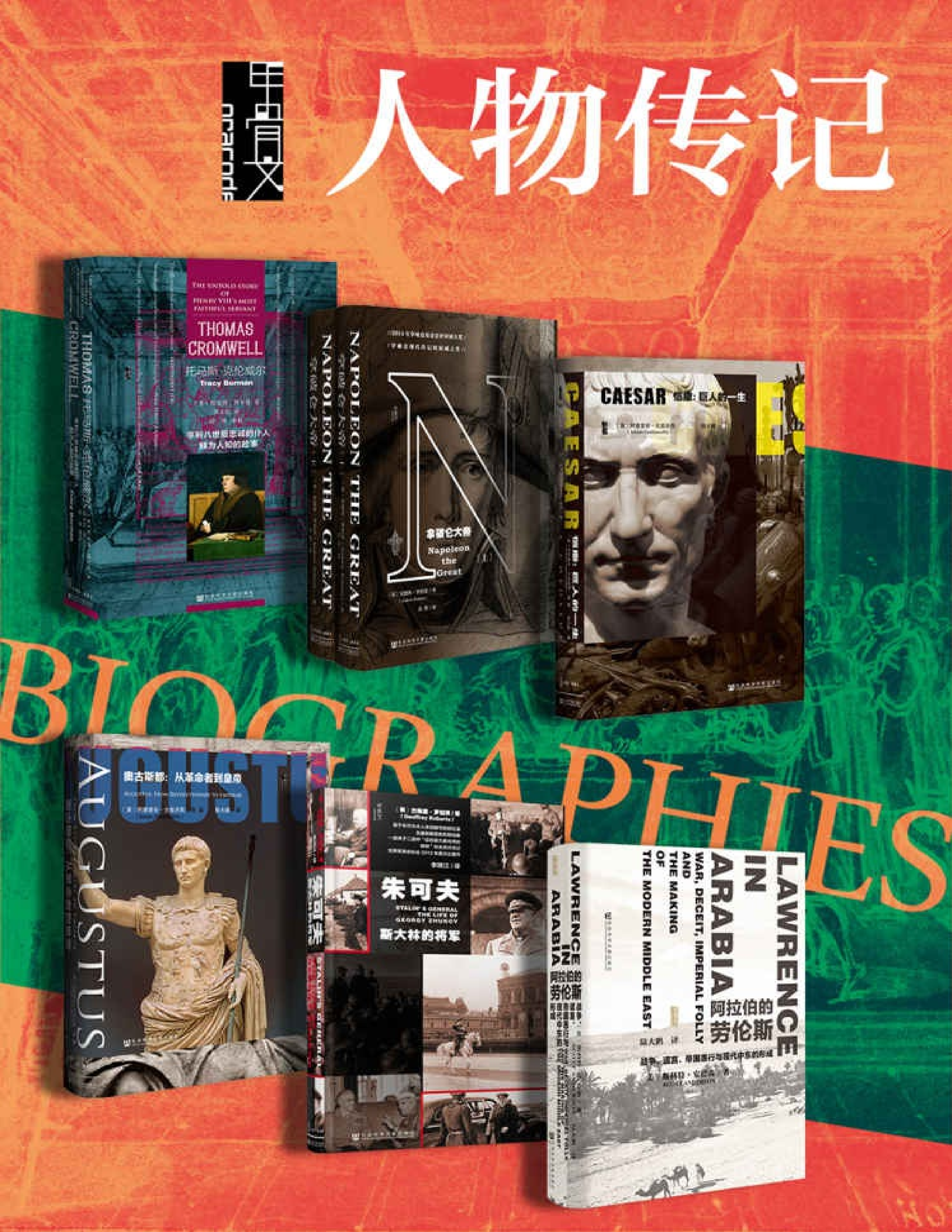

人物传记
BIOGRAPHIES
THE UNTOLD STORY OF HENRY VIII'S MOST FAITHFUL SERVANT
THOMAS CROMWELL
托马斯·克伦威尔
Tracy Borman
NAPOLEON THE GREAT
拿破仑大帝
Napoleon the Great
CAESAR 恺撒：巨人的一生
AUGUSTUS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朱可夫
STALIN'S GENERAL THE LIFE OF GEORGY ZHUKOV
斯大林的将军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阿拉伯的劳伦斯
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 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鲜为人知的故事
- 拿破仑大帝（上、下册）
- 恺撒：巨人的一生
-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 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
-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THE UNTOLD STORY
OF
HENRY VIII'S MOST
FAITHFUL SERVANT

THOMAS CROMWELL

托马斯·克伦威尔

Tracy Borman

[英]特蕾西·博尔曼 著

郭玉红 译

徐一彤 审校

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
鲜为人知的故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特蕾西·博尔曼（Tracy Borman）

| 赫尔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英国历史皇家宫殿联席馆长、遗产教育信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著有《玛蒂尔达：征服者的妻子，英格兰的首位王后》（*Matilda, Wife of the Conqueror, First Queen of England*）、《女巫：一个关于巫术、丑闻和诱惑的传说》（*Witches: A Tale of Sorcery, Scandal and Seduction*）等书，还有备受称赞的《伊丽莎白身边的女人们：朋友、对手和塑造了童贞女王的敌人》（*Elizabeth's Women: Friends, Rivals, and Foes Who Shaped the Virgin Queen*）。

郭玉红

|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硕士，英文译者，曾为《国际儒学研究通讯》《或问》《国际汉学》等刊物翻译多篇学术论文。

徐一彤

| 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与哲学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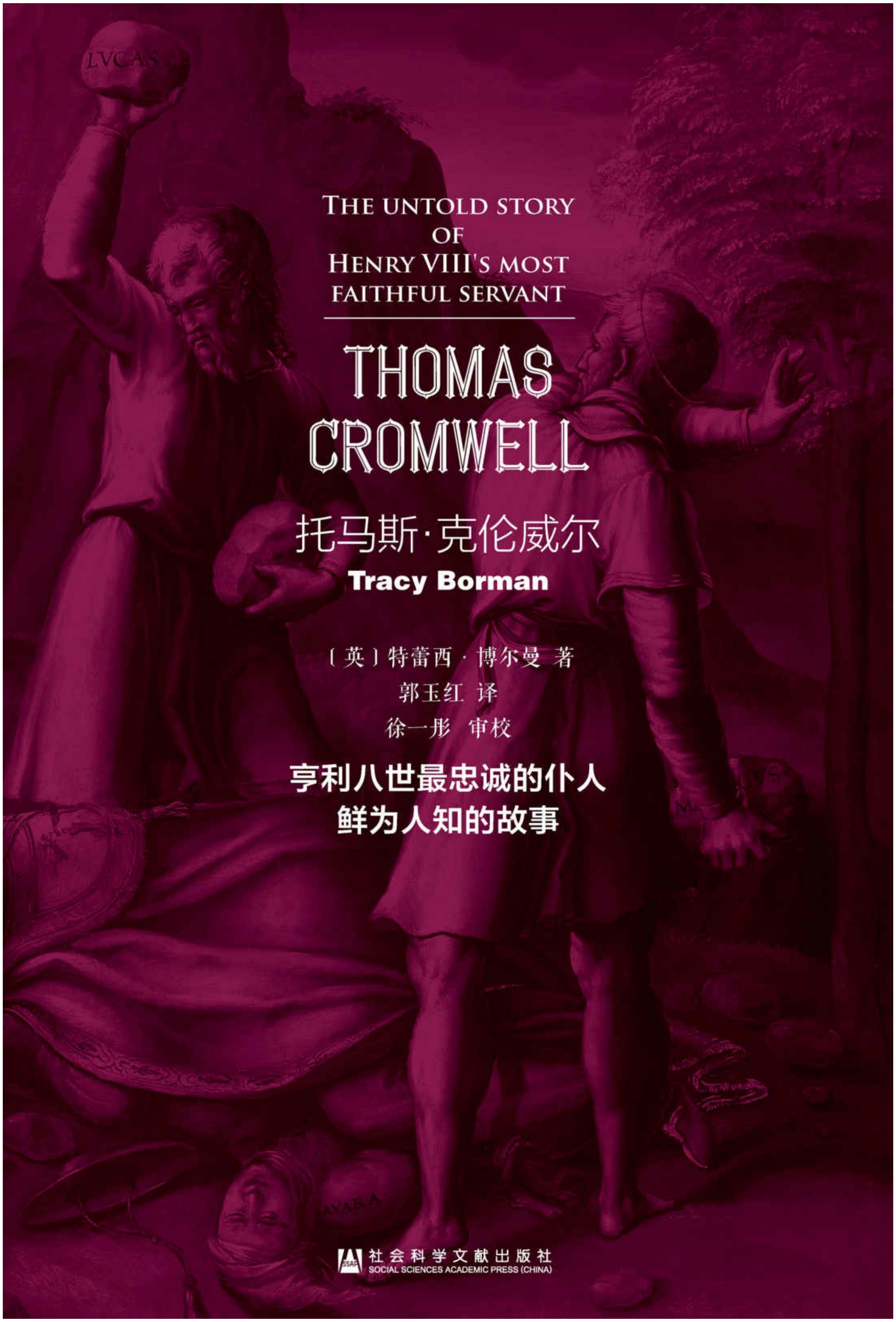
Thomas Cromwell：The untold story of Henry VIII’s most faithful servant

Copyright © Tracy Borman 201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dder & Stoughton.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UNTOLD STORY
OF
HENRY VIII'S MOST
FAITHFUL SERVANT

THOMAS CROMWELL

托马斯·克伦威尔

Tracy Borman

〔英〕特蕾西·博尔曼 著
郭玉红 译
徐一彤 审校

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
鲜为人知的故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汉斯·荷尔拜因笔下的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这幅肖像可能是为了纪念克伦威尔**1532**年被任命为珠宝大臣而请人绘制的。肖像顶上题写着**“**致克伦威尔大人，珠宝馆值得信赖的、备受爱戴的大臣**”**。

©Frick Collection New York，Henry Clay Frick 遗赠（收藏编码1915.1.76），图片由Alamy提供



圣博托尔夫教堂，波士顿，当地人称**“**波士顿树桩**”**。克伦威尔**1517**年到访罗马，为了向教宗寻求在教堂出售赎罪券的许可。出售赎罪券是一桩获利颇丰的生意。

©Alamy



教宗出售赎罪券，**1521**年。摘自菲利普·梅兰克森（**Philipp Melancthon**）的《狂热的基督徒与反基督徒》。菲利普是一位重要的改革主义者和出售赎罪券的批判者。

©个人收藏，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佛罗伦萨的风光，**1493**年。这是克伦威尔所熟知的城市，四周环绕着城墙，城中央是大教堂，大教堂圆顶是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完成的。这幅插图选自《纽伦堡编年史》，该书首次出版于**1493**年，是克伦威尔的朋友斯蒂芬·沃恩买给他的。

©个人收藏，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1470/1471—1530**）。这幅肖像是为了纪念**1525**年枢机主教学院（后更名为圣基督教会学院）在牛津大学建立而制作的。

©Magdalen College Oxford，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议会上的亨利八世（**1491—1547**）。这次议会于**1523**年**4**月到**8**月召开，是克伦威尔参加的首次议会。因为那时他是无名小卒，所以不大可能出现在这幅插图中，这幅插图选自《赖奥思利嘉德书卷》。可以看到他的侍主托马斯·沃尔西位于国王的右边，头上戴着枢机主教的帽子。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Royal Collection Trust代管，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朱斯·范·克利夫（**Joos Van Cleve**）在**1530**～**1535**年绘制的亨利八世肖像。肖像绘制的时候，克伦威尔正在服侍国王的官路上迅速攀升。亨利这时不超过**45**岁，体重开始增加，但仍保留了一些年轻时的魅力。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Royal Collection Trust代管，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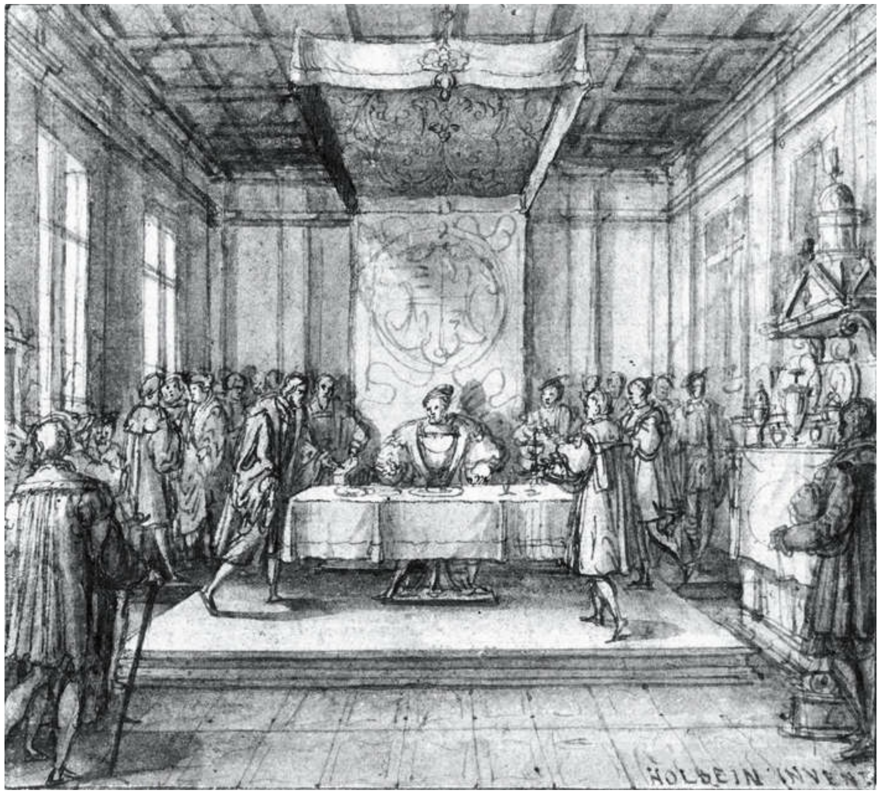
1525年卢卡斯·欧汉布（**Lucas Horenbout**）绘制的阿拉贡的凯瑟琳（**1485—1536**）。这幅肖像象征了凯瑟琳的虔诚。她给她的猴子一枚硬币，但是猴子选择了十字架。

感谢Buccleuch & Queensberry KBE公爵准予复制



安妮·博林（**1500—1536**）。当代少有安妮的肖像，这幅肖像是从一个更早的版本中衍生而来的。她戴着一个因她而在宫廷流行的法国头饰，还戴着那个有名的字母**“B”**吊坠。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亨利八世在他的接见厅用餐。国王坐在一个华盖下面，身边环绕着宫廷的人。左侧手持木板的是他的高级廷臣们。

©个人收藏，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汉普顿宫。起初是由枢机主教沃尔西所建，亨利八世在前者失势的时候得到了它。国王立即开始扩充已有的庞大宫殿，增建了有名的“大厅”。

©Colin Palmer Photography



选自约翰·福克斯《伟绩与丰碑》中关于改革的寓言。这幅插图象征了亨利对教宗克雷芒的胜利，后者俯伏在亨利的脚前。克伦威尔和克兰默在亨利的右

面，正在接过《圣经》。

©个人收藏，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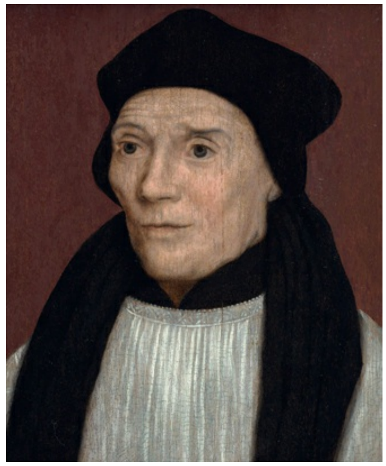
四位《圣经·新约》福音书的作者正在用石头砸教宗，这是吉罗拉莫·达·特雷维索（**Girolamo da Treviso**）于**1538**～**1540**年创作的。这是亨利八世所拥有的几幅反对教宗的画作之一，意在巩固他自己对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利。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Royal Collection Trust代管，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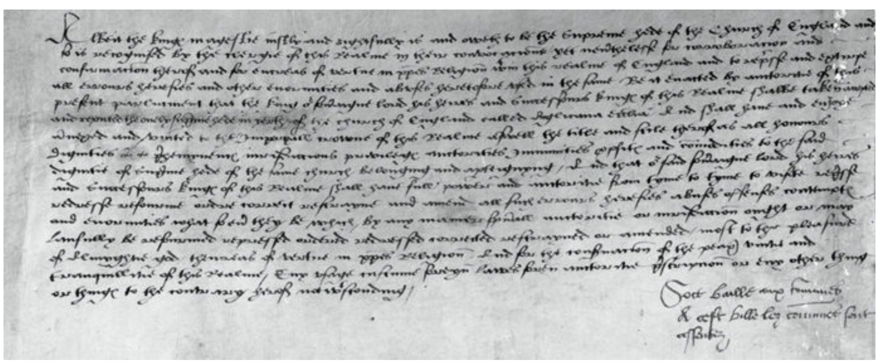
汉斯·荷尔拜因**1527**年绘制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莫尔戴的项链象征了他对国王的服侍，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位。在这幅肖像绘制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大法官。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汉斯·荷尔拜因绘制的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费舍。费舍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是最憎恶克伦威尔的对手之一。

©个人收藏，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至尊法案》，**1534**年。该法案承认亨利八世而非教宗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为他跟阿拉贡凯瑟琳的离婚铺平了道路。

©Houses of Parliament Westminster London，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Valor Ecclesiasticus，**1535**年，意为**“**教会的估值**”**，是克伦威尔成为代理总教监之后安排的一项调查。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E344/22 f2）



托马斯·克伦威尔（日期不详）。尽管这幅画基于荷尔拜因的原作，但是它以一个不那么好看的角度刻画了克伦威尔。可能是在克伦威尔死后被委托绘制的。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格雷斯修道院，北约克郡。格雷斯建于**14**世纪晚期，是英格兰仅有的十大加尔都西会修道院之一。**1539**年被拆毁。

©Skyscan Photo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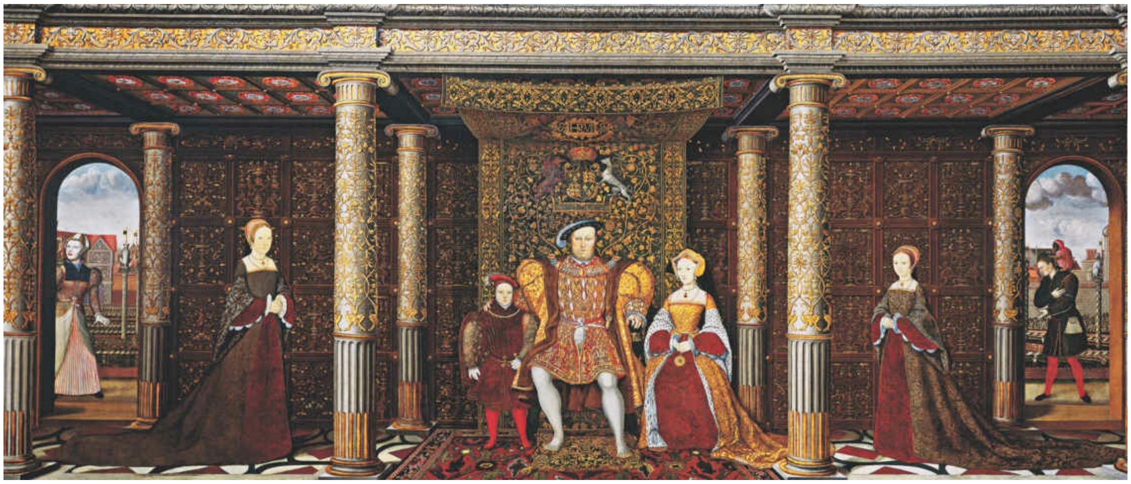
汉斯·荷尔拜因**1538**年绘制的爱德华六世（**1537—1553**）小时候的肖像。爱德华于**1537**年**10**月出生，迎来了普天同庆。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迎娶了这个男孩的姨母伊丽莎白·西摩尔。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C，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汉斯·荷尔拜因**1536**年绘制的简·西摩尔。这幅肖像是为了纪念亨利八世与他的第三任妻子的婚姻而绘制的，他们的婚礼在其第二任妻子被处决几天后举行。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亨利八世的家庭，**1545**年。这幅肖像可能是为了纪念国王恢复两个女儿玛丽和伊丽莎白（分别位于左边和右边）的继承权而安排绘制的。亨利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坐在他的右边，而简·西摩尔（八年前去世）在他的左边。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Royal Collection Trust代管，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格拉赫·弗利克（**Gerlach Flicke**）**1545**年绘制的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作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推进宗教改革上，克兰默是克伦威尔的重要盟友。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大圣经》的扉页，**1539**年。它首印于**1539**年，再版了六次，到**1541**年共有**9000**本《大圣经》被分发到整个王国。这本可能属于亨利八世，有图画显示他将这本《大圣经》递给分别位于自己左右两边的克伦威尔和克兰默。

©British Library Board （C.18.d.10）



汉斯·荷尔拜因于**1535**～**1537**年绘制的托马斯·怀亚特（**1503—1542**）。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外交官，据说怀亚特**“**忠于**”**克伦威尔，在整个宫廷生涯中一直是他忠实的朋友和门徒。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由Royal Collection Trust代管，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一个男人的画像（可能是拉尔夫·萨德勒，**1507—1587**），是汉斯·荷尔拜因**1535**年的创作风格。萨德勒担任克伦威尔的秘书几近二十年。他的忠诚得到了丰厚的汇报，**1535**年他为自己建了一栋新的宅邸，即位于哈克尼的萨顿大宅。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图片由The Jules Bache Collection 1949提供（收藏编号40.7.28）



萨顿大宅内部景观。

©National Trust Images，图片由Dennis Gilbert提供



查理五世（**1500—1558**）。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的统治者，查理统治了大片地域。他还是阿拉贡凯瑟琳的外甥，这让他跟亨利八世的关系日益紧张。

©Pinacoteca Nazionale Siena，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是亨利个人及政治上最大的敌人。由于他们的王国比邻，他们对军事胜利的渴望成为两国经常产生摩擦的由头之一。

©Louvre Paris，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教宗保罗三世在**1540**年隆重进入巴黎。当他的两个欧洲大敌于**1539**年在教宗的支持下结盟的时候，亨利八世深受困扰。

©Villa Farnese Italy，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汉斯·荷尔拜因**1539**年绘制的克里维斯的安妮（**1515—1557**）。亨利坚持要在答应迎娶她之前见到有望成为他第四任妻子的人的肖像。荷尔拜因可能在这幅肖像中美化了她，因为国王在见到她本人后非常失望。

©Louvre Paris，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科内利斯·马赛斯（**Cornelis Massys**）绘制的亨利八世，**1548**年。这幅画描绘了国王在生命接近尾声时的样子，他非常胖，他的表情揭示了他日益严重的偏执和坏脾气。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一位女士的肖像，被认为是汉斯·荷尔拜因笔下的凯瑟琳·霍华德（**1520—1542**）。亨利八世迷恋比他小了近**30**岁的第五任妻子。近来有一种说法称这幅画描绘的可能是克伦威尔的儿媳——伊丽莎白·西摩尔。

©个人收藏，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第一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1484—1545**），**1540**～**1545**年绘制。布兰登是亨利八世最亲密的朋友，在亨利整个在位时期一直忠诚地服侍他。他是一个

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嘲笑像克伦威尔这样出身低微的顾问大臣。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第三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1473—1554**），汉斯·荷尔拜因绘制。作为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的掌管者，诺福克鄙视克伦威尔的卑微出身和改革主义的观点。他也成为首席大臣致命的敌人。

©Duke of Norfolk，Arundel Castle，图片由Bridgeman Art Library提供



温彻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1495—1555**）。尽管加德纳跟克伦威尔一样都曾在枢机主教沃尔西的府邸做门徒，但是这两人在沃尔西倒台后成了誓不两立的敌人。

©National Trust Images，图片由J. Whitaker提供



托马斯·克伦威尔，**1537**年。国王于**1537**年**8**月选中并授予克伦威尔嘉德勋位，这是英格兰最高级别、最古老的骑士勋位。画中克伦威尔戴着嘉德勋章，这幅肖像可能是为了纪念他的新地位而安排绘制的。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嘉德登记册，记录了**1534**年的嘉德仪式。在左上方，亨利八世坐在王位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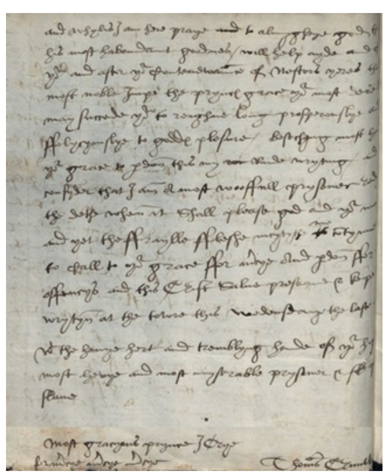
边围绕着嘉德骑士。在接受勋位时，据说克伦威尔**“**竭尽雄辩所能**”**发表了一席感言。

©The Dean and Canons of Windsor



1597年的伦敦塔。代理官员的居所，即克伦威尔可能被关押的地方，位于左下方。圣彼得被囚礼拜堂，即克伦威尔遗骸被埋葬的地方，位于左上方。

©Hatfeld House Archives （The Cecil Papers CP1/24），感谢索尔兹伯里侯爵的好意



克伦威尔**1540**年**6**月**30**日写给亨利八世的最后一封信。这封在伦敦塔写的信给亨利提供了摆脱克里维斯的安妮所需的证据。克伦威尔为自己附上了一条孤注一掷的附言：**“**至善至仁的君王，我乞求您饶命、饶命、饶命。**”**

©王室所有，图片由Historic Royal Palaces提供



伦敦桥，**1616**年。叛徒的头颅被挂在入口处（位于图片右下角），克伦威尔在**1540**年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可以看到伦敦塔在河的对岸。

©The Art Gallery Collection，图片由Darryl Gill提供

本书获誉

“特蕾西·博尔曼用四百多页文字简洁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成为国王最高顾问大臣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著作。”

——《泰晤士报》

“这是一本极具可读性的叙述性著作，将会增加关于这位最难以捉摸的人物的争论。”

——《金融时报》

“她的散文，一如既往地……典雅，优美流畅。”

——《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有见地的、令人感同身受的、调研翔实的传记。”

——《华尔街日报》

“博尔曼巧妙地讲述了克伦威尔崛起的故事……如果你想对克伦威尔有深入的了解……这本书不容错过。”

——《旗帜周刊》

“特蕾西·博尔曼博士创作了一部与众不同且引人入胜的传记，讲述了都铎时期最复杂、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的故事。专业的见解基于丰富的调研，再加上令人着迷的细节，她对克伦威尔的刻画栩栩如生、前所未有，还对他的性格和事业进行了公正合理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她的书读起来饶有趣味——是我们中间最有才华的一位历史学家的非凡杰作。”

——艾莉森·威尔（英国著名历史传记作家，《伊丽莎白女王》的作者）

“太好了……这部经过深入调研之后撰写的扣人心弦的传记将克伦威尔刻画得栩栩如生，探讨了他复杂的性格特点，揭露了亨利宫廷的

残酷和光彩夺目。”

——《独立报》（英国）

“特蕾西·博尔曼令人信服且动人地讲述了这位不简单的平民迅速崛起的故事——他在亨利宫廷身兼多个要职且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讲述了他迅速跌落、失宠、被处决的故事。”

——《美国杂志》（*America* ）

“钟爱希拉里·曼特尔的畅销作《狼厅》（一本以克伦威尔为主角的历史小说）的读者一定会喜欢这本书。”

——《今日美国》

“英国历史学家特蕾西·博尔曼发掘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证据，让人能够更多地了解英国历史上最冷酷的一位权谋政治家。”

——《卫报》（英国）

“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一个关于英格兰改革的主要人物之一从白手起家到走向断头台的有趣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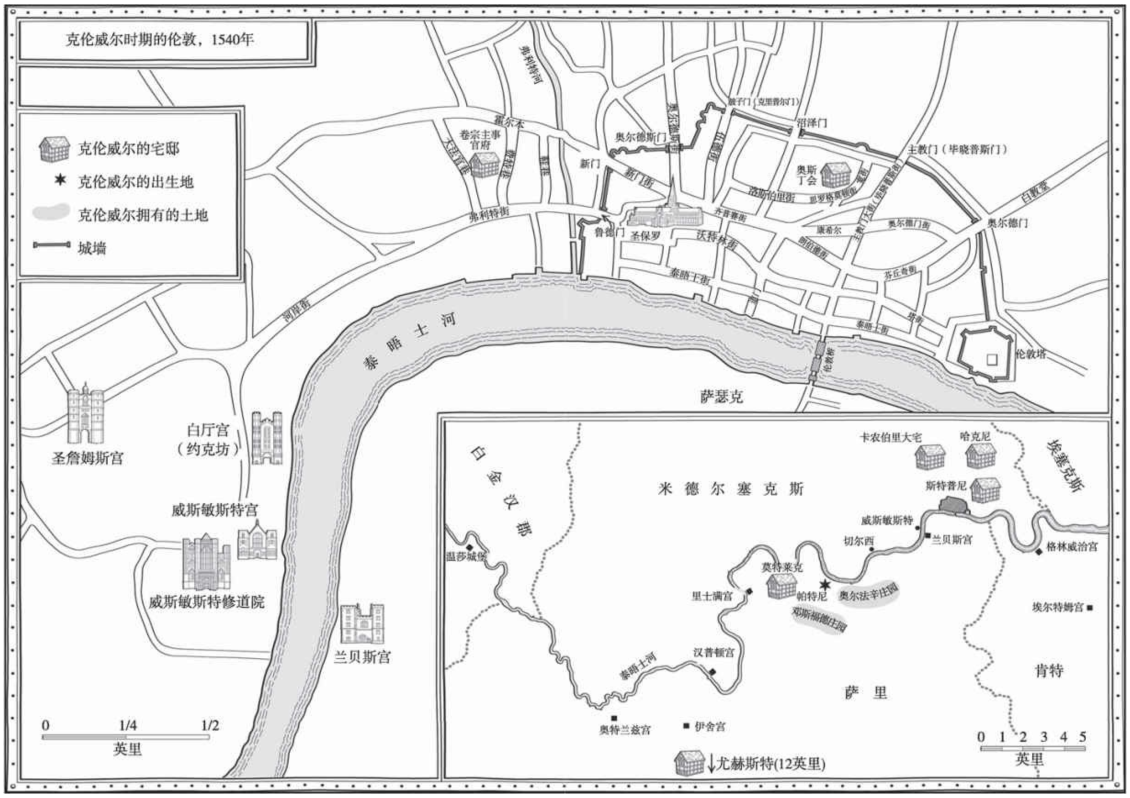
——《柯克斯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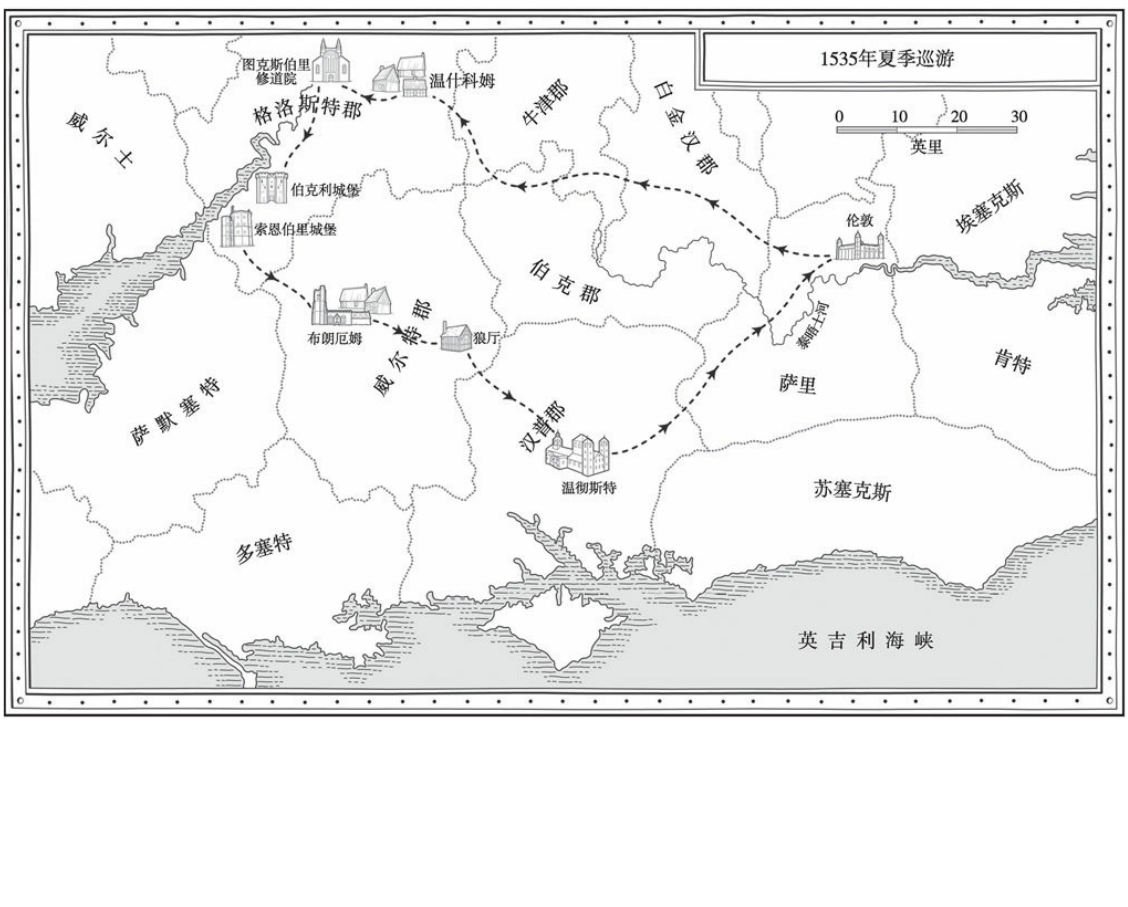
“一部关于一位饱受非议的历史人物的颇有见地的传记。”

——《书目杂志》

“博尔曼将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与快节奏且易理解的风格糅合在一起。她没有忘记自己的笔下是人物，而人物有其不可靠之处，有其微妙的动机……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克伦威尔跟他所服侍的那个人一样令人着迷。怪不得我们都想要了解更多。”

——《独立报》（英国）


克伦威尔时期的伦敦，1540年
克伦威尔的宅邸
克伦威尔的出生地
克伦威尔拥有的土地
城墙
泰晤士河
萨瑟克
伦敦塔
圣保罗
新门
鲁德门
奥尔德斯门
沼泽门
主教门（毕晓普斯门）
奥尔德门
奥斯丁会
弗利特街
泰晤士街
河岸街
圣詹姆斯宫
白厅宫
（约克坊）
威斯敏斯特宫
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兰贝斯宫
0
1/4
1/2
英里
米德尔塞克斯
白金汉郡
埃塞克斯
卡农伯里大宅
哈克尼
斯特普尼
威斯敏斯特
切尔西
兰贝斯宫
格林威治宫
温莎城堡
里士满宫
莫特莱克
帕特尼
奥尔法辛庄园
汉普顿宫
泰晤士河
萨里
肯特
埃尔特姆宫
奥特兰兹宫
伊舍宫
尤赫斯特(12英里)
0 1 2 3 4 5
英里


1535年夏季巡游
0
10
20
30
英里
威尔士
格洛斯特郡
图克斯伯里
修道院
温什科姆
牛津郡
白金汉郡
伯克利城堡
索恩伯里城堡
伦敦
埃塞克斯
伯克郡
布朗厄姆
狼厅
威尔特郡
泰晤士河
萨里
肯特
萨默塞特
汉普郡
温彻斯特
苏塞克斯
多塞特
英吉利海峡

- 前言
- 第一章 “一位伟大的旅行者”
- 第二章 枢机主教
- 第三章 “并非没有懊悔”
- 第四章 “孤注一掷”
- 第五章 “人事的弱点”
- 第六章 国王的“大事”
- 第七章 “某些人的突然崛起”
- 第八章 “严词和骇人的威胁”
- 第九章 “良善的秘书大人”
- 第十章 解散
- 第十一章 “一位更仁慈的情妇”
- 第十二章 “塔里的女人”
- 第十三章 叛乱
- 第十四章 “一些适当的处罚”
- 第十五章 “那些操纵国王的奸人”
- 第十六章 佛兰德斯的梦魇
- 第十七章 “克伦威尔摇摇欲坠”
- 第十八章 “饶命 饶命 饶命”
- 第十九章 “很多人哀叹，更多人狂喜”
- 尾声 “一个出身低微但品格高尚的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注释
- 索引

前言

悬挂在纽约弗里克收藏馆的一幅肖像画近年来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幅画像是都铎王朝时期颇负盛名的画家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作品。无论是后来史学家还是同时代的人都对画中的人物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家，指责他毁坏了英格兰很多修道院，协助废黜了一位王后并促使另一位王后被处决，指责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但是近来人们评价的视角有所转变，开始把他看作一个博学、尽责、忠心耿耿的皇室仆人，一个因为聪明、睿智、热情好客而广受朋友喜爱并令对手敬佩的人。他就是托马斯·克伦威尔。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于2009年、2012年先后出版的小说《狼厅》（*Wolf Hall* ）及其续集《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 ）风靡全球。这两部小说给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带来了火热的档期，为作者先后两次赢得布克奖，并被改编成一部大型电视剧的剧本。曼特尔的成就在于把托马斯·克伦威尔这个历史上看似最不可能被当作英雄的人物塑造成了一个富于同情心且极具感染力的角色。她的两部小说透过克伦威尔臭名昭著的公众形象，为我们揭示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关于克伦威尔，还有哪些是我们真正可以了解的呢？很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克伦威尔的众多书信只能用来推断他的公众生活，其中关于他个人生活、性格、信仰和人生观的信息充其量也只能说是零散的。在为写作克伦威尔传记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是不准确的。我翻阅了克伦威尔被捕时被查封的很多书信、单据和账目，将其中的很多细节拼凑起来之后，这位亨利八世首席大臣极为有趣的私密一面才渐渐浮出水面。

荷尔拜因的这幅画作没有捕捉到画中人物的所有上述特征。1532年为克伦威尔绘制肖像的时候，这位艺术家已经以他既能绘出画中人物的状态又能体现其性格特征的技巧闻名于世。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是亨利八世的等身肖像。但是他为克伦威尔绘制的肖像画与众不同。这幅画是都铎王朝时期最具表现力的肖像画之一，不带一丝谄媚、不留任何情面地、真实地再现了画中人。画中的克伦威尔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陷入沉思、性格乖戾的官僚。他身宽体胖，身高看似中等，但是因为坐着所以很难确定。视线稍稍右移就可以看到：他小而呈灰色的眼睛盯着不远的前方，像是在窥探着什么；他的眉毛微微上挑，似在询问，隐约有点愤世嫉俗的姿态；他那稍大的、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硕大的蒜头鼻和双下巴都在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年龄和肥胖。

画中克伦威尔的帽子和外衣都是暗黑色的，镶着棕色的毛边，虽然质量上乘，却不像是上层社会廷臣的穿着，这或许是因为克伦威尔不喜张扬，又或许是他的一个务实的选择。亨利八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来管理宫廷的着装，使其与每个人的地位紧密相关。只有王室可以穿着紫色；公爵和侯爵可以用金丝线装饰外衣的袖子；伯爵可以穿着黑色貂皮；男爵可以穿着用尼德兰布料制成的、用猩红或者蓝色天鹅绒装饰的衣物；骑士可以穿着锦缎面料的上衣，配以金色薄绢装饰的衣领。尽管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在宫廷位高权重，但是他出身卑微，没有任何头衔，因此没有权利穿戴色彩艳丽的衣饰或者使用相应的面料。在绘制肖像的时候，他其实不用像平时那样穿戴朴素，不过由他严谨务实的性格可以推断他是主动选择如此着装的。

荷尔拜因的肖像画极为逼真地展示了克伦威尔的聪明睿智和杰出的实干能力，就好像是画家偶然走进书房，刚巧撞见正在思考某件严肃的事情、表情坚决的克伦威尔。他坐在椅背嵌入墙面的长椅上，背后是装饰精致的墙面，身前的书桌上有一本装订精美的书，书的一侧是一些书信和一支羽毛笔。他的左手上戴着硕大的戒指，手里握着一封信，看来

这位大臣刚刚收到一个急件，需要仔细思量如何妥善回复书信的内容。他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学者，而是一个实干家，一个精明果断的、凡事力求成功的务实主义者。

如果说荷尔拜因刻画的是一个虽然并不宽宏大量但是令人信服的、极为活跃并且颇具野心的廷臣，那么他并没能描绘出克伦威尔那些较为令人喜爱的性格特征。透过他的个人信件以及别人对他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机智和善辩，他的不羁和温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的统治疆域包括德国、尼德兰、西班牙以及意大利部分领土——派驻英格兰的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Eustace Chapuys）说，一旦克伦威尔参与自己感兴趣的讨论，他那不协调的姿态、沉闷的气场会瞬间改变。他容光焕发，神色不停变换，从睿智、愉悦到狡黠、若有所思。这种情境下的克伦威尔极具魅力，他会用他的机敏、温暖和幽默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带来快乐。当他口出尖刻、不羁的言语时，他会戏谑地瞥一眼那些跟他交谈的人。他能像变色龙一样适应听众和情境的变化，时而用恰当的言辞恭维同伴，时而又用尖锐的言语奚落他们。16世纪历史学家约翰·福克斯（John Foxe）称他“有着英格兰人少有的机敏”[1]。甚至克伦威尔的对手们也承认他的社交能力、个人魅力和热情好客无人能及。夏普伊还说，饱经历练的廷臣们面对克伦威尔令人愉悦的举止时会不由得放下戒备，说出令自己后来懊悔的话。

无视克伦威尔的个人特质并不是荷尔拜因的疏忽，克伦威尔想要后代铭记的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形象而不是他私下的一面，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一定是克伦威尔指示荷尔拜因在肖像画中展示他公众人物的形象。在荷尔拜因开始筹备克伦威尔肖像画绘制的时候，克伦威尔务实、高效的性格特征就已经在多个场合显现。克伦威尔曾不屑地描述1523年他第一次参加议会，“熬过”冗长、漫无边际的辩论，结果又“回到了起点”。这是早期能够体现他务实高效的性格特征的一个事例。[2]另一个事例是他跟枢机主教波尔（Cardinal Pole）在沃尔西家中围绕如

何最好地服侍君主这一主题进行的谈话，谈话内容被记录了下来。当时，波尔主教正在大谈特谈如何最有效地增加君主的尊荣，突然被克伦威尔粗鲁地打断了，克伦威尔告诉波尔抛开他一直以来阅读的理论巨著，参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The Prince* ）这本实用主义的新著作。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历史上关于政治实用主义的最有名的著作，书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经常被（错误地）引用。克伦威尔解释说，政治家唯一最实用的本领是透过君主制造的假象看清他真实的愿望，在不违背道德和宗教的基础上找到最好的方法以满足君主的愿望。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克伦威尔恰恰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颠覆”了英格兰的道德和宗教生活。

因为务实，克伦威尔在处理政事和生意时能够不带任何情绪，似乎只有在私下交际的时候他才会显露自己的情绪。透过他的举止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慎重、变通与偶尔的冷酷。出于政治需要，他可以毫不退缩地处死男人（和女人），也可以毫不迟疑地预设审判结果。他曾起草了一份文件，指示下属“审讯、处决雷丁修道院院长”。[3] 克伦威尔跟他的对手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完全不同，后者曾经大动肝火，威胁要教训国王的长女玛丽公主。克伦威尔从不动怒也不冲动，他总是细细盘算、筹谋、等待最好的时机。19世纪负责整理克伦威尔书信的编者罗杰·梅里曼（Roger Merriman）说：“他始终定睛在目标上，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在他眼里无足轻重。”[4] 关于他流露感情的文字记载很少。他在得知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沃尔西主教失势之后流下了眼泪，这可能既是为了受困的沃尔西也是为了他自己。

私下的克伦威尔完全不同，通过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令人敬爱的丈夫，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忠诚的朋友，一个不知疲倦地帮助穷人、寡妇和其他身处困境请求救助之人。他还是一个极为忠诚的仆人，无论是在意大利服侍他的第一位主人弗朗切斯科·弗雷斯科巴尔迪（Francesco Frescobaldi）的时候，还是在服侍沃尔西——这位开启他

政治生涯的主教的时候，又或是——最重要的——在服侍亨利八世的时候。

但是，分别看待克伦威尔的个人交际和公众交际意味着用现代的眼光来观察都铎王朝，既不真实又没有启发性。亨利在枢密院处理的政务跟在寝宫同样多。原本为人所不齿的马桶侍从的职位在宫廷中却是人人渴求的，因为这个职位有接近国王的特权。他对国王的服务是全天候的，这种公私混淆的状况也在克伦威尔的家庭生活中显而易见。在他位于奥斯丁会（Austin Friars）的私宅里，除了家人和用人之外，克伦威尔还有很多秘书、文员、信使。他在私宅定期主持枢密院会议，或是一边看着家养的老鹰在后花园上方盘旋，一边与帝国大使商讨外交事宜。仅存的一封克伦威尔写给妻子的书信里面关于公事跟私事的篇幅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位亨利八世首席大臣的个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相互交错，这是了解他本人性格特征的关键而不是障碍。

---

[1]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5.

[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13-314.

[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no.399.

[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87.

第一章 “一位伟大的旅行者”

这位后来成为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的出身是如此卑微，以致没有人能够确定他出生的时间或地点。在对16世纪殉道者的记述中，约翰·福克斯把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血统和出身都很卑微的男人”[1]。他的出生年份最有可能是1485年，这一点如果属实，倒也恰如其分，因为都铎家族正是在这一年掌权的。亨利·都铎（Henry Tudor）在博斯沃思战场上战胜理查三世（Richard III）之日素来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场胜利结束了玫瑰战争，即金雀花王朝两个敌对王室分支（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使英格兰分裂超过30年之久的战争。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威尔士人、这位王位继承权存疑的兰开斯特派会建立一个统治英格兰并影响欧洲政治、宗教和社会超过一个世纪的王朝。

虽然值得注意，但是1485年8月在遥远的莱斯特郡领地一个新的王朝的开端在生活在帕特尼的人看来一定非常遥远，那里正是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家人居住、谋生的地方。克伦威尔如果不是在这个位于伦敦以西的小村庄，就是在温布尔顿附近出生的。约翰·福克斯记载克伦威尔出生于“帕特尼或者其周边一个身份低微的、名不见经传的家庭”。[2]传说克伦威尔的出生地位于帕特尼荒野（Putney Heath）边缘的帕特尼山上，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强盗聚集地。[3]

克伦威尔家族的祖籍并非位于伦敦西南，而是诺丁汉郡的诺威尔。当时克伦威尔家族既有财富又有地位，约翰·克伦威尔（John Cromwell，克伦威尔的祖父）大名鼎鼎且备受尊重。1461年，他与族人

以及姐夫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一起迁至温布尔顿，在那里，坎特伯雷大主教租给他一个漂洗作坊和一栋房舍。[4] 他的长子约翰搬到兰贝斯成了一个富裕的酿酒商，后来成为大主教的厨师。[5] 而他的次子沃尔特留在温布尔顿，或许做了他姑父的学徒，因为他将史密斯的姓放进了自己的名字里。

沃尔特·克伦威尔（Walter Cromwell）和其妻子凯瑟琳·梅弗莱尔（Katherine Meverell）唯一的儿子便是托马斯·克伦威尔，有记载显示他是三个孩子中最为年幼的。托马斯有可能是意料之外的孩子，因为他比姐姐们小了许多。在唯一一份提及他母亲的记载中，托马斯不是很确定地说母亲生下他时是52岁。[6] 同时代的文字记载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凯瑟琳的唯一信息是她是来自德比郡威克斯沃斯的尼古拉斯·格洛索普（Nicholas Glossop）的阿姨，她在1474年左右出嫁时住在帕特尼一位名叫约翰·韦尔贝克（John Welbeck）的律师家里。尼古拉斯比他的表弟大30多岁，这更加证实了托马斯是凯瑟琳所有孩子当中最年幼的。

沃尔特·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从事多个不同但据推测有互补关系的职业，比如铁匠、酿酒商、漂洗工（布料加工工人）。根据当时的资料，沃尔特曾在博斯沃思战役中作为亨利·都铎军队的一名蹄铁匠参军。以他的出身几乎不可能参与最激烈的战斗，但有意思的是他选择了，或者说被选去为进攻一方的都铎军而不是为占优势的国王理查三世军效力。从沃尔特儿子的职业发展来看，推测克伦威尔家族在踏上英格兰土地之后便开始为都铎家族效力是非常合理的。

克伦威尔家族在帕特尼经营一个漂洗作坊长达50年。沃尔特还拥有一间名为“锚”的旅店、一座啤酒厂和两威尔格（60英亩）土地。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密封敕令中，沃尔特被记为一位“啤酒酿造商”。[7] 作为一位当地商人，他的成功受到认可，经常被叫去做陪审员，1495年被任命为帕特尼的治安官。他很快获得了新的土地，截至1500年，他拥有八

威尔格土地（土地面积大到需要两头公牛耕种）。克伦威尔家族宅邸和酿酒厂位于一条名副其实的酿酒巷（Brewhouse Lane）的两端。这条酿酒巷至今仍然连接着帕特尼桥路和泰晤士河。河边是在泰晤士河作业的渔船的停靠码头，这里也是从伦敦返回西萨里以及其他郡城镇与乡村的行人们的驻足地。如果是在现代的帕特尼，河边的一栋房舍售价不菲，但是这个区域在16世纪并没有那么宜居。酿酒巷的另一端紧邻渔场，所以克伦威尔家族的宅邸应该经常受渔场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困扰。

关于宅邸的样子并无文字记载，但是考虑到沃尔特在当地社区的地位以及各种商业所得，他的宅邸应该比帕特尼其他大多数居民的更舒适一些。当时大多数房舍是由木料、枝条和粗灰泥而不是砖块建成的。木质框架表层通常会涂有黑色的沥青以防止腐烂，框架之间是刷白的墙壁。因为房屋主要是用木材建造的，所以易燃，假使沃尔特·克伦威尔的铁匠铺紧邻宅邸的话，他们家的宅邸着火的风险会比其他大多数宅邸更高。普通的房舍通常只有一间房屋，作为厨房、盥洗室、卧室和起居室使用。稍微大一点的房舍，比如克伦威尔家族可能拥有的房舍，也许会有一到两处隔墙来隔开这些功能空间，同时像大多数房舍一样，配有一个室外的厕所。在都铎时期，壁炉及烟囱在较为富裕的家庭得到了广泛普及，取代了常见于中世纪和当时较为贫穷的居民房屋中央的开放式火炉。即使如此，这两种房舍一般阴冷、透风，很多居民冬天会把牲畜牵入室内帮助取暖。诸如长椅、木凳、桌子、木箱之类的家具稀少而简陋。人们在用稻草填充的、满是各种寄生虫的床垫上睡觉。地毯是富裕人家才有的奢侈品，普通人家会在屋内地面撒上灯芯草、芦苇和好闻的草药。这些草药用来遮盖各种难闻的气味，其中有用动物肥脂制成的脂蜡或者灯芯草蜡的气味，也有不常盥洗的居民身上的味道。

安德烈亚斯·弗朗西斯库斯（Andreas Franciscius），一位意大利的旅行者，于1497年11月描述了托马斯·克伦威尔青少年时期所熟悉的伦敦。“它的位置如此舒适宜人，很难找到比伦敦更便利、更有魅力的地

方，”他写道，“它屹立于英格兰岛最大的河流——泰晤士河的岸边，而泰晤士河将伦敦一分为二。”弗朗西斯库斯估计当时的伦敦城区方圆不超过3英里，但是他补充道：“伦敦城的郊区是如此广阔，它们极大地增加了伦敦的地域。”他继续描述了伦敦一些较著名的地标：

> 伦敦筑有雄伟的城墙，其中尤以伦敦城北部最近重修的部分最为美观。矗立在其中的是位于泰晤士河岸边防卫森严的城堡——伦敦塔，英格兰国王和王后偶尔会在那里居住。还有其他一些宏伟的建筑，尤其是一座横跨在泰晤士河上的大桥，它外观宏伟、交通便捷，由很多大理石桥拱构成，桥上有很多石砌的商店和住宅，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教堂。我没有见过比它更好、更壮观的大桥。

因为没有现代防洪屏障的阻碍，所以每天涨潮时场面壮观：“伦敦城离大海60英里，尽管如此，满潮时涌入泰晤士河的海水仍如此汹涌，不仅令河流停滞，还推动河水逆流而上，构成一幅宏伟的图景。”

弗朗西斯库斯继而描述了“很多从事各种机械工艺的工匠作坊”，这些工匠包括像克伦威尔的父亲那样的铁匠。甚至伦敦的食物都得到了这位旅行者的赞许。

> 他们喜爱宴会以及各种各样的肉类和其他食物，他们烹饪的食物极其丰盛，无与伦比。他们经常甚至过度宴饮，尤其钟爱小天鹅、兔子、鹿和海鸟。他们经常食用羊肉和牛肉，据说这里的羊肉和牛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主要得益于他们优良的牧草。他们拥有各种各样、数量众多的鱼类，还有海上运来的大量牡蛎。虽不能说每个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喝我之前提到过的“麦芽酒”，并且有各式各样的酿造方式。因为英格兰岛上没有葡萄生长，所以葡萄酒非常昂贵。[8]

然而，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合弗朗西斯库斯的心意。

> 所有街道铺设得如此简陋，稍有一点儿水就会变得泥泞，因为大量运水的牛群经过，加上英格兰岛本身降雨丰沛，所以街道经常泥泞不堪。大量气味难闻的淤泥随之形成，这些淤泥总要很长时间，实际上需要将近一年才会消失。因此，居民为了清理这些淤泥和靴子上的污垢，常常在各个房屋的地板上放置新鲜的灯芯草，每逢进入房屋的时候都会在灯芯草上清理自己的鞋子。

同样，他为伦敦人“火爆的脾气和刻薄的性情”而震惊，他也很厌恶伦敦人对自己孩子的轻视和疏于照料。

沃尔特·克伦威尔看似属于这一类型，尤其是在他跟儿子托马斯的关系上。不过他至少为女儿们都找到了不错的夫家，虽然他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出于对女儿们幸福的考量。长女凯瑟琳嫁给了一位胸怀壮志的威尔士律师摩根·威廉斯（Morgan Williams），他的家族由格拉摩根郡迁至帕特尼。摩根的哥哥是内兰德领主约翰·斯凯尔斯（John Scales）的管家，是帕特尼一位有名望的人。凯瑟琳的妹妹伊丽莎白嫁给了一位牧羊的农场主威廉·韦利费德（William Wellyfed），后来他跟着岳父一起做生意。

尽管沃尔特其人在当地社区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经常卷入法律纠纷。1475～1501年，他因“违反麦芽酒法定标准”被庄园法庭处罚6便士不下48次，这意味着他一直在用水勾兑自售的麦芽酒。[9] 15世纪以来，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日益常见，促使酿酒者行会颁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条例，确保所有“从事酿酒工艺者”生产“优质的麦芽酒，使酒的浓度和纯度与麦芽酒的价格相称”。此外，行会还任命了正式的品酒师对该城的酿酒商进行随机抽查。所以沃尔特的这种牟利方式很快被发现了。[10] 他的妻子可能协助他经营酿酒生意：酿酒是为数不多的鼓励妇人们参与的行业之一。诗人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创作了一个脾气暴躁的酿酒作坊女主人的讽刺形象，她醉酒的滑稽姿态给这类从事酿酒业的女性带来了（往往不是她们应得的）不好的名声。虽然当时有像沃尔特和他的妻子这样的本地酿酒商，但英格兰真正的优质酿酒中心仍然是修道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出身酿酒作坊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手策划了修道院的衰败，进而给整个国家的酿酒业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沃尔特·克伦威尔的违法活动并不止酿酒一项，他还时常因为放纵牛群在公共土地上任意吃草而被申饬。他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发生在1477

年，他因“抽取”了一名叫作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chell）的男子的“血液”而被判犯有人身侵犯罪，并被处以罚金20便士。沃尔特和他的父亲约翰同样也因为过度放牧给帕特尼的公共土地“增加负担”、过度采割荆豆和荆棘而经常被起诉至当地法院。[11] 1514年，因为在当地社区越来越不受欢迎，在“用欺骗手段”修改与租赁期相关的文件之后，沃尔特最终被逐出承租的庄园。[12] 他所有的土地都被没收，并且之后的文字记载中再未提及他，这说明在这之后不久他可能就去世了。

很多年后，沃尔特的儿子托马斯在一次耐人寻味的谈话中暗示他继承了父亲身上一些不好的品质。他向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吐露“他年轻时是多么无法无天”。[13] 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也曾说“克伦威尔年轻时行为不端，在一次入狱服刑后被迫离开英格兰”。[14] 虽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但在当时一个父亲是可以避开合法程序把自己的儿子送入监狱的。

虽然没有其他关于托马斯童年和教育经历的记载，但是考虑到沃尔特在社区的地位以及他的多项收入来源，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为儿子的教育做了一些投资。但是根据1715年出版的关于克伦威尔生平的记载，“这位伟大男人的父亲从事的工作如此卑贱，没有能力为儿子的教育投入许多”。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的编年史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15]也曾暗示克伦威尔是自学成才，他写到克伦威尔的“满腹学识，是通过勤恳、刻苦的努力积累而得”。当时，孩子们在7岁到9岁之间离开家乡去“其他人家辛苦劳作”是常见的现象。这些学徒期通常持续7年或者9年，“在此期间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工作”。虽然并没有关于克伦威尔当学徒工的记载，但是霍林斯赫德写到“很少有人能够幸免”。[16]

有文件记载暗示了克伦威尔家的这两个男人之间关系紧张。如果说托马斯跟他的父亲很像，那么显然这并没有帮助他赢得父亲的喜爱，或许正是他跟父亲之间的一次争吵促使他决定于1503年前后离开帕特尼。

与克伦威尔同时代的意大利小说家马泰奥·班戴洛（Matteo Bandello）称克伦威尔逃离了父亲。[17] 约翰·福克斯则描绘了一个美好得多的图景，称“在其成长时期，随着年龄增长和成熟，他脑海里冒出了要去游历他国、一览外面的世界并增加阅历的想法”。[18]

仅仅逃离家还不够，托马斯干脆离开了英格兰。在那个人们鲜少冒险迈出本乡边界、视那些由别郡来的人为“外地人”的时代，离开家乡是一个极为大胆且冒险的事情，对出身低微的托马斯来说尤为如此。于1602年出版的关于托马斯生平的一部剧作中，已经梦想着赚取财富的年轻的克伦威尔这样告诉父亲：“有一天我会视金钱为粪土……为什么要任由我的出身阻挠我向上的心志呢？”[19] 年轻人梦想的图景是引人神往的。克伦威尔在离开伦敦之前很有可能已经在国外找到了工作。伦敦到处都是从国外来的商人，正如弗朗西斯库斯所描绘的那样：

> 来自世界各地的，不仅有威尼斯的，还有佛罗伦萨的、卢卡的以及很多来自热那亚、比萨，来自西班牙、德国、莱茵河畔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带着极大的热情来这里进行贸易。但是英格兰岛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羊毛以及毛织物，还有白铅，因为相比其他国家，英格兰更加盛产这些商品。通过大海和泰晤士河，各种各样的商品可以运到伦敦来，也可以由伦敦运往其他地方。[20]

克伦威尔或许通过他父亲的生意跟这些商人中的一位有了联系。

至于他是如何攒够船费的尚且不清楚：虽然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偷渡者的假想很有吸引力，但是他同样有可能找到了一份船上的工作。一艘大的轮船，比如亨利八世命途多舛的旗舰“玛丽·罗斯”（Mary Rose）号，船上人员最多能有400人，其中包括仆人、厨师、事务长以及医生，还有船员和军官。克伦威尔可能找到了一个稍微低级的工作。正如福克斯后来所说：“没有什么是他靠着智慧和勤勉不能达成的。”[21]

克伦威尔首先去了尼德兰，然后从尼德兰旅至法国。史料鲜少记载他具体是在哪里生活，以及他是如何赚取足够的钱财生存下来的。直到

1503年秋末，他作为法国军队的一分子、远征意大利的时候才第一次有了关于他的记载。他的参军时限至今尚未可知，但后来他能够展示出对于法国军事体系超乎寻常的详细了解，说明他在随军远征意大利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据他后来的对头——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所说，克伦威尔当时是一名普通士兵[22]。虽然苏格兰士兵经常会为法国征战，但是这一时期这样做的英格兰士兵极为少见。克伦威尔或许是从14世纪在意大利征战获得财富的英格兰雇佣兵那里受到了启发。但如果他以为为法国征战是一条通往财富和荣誉的路，那么他就要失望了。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意大利城邦就成为法国和西班牙激烈的权力之争的焦点。而最近的一轮战事则发端于四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宣称对米兰和那不勒斯公国拥有所有权。在此之前，法国和西班牙军队联手占领了那不勒斯，但是他们在占领区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争端，继而引发了战争。1503年4月，西班牙在切里尼奥拉大败法国，然而法国军队并没有灰心丧气，于11月中旬在那不勒斯以北约60千米处的加里利亚诺河口聚集。西班牙数次试图渡河，终于在12月28日至29日的夜晚成功偷袭法军。法国军队驻扎在泥泞而不健康的环境中，因疾病而衰弱，不敌西班牙步兵中的长矛兵、剑士和火绳枪手，尽管大名鼎鼎的法国骑士“好骑士”巴亚尔（Bayard）在加里利亚诺桥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法国还是被逼退至加埃塔并宣布投降。

这场战败以及战败前法国军队连续数周的糟糕境遇或许让克伦威尔决定尽早放弃军旅生涯。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军队，不过他决定留在意大利而不是以战败者的姿态返回英格兰。他生活在意大利历史上文化最兴盛的时期，这对他的性格、信仰和兴趣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拉斐尔（Raphael）、贝利尼（Bellini）、提香（Titian）正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创制杰作，博吉亚家族（Borgias）主宰着教宗国的政治与宗教生活，而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则开始在佛罗

伦萨政府施加影响。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意大利保留了它的独特气质，相比道德，彼时的意大利社会更注重美学。其夺目的艺术和思想成就与社会环境和民族脾性引发的普遍的暴力与流血事件呈鲜明对比。白天文化和政治精英进出的精美广场，到了夜晚就变成斗殴、持械伤人和凶杀事件的案发地。对年轻的克伦威尔来说，这是一个残暴又具有启蒙性质的训练场。

再次出现关于克伦威尔的书面记载是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文艺复兴是受古典时代影响的一次文化、思想的大爆炸，它变革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政治和宗教。文艺复兴的影响如此之大，人们通常认为它是连接中世纪和近代世界的桥梁。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在艺术中探寻现实主义与人类情感。有着令人惊异的精密细节的作品取代了中世纪高度程式化的绘画和雕塑，并赋予题材以生命力。

佛罗伦萨之所以能够成为意大利所有文艺复兴城市中最有生机活力的一个，并且拥有乔托（Giotto）、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波提切利（Botticelli）等诸位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强大的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有了精美的绘画、壁画、雕塑和建筑的装饰，佛罗伦萨成为无与伦比的美都，闻名全世界。克伦威尔到达佛罗伦萨的具体日期不详，但应该早于1504年6月，因为这时他已经进入强有势的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家弗朗切斯科·弗雷斯科巴尔迪的府邸。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自12世纪以来就是有名的金融家，在佛罗伦萨公共事务中声名日盛的同时，他们也在英格兰建立了收益颇丰的商业往来。到了13世纪末，他们成为王室银行家，赞助了英王爱德华一世和二世的战争。弗朗切斯科是“一个非常忠诚、正直的商人”，“非常富裕”并在整个欧洲市场“拥有很大的生意”。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伦敦，不过克伦威尔是在他返回佛罗伦萨的一次旅途中与他相遇的。当时的小说家班戴洛描述了这位商人是如何遇见在街上乞求施舍的克伦威尔（“一个可怜的年

轻人”）的。当弗朗切斯科停下来跟他说话的时候，克伦威尔乞求他“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他。弗雷斯科巴尔迪见他虽然“衣衫褴褛”但“举止中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就产生了怜悯之情。当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来自他熟悉并且热爱的英格兰时，就询问了年轻人的姓氏。“我叫托马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如是回答，“是一个布料加工工人的儿子。”[23] 克伦威尔接着给他讲了自己是如何从加里利亚诺战役中死里逃生的，无需多言，这位富商显然已被说服：他带克伦威尔回到自己的府邸，为他提供衣食和居所。

虽然未经验证，但这种说法是可靠的。班戴洛的小说基于真实事件，克伦威尔后来的生平也证实了他拥有善于赢得精英群体好感的杰出能力。私下里熟识克伦威尔的夏普伊和雷金纳德·波尔的记述也佐证了这一点。唯一不一致的地方是班戴洛笔下的克伦威尔称他的父亲是一个剪切工（一个剪羊毛的人）而不是一个铁匠，也没有提及他父亲的其他职业。这一出入或许是因为克伦威尔的母亲在沃尔特死后改嫁了一个剪羊毛的工人。[24]

克伦威尔显然没有辜负弗雷斯科巴尔迪对他的信任，他忠诚且有力地服侍着他的主人。班戴洛将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斗志非常昂扬、机智、果断的年轻人，他非常清楚如何迎合他人的想法，当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他可以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好地掩饰自己的情感。”[25]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磨砺而成的这些性格特点在他回到英格兰之后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在服侍弗雷斯科巴尔迪的过程中，他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见识。那个时期佛罗伦萨还是一个共和国，政客、外交家、人文主义学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共和政府的积极分子。或许可以推测克伦威尔了解，甚至可能欣赏马基雅维利的方法论，但是几乎可以断定的是两人并不相识：克伦威尔当时是共和国极为卑微的一个居民，不可能跟这样一位卓越的领袖有交集。

弗雷斯科巴尔迪以“好客”和“生活奢华”闻名，所以克伦威尔在他的府邸生活得很舒适。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后来因好客而出名的克伦威尔。作为佛罗伦萨名门望族中最富有、最显赫的一员，弗朗切斯科雇用了最好的厨师、乐师和表演者来宴请、招待他的宾客。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利润最丰厚的生意之一是酿制托斯卡纳红酒，自14世纪早期开始他们便精于酿制此酒，后来还进贡给英格兰宫廷供亨利八世本人享用。弗雷斯科巴尔迪酷爱艺术，他与大名鼎鼎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有一个互惠的约定，凭此约定拿红酒来换画作。因此克伦威尔曾置身于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最好的作品之间，难怪在那之后他会如此热爱艺术。

弗雷斯科巴尔迪在意大利各地为生意奔走的时候会带上他的这位英格兰侍从，直到最后把克伦威尔留给了一位威尼斯商人。没有迹象表明克伦威尔对此有异议，因为弗雷斯科巴尔迪给了他丰厚的饯别礼物——16个金杜卡特和1匹壮马。枢机主教波尔证实后来克伦威尔被一位他熟识的威尼斯贸易商雇为会计。[26]

此后克伦威尔的行踪无法确定，他很可能在那之后不久就离开了意大利，在欧洲其他地方游历了一段时间。可以确定的是他作为布料商人在尼德兰（Netherlands）待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威尼斯和安特卫普贸易联系密切，这可能促使他多次游历。对这位未来的英格兰政客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之都就是最好的训练场。安特卫普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化都市，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所有贸易国家的商人。英格兰的毛织品和布匹有半数经由这座城市出口。克伦威尔亲身经历了商人冒险家公司——一家由英格兰主要海外商人组成的公司——尝试将这些出口原材料制成成品以获得最大利润的经济努力。过了一段时间，克伦威尔开始为安特卫普英国会馆（The English House）的商人效力，随后他自己成为一名独立的贸易商人。

许多年之后，一位名叫乔治·埃利奥特（George Elyot）的商人回忆

说，“自1512年在米德尔堡的辛松市场我就感受到了克伦威尔的热情和真诚”。[27] 米德尔堡是位于尼德兰西南部的一座城市，是中世纪英格兰和佛兰德斯商业往来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从英格兰贸易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来看，克伦威尔完全有可能在那里找到了工作。他在意大利最有权势的商业家族之一的府邸的工作经历也增加了他的优势。在这一时期，克伦威尔可能也获得了一些法律上的经验。虽然从未受过训练，但是他肯定有从事法律这一行业的天赋，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因在法律事务方面的知识和本领而出名。

克伦威尔大概在1512年夏末或秋初返回了英格兰。两年之间，年近30的他就已经在伦敦商界和法律界站稳了脚跟。从亨利八世官方文件的一次偶然提及可以看到，克伦威尔在回到英国之后几乎立即就开始了其律师生涯。克伦威尔的签名出现在一份1512年11月前后的文件中，文件内容涉及白金汉郡大小金布尔庄园及地产产权。[28] 在他整个律师生涯中，克伦威尔专攻产权转让。早年间，他的很多客户都来自其生意上的人脉。

但是克伦威尔四处游历的日子并未结束。1514年，他再次来到尼德兰，在一些主要的贸易中心（特别是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开始自己做起了生意。在积累生意经验的同时，他也建立了一个将在未来对他大有助益的交际圈。在此处，他也对欧洲经济和政治事务形成了极好的基本认知。他学会了几种语言，可以熟练使用法语和意大利语，通晓西班牙语，可能也会德语。对意大利的钟爱伴随了他一生，他收到的很多国外信件都是用意大利语写就的。吝于夸奖的圣罗马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后来也坦言：“克伦威尔英语口才极好，除此之外他的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也说得相当好。”[29] 克伦威尔也熟谙古典文学，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后者是非常难得的成就。后来成为克伦威尔死敌的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也坦言克伦威尔经常对他“直言不讳，不管跟我讨论什么他都非常自信，无论是希腊语、拉丁语还是其他，他知

晓的都跟我一样多。”[30]

虽然关于克伦威尔这一时期的生活，当时的文献能够提供的只有零零散散的细节，但从中可以看出在1514年克伦威尔还返回了意大利。根据位于罗马的英格兰救济院——至圣三一和圣托马斯救济院（the Most Holy Trinity and St Thomas）的记载，克伦威尔1514年6月曾在那里居住。至圣三一和圣托马斯救济院建于1362年，旨在照管“来自英格兰的贫穷的、体弱多病的、需要关爱的不幸旅人”，克伦威尔旅居于此的时候，该救济院已经成为罗马接待英格兰来客的主要中心。它每年接待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不过克伦威尔旅居于此更有可能是由于生意需要而非精神需求。根据梵蒂冈城档案馆的文件，克伦威尔这时是枢机主教雷金纳德·班布里奇（Reginald Bainbridge）的代理人，在由教廷建立的最高宗教事务裁判所处理英格兰教会事宜。

1514年夏，克伦威尔回到英格兰。一份日期为8月26日的文件上的签名被认为是他的。文件与约克大主教有关，文卷编辑者描述文件的背书部分写有“一些线条，明显是刻意的字迹练习”。[31] 这（虽未经考证）提供了一个青年克伦威尔的迷人形象，他为了让自己的字迹看起来优美、老练而不断练习。如果这真的是他的字迹，那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谜题。这位刚刚回国的冒险者在本国鲜为人知，他是如何介入英格兰最重要的一位神职人员的事务的呢？这说明克伦威尔的社交网比当时资料所披露的要大。

无疑，在欧洲大陆的几年，克伦威尔由一个未受良好教育、早熟并混迹街头的“小混混”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人脉广且成功的商人。后来克伦威尔称自己是“世间伟大的旅行者”也不无道理。[32] 他的天资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正如福克斯所说：“他的记忆力超群，无论学什么都可以记住，这也是他最为出众的能力。”[33] 同样，霍林斯赫德在描述他时也说“有如此超群的记忆力，有如此胆量和韧性，可以利用手中的

笔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在人们看来他经验丰富，不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34] 他有随军服役并参加作战的经历，又在几个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工作过，在文艺复兴期间亲眼见证了文化和思想的异常繁荣，并且吸收了当时开始在北欧扎根的一些激进的宗教思想。他的人生历练可谓卓越。

克伦威尔在意大利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刻，这段经历培育了他对艺术、文学、音乐和精美器物的终生热爱。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非常有感染力。很多年后，埃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枢机主教沃尔西的随身教士，曾写信给他：“很久之前你就答应借我彼特拉克的《凯旋》（‘Triumphs of Petrarch’），希望让我成为一个优秀的意大利人，我恳请您让奥古斯丁先生的侍从给我送来，如果您有意大利语的《廷臣论》（*Cortigiano* ）就更好了。”[35] 意大利作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一直被认为是对克伦威尔有特别影响的人。克伦威尔可能获得了他最有名的著作《君主论》的早期手稿。这本最终于1532年出版的著作使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与无情、不择手段的治国之道画上了等号。[36]

作为一个伦敦人，克伦威尔对一切意大利事物的热爱是极为不寻常的。安德烈亚斯·弗朗西斯库斯在游历这个都城时震惊地发现它的居民“不仅看不上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带着难以抑制的憎恶咒骂他们”。[37] 这一时期另一位意大利旅行者也证实了这一点：“英格兰人大爱自己以及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的眼里只有英格兰和英格兰人；每当看到一个英俊的外国人，他们会说‘他长得像英格兰人’……他们对外国人有很强烈的反感，幻想他们一旦踏足自己的岛屿，就必然是为了将其据为己有、夺取英格兰人的物资。”[38] 克伦威尔要心胸宽广得多，游历让他比大多数同胞更加文雅、好奇和开明。他是一个真正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克伦威尔在国外的这几年经历与在帕特尼他父亲的啤酒作坊做学徒

的时日堪称天壤之别，他拥有只有少数统治者和极少数大臣花费一生才能掌握的关于地理、人文和时政的见识，因此没有常见于其英格兰同胞身上的成见和偏见。他的游历开阔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他学会了质疑一切、颠覆传统并且行事求新。他的经历教会他不要急于相信（如果还有信任可言的话），但是同时他也真正关心他人，他的平易近人在同侪当中罕有其匹。他从默默无闻到站在辉煌事业的顶点完全归功于他自身的优点。正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编年史家霍林斯赫德后来所评述的："虽然卑贱的出身和生活的匮乏是他养成能够立身于世的优点的较大障碍……但是凭着异常卓越的才智和勤劳刻苦的心性……他逐渐培养了如此充分、熟练的权衡重要事务的理解能力和本领，以至于旁人认为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任何一个职务，他都能胜任。"霍林斯赫德确信克伦威尔的旅行对他后来的事业十分有益，因为他从中观察到了"本国以及其他各个国家和政府的运作原理"。[39]

1514年回到英格兰后不久，克伦威尔娶了伊丽莎白·威廉斯（Elizabeth Williams），伊丽莎白的旧姓是威基斯（née Wykys）。他能够寻得如此佳偶显示出他所取得的成就。伊丽莎白是王室护卫托马斯·威廉斯（Thomas Williams）的遗孀。她的父亲亨利·威基斯（Henry Wykys）跟克伦威尔的继父从事同一行业，都是帕特尼的羊毛商人，有可能正是这两人安排了这门婚事——或者至少介绍他们相识。亨利·威基斯曾是亨利七世的引见官，这给托马斯提供了一个薄弱但有价值的宫廷关系。他的岳父也帮助他在英格兰的布料生意中立足。有记录显示伊丽莎白是一位坐拥财富与地产的女性，这可能是克伦威尔娶她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在他们刚结婚的那几年，克伦威尔个人的财富快速增长，其速度远比他仅靠自己所能达到的要快得多。

如此博学且也在岳父家里做羊毛和布料生意的克伦威尔同样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商业代理人的地位，这是一个没有明确业务范畴界定的角色，明显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训练，但可能涉及包括借贷在内的多种业

务。这个角色同样也让他进入了英格兰的法律界。他充分利用这次转行的机会，努力以律师为自己的主业。鉴于在此之前他的经验都来自跟英格兰有不同法律系统的其他国家，他能如此之快地在法律事业上获得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克伦威尔的知识不是在大学里学来的，而是从伦敦现有的已出版的法律书籍或者同时代文献中没有记载的人那里学得的。加上在欧洲的人脉和训练，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开始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

托马斯和伊丽莎白生育了至少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安妮（Anne）和格雷丝（Grace），还有一个儿子叫格雷戈里（Gregory）。[40] 他们的出生日期没有记载，不过正如大多数历史中常见的，跟儿子年龄相关的证据比关于女儿的要多。通常认为格雷戈里大约在1520年出生。[41] 同时代文献中最早提到了安妮，这或许说明她是两个女儿当中年长的那个。

他们一家生活在位于伦敦城东部的芬丘奇（Fenchurch），可能租住在圣加百利一个小的教区教堂附近。这一区域经常有许多商人光顾——附近有布料工人、锡匠、五金商——所以克伦威尔很容易接触到很多生意客户。

尽管他很快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但是克伦威尔很快又踏上了旅程。1517年他收到一位来自林肯郡波士顿的熟人——市政官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请求帮助的来信。这两个人可能是在生意往来中认识的，当时波士顿是汉萨同盟的一个城市。汉萨同盟是一个主导北欧贸易的强大的商人联合体。罗宾逊的同乡杰弗里·钱伯斯（Geoffrey Chambers）正要代表波士顿圣博托尔夫教堂（今天当地人热切地称之为“波士顿之桩”）圣母公会去一趟罗马，目的是获得教宗的准许以出售赎罪券。这是该镇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所以该镇官员迫切需要确保其能够继续。罗宾逊问克伦威尔是否可以陪同钱伯斯前往。虽然克伦威尔“对宗教事务缺乏兴趣与良好的判断力”，因而无法直接出面说服教

宗，但他游历甚广，精通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事务，这一点相比之下更为罗宾逊所看重。[42] 克伦威尔或许急于冒险，便欣然同意。他跟钱伯斯在安特卫普见面，一起前往罗马。[43] 他们的出行显然很气派，因为整个旅程花费竟高达1200英镑——比今天的45万英镑还要多。

克伦威尔和他的同伴于1517年到访极盛时期的梵蒂冈城。米开朗琪罗已经于5年前完成了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画——这一杰作对西方艺术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另一位伟大的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于1508年开始装饰教宗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的居所。教宗宫殿四个接客室装饰有大量的系列壁画，这些壁画是如此精美，以至于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Leo Ⅹ）在1513年成为教宗之后留用拉斐尔和他的团队继续完成壁画创作。当克伦威尔和罗宾逊抵达罗马的时候，这项工作应该仍在进行中，但是他们在拜访利奥的时候有可能看到了一些已经完成的壁画。

克伦威尔做了一个可以绕开通常漫长乏味的等待、获得教宗接见的计划。当他们到达罗马的时候，他发现教宗即将开始狩猎之旅，所以他暗自等待教宗回来并通过一场英格兰“三人联唱”的表演给教宗以惊喜。克伦威尔知道教宗喜爱“新的、流行的、不常见的小食和精致的菜品”，于是他给教宗准备了一些精选的英式甜点和果酱，并称“在英格兰这些通常是只供国王和王子食用的”。[44] 教宗被他打动，立刻批准了公会所有的请求。1518年2月24日签署的一份教宗训谕给波士顿公会颁发了许可，允许其继续出售利润颇丰的赎罪券。虽然这一事件的细节是在事情发生大约50年后由约翰·福克斯提供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克伦威尔为获得这一许可做了努力并且完全获得了成功。这是他第一次显示出在与社会上最显贵的人交往时的技巧和胆识。他的经历给了他与其卑贱出身不符的自信，但是他一定还有一种天生的傲慢——甚至是狂妄——能够劝服有权力的人听从他的要求。

这一事件或许还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在证明教宗是多么容易被人哄骗并因此答应他人诉求之后，克伦威尔可能对教宗权威和宗教社团产生了一种轻蔑，这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发展成强烈的敌意。正如编年史家霍尔（Hall）[45]那句有名的评述所说的那样，他后来对“一些高级教职人员的自命不凡”怀有强烈的憎恶。此外，福克斯说克伦威尔曾在漫长的返程途中默记、研读伊拉斯谟（Erasmus）刚出版的拉丁译本的《新约圣经》以排解旅途的乏味。显然，从那时候开始，克伦威尔对《圣经》的理解就出奇地好，这种理解持续了一生。对《新约》教义的深刻认识或许也为克伦威尔后来的福音主义信仰埋下了种子。鉴于这一信念诞生在去罗马天主教中心寻求获批出售赎罪券——一种改革派基督徒尤为反对的活动中，这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

但在当时，当克伦威尔和钱伯斯乘胜而归，返回英格兰的时候，这一在罗马诉求获批的事迹极大地增添了他的资历。福克斯将克伦威尔描述为“在向各地发行并推动波士顿赎罪券的事业上……一个伟大的行动者”。[46]他决定宣传自己的成功以让他的声誉达到能够有效影响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的地步。如果教宗可以任他如此巧妙地摆布，那么英格兰的国王或许也可以。

---

[1]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5.

[2]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

[3] 1618年对温布尔顿庄园的一项调查支持这一观点，因为它描述在那个地方的“一座古老的房舍叫史密斯的商店，位于从里士满到旺兹沃思的大路西侧”。Walford，E.，‘Putney’，*Old and New London* ，Vol.6（1878），pp.489-503.

[4] 漂洗指清洗布料或羊毛，除去油脂、尘土和其他杂质，让其变得更厚重。该过程包括将羊毛浸泡在大桶大桶的人的尿液里。

[5] 这是帝国大使夏普伊所说的。目前不清楚他是如何得知的，因为同时代的其他资料中没有提及此事。*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6]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68. 他在争论时就亨利的“大事”以及阿拉贡的凯瑟琳是否还能生下一个儿子进行发言。

[7] *Calendar of the Close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Henry* Ⅶ，p.18.

[8]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p.188-190.

[9] 为了预防出售劣质啤酒，啤酒品鉴人受命评估教区内所有的酿造厂，判定其是否合格。

[10] Hornsey，I.，*A History of Beer and Brewing*（Cambridge，*c*.2003），pp.321-322.

[1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4.

[1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2-4.

[13]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15] 原文为“Ralph Holinshed”，疑为作者笔误，拉斐尔据传是拉尔夫之子，但其家族谱系并不确定。（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编者注，后文不再另做说明）。

[16] Anon.，*Life of Thomas Lord Cromwell*，p.3；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p.190，196；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p.951.

[17]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107.

[18]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3.

[19] Anon.，‘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Lord Cromwell’ p.351.

[20]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189.

[21]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Merriman，

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3.

[22] 原文为“gregarium militem”，是拉丁语中“普通士兵”的意思。

[23]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p.106-107.

[24] Foxe，*Actes and Monuments*，Book II，pp.419-434. This is repeated in 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p.951.

[25]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107.

[2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18-19.

[2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218；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1. 辛松市场是尼德兰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Part i，no.1473.

[2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30] Muller，J.A.（ed.），*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Cambridge，1933），p.399.

[3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no.3195.

[3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03.

[33]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3.

[34] 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p.951.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346.

[36] 1538年波尔的记述回忆了16世纪20年代发生的一场对话。这个时间让人质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君主论》直到1532年才刊印。但是考虑到克伦威尔的人脉，认为他获得了一本早期手稿的理论是可信的。的确，波尔说克伦威尔提出要借给他，前提是他承诺会阅读。

[37]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190.

[38]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196.

[39] 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p.951.

[40] 安妮在当时的文献中又被称为爱丽丝。

[41] 此前一直认为格雷戈里于1528年进入了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这是不准确的。这导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格雷戈里可能早在1514年就已出生。事实上，格雷戈里于1528年被安排了一位来自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他本人并没有去那里。Pratt，J.（ed.），*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8 vols.（London，1877），Vol.V，p.73.

[42] Pratt，J.（ed.），*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8 vols.（London，1877），Vol.V，pp.363-365.

[43] 有一些证据暗示克伦威尔曾两次代表波士顿公会去罗马，一次是在1510年，另一次是在1517年或1518年。波士顿账簿中有两笔支出。但是福克斯只记录了1510年的那次，至少同样有可能是因为关于克伦威尔早期事业的信息不明确，所以旁人推测他去了两次而不是一次。

[44] Pratt，J.（ed.），*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8 vols.（London，1877），Vol.V，p.364.

[45]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pp.838-839.

[46] Pratt，J.（ed.），*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8 vols.（London，1877），Vol.V，p.365.

第二章 枢机主教

克伦威尔1517年到访罗马是他最后一次有文字记录的国外旅行。在那之后，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在英格兰的事业上。根据当时的一份资料，他在这一时期对自己家族关系的利用并不亚于对商业人脉的利用。沃尔特·克伦威尔兄弟的儿子，亦即托马斯的堂兄罗伯特当时已经成为巴特西教区牧师，直属于枢机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托马斯·沃尔西是约克大主教、英格兰大法官，也是亨利八世最亲近的顾问。

沃尔西是一位旅店老板的儿子，跟克伦威尔出身相仿。他比克伦威尔年长约15岁，大约在 1470年或1471年出生于伊普斯威奇。不久之后，他的父亲成了一个屠夫，正是这个屠夫的身份让年轻的沃尔西在随后的几年受尽嘲讽。不管他在宫廷里如何高升，他的贵族对头总会嘲笑他是“屠夫的儿子”。

虽然出身卑微，但沃尔西还是受到了极好的教育，这或许得益于他富有的叔叔的资助。沃尔西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15岁的时候就从牛津大学毕业，获得了“小学士”的绰号。他继续自己的学业，在莫德林学院攻读神学，对于一个在政治领域有野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不过对沃尔西来说，宗教和政治一直都是相互交错的——无论是在他内心里还是在他的事业中。他的首次重大突破是在1507年，当时他被任命为王室御用牧师。他很快利用自己的职位，与宫廷中“他认为是枢密院最得意的和最受国王重用的”[1] 人结为同盟。不久，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经验。

沃尔西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真正博学的人。他完全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宗教范围内，听任亨利八世的差遣、从事各种外交活动。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avendish）吹嘘说他仅用三天半就完成了对身在佛兰德斯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ian）的访问，惊艳了国王。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改革家，将沃尔西描述为“一个有欲望、有勇气、身强体壮的人”，沃尔西处理繁重工作的能力让人震惊。[2] 在亨利八世1509年继位之后，沃尔西平步青云。

“未来，整个世界都会讨论他”，亨利17岁继位的时候，威尼斯大使曾以其非凡的眼力如此预言。每个人对这位热情洋溢、魅力非凡、睿智英俊的新王——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式君主赞不绝口。“如果你们见到也会抑制不住流下喜悦的泪水，这里所有人都为能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王而欣喜，他们满心祈愿他的安好”，廷臣蒙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兴致勃勃地说。“天地为之欢喜……贪婪被驱逐，强夺被制止，慷慨的手大方地施舍财富。吾王渴求的不是黄金、宝石和贵重的金属，而是美德、荣耀和不朽。”[3]

新王的体格也在宫廷里鹤立鸡群。身高6英尺2英寸的亨利仪表堂堂，（直至晚年）身材矫健。他擅长运动，乐于在竞技场上展示他的技能。他继承了外祖父爱德华四世的英俊相貌，被称为“历史上最英俊的君王”“肤色白皙的美男子”。一位威尼斯外交使者1515年到访英格兰宫廷，写了一篇汇报，对新王赞不绝口，称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统治者，比常人要高，小腿矫健，肤色白皙透亮，赤褐色的头发梳成法式，又短又直，圆圆的脸如此美好，若生为女子，一定是一位美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也同样赞美“在1000个贵族同僚中，国王是最高大的，他的力量与他高大的体格相称。他的眼神饱含热情，脸庞俊秀，双颊如两朵玫瑰一样红润”。[4]

亨利的性情同样具有魅力。他继承了母族——约克家族的魅力和感召力，在几乎各个方面都跟他阴沉、心胸狭窄的父亲截然相反。亨利八世平易近人、聪慧机智、理想主义并且极其慷慨，伊拉斯谟称他是“最有心的男人”。托马斯·莫尔也认同：“国王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受到他的特别青睐。”威尼斯的大使认为他“谨慎、明智、没有任何恶习”。[5] 这并非完全属实。虽然可以说亨利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但是总体上他的性情也有较为黑暗的一面。他容易激动、任性放纵且自负虚荣，那令人恐惧、难以捉摸的脾气会吓得廷臣四下逃散。他同样也很冲动，常常随自己喜好突然提升或者贬黜侍者。虽然尚没有迹象表明此时的亨利已经染上了常见于他晚年的那多疑、无情、残忍的性情，但是他的随从们在侍奉他时仍不得不为他转瞬即逝的青睐提心吊胆。

另一个对亨利的统治有很大影响的缺点是他对运动的过度热爱。他酷爱狩猎，经常整天骑马外出，黎明之前出发，夜深了才返回。这爱好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国王青春活力渐失，不得不参加一些略不耗精力的消遣。就在1526年，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淡漠地评述道：“因为整个夏天国王闲暇时都在狩猎……所以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载的事情。”[6] 即使是在亨利无意狩猎或者（这更有可能）天气不好的日子里，他通常也只是在上午听弥撒的时候以及晚上晚宴过后关注一下正事。他对冗长的汇报和陈述没有耐心，自己也曾经承认书写“对我而言有些乏味、痛苦”。[7] 要不是有人数可观的书记员、侍从和顾问大臣负责将王室政策、财政、行政的细枝末节付诸实施，政府事务早已停滞。

亨利天生寻欢作乐的性格给老道的廷臣以机会，这一机会很快便被沃尔西迅速抓住。据说在察觉年轻的国王更热衷于悠闲消遣而不是国家事务之后，他向“安逸的国王”保证“只要有他在枢密院，国王无需利用享乐时间来处理枢密院里的事务”。[8] 他有策略地发挥国王的作用，在最有利的时候让国王参与进来，正如17世纪教会历史学家约翰·斯特赖

普（John Strype）记述的："沃尔西虽然知道如何让国王纵情享乐，有时也会提示他出面理政。"[9] 这位枢机主教证明自己非常擅长应对各项国家事务。有影响力的人文学者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说："傲慢且有野心的沃尔西……声称自己能够处理几乎所有公务。"结果，他获得了国王越来越多的信任，并且掌握了超乎寻常的自主权。"事态之严重以至于此，"一位震惊的同时代人评述道，"枢机主教处理所有政事，国王对此毫不过问。"[10]

然而，沃尔西受宠并不只靠他减轻国事重担的能力。极为精明、有识人之能的沃尔西很快感知到亨利需要他身边的人对他绝对忠心和忠诚。他同样也知道他的权力之路取决于如何让自己尽可能对君主有用。据卡文迪什所说，"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满足国王的心意，他知道这是让自己升至高位的一条非常虚荣且正确的道路"。沃尔西因此"得到国王特殊的恩典和宠信，每日在宫廷陪侍在国王左右"。最终，"国王对他心生喜爱，尤其认为他是所有廷臣中最忠诚、最甘心乐意的，且他不论如何只推进国王的意旨和意愿。国王因此把他当作一个合用的工具，用来实现他的筹谋，满足他的娱乐，并且让他更接近自己，给他如此高的尊崇，以至于他受的尊荣和宠信使得其他所有廷臣都失去了原有的宠信。"虽然威廉·廷代尔不是沃尔西的崇拜者，但他也承认沃尔西"顺从且有用，并且在所有消遣和娱乐上都是数一数二的"。[11]

沃尔西在如何赢得国王宠信的这门学问上可谓大师，而克伦威尔也将作为他的门徒从中受益匪浅。一系列关键的教会任命成为沃尔西自身迅速得权的标志，其顶点是他1514年8月成为约克大主教。一年后，他被封为枢机主教，甚至有流言称他有成为教宗的野心。时人很快就认识到宫廷真正的权力之源在哪里。伊拉斯谟也在亨利的宫廷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形容沃尔西"事实上"的统治"更胜于国王本人"。威尼斯大使朱斯蒂尼亚尼（Giustiniani）称沃尔西是"尊敬的枢机主教，这个国家所有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并且是一个"就权威而言堪与国王相比"的男

人。亨利八世本人的举动也加深了这一印象。1515年他授意教宗利奥十世“重视沃尔西的话，一如这些话是从国王本人口中说出的”。[12] 至此，沃尔西作为亨利宫廷首席大臣的地位完全确立。

沃尔西的晋升如此迅速，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的府邸众人没能跟上节奏，因此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新的值得信任的仆人。当时并不缺少有野心且愿意接受聘用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有了多达400个仆人。同时，他开启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宏大的建筑计划，仅有国王的宫殿可与之匹敌。他最豪华的府邸是汉普顿宫，这座杰出的建筑里置满了珍贵的艺术作品。也难怪嫉妒他的廷臣开始议论说沃尔西的奢华使国王黯然失色。“他几乎在同一时间担任如此多的公职，并变得如此高傲，以至于他开始自视与国王并驾齐驱”，一位怀有敌意的时人如此说。

> 很快他开始使用金色的座椅和金色的软垫，铺金色的桌布，他徒步出行的时候把他的帽子——枢机主教品级的象征——给仆人拿着走在前面，并且像举神像一样高高举起，在举行礼拜的时候，他把帽子放在国王小礼拜堂的祭坛之上。沃尔西因其傲慢和野心招致了来自全国的憎恶，因为他对贵族和普通大众的不友善，他们对他的虚荣产生极大的反感。他确实为每个人所憎恶，因为他以为自己一个人可以担任英格兰几乎所有的公职。

伊拉斯谟也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所有人都畏惧但几乎没有人爱戴”他。[13]

截至当时，没有人限制沃尔西的权力，1515年年末亨利任命这位枢机主教为大法官，证实了他对后者的钟爱。这一任命惹怒了沃尔西的同僚，他们憎恨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到这位“屠夫的儿子”手里。1516年5月，托马斯·阿伦（Thomas Alen）向他的侍主什鲁斯伯里伯爵汇报宫廷里产生了“极大的混乱”。[14] 这位新任大法官几乎没有做什么去迎合他的同僚。沃尔西不咨询共事的大臣，只征求国王的准许。他的策略是“在他进一步确定或者决定最应该满足谁的意愿或者听从谁的意见之前，先让国王知晓所有（本该由大臣经手的）事情，以最大限度地赢得

国王的欢心”。[15] 虽然他在短期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策略的危害也将暴露出来。

对克伦威尔开始服侍沃尔西的时间的判定多少都有推测的成分，一些历史学家推断最早是1514年，而另一些推断最晚是1525年。不过，历史学界一致认为两人是在1516年结识的。[16] 罗伯特·克伦威尔有可能帮助了他的堂弟成为大主教约克坊——沃尔西在伦敦的宏伟官邸的管家。但直到克伦威尔1518年从罗马返回英格兰后，他才作为枢机主教的门徒崭露头角。1519年他成为沃尔西个人理事会的一员——这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从那时起，他开始穿黑色和褐色的天鹅绒制服，表明他是服侍枢机主教的数百人之一。

据尤斯塔斯·夏普伊所言，沃尔西很快就注意到了克伦威尔的潜力。“约克枢机主教看到了克伦威尔的警觉和勤勉，以及他在不论正邪的诸般事务上的能力和机敏，便把他招至麾下，主要派他负责拆除五六座修道院。”[17] 这一说法的前一部分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在后一部分，夏普伊将不同的事件混在了一起：克伦威尔确实帮沃尔西解散了一些宗教设施，但这是在他已经服侍沃尔西多年以后。夏普伊暗指这是克伦威尔的第一个任务，其实只是一个将注意力吸引到他眼中的克伦威尔最大的罪过上的手段。约翰·福克斯更为积极地描述了克伦威尔早期对沃尔西的服侍：“他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主教府中，他在那里确实担任过几份职务，并在这些职务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忠诚，很快他看起来比枢机主教更适合服侍国王。”[18]

很容易就能看出为什么克伦威尔和沃尔西如此迅速地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他们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二人都出身卑微，都利用他们与生俱来的机智、悟性、精明和勤奋成就了自己，并如风暴一般征服了世界。当然，他们结识的时候，沃尔西已经比克伦威尔高出了好几节。但是后来者看到了他的机会：如果他自己能成为国王首席大臣的左右

手，那未来更大的提升也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同时，克伦威尔发展迅速的法律事业也让他离宫廷的社交圈更近一步。他开始在几个重要的法律诉讼中代理客户，其中最早的案件之一就是坎特伯雷特权法院1520年10月向罗马教宗法院提起的诉讼。案件复件送到沃尔西那里，其中附有“其他信息详见托马斯·克伦威尔信件”的字样，在信件中克伦威尔总结了案件的关键点并就如何最好地处理提出了建议。[19] 显然克伦威尔表现得很好，第二年他受命为曾在第三代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Edward Stafford）手下任监督员的查尔斯·尼维特（Charles Knyvett）担任代理律师。尼维特在1521年5月17日公爵被处死前不久辞职并对公爵做出了不利指证。他就因辞职而失去的几份职位提出赔偿诉求，同时要求免除价值3100英镑（比现在的110万英镑还多）的债款，这是他被迫代替主人承担的。

为一个已被判刑的叛国者的侍从申诉赔偿是一个冒险的工作，大多数律师都会拒绝。但是克伦威尔知道这个案件能让他接触到宫廷社会的最高层人士，所以他欣然受理了这个案件。他一丝不苟地替他的客户准备并修改了多份诉状，一些送到了国王那里，一些送到了枢机主教沃尔西那里。虽然克伦威尔没能为尼维特打赢官司，但是他实现了为自己在宫廷里立名的目的。

现存文献中没有关于克伦威尔何时获得了国王接见的记载，但是1515年第一次到访宫廷的威尼斯使臣描述了接见的可能场景：

> 有人引我们进入宫殿，各个房间里都挂有极为精美的壁毯，护卫根据等级从上至下依次穿着金、银和丝绸，其中包括300个身着银色胸甲、手持长矛的戟兵；我对上帝发誓，他们每一个都像巨人那么高大，所以排列起来很是壮观。我们终于到了国王那里，他坐在一个金线织成并在佛罗伦萨加工刺绣的华盖下，这个华盖是我见过的最昂贵的东西：他斜靠在镀金的宝座上，宝座上有一个大的金线锦缎制成的软垫，上面放着那把金色的国剑。

亨利衣着白色和深红色的缎子制成的华丽衣衫，脖子上戴一个“金色的项圈，项圈上镶有一枚圆形钻石，跟我见过的最大的胡桃一样大小，还有一颗极为炫目的、特别大的珍珠吊在下面……他的手指上戴满了镶有宝石的戒指”。国王的右边有“8个贵族，衣着与他相仿”，并且“还有6个手持权杖的男人，以及10个传令官，他们身着金色织物制成的短袖制服，衣服上饰有英格兰纹章。此外还有一群贵族，他们都身着金色织物和丝绸”。[20] 即使对一名经验丰富的使臣来说，那一定也是令人敬畏的场景。虽然因为经常游历，克伦威尔对宏伟的宫廷并不陌生，但是在第一次被召见的时候，他一定也会对此感到印象深刻——或许，尽管他天生不羁，也会有一点惶恐。据小说家班戴洛说，克伦威尔立刻就给国王留下了好印象：“他（沃尔西）会时常让克伦威尔跟国王汇报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位年轻人清楚地知道要讨好国王，国王开始对他面露慈色，认为他是一个适合处理任何极其重要事务的人。”[21]

在尼维特案之后，克伦威尔的律师事业继续发展。毫无疑问这得益于沃尔西的影响，克伦威尔任务使他与宫廷的接触越来越多。1522年年初，他代理了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的诉讼当事人，案件由星室法庭的理事会听审。而在该案件之外，其他正式法庭文件中也有多处提到了他的名字，表明他作为一名本领和能力相当大的律师的名气正在迅速扩大。他的其他委托还包括代理理查德·乔费尔（Richard Chawfer）起诉威廉·布朗特（William Blount）和蒙乔伊勋爵（后者蒙国王喜爱），案件由伦敦主教听审。在1522年8月15日写给克伦威尔的信件中，乔费尔写到主教指示双方指任“一个中立且对这种庭审有了解的人”，还写道：“我选了您，想知道您什么时候会在城里，这样我可以进一步知会您详情。”[22] 从他这个时候的通信来看，克伦威尔也没有忽视他的羊毛和布料生意。[23] 他的英格兰客户包括金匠、杂货商、裁缝、布商、鱼贩和市议员，还有从巴黎、诺曼底到奥格斯堡和佛罗伦萨的国外人脉。到1522年年中，克伦威尔认识沃尔西已有约6年了，他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权势令他有资格在德意志的汉萨同盟授予的委托书中被称为“先生”。

大约这个时候克伦威尔雇了一个学徒，一个精明的、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名叫拉尔夫·萨德勒（Ralph Sadler）。萨德勒在1521年就已经服侍克伦威尔了，当时他十三四岁，但有可能自1514年开始就被收养在克伦威尔的宅邸。可能是他的父亲——第二代多塞特侯爵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管家亨利·萨德勒（Henry Sadler）——把他带到了克伦威尔的面前。克伦威尔曾在1522年充任多塞特的律师（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因为格雷家跟国王关系密切），不过显然当时他已经认识亨利·萨德勒了。他很快注意到拉尔夫的潜力，并保证这个男孩受到极好的教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以及法律培训。拉尔夫很快证明自己堪当大任，而且克伦威尔开始让他承担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责任。他大约19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主人的秘书，这让他在法律、管理、财务尤其是政治等各个方面接受了基础训练。克伦威尔给了拉尔夫如此大的信任，后者开始负责撰写克伦威尔的大量信件。他因此直接接触国家事务，并且几乎可以像他的主人一样精准地理解国家事务的细微差别。这是一个信任度极高的职位，萨德勒证明自己完全可以胜任。不久之后，人们都知道他跟克伦威尔关系密切，开始请他帮忙。

萨德勒诚心诚意、忠心辅佐克伦威尔，不仅能够跟得上后者的节奏，甚至有着与克伦威尔相当的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干劲。他习惯以小时而不是以天为单位给自己的信件标注时间，由此可以很好地看到他繁重的工作日程，他经常凌晨4点就起床，很少在午夜之前休息。由此可以推断他的主人也是这样。克伦威尔有一次发牢骚说他一直“忙于其他的事务……几乎没有时间进食”。[24]

1523年克伦威尔在上流社会的快速爬升迎来了一个高点，他第一次进入下议院。[25] 那时，议会已经由一个国王召集显贵的臣民以传达自己意愿的集会演变成一个可以制定法律、批准征税，甚至偶尔反对王室意志的活跃机构。议会分为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成员为根据君主敕命出席的本国贵族，而下议院成员则是通过地方选举获得席位的人。

议会总体上是一个临时的机构。虽然会不定期举行集会，但每次集会之间间隔很长，都铎时期它的重要性得到极大提升。在亨利七世24年的统治中，他召集了7次议会，总共只持续了25周。相比之下，他的儿子在位37年间，召集了9次议会，总共持续了183周。自1529年以后，议会大多数都集中在克伦威尔手握大权的时期。议会成为克伦威尔施展他和王权影响力的重要舞台，让他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雄辩家和律师的优势。

1523年议会——自1515年12月之后第一次集会——之所以被召集起来，是为了给沃尔西激进的对外政策筹措资金。得益于克伦威尔的一个勤勉的书记员，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演讲的文字记录，由此可以难得地一窥亨利统治之下的议会辩论的喧闹实况。显然没有因议会首秀而感到紧张的克伦威尔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他利用那让他成为一名成功律师的出类拔萃的雄辩能力，冒险质疑国王长期以来意欲宣示自己对法国的古老的所有权。考虑到亨利是如此喜爱扮演伟大的勇士之王这一角色，这是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这同样也公然违背了他的新侍主的策略。但是，正如克伦威尔辩论的那样，英格兰没有能力负担与法国开战带来的巨额花费。他的长篇演讲巧妙地糅合了恭敬与理性。意识到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新来者，他的意见可能会被有权势的同僚忽视，他表示：“我认为我是所有人中最不配在诸位睿智、高贵的大人面前以任何方式发表自己看法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每当我思量的时候都会因敬畏而战栗的事情上。”他同样假装顺从这些“远比我有智慧、学识和经验”的人。

克伦威尔随后提出的论据源自他自身在法国军队服役的经历，因为他有能力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给出最新的评估。这给那危险的怀旧观点泼了冷水，这个观点经常以伟大的克雷西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为参考。克伦威尔在结论中建议国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英格兰北部边境构成威胁的苏格兰上。总之，在失去理智妄想获得广阔的海外领土之前，国

王应该先整顿好家门内的事。结束的时候，跟演讲开始时一样，他本着谦逊的姿态说："因此我表达了我纯粹、单纯的想法。"然而，这个演讲真正的妙处在于克伦威尔自始至终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国王坚定又强烈的忠诚。他宣称正是他对国王安危的强烈担忧促使他反对沃尔西的计划。这纯粹是权术，克伦威尔知道他在议会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详尽地记录下来并呈给国王。因此他重视并充分利用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奉承他的君主并给他留下印象。[26]

这次出色的演讲是克伦威尔谨慎的外交手段的早期迹象，这种谨慎也是克伦威尔日后对外政策的基础。我们虽然可以轻易将他对与法国开战的厌恶归咎于年轻时在法国的经历，但其实克伦威尔是一个精明、有洞察力且非常务实的人。虽然对自己最亲密的伙伴有着强烈的忠诚，但是他从不允许个人偏见主导他的事务决断。此外，他会适时地、始终如一地支持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不是与法国的联盟。

至于克伦威尔公开表达对与法国开战的异议是否背叛了他的新主人，这一点则颇值得玩味。沃尔西偏向好战的外交政策，因此可能会因为他的门徒如此有说服力地驳斥这一政策而愤愤不平。不过，也有人暗示，克伦威尔如此行事是受向来诡计多端的枢机主教的指示，是为他改变政策奠定基础的方式。但是，不管沃尔西怎样相信克伦威尔的能力，他不大可能会冒险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新人。况且，克伦威尔演讲的语气透露出他是真的试图制止这个他（凭经验）认为十分错误的政策。

虽然克伦威尔的辩论很有说服力，但是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议会拖了整整17周，几乎相当于平均周期的两倍。议会结束后不久，克伦威尔对他的朋友约翰·克雷克（John Creke）抱怨：

> 包括我在内的议员们都坚持了长达17周之久的议会，在议会上我们谈论了战争、和平、冲突、怨恨、富足、匮乏、贫穷、真实、虚假、正义、平等、欺骗、压迫、慷慨、敏锐度、力量、节制、叛国、

> 谋杀、重罪、调节，有争论，有辩论，也有窃窃私语，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在我们的王国建立并维系一个英联邦。然而结果我们做了前辈们惯常做的，我们可能也会习惯这样做，讨论最终又回到了起点。[27]

这是克伦威尔现存最早的信件。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因与这群威严的男人争吵而害怕，反而已经开始嘲弄议会的不足。这种天生的不羁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他的这一特点帮他结交朋友，但同样也为他树敌。

克伦威尔迅速理解了议会的运作方式，这反映出他头脑敏捷、适于从政。沃尔西曾经告诉他："你有很好的理解力。"[28] 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克伦威尔是一个聪慧的男人，非常熟悉政府事务，且足够理智，能对它们做出正确的评判。"[29]

克伦威尔给克雷克的信同样也说明了他出色的交友能力。这不是一个通常会与诡计多端的律师联系在一起的特质，但是这方面的证据令人信服。约翰·克雷克非常忠于自己的朋友克伦威尔，他广泛游历欧洲大陆，并告知克伦威尔发生在大陆上的各种事件。就在前一年的7月，他向克伦威尔寄了一封真情洋溢的信。"我对你的爱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一样热烈。我的心，像以前怀念别人一样，怀念你和沃达尔先生的陪伴……我的一生从未在如此短暂的相识中对别人产生如此真诚的情谊，这种情谊如火一样日益炽烈。上帝知道分开的时候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每每记起我们在你的花园里漫步，我就会不顾一切地陷入沉思。我想写更多，但是我的心不允许。"克雷克就此结束了他的信："但凭尊夫人差遣。"[30]

就克伦威尔自身来说，他是一个秉笔直书的通信者，完全没有一个知晓大量机密信息的人应该有的矜持。他答应克雷克，在后者还居住在毕尔巴鄂的时候，他会告诉后者国内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据说消息可以更新生命的活力"。不过，他的确采取防范措施在一些回件中使用了加密的标记。"据我所知，你所有的朋友都很健康，尤其是你担

心的那些人：你知道我什么意思，”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想用寓言来表述最好，因为我有所怀疑。”[31]

克伦威尔和克雷克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沃达尔先生”应该是约翰·伍德尔［John Woodall，或者是乌维达尔（Uvedale）］，是一名隶属于掌印司（the Signet Office）和国库的办事员。他比克伦威尔年长三岁，也像克伦威尔一样在政府开拓了一份事业，他很快引起了枢机主教沃尔西的注意。这三个人之间有一段融洽的友情，在一封信中克伦威尔告诉克雷克“伍德尔是一个没有妻子的人，我把他引荐给你”。[32]

克伦威尔和克雷克另一个共同的朋友是斯蒂芬·沃恩（Stephen Vanghan），一位英格兰商人兼御用外交官。他经常造访尼德兰，应该是在尼德兰的时候跟克伦威尔结识的。沃恩出生在商人世家，他自己也延续了这个传统，成为商人冒险家公司活跃的一员。他是一个跟克伦威尔一样勤勉的人，他的生意让他不断地往返于低地国家的各个市场之间。“我从来没有休息，”他曾经对一位通信者抱怨，“我一会儿在贝亨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一会在布鲁日，一会儿在根特，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这样经历了异常的麻烦我才能满足我服务的所有人……尽可能地取悦他们。”[33] 克伦威尔应该是肯定且尊重沃恩对自己事业的投入的。这种投入得到了回报，因为沃恩在商业圈的地位迅速攀升。不管有多少其他的需求，沃恩总是优先处理来自他的英格兰朋友的需要。“我会尽快答复你的指示，”他曾经向克伦威尔保证，“虽然作为一个为多个对象效力的人，这样做是不容易的。”[34]

他们的通信表明沃恩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克伦威尔，因为他的大多数书信结尾都是问克伦威尔的母亲安好。[35] 克伦威尔毫无保留地信任沃恩，两人很快建立了亲密、长久且互相扶持的友谊。1524年3月克伦威尔指任沃恩为自己在尼德兰的代理人。他是克伦威尔不断扩大的海外交际圈、代理人圈和朋友圈的第一人，这些人为克伦威尔提供宝贵的国

内外时事信息。沃恩以及克伦威尔圈子里的其他人在事实上充当了他的个人间谍，让他及时了解关于经济、政治事件的传闻和情报。克伦威尔不得不为这项服务花费大量金钱，一如沃恩在一封信中坦言："要知道这里的隐秘之事，一个人必须知道可以从哪些人那里了解这些事——这代价很高，是我力不能及的。"[36] 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回报，1526年克伦威尔帮助沃恩在沃尔西那里谋得一个职位，为沃尔西在牛津的学院"记录证据"。[37]

不过，他们的交往延伸到商业事务以外。沃恩受益于他的老主顾的殷勤好客，以及克伦威尔为他介绍的广泛人脉。克伦威尔视他为一个忠实的朋友，还把一名年轻的爱仆托马斯·埃弗里（Thomas Avery）托付给沃恩培养。在1529年埃弗里离开克伦威尔家去往尼德兰前不久，克伦威尔为这个年轻人准备了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慷慨馈赠。他要求沃恩确保埃弗里"得到适合他年龄的知识教育和培养"。他的朋友是一个理想的监护人，并且经常汇报这个男孩的成长状况。[38]

沃恩和克伦威尔一样热爱学习。沃恩可能受教于伦敦有名的圣保罗学院。沃恩知道他朋友的文学兴趣，会竭尽全力帮他找到在英格兰没有的书籍。这些书包括《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这是1493年首次出版的图解世界史。沃恩知道他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想要收到这本书的最新版，因为克伦威尔还提出给他寄些钱以加快寄书的速度。伤心的沃恩于1530年6月写信给克伦威尔说："我打心底跟你说实话，如果你想要我的外衣，你可以连同我的斗篷一起拿走，我不缺为我朋友做事的钱，所有朋友中我最尊崇的是你，我更不缺少为你做事的钱。"[39] 沃恩还给克伦威尔寄了一个地球仪并向他保证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物件"。[40]

这位商人乐此不疲地关心他朋友的安危。1528年3月，在回伦敦的一次旅程中，他有些惊恐地写信给克伦威尔，告知在他家附近发生的一

起暴力抢劫事件：

> 上周四，下午6点到7点之间，五个窃贼敲响了罗德雷戈（Roderego）的门。他是住在紧靠着你门口的金匠旁边的西班牙人。他问门外是谁，窃贼回答说："宫廷派来的，要找罗德雷戈问话。"门打开之后，三个男人冲进来，看到上面提到的罗德雷戈坐在火炉旁，与他为伴的是一位在温莎女士隔壁居住的可怜妇人。另外两个人等着，看着门，掐住妇人的脖子不让她大叫。然后他们拿走了罗德雷戈的钱包，并刺中他的腹部，将他杀害。

虽然窃贼很快被逮捕，但沃恩还是未雨绸缪，为克伦威尔的大门了订了一条结实的门链，这样"陌生人就没有办法进入了"。[41] 克伦威尔对沃恩也同样关切，后者曾经感谢他"亲切而慈爱的言语"。[42]

克伦威尔的其他朋友来自各个地方。一些来自他或他妻子伊丽莎白的家庭，还有一些是来自他不断加入的更有文化的圈子。他在意大利期间培养的对艺术和人文的热爱让他结识了亨利时代一些最重要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包括诗人托马斯·怀亚特爵士（Thomas Wyatt），他后来因与安妮·博林的交往而臭名昭著。据说他是"忠于"克伦威尔的。[43] 当时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律师爱德华·霍尔也成为克伦威尔的好友。虽然他们可能在法律圈结识，但是克伦威尔也热爱历史，并收集了大量历史著作，其中包括古代编年史和宪章的抄本。伦敦主教爱德蒙·邦纳（Edmund Bonner）——被福克斯称为"罗马（即教宗）教令最忠实的拥护者和保护者"——也会放下他对克伦威尔改革主义信念的不齿，一有机会就突然到访翻阅他家中卷帙浩繁的藏书。[44] 著名的宫廷画家汉斯·荷尔拜因也成为克伦威尔的熟识。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后者的赞助，这位艺术家才能得到如此好的名声。

克伦威尔到访意大利的时候正值人文主义盛行之际，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场旨在恢复古典知识的思想文化运动。人文主义学说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学习和翻译原著——这一原则在克伦威尔稍后生涯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这场运动的首要推动者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他的作品得益于1517年印刷机的出现而得到广泛传播。结果，这些作品迅速传到英格兰，被亨利八世宫廷的一些主要成员所接受。一个尤为活跃的支持者是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他跟克伦威尔的友谊开始于1519年前后。埃利奥特曾在巡回法庭在西部巡回的时候作为书记员为他的父亲服务，所以他跟克伦威尔有相同的法律和知识兴趣。这两人可能是在沃尔西注意到埃利奥特并任命他为枢密院书记员的时候结识的。虽然他和克伦威尔的宗教信仰不同，在未来几年会有数次冲突，但是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克伦威尔去世。

克伦威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是安东尼奥·邦维西（Antonio Bonvisi），一位生活在伦敦的成功的热那亚商人。他是为政府服务的银行业者，为在欧洲的外交使节们递送钱和信件。得益于他的人脉，他消息极为灵通，往往在国外事件的消息还没到达宫廷的时候就已经知情。因此，他对克伦威尔十分有用，但他们的友谊远不止是商业联系。邦维西亲近有学识的人，特别是那些——像克伦威尔一样——到过他的祖国意大利的人。克伦威尔能说意大利语这一点肯定也促进了他们的友谊。两人住得非常近，都在今天伦敦金融城的中心地带。

有趣的是，邦维西与那位后来会成为克伦威尔死敌之一的托马斯·莫尔也过从甚密。传奇的圣人莫尔给欧洲杰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带来了创作颂词和赞美诗的灵感。他是一个“有着非凡美德和纯净无瑕的良心的人，正如伊拉斯谟所说，比最白的白雪还纯净、洁白；作为一个英格兰人，他有天使般的智慧。伊拉斯谟说，从前及今后再无人能像他一样”。[45] 莫尔比克伦威尔年长7岁，他接受法学训练，年仅18岁的时候就被林肯律师学院录取。跟克伦威尔一样，他也因机智、令人愉悦的谈吐和出色的学识而出名。他也是人文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因此，他与当时欧洲一些主要的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联系，包括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以及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1516年莫尔出版的《乌

托邦》（*Utopia* ）——一本有影响力的人文主义小册子——轰动一时，并多次再版。这部作品讽刺欧洲社会目光短浅地追求物质，缺乏真正的基督教的虔诚和博爱。这样做表现了莫尔本人强烈的虔诚之心，这让他远离财富的诱惑。虽然他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人，但是他不在乎美食，喜欢水胜过酒，也不关心衣着。这让他与宫廷的大多数人不同，不过，他跟克伦威尔一样精通法律事务，加上他的魅力人格，确保了他会快速成名。

莫尔约于1515年开始为王室服务，他大概是沃尔西的一个门徒，并在三年后成为枢密院的一员。但他一直对廷臣生涯缺乏兴致。他的女婿，也是他最早的传记作者威廉·罗珀（William Roper）说他“有令人愉快的性情”，并且说“国王和王后对他很满意，在枢密院晚餐结束、他们用餐的时候，为了开心，经常找他来一起娱乐”。亨利非常喜欢莫尔的陪伴，以至于“他整月不能离开宫廷回家一次去陪伴妻子和孩子们（而他渴望与家人在一起），也不能连续两天不出现在宫廷里”。罗珀称他的岳父憎恨这种“对他自由的禁锢”，在国王身边也日益忧郁，结果——这无疑也是他的初衷——他不再那么频繁地被国王召见。[46]

克伦威尔服侍沃尔西，这意味着他跟莫尔几乎肯定有过交集。考虑到他们在个人兴趣和职业生涯上都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他们彼此间有可能十分熟悉。但是他们之间有着明显且危险的不同：莫尔极度自律、虔诚；克伦威尔则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莫尔不太在意个人财富和权力；而克伦威尔渴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权力。难怪人们习惯上会视他们为对立面：圣人莫尔和恶人克伦威尔。

约翰·福克斯对他俩以及斯蒂芬·加德纳进行了有趣的比较，说他们三个“从年少时就在一起成长（在沃尔西的府邸）”，年龄也大致相当：

> 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很大差别，虽然他们的性情和学业大不相同。尽管这三个男人有相似的学识和悟性，在本国的名望地位也大体相

> 当，并且莫尔和温彻斯特[47]可能更加博学，但这个人（克伦威尔）的天资更为聪慧、判断更敏捷，其口才也与前两者相当。而据推测，这个人也更能机警应变，还有一种英雄式的抑或王公式的气度，仿佛专为伟大且重要的事业而生。[48]

撇开福克斯对克伦威尔惯常的奉承不说，他指出莫尔和加德纳的“学识”得益于全面的教育，而克伦威尔则靠自学并且在天资上可能更胜他日后的这两位对手一筹，这一点还是合乎情理的。

邦维西不是莫尔和克伦威尔之间唯一的共同朋友。克伦威尔也和莫尔的连襟约翰·拉斯泰尔（John Rastell）成了亲密的伙伴，后者是一位出庭律师、议会议员、印刷商以及作者。他们有很多共同爱好，偶尔会在一起打保龄球并相谈甚欢。拉斯泰尔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这一事实后来预示着麻烦，但克伦威尔能够和一些在教义和政治问题上与他立场相反的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这一点也是他思想开放的一个证明。

克伦威尔社会地位的急速攀升促使他寻找新的居所。1522年9月之后不久，他和家人就从紧挨着伦敦塔的芬丘奇街搬到了宽街（Broad Street）上的奥斯丁会。虽然他们的新房子离曾经居住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却显示了他们地位的显著提升。奥斯丁会是一片隶属于奥古斯丁修道会（Augustinian Friary）的大型宗教设施，可追溯到13世纪60年代，坐落在伦敦城内，占地约5.5英亩，离现在的英格兰银行不远。建立这一设施的奥古斯丁修道会隐士在英格兰以奥古斯丁托钵修会之名为人所知，后者通常被略称为奥斯丁会。在1598年出版的对伦敦的调查中，古文物研究者约翰·斯托（John Stow）描绘了这座宏伟的教堂：“紧接着是奥古斯丁修道会教堂和教堂墓地：经由南门走进西门厅，可以看到一座很大的教堂，教堂顶上有一个最精致的塔状尖顶，纤细、高耸而笔直，我从没有见过类似的建筑。”[49]他继续列举了几个葬在教堂墓地的名人，包括理查二世的兄长，还有几个在伦敦塔和塔山被斩首的叛国

者，其中包括在1521年被斩首的白金汉公爵。

伦敦的修道院经常把辖区内的土地租给世俗租户并由此大赚一笔，奥斯丁会也不例外。奥斯丁会在辖区的西侧建了一些公寓，同时也在辖区外紧挨思罗格莫顿街（Throgmorton Street）的地方有一些房产。克伦威尔家位于宽街上的新居所就靠近这里，与奥斯丁会教堂墓地的西侧相接。他们的邻里都很好，因为修会其他房产的租户都是一些杰出的人，其中还有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他未付租金就离开了。他们北面隔壁的邻居是约翰·卡瓦尔坎蒂（John Cavalcanti），一个富有的意大利商人。虽然这充分反映了克伦威尔的新地位，但是考虑到他后来成了修会最大的敌人，他选择在奥斯丁会的地界上居住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



托马斯·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第一座房子（比例尺**1∶400**）

根据当时的记载，克伦威尔的房子实际上是一座三层的房舍，有三面、至少14个房间，还有一座花园。不过尚不清楚他和家人是什么时候搬到那里的，但这一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522年。那年12月，克伦威尔参加了一场宽街选区的会议，此时他显然已是该区的一个住户。[50] 1523

年年底，他当选宽街选区法庭的某一高级职位，有可能是负责为市议员编写本选区年度报告的书记员，那时他肯定就已经住在那里了。这是克伦威尔地位迅速攀升的另一个体现，因为在晋升到高级职位之前，他必须在选区几个级别略低的位置上任职。

有资料提供了其他几个关于克伦威尔这一时期家庭生活的线索。他的妻子伊丽莎白1525年肯定生活在奥斯丁会。她的母亲默西·普赖尔（Mercy Pryor）及其第二任丈夫不久之后也过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都十分优渥，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舒服的、布置精美的房间，有资料显示默西生活在这里直至去世。1532年当克伦威尔的一个熟人汇报说她身体康健的时候，她肯定还住在那里。[51] 克伦威尔后来给他的岳母留下慷慨的遗赠，说明他相当尊重她。

依靠仅有的关于伊丽莎白在奥斯丁会生活的零碎证据，可以知道她既承担了家庭事务又支持了丈夫的事业。1525年11月29日克伦威尔从肯特寄信给她，他在那里处理解散贝汉姆修道院（Bayham Monastery）一事。他给她送了一头在附近打猎时猎杀的母鹿。他的附信非常简短潦草。“伊丽莎白，愿你一切安好。我让这个信使给你送了一头肥美的母鹿，请你把其中一半送给我的老师史密斯，剩下的你留着享用。”信的其余部分包括其他数件需要他的妻子处理的差事：“还有，如果理查德·斯威夫特（Richard Swift）正在家中拜访，或者碰巧不久后即将到访，我希望他迅速来贝汉姆或者汤布里奇找我。请你把在那些聚会中得到的信息都通过这个信使发给我。”然后，他又想起来什么，写道：“还有，请在信里写下自从我离开你之后有哪些来找我商谈的人拜访了你。”他落款：“你的丈夫托马斯·克伦威尔。”即便这封信缺少情感，但至少证明克伦威尔信任伊丽莎白，让她在他不在的时候代表他，并向他汇报家里的人员往来。与信件内容相比，克伦威尔对妻子的称呼流露出更多的爱意。他在信封上题写道：“致我挚爱的妻子伊丽莎白·克伦威尔，请送至伦敦奥斯丁会。”[52]

伊丽莎白显然从她丈夫不断上升的地位中受益，因为她从迫切想讨他欢心的人那里收到了很多礼物。其中一位是威廉·巴雷斯（William Bareth），1525年11月，他“为了讨一夸脱酒喝”给克伦威尔夫人送了六只鸽。[53] 不过几乎没有关于她和她的三个孩子在奥斯丁会的日常生活的其他记载。安妮、格雷丝、格雷戈里幼年时期大概生活在家里，当时通常由妻子负责这一阶段孩子们的教育。在很多富裕的家庭里，男孩子7岁的时候会被指派一个家庭教师。格雷戈里是克伦威尔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所以他的父亲很可能非常热衷于为他的教育投入资源。除了学习拉丁语、希腊语、算术、古典文学和宗教典籍之外，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培训以为未来的事业做准备。有史料证据显示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同样从事法律和贸易行业，接管自己一手创立的盈利颇丰的生意。

格雷戈里有一段时间可能受教于约翰·帕尔格雷夫（John Palgrave，或称帕尔斯格雷夫），后者曾为国王的女儿玛丽担任家庭教师。1525年帕尔格雷夫被指派在布赖德韦尔宫辅导国王的私生子亨利·菲茨罗伊（Henry Fitzroy），布赖德韦尔宫离克伦威尔在城里的家很近，所以格雷戈里可能在那里跟菲茨罗伊一起学习。帕尔格雷夫制订的学习计划颇具野心。受当时一些最伟大的学者的影响，包括托马斯·莫尔、托马斯·埃利奥特、斯蒂芬·加德纳，他的学习计划包括语言、古典文学、法律和音乐。但是他跟沃尔西交恶，次年被辞任。

相比之下，女儿们幼儿时期的教育是母亲们的责任，只有最有权或者开明的家庭才会为她们花钱请一个家庭教师。女孩们常常生活在家里直到成人，她们的学习通常仅限于缝纫、刺绣、跳舞、音乐和骑马。培养的主要目标是把她们变成敬虔的、有道德的年轻女性，擅长家庭管理和社交。鉴于她们的追求被限制在婚姻上，一个女孩在这些“身为人妻的”技艺上受到的教育越好，她的父亲为她找到一个好丈夫的可能性越大。16世纪后期，加尔文教牧师约翰·诺克斯（John Knox）说：“女人最完美的品德就是服侍、顺从男人。”他声称女性“软弱、不堪一击、焦

躁、不可信且愚蠢……经验证明她们善变无常且残酷，缺乏协商态度和组织精神”。[54] 为了增长学识而学习是不被鼓励的：一个女人能从智力激发中得到什么乐趣呢？亨廷顿伯爵夫人凯瑟琳·波尔（Katherine Pole）认为她的四个女儿离开她的照料时“尽管没有过多的学识，但是识字”。在男人看来，这是一个自然且令人满意的状态。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女人被比作一个拿着剑的疯子：她会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中。

这个一般惯例也有例外。托马斯·莫尔爵士让她的所有女儿接受了跟男人同等的教育。他在音乐和文学上指导妻子，使她在原来接受的家庭教育上有所提升。亨利八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后来成为一个天资聪慧且早熟的学者，她在8岁时就已经在学习几种语言，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与之相反的则是亨利的两任妻子简·西摩尔和凯瑟琳·霍华德，她们几乎不识字。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生意人，克伦威尔肯定计划给女儿们安排好的婚姻，因此会确保她们掌握当时社会通行的为妻之道。但是很难想象他没有让她们分享他那普世开明且富有修养的背景所带来的好处。克伦威尔后来的生涯显示他热衷于男孩们和女孩们的宗教教育。此外，克伦威尔在1529年起草的遗嘱中特意提到了安妮和格雷丝的教育，留下了11英镑的遗赠用于两个女儿直到长大成人之前的“道德教育和培养”，[55] 这表明他重视女儿们的教育超过当时常见的程度。克伦威尔成长在一个由女性主导的家庭，跟父亲相处得并不好。有证据显示他在后来的生涯中对女性抱有积极的看法。一些他最常往来的通信对象都是女性。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为那些向他寻求帮助的妻子、寡妇和女儿们在诉讼中取得进展。[56]

我们可以看一下克伦威尔是如何利用他服侍沃尔西之余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的。他在家用餐的时候通常是跟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家人总是在一起用餐。一天只有两顿主餐：午餐通常是11点进行，而晚餐通常是

在晚上5点到6点之间。宴会通常在特殊情况下举行，用餐时间（和菜单）也会大大增加。克伦威尔家有能力提供以都铎时期的标准来看可谓丰盛的饮食，有分量可观的烤肉、炖肉、家禽、鱼、面包、麦芽酒和葡萄酒。他们在水果和蔬菜的食用方面较为克制，1500年的一本居家手册告诫读者“要注意绿色植物和生的水果，因为它们会让你的身体不舒服”。人们认为水果会加重瘟疫，所以在异常致命的瘟疫爆发时会禁止售卖水果。[57]

在大多数普通家庭，食物是用木质餐具盛放的。最大的“盘子”是一个薄的正方形木板，中间有一个大的凹陷用来盛肉和肉汁。克伦威尔家的一份清单表明他的餐具在16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财富的增长换成了锡铅合金制的，可能他是想仿效他的侍主所举办的盛大晚宴。乔治·卡文迪什描述了沃尔西家庭及其宴客用餐时盛食物的精致餐具：在一个大的碗橱里摆放着“6层架子高的、满满的金制餐具，非常奢华，都是最新的样式，在最下面一层架子上的餐具全部由黄金装饰、加工尤为精巧细致”。[58]

克伦威尔在欣赏艺术、文学和音乐之余也热衷园艺，或许还在他新近加入的宫廷社交圈的影响下培养了对驯鹰捕猎的热爱。他是一个好客、慷慨的主人。1529年夏普伊大使在英格兰任职之后在克伦威尔的住宅附近租了一栋房子，他描述克伦威尔“好客，在财产上慷慨大方，言谈彬彬有礼，家庭出色、房舍华丽”。有一次，他回忆克伦威尔对他的接待“跟往常一样，极为和善”，还有一次他说克伦威尔“按照他一如既往值得称道的习惯，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59] 尽管是对手，但夏普伊也承认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言谈彬彬有礼的、举止慷慨大方的人”。沃尔西的一个仆人托马斯·阿尔瓦尔德（Thomas Alvard）也认同夏普伊的体会。他对克伦威尔极尽赞美之词：“您的持家待客之道让我看到，除了国王以外，没有一个英格兰人能像您一样接纳并款待国内外的来宾。”[60]

一份1527年6月奥斯丁会的清单提供了一条关于克伦威尔及其家庭生活方式的引人遐想的线索。[61] 这份极为详细全面的“克伦威尔大人家中物品”清单包括从家具、室内陈设、衣物和珠宝到碗橱中木板和桌上锡铅合金制的盘子数量。清单上甚至描述了摆放在其中一个卧室里的“老旧安乐椅”。整个清单就是对克伦威尔良好品味的证明。

显然在那个时候克伦威尔家的生活相当舒适。奥斯丁会的房子有三翼，主要的房间在前翼，俯瞰教堂墓地，大厅和走廊与位于后面的勤务侧翼连接，显然这个住宅不仅可供居住，还可以用来宴请宾客。勤务侧翼有厨房、酒储藏室、食物储藏室和柴棚。个人起居室在第一层，卧室（总共有8个）在第二层，仆人的房间在顶层。另外还有一处配备齐全的地下室。

克化威尔家的每个房间都按照最新流行品味和风格进行装修。位于一层的起居室尤其宏伟，铺有地毯并且配有长桌和屏风，也是克伦威尔的客人到访时要展示的地方。大厅经由“大门”亦即气派的门廊进入，是克伦威尔招待密友或者重要来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奢华的陈设才显出最炫目的效果。即使最显贵的大使都会对房屋主人坐的那把“镀金的大椅子”——他个人宅邸的宝座印象深刻。这里还有三把稍小一些的“女人专用”的镀金椅子、十二个镀金凳子和脚蹬、一张镀金桌子、一个橱柜和一面镜子。地板上铺着精美的地毯，房间各处放有绣着兰开斯特红玫瑰的软垫。克伦威尔对他的另一位侍主的忠诚可以从“画布中镀金的枢机主教大人的纹章”中看出来。他同样还展示了他的第一个贵族客户多塞特侯爵的纹章。此外，皇帝查理五世的一幅画像则是一个更令人惊讶的大胆收藏，毕竟英格兰国王的外交政策经常在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和支持法国的立场之间变幻不定。但是克伦威尔显然觉得可以在自己家中表达自己的个人偏好——虽然它算不上一个私密的宅邸。有记录表明他在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曾多次在这里主持枢密院会议。

大厅和起居室都装饰有一系列宗教图画，包括罗马的卢克雷蒂娅（Lucretia Romana）的画像。根据传说，贞洁的卢克雷蒂娅是贪恋性爱的塔尔奎尼王子（Prince Tarquin）追求的目标，后者的暴行导致了罗马君主制的终结。尽管这个故事在这份清单被列出时众所周知，也可能成了其他显赫家族中收藏的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但我们也不禁猜测克伦威尔在16世纪30年代作为亨利八世的臣仆时是否将画作拿掉了，毕竟那个时候现实（以安妮·博林这一形式）已经与艺术过于相像。[62]

奥斯丁会宅邸最大的卧室是供克伦威尔和妻子就寝用的新房间。卧室中间放着一张有羽毛床垫的华丽大床，左右两侧是红色和绿色的床帘和镀金的铃铛，床下铺有精美的羊毛地毯。清单描述了这对夫妇拥有的多件长袍，这些长袍都由绸缎、天鹅绒和其他珍贵的布料制成，镶有很多不同的毛边。克伦威尔自己有至少16件紧身上衣，其中两件是深红色绸缎的，一件是黄褐色塔夫绸的，还有一件是黑色天鹅绒的。他还有很多紧身裤、手套、帽子和其他配饰，都是由最好的材料制成。他的日常穿戴也是一样，他有一件“蓝褐色”骑射外衣和一件镶有狐狸毛边的睡衣。他的妻子也有不少盛装，包括红褐色、黄褐色、黑色绸缎和天鹅绒的裙子，还配有项链、手包和帽子，其中有“一顶威尼斯金的贴头帽”——这是克伦威尔的众多珍品之一，显示出他对意大利事物的无比钟爱。

他们的衣服上还点缀有珍贵的珠宝。克伦威尔尤其喜爱金戒指，清单中列出了20枚不同的金戒指。其中有“一枚镶有平面钻石的金戒指”和“一枚镶有心形绿松石的金戒指”，两枚戒指在清单列出时仍戴在“我主人的手指上”。还有一个“大的平面红宝石”、一枚带着别针的珍珠和“一块镶在金子上的三角形钻石”。他的其他贵重物品包括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金银餐具，其中有银制高脚杯、勺子和盐碟，一个镀金杯子和麦芽酒罐，还有一个用银装饰的精致玻璃杯。

较为私人的房间里放置的物品可能更能体现克伦威尔的个人品味。其中，起居室的一块“桌布上印染有一对男女情侣的图案”。还有一张桌子的左右两边是沃尔西的纹章，克伦威尔在家里的公共和私人房间里都对此有所表现，表明了他对侍主的忠诚。克伦威尔家中还有两幅世界地图——一幅在起居室，一幅在用人住处——有这样一个四处游历的主人，这并不意外。他为其中一个挂毯选择了一个适合的主题：“一个镶边的阿拉斯挂毯，上面是消遣放松的图景。”

用人房间出人意料地舒适，墙上挂有壁毯和图画，有雕刻着花纹的镶金的床和羽毛床垫，还有一个新的壁板橱柜。紧挨卧室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大的船用箱子，用佛兰德斯铸造厂生产的扁铁条绑着，上面覆盖着黄色的羽毛。房子里还有几只这样的箱子，这表明很多——或者说大多——克伦威尔的贵重物品可能都被收藏起来了，不为人所见。

厨房的物件暗示了克伦威尔家庭及其宾客丰盛、多样的饮食。一个“大且圆的烤肉叉”立在火炉前，还有很多圆锅、平底锅、大浅盘、刀、壶、麦芽酒壶和红酒壶。从“铜质的阉鸡容器”、“挂肉的钩子”和“蒜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克伦威尔家厨房日常烹饪所用的一些食材。克伦威尔因大方好客而闻名显然是理所应当的。

房子的北面有一处小花园（约1/20英亩，220平方米）。清单没有提供关于这个花园的详细信息，不过如果在17世纪的房产调查时花园仍没有变化的话，这处小花园应该包括两座都铎时期盛行的方形结纹园，周围环绕有砾石铺就的小道。花园的东北角还有一座拱形的凉亭。[63]

克伦威尔家中齐全的配置足以供他招待重要的客人，而他因大方好客闻名也证明他愿意投入相当数量的钱用于宴请和款待宾客。他雇有一支由约12名音乐家组成的小型管弦乐队，他的账本上记为“布赖恩先生的音乐家们”。[64] 他还赞助了一个剧团。“克伦威尔大人的表演者们”不仅在他的府邸表演，也到英格兰各地巡演，巡演最远到过德文郡的巴恩

斯特普尔和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修道院。[65]

克伦威尔和家人生活的舒适度毋庸置疑，但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存有一种节制近乎节俭的意识。克伦威尔早年在佛罗伦萨街头乞求施舍的经历让他没有完全丢掉节约的习惯。在贵族宫廷同僚浪费大量钱财互相攀比炫耀的时候，他有计划地把钱花到最有用的地方。他这样做很有效果，以至于他的熟人都误以为他生活得跟那些公爵一样奢华。“他生活奢侈，”夏普伊说，“并且异常讲排场，热爱炫耀他的家庭和府邸。”[66] 事实上，克伦威尔的账本表明当他没有宴请重要宾客的时候，他甘于过简单的生活。这也体现了他的务实主义和他的自制力。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宫廷里或者在生意场上，所以为什么要浪费钱财修建一栋用于不间断宴饮娱乐的宅邸呢？他不是沃尔西，沃尔西的住宅和府邸几乎可以和宫廷相媲美，而克伦威尔权力的中心就在宫廷里。

数个世纪以来，克伦威尔背负着一名贪婪官僚的恶名，但他慷慨接济伦敦穷人的史料证据令这一形象缺乏说服力。一个生意上的联系人劳伦斯·贾尔斯（Lawrence Giles）曾向克伦威尔和他的妻子致信问好并感谢他的善意，向他保证上帝会眷顾那些帮助穷人的人。“在我来看……大人已受到上帝眷顾了。”[67] 《西班牙编年史》（*Spanish Chronicle* ）佐证了这一点。一位居住在伦敦的西班牙商人［可能是安东尼奥·德·瓜拉斯（Antonio de Guaras），1529年随尤斯塔斯·夏普伊来到英格兰］于1552年之前编写的《西班牙编年史》漏洞百出，带有来自神圣罗马帝国视角的强烈偏见。尽管如此，几乎可以确定作者亲眼看到了他所描述的其中一些事件，所以它仍有一些可取之处。他后来回忆克伦威尔深受都城人们的爱戴，这说明他的慷慨是持续且为人熟知的。伦敦人同样也对他通过辛勤努力致富，而不像富裕阶层的大多数人那样靠继承财产发家的人生历程怀有肯定和敬佩的态度。

---

[1] Cavendish，*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p.7.

[2] Tyndale，W.，*The Practice of Prelates*（London，1530），p.307.

[3] Weir，A.，*Henry* Ⅷ：*King and Court*（London，2001），pp.1-2，19.

[4] Weir，A.，*Henry* Ⅷ：*King and Court*（London，2001），p.2.

[5]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389；Weir，A.，*Henry* Ⅷ：*King and Court*（London，2001），p.3.

[6]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p.712.

[7]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London，2002），p.3.

[8]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1-12.

[9]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6.

[10]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1.

[11]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1-12；Tyndale，W.，*The Practice of Prelates*（London，1530），p.307.

[12] Brown，R.（trans. and ed.），*Four Years at the Court of Henry* Ⅷ：*Selection of despatches written by the Venetian Ambassador*，*Sebastian Giustinian*，*and addressed to the Signory of Venice*，*January 12th 1515*，*to July 26th 1519*，2 vols.（London，1854），Vol.I，pp.139，15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Part ii，Appendix，no.12.

[13]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02.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Part i，no.1959.

[15]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2.

[16] Ward，P.J.，‘The Origins of Thomas Cromwell’s Public Career：Service under Cardinal Wolsey and Henry Ⅷ，1524-30’，Ph.D.diss.，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99），pp.23-24.该处提供了对这个争论的一个实用的总结。

[1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2.

[18]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8.

[1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14-15.

[20]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 pp.388-389.

[21]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108.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I，no.2441.

[23] 例如，可参见*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I，no.2624。

[24]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45.

[25] 他的选区尚未得到确认。

[2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0-44.

[2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13-314.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262.

[29]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 Vol.IV，Part II.ii，p.752.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II，no.2394. 克雷克（又写为克里克）可能是文案处的一个文员。这是大法官法庭的一个职位。文员，也称为文案管理者，通过为特许状、公有土地转让证书和令状等盖章而获得工资和其他收入。

[3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p.313-314.

[3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314.

[33] BL Cotton MS Galba B x fo.9r.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no.247.

[35] 例如可参见*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429。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no.247.

[37] Richardson，W.C.，*Stephen Vaughan，Financial Agent of Henry* Ⅷ：*A Study of Financial Relations with the Low Countries*（Louisiana，1953），p.18.

[38] 例如可参见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429。

[3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429.

[4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744.

[4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4107.

[4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 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 1862-1932）， Vol.V， no.247.

[4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V， p.93.

[44]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 1563）， Book III， p.650.

[45] Sampson， G.（ed.）， *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with Roper's Life of More and some of his letters* （London， 1910）， p.203.

[46] Roper， W.， *The Lyfe of Sir Thomas Moore，Knighte*， ed. Hitchcock， E.V，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97（Oxford， 1935）， pp.11-12.

[47] 指加德纳，他曾任温彻斯特主教。

[48] Foxe，J.， *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 1563）， Book III， p.648.

[49] Stow， J.， *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ed. Morley， H.（Stroud， 1994）， p.190.

[50] 感谢尼克·霍尔德（Nick Holder）博士分享他关于奥斯丁会的极佳而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伦敦的中世纪修道院》（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中。

[5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 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 1862-1932）， Vol.V， no.1509.

[52] Ellis， H.（ed.）， *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2nd and 3rd series（London， 1827， 1846）， p.125； Merriman， 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 1902）， Vol.I， p.3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 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 1862-1932）， Vol.IV， Appendix， no.57.

[5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 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 1862-1932）， Vol.IV， no.1768.

[54] Knox， J.， *First Blast of the Trumpet Against the Monstrous Regiment of Women*， first published 1558（New York， 1972）， pp.9-10.

[55] Merriman， 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 1902）， Vol.I， pp.56-63.

[56] Black， M.et al.， *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 （London， 1993）， pp.284-287.

[57] Black，M.et al.，*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London，1993），p.140.

[58] Black，M.et al.，*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London，1993），p.156.

[59]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90；Vol.VI，Part I，p.17.

[6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09；Vol.IX，no.862；Weir，A.，*Henry* Ⅷ：*King and Court*（London，2001），p.307.

[6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3197. See also 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

[62] 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p.161.

[63] 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p.161.

[6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s.819，840，855；Vol.XIV，Part ii，no.782.

[65] Robertson，M.L.，'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The Ministerial Household i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75），pp.101-102.

[66]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69.

[6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1732.

第三章“并非没有懊悔”

大约与克伦威尔家搬到奥斯丁会同时，宫廷里出现了一张新面孔。1522年，野心勃勃的政客兼外交官托马斯·博林（Thomas Boleyn）在阿拉贡的凯瑟琳府中为当时21岁的小女儿安妮寻了一个职位。上任之后，安妮迅速成为宫廷的主要侍女之一。她的风范和教养令她与众不同，而这两样都是在世界上最奢华的宫廷之一里得到打磨以至完美的。从一开始，她和她的姐姐玛丽就接受训练，以通过联姻提升家族的贵族资历，帮助她们的父亲托马斯在政治阶梯上更上一层楼。在这之前，他曾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帮两个女儿在亨利八世的妹妹，即于1514年10月嫁给年老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玛丽·都铎府上谋得了职位。

博林家的女孩以不同的方式给法国宫廷留下了印象。不管是否属实，玛丽风流放纵的名声很快传了开来。与此同时，安妮在活泼且充满智识刺激的法国宫廷茁壮成长，并培养了对学习的终生热爱。她最亲密的伙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Ⅰ）的妹妹纳瓦拉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Navarre），她激发了安妮对文学和诗歌的喜爱。安妮也是在法国养成了对活跃交谈的热爱，这个本领让她在进入英格兰宫廷之后从那些安静、温和的淑女中脱颖而出。

安妮完全接受了法国的礼仪、语言和风俗，以至于宫廷诗人朗瑟洛·德·卡莱斯（Lancelot de Carles）说：“她变得如此优雅，你会认为她生来就是法国女人而不是英格兰女人。”[1] 安妮高雅的品味和讲究的衣着广受赞美，也得到了一位名为皮埃尔·德·布朗托姆（Pierre de Brantôme）的资深廷臣的称赞，他说宫廷里所有时尚的女性都尝试模仿

她的风格。他说她拥有“可与维纳斯相媲美的优雅”，是“法国宫廷所有美丽的女人中最美丽、最迷人的”。[2]

路易国王婚后仅三个月就去世了（有人说他因竭力满足年轻的新娘而逝世），他的遗孀急速返回英格兰。两个博林家的女儿继续在法国待了几年。玛丽成为新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据说他称她为自己的“英格兰母马”或“乘用马”并曾有幸多次骑在其上，不过这当中可能存在不正当的诋毁。1519年年末，玛丽被召回英格兰，与父亲一同在宫廷侍奉。之后不久，她嫁给了威廉·凯里（William Carey），但这并没有阻止英格兰国王把她变为自己的情妇。

不过，她的妹妹安妮已经喜欢上了在法国的生活，所以在玛丽离开之后继续在那里待了两年。她的父亲托马斯·博林于1522年召她回来，计划把她嫁给她的表兄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安妮后来择偶的目光能有多高。回国之后不久，安妮参加了1522年忏悔节主教沃尔西为国王筹办的宫廷盛大表演，在其中扮演“毅力”（Perseverance）的角色——联系到后来事情的发展，这一角色尤其适合于她。

安妮·博林进入宫闱一事对克伦威尔没有明显的影响，后者越来越忙于他蒸蒸日上的事业。1524年他被委任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补助金专员，一个地位高但不受人欢迎的角色，职责包括计算人们土地和私人财产的价值以便征税。同时，他也因在普通法业务上的成功表现被选为格雷律师学院的会员。随着声名渐盛，他收到了越来越多来自知名客户的请求，其中有托马斯·赖奥思利（Thomas Wriothesley）。他来自一个野心勃勃的家庭，曾受白金汉公爵和第五任南安普顿伯爵的资助。他受教于剑桥，得到了受人尊敬的学者斯蒂芬·加德纳的庇护，后者在日后成为廷臣。赖奥思利以他的睿智、正直和不凡仪表而出名。后来有人赞扬“他是一个认真的属下，不管接手什么，都很少犯错，能利用智慧或

勤奋达成他的目标”。[3] 此外，《西班牙编年史》把他描述为“英格兰王国最睿智的人之一”。[4] 赖奥思利放弃了学位，选择在宫廷发展。在1524年，只有19岁的他向克伦威尔寻求法律帮助，但客户-服务者的关系很快被逆转过来，他开始帮克伦威尔处理一系列宫廷行政事务，并称克伦威尔为“主人”。他还被任命为国王的信使，并把熟悉宫廷的所有事务视为己任。简言之，他是一个可以结识但不能完全信任的有用之人。尽管如此，克伦威尔还是赏识他的聪慧和勤奋，并在后来的几年将一些涉及英国内外的任务交给他，且这些任务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克伦威尔的另一个客户对他的未来发展更加重要。1524年2月，一个来自约克郡、名叫罗伯特·乌特雷德爵士（Robert Ughtred）的骑士把约克城附近的凯克斯比庄园卖给了约翰·阿林（John Aleyn），后者是一位伦敦市参议员，也是绸缎商人行会的资深成员。在得到这处地产之后，阿林马上雇用克伦威尔负责把它卖给了沃尔西主教。沃尔西在这场买卖中的一名代理人托马斯·赫尼奇（Thomas Heneage）对克伦威尔处理产权转让的本领印象深刻，并请求他代自己处理一些个人交易。两个人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525年1月，沃尔西交给克伦威尔的一个任务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沃尔西让他帮助调查6座可以用来改造以供牛津的主教学院使用的修道院，克伦威尔随后负责解散了另外30处小的宗教场所，以为美化主教学院和筹建沃尔西在伊普斯威奇的文法学校提供资金。[5] 两个建筑项目都很铺张，导致成本过于高昂。将宗教场所的收入转到类似的建筑工程上来是有先例的，但是之前从未有如此规模的尝试。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其负责人需要精通法律知识。除了调查、估计修道院资产的价值外，在剥夺他们的家具和财富并将他们的土地出售或出租之前，克伦威尔还要列制详细的清单。他已经证明了自己擅长产权转让，这一事实让他成为最适合这项任务的人。

接下来的两年，他和一群助手一起致力于出售这30座修道院的土地和动产。一贯关注细节、不心存侥幸的克伦威尔亲自监督了这些资产的让渡和解散。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也是一段在后来对他极有价值的经历。截至1526年8月，被迫用于资助牛津主教学院的房产的相关文件装满了34只袋子。在评论他在这项任务中的细致时，一个匿名的同时代编年史家说："这位克伦威尔是如此勤奋，他面面俱到，那些可怜的男修道院院长们则只求讨好主教，通过克伦威尔给他送了很多钱，却不明白主教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6]

两年后克伦威尔汇报说："我听从您的命令，又去了一趟沃灵福德的最后一个修道院的旧址，在那里我发现所有教会的装饰和其他日用器具都被运走了，一无所剩。只剩下一些证据，我已经整理好寄给了您在牛津的学院。" [7] 1529年1月克伦威尔在写给斯蒂芬·加德纳的一封信中详述了这项任务的规模和加诸自己身上的重担。他请加德纳向沃尔西解释他的缺席，恳请道："我有一些关于他在伊普斯威奇的学院的账簿需要整理、完成。"这些"账簿"包括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许可证、契约，还有一些与修道院土地转让相关的地契。克伦威尔意识到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这是证明自己价值的不二良机，所以他没有把这项任务的任何一部分委托给别人。他承认，虽然并非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准备好或者在他看来已尽善尽美"，但他仍希望在"明天晚上或者周三中午"完成并在完成的时候直接拿给"我的大人"。 [8]

克伦威尔参与的这份解散30座修道院的工作发生在英格兰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点上。1525年9月，威廉·廷代尔翻译出版了英文版的《圣经》。在那之前，大多数人无法接触上帝的话语，因为大多数可用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尽管有更早的译本，但是廷代尔的版本史无前例地利用了印刷机这一新技术，得以供空前广泛的受众群体阅读。它还吸收了马丁·路德的教义，后者的激进神学在欧洲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普及。

认为此时的克伦威尔在为沃尔西执行任务时受到激进改革主义信仰驱动的观点是可疑的。他的勤勉更像是为了证明自身价值，并为他的侍主和自己谋利，而不是为了任何宗教信念。不过，自从1517～1518年在意大利游历期间阅读了伊拉斯谟的译本之后，他就对《圣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次游历的时间与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新教神学在德国兴起的时间重合，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正是于1517问世。在质疑教宗权力的同时，路德谴责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尤其是对圣徒和圣物的崇拜，以及出售号称可用于“收买”上帝饶恕的赎罪券的行为。与之相反，路德主张救赎只能凭信仰心获得。这就是新教运动的中心教义，后来被称为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

这些观念在诸如威廉·廷代尔、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和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等“激进”传道士的帮助下逐渐渗透英格兰。当罗伯特·巴恩斯于1525年平安夜在剑桥讲道的时候，这座城市迅速成为改革主义信仰的温床，并跟伦敦一起成为新教书籍传播的中心。改革主义者谴责罗马天主教滥用信仰的种种劣迹，常见于修道院内的腐败行为也位列其中。他们鼓励信徒个人直接学习经文并建立一个总体上跟上帝更亲密的关系，远离罗马天主教会——尤其是教宗本人的束缚。克伦威尔没有立即拥护这种信仰，尽管他对此至少是持开放心态的。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对改革主义信仰越来越感兴趣——因为这不仅符合他的私人利益，也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沃尔西手下的另一个人在后来成为克伦威尔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他就是剑桥学者和神学家斯蒂芬·加德纳。时年约30岁的加德纳从1524年前后开始服侍沃尔西，很快就在其任职的一系列教会圣职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教会法的专家，他对沃尔西和亨利八世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还是一个老练的外交家，曾在1527年陪同沃尔西出使法国。尽管主教对加德纳十分满意，以至于拒绝把他转让给国王，但加德纳还是越

来越多地参与到国王的事务中去。加德纳以为人圆滑和两面三刀而著称。对他缺乏好感的福克斯说他“无比残酷，也无比敏锐、狡猾，睁大眼睛时刻准备着抓住机会妨碍福音的传播”。福克斯说加德纳“看起来是一个不为其他、专为破坏良善而生的人”。[9] 加德纳在1531年被派到温彻斯特教区任主教之后，曾称自己是“狡猾的温彻斯特人”。[10] 据一个立场与他对立的资料来源显示，加德纳的长相显示出他邪恶的本性：“这位博士肤色黝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眉毛紧皱，两眼之间宽有1英寸，钩状的鼻子如秃鹫一般，粗大的鼻孔总是像马一样吸气，他的嘴很小，脚掌像魔鬼一样大，脚趾像葡萄一样，比普通人的脚趾大2英寸。”[11] 虽然加德纳自己坚持说：“我从未想过恶意对待任何人。”但是他跟克伦威尔的关系证明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12]

这期间，克伦威尔也在留心他的侍主在牛津和伊普斯威奇的学院建设工作。他起草所有必要的契约，在审查工人们的账目时锱铢必较。此外，他亲自监督工人们，并定期去两所学院检查施工状况。伊普斯威奇学院的院长向沃尔西汇报说克伦威尔“煞费苦心地”确保所有来自被迫解散的修道院的珍品和家具陈设都被极为小心地搬进了侍主的新建筑中。到1528年4月他才向他的侍主汇报：“您（在牛津）的学院建筑极为豪华、宏伟，排列得当，每一个人都说其规模、华美、精巧前所未有，它是同类建筑中最牢固的。”他补充说，小礼拜堂每日的礼拜是“如此虔诚、庄严、充满和谐，在我看来鲜有可与之媲美者”。[13]

后一个评论暗示了克伦威尔的虔诚，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他和他的同僚们在工作中展现令时人震惊的严酷无情。约翰·福克斯后来记录到，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招致若干迷信之人的怨恨，有一些贵族将之禀告了国王”。[14] 不久，亨利本人听闻了这件事，并要求沃尔西更加严格地监督他手下侍从的工作。“我听到了国王和贵族们关于阿伦先生（约翰·阿伦，后来的都柏林大主教）和克伦威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评论”，国王的大臣威廉·奈特博士（William Knight）在一封给枢机主教的信中如

是说。

据其批评者所言，克伦威尔不仅无情，而且腐败。沃尔西的政敌在一次破坏解散修道院行动的尝试中，指控克伦威尔将所得的一些钱财转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虽然他可能期望收到一些礼物作为对其辛劳的补偿，这一点情有可原，但是看起来他确实越界了。如果一个修道院足够富有可以给他贿赂，那么它就可以逃过镇压。相比之下，从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修道院里收缴的财产通常进了克伦威尔的口袋，而不是被用来资助新学院。因为这次解散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和其他世俗民众可以向克伦威尔提出收回土地的请求，但只有他们给予的贿赂足够多的时候才能得到批准。难怪到1527年8月他已经激起如此深的敌意，以至于有传言称一个名叫佩恩（Pen）的“教会人士”“正伺机刺杀克伦威尔”。[15]

与此同时，枢机主教波尔也记录了一则流言，说沃尔西的这位被人藐视的代理人被送进了监狱，并将很快因他的罪行而受罚。[16] 在作者不详的《西班牙编年史》中也提到了这则流言。它说愤怒的亨利召见克伦威尔问罪：

> 国王一听说克伦威尔自己从修道院敛获了如此多的钱财，就召见了他并问他：“进前来，你在修道院的这些抢掠是怎么回事？”克伦威尔大胆地回复他：“国王陛下，我没有抢掠，我只是照着我的侍主枢机主教的吩咐行事，再无其他。我拿来的钱财是修道院院长自愿给的，是给枢机主教的礼物。陛下您知道枢机主教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我则照他的指示行事，因此我给枢机主教带回了30000镑。”国王随即对这位克伦威尔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这样跟他说：“去吧，克伦威尔，你比别人以为的要聪明很多。”国王没有像别人想的那样绞死克伦威尔，反而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以后你应该做我的秘书。”这是这位克伦威尔晋升的开始，后来他比枢机主教更有权势。[17]

这种叙述虽然有趣并且有一些事实基础，但是它合并了令克伦威尔得势的几个不同的事件，据传发生在他和国王之间的这场对话在其他同时代文献中也没有记载。

事实上，知道克伦威尔不正当交易的更有可能是沃尔西而不是国王，但是他非常乐意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的新助手比他更擅长这项极为宏大而复杂的任务。卡文迪什说：“克伦威尔先生在处理这些学院用地时公正而缜密，尽职尽责、恰到好处，他睿智的处事和对我的大人、他的侍主真诚、忠实、勤勉的服侍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尊重。”[18] 虽然克伦威尔在沃尔西府邸从未有过较高的正式职位并且很少（至少没有正式地）参与国家大事，但他仍通过越来越多地主管枢机主教的法律事务以及广泛的宗教布施与庇护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很快，他就被很多请求得到枢机主教帮助的人所包围。请求者们意识到要获得沃尔西的眷顾，他们得先赢得克伦威尔的好感，他们不只把他作为渠道，而是极为恭敬地尊称他为“正直而尊贵的克伦威尔先生”“教宗使臣大人的顾问”。[19] 虽然很多有求于克伦威尔的人是即将因修道院解散而失去房舍和生计的贫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比如约克修道院院长、第二代伯纳斯男爵约翰·鲍彻（John Bourchier）。

在被提升为枢机主教首席顾问的同时，克伦威尔的个人法律事业也得到发展，他成为伦敦城最有名望的律师之一。事实上，这两个职业是互补的：沃尔西的名字如此有分量，以至于客户竞相与他的首席代理人建立联系。

因为宫廷的形势发生了意外且令人不安的转折，沃尔西很快就将急需他这位新门徒的帮助。1526年，安妮·博林服侍王后已有四年。她依然未婚，跟詹姆斯·巴特勒的婚约也不了了之。但是她还有其他追求者。正值25岁的安妮愈发有魅力。[20] 她身材纤细、娇小，楚楚动人，蓄长的深褐色秀发性感迷人。然而最吸引人的是她的眼睛，尤为乌黑、魅惑，“诱人搭讪”。“她的眼睛乌黑、美丽，”威尼斯大使说，“深深吸引着她的追求者们。”尽管如此，安妮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美人。“安妮小姐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威尼斯大使讥讽道，“她身材中等、皮肤黝黑、脖子纤长、嘴巴宽大、胸也不够丰满。”[21] 她的皮肤呈橄榄色、

有一些小的黑痣，而当时人们欣赏白皙无瑕的皮肤。她胸小、有“像男人一样的”喉结，且一只手上有六根手指，这也是她最著名的特征。[22]

毫无疑问，是安妮的个人魅力和优雅而非她的长相给了她令人琢磨不透、难以抵挡的吸引力。乔治·怀亚特（George Wyatt）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如此描述她的长相：“因她非常甜美、愉悦的表情而显得更加出众；并且……高贵的姿态和衣着也增加了她的魅力，突出了她无可比拟的典雅和高贵。”宫廷的女人都尝试模仿她的风格，而男人们都为她挑逗的风姿和无所顾忌的自信所吸引。怀亚特说她“在行为、举止、衣着和口才上超越众人”。[23] 不过，与她的姐姐不同，安妮严格地控制了自己的欲望。她尽可能地调情又不破坏自己的声誉，并且保持高傲，这只会增加她的吸引力。

不过安妮并不是不让所有追求者靠近。亨利·珀西（Henry Percy）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和继承者，英格兰最有权势的贵族之一。他在很小的时候被送至枢机主教沃尔西的府邸做仆人，也因此跟克伦威尔结识。枢机主教看不起这位年轻的贵族，还嘲笑他没有理财意识，丝毫不尊重他的贵族出身。珀西眼里的沃尔西可谓一个仗势欺人、控制欲强的侍主。

因为服侍沃尔西，珀西得以如其父之愿进入宫廷圈，在那里他很快对博林小姐产生了深深的迷恋。虽然她很喜欢扮演无情美人的形象，但安妮并非没有感情，她深深地爱上了珀西。然而，他们的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诺森伯兰伯爵很早就计划让他的儿子迎娶什鲁斯伯里伯爵的女儿玛丽·塔尔博特（Mary Talbot）小姐。尽管安妮在宫廷里很受欢迎，但她只是一个骑士的女儿，不能与诺森佰兰佰爵的儿子门当户对。但是珀西和安妮决意要在一起，因此私下订婚了。

在都铎宫廷，任何事情都无法隐瞒长久，当婚约的消息曝出的时候，沃尔西被置于极尴尬的境地。诺森伯兰伯爵十分愤怒，因为枢机主

教没能看紧珀西、阻止这场背叛，连国王也反对这个婚约。亨利完全有生气的理由：考虑到诺森伯兰伯国的重要性，伯爵在继承人婚配一事上必须征求他的允许。沃尔西在府邸众人面前责备了这位年轻贵族，并要他的父亲从宫廷把他接走，以免他惹出更大的乱子。不久珀西就与玛丽·塔尔博特成婚。

沃尔西的传记作者乔治·卡文迪什说，枢机主教在国王的命令下终止了珀西大人和安妮的恋情，是因为国王自己当时已经深深爱上了安妮。然而，从时间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婚约1523年终止，直到三年后安妮才作为国王的新情妇被提及。

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早期的感情没有强烈到会有后续发展的迹象。安妮在宫廷待了四年左右两人还没有爱慕的迹象，说明这并不是一见钟情。况且，在这期间亨利至少有一段时间忙于跟安妮的姐姐玛丽交往。但是安妮跟她的姐姐以及还有在她之前的其他众多情妇都不同。她没有受成为英格兰国王情妇之后那令人兴奋的前景的诱惑，而是在国王开始注意她的时候就立下更大的目标。她不愿只做一个情妇：她想成为王后。尽管她来自一个野心勃勃的家庭，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安妮还未充分享受到诺森伯兰伯爵儿媳的身份，就开始把嫁给国王作为自己的目标。此外还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亨利已经有了一位王后——还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王后。但是安妮准确地判断出亨利厌倦了一个年逾40、比他自己年长5岁多并且不太可能为他生下男丁（这正是他急需的）的妻子。相比之下，她自己还年轻，生育前景大好。

与国王保持一定的距离是一个妙举。跟打猎一样，亨利在私生活中也喜爱追逐的快感。如果安妮立即与他共枕，那她很快就会被抛弃并遗忘。她的欲拒还迎让她的吸引力增加了10倍，并让国王因欲求受挫和“强烈的感情”而疯狂。[24] 很快，这位大权独揽的君主就变成了一个害相思病的青年。在一封写于1527年的信里，亨利抱怨自己“一年多来

被爱之箭刺伤，还不知道是该放弃还是该赢得你的爱慕”，请求安妮“把你自己、你的身和心交给我”。[25] 他甚至还承诺让她成为自己“唯一的情人”，一个他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女人的特权。这并不足以让安妮动摇，她反驳道：“我宁愿丢掉性命也不愿说谎话……我不愿做你的情人。”她如同操纵木偶一般玩弄着国王，只给他足够保持兴趣的激励，但在他试图逾矩的时候断然拒绝。因此，上一分钟亨利还在愉快地憧憬可以亲吻安妮的“漂亮乳房”，下一分钟他就会悲叹自己离“太阳”还如此之远，并戏谑地补充到“然而这热情更炽烈了”。[26]

不久之后，安妮的这位至尊追求者就产生了结束他跟凯瑟琳婚姻的念头。1527年年底，他承诺娶安妮为妻，并已对该派谁来实现这一承诺了然于心。沃尔西被召到国王的寝殿听命。据说当他的君主指示他提出与王后离婚的诉讼时，这位枢机主教跪倒在地、乞求亨利三思，并维持这一姿势一个多小时，以竭力劝服国王。[27] 但这并没有奏效：国王不为所动。枢机主教清楚地知道他的君主对博林小姐的迷恋，但他显然不知道安妮本人是国王这一决定的关键，因为在同意奉行国王的命令时，沃尔西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公主取代凯瑟琳。

亨利希望尽快宣告婚姻无效，但很快就被证实是一场无稽之谈。因沃尔西无力解决问题而受挫的亨利开始怀疑他的首席大臣是在故意使用拖延手段。这或许有一点真实性。枢机主教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君主，他或许判断亨利对安妮的感情就像对宫廷中其他小姐的感情一样，很快就会消逝。但沃尔西也知道违抗国王的命令有多么危险，因此他恳请亨利不管收到何种关于他处理此事的不利汇报，都要“要相信在这件事情和所有其他关系到您荣誉和保证的事情上，我跟所有人一样忠诚”。[28]

目前还不清楚克伦威尔在何种程度上协助了他的主人促成这场离婚的尝试，甚至连他是否参与了这一任务也未可知。但既然他已经显示了在法律事务上的杰出才干，枢机主教很有可能安排他做一些基础的准备

工作。宣告婚姻无效的关键前提在于坐实亨利与凯瑟琳婚姻的有效性存疑，这是因为凯瑟琳是亨利的哥哥亚瑟的遗孀。根据《圣经》的说法："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二人必无子女。"[29] 亨利和凯瑟琳只有一个健在的女儿玛丽，这一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儿子才算数。凯瑟琳始终坚称自己嫁给亚瑟但从未同房，所以可以嫁给他的兄弟。1527年5月17日沃尔西秘密召集了一次特别法庭，亨利出席，接受关于与哥哥的妻子不合法同居之指控的质询。这次特别法庭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听证会在月底被解散。

亨利知道沃尔西在回避这个问题。只有教宗克雷芒七世（Pope Clement Ⅶ）批准，离婚才会得到承认，所以他的努力应该集中在那个方向。但是教宗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阶下囚，就在沃尔西召集特别法庭的当月，皇帝的军队暴发哗变，洗劫了罗马。这限制了教宗的行动能力，而由于俘虏他的皇帝查理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外甥，教宗也不可能做出任何违背皇帝意愿的举动。亨利如期在1528年年初对查理宣战，但是没有产生影响。

5月末，更多灾祸降临，伦敦爆发了汗热病。这种极为致命的疾病自1485年第一次有记录的爆发以来已经夺取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汗热病很快大规模蔓延，在数周之内横扫全国。当时的一名医生凯厄斯博士（Dr Caius）描述了它那标志性的快速蔓延的过程："公元1485年，8月7日之后不久……人们中间偶然出现了一种疾病，一直持续到9月末，它突如其来的急剧性和不寻常的残酷性超过了鼠疫。"

> （虽然一些受害者坚持到了第14天，但是这场疾病）迅速夺去了那些正在开窗的人、那些在临街大门前玩耍的孩子们的性命；它杀死一个人有时只需一个或两个小时。那些开心用餐的人最长也只挨到晚餐。它一逮住患者就夺去他们的生命；他们有的还睡着、有的醒着，有的还在欢笑着，有的被照料着，有的在禁食，有的已经吃饱了，有的在忙着，还有的在闲着；一屋之中可能死了三个人或五个人，有的死了更多，还有的全死了；被感染的城镇如果有半数的人死里逃生就是极大的恩惠了。这一疾病的患者从始至终都在出汗，所以被叫作"汗

热病”；因为第一次爆发是在英格兰，所以别的国家叫它“英格兰汗热病”。[30]

这一疾病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社会上较富裕的人比贫穷人受到的影响大。伊拉斯谟把它归因于通风不足、黏土地面和房间内常撒满的那些因没有更换而早已腐烂的灯芯草。他还说用餐时过度摄入食物和使用太多盐也是促因。

这个病的特征是发病时会有恐惧感，然后是强烈的冷战、晕眩，同时伴随头部和颈部的剧痛。因为无法保温，所以发病的人会经历热汗、心悸、干渴和精神错乱。在最后阶段，他们会精疲力竭、感到嗜睡。“这种病……是世界上最易致死的疾病”，法国大使贝莱主教（Cardinal du Bellay）在1528年7月总结道。[31]

在这场流行病中，伦敦城的死亡人数注定非常高，四处人心惶惶。“仅在伦敦就有2000人发病”，贝莱说，不过他还补充道，那些尚未染病的人“可以说跟从街道上和商店里匆忙飞进人家里的苍蝇一样多，一旦他们感染了这个病，就会开始出汗……可以肯定的是彼时的伦敦更需要牧师而非医生，只不过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埋葬死者……12年前同样的事情发生时，在10～12天的时间里有10万人死亡，据说当时还没有这次刚开始的时候猛烈……每个人都极为惊恐。”[32]

一直害怕感染的亨利八世命令将宫廷疏散。他匆忙离开伦敦，在英格兰多个府邸轮流避祸。让他惊恐的是，他听说亲爱的安妮也感染了这个病，她很快就被送到她父亲在肯特郡希佛堡的宅邸，在那里她连续几天命悬一线。尽管他多次送去宣示自己爱意不泯的宣言，但亨利本人始终离得远远的，只满足于写信给她。他被迫过着近乎独居的生活，因为他的很多近身侍从也生病了，其中包括亨利·诺里斯（Henry Norris）、威廉·菲茨威廉（William Fitzwilliam）和威廉·佩吉特（William Paget）。

与此同时，沃尔西勇敢地决定留在英格兰，最远也只是搬到了汉普顿宫，在那里他继续为国王的“大事”周旋。他府邸的几个人都染病了，枢机主教这时写给他的君主的信表明他可能也发病了。他向亨利保证：“如果我的命运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跟陛下您通话或写信，我斗胆进言，向陛下保证我一直是一个最忠诚、真诚、可靠的仆人。”[33]

尽管克伦威尔本人免于染病，他的妻子却没有那么幸运。伊丽莎白在那个夏天去世，几乎可以确定死于同样让伦敦城的人大批丧生的疾病。她在文献中最后一次被提及是在与克伦威尔往来密切的理查德·凯夫（Richard Cave）1528年6月18日的来信中。他向托马斯及其妻子问好，并且感谢克伦威尔上次相见时的“款待”。这封信写于“斯坦福”，应该是林肯郡的斯坦福镇，所以可能在他写信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去世，只是消息还没有传到他那里。[34]

因为克伦威尔对最亲近的人有强烈的忠诚和感情，所以失去妻子的他一定非常悲恸——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无疑也令他震惊。虽然现有的记载仅能提供少量的关于克伦威尔婚姻的引人好奇的细节——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毕竟伊丽莎白在丈夫在宫廷真正得势以前就去世了——但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很和谐。克伦威尔在提到他“挚爱的妻子”时所说的远非只是普通的礼节性称呼。她为克伦威尔生了三个孩子，在奥斯丁会有一个操持得很好的家，还在他出差离家时代他处理生意。他同意接她母亲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感情。克伦威尔一年后立下的遗嘱表明他仍然珍爱着他“逝去的妻子”。他最慷慨的遗赠是给她的母亲默西·普赖尔、她的妹妹琼、她的孩子们，还有伊丽莎白家族的其他成员。[35]

不过也有证据——虽然模糊——表明克伦威尔或许有一个私生女。切斯特郡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个名为简·克伦威尔（Jane Cromwell）的

人。关于她的信息不多，只知道她在1535～1540年的某一时间嫁给了柴郡威勒尔市雷顿的威廉·霍夫（William Hough）。那时的女孩经常在12岁就出嫁，如果简是在1540年结婚的话，那么克伦威尔的妻子还在世的时候她就已经在母腹中了。简的丈夫是理查德·霍夫（Richard Hough）的儿子，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理查德·霍夫于1534年至1540年在柴郡做克伦威尔的代理人。因此有可能是克伦威尔安排了他们的婚姻，这对出身不明的简来说是一条好出路。不过，他不一定会给任何忠诚的侍从这样的恩惠，况且除了这个女孩的姓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信息可以证实她可能是他的女儿。她同样可能是克伦威尔姐妹们的女儿，然后像他的外甥理查德一样随了他的姓以促进其前途发展。

除此之外，史料当中再未提供任何关于克伦威尔可能不忠的暗示，也没有材料表明克伦威尔在伊丽莎白去世后有任何情人。1537年他应邀在约克的诺福克公爵家里做客的时候，前途大好的主人逗弄他说："如果你不想跟我的妻子调情"，他愿意"提供一个丰腴的年轻女人"满足他。[36] 这更多地透露了诺福克公爵而非克伦威尔在性爱上的放荡不羁。这位公爵的妻子有理由指责贝丝·霍兰（Bess Holland）为"娼妇"，但他显然还在府邸养了多位心甘情愿的情妇。相比之下，克伦威尔遵循了严格的道德标准。在他的遗嘱里，他要求要由一位"自制而良善的"牧师为他的灵魂祈祷，他后来也讨厌听到居住在宗教场所的人有奸淫行恶的行为。约翰·福克斯认同他"虽有不幸，但还是有着现在大多数贵族家族里都没有的美德"。[37]

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似乎在伊丽莎白死后不久就离开了家，表面上是去接受教育，但可能也是为了不受传染。没有记载表明他的姐妹们离开了家：她们的外祖母可能在母亲死后负责她们在家的教育。格雷戈里被安置在白金汉郡本笃会修女们的一栋简朴的房子里，由小马尔洛的女修道院院长玛格丽特·弗农（Margaret Vernon）照看。把幼子寄养在修女处，这对于当时有地位的人来说实不常见。克伦威尔这样选择可

能更多的是考虑到修道院院长其人而不是修道院。玛格丽特·弗农是他的一位好友。他们可能是通过沃尔西认识的，玛格丽特跟沃尔西也是熟识，他们亲密、家常的书信说明了他们对彼此的尊重甚至喜爱。这位女修道院院长显然在过去受到了克伦威尔的庇护，因为在她写给他的众多书信的其中一封中她回忆说：“大人您清楚地知道我的敌人们散布的很多极端的、诽谤性的言语，您给了我如此多及时的帮助。”[38]

虽然有人认为9～10岁以上的男孩子待在修道院是不合适的，但玛格丽特后来称克伦威尔许诺她可以监护格雷戈里直到他12岁。[39] 虽然修女可以教育女孩，但是她们只能监护男孩，通常还会给男孩配一名男性家庭教师。格雷戈里就是这样，他的父亲为他安排了多位有名的家教来教导他。

第一个在小马尔洛指导格雷戈里学习的学者是剑桥彭布罗克学院的约翰·切金（John Chekyng），他定期向克伦威尔汇报他儿子的进展。虽然克伦威尔对这个孩子寄予厚望，但格雷戈里令人失望——至少在学术上。在1528年7月27日的第一次汇报中，切金说他的被托管人“时而用功时而玩耍，迟钝但勤奋”。或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嫉恨，切金说他惊讶于格雷戈里一直以来接受的教导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在刚开始对他进行教导时，格雷戈里只能勉强列举三个动词的词形变化，“尽管他靠死记硬背可以记住规则”。他补充说不认为帕尔格雷夫式教学可以让格雷戈里成为一名学者，所以他不得不“让他忘掉现在所掌握的几乎所有内容”。但是他向克伦威尔保证他的儿子“现在在学习最有助于他阅读的一些东西，其余时间学习写信”。[40]

格雷戈里自己写了一封信附在老师的信后面，信中相当不规则的拼写和语法说明切金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这封深情的简短书信同样表明了这对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至爱的父亲，”格雷戈里在开头写道，“向您问安，衷心祈求您得蒙恩惠、每日安好，因为您给我的祝福

和其他很多的益处。我是您每天的挂念，心里盼望这一点一直不改变，请相信我在求知的路上会遵守您的教导、达成您的要求，这样我亲爱的父亲能够心满意足，靠着上帝的帮助，愿他施恩于我们，阿门。”他在信末写道：“您时刻警醒的儿子，格雷戈里·克伦威尔。”[41]

在切金的密切关注下，格雷戈里快速进步。在写于1528年11月的第二封信中，那位老师写到“小格雷戈里在写作上有很大提高”。这时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的男孩跟格雷戈里一起学习，可能是他的表兄克里斯托弗·威利菲德（Christopher Wellyfed）。这个男孩显然是受克伦威尔资助的，因为在众多同时代资料中有克里斯托弗1530年6月15日给克伦威尔的账本，详述了他从“天使报喜节到施洗者圣约翰节”期间的花销。[42] 格雷戈里受到这个男孩的影响，而切金提到他“不需要太多煽动（就能生事）”。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活泼、看起来易惹事的孩子，在到那儿之后不久就引起了一场火灾。他在烛光下阅读的时候睡着了，蜡烛掉到了下面的草垫上，由此引起的火烧掉了一个新羽毛褥垫、长枕、床单，还有克里斯托弗和尼古拉斯·萨德勒（Nicholas Sadler）——可能是克伦威尔的秘书兼好友拉尔夫·萨德勒的弟弟或者其他亲戚——的几件衣服（有两件紧身上衣和长筒袜）。要不是他们房间的墙上涂上了灰泥，切金向克伦威尔坦言，“我们会遭受更大损失”。1530年11月，切金懊恼地坦言，克里斯托弗在花光了“很大一笔”钱后离开了小马尔洛。[43]

克伦威尔在他的外甥完成学习之后继续资助他。1533年6月，克伦威尔的表兄尼古拉斯·格洛索普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有一小段暗示克伦威尔安排克里斯托弗在康布雷待了一段时间，不过信中没有明说克里斯托弗这次旅行的目的。[44] 虽然他的外甥明显不是一个好的学者，但是克伦威尔随后帮助他在教会谋了一个职位——相当出人意料的是，克里斯托弗表现出了想从事这个职业的愿望。克伦威尔还为他的外甥女爱丽丝·威利菲德安排了一桩有利的婚事。他们的父母——克伦威尔的姐姐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威廉都在1533年去世了，所以克伦威尔可能觉得他有

更大的责任确保他们未来的幸福。他将家庭关系看得最为重要，在他日益辉煌的事业中一直如此。

在这期间，切金向克伦威尔保证格雷戈里在不断进步，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会“掌握很多拉丁语”。[45] 克伦威尔在对儿子的照料上显然一丝不苟，他担心儿子会否感到不舒服或者生病。偶尔不必在宫廷值勤（这非常罕见）的时候，他会去小马尔洛看望格雷戈里，其他时候他会定期收到关于格雷戈里健康状况的报告。在一封信中，切金跟他确认了在入冬的时候格雷戈里有厚外衣和柴火保暖。他还感谢克伦威尔提前送来了一捆布匹，这无疑是他想用来给儿子做冬衣的。这位教师还说剑桥有很多关于克伦威尔的流言，他很高兴这些流言“被证实是假的”。[46] 虽不清楚这里的具体所指，但是可以说明克伦威尔名声见涨，伦敦以外都在讨论他的事情。

切金的忠诚没有得到丰厚的回报。虽然克伦威尔对儿子的照顾很是尽心，但是有时会拖欠应给老师的伙食费、住宿费和学费。1528年6月28日，切金恭敬而坚决地写了一封信，问克伦威尔是否收到了他的账单，因为他负债了，其他地方也在问他要账。没有记录表明克伦威尔是否在这个时候结账了，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来年夏天急剧恶化。据说克伦威尔对切金的教学水平很不满意，说他的“孩子们”没有从他的照料中“受益”。这位教师愤愤不平地回复克伦威尔，提醒克伦威尔有很多学生从他的教导中受益，并向他保证他愿意放开克伦威尔的被监护人，“假若跟任何学者相比我没有优势，我一定会过着贫穷的生活”。他说每隔6个星期就要为孩子们垫付40先令，而克伦威尔不经常予以偿还，这意味着他不得不经常负债。[47]

克伦威尔对待切金的方式暗示了他吝啬的一面。他迫切地增加他的财富，一旦获得财富就谨慎地保存好，这一点被他大量的商业信件所证实。从财务上说越晚结账越好，但他把这个规则用到格雷戈里的教育

上，这与他在其他方面对儿子的关心不符。他想要这个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明显不愿意付钱——或者至少没有及时付钱。

不过，克伦威尔也有可能是将儿子进步之缓慢归罪于切金，才暂不付钱给他，直到看到更好的结果。或者被宫廷事务缠身，有时自己忽略了。不过他忽略的欠账不止来自切金一人。有一份账单表明克伦威尔欠一位年迈妇人的钱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她提醒克伦威尔的时候，他立即全额偿付了欠款并且给了她4英镑的年金和一套衣服作为补偿。此外，还有很多他慷慨救济穷人和其他慈善事业的记录。因此他不大可能是因为天生吝啬而延迟支付格雷戈里的学费。

克伦威尔的政治和法律事业占用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他极少有时间为妻子的逝世和儿子的远离而感伤。当然，他的公务有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间歇期。一旦汗热病过去，国王可以安全返回伦敦，他离婚的计划就重新正式开始了。10月，枢机主教坎佩齐奥（Campeggio）从罗马出发并抵达伦敦。教宗任命他为使节并委托他代教宗裁决离婚一案。在听取了亨利和沃尔西冗长的辩论之后，他也拜见了王后。凯瑟琳给他看了前任教宗颁发的教宗特许，准许她在嫁给了亨利的哥哥之后与亨利再婚。坎佩齐奥利用这一点作为理由，证明他的使命是不存在的，这转而导致了进一步的拖延。

此时，沃尔西离失势已经不远了。因对他没能迅速完成诉讼程序并带来有利结果感到恼怒，安妮·博林转而反对这位枢机主教，指责他故意拖延、制造障碍。“我不能理解，国王更不能理解，尊敬的大人您在用如此多美好的离婚的承诺诱惑我们之后，怎么能改变初衷”，她如此责备沃尔西。亨利也逐渐失去耐心，下令暗中调查他这位顾问的活动。沃尔西对他的君主诉苦，说他被“身处其中的所有人深深猜疑”。[48] 但是他坚持跟教宗使节进行着越来越折磨人的谈判，并1529年6月在布莱克弗莱尔召集了一次听审试图证明亨利的婚姻不合法。但为了让凯瑟琳

王后的诉状能送到罗马教宗手中，坎佩齐奥在7月30日中止了这场听审。

克伦威尔在听审期间立了遗嘱，这或许表明了他的不安。[49] 他委任拉尔夫·萨德勒作为执行人——这表明他此时极其信任这位秘书。遗嘱立于1529年7月12日，主要受益人是他的孩子们：安妮、格雷丝和格雷戈里。后者出现在最显著的位置，可能是因为他被看作克伦威尔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克伦威尔给这个男孩留下了一大笔钱，足有666英镑（约等于现在的20多万英镑），他规定这笔钱应用于购买土地。他判断购买土地后的收入应该足够支付“我的儿子格雷戈里的教育，切实地资助他培养好的品格和礼仪，直到他满22岁”。他补充到，他的执行人要“善待我的儿子格雷戈里，确保他不浪费时间，确保他被养育、管束得品格正直，不辜负我的信任”。克伦威尔指示在格雷戈里24岁的时候再给他200英镑，还留了一些他最有价值的家用物品作为对这笔慷慨遗赠的补充。

克伦威尔也为他的女儿们提供了遗产。他本可以只关注男继承人，但他还是在遗赠中提到了安妮和格雷丝，这说明他跟她们很亲近。克伦威尔饱含深情地写到他“年幼的女儿安妮和格雷丝”，这暗示了在立这份遗嘱的时候她们还非常小。克伦威尔给两个女儿各遗赠了100马克（相当于现在的2万英镑），待她们成年或结婚后使用。

这份文件是现存唯一一份与克伦威尔两个女儿存在有关的记录，也是与她们的逝世有关的唯一记录。她们的父亲在遗嘱中留给她们的遗赠在稍后被划去了，目前还不确定是多久以后。没有关于她们逝世原因和日期的记载，但她们的死期似乎相隔不久。她们可能和母亲一样，身受汗热病之害，这种疾病自1528年起在都城周期性爆发。她们也有可能死于其他致命疾病。克伦威尔为女儿们在如此年轻的时候（较为年长的也不过14岁）一个接一个地被夺去生命而深感悲伤，非常思念她们。可能

是为了缓解丧女之痛，他邀请姐姐和姐夫伊丽莎白和威廉·威利菲德来奥斯丁会同住。威廉成为这个家庭非常有用的帮手，在克伦威尔经常离开处理宫廷事务的时候照管仆人们。[50]

克伦威尔在遗嘱中提到了所有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他遗赠给拉尔夫·萨德勒200马克（约合现在的4万英镑），还有“我的里层长袍外衣、紧身上衣和我所有的藏书”。他给老朋友斯蒂芬·沃恩留了一笔差不多一样的遗赠。他给伊丽莎白和威廉·威利菲德的遗赠是每年20英镑（约合现在的6000多英镑）的生活费。除这些对个人的遗赠之外，遗嘱上还提到了一些日常的慈善捐赠，克伦威尔在这方面也没有吝啬。

差不多在他起草遗嘱的同时，克伦威尔也为他外甥女的监护问题——据推测应是他姐姐凯瑟琳·威廉斯的一个女儿——做了安排。此时凯瑟琳已经去世，因为遗嘱称伊丽莎白为他“唯一的姐姐”。[51] 之后不久他写了一封收信人不详的信，不过从信中近乎威逼的语气来看，收信人显然是一个代理人或者仆人。克伦威尔开头就严厉地责备说自己“非常吃惊，因为你还未能更好地满足你的牧师的心意，得蒙他的眷顾我已经给温彻斯特的钱塞勒先生写了信”。接下来他话锋一转，继续道：“请您帮我个忙，让我把姐姐的女儿送到您那有教养的妻子那里，并代我请你的妻子接纳她、养育她，如果善良的她甘心乐意这么做，我会非常感激你们并补偿她的操劳，还会满足您妻子的要求，我相信她会满意的。”[52] 他对家人的慷慨透露出他始终不变的忠诚和深情。尽管有很多其他更加要紧的事情占据了他的时间，但是他从没有忘记年轻时候的情谊，在有能力之后他从未错过帮助家人的机会。

布莱克弗莱尔听审的失败极大地削弱了沃尔西的权势。这是他促成离婚的最后一次机会，除此之外再无他法。虽然沃尔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其他人无法取得的进展，但他渐渐被当作国王“大事”无法解决的替罪羊。一位刻薄的评论者说“他承诺了很多，履行了太

少”。与此同时，幸灾乐祸的夏普伊向他的主人汇报说：“枢机主教的形势日益恶化，已成定局，这一点几乎人尽皆知。”[53]

根据霍尔的编年史记载，在一本载有至少34条针对沃尔西的指控的小册子被呈予亨利之后不久，“深以枢机主教为傲、以礼相待的国王清楚地看到了他是用怎样的掩饰和障眼法处理他的大事的：他是如何用美好的谎言遮人耳目、欺瞒诈骗的”。[54] 或许是顾念自20年前继位以来沃尔西对他忠诚的服侍，国王起初拒绝对他的这位重臣动手。但在安妮的持续施压之下，1529年10月9日，沃尔西在王座法庭的一场审讯中被指控蔑视王权——依据一项禁止维护教宗管辖权而侵害君主至高无上权威的法案，9天后他辞去了掌玺大臣的职位。

10月22日，沃尔西上交了他所有的财产。他以令人钦佩的平静语气宣告：“我想让世人知道，按照法律我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他的，因为正是靠着他我才获得了现有的一切，因此我甘心乐意同样回报我的陛下，这是合情合理的。”即便在那种情况下，亨利还是保护了他，令他不至于完全毁灭。沃尔西可以选择接受国王或者议会的问询。可能是感知到君王对他尚存的情分，他选择了前者。但是亨利的情绪是出了名地变幻无常，其他廷臣很快推断沃尔西的前景并不乐观。沃尔西上交所有财产的当天，法国大使让·迪·贝莱（Jean du Bellay）汇报说：“沃尔西被驱离府邸，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收缴给了国王。除了指控他抢劫和在信奉基督教的王室之间引起纷争之外，他们还以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55]

当枢机主教离开在约克的住所、踏上驳船的时候，他沮丧地看到民众聚集在岸边，期待看他被带去伦敦塔。他们失望了，因为他被命令前往在伊舍的住所。不管怎样，对曾经蒙国王盛宠许久的他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时刻，他和残留的侍从（包括克伦威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沿着泰晤士河西行。但是卡文迪什称他们在帕特尼附近某个离克伦威尔早年旧居不远的地方被国王的马桶侍从亨利·诺里斯赶上，他给沃尔

西带来了国王的戒指和口信，告诉他“要满心欢喜，因为他一如既往得蒙圣宠”。[56] 沃尔西倍感释怀与感激，在烂泥里跪下感谢诺里斯带来这样的好消息。他把自己的十字架给了诺里斯，把他的弄臣塞克斯顿（Sexton，又名帕奇）作为礼物送给国王。

10月底，迪·贝莱已经开始自信满满地预言“他（沃尔西）不大可能重新得势”。[57] 而沃尔西和他府中的侍从们在伊舍痛苦地度过了几周，没有任何家居用品供应，对未来的去向无比担忧。克伦威尔始终陪在他的主人左右，拼命想帮他重新赢得国王的宠爱。尽管国王姿态友好，但沃尔西知道连他也无法阻止这股试图扳倒自己的潮流。他迟早都要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名誉，甚至是生命。

---

[1] Ashdown，D.M.，*Ladies in Waiting* （London，1976），pp.23-24.

[2] Strickland，A.，*Lives of the Queens of England* （London，1851），Vol.II，p.572.

[3] Turnbull，WB.，*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of the Reign of Edward* Ⅵ，（London，1861），no.491.

[4]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05.

[5] 枢机主教的学院后来被亨利八世重建成基督教教堂。

[6]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25.

[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18.

[8]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23-324.

[9]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585.

[10]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22.

[11]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23.

[12]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Ⅴ，1485-1558（London，1967），p.422.

[1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19.

[14]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5ff.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3334.

[1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9.

[17]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p.25-26.

[18]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26.

[1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47.

[20] 安妮的出生日期没有确切记载，据推测约在1500或1501年。伊丽莎白17世纪的传记者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称安妮出生于1507年，这时期的其他文献也这么说。但是这样她在1513年服侍奥地利的玛格丽特时只有6岁，年幼得令人难以置信。

[21]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IV，p.365.

[22] 事实上，不过是她一个手指的一侧长了第二个指甲而已。安妮如此难为情以至于她开始穿垂得长长的衣袖，这立刻在宫廷女眷中流行起来。

[23] Wyatt，in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424，441.

[24]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edited by Clarke，A（London，1888），p.209.

[2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I i，no.1467.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I i，p.1468.

[27] 亨利八世寻求通过废除而不是离婚来结束他跟凯瑟琳的婚姻。不过，我大部分时候用后者来表达，部分是因为易于理解，部分是因为很多当时和后来的历史学者都是这样表述的。

[28] *State Papers* ，Vol.I，p.194.

[29] Leviticus，chapter 20，verse 21.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I，p.ccvii.

[31]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p.105-106.

[32]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106.

[3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i，no.4468.

[34] 很多较晚的文献说她在帕特尼去世，不过同时代的文献中没有可以佐证的证据。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5772；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56-63. 琼后来嫁给了约翰·威廉姆森，他是克伦威尔的一个老朋友，后来在自己的职位上干得很出色。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s.35，100-101.

[37]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48.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9.

[3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7. For Margaret’s correspondence with Cromwell，see Erler，M.C.，*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the Dissolution：Monks，Friars，and Nuns 1530-1558* （Cambridge，2013），pp.88-106.

[4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560. 格雷戈里暂时从剑桥搬到了乡下，因为瘟疫开始在城里蔓延。

[4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561.

[4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57.

[4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4916，6219，6722.

[4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no.696.

[4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722.

[4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4916.

[4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4433，5757，6219.

[48]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65.

[4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56-63提供了完整的抄本。

[50] 1532年11月的时候他们还跟他生活在一起，当时托马斯·阿尔瓦尔德去奥斯丁会拜访之后，向不在家的克伦威尔汇报说他们都安好。*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09；Vol.VI，no.696.

[5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61.

[5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25.

[53]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p.772；*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p.189.

[54]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p.759.

[5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19.

[56] *Cavendish*，*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p.102.

[5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30.

第四章 “孤注一掷”

1529年诸圣节这天早上，沃尔西的招待官兼传记作者乔治·卡文迪什在沃尔西伊舍住所大房间的带炮眼的窗户那里碰到了心烦意乱的克伦威尔。他的眼泪流过脸颊，握紧火帽、默念“圣母玛利亚”。这是他情绪波动与虔诚一面的罕见流露——“他面前是一副陌生的图景”，卡文迪什坦言——透露出克伦威尔对他的主人枢机主教的强烈情感和忠诚。这幅图景后来被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八世》中再现（但略有修饰），克伦威尔在剧中含泪告别他的主人：

> 那么，我必须离开你么？我必须舍弃您这样善良、这样高贵、这样真诚的一位主人么？心肠不似铁石的人们全来给我做证吧，克伦威尔离开他的主人的时候是如何的悲伤。我要去投效国王；但是我的祈祷将永远永远为您而发。[1]

不过克伦威尔的眼泪也是为自己而流。当卡文迪什问他是不是因为沃尔西而心烦意乱的时候，他回答说：“不，这是为我不幸的遭遇。因为我有可能会失去我努力获得的一切，我生命的所有时光都在真诚、勤恳地服侍我的主人……我清楚地知道，因为主人的缘故，我也声名狼藉……这种不好的名声一旦形成就很难抹去。”[2] 在沃尔西倒台的时候，克伦威尔已经是枢机主教身边地位最高且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不过，因为他在沃尔西的府邸没有正式的职位和工作收入，克伦威尔的影响力完全取决于他主人的存亡。过去10年他为枢机主教的利益付出的所有努力显然都付诸东流。他的命运——以及他的名声——与他主人的紧密相连，他在宫廷中飞黄腾达的希望也因此破灭了。简而言之，他押错了宝。更糟糕的是，没有枢机主教的庇护，他现在必须独自承受因为解

散修道院而结怨的所有敌人的怒火。已经有流言称他被关进了伦敦塔。这些流言离变成现实还有多久呢？

不过，克伦威尔不是轻易自艾自怜的人，他很快冷静下来，对卡文迪什（或许也是对自己）说：“我打算（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在今天下午替我的大人去伦敦的宫廷，在那里我会孤注一掷，等待最终结果，看有哪个人能控告我不忠诚或品行不端。”[3] 他言出必行。在建议沃尔西清退府中冗员之后，他在忠诚的侍从拉尔夫·萨德勒的陪同下出发去了伦敦。之后不久，在11月1～2日的夜里，备受亨利信任的大臣——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到达伊舍，浑身湿透的他和亨利·诺里斯一样以国王的戒指为信物暗中造访。没多久之后，沃尔西欢喜地收到“很多家居用品、器皿、盘碟和所有必需品”，[4] 这是君主垂怜他的又一证明。

克伦威尔不大可能这么快就为主人争取到这些慰问品。不过，他确实不遗余力地为沃尔西求情。在到达伦敦几天后，克伦威尔作为市镇议员（即一个自治市镇在英格兰议会的代表）重返于11月4日召开的新议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做到这一点主要依靠的是第三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的影响力，后者是一位重要的顾问大臣，也是沃尔西的死敌。

时年56岁的诺福克公爵是亨利宫廷最显贵、辅佐时间最长的大臣之一。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是爱德华四世第四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亨利八世的姨母，这为他赢得了进入最显贵的王室阶层的机会。亨利七世在位统治期间他忠心服侍，是一名得力的战士和领袖，在新君继位后继续得宠。亨利八世在即位一年后封他为嘉德骑士，这是英格兰级别最高的骑士封号。1513年他在击败英格兰军队的弗洛登（Flodden）之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证明了这一封号是他理所应得的。接下来的一年他被封为萨里伯爵，1524年其父逝世后，他承袭了诺福克公爵之位。当他的外甥

女安妮·博林捕获了国王的爱慕时，诺福克在宫廷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当时的人评论诺福克公爵“是一个认真、果敢、在各种事务上都很‘诙谐’（Witty）的人”。[5] 在这里，“诙谐”是指尖刻而不是幽默：与克伦威尔不同，诺福克并没有因才智和谈吐而出名。他骄傲、自大、脾气暴躁，会痛斥每一个冒犯他的人。他小心地守护着国王对他的宠爱，对任何一个跟他影响力相匹敌的人都抱有强烈的敌意。1539年，荷尔拜因在诺福克公爵66岁的时候为他绘制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他表情严厉、令人生畏，瞪着冷酷、乌黑的眼睛。他的体格也跟克伦威尔截然相反。威尼斯大使在描述他的时候说他“身材瘦小、一头黑发”。[6] 在外交领域，他一直是强硬尚武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提倡者，这让他跟立场更趋谨慎的沃尔西意见相左。诺福克对这位出身低微的暴发户颇为不齿，认为他既不应该出现在枢密院也不应出现在宫廷里。他对沃尔西的门徒自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克伦威尔还是来寻求诺福克的帮助，这体现了他的胆识。

克伦威尔准确地判断，在沃尔西失势后诺福克就将时来运转，但他在向主人的政敌请愿求情时并无内心挣扎。的确，以诺福克的权势，能够讨取他的欢心是克伦威尔确保在宫廷的利益的必要前提。如果说务实主义再一次战胜了原则，那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克伦威尔抛弃了旧主：跟敌人结交只是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

诺福克让国王同意克伦威尔进入议会，但条件是克伦威尔必须通过选举获得一个地方席位，这也是成为下议院议员的条件，此外他还必须遵照王室的指示。由于他背后无人庇护，在议会行将开幕之前满足前一个条件颇具挑战性。但是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他手上已有的为数不多的宫廷人脉。他的第一个方法是指示萨德勒去说服沃尔西的一位朋友（据卡文迪什所言也是克伦威尔的朋友）托马斯·拉什（Thomas Rush），他跟威洛比家族有联系，能帮助克伦威尔获得萨福克郡境内奥尔福德

（Orford）的议席。这个方法失败后，克伦威尔拜访了沃尔西在温彻斯特主教辖区的管事威廉·波利特爵士（William Paulet）他有权力在自己的辖区提名人员列席。不久，他作为汤顿的新议员返回议员行列。

克伦威尔从11月4日开始参与议会的事务，直到12月17日第一次会议结束。在这期间，他在一个为调查商人滥用国王庇护而成立的委员会列席。更重要的是，他可能还在下议院抵制神职人员腐败的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场为应对沃尔西政策失败而组织的议会反而成了他的门徒仕途的开端，这颇具讽刺意味。这同样也是极具革新意义的：克伦威尔也因此成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以下议院议员身份起家，最终崛起得势的政客。他精明地判断这样可以让自己免遭恶意的攻击，同样也可以此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绝佳基础。但克伦威尔也知道，议会议员的身份是不够的：要得到实权，他需要得到国王的垂爱，并取得一个服侍国王的正式职位。

虽然急于开拓自己的政治事业，但克伦威尔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前侍主。卡文迪什宣称，正是在1529年的这届议会上，克伦威尔成功地保护了沃尔西不被一份剥夺私权法案制裁（根据这一法案，冒犯国王之人要被剥夺土地乃至生命），尽管针对枢机主教的诉讼是10月在王座法庭听审的。鉴于那次法庭没有对沃尔西采取剥夺财产和公民权的手段，他可能转而向议会递交了一份供状。接任沃尔西职位的新任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显然采取了强硬的姿态。他公然抨击沃尔西为“那头刚刚失势的大公羊”。[7] 沃尔西的敌人进而列举了他的44条罪状，这些罪状在12月1日被呈于国王，其中罗列的罪名有侵犯教会自由、破坏法律“程序和秩序”，还有最严重的一条——自恃与国王并驾齐驱。枢机主教无疑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签署了这份文件，由此承认自己有罪，并且断绝了恢复头衔和职位的可能性。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开口为他辩解。他甚至有可能是在国王的指示下这么做的，后者对沃尔西还有一定的感情，不忍看他被剥夺财产和一切民事权利。这与沃尔西的屈服一

道，已足以让他免于被剥夺私权了。在议会于12月17日休会时，沃尔西的地位暂得保全。虽然他放弃了其他职位，但仍是约克大主教兼教宗特使。后一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他免于遭到叛国的指控，但这远不是绝对有效的。他愉快地写信给克伦威尔，争辩说国王从他的屈服中得到了以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东西，并希望现在他的麻烦可以告一段落。

克伦威尔对沃尔西的忠诚值得称赞。尽管亨利本就不愿给没能促成离婚的枢机主教施以极刑，但支持一名失宠的大臣还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沃尔西其他的侍从则纷纷跟他撇清关系，急于保住自己的地位。首先脱逃的是枢机主教的秘书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他合乎时宜地选择忘记在服侍沃尔西期间获得的许多职位和晋升，在1529年7月成为国王的大臣。当年9月，他写信告诉自己的前侍主说国王不愿意召见他——显然他自己也没有怎么劝服国王。刚清除沃尔西这个障碍，加德纳就开始耍手段争取温彻斯特主教这一空缺，那是英格兰最富裕的一个教区。克伦威尔的秘书拉尔夫·萨德勒不久之后向他坦言自己去拜访了加德纳，请他帮助枢机主教，但是他“说关于大人的事，自己知之甚少”。萨德勒精明地推测：“我想，只要自己不至于蒙羞，他几乎不会为我的大人（沃尔西）或者他的其他朋友们做什么好事。我对他没什么信赖可言。”[8]

托马斯·赫尼奇爵士（Thomas Heneage）也同样变幻无常。作为沃尔西门下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门徒，枢机主教给他在国王寝宫安排了一个职位，以制衡博林派在宫中的崛起。他曾是沃尔西和安妮的中间人，但他的主人渐渐对他失了信任——这自然有其原因。沃尔西失宠后，赫尼奇很快跟他断了联系。在枢机主教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冷酷无情地回应“您要满足于现状”，外加一句虚伪的保证“国王会眷顾并善待大人您的”。[9]

相反，克伦威尔拒绝抛弃旧主，即使这样做会威胁到他在议会刚得

到的职位。他怀着不变的忠诚，继续在枢机主教和国王之间充当媒介，往返于沃尔西住处和宫廷之间，传递消息和请愿书。诚然，他成功的希望渺茫。他的盟友少之又少，而就连这些人也缺乏真正的影响力。他们当中有理查德·佩奇爵士（Richard Page），他在沃尔西门下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在1516年被任命为国王寝宫的侍从。不过在那之后，他继续为沃尔西服务，也因此与克伦威尔熟识，并用他的忠诚让克伦威尔完全信服，令两人间的联系得以延续。受沃尔西重用已有一段时间的约翰·罗素也愿意向克伦威尔伸出援手。

不管怎样，沃尔西的敌人因他的失势而得意扬扬，现在在宫廷中占据支配地位。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诺福克公爵。鉴于他跟安妮·博林之间的亲属关系，国王的“大事”与他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作为本国地位最高的贵族，他还对他视为出身卑微的暴发户有天然的蔑视。他与外甥乔治·博林（George Boleyn）、罗奇福德子爵（Viscount Rochford）和萨福克公爵（Duke of Suffolk）合谋，决心彻底搞垮沃尔西。“他们每天都会给他送一些令他不快的东西或者做一些诋毁他的事情，”卡文迪什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让他沉湎于悲伤之中。”[10]

只有克伦威尔为沃尔西辩护。而在为这个整日被传将正式受到叛国罪指控的人说情的同时，他也因此受到牵连。1529年10月底，斯蒂芬·沃恩非常焦虑地写信给他：“向你问安。我非常疑虑在你的主人（沃尔西）被突然推翻的时候你受到了怎样的待遇。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希望收到你的来信……我想你遭记恨更多是因为你的主人，而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得罪别人的事情。”沃恩显然预料到了会发生在沃尔西身上的灾祸，因为他补充说自己“非常希望”在克伦威尔离开伦敦之前告诉他“自己多么担心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不敢写出来”。不过沃恩不是不可共患难的朋友，他向克伦威尔保证：“就像一颗真诚的心不会被任何暴风雨击垮，虽然我不能身处其境，但是我现在更加渴望知道你的境况……如果这世上有任何我能为你做的，请让我知道，像相信你自己一

样相信我。”在信的结尾，他更加乐观地安慰说：“虽然我听到的很多关于你的消息令我难安，但是我相信你的真诚和智慧会让你化险为夷。”[11] 四面楚歌、自感脆弱的克伦威尔一定感激他这位朋友表达出来的忠贞。但事实是，不管沃恩如何心怀好意，远在尼德兰的他能带来的保护和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克伦威尔不得不在宫闱之中敌众友寡的惨淡前景面前独自思考解围的方法。

克伦威尔的名字与失势的枢机主教依旧密不可分地绑在一起，这一点从沃尔西老主顾们留下的大量请求他的这位门徒接管他们事务的书信中也可见一斑。沃尔西背负的蔑视王权罪指控影响了那些从他那里得到土地授权的人，因为这不只令他本人的土地所有权失效，也让受益于他的人们的所有权失去了法律效力。此时，他们当中很多人惊慌失措地写信给克伦威尔，迫切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其中包括肯特郡霍斯门登的威廉·佩奇（William Page），沃尔西授予他一些旧修道院土地的所有权，但是现在这些土地的原所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佩奇在一位杰出的律师和受信任的王室顾问托马斯·内维尔爵士（Thomas Neville）的建议下，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12] 克伦威尔并没有避开与旧主的关系，恰恰相反，他似乎在积极宣传他们的关系。他甚至把沃尔西盾徽上的一些纹样纳入自己的纹章，以作为他不朽忠诚的大胆宣言。

12月17日议会休会后不久，沃尔西就写信给克伦威尔请他来伊舍：“因你爱戴我，请在今天议会解散后到我这里。我需要跟你交谈以得安慰，有一些急需代理的事情需要征求你的意见。”克伦威尔显然拒绝了，因为不久之后沃尔西再次写信敦促他：“我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事情需要跟你沟通，你听了也会开心的。”惊慌失措的他称克伦威尔的一封信被拦截并因此送至伊舍，但这可能只是他劝这位门徒造访的一个计谋。他跟克伦威尔说“在这难耐的焦虑和忧伤中你是我唯一的救兵”，说他不信任别人代理他的案子，要把它们全部交到克伦威尔手中。[13]

情势的压力很快给沃尔西的身体带来了损害。几天后，他生病了。年近60岁的沃尔西健康状况不佳已有一段时日，他接受了很多疾病的治疗，其中包括结石（可能是胆结石）、发热、黄疸、咽喉感染、腹绞痛和水肿。他的失势让他的健康状况急速恶化，也影响了他的胃口和睡眠。因他拒绝规律用餐，尚在早期的疑似糖尿病（病症是腹泻和呕吐）病情恶化了。枢机主教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归咎于克伦威尔没能来访，告诉他："你迟迟不来这里，让我更加忧伤，我的心是如此焦虑，这天晚上我哀叹时的气息是如此短促，像离死只有3小时之隔的人一样。"他悲痛地继续道："如果我不能搬到空气更干燥的地方，那我很快就没什么希望了。"尽管确实备受折磨，沃尔西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病痛说服克伦威尔来看他。"如果你顾念我的生命，今晚抽身来我这里，好让我对你诉说那些无法给你写在信中的指示。"信末他悲伤地恳请他"现在为我吃些苦，不要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丢弃我……现在正是考验你对我是否真心的时候"。[14]

沃尔西的病似乎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在恳请克伦威尔乞求国王垂怜的同时，他还敦促其请安妮·博林从中调解。"如果小姐的怒火有所平息，正如我向上帝祈求的那样，你可以想一些合适的办法请她帮忙，因为这是唯一的补救方法。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得到她的帮助。"[15] 这个女人协助推倒了他，宫廷中几乎没有人比她更不愿意为身陷重围的枢机主教求情的了。克伦威尔充分利用沃尔西糟糕的身体状况以争取她以及她的王室追求者对身陷重围的枢机主教施以同情。亨利立即派他的医师威廉·巴茨（William Butts）去照看沃尔西，并送去另一枚戒指以示爱怜。安妮感到有必要使用交际手段，也给沃尔西送了一个象征自己的物件。受这些垂怜象征的鼓励，沃尔西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奇迹般的恢复。[16] 他一度试图修复与安妮的关系，或许是误以为安妮对他的关切是真心的。他为此从温彻斯特教区的地产中支出200英镑的年金给安妮亲爱的弟弟乔治，并从圣奥尔本斯（St Albans）给他支出了同样的金额。这几乎肯定是克伦威尔的主意。他明白——而他的主人不明白——

即使是宫廷中最有影响力的贵族在经济上也得依靠国王、几乎没什么属于自己的可支配收入。他们的地位要求他们在亨利八世耀眼夺目宫廷中衣着光鲜，而这是大多数贵族都负担不起的。除了给乔治·博林拨款之外，克伦威尔还安排将亨利·诺里斯的薪资从100英镑涨到200英镑，并将约翰·罗素爵士的年金提高了一倍多。[17]

虽然这些馈赠是以沃尔西的名义做出的，但克伦威尔自己也从中获得了好处。由于枢机主教本人被困在远离宫廷的伊舍，他的代理人收获了所有的谢意以及由此产生的很多好处。大多数馈赠是给博林家族的，他们对沃尔西的憎恶十分强烈，绝非零零散散的几百英镑可以驱散，这暗示了此举可能是克伦威尔有意而为，而博林家的人也很可能对这位实际馈赠者高看一眼。不出所料，沃尔西在给乔治·博林拨款之后不久就给安妮·博林写了一封信，但无人答复。克伦威尔感伤地坦言："她说了几句客气话，但不愿答应替你向国王求情。"他不可能再到安妮那儿碰运气了。克伦威尔告诫沃尔西："没有人愿意替您向国王求情，因为他们都担心安妮小姐生气。"他是对的。1529年9月来到英国宫廷的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向他的君主查理五世汇报说，安妮对约翰·罗素在国王面前为沃尔西美言的行为感到气愤："安妮小姐非常生气，拒绝跟他说话。诺福克告诉他安妮在生气，因他没有尽可能地对付沃尔西而恼火。"[18]

查理五世任命夏普伊为自己的大使，为姨母阿拉贡的凯瑟琳充当顾问。虔诚而坚守原则的夏普伊不仅完成了皇帝的指示，还迅速跟深陷囹圄的王后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的拜访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安慰。凯瑟琳委托夏普伊给外甥带信，她和女儿玛丽渐渐把夏普伊当作钟爱的朋友而不是官方的顾问。夏普伊也越来越喜爱这两位女士，把自己当作她们唯一的捍卫者，完全投身于支持她们的事业，也在此期间对"情妇"安妮·博林以及所有帮助她夺取王后宝座的人——包括克伦威尔——产生了无法平息的深切憎恶。

尽管在公务上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夏普伊和克伦威尔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律师，才思敏锐、热爱学习。他们也都异常精明，能够在任何形势下找出关键所在。在彼此之间变得熟络之后，克伦威尔和夏普伊仍旧互为对手而非朋友，但从两人的通信中确实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彼此都怀有一定敬意。大使在一封写给皇帝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对他（克伦威尔）的喜爱”。[19] 克伦威尔还是一个好邻居，1533年10月帝国大使馆发生火灾，烧毁了夏普伊的衣服、家具和贵重物品。这位大使立即写信给他的君主，哀叹道：“这对我是一次糟糕的、难以弥补的打击，我损失惨重！”但他又补充说，自己的邻居克伦威尔“派人来为我个人提供了一些帮助”。夏普伊虽然表达了“婉拒”之意，但似乎为此感动。[20]

随着克伦威尔在宫廷站稳脚跟，为自己开拓事业和替饱受憎恶的沃尔西辩护这两个明显矛盾的目标渐渐变得一致。卡文迪什回忆道：“克伦威尔大人判断自己独立行事并使夙愿达成的时机已到，意图在这些事务的处理上满足宫廷中人的要求，进而更快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所以这两人利用聪明的头脑共同努力，并用他们的方法让克伦威尔先生有了既可以为他自己效力也可以给我的大人带来益处的职位和身份。”[21] 克伦威尔定期入宫，即便从事如此棘手的差事，他也得以在宫廷积累人脉。此外，接管处理沃尔西地产的事务也让他能够展现自己在法律事务上的能力。不过最重要的是，作为沃尔西的首要辩护者，克伦威尔跟国王本人的接触更加频繁。起初，因为没有头衔和背景，他不得不跟已经可以接近亨利的人建立联系。他的选择在预料之中：国王的律师们。克伦威尔跟亨利的司法大臣克里斯托弗·黑尔斯（Christopher Hales）建立了尤为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后者把他引荐给了国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或许是宫廷上唯一对失宠的枢机主教还有感情的人。1529年12月底，拉尔夫·萨德勒向他的主人汇报“大人（沃尔西）的阻挠者和敌人先他的朋友一步面见了国王”，但又说他“相信他们

的目标不会达成”。[22] 萨德勒的信心是合理的。亨利愿意听克伦威尔代他的主人请愿。这些早期的交流让克伦威尔有机会利用他的不俗魅力来争取国王青睐，同时也证明他在商业事务上的能力。他的举动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沃尔西失势后不到一个月，克伦威尔的一个朋友就告诉他，说自己听到“令人欣慰的消息，国王、上议院、宗教和世俗群体都很喜欢你”。[23]

虽然沃尔西的敌人在他离开后迅速掌握了宫廷和枢密院的主动权，但是还有亨利本人也很想填补的一处非正式的空缺无人接替。自1509年亨利即位以来，枢机主教就是他的主要依靠。他将国王从烦琐的政务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在从外交活动、对外政策到司法、税收和教会的各项事务上都责无旁贷。他是亨利政府中第一个真正的全才，现在国王需要另一个。而克伦威尔——或许在他旧主的指点之下——也需要尽快证明自己有能力接替这一职缺。他跟沃尔西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国王不可能没注意到克伦威尔同样也出身卑微，也是靠着自己的极佳本领和刻苦努力为人所知，并证明了自己擅长各种事务。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面面俱到的经理人：他的确不喜欢把工作委予旁人。这或许是出于高傲的自信，认为自己一个人就能有效地处理各项事务，也可能是他本性如此，对他人的动机持有怀疑（这经常是合理的）。

国王也注意到他们两人性格相似。克伦威尔同样异常精明、有敏锐的观察力——或许更甚于他的师父——此外，他们都集令人难以抵挡的魅力、幽默和不恭于一身，这让亨利受制于枢机主教多年。他或许没有享受正规教育所带来的益处，但是他学会了和出身高贵的同僚们一样用清晰、有说服力的方式写信、交谈——以至于后来他作为伟大的雄辩家闻名于整个宫廷。虽然他曾宣称“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说谎或者假装”，但他已经是交际和欺骗的行家，擅长两面三刀。[24] 简单来说，克伦威尔是一个理想的廷臣。让他更有资格的是，他很快跟上了宫廷狩猎和驯鹰

的风尚，他知道想要定期接近国王，这两项技能是必需的。他还可以用长弓射箭。这类消遣的一个附带好处是能让他跟宫廷的其他成员一起处理非正式的事务。夏普伊在信中多次提到克伦威尔邀请他去狩猎，并且要为此给他一匹好马——大使一贯对这种馈赠表示拒绝。他还报告说，克伦威尔在家里饲养鹰，并且喜欢在用过晚餐后看他们在暮色中飞翔。

不过克伦威尔知道，即使他希望如此，但通过扮演延臣的角色无法抹掉他卑微的出身。相反，他将卑微的出身转化为又一优势。尽管他可以像圆滑的廷臣一样不留痕迹地阿谀奉承，但他还是选择坦白直率、不加修饰地讲话。“我知道你是如此希望人们能对你开诚布公、直白地讲话。”帝国大使告诉他。[25] 并且，克伦威尔让人留意他的背景是为了让亨利相信，他自认为自己不配面见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一如既往对奉承没有抵抗力的亨利很快对这一套路产生了好感。“极为谦卑地俯伏在您威严的脚前，乞求陛下您原谅我这样大胆地写信给您，”克伦威尔在一封信中这样结尾，“是为了表达我真正的职责和忠心，以及我对陛下您和您的王国的热爱，上帝知道，我时常向他祈求您高高在上的、至尊的、威严的国度繁荣昌盛、直到永远。”[26] 但是国王并不希望身边的人只会溜须拍马：他需要一个敢于挑战他、跟他说实话，但又听从他命令的顾问。托马斯·克伦威尔正是填补沃尔西留下的空缺的完美人选。

两个人都有如此卑微的出身并非偶然。沃尔西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要不是他的仕途一结束国王就找了另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取代他，他的崛起仍是一件反常的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亨利选择他们是否恰恰看中了他们的背景呢？是不是他们的出身给了他们其他贵族同僚没有的重要本领？当然，他们都是本领高超、自学成才的人，有着各种在服侍国王的时候极其有用的实践经历。他们还都非常勤奋，有承担繁重差事的强大能力——这是大多数贵族廷臣都没有的，他们的地位与生俱来，而非从艰苦奋斗中获得。立志以服侍国王为业需要相当大的远见和野心：这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看似完全触不可及的梦想。在宫廷有了立足

之地后，两个人都被同样的野心激励着；这让他们有力量和动力继续争取更大的发展，也让他们有了洋洋自得的对手所没有的优势。

但是克伦威尔必须让人看到，他并不只是枢机主教的复制品：毕竟无论后者如何得蒙亨利宠爱，他最后没能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没能促成国王和凯瑟琳的离婚只是其中一项。如果克伦威尔要在他主人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帮助亨利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关键。克伦威尔在法律事务上取得累累硕果的能力已经在宫廷中得到认可，亨利也很快意识到这种能力可以有效地运用到自己的“大事”上。据说在两人早期的一次会面中，克伦威尔悄悄对君主讲述了一个将在16世纪30年代引发一系列教会和政府机构变革的计划，于是亨利立刻命令他将其付诸实施。不过，现实可能并非如此。虽然国王无疑看到了克伦威尔的潜力，但是自沃尔西当初掌权以来，他选择首席顾问的条件改变了很多。当年的亨利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乐于将政府事务交给沃尔西，这样他就可以专注于更有趣的消遣活动。这样的安排在近20年的时间里是有效的，但是沃尔西在促成离婚一事上的挫折迫使这位君主更加积极地执政——他过去并不介意放手。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够执行自己命令的人，而不是让他们自行决断。

当时的人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对克伦威尔和沃尔西进行比较，并猜测前者是不是会在旧主失败的地方成功。当不少（贵族出身的）廷臣轻蔑地议论着又一位出身卑微的侍从的崛起时，夏普伊大使则利用比较来抬高克伦威尔。他告诉查理五世：“在跟他几句随意的交谈之后，我认为最好让他站在我们这边，用感叹他没能在枢机主教得宠时得到君主赏识和厚爱的说辞奉承他，因为他比枢机主教更有能力和天赋，现在有这么多机会可供人成名得势，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比枢机主教更伟大的人，同时国王的事务也会得到更好的处理。”夏普伊总结道：“我认为英格兰国王、他的君主在眼下的多事之秋能拥有像他这样的人，可谓十分幸运。”[27] 克伦威尔自己也迫切希望能从他的前任身上吸取经验教训，并

将其超越，因为他也想摆脱人们对这两个服侍国王的平民喋喋不休的比较。

虽然克伦威尔作为律师的名声已令人印象深刻，但亨利还是不大可能把离婚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至少在他看来未经考验的人。因此他让克伦威尔处理一桩非常复杂的法律案件，以检验他被大肆夸赞的能力。虽然沃尔西在退任时将他所有的资产和财物都上缴给了国王，但是他筹建的学院的法定地位还很复杂。尽管因为收入和财产被没收，这些学院在经济上越来越拮据，但在枢机主教失势后，它们仍然继续运转了将近一年。不过，尽管国王可以轻易没收他们的贵重物品，但是地产就另说了，因为学院的建筑是由克伦威尔协助监管解散的约30座修道院赞助修建的。相应地，这次解散行动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得到了教宗的批准，并规定收入必须用于资助教育设施。亨利本人认可这一点，并承诺保护这些学院的合法性不受质疑。因此他不愿公开食言，把这些土地用于世俗目的。但是他的律师们找到一个漏洞让他可以这么做，他最终也同意付诸行动。约从1530年6月开始，他委任专员开展调查，并监督修将道院地产移交给王室的过程。因为克伦威尔负责最初的财产转让，所以选他监督此事顺理成章。

克伦威尔正式开始为国王效力的日期尚不确定。此事首见于沃尔西1530年8月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到克伦威尔有“接近国王本人的机会”。[28] 但是其他通信表明，即便没有正式服侍，他至少也在几个月前就得蒙国王喜爱。1530年2月3日，他的旧友、一直担心沃尔西失势之后克伦威尔的名声会受影响的斯蒂芬·沃恩写信恭喜他赢得了亨利的青睐，对他说：“你现在是在一个安全的港湾里航行。”不过，他也忍不住提醒他：“天气平静的表象会让人放心驶入危险海域，不再担心突然被暴风雨压制，但他们不经意间就会遭遇险阻、身处极大的危险之中。”[29]

沃恩还让我们罕见地瞥见了他这位朋友的私人生活，因为他让克伦

威尔代问后者的母亲安好。如果他指的是凯瑟琳·克伦威尔，那么这是自托马斯童年以来她唯一一次在当时文献中被提及，常见的假设是青年克伦威尔在离开帕特尼去欧洲大陆的时候跟父母断了联系。他的父亲沃尔特大概在克伦威尔还在游历的时候就去世了，虽然他的母亲比父亲活得久且再嫁过，但此时按照当时的标准，她应该也是一位非常年老的妇人了。事实上，凯瑟琳有可能在1530年就已经去世了，沃恩指的是克伦威尔的岳母默西·普赖尔。沃恩非常喜欢她，称呼她是“除了你之外我最好的朋友”。[30]

沃恩不是当时唯一一个记录克伦威尔快速得宠的人。早在1530年5月，玛丽公主请他调节她跟父王的关系时对他说：“我听别人说所有人都会先找你打探我父王的心情。”[31] 接下来一个月，约翰·罗素爵士告诉克伦威尔，在他帮助宫务大臣桑迪斯男爵威廉（William Lord Sandys）成为法纳姆城堡——枢机主教上缴的房产之一——的主人之后，亨利很喜爱他。“在你退下之后，国王给了你很高的评价，”他写道，“下次见面时我会告诉你。”[32]

在极短的时间内，克伦威尔显然已经获得了三样在宫廷发展的必需品：国王的钟爱、宫廷重臣的支持，以及证明自己拥有服侍王室的能力。

---

[1] Shakespeare，W.，*Henry VIII*，Act III，scene ii.

[2]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69，170.

[3]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05.

[4]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12.

[5]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277.

[6] Mathew，D.，*The Courtiers of Henry Ⅷ* （London，1970），p.70.

[7]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764.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12.

[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47.

[10]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19.

[1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36.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58.

[1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80，6098.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114，6076.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14.

[16] 尽管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病痛，但病痛是真的。稍后不到一个月，他的医师奥古斯丁博士惊慌地写信给克伦威尔，请他找水蛭并从国王的医生那里找来“催吐的药剂”。*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51.

[1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115，6181.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

6199.

[1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Vol.X，no.601.

[20]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I.ii，p.819.

[21]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26.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12.

[23] Elton，G.R.，*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Cambridge，1953），p.88.

[24]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56.

[25]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298.

[2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373.

[2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I.ii，p.759.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554.

[2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96.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6，5034.

[31]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66.

[3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420；Elton，G.R.，*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Cambridge，1953），p.85.

第五章 “人事的弱点”

这一时期克伦威尔所在的宫廷是世界上最耀眼的宫廷之一。据一位心怀艳羡的外国访问者所说，亨利的宫廷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宏伟、非凡、华丽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供君王居住，但到16世纪早期它已成为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政府机构所在地，以及学者、艺术家和该时代一些最伟大思想家的聚集地。作为时尚和优雅的典范，它决定了整个国家服饰、艺术和建筑的潮流。

亨利八世拥有的宫殿数量冠绝历代英格兰君王。其中最主要的是坐落在泰晤士河岸边的奢华宫邸群：从庞大的怀特霍尔宫到宏伟的伦敦塔，再到辉煌的汉普顿宫，他的宫邸令举世羡慕。这些宫殿以最精致的挂毯、色彩艳丽的丝绸和天鹅绒装饰，有金银图版、精美的雕塑和绘画点缀，即便在阅历丰富的廷臣看来也是令人惊叹不已的。家具上镀有大量金属，挂毯都穿织着大量的金丝线，所有的东西都涂着明亮的色彩，以现在的品味来看可谓艳俗。就连地板都涂上了鲜艳的色彩，或是铺上了色彩艳丽的地毯。尽管大多数室内装饰如今都已不存，但假如站在汉普顿宫巨大的大厅里，抬头凝视那些留存至今的悬臂梁屋顶上令人惊叹的工艺，以及为提醒众人宫廷内隔墙有耳而设的、俯瞰着廷臣们的小型人头像“窃听者”（eavesdroppers）的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敬畏和惊奇。

亨利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度过，在他伦敦的宫殿里住的人是最多的。每天挤在议事厅里的廷臣没有数千也有数百，为他们提供食宿等必要服务的工作如军事行动般忙碌。在夏季或伦敦城受时疫威胁的

时候，国王和少数受宠的廷臣会去伦敦以外的宫殿或者显赫的贵族和枢密大臣的府邸“巡游”。他们会在一地待到正好耗尽主人所拥有的物资为止，然后带着庞大而冗杂的车马与侍从队伍搬到下一个住处。这支队伍就是一个流动的宫廷，国王和随从平均一年要搬迁30次——不过随着国王的身体不再矫健，搬迁的次数也少了一些。

皇家宫殿是按照大致固定的规划建设的，这反映了都铎王朝的王室成员比生活极其公开的中世纪君王更渴望隐私。因此，诸如大厅之类的公共空间抑或“公务”空间和私人起居套房之间的划分越来越明确。亨利和妻子的住处彼此分开，沿着一条正式的、列队仪式时用的路线分布，越往里走就越隐蔽、越私密。外围的房间有守卫室和接见厅。接着是寝宫——国王的内室，他在这里用餐、跟客人交谈、处理公务，或者休息。再往里是一个人的或者说“私密”的住处，其中有国王的主卧室和小卧室，还有一间密室（可以是个人祈祷室也可以是书房）和马桶。

因为只有最受宠的廷臣才可以进入寝宫，所以它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重要性，只有枢密院可与之相比。后者通常由19名左右的成员组成，几乎每天都要聚集讨论并决定所有政务。亨利在位的时候寝宫的内侍人数有所增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持续工作。随着亨利的统治延续，这些寝宫内侍的个人权力抑或非正式权力——他们可以在国王的“休息”时间向他请愿、影响他的决策——跟枢密院大臣掌握的正式权力抑或“官方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聪明的廷臣会确保自己在两处都有涉足。

不过，宫邸仆人和枢密院大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随着亨利在位时间的增长，宫廷因派别斗争日益分裂。这些派系在不同的时期，由有影响力的廷臣和枢密院大臣根据不同的问题结成，其成因涵盖了对外政策乃至国王的婚姻问题。他们的权力之争主导着亨利宫廷正式和非正式的生活。弗朗西斯·布赖恩爵士（Francis Bryan）说那里有着“过剩”的“恶意和不快”是有充分理由的。政治联盟的聚散之快令

人不知所措，如果某个派别看上去要失去国王的青睐了，它的成员就会叛离，没有什么忠诚或原则可言。诺言不能当真，没有人值得完全信任——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真诚。很多人批评这种生活方式。莱尔夫人（Lady Lisle）的代理人约翰·休斯（John Husee）也认同布赖恩的观点，他提醒道：“每个人都应该当心宫廷里的阿谀奉承。”同时，亨利后来的王后简·西摩尔把宫廷描述为一个“充满骄傲、嫉妒、愤慨、嘲弄、轻蔑和讥笑”的地方。[1]

亨利八世喜欢被跟他志趣相投的廷臣所簇拥。诸如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Charles Brandon）、安东尼·布朗爵士（Anthony Browne）和威廉·康普顿（William Compton）都经常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不仅与他兴趣相投，体格也跟他相仿：高大、仪表堂堂。据说国王有意挑选跟自己相似的人。从荷尔拜因的肖像画来看，克伦威尔——至少在体格上——跟他的君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克伦威尔开始辅佐他的时候，亨利已经没有了青年时对运动的热情，腰围也长了不少。克伦威尔的体格也可以称得上肥胖。跟他的君主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克伦威尔有很好的运动技能，虽然在青年时期他的身体足够强健可以从军。不论怎样，两人现在都安于中年的舒适，有着与年龄相称的腰身。

要不是在宫廷服侍的回报至少与风险大抵相当——甚至比风险大的话，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在这种诡谲多变的地方度过一生就令人费解了。虽然亨利对宫廷和政府的掌控绝没有他的父亲那么紧，但他依然是权力和晋升的主要来源。因此对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廷臣来说，能够近距离、经常接近国王是一个关键的前提——克伦威尔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曾向夏普伊坦言：“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人事的弱点，特别是宫廷的人事，他亲眼见证了几个可以称得上是身边的例子，他总说如果命运像待他的前辈一样待他，他会以耐心为装备，把剩下的交给上帝——这是非常正确的，正如我之前说过，他要依靠上帝的帮助才不致遭逢厄运。”[2] 奉行这种哲学是明智的，但是后来克伦威尔的乐观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考验。

到1530年年初，克伦威尔显然已经成为宫廷中的后起之秀。他不仅用最初几个月来稳固自己的位置，还坚持不懈地修复沃尔西与国王的关系以避免前者被控告叛国。失宠的枢机主教的感激之情横溢，用各种方式称呼他的前门徒是“我唯一的安慰”“我唯一的救兵”“我忠诚的托马斯”“我唯一的避难所和帮手”。[3] 不过，尽管充满感激，但枢机主教对他这位门徒的期待有些不切实际。他拒绝承认自己辉煌的日子已经结束，一直试图再得国王宠爱，称克伦威尔是他达成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敬畏上帝的你不要现在离弃我，因为如果你离弃我，我将无法继续生活在这令人痛苦的世界上，”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呼求，“你不会相信这让我改变了多少，因为我没有从你那里收到关于我的事情的进展和行动。”[4]

尽管说了这些好话，但沃尔西是所有乞求克伦威尔帮助的人当中要求最高的。虽然他声称不在意“这个世界的好与坏”，只想“有适当的收入可以供养自己的家，恩待自己可怜的用人和亲戚”，但他显然不能适应经济窘迫的境遇，坚持说他生活一年最少需要4000英镑——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目，相当于今天的130万英镑。他甚至要克伦威尔给他送来一些鹌鹑做晚餐。以没有人愿意给枢机主教送鹌鹑为借口，克伦威尔相当恼火地拒绝了他。一份约在这个时期制作的沃尔西物品的存目揭示了他过去10年异常奢靡的生活。存目收录了很多挂毯和天鹅绒幔帐、27个羽毛铺盖、157床羊毛床垫、88个羽绒枕头、绣花丝绸床单、“金线绸”垫套、威尼斯地毯、水晶杯和金杯、镀金杯盘，还有很多其他财宝和装饰品。

克伦威尔在看到前侍主这些越来越坚决、不切实际的来信时的愤怒可想而知。沃尔西把他置于一个在任何能力或说服力略差的人看来都难以忍受的境地。但是克伦威尔在欧洲大陆游历多年和辅佐沃尔西期间学会了交际的艺术，他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国王的性格和情绪。这一点在1530年2月12日他求得亨利对沃尔西的赦免时得到证明。[5] 之后不久，

他的前侍主恢复约克大主教的职位，重获除了约克坊以外的其他资产。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略长于四个月的时间里，克伦威尔将沃尔西由一位行将面临叛国指控的失宠大臣再一次转变成英格兰最重要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他是在没有职权、缺乏人脉的基础上，在为枢机主教的政敌所充斥的宫廷中取得了这样的成就。现在，沃尔西和克伦威尔本人都得到了国王青睐。

但沃尔西仍不满足。一个稍微不那么有野心的人可能会满足于仅得赦免，这样即使不能飞黄腾达，也可以安稳度过余生。但是枢机主教太习惯于富足和奢靡，他给克伦威尔寄送了多封语带恼意的信件，督促其保护自己的财产。他特别想保留温彻斯特教区和圣奥尔本斯修道院——或者，如果国王想从他这里收走这两处圣职名下的财产，他希望克伦威尔能够为他谋得一笔抚恤金。“上帝做证，在我上交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并且也得到保证不会失去我的任何一个职位；尽管法律严苛，但我被指控任一罪行都不应受如此惩罚；因而，抱着对国王之仁慈的信赖，我提出了这个请求。我希望国王陛下也能给予相应的考量。我听到很多好听的话，但很少看到令人欣慰的行为。”[6] 尽管他口头忏悔，但枢机主教满是自以为是的愤慨，他督促克伦威尔对国王晓之以理。“至于加诸我身上的罪状，一大部分是不真实的，其中真实的那些也不足以用来控告我曾对国王本人或王国怀有恶意，或蓄意蒙骗。”从沃尔西建议克伦威尔用在国王身上的策略可以一窥他本人跟亨利的关系，因为他力劝克伦威尔把对国王的顺从放一边，“要大胆行事”。[7]

这种策略在沃尔西权力位于巅峰的时候或许有效，但是克伦威尔与国王还不够亲近，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更加圆滑得体的方式。他对沃尔西说：“我已就财政部门（Exchequer）对您的控诉和其他针对您的控告为您请求了赦免，这已在国王的各法院得到批准；针对您行为的控诉也因此取消了。”但沃尔西仍旧不满意。虽然他被赦免了，但约克的地产并没有被立即还给他，他敦促克伦威尔查一下发生了什么。他的这位前门

徒请他耐心等待，因为结案要走必要的法律程序，而这要花一定时间。“这会让您非常不快，但是最好忍受。这是因为，倘若您不能收回这些资产，那么即便在得到赦免之后，您也无法安坐主教之位，而由于国王在法庭备案之前为您提供了赦免。所以这一赦免目前仍未生效。只有等到您的职务正式恢复之后，赦免令才会名副其实地完全生效” [8]

诺福克公爵因枢机主教逃脱了更多报复而被激怒。当约翰·罗素爵士以为沃尔西现在有望返回宫廷的时候，这位公爵“开始大声宣告自己宁可生吞了他也不愿就此罢休”。在这件事上，他要把枢机主教赶得远离宫廷才罢休。3月初，他通过克伦威尔命令枢机主教出发去约克。因不愿离宫廷那么远，沃尔西延迟启程。但到1530年4月，他再无借口拖延，不得不开始向北的漫长旅途。他缓慢而（根据某些说法）庄严地向北进发，途中几次在各个居所停留。虽然以贫穷为借口，但是他以“奢华得让一些人以为他像过去一样大胆的方式”出行。在到达约克的时候，他告诉亨利“让我极为忧伤的是，没有任何可以供我和我可怜的手下们使用的家具用品……我既没有谷物也没有家畜，或者其他用于维持主教府运转的必需品，也不知道该向哪里借得这些物资”。因此，他总结到，自己正“陷于困苦之中，各方面都缺乏；除了最仁慈、慷慨的国王陛下以外，不知道还可以从哪里得到援助和解救”。 [9]

克伦威尔耐心渐失。沃尔西此前一直抱怨他不来伊舍拜访自己，现在又扮成了一个完全被忽视的人。尽管枢机主教的反应趋于夸张，但他对克伦威尔不再关心他的指控并非全然无稽。毫无疑问，克伦威尔仍在为沃尔西的利益而努力，但他慢慢开始建议枢机主教向枢密院的其他成员请求援助。 [10] 他还开始仅传达国王和其他人的话，而不是用未来情况会好转的保证让信件更乐观轻松。在一封信中，他甚至传达了诺福克公爵的口信：“你要满足于现状，不要经常打扰国王……因为他认为这不合时宜。”克伦威尔也提醒枢机主教，亨利已经“告诉我他注意到自您与诺福克大人结怨以来，您在他和其他贵族面前对诺福克大人素有微

词，这些言语听起来像是在挑拨他和诺福克大人”。他继续说道，尽管沃尔西仍在一些领域受到尊重，但他的敌人“要把他彻底搞垮”，并提醒道：“大人，有一些人提出大人您的房子太大、家仆太多，而且您一直都在建造。因此，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克制一下以示尊重。”[11] 这足够让大多数人胆战、保持低调了，但是沃尔西仍固执地企图重获他认为当属他的资产和财富。

虽然克伦威尔继续为枢机主教效劳，但是他们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克伦威尔对他前侍主的忠诚让他无论在名誉还是钱财上都受损很多，而他不是一个会轻易放过他人借债的人。1530年7月，他告诉枢机主教继续为其辩护“花费太多”，自己已无力再承担。他说：“我的财富比您刚陷入困境时减少了1000英镑。”这促使沃尔西给他的这位前门徒一些补偿，但这是由克伦威尔的秘书拉尔夫·萨德勒而非克伦威尔本人出面接受的。这很难说是一种有礼貌的回应。萨德勒告诉沃尔西，他的主人“已经接受了他的好意，但是这跟他期望的补偿有差距”。[12]

9月29日迷迦勒节当天，沃尔西搬到了约克以南几英里外的卡伍德城堡（Cawood Castle）居住。之后不久，他获悉国王开始占有他的学院以及圣奥尔本斯和温彻斯特的地产。因为这时枢机主教以蔑视王权罪被指控，只要沃尔西还活着，亨利对这些学院收入的转让都是合理的。这时克伦威尔看到了他的优势——或者像卡文迪什所说的那样，“察觉到一个碰巧可以为己谋利的机遇”。只有一位具备他那样出色本领的律师能够在冗长复杂的程序中找到出路，其中一道程序是确保这些转让可以长期有效。这些转让的获得者们因此不得不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并给予丰厚的报酬。“他们都是来获得我家大人对土地转让的确认的，”卡文迪什说，“继而在温彻斯特和圣奥尔本斯获得土地转让的每个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富绅，都开始请克伦威尔代理他们的案子，从我家大人那里得到他的确认，他们为他在其中的付出给予丰厚的回报，并且每个人都向他保证始终乐意用他们不大的权势为他效劳。”

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收获。“现在凡事都开始以与他的职位晋升相对应的方式增加克伦威尔大人的名望”，卡文迪什说。以前请求沃尔西介入的所有人“现在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诚心诚意地拜访克伦威尔大人，他从不拒绝，承诺会在相应的案子上竭尽全力，他有很好的接近国王的机会，可以处理各种各样他负责和管理的事务；通过这种途径、靠着机智的言行，他越来越得国王宠爱”。据卡文迪什所言，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这次机遇：通过解决棘手的法律难题使每个人获益（可能除了他的前侍主以外），他让自己一跃成为宫廷中极受尊崇、极有影响力的人。“因此他的名气和友好态度在众人中传响。他诚实而贤明的名声传到国王耳中……以至于国王也认为，他拥有与名声相符的智慧……他在这个过程中跟国王的对话使国王越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一个适合辅佐他的人，正如后来的实际情况一样。”[13]

沃尔西听闻他挚爱的地产被夺取后非常悲痛。克伦威尔本人记录道：“枢机主教因他的学院被解散并拆除一事而深受打击。”起初，沃尔西的悲伤还较轻，将他的“可怜的房产和学院”托付给“你和其他好朋友，帮助、救济他们”。但当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被拆除时，枢机主教在悲痛面前丧失了平常的冷静，他“谦恭地跪着流泪”恳请国王至少放过牛津学院。他也给克伦威尔送了相似的信息，哀痛地说他“因悲伤流泪以致下不了笔”。他继续感谢他的这位门徒付出的“所有努力”，承诺在他有能力的时候“报答他”。[14]然而，由于回信迟迟不到，沃尔西的悲痛变成了怨恨——大多是针对克伦威尔的。显然沃尔西听闻传言说他的前门徒背叛了他，从他地产的四散中获利。枢机主教跟别人抱怨，惹得克伦威尔愤怒地写了一封信，质问枢机主教是否还信任他。

> 有人告诉我大人您对我有些怀疑，就像我真的对您有所隐瞒，或者做了任何有悖于您利益和名誉的事一样。考虑到我的所有付出，我很惊讶您会这么想，或者私下这么控诉……我真的恳请您，如果您有这样的想法，请让我有机会为自己正名。我认为大人您应该写信直白

> 地告诉我而不是暗中诬告我……不过我对大人你的善意不减……上帝在我们中间做证。大人您确实在一些事情上做过了头，您应该在考虑可以跟哪些人说哪些事情时三思而后行。[15]

克伦威尔精明地判定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朋友告知沃尔西克伦威尔在代理他所有案件时的忠诚之后，情绪缓和的沃尔西温顺地向他保证，他已经意识到这些传闻是站不住脚的。“枢机主教努力向克伦威尔表白自己，”有记载显示，“明言没有怀疑他，这点可从他的行动中看出来，因为除克伦威尔以外他没有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或建议……他向他们共同的朋友询问克伦威尔对他如何，令他欣慰的是，他发现克伦威尔很忠诚。”沃尔西信末是饱含热情的请求，他“悲痛流泪”恳请克伦威尔“保持坚定，不要相信任何不真实的使我们之间产生分歧、让我丧失所有援兵的暗示”。沃尔西后来还寄去了更多都是以卑微的语气写的信函。“我最亲爱的克伦威尔”，他在1530年8月一封称赞这位门徒“仁慈心肠”的信函开头如是写道。[16]

克伦威尔给沃尔西回信一封以示安慰，但他在信中虚与委蛇，态度近乎无礼。克伦威尔肯定知道自己给出的保证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但他显然急于掩饰自己从这整件让人抱歉的事件中得到的好处。“请大人保持安静，沉着对待关于这些职位的决议，在归还您的资产一事上，会有法院裁决，这不会影响您得到收入，也不会让您另外受任何新的庄园诉讼案的干扰。”他在另一封信的结尾说道：“我恳请大人您知足，好遂陛下之心意。”[17] 通过暗示这一切是国王而不是他的所作所为，克伦威尔精明地转移了沃尔西对他仍存的怨恨。

这个插曲不仅显示了沃尔西和克伦威尔关系的裂痕，还表明了二人是何等易受宫廷阴谋的影响。虽然沃尔西远离宫廷并且显然不可能重新获得影响力，但是他跟克伦威尔的联盟在意图完全摧毁他们的对手眼里仍是一个威胁。即使在远离宫廷的伊普斯威奇（Ipswich），一名与克伦威尔通信的联络者也汇报称：“在这些地方关于您跟我的谣言会让您震

惊。”[18] 在卡伍德显然也是如此，那里也不乏诋毁克伦威尔和他的前侍主的告密者。

沃尔西跟克伦威尔的关系从未完全修复。后来的通信透露了克伦威尔对枢机主教不能接受事实而感到越来越失望，但对个人和政治利益的追求并没有完全冲刷掉他的忠诚。虽然他不能阻止国王占有学院，但他知道这在沃尔西心中有多重要，所以他尽自己所能帮助那里的居住者。牛津主教学院一位心怀感激的教士约翰·克雷克（John Clerke）在12月21日给克伦威尔送了一副手套，以感谢他善待自己和兄弟。克伦威尔10月21日很有礼貌地向沃尔西建议他雇用他的亲属，一个名为卡伯特（Dr Karbott）的学士，“虽然他外表有些朴素，但如果加以重用会很得力”。他接着为沃尔西的一位年轻侍从尼古拉斯·克福德（Nicholas Gifford）做出了推荐并给这个人的性格以敏锐的评价：“虽然年轻、有些轻率，但他诚实、正直、坚韧，会全心全意爱戴大人您。”[19]

忙于枢机主教府中杂务让克伦威尔误以为枢机主教的个人兴趣仅限于那个范围。但除了处理主教教区的事务以外，有传言称沃尔西又开始干预政事了。据他的对手宣称，沃尔西正在跟罗马皇帝和法国国王协商，意图获得教宗禁令让亨利放弃安妮·博林。至于枢机主教是否真的如此鲁莽行事尚有争议。考虑到他是如此迫切地想重得国王的宠爱，这看起来不大可能。更何况，在一份7月向教宗请愿要求批准国王离婚的教会和世俗要人名单上，沃尔西也名列其中。但是，10月23日，当亨利收到一份禁止他再婚并命令其将安妮·博林从宫廷中驱离的教宗手谕时，嫌疑直指沃尔西。

国王很快采取了行动。11月1日他派国王寝宫的侍从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以叛国罪逮捕枢机主教，并快速将他带到伦敦塔。法国使臣暗示流言起于沃尔西府邸的一员：“国王说他密谋在王国内外反抗他们，并且告诉了我地点和计划，此外他的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侍从已

经发现了他的阴谋并指控了他。”沃尔西遵命出发去伦敦，但他的行程因病受阻，这场病让他差点倒下。勉强坐在骡子上的他在11月26日晚上到达莱斯特修道院，在那里他对修道院院长说的第一句话是：“神父，我来这里是要埋葬在你们中间。”第二天早晨，他做了最后的告解，说出了那段有名的忏悔：“我看到于我不利的事是如何成形的，但是如果我像侍奉国王一样殷勤侍奉上帝，他不会在我头发花白时放弃我。”[20]不久之后他就死了。

沃尔西的敌人急于确保枢机主教的名誉在死后得不到恢复，于是迅速开始谴责他。除了将国王离婚陷入僵局归咎于他之外，他们还宣称不能指望这样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法国使臣轻蔑地说道：“他一直认为一个出身如此卑微而十分自负又有野心的人总有一天会显出他粗鄙的本性，而大多数把他从低位推至高处的人一般会反对他。”简单地说，一切取决于血统之高贵抑或卑贱。夏普伊在这期间也向他的皇帝汇报：“约克枢机主教于圣安德鲁日在离此地约40英里，最后一位理查国王[21]战败而亡的地方去世。两人被葬在同一所教堂，人们已经开始称那个地方为“篡权者的坟墓”。[22]

克伦威尔在接到他旧主的死讯后一定五味杂陈。沃尔西是他曾经服侍多年的侍主，也是他在宫廷得以崛起的途径，但克伦威尔在为这个男人的逝世感到悲伤的同时，可能也感到了一些宽慰，因为自沃尔西失势以来他的处境一直颇为不利，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然而，他在国王那里的声望还有被枢机主教最终无可挽回的失宠所破坏的风险。不过，在1530年最后几周克伦威尔被任命为枢密院一员的时候，这样的担忧很快消除了。

对于克伦威尔被选入枢密院的原因，当时的评论者做出了种种猜测。福克斯称克伦威尔的突然晋升得益于他的一些时机得宜的评论被隶属于亨利国库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听到：“正巧克伦威尔所在的地方，

有人讨论起国王的资产和财富。当时克伦威尔说，如果国王听我的忠告，我会让他很快成为所有基督教国王中最富裕的。越是听起来合国王利益的话，越早传到国王耳朵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国王就更加了解并看重克伦威尔了。”[23]

帝国大使尤斯塔斯·夏普伊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他说一位名叫约翰·沃洛普爵士（John Wallop）的外交官兼政客，就沃尔西之死对克伦威尔又是侮辱又是威胁。克伦威尔深受其扰，去寻求国王的庇护。在接下来单独面见的时候，他承诺要让亨利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富有的国王。国王对他的这一提议印象深刻，立刻任命克伦威尔为枢密院成员，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国王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西班牙编年史》也认为“克伦威尔总是在找可以让国王富裕并强化王权的方法”。[24]

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福克斯和夏普伊一致认为克伦威尔得宠是通过说服君主他可以让后者成为一个富裕的人。这一策略与克伦威尔在掌权者身边天生的近似于鲁莽的自信相称。他在1517年精心安排跟教宗的会面时就展示了这一点。1530年年末，他已经在亨利身边待得足够久、可以判断出亨利对相似的策略会有很好的反应。从此，他所享有的接近亨利的特权不断增长，时常近乎垄断。约翰·福克斯描述他是“国王最私密、最亲近的枢密大臣”。[25]

加入枢密院对克伦威尔在宫廷的生涯来说是重要的一步，这让他得以进入受国王信任的顾问圈。虽然他是那个团体中次要的一员，主要负责法律事务，但他在表达对各种事务的看法时毫不犹豫。《西班牙编年史》记载，在枢密院会议上“他（克伦威尔）……总是第一个发言”。这完全符合克伦威尔的个人风格。夏普伊曾经记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当时克伦威尔“一反常态地保持沉默，沉思了一会儿”。另一次，他打断了一群显贵人士的交谈，说：“够了，我们开始工作吧。”[26] 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直言不讳并且——最糟糕的是——出身低下、自命不凡

的人突然出现，无疑令一些更高贵、地位稳固的人，比如沃勒姆大主教（Archbishop Warham）和沃尔西的旧敌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厌烦。尖刻的乔治·卡文迪什用下面的诗来描述克伦威尔在枢密院的突然出现：

有高贵的鹰在，一个骑士也无法动弹；

虽然一只鸟可以在金笼子里叽叽喳喳，

但是鹰依然会鄙视他的出身。[27]

相反，霍林斯赫德称，克伦威尔卑微的出身使得他迅速崛起得势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很好地显示了英勇美德的好处，让人向着名望和荣誉前行，不单靠着出身和血统这些仅适用于贵族并被贵族占有的优势，而是靠着所有天赋的赏赐者和给予者——伟大上帝的安排，他无数次抬高最低下的贫穷人使他们与君王共处。"[28]

诺福克在沃尔西失势之后迅速夺权。1530年11月，威尼斯大使就汇报说，国王"在所有谈判中重用他超过任何一个人……各项职责都被移交给他"。[29] 虽然一年前他帮助克伦威尔在议会谋得一个议席，但他不是克伦威尔的盟友：事实上，他迅速将对沃尔西的敌意转移到克伦威尔身上。同时，枢机主教的另一个前门徒斯蒂芬·加德纳（Stephen Gardiner）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成为克伦威尔的死敌。他深以为国王会将对已故枢机主教的宠爱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没想到这种宠爱却给了克伦威尔，因而他对这位新任枢密大臣产生了难以平息的、经久不衰的憎恨。虽然他们的通信不失礼数，正如宫廷礼仪规定的那样优美，但是敌意偶尔会暴露出来。在一封信中，克伦威尔责备加德纳："你的这些信言辞表达不甚友好，我认为与我对你的好意并不相称。"在另一封信中，克伦威尔指责对方"易怒"并且对自己持有"恶意"。[30]

不过——至少此时——这段危险而牢固的对立关系没有阻挡克伦威

尔继续得宠。亨利很快发现了克伦威尔的潜力，并且在让其进入枢密院的任命之后很快进一步提拔了他。翌年年初，克伦威尔开始担任从已故枢机主教那里获得的学院地产的接管总负责人和管理者。一年后的1532年1月9日，他的这一职位正式确立。

克伦威尔学习沃尔西的经验，决意要让自己成为国王不可缺少的人。他负责王室地产的出售和接收，监督在伦敦塔和威斯敏斯特的建筑工程，听取诉讼并且决定带到他面前的囚犯和重罪犯的命运，并参与其他各种执法事务。他很快被令人眼花缭乱的求助缠扰，表明时人普遍认可他对国王的影响力。一些在宫廷里颇有地位的人现在收回了他们的傲慢，转而寻求这位铁匠之子的帮助。其中有亨利最亲密的朋友和妹夫萨福克公爵，还有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亨利·鲍彻（Henry Bourchier）。

尽管在宫廷的职责越来越多，但是克伦威尔在这期间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私人法律业务——或许是考虑到如果自己的政治生涯化为乌有的话，还有这份生意可以养活他。但是在当时看来，克伦威尔的仕途几乎没有所有都化为乌有的迹象。他的私人事业与政治事业都进展顺利。对他法律援助的请求从四面八方涌来：商业机构、宗教场所和个人都花费相当大的金额购买他的服务。1526年8月一位名叫乔治·莫诺克斯（George Monoux）的市议员向克伦威尔保证，如果他的“大事”能够成功结案，他会支付后者20马克（约等于现在的4500英镑）。[31]

克伦威尔也继续他的个人借贷业务，这令他获益颇丰。他的一个债务人名叫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借了一笔100英镑的巨款。当他无力偿还的时候，克伦威尔写信告知他：“因为拖欠债款，你已经欠了国王1000马克，我认为你应该充分重视此事，因为国王既不是你可以欺哄也不是你可以嘲弄的人。”[32] 这封信证明，不论当时在政府的新职位如何占用了克伦威尔的时间，他依然紧盯着自己的个人生意。他显然还使这两个事业相互配合：如果有一个债务人没能偿还，他就会用国王

的怒火威胁他。

1531年1月议会再次召开。[33] 虽然议会自克伦威尔1523年第一次进入下议院以来只召开了寥寥几次，但他现在的影响力已举足轻重。1531年3月该次议会结束，他带回家不少于29项已被录入法案汇编的法案——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由他发起的。到了夏天，远至德比郡也有传闻称“克伦威尔一人确定了议会的某些事务，没有人反对”。[34] 国王本人现在也充分意识到克伦威尔的能力，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就当时最要紧的事积极地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

克伦威尔参与国王“大事”的第一个迹象是他起草了一些关于此事的法律法规。不过，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任何程度上影响了诉讼：他看起来只是作为亨利的代理人和起草者，沉默而勤勉地执行一项既定政策。这所有一切都将改变。

枢机主教波尔提供了一份亨利和克伦威尔之间第一次讨论这件“大事”的谈话记录。在请求国王原谅自己大胆在这样一件他所知甚少的大事上发表观点之后，他说自己对国王的忠诚不允许他在有机会——不管多小——为国王提供帮助的时候保持沉默。克伦威尔继而把未能促成离婚的责任完全推到亨利的顾问身上。他们太看重“平民大众”，而不是“睿智博学”但支持离婚之人的建议。鉴于唯一的阻碍是教宗，那这个难题的答案就简单了：与罗马当局断绝关系，像德意志的路德宗教徒那样。

长达几个世纪以来，教宗和他的宗教会议把持着对教义的决定权和对教会司法事务的最后裁决权，征收教会税并对主教的任命有最终决定权。此前英格兰在天主教会辖下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所接受的——尽管那些支持国王婚姻无效的人对此日益不满。但现在，波尔声称，克伦威尔让国王明白跟罗马决裂不仅合他心意，而且颇为可行。英格兰就像是一个两头怪兽，他说。如果国王让自己成为教会的首脑，那么教宗

这个头颅就必须被砍掉，且他的追随者（包括神职人员）只能听命于亨利。波尔说国王对克伦威尔的计划大感喜悦，命他立即实施。[35]

尽管波尔的记述令人信服，但是没有其他资料可以佐证他的这一记载。宫廷里大多数主要的同时代评述者——尤其是帝国大使夏普伊——把1530年到1533年之间发生的所有事件看作国王一人所为。不过也许——甚至很可能——克伦威尔在这整个期间都在幕后默默地工作。亨利本人几乎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一个政坛新人，并且是一个出身卑微的政坛新人的建议下采取这样激烈的举措的，这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可信度，相比之下让世人以为这些举措源于自己则要好得多。这个时期人们对他权威的尊崇是如此之高，一个政策以他的名义推行要比以一个枢密院新成员的名义推行更能成功得多。克伦威尔的权柄来得如此突然并且又如此稳健，他一定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这事实也暗示了在辅佐亨利的前三年克伦威尔的影响力被隐藏了起来。夏普伊不是宫廷中唯一了解这一事实的大使。[36]

仅通过跟国王的一次简短会面，克伦威尔就把抵制教宗权威的想法植入了亨利的脑海，进而使国王开启了一系列剧烈并会永远改变英格兰政治、宗教图景的事件——虽然这一观点很吸引人，但亨利的这个想法可能是渐渐形成的，并且还要得益于除克伦威尔之外的其他影响。因教宗拒绝批准他的离婚而沮丧的亨利开始更加愿意倾听法律界和学术界很多不同专家的意见，来力证他对英格兰教会的绝对管辖权。不过，克伦威尔的论证更令人信服，并且拿出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他为一个即将被无止境辩论和谈判所充斥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动力。

从1530年开始，一群由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ox）博士引领的学者辛勤工作，在一堆包含《圣经》原文在内的旧文献中寻找可以支撑国王对教会的管辖权这一新观点的正当理由。他们收集的文献，又称

《丰文汇编》（*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 ）[37]，被用作论证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英格兰国王一直享有绝对宗教和世俗主权的依据。他们对文献的解读经不起推敲，但足以助长国王的改革热情。他开始了一场针对教宗权力的改革运动，不惜一切代价直到实现他的终极目的：跟凯瑟琳离婚，与安妮结婚。

意识到英格兰神职人员对离婚计划表现出的不满，亨利决定威胁他们屈服。1531年1月末，亨利签发了针对英格兰全体神职人员的王权侵害罪令状，要求坎特伯雷教士会议以1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320多万英镑）的津贴换取大赦。当时一些高级神职人员强烈反抗，但是他们不敌国王。亨利增加了五个新的条款，包括要求他们承认他是英格兰教会至高无上的领袖。随着教会和国王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主要人物很快浮出水面。教会反抗的带领人是最高级别的神职人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沃勒姆（William Warham），连同坚定的保守派约翰·费舍（John Fisher）主教。国王的诉讼则由两人领衔：下议院发言人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和托马斯·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对国王诉讼的主导体现了他高升的程度和速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从一个行政职责较次要的议会新成员转变成当时最重要、最有争议、最紧要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一事件既具有国内意义又具有国际意义。意识到亨利的威逼策略除了制造僵局之外很难达成更理想的结果，克伦威尔对沃勒姆和他的支持者开始了魅力攻势，向他们保证国王没有为自己增加新的权力。有理由保持怀疑的他们不为所动。克伦威尔继而改变策略，说服教士会议——神职人员的一个代表集会——接受给国王授予一个打折扣的头衔，只在基督律法准许的程度上承认国王的最高领袖地位。他们最终依克伦威尔之言同意了亨利的条款，并在1531年3月8日缴纳了津贴。这只是法律行文上的一个细枝末节，却有着巨大的意义。王权至尊在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即使国王对教会的权力依然有些不明确，但也意味着这一权力仍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克伦威尔

一下子促成了推进离婚所需要的短期协议，并且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宗教和政治变革打下了基础。时人没有忘记将英格兰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归因于他。一个世纪后，斯特莱普说：“克伦威尔大臣在这一事业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所有这些提议和方法都出自他的头脑。为此，在他被咒骂、引来很多人憎恨的同时，还有更多从对教会迷信的改革中受益的人高度赞颂他。”[38]

虽然克伦威尔越来越多地忙于蒸蒸日上的宫廷事业，但他仍然密切参与儿子格雷戈里的教育，并且定期与儿子的监护人玛格丽特·弗农通信。切金被一个名叫科普兰（Copland）的人代替，在他的指导下格雷戈里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个人教育上曾受克伦威尔资助的尼古拉斯·萨德勒，同样也对格雷戈里的学业带来有益的影响。玛格丽特·弗农在1531年向克伦威尔汇报：“您的儿子和老师都身体安好，格雷戈里的学习进展顺利，一日顶之前一周，这都是因为有尼古拉斯·萨德勒，他的资质非常好。科普兰先生每天早上给他们每人上一堂拉丁语课，尼古拉斯能够牢记格雷戈里和他自己的课业内容，并且在给定的时间里帮助格雷戈里温习。老师非常欣慰，每天教他们三次。”在另一封信中，她向克伦威尔保证：“您的儿子安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并且能够理解祈祷文和教义。等您下次来我这里的时候，我相信您会非常喜欢他的。”[39]

玛格丽特对格雷戈里的信仰教育尤其关心。克伦威尔显然曾答应为这一目的派去一位神父，但是当这位神父还没到达的时候，玛格丽特找了一个她认为更能胜任此事的人。她力劝克伦威尔：“请让我尽快知道您的心意，因为我希望您的孩子不至于浪费更多时间。您答应会派来的先生可能主要听从您的命令行事，对孩子不会有很大的好处……您答应让我负责照管这个孩子直到他12岁。届时如果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可以为自己辩解，但现在他还不能，除非有我干预；如果他有一个轻视我的干预的老师，这会让我非常不安。”[40] 玛格丽特于1531年写这封信

的时候，当时11岁的格雷戈里似乎已经在剑桥开始大多数科目的学习了。除科普兰先生以外，他的家庭教师还有基督学院的老师亨利·洛克伍德（Henry Lockwood），以及约翰·亨特（John Hunt），他是一位律师，毕业于沃尔西在牛津的学院。后者的专业知识无非是要帮助格雷戈里走他的法律道路。

1531年9月29日圣米迦勒节之前不久，国王发布指令："在国王即位以来的第23年，由他忠实可靠的顾问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代他向枢密院宣布命令并且毫不迟延地在圣米迦勒节执行。"[41] 这是克伦威尔一举得势的证明：他进入了枢密院的核心集团。仅两个月之后，威尼斯大使就把克伦威尔列入主要枢密大臣名单并位列第七。位置在他之上的是诺福克、萨福克和其他血统最高贵的人士。克伦威尔是唯一的平民，不过他被授予了比很多同僚大得多的职权。这些职权包括监管刑事诉讼、关税和应缴纳的款项，以及就从叛国到下水道等各项事务起草议会立法。同时，因与奥德利密切协作，他接管了国王的法律和议会事务。第二年春天，他已经开始影响下议院的选举了。

克伦威尔此时将他所有注意力转向回报更大也是国王最关心的事务上。如果他能够促成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那么他在宫廷的地位就会无人能及，并且一定不可撼动。

---

[1] Weir，A.，*Henry* Ⅷ：*King and Court*（London，2001），p.27；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London，2002），p.17.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01；*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p.81-82.

[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

6181，6203.

[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203.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s.6213，6214.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076.

[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226.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076.

[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s.6199，6344，6335.

[10] 可参见*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262。

[1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s.6076，6571.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6076；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327.

[13]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 p.126.

[14] *State Papers*， Vol.I，no.362；*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s.6076，6524.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076.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554.

[1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571；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31.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10.

[1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100，6699.

[2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720；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p.174，178-179；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p.951.

[21] 即理查三世。

[22] *State Papers*，Vol.VII，no.213；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149.

[23]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5-655.

[2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17-18；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p.31，87.

[25]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5.

[26]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95；*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p.207，239.

[27] Cavendish，*Metrical Visions*， Vol.II，p.52.

[28] 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 Vol.Ⅵ（London，1587）， p.951.

[29]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IV，pp.294-295.

[30]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I，pp.20，23.

[3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IV，no.2387.

[3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p.357-358.

[33] 所谓的改革议会于1529年第一次召集并在1536年解散，其间有几次休会。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no.628.

[3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92.

[3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p.90-91.

[37] 拉丁文原名本意为“充分丰富之文献集”。

[38]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 3 vols.（Oxford，1822）， Vol.I，Part i，p.316.

[3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nos.15，18.

[4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no.17.

[41] *State Papers*， Vol.I，p.380.

第六章 国王的“大事”

在克伦威尔被选入国王枢密院核心的同一年，阿拉贡的凯瑟琳被赶出宫廷。她处于不堪忍受的地位已经很久了，但是她决不会自愿离开。她坚决相信她的婚姻是不可废除的，并用毫不动摇的忠心和忠诚回应她丈夫的冷淡，以令人恼火的坚定抵挡企图废除这段婚姻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逐渐看清她不会满足自己的要求之后，亨利对她的冷淡变成了残酷，他开始试图威逼她屈服。

他的情妇也同样折磨人。安妮·博林跟国王的感情持续得越久，她在宫廷的影响力就越大。一个外国来的宫廷访客记下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现在与他（国王）同住的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年轻女人，虽然很多人说她性格不好，但是她的意志对他来说就是法律。”[1] 安妮总是在国王身边：她与他一同吃饭、一同祈祷、一同打猎、一起跳舞。她唯一拒绝的就是跟他同睡。她的骄傲和不驯随着地位的上升而增加。她甚至开始侮辱王后，尽管她依然在后者的宫内服侍。有人听到安妮曾说她希望所有西班牙人沉入海底。在另一个场合，她告诉与她一起服侍王后的侍女“她才不管王后会怎样，宁愿看王后被绞死甚于将其视为情妇”。[2]

安妮如此嫉妒国王和王后之间任何感情的迹象，以至于别人会以为她才是被冷落的妻子，而凯瑟琳是被珍爱的情妇。随着恼人的离婚问题谈判越拖越久，她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稍被激怒就会发火。当她发现凯瑟琳还在修补丈夫的衬衫时，她立马嫉妒得发狂。亨利的求爱受挫加上安妮越来越多的发作，往往会有爆炸性的效果。意识到时不我待，自己早就应与国王成婚圆房的安妮一度威胁与国王一刀两断。仍然鬼迷

心窍的亨利保证他会迅速安排以便他们可以结婚，这才消除了她的威胁。但是他的情妇在宫廷中与一些非常危险的人为敌。她还疏远了大批民众，他们非常同情凯瑟琳，嘲笑安妮是“大淫妇”。

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在母亲被赶出宫廷的时候已经15岁了，她也是被同情的对象。据威尼斯大使说，在亨利被安妮·博林迷住之前，她是他挚爱的独女，“被她的父王宠爱着”。[3] 亨利骄傲地向外国大使炫耀自己的女儿，他们都称赞她美丽又有智慧。她的红色长发是“所有人中最漂亮的”，另一个人称赞她纤弱而“匀称”的身材，还有“漂亮的脸蛋……美好的肤色”。一位威尼斯权贵加斯帕罗·史宾尼利（Gasparo Spinelli）讲述了年轻的公主是怎样与法国大使共舞的：“他觉得她很漂亮，她不同寻常的极好的天资禀赋令人称赞。”[4]

当玛丽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对安妮·博林的迷恋时，她并没有立即产生忧虑；之前他也有情妇，毫无疑问以后也会有更多。但她的盟友夏普伊警告她，安妮“掌控一切，是一个国王无法把控的女人”。[5] 尽管如此，玛丽仍固执地相信她母亲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因此后来发生的事件对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当1531年凯瑟琳被迫离开宫廷时，她曾用的寝宫被赐给了那个替代她的女人，这是对这位身陷绝境的王后有预谋的侮辱。安妮现在就是实质上的王后，只差一个头衔。玛丽对母亲的忠心不变，希望能跟她同处，但是国王残忍地将她们分开了。虽然她小心地公开表示对父王不变的爱，但她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情妇”的恨意。不过安妮决心要抹杀国王对玛丽的感情，正如她驱逐了凯瑟琳那样。她试图影响国王对玛丽的看法，并且几乎不遮掩对后者的轻视。“有传闻说安妮大放厥词要让公主做她侍女的女仆……或者把她嫁给某个男侍，”夏普伊报告说，“但这只是为了让她忍辱含垢。”[6]

看着父母的婚姻被废除，同时母亲遭受无比残酷的侮辱，被迫在遥

远且不舒适的多个居所之间辗转生活，这样的精神代价给这个年轻女孩的健康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玛丽频繁犯恶心，一度连续三周不能咽下饭，这让她的侍从非常惊慌。1531年春天，在又一次从肠胃不适中恢复时，她写信给父亲，说没什么比去格林尼治拜见父王更能加速自己身体恢复的了。她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了，夏普伊认为这是“为了满足那位女士（安妮），她恨玛丽就像恨她母亲一样，乃至更甚，这主要是因为她看到国王对玛丽还有一些感情”。[7]

在试图去除凯瑟琳和安妮在宫廷的影响力的同时，安妮还支持王权的至尊性，她意识到这是离婚的关键所在。直到此时，除了在推进沃尔西的案子时跟她有来往之外，克伦威尔一直跟安妮保持了一定距离，可能是等着看形势会转向哪边。安妮·博林对枢机主教的憎恨，以及她在其失势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让她成为克伦威尔的天敌。不过，安妮是一个可与克伦威尔比肩的实用主义者，不会为了原则牺牲个人利益。此外，他们对国王“大事”解决方案的看法高度一致。认识到克伦威尔在法律事务上的强大才能以及他在宫廷中作为“问题解决者”的本领，她开始寻求他的帮助。1533年，她开始称克伦威尔是“她的人”。

克伦威尔在宗教改革上看起来与安妮利益一致，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如果不是刻意而为的话）机缘巧合带来的好处。另外，安妮是克伦威尔主要对手的外甥女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靠近。事实上，据夏普伊说，这反而在他们的利害关系之间成了一个积极因素。“我从一个可靠的线人那里听说，安妮小姐正昼夜致力于让诺福克公爵在国王那里失宠，”他报告说，“至于是因为他关于她的言辞太过随意，还是因为克伦威尔希望从他着手打倒英格兰的贵族，我说不准。”[8] 认为克伦威尔谋求摧毁英格兰的贵族更多是大使对这个出身低微的冒险者的偏见，而不是事实。克伦威尔顶多可能认识到诺福克和他的外甥女之间没有感情，因此他可以通过跟后者结盟获利。但对克伦威尔来说，跟安妮结盟从来都只是一个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个时候他几乎肯定已决心解决国

王“大事”这个难题，而这只是偶然跟安妮的心愿一致：克伦威尔的动机首先是辅佐他的君王，其次是他自己。

当时的文献没有揭露二人这个时候联合的程度。可能安妮认可克伦威尔的潜力，他们一起制订了实现他们共同目标的计划。但是克伦威尔继续替国王办事，也只听国王的指示。

1532年1月15日，第三届所谓的“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开始了。这次议会最初被定在前一年10月，但因为亨利的大臣们对如何推动改革犹豫不决而被推迟。同样的犹豫体现在这届议会的立法上。克伦威尔和他的团队起草了一份法案，提议赋予教士会议裁决王室婚姻无效的权力，而另一法案谋求取消它的独立司法权。与此同时，安妮的舅舅诺福克公爵试图给有影响力的贵族施压，让他们支持婚姻无效应由议会裁决而不需要教宗批准这一提议。两方的努力都失败了。最终达成的只有一份起间接作用的《限制首岁教捐法案》，这一法案旨在通过终止高级神职人员将圣俸第一年的收入交给罗马（首年收入奉献）来对教宗施压。克伦威尔可能起草了这个法案，但是他怀疑该法案成功的可能性，向加德纳坦言“我确实不知道它能达成怎样的目的或功效”。[9] 但他的悲观预期并未落实。事实证明这个法案连同他推行的旨在让神职人员受国王直接控制的其他措施，是与罗马决裂的决定性的一步。

这个法案同样也充盈了王室的金库——这是自克伦威尔开始辅佐国王以来有意完成的目标。拜其对局势的精妙操纵所赐，克伦威尔确保了为与罗马决裂而采取的大部分措施都有一般看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即增加国王的财富。在克伦威尔的大量备忘录中，有一份记录了控制首年收入奉献得来的资金可以重新归入王室金库，并且相当含糊地解释了一下这些收入会如何支出：“这个王国的居民和臣民要每年向国王交一次贡，而不是交给罗马主教[10]，以替代烟囱税，每人或每户缴纳的这一

小笔钱将用于保卫王国，这些钱可以用来在王国各处建设堡垒。”[11]

夏普伊在1534年12月向查理五世所做的汇报揭示了这个法案和克伦威尔的其他措施让他的君主变得多么富裕：“除了刚从神职人员那里获得的3万英镑之外，国王还以1/15的税率向平信徒课税，这是去年授权征收的一笔赋税，数额高达2.8万英镑，国王借议会授权强制对臣民的所有财物征收1/20的税，外国人的税率则在此之上翻倍，这加起来也是一大笔。”大使十分确定谁是罪魁祸首：“这是克伦威尔的诡计，他吹嘘要让他的君主成为所有基督教国王中最富裕的。”威尼斯大使卡洛·卡佩罗（Carlo Capello）也认同克伦威尔让国王成了一个富裕的人，并且对后者的收入做了一个更高的估算。“国王的父辈年收入约40万杜卡特，我在英格兰的时候，现在国王……的年收入涨到了70万杜卡特，克伦威尔大臣曾是并且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一增长的缔造者；近来靠着这些首年收入奉献以及他收取的教会圣俸，这笔钱将会翻番；所以现在国王的年收入合计超过150万杜卡特。”[12]

表明国王财路大开的另一个迹象是，在克伦威尔得势的整个时期，英格兰的货币从未贬值。第一个用操纵铸币的方法补充王室金库的是克伦威尔的前侍主沃尔西，他还降低硬币中金或银的含量，以制造数量更多但实际总价值更少的货币。值得称赞的是，克伦威尔决定杜绝这一方式并恢复货币的真正价值。他这么做的主要动机是保护英格兰的贸易利益，因为他知道如果英格兰货币的价值受到质疑，英格兰的贸易利益就会受损。因此他安排发布了一则公告：“针对流入这个国度的假币和不足额的硬币，每个被发现持有任何假币或仿币的人都会被严惩。”[13]

然而，克伦威尔就造币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为他赢得英格兰的民心。他们越来越确信克伦威尔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评论克伦威尔的财政政策时，夏普伊说：“他没有考虑这么做疏远了既恼怒又绝望的民心，他们受到如此的压迫、感到如

此沮丧，但倘若没有外来的帮助他们的抱怨也毫无用处，而如果他们没被更深地压迫，那也不是克伦威尔的原因。”根据夏普伊的描述，克伦威尔的激进政策不但给自己树立了一些危险的敌人，他鼓励国王像专制君主一样行事的做法也让大批臣民疏远并反对他们的国王。[14]

不屈不挠的克伦威尔接下来发起一场旨在系统性地削弱英格兰教会权力的运动，并把这看作确立王权至尊的唯一途径。1529年议会上已经有人提出了对神职人员滥用职权的控诉，这些控诉在“针对教区长的祈愿书”中再次被克伦威尔提及。针对教区长（或神职人员）的控诉包括教会法庭过度收费、对轻罪者判处绝罚及没有虔诚遵守众多圣日等。不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文件把亨利说成是“唯一的领袖、最高统治者、君王、保护者和捍卫者”，并且迫使教士会议重新定义“基督教法律允许的领袖地位”这个一年前让他们接受侵害王权法案的空口承诺。[15]

这份祈愿书在1532年3月18日被呈予国王。教会在这之后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当坎特伯雷教士会议于4月12日再开的时候，议程的第一项就是如何回应这份祈愿书。此前忠于国王的加德纳主教现在显然变节了，他代表教士会议起草了一份强硬的回复，宣告：“我们，您最谦卑的仆人，不会放弃履行我们确实由上帝赋予的责任和职务而将其移交给您。”[16] 在对克伦威尔几乎不加掩饰的攻击中，他们继续谴责“心怀恶念之人佯装为渴求正义与改革之狂热信念所推动的姿态，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以邪恶的讯息与言语诱骗正直坚贞之人将这些并不属实的文字认作事实”。[17] 加德纳和他的同僚正中克伦威尔下怀。国王因他们的反抗震怒，继续逼迫他们屈服。5月11日国王在议会演讲控告他们简直是在叛国：“朕以为在朕之王国的神职人员完全是朕的臣民。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只算朕的半个臣民，甚至算不上臣民。因为所有的高级神职人员在他们的任职仪式上向教宗宣誓，与他们对朕的誓言明显相反，所以他们是他的臣民而不是我们的。朕把两份誓言拿给你们，要求你们

起草法案，让朕不再受这些宗教臣民的欺哄。”[18]

四天后，面临又一次王权侵害罪指控的教士会议停止反抗，勉强签署了后来所谓的“教士的屈服”（Submission of the Clergy）。这么做意味着在未来神职人员将承认，基督教法律取决于国王首肯，就像世俗的法律需要议会的首肯一样。这是克伦威尔改革的一大胜利——这为与罗马的决裂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个虔诚、正统的天主教徒，托马斯·莫尔爵士逐渐跟神职人员一道反对国王的宗教改革。他也极其反对亨利的离婚，为王后的利益坚持不懈地抗争。虽然国王对他的好感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莫尔表明他会继续为他所认定的正确信仰和英格兰的教会而抗争，因而成为国王危险的对手。过去7年间莫尔对异端发起了激烈的斗争，声讨路德教义和他的教团，出版言辞激烈的小册子维护正统天主教信仰，对已知异端信徒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1532年5月，莫尔卸任大法官。因为他不再是政府的一员，所以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加紧这项活动。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莫尔出版了五部重磅作品反对新教教义和对教会权力的侵蚀。除了引起国王的反感之外，这也让莫尔跟克伦威尔之间产生了对立。

莫尔的女婿威廉·罗珀（William Roper）叙述了克伦威尔到前大法官在切尔西的家中拜访的经过。他带来了国王的口信，内容无疑是敦促莫尔顺从，不过后者利用克伦威尔到访的机会劝告他如何最好地跟亨利打交道。“在给陛下的建议时，你应时刻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决不告诉他他能够做什么……因为如果这头狮子知道他自己的力量，任何人都很难左右他。”[19] 这为我们了解莫尔及其同僚大臣们如何尝试支配亨利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视角。这意味着实际主持决策的是廷臣们而非亨利本人，他们试图影响亨利，使他认同他们的意志。从莫尔的说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控制损害的方式：如果国王一个人决定事务，会造成混

乱、无序，甚至暴政。

克伦威尔给莫尔的回应没有被记载下来。此时的克伦威尔已有办法应对亨利和宫廷，他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位旧秩序捍卫者的建议，后者固执的理想主义已经让自己失去了官位。不过，在随后几年里，克伦威尔对待国王的方式跟莫尔所用的方法其实并非完全不同。有一次他苦笑着跟夏普伊说："国王，我的君主，是一个伟大的王，但是非常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事。"[20] 克伦威尔的诀窍或许正是在于让亨利相信他是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

虽然克伦威尔毫无疑问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策划与罗马的决裂，但是有证据表明新宗教信仰逐渐影响了他针对正统天主教会的行动方向。这构成了他信仰的一个显著转变。他在1529年的遗嘱说明，至少在那之前，任何他个人的虔诚行为都是沿袭传统的做法。他请求圣徒代祷，并为伦敦城内的五个修会捐献金钱，以支付为他的灵魂做弥撒的费用。[21] 在沃尔西失势那年稍晚的时候，克伦威尔罕见地公开展示了他的信仰，卡文迪什说自己曾听见他念"我们的圣母玛利亚"，这也是遵循了正统的信仰。在1530年5月写给沃尔西的一封信中，他公然批评新生的改革主义信仰："有传闻说路德已经去世了。我宁愿他从未出生。"[22] 奥斯丁会1527年的存目里有线索指向克伦威尔保守的宗教偏向。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封闭在水晶里的圣物，用银和镀金装饰，像一条鱼"，克伦威尔自己的房间里有"一张带雕刻的镀金祭坛桌，上面供奉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场景"。房屋各处都有童贞玛利亚的图像。[23]

但是改革主义信仰的种子或许早已种在了克伦威尔脑子里。根据卡文迪什记载，在他于伊舍突然落泪的同一天晚上，克伦威尔也大发议论，抒发他对教会干预政治的怨恨情绪。同样，当失宠的枢机主教坦言自己没钱给他的世俗仆人时，克伦威尔要求他的教士奉献。他愤恨地抱怨教士们享受的"利益与好处"，声称沃尔西的世俗仆人"一天内为您所

做的比所有无所事事的教士一年所做的还要多”。[24] 这些情绪可能是被他亲密的朋友、有影响力的改革主义者斯蒂芬·沃恩和迈尔斯·科弗代尔激起的。后者是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邻居，师从剑桥学者罗伯特·巴恩斯，他宣扬只有通过研习《圣经》才会产生真正的宗教信仰，由此产生了“福音派”的说法，这一派别的教义建立在福音或《圣经》中福音书的基础上。因此“福音派”被用于称呼这一时期英格兰最虔诚的改革主义者，“新教”这个说法直到玛丽一世在位时期才被广泛采用，“路德宗”则更准确地特指马丁·路德较激进的教义。

科弗代尔约在1527年或更早以前曾写信给克伦威尔向他要书以帮助自己研习，他称赞克伦威尔“对美德和敬虔的研习有强烈的热情”。[25] 克伦威尔的另一个朋友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怀揣同样的心情写信感谢他在1531年或1532年的某天晚上让他留宿。“在您那里我确实听到了促使我改变信仰的信息”。这两人显然花了数个小时熟读福音章节和《新约》的译本，奥弗尔承认他发现“您得出的结论总是跟上帝神圣的话语近乎一致”。[26] 福克斯也认同克伦威尔“自己是最用功的，他以自己极端的热情提出福音书的真理，寻找各种方法和途径打倒伪信、传播正确的信仰”。[27]

16世纪30年代，随着克伦威尔对国王的影响力增加，他开始鼓励亨利考虑福音派改革。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他非常清楚亨利憎恶路德，曾反对更改教义。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措施——至少最初是这样。1531年年初，他说服君主允许威廉·廷代尔安全返回英格兰。这证明了克伦威尔的说服力，以及他在国王那里的分量，因为亨利仅在几个月前刚刚公然谴责廷代尔是个异端。克伦威尔的朋友斯蒂芬·沃恩被派到安特卫普寻找廷代尔，并开始就他回国进行协商。廷代尔最初并不情愿，说他听闻有关英格兰发生的事情后不敢回去，甚至连亲切的沃恩都没能劝动他。所以沃恩跟克伦威尔坦言：“他不听我劝，因为他非常怀疑我。”[28

最终，沃恩的魅力开始奏效，那位宗教改革家逐渐接受了这个提议。凡事进展顺利，直到沃恩在他写给国王的一封信中附了一本廷代尔写给托马斯·莫尔的《答托马斯·莫尔爵士》。廷代尔一直公开批评大法官的活动，并且他自己也准确预测到这会激怒国王。亨利大为震怒，并要求克伦威尔命沃恩不要再跟廷代尔有任何瓜葛。克伦威尔于是写信给他的朋友。他一边平息国王的怒火，一边向沃恩保证国王"十分喜悦并且十分合意，考虑到你的付出以及你在写信、寄书上所费的精力"，但是承认："陛下不喜欢这本书，里面充满了煽动性的、诽谤性的谎言和荒谬的观点。"他说，国王担心"如此堕落、不怀好意的人的邪恶教义"会"误导并使王国的民众烦忧"。克伦威尔以一个更加迫切的请求结尾："我衷心请求你看在上帝的分上……劝告你彻底放弃、离开，收回你对廷代尔和他所有教友的感情。"[29] 不过，沃恩的回复暗示了克伦威尔可能加寄了一封隐秘的附信，敦促他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在克伦威尔还没放弃圆满解决此事之前，沃恩在那年5月和6月跟廷代尔又见了两次。实际上，他默许了国王要求派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逮捕这位改革者并把他带回英格兰的要求。

这场争论——可能无法挽回地——破坏了沃恩在国王面前据称始终受"他人的恶意"攻击的信誉。[30] 相比之下，因为克伦威尔谨慎的处理，他本人在亨利那里的信誉未有损伤。当然，这个插曲没有阻止克伦威尔在宫廷继续攀升。

---

[1]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IV，p.287.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Part i，no.24.

[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IV，p.288.

[4]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IV，pp.57，288.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861.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Part i，no.324.

[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Part i，no.805.

[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84.

[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43.

[10] 即宗教改革时期拒绝服从教宗权力者对教宗的蔑称。

[1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134-13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725（1）.

[1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3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26.

[1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35.

[1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3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

[15] Bray，G.（ed.），*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1994），p.59.

[16] Bray，G.（ed.），*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1994），p.59.

[17] Lehmberg，*Reformation Parliament*，p.146.

[18]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788.

[19] Sampson，G.（ed.），*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with Roper's Life of More and some of his letters* （London，1910），p.240.

[20]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257.

[2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62.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s.6076，6391.

[2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3197.

[24]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106.

[25] *State Papers* ，Vol.I，p.384.

[26] Brigden，'Thomas Cromwell and the Brethren'，p.41.

[27]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654.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53.

[2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p.335-339；*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248.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533.

第七章 “某些人的突然崛起”

“您是我所有的希望，”沃尔西的私生子托马斯·温特（Thomas Winter）在1532年10月致克伦威尔的信中写道，“您现在身居高位，这是我和所有您的朋友很久以来所盼望的，您已经获得了可以随心为他们服务的职权。”[1] 1532年对克伦威尔来说是辉煌的一年。在这年年底，克伦威尔自国王处获得的任用与优待已令他成为英格兰内政事务的实际负责人。托马斯·莫尔爵士卸任后，国王向他的主要对手展示了荣宠，他赐予克伦威尔及其儿子格雷戈里威尔士南部纽波特的罗姆尼（Romney in Newport）的领主身份。克伦威尔的财富跟他对国王的影响力呈正比增长。他一丝不苟地记账，收录那些渴望晋升的人留在他住处不可计数的礼物，包括装得满满的钱包、手套、奶酪等。[2]

克伦威尔不断增加的财富的一个体现是在1532年，他和家人接手了奥斯丁会辖区内位于思罗格莫顿街的两处大型房产，那离他们当时住的地方不远。[3] 他于6月获得了当时住的房子和花园、毗邻的房子以及仓库长达99年的租约。他还在更南一个叫斯旺尼的地方租了一处房产，正对着思罗格莫顿街，这处房产归修道院所有，但在它的辖区之外。两年后他从修道院买下了这栋房产还有毗邻的沿街土地，这意味着此时他已在当时所住房子的周围拥有一大片土地和建筑。除此之外，克伦威尔买下了他房子后面的土地和房产，这样他就能建一座巨大的花园。[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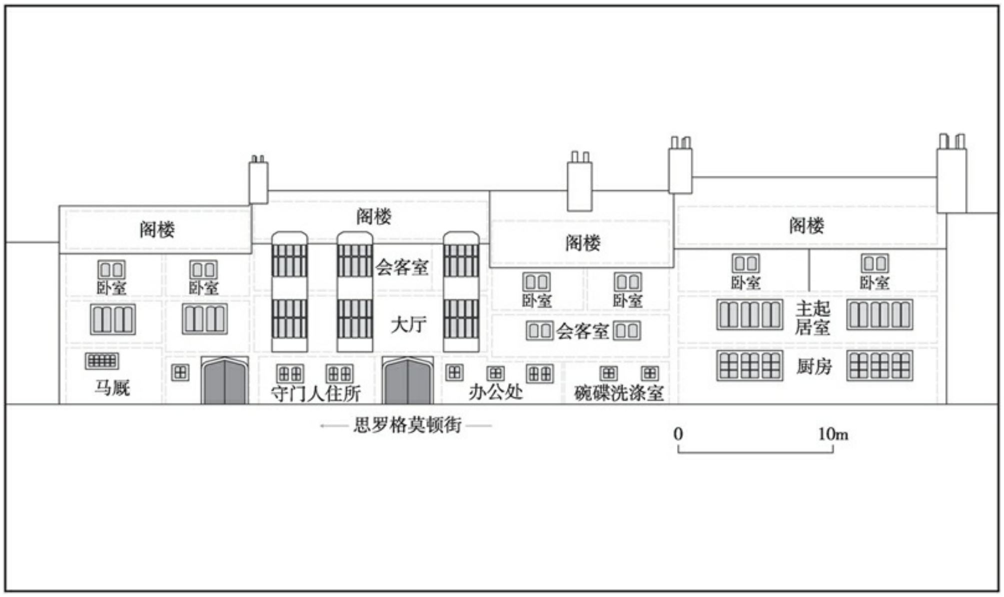
克伦威尔没有暂停施工以等待批准，而是马不停蹄地将他邻居花园的篱笆往后推了22英尺，同时没有给对方任何提醒或补偿。“（克伦威尔的）这栋房子建成了，留有一块大小适中的土地做花园，他突如其来

地拆除了北面与他毗邻的几座花园的栅栏，向北往每家的地界里量了22英尺，设了一条边界，筑了沟、打了地基、建了高耸的砖墙。”更大胆的是，他把托马斯·斯托（Thomas Stow，古文物收藏者约翰的父亲）的房子放在滚轴上搬走了，然后在这片腾出来的土地上开始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新房子。愤怒的约翰·斯托记载称，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在“我的父亲还没听说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任何提醒，在他问起监工的人时，除了得知是他们的主人托马斯命他们这么做的之外，没有得到其他答案”。这体现了克伦威尔在宫廷的影响力广为人知，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声音。“没多少人敢上前就此事争辩，”斯托说，“但是每个人都丢了土地，我的父亲为仅剩一半的房子……交了全额的租金。”他忍不住加了一句：“某些人的突然崛起让他们忘乎所以。”[5]

1535年9月，房子的建筑工程还在继续，这时克伦威尔的代理人托马斯·撒克（Thomas Thacker）报告说：“朝向街道的厨房墙面、砂岩砌成的窗户、碗碟洗涤存放室和其他家务用房间都已经成形。木匠正在盖屋顶，除了大厅朝向庭院一侧的窗户之外别的都已建成。您自己的住房包括楼上的卧室和个人收藏室已建成并涂好泥灰，只差抛光了。”[6]



克伦威尔奥斯丁会府邸细节平面图（比例尺：**1：500**）



克伦威尔奥斯丁会府邸正面复原图（比例尺**1：350**）

克伦威尔的新居非常宏伟，耗费数年才完工，修建时最多的时候有98名工人在场。[7] 1536年2月夏普伊告诉皇帝自己打算在结束奥斯丁会晨祷返回时“经由他（克伦威尔）在建的房舍，因为这是距离最近的回家路线”。[8] 1539年7月最终建成的时候，这栋房子花费了至少1000英镑（约合今天的30万英镑），它是整个都城最大的私人住宅之一。斯托承认克伦威尔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在教堂南面和西端，建了很多上好的房舍；也就是说，在思罗格莫顿街一些小房屋的旧址上，托马斯·克伦威尔盖了一座宏伟宽敞的房子。”[9]

这座宅邸有三层楼高，用砖垒成，部分墙壁厚达2英尺。它是木构架建筑、屋顶用瓦片铺成，有三座横跨第一层和第二层楼的窗台凸出外壁。沿着三座庭院排列着50个房间——是他奥斯丁会旧房子的三倍还多。这座新居有一座小礼拜堂、多个厨房、私人用房和卧室。中央是几座彼此相连的宏伟大厅，贵客可以通过宽大的楼梯来到这里。俯瞰街道的大厅有四个凸窗，窗上悬挂着佛兰德斯织工制作的精美挂毯。公用房间几乎没有其他的装饰细节，不过卧室都装潢得很奢华，配有四柱大床，用金色的布、锦缎或天鹅绒做床幔。巨大的花园里有正规的方形花

坛或苗圃，中间穿插着小道和连廊，17世纪测绘图里展示的迷宫可能就是克伦威尔新花园的一部分。他对休闲娱乐的追求也在这里得到自由的发挥，因为这里不仅有一个“赌博用的”房间、一条保龄球道，还有几处凉亭。

克伦威尔宽敞的新居并不只是地位的需要：旧居内的住宿与工作空间正因府邸成员的不断增加而变得捉襟见肘。他的家人们也需要住的地方。他唯一幸存的孩子格雷戈里在此前四年间一直在剑桥学习，时光飞逝，他于1533年在差不多13岁的时候回到了家。他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并且跟他的父亲有共同的爱好和信仰，这至少一部分归功于他的家庭教师们以及同窗的尼古拉斯·萨德勒的影响，后者是改革主义信仰有名的追随者。

毫无疑问，格雷戈里会留在剑桥继续学习以拿到学位：这样的课程通常是预留给那些打算进教会服侍的人的。除此之外，克伦威尔还热衷于让格雷戈里像他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样，从实践中获益。因此克伦威尔安排各种有影响力的、可以提高格雷戈里的精神、智力以及——最重要的——实践能力的朋友们照管他。这些朋友包括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的主教罗兰·李（Rowland Lee），他是克伦威尔的一个近交。虽然他因奉行严苛的司法而得到了可怕的名声，但据说李对这个男孩“视若己出”。[10] 格雷戈里随后与枢密院大臣理查德·索斯韦尔爵士（Richard Southwell）在他位于诺福克郡伍德赖辛庄园的宅邸同住。

格雷戈里每到一个新的住处都由他的家庭教师亨利·道威斯（Henry Dowes）陪伴，后者是一个智力相当高的人。道威斯跟克伦威尔合作，给这个孩子制订了一个全面的学习课程，其中包括法语、拉丁语、英语、会计、音乐以及罗马和希腊历史。鉴于他父亲对人文主义学说的偏爱，这可能并不出人意料，伊拉斯谟的著作在他的学习中占据了显要位置。但是格雷戈里也遵守传统信仰的教规：道威斯曾提到他的学生做弥

撒。[11] 格雷戈里还练习长弓、弹鲁特琴和维金纳琴，后来像他的父亲一样热衷打猎、驯鹰和骑马。格雷戈里跟表兄克里斯托弗·威利菲德显然又重聚了一段时间，他俩一起在学习的空档或者有其他机会的时候溜去打猎。在给克伦威尔的一封信中，道威斯赞赏地写道："作为消遣，他经常放鹰、打猎，并用长弓射杀猎物，这把长弓非常适合他，他也用得顺手，仿佛天生就擅长此道。"[12]

比起文化学习，格雷戈里显然更倾心于户外运动。1534年9月，亨利·道威斯沮丧地向克伦威尔坦言，自己用了各种方法让格雷戈里专心学习，"但因为他夏天都不务正业，所以要特别留意以怎样的方式来培养这个年轻人"。[13] 虽然道威斯向他的主人保证格雷戈里每天花几个小时在阅读和写作上，并会在他们出去骑马的时候在路上给他们讲一个希腊或罗马的故事，但是克伦威尔仍不满意。他敦促道威斯对这个孩子要更严格，不要让他享受追捕的乐趣，这样他才可以专心提升自己的才智。第二年4月，道威斯报告说："格雷戈里和他的伙伴身体健康、忙于学习。他的进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大，一部分是因为他现在有了一些敬畏和害怕，在被要求的时候能迅速投身学习；另一部分是因为那些之前让他心思不在学习上的事物被拿走了。"虽然他承认"他的理智不是匆忙间可以培养成的那种，而是逐渐产生效果，逐渐更加温顺，"但他向克伦威尔保证，"他学习法语、写作、练习兵器、计算账目、弹奏乐器消遣的时间都是由索斯韦尔先生规划的，后者不遗余力，每日听他阅读英语，告诉他正确的发音，解释那些不常见于日常会话中的法语或拉丁语借词的词源……如果他继续这样一直专注于把整个夏天奉献给阿波罗和缪斯等神，最后才会轮到戴安娜女神。[14]"[15]

格雷戈里跟他的表兄理查德·威廉斯（即克伦威尔姐姐凯瑟琳和她丈夫摩根的儿子）变得很亲近，他在理查德来奥斯丁会拜访的时候见到了他。理查德1502年（或更早）出生在威尔士，至少比他的表弟大18岁，格雷戈里对他似乎也有英雄崇拜的成分。理查德确实有很多值得仰

慕的地方：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作为一名军人，他擅长马上长枪和其他宫廷盛行的竞技运动。他具备舅舅的聪明机智和老练，两人天生相像。克伦威尔似乎在姐姐凯瑟琳死后不久收养了这位外甥，所以理查德使用了他的姓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很快看到了外甥的潜力。几乎可以肯定，正是在他的影响下，理查德才被指派到多塞特侯爵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的门下，后者也曾是克伦威尔本人早年的服侍对象。显然克伦威尔于自己扬名宫廷之后不久就引荐了他的外甥。可能是因为在竞技场上的勇猛，理查德很快赢得了国王的喜爱，1531年他被选入枢密院。他似乎还为舅舅做了信使，克伦威尔1532年1月写给加德纳的一封信里所指的“送信的男性亲属”可能就是他。克伦威尔对外甥非常满意，他不仅提拔他，还提拔理查德的朋友们。在收养理查德几年后，他写信给自己的盟友、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主教罗兰·李，请他在利奇菲尔德教会里给理查德安排一个职位，这样后者可以转而让给“自己的一个亲近的朋友”。[16]

克伦威尔、儿子和外甥组成了一个小而亲密的家庭。格雷戈里和理查德在写给年长的克伦威尔的信中流露出真挚的感情。理查德后来写信给舅舅哀叹他们的分离：“自您离开后，我最想的就是见到您，不想与离开您的时间再多一分。”格雷戈里在一封给父亲问安的信中也同样感情满溢，他称父亲的安好“比世间所有物质的丰富都珍贵”。认为这两个年轻人竞相争取克伦威尔的感情是说不通的。理查德在遗嘱中给表弟遗赠了“一匹壮马”。[17]

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日益增加的仆人数量远超过了他家人的数量。虽然从克伦威尔府邸发出的大多数信件都跟他们参与的生意往来有关，但其中也有关于他们私人生活的证据。1530年一个新来的仆人引起了素性勤勉的拉尔夫·萨德勒的注意。艾伦（或海伦）·巴尔［Ellen（or Helen）Barre］跟马修的婚姻痛苦不堪，后者是一个伦敦商人，挥霍钱

财喝酒、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在试着找了他一段时间之后，艾伦推测他已经死了，于是在克伦威尔的府邸做了洗衣女工。她和萨德勒之间很快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见面几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但到了1545年，在结婚15年之后，为萨德勒生育了7个孩子（3个儿子和4个女儿，为纪念他的主人，萨德勒给长子起名为托马斯）的艾伦惊恐地发现：分居的前夫还活着。她因此犯了重婚罪。托马斯·赖奥斯利（Thomas Wriothesley）的仆人一次偶然听见醉酒的巴尔说他是萨德勒夫人的丈夫。巴尔立即被抓起来审问。在确认他所说的是真相后，萨德勒唯一的选择是向议会请愿。得益于作为枢密院顾问大臣的经历和影响力，他几乎没费什么劲就让议会12月24日通过了一个私法法案，使他的孩子们合法化。但是萨德勒夫人仍是巴尔的合法妻子，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才得到解决。萨德勒非常爱恋他的妻子并且“因这件事非常悲伤”。[18]

克伦威尔另一个亲近的仆人和门徒——托马斯·埃弗里（Thomas Avery）在1532年返回奥斯丁会。埃弗里受教于斯蒂芬·沃恩，沃恩2月写信给克伦威尔通知他这个男孩在回去的路上，已经到了泽兰。他叮嘱他的朋友：“把他作为我粗浅教育的初步成果看待。如果他得不到重视，树液将会溢出，今后可能会长出的花朵也会消失。”[19] 埃弗里回来之后没有在克伦威尔的府邸待多久，从1533年11月他自埃克塞特侯爵夫人格特鲁德的府邸写信的记录来看，克伦威尔让他去服侍了这位侯爵夫人。不过这些安排本就是为了让这位年轻人得到历练，他的潜力——像理查德的一样——很快被克伦威尔注意到了。因此他打算把他留在自己府邸。

善于识人的克伦威尔必然有发掘家人和仆人潜力的天赋。16世纪30年代初，当他在宫廷的事业开始发达时，克伦威尔可以依赖一群不断增加的有才能的、忠诚的、值得信任的年轻人，他们都迫切并很快掌握了克伦威尔的生意诀窍。正如17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斯特赖普所说：“他留用了很多非常机敏、有能力的人并向国王引荐他们，国王经常派他们到

其他王国传递消息与信件。”同样，精明识人的能力让克伦威尔能够在熟人当中找出值得提拔的人才。斯特赖普说“比起宫廷中其他身居高位、得宠的人，他（指克伦威尔）在得势的时候引荐的有才能、正直的教俗人士要更多”。在定期给查理五世的冗长信件中，大使夏普伊多次提到克伦威尔的各个仆人和信使。“他让自己信任的朋友给我传口信，从未停止，”他在一封信中汇报说，“他的朋友在过去两星期里多次拜访我。”[20]

做克伦威尔的门徒是在宫廷获得有益仕途的最稳妥的途径之一。他的府邸跟宫廷其他重要成员的府邸一样，成了一个半正式的政府部门，充斥着秘书、文员、会计和其他行政人员，他们的工作是管理大批信件、法案，起草法案和其他跟克伦威尔宫廷事务以及法律案子有关的文件，以及处理他个人的生意事务和财务往来。这座府邸最多曾容纳了400名仆人，其中很多人以前是服侍沃尔西的。克伦威尔无疑选出了那些在服侍枢机主教的时候证实了自己价值的人。[21] 所有仆人都穿着克伦威尔家的制服，一般是低调的灰色，贴身男仆穿天鹅绒，仆人穿长款束身外衣，“他们的下摆大到足够朋友坐在上面”。在特殊场合，主人会给他们穿上更引人注目的服装，比如在1540年的伦敦游行期间，他的仆人们从麦尔安德（Mile End）行进的时候身着“白色的外套，其胸前和背后都缀有这座城市的纹章，即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和一把剑”。[22]

服侍克伦威尔的衣着象征的不仅仅是地位。与都铎时代那些让上流人士精进礼仪修养的大宅邸不同，克伦威尔府上的工作并不清闲。任何想要被亨利政府的这位后起之秀聘用的人都必须证明自己有很高的能力，能够承担大量工作。他还必须愿意跟他的主人工作同样长的时间。不过，克伦威尔对他的家仆都很好，保证他们所有人的生活起居条件适宜，并得到良好的管理。他后来回想说留用这些人“花了我好大一笔”，说明他们都有丰厚的报酬。[23] 约翰·斯托说：“如果能称自己是克伦威尔的仆人，这个人会深以为幸。”约翰·福克斯同意他的看法，钦佩克伦

威尔是如此“一位对仆人仁慈周到的主人”。一个来自坎伯兰郡的大胆男孩的故事佐证了这一点。他迫切想要成为克伦威尔府邸的一员，因此给自己买了一件跟克伦威尔家一样颜色的制服外套，1535年的一天，在托马斯·雷（Thomas Legh）巡视修道院的时候，他出现并请求这位代理人让他跟着。[24]

除了在奥斯丁会最亲近的交际圈外，克伦威尔还跟关系稍远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其中包括他的表兄尼古拉斯·格洛索普（他母亲的外甥），后者在1533年6月写信请求克伦威尔的帮助。他是泰勒斯行会的一员，在他的侍主逝世后，行会要取消他每年26先令8便士的年金，这令格洛索普面临破产。他恳求道：“我已经80岁了，没什么能力，痛风和痛性痉挛导致瘸腿，一只眼睛也瞎了。”他给表弟送了“12块班伯里奶酪，一半是硬质的，一半是软质的，希望它们值2万镑”。他还跟克伦威尔提起他们的家族联系，说“您的母亲是我的姨母”，并提到了克伦威尔的外甥克里斯托弗·威力菲德，说曾经为他提供了“带长枕的羽毛铺盖”。克伦威尔很快根据他的信采取行动，立即给商人泰勒斯就表兄的年金问题写信：“请你看在我的分上继续支付年金，并且每年增加13先令4便士。”他的举动是出于真正的关心而非敷衍，这一点从他传达的急迫感中可以看出来，他告诉这个行会：“我希望在下一个开庭日早上收到你的回复。”[25]

虽然腾出时间处理私事和家事，但克伦威尔从未耽误他对国王的职责——也因此得到丰厚的回报。1532年4月14日他成为珠宝库主管（Master of the Jewels），这虽是他的第一份正式官职，但这看起来很小的任命让他能够接近王室金库并且管理那些由他负责的资金。约翰·斯特赖普说这个任命标志着他“深得国王的宠爱”。[26]

大约在这一时期，汉斯·荷尔拜因给克伦威尔画了肖像。克伦威尔能够委托当时最有名的宫廷画家为他画像说明了他的得势程度。出身卑

微的帕特尼铁匠之子作为荷尔拜因的肖像画主顾获得了不朽的声名，现在他与王族、公爵和伯爵同处。这幅画像或许是为了庆祝克伦威尔的新任命而画的，因为最上面题写着：“致克伦威尔，珠宝库备受信任、深受爱戴的大人。”

紧接着，在7月16日，克伦威尔又有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即属于大法官法庭（the department of the chancery）的归档文员（clerk of the hanaper），这允许他通过给特许状、土地转让证书、令状之类的文件加盖封印获得报酬和其他收入。在接下来受宠于宫廷的岁月里，克伦威尔得到了至少17个职位的任命，虽然其中大多数职位相对不高，但是他从中获得的收入并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10年间克伦威尔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据估计，1537年他的年收入约为1200英镑——约合今天的350万英镑以上。

克伦威尔迅速以他的新身份为工具，既广开财路，也为自己博得更多经常面见君主的机会。1532年9月，他写信向亨利告知了由国王本人设计的镶有珠宝的新项圈的制造进展。他向君主保证：“我已经命令工匠在进一步得知您雅致的喜好之前不要继续完成制造，为此他和我将在周六晚上或者周日早上拜见您。”[27] 克伦威尔虽然迫切地想要确保君主收到最奢华的珠宝饰品，但他自己避免过度暴露权力。他的头衔和职位与他所得到的权势和财富相当，但是——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他没有追求浮华的服饰和排场。他没有试图用这种方式抹去他低微的出身，这透露出他天生朴素的本性和安全感，他相信自己的权势源于内在的能力而不是外在的炫耀。克伦威尔还从他的前侍主沃尔西身上吸取教训，知道太多的浮华和排场会招致麻烦。

不过，克伦威尔的头衔确实让他在与较高贵的同僚们相处时有了新的自信。这在他写信给萨福克公爵——亨利身边最高贵、服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要求他上交已经授予诺福克公爵的典礼大臣的特权时可见

一斑。虽然萨福克得到了特伦托河附近御林法官的职位作为补偿，但他显然对这个安排感到愤愤不平。克伦威尔谦逊地向他保证："国王陛下料想并且准确地看到大人您非常看重并潜心与诺福克培养善意和友爱……陛下无疑非常乐于看到在众臣民中，两位重要而尊贵的大臣如此友善，彼此喜爱。"克伦威尔无疑暗自欣喜，他知道此举会在二人之间引发对立，而他——亨利枢密院中出身卑微的一员——则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信末他请萨福克"尽快给予宫廷答复"，并为他的"大胆、鲁莽的信"致以言不由衷的歉意。[28]

克伦威尔新得的权力对血统高贵的对手来说是诅咒。17世纪教会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敏锐地说道："这就是他被贵族嫉妒的原因，他出身比他们低很多，但是职权又比大多数人高很多。不仅如此，他的很多晋升不被看作荣耀，而被看作对他人的伤害。他接受这些晋升被认为要么是在实用层面不当，要么是在分配上不公，要么是在道义上不义，要么是在良心上不善。"[29] 克伦威尔会怡然自得地任他们把事情往坏处想。虽然他私下里可能会享受对手的暴怒，但他看重的总是实务而不是压倒对手的嚣张气焰。

到1532年夏天，克伦威尔明显已经被国内外的事务缠身。5月和6月他各送了两封信给国王，转告自己设法从国外的联系人那里收集到的某些信息。其中包括英格兰大使跟帝国大使的一次会面，还有他从罗马和威尼斯收到的关于土耳其可能进攻意大利的报告。克伦威尔前些年细心建立的线人和代理人网络让他占据极大的优势。亨利意识到比起大多数人，这个人能让他更好地了解大陆的事情。

1532年8月，大主教沃勒姆的去世让克伦威尔在宫廷的保守派对手又少了一个，这为下一个后来证实对克伦威尔改革极为有利的任命铺平了道路。比克伦威尔差不多小4岁的托马斯·克兰默出身略高于他，是诺丁汉郡一个落魄绅士的儿子。克兰默在剑桥接受教育，他正是沃尔西要

为牛津的新学院搜罗的杰出年轻学者之一。克兰默拒绝了这一邀请，但他后来接受了枢机主教的邀请加入了赴西班牙访问查理五世的英格兰外交使团。克兰默在这项任务中表现出色，因此在回国后被给予了面见国王的荣誉，国王赐给他很多礼物，包括金银戒指。从那时开始，克兰默坚定地支持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然而，在回到剑桥后，他好像被沃尔西招募、处理各种生意上的事务。比如，1528年10月，他带着克伦威尔写给沃尔西在伊普斯威奇新学院的院长威廉·卡彭（William Capon）的信从伦敦赶往伊普斯威奇。几乎可以确定那时这两个人已经认识了，但是直到沃尔西失势后他们才开始真正的合作。

克兰默受人欣赏的是他冷静和乐观的本性——这是亨利宫廷里不多见的品质。“他的性情平实，或者说非常克己，不为任何形式的成功或不幸所动……尽管他私下同私密的朋友在一起时会痛苦地流泪，感伤世界的不幸和灾害。”[30] 克伦威尔很快成为这个评论者所提到的“私密的朋友”之一。

1529年夏，坎佩吉枢机主教的庭审失败后，克兰默建议将重心由罗马的法律案件转到对全欧洲大学神学家的广泛拉拢上。除了将教宗排除在计划之外，这个策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比沃尔西主导的拖延而徒劳的谈判更加划算。在得到国王默许后，克兰默甘心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看到他的潜力后，博林家族很快把他招到自己阵营里，让他住在托马斯·博林新得到的杜伦坊（Durham Place）——一座位于泰晤士河畔河岸街（the Strand）上的奢华宅邸，这样他可以安静地将“他的头脑用于思考国王的难题”。[31] 亨利对克兰默如此信任，以至于1530年后者被派为去罗马的使团的一员，任务是收集大学的意见。他们的任务无果而终，但是克兰默并没有受到牵连，在回到英格兰后他受命编写《丰文汇编》（*Collectanea*）[32] 以及其他学术著作，为离婚提供理论支持。

虽然克兰默以保守派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神学生涯，但是他为国王的

利益所做的努力让他开始质疑教宗的权威。1532年一次出使德意志的经历点燃了他心中尚在萌芽的福音派信仰之火。在那里，他见了几位主要的路德宗改革家，包括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这次会面从各方面看都很重要。在一次对奥西安德的拜访中，克兰默见到了牧师妻子的侄女，一个名叫玛格丽特的年轻女人。他显然立刻就被迷住了，在第一次见面不久后就娶了她。这不仅表明了他对玛格丽特的爱，还表明了他对新信仰的热忱，因为福音派拒斥神职人员禁欲的旧传统。不过，在于当年秋天离开身在纽伦堡的妻子、跟随查理五世的宫廷去意大利之后，他有点惊慌地发现自己已经被选为下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决意对自己的婚姻保密并接受了这个任命，于第二年1月返回英格兰。

彼时，宫廷中的形势迅速变化，国王的“大事”已经不能再拖了。对冗长而无果的谈判感到恼火的安妮·博林孤注一掷：她准备放弃之前的策略，甘愿成为国王名义和事实上的情妇。或许是在1532年11月去加来的时候，安妮开始跟亨利同床共枕。她这么做是在毫无把握地打赌，如果她怀孕了，亨利会克服所有看似不能克服的障碍娶她。此外，虽然亨利追求了她很多年，但令他求而不得这一点是她诱惑力的一大来源。如果她放弃了这一点，就有可能会永远失去亨利的兴趣。

不过这回她似乎赌赢了。夏普伊略带嫌恶地记载“国王一点都不能离开她左右”。到当年12月，安妮怀孕了。如果要让这个孩子合法地出生，她的王室情人及其大臣们就必须迅速行动。克伦威尔陪伴皇室一行去了加来，无疑迅速得知了这一情况。亨利与安妮有可能在还在加来的时候就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结婚仪式。更有据可考的是，亨利于1533年1月25日在威斯敏斯特的私人礼拜堂正式迎娶了安妮。虽然有神父主持，但这场婚礼还是秘密进行的，这意味着这场婚姻的合法性会遭到质疑。更重要的是，跟凯瑟琳的离婚还没有达成。亨利可以说服自己之前的那段婚姻从来不是合法的，所以他可以随意娶他选的人，但是在大多

数臣民（和世界各国）眼里，他是重婚者。

国王确信安妮怀的是儿子，立马命克伦威尔将他们的婚姻合法化。克伦威尔迅速执行了他的命令。婚礼后的第二天，议会便被召集起来以通过必要的立法。从克伦威尔行动之迅速可以看出他过去三年细心打下的基础有多么坚实，他因此得以确保新一届议会里都是确定会支持离婚的人。他还让盟友托马斯·奥德利爵士担任大法官，这意味着现在他可以主持上议院了。

议会于2月4日开始，克伦威尔没有浪费时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禁止向罗马上诉的权利。这实际上意味着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决定将是最终的、不容置疑的。克伦威尔强烈意识到他的仕途——甚至他的生命——都取决于这个方案的成功，他无视所有的反对，甚至连国王在法案草案上的批注都被忽视了。克伦威尔还列出了所有胆敢出声的人的名单。他始终记得那些反对者，一如他始终记得他的朋友们，那些试图阻碍他成功的人终将为此悔恨。其中有乔治·思罗克莫顿（George Throckmorton），他声称自己担忧如果跟安妮的婚礼继续进行（他不知道已经进行了）会让亨利良心不安，因为与他第一任妻子的形势大不相同，国王已经跟安妮·博林“的母亲和姐姐都有了瓜葛”，这令他成为国王的敌人。国王大叫“跟她的母亲没有过”，克伦威尔赶紧补充道：“跟她的姐姐也没有——因此不要再考虑这个了。”在克伦威尔的煽动下，这场短暂的交锋令思罗克莫顿在不久后离开了宫廷。思罗克莫顿那年10月29日写给克伦威尔的一封信表明他被勒令“待在家里，服侍上帝，少管闲事”。[33]

在克伦威尔影响议会审议的时候，3月30日克兰默被封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这之后，教士会议立刻宣布国王跟凯瑟琳的婚姻不合法，另一个离婚的重大阻碍被清除。然后，在4月第一周，克伦威尔成功地让《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案》（the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得到通

过。这个法案被称为“克伦威尔立法的杰作”，其著名的序言宣称英格兰是一个帝国，国王是最高领袖，对他臣民的身体和灵魂有绝对的统治权。[34] 留存至今的法案草案揭示了克伦威尔和他的君主在后者权威性质上存在一些分歧，亨利坚持他对教会的管辖权源于“至高无上的”王权。克伦威尔将这些内容删除可能并不是因为在看法存在分歧，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减少神职人员反对的典型的务实手段。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强调向罗马申诉对亨利世俗地位的威胁，法案才会更有可能被神职人员接受。从此以后，国王的任何一个臣民——包括阿拉贡的凯瑟琳——都不能把罗马作为更高的权威向其申诉。

拼图的最后一块现在迅速到位。4月11日，克兰默出于程序上的要求向国王提出了针对其与凯瑟琳婚事有效性的质疑。第二天，克伦威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这是他深受亨利宠爱且在财政事务上颇有才干的证明。5月10日，裁定国王第一次婚姻合法性的庭审正式开始。两周内，庭审判决凯瑟琳和亚瑟之间是事实婚姻，因此她在之后跟亚瑟之弟的结合是非法的。5月28日克兰默宣告亨利与安妮的婚姻合法，四天后，在一场旨在平息一切针对其合法性之质疑的隆重典礼上，安妮加冕成后。但是臣民对她的敌意十分强烈，单靠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壮观典礼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夏普伊形容这场加冕礼是一场“冷漠、浅陋、令人不舒服的仪式，不仅让民众极其不满，其他的人也很不满”。[35] 不满很快演变成公开的嘲讽。亨利和安妮的姓名首字母（HA）在游行的沿路上相互交织着。但是安妮的游行车队经过的时候，交织的字母很快变成了嘲弄鄙视的群众大喊的“哈哈（HA HA）”。

作为一场公关活动，这场加冕礼以惨败收场。但是克伦威尔决意禁止愤恨的英格兰民众破坏他竭力促成的立法，因此他试图威逼他们接受新的王后。他对反对者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与他在国王面前空前受宠的事实有着几乎不容质疑的关系。1533年5月夏普伊告诉他的主人，克伦威尔现在“管理他（亨利的）所有事务”，而在当月的另一封信

中，他形容克伦威尔是“所有顾问大臣中最年长的，现在最得国王信任”。[36] 苏格兰神学家亚历山大·阿莱斯（Alexander Ales）在提及他时说道：“克伦威尔大人是国王的耳朵和头脑，国王把整个王国的管理事务都交给他。”[37] 夏普伊在当年稍晚一些时候提到，就连颇有权势的诺福克现在都不得不屈从于他对手的主张，这证实了克伦威尔的显达。这位公爵曾经是“旧信仰”在宫廷中最直言不讳的拥护者，因此他的同僚大臣们在听到他对教宗大加谴责，“用1000句不敬的言语称他是一个不祥的私生子、一个骗子和邪恶的人，说他必须为此失去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所拥有的一切，不然自己就会亲自去报复他”的时候是有一些吃惊的。夏普伊挖苦道：“他的态度完全反转，因为从前正是他在宫廷中将自己表现为最虔诚的天主教徒、教宗权威最大的拥护者；但是他这么做一定是为了不失去现有的权势，尽管他现在的权势之有限正合克伦威尔心意。因此，我认为他非常厌恶宫廷。”[38]

---

[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no.1452.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146；Vol.XIV，Part ii，no.782.

[3] 夏普伊估计克伦威尔的新住宅离这儿有“半法里”远。*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尽管很难准确地将法里转化成现代的测量，但约等于现在的三英里。

[4] 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p.162.

[5]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ed. Morley，H.（Stroud，1994），pp.191-192.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340.

[7] 1536年10月，克伦威尔的外甥理查德带了80位工人去约克郡协助镇压求恩巡礼，这样一来缓慢的进展就解释得通了。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pp.163-164.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9]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ed. Morley，H.（Stroud，1994），p.191.

[10] SP 1/85，fo.56.

[1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135.

[12] Ellis，Vol.I，pp.343-345.

[1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135.

[14] 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是主司光明、预言、音乐和医药之神，缪斯是主司艺术与科学的九位古老文艺女神之一，而戴安娜女神主司狩猎，所以文中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格雷戈里在这个夏天都专注于文化艺术的学习，文化艺术学习之后才会进行户外活动。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618.

[1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43；Vol.II，p.137.

[1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290；Ellis，H.（ed.），*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2^{nd} and 3^{rd} series（London，1827，1846），Vol.I，p.340；Noble，M.，*Memoirs of the Protectorate House of Cromwell*，2 vols.（Birmingham，1784），Vol.I，p.18.

[18] Bindoff，S.T.，*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58*，Vols.Ⅰ and Ⅲ（London，1982），Vol.III，p.251.

[19] Bindoff，S.T.，*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58*，Vols.Ⅰ and Ⅲ（London，1982），Vol.I，p.369.

[20]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p.561-562；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p.260-261；*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964.

[21] Robertson：‘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提供了对克伦威尔府邸人员的极好的评估。

[22]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ed. Morley，H.（Stroud，1994），p.34.

[2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67.

[24]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ed. Morley，H.（Stroud，1994），p.34，and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651；Robertson，M.L.，‘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The Ministerial Household i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75），p.375.这个男孩之后没有在关于克伦威尔府邸人员的记录中出现，所以看起来他的大胆尝试没有成功。

[2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nos.696，698.

[26]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221.

[2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48.

[28]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53-354.

[29] Fuller，T.，*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London，1655），p.231.

[30] Nichols，J.G.，*Narratives of the Reformation*，Camden Society，1st ser.，Vol.LⅩⅩⅦ（London，1859），pp.244-245.

[31]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ed. Morley，H.（Stroud，1994），p.34.

[32] 即前文提到的*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 该书收录了基于《圣经》或历史的有关早期基督教的文章，编撰该书的目的是为亨利八世和英国脱离罗马教廷一事正名。

[3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I，no.1365；Vol.XII，Part ii，no.952.

[34] Elton，G.R.，*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London and New York，2005）， p.133.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I，Part i，no.653.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I，no.465；*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 Vol.IV，Part II.ii，pp.669，677.

[37]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 p.325.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VI，no.1510.

第八章 “严词和骇人的威胁”

通过推动立法将英格兰从教宗权威中解放出来并促成国王离婚，克伦威尔已经履行了他的那部分约定。然而，安妮王后没有履行她的。1533年8月末她在格林尼治宫进入产期，遵循所有的礼制以确保小王子顺利诞生。她的房间都挂上了厚厚的挂毯，每一丝自然光都被遮挡在外面（甚至连锁眼都被堵上了），服侍她的只有侍女。这些传统是亨利的祖母玛格丽特·博福特（Lady Margaret Beaufort）在15世纪定下的，一直以来都得到严格遵守。安妮深信只要诞下一个儿子就能让她的敌人永远沉默，她下令写信感谢上帝给她“顺利生产、诞下一位王子的”恩赐。[1]

9月7日凌晨，这个孩子降生了，但不是备受期待的儿子和继承人，而是一个女孩，亨利备受打击。他为迎娶安妮而颠覆了英格兰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因为安妮承诺会为他生下王子，这关乎整个王国的稳定。但与此相反，她产下的不过是一个没什么用的女儿。上帝无疑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新婚姻是被诅咒的。所有纪念都铎新王子降生的庆祝计划都被取消了。夏普伊几乎不加掩饰地幸灾乐祸道：“国王的情妇生了一个女儿，这让他和那个情妇都很失望，也让确认新生儿会是一个男孩的医生、占星家、巫师和女术士受到很多责备。但人们因为是女儿而不是儿子加倍欢喜，高兴地嘲弄那些相信这类预测的人，看他们备受耻辱。”他后来继续说新王后对女儿的降生显得“很是失望、生气”。亨利控制住自己的暴怒和失望，在第一次见刚出生的女儿的时候告诉安妮：“你跟我都很年轻，靠着上帝的恩惠，后面会有儿子的。”[2] 安妮清楚，这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威胁。

小公主根据所有以往的惯例受洗并被命名为伊丽莎白，但据夏普伊说这场洗礼“冷淡而令人不快”。跟她的母亲一样，这个孩子很快成为被憎恶的对象。两个修道士因为说公主在热水中受洗“但水不够热”而被捕。同时西班牙人称“情妇的女儿”是“小贱人”“小杂种”，并幸灾乐祸地认为她代表了上帝对英格兰国王驱逐教宗权威的惩罚。[3] 国王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继承人，克伦威尔在第二年初迫使议会通过的《继承法案》中正式承认了这一点。这样一来，伊丽莎白取代了国王的长女（现在仅以玛丽小姐称呼），后者因为生母的婚姻被废除而变成了私生女，这也让玛丽跟克伦威尔处于可能发生冲突的状态。

玛丽·都铎和托马斯·克伦威尔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都完全对立。她是一个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他是一个主导英格兰脱离罗马的改革者；她是亨利八世第一任王后的女儿，而他策划了国王跟第二任王后的婚姻。因为克伦威尔，玛丽承受了从继承人降为被放逐的私生女的痛苦和羞辱。不过，至少在表面上，两人的关系是友好的。他们的信件充满尊重甚至深切的感情。克伦威尔时刻准备着奉承并保证帮助玛丽，比如他公然承认“国王不仅非常珍爱公主，他的女儿，他对她的爱是新生儿（伊丽莎白）的100倍”。[4]

然而，他们的通信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即使是最讨厌的敌人之间也会用都铎时期巧妙、彬彬有礼的语言掩盖他们的厌恶。克伦威尔的朋友和门徒托马斯·怀亚特写了一首关于这种“虚伪的言语”的诗，挖苦道：

如果要寻遍全世界，

一个人会找到足够美妙的文字；

它们非常廉价，它们不费一毫，

它们的实质是空辞；

但是因为说得如此巧妙又如此恰当，

所以才得见少有的温柔和谐。[5]

作为一名老练的外交家和廷臣，夏普伊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虽然克伦威尔总是让我感到他对公主有很深的感情，”他告诉查理五世，“但他还没有能够证实他言辞和声明的行为。”[6] 在国王正式离婚后，克伦威尔跟玛丽表面的彬彬有礼之下隐藏着玛丽固执地拒绝承认父母婚姻无效、拒绝接受他父亲作为教会最高领袖的新地位这一强烈矛盾。自1533年议会以来，克伦威尔为了制服所有对他改革的反抗而施行了强硬的举措，国王长女表面上的屈服至关重要。作为反对派名义上的领袖——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国外——她对克伦威尔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他竭尽全力说服她让步。

玛丽的特权逐渐被取消，她不仅失去了母亲的陪伴，还失去了朋友和盟友的陪伴，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克伦威尔的煽动。夏普伊多次要求拜访玛丽，但常常被克伦威尔这位擅长拖延和推辞的大人回绝。受挫的大使于1533年11月写信抱怨克伦威尔在这件事上难以捉摸、态度不明：“我让克伦威尔的一个仆人转告，但是因各种原因没能当面跟他谈话，我能怎么抗议呢？他回复说，无论是他还是别人都没办法详细告诉我他从枢密院了解到的国王的意图，但他笼统地向我保证国王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有道德的君王，并希望保持跟皇帝的友谊，善待王后和公主。他说在跟国王交谈后，他或许能得到更具体的答复。”[7]

另一次，克伦威尔以宫廷有事为由，临时取消了大使到奥斯丁会的拜访。但是夏普伊确切地知道他后来出发去了另外一个宅邸。其他时候，克伦威尔用“美妙的言辞”和亲切的保证迷惑大使，但他总是小心地避免给出书面承诺。这是夏普伊后来应对国王时用的一个策略：“我同样使用了克伦威尔自己的方式，像他对我那样决不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8] 不过，玛丽继承了她母亲的坚韧，抵挡了克伦威尔所有削弱她

地位的尝试。她和她的支持者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依旧是克伦威尔的肉中刺。

然而，在亨利复杂的政治外交世界里，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和睦并不固定。虽然克伦威尔是亨利和凯瑟琳婚姻无效的主要促成者，但是他对被废的王后和她的女儿存有一丝同情，他的信件证明他有时候会给她们提供一些安慰。凯瑟琳跟他同岁，两人都对国王怀有强烈的忠诚心。克伦威尔一定给了夏普伊足够真切的希望，促使这位外交官相信他的意图是好的，并尝试赢得这位大臣对凯瑟琳的支持。1533年7月，他向皇帝坦言："如果我看到他（克伦威尔）有选择正确道路的微小迹象，我一定会……让他知道他的人身安全会得到怎样的保证，并增加他的权势和声誉，如果他帮助凯瑟琳复位的话。"[9] 这既是承诺又是威胁，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克伦威尔打算听从——至少彼时还没有。在夏普伊写这些的时候，国王对克伦威尔的宠爱达到最高峰，他帮助取得后位的女人已经怀孕，据说怀的是一个男性继承人，新时代的来临似已万事俱备。

但克伦威尔从来都是一个规避风险、尽可能多地保持潜在盟友的人。因此在接下来数月的时间里，他表现出愿意听从大使尝试对他的劝说的样子。"他可以相信，一旦王后复位，他将发现她是仁慈且知恩图报的，她会比我说的更加乐意倚重他"，夏普伊在1533年8月跟他的主人如是说。

> 克伦威尔接受了我谈话中相当多的部分。他非常感谢我给出的好建议以及我对国王和对他的友爱……他一遍又一遍地承诺我，就他自己而言，他会竭尽全力，并希望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有好的结果。那次他没有像通常那样说起您和王后，也没有像其他时候那样劝您应该让步并同意国王的婚姻。当然，如果要相信克伦威尔的话，考虑国王的身边现在没有那位情妇，或许可以说他在那方面有一些后悔的表现。[10]

尽管克伦威尔的态度让人充满希望，但夏普伊知道自己在这场协商中处于劣势地位。是克伦威尔而不是他握有左右亨利宫廷的权力，并可

以见风使舵地采用最有利于自己的立场。很快，大使的幻想就破灭了。“克伦威尔所说的确实非常好，”他告诉皇帝，“但是他的行为不好，他的意志和意图无比恶劣。”[11]

公主的降生并没有阻止克伦威尔推行由她父母的婚姻引发的改革。他利用自己庞大的线人网络收集对那些反对新法律、同情前王后的人不利的证据。1533年7月他得知两个意图激起民愤、反对国王新婚姻的修道士来到英格兰。他的线人们告知他，这些修道士还给那些他们认为同情旧统治以及凯瑟琳本人的人带了信。他当即向他的君主汇报了所有信息。他没有立刻逮捕这些修道士，而是建议“要让这些修道士跟她（凯瑟琳）和她的支持者说上话并探听他们传达的内容，由此或许可以察觉他们的进一步行动，辨识他们不好的意图”。他的建议显然被采用，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他汇报说：“至于与王子遗孀接触的那些修道士，我特意安插在韦尔（ware）的线人们在那里首次发现他们在暗中接受传召。线人们等了他们很长时间并尾随他们从那里到伦敦，然后在伦敦（尽管他们很谨慎、多次用计试图逃脱）逮捕、拘留他们直到我回来。”他继续描述了自己是如何亲自审讯这些修道士的，虽然他“没有获得重要、有意义的信息”，但他相信这些人将在严刑之下坦白。[12]

尽管克伦威尔成功地镇压了这次反抗，但仍有很多本土人士抵制他的改革。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之一是一个叫伊丽莎白·巴顿（Elizabeth Barton）的修女，她宣称自己预见了国王迎娶安妮之后将发生的灾难。她受年长的大主教沃勒姆庇护，但是1532年后者的逝世让她失去护身符，并因此成为克伦威尔唾手可得的猎物。他和克兰默一道用高强度的审问向她施压。由于伊丽莎白拒绝屈服，克伦威尔于1533年下令将她和她的支持者集体逮捕并投入伦敦塔。通过这么做，他向所有想要反对新政权的人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与伊丽莎白·巴顿有勾结的人当中有约翰·费舍主教。他与这位修女

见过几次面，但没有向国王汇报她的任何不忠的预言，现在这被看作忽视对君王的职责的表现。在对他用了“严词和骇人的威胁”之后，1534年2月克伦威尔本人又写信斥责这位主教。[13] 在一封冗长且措辞强烈的信里，他指控费舍“高看了这个女人的神圣性”并且只问她“没什么意义的问题”，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潜在的叛国者严加审问。克伦威尔说，这种行径轻则为“玩忽职守”，重则可能暗示主教与她共谋。“你听到、相信并隐藏这意图毁灭陛下的事情，是严重的失职”，他警告道。这表明克伦威尔对国王的宠爱是如此自信，他大胆预测了如果费舍在关于修女煽动性预言上坦白，国王会如何反应：“我认为我足够了解国王陛下的仁慈和温和的天性，只要您给他一些不同于您信中所写的其他理由，他不会像您刻意所写的那样不近人情地处理你。”[14]

克伦威尔并没有就此停手。他决定利用伊丽莎白·巴顿被捕的机会诱捕其他备受瞩目的反对者。为了确保国王至高无上的王权，他表现出清晰的战略思考能力，这让他在周遭的政治和宗教理想主义者中脱颖而出。没有记录表明亨利在根除改革反对者一事上给克伦威尔施加了多少压力，即便他施压了，克伦威尔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给反对者以致命一击。克伦威尔的魄力第一次受到真正的考验，而他没有让君王失望。

克伦威尔关注的首要反对者就是托马斯·莫尔爵士，这位前大法官被指控与伊丽莎白·莫顿勾结。虽然莫尔跟她的接触没有费舍那么明显，但是克伦威尔擅长用最纤细的线织就错综复杂的法网。因此，在莫尔承认自己曾跟这位修女见过面并通过书信之后，接下来的调查对此大做文章。克伦威尔亲自审讯了莫尔，但即使凭他的才能也没有找到足够立案的情节，就像夏普伊汇报的那样：“由于国王似乎没有找到他想要的借口以对莫尔施加更大的伤害，他停发了后者的俸禄。”大使敏锐地补充道：“这些人（莫尔和费舍）遭迫害仅仅是因为他们站在了王后（凯瑟琳）这边。”[15]

虽然克伦威尔的威逼策略暂时成功镇压了英格兰本土的反对者，但是这些策略促使了英格兰与罗马的完全决裂。当听说这场争议时，克雷芒七世拒绝再签署任何任命英格兰主教的文书。这并没有说服克伦威尔采取一个更加缓和的态度，反而促使他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贬抑教宗权威。在亨利的许可下，克伦威尔开始了英格兰历史上最猛烈、最肮脏的诽谤运动，动用布道坛和印刷出版物攻击教宗。一幅四位福音传道者向教宗扔石头的图像可能就是在他的推动下制作的。与此同时，他起草了必要的法律法规以打破英格兰跟罗马之间的既有联系。1534年年初议会再次被召集，在克伦威尔的严密监视下，这届议会通过了《继承法案》，宣布玛丽为私生女，并承认伊丽莎白（以及安妮·博林未来诞下的其他孩子）为王位继承人。这届议会还通过了《豁免法案》，取消了拥有一定规模地产的家庭向罗马缴纳金钱的传统义务。这与第二部《限制首岁教捐法案》互为补充，它将教会先前向教宗缴纳的款项转入王室金库。教士会议两年前通过的神职人员服从状也以法令形式得到确认。3月30日该届议会结束的时候，英格兰实现了跟罗马彻底且无可争议的决裂。

作为奖励，次月亨利任命克伦威尔为他的首席秘书兼首席大臣。他在实质上负责这两个职位的工作已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丝毫没有削弱任命的意义。

克伦威尔因这一宠任而振奋，坚持不懈地继续他镇压反对者的努力。虽然议会两院的成员在该届议会结束前都不得不宣誓接受《继承法案》，但克伦威尔明智地判断这还不够。要想让这个法案充分生效，亨利的所有臣民就必须正式承认国王跟安妮·博林婚姻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整个国家从未像这样被迫执行国王的命令。克伦威尔意图借此剔除所有尚未受到报复的反对者。通过迫使他们宣誓承认这场婚姻，而不只是用其他方式委婉表达他们的看法，他迫使危险的暗中活动变成公开的抵抗，以便他和他的执法者们加以处理。

克伦威尔首先从都城着手。4月13日，伦敦的神职人员对《继承法案》宣誓。但不久之后，多位高层人士站出来反对。他们当中首要的是托马斯·莫尔爵士和约翰·费舍，两人都拒绝宣誓。莫尔立刻被逮捕，并在4月17日被扔到伦敦塔。四天后费舍也受到同样的对待。这位前大法官给他的女儿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在信中解释了拒绝屈从的原因，并且描述了他的拒绝在枢密院产生的强烈反应。似乎没有人比克伦威尔更愤怒了。“秘书大人起誓说他宁愿自己的儿子丢掉脑袋也不希望莫尔拒绝宣誓，因为国王会对他产生很大的怀疑，以为坎特伯雷修女事件是因他的放任自流才得以密谋的。”[16]

尽管在表面上危言耸听，但克伦威尔私下里一定为自己用计使对手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而窃喜不已。莫尔和费舍被逮捕之后不久，克伦威尔写信给克兰默，后者曾建议让这两人只需对誓言宣誓、无须对序文宣誓，以求和平化解这一局面。克伦威尔指出：“如果他们如此宣誓，那么一定会成为所有人拒绝宣誓或至少像他们这样宣誓的借口。因为如果他们对继承权而不对序文宣誓，那么这不仅会被看作对罗马主教职权的认可，而且是对国王第二段婚姻的谴责。”克伦威尔敦促道：“不能让民众注意到上述罗彻斯特主教和莫尔先生的例子。”克伦威尔在此以“莫尔先生”称呼托马斯·莫尔，表明了他对这位前大法官的蔑视。不过他的信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对克兰默的恼火，因为后者对回避冲突的渴望有时令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可靠。他提醒这位大主教：“国王尤其相信你无论如何都不会试图站在他的对立面。”[17]

与此同时，一条命令在4月18日下达给全体伦敦市民，要求他们宣誓，他们遵命照做了。但是克伦威尔决意要根除任何进一步抵抗的可能，因此他决定以一种非常公开且残忍的方式展示力量。伊丽莎白·巴顿及其支持者们从上一年被捕之后就一直被关在伦敦塔。夏普伊沾沾自喜地汇报说，法官极不乐意宣告她有罪——这是他们忠于旧宗教的铁证。他们因此成为抵抗改革的有力象征，使克伦威尔决意严惩他们以儆

效尤。

克伦威尔绕过法官的进一步抵抗，借助他所偏爱的议会决议路线，通过《剥夺私权法案》坐实了叛国罪的裁决。他继而下令将伊丽莎白·巴顿和她的五位支持者（都是神职人员）从伦敦塔拖到泰伯恩（Tyburn）示众，并且在那里作为叛国者被处死。伊丽莎白在都城颇有恶名，因此那些目击这一可怕场面的民众一眼就能认出她来。一位女叛国者应当被处以火刑，但是克伦威尔特许对她施以绞刑然后砍头。她的支持者们就更不幸了：他们作为叛国者被处以恐怖的死刑，不过他们的尸体是被斩首而不是被分尸。

这场处决不仅是克伦威尔改革进程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司法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它们体现了克伦威尔权力之大及手段之残酷。他预备好打垮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就连在不经意间被卷入这些事件中的人也不能幸免。甚至那些克伦威尔最亲近的人也为这种陌生的残忍所震惊。当克伦威尔命令逮捕四个被怀疑与伊丽莎白·巴顿有勾结的人时，司法大臣克里斯托弗·黑尔斯爵士就被卷入了纷争。他向他的朋友恳求道："如果没有相反的理由，我请求您尽快把这些虔诚的人放回家。"克伦威尔没有理会他的请求，于是他在处决前三天再次请求，试图说服克伦威尔："赦免他们所有人是上帝的意旨也是国王的用意。"[18] 但是处置巴顿和她的支持者只是开始。很快，对新政反对者的草率逮捕乃至处决变得更加司空见惯。

克伦威尔突然转向这种残酷策略的原因仍有争议。反对克伦威尔的人迅速将此归咎于他一直小心遮掩直到此时的残忍天性。但有证据表明他这么做是出于惯用的实用主义，而不是暴虐的冲动。在莫尔和费舍这类人那里遭到的阻力坚定了克伦威尔推动改革的决心，也让他强烈地认识到自己的对手是多么危险与普遍。同时，对手显然不可能妥协：双方极度对立。如此野蛮地维护改革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权术。虽然

他现在深得国王重用，但是他清楚地知道亨利的态度有可能很快转变。因此他比自己的头衔和权势所暗示的要脆弱得多。在这种情势下，进攻是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防守。

在伦敦试验过的模式被推广到英格兰其他地区。克伦威尔组织委员会到每个郡确保当地人宣誓。他不再满足于人们对《继承法案》的接受：意识到最大的反抗来自神职人员，他要求所有新任主教也要正式承认王权至尊。含大学在内，教会的机构和学院也被迫进行集体宣誓，每个神职人员都要签署“在本国，上帝赋予罗马主教的权力跟其他外国主教一样”[19]的声明。同时，大多数普通的世俗人也不情愿地接受了委员会呈给他们的文书，即便他们之后继续提出异议。认识到这一点，克伦威尔在1534年11月议会召集的时候提出了一项严苛得令人震惊的新叛国法案。现在，谈论反对王室、否认他们的头衔，或者称国王为异端、暴君、异教徒或者篡位者都将被视为叛国。

在同一届议会上，克伦威尔强行通过了《至尊法案》，阐明并确立国王作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的地位，并规定他和他的继承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定期巡视、约束、矫正、改革、整顿、告诫、制止并且改进所有错误、异端邪说、滥用、违法、蔑视和暴行，无论上述罪行源自……任何惯例、风俗、外国法律、外国权威、指示或者与此相悖的其他事宜”。[20]同时，《首年金与十分之一税法案》给神职人员增加了一个新的纳税重担。克伦威尔估算这项法案会产生年均4万英镑的收入——约等于今天的1250万英镑。

克伦威尔的新法案得到了迅速且残忍的执行。那些胆敢在布道坛上出言反对国王的神职人员被投入伦敦塔或流放国外。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也没能逃离责罚。即便是针对最卑微臣民的指控，克伦威尔也亲自参与调查，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国王或者赞颂教宗的打杂女佣或铁匠能够逃离惩罚。但是克伦威尔知道草根阶层的反对是公众对新统治态度的可靠的

晴雨表，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如此审慎、细致地关注每一个指控乃至传闻。1534年10月，他写信给枢密院，事关一个被捕的“居心非常险恶的人”。他力劝枢密院在其被“审查”之前不要将此人处死，这样“我们就知道他掩藏在深处的全部心思”。[21] 除了对他宗教改革的普遍反对之外，克伦威尔发现社会上还存有对新王后根深蒂固的憎恶。即使是在亨利娶了安妮·博林两年后，一个名叫玛格丽特·钱瑟勒（Margaret Chanseler）的萨福克女人公开反对离婚并骂王后是一个“下流胚子”“大眼睛的贱人”，并诅咒她再也生不出孩子。[22] 玛格丽特逃脱了惩罚，但是在这之前，目击者们经受了来自超过10个治安法官的彻底质询，其中包括圣埃德蒙兹伯里的修道院院长。

英格兰北部一直是王室权威最顽固的抵抗者。离宫廷的距离越远，臣民对国王的忠心似乎越少。这个地区还是罗马天主教的大本营，比英格兰其他地区更谨遵旧宗教的礼仪。约克郡的一些大修道院，比如方廷斯修道院和格雷斯山修道院，是北方传统与反抗的代表。克伦威尔知道，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把北方各郡更直接地置于王室掌管之下。他的策略是削弱当地有权势的贵族，从最弱的开始逐个清除。第六代诺森伯兰郡伯爵、安妮王后的前情人亨利·珀西身居北方代理官员的关键职位，但他债务缠身、难当大任，其管辖权仅限于中部和东部边界地区，且仍在不断衰弱。因此克伦威尔以他管辖下的地区为重点，然后向西北推进。在这里，他利用了这一地区软弱、分裂的形势，戴克斯（Dacres）和克利福德（Cliffords）两大世家之间的世仇让他们的支配力大不如前。克伦威尔故意在他们之间挑起事端。他以跨过边界跟苏格兰领主发展亲密关系这个模棱两可的理由指控第三代戴克斯男爵威廉叛国，即便这在后来被证实是为了英格兰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戴克斯于1534年7月被主持庭审的贵族们释放，但此时克伦威尔已经成功打破了他对西部边界地区的控制，继而在两个月后任命第一代坎伯兰郡伯爵亨利·克利福德（Henry Clifford）为当地的监管者。

在降服北方的同时，克伦威尔没有忽略王国的其他边远地区。虽然亨利是爱尔兰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的前辈们对当地的控制力向来有限。和英格兰北部一样，有权势的地方领主在当地占支配地位。因此克伦威尔故技重施，把受信任的王权拥护者安置在关键职位。其中最重要的是代理人（deputy）一职，自1532年以来就被与诺福克公爵颇有联系的第九代基尔代尔伯爵（Earl of Kildare）占据。但伯爵在当年晚些时候因枪伤丧失行为能力，克伦威尔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开始培养基尔代尔的对手巴特勒家族（Butlers）和都柏林阿伦大主教（Archbishop Alen of Dublin），并在1533年9月把伯爵召回英格兰。克伦威尔很快用拥护自己管理方式的人取代了伯爵，并在都柏林议会安插自己的支持者。他还任命威廉·斯凯芬顿爵士（William Skeffington）为代理人。终于，在1534年5月底，爱尔兰普遍接受了王权至尊原则。

但这绝不意味着事件的结束。6月11日，基尔代尔的儿子托马斯·奥法利勋爵（Thomas Offaly，又称“温和的托马斯”）公然在议会抨击国王的政策，发动叛乱。克伦威尔再次采取了果断的行动。6月29日，他将基尔代尔投入伦敦塔，两个月后基尔代尔逝世。这刺激奥法利发动了全面叛乱。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杀害了阿伦大主教以及他的所有教士和侍从，因为他们试图于7月27日逃回英格兰。随后，叛乱者袭击了都柏林城堡。奥法利和他的同伙掌权长达一年，直至1535年8月24日投降。他被押送到伦敦并被直接投入伦敦塔。

有说法认为，从这时开始直到他被杀为止，克伦威尔都是爱尔兰的“实际统治者”。[23] 当然，国王看起来也同意委托他管理爱尔兰的事务。官员的任命、经济及其他与爱尔兰相关事务现在统归克伦威尔支配。他像在英格兰一样在爱尔兰运用王室权威，一丝不苟地留意细节，与在那里的委员们多次通信。[24]

随权力而至的是腐败。克伦威尔似乎在爱尔兰收受了比在其他地方

更多的贿赂。一位廷臣说他是国内“最大的受贿者”。[25] 据说，诺福克公爵的亲戚、富有且有影响力的巴特勒家族给了克伦威尔一大笔钱，希望能避免王室代理人搜查他们的城堡。这样的贪婪引发了爱尔兰境内对国王首席大臣的普遍不满。甚至有谣言称他将被暗杀。“掌玺大人一手造成了混乱和死亡，稍后他也差点丧命，最终只能勉强逃生。”乔治·波利特（George Paulet）如是说。“因为他的手段和教唆，所有国王的收入和收益都被他用邪恶的手段夺走了。”他估计亨利的收入至少是他前辈们的6倍，但是“都因掌玺大人的手段而被消耗、化为乌有了”。[26] 不过，国王显然乐见他的大臣从对爱尔兰事务的管理中获利，只要他能让爱尔兰听从王室支配，那么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付出寻求回报。

克伦威尔在威尔士面临相似的对王室权威的挑战，不过由于威尔士跟英格兰距离较近，事情多少更容易处理。尽管如此，那些紧守传统和特权的人仍强烈反对克伦威尔的新政。1534年他任命考文垂和利奇菲尔德的新任主教罗兰·李（Rowland Lee）为威尔士边境议会议长。李在进入教会前在剑桥学过法律，曾积极服侍枢机主教沃尔西。沃尔西失势后，他转到克伦威尔麾下，两人迅速成为朋友。作为国王的教士之一，李积极参与王室事务，是克伦威尔推进亨利跟凯瑟琳离婚重要的教会盟友。有传闻称他秘密主持了亨利跟安妮·博林的婚礼，不过没有记录佐证这一点。1533年他被派到北方各郡说服那里的教士会议支持国王离婚，并且协助审讯了伊丽莎白·巴顿和她的支持者们。

因此李不只证明了他对克伦威尔的忠诚，也证明了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监督威尔士改革的执行。作为议长，他接任了埃克塞特天主教主教约翰·维齐（John Veysey），后者失去了他的主教辖区。克伦威尔进一步增加了李的权限，让他逮捕那些利用边境领主独立司法权逃脱法律制裁的罪犯。李毫不迟疑地开始运用他的权力，很快因执法果断残酷而出名。人们称他为绞刑法官，威尔士编年史家伊利斯·格鲁福德（Elis

Gruffudd）说他在6年间处决了5000名罪犯。虽然这无疑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李的确受到相当强烈的敬畏，很快降服了桀骜的威尔士。

在1534年12月写给查理五世的一封信里，夏普伊因威尔士对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她女儿的忠诚而对其怀有同情，他在信中描述了李的管治在威尔士引起的普遍憎恨：“人们身受的痛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因不得不宣誓而焦虑，尤其是威尔士人，他们刚被国王通过议会废除本地法律、习俗和特权，这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我在想国王怎么敢在爱尔兰麻烦频发的情况下如此行事，除非上帝要他这样被蒙蔽。”[27]

虽然克伦威尔任命像李这样可靠的仆人担任重要的战略职位，但是他在执行新法时几乎不会放弃个人把控。其结果就是他一力承担了大量行政、文书和调查工作。克伦威尔的朋友斯蒂芬·沃恩在1534年年末写信给他，请他改革现有司法体系，这样他就不用“因接连不断的民事案件难题”[28]而劳心费力。而他能够在推进政府层面的改革之余腾出时间监督执法也体现了他的勤勉、完美主义乃至偏执。虽然身边都是有能力的仆从和顾问，但克伦威尔从未完全信任任何人。他已经见过太多人（包括他的前侍主）成为亨利宫廷危险、处处可见的阴谋的牺牲品，他必须谨小慎微。

在沃恩去信之后仅几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例证。虽然沃恩与克伦威尔之间关系密切，但这一关系仍然易受宫廷里迫切想让克伦威尔失去盟友的政敌的密谋攻击。他们激起二人之间的矛盾，让沃恩相信他的老朋友在玩弄他。当克伦威尔发觉之后，他立刻写信给沃恩，指责他对自己的忠诚如此缺乏信心。“从你的信里可以看出，你对我的友谊和我从前对你的友好存有如此大的疑心（对此我不禁感到惊异），我必须直白地告诉你，你在那个方面担心过了头……我一直都是你的好朋友，从未有任何表现或给你任何理由让你怀疑。”他坚持说：“你会确实地发现，我现在跟从前一样时刻准备为你服务，因此建议你除非真的有理由，不然

不要对你的朋友有类似的猜疑，但我向你保证你在我这里找不到也不会找到这样的理由。”克伦威尔还告诫沃恩以后要留意信中所写的内容，因为“远离宫廷，你给我写的信有可能会经由他人传到国王手中，我不在的时候他会拆阅”。[29]

经过这次沟通，克伦威尔与沃恩的关系似乎恢复了，但他们后来的通信都是在更加审慎的基础上进行的。克伦威尔无视朋友请他把重担移交给他人的请求，继续开展针对改革反对者的运动。据统计1532年到1540年间有883人被指控叛国，其中308人被处决。这些判决很大程度上拜克伦威尔对反对者孜孜不倦的处置所赐。亨利的长女玛丽在位5年便烧死283位新教徒，因此获得“血腥玛丽”的称号。克伦威尔的记录要更高，但是这会让人误解他统治的残暴程度。被处死的绝大多数人都参与公开反对国王的活动，或者像白金汉公爵一样受王室或者说宫廷政治的牵连。事实上，像玛格丽特·钱塞勒（Margaret Chanseler）那样在公开反对国王跟安妮·博林婚姻后仍被开释的案例也绝非罕见。在数以百计的因公开反对王权至尊被调查的人当中，只有63人被处罚。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但还不算是个暴政的年代。

---

[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Part ii，no.1089.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Part i，no.1112；Weir，*Six Wives of Henry VIII*，p.258.

[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Part i，no.809；Vol.VI，Part ii，no.1125.

[4]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295.

[5] Wyatt，T.，*Collected Poems*，ed. Daalder，J.（Oxford，1975），Collected Poems.

[6]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38.

[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I，p.451.

[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p.219-220；Part II，p.95.

[9]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I.ii，p.752.

[10]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I.ii，p.760.

[1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126.

[1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60-361，371.

[1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74.

[1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73-379.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287.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575.

[1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81.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s.1149，496.

[1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025.

[20] Bray，G.（ed.），*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1994），pp.113-114.

[2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89.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196.

[2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54.

[24] 例如可参见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80-82。

[25] *State Papers*，Vol.II，p.553n.

[26] *State Papers*，Vol.II，p.551n.

[2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155-6；*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

[28] Elton，G.R.，*Reform and Renewal：Thomas Cromwell and the Common Weal*（Cambridge，1973），p.45.

[2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43-44.

第九章 “良善的秘书大人”

1534年克伦威尔在宫廷势不可挡的攀升持续了一整年。“国王现在给他的荣誉和权力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夏普伊在当年向查理五世汇报说，“跟枢机主教的荣誉和权势一样大，此外每天他都会从国王那里得到赏赐。”[1] 克伦威尔已经证明了他作为首席秘书的能力，鉴于他对细节的关注和对繁重工作的巨大承受力，这个职位非常适合他。不论国王给他多少职务，他不把任何一个当作挂名差事。如果某个职位的工作太繁重，他会把职位连同薪水一起让给其他人。

这种勤勉让克伦威尔与亨利宫廷里的大多数人不同，他们为新头衔彼此竞争却没那么急于承担相应的职责。相比之下，克伦威尔府邸不断增加的文员、秘书和传信者确保每一份职务的工作都能以最高效率开展。大量的文档和书信透露出他对细节出了名的高度关注。克伦威尔认真对待每份职务（不论大小），这跟被大肆吹嘘的腐败、贪婪、只为个人利益驱动的官员形象形成有趣对比。连他的老对手夏普伊都不得不赞叹这位始终都在忙碌的官员的尽职尽责，他在给主人的一封信中提及克伦威尔“事务纷繁复杂”。在另一场合，这位大臣向他抱怨“给再多酬劳他也不会甘心乐意地承担自我们上次见面以来他接手的繁重工作”。[2]

克伦威尔利用他首席秘书的身份对王室财政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1534年他起草了《补贴法案》，第一次以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名义提高征税。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策划改革，以改善“公共福祉”。与克伦威尔其他的很多变革不同，这些社会改革是出于福音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想，而不是为了国王的经济利益。古文物学者约翰·斯托（他并不喜欢

克伦威尔）描述说“在慈善日益衰落的时代”，他经常看见克伦威尔在家门外每日两次为200个穷人提供“足量的面包、肉和饮料”。尤斯塔斯·夏普伊也说克伦威尔在自己的钱财使用上“非常慷慨”，一个名叫乔安娜·克雷克（Joanna Creke）的寡妇也因他“丰富的施舍”而称赞他。[3]

克伦威尔在一系列回忆录（或备忘录）中煞费苦心地写下了所有他希望与国王讨论的想法。那些依然留存的回忆录可以让我们一睹这位真正的全才引人注目的卓越、机敏的思想。他呈予（或者打算呈予）君主的很多计划是关于教育、贫穷救济、贸易、工业、农工业和民法的改革提议。并非所有的提议都得到了成功实施，但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政策确保了克伦威尔作为英格兰历史上一位最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家的地位。

克伦威尔惊人生产力的一个表现是他上位期间通过的法规的绝对数量。他的文件里充斥着计划向议会引介的法案草案，他的备忘录里还有更多。在1509年到1531年间召开的9届议会通过了203项法案。相比之下，在1532年到1540年间，亦即克伦威尔权力的鼎盛时期召开的8届议会通过了333项法案。立法的篇幅同样值得注意。克伦威尔未上位以前，亨利在位22年间共起草了416页法规——克伦威尔几乎在仅8年内就几乎达到了这个数字（409页）。[4] 所有克伦威尔起草的法规在细节上非同寻常，有数百页之多，这揭示了他在法律事务上的严谨，以及每条法规内容的立法意义。

1534年9月，一位十分出人意料的访客到达英格兰宫廷，这暂时分散了克伦威尔在多件国事上的注意力。她就是玛丽·博林，王后的姐姐。玛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确实，自她1532年年末陪安妮到法国之后，几乎就没有她的消息了。她的到来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她离开宫廷的时候还是一个孀妇，回来时显然已经怀孕。不过，她所怀的不是私生子，因为玛丽承认她已经秘密地嫁给了地位低贱的威廉·斯

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安妮震怒，立刻把她赶出了宫廷。此时的她没有心思被姐姐羞辱，因为那年夏天她已经遭受了一场流产（也可能是怀上了死胎），同时还因她的丈夫新找了一个被称为“帝国夫人”的情妇而受到嘲讽，这位“帝国夫人”公开支持阿拉贡的凯瑟琳及其女儿玛丽。

安妮斩钉截铁地做出反应。她拒绝见姐姐或者跟她说话，并且说服国王不要取消放逐的命令。陷入绝望的玛丽写信给克伦威尔，请他向妹妹和国王求情，说自己是一个“被放逐的可怜人”，她哀叹：“我相信您并非不知道我和他惹得国王陛下和王后非常不快，因为我们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成婚。”她继续哀求说，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爱而不是恶意。“良善的秘书大人，试想一下，他年轻，爱战胜了理智；至于我，我在他身上看到如此的忠诚，我爱他如他爱我一般……尽管我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出身更好、身份更高的人，但是我向您保证我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爱我、比他更忠诚的人。”让克伦威尔知道她丈夫的个人品格弥补了他出身卑微这一事实，或许是她赢得克伦威尔同情的一个尝试：暗含的对他本人的恭维显而易见。

玛丽的信足以表明克伦威尔在宫廷的影响力已大到何种程度。由于国王和王后不听她的请求，克伦威尔成了她重返宫廷的最可靠途径。她提到了克伦威尔帮助过的其他很多人，恳请他“施恩于我们，像您施恩于我们之外的所有世人一样”。玛丽继续说：

> 良善的秘书大人，这是我对您的恳请，看在我清楚地明白您对我家族的敬爱的份上……代我们向国王求情，恳请一直不愿怜悯的陛下，怜悯我们；并且，如果仁慈的陛下愿意，请他在王后那儿为我们说话；因为，在我看来，王后对我们极其不满，如果国王不施恩于我们，收回他的严苛并为我们说情，我们不可能重得王后的偏爱：这太过沉重，我们难以承受。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了，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帮帮我们吧。

尽管她为安妮的不依不饶深感痛苦，两姐妹之间显然存有敌意，因

为玛丽忍不住又加了一句："我宁愿跟他（斯塔福德）一起乞讨也不愿做基督教王国最伟大的王后。"

虽然玛丽准确判断出如果有人能够帮她摆脱困境，那个人一定是克伦威尔，但她显然已不再熟悉宫廷政治，因为她还请他说服诺福克公爵和自己的弟弟罗什弗德侯爵（Lord Rochford）恩待她，因为"他们对我们如此冷酷"。[5] 在这个时候，克伦威尔是最不愿意说服诺福克做任何事的那个人，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得到罗什弗德的友谊或者信任。确实，玛丽误判了克伦威尔愿意为她的利益而努力的程度。他跟王后的联盟是脆弱的，参与一件已经让她极其恼火、难堪的事情会让他成为后者永远的敌人。国王也不想让他的旧情妇返回宫廷——新情妇和一份给他带来的痛苦多过欢愉的婚姻占据了他非常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势下，如果不是为了朋友的利益，克伦威尔是不会接下这样一个既不讨好又有潜在风险的任务的。玛丽离开宫廷前可能已与他结识，但她算不上是克伦威尔的密友之一。即使克伦威尔回复了她，他的回信也没有留存下来。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因被感动而采取了任何行动，玛丽不得不远离宫廷。[6]

大约在玛丽·博林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克伦威尔有机会遇到了另一个旧识，这个人整体上更受欢迎。根据当时意大利的小说家马泰奥·班戴洛所言，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费雷斯科巴尔迪在1533年到153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来到英国，收取别人欠他的一些债款。这表明他也已陷入窘境，不得不走这一程。据说克伦威尔骑马进宫的时候在街上认出了他的旧主，"他突然下马（令所有侍从不解），上前极为热情地拥抱了他；并勉强忍住眼泪，问那人是不是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费雷斯科巴尔迪；是的，先生（他说），我是您卑微的仆人，'我的仆人（指克伦威尔），不，您从未做过我的仆人，我只把你看作我特别的朋友'"。[7] 克伦威尔急忙把他带到奥斯丁会，请他吃晚餐，并毫不迟疑地下令追查费雷斯科巴尔迪的债务人。克伦威尔召来一名仆人，告诉

他："看这份账单记录的是哪些人，找到他们所有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在英格兰，让他们知道，除非在15天内偿还全部债务，否则我会着手此事，让他们受到伤害和不快，所以让他们把我当作债主。"[8] 几天内所有的债款就被偿还，克伦威尔的权势也可见一斑。弗朗切斯科得以带着一大笔钱返回意大利，其中有从他债务人那儿收来的，也有从他的前门徒那儿得来的，克伦威尔坚持要给他1600杜卡特，外加36杜卡特以作为对费雷斯科巴尔迪多年前在佛罗伦萨给他的那些钱财、衣物和马匹的回报。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虽然未经证实，但说明了克伦威尔对前侍主们强烈的忠诚。他从不忘记老朋友或者那些善待过他的人，无论他们如何卑微或者没落。

克伦威尔对费雷斯科巴尔迪的善待可能也出于他对意大利经久不衰的感情。一些年以后，当威尼斯人寻求更新他们从英格兰进口羊毛的许可时，威尼斯的总督和参议员叮嘱他们的大使要接近"高贵的克伦威尔"，因为他们"相信这位秘书会轻易获得他们想要的"。[9] 班戴洛后来若有所思地说："如果他爱英格兰贵族像爱外国人一样，或许他也不至于死于非命。"[10]

不过克伦威尔的忠诚并不只留给意大利的旧交。1529年，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沃恩因为宗教争端与商人冒险家公司发生了冲突。公司的管理者把他拖到伦敦主教面前指控他为异端。当时，克伦威尔没办法帮助他的朋友，因为随着沃尔西的失势他一直在挣扎求生，但是他刚在宫廷得势，就确保这些指控被撤销、沃恩能够重建他的事业。克伦威尔随后为沃恩和他的新婚妻子购置了伦敦肖迪奇（Shoreditch）圣玛丽医院的小修道院，并给后者在安妮·博林宫中谋得了一个丝织女工的职位。他持续关注沃恩的福祉，在得知国王欠他一年的俸禄后，他写信给奥德利措辞强烈地要求支付其酬劳。[11]

1534年10月，克伦威尔被任命为卷宗主事官（Master of the

Rous），这是英格兰级别最高的司法职位之一。这一职位还为克伦威尔带来了一栋宏伟的古老府邸，即位于大法官巷（Chancery Lane）的卷宗主事官府。1233年，亨利三世在那里为改变信仰的犹太人修建了一座加尔都西会修道院。爱德华三世在1377年将这座修道院作为新设的卷宗主事官（Custos Rotulorum）的附属建筑。主事官负责存放大法官法庭的记录（又称为“案卷”），大法官法庭对所有衡平法事务都有司法权，比民事法庭的管辖范围要大得多。自14世纪末受理个人案件之后，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大法官法庭的庭审次数翻了两番。卷宗主事官通常由神父（往往是国王的御用牧师）担任。克伦威尔是首批任该职的世俗人士之一。

克伦威尔的通信记录显示他经常在卷宗主事官府。很快，一大批访客聚集在外，令府邸水泄不通。1536年7月，他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弗农——曾任小马洛女修道院院长、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的监护人——写信抱怨道：“我经常到您的卷宗主事官府想要跟您谈话，但是因为有大批求见的人而我在府邸又没有门路，所以不能进前来与您见面。”[12]克伦威尔实质上为自己设立了一个专属的议事厅，里面满是请他帮忙的人、政治要人、大使和使臣。集中在他府邸的权力与恩惠几乎跟在亨利的宫廷一样大。乔治·卡文迪什在一首关于克伦威尔的诗中，以后者的口吻抱怨道，自从晋升之后“随之而来的求助者像密密麻麻的蜜蜂一样”。[13]

获得卷宗主事官府缓解了克伦威尔的庞大家庭日益严峻的住宿问题，他立即将一些仆人调到这里。[14] 但他还需要更大的空间。他已经买下了一座名叫大宅的新宅邸，紧邻坐落在伦敦东边斯特普尼格林（Stepney Green）的圣邓斯坦教堂。1535年之前的某段时间，克伦威尔可能将大宅租给了他的外甥理查德·克伦威尔，也可能在附近给他买了栋新房子。他此时又在哈克尼（Hackney）买了一栋房子并开始了一系列装修。“我看了您在哈克尼的房子，”1535年他的代理人托马斯·克罗

克（Thomas Croke）写信说，“厨房都完成了，只差铺地，干、湿储藏室以及花园水池的加注进展顺利。”之后不久，那年9月，他的另一个代理人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汇报说：“您在哈克尼的房子已经竣工，只差还在动工的花园。”从托马斯·撒克同一天呈上的一份报告可以一窥克伦威尔房产开发的规模，以及每栋房子委托修缮的情况。

> 您的卷宗主事官府和在奥斯丁会、哈克尼、斯特普尼的房子状况良好。（最后一处房子）从房间到门廊的楼梯已经修好，加了一扇窗户，房子的厕所也建得非常好。您在哈克尼的房屋修建工程还在进展中，带烟囱的厨房砖已经砌到房顶，房顶盖好并铺上了瓦；扩大的食品储藏室和碗碟洗涤室也已经拔地而起。它们的屋顶正在快速成型；你的房间修有窗户、配有玻璃和挂饰——在我看来是一个漂亮的地方。[15]

除了在伦敦的宅邸之外，克伦威尔在乡村也修了房子——虽然坐落在萨里郡的犹赫斯特（Ewhurst），但离都城也不太远。一向警觉的撒克在近期察看克伦威尔房子的时候也没有忘掉这里：“上周日我去了犹赫斯特，在那里看到了相当好的框架。两层的大厅和厅顶已经盖好，有些东西必须要从泰晤士河岸边运到犹赫斯特。因为正是运干草和收获的时节，所以马车稀少。但是犹赫斯特的教区神父说下周就有手推车供我们使用。”[16] 克伦威尔又对这栋房子进行了大修缮，因为他往那里运了不少于600推车的砖。他在温布尔顿庄园也有地产，那里离他的出生地很近。1534年起，他从国王手里租下了旺兹沃思（Wandsworth）的奥尔法辛庄园，5年后他从萨福克公爵手里买下了附近的邓斯福德庄园。除了这些之外，克伦威尔在莫特莱克（Mortlake）也有一座宅邸。他的姻亲和家佣都住在这里和奥斯丁会。其他房产里住满了文员、秘书和其他仆人。

除了房产之外，克伦威尔还持有相当多的地产。他在16世纪30年代逐步积累了很多修道院地产和王室赠地。大多数土地都集中在埃塞克斯、肯特和苏塞克斯，30年代末克伦威尔已成为这些郡最大的地主。同

时，他的地产遍布西至康沃尔北到林肯郡的广大地区。1535年他的账目显示所有地产的年总收入共计417英镑（约合现在的13万英镑），不过现代土地和房子价格的快速上涨意味着按实值计算，这些土地如今要值钱得多。此外，克伦威尔的土地购入在30年代后半期急剧增长，那时他似乎已不只把土地兼并当作对其他生意收入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他的相关收入因此有了相应的增加。[17]

得益于他不断扩大的房产组合（遑论他在宫殿中分得的住处），克伦威尔过着流动的生活。从写信的地点来看，他没有在犹赫斯特或哈克尼呆太多时间，因为大多数信件都落款是奥斯丁会、卷宗主事官府和斯特普尼。因此，16世纪30年代中期，克伦威尔持有的房产数量非常可观，跟一个有如此地位和影响力的廷臣相衬。他的代理人们紧盯着每座宅邸的花销，这说明它们远非奢华招摇的宅邸，不像他的旧主沃尔西的宅邸那样，里面填满了克伦威尔几乎不会享用——并且有被偷风险的无价珠宝。这些房产都经过精挑细选，实用且建筑精良，它们无疑是为了供克伦威尔最后从宫廷卸任后使用——尽管这并不是说他有任何从宫廷卸任的迹象。这些房产也是为了安置他日益增加的仆人，不过克伦威尔十分节俭，他区分了哪些仆人是需要一直跟着他的，哪些是可以住在自己家里的。虽然他的秘书拉尔夫·萨德勒大部分时间住在克伦威尔的宅邸，但是他自己也在哈克尼修建了一座漂亮的房子——萨顿大宅——以安顿他庞大的家族。这座宅邸存留至今。

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另一位年轻门徒也回到他的门下并在那里找到了位置。托马斯·艾弗里完成了他在埃克塞特女侯爵宅邸的进修。1535年9月，他被雇佣为克伦威尔的私人金库管理者，或者说私财主管（purse-keeper），其职责包括管理克伦威尔府邸开销以及给仆人发钱。虽然这个职位的政治重要性不如萨德勒的职位，但因为定期会有大量钱财经手，依旧责任重大。[18]

除了家仆之外，克伦威尔也希望自己在各处住所都能为最好的知识分子和宗教改革派人士所环绕。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ison）、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等人的在场让他的宅邸成了一座策动革新与进步的熔炉。“他总是把那些能够推动、帮助同一（信仰）的人留在身边，”福克斯说，“这拨人各具独特而新颖的才智，他们附属于他的家庭，正是凭借他们的勤勉和创造性的努力，各种各样的抵制教宗和天主教崇拜的杰出的叙事诗歌和书籍才被创作出来并传到国外。”[19] 在这一期间，斯塔基回忆了他与其他门客在克伦威尔的晚宴上进行的“关于上帝、自然和其他政治和世俗事务”的讨论。律师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认同“我确实在宴会和晚餐上听过这种讨论，正是这些讨论让我开始转信福音派”。[20]

那些有幸受邀在奥斯丁会、斯特普尼或者克伦威尔在伦敦的其他宅邸赴宴的人肯定会享用一场丰盛的宴席。除了都铎宫廷偏爱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各样的肉类和鱼类，比如鹿肉、野鸡肉、阉鸡肉、天鹅肉、兔肉、牛肉、鳕鱼、牡蛎和鸟蛤之外，克伦威尔的厨师还会利用异国的美味，比如姜、肉豆蔻、无花果、橙子和杏仁膏。由汉普顿宫的王室菜园供给的洋蓟显然尤受喜爱，同样由王室菜园供给的还有豆类、樱桃、柑橘、醋栗和苹果。好甜口的门客会享用到王室厨房的甜馅饼或者“比格斯夫人”的布丁。与上述食物搭配的是来自王室酒窖的大量葡萄酒。1537年6月，克伦威尔向为他供货的国王酒窖“看管者”希尔先生支付了400英镑（相当于现代的12万英镑以上）。[21]

克伦威尔的社交往往具有严肃的目的，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所谓的休闲时间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正事上。不过他依旧喜欢在晚上放鹰捕猎，并经常邀请夏普伊到这种场合，这样他们可以边看鹰追捕他们的猎物边讨论国事。他的马厩养了约100匹马，尽管他选择骑驴到宫廷——像他的旧主沃尔西一样。他显然喜欢鸟，因为后来他在宅邸里养了“一笼金丝雀”。他还养了多条灵缇。另外，更加不同寻常的是，他的账单

上也列有动物。他曾收到一头来自吕贝克的麋鹿，以及四只来自但泽的活海狸。1539年7月，他花了19先令给他的一个不知为何物的“奇异野兽”买了个天鹅绒项圈，这个“奇异野兽”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国王。[22]

克伦威尔的账单同样也揭示了他喜欢赌博，尤其是用骰子赌博，并且经常会输掉一大笔钱。比如，从1537年到1539年，他输钱的总额几乎达到了现在的5万英镑。他也在玩牌时赌博，他的牌友包括威廉·波利特爵士，理查德·里奇（Richard Rich）爵士和伦敦市长。此外，克伦威尔还会定期跟沉迷于这类消遣的国王打牌，并且输了很多次，也输了好多钱（或许是有意为之）。[23]

热衷于提供一个廷臣兼东道主所能提供的所有消遣以满足旁人期待的克伦威尔还在府上雇了一个小丑。他可能是在一次对受雇于国王并深受喜爱的弄臣威尔·萨默斯（Will Somers）的拜访中得到了启发。克伦威尔费了很大周折去寻找跟萨默斯有同样才艺的小丑。1538年11月，他派了一个仆人去加来迎接“小丑安东尼”。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在“安东尼外套的铃铛”上花了34先令6便士，这之后又过了几个月，他委托一个制袜者做一些袜子，想必是与小丑形象相配的鲜艳颜色。[24]

克伦威尔显然有招待的天分，因为他有时会奉命安排君主非常喜爱的奢华的宫廷假面剧，虽然通常由他自掏腰包，但他从不在任何一个细节上节省。在一次尤其豪华的表演中，意大利工匠乔瓦尼·波尔蒂纳里（Giovanni Portinari）受命布景，花费超过25英镑（约合现在的8000英镑），他又付给一位女帽制造商近11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600英镑）的佣金以“制造《亚瑟王的骑士们》这部假面剧所需的道具”，克伦威尔的朋友斯蒂芬·沃恩的妻子用最好的丝绸制作了一些戏服。克伦威尔自己至少参与了其中一部假面剧：1537年1月一位裁缝收到约合4000英镑的酬劳，为“假面剧中大人的角色”[25]制作戏服。遗憾的是，账单没有提供更多关于戏服或者克伦威尔所扮演角色的细节。但是他带着显而易见

的热情参与这类琐事，这一事实与看似一本正经的官僚形象相矛盾。

1534年年末，克伦威尔的权势之盛人尽皆知。他不仅掌管内政和宗教事务，也影响国王对外政策的决定。在这一点上，他像在所有其他事务上一样务实，不过他的总体思路是不让国王陷入花费巨大的海外军事行动。虽然他谨慎地与所有外来势力周旋，不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结盟或者对抗，但他策划了国王跟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以及与罗马的决裂，这一事实让他与凯瑟琳的外甥查理五世的对立成为定局，这进而引起了他会跟查理皇帝的死对头法国结盟的猜测。1534年12月夏普伊汇报说："有人告知我，克伦威尔自海军大臣（诺福克）离开后，跟亲近的人吹嘘说他已开始编织一张陛下您一整年之内都无法从中脱身的包围网。我听说法国大使近来也更加公开地提及此事，并且以典型的法国佬嘴脸说，陛下在为法王造成诸多损失之后，终于要通过促使英法联姻来为之前的那些过错补偿了，之前法王曾被豪夺的一切都将被讨回。" [26]

与此同时，亨利跟罗马教宗的关系看似有所改善，这主要得益于1534年10月克雷芒七世的逝世以及其继任者保禄三世更加圆润的立场，克伦威尔迅速利用了这个喜闻乐见的进展。1535年4月他写信给一个在罗马的使臣，重申亨利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的公正。他说，这是建立"在事实和真理基础上的"。国王因此"放下了他由此而来的（像一个善良的、有美德的天主教君主一样）对上帝和世人所负之良心上的重担"。克伦威尔跟他的君主一样，乐见"上述罗马主教现在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上述案件的公正和公平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王"。但是私下表达对亨利困境的同情是不够的：克伦威尔敦促教宗"通过公开的证言向世界展示他对这件最公正、最正义的事件的感受"。[27] 虽然他的书信强硬而自信，但是克伦威尔意识到，实现这一目标要比写一封书信难得多。

---

[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294.

[2]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V，Part II.ii，p.841；Vol.V，Part I，pp.465-466.

[3]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ed. Morley，H.（Stroud，1994），p.34；*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69；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268.

[4] Elton，*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Vol.II，p.225.

[5]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p.203-205.

[6] 安妮最终原谅了玛丽，后者在1536年安妮最后一次不幸的妊娠期间照料她。

[7] Anon.，*Life of Thomas Lord Cromwell*，p.18. Bandello：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111提供了类似的描述。

[8]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p.113-114.

[9]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82.

[10]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114.

[1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62.

[12] 在*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108. NB中，这封信的日期被误引为1535年1月26日，但后来已被证实是1536年7月1日。Erler，M.C.，*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the Dissolution*：*Monks*，*Friars*，*and Nuns 1530-1558*（Cambridge，2013），p.99n.

[13] Cavendish，*Metrical Visions*，Vol.II，p.52.

[14] 甚至在1536年7月克伦威尔珠宝大臣的职位被克里斯托弗·黑尔斯取代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留在那里。Robertson，M.L.，‘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The Ministerial

Household i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75）.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s.272，339，340.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340.

[17] 罗伯森提供了对克伦威尔所拥有的地产和房产的出色分析，见‘Proft and Purpo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mas Cromwell’s Landed Estates’，pp.317-346。

[18] 例如，1538年8月，他帮助安排将温布尔顿、帕特尼和罗汉普顿的一大片地产授予沃尔特·威廉斯。后者被认为是克伦威尔的外甥，但也可能是他姐姐凯瑟琳的小叔子。*History of Parliament online* .

[19]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54.

[20] Williams，N.，*The Cardinal and the Secretary*（London，1975），p.150.

[2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450；Vol.XIV，Part ii，nos.85，782；Robertson，M.L.，‘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The Ministerial Household i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75），pp.102-103.

[2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2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2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

[2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402-405.

第十章 解散

克伦威尔可谓大器晚成。1535年他已经接近50岁了——在那个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时代，大多数人在这个年纪都过着久坐不动的生活，或者已经逝世。[1] 因此，克伦威尔比宫廷和枢密院的同僚都年长。但等待是值得的，经过前些年的苦心经营，并在同时始终留意维持他的私人生意盈利以作为保障，克伦威尔显然为取得更大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从克伦威尔早年参军的经历和经常出现的出行狩猎记录中可以看出他身体健壮，但是自16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健康开始衰退。根据班戴洛所言，克伦威尔一直“坚持忍受着身体的所有疲惫”，但是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迅速恢复了。[2] 克伦威尔的年龄与长时间面对法律卷宗的伏案工作无疑导致了视力的下降。克伦威尔的账单证实，刚满5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戴眼镜。更加严重的不适接踵而至。1535年3月，夏普伊记录说他原本应拜访这位秘书，但“听说他比头一天状况要差，因此不能见任何人”。克伦威尔得了“感冒，脸颊和眼睛也跟着肿了起来”。向来多疑的夏普伊认为这种“轻微的不适”是“某种花招”，但是一个月后克伦威尔的病情加重以至于无法入宫，国王亲自来家里探望他。虽然他声称这“能够驱散他尚存的病痛”，但直到4月底他的身体才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程度。5月5日，夏普伊汇报说，这是克伦威尔自生病以来唯一一次入宫。[3]

这期间，克伦威尔在公务上毫不松懈。1535年1月21日，亨利任命他为教会事务代理人（Viceregent in Spirituals），又称作代理总教监

（Vicar General），这赋予他在教会事务上相当大的新权力。国王认识到他的首席秘书是怎样成功地监控并在必要时清除公众对他至尊王权的反对，迫切地想把这种强制扩展到神职人员身上。即便如此，这位大臣推行的改革规模也超出了他的预想。这项任命开启了一场触动英格兰核心的革命。

克伦威尔展开了全面攻势，在所有交往中，包括跟英格兰最高级的神职人员打交道时都自负得令人不快。正如夏普伊在1535年年初汇报的那样："克伦威尔一直在骚扰主教们，甚至包括温彻斯特主教以及其他忠心的主教，他最近把他们召至枢密院，问他们国王能否任意任命或撤销主教，他们不得不说'是'，否则会失去他们的礼遇。"大使又说克伦威尔向他的一位线人吹嘘"召集枢密院就是为了让主教们上钩"。[4]

16世纪30年代初期，随着克伦威尔事业的发展，他对出身高贵的对手的态度发生了逐步但明显的转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诺福克和加德纳。克伦威尔刚开始得到亨利重用的时候，对对手态度谨慎克制，甚至有些冷淡，这在不谙内情的人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对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不情不愿的尊重。但随着他越来越得国王的倚重，克伦威尔对自己权力的信心也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态度转变成公开的敌意甚至轻蔑。克伦威尔的社会地位或许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他的政治地位高于他们，且他决心让这些对手们认清这一点。

克伦威尔在1535年里化解其主要对手制造的威胁的手法，既证明了他的自信，又证明了他能熟练地通过谈判处理宫廷中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他智胜对手的其中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屡次用各种内政和外交差遣把他们从宫廷里支走。接近国王是权力和影响力至关重要的前提。一旦不能接近国王，一个有再多头衔、享有再多特权的人也必然更容易陷入敌人的阴谋，他们只要伺机向国王进献谗言就能让其所受的宠信遭到削弱。这也是为什么克伦威尔要保证自己几乎总是在君主身边。他甚至设

法在宫廷得到了一套房间，这样一来“亨利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室内通道来找他，不被人看见”。[5] 此外，克伦威尔在国内外建立了一张强大的线人与间谍网络，他可以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并持续获得消息。这张非常有价值的代理网络让他能够维持在宫廷的地位。如果有生意上的事务要求他暂时离开，克伦威尔必须保证自己可以在几天之内回到国王身边。

同时，克伦威尔成功地将他的主要敌人赶出了宫廷，其中一个人遭到了永久的驱逐。他首先拿诺福克开刀。夏普伊两年前就已经看到，克伦威尔巨大的影响力激怒了诺福克，令他宁愿称病也不去宫廷。1535年春天，诺福克终于退出政坛并在肯宁霍尔[6] 的庄园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显然不打算屈居于一个出身卑微的暴发户之下，可能也需要时间筹谋反击。

诺福克的缺席严重削弱了他的主要盟友的地位，在1534年4月当斯蒂芬·加德纳被命令卸任秘书一职，并被克伦威尔接替的时候，他对克伦威尔的反感加深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屈辱，从那天起这位高级教士就决心报复。不过，他跟克伦威尔的通信不露一丝痕迹：嫉妒和憎恶被顺从和赞赏的表现遮盖。1534年7月他写信给新的“秘书大人……我特别的朋友”，用“最真心的称赞”让他确信：“经您妥善的处理，我遗留下来的冗务与难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我看来如此成功、令人欣喜，而您的友善又一向如此坚定、可靠，以至于在这些让我心生疑虑和困惑的事上，我总认为您是最适合的，也非常相信您已经完全准备好，像对待其他类似的事务一样，为我找到解决的方法。”[7]

两个人很快抛开了这种殷勤的伪装。此时他们之间的敌意在宫廷已是人尽皆知。“两人之间一直都有竞争以及难以调和的分歧，就像……狼和羊一样，”约翰·福克斯说，“因为两人都极受国王倚重，一个更多的是敬重（加德纳），而另一个更多的是垂爱（克伦威尔）。二人都非

常机敏、睿智，不过，其中一个在美德上要远胜于另一个。”[8]

克伦威尔看似非常喜欢当着其他廷臣的面嘲弄乃至欺侮加德纳。这位高级教士后来回忆起自己曾被召至汉普顿宫参与一场争辩，讨论是不是应该把国王的“意志和偏好”当作法律对待，克伦威尔坚持认为是。“‘来吧，我的温彻斯特大人’，（克伦威尔）说，……‘回答国王……坦白直接地说，不要畏缩，伙计！’”因被如此羞辱而暴怒，加德纳没有回答克伦威尔而是直接回禀国王本人，给出一个他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回答。“国王转过身去对此事置之不理，直到克伦威尔大人突然当众变卦，又对我大为光火，仿佛之前种种（克伦威尔令国王感到厌倦的言行）出自我手一般。”[9] 又一次，在加德纳指控他侵害了自己的利益时，克伦威尔佯作失望状，并如此斥责道：“你提到的那封信件没有得到善意的解读，我认为我对你的善举不应该被这么对待。”克伦威尔还对加德纳声称：“认为我宁愿亲自处理此事是你的幻想。”[10]

虽然克伦威尔看似处于上风，但他知道加德纳是一个危险的对手，尤其是在他跟诺福克这样的人联手的时候。因此他策划让主教离开宫廷，作为大使派驻法国。1535年10月，加德纳接受了这个任命并在那里待了三年，这使克伦威尔能够在牺牲对手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对此福克斯欣喜地评述道：“虽然他（克伦威尔）只是国王的首席顾问，但随后他给……温切斯特主教本人下达了一道命令，通过令人惊异的深谋远虑挫败并阻止了后者的所有阴谋和谗言，尤其是那些意图陷害、毁灭良善之人与支持福音之人的计划，克伦威尔总是保护他们不受温彻斯特的阴谋所害。”[11] 后来诺福克和加德纳都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对手克伦威尔正稳居上风。

作为代理总教监，克伦威尔受命组织了两次彻底的巡查：一次是巡查王国所有的教会、修道院和神职人员，另一次只巡查修道院。他细心遴选出一些值得信赖的人，委派他们去王国各个宗教场所，指示他们评

估那里的宗教生活质量。克伦威尔特别鼓励他们上报自己看到的任何滥用权力、腐败、不道德或“迷信的”行为。他们发现了很多需要上报的问题。

英格兰600多所修道院社区中的大部分始建于11～12世纪，当时修道院热潮席卷整个西欧。到克伦威尔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上的时候，它们已经在整个王国的乡村和城镇社区生活中起重要作用长达500年之久。修道院的作用已经大为扩展，远不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它们是著名的学术和文化中心，为生病的人提供医疗帮助，接济穷困者，为成百上千的平信徒提供工作岗位。最重要的是，它们是王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其持有的房产和地产规模远超国王本人。也正是这一事实吸引了克伦威尔的注意。

除某些显著的个例之外，大多数修道院在这一时期可能已堕落多年了。它们“充斥着世俗欲望且因循守旧”，几乎已经不再发挥原有的宗教、社会和经济功能。[12] 它们旧有的知识活力已经下降，慈善作用微不足道，现在鲜少有人依照宗教教导将遗产指赠给需要的人。相当一批修道士并没有严格遵守他们的誓言，恶习和贪腐在很多场所都司空见惯。福克斯斥责他们为“懒惰、闲散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追随者”[13] 是有一些道理的。虽然仍有不少真心虔信、克己敬神的案例（尤其在修会会士当中）可与修道院总体上的堕落互为对照，但是确实存在的滥用权力的证据已足以刺激克伦威尔推行改革。

1535年4月，克伦威尔以一种谨慎的姿态开始了改革，这掩饰了他的攻势即将快速上升的强度。鉴于大主教克兰默也在进行一次巡查，克伦威尔转而以国王的名义写信给每个郡的主教、贵族和治安官，指示他们将任何“用污秽、堕落的恶习诱惑罗马主教或者他的门徒或追随者”的神职人员逮捕收监。他还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称自己是“国王的眼睛”，任务就是“预见并及时纠正这种逾矩行为……如若不然，只要稍加

纵容他的王国里就会滋生更多的恶行，若彼时再来费心整顿也为时已晚”。[14]

这些加盖了国王御玺和克伦威尔印章的信件体现了他的影响力之大，以及他的权力有多么被人所畏惧。卡文迪什把他描绘成一位“滥用职权和拥有特长”的人。6月3日驻英格兰的威尼斯大使不以为然地说，虽然“这个克伦威尔是一个出身卑微、身份低下的人；但他现在是国务大臣，国王最重要的大臣，有至高的权威”。[15] 同日，克伦威尔给王国的每一位主教发了一封通知信，命令他们布道拥护至高王权并确保他们辖区的神职人员也如此行事。

但是克伦威尔知道，即便其执行得到了严密监督，这样的信也缺少足以慑服神职人员的影响力。他必须更鲜明——因而也是更具威慑性地展示亨利政权的力量。信件发出仅几周后，他就组织了一系列处决，惩罚那些仍然忠于教宗的神职人员以示警诫。1535年5月4日三位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传道士、一位博学的修道士和艾尔沃思教区的代牧在泰伯恩刑场被处决。之后不久，另外三位修道会成员——霍顿（Houghton）、黑尔（Hale）和雷诺兹（Reynolds）——被拖上了法庭。法官已经准备要无罪释放他们，但是或许在克伦威尔的压力下，他们被判有罪。这些人在反抗时直言不讳。黑尔骂国王是一个“暴君”，并且告诉他的指控者：“如果你们仔细察看他的生活，你们会发现他比一头在肮脏的地里打滚、弄得满身污秽的母猪更加不堪、令人作呕。”雷诺兹也在同时大胆地告诉克伦威尔，王国中所有像他们一样“虔诚的人”都相信，国王没有权力称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克伦威尔决心惩罚这种公开的反抗，力求将这三个人处以最令人丧胆的死刑。他们身穿修士服被带到泰伯伦并被“用粗绳”绞死，然后在意识尚存的时候被取出内脏，最终被砍头、分尸。在这种折磨之上变本加厉的是，克伦威尔命令“一个人在死前要看到另一个人遭受全部的刑罚”。不过，一位目击人说：“他们的脸色或者语气没有变化，行刑过程中他们坚持讲道并大胆劝告旁观者要多

行善举，并且在不辱于上帝和教会荣誉的一切事务上服从国王。”[16]

他们的坚定不移表明针对克伦威尔改革的反感情绪十分强烈，这对克伦威尔是一个警告。但是首席大臣选择忽略这一警告。相反，他进一步加强了对所有胆敢出言反对新政之人的迫害。他的密探无孔不入。1535年的宫廷记录收录了很多普通人因对君主出言不逊而被曲解成叛国的案例。曾有人举报伍斯特郡一位80岁的农夫因一连串的坏天气怪罪国王，说这都是因他的“事儿”而起——不过报告中没有写明“事儿”的具体所指。这些轻微过失招来的惩罚之重令人发指。如果当局认为这些话是煽动性的，犯罪者会被处死。因为害怕遭到严惩，亨利的臣民不再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即便他们没有打算付诸实践。

克伦威尔承认，对包括社会最低层在内的个人生活的密切关注，以及对任何有叛逆倾向之私语的惩罚，都是“让国王的臣民和其他人处于更大的恐慌与畏惧之中”的一种手段。他这时的政策就是通过威逼而非劝说令人屈从。福克斯讲述了克伦威尔某次遇见一位修道士的情景，尽管修道士所在的修道院已经被取缔，他仍身穿蒙头斗篷。“你的蒙头斗篷不应该脱掉吗？”克伦威尔要求说：“如果我听说，到1点的时候你的衣服还没有换，我会马上对你施以绞刑。”惊慌失措的修道士立刻默然顺从。这个故事或许有夸张或捏造的成分，但是它反映出克伦威尔已经拥有了令人恐惧的名声，且这一名声所及的范围不只局限在宗教事务。据说一群恶棍听说他和他的随从正在接近，便惊慌失措地四散开来。[17]

尽管他的威逼（不论是真的还是虚构的）和小的惩戒在震慑民众时颇具成效，但是克伦威尔还需要一个地位更为崇高的案例以儆效尤。约翰·费舍已经在伦敦塔受折磨一年有余，这期间他被施加了巨大压力，要他承认或否认国王作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最终表示否认，而根据克伦威尔的新法案，这构成了最严重的叛国罪。费舍依程序被审判、定罪、判处死刑。这位亨利时代的忠臣沦落至此，十分令人震

惊。时年66岁的费舍自被亨利八世虔诚的祖母玛格丽特·博福特女勋爵（Lady Margaret Beaufort）注意到之后就开始服侍都铎家族，他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神职人员，是传统信仰的有力象征。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最终被判叛国。6月22日他被押送到塔丘（Tower Hill），在惊骇而沉默的人群面前被处决。

虽然令人震惊，但是费舍的死很快因另一位显要的传统信仰拥护者的处决而黯然失色。跟费舍一样，托马斯·莫尔自1534年4月被捕以来一直被关在伦敦塔。只要他还在那里公然抵抗国王的命令，他就是反对王权至高原则和国王离婚一事之人的名义领袖，这对当政者而言危险且难堪。当政者当然可以用暴力制止他的反抗，但是处决莫尔会让他成为一位殉道者，招来更多同情和对"真正"信仰的支持。多位顾问大臣被派去说服他改变主意，但都未能奏效。就是他的妻子都没能让他认清时务，她责骂莫尔："我感到惊讶，你一直被看作如此睿智的一个人，你本可以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居然像个傻子一样待在这封闭、肮脏的监狱里，安于与老鼠为伍。"[18]

因此这个任务落到了克伦威尔的肩上。不过，他之所以急于让莫尔顺从，并不只是出于对国王的忠诚。虽然他们在信仰和原则上完全对立，但是他们兴趣和事业的相似性让这两个强劲的对手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尊重，因而看起来铁石心肠的克伦威尔也不愿看着莫尔被送上断头台。如果他能够说服这位保守派最有影响力的名义领袖屈服，这将给他们传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信号。

克伦威尔多次到莫尔在钟塔的牢房探视，并经常由拉尔夫·萨德勒陪伴。他动用自己作为律师时所有推理和说服的本领来瓦解莫尔的抵抗。在其中一次探视期间，他特意赶在加尔都西会的修士被收监的消息已经传到莫尔那里之后才过去。但是这些修士的命运丝毫没有影响莫尔自己的心志：即便有，也只是增强了他的决心。克伦威尔徒劳地敦促

道："国王陛下会对他看着顺眼的人施恩，也会依从他的法律处置那些他认为顽固不化的人。"克伦威尔还警告说，莫尔"现在在此事上的态度可能会让那里的其他人继续顽固下去"，这显然是在用行将被处决的修士进行要挟。[19]

不过，在身陷囹圄的14个月里饱受这座阴冷潮湿的监狱折磨的莫尔并不畏惧死亡：实际上，他似乎乐于赴死。他跟自己的女儿玛格丽特说："我是……国王真正忠实的仆人和日复一日的祈祷者，为他和他所有的以及他的国度代祷，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说任何害人的话，没有任何害人的思想，对他人唯有善意。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一个诚心诚意的人存活的话，那我不愿再活。"[20] 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克伦威尔安排莫尔于1535年7月1日接受审讯。虽然莫尔起初是因为拒绝承认《继承法案》被捕入狱，但控告他的依据是他否认王权至高，这在他被投入伦敦塔数月之后才被提起，因此至少可以说这场审讯的基础是不牢靠的，但其结果早已确定。一位有才华但寡廉鲜耻的律师和行政官，现已身居副司法大臣的理查德·里奇（Richard Rich）做证说莫尔1535年6月12日拒绝承认国王的头衔。即便莫尔并未如此行事，但在列席裁决的那些人看来，只凭他在王权问题上的沉默已经足够治罪。司法大臣克里斯托弗·黑尔斯爵士称莫尔的沉默是"他堕落和乖戾本性的确实体现，是他诋毁并对法案心存怨念的表现"。[21]

陪审团通过了判决，莫尔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在指控里奇做伪证之后，他继续批判王权至高的概念，称其"直接与上帝的律法和他神圣的教会相悖"。莫尔宣称英格兰与罗马的分离无异于肢解基督的圣体。此外，跟罗马的普世教会相比，英格兰的教会太过狭隘局促："对您的每一个主教，我背后都有历史上至少一百位神圣的主教可以对应；您每召集一场会议、一次议会（天知道这是以什么样的德行举办的），我都有一千年来的种种会议累积的结果以为奥援；跟这一个王国相比，我身后有其他所有基督教国度。"[22] 莫尔的激情演讲或许让他得以直抒胸

臆，但是并没能阻挡审判的自然进程。他被以叛国者论处，被判死刑。鉴于莫尔曾是大法官，行刑方式改为斩首，他在1535年7月6日于伦敦塔被执行死刑，克伦威尔也在场。离被斩首还有几分钟的时候，莫尔站在断头台前，请围观的民众记得他是“因为并且是为了天主教会的信仰”[23]而遭难的。

正像克伦威尔担忧的那样，莫尔立即被奉为殉道者，这一名声不仅传扬于英格兰，也远播欧洲各地。查理五世皇帝在帝国宫廷上向英格兰大使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表示抗议，说他“宁愿丢掉领土内最好的城市也不愿失去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顾问大臣”。[24]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克伦威尔迅速指示驻法国大使约翰·沃洛普爵士向弗朗索瓦国王解释处决的合理性，因为后者也向英格兰的国王展示了同样“忘恩负义且不友好的态度”。“你应该跟法国国王说上述事件不像他指控的那样极端到难以置信，”他告诉沃洛普，“莫尔先生和罗切斯特主教……暗中在王国内外鼓动并激起不满，并在王国内散布煽动性言论，意图借此毁灭国王并且完全颠覆他的王国。”克伦威尔最后说：“要充分向全世界显明，他们反对国王和他的政权、彻底毁灭整个王国的预谋根植于心，即便他们有一千条命，对其处以比现在他们任何一人受到的处决和死刑严酷十倍的刑罚都是理所应当的。”他机智地把弗朗索瓦和亨利描绘成并肩作战、抵抗教宗权威的盟友，同时敦促法国国王多考虑“罗马主教通过压迫国王和君主、压制《圣经》赋予他们的权力所僭称的权势”。[25]

但是弗朗索瓦并没有轻易地为这样一席挑动人心的话所动摇。他和查理继续坚持对这些处决加以责难。这只是开始。莫尔的名字在未来几十年内一直被尊崇。1550年，莫里斯·昌西（Maurice Chauncy）在美因茨写的那本富有影响力的关于殉道者的历史著作中收录了关于莫尔和费舍的记述。1584年，意大利人尼科洛·奇尔奇纳尼（Niccolo Circignani）也将他们的事迹收录其中。同时在英格兰，即使莫尔的批评者也承认他的事迹会继续激励未来的几代人。在出版于1563年的有名的《殉道史》

（Book of Martyrs）一书中，约翰·福克斯准确地预测了莫尔会被封为一名圣人。[26]

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处决前所未有地划清了新、旧信仰之间的战线，克伦威尔似乎也没有因这位与自己生涯经历相似的人的下场而感到警惕。相反，那位律师同行的去世似乎令他在推动宗教改革的事业上重新焕发活力。国王本人也亲自参与此事。亨利很是看重他作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的新角色：它远不止是一个用来摆脱第一任妻子的权宜（但也是复杂的）方法。他一直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像莫尔一样，是伊拉斯谟的拥趸。即使他不完全认同克伦威尔在反对教会贪腐的问题上日渐凸显的福音主义倾向，但是他也愿意听取这种意见——至少现在如此。

在作为代理总教监受命开展巡查之前，克伦威尔首先不得不对教会土地和收入进行调查。1535年4月初，在克伦威尔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加了一条备注要求“记录英格兰修道院所有的珠宝，尤其是圣保罗修道院的绿宝石十字架”。[27] 接下来的调查被称为“*Valor Ecclesiasticus*”（字面意思是“教会的估值”），这是自1086年《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28] 以来最详尽的调查。这份调查在一年之内完成，以令人惊异的准确细节向克伦威尔和他的君主揭示了英格兰所有教会土地和资产的估值。这份调查起初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对教会财产进行征税，并在较小程度上消除贪腐，但是很快这份调查指向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揭示了解散这些宗教场所能为王室金库带来多大的利益。一份当时的文献估计修道院掌握了“王国2/3的”地产和房产。[29]

从1535年夏天开始，克伦威尔将他的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了修道院上。7月23日他同国王和王后一道去英格兰西部诸郡巡游。他很少离开伦敦，这便是其中一次。除了青年时期和1532年年末在加来旅居这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之外，克伦威尔离开都城的时间从不会超过几天——即

便其目的地是几英里开外的地方，比如温莎。跟贵族同僚不同，他每年不会花相当长的时间待在乡村庄园里。他的工作和个人生活都集中在伦敦，没有兴趣待在其他地方。

这次巡游对克伦威尔来说想必是一场折磨，但是他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他随从国王夫妇巡游了整整两个月，并在这期间毫不松懈。他的众多书信描绘出王室在英格兰西部迂回曲折的巡游路线，因为他在每封信上细心地写下了所到之处的地名。从格洛斯特郡的文契尔开始，他们巡游到图克斯伯里修道院、贝克莱和索恩伯里城堡，布罗翰姆和温彻斯特。他们的路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亨利被安妮（或许是克伦威尔）说服，决定牺牲往常出游时的安逸与享受，利用这次巡游为自己的宗教改革争取支持。因此他巡访了被认为支持改革的城镇，并且在那里公开赏赐当地士绅。

同时，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他在英格兰西南各郡的时间，亲自探访那里的宗教场所。一向关注细节的他甚至亲自调查了几处宗教场所。夏普伊汇报说："不论国王到哪里，伴随他身边的克伦威尔都会四处探访周边的修道院，记录他们的土地和收入，详细教导这些新教派的人们，并且遣散上述修道院、女隐修院或女修道院里未满25岁的所有男性和女性，让剩下的人自行决定去留。"[30]

克伦威尔在那个夏天的经历足够激励他在返回宫廷后立即加快剧烈改革的步伐。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有了完美的盟友。安妮王后支持在她丈夫的宫廷里势头日盛的宗教改革有一段时间了，她向亨利介绍威廉·廷代尔的著作，并在她的寝宫里摆放了《新约》的英文译本，供有意阅读的人翻阅。她还表现出与宫廷里的改革派的主要人物交好的姿态，正是借着她的影响，他们后来都被任命为有权势的主教。据说诸如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尼古拉斯·沙克斯顿（Nicholas Shaxton）、托马斯·古德里奇（Thomas Goodrich）乃至托马斯·克兰默之所以能够得到圣

职都得益于她。一位改革派神父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ymer）在安妮逝世后撰写的关于她的记述里说她“熟读经文”，是“新教徒的支持者”。[31]

因为公开发言支持改革派信仰，安妮在宫廷树立了一些危险的敌人。天主教徒确信国王发起这场激进得惊人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受了安妮的教唆。尤斯塔斯·夏普伊向他的主人查理五世汇报说，“这位情妇”告诉国王“他对她的忠心应当更胜于一般的男女之契，因为她将他从罪中解救出来……没有她，国王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及所有民众的利益改革教会”。[32] 不过安妮的信念让她跟国王的首席大臣越来越一致。安妮和克伦威尔因同一事业而联结，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双人组合。不过他们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观点不一：虽然这位大臣打算让国王获得修道院的利益，但是王后认为他们的财富应当被用于慈善事业。虽然此时这点分歧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它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并将在不久之后产生致命的后果。

据推测，克伦威尔和安妮在宗教改革上的联合是通过经常的会面和谈话形成的，其中一些可能在暗中进行。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信件上显露他们的改革派观点，但是在一封罕见的现存于世的信件中，安妮向克伦威尔清楚地表明他们在朝着同一目标努力。信里标明了月份但没有年份，不过可以肯定这是在安妮成为王后之后写的。她问候克伦威尔的方式是王室成员问候宠臣的标准方式：“向备受倚重、敬爱的大人您问好。”她接着提到送信人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Herman）是安特卫普一个经商的居民，但“只因为他曾……帮助展示英文版的《新约》”而被放逐。安妮总结道，这算不上一个正当的驱逐理由，因此她要求克伦威尔“大人您作为忠诚、亲爱的臣民，要尽可能快地给予适当的援助，让这位善良、真诚的商人恢复他原有的自由和身份”。[33]

安妮这时候是需要盟友的。尽管在巡访英格兰西部各郡时，这对王

室夫妇表面上一切如常，但是国王很快厌倦了他的新妻子。结婚两年后她没能产下一个男继承人，这严重削弱了她的地位。就像是为了展示她的地位有多么不稳固一样，亨利下令夏季巡游的最后一站是狼厅。狼厅是约翰·西摩尔爵士（John Seymour）和他的家族在威尔特郡的宅邸，坐落在萨弗纳克森林。狼厅是一栋中世纪庄园，在那个夏天王室曾经停留过的宅邸当中堪称简朴，但是它的重要性远比其他宅邸要大。西摩尔家族有着比较古老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的时代。约翰爵士的妻子马热丽（Margery）出身同样高贵，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他们的儿子爱德华和托马斯已经在宫廷中开拓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不过，国王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了他们的长女身上。

简·西摩尔在1529年前后第一次出现在宫廷，当时她被任命为凯瑟琳王后的侍女，她也对后者充满敬仰。凯瑟琳从宫中被放逐后，简被转到安妮·博林的身边。起初，她显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注意——无论是来自国王还是宫廷里的其他人，这或许并不稀奇。的确，简除了血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取之处。她相貌普通且气色欠佳，“（她的皮肤）过于白皙，以至于旁人会用苍白而不是其他词来形容她”。[34] 约在1536年绘制的一幅肖像显示她的脸盘大而圆，有双下巴。她的眼睛小而有神，嘴唇薄而扁。宫廷的一位看客嫌她“身材中等且不甚貌美”。[35] 简不像她的对手那样机智聪颖：事实上，她几乎不识字，关于她言辞的记录也很少。甚至连偏爱这位对手而憎恶“情妇”安妮的夏普伊都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亨利看上了她的哪些地方。他只能总结说她一定有良好的“enigme”，意思是“谜一般的东西”或“秘密”，这个词在都铎时代指代女性的生殖能力。[36]

直到1534年年末，简才开始作为国王的新欢被人提及。一贯机警的夏普伊在10月记录说国王已经“迷恋”上宫廷里的“一位年轻小姐”。[37] 她那时差不多27岁，比她的女主人年轻七八岁。如果说简不甚貌美，那么此时的安妮也是如此。伊丽莎白出生后，安妮费尽力气夺回自己的权

力但徒劳无功，这样的巨大压力开始显露在她的脸上。安妮在1535年前后的一幅肖像与短短两年前在她权势鼎盛时绘制的肖像形成了鲜明对比：她那有名的魅眼已经凹陷并尽显疲态；她的高颧骨正被逐渐松弛下去的皮肤所掩盖；她那在微笑时一度让国王渴望亲吻的美丽嘴唇已经变薄，并且因失望而紧抿着。同年，在给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和参议院的一封信中，威尼斯大使将这位35岁的王后形容为“那个瘦弱苍老的女人”。同样地，大使夏普伊在描述简替代安妮的前景时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比作一个男人在抛开瘦弱、苍老、恶毒的老马，以求尽快得到一匹美好的坐骑时会所体会到的那种喜悦和欢愉”。[38]

与正在快速失宠于亨利八世的安妮相比，简可谓一个完美的对照。安妮情绪波动剧烈且直言不讳，而简看起来则温柔、顺服且文静。“（简）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位小姐都温柔”，一位廷臣曾如是说。国王本人也说她“温柔且喜欢安静”。[39] 其他廷臣很快也拿她与王后比较。贝德福德伯爵约翰·罗素说“国王已经离开了（安妮）不幸、不快的地狱，来到了这个（简）温柔的天堂”。[40]

虽然那些对王后安妮抱有敌意的人毫不犹豫地奉承国王的新欢，但当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简·西摩尔会拥有除了情妇以外的其他身份。只有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廷臣才有可能看出她会成为安妮倒台的原因。当然，克伦威尔在这一时期没有表现出要变更阵营与王后安妮决裂的迹象。虽然意识到君主对安妮的热情已经冷却，但克伦威尔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促成这段婚姻到底付出了多少牺牲，所以他一定难以相信局势会快速迎来反转。因此，这位大臣仍暂时坚定地站在博林一边。

受到英格兰西南各郡巡游的启发，在9月返回宫廷后克伦威尔暂停了王国内每一位主教的职权，以便他委任的6名教会法律师能够作为他的代理人完成调查。他还动用自己作为代理总教监的权力组建了一个新的法庭以逐步恢复每个主教的权力，但借此机会明确了他们今后作为政

府官员的身份。这意味着如果国王逝世，他们的权力也会丧失。为进一步促使他们顺从，克伦威尔从他们的手中收走了部分权利以限制他们的特权，比如探访和遗嘱认证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往往能为主教带来丰厚的酬金。

同时，他的代理人也加快了巡察各地教会和修道院的步伐。其中最遭憎恨的两个代理人是托马斯·雷（Thomas Legh）和赖斯家的儿子约翰（John ap Rice），他们的傲慢和严苛招致了普遍的怨恨。很快克伦威尔就被来信淹没，信中抱怨他们用各种寡廉鲜耻的手段从巡查的场所中搜索对被调查者不利的证据。“代理人们找到了让各个修道院不快的方法”，一位旁观者称。虽然残暴，但是他们的方法非常有效。在雷的施压下，一位修道士在给克伦威尔的一封信中做证说他所在的修道院的居留者不关心宗教，只希望早上醒来能“像小姐一样醉酒，玩玩牌、玩玩骰子”。与此同时，克伦威尔的一位代理人理查德·莱顿（Richard Layton）斥责他到访的苏塞克斯郡其中一座修道院的居留者“是诸位修道士中最恶劣的”，声称他们已经“无药可救”。[41]

莱顿和雷在搜查贪腐时十分得力，于是克伦威尔随后派他们去了约克郡，那是旧宗教的大本营之一。他们在那里进行了全面而冷酷的调查。“北方方圆10英里或12英里内没有雷或者我不熟悉的修道院、修道院隐室、女修道院或其他宗教场所，”莱顿向他们的主人汇报说，“我们了解并体会到了当地的风俗与粗鲁的民情……发现了关于腐败的庇护所、伪装成宗教的迷信及其他各种可恶的逾矩行为的充足证据。”[42]

代理人送到宫廷的报告无疑让克伦威尔大为欣喜。他们提供的证据正是他证明对英格兰宗教生活进行改革的合理性，并加速推进这一事业所需的。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对这位大臣来说并不是很重要，但值得后人思考。毫无疑问，克伦威尔的代理人们在到访的很多修道院都发现了放纵和贪腐的真实证据。这些修道院的院长们都是由修士自己选举产生

的，他们通常会选择那些允许居留者轻松度日的人。在一些较富裕的修道院里，修道教友们的生活之奢靡已到了不恰当的程度。此外还有性放荡的传闻，这表明禁欲的誓言远未得到普遍遵守。不过递交给克伦威尔的报告内容一致得令人质疑，这可能说明一些案例中有修饰甚至捏造的成分。

不过，约翰·福克斯确信，在改革并逐步取缔英格兰修道院社区的尝试中，克伦威尔做了伟大、卓越的工作。福克斯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写道："（克伦威尔）用一些明智的政策抑或手段抵制来自托钵修会修士、修道士、修道的教徒和教士的恶意和憎恨，令他们备受折磨、丧失希望，并遭到弹压，这些人在英格兰陷入一片混乱。他们遍布整个王国的宗教场所都被颠覆了。"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克伦威尔的改革已经更加卓有成效，这时福克斯心有余悸地反思了如果当时宗教改革未得到执行，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应将一切归功于那个人（克伦威尔），若没有他的努力，我们的现状将多么凄惨。他在恢复旧宗教信仰尚存一线希望时驱逐了大量修士，而如果他们在那时不受制裁的话，现在他们在英格兰的数量定将变得庞大到连十个克伦威尔再世，也不能再次将其驱逐。"[43]

虽然在后世看来，克伦威尔显然为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小心盘算、蓄谋已久，但直到1536年年初他才承认这一点。在他众多留给自己的备忘录中有一份记录了"王国上下宗教人士的恶习，以及计划在这方面进行的改革"。[44] 不久之后召集的议会揭示了这次改革的规模。在2月4日到3月6日召开的所谓改革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解散所有年总收入少于200英镑（约合今天的6.5万英镑）的宗教场所。这一法案得到了克伦威尔代理人报告的支持，报告讲述了这些较小的宗教场所堕落、贪腐、利欲熏心的情况。这些报告给了克伦威尔推动解散修道院所需的理由，并且帮助他抵消了所有认为此举动机是他和国王的贪欲的猜疑。3月18日，上下两院通过了这项《较小修道院解散法案》

（the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Lesser Monasteries）："上下两院仔细商议之后，最终决定这样会更合全能的上帝的心意，也是为了他这个国度的荣耀，这些宗教信仰场所的所得，应该得到更好的使用，但是现在因越来越多的罪行而被挥霍、糟蹋、浪费。"[45]

之后不久，议会通过了另一项法案，成立一个负责国王收入的扩大法庭（Court of Augmentations）。这个法庭有权接收被关闭的修道院的土地、房产和所有物，并用任何对君主最有利的方式处理它们。扩大法庭约有30位职员，主要由克伦威尔的朋友和仆人组成。这位新上任的代理总教监决心要控制即将源源不断流入王室金库的资金。

克伦威尔通过议会强行推动的立法的背后是一场对政府行政机构的大改革，这一改革在历史学家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看来可谓一场"政府革命"。在克伦威尔任职期间，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王室和单个顾问大臣基础上的中世纪政府体系逐渐被一个官僚制政府所取代，这一官僚体制由承担具体事务的部门组成，由具备才能的人在其中担任职务，根据规则与规范程序开展工作。这不仅令治理更为高效，还极大地降低了一个或多个个人主导政府的可能。考虑到在创建这个体制的过程中，克伦威尔使自己成了国王不可或缺的人，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随着新的立法到位，克伦威尔派出专员前往各郡接洽当地高层，授权他们调查辖区各个宗教场所的状态。他们要对这些场所的财富，以及被解散后需要在别处谋职的修道士的数量进行详细的统计和估算。值得注意的是，比起莱顿和雷这类人编撰的报告，这些人在返给克伦威尔的汇报对这些宗教场所状态的描述要乐观得多。

毫无疑问，潜在的财务收益至少构成了克伦威尔决定解散小规模宗教设施的部分原因。"鉴于他自己这么快晋升为国王的秘书，并且成为王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异端之一，他跟他认为下决心要增加王室财富的国王说：'我记录了修道院的所有收入和持有的贵重物品，如果陛下愿

意，我以为陛下可以拿走其中一大部分，将这些收入用于王室，'”《西班牙编年史》如此记述道，“'但是这事如何达成呢，克伦威尔？'国王问。'我来告诉陛下。我会以您的名义给议会一封信，要求他们将所有收入在3000杜卡特以下的修道院转让给您，这样陛下就能获得一大笔收入，并把修道士赶到较富裕的修道院去。'”

修道院解散事业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进着。“克伦威尔不是懈怠的人，”《西班牙编年史》如是说，“因为他立即派接收者去解散这些修道院。”[46] 一旦扩大法庭收到一份报告，就会签发命令解散报告中所提到的问题场所，并将其财富转到王室，然后委任一名接收者去收取教会的贵重物品——从祭服和金器到鸣钟和靠背长椅，甚至房顶的铅板都要剥下来。很多人（多数是从首都带来的，因为当地工人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受雇在摧毁每栋房舍前先把它们搜刮个精光。克伦威尔的一个行政人员在描述他们工作的景象时，将其比作一群秃鹰俯冲向一具新倒下的尸体。“我们在拆毁一座由4根粗大的支柱撑起的高拱顶，两边相距14英尺，周长约45英尺……我们从伦敦带来了15个人，其中有3个木匠，2个铁匠，2个管道工，还有1个烧火炉的。每个人各司其职：10个人负责推倒上面的墙，其中有3个木匠：他们在其他人劈开的地方做防护支撑，其余的人则打碎、推倒拱顶室。”[47]

这些精美的宗教建筑一点点被摧毁，其中很多场所已经屹立了数百年，这对那些住在附近的人来说一定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修道院曾是方圆数英里内最宏伟、最壮观的建筑，俯瞰着周边的风景。它们在当地民众当中曾深受敬畏和尊崇。通过夺取修道院内的财物，并将其片瓦不留全部拆除，克伦威尔的手下所做出的行为在外人看来一定是最为骇人听闻的蓄意破坏。这也以最残忍的方式象征了他被人蔑视的改革过程。

半个世纪以后，这段记忆依旧强烈而鲜活，一位其父亲和叔叔曾目睹了当地修道院被摧毁的男子描述这一事件对他们和邻居的影响时

说："即便一个人有着燧石做的心肠，在看到修道院被拆毁、修道士们黯然离开，以及在他们离开修道院当日突如其来的抢夺时也会心软并为之落泪。人人都捡到了便宜，除了那些可怜的隐士、修道士和修女们，他们没有钱留住任何东西。"除了克伦威尔的手下，还有很多抢掠者趁火打劫："他们拿取自己目之所及的一切，然后悄悄带走……任何人看到都会感到惋惜，铅板被掀开、木板被扯掉、剩余的东西被丢下来……教会的墓碑也都被破坏……所有值钱的东西要么被抢夺、卷走，要么被毁坏得面目全非。"[48] 《西班牙编年史》也对这大规模的破坏表示惋惜："很多金器和钱财被夺走，这还不算代理人们偷走的大批物品，这些修道院的毁坏给王国带来了很大损失。"[49]

虽然修道院解散的影响在乡村地区最明显，但这一运动在英格兰的城市也留下了痕迹。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伦敦，威尼斯大使于1554年从那里汇报说："河的两岸有很多大的殿宇，呈现非常壮观的景象，但因为城区内部有很多曾属于修会或修女的教堂与修道院遭到破坏、徒留废墟，整座城市面目全非。"[50]

解散修道院运动的第一阶段总计拆除了376所修道院。变卖夺取的珠宝、金器、铅板和其他贵重物品所得的总额估计有10万英镑，约合今天的3200万英镑。同时，自修道院收缴的年收入又给王室带来了3.2万英镑（约合现在的1030万英镑）。这在国王金库每年25万英镑的常规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不过，即使如此，修道院解散运动的潜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那些最大、最富有的宗教场所一定能提供最丰厚的斩获，但是克伦威尔的代理人们一直在竭力称赞那里始终如一的高道德标准。此外，一些较小的场所最终（在缴纳大笔罚金之后）得以幸免，很多希望继续他们信仰呼召的居留者也得到了许可。亨利甚至以他的名义重修了两座修道院：伯克郡的毕萨姆修道院和林肯郡的斯蒂克斯伍德修道院。这被一些人看

作拆毁修道院运动背后并无全盘计划的一个迹象。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是克伦威尔清晰明确且富有远见的政策表明他的行动不太可能只是一种对已有现象的反应，而非某种先发制人的手段。更有可能的是，在亲眼看到初期改革遭遇的来自大量民众的抵抗后，他在这场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他的审慎或许有另一个缘由，那就是王后本人也是这场小规模的修道院解散运动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

[1] 平均寿命这么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婴儿的死亡率高。那些活下来的婴儿有望活到50岁或者60岁出头。

[2]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p.107.

[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p.411，428，436，452.

[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121.

[5]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288. 后来克伦威尔被迫将其中一间房让给简·西摩尔以促进她跟君主的恋情。

[6] 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诺福克郡，为诺福克公爵的住所。

[7] Muller，J.A.（ed.），*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Cambridge，1933），pp.60-61.

[8]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6.

[9] Muller，J.A.（ed.），*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Cambridge，1933），p.399.

[1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29；BL Add MS 25114 fos.175-177.

[11]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6.

[12] Elton，G.R.，*England under the Tudors*（London and New York，2005），p.141.

[13]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9.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45.

[15]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26. 后来的一位大使，乔瓦尼·索兰佐（Giovanni Soranzo），认同克伦威尔是“英格兰最高的统治者”。*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p.550；Cavendish，*Metrical Visions*，Vol.II，p.51.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s.609，661.

[1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410；Pratt，J.（ed.），*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8 vols.（London，1877），Vol.V，pp.391，394-396；Anon.，*Life of Thomas Lord Cromwell*，pp.23-24.

[18] Sampson，G.（ed.），*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with Roper’s Life of More and some of his letters*（London，1910），p.258.

[19] Rogers，E.F.，*Correspondence of Sir Thomas More*（Princeton，1947），p.533.

[20] Rogers，E.F.，*Correspondence of Sir Thomas More*（Princeton，1947），p.533.

[21] Harpsfield，N.，*The Life and Death of Sr Thomas Moore*，*Knight*，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ser.，Vol.186（Oxford，1932），p.185.

[22] Harpsfield，N.，*The Life and Death of Sr Thomas Moore*，*Knight*，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ser.，Vol.186（Oxford，1932），pp.193，196.

[23] Harpsfield，N.，*The Life and Death of Sr Thomas Moore*，*Knight*，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ser.，Vol.186（Oxford，1932），p.103.

[24] Harpsfield，N.，*The Life and Death of Sr Thomas Moore*，*Knight*，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ser.，Vol.186（Oxford，1932），p.104.

[2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417-419.

[26] 1935年5月，在莫尔和费舍去世400年后，教宗庇护十一世封二人为圣徒。

[2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475.

[28] 由英格兰诺曼底王朝首位国王“征服者”威廉下令编写的大规模土地调查记录，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份记载了全国人口与经济状况的文献。

[2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27.

[30]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42.

[31] Bodleian Library MS Don.C42 fos.21-33.

[3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Part ii，p.251.

[33]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p.197-198.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901.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901.

[36] Starkey，D.，*Six Wives：The Queens of Henry* Ⅷ （London，2003），p.584.

[3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Part ii，no.1257.

[38]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297.

[39] Weir，*Six Wives*，p.34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069.

[40] SP 3/7，fo.28r.

[41] Wright，T.（ed.），*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onasteries*，Camden Society，Vol.26（London，1843），p.156；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167，169；*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X，nos.509，632.

[42] Wright，T.（ed.），*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onasteries*，Camden Society，Vol.26（London，1843），p.156.

[43]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646，649.

[4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10，no.254.

[45] *Statutes of the Realm*，Vol.III，pp.575-578.

[46]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26.

[47] Wright，T.（ed.），*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onasteries*，Camden Society，Vol.26（London，1843），pp.180-181.

[48] Ellis，Vol.III，pp.33，34；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72.

[4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26.

[50]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543.

第十一章 “一位更仁慈的情妇”

自1530年服侍亨利八世以来，克伦威尔的权势看似一直在势不可挡地攀升。1536年年初，整个世界似乎都臣服于他的脚下。他说服议会通过了能够巩固他的所有改革，并对未来有真正和革命性影响的立法。他在宫廷的地位和国王对他的宠信都史无前例地高。

相比之下，安妮王后只有几段短暂的辉煌时光，每次都因不同程度的挫败而黯然失色。最为糟糕的是，在她那无人期待的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之后，安妮没能生下她向亨利承诺的男继承人。事实上，安妮没能再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或女孩，她至少经历了两次流产。不过，1536年开年似乎预示了一个让人欣喜的未来。安妮王后再次怀孕了，而且她腹中孕育的胎儿度过了危险的那几周，她为亨利带来他渴望的儿子的希望陡然增长。还有更多愉快的消息接踵而至。一直以来，新王后从未摆脱前王后的桎梏。受困的凯瑟琳坚定不移地维护她和亨利婚姻的有效性并得到持久、普遍的同情，只要她活着，英国民众就永远不会接受那位“大贱人”。但是近几个月凯瑟琳的健康急速恶化，软禁地糟糕的居住环境也令她不得安生。1535年12月末，克伦威尔向加德纳汇报：“这位（亨利之兄亚瑟的）遗孀处境堪忧。”[1] 他是对的。1536年1月7日，安妮非常开心地得知她的老对头去世了。

克伦威尔一定也乐于听到这个消息。他第二天写给加德纳的信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他在报告“昨天王子遗孀去世，她的罪已得上帝赦免”时，忍不住含蓄地提到了他很久以来试图证明的凯瑟琳嫁给亡夫弟弟的“罪过”。凯瑟琳代表了他在整个宫廷仕途中取缔的一切，还始终是

克伦威尔新政之反对者的象征领袖。的确，她的死如此适逢其时，以至于夏普伊甚至猜测克伦威尔可能从中动了手脚。他忆起克伦威尔1534年8月公开发出的恶意威胁，当时他说：“王后和公主的去世会终止（亨利八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所有争论。”大使总结道：“不难看出他们的目标是摆脱这两位女士。”[2]

克伦威尔始终派间谍对前王后及其府邸进行监视的事实也加深了夏普伊对他的怀疑。大使在王后去世前不久前去拜访时，得到了“克伦威尔朋友”的陪同，夏普伊宣称“他是国王派来与我同去的，或者说是监视并记录一言一行的”。几天后通知大使凯瑟琳死讯的也是克伦威尔。夏普伊立即写信给他的主人，坦言他确信其中有阴谋：

> 王后的病始于五周前，正如我当时写信给陛下时所说的那样，而在圣诞节第二天，病痛再次袭来。她的胃痛如此剧烈，以至于胃里存不下任何食物。我几次问她的医师有没有中毒的可能，他说恐怕是这样，因为她在喝了一些威尔士啤酒后就恶化了，而这种毒一定是慢效且微量的毒物，因为他找不到直白可见的投毒痕迹，但只要对她进行解剖，就可以看到迹象了。

六周多以后，夏普伊还在提及他对国王首席大臣的猜疑：“我忘记提到，在克伦威尔给我带来的众多消息中，他说在法国有传闻说虔诚的王后是被毒死的，并且法国人声称这个传闻来自西班牙人；这些消息不可能不加粉饰和润色便报告给我。”[3]

克伦威尔的粉饰令夏普伊确信自己有必要单独对这件事进行谨慎的调查。在听到被指任“剖开”王后——在防腐处理前移除她的重要器官——之人的描述后，他更加确信凯瑟琳之死的背后有阴谋。这人“以传达足以致自己于死地之秘密的审慎态度”将解剖时发生的事告诉了凯瑟琳的告解神父兰达夫主教，接着大使又说服主教将情况告知自己。根据这人的描述：

> 王后是在午后2时去世的，8小时后她被剖开，下令进行解剖的是

国王那边的人，此外无人被允许待在现场，就连她的告解神父或医师都不行，在场的只有府上的点蜡人、一个仆人和一个解剖她的伙计，虽然这不关他们的事，而且他们也不是外科医生，但是他们经常做这样的事……他发现尸体和所有内脏都近乎完好，除了特别黑又不堪入目的心脏，即便在洗了三次之后，它的颜色也没有改变。他从中间切开心脏，发现内里是同样的颜色，冲洗后也没有变化，心脏外壁上还附着一些黑色的圆形物体。我的人问医生她是不是死于中毒，他回答说从她的告解神父所听到的情况来看，这一点明白无疑。即便此事没有披露，从病况和报告来看事实也足够清晰。[4]

王室和其他有名人物的死经常会伴随下毒的传闻，与其他传闻相比，这个传闻并没有更值得相信的理由。尽管如此，克伦威尔下令谋杀凯瑟琳这一观点还是让当时以及近来的一些评述者深信不疑。克伦威尔信件的编者便是其中之一。“如果王后是被谋杀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克伦威尔是这一罪行的主谋，”他断言，“这样的手段对亨利而言令人厌恶，但对于一个有他这样性格和训练的人来说并非如此，只要他说服自己这是实现目的所必需的。他在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和切萨雷·波吉亚（Caesar Borgia）[5]时代的意大利掌握的经验足以让他在这类事务上对人类的正常情感麻木不仁。”梅里曼则说，鉴于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有可能结盟讨伐英格兰的异端国王，英格兰的处境颇为凶险，克伦威尔完全有可能试图采取“非常措施”以避免这一未来。不过，他承认若无君主参与，克伦威尔不会自行动手：“那种认为克伦威尔会在没有国王充分认可的情况下试图谋杀王后的想法简直是愚蠢的。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毒杀确有其事——他将这个主意植入了亨利的脑海，并且亲自负责执行。”[6]

克伦威尔马不停蹄地开始对凯瑟琳之死所带来的好处大加利用。在亨利的命令下，他安排将这一消息传给法国国王，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立场对英格兰邻居发号施令。1月8日，克伦威尔适时地给加德纳和沃洛普下达指示，直白地告诉他们凯瑟琳的死消除了君主和帝国皇帝之间“唯一的芥蒂”。他还命令他们在“跟法国国王及其枢密院的会议和各项进程中”要“更加冷淡，并且在对待他们的任何提议或要求时要

更加沉着和冷静”。同时，克伦威尔很快向夏普伊指出，前王后的死去除了导致两国各自君主彼此怨恨的唯一缘由，是能够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他甚至向大使的一位信使愉快地保证，如果玛丽小姐追随她母亲走向坟墓，那也不会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不幸”，“并且国王已经充分讨论了可能由此引起的不好反响，而且他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一切”。[7]

虽然凯瑟琳的死于克伦威尔而言无疑是有利的，但他不太可能促成了此事的发生，这种猜测背后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唯一暗示了克伦威尔参与其中的说法是夏普伊提供的，而他注定会对主导凯瑟琳垮台的人心存疑虑。不过一周多之后，这位大使猜测宫廷里有其他人在除去前王后一事上可能有比克伦威尔更强的动机。她的继任者安妮从未得到英格兰人民的爱戴，他们依旧把凯瑟琳看作正统王后。安妮也没能成功留住国王的喜爱，国王因她没能诞下儿子而愈发沮丧。在推测克伦威尔是前王后逝世的幕后主使仅一周后，夏普伊又做出了犯人是安妮的无稽猜测，因为她一直想要除去凯瑟琳和她的女儿玛丽。

> 我推测（怀疑）不是国王而是这位姘妇（她曾时常诅咒凯瑟琳母女二人去死，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担心因为国王的心意变化无常，只要上述的两位女士有一位活着，她的地位就不会稳固），下毒是她达成自己可恶目的的一种空前的好办法，因为她们没有那么警惕了；此外，她这么做不会有人猜疑，因为人们以为当上述两位女士同意了国王想要的一切，并在放弃自身权利以换取和解与优待之后便不必担心她们会继续行不利之事，因此也不会有人怀疑她们为人所害。[8]

事实上，前王后身体欠佳已有一段时间，现代医学分析显示她的症状与癌症相符，她的女儿玛丽也同样死于该病。而且，凯瑟琳享年51岁，按都铎时代的标准可谓长寿——她肯定比其他大多数女性活得更久。如果长眠于金博尔顿的她知道亨利会让克伦威尔安排她的葬礼，她一定很难从中得到安慰。克伦威尔以惯常的效率完成了这份棘手的任务，遵循他主人的指示，在避免大量花费的同时确保给予这位前王后相应的尊重。只有夏普伊找到了抱怨的理由，说凯瑟琳没有被埋葬在彼得

伯勒大教堂最神圣的地方。

与此同时，对安妮·博林来说，对头的死让她大获全胜，自己作为英格兰王后的大好前程看似得到了保障。国王在听到凯瑟琳的死讯时显然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一样开心。克伦威尔汇报说“陛下很愉悦且身体康健”。因抛弃第一任妻子而来的质疑和愧疚终于消散了，这让亨利感到解脱。此外，对于亨利这个极重视这些问题的人而言，这是上帝终究没有抛弃他的一个确切的信号。宫廷举办了奢华的娱乐活动，亨利“从头到脚穿着黄衣”现身，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其身侧，“看上去十分愉快”。[9]

但是安妮的胜利是短暂的。在凯瑟琳长眠于彼得伯勒大教堂的当天（1月29日），安妮流产了，这可谓是命运残忍而又讽刺的转折。这无疑是上帝的手笔：15周大的胎儿貌似是一个男孩。夏普伊迅速将这个消息传给了皇帝。喜不自禁的夏普伊告诉查理：“这位姘妇流产了，胎儿状似一个男孩，她怀胎不足三个半月，国王极为悲痛。”他的结语老辣但准确：“她痛失了自己的救星。”[10]

安妮的情况这时开始急转而下，亨利不再掩饰对她的怨恨和厌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国王跟这位姘妇说话不超过十次……从前他连一小时都不能离开她身边，”夏普伊在1536年2月怀着窃喜之情汇报说，“流产的时候，他几乎没跟她说一句话，除了说他看明白了上帝不打算赐给他儿子。”其他人记录说虽然亨利在宫廷里佯装一切正常，私下里却“（对安妮）避而不见”。对安妮来说，更糟糕的是她的丈夫已经找到了一个新宠代替她。安妮对此心知肚明：实际上，她声称自己是因为发现他对简·西摩尔的爱意才流产的。安妮发誓“自己对他（亨利）的爱要比已故的王后多得多”，所以“在看到他爱别人的时候心都碎了”。[11]

在安妮刚开始陷入危机时克伦威尔似乎还在忠于她的事业。2月24

日暴怒的夏普伊报告说这位秘书命令玛丽公主放弃她母亲给她的十字架。虽然克伦威尔尽力指出这是“国王的命令并且是以国王的名义”，夏普伊显然存有疑问。[12] 但是他很快改变了想法。

4月1日，夏普伊告诉查理五世，说他听说“国王的这位姘妇跟秘书克伦威尔时下关系不睦”，并提到有传言说国王要再婚——据推测克伦威尔正忙于安排此事。[13] 他立刻去见这位大臣，以探查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他想知道国王是否真的如传言所说的那样，意图抛弃他的第二任妻子，并迎娶法国国王的女儿。为了哄骗克伦威尔对他说实话，夏普伊保证“尽管在接下来一桩更合法的婚姻之中产生的男性子嗣会于公主（指凯瑟琳之女玛丽）不利，但是我出于对国王的荣誉及其王国之安宁的挂念，仍希望国王能有另一位情妇，而不是因为我对现在这位情妇（指安妮）怀有恨意，毕竟她从未伤害过我”。克伦威尔“看似欣然接受了这一切”。他非但没有对这场自己如此努力促成的婚姻表示支持，反而否认曾参与其中：“他接着开始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来不是这场婚姻的促因，只是看国王决意如此，他才铺平了道路。”不过，与此同时，克伦威尔试图平息传言：“尽管国王依然对淑女们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自己今后应该过上忠贞而有荣誉感的生活，继续他的婚姻。”夏普伊因克伦威尔态度的突然转变而感到吃惊：

> 他用冰冷的语气如此说道，仿佛是要令我怀疑实情与他的这番描述相反，此时我不知道该露出怎样的表情以作为回应。在这之后，他靠着窗户以手掩嘴，不知是为了防止自己笑出来还是在遮掩笑意，说法国人可以确信的是即便国王有意再娶，新娘也不会来自法国。他接着说当皇帝陛下就我们所议之事给出回应的时候，我们应该商讨所有的事宜并好好准备。

虽然克伦威尔这时几乎确定要与王后决裂，但是他刻意保持了暧昧的姿态：宫廷的形势比以往更加动荡，尽管国王现在似乎厌恶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但是克伦威尔清楚地知道他在明天有可能就会再疯狂地爱上她。不过，这位秘书很热衷于与夏普伊交好。“最后，在我要离开的时

候，他跟我说虽然我之前拒绝了他想要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一匹马，但是现在我要是再不接受，他就会怀疑我对他是不是有意见了，”大使汇报说，“然后他把萨塞克斯伯爵头天刚进献给他的马送给了我；我迫不得已才接受了它，这是我唯一可做的辩白。”[14]

克伦威尔放弃与安妮结盟的速度之快或许令人惊讶，毕竟他们已经成功联手了至少五年。安妮能够实现她成为王后的野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克伦威尔，她对宗教改革的热情也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但是他们的联盟一直都有些不稳定。虽然安妮很快注意到他的价值，但与她的丈夫不同，安妮从未对克伦威尔有过好感，也不欣赏他的个人品质。根据夏普伊从克伦威尔处听到的说法，“要是王后知道他（克伦威尔）跟我（夏普伊）的交情还可以，她一定会试图给我们找些麻烦。三天前她还曾在和克伦威尔谈话时说，她想看他被砍头”。[15] 大使被这一席话震惊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王后和这位秘书之间的关系难以把握。他是如此回复的：“我只希望他能遇到一个更仁慈，且对他（克伦威尔）对国王难以估量的付出心怀感激的国王情妇，他一定要小心避免触怒她，否则将永远不会得到完美的和解。”大使担心安妮会让克伦威尔失势，正如她导致了沃尔西的垮台。“我告诉克伦威尔我会在一段时间内避免见他，这样他或许不会因为之前跟我的谈话引起安妮的怀疑——我希望他在这种情势下能比沃尔西处理得好，我相信他的机敏和审慎。”[16]

对克伦威尔来说，他只会在王后的目标跟国王一致的时候才会致力于推进王后的事务。克伦威尔个人对她没有忠诚或感情，跟亨利一样，他无疑也厌倦了她越来越歇斯底里的爆发。在克伦威尔看来，政务始终都应放在感情和原则之上。这也表明了他在国王的宠信之下多么泰然自若，以及对国王对第二任王后越来越冷淡的态度有多么深的掌握，以至于他没有因她的威胁而表现出害怕。他告诉夏普伊：“我非常相信我的君主，我以为她不能对我怎样。”[17]

克伦威尔对较小修道院的解散第一次让他和安妮处于公然的冲突状态。尽管安妮支持改革，但她对解散的宗教场所的收入被转移至国王的金库而不是用到慈善事业这一处理手法越发感到厌恶。亚历山大·阿莱斯，一位与克伦威尔熟识的苏格兰改革派人士，说他和他的支持者“憎恨王后，因为她严厉地斥责他们，并且威胁要向国王告发他们打着福音和信仰的幌子谋取私利，说他们变卖一切并收受贿赂将教会圣职授予不能胜任的人，给那些真理的敌人，乃至真正信仰的敌人，令虔散之人遭到压迫，坐视他们正当的酬劳被剥夺”。[18]

虽然安妮和克伦威尔之间的敌意与日俱增，但截至此时，他们仍在表面上维持一致，足够骗过大多数廷臣。就连夏普伊都怀疑克伦威尔说安妮要他死是“无中生有”，并说道：“我只能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当他是安妮的右手，我自己之前也这样告诉他。”[19] 但是他们之间日益激化的敌意即将爆发，演变成公开的批评。1536年耶稣受难日（4月2日），她指使自己的布施者约翰·斯基普（John Skip）在布道时以几乎毫不掩饰的方式攻击克伦威尔。在国王及其廷臣们都参加的礼拜上，斯基普“阐释并维护了教会古老的仪式……为神职人员辩护，谴责那些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把单个神职人员的错误看成所有人的过错、交由大众谤议的人”。随着主题深入，斯基普对国王首席大臣的抨击也越发明显，他“强调一个国王自身需要保持睿智，并拒绝所有诱使他不作为的奸臣”。他还谴责这些“奸臣”“建议改变既有习俗”，接着讲述了哈曼的故事：哈曼是《旧约》中以斯帖王后邪恶且贪得无厌的政敌，他迫害犹太人，并试图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王室金库。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哈曼在他给敌人——王后的保护者所建的木架上被吊死。这位布道者在布道结尾时说，一个国王的顾问“在建议修改古俗时必须十分小心”并且“哀叹了大学的衰落，强调了学识的必要性”。[20]

为了用布道阻止丈夫因简·西摩尔而背叛她，安妮还指示斯基普讲述了所罗门是怎样“在生命的尽头因世俗和肉体的情欲保有了很多妻子

和情妇，丢掉了真正的高贵”。此前已有很多出于好意将亨利比作所罗门的说法，所以他对布道词的言外之意心知肚明。国王和他的首席大臣愤然离开了礼拜堂。斯基普立即因“宣讲煽动性的教义并诽谤国王陛下、他的顾问大臣、上议院议员、贵族还有整个议会”被审问并遭到训斥。他逃离了，没有遭到进一步惩罚。尽管怒不可遏，但是亨利和克伦威尔知道他只是王后的一个傀儡。

但是安妮没有就此罢休。她显然争取到了克兰默的帮助，他在4月22日写信给克伦威尔表示支持王后在解散修道院上的看法，为安妮打响了第一枪。克伦威尔一定对自己最重要的一位盟友就这样被争取过去支持敌人的大业大感震惊。安妮紧接着试图阻挠克伦威尔偏向罗马神圣帝国而不是法国的政策，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她坚持要求查理五世支持王权至尊——她十分清楚皇帝作为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已故凯瑟琳王后的外甥）是不会这么做的。对此事强做要求会破坏英格兰与查理皇帝的关系，迫使他与自己的强敌弗朗索瓦一世结盟。如果只是安妮自己大放厥词，局势尚且可以收拾；但是让克伦威尔和帝国大使感到沮丧的是，她显然是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所有这些对克伦威尔而言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他对此也一清二楚。安妮打倒了他的前侍主、看似不可动摇的枢机主教沃尔西，现在她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到了克伦威尔身上。她曾在提及国王的长女玛丽时说的话如今同样适用于他：“要么我死，要么她亡。”[21] 为了重获主动权，克伦威尔必须迅速行动。他的第一步举措是进一步接近保守派廷臣，为首的是尼古拉斯·卡鲁（Nicholas Carew），西摩尔兄弟也在其中。卡鲁及其支持者已经密谋一段时日，要赶走“篡位的王后”并让更容易听从他们意志的简·西摩尔取而代之。卡鲁是一个古老贵族家庭的掌门人，他自幼便是廷臣，视萨福克公爵为好友，也是亨利八世最亲近的宠臣之一。他跟国王如此亲近，以至于沃尔西曾指控他对君主过于亲昵。虽然他是改革议会中活跃的一员，但是他的家庭非常保守，并且非

常忠实于阿拉贡的凯瑟琳和她的女儿。在意识到前者复位无望之后，卡鲁选择了帮助简·西摩尔以间接达到目的。他安排简住在位于伦敦南部贝丁顿的宅邸里，国王夜里定期到这里探望她。他还给玛丽小姐写了含有鼓励意味的信，告诉她“要开心起来，因为不久之后敌对一方就会捉襟见肘”。[22]

早在1535年7月，克伦威尔就开始对卡鲁一派的人摆出友善的姿态。在这个月里，他派理查德·里奇告诫萨福克公爵，说国王对那些公爵声称已经得到修缮的宅邸的“衰败”状况表示不满，还告知国王在其他事务上对公爵的抱怨。他指示里奇：“关于这件事，要设法向这位公爵表示我一向是他最真诚的朋友且今后也将如此，所以我请求他在这件事上不要顶撞（反对）国王……请你代我向他表示，我在这件事上单纯且友好的建议是，请公爵殿下写信给国王陛下，这样陛下会因此认为这位公爵在这件事以及其他所有事上对陛下持心温顺、天生热诚。”[23]

这显示出克伦威尔是多么想要摆脱安妮，也体现他的务实程度，他为达目的不惜对一帮在原则问题上和自己背道而驰的人施以援手，即便后者当时仍是他在宫廷中最顽固的政敌们。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支持保守的天主教教义以及由贵族支配的政府。相反，克伦威尔是一个激进的宗教和政治改革者，他靠自己的本领和努力而不是出生在宫廷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他清楚地判断，除了尽自己所能地利用这个不太可能且平心而论令人不快的联盟之外，自己没有其他选择。卡鲁及其支持者也不看好这个联盟。他们蔑视克伦威尔是一个出身低微、不择手段的闯入者，认为他没有资格如此受国王宠爱。不过他们也承认，克伦威尔是宫廷实权的所在，所以他们同样也乐于为了获利暂时放下原则。

克伦威尔不得不加入派别政治这个危险的游戏，从这一决定中也可看出他跟国王的关系。虽然亨利把他提拔到了一个在宫廷有着无可比拟

的影响力的地位，但克伦威尔绝对没有像沃尔西跟他那样亲近。国王和枢机主教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近，这是后者的门徒和继任者赶不上的。这不是克伦威尔的失败：他的政治手段和魅力足以为他赢得国王的宠信。与沃尔西时代不同，现在的亨利对政府事务中所有他所关切的领域都有着亲自过问的欲望，而无可否认的是，这仍旧让克伦威尔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的君主乐意让他主管自己不关心的事务。国王同样愿意倾听首席大臣的建议，在与自己目标一致的政策上给予许可，但是他再也不会给予一个大臣像沃尔西那样的自由。亨利从那段经历中学到很多，而克伦威尔则在付出代价。克伦威尔总是以最恭顺的态度为写给国王的信件落款，称自己是“最蒙陛下恩惠的”或“谦卑的臣民和仆人”。[24] 雷金纳德·波尔于1536年8月称克伦威尔“掌控”亨利，这种说法错得离谱。[25] 国王后来对他当时的秘书威廉·彼得（William Petre）吹嘘说：“是我把克伦威尔、赖奥思利和帕吉特训练成优秀的秘书的，我也一定会这样训练你。”[26]

阿拉贡的凯瑟琳逝世后英格兰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也说明了这一点。凯瑟琳的死让亨利八世与她的外甥查理五世的关系立刻得到改善，正如克伦威尔自信地向夏普伊预测的那样。但是，迫切要阻止英格兰与神圣罗马帝国结盟的弗朗索瓦一世也开始对亨利八世摆出友好姿态。亨利则乐见自己的王国恢复了如此有利的国际地位，热衷于让这两大势力继续争夺下去。克伦威尔的记录显示，驻西班牙和法国宫廷的英格兰大使都受命给出“含糊的回应，既不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但也不要怂恿他们、让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成目的”。[27] 但是克伦威尔也开始违背对君主的命令，这是他从政生涯中的头一遭。这位首席秘书倾向于和皇帝结盟，开始在英格兰和法国国王之间制造麻烦。他欣喜地向加德纳汇报说亨利当着宫廷众人的面羞辱了法国大使。“在此我想告知大人，国王陛下接见了法国大使，他向后者反复重申了自己对法方的友好姿态，以及法方对此不甚友好的应对态度。”[28]

但当克伦威尔坚持要在跟夏普伊的一次会面中表达对法国的蔑视时，他越界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违背国王的意志采取单独行动是一种冒险，这从他尽力使自己与大使的会面保密的做法上也可见一斑。他送信问夏普伊是否愿意与他在离他们宅邸都不远的奥古斯丁修会见面。大使拒绝了，说他想去“为虔诚的王后的灵魂”做弥撒，并提议克伦威尔写信给他。这位首席秘书解释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迫切“想要避免法国人起疑，且见面的请求出于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奉国王之命，因此他求我找一个可供我们交谈且不那么令人生疑的地方，他会告诉我一些于陛下您和国王都有益处的要事”。[29]

夏普伊在从教堂走回家的路上，像是临时起意一样，最终同意拜访克伦威尔。他极为详细地向他的主人转述了二人之间的谈话内容。他说克伦威尔对他礼遇有加，向他保证“他在尽力避免在对法外交中对皇帝有所轻慢”。克伦威尔接着说“国王陛下非常诚恳地希望获得您（指查理五世）的友谊，不仅他自己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此，他的枢密院也强烈建议他如此行事”。大使显然不相信他的这些花言巧语，给出了一个礼貌但含糊不清的回复。这让克伦威尔更加有力地为他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诉求施以援手的决心做出保证：“他表现出因难以表达自己而十分生气的样子，他说法国如此玩弄国王，他宁愿自己在伦敦最高的塔尖上被吊死也不愿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抑或行事。”在提到国王的使团正在德意志和丹麦进行的谈判时，他告诉夏普伊“如果在与这些国家探讨的事务中有任何有损于您的陛下的事情，他宁愿丢掉自己的脑袋”，并且“他认为国王愿意达成陛下的所有愿望”。克伦威尔继续自吹自擂地说夏普伊“应该回想一下他自从接管国王事务以来所实现的种种壮举”。[30]

但这位首席秘书知道，不论在宫廷中多么出众，他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跟查理五世商谈：“克伦威尔说我可以完全放心，他所说的并无虚假，意图说假话是愚蠢的，因为这样不能给他的君主带来什么好处；但由于这些话并非源自他主人的命令，而是由他个人所做的表态，我可以

看出他没有权力做出正式的外交提议，提议一定得出于陛下您。”[31] 这对克伦威尔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他没有主动缔结同盟，以避逾矩之嫌，却鼓励夏普伊力劝他的主人这么做。

大使心中依旧存疑，他跟克伦威尔长时间的交手经历让他无法轻信这位诡计多端的大臣的话。夏普伊对克伦威尔的诚意怀疑似乎一度是对的：后者除了巧妙的言语和承诺之外没有冒其他的险。不过，4月21日大使汇报了他跟克伦威尔再次会面，他发现克伦威尔“对完成业已开启的这一事务的态度空前坚决”。夏普伊让克伦威尔看了皇帝的信件，“他十分尊敬地亲吻并接过来”，显然是因这样有权势的君主会关注他这位“小小的爵士”而受宠若惊。但在夏普伊看来，这种谦逊的姿态所产生的效果似乎被克伦威尔在与皇帝结盟一事上的强硬态度抵消了，后者如此转变是因为查理皇帝坚持要求英格兰在与帝国结盟前先完成与教宗的和解。

尽管如此，克伦威尔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推动与帝国结盟的事业。一次他信誓旦旦地跟夏普伊说：“我宁愿失去一只手，甚至两只，也不愿之前所提到的两国友好关系有任何破裂或者变化。”[32] 这不是礼节性的敷衍。克伦威尔跟伦敦商人关系密切，他们的市场在帝国而不是法国。他一直努力抵制与法国国王结盟。克伦威尔跟夏普伊的多次会面跟他与法国大使的不定期会面形成了强烈对比。一次，后者突然到访奥斯丁会，被仆人们告知他们的主人不在家。但实际上，克伦威尔正在后花园打保龄球。[33]

克伦威尔让夏普伊在第二天早上6点到宫廷。他在半路上跟他见面，一路上就后者在宫廷如何表现以及怎么对国王开口给出建议。克伦威尔的一些建议对大使来说极难接受，其中最令他不齿的是让他在安妮王后与国王例行参加弥撒的时候吻那位姘妇。这对夏普伊来说太过分了，他找了借口准备离开，但是乔治·博林介入并引导大使参加弥撒，

借此迫使他与王后在公开场合相见。这是自安妮嫁给亨利后，夏普伊第一次与她面对面。宫廷挤满了迫切想要看会发生什么的人。“人群大量聚集，”夏普伊汇报说，“要看（安妮）和我如何对待彼此。”[34] 在这个场合，礼节战胜了原则。当王后向大使行屈膝礼的时候，他鞠躬回应她。这被看作对她王后身份的认可，而不是迫不得已的社会礼节——这正是安妮的打算。

礼拜结束后，夏普伊小心地回避了跟国王和那些廷臣一起同安妮用餐，但是没能回绝她弟弟找他一同在接见厅用餐的邀请。等到两边晚餐结束的时候，克伦威尔安排夏普伊与国王会面。亨利以看似真诚的热情迎接了这位大使。但国王在克伦威尔和奥德利的陪伴下带夏普伊到他的私人会客室之后，事态急转而下。夏普伊向国王通禀了他跟克伦威尔就英格兰与帝国结盟的好处进行的讨论，亨利的态度骤然恶化。不久之后，亨利就终结了这次会见。

夏普伊在跟简·西摩尔的一个兄弟交谈时“一直关注着国王和他身边人的动向”，他注意到亨利和他的首席大臣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我看来，在国王和克伦威尔之间似乎爆发了争吵和相当强烈的怒吼；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克伦威尔愤愤不平地退出了与国王的交谈，借口说他渴得筋疲力尽，但事实上只是恼怒，然后坐在国王看不到的一个箱子上叫了点东西喝。”之后不久，亨利出现在宫廷众人当中，正如夏普伊所说：“我不知道他是要来找我还是要看克伦威尔在哪里。”几乎毫不掩饰怒气的亨利直率地向大使表示，他所提出的与皇帝结盟的条件事关重大，只有在得到书面确认之后才会得到考虑。夏普伊抗议说他一直都是忠于自己言语的，还从未被要求这么做过。他因此说：“何况我效法的是克伦威尔，他从未给我任何书面的东西。”国王对他的抗议置之不理，“执意要我拿到上述的书面确认，并且毫不退让地反复重申他不会给予回复”。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出了详尽且愤怒的回复，拒绝了每一条克伦威尔跟夏普伊认真探讨得出的条件。回想起皇帝前些年来对他的

所有不公，亨利愤怒地谴责其“非常忘恩负义”，说如果没有亨利的支持，皇帝不会获得如此庞大的帝国。“克伦威尔和大法官表现出对这些回应感到惋惜的样子，尽管国王用手势示意他们应赞同他，但是没有人会说那三个字”，夏普伊汇报说。违抗国王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也体现出克伦威尔对与帝国结盟的信念之强。此外，他或许也觉得鉴于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宫廷中最有权势的人，当着阖宫众人的面退缩是一种耻辱。最后，当接见结束时，亨利承诺自己会回顾与查理过去的和约，然后再向帝国大使给出进一步的意见。[35]

大使立即离开宫廷，克伦威尔紧跟着他的脚步。他们俩在早上见面的地方，即从威斯敏斯特到格林尼治的半路上碰头。“在那里我们各自表达了深切的遗憾之情，尤其是克伦威尔，他因为心痛几不能言，他这一生中从未经受像上述回应那样的羞辱。”克伦威尔告诉夏普伊他已经跟君主就此事进行了商谈，并向他保证“如果他知道这件事会这样发展，就算把英格兰所有的黄金都给他，他也不会掺和，而且今后他不会在没有同僚陪同的情况下会见外国使节”。大使反思说：“毫无疑问，在此事上他展示了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人；因为尽管他知道这会让君主不悦，而且还为此经历了一些危险，但是他不会收回跟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36]

克伦威尔当时对夏普伊的坦白是他和国王关系最清楚的一个说明：“虽然他总是把跟我说的话伴装成他自己的建议，但他的所言所行都是对国王命令的表达。”如果只从字面上看，这些话语似乎表明无论克伦威尔在宫廷获得了多么大的权力，他的权威始终严格受制于国王。克伦威尔存留下来的很多信件中所用的语言也证明了这点，这些信中满是诸如“国王陛下希望你……”“国王陛下的心愿和旨意是……”以及“陛下让我告知你他尊贵的心愿和旨意是……”之类的语句。[37]而在没有得到国王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试图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结盟，则非克伦威尔力之所及。

这对首席大臣来说可谓一个惨痛的教训。尽管克伦威尔谨慎又精明，但他的野心让他看不到实际的形势。或许他的前主人沃尔西可以侥幸逃脱如此鲁莽举动的后果，但是亨利决不会允许另一位大臣享有跟失势的沃尔西同等程度的自主权。克伦威尔因这个插曲受到惩罚并不再抱有幻想。夏普伊曾记录道："在我问他是什么让国王的意志发生这样变化的时候，他说他想不出这是因为什么情绪；但至少我不是他如此暴怒的理由，因为国王本人对我谦逊的言语还是满意的；他说君王们都有其他所有人看不到也无从知晓的情绪和性情。通过这些话克伦威尔含蓄地表达了对君主这种自相矛盾的不满。"略微令人欣慰的是，正如克伦威尔对夏普伊所说的，国王接见了法国大使，而后者"从宫廷回来时跟我在一天前一样窘迫"。夏普伊准备离开的时候，灰心的克伦威尔做出了这样的反思："他不应该过于相信君王的只言片语，因为他们的说法总是反复无常，指望从这些话语里得到某种保证是不明智的，正如他在上周二亲身体验的那样。"[38]

这一整个令人遗憾的插曲不仅给了克伦威尔一个教训，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还让他和国王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的确，克伦威尔在宫廷的权力和影响力依旧无人能比，但是他在应对国王时的轻松和自信逐渐被顺从和犹疑所取代。在向君主提供建议时，克伦威尔越来越谦卑，有一次他向亨利保证："陛下您如此高贵、极其睿智、审慎且经验丰富，我不是以为您需要告诫才这样写的。我只是向陛下言明我是如何尽我的职责、以我认为别人会使用的方式来考虑事情。"[39]

同时，亨利对克伦威尔的态度逐渐多了些轻视。1535年5月，夏普伊跟皇帝报告说克伦威尔因为大量的工作犯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国王让他给大使看一封他写给在法国的使团的信，克伦威尔忘记照做了。当听说此事时，亨利骂他的大臣是"一个愚蠢的、不谨慎的人"。[40] 根据一个消息来源，为了让克伦威尔安守本分，国王甚至动用了人身威胁。"至于我的掌玺大人，即便给我他所拥有的一切，我也不愿意身在

他的处境，”1538年因诽谤克伦威尔而身陷囹圄的乔治·波利特宣称，“因为国王每周教训他两次，并且有时候会狠敲他的头；但是当他整理好头发，并且像狗一样摇摇头离开国王御前、来到大厅之后，他会甩掉疲惫，摆出愉悦的表情，仿佛自己仍主导一切。”他补充说“国王陛下骂掌玺大臣（克伦威尔）是恶棍、流氓，轻敲他的头并且把他赶出国王寝宫”，不过克伦威尔对这种待遇“一笑了之”。[41]

没有其他的史料能佐证亨利对克伦威尔动武这一说法，波利特的说法或许也只是所谓的没有根据的诽谤。不过，这位波利特很熟悉宫廷，他是宫务大臣威廉·波利特爵士的兄弟，也与威廉·菲茨威廉熟识。他经常目睹克伦威尔在宫廷的一些行为，并且挖苦地说：“我，身处宫廷较低的位置，这些事见得足够多，也会笑话他的行状和暴举。”[42] 此外，克伦威尔本人也向曾夏普伊坦言，说自己不敢当面向国王转达一则令人不快的消息，所以给他送了封信。大使又说：“克伦威尔跟我说这话，就像它是一个很大的秘密。”[43] 不难想见，越来越易怒且多疑的亨利像这样对他的这位出身低微的大臣发泄怒火，很可能是在通过强调自己与克伦威尔之间的社会地位鸿沟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虽然本人颇有恶名，且曾在早年自认为“流氓”，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克伦威尔曾在国王面前情绪失控。当然，如果他出手报复就会被视为叛国，这个刺激足以令他保持冷静。不过证据表明克伦威尔大体上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很少发脾气，且据一位熟人的说法，他即使发脾气也只持续一“小会儿”。[44] 他比很多同僚年长，并且更多地经历了生活的艰苦和无情，年轻时的鲁莽性急逐渐被更冷静、慎重的态度取代。他在人生中不断袭来的变故面前即便不能说毫不震惊，至少也可以说是泰然自若的，对宫廷的生活尤其如此。卡文迪什讽刺地说，克伦威尔“被置于轮子的顶端”，暗示他有可能会突然滚落到最底端。[45]

克伦威尔或许在宫廷获得了比同僚大的影响力，但为了巩固在宫廷

的地位，他很明显需要在君王身边培植其他的盟友。或许正因有这种想法，克伦威尔才让他的秘书和密友拉尔夫·萨德勒搬进了宫廷的内室。在那里，他可以轻易地向主人传达并传递消息，而且通常能察知或听到各种可能有价值的消息或传闻。克伦威尔还让他的门徒代他献上各种礼物讨好国王。比如，1536年1月，萨德勒报告说他“将您那个带锁的箱子献给了陛下，里面装满了杜松子酒，陛下非常喜欢，并为此对您表示了由衷的谢意”。[46]

萨德勒在主人的指导下继续活跃，到16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影响力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夏普伊在1536年2月提到的那位“在克伦威尔手下负责其与国王之间所有通信往来的秘书”指的是萨德勒。[47] 萨德勒在协助其主人调查当时最高调的两位天主教殉道者——费舍和莫尔时的表现，让他得到了国王本人的注意。上述二人被处决的那年，萨德勒被任命为国王秘书处司库文员（clerk of the hanaper of chancery），这一要职的责任包括盖章批准特许状和专利证，以及用国玺签发某些法令。在证明了自己能胜任此职之后，萨德勒于1536年被任命为国王寝宫的贴身男侍，得以进入宫廷核心。他还在同年开始了自己的议会生涯，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当选威尔特郡辛登镇的议员。

克伦威尔需要像萨德勒这样的王室侍从，后者是极少数得到他信任的人之一，克伦威尔会把跟自己的宫廷地位有关的很多秘密告诉他。在4月21日与国王的那段羞辱的插曲之后，克伦威尔请假缺席宫廷，但萨德勒仍是他在那里的耳目。他需要汇报的情况很多，因为尽管国王在对妻子和对与神圣罗马帝国结盟的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显著反转，但他对简·西摩尔的迷恋与日俱增。

简本人在以她为中心的密谋中并非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尽管她看上去颇为平静，但她跟她的兄弟们一样野心勃勃，还有一丝冷酷无情，这让她很难同情安妮。几乎从国王对她感兴趣的那刻起，她就开始给国王

的女儿玛丽传递消息，力劝她要勇敢，因为她的困扰很快就会结束。凭着不输于其死敌安妮的魄力，简也计划一劳永逸地让国王落入自己的圈套，并用了一些跟安妮同样且在她看来非常有效的策略。从安妮的先例中她知道情妇也可以成为王后，并决心照做。

简用处女般的羞涩温柔地回绝了亨利的求爱，坚定地拒绝献出自己的贞操。但是她知道自己必须给亨利一些激励，所以她扮演了一个被礼节束缚、因而不能坦然接受自己内心深情的女子。因此，1536年4月当亨利送给她一包钱并附上他爱的宣言的时候，简恭敬地亲吻这封信并原样送回，恳请国王考虑“她看中她的荣誉超过世上任何珠宝，她决不会丢弃它，即便要她死一千次”。她精明地加上了一句，如果她高贵的追求者以后想送给她这样的礼物，他应该等到“上帝愿意赐给她一桩有利的婚姻的时候”再这么做。[48] 这让亨利心烦意乱，他想要赢得简的芳心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强烈。很快，他对简的爱慕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宫廷上下人尽皆知。廷臣们现在涌到情妇西摩尔一边以求得到晋升，就像他们当初涌到安妮身边一样，历史就这样以惊人的方式得到了重演。亨利在格林尼治的宫中为简安排了一间紧挨着自己的寝室，并把她的哥哥爱德华和嫂子安妮安置在那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这对情侣见面的时候充当监护人。

尽管如此，克伦威尔还是谨慎行事。虽然简这颗新星看似正在冉冉升起，而安妮则在快速陨落，但他太了解亨利，不会将自己的仕途——甚至生命——作为赌注押在亨利以变化无常闻名的感情倾向上。更何况，正如一条被掠食者逼入绝境的蛇一样，安妮在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她对任何威胁的一贯回应都是进攻而不是防守。现在在她的眼里，克伦威尔是最大的敌人。

---

[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439.

[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095.

[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59；*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s.59，351.

[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41.

[5] 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为出身波吉亚家族的罗马教宗，切萨雷波吉亚（1475—1507）为其私生子，后者曾倚靠其父与法国国王的权势在意大利北部确立霸权，因毒杀政敌而臭名昭著，但在《君主论》中得到马基雅维利赞扬。

[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228-229.

[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2；*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41.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41.

[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3；*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41.

[1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p.102.

[1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Weir，*Six Wives*，p.293.

[12]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286.

[1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81.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01.

[15]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84；Part II，p.81.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01；*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81.

[1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84.

[18]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325.

[19]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84.

[2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99.

[2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73.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752.

[2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414.

[24] 例如，可参见BL Cotton MS Titus B i fos.261r，264。

[25]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47.

[26]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2002），p.101.

[2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36.

[28]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5-6.

[2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3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3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32]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1，p.125.

[3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1105.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99；*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p.91-93.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99.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700.

[37] Elton，G.R.，*Reform and Reformation*：*England*，*1509-1558* （London，1981），p.172.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99.

[3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

1902），Vol.II，p.196.

[40]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66.

[41] *State Papers*，Vol.II，pp.551-553n.

[42] *State Papers*，Vol.II，p.552n.

[4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I，pp.453-454.

[4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938.

[45] Cavendish，*Metrical Visions*，Vol.II，p.51.

[46]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London，2002），p.83.

[4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4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84.

第十二章“塔里的女人”

根据夏普伊的说法，让克伦威尔决心毁灭安妮的并不是那场被视为公开宣战的耶稣受难日布道，而是4月21日国王与大使羞辱性的交谈，这表明克伦威尔得到的宠信是如此脆弱，安妮依旧可以娴熟地控制她的丈夫，力劝他偏向与法国而非帝国结盟。但克伦威尔不是一个只因自尊心受伤就会采取行动的人。虽然因那场与君主“令人失望又气恼”的见面而受挫，他“突然恢复了以往的那种狡黠，并说博弈还未完全失败，他还有成功的希望”。[1] 大使很快就将明白克伦威尔所想的博弈指的是什么。

克伦威尔意识到，对他的地位而言，与查理五世的联盟可能会跟与弗朗索瓦一世的联盟一样具有灾难性。查理皇帝希望他的表妹玛丽可以继承英格兰王位，他精明地对夏普伊说达成这点的最好机会是确保国王不跟安妮·博林离婚：“要让亨利抛弃这位姘妇，他可能会再娶别人，但只要这个情妇还在他身边，他们便无法生出可以干扰公主（玛丽）继承王位的后代。”[2] 或许正是看清了这一事实，克伦威尔才有动力放弃他原本支持帝国的立场而转向促成安妮的倒台。无论他多么倾向于推动亨利与查理的联盟，如果玛丽继承王位，他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考虑到克伦威尔和玛丽之间存在的敌意，这很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夏普伊非常清楚，是克伦威尔而非国王主导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他向自己的主君通报称是掌玺大臣“计划并促成了整件事”。[3] 根据他的汇报，在忍受了“国王难以言喻的固执”之后，克伦威尔回到自己在斯特普尼的宅邸，“因为难过而卧床”。[4] 的确，这是一段令人难堪的经历，

但克伦威尔是一个顽强的廷臣，他经历过比那还糟糕的情形。他不是一个敏感到需要退出宫廷舔舐伤口的人，更不可能用近一周时间“恢复”状态。他更有可能把这段时间投入了一个更黑暗的目的上：密谋推翻王后。克伦威尔知道为了对抗她需要找出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她没能给亨利产下一子，但这一事实构不成离婚的充分根据。他也无法以宗教原因证明她与国王的婚姻是无效的。这只对凯瑟琳有效，但如果国王的第二段婚姻因相似的理由作废，那些复杂的离婚谈判就会成为笑柄。此外，只废除婚姻是不够的：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克伦威尔必须彻底摧毁安妮和她的同党。过去安妮曾多次证明了在以甜言蜜语诱哄、重获陛下喜爱上自己有多么得心应手。克伦威尔需要的是证明她是叛国者的确凿证据。

王后本人就为克伦威尔提供了绝妙的灵感。众所周知，安妮一直举止轻浮，乐于置身在一群爱慕她的男性之间。他们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她的弟弟——罗奇福德子爵乔治·博林。得益于国王对他的父亲和两个姐姐的宠爱，自他12岁初次入宫以来，乔治·博林就在宫廷仕途上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功。和博林家族的其他人一样，他曾与沃尔西为敌，但是枢机主教曾在自己的权势日薄西山时试图讨好他，尽管这么做为时已晚。作为沃尔西一方的代表，克伦威尔为乔治安排了一份来自温彻斯特主教辖区土地的礼物，这虽然没有达到枢机主教想要的效果，但为克伦威尔和博林的接近奠定了基础。后来这两人可能在促成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一事上有合作。博林真诚地致力于宗教改革事业，并且一直积极试图确保神职人员屈从。不过，虽然他和克伦威尔在政策上不乏一致，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友好关系。

罗奇福德子爵跟他的姐姐关系亲密，这毋庸置疑。他经常见她，多次私下会面、聊天。有消息来源暗指他和安妮的女官简·帕克（Jane Parker）之间的婚姻并不幸福，而且他似乎觉得和姐姐共处比和妻子在一起更开心。这对夫妇没有子女，这一事实让人对他的性取向——至少

对他的忠贞产生怀疑。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担任利奇菲尔德大教堂教长的另一位乔治·博林曾被认为是他们的儿子，但这一传闻的依据并不可信，且他也有可能是一名私生子。在罗奇福德子爵死后对他进行的调查没有提到这个乔治，而是指定罗奇福德的姐姐玛丽·博林为他的继承人。不管怎样，丈夫显然偏好姐姐的陪伴，这让简产生了危险的憎恨，这种憎恨很快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王后的另一位宠臣是弗朗西斯·韦斯顿（Francis Weston）。韦斯顿自1526年起开始在宫廷效力，时年15岁的他起初被任命为一名男侍。他的得宠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吸引力和魅力，另一方面得益于他父亲作为亨利七世宠爱的廷臣的人脉。亨利八世一向喜欢让像韦斯顿这样的人随侍在侧，他在1532年提拔韦斯顿为国王寝宫的侍从。克伦威尔并不支持这一任命，因为韦斯顿与他的很多对手过从甚密，不过宫廷中的女士们和国王一样喜欢韦斯顿。卡文迪什说他“生活放纵，心无忌惮地……纵情于声色私欲”。[5] 1535年5月，王后责备他忽视自己的妻子、跟当时正在被亨利·诺里斯追求的玛格丽特·谢尔顿（Margaret Shelton）调情。韦斯顿迅速反驳，说诺里斯如此频繁地到访王后的寝宫不是为了玛格丽特，而是为了安妮自己。他又说自己爱她寝宫里的一个人比爱妻子或情妇谢尔顿更深。当安妮盘问他恋人的名字时，他回答“是您”。王后“回绝了他”并斥责他无礼。[6] 但是这个对话没有就此被遗忘。

另一个投身于危险的宫廷恋爱游戏（尽管表现相对笨拙）的人是马克·斯米顿（Mark Smeaton），一位英俊且因美妙的歌声闻名的年轻乐师。出身卑贱的他因才能被沃尔西看中，后者让他加入自己的合唱团。枢机主教失势后，他转任到王室礼拜堂，并很快吸引了热爱音乐和舞蹈的安妮·博林的注意。安妮指派这位年轻的乐师到自己的寝宫，这似乎令他（也许是在她轻浮举止的误导下）对这位恩主产生了爱恋。王后可能因年轻乐师显而易见的爱慕而感到高兴，但对两人之间可以对等交往的想法嗤之以鼻。

安妮尤为宠信亨利宫廷里的头号诗人托马斯·怀亚特。怀亚特家族一直蒙王室恩宠和重用，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离博林家很近，而且效忠于后者。王后不仅因托马斯爵士的诗才而乐于以他为伴，还因为他和自己一样爱好法国而大加青睐。在1529年到1530年间怀亚特在加来担任高级执法官，他在这一时期对法国的诗歌体裁产生了兴趣。他还持有福音派信仰的观念，并以放纵的性道德观闻名。虽然他设法获得王后的喜爱，但是怀亚特跟克伦威尔也相识，后者是他父亲遗嘱的执行人。据说克伦威尔“非常喜欢怀亚特大人”，两人有密切且诙谐的信件往来。[7]

与托马斯·怀亚特不同，安妮的另一位近臣亨利·诺里斯（Henry Norvis）自国王即位以来就是他的宠臣，在过去10年间一直是马桶侍从。这让他有了无可匹敌的接近君主的机会，使他成为国王最亲密的仆人和心腹——或许也是亨利身边最近似于朋友的人。诺里斯还对宫廷任免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因为他可以选择在恰当（或者不恰当）的时候向国王寻求签名准许。虽然诺里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温和可亲的人，但他并不会回避利用身份增强自己在宫廷上的权力，因此他成为众多追求王室恩宠的人的焦点。正因如此，诺里斯一直是克伦威尔的眼中钉，因为他试图掌控王室任免权。诺里斯马桶侍从的身份意味着克伦威尔能用来克服这一障碍的办法很少。不过，他把财政支配权从诺里斯的手里夺了回来，后者作为国王私用金的管理者一度染指了财政大臣的职权。

虽然诺里斯起初是国王的宠臣，但他很快从安妮那里获得了类似的宠信。他可能是在1533年1月见证亨利与安妮婚礼的一小部分人中的一员，也从不隐瞒自己对新王后的爱慕。他是宫廷恋爱游戏的完美玩家，赞美恭维安妮但从不逾矩。不过，他们的关系不只是阿谀奉承，而是有一个更稳固的基础，因为诺里斯在改革主义信仰观念上跟安妮一致，他们经常就此进行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毫无分歧，这一点将会产生致命性后果。

虽然这些人喜爱调情且关系亲密，但没有证据表明安妮跟她的男性宠臣们曾犯下不忠之事。一旦败露安妮将失去的东西太多，因此她不敢冒险通奸。再者，她能在求爱期吊着亨利长达7年，也证明她并非没有自制力。但是，安妮一直享受宫廷式恋爱的游戏乐趣，现在随着丈夫对她的热情渐熄，她对爱慕和恭维的需求上升到了一个危险的新高度。克伦威尔对此心知肚明，这也给了他一个可以用来将安妮这个宫廷里最致命的死敌赶下台的完美机会。我们尚不清楚他究竟从何时开始产生了构陷王后通奸的想法。实际上，他足够谨慎地掩盖了自己的痕迹，以让自己在这场争议中扮演的角色显得捉摸不清。但有一个证据是令人信服的。在安妮所有的宫廷敌人中，克伦威尔除掉她的动机最强。几乎所有被这场丑闻牵连的人都是这位国王首席大臣棘手的反对者，这一点也不是巧合。

在确定了促使安妮倒台的方法之后，克伦威尔开始默默地收集证据。他有可能贿赂了王后的一些侍女，或者在她的寝宫安插了眼线。他们汇报的大多数传闻本身并无大碍，但它们很快被扭曲成毁灭性的证据。这一切操作的手法都十分谨慎，安妮对即将到来的恐怖全然不知，就连国王看起来也不知情，直到克伦威尔断定自己有一套具备足够说服力的案情可以呈报给他。

在1536年4月最后几天，事情突然加速进展。克伦威尔在暂离一周后回到宫廷，并立刻要求面见国王。没有记录显示他们说了什么，但是这位首席大臣——也许伙同卡鲁及其阵营的其他人——一定透露了他对王后忠贞的质疑（以及相应的证据）。对妻子的态度始终在敌意和热情之间摇摆的国王迅速改变了心意，无可挽回地与她敌对。在当天于格林尼治召开的嘉德骑士团年度集会上，他大张旗鼓地宣布王后最大的敌人尼古拉斯·卡鲁爵士被推举为嘉德骑士，而不是她的弟弟。乔治·博林被宫廷最有名望的兄弟会拒于门外显然是一种故意的冷落，而克伦威尔的新盟友从中受益的这一事实也表明他是背后谋划者。

在第二天，大法官托马斯·奥德利——“克伦威尔的人”——授意在温彻斯特设立了两个特别听审裁判法庭（Commissions of oyer and terminer）。[8] 这是听审和审判王室申诉的法律程序，虽然可追溯到13世纪，但是很少被使用，且只用于最严重的案件，这个程序要求在被指控的罪行发生的郡设立法庭。我们不清楚特派委员会被委托调查的事务是什么，但是从法庭设在据称为安妮通奸罪行发生地的米德尔塞克斯郡和肯特郡，这一事实表明这是对她被指控罪行的正式调查。陪审员的人选由各郡治安官负责安排，但是从被选上的名单中——包括萨福克公爵、诺福克公爵、威廉·菲茨威廉以及其他对安妮怀有敌意的人——可以观察到克伦威尔的影响。此外，在听审裁判制度下，在被指控者被捕前即设立法庭的情况十分罕见。不过克伦威尔希望避免通常设立法庭所需的约7天的延迟，以免安妮在知情之后利用这个时间赢回国王的感情——他有充足的理由如此担心。[9]

在听审裁判法庭的帮助下，克伦威尔立即开始攻击王后，对安妮寝宫的人员以及更大范围的宫内人员进行了细致的盘问。据说，“国王寝宫的一些人和另一些王后那边的人以极隐秘的方式被调查”。同时，克伦威尔的眼线继续诱哄安妮的侍女吐露事涉隐秘的宫中绯闻。意识到这些侍女可能会担心泄露这类消息的后果，克伦威尔的人向她们保证“国王恨恶王后，因为她没有给他生下王国的继承人，而且她也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10] 不久之后这些侍女们就被诱哄成了共谋。

据说，在4月29日，恼火的安妮与她的乐师马克·斯米顿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口角。根据她后来的供词，“我发现他站在我寝宫的圆窗前。我问他为什么如此悲伤，他回答说没什么”。王后冷酷地反驳道：“你别指望我会用对一个贵族说话的方式跟你讲话，因为你是一个身份低下的人。”知道她所说的符合事实，斯米顿可怜地回复：“不，不，夫人。看一眼就足够了，那么再会。”[11] 这场对话的内容本身并无问题，但还是立即被王后身边一个可能接受过克伦威尔贿赂的女性随从汇报给了他。

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可能就是与斯米顿发生口角的当天，王后和亨利·诺里斯之间爆发了争吵。争吵因他们讨论诺里斯作为一个鳏夫应该娶谁而起。安妮中意的人选是她的亲戚以及侍从女官玛格丽特·谢尔顿。有传闻称玛格丽特在前一年成了国王的情妇，这可能促使安妮迫切要让她跟诺里斯结婚。当后者表现出不情愿的时候，安妮突然暴怒并警告他："你这是要找死；你想在国王遭遇不测的时候占有我。"诺里斯马上反驳说"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他宁愿自己的头被砍掉"。[12]

克伦威尔认定，这两次口角加在一起让他有了充分的行动理由。4月30日他逮捕了斯米顿并将他带到自己在斯特普尼的宅邸，在那里集中盘问他和王后的关系。《西班牙编年史》的记载称，当斯米顿不愿意吐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时，克伦威尔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然后他叫来了手下两个强壮的年轻人，并且要来绳子和棒子，命令他们把打满绳结的绳子缠绕在马克的头上，并用棒子拧绳子直到马克大喊，'秘书大人，不要再拧了，我说实话'。"但当他没能说出克伦威尔想听的话时，后者"下令再多拧几下绳子，可怜的马克，扛不住这样的痛苦折磨，大喊，'不要再拧了，大人，我会告诉您所发生的一切'。然后他全部坦白了"。[13]

克伦威尔有可能给斯米顿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是王后身边所有人中最年轻且对宫廷政治最没有经验的。再者，斯米顿的被捕是克伦威尔扳倒王后的第一步，如果没能从中获得任何证据，他就将有可能落到叛国控告的错误一方，自己成为叛徒。不过说服马克开口并没有耗费多大力气，他一定是被国王首席大臣的威严吓住了，迫切地说任何能够确保自己得到释放的话。这个天真、受惊且可能为爱所迷惑的年轻乐师不是这位已经在政治和法律事务上表现出杰出才干的人的对手。一份供词很快出炉。除了承认跟王后发生性关系之外，斯米顿还详尽地向克伦威尔提供了王后的圈子中与她发生过不正当关系的其他人的名字。斯米顿的供认给了克伦威尔将计划付诸实施所需的一切，但是这绝对没有保证

这位年轻人重获自由。克伦威尔把他拘留在自己的宅邸过夜，并在第二天——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他把这位年轻人丢进了伦敦塔。

根据《西班牙编年史》，克伦威尔立即写信给国王，并在信中附上马克的供状，然后将送信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外甥理查德。当亨利打开信的时候，他读到的内容是：

> 陛下您会理解，为了守护您的荣誉，看到宫里发生的某些事，我决定要展开调查以查明事实真相。请陛下试想，马克服侍您不过4个月，薪金只有100英镑，然而阖宫都注意到他的奢华穿着，而且他还在骑士比武活动上花了很大一笔钱，所有这些都让某些绅士心中起疑，而我已对马克进行了审问，并把他的供词附在给陛下您的这封信中。[14]

国王读到这里非常激动，但他保持冷静，并下令即将在格林尼治宫依传统举行的五朔节骑士比武大赛照常进行。不过，他立即取消了竞赛结束后和安妮即刻前往加来的行程。

对王后安妮来说，1536年5月的第一天起初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她对自己的乐师被捕一事毫不知情，甚至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缺席，而是忙于为骑士比武大赛做准备。这是一个晴好的暮春之日，安妮在隆重的仪式中进入竞技场，在王室看台就座。一向擅长掩饰自身情绪的国王丝毫没有表露内心的起伏，看似“完全投入享乐之中”。[15] 竞赛到一半的时候，王后挚爱的弟弟也参加了比试，有人递给亨利一则消息，令所有人吃惊的是，他在少数廷臣的陪伴下匆忙地离开了竞赛现场。此时一切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发展着。在骑士竞赛的其中一队担任领队的亨利·诺里斯被告知立即陪国王到伦敦塔。当他们骑马去威斯敏斯特的时候，惊恐的诺里斯得知自己被指控与王后通奸。他极力否认这项指控，尽管亨利——仍对这位老朋友和侍从怀有一些感情——提出如他认罪可得完全赦免。他被带到伦敦塔，与马克·斯米顿关在一起。同时，克伦

威尔采取预防措施，阻止任何人靠近国王，以免安妮的支持者为她或为自己申诉。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廷臣，克伦威尔知道重获恩宠的唯一机会就是亲自恳请国王。因此，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努力确保亨利在实质上进入隐居状态，只有“晚上才在花园和船上出现，这期间无人可以妨碍他”。[16]

在搜集对诺里斯不利的罪证时，克伦威尔得到了一位重要廷臣、南安普顿伯爵威廉·菲茨威廉的帮助。菲茨威廉跟克伦威尔的联盟是脆弱的。他以善变著称，凭权力而非原则来选择盟友。一旦盟友丧失了权力，他就会将其抛弃。因此，虽然菲茨威廉曾是沃尔西的门下，并因这层关系大大受益，但在枢机主教失势的时候，他在签署上议院针对沃尔西的批文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疑虑。同样，虽然理论上是传统信仰的追随者，但当克伦威尔得到的恩宠显著增加时，他转而支持国王离婚，以及随后由克伦威尔发起的改革。克伦威尔也非常清楚菲茨威廉的缺点，但是不怎么在意。在基于宫廷政治（而非个人关系）与人联手时，他也信奉务实主义而不是原则。在谋划安妮的倒台时，克伦威尔意识到可以利用菲茨威廉，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伍斯特夫人是王后寝宫的一员，但她对安妮显然没有什么忠心。因此，伍斯特夫人非常乐于为克伦威尔提供能让国王对妻子和诺里斯的关系起疑心的证据。菲茨威廉参与了后者的审问，诺里斯指控伯爵骗他招供。

其他涉案人员也很快被逮捕——包括王后本人，她在5月2日被带到伦敦塔。根据赖奥思利于事件发生不久之后撰写的编年史，克伦威尔本人陪她到那里，随同的还有诺福克和奥德利。[17] 另一个消息源称，克兰默主教也参与了这项无情的任务。他们刚开始审问，安妮就打断了他们。“别浪费时间了，”她告诉他们，“我从未辜负国王，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厌倦了我，就像他之前厌倦虔诚的凯瑟琳夫人一样。”当克兰默断言她的“邪恶行径”已经暴露的时候，她立刻暴怒并大叫：“滚！事情的发生正如我所说，都是因为国王与他人陷入爱河——对象据我所知是

简·西摩尔——但是不知道怎样摆脱我。”[18] 意识到再审问下去也是徒劳，克伦威尔和他的同伴们撤退了。

在安妮被捕当日，她的弟弟乔治也被带入伦敦塔，他面临与自己的姐姐通奸这一“在神意法与自然法中都尤为可鄙”的指控，还被指控密谋害死国王。下一次逮捕发生在两天后，被捕者的身份完全出人意料。和诺里斯与韦斯顿一样，威廉·布里尔顿（William Brereton）是国王的近身侍从之一，也是国王寝宫的男仆。在1529年迎娶了亨利的堂兄伍斯特伯爵的女儿之后，他与王室的关系进一步增强。但是布里尔顿跟王后没有任何关系，当其他人被捕的时候，他正在柴郡的家族庄园里消遣度日。布里尔顿被卷入这场宫廷丑闻是本起事件由克伦威尔一手设计的最明显证据之一。布里尔顿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以专横的方式处理事务。他控制着柴郡的修道院，并阻碍克伦威尔在该地区进行改革的努力。他还在自己担任王权代行官（steward）的威尔士边境区包庇乃至鼓励当地贵族（marcher lordships）的不法行为。在1534年，事情发展至高潮部分，布里尔顿捏造了一份指责自己的前副手约翰·格鲁菲思·艾顿（John Grufth Eyton）杀害一位家仆的指控，并且下令判处他死刑。克伦威尔决意要让这位令人头疼的人物就范，扳倒王后的计划给了他绝妙的机会。

布里尔顿于1536年5月4日被捕，这在宫廷里引起一片震惊。在被指控与王后有不正当关系的一群人中，布里尔顿显得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是王后圈内的人，不仅如此，年近50的他也比其他人大得多。王后多年以来的密友托马斯·怀亚特说他“是我最不了解的一个人”。[19] 对布里尔顿进入伦敦塔一事，安妮本人也没什么反应。相比之下，她倒是（或许在不经意间）提到了弗朗西斯·韦斯顿在前一年公然调情的事。她让伦敦塔典狱长威廉·金斯顿爵士（William Kingston）听到了这些话，这意味着它们可被采纳为证据，于是韦斯顿在5月5日被逮捕。托马斯·怀亚特爵士也于当天和他一起被投入伦敦塔。夏普伊迅速汇报说怀亚特因与

安妮的关系被扣留。其他消息源称怀亚特在安妮上位前就是她的情人之一，并且他曾提醒亨利不要娶她。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由反对宗教改革的人写的，怀亚特的倒台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

事实上，怀亚特并没有正式被指控通奸，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被捕，以及理查德·佩奇爵士三天后被投入伦敦塔一事都不是克伦威尔主导的。这两人与克伦威尔素有交情，把他们卷入这个密谋与他的利益不符。[20] 怀亚特后来称他入狱是萨福克公爵“不当的邪恶意图”的结果。[21] 随后发生的事证明了这点。《西班牙编年史》描述了克伦威尔在怀亚特被送往伦敦塔之前是如何设法拦截的。克伦威尔让他的外甥理查德通知怀亚特在伦敦与自己相见——据推测是在斯特普尼或奥斯丁会。“克伦威尔把怀亚特大人领走，并且跟他说，‘怀亚特大人，您知道我一直对您怀有极大的喜爱，而且我必须要告诉您，如果您在我要说的这件事上是有罪的，将令我痛心疾首’。然后他告诉了怀亚特之前发生的一切；怀亚特大人震惊了。”怀亚特否认自己曾（“哪怕在脑海中”）辜负过国王，克伦威尔保证他虽然会被带去伦敦塔，但“他承诺会始终保持朋友的立场”。然后，克伦威尔的外甥护送怀亚特去伦敦塔，并在抵达的时候告诉典狱长：“克伦威尔大臣的口信是请您尊重怀亚特大人。”[22]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记录的真实性，因为后续事件佐证了这一叙述。怀亚特的父亲在5月11日写信给克伦威尔，感谢他对儿子的付出，并显然相信儿子会很快得到释放。怀亚特确实于6月中旬被无罪释放，这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于克伦威尔的要求。[23] 佩奇则在一个月后才被释放。二人逃脱拘押不仅证明了他们跟克伦威尔的关系，还证明了克伦威尔对安妮及其支持者垮台过程的影响程度。

另一个即将落入陷阱的是弗朗西斯·布赖恩，他的母亲是玛格丽特·布赖恩（Margaret Bryan）夫人，她不仅是安妮·博林母亲同父异母的妹

妹，还是安妮之女伊丽莎白公主的家庭教师。布赖恩积极推动国王第一次婚姻的无效化，并因此坚定地站在博林阵营。亨利对他的恩宠不比别人少。1518年被指命为国王寝宫的男侍之后，他很快成为国王最亲近的人之一，并因赌博、喝酒和“恶习”而出名。但他有非常保守的宗教信仰，他相当有讽刺意味的座右铭是“ja tens grace”（“我希望得救赎”）。克伦威尔后来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地狱的代理人”。当安妮显然已开始失宠时，布赖恩跟她的弟弟上演了一场传播甚广的争吵，试图跟安妮一派保持距离，但这并不能让他免受现在围绕她的丑闻牵连。在主要人物被逮捕之后不久，布赖恩突然“因他的忠诚问题”而被召入宫，在那里他受到克伦威尔的非正式审问。布赖恩没有背负任何指控，并很快得到释放。

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和与他一同进行审问的人收集的针对其余五人的证据无力得令人难堪。马克·斯米顿是唯一招供的：其他所有人都坚决否认自己与王后之间有任何不正当关系。只要简单考察他们被指控犯下通奸罪的日期就能发现，几乎每一次他们都没有跟安妮在一起。斯米顿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可能在5月13日跟安妮在格林尼治发生性关系，因为那天她一直在里士满。同样，在提出安妮与布里尔顿发生通奸关系的四天里，她至少有两天不在指控中认定的事发地点。除此之外的证据充其量不过是传闻。

在王后被捕之后，她的侍从女官们提出的证言内容变得更加淫秽，这是因为她们已不再害怕遭到报复。其中最具毁灭性的一则证言是安妮的弟妹简提供的。简显然很乐意利用这次机会报复自己的丈夫乔治·博林，她不仅提供了关于他和王后乱伦的耸人听闻的描述，还声称后者曾经当着女官们的面嘲笑国王逐渐衰退的性能力。更糟糕的是，简可能让克伦威尔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安妮为从她的情人那里得到更多的性满足，伙同他们一起蓄谋弑夫。克伦威尔后来回忆道：“在多次审问中，事态变得如此明显，除了这项罪（通奸）之外，还有一个针对国王性命

的密谋浮出水面，这个密谋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所有审问的人都因陛下身处的危险而震惊。”[24]

为了巩固这则证据，克伦威尔特意挑选了在伦敦塔照顾安妮的侍女，让她们在那里积极地监视她。他还指示典狱长威廉·金士顿定期报告她的行为。这就形成了最牢靠的消息源，由此可以得知她在监禁期间的言语，尤其是她对针对她的指控的看法——安妮完全（且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所有指控。她不仅抗辩自己无罪，还称和她一起被指控的人也是无罪的，且似乎为他们感到十分忧虑。克伦威尔因此几乎没有抓到什么可堪一用的把柄，只有金士顿的一封信里还包含了可利用的内容。在描述安妮如何抵达伦敦塔的时候，金士顿说她问自己是不是要被关进地牢。当金士顿回答说她会住在加冕礼之前住的地方时，她大喊道“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然后开始哭泣。[25] 这被解读为她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因此不配得到这么好的居所。但这更可能是一个因骤然倒台而受惊的女人歇斯底里式的呐喊。

克伦威尔的文件中有一封安妮给亨利的信，在她被捕四天后写于伦敦塔。它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一部分是因为这封信的字迹不是安妮的，另一部分是因为这封信的文风跟她的其他信件不一样。它是一份大胆的无罪陈述，信中她指责丈夫将自己置于如此境地。虽然安妮对国王一直直言不讳，但是旁人可能会以为她在一封为自己性命哀求的信中会表现得更恭顺而谦卑。相反，她痛骂亨利“残忍地利用我，不像君主所为”，并且宣称如果他坚持这种“无耻的诽谤”，那么她唯愿上帝会赦免他的“大罪”。克伦威尔为这封信批注：“塔里的女人致国王。”[26] 尚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将这封信给国王看。他有可能判断，这封信虽然很令人气愤，但最好还是不让国王看到这样真诚的无罪坦言。

即便对安妮不利的证据不甚可靠，但也足以让国王信服，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听闻对他妻子的不忠指控后，亨利表现得愤怒且沮丧，但

是他迅速相信了这些指控，快得令人起疑。他虽然不喜欢扮演被妻子红杏出墙的丈夫的角色，但是很乐于接受这些指控带来的便利。他跟安妮的关系在结婚之后很快就变得乏味，而且她没能生下儿子，这让他迫切地想要像逃离自己的第一段婚姻一样甩掉安妮。克伦威尔巧妙地给他提供了一个快速且相对轻松的（虽然会令他蒙羞）逃离方法。但是亨利真的相信那些针对王后的指控吗？他有可能真的相信了，因为据说在安妮最终同意亨利的求爱之后，他被这位看似清纯的女子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经验震惊了。在弗朗索瓦的宫廷里，安妮是不是和她的姐姐玛丽一样，学到了一些法式礼仪之外的东西？他的疑心现在变成了确信。根据夏普伊的说法，国王或许是碍于颜面，声称自己是被安妮用巫术蛊惑才与她结婚的。据说她一只手有六个手指，这一点加重了这一说法的分量，而英格兰人民无须多加怂恿便乐于用最大的恶意揣测这位可憎的王后。

亨利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主导而非被动接受了安妮及被控为其情夫者被捕一事，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一封在风波发生后不久由神圣罗马帝国大使写给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转达了克伦威尔对大使说的一番话，这些言论被认为意味着这位首席秘书只是在执行国王的命令。克伦威尔告诉夏普伊“他本人是被国王授权委托审理并了结对这位情妇的审判，这令他颇费周折”。[27] 亨利有可能指示克伦威尔设法帮自己摆脱她，这可能发生在同年1月安妮最近一次流产后。不过，即使他做出了这种指示，也没有证据表明是他设计了这场“博林的灾难”：的确，考虑到最后亨利会不可避免地承受相当大的羞辱，他似乎不太可能这么做。[28] 即使简·罗奇福德没有明说，妻子在婚外寻求性满足这一点本身也贬低了亨利作为爱人的能力。事实上，克伦威尔的话是说国王指示他确保安妮的审讯达到他希望的结果，而不是说他从开始策划了整件事。

克伦威尔写给在法国的加德纳和沃洛普告知王后被捕一事的信件也进一步证明这起风波是他策划的。这封信不但公然诋毁安妮的品行，还意在洗脱自己对揭露安妮被控罪状过程中的责任。他在信中将自己写成

宫廷中一个震惊的旁观者，而不是整件事情的主谋，并强调一切都是按君主的指示进行的。这封信如此开头：“国王陛下认为我应该将这样一场骗局告知你们，它由人为设计、构想、执行并发展，极为可憎且可恶，却在上帝默示的律法下被极为幸运地揭穿，其恶名已人尽皆知。”

克伦威尔接着用一种受惊吓且道貌岸然的笔法描述了安妮被指控的罪行。“王后的可憎之处包括她无节制的生活，以及对国王陛下的其他不敬之举，这些行径是如此过分且频繁，以至于她寝宫的侍从女官……都不能藏在心里……这些劣迹最终传到陛下枢密院一些人的耳朵里，出于对陛下的职责他们不能向他隐瞒。”克伦威尔说，那些女官直到这时才受到审问——在这里，他又一次暗示自己并不对此事负单独责任，甚至不负主要责任。当她们揭露了意图谋害国王性命的证据时，克伦威尔和他的同僚“跪下感谢他（上帝），大声赞美他让他（国王）免于此祸，这时最卑鄙、可恶的意图才被公布于众”。邪恶的阴谋就此暴露，“一些人因为此事被投入伦敦塔，其中有马克·斯米顿和诺里斯以及她的弟弟，然后她本人也被逮捕并被送到同样的地方，在她之后，弗朗西斯·韦斯顿爵士和威廉·布里尔顿也因具体的罪行被送到那里”。[29]

克伦威尔佯装出一种令人难以采信的敏感态度，表示自己不敢再披露关于此事的更多细节，因为它们太令人震惊了。“我没有提到细节，这些细节如此令人作呕，简直闻所未闻。”即使在安妮的审讯结束后，当所有耸人听闻的细节都被披露时，克伦威尔仍声称还有更多隐情。“出于诚意，我尽可能多且直白地写下了本案中涉及的那些密谋情节，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就只能把供词原文寄给你们了，这些供词是如此可憎，以至于其中一大部分从未被用作证据，而是显然被隐藏起来了。”[30]

安妮一案的第一次审讯于5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进行。布里尔顿、诺里斯、斯米顿和韦斯顿出庭回应针对他们的指控。除斯米顿之

外，所有人都做无罪抗辩。庭审前，布里尔顿对一位老校友乔治·康斯坦丁（George Constantine）坦言，针对他的所有指控都是无中生有，自己完全是清白的。甚至在临死之际，他仍强调自己无罪，他鼓动康斯坦丁声明："如果他是有罪的，那么我发誓他会死得最惨。"[31] 他们的抗辩没有任何效用。克伦威尔汇报说："根据上周五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审讯，诺里斯、韦斯顿、布里尔顿和马克已被判处死刑。"[32]

三天后，王后本人也和她的弟弟出庭受审。后者之所以能跟其他人分开受审，或许是因为他的子爵头衔和作为王后弟弟的身份。克伦威尔能够对他提出的正式指控包括宣称他曾有一次在姐姐的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并曾在另一个场合声称国王不是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做出了充满热情且有理有节的辩护，赢得了很多人的钦佩。据说街上的人们赌他不会被定罪。但他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无力抵挡注定的结果。审判开始前，克伦威尔自信地预测："她和她的弟弟明天会被传讯，且无疑会迎来（和诺里斯等人）同样的下场。"[33]

假装正经的克伦威尔将最耸人听闻的细节留到了他明知会最吸引眼球的那场庭审上：那就是对王后本人的庭审。在进入挤满了执法者和廷臣的伦敦塔大厅后不久，安妮必须听着针对她的指控被一一宣读。根据安妮的控诉人所言，她的罪名不仅仅是通奸，还包括乱伦和性变态。她被"不纯洁的、肉体的欲望"驱使，亲吻自己的弟弟，"把舌头伸进他的嘴里，他亦是如此"，并煽动身边的人屈从于她"恶意的挑逗"。[34] 她因肉欲而发狂，仅在生下伊丽莎白6周后就让亨利·诺里斯爬上了她的床。

即便她被指控犯下的罪行细节越来越清晰，安妮依旧不为所动。不过，轮到她开口的时候，她对"所有对她不利的情节给出了非常机智、谨慎的回答，条理分明地用话语为自己开脱，就像她从来不应当受到上述指责一样"。[35] 但这并没有改变指控她的人或者国王本人的决心，国王在听到她勇敢的自辩时说："她有一颗大胆的心，但是她要为之付出

代价！”夏普伊机智地注意到，即便他的妻子被证实无罪，国王也已经决定要抛弃她。[36]

陪审团知道自己背负着怎样的期许，最终也不辱使命。安妮被定为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当被遣送回在伦敦塔的房间时，安妮的勇气变成歇斯底里。她告诉威廉·金士顿“我听说行刑人非常强壮，而我有一根细小的脖子”，然后她双手放在脖子上“尽情地大笑”。大吃一惊的威廉爵士宣称“死亡让这位夫人感到愉悦”。甚至在她行刑前的头天晚上，有人报告说安妮仍在不停地谈笑，对她吃惊的同伴说在自己死后，对手们能轻易为她起一个绰号，因为他们可以叫她“那个没有脑袋的王后安妮”（la Royne Anne Sans teste［tête］）。然后她“痛快地大笑，虽然她知道第二天自己难逃一死”。[37]

1536年5月17日，安妮可能看到那被“认定”是她情人的五名男子被送往刑场。作为已被定罪的叛国者，他们应被处以令人丧胆的绞刑并四马分尸，但他们还是得到了斩首的减刑。当斯米顿被带去行刑的时候，他在断头台前被绊了一下并向后倒地，断头台上满是在他之前被处死的人的血。他打起精神，大声说：“大人们，我求你们为我祈祷，因为我该死。”他的话被看作一个可供利用的认罪表态，而不是一个即将被处死的人受到惊吓时的胡言乱语。

当天，克兰默宣告国王跟安妮的婚姻无效。他这么做有些勉强，因为他之前曾向君主为安妮辩护，说他不相信安妮犯下了被指控的那些罪行，因为“她是我最为赞赏的女性”。[38] 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在逆流而行，而克伦威尔也可能说服了他改变方向，否则就会有失去地位的风险——乃至招来更严重的后果。无论怎么说，宣布婚姻无效的根据都有些牵强：亨利·珀西被逼承认他和安妮曾有婚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亨利摆脱第一次婚姻时耗时数年的争论相比，这次的婚姻作废认定完成得十分迅速。鉴于王后即将被处死，亨利寻求将婚姻作废的决定可能显

得奇怪。这一程序的主要动机似乎是让伊丽莎白公主变成私生女，继而将她从继承顺位中挪去。

安妮在两天后被处死。她从头到尾极有尊严的举止让那些聚集前来见证这位“大贱人”引颈就戮的民众心生敬意。克伦威尔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一个极为熟练的行刑人从加来被带到此地，他按法国的方式用一把剑而不是传统的斧子为安妮行刑——这是亨利对他形同陌路的妻子唯一的仁慈。事实上，他在妻子出庭受审前就下令招募行刑人担此任务，这表明了他对结果有着何等的确信。此番周折是值得的。只是干净利落的一挥，安妮的头就与身体分离了。在她的头被举在空中时，严肃的民众惊恐地看到她的眼睛和嘴唇还在动着，像是在默祷。围观者散去之后，安妮的女侍哭泣着想要找一具棺材安放主人的遗体却求而不得。她们被迫用一个装箭的旧箱子安放遗体，这是对她的最后一个羞辱，亨利第二任王后就是躺在这个箱子里长眠于伦敦塔内的圣彼得被囚礼拜堂（the Tower Chapel of st Peter ad Vincula）中。

至此，克伦威尔大获全胜。

---

[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37.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575.

[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37.

[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700.

[5]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30.

[6]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p.452.

[7]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66.

[8] Weir，A.，*The Lady in the Tower*（London，2009），p.63.

[9] Weir，A.，*The Lady in the Tower*（London，2009），p.89.

[10]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Weir，A.，*The Lady in the Tower*（London，2009），p.99.

[11] Weir，A.，*The Six Wives of Henry Ⅷ*（London，2007），p.312.

[12] BL，Cotton MS Otho C x fo.225.

[13]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61.

[14]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62.

[15] Weir，A.，*The Lady in the Tower*（London，2009），p.5.

[16] Byrne，M.S.C.（ed.），*The Lisle Letters*，*6* vols.（Chicago and London，1981），Vol.III，no.648；*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909.

[17] 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Vol.I，p.36.

[18]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65.

[19] Wyatt，T.，*Collected Poems*，ed. Daalder，J.（Oxford，1975），p.cxlix.

[20]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66.

[21] Muir，K.，*Life and Letters of Sir Thomas Wyatt*（Liverpool，1963），p.201.

[22]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63-64.

[23] 根据法国大使所言，克伦威尔在接下来几年仍是怀亚特的保护人，至少有一次平息了君主对这位廷臣的怒火。Kaulek，J.（ed.），*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 MM.de Castillon et de Marillac，Ambassadeurs de France en Angleterre（1537-1542）*（Paris，1885），p.157.

[2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2，21.

[25]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333.

[26]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346.

[2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37.

[2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96.

[2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2.

[30]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2，21.

[31] Amyot，T.，‘Transcript of an Original Manuscript，Containing a Memorial from George Constantyne to Thomas，Lord Cromwell’，*Archaeologia*，23（London，1830），p.65.

[3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2.

[3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2.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pp.361-362.

[35] 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Vol.I，pp.37-38.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p.330.

[3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s.910，1070.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792.

第十三章 叛乱

安妮·博林被处决之后，政治局势迎来了剧烈的变化。她的家族在过去10年间主导宫廷，但几乎在安妮被斩首的同时，他们就被取代了。西摩尔家族现在处于支配地位。亨利在第二任妻子被处死的当天就跟西摩尔订婚，在10天后的1536年5月30日，他们便正式结婚了。汉普顿宫以及其他王室宫殿的木匠们急忙开始将雕刻上的“HA’s”字样刮掉，换成“HJ’s”。[1] 克伦威尔同样急于抹除自己曾与被处决的王后结盟的痕迹，他现在对国王的新妻子大加赞扬，称赞简是“一位贞洁的小姐、真正的淑女，她的性情有别于他人，就像白昼有别于黑夜”。[2] 有趣的是他提到她的贞洁。虽然简的品行一向无可指摘，但克伦威尔是第一个如此强调她纯洁的人。他的目的无疑是在安妮的棺材上敲上最后一颗钉子：赞美新王后的美德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谴责前王后行为不端。

有证据表明克伦威尔还曾指使他最信任的侍从诋毁前王后的名声。安妮被处决的时候，亚历山大·阿莱斯正在伦敦，他在和宫廷成员用餐的时候，克伦威尔的一名侍从到场了，他“极其饥饿”并请主人给他些吃的。其他客人立即开始向他打听宫廷的最新消息，以及他是否为王后感到惋惜。“他回答的时候反问，为什么自己要为她感到惋惜？她已经暗中背叛了他（亨利），所以现在他公开羞辱她。因为正如她在国王为国事的重担操劳的时候与其他人纵情声色一样，他在王后被砍头的时候也在跟其他女人欢愉。”当震惊的众人命他闭嘴的时候，他反驳道：“你们很快会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我跟你们说的真相。”[3]

值得注意的是，刚成为寡妇的简·里奇福德在安妮被处决之后很快

回到宫廷，她提供的那些对丈夫的姐姐不利的证据对克伦威尔非常有用。或许有人认为，以她跟垮台的博林家族的密切关系，外加上她的证言让人质疑国王的性能力，她可能永远不会再在宫廷出现。但是，她不但没有跟丈夫一起受辱，反而被任命为新王后寝宫的一位侍从女官。几乎可以确定这得益于克伦威尔的影响力：他一直记得奖励那些行事于他有益的人。

与此同时，尼古拉斯·卡鲁爵士和他的保守派系意图通过恢复国王的长女玛丽（这时20岁）的正统地位以尽可能地增加他们的优势。但是克伦威尔无意让此事发生。过去三年里他成功地阻止了帝国大使促成此事的企图，并曾训诫后者，说查理五世的代理人们“像鹰一样从高空快速地捕捉猎物，并且（克伦威尔）猜测我方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将玛丽扶上继承者之位；但克伦威尔补充道，如果那真是我们所愿，‘我可以告诉您，这是没有可能的’”。[4] 玛丽象征的不只是国王的第一次婚姻，还有旧宗教的回归。作为一个忠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轻视克伦威尔的改革，并强烈祈祷英格兰尽快回归教宗的怀抱。如果她成为亨利的合法子女，这就将一举破坏克伦威尔辛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况且，他已经无意再推进卡鲁的大业：他们已经发挥了摆脱安妮·博林的作用。克伦威尔和卡鲁之间脆弱的联盟在她被处决后很快瓦解，而他们再一次成为对立的双方。

当玛丽公主被她的父亲邀请回宫时，克伦威尔一定感到十分警觉，玛丽的父亲“极为重视她”，并“把那位不忠诚的王后的很多珠宝都赐给了她”。[5] 与此相反，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则被关在房间里。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但克伦威尔在面对威胁的时候总是迅速采取行动。即便国王抱有任何恢复长女身份的想法，他的首席大臣也会向他说明这样做是怎样的不明智。毕竟，国王不愿意在这件引起国内如此骚动，并让他成为英格兰教会首脑的“大事”上出尔反尔，也不愿意在天主教欧洲诸国面前表现得像个傻瓜。相反，克伦威尔力劝君王必须让玛丽最终承

认父亲的至高王权。他又借机抨击对手，说服亨利指责卡鲁及其支持者，正是他们鼓励玛丽顽固地拒绝服从。

起初，玛丽拒绝接受王权至高原则，以遵从母亲的遗志。国王很快失去了信心，命令克伦威尔让她看清事实。两人有很多看似友善的信件往来，玛丽感谢克伦威尔“和善且友好”的来信，使他确信她“因您为我的付出和努力而感恩戴德”并说自己“对您的仁慈寄予厚望”。信末她令人同情地为自己“出言不善的信函”请求谅解，并借口说这是受到了“脑中泪水”的影响。[6] 然而，当玛丽继续毫不动摇时，这位恼怒的大人抛下了所有的友善态度，直白地告诉她“无论你身体如何不适”，也不是如此“顽固不化”的理由。他接着说，“坦白地说，我认为你是最顽固的女人”，并且严肃地表示如果她不遵从她父亲的意志，“我会把你当成最不知感恩、不近人情、顽固不化的人”。他又警告说她不仅应该感到“非常惭愧”，还应感到“同样恐惧”。[7]

正式摊牌的时刻终于来临。克伦威尔意识到这位桀骜不驯的年轻小姐不会听从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跟她截然对立的人，于是派诺福克公爵和萨塞克斯公爵威逼她服从。当她继续反抗的时候，他们野蛮地告诉她，“如果她是他们的女儿，他们会打她，并且拿她的头用力地撞墙，让它软得像烤过的苹果一样”。[8]

尽管她固执且坚持原则，但玛丽并非对政治形势毫无认识。她受到大使夏普伊的影响，夏普伊是她近7年来的朋友和知己，后者力劝玛丽暂时牺牲自己的原则，这从长期来看最符合她的目的。1536年6月15日，玛丽终于极不情愿地宣布服从。一封由克伦威尔起草、玛丽“逐字”誊写的信里满是谦恭顺从和请求宽恕的文字，她甚至要为拒绝承认她同父异母妹妹的地位道歉。“至于公主（我想我必须这么称呼她，因为我无意冒犯），我曾提出根据她的名字与地位称她为妹妹，但是被拒绝了，除非我愿意加上另外的头衔；我当时固执地回绝了这一要求，而

现在为此更加后悔，因为我那么做冒犯了我的父亲和他公正的法律；现在如果您认为合适，我将把她认作妹妹，除此之外不作他想。”[9] 克伦威尔相当满意地汇报：“我的玛丽小姐也是国王陛下最听话孝顺的一个孩子，她跟任何一位忠诚的臣民一样顺从。”[10]

玛丽妥协之后，她和克伦威尔的关系看似有所缓和。甚至有谣言称国王的首席大臣暗中计划迎娶她，这样他们的子嗣就有继承英格兰王位的可能。这个谣言始于这位公主府邸的一些仆人，他们告诉她母亲的前医师说他们担心国王会把玛丽嫁给一个英格兰人。这位医师将此汇报给夏普伊，夏普伊告诉他的主人：“他们甚至担心他（亨利）打算将她嫁给克伦威尔大人。”大使对此表示怀疑：“我无论如何无法相信（这则传言）；我认为即便她向他伸出了手，他（克伦威尔）也不会接受。”夏普伊又说：“在我看来，公主仆人们担忧与恐惧的唯一根据是自从他拜访公主回来之后，国王对他的秘书表现出极大的宠信。”[11]

不过两周后，夏普伊似乎改变了想法。他汇报说克伦威尔为公主也定制了一个金戒指，上面雕刻着她和她的父王，以及新任王后的肖像，周边刻着一圈拉丁语的题字。“克伦威尔想要以此为礼物送给公主，”大使说，“但是国王想要自己来送，因此克伦威尔不得不再去找其他的礼物。”[12] 克伦威尔选择赠送一枚戒指而不是其他更无伤大雅的首饰足以让夏普伊起疑。但是戒指上的拉丁文题字表明他更想把这个作为对她顺从的一个奖励，而不是爱的宣示，因为其内容敦促玛丽要对她的父亲尽显恭顺。一个月之后，克伦威尔又送给了她另一件礼物。8月20日，玛丽写信感谢他“送给我一匹健美的小马和一具非常精致的马鞍，为此我衷心向您致谢”。[13]

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表明克伦威尔曾妄想迎娶君王的女儿。虽然他无情无义且富有野心，但他毕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即使他曾对这样的婚姻抱有幻想，国王也极不可能批准：无论克伦威尔在宫廷的地位如

何攀升，他依然是一介平民。事实上，亨利阻止克伦威尔给女儿送礼物；这已表明他不可能欢迎这位大臣成为自己女婿的人选。而在几天后，宫廷因托马斯·霍华德勋爵（Thomas Howard）和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小姐的订婚丑闻而大受震动。作诺福克公爵的弟弟，霍华德在国王的外甥女玛格丽特小姐为自己的外甥女安妮·博林担任侍从女官的时候秘密向她求婚。在未得君主同意的情况下与有王室血统的人订立婚约是违法的，所以7月初消息一经传播，便在宫廷引起了骚动。愤怒的亨利下令在1536年《继承法案》的基础上再加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与国王的女性亲属“订婚、结婚或者让未婚者失去贞洁”的行为都是叛国。[14]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克伦威尔是不会冒着激怒君主的风险，谋划迎娶他的女儿的。

此外，玛丽本人也决不会同意与克伦威尔结婚。这两人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都截然不同：玛丽是一个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克伦威尔是主导修道院毁灭和英格兰脱离罗马的改革主义者；玛丽是亨利八世第一位王后的女儿，克伦威尔帮助国王以安妮·博林取代了这位前王后。正是因为克伦威尔，玛丽从王位继承人沦为非法的被放逐的私生女，为此蒙受了痛苦和羞辱。克伦威尔也十分反感玛丽，对她任何被视为冥顽不化之表现的行为都不由分说地进行卑劣乃至残酷的惩戒。在玛丽的母亲于1536年1月去世前，他拒绝让玛丽与她母亲相见。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又拒绝将凯瑟琳给女儿的一些小慰问品转交给悲伤欲绝的玛丽，一如夏普伊汇报的那样：“公主写信告诉我，自从克伦威尔跟我谈过之后，他以国王的名义写信给她，向她讨要王后生前曾下令在自己死后送给公主的那个小十字架。我以为那个十字架里含的金子价值不足10克朗，也没有任何珠宝点缀，但它含有一点真十字架[15] 的残片，为公主所崇敬。”[16]

尽管如此，根据克伦威尔自己的记述，他在幕后一直不断地默默努力，以让玛丽的父亲恢复对她的宠爱。1536年2月，他向夏普伊保证自

己已经为玛丽争取到了很多，“并乐意尽己所能为她效劳”。玛丽自己承认“克伦威尔对她的善意，以及他一直以来为她的福祉和解决她的事情所做的努力”。克伦威尔对玛丽的同情甚至招来了君主的怒火。1536年7月1日，夏普伊汇报说：“因为克伦威尔与我讨论公主的事情，并对她表示同情，国王一直在生气，克伦威尔本人也几乎面临性命之忧。事实上，按克伦威尔事后告诉我的说法，在接下来的四到五天，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在适当的克制之下，首席秘书后来避免了在与夏普伊的谈话中称玛丽为公主，并“要我在指代她的时候也不要使用这个词”。[17] 克伦威尔可能有些夸大其词，甚至为了赢得夏普伊的好感虚构了亨利的怒火，因为与此同时，他正在跟君主一道应对英格兰民众因玛丽得到的糟糕待遇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克伦威尔曾为国王的这位长女求过情，那也只是发生在他努力争取玛丽服从父王的时候而已。但这也只是为了推进他的改革，而不是为了保护玛丽的地位。或许他对这位丧母且体弱多病的年轻女子由衷地怀有一些同情，但这从未让他忽视亨利宫廷严峻的政治现实。认为克伦威尔计划娶她的看法依旧是极不可能成立的。不过这两人之间有婚约传闻这一事实也体现出在外人看来克伦威尔在宫廷的地位有多么尊崇。

克伦威尔1537年2月的账本中有一处记录暗示了他完全知晓这些传言，并拿它们开玩笑。克伦威尔向偶尔在他和玛丽之间充当联络人的托马斯·赖奥思利支付了15英镑“因为大人是她的情人”。[18]

在与亨利长女之间的矛盾暂时告一段落之后，克伦威尔又被要求处理国王的幼女。父母婚姻的无效让伊丽莎白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私生女，克伦威尔准备正式确定这一点。7月的第一周，议会废除了宣告伊丽莎白为国王合法继承人的法令，克伦威尔之后不久向加德纳汇报说：“前公主伊丽莎白小姐还被议会宣布为私生女。”[19] 这位早熟的小女孩还差两个月才满三岁，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变化。“老

师，为什么，”她对约翰·谢尔顿提出有名的一问，“为什么昨天我还是公主，而今天却成了伊丽莎白小姐呢？”[20] 不愿再想起安妮·博林的父王亨利显然决心要将他们的这个女儿抛在脑后，并将其排除在继承顺位以外。

但伊丽莎白并非完全没有支持者，克伦威尔本人似乎也对这位丧母的孩子有一些同情。一听说这个小女孩被宣布为私生女，她的女家庭教师玛格丽特·布赖恩夫人便愤怒地给这位首席大臣写了一封信。她愤然抱怨没有人有心将伊丽莎白的新身份告诉自己，她在承担管教这个可怜女孩的重责时也得不到来自枢密院的指示。她说得有理。虽然伊丽莎白的仆人们负责抚育她，但他们一直定期从枢密院获得关于她的一切事务的指示，从应该怎样照料她到应该在何时给她断奶。克伦威尔要亲自考虑这些事务，也着实证明了他对宫廷事务各个方面的掌控。虽然他应当关注一个王位继承人的抚育问题，但一个私生女的抚育则不然。

然而布赖恩夫人不是一个愿意忍气吞声的人。“现在我的小姐已失去了从前的身份，至于她现在的地位如何，我无从确证，只能道听途说，”她的信件如此开头，“我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她，也不知该如何自处，更不知道该怎样管理她的男女侍从们。”玛格丽特夫人已有8年多照管国王子女的经历，她不可能对抚育伊丽莎白如此没有头绪。但她决定要表明自己的观点：不论她父亲现在对她有着怎样的厌恶，伊丽莎白不能就这么被忽略了。布赖恩夫人接下来逐渐进入正题，抱怨她的小主人几乎没什么衣服可穿。过去，她母亲定期送一些量身定做的华丽衣裙和首饰过来，以满足女儿的着装需求。但如今这个供应已经永久停止了。布赖恩因此向克伦威尔请求道：“我恳求您对她和她的仆人好一些，她有衣服，但是没有长袍、裙子和衬裙，也没有亚麻罩衫、方巾、套袖、睡衣、紧身内衣、手帕、围巾和睡帽。我已经尽可能地填补小主人所有的短缺，但我今后恐怕无法坚持下去了。”[21] 很难相信在短短两个月里，伊丽莎白的身体发育已经令她的所有衣服不再合身。但她的女家庭

教师仍决心用这一点表明自己的看法。

信的剩余部分记录了一连串针对其他问题的抱怨，包括伊丽莎白乱作一团的家政。三餐不再按恰当的礼仪奉上，小女孩的饮食不再受严格的监管，以至于她甚至能在餐桌上自己拿酒喝。布赖恩夫人在信件结尾的语调变得柔和起来，或许是希望能够博得克伦威尔作为一个父亲而不是一名官员的同情。“我的小姐受严重的牙痛之若，”她写道，“这疼痛发作得很慢。”她接着称赞伊丽莎白懂事且早熟，称她是“我所见过的孩童当中性格最温和的”。她保证如果这个孩子有可能在特殊场合“被放到外面”（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一定不会辱没国王和她自己的荣耀”。在结尾部分，布赖恩夫人“为自己如此口无遮拦写下的一切”表达了真诚的歉意，结束了这封信。[22]

克伦威尔或许曾为自己不得不卷入这种琐事感到恼火，但在收到这封信后不久，这些可能的情绪肯定也很快被他抛诸脑后。他以一贯的高效率迅速解决了布赖恩夫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文献记录中再没有出现对衣物的要求，表明这个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克伦威尔还因约翰·谢尔顿在用餐时间纵容不合礼仪的举止而警告了他，从那之后伊丽莎白开始按布敕恩夫人的要求独自用餐。克伦威尔在有更多要紧的事情要处理的时候仍费心安排这种事，或许不只是体现了他对细节的关注。克伦威尔可能对伊丽莎白感到一些同情乃至愧疚，因为她之所以身处这样糟糕的境地——失去了母亲，被父亲疏远，并被宫廷的其他人完全遗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

但是克伦威尔很快就有了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其中首要的是粉碎卡鲁及其支持者们的影响力，他们威胁要破坏克伦威尔的改革，因而危及他的地位。克伦威尔将威廉·菲茨威廉和埃克塞特侯爵以及其他保守派成员赶出了枢密院。卡鲁比较难以排挤，因为他一直受国王宠爱，但是克伦威尔愿意长期作战。他开始逐渐削弱卡鲁在国王寝宫的优势，

指派自己圈子里的人员——拉尔夫·萨德勒、菲利普·霍比（Philip Hoby）、彼得·缪蒂斯（Peter Mewtis）和安东尼·丹尼（Anthony Denny）——填补那些因安妮的丑事被牵连的人留下的空缺。这些人在宫廷的各个岗位上辅佐克伦威尔已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忠实的福音派信徒，甚至是这一派别中的激进主义者。他们的任命是克伦威尔刻意而为的结果，目的是让亨利身边充满他改革事业的支持者。

克伦威尔任命人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的出身。虽然他们的前任都拥有贵族出身或贵族人脉，但是这些人的出身一点也不“高贵”。和他们的恩主克伦威尔一样，这些人都是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才能和勤勉而不是贵族血统脱颖而出。看起来，克伦威尔是要在宫廷掀起一场社会革命。他这么做惹恼了卡鲁、诺福克和其他主要的保守派，他们本已厌恶宫廷中有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存在，而现在则要面对一群。

国王本人显然乐于欢迎这样一群陌生的新侍从到他的宫廷来。但他的友善并非没有限度。当克伦威尔试图指任他的另一位门下弟子理查德·莫里森到国王寝宫的办公处时，亨利拒绝了。莫里森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被收入沃尔西在牛津创立的枢机主教学院，随后在帕多瓦大学学习，他在那里成为马基雅维利思想和路德教义的信奉者。克伦威尔注意到他的潜力，并招募他做自己在意大利的代理人，他从当地发送时事汇报和情报。虽然他乐于服侍克伦威尔，但他只能从这份工作中获得很有限的物质回报，因此他写信要求返回英格兰，说：“那个帮助全英格兰脱离教宗暴政的人已经承诺要帮助莫里森脱离贫困。”[23] 克伦威尔判断现在是时候将他引荐给国王了，于是在1536年5月适时地把他召回宫廷，并且在国王寝宫为他谋得一职，但是亨利并不喜欢克伦威尔推荐的这位新人。虽然他愿意接纳出身卑微的人，但他们至少得是好的伙伴。而莫里森看起来并不是这样的人。“只要我一在宫里就会脸红”，他向他的侍主埋怨道。[24] 克伦威尔并没有因为国王拒绝自己的一个忠实的门徒而气馁，他最终成功地让亨利认识到这个年轻人的才能，并让他进入

了国王寝宫。三年后，当克伦威尔获得国王寝宫的主导权时，他大获全胜。

在安妮被处决之后，克伦威尔熬过了艰难的几周，最终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克伦威尔统管一切”，雷金纳德·波尔在6月8日说。[25] 6月18日，安妮·博林进退失据的父亲托马斯爵士让出了掌玺大臣的职位，这一职位在两周后由克伦威尔接替。随后在7月6日，他成为温布尔顿的克伦威尔男爵，并在12天后被授予爵士头衔。被提拔为贵族一定让这个来自帕特尼的铁匠的儿子心满意足。无论他在宫廷获得了多大的影响力，在这之前没有头衔的他易受来自宫廷贵族对手们阴谋诡计的攻击和嘲笑。现在他即便不靠出身，也可以在名义上以对等的立场与他们打交道。随头衔而来的是房产。虽然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已经有了一处相当宏伟的新宅邸，还有在大法官巷上的房产，以及紧挨着泰晤士河、位于格林尼治和威斯敏斯特之间的一处房产，但根据1536年4月夏普伊的记录，[26] 国王赐给了克伦威尔“一栋非常精美的房舍……家具齐全”，首席大臣已经在那里接待了重要的宾客。大使以一种罕见的宽容笔调评论道：“鉴于克伦威尔至今为止做出了很多贡献，无论是爵士头衔还是下赐给他的房产和地产，当然都是他应得的。”[27]

看起来一切尽在克伦威尔的掌握之中。夏普伊大使置克伦威尔早前的人情于脑后，埋怨这位秘书现在控制着所有接近国王的渠道，并特意截留或者误传那些跟自己的目标不相符的信息。7月23日，他向查理五世坦言说自己担心“克伦威尔可能不会让他（亨利）知道我着急求见”。[28] 克伦威尔还向那些请求拜见的人传达国王的口谕，并无疑在其中加上了自己的诠释，以满足自己的目的。他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西班牙编年史》称：“这个克伦威尔的权力甚至比曾经的枢机主教还大，众人（即枢密院）顺从他就好像他是国王一样。”[29]

在成功排挤了自己的对手之后不久，克伦威尔新获得的权力和提拔

又加剧了他们心中的愤恨。“国王给他的恩赐和宠信给他带来了如此众多的敌人”，撰写关于克伦威尔生平的剧本的作者如是说。[30] 此时宫廷中有越来越多保守派的人决心要铲除克伦威尔，并视他为一切麻烦的始作俑者。克伦威尔充分意识到他们的敌意，但他的回应一如既往，还是继续发起攻势。他对过去三年间由自己主导的巨大的宗教变革还不满意，现在决心要掀起更加野心勃勃的改革。

议会于1536年6月8日召开，该次议会除了通过承认王后简的子女对王位之继承权的《第二继承法案》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事务。紧接着是教士会议，这场会议要讨论的事务相比之下可谓繁多。克伦威尔本人在这场会议上出席了几次，他的世俗代表威廉·彼得博士与克兰默合作，强调至高王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曾受命领导一批学者在经文中寻找国王离婚理由的爱德华·福克斯博士（现已成为主教）带领了一个使团访问了萨克森的路德宗诸侯，目的是建立一个宗教政治联盟。虽然谈判失败了，但是他们启发了一系列福音派的提议（又被称为《维滕贝格论纲》），由福克斯在归国之后呈给教士会议。虽然有克伦威尔和克兰默的强力支持，但是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提议都太过激进，因而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国王几乎没有采取什么促进克伦威尔宗教改革的行动。当改革为他甩掉凯瑟琳并与安妮结婚的目标服务的时候，他乐于支持克伦威尔的改革，但他从未真心支持改革，且依然倾向保守主义。他试图在两派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但这只制造了更多的困惑，并同时给双方以将君主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希望。最终，在克伦威尔的大力劝说下，他同意为论纲中的十项宗教条款提供支持。这些条款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略微有些福音主义色彩。为了满足像克伦威尔这样的激进分子，这些条款质疑了一些长期受到信奉的天主教教义，比如炼狱，提出传统七大圣事中只有三项构成救赎的必要条件，并将“信”与“义”写在一起。[31] 但这些条款依旧鼓励使用与“旧宗教”密不可分的图像和仪式，并继续主张基督的身体

和血在圣餐仪式中的真实存在。或许是在受挫的克伦威尔的坚持下，教士会议在几天后同意了这些条款，并颁布了一项法律废除了一些圣日。

1536年8月这些条款被刊印，随后克伦威尔快速散布了要求强制执行这些条款的指令。他利用强制令规定神职人员必须执行所有教士会议的决定，并“如实地履行并遵守……本王国为彻底废除罗马主教在本王国内的所谓职权和管辖权，并确立国王作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在本王国内的权威和管辖权所制定的每条法律和法规”。序文清楚地表明了克伦威尔自身权力的范围，因为序文这样称呼他本人“托马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男爵，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的掌玺大臣和代理总教监，致王国内陛下辖下的所有教会”。

为了壮大那些认同新宗教并反对教宗权威的人的势力，克伦威尔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学术研究。在他于1536年向神职人员发布的指令中有一则要求学院和大学增加奖学金的名额，“以产生更多有学识的人”。[32] 他甚至对儿童的宗教教育做出了规定，敦促“家长和家庭教师们要教育那些受他们照料的孩子，或者让孩童从婴儿时期开始使用母语主祷文、与我们信仰相关的经文以及十诫，并让他们时常复习和领悟这些内容”。他对细节的关注令人惊异。或许是援引自己教育子女的经历，他建议教区牧师“每天诵读上述主祷文、经文或者诫命的一节，第二天诵读另外一节，直到全部内容逐渐被掌握和理解”。他说这将有助于确保儿童在未来成长为诚实、勤恳的人，让他们愿意刻苦努力以在世界上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像他本人一样。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克伦威尔似乎十分注重根除教会内部的贪腐和职权滥用行为。他在针对修道院的运动中见到了足够多的反面例证，这让他产生了要建立一个纯洁、神圣、焕然一新的英格兰教会的想法。他告诫神职人员不要“经常光顾或在客栈和酒馆逗留”，相反要在闲暇时“诵读或聆听经文，或者进行一些诸如此类的宗教活动……要让他们

始终牢记自己对生活之纯洁的追求超过他人，并应让他们在外人眼中成为良善而有信德之生活方式的榜样”。[33] 宗教改革已经不只是克伦威尔获得权力的一个途径，而是他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表现。

接下来，克伦威尔越权命令每个教区的教堂都要同时提供英文和拉丁文的《圣经》——虽然教士会议还没有同意这一点。他还用比十诫更尖锐的言语抨击圣人崇拜以及对画像的使用，这些举措在结果上激起而非平息了民众对宗教改革的反抗，克伦威尔对此知情，但依然不屈不挠。夏普伊记录了克伦威尔就“英格兰教士集团（克伦威尔自己如此称呼他们）因他试图推翻天主教会僭政、改革神职人员体系而对他怀有的强烈憎恨”所发出的抱怨。[34] 他在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批评上越来越直言不讳，并曾在某次会面时因少见的情绪爆发而让大使感到惊讶，“他开始对所有教宗和枢机主教发怒，说希望这群人尽快灭绝，这样人们就可以摆脱他们厌恶的人和专制”。[35]

决心消灭一切反对力量的克伦威尔毫不犹豫地使用酷刑，以让那些被他的眼线发现仍然效忠于罗马的人招供。1536年9月他给自己的代理人吉尔伯特·塔尔博特（Gilbert Talbot）和约翰·罗素写下了详细的指示，这两人此前曾向他汇报了伍斯特郡克罗利教区牧师“不道德的通信”。克伦威尔怀疑这个牧师可能是一个牵涉范围更广的“教宗制信奉者”团体中的一分子，于是敦促道：“你们当用尽一切手段引他说出自己是否认识任何有意支持，或在条件允许时会倾向于（亲罗马教廷之）立场的人，倘若好言相劝不能令他就范，你们可用任何已知的手段对他施加痛苦以获得口供。”[36] 这是一个怀疑和偏执的时期，但是克伦威尔有理由感到害怕。除了迫害——可能还有折磨——已知的反对者之外，他还加强了他的线人网络，这样他就能迅速发现任何反抗的风声并进行处理。之后的一个月里，他写信给托马斯·巴特勒：“希望你在这个不稳定的时期保持警惕。”[37]

同时，克伦威尔依旧继续有计划地解散较小的修道院。虽然它们的居留者理论上都被迁到了另一个宗教场所，或得到了供养自己的抚恤金，但如果他们不选择继续宗教生活，那么抚恤金就会被收回。其他宗教设施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安置他们。很多曾经的修道士和修女因此陷于贫困。在一封写于1536年7月的信中，夏普伊描绘了他们可怜的命运图景："看到众多修道士和修女被赶出修道院，不幸地在各处辗转流离、寻找生计，是一件令人哀伤的事情。几个可靠的人告诉我，由于很多修道士、修女和其他人等赖以为生的修道院遭到解散，有超过2万人不知道如何生存。"[38]

与之相对，克伦威尔继续从解散中获利。就像上一个10年里为了沃尔西第一次担此重任的时候一样，他坚持了自己的策略及承诺，在修道院院长付给他适当费用之后便保留该处设施不将其拆除。因此，1536年9月他写信给诺福克圣费思修道院的院长，指出虽然后者的修道院位列国王选定应被解散的修道院名单当中，但这处修道院因为克伦威尔的"努力"得以挽救。因此他请修道院院长思量一下自己为了他经历了怎样的麻烦，并暗示希望得到酬劳。接下来一年里他以相似的风格写信给诺福克考克斯福德修道院院长，请后者借40英镑给他以作为回报："我会让你脱离危险。"[39]

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加上对那些因此失去家园和生计的修道士的普遍同情，克伦威尔做了一个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尝试，把解散运动包装成一个可协商的活动。在一封收信的修道院院长姓名不详的信中，克伦威尔强调除非居留者心甘情愿地同意，国王无意解散任何一个修道院：

> 鉴于少数宗教场所的某些管理者和成员近期自由、自愿地服从陛下的管理，陛下命令我作为你的依靠及出路，并为了特定的事宜代表陛下通知你，除非那些顺从的宗教场所主动做出表示，否则陛下是不会接收的。无论如何，陛下无意烦扰你或者解散任何尚存的宗教场所，除非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决心反抗或者放弃继续存在的权利。

不过，他又说如果一个修道院的居留者一致抵抗的话，“他们会遭受除居所和财产以外的其他损失，即失去他们的生命”。[40]

抗议很快演变成公开的叛乱，其焦点不是国王，而是新改革的设计师——克伦威尔。平民出身的克伦威尔竟握有如此之大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力造成如此有破坏性的效果，这些事实都在反对者当中煽动起不满的火焰。一首流行的民谣公开谴责“克伦威尔、克兰默和理查德·里奇”并祈祷“上帝管教他们”。[41] 虽然克兰默和里奇也被卷入，但民众的憎恨还是集中在克伦威尔身上。一些叛乱者要求恢复修道院，另一些要求取消过高的税收，但是所有人都要求处死克伦威尔，他们认为克伦威尔一人当为他们的痛苦负全责。当时发表的一份声明鼓励每个郡的平民“在死亡的痛苦中站起来”“打倒克伦威尔这个异端”。[42]

1536年10月1日，林肯郡劳斯的教区神父托马斯·肯德尔（Thomas Kendall）利用周日布道，公然反对第二天要来到本镇的克伦威尔代理人。有传言称这些人打算强行搜查所有的地方教会以及修道院，抢夺贵重物品并扔掉所有的装饰品。传言像野火一样扩散，几天内林肯郡北部的居民几乎全都起来反抗。据说克伦威尔一名委员的厨师被绞死，另一个委员则被以尤其野蛮的方式谋杀：“因为掌玺大臣的一个仆人责备他们处决那个厨师，他们抓走了这个仆人，用一张刚剥下来的牛皮裹住他，让他被狗攻击、撕咬，并且威胁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的主人。”10月7日夏普伊汇报说“很多人起来反抗国王的专员们”，而且“他们的人数估计约有1万人，一些人估计得多，另一些人估计得少；不过从回击他们的准备来判断，叛乱者的数量一定很多并且在不断增加，因为国王命令每一个有身份和有影响力的人准备好动员自己的兵力”。[43]

亨利的确迅速采取了行动。他命令贵族们提供人力和武器以镇压叛乱，并派萨福克公爵前去平定该郡。同时，克伦威尔命外甥理查德从伦敦塔那里收集弓箭和其他武器，并派一批人前往林肯郡。亨利又召回了

诺福克公爵，这是恐慌已在宫廷扎根的证明。据夏普伊说，这之前不久诺福克被遣送离开宫廷——显然是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之下。“他（亨利）派人请回诺福克公爵，尽管这非常违反常规，因为他因克伦威尔的提议对诺福克多少有些生气，而且据说诺福克几乎已被宫廷放逐，但因为紧急需要又被召回。”虽然迫切想通过支持对叛乱的反击以重获国王的宠爱，但诺福克私下赞同叛乱者，并庆幸他们的叛乱会给他最大的对手带来损失。夏普伊报告说：

> （卡莱尔的）主教告诉我公爵并不是很在意上述叛乱并相信局面不难挽回，说叛乱者不会超过5000人。主教还派人跟我说他从未见过公爵像今天这样开心，我把这归因于他与国王的和解，或者是叛乱报告本身给他带来的快乐，他觉得这场叛乱会为他的对手克伦威尔带来灾难，因为一切责难都针对他，叛乱者也要他的人头；这场叛乱还有可能是阻止教堂拆除运动和宗教事务改革的途径，而这些改革不合公爵的心意。公爵就是因为在这些事务上表达了自己的部分看法才招致国王的不悦。

不过，这位狡猾的大使意识到，诺福克对旧宗教的偏爱并不会优先于他的政治野心：“公爵是我曾在写给虔诚的大人（克林顿男爵）的信中提到的那些在形势需要时愿意维护教会事业的人之一，不过鉴于他的反复无常，克林顿男爵并未特别仰仗他。”[44]

虽然叛乱的消息让克伦威尔恐慌，但是他并不打算让对手利用这场叛乱。因此他让国王相信公爵应该留在诺福克而不是来到宫廷。一封信被即刻送往公爵的乡下宅邸，命令他派自己的儿子来宫廷，这让诺福克大怒。他抱怨国王的信是“寄到他手中的最让他沮丧的信”，并抗议称自己“不会做任何约束本地民众的举动，国王召见的时候也不会去”。在针对克伦威尔的辱骂中，他强调自己不会“在其他贵族都到国王那里或他敌人那里的时候像一个守法的人一样静坐。除非他周二晚上再收到信，否则他宁愿朝敌人前进，尽管随身只有40匹马，但自己也不愿如此羞辱地待在家里”。[45]

林肯郡的威胁迅速被清除，但是在北部六郡境内很快爆发了新的叛乱，这些地区在英格兰离伦敦的宫廷最远，也一向最难控制。叛乱者的头目是一个名叫罗伯特·阿斯克（Robert Aske）的独眼的约克郡律师，他很快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一份报告称有5000人举兵反抗国王。[46]不久后，北方贵族的成员也参加了叛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托马斯·达西（Thomas Darcy）。他们的举兵后来以“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之名为人所知。

这是亨利八世在位的27年里面对的最大威胁。但是看起来国王低估了危险，他最终召回诺福克公爵，命令他快速赶往约克郡并武力镇压叛乱者。然而，公爵意识到了君主所没能意识到的：叛乱者的数量远超过了王室军队的数量。因此他与叛乱者议和，承诺国王会倾听他们的申诉。紧接着是暂时的和平，但停战条款几乎完全满足了叛乱者的要求，整个冬天英格兰北部仍在他们的控制下。

整个叛乱过程中，克伦威尔安然留在宫廷。考虑到他是叛乱者怒火的焦点，毫无疑问，如果他和同僚冒险去北方，叛乱者会毫不犹豫地当场杀掉他。即便在宫廷，克伦威尔似乎也保持低调，他的通信中极少提到叛乱。只有在一封写给斯卡伯勒城堡代理治安官拉尔夫·厄尔（或埃弗斯）（Ralph Eure or Evers）的信中，他使用了好战的语气鼓励后者对国王忠诚。克伦威尔感谢厄尔目前为止忠诚的服侍并向他保证：“陛下现在已将一切准备就绪，如果这些人继续叛乱，不用怀疑，你会看到他们被降服，他们以身试法的下场会让所有臣民胆战，世事会继续如常。”尽管充满了无畏的情绪，但是这封在威斯敏斯特安全地带写的信缺乏说服力。同样，当克伦威尔试图制止在法国流传的一则声称国王的军队又弱又不忠诚且叛乱平息是因为一份可耻条约的谣言时，没人听得进去他的话。[47]克伦威尔也没有挽回他的外甥理查德，他因同情伦敦民众的叛乱而挣扎着遵照指示从伦敦塔调用武器和人力。只剩下好战的诺福克和萨福克公爵抓住了主动权，并从中赢得了荣誉。

作为议和的一部分，诺福克承诺安全护送罗伯特·阿斯克到伦敦，这样后者可以亲自向国王表达他们的苦楚并请求宽恕。《西班牙编年史》描述了叛乱者和君主之间的会面。“国王一看到他就起身，并将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上，用所有人都可以听到的声音大声说：‘欢迎我的好阿斯克。我希望在这里，当着枢密院众人的面，你说出你想要的，我都会准许。’阿斯克回答说：‘陛下您将自己置于一个叫克伦威尔的僭主的支配下。每个人都知道要不是他，与我一起的7000名可怜的教士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落破的、流离失所的人。’” [48] 国王答应阿斯克将完全补偿他们的不满，让他开开心心地离开了。但是1537年年初，当北方再次开战消息传到宫廷时，亨利改变了主意，下令抓住阿斯克并把他带到伦敦塔审问。他被判叛国罪并被带到约克，在那里的城墙上被吊死。

一场新的叛乱是由出身较好、在沃尔西府邸长大的弗兰西斯·比戈德（Francis Bigod）领导的。这次，国王的镇压命令得到成功执行，亨利接下来便以比戈德的背叛为借口报复叛乱者。他将倾听他们苦楚的承诺抛在脑后，下令处决超过200名叛乱者成员，以儆效尤。他还下令将头目带回伦敦审问。

当叛乱者们被审问的时候，他们表达了对各种事务的不满之情。他们最强烈的抱怨是针对克伦威尔1536年年初令议会强行通过的《用益权法》（the Statute of Uses），它重新定义了土地赠予（或转让）的条款，保护了王室领地权利。这项影响深远的（且对平民并不特别有利的）法令几乎可以确定是克伦威尔的主意：他在前一年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它。 [49]

不过叛乱者最大的抱怨还是针对修道院的解散，而且他们确信谁是罪魁祸首：那就是国王“邪恶的顾问们”，其中首推克伦威尔。他们对克伦威尔的憎恨程度非同寻常。克伦威尔摧毁了他们热爱的修道院，夺去了令人宽慰的旧宗教习俗和仪式，并（在他们看来）威胁到了他们珍视

的一切。在1527年4月19日的审问中，受审的达西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他当面告诉克伦威尔："这些叛乱和痛苦最初都因你而起，同样也是你让那些贵族和每日勤恳辛苦劳作的人对我们心生恐惧，要消灭我们、砍掉我们的头，我相信要么你死，要么你让王国所有贵族的头都被砍掉，否则只要有一人存活，他就会砍掉你的头。"[50]

简短的一段话表达了民众对国王首席大臣极深的怨愤和憎恨。是他而非亨利毁坏了英格兰的社会结构。他是一个独裁者，会砍掉任何胆敢反对他的人的头。而且——或许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平民，攀升到一个远非他生命中应当达到的位置。达西澄清：有"我们这样的贵族"（因此有资格得权），也有像克伦威尔一样的人，而他们应该待在贫民窟。克伦威尔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嘲讽，所以无疑会对这一则最新的嘲讽不予理睬，像打掉一个惹人厌的苍蝇一样不放在心上。但达西最后的话还是让他一阵冷战，因为他太清楚这句话的精辟之处了。他见过自己的君主是怎样无情地除掉他身边那些地位看似不可动摇的人：枢机主教沃尔西、亨利·诺里斯、安妮·博林，头衔、宠爱和晋升都化作乌有。国王可以在第一天轻拍你的后背，但第二天就砍掉你的头。克伦威尔知道，或许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但这并没有什么影响：他的命运现在已经跟君王密不可分地绑在了一起。

虽然在镇压叛乱一事上帮了忙，但是诺福克公爵内心又有些希望这场叛乱能够成功。他有把握地预测这会为克伦威尔带来毁灭。据夏普伊说，这位公爵希望叛乱"最终会造成他的竞争者和敌人克伦威尔的倒台和覆灭"。[51] 不过，《西班牙编年史》描述了亨利如何坚定地站在他的首席大臣这边。"当尘埃落定的时候，亨利对克伦威尔说，'克伦威尔，看起来，国人不如我那样了解你。任何伤害你的人也都是在伤害我'。"然后克伦威尔感激地跪下并亲吻君主的手。尽管近来遇上一些麻烦，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得到亨利重用，这点被查理五世记录下来。他在1537年2月说"克伦威尔大人"是"现在最受（亨利八世）倚重的人，而且

对君主有极大的影响力”。[52]

---

[1] 他们并没有国王希望的那样仔细。汉普顿宫大厅依然可以看到一些旧的“HA”标志。

[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1；*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29.

[3]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329.

[4]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20.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973.

[6]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246-247；Vol.III，p.13.

[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110；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7-18.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24.

[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186；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250-259.

[10]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1.

[1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Spain*，*Vol.V*，*Part II*，p.198.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148.

[13]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261.

[14] Perry，M.，*The Word of a Prince*（London，1990），p.23.

[15] 基督教圣物，据信为耶稣受难时的十字架，基督教世界有多地宣称保有该圣物的部分残片。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351.

[1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p.183-186.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1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1.

[20]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Rutland I*，p.310.

[2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p.190，no.479.

[2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p.190，no.479.

[23] BL Cotton MS Nero B vi，fo.135r.

[24]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London，2002），pp.97-98.

[25] Mayer，T.（ed.），*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Volume 1：A Calendar，1518-1546*（Aldershot，2002），p.98.

[26] 这指的是夏普伊1536年4月21日写给查理五世的一封信。*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99.

[2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699；*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198.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147.

[2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36.

[30] Anon.，'The 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Lord Cromwell'，in *The Ancient British Drama*，Vol.Ⅰ（London，1810），p.368.

[31] 法案支持的三大圣事是洗礼、圣餐和忏悔。

[3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42.

[3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5-29.

[34]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500.

[35]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27.

[3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30.

[3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35.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42.

[3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31-32，49.

[40]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31-132.

[4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786（3）.

[4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no.163.

[4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576.

[4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576；*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268.

[4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601.

[46] *LP Henry VIII* Vol.XI no.714.

[4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36，40-41.

[48]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35.

[4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Vol.I，p.137；*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I，no.892.

[5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no.976.

[5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no.268.

[52]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36；*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I，p.313.

第十四章 “一些适当的处罚”

克伦威尔非但没有对“求恩巡礼”事件中爆发的广泛反对情绪吓到，反而变本加厉地推出了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叛乱平定之后不久，克伦威尔就开始行动，着手处理北方各郡的特权。尽管他没有取缔当地多年来享有的全部特权、让当地人对王室权威和司法毫无招架之力，但是他确实通过议会的法案和修道院解散运动大大削弱了当地的司法特权。修道院以前拥有很多特权，这在杜伦主教领（the palatinate of Durham）尤其显著，在克伦威尔的改革发起前，政府对当地的司法管辖权已有名无实。

在正式措施之外，克伦威尔还派拉尔夫·萨德勒监督英格兰北部的地方贵族。他让自己的秘书特别关注珀西家族，并留心收集可供批捕他们的证据，因为他们颇有权势，并被国王怀疑为叛乱的发起者。一向勤勉的萨德勒很快送回了关于贵族和平民之间传出的煽动性言论的汇报。他还坐实了国王对珀西家族的怀疑。第六代诺森伯兰伯爵（也是安妮·博林曾经的追求者）的弟弟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因被发现参加了比戈德的叛乱而迎来了死亡的判决。1537年他在泰伯恩被处以绞刑、取出内脏并被分尸，他的伯爵哥哥也在同年去世。克伦威尔饶有兴致地汇报称他们“极其忘恩负义、恶意满满、十恶不赦，对如此良善、宽厚、仁慈的陛下犯下叛国罪”，对此只有这样的处罚足以相配。“看到他们不怀好意、屡不悔改的心，他（亨利）只能让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1]

珀西兄弟的死给了克伦威尔进一步强化王权支配的机会。第六代诺

森伯兰伯爵没有留下亲生的继承人，而且因为跟兄弟们不和，所以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归于国王名下。克伦威尔充分利用这一大笔财产，指派当地贵族中有能力且忠诚的人作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边境领地的代管者。他还从国王那里求得一笔年金，用来进一步收买边境几个区的忠心。同时，萨德勒因忠心的服侍得到奖励，被提拔为大法官法庭首席书记（或首席书记员），并且在枢密院有了自己的席位。

萨德勒在枢密院的任务无疑是要削弱诺福克的权势，并根除叛乱之后北方残余的反对势力。克伦威尔决意不让公爵利用这个有重大职责的职位：他已经从这场叛乱中获得了太多相对于政敌的优势。因此在1537年5月，克伦威尔给诺福克公爵送了一份长且详尽的备忘录，以表现出他对后者之行动的指导地位。尽管国王的武装力量中没有他的份，克伦威尔急于证明自己跟公爵一样无情，指示后者对叛乱者的家人和支持者实施极为残酷的惩罚。他命令叛国者的妻子、母亲和姐妹不得解下并埋葬他们亲人的尸体，因为这些示众的尸体是对其他想要叛国之人的警告。他又说“总的来看，这些恶劣行为不能被宽恕，需要受到一些适当的处罚，陛下要求您……尝试并找出那些主要的起事者与见机追随者，一旦他们犯事并被逮捕，就应根据他们犯事的性质量刑处罚”。[2]

虽然在表面上克伦威尔正在毫不懈怠地处罚反对者并推进改革，但是私下里越来越常发作的不适症状折磨着他，他的健康问题可能因近来的压力而有所加重。在1537年2月到1538年7月之间，他五次请医生前来诊疗，其中包括“医师”和“药剂师”，并为此花费了不少金钱。和他的君主一样，克伦威尔也为一条腿上的疼痛所扰，这一疾患无疑因他不断增大的腰围而恶化，使他走路时呈现一种摇摇晃晃的笨拙步态。他的账本表明他后来不得不利用两只凳子来“放大人的腿”。[3]

尽管克伦威尔经常受身体不适之苦，但他没有因此放缓工作的速度。1538年，克伦威尔着手改革北方事务院（Council of the North），

这是爱德华四世建立的一个行政机构，意在对当地施行更大的管辖权。进入都铎时代，这一机构的权力已经衰弱，不敌势力过于强大的北方贵族。不过克伦威尔意识到北方事务院有在北方作为王权象征的潜力，因此他让对君主忠诚的人填满了这一机构的职位。为了阻挠诺福克公爵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安排的人选大多出身卑微。国王显然已经被克伦威尔的身体力行说服，相信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出身卑微”的人才都能和在传统上垄断了政府职位的社会顶层人士一样有效地服侍他。这让诺福克生厌。“王国里有了更多可恶的盗贼和杀人犯，”他嘲讽道，“这会令平民议论纷纷，以为陛下乐意花钱雇佣罪大恶极的家伙安然霸占政府要职，而不对他们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予以追究。”他总结说：“边境不能靠这些卑鄙的人约束，而是要由具备贵族身份的人来管理。”[4]

克伦威尔并未因此退缩，他将北方事务院重组为一个永久性机构，并和每个成员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样一来，他成功地将事务院变成了王室司法和宗教改革的一个高效的执行机构。诺福克继续抱怨，并在数月之后与克伦威尔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执。最终，国王出面制止了这场争吵，他告诉诺福克：“我相信你终将欣然承认我们在那里（北方）建立的井然秩序，并出于好意让其他人也这样看待。因为我们肯定不会再陷入被那里的贵族服侍的不得已的境地，相反服侍我们的将是那些身份地位由我们指定的人。”[5] 亨利释放出的这个恩宠信号一定令克伦威尔大感欣喜——更让他感到快慰的是，付出代价的是他厌恶的对手。

他在王国其他地方也获得了类似的成功。1536年，他为议会通过一个“旨在于威尔士施行和英格兰同样之法律和司法的法案”奠定了基础。这加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始于爱德华一世时代的联合统治关系，并规定威尔士现在享有跟它的英格兰邻居同样的合法权利。旧的边境贵族领地被五个新的郡代替，每个郡都有议会代表权。同时，这一法案也计划在布雷肯（Brecon）和登比（Denbigh）建立专属威尔士的财政大臣

署和大法官法庭。不过，事实证明这项新法案实施困难——不仅仅是因为国王本人决定行使法案中写明的某些否决权。[6] 这是对克伦威尔的一个警告（如果他需要的话），表明他的权力取决于他的君主。但即便这项法案在几年后才得到完全的实施，克伦威尔在这期间仍确保了威尔士的稳定与顺服。

与此同时在爱尔兰，看似对亨利忠心耿耿的伦纳德·格雷子爵（Leonard Grey）在1535年12月31日威廉·斯凯芬顿爵士死后被任命为王权代理。格雷积极参与爱尔兰改革议会，1537年12月闭会的时候，该议会已经通过了所有主要的英格兰改革立法。议会还剥夺了奥法利及其支持者们的财产和民事权利，他们于同一年在泰伯恩刑场被以叛国罪处死。同时，克伦威尔派了一批高级官员评估和纠正所有地区政府滥用职权的情况。他与他们保持定期通信，确保他们完全执行了自己的指示。但是，和在威尔士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当地维持长久的控制颇为困难。爱尔兰领主们仍然统治着他们的领地，直到一系列军事讨伐和谈判之后，某种程度上的秩序才在当地建立起来。[7] 这并没有阻止克伦威尔将王室权威扩张到加来，1536年他开始引入了一系列举措，让它的地位与其他英格兰自治城镇等同，最后授予当地在议会的代表权。

在这期间，无论确保国内改革顺利进展的需要怎样迫切，克伦威尔也没有放松对国外事务的掌控。和在英格兰一样，他在外交事务上的策略也是派自己的门徒和盟友占据职责重要的位置。其中就包括托马斯·怀亚特，克伦威尔对他有救命之恩，他也不曾忘怀。1537年3月，他被任命为驻查理五世皇帝宫廷的大使，并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两年半。他的任务是改善亨利与皇帝之间自与其姨母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以来始终充满敌意的关系。为了巩固联盟，怀亚特还要协商让亨利的长女玛丽与葡萄牙的王子联姻，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隐藏任务，那就是确保皇帝不与法国国王结成同盟。虽然亨利在凯瑟琳王后去世后不久一度让这两大势力彼此敌对，但是这一策略的效用在降低，查理和弗朗

索瓦之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修好迹象。

克伦威尔敦促他的门徒不要被外交中典型的友善态度和虚假承诺误导，而要弄清查理真实的意图——或者用他自己的说法，“钓出他腹中所思”。他又要求怀亚特“一定要在所有这些事上向查理坦言，以察觉他内心深处的想法”。[8] 在怀亚特看起来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勤勉地完成使命时，克伦威尔马上责骂他：“你到现在为止有些懒散，并且疏于写信向我汇报你的发现和进展。”[9]

虽然他将在不久之后身不由己地为在这个危险的新国际秩序中捍卫英格兰地位而努力，但眼下的克伦威尔又一次被国内事务缠身。即便他在王国边远地区的施政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他仍决心要在英格兰进一步推动改革。1537年2月，克伦威尔在威斯敏斯特空闲的议会大厅以代理总教监的名义召开教士会议，召集主教和神学博士出席。在以国王名义发表的开幕演说中，克伦威尔呼吁就当下的宗教矛盾进行一场冷静、深思熟虑的讨论，但是他没有要妥协的打算。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他始终把议论控制在有利于福音主义观点的方向上。在最初的几轮会议后，这次大会变得更像是一个旨在实现克伦威尔构想的非正式委员会。由于对大会在朝着对的方向进行而感到满意，克伦威尔让克兰默和福克斯主教代为监督会议，并确保宗教改革派保持优势地位。

这三个人在北方叛乱后的几个月里齐心协力，继续推进福音派的事业。出于对民意的考量，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选择委婉行事，但是这并没有削弱他们措施的效果。虽然保守派人士所遵守的自中世纪流传而来的七种圣事仍为官方所承认，但克伦威尔、克兰默和福克斯成功地强调了信心而非善功（或良善的举止）作为获得救赎首要途径的作用。他们还削弱了传统天主教徒对圣体和圣血在圣餐中“真实”显现的信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修改了十诫并重新为其排序，使之与新教教义一致，更多地强调上帝禁止创造并崇拜“雕刻的偶像”。这些都收入了1537年10月

刊印的《基督徒的基本守则》（*The 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Man*，又称《主教手册》）。

克伦威尔在这一时期对推动宗教改革的热忱经常被视为他真心信仰福音主义教义的证据。但是他的个人信仰仍在很大程度上谜团重重。他也有可能把新教事业看成自己攫取权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以及打败宫廷敌人的一个手段，他们当中最危险的恰恰是那些立誓信奉旧宗教的人。此外，还有零散证据暗示克伦威尔私下里偏向传统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在改革政策达到高潮的时候，他安排简·克伦威尔嫁入了英格兰最坚定地信仰天主教的家族。[10] 当时克伦威尔已经是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他可以为（声称是他的）女儿选择任何一位丈夫。如果他真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忠实的改革者，那他为什么选择一个已宣誓的宗教保守派？

但这个证据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相比之下能证明他对改革宗信仰产生兴趣并最终皈依的记录更让人信服。克伦威尔或许不是一个路德宗信徒，但是他确实遵守一些路德宗教义，尤其是对《圣经》的真理属性，以及认为《圣经》应当为民众理解的观点。不过，他对路德因信称义的核心教义持有不同看法。相比之下，他认为伊拉斯谟以及其他更温和的福音派教士的教义更可取，而且他积极支持后者，这表明他对此有真诚的认同。他对宗教改革，尤其是对用英语传播上帝话语的热忱，以及他对每一个有关法案措辞巨细靡遗的关注，并非一个只为私利而推动改革的世俗之人所为。

或许对克伦威尔个人信仰最恰当的描述不是改革派或保守派，而是理性主义。他偏好基于证据和推理的论点，而非传统或教条。这也是为什么他自己花费那么多时间研究并鼓励对原文本的新翻译，认为这是一个剥离几个世纪以来的误解，以重新认识原典观点的一个方式。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中间路线的偏好为亨利的女

儿伊丽莎白成为女王之后非常喜爱的“中庸之道”奠定了基础。

他的儿子格雷戈里成年后持有强烈的改革主义信仰，这一事实表明他受到了父亲本人的观点，以及后者细心指定的家庭教师的影响。克伦威尔的儿子可能在1537年年初完成了学业和训练，已经长成了一个广受克伦威尔的盟友和敌人称赞的年轻人。罗兰·李在曾与格雷戈里同住一段时间的1536年1月19日写信给克伦威尔寻求帮助，因为现在他不得不“为了国王陛下的财产学习一门新功课，跟笔和计数工具打交道”。他提到自己“绞刑法官”的声名，并请克伦威尔“将我最爱的格雷戈里送过来，因为虽然盗贼们让我陷入空想，但我相信不久就会跟他们扯平”。[11] 8月5日诺福克公爵从格雷戈里暂住的位于诺福克郡肯宁霍尔的宅邸写信给克伦威尔说他的儿子身体健康，“尽情地骑马追逐鹿和猎犬”。他忍不住嘲弄这位对手说，“我相信你不会因为现在我让他放开他的书本而不满”，但他也承认，“你一定会发现他机智伶俐”。[12] 如果说格雷戈里真的像近来的评论家暗示的那样头脑迟钝的话，一向吝于夸奖他人且对克伦威尔怀有嫌隙的诺福克是不会向他赞扬他的儿子的。认为格雷戈里头脑迟钝的观点可能是根据1541年2月商人理查德·希尔斯（Richard Hilles）所写的一封信里偶然的评论，他说格雷戈里“几乎是个笨蛋”。[13]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格雷戈里有任何的智力缺陷，他可能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天资聪颖，他的家庭教师们因他不能掌握拉丁语而沮丧，但从他的通信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聪慧、表达能力强且有洞察力的年轻人。他可能不具备像父亲那样极高的智力，但这构不成批评他的理由。

1537年秋天，克伦威尔的宗教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相比之下，他在宫廷的地位经受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倒退。“求恩巡礼”期间，一群主要贵族组成了一个专门的战时委员会镇压叛乱者。它被证明非常有效，继而在1537年春天发展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新“枢密院”，由克伦威尔的保守派对手支配。诺福克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可以解释克伦威尔近来对他的友好姿态。他不仅让公爵照管自己的儿子，还帮诺福克得到了他看

中的一座有利可图的旧修道院房产。

但是克伦威尔和诺福克的任何友好关系往最好了说也注定是脆弱的。虽然克伦威尔仍是亨利的首席大臣，但他在权力颇大的新枢密院中没有席位，这一事实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王的倚重和支持。亨利时不时地会表示对他的支持——例如，当年5月他让克伦威尔代他写信给自己的妹妹，孀居的苏格兰王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而且克伦威尔知道这一点。他写信给玛格丽特的时候给了她充分的敬重，向她保证："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您效力。"他还送给她一些"防抽搐指环"（Cramp rings），据说可以医治"跌倒症"（癫痫）。不过，克伦威尔忍不住加了一个请求，请王后"时不时"告知他苏格兰的时事。[14] 他一定是想维持与这位尊贵之人的信件往来。

克伦威尔另一个受宠的迹象是他在1537年8月5日被国王册封为嘉德骑士。作为最古老、最受尊崇的骑士勋位，它由爱德华三世于1348年设立，旨在纪念那些在服侍国王的工作中表现尤为突出的个人。这一勋位的授予范围极为有限，由国王和25名骑士组成，他们专属的宗教场所是位于温莎的圣乔治教堂。每个骑士都要在教堂展示一面自己的纹章旗，还有头盔、徽饰和剑。这是克伦威尔至此为止获得的最高荣耀，他以一贯的魅力和优雅姿态接受了这个荣耀。甚至在通常只简略记录正式活动的嘉德登记册上都特别记载了他"用擅长的雄辩（以及他所熟稔的得宜举止）"[15] 致谢。

尽管获得了如此殊荣，克伦威尔仍然清楚，自己在宫廷的地位已经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他决定采用一个大胆的策略，如果成功，这就会让他跟国王的联系更加紧密。年届17且刚刚完成学业的格雷戈里·克伦威尔已经成人，可以开启自己的事业，也到了适婚年龄。而且他的父亲已为他看好了最合适的人选。乌特雷德夫人伊丽莎白是约克郡最为显赫且以忠于国王著称的一个家族的掌门人安东尼·乌特雷德爵士（Anthony

Vghtred）的遗孀。不过，伊丽莎白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是一位显赫贵族的遗孀，而在于她自身的家族关系：她是王后简·西摩尔的姐姐。成为她下一任丈夫的男人会因为这场婚姻与国王产生联系——这是一个克伦威尔难以拒绝的诱人前景。的确，伊丽莎白的价值如此之大，克伦威尔甚至可能考虑过亲自娶她。毕竟，他的权力和财富让他成为宫廷最引人注目的单身汉之一。尽管乌特雷德夫人的具体出生日期无可得知，一般认为是1500～1505年，这让她比克伦威尔小了15～20岁——不算是很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她正好也比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年长十来岁，而考虑到大多数婚姻都是为了生育继承人，长妻少夫的情况并不多见。不过克伦威尔或许对这样的联姻不感兴趣，又或许他判断格雷戈里能带来更吸引人的前景，因为正是他的儿子构成了他谈判的基础。

克伦威尔产生与西摩尔家族联姻的想法的时间尚不确定，这可能是乌特雷德夫人本人提起的。她于1537年3月18日写信给克伦威尔，以她每况愈下的境遇为理由，请他帮忙为自己获得一座即将被解散的约克郡的修道院。她写道："我请求您的帮助，在这些修道院被解散时（修道院的名字我随信附上）让我能替国王代管其中一座。"她称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孤独女人"，并请求说："因为我过世的丈夫对大人您的服侍和忠心仅次于国王，我也斗胆提出这样的请求，并且不会再请求他人。"她又另外加了一句说服之语："我上一次在宫廷的时候，您曾允诺要帮助我。"[16] 最后一句话暗示克伦威尔在数月前就开始对她释放善意：事实上，他安排乌特雷德夫人在利兹城堡住了一段时间。有可能他从那时起就已经有了联姻的念头。

但克伦威尔毕竟亲历了两任王后被草草除去的风波，这位狡猾的大臣或许仍想多处下注，直到新王室继承人诞生的迹象出现。1537年5月末这一点终于得到确认，宫廷正式宣布了王后的孕讯并在一次弥撒时加以庆祝。国王又一次希望满满、欣喜若狂，并且相信现在自己终于要有儿子了。"陛下的身体之健康与心情之愉悦，是我长期随侍以来所罕

见，”克伦威尔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记录说，“这更多是因为王后很快怀了孩子，上帝恩慈，念及陛下的愿望和整个王国以及所有臣民共同的喜乐和幸福，赐给她一位长命百岁的王子。”[17] 如果国王的新妻子做到了其他人没有做到的，那么与她的家族联盟绝对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克伦威尔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在孩子出生前冒险结盟。

伊丽莎白的其他追求者中有一位亚瑟·达西（Arthur Darcy）爵士，他在当年6月15日暗示联姻的传言已流传了一段时间。这位约克郡的贵族告诉伊丽莎白：“如果我留在这里，而你也能留在这里的话，我会很开心，但是事实上，就像我说过的，某位南方的大人将让你忘记北方。”[18] 克伦威尔与伊丽莎白的哥哥爱德华进行了谈判，两人在7月达成了一致。婚礼于1537年7月17日到8月3日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在西摩尔家族的宅邸狼厅举行。[19]

事实证明这个结合对各方来说都是成功的，它确实加强了克伦威尔与西摩尔家族的联系。9月2日，爱德华·西摩尔写信表达了希望克伦威尔跟他一起的愿望，这样他就能“用弓、猎犬和猎鹰享受最好的户外消遣”。在一份附言中，他问候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又说：“我祈求上帝能让他们尽快为我生下一个外甥。”[20] 他的祈祷很快应验了，因为作为格雷戈里的妻子，伊丽莎白为其生育了多名子女。结婚一年后她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又为他生下了三儿两女。

伊丽莎白对公公的孝敬也堪称典范，后者慷慨地向这对夫妇赠送了自己的一座宅邸，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庭。1537年10月她写道：“我无法表达对大人您的诸多感谢，您不仅费心为我的生活安定和健康筹谋，还派仆人赖奥思利向我赠送了慷慨的纪念品；另外，世界上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看到大人您对我满意，并成为我仁慈的大人和父亲，我除此之外不再另有奢望，只求能继续如此。”克伦威尔显然对他的新儿媳非常慷慨，因为她接着感谢他给她“一座跟其他宅邸一样上好的房子”。信末

她向克伦威尔保证："现在我只信任您。"[21]

不论克伦威尔所受的荣宠如何因这场联姻以及他个人的努力节节提升，他依然维持着在所有人面前的亲和力——无论是平民还是廷臣——就像他仕途早些年表现的那样。这或许是他从沃尔西身上学到的教训，因为枢机主教因对普通人以及贵族的无视而备受诟病。相比之下，克伦威尔对可怜的妇人和孀妇尤为同情，记录证实他曾在16世纪30年代介入众多案件，为她们充当代理。这些人当中包括因被丈夫抛弃而陷入贫困的伊丽莎白·康斯特布尔（Elizabeth Constable），她向克伦威尔倾诉说自己出于羞耻心不能去乞讨或者卖淫。同时还有一位伊丽莎白·伯格（Elizabeth Burgh）夫人，她于1537年年末生下一个早产儿，她的公公称自己的儿子不是真正的父亲，而她的丈夫因为太过软弱不能为她辩护，所以她请求克伦威尔帮助自己阻止这个男孩被剥夺继承权。另一位伊丽莎白·惠特尔夫人（Elizabeth Whettyl）因为她的儿子拒绝遵守已逝父亲的遗志、供养自己的母亲而向克伦威尔求助。曾在克伦威尔宅邸当过仆人的爱丽丝·帕克（Alice Parker）则在另外两位仆人拒绝向她还债的时候请求克伦威尔帮助。在廷臣尼古拉斯·卡鲁之父理查德爵士体弱且近乎失明的遗孀毛德·卡鲁（Mawde Carew）被盗贼抢劫（抑或被骗取积蓄）时，克伦威尔也出手帮助了她。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声称自己感到"深深受惠"于他，并请求上帝"让仁慈的大人您继续成功，为了使所有可怜的孀妇得到安慰"。[22]

1536年7月，玛格丽特·弗农来卷宗主事官府拜访他，这时候她有充分的理由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曾由她担任院长的小马洛女修道院已经在当年6月27日被关停。虽然几天前一位克伦威尔代理人的来信汇报说这位女修道院院长"像一个聪明的女人"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解散，但她给克伦威尔的信表明这只是伪装。克伦威尔没有忽视她的请求。三个月后，玛格丽特被任命为肯特郡显赫的莫灵修道院的院长，该院的原院长里德未做解释便擅离职守。鉴于莫灵比她原来的小马洛女修道院的规模

要大10倍以上，这一任命显著提升了她的地位。但这只是暂时的：莫灵也在1538年10月被解散，不过克伦威尔为玛格丽特和与她同为修女的人争取到了慷慨的抚恤金。之后不久，她写信给休·拉蒂默说“希望他代为感谢克伦威尔的善举”，暗示了她对自己的待遇非常满意。[23]

克伦威尔帮助的妇人并不都陷入了贫困。1536年伊丽莎白·亨格福德（Elizabeth Hungerford）夫人写信给克伦威尔，痛苦地向他抱怨自己悲惨的婚姻：“我，您最不幸、最可怜的求助者，身处比从前更糟糕的境遇。我被单独囚禁在我丈夫在亨格福德城堡的一座塔楼里，为时已有三四年，其间没有任何人前来安慰。”亨格福德显然寻求了克伦威尔的帮助，声称妻子羞辱了自己，要与她离婚——她愤怒地将这一说法称为“严重的诽谤”并予以否认。[24] 看起来她是有理由的。她的丈夫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同性恋，他虐待所有的前妻，且似乎以对她们施加暴行为乐。亨格福德夫人因此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以对抗丈夫对她的虐待。

克伦威尔帮助过的另一位女人是诺福克公爵夫人伊丽莎白，这多少有些令人诧异。她与克伦威尔的这位政敌的婚姻从来都算不上幸福，而在诺福克把他的情妇贝丝·霍兰搬进家族宅邸，并把伊丽莎白送去赫特福德郡生活之后，他们的婚姻更是急转而下。陷入痛苦的她写信给克伦威尔，请他代为调解。关于克伦威尔如何回复的记载现已无存，但他一定提供了一些帮助，因为心怀感激的公爵夫人很快再次写信感谢他的善举，并送了他一对雕刻精美的小刀以示感谢。不过，这对夫妇的感情在这之后依旧疏远，1537年6月伊丽莎白再次给克伦威尔写信，悲叹道：“到这个盛夏，他（诺福克）就已经抛弃我四年了。”[25] 但对于公爵和公爵夫人之间的隔阂，克伦威尔几乎没什么能做的了。克伦威尔似乎避免过多地干预诺福克的私事，这或许是出于对他们刚结成不久的联盟的尊重，而值得称赞的是他没有把这件事作为制造麻烦的手段加以利用，比如在宫廷散布关于此事的谣言。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诺福克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公爵的女儿玛丽也来寻求克伦威尔的帮助。国王安排她嫁给自己的私生子亨利·菲茨罗伊，但在后者于1536年7月早逝之后，国王拒绝把已经指定给玛丽的遗产交给她。玛丽首先向自己的父亲求助，但正如她对克伦威尔坦言的那样"他的回复如此简短，靠着他的请愿得到的结果多半会令我失望"。"唉，我仁慈的大人，行了诸多善事的您，请帮帮我这个本国最可怜的孀妇。"之后不久，她写信感谢他"每日为我的事在国王陛下那里辛苦费力"，这表明克伦威尔曾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她，无论最终是否为她争取到了这份遗产。[26]

毫无疑问，请求克伦威尔帮助的女性当中最显赫的是国王的外甥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小姐。虽然作为亨利的姐姐玛格丽特和第六代安格斯伯爵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的女儿出生在苏格兰，但是她1530年就来到英格兰，并成为深受英格兰国王喜爱的人，被亨利称为"我们最亲爱的外甥女"。[27] 玛格丽特后来在宫廷的生涯异常跌宕。作为一个精明的政客，她成功赢得了亨利每一任王后的喜爱，挨个服侍她们。但是她在个人生活上一直作风轻率。一位时人描述她"美丽且极受尊敬"，她在亨利的男性廷臣中引起了很多关注。[28]

1536年，当玛格丽特因与托马斯·霍华德私订婚约一事败露而被捕的时候，国王命令克伦威尔安排把她关在锡安修道院。貌似悔悟的玛格丽特小姐不久之后从那里写信给这位大臣。她否认自己随身带有过多仆人，不过她同意按照克伦威尔的命令，解雇那些从托马斯·霍华德宅邸带来的仆人。她还请求克伦威尔解决那些被允许跟随她的仆人的薪资问题。玛格丽特认定克伦威尔是自己重获舅舅宠爱的途径，向他恳求道："我相信您能帮我重获国王陛下的喜爱，为此我不知该如何向您道谢，而您于我又是何等的恩重如山。"但她的感谢来得太早了。一年后，国王宣布她是私生女，因为她的父亲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在发现她母亲已有婚约的证据之后跟她离了婚。道格拉斯对于这段婚姻不合法

性的主张最终成立，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在苏格兰被公然视为私生女。[29]

和上述信件一样的信件在克伦威尔16世纪30年代的通信中并不罕见。[30] 它们证实了克伦威尔热心帮助不幸妇人的声名，以及他对每一个求助者的关心和关注。虽然一些案件的结果尚不清楚，但是他的求助者们不断地示谢，这暗示了他在帮助她们时即便不一定总能成功，也至少是一丝不苟的。

随着1537年秋天临近，克伦威尔热衷于让他的君主全面批准《主教手册》。但在实际进入1537年秋季之后，亨利有了更要紧的担忧。他的新妻子简刚刚进入产期。简在妊娠期间平安无事，9月中旬她被送到汉普顿宫待产。差不多快一个月之后，她开始分娩。简的分娩持续了两天三夜，这期间亨利和他的廷臣们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在10月12日凌晨2时许，喜讯终于传来，王后平安产下“一位极漂亮的男孩”。[31] 国王为诞下一个男继承人所做的漫长努力终于结束了。现在都铎王朝的统治无疑有了保障。

克伦威尔立刻写信给在帝国宫廷的托马斯·怀亚特说：“上帝施恩于王后，让她产下一位俊美的王子，让国王以及所有敬爱、服从他的谦卑臣民都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我们有十足的理由感恩我们至善至慈的创造者，他在我们如此漫长的期待之后达成了我们的祈祷和心愿。”[32] 不过这封信并不只是为了向怀亚特报喜。克伦威尔敦促怀亚特立即将此事告知皇帝，这样他和欧洲其他君王可以同享亨利“极大的喜悦和安慰”——换句话说，他总算可以因为英格兰国王现在有了儿子以巩固自己的王朝而感到得意，这让他在外交事务中拥有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三天后，这位幼小的王子接受了盛大的洗礼。克伦威尔的对手卡鲁在仪式上颇受礼遇。爱德华的出生标志着克伦威尔对西摩尔家族的耐心

支持取得了胜利，国王只是太过欣喜才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然而，国王的喜悦很快被他挚爱的简病重的消息所破坏。在给了丈夫他在世界上最想要的儿子12天之后，简就去世了。简一直没有从生产中恢复，她可能感染了产褥热，一种因产室缺少必要的卫生条件而产生的细菌感染。然而，当时没人知道这种病，克伦威尔很快将她的死归咎于他人。他告诉加德纳和霍华德大人是“她身边人的错，她们让她受凉，并在她因病神志不清时给她吃了她要求的东西”。[33]

“神圣的上帝用为我带来幸福之人的死在我喜悦中混入了悲伤”，亨利悲叹道。[34] 相比之下，尽管克伦威尔也对简的逝世表示哀伤，但他已经开始安排她的继任者。在一封写于简逝世几天后的信中，他表示：

> 尽管陛下无意再娶……但是陛下枢密院的众人认为，我们作为陛下最恭顺的臣仆，理应考虑国家的未来，并且在不久之后为满足陛下，让他步入另一场合适的婚姻。他对我等臣民的热忱已经如此强烈，以至于改变了陛下的性情，使他内心对这件事、对仔细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变得不甚在意，无论对方来自何处。[35]

克伦威尔接着写道，他已经筛选出一些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候选人，并且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指示亨利的大使们就国外可作为新娘的人做出提议。以他一贯对细节的关注，他甚至写好了大使们要对这些小姐所说的话，好让她们同意。[36]

尽管克伦威尔在应对简的逝世时干脆利落、务实高效，但他也有理由发自真心地哀悼她：他的儿子成为王后的姐夫才两个月出头。不过，只要幼小的王子尚在，西摩尔家族在宫廷仍会拥有权势，他可以用这一事实来安慰自己。不过这一安慰将很快落空。

---

[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60.

[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

1902），Vol.II，p.57.

[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nos.594，636.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no.118.

[6] 这或许是为了给国王的新生儿子——威尔士王子爱德华以更大的权力。

[7] 格雷子爵最终被召回伦敦并因叛国罪被剥夺公民和财产权。1541年7月他被处死。

[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870.

[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58.

[10] 简后来跟丈夫一同信奉天主教。加上她的女儿爱丽丝与丈夫威廉·惠特莫尔及他们的孩子们，这一家人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作为不服英国国教的天主教徒引起了当权者的注意。Wark，K.R.，*Elizabethan Recusancy in Cheshire*（Manchester，1971），pp.153，168.

[1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no.129.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no.233.

[1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I，no.578.

[1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53.

[15]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London，2002），p.83.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no.678.

[1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60.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97.

[19] 没有确定的关于伊丽莎白·克伦威尔的画像。不过最近有说法（有一些合理性）提出，由荷尔拜因绘制、被认为描绘了凯瑟琳·霍华德的《一幅无名女士的肖像》（*Portrait of an Unknown Woman*）事实上描绘了格雷戈里·克伦威尔的妻子。Wilson，D.，*Hans Holbein：Portrait of an Unknown Man*（London，2006），p.215.

[2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629.

[21]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355-356.

[22] Schofield，J.，*The Rise and Fall of Thomas Cromwell：Henry* Ⅷ*'s Most Faithful Servant*（Stroud，2011），pp.277-279；*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556；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267-271.

[23] Erler，M.C.，*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the Dissolution：Monks，Friars，and Nuns 1530-1558*（Cambridge，2013），pp.99-105.

[24]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271-275.

[2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 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s.143，1049；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218-226；Vol.III，pp.96-100.

[26]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373-378.

[27] Marshall，R.K.，*Queen Mary’s Women* （Edinburgh，2006），p.108.

[2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p.7.

[29]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p.292-293.

[30] See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s.II and III.

[31]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73.

[32] BL Harley MS 282 fos.211-212；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94.

[3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96.

[3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Part ii，no.972.

[3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96-97.

[36] 例如，可参见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22。

第十五章 “那些操纵国王的奸人”

已故王后的葬礼于11月12日早上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举行，克伦威尔让他的家庭成员大量出席。简·西摩尔的姐姐伊丽莎白自然身在送葬队伍的显要位置，她的新丈夫格雷戈里和表兄理查德也是如此，上述二人都举着旗子。克伦威尔本人也在现场，他在法国大使的陪伴下带领着由大臣和外交使臣组成的队伍。葬礼结束后，送葬的人前往城堡，在那里他们“得到丰盛的款待”。正午时分，葬礼全部结束，显然急于回到工作中的克伦威尔即刻返回伦敦，在那里他撰写并收到了很多与国事和个人法律事务有关的信件。

尽管期盼许久的都铎王子终于降生，但1537年无论对克伦威尔还是对他的君主来说都不是幸福的一年。国王失去了唯一一个他真正爱过的妻子，也逐渐意识到以自己的名义开展的宗教改革受到大量（即便不是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同时，宫廷的保守派形成了一个针对克伦威尔的新联盟，令后者落于下风。克伦威尔对加德纳的反感现在也发酵成了公然的冲突。在一封写于王后简死后不久的信中，克伦威尔向这位主教发火，指责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不论你对我有怎样的看法，让我惊讶的是，你明知道君主的智慧，还会以为能有人在他的手下为所欲为。”他与诺福克的矛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人说“诺福克公爵跟这位秘书总是交恶”并非没有理由。[1] 此外，面对针对福音派改革的反对情绪，无论克伦威尔表现得怎样目空一切，在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英格兰最受憎恶的人之后他也一定深感不安。

欧洲大陆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关系

日益密切，在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策略已不敌这两个对手之后，万般无奈的亨利指示克伦威尔为他自己和他的女儿们寻找联姻对象。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因为国王的婚姻劣迹已经震惊了整个欧洲。一位意大利绅士的言论总结了很多人的鄙视之情，他在1546年说："不只是他的第一位妻子，他的另外三四位妻子，不是都被他砍头、取代、处决，以满足他那像马匹垂涎新牧草一样无节制的肉欲了吗？"[2]

即便他的君主已成为外国评论者的笑料，克伦威尔也别无选择，只能依从他的命令。他飞快地写了很多令人困惑且互相矛盾的信给他的朋友菲利普·霍比，后者是一位狂热的新教改革支持者，现在正作为国王的使臣执行各种外交任务。他指示霍比就与刚刚嫁给苏格兰詹姆士五世的玛丽·吉斯（Mary of Guise）的妹妹、米兰女公爵以及洛林公爵之女等人联姻的可能进行谈判。霍比安排汉斯·荷尔拜因为上述人选中的一部分人绘制肖像。亨利在收到米兰女公爵的肖像之后颇感欢喜。不过，这位淑女本人对嫁给英格兰国王一事无甚兴致，并因放话说如果她有两个头，一个任凭亨利处置而出名。

在克伦威尔为君主争取一个合适妻子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之后，亨利转而命他专注于他的两个女儿。迫切想要在对法国和帝国的关系上恢复微妙平衡的亨利提议奥尔良公爵和葡萄牙国王的儿子作为长女玛丽的联姻人选。克伦威尔开始与这两处宫廷进行谈判，并借机给他正在出使法国宫廷的对手加德纳挑起麻烦。他愉快地告诉夏普伊："亨利对在法国的大使温彻斯特主教非常恼怒，后者明知国王正在谈判把玛丽嫁给葡萄牙的路易王子，但还是写信给他说要把玛丽公主嫁给某个法国人。"[3] 然而克伦威尔自己很快也成了君主恼火的对象。法国大使卡斯蒂永（Castillon）宣称这位大臣"颇为热衷与西班牙亲善"，并抱怨他偏向与葡萄牙联姻。这引起国王强烈的训斥，他斥责克伦威尔"没有资格干涉国王的事务"，并召来诺福克代他处理。[4] 亨利和克伦威尔的所有联姻尝试最终沦为徒劳，1538年7月，令人不快的消息到达英格兰，查

理和弗朗索瓦签署了休战协定。

即便克伦威尔不能控制外交事务的发展，他至少可以尝试阻止英格兰的宗教敌人在欧洲大陆蔓延。他在这期间签发的很多下令调查国外已知有反对改革嫌疑之人的公文中，显现出一丝日趋严重的偏执恐慌与冷酷迹象。得益于他在国外的线人网络，他发现“一窝叛徒”登上了一艘被风吹到英格兰东北部海岸边的法国船。他向君主汇报说他们携带“煽动性的、叛逆的、于陛下不利的信，要带给罗马主教和叛徒波尔”。[5] 雷金纳德·波尔枢机主教是对克伦威尔的政策最危险、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作为一位颇具才华的学者和神学家，他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他的外祖父是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乔治，他的母亲是颇有权势的索尔兹伯里女伯爵玛格丽特·波尔，她曾任公主玛丽的家庭教师，也是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亨利曾试图让她的儿子站在自己这边，许诺只要他愿意支持自己跟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就给他约克大主教或温彻斯特主教的职位。波尔拒绝了亨利的要求，流亡法国和意大利。在短暂返回英格兰之后，他彻底与国王决裂，并力劝欧洲各国君主废黜他。教宗对这位来自英格兰的忠实信徒非常满意，在1537年授予他枢机主教的职位以示褒奖，并唆使他为众多针对“异端”国王的阴谋和叛乱提供支持。

波尔因此成了亨利一方的眼中钉，克伦威尔视消灭他和他的所有同党为己任。克伦威尔从两年前就开始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托马斯·斯塔基引诱波尔返回英格兰，让他向国王表示效忠以遂国王心意。斯塔基向波尔保证“克伦威尔怀有善意，即便他不了解你”，并承诺他的返回将对他的家族和朋友们大有助益。[6] 但是波尔拒不妥协，克伦威尔不得不在1537年9月又派两位使臣威尔逊博士和希思博士（Dr Wilson and Dr Heath）与波尔协商，力劝他回国与国王和解——或者被控叛国罪并被处死（这个结局的可能性更大）。克伦威尔的指示旨在让使臣们对枢机主教产生强烈的反感和怀疑。他称波尔是“一个穷凶极恶的阴谋家，用

极为卑鄙的叛国行径反对他的主权君王”，并指示威尔逊和希思以最简洁的方式称呼他，不要提到他“无关紧要”的枢机头衔。此外，他们应“以坦白直率的方式向这个波尔言明他悲惨的地位和处境，并告知他国王极大的宽容与仁慈”。他还叮嘱使节们要威逼波尔顺从：“尽可能告诉他……如果他继续他的疯狂行为可能会招致什么后果”。[7]

波尔没有听从返回英格兰的召唤，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有传闻称当他继续在欧洲大陆的盟友中煽动对国王的反感时，亨利的顾问们密谋要暗杀他。克伦威尔在此事上有用武之地，这得益于他在青年时期对意大利事务的了解以及在那里保有的人脉。他发出了以下这则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现在我们有办法在意大利除掉一个叛逆的臣民。一定不要让他心存侥幸，无法在国内通过法律程序伸张的正义，有的时候是可以通过在国外寻找新的途径来得到伸张的。”[8]

尽管波尔本人幸免于难，但是英格兰国王对他的家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波尔的哥哥因同谋的指控于1538年8月被逮捕。三个月后，波尔的长兄亨利被投入伦敦塔，并于次年1月被处决。同时，他们的母亲也被逮捕收押，这意味着她失去了相当多的地产和头衔。她在伦敦塔受折磨近三年，直到被定死罪并遭受了令人惊骇的拙劣处决。据说刽子手的斧子连砍了11下，她的头才最终跟身体分离。

尽管手段残忍，但从他们造成的危险来看，对波尔家族的惩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允的。有证据表明克伦威尔因他们的密谋牵涉之广而深受困扰——尤其是当他发现自己信任的线人也牵涉其中的时候。迈克尔·思罗克莫顿（Michael Throckmorton）是波尔的线人，但他似乎让克伦威尔相信自己其实是忠于国王亨利的。当克伦威尔发现思罗克莫顿一直积极参与波尔接连不断的密谋时，他震惊了。他对这位线人大发雷霆，同样也为自己被如此欺瞒而生气。“你已经蒙蔽了我的双眼一次，”他告诉思罗克莫顿，“你的信誉现在绝不足以让你再次欺瞒

我。”他接着控告思罗克莫顿为骗取自己对他站在国王一边的信任而伪造书信。“忠诚和背叛很少能同时起作用”，他满怀怨恨地说。波尔写信嘲弄他罕见的误判，并蔑视他愤怒的威胁，“你以华而不实、徒劳的方式对我猛烈攻击……我越温和你越生气，然而你从未说过什么新鲜的”。这让克伦威尔更加下定决心重获优势，他暗自庆幸思罗克莫顿服侍的这位“精神错乱”“自作聪明的蠢货”将会“为他的庞大家族带来毁灭”。他还在信里发出了和此前对波尔一样的暗杀威胁，并在信末向思罗克莫顿保证：“你在罗马也可能受到在英格兰应受的恶待……我已经尽我所能地拯救你。我将不遗余力地让你得到相应的惩罚。”[9]

克伦威尔的无情跟亨利一样，源于日益加重的偏执。在1538年他采取措施为家中尚未自立的亲属今后的生计做出了安排，这一事实说明他在这个时期感到脆弱。托马斯·艾弗里被任命为伍斯特郡布什利林苑的狩猎主管，这个职位自带房舍和地产。值得注意的是，克伦威尔帮艾弗里在宫廷之外立身。他是在害怕自己可能无法庇护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吗？这或许也是他为挚爱的儿子格雷戈里铺路以便他自立的原因。至此为止，格雷戈里一直在服侍父亲，在法律和权术上都得到了锻炼。这一时期他肯定跟随父亲在宫廷待了很长时间。格雷戈里显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因为在1538年4月，克伦威尔判断给他某一个正式官职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时修道院解散工作正在全面展开，而且它的设计者最新的收获之一是位于刘易斯的圣潘克拉斯修道院，该院曾为克吕尼修道院[10]的分支。作为英格兰最大、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它在前一年的解散是克伦威尔改革进程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他安排了一队以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家乔瓦尼·波尔蒂纳里为首的专业拆迁者，后者尤为细致彻底地完成了任务。克伦威尔将这个地方租了出去，但保留了修道士们的居所，并将其扩建成一栋宅邸，它被后世称为“勋爵府”（The Lord’s Place）。他通常不会如此关注修道院建筑的改建工作，不过他计划把这座宅邸留给儿子和儿媳。

格雷戈里和伊丽莎白于1538年4月隆重地搬去了刘易斯，带去了大批随从。之后不久，格雷戈里被任命为当地的太平绅士[11]。即便当地民众对这位下令毁坏苏塞克斯最重要的修道院的大人的儿子有什么不满，他们也没有显露出来。格雷戈里写信给父亲说，他和妻子受到了附近一带各家族的热情款待，并且收到了他们赠送的礼物。[12]不过他们没在那里待多久，因为他们刚抵达不久该镇就爆发了瘟疫。听闻瘟疫爆发，克伦威尔立刻警觉地写信给他在那里的两位仆人，指示他们不要让任何瘟疫受害者埋葬在儿子和儿媳住的房子的庭院里。三天后的5月24日，威廉·乔姆利（William Cholmeley）写信向克伦威尔汇报说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该镇的其他居民只能待在家里以求能躲过瘟疫，而克伦威尔在该地区拥有多处房产，可供格雷戈里和伊丽莎白选择。他们搬去了离刘易斯只有4英里远的一个叫小丘（the Motte）的“漂亮房子”里，格雷戈里对这处住所“很是喜欢”。乔姆利向他保证“您的烘焙室、酿造房、屠宰室和禽舍可以继续使用”，这样克伦威尔的儿子和儿媳就有了充足的食物供应。邻近的一处名叫斯旺伯勒的宅邸则因为“太过狭小，不足以供格雷戈里先生一行居住”而未被使用，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格雷戈里和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13]

6月末，格雷戈里写信提醒父亲，说国王可能有意在夏季巡游期间访问该镇，这时瘟疫仍在继续。[14]1538年稍晚一些时候，在格雷戈里和伊丽莎白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出生时，他们还住在刘易斯或其附近。为了取悦国王，他们给新生儿起名为亨利。第二个男孩爱德华（随伊丽莎白的外甥、年幼王子的名）在第二年出生，不过那时他们有可能已经离开了刘易斯——即便当时没有，也在那之后不久离开了。他们的通信透露出友爱和谐的关系。1539年12月，格雷戈里因公务去加来，他写信给妻子，称她是自己“挚爱的枕边人”并向她保证：“感谢上帝，我身体健康，相信很快也能从你那里收到你自己还有我幼小的儿子们的类似消息，我向你保证，我对此非常期待。”克伦威尔也密切参与孙子们的养育工作，他1539年的账目包括支付给宫廷洗衣工的酬

劳，因为后者“为大人的后代洗了100打……布块”。[15] 这些“布块”就是尿布的前身。

尽管克伦威尔在听到自己的第一个孙子降生时无疑是兴奋的，但他无暇探望。他的生意和政务十分繁重，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才干和能力不及他的人。此外他在宫廷的敌人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很少有人能让克伦威尔放心地委托自己的事务。虽然他的改革十分不受欢迎，但是克伦威尔前进至此，已经无法后退了。他对政府机构和宗教进行了一场不可逆的革新，他唯一的选择是在这条道路上孤注一掷。因此他毫不留情地推动改革，并力劝国王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

1538年1月，克伦威尔针对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发动了一轮全新的攻击，下令摧毁全国所有教会和宗教场所的雕塑、十字架和图像。他的专员们搜遍全国，肃清圣物、神龛和旧宗教的其他痕迹。为了表示对这些物品的藐蔑，克伦威尔命令手下将其中一些臭名昭著的案例带到伦敦来，以向人们展示它们是骗人的。例如，肯特郡博克斯利著名的“恩典的十字架”号称曾发生过开口说话的“奇迹”，却被拆穿是一个用“某种机关和老旧的线，以及被绑在后面的腐朽木棍”来操作的玩偶。克伦威尔的运动很快失控，在1538年夏季，英格兰国内最大的一些神龛也受到了攻击。沃辛汉与伊普斯威奇圣母堂（Our Lady of Walsingham and Ipswich）的两座著名的神龛被带至伦敦，“随之被带来的还有供普通朝圣者礼敬的……其他各式图像，理由是民众不应再崇拜偶像；它们都在切尔西被掌玺大臣销毁”。[16] 在所有罗马天主教神龛中最为神圣的、位于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 [17] 的神龛也被拆毁，象征着这一轮大规模破坏运动达到了顶峰。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克伦威尔近二十多年的邻居奥斯丁会被解散。克伦威尔在推进改革的时候没有——或者也不能——为私情留下任何余地。事实上，起初可能正是该修会内一些修士的行为才启发了他的一些

改革。四年前，修道院内一些心怀不满的匿名成员就会内的各种逾矩行为发出了抱怨，比如饮酒、独自而不是集体用餐、忽视礼拜、不遵守修道院的规则。尽管院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显然没能纠正这些行径，但他成了克伦威尔一位有用的盟友，在布道中声言支持国王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作为回报，克伦威尔指派他作为一名专员巡访王国内各个尚未被解散的宗教场所，评估其成员是否虔诚、财富几何。在奥斯丁会解散后，布朗的去向无从确知，但克伦威尔有可能让他留任了专员这一肥缺。

解散运动风头正盛，克伦威尔也变得更受人鄙视。“英格兰没有一位领主或绅士喜爱或支持掌玺大臣，”乔治·波利特1538年在狱中这样说，“因为他敛财无度，他的论辩与煽动不是为了别人，只是为了钱。”[18] 即便克伦威尔知道这样的批评是针对他的——鉴于他的情报网络十分发达，我们可以假设他对此知情——这也没能阻止他的行动。1538年5月，在克伦威尔的专员们摧毁全国的圣物和神龛的时候，来自施马尔卡尔登同盟（the Schmalkaldic League）的一位代表到达宫廷。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是德意志南部信奉路德宗的诸侯组建的自卫同盟。克伦威尔安排了这次访问，而当他的君王表示希望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缔结正式盟约或协议的时候，他备受鼓励。克兰默和一队神学家受命进行磋商，而克伦威尔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有关情报。

这一时期的克伦威尔日益依赖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沃恩，视他为自己在大陆的心腹代理人。可能是在克伦威尔的影响下，沃恩于1538年被指派为亨利八世驻低地国家的大使，并且继任商人冒险家公司的总督一职。从那之后，他作为外交官更加积极地服侍克伦威尔，并从王室那里接掌了不断增加的职责。

1538年9月初，克伦威尔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代理总教监命令，极大地强化了改革的力度。这些命令公开向“朝拜、圣物、图像以及其他任

何迷信”宣战，并强调《圣经》是“上帝鲜活的话语，是每个寻求救赎的基督徒都必须尊崇、信仰并遵守的”。[19] 他在两年前下达的要求每座教堂都应配备一本英文《圣经》的命令只得到了部分遵守，这背后的唯一原因是民众的抵抗。国王已经批准了一个名为《托马斯·马修圣经》的译本，这一版本是1537年8月克兰默第一次拿给克伦威尔看的。克伦威尔当即命令将它分配到全国各个教会中去，但这一版本只印刷了1500本，而英格兰有将近8500个教区。因此他委任他的朋友迈尔斯·科弗代尔修订马修的《圣经》，以使其更具学究性。科弗代尔要在巴黎开展这项工作，因为那里的印刷技术比英格兰更先进。克伦威尔的好友汉斯·荷尔拜因被委任设计扉页，此时他已经创作了支持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作品。但是当这本书进入生产的最后阶段时，灾难发生了。一支为出版此书而工作的英格兰团队被指控为异端，还有传闻称一些英格兰主教正在法国宫廷游说，呼吁叫停此版《圣经》的印制。科弗代尔向克伦威尔汇报说2500册已经印好的《圣经》中有一部分已被宗教法庭收缴。当这项工作陷于停滞的时候，克伦威尔写信给法国国王，请他归还未完成的书，以转到英格兰继续印刷。弗朗索瓦同意了。这项工作于1539年2月在克伦威尔的掌控下于伦敦的格雷修道会重新开始，到4月底，已有3000本《圣经》印制完毕，等待分发。

克伦威尔决心一举成功，因此他下令在每个教会要存放“一份英译《圣经》全本”，以“供所有人任意翻阅，通过阅读上述的经典，他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布道者口里所讲的内容，并且还能在家里向他的妻子、孩子和家人传授”。[20] 鉴于此时有机会接触上帝话语的民众依旧缺少教养，克伦威尔向助理牧师颁布了一系列指令，敦促他们：

> 在阅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对《圣经》的任何一部分内容的道理和意思存有疑虑，不要太过听从自己的错觉或意会，也不要在旅店和酒馆等公共场合公然争辩，你应该求助于那些被授权或者会被授权布道、宣讲经文的有学识的人，这样一来……你可以充分认识上帝的恩典，默默地利用这个最大的好处并且惠及众人，在各种事情上教化自己，同时也教育妻子和家人。[21]

克伦威尔又追加了一条命令，要求每一个教牧人员“保有一本工作簿或登记簿，在其中记下在任期间教区内的每一场婚礼、洗礼和葬礼的年份和日期”。[22] 这一举措对后世地方史家的意义非同小可，他们从此便有理由对克伦威尔一丝不苟的作风心怀感激。不过，克伦威尔的主要关切仍是确保《大圣经》（Great Bible）得到有效的分配。他对这项工作是如此投入，就像他向法国大使坦言的那样，他本人为促成此事就花了400英镑。1540年4月，《圣经》译本又在英格兰印刷了3000册，足够整个王国的每个教区使用，进而让几乎每一个想要聆听上帝话语的人都能轻易地听到。就这一点而论，它是克伦威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一个世纪以后，人们依旧认同他为促成此事所做的积极努力。历史学家约翰·斯特莱普将全部功劳归于他：“它体现了《圣经》印刷的时候克伦威尔凭借国王的权威提供了多么有益的帮助。”[23]

当国王在这之后批准他采取措施让较大的修道院顺服的时候，克伦威尔似已胜利在握。不过真相要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加复杂，真正驱使国王支持彻底改革的是财政收益的前景，而克伦威尔无疑描述了这项收益会多么巨大。亨利的良心（尽管不怎么好）则因很多隐士和修道士参与了“求恩巡礼”而多少得到了安慰。在1537年，克伦威尔的专员们已经开始巡访一些较大的宗教场所，以这场叛乱为理由对其成员施以严格的审问。兰开夏郡沃利修道院院长约翰·帕斯鲁（John Pasleu）因参与叛乱被处决，国王敦促苏塞克斯伯爵“因他们惨无人道的罪行指控那里所有的隐士……并且进而分析他们的心思，看他们是否会因之前的过错而心甘情愿地听从安排，去往其他宗教场所……或者宁愿接受世俗的身份并接纳世俗的习惯”。[24]

克伦威尔的人还受命追查修道士和修女当中迷信活动的证据，尤其是持有圣物的行为。他们很快带回了很多用假圣物引人注意或者恐吓宗教场所居留者的故事。一小瓶被认为是基督之血的液体被证实为鸭血，而一个装有“圣母玛利亚母乳”的瓶子“被打破并且发现里面是一块粉

笔”。[25] 克伦威尔让类似的这些故事得到充分传播，以嘲弄修道院，并为其解散提供正当理由。

1539年春，议会将对较大修道院的解散活动合法化。同年年底，只有少数的修道院没有被克伦威尔和他的专员们触及。大多数修道院都在威逼之下表示了顺服，不过仍有少数修道院立场坚定——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格拉斯顿伯里和雷丁的修道院院长们因为拒绝屈从而被剥夺财产和民事权利，克伦威尔命令将他们“审判并处决”的信件表明他们在庭审开始前便已被定罪。[26] 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具有毁灭性且有失公正，但它为王室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尽管国王承诺将利用他新获得的收益修建很多新的教会和教堂，现在证据只能证明他修建了6座。事实上，大多数来自被解散修道院的地产都被卖给了贵族，用来确保他们的忠心并为王室获得更多钱财。

但是克伦威尔无法永享胜利的果实，因为有迹象表明国王正对宗教改革日趋缄默。国王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和他的大臣的立场之间有着根本且危险的差别。尽管二人都热衷于践行王权高于教会的原则，但亨利的动机是想使英格兰摆脱教宗权威，而克伦威尔则对推进福音派改革更感兴趣。此外，虽然克伦威尔计划用从解散修道院得来的资金为王室设立一笔永久性的土地资产捐赠，亨利却更倾向于出售土地以资助对法国和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在往后几年里，这个差别变得更加显著。

1538年1月，国王起草了不下250处对《主教手册》的改动。国王对克伦威尔改革日益厌恶的一个更清晰的迹象是他邀请立场保守的杜伦主教卡思伯特·滕斯托尔（Cuthbert Tunstall）陪同他进行夏季巡游。这个举动让克伦威尔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何等脆弱，因为这场巡游比以往更加与世隔绝且行踪不定，让这位首席大臣更难与君主保持联系。当时的人很快理解了其中的意义。亨利·诺里斯的前侍从乔治·康斯坦丁注意到，滕斯托尔和加德纳一起对克伦威尔的权力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我

不建议掌玺大臣太过信任他们，”他告诉自己的一个密友，“因为我敢这么说，如果他们见他再次处于优势地位，就会竭尽全力踢他出局。”[27]

接下来更糟糕。1538年8月，路德宗代表团写信给亨利，请他就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的《辩解书》（*Apologia* ）中概述的神学争议的关键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声称这会帮助他们更快地达成协议。但是9月底国王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那时商谈已经失败了，路德宗诸侯的使团只得于10月无功而返。失望的克伦威尔向君主解释，尽管他倾向于他们的信仰，但是“跟世人一样，他会追随国王的信仰”。[28] 这句简短的发言不仅揭示了克伦威尔和国王之间的信仰差异，也揭示了他的忠诚度。无论他怎样强烈支持福音派的事业，也永远不会大过他对国王的效忠。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尝试争取让国王支持自己的观点。

国王对克伦威尔改革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忧虑因9月25日寄出的一封考虑不周的信件而进一步加深，这封信来自黑森，该地位于当时德意志福音派各邦的腹地。它让国王注意到他的王国内再洗礼派教义的盛行。这是新教教义的一种激进形式，它禁止追随者在政府任职，并提倡只对世俗权威维持薄弱的服从。在这一点上，再洗礼派构成了叛乱之风险的来源。克伦威尔迅速采取行动。10月1日他派出一组专员，根除再洗礼派教徒和圣礼主义者（那些在圣餐中否认基督真实存在的人）。但是事态已难挽回：亨利此时确信这位大臣的福音派改革为国内激进分子和异端的兴盛制造了条件。西班牙外交家门多萨于1538年9月汇报说，他看到克伦威尔“担惊受怕”，尽管他从同胞夏普伊那里了解到这位大人是伪装情绪的高手，但他相信“没有理由推断这种恐惧是虚假的”。这期间夏普伊也汇报说克伦威尔近来“度过了很多不眠的夜晚，并且受到了”来自君主的“诸多斥责和非难”。[29]

宫廷的保守派借此机会开始进一步培植势力，并团结起来。刚从法

国回来的加德纳用甜言蜜语赢得了亨利的宠信。斯特莱普记述道："这一时期克伦威尔不再拥有绝对优势，有时温彻斯特主教在国王面前更胜一筹。"[30] 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克伦威尔继续主动出击。在一场残酷但缺乏证据支持的执法行动中，他令几位显要的保守派人士背上了叛国指控，其中包括埃克塞特侯爵亨利·考特尼（Henry Courtenay）。考特尼有王室血脉，是爱德华四世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的外孙，他们年龄第二小的女儿凯瑟琳嫁给了德文伯爵威廉·考特尼。这一王室血脉既是一个祝福又是一个诅咒。这令亨利·考特尼在宫廷中地位显赫，尽管他的地产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他仍选择生活在王室权力的中心。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廷度过的，这让他成为国王的亲密伙伴，并于1520得以在枢密院和国王寝宫任职。他在寝宫的影响力尤为重要，这也让他注定和主导枢密院的克伦威尔产生冲突。这一点与他们出身上的差异一道，让两人自然而然地互为政敌。为了让安妮·博林下台，他们曾一度结盟，但在安妮倒台后不久，克伦威尔就指控考特尼（以及卡鲁）过于殷勤地为玛丽公主效力。在1537年他们之间的关系跌至最低点，以至于有流言开始传播，说考特尼因为用匕首捅克伦威尔而被投入伦敦塔。

尽管亨利一度相信克伦威尔的控诉，以至于在前一年决定派考特尼协助处理北方的叛乱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但考特尼很快就重新受宠。在备受珍视的爱德华王子于1537年10月受洗时，亨利·考特尼的妻子负责将王子抱在怀中，考特尼本人也在典礼上被安排了一个荣耀的位置。意识到考特尼跟君主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克伦威尔改变了策略。和他的家乡——西南英格兰的很多人一样，考特尼和他的圈子仍旧坚持旧宗教。1538年，克伦威尔利用这点作为控告的基础，指控考特尼、雷金纳德·波尔共同密谋，后者的兄弟杰弗里不久前在伦敦塔的审问中告发了他们。他们的同谋者是爱德华·内维尔爵士（Sir Edward Neville）和波尔家族的另一个兄弟蒙特古男爵亨利。这个所谓的"白玫瑰集团"被控欲置亨利八世于死地，他们意图剥夺国王的教会最高领袖头衔，并密谋为教

宗收回英格兰。克伦威尔谴责他们“可耻的卑劣行径以及叛逆的恶行”令人“深恶痛绝”。[31]

在考特尼入狱之后不久，克伦威尔出于小心起见，将他的妻子——埃克塞特侯爵夫人格特鲁德（Gertrude）逮捕并关在伦敦塔。这位侯爵夫人一直是阿拉贡的凯瑟琳的追随者，她的保守宗教立场也众所周知。克伦威尔向君主保证，尽管她顽固不化，“我会动用所有力量考验她，并且直到她的内心完全敞开并被公布于众为止，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不会松懈，如果我能够弄清上述内容且身体足够健康，我将在下周一亲口向您汇报此信中未能言及的详细情况”。他又说他真诚地希望“伟大的上帝让一切不虔诚、对陛下心怀不轨的人都暴露出来”。[32] 格特鲁德于1539年因叛国罪被剥夺财产和民事权利，但在后来被释放。她的丈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538年11月，克伦威尔及其同伴对所谓的叛徒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多次审问。在收集到的众多证据中有一分考特尼和蒙塔古1536年8月的私人谈话记录，在记录中前者自信地预言：“我相信那些操纵国王的奸人终有罪有应得的一天，我还相信世道终将得到匡正。”[33] 他所指的“奸人”中首先就有克伦威尔，他视后者为最致命的敌人，并对他大加鄙夷。尽管这是一场私人谈话，但根据1534年通过的《叛国法案》，其内容依然可被采纳为证据。1531年考特尼及其支持者们曾在私下里说他是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这一传言促使国王在该年将他赶出国王寝宫，审问者们也对此大加利用。即便考特尼很快重获恩宠，但克伦威尔此时利用这个把柄为他敲响了丧钟。他委任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宣传家、宗教激进分子理查德·莫里森于1539年将这一阴谋编成一部题为《叛国大逆洁难录》（*An Invective Ayenste the Great and Detestable Vice，Treason* ）载入编年史。

针对考特尼及其“同谋者”的指控几乎毫无依据。的确，他们是旧宗

教的信徒，但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他们在西部谋划了一场武装叛乱。考特尼没在那里待过多久，且他在当地民众中缺乏联络人，但这一事实在克伦威尔一手策划的极具破坏力的宣传攻势中被掩盖了。同时代的记录也表明考特尼对君主怀有真正的、长久的忠诚，这一点同样被宣传攻势所掩盖。考特尼真正的过错是反对克伦威尔和他的改革。克伦威尔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候发起了进攻，尽管亨利越来越担忧改革的性质和步调，但是他也因王国的旧敌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联盟感到深受威胁，这一联盟可能会导致一场对“异端”英格兰的入侵。因此，亨利对廷臣任何涉嫌支持此类入侵的谋反迹象都抱着极大的警觉。考特尼及其同伙于1538年12月3日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被正式定罪，并且6天后与蒙特古男爵在塔丘被斩首。

在上述二人被处决之后，克伦威尔另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尼古拉斯·卡鲁爵士很快也走上了刑场。和针对考特尼与蒙特古的证据一样，被用来指控卡鲁的证据也是1538年10月末从杰弗里·波尔爵士在伦敦塔审问中的供词里收集来的。在1538年最后一天被捕的卡鲁被控与波尔家族密谋，后者的王室血脉和坚定的天主教信仰让其成为君王的致命威胁。他在1539年2月14日被审讯并定罪，并于3月8日在塔丘被斩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们在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卡鲁在临终前显然皈依了克伦威尔的信仰。根据一位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所言，他“诚恳地为自己的狂热和迷信认罪，衷心地感谢上帝，因自从被关进伦敦塔以来，他第一次在英文《圣经》中领会了上帝鲜活而甘甜的神圣话语”。[34]

尽管克伦威尔全神贯注地忙于从宫廷中驱逐某些最致命的敌人，但他仍旧密切关注更为私密的宫廷内务。1538年10月，西比尔·佩恩（Sybil Penn）在他的安排下被任命为爱德华王子的保姆。他还要求那位不屈不挠的玛格丽特·布赖恩夫人（她已转任爱德华王子府上）就这个男孩的健康状况进行定期汇报。1539年，当一位显赫的客人即将到访

爱德华位于埃塞克斯黑弗灵的宫殿时，克伦威尔指示布赖恩夫人确保王子以恰当的姿态出场。一向不会放过每个求财机会的布赖恩夫人坚称：“他（爱德华）从没有一件可以装饰在帽子上的上好珠宝；不过我会尽自己所能彰显主人的荣耀。”她接下来又补充了一句：“王子殿下身体健康并且很快乐；殿下长了四颗新牙，其中三颗已经长出来了，第四颗刚露头。”在另一份报告中，她自豪地描述了这次访问的成功进行：“吟游诗人吟唱，殿下手舞足蹈、尽情地玩耍，几乎一刻不曾驻足停歇，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孩子拥有如此之多的精美玩具。”[35]

当然，克伦威尔对年幼王子的关注并不仅在于内务。鉴于爱德华是国王唯一的男性继承人，他要确保这个男孩受到最好的照顾。而作为一位狡猾的宫廷事务家，布赖恩夫人也在利用自己和国王首席大臣的沟通进一步让家族获益，其中包括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尼古拉斯·卡鲁爵士的遗孀。卡鲁死后他的财产被没收，这位遗孀写信向克伦威尔寻求帮助。他显然也提供了帮助，因为布赖恩夫人曾向他道谢，“因您对我可怜女儿卡鲁的大恩，只要我活着，就一定会向您献上我的真心和忠诚的服侍”。[36] 这一举动说明克伦威尔能够对自己的敌人或那些跟他们有关系的人宽宏以待。

在与布赖恩夫人的这次交流之后不久，克伦威尔不得不再次将注意力放到在全国继续推动实施宗教改革的运动上。西部各郡叛乱的苗头让克伦威尔得以扳倒考特尼，也成为他在1539年3月设立西部理事会的前提。西部理事会在形式上和北方事务院类似，目的是在萨默塞特、多塞特、德文和康沃尔等郡建立秩序。多塞特郡出身的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约翰·罗素被任命为议长。罗素与克伦威尔年纪相仿，且和他一样已服侍王室多年。1536年他在参与镇压“求恩巡礼”时的努力得到了君主的认可，尽管他当时已经是亨利最亲近的心腹之一。不过罗素的忠诚并非成功的保障，西部理事会在成立一年后即告解散。

西部理事会成立当月，克伦威尔已制定计划，要“在议会通过一项旨在实现宗教统一的措施”。[37] 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的抵抗，克伦威尔决定提高盟友的地位。实际上，这个时候可以称作他盟友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现任海军大臣威廉·菲茨威廉、托马斯·怀亚特和托马斯·赖奥思利。他的前盟友托马斯·奥德利曾令人质疑克伦威尔对国王的忠诚，因而不再可靠。1535年4月奥德利受命协助征收新税的工作，这在亨利的臣民中极不受欢迎。夏普伊汇报说，在奥德利返回伦敦的时候，“他跟克伦威尔激烈地争吵，指控后者是这项税收的推动者和发起人，并说这项税收可能会成为王国境内爆发最危险暴乱的肇因，提出应停止征收”。然而，这份报告显示，克伦威尔反驳说“这个主意不是他的，而是国王的，他（奥德利）应该对国王的欲望与贪财之心十分清楚”。[38] 以这种方式批评国王与克伦威尔的性格全然不符：即便他的敌人也承认他坚定不移、尽心尽力地服侍亨利。奥德利对克伦威尔的忠诚远非始终如一，就像这次转移责任的企图所显示的那样，尽管很多廷臣相信他们是盟友，但克伦威尔从那天起就没再相信他了。

尽管克兰默对克伦威尔的忠诚源于真正的信念和友谊，但他不是一个会为盟友牺牲一切的人。他在国王面前为安妮·博林辩护的尝试既不坚决也没有持续多久。而菲茨威廉是宫廷中最以善变闻名的一个人。怀亚特对克伦威尔的忠诚是坚定的，因为自他在卷入安妮·博林案并险些丧命之后，克伦威尔就一直是他在宫廷的首要庇护者。他们的通信表明这两人建立了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友谊，克伦威尔对怀亚特产生了近乎父爱般的感情，常常温柔地责备他不能保持收支平衡。“我认为你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你温柔、慷慨的内心，”克伦威尔某次对怀亚特说，“你一有了钱就乐于花掉它。”他还总是以“我非常钟爱的朋友”来称呼怀亚特。[39] 然而国王对怀亚特并无好感，只是勉强接受他留在宫廷，所以他很难给克伦威尔提供多少帮助和保护作为报答。托马斯·赖奥思利相比之下（至少在理论上）更为可靠，他被描述为“当时最成功

的文官”。[40] 虽然他在斯蒂芬·加德纳手下做文员，但赖奥思利的改革主义信仰让他与主人渐行渐远，到1538年他已开始从加德纳的主教府邸为克伦威尔提供对加德纳名声不利的内部消息。显然他的忠诚足以让人信服，1539年3月克伦威尔让他作为汉普郡的郡选议员被选入下议院。

但是这些人难以牵制诺福克及其日益团结起来的支持者们，克伦威尔因此开始寻找与自己更为亲近盟友。1539年1月，克伦威尔被任命为肯特利兹城堡的总管。他的儿子格雷戈里在当年迁入了这座城堡，伊丽莎白在不久之后也去了。他们的生活花销由克伦威尔承担，但这不仅仅是出于克伦威尔的慷慨。克伦威尔知道只要让自己的儿子住在城堡里，格里戈里就有资格在计划于4月召开的下一届议会中获得被选为肯特郡郡选议员的资格。尽管严格来说，格雷戈里还不满21岁，所以没有资格当选，但是他的父亲已与有影响力的五港同盟（Conque Ports）[41] 总管托马斯·切尼（Thomas Cheyney）打通了关系，以确保格雷戈里功成而返。

尽管克伦威尔细致筹谋，但他仍遭到了议会的反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君主。克伦威尔曾对亨利的恩宠自信满满，因而与他商讨了议会立法的筹备工作，然而国王最终辜负了他的期望。甚至与克伦威尔击退在宫廷和地方的敌人同时，他的君主也在对福音派进行一场类似的肃清。1538年11月16日，国王亲自主持了对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的审讯。国王身着白色以凸显他的纯洁，他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演讲捍卫圣餐变体论教义，这一理论主张圣餐礼中无酵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为了表明观点，他命克伦威尔大声读出对于兰伯特的判决。根据约翰·福克斯所说：“让克伦威尔而不是其他人宣读这些判决无疑出自温彻斯特主教（加德纳）的奸计，这样一来如果克伦威尔拒绝依命行事，他也会陷入类似的危险。”不过克伦威尔并未说出什么让他受牵连的话，而是拿出了那份令他如鲠在喉的判决：“其中包括烧死发表、著有违背或不认同天主教会的言论，或持有此类书籍的异端。”[42]

兰伯特被施以火刑的当天，亨利颁发了一份公告，以捍卫圣餐变体论和另一个传统宗教的关键信条：神职人员的禁欲原则。他还明令禁止异端书籍。随后，在1539年圣周和复活节期间，国王故意举行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并且大张旗鼓地庆祝耶稣升天节（罗马天主教信仰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这是对克伦威尔及其福音派信徒同党的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如果继续推进改革，他们就是在违反国王本人的意愿。克伦威尔的一个批评者稍后控告他"在背地里间接推动某种极端教义（即路德宗教义），并背弃陛下孜孜以求的那种真诚而有道德的中间路线"。[43]

克伦威尔正处于劣势，他自己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当一个削弱诺福克的机会出现时，即便事件的情节并不紧要，但克伦威尔仍对其大加利用。诺福克公爵府上一个名叫安东尼·劳斯（Anthony Rouse）的男仆看上了已故爵士爱德华·因金汉姆（Edward Inchingham）的女儿兼继承人，她当时正受国王监护。但是诺福克的管家罗伯特·霍尔迪奇（Robert Holditch）诱拐了这个女孩，意图把她嫁给自己的儿子。当时公爵身在北方，所以在劳斯为此事向克伦威尔求助后，他得以用最能给公爵带来麻烦的方式采取行动。克伦威尔推断公爵会支持管家的行为，决定支持劳斯并命令霍尔迪奇交出这个女孩。当公爵返回府邸，发现这一事态时，他在多封信函中倾泻了怒火。一脸无辜的克伦威尔将这些信呈给国王，并为诺福克"如此介意此事"而感到伤心。[44]

这场胜利令人满意，但它的效果太过微小，不足以扭转局面。事态似乎正快速地向着不利于克伦威尔的方向发展。1539年4月克伦威尔因发热病倒。23日他抱病写信给国王，请国王原谅他缺席宫廷："我感到非常抱歉、悲伤与难过，因为身患某种间日热症状，我现在不得不缺席宫廷，无法服侍陛下。"他解释说，自己原本打算前一天早上就去宫廷，但是"我因突然发作的热症而病倒，并在接下来的10小时一直高烧不退"。

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宫廷，克伦威尔显然颇感沮丧。“疾病给我带来的痛苦远不及……我不能……如愿来到宫廷并用我的能力为陛下分忧效劳（带来的痛苦），”不过，他向亨利保证，“我非常确信疾病这一大敌自发作时起便已得到控制，我将很快将其战胜，不让它占用我更多精力。同时，我相信慷慨、宽厚的陛下会以独有的仁慈原谅我，我为此极为谦卑地恳请陛下。”[45]

如果克伦威尔不知道国王对疾病怀有病态的恐惧，他无疑会抱病现身宫廷，即便自己衰弱无力。然而，只要有一丝被疾病感染的风险，亨利就会全速撤离。因此，克伦威尔只能在完全康复之后再回到他身边。亨利很快原谅了克伦威尔的缺席，克伦威尔对此也表示了谢意，虽然他显然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宫廷。结果，他不得不尽可能利用这段养病的时间在病床上处理事务。他接待了许多访客，并写了很多信给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大使们。为了不让自己的缺席为敌人所利用，克伦威尔还安排忠心耿耿的拉尔夫·萨德勒在宫廷里代表自己，并给了他一系列详细的指示。他再次给亨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的内容连贯得令人印象深刻，显然是费心构思的产物，并在信中传达了他在家能收集到的每一丝信息，并再次为自己长期的缺席请罪。“我的病还不能让我像职责所在、心思所想的那样出席宫廷并服侍陛下，”他写道，“今天晚上我没有休息好，因为疾病再次发作了。如果我可以摆脱病魔，就有望很快恢复。如果它持续下去，我会尽早克服它，直到我能更好地服侍陛下，因为我觉得（卧病的）时间太长了。”[46]

克伦威尔的希望没有实现。他的病症绵延了数周。他被迫错过了4月28日的议会开幕式，且直到5月10日还是没有充分恢复，未能在上议院列席。在这期间，他的敌人完全占了上风。5月5日，大法官奥德利在上议院发表演讲，重申了国王希望对“观点的分歧”加以约束。一个委员会因此被设立起来，旨在审查教义问题。如果克伦威尔在场的话，他一定会竭力避免这个结果。重启关于宗教事务的公开辩论给了他的对手一

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让克伦威尔改革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并让国王的心中产生疑窦。更糟糕的还在后面。5月16日，诺福克公爵抢占先机，宣布委员会无法达成决议，然后提出了六个问题供上议院定夺——每一个问题都在主张回归保守的宗教规则，其中包括对弥撒的正统理解，亦即承认圣餐礼上的无酵饼和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并且强调了个人弥撒（private mass）[47] 和告解的重要性。其他问题则谴责了在圣餐礼中允许平信徒兼领圣体圣血 [48] 的行为，批评神职人员结婚的现象，并呼吁其遵守禁欲誓言。简单来说，这六大论点提倡对神职的传统理解，并撤销了过去7年完成的一些最显著的改革。5月20日，诺福克机智地提议议会休会一周，这样议员们可以有时间考虑这些论点。但事实上，休会的目的是让公爵及其盟友为他们的主张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亨利似乎开始采取与欧洲天主教势力和解的政策。尽管他因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的头衔而颇感欣喜，但亨利一向并不乐于接受改革主义者君王的形象。6月7日，他向查理五世示好，宣布对皇帝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外甥女伊萨贝拉进行两天的哀悼。这引起宗教改革派群体的不安，并促使正在带领另一个路德宗使团访问英格兰的弗朗茨·布尔夏德（Franz Burchard）在当日返回本国。

加来的局势也开始陷入动荡。这处英格兰的军事据点由莱尔子爵掌控，他和他的妻子一样是虔诚的保守派，并坚决反对克伦威尔的宗教改革。二人在过去有过几次冲突。例如，1537年7月，克伦威尔就“天主教派在那个城镇（加来）依旧存在且你作为陛下的枢密院成员提供了主要的庇护”，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指责他。克伦威尔还顺带嘲讽莱尔的妻子：“一个女人的所愿以及她摇摆不定的喜好，会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做出那件不论如何都会让君王和至高无上的上帝不悦并触犯他公正律法的事，这是与所有常理相悖的。”[49] 这场争辩很快结束了，但克伦威尔为了保障一些福音派教士的安全曾将他们从英格兰送到了加来，由此引发的事件在此时到了紧急关头。[50] 在这些人当中，克兰默主教的福

音派专员约翰·巴特勒（John Butler）尤为遭到莱尔子爵的反感。当已故王后简的哥哥哈特福伯爵（the Earl of Hertford）在1539年年初以检查防务为由到访加来的时候，莱尔抓住机会表达他的不快。哈特福伯爵在争取让妹妹成为王后的时候曾乐意与克伦威尔结盟，但现在他对后者已没有什么忠诚，他很快就将消息散布到整个宫廷。

尽管克伦威尔还在家养病，但他很快听到了这个传闻并警觉起来，他立刻于5月6日写信给莱尔，请他调查此事。不过，虽然克伦威尔想让这场调查在当地审慎地进行，莱尔却有其他的想法。这位王权代理官显然对议会的风向一清二楚，他采取了大胆的举动，逮捕了加来的改革主义者并把他们送到伦敦接受审讯。这几乎是一场猎巫式的迫害。愤怒的克伦威尔要求莱尔立即中止这种强制迁离的行为，但是这位代理官故意无视了他的指示。他如此自负的作风折射出克伦威尔势力衰落的程度以及速度。仅在几个月前，克伦威尔的话曾像国王的口谕一样一言九鼎，无人敢违。但是此时，就连一个英格兰海外据点的代理官也敢忽视他的直接命令，好像它是由一个下级文员发出的一样。

克伦威尔支持者们的影响力也遭到了类似的削弱。6月12日，一位来自加来的议会议员托马斯·布罗克（Thomas Broke）进行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对诺福克的六个宗教条款，随后便和在加来被捕的福音派人士一道接受审讯。当议会于5月30日再开的时候，克伦威尔已经痊愈，可以参会。他立刻出手反转局势、支持改革。他成功地使因赋予亨利或其枢密院颁布的法令与议会法案同等的法律地位而饱受争议的《王权告谕法案》（the Statute of Proclamations）得到通过，证明了自己在逆境中的韧性与能力。这意味着重大决策将不必等待议会表决通过（这一过程通常颇为恼人），从而大大加快了制定政策的速度。在强行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克伦威尔的目的无疑是想进一步推进宗教改革，这说明他有信心夺回在枢密院的主动权，以及国王对他的宠信（这一点至关重要）。他很快利用自己的优势，让议会两院同意放宽诺福克对神职人

员结婚和禁欲的苛刻要求，令诺福克的六条提议不再那么尖锐。

然而克伦威尔的乐观落空了。诺福克的六大论点以及对其反对者的惩罚办法于1539年6月16日作为《六条法案》（the Act of Six Articles）得到通过，成为法律。为避免让这份法案被视为国王在先前的改革中出尔反尔的迹象，这份法案中还包括了一条为他挽回颜面的理由："最尊贵的陛下深思熟虑，鉴于上述法案在王国的神职人员以及大多数平民百姓及国王的臣民当中引起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判断，出现了很大的不一致和分歧，他满心希望并相信，针对上述法案的一个充分且完美的决议会让忠诚、顺从的臣民达成充分的一致和普遍的统一。"6月28日，这一法案得到国王御准。改革派对此感到愤慨，他们指责这项法案是"用六根绳编成的血腥鞭子"。[51] 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堪一击之后，曾强烈反对上述法案的拉蒂默主教和沙克斯顿主教当即辞任。两人都是克伦威尔在推进改革期间最得力的盟友，他们的离职对这位首席大臣造成了切实的打击。

不过，至少沙克斯顿的下台没有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这位主教已经抱怨好几个月了。1538年3月，克伦威尔写信指责他接连不断地发牢骚。"如果你因为我尖锐的去信而感到冒犯，"他询问道，"那你那些暴躁的言语——我差点用另外的说法描述它们——又怎能让我高兴呢？"在更多严厉的斥责之后，他用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向沙克斯顿解释自己的行为："上帝给我的寿命不长，我乐于履行自己的职责，去教诲而不是去毁灭，你也知道这就是我的本意。你自以为是地说上帝会对这种对权力的使用降下裁判，无异于指责我滥用这种上帝和陛下愿意赐给我的职权……我或许曾因无知而犯错，但我从未凭恶念行事。我不会伤害任何不背离国王律法与正直原则的人。"看来沙克斯顿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尽管克伦威尔冷静沉着且从容幽默，但他对经常加诸他和他的改革之上的尖刻言语变得越来越敏感。他对沙克斯顿的说辞也可以说是对整个世界的自白。不过，他还是以一句对主教的明显威胁结束了这

封信：“你应当认真履行你的职责，如果你这么做了，你没有理由怀疑我的友谊。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一定会用直白的方式告知你。”[52] 沙克斯顿明显没有留意这个警告，于是他为此付出了代价。在辞任后不久，他写信给克伦威尔，询问他是否应该像一个主教或神父那样着装。7月初他穿着神父的衣服陪同依旧跟他保持密切同盟关系的克兰默在同一场合出现，但是克兰默和克伦威尔都没能阻止他在7月7日被逮捕；事实上，基于他们早前的交流，后者可能积极推动了这次逮捕。[53]

对外界来说，克伦威尔仍旧处在权力巅峰。他的账簿证明那些有野心的、希望他能代为向国王说情的廷臣们强塞到他手中的贿赂没有减少。[54] 但是《六条法案》的通过标志着他的仕途跌至到此为止的最低点。诺福克一党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他苦心经营的这场宗教改革的力度被严重削弱，若再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这些改革就将有灰飞烟灭之虞。

但根据约翰·福克斯所言，正是在这个时候，国王突然回心转意，决定以克兰默的名义于1539年6月29日在兰贝斯宫举办一场和解晚宴。克伦威尔和诺福克都受邀出席，亨利显然希望他们能在这个非正式的场合化解分歧，结果这一预期显然太过乐观。福克斯称，当一位显要的贵族（可能是诺福克）出言侮蔑枢机主教沃尔西时，克伦威尔大感愤怒，为维护旧主的名誉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指控诺福克不忠，而这位公爵说他是一个骗子。这一记录没有得到其他资料的佐证，但是它与克伦威尔强烈的忠诚感相符合，而诺福克会用这种方式激怒他也不难想象。两人不断激化的憎恶因最近一届议会以及加来的争议而进一步加剧，似乎一触即发。

保守派马不停蹄地利用新的立法让改革主义者乖乖就范。7月上旬，一批福音派教徒被告发到克兰默那里受审，他们中很多人是被莱尔检举的。虽然对他们信仰怀有同情，但这位主教不得不下令监禁了大部

分被指控的人。7月12日，法国大使马里亚克（Marillac）向他的主人弗朗索瓦一世汇报说英格兰国王“再次捡起所有旧的观念和习俗，只有对教宗的服从和对修道院和教堂的毁坏除外，因为他已从那些宗教场所攫取了收益”。[55] 诺福克及其支持者们因胜利的前景而欢欣雀跃。

然而，事态再一次向着有利于克伦威尔的方向发展。他的君主似乎不愿意回归更加保守的教义，就像他曾经不愿意接受克伦威尔改革中较为激进的一些措施一样。因此他重新宠信克伦威尔，再一次接纳他的改革主义思想。议会解散后，保守派主教们都开始返回他们的主教辖区，令形势对克伦威尔更加有利。8月，保守派主教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员斯蒂芬·加德纳在公开场合草率地痛骂福音派的罗伯特·巴恩斯，并指控他是异端。克伦威尔立刻将他逐出了枢密院。加德纳曾积极支持《六条法案》并致力于起草处罚条款，他的离去让诺福克失去了最有权势的一位教会盟友。亨利批准了驱逐加德纳的决定，这一事实表明形势终于转到了克伦威尔这边。

另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于1539年秋季伴随着路德宗使臣弗朗茨·布尔夏德的返回而到来。一向不放过每一个优势的克伦威尔开始为英格兰和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路德宗诸侯之间的联盟铺路。为达成此事，克伦威尔的首要策略就是为他的君王安排一桩新的婚姻。

---

[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98；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95.

[2] Froude，J.A.（ed.），*The Pilgrim：A Dialogue of the Life and Actions of King Henry Ⅷ，by William Thomas，Clerk of the Council to Edward Ⅵ*（London，1861），p.11.

[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II，p.457.

[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

1902），Vol.I，pp.235-236；*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rance*，Vol.XIII，Part I（London，1899），pp.995，1147，1355.

[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93.

[6] Mayer，T.（ed.），*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Volume 1*：*A Calendar*，*1518-1546*（Aldershot，2002），p.78.

[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84-86.

[8]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88.

[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86-90；Mayer，T.（ed.），*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Volume 1*：*A Calendar*，*1518-1546*（Aldershot，2002），p.136.

[10] 位于法国勃艮第地区，设立于910年，曾在中世纪发起名为"克吕尼改革"的修道院革新运动，在天主教世界颇有影响。

[11] 英文名为"Justice of the Peace"，普通法体系下由政府委任民间人士担任维护治安、防止非法刑罚及处理一些简单的法律程序的职衔。

[12] Ellis，H.（ed.），*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2nd and 3rd series（London，1827，1846），Vol.III，pp.192-194.

[1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059.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281；Ellis，H.（ed.），*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2nd and 3rd series（London，1827，1846），Vol.III，pp.208-209.

[15]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p.358；*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1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231；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 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Vol.I，p.83.

[17] 托马斯·贝克特（1118—1170），曾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任大法官，后作为亨利二世之亲信被推举为坎特伯雷大主教。1170年因主张捍卫教会权力与亨利二世反目，被忠于国王的四名骑士杀害于坎特伯雷座堂内，因此被视为英格兰天主教会史上的殉道者，在1173年被教廷封为圣人。

[18] *State Papers*， Vol.II，p.551n.

[1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p.151-154.

[20]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145.

[2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p.146-147.

[22] Williams，pp.811-814.

[23] Strype，*Memorials of Thomas Cranmer*， Vol.I，p.83.

[24] *State Papers*， Vol.I，p.540.

[25] 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 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Vol.I，p.31.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399.

[27]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p.278.

[28] Elton，G.R.，'Thomas Cromwell's Decline and Fall'，*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0（1951），p.19.

[29]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I，Part I，pp.40，53.

[30]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530.

[3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62.

[3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14.

[33] TNA KB 8/11/2.

[34]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p.827.

[35]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I，pp.67-69；Vol.III，p.112.

[36]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I，pp.67-69，Vol.III，p.112.

[3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Part i，no.655.

[38]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42.

[3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167.

[40] Elton，G.R.，*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Cambridge，1953），p.312.

[41] 中世纪以来由英格兰东南各郡五座位于英吉利海峡东端的港口城镇组成的同盟，其成员为黑斯廷斯、新罗姆尼、海斯、多佛和桑德维奇。

[42]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589.

[43] MacCulloch，D.（ed.），*The Reign of Henry* Ⅷ：*Politics，Policy and Piety*

（Basingstoke，1995），p.43.

[4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307.

[4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16-219.

[4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16-222.

[47] 即无会众参与，只有司祭一人进行的弥撒。

[48] 即在圣餐礼中允许非神职信徒同时领无酵饼（圣体）与葡萄（圣血）。天主教会主张平信徒在圣餐礼中只领圣体，这一规定为新教派所反对，成为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争议焦点。

[4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65.

[50] 1533年9月，莱尔子爵试图采取关于谷物的新举措引发了一场最激烈的争论。克伦威尔斥责他让国王动怒，斥责他因他人的建议，尤其是他妻子的建议而动摇："尽管尊夫人值得尊敬且有智慧，但是在与你权力有关的这类事上，她的建议和决断并不通用。"接下来一年，他因他所谓的"无节制的生活"而责骂这位总督。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364，391.

[51] Bray，G.（ed.），*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1994），pp.222-223.

[5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28-131.

[53] 沙克斯顿当年余下的时间里都处于监禁中，1540年春他和拉蒂默被赦免，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不再布道，不再靠近伦敦或任何一座大学。

[5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82.

[5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no.1260.

第十六章 佛兰德斯的梦魇

安妮是克里维斯公爵威廉的姐姐。克里维斯是神圣罗马帝国辖下的一个公国，位于莱茵兰的北部。在1537年的最后几周，简·西摩尔死后不久，安妮首次被提议为亨利的第四任妻子。[1] 当年22岁的她早在1527年与洛林公爵继承人弗朗索瓦订婚时就已经作为一个棋子被放在了国际婚姻市场上。这场订婚无果而终之后，她得以自由地嫁去别地。英格兰派驻尼德兰摄政——匈牙利的玛丽处的大使约翰·赫顿（John Hutton）最初发起了这一提议，尽管他也承认安妮从来不是以美貌闻名。这一建议并未打动当时正在为简的去世而哀悼的国王，因此它直到1539年年初才被重新提起。这次亨利的态度更为积极，因为他迫切需要新的盟友。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签署于1539年1月的和平条约里，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发誓在没有得到彼此同意时不与亨利结盟。更糟糕的是，不久之后教宗保禄三世再次发出开除英格兰国王教籍的训谕。尽管当时的克里维斯公爵约翰（安妮的父亲）不是新教徒，但他也和亨利一样，已在自己的领地内否定了教宗权威。他的长女希比尔（Sibylle）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他是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领袖。因此，与克里维斯的同盟会为英格兰的改革提供不小的助力，而克伦威尔之所以如此热情地支持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1539年3月，亨利终于同意开始谈判——主要事项既包括他自己与安妮的婚姻，也包括女儿玛丽与安妮弟弟的婚姻，但他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纯粹是一场政治联姻。克伦威尔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让他越来越感到不安，因此他决不愿与他眼中欧洲大陆的激进改革派为伍。为了与谈判保持距离，国王还明确地把结成这一同盟的重任完全压在他的大臣肩

上，这样一来他在有必要时可以更容易地撇清关系。这对克伦威尔来说意味着危险，但事已至此，他除了推进谈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这场联姻有除了热情以外的其他情绪。这场联姻不仅让英格兰与一个重要的改革派政权联结，还避免了亨利娶一个英格兰贵族新娘为后的可能性，进而牵制宫廷中的贵族势力。所以他派出两个代理人——尼古拉斯·沃顿（Nicholas Wotton）和理查德·比尔德（Richard Beard）到克里维斯开展这项工作。

他相信这两人可以促成这桩联姻。沃顿两年前协助起草了所谓的《主教手册》，而比尔德是克伦威尔在枢密院的盟友之一。然而，他们的任务起初并不顺利，因为威廉当时正试图与皇帝和解，并知道与英格兰的联姻会被视为和解之路上的一个障碍。英格兰国王这边也有一些勉强，亨利认为这场联姻有些配不上他。就连克伦威尔似乎也认为他的君主应当娶一位更好的伴侣。在一封写给萨克森选帝侯身边的使者的信中，国王指示克伦威尔要与萨克森的副首相伯克哈德（Burckhard）围绕克里维斯的安妮交换意见，“不至于苛求她，但是要给他们挑刺，让他们认识到能够将她奉上是克里维斯家族所能享有的最高殊荣”。[2] 但因为法国与西班牙正处于同盟状态，克伦威尔别无选择。

和谈由克伦威尔而不是亨利主导，克伦威尔在就玛丽公主的婚事向萨克森选帝侯做出保证时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克伦威尔说当他与君主提及此事时，他认为“从陛下的表情和外在表现看……陛下是有充分意向的”。[3] 这算不上一个有力的认可。早在1539年1月，即亨利同意开始谈判之前，克伦威尔已向亨利在萨克森的使臣兼克伦威尔一直以来的代理人克里斯托弗·蒙特（Christopher Mont）做出了一些指示，让他平息一切对于这桩婚事的反对意见。克伦威尔对玛丽小姐的称赞缺乏诚意，他敦促蒙特要让萨克斯选帝侯确信“她是举世最有吸引力的、最为华美的女性，她美丽优雅、身材匀称且拥有最杰出的学识和高贵的举止，以及所有真诚的美德和良好的品格”，但他又坚持无需将安妮的肖

像画送到国外以证实这些赞誉。[4] 尽管国王的长女在孩提时代曾因美丽而被称赞，并被她的支持者们描述为“世界上最美丽、最具有美德且最温柔的人之一”，但自长大成人之后她便因焦虑和病痛而衰弱，她的长相也因此受到影响。[5]

在克伦威尔努力促成这场联姻的同时，他的君主却忙于讨好法国。1539年3月28日，查理·德·马里亚克（Charles de Marillac）来到宫廷以接替早应被取代的前任大使卡斯蒂永，这给了亨利很大的希望，让他以为弗朗索瓦一世会抛开与查理的联盟并和英格兰达成协议。宫廷上下似乎“为之一振”。[6] 只有克伦威尔对形势与转变感到惊愕，但他还是继续不动声色地推进与克里维斯联姻的计划。

在议程早期阶段，玛丽小姐联姻的计划似乎便已被搁置了。后来克伦威尔被指控故意破坏这一计划以便亲自迎娶国王的女儿，但考虑到与克里维斯的联盟对他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这很有可能只是传闻，由一则先前关于克伦威尔有意染指玛丽小姐的谣言引起。

夏末，克伦威尔的使者们就国王的婚姻与克里维斯一方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安妮将会成为亨利唯一一个从未见过就同意迎娶的新娘。尽管在政治上有利，但亨利是不会仅凭对这位小姐相貌的转述就愿意与之结成婚姻的。年初的时候，克伦威尔指示蒙特“坚持不懈但隐秘地询问这位小姐的相貌和品格……以及她的身高、身材和肤色，还有学识、举止以及是否诚实”。蒙特显然给出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报告，因为克伦威尔随后向君主汇报称：“每个人都夸赞这位小姐的美貌，她的容貌和身姿都在其他杰出的小姐之上……她的魅力与公爵夫人相比有如太阳之于月亮。每个人都称赞她的美德与真诚谦逊，这些特质在她庄严的面容上一目了然，那些见过这两位女士的人都如是说。”[7]

但是亨利并没有对克伦威尔的话信以为真。本已对联姻持保留态度的他派自己钟爱的画家汉斯·荷尔拜因去克里维斯，让他描摹安妮的形

象。沃顿是赞扬安妮美貌的众人之一，他描述她“非常漂亮”，并认定荷尔拜因的画像是一幅精准地捕捉了安妮的形象。克伦威尔要求这幅肖像在展示给君主之前先给他看，而这幅肖像并没有让他失望。“当克伦威尔看到这幅肖像画，发现这位小姐漂亮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高兴”，《西班牙编年史》记录道。[8] 这份史料还声称，掌玺大臣等到国王心情“非常愉悦”时才将这幅画呈给他。据说亨利在看到安妮漂亮得像娃娃一般的脸蛋、秀美的头发、乌黑的眼睛、精巧的嘴唇和下巴以及端庄优雅的神情时大为高兴。他以至此为止最强烈的热情即刻指示克伦威尔快速结束和谈。

克伦威尔将此事委托给老朋友斯蒂芬·沃恩，派他立刻到克里维斯。克里维斯公爵极为隆重地接待了沃恩，在他到达后“奉上了丰盛的宴席”。[9] 在这位老道使臣的主持下，谈判很快达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根据国王迎娶外国新娘的惯例，订婚由代理人完成。

9月末，一个来自克里维斯的使团抵达伦敦的宫廷。10月4日，他们签署了一份几乎可以确定是由克伦威尔起草（或者至少是在他的指导下起草）的婚约。根据婚约条款，国王会收到一笔不少于10万金弗罗林（约合2.5万英镑）的礼金。不过，亨利意识到威廉公爵可能支付不起这样的巨款，于是放弃了这笔礼金以作为慷慨的表示，这可能也体现出他对这位新娘的渴望。结果，大使们第二天签署了一份合约，完成了亨利和安妮不可撤销的联姻。克伦威尔迅速“向安妮小姐送出祝贺的书信”，表达了自己因她的婚姻将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欢喜的心情。《西班牙编年史》认同他“因促成这场联姻而喜悦得难以言表”，但又说“事实证明这场婚姻于他无益”。[10]

在克里维斯的安妮准备启程前往英格兰的时候，克伦威尔将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宗教事务上。他利用国王重新施予他的宠信，激起亨利对科弗代尔《大圣经》的热情。受首席大臣的鼓舞，亨利适时委托克兰默为

《大圣经》第二版写正式的序言，并且在11月14日发布公告，赋予克伦威尔在接下来5年审批所有《圣经》译本的职权。这对克伦威尔来说是重要的一步进展，而且似乎表明了国王是真心投身于宗教改革事业。《圣经》很快就供不应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几个新的版本被委托制作。

同时，克伦威尔为身陷监禁数月的加来福音派人士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1539年9月，这些福音派人士的监管人、伦敦主教史托克斯莱逝世，他一直是一位最坚定的改革反对者，他的逝世让克伦威尔得以为争取让福音派人士获释展开行动。11月中旬，他和克兰默让绝大多数被羁押的福音派人士重获自由，并且成功推迟了针对其他人的诉讼。

此时克伦威尔感到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这一点可以从1539年11月林肯主教举报的一个异端分子的案例中看出来。霍恩卡斯尔的一个教区神父被指控“草率、虚假地传扬上帝的话语”，令“人们受到极大的冒犯”。这个人被审问、起诉，但当有人向克伦威尔提及他的案子时，后者的态度却意外的仁慈。他向主教建议说，在他看来这位神父的行为是“单纯、无知的结果，而不是任何恶意或自大的举动”。[11] 因此他的结论是应该赦免这个人。克伦威尔的这种仁慈是少见的，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但是他显然感到足够的自信，因而可以在这个案件里宽宏大量。

然而，正当克伦威尔改革的巩固看似得到了保证时，国王再一次收回了他那以善变著称的宠信，其原因正是好那位在几个月前似乎是克伦威尔救星的女人。克里维斯的安妮于11月26日启程前往英格兰，她乘坐一辆与自己作为英格兰新王后的身份相称的马车和她的随从一道向加来进发。斯蒂芬·沃恩是受命欢迎英格兰未来王后的人员之一，克伦威尔也派了他的儿子格雷戈里前去迎接。青年时期的格雷戈里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热衷冒险，所以这可能是他第一次离开英格兰前往海外。这趟旅程

并不容易，格雷戈里汇报说很多船上的侍从“因呕吐而十分焦躁”——不过他自己的忍耐力较强。[12]

欢迎队伍比安妮早到了一个多星期，他们在这期间以宴饮和竞技为消遣。12月11日一大早，国王未来的妻子终于来到加来附近。格雷戈里骑马去迎接她和她的随从，她“佩有三件颈饰，分别由布、黄金和紫色天鹅绒制成，还戴着金项链，身后有200个仆人随侍，他们身穿由红蓝两色组成、代表国王旗号图样的衣服”。在场的还有80名侍卫，身穿“厚花缎和天鹅绒的外套”。他们从路程的最后1英里左右开始护送她来到城镇中心。当安妮小姐一行从国王“装饰着100面金丝线旗帜”的舰队前经过时，舰队鸣放了200响礼炮，“随后加来城也鸣炮300响”。根据当时的一份记录，那天的加来“浓烟滚滚，她的车队彼此之间竟不能看见”。[13] 这是一场既奢华又震耳欲聋的欢迎仪式。

安妮一行接下来的航程因坏天气耽搁了，所以安妮和她的随从在加来待了两个多星期，这让格雷戈里得以充分加深对这位新王后的了解。他的父亲报信说她那高贵的未婚夫尽管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她，但还是指示英格兰方面在加来的随行人员“要尽心尽力让我的小姐和她的随从开心，让他们感到等待的时间很短且没有那么沉闷”。格雷戈里深入参与了这些娱乐活动，即便他发现未来的王后没有荷尔拜因的肖像画里描绘的那么吸引人，他出于谨慎起见也没有说起，只是向他的父亲汇报说安妮“身体康健”。[14] 欢迎队伍的其他人员也没有做出任何与之前的预期不一致的评论。相反，他们的报告里满是对竞技、宴会以及其他娱乐活动的描述，这些活动是为滞留在加来的新王后举办的。

12月27日，天气终于好转，安妮和她的众随从可以起航通过海峡了。安全抵达英格兰海岸之后，她在肯特郡的迪尔登陆，然后动身前往多佛，在当地得到了盛大而奢华的接待。在新年前夜，队伍顶风冒雨抵达罗彻斯特，急于与安妮见面的亨利也冒着恶劣天气带着侍从向南骑

行。遵照文艺复兴时期与素未谋面的外国新娘订婚的君王们偏爱的习俗，为了“培养爱意”，亨利在一些亲信顾问（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的陪同下乔装改扮赶去见她，但他浪漫的冒险之举在第一眼看到新娘时便戛然而止。安妮的肖像画显然对她本人进行了高度的美化。和他前三位妻子娇小的身姿相比，安妮又高、骨架又大。荷尔拜因肖像画的角度巧妙地掩饰了她的大鼻子，而她的皮肤上还有天花留下的疤痕。她的体味如此刺鼻，以至于在那样一个对个人卫生毫不挑剔的时代仍引起了几位廷臣的议论。国王大感惊骇。“我不喜欢她！我不喜欢她！”他在会面结束后对忧虑的克伦威尔大喊。他接着“严厉且不悦地”抱怨安妮“没有描述的那么好”，又说他如果知道安妮的长相，“就决不会让她踏足这个王国”。他要克伦威尔想出“某种补救方法”，烦恼的克伦威尔坦言自己“也不知道，因此非常抱歉”。[15]

平心而论，在亨利对安妮表示出如此强烈的厌恶之前，从来没有其他记载说她相貌不好。安妮著名的绰号“佛兰德斯的梦魇”只是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主教于17世纪末杜撰的。在她成婚前，所有同时代的记录都对她称赞有加。就连亨利也不得不承认她“容貌不错”，而克伦威尔则费尽心思地指出“她有王后的仪态”。[16] 但是安妮的新婚丈夫认为她令人厌恶，这一事实意味着她注定将作为“丑妻”被载入历史。其实在他们结婚的时候，亨利自己的样貌也很难称得上具有魅力，但这并不重要。现年48岁的亨利因腿上的竞技旧伤变成溃疡而渐渐丧失了行动能力，他从前在运动方面的卓越能力早已不复存在，而他的腰围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亨利刚成为国王的时候身材尚算苗条，腰围只有32英寸；当他见到克里维斯的安妮时，腰围已经接近42英寸了。安特卫普的艺术家科尔内留斯·马赛斯（Cornelius Massys）在4年后绘制的一幅素描显示了国王怪异的体格。他小珠般的眼睛和小而噘起的嘴几乎被淹没在周围的层层赘肉里。他看起来几乎没有脖子，整张画布都装不下他宽大的身躯。同时代的一个记录者为这幅肖像画提供了佐证：“国王之肥胖前所未见，他的紧身上衣可以塞进三个最胖的人。”[17] 虽然无人敢于

议论（预言国王的死相当于叛国），但亨利的很多廷臣——包括克伦威尔在内——一定也在私下里思忖他会活多久。总的说来，安妮比他未来的丈夫有更多抱怨的理由。

亨利继续向克伦威尔施加压力，让他设法解除婚约；并质问他："难道一定要违背我的意愿、给我的脖子套上轭，而没有其他的补救方法了吗？"[18] 但是这位大臣罕见地感到手足无措。最终，国王只得不情愿地承认，既然已经通过代理人订立婚约，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完成正式的婚姻仪式。一旦违背条约就会引起重大的外交事故，而英格兰不能失去盟友。即便在这个时候，法国国王还在巴黎与查理五世一道庆祝新年，两人仍在制订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尽管他们的同盟最终没有维持多久，但它当时对英格兰国王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亨利自己坦言："如果不是因为她已如此深入我国境内，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王国和民众为她做了如此多的准备；如果不是因为担心这会把她的弟弟逼向现在正在联手的皇帝和法国国王一方，从而在世人面前闹出笑话，我决不会娶她。"尽管如此，亨利仍立即命令他的首席大臣让他摆脱这场由其一手策划的联姻。就好像克伦威尔需要任何进一步刺激才会行动一样，托马斯·赖奥思利也敦促他："看在上帝的分上，想想办法让国王解脱吧，因为如果他继续这样不快、困扰，我们有一天会因此而受罪。"[19]

显然亨利不相信克伦威尔会将自己从一桩他如此热心安排的联姻中解救出来，于是他暗中指示沃恩返回克里维斯，并且调查更多关于安妮早先与洛林的弗朗索瓦的婚约情况。根据《西班牙编年史》记载，沃恩招揽公爵的侍从喝酒，他们透露说安妮实际上已经跟弗朗索瓦结婚了，但在与亨利订婚的谈判开始之后，公爵就遣走了他。弗朗索瓦似乎在不久之后就"郁郁而终"。[20] 当沃恩将此情况汇报给国王的时候，他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这一点。如果安妮和洛林的弗朗索瓦已经结婚而不只是订婚，那么他们一定也已圆房，这便足以构成亨利与安妮之婚姻无效的依据。但是克里维斯的大使们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带来洛林

的婚约，所以这一点无法证实。

据说气恼且沮丧的亨利把克伦威尔召来并质问：“你为什么引我犯如此大罪，让一位绅士因此逝世？如果你知道克里维斯的安妮结婚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娶她？”克伦威尔听到这话颇感“悲伤”，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陛下可以留着她，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已经死了，”克伦威尔回复说，“而且，如果陛下您离弃她的话，人人都会对您拥有如此多的前妻而议论纷纷。”[21] 亨利因这样傲慢无礼的回答而大怒，并命令克伦威尔退下。至于这场对话是不是像《西班牙编年史》描述的那样，目前还没有定论。亨利的暴怒不难想象，但是克伦威尔的傲慢无礼则不合道理。这时他已经服侍君主长达数十载，因而十分清楚应对亨利脾气爆发的最好方式是安抚。

与此同时，在外界看来，宫廷一切如常。回到伦敦之后，国王于1月3日在布莱克希斯公地（Blackheath Common）以盛大的仪式公开迎接他的新娘。包括克伦威尔在内，王国内所有重要的达官贵人都出席了仪式。亨利在整场仪式中都没能掩饰他的不悦。“很多人都留意到国王跟她一起走来，但他的脸上流露出失望，”《西班牙编年史》记录道，“据说从那天起国王就不像从前那样快乐了。”[22]

亨利一边为他的新王后提供了与她的身份相应的排场，一边以沃恩先前的调查无法令人满意为由，在私下里指示克伦威尔对安妮的使节们就她的上一次婚约进行质讯。克伦威尔给了他们一天时间考虑，他们在1月4日断然回复说安妮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洛林的妻子，并承诺立即将婚约送到英格兰来。更糟糕的是，诚实的安妮同意签一份公证文书发誓她可以自由结婚。克伦威尔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君主，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令人为难的任务。他自己后来记录道：“我受命向陛下汇报使团的答复……这让陛下大为不悦，说我处理不当，可以看出陛下已下定决心终结这场婚事。”[23] 克伦威尔承诺仪式一结束就推动将这桩婚姻无效的进

程，或许才令亨利的心情略微平复了一些。亨利在1月5日批准了一笔留给安妮的价值4000英镑的遗产，这是他在遏制住拖延这场厄运发生的冲动之后做出的决定，表明他显然已向既成事实让步。他还批准了对安妮宫廷女官的任命，克伦威尔的儿媳伊丽莎白也身在其中。

第二天，亨利极不情愿地前往格林尼治参加自己和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婚礼。花在仪式上的心思非常少，以至于直到婚礼当天一早还没有确定由谁来带着安妮走过红毯。最终确定的人选是埃塞克斯伯爵和欧弗斯坦伯爵，但由于找不到埃塞克斯，他的位置便由克伦威尔接替。这无疑是亨利对克伦威尔的惩罚而非荣宠，他决意要将这场联姻完全归咎于他的大臣——因此一有机会就让他卷入其中。克伦威尔直到最后一刻才得以幸免，他刚刚到安妮的住所迎接她的时候，埃塞克斯终于露面了。松了口气的克伦威尔回到国王身边，向他汇报说一切已经就绪。亨利召唤他的大臣近前来，怨恨地低语："我的大人，如果不是为了满足世人和我的王国，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能让我做今天这必须要做的事。"[24] 克兰默主持了接下来的仪式，随后新娘和新郎进入例行的庆祝环节。

但即便国王履行职责完成了婚礼，同房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亨利在位的记录中有一份关于当晚的详细记录。国王抚摸了新娘全身，但是这令他如此反感，以至于无法再继续下去。第二天早上，克伦威尔来到君主的寝宫，并发现"陛下不像我以为的那样愉悦，我斗胆问道，您觉得王后怎样，陛下回复说，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我的大人，你知道我之前不喜欢她，现在我更不喜欢她了"。他抱怨说"她一点都不美丽，而且她身上有股令人不快的气味"，并且继续称有"迹象"暗示她不是处女："我已经抚摸了她的肚子和乳房，凭此我能够判断出她不是处女，这让我心中一惊。当我摸到它们的时候，我没有决心或勇气进一步进行其他的事项，也就是说她的身体还是和与我初见时一样，（一夜过去）没有任何变化。"[25]

而在安妮这边，显然完全不谙世事的她向侍女说她觉得自己可能怀孕了。“我每天跟国王睡一起……怎么会是一个处女呢？”她问。“他来我的床边亲吻我、拉我的手，轻声对我说‘晚安，亲爱的’；然后他在早晨亲吻我，再轻声对我说‘再见，亲爱的’。这不够吗？”拉特兰郡伯爵夫人回答说：“夫人，一定得有更多，不然很久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位约克公爵，而这是这个王国最渴望的。”[26]

传说亨利没能圆房是因为他对新娘的强烈反感，但这同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不举。他的年龄是这位年轻新娘的两倍还多，且在近年来日益丧失行为能力。虽然他依旧喜欢玩宫廷式恋爱的游戏，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传出他拥有情妇的传言了。这种情况在争取婚姻无效化时可能有用，但毕竟不是那种他会希望公之于众的事情。君主们对性能力的自矜甚于普通男性，因为这对他们王国的延续至关重要。亨利有点过于急切地向他的医师巴茨医生吹嘘，说尽管他无法与安妮圆房，但是他有过“两次梦遗”。[27] 这可能是他抗拒过度的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安妮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迫切地寻求建议。她首先向克伦威尔求助。出于谨慎起见，克伦威尔战战兢兢地请示君主，以为她排忧解难。尽管国王视这位首席大臣为把自己卷入这第四场婚姻的罪魁祸首并因此颇为恼火，但他依旧信任克伦威尔，因此准许他与安妮讨论此事。不过，克伦威尔大概觉得这个话题相当难以启齿：妥善处理君主的宗教和政治事务是一回事，理清他的性生活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他向安妮的宫务大臣拉特兰伯爵托马斯·曼纳斯（Thomas Manners）做出指示，让他鼓励安妮以一种可能会取悦国王的方式表现自己。稍后他向君主汇报说他已经敦促拉特兰“设法诱导王后能在举止上更讨陛下欢心，顺应您的心意，纠正一些缺点，以宽慰陛下”。[28] 拉特兰的妻子在安妮的寝宫服侍，后来的事态表明克伦威尔还指示她汇报这对王室夫妇有无性生活。同时，他悄悄指示安东尼·丹尼在君主耳边说些鼓励性的话，利用“一切机会向陛下称赞安妮”。这不是一份值得羡

慕的工作，倒霉的丹尼很快败下阵来。亨利斥责了丹尼，“直白地告诉他这个私下服侍自己的仆人……自己决不会被挑动或被诱导去与她发生肉体关系。”[29]

尽管如此，国王仍刻意与新王后维持表面的关系，尽可能多地与她一起公开露面。婚礼几天后，格林尼治举办了一场庆祝竞技。当时的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记载了此事，并热情洋溢地称赞新王后，仿佛那场庆典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婚礼）之后的周日非常隆重……那天她按照英格兰的风格穿着，戴了一条法式的头巾，这表现出了她美丽和姣好的容貌，每个人都为看到她而欢喜。”[30]

1540年2月，这对王室夫妇乘船出发前往威斯敏斯特，接受伦敦市民的夹道欢迎。安妮收到来自新臣民的礼物，并欣然参加了宫廷庆典。但是她的举止和教养远不如她的前任。克里维斯贵族女性的教育和英格兰贵族小姐的教育很不一样。那里的英格兰大使描述她“品性谦逊且柔和……大多数时间都忙于针线……她可以阅读和写作（但得用自己的语言），不懂法语、拉丁语及其他语言，也不会唱歌或弹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德意志这里，人们不认同名门女性应当拥有学识或了解音乐的观点，认为这是轻浮的表现”。[31] 安妮显然缺乏她的新婚丈夫所习惯的那种风雅气质，而且无论她怎样温和、怎样渴望取悦亨利，她都会在都铎宫廷这个精致的世界里因笨拙而令人难堪。这是国王摆脱她的另一个理由。

尽管亨利决意要摆脱这个令人不快的新娘，但这场婚姻给了路德教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诸侯以勇气，他们于1540年1月派一位代表来到英格兰宫廷，受命与英格兰结成宗教和政治上的联盟。这位使臣名叫路德维希·鲍姆巴赫（Ludwig Baumbach），他向亨利表达了对英格兰议会通过《六大法案》的遗憾，并要将英格兰国王拉回到宗教改革的大业上来。到达伦敦后，鲍姆巴赫和使团的其他人直接去找克伦威尔，他们视

他为宗教改革派的领袖，因此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最大希望。但让他们沮丧的是，这位掌玺大臣在接待他们的时候极为冷淡，他要求知道他们是否有权力议定政治联盟。当使节们提出异议的时候，克伦威尔让他们去找他的君主，而亨利也重复了同样的问题。被激怒的鲍姆巴赫转而向陪安妮来到英格兰的萨克森副首相伯克哈德寻求帮助。两人一起拜访了克伦威尔，并且重申了他们想与英格兰国王达成联盟的愿望。他告诉大使们说，国王只想要一个政治联盟，宗教问题可以晚些再决定。他们没有因此打消念头，坚称这不可接受，宗教是他们使命的核心。

克伦威尔的回复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无论他怎样重视宗教改革，这一事业永远次于他对国王的服侍。他抛开外交谈判的惯有礼仪，以出人意料的坦诚向使节们宣称自己对他们在宗教协议问题上的诉求十分清楚，但鉴于目前的事态，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顺从国王的信仰，哪怕这会让自己失去性命。克伦威尔或许曾在过去10年间致力于推进宗教改革，但这是以改革事业与他的政治野心一致为前提的。既然现在国王在宗教事务上采取越来越保守的立场，克伦威尔也不愿成为像莫尔或费舍那样的良心犯。他已被迫深陷与克里维斯联姻一事中，倘若再公开支持路德宗诸侯的主张，局势将会进一步复杂化，而这是他无法承受的。况且，克伦威尔的个人信仰更多地与较温和的福音派一致，他觉得路德宗的很多教义令人反感。在国内外的政策中，谨慎和模棱两可一直是他的格言，克伦威尔现在迫切地要重拾那样的态度。

鲍姆巴赫和伯克哈德因这位英格兰宗教改革主导者的反复无常而极感失望，他们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最后一次拜访国王。至此，亨利在这件事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他不仅继续抵制他们要求缔结宗教联盟的压力，还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们，作为政治盟友，他们对英格兰没什么价值。即便法国和西班牙真的像这两位使节所说的那样决定入侵，他也有足够的能力驱逐外敌，无须路德宗诸侯的帮助。然后他遣走了这两人，并命克伦威尔正式为他们送别。这位大臣无疑乐于看到这两位使节的离

开：他们为克伦威尔敲响了警钟，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多么疏远于国王的立场和宠信。不过，尽管克伦威尔像他在权力巅峰时期可能会做的那样拒绝为他们的使命提供帮助，这一旨在与路德宗势力划清界限的企图也为时已晚，无不足以挽回他的局面了。

这一时期，除了国王新婚的麻烦外，克伦威尔还为别的紧急事态所扰。克里维斯的安妮的惨败鼓舞了他在宫廷中的敌人，其中首要的是诺福克公爵。《西班牙编年史》记述，亨利在与克伦威尔就这桩婚事进行了一番愤怒的对话之后，召见了诺福克和爱德华·西摩尔，告诉他们："我决意要摆脱克里维斯的安妮，不能再让克伦威尔欺骗我。"诺福克迅速把握机会，在会面结束的时候对西摩尔说："公爵，这是将平民从我们当中赶走的机会，你看国王跟克伦威尔发生了争执，现在寻求我们的建议，我们要建议他自己定夺此事，不要再受克伦威尔把控。"[32]和其他收录在《西班牙编年史》中的对话场景一样，这段对话可能也是臆想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诺福克想利用这场婚姻摧毁他的对手。

诺福克还利用外交事务巩固自己的地位。1540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与查理五世的会面给公爵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得以发挥自己的外交本领在两位君主之间挑起事端，进而降低了这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对英格兰构成的威胁。2月，他从巴黎汇报称法国国王"对皇帝的话不甚满意"。[33] 诺福克不能将这种不和的实现归功于自己：因为查理拒绝履行条约中的承诺，两位君主之间的关系本已趋于紧张。但诺福克出手挑旺了这两人之间憎恨之火的事实还是让亨利特别满意。而克伦威尔则与此无关。直到此时，他仍被与德意志诸侯结盟的主张所绑定，这令他在实质上不可能参与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外交事务，所以他的死对头可以一揽所有功劳。更糟糕的是，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间的不和已经实质性地削弱了与克里维斯结盟的价值。

诺福克的胜利是重大的。但他不是一个人在行动，加德纳自1538年

从法国被召回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削弱他们所鄙视的对手，而在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之后，他们开始密谋促使克伦威尔垮台。意识到这个危险，克伦威尔对诺福克家的核心资产进行了攻击。1540年2月，克伦威尔安排关闭了诺福克郡的赛特福德修道院，这里是最后一批免于解散的修道院之一（可能得益于诺福克的保护），而且是诺福克公爵的家族墓地。诺福克奋力保护它，并计划将其改建成一座神学院，这样那里的神职人员就可以一直为家族的灵魂做弥撒，但克伦威尔有另外的想法。他对自己的这位头号政敌发起了最为决绝也最具报复性质的一场攻势，将这座修道院彻底拆除。由于原址上并未建立起神学院，诺福克公爵不得不将祖先的遗骨转移到35英里外萨福克郡的弗拉姆灵汉姆，这让他深受侮辱。这既是有计划的羞辱，也是一种宣战行为。如果说诺福克之前只是厌恶这个出身卑微的暴发户，那么现在他开始全然地鄙视克伦威尔，且不让克伦威尔彻底垮台便不会罢休。

孤注一掷的克伦威尔更进一步，试图以肯宁霍尔有人罹患汗热病为由将诺福克公爵赶出宫廷。克伦威尔深知国王对疾病的恐惧近乎病态，且对任何有轻微症状的人都避而远之，因此认为此计肯定能将诺福克支开几个星期，而这一空隙足以让自己在宫廷里重获主动权。但诺福克坚决否认自己有被传染的风险，因为他已经很久没与被感染者接触过了。他还明确表示，即便被逐出宫廷，自己也不会退居乡间，而是会住进自己在伦敦的居所。这让亨利相信留诺福克在宫廷不会构成危险，克伦威尔此番落败。

《西班牙编年史》称，在这场挫败之后不久，克伦威尔曾谋划要以叛国罪构陷诺福克。根据这一说法，诺福克有一位人称“达特内尔先生”的亲戚因被怀疑试图毒死国王珍视的儿子及继承人爱德华王子而被捕。据说克伦威尔秘密探望关在伦敦塔里的达特内尔，并且试图说服他做证称是诺福克让他这么做的。这位震惊的被囚者拒绝了，大声说：“我才是世上最不可饶恕的叛国者，而我的家族里从未有其他人叛

国！”[34] 没有证据佐证这个故事，它有可能是出自作者的虚构，以展现两人之间的厌恶之深与手段之无情。

此时，事态似乎正朝着不利于克伦威尔的方向飞速发展。除了要在宫廷中与他的敌人争斗外，他还面临着全国宗教保守派的反对。为了在国王那里重获一定程度的信任，他迫切需要取得一些成功，于是他派拉尔夫·萨德勒到苏格兰宫廷推动那里的宗教改革事业。但运气总是与克伦威尔相背，这次出使以失败告终。尽管精明且有政治敏锐性，但萨德勒在外交事务上经验尚浅，他高估了自己，向苏格兰国王许诺举行一场与亨利的双边会面。然而，这场会面从未实现，萨德勒也被迫灰溜溜地回到宫廷。

与此同时，加来争端在1540年3月9日因诺福克公爵（他持续与莱尔子爵保持密切联系）在当地挑起新一轮异端调查而重燃。诺福克派去执行这场调查的人员都是坚定的保守派，在当年4月5日，他们得出结论称当地存在“严重的宗教分裂”。随后有13名异端分子被押送回伦敦，其中有5个人是克伦威尔的门徒。

同样在3月，主教加德纳发起了一场新攻势，下令逮捕罗伯特·巴恩斯。巴恩斯强烈反对加德纳在圣保罗教堂前十字架下进行的一场布道，后者在这场布道中谴责了多条新教教义。两周后，巴恩斯在同样的讲道坛上布道，他利用这个机会不但驳斥了加德纳的论点，还公开侮辱了他。巴恩斯可能指望克伦威尔的保护，因为后者在过去曾救他免受异端指控，但如果他这样想的话，那他就严重地错判了形势。加德纳就此事向国王申诉，国王下令将布道者带到他面前审问。巴恩斯在接下来的神学讨论中被加德纳击败，并在猛烈抨击对手时被逮捕，连同另外两个有名的福音派人士（他们也都是巴恩斯的支持者）托马斯·杰勒德（Thomas Gerrard）和威廉·哲罗姆（William Jerome）一起被投入伦敦塔。

哲罗姆是斯特普尼的教牧，当地的教堂正是克伦威尔和他的家人做礼拜的地方，可见加德纳意图以此一击作为一个清晰的警告。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捕的三人被迫在复活节当周公开宣布放弃福音派信仰。当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听到哲罗姆宣布放弃信仰时，他非常痛苦地写信给他的前家庭教师亨利·道威斯，敦促他查清细节。道威斯于3月回复：“你的指示让我完全相信，你在得知他（威廉·哲罗姆）的那种行为、他宣布放弃信仰的举动以及他上述布道中的内容之后，一定非常痛苦。”[35] 然而，他们放弃信仰的宣言被认为不可信赖，所以针对这三人的诉讼仍在继续。法国大使马里亚克挖苦地说，维护这些异教徒“近来动摇了克伦威尔大人的可信度，以至于他也差一点遭遇不幸”。[36]

---

[1] 早在1530年就有关于英格兰和克里维斯之间婚姻联盟的提议了，当时公爵写信给亨利八世，承诺如果结成这样的联盟就给予军事援助。他急于证明自己家族血统，向亨利保证他跟“英格兰国王源于同一个血脉”。这个提议没有任何结果。*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IV，no.6364.

[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44n.

[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74-175.

[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74-175.

[5] Froude，J.A.（ed.），*The Pilgrim*：*A Dialogue of the Life and Actions of King Henry* Ⅷ，*by William Thomas*，*Clerk of the Council to Edward* Ⅵ（London，1861），p.12.

[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53.

[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175，200.

[8]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62；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88.

[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89.

[10]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38；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90.

[1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41.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s.622，630.

[1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14.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Part ii，no.707.

[1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68-276；*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s.823，824.

[16]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68-269.

[17]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08.

[18]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70.

[1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70；*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23.

[20]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92-93.

[21]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94.

[22]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91-92.

[2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69-270.

[2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70-271.

[2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271；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p.555-556.

[26]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i，p.462.

[27]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2002），pp.101-102.

[28] BL Cotton MS Titus B i.

[29]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London，2002），pp.98-99.

[30]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p.837.

[3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p.261-262.

[32]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94-95.

[33]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84.

[34]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100-101.

[3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V，no.414；Ellis，H.（ed.），*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 ，2nd and 3rd series（London，1827，1846），Vol.III，pp.258-265.

[3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37.

第十七章 “克伦威尔摇摇欲坠”

克伦威尔正在溃败，这一点路人皆知。4月10日，马里亚克兴高采烈地预测克伦威尔即将垮台，甚至猜测谁会接替他的众多职位。“我之前写过的那场闹剧如今越发精彩起来，其主角曾唆使神学学者进行布道，为他们摧毁修道院、掠夺教会财富的行径张目，现在却导致了这些神学学者的毁灭，这些神学学者因而归咎于他们——其中就有克伦威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如何，”他记录道，“几天内这个王国的许多事情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国王开始在他的大臣们中间做出调整，召回那些他曾疏远的，贬低那些他曾提升的。”这位大使说：

> 克伦威尔摇摇欲坠，因为所有被召回的那些曾因他的手段被免职的人都对他怀有“不好的意念”；其中温彻斯特主教、杜伦主教和巴斯主教等极富学识和经验的人被召到枢密院。根据确实可靠的依据，富有威望与学识的杜伦主教滕斯托尔[1]会成为新任代理总教监，而巴斯主教会成为掌玺大臣，这是克伦威尔两个主要的头衔。无论如何，他不能再保留代理总教监的职位了，甚至连他手下的人也认同这一点。

马里亚克在结尾部分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便他的声望和权威一如从前，那也只是因为他工作勤勉，尽管他处理政务的手段很粗野。他做任何事都要先征求国王的意见，并且表现出愿意处事公正的态度，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2]过去10年这种“粗野”的管理方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与他对国王谨小慎微的恭顺态度一道，为他赢得了国王的欣赏和信任。但也正是这种无疑源于他卑微出身的处事风格，现在让国王和枢密院都坚决地反对他。这位来自帕特尼的铁匠之子已经飞黄腾达了很久，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但是现在他的贵族敌人团结一致，急于从这

位自称“流氓”的人手里夺回对政务的控制权。

法国大使的预测并非像看起来那样为时过早。3月末克伦威尔试图与加德纳达成和解，这意味着他自感身临绝境。时任驻法大使约翰·沃洛普汇报说：“现在这个时刻，赖奥斯利告诉我说，温彻斯特主教大人昨天在伦敦跟掌玺大臣一起用餐，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他们在坦诚的对话之后得出发自真心的结论，那就是抛下所有分歧，从现在开始由衷地视彼此为最好的朋友。”[3] 几乎可以确定，这样的休战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克伦威尔这边卑躬屈膝道歉的结果。加德纳自恃有国王的宠信，所以只能由他的对手做出所有的让步。考虑到不久前他对主教曾有绝对的优势，这一定很让掌玺大臣恼火。

然而，即便这样羞辱的表现也无法令他的政敌罢休，克伦威尔被迫采取更决绝的行动。不久之后，他辞任秘书职位，让给了他的门徒拉尔夫·萨德勒和托马斯·赖奥斯利，后者也加入了枢密院。克伦威尔采取这种策略的原因尚不清楚。当然，无论其他廷臣针对他的策略如何具有攻击性，他不可能是因被同僚逼迫才辞任的。只有国王才能夺走他的职权。克伦威尔可能是在得到亨利许可后为自己即将迎来的提拔铺路，或者是有意提升自己在枢密院的影响力。

新一届议会于4月12日召开。议会一直是克伦威尔最中意的政治舞台，他在出席这届议会时也表现出了和往届一样的自信。克伦威尔决意要跟国王较保守的立场保持坚决一致，他在上议院做了开幕演讲，强调了亨利希望他的众臣民能够实现宗教一致。他接着采取措施，指派专员纠正所有逾矩行为，并强制要求尊重经文。这显然意在根除异端，并会反过来导致克伦威尔非常珍视的一些改革被颠覆。他随后设立了两个新的委员会，旨在确立一条国王在宗教事务上非常渴望的“中间道路”。

但是这位大臣没有完全背弃改革的方针。英格兰隐修制度唯一一处尚未被改革攻陷的难关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它是一个古老的军事

修会。克伦威尔起草了一则法案将这一组织取缔，并将其财产转移给王室。紧接着是冗长的辩论，辩论最终以这位四面楚歌的大臣的胜利结束，他的法案最终在两院得到通过。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征税法案，这同样极大地充盈了王室的金库。

克伦威尔再一次在议会上大获全胜，但这也是最后一次。这届议会让他空前明确地展现了自己对国王的忠诚。通过为宗教一致铺路并增加王室的收入，克伦威尔以一种既极具价值又带有自我牺牲色彩的方式为国王效力。或许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可，4月18日亨利授予了他埃塞克斯伯爵的爵位，这是英格兰最古老、最显赫的一个头衔。在第二代伯爵亨利·鲍彻（Henry Bourchier）于当年3月因坠马折了脖子去世之后，这一头衔便空了出来。同时，在第十五代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John de Vere）逝世后，亨利也将他留下的掌礼大臣（lord gerat chamberlain）一职授予克伦威尔，这是宫廷中的一个高级职位。同时，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被授予克伦威尔勋爵的荣誉头衔，他和赖奥思利都被授予爵士称号。亨利对克伦威尔态度的明显翻转让马里亚克大感诧异，他说新任埃塞克斯伯爵“一如既往地受国王宠信，尽管他的地位之前差点被温彻斯特主教等人撼动”。[4] 克伦威尔对他的新头衔无比自豪，从那时开始用“托马斯·埃塞克斯”的称呼为自己的信件署名。他继承了亨利宫廷两个贵族成员的头衔和职位，这让诺福克及其支持者们难以接受。现在克伦威尔本人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侮辱，他们不会放任克伦威尔在新得到的显赫位置上逍遥太久。

但是国王对克伦威尔释放出了更多的恩宠信号。亨利将埃塞克斯多座被解散的修道院的财产和收入赐给了克伦威尔，其中最显著的是圣奥西蒂的修道院。大量的地产和租金都被赐给了“上述托马斯·克伦威尔勋爵，以供其终身享用”。[5] 只不过克伦威尔不曾设想自己“终身”将会如此短暂。他大可以回想在安妮·博林倒台前不久，国王曾出人意料地赐给了她很大的荣誉。国王宠信之心的善变程度往往出人意料——近些年

来更是如此。夏普伊曾写道，“鉴于国王如此善变”，自己无法“形成判断”。《西班牙编年史》也认为，“当国王喜爱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极其喜爱”——但当他想要收回这种喜爱时，这也将发生得极其突然。尽管克伦威尔总是称赞君主行事公正、意志坚定，“是一位言出必行的可敬君王”，但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国王有多么善变。这位曾经健壮、苗条的国王现在“非常肥胖且极其过度地宴饮”。不断增长的腰围在他溃烂的腿上施加的压力日渐加剧，疼痛让他更容易出人意料地发脾气。结果，正如马里亚克所说，“有可靠信源说他早上的想法往往在晚餐后就变了样”。[6]

尽管如此，克伦威尔的运势看上去仍有所好转，形势又开始对他有利起来。4月中旬一个传闻传到伦敦宫廷，证明了这位新伯爵外交政策的正确性。这一传言宣称，法国正在紧邻加来的阿德尔构筑要塞。克伦威尔指示沃洛普就这一明显具有侵略性的举动要求法国国王做出解释。对手冷静的反击更激起了亨利的疑心，法方回复说：“吾主只知道我国可以在那里或其他边境地带构筑要塞，就像贵国国王陛下在加来、吉讷等地修建的要塞那样。”[7] 突然之间，国王对英法联盟的热切希望看起来乐观得可悲，这反而让克伦威尔主张的跟克里维斯的联盟变得更加可靠。

但就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正在应对来自法国的消息时，尼德兰方面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态。查理五世在成功镇压了根特的叛乱之后，要求克里维斯公爵让出格尔德兰。作为克里维斯的盟友，英格兰将受邀出面支援公爵，这反过来会让他们跟皇帝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是亨利一直竭力避免的。更糟糕的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形势也动荡不定，所有这些责任正好都归在克伦威尔肩上。政局的动向又一次于这位新任的埃塞克斯伯爵不利，他的敌人们迅速抓住了先机。

事态开始加速发展。长久以来被克伦威尔一方视为眼中钉的里尔子

爵在被授予爵位的前一天到达伦敦。迫切想要扩大自己在宫廷的支持者队伍的诺福克向他发出了邀请，但是公爵袖子里藏有一张更大的王牌，那就是他的侄女凯瑟琳。国王可能在前一年12月去罗彻斯特见他的新妻子时第一次见到了凯瑟琳·霍华德。她是第二代诺福克公爵的幺子托马斯·霍华德的女儿，曾担任安妮的童女侍从（maid of honour）[8]。我们无从确知她的年龄，但当亨利贪婪的目光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时候，她可能只有15岁。尽管年轻，但凯瑟琳并不单纯。她是由父亲的继母、孀居的诺福克公爵夫人养大的，而这位公爵夫人的宅邸在道德准则方面声名不彰。当凯瑟琳在1536年跟她的音乐老师发生不正当关系时，她可能只有12岁，不久之后她又与自己的亲戚弗朗西斯·德雷厄姆（Francis Dereham）发生了性关系，后者“以一个男人会对待自己妻子的各种方式”利用她。[9]他们之间无疑是情人关系：德雷汉姆甚至称凯瑟琳是他的妻子。一位贵族新娘得以出嫁的首要条件是童贞，所以这件风流韵事被孀居的公爵夫人掩盖了，她在发现此事之后很快就为她在新王后的寝宫弄到了一个职位。

诺福克很快发现了国王对他年轻侄女明显的爱慕之情。凯瑟琳活泼迷人，这让她与国王非常厌恶的妻子形成了完美的对照。诺福克因此开始安排他们私会。诺福克的盟友加德纳在这件事上也出了一臂之力，据说他在自己位于萨瑟克的官邸中举办宴会和娱乐活动，以撮合凯瑟琳和亨利。1540年4月，国王的新欢已阖宫皆知。当月24日，亨利将两个杀人犯的财产（已定罪之重罪犯的动产和不动产应被上缴给君主）赐给了凯瑟琳，5月18日他又赐给她23套薄绸被褥。一位旁观者记录称他“与另一位女性走得太近”。[10]王后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在6月20日向克里维斯公爵驻伦敦的大使卡尔·哈斯特（Karl Harst）吐露了怨言。有趣的是，在随后给公爵的报告中，哈斯特称这段风流韵事已经持续了数月，尽管没有证据可以佐证这点。同时，在叔叔的指导下，凯瑟琳在追求着她的国王面前假扮处女。克里维斯的安妮被废黜的诱人前景似已唾手可得，她即将摘取最大的一颗胜利果实。

尽管克伦威尔也在试图推动将安妮废黜一事，但自己最大敌人的侄女即将成为下一位王后的前景仍令他极感厌恶。克伦威尔现在进退维谷：如果他执行国王的命令，那么他就是在为凯瑟琳·霍华德的上位铺路；如果他违背国王的命令，他会受到君主的责难。两种情况都将意味着灾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克伦威尔第一次陷入绝境——他几乎无法脱身。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克伦威尔仍像往常一样处理事务。他继续过问法律和宗教事务中的细枝末节，这一事实体现了他毫不松懈的精力、勤奋以及他对自己仍受国王宠信的信心。因此，他花了很多时间审理针对来自萨默塞特郡基尔明顿的威廉·哈吉尔（William Hargill）的诉讼，据指控他跟他的儿子们试图谋害一个当地人，因为后者要向他们讨回一头被哈吉尔的仆人偷走的母猪。此外，他解决了一起与威尔士北部惠特福德教牧住宅有关的琐碎纠纷，接着还为威尔特郡的一位神职人员谋得助理牧师的职位。[11] 如果克伦威尔认为自己处境危险，他本应将所有精力放在维护自己的地位上。

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的传统的五朔节竞技似乎表明这位埃塞克斯伯爵确实重获了宠信。竞技活动于5月1号星期六开始，持续了一整周。所有参与比武的选手都在身上"华丽地穿戴着"白色天鹅绒和丝绸，其中就有克伦威尔的外甥理查德。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则位列理查德的对手之中。[12] 理查德显然乐于借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天生的运动天赋，并在之后进行的竞技中脱颖而出，击败了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托马斯·卡尔佩珀（Thomas Culpeper）[13] 在内的诸多挑战者。与新妻子一起全程出席竞技活动的国王对理查德印象非常深刻，因而宣告："'从前你是我的亲随，但从现在起你是我的钻石。'随后一枚钻石戒指从他的手指上掉了下来，理查德将其捡起，陛下则将戒指赐给他，并命他从今往后要将此佩戴在他饰章中小狮子的前腿上。"亨利接着授予这位年轻人骑士爵位，这无疑让他的舅舅很是欣慰。理查德和其他每一位挑战者都被赐

予了100马克的年金以及一栋可以传于子孙的房舍，这些赏赐来自斯坦福德的圣弗朗斯西修道院的收入，这座修道院于1538年10月被解散。[14]

如果克伦威尔曾因这些宠信的迹象而受到鼓舞，他将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谋。5月9日君主召见他议事。尽管谈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几乎可以确认这次召见是为了商讨使国王摆脱与克里维斯的联盟的方法。两天后，克伦威尔被迫给新任驻神圣罗马帝国大使理查德·佩特（Richard Pate）写信，指示他向皇帝暗示英格兰与克里维斯的同盟会很快终结以作为安抚之策。当月末，亨利在宫廷中接待威廉公爵的大使们时故意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对他们请求支援以对抗皇帝的诉求给出了极为暧昧的回应。

克伦威尔并未被这些不祥的事态吓倒，而是重新鼓起勇气猛击对手。他建立了监护法庭管理封建税捐制度，这一政策于1540年6月以法案形式得到议会批准。与此同时，里尔子爵非但没有得到诺福克承诺给他的晋升，反而在5月19日因叛国嫌疑被投进伦敦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那里。5月底，两位显赫的保守派人士也被投入牢狱，分别是天主教会的理查德·桑普森（Richard Sampson）主教和尼古拉斯·威尔逊（Nicholas Wilson）博士。

这样果断的行为带有一丝困兽之斗的色彩。克伦威尔知道靠交际手腕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如此凶猛地反击敌人，他是在迫使君主在宫廷里互相角逐的两派中做出选择。这是一个既危险又勇敢的策略。亨利看似转向了克伦威尔，但他的善意从来不是可以长久依靠的。

在进攻宗教对手的同时，克伦威尔还试图利用国王新的婚姻中更加积极的进展。安妮跟亨利一起出席了传统五朔节的竞技会活动，这助长了她不久将会加冕的传言，这一仪式通常会在婚礼数周甚至数月之后进行。安妮指示克里维斯的大使兼她的心腹卡尔·哈斯特与她丈夫的枢密

大臣们讨论这个可能性。几乎可以确定，克伦威尔是他询问的大臣之一。5月末，拉特兰伯爵着手让安妮的一些侍女返回了克里维斯，克伦威尔再一次敦促他向安妮劝谏让后者的行为举止更讨国王欢心。

但是如果克伦威尔将赌注压在了国王的新婚姻会顺利延续的可能性上，那么他下错了注。亨利在表面上可能急于做做样子，但他决不会跟一个他所讨厌的女人维持婚姻关系——特别是在他有诺福克侄女这样一个令人愉悦的备选的时候。此外，克伦威尔对其宫廷对手的攻击性举动只会让他们更努力地寻求彻底消灭他。《西班牙编年史》说，诺福克和爱德华·西摩尔散布了一个谣言，称克伦威尔从克里维斯公爵收受了一大笔贿赂来安排这场联姻。他们求见国王并重申了他们的猜疑，并告诉他："王国所有的贵族都诧异于陛下您会给这位秘书如此多的职权，他一定接受了克里维斯公爵一大笔钱，才会像这样促成您的婚姻。"

与此同时，政敌们据说还在克伦威尔为什么豢养了如此之多的家仆这一问题上煽动了国王的疑心。《西班牙编年史》描述了诺福克是怎样告诉亨利的："在我们看来，克伦威尔意图不轨……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管地位怎样高，都没有他那么多的仆人，而且我可以证明，王国各地都有人佩戴他的徽章并自称是他的仆人，以此为掩护犯下了很多罪行。"另一位在场的枢密大臣赞同道："我知道他的宅邸有可供超过7000人使用的武器，这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不得不注意到，陛下您的侍卫中有足有40人曾是他的仆人，您的寝宫中有5个忠于他的人，基于所见所闻，我们相信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将可以为所欲为。"根据这份史料，克伦威尔在宅邸雇用了超过300个仆人，在全国各地足有1500人佩戴他的徽章。第一个数字有些低估，而第二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有夸大成分。据说亨利对此很是烦躁不安，并且向这些大人们承诺："我答应你们，今后会设法夺去他的权力。"[15]

尽管其他史料中没有提到这场会面，但是克伦威尔的敌人确实引起

了国王对他雇用的仆人和侍从数量的怀疑。他们的潜台词在于指控新任埃塞克斯伯爵有叛国的意图。随着传言日益失控，开始有流言说他的目标是自己加冕为王。一位匿名的“绅士”汇报说自己在某次与夏普伊大使和克伦威尔用餐时听到后者说“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个国王”。《西班牙编年史》称，在得到这个把柄之后，诺福克和西摩尔立刻回禀君主。亨利听到这一汇报后大为愤怒，但似乎并不吃惊。“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十分怀疑他设计要集结全国的力量来谋害我，”亨利告诉他的两位枢密大臣，“因为几天前他厚颜无耻地请我同意将我的女儿玛丽嫁给他为妻。”[16] 后来这一罪状连同对他所养侍从数量的怀疑一道都构成了针对他的指控的一部分。《西班牙编年史》可能在回顾历史事件时虚构了这些谈话，但这也是基于克伦威尔倒台时流传的谣言。

6月初，形势已十分紧张，马里亚克汇报说：“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关口，克伦威尔一派和温彻斯特主教（加德纳）一派必须有一方屈服。”[17] 尽管如此，这位大使改变了自己先前对结果的看法，并相信克伦威尔会胜利。他认为：“尽管二人都非常有权势且都得到了君主的宠信，但是事情的发展态势看上去对克伦威尔一方有利。”他引以为证的是一则传言，该传言称巴恩斯不久将会被释放，而一位众所周知有“教宗派倾向的”教士最近被逮捕了，然后又忍不住补充道：“英格兰人真的很反复无常。”马里亚克接着说：“与此同时，宗教界的情形依旧令人烦忧，主教们处于嫉恨和不可调节的分裂中，而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些路德派的人时不时地会被当作异端，而其他人更经常地被视为教宗派叛国者。这届议会必须要在宗教问题上达成一个定论、找到一条中间的道路；但是议会看上去就像德意志人的饮食一样，他们的结论由一个产生更多个，且越发令人生疑，而非澄清问题。”[18]

虽然受政敌环伺，但是现存的最后一封克伦威尔在任时写下的信件表明他和马里亚克一样有信心。这封写于6月4日的信是一封日常的事务信件，信中看不出任何写信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迹象。收信人是乔

治·劳森爵士（George Lawson），他是北方事务院的一员。克伦威尔向他转达了君主就在贝里克和卡莱尔加筑工事的费用问题做出的指示。在以一贯的直截了当处理好这一事务的细枝末节后，克伦威尔在信末愉快地写道："在伦敦衷心祝您一切安好，国王陛下在位的第32年6月4日。"[19]

然而，克伦威尔在私下里还是承认了自己的不安。6月6日，他对首席秘书赖奥思利坦言"一件盘旋在他脑海里的事困扰着他——国王不喜欢王后，且一直都不喜欢"。赖奥思利试图重振这位前侍主的斗志，鼓励说"可以想出一些方法让国王解脱"，但显然已有退缩之意的克伦威尔只回应称这是一件"大事"。这位秘书非常担忧，他在第二天返回克伦威尔处，并再次劝他找出一个解决方法，不然"他们都会因此而吃苦头"。克伦威尔只是重申了他此前的回答，说这是件"大事"。"找找补救的方法吧"，赖奥思利迫切地敦促道，然而克伦威尔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好吧"，然后"便不再跟他说话"。[20]

这份史料没有记载在这次碰面和三天后克伦威尔挣扎求生的故事里那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间发生了什么。即便埃塞克斯伯爵略知前路如何，他也没有在信中留下一丝痕迹。

---

[1] 卡思伯特·滕斯托尔（Cuthbert Tunstau），都铎时代英国神学家，曾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任杜伦主教。原文中将滕斯托尔写作"Tonstallus"，即其姓氏的拉丁文写法。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486.

[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429.

[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90.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611.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VII，no.1554；Vol.XVI，no.590；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05；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60.

[7]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p.290.

[8] 宫廷女侍的一种，地位低于侍从女官（lady-in-waiting），一般由未婚年轻女性担任。

[9] Plowden，A.，*Tudor Women*：*Queens and Commoners* （Sutton，2002），p.101.

[10] Weir，A.，*The Six Wives of Henry* Ⅷ （London，2007），p.413.

[11]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p.256-259，260-261.

[12] 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 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Vol.I，p.117.

[13] 托马斯·卡尔佩珀（1514—1541），亨利八世的廷臣，因与凯瑟琳·霍华德偷情，两人双双被斩首。

[14] Noble，M.，*Memoirs of the Protectorate House of Cromwell*， 2 vols.（Birmingham，1784），Vol.I，p.11.

[15]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96-97，99.

[16]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97.

[1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37.

[1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37.

[19]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p.263-264.

[20]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I，pp.459-460.

第十八章 “饶命 饶命 饶命”

1540年6月10日，枢密院定于3点开会，克伦威尔到场时略微有些迟。他鲜有的迟到行为正中诺福克下怀，后者已经计划好要利用这次会议攻击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刚进入会议厅，侍卫首领便上前以叛国和异端的罪名逮捕了他。大感惊讶的克伦威尔

> 愤怒地将他的软帽仍在地上，对诺福克和其他聚集到会议厅的枢密院成员说，这就是他的效力所得来的回报，并请他们凭良心说他是不是一个叛国者；但既然他已经被如此对待，因而他宣布放弃所有赦免，因为他从不认为自己犯了错，并且只是请国王不要让他承受太久的痛苦。有鉴于此，一些人说他是叛国者，而一切人说应当按照他立下的法律审判他，这些法律极为严酷，一个人只是口出无心之言也时常构成叛国罪。[1]

诺福克在斥责了他的对手所犯下的一切“罪恶”之后，大步走上前去，将圣乔治的勋章从克伦威尔的脖子上扯了下来。数年来，这位帕特尼铁匠的儿子以牺牲出身高贵的对手为代价，哄骗国王给他权力，这个举动正是象征了对他手中握有的这些权力的怨恨。威廉·菲茨威廉一如既往地迅速倒戈，并和诺福克一起抨击克伦威尔。“这位海军大臣解下了克伦威尔膝上的嘉德勋章，虽然克伦威尔在富贵时把他当作很好的朋友，在患难时他却成了一个大敌。”[2] 之后，回天乏术的克伦威尔被押送出去，经过一扇通往泰晤士河岸的侧门，然后坐船走完从威斯敏斯特到伦敦塔这趟短暂而不祥的旅程。在那里，他被安置在狱官威廉·金斯顿的手下，正是后者在10年前被派去逮捕沃尔西。这是克伦威尔前侍主的生涯与他自己的生涯间最后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次共鸣。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奥德利受命将克伦威尔被捕的消息通报到上

议院。在场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震惊得哑口无言。逮捕克伦威尔距离他被封为埃克塞斯伯爵还不满两月，自莱尔子爵被捕这一被视为首席大臣克伦威尔时来运转之迹象的事件发生还不满三周。如今他因叛国罪被投入伦敦塔，这给后世那些效仿他的野心勃勃的廷臣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尽管他精明且务实，但克伦威尔本人一定是最受震惊的。“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国王之外，还有谁能有比克伦威尔更大的权力呢？/还有谁能大过我呢？”在根据克伦威尔生平编写的戏剧中，作为戏剧角色的克伦威尔如此沉思。[3] 他必然也充分意识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以及国王对他的宠信的微妙平衡，但是近来的晋升以及对诺福克和加德纳的胜利一定振奋了他的信心。在突然被捕时，克伦威尔的反应想必混杂了极度的困惑、恐惧与恼怒。

当父亲被捕的消息传出时，格雷戈里·克伦威尔就在下议院附近，因此他应该在事发不久后就得到了消息。他心中对父亲的担忧无疑也夹杂着震惊和对自身安危的担心。4年前安妮·博林被捕的经历表明国王在抓捕与罪犯有关之人时不会有任何回避。格雷戈里的克伦威尔勋爵头衔当即被褫夺，同样被夺去的还有他父亲的所有宅邸、地产和财产。尽管这会让格雷戈里夫妇无家可归，但他们并没有穷困潦倒。1538年11月，格雷戈里自己也被授予了一片颇为可观的不动产，并且他仍在从中获得收益。[4] 截至此时，国王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格雷戈里可能是因为与已故王后之姐的婚姻，才未被逮捕。爱德华·西摩尔可能也为这对夫妇向国王求了情。不论如何，格雷戈里很快又得到了君主的偏爱。几个月后，商人理查德·希尔斯记录了亨利“在克伦威尔入狱期间”将他的头衔“以及很多产业都转给了他的儿子格雷戈里……以便他在行刑的时候更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5]

在向上议院通知克伦威尔被捕的时候，国王已经派一队人封锁了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宅邸。在这之前，克伦威尔被捕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宫廷以外，但是当他的邻居们看到国王的人在克伦威尔的住所展开搜查

的时候，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都城内外。在一小时之内，马里亚克便听闻了消息，他立即写信给弗朗索瓦一世说：“托马斯·克伦威尔，国玺的掌管者和圣职者的代理总教监，自枢机主教逝世以来就主管王国的各项事务，并且刚刚被封为掌礼大臣，但在一个小时前他被投入伦敦塔成为囚犯，他的所有财产也被收缴。”[6]

克伦威尔的仆人们惊愕地看着国王的人登记克伦威尔的财产，并报告说“其价值并无世人预想的那么多”，尽管“对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已是过多了”。克伦威尔的财产不是一笔小数字，国王的人查出了总共7000英镑的巨款（约合今天的200万英镑还多）自教堂缴获的财物，还有银盘、圣餐杯、十字架和“其他教会珍宝”，与1529年他刚立遗嘱的时候相比，克伦威尔的可支配现金增长了近8倍。马里亚克准确地判断，将这些抄没所得纳入国王金库“意味着它们不会被归还”。[7]

除了查收克伦威尔的财宝之外，亨利的下属还搜索了他的宅邸，以寻找能够定他罪的证据，这项任务并没有耗费他们多少时间。法国大使马里亚克汇报说，“第二天就找到了一些他与德意志路德宗贵族之间的往来信件”。他无从得知这些信件的内容，“不过国王因此对他（克伦威尔）大为震怒，不愿再听人提起他，宁可彻底忘掉这个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为卑鄙之人”。威尼斯驻神圣罗马帝国宫廷（位于海牙）的大使弗朗切斯科·孔塔里尼（Francesco Contarini）说，国王的下属还发现了一些信件“表明这位公主（克里维斯的安妮）曾被许给另一位德意志贵族”。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查尔斯·赖奥斯利也确认了此事：“她（安妮）在来英格兰之前与本国的一位公爵有婚约，埃塞克斯伯爵托马斯·克伦威尔向国王隐瞒了这一点。”[8] 如果克伦威尔真的隐瞒了安妮有婚约的证据，他便可以被当即定罪，但鉴于后来他并未背负这一指控，这可能只是一个谣言。这位威尼斯大使写信时离英格兰宫廷有一段距离，除了谣言之外他没有别的依据，他接下来汇报说凯瑟琳·霍华德已经怀了亨利的孩子，这也是他的记载并不可靠的一个证明。[9]

和诺福克一样，国王现在决定要将克伦威尔贬低到和他入宫效力之前一样籍籍无名的程度。克伦威尔自1538年3月31日以来持有的财产全被收缴并归入国王名下，其中包括他从修道院解散运动中获得的地产，这占他所有财产的一大部分。接下来的处分更为严重，马里亚克记载道："首先，国王重新分配了克伦威尔的所有官职，并宣布任何人不得称他为掌玺大臣，或者以其他任何身份头衔称呼他，只叫他托马斯·克伦威尔、剪毛工，剥夺他所有的待遇和特权，并且将不那么有价值的动产分给他（克伦威尔）的仆人们，他们都为自己不用再穿主人的制服感到开心。"[10] 这可能是传闻，但在当时的记录中，将克伦威尔的失势与他卑微的出身密切关联起来的记述方法颇为典型。

常见于这类记载中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克伦威尔的倒台是阶级矛盾的结果。约翰·福克斯遗憾地说，克伦威尔因"一些煽风点火的贵族的憎恶和嫉恨"而受害，他们密谋反对他，"一些人是因为憎恶，另一些人是因为宗教分歧"。[11] 其他人就没那么同情他了。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高官显贵对这位出身卑微的异端分子的蔑视在此时变得非常明显。马里亚克甚至为让他的君主注意这样一位平民的命运而道歉："尽管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桩无关紧要的个人事件，毕竟他们只是把一个被提拔到高位上的人（指克伦威尔）重新贬低到他原本的位置，但鉴于此事彻底地改变了政局的走向，尤其是考虑到对克伦威尔主导的宗教新政的影响，窃以为这一消息仍相当重要，应即刻写在信中。"[12] 马里亚克所言正是克伦威尔的对手们一直相信但在他掌权时没能表达出来的想法：克伦威尔真正的罪过是他以区区平民之身却想要成就大事。现在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只有威尼斯大使在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语带讽刺，而是批评了国王的善变。"我以为他（克伦威尔）的下场也同样可能是其他所有深得国王宠信的人的下场"，他以挖苦的语气说。[13]

没过多久，马里亚克就得到了克伦威尔被逮捕的正式通知。当国王本人的信使到达的时候，他差不多已完成了他的那份急报。亨利显然迫

切地想让欧洲的天主教势力知道他终于和那场极具争议性且越发不受欢迎的宗教改革的设计者撇清了关系。这位大使匆忙汇报说，亨利敦促他不要对克伦威尔被关进伦敦塔一事感到震惊，“无知平民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他（国王）希望马里亚克知道真相”。马里亚克说，亨利希望“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将宗教带回正道上来”，而“克伦威尔与德国的路德宗信徒有联系，一直偏爱那些宣扬错误观念的神学者，并阻挠那些宣扬相反观念的人”。近来已有一些“主要随从”提醒这位大臣，让他反思“自己违背国王意愿与议会法案的做法”，但固执己见的克伦威尔坚持认为“马上局势就将度过临界点，届时国王就算动用全部力量也无法阻止，而他自己的势力将强大到足以让国王向他的新教义屈服的地步，为此他不惜动用武力与国王对抗”。尽管这样鲁莽的说法完全与克伦威尔的性格不符，但是国王很快就相信了。他派人传话说，下次再见到马里亚克的时候，他会向他坦言克伦威尔的罪过是何等之大——以及这位失宠的大臣从多久以前开始便隐瞒了他的罪过。[14]

国王派人知会马里亚克的时候，枢密院起草了一封写给驻法大使约翰·沃洛普的信。这封信用更冷酷的语言阐明了克伦威尔被捕的原因，说亨利在宗教事务上很是信任这位大臣，但是：

> （克伦威尔）不但因一己私欲违反陛下最为圣洁的意旨，在暗中间接推行极端教义，背离陛下孜孜以求的中庸正道；还表现出试图维护自身暴举的狂热迹象，为这一目的不惜动用一切最为隐秘、最为悖逆的手段，乃至公然宣称——正如已经由可靠的证词向他当面指出的那样——假如国王和整个王国与他的意见相悖，他将亲自执剑上阵，与他的君主以及任何其他反对者对抗。

根据这个表述，克伦威尔唯一的目的是完全把控国王和整个王国：“如果再给他一年或两年，他一定会将事态发展成那样，如果他愿意，国王将不再有定夺之权；而从他的其他言行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来看，他的不逞之心已与他的语气一样坚定。”[15]

信中刻薄的语气和着重把宗教改革当作克伦威尔最大罪行的笔法暗示了写信人是他的死敌诺福克。这位公爵决心一举诋毁那个他所鄙视的对手的名声，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抓住机会摧毁他所支持的一切，并将英格兰拉回到宗教保守主义路线上来。意识到国王对克伦威尔及其改革一向态度矛盾，且他现在的厌恶不会持续太久（尤其是考虑到这位身陷囹圄的大臣可能会用自己出了名的说服力争取国王的同情），诺福克毫不迟疑地设计了一系列无懈可击的指控，不留任何疑点，也不给国王臭名昭著的善变留下余地。自克伦威尔被捕之后，国王愤怒地丢掉了德意志“路德派诸侯”的一系列来信，而公爵无疑乐于听到这个消息。

毫无疑问，诺福克及其党羽在克伦威尔被捕上是起了作用的。克伦威尔一直是他们最危险、最鄙视的敌人，而他近来的攻击性行为更加深了他们的憎恨。《西班牙编年史》认为这是克伦威尔致命的错误：“如果不是被他的虚荣心所害，如果他能与大臣们（即枢密院）保持友好，他不会沦落至此。”[16] 但是亨利时期政治局势的本质就是如此，克伦威尔要取得这样的权势就一定会为自己树敌，廷臣对手的增加与他所得到的影响力呈正比。如果克伦威尔甘于在幕后默默地努力，回避所有晋升和宠信，那么他很难像现在这样带来如此具有开创性的变革。想要在王权中心取得成就的风险总是很大，不过回报也很大。克伦威尔在近10年间享受了最好的一面即回报：现在他将面临后果。

亨利能够如此迅速地抛弃克伦威尔这位十多年来的股肱之才，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看是脆弱的。无可否认的是，没有廷臣能得到这位越来越多疑的国王明确且持续的宠信，不过他与克伦威尔之间跨越地位鸿沟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尽管克伦威尔的政策中至少有一些动机是可质疑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在过去11年间的主要动力是他对君主一以贯之的忠诚。

在国王自己看来，他以头衔、特权和财富回报了克伦威尔的忠诚，

却没有以同等的诚信对待他。这不禁令人猜测，如果克伦威尔出身高贵，亨利可能会从他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共鸣，因而会对他更为忠实。不过地位并不是安全的保证，像白金汉[17]、卡鲁和基尔代尔[18]等人也都付出了代价。就连（或者说尤其是）嫁给这位日益衰老、越来越善变的国王也保证不了安全。他的宠信会随风向而变动——且一旦改变，很少会恢复到原来的方向。

但亨利与克伦威尔的关系是复杂的。《西班牙编年史》注意到国王在克伦威尔被捕时对他的仆人“非常仁慈”，“因为他不仅下令归还属于他们的东西，还命令贵族从他们当中挑选仆人以供留用；他也从中选了很多人服侍自己，以保障他们不至于陷入贫困。”[19]据说亨利还下令不对他的前大臣施酷刑，即便对那些有叛国嫌疑的人施酷刑是被允许且是意料之中的——尤其是对那些不愿意坦白自己罪行的人而言。此外，他还给克伦威尔送了些钱，可能是为了让他在狱中更舒适一些或买些食物。感恩的克伦威尔稍后写信“谦恭地感谢陛下送来的这些钱”。[20]一封写于克伦威尔被捕两天后的信表明国王是怎样挂念他的前大臣是否安好的。亨利吩咐威廉·金斯顿，让他允许克伦威尔写信，并告诉他“关于其最糟糕的状态和处境，这些我认为适合写下来”。克伦威尔因为君主“最为丰厚的慈爱、恩赐和许可”而致谢，想必也将此视为希望尚存的迹象。如果亨利完全抛弃了克伦威尔，那么他肯定不会关心克伦威尔被关押的环境有多糟糕。国王没有对克伦威尔失势的对头安妮·博林表示过这样的仁慈。

从亨利此时施予克伦威尔的恩宠来看，逮捕克伦威尔的旨意几乎可以说是他为安抚诺福克、加德纳一党而采取的违心之策。不过亨利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疑、越来越专制的国王，他可能会被顾问大臣影响，但绝不会被他们左右。毋宁说，正是克伦威尔的崛起促使亨利将自己对政事的控制扩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克伦威尔充分利用了亨利允许他写信所提供的机会。他于6月12日写了一封长达近4页且慷慨激昂的信，信中满是他对被捕一事的悲痛之情以及对所谓罪行的全然困惑。“极富怜悯之心的国王、至为仁慈的君主”，他的信如此开头，并说自己是“您最谦卑、最恭敬、最感恩的臣民，您最可怜的仆人和被囚者俯伏在高高在上的陛下的脚前”。紧接着，他动用自己作为一个律师的说理能力，在强调自己的无辜与避免暗示国王有失公正之间摸索出一条危险的思路。“别人向陛下指控我叛国，对于这个指控，我说我这一生决不会做可能或者会让陛下不悦的事，更不可能提起或犯下那桩本身就是极端的、令人憎恶的罪行，我的心意上帝可鉴，我相信他会向陛下展现出事实的真相。”他小心地将国王和他的“控诉者们”区分开来，坚持说：“一直以来我都珍视陛下您的荣耀、性命、财产、健康、财富、喜乐、舒适和陛下您最宝贝、最挚爱的儿子王子殿下以及您的诉求，愿上帝在逆境中帮助我，如果我有相反的心思，愿上帝厌恶我。”

意识到自己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是让国王相信自己的绝对忠诚以及对国王利益的全情投入，克伦威尔接着向国王提起自己在过去10年间为他效力的时候所做的一切：

> 上帝知道我本着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付出了多少劳苦，假如我能像上帝一样让陛下永享青春与昌盛，上帝清楚我一定会如此照做；如果我有能力让陛下富裕，正如陛下让万民富裕一样，上帝定将助我如此照做；如果我有能力让陛下变得强大，乃至令全世界向您臣服，主基督知道我定将如此照做。因为我是所有人中最忠实于您的，因为陛下在我眼中是所有君主当中对臣民最为慷慨的，陛下于我等更像一位慈父，对此言语还望陛下不要见怪。

克伦威尔非常确信自己从未犯过那些过去曾被用来指控自己的罪行，他向国王保证：“面对如此超乎寻常的仁慈、善意、宽宏与慷慨，如果我现在还背叛您，那么最大的痛苦对我来说都太少了。如果任何派系斗争或对任何事物的任何情绪让我成为一个叛国者，那么愿所有地狱

的恶魔都来搅扰我，愿上帝来惩罚我。”

对自己被控的具体罪名一无所知的克伦威尔显然认定，最好的策略是就自己认为可能会背负的罪名向亨利做出申辩，而不是在政敌向国王陈说自己的过错时静静等待。他知道自己与扩大法庭的工作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和怨恨，且外人以为他利用被扣押的修道院财产中饱私囊，他推测这是其中的一个指控。克伦威尔还估计奥德利在自己失势的过程中施加了影响，并提醒亨利他自己曾多次就奥德利的密谋做出警告：“大法官大人如何对我，只有上帝和他自己最清楚，对此我无从指摘。而我待他如何，陛下也心知肚明。对主基督发誓，如果我曾听从您最为良善而严肃的劝告，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

克伦威尔还听说针对他的另一个指控宣称他违法蓄养侍从。他发誓除了家仆外自己从未蓄养过任何人，除此之外他收容的都是朋友的孩子们和熟人——比如拉尔夫·萨德勒之类。克伦威尔对朋友的忠诚被彻底曲解成阴险的图谋，这体现了他的政敌的险恶用心，他们不顾一切地抓住了任何一件可以定他罪的事情。克伦威尔的否认是坚决的：“我这样说，如果我曾蓄养过除家仆以外的任何人，我将任凭上帝制裁我。”他又说他为照顾朋友的孩子们“花费甚多，且不是出于任何邪恶的目的”。

不过，其中一项“罪过”，克伦威尔是可以确定的：他安排了亨利和克里维斯的安妮之间的联姻——并且没能迅速将其废除。他听说国王向金斯顿抱怨了“一件很私密的事，我确实在这件事上违背了您的期待”。尽管他知道国王指的是“陛下厌恶王后的那些方面”，但是克伦威尔否认自己泄露了秘密（确是如此）。他与之讨论过此事的人只有威廉·菲茨威廉和拉特兰伯爵，而且这些讨论是在国王的命令下进行的。

因此，克伦威尔针对他能想到的每一条指控为自己做了辩护，恳请国王不要容许这样的误判。“我们的上帝，如果这是他的旨意，可以像对被诬告的苏珊娜[21]那样对待我……因为除了上帝和您之外，我没有

其他的希望。”信末他多次为他不经意间犯下的错而道歉，请求国王宽恕：

> 陛下，我确实承认自己是一个最卑鄙最无耻的罪人，不论是对上帝还是对陛下，我都没有照我应做的行事为人。为我对上帝的冒犯，只要我活着，我将不断地祈求他宽恕；为我对陛下您的冒犯，上帝知道我从来都不是蓄意或故意的，我绝不会有背叛陛下、您的王国以及后代的想法，无论是在言语还是在行为上，上帝可为我做证，尽管如此，我俯伏在您的脚前，为我在任何事上的冒犯恳求陛下的宽容、饶恕、赦免。

他在信末如此落款：“您极为悔恨的臣民和最谦卑的仆人与被囚者，周六写于伦敦塔，托马斯·克伦威尔。”[22]

亨利没有亲自出面回复，此时的他正忙于利用克伦威尔的失势讨好法国国王。当弗朗索瓦一世听到克伦威尔被逮捕的消息时，他立刻写信给马里亚克：

>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仅令人愉快，而且令我出于一直以来对我的好弟兄所怀的无上善意感谢上帝；请你把我写给你的国书呈给他，告诉他我说的，他应该感谢上帝让他有机会认清克伦威尔这样一个邪恶之人的过犯和不法行为。克伦威尔一个人让他对朋友们以及最好的臣仆们都起了疑心。他要知道消灭这样一个邪恶、不祥的手下会给他的王国带来怎样的安宁，这合乎教会、贵族和百姓的共同福祉。

他还指示马里亚克鼓励英格兰国王处决这个失宠的大臣，以免他回心转意。马里亚克向弗朗索瓦保证，他已经让亨利阐明“这位大臣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在他的奸计得逞前将他除掉的迫切性”。[23]

为了在克伦威尔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弗朗索瓦还直接致信亨利本人。他告诉他的英格兰对手说，他与克伦威尔的对头探讨了（无疑也谴责了）克伦威尔的影响：“诺福克会记得他上次在法国的时候我跟他说过的话，就此事您应该首先与他沟通。”法国国王的信表明了诺福克阴谋的触角已经伸到多远。他不满足于只是提高克伦威尔国内政敌

的地位，还直接利用他的多个外交任命，获得了欧洲天主教君主们的支持——此外，他也动用了自己对英格兰驻外使节们的影响力。克伦威尔被捕当天，公爵写信给英格兰驻查理五世宫廷的大使理查德·佩特，指示他将所有的细节告知皇帝。佩特颇为乐意地照做了，但是他发现查理的反应比预想的要谨慎。皇帝显然震惊了，大声说："什么！他真的被捕了，而且是因为国王的命令？"当佩特证实确是如此时，皇帝不愿再言语。[24]

诺福克和他的使臣们即刻着手撤销克伦威尔的外交政策，其残酷与高效程度与对待他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一样。7月27日佩特汇报说因为这一方针逆转，英格兰国王"失去了帝国选帝侯的心"，不过他"转而争取到了皇帝和法国国王"。[25] 与克里维斯的联盟被突然中断，唯一的阻碍是一件小事，即国王与安妮依然是夫妻。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事实，国王有点半心半意地试图为克里维斯公国寻找另一个盟友。因此他知会弗朗索瓦一世，称如果后者支援克里维斯，会进一步改善英法关系。克里维斯公爵已经派了大使到法国宫廷。7月初，沃洛普和爱德华·卡尔内（Edward Carne）汇报称，法国国王心怀同情地听取了他们的请求，并说"他乐于与克里维斯公爵结盟，正如亨利赞同的那样，并为亨利派了另一位使臣（卡尔内）来议定此事感到高兴"。[26]

克伦威尔戏剧性失势的余震回荡了几周。10年前沃尔西倒台之后，宫廷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震惊、惊慌和（对一些人而言）弹冠相庆了。马里亚克在接下来的一封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描述了"国王大臣们之间的分裂，他们试图消灭彼此"。这位在仅仅几天前还预测克伦威尔会战胜其对手的大使，显然对事态的剧变感到惊愕。"克伦威尔一派近来看似是最强大的，"他说，"因为出乎每个人的预料，所以当前的事态更加不可思议。"而现在局势已经明朗，克伦威尔在诺福克和加德纳联手时已落入孤立无援之境。马里亚克汇报说，克伦威尔在宫廷的同党"看起来因上述克伦威尔大人的被捕而被完全打垮，他是他那一派的

首领，站在他这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不敢开口，而海军大臣（南安普顿伯爵威廉·菲茨威廉）很久之前就学会了见风使舵，而现在他们在公开场合的对手是诺福克等人。”[27]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坎特伯雷主教确实曾为克伦威尔请愿，就像他当初为安妮·博林请愿一样，这一请愿虽然真心实意但未能奏效。他写信给君主，表达他“对于这样被国王提拔、这样不关心他人的不快而只服侍国王的人竟然被指为叛国者一事的惊愕和忧伤，他还曾如此警惕地探查叛国行为，假使约翰王[28]、亨利二世[29]和理查二世[30]有这样一位顾问大臣，他们绝不会就那样被颠覆”。克兰默又说自己“像爱朋友一样爱他（克伦威尔），而他对国王的爱戴似乎比这更多”，但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证明了这是假话。他告诉亨利他“乐见”克伦威尔的“叛国行为”被发现，但是又“非常忧伤，因为这之后国王该信任谁呢？”这位主教信末请求上帝“赐给国王一个可以信任的大臣，并且是一个具备他的全部品质、能像他一样服侍的人”。[31]

克兰默的信没有在国王那里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这或许一点儿也不出人意料。即便亨利的良心因为主教提到的克伦威尔的服侍和忠诚而被刺痛，但是他很快就从克兰默对这位前大臣罪行的明显接受中得到了安慰。这本身可能是一种自卫的形式：有传言称，这位主教很快会跟随他的盟友进入伦敦塔。

尽管未能见效，但克兰默的信是对克伦威尔被捕一事发出的唯一一声悲叹。没有证据表明克伦威尔的其他熟人曾开口为他辩护，可能他们在幕后默默努力争取恢复他的名誉。但是他们身处一个无可否认的尴尬境地，并且冒着因为与他的关系而被牵连甚至被定罪的风险。格雷戈里的处境尤其艰难。他是一个有叛国嫌疑之人的儿子，却娶了已故王后的姐姐。当国王在克伦威尔被捕后表现出宽厚之意时，格雷戈里可能很想代父亲向他求情。但是他的妻子无疑向他施压，要他保持沉默，以保护

自己的利益。她很快证明了自己是怎样迫切地要与自己的公公保持距离。相比之下，新近得宠并在宫廷里前途无量的理查德·克伦威尔和拉尔夫·萨德勒仍旧对他们的主人怀有强烈的忠诚，这一点在过去10年间得到了持续的证明，甚至当克伦威尔的权势明显“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也坚定地站在他那边。他们在克伦威尔手下担任秘书和信使多年，在宫廷中建立了出色的人脉网，他们无疑在努力争取释放他。克兰默写信给国王为他们的主人辩护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劝说。

克伦威尔被捕的消息传遍欧洲，并受到广泛的欢迎。加来的治安官“因那些消息而欣喜，说他比收到500万先令还高兴”。同时，法国国王称这是“上帝的一个神迹”。沃洛普愉快地汇报说，他被迫切想要知道克伦威尔已经被处死的法国廷臣所包围。一天在去宫廷的路上，“很多人在途中问他克伦威尔是不是死了，他们因他的遭遇而欢欣鼓舞”。不久之后传言开始散播，所有消息都是为了在克伦威尔被捕一事的基础上进一步诋毁他的品格。几乎可以确认是诺福克盟友的约翰·沃洛普毫不迟疑地揭示了“克伦威尔邪恶之处的更多详情”。同时，法国的枢机主教兼外交官让·杜·贝莱宣称他得到可靠消息称“前掌玺大臣意图伺机让自己成为英格兰的国王”。他还敦促沃洛普立刻让国王知道此事。

在葡萄牙的一位大使听到了同样的消息，并增加了一些虚构的细节，说克伦威尔“欲娶玛丽小姐为妻”——欧洲的大使们显然已在两年前知道了这个传闻。沃洛普不需要劝说在当天也将这些传言上报给了君主：“关于克伦威尔，枢机主教贝莱一次派人至卡斯蒂永处，告诉沃洛普说9个月前他和法国国王讨论了此事，并推断克伦威尔会成为一位伯爵或公爵，而且亨利会将玛丽小姐嫁给他，就像他之前将法国王后嫁给萨福克公爵一样。”他说，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克伦威尔才总是竭力破坏所有给国王长女的联姻提议。亨利抓住这些传闻，作为针对他的前任首席大臣的着实站不住脚的案子十分需要的证据，并且命令沃洛普找到确实的证据证实这些报告。[32]

同时，克伦威尔本人在伦敦塔被严密监视。尽管这座城堡的名字本身就足够让任何一位英格兰臣民感到恐惧，但是克伦威尔对它很熟悉。作为珠宝大臣，他曾监督重建了白塔南面的珠宝室。他还将朋友斯蒂芬·沃恩引荐到那里的皇家造币厂。1536年他开始对伦敦塔的其他地方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在被捕前不久还下令修建了王后馆（the Queen’s House），这是一栋俯瞰绞刑台的精美木构建筑。作为国王的首要执法者，他探望了多位关在塔里的知名囚犯，其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莫尔和安妮·博林。

没有关于克伦威尔被关在何处的记录，但一般观点认为他被囚禁在王后寝宫（或者副官的住处），这里起初是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修建的，然后又因安妮·博林的加冕得以重修。这栋建筑应位于在提灯塔和衣橱塔的中间，堡内空地的东边，现已不复存在。如果克伦威尔也被关在这里，那就是对他非常有效的一个讽刺，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对手安妮·博林被定罪行刑前住的地方。他非常熟悉这处寝宫，因为在1532～1533年他曾奉亨利的命令安排修缮此处。这座寝宫舒适且布局合理，包括一间接见厅、一间密室（安妮用作私人祈祷室）、餐厅和带盥洗室的卧室。即便室内陈设因为多年无人使用而有疏于照管的痕迹，但这至少比大多数塔内的罪犯所应受的待遇好上太多。

被捕之后不久，克伦威尔受到了密集的审问。他的审问者中有死敌诺福克公爵，后者毫无疑问喜欢这个任务。《西班牙编年史》记述了他和他的同党在他们所鄙视的敌人终于落入自己手中时发出的刻薄讽刺。“克伦威尔，沦落至此，该怪你自己和你的虚荣，”西摩尔首先愉悦地说道，“说吧，克伦威尔，你一个铁匠的儿子，擢升为统管整个王国的大臣，让我们所有人都听命于你，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33] 尽管心怀恐惧，但是克伦威尔拒绝不战而降。他要求知道自己被指控了什么，这样他可以反过来逐一驳斥。他比任何人都知道针对他的控诉有多么站不住脚。的确，他主导了一场对政府机构和宗教事务的革命，在此过程

中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反抗，但是他的每一个行动都经过了国王的批准，他从未违反任何法律、触犯任何法令或告谕。事后诺福克曾忆及克伦威尔“希望自己即便见不到控告者，至少也可以知道是因哪些事项被指控；而且如果不能正当地驳斥每一条指控，他不希望多活一时”。克伦威尔又发出了一句吐露心迹的哀叹，说自己“一直都被国王的大敌们追击；所以他的忠诚像金子一样历经试炼”。或许这是对诺福克以及其他审问者的委婉威胁。他们可能感觉到克伦威尔意图证明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有叛国的嫌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手段奏效了。克伦威尔即刻就被告知了针对他的指控，以及控告者的名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特权，而且在他之前很少有人享受过。[34]

根据《西班牙编年史》，眼下针对克伦威尔的首要指控在于他的野心之大，他被控有意迎娶国王的女儿并成为国王。西摩尔说：

> 一定是魔鬼把这个念头放在了你的脑海里，才让了你这样厚颜无耻地去向国王请求迎娶他的女儿。你一定在图谋某种大逆不道之事，我们只能相信你的目的是篡夺王权、自己称王，因为有一天你在大使（夏普伊）的宅邸确实这么说了。哦，无知的忘恩负义之徒，你难道不知道即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拿下了众王国，他还有比你更加配得国王之位的封臣吗？况且，你给皇帝贡献了什么，才能让他扶持你为王呢？说真的，更易让人相信的是，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如果你娶了玛丽小姐，你会轻易地除掉国王，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你让他身边环绕着你的人，以更好地确保你可怕的计划能够得逞。[35]

确定这个大体的罪名之后，这些大臣们转而就更加具体的方面展开问询。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主题是由克伦威尔安排的君主与克里维斯的安妮之间的联姻。国王本人起草了在这件事上要问克伦威尔的问题，这一事实暗示了此事是国王最为关心的。这些问题包括亨利第一次在罗彻斯特见到安妮时与他的大臣所说的话，以及他的新婚妻子以前已有婚约的证据。西摩尔及其他审问者饶有兴致地追问这些问题：“所有人都开始讲话，每个人都对他说自己想说的——非常有凌辱性的话。”[36]

根据同一份史料的记载，克伦威尔的回答同样尖锐。“如果我曾实现了我所计划的，你们现在就不能在这凌辱我了，”他告诉他的审问者们，“我的大人们，别费劲探求更多了。我没有报复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是我的错。但任凭国王处置我吧，因为我该死；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先看到你们中的一些人死去。”[37] 像之前一样，编年史家无疑使用了一定程度的文学想象，因为他不会身处审问现场。但是作者对宫廷内部的事件一直都有透彻的了解，他假想的对话内容也符合当事人的性格。

克伦威尔继续坚持抵抗，针对所有捏造的指控坚决地为自己辩护。他的君主越来越不耐烦了。在一封事发几个月后所写的信中，商人理查德·希尔斯称国王给他的前大臣施加了一系列心理压力。他记录称有传言说“如果克伦威尔不在行刑时坦白自己的罪行，他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是被斩首，然后他说自己是一个可耻的得罪上帝和国王的罪人，但对关于他曾经冒犯国王的问题，他的回答冷淡而漫不经心”。为了佐证自己关于国王使用阴险手段针对克伦威尔的说法，希尔斯提到了亨利在克伦威尔被捕前夕授予其埃塞克斯伯爵之位一事，“正如他在将安妮斩首前赐予她头衔一样”，并补充道：“有人认为这是亨利故意设计，让众人相信克伦威尔曾犯下最为严重之叛国罪的一个手段。”[38] 没有可信的证据暗示克伦威尔被以火刑威胁。这个故事无疑源于英格兰很多传统天主教徒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个失宠的大臣是一个异端。

尽管谣言继续疯传，但是一整周过去了，新的消息仍未出炉。接着，上议院收到了一份剥夺财产和民事权利的议案，在两天后的6月19日，这一议案再一次被提及。[39] 针对这个“极为卑劣的（囚犯）……自国王即位以来最可憎的叛国者”的诉状长得惊人，总共包括了11项指控，详情长达数页。诉状中的主要罪名可被描述为一种出于宗教动机的叛国：克伦威尔被控是一个“可恶的异端分子”，密谋违背国王的意愿将路德宗的教义带入英格兰。他发行的异端书籍直接违反了议会通过的条款，其中那些反对圣礼的书籍的问题尤为严重。后一项罪名的性质后来

被加重，克伦威尔直接被指控为圣礼形式论者——根据之前的宗教问题六项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这是一项可被判处死刑且无望得到赦免的罪行。

这份控诉状的措辞表明了这位底层出身的大臣密谋要让自己在各种事务（既有政治的也有宗教的）上的权力大过国王，因而犯了严重的叛国罪，为此应被判死罪。它指控克伦威尔“在未得到陛下命令或许可的情况下盗用国王的财产权、管辖权和职权”，接着引述了据说是这位大臣曾说过的叛逆性言论。“像他那样贫贱、低微的人”，曾公然说“他对您（即陛下）了如指掌，而任何一个臣民这样说他的君主都是可憎的”。傲慢的克伦威尔在言谈中有失谨慎，说出了构成叛国罪的言语。根据这些指控，包括罗伯特·巴恩斯在内的一些“异端”布道者在前一年被举报到克伦威尔那边时，他公开支持他们，发誓说：“即便国王会背离它（宗教改革），我也不会；而且假如国王和他的臣民都背离了，我会亲自执剑上阵抵抗，抵抗他以及其他所有人。”然后他手握自己的短剑说：“我会与他们所有的人争辩，至死方休，否则，我会把这个匕首刺进我的胸膛里；并且我相信如果我再多活一年或两年，拒绝或者准许（如果他愿意的话）的权力就不在国王手中了。”至于为什么这段对话过了一年才被上报并成为依据，尚没有任何解释。

指控仍在继续。克伦威尔释放叛国者或者有叛国嫌疑的人，售卖出口许可，发放通关证，并在国王不知情的时候起草委任状。他还鼓动克里维斯的安妮采用可能讨她丈夫喜爱的行仪举止。这是为了激起亨利的愤怒，因为它表明克伦威尔质疑了他的男子气概：不然他为什么要努力让这对夫妇圆房呢？声称克伦威尔密谋要娶国王长女玛丽的莫名其妙的指控是稍后加上去的。这一指控除了葡萄牙大使散布的谣言之外再无其他的基础，因为沃洛普没能找到其他佐证。把它加到控诉里面表明了克伦威尔的被捕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迫害。但是没有人关心这一点。这份诉状最后借机抨击了克伦威尔出身的低贱：“通过贿赂和勒

索，他获得了数不尽的钱财，变得如此富有，以至于他对王国的贵族们很是轻视。”[40] 这些指控的本质以及这份诉状的措辞显现出诺福克在起草时所起的作用。他决意要让这个针对他的老对头的案子变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后者根本无法脱身。

克伦威尔现在离断头台又近了一步，这在宫廷引起了极度的兴奋。马里亚克得意扬扬地汇报道：“这里没什么别的好说的，最迟一周内上述被囚者将被处决，得到他应得的报应。”既然克伦威尔已经被褫夺了职权和头衔，按照预期他会被当作一个普通叛国者对待。6月23日，马里亚克向法国地位最高的贵族和官员阿内·德·蒙莫朗西（Anne de Montmorency）[41] 汇报：“从此可知，他被定罪时不会享受王国贵族才有的庄重待遇，也不会被斩首；而是会像一个无耻之徒那样被拖起来，然后被吊死并分尸。一切会在几天之后见分晓，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准备在本届议会会期内在伦敦塔把此事解决，亦即本月之内。”[42] 诺福克在这一看法上支持马里亚克，向他保证“克伦威尔的死刑将会在议会结束后立刻执行，他将以这个王国最不体面的行刑方式被处决”。[43]

6月29日，剥夺财产和民事权利的议案在经过下议院部分修订后得到通过。克伦威尔过去曾用这个骇人的王室司法手段消灭了很多政敌，它可以绕开正常法律程序夺走贵族的土地与生命。大多数剥夺公权法案都是作为宫廷决议的补充，但是1537年克伦威尔仅凭剥夺公权法案就让玛格丽特·波尔（Margaret Pole）——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被定罪并遭处决，让她无法将自己的案子呈上法庭。[44] 而现在，克伦威尔即将品尝自己种下的恶果，正如卡文迪什[45] 所说：

> （我）构思了一条针对被告人的法律，提出控诉而无须听取申辩，否则被告就将知道他所负罪名的依据，因此控诉无法被反驳；我巧妙的谋略就这样将法律据为己用：结果，我成了第一批被这条规定所害的人。

毫无疑问，克伦威尔体会到了命运极具讽刺性的捉弄：这位世界上

最臭名昭著的律师未经审讯就被定罪了。

但是亨利还不打算放过克伦威尔。此时他迫切地想要逃离与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婚姻，以娶凯瑟琳·霍华德，因此忙于收集证据证明这场婚姻不是已圆房的事实婚姻。在那些被叫去做证的人中有克伦威尔的前仆人托马斯·赖奥思利，他证实国王对新娘如此厌恶以至于不能做一个丈夫应当做的事。但只有最初促成这桩婚姻的那个人宣誓证实它的无效性，亨利才能满意。因此他要求克伦威尔给出证词，并说明了证词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 既然他（克伦威尔）已被定死罪，他不会再（让他的灵魂）受苦，（而是证实国王在当时且直到）结婚之日乃至很久以后表明自己显然不认同这桩婚事的发言，以及国王既无心也无力与安妮圆房的事实；我从未出于对女性的爱意同意与安妮结婚，而如果她在与我成婚时保持童贞，我也没有通过真正的肉体交合将其夺取。无论是他、我的医生、现任掌玺大臣还是亨内奇和邓尼[46]都能做证，我本人也保证此言为真。

克伦威尔抓住任何一个寻求宽恕的机会，毫不犹豫地给了君主他想要的。不过，他在被剥夺公权的第二天所写的信不仅仅是一则证实亨利和安妮从未同房的声明，也是他向国王请求宽恕的（或许是最后一个）机会。简言之，他是在为自己争取最后的生机。信上众多划去、重写的痕迹以及满满8页的长度都体现出他写这封信时的极度绝望，他仔细斟酌每一个词以便让这封信在君主那里产生理想的效果。信的原件已经腐烂大半，但是之后不久誊写的复件确保了克伦威尔的言语能够永久地保存下来。

这封信以最为谦卑、恭顺的方式开头，在此克伦威尔表达了他即便在如此困难重重的环境中也想要服侍国王的迫切愿望：“承蒙最高贵、最仁慈的陛下喜悦，两次派了这么尊贵的要人到我这里来，一次是对我有所求，而另一次是以最尊贵、深谋远虑的和明智的方式来告知我的情况和处境，我最为仁慈、良善的君主……我不能再为陛下尽我应尽的职

责，但我会在余生里一直向伟大的上帝祈祷，愿他以恩典赏赐您对我的仁慈和慷慨。”他接着向君主保证：

> 仁慈的陛下，他们来我这儿，没有打断我，而是以我无法奢求的温和与耐心听取了我所说的一切，他们敦促我，务必尽我所能揪出并指控其他……在任何方面不忠于陛下的人。我像现在这样回答他们，如果我知道您的王国内有任何一个不忠于您的臣民……我会把揪出他们作为我的职责，仁慈的陛下，在世上我最渴望的就是陛下的平安以及您的国度的富有。

对于前一天“上下两院”通过的剥夺公权法案，克伦威尔试图表现出卑微的接受态度，承认这一决定的公正性：“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正如我现在说的一样——我是一个臣民，生来就要遵守法律，我知道基于任何法律的审判都离不开诚实可信的证人，而鉴于陛下的整个王国都已接受了这些判决并依程序进行了处理，而我也相信他们如此决定并不带有恶意，我愿意服从他们的裁判。”克伦威尔所谓“不带恶意”的提法表明他并非真心服从：他一定因自己的政敌诺福克成功地使他沦落至此而深感怨恨。

尽管克伦威尔声称自己因被指控叛国而“十分痛心”，但他意识到抱怨对手是徒劳的，转而选择向国王重申他从未改变的忠心和忠诚：“上帝就是上帝，他知道我对陛下您和您的国度的忠心……以及我对您一直以来的珍视……您的律法在我的心中。”这在后来被他的敌人曲解为克伦威尔承认他“因上帝公正的审判而受罚，因为他爱国王超过了上帝”。[47] 在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基督徒”的时候，克伦威尔所有的言下之意都是对上帝和国王的顺从，他说：“至为仁慈的君王，我谦卑地将自己献给您，并请求上帝怜悯我的罪，请求陛下以在您的叡虑之中最为得宜的方式怜悯我并宽恕我的罪行。陛下，如果说我曾在您重视的任何一点上欺骗您，那是绝对没有过的，伟大的上帝对此最为清楚，所以在我陷入绝境并向主基督祈求帮助时，我得到了护佑。”

到此为止，克伦威尔的信与一个等待被处决的囚犯在绝境中向国王乞求宽容的惯常写法别无二致。他所表达的忠诚和对判决的服从既是必需的也在是意料之中。不过，接下来他转向了一个整体上更贴近他心意的话题。克伦威尔担心格雷戈里的命运会与自己的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所以请求亨利善待他："我极为谦卑地下跪恳求宽厚的陛下能对我可怜的儿子、他善良且富有美德的妻子以及他们可怜的孩子们宽仁以待……我请求您看在基督的分上这样做。"又说："我会每日为陛下祈祷。"克伦威尔明白地提到格雷戈里的妻子或许是想提醒国王他和自己有姻亲关系，也是想唤起他对伊丽莎白已故的妹妹、挚爱的王后简的记忆，软化他的心。克伦威尔在回应国王让自己提供证据支持他与克里维斯的安妮离婚的要求之前为儿子求情，表明了他是怎样迫切地想要保护格雷戈里的未来。

克伦威尔现在转到了信的主题（至少在他的君主看来）上来：与克里维斯的联姻。他处在一个极为难堪的位置上。如果他证实这场婚姻是不合法的，那么他就是在嘲讽缔造了这场联姻的自己，并因此给国王更多处死他的理由。但是如果他为这场婚姻的合法性辩护，就会让国王对他更加不悦。因此他以一个熟练且老道的律师应有的谨慎和权衡写下了他的证词。

克伦威尔开始描述了枢密院的一个代表团（诺福克、奥德利和菲茨威廉）是怎样"触动我的灵魂、搅动我的忧虑，让我言明自己就陛下和王后的婚姻所知道的情况"。他接着描述了自己在亨利于罗彻斯特第一次看到他的新娘之后与他的对话。

> 我与陛下交谈，问您觉得安妮小姐怎样，窃以为陛下当时回答得有些沉重，说她的举止不像外人对您描述的那样，还说了很多其他无疑让我非常苦恼的话，因此我觉察到陛下您不满意。尽管如此，陛下您依旧决定第二天的会面应如约进行……陛下您出席了，这次会面之后……您召我到您面前并问我您之前跟我说的是不是实话，我没有回答什么，因为想到没有让陛下您更满意，我非常悲伤。

克伦威尔知道自己的证词对亨利摆脱这场婚姻有多重要，以及为了帮助实现这点他要说哪些话。他接着说起安妮之前与洛林公爵之子的婚约。尽管他不怀疑克里维斯使节们坦言婚约已被正式解除时的真诚，但他暗示说他们故意扣留了支持这点的必要文件。他还重申了亨利的判断，即安妮的身体表露出之前有性行为的迹象，因此“您内心从来不愿意触碰她的肉体”。这是一个机智的说辞，既解释了亨利无法圆房的原因，又避免了任何不举的暗示。

为预防这份措辞刻意暧昧的证词无法达成满足国王要求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的，这位囚犯在结尾声明自己无法就如此重大的事务提供证据：

> 在这件事上我是一个正真诚实的见证者，不过我想和陛下相比，我知道的与住在这个王国的其他人一样多，这是真的，最知道真相的上帝可以作为我的见证，而且我相信海军大臣也可以为我和他说了什么做证，无论是陛下您从罗彻斯特返回后还是在众多的其他场合。我确信我前面提名的所有大人都清楚地察觉到陛下您在婚礼前一天以及婚礼之后的不悦，而且，在上帝面前，我敢说我从不以为陛下您看过她后会满意。

克伦威尔判断，这样一来他就满足了国王要他帮助摆脱与安妮的婚姻的要求，他向君主保证：“我会继续为陛下祈求长久的繁荣和富有。”信末他最后一次请求饶恕。或许是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为亨利效劳，他抛开了以往的冷静。这时席卷他内心的纯粹恐惧显而易见，令人痛心。说到“我的血流出”时，他“双膝跪地俯伏”请求国王饶恕他，然后如此落款：“6月末周三于伦敦塔，陛下您最沉重、最痛苦的囚犯和可怜的仆人托马斯·克伦威尔怀着沉重的心思用颤抖的手写下。”担心这样还不够，他又加了一句孤注一掷的附言：“至善至仁的君王，我乞求您饶命、饶命、饶命。”[48]

尽管他的精神状态近乎歇斯底里，但是在王室权力中心生活了近20年的克伦威尔一定非常清楚地知道，仅靠语言拯救自己的希望多么渺

茫。不过，据说亨利让人把他的信念了三遍。尽管福克斯暗指这是因为他因信的内容大为感动，但这至少同样有可能是因为国王想确定信里包含对他摆脱与克里维斯的安妮的婚姻而言必不可少的证据。克伦威尔真心实意的乞求没有得到回复，这一事实让后一种理论更可信。

国王的沉默已是足够的答复。

---

[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04.所谓依照的“法律”大概指的是1534年的《叛国法案》。《西班牙编年史》对这一争论给出了不同的叙述，声称克伦威尔的软帽是在他和其他枢密院成员共赴那场致命会议前的晚宴的时候被刮掉的。按照惯例，如果一个绅士丢掉了软帽，在场的其他绅士也要脱帽，而这次没有人这么做，这引起了克伦威尔的怀疑。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98.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04.

[3] Anon.，‘The 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Lord Cromwell’，in *The Ancient British Drama*，Vol.Ⅰ（London，1810），p.368.

[4] 它包括在拉特兰郡奥克汉和兰格汉，北安普敦郡克拉普索恩、哈卡尔顿和佩丁顿，莱斯特郡布雷斯顿的庄园和领地，以及北埃尔姆汉和诺福克郡贝特雷的多处庄园。*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519（2）；Part ii，no.967（54）；Vol.XVI，no.744.

[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519（2）；Part ii，no.967（54），Vol.XVI，no.578.

[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519（2）；Part ii，no.967（54），Vol.XV，no.804.

[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III，Part i，no.1519（2）；Part ii，no.967（54），Vol.XV，no.804.

[8] 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 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Vol.I，p.119.

[9]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04；*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V，pp.86-87.

[1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04.

[11]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Book III，pp.645，654.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66.

[1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V，p.84.

[1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66；*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I，Part I，pp.537-539.

[1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294n.

[16]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36.

[17] 指斯塔福德家族的第三代白金汉公爵爱德华（1478—1521），他拥有金雀花王朝血统，历经亨利七世、八世父子两朝，于1521年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18] 指爱尔兰贵族第九代基尔代尔伯爵杰拉德·菲茨杰拉德（1487—1534），他曾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任爱尔兰总督，后被关入伦敦塔郁郁而终。

[1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99. 罗伯特森描述了克伦威尔倒台后其仆人们各种各样的命运。Robertson：‘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pp.400-408.

[20] BL Cotton MS Otho C x fo.242.

[21] 这个故事来自《但以理书》的经外章节，讲述了一个名叫苏珊娜的貌美的希伯来妇人

被两个看到她在花园沐浴的好色的年长者指控，他们威胁要质疑她的贞洁，除非她同意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她拒绝被要挟，因此被逮捕并以乱交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但是但以理要求审问这两个男人进而阻止了行刑，当发现这两个男人所讲述的互不一致的时候，他们被处决而苏珊娜被释放。

[22] BL Cotton MS Titus B i fos.267-269.

[2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03.

[24]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s.785，786，794.

[2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300.

[26]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42.

[27]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67.

[28] 无地王约翰（1166—1216），安茹王朝英格兰国王，任内爆发诸侯叛乱。

[29] 亨利二世（1133—1189），安茹王朝英格兰国王，无地王约翰之父，晚年因继承问题与三个儿子之间爆发内战。

[30] 理查二世（1367—1400），金雀花王朝英格兰国王，在统治末期被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推翻，后者加冕成为亨利四世，开启了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

[31]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770.

[3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s.792，801，842.

[33]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p.99-100.

[34] Burnet，G.，*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4 vols.（London，1865），Vol.III，p.296. 诺福克在6年后自己被逮捕时要求同样的特权。他“请求诸位大人向国王

代求，让指控者们跟他面对面，说出他们对他的指控；他相信人们会发现自己是被诬陷的”。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99-100.

[35]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00.

[36] BL Cotton MS Otho C x fo.241；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100.

[37]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pp.100-101.

[38]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I，no.578. 在位于布鲁日的查理五世宫廷的威尼斯大使还汇报说“克伦威尔会跟其他两名异端一起被烧死”。*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V，p.85.

[39] BL Additional MS 48028 fos.160-16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498. 控诉状的复本刊印在Burnet，G.，*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4 vols.（London，1865），Vol.IV，pp.416-421。

[40] BL Additional MS 48028 fos.160-165；*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498.

[41] 第一代蒙莫朗西公爵阿内（1493—1567），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重臣，克伦威尔被捕时正在担任法国宫廷最高职务“王室统帅”。

[4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04.

[43]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47.

[44] 福克斯说关于这个“暴力的法案”，克伦威尔的意图是“为了某个隐秘的使温彻斯特主教（加德纳）被卷入的目的”，但这纯粹是揣测，法案的时机暗示了它是针对玛格丽特·波尔的权宜之计。

[45] Cavendish，*Metrical Visions* ，Vol.II，p.54.

[46] 即托马斯·亨内奇和安东尼·邓尼，二人在亨利八世与克里维斯的安妮结婚期间担任亨利

的马桶侍从，颇受亨利信任，对这桩婚事的内情多有了解。

[47]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 （Stroud，2013），p.332.

[48] BL Cotton MS Otho C x fo.242；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Vol.II，pp.268-276；*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24. 在no.823.提供了另一个（编辑）版本。

第十九章 “很多人哀叹，更多人狂喜”

当克伦威尔在伦敦塔里备受折磨，并满怀焦虑地等待来自宫廷的消息时，废黜那个被他推上王后之位的女人的工作也正在进行。6月24日，安妮收到了从宫廷搬往里士满宫的命令。她向克里维斯的大使坦言自己担心会落得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同样的下场。但安妮不是殉道者，尽管她因国王的离弃而悲伤，但她本质上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并且准备好要体面地迎接不可避免的事。

亨利的律师们继续利用安妮与洛林公爵先前的婚约作为国王与她离婚的依据。他们称这是国王不能够圆房的原因，并小心地提出这是一个“相对的”不举，因为其对象只限于一个女人。不管亨利多么急于摆脱安妮，他都不会让自己的男子气概受到质疑。一场教会的问询已经适时地安排好，包括萨福克公爵、威廉·菲茨威廉姆和托马斯·赖奥思利等在内的大臣代表于7月6日抵达里士满宫，寻求安妮对这次问询的首肯。安妮显然因事态的急变而震惊以致晕倒了。但在完全恢复自我意识之后，她拒绝配合。安妮这种不足以令人信服的反抗姿态或许更多是为了保留自己残存的尊严，而不是真的渴望挽回这场婚姻。

三天后，这桩婚姻被宣布为不合法。安妮服从裁决，并给国王写了一封表示服从判决的正式信函。她写道：“尽管此案令我非常悲伤、不堪忍受，不过我对最高贵的您的极大的爱，更多的与上帝和他的真理而非任何世俗的情感有关……我特此宣布接受并同意这一裁决。”她确认了这场婚姻并非事实婚姻，提到“陛下与我清白、纯洁的共处”，并声明自己愿意做他“最谦卑的仆人”[1]。当月晚些时候，安妮在给兄长的一封

信中也有此说法，她写道“我的身体完整，一如刚入此国之时”。[2] 她的妥协让议会能够在7月12日确认这段婚姻无效。

现在，亨利可以继续他迎娶诺福克侄女的计划了。这一计划与克伦威尔的处决同时展开，后者被安排在7月28日早上在伦敦塔进行。克伦威尔没有在远离嘲弄的人群的格林塔被秘密处决，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在被判叛国罪的时候，他就被剥夺了所有的荣誉，不再拥有埃塞克斯伯爵、掌玺大臣或者任何他之前享有的众多头衔，他将作为一介平民赴死。

当天被处死的阶下囚也不止克伦威尔一个。亨格福德男爵的妻子4年前曾向克伦威尔求助，他本人也曾是克伦威尔的门徒，后者曾安排他担任威尔特郡的治安官，以犒劳他对自己的忠心耿耿。但是亨格福德对国王并没有显示出多大忠心，他被控包庇一位公然同情“求恩巡礼”的神职人员。此外，据说他找了一个狡诈的人预测国王的死期。这是叛国行为，亨格福德很快就被定罪。在他那越来越长的诉状上还加了一条“鸡奸”的指控。

目前还没有关于格雷戈里·克伦威尔在其父处决前夕的活动记载。从表面上看，他明哲保身、行事低调，不过在幕后他仍在与拉尔夫·萨德勒、理查德·克伦威尔等人一起努力。同时，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已经给国王写了一系列信件，乞求国王宽恕她和丈夫。这些信件只有一封保留了下来，它写于1540年7月克伦威尔死期前不久。伊丽莎白在开头感谢国王的恩惠：

> 我义不容辞极为谦恭地顺服伟大的陛下，尽管我的公公犯下十恶不赦、极其严重的罪行，陛下仍乐于给予我们完全的宽容和无尽的友善。我公公最可憎的罪行让我们为穷乏和贫困而烦扰，然而您仁慈地给予我和我可怜的丈夫宽厚的怜悯，让我们因此得到很大的帮助和宽慰。我，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渴望的那样，现在也是如此，向您表示最谦卑的感谢，同样也渴望陛下如此的宽厚和友善可以继续。

她继续向国王保证：

> 鉴于陛下日理万机，我担心打扰或让陛下烦忧，至今还没有向陛下请求，只是谦恭地写几封信，直到陛下您的上述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结。我只为谦恭地恳请陛下在这个恶劣的时候，仁慈地接受我最恭顺的诉求，愿您独有的怜悯和宽厚友善惠及我可怜的丈夫和我；上帝保佑，我们从未也决不会冒犯陛下，而是会不断地为您祈祷一直以来的繁荣昌盛会继续下去。

这封信让伊丽莎白之前对克伦威尔的感情表达成了谎言。克伦威尔不再是她“仁慈的大人和父亲”，而是一名犯罪者，犯下了“十恶不赦”、“极其严重”和“最可憎”的罪行。[3] 或许她是被哥哥爱德华·西摩尔劝服或者是应亨利本人要求而写的这封信。格雷戈里几乎不可能允许妻子表露出这种明显的不忠，但是克伦威尔本人或许更能理解。毕竟，他的儿媳只是展示了与那种贯穿于他本人整个仕途的作风相同的务实主义。

7月24日，距离被处决还有4天的时候，克伦威尔写下了最后一封存留下来的信。这封信并不是对亲友们的辛酸告别，而是向枢密院辩护自己没收皮卡第总督船只上的赃物的行为。最终多添这一额外的控诉是弗朗索瓦一世的手笔。在克伦威尔被捕后，他给亨利八世写信，声称这位大臣将赃物中饱私囊。克伦威尔坚决否认了任何不法行为，“我向上帝保证，我从未从这件事中受惠，也没有违法”，并提出让诺福克、加德纳和其他涉身此事人员为他的行为做证。“如果那些战利品中有我一份或者我因此被承诺得到任何东西，我向大人们保证，上帝不会也不可能眷顾我。”[4] 枢密院在此时提起这一小小的争议，可能是想进一步抹黑克伦威尔的品格，这样国王的臣民及其国外盟友都会对失势的克伦威尔的罪行深信不疑。这是对克伦威尔所剩无几的意志无情而致命的一击。

《西班牙编年史》记载，7月27日克兰默和西摩尔受命去伦敦塔探望克伦威尔，并告知克伦威尔他将在次日被处死。一向残酷无情的西摩

尔宣称："我相信一定是上帝不让你继续活在这世上。似乎你从枢机主教那里学得很好。"但是这位囚犯并没有被激怒。在铁斧阴影下度过了7周之久，克伦威尔的恐惧已经被坦然的接受所取代。据说，"那一晚他一直都在沉思"。他可能终于被告知自己的行刑方式从已从一名叛国者所应承受的残酷处决减轻为更快的斩首。马里亚克汇报称："在处决方式上他得到了宽宥，因为以他的定罪原本要面对更加痛苦且耻辱的死法。"但这并没能给克伦威尔带来太多的安慰。克伦威尔的坦然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任何向国王求情的希望，而当希望彻底破灭的时候人总是会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但他的狱友亨格福德并无同感，他"看起来是如此不安，以致许多人判断他更有可能是疯了"。[5]

7月28日，处决克伦威尔的时刻终于到了，伦敦的治安官们受命将他从关押的地方押往行刑台。据记载，"当天有1000名长戟兵押送他，因为担心骚乱；倘若之前那些穿着他的制服、自称是他仆人的人在场，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在这座城市引起动乱，因为他是如此受普通百姓爱戴"。这样的灾难最终没有发生。克伦威尔极其镇静地登上行刑台，准备向聚集的人群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资深廷臣托马斯·怀亚特也在围观者之列，他正处于极大的悲痛之中。根据《西班牙编年史》的记载，克伦威尔安慰他多年的门徒说："哦，怀亚特，不要哭泣，因为如果我跟当初被他们逮捕的你一样无辜，我不会身处这样的关口。"[6]

即便在这句话里语带歉疚，克伦威尔所指的也只是他的政治活动而已。在他当时向围观者发表，并在事后被印刷出来且大量传播的演讲中，他是如此开头的："善良的人们，我恳求你们为我向上帝祈祷。"当他看到有"不少廷臣"在场时，克伦威尔对他们说：

> 先生们，你们当以我为鉴。大家都知道，国王让我从一个卑贱的人成为一位大臣，但是我既不满足于此，也不满足于对王国发号施令，我妄想占据一个更高的位置，我的傲慢带来了如此惩罚。我坦白，我罪有应得，但是我劝你们，我的先生们，学会坚持你们具备的优良品性，勿被贪婪或自傲战胜。服侍你们的国王，他是世上最好的

君王之一，也是最知道该如何奖励自己臣下的人。[7]

尽管曾经的同僚和对手看到克伦威尔的倒台而狂喜，但他们一定因这一有益的告诫而战栗。国王的恩宠变化无常，这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是从克伦威尔而非自己的视角审视他人。

克伦威尔以传统的方式继续他的演说，表示自己接受了命运的审判："我来这里是受死的，并非像有些人可能会以为的那样为自己辩护，如果我真的这样做，那我就是一个非常无耻、卑鄙的人了。依照法律我被判了死刑，感恩上帝因我的罪过而赐我死亡。在我余年尚存之际，我却过着一个罪人的生活，冒犯了我的上帝，对此，我诚心乞求他的原谅。"被定罪的叛国者为保全遗属的性命宣布接受命运的审判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克伦威尔竭力恳求亨利对他的儿子开恩，这一事实说明这才是他的意图。此外，后来他还在演讲中宣布："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为国王陛下祈祷，愿他能长久与你们同在，身体康健、繁荣昌盛，在他之后，愿他杰出的儿子爱德华王子可以长久地统治你们。"克伦威尔在这里提到王子可能是有意提醒亨利，让他注意到通过与伊丽莎白·西摩尔的联姻，他的儿子已经成为格雷戈里·克伦威尔的外甥。

犯人克伦威尔继续回想他的人生，以及他的崛起发迹："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位旅行者，出身卑微，被提拔到高位，自我升至高位那时起，我就冒犯了我的陛下，对此我衷心乞求他的原谅，也恳请你们和我一起向上帝祈祷他会原谅我。哦，天父，请原谅我。"此处提到他卑微的出身可谓是一个妙举：他知道这一点引起了同僚和普通人对他的憎恶。当然，这并没有被包含在针对他的种种指控中，毕竟出身卑贱并不是一种罪。通过公开提及出身，并且假装认同对手们对取得如此地位的低微之人的憎恶，克伦威尔在争取围观人群的同情，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是从较低微的阶层被提拔起来的。

这个被定罪的人接着谈到了宗教问题。

> 我乞求在场的你们为我做证，我是带着我对天主教的信仰死去的，不要在任何一点上质疑我的信仰，也不要质疑教会的任何圣礼。很多人污蔑我，说我是一个持有邪恶念头的人，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必须承认就像上帝借着圣灵教导我们他的真理，魔鬼也同样预备好要引诱我们，而我就被引诱了；但是请为我做证，我死的时候信奉的是神圣教会的天主教……我再一次盼望你们为我祈祷，只要我的肉体还活着，我的信仰必不动摇。[8]

克伦威尔在死前公开表示自己信奉“天主教的信仰”，这被看作他对宗教改革的彻底否认。据推测这份演讲稿是由他人写好，“强迫即将赴死的克伦威尔读出来的”。[9] 还有一种可能是，该演讲的印刷版（收录于霍尔的《编年史》）没有忠实地记录克伦威尔的话语。9月11日，波尔主教对一名意大利熟人坦言，他担心自己“不应该写克伦威尔恢复了理智，因为印刷出来的克伦威尔最后说的话与那些讲述他临终情景以及死前遗言的人所说的不一致”。波尔总结道：“对人们的审判应归于基督，因为他知道隐藏在人们内心的东西。”[10] 事实上，霍林赫德、霍尔和福克斯所分别记载（且彼此之间的内容高度相关）的这篇讲稿完全体现了克伦威尔的逻辑能力与口才，我们因此没有什么理由怀疑其准确性。这是一份非常含糊的声明，让克伦威尔能在表面上遵从传统的（也是他的君主此时信奉的）天主教信仰，同时也能保持自己的改革主义立场。需要注意的是，克伦威尔要取代的不是天主教教义而是罗马天主教。为了促成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的离婚，让英格兰脱离教宗权威是必需的，这也让克伦威尔的政治生涯更进了一步。同时，解散修道院的目的是充实王室金库，同样也是为了根除腐败，恢复宗教团体的纯洁。

克伦威尔本人或许持有改革派观点，计划将福音派的思想引入英格兰，但是直到被捕前，他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奠定基础罢了。在临死前的演说里，他重申了一个事实，即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他的君主一样。他也否认了对手试图安在他身上的一项指控，即他是一个圣礼形式论者——这是一个天主教徒和改革宗信徒都憎恶的教派。他坚称自己不怀疑“教会的任何圣礼”，直接回击这一指控。同时，在演说的最后

加入“不要在任何一点上质疑我的信仰”，以及更有说服力的“我的信仰必不动摇”，表明了克伦威尔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个人信仰。总之，这是一场与英格兰最成功律师之名相称的演说。他没有说什么能够招致国王责难的话，也没有通过破坏过去10年所奋斗的一切让自己变成一个伪君子。

他接受命运的审判，给予了君主最后的恭维。克伦威尔和他已故的对手安妮·博林4年前的表现一模一样。在面对同样命运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起她，还有托马斯·莫尔，以及其他在他的运作之下被推上断头台的人？现在，他面临着和他们同样的命运。不过，当他跪地祈祷时，他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为了他们。

编年史家爱德华·霍尔描述克伦威尔“在将自己的灵魂交到上帝的手中之后”如何“进行了一场耗时较长的祈祷，但这与他的虔诚和博学相比并不显冗长；之后，他将灵魂交予上帝”。[11] 殉道史传记作者约翰·福克斯提供了一份完整的祈祷词记录稿。倘若这份记录的内容准确，那么这位被定罪的改革者临终的言语中充满了对自己罪恶与邪恶的一生的懊悔。然而，这种虔诚是可疑的，因为其措辞跟克伦威尔最后的演说不一致。它仅仅被记录在福克斯的作品中，意味着其真实性更加值得怀疑。对编者来说，让读者相信克伦威尔作为一名真正的殉道者死去有其好处。

“我这个可怜的罪人现在把自己完全交到您最圣洁的旨意当中，”福克斯的记述如此开始，“现在，我愿意舍下这脆弱而罪恶的肉体，确信当义人在末日被复活时，您会再恢复我的肉体……在您面前，我没有美德也没有善行可以夸耀。我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唉）罪孽和恶行……愿您的圣血洗净我罪恶的污点并冲刷我所有的罪行，愿您的公义遮盖我的不义。”据福克斯记载，克伦威尔在祈祷的结语——也是他人生的结语——中这样说：“我肉体的脆弱终究没有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仁慈的救世主，在死亡闭上了我肉体的眼睛的时候，请让我灵魂的双眼依旧定睛仰望您，在死亡让我的舌头无法再动的时候，请让我的心流泪并对您述说，上帝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您的手中，耶稣基督，请接收我的灵魂，阿门。”[12]

“就这样，”福克斯说，“他的祈祷结束了，在他虔诚而悲悯地告诫那些在行刑台上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之后，他平静地把自己的灵魂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他转身向行刑人说：“恳请你如果可能的话一刀砍下我的头，这样我可以少受一点痛苦。”[13] 然后，克伦威尔把头放在了断头台上。他或许盼望国王陛下能赐予他和安妮·博林同样的特权。他的行刑人，一个叫古雷亚的人，不是从法国来的熟练的剑手，而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笨手笨脚的可怜人，他极其笨拙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人们惊悚地看着这位国王的前首席大臣“如此坚忍地忍受斧斫”。[14] 一则不太可能属实的记载称两个行刑人在克伦威尔的脖子和头上砍了“近半小时”。[15] 是不是诺福克公爵故意为自己的这位宿敌安排了一个不熟练的刽子手，或者事先把刽子手灌醉，以对他施加最后一次残忍的折磨？鉴于很多高级别叛国者曾被国王下令处死，训练有素、可以胜任这一任务的刽子手本应为数不少。克伦威尔的处决进行得如此拙劣，肯定不只是运气差的缘故。

至少砍了三斧之后，克伦威尔的头才终于与他的身体分离开来，并且被高举着给那些有胆量直视的人看。头颅剩下的部分被钉在伦敦桥的长钉上，这在传统上是一种针对潜在叛国者的警告。在桥上按规定展示了一段时间后，克伦威尔的头颅连同他的遗体一起被埋葬在伦敦塔的圣彼得被囚礼拜堂地下。在1529年的遗嘱中，克伦威尔谦和地声明“当我离开的时候，我的遗愿是把我的身体埋在上帝愿我逝去的地方”，还说他的葬礼不要有“任何世俗的奢华”。有点讽刺的是，他的这些愿望都实现了——但绝对不是以他十多年前所设想的形式。[16]

即使对处决的方式感到震惊，但很少有人对克伦威尔的离去表示遗憾。《西班牙编年史》记载："这位克伦威尔落得如此下场，还不如当初不要出生。"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势力因他的死亡而欢喜。在克伦威尔被处决短短两天之后，查理五世在马德里的首席秘书就汇报说他听闻"英格兰传来消息，国王命令将克伦威尔，他自己的宠臣被斩首；据了解，原因是他劝说国王成为一个路德宗信徒。希望这能唤起国王的责任感"。在一片嘲笑声中，弗朗切斯科·孔塔里尼加入了自己的声音，称克伦威尔"比恶魔的下场要好，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有应得"。[17]

同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克伦威尔的老朋友爱德华·霍尔提供了大众对克伦威尔的死最中肯的反应：

> 很多人哀叹，更多人狂喜，尤其是那些宗教人士，或那些支持宗教人士的人，因为他们在那天晚上聚在一起宴饮、欢庆，许多人希望这天7年前就到来……而那些在他身边知道真相的人既为他悲叹，又真心地为他祈祷：不过这是真的，一些神职人员，尤其是那些与生俱来的特权因他的手段而被剥夺的人，厌恶憎恨他，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在各项事务上都不会偏袒任何形式的罗马天主教的人，也不会忍受一些高级教士嗤之以鼻的傲慢。这无疑是他死亡的促因，缩短了他的寿命，促成了他被人设计的结局。[18]

在他死后不久，一首"托马斯·克伦威尔民谣"就刊行于世，宣告了这位"虚伪的叛国者"的死亡。但对这一民谣的反驳也接踵而至，比如"反对恶意诽谤的民谣"，大多数都采取同情这位倒台权臣的立场。最初的民谣有可能是由官方执笔或赞助的，但其余的都是普通民众的作品。据说只有伦敦的"平民"才如此"热爱"克伦威尔，为他的死亡而感伤。[19] 毫无疑问，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克伦威尔一直是穷人的挚友，也一直留心倾听国王普通臣民的疾苦。

但是也有其他人对克伦威尔的离世表达了真实的、持久的悲伤。记录没有显示格雷戈里·克伦威尔在父亲被处决时是否在场，或者他是否像托马斯·莫尔的家人一样向国王请求将他父亲葬在伦敦塔的圣彼得被

囚礼拜堂地下。尽管失去挚爱的父亲无疑让他忧心如焚，但格雷戈里在行刑后的数日内一直保持沉默。相比之下，他的表兄理查德难遏悲痛之情，进行了公开的哀悼。对一位被判叛国罪的人表达如此的尊敬，不仅表明理查德有多么爱戴和敬重他的舅舅，更能表现出他有多么勇敢。亨利八世甚至不能容忍有人在宫廷之上低语那些倒台的人的名字。在安妮·博林失势后，他甚至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因为她会让他想起她的母亲。

克伦威尔的前任秘书拉尔夫·萨德勒仍然忠于他。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是克伦威尔府邸的一员，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他。有许多迹象表明萨德勒高度敬重他的主人，例如他曾请克伦威尔做自己长子和次子的教父。在克伦威尔死后，萨德勒弄到了荷尔拜因给他的主人所画的那幅著名的肖像，并在接下来亨利在位几年里将其妥善保存。如若不是他思维敏捷，这幅画肯定已经被毁了，我们如今也就无法看到这个曾是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的精准画像。

哀悼克伦威尔的还有这么一群人——诚然在他死去的时候为数不多——这些年他在宫廷上结交的朋友。他们当中主要有诗人托马斯·怀亚特，在安妮·博林倒台的时候，得益于克伦威尔的帮助，他侥幸逃脱定罪和处决。怀亚特写了一首诗哀叹他的保护人和朋友：

我所倚仗的柱石崩塌了；

在我心神不安时那是最可靠的缆绳，

无人可找到类似的替代，

无论从东找到西，

这令我神伤。这伤感夺走了

我所有的愉悦，从根干到表层：

呜呼，而我因此变故

注定每日哀悼，至死方休。

但既是命运注定，

除了心怀悲痛，我又为之奈何；

我笔为之喟叹，我声为之哽咽，

我心为之哀伤，我身痛苦遍体；

我只能憎恨自己，

直到可怕的死亡平息我的心境。

相比之下，没有人比那位将他提拔到高位的人更不受克伦威尔的死困扰了。亨利国王非但没有为纪念这位前大臣兼心腹的死亡保持礼节性的低调，反而选择在克伦威尔被处决当天迎娶凯瑟琳·霍华德。此时，他的目光坚定地看向将来，而不是过去。

---

[1]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I，p.161. 安妮因她的顺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获得了里士满宫和布莱奇利庄园的终身所有权，还有一份高额的年金。她稍后被赏赐了其他庄园，包括希佛城堡，那里也成为她的主要居住地。安妮可以保留她的所有王室珠宝、金银餐具以及物品，用来装饰她的新居。她还能被称作国王的“妹妹”，除国王的孩子们和他未来可能的妻子外，其地位高于他所有的臣民。

[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898.

[3]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3 vols.（London，1846），Vol.III，p.159.

[4]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I，pp.277-278.

[5]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103；*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no.926；Harrison，W.J.，‘Hungerford，

Walter（1503-1540）’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Vol.XXVIII（Oxford，1891）， pp.259-261.

[6]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 pp.103-104.

[7]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 pp.103-104.

[8]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 p.839；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 Book III，p.654.

[9]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301.

[10]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 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Vol.XVI，no.40；Mayer，T.（ed.）， *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Volume 1*：*A Calendar*，*1518-1546* （Aldershot，2002）， p.254.

[11]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 p.839.

[12]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1902）， Vol.I，pp.303-304.

[13] 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 p.104.

[14]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 （London，1563）， Book III，p.654；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 （London，1809）， p.839.《西班牙编年史》给出了一个不同的描述，说“行刑人只一斧便成功地砍下了他的头”。Hume，M.A.（ed. and trans.）， *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 （London，1889）， p.104.

[15] Galton，A.，*The Character and Times of Thomas Cromwell* （Birmingham，1887）， p.156.

[16] Merriman，R.B.（ed.），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 2 vols.（London，

1902），Vol.I，p.56. 19世纪70年代，克伦威尔的遗骸被发掘并被重新葬在教堂的墓穴里。

[17]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I，Part I，p.243；*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87.

[18]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pp.838-839.

[19]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p.103-104.

尾声 “一个出身低微但品格高尚的人”

克伦威尔本人曾说“在这世上他最渴求的莫过于留下一个好名声”。在这点上，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会感到失望。即便在生前，克伦威尔就让当时评述者们的看法有了分歧。枢机主教雷金纳德·波尔痛斥他是“魔鬼派来的撒旦的代理人，要诱使亨利国王下地狱”。根据他的评述，国王的首席大臣从未真心支持福音派信仰，他唯一的动机是贪婪和不择手段的权术。他的观点影响了两名16世纪后半叶的天主教作者尼古拉斯·桑德尔（Nicholas Sander）和罗伯特·珀森斯（Robert Persons）。尽管他们勉强承认克伦威尔的福音派信仰是真实的，但他们和波尔一样攻击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残酷与伪善。同时，在一份写于1551年的英格兰时事评述中，威尼斯大使丹尼尔·巴尔巴罗（Daniel Barbaro）将亨利的离婚以及后来的宗教骚乱全部归咎于“当时非常得宠的克伦威尔大人邪恶的劝说”。[1]

与此相对，约翰·福克斯——他的《伟绩与丰碑》（*Acts and Monuments*）在克伦威尔被处决23年后问世——将克伦威尔称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先驱，并说他整个人生“没有别的，只是持续关注并致力于推动和促进对福音的正确理解，以及改革上帝的居所”。福克斯的描绘或许影响了戏剧《关于托马斯·克伦威尔生平和逝世的真实的编年史》（*The True Chronicle Historie of the Whole 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Crowell*），这部剧于1602年第一次发表。作者的名字被引述为“W.S.”，一些学者说这指的是威廉·莎士比亚。演绎的戏剧描绘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克伦威尔早年的崛起历程，他忠于一直以来帮助自己的恩人，之后因修道院的解散遭到加德纳的报复而被打败。教会历史学家约

翰·斯特莱普同样对这位失势的大臣持正面看法。“他是一个靠着自身才干从极低的阶层中崛起的人，”他评论说，“他非常热情、非常忠诚地为国王亦即他的君主工作，有时他的苦差事……给他带来了很多敌人，他最后因他们而覆灭。”同样，16世纪编年史家霍林斯赫德回顾道：“试考虑他如此的飞黄腾达是他自己争取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怀疑这到底是因为他本人的好运，还是因为他可敬且勤勉的行为。”[2]

这种对克伦威尔的正面看法又持续了两个世纪。一个自律、白手起家、为英格兰新教奠定基础的人被保守的贵族势力打倒，这种观点对清教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者都有吸引力。正如17世纪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吉尔伯特·伯内特简明地表述的那样，克伦威尔是“一个出身低微但品格高尚的人”。[3] 但是一切都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当时一个整体上对克伦威尔更消极的刻画开始形成。一场为天主教徒争取更大自由的运动加上新兴的浪漫主义运动引发了一场对宗教改革前的英格兰的回忆。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隐修制度也得到了正面的、怀旧的评价，那么曾主导其毁灭的人此时受到激烈的批评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中一位最直言不讳且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是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他痛斥亨利八世是一个“专制的”国王，他的首席大臣是一个“无情的铁匠”。科贝特的著作《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让其读者毫无疑虑地相信克伦威尔是历史上最大的恶棍。“或许在所有已死的卑鄙、邪恶的无耻之徒中，这位是最卑鄙、最邪恶的一个”，科贝特总结道。[4] 就连费力为克伦威尔大量书信进行编目的罗杰·梅里曼也把他描绘成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并称他是“阴诡的天才”。[5]

进入20世纪，有一些人开始为克伦威尔平反，其中最著名的是杰弗里·埃尔顿，他称克伦威尔是“16世纪英格兰最杰出的政客之一”，并说他“发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国家公共生活几乎每个方面重大且持续的变革”。[6] 但认为亨利的首席大臣是一个腐败、不道德的恶人的观

点仍很难消除。这种观点在流行文化中得到宣扬，其中的代表作包括电影《四季之人》（*A Man For Au Seasons*），在这部电影中，高尚的托马斯·莫尔因为克伦威尔邪恶的阴谋被打倒。完全改变了这种认识的是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一部描写克伦威尔生平的小说，它于2009年征服了整个出版界。《狼厅》连同其续集《提堂》呈现了一个更人性化、更有同情心——甚至英勇的克伦威尔。这一种克伦威尔的形象虽然有虚构成分，但也建立在对历史细节翔实的考察之上，因此总体上更令人信服。

在对亨利八世时期首席大臣各式各样的描绘中，哪一种更接近真相呢？克伦威尔无疑是一个拥有旺盛精力、出众能力和极大野心的人。他的决心让他从默默无闻中挣扎出来，并推动他登上都铎政治的最高峰。荷尔拜因肖像画里坚定、勤勉的大臣形象即便只有一个维度，但也是准确的。克伦威尔能够维持极度的忠诚，他早期对沃尔西的服侍和之后对国王的服侍都优先于他最珍视的个人抱负。他的福音派信仰从一种合宜的态度发展为强烈的确信，在宗教改革期间，他常常在理性要求他谨慎行事的时候满怀热情地推动后续的改革措施，这表明他在这些改革背后所怀的个人信仰是真诚的。虽然毫无疑问克伦威尔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但他也因自己的机智、慷慨和对艺术的爱好而闻名。从当时关于他个人生活的少数记载来看，克伦威尔也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丈夫、父亲和朋友。

但是让克伦威尔毕生及死后500年间广受批评的残酷、腐败和不择手段的倾向，是不可能完全得到辩护的。鼓励他解散修道院的是（至少起初是）充盈国王金库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国王臣民们宗教福祉的真实关切。同样地，他为了摆脱诸如安妮·博林之类的政敌所使用的阴险计策揭示了他性格中狡诈、无情的一面。不过没有人可以在亨利八世的宫廷攀升至此而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无情和残忍，那里是一座充斥着阴谋、辜负、背叛和欺骗的竞技场。进攻不仅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防守方

式。此外，在推行他的新秩序时，克伦威尔总是谨慎地遵循法律条文，且只有在有政治必要性时才会让人赴死。因此关于他是一个残暴之人的断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同理，对于他那日益善变的君主也不能如此评价。

至于克伦威尔的个人特点让他成了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恶棍，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因他无可否认的成就之大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务人士之一，承担了很多业务——且在每一项上都特别成功。甚至当他的政务变得如此繁重以至于一天中几乎没有一刻是属于自己的时候，他的这些私人业务依旧有所发展。在快速攀升得权的同时，克伦威尔策划了都铎时代一些最重要的发展：从国王的“大事”到王权至尊原则，从政府中的“革新”到宗教生活的改革。他的举措永久性地改变了英格兰的面貌。修道院消亡了，并迅速被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改革主义信仰所取代，它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并通过确保每个教会都有一本英语《圣经》将上帝的话语带给民众——这大概是克伦威尔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克伦威尔的社会改革提高了亨利治下很多最穷困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到他的任期终止时，克伦威尔已经为君主创造了一个更统一的、方便管理的王国，以及相当雄厚的财政储备，这得益于修道院的财富。正如福克斯所总结的：“这样，通过克伦威尔的努力……整个英格兰都有了一些变革。”[7]

议会也转变成了一个更稳定且更强大的机构。在沃尔西主政时，议会只是不定期地召开集会，因此效能有限。但是他的门徒克伦威尔为了推动自己的改革，将议会确立为一个定期的固定设置。尽管克伦威尔确保它顺从王权，但当国王缺少控制力的时候，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宪政权力机构——并因此成为王权的一个威胁。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克伦威尔自己的后代奥利弗意识到了它的终极潜力，即作为让这个国家摆脱君主统治的手段。他和他的追随者在17世纪中叶英格兰内战时期以“议会派”之名著称，因为他们相信议会而非国王应该拥有最高的权

力。

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全才，克伦威尔很快就变成了君主不可或缺的人。在亨利的所有大臣当中，克伦威尔大概是最高效且一定是最勤奋的一位。但他也成了自己成就的受害者。他主导变革的节奏最终超过了国王自己的追求，这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只要他执行亨利的意旨，亨利就对这位首席大臣百般宠信，但如果亨利因克伦威尔较激进的想法而感到不安，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至于君主和首席大臣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是何时开始变化的，目前还很难确定。无疑，早在1538年克伦威尔就开始让国王越来越不安了。不过，如果宫廷中的保守派不对克伦威尔步步紧逼的话，他们还可以恢复关系的微妙平衡。当克伦威尔对保守派主动出手，并敦促亨利采取对后者而言显然太过激进的改革措施时，他就在事实上将自己推上了死路。亨利或许让这个铁匠的儿子崛起成为伟大的人物，但最终也是他将克伦威尔葬送。

国王希望克伦威尔的死能够为他所寻求的国内宗教统一铺路。亨利逐渐意识到，只要克伦威尔还是他的首席大臣，这样的统一就不可能实现。掌玺大臣是如此坚定的福音派信徒，他在面对来自诺福克、加德纳和宫廷中其他保守派人士的反对时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硬。仿佛是为了表明自己从此之后不会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倾向于一个中间的道路，亨利在克伦威尔被处决两天后就下令将罗伯特·巴恩斯和其他两名在3月与他一起被逮捕的福音派信徒连同三个已知的效忠于罗马的保守派人士处以火刑。巴恩斯在准备赴死时问行刑官是否“有任何于他不利的、使他被定罪的条款”，而行刑官一条也找不出来，这一事实表明这场处刑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而不是基于真实的定罪所做出的处罚。[8]

尽管他们的死被三位天主教徒的处决所抵消，但是巴恩斯及其福音派信徒同伴在克伦威尔本人死后如此快地被处死，表明克伦威尔在维持他们的生命上起了作用。福克斯也十分确信，如果不是因为克伦威尔的

影响力，会有更多被视为“异端”的人被烧死。“有多少好人因这个人的帮助和辩护而被释放并脱离危险，因他的死，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庇护者并在不久之后死去。要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些事例不免显得冗长而乏味。”[9]

克伦威尔大多数的所谓盟友在他失势之后都急于和他保持距离，其中一些人从他曾拥有的资产和职位的突然空缺中获利，其中包括托马斯·赖奥思利。他在克伦威尔被捕后被拖来询问，但是他利用巧言善辩摆脱了麻烦。1540年年末，国王对他的宠信已充分恢复，并将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新修的“大宅”赐给了他。即便他因为如此轻易地替代一个死人而感到了任何的不安，那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在接管克伦威尔的房产的同时，他还恢复了与后者的对手斯蒂芬·加德纳曾经的紧密联系。据说在克伦威尔失势后几个月内，赖奥思利“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同时，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大批家具被搬走并送给了克里维斯的安妮，作为婚姻废除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她形同陌路的丈夫无疑觉得这个举动恰当得令人满意。[10]

马里亚克汇报说，克伦威尔被处决之后的分赃异常仓促。“掌玺大臣的职位给了海军大臣菲茨威廉，而罗素大人取代他成了英格兰海军大臣。杜伦主教（卡思伯特·滕斯托尔）被任命为首席秘书或者代理总教监……而司法事务则被委派给大法官奥德利。”不过，他承认“在宗教事务上，什么都还没确定”。[11]

接下来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宫廷的气氛一直是紧张的。亨利依旧相信他的前大臣犯了叛国罪，利用每个机会进一步破坏克伦威尔的名声。传说他每次拿到纸牌里的杰克都会说：“克伦威尔在我手里。”国王现在怀疑所有与克伦威尔关系密切的人，并且下令对其中一些人进行监视。1541年1月，当拉尔夫·萨德勒、托马斯·怀亚特和其他几位被认为一直与克伦威尔有联系的人突然被捕的时候，事情到了紧急关头。他们被

绑住了手，从汉普顿宫带到伦敦塔，随行有至少24名弓箭手，以防他们逃跑。马里亚克很快将这起引人注目的事件报告给蒙莫朗西，告诉他怀亚特被“绑着带去了伦敦塔，肯定让人觉得不恰当，因为惯例是让他们在不受束缚的状态下被带去囚禁之处”。他还说：“这是怀亚特第三次去那里了，显然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这次肯定出了大事，他是克伦威尔的下属，他的敌人是那些伙同起来对付克伦威尔的人。”马里亚克讽刺地说：“没有比英格兰人彼此对抗更糟糕的战争了，因为在克伦威尔打倒了王国内最显赫的一些人物，从侯爵到伟大的骑士卡鲁之后，现在其他人崛起了，他们直到打倒克伦威尔的所有追随者为止不会罢休，天知道在他们之后会不会有别人重演这场盛事。我从未见过他们比此时更不安的样子。只要一刻不停止内讧，他们就无心对付法国。”[12]

怀亚特在塔里备受折磨，直到3月才在王后凯瑟琳·霍华德的要求下被释放。她显然为这位诗人出名的魅力着迷。萨德勒没有这样的偏爱可以依靠，但他从旧主那里学到了很多，因而有效地就审问者的指控进行争辩，让他们不得不在几天后就释放了他。此外，他的证词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似乎引起了国王对克伦威尔定罪和处决的质疑。

不过，那时亨利已经开始后悔处死克伦威尔了。从那之后，他好像诸事不顺。他与凯瑟琳的婚姻始于强烈的希望和热情，但很快就被发现是一场骗局。新王后——“他所有妻子中最漂亮的，也是最轻浮的”——因被发现犯了通奸罪而在婚礼举行18个月之后被斩首。[13] 与安妮·博林不同，对她的指控是有据可依的：这位轻浮而乐于调情，比国王年轻三十多岁的年轻王后，与国王寝宫的一个侍从托马斯·卡尔佩珀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曾用证言将安妮·博林推上绝路的罗奇福德夫人坦白自己帮助了这一对情人私会。这位年轻王后的一封亲笔信为他们的关系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当卡尔佩珀因病缺席宫廷时，她写到自己“渴望”见到他并让他相信自己的感情，还在信末落款“一生属你的凯瑟琳”。克兰默主教注意到她的轻率之举，并进行了秘密的调查。他发现了凯瑟琳的信

以及除此以外的更多信息。王后年少时与她的音乐老师的韵事以及她和弗朗西斯·德雷汉姆的私通都被揭露了出来。她行事鲁莽且轻率，在成为王后之后还任命德雷汉姆为自己的私人秘书。

只要国王不知情，凯瑟琳的家族就把持着他的宫邸和枢密院——其中为首的就是诺福克公爵。但当亨利发现真相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克伦威尔忠诚的仆人拉尔夫·萨德勒在这位王后迎来毁灭宿命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541年年末，当克兰默发现凯瑟琳的不忠迹象时，萨德勒孜孜不倦地收集了足够的证据，确保她被判叛国罪。但他同时也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一个既能扳倒王后，也能让那些合谋搞垮克伦威尔的人（尤其是诺福克和加德纳）倒台的机会。他和盟友一起（其中最突出的是克兰默）不知疲倦地努力为他的前侍主报仇，但是没有立即成功。对法国和苏格兰开战的风险正在迫近，亨利离不开诺福克和加德纳的外交和军事本领。尽管如此，他们在宫廷的影响力因凯瑟琳失宠的丑闻而削弱，而萨德勒的地位在之后亨利在位时期继续攀升。在亨利的子女相继即位后，萨德勒继续辅佐他们。在于1587年去世的时候，他已是英格兰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个成就一定会让他最初的、对他影响最深的侍主印象深刻。

早在1540年12月，国王就对克伦威尔的儿子格雷戈里表现出了偏爱，封他为奥克汉的克伦威尔男爵，并把他作为王国贵族的一员召到议会。次年2月，亨利将格雷戈里已故父亲在莱斯特郡曾拥有的一些地产赐给了他。这些地产以兰德修道院为核心，这是老克伦威尔在一座奥斯丁会修道院旧址上修建的豪华庄园住宅。格雷戈里在那里与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余生，在这期间他被封为巴斯骑士并成为宫廷中备受尊敬的一员。1540年当他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选择叫他托马斯，这暗示了他对父亲的怀念。和母亲和姐姐们一样，格雷戈里在1551年7月4日死于汗热病。他的遗孀伊丽莎白仅在三天后就嫁给了约翰·波利特，即后来的第二代温彻斯特侯爵。

克伦威尔的外甥理查德在舅舅倒台一段时间后也官运亨通。1541年，他被任命为剑桥郡和亨廷顿郡郡长，并在次年成为一名代表亨廷顿郡的议会议员。1542年国王将位于亨廷顿和圣尼茨的几所圣玛丽修道院赐给了他。这让他每年享有488英镑（约合现在的1.5万英镑）的收入，外加上从其他各种馈赠和职务中获得的收益，他在这10年里成了一名富人。理查德从舅舅那里学会了房产和地产收购的业务，并在逝世时凭借多处资产的收益成为王国境内最富有的贵族之一。亨利还于1543年任命理查德为国王寝宫的侍从，这进一步体现出他对后者的宠信。国王一直欣赏理查德在竞技场上的英勇，在当年晚些时候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时，他毫不犹豫地派理查德去法国战场上指挥步兵。理查德于1546年去世，留下两个儿子。其中，长子亨利·克伦威尔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剑桥郡和亨廷顿郡的郡长并颇受伊丽莎白一世宠信。他的第一任妻子琼·沃勒姆是伦敦市市长的女儿，她给亨利生了两个儿子和五个女儿。理查德的次子罗伯特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父亲，而奥利弗·克伦威尔是英格兰内战中议会派的统帅，他打败并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主。

克伦威尔的盟友在他失势后飞黄腾达，但他主要的对手们则不然。诺福克公爵在侄女凯瑟琳·霍华德失宠后也失去了宠信。1543年他加入了对法国的作战，但是因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就退兵而受到国王的严厉斥责。在亨利在位的最后几年里，诺福克又输给了爱德华·西摩尔和新王后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后者是亨利的第六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他们都支持改革主义信仰。他与加德纳一起设计让主教克兰默被捕，但是失败了。他和与他一样的宗教保守派此时处于弱势。接下来更糟糕。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越来越傲慢、古怪的行为让他们双双陷入困境。当萨里展示他盾徽上的王室纹章时，这种行为被理解成觊觎王位的一个表现。1546年12月，他和他的父亲被逮捕并被送进伦敦塔。诺福克向国王申辩自己的清白，但是国王充耳不闻。他自己家族的成员，包括多年前寻求克伦威尔帮助的形同陌路的妻子，提

供于他不利的证据，指出他犯有“包庇严重叛国行为，对我儿子的错误行为默而不语”的罪。和克伦威尔一样，他根据法案被宣告剥夺财产权和民事权利，未经审讯被判处死刑。亨利的逝世让他得到了缓刑，但是在已故国王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他一直被关在伦敦塔里。最后，亨利的女儿玛丽在1553年成为女王之后赦免了他，他重新宣誓成为枢密院的大臣。第二年他在肯宁霍尔去世。

诺福克的老盟友斯蒂芬·加德纳在亨利在位的最后几年经历了相似的失宠。他把克伦威尔的处决作为一个信号，加紧他重申保守信仰的活动，并主持了著名的对安妮·艾斯丘（Anne Askew）的审讯，随后她被作为异端遭到处决。还有流言称他密谋对王后凯瑟琳·帕尔不利，并试图把她当作异端逮捕。加德纳越来越极端的宗教立场令他迅速与国王疏远，国王在临终之际下令将他的名字从遗嘱执行者和枢密大臣的名单中移除，名单上的这些人将在爱德华未成年时摄政。当加德纳的盟友试图说服将死的国王三思时，亨利拒绝了，坚持主教“太固执己见而且太倾向于天主教一派”，并且“不适合在他儿子身边”。加德纳注定不会在新的政权中飞黄腾达，因为它是由新教国王和枢密院大臣主导的，他还因布道反对改革主义信仰两次入狱。和诺福克一样，当信仰罗马天主教的玛丽即位的时候他得到释放，并且被再次任命为枢密院成员。几天后他被提拔为大法官，并担任此职直到1555年去世。

尽管诺福克和加德纳从亨利八世在位后期的失宠中坚持了下来，但是他们得罪了国王，这一事实暗示了后者对克伦威尔的感情。亨利很快痛苦地表示他因首席大臣的死而悲痛。克伦威尔在倒台后一直未被取代。或许是这位逐渐衰老、日益偏执的国王决定不再给任何一个廷臣这样大的权力，又或许是他意识到克伦威尔的卓越本领和能力无可替代。有说法称，克伦威尔被处决一年后，国王下令对那些没能购买科弗代尔《大圣经》的教区处以罚金。正如福克斯所说：“最肯定的一点是，国王在他死后的确深深地、真心地感到懊悔，但是为时已晚了，经常有人

听到他说，现在他失去了他的克伦威尔。”[14]

亨利没有将这个损失归咎于自己，而是痛斥枢密院。1541年3月3日，前任首席大臣被处决约七个多月后，马里亚克汇报说国王“有时甚至因克伦威尔的死而责备（他的大臣们），说他们凭着微不足道的借口，借着虚假的指控，让他处死了自己最忠诚的仆人”。[15]

---

[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Part I，p.436；*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Vol.V，p.346.

[2]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363-365；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3 vols.（Oxford，1822），Vol.I，Part i，p.561；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p.951.

[3] Burnet，G. and Burnet，T.，*Bishop Burnet’s History of his Own Time*，2 vols.（London，1724-1734），Vol.I，pp.281-282，454.

[4] Cobbett，W.，*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New York，1824-7），Vol.I，pp.157，189.

[5]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Vol.I，p.165.

[6] Elton，G.R.，*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4 vols.（Cambridge，1974-92），Vol.III，p.373.

[7]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54.

[8]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p.363-365.

[9]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46.

[10]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105；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p.169.

[11]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Vol.VI，Part I，p.541.

[12]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I，no.467.

[13]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p.77.

[14]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Book III，p.654.

[1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Vol.XVI，no.590；Kaulek，J.（ed.），*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 MM.de Castillon et de Marillac，Ambassadeurs de France en Angleterre*（*1537-1542*）（Paris，1885），p.274.

致谢

这是我第一本与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合作的书。我向他们致以最大的感谢。他们从始至终对我的温暖、热情和投入让我受宠若惊。我尤其感激我的编辑马迪·普赖斯（Maddy Price），感谢她的远见、鼓励和对细节的关注，感谢她最先产生传记的想法。同样，感谢鲁珀特·兰卡斯特（Rupert Lancaster）对我这个作者的信心，感谢他无穷尽的智慧和乐观。埃米莉·弗格森（Emilie Ferguson）、埃玛·戴利（Emma Daley）、贝亚·朗（Bea Long）在宣传、营销和组织活动上是极出色的，而朱丽叶·布赖特莫尔（Juliet Brightmore）则是我见过的最勤奋、最卓越的图片研究员。

我很幸运，除了霍德优秀的新团队之外，还得到了更多熟人的再一次支持。我的经纪人朱利安·亚历山大（Julian Alexander）始终有着低调但上佳的表现，在我陷于兴奋或焦虑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冷静。艾莉森·韦尔（Alison Weir）好心地从严苛而繁忙的日程中抽出时间读这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极为有用的反馈。琼·麦金泰尔（Jean MacIntyre），我的朋友兼我在林肯格罗斯泰特主教大学的同事，提供了孜孜不倦的支持以及与之同等重要的乐趣。我还要感激王室宫殿历史遗迹管理组织（Historic Royal Palaces）的同事们，尤其是艾拉·沙利文（Ella Sullivan）、萨姆·库森斯（Sam Cousens）、露西·沃斯利（Lucy Worsley）以及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Michael Day）。

我有幸与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开始了生动且使人受教的邮件往来，她无私地分享了她对克伦威尔生活和性格的理解，而且她的

书对我而言当然是一个启发。伦敦摄政大学的英国历史讲师尼克·霍尔德博士（Nick Holder）十分大方地分享他对克伦威尔在奥斯丁会的宅邸的研究，并且允许我从他的论文中复制设计图和草图。巴克勒奇公爵非常仁慈地免除了我复制阿拉贡的凯瑟琳那幅绝美肖像画的费用，而且我还要感谢鲍顿庄园加雷思·菲茨帕特里克（Gareth Fitzpatrick）安排这一切。本书的图片部分因加入了英国国家档案馆赠送的图片而得到极大提升，感谢赫斯特·韦泽伊（Hester Vaizey）和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感谢王室宫殿历史遗迹管理组织，感谢安妮·赫伦（Annie Heron）和克莱尔·墨菲（Clare Murphy）。

我非常幸运得到了美好的家庭和朋友们一如既往的鼓励。我的父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继续支持我，我的母亲尤为体贴地在照料孩子上给我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杰恩、里克、利维和妮芙·爱丽丝继续关注我的写作事业，并且想方设法地陪我的女儿埃莉诺玩耍。斯蒂芬·库特（Stephen Kuhrt）从最初开始就一直是这本书忠实、热情的追随者，我十分感谢他的所有建议，从福音派到克伦威尔的电影刻画。我还要感谢朱利安·汉弗莱斯（Julian Humphrys）对克伦威尔军事生涯的见解，感谢尼古拉·塔利斯（Nicola Tallis）分享她对克伦威尔担任珠宝大臣时期的研究，感谢史蒂夫·厄尔斯（Steve Earles）分享与爱尔兰有关的专业知识（更别提他经常送我的巧克力了）。其他朋友，比如索菲·格兰特（Sophie Grant）、乔吉·威尔金斯（Georgie Wilkins）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我实质性的帮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我忠诚的朋友和评论家霍诺尔·盖伊（Honor Gay）相信克伦威尔并没有那么坏。

最后感谢汤姆·阿什沃思（Tom Ashworth），谢谢他的慷慨支持，容忍我经常缺席大英图书馆并确信——像梅丽曼说克伦威尔的那样——我将我的“眼睛坚定地定在目标上”了。

参考文献

部分档案资料

BL Additional MS 25114 fos.160-1 Cromwell to Gardiner and Wallop regarding Anne Boleyn’s fall，14 May[1536]

BL Additional MS 25114 fos.175-7 Cromwell to Gardiner，upbraiding him for accusing him of acting against his interests，July[1536]

BL Additional MS 48028 fos.160-5 Act of Attainder of Thomas Cromwell，29 June 1540

BL Cotton MS Otho C x fo.241 Questions written in Henry Ⅷ’s own hand to be put to Cromwell，June 1540

BL Cotton MS Otho C x fo.242 Cromwell’s last letter to Henry Ⅷ，regarding Anne of Cleves marriage

BL Cotton MS Titus B i fos.257-69 Cromwell’s letters to Henry Ⅷ

BL Harley MS 282 fos.211-12 Cromwell to Wyatt，12 October 1537，announcing Edward Ⅵ’s birth

BL Harley MS 3362 fo.17 Cromwell’s last words on scaffold

TNA SP1/57 fos.92-3 and 294-7 Cromwell to Wolsey，5 May and 18

August[1530]

TNA SP1/78 fos.26-7，SP1/80 fos.51-2 and SP1/82 fo.98 Cromwell to Henry Ⅷ

TNA SP1/83 fos.98-9 Cromwell to Cranmer regarding Fisher and More’s refusal to swear to the Act of Succession，April 1534

TNA SP1/120 fos.165-6 Cromwell to Norfolk regarding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ilgrimage of Grace，22 May[1537]

TNA SP1/161 fos.173-4 Cromwell to the Privy Council，24 July[1540]

出版的一手史料文献

Amyot，T.，‘Transcript of an Original Manuscript，Containing a Memorial from George Constantyne to Thomas，Lord Cromwell’，*Archaeologia*，23（London，1830），pp.50-78

Anon.，‘The 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Lord Cromwell’，in *The Ancient British Drama*，Vol.Ⅰ（London，1810）

Baker，J.H.（ed.），*Reports of Sir John Spelman*，Vols.Ⅰ and Ⅱ（London，1977）

Bray，G.（ed.），*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1994）

Brown，R.（trans. and ed.），*Four Years at the Court of Henry* Ⅷ：*Selection of despatches written by the Venetian Ambassador，Sebastian Giustinian，and addressed to the Signory of Venice，January 12th 1515，to July 26th 1519*，2 vols.（London，1854）

Bruce，J. and Perowne，T.（eds.），*Correspondence of Matthew Parker*（Cambridge，1853）

Byrne，M.S.C.（ed.），*The Lisle Letters*，*6* vols.（Chicago and London，1981）

Calendar of the Carew Manuscripts，Preserved in the Archiepiscopal Library at Lambeth，1515-1574（London，1867）

Calendar of the Close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Henry Ⅶ， Vol.Ⅱ，1500-1509（London，1963）

Calendar of Letters，*Despatches*，*and State Papers*，*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Spain*，*preserved in the archives at Simancas and elsewhere*， Vols.Ⅱ-Ⅵ，Part Ⅰ（London，1866-90）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of the Reign of Elizabeth*， Vol.Ⅰ 1558-9（London，1863）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Venice*， Vols.Ⅰ-Ⅴ（London，1864-1873）

Cavendish，G.，*Metrical Visions*， in Singer，S.W.（ed.），*The Life of Cardinal Wolsey*，2 vols.（London，1825）

Cavendish，G.，*The Life and Death of Cardinal Wolsey*， ed. Sylvester，R.S.，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1 ser.，243（London and New York，1959）

Cox，J.E.（ed.），*Miscellaneous Writings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anmer*（Cambridge，1846）

Cranmer，T.，*Works of Archbishop Cranmer*， ed. Cox，J.E.（Cambridge，1844）

Dickens，A.G.，*Clifford Lette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ublications of the Surtees Society，Vol.172（Durham and London，1962）

Dowling，M.（ed.），*William Latymer's Chronicle of Anne Boleyn*， Camden Miscellany XXX，Camden Society，4th ser.Vol.39（London，

1990），pp.23-66

Drayton，M.，*The Legend of Great Cromwell*（London，1607）

Drayton，M.，*The Historie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Lord Cromwell，sometime Earl of Essex and 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London，1609）

Ellis，H.（ed.），*Original Letters Illustrative of English History*，2nd and 3rd series（London，1827，1846）

Fisher，J.，*The English Works of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1469-1535*，ed. Hatt，C.A.（Oxford，2002）

Foxe，J.，*Actes and Monuments*（London，1563）

Froude，J.A.（ed.），*The Pilgrim：A Dialogue of the Life and Actions of King Henry Ⅷ，by William Thomas，Clerk of the Council to Edward* Ⅵ（London，1861）

Hall，E.，*A Chronicle；Containing The History of England，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Fourth，and the Succeeding Monarchs，to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Henry the Eighth*（London，1809）

Harpsfield，N.，*The Life and Death of Sr Thomas Moore，Knight*，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orig.ser.，Vol.186（Oxford，1932）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The Manuscripts of His Grace The Duke of Rutland，KG，Preserved at Belvoir Castle*，Vols.Ⅰ and Ⅳ（London，1905）

Holinshed，R.，*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Vol.Ⅵ（London，1587）

Hughes，P.L. and Larkin，J.F.（eds.），*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Vol.1（New Haven and London，1964）

Hume，M.A.（ed. and trans.），*Chronicle of King Henry* Ⅷ *of England...written in Spanish by an unknown hand*（London，1889）

Kaulek，J.（ed.），*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de MM.de Castillon et de Marillac*，*Ambassadeurs de France en Angleterre*（*1537-1542*）（Paris，1885）

Letters and Papers，*Foreign and Domestic*，*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1509-47*，ed. Brewer，J.S.，et al.，21 vols. and 2 vols. addenda（London，1862-1932）

Loades，D.M.（ed.），*The Papers of George Wyatt Esquire...son and heir of Sir Thomas Wyatt the Younger*，Camden Society 4th ser.，Vol.Ⅴ（London，1968）

Machiavelli，N.，*The Prince*，trans. Bull，G.（London，1999）

Mayer，T.（ed.），*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Volume 1*：*A Calendar*，*1518-1546*（Aldershot，2002）

Merriman，R.B.（ed.），*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Cromwell*，2 vols.（London，1902）

More，T.，*A Dyaloge of Syr Thomas More*（London，1529）

Muir，K.，*Life and Letters of Sir Thomas Wyatt*（Liverpool，1963）

Muller，J.A.（ed.），*The Letters of Stephen Gardiner*（Cambridge，1933）

Nichols，J.G.，*Narratives of the Reformation*，Camden Society，1st ser.，Vol.LⅩⅩⅦ（London，1859）

Norton，E.，*The Anne Boleyn Papers*（Stroud，2013）

Payne，J.（ed. and trans.），*The Novels of Matteo Bandello Bishop of Agen*，Vol.Ⅳ（London，1890）

Pocock，N.（ed.），*Records of the Reformation*：*The Divorce*，*1527-1533*（Oxford，1870）

Pole，Cardinal R.，*De Unitate*（1536）

Pratt，J.（ed.），*Acte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8 vols.（London，1877）

Robinson，H.（ed.），*Zürich Letters*，2 vols.（Cambridge，1842，1845）

Robinson，H.（ed.），*Original Letters Relative to the English Reformation*，2 vols.（Cambridge，1846-7）

Rogers，E.F.，*Correspondence of Sir Thomas More*（Princeton，1947）

Roper，W.，*The Lyfe of Sir Thomas Moore*，*Knighte*，ed. Hitchcock，E.V，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197（Oxford，1935）

Sampson，G.（ed.），*The Utopia of Sir Thomas More...with Roper's*

Life of More and some of his letters （London，1910）

Shakespeare，W.，*Henry* Ⅷ （London，1623）

State Papers of the Reign of Henry Ⅷ， Record Commission，11 vols.（London，1830-52）

Statutes of the Realm ，11 vols.（London，1963）

Stow，J.，*A Survey of London Written in the Year 1598* ， ed. Morley，H.（Stroud，1994）

Strype，J.，*Ecclesiastical Memorials*，*Relating Chiefly to Religion*，*and the Reformation of it...under King Henry* Ⅷ，*King Edward* Ⅵ *and Queen Mary* Ⅰ ，3 vols.（Oxford，1822）

Strype，J.，*Memorials of Thomas Cranmer* ，3 vols.（London，1840）

Turnbull，WB.，*Calendar of State Papers*，*Foreign Series*，*of the Reign of Edward* Ⅵ， （London，1861）

Tyndale，W.，*The Practice of Prelates* （London，1530）

Vergil，Polydore，*Anglica Historia* （London，1534）

Williams，C.H.（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Ⅴ，1485-1558（London，1967）

Wood，M.A.E.，*Letters of Royal and Illustrious Ladies of Great Britain* ，3 vols.（London，1846）

Wright，T.（ed.），*Three Chapters of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Monasteries*，Camden Society，Vol.26（London，1843）

Wriothesley，C.，*A Chronicle of Englan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Tudors*，*From A.D.1485 to 1559*，ed. Hamilton，W.D.，2 vols.，Camden Society，2nd ser.（London，1875）

Wyatt，T.，*Collected Poems*，ed. Daalder，J.（Oxford，1975）

二手文献资料

Ackroyd，P.，*The Life of Thomas More*（London，1998）

Anglo，S.，*Spectacle and Pageantry and Early Tudor Policy*（Oxford，1997）

Anon.，*The Life of Thomas Lord Cromwell，A Black-Smith's Son，born at Putney in Surry*（London，1715）

Bean，J.M.W.，*The Decline of English Feudalism，1215-1540*（Manchester，1968）

Beckingsale，B.W.，*Thomas Cromwell：Tudor Minister*（London and Basingstoke，1978）

Bernard，G.W.，'The Fall of Anne Boley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06（1991），pp.584-610

Bernard，G.W.，'The Making of Religious Policy，1533-1546：Henry Ⅷ and the Search for the Middle Way'，*Historical Journal*，41（1998），pp.321-49

Bernard，G.W.，*Power and Politics in Tudor England*（Aldershot，2000）

Bernard，G.W.，*The King's Reformation：Henry Ⅷ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English Church*（New Haven and London，2005）

Bevan，A.S.，'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Tudor Government，1509-

1547’，Ph.D.diss.，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85

Bindoff，S.T.，*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58*，Vols.Ⅰ and Ⅲ（London，1982）

Black，M.et al.，*A Taste of History*：*10，000 Years of Food in Britain*（London，1993）

Bobbitt，P.，*The Garments of Court and Palace*：*Machiavelli and the World that he Made*（London，2013）

Bowker，M.，‘The Supremacy and the Episcopate：The Struggle for Control，1534-40’，*Historical Journal*，18（1975），pp.227-43

Bradshaw，B.，‘Cromwellian Refor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ildare Rebellion，1533-34’，*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27（1977），pp.69-94

Brecht，M.，*Martin Luther*，trans. Schaff，J.L.，3 vols.（Philadelphia and Minneapolis，1985，1990，1993）

Brigden，S.，‘Thomas Cromwell and the Brethren’，in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the Tudors*：*Essays presented to Sir Geoffrey Elton*，ed. Cross，C.，Loades，D. and Scarisbrick，J.J.（Cambridge，1988），pp.31-49

Brigden，S.，*London and the Reformation*（Oxford，1989）

Brigden，S.，*New Worlds*，*Lost Worlds*（London，2001）

Burnet，G.，*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4 vols.（London，1865）

Cameron，E.，*The European Reformation*（Oxford，1991）

Cobbett，W.，*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Ireland*（New York，1824-7）

Coby，J.P.，*Thomas Cromwell*：*Henry Ⅷ’s Henchman*（Stroud，2012）

Coleman，C. and Starkey，D.（eds.），*Revolution Reassessed*：*Revisions in the History of Tudor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Oxford，1986）

Cross，C.，Loades，D. and Scarisbrick，J.J.（eds.），*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the Tudors*：*Essays presented to Sir Geoffrey Elton*（Cambridge，1988）

D’Alton，C.，‘William Warham and English Heresy Policy after the Fall of Wolsey’，*Historical Review*，77/197（2004），pp.337-57

Daniell，D.，*William Tyndale*：*A Biography*（New Haven and London，1994）

Davies，C.S.L.，‘A New Life of Henry Ⅷ’，*History*，LⅦ（1969）

Dickens，A.G.，*Thomas Cromwell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London，1959）

Dickens，A.G.，*The English Reformation*（London，1989）

Dowling，M.，‘Anne Boleyn and Reform’，*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Vol.35（Cambridge，1984），pp.30-45

Duffy，E.，*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Traditional Religion in England*，*c.1400-c.1580* （New Haven and London，1992）

Ellis，J.J.，*Thomas Cromwell* （London，1891）

Ellis，S.，*Tudor Frontiers and Noble Power* （Oxford，1995）

Ellis，S.G.，*Ireland in the Age of the Tudors* （London，1998）

Elton，G.R.，‘Thomas Cromwell’s Decline and Fall’，*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10（1951），pp.150-85

Elton，G.R.，*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Cambridge，1953）

Elton，G.R.，*Star Chamber Stories* （Cambridge，1958）

Elton，G.R.，*Policy and Police*：*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omas Cromwell* （Cambridge，1972）

Elton，G.R.，*Reform and Renewal*：*Thomas Cromwell and the Common Weal* （Cambridge，1973）

Elton，G.R.，*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4 vols.（Cambridge，1974-92）

Elton，G.R.，‘Tudor Government：The Points of Contact：Ⅰ.Parliament’，*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ⅩⅩⅣ（1974）

Elton，G.R.，‘Tudor Government：The Points of Contact：Ⅱ.The Council’，*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

ⅩⅩⅤ（1975）

Elton，G.R.，‘Tudor Government：The Points of Contact：Ⅲ.The Court’，*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ⅩⅩⅥ（1976）

Elton，G.R.，*Reform and Reformation*：*England*，*1509-1558*（London，1981）

Elton，G.R.，*The Tudor Constitution*：*Documents and Commentary*，2nd edn（Cambridge，1982）

Elton，G.R.，‘A New Age of Reform？’，*Historical Journal*，30（1987），pp.709-16

Elton，G.R.，*Thomas Cromwell*：*Secretary*，*Minister and Lord Privy Seal*（Cambridge，1991）

Elton，G.R.，‘How Corrupt was Thomas Cromwell？’，*Historical Journal*，36（1993），pp.905-8

Elton，G.R.，*England under the Tudors*（London and New York，2005）

Eppley，D.，*Defending Royal Supremacy and Discerning God’s Will in Tudor England*（Aldershot，2007）

Erler，M.C.，*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the Dissolution*：*Monks*，*Friars*，*and Nuns 1530-1558*（Cambridge，2013）

Foister，S.，*Holbein and England*（New Haven and London，2004）

Fox，A.G. and Guy，J.A.（eds.），*Reassessing the Henrician Age*：*Humanism*，*Politics and Reform 1500-1550*（Oxford，1986）

Fraser，A.，*The Six Wives of Henry* Ⅷ（London，1993）

Friedmann，P.，*Anne Boleyn*：*A Chapter of English History*，2 vols.（London，1884）

Fuller，T.，*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London，1655）

Galton，A.，*The Character and Times of Thomas Cromwell*（Birmingham，1887）

GEC，*The Complete Peerage of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Kingdom*，Vol.Ⅲ（London，1913）

Grummitt，D.，'Calais 1485-1547：A Study i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and Politics'，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1997）

Gunn，S.J.（ed.），*Early Tudor Government*（1995）

Gunn，S.J. and Lindley，P.（eds.），*Cardinal Wolsey*：*Church*，*State and Art*（Cambridge，1991）

Guy，J.A.，'Communications-The Tudor Commonwealth：Revising Thomas Cromwell'，*Historical Journal*，23/3（1980），pp.681-7

Guy，J.A.，'Henry Ⅷ and the Praemunire Manoeuvres of 1530-1'，*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97（1982），pp.481-501

Guy，J.A.，*Tudor England*（Oxford，1988）

Guy，J.A.（ed.），*The Tudor Monarchy*（London，1997）

Guy，J.A.，*Thomas More*（London，2000）

Gwyn，P.，*The King's Cardinal*：*The Rise and Fall of Thomas Wolsey*（London，1990）

Haigh，C.，*English Reformations*：*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Tudors*（Oxford，1993）

Head，D.，*Ebbs and Flows of Fortune*：*Life of Thomas Howard*，*Third Duke of Norfolk*（Athens，1995）

Holder，N.，'The Medieval Friaries of London'，Ph.D.diss.，University of London（2011）

Hornsey，I.，*A History of Beer and Brewing*（Cambridge，*c* .2003）

Hoyle，R.W.，*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1530s*（Oxford，2001）

Hurstfield，J.，'Was There a Tudor Despotism After All？'，*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LⅡ（1967）

Hutchinson，R.，*Thomas Cromwell*：*The Rise and Fall of Henry Ⅷ's Most Notorious Minister*（London，2008）

Hutchinson，R.，*Young Henry*：*The Rise to Power of Henry Ⅷ*（London，2011）

Ives，E.W.，'Faction at the Court of Henry Ⅷ：The Fall of Anne

Boleyn’，*History*，LⅦ（1972），pp.169-88

Ives，E.W.，*Anne Boleyn*（1986）

Ives，E.W.，‘The Fall of Anne Boleyn Re-considered’，*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107（1992），pp.651-64

Ives，E.W.，Anne Boleyn and the Early Reformation in England：The Contemporary Evidence’，*Historical Journal*，37（1994），pp.389-400

Ives，E.W.，*The Life and Death of Anne Boleyn*（Oxford，2004）

Jones，J.G.，*Early Modern Wales，c.1512-1640*（1994）

Lehmberg，S.E.，*The Reformation Parliament，1529-1536*（Cambridge，1970）

Lehmberg，S.E.，‘Sir Thomas Audley：A Soul as Black as Marble？’，in Slavin，A.J.（ed.），*Tudor Men and Institutions*（Louisiana，1972）

Lehmberg，S.E.，*The Later Parliaments of Henry Ⅷ 1536-1547*（Cambridge，1977）

Lehmberg，S.E.，‘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Thomas Cromwell’，in *Leaders of the Reformation*，DeMolen，R.L.（ed.）（London and Toronto，1984）

Loades，D.，*Power in Tudor England*（London，1997）

Loades，D.，*Tudor Government：Structures of Author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Oxford，1997）

Loades，D.，*Henry* Ⅷ：*Court*，*Church and Conflict* （Kew，2007）

Loades，D.，*Thomas Cromwell*：*Servant to Henry* Ⅷ （Stroud，2013）

MacCulloch，D.（ed.），*The Reign of Henry* Ⅷ：*Politics*，*Policy and Piety* （Basingstoke，1995）

MacCulloch，D.，*Thomas Cranmer*：*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1996）

MacCulloch，D.，*Reformation*：*Europe's House Divided* （London，2003）

McEntegart，R.，*Henry* Ⅷ，*The League of Schmalkalden*，*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Woodbridge，2002）

Mantel，H.，*Wolf Hall* （London，2009）

Mantel，H.，*Bring up the Bodies* （London，2012）

Marius，R.，*Thomas More* （New York，1984）

Mathew，D.，*The Courtiers of Henry* Ⅷ （London，1970）

Mattingly，G.，*Catherine of Aragon* （London，1942）

Neame，A.，*The Holy Maid of Kent* （London，1971）

Noble，M.，*Memoirs of the Protectorate House of Cromwell* ，2 vols.（Birmingham，1784）

O’Day，R.，*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1986）

O’Day，R.，*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Tudor Age* （Cambridge，1995）

Ormerod，G.，*History of the County Palatine and City of Chester* ，3 vols.（London，1819）

Parmiter，G.de C.，*The King’s Great Matter*：*A Study of Anglo-Papal Relations 1527-1534* （London，1967）

Pettegree，A.（ed.），*The Reformation World* （London，2000）

Phillips，J.，‘The Cromwells of Putney’，*Antiquarian Magazine and Bibliographer* ，Vol.Ⅱ（London，1882），pp.56-62

Plowden，A.，*Tudor Women*：*Queens and Commoners* （Sutton，2002）

Redworth，G.，*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The Life of Stephen Gardiner* （Oxford，1990）

Rex，R.A.W.，*Henry* Ⅷ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Basingstoke，1993）

Rex，R.A.W.，*The Tudors* （Stroud，2002）

Richardson，W.C.，*Stephen Vaughan*，*Financial Agent of Henry* Ⅷ：*A Study of Financial Relations with the Low Countries* （Louisiana，1953）

Ridley，J.G.，*Henry* Ⅷ （London，1984）

Ridley，J.，*Thomas Cranmer*（Oxford，1948）

Robertson，M.L.，‘Thomas Cromwell’s Servants：The Ministerial Household in Early Tudor Government and Society’，Ph.D.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75）

Robertson，M.L.，‘The Art of the Possible：Thomas Cromwell’s Management of West Country Government’，*Historical Journal*，32/4（1989），pp.793-816

Robertson，M.L.，‘Profit and Purpo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mas Cromwell’s Landed Estates’，*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29，no.4（Cambridge，1990）

Robinson，J.M.，*The Dukes of Norfolk*（Chichester，1995）

Ryrie，A.，*The Gospel and Henry* Ⅷ：*Evangelicals in the Early English Reformation*（Cambridge，2003）

Scarisbrick，J.J.，*Henry* Ⅷ（London，1968）

Scarisbrick，J.J.，*The Reformation and the English People*（Oxford，1984）

Schofield，J.，*The Rise and Fall of Thomas Cromwell*：*Henry* Ⅷ*’s Most Faithful Servant*（Stroud，2011）

Slack，P.，*The English Poor Law*，*1531-1782*（Cambridge，1990）

Slavin，A.J.，*Politics and Profit*（Cambridge，1966）

Slavin，A.J.，*Thomas Cromwell on Church and Commonwealth*：

Selected Letters，*1523-1540*（New York，1969）

Slavin，A.J.，‘Thomas Cromwell ana the Printers：The Boston Pardons’，*Proceedings of th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Washington，1984）

Starkey，D.，‘A Reply：Tudor Government：The Facts？’，*Historical Journal*，31（1988），pp.921-31

Starkey，D.（ed.），*A European Court in London*（London，1991）

Starkey，D.，*The Reign of Henry* Ⅷ：*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London，2002）

Starkey，D.，*Six Wives*：*The Queens of Henry* Ⅷ（London，2003）

Starkey，D.，and others（eds.），*The English Court*：*From the Wars of the Roses to the Civil War*（London and New York，1987）

Strong，R.，*Holbein and Henry* Ⅷ（London，1967）

Strong，R.，*Tudor and Jacobean Portraits*，2 vols.（London，1969）

Underwood，W.，‘Thomas Cromwell and William Marshall’s Protestant Books’，*Historical Journal*，47，（2004），pp.517-39

Walker，G.，‘Rethinking the Fall of Anne Boleyn’，*Historical Journal*，45/1（2000），pp.1-29

Ward，P.J.，‘The Origins of Thomas Cromwell’s Public Career：

Service under Cardinal Wolsey and Henry Ⅷ，1524-30’，Ph.D.diss.，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1999）

Warnicke，R.M.，*The Rise and Fall of Anne Boleyn*（Cambridge，1989）

Warnicke，R.M.，*The Marrying of Anne of Cleves*：*Royal Protoco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2000）

Weir，A.，*Henry* Ⅷ：*King and Court*（London，2001）

Weir，A.，*The Six Wives of Henry* Ⅷ（London，2007）

Weir，A.，*The Lady in the Tower*（London，2009）

Weir，A.，*Mary Boleyn*（London，2011）

Wilding，P.，*Thomas Cromwell*（London and Toronto，1935）

Williams，G.，*Renewal and Reformation*：*Wales*，*c.1415-1642*（Oxford，1993）

Williams，N.，*The Cardinal and the Secretary*（London，1975）

Williams，P. and Harriss，G.L.，‘A Revolution in Tudor History？’，*Past and Present*，ⅩⅩⅤ（1963），pp.3-58

Wilson，D.，*In the Lion’s Court*：*Power*，*Ambition and Sudden Death in the Reign of Henry* Ⅷ（London，2002）

Youings，J.，*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London，1971）

注释

对克伦威尔的盾形纹章的注解

在一朵都铎玫瑰的周围是英格兰的雄狮，两侧是康沃尔红嘴山鸦——一种与众不同的鸟，羽毛是黑色的，但拥有颜色明亮的腿、爪和喙。中央的长条来源于克伦威尔的首位侍主——枢机主教沃尔西。

索引

（索引页码为本书页边码）

Act for Payment or First Fruits and Tenths 165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Lesser Monasteries 203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151-2

Act of Six Articles 315，316，317

Act of Succession 155，161，162，255

Act of Succession，second 262

Act of Supremacy 165

Acts in Restraint of Annates *see* Annates，Acts in Restraint of

Alen，John，Archbishop of Dublin 63，167

Alen，Thomas 32

Ales，Alexander 153，216，251

Aleyn，John 59

Allen，Thomas 117

Alvard，Thomas 52

Anabaptism 303

Angelico，Fra（Guido di Pietro） 16

Anglican Church *see* Church of England

Annates，Acts in Restraint of Act for the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 127 second Act 161

Anne Boleyn 43，53，57-8，65-9，93，102，123-6，200，223

arrest and confinement in the Tower 241-7

birth of daughter，Elizabeth 154-5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123-4 *see also* Henry Ⅷ：Catherine of Aragon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and Catherine’s death 213

championing of religious reform 197-9

and Cranmer 249-50

and Cromwell 58，125-6，150-53，197-9，214-18，219，230

blackening her name after her death 251-2

Cromwell’s conspiracy and the death of Anne 231-50

death 250

and Henry Ⅷ 67-9，71，123-5，213-14

and the birth of Elizabeth 154-5

and Catherine’s divorce *see* Henry Ⅷ：Catherine of Aragon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

Cranmer and the invalidation of her marriage 249-50

and her imprisonment and death 231-50

and Jane Seymour 199-201，213-15，241

letter from the Tower 245

marriage and coronation 150-53

oaths of acceptance of marriage 162-3，164-5

pregnancies 150，208，213-14

and religious radical reforms 198

secret wedding ceremony 168

and Tyndale 198

and Princess Mary 124-5

miscarriages 208，213-14

and Norfolk 85，126

and Norris 233，235，237-8，240-41，247，248

and Percy 66-7，250

and Smeaton 234，237，238-9，244，247

sweating sickness 71

trials 247-9

and Weston 233-4，242，247，248

and Wolsey 68-9，78，81，91-2，112，125，218

and Wyatt 234

Anne of Cleves 319-23，324-33，334，344-6，352，359，366，368，373-5，394-5

betrothal to Francois I，Duke of Lorraine 319，327-8，374，376

declaration that marriage to Henry had been illegal 376-7

Holbein s portrait 322，325

and Katherine Howard 343，370-71

Anne of York，Lady Howard 85

Antwerp 19，20

Ardrcs 341-2

Arthur，Prince of Wales 69

Aske，Robert 269，270

Askew，Anne 399

Audley，Sir Thomas 120，151，236，241，312，358，395

Austin Friars 5，46-8，52-5，132，135-6，176，223

dissolution of the friary 297-8

furniture given to Anne of Cleves 394-5

meals at 51，181

new mansion 136-9

seized by the king’s men 351

staff 142-3，144-5

Wriothesley’s acquisition of 394

Avery，Thomas 41-2，143，180-81，295

Bainbridge，Reginald，Cardinal 20

Ballad Against Malicious Slanderers’ 386

‘Ballad on Thomas Cromwell’ 386

Bandello，Matteo 13，17-18，176，177

Barbara，Daniel 389

Bareth，William 49

Barnes，Robert 61-2，132，317，336-7，394

Barre，Ellen/Helen 142-3

Barre，Matthew 142，143

Barton，Elizabeth 159-60，163，164，169

Baumbach，Ludwig von 332，333

Bayard，Chevalier de（Pierre Terrail） 15

Bayham/Begham Abbey 48

Beard，Richard 320

Beaufort，Lady Margaret 154，192

Bedford，1st Earl of *see* Russell，John，1st Earl of Bedford

Bellini 16

Bible 26，119，264，299-300，323，392

Coverdale translation 299，323，400

Erasmus translation 61

Matthew translation，‘Thomas Matthew’s Bible’ 299

Tyndale translation 61

Bigod，Sir Francis 271

Bilncy，Thomas 61

Bisham Abbey 207

Bishops' Book（*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Man*）278，287，302，320

Blackfriars trial 78，80

Blount，William，4th Baron Mountjoy 28，35

Boleyn，Anne *see* Anne Boleyn

Boleyn，George，brother of Anne *see* Rochford，George Boleyn，2nd Viscount

Boleyn，George，Dean of Lichfield 233

Boleyn，Jane，Viscountess Rochford 244，246，252，396

Boleyn，Mary 57，58，67，174-6，233

Boleyn，Thomas，1st Earl of Wiltshire 57，149，261

Boleyn family 149，251

Bonner，Edmund 21-2，43

Bonvisi，Antonio 44

Borgia family 16

Boston，Lincolnshire 24

Guild of Our Lady 24-5

Bosworth Field，Battle of 7，8

Botticelli 16

Bourchier，Henry，2nd Earl of Essex 116，340，344

Bourchier，John，2nd Baron Berners 65

Boxley Abbey，‘Rood of Grace’ 297

Brandon，Charles see Suffolk，Charles Brandon，1st Duke of

Brantôme，Pierre de 58

Brereton，William 241-2，244，247-8

Broke，Thomas 314

Brown，George 298

Browne，Sir Anthony 103

Bruges 20

Bryan，Sir Francis 103，243

Bryan，Lady Margaret 243，258-9，307

Buckingham，Edward Stafford，3rd Duke of 33

Burchard，Franz 313，317

Burckhard，Francis，Vice-Chancellor 320，332-3

Burgh，Dame Elizabeth 284

Burnet，Gilbert 326，390

Butler，James 58，65

Butler，John 314

Butler，Sir Thomas 265

Butler family 167，168

Butts，William 91，330

Caius，Dr 70

Campeggio，Lorenzo，Cardinal 78，149

Canterbury，Convocation of 119，129-30

Capello，Carlo 128

Capon，William 148

Cardinal College，Oxford 41，59-60，110

Carew，Elizabeth 307

Carew，Mawde 285

Carew，Sir Nicholas 218-20，236，252，253，259-60，288，304，306，307，395

Carey，William 58

Carles，Lancelot de 57-8

Carne，Sir Edward 361

Castillon，Louis de Perreau，Sieur de 292

Catherine of Aragon 68-70，78，80，92-3，212-13

banishment from court 123

and Cromwell 157，208-13

death 208-12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see* Henry Ⅷ：Catherine of Aragon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

Catherine Howard *see* Katherine Howard

Cavalcante，John 47

Cave，Richard 72

Cavendish，George 28，30，51-2，67，81-2，83，84，86-7，108，109，115，131-2，178，228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69-70

Cawood Castle 108，111

Cerignola，Battle of 15

Chambers，Geoffrey 24-5

Chanseler，Margaret 166，171

Chapuys，Eustace 80，92-3，113，118，127-9，152，155，160-61，163，198，200，212，213，242，246，249，265-6，267，341

and Cromwell 3，13，17，20，33，39，52，56，93，95，97-8，104，114-15，126，128-9，131，139，144，153，156-7，158，172-3，182，183，185-6，187，209-10，212，214-16，217，221-7，231-2，246，254-5，256-7，261-2，265，268，272，292，303，308，347

and Lady Mary 124，125，156，214，231，254-5，256-7

Charles V，Holy Roman Emperor 53，70，92，97-8，156，218，262

and Cleves 342

and Cromwell 38，183，220-23，

224-7，231，272，291，345

Francis I’s truce and alliance with 292，306，319，321，327，334

and Henry Ⅷ 209，313，342

and More 195

and Wyatt 277

Chauncy，Maurice 195-6

Chawfer，Richard 35

Chekyng，John 74，76-7，121

Cheyney，Thomas 309

Cholmeley，William 296

Church of England 299-302

break from Rome，and royal supremacy 118-20，125-31，152，161，165，196，382

Cromwell and the bishops 161，164-5，186，190，201，278，317

evangelical reforms 132-4，197-9，262-4，278，299-300，314-15 *see also* Cromwell，Thomas：protestant reformist drive

Bible distribution 299-300，392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53-5，367，393-4

king s opposition to 310，353-4，393-4

parliamentary debate about 312-13

rebellions against 265-72，280-81，301，308

Six Articles undermining reforms *see* Six Articles

lands and revenues census 196

parish records 300

Queen Anne’s championing of religious reform 197-9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 130，161

Ten Articles 263

and transubstantiation 310

Circignani，Niccolo 196

Clement Ⅶ，Pope 70，78，112，118，161，183

Clerke，John 112

Clifford，Henry，1st Earl of Cumberland 167

Clifford family 166

Cobbett，William 390

Colet，John 44

Collectanea satis copiosa 119

Compton，William 103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Act for 127

Constable，Elizabeth 284

Constantine，George 247-8，302

Contarini，Francesco 352，385

Convocation of Canterbury 119，129-30

Copling，Mr（tutor）121

Council or the North 275-6

Council of the West 307-8

Court of Augmentations 203-4，205，358

Courtenay，Gertrude，Marchioness of Exeter 143，304，305

Courtenay，Henry，1st Marquess of Exeter 259，304-6

Courtenay，Katherine of York 304

Courtenay，William，1st Earl of Devon 304

Cover dale，Miles 61，132，299

Bible translation 299，323，400

Cranmer，Thomas 13，148-50，151，190，198，218，241，249-50，262，263，267，308-9，396，397，398

and Cromwell 149，218，250，278，299，308-9，323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62，379

and Henry Ⅷ

and the Coverdale Bible 323

invalidation of king’s marriage to Anne 249-50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 148，149，152

Creke，Joanna 173

Creke，John 39-40

Cromwell，Anne（daughter）24，49，51，73-4，78，79

Cromwell，Edward（grandson） 296

Cromwell，Elizabeth，née

Seymour（daughter-in-law）*see* Ughtred，Lady

Elizabeth，nee Seymour，later Lady Cromwell

Cromwell，Elizabeth，nee Wykys（wife）23，48-9，54，72

death 72

previous marriage to Thomas Williams 23

Cromwell，Elizabeth（sister，later Elizabeth Wellyfed） 12，76，79

Cromwell，Grace（daughter） 24，49，51，73-4，78，79

Cromwell，Gregory（son）24，49，73，74-5，76，78-9，121，135，139-41，142，279-80，289，290，296-7，337，344

death 397

and his father's downfall 350-51，362-3，372-3，377-8，386

in his father's service 295-6，324，325

at Launde Abbey 397

at Leeds Castle 309

marriage to Lady Ughtred 282-4，295-7

titles and knighthood 340-41，397

Cromwell，Henry，2nd Baron（grandson） 296

Cromwell，Henry（son of Richard） 398

Cromwell，Jane，later Jane Hough 73，279

Cromwell，Joan，nee Warren 398 Cromwell，John（grandfather） 8，12

Cromwell，John（uncle） 8

Cromwell，Katherine，née

Meverell（mother） 8，17，99

Cromwell，Katherine（sister，later Katherine Williams） 12，80，141

Cromwell，Oliver 393，398

Cromwell，Richard（nephew，previously Richard Williams） 73，141-2，178，242，243，270，290，344，363，386-7，397-8

Cromwell，Robert（cousin） 27

Cromwell，Robert，of Huntingdon 398

Cromwell，Thomas

and Anne Boleyn *see* Anne

Boleyn：and Cromwell

and Austin Friars *see* Austin Friars and Avery 41-2，143，180-81，295

and Barnes 317，336-7

and Barton 159-60，163，164

birth 7

and the bishops 161，164-5，186，190，201，278，317

and Jane Boleyn 244，252

and Mary Boleyn 174-6

and Brereton 241-2，248

and Calais’administration 277，313-14，363

and the Calais

evangelicals 313-14，323，336

and Carew 218-20，252，253，259-60，304，306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157，208-13

and Chapuys *see* Chapuys，Eustace：and Cromwell

character 2-5，52，56，73，389-92

attitude to women 51，284-6

corruption 63-4，168，391

generosity 41，48，52，55，56，173

loyalty 53，54，82，85-7，88，89，111-12，176-7，303，317，340，356，358-9，391

paranoia 170，292，295

pragmatism 3，4，45，56，85，279

ruthlessness 4，63，158-71，191-5，238，265，273-4，292-5，301，303-6，389，391-2

thriftiness 55-6

and Charles V 38，183，220-23，224-7，231，272，291，345

and Chekyng 74-5，76-7

Church lands and revenues census 196

as clerk of the hanaper 146

and coinage 128-9

conveyancing work 19-20

and the Council of the North 275-6

and the Council of the West 307-8

and the Court of Augmentations 203-4，205，358

and Courtenay 304-6

and Coverdale 132，299

and Cranmer *see* Cranmer，Thomas：and Cromwell

and John Creke 39-40

and his daughters’ education 50-51

downfall of 349-75

arrest 349-51，353-4

ballads following his death 386

bill of attainder 369-70，371-2

charges 349-50，365-9

and class 187，339，349，352-3，365，369

and division of spoils 394-5

execution 377，379-80，384-5

imprisonment in the Tower 350，351，364-5，374-5

and last letter 379

prediction of fall，and the turning or his luck 338-48

seizure of property and goods 351，352

speech from the scaffold 380-84

stripping of honours 377

dress 2，54

early travels abroad 14-21

education/self-teaching 13

and Elizabeth I 257-9

evangelical beliefs and ideals 26，132，173，278-80，302-3，333，389，391

expression and conversation 3

falconry 52，95

and Fisher 160，162-3

Fisher’s execution 192

and Fitzwilliam *see* Fitzwilliam，William，1st Earl of Southampton：and Cromwell

in Florence 16-18

and France 15，183，220-21，223，341-2

and Francis Ⅰ 195，299，360，363，379

gambling 182

and Gardiner *see* Gardiner，Stephen：and Cromwell gold rings 54

health problems 185-6，274-5，311-12

and Henry Ⅷ *see* Henry Ⅷ：and Cromwell

Holbein’s portrait 1-4，103，146，387，391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36-8，86，117，369

and Ireland 167-8，276-7

in Italy 16，20-22，24-6

and Jane Seymour 251，288-9

and Katherine Howard 345

and Lambert 310

land ownership 179-80

language skills 20

and Lee 168-9

legal career 19-20，33-4，35，58-9，65，116

leisure activities 51-2，95

and Leo Ⅹ 25-6

literary and cinematic portrayals of 389-91

lowly birth 17，37，85，96，97，115，118，126，146，187，219，227，261，339，349，352-3，365，369

and Lutheranism 333-4，353-5，367

and Lady Mary 155-7，214，252-7，291-2，304，320-21，368

as Master of the Jewels 146，364

Master of the Rolls appointment 177-9

monastic visitations 189-90，196-7，201-2

money-lending 23，116-17

and More *see* More，Sir Thomas：and Cromwell

and Moryson 260-61

and‘My Lord Cromwell’s players’（theatre company）55

in the Netherlands 15，19，20，24

network of agents and spies 187，237，292

neutralising threat from rivals during 1535 186-7

and Norfolk see Norfolk，Thomas Howard，3rd Duke of：and Cromwell

and Norris 235，240-41，248

and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281

and the papacy 24-6，161，183-4，265

parish records instructions 300

physique 103-4

and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269-72，280-81，301，308

and Pole *see* Pole，Reginald，Cardinal：and Cromwell

popular hatred of 120，265，267，271-2，290-91，298

Privy Council appointment 113-14

properties of 135，139，178-9，180，261

Austin Friars *see* Austin Friars

seized by the king’s men 351，352

protestant reformist drive 62，131-3，190-207，262-4，278-9，297，299-302，308-9

Act of Six Articles undermining reforms 315，316，317

destruction of Roman Catholic shrines 297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33，48，59-62，63-4，98，202-7，216，265-7，273，295，297-8，301-2，335，340，391-2

and his downfall 353-5，367 king’s reticence/opposition to reforms 263，290，302-3，310，353-4，393-4

and his last speech 382-3

opposition to reforms in Calais 313-14，317，323，336，363

parliamentary debate about the reforms 312-13

rebellions against reforms 265-72，280-81，301，308

and Rastell 46

rationalism 279

reforms and ruthles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158-71，191-5，265，273-4，292-5，301，303-6

and Roman Catholicism *se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Rouse 311

and Ralph Sadler 35-6，78，79，84，86，88，94，108，180，193，228-9，260，273，274，312，336，339，358，363，387

and Shaxton 315-16

and Smeaton 238-9

statutes passed during ascendancy 173-4

Act for abolishment of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340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Lesser Monasteries 203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151-2

Act of Six Articles 315，316

Act of Supremacy 165

Acts for Restraint of Annates 127，161

Dispensations Act 161

establishing Court of Augmentations of the king’s revenue 203-4，358

Statute of Proclamations 314

Statute of Uses 271

Subsidy Act 173

Taxation Bill 340

Treasons Act 165，192，305

for Wales 276

and Suffolk 115，147，219，242

and Lady Ughtred 282-4，372-3，377-8

and Robert Ughtred 59

and Vaughan 40-42，79，89，99，132，133，143，169，170，177，298-9，322，364

as vicar-general 186，189-91，196-8

wealth 135，146

will 73，78-80，131

and Wolsey *see* Wolsey，Thomas，Cardinal：and Cromwell

and Wriothesley 59，257，308，309，327，339，348

and Wyatt 242-3，277，288，308，309，380，387

Cromwell，Thomas jnr（grandson）397

Cromwell，Walter（father）8-9，11-13，51，99

Cromwell family 7-9，145

Culpepper，Thomas 344，396

Cumberland，Henry Clifford，1st Earl of 167

Dacre，William 3rd Baron 166

Dacre family 166

Darcy，Sir Arthur 283

Darcy，Thomas，1st Baron 269，271-2

Denny，Anthony 260，331

Dereham，Francis 342-3，396

Dispensations Act 161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33，48，59-62，63-4，98，202-7，216，265-7，273，295，297-8，301-2，335，340，391-2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Lesser Monasteries 203

Dorset，Thomas Grey，2nd Marquess of 36，142

Douglas，Archibald，6th Earl of Angus 287

Douglas，Lady Margaret 255，286-7

Dowes，Henry 140-41，337

du Bellay，Jean，Cardinal 71，81，82

Dublin Castle 167

Durham Place 149

Edward Ⅲ 177

Edward Ⅳ 28，275

Edward Ⅵ（Prince Edward）288，304，307，336

Elizabeth Ⅰ，Princess Elizabeth 50，154-5，250，253，257-9，387，398

and Cromwell 257-9

and Lady Mary 254

Elton，Geoffrey 204，391

Elyot，George 19

Elyot，Sir Thomas 43，133-4，195

English Hospice of the Most Holy Trinity and St Thomas，Rome 20

Erasmus，Desiderius 26，29，31，32，43，44，47，279

Esher 83，84，90

Essex，Henry Bourchier，2nd Earl of 116，340，344

Eure，Sir Ralph 270

Ewhurst 179

Exeter，Gertrude Courtenay，Marchioness of 143，304，305

Exeter，Henry Courtenay，1st Marquess of 259，304-6

Eyton，John ap Gruffith 241-2

Fenchurch 24

Fisher，John 120，159-60，162-3，192

FitzGerald，Gerald 9th Earl of Kildare 167

FitzGerald，Thomas，Lord Offaly，10th Earl of Kildare 167，276

Fitzroy，Henry 286

Fitzroy，Mary 286

Fitzwilliam，William，1st Earl of Southampton 71，309，376，395

and Cromwell 237，240-41，259，308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49-50，359，362

Florence 16-18

Fountains Abbey 166

Fox，Edward 119，262，278

Foxe，John 3，7，14，21，26，45-6，63，73，113-14，181，202-3，316，394，400

Acts and Monuments 389

Book of Martyrs 196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52，375，383-4

and Gardiner 45-6，62

Framlingham 335

France 15，183，220-21，341-2

and the Boleyn sisters 57，58

Franco-Spanish war in Italy 15-16

and Henry Ⅷ 37-8，321，360

and Wolsey 37-9

Francis Ⅰ of France 58，195，211，218，220，277，291，299

Charles Ⅴ’s truce and alliance with 292，306，319，321，327，334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60，363，379

and Henry Ⅷ 321，360

Franciscius，Andreas 10-11，14，22

François Ⅰ，Duke of Lorrain 319，327-8，374，376

Frescobaldi，Francesco 17-18，176

Frescobaldi family 17

Fuller，Thomas 147

Gardiner，Stephen 49，59，127，129，394，399

and Cromwell 20，45-6，60-61，62-3，115-16，127，129，186，187-9，211，221，246-7，290，292，302，317，336-7，339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57，361-2，390

and Henry Ⅷ 62，87-8，303，337，397，399

and Wolsey 60-61，62，87-8

Garigliano，Battle of 15

Gerrard，Thomas 337

Gifford，Nicholas 112

Giles，Lawrence 56

Giotto 16

girls’education 49-50

Giustiniani，Sebastian 31

Glossop，Nicholas 8，76，145

Goodrich，Thomas 198

Grey，Lord Leonard 276

Grey，Thomas，2nd Marquess of Dorset 36，142

Grey Friars 299

Grocyn，William 44

Groom of the Stool position 5

Gruffudd，Elis 169

Guaras，Antonio de 56

Gurrea，Mr（executioner）384

Hackney 178-9

Hale（a Carthusian monk）191

Hales，Sir Christopher 94，164，194

Hall，Edward 26，29，43，80-81，331，382，383，385-6

Hampton Court 31，101-2，251

Hanseatic League 35

Hargill，William 344

Harst，Karl 343，345

Heath，Dr 293

Heneage，Sir Thomas 59，88

Henry Ⅲ 177

Henry Ⅶ（Henry Tudor）7，37，85

Henry Ⅷ 2，28-31，34-5，53，212-13，310

and Anne Boleyn *see* Anne Boleyn：and Henry Ⅷ and Anne of Cleves 319-23，324-33，334，344-6，359，368，370-71，373-5，376-7

and Aske 270

and Mary Boleyn 58，67，175

Catherine of Aragon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68-70，72，78，80，97，117-19，123-34

and the Act for the Conditional Restraint of Annates 127-8

and Anne Boleyn’s marriage and coronation 150-53

and break with Rome 118-20，125-31，152，161，382

and Cranmer 148，149，152

and Cromwell 97，117-19，125-6，127

and Wolsey’s fall 80-82，87-92，97

and Charles Ⅴ 209，313，342

and the royal supremacy 118-20，125，129-31，152，165，196

court magnificence 101-2

Court of Augmentations of the king’s revenue 203-4，205，358

and Cranmer *see* Cranmer，Thomas：and Henry Ⅷ and Cromwell 34-5，37-8，393-4

and Anne Boleyn’s imprisonment and death 231-50

and Anne of Cleves 319-23，324-33，334，344-6，352，359，366，368，370-71，373-5

blackening his name after his death 395

and the break with Rome 118—19，120，125-31，152，161，382

and Cromwell’s bid for an imperial alliance 220-23，224-6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46，347，351-4，356-60，362-4，365-

8，370-75，393-4

dealing with opposition to reforms and royal supremacy 158-71，190-96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202-7

downward turn in relationship 226-7

and evangelical reforms 132-4，262-3，278，310，317，353-5，393-4

and the king’s‘Great Matter’97，117-19，125-6，127-9

knighthood 261

lamenting Cromwell’s demise 396，399-400

and the licensing of Bible translations 323

loyalty to the king 303，308，340，356，357-8

and marriage alliances after death of Jane Seymour 291-2

marriage and coronation of Anne Boleyn 150-53

marriage matching attempts for daughters 291-2

and Lady Mary 253-7，368

and the match of son Gregory with the Seymours 281-4

as principal secretary and chief minister 161-71，172-84

promises of riches for the king 114

and the rebellions against Cromwell’s Church reforms 267-72，301，308

reticence/opposition to Cromwell’s reforms 263，290，302-3，310，353-4，393-4

rise in the king’s favour，court and power 94-100，104，113-14，116，118-19，121-2，134-5，145-6，153，157-8，161，172，186，208，261-2，281，341

rumours reported by Pole and Spanish Chronicle 64-5

similarities 103-4

and subjects’oaths of acceptance of marriage to Anne 162-3，164-5

travelling together 197

withdrawal of secretaryship 339-40

and Wolsey’s pardon 105-7

defence of Roman Catholic teachings and ceremonies excommunication of 319

and France 37-8，321，360

and Gardiner 62，87-8，303，337，397，399

Holbein s portrait 2

and Jane Seymour 199-201，214，229-30，241，251，287-8

and Katherine Howard 342-3，352，370，377，388，396-7

and Lambert 310

marriage matching attempts for daughters 291-2

and Lady Mary 124-5，253-4，320-21

and More 130-31

and Moryson 261

and Norfolk 85，346

and Katherine Howard 342-3，396-7

and Norris 234-5

palaces 101-2，251 *see also* Hampton Court

papal relations after death of Clement Ⅶ 183-4

papal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319

physique 103-4

girth 103，326，341

and Pole 117-18，292-4

and Ralph Sadler 228-9

and Margaret Shelton 238

and Smeaton 239

and Tyndalc 133-4

and Wolsey *see* Wolsey，Thomas，Cardinal：and Henry Ⅷ

Herman，Richard 199

Hertford，1st Earl of *see* Seymour，Edward，1st Earl of Hertford and Duke of Somerset

Hever Castle 71

Hilles，Richard 280，351，367

Hoby，Philip 260，291

Holbein，Hans，the Younger 43，291，299

portrait of Anne of Cleves 322，325

portrait of Cromwell 1-4，103，146，387，391

portrait of Henry Ⅷ 2

portrait of Norfolk 85

Holditch，Robert 311

Holinshed，Ralph 13，22-3，115，390

Holland，Bess 73

Hough，Jane，née Cromwell 73

Hough，Richard 73

Hough，William 73

Hough family 279

Houghton（a Carthusian monk）191

Howard，Anne of York，Lady 85

Howard，Elizabeth，Duchess of Norfolk 73，286

Howard，Henry，Earl of Surrey 398-9

Howard，Katherine *see* Katherine Howard

Howard，Thomas，3rd Duke of Norfolk *see* Norfolk，Thomas Howard，3rd Duke of

Howard，Lord Thomas（1511-37）255，287

humanism 43

Hungerford，Elizabeth，Lady 285

Hungerford，Walter，1st Baron 285，377，379-80

Hunt，John 121

Husee，John 103

Hutton，John 319

indulgencies 24-5，26，61

Institution of a Christian Man （the Bishops’Book）278，287，302，320

Ipswich 27

college 60，63，148

grammar school 60

shrine of Our Lady 297

Ireland 167-8，276-7

Irish Reformation Parliament 276

Isabella of Portugal 313

Italy 16，20-22，24-6，177

Franco-Spanish war in 15-16

High Renaissance 16-18，21-2

James Ⅴ of Scotland 291

Jane Seymour 50，103，199-201，214，229-30，241，251，287-8，373

and Carew 218-19

and Cromwell 251，288-9

death 288-9

funeral 290

Jerome，William 337

jewellery 34，54

Johann Ⅲ，Duke of Cleves 319

Karbott，Dr 112

Katherine Howard 50，342-3，352，370，377，388，396-7

execution 396

Katherine Parr 398，399

Kendall，Thomas 267

Kildare，Gerald FitzGerald，9th Earl of 167

Kingston，Sir William 242，244-5，249，356，359

Knight，William 63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340

Knox，John 50

Knyvett，Charles 33-4

Lambert，John 310

Latimer，Hugh 198，315

Latymer，William 198

Launde Abbey 397

Lawson，Sir George 348

Layton，Richard 201-2

Lee，Rowland 140，142，168-9，280

Leeds Castle，Kent 283，309

Legh，Thomas 145，201，202

Leicester Abbey 113

Leo Ⅹ，Pope 25-6

Lewes 295-6

Linacre，Thomas 44

Lisle，Arthur Plantagenet，Ist Viscount 313-14，317，342

Lisle，Honor Plantagenet，Viscountess 103，313

Little Marlow Priory 74，285

Lockwood，Henry 121

London 7，8-10，14，23-4

Grey Friars 299

monastic houses 47 *see also* Austin Friars

St Mary Spital 177

sweating sickness 70-72，79

Tower of *see* Tower of London Lorrain，François Ⅰ，Duke of 319，327-8，374，376

Louis Ⅻ 15，57，58

Low Countries *see* Netherlands Lucretia Romana 53

Luiz，Dom，Duke of Orleans 291-2

Luther，Martin 61，130，132

Lutheranism 61，279，302-3，310，313，317-18

and Cromwell 333-4，353-5，367

Schmalkaldic League 298，318，319，332

Machiavelli，Niccolò 16，18，22

The Prince 4，22

Mailing 285

Man *For All Seasons*（film）391

Manners，Thomas，Ist Earl of Rutland 331，359

Mantel，Hilary *Bring Up the Bodies* 391

Wolf Hall 1，391

Margaret of Navarre 57

Margaret Tudor，Dowager Queen of Scotland 281

Marillac，Charles de 317，321，337，338-9，341，347，395，400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51-2，353—4，360，361-2，369，379

Marshall，William 181

Mary Ⅰ of England（Lady Mary）99，124-5，170，219，231，304

and Cromwell 155-7，214，252-7，291-2，304，320-21，368

and Elizabeth Ⅰ 254

and Gardiner 399

and the Infante of Portugal 277

and Norfolk 399

and Wilhelm Ⅰ of Cleves 320-21

Mary of Guise 291

Mary Rose 14-15

Mary Tudor，‘Bloody Mary’*see* Mary Ⅰ of England（Lady Mary）

Mary Tudor，Queen of France 57，58

Massys，Cornelius 326

Medici family 16

Melanchthon，Philipp：*Apologia* 302-3

Mendoza，Diego Hurtado de 303

Merchant Adventurers 19，177，298

Merriman，Roger 4，211，390

Mewtis，Peter 260

Michaelangelo 18，25

Michell，William 12

Middelburg 19

Milan，Christina of Denmark，Duchess of 291

monasteries dissolution of *se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visitation of 189-90，196-7，201-2

Monoux，George 116

Mont，Christopher 321，322

Montague，Henry Pole，Ist Baron 294，304-5，306

Montmorency，Anne de 369，395

More，Sir Thomas 44-6，50，130，162-3

and Bonvisi 44

and Cromwell 45-6，130-31，160-61，162-3，193-6

in *Man For All Seasons* 391

and Henry Ⅷ 28-9，130-31

martyrdom 194-6

Utopia 44

and Wolsey 87

Morison，Richard 181，260-61，305

An Invective Ayenste the Great and Detestable Vice，*Treason* 305

Mount Grace 166

Mountjoy，William Blount，4th Baron 28，35

‘My Lord Cromwell’s players’（theatre company）55

Netherlands 15，19，20，24

and Vaughan 40-41，298-9

Neville，Sir Edward 304-5

Neville，Sir Thomas 90

Norfolk，Elizabeth，Duchcss of 73，286

Norfolk，Thomas Howard，3rd Duke of 4，73，84-5，126-7，241，260，398-9

and Anne Boleyn 85，126

and Mary Boleyn 175

and Cromwell 85-6，115，175，186，187，253-4，260，274，280，290-91，316-17，334-6

and the Council of the North 275-6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46-7，349，354-5，360-62，365，369，384-5

parliamentary debate about the reforms 312-13

and the rebellions against Cromwell's Church reforms 268-9，272，280-81

and Rouse 311

death 399

and Henry Ⅷ 85，342-3，346，396-7

Holbein's portrait 85

as juror in Anne Boleyn's trial 237

and Lady Mary 253-4，399

in the Tower 399

and Wolsey 85，89，107-8，316-17

Norris，Henry 71，81-2，92，233，234-5，237-8，240-41，247，248

Northumberland，Henry Percy，5th Earl of 67

Northumberland，Henry Percy，6th Earl of 66-7，166，250，273-4

Northumberland，Mary Percy，Countess of 67

Nuremberg Chronicle 42

Offaly，Thomas FitzGerald，10th Earl of Kildare 167，276

Oliver，John 132

Order of the Garter 281

Osiander，Andreas 149

Oxford，Cardinal College 41，59-60，110

Page，Sir Richard 88，242，243

Page，William 90

Paget，William 71

Palgrave，John 49，74

parish records 300

Parker，Alice 284

Parker，Jane 233

Parliament 36-8，39，86-7，117，122

and the Parliamentarians 393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26-7，151，155，161，165，203，262，271，309-10，312-13，314-15，340，392-3

Pasleu，John 301

Pate，Richard 345，361

Paul Ⅲ，Pope 183-4，319

Paulet，George 168，227，298

Paulet，John，later 2nd Marquis of Winchester 397

Paulet，Sir William 86，182，227

Payment of First Fruits and Tenths Act 165

Penn，Sybil 307

Percy，Henry，5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 67

Percy，Henry，6th Earl of Northumberland 66-7，166，250，273-4

Percy，Mary，née Talbot，Countess of Northumberland 67

Percy，Thomas 273-4

Percy family 273-4

Persons，Robert 389

Petre，William 220，262

Pilgrimage of Grace 269-72，280-81，301，308

plague 296

Plantagenets 7

Arthur Plantagenet，Ist Viscount Lisle 313-14，317，342

Honor Plantagenet，Viscountess Lisle 103，313

Pole，Sir Geoffrey 294，304，306

Pole，Henry，Ist Baron Montague 294，304-5，306

Pole，Katherine，Countess of Huntingdon 50

Pole，Margaret，Countess of Salisbury 292，369

Pole，Reginald，Cardinal 64，220，292-4，304，382，389

and Cromwell 4，15，17，18，117-18，261

opposition to Cromwell’s regime 292-4

and Henry Ⅷ 117-18，292-4

Portinari，Giovanni 182-3，295

privy chamber 5，69，88，102-3，237，260

Privy Council 5，43，45，53，102-3，113，142，165-6，274，317，339，349，379，399

Proclamations，Statute of 314

Protestantism Anabaptism 303

Cromwell’s evangelical beliefs and ideals 26，132，173，278-80，302-3，333，389，391

Cromwell’s reforms *see* Cromwell，Thomas：protestant reformist drive

Luther and the rise of 61

Lutheran see Lutheranism

spread to England 61-2 *see also* Church of England

Pryor，Joan 72

Pryor，Mercy 48，72，73-4，99

Putney 7，8-9，23，81-2

Raphael 16，25

Rastell，John 46

Rede，Abbess 285

Reformation Parliament 126-7，151，155，161，165，203，262，271，309-10，312-13，314-15，340，392-3

Renaissance，Italian 16-18，21-2

Reynolds（a Carthusian monk）191

Rice，John ap 201

Rich，Richard 182，194，219，267

Richard Ⅲ 7

Robinson，John 24

Rochford，George Boleyn，2nd Viscount 89，91-2，175，223，232-3，236

and Cromwell’s conspiracy against Anne 241，244，248

trial 248

Rochford，Jane Boleyn，Viscountess 244，246，252，396

Roderego，a Spaniard 42

Roman Catholic Church Cromwell’s crusade against the‘old religion’*see* Cromwell，Thomas：protestant reformist drive

and Cromwell’s last speech 382-3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se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Henry Ⅷ’s break with 118-20，125-31，152，161，382

Henry Ⅷ’s defence of Roman Catholic teachings and ceremonies 310

indulgencies 24-5，26，61

and Luther 61

and the north of England 166

papacy 118，183-4

and Cromwell 24-6，161，183-4，265

excommunication of Henry Ⅷ 319

Henry Ⅷ’s crusade against papal authority 119-20

relations with Henry Ⅷ after death of Clement Ⅶ 183-4，319

and Rastell 46

Rome 20，24-6

Roper，William 45，130

Rouse，Anthony 311

Russell，John，Ist Earl of Bedford 84，88，92，99，107，200-201，265，308，395

Russhe，Thomas 86

Rutland，Eleanor Manners，Countess of 330

Rutland，Thomas Manners，Ist Earl of 331，359

Sadler，Henry 36

Sadler，Nicholas 75，121，140

Sadler，Ralph 35-6，78，79，84，86，88，94，108，180，193，228-9，260，273，274，312，336，339，358，363，387，395，396-7

and Ellen Barre 142-3

St Francis Friary，Stamford 344

St Pancras Priory，Lewes 295

Sampson，Richard 345

Sander，Nicholas 389

Sandys，William，Ist Baron 99

Schmalkaldic League 298，318，319，332

Seymour，Anne 230

Seymour，Edward，Ist Earl of Hertford and Duke of Somerset 199，230，309，314，334，351，398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46，347，365-6

Seymour，Elizabeth *see* Ughtred，Lady Elizabeth，née Seymour，

later Lady Cromwell

Seymour，Jane *see* Jane Seymour

Seymour，Margery 199

Seymour，Sir John 199

Seymour，Thomas 199

Seymour family 251，289

Shakespeare，William 389

Henry Ⅷ 83

Shaxton，Nicholas 198，315-16

Shelton，Sir John 257，259

Shelton，Margaret 233，238

Shrewsbury，Mary Talbot，Countess of 67

Sibylle of Cleves 319

Sion Abbey 287

Six Articles 314，317，367

Act of 315，316，317

Skeffington，Sir William 167，276

Skelton，John 12

Skip，John 217-18

Smeaton，Mark 234，237，238-9，240，244，247，249

Smith，William 8

Somers，Will 182

Southampton，Ist Earl of *see* Fitzwilliam，William，Ist Earl of Southampton

Southwell，Sir Richard 140，141

Spain，Franco-Spanish war in Italy 15-16

Spanish Chronicle 56，64，114，204-5，206，238，239，242，262，270，272，322，323，328，334，335-6，341

and Cromwell’s downfall 346，347，355，356，365-6，379，380，385

Spinelli，Gasparo 124

Stafford，Edward，3rd Duke of Buckingham 33

Stafford，William 174

Starkey，Thomas 181，293

Statute of Proclamations 314

Statute of Uses 271

Stixwould Priory 207

Stokesley，John 323

Stow，John 46，136

Stow，Thomas 136

Strype，John 30，120，143-4，146，303，390

Submission of the Clergy 130，161

Subsidy Act 173

Succession，Act of 155，161，162，255

Succession，second Act of 262

Suffolk，Charles Brandon，Ist Duke of 89，103，116，218，242，268，376

and Cromwell 115，147，219，242

as juror in Anne Boleyn’s trial 237

Suppression of the Lesser Monasteries，Act for 203

Supremacy，Act of 165

Surrey，Henry Howard，Earl of 398-9

Sutton House 180

sweating sickness 70-72，79，335，397

Talbot，Mary，Countess of Shrewsbury 67

Talbot，Sir Gilbert 265

Taxation Bill 340

Ten Articles 263

Terrail，Pierre，Chevalier de Bayard 15

Thacker，Thomas 136，178-9

Thetford Priory 335

Throckmorton，Michael 294-5

Throckmorton，Sir George 151

Titian 16

Tower of London 84，101，112，163，165，167，192，193，195，240，270，294，304，305，336，337，395，399

Anne Boleyn and those accused with her in 241-50，364

Cromwell in 350，364-5，374-5

transubstantiation 310

Treasons Act（1534）165，192，305

True chronicle histone of the whole 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cromwell，

The 389-90

Tunstall，Cuthbert 302，395

Tyburn 163，191，273，276

Tyndale，William 28，30-31，61，133-4，198

Bible translation 61

Ughtred，Lady Elizabeth，née Seymour，later Lady Cromwell 282-4，290，295，309，329，363，372-3，377-8

marriage to Paulet 397

Ughtred，Sir Robert 59

Uses，Statute of 271

Valor Ecclesiasticus 196

Vaughan，Margery 177，183

Vaughan，Stephen 40-42，79，89，99，132，133，143，169，170，177，298-9，322，324，327，328，364

Venice 16，19

Vergil，Polydore 30

Vernon，Margaret 74，121，178，285

Veysey，John 169

Wales 276

Wallop，Sir John 114，195，211，246-7，339，342，354，361，363-4，368

Walsh，William 112

Walsingham，shrine of Our Lady 297

Warham，William 115，119-20，148

Warren，Joan 398

Wars of the Roses 7

Welbeck，John 8

Wellyfed，Alice 76

Wellyfed，Christopher 75-6，140，145

Wellyfed，Elizabeth，née Cromwell 12，76，79

Wellyfed，William 12，76，79

Weston，Francis 233-4，242，247，248

Whettyl，Dame Elizabeth 284

Whitehall Palace 101

Wilhelm Ⅰ of Cleves 320-21，322，323，361

Williams，Elizabeth，née Wykys *see* Cromwell，Elizabeth，née

Wykys（wife）

Williams，Katherine，née Cromwell 12，80，141

Williams，Morgan 12

Williams，Richard *see* Cromwell，Richard（nephew，previously Richard Williams）

Williams，Thomas 23

Williamson，John 178

Wilson，Nicholas 293，345

Wiltshire，Thomas Boleyn，Ist Earl of 57，149

Wimbledon 8

Winter，Thomas 135

Wittenberg Articles 262-3

Wolfhall 199，283

Wolsey，Thomas，Cardinal 27-8

and Anne Boleyn 68-9，78，81，91-2，112，125，218

and Catherine of Aragon 68-70，80

failure to secure divorce，and the fall of Wolsey 80-82，87-92，97

and Cranmer 148

and Cromwell 5，31，37-9，83-4，132，284

alliance viewed as threat to enemies 111

blind eye turned to Cromwell’s dealings 65

and college lands 108-12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33，59-61

entry into Wolsey’s service 32-3

and France 37-9

and Henry Ⅷ 35，37-9，82，105-6，107-8

loyalty to Wolsey 53，54，82，85-7，88，89，111-12

power and status of Cromwell 65

and the royal pardon 105-7

and Wolsey’s fall 82，83-4，86-7，88，89-92，94-100，104-12

death 113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33，59-61

and France 37-9

and Gardiner 60-61，62，87-8

health problems 90-91

and Heneage 59，88

and Henry Ⅷ 30-31，32，63，68-70，72，78，80-82，94，107

and Anne Boleyn 112

and Cromwell 35，37-9，82，105-6，107-8

failure to secure divorce，and the fall of Wolsey 80-82，87-92，97

high treason 112-13

indictment for *praemunire* 81-2，90

king’s seizure of college lands 108-12

pardon 105-7

Lord Chancellor appointment 32

and More 87

and Norfolk 85，89，107-8，316-17

rise to power 30-32

and Rochford 89，91-2

and Suffolk 89

tableware 51-2

Woodall，John 40

Wotton，Nicholas 320，322

Wriothesley，Charles 352

Wriothesley，Thomas 59，241，257，308，309，327，339，348，376，394

Wyatt，George 66

Wyatt，Sir Thomas 43，156，234，242-3，277，288，308，309，380，387，395-6

Wykes，Elizabeth *see* Cromwell，Elizabeth，née Wykys（wife）

Wykes，Henry 23

York Place 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马斯·克伦威尔：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鲜为人知的故事/（英）特蕾西·博尔曼（Tracy Borman）著；郭玉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9

书名原文：Thomas Cromwell：The untold story of Henry VIII’s most faithful servant

ISBN 978-7-5201-4338-7

Ⅰ.①托… Ⅱ.①特…②郭… Ⅲ.①托马斯·克伦威尔（1485-1540）-传记 Ⅳ.①K835.617=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8351号

托马斯·克伦威尔

——亨利八世最忠诚的仆人鲜为人知的故事

著者/〔英〕特蕾西·博尔曼（Tracy Borman）

译者/郭玉红

审校/徐一彤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沈艺 朱露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5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6.75 插页：0.7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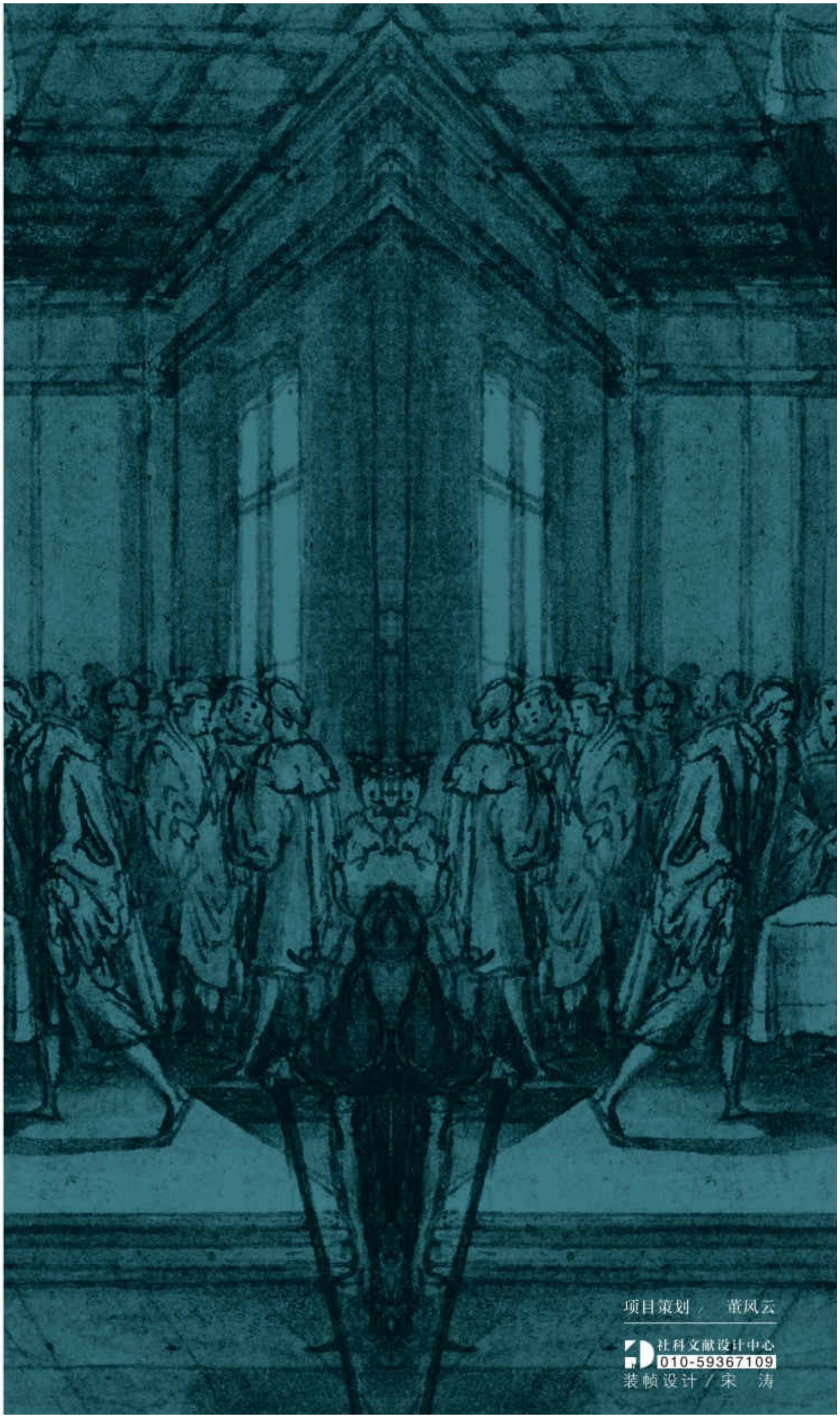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201-4338-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2367号

定价/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项目策划 / 董风云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作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先驱，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政治家，但真实的克伦威尔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他是身份低微的酒馆老板的儿子，平步青云成为亨利八世的左膀右臂；他既是冷酷的政客，亦是一位富有爱心的丈夫、父亲和监护人；他是一位高度国际化的“文艺复兴式”全才，也是一位忠诚尽职的臣仆。特蕾西·博尔曼基于丰富的调研，为我们讲述了克伦威尔从白手起家到走向断头台的精彩故事。

❙细致入微的考证，扣人心弦的文笔。

——《独立报》（英国）

❙这是一部有见地的、让人感同身受的、调研翔实的传记。

——《华尔街日报》

❙钟爱希拉里·曼特尔关于克伦威尔的畅销书《狼厅》的粉丝会喜欢这本书。

——《今日美国》

❙英国历史学家特蕾西·博尔曼发掘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证据，让人能够更多地了解英国历史上最冷酷的一位权谋政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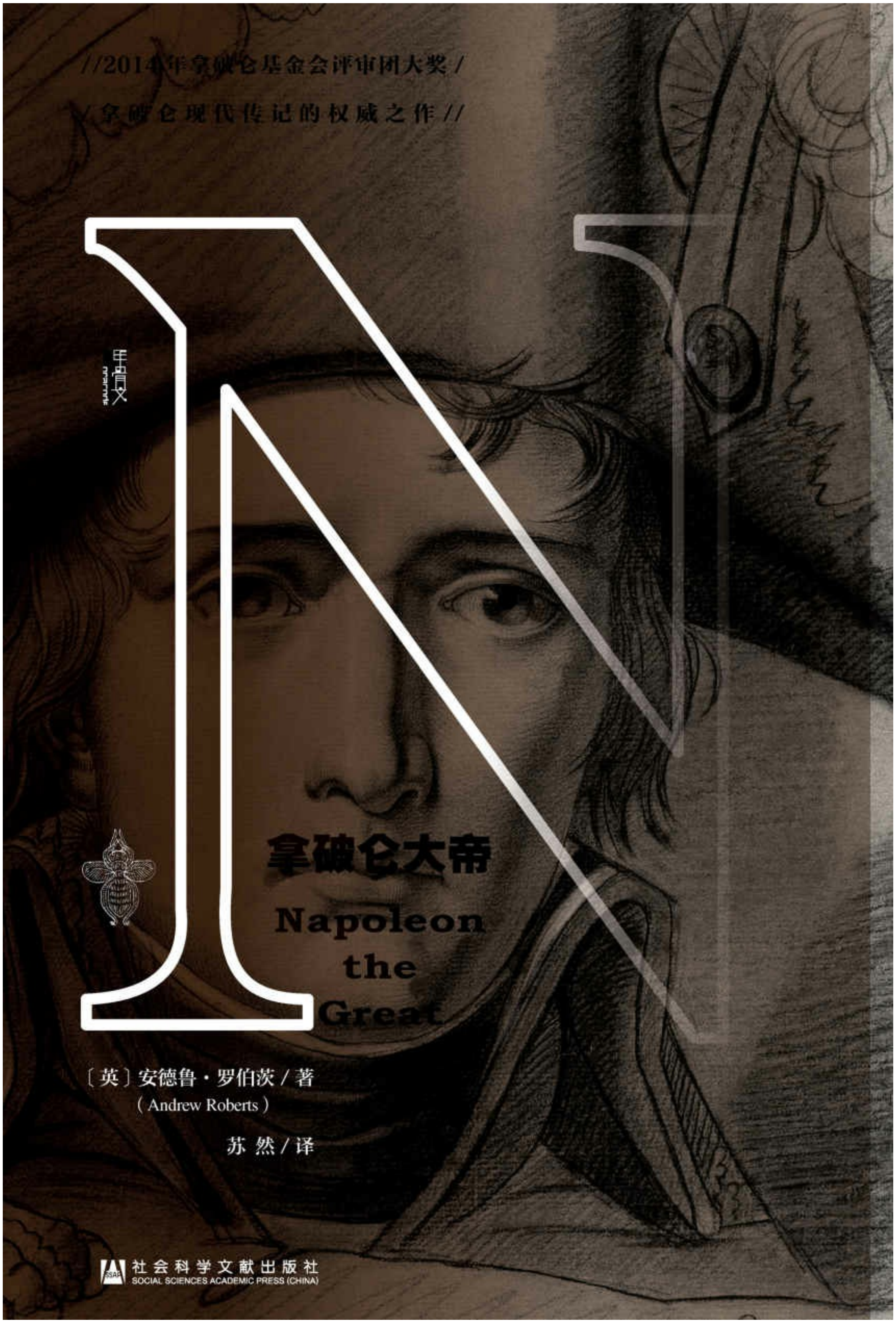
——《卫报》（英国）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4338-7

9 787520 143387 >

定价：88.00 元


//2014年拿破仑基金会评审团大奖/
/拿破仑现代传记的权威之作//
拿破仑大帝
Napoleon the Great
〔英〕安德鲁·罗伯茨/著
（Andrew Roberts）
苏然/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摄影师：Nancy Ellison）

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

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和皇家艺术学会会员，杰出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索尔兹伯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泰坦》（获 199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战争风云：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史》等诸多广受赞誉的作品，他还是诸多报纸的撰稿人。为撰写本书，他先后走访了位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比利时、意大利、捷克、奥地利、德国、法国的拿破仑战场（60 处中的 53 处），并去圣赫勒拿岛调研。他关于拿破仑的三集电视短剧也在 BBC2 台放映。

苏然，1991 年生，安徽黄山人，2014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拿破仑时代历史的爱好者。

Napoleon the Great By Andrew Robe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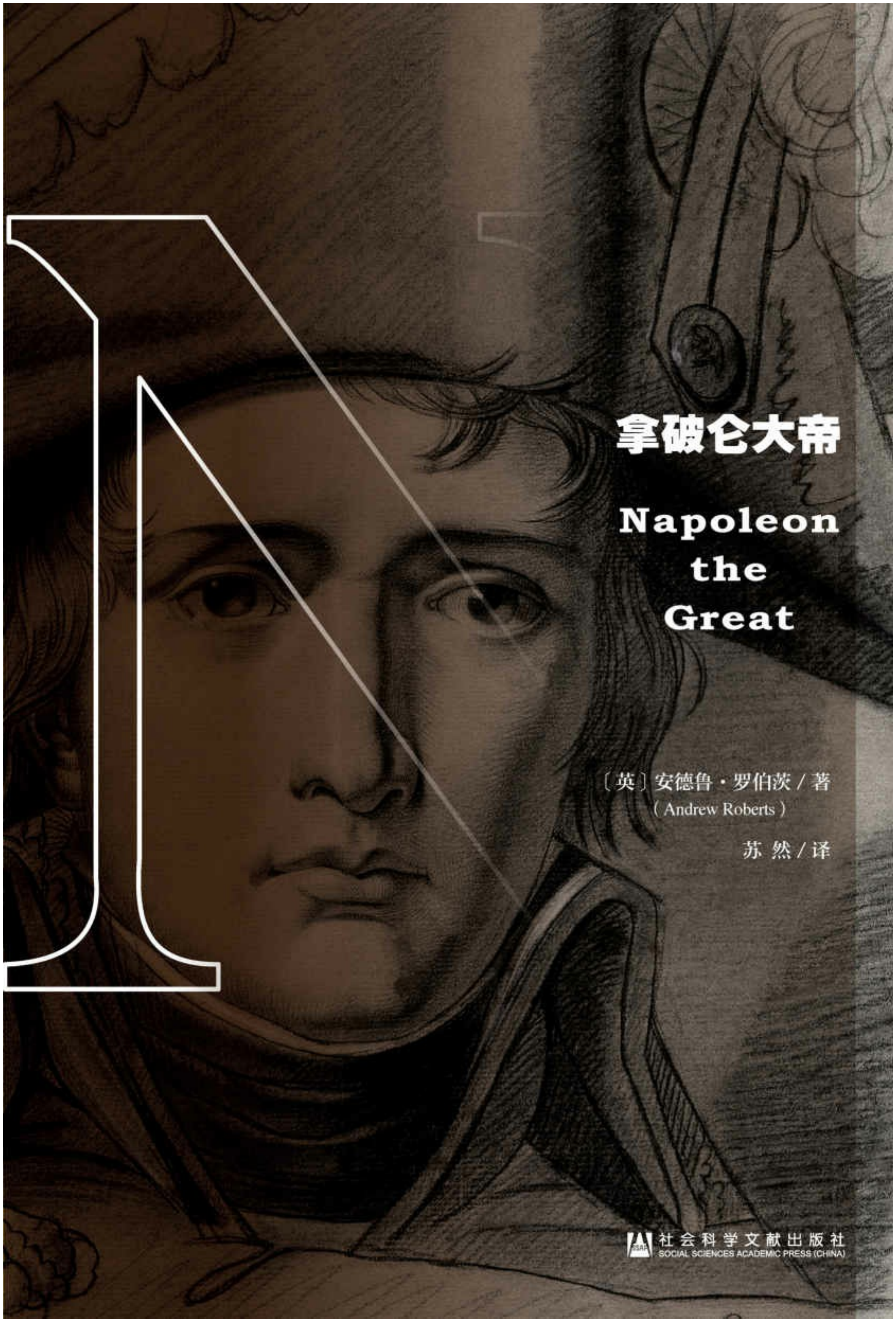
Copyright：©Andrew Roberts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ina Capel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6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拿破仑大帝
Napoleon the Great
〔英〕安德鲁·罗伯茨 / 著
（Andrew Roberts）
苏 然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干劲十足、意志坚定的意大利军团司令波拿巴将军，时年**27**岁。



2.19世纪中期阿雅克肖中心地区阔大的波拿巴宅，比**1769**年拿破仑出生在宅内一堆壁毯上时高了一层。



3.布列讷军校同学所作漫画。图中，**16**岁的拿破仑毅然前去保卫科西嘉民族主义领袖帕斯夸莱·保利，一位老师抓着他的假发，想阻止他。图下文字写

道：“波拿巴飞奔去P那儿，要帮他对付敌人。”



4.1796年5月10日法军在洛迪占领的狭长桥梁，它连接通往米兰的道路。这是拿破仑的首次重要胜利，大大增强了他对自身军事能力的信心。此图作者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参加过拿破仑战争中的很多战斗。



5.艺术气息浓厚的宣传肖像，刻画了1796年11月15日拿破仑在阿尔科莱会战中

举旗，安托万-让·格罗作。拿破仑才举了片刻就被挤进水沟里。



6.1798年**7**月**21**日的金字塔会战中，秩序井然的法军方阵粉碎了马穆鲁克的势力。**“**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金字塔顶凝视你们。**”**次日，拿破仑占领开罗。



7.1799年**3**月，拿破仑在雅法海滨医院照料法军中的瘟疫患者，他的确展示了真正的勇气。



8.1799年**11**月**9**～**10**日，拿破仑在混乱的雾月政变中夺权。在圣克卢宫橘园厅，五百人院议员对拿破仑动武，掷弹兵救走了他，然后用刺刀清场。



9.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雾月政变关键人物。拿破仑反对吕西安的婚事，导致两人疏远彼此，但是滑铁卢会战前，吕西安终于回来支持拿破仑。



10.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拿破仑都亲近聪明但软弱的兄长约瑟夫。拿破仑封约瑟夫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来又封他为西班牙国王，但是对拿破仑来说，约瑟夫带来的政治负担胜过政治利益。

家人



11.太后，拿破仑那精明的母亲。拿破仑给了太后很多钱财，但她仍然很节俭，被问及为何时，她回答：**“**也许有一天，我得给所有这些国王孩子找面包吃。**”**



12.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拿破仑封她为卢卡和皮翁比诺公主、托斯卡纳女大公。



13.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拿破仑封他为荷兰国王。因为路易把荷兰利益置于法兰西帝国利益之前，拿破仑后来废黜了他。



14.拿破仑和约瑟芬一同撮合约瑟芬之女奥尔唐斯与路易的婚姻。这是桩不幸的姻缘，虽说两人生下了未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



15.拿破仑的兄弟姊妹中，迷人的妹妹波利娜最亲近他。她的确对他展示了爱与忠诚。



16.拿破仑封卡罗琳为那不勒斯王后，但她和两人共同的姊妹波利娜不同，为了挽救自己和丈夫若阿基姆·缪拉的王位背叛了他。



17.拿破仑的幼弟热罗姆性格冲动，不经他同意便迎娶一位美籍女继承人。热罗姆被迫离婚，后来娶了符腾堡的卡塔琳娜公主（图中坐着的人）。他当了短短一阵威斯特伐利亚国王。



18.约瑟芬·德·博阿尔内。**1796**年**3**月，拿破仑和约瑟芬结婚，四十八小时后离开她去前线。虽然两人都有出轨，且最终离婚，他却始终认为她是自己的幸运星。婚礼上，他送给她一枚涂瓷釉金圆牌，上刻**“**致命运**”**。



19.约瑟芬之子欧仁·德·博阿尔内脾气和蔼，非常讨拿破仑喜欢。拿破仑让欧仁当意大利总督，还在多场战局中任命他为高级将领。



20.约瑟芬的盒子，中心饰品是拿破仑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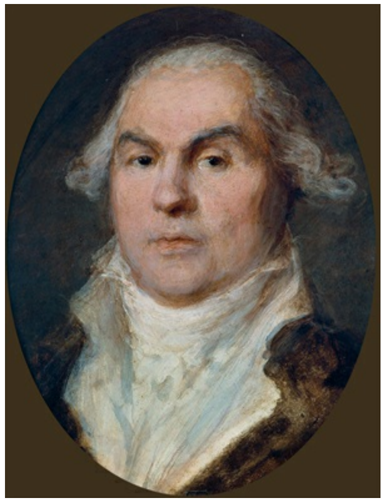
21.第一执政拿破仑，安托万-让·格罗作。图中，拿破仑指着**1801**年和**1802**年他签订的和约。奢华的红色天鹅绒短外套旨在鼓励里昂奢侈服装业。



22.宣传漫画，表现拿破仑在魔鬼面前保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1802**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签署《政教协定》，恢复了法国天主教，这一协定是其最受欢迎的改革措施之一。



23.法兰西学院制服。**1797**年，拿破仑当选学院院士，他经常穿此制服。他因自己既是军人又是学者而自豪。



24.拿破仑征战在外时，让**-**雅克·康巴塞雷斯成功地代他统治法国。康巴塞雷斯是大革命时代的律师、弑君者、政治家，他拟出了《拿破仑法典》中的很多内容。拿破仑不介意康巴塞雷斯的断袖之癖。

友人



25.1800年**6**月，在马伦戈，拿破仑最亲密的朋友路易·德塞将军前额中弹后身亡。假如德塞没死，他将会成为帝国元帅。



26.让·拉纳元帅属于少数能和拿破仑坦率交谈的人，但是**1809**年**5**月，他在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中丢了一条腿，几天后他痛苦地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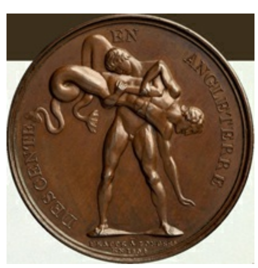
27.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元帅。**1813**年**5**月，贝西埃在侦察敌军阵地时胸口中了一发加农炮炮弹，就此身亡，生前他一直是拿破仑的心腹。



28.除了拿破仑的家人，只有宫廷司礼官热罗·迪罗克将军能用亲切的**“**你**”**称呼他。**1813**年**5**月，继贝西埃之后，迪罗克在赖兴巴赫之战中被加农炮炸得肠子外流。



29.法国漫画。图中，小威廉·皮特骑在乔治三世背上，并躲在小土丘后观察强大的法国侵略舰队。从**1803**年起，这支舰队就一直在威胁英国，直到**1805**年**10**月特拉法尔加海战爆发，此战中，霍雷肖·纳尔逊将其大部分船只击沉。



30.法国傲慢地设计了旨在庆祝**1804**年成功侵英的纪念章，章上题字为**“**伦敦制

造**”**（**Frappé à Londres**）。



31.1804年**7**月**14**日，拿破仑首次封授荣誉军团勋章。和旧王朝勋章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荣誉不同，它对法国社会所有阶层开放。



32.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将皇冠戴到自己头上。像之前安排的一样，庇护七世只是旁观。此乃这位白手起家之人的至上时刻。



33.1805年**12**月**2**日，在拿破仑的最大胜利奥斯特利茨会战中，让·拉普将军把缴获的军旗带到他面前。

元帅



33.一丝不苟的亚历山大·贝尔蒂埃，拿破仑所有战役（除了最后一场）的参谋长。贝尔蒂埃是拿破仑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



35.安德烈·马塞纳号称**“**胜利的宠儿**”**，直到他在里斯本城外被强大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所阻。半岛战争中，拿破仑一直没有充分支持马塞纳。**1808**年**9**月，拿破仑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击中马塞纳的眼睛。



36.“勇中之勇**”**米歇尔·奈伊。**1812**年，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俄国的法国人。三年后，奈伊对路易十八许诺道，他会用**“**铁笼子**”**把拿破仑押到巴黎。事实与之相反，滑铁卢会战中，奈伊成了战场指挥官。



37.半岛战争中，让**-**德**-**迪厄·苏尔特非常能干，但他比不上同在那儿的威灵顿公爵。滑铁卢战役中，事实证明他是个不合格的参谋长。



38.“铁元帅**”**路易**-**尼古拉·达武。他从未战败，于**1806**年在奥尔施泰特击败兵力三倍于己的敌人。达武是最擅长独立指挥的元帅，但他和拿破仑关系不佳。



39.酿酒商之子尼古拉·乌迪诺。他曾**34**次受伤，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时代高级指挥官无出其右。**1793**年**12**月，乌迪诺首次负伤。**1814**年，他在阿尔西最后一次负伤，当时，一发冲力已尽的子弹撞上他的荣誉军团勋章，于是变了方向。



40.皮埃尔·奥热罗身材高大，趾高气扬。他当过雇佣兵、钟表贩子、舞蹈教师，靠决斗杀死两人，还在斗殴中打死一名骑兵军官。埃劳的暴风雪中，奥热罗指挥了一次步兵进攻。



41.若阿基姆·缪拉，他是自己所属时代最伟大的骑兵军官。缪拉身着奇装异服，所以他在战场上夺人眼球。缪拉娶了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但他是第一个背叛拿破仑的元帅。

普鲁士人



42.1806年耶拿会战中，一支普军一败涂地。在此图最右端，法军在俯瞰耶拿镇的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上用加农炮轰击普军阵地。



43.“前进元帅**”**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他经常被拿破仑击败，但滑铁卢会战中，他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44.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拿破仑在蒂尔西特鄙视他，把他晾在一边，但他让自己的国家走上变革与新生的道路。



45.帝国雄风：身着加冕袍的拿破仑。雅克-路易·大卫作。



46.1807年**2**月，缪拉在埃劳的万人以上大型骑兵冲锋。这是拿破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骑兵冲锋。



47.1807年**6**月，弗里德兰会战。这是拿破仑最辉煌的胜利之一，它迫使俄国求和。



48.1807年**7**月，在蒂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中段，拿破仑迎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进入系于岸边的特制木筏上的帐篷，法俄与普鲁士的和谈就此开始。亚历山大的第一句话是：**“**我将是仅次于你的英国之敌。**”**



49.沙皇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交好，但是**1810**年年末，沙皇在那儿签署的条约就令他恼火了。没过多久，他开始谋划让拿破仑倒台。

恋人



50.德西蕾·克拉里是拿破仑的初恋，他向她求婚时遭拒。德西蕾后来嫁给贝纳多特元帅，并成为瑞典王后。



51.拿破仑发现约瑟芬与骠骑兵伊波利特·夏尔偷情后，他在开罗把**20**岁的骑兵中尉之妻波利娜·富雷斯收为情妇。



52.1800年，拿破仑和**27**岁的歌剧院歌手朱塞平娜·格拉西尼在米兰开始长期的风流关系。



53.1802年，**15**岁的玛格丽特·魏默尔成了拿破仑的情妇，当时她的艺名是**“**乔治小姐**”**。



54.1807年元旦，拿破仑遇见波兰伯爵夫人玛丽·措隆纳**-**瓦莱夫斯卡，当时她**20**岁，嫁给了**72**岁的波兰地主。拿破仑有**22**个情妇，瓦莱夫斯卡成了最得宠的一位。**1814**年和**1815**年，她分别来厄尔巴岛和枫丹白露宫探望他。



55.拿破仑的私生子亚历山大·瓦莱夫斯卡伯爵，他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期担任外交部长和立法院议长。



56.1806年，拿破仑把**17**岁的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收为情妇，她

是个**“**美人，瞳色黝黑，发色深棕**”**。拿破仑和埃莱奥诺尔生下私生子莱昂伯爵。莱昂长得特别像皇帝，以至于在其后来的人生中，街上的人们经常盯着他看。



57.女演员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艺名为**“**火星小姐**”**。**1815**年，她用紫罗兰向拿破仑致敬，象征春天时他返回巴黎。



58.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找的最后一个情妇阿尔比娜·德·蒙托隆。她把一个女儿取名为约瑟芬**-**拿破仑，这个孩子可能是他的。

帝国风格



59.塞夫勒制造厂生产的长瓷瓶，属于拿破仑的母亲。瓶上是大卫的名作，描绘的是**1800**年拿破仑跨越大圣伯纳德山口。

61.体现了君权的金制船形调味碟，它叫舟碟（**Nefs**）。亨利·奥古斯特



60.立法院的皇帝御座，**1805**年。



61.体现了君权的金制船形调味碟，它叫舟碟（**Nefs**）。亨利·奥古斯特

（**Henry Auguste**）为**1804**年的拿破仑加冕礼制作了这只舟碟，碟盖上印有他的个人徽记蜜蜂。舟碟上展示的其他象征物代表名望、正义与慎重，以及塞纳河、马恩河、埃及（棕榈树）、法国（小公鸡）、胜利（月桂树叶）、查理曼的王冠，以及巴黎的**12**个区。

帝国建筑



62.旺多姆柱。它建于**1803**～**1810**年，其柱顶立着拿破仑的雕像，其基座则称赞**“**拿破仑大帝**”**。**1870**年巴黎公社起义时，旺多姆柱被毁。



63.布龙尼亚公馆（**Palais Brongniart**）是拿破仑热衷于古典建筑的典型例子，巴黎证券交易所位于此地的时间将近两百年。



64. 1803～**1813**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担任拿破仑的忠实秘书。



65.阿加顿·费恩男爵接替了梅纳瓦尔，并且也像他一样崇拜自己的上司。梅纳瓦尔和费恩都提供了表现皇帝工作时的样子的私人肖像。



66.弗朗西斯科·戈雅描绘半岛战局的《战争之灾》的插图。在此战局中，人们发明了游击战，双方都实施骇人的暴行。



67.1809年**7**月，瓦格拉姆会战第一日与第二日之间的晚上，拿破仑在营地。贝尔蒂埃元帅在火堆后的桌边忙活，拿破仑的警卫马穆鲁克鲁斯塔姆则躺在此图前景处。

奥地利人



68.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左）、约翰·利希滕施泰因亲王（中）与拿破仑的会面。五年后，弗朗茨成了拿破仑的岳父。



69.奥地利驻法大使、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他最后成了首相。梅特涅是狡猾的外交官，完美地把握了奥地利最终倒向拿破仑敌对面的动机。



70.卡尔·冯·施瓦岑贝格亲王，他让兵力远超法军的军队实施谨慎机动，这是拿破仑在**1813**年战败的关键因素。



71.玛丽·路易丝皇后，弗朗索瓦·热拉尔作。创作此图的那一年，玛丽·路易丝成了拿破仑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她才**18**岁，而他已经**40**岁，但他们的婚姻起初非常成功。



72.拿破仑溺爱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儿子罗马王（未来的赖希施塔特公爵）。罗马王**21**岁时死于肺结核。



73.时髦的独眼奥军将领亚当·冯·奈佩格。**1813**年，拿破仑在战场上击败奈佩格，但次年皇帝第一次退位后，奈佩格成了玛丽·路易丝的情夫。



74.卡尔·韦尔内协助设计了法军的军旗，正如他绘制的此图一般，大军团常有华丽制服。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国时就穿着这类制服。



75.1812年**9**月，法军刚占领莫斯科，俄国人就在城中放火，超过三分之二的城市遭焚毁。



76.从莫斯科撤退途中，拿破仑（中间偏左）在取暖。**“**渡过涅曼河的雄壮大军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此图作者法布尔·迪福尔（**Faber du Faur**）如此写道。



77.1812年**11**月下旬，拿破仑的军队奇迹般逃生**——**在两座栈桥上穿过结冰的别列津纳河。

变节者



78.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四任法国外交部长。拿破仑封塔列朗为亲王，但是**1807**年，此人密谋反对他。两年后，皇帝叫塔列朗**“**丝袜裹着的一泡屎**”**。



79.约瑟夫·富歇，警务部长。从雅各宾派到波旁王朝，富歇侍奉了所有政权，成功地永远站在赢家一边。



80.夏尔**-**让·贝纳多特元帅，拿破仑允许他成为瑞典王储。**1812**年大军团遭受致命打击后，贝纳多特随即反对拿破仑。



81.奥古斯特·德·马尔蒙。他是拿破仑交情最久的朋友，被拿破仑封为元帅，**1814**年**3**月，马尔蒙把巴黎献给联军，背叛了拿破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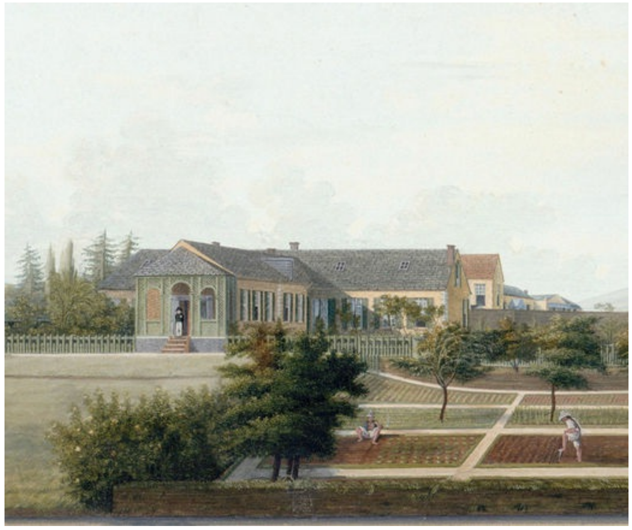


82.1814年**4**月，皇帝即将流放厄尔巴岛。临行前，他在枫丹白露宫告别老近卫军，这是拿破仑史诗中最动人的时刻之一。



83.1815年**6**月**18**日，如英国漫画家乔治·克鲁克香克所绘一般，拿破仑逃离滑铁卢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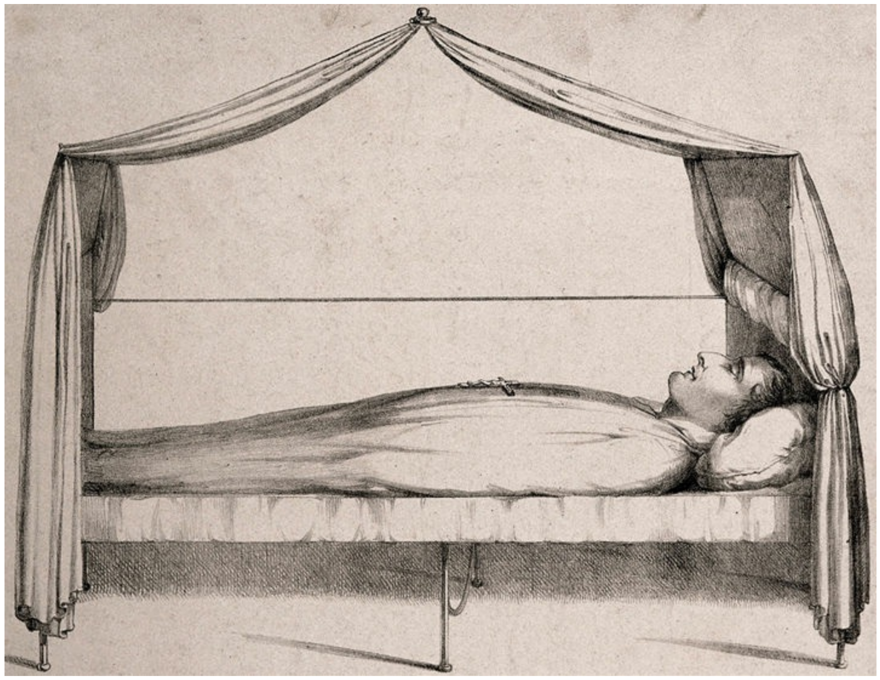
圣赫勒拿



84.圣赫勒拿岛上的长林，拿破仑（门口处）在此住了五年半。



85.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肥胖且秃顶。



86.在长林客厅，刚刚去世的拿破仑躺在其铁行军床上。草图作者是一名皇家海军指挥官。

- 插图说明
- 致谢
- 波拿巴家族家谱
- 引言
- 第一部 发奋为雄
    - 第一章 科西嘉
    - 第二章 大革命
    - 第三章 渴望
    - 第四章 意大利
    - 第五章 克敌制胜
    - 第六章 和平
    - 第七章 埃及
    - 第八章 阿克
    - 第九章 雾月
- 第二部 文治武功
    - 第十章 执政
    - 第十一章 马伦戈
    - 第十二章 正法直度
    - 第十三章 阴谋
    - 第十四章 亚眠
    - 第十五章 加冕
    - 第十六章 奥斯特利茨
    - 第十七章 耶拿
    - 第十八章 受阻
    - 第十九章 蒂尔西特
    - 第二十章 伊比利亚半岛
    - 第二十一章 瓦格拉姆
    - 第二十二章 登峰造极
- 第三部 尘埃落定
    - 第二十三章 俄国
    - 第二十四章 进退维谷
    - 第二十五章 大撤退
    - 第二十六章 重整旗鼓
    - 第二十七章 莱比锡
    - 第二十八章 困兽犹斗

    - 第二十九章 厄尔巴
    - 第三十章 滑铁卢
    - 第三十一章 圣赫勒拿
- 结语：拿破仑大帝
- 尾声
- 参考文献
- 索引
- 译后记

插图说明

衬页：路易·拉菲特，波拿巴将军像（局部）。Bibliothèque Thiers，Paris. Photograph © RMN-Grand Palais/Agence Bulloz

文中插图

页边码xxxiv-xxxv页：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像草图，1797年。Musee d’Art et d’Histoire，Palais Masséna，Nice.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页边码204页：多米尼克·维旺-德农男爵，《埃及记》封面，1809年。Photograph：akg-images/Pietro Baguzzi

页边码632～633页：夏尔-约瑟夫·米纳尔，解释1812～1813年俄国战局中法军连续损失的图表，1869年发布。Photograph：©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页边码804页：塞夫勒制造厂制作自安托万·德尼·肖代，皇帝拿破仑一世半身像，1806年。Bibliothèque Marmottan，Boulogne-Billancourt，Paris.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彩图页

1.大安德烈·阿皮亚尼，《拿破仑一世·波拿巴》，1796年。Pinacoteca Ambrosiana，Milan. Photograph：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Veneranda Biblioteca Ambrosiana-Milano/Bridgeman Images

2.莱昂纳尔-亚历克西斯·达利热，《阿雅克肖波拿巴宅》，1849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 Jean Schormans

3.保利和波拿巴的漫画，出自学生瓦古迪的地图册，约1785年。Photograph：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4.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洛迪之战》，约1804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Daniel Arnaudet/Gérard Blot

5.安托万-让·格罗男爵，《拿破仑在阿尔科莱桥》，1796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 Gérard Blot

6.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金字塔之战》，1806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 Gérard Blot

7.安托万-让·格罗男爵，《拿破仑在雅法探望伤员》（局部），1804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Thierry Le Mage

8.I.埃尔曼与J.迪普莱西-贝尔托描画自夏尔·莫内，《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1800年发布。Photograph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9.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法布尔，吕西安·波拿巴像。Photograph：The Art Archive/Napoleonic Museum Rome/Gianni Dagli Orti

10.让-巴蒂斯特·维卡尔，约瑟夫·波拿巴像，1808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Fontainebleau）/Gérard Blot

11.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玛丽亚-莱蒂齐娅·拉莫利诺像（局

部），1803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Daniel Arnaudet/Jean Schormans

12.萨洛蒙-纪尧姆·库尼，玛丽-安妮·埃莉萨·波拿巴像，1813年。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Gérard Blot

13.查尔斯·霍华德·霍奇斯，路易·波拿巴像（局部），1809年。Photograph：©Rijksmuseum，Amsterdam

14.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奥尔唐斯·德·博阿尔内像。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15.罗贝尔·勒菲弗，波利娜·波拿巴像，1806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16.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卡罗琳·缪拉像，1800年代。musée des Beaux-Arts，Palais Fesch，Ajaccio. Photograph ©RMN-Grand Palais/Gérard Blot

17.弗朗索瓦·金松，热罗姆·波拿巴与其妻符腾堡的卡塔琳娜的画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Franck Raux

18.安托万-让·格罗男爵，约瑟芬皇后像，约1809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Daniel Arnaudet/Gérard Blot

19.大安德烈·阿皮亚尼，欧仁·德·博阿尔内像，1810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Daniel Arnaudet/Jean Schormans

20.费利克斯·勒蒙制作，约瑟芬皇后的盒子（Nécessaire）。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Gérard Blot

21.安托万-让·格罗男爵，《第一执政拿破仑》。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Gérard Blot

22.法国画派，《〈政教协定〉讽喻》，1802年。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23.路易·卡龙描画自普瓦松，《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约1802～1810年。Private collection.Photograph：Archives Charmet/Bridgeman Images

24.让-巴蒂斯特·格勒兹，让-雅克·德·康巴塞雷斯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Agence Bulloz

25.大安德烈·阿皮亚尼，《路易-夏尔-安托万·德塞向两名埃及人宣读波拿巴将军的命令》。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Gérard Blot

26.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让·拉纳像。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27.亨利-弗朗索瓦·里瑟内（描画自他人）让-巴蒂斯特·贝西埃像，1805年。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image musée de l’Armée

28.阿内-路易·吉罗代·德·鲁西-特里奥松，热罗·克里斯托夫·米歇尔·迪罗克像。Musée Bonnat，Bayonne. Photograph ©aRMN-Grand Palais/René-Gabriel Ojéda

29.法国画派，小威廉·皮特和乔治三世观察法国海军分舰队的漫画，1803年。Musée de la Ville de Paris，Musée Carnavalet，Paris.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30.米迪，拿破仑计划的侵英行动的庆功勋章复制品，1804年。Photograph©Ashmolean Museum，University of Oxford

31.让-巴蒂斯特·德布雷，《1804年7月14日首次封授荣誉军团星章》，1812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32.雅克-路易·大卫，拿破仑自己加冕为皇的草图，约1804～1807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Thierry Le Mage

33.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1805年12月2日奥斯特利茨会战》，1808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de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34.皮埃尔-米歇尔·阿利克斯描画自安托万-让·格罗男爵，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元帅像，1798年。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 Pascal Segrette

35.弗拉维·雷诺描画自安托万-让·格罗男爵，安德烈·马塞纳元帅像，1834年。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image musée de l’Armée

36.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米歇尔·奈伊元帅像，约1805年。Photograph：©Christie’s Images

37.路易·亨利·吕德尔，让-德-迪厄·苏尔特元帅像（局部）。

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Franck Raux

38.蒂托·马尔佐基·贝卢基，路易-尼古拉·达武元帅像（局部），1852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39.雷蒙-坎萨克·蒙瓦森，1792年的尼古拉-夏尔·乌迪诺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Daniel Arnaudet/Jean Schormans

40.罗贝尔·勒菲弗，夏尔-皮埃尔-弗朗索瓦-奥热罗元帅像（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Droits réservés

41.安托万-让·格罗男爵，若阿基姆·缪拉像（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Jean-Gilles Berizzi

42.埃德姆·博维内描画自雅克-弗朗索瓦·斯韦巴克，《1806年10月14日耶拿会战》。Photograph：JoJan

43.乔治·道，陆军元帅、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亲王像，约1816年。The Wellington Museum，Apsley House，London.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44.W.赫尔比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像（局部）。The Wellington Museum，Apsley House，London.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45.雅克-路易·大卫，《身着御袍的拿破仑一世》，1805年。Palais des Beaux-Arts，Lille. 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 Philipp Bernard

46.雅克-安托万-西梅翁·福尔，《1807年2月8日埃劳会战》。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Droits réservés

47.托马·诺代，《弗里德兰会战，1807年》，约1807～1812年。Photograph：Anne S. 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Brown University Library，Providence，RI

48.阿道夫·勒恩，《1807年6月25日拿破仑一世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会面》。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Franck Raux

49.弗朗索瓦·热拉尔，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像，约1814年。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Lausanne. Photograph：akgimages/ André Held

50.弗朗索瓦·热拉尔，德西蕾·克拉里像。Photograph：Alexis Daflos. The Royal Court，Sweden

51.让-巴蒂斯特·伊萨贝，波利娜·富雷斯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Droits réservés

52.费迪南多·夸利亚，朱塞平娜·格拉西尼像。Photograph：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A. Dagli Orti/ Bridgeman Images

53.皮埃尔-奥古斯特·瓦夫拉尔，玛格丽特·魏默尔（乔治小姐）像，1805年。Photograph©Collections Comédie-Française/ P. Lorette

54.让-巴蒂斯特·伊萨贝，玛丽·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像。Photograph Fine Art Images/ Heritage Images/ Scala，Florence

55.马耶尔与皮尔逊，亚历山大·措隆纳-瓦莱夫斯卡的相片。Photograph：©Musée d’Orsay，Dist. RMN-Grand Palais/ Patrice Schmidt

56.皮埃尔-保罗·普吕东（据说），《据说名唤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的女士与其子的画像》，1814年。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Christie’s Images/Bridgeman Images

57.让-巴蒂斯特·伊萨贝，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火星小姐）像，1819年。Photograph：©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Trustees of the Wallace Collection，London.

58.阿尔比娜·德·蒙托隆。Photograph：Roger-Viollet/ Topfoto

59.塞夫勒制造厂，太后的纺锤形花瓶，上绘跨越阿尔卑斯山脉大圣伯纳德山口的拿破仑，1811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Droits réservés

60.弗朗索瓦-奥诺雷-乔治·雅克-德马尔特、贝尔纳·普瓦耶和阿古斯坦-弗朗索瓦-安德烈·皮科，立法院会议中拿破仑的御座，1805年。Photograph：©Les Arts Décoratifs，Paris/ Jean Tholance. Tous droits réservés

61.亨利·奥古斯特，皇帝的舟碟，1804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Fontainebleau）/Jean-Pierre Lagiewski

62.法国画派，《建造旺多姆柱》，约1803～1810年。Musée National du Château Malmaison，Rueil-Malmaison. Photograph：Giraudon/ Bridgeman Images

63.亨利·库瓦西耶-瓦赞，《证券交易所公馆》（*The Palais de la Bourse*），约1826年。Musée de la Ville de Paris，Musée Carnavalet，Paris. Photograph：Giraudon/Bridgeman Images

64.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Photograph：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Epic

65.勒梅西埃，阿加顿-让-弗朗索瓦·费恩像。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Photograph：Roger-Viollet/ Topfoto

66.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英雄业绩与死者！》，《战争之灾》插图，1863年出版。Photograph：Index/ Bridgeman Images

67.阿道夫·勒恩，《1809年7月5～6日夜，瓦格拉姆战场上拿破仑的营地》（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Gérard Blot

68.安托万-让·格罗男爵，《1805年12月4日拿破仑与弗朗茨二世于奥斯特利茨会战后会面》（局部）。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 Daniel Arnaudet

69.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克莱门斯·梅特涅亲王像（局部），1815年。Royal Collection Trust©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2014.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70.托马斯·劳伦斯爵士，施瓦岑贝格亲王卡尔·菲利普像，1819年。The Royal Collection©2014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II.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71.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玛丽·路易丝皇后像，1810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u Louvre）/ Hervé Lewandowski

72.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罗马王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Fontainebleau）/ Daniel Arnaudet/ Jean Schormans

73.大约瑟夫·兰泽代利，亚当·阿尔贝特·冯·奈佩格像（局部），约1810年。Photograph：©Stadtverwaltung，Schwaigern

74.安托万·夏尔·奥拉斯·韦尔内描画自艾蒂安·亚历山大·巴尔丹，《一名战列步兵和一名准旗手的制服》，巴尔丹规章的插图。Photograph：©Paris-Musée de l’Armée，Dist. RMN-Grand Palais/ Pascal Segrette

75.克里斯蒂安·约翰·奥尔登多普，《1812年9月莫斯科大火时所见克里姆林宫景象》。Photograph：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M. Seemuller/ Bridgeman Images

76.法布尔·迪福尔，《1812年11月8日离普涅瓦不远的路上》，《1812年战局中我的公文包里的作品》插图，约1830年代。Photograph：Anne S. K. Brown Military Collection，Brown University Library，Providence，RI

77.V.亚当（描画自他人），《渡过别列津纳河》。Brown University Library，Providence，RI. Photograph：Bridgeman Images

78.皮埃尔·保罗·普吕东，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像（局部），1817年。Purchase，Mrs Charles Wrightsman Gift，in memory of Jacqueline Bouvier Kennedy Onassis，1994. Accession Number：1994.190.©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

79.法国画派，约瑟夫·富歇像。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80.弗朗索瓦·热拉尔男爵画室，夏尔-让·贝纳多特元帅像，1811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81.让-巴蒂斯特·保兰·介朗，奥古斯特·德·马尔蒙元帅像，1834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Château Versailles）/Gérard Blot

82.佚名，《1814年4月20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城堡庭院告别他的军队》。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Photograph：Roger-Viollet/Topfoto

83.乔治·克鲁克香克，《拿破仑随向导逃离滑铁卢战场》，1816年。Private collection. Photograph：The Stapleton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

84.路易-约瑟夫-纳西斯·马尔尚伯爵，《长林景象》（局部），1820年。Photograph：©RMN-Grand Palais（musée des châteaux de Malmaison et de Bois-Préau）/Gérard Blot

85.佚名，圣赫勒拿岛上生命还剩最后几周的拿破仑像。©Bodleian Library，Oxford（Curzon Atlantic a1 folio 19）

86.查尔斯·约瑟夫·赫尔曼德尔描画自指挥官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平躺的拿破仑·波拿巴遗体》，1821年。Photograph：Wellcome Library，London

致谢

我进行研究与创作这本书的时间已超出拿破仑本人在圣赫勒拿岛和厄尔巴岛度过的岁月，现在我要感谢一大群人一贯的慷慨、善意、时间与帮助，他们的人数多得令我心下难安。这些人包括：尼古拉·萨科齐总统，感谢他针对今日法国人回忆拿破仑的现象提出的深刻见解；戴维·卡梅伦与罗德尼·梅尔维尔，感谢他们允许我查阅契克斯的拿破仑通信集；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法兰西学院院士格扎维埃·达尔科，感谢他在巴黎时替我做介绍；默文·金，感谢他对拿破仑战争中英法债务融资的看法；卡罗勒·奥普瓦，感谢他给我看了一只虱子，这种昆虫传播斑疹伤寒，摧毁了拿破仑在俄国的军队；已故的奥托·冯·哈布斯堡大公，感谢他对玛丽·路易丝"屈尊"嫁给拿破仑一事的观点；玛丽·贝里女士，感谢她给我看了维也纳会议时使用的椅子；杰恩·赖茨曼，感谢她给我看了她收藏的拿破仑时代书籍的装帧设计；罗伯特·皮里，感谢他鼓励了我；已故的亚历山德拉·戴克女士，感谢她的欧亨妮皇后回忆录；奥斯特利茨的杜尚·弗里博特，感谢他让我用他的拿破仑时代的滑膛枪射击；埃文·拉蒂默女士，感谢她给我看了据说是拿破仑的"肌腱"的东西；夏尔-亨利·特拉尼耶与让-帕斯卡尔·特拉尼耶；杰里·德尔·米西尔与简·德尔·米西尔，感谢他们在日内瓦湖畔盛情款待我；尼古拉斯·斯蒂德，感谢他对拿破仑的马耳他岛事迹所做的报告；卡那封伯爵夫妇，感谢他们给我看了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的座椅以及在杜伊勒里宫的书桌；罗宾·伯利，感谢他的极其慷慨之举；罗斯伯里伯爵夫人，感谢她给我看了皇帝的移动图书馆；亨利·基辛格博士，感谢他对维也纳会议的看法；查尔斯·埃斯代尔教授，感谢他在2007年邀请我去利物浦大学出席他的"巅峰时期的拿破仑"讨论会，这次会谈极其精彩；德博拉·埃德尔

曼；鲁里克·英格拉姆；我的表亲菲利普·恩格伦与桑德拉·恩格伦，感谢他们在我的圣赫勒拿岛之旅（我的旅程花了两周，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王家游轮上）经过开普敦时供我食宿；扎克·格特勒，感谢他在特拉维夫给我的招待和表现出的慷慨；卡罗琳·达尔梅尼，感谢她借给我一绺拿破仑的头发，它一直待在我的书桌里，激励着我；法国巴黎银行的博杜安·普罗，感谢他允许我参观拿破仑和约瑟芬结婚时的房间。我还要向热罗姆·特雷卡和枫丹白露宫员工致以深深歉意，因为我在陈列拿破仑御座的房间里至少三次弄响警报。

不考察战场的军事史学家好比懒得勘查犯罪现场的侦探。在为本书做研究的过程中，我去了拿破仑的60处战场中的53处，杰出的军事史学家约翰·李陪伴我造访了大部分战场遗址。创作本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和李一同走在蒙特诺特、蒙多维、洛迪、曼托瓦、阿尔科莱、卡斯蒂廖内、里沃利、罗韦雷托、代戈、马伦戈、乌尔姆、奥斯特利茨、耶拿、埃劳、弗里德兰、阿本斯贝格、兰茨胡特、埃克米尔、雷根斯堡、阿斯佩恩-埃斯灵、瓦格拉姆、小雅罗斯拉韦茨、吕岑、包岑、德累斯顿、莱比锡、赖兴巴赫、布列讷、拉罗蒂埃、尚波贝尔、蒙米拉伊、蒂耶里堡、沃尚、蒙特罗、克拉奥讷、拉昂、兰斯、奥布河畔阿尔西和圣迪济耶的土地上。我们之间通了海量的电子邮件，它们蕴藏着约翰无与伦比的建议与洞见。事实证明，他对拿破仑征途所做的战斗记录全都非常宝贵。他的友谊也令我快乐。约翰的妻子西莉亚容忍他如此频繁地陪我探访战场，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研究过程中，我在15个国家走访了69个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在那些地方，我遇上的全是帮助和友谊。我尤其想感谢以下人士：

法国：巴黎国家档案馆的萨沙·托帕洛维希和弗洛朗斯·塔尔诺；法国国家图书馆托尔比亚克馆的Y.邦拉塔和黎塞留馆的洛朗斯·勒布拉；

拉库尔讷沃外交档案中心的安妮·若尔容-利斯凯纳；万塞讷国防部历史司的克洛德·波努和蒂西奥·贝尔纳；梯也尔图书馆的西尔维·比耶和达妮埃勒·沙尔捷；卡纳瓦莱博物馆的热拉尔·莱里斯；英国驻巴黎大使彼得·韦斯特马科特爵士和他的管家本·纽威克，感谢他们带我参观了波利娜·博尔盖塞在巴黎的宅邸，如今它是英国大使馆；德国驻巴黎大使苏珊·瓦苏姆-雷内，感谢她给我看了自己的住所博阿尔内公馆，那是约瑟芬给其子欧仁的完美礼物；圣约瑟夫-德-卡姆教堂的莱奥诺尔·洛瑟朗；前圣克卢宫馆长达维德·德芒若；巴黎王家军校的奥萝尔·拉科斯特·德·拉瓦尔；美国驻巴黎大使馆首席秘书克里斯托弗·帕尔默和塔列朗公馆元帅中心的主任罗班·斯密特夫人；布列讷堡拿破仑博物馆的安格利克公爵；荣军院和陆军博物馆的范妮·朱布古；蒂埃里·伦茨和彼得·希克斯教授，感谢他们在杰出的拿破仑基金会如此热情地欢迎我；马尔迈松城堡的阿兰·普热图；王家宫殿（原保民院所在地）内的参政院的格扎维埃·卡永；拉纳元帅的迈松拉耶特城堡的玛丽安娜·朗贝尔；伯努瓦·德·阿邦维尔夫妇；汝拉省茹堡的康坦·艾莫尼耶；我的儿子亨利和女儿卡西娅，感谢他们陪我去了科西嘉岛；巴黎荣勋宫博物馆工作人员；巴黎警察局博物馆；圣但尼的荣誉军团学校；先贤祠；科西嘉阿雅克肖的费施博物馆、波拿巴宅国立博物馆。

俄罗斯：博罗季诺国立博物馆的亚历山大·苏哈诺夫和埃尔薇拉·丘拉诺娃，感谢他们带我参观博罗季诺战场遗址；三鲸旅游公司的奥列格·亚历山德罗夫，感谢他带我去了小雅罗斯拉韦茨战场遗址；城市事件公司的马切伊·莫拉夫斯基，感谢他带我去了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埃劳和弗里德兰战场遗址；小雅罗斯拉韦茨军事史博物馆的康斯坦丁·纳扎罗夫；埃劳战场遗址上的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历史博物馆的亚历山大·潘琴科；莫斯科的俄国国家军事史档案馆的瓦列里·沙巴诺夫和弗拉基米尔·乌基维奇·卡茨；莫斯科博罗季诺全景博物馆的玛丽娜·兹博耶夫斯卡娅。

白俄罗斯：伊戈尔·格鲁佐教授，感谢他带我看了别列津纳战场遗址；鲍里索夫联合博物馆的拉霍维奇·纳塔利娅·斯捷帕诺芙娜。

以色列：埃阿多·赫克特博士，感谢他带我看了卡孔、雅法和塔博尔山战场遗址；阿隆·克布兰诺夫博士，感谢他带我看了阿克围攻的遗迹；特拉维夫大学的阿扎尔·加特教授；泰勒多尔考古博物馆的利亚特·马尔戈利特。

圣赫勒拿岛：极其勤奋的法国名誉领事与长林管理员米歇尔·当夸纳·马蒂诺，感谢他让我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阿伦·莱格，感谢他带我参观了快乐山、黛安娜峰、普罗斯珀勒斯湾、荆园、沙湾与詹姆斯敦；安德鲁·韦尔斯，前圣赫勒拿布政司。

比利时：伊恩·弗莱彻和约翰·休斯·威尔逊上校，感谢他们带我观看了滑铁卢；利尼之战博物馆馆长伯努瓦·伊斯塔斯，感谢他带我参观了利尼战场故地；拉艾圣的主人弗朗索瓦伯爵和苏珊·科尔内·德尔丘斯伯爵夫人。

大不列颠：牛津大学罗德楼图书馆的露西·麦卡恩；牛津大学博得林图书馆特藏品阅览室的利·麦基尔南；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赫伯登钱币室的尼克·梅林教授；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馆的艾伦·帕克伍德；阿普斯利邸宅的约瑟芬·奥克斯利；大英博物馆的保罗·罗伯茨；国家陆军博物馆的凯蒂·卡纳勒和皮姆·多德；切尔西王家医院的希拉里·伯顿和约翰·罗切斯特；伦敦传媒学院的理查德·丹尼尔斯；英国军事史委员会的理查德·坦南特；朴次茅斯皇家海军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意大利：里沃利博物馆的拉里奥·泽尔比尼；我的女儿卡西娅，感谢她陪我去了厄尔巴岛；厄尔巴岛马尔恰纳山上马东纳圣殿的内洛·安塞尔米；米兰塞尔贝洛尼宫的塞尔贝洛尼基金会的伊丽莎白·拉拉塔；

曼托瓦总督府的里卡尔多·比安切利；罗马拿破仑博物馆、斯皮内塔马伦戈的马伦戈博物馆、蒙扎的雷阿莱别墅、厄尔巴圣马蒂诺别墅的工作人员。

捷克：和平纪念博物馆石标处的西莫纳·利波夫斯卡；奥斯特利茨斯拉夫科夫城堡的亚娜·斯卢科娃。

奥地利：阿斯佩恩与埃斯灵博物馆的赫尔穆特·蒂勒；瓦格拉姆博物馆的鲁珀特·德比克；维也纳的美泉宫与军事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葡萄牙：马克·克拉索恩和路易斯·萨尔达尼亚·洛佩斯，感谢他们带我看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的40、41、42、95号要塞；里斯本军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德国：英戈尔施塔特的拜恩陆军博物馆、耶拿科斯佩达的1806博物馆、莱比锡战场遗址上的马克-克莱贝格门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艾伦室的杰伊·巴克斯代尔和福兹海默室的伊丽莎白·登林格；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的德克兰·凯利；耶鲁大学的拜内克图书馆的凯瑟琳·詹姆斯和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史蒂夫·罗斯；康奈尔大学卡尔·A.克罗克图书馆手稿藏品室的伊莱恩·恩斯特和劳伦特·费里；梅里尔一家，我在康奈尔大学做访问教授时，他们给予我慷慨赞助；康奈尔大学的巴里教授和马西娅·斯特劳斯博士，感谢他们的周到招待；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就拿破仑为何侵略俄国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所长雷夫·布劳法布教授，感谢他让我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之行如此愉悦；纽约历史社会图书馆的埃里克·鲁宾逊；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罗伯特·曼宁·斯特罗齐尔图书馆特藏品室的凯蒂·麦考密克；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的伊丽莎白·费尔曼；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吉尔克里斯博物馆馆长罗伯特·皮克灵博士；海军战争实验室战争推演部部长威廉·J.拉德曼博士。

瑞典：阿维瓦·科恩-西尔伯，感谢他带我看了斯德哥尔摩王宫的贝纳多特室。

瑞士：日内瓦湖畔勒科佩城堡的保拉·贾诺利·图埃纳。

加拿大：布鲁斯·麦克尼文，感谢他带我参观了蒙特利尔艺术博物馆的拿破仑画廊。

我还要感谢乔希·萨顿、查利·米切尔、凯蒂·罗素，特别是不知疲倦的吉勒·沃克莱尔所做的历史研究，以及朱莉·迪·菲利波的德语翻译，贝娅塔·维杜林斯卡的波兰语翻译，蒂莫西·查普曼的西班牙语翻译，埃阿多·赫克特的希伯来语翻译，加林娜·巴布科娃博士的俄语翻译和安娜莉丝·埃里奇-韦弗、海伦娜·福什、玛克辛·哈菲尔德-奈朗、吉勒·沃克莱尔、卡罗勒·奥普瓦的法语翻译。巴黎那五个研究所的街道有时让人感觉神神秘秘，穿越它们时，玛克辛给我的鼓励与帮助格外大。

写作本书时，我正在为BBC拍摄关于拿破仑的系列纪录片。我要感谢戴维·诺特曼-瓦特、西蒙·沙普斯、戴维·巴里、戴维·丹吉尔、帕特里克·杜瓦尔和托尼·伯克，感谢他们让整个拍摄过程如此快乐又如此发人深省。

因为拿破仑之死变得富有争议（在我看来这不必要），我听取了蒂姆·巴里医生、康奈尔大学教授艾拉·雅各布森、艾伯特·纳普医生、罗伯特·克拉斯纳医生、阿沙纳·瓦茨医生、詹姆斯·勒法努医生、帕梅拉·亚布隆医生、盖伊·奥基夫医生、迈克尔·克伦普林医生对皇帝之死的专家级医学意见，我要感谢他们。我还要感谢弗兰克·雷兹内克医生对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所患牙病的诊断。

我要感谢海伦娜·福什、苏迪尔·哈扎雷辛、约翰·李、斯蒂芬·帕克、于尔根·萨赫特阅读我的手稿，并提出宝贵的改进建议。

我的代理人卡佩尔与兰德公司的乔治娜·卡佩尔，以及我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和乔伊·德·梅尼尔，像往常一样处于完美的高效、专业与迷人状态；我的文字编辑，充满灵感的彼得·詹姆斯和夏洛特·赖斯丁亦然。斯图尔特和乔伊为这本书耗费了大量心血，大大地完善了它，我对他们着实感激不尽。我也非常感激企鹅出版社的理查德·杜吉德、伊莫金·斯科特和莉萨·西蒙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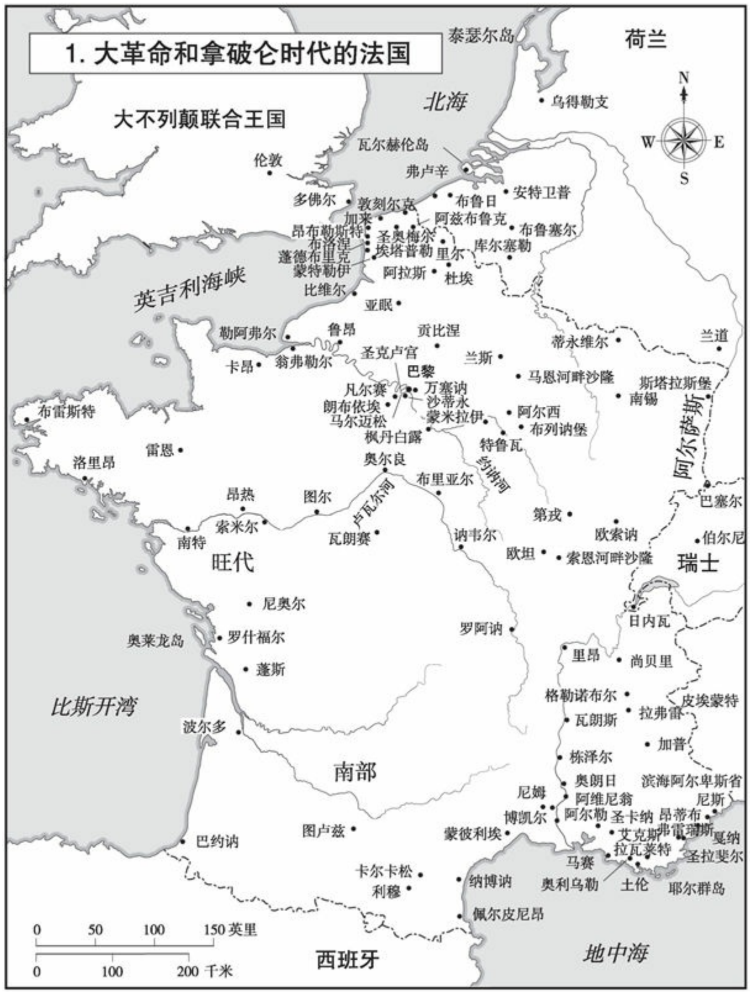
我那极好的贤妻苏珊·吉尔克里斯特陪我一同查看断头台的斩刀、在关押约瑟芬的教堂地窖里数被屠杀的教士的头骨、和我一起驾车驰过拿破仑之路、随我前往开罗爱资哈尔大清真寺，我们去那儿不仅仅是因为它内含的考古与文化趣味，还因为它是1798年起义开始与结束的地方。没有她的持久爱意与支持，我不可能写出本书。对我来说，她是融为一体的约瑟芬、玛丽·路易丝与玛丽·瓦莱夫斯卡。

本书献给我的弟弟妹妹们——阿什莉·格登·罗伯茨、马修·罗伯茨、埃利奥特·罗伯茨。因为他们在那么长时间内非常友善地容忍了自己的万事通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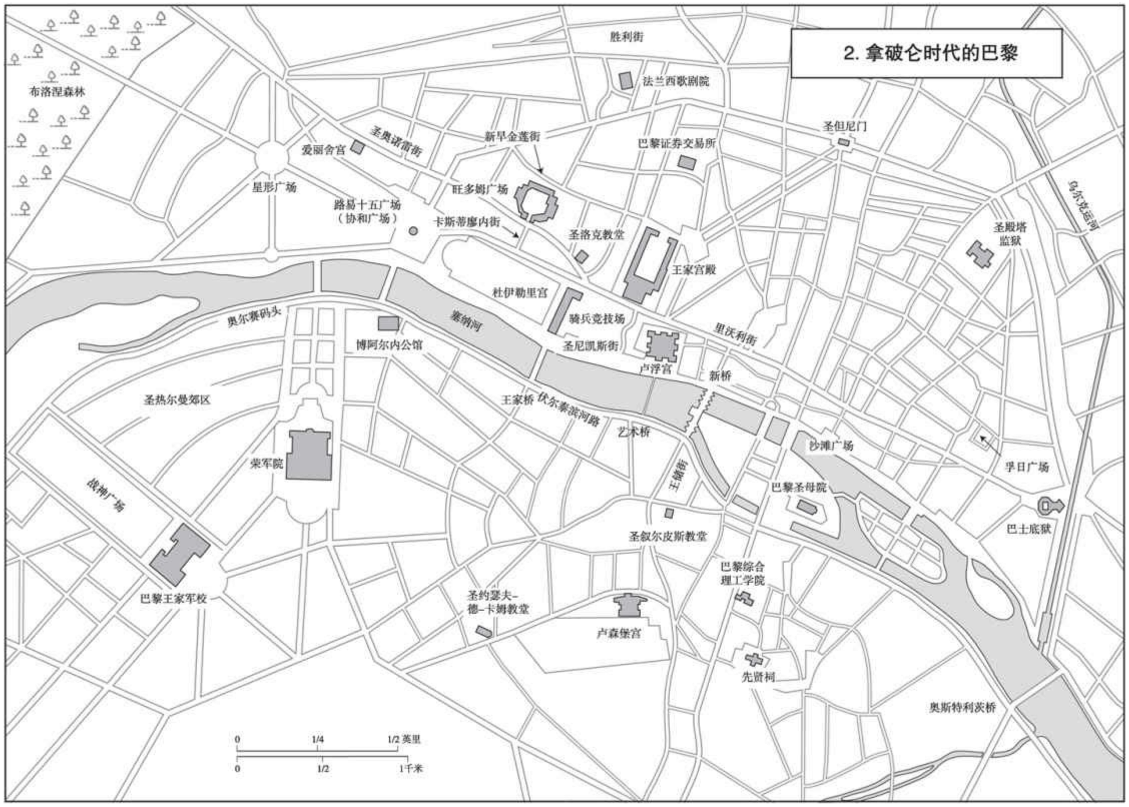
安德鲁·罗伯茨

巴黎，奥热罗街2号

www.andrew-roberts.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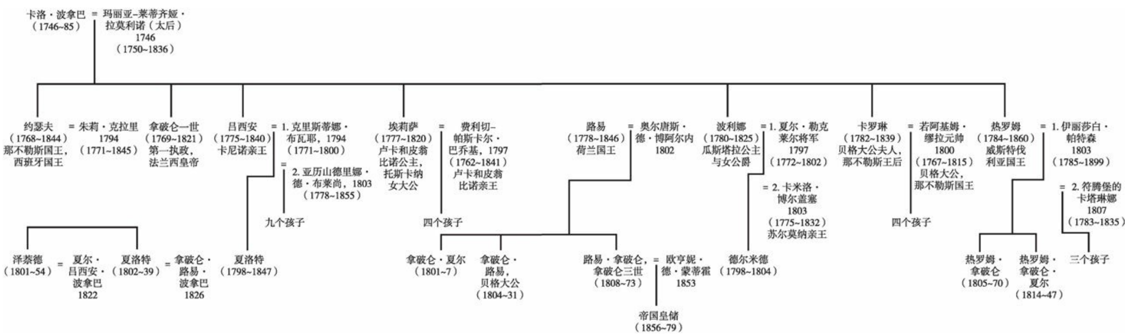


1. 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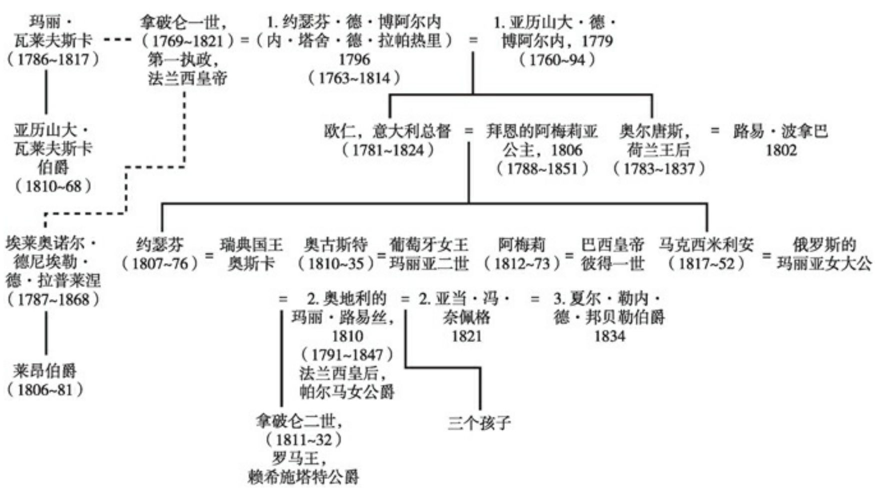

2. 拿破仑时代的巴黎
胜利街
法兰西歌剧院
圣但尼门
布洛涅森林
圣奥诺雷街
新早金莲街
巴黎证券交易所
爱丽舍宫
旺多姆广场
星形广场
路易十五广场
（协和广场）
卡斯蒂廖内街
圣洛克教堂
乌尔克运河
圣殿塔
监狱
王家宫殿
杜伊勒里宫
骑兵竞技场
奥尔赛码头
塞纳河
博阿尔内公馆
圣尼凯斯街
里沃利街
卢浮宫
新桥
圣热尔曼郊区
王家桥
伏尔泰滨河路
艺术桥
沙滩广场
孚日广场
荣军院
王储街
巴黎圣母院
战神广场
巴士底狱
圣叙尔皮斯教堂
巴黎综合
理工学院
巴黎王家军校
圣约瑟夫-
德-卡姆教堂
卢森堡宫
先贤祠
奥斯特利茨桥
0
1/4
1/2 英里
0
1/2
1千米

波拿巴家族家谱

波拿巴家族



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近亲





引言

1944年10月，正当荷兰从纳粹手中获得解放之际，伟大的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Pieter Geyl）写完了他的拿破仑相关作品[1]。此前215年间有数万本关于拿破仑的书出版，海尔的这本是其中最富有创意的之一。此书的独创性不在于海尔自己对拿破仑的看法（尽管他肯定在书中明确阐述了对拿破仑的见解），而在于它复述了其他人的观点，并追溯了在1815年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拿破仑名声的不同变化阶段。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拿破仑既是历史风云人物，又是如此重要的政治巨人，他的这两个身份都经历了很多浪漫化或诽谤，所以海尔摘录的观点（不出意外地）经常激烈对立，它们一般都反映了作者自身的政治立场。海尔写完这本书后，二战期间的欧洲历史影响了人们对拿破仑时代欧洲大陆上的事件的观点，而且有时仍让它们黯然失色。这一点也不出意外，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写作本书时，我努力不让自己被之前的阐释过度影响，而是尽量回溯到拿破仑本人和私下认识他的人的言论。当然，对他的本能分歧也延伸到了这里，几乎所有同时代人的叙述都立足于拿破仑生前或死后作者所处情境，具有严重的倾向性。数十个例子表明，在那些他逊位后不久写出来的文字中，工作的诱惑、津贴的诱惑，抑或仅仅是在波旁王朝治下出版的权利都损害了其内容的客观性。举个例子，1803～1814年，拿破仑的廷臣之妻克莱尔·德·雷米萨（Claire de Rémusat）在写给丈夫的信中对皇帝满怀情意，但1818年时，她在回忆录中说他是“不懂慷慨”的怪物，此外他挂着“撒旦般的”笑容。这两个时期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其夫想在波旁王朝谋得省长的差事。1815年，克莱尔烧掉了她的实时文

字，设法恢复夏多布里昂所谓的“回忆中的回忆”（memories of memories）。

或者再看这个例子。我们接受的对拿破仑的很多理解其实受其同学路易-安托万·布列纳的回忆录的影响，但那本书相当可疑。1797年拿破仑在莱奥本与奥地利议和时，布列纳任其私人秘书。布列纳已经不能亲昵地称拿破仑为“你”，他说比起荣升拿破仑的私人办公室之首，这不过是个“小损失”，但因为他贪污，拿破仑只好两度将他解职，他们最终不欢而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布列纳的回忆录比较客观，哪怕它其实只是包括幻想家夏尔·马克西姆·德·维尔马雷（Charles Maxime de Villemarest）在内的很多人写的。1830年，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等熟识拿破仑的人出版了共有800页的两卷本著作，用论辩语句粉碎了布列纳的很多说法。因此，我在引用布列纳的文字时存疑，只有他本人据信在场时，我才用他的文字来例证我的叙述。

拿破仑时代的经典著作中，到处是这类需要谨慎对待的“同时代”材料。蒙托隆伯爵曾在圣赫勒拿岛陪伴拿破仑，离岛二十年后，此人写下了他所谓的关于岛上生活的“自述”，但他甚至都没有那个时期的笔记。蒙托隆的回忆录其实是小说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代笔的，拿破仑最喜欢的演员塔尔马的回忆录也是他代写的。1813年，拿破仑禁止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进入巴黎。19世纪30年代，她的回忆录问世，彼时她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可她仍声称自己记得与皇帝的私下长谈。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18卷本回忆录有不少是巴尔扎克（Balzac）代笔的，其写作目的是摆脱债主纠缠。拿破仑的警务部长富歇的回忆录其实是受人雇佣的穷酸文人阿方斯·德·博尚（Alphonse de Beauchamp）写的。拿破仑宠爱的情妇乔治小姐的回忆录也是代笔的，但她觉得内容太无聊了，于是在书里添油加醋，写了拿破仑把一卷钞票塞进她的胸衣的故事。

在著作权法出现之前的年代，人们甚至可以出版约瑟夫·波拿巴、马尔蒙元帅、拿破仑的外交部长阿尔芒·德·科兰古等尚在人世的有关人员的回忆录，而后者没有任何诉诸法律的权利。1837年，有个叫夏洛特·德·索尔（Charlotte de Sor）的骗子出版了她所谓的科兰古回忆录，创作此书的基础是1826年他俩的一次简单会面（直到1934年，真正的科兰古回忆录才出版。）19世纪20年代，塔列朗写了回忆录中关于拿破仑的部分，但是19世纪60年代，激烈的反拿破仑主义者阿道夫·德·巴古（Adolphe de Bacourt）全面重写了塔列朗回忆录。梅特涅亲王的回忆录亦是代笔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私的。约瑟芬曾经的爱人保罗·巴拉斯的回忆录则是恶意与自怜的典范，旨在报复拿破仑。拿破仑在雾月政变中推翻了路易·戈耶，此人在回忆录序言中承诺道，他将是“公正的作者”，给予拿破仑“完全的公道”。可事实上，戈耶的两卷本回忆录几乎都是愤愤不平的咆哮。大臣拉扎尔·卡诺与格鲁希元帅都没写回忆录，但是他们根据自己留下的文件拟出了稿子，其中有的是实时的，有的则不然。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米奥·德·梅利托的所谓回忆录其实是其女婿写的。在梅利托的女婿动笔时，书中描述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无论如何，因为有那么多人想要记下自己对这位非凡人物的印象，也有些亲近拿破仑的人做了实时记录，他们既没有靠诋毁他在即将建立的政权下谋职，也不曾靠夸大自己与他的亲密关系谋财。举个例子，科兰古侯爵描写的1812～1814年、亨利·贝特朗写的关于圣赫勒拿岛上事件的日记，以及康巴塞雷斯的回忆录，直到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才分别问世，不是为了马上出版而写这一点就大大增强了它们的可信度。身为拿破仑的宫廷总管，不太知名的路易·德·博塞-罗克福比布列纳更亲近他。波旁王朝统治时期，博塞勇敢地出版了回忆录。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和阿加顿·费恩担任过拿破仑的秘书，他俩刻画的拿破仑形象与博塞描写的达成相称与均衡。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三本书和所知的其他资料核对，此外它们也要经历互相核对。然而，核对工作

完成后，比起皇帝的敌人与其代笔者在他死后描绘的“黑色传奇”，这三本书描述的他往往更具一致性与可信度。

循着引线走出这座迷宫时，2014年拿破仑传的作者有个胜过所有前辈的巨大优势：从2004年开始，巴黎拿破仑基金会开始对拿破仑现存的33000封信件进行卓越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其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信要么没出版过，要么经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删减后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通信集旧版中露面。这一内容浩大的新版本使人们可以重新评价拿破仑，它也是本书的基石。

自从200年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其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被记录、研究、挑拣过，这些工作细致到了最惊人的程度。比如说，1804年7月19日，他在皮卡第（Picardie）比尼圣马克卢（Buigny-St-Maclou）附近的铁匠家停下，喝了杯加牛奶的咖啡，然后他分了些金币给惊讶喜悦的住户。为了这区区一件事，就有人写了一篇15页的论文。关于他的事实内容上极其精细，数量上多如牛毛，但它们并未导出对其人格、政策、动机乃至成就的一致结论。正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拿破仑未满30岁时，他的第一本传记就出版了。从那以后，关于他的争论成了长期传统，本书显然也是其组成部分。1817年，瑞士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吕兰·德·沙托维厄（Frédéric Lullin de Chateauvieux）写道：“像强烈的飓风一般，他扫清前进路上的僵化障碍，为民族铸就业绩——它们盖过统治了800年的哈布斯堡和统治了600年的波旁。”1818年，斯塔埃尔夫人死后出版的作品管拿破仑叫“没有礼貌、没有祖国、没有道德的雇佣兵，他是东方暴君、新阿提拉，只知道如何破坏与毁灭的士兵”。1808年，德意志最伟大的文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与拿破仑会面，他说对方“永远处于开明状态”。拿破仑是摧毁者还是建设者？是解放者还是专制者？是政治家还是冒险家？“争论继续进行。”海尔之书的最后一句话如是说。在本书结尾，我希望读者能完全明白为何我用的标题是“拿破仑大帝”。

[1] 这是指海尔的*Napoleon*：*For and Against* 。——译者注

第一部 发奋为雄

第一章 科西嘉

为了让我们感兴趣，悲剧英雄既不可十恶不赦也不可清白无瑕……所有软弱和矛盾都令人心生不快，并呈现格外悲哀的色彩。

——拿破仑论弗朗索瓦-朱斯特-马里·雷努阿尔的戏剧《圣殿骑士》

读史立刻让我觉得，我能如我们的史书中最伟大之人一般成就业绩。

——拿破仑致科兰古侯爵

1769年8月15日（周二）正午将临时，在地中海岛屿科西嘉岛（Corsica Island）上的一座较大城镇阿雅克肖（Ajaccio），拿破莱奥内·迪·波拿巴（Napoleone di Buonaparte）出生，成年之前，他签名时都用这种拼写。“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她感到分娩阵痛，”他说自己的母亲莱蒂齐娅，“她一到家我就出生了，我没有生在床上，而是生在一堆壁毯上。”[1] 父母给他选择的名字不同寻常，但并非不为人知，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就有这个名字，所属时代离他更近的一位叔祖父也叫此名。

波拿巴家族先祖原是佛罗伦萨（Firenze）和里窝那（Livorno）之间的领主，1261年，一个佛罗伦萨人首先采用姓氏波拿巴。家族长子一脉留在意大利，而1529年，弗朗切斯科·波拿巴（Francesco Buonaparte）移民科西嘉，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其后代大都在法律界、学术界和教会谋求体面职业。[2] 拿破仑出生时，波拿巴家族处于包

含中产阶级上层（haute bourgeoisie）和极弱小贵族的社会圈子外围。

拿破仑统治法国后，人们试图证明波拿巴家族后人源自13世纪的特拉布宗（Trebizond）皇帝，他便告诉他们，他发动军事政变后，波拿巴王朝才开始。“有的系谱学者能把我家的历史上溯到大洪水时期，”拿破仑告诉奥地利外交官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亲王，“也有人假称我出身庶民。真相介于二者之间。波拿巴一族是个不错的科西嘉家族，我们很少离岛，所以不太出名，但要大大胜过那些开始诽谤我们的纨绔子弟。”[3] 拿破仑偶尔会谈起自己的意大利血统，并自称古罗马人的后代。“我属于创立帝国的种族。”有一次他如此自夸道。[4]

虽然波拿巴家族远远算不上富裕人家，但他们有足够的土地，以至于阿雅克肖领班神父、拿破仑的叔祖父卢恰诺（Luciano）说波拿巴家的葡萄酒、面包或橄榄油从不用买。自从1682年起，波拿巴家族就住在波拿巴宅（Casa Bonaparte），这栋三层大屋位于今阿雅克肖圣夏尔街（rue Saint-Charles），今人仍可在屋内地下室看到用于磨面粉的磨石。拿破仑的父母另有一幢乡间住宅。除了阿雅克肖，至少三个城镇有他们的财产。此外，他们有一群绵羊、一座葡萄园，还雇了一个保姆、一位女仆和一名厨师。“科西嘉没有财富，”多年后，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Joseph）写道，“有钱人的积蓄也很少超过20000里弗赫（Livre），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我们家算得上科西嘉最有钱的人家之一。”青年拿破仑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道：“在科西嘉，奢侈是件坏事。”[5]

拿破仑出生之前四年，即1765年，苏格兰律师兼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游览了科西嘉岛，他沉醉于眼前的景象。“阿雅克肖是科西嘉最美的城镇，”他后来写道，“这里有很多非常优美的街道，还有漂亮的花园和热那亚总督府。小镇居民是岛上最文雅的人，同法国人有不少往来。”当时科西嘉岛大概有14万人，大多从事农业，三

年后，岛上居民和约2800万法国人口产生的交集将显著超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所愿或所求。

意大利城邦热那亚（Genoa）名义上统治了科西嘉两个多世纪，但其支配权仅限于沿海城镇，它很少设法将权力延伸至内陆山区，而科西嘉人在那儿非常独立。1755年，科西嘉颇具魅力的民族主义领袖帕斯夸莱·保利（Pasquale Paoli）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1763年，他赢得佩迪科斯特（Pedicoste）之战，共和国的概念于是变成现实。科西嘉人亲切地称保利为“爸爸”（Il Babbù），很快，他开始改革小岛的财政、法律和教育体系，并修建若干道路，开办一家印刷厂，还让强大家族组成的岛上竞争派系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和睦相处。少年拿破仑认为保利是立法者、改革者与真诚友善的独裁者，他怀着这一腔敬意长大。

热那亚明白，想在科西嘉重建统治就得开战，但它对此并无兴趣。1768年1月，热那亚不情愿地把科西嘉卖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Louis XV），换得4000万法郎。法国外交大臣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任命科西嘉人马泰奥·布塔福科（Matteo Buttafuoco）统治该岛，保利自然反对，于是法国派冷酷无情的沃（Vaux）伯爵率3万名法军士兵镇压起义，并且马上让法国人马尔伯夫（Marbeuf）伯爵接替布塔福科。

拿破仑之父卡洛·波拿巴（Carlo Bonaparte）与其年轻漂亮的妻子莱蒂齐娅支持保利，他们在山区作战时，她怀上了拿破仑。卡洛担任保利的私人秘书兼副官，然而，1769年5月8日，沃伯爵在蓬泰诺沃（Ponte Nuovo）之战中消灭了科西嘉军队，此后卡洛与怀孕已久的莱蒂齐娅拒绝随保利和另外340名抵抗者去流放。[6] 马尔伯夫与科西嘉乡绅会面时，卡洛反倒宣誓效忠路易十五，因此他保住了自己在岛上的职务——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和科西嘉岛林业学校校长。蓬泰诺沃会战后不到两个月，卡洛和马尔伯夫一起进餐，坚持抗法的昔日战友们抗议他的行径。18世纪70年代中期后，大规模反抗很少见了，但在接下来二十年

间，数百人死于零星的反法游击斗争。[7]“他发现并入法国会给祖国带来巨大利益，”约瑟夫·波拿巴描写自己的父亲道，“于是他就成了优秀的法国人。”[8]1777年，卡洛就任科西嘉贵族代表，因为这一职位，他两度在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觐见路易十六。

青少年时期，拿破仑一直宣扬激进的科西嘉民族主义，人们常说他鄙视父亲的通敌行为，但此说的证据只有路易·安托万·德·布列纳（Louis Antoine de Bourrienne）倾泻在他身上的恶评。布列纳是拿破仑的同学，也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但此人贪污行径严重，为此他不得不两度将其解职。1789年拿破仑确曾致信保利，谴责投靠敌营的科西嘉人，但他并未提及已经过世的父亲。拿破仑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夏尔（Charles）[9]，若他认为父亲是卖国贼，他很可能不会这么做。在日后拿破仑所谓的小贵族（petits gentilshommes）阶层中，波拿巴家族是一个顽强拼搏、奋发向上、关系密切的宗族，他们明白跟历史逆流牵扯将得不到任何好处。

事实证明，法国尽可能灵活地治理科西嘉。马尔伯夫试图让岛民中的上层阶级相信接受法国的统治将有益处，而卡洛将是主要受益人之一。如果说保利是拿破仑早年的政治偶像，卡洛就正好代表愿同法国合作的外国人，这种合作对未来拿破仑帝国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卡洛身材高大，相貌俊朗，广结人缘，擅长马术。他能讲流利的法语，熟知洛克、孟德斯鸠、休谟、卢梭和霍布斯的启蒙思想，并撰写质疑组织化宗教的伏尔泰式随笔，供人私下传阅。[10]拿破仑后来说，父亲是个“败家子”。卡洛的花销肯定超过他那微薄收入，这导致波拿巴家族逐渐背上债务。[11]卡洛是个慈父，但他身体虚弱，经常囊中羞涩，为人甚至有些轻浮。除了债务、蓝灰色眼睛以及导致他们双双早死的疾病，拿破仑没从父亲那儿继承多少东西。“我的好运和我的一切有意义之举都归功于母亲。”他日后会这么说。[12]

名唤玛丽亚-莱蒂齐娅·拉莫利诺（Maria-Letizia Ramolino）的女人模样迷人，意志坚定，她出身良好，但从未受过教育。莱蒂齐娅的父亲曾是阿雅克肖的代理行政官，后来又担任科西嘉路桥巡检。1764年6月2日，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莱蒂齐娅嫁给18岁的卡洛·波拿巴（法国大革命时期，阿雅克肖档案馆遭焚毁，所以当时莱蒂齐娅的确切年龄不明）。卡洛自诩是个世俗化的启蒙人士，因此两人没在天主教堂结婚，但是领班神父卢恰诺后来篡改教堂记录，声称他们在此举行了婚礼弥撒，这是波拿巴家族不重视官方文档真实性的早期迹象之一。[13] 莱蒂齐娅的嫁妆包括“一间窑炉及其附近的一座房子”、一套寓所、一片葡萄园和8英亩土地，价值总计175000法郎，颇为可观。花花公子卡洛据信结婚时爱着另一个女人，不过这笔嫁妆胜过了他的爱。[14]

1765～1786年，莱蒂齐娅一共生了13个孩子，其中8个没有在婴儿期夭折，当时，这一存活比例并不罕见。最终，这些孩子里出了1个皇帝、3个国王、1个王后、2个藩属公主。拿破仑淘气时莱蒂齐娅会揍他，有一次他因为模仿奶奶而挨揍。虽说他不太喜欢挨打，但那个年代体罚是正常现象，他提到母亲时也只流露了真诚的爱意与尊敬。“我的母亲是个出色的女人，既能干又勇敢。”暮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她柔中带刚，女人的身体上长了男人的头脑。”此言出自他口中便是盛赞。“她是强势的女家长，”他补充道，“她头脑发达！”[15] 拿破仑一掌权就优待母亲，他为她买下塞纳河（the Seine）畔的蓬城堡（Château de Pont），让她每年可享100万法郎。莱蒂齐娅把大部分拨款存起来，她吝啬得出了名，当有人为此嘲笑她时，她回答：“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得给所有这些我生下来的国王孩子找面包吃。”[16]

在拿破仑出生之前，莱蒂齐娅的两个婴儿夭折了。紧接着拿破仑之后出生的女孩玛丽亚-安娜（Maria-Anna）只活到了5岁。1768年1月，拿破仑的哥哥朱塞佩（Giuseppe，他后来改用法语化名字约瑟夫）出生。拿破仑出生后，1775年3月，卢恰诺/吕西安（Lucien）出生；1777

年1月，妹妹玛丽亚-安娜/埃莉萨（Elisa）出生；1778年9月，路易（Louis）出生（他显然取了法国国王的名字）；1780年10月，玛丽亚-保拉（Maria-Paola）/波利娜（Pauline）出生；1782年3月，玛丽亚-安农齐亚塔（Maria-Annunziata）/卡罗琳（Caroline）出生；1784年11月，吉罗拉莫（Girolamo）/热罗姆（Jérôme）出生。卡洛于38岁时去世，那时莱蒂齐娅才33岁，此后她再没生过孩子，但拿破仑认为，如果父亲活得长一些，母亲能生育20个子女。[17]

对家人深切长久的挂念是拿破仑书信的显著特点之一。不论是涉及母亲在科西嘉的财产、弟弟的教育，还是妹妹的婚姻前景，拿破仑都不懈地设法保护并振兴波拿巴家族。“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永久真爱。”他致信哥哥约瑟夫称。[18] 拿破仑坚持促进家族繁荣，这一倾向后来严重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

身为意大利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出身招来诋毁者无尽的谩骂。威廉·伯登（William Burdon）属于最早的一批英文拿破仑传作者，此人提到传主的意大利血统时说：“比起法国人的坦率与活跃，他性格里的残暴阴暗面更接近意大利人的背信弃义，这或可归因于此。”[19] 类似地，1800年11月，英国记者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说，拿破仑是个“来自卑劣小岛科西嘉的粗鄙暴发户！”1804年，法国元老院提议拿破仑加冕，让-德尼·郎瑞奈（Jean-Denis Lanjuinais）伯爵出声反驳：“什么！他所属种族的渊源可是丢尽了脸，罗马人都不屑于雇他们当奴隶！让这种人统治祖国，难道你们能忍吗！”[20] 因为拿破仑是科西嘉人，人们认为他会热衷于世仇争斗，然而并没有记录表明波拿巴家族投身宗族复仇，而且拿破仑也相当宽容地对待好几个背叛他的人，如外交部长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警务部长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

拿破仑小时候患过干咳，这可能是未经确诊的轻度肺结核症状。验

尸报告证明，他的左肺叶有患过肺结核的迹象，不过此病早已痊愈。[21] 然而，广为人知的孱弱内向者形象很不符合家人给他起的昵称“拉布莱奥内”（Rabulione，意为捣蛋鬼）。由于缺乏可信资料，拿破仑童年的很多内容必然仍是猜测，但有一点没多少疑问：他是个早熟的出色读者，早年时就迷上历史与传记。莱蒂齐娅告诉一位政府部长，她的儿子“从不参加同龄小孩的娱乐活动，小心地避开他们。他总是独自待在自家三楼的一个小房间，不怎么下楼，哪怕要和家人吃饭。他一直在楼上读书，特别是历史书”。[22]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800页小说《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 ）描写爱与赎罪，拿破仑称，9岁时他第一次读这本书，“它改变了我的思想”。[23]

“我相信早年阅读深深影响了他少年时代的爱好和性格。”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后来回忆道。[24] 他讲了两人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有一次，学生们分组，每人都被告知在罗马或迦太基国旗下入座，而拿破仑根本不肯加入失败的迦太基一方，非要跟约瑟夫换座位。[25] （拿破仑比约瑟夫小18个月，但他的意志总是比哥哥坚定。）拿破仑日后督促低级军官“反复阅读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尤利乌斯·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欧根亲王和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h the Great）的战史，唯循此道才能成为伟大统帅”。[26] 古代史赋予拿破仑渊博的军政策略知识和贯穿其一生的可引用素材。这种激励非常强烈，以至于拿破仑在为画像摆姿势时不时把手插进马甲，模仿穿长袍的罗马人。

拿破仑的母语科西嘉语是多含习语的方言，同热那亚语不无相似之处。他在学校学会用意大利语读写，快10岁时开始学法语。拿破仑说法语时总带有浓厚的科西嘉口音，比如把“eu”或“u”说成“ou”，这让他在学校和军队里招来各种嘲笑。建筑师皮埃尔·方丹（Pierre Fontaine）装饰并翻修了拿破仑的很多宫殿，此人认为，“很难相信他这种地位的人”讲话时口音那么重。[27] 拿破仑不精通法语语法和拼写，不过旧时代标准拼写无关紧要，而且他一直能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终其一生，拿破

仑的笔迹遒劲果敢，尽管相当潦草。

拿破仑的童年常被描述成充斥着焦虑不安的激烈涡流，但他在阿雅克肖度过的最初九年单纯而快乐。那时，家人、朋友与一些家仆陪伴着他。后来，他慷慨地对待自己的文盲保姆卡米拉·伊拉里（Camilla Illari）。[28] 为了把拿破仑培养成法国军官和绅士，家人把他送去法国（科西嘉人称之为“大陆”），此后情况才开始复杂化。

马尔伯夫在科西嘉上层阶级中积极推行法国化政策。1770年，他颁布法令，宣布凡能证明自身贵族家世长达两个世纪的科西嘉人皆可享有法国贵族（noblesse）的广泛特权。托斯卡纳（Tuscany）大公曾正式认可卡洛之父约瑟夫的贵族身份，随后比萨（Pisa）大主教承认约瑟夫是“佛罗伦萨贵族”。[29] 科西嘉未封建化，少有岛民购买头衔，但卡洛为波拿巴家族申请到了跻身岛上78个贵族之家的权利。科西嘉最高理事会追溯了波拿巴一族的佛罗伦萨起源，1771年9月13日，理事会声明该家族正式受封为法国贵族。[30]

现在，卡洛可依法首次使用签名“德·波拿巴”（de Buonaparte），并出席科西嘉议会。卡洛自己的收入难以供儿子们上学，但他也能为他们申请王室奖学金了。法国政府愿为多达600名法国穷贵族之子支付学费，条件是他们都得证明自己出身贵族、无力负担学费、能用法语读写。9岁的拿破仑已经符合前两个条件，为了满足第三个，1779年1月，家人送他去勃艮第（Burgundy）的欧坦（Autun）接受严格的法语教学。

卡洛申请奖学金时，马尔伯夫伯爵亲自加快了法国官僚机构的办理进度，此事后来激起谣言，传谣者说他是莱蒂齐娅的情人，可能也是拿破仑的生父。波旁王朝和英国的作者们孜孜不倦地传播这一诽谤之辞。就像拿破仑一生都自夸一样，他的敌人也一直寻找妙法来贬低他的神话。1797年，28岁军事英雄的最早传记开始出现。当年，布尔古安

（Bourgoing）骑士将某位佚名英国作者的《波拿巴早年的一些简况》（*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 ）译成法文。此书声称，莱蒂齐娅“吸引了”马尔伯夫。安德鲁·道格拉斯（Andrew Douglas）爵士为这本书撰写了简短导言，证明此说的真实性。道格拉斯是拿破仑在欧坦的同学，但他显然并不认识波拿巴家族的其他人。[31]

拿破仑本人不太在意这种诋毁，不过他确曾对杰出数学家兼化学家加斯帕尔·蒙日（Gaspard Monge）指出，母亲在保利的科尔特（Corte）要塞对抗马尔伯夫的军队时怀上了他。皇帝拿破仑不厌其烦地关照马尔伯夫之子。在他指挥的某次战役中，一群士兵抢劫了马尔伯夫之女布吕尼（Brunny）夫人，于是他“极尽关切地招待她，从自己的卫队中拨给她一队猎兵哨兵，最后把心满意足的她送走了”。[32] 若布吕尼夫人的父亲勾引莱蒂齐娅、给卡洛戴绿帽，拿破仑不大可能做出上述举动。也有人说保利才是拿破仑的生父，此流言同样地被证伪。

拿破仑接受法国教育后成了法国人。他年龄尚幼，又在法国待了较长时间，再说当时法国文化在欧洲最强势，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假如他没有变成法国人倒会叫人惊讶。1778年12月31日，拿破仑获得奖学金（相当于助理牧师的薪水），次日，他开始在欧坦主教管理的教会神学院上学，此后他会阔别科西嘉近八年之久。学校名册上登记的拿破仑姓名是“拿破仑·德·波拿巴先生”（M.Neapoleonne de Bonnaparte）。校长沙尔东（Chardon）教士回忆道，拿破仑“为人深沉抑郁，他没有玩伴，独来独往……他有才能，学得快……如果我责备他，他会回答，‘先生，我知道了’，语气冷淡得近乎傲慢”。[33] 因为学生是个聪明好学的顽强少年，沙尔东只用三个月时间就教会了他法文读写，甚至还教了短文写作。

在欧坦学会必备的法语后，1779年4月，拿破仑进入香槟地区（Champagne）特鲁瓦（Troyes）附近的布列讷堡（Brienne-le-

Château）王家军校就读，此时他还差四个月满10岁。次日，父亲离去，因为学校没有假期，三年后他们方才再会。学校教师是圣方济各会分支最小兄弟会（Minim order）修士，学生有110人，连拿破仑在内共50人领有奖学金。虽说布列讷是军校，但其管理者却是修士，不过学校的军事课程是由校外教员教授。校园条件简朴，每个学生只有一块草垫、一条毯子，但他们不会挨打。1782年6月，父母的确来看望拿破仑了，当时，莱蒂齐娅说她担心儿子瘦了太多。

1776年，路易十六（Louis XVI）建立了12所王家军校，布列讷军校在社会上并非最受欢迎，但拿破仑在此接受了良好教育。他每天学习八小时，课程包括数学、拉丁语、历史、法语、德语、地理、物理、工事学、武器学、击剑、舞蹈和音乐（最后三门课表明，布列讷军校兼具贵族精修学校的特征）。[34] 除了拿破仑，物质环境艰苦、学术要求严格的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将军，如路易-尼古拉·达武（Louis-Nicolas Davout）、艾蒂安·南苏蒂（Étienne Nansouty）、安托万·菲利波（Antoine Phélippeaux）、让-约瑟夫·多特普尔（Jean-Joseph d’Hautpoul），学校教员夏尔·皮舍格吕（Charles Pichegru）则是未来的荷兰征服者、保王党阴谋者。[35]

拿破仑擅长数学。“要成为良将，你必须学会数学，”他后来评论道，“它能在纷繁场合指引你的思想。”[36] 出色的记忆力帮了他的忙。“记忆力是我的超凡之处，”他曾自夸道，“我还是男孩时就记得三四十个数字的对数。”[37] 他获准提前修习针对12岁学童的数学课程，很快就掌握了几何、代数和三角学。拿破仑最差的科目是德语，他从未学会这门语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如此热爱古代史，可他的拉丁文也薄弱（好在直到1780年后他才需要参加拉丁文考试，那时他的去向已然明了。他会加入陆军或海军，不会投身教会）。拿破仑也精于地理，就在他的学校练习册的最后一页上，他在一长串英国王室领地名称后写着：“圣赫勒拿：小岛。”（Sainte-Hélène：petite île.）[38]

“历史能传授年轻人道义与美德。”布列讷军校简章写道。修士们赞同伟人中心史观，用古今英雄人物激励男孩们的进取心。[39] 拿破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如饥似渴地阅读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传说、爱国事迹与共和国美德故事。他也读了恺撒、西塞罗、伏尔泰、狄德罗、雷纳尔（Raynal）教士以及伊拉斯谟、欧特罗皮乌斯、李维、菲得洛斯、撒路斯特、维吉尔的著作，还读过公元前1世纪人士科奈利乌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的作品《伟大统帅传记集》（*Lives of the Great Captains* ），此书有章节论及地米斯托克利、来山德、亚西比德与汉尼拔。在校期间，拿破仑得绰号“斯巴达人”，原因也许根本不是他为人吃苦耐劳，而是他深深仰慕斯巴达城邦。拿破仑可以背诵维吉尔的整篇文章，上课时他自然支持心中英雄恺撒，反对庞培。[40] 他成年后喜欢的戏剧常常也围绕古代英雄展开，如拉辛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 ）、《昂朵马格》（*Andromaque* ）、《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 ），以及高乃依的《秦那》（*Cinna* ）、《贺拉斯》（*Horace* ）、《阿提拉》（*Attila* ）。

一个同时代人回忆说，拿破仑曾逃课去学校图书馆，在馆内阅读波里比乌斯、普鲁塔克、阿里安（“他读得很开心”）、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他“不太喜欢”）的著作。[41] 波里比乌斯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记述罗马帝国的兴起，描述了他目击到的汉尼拔之败与迦太基洗劫事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简要刻画了拿破仑最崇拜的两位英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亚历山大战史的最好史料之一。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的作品只有一本传世，而这本书是亚历山大的传记。所以说，少年拿破仑的读物主题鲜明。同龄人在户外运动时，他却尽可能纵览有关雄心勃勃的古代领袖的书籍。对拿破仑来说，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愿望并不奇怪。学校教育也让他日后有机会比肩古代巨人。

拿破仑在课堂上认识了查理曼和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的最伟大时

代，但他也学习近期的七年战争中法国在魁北克（Quebec）、普拉西（Plassey）、明登（Minden）和基伯龙湾（Quiberon Bay）的败绩，还包括“英国征服印度的累累硕果”。[42] 拿破仑在布列讷读书的大部分时间，英法都在美洲交战，学校如此安排课程是为了培养一代不仅坚信法国伟大，而且执意羞辱英国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对英国政府恨之入骨，人们往往将这种倾向归于盲目的仇恨或科西嘉复仇主义。事实上，在他出生的那个十年期，1763年的《巴黎条约》令法国丧失印度和加拿大的大片大陆地块（及市场），他的少年时代，英国也忙着在澳大利亚拓殖，所以说，把他的反英倾向看作非常合理的反应要更准确。晚年拿破仑两度请求去英国生活，他也曾表示自己崇拜马尔伯勒公爵和奥利弗·克伦威尔，但其所受教育导致他视英国为不共戴天之敌。在布列讷上学时，他的英雄中似乎只有被流放的保利尚在人世。另一个已故英雄是瑞典的卡尔十二世（Charles Ⅻ）。1700～1706年，他消灭了敌对四国的联军，但他后来深入俄国，结果只是遭遇惨败，并被流放。

拿破仑也深爱文学。晚年时他回忆道，自己上学时曾在一棵树下阅读描写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塔索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814年布列讷之战中他就在那棵树旁被一个哥萨克（Cossack）袭击。[43] 卢梭肯定科西嘉，拿破仑视其为偶像，17岁时，他写文赞美此人的《社会契约论》。他接受卢梭的思想，认为国家掌握公民生死权，有权禁止轻浮奢侈品，有义务审查戏剧与歌剧。[44]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是18世纪最畅销的著作之一，此书主张不按社会常态行事、追求个人真情实感，这种观点吸引任何年轻人，特别是心怀凌云壮志的梦想家。1765年，卢梭为科西嘉起草自由宪法，这份草案反映了他仰慕保利，保利也同样崇敬他。

拿破仑显然爱读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作品。他最喜欢的诗人是莪相（Ossian），此人的吟游诗篇记述了古盖尔人的征服史，那些荒野迷雾中的英雄传奇、汹涌大海上的战斗史诗激励了他。拿破仑携带莪相

的《芬戈尔》（*Fingal*）奔赴战场，委托画师为莪相的诗创作多幅画作。他特别喜欢让-弗朗索瓦·勒叙厄尔的歌剧《莪相》和演奏它的十二架踏板竖琴，以至于1804年该剧首演时他封作曲者为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骑士。同年，他建立凯尔特学院（Académie Celtique），以便研究高卢人的历史与考古学。那个年代，人们大都认为凯尔特人和古高卢人很有渊源，拿破仑也不例外。1813年，凯尔特学院成为法兰西社会与考古学院（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其院址现为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其实，莪相的史诗系自封的“发现者”、文坛骗子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所作，真相揭晓后，拿破仑并未特别介意。[45]

1781年，军校副总督学凯拉利奥（Kéralio）骑士给拿破仑出具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两年后，此人推荐他升入卓越的巴黎军校。1781年的成绩单显示，拿破仑“体质极佳，神情柔顺，为人温存和善、直言不讳、深思熟虑。课业大都合格，数学应用能力一直突出……此男孩可成为出色的水手”。[46] 拿破仑显然有智力优势，但这不大可能改善他与同学们的关系。他们给他起绰号“稻草鼻”（La Paille-au-Ne，发音像科西嘉语“Napoleone”）[47] 。同学们笑他说不利索法语，笑他父亲还要证实自己的贵族身份，笑他来自被征服的民族，笑他的瘦弱骨架上长了颗相对较大的脑袋，笑他比学校里大部分同龄人穷。“我是班上最穷的学生，”1811年，拿破仑对一位廷臣说，“同学们有零花钱，我没有。我感到自豪，并小心地掩藏骄傲……我不知道如何像其他人一样微笑或嬉戏。”[48] 日后谈及求学生涯时，拿破仑能忆起他喜欢的老师，但很少提到那些同学。

学童能迅速察觉并嘲笑彼此的细微差距，他们很快发现，拿破仑的致命痛处在于他深深以故乡为荣。（沙尔东教士也曾提及这一点。）他是局外人、外国人，认为身边的富家子弟都属于压迫他同胞的统治阶级。嘲讽恰恰产生了可以在生机勃勃的男孩身上盼来的效果，拿破仑从

此变成骄傲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从不放弃捍卫故土。“他天性内向，喜好反思科西嘉被征服之事，少年时便心系国恨家仇，”布列纳回忆道，“所以他追求孤独，养成了有些惹人厌的惯常言行。”[49] 布列讷修士教员居曼·德·克雷格米伦（Cuming de Craigmillen）以“他的同学C.H.先生”的名义写了第一本关于拿破仑的书。此书由英文写成，于1797年出版，它描写了一个内敛且反社会的孩子。一位评论家说，书里的小孩“行事直截了当，他大胆莽撞、锐意进取，甚至狂野凶暴”，这四个形容词也适用于他此后的人生。[50]

拿破仑学生时代最著名的逸闻讲述了全校学童一起打雪仗的故事，其中的大量内容很可能是编造的。1783年隆冬时节，据说拿破仑在他设计的冰雪要塞周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模拟战斗，他先是率领进攻方，次日又指挥防御方。[51] 拿破仑据信不受同学欢迎，但雪仗故事很不符合这一点。布列纳给回忆录代笔人的笔记也没提这桩逸闻，它很可能纯属写手的杜撰。“这次模拟战斗打了十五天，”回忆录写道，“直到夹杂着沙砾和小石块的雪球打得很多学生失去了战斗力（hors de combat）。”[52] 学校真的会让伤害许多学生的游戏玩上两个多星期吗？

拿破仑的信件现存33000多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784年6月15日，收信人是其继舅父约瑟夫·费施（Joseph Fesch），他是莱蒂齐娅之母的第二任丈夫之子。拿破仑在信中争辩道，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不应该参军，因为“全人类命运的伟大主宰赋予我对军事的浓厚热爱，但它（没有）赋予约瑟夫这一点”。拿破仑补充道：“他不敢直面战斗的危险，他的健康也不佳……而且我哥哥完全用卫戍部队的观点看待军事专业。”[53] 拿破仑认为，若约瑟夫选择加入教会，马尔伯夫的亲戚欧坦主教“会让他过上舒适生活，他肯定能当上主教，这对家族多好啊！”约瑟夫欲加入步兵，拿破仑遂问道：“可怜的步兵军官是什么货色？对他来说，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碌碌无为的。”这封三页的书信现藏于纽约皮尔庞特·摩根（Pierpont Morgan）图书馆，几乎每行都有错别字，比如把“Saint-

Cyr”（圣西尔）拼成“Saint-Cire”，把“arrivé”（已到达的）拼成“arrive”，把“écrit”（书面的）拼成“écrie”。这封信也满是语法错误，但拿破仑的字迹清晰可辨。信上的签名是“您忠实顺从的仆人拿破廖内·迪·波拿巴（Napolione di Buonaparte）”。拿破仑在附言中写道：“阅毕即毁。”这是他本人注意审慎编辑历史记录的早期迹象。

1784年9月15日，拿破仑轻松通过布列讷军校毕业考试。次月末，他进入塞纳河左岸的巴黎王家军校（École Royale Militaire in Paris，简称巴黎军校）就读。论社会地位，巴黎军校远远胜过布列讷军校。这里一周给学生换三次床单，伙食也不错。仆役、教师以及假发匠等后勤人员加起来是学员的两倍还多。从早上6点的弥撒开始，学校每天还举行三次礼拜仪式。奇怪的是，巴黎军校不教战争和战略史，但其教学大纲涵盖了布列讷军校的很多课程。此外，巴黎军校还教滑膛枪射击、军事操练及马术。（当年的很多建筑保存至今，它们位于正对埃菲尔铁塔的战神广场一端，里面环绕着总占地超过29英亩的17座庭院。）拿破仑在巴黎待了十二个月，除了战神广场和巴黎军校本身，他没怎么去过城中其他地方，但他自然从书本和军官同僚中获知很多关于巴黎及其纪念碑、防务、资源、建筑奇观的知识。[54]

拿破仑的学业依然出类拔萃。他在布列讷时就决定不去海军，莱蒂齐娅的想法是缘由之一，她既害怕他会被淹死或烧死，也不想让他睡吊床，但主要原因还是炮兵部队名头远胜海军，而数学才能也让他有望成为炮兵军官。1784年，法国各军校的考生总计有202人，共136人通过毕业考试，其中仅14人收到炮兵部队的邀请，所以拿破仑被选入了精英队伍。[55] 他是巴黎军校的第一个科西嘉学生。某同学给拿破仑画了一幅亲切的漫画，画中少年英雄坚持捍卫保利，一位老教师拽他身后的假发，努力把他拉回来。[56]

拿破仑有三个杰出的老师：路易·蒙日（Louis Monge，数学家兼化

学家加斯帕尔·蒙日的弟弟）；拉普拉斯（Laplace）侯爵[57]，他后来成了拿破仑的内政部长；路易·多迈龙（Louis Domairon），他教会了拿破仑战前鼓动（harangue）军队的价值。（英语中的“harangue”含有久久咆哮的意味，但法语中的“harangue”并无此意，它可指鼓舞人心的演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修昔底德笔下的伯里克利就发表过这类演说。拿破仑在战场上具备卓越的鼓动技巧，但他在公共集会上并非一直擅长鼓动。）七年战争之后，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尔（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革新法军炮兵战术，拿破仑在巴黎军校接触了他的新思想。（历史上，战败总是军事改革之母，这回亦然。）他还学习了法军将领雅克·德·吉贝尔（Jacques de Guibert）伯爵的革命性著作《战术通论》（*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1770年版），此书写道：“现役部队既给人民造成负担，又不能在战争中取得决定性大捷。与此同时，民众大都疏于武装训练，愈发衰弱……假如某国能具备男子气概、创建国民军队，它将称霸欧洲。”[58]吉贝尔宣扬战争中速度、奇袭与机动性的重要性，他主张放弃有城墙的城市的大型补给站，改为因地自给。书中还有一条原则：高昂的士气——军旅精神（esprit de corps）——能克服大部分困局。

拿破仑在布列讷军校读了五年，在巴黎军校读了一年，此时，军事思潮已彻底渗透其身心。它将伴随拿破仑的余生，深深影响他的信念和形象。他接受革命信条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效率和激进民族主义，此举很符合这种思潮，但他对结果平等、人权、媒体自由、代议制政府这些信条无甚兴趣，在他看来，它们都不太符合军事思潮。拿破仑所受的教育让他尊重社会等级、信奉法律与秩序、强烈推崇奖赏人才与勇士，但也令他厌恶政客、律师、记者和英国。

1802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Claude-François de Méneval）接替布列纳任拿破仑的私人秘书。梅纳瓦尔日后写道，拿破仑离校时“自尊自傲，天性好战，组织能力极佳，热爱秩序与纪律”。[59]

这些个性都属于军官准则，把拿破仑塑造成强大的社会保守分子。军官拿破仑信奉公认层级指挥链中的集权控制与保持高昂士气的重要性。行政事务秩序和教育至关重要。由于本能使然，他痛恨一切看上去像“作乱暴民”（canaille）的人。法国大革命期间，甚至他的一生中，这些情感都没太大变化。

卡洛·波拿巴试图让身体好起来，遂搬去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1785年2月24日，他在那儿去世，终年38岁，死因很可能是胃癌，但也可能是胃溃疡穿孔。当时，拿破仑只有15岁，之前六年他仅仅见过父亲两次，卡洛逝后他也只是匆匆见上一面遗容。“父亲的死亡漫长残酷，严重损伤他的器官和官能，”约瑟夫回忆道，“以至于最后几天（他）完全神志不清了。”[60] 卡洛的大夫建议他吃梨子，所以拿破仑对医生抱有的终生恶感可能源于此时。他本人具备无限干劲与精力，或许父亲的英年早逝是原因之一；他怀疑自己也活不长，这倒是正确了。一个月后，拿破仑致信叔祖父卢恰诺，称卡洛是“开明热情、公正无私的公民，然而上帝还是让他死了，而且他死在怎样的地方啊！故土百里之外的异国，此地毫不关心他的存在，远离他珍视的一切”。[61] 除了值得赞美的孝心，这封信的有趣之处还在于拿破仑仍视法国为“异国”。抒发完由衷同情后，他又向教母、亲戚乃至家里的女仆米纳娜·萨韦里亚（Minana Saveria）问好，然后他加上信末附言：“3月27日晚上7点，法国王后诞下王子诺曼底（Normandy）公爵。”[62] 那个年代，人们常常充分利用昂贵的书写纸，可是给这么重要的信加上如此随便的附言就有点奇怪了。

虽然约瑟夫是卡洛的长子，但拿破仑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新任家主身份。“他不是被权力和荣誉捧高后才在家中最显强势的，”吕西安回忆道，“甚至在他年轻时，他就开始这样做了。”[63] 拿破仑提前参加毕业考试，在58名考生中位居第42名，这个成绩可能看上去糟糕，其实不然，因为军校正常学制是两到三年，而他只学了一年。现在他可以投身

军事、专心克服卡洛留下的严重经济困难。拿破仑后来承认，这些事“影响我的心绪，让我少年老成”。[64]

阿雅克肖法院陪审推事卡洛领有22500法郎年薪。他和邻居打财产官司（他一度起诉妻子的祖父）、在地方政府中兼任多个小职位，借此补充收入。然而，卡洛的谋财大计却是桑树苗圃（pépinière），正是这项工程令其次子非常焦虑。“科西嘉桑树长势良好，”博斯韦尔在《科西嘉记》中写道，“这里的虫害和雷雨险情也没有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严重，因此只要状态安定，科西嘉就可出产丰富的丝绸。”[65] 岛上某座桑树苗圃的特许经营权原属卡洛·波拿巴的先辈杰罗尼莫·波拿巴（Gieronimo Bonaparte），1782年，卡洛获得这一权利。凭借王室的137500法郎十年期无息贷款和他自己的大量投资，他能种植一大片桑树林。三年后，科西嘉议会撤销与卡洛签订的合同，理由是他没有履行维护义务，他则坚决否认。卡洛去世后又过了十五个月，1786年5月7日，合同正式终止，于是波拿巴家族债台高筑，因为他们得偿还贷款、支付桑树园日常管理费用，它依旧由他们负责。

苗圃导致莱蒂齐娅面临破产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拿破仑向将要加入的团请了长假。这桩官僚主义麻烦持续数年，耗资颇大，以至于法国大革命初露迹象时，波拿巴一族只关心巴黎的政变能否减轻家族债务、政府是否可能给他们发放额外农业补贴来维持苗圃事业。[66] 据我们所知，拿破仑处理苗圃事务（l’affaire de la pépinière）时最显偏狭。此事让家族面临破产危机，他奋力推动这一公案。他努力寻找了结方法，以母亲的名义寄出大量信件，游说他能在科西嘉和巴黎找到的所有人。少尉拿破仑对家族尽责，尽量从1100法郎年薪中匀出钱来寄回家。他写给法国总审计长的很多信件称母亲为“波拿巴遗孀”。莱蒂齐娅借了某法国军官600法郎，她差点把家中的银器卖掉还债。[67] 由于卢恰诺领班神父相助，执达吏没有插手此事，但波拿巴家族长期缺钱，直到1791年领班神父过世后他们继承了遗产。

1785年9月1日，拿破仑就任拉费尔团第1营第5大队秋季炮兵连的军官，该连屯于罗讷河（the Rhône）左岸的瓦朗斯（Valence）。秋季连属于五个历史最悠久的炮兵部队之一，享有盛誉。[68] 16岁的拿破仑既是最年轻的军官之一，又是法军炮兵军官中唯一的科西嘉人。他回忆瓦朗斯的日子时总说自己过得寒酸。当时，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扶手椅，但他仍像从前一样醉心阅读，有时他只好不吃饭，以便有钱买书。那时，救济是拿破仑的部分生活来源。瓦朗斯一家咖啡馆的老板经常招待他喝咖啡，当上第一执政后，他向一位内政部长打听老板的消息。他听闻她还活着，便说："恐怕我没有付清她招待我的所有咖啡，这里是50金路易（louis）（相当于1000法郎），替我交给她。"[69] 拿破仑的餐馆账单也慢慢累积起来。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道："和别人一起去酒馆或咖啡馆时，有时他可以方便地不付账。经历过这种事的人们向我保证道，虽然拿破仑最年轻最穷，但他不用强迫手段就能获得其他同伴的尊重乃至顺从。他不曾一文不名，但在人生的那个时期，他极其在意开销细节。"[70] 他承受不起忘掉苗圃梦魇。

1786～1791年，拿破仑给很多书做了详细笔记，如阿拉伯民族、威尼斯（Venetia）、印度群岛、英格兰、土耳其、瑞士和索邦（Sorbonne）的历史。他评注伏尔泰的《论道德》（*Essais sur les moeurs* ）、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 ）、米拉波的《论密信》（*Des lettres de cachet* ）和夏尔·罗兰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他做过笔记的书还有当代地理和政治著作，如雅克·迪洛尔（Jacques Dulaure）的反贵族阶级著作《批判贵族史》和夏尔·杜克洛（Charles Duclos）的八卦之谈《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时代秘闻》。[71] 与此同时，拿破仑还背诵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诗作，或许他是为了赢得漂亮姑娘卡罗琳·德·科隆比耶（Caroline de Colombier）的芳心。"听来非常不可思议，"两人曾在黎明时漫步草坪，他日后回忆当时他们的关系多单纯时说道，"但我们一直在吃樱桃！"[72] 拿破仑在瓦朗斯继续学跳舞，他可能意识到，若想成为一个能在社会上见人的军

官，舞蹈能力有多重要。[73] 他的舞蹈教师多泰尔后来穷困潦倒，1808年12月，他致信拿破仑称：“陛下，帮您在礼仪社会迈出第一步的人如今渴求您的慷慨。”皇帝便给他安排了工作。[74]

1786年4月26日，拿破仑在瓦朗斯写了其现存随笔的第一篇，讨论科西嘉人抵抗法国的权利。他已经完成了学业，所以此文并非旨在出版，而是写给他自己看的。对那个时代的法军军官来说，这是不寻常的消遣活动。文章庆祝保利的61岁生日，辩称法律或源于民权或源于君权，倡导国民主权，并总结道：“追求一切正义法律的科西嘉人曾挣脱热那亚人的枷锁，如今也能打破法国人的。阿门。”[75] 一个法军军官写这种文字显得很奇怪，甚至可说是谋反，但拿破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奉保利为偶像，从9岁到17岁，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孤身待在法国，这让他思念理想化的科西嘉。

拿破仑是个业余作家，26岁之前，他写过约60篇随笔、小说、哲学论述片段、历史文章、论文、小册子和公开信。[76] 这些文字一同反映了他在才智和政治上的发展，追溯了他的转变过程：18世纪80年代，他是坚定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后来他又公开自称是反对保利的法军军官，1793年他则希望雅各宾法国镇压科西嘉的反叛。晚年拿破仑说，保利“是个好人，他既没背叛英国也没背叛法国，但永远只为科西嘉考虑”，他“是我家族的挚友，力劝我加入英军，这样他可以动用权力给我谋职……但我更喜欢法军，因为我和他们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我能理解也能欣赏他们的作风，而且我认为，对积极进取的年轻人来说，大革命的兴起是个好时机”。[77] 拿破仑也声称保利“盛赞”自己：“那个年轻人会成为普鲁塔克笔下的古人之一。”[78] 不过，此事的可信度也许更低。

1786年5月上旬，拿破仑写了两页随笔《论自杀》，此文融合了浪漫民族主义者的痛苦呐喊与古典演讲术的做派。“我置身人群却永久孤

独，回房独梦，沉沦于我的忧愁的全部魅力。”他写道，“今天我在思考什么方面？死亡。”[79] 这令他想到：“既然我必定死亡，难道我不可以自杀？”“人是多么远离自然啊！”他的呼喊反映了经典的浪漫主义修辞。拿破仑显示了既自大又自怜的哈姆雷特式矛盾心态，然后将一些自我放纵的哲思融入卢梭的科西嘉民族主义。“我的同胞伙伴背负锁链，同时恐惧地亲吻压迫他们的手！他们不再是某位英雄用其美德激励的勇敢科西嘉人，不再抵触暴君、奢侈与卑劣娼妓。你们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抢走我们珍视的一切还不够，还腐蚀我们的灵魂。若祖国不复存在，卓越的爱国者就应赴死……我不快乐，万事于我皆苦，所以生活是我的负担。”[80] 浪漫夸张的文字吸引了很多受折磨的年轻人，拿破仑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决定不自杀，但这些随笔让我们一瞥他那正在萌发的自我意识。他的随笔常常遵循当时的古典传统，充斥着言过其实的浮夸词句和华丽辞藻的问题。后来，他写这些随笔时磨炼出的文风成了其宣言和演说的特色。

17岁时，拿破仑的宗教观点开始融合，此后它们也少有变化。虽然他的老师是修士，但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从未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确信奉某种神力，不过除了最初的创世，这种神力和世界的互动非常有限。后来，人们有时见他在开战前画十字。[81] 我们将看到，他肯定也知道宗教的社会功效。但就个人信仰而言，他本质上是启蒙主义怀疑论者。1780年9月，11岁的拿破仑参加公开口试，考官要他解释基督的四个主要奇迹，问他关于《新约》的问题。他后来回忆那场考试时道：“因为没有皈依自己从没听过的宗教，古代最贤德之人就要受永久火刑，我听到这种话后感觉恶心。”[82] 拿破仑15岁时，一位神父提出帮他度过父亲去世的难关，他拒绝了。而眼下，他又写了一篇未发表的文章，驳斥某位批判卢梭的热那亚新教牧师，并指责基督教包庇专制暴政，因为人类渴望靠坚持建立旨在“扶弱制强从而使人人得享通往幸福的美好安宁”的政府来改善现世生活，但基督教许以死后人生，分散了人类对此希望的注意力。[83] 他认为，只有社会契约（人们与国家当局

的协议）能实现幸福。除了这篇15000字的论文，拿破仑还写了喜剧寓言短诗《野兔、猎狗与猎人》（*The Hare，the Hound and the Huntsman*），其诗歌形式模仿了拉方丹的作品。诗中主角向导猎犬恺撒在正要杀死野兔时被猎人射中，全诗最后的押韵对句如下：

> 自助者天助，
>
> 我亦赞此述。[84]

拿破仑的下一篇现存散文仅一页长。他为了解决苗圃问题造访瑟堡旅馆（Hôtel de Cherbourg），1787年11月22日（周四），他在那儿写了《王家宫殿的邂逅》（A Meeting at the Palais-Royal）。今天，该旅馆地址为巴黎圣奥诺雷街（rue Saint-Honoré）附近的沃维利耶街（rue Vauvilliers）。那个由赌场、餐馆和珠宝店（bijouterie shops）构成的巴黎市中心街区是个声名狼藉之地，他在此邂逅了一名妓女。《王家宫殿的邂逅》是写给他自己看的私人记录，其按时间顺序记载了这次经历：

> 我刚刚看了意大利歌剧，正轻快地走在王家宫殿的小径上。对我来说，感受活力正常不过。受此感觉激励，我精神焕发，毫不介意寒冷。可头脑一冷静下来，我就感到寒意阵阵，于是躲进长廊。我正要进铁门时，一位异性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是晚上，她又年纪轻轻、身材曼妙，于是我马上确定她的职业。我看着她。她停下来，并未露出那个阶层常有的放肆神情，相反，她的举止同她的美丽外貌相得益彰，令我震惊。她的羞怯鼓励了我，我开口了。我比任何人更能察觉她所处的环境多可怕，哪怕被她这种人看上一眼都自觉受辱，这样的我对她开口了。她脸色苍白、身形虚弱、嗓音柔和，叫我一刻也没法犹豫。[85]

两人一同步入王家宫殿的花园，他问她能否从事“更适合你的身体状况的职业”，她答道：“不能，先生，人必须活下去。”“我迷上她了。我发现她至少给了我一个答案，让我有了全新的成功体验。”他问她来自何方（“南特”），问她为何丧失贞操（“一个军官糟蹋了我”），问她是否为之伤心（“是的，非常难过”），问她如何来到巴黎。又问了一连

串问题后，他终于问她是否愿意带他回房，“这样我们能取暖，你还可以满足欲望”。[86] 文章结尾写道：“此时，我不想过分谨慎。我已经吸引她了，所以尽管我说的话步步进逼，她也不打算逃避。我也不希望她开始装贞洁，我宁愿证实她已失贞。”[87] 起初他并未寻求这种邂逅，但他觉得值得按时间顺序记下此事的事实，表示他很可能这一次就初尝禁果了。连珠炮般迅速提问的交谈方式纯属拿破仑的作风。

几天之后，拿破仑依然待在巴黎，他开始撰写科西嘉史，但没写几行就放弃了。他转而写了辞藻华丽的雄辩式随笔《爱荣誉与爱国家之对比》。文章采用书信体，寄语某位无名年轻女士，力主爱荣誉胜于爱国家。在举出爱荣誉的例子时，他不仅提到法国军事史上的孔代元帅、蒂雷纳元帅，还费了大量笔墨谈论斯巴达、马其顿的菲利普、亚历山大、查理曼、莱昂尼达斯和“首任地方行政官——伟大的保利”。[88]

1786年9月，拿破仑返回阔别近八年的科西嘉，他头一回见到最小的三个弟妹。从这次返乡开始，1786～1793年，他一共回了五次家，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月，他之所以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处理父亲遗产留下的各种问题。1787年4月21日，他致信战争部长，要求请五个半月带薪假，“以便恢复健康”。[89] 拿破仑其实没病，却能随信附上请假必需的诊疗单据，可见他要么是个好演员，要么有个好说话的医生。将近一整年之后他才归队。评判这次长期离队要看情境：当时是和平年代，冬季，三分之二的步兵军官和四分之三的骑兵军官都不在队。[90] 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家庭，约瑟夫已被迫彻底放弃从军或投身教会的希望，但1788年时，他的确获得了比萨大学（University of Pisa）法学学位。所有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在念书，甚至有迹象表明吕西安聪慧过人、胸怀大志。

1788年5月下旬，拿破仑待在法国东部的欧索讷（Auxonne）炮兵学校，该地靠近第戎（Dijon）。就像随他所属团屯于瓦朗斯时一样，他

仅仅每天下午3点吃一顿饭，以便从军官薪水中省下足够的钱寄给家中的母亲，并用剩下的买书。每隔八天，他换一次衣服。拿破仑一心坚持详尽透彻的阅读自学计划，他在欧索讷的大量笔记本中写满雅典人、斯巴达人、波斯人、埃及人、迦太基人等古代世界最杰出民族的历史、地理、宗教与习俗。他的笔记既涵盖当代炮兵改革、团的军纪，也涉及柏拉图的《理想国》、阿喀琉斯以及（必不可少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

欧索讷军校校长是炮兵技术先驱、法军将领让-皮埃尔·迪泰伊（Jean-Pierre du Teil）男爵。拿破仑一周上九小时军事理论课，每周二还学习高等数学。随着冶金术的发展，加农炮只需原先一半重量便可发挥原有的威力，因此人们认为炮兵愈发重要。一旦火炮能在战场上移动，并保持其火力与精度，它们就可成为制胜关键。拿破仑最爱相对灵活的12磅炮，他后来叫它们“俏姑娘”。[91] “我认为每个军官都得去炮兵部队服役，”日后他会说，“那里能培养大部分良将。”[92] 此言并非全然自捧，他的时代，法军炮兵指挥官包括如下良将：让-巴蒂斯特·埃布莱（Jean-Baptiste Éblé）、亚历山大-安托万·德·塞纳蒙（Alexandre-Antoine de Sénarmont）、安托万·德鲁奥（Antoine Drouot）、让·德·拉里布瓦西埃、奥古斯特·德·马尔蒙（Auguste de Marmont）以及夏尔-艾蒂安·吕蒂（Charles-Étienne Ruty）。

“军事行业里没有我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拿破仑后来自夸道，“如果没人配火药，我知道怎么做；炮架我也会组装，加农炮我也清楚怎么架；或者说，要是必须有人来教战术细节，我也能教。”[93] 这都归功于欧索讷军校。军队原本只用臼炮发射爆破弹，1788年8月，拿破仑负责组织200人测试改用重型加农炮发射爆破弹的可行性，他的报告因阐述清晰而受到赞赏。这些日子里，拿破仑的军事备忘录简明扼要、内涵丰富，强调进攻的重要性。

炮弹试验课题得出了肯定结论。几天后，拿破仑写了《论王权》（Dissertation sur l’Autorité Royale）第一段，辩称军事统治乃优于专制的政府体系，并明确总结道：“只有极少数国王不应该被推翻。”[94] 他的观点充满专制主义色彩但又具有颠覆性，若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此文就会陷入麻烦，哪怕是在巴士底狱陷落前的几个月中法国政治形势愈发混乱的情况下。他把“论文”题献给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艾蒂安-夏尔·德·洛梅尼·德·布里耶纳（Étienne-Charles de Loménie de Brienne），幸运的是，当他正要把文章寄给出版商时，财政大臣被解职的消息传来，于是他立刻停止发表此文。

写作癖影响范围延伸至拿破仑针对下属军官混乱状态起草的规章，不知怎的，最后他写出一篇4500字的文章，文中充斥华丽修辞，如：“一丝不苟处事，莫损己身军衔和军装一毫，则临夜亦无忧。鹰有锐目，阿耳戈斯有百头，然其勉强能够尽忠职守。”[95] 1789年1月，他写了浪漫传奇剧《埃塞克斯伯爵：一个英格兰故事》（The Earl of Essex：An English Story），不过这不是他最好的文学作品。“伯爵夫人的手指伸入伤口裂缝，”剧中某段话开头写道，“滴着鲜血。她尖叫，捂住脸庞，但她再次抬头时什么也看不见。伯爵夫人惊恐万状、颤抖不已、呆若木鸡，这些可怕兆头正中她的痛处。她坐上马车，来到伦敦塔。”[96] 故事包含暗杀阴谋、爱情、谋杀、预兆和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垮台。1789年3月，拿破仑继续遵循传奇剧风格，撰写了两页小故事《先知的面具》（The Mask of the Prophet）。故事围绕英俊迷人的阿拉伯军人兼先知哈卡姆（Hakem）展开。哈卡姆患病后容颜受损，只好戴上银面具。他同当地亲王马哈迪（Mahadi）吵了一架，假装为了对付敌人，他让信徒挖掘陷坑、在坑内填满石灰。然而，哈卡姆却毒死信徒们，抛尸入坑，最后自焚。[97] 整个故事充斥着强烈的大龄少年之愤，读来令人心烦。

次月，瑟尔（Seurre）发生暴乱，暴动人群杀死了两名谷物商。拿

破仑奉命沿索恩河（the Saône）下行20英里，去瑟尔镇压暴动。这次行动中，他担任副指挥。“老实人回家去，”据说19岁的军官对群众喊道，“我只对暴徒开火。”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赢得迪泰伊将军的欣赏，但政治形势到了如此地步，结果没过多久，暴动也波及欧索讷本地，暴民袭击了公共建筑，还烧毁了税务局。拿破仑从这个有利的地方视角见证了伟大政治事件的最初征兆。这一事件将改写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并改变他自己的一生。

1789年7月14日，巴黎暴民猛攻国立监狱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随之爆发。之前数年，法国经历了财政危机和骚乱，如迪泰伊派拿破仑镇压的那种小暴乱。不稳定的导火线最早可追溯至1783年，即美国独立战争最后一年。这次战争中，法国支持反叛的殖民地对抗英国。除了瑟尔，其他地区也开始抗议低工资和食物短缺，1789年4月，当局严厉镇压了这些反抗，导致25人死亡。“拿破仑常说，国家就像人一样会患病，记录国家历史不比描述人体疾病无趣。”多年后，他的一位部长如此记载道，“法国人最珍视的利益受损。贵族和教士凭借傲慢与特权羞辱他们。人民长期苦于此等负担，但他们最终决定挣脱束缚，于是大革命开始了。”[98]

1789年5月5日，法国召开自1614年以来的首届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 of France），看上去国王可能被迫同第三等级代表分享至少部分权力，但此后事态迅速发展，无法预知其轨迹。6月20日，第三等级代表誓称制定新宪法前不解散，此时他们已自称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99]。三天后，王家卫队的两个连在镇压公众骚乱前哗变。抗议已然演变成反叛，路易十六招募外国雇佣兵镇压叛乱，消息传来后，激进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号召人民猛攻巴士底狱，这次攻击导致巴黎总督、巴黎市市长和国务卿身亡。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宣言》。10月6日，暴民攻进了凡尔赛宫。

拿破仑在日后的生涯中展现了非常敏锐的政治嗅觉，但就他而言，法国大革命初期，他完全误判了形势。“我再跟你说一遍，”巴士底狱被攻占一周后，即7月22日，他致信约瑟夫，“会平静下来的。一个月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说，如果你给我300里弗赫（相当于7500法郎），我就去巴黎了结我们的事情。”[100] 比起宗教改革后欧洲爆发的最大政治浪潮，此时拿破仑更关心苗圃事务。他又回头去写科西嘉史，并鼓起勇气致信自己的英雄、仍在伦敦流放的保利。“我生于国家衰亡之际，”他夸张地宣称，“三万法国人在我们的海滩上呕吐，把自由的王冠浸入血海，我一睁眼便看到如此可憎的景象。从我出生时起，垂死者的哭号、受压迫者的呻吟和绝望的眼泪就环绕着我的摇篮。”[101] 对就任军官时宣誓效忠法国国王的人来说，这些话可谓极其反常的情感。大革命爆发了，1790年7月，保利重返科西嘉，所以拿破仑心中分立的忠诚感无法长期共存。他将不得不做出抉择。

---

[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7

[2]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42，Browning，*Napoleon* p.22，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500

[3]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77

[4]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42

[5] Buhl MSS 110 Box 1 fol.2 p.4

[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46

[7]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4，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8

[8]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Ⅹ p.25

[9] “Carlo”的法语变体。——译者注

[10] Carrington，*Napoleon and his Parents* pp.29-31，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

[11]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44

[12] Decaux，Alain，*Napoleon's Mother* 1962，p.ⅹii

[13]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

[14]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

[1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3

[16]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9

[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3

[18]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12/2/2005 p.11

[19] Burdon，William，*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Bonaparte* 1804，p.6

[20]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68

[21] ed. Jones，*Intimate Account* p.425

[2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173-4

[23]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ⅹ，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20 n.37

[24]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Ⅹ p.26

[25] Zarzeczny，Matthew，*Meteors that Enlighten the Earth* 2013，p.45

[26] Ross，Steven，'Napoleon and Manouver Warfare'28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in Military History，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Colorado 1985，p.1

[27] Gillian Tindall in *TLS* 24/9/1999 p.34，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20/2/2004 p.9

[28] Buhl MSS 110 Box 2 fol.7 p.11

[29]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25

[30] Markham，Felix，*Napoleon* 1963，p.3，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p.5，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5，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5，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36

[31] Bourgoing，Chevalier，*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 1797，p.1

[3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55

[33] Coston，F.G.de，*Biographi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Napoléon Bonaparte* 1840，p.20

[34] Assier，Alexandre，*Napoléon Ⅰ à l'École Royale Militaire de Brienne* 1874，p.44

[35] 原文似有误，据考证，达武毕业于欧塞尔军校；而从多特普尔的生平履历看，他应该没上过军校。——译者注

[36]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p.29

[37]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40

[38] Biagi，Guido，‘A Coincidence in Napoleon's Life’*Century Magazine* November 1894，pp.19，1545

[39]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8

[40] Nasica，Abbé T.，*Mémoires sur l'enfance et 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1852，p.12

[41]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

[4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1

[43]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21

[44] Hicks，Peter，‘The Napoleonic “Police” or “Security” State in Context’*Napoleonica La Revue* nos.2-10 2009，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31

[45] ed. Gaskill，Howard，*The Reception of Ossian in Europe* 2006，p.ⅹⅹⅶ

[46]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14，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21

[47] Barral，Georges，*Histoire des sciences sous Napoleon Bonaparte* 1889，p.7

[48]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8

[49]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4

[50] Hicks，Peter，'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51] Baring-Gould，S.，*Th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97，p.17，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2

[52]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4

[5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 p.43，June 24，1784

[54] Robb，Graham，*Parisians* 2010，p.13

[55]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4

[56] AN AⅡ.1891 p.51

[57] 拉普拉斯1817年被封为侯爵。——译者注

[58] *TLS* 30/12/1939 p.754

[59]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7

[60]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Ⅹ p.29

[6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 p.47，March 28，1745

[62]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17

[63]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9，p.14

[64]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24

[65] Boswell，James，*An Account of Corsica* 1769，p.77

[6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 p.65，August 29，1788

[67] NYPL MSS Coll 4854，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25

[68] Smith，Digby，*Napoleon's Regiments* 2000，p.294

[6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184

[70]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p.211-12

[71]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Appendix A

[72] 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p.164

[73] 拿破仑学得如何存在争议，1807年，在华沙的舞会上，他问安娜·波托茨卡伯爵夫人自己跳得怎么样。“陛下，”她婉转地回答，“伟人中您跳得好极了。”Stryjenski ed.，*Memoires*，p.125.

[74]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p.23

[7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9

[76]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34

[77] Bodleian MS Curzon e1. p.16

[78]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60

[79] Browning，*Napoleon* p.283，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42，63

[80] Browning，*Napoleon* pp.283-4

[81]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24

[8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0，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31

[83]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31

[84] Browning，*Napoleon* pp.285-8，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42-3

[85] Browning，*Napoleon* pp.285-8

[86]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25

[87]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p.36-7

[8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p.36-7

[8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 p.54，April 21，1787

[90]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47

[91]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p.26

[92]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p.29

[93] ed. Johnston，R.M.，*The Corsican* （New York）1930，p.143

[94] eds. 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53

[95]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31

[96]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61

[97]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44-5

[98]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08

[99] 国民议会成立于1789年6月17日，当年7月9日更名为国民制宪议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1791年9月30日解散，其继承者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原文中皆为 National Assembly，译者据相应时间对译名进行了调整。——译者注

[10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1 p.78，July 22，1789

[10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 p.76，June 12，1789

第二章 大革命

他不论何时出场都露尽风头，但他在事业起步时遇上了尤其适合自己提升的时代。

——梅特涅论拿破仑

二十二岁时人生尚有很多可能，过了三十岁就不行了。

——拿破仑致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选侯

巴士底狱被攻占八天后，欧索讷再次爆发了动乱。“给你写这封信时，我身边是喧闹的鼓声、武器以及鲜血。”拿破仑从欧索讷致信约瑟夫。[1] 他自豪地告诉哥哥，迪泰伊将军就此状态询问了他的意见。他逮捕了33人，花了大半小时劝说暴动者住手。

拿破仑厌恶暴徒，严格意义上他也是贵族，尽管如此，他却拥护法国大革命。至少革命初期阶段很符合他从卢梭和伏尔泰处汲取的启蒙思想。他支持革命的反教权作风，不介意他并不特别尊重的君主国被削弱。此外，革命似乎为科西嘉提供了更具独立性的前景，还让穷困又势薄的有志异域青年有望获得一个好得多的前程。拿破仑相信大革命承诺引入的社会新秩序将消除他的这两个不利因素，并建立在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s）眼中的唯一权力基础——逻辑和理性——之上。

拿破仑后来声称，科西嘉贵族中“唯有”波拿巴家族支持法国大革命，实情并非如此，但他们属于拥护大革命的少数的岛上贵族之一。[2] 有一点看上去倒是真的：巴黎军校同期炮兵毕业生中，只有拿破仑赞成推翻路易十六；1789年，他所属部队的军官中，很多人逃离法国，连他在内，只有少数人支持国王下台。拿破仑忠实地执行军务，镇压瓦朗斯和欧索讷的食物暴动（欧索讷暴动中，他的团有人哗变倒戈），但他也是革命组织宪法之友协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当

地分会的早期追随者。回过头来看阿雅克肖，拿破仑的弟弟、14岁的吕西安明显更热衷、更坚持激进政治，他加入了极端的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3]。[4]

1789年8月8日，巴黎陷入骚乱，很大一部分法军军官队伍混乱无序，此时，拿破仑再次获准返乡休病假。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他都待在科西嘉，兴致勃勃地投身于岛上政治。这回也无迹象表明他真病了。博斯韦尔的《科西嘉记》描述了当地城市、九个行政区和大量基督教教区群（pieves，“世俗职能同宗教职能一样多的”教区群）的政治分歧。总督权力以首府科尔特为基，受到制约。城镇之间、乡村之间、宗族之间有敌对传统，岛民深深依恋天主教会和流放中的保利，拿破仑正是热情地踏入了这个旋涡。此后四年，他关心科西嘉政治远胜自己的法军军官生涯。

在约瑟夫和吕西安的支持下，拿破仑一返回科西嘉就号召岛民拥护革命事业、升起新的三色旗、佩戴新的三色帽徽，并且建立“爱国者”革命俱乐部、组织科西嘉志愿兵团。这个团是国民自卫军民兵部队，被寄予日后赶上总督的军队的希望。总督关闭了俱乐部，解散志愿兵，随后拿破仑的名字在巴黎制宪议会收到的抗议请愿中居首。[5] 10月，他撰写小册子，谴责科西嘉的法军指挥官，批判岛上政府缺乏革命性。[6] 就在拿破仑领导阿雅克肖革命派之际，制宪议会科西嘉代表安托万-克里斯托夫·萨利切蒂（Antoine-Christophe Saliceti）让更大的巴斯蒂亚镇（Bastia）激进化了。

1790年1月，在萨利切蒂的强烈要求下，制宪议会颁布法令，规定科西嘉是法国的一个省。拿破仑支持这一变化，而伦敦的保利则予以斥责，称此举意在将巴黎的想法强加于人。眼下，萨利切蒂和拿破仑认为巴黎是科西嘉革命道路上的盟友，所以若保利回岛，他们多半会同他产生重大分歧。当年3月，约瑟夫当选阿雅克肖市市长。即便是忙于所有

这些政治活动，拿破仑也夜读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s*），并整页整页记诵。病假结束后他又请求延期，因为团里没剩多少军官，他的指挥官承受不起拒绝的代价。

拿破仑花了十五个月重写科西嘉史，但他找不到出版商。此书现存部分辩称，科西嘉人本是古罗马一切美德的化身，却被“莫名的命运”降服，沦为其牺牲品。这时候，拿破仑还写了暴力色彩格外鲜明、含有报复意味的短篇小说《新科西嘉》（New Corsica），它一开始是个冒险故事，接着却变作政治声讨，最后则成了一幕血祭。文中，一个英国人遇见一位老者，此人向他讲述了1768年法军入侵后科西嘉岛上出现的暴行。“我离开我的人，飞奔去救我那不幸的父亲，”老人说，“他浑身是血，用最后一丝力气告诉我：‘儿子，为我复仇，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若别无选择，就像我一样赴死，但永远不要向法国人屈服。’”老汉回忆道，他找到母亲的遗体，她被人强暴，赤身裸体，“伤痕累累，摆着最下流的姿势”。他还说：“我的妻子和三个兄弟也被吊死在那。我的七个儿子遭遇同样的命运，其中三个还不满5岁。我们的木屋被焚毁。我们的山羊的鲜血同我家人的混在一起。”诸如此类。[7]“从那时起，”老人说，“我在我的祭坛上重新起誓，发誓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法国人。”[8]20岁现役军官拿破仑笔下的这则故事乃反法的复仇幻想，读来令人不快。老者狠狠地复仇，杀光了一条船上的法国人，连侍者都不放过。然后，“我们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我们的祭坛，一把火烧光。新的焚香似乎取悦了神明”。[9]大革命开始时，拿破仑显然无法抵御暴力的诱惑。

1770年，颇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雷纳尔教士匿名首次出版《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群岛殖民和贸易的哲学与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此书随后在法国遭禁。这本成功著作大受欢迎，它篇幅浩大，但论辩有力。雷纳尔教士被迫流亡了好几年，但1787年，他受邀回

国。1790年6月24日，拿破仑把科西嘉史寄给雷纳尔。附信上的日期是“自由历元年”，他在信中称：“国家因家庭琐事彼此残杀、以宇宙主宰之名互相割喉。它们热爱奇迹、心怀畏惧，狡诈贪婪的教士利用这一点影响它们的想象力。”[10] 他对雷纳尔说的这番话同样夸张：“我急于接受这份取悦我对祖国之爱的工作，然后羞愧不悦、深受束缚。”他模仿博斯韦尔和卢梭对科西嘉荣耀的理想化描写，补充道：“我高兴地发现，我的祖国是罗马自由仅存遗迹的庇护所，我的民族是加图后人，这令宇宙蒙羞。”[11] 他说喜好争吵的科西嘉人是争取罗马自由的斗士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的真正后代，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有益的历史见解，不如说是拿破仑对古典世界的浪漫执念。他还把书稿寄给昔日他在布列讷的导师迪皮伊（Dupuy）神父。迪皮伊建议他完全重写，不过少有作者会乐意接受这种意见。

1790年7月12日，制宪议会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将教会纳入政府管辖，并废除修道会组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要求教士对国家起誓效忠宪法，这导致第一等级分裂为宣誓派（即发过誓的教士）和拒宣誓派。次年3月，教皇庇护六世（Pius VI）批评这一规定。对基督教的普遍敌意，特别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仇恨鼓舞了很多革命者。1793年11月，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Cathedral）已然改为理性崇拜专用地。六个月后，雅各宾派领袖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颁行法令，建立泛神性的至上崇拜。数万名贵族被剥夺财产，他们被迫流落他乡，成为国外流亡者（émigrés）。此外，成千上万的教士也离开了法国。

拿破仑写了本小册子支持《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其内容有足够的煽动性，以至于小册子出版后不久，有一回拿破仑和约瑟夫在阿雅克肖偶遇宗教游行，结果险些被处以私刑。［强盗特伦塔·科斯特（Trenta Coste）救了他们，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后给了他恰当的回报。］[12]
1790年7月，65岁的保利返回科西嘉，此时他已被流放了二十二年。拿

破仑和约瑟夫都是欢迎保利归来的阿雅克肖接待委员会的成员。保利立刻被一致推举为科西嘉代理总督，并当选科西嘉议会议长及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司令。

尽管拿破仑明显渴求保利的赞许，后者却视波拿巴家的小伙子们为通敌者之后，只花了一点点功夫保持他们的忠诚。保利最初的举措中有一项是将首府从科尔特迁至巴斯蒂亚，这惹恼了如波拿巴家族之类的阿雅克肖居民。根据当地传说，拿破仑与保利同游蓬泰诺沃战场时指责后者的布阵，这令保利大为光火（但约瑟夫在回忆录中说，拿破仑仅仅和长兄谈了批评意见）。[13] 在启蒙运动晚期的数十年中，保利是欧洲进步人士尊敬的人物，波拿巴一族愿意不遗余力地迎合他。

9月15日，约瑟夫被选为科西嘉议会的阿雅克肖代表之一，后来又就任市执行政府（名为行政府）主席，但拿破仑既没当选议员，也没当选国民自卫军高级军官。“这个城市里尽是坏公民，”他致信岛上的政府官员卡洛-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Carlo-André Pozzo di Borgo），“你不知道他们多疯多卑鄙。”他建议革除市政会中三名委员之职，“这项强硬措施也许不合法，但有必要”，并引孟德斯鸠的话作为结论：“法律就像某些神的雕像，有时必须蒙上面纱”。[14] 这次他没成功。

10月，制宪议会实际上已掌握法国主权，它通过米拉波伯爵的提议，称科西嘉现在是法国的一部分、适用法国法律，但此后该岛将完全由科西嘉人治理。消息传来，全岛热烈欢庆，每个教堂都演奏《感恩赞》（*Te Deums*），拿破仑在波拿巴宅挂起巨大横幅，上书：“国民万岁，保利万岁，米拉波万岁。”[15] 他照常语带夸张（此时或可理解），向雷纳尔大肆宣扬道：“大海再也不能分隔我们。”[16] 然而，保利的新政治秩序中没有拿破仑的位置。保利派与巴黎政府开始失和后，波拿巴家族仍然忠于制宪议会，1792年9月后，他们又追随它的后身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17] 他们逐渐和保利派分道扬镳，其间矛盾既

有激化亦有缓和，但到1793年春时，双方已彻底决裂。

1791年1月6日，拿破仑出席阿雅克肖革命俱乐部“全球爱国者”（Globo Patriottico）创立仪式，它模仿了雅各宾派和更温和的吉伦特派在巴黎建立的俱乐部。当月晚些时候，他出版政治小册子《致布塔福科先生的一封信》，指控二十三年前受命治理科西嘉的人充当叛徒、支持“荒唐封建政权”。小册子也谴责保利被布塔福科欺骗，“置身狂热分子之中”。“狂热分子”指那些倾向于为科西嘉制定英式宪法的返乡流亡者，而拿破仑偏好法国革命宪法。当时，保利与布塔福科合作良好，他对小册子的反应激烈，不同意拿破仑将科西嘉史题献给他。他说，“年轻人不该写历史”，史书作者必须“成熟公正”。[18] 保利补充道，他没法归还手稿，因为他没空去找，他也拒绝了拿破仑索要资料的请求。不管拿破仑曾有怎样的成功作家梦，现在他的希望再次受挫，而且阻碍者还是他少年时崇拜的英雄。后来，有谣言说约瑟夫窃取阿雅克肖市资金（炮制此流言的动机很可能是政治因素，但它说的多半是实情），而保利也没支持波拿巴家族。[19]

1790年10月15日，拿破仑的假期正式到期，但次年2月1日他才从科西嘉出发，前往自己所属的团。他带上了12岁的路易，准备供弟弟在欧索讷上学。拿破仑对向来耐心的指挥官出示疾病诊断书，甚至拿出恶劣天气的证明，长官便友善地给他发了三个月欠饷。尽管如此，路易还是得睡在紧挨着拿破仑床位的壁橱底板上。兄弟俩仅有的家具就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吗？”拿破仑回忆这段人生时说道，“我从不去咖啡馆，从不社交。我吃干面包，刷自己的衣服，好让它们可以更耐用。我窝在小房间里，就像一头熊，朋友只有书籍……那是我年轻时代的欢乐与放纵。”[20] 此言也许稍有夸张，但程度不重。他最重视的是书籍和良好的教育。

1791年2～8月，拿破仑参加里昂（Lyons）学院有奖征文，以“什么

样的真谛和情感对人类学会幸福最重要？”为话题写了一篇论文。学院和雷纳尔修士会准备奖励最佳投稿1200法郎，这比他的年薪还多。拿破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写文章，此文谴责野心的虚荣，甚至批评亚历山大大帝妄自尊大，“亚历山大从底比斯（Thebes）跑去波斯又跑去印度，他在搞什么？他一直坐立不安，他失去智慧，他自诩为神。克伦威尔的结局又怎样？他统治英国，但复仇女神的利剑难道没有折磨他吗？”[21] 拿破仑还写了无疑带有自传色彩的话：“你回到阔别四年的故乡，漫步于那稚嫩的、早年的嬉戏场所……你感到对故土的一切有种似火的热爱。”[22]

拿破仑日后声称，他在评奖前撤回投稿，但他其实并没有。因为文章的风格太夸张，学院的评审给它打了低分。一位评委说，此文“无甚趣味、条理不清、严重杂糅、漫无边际、字迹潦草，没法吸引读者的注意力”。[23] 数年后，塔列朗从学院档案室找到了稿子，把它呈给拿破仑，后者重读一遍，说：“我觉得该用鞭子抽作者一顿。我都说了什么混账话啊，留着它们我该多恼火啊！”[24] 于是他转而“将文章投入火中，用火钳把它往下按”，生怕“别人会嘲笑我写出这玩意”。[25] 拿破仑根本没能获奖，但他甚至能参与法语征文比赛，这体现了他那可观的自信心。

22岁的拿破仑是个高产的文学创作者，这篇正式作品仅仅是其产出之一。他还写了《关于爱情的对话》（Dialogue sur l’Amour），文中人物“B”代表他自己，另一个人物亚历山大·德·马齐（Alexandre de Mazis）真有其人，现实中，此人是他的朋友以及他在卫戍部队的战友。马齐和拿破仑关系有多密切尚存疑虑，因为文中他自吹自擂、缺乏耐心，相对而言，“B”却沉着冷静、善驭形势。这篇对话辩称，爱情是社会和个人幸福的噩梦，为了让所有人更快乐，上苍应当消灭爱情。另一篇文章《回顾自然状态》（Reflections on the State of Nature）探讨为何社会产生前人类生活得更好，这一理念套用了卢梭的很多观点。

1791年6月，拿破仑晋升中尉，并返回瓦朗斯，转入第4炮兵团。他在拉费尔团待了六十九个月，却请了至少三十五个月的假，眼下，他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作风。“给我寄300法郎，”他一到部队就致信费施，“这个数够我去巴黎了。在那儿，人至少能崭露头角、克服困难。一切都昭示我会成功，难道你要为了100克朗阻止我吗？”[26] 拿破仑的急切和抱负并没有错，然而，要么是费施反对他去，要么是他同时获知科西嘉国民自卫军正在招募四个营，因为他最后没去巴黎，而是打算请假回家。新长官孔帕尼翁（Compagnon）上校以拿破仑才入团两个月为由不准假，这倒也可以理解。

1791年6月末，国王一家试图逃离法国，经过瓦雷讷（Varennes）时，他们在所乘马车中被捕。国王一家被迫返回杜伊勒里宫（the Tuileries Palace），重新过上近似监禁的日子。7月10日，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对欧洲其余王室发出请求，恳请他们救救他的妹夫路易十六。此时，拿破仑已是宪法之友协会瓦朗斯分会秘书。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纪念日当天，他在庆祝宴会上向“欧索讷的爱国者”祝酒，那些人正提请审判国王。拿破仑致信一位朋友称，“这个国家充满热情与烈火”，并补充道，虽然大革命只能仰仗他的团一半的军官，但下层军人一致拥护它。[27] “南方的血液以罗讷河之势奔流过我的血管，”他在附言中又加了一句，“如果你阅读我的潦草字迹有困难，务必见谅。”

虽然拿破仑被长官拒绝，但他不肯罢休。8月30日，他向迪泰伊将军请假。事后，迪泰伊告诉自己的女儿：“那个人能力非常强，他有朝一日会成名。”[28] 拿破仑获得了四个月返乡假，条件是他要在1792年1月10日携军旗出席全团阅兵式，否则将被视作逃兵。

拿破仑发现科西嘉一片混乱。大革命开始后，岛上共有130起谋杀案，税收则为零。自从六年前父亲去世后，家族的金钱困扰一直占用了

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1791年10月15日，拿破仑的叔祖父、领班神父卢恰诺·波拿巴去世，他把遗产留给波拿巴家族，多少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困难。1792年2月22日，拿破仑竞选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第2营中校[29]，卢恰诺的钱便派上了用场。选举中有大量贿赂行为，投票日当天，三个监票人中甚至有一人被绑架，他被扣押在波拿巴宅，直到选举胜利已成定局。拿破仑的最大对手马泰奥·波佐·迪·博尔戈（Matteo Pozzo di Borgo）是颇有势力的科西嘉政客卡洛-安德烈·波佐·迪·博尔戈的弟弟。马泰奥在圣弗朗切斯科（San Francesco）教堂外被拿破仑的持械支持者轰下讲坛。科西嘉政治一向野蛮，但这些招数严重违反了公认的惯例。保利支持马泰奥，要求当局调查这桩他所谓的“腐败与阴谋”。巴黎立法议会代表的科西嘉代表萨利切蒂阻止了保利，所以选举结果没变。与此同时，1月已过，拿破仑误了归队的最后期限。他在战争部的档案仅仅注明：“放弃军职，1792年2月6日被取代。”[30]

1792年1～3月，巴黎严重的粮食暴动进一步激化了政治危机。在2月初时，奥地利和普鲁士结盟。两国打算推翻法国革命政府并且恢复君主制，虽然它们未言明自己的目的，但那几乎算不上秘密。英国没有加入第一次反法同盟，但它显然也敌视大革命。战争流言传开后，科西嘉革命发生了激烈变化。2月28日，萨利切蒂下令关闭阿雅克肖、巴斯蒂亚、博尼法乔（Bonifacio）和科尔特的男女修道院，并将其收入划归省政府金库。保利和绝大部分科西嘉人反对此举。信奉天主教的阿雅克肖居民想保护当地的修道院，复活节（周日）当天，他们和拿破仑的国民自卫军爆发冲突。斗殴中，他的一名副手在他身旁被击毙。镇民同国民自卫军在城中混战了四天四夜，双方脾气暴躁、僵持不下。在此期间，拿破仑一度试图从法国正规军手中夺取防卫森严的城寨，但他失败了。事后，城寨驻军指挥官马亚尔（Maillard）上校向战争部寄去一份证据确凿的归责报告，有力地指控拿破仑谋反。通往阿雅克肖的路上挤满背着空口袋的农民，他们急切地预谋劫掠城镇。

保利站在马亚尔一边。他命令拿破仑离开阿雅克肖来科尔特向自己报告，后者照办。对拿破仑来说，好在明显更紧迫的战争部文件多如山倒，马亚尔写的这起混乱事件的报告被它们淹没了。奥军和普军的司令部位于科布伦茨（Coblenz），两军将从西北方入侵法国。为了挫败预料中的进攻，4月20日，法国抢先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八天后，法军侵入奥属尼德兰（Netherlands，今比利时）。阿雅克肖骚乱结束后，拿破仑没法留在科西嘉了，但他也不能回瓦朗斯，在那儿，他的正式身份是逃兵。于是，他去了巴黎。

拿破仑到达巴黎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的战争部后，发现那里也是乱作一团：1792年5～10月，新的革命政府历经六任战争部长。显然没人有机会看马亚尔的报告，抑或非常关心阿雅克肖那样偏僻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似乎也没人在意1月时拿破仑的假期就已正式到期，而那会儿他还没当选科西嘉国民自卫军中校。1792年7月，拿破仑晋升上尉，而且上任日期是一年之前，他能领到一年的全饷，但他没有获得新军职。凭借自卫军中校身份，他要求升至正规军中校，对于这一放肆主张，战争部所做标记是“SR”（sans réponse，意为“无答复”）。[31]

拿破仑对他的巴黎见闻不以为意。“冲在大革命前头的是窝囊废，”他致信约瑟夫称，“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犯下各种罪行，从而找到法子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搞的阴谋像以前一样卑鄙。这些都毁了雄心壮志。人们同情不幸投身公共事务的那些人。”[32] 拿破仑其实是阿雅克肖的革命阴谋家，如果说同政坛浑水无涉的坦诚军人一面很不符合这一事实，他仍然在战略上成功扮演了这一角色。此时，拿破仑支持推翻君主制、将科西嘉修道院收归国有，这证明他是完全成熟的革命者。他在政治上倾向于雅各宾极端分子，再者，他们看上去也像赢家。随着大革命接近高潮，巴黎已经出现镇压行动，尽管他本人没有卷入这些事，但也无证据表明他反对它们。

1792年6月20日，巴黎暴民侵入杜伊勒里宫，他们抓住了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强迫国王头戴象征自由的红帽子站在王宫阳台上。拿破仑当时也在巴黎，布列纳在圣奥诺雷街的咖啡馆遇见了他。两人看见全副武装的群众向王宫进军，布列纳称，此时拿破仑说："我们跟着暴民吧。"他们在河边阶梯上站定位置，"惊讶又愤怒地"（表情想必是精心伪装出的）观看接下来的历史性场面。[33] 两天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描述了自己所见：

> 七八千人拿着长矛、斧头、剑、枪、烤肉叉、削尖的棍子当武器……朝国王去了。杜伊勒里宫花园的门关着，国民自卫军的1.5万人把守那儿。民众打破大门，进入王宫，把加农炮对准国王的寓所，还撞倒了四扇门。他们给国王看两个帽徽，一个是白色的（波旁王朝的颜色），另一个是三色的。他们让他选。选，他们说，选在这儿还是在科布伦茨统治。国王露面了。他戴上了红色无边软帽。王后和王子也戴了。他们让国王喝了口水。他们在王宫里待了四小时……这些行为都不符合宪法，并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在如此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难以预料帝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34]

布列纳后来说，拿破仑评论道："多么疯狂！他们怎么能放暴民进去？为什么不用加农炮轰倒四五百人？那样，剩下的人立马会自己跑掉。"那时候，国王一家的屈辱遭遇进一步降低了拿破仑对这个君主国的评价。他支持推翻国王，但不理解为何路易十六顺从地任人侮辱。事实上，要不了两个月，国王夫妇危险的自由生活就会结束。

十天后，奥地利和普鲁士入侵法国，这催生了某种非常正当的猜测：路易十六与其奥地利妻子赞成入侵，勾结法国的敌人。如今，这些敌人公开声明他们想恢复路易十六夫妇的所有权力。8月10日，拿破仑再次明显鄙视波旁王室的懦弱。当日，暴民再现，他们逮捕国王和王后，屠杀王室的瑞士卫队。拿破仑离开马伊街（rue de Mail）的旅馆，去骑兵竞技场（Place du Carrousel）的朋友家旁观事态。路上，人群中有人看见穿着得体的年轻军官，便要他高呼"国民万岁！"数十年后，他回忆道："如你所想，我赶忙喊了！"[35] 拿破仑的朋友家堆满了贵族财

产——贵族被迫在逃离法国前低价甩卖财物。他从楼上的窗户俯瞰，发现瑞士卫队不肯向暴民开枪，便用意大利语喊道："多蠢啊！"事实证明，卫队士兵为此付出了自己的性命。[36] 七年后，拿破仑自己搬入杜伊勒里宫，并叫人抹平了从那天起便留在这栋建筑上的弹孔。

9月上旬，暴民在巴黎市监狱无情地杀害1200多人，其中包括115名教士，当时拿破仑仍在首都。9月3日，不伦瑞克（Brunswick）公爵的普鲁士侵略军攻克凡尔登（Verdun），四天后，针对通敌嫌疑人的荒唐谋杀开始了。拿破仑日后试图为发生的事辩护："我想九月屠杀可能强烈震慑了侵略军。那一刻，他们看到全体人民站起来反抗自己了。"[37] 他声称屠杀执行者"几乎都是士兵，他们……决心不放过面前的任何敌人"。至于资深雅各宾革命者，"不管人们怎么评价，他们并非卑鄙之徒。很少有人能像他们那样在世上留下印记"。[38] 统治法国后，拿破仑并未否认自己的雅各宾历史："曾有一度，一切有血性的人应融为一体。"他甚至分别给了小罗伯斯庇尔的遗孀和女儿7200法郎、1800法郎抚恤年金。[39] 他评估亲身经历的形势，像父亲一样支持看上去像赢家的一方。

1792年9月21日，法国正式自称共和国，立法议会则宣布路易十六将因通敌、对法国人民犯罪受审。前一天，香槟-阿登地区（Champagne-Ardenne）的瓦尔米（Valmy）爆发战斗，弗朗索瓦·克勒曼（François Kellermann）和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 François Dumouriez）两位将军击败不伦瑞克的普军，挽救了共和国。瓦尔米会战证明，法国公民军队可以战胜反革命国家的正规军。

到10月中旬时，拿破仑已返回科西嘉，并宣传雅各宾派的事业。他没有去法国正规军第4炮兵团就任上尉，而是复任科西嘉国民自卫军中校。他发现，自己走后，特别是九月屠杀和共和国立国后，岛上反法情绪大大增强。然而正如他所说的，他仍然"相信科西嘉的上上之策就是

变成法国的省”。[40] 拿破仑从激进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变成了法国革命党人，原因既不是他终于走出了学生时代的欺侮阴影，也和他父亲毫无关系，更不像近年来某些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说的那样是奇怪的性心理作祟。他之所以转变，仅仅是因为法国和科西嘉政局风云突变，他在其中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剧变。比起波拿巴一族，保利更想同势力更大、更具政治影响力的布塔福科一族和波佐·迪·博尔戈一族合作。他反对波拿巴家族支持的大部分革命议题，如建立共和国、关闭修道院。保利也不让吕西安当自己的幕僚，甚至设法阻止拿破仑重任国民自卫军中校。既然科西嘉民族主义的化身如此决绝地抛弃拿破仑及其家人，他也就没法再当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了。

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个人主义强烈的科西嘉宗族政治中，波拿巴家族渐渐输给保利派。由于阅读、教育、在巴黎的日子、法国文化的浸润这些因素，就连拿破仑在仍是狂热的科西嘉民族主义者时，他的脑子里也充满了法国思想。奥地利和普鲁士大举入侵，威胁了大革命一下子提出的普遍理念。拿破仑也明白，科西嘉关心的事较之这些理念有多狭隘。接下来几个月，他越发地认为自己不是科西嘉人，而是法国人。多年后，一位市长试图恭维他：“陛下，您不是法国人，但您依然热爱法国，为它付出良多，这太令人惊奇了。”拿破仑说：“我感觉像被他打了一拳！我背过身去了。”[41]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斩首，以及此后在巴黎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成立，都加速了保利派和波拿巴家族的分裂进程。某个目击者回忆，拿破仑听闻路易死讯后私下感叹：“噢！可怜的家伙们！不幸的家伙们！他们要经历无政府状态了。”[42] 10月，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落得丈夫一样的下场。拿破仑认为处死国王是个昏着。“如果法国人温和一点，不杀路易，”他后来提出，“整个欧洲都会革命，结果这场战争救了英国。”[43] 然而，当时他还是公开支持已经发生的事，写信件抬头时也开始使用共和国的称呼“公民”。[44]

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Piedmont-Sardinia）对法宣战之后不久，法国在2月1日也对英国与荷兰宣战。欧洲君主国忽视瓦尔米的结论，联合起来惩罚弑君的共和国。1793年3月，国民公会建立公共安全委员会，7月时它实际上成了法国政府的执行机关。委员会的杰出成员有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兄弟与路易·圣朱斯特（Louis Saint-Just）。8月23日，法国政府颁布普遍征兵令（levée en masse）。根据此令，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健壮男子皆需响应号召，捍卫大革命与祖国（la patrie）。法军原有64.5万人，普遍征兵令使其兵力翻了一倍还多，达到150万人，它也让全体国民在共和国命运背后团结起来。

战争迟早会爆发，但共和国政权对英宣战却是大错特错。当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45]（1783年，小皮特掌权，当时他24岁，年轻得惊人）的托利党政府打心眼里反感弑君的法国。凭借其岛国的地理优势，英国将成为目前为止革命法国与拿破仑法国最执着的敌人，在接下来二十三年中，双方和平相处的时间只有十四个月。早在1790年，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就预言了恐怖统治与独裁者崛起。“相信我，”小皮特对伯克说，“我们会继续下去，直到审判日。”[46]仅仅十年前，英国还在美洲受辱。此刻，英国意识到，它有机会利用海军力量打击法国的海外贸易，使法国殖民地中立化或将其夺为己有，同时巩固自己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小皮特与其继任者们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拿破仑法国，此举不仅满足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也营造了完美的地缘政治意识，让英国有望取代法国成为世界霸主。为此目的，伦敦的小皮特政府发放大量政府间直接现金补助，资助一连串反法同盟（总计至少有七个），拿破仑管这些钱叫“皮特的黄金”。[47]

路易十六被处死后的下月（2月），拿破仑第一次领到重要的指挥任务。保利的外甥皮耶尔·迪·切萨里·罗卡（Pier di Cesari Rocca）将率远

征军“解放”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三个撒丁小岛，拿破仑负责指挥炮兵部队，他私下嘲笑罗卡是“晾衣架”。[48] 海军将领洛朗·德·特吕盖（Laurent de Truguet）率领一支小型舰队从博尼法乔出发，其中有一艘22炮轻型巡航舰“刺莺号”（La Fauvette）。2月18日，拿破仑同其科西嘉国民自卫军登上“刺莺号”。23日晚，军队攻占圣斯特凡诺岛（San Stefano），该岛距马达莱纳岛（Maddalena）和卡普雷拉岛（Caprera）不过800码。拿破仑布置好他的加农炮，以便炮轰另外两个岛，次日，大炮的确冲它们开火了。然而，罗卡的军队中，普罗旺斯（Provence）应征农民人数最多，他们在“刺莺号”上发现，一身戎装、斗志昂扬的撒丁人正拥向海滩，看起来并不怎么渴望解放。于是农民哗变，罗卡遂放弃整个远征。拿破仑大怒，但他只能钉死加农炮，并把臼炮丢进海里。

拿破仑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耻辱的经历，但保利只派了1800人，如果他按照国民公会的要求提供1万人，远征可能会成功。拿破仑朝保利抱怨道，他的部队“完全没有战争必需品，没有帐篷、没有制服、没有斗篷、没有炮兵辎重，就这么行军了”。他补充道，支撑他们的纯属“成功的希望”。[49] 新恺撒的初阵并不顺利，但他从中悟到了士气、后勤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性，再多的学校课程也不及这次的教训深刻。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保利政府更加亲英（1794年7月23日，英军在保利首肯下占领科西嘉岛）疏法，拿破仑尽力维持两大分立的忠诚感，即便某次争吵后保利管吕西安叫“毒蛇”（serpent）。不信神的革命党人处死路易十六后，叛徒在天主教影响深厚的法国西部旺代地区作乱，这些人被称作朱安党（Chouans），他们支持波旁王朝，对抗政府。巴黎遂向全国上下派遣国民公会特派员（représentants-en-mission，据说这些人还携带移动式断头台[50]），确保思想意识统一，而保利在阿雅克肖城寨加筑防御工事，拿破仑的选择空间于是更狭窄了。迟至4月18日，他撰写小册子《致国民公会》为保利辩护，但当月他也写了《致阿雅克肖市政府的请愿书》，力劝该镇宣誓效忠共和国。萨利切蒂下令以谋反

罪逮捕保利，拿破仑遂需要紧急决策。为了“爸爸”保利，岛民造反了，他们烧毁萨利切蒂的傀儡像，砍倒共和派栽种的“自由树”。只有巴斯蒂亚、圣菲奥伦齐、卡尔维及上述地区的法军卫戍部队坚持拥护共和国。

在1793年4月的国民公会上，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派在政治上取胜，这一事态明了后，与人合力打赢瓦尔米会战的吉伦特党人迪穆里埃将军随即叛变，投奔奥普同盟。迪穆里埃的背叛和其他危机导致罗伯斯庇尔大规模逮捕吉伦特党人，10月31日，其中22人在三十六分钟内被斩首。恐怖统治开始了。

5月3日，拿破仑试图去巴斯蒂亚与约瑟夫会合，但保利派山民（montagnards）扣押了他。博科尼亚诺（Bocognano，波拿巴家族在当地曾有房产）的村民很快释放了他，于是他能继续上路了。5月23日，保利派暴民把阿雅克肖的波拿巴宅洗劫一空，但他们没像某些记载说的那样烧毁房子（很可能也没造成太大破坏，因为四年后波拿巴宅的翻修劳务费只有131法郎）。[51] 保利主导的科西嘉议会正式宣布波拿巴家族不受法律保护，不过他们在岛上的30位亲戚不受牵连。议会按捺不住，诬蔑莱蒂齐娅，说她的家族“生于暴政的泥沼，靠遗臭万年、沉溺女色的已故帕夏（Pasha）马尔伯夫栽培，在他眼皮底下过活”。[52]

5月31日，拿破仑和巴黎雅各宾政府代表、驻科西嘉特派员萨利切蒂试图夺回阿雅克肖，但失败了。次日，拿破仑写了《科西嘉省军政态势回忆录》，他终于谴责保利“满怀仇恨与复仇执念”。[53] 此文是他挥别故乡之作。1793年6月11日，波拿巴家族乘“新信徒号”（Prosélyte）离开卡尔维，两天后他们在土伦（Toulon）上岸，自此告别从祖辈开始生活了约二又四分之三世纪的科西嘉岛。[54] 科西嘉雅各宾派失势后，萨利切蒂也被迫逃往普罗旺斯。当月末，保利已奉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55] 为科西嘉国王。

拿破仑从未和故土一刀两断，尽管后来他只回去了一次：1799年，

他从埃及回国时在科西嘉待了几天。1796年10月，拿破仑下令夺回科西嘉岛，他大赦岛民，只驱逐保利派最核心人物，不管怎么说，这些人都被流放了。[56] 1807年，保利逝于流放地伦敦。拿破仑日后谈话时“怀着对保利的最大敬意”，但1793年6月13日，当他踏上普罗旺斯海岸时，他知道自己要在法国构筑未来。[57]

政治难民波拿巴一家抵达土伦，这个九口之家缺少父亲，几乎全靠莱蒂齐娅一生的积蓄及第4炮兵团上尉拿破仑的微薄薪水度日。此外，拿破仑就只能靠自己的教育和抱负支撑他们了。他把家人安置在土伦城外的拉瓦莱特村（La Valette），然后带着又一份离队原因证明去尼斯（Nice）加入他隶属的团，这一回，萨利切蒂在他的证明上签了字。幸运的是，孔帕尼翁上校需要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军官，他麾下原有80名军官，但国王被处死、大批贵族离开法国后，只有14人还效忠共和国。

拿破仑在欧索讷的上司的弟弟让·迪泰伊（Jean du Teil）将军交给他一项任务——组织队伍护送火药至法国革命军中的意大利军团（Army of Italy）。7月中旬时，拿破仑转入南方军团（Army of the South）。南方军团司令、前职业画家让-弗朗索瓦·卡尔托（Jean-François Carteaux）将军准备包围阿维尼翁（Avignon）的联盟派（fédérés，反雅各宾叛军），当地有一座重要军火库。7月25日，阿维尼翁陷落，虽然拿破仑当时不在场，但这次胜利成了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作品、政治小册子《博凯尔晚餐》（*Le Souper de Beaucaire* ）的背景。从1792年1月开始，他的文章都包含军事或政治倾向。他描写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幻想时所用的华丽散文辞藻听来如此虚假，如今他用这种文风描绘即将自饰主角的重大事件，它便呈现出更真实的壮丽色彩。1792年后，拿破仑不再给文学作品做笔记，他倒是写了阿雅克肖复活节事件记录、针对撒丁远征的自我辩护以及从英军手中夺取科西嘉的计划。

博凯尔村位于阿维尼翁和阿尔勒（Arles）之间，1793年7月末，拿破仑写了《博凯尔晚餐》，用虚构手法描述了当地旅馆的一次晚餐。小册子采用对话体，参与讨论的角色如下：卡尔托军队的一位军官，两名马赛（Marseilles）商人，一位蒙彼利埃市市民，一个来自邻近的尼姆（Nîmes）的市民。小册子辩称法国形势十万火急，所以人们必须支持巴黎雅各宾政府，否则欧洲暴君和复仇心切的法国贵族就会取胜。代表拿破仑的角色对卡尔托评价颇佳，“今天这里有6000人，不出四天就会有10000人”，并声称卡尔托的全部战损仅有五死四伤。同样地，他预言以马赛为大本营的联盟派反对者将面临凄惨下场。拿破仑忍不住指涉自我、攻击保利：“因为最富有的家庭支持共和国统一，他就劫掠没收他们的财产，还与所有留在我军之人的祖国为敌。”[58]

小册子反映拿破仑确实是雅各宾分子，他用讽刺口吻评价联盟派：“每个知名贵族都急切盼望你们胜利。”其他用餐者只开了六次口，而且其发言的主要作用是引出军人的雅各宾式反驳。最终，他的雄辩说服了大家，他们痛饮香槟，一直喝到凌晨2点，“变得无忧无虑”。拿破仑把《博凯尔晚餐》手稿给萨利切蒂（现在他是国民公会驻普罗旺斯特派员）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Augustin Robespierre）看，在他俩安排下，小册子以公费出版。《博凯尔晚餐》让雅各宾派认为，拿破仑是政治上可信的军人。

8月24日，卡尔托费了大功夫才夺回马赛。四天后，海军将领亚历山大·胡德（Alexander Hood）应上月叛变的土伦联盟派邀请，率英军、西班牙军和那不勒斯军进入土伦港，其兵力总计15000人。里昂起兵支持保王党，旺代（Vendée）发生了叛乱，西班牙军和皮埃蒙特-撒丁军侵入南部领土，普军和奥军则进犯东部边境，因此夺回土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9月7日，拿破仑就任第2炮兵团少校（chef de bataillon）。也许是因为科西嘉籍上校让-巴蒂斯特·塞沃尼（Jean-Baptiste Cervoni）的请求，下一周，他去奥利乌勒（Ollioules）拜访卡尔托司令部，该地正好

位于土伦西北方向。[59]

巧就巧在卡尔托的特派员不是别人，正是萨利切蒂。南方军团右翼炮兵指挥官多马丹（Dommartin）上校已经负伤，副指挥官佩里耶（Perrier）少校不在队，卡尔托几乎不懂炮兵，正在物色替代人选。萨利切蒂与同僚托马·德·加斯帕兰（Thomas de Gasparin）劝卡尔托选拿破仑，尽管他只有24岁。拿破仑猜测巴黎军校的教育是他获得首次重大突破的决定因素。他后来说，炮兵部队缺少“饱学之士，全由中士和下士指挥，我了解炮兵军务”。[60] 绝大部分法军军官是贵族，此时，大量贵族或移居国外，或被斩首，这严重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所以拿破仑的年龄被忽视了。当然，他的盟友萨利切蒂监督卡尔托的任命，这一点也帮了他。

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私下回报巴黎，称卡尔托“无能”。卡尔托在土伦和奥利乌勒之间部署了8000人，让·拉普瓦佩（Jean Lapoype）将军另率3000人驻于城市的拉瓦莱特一侧，但卡尔托不打算进攻。10月9日，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已让拿破仑获得土伦城外所有炮兵的指挥权，因为炮兵显然会在战斗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便成了围城战的中心人物。[61] 不久，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向巴黎报告称：“炮兵军官里只有波拿巴清楚自己的所有职责，他的担子太重了。”[62] 后半句不对——拿破仑永远不嫌工作多。长达三个月的围城战后期，他有了两个副官帮手：奥古斯特·马尔蒙与安多什·朱诺（Andoche Junot）。朱诺原是科多尔省（Côte d’Or）的一名营军需官，拿破仑向他口述信件时，一发加农炮炮弹在两人身边触地，飞扬的沙砾落了他们一身，朱诺冷静地说他不用撒沙子吸墨汁了[63]，拿破仑非常喜欢出身良好的马尔蒙，但从这时起他喜欢上了朱诺。[64]

今天，只要参观一下土伦上方的拿破仑的炮台旧址，当时他应该采取的策略显而易见。土伦有一个外港、一个内港，该地以西还有俯瞰二

者的埃吉耶特海角（L’Eguillette）。“要掌控海港，”拿破仑向战争部长让-巴蒂斯特·布绍特（Jean-Baptiste Bouchotte）报告称，“得先掌控埃吉耶特。”[65] 为了向内港的皇家海军舰队倾泻滚烫的加农炮炮弹，法军需要拿下控制海角的马尔格雷夫要塞（Fort Mulgrave，由其指挥官第一代马尔格雷夫伯爵[66] 所建，因防守牢固得到绰号“小直布罗陀”）。尽管所有人都明白要塞的重要性，但只有拿破仑才把它纳入攻占的计划。只要把皇家海军逐出土伦，联盟派就无法独自守住内含28000人的城市，所以说，一旦法军拿下要塞，战略形势将豁然开朗。

拿破仑很快投身攻占马尔格雷夫要塞的方案。他说服附近城镇，一共拿到14门加农炮、4门臼炮以及储备、工具和弹药；他派军官去更远的里昂、布里扬松（Briançon）和格勒诺布尔（Grenoble），请求意大利军团把没有用于防卫昂蒂布（Antibes）和摩纳哥（Monaco）的加农炮交给他；他在奥利乌勒建立了一座80人的兵工厂，生产加农炮和炮弹，还从尼斯、瓦朗斯和蒙彼利埃征集马匹；他给部下们注入不停活动的意识。因为火药不足、弹药筒尺码不对、受过训练的拉炮战马摊上其他任务等原因，拿破仑总是苦苦央求、怨愤发怒，他越过卡尔托司令部和直接领导，给布绍特寄去几十封信，提及自己的需求，有时他甚至会直接把信寄给公共安全委员会。

拿破仑对军务组织长官（ordonnateur en chef）[67] 、好友肖韦（Chauvet）诉苦，慨叹当前安排“混乱浪费”和“显然愚蠢”，他绝望地说：“军队补给全凭运气。”[68] 他写给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的典型信件称：“人可以二十四小时不吃饭，必要时也可以三十六小时不吃，但不能三分钟没有火药。”[69] 拿破仑的信显示他干劲充沛、工作积极，且事无巨细地关心从配给价格到正确修筑栅栏的一应事务。总体上，他却一直传达同样的信息：军队只有约60万份（600 milliers，仅相当于半吨多）火药，如果不能生产更多，他们无法发动重要战斗。10月22日，拿破仑致信公共安全委员会，他说“自己所属兵种不受重视，所以深感痛

苦”，并补充道：“我必须力克无知和它引起的卑劣情绪。”[70]

拿破仑又是威吓咆哮，又是征用物资，又是走政治后门，结果他很快凑出一支实力可观的炮兵辎重队。他征用了一个铸造厂和一个车间，让前者制造子弹和臼炮，让后者维修滑膛枪。他动用强大的领导力，并且暗示某种威胁（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时期，雅各宾军官可以这样做），借此让马赛政府提供了数千只沙袋。到围城战末期时，拿破仑已经指挥11座炮台，拥有近100门加农炮和臼炮。

拿破仑开始鄙视卡尔托。他完成上述工作时，此人没帮上什么忙。11月11日，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合谋用弗朗索瓦·多佩（François Doppet）将军换下卡尔托。多佩对麾下炮兵指挥官的印象良好，向巴黎报告道：“我总是看到他坚守岗位。他从不离开炮台，需要休息时，他就裹着斗篷躺在地上。”[71] 然而，拿破仑并不赞赏多佩。11月15日，法军进攻马尔格雷夫要塞，多佩过早吹号收兵，事后拿破仑返回多面堡，咒骂道：“我们错过了攻打土伦的机会，因为一个（此处原为脏话，19世纪人士将之删除）急着撤退！”[72]

在土伦的炮台和多面堡，拿破仑本人表现得很勇敢。有一次，他身旁的炮兵战死，他便捡起浸满鲜血的推弹杆，亲自装填和发射加农炮。拿破仑认为此举令他染上疥疮。“没过几天，我就痒个不停。”他日后谈起这一“可怕的疾病”时如是说。[73] 在意大利和埃及战局中，他始终患有皮肤炎，直到1802年才痊愈。当时，拿破仑的医生让-尼古拉·科维萨尔（Jean-Nicolas Corvisart）让他洗硫黄浴，“在我胸口放了三剂发疱药……这是我健康水平改善的转折点。此前我总是身形瘦弱、面色蜡黄，此后我身体一直很好”。[74] 有些历史学家争辩道，同染血推弹杆的有限接触不足以构成真正的病因，但拿破仑很可能也戴了死者的手套，这大大增加了感染皮肤炎的可能性。[75] [76]

在进攻防卫马尔格雷夫的外围要塞时，拿破仑受了伤——一名英军

炮兵“把长矛刺入”他的左大腿。他试图从炮眼钻进炮台，但幸运的是，援军从后方赶到，和他同时进入炮台。很多年后，拿破仑给一位医生看“左膝盖上方的（伤疤）深痕”，并回忆道：“军医们犹豫不决，不确定最终是否有必要截肢。”[77] 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他写了一本讲述尤利乌斯·恺撒战史的书，此书比较了战斗时受严密保护的古代将帅和当代指挥官，总结道：“如今，若想评估战局、观察战况、发号施令，总司令被迫每天直面炮口，他总得待在加农炮射程内，常常也要待在葡萄弹射程内，因为将军们的视野不够宽，无法让他们避开子弹。”[78] 拿破仑的诋毁者指责他本人并不勇敢。举个例子，1815年英国作者海伦·威廉斯（Helen Williams）写道：“懦弱乃波拿巴晚年时的习性。”[79] 此言荒诞不经，懦夫不会参加60次战斗，而且在战斗之间，拿破仑近距离侦察敌军时多次死里逃生。雷根斯堡（Regensburg）之战中，不少人在他身旁战死，他自己也中了一弹，这进一步证明他有非常勇敢的性格。拿破仑的士兵既欣赏他的勇气，也喜欢见他夸大他们的英勇。一群炮手试图在马尔格雷夫要塞的手枪射程内搭建炮台，但他们非死即伤，拿破仑便把炮台取名为“无畏者”（Hommes Sans Peur），于是仍有志愿者奔赴炮台岗位。没人比他更懂普通士兵的心理。

雅克·迪戈米耶（Jacques Dugommier）将军非常能干，11月17日，他接过了多佩的指挥权。不久之后，援军到来，围城军队遂增至37000人。拿破仑与迪戈米耶关系良好。11月中旬，他已用炮台包围马尔格雷夫要塞。23日，要塞中的英军指挥官查尔斯·奥哈拉（Charles O’Hara）突围，他设法反击，试图钉死其中一座法军炮台的大炮，结果被拿破仑俘虏。“迪戈米耶将军凭借真正的共和国勇气战斗，”拿破仑报告这次行动时称，“我们夺回了炮台……我们及时拆下国民公会的火炮的钉子，让退兵更加混乱。”[80] 修好开火机关被金属钉子钉死的大炮是非常罕见的事，更不用说迅速修好了，由此可见拿破仑的操练让士兵达到了怎样的专业水准。

1793年12月17日（周二）凌晨1点，迪戈米耶着手执行拿破仑制订的攻打土伦的计划。克洛德·维克托-佩兰（Claude Victor-Perrin，未来的维克托元帅）率领一路纵队越过马尔格雷夫要塞第一道防线，但在第二道面前败退。3点，迪戈米耶不顾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仍然派拿破仑和让-巴蒂斯特·米龙（Jean-Baptiste Muiron）上尉率2000人接着进攻。拿破仑的坐骑在其胯下被击毙。一番激烈的肉搏战后，法军终于攻克要塞，拿破仑随后让炮口朝下，向整个海港内的皇家海军舰队扫射烫热的加农炮炮弹。他一生都记得2艘西班牙火药船爆炸的场景，数十年后回忆道："弹药库腾起烟火的旋风，仿佛火山爆发；13艘船在熊熊燃烧，如同大片焰火；火焰清晰地勾画出桅杆的轮廓、船只的外形，这幕无与伦比的壮丽场面持续好几个小时。"拿破仑语带夸张，他说大火席卷了整个舰队，实际上只有2艘船起火，不管怎么说，炮轰效果还是令人激动不已。迪戈米耶在报告中盛赞拿破仑，称他为"这个难得的军官"。[81]

次日，联军撤出土伦，引发大混乱。拉普瓦佩将军攻下法龙高地（Faron heights），接着他也开始从东侧炮轰城市，土伦城内立刻变得慌乱不已。此后不久，萨利切蒂和加斯帕兰处死了约400个疑是联盟派成员的人，但拿破仑未参与此事。[82] 土伦的胜利赋予拿破仑他应得的巨大利益。12月22日，他晋升旅级将军，就任罗讷河至瓦尔河（the Var）海岸防务监察。通过萨利切蒂，他引起了资深政客保罗·巴拉斯（Paul Barras）和路易-斯塔尼斯拉斯·弗雷龙（Louis-Stanislas Fréron）的注意。然而，正如他日后所说的，最妙之处在于土伦会战"让他建立了自信"。[83] 拿破仑已表明自己能胜任统帅之位。

18世纪90年代，大批法军将领反叛，这一军事史上的罕见现象意味着青年才俊的晋升速度能突破先例。因恐怖统治、移民出境、战争折损、政治清洗、贬黜败将、政治猜疑、找替罪羊而流失的军官人数超过了正常辞职或退役人员的数量，于是有人升得很快就不足为奇了。如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e），1789年他还是下士，1793年他就当将军

了；再如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92年他还是中尉，1796年他也当将军了。所以说，拿破仑的晋升在当时的军政环境下绝非特例。[84]尽管如此，他的进度还是可观的：他当了五年半少尉、一年中尉、六个月上尉，此外，他只当了三个月少校，而且根本没当过上校。拿破仑已服役九十九个月，而假期和擅自脱队时间就占了五十八个月，他服现役的时间也不满四年，但在1793年12月22日，他也成了将军，尽管才24岁。

---

[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1 p.78，July 22，1789

[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1

[3] 在巴黎，雅各宾派与稍稍温和些的吉伦特俱乐部（Girondin Club）将视对方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4]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10，Collins，Irene，*Napoleon and His Parliaments* 1979，p.7

[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28-9，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45

[6] Thrasher，Peter，*Pasquale Paoli* 1970，p.197

[7] 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p.79-83，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p.141-2

[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71

[9]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73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9 p.86，June 24，1790

[1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1

[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1. The pamphlet itself has not survived.

[13]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Ⅰ p.44

[14]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42

[15]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7

[16] 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128

[17] 制宪议会与国民公会（1792年10月～1795年10月）之间还有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792年9月）。——译者注

[18]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2

[19]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8

[2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2

[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3

[22]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39

[23]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45

[24]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ix

[2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2

[2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4

[2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7 p.115，July 25，1792

[2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4

[29] 原文误作“中校级别的参谋”。根据Patrice Gueniffe的*Bonaparte*，拿破仑本想自任国民自卫军参谋尉官，但立法议会禁止现役军官在国民自卫军的营中任职，除非被部下选为中校。为了留在科西嘉国民自卫军，拿破仑只能去竞选中校。——译者注

[30] Richardson，Hubert N.B.，*A Dictionary of Napoleon and His Times* 1920，p.469

[3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8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

[3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

[3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5 p.113，June 22，1792

[35] Robb，Graham，*Parisians* 2010，p.435

[36] Orieux，Jean，*Talleyrand* （New York）1974，p.224

[3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 46-7

[3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7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9，Thibaudeau，Antoine，*Mémoires sur la Consultat 1799 à 1804* 1913，p.59

[4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8

[4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8

[4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185-6

[43]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p.137-8

[44] CG1 no.75 p.121，January 12，1793

[45] 其父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1708～1778年）曾任首相，在七年战争中领导英国战胜法国。

[46] Pellew，*Life of Lord Sidmouth* Ⅰ p.72

[47]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 （Cambridge，MA）1969，p.345

[48] Thrasher，Peter，*Pasquale Paoli* 1970，p.255

[4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7 p.122，March 2，1793

[50] 1792年4月，政府首次使用断头台处死一名路匪，但此后不久，斩首就成了处决政治犯与平民的普遍方式。

[51] Musée National de la Maison Bonaparte

[52]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8，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8

[53]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149

[54] Paoli，François，*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2005，p.9

[55] 乔治三世，英国国王，1760～1820年在位，因此他经历了整个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在此期间，他的神智在清醒与癫狂之间定期转换。1811年，英国实施摄政，乔治三世之子、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任摄政王，实际上是他代替父亲统治。

[56] Foladare，Joseph，*Boswell's Paoli* 1979，p.225

[57] Bodleian MS Curzon e.1.p.23

[5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128，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Ⅱ pp.477-97

[59]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2

[60] Bodleian MS Curzon e1. p.16，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87

[61] 临终时，拿破仑想起了加斯帕兰的帮助，在遗嘱里给他的后人留了10万法郎，并解释道："在我的朋友迪戈米耶来之前，加斯帕兰保护了我，让我免遭指挥军队的总参谋部那帮无知之辈的迫害。"Jonge ed.，*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p.78.

[6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2

[63] 当时人们写加急文书时，如果来不及等墨水干，就撒上一层沙子来吸墨水。——译者注

[6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3，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53-4

[6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1 p.142，November 14，

1793

[66] 1805～1806年，马尔格雷夫任小皮特的外交大臣。

[67] 军务组织长官与后文的军务总监（Intendant général）、军务组织官（ordonnateur）同属军务部，其层级由上至下依次为军务总监、军务组织长官、军务组织官。——译者注

[6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5 p.132，October 1793

[6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6 p.133，October 16，1793

[7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2 p.137，October 2，1793

[7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49

[7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52

[73] Friedman，Dr Reuben，*The Emperor’s Itch* （New York）1940，p.33

[7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43

[75] 不管拿破仑是怎么得了这种高传染性螨虫疾病，但患者不止他一人。那时的所有军队里，疥疮（la Gale）很常见，法军给它起了两个趣称：“挠痒病”（Gratelle）和讽刺性的“可人儿”（la Charmante）。一名老兵回忆道：“大家都在挠痒。”公共健康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显示，军中至少有40万人患疥疮。拿破仑日后的战局中，他设立了专门治疗疥疮的医院。Desclaux，“A Propos de la ‘Gale’”，p.868；Brice，*The Riddle*，p.139；Friedman，*Emperor’s Itch*，p.32.

[76] Friedman，Dr Reuben，*The Emperor’s Itch* （New York）1940，pp.22-3

[77]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Memorial de Saint-Hélène*：*Journal of the Private Life and Conversation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at St Helena* 4 vols.1823，Ⅰ pt 2 p.67，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Ⅰ pp.198-9，229

[7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2

[79]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80

[8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5

[81] Crook，Malcolm，*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91，p.145

[82]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9，p.10

[8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52

[84]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9

第三章 渴望

如果暴民胜利，他们就不是暴民了，而是改叫国民，但若失败，哎呀，那他们的名字就是流氓、叛徒、小偷等，有些人还会被处死。

——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对巴里·奥马拉医生说

我只能决胜沙场，约瑟芬却用善良征服所有心灵。

——拿破仑对侍从路易·德·博塞-罗克福男爵说

1794年2月7日，拿破仑就任意大利军团炮兵指挥官。皮埃尔·丹贝里翁（Pierre Dumberion）将军与奥地利盟友、意大利西北部的独立王国皮埃蒙特-撒丁（它也统治撒丁岛）交战五周，小胜三场。拿破仑参加了这次战役，他表现不错，但并不出彩。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the Ligurian Alps）的峰峦与山口的美丽之下却暗藏险境，他也在这五周内熟悉了它们的地形。拿破仑与脾气火爆、能力非凡的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将军并肩作战。5月，马塞纳把撒丁军逐出了文蒂米利亚（Ventimiglia），从侧翼包抄滕达山口（Col di Tenda）的奥撒联军，自此赢得绰号“胜利的宠儿”。

战役很快结束。夏初，拿破仑已返回尼斯和昂蒂布。他开始追求昂蒂布的漂亮姑娘欧仁妮·德西蕾·克拉里（Eugénie Désirée Clary），德西蕾年方二八，其亡父既是保王党人，也是富裕的织物商、肥皂商。1794年8月1日，德西蕾的姐姐朱莉嫁与拿破仑之兄约瑟夫，她的丰厚嫁妆多达40万法郎，波拿巴家族的金钱困扰终于解决了。拿破仑和德西蕾几乎全靠书信交往，次年4月，两人订婚。一年前，19岁的吕西安·波拿巴娶了22岁的克里斯蒂娜·布瓦耶（Christine Boyer），她是旅馆老板的女儿，虽美丽动人却目不识丁。吕西安办婚姻证明时用了自取的革命名号布吕蒂斯（Brutus）[1]，波拿巴家族里只有他如此改名。

1794年4月，拿破仑向公共安全委员会递交了经撒丁入侵意大利的计划，意大利军团成员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将其携至巴黎。好在计划书并非拿破仑亲笔写成，它出自朱诺之手，所以字迹清晰。拿破仑提出了具有战略价值的观点，如："不可分头行动，务必合兵出击"；"必须击败（奥地利），一旦成功，西班牙和意大利不战自溃"；"头脑发热的人才想打马德里，应该防守法西边界、入侵撒丁"。甚至在那时，他就开始急求集中权力了："应当统一调度阿尔卑斯军团和意大利军团。"[2]

拿破仑躁动难耐，注重细节，需要所有事都干得更快更好，倒霉的部下贝利埃（Berlier）少校首当其冲。"我非常不满意装填那16门（加农炮）的方式，"他致贝利埃的一封信写道，"你肯定很乐意回答以下问题……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另一封信则是："我不敢相信你贯彻指令那么慢，什么事都得给你讲三遍。"再小的军务也逃不过拿破仑的眼睛。"把炮台指挥官卡利（Carli）关起来，"他命令贝利埃，"他离队去昂蒂布找葡萄酒了。"[3]

皮埃蒙特战役期间，拿破仑收到官方的晋升旅级将军确认书，但他得先回答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贵族？"恐怖统治仍大行其道，所以他非常理智地否认了，严格意义上他撒了谎。[4] 大革命开始对自己的儿女张开血盆大口：3月5日，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下令处死极端主义的埃贝尔派（Hébertist faction）；4月5日，委员会又处决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和卡米耶·德穆兰。一位当时的人士指出，"面包店门口的石头上坐着成千上万的妇孺"，"巴黎人半数以上靠土豆过活，纸币毫无价值"。[5] 显而易见，雅各宾派既拿不出食物，也无法实现和平，巴黎人民推翻他们的时机成熟了。1794年，联军开始撤离西班牙、比利时与莱茵河（the Rhine）一线，一群吉伦特派阴谋者遂有足够的信心推翻雅各宾派，最终结束恐怖统治。

7月中旬的六天中，拿破仑代表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赴热那亚执行

秘密任务。他汇报了当地的防御工事，同法国代办（chargé d’affaires）让·蒂利（Jean Tilly）会谈五小时，并说服总督相信有必要巩固法国-热那亚同盟。此事让他更深入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圈子，但时机偏偏最糟。7月27日（革命历热月九日），巴拉斯和弗雷龙领导“热月政变”（Thermidorian reaction），推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次日，罗伯斯庇尔兄弟和60名“恐怖分子”被斩首。若拿破仑当时在巴黎，他可能被抓住，同他们共赴刑场。8月5日，拿破仑得知罗伯斯庇尔兄弟的下场，当时他刚从哥哥约瑟夫的婚礼上返回锡格（Sieg）的军营，该地位于尼斯附近。“小罗伯斯庇尔的命运让我有些感动，”他致信蒂利，“我喜欢他，相信他为人正直，但若他渴望暴政，要是他是我兄弟，我会亲手刺死他。”[6]

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的栽培当然导致拿破仑身陷怀疑。8月9日，一名军官带着十个士兵来到拿破仑在尼斯的住处，逮捕了他。他被押至尼斯的要塞，在那儿待了一天，接着又在昂蒂布的卡雷要塞（Fort-Carré）关了十天。（此前的军事生涯中，他视察过这两处要塞。）萨利切蒂的自保意识无可非议，他根本没保护拿破仑，事实上，他还翻遍对方的文件寻找谋反证据。[7]“他是高高在上的伟人，几乎不屑看我一眼。”拿破仑愤怒地评价自己的科西嘉同胞兼五年政治盟友。[8]

1794年，无辜者和战绩确凿的共和国英勇战士也逃不过断头台，所以拿破仑的确身处险地。他被捕的官方原因是炮台纠纷：他把炮架在马赛市向陆一侧，一些市民认为他不是抵抗侵略者，而是对付他们。之前在1月，拿破仑致信战争部长布绍特：“保护马赛港的炮台位置太离谱了，布局者是个十足的蠢货。”[9]当然，逮捕他的真正原因还是政治因素：他受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提携，又写了由其帮忙出版的雅各宾小册子《博凯尔晚餐》。“亲爱的朱诺，人们可以冤枉我，”拿破仑致信忠实的副官，“但我无辜就够了。我的良知就是听我自白的法庭。”[10]（朱诺忠诚却冲动，他想了个红花侠式[11]计划，打算劫狱，而犯人明

智坚决地制止了他："什么都别做，不然只会害了我。"[12] ）

拿破仑是幸运的。热月党人既不像雅各宾派那样对敌人不留余地，也没有纵容类似九月屠杀的法外监狱谋杀。8月20日，他因证据不足获释。拿破仑在狱中的物质生活并不辛劳，掌权后，他任命自己的监狱看守当宫廷侍从。他一出狱就重启科西嘉远征计划，不断骚扰可怜的贝利埃少校。他也有时间重新追求德西蕾·克拉里（他叫她欧仁妮）。9月10日，他致信她："您容貌迷人，性格可爱，赢得了您的爱人的心。"[13] 为了让她更具智慧的魅力，他给她寄书单，希望她照单阅读，还承诺今后在信中谈谈他对音乐的看法。他还力劝她提高记忆力，"形成自己的思维"。

拿破仑一向认为女性低人一等，但他显然清楚如何靠教育培养男人的良偶。他问德西蕾"用灵魂"阅读的效果，设法让她更知性地看待音乐，因为它"是生活中最大的乐事"。波拿巴家族曾在巴黎和罗马雇请乔瓦尼·帕伊谢洛（Giovanni Paisiello），1797～1814年此人几乎一直在谱曲。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后来说，拿破仑对帕伊谢洛所创作音乐的鉴赏力相当敏锐。拿破仑写给德西蕾的信并不是特别华丽，甚至说不上非常浪漫，但他爱意浓烈，而且他集中注意力的目的是吸引她，尽管他仍称她为"您"（vous），哪怕新生的共和国不拘礼节。[14]

德西蕾开玩笑似地批评拿破仑，不过他似乎很享受这种调侃。"小姐（mademoiselle），如果您能看到，"1795年2月，他致信她称，"您的信让我产生了怎样的感情，您就会相信自己的指责不义……我没有什么快乐不想与您分享。我的每个梦境，您都装点了一半。请确信，'最明理的女人爱最无情的男人'是一句凶险恶毒、判断失当的不公正评价，您并不相信您笔下的这句话。哪怕您正写下它时，您的手也未书写您的心。"[15] 他补充道，给她写信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最迫切的"灵魂"需要"。他为她订阅击弦琴杂志，好让她获知巴黎最新的音乐；他担心她

的老师对乐理课不够上心；他在信中加上长长一段歌唱技巧，这说明他谙熟声乐知识（或者说，至少他有自己的观点）。1795年4月11日，他终于亲切地称她为“你”（tu），并写道，自己“一生恋你”。[16] 拿破仑坠入了爱河。

1794年3月3日，拿破仑率15艘船、1174门大炮、16900名士兵从马赛起航，欲从保利和英军手中夺回科西嘉。远征舰队很快被一支英国海军分舰队驱散，其中2艘船被俘。英军舰队也有15艘船，但其火炮较少，兵力也只有法军的一半。在这场海战中，法军试图凭同等兵力对付部署能力明显更强大的皇家海军，拿破仑对败退不负责任，但这个“旱鸭子”代表也没从中学到什么教训。1793～1797年，法军损失军舰125艘，包括35艘战列舰，英军损失军舰38艘，包括11艘战列舰（英军军舰折损的主要原因并非法军袭击，而是火灾、事故和暴雨）。[17] 大战略的海洋方面永远是拿破仑的弱点之一。他固然常胜，却从未赢在海上。

远征搁浅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就失业了，而且他在将军资历表上只排第139位。虽说他是公认的炮兵专家，但人们认为他“太专注于谋求晋升”，所以意大利军团新任司令巴泰勒米·谢雷（Barthélemy Schérer）不想招募他。[18] 这句评价当然不假：拿破仑眼中军事与政治的区别至少与其心中的英雄亚历山大和恺撒眼中的一样小。然而，科西嘉远征舰队送他上岸后仅过八天，他就调任西方军团炮兵指挥。该军团屯于布雷斯特（Brest），正在镇压旺代保王党叛乱，军团司令为奥什将军。

恐怖统治中幸存的很多吉伦特党人组成了现在的政府。此刻，政府在法国西部打一场残酷肮脏的战争，死于此役的法国人比巴黎恐怖统治的所有牺牲品还多。拿破仑清楚，就算在旺代取胜也无甚荣誉。奥什只比他大一岁，所以他升职的机会不大。他已同英军和撒丁军交过手，对战其他法国人的前景已勾不起他的兴趣。5月8日，他去巴黎试图谋取更

好的职位，并带上16岁的弟弟路易［他想送路易去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19] 的炮兵学校上学］以及马尔蒙与朱诺这两个副官（米龙已成为第三个副官）。[20]

5月25日，拿破仑住进巴黎的自由旅馆（Hôtel de la Liberté），然后马上去拜访了代理战争部长奥布里（Aubry）上尉，但此人实际上把他贬为旺代步兵指挥官。“拿破仑感到受辱，”吕西安回忆道，“他回绝了。他在巴黎待业，领有失业将军的薪水。”[21] 拿破仑又称抱病，靠半薪勉强过活，但他仍把路易送去沙隆。战争部命令他要么去旺代，要么提供患病证明，要么干脆退役，但拿破仑继续忽视这些要求。数月来他艰难度日，但对命运仍泰然处之，8月，他致信约瑟夫：“我，我对生活几乎无爱……我发现自己总是置身濒临战斗的情境，只赞同一个观点：既然生活中存在毁灭一切的死亡，焦虑就是蠢事。”他还自嘲道：“我总是非常听天由命，再这样下去，朋友，迟早有一天马车驶来我也不让道。”[22] 历史学家严肃对待此言，导致它完全丧失了幽默韵味。

事实上，拿破仑决定享受巴黎的魅力。“在这里，恐怖时代的记忆不过是噩梦一场，”他告诉约瑟夫，“看来每个人都决心补偿吃过的苦头。因为未来不明，他们也决意在今朝尽情享乐。”[23] 拿破仑咬咬牙，初次踏入社交界，但他和女性相处时感觉不适。长相也许是部分原因。那年春天，某位女性见过他多次，她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瘦最怪的家伙……瘦得叫人同情”。[24] 还有一名女子给他取了绰号“穿靴子的猫”（Puss-in-Boots）。[25] 交际花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Laure d’Abrantès）当时认识拿破仑，她后来写了刻薄的回忆录，说两人熟识，但他们的关系很可能没那么好。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回忆道：“他的前额上耷拉着破旧的圆帽，头发扑了一层乱糟糟的粉，垂在灰色厚大衣领口。他曾说手套是无用的奢侈品，所以不戴它们。他蹬着粗劣的靴子，黑鞋油也没涂匀。他体格瘦弱，面色蜡黄。”[26] 难怪拿破仑不适应巴黎的时髦沙龙，甚至鄙视乐在其中的人。他和朱诺（阿布朗泰斯公爵

夫人洛尔未来的丈夫）交谈时曾批评花花公子的着装以及他们采用的咬舌音。称帝后，他确信郊区（faubourg）的时髦沙龙女主持在煽动对自己的敌意。拿破仑最爱的娱乐不是社交是求智，他旁听公共讲座、参观天文台、观看戏剧和歌剧。“悲剧激励灵魂、振奋心灵，”日后他告诉一位秘书，“可以且应当铸就英雄。”[27]

1795年5月，拿破仑在去巴黎的路上致信德西蕾：“离你如此遥远，分别如此长久，让我痛苦不堪。”[28]现在他攒了足够的薪水，可以考虑购买勃艮第拉尼（Ragny）的城堡。他列出自己靠当地各种谷物可获得的收益，估计堡中饭厅会是波拿巴宅里的四倍大，并做出共和意味强烈的评价：“拆掉三四座赋予城堡贵族气派的塔，它就只是一个人丁兴旺之家的宜居之所了。”[29]他告诉约瑟夫自己想成家。

“我在沙蒂永[30]的马尔蒙家见到许多女人。她们容颜美丽、性格宜人，”6月2日，拿破仑致信德西蕾，很明显他想引她吃醋，“但我亲爱的好欧仁妮，我一刻也不觉得她们比得上你。”两天后，他又写道：“亲爱的朋友，我没收到你的信，你怎能十一天都不写呢？”[31]克拉里夫人认为家里有一个波拿巴就够了，因此劝阻女儿写信，拿破仑也许察觉到了，一周后，他又只称呼德西蕾为“小姐”了。6月14日，他承认了形势：“我知道你永远保有对朋友的爱，但那不过是亲切的敬意。”[32]拿破仑致约瑟夫的信表明他仍爱德西蕾，但8月时，他又在信中称呼她为“您”了：“您要追寻本能，任自己去爱身边之物……您明白我命属险恶沙场，或荣耀凯旋，或马革裹尸。”[33]他的话固然煽情过头，但也有闪光点——真实。

6月24日，拿破仑给约瑟夫写了封信。乍看之下，此信只写了哥哥计划参与热那亚橄榄油贸易这类稀松平常的事，但他一边写信一边大哭，催他落泪的因素只有手足情吗？因德西蕾引发的自哀是否占了同等分量？“生活仿佛消散的空梦，”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并索要对方的画

像，“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心灵交融，你最清楚我的心完全属于你。”[34] 7月12日，拿破仑设法说服自己相信德西蕾已成过去，他致信约瑟夫，谴责阴柔男子太专注女色：“为她们痴狂，脑子里唯有她们，只因且只为她们而活。只要在巴黎待上六个月，女人就会明了她的使命和帝国疆界。”[35]

德西蕾抛弃了拿破仑，这加深了他对女人乃至爱情本身的深深疑虑。在圣赫勒拿岛上，他把爱情定义为“懒人的职业、战士的烦恼、君主的绊脚石”，并告诉一位随员：“爱情是诞生于社会的人造情感，真爱并不存在。”[36] 放弃追求德西蕾后，拿破仑不到三个月就做好再次恋爱的准备，但德西蕾似乎仍在他心中留有一席之地，哪怕她嫁给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Bernadotte）将军，最后成了瑞典王后。

1795年6月下旬，一股英军在圣纳泽尔（Saint-Nazaire）[37] 附近的基伯龙湾登陆，支援旺代叛军。事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们非常确信我军步兵占优势，所以嘲笑英国的威胁。”[38] 土伦会战后，他对待英军时总是自信过头，此事便是一个早期例子（诚然，这回他的确没错，因为10月时英国远征军已一败涂地）。除了土伦会战，拿破仑此后只和英军交过两次手——阿克会战与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想重返意大利军团炮兵部队，8月上旬他仍在为此事游说，但也认真考虑去土耳其任职，使苏丹的炮兵实现近代化。吕西安的回忆录称，值此事业波动期，拿破仑甚至细细盘算参加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军队，虽说比起军事优势，他的动机更偏向其经济利益。他开玩笑称：“几年后我成了东方大富翁，给三个妹妹捎回丰厚的嫁妆。”[39] 太后（Madame Mère，其母未来的名号）对这提议太较真，指责他连想都不该这么想。她认为儿子相当有可能因为“与政府一时不和”便去投奔东印度公司。亦有迹象表明俄国人想招揽他，好让他协助对付土耳其人。

1795年8月中旬，事情已临危急关头。战争部命令拿破仑去见其下属单位医学委员会，以确认他是否诈病。拿破仑便向同他有联系的政客求助，如巴拉斯、弗雷龙。其中一人把他编入战争部的历史和地形测绘局，虽然名称普通，但它其实是协调法军战略的规划部门。8月17日，拿破仑致信尼斯的意大利军团军务组织官西蒙·叙西·德·克利松（Simon Sucy de Clisson），称“他们让我当旺代军团将领，我不接受”，可才过三天，他就对约瑟夫自夸，“此刻，我隶属指示军队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测绘局”。[40] 亨利·克拉克（Henri Clarke）担任测绘局局长，他是伟大的军事组织家、“胜利的谋士”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的宠儿（protégé）。

战争部下属单位测绘局规模不大，运转高效，号称“当时最复杂的计划组织部门”。[41] 测绘局由卡诺创立，直接向公共安全委员会汇报工作。它从各司令处收集情报，部署军队调动，准备详细的行动指示，并协调后勤。克拉克的高级下属有让-吉拉尔·拉屈埃（Jean-Girard Lacuée）、塞萨尔-加布里埃尔·贝尔蒂埃（César-Gabriel Berthier）和皮埃尔-维克托·乌东（Pierre-Victor Houdon）这三位将军，他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战略人才。拿破仑很难找到比这里更适合学习补给、支援和后勤这些战略必备要素的地方了。（尽管19世纪早期军事词典里才出现战略这个词，拿破仑也从未使用它。）[42] 拿破仑在土伦的战术性战斗中表现突出，与那种战斗相比，1795年8月中旬至10月上旬，他习得了军事战略实践，这段时间虽然短，但很能调动智力。归根到底，他的军事成就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和吃苦耐劳的能力，但法国此时亦有才识过人的军事思想家及官员，他们能教导他，最终还能处理实现他的设想所需的详尽工作。在测绘局，他也能站在最佳角度上独立地评定将军的能力，判断哪些人有价值、哪些人可被抛开。

测绘局并不制定全局战略。公共安全委员会的政客酌定大局，但委员会很容易被党派斗争干扰。例如，1795年，在政客们争论是否渡过莱

茵河以及在何时何地渡河时，他们最后不得不打了起来，而测绘局只对每个选项提建议。8月，委员会取消了所有为土耳其战斗（或者说其实是对付土耳其）的计划，并下令战争结束前拿破仑不得离开法国。战争部下属各机关仍在找他麻烦，9月15日，他甚至被踢出现役将军名单。“我像狮子一样为共和国战斗，”拿破仑致信好友、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François-Joseph Talma）称，“而它的回报就是任我饿死。”[43]（不过他很快就复职了。）

测绘局采用奇怪的办公时间：下午1点到5点以及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因此，拿破仑有充足的时间撰写浪漫短篇小说《克利松与欧仁妮》（*Clisson et Eugénie*），以此告别他对德西蕾的单恋。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个故事受1774年歌德所作著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按照史诗传统采用精短句型。在埃及战役中，拿破仑读了不下六遍《少年维特之烦恼》，他读第一遍时很可能才18岁。此书是欧洲狂飙运动（Sturm-und-Drang）最重要的代表小说和当时一大畅销书，深深影响了浪漫文学运动和拿破仑自己的写作。虽然“克利松”之名取自拿破仑那时候的友人叙西·德·克利松，但名唤克利松的角色完全就是拿破仑，两人的共同点延伸至年龄——同是26岁。“克利松一出生就迷恋战争，”故事开头写道，“同龄小孩还在如饥似渴地听人讲炉边故事时，他却狂热地梦想战斗。”克利松加入革命队伍国民自卫军，“很快超越人们寄予他的厚望，胜利是他的忠实伴侣”。[44]

克利松的同辈靠调情、赌博、妙谈等事消遣娱乐，但克利松不为所动，因为“像他那样想象鲜明、心灵炽热、才智广博、头脑冷静的人，注定会被同风情女子的矫情对话、诱惑游戏、赌桌逻辑以及大声喊出的巧妙侮辱言论烦扰”。[45]唯有置身森林与自然进行卢梭式谈话，这样的完人才能放松自在，“他感到自身达到和谐，嘲笑人类的恶行，鄙视愚行与暴行”。克利松在温泉邂逅16岁的欧仁妮，“她露出排列整齐的珍珠白牙齿”。小说接着写道：

> 他们视线交汇，心灵融合，没多久他们就意识到两人乃天生一对。在打动人类的爱情中，他的爱最为热烈贞洁……他们觉得彼此的灵魂恍若一体。他们克服所有困难，一生相守。两位痴情恋人的心中只洋溢着最高尚的爱情、最纤细的情感、最强烈的性欲。[46]

克利松与欧仁妮结婚生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慷慨济世，深受穷人敬仰，但田园诗般的童话太美好了，无法长久。有一天，一封信送来，通知克利松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动身去巴黎，“有重要任务在那儿等着他，它呼唤他这样的人才”。克利松奉命指挥一支军队，他“大获全胜，超出军队和人民的期望，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胜利的原因”。然而，克利松在一次小战斗中受重伤，于是他派下属军官贝维尔（Berville）去告知欧仁妮，“并陪伴她，直到他完全恢复”。欧仁妮和贝维尔很快有了私情，而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克利松养伤时得知妻子出轨，他想报复，这可以理解，“但他怎么能离开军队和职责呢？祖国需要他留下来！”解决之道是光荣捐躯。“战鼓敲响，宣告向侧翼冲锋，队列间弥漫死亡”，这时，克利松给欧仁妮写了一封恰当的动情信件。他把信交给一位副官，“然后尽忠职守，置身激烈战斗的最前端，那里将决出胜负。无数发子弹穿透了他，他死了”。[47] 全文完。

不能把《克利松与欧仁妮》视作今天的廉价言情读物，应当尽量用18世纪的文学视角看待它。有说法称，作者“将凭借其卓越的实用主义焕发光彩”，这篇17页的短故事是“其萌动浪漫情怀的最后一次抒发”。拿破仑显然是借这个故事来幻想，在此例中，欧仁妮成了与人偷情的荡妇，而他依然英勇痴情，最后甚至原谅了她的不忠。[48] 然而，拿破仑没法为夸张情节、感伤情绪与陈词滥调辩解，因为他当时半含怨愤，一怒之下一气写就全文。《克利松与欧仁妮》后来改了又改。

1795年下半年，法国吉伦特派领导人意识到，只有给法国制定新宪法，它才能把雅各宾恐怖统治时代置之身后。“保王党正在酝酿，”9月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们来瞧瞧如何收场。”[49] 阿历克西·德·托克

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后来写道，试图改革的国家最脆弱。这句话尤其适用于1795年秋天时的法国。

8月23日，国民公会通过巴士底狱陷落后的第三部宪法——《共和三年宪法》，规定建立两院制立法机关与五人制执法机关督政府（the Directory）。10月底宪法将生效，届时，五百人院和元老院组成的立法院将取代国民公会，而督政府将代替已成恐怖统治代名词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一变革时刻也让大革命与共和国的对头有机会造反。9月20日，奥军大举反击，返回莱茵河，而法国经济仍十分不景气，腐败现象也普遍存在。10月的第一周，共和国的敌人便合谋推翻新政府，将大量武器与弹药偷运至巴黎。

恐怖统治已然结束，新的督政府成立后，公共安全委员会也将废止。然而，恐怖统治和公共安全委员会激起的愤恨现在瞄准了其继承者。1790年时，巴黎设立了48个地方行政辖区——“区”[50]。各区控制当地国民公会及国民自卫军，反叛正集中在这里。虽说只有7个区真的叛变，但其他区的国民自卫军亦有参加。

区的队伍里并非只有保王党人，他们甚至都算不上主力。老兵马蒂厄·迪马（Mathieu Dumas）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巴黎人民最普遍的愿望就是恢复1791年宪法”，没几个人喜欢波旁王朝复辟所需要的内战。[51]区里有国民自卫军中层军官、保王党人、一些改良派与自由派人士，此外还有抗议政府腐败堕落、对内无能、对外无力的巴黎平民。虽然叛党确定了政变日期，但除此之外，泥沙俱下的政治构成就决定了他们根本不能围绕一个中心协调行动。叛党的政变时间也瞒不过政府。

国民公会原本指望内防军团司令雅克-弗朗索瓦·德·梅努（Jacques-François de Menou）能够镇压迫近的反叛。梅努想避免流血冲突，遂试图和区谈判，但国民公会领导人以为这是反水兆头，逮捕了他（他后来脱罪）。预期的叛乱迫在眉睫，吉伦特派便任命立法院议长保罗·巴拉

斯为内防军团司令，尽管1783年后他就再未涉足军事。巴拉斯接到的指示是拯救大革命。

10月4日（周日）晚上，拿破仑在费多剧院（Feydeau Theatre）观看索兰（Saurin）的戏剧《贝韦利》（*Beverley*），这时他听闻各区准备于次日起事。[52] 次日（革命历葡月十三日）一大早，巴拉斯任命拿破仑为内防军团副司令，要他动用一切必要手段镇压叛乱。法军在土伦胜利之后，巴拉斯从萨利切蒂那儿听说了拿破仑。他已经给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者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些人有凯拉利奥、迪泰伊兄弟、萨利切蒂、多佩、迪戈米耶、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现在又加上了巴拉斯。在测绘局工作时，卡诺、让-朗贝尔·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等政界大人物也认识了他。[53] ［他后来愉快地回忆道，政客之中，政治理论家埃马纽埃尔·西哀士（Emmanuel Sieyès）神父对旺代喋血事件反应最为激烈。］令人惊讶的是，巴黎没多少高级军官接手这项任务，或者说，没有几个人愿意在街上朝平民开火。1792年，拿破仑两度目击攻打杜伊勒里宫，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他会做什么已经没有悬念了。

这是拿破仑第一次进入国家高层政治的前线，他兴奋不已。他命令第21猎骑兵团（Chasseurs à Cheval）上尉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率100名骑兵驰往2英里外的萨布隆（Sablons）营地，夺取当地加农炮并运至巴黎市中心，他还要求缪拉砍杀所有反抗者。当时只有50人看守萨布隆的加农炮，叛军错失了大好时机。

拿破仑确认了下属官兵的忠心。上午6点至9点，他布置加农炮：圣尼凯斯街（rue Saint-Nicaise）入口处2门；王储街（rue Dauphine）末端1门，直面圣洛克（Saint-Roch）教堂；圣奥诺雷街2门，临近旺多姆宫；伏尔泰滨河路（Quai Voltaire）2门，直面王家桥。拿破仑让步兵在加农炮后列队，并派预备队去骑兵竞技场，从而守卫国民公会和政府所在地杜伊勒里宫。他把骑兵置于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此

地如今叫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54]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拿破仑轮流视察所有火炮。“对善良明理人士必须彬彬有礼地劝说，”他后来写道，“对暴民就得吓跑他们。”[55]

拿破仑决定使用葡萄弹，这个词是霰弹或榴弹的口语说法，意指塞进金属外壳里面的数百枚滑膛枪子弹。一旦葡萄弹从加农炮炮口射出，金属外壳就会裂开，随之喷出的铅弹将形成较大弧形，其速度甚至超过滑膛枪每秒1760英尺的射速。葡萄弹最大射程约为600码，最佳射程约为250码。拿破仑认真地考虑使用葡萄弹，而巴黎的历史上从未有人用它对付平民，这证明他冷酷无情。他不想犯傻。“若善待暴民，”他后来告诉约瑟夫，“这些家伙就幻想自己不可战胜；若绞死其中几个，他们就厌倦了游戏，变回他们应该有的样子，唯唯诺诺，低声下气。”[56]

拿破仑的部队包括4500名正规军士兵、1500名“爱国者”——宪兵和荣军院（Les Invalides）老兵。他们的对手是各区七拼八凑的30000人。当西昂（Dancian）将军名义上指挥叛军，他试图谈判，浪费了当天的很多时间。直到下午4点，叛党队列才从侧街拥向杜伊勒里宫北部。拿破仑没有马上开火，但4点15分至45分之间，区的队伍里有人开了第一枪，枪一响他就回敬对方，下令开炮消灭他们。有叛乱者想走过塞纳河上的桥，他也冲那些人发射葡萄弹，结果他们伤亡惨重，迅速奔逃。圣奥诺雷街的圣洛克教堂实际上成了叛军总部，伤员在此聚集。6点时巴黎大部分地区已经平定，但圣洛克教堂的狙击手继续从屋顶上和路障后射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拿破仑的加农炮离教堂已不足60码，叛党唯有投降。[57] 当日，约有300名叛乱者死亡，拿破仑仅损失6人。相对当时常规做派而言，国民公会极其宽大，事后只处决了区的2名领导。[58] “轻风般的葡萄弹”（whiff of grapeshot，日后对镇压行为的称呼）意味着接下来三十年巴黎暴民再也没登上政治舞台。

1811年，让·萨拉赞（Jean Sarrazin）将军在伦敦出版《波拿巴将军

对莫里教士的忏悔》（*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 ）。此书称，葡月十三日，“波拿巴根本没有阻止士兵的盲目暴行，反倒亲身树立暴行范例。可怜的人们在战斗中已经扔掉武器，哀求慈悲，但他依然挥下马刀”。[59] 拿破仑曾以谋反罪缺席判处萨拉赞死刑，所以他这么说也没多少损失。萨拉赞又说，当日拿破仑的副手蒙瓦森（Monvoisin）谴责他残暴，离职走人。上述内容都是谎言，但它们都属于葡月暴动（Vendémiaire）后开始环绕拿破仑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

葡月十三日晚，大雨很快冲刷干净了街上的血迹，但人们的记忆萦绕不绝。就连埃德蒙·伯克办的激进的反雅各宾读物《年鉴》（*Annual Register* ）也指出，“正是在这次冲突中，波拿巴首登战争舞台，他用勇气与行动奠定了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这很快会把他引向晋升与荣耀”。[60] 政治事态紧急迫切，因此战争部不会再拿资历表、医学委员会、逃兵等无聊事干涉他了。为了表彰拿破仑挽救共和国、阻止潜在内战，葡月还没过，巴拉斯就升他为师级将军，没过多久他又就任内防军团司令。讽刺的是，他不想杀法国人，所以不肯去旺代就职，但他后来杀了法国人，且恰恰因此赢得人生中最迅捷的晋升。不过在他看来，合法的作战军队与暴民不是一回事。葡月暴动后，拿破仑一度被称作“葡月将军”，不过没人当面这么叫他。他参与杀害了那么多同胞，但浑然不觉难堪，成为第一执政后，他随即下令举行周年庆典。一名女士问他怎能如此无情地向暴民开火，他答道：“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61] 他没有提到下命令的就是他自己。

一夜之间，“轻风”送波拿巴家族直上青云：拿破仑领有48000法郎年薪；约瑟夫谋得外交职位；路易在沙隆炮兵学校升学，后来加入拿破仑迅速扩张的副官队伍；家里最小的弟弟、11岁的热罗姆去了更好的学校。拿破仑告诉约瑟夫：“家里什么也不缺了。”接下来二十年的情况亦如此。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称，她注意到葡月后拿破仑变了：

> 他的靴子不再泥泞斑斑。波拿巴住进早金莲街（rue des Capucines）豪宅，每次出门都乘漂亮马车……他曾经憔悴瘦削，现在脸长丰满了。他本来面色蜡黄，显然健康不佳，如今他的脸变干净了，相对好看些。波拿巴瘦骨嶙峋的身体也长壮实了，他的微笑倒是一直讨人喜欢。[62]

再没人叫他“穿靴子的猫”了。

葡月暴动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拿破仑监督下列事务：解散反对党贤人俱乐部（Panthéon Club），驱逐藏身战争部的保王党人，管制戏剧演出。就最后一项职责而言，他几乎每天给政府写信，汇报歌剧院（the Opéra）、喜歌剧院（Opéra Comique）、费多剧院及共和国剧院（La République）这四家巴黎剧院中观众的表现。一份代表性的报告显示，“爱国歌曲在前两家（剧院）受到热烈欢迎，第三家反应平淡，费多剧院的马赛曲演奏到倒数第二节时，有人吹口哨（据信是旺代人），警察只好逮捕他”[63]。[64]监管收缴所有民间武器也是拿破仑的任务，家族传说称，此事让他认识了一个女人，之前他可能在社交界听过关于她的小道消息，但从未与她谋面。这名女子是博阿尔内子爵遗孀，名唤玛丽-约瑟芙-罗丝·塔舍·德·拉帕热里（Marie-Josèphe-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拿破仑昵称她为“约瑟芬”（Josephine）。

1726年，约瑟芬的祖父、贵族加斯帕尔·塔舍（Gaspard Tascher）从法国去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想靠那儿的甘蔗种植园谋财，但他遇上飓风、欠缺好运及为人懒惰，最后没能致富。拉帕热里这个名字是指塔舍家族在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今海地）的又一处地产。约瑟芬之父约瑟夫当过路易十六的宫廷侍者，但他后来返回其父的庄园。1763年6月23日，约瑟芬出生在马提尼克岛，尽管她后来自称生于1767年。[65]1780年，17岁的约瑟芬来到巴黎，她几乎未受过教育，以至于第一任丈夫、法军将领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Alexandre de Beauharnais）子爵无法掩饰对她的鄙视。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表哥，后者在15岁时与他订婚。约瑟芬牙龈发黑，原因据信是她小时候咀嚼马提

尼克蔗糖，但她学会了笑不露齿。[66] “要是她只有牙齿，”未来的太后侍女、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写道，“她一定胜过执政宫（Consular Court）中几乎所有女士。”[67]

约瑟芬的丈夫博阿尔内有家暴倾向，有一次她躲进修道院逃避殴打，而他从那儿绑走了他们3岁的儿子欧仁。1794年，博阿尔内被捕，但约瑟芬仍勇敢地奋力救他一命。她自己也被怀疑是保王党人，结果她在1794年4月22日下狱，直到同年7月22日（博阿尔内被处刑后不久）才获释。约瑟芬被关在沃日拉尔街（rue de Vaugirard）的圣约瑟夫-德-卡姆（Saint-Joseph-des-Carmes）教堂[68] 地窖。据她的狱友、英国女人格雷丝·埃利奥特（Grace Elliott）回忆，“墙上甚至木椅上仍沾着教士的鲜血和脑浆”。[69] 约瑟芬被迫忍耐确实毫无人性的环境：地牢只有三个深孔可透气，而且没有厕所；她和狱友们每天都担心将被送上断头台；每人每日只有一瓶水应付所有生活需要；因为孕妇临盆前不会被处刑，晚上在走廊便能听见女人与狱卒做爱的动静。[70] 哪怕是盛夏时节，圣约瑟夫教堂地窖里也很冷，囚徒们的身体很快垮了，事实上，约瑟芬之所以活了下来，也许只是因为她病得太重，不能送她上断头台。博阿尔内死后只过了四天，罗伯斯庇尔就倒台了，如果罗伯斯庇尔多活一阵，约瑟芬很有可能追随丈夫而去。热月政变放约瑟芬出狱，同时把拿破仑关进另一所监狱，这体现了矛盾的对称。

地牢内恶臭弥漫、昏暗阴冷，囚犯们落魄潦倒，连续几周中，他们每天都担心惨遭横死，这一切让恐怖统治显得名副其实。事后数月甚至可能数年，约瑟芬多半患有今人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许她耽溺于性爱、从事肮脏交易、热爱奢华（她的服饰比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昂贵），或许两年后她为了稳定生活与金钱保障而嫁给不爱的人，但因为这段经历，我们很难据此指责她。[71] 约瑟芬常被视作模样性感、为人浅薄、开销奢侈的荡妇，但她对音乐和装饰艺术的品位相当不错，其文化造诣必然不浅，而且她待人大方，虽说她慷慨支出的常常是公款。那

个年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说，她的“社交手腕别具一格”。[72] 约瑟芬擅长演奏竖琴，不过有些人说她只弹一个调。她还在床上玩所谓的“之字形体位”（zig-zags）。[73] 她不会画画，平日织一些壁毯，间或下下西洋双陆棋（backgammon），但她每天接待访客，喜欢和众女友边用午餐边聊八卦。

无可否认，35岁左右的约瑟芬拥有难以抵御的女性魅力，她抿唇时的笑容无与伦比。1795年年末，她需要一个人保护她、供养她。出狱后，约瑟芬成了拉扎尔·奥什将军的情妇，他不愿离开妻子，但她想嫁给他，这种念头甚至一直持续到她勉强嫁给拿破仑。[74] 约瑟芬也是保罗·巴拉斯的情妇，不过1795年夏天结束时，他俩的风流关系也快断了。巴拉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早就厌倦她了”，并且很不礼貌地叫她“撩人的妓女”。[75] 长期的流血冲突后出现纵欲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现象，姑且举两个例子为证：一战后出现了“兴旺的二十年代”，古罗马内战后社会风气淫靡。恐怖统治之后，约瑟芬决定与当权者风流，但此事就像她人生中的很多行为一样，只是时代风尚（à la mode），不过她并不及好友泰蕾札·塔利安（Thérésa Tallien）放荡。泰蕾札绰号“政府财产”，因为多年来她与好多部长做过露水夫妻。不管“之字形体位”是什么，除了奥什、巴拉斯以及约瑟芬的第一任丈夫博阿尔内，她显然也和其他人玩过这一套。她的第二任丈夫几乎是个处男，论性爱经验（éducation amoureuse）远不及她。

葡月暴动后，政府收缴武器，约瑟芬趁机让14岁的儿子欧仁·德·博阿尔内去拿破仑司令部。欧仁说父亲的佩剑有感情意义，询问自己的家族能否保留它。此举显然是制造社交契机，拿破仑也顺水推舟，不出几周，他真的深深坠入爱河。他对她的迷恋有增无减，直到五个月后两人结婚。他们同是异乡岛民、法国移民、前政治犯，共同点的确不少。因为拿破仑肤色微黄、头发平直、外观邋遢，也许还因为他身患疥疮，起初他并不吸引约瑟芬，而且她当然也不爱他。然而，那时约瑟芬开始长

皱纹，她韶华渐老，身缠债务。（她明智地等戴上婚戒后才告诉他自己究竟有多少债务。）

约瑟芬梳妆打扮要费好大一番功夫，她在私宅和宫殿的卧室都有镜子。虽然约瑟芬不够聪慧，做不到机智诙谐，但她迷人可亲，非常清楚成功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殷勤。有人问塔列朗约瑟芬是否聪明，据说他回答："蠢货没法干这么好。"就拿破仑而言，他看重她的政治人脉和身为子爵夫人的社会地位（革命派也可接受子爵夫人）。她能弥补他欠缺的能力（savoir-faire）与社交风度，这点也引起他的重视。他不擅长客厅中的机敏应答。"他对女人就没讲过好话，"圆滑言谈的大师梅特涅回忆道，"尽管表情和声音常常表明他努力想说点好的。"[76] 拿破仑和女士们谈论其着装或其拥有的孩子数，还问她们是否亲自养育小孩。他同女性笨拙地交往，约瑟芬却在巴黎社交界掌握极佳人脉，她能进入塔利安夫人、雷卡米耶（Récamier）夫人、德·斯塔埃尔夫人等人主持的颇具影响力的政治沙龙。

出生、死亡与婚姻本由神职人员登记，但大革命解除了他们的职责。于是乎，1796年3月9日（周三）晚上10点，在昂坦街（rue d'Antin）上的第二区（arrondissement），拿破仑与约瑟芬在昏昏欲睡的市长面前举行世俗婚礼。新娘身着白色薄纱婚裙，腰缠共和国三色彩带。[77] 新郎迟到了两小时。在场的有巴拉斯、拿破仑的副官让·勒马鲁瓦（Jean Lemarois，严格意义上是未成年人）、塔利安夫妇、约瑟芬之子欧仁及其11岁的妹妹奥尔唐斯。为了尽量缩小六年的岁数差，拿破仑在婚姻登记册上写自己1768年出生，同时约瑟芬照例少说了四岁，这样他们都是28岁了。[78] ［后来，帝国历（Almanach Impérial）把约瑟芬的生辰记作1768年6月24日。[79] 妻子执意虚报年龄，拿破仑一直觉得好笑，他打趣道："照她那么算，她一定12岁就生了欧仁！"[80] ］他送给她一枚涂瓷釉金圆牌当结婚礼物，上面刻着"致命运"（To Destiny）。[81]

3月2日，巴拉斯等五名督政给了拿破仑他能期盼的最好的结婚贺礼——意大利军团司令职位。这就是他在自己的婚礼上迟到，和约瑟芬度蜜月也不满四十八小时的原因所在。督政府是法国新执行机关，除了巴拉斯，另外四个督政是前雅各宾分子让-弗朗索瓦·勒贝尔（Jean-François Reubell）与路易·德·拉雷韦利埃-莱波（Louis de La Révellière-Lépeaux）、稳健派人士拉扎尔·卡诺与艾蒂安-弗朗索瓦·勒图纳尔（Étienne-François Le Tourneur）。巴拉斯后来写道，自己劝众同僚派拿破仑去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指挥未来的战事，理由是他是科西嘉“高地人”，“一生下来就习惯爬山”。[82] 这几乎算不上科学依据，因为阿雅克肖与海平面持平。但巴拉斯也说拿破仑能重振无精打采的意大利军团，这句评价明显更接近事实。

3月11日，拿破仑前往尼斯司令部。从接到任命状到出发这九天，他要战争部尽全力提供有关意大利的书、地图和地图册。他阅读在当地战斗过的将领的传记。当他不知道某事时，他敢于承认无知。多年后，一位军官同僚回忆道：

> 有一次，波拿巴将军去了位于新旱金莲街的总参谋部办公室，我正好在场，那一天的他仿佛仍站在我眼前。他戴着小帽子，上面插了根找来的羽毛。他也马马虎虎地裁了外套，不过说实在的，他的剑算不上一把好兵器。他把帽子扔向屋子中间的大桌，然后去找老将军克里格（Krieg）。克里格将军具备细致学识，写过一本非常好的士兵手册。他让克里格挨着他在桌旁坐下，自己手握钢笔，开始问他一大堆关于军务和纪律的问题。有些提问显示出他完全不知道最基本的事实，以至于我的好几个战友都笑了。他考虑对方的回答，结果往往是导出其他问题，令我震动，他提问的次数、顺序和速度给我的冲击不亚于此。可是，还有一件事更叫我震撼：总司令完全不介意告诉部下自己对事情的很多方面一无所知，照理说他最年轻的下属都对此了如指掌。他在我心中的形象陡然变得高大伟岸。[83]

1796年3月11日，拿破仑乘驿站马车离开巴黎，同行者有副官朱诺与意大利军团新任军务组织长官兼好友肖韦。3月14日，他南下抵达尚索（Chanceaux），给约瑟芬写了一封信。写信时，他首次去掉了自己

姓氏中的字母“u”。1794年，拿破仑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报《世界箴言报》（*Moniteur Universel*，简称《箴言报》）上，当时刊登的姓氏是带有连字符的“波诺-巴”（Buono-Parte）。[84] 现在他使用法国化姓氏，有意强调自己的法国国籍盖过了意大利和科西嘉血统。[85] 他打破了和过去的又一道羁绊。

十五天后，拿破仑抵达尼斯。据说当时有人说了句相当没有用的话：拿破仑才26岁，太年轻了，不能指挥军团。对此他答道：“等我回来就老了。”[86]

---

[1] “Brutus”出自古罗马人物布鲁图。——译者注

[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6，Fraser，Ronald，*Napoleon’s Cursed War*（New York）2008，p.23

[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163，172，191 p.171，April 4，1794，p.174，May 7，1794，p.182，June 10，1794

[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6

[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9

[6] CG1 no.232 p.196，August 7，1794

[7]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p.18

[8]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60

[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39 p.159，January 4，1794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35 p.197 August 12 or 19，1794

[11] 《红花侠》系英国作家奥希兹女男爵作品，书中主角红花侠营救恐怖统治受害者，帮他们从法国私渡出境。——译者注

[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41

[1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44 p.201，September 10，1794

[1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83 p.218，February 4，1795

[1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85 p.219，February 12，1795

[1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0 p.221，April 11，1795

[17] *Mars & Clio* Autumn 2010 p.21

[1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44

[19] 今香槟地区沙隆（Châlons-en-Champagne）。——译者注

[20]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9

[21]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9，p.19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22 p.248，August 10，1795

[23]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16

[24]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4n

[25]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76

[26] D'brantès，*At the Court* p.34

[27]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Ⅰ p.401

[2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7 p.224，May 9，1795

[2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98 p.224，May 22，1795

[30] 指塞纳河畔沙蒂永。——译者注

[3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1 p.227June 4，1795

[3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3 pp.228-9，June 14，1795

[3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21 p.247，August 10，1795

[3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9 p.233，July 6，1795

[3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10 p.235，July 12，1795

[36]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Ⅱ p.218，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Ⅰ p.284

[37] 今卡内昂鲁西永-圣纳泽尔（Canet-en-Roussillon-Saint-Nazaire）。——译者注

[3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09 p.233，July 6，1795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55

[4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27 p.252，August 20，1795

[41] Brown，Howard G.，*War*，*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1995，p.128

[42]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2

[4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45 p.268，between September 15 and October 5，1795

[44]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13

[45]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15

[46]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2-21

[47]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p.2-21

[48]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67

[4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334 p.258，September 1，1795

[50] 此处的区是“Section”，并不是“Arrondissement”，《共和三年宪法》已宣布废除“Section”。若无特殊说明，本书的区皆指“Arrondissement”。——译者注

[51]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40

[52]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79

[53]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9，p.20

[5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2

[55] ed. Lecestre，Léon，*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er* 2 vols.1897，Ⅱ p.133

[5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 no.485 p.15

[57] Arnault，A.V.，*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Boston）1833，Ⅰ p.35，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p.12-13

[58] 相形之下，1780年，伦敦爆发戈登（Gordon）暴动，285人被杀，200人受伤，事后更有20人被处决。

[59] Sarrazin，General，*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 1811，p.13

[60] *Annual Register* 1795 no.37 p.106

[61] Gibbs，Montgomery B.，*The Military Career of Napoleon the Great* （Chicago）1895，p.42

[62]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37

[63] 《马赛曲》创作于1792年，是反对君权的伟大革命赞歌。拿破仑称帝后立即禁止人们唱《马赛曲》，但1815年他又重新提倡这首歌。

[64] Christies Rare Books catalogue 27/11/2012 p.14

[65] Memes，John，*Memoirs of the Empress Josephine* （New York）1832，p.13

[66]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45

[67]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37

[68] 今人若在周六下午3点整准时到达教堂便可参观。1792年的九月屠杀中，暴民在此杀死了115名教士，其中35人的骸骨现在是展品。

[69] Haig，Diana，*Walks Through Napoleon and Josephine's Paris* 2003，p.50

[70] Haig，Diana，*Walks Through Napoleon and Josephine's Paris* 2003，p.49.

[71] Philip Mansel in *TLS* 16/1/2004 p.23

[72]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77

[73]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06

[74]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23，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74

[75]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Ⅱ p.72

[76]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81

[77] 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p.35

[78]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65，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

[79]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326 n.3

[8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81]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162

[82]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Ⅱ p.79

[83] Pratt，Fletcher，'Vignettes of Napoleon in Italy 1796'*Journal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vol.2 issue 2 Summer 1938，p.59

[84] 此后数十年，不列颠和波旁的宣传人士又把"u"放回去，突出拿破仑的外国人身份。举个例子，1814年，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写了小册子《论波拿巴、波旁以及为了法国和欧洲的幸福拥护我们的正统亲王的必要性》，这一标题体现出了恶意。夏多布里昂在书中写道："无望找到敢于戴上路易十六之冠的法国人，一个外国人便站了出来，人们接受了他。"Chateaubriand，*Of Buonaparte and the Bourbons and the Necessity of Rallying Round our Legitimate Princes for the Happiness of France and that of Europe*，p.5.1917年，英国王室将王朝名从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温莎，甚至在那之后，有些英国历史学家仍然嘲笑拿破仑去掉了姓氏中的"u"。

[85]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Ⅰ p.41，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501

[86]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4，Poultier，

François，*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in Europe* （New York）1798，p.260

第四章 意大利

> 1796年5月15日，波拿巴将军进入米兰，身后跟着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这支刚跨过洛迪附近的桥的队伍向世界昭示：千载沧桑之后，亚历山大与恺撒的继承人终现于世。
>
> ——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

> 为将之大道在知军心、赢军心，在这两个方面，法军皆最难统帅。法军士兵不是等待开动的机器，而是需要领导的理性个体。
>
> ——拿破仑致沙普塔尔

1796年3月26日，拿破仑抵达意大利军团尼斯司令部。有些人后来声称，此时的他是无名之辈，次日初见麾下的师长们时便遭诸人鄙视，因为正如一位蔑视他的同时代人所说的，他“靠街头暴乱混个名头响，靠床上新娘混个司令当”。[1] 事实上，仅仅两年之前，拿破仑还是意大利军团的炮兵指挥官，而且很多人因为土伦大捷知道他，他也给测绘局写了至少三封信，详细探讨如何赢得迫近的战役。因为他年纪轻轻，年长的下属最初的确愤愤不平，但这只是人之常情，军官们也很清楚他是何等人物。

拿破仑麾下有五位师长。让·塞吕里耶（Jean Sérurier）年纪最大，在法军中服役三十四年，曾参与七年战争，大革命爆发后一度考虑退役，但其后几年他战绩良好，1794年12月晋升师级将军。皮埃尔·奥热罗（Pierre Augereau）现年38岁，此前干过雇佣兵、钟表贩子和舞蹈教师。他身材高大，为人狂妄，稍带粗俗，绰号“人民之子”“骄傲的土匪”。奥热罗曾在决斗中杀死两人，在斗殴中打死一名骑兵军官。他在里斯本时差点遭受异端裁判所的酷刑，全靠天性活泼的希腊籍妻子调解才得以脱险。安德烈·马塞纳亦38岁，13岁时他随船出海，当船上侍者，但1775年他转而从军，晋升上士，大革命爆发前夕退伍。马塞纳随

后在昂蒂布搞走私、卖水果，1791年他加入国民自卫军，迅速升迁。马塞纳在土伦围攻中立功，因而晋升意大利军团师级将军，1795年他在此军团中表现出众。瑞士人阿梅代·拉阿尔普（Amédée Laharpe）现年32岁，长着浓密的大胡子。让-巴蒂斯特·梅尼耶（Jean-Baptiste Meynier）曾在德意志军团效力，但4月中旬时拿破仑致督政府的报告称，梅尼耶“无能，在如此积极活跃的战争中，他都不适合指挥一个营”。[2] 这五个人都是老兵，而拿破仑连正规军步兵营都没带过。他们不好折服，更不好激励。正如马塞纳日后回忆时所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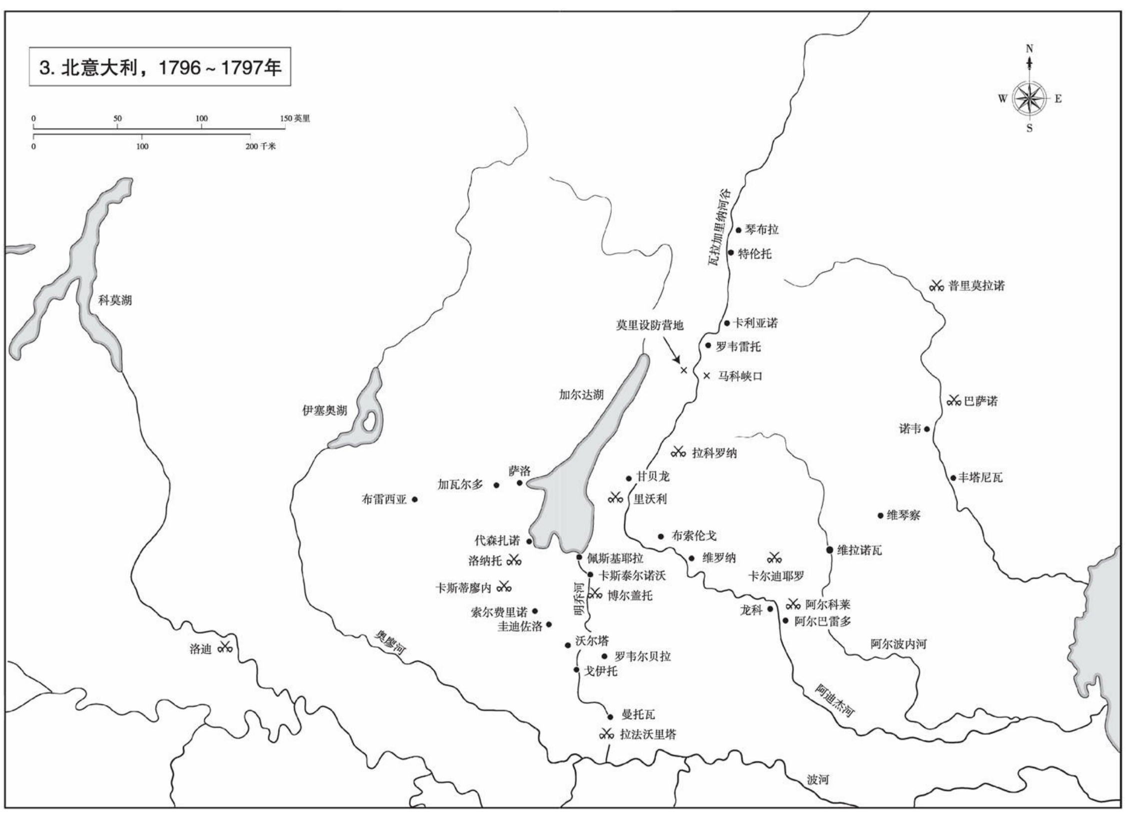
> 刚开始时，他们瞧不起他。他人小脸瘦，遭他们嫌弃。他抓着老婆的画像，拿给大伙看，而且他年纪太小了，他们就寻思，他搞了鬼才混得官位。但过了一会儿，他戴上将军帽，活像长了两英尺。他问我们的师位置在哪、装备如何，问每个部队劲头怎样、实际多少人。他下达我们必须遵循的指令，宣布明天视察全军，后天就出发去打仗。[3]

第一个月并无战事，马塞纳记错了最后一点，但这段话紧扣拿破仑展现的活跃精力，并且抓住了他的自信心、贯穿他一生的迫切信息需求以及他对妻子的爱。

在这首次会议上，拿破仑给部下看萨沃纳-卡尔卡雷（Savona-Carcare）公路的走向，只见它通往三个山谷，不管他们走哪个，最终都能到达富饶的伦巴第（Lombardy）平原。皮埃蒙特-撒丁反对法国大革命，从1793年开始，它一直与法国交战。拿破仑认为，假如把奥军赶到东边，并拿下切瓦（Ceva）的要塞据点，法军就可威胁撒丁首都都灵（Turin），迫使该国休战。这意味着4万名法军士兵将对抗奥撒联军的6万人，但拿破仑告诉下属，他能靠速度和诈术保住主动权。他的计划以皮埃尔·德·布尔塞（Pierre de Bourcet）的《山区战术通论》（*Princip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nes*，1775年版）和1745年的侵撒战略为基础。1745年战略虽被路易十五废止，但也强调集中力量夺取切瓦。布尔塞论及明确规划、集中行动以及扰乱敌军步调的重要性。拿破

仑的意大利战局既在教科书指导下进行，又是未来的教科书范本。

意大利军团只是督政府的余兴节目。督政们在德意志西部和南部集中物力，那儿有共和国的两支主力部队：让·莫罗（Jean Moreau）将军的莱茵-摩泽尔（the Rhine and Moselle）军团，让-巴蒂斯特·儒尔当（Jean-Baptiste Jourdan）将军的桑布尔-默兹（the Sambre and Meuse）军团。6月，莫罗和儒尔当的军团开始进攻，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奥皇弗朗茨[4]的弟弟、劲敌卡尔·冯·哈布斯堡（Karl von Habsburg）大公使出浑身解数迎敌，1797年8月和9月，他分别在安贝格（Amberg）和维尔茨堡（Würzburg）击败儒尔当。10月，卡尔大公转而对付莫罗，在埃门丁根（Emmendingen）战胜对方，接着他把法军的两个军团都赶回了莱茵河对岸。因为意大利的战事只是助兴，拿破仑的全部战局经费只有4万法郎，还不及他自己的年薪。[5]有一个真伪不明的故事称，为了筹集自己和副官从巴黎去尼斯的旅费，拿破仑卖了他的银柄佩剑，叫朱诺拿卖剑的钱赌博。[6]



抵达尼斯后，拿破仑发现意大利军团哪儿也去不了。天气严寒，士兵没有大衣。肉类配给中断三月，面包供应也不稳定。挽马都死于营养不良，炮兵只能用骡子拉炮。整个营要么赤足要么蹬木鞋，经常从尸体上剥下军服凑合穿。有些士兵几乎没了军人样儿，他们身上仅存的战士印记就是军队分发的弹药囊，很多人的滑膛枪也缺刺刀。饷银已拖欠数月，士兵们怨声载道，心生反意。[7] 热病肆虐，短短二十天内，第21半旅[8] 至少有600人死于此疾。佛罗伦萨的英国作家玛丽安娜·斯塔克（Mariana Starke）准确地描述了拿破仑上任前法军的“惨状”：“必需品根本没有，饥荒自然导致军中出现传染性热病……患病的士兵消沉虚弱。没有战马，没有加农炮，几乎没有任何战争用品。”[9]

为了应对军中的“惨状”，拿破仑解除了梅尼耶的职务，命令军需官肖韦彻底整顿军需系统。正如3月28日他致督政府的信所说，重整内容包括“威胁军事承包商，他们抢了太多，很有钱”。[10] 拿破仑还要法国驻热那亚公使、公民费普（Faipoult）“悄悄”从犹太金融家那里募集300万法郎贷款，并召回待在罗讷河谷冬季牧场的骑兵。到尼斯后不出两天，拿破仑就解散了哗变的第209半旅第3营，驱逐了该营军官与军士。他把剩下的列兵每五人分成一组，按组编入不同的营。拿破仑明白公平待人至关重要，如他所言，他高兴地看到“不管是谁，只要有人享有单单一项特权，那就没人听令行军”。[11] 4月8日，他向督政府报告称，自己被迫惩罚了唱反革命歌曲的士兵，并以军法审判两名高呼“国王万岁！”（Vive le roi！）的军官。[12]

师长们立刻佩服起拿破仑的苦干能力。部下们得干活，再也不能只动嘴皮子了，在尼斯待了四年的参谋部也突然被拿破仑的活力震动。从上任到1796年年底共九个月，其间他写了800多封平信与急件，其内容囊括一切，从阅兵式鼓手站位一直谈到应该演奏《马赛曲》的场合。奥热罗是最先造访拿破仑的部将，马塞纳是第二个。“我真怕那个小杂种将军！”奥热罗后来对马塞纳说。[13]

拿破仑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军人声望。1796年3月29日，他发布当日公告[14]，告诉士兵他们会“发现，他是他们的战友，坚信中央政府，以爱国者的尊严为荣，决心为意大利军团争得它应有的命运”。[15]不管怎么说，督政府的耳目将军可能养活他的军队。拿破仑害怕军队因濒临饿死而纪律涣散。“没有面包的话，士兵常会太过暴力，”他写道，“让人耻于认其为同类。”[16][17]他一定经常对巴黎提要求，4月1日，他设法让政府运来了5000双鞋子。终其军事生涯，提及军队鞋子的信多得惊人。某则传说称，拿破仑说“胃乃大军之足”，他很可能从没说过这种话，但他一直很清楚军队一定要用脚走路。[18]

此外，3月29日的公告还宣布亚历山大·贝尔蒂埃（Alexandre Berthier）将出任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现年43岁，原是工兵，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直到1814年他才卸去参谋长之职。在1792年的阿戈讷（Argonne）战役和接下来三年的旺代战事中，贝尔蒂埃表现良好。他的弟弟也是拿破仑的测绘局同僚之一。

拿破仑是首位用现代方式役使参谋长的指挥官，贝尔蒂埃是他能找到的最能干的参谋长。贝尔蒂埃的记忆力仅次于拿破仑，听对方说上十二个小时后仍然头脑清醒，光是1809年某晚，他就被传唤了至少17次。[19]国家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及万塞讷（Vincennes）的大军团档案馆堆满了贝尔蒂埃联络同僚的命令，他传达了拿破仑想做的事，语气礼貌但态度坚决。工整的秘书文稿呈现出的指令精练简洁，开头千篇一律：“将军，皇帝请您见此令后……”[20]贝尔蒂埃身负诸多品质，如圆滑委婉的性格，这一特征被调节得很好，以至于其妻拜恩（Bayern）的玛丽亚（Maria）女大公与其情妇维斯孔蒂（Visconti）侯爵夫人都被他说服，同意共住一座城堡。贝尔蒂埃很少直接违抗拿破仑的命令，除非以严谨的后勤理由为据。他组建了一个团队，确保总司令的想法能够迅速贯彻。贝尔蒂埃能把拿破仑的潦草总指示转化成每个半旅的确切任务，这种特殊能力几近

天才。参谋部的工作效率几乎一直极高。拿破仑下达的命令如同连珠炮，为了处理它们，贝尔蒂埃需要书记员、传令兵、参谋军士、副官组成的专业队伍以及格外发达的文书系统，他经常通宵劳作。拿破仑偶尔会发现贝尔蒂埃给半旅下令时弄错部队人数，有一回他写信给对方指正错误，并补充道："我觉得驻军方位读起来像小说一样有趣。"[21]

1796年4月2日，拿破仑司令部前进至热那亚湾（Gulf of Genoa）的阿尔本加（Albenga）。同日，肖韦因热病而逝世于热那亚。拿破仑报告称，肖韦的死"的确是军队的损失。他积极活跃、锐意进取。大军想念他时都会落泪"。[22] 战时，拿破仑的很多朋友和副手死在他身边，肖韦是第一个，他的确为此人而悲伤。

从1714年开始，奥地利一直统治着北意大利。奥军派大股军队去西边的皮埃蒙特，以便对付法军，皇家海军也从科西嘉运物资给撒丁军，因此拿破仑只好经利古里亚的高山山道拖运一切军需物资。4月5日，拿破仑抵达阿尔本加，他告诉马塞纳和拉阿尔普，自己计划在卡尔卡雷、阿尔塔雷（Altare）和蒙特诺特（Montenotte）之间切断敌军。奥军指挥官约翰·博利厄（Johann Beaulieu）经验丰富，才干尚可，但他已经71岁了，且曾败给法军。拿破仑热衷于研究过往的战局，他知道博利厄小心谨慎，打算利用对方的这个缺点。奥撒同盟并不稳固，奥地利方面曾警告博利厄不要太相信盟友。（"既然我知道同盟是什么玩意了，"一战期间，福煦元帅开玩笑道，"我就更不崇拜拿破仑了！"）哈布斯堡帝国疆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奥军部队的语言常常不统一，军官间则通用法语。对博利厄来说，更糟的是他还得应付庞大臃肿、讲究官僚做派的维也纳宫廷会议（Aulic Council）。宫廷会议下令时常常拖拉，结果命令下达后已跟不上军情。相形之下，拿破仑准备采用一次大胆的调动：守在两路敌军之间，趁其尚未会师各个击破。当代军事学院称此机动为"中央位置"战略，这也是他征战生涯中一直坚持的战略。某则拿破仑军事箴言称："若中央的军队联络畅通，则兵法绝不容各孤军独自与

之为敌。”[23]

“我这里非常忙，”拿破仑从阿尔本加致信约瑟芬，“博利厄在调动军队，我们正面对面。我有点累。我每天都在马背上。”[24] [25] 征途中，他仍然每天给约瑟芬写信，一共写了数百页字迹潦草的热烈情书，其中有些是在重大会战日写的。拿破仑经常先是浪漫告白（“日日夜夜痴恋你”），随后转向以自己为中心的思绪（“每次端起咖啡杯，我就诅咒荣誉与抱负，它们迫使我与生命中的灵魂分离”），或哀叹为何约瑟芬很少回信。她真的动笔时却称他为“您”，由此大大惹恼了他。拿破仑的信满是忸怩情欲之辞，表明她一来意大利团聚，他就想与她尽情欢好。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吻你的双胸，浅浅吻下来，深深深深吻下来。”[26] 尚不确定“小克庞男爵夫人”（la petite baronne de Kepen，有时亦作“Keppen”）是否系拿破仑给约瑟芬私处起的戏称。遗憾的是，“克庞男爵夫人”出处已不可考，不过约瑟芬养了很多哈巴狗，它可能只是其中一条狗的名字，这样的话，“恭敬地赞美小克庞男爵夫人”也许不具性事意味。[27] 至于直白些的“小黑森林”就更无疑问了，出现这个词的语境为：“吻它千遍，等不及进去了。”[28] 他的信就像军令一样，常常署名波拿巴或缩写“BP”，这样做有些不浪漫。[29] “再见，我生命中的女人、悲喜、希望与灵魂。我爱慕你，我畏惧你。你激起我的敏感情绪，其中汇聚我奔雷般狂暴迅疾的天性与感情。”纵观他的信件，此类句子纯属常态。

◆

“大军物资极其匮乏，”4月6日，拿破仑从阿尔本加向督政府汇报称，“我仍需战胜严重困难，但它们能被克服。痛苦的士兵不听号令，没有纪律就没有胜利。我希望接下来几天事态好转。”[30] 意大利军团有49300人，他们的对手奥撒联军约有80000人。幸运的是，此时贝尔蒂埃已解决眼下的补给问题。拿破仑计划于4月15日发动进攻，但奥撒联军

比他提前五天行动，4月10日，他们沿他准备下山的路上山。尽管他不曾料到这招，但他只用四十八小时就翻了盘。拿破仑把军队从萨沃纳调回，而且他们基本没受损失，现在他马上就能组织反攻了。4月11日晚，拿破仑察觉奥军战线拉得太长，他把敌军钉在埃罗河谷（valley of the River Erro）的蒙特诺特山村，该地位于萨沃纳西北方12英里处。凌晨1点，拿破仑派马塞纳冒着倾盆大雨包围敌军右翼。当地战斗环境艰苦：一条山脊从上蒙特诺特（Montenotte Superiore）向下延伸至海拔2000～3000英尺的群峰，到处都覆盖厚厚的植被（今亦然），山坡爬起来让人气喘吁吁。行动迅捷的法军步兵纵队夺下了不少奥军建的多面堡。

战斗结束后，奥军损失了25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俘。拿破仑的损失为800人。蒙特诺特之战相对而言只是小战，但这是总司令拿破仑第一次赢得野战，它既振奋军心，同样也鼓舞他自己的信心。拿破仑未来诸多战斗中的特征都在这一战中初露端倪：敌将老迈无力；敌军民族杂融、语言多样，而法军则成分单一；有一个能让他紧咬住不放的薄弱之处。法军行军速度远超敌军，而且他能在刚好足以制胜的时间内集中兵力逆转强弱。

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是迅速扩大战果：战后第二天，拿破仑在博尔米达河（the River Bormida）上的米莱西莫村（Millesimo）再战退兵，拆散了奥撒联军。奥军想退到东边防守米兰，撒丁军想撤到西边保卫首都都灵，拿破仑能够利用他们的不同战略急需。联军要逃出谷地就必须退到设防村庄代戈（Dego），4月14日，拿破仑在代戈取胜，三天来他三战三捷。奥撒联军约损失5700人，法军约损失1500人，而主要原因是拿破仑等不及拿下防守严密的科塞里亚（Cosseria）城堡。

一周之后，双方在埃莱罗河（the Ellero）上的蒙多维（Mondovì）开战，拿破仑奋力把撒丁军钉在原地，同时试图完成双重包围。这次机

动规模庞大，难以实施，可一旦成功便会摧毁敌方士气。他成功了。次日，撒丁求和。拿破仑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重型围城武器来围攻都灵。他之所以追求速战速决，原因之一便是受制于物力，别无选择。他冲卡诺抱怨道：“既无炮兵支援也无工兵相助，你是下了命令，可我要的军官一个也没来。”[31] 他无法实施（或支撑）围城战。

4月26日，拿破仑从凯拉斯科（Cherasco）发来宣言鼓舞军心：“今天，你们凭借自己的战斗赶上了荷兰军团与莱茵军团。你们什么都没有，却带来了一切。没有大炮，你们也能取胜；没有桥，你们也能渡河；没有鞋子，你们也能强行军；没有白兰地、经常没有面包，你们也能宿营……今天，你们将拥有很多。”[32] 他继续说道：“我承诺占领意大利，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发誓，你们会尊重亲手解放的人民，杜绝恐怖的烧杀抢掠。敌人会激得恶棍沉溺于劫掠。”[33]

饥饿的胜利之师会洗劫驻地。拿破仑的确关心军队的行为，想抑制破坏现象。在四天之前，他就发布当日公告，谴责“违逆人士”的“骇人抢劫”：“这些人战后才归队，他们的过分之举令我军和法兰西之名蒙羞。”他允许将军枪毙任何纵容劫掠的军官，但并无军官真的因此丧生。两天后，他私下致信督政府：“我打算杀鸡儆猴。我要么恢复秩序，要么抛弃这窝匪徒。”[34] 在意大利战局中，他多次提出高调的辞职威胁，这次是第一回。

拿破仑总是区分“因地自给”（因为给养不足，他的部队必须就地谋生）与“骇人抢劫”。[35] 必须承认，这其中有诡辩的成分，但他靠灵活的思维解决了问题。日后他经常斥责奥军、俄军、英军劫掠，可他也清楚，很多时候，他的军队干了同样的事，而且程度要严重得多。[36] “我们就靠士兵找东西过活，”那个时代的一名军官回忆道，“士兵拿东西不算偷，只算找。”拿破仑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马克西米利安·富瓦（Maximilien Foy）后来指出，如果拿破仑的士兵“等军队后勤部门发面

包和肉才开伙，他们也许会饿死”。[37]

“因地自给”让拿破仑的军队能够快速机动，这成了其战略的关键所在。“根据力学，加速会增大质量，进而产生能量，”他说，“军队战力同理。”[38] 拿破仑鼓励一切提速行为，半旅一天能走15英里，而他使用强行军，让每日行进里程增加了一倍左右。“没人比拿破仑更懂如何强行军。”他的军官回忆道，“行军通常非常累，有时一半以上的士兵掉队，但他们一直讲信誉，就算迟到也赶到了。”[39]

天气暖和时，法军晚上不睡帐篷，照一位老兵的说法，这是因为“行军太快，士兵没法带全必要的行李”。[40] 唯一能跟上他们的只有弹药马车。1775年，法国工程师皮埃尔·特雷萨盖（Pierre Trésaguet）出版了关于科学筑路的备忘录，其中提出不少筑路的建议。18世纪末特别是特雷萨盖的提议被采纳后，路面状况有了改善，因此行军速度大幅超出18世纪初的。现在，野战炮更轻便，公路更多，辎重车队更小，随营人员大大减少，照拿破仑的计算，这些因素促使法军行军速度达到尤利乌斯·恺撒大军行军速度的两倍。

◆

拿破仑立刻在凯拉斯科与撒丁议和。在某次交谈中，一名全权大使开出条件，但此人提议的要塞数量不能满足拿破仑，他便嘲讽道：“共和国令我掌军，它相信我足够清楚那支军队需要什么，而不必听取敌人的意见。”[41] 萨伏依（Savoy）上校亨利·科斯塔·德·博勒加尔（Henry Costa de Beauregard）侯爵是两名谈判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了回忆录，描述了当时的相遇场面：“（他）总是待人冷淡、举止文雅、谈吐简洁。”[42] 4月28日凌晨1点，拿破仑掏出怀表，说：“先生们，我告诉你们，我已下令于2点发动总攻。如果今天结束我还没得到科尼，总攻一刻也不会耽误。”

也许此举只是拿破仑虚张声势的经典案例，但撒丁人无法冒险。双方很快签订停火协议。撒丁不仅割让托尔托纳（Tortona）、亚历山德里亚（Alessandria）、库内奥（Cuneo）、切瓦以及通往瓦伦扎（Valenza）[43] 的道路，还交出科尼与斯图拉河（the Stura）、塔纳罗河（the Tanaro）、波河（the Po）之间的所有领土。拿破仑耍了个小花招，他坚持加一条秘密条款，规定自己有权使用瓦伦扎的桥梁渡过波河。他清楚消息会走漏给奥军，博利厄也会派军驻守瓦伦扎的桥，但拿破仑其实打算在皮亚琴察（Piacenza）附近渡河，该地位于瓦伦扎以东70英里处。

庆功宴上，凯拉斯科修女用阿蒂斯酒和堆成金字塔的蛋糕款待拿破仑。他在撒丁人面前坦率地说起前几天的事，批评自己“等不及分散奥撒联军”，导致米莱西莫之战中法军在科塞里亚城堡折损人手。拿破仑说两年前他曾率一支炮兵部队驻扎代戈，当时他就提出了同一作战方案，但被战争委员会否决。他补充道，“（我的）军队绝不会用这种决策方式”，还说这些委员会只会借“怯懦行径”分摊罪责。[44]

拿破仑对撒丁人说，头天夜里他处死了一名犯强奸罪的士兵。他还圆滑地称赞4月17日和21日撒丁军的撤退表现：“你们两次巧妙地逃出我手心。”拿破仑给博勒加尔看装着自己全部私人用品的小旅行箱，说：“现在我是司令了，当初只是炮兵军官时，这些没用的东西要多上一堆！”两人一边看日出一边畅谈数个小时，博勒加尔佩服他熟知撒丁历史、艺术家与学者。拿破仑把自己的调动比作“小贺拉修斯的战斗：他离间三个敌人，弄残他们，再挨个杀死”。拿破仑说他其实不是最年轻的法军将领，但他承认自己的年龄是笔财富。“年轻对于统领一支军队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他告诉博勒加尔，“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也非常需要昂扬的斗志、勇气与荣誉感。”[45]

停火协议签订次日，拿破仑写信回报巴黎。他清楚同外国达成外交

协议是越权行为，更不用说身为优秀共和党人的他竟允许皮埃蒙特-撒丁国王维克托·阿马德乌斯三世（Victor Amadeus III）保留王位。“我同一路敌军签订停火协议，这样就有时间进攻另一路。”他写道，“我的部队正在行军，博利厄在飞奔，但我希望赶上他。”[46] 他想用金钱消弭巴黎方面的怨言，答应向帕尔马（Parma）公爵征收数百万法郎，并建议从热那亚征收15万法郎，他用“捐赠”委婉代指征收，这种“捐赠”一旦遍及北意大利，他就能用银币代替经常贬值、口碑不佳的纸币本土汇票（mandats territoriaux）付一半军饷。[47] 显而易见，应该先付现金军饷，再把剩下的钱运回囊中羞涩的督政府，似乎是萨利切蒂灵机一动想到的。对于此人，拿破仑显然原谅了其在昂蒂布监狱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让此人在意大利军团从事组织工作。除了军事败绩，只有超级通货膨胀能如此彻底地击垮一国的信心，葡月暴动后，巴拉斯领导的督政府也急需拿破仑即将运过来的大批金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督政们只有一次试图替换司令（而且没下什么功夫），尽管他们开始反感甚至害怕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胜绩。

“只要我们的政治形势允许，”督政府指示拿破仑，“你就带走意大利境内所有可能有用之物。”[48] 他积极执行这一任务，决定不仅要在意大利（或者说，至少是在反抗他的意大利地区）抢现金，还要抢艺术珍品。5月1日，他致信公民费普：“给我寄一份清单，列出米兰（Milan）、帕尔马、皮亚琴察、摩德纳（Modena）、博洛尼亚（Bologna）的画作、雕像、珍品柜（cabinet）和奇珍。”[49] 上述地区的统治者完全有理由颤抖，因为他们注定要把大批最好的珍品送去巴黎的中央美术馆（Musée Central des Arts）。1793年，中央美术馆开馆，1803年更名为拿破仑美术馆（Musée Napoléon），1815年时又改为卢浮宫。

拿破仑委派法国鉴赏家与美术馆馆长挑选要带走的艺术品，这些人争辩说，事实上，把西方艺术中最伟大的杰作集中到巴黎后，人们想欣

赏它们就方便多了。1814年，英国教士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ard）写道，“以前得翻过阿尔卑斯山脉、漫游过所有地区，才能见到精湛尊贵的珍品”，但是“现在，来自意大利的战利品几乎聚集一堂，任世界观赏”。[50] [51] 正如支持波拿巴派的英国作家与翻译安妮·普伦普特里（Anne Plumptre）当时所说的，法军拿走的很多战利品也非意大利本土产物，仅仅是卢西奥·穆米乌斯执政等罗马人从科林斯（Corinth）、雅典（Athens）等地带走的东西。[52]

拿破仑想让他的博物馆不仅拥有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品，还应藏有最丰富的历史手迹。他翻修博物馆，给它镀上一层金。他在馆内放满雕塑，把它改造成“展览的殿堂”。拿破仑是专注的藏书家，他日后宣布，自己想“凭巴黎的单单一栋建筑收藏德意志帝国、梵蒂冈（Vatican）、法兰西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United Provinces）的档案”。拿破仑后来指示贝尔蒂埃，要他命令一位在西班牙的法军将领寻找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档案所在地，“它们会为浩如烟海的欧洲藏品锦上添花”。[53]

5月上旬，拿破仑告诉督政府，他打算渡过波河，但事情有些棘手。他提醒政府不要听信“俱乐部士兵的话，他们以为我们游泳就能过大河”。[54] 奥军指挥官博利厄已经退入波河与提契诺河（the Ticino）的夹角，正掩护帕维亚（Pavia）和米兰，他的交通线延伸到波河以北。博利厄咬了拿破仑的钩，一直严密监视瓦伦扎。拿破仑突袭帕尔马公国的皮亚琴察，绕开了多条沿河防线，进逼米兰。这是他首次尝试敌后机动（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即绕到敌后，这是他日后偏好的又一种战略。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突袭维也纳，1806年和1807年，他在波兰进行战略机动，上述行动都翻版了在波河的初次渡河奔袭。

博利厄能比拿破仑早一天到达皮亚琴察，所以他得提前两天赶到才能安全渡河，若提早三天则更为理想。他自信已详细算过所有的补给需要，命令法军还要超越之前的行动速度。塞吕里耶和马塞纳去瓦伦扎迷

惑博利厄，奥热罗则在瓦伦扎和皮亚琴察中间立足，让奥军更摸不着头脑，并切断了河流两岸的联系。与此同时，拿破仑与拉阿尔普、克洛德·达勒马涅（Claude Dallemagne）将军奔往目的地。达勒马涅的士兵大多只能足缠破布，拿破仑承诺给他调来一批新鞋。与拿破仑同行的还有“勇士”夏尔·基尔迈纳（Charles ‘Brave’ Kilmaine）[55] 将军的骑兵。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要经过中立的帕尔马公国，但拿破仑知道公爵敌视法国，于是他没有因为当时国际法的细节而耽误行程。

5月7日黎明，法军准备在波河与特雷比亚河（the Trebbia）交汇处渡河。勇敢的让·拉纳上校 [56] 沿河搜寻数英里，收集所有船只和造桥材料。他找到一艘渡船，可一次载500人渡过500码宽的河流，拿破仑于是命令20英里外的奥热罗、35英里外的马塞纳以及70英里外的塞吕里耶尽快与己会合。8日，拿破仑本人渡过波河，前往皮亚琴察。法军向皮亚琴察总督简要但坦率地说明不投降的话城市会遭遇什么，后者便打开了城门。“再来一场胜利，”当日，拿破仑对卡诺预言，“我们就是意大利之主。”[57] 他大力征集马匹，不必再用骡子拉炮了。事实上，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拿破仑的很多加农炮都是靠皮亚琴察贵族的四轮大马车挽马拉运。

拿破仑随意侵入帕尔马公国，与帕尔马公爵达成停火协议，然后他给巴黎送去20幅画作，包括米开朗琪罗和柯勒乔的作品。他还送去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抄写的罗马最伟大诗人维吉尔的文集。[58] 法国人仍不满足，他们还带走动植物。科学家加斯帕尔·蒙日与克洛德-路易·贝托莱（Claude-Louis Berthollet）以及植物学家安德烈·图安（André Thouin）奉命去帕维亚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并把它们送往巴黎植物园。拿破仑甚至给贝托莱找来水银做实验。[59]

5月10日，奥军经阿达河（the Adda）右岸的洛迪镇（Lodi）退往米兰。洛迪位于米兰西南方22英里处，拿破仑准备在此截击奥军。马尔蒙

率领一个骠骑兵团，拉纳率领一个掷弹兵营，两人追逐奥军后卫，穿过城镇。阿达河上横跨一座长200码、宽10码的木桥，敌军从对岸桥头发射霰弹，马尔蒙和拉纳被迫仓促停下。拿破仑征用了他最先找到的2门大炮，他一边把炮拉到桥边开火，以防敌军摧毁木桥，一边下令调来更多大炮，并在河岸和附近屋舍布下狙击手。随后，他去了木桥正后方的教堂钟楼[60]指挥战斗。

奥军后卫指挥官泽博滕多夫（Sebottendorf）将军动用3个营和14门炮守桥，让8个营和14个骑兵中队留作预备，他共有约9500人。另选地点可能会花几天时间，那法军就根本无望追上博利厄的退兵了。拿破仑断定必须速夺此桥。下午5点时，他布好了30门火炮，并向南北方向共派出2000名骑兵，让他们设法寻找渡河浅滩。接着他让达勒马涅的3500人在洛迪后街列队，发表演说鼓动他们。（“人必须与灵魂对话，”他曾谈到自己的战场演讲，“这是激励人的唯一方法。”[61]）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让炮击速度提高一倍，下午6点，他派第27和第29轻步兵半旅冒着奥军的葡萄弹上桥。其实在下令之前，皮埃尔-路易·迪帕（Pierre-Louis Dupas）上校的卡宾枪兵连集合起来，主动请缨打头阵，这几乎是自杀式任务，他们无疑排除了自保的自然本能。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一旦拿破仑的战前鼓动激励利用团的荣誉感、激起炽热爱国狂潮，这种得名“法国怒焰”（the French fury）的狂热精神便能让他占据优势。

桥上第一波士兵蒙受伤亡，被赶了回来，但有些人跳进浅水，继续在桥下和桥边开枪，拿破仑则派更多人上桥。法军凭借巨大的勇气攻克并守卫桥梁，尽管敌军骑兵与步兵发起了反击。一个法军猎骑兵团找到穿过河流的浅滩，等他们到了河流右岸，奥军便照例有序撤走。五天后，拿破仑进入米兰，奥军被迫退往阿迪杰河。[62]

拿破仑只迎战了奥军后卫，双方都有约900人伤亡，即便如此，洛迪夺桥战却很快成了拿破仑传奇的重头戏。冒着几次三番的葡萄弹炮击

冲过狭长木桥堪称英勇壮举，贝尔蒂埃、拉纳、马塞纳等带头冲锋的军官后来成了拿破仑的一流将领。[63]（当天，贝尔蒂埃扮演了参谋长、炮兵指挥官、纵队队长三个角色，但此后他再未获准在战术层面领兵，因为拿破仑正确认识到他是宝贵的人才，不舍得让他参战冒险。）洛迪之战后，军队开始昵称拿破仑为“小伍长”（le petit caporal）。面对自己仰慕的指挥官时，旧时士兵有亲昵地戏谑他们的传统：尤利乌斯·恺撒的士兵歌唱“光头奸夫”（出自苏埃托尼乌斯）；威灵顿（Wellington）得名“大鼻子”；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得名“奶奶”；诸如此类。拿破仑喜欢“小伍长”之称，并鼓励人们使用它。正如这个绰号一般，他强调共和派的平凡做派，但他其实正在脱离这一点。洛迪之战后，所有哗变流言都销声匿迹了，至关重要的军旅精神代替了它们，且维持到战局告终。

“我曾经以为自己只是个将军，”拿破仑后来谈到他在洛迪的胜利，“但从那以后，我知道我是应召而来决断人民命运的人。我突然想到，我真的可以在我国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我的凌云壮志此时初现。”[64]一生之中，他在诸多场合对很多人重复此言，因此洛迪的确堪称他事业的分水岭。傲慢野心能变成可怕的东西，但拿破仑拥有多变精力、宏大目标、演说天赋、几近完美的记忆力、上佳的时机掌控能力以及鼓舞人心的领导技巧，此等奇才与野心结合方可成就辉煌业绩。

5月11日，拿破仑写了15封信，其中给督政府的如此说道：“希望不久之后，我能把米兰和帕维亚的钥匙交给你们。”博利厄正在向曼托瓦（Mantova）行军，拿破仑单独告诉卡诺，只要拿下几乎固若金汤的曼托瓦，他就能在两“周”（décade，革命历的周，相当于十日）内“到达德意志心脏腹地”。[65]尽管减员名单和统计的尸体数目必定会提供真实的伤亡数字，拿破仑依然报称：法军有150人伤亡，奥军有2000～3000人伤亡。终其一生征途，他经常系统性地夸大敌方损失、少报己方损失，此举当然是他非常熟悉的古典作家的写作特征。就连给约瑟芬写家书

时，拿破仑也会夸张，他盼着她透露消息，出自她口中会让它更显可信。（一次战斗后，他给约瑟芬写信，先写700人受伤，然后划掉，改成100人。[66]）拿破仑清楚，在没有切实求证渠道时，至少一开始法国人会相信他口中的数字，他们不仅信了伤亡人数，也信了俘虏人数以及缴获的加农炮与军旗数。拿破仑写军事公报时并不觉得受制于誓言。

拿破仑因战后谎报挨批，但是立足传统道德评判这些报告未免荒谬。自孙子的时代起，虚假情报就是公认的战争武器。（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战时真相太宝贵了，必须用一堆谎言捍卫它。）然而拿破仑的确有错，错在谎话太多，以至于最后真正的胜利反而变得不可信，或者至少不受重视了。法语中出现了短语“像公报一样撒谎”。条件允许时，拿破仑也给法国人看确凿证据，他送回缴获的敌方军旗，让它们陈列于荣军院军人教堂。然而，终其军事生涯，拿破仑都擅长把噩耗一般的消息说成单纯坏消息，把坏消息说成尚可接受的不好消息，把尚可接受的消息说成好消息，把好消息说成胜利。

两周来，拿破仑一直呼唤约瑟芬赴意大利团聚。他要她从都灵过来：

> 我求你了，和缪拉一起来，这样你能缩短十五天行程……你若幸福，我便安乐；你若开怀，我便愉悦；你若满意，我便知足。没有哪个女人被如此深沉的忠贞、热情与温柔爱过。我再也不是我心的绝对主宰，再也不能自定所有品位喜好，再也不能自主萌发所有渴求……没有你的信。我每四天才收到一封回信，如果你爱我就不会这么做，你会一天给我写两封……再见，约瑟芬，你是我无法理解的怪物……对你的爱与日俱增。分离消弭微细情感，却让深情厚谊更悠长……请思念我，或轻蔑地说你不爱我，那样的话，也许我能从精神中找到办法让自己不那么可怜……那将是美好的一天……你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天。那是我所有痛苦的最好补偿、所有胜利的最佳褒赏。[67]

约瑟芬一点儿也不想动身，她想了个挺冷酷的借口（如果那是真实情况的话），告诉缪拉她觉得有孕在身。消息传来，拿破仑欣喜若狂，

5月13日，他从洛迪司令部致信她："我能有幸见到腹部微隆的你吗！……你很快会诞下一个生命，它就像我一样爱你。我和孩子永远在你身边，让你相信我们关爱着你。你不会生气的，难道不是吗？不要说'哼！'！！！除非开玩笑。接下来我们就是三口或四口之家了，简直再妙不过。一记浅吻弥补一切。"[68]

约瑟芬可能是幻想自己怀孕，或者她真的流产了，但他们不会有孩子。事实上，她还被别的事分散注意力，于是没去意大利见丈夫——她正和骠骑兵中尉伊波利特·夏尔（Hippolyte Charles）如胶似漆。夏尔比她小九岁，风度翩翩，诙谐风趣，擅长恶作剧。约瑟芬致信友人称，"你会为他疯狂"，他的脸"那么漂亮！我敢说在他之前没人知道怎么系领巾"。[69] 特别熟悉夏尔的金融家安托万·阿默兰（Antoine Hamelin）认为，此人只是"一介庸人，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俊朗的外表"。阿默兰还说，夏尔就像"假发匠学徒"一样粗俗。[70] 此言显得夏尔中尉只像是花花公子，但那个年代常有决斗，必须承认他给拿破仑·波拿巴戴绿帽时的确有些勇气。

甚至在拿破仑的洛迪捷报送抵前，督政府就打算强迫他分享意大利战局的荣耀。事情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让·莫罗将军与让-巴蒂斯特·儒尔当将军在德意志表现平平，导致公众的高调赞美开始集中到拿破仑身上，危及督政府。自从1793年迪穆里埃将军背叛后，所有政府皆不想授予某位将军太多权力。拿破仑要求从克勒曼将军的阿尔卑斯军团调15000人支援自己，督政府回答说的确可以，但克勒曼必须跟去意大利，意大利军团指挥权也要分割。5月14日，即洛迪之战后第四天、夺取米兰前一天，拿破仑回信了。他告诉巴拉斯："我要辞职。我天生性格鲜明，稍具才干。没有你们的完全信任，我在这派不上用场。"作为瓦尔米会战胜利者的克勒曼，被拿破仑描述成一个"我不会尊重其腔调和准则的德意志人"。[71] 与此同时，他致信卡诺："克勒曼自诩欧洲第一将，我不甘心和他共事，再说我相信一个坏将军胜过两个好将军。

战争像政治一样讲究圆滑。”[72]

拿破仑给督政府的正式回复更显练达。“人人都有他的作战之道。克勒曼将军比我更富有经验，会比我表现更好，但我俩一起行动的话，事情只会糟糕透顶。”[73] 假意自谦一番后，他流露出青年人的倨傲：“仗打到现在，我还没咨询任何人。如果我被迫同异议者协商，那将得不偿失……我相信你们是毫无保留地信任我，所以我的行动才迅捷如思。”[74] 拿破仑说两个司令会很快失和，诚如所言。他没法当克勒曼的同事，更别说部下了。到目前为止的战局已经证明单人司令制明显优于奥军的臃肿指挥系统。[75] 他的辞职威胁随洛迪与米兰的捷报送至巴黎，这确保了分权念头自此夭折。事后，拿破仑知道只要继续取胜就能支配督政府，尽管他越发鄙视当局，但仍用恰当的修辞表示顺从。

拿破仑致督政府的信经过大幅度删减后刊登在《箴言报》上，原文笑话与闲言都被略去了。举个例子，摩德纳的第三代埃库莱斯（Hercules）公爵孱弱无奇，拿破仑说他“配不上自己的教名，就像他配不上名门埃斯特家族之后的身份”。他又暗示公爵的首席谈判代表弗雷德里克（Frederic）阁下是西班牙舞女和公爵父亲的私生子。[76] 巴拉斯后来说，拿破仑的报告含有“侮辱”与“讽刺”言论，令他震惊，但我们有把握认为，当时他和其他人都乐在其中。

1796年5月15日（周日），拿破仑胜利进入米兰。[77] 为了表彰卡宾枪兵在洛迪夺桥战中的英勇表现，他们享有最先入城的殊荣。米兰百姓给卡宾枪兵“戴上鲜花，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78] 拿破仑骑行过街道，群众高声欢呼，但他明白将被占领的城市总是倾向于欢迎征服者的。很多意大利人庆幸赶走了奥军，但他们对替代者法军其实没多少热情，倒是满怀忧虑。也有人认为法国革命理念将影响意大利的政治与社会，并且的确为之激动。这些人人数虽少，影响力却颇大。一般说来，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专业素养的世俗化精英阶层更可能视拿破仑为解放

者，相对而言，天主教农民则认为法军是不信神的外国佬。

塞尔贝洛尼公爵邀请拿破仑入住米兰的豪华宫殿塞尔贝洛尼宫（Palazzo Serbelloni），宫内有30名内侍和100名厨房工作人员。公爵需要这些人手，因为客人拿破仑开始大肆享乐，他接待作家、编辑、贵族、科学家、学者、知识分子、雕刻家、意见领袖，陶醉于米兰的歌剧、艺术和建筑，这一切都内含政治目的。“你是著名艺术家，有权获得意大利军团的特别保护，”他致信身在罗马的雕塑家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我已下令立即支付你食宿费用。”[79] 拿破仑不甘只成为一长列征服者的最新一员，他想把自己塑造成开明的解放者，于是他提出最终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希望，从而点燃意大利民族主义的火花。为此目的，进入米兰后第二天，他宣布成立伦巴第共和国。新国家将由亲法的意大利雅各宾派（giacobini，又叫“爱国者”）统治，他也鼓励整个地区以雨后春笋之势建立政治俱乐部（米兰俱乐部很快吸纳了800名律师和商人）。此外，拿破仑废除奥地利管理机构、改革帕维亚大学、组织选举临时市政府、建立国民自卫军，并会晤意大利统一运动的米兰领导人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里尔（Francesco Melzi d’Eril），尽可能授予他权力。不过，上述举动并未阻止拿破仑与萨利切蒂以“捐赠”为名在伦巴第征收20万法郎。讽刺的是，“捐赠”日他发布当日公告，声称自己“强烈关心军队荣誉，所以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财产权”。[80]

正如梅特涅日后所言，1796年时意大利“只是地理概念”，虽然意大利有共同的文化和缓慢发展的通用语，但它远不是国家。伦巴第理论上是新生的独立共和国，尽管法国是其保护国，但威尼斯还是奥地利省份，曼托瓦也在奥军手中。奥地利公爵与大公统治托斯卡纳、摩德纳、卢卡（Lucca）和帕尔马；教皇拥有教皇国（Papal States），其领地包括博洛尼亚、罗马涅（Romagna）、费拉拉（Ferrara）以及翁布里亚（Umbria）；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另成独立王国，拥戴波旁家族的费迪

南德四世（Ferdinand IV）；萨伏依君主也保有皮埃蒙特和撒丁。尽管拿破仑索要“捐赠”，但梅尔齐等梦想国家统一的意大利人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他。

1796年之后的三年［即所谓的“三年时代”（triennio）］，在拿破仑将建立的一系列“姐妹共和国”中，意大利人会看到雅各宾派兴起。拿破仑渴望以法国大革命为基础，在意大利营造精英人士优于特权阶级、民族意识强于城邦地方主义、自由思想重于特伦托天主教的新政治文化。[81] 这也属于督政府的政治议程，不过拿破仑推行自己的看法时越来越不尊重他们的意见。雅各宾派受法国大革命原则熏陶，在三年时代中，拿破仑允许他们动用有限权力，但旧秩序大多留存。常被征服的意大利人往往有办法冷却征服者的热情，这次亦然。事实上，绝大多数雅各宾政府的统治局限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很少长久。大部分意大利人认为，法国统治太赤裸裸、太集中、太贪婪（特别是对金钱和艺术品）、太异国。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天主教思想过激的南部乡野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ia），意大利并未像未来的蒂罗尔（Tyrol）和西班牙一样大举反抗拿破仑，因为总的来说，意大利人认为法国政府的方式比奥地利的更有利于他们。

拿破仑在新征服地区施行了下列改革：废除内部关税，刺激经济发展；关闭贵族议会等封建权贵势力中心；重组财政，削减政府债务；解散封闭的行会体系；实行宗教宽容；取消犹太人居住区，允许犹太人自由择居。有时他还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未来十年，拿破仑在大部分占领区一再推行这些近代化政策。在法国以外的很多地区，中产阶级进步人士都很拥护上述举措，就连憎恨拿破仑的人也不例外。伏尔泰认为欧洲将逐渐文明化，在拿破仑生活的时代，这一观点在法国相当流行，它也为他的文明化行动奠定了基础。拿破仑废除异端裁判所，淡化封建做派、反犹规定以及行会等对贸易和产业的限制，他也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真正的启蒙。如果没有他的军事胜利，他们在法律面前仍无权利和平等

可言。

要是拿破仑想说服欧洲其他地区相信法国政体具有根本优势，比起一味顺从，他更需要积极合作。他可以赢得战争，但他的官员们得迅速跟进、赢得和平。事实上，18世纪60年代，法语词典才收纳单词“文明”，拿破仑时代这个词也不常用，但法国大革命的精英积极领导起他们坚信的新型文明化方式，并且真的认为自己在法国大旗下改善了欧洲福祉。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方式，当然，先决条件是法国大军不败。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一直自称“大国”。1797年8月，意大利军团报纸大力鼓吹道：“大国每一步都伴着祝福！”[82] 督政府时代，法军军官在爱国宴会上如此祝酒：“为法兰西共和党的团结干杯，愿他们以意大利军团为榜样，在它的帮助下重振统领地球之国应有的活力！”[83] 此言不符祝酒词的简洁本性，但流露了一切帝国霸业必需的文明优越感。

“人才与文豪不论国籍，皆法国人。”1796年5月，拿破仑从米兰致信意大利的杰出天文学家巴尔纳巴·奥里亚尼（Barnaba Oriani），“米兰学者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躲进实验室，如果教士不管他们……他们就觉得幸运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意大利思想自由了。异端裁判、不容异己、专制暴君不复存在。为了复兴科学与艺术，我邀请学者们共聚一堂，畅谈必需策略。”[84] 废除审查制度令学者们欣慰，不过这当然不足以弭平对法军占领的批评。

然而，拿破仑必须把奥军全数逐出北意大利才能兑现哪怕一条承诺。1796年5月，大批奥军驻于曼托瓦，他们被逐出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随时可能获救。进入米兰后，拿破仑对士兵发表宣言：

> 士兵们，你们就像一道激流，从亚平宁山脉（the Apennines）顶端直泻而下。你们推翻驱散了进军路上的所有障碍……完全是因为你们慷慨大度，帕尔马公爵与摩德纳公爵才保住了国家……这些辉煌战绩令你们的祖国满心喜悦……故园的父老乡亲为你们的好运欢欣鼓舞，骄傲地夸口说他们属于你们。[85]

这是一番溢美之词，但所有盼着在米兰好好休整的士兵马上就醒悟了：

> 你们厌恶柔弱的安眠，失去了荣誉的日子里，你们也失去了快乐。那么，让我们前进！我们要继续跋山涉水、过关斩将、建功立业、以牙还牙……然后你们会返回家园与祖国。人们会指认出你们：“他来自意大利军团。”[86]

天主教教士在帕维亚制造反法起义，5月23日，拉纳直接射杀市政会成员，严厉镇压反抗。[87] 次日，米兰西南方10英里处的比纳斯科（Binasco）上演了类似事件。[88] 武装农民防卫该村，袭击法军交通线。“我们去帕维亚，半路上在比纳斯科击败1000个农民。”拿破仑告诉贝尔蒂埃，“我们杀了其中100人，然后烧村。虽然手段可怖，但威慑效果很好。”[89] 烧毁比纳斯科一事类似于遍布旺代的一种反游击战斗，在那儿，法军正靠屠杀和烧村对付朱安党。[90] 拿破仑相信“放血是政治药剂的配方”，但他也认为及时明确的惩罚有望阻止大规模反叛。[91] 他几乎不会因为暴力而放纵暴力，也能体恤人间疾苦。比纳斯科事件结束一周后，拿破仑告诉督政府：“我必须这么做，但这一幕还是很可怕的。我很痛苦。”[92] 十年后，拿破仑给朱诺的一封信有如下附言：“记住比纳斯科，因为它，意大利全境安定，千万人避免流血。恰当的严苛例子最有效。”[93] “如果你要开战，”1799年12月，他告诉戴杜维尔将军，“那就打起精神、严肃对待，唯此方能缩短战争，进而减少人类的悲痛。”[94]

帕维亚起义扩散至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在此期间，当地最富裕的人家中有500人成了“政治犯”。他们被送去法国当人质，以确保意大利人顺从。在托尔托纳周边的乡村，拿破仑销毁了所有用于召集反抗者的教堂鸣钟，一旦当场抓获指挥农民团体的乡村神父便毫不犹豫地枪决他们。尽管他在科西嘉时已有的反教权思想就足以让他憎恨所谓的“伪神职人员”（la prêtraille），如今教区神甫煽动起义之举更是让他坚定此

念。然而，此事也让他逐渐尊重教会作为制度的力量。拿破仑意识到不能与整个教会为敌。他承诺保护没有混淆政教事务的教士。

5月下旬，拿破仑痛苦万分。他不断给约瑟芬寄去长信，询问“你会来吗？怀孕的事怎样了？”在单单一封信里，他叫了她五声“甜心”（dolce amor）。然而，约瑟芬却不回信。[95] 有一次，他写道：

> 我预感你已经出发，满心欢喜……对我来说，你一来，我就高兴得忘乎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看你抱孩子……不，甜心，你会来，你会很好；你会生下像母亲一样美丽、像父亲一样爱你的孩子，当你老去，当你百岁之际，孩子会让你欣慰快乐……快来听美妙的音乐，快来看美丽的意大利。这里独独缺了你。[96]

伊波利特·夏尔身着天蓝色制服与匈牙利式紧身马裤，足蹬红色摩洛哥靴，爱搞孩子气的恶作剧，约瑟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直到下个月才离开巴黎。

1796年6月2日，拿破仑开始围攻储备充足的曼托瓦。他一边提防奥军从蒂罗尔杀回，一边镇压北部叛乱，而且尚需夺取名为城寨（the Citadel）的米兰城堡，因此他的部队捉襟见肘。巴黎政府指示拿破仑把革命传播到西南方的教皇国、驱逐教皇城市里窝那的皇家海军。他得威胁威尼斯，确保它不会借援助奥地利而违背中立承诺。他下令把昂蒂布的围城器械运至米兰。6月中旬，拿破仑将突然南下扫荡教皇国。他盼着到时在博洛尼亚、费拉拉和摩德纳的要塞缴获更多大炮，从而增加围城器械。

5月30日，博尔盖托之战爆发，拿破仑渡过明乔河（the Mincio），博利厄被迫经阿迪杰河谷（the Adige valley）北上，退往特伦托（Trento）。在战斗中拿破仑险些被俘，于是他解散了卫队，另选猎骑兵连保护自己。这支部队是他的近卫猎骑兵（Chasseurs à Cheval de la Garde）前身，其指挥官让-巴蒂斯特·贝西埃（Jean-Baptiste Bessières）

将军为人冷静谨慎。博尔盖托之战后，弗朗茨皇帝不再让倒霉的博利厄指挥奥军野战军（不过他仍率领曼托瓦守军），而改派陆军元帅达戈贝特·冯·武姆泽（Dagobert von Wurmser）上阵。阿尔萨斯人武姆泽又是一员古稀老将，他在七年战争中成名，那场战争结束六年后拿破仑才出生。

曼托瓦、佩斯基耶拉（Peschiera）、莱尼亚戈（Legnago）、维罗纳（Verona）这四座要塞是奥地利势力打开北意大利的钥匙，它们合称“四边形”（Quadrilateral），掩护北方与东方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入口以及通往波河和加尔达湖（Lake Garda）的道路。一般说来，拿破仑偏好灵活行军，尽量避免围城，但眼下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动用40400人围攻曼托瓦、保障交通线畅通、防守阿迪杰河（the River Adige）阵线。1796年6月至1797年2月，曼托瓦围城战一共只有五周。曼托瓦三面临大湖，剩下一面是高耸厚实的城墙，对所有攻城者来说，这座城市都是严峻挑战。城内守军兵力远超围城军队，至少在最初阶段，奥军发射的加农炮炮弹数量是法军能够回击的数量的两倍。然而，6月上旬，拿破仑靠伦巴第平原和“捐赠”获得充足给养，以至于他给督政府送去100匹马车挽马，以便“给你们的四轮大马车换上好马”。[97] 他还送了价值200万法郎的黄金，督政们非常需要这些财物。

6月5日，拿破仑会见法国驻托斯卡纳公使、外交官安德烈-弗朗索瓦·米奥·德·梅利托（André-François Miot de Melito）。日后米奥描述了他们的相遇：

> （拿破仑）特别瘦。他那扑了粉的头发剪得很奇怪，直垂到耳朵下，触及肩膀。他穿着笔挺大衣，上绣一条细细金边，扣子扣到下巴。他的帽子上插了根三色羽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英俊，但颇具特色的面容、敏锐灵活的眼睛、粗鲁生动的手势昭示了炽热的精神。他前额宽阔多虑，说明其人是沉思者。[98]

米奥发现，拿破仑给缪拉、朱诺和拉纳下令时，“他们都尊敬他，

甚至能说是仰慕。我在其他军人身上看到过亲密情谊，这符合共和国的平等，但他和战友之间没有那种迹象。他已经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与他人保持距离”。此乃蓄意为之。虽然拿破仑只有27岁，但他开始借助副官、秘书和家仆控制别人接近他的难度，并提升他的地位。为此目的，除了朱诺、马尔蒙、米龙和缪拉，他又任命了两名副官：革命军中的波兰少尉约瑟夫·苏乌科夫斯基（Joseph Sulkowski）；炮兵军官热罗·迪罗克（Géraud Duroc），他曾是奥古斯丁·德·莱斯皮纳斯（Augustin de Lespinasse）将军的能干副官。数年后，拿破仑说“他只同迪罗克亲近，只会完全信任迪罗克”。[99] 除了拿破仑的家人，只有迪罗克等极少数人称他为“你”。

督政府希望拿破仑向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国进军，但他明白顶着蒂罗尔的威胁南下有危险，所以这回他没有像在凯拉斯科时一样超越巴黎的命令，而是直接抗命了。他命令米奥与那不勒斯商谈停火，要求该国撤回编入奥军的四个骑兵团、收回投入里窝那的皇家海军分舰队的军舰，否则他就率意大利军团入侵。那不勒斯谈判代表贝尔蒙特-皮尼亚泰利（Belmonte-Pignatelli）亲王拿到条约还不满两小时，但他一听到入侵威胁就签字了。此时拿破仑已经乐得嘲讽督政府了，他问皮尼亚泰利是否真的认为他“在为那群流氓律师而战”。[100] （拿破仑欣赏佩服个别律师，但他全然鄙视律师群体。五督政中有三个前律师、一个前法官——巴拉斯。只有数学家卡诺没有法律背景。）

拿破仑回到米兰，6月5日，他又给约瑟芬写信。他仍然认为她怀孕了，正在来见他的路上。他写了很多很多长信，信中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爱情、愤怒、迷茫与自怜，这说明他写信定是为了放松，进而逃避当时身上的沉重军政负担。那个年代的人刻意书写浪漫信件，拿破仑显然力争最理想效果。他写给妻子的内容和《克利松与欧仁妮》中的幻想几乎没有区别。其中一封信写道：

> 我的灵魂悲伤满溢，只望欢愉。不断有信来，却无你的消息。当

你真的提起笔，却又只写几个字，毫无深情可言。你爱我时只是稍稍任性一下，你觉得就连让自己的心灵深陷其中都显荒唐……我对你仅剩一个愿望，愿你不会厌恶对我的记忆……我不曾心怀平凡情感……我已经硬起内心抵御爱情，而你出现，点燃了它无尽的激情，那是会堕落的狂喜。我灵魂中的一切都为对你的思念让步，除此之外的宇宙什么也不是。你最小的任性，我却奉之为神圣号令。能见你就是我的极乐。你美丽和蔼，你是甜蜜，是你脸上美艳无双的神色映照出的曼妙灵魂……残忍！！！你从未动过的感情，怎能让我想象！！！但指责与我不相称。我从不相信幸福。死神每天飘在我身边……我们值得为人生搞出这一通忙乱喧闹吗？再见，约瑟芬……我的心头戳着千把匕首，别把它们推向更深处。再见，我的幸福，我的生命，我的世界唯一真实的存在。[101]

拿破仑曾多次从事文学创作，如宣泄对德西蕾的伤感、回忆初夜、表达对法国“征服”科西嘉一事的痛恨、解释他的雅各宾思想，等等。可这回，他真的给约瑟芬寄去忧心如焚的信。她正忙于自己的风流事，懒得回信，隔上两周才写两三行。有一次，她整整一个月没写信，直到6月11日才动笔。那时拿破仑好像终于猜到事情不对了，因为当日他致信她的前情夫巴拉斯：“我很绝望，妻子不来陪我。她被巴黎的情人拖住了脚步。我诅咒所有女人，但我全心全意地拥抱朋友。”[102]

至于约瑟芬本人，拿破仑告诉她，他几乎已经听凭她不再爱他（如果她真的爱过），但次日早上，他无法接受这有些明显的结论，于是拼命抓住其他可能性，包括她也许要死了（尽管巴黎的缪拉报称，就算生病了，她得的也是“小病”）：

你不爱我了。我唯有一死……如果可以！！！我的心上缠满复仇女神的毒蛇，我已然半死半生。噢！你……我在流泪，既无安逸也无希望。我尊重这命运的愿望与不变法则，它让我背上荣誉重负，对自身不幸愈感悲痛。我会逐渐适应新局面的一切，但我无法习惯不再尊敬它。但不，这不可能，我的约瑟芬在路上。她爱我，至少爱那么一点。许诺了那么多爱，岂能两个月就消散。我恨巴黎、女人和做爱……那是可怕局面……和你的行为……但我能怪你吗？不，是你的命运让你做的。你如此友善，如此美丽，如此温雅，你能刺穿我的绝望吗？……再见，我的约瑟芬，想到你向来令我开心，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替我拥抱你的漂亮孩子们，他们写了可爱的信。因为我必须停

止爱你，我就更爱他们了。不论命运和荣誉，我将爱你一生。昨夜我重读你所有的信，甚至读了你的血书，它们让我产生了怎样的感情啊！[103]

拿破仑一度叫约瑟芬见面前三天不洗澡，这样他就能沉浸于她的体味。[104] 6月15日，他对她坦言："我不能容忍情夫，更别说带他过来。"他说他回想起一个梦，"梦里我脱下你的靴子、裙子，把你整个人放进我心里"。[105]

拿破仑给约瑟芬写了数百页感情狂想，不断暗示要是她发生了什么他就去自杀，但他提到战争时说的信息几乎都能在公共报纸上找到。他也不放心对她述说自己内心深处对人对事的看法。或许他担心信会落入敌军之手，因为特别信使把信送到巴黎要花两周时间。1833年，拿破仑给约瑟芬的238封信首次出版，英国政客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便在《每季评论》中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也许正如他所说，拿破仑认为约瑟芬"轻浮放荡、水性杨花，虚荣得足以讨好，粗心得无法信任"。克罗克贬低这些信，认为它们说明两人"没有切实信任，没有思想交流……没有认真对话，没有一致兴趣"。[106] 他的话听来严苛，但不无道理。

拿破仑能够划分生活中的事务，所以他思索某事时不会被他事干扰。大概这是伟大政治家的必备素质，但他把这种能力发挥到了超凡水平。"我的大脑就像储物柜，不同主题不同事务分门别类放好。"他曾说，"不想继续思考某事，我就关上它的抽屉，打开另一个。我想睡觉？只要统统关上就睡着了。"[107] 一名副官写道，拿破仑的部下非常"钦佩他头脑发达，且能灵活自如地在任何喜欢的事上切换全部注意力"。[108] 他的私生活刮起了飓风，他逐渐认识到爱慕的女人对自己至多不冷不热，这让他愈发痛苦，但他一边置身这一切之中，一边给大胆的战役方案添上最后一笔。拿破仑已经取胜五场，这份计划会让他超越前胜告捷七次，并助他拿下曼托瓦、赶走统治了意大利三个世纪的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朝。

---

[1] Pratt，Fletcher，‘Vignettes of Napoleon in Italy 1796’*Journal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vol.2 issue 2 Summer 1938，p.60

[2] Boycott-Brown，Martin，*The Road to Rivoli* 2001，p.412

[3]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04，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90-92

[4] 严格意义上说，本书前半部所谓的奥地利皇帝都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关于弗朗茨的两个帝号，详见第十七章。——译者注

[5] Baldet，M.，*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1964，p.33

[6] Starke，Mariana，*Letters from Italy Between the Years 1792 and 1798* 2 vols.1800，Ⅰ p.60

[7]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p.135，205

[8] 半旅是步兵团前身，法国革命战争期间，它们很难保持满员。一个半旅下辖三个营，平均兵力一般约为2400人。（将半旅解释为步兵团变体更恰当，1803年拿破仑恢复了团，但本书作者仍经常用半旅，所以译者对原文有所改动。——译者注）

[9]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p.217-19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26 p.304，March 28，1796

[11]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367

[1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71 p.328，April 8，1796

[13]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90-92

[14] 每日公告（Orders of the Day）常常汇报信息、干涉勤务，下午1点营地点名或行军途中停下休息时，军中会宣读它们。每日公告不同于宣言，后者旨在鼓舞人心，读来如同演说。

[1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67

[16] 虽然法军不像英军那样动用鞭刑，军中死刑范围却宽得多。瓦格拉姆会战前，军粮部12名文员出售帝国近卫军口粮，他们被当场抓获，几小时后就遭枪决。Blaze，*Life in Napoleon’s Army*，p.190.在西班牙，有个人吃了一串葡萄后被枪毙（人们认为葡萄会诱发痢

疾），面对上级时有动武迹象即是死罪。西班牙战局后期的一次战役中，一名腾跃兵（轻步兵）把女式黑围裙改成领巾，就连这种事也为他招来枪决之祸。

[17] ed. Luvaas，Jay，*Napoleon on the Art of War* 1999，p.10

[18] Gray，Daniel Savage，*In the Words of Napoleon* （Troy，AL）1977，p.ⅹⅱ

[19] *TLS* 12/5/1927 p.325，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3/2/2012 p.4

[20] AN 192AP/2，SHD GR6.YD/1

[2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847 p.694，April 28，1804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63 p.324，April 6，1796

[23]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46

[24] 拿破仑经常把坐骑累得筋疲力尽，但他的马术不错。他能“完全驾驭”自己的战马，有时甚至让它们耍特技。Balcombe，*To Befriend* ，pp.41-2.

[25]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32

[26]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34，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464，467 p.325，April 6，1796，p.326，April 7，1796

[2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120 p.111，January 19，1807

[28]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73，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06，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277 p.230，May 11，1800，GC1 no.1068 p.672，November 21，1796

[29]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25-6，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36 and *passim*

[3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463 p.324

[3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0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4

[33]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p.128-9，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4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2

[3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71-2

[36] 在这方面，威灵顿的英军也算不上无可指摘。半岛战争参战士兵没留下多少回忆录，但德意志国王兵团的弗里德里希·林道（Friedrich Lindau）写过一本。此书表明，英军偷窃当地百姓，殴打不交收成和牲口的农民。Bogle and Uffindell，eds.，*Waterloo Hero passim*，Mars & Clio，No.26，pp.89-90.拿破仑的确枪决了在教堂里偷拿珍贵花瓶的一名下士、两名列兵，在他看来，虽然他从教堂和宫殿取走了北意大利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但此事与彼事天差地别。法军将领常常牺牲被征服者的利益为己谋财，马塞纳等人更是贪得无厌，日后拿破仑强迫马塞纳吐出数百万法郎。那个年代，指挥官常常厚待自己，威灵顿从印度战场回来后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攒下了4.2万英镑（相当于100万法郎），这些收入都非常合法。
Weller，*Wellington in India*，pp.257-9.

[37] Foy，General，*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 2 vols.1829，I p.43

[38]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11

[39]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p.42-3

[40]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45

[4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88

[42]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Ⅱ p.112ff

[43] 原文误作“瓦朗斯”（Valence）。——译者注

[44]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Ⅱ p.122

[45]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Ⅱ pp.126-7

[4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45 p.370，April 20，1796

[47]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252

[4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76

[4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57 p.377，May 1，1796

[50] 今天也有人辩解为何埃尔金大理石应该留在大英博物馆，其理由与谢泼德的本质上如出一辙，尽管取得大理石的情境有所不同。

[51] *Edinburgh Review* no.XLVI September 1814 p.470

[52]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Ⅲ p.352

[5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55

[5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73 p.384，May 6，1796

[55] "Brave"意为"勇士"，系基尔迈纳的绰号，其原名为Charles-Edouard-Saül Jennings de Kilmaine。——译者注

[56] 原文误作"将军"。——译者注

[5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82 p.389，May 9，1796

[5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609-11，pp.406-7，May 18，1796

[59] Higgonet，*Paris* p.136

[60] 位于今日桥梁上游15英里处。

[61]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203

[62] 拿破仑战争中，法军经常在敌军眼皮底下过桥并夺取桥头堡。这一幕不断重演，如1796年的阿尔科莱会战、1805年的多瑙河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1807年的波兰战局、1809年的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与瓦格拉姆会战、1812年的别列津纳河之战、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1814年的蒙特罗之战以及1815年的沙勒罗瓦之战。

[63] 然而，洛迪之战当天亦有挫折。战斗胜利后，拿破仑得知拉阿尔普死于皮亚琴察附近的小战之中。大革命期间，拉阿尔普在伯尔尼的地产被当地政府没收，拿破仑于是致信法国驻伯尔尼大使，确保没收的财产返还他的6个子女。伯尔尼州政府当然不会拒绝洛迪胜者的要求。

[64] Tulard，Jean，*Napoléon：les grands moments d'un destin* 2006，p.97

[65]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114，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0

[6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89 p.393 and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88 p.392，May 11，1796

[67]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37-40

[6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5 pp.396-7，May 13，1796

[69]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174

[70] Dwyer，Philip，*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p.243

[7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6 p.397，May 14，1796

[7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7 p.398，May 14，1796

[7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599 p.399，May 14，1796

[74]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 （Boston）1897，pp.34-5

[75] "战时全权指挥最重要，"拿破仑日后宣称，"只能有一支军队、一个行动基础、一位司令。"Chandler ed.，*Military Maxims* ，p.213.

[76]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Ⅱ p.153

[77] 据说，此刻拿破仑告诉马尔蒙："运气就像女人，她越服侍，我越索取。"Rose，*Napoleon I* ，p.118.

[78] Gaffarel，Paul，*Bonaparte et l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1895，p.5

[7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880，p.1107，August 6，1797

[8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82，85

[81] Broers，Michael，*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2005，p.31

[8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9

[83] Woloch，Isser，*Jacobin Legacy* （Princeton，NJ）1970，p.70

[8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7 p.415，May 24，1796

[85]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 （Boston）1897，pp.36-7

[86]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 （Boston）1897，pp.37-8

[8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39 p.421，June 1，1796

[8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9 p.416，May 25，1796

[8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9 p.416，May 25，1796，Chrisawn，Margaret，*The Emperor's Friend* 2001，p.22

[90]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40-41

[91] Pigeard，Alain，*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2000，p.182

[9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39，p.421，June 1，1796

[9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392 pp.86-7，February 4，1806

[9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6 no.478 p.73

[9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25，p.414，May 25，1796

[96]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43

[9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42，p.424，June 1，1796

[98]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51

[99]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1

[10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95

[101]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47-9

[10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72 p.441，June 11，1796

[10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77 p.443，June 11，1796，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p.46-7

[104] *TLS* 24/11/2006 p.14

[10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693 p.451，June 15，1796

[106] *Quarterly Review* 1833 pp.179-84

[107]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4

[108] Summerville，*Ségur* p.119

第五章 克敌制胜

为了指挥一支军队，你需要不懈地投身于它，抢先获知情报，为一切做好准备。

——1813年4月，拿破仑致约瑟夫

胜利与失败仅一步之遥。我发现最关键时刻总是细节定乾坤。

——1797年10月，拿破仑致塔列朗

在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头号敌人一直是奥地利，但他也能利用奥地利不具威胁性的短暂时间保卫后方。1796年6月，法军进入教皇国，据说他们用圣烛点烟斗，不过这画面太过生动，像是一记反法宣传。[1] 庇护六世倒是确曾批判法国大革命，并支持第一次反法同盟，但他没有正式加入同盟。教皇很快要为这一侮辱行为付出高昂代价。庇护六世现年78岁，已统治二十一年。6月18日拿破仑进入摩德纳，次日又入驻博洛尼亚，教皇的军事水平和个人能力无法阻止他。他驱逐了两地教廷当权者，强迫他们在一周内妥协。6月下旬，拿破仑与教皇达成停火协议，要求对方“捐赠”1500万法郎，这笔钱足以让督政府考虑缔结和约。萨利切蒂还与教皇国商谈艺术品交接。“法国专员有权挑走100件画作、花瓶、半身像或雕像”，其中包括尤尼乌斯·布鲁图的铜制半身像和马库斯·布鲁图的大理石半身像。此外，法国人还拿走了梵蒂冈图书馆的500份手稿。[2] 8月11日，拿破仑敏锐地察觉到图书馆打算尽量敷衍，遂致信法国驻罗马代理人弗朗索瓦·卡科（François Cacault）：“条约写的是500份手稿，不是300。”[3]

6月21日，26岁的拿破仑给督政府写了至少四封信。这些信警告道，他只有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却得用它“四处救急：拖住（奥地利）军队、围攻要塞、保护后方，并威慑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全线都需强势兵力”。[4] 诚如此言。意大利的大城市

（名单上甚至可添加米兰和都灵）之所以受制，既是因为似乎无敌的拿破仑威震全境，同样也是因为其附近有随时可供调遣的军队。妥善协调的反叛容易损害他。督政府仍然认为莱茵战场重要得多，没给他多少增援。

此时，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治国策略讲求巧妙明智地运用威胁与漠视。“在此必须烧杀一番，营造恐慌气氛，”6月21日，他写道，“在彼必须视而不见，因行动时机未到。”[5] 他满足待征服者的自尊，但也叫他们完全明白反抗的下场。“法军热爱全人类，尊重全人类，特别是淳朴正直的山民，”当月，他对蒂罗尔居民发表宣言，“但若你们不为自己着想，执意拿起武器，我们就化身恐怖的天降烈火。”[6]

拿破仑很依赖贝尔蒂埃，但他大大方方地维护自己的能力。6月22日，拿破仑在博洛尼亚会见米奥·德·梅利托，问外交官某则流言的情况：“他们说胜利多亏贝尔蒂埃，他指挥我的计划，我只是听从他的建议。”米奥曾在凡尔赛结识青年贝尔蒂埃，他否认了谣言，于是拿破仑热情地说：“没错，贝尔蒂埃一个营都管不了！”[7] 此言非他本意，因为1798年与1800年，他分别让贝尔蒂埃指挥意大利军团和预备军团，但它说明他格外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亦有另一件风格与之相似的事：他修改宣言文本，去掉“法军指挥官们”的“们”字。

英国商人与托斯卡纳大公友好通商，6月27日，法军将他们逐出里窝那，缴获了价值1200万英镑的货物。米兰城寨经受了四十八小时炮击，于29日陷落。7月11日，英军回击，吞并意大利海岸线上的大公国前领土厄尔巴岛，拿破仑理智地评论道：“我们违反中立在先，没资格抗议别人。”[8] 事后不久，拿破仑从弗朗茨皇帝胞弟、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III）处榨取了一笔“捐赠”，此人曾授予里窝那的英国商人经营特权。7月1日，拿破仑造访佛罗伦萨，从圣弗雷迪亚诺教堂（San Frediano）到碧提宫（Pitti Palace）的街上“挤满市民”，他们争

着看他一眼。[9] 他在碧提宫波波利花园拜访费迪南德，一睹美第奇（Medici）家族委托彼得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创作的天顶画杰作，这幅画不好运往巴黎。他也一览鲁本斯、拉斐尔、提香、凡·戴克和伦勃朗的作品，这些都能拿走。大公待拿破仑极尽礼数，而后者告诉前者："令兄在伦巴第再无寸土。"此言不实——曼托瓦仍在顽抗。费迪南德"非常克制，显得全不在意"，但他清楚，若曼托瓦陷落，他的权位马上不保。[10]

6月26日，约瑟芬终于含泪从巴黎启程去米兰。同行之人有约瑟夫·波拿巴（他正在调养性病）、约瑟芬的女伴（demoiselle-de-compagnie）路易丝·孔普安（Louise Compoint）、约瑟夫的妻舅尼古拉·克拉里（Nicolas Clary）、金融家安托万·阿默兰（他依赖约瑟芬过活，想去拿破仑处谋职）、朱诺、四名仆人、一队骑兵护卫以及约瑟芬的小杂种犬好运（Fortuné）。好运在床上咬过拿破仑，后来同其厨师的狗干了一架，这是一次不公平的打斗——厨师的狗更大更凶猛。[11] 约瑟芬胆大包天，她竟然带上骠骑兵情郎伊波利特·夏尔。路上，朱诺勾引路易丝，约瑟芬到米兰后便解雇了女伴，从此她与朱诺结仇，两年后痛悔不已。

在南下途中，拿破仑的长长情书汹涌而来。一封典型信件如此收尾："再见，我的爱人，吻你的唇，吻你的心……（盼着）在你怀中、在你脚边、在你胸口的那一刻。"[12] 他从托斯卡纳的皮斯托亚（Pistoia）致信她，说自己口袋里"塞满没寄给你的信，因为它们太蠢太傻，只能用荒唐（bête）来形容"。[13] 考虑下他真正寄出的信的文风，我们便可断定留下的一定分外夸张。拿破仑早年的感情受虐癖复发，他写道："尽情嘲笑我吧，别离开巴黎，叫大家都知道你在找情人，绝对不要给我写信。啊！我只会更爱你十倍！"[14]

7月10日，约瑟芬抵达塞尔贝洛尼宫，三天后，拿破仑来此同她会

合。之前六周，他从米兰出发，途经哈布斯堡帝国、教皇国、威尼斯以及独立城市佩斯基耶拉、布雷西亚（Brescia）、托尔托纳、摩德纳、博洛尼亚、里窝那、佛罗伦萨、罗韦尔贝拉（Roverbella）、维罗纳，然后返回米兰。他一共行军300英里，震慑整个意大利中部，攫取了总计超过4000万法郎的“捐赠”。拿破仑没有注意到伊波利特·夏尔，朱诺、缪拉和约瑟夫都不想揭露实情，而且约瑟芬似乎热情回应他的殷勤，不管她心里有何情绪。阿默兰回忆道：“他不时离开书房同她玩乐，拿她当孩子一般。他逗她，惹她尖叫，粗暴地拼命爱抚她，我只好走到窗边，看窗外天气。”[15] 他们的关系的确非常依赖触觉，剧作家卡里翁·德·尼萨（Carrion de Nisas）记载道：“波拿巴夫人年老色衰，但极其谦和迷人。她时时爱抚丈夫，他似乎对她痴心一片。她常为很小的事落泪，有时每天都哭。”[16]

萨利切蒂为约瑟夫谋得意大利军团军需总监一职，拿破仑召兄长过来，这样的话，他身边便有人可托付微妙的秘密外交。约瑟夫去里窝那、帕尔马和罗马执行任务时，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为弟弟所用。他后来和米奥·德·梅利托重建法国对科西嘉的统治。在这些征途中，约瑟夫发现自己确有外交才华。

武姆泽正率5万人南下，法军得赶在他解围前从博利厄手中夺取曼托瓦，所以拿破仑只能待两晚。“我打算大胆出击。”他告诉督政府。[17] 然后他又和督政说了缪拉的计划：缪拉将率乔装改扮、身着奥军军服的士兵趁夜渡河，此举旨在打开城门、为他赢得入城时间。拿破仑写道，缪拉的“突袭就像类似行动一样取决于运气，比如一条狗或一只鹅”，[18] 可见他当时很可能想到拯救古罗马的卡皮托利诺山上的鹅。最终，波河水位下降导致湖面萎缩，夜袭计划告败。

7月下旬，拿破仑安插在奥军参谋部的情报贩子报称，武姆泽正沿加尔达湖两岸南下解曼托瓦之围。武姆泽指挥的部队中有从莱茵战场调

来的精锐老兵。在曼托瓦，疾病开始拖垮博利厄的守军。战时，拿破仑很仰仗情报，他不让参谋插手，坚持自己分析敌情，从而亲自确定每条信息的可信度。[19] 为了搜集军情，军队审问逃兵与战俘、派骑兵巡逻，甚至把雇农妻子扣作人质后让士兵假扮雇农。拿破仑清楚，执行侦察任务的间谍和军官可能混淆军团和小分队，他们的报告常常也非亲身见闻，而是从“恐慌或惊讶的人们”那儿听来的。[20] 他命令情报官员：“每到一处都要仔细侦察隘路与浅滩；觅得可信向导；盘问教士和邮政局长；迅速了解居民；派出间谍；拦截公文与书信……简言之，当大军最前头的总司令抵达时，你们要能回答他的所有问题。”[21]

这回的间谍报告属实。武姆泽率五路纵队沿加尔达湖东岸南下，兵力合计32000人；出身克罗地亚（Croatia）的骑兵、彼得·冯·夸斯达诺维希（Peter von Quasdanovich）将军率18000人沿西岸南下。拿破仑让塞吕里耶留下10500人继续围攻曼托瓦，自领31000人迎接新敌。他派皮埃尔-弗朗索瓦·索雷（Pierre-François Sauret）带4400人去萨洛拖住夸斯达诺维希，令马塞纳率15400人去东岸。他调遣亚森特·德皮努瓦（Hyacinthe Despinoy）将军的4700人，以便掩护佩斯基耶拉-维罗纳一线。他让奥热罗的5300人从东边监视公路，并留下基尔迈纳的1500名骑兵充当预备队。此后拿破仑本人不断往返于布雷西亚、卡斯泰尔沃诺（Castelnuovo）、代森扎诺（Desenzano）、罗韦尔贝拉、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戈伊托（Goïto）和佩斯基耶拉，哪儿能最好地把握战局，流动司令部就搬到哪。天气常常炎热，他又不停奔波，在短时间内接连累死五匹坐骑。[22] 拿破仑的波兰副官代齐德里·亚当·赫瓦波夫斯基（Dezydery Adam Chlapowski）回忆道：“他从不用马刺或膝盖策马，只用鞭子。”[23]

不出所料，7月29日，夸斯达诺维希将索雷逐出萨洛，不过该镇曾三度易手。同日凌晨3点，东岸的马塞纳在拉科罗纳（La Corona）和里沃利（Rivoli）遭遇大举进攻，只得沿阿迪杰河且战且退，他下行很长

一段路，于夜幕降临时抵达布索伦戈（Bussolengo）。奥地利人大胆前进，拿下里沃利。“明天，或许之后，我们会夺回你今天失去的一切。”拿破仑为了让马塞纳放心，于是说道，“勇气在，一切就在。”[24] 然而，7月30日，奥军发起“布雷西亚奇袭”，以3人死亡、11人负伤的微小代价俘虏了当地守军，并占领医院。医院病人包括拉纳、被某位吕加（Rugat）夫人传染了性病的缪拉以及克勒曼之子弗朗索瓦-艾蒂安（François-Étienne Kellerman），小克勒曼是出色的骑兵。拿破仑要约瑟芬从布雷西亚回米兰，就连她也差点在路上被俘，他便发誓道：“武姆泽必须为那些眼泪付出惨痛代价。”[25]

拿破仑对督政府承认道，“我们遭受了一些挫折”，同时他把所有不必要的装备运至后方。[26] 7月29日中午，他认为大批敌军将从巴萨诺（Bassano）南下，遂命令军队在维罗纳东边的维拉诺瓦（Villanova）集结。奥热罗师来回行军五十五小时，一共走了60英里，但次日中午，拿破仑发现敌军主力其实在北边和西边。如果他迎击主攻的武姆泽却未完胜，不管怎么说他也拿不下曼托瓦，于是他决定先对付夸斯达诺维希。7月30日，他命令塞吕里耶放弃围城、增援野战军：路易·佩尔蒂埃（Louis Pelletier）旅支援奥热罗，达勒马涅旅支援马塞纳。[27] 拿破仑命令奥热罗退回罗韦尔贝拉：“每一秒都是宝贵的……敌军在三处突破我军阵线，并掌控科罗纳和里沃利两处要地……你会发现，我们与米兰和维罗纳已经失联。在罗韦尔贝拉待命，我本人会去。”[28] 奥热罗一刻也没有耽误。

法军放弃曼托瓦围攻，同时放弃至少179门无法运走的加农炮与臼炮，并沉弹药入湖。这样做令拿破仑痛心，但他明白当前战事的关键不是要塞，而是野战大捷。“不管发生什么，不论代价多大，明天我们必须在布雷西亚睡觉。”他告诉马塞纳。[29] 31日，他的往复奔波险些酿成悲剧。在从罗韦尔贝拉去戈伊托的路上，他侥幸逃过一支克罗地亚部队的伏击。

在布雷西亚和萨洛之间，海拔3000英尺的群峰与数列冰碛山丘经洛纳托（Lonato）、卡斯蒂廖内以及索尔费里诺（Solferino）延伸至沃尔塔（Volta），非常破碎的地表亦随之降为宽阔平坦的平原。7月31日凌晨3点，法军向西进军。黎明时分，索雷与奥军将领奥特（Ott）在洛纳托镇激战四小时。与此同时，马塞纳在代森扎诺与洛纳托之间展开部队，将第32战列步兵半旅置于左翼。奥特寡不敌众，败走。奥热罗尽全力迅速赶到，现在夸斯达诺维希要用1.8万名奥军士兵对付3万名法军士兵，所以他立刻撤退。当晚，拿破仑担心交通线，遂与奥热罗一同进军布雷西亚，次日上午10点到达该地。

武姆泽听说拿破仑一边向西边的布雷西亚进军，一边在罗韦尔贝拉集结兵力掩护曼托瓦围城战线（其实法军已放弃围城），他完全糊涂了，按兵不动，结果丧失了主动权。第18轻步兵半旅指挥官安托万·拉瓦莱特（Antoine La Valette）曾仓皇逃出卡斯蒂廖内，次日，拿破仑当着18半旅的面将其撤职。那一天，军队热情高涨，促使他决心设法击溃夸斯达诺维希。8月3日，第二次洛纳托之战爆发，他派布雷西亚的德皮努瓦去加瓦尔多（Gavardo）击退夸斯达诺维希右翼，令获得增援的索雷去萨洛攻其左翼，并让达勒马涅旅在两地间行军，使两支部队相连。索雷的士兵冲拿破仑抱怨饿肚子，他回答敌营有食物。

让-约瑟夫·皮容（Jean-Joseph Pijon）将军的旅被逐出洛纳托，皮容本人也被俘。值此关头，拿破仑率马塞纳师部分人马赶到，命令第32战列步兵半旅排成“连纵队”。伴着鼓声与音乐，列队一完成他就让32半旅发起刺刀冲锋，并派18半旅支援他们。两个半旅都折了营长，但奥军被他们赶回代森扎诺，径直撞上拿破仑的骑兵卫队连、第15龙骑兵团部分兵员、第4轻步兵半旅。朱诺身负六伤，但仍接受整个奥军旅投降。夸斯达诺维希得知灾难，于是紧沿加尔达湖北岸撤退，试图同武姆泽会师，接下来十天他一直未参战。“我平静了，”拿破仑的战后公报写道，“勇敢的32半旅在那儿。”32半旅在军旗上把他的话绣成硕大金字，

自豪感驱使他们变得更勇敢。“语言对人的影响令人惊讶。”多年后，拿破仑提起32半旅时如是说。[30]

8月3日，奥热罗在干旱平原与敌鏖战十六个小时，夺回卡斯蒂廖内。此后多年，每当自己的随员指责奥热罗不忠，拿破仑就会说：“啊，但别忘了，他在卡斯蒂廖内救了我们。”[31] 8月4日，法军在卡斯蒂廖内重新集结。武姆泽已再无机会袭击拿破仑的后方。他正率2万人沿索尔费里诺缓慢上行，此时他最好的盼头就是为曼托瓦争得时间应对下次围城。8月4日早上，拿破仑在洛纳托，身边只有1200人，而夸斯达诺维希麾下掉队的3000名奥地利士兵突然误入镇中。拿破仑冷静地告诉对方的谈判军官（parlementaire），他的“整个大军”都在这里，“如果八分钟内奥军师不放下武器，我就叫它全军覆没”。[32] 为了以假乱真，他命令贝尔蒂埃调配掷弹兵和炮兵，后者知道这些部队根本不存在。奥军缴械投降后才发现周围并无法军，他们本可轻易俘虏拿破仑。

在第二次洛纳托之战中，拿破仑首次采用了营方阵（bataillon carré）系统。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吉贝尔和布尔塞分别在教科书中发明营方阵，但拿破仑最先在战场上成功运用它。在营方阵体系的菱形阵型之下，举个例子，若右翼遭遇敌军主力，右翼师就变成新前卫，负责钉住敌军，原前卫与后卫大队的人自行变成实施机动的集团（masse de manoeuvre），这一核心打击力量能支援新前卫师，其目标是包围敌军侧翼。因此不论哪个方向，大军皆可相对轻松地转90度。营方阵还有可以放大的优点，它既适用于师，也适用于整个军。这一系统的关键是布尔塞所谓的“有控制的分散”（controlled dispersion），拿破仑凭此大大增强了军队的灵活性，根据战况变化不断变更战场前线。[33]

8月5日（周五），曼托瓦西北方20英里处爆发了第二次卡斯蒂廖内之战，拿破仑又使用营方阵战术。武姆泽右翼为索尔费里诺，左翼为曼托瓦-布雷西亚公路上梅多拉诺山（Monte Medolano）上的某处多面

堡，其兵力在2万到2.5万人之间。拿破仑有3万多人：马塞纳的1万人在左翼排成横队与纵队；奥热罗的8000人在卡斯蒂廖内镇前方组成两排横队；基尔迈纳的骑兵在右翼留作预备；德皮努瓦的5000人正从萨洛折回；帕斯卡尔·菲奥雷拉（Pascal Fiorella）将军率塞吕里耶师的7500人从南方赶来，打算给奥军后方决定性一击。拿破仑计划佯退，诱使武姆泽的预备队北上。第二次卡斯蒂廖内之战非常复杂，站在洛纳托壮观城堡的顶端和索尔费里诺的拉罗卡（La Rocca）钟楼顶楼可非常清楚地纵览全局，也可最充分地理解此战。

8月5日上午9点，拿破仑听见南方加农炮响，他以为菲奥雷拉来了，但那其实只是法军第8龙骑兵团在圭迪佐洛（Guidizzolo）洗劫奥军辎重车队。他令马塞纳和奥热罗发动进攻，派马尔蒙携12门大炮去梅多拉诺山。双方全面开战，武姆泽被迫调步兵阻挡菲奥雷拉，奥热罗遂拿下索尔费里诺，德皮努瓦也及时赶来援助中左翼。武姆泽发现自己困在两路军队中间，还有第三路正威胁他的后方，他被迫撤退，差点被法军轻骑兵抓获。强行军赶来的法军筋疲力尽，仅仅因此奥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逃至明乔河对岸。

当日，奥军有2000人伤亡、1000人被俘，还有20门大炮被缴获。拿破仑的军官清点法军死亡人数，发现伤亡及失踪人员合计约有1100人。[34]“于是我们做到了，”8月6日，拿破仑回报督政府，“用五天完成又一战役。”[35]两日后，他再次占领维罗纳，便补充道：“奥军……像梦一般无影无踪，被他们威胁的意大利也安静了。”[36]8月10日，他二度包围曼托瓦，10英尺厚的城墙内仍有16400名奥军士兵，不过只有12200人尚可到岗。

8月剩下的三周中，拿破仑重整军队。他非常佩服索雷与塞吕里耶，送这两位受伤的将军回家，并让炮兵中的老手克洛德-亨利·沃布瓦（Claude-Henri de Vaubois）将军、近日才晋升的让-约瑟夫·萨于盖

（Jean-Joseph de Sahuguet）将军接任，巴黎对此没有多少指示。拿破仑每打一次胜仗，他在法国的声望就涨一分，督政府也愈发怀疑无法控制他。“哪怕一个心灵纯澈的法国君子怀疑我的政治动机，”他告诉卡诺和巴拉斯，“我就马上舍弃报效国家的快乐。”[37] 此时拿破仑知道，这番虚张声势被他们指责的风险不大。先前他得跟政府商量晋升哪位将领，因为当局有一堆现役将军，多达343人。然而，他越取胜，督政府就越依赖他聚财立威，于是也就越少干预他的选择。

他的私生活显然不那么安定。他努力去找度假的约瑟芬，“两周来我妻子一直在意大利游荡，我想她在里窝那或佛罗伦萨”。拿破仑曾让吕西安在马赛处理军需工作，但弟弟突然不经自己的司令（和哥哥）同意就去了巴黎。拿破仑提出，要是能追上“精力勃发但刚愎自用”的吕西安，就在二十四小时内送他去北方军团（Army of the North）。[38]

8月下旬，拿破仑得知武姆泽准备再解曼托瓦之围。他疏导交通线，又从阿尔卑斯军团获得援军，现在共有5万人。武姆泽可行的南下路线有三条，拿破仑不知其会选哪条，他的布置如下：沃布瓦率11000人封锁加尔达湖西岸的路；马塞纳率13000人去里沃利，奥热罗率9000人去维罗纳，从而构成核心的实施机动的集团；基尔迈纳率1200名步兵与大部分骑兵监视东边的路。拿破仑本人领预备队3500人待在莱尼亚戈，萨于盖领10000人包围曼托瓦，另有6000人提防克雷莫纳（Cremona）起义。一旦拿破仑猜出武姆泽的进攻路线，他就能集中兵力，在那之前，他一直忙着保障白兰地、面粉、草料、军火和军用饼干（烤面包制成的方形硬面饼）供应充足。

9月2日，拿破仑确认武姆泽将从阿迪杰河流经的瓦拉加里纳山谷（the Vallagarina valley）南下。他打算一得知德意志军团司令莫罗将军到达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就从瓦拉加里纳谷地出击，因为若有可能，他的进军应同德意志战况协调。然而，9月3日，卡尔大公在维尔茨

堡击败儒尔当将军，而莫罗深入拜恩南部，突袭慕尼黑（Munich），所以他俩都不能帮他忙。若拿破仑被迫同时对付卡尔大公与武姆泽，那么他根本没有足够人手。他必须提防这种风险。

拿破仑前进至特伦托以南15英里处的罗韦雷托镇（Rovereto），4日，他在此截击武姆泽前卫。破晓时分，他来到防守严密的马科峡口（defile of Marco，在罗韦雷托正下方），此时另一支敌军屯于阿迪杰河对岸的莫里（Mori）设防营地。皮容的轻步兵占领马科以左的高地，奥军阵线顽抗两小时后放弃了。法军约有750人伤亡或失踪，奥军将领达维多维希（Davidovich）男爵损失3000人（大部分被俘）、25门大炮和7面军旗。[39]

罗韦雷托之战后，奥军全线撤退。下周，双方又在小山谷内连战四场。在卡利亚诺（Calliano），奥军警备太松懈，结果他们做早饭时遭法军突袭，丢了阵地。9月7日，法军在普里莫拉诺（Primolano）进攻似乎牢不可破的阵地，靠强势冲劲拿下了它。山谷两侧猛然汇聚成U形，两侧的陡直峭壁彼此仅隔半英里。奥军本可轻松守住谷口，但当日下午，法军轻步兵纵队拥上两侧山峰、蹚过及腰湍流布伦塔河（the Brenta），完全用冲锋对敌，奥军遂逃往巴萨诺。

当晚，拿破仑睡在奥热罗师，他吃士兵口粮，裹斗篷躺在星空下，早期战局里他经常这么做。次日，他在巴萨诺俘虏2000名奥军士兵，缴获30门火炮和不少弹药马车。法军只有一次小挫折。11日在切雷阿（Cerea），马塞纳追歼敌军时冲过头遭遇小败，导致400人伤亡。次日，奥热罗不费一卒攻克莱尼亚戈，他缴获了22门大炮，释放了当地关押的500名法军战俘。仅仅三天后，即9月15日，基尔迈纳在曼托瓦城外的拉法沃里塔（La Favorita）击败武姆泽，迫使奥军司令进入围城之中。

9月19日，拿破仑回到米兰陪伴约瑟芬，待了近一个月。他派马尔

蒙携最好的宣传工具——22面奥军军旗——赴巴黎，将其陈列在荣军院中。凭借快速的作战节奏，他总是先发制人，奥军本可在狭长山谷内的很多地方拖住或阻击他，但他却像玩保龄球般接连打击他们。布伦塔河谷的闪电战役完美证明了为何军旅精神无价。拿破仑动用自己的意大利统治权询问当地民众，采取能让军队瞬间转向的营方阵。他在罗韦雷托将奥军一分为二，迫使他们各自走开，然后他操作经典的中央位置机动，各个击破敌军，而且他常常在黎明发动进攻，一直给武姆泽施压。

战役开始时，武姆泽有20000人，还比拿破仑提早三天行动。战役结束时，他被迫率剩下的14000人退入曼托瓦，同已然受困的16000人合兵。10月10日，曼托瓦又挤得满满当当，只不过这回武姆泽也身在城中。六周之内，他的军队有4000人死于伤病和营养不良，另有7000人住院。城中食物只够支撑三十八天，武姆泽只好出击，以便去乡间寻找给养，尽管此举令他折损近1000人。

曼托瓦撑不了太久，然而大战局环境不利于拿破仑攻陷该城。9月21日，卡尔大公把儒尔当赶回莱茵河对岸，所以奥地利多半会三度派兵解围，而且这回的兵力将远超之前的。拿破仑要督政府增派援军25000人，以防罗马和那不勒斯宣战，他补充道，还好“帕尔马公爵表现很好，但他也一无是处”。[40] 10月2日，拿破仑向弗朗茨皇帝求和，他既奉承又恐吓，想借此引诱对方谈判。“陛下，欧洲渴望和平，”他写道，“这场战争灾难实在太久了。”他警告弗朗茨，督政府已令他封锁的里雅斯特（Trieste）等亚得里亚海（Adriatic）岸边的奥地利港口，并补充道：“我不希望这场战争再添无辜牺牲者，（因此）尚未执行指令。”[41] 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松散联盟，其治下的半独立国家遍布德意志与中欧的很多地区。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是不同的政治实体，但前者受后者控制），为人骄傲清贫、精于计算，并且憎恨将其姨母玛丽·安托瓦内特斩首的大革命。1794年的佛兰德（Flanders）战役中，弗朗茨曾短暂指挥奥军，后来他把指挥

权交给弟弟卡尔大公。论军事能力，弗朗茨远不及卡尔。拿破仑的求和书如泥牛入海。

10月8日，拿破仑又威胁辞职，这回的理由是全身乏力。“我不能骑马了，”他写道，“我只剩下勇气，但单凭勇气难当此职。”他还宣称，2月之前难克曼托瓦，而且“罗马正在武装，并煽动人民的狂热”。他认为梵蒂冈的影响“不可估量”。[42] 他警告道，秋雨导致医院病号增加，要求督政府授权他同那不勒斯签署“最关键”的最终条约、同热那亚和撒丁结成“必要”的同盟。拿破仑传达的中心信息是，“最重要的是派援军来”，但他也希望巴黎知道，“在你们拿去冒大险的东西中，你们的意大利将军永远不是核心”。

两天后，拿破仑未经督政府批准与那不勒斯全面媾和。和约规定，若波旁家族同意不参加任何反法活动，拿破仑就允许他们保留王位。为防奥军从北面入侵，他得保障南部安全。他也确保交通线不经过皮埃蒙特-撒丁，而是从更可靠的热那亚过境。撒丁新君卡洛·艾曼努尔四世（Charles Emmanuel IV）不值一提。

巴黎人正传播流言，他们说拿破仑的动机完全是野心，他以后可能推翻政府。他知道这些传言，于是在致信督政府时嘲笑诋毁者：“要是两个月前我想自封米兰公爵，今天我就想在意大利称王！”[43] 然而，督政府并不信服。巴拉斯和卡诺承认拿破仑的军事才能不可否认，但民众越来越喜欢他，督政们都担心意大利战局后他将如何利用这一点。当时，拿破仑的心思大都在狡猾又不可靠的军队承包商身上。他常常说，承包商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弗拉沙公司（Compagnie Flachat）是一群骗子。弗拉沙公司“不过是一帮没钱没信誉没道德的忽悠”。他希望可以枪毙他们，10月12日，他告诉督政府：“我不断逮捕他们、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但他们买通法官。这很正常，在此地一切都是交易。”[44]

10月16日，拿破仑叫武姆泽献城。“勇士应该直面危险，而非沼泽

瘟疫。”他写道。武姆泽一口回绝。[45] 同日，他宣布博洛尼亚、费拉拉、摩德纳、雷焦（Reggio）四地成立奇斯帕达纳共和国（Cispadane Republic），督政府对此也没多少指示。立国之举牵涉废黜摩德纳公爵，此人曾允许护粮队进入曼托瓦。拿破仑组建了2800人的“意大利兵团”（Italian Legion）保卫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名字含义为“波河沿岸”），它废除封建制度，规定平等民权，创立普选议会，并发起民族复兴（Risorgimento）统一运动。这一运动历时四分之三世纪，但它最终让意大利成为独立、统一的国家。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开了不下38次制宪会议，因为拿破仑积极投身其中，这证明他有耐心。亚平宁半岛几百年来一直政权林立，现在法国人开始促其形成统一政权。

然而在某一领域，法国的革命制度一直难以战胜意大利保守主义，此领域便是天主教会。意大利人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宗教改革，在意大利史上所谓的“法国时代”（epoca francese），他的教会改革所遭抵制之顽强，堪比他引入的行政文化所受拥护之热烈。[46] 拿破仑早就开始试着恐吓梵蒂冈。1796年10月，他警告庇护六世不准反对奇斯帕达纳共和国，更不许等奥军回来后袭击法军。他语带不祥地告诉庇护六世，“想摧毁教皇的世俗权力，光愿望本身还不够”，但和平时期“一切也许能安排妥当”。他接着警告道，若教皇宣战，“反对共和国大众的疯子将面临毁灭与死亡”。[47] 儒尔当和莫罗在德意志战败后，督政府无力调拨拿破仑急需的25000名增援士兵，仅派3000人支援接下来的战役，所以他只好同梵蒂冈拖时间。正如他对罗马的卡科所言：“我们的游戏真的就是把球丢来丢去，好骗过那只老狐狸。”[48]

11月上旬，奥地利准备就绪，试图三解曼托瓦之围，他们策划的战略只有维也纳宫廷会议这种委员会才想得出：匈牙利老将约瑟夫·阿尔文齐（József Alvinczi）率28000人，把里沃利的法军赶回曼托瓦；乔瓦尼·迪·普罗韦拉（Giovanni di Provera）将军率9000人从布伦塔去莱尼亚戈，牵制法军；巴萨诺的10000人袭击各处，防止拿破仑集中兵力。委

员会把19000人的主要任务定为佯攻，只留给主力部队28000人，这说明他们没从过去六个月的战事中吸取教训。61岁的阿尔文齐具有丰富的履历，曾在拜恩、荷兰和土耳其作战。拿破仑后来说，当时阿尔文齐是他遇上的最好敌将，这也是为何他在公报里对阿尔文齐不置可否（相反，他盛赞自己看不上的博利厄、武姆泽和卡尔大公）。他还在宣言和当日公告中说，自己非常尊敬普罗韦拉。那是因为拿破仑认为这些人中普罗韦拉最差劲，他希望此人不会被解职。

拿破仑现在有41400人，他再次驱策军队快速向前，好尽量获知奥军在何时何地出现的警报。另有2700人守卫布雷西亚、佩斯基耶拉和维罗纳。第40半旅的2500人已从法国出发，尚未到达。11月2日，阿尔文齐渡过皮亚韦河（the Piave）。他指示夸斯达诺维希和普罗韦拉分别经巴萨诺与特雷维索（Treviso）去维琴察（Vicenza）。奥军开始前进了。

拿破仑命令马塞纳不要开战、直接退回维琴察，后者万分懊恼。马塞纳像奥热罗一样，开始欣赏拿破仑的领导能力和军事才干，但上司被称作法国最好的将军之一，这令他嫉妒，而且他为自己的绰号“胜利的宠儿”自豪。马塞纳不喜欢奉命撤退，哪怕敌人兵力占优。11月5日，拿破仑带奥热罗去蒙特贝洛（Montebello），他看到奥军就在法军纵队正前方横渡布伦塔河，遂决定次日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马塞纳在丰塔尼瓦（Fontaniva）攻击普罗韦拉的纵队，把他们赶到河中的一些小岛上，但未彻底将其逐过河去。

11月6日，夸斯达诺维希的军队刚在巴萨诺露面，奥热罗便发动进攻，他苦战一场，但未将敌军赶回布伦塔河对岸。当日，诺韦村（Nove）数次易手，奥军有28000人，拿破仑的兵力不及敌人，只有19500人，于是他被迫撤退。当时有很多的胜负判断标准，如减员人数、是否保住战场、是否挫败敌军计划，但不管怎么看，巴萨诺之战都

是拿破仑的第一次败仗，不过后果不算严重。

拿破仑退回维琴察，获知沃布瓦在琴布拉村（Cembra）和卡利亚诺村与达维多维希小战五天后告败，其部队中有超过40%的人死亡、受伤或失踪。拿破仑立刻令奥热罗返回维罗纳以南的阿迪杰河，派马塞纳去维罗纳，并让巴泰勒米·茹贝尔（Barthélemy Joubert，律师之子，15岁时，他从家里跑掉参加炮兵）将军从曼托瓦调一个旅去里沃利助沃布瓦集结。他随后鼓动沃布瓦的部下："第39和第85步兵半旅的士兵们，你们不配继续投身法军。你们既无纪律又缺勇气，几个勇士就能在你们的阵地拦下大军，但你们竟被敌人赶走，所以参谋长会在你们的军旗上题字：'这些人不再属于意大利军团'。"[49] 拿破仑能敏锐察知何事会鼓舞部队、何事会打击士气，如他所料，因为公开羞辱，在接下来的几天，这两个半旅作战时都比之前更卖力。

奥军在巴萨诺取胜后几乎停滞不动，拿破仑便得空重整部队。12日，他派2500人守维罗纳，调6000人守阿迪杰河一线。与此同时，被贬的沃布瓦在里沃利拖住达维多维希，基尔迈纳继续包围曼托瓦。于是右翼的马塞纳和左翼的奥热罗各自剩下13000人和5000人，两人在维罗纳以东10英里处的卡尔迪耶罗村（Caldiero）进攻阿尔文齐。大雨劈头浇在意大利军团步兵的脸上，他们没有体现此前常有的冲劲。大风刮走火药，法军的鞋也在泥泞中打滑，他们战斗一上午，但只在右侧稍稍站稳阵脚。下午3点，奥军援军一到，法军就被迫放弃已得的阵地。双方都有约1000人伤亡。拿破仑当然宣称战胜，但事实告诉我们，那年他下令铸造勋章纪念蒙特诺特之战、米莱西莫之战与卡斯蒂廖内之战，却无视了卡尔迪耶罗之战。

11月13日，两军休战。拿破仑趁机从维罗纳给督政们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有力地将当前处境归咎在他们头上：

> 我们也许即将失去意大利。我等待的救援统统没来……我在尽

> 责，军团在尽责。我的灵魂裂成碎片，但我意识平静……天气依然恶劣，全军赤足，疲乏至极……伤员都是精兵，优秀的军官和最好的将军都失去了战斗力。每个来我这的人都如此无能，连身为士兵的信心都没有！……我们被丢在意大利深处……也许我……大限将至。我不敢暴露自己，我死了部队将会消沉。[50]

的确，塞吕里耶和索雷负伤，拉纳、缪拉与小克勒曼住院，但拿破仑麾下还有不少良将。此信的结尾当然语气乐观，盖过一切前文："过几天，我们试最后一回。如蒙幸运照耀，曼托瓦可取之，意大利可随之平定。"

拿破仑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打算绕到阿尔文齐后方的维拉诺瓦，迫使对方保卫自己的撤退路线。那儿的战场是成片的稻田，奥军兵力优势难以发挥。在阿尔巴雷多（Albaredo）渡过阿迪杰河会比较轻松，但奥军骑兵可以发出警报，于是拿破仑避开了阿尔巴雷多，选择在龙科（Ronco）过河。因为先前战事，法军在龙科修了一座浮舟桥，桥已被拆解，但其部件藏在附近的安全处。11月14日晚，马塞纳离开维罗纳，他故意向西，愚弄城中的奥军间谍，然后他折向东南方，在路上同奥热罗会合。

意大利此地的堤道蔚为壮观（今亦然），只见湿地两侧高耸笔直陡壁，故法军来架桥时，奥军警卫浑然未觉。破晓时分，第51战列步兵半旅乘船过河，夺取桥头堡。早上7点，桥造好了。在河对岸的交叉路口，奥热罗走右路，沿堤坝抵达阿尔科莱镇（Arcole），他打算渡过阿尔波内河（the Alpone）北上至维拉诺瓦，从而袭击阿尔文齐的炮场；马塞纳走左路，进军波尔奇莱（Porcile），欲从后方击退阿尔文齐左翼。天色阴暗，奥热罗同路易-安德烈·邦（Louis-André Bon）将军的第5轻步兵半旅前进，但他很快在阿尔波内河沿岸公路全线遭遇射击。敌人是掩护阿尔文齐左后方的两个克罗地亚营和两门大炮。阿尔科莱防守严密，既有枪眼又设了路障。法军第一波攻击失败，奥热罗亲率第4轻步兵半旅再度攻袭，但也告败。攻方被迫滑下陡直河岸，躲避守方火力。

与此同时，去波尔奇莱的马塞纳路遇另一个克罗地亚营和一个奥军团，他把敌军赶回波尔奇莱村，稳固了桥头堡左侧。伦巴第平原和山地是不同的战场，在伦巴第平原，奥军骑兵机会更多，但此地河流迅急、堤岸缠结，更利于明悉战术细节但手头骑兵数量远远不及对方的年轻指挥官。

阿尔文齐很快获知法军动向，但他认为既然此处是沼泽地，那么这些法军只是实施佯攻的少许诈兵。巡逻队回报维罗纳平静无事，阿尔文齐遂派人侦察左方军情。在那儿，马塞纳击败普罗韦拉的3000人，另外3000人则迅速奔向阿尔科莱，正午刚过时赶到此地。奥军安放了两门榴弹炮，堤道便沐浴在弹雨中。拉纳刚从米兰医院归队，结果又中弹负伤。

奥热罗夺桥未成，恰在此时拿破仑赶到。他下令再战，但被密集的炮火阻挠。奥热罗便抓过一面军旗，走到麾下散兵前方15步处，说："掷弹兵，过来追你们的军旗。"拿破仑身边围着副官与警卫，此时他也抓起一面军旗，亲自指挥冲锋，还用士兵在洛迪的壮举鼓动他们。两天前，他告诉督政府不想置身险地，但他在阿尔科莱的确冒险了。然而，进攻失败了。米龙等人都死在拿破仑身边，但苏乌科夫斯基说"士兵胆小如鼠"，他们没冲上尸横遍野的桥。奥军反击，推搡中拿破仑摔进桥后的泥沼，因为掷弹兵冲锋才获救。他是勇士，但面对固守奥军的猛烈炮火，人皆力量有限。这种炮轰还会持续两日。今人参观此桥便可明了拿破仑当时如何被推进紧挨着的大排水沟，虽说不太体面，但他可能因此捡回一条命。

事态已见分明——法军无法夺下桥。拿破仑当即命令马塞纳与奥热罗返回阿迪杰河南岸，他在阿尔科莱留下燃烧的营火，假装法军仍在此地。如果里沃利的沃布瓦继续后撤，他得准备好去对付达维多维希。在小村庄龙科的教堂塔楼上，法军看见阿尔文齐从卡尔迪耶罗返回维拉诺

瓦，并在阿尔波内河东岸布阵。接下来两天桥依然在奥军手中，17日，奥热罗和马塞纳返回阿尔科莱，成功夺桥，当时拿破仑不在场。法军遭受了严重损失，有1200人死亡（包括8名将领）、2300人负伤，相对而言，奥军有600人死亡、1600人负伤，但阿尔科莱会战的最终赢家仍是法军，因为他们俘虏了4000名奥军士兵，缴获了11门大炮。“击败阿尔文齐是运气好。”拿破仑后来如此承认道。[51]

冬季临近，战事暂歇。曼托瓦仍然被困，奥地利会四度尝试解围。奥军在这场战役中损失近18000人，而法军损失了19000多人。战役结束时，法军什么都缺，尤其缺军官、鞋子、药品和军饷。有些士兵饥肠辘辘，第33战列步兵半旅甚至哗变，结果三个连被关禁闭，两名魁首被枪决。战事一结束，拿破仑就革了沃布瓦的职，并提拔茹贝尔，令其指挥掩护里沃利的师。

11月19日，拿破仑向卡诺汇报情况，这份报告比之前的明显乐观许多。“意大利的命运开始明朗，”他写道，“我希望十天之内就能从曼托瓦司令部给你写信。没有什么战事比阿尔科莱的更激烈。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将军，他们的忠诚与勇气无可匹敌。”他在结尾处说，曼托瓦一投降他就要向“顽固”的罗马进军。[52] 11月下旬，督政府派拿破仑在测绘局的前上司亨利·克拉克将军去维也纳议和。他劝克拉克不要为和谈牺牲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因为曼托瓦注定失守。[53] “那个人只是自高自大，他一无所长，”据说拿破仑告诉米奥称，“督政府派他当间谍监视我。”[54] 这几乎不可能是拿破仑的慎思之语，因为日后他不断提拔非常能干的克拉克，封其为费尔特雷（Feltre）公爵。克拉克先是拿破仑的私人秘书，后任战争部长，到1812年时，他已是法国的权力巨头之一。“给我30000人，我就向的里雅斯特行军，”拿破仑告诉督政府，“我会把战火烧向皇帝领土、让匈牙利革命、进军维也纳。到时你们就能盼着百万的财富与安逸的和平。”[55]

约瑟芬仍在热那亚同伊波利特·夏尔度假。“我一到米兰，”11月27日，拿破仑致信她，“就冲向你的房间。我抛下一切只为见你，只为紧紧拥抱你……你不在那儿，你玩够了就一个城一个城地跑。我要来时你就走了。你不再关心自己，不再关心你亲爱的拿破仑……全世界都为你的欢心心花怒放，只有你的丈夫闷闷不乐。波拿巴。”[56] 次日他又写信：“我错了，我不该要求你回报同等的爱，怎能用黄金的标准衡量蕾丝？”[57] 不过，约瑟芬擅长打消拿破仑的疑虑。她的外甥女婿安托万·拉瓦莱特（Antoine Lavalette）接替死去的米龙，担任拿破仑的第八位副官。他回忆道，在米兰时，“波拿巴夫人用过早餐后会让丈夫坐在她大腿上，紧紧抱他几分钟”。[58] 除了其他意味，此事还体现了当时他有多么轻。这段时间中，还有则花絮同样有趣，我们能在拿破仑致巴黎天文台台长热罗姆·德·拉朗德（Jérôme de Lalande）的信中窥其一斑。他写信时若有所思：“夜晚背临青空怀抱佳人，白日手录军情心谋策略，看来这就是我今世之福。”[59]

中立国威尼斯最高行政官巴塔利亚（Battaglia）寄来的信就没那么开心了，他抗议法军在当地的行径。拿破仑怒而否认军队强暴妇女，“难道威尼斯共和国真想如此公开地对我们宣战？”[60] 巴塔利亚立刻软了下来。两天后拿破仑冷静些了，他的回信承诺“用树典型的方式处罚任何严重违纪的士兵”。

里窝那失守后，英军意识到已无法阻止法军攻占科西嘉。10月，现年38岁的海军准将、名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组织英军撤离该岛，这次撤退堪称范例。保利及其支持者也随之离开。英军一走，拿破仑就派米奥·德·梅利托和萨利切蒂去科西嘉岛，以便组建当地将成立的法国省份。约瑟夫跟着梅利托出行。在致信巴塔利亚之日，拿破仑也给兄长写信，他说自己想让波拿巴宅变得“洁净宜居，它需要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回到四年前未遭保利派洗劫时的样子。[61] 多年以来，他都在为苗圃之事与法国官僚奋力周旋，这些辛劳没有完全白费。

1796年9～12月，曼托瓦城内共有9000人死于疾病与饥饿。守军有18500人，但仅剩9800人在岗。曼托瓦最后的补给只能撑到1月17日。奥军的下一轮攻击必定很快到来，拿破仑的当前要务就是备战。12月，他在十八天内给贝尔蒂埃写了40封信，并请求督政府派来更多的增援部队。“敌军正从莱茵河抽出兵力对付意大利。你们也这样做吧，帮帮我们，”28日，他写道，“我们只是要求更多人手。”[62] 这封信还说，他抓获一名奥军间谍，此人的胃里藏着一个圆筒，里面是给弗朗茨皇帝的信。“要是他们腹泻，”拿破仑补充有用的信息道，“他们定能取出小圆筒，先浸入烧酒然后再吞下。小圆筒泡在掺醋的西班牙蜡中。”

拿破仑无微不至地关注士兵们的生活与福利。他发现，发饷日当天茹贝尔师有人不去见军需官，他怀疑这是某种欺诈，想知晓原因。“空闲时，我越深究意大利军团管理系统痼疾，”1797年1月6日，他致信督政府称，“我就越确信有必要迅速采取简单的补救措施。”“军队承包商包养了意大利所有领衔女角”，“他们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由此他再度请求“枪决所有军队管理人员”。[63] （督政府太过敏感，或者说太专注于自保，所以不敢授权一位将军仲裁法国人的生死。）可以的话，拿破仑会毫不犹豫地无情行使他的确掌握的权力。1月7日，他命令让-巴蒂斯特·吕斯卡（Jean-Baptiste Rusca）将军枪决摩德纳起义主犯。反抗者的领袖是摩德纳公爵的告解神父，他的房子被毁，其废墟上堆起了尖锥，上书告示：“滥用神职、教唆叛乱与谋杀的疯狂神父的下场。”[64][65]

当日，拿破仑获知阿尔文齐再率47000人南下。奥军又分兵了：阿尔文齐的主力有28000人（包括夸斯达诺维希的部队），他们分成六列纵队，沿加尔达湖东岸行军，占据每一条道路和小径，以防与法军在意大利平原交手；普罗韦拉的15000人从东边穿过平原，前往维罗纳与莱尼亚戈。4000多人屯于加尔达湖西岸。阿尔文齐命令武姆泽从曼托瓦突围，去东南方与己会师。拿破仑立刻离开米兰，他多次奔赴博洛尼亚、

维罗纳和罗韦尔贝拉的司令部，努力弄清阿尔文齐的意图。他的野战军有37000人，塞吕里耶另率8500人待在曼托瓦围城战线。

1月12日，茹贝尔报告称，里沃利正北方的拉科罗纳遇袭，当时新雪深厚，敌袭失败。“布吕内将军的衣服中了七弹，但他毫发无伤，”拿破仑告诉约瑟芬道，“他运气好得出奇。”[66] 拿破仑认为，战役将在阿迪杰河沿岸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Italian Alps）山麓丘陵分出胜负，但他尚需大量情报才可组织反击。他一边等待，一边命令马塞纳守卫维罗纳，并从阿迪杰河对岸调回7000人。加布里埃尔·雷伊（Gabriel Rey）将军将在卡斯泰尔沃诺集结两个旅，拉纳则需离开南方的意大利部队，并率麾下2000名法军士兵回巴迪亚阻挡奥军南下，而奥热罗则守卫龙科。

次日，拿破仑正准备北上击溃普罗韦拉，晚上10点时，他却获知茹贝尔遭遇大举进攻。遇袭后，茹贝尔便留下燃烧的营火，有序退往里沃利。拿破仑察觉普罗韦拉的进军只是佯攻，奥军主攻方向经过里沃利。于是他从维罗纳驰往里沃利，重新下了一堆命令：茹贝尔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里沃利；塞吕里耶高度警戒围城动向，同时立刻派骑兵、炮兵与600名步兵赶往里沃利；马塞纳把第18、第32和第75半旅调至茹贝尔左侧列阵；奥热罗在阿迪杰河堵截普罗韦拉，并派部分骑兵与炮兵去里沃利。拿破仑告诉所有人，决战即将打响。加上加布里埃尔·雷伊将军的两个旅，1月14日中午，他可在里沃利聚集18000名步兵、4000名骑兵及60门大炮，并且在阿迪杰河留16000人、在曼托瓦留8000人。这是老箴言“分头进军，合兵出击”的最佳体现。阿尔文齐没能在里沃利增加兵力，他只有初始的28000人和90门大炮。

1797年1月14日（周六）凌晨2点，拿破仑赶到里沃利峡谷上方的高原，此地将是会战关键决胜点（point d’appui or Schwerpunk）。是夜月朗天清、寒气深重，他观察奥军营火的位置与数量，据此断定精力充沛

的西班牙籍奥军将领卢西尼安（Lusignan）侯爵离得太远，上午过半后方能参战。这四个月来，拿破仑经常骑过此地，所以他熟悉地形。他认为，只要守住奥斯泰里亚峡谷（Osteria gorge）以及圣马尔科（San Marco）小教堂所在战场东侧的山坡，他就能轻易击退敌方主攻。他需要让马塞纳师先休息，并争取时间等待雷伊，于是他决定发动骚扰性攻击以吸引阿尔文齐。按照拿破仑的命令，茹贝尔返回里沃利高原，派一个旅去奥斯泰里亚，然后进攻中路，高原上所有的法军大炮都负责掩护他。马塞纳则奉命派一个旅尽可能地拖住卢西尼安。

此刻是凌晨4点，还有三小时破晓。奥诺雷·维亚尔（Honoré Vial）将军的第4、第17和第22轻步兵半旅把奥军逐回圣乔瓦尼和甘贝龙（Gamberon），夺下了圣马尔科小教堂。黎明时分，茹贝尔进攻卡普里诺（Caprino）和圣乔瓦尼（San Giovanni），但他的阵线非常薄弱，被兵力明显占优势的敌军挡下来。上午9点，奥军发动反击，击溃维亚尔的半旅，拿破仑立刻派马塞纳的一个旅救援中央，夺回特兰巴索雷村（Trambassore）。中路的战斗如同马拉松长跑，双方连续缠斗十小时。

卢西尼安逐走马塞纳派出的旅，上午11点，他率5000人赶到里沃利。卢西尼安深入阿菲（Affi）附近的法军左后方，阻止任何援军的到来。拿破仑只能勉力守住中路，他的右翼承受了巨大压力，左翼又被卢西尼安击退，他的预备队只有一个旅，雷伊则还要一小时才能赶到。得知卢西尼安到了后方，参谋官们紧张地看着拿破仑，他异常冷静，只是简单地说：“他们来了。”[67] 他认定中路的奥军已是强弩之末，而卢西尼安还很远，不足以影响战局，于是他把东边的夸斯达诺维希看作主要威胁，集中力量对付此人。拿破仑从茹贝尔的阵线抽调兵员，尽可能往圣马尔科教堂派去人马。密集的奥军纵队在炮兵的掩护下进攻峡谷，但是到达高原后，法军向他们发射霰弹，并从四面八方开枪。接着，一个步兵纵队向奥军发起刺刀冲锋，此后他们遭到法军所有可用的骑兵的攻击。奥军退入峡谷，这时法军幸运地射中敌方弹药马车，狭小的空间令

此举更具破坏性，夸斯达诺维希遂放弃了进攻。

拿破仑立刻把攻势转向中路，那儿的奥军近旁既无炮兵也无骑兵。三路奥军纵队花大力气攻下高原，又被逐走。卢西尼安前往战场时受阻，恰在此时，雷伊突然在其后方出现。卢西尼安仅带约2000人逃生。下午2点，奥军全线后撤，法军追击，直到奥热罗报告普罗韦拉已过阿迪杰河并正前往曼托瓦。拿破仑派马塞纳支援奥热罗，阻止普罗韦拉解围。

里沃利之战，拿破仑折损了2200人，另有1000人被俘，但奥军的损失大得多：4000人伤亡，8000人被俘，8门大炮与11面军旗被缴获。拿破仑写家书，声称自己对战了45000名奥军士兵，敌军有6000人伤亡，而他缴获了60门大炮与24面军旗（“军旗是皇后亲手绣的”）。[68] 里沃利会战是一次辉煌大捷，可这封家书没有说实话。但接下来几天，阿尔文齐的撤退逐渐变成溃败，结果奥军中又有11000人被俘。

1月15日中午，普罗韦拉率解围部队抵达拉法沃里塔，他有4700人，其中很多人是新兵，训练不足。次日曙光初露时，武姆泽试图从曼托瓦突围，但立刻受阻。拿破仑赶来时，普罗韦拉在曼托瓦城外的拉法沃里塔村被奥热罗和马塞纳夹击。普罗韦拉英勇迎战，但在战斗就要变成屠杀前，他投降了，其麾下部队全部被俘。曼托瓦的食物最终耗尽。武姆泽设法再硬撑了两周时间，徒劳地盼望阿尔文齐奇迹般出现，然而，1797年2月2日（周四），他终于率领疲弱守军投降，交出了曼托瓦。之前八个月中，约有16300名奥军士兵死于此地，平民死者还要多得多，他们已然沦落到吃老鼠和狗。法军缴获了奥军的325门大炮，并取回上一年8月时丢在那儿的179门大炮。武姆泽与其500名部下离城时享受降军礼遇，他们返回奥地利，条件是不得与法军交战，除非有战俘交换。其余俘虏则被押往法国，他们将参与农业生产和工程建设。曼托瓦投降一事轰动整个巴黎。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道：“大群民众簇拥着一

名公职官员，他宣告法军的荣耀，在号声中公布了这一消息。”[69]

拿破仑没有亲眼见到自己的胜利。上一年6月，教皇国签署了停火协议，此刻它却威胁起事支援奥地利，于是他先后赶往维罗纳和博洛尼亚，以便惩罚教皇国。1月22日，拿破仑毫无愧色地篡夺了督政府的权力，命令卡科“六小时内让罗马见此信”，从而给梵蒂冈施压。同日，他致信教皇国谈判代表、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马泰（Alessandro Mattei），称罗马外交政策不得再受奥地利与那不勒斯影响。拿破仑写结尾时口气却软了下来，请求马泰“让教皇陛下放心”。作为“宗教界最高领袖”，教皇“可以继续留在罗马，并且不会感到丝毫不便”。[70] 正如拿破仑对督政府所说的，他担心，“如果教皇和红衣主教逃离罗马，我就永远得不到想要的”。他也知道，要是他猛攻梵蒂冈，欧洲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将憎恶他，甚至终身痛恨他。他告诉米奥：“取罗马则失米兰。”[71]

2月1日，拿破仑发布宣言。这份文件称，不“遵守新约教义”的教士与修士所受惩罚会比“普通公民所受的更严厉”，此举旨在减弱他们对法国统治意大利一事的抗议。[72] 教皇国军队仍然决定开战，这固然荒谬可笑，但不可否认其亦有勇气。2月3日，克洛德·维克托-佩兰将军（一般称作维克托）在博洛涅塞堡（Castel Bolognese）轻松战胜他遇上的敌人。一周后，他不费一兵一卒就俘虏了安科纳（Ancona）的全部教皇军守军。2月17日，教皇求和。他派马泰去托伦蒂诺（Tolentino）的拿破仑司令部签署条约。条约规定：教皇割让罗马涅、博洛尼亚、阿维尼翁和费拉拉给法国，对英国封闭所有港口，“捐赠”3000万法郎与100件艺术品。“除了都灵和那不勒斯的少量物件，”拿破仑告诉督政府，“意大利美丽之物都是我们的。”[73]

1797年2月18日，意大利军团发行小报《波拿巴与君子报》（*Journal de Bonaparte et des Hommes Vertueux*），报头声称：“汉尼拔

在卡普阿沉睡[74]，但波拿巴不会在曼托瓦入眠。”[75]拿破仑很清楚宣传的力量，民众本就对他颇具溢美之词，现在他有意引导公众舆论。他口述“波拿巴奔袭速若闪电、出击势如雷霆”之类的句子，就此展开媒体业主与记者的新生涯。不出十天，小报就开始暗讽督政府，没有拿破仑的许可它不会这么做。当年，他还创立了另外两份军报：《意大利军团邮报》（*Courrier de l'Armée d'Italie* ），由前雅各宾党人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编辑；《意大利军团眼中的法兰西》（*La France Vue de l'Armée d'Italie* ），由米歇尔·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Michel Regnaud de Saint-Jean d'Angély）编辑，其相较《意大利军团邮报》更不可靠。巴黎报纸经常摘登这两份军报的文章。莱茵战场离法国近得多，拿破仑不希望意大利战事只是公众想象力的余兴节目，他觉得士兵也会喜欢巴黎的消息。丹热利原是议员兼律师，现主管意大利军团医院，日后他成了拿破仑的重要副手。任命朱利安一事说明，只要某人才愿意埋葬过去，他就乐意忽视他们先前的政治立场。意大利像法国一样政体多变，故此举与其说出于宽容，不如说出于常识。毕竟仅仅三年之前，拿破仑自己还是个雅各宾分子。

在巴黎，《箴言报》报道旨在庆祝拿破仑胜绩的舞会、大合唱、公共宴会和游行。这些活动的主办方是他日渐庞大的支持者队伍，而督政府私下发现，这些人并不一味拥护政府。且不说政治因素，拿破仑还是不错的稿子素材。举个例子，六个月内，保守报纸《政治新闻》（*Nouvelles Politique* s）66次提到意大利军团。[76]总的来说，对拿破仑战绩的报道大大多于对其他法军将领的，这令莱茵-摩泽尔军团和桑布尔-默兹军团的高级指挥官愈发懊恼，他们在意大利军团面前黯然失色，由此也心生怨恨。

1796年，有人开始制作并销售拿破仑的画像与雕像，如《波拿巴将军在洛迪》（*General Bonaparte á Lodi* ）、《波拿巴进入米兰》（*Bonaparte Arrivant á Milan* ）等。有的作品标题给他的教名多加一

个“e”，有的给他的姓氏多加一个“u”，还有的写成“布拿巴”（Bounaparte）。[77] 1798年，刻画拿破仑的不同作品已有数十件，甚至可能有数百件，这说明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兴起。艺术家为拿破仑画像前觉得没必要先见本人，所以我们能看到有些人把他画成灰头发中年人，这副形象更符合人们心目中常胜将军的样子。[78]

蒙特诺特之战后，拿破仑首次下令铸造纪念章铭记胜利，这些纪念章也成了有力的宣传道具。其他将军不曾这样做，而他也没征求督政府的许可。前色情小说家、娴熟雕刻师维旺·德农（Vivant Denon）设计的铜勋章最佳，此人后来担任卢浮宫馆长。以蒙特诺特纪念章为例，它的直径长只有1.5英寸，正面刻有拿破仑半身像，其外衣缀饰橄榄枝与橡子，背面则是象征“战争天才”的造型。[79] 到1815年为止，官方一共铸造了141款纪念章，铭刻战斗、条约、加冕、渡河、皇帝大婚与占领敌方首都。在公共活动和庆典上，这些纪念章被广泛分发给群众。有的纪念章也铭记相对平淡之事，如创立巴黎医学院、开通乌尔克运河（Ourcq Canal）以及在勃朗峰省（Mont Blanc）建立矿业学校。1807年3月，拿破仑一直在奥斯特罗德（Osterode）[80] 静待，即便如此法国也铸造纪念章，其背面是罗马将军、“拖延者”费边·马克西穆斯，此人的小心谨慎出了名，但也为他带来胜利。

1797年3月10日（周五），拿破仑履行对督政府的承诺。他冒险向北远征，仅率4万人经蒂罗尔到达克拉根福（Klagenfurt），最终进抵施泰尔马克（Steiermark）的莱奥本（Leoben）。在莱奥本的塞默灵丘陵（the Semmering hills）山顶，拿破仑的前卫可以俯瞰维也纳的尖塔。卡尔大公已将儒尔当与莫罗的军团（这两个军团的规模都是意大利军团的两倍）逐出了德意志，法国现在盼着兵力较少的拿破仑军团进逼奥地利首都本身，迫其求和。当年秋天，儒尔当和莫罗战败，未能渡过莱茵河。拿破仑原以为意大利军团和莱茵军团会结成钳形攻势，他得知此事后愈发担心。为了鼓舞士兵，他贬低卡尔之兄弗朗茨皇帝，在一篇宣言

中称其为“英国商人雇来的下人”，并声称英国人“不知战争疾苦，欢颜笑看大陆悲痛”。[81] 拿破仑之所以在对奥宣传战中说这句话，是因为英国政府将给奥地利162万英镑（相当于4000多万法郎）的贷款。[82] 当时，英国不曾打算派兵登上欧洲大陆，但它总是慷慨资助法国的敌人，只要该国愿同法国开战。

3月16日，拿破仑渡过塔利亚门托河（the Tagliamento），在瓦尔瓦索内（Valvassone）小胜卡尔大公。次日，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将军扩大战果，不费一卒俘虏了一支脱离主力的较大的奥军分队。拿破仑在塔利亚门托河引入混合队形（ordre mixte），它是横队与纵队这两种进攻队形的折中，由吉贝尔首创，旨在对付不宜部署常规阵型的多变地形。在混合队形中，一个营排成横队，两个营组成纵队，横队的火力与纵队的攻势相结合。几天后，拿破仑又靠这一队列渡过了伊松佐河（the Isonzo），进入奥地利。在塔利亚门托河和伊松佐河，他都亲自指挥部队投入混合队形作战。[83]

“勿要不安，”拿破仑告诉意大利东北部的哈布斯堡省份戈里齐亚（Görizia）的居民，“我们善良仁慈。”[84] 1793年卡尔大公在荷兰取胜，1796年他又击败儒尔当和莫罗，但拿破仑对新对手不以为意，他认为此人配不上其战略家的名头。“目前为止，卡尔大公的机动水平不及博利厄和武姆泽，”拿破仑致信督政府，“他每次转向都犯错，有时还蠢不可及。”[85] 拿破仑和卡尔大公尚未展开大战，而莫罗已重整旗鼓，从德意志进攻奥地利。奥地利人决定不去冒被拿破仑夺走首都的风险，4月2日，他们在莱奥本接受他提出的停火协议，该地位于维也纳西南方100多英里处。

在长达一年多的战事中，拿破仑翻越亚平宁山脉与阿尔卑斯山脉，击败一支撒丁军与至少六支奥军，导致12万奥军将士伤亡或被俘，而他此时还不满28岁。十八个月前，他是个脾气暴躁、无足轻重的士兵，写

文讨论自杀，现在他已享誉欧洲。他战胜了强大的奥地利，迫使教皇、撒丁国王与那不勒斯国王签署和约，并废除了中世纪公国摩德纳。他在所有可想到的战地环境中击败大部分最著名的奥军将领，如博利厄、武姆泽、普罗韦拉、夸斯达诺维希、阿尔文齐、达维多维希，而且他还智胜卡尔大公。

虽然奥军兵力总是超过法军，但拿破仑反复采用中央位置战略，常在战场上形成兵力优势。他还没踏上意大利土地就深入研究当地的历史和地理，而且他愿意尝试营方阵、混合队形等别人的思想，并精确计算后勤（在这一层面上，他的惊人记忆力发挥了无价作用），这些都对战事大有裨益。拿破仑让各师彼此间隔一日行军里程，所以他能集中兵力作战。一旦各师参战，他可以在压力面前镇定自若。

拿破仑刚接管意大利军团时，它困厄潦倒，事实上完全不能战斗，这是他精力旺盛、擅长组织的又一证明。在认为必要时，他会严厉无情，但在其他时候又盛赞部下，这种领导艺术催生了军旅精神，它对胜利来说如此必要。“战争中，”1808年，拿破仑说，“士气决定一切的四分之三，相对现实的兵力只决定四分之一。”[86] 个人勇气让他和士兵更加亲密。当然，奥地利不断派来七旬将领，这些将军又总是分兵，且其行军速度只及法军速度的一半，这也大大地帮助了拿破仑。不过，此等局面不会永远维持下去。

拿破仑有幸招到一批优秀的副手，茹贝尔、马塞纳、奥热罗尤为突出，拉纳（在洛迪和阿尔科莱）、马尔蒙（在卡斯蒂廖内）、维克托（在拉法沃里塔）、塞吕里耶（在曼托瓦）、布吕内、缪拉和朱诺也立下大功。值得称道的是，拿破仑不论年龄与出身提拔人才，并解聘不能提升自己来适应事态的将领，如梅尼耶、沃布瓦。他掌权后，前意大利军团指挥官也高升了，这并非巧合。巴黎的“人山人海”喜迎十二场胜利，欢庆数月，法兰西共和国如今也牢牢掌控意大利北部与中部，若此

时有人有资格号称“胜利的宠儿”，那他就是拿破仑。

早期的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初次显露其军事哲学与习惯。他的至上信条是保持军旅精神高涨。由于性质使然，这种精神与荣誉的组合本无形，但他知道具备军旅精神的军队可创造奇迹。“记住，十场战役才能铸就袍泽之情，”1807年时拿破仑告诉约瑟夫，“但一瞬间就能毁掉它。”[87] 他想了很多办法鼓舞并保持士气，其中一些来自他读过的古代史，另一些则专属于他的领导风格，并在战局中发展。其中一个方法是培养士兵对所属团的强烈认同感。第57半旅在里沃利之战和拉法沃里塔之战中表现英勇，1797年3月，拿破仑便允许他们在军旗上绣：“强大又无人可挡的第57半旅”（Le Terrible 57ème demi-brigade que rien n’arrête）。57半旅自此也成为以绰号闻名的英勇半旅，跻身“勇者”（Les Braves，第18战列步兵半旅）、“无双”（Les Incomparables，第9轻步兵半旅）、“以一当十”（Un Contre Dix，第84战列步兵半旅）等部队之列，可见拿破仑深谙普通士兵心理与团队荣誉感的力量。他凭本能察觉战士的需要，戏剧、歌谣、歌剧咏叹调、宣言、节庆、典礼、符号、军旗、勋章，并实现他们的愿望。至少在1809年的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前，他总能满足他们最强烈的渴盼——胜利。

战时，拿破仑贴近士兵，赢得他们的喜爱。士兵可以要求受赏奖章、晋升军职，甚至可索求津贴，他与其指挥官核实情况后会很快办理。他亲阅列兵请愿书，尽量照顾他们。常伴拿破仑征战的高级宫廷侍从路易·德·博塞-罗克福（Louis de Bausset-Roquefort）男爵回忆，他“聆听并提问，立即决断，就算拒绝对方，他解释理由的方式也能减少不满”。[88] 威灵顿公爵的英军、卡尔大公的奥军根本不敢想象他们的司令能这样平易近人，但在法兰西共和国，这是了解部下需求与关切的宝贵手段。若列兵中有人善意地大嚷，他常报之以俏皮话。在意大利战局中，一名士兵指着身上的破外套，大叫给自己换一套新制服，拿破仑回答：“噢不，以后都别换，不然你的伤口就被遮住了。”[89] 正如1800年3

月他对布吕内所说的："你知道言语对士兵的影响。"[90] 后来，若他看见某位士兵表现勇敢，有时他便解下自己的荣誉军团星章，将它授予此人。（拿破仑的马穆鲁克侍卫鲁斯塔姆想把星章缝到他的制服上，但他阻止了鲁斯塔姆，说："让它去吧，我是故意的。"[91] ）

拿破仑的确喜欢和士兵在一起。他捏他们的耳垂，同他们开玩笑，挑出老"牢骚兵"（grognards，字面意义是"牢骚鬼"，但也能译作"老兵"），并追忆过往战事，不断向他们提问。部队暂停行军用午餐时，拿破仑和贝尔蒂埃邀请副官与传令兵一同进餐，博塞称："这对我们大家来说简直是节日。"拿破仑也总是确保自己餐桌上的酒能分给哨兵。事情或许小，但它们反响很好，并促成了忠诚感。他不断提及古代世界，设法让平凡士兵觉得自己的性命乃至必要时的捐躯关乎大业，必将融入永垂法国史册的大事。这一点难于大部分领导技巧，但若论对行动的推动力则无出其右者。拿破仑告诉普通人，他们也可书写青史。他让追随者相信，他们正在勇闯险境、上演历史、开创伟业、挥就传奇，哪怕沧海桑田，后人都将慨叹这些光辉事迹。

阅兵式有时长达五小时，在仪式上，拿破仑与士兵们交谈，细问其伙食、制服、鞋子、整体健康水平、娱乐、发饷频率，希望获知真相。"你们想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他对第17半旅说，"对上司不满也别憋着。我来这里主持公道，尤其注意保护弱者。"[92] 全军上下都认为，"小伍长"会帮助他们对付"大帽子"（les gros bonnets）[93] 。

拿破仑格外关心妥善照顾伤员，这当然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尽快归队，但也是因为他清楚及时医治伤兵对士气多么重要。"偶遇伤员车队时，"一名副官回忆道，"他会叫他们停下，询问他们的处境、苦楚以及负伤之战。每次告别时，他要么说些安慰话，要么给他们奖金。"[94] 相形之下，拿破仑总是责备医生，他认为大部分医者都是骗子。

拿破仑从尤利乌斯·恺撒处习得不少关键的领导技巧，认为部队表

现不符合预期时，他更会效仿恺撒训诫他们，如1796年11月在里沃利鼓动军队。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写了《恺撒战史》，此书详写了罗马的一次兵变。当时，士兵要求散伙回家，恺撒一口答应，但他不再叫他们“士兵们”或“战友们”，而是叫“公民们”。此举的效果立竿见影。“最终，”拿破仑总结道，“这幕动人场面以他们继续服役告终。”[95] 当然，他对士兵的盛赞远远多于批评。埃劳（Eylau）战役中，他对第44战列步兵团喊道：“依我看，你们的三个营相当于六个！”“我们会证明的！”他们高声回应。[96]

营地公告牌张贴拿破仑的军中讲话，很多人都会去阅读。他喜欢接二连三列出数据，告诉士兵他们在多长时间内赢得多少场胜利、攻克多少座要塞、俘虏多少位将军与多少名战俘、缴获多少门大炮与多少面军旗。有些布告听来也许虚荣，但其目标读者是无甚教养的军人。为了鼓舞士兵，拿破仑提及古代世界（虽说军中只有极少数人熟知古典文史）。他借助特殊的辞藻，把战士们比作雄鹰，抑或描述家人与邻舍多么以他们为荣。这时候，部下的心都被他抓住了，他们往往一生追随他。

拿破仑笔下的绚丽鼓动之辞大都出自古典著作，但他也引用莎士比亚的作品。“同乡会指着你们说：‘他来自意大利军团。’”在这类句子中，我们便能看到莎士比亚作品《亨利五世》中那段圣克里斯平日演讲的痕迹。[97] 拿破仑给将军、大使、参政、部长和兄弟写私人信件时语气尖刻，但他对士兵的赞美滂沱澎湃，两种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说自己的准则是：“严待军官，友待士兵。”[98]

高效的管理工作自然助拿破仑从列兵中“识别”老兵，但他也运用非凡的记忆力识人。“我向他介绍三名瓦莱（Valais）代表，”某位内政部长回忆道，“他问起其中一人的两个女儿。这位代表告诉我，此前他们仅在阿尔卑斯山山麓见过一次面，那时他正要去马伦戈

（Marengo）。‘炮兵遇上麻烦，他只好在我家门口逗留一会儿。’代表补充道，‘他爱抚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上马离去，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99] 下次重逢已是十年后。

---

[1] Chadwick，Owen，*The Pop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1981，p.450

[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03

[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45 p.542，August 11，1796

[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10 p.462，June 21，1796

[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11 p.464，June 21，1796

[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96

[7]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55

[8]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56

[9]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p.60-61

[10] Starke，Mariana，*Letters from Italy Between the Years 1792 and 1798* 2 vols.1800，Ⅰ pp.74-5

[11]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p.133-4，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199

[12]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38

[13]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59

[14]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60

[15] Hamelin，Antoine，*Douze ans de ma vie* 1926，pp.14-15

[16] Bibliothèque Thiers，Fonds Masson No.223/Ⅰ/81

[1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776 pp.500-501，July 12，1796，AN 400AP/6/p.4

[18] AN 400AP/6/p.4

[19] eds. Olsen，John and van Creveld，Martin，*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2011，p.32

[20]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211

[21]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0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3 p.533，August 2，1796

[23]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0

[2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20 p.526，July 29，1796

[2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07

[2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2 p.532，August 2，1796

[2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26 p.529，July 30，1796

[28] CG 1 no.822 p.527，July 30，1796

[2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28 p.530，July 31，1796

[3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1

[31] Marbot，Baron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 Marbot* 3 vols.1891，Ⅱ ch.16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06

[33]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p.79

[34] “失踪”涵盖当日战事的诸多情况：死亡但尸骨难寻或难辨；藏匿；逃跑；意外或蓄意迷路；诈病；被俘；遭遇脑震荡；被游击队杀死；战后花名册误列；暂编入别的部队；在野战医院昏迷不醒、身份不明；炸得粉身碎骨；抑或仅仅是擅自离队。因此，“失踪”的人后来常常变回战斗力，不过很多人也一去不返。

[3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7 p.538，August 7，1796

[3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38 p.538，August 8，1796

[3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840 p.540，August 9，1796

[3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839-40 p.539，August 9，796

[39]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22

[4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61 p.612，October 2，1796

[4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62 p.614，October 2，1796

[4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s.961 and 980 p.612，October 2，1796，p.620，October 8，1796

[4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93 p.628，October 12，1796

[4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92 p.628，October 12，1796

[4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96 p.631，October 16，1796

[46] Broers，Michael，*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Italy* 2002，p. x

[4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07 p.639，October 21，1796

[4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08 p.639，October 24，1796

[49] Paris，*Napoleon's Legion* p.15

[5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59 p.664，November 13，1796

[5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23

[5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60 p.666，November 19，1796

[5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86 p.681，November 29，1796

[5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130-31，ed. Fleischmann，

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93

[5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20

[5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84 p.680，November 27，1796

[5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85 p.681，November 28，1796

[5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9

[5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093 p.685，December 5，1796

[6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12 p.696，December 8，1796

[6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127 p.704，December 10，1796

[6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09 p.746，December 28，1796

[6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74 p.778，January 6，1797

[64] 拿破仑设计特殊惩罚时想象力活跃。他认为“可憎的女性”随军人员“唆使士兵劫掠”，1797年4月中旬，他命令仍在贝纳多特师的所有女人在此令颁布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否则就把她们涂上煤灰，在市场曝光两小时”。Bingham ed.，*Selection I*，p.151。

[6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79 p.782，January 7，1797

[6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86 p.784，January 7，1797

[6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36

[68]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31，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 p.131

[69] René，François，*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s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p.121

[7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315 p.802，January 22，1797

[71]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91

[7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35

[7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395 p.849，February 19，1797

[74] 公元前215年，意大利名城卡普阿与汉尼拔结盟。遭受背叛的罗马开始围攻卡普阿，因此在坎尼战役之后，汉尼拔虽获得根据地，却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奔走救援意大利盟友。——译者注

[75]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87

[76]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86

[77] Dziewanowski，Lieutenant M.K.，'Napoleon：Legend and Propaganda'*Military Affairs* vol.9 issue 1 January 1945，p.91，89 Carnavalet Portraits Box 229，Bibliothèque Thiers 34/7001-7274

[78] Theodore D.Buhl MSS 110 Box 1/fol. 1/pp. 18，23，26

[79] Laskey，Captain J.C.，*A Description of the Series of Medals Struck at the National Medal Mint by Order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18，p.1

[80] 今奥斯特鲁达（Ostróda）。——译者注

[8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42

[82]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522

[83] eds. Nafziger，George，*Imperial Bayonets* 1996，p.165，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640 p.880

[8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69 p.885，March 22，1797

[8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76 p.889，March 25，

1797

[86] eds. Horn，Colonel Bernd and Walker，Robert W.，*Le Précis de leadership militaire*（Ontario）2008，p.485，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105

[8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773 p.396，March 20，1807

[8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67

[89] Bourne，George，*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Baltimore）1806，p.376

[9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087 p.138

[91]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54

[92]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117

[93] 绰号，泛指法军将领。——译者注

[94] ed. Summerville，*Ségur* p.38

[9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2 p.68

[9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2

[97]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Boston）1897，p. x

[98]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7

[9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7

第六章 和平

光赢还不够，要乘胜追击。

——1808年11月，拿破仑致约瑟夫

我看法国人并不在乎自由与平等，他们只依恋荣誉……军人渴求荣誉、殊荣与褒赏。

——1802年4月，拿破仑在参政院的发言

“一切都让我相信和平将至，我们尚可开出合理的条件，必须趁此议和。”1797年4月8日，拿破仑如此致信督政府。[1] 4月15日，他开始和他所谓的“懒惰傲慢的宫廷”谈判。奥地利全权代表加洛（Gallo）侯爵拘泥于繁文缛节，主张官方必须宣布举行和谈的帐篷位于中立地。拿破仑愉快地让了步，他对督政府解释道：“我们的帐篷环绕这片中立地，其四面八方都是法军。”[2] 加洛提出奥地利愿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拿破仑则告诉他：“共和国既不需要也不渴求承认。它已经是欧洲地平线上的朝阳，既不想见它也不想得它恩惠的人太可悲。”加洛固执己见，他说奥地利愿意承认革命政权，“条件是共和国维持法国国王的礼仪”，他显然认为此举是施恩。拿破仑便说，法国人“根本不管有关礼节的东西，接受这一条对我们没意义”。[3] 从共和派立场看，他的话无可指摘。

拿破仑认为，要是莫罗将军和奥什将军已过莱茵河，和谈会顺利许多。“在军事行动编年史上，”4月16日，他致信督政府，“没有哪条河是难越的天险。莱茵河莫罗想过就能过……莱茵军团光有血管没有血。”[4] 他有力地辩称道，若法军已踏上奥地利土地，“我们现在就能骄傲地要求和平”。事实上，4月18日奥什的确已经渡河，两天后莫罗也到了对岸，但18日正好是初步协议签订日，奥什与莫罗只能按兵不动，等待对手拿破仑和谈，这让两人大为懊丧。

古老的城邦国家威尼斯急于保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但该国没有军队保障这一点。威尼斯城中似乎正涌现威胁，拿破仑处理它时同样盛气凌人。4月9日，他致信总督卢多维科·马宁（Ludovico Manin），要求威尼斯选择战争或和平。“我身处德意志心脏地带，”他说，“所以你就认为我没法叫人尊重宇宙第一国度？”[5] 威尼斯倒向了奥地利，迅速武装起来，还在亚得里亚海上冲一艘法军巡航舰开火。法国人确有正当理由指责威尼斯，但几天后，拿破仑派朱诺去威尼斯，要求对方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自己的信，这无疑是恃强凌弱。4月17日，事态严重恶化：威尼斯共和国的维罗纳显然没从帕维亚、比纳斯科和摩德纳事件中学到教训，当地上演了一次起义，300～400名法国人遭屠杀，其中很多人是医院伤员。

“我会在威尼斯本土采取普遍措施，”拿破仑向督政府保证道，“我要施加极端惩罚，叫他们永生难忘。”[6] 据布列纳后来的记载，反叛消息传来后，拿破仑说：“安静，那些流氓会付出代价的，他们的共和国完蛋了。”[7] 1797年4月19日（周三）凌晨2点，拿破仑在《莱奥本初步协议》（Preliminaries of Leoben）上签字，不过官方称签署日是18日。巴黎没派全权代表与奥地利谈判签约，和谈全由拿破仑经手，他与督政府之间原本彼此制衡，此事是权力天平已倾向他的重要证明。这个协议只是先行协定，直到10月，法奥才在坎波福米奥（Campo Formio）签署全面和约的终稿，但谈判人还是拿破仑。《莱奥本初步协议》规定：奥地利割让米兰公国、摩德纳公国与奥属尼德兰给法国，认可法国“宪法划定的疆界”（法国主张把国土推进至莱茵河）；法国认同弗朗茨的帝国其余领土的完整性。秘密条款迫使奥地利将奥廖河（the Oglio）以西的全部意大利领土交给奇斯帕达纳共和国，但作为补偿，达尔马提亚（Dalmatia）、伊斯特拉半岛（Istria）以及奥廖河以东的威尼斯本土归奥地利，奥廖河以西的威尼斯本土亦归法国。拿破仑完全认为，条约签署前他就可以处置威尼斯领土。

双方同意日后再议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也尊重奥地利的领土主权完整，表面看来，奥地利在莱奥本占到便宜。拿破仑为协定辩护，他告诉督政府，博洛尼亚、费拉拉和罗马涅“永远是我们的”，因为法国在米兰建立的姐妹共和国正统治它们。他举了个不太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威尼斯让给奥地利，皇帝……就不得不友待我们。”在这封信里，他坦然地告诉督政府，当局的意大利战略从头错到尾。“如果我坚持去都灵，我就过不了波河；如果我坚持去罗马，我就丢了米兰；如果我坚持去维也纳，共和国也许就亡了。我采用的计划才能真正击垮皇帝。”拿破仑接下来的话听来必定虚伪，叫人难以相信。“至于我本人……指挥战事时，我总认为自己无足轻重。进抵维也纳时，我摘取的荣誉已超快乐所需。”[8] 他请求获准回家，并承诺道：“我的平民生活将如军事生涯般单纯。”他一定把自己想象成了古代英雄卢修斯·昆克蒂乌斯·辛辛纳图斯，此人在拯救罗马共和国后返回农场躬耕。因为这是份半公开报告，《箴言报》会刊登其中的非涉密段落，所以他写这几行文字的动机大概既是取悦公众，也是启发他称之为“流氓律师”的督政们。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批准了《莱奥本初步协议》。督政曾投票表决，结果四人赞成，仅让-弗朗索瓦·勒贝尔反对，他认为协议条款对奥地利来说太严苛了。

在和谈中，摩德纳公爵试图用400万法郎贿赂拿破仑，以求保住爵位。布列纳的话并非全然不可靠，根据他的说法，加洛、奥军将领默费尔特伯爵这两位奥地利谈判代表甚至提出封拿破仑为德意志诸侯，他回答：“我谢过皇帝，但我只接受法国赐予我的伟大。”[9] 当时，奥地利似乎挺满意《莱奥本初步协议》的条款，加洛只提了句微不足道的抱怨：“条约应该抄在羊皮纸上，封印也要再大些。”拿破仑及时迁就了他。[10]

4月20日，法国海军上校洛吉耶（Laugier）在威尼斯的利多（Lido）弹药库附近违规停船，威尼斯人开火，杀死了洛吉耶。对拿破

仑来说，威尼斯算是直接送上门来。他迟早要制裁威尼斯，此事更令他师出有名。他要求威尼斯驱逐英国大使与支持波旁王朝的法国流亡者、交出所有英国货物、“捐赠”2000万法郎，并逮捕“暗杀”洛吉耶的凶手（包括某位出身贵族的威尼斯海军将领）。总督承诺为维罗纳屠杀赔罪，但拿破仑不为所动，他说对方的使臣“身上滴着法国人的血”，转而强令总督放弃本土。为了让《莱奥本初步协议》秘密条款生效，他需要控制威尼斯本土。与此同时，他鼓励布雷西亚与贝加莫（Bergamo）反叛，到了5月3日时他对威尼斯宣战。拿破仑惩罚了维罗纳屠杀，他从该城征收17万西昆（sequin，约等于170万法郎），没收市营当铺中所有价值超过50法郎之物。一些人被绞死，另一些人则被流放至南美的法属圭亚那（Guiana），那里有革命政府打发去的它不想见的人。教堂善款、画作、植物藏品乃至“城市和私人的海贝”被征收。[11]

与威尼斯开战才过十天，拿破仑就煽动城中政变。他通过法国公使馆秘书约瑟夫·维尔塔（Joseph Villetard）威胁报复，进而削弱了当地寡头政权。威尼斯已经独立了1200年，总督和议员的先祖也曾在海湾阻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如今他们温顺地放弃掌权。总督等人也曾设法行贿，想给拿破仑700万法郎，他回答：“法国因背叛而流血，就算你们给我秘鲁的财富，就算你们的领土铺满黄金，罪孽也不能赎清，圣马克（St Mark）狮[12]必须去舔灰。”[13]5月16日，路易·巴拉盖·迪利耶（Louis Baraguey d’Hilliers）将军率5000名法军士兵进入威尼斯，他们号称“解放者”。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外的四尊铜马可能原是罗马图拉真拱门饰物，如今它们被搬去了卢浮宫，直到1815年时才迁回。

拿破仑与威尼斯城中新上台的亲法傀儡政府缔结条约：威尼斯为法国海军提供3艘战舰、2艘巡航舰，“捐赠”1500万法郎，交纳20幅画作、500份手稿，并且割让大陆本土，任法国将它分给奇斯帕达纳共和国与奥地利。威尼斯换来的则是法国的“友谊永存”宣言。以上事务皆与督政府无涉。1796年战局伊始时，拿破仑与撒丁停火都得经萨利切蒂批准，

此人名义上是督政府特派员（虽说他对拿破仑有好感）。从那以后，拿破仑就自作主张，同罗马、那不勒斯、奥地利签订了三份重要和约，现在他又和威尼斯签了第四份。

拿破仑还要签第五份。5月23日，热那亚总督及议员的武装与亲法的雅各宾民主派在当地街头爆发冲突，政府取胜。一些曝光后的文件显示，萨利切蒂与费普曾煽动这次拙劣的暴动。热那亚民主派过早生事，惹得拿破仑大怒，但他借口法国人遇害，派副官拉瓦莱特劝降热那亚政府。像威尼斯政府一样，热那亚当局很快投降。拿破仑又一次不等督政府指示就行动[14]，为新生的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 Republic）起草宪法。这份宪法以1795年法国宪法为基，设立两院制立法机关，其中一院有150人，另一院有300人。宪法也规定信仰自由、平等民权与地方自治权措施，其原则既未彰显他早年时秉持的纯粹雅各宾主义，也不像某些同时代人所说的，体现了科西嘉人对热那亚的复仇精神。事实上，拿破仑谴责民主派拆毁热那亚大英雄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雕像。他写道，多里亚是“伟大的航海家、政治家。在他的时代，贵族政权就是自由。全欧洲都嫉妒你们的城市有幸降生此等大人物。我毫不怀疑你们会尽心竭力再为他塑像，我恳求你们让我承担一定费用”。[15]

1797年春，拿破仑常住米兰城外的蒙贝洛宫（palazzo of Mombello），并召米奥·德·梅利托来此议事。梅利托注意到了拿破仑在蒙贝洛的日常大排场。他先让母亲、约瑟夫、路易、波利娜与舅舅费施住进来，又陆续安排其他家人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开始采用准宫廷礼仪。他的桌旁不再是副官，而是意大利贵族。波旁家族曾在凡尔赛公开宴乐，拿破仑也当众设宴，他还暴露了非常不符合共和作风的爱好——喜好谄媚者。他说自己为这些事花费了30万法郎，但布列纳声称开销超过300万，这相当于整个意大利军团一个月的饷银。不管是30万还是300万，此事都说明，除了麾下将军们，拿破仑自己也劫掠意大利。[16]

米奥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女婿弗莱施曼将军执笔，此书称，1797年6月1日，拿破仑携米奥去蒙贝洛宫花园散步，对他说：“你认为我在意大利打胜仗只是为了填满律师督政的口袋？只是想讨好卡诺和巴拉斯？什么念头！……我要削弱共和派，但那只是为我自己……亲爱的米奥，就我而言，我已尝过权力滋味，不会就此撒手。”据米奥记载，拿破仑接着评价法国人：“给他们小玩意儿就够了，只要你能巧妙掩藏目的地，他们会高兴地听你使唤。”[17] 很多历史学家仅看到这段话的表面，但这番可疑的言论全是谎言。当时，拿破仑若有削弱法国共和主义的野心，那他堪称叛徒，但他也无从知晓米奥·德·梅利托有多忠诚。像他那样的圆滑政客会随随便便对米奥这种公职人员脱口说出自己有多大抱负吗？而且数十年后，米奥还能记得这么清楚？[18]

拿破仑的很多家人都住在蒙贝洛宫，待在他的眼皮底下。从此以后，他不断干涉兄弟姐妹的感情生活。1797年5月5日，20岁的埃莉萨嫁给科西嘉贵族费利切·巴乔基（Felice Baciocchi）上尉。事后，巴乔基迅速晋升军职，最后成了元老院议员和卢卡亲王，他也明智地忽视了埃莉萨的多次出轨。类似地，拿破仑鼓励并促成波利娜的婚事。次月，即6月14日，17岁的波利娜嫁给了25岁的夏尔·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将军。土伦会战中，拿破仑曾和勒克莱尔并肩作战，后者也参加过卡斯蒂廖内之战与里沃利会战。波利娜当时另有所爱，而母亲莱蒂齐娅认为那个男人不适合她。拿破仑知道妹妹心有所属，但他仍支持这桩婚事。他还鼓励骑兵缪拉追求另一个妹妹卡罗琳，1800年1月他们成了婚。

巴黎督政府岌岌可危。1797年，鞋价比1790年时贵40倍，纸币指券（assignat）[19] 交易价值只有其面值的1%，由于通胀水平失控，政局陷入动荡状态。[20] 5月26日，保王党赢得选举，君主立宪党人巴泰勒米（Barthélemy）侯爵就任督政，这显然说明原政府不得人心。现任五督政为巴拉斯、卡诺、让-弗朗索瓦·勒贝尔与路易·德·拉雷韦利埃-莱波这两位律师以及巴泰勒米，前四人是弑君者，不过卡诺现在紧随更推崇自

由主义的不保王稳健派。拿破仑曾在葡月暴动中力挽狂澜，拯救共和国，他可不想最后只见到保王党取代共和派，遂派拉瓦莱特去巴黎捕捉政治动向。拉瓦莱特察觉有人暗谋迎回波旁，前布列讷军事教员、荷兰征服者夏尔·皮舍格吕也是同党。他还发现极左派亦有密谋，其中一桩后来曝光，5月下旬，记者、煽动者弗朗索瓦-诺埃尔·巴伯夫（François-Noël Babeuf）因此被斩首。巴伯夫的思想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尽管当时尚无这一术语或概念）。

拿破仑特别在意立法院对其行动的反对意见。稳健派代表、前吉伦特党人约瑟夫·迪莫拉尔（Joseph Dumolard）发表讲话，抱怨道：威尼斯所受待遇不公；拿破仑签约时瞒着立法院；“法国”（迪莫拉尔指的是拿破仑）干涉主权国内政，违反国际法。拿破仑激烈地回应。“无知饶舌的律师问我们干吗占领威尼斯，”他告诉督政府，“但我代表8万将士警告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律师懦夫与混账贱嘴斩杀战士的时代了，你们要是帮助他们，意大利军团就进军克利希（Clichy），等着大难临头吧！”[21] 克利希既指克利希街（rue de Clichy）保王党俱乐部，也指可容军队入城的巴黎城门。

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当天，拿破仑在军中发布宣言，警告国内反对派：“保王党一露马脚就不复存在。”他承诺道：“坚决迎战共和国与宪法之敌！”[22] 五天后，他在米兰举办盛大庆典，此举旨在告诉法国，比起莱茵军团的绅士们（messieurs），意大利军团是更可靠的共和派。两军团彼此仇视，以至于1797年年初贝纳多特师从德意志调来意大利时，他的军官与意大利军团军官械斗，而拿破仑授予贝纳多特携里沃利会战中缴获的军旗赴巴黎的荣誉时，有人认为这是赶他走的花招。贝纳多特野心勃勃、自作主张，拿破仑与他的关系向来复杂。次年，贝纳多特迎娶拿破仑的前未婚妻德西蕾·克拉里，两人之间又平添甚多纠结。

1797年7月7日，拿破仑为新生的内高卢（意为阿尔卑斯山脉边）共

和国（Cisalpine Republic，又译奇萨尔皮尼共和国）颁布宪法。内高卢共和国以米兰为首都，包括科莫（Como）、贝加莫、克雷莫纳、洛迪、帕维亚、瓦雷泽（Varese）、莱科（Lecco）与雷焦。意大利人踊跃参加共和国军队，可见比起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内高卢共和国推动意大利在民族统一与觉醒道路上迈出了更大一步。[23] 统一的意大利亲法政权辖域阔大，一直延伸到伦巴第平原之外。拿破仑明白，有这样的意大利相助，他既能防备奥地利复仇，也可在必要时进攻施泰尔马克、克恩滕（Kärnten）和维也纳。他指导四个委员会以法国宪法为蓝本起草内高卢共和国宪法。然而，因为奇斯帕达纳共和国首次选举时有大量教士当选，这回拿破仑亲自任命了5名督政与全体立法委员（共180人），并指定塞尔贝洛尼公爵出任首届政府主席。

7月中旬，巴黎形势危急。当局想威慑反对党，遂任命共和派将领奥什为战争部长，但奥什未到而立之年，宪法又规定官员年龄不得小于30岁（督政除外，其年龄下限是40岁），立法院议员便指控奥什违宪，结果他上任五天就被迫下野。27岁的拿破仑注意到了此事。7月15日，迪莫拉尔竟然向立法院提交批判他的议案，他便夸张地告诉督政府："我看克利希俱乐部想踩着我的尸体毁灭共和国。"[24] 1795年8月的《共和三年宪法》分割了权力，意味着督政府不能解散立法院，立法院也不能强行干涉督政府。二者之上再无裁决机构，巴黎政坛陷入僵局。

7月17日，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首任外交部长，日后他会四任此职。塔列朗精明懒散、狡诈多智、饱经世故、腿脚不便、沉溺酒色，其先祖是公元9世纪的昂古莱姆与佩里戈尔采邑伯爵。塔列朗原是欧坦主教（但他从没去过那个主教辖区），1791年被逐出教会。塔列朗曾协助促成《人权宣言》和《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1792～1796年，他被迫去英格兰和美国流放。在指导原则上，他说自己喜欢英国宪法，但他绝不会为贯彻任何原则而损害自己的事业和利益。多年来，拿破仑似乎心怀对塔列朗的无限仰慕之情，他经常给此人寄去亲密信件，称其为"欧

洲言谈之王”（the King of European Conversation）。然而，拿破仑暮年时已彻底看清塔列朗：“他很少提建议，却让别人说……我再没见过像他那样毫不关心正误的人。”[25] 时机一到，塔列朗就背叛所有人，拿破仑也不例外，他用非常私人的方式处理此事。拿破仑日后说：“没有降下天罚的上帝。”塔列朗大概是在自家床上寿终正寝的，这证明此言不假。[26]

不过，此时两人尚未结怨。1797年7月，外交部长塔列朗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拿破仑写信，他油嘴滑舌，想与对方结好。塔列朗写道：“光波拿巴的名字就能抚平我的所有困扰。”[27] 拿破仑的回信同样热情洋溢，读来令人尴尬。“也许亚历山大的胜果不过是鼓舞雅典人，”他回复道，“其他领袖才是社会砥柱，比如你。我深入钻研大革命，岂会不知它欠你多少。你的牺牲应有回报，我一掌权就报答你。”[28] 奉承彼此的字句中蕴藏着政治同盟的潜在前景。

巴拉斯组织整肃法国政府与立法机关，驱逐保王党与稳健派。拿破仑也认为保王党和稳健派危害共和国，7月下旬时他决定支持巴拉斯。27日，他派坚定的共和党人奥热罗（事实上，他是新雅各宾分子）去巴黎。拿破仑警告拉瓦莱特注意奥热罗的野心：“不要被他控制。他是党派主义者，曾在军中制造混乱。”[29] 不过拿破仑也承认，此时奥热罗是去巴黎的合适人选。他告诉督政府，奥热罗“因私事”回巴黎，但总的来说，真相更具戏剧性。[30] 皮舍格吕就任下院五百人院议长，另一位地下保王党人巴尔贝-马尔布瓦侯爵担任上院元老院议长，莫罗几乎懒得让莱茵军团庆祝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巴拉斯现在便需要拿破仑的政治支持、军事力量和经济援助。据说拉瓦莱特携300万法郎去巴黎，趁正在筹划的政变爆发前花钱买得影响力，如果布列纳的话可信，这笔钱是拿破仑的全部净资产。[31]

1797年9月4日（共和历果月十八日）清晨，果月政变（Fructidor

coup）爆发，大获成功。法律禁止军队不经立法院允许便接近首都，但奥热罗照样占领了巴黎战略要地。他在议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布下士兵，逮捕了86位议员与多名编辑，并把他们押至圣殿塔监狱。这些人中，巴泰勒米、皮舍格吕、巴尔贝-马尔布瓦等很多人随后被逐至4400英里之外的流放地圭亚那。卡诺逃脱抓捕，成功来到德意志。可想而知，迪莫拉尔亦被捕，不过他没去南美流放，而是去了法国的大西洋海岸线附近的奥莱龙岛（Île d’Oléron）。然后，立法院剩余议员在支持保王党的49个省取消了将要开始的选举，并立法反对被指名的教士，以及虽回国但未被宽恕的流亡者。卡诺和巴泰勒米被赶走后，可靠的共和党人菲利普·梅兰·德·杜艾（Philippe Merlin de Douai）和弗朗索瓦·德·纳沙托（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接任督政。督政府再度激进化，动用额外权力关闭报社与政治俱乐部（如克利希），现在它变得像恐怖时代的老公共安全委员会一样强势。至少眼下，意大利军团拯救了督政府。米奥认为，拿破仑支持果月肃清，“保证了政变成功”。[32] 督政府也整顿军官队伍，开除了38名被怀疑是地下保王党人的将军，其中有拿破仑的前对手、阿尔卑斯军团司令克勒曼将军。

布列纳称，拿破仑得知政变结果后“喜气洋洋”。[33] 卡诺是果月政变最重要的牺牲品之一，但他似乎并不因此记恨拿破仑。1799年，卡诺在流亡途中发表自我辩护词：1796年巴拉斯没有提议让拿破仑去意大利任职，提名他的人其实是卡诺；1797年巴拉斯已经敌视拿破仑，于是“用下流诽谤之辞讥讽波拿巴必然珍爱的人（约瑟芬）”。[34] 卡诺声称，巴拉斯、勒贝尔与拉雷韦利埃“一直痛恨波拿巴，非毁灭他不可”，“《莱奥本先行协议》签订后”，他们私下“惊呼反对协议”。[35] 拿破仑显然相信这些话，因为他掌权后即将卡诺召回战争部。

果月十七日（即9月3日）晚，拉瓦莱特和巴拉斯在一起。拿破仑自己不想摆出一副搞阴谋的样子，政变当天，他仍在意大利帕塞里亚诺（Passeriano）议和，但拉瓦莱特一回来，他就要对方复述事件，“描述

每一位主演的犹豫不决、激情发作和几乎每个手势”。[36] 巴黎也召回卡诺的宠儿克拉克，仅剩拿破仑全权代表法国参与坎波福米奥议和。

拿破仑与奥地利全权代表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Ludwig von Cobenzl）伯爵交谈时常感恼火。9月12日，他告诉塔列朗，“愚蠢又赖账的维也纳宫廷看来难以理喻”，还说和谈“就是个笑话”。果月政变后，督政府不再过问一些议程，比如让威尼斯加入内高卢共和国（他反对）、用德意志土地补偿奥地利损失的意大利领地（他支持）。[37] 奥地利发现波旁王朝眼下无望复辟，所以和谈再无其他阻碍。9月26日，拿破仑要求督政府批准他与皮埃蒙特-撒丁的和约。根据条约，撒丁需派1万人加入法军，他还预言道，六个月之内卡洛·艾曼努尔四世就会下台。他对塔列朗说：“若巨人拥抱侏儒，紧紧搂着他，闷死了他，也不能就此指控巨人犯罪。”[38] [39]

这一时期，拿破仑常常写信假称抱病，“我几乎跨不上马背，需要休息两年”。他的信再一次充斥着辞职威胁，理由是政府不够喜爱他。9月17日，奥什因肺结核去世，“党派主义者”奥热罗接替他就任莱茵军团司令，此后拿破仑的恐吓变本加厉。他还不断抱怨难同科本茨尔议和。[40] 在与科本茨尔坦率交谈伊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es）的未来时，拿破仑往地上砸了一尊漂亮的古董瓷器（奥地利的说法），抑或一套廉价茶具（波拿巴分子的说法），他砸的也可能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等君主赐给科本茨尔的珍贵的陶瓷茶杯”（二十年后他自己的说法）。[41] 装腔作势是他的谈判技巧，他常常装样子给人看。不管砸碎的是什么，科本茨尔依然冷静，仅仅向维也纳报告道：“他表现得像个傻瓜。”[42] 拿破仑的一位私人秘书记录他生气时的样子：

> 一旦被强烈的激情刺激，他的脸色就变得……可怕……他眼睛喷火，鼻孔因内心剧烈斗争扩张……他似乎能随意控制这些情绪爆发。顺便说一句，随着时间流逝，他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的头脑始终冷静……心情好时，或急着取悦他人时，他就露出温和亲切的表情，脸上也绽放着非常美丽的微笑。[43]

10月7日，拿破仑给塔列朗写了一封长信，又向对方述说科本茨尔的顽固执拗。他开诚布公，质疑意大利战局的长远价值，称意大利“这个国家孱弱迷信，是潘塔洛内[44]又是懦夫”，不足以创造伟绩，当然“不值4万法国人为之捐躯”。[45]他补充道，整个战局中，意大利人没帮他，内高卢共和国军队也只有2000人。“这才是历史，”他写道，“但流传下来的尽是虚构传奇，宣言、出版的论著等物把它们写得那么美好。”拿破仑致塔列朗的信思想丰富，短短几周时间，他们的书信联系竟变得如此密切。“我写的全是心里话，”他对自己的新盟友兼知己说，“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敬意。”[46]

1797年10月13日破晓时分，布列纳走进拿破仑的卧室，告诉他山上满是雪。于是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至少布列纳这么说），大叫：“什么！才10月中旬！什么鬼地方！好吧，我们必须讲和。”他立刻推测大雪很快会封路，所以莱茵军团不能支援他了。[47]坎波福米奥村位于帕萨里亚诺（Passariano）的拿破仑司令部和乌迪内（Udine）的科本茨尔总部正中间，10月17日（周二）午夜，双方在此签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割让比利时（奥属尼德兰）与莱茵河西岸给法国；威尼斯的伊奥尼亚群岛归法国；伊斯特拉半岛、弗留利（Friuli）、达尔马提亚、威尼斯本身、阿迪杰河与波河下游归奥地利；奥地利承认利古里亚共和国与内高卢共和国，而内高卢共和国将与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合并；法奥结成“最惠国”关税同盟；摩德纳公爵失去他的意大利封地，但奥地利用莱茵河以东的布赖斯高（Breisgau）公国补偿他。11月将召开拉施塔特（Rastatt）会议，届时双方会规划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探讨如何补偿封地被征收的莱茵亲王们，并且分别在莱芒湖（Lake Léman）岸边的日内瓦周围和瑞士建立莱芒共和国（Lemanic Republic）、海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an Republic）。

次日，拿破仑致信塔列朗称，“我相信一定有人狠批我刚签订的条约”，但他辩称，想争取更好的条件就只能再战，征服“两到三个其他奥

地利省份。可能吗？可能。很可能吗？不大可能”。[48] 他派贝尔蒂埃与蒙日携条约去巴黎，叫他俩对首都人士详解其优点。两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公众也热盼和平，于是督政们迅速批准了条约，但他们私下抱怨对威尼斯的态度显得共和派不够团结。据说被问及有关威尼斯的条款时，拿破仑解释道：“我在玩21点（vingt-et-un，又叫黑杰克），玩到20点时停手。”[49] 《坎波福米奥条约》结束了法奥之间长达五年的战争，签约当日，拿破仑还致信内高卢共和国内政部长，讨论在意大利全体音乐家中举办谱曲比赛，从而纪念过世的奥什将军。[50]

拿破仑一边对塔列朗称赞《坎波福米奥条约》，一边细思下一阶段法国的要务。“我国政府必须消灭英国国教政权，否则会被那帮居心不良、野心勃勃的岛民腐化，坐等灭亡。眼下时机大好。我们在海军方面集中力量，消灭英国。英国亡则欧洲臣服。”[51] 塔列朗替拿破仑积极走动，才过九天，督政府就任命他指挥一支新军——英格兰军团。拿破仑立刻开工，他提议从奥什子女处取走奥什的英国地图，重新勘察敦刻尔克（Dunkirk）与勒阿弗尔（Le Havre）之间的所有港口，还下令建造大量运兵炮舰。[52] 11月13日，他派自己的炮兵专家、安托万·安德烈奥西（Antoine Andréossy）上校去巴黎“铸造口径与英国加农炮等长的大炮，这样的话，我们到英国后能使用他们的加农炮炮弹”。[53]



4.《坎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的中欧

与此同时，拿破仑确保意大利军团的英雄为人认可，他给政府送去

名单，上列100名战场勇士，他们将受赏别人梦寐以求的金制荣誉马刀。这些英雄包括：第85战列步兵半旅中尉茹贝尔（Joubert），里沃利之战中他率30人俘虏了1500名奥军；第39战列步兵半旅鼓手长西科（Sicaud），卡利亚诺之战中，他独自抓获40名俘虏；第27轻步兵半旅上校迪帕（Dupas），他“是洛迪之战中最早冲上桥的人之一”；第32战列步兵半旅掷弹兵卡布罗尔（Cabrol），他冒着敌军炮火攀上洛迪城墙，打开城门。[54] 拿破仑还给巴黎送去一面锦旗，旗上列有他口中的此场战事中的俘虏人数（15万）、缴获的军旗数（170）与大炮数（600）、俘获的战舰数（9）、签署的和约数、“解放”的城市数、其作品被送去巴黎的艺术家人数，这些人包括米开朗琪罗、提香、韦罗内塞、柯勒乔、拉斐尔和列奥纳多·达·芬奇。[55]

11月，拿破仑让妹夫勒克莱尔掌管意大利军团，自己则去参加拉施塔特会议。他从米兰启程，途经都灵、尚贝里（Chambéry）、日内瓦、伯尔尼（Bern）与巴塞尔（Basle）等地，一路上民众向他欢呼。布列纳回忆道，伯尔尼某夜，他和拿破仑经过两列马车中间，只见车里“灯火通明，佳丽满座，她们都高呼：‘波拿巴万岁！平定者万岁！’”[56] 拿破仑乘坐八匹马拉拽的马车进入拉施塔特，30名骠骑兵护卫他的座驾，一般只有在位君王才能享此待遇。他明白盛典对公众想象力的影响，希望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获得欧洲旧王朝君主享有的视觉冲击力。

11月30日，法奥两国在拉施塔特正式批准《坎波福米奥条约》。奥地利被迫放弃首要的莱茵要塞美因茨、菲利普斯堡（Philippsburg）与凯尔（Kehl），撤离乌尔姆（Ulm）和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并让军队退至莱希河（the Lech）以远。当时有1600万德意志人不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定居，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代曾让他们凝为一体，但那已是遥远的历史。拿破仑想让法国积极争取这些德意志人的支持。（有一次，他更粗俗地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个“老妓女，早就谁都嫖过了”。[57]）《坎波福米奥条约》将数位德意志亲王的封地划给法国，拿破仑想补

偿他们，他扮演中等大小的德意志国家的保护人，助它们对付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企图。早在5月27日，他致信督政府时就预言到："如果德意志的概念不存在，我们就得创造它为己谋利。"[58]

拿破仑发起的和谈一直持续到1799年4月。谈判期间，瑞典国王（此人在德意志有领土）厚颜无耻，竟派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前情夫阿克塞尔·冯·费尔森（Axel von Fersen）男爵做代表，这让他有绝好的机会故意制造外交失礼事件。拿破仑对塔列朗调侃费尔森道："他来见我时就像牛眼窗（Oeil-de-Boeuf，指代路易十四在凡尔赛的私人寓所房间）里的官妓一样自鸣得意。"[59] 拿破仑告诉费尔森，他其实"遭全体法国公民唾弃"，他"出名只是因为喜欢上一个活该倒台的法国政府，还为重建它白忙活"。[60] 据拿破仑回忆，费尔森"答道，他的陛下会考虑我的话，然后他离去。我自然照惯常礼节送他到门口"。[61] 费尔森被召回了。

1797年12月2日，拿破仑从拉施塔特启程回巴黎。途中，他仅在南锡（Nancy）稍事逗留，作为贵宾赴共济会当地分会的宴席。（共济会员常常支持他的近代化改革，特别是在意大利。）5日下午5点，他身着便装，乘简朴马车进入巴黎，同行者仅有贝尔蒂埃与让-艾蒂安·尚皮奥内（Jean-Étienne Championnet）将军。"将军计划悄悄返程，"一名当时的人士回忆道，"最次也要悄悄进入巴黎，他安静地依计而行。"[62] 拿破仑太年轻了，不能当督政，于是故意在巴黎保持低调，以免触怒督政府，不过他归来之事一传出去就轰动了首都。约瑟芬之女奥尔唐斯回忆道，"每天都得拦下大群各阶层人士，他们等不及了，抢着要看意大利征服者"。[63] 拿破仑和约瑟芬租住的房子位于尚特雷纳街（rue Chantereine）6号（尚特雷纳意指歌唱的青蛙，因为其附近曾有湿地）。为了表彰他，尚特雷纳街便改称胜利街（rue de la Victoire）。[64] 后来，拿破仑花52400法郎[65] 买下了房子，但两人尚且只是租客时，约瑟芬就用庞贝壁画、镜子、丘比特像、粉玫瑰、白天鹅等物装饰

屋子，装修费多达30万法郎，此事或可反映她的病态奢侈严重到了何等地步。[66]

多年后，拿破仑回忆道，人生中的那段巴黎岁月危机四伏，重要原因之一是士兵当街大叫“他应该称王！我们必须立他为王！”。当时很多人（误）认为奥什死于毒杀，拿破仑也害怕因此而落得同样下场。[67]于是乎，正如一位支持者的记载，“他避开公共活动，很少当众露面，只亲近少数将军、科学家与外交官”。[68]他也认为人们马上就会忘记他的胜利，说：“巴黎人是健忘之辈。”[69]

外交部位于巴克街（rue du Bac）上的加利费公馆（Hôtel Galifet），12月6日上午11点，塔列朗在此会见拿破仑。两人抓住对方长谈一番，对眼前之人感到满意。当晚，五督政私下设宴款待拿破仑，巴拉斯和拉雷韦利埃热情待人（也许是虚伪之举），勒贝尔不失礼数，但另外两人态度冷淡。[70]12月10日（周日）午夜，政府全员在卢森堡宫（Luxembourg Palace）举办盛大的官方庆典欢迎拿破仑，只见大宫殿屋顶旗帜飘扬，宫中特地搭起圆形场地，其上突显象征自由、平等与和平的雕像。拿破仑始终谦虚客套。巴黎某位英国居民注意到，“穿过街上人海时，他缩进马车里面……我见他拒绝了给他预留的主位（chief of Sate），而且似乎想逃开潮水般的普遍掌声”。[71]另一个当时人士评论道：“督政冷冷地表彰他，群众却欢呼，这形成鲜明对比。”

拿破仑既置身聚光灯下，又让别人觉得自己谦恭低调、想悄悄离席，这是最精湛的政治手腕之一，而他玩得纯熟。一位在场人士回忆道，“当时巴黎最高贵最杰出的人都来了”，如督政、立法院上下两院议员与他们的妻子。另一名目击者称，拿破仑入场时，“所有人起立致敬（即脱帽），窗边挤满妙龄靓女。典礼的确盛大，可氛围冷淡如冰。人们似乎只想来看他一眼，与其说他们聚在一起是因为高兴，倒不如说是好奇心使然”。[72]

塔列朗介绍拿破仑，大肆奉承他。拿破仑回话，称颂《坎波福米奥条约》，褒扬士兵"为光荣的《共和三年宪法》"热情奋战。然后，他述说自己的信念："若有最实用的法律来保障法国人的幸福，欧洲就自由了。"[73] 正式场合中督政皆着长袍，巴拉斯也不例外。他恭维拿破仑一番，"自然殚精竭虑才造出波拿巴"，把对方比作苏格拉底、庞培和恺撒。然后，他提到已经把法国海军彻底赶出全球大洋的英国，"抓住骚扰大海的悍匪，拴住横行大洋的暴徒，叫伦敦恶棍尝尝迟到已久的惩罚"。[74] 语毕，巴拉斯等督政拥抱拿破仑。布列纳总结道："这幕多情喜剧的演员都发挥得淋漓尽致。"[75] 他的讽刺语气情有可原。

圣诞日，拿破仑接替流亡的卡洛，当选法国当时最顶尖的（今亦然）学术团体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这回他开心多了。学院共有312人，在拉普拉斯、贝托莱和蒙日的帮助下，他获305票，票数排二三位的候选人仅分别获166票和123票。此后，拿破仑经常穿着上绣橄榄绿枝与金枝的深蓝色院士服，不时出席院内科学会议，签名时也按序自称"法兰西学院院士、英格兰军团司令"。当选后次日，拿破仑写信答谢学院院长阿尔芒-加斯东·加缪（Armand-Gaston Camus）："从未知中发掘的知识才是取之无愧的真正战利品。"[76] 他出示这些学识证明不止是为了折服法国民众。他说："我很清楚，全军将士相信我不单单是军人后只会更尊敬我。"[77]

拿破仑在学院的提名人和支持者肯定认为招纳当今一流的将领是予人方便，但拿破仑不仅仅是一员智将，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他饱读多本最艰深的西方经典，并为其做注；他是鉴赏家与评论家，甚至略通传奇悲剧理论与乐理；他捍卫科学，结交天文学家；他喜欢和主教、红衣主谢赫谈神学；他不管去哪都带上收藏丰富的流动图书馆，里面的书都翻了很多遍。歌德赞赏他对维特的自杀动机的看法，柏辽兹欣赏他的音乐知识水平。拿破仑日后建立埃及学院（Institut d'Égypte），院内聘有当时最伟大的法国学者（savant）。19世纪，欧洲有很多杰出学者与

创意人士崇拜他，如歌德、拜伦、贝多芬（至少开始时如此）、卡莱尔（Carlyle）、黑格尔。他还在最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建立法兰西帝国大学。[78] 拿破仑配得上他那件绣花外套。

处决路易十六纪念日（1月21日）当天，督政府举办了已经过气的周年庆，并让拿破仑扮演主角，当时他的表现颇为圆滑。他不穿军装，只着院士服。他也没有紧挨督政们坐下，而是在第三排就座。

1798年1月3日，塔列朗举办招待会为拿破仑庆祝。宴会上，他暴露了自己不擅长同异性交往。约瑟芬之女奥尔唐斯日后回忆，知名聪慧女性热尔梅娜·德·斯塔埃尔（Germaine de Staël）夫人“一直尾随将军，他烦得难掩怒容，也许他发作了”。[79] 斯塔埃尔夫人之父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是富可敌国的银行家、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她本人也是巴黎沙龙界（salonnière）的领军人物，当时她把拿破仑当英雄崇拜。就因为拉瓦莱特是拿破仑的副官，果月肃清之后的某次宴会上，她非要等拉瓦莱特离席才走。塔列朗举办的筵席上，斯塔埃尔夫人问拿破仑：“你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最优秀？”她显然盼他夸自己几句智名远扬、文采斐然，但他回答：“生小孩最多的。”[80] 面对近乎暗恋自己的女子，他的随口之言的确奏效（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因为下个世纪中，低生育率一直困扰法国），但此事充分表明了他对女性的根本态度。

拿破仑把思绪转向入侵英国的行动。他同反抗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领袖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会晤，向其求助。托恩说他不是战士，帮不上大忙，拿破仑打断他：“但你勇敢。”托恩谦逊地承认自己确有勇气。根据此人日后的记录，拿破仑说：“好，那就够了。”[81] 2月的两周中，拿破仑考察了布洛涅（Boulogne）、敦刻尔克、加来（Calais）、奥斯坦德（Ostend）、布鲁塞尔（Brussels）与杜埃（Douai），评估成功入侵的可能性。他咨询水手、引航员、走私商和渔民，有时问到半

夜。“太危险了，”他总结道，“我不会尝试。”[82] 1798年2月23日，他明确告知督政府：

> 不管怎么努力，数年后我们的海军才可制霸。没有海上霸权就入侵英国的行动堪称史上最冒险、最艰巨的任务……命令需及时贯彻，但考虑到海军当前的组织状态，它似乎做不到这点，果真如此，我们就必须放弃远征英国，止步于守势，并在莱茵河上倾注全部精力与物力，以图夺取英属汉诺威（Hanover）……或者远征东方，威胁英国同印度的贸易。若以上三策皆不可行，我看就只能媾和。[83]

督政府根本不准备求和，它在拿破仑的三个替代方案中选了最后一个。3月5日，督政们全权委托拿破仑筹划并指挥全面的埃及远征，盼着他打击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和贸易路线。拿破仑去埃及对督政们有利，他可能为法国征服埃及，抑或大败而归，令人满意地声名扫地。对他们来说，两种情况都一样为人所喜闻乐见。波拿巴派支持者、英国上院贵族霍兰（Holland）勋爵说，他们派他去那儿，“既为摆脱他，也为满足他，还为折服并取悦巴黎的……公共舆论界要人”。[84] 至于拿破仑，他觉得自己可趁机追随心中最伟大的英雄亚历山大大帝与尤利乌斯·恺撒。“欧洲只是鼹鼠丘，”他高兴地对私人秘书说，“天下盛名都出自亚洲。”[85]

当月的晚些时候，一桩小丑闻浮出水面，导致拿破仑陷入危机，他可能因此被卷入金钱腐败与政治丑闻的旋涡，甚至就此永失在尼罗河畔成名的机会。弗拉沙公司、第戎公司（Compagnie Dijon）等大军事承包商从财政部受领滞后的长期拨款，用这笔钱应付军队的当前需要。此外也有小公司充当承包商，它们经常被指变相克扣纳税人的钱，如篡改发票、不达标运输、供应腐物，甚至指使人偷农民的马。这些小公司大发战争财，博丹公司（Compagnie Bodin）便是其中一例，其经营人乃臭名昭著的路易·博丹（Louis Bodin）。然而，拿破仑从兄长约瑟夫处获知了一则可怕的消息：除了其他投资者，巴拉斯、伊波利特·夏尔（他已退役，成为全职承包商）、约瑟芬都是博丹的股东。[86] 1796年8月，

夏尔离开了意大利，但他和约瑟芬仍然保持亲密关系。

巴拉斯、塔列朗等人通过放贷、投机和内幕交易生财没什么，因为公众几乎都认定他们从事肮脏买卖，但换作拿破仑，事情就不同了。正直形象是他最吸引民众的品质之一，一旦他们知晓他的妻子也靠腐败军需供给牟利，它会在一夜之间消散。此外，他在米兰时亲自与弗拉沙公司斗争，还放逐了一名董事，虽说他的初衷确是力争意大利军团利益最大化，如今此事倒更像虚伪行径了。

1798年3月17日，拿破仑和约瑟夫严厉盘问约瑟芬，她颤抖不已、怒火中烧、报复心切，但仍像往常一样撒谎。他们逼问她到底了解博丹多少、是否为他谋取补给合同、伊波利特·夏尔是否与博丹同住圣奥诺雷郊区（Faubourg Saint-Honoré）100号、她是否如流言所说每天都去那儿。[87] 事后，约瑟芬立刻给夏尔写了一封惊慌失措的信，此信表明，她不仅否认一切指控，还眷恋夏尔、憎恨波拿巴兄弟，可能想借博丹的投机摆脱婚姻与债务，而且此时的她急于掩盖把柄。“我回答道，他说的我一概不知，如果他想离婚，开口就行。”她告诉自己的情夫，“他完全不必动用此等手段，我则是世上最不幸、最痛苦的女人。是的，我的伊波利特，我只恨他们，但只对你温柔，只爱你……伊波利特，我要自杀。是啊，如果不能专情于你，活下去只是负担，我宁愿死。”[88]

约瑟芬又对夏尔写道：与博丹通气，让他一口咬定根本不认识她，否认借她之力与意大利军团订合同；告诉圣奥诺雷郊区的门卫要坚称没见过博丹；叫博丹别用她为其意大利出差之行写的介绍信。信的结尾则是“一千个如我心般炽热多情的吻”。[89] 她随后再次致信夏尔，在信末写道：“只要有你我就开心。告诉我你爱我、你只爱我，那我就是最幸福的女人。从你的纸币里取5万里弗赫（约为125万法郎），让（男仆）布隆丹（Blondin）捎给我……我全是你的。”[90]

拿破仑正在策划新的埃及战局，所以他有充足的理由逃离巴黎。在

那儿，他已渐渐变成腐败、痛心、不忠、阴险的代名词，也许还会招来更大的尴尬。他一直相信自己是高贵的骑士，正如自创短篇中的克利松一般，而督政府和约瑟芬的行为动摇了这一理想形象。是时候再添一倍赌注了。

---

[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95，p.901，April 8，1797

[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4 p.914，April 16，1797

[3]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4 p.914，April 16，1797，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0

[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4 p.916，April 16，1797

[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497 p.905，April 9，1797

[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21 p.923，April 30，1797

[7]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5

[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16 p.917，April 19，1797

[9]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4

[1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87 p.962，May 27，1797

[1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56

[12] 威尼斯共和国国徽上的金色飞狮。——译者注

[1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4

[14] 拿破仑不能完全把督政府晾在一边。6月，庇护六世中风，他便请督政府“积极指导必要的应对措施，以防教皇去世。我该拥立一位新教皇吗？”CG1 no.1725，p.1030。庇护六世后来病愈，又多活了两年。

[1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87 p.962，May 27，1797

[16]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4

[17]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94

[18]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p.94-5，Markham，Felix，*Napoleon* 1963，p.63，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153，Schom，Alan，*Napoleon Bonaparte* 1997，p.65，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60，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1

[19] 1789～1797年法国以国家财产为担保发行的证券，后来成为通货。——译者注

[20]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19

[2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68

[2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785 p.1058，July 15，1797

[23] Schneid，Frederick C.，*Soldiers of Napoleon's Kingdom of Italy* 1995，p.3

[2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785 p.1058，July 15，1797

[25] *TLS* 8/8/1971 p.1208，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7

[2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8

[2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65

[2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822 p.1081，July 26，1797

[2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61

[3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71

[3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962 p.1140，September 3，1797

[32]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109，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661，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9，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28

[3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59

[34] Hicks，Peter，'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35] Carnot，Lazare，*Reply of L.N.M.Carnot* 1799，p.30

[3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29

[37]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009 p.1166，September 12，1797

[38] 事实上，卡洛·艾曼努尔国王一直在位，直到1802年才让位于他的弟弟。

[3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098 p.1216，September 26，1797

[40] 为防止奥地利最后倾向于战争，军团必须做好准备，所以拿破仑也给巴黎的意大利军团财务、公民阿莱（Haller）等人写信。阿莱收到的信说："请去纽扣生产地，告诉我情况如何。因为纽扣没做好，全军依然赤身裸体。"附言只有一句："钱钱钱！"CG1 no.2146，p.1243。

[41]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1

[4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69

[4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6

[44] 指意大利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角色潘塔洛内（Pantalone），此人唯利是图，贪得无厌。

[45]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49，p.1244，Octoebr 7，1797

[4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89

[47]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0

[4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70 p.1256，October 18，1797

[49]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p.90

[50]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63 p.1253，October 17，1797

[51]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70 p.1257，October 18，1797

[52]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26，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191 p.1267，November 5，1797

[5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2

[54]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220 pp.1283-9，November 11，1797

[5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3

[56]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4

[57]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56

[58]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587，p.963，May 27，1797

[5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274 p.1313，November 30，1797

[6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35

[6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4

[62] Espitalier，Albert，*Vers Brumaire* 1914，pp.45-6

[63]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32

[64] 1865年，宅邸全面重建，如今它是银行，门牌也改成了60号。拿破仑时代的遗址中，此地是个例外，不值特意绕道去。

[65] 这一时期，一名将军的年薪约为5000法郎。

[66]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 （Cambridge，MA）1963，p.153

[6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53-4，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5

[68]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5

[6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00

[70] Espitalier，Albert，*Vers Brumaire* 1914，pp.45-7

[71]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5

[72]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46，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4

[7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p.65-6

[7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195，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73，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105

[7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3

[76]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2280 p.1316，November 26，1797

[77] 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p.105-6

[78]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88，Williams，*The Life of Goethe* p.39

[79]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33

[8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6

[81] Tone，Theodore Wolfe，*The Life of Theodore Wolfe Tone* 1828，p.266

[82]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8

[8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315 p.38，February 23，1798

[84]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245

[8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68

[86]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p.150-53

[87]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Cambridge，MA）1963，p.151

[88]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p.152

[89]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pp.152-4

[90]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p.160

第七章 埃及

今年没见人去麦加朝圣。

——佚名伊斯兰教史学家笔下的1798年

如果我留在东方，我会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开创帝业。

——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

关于谁是埃及远征的倡议人有多种版本，如塔列朗、巴拉斯、蒙日（尽管只有他自己这么说）、百科全书编者兼旅行家康斯坦丁·德·沃尔内（Constantin de Volney）等。事实上，早在18世纪60年代，法军策划人员就开始考虑此事，1782年，弗朗茨皇帝的伯父、奥皇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也建议妹夫路易十六吞并埃及，以此作为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更大计划的步骤之一。[1] 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埃及，眼下它仍是埃及的正式统治者，但实际控制权早已落入源自高加索（Caucasus）的格鲁吉亚（Georgia）军人阶级马穆鲁克（Mamluks）手中。24个马穆鲁克贝伊（Bey，军阀贵族）被视作外族，他们征收重税，所以不得民心。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激进理想主义者认为征讨埃及可以传播自由、解放被暴虐异族压迫的埃及人，卡诺、塔列朗等更精于算计的战略家则想对抗地中海东岸的英国势力，因此埃及远征对这两类人都有吸引力。拿破仑属于后一类人，1797年8月，他告诉督政府："为了根除英国，我们现在必须拿下埃及。"[2] 塔列朗毛遂自荐，称愿赴君士坦丁堡劝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不要积极反对远征。这是他第一次误导拿破仑，但绝不是最后一次，也绝非最严重的一次。

1798年3月5日，拿破仑秘密就任埃及军团司令，他仅用十一周不到的时间组织筹备整个远征，5月19日就率军启程。但在准备期间，他仍设法出席了法兰西学院的八个科学讲座。作为假情报战的一部分，趁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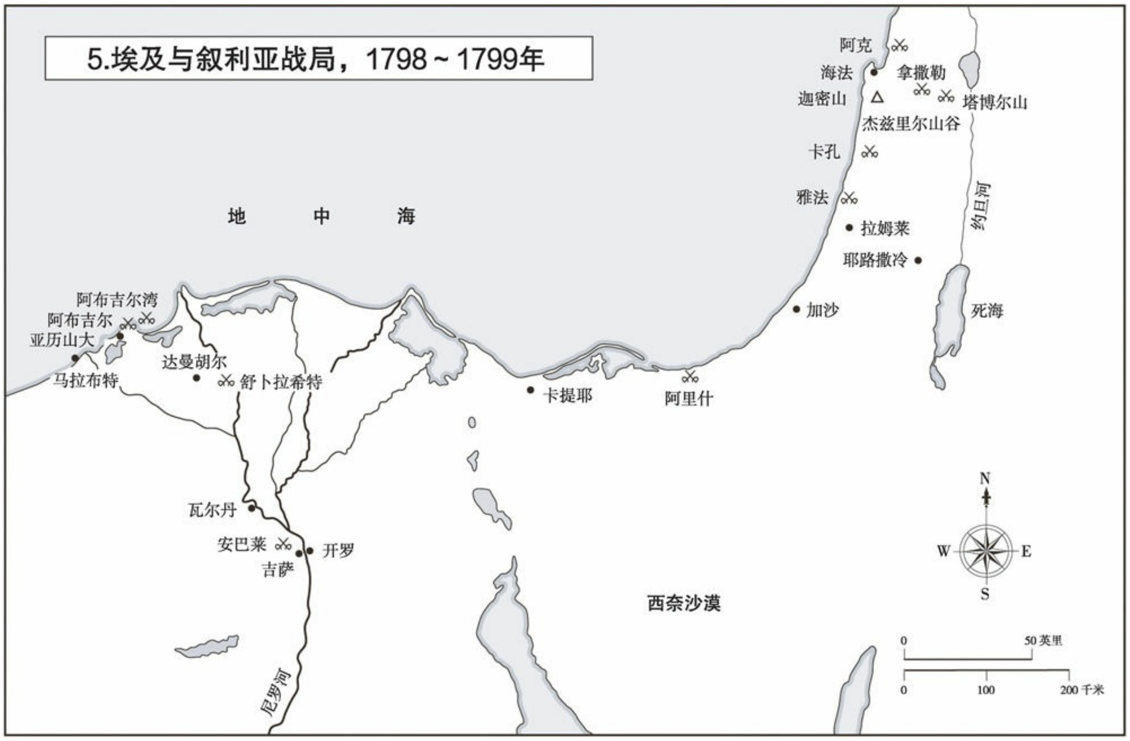
龙中有人讨论假日时，拿破仑当众说想带约瑟芬、蒙日、贝尔蒂埃和马尔蒙去德意志。为了进一步瞒天过海，官方重申任命拿破仑为屯于布雷斯特的英格兰军团司令。

拿破仑称埃及为“通向世界的地理钥匙”。[3] 他的战略目标是摧毁当地的英国贸易并代之以法国贸易，最起码也要消耗皇家海军，强迫他们同时掩护地中海入海口、红海入海口以及美洲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线路。[4] 1796年，皇家海军丢了基地科西嘉岛，若法国海军可从几乎固若金汤的马耳他岛（Malta）港口行动，它将更加受限。“何不攻占马耳他岛？”1797年9月，拿破仑致信塔列朗，“它可以让英国海军霸权更受威胁。”[5] 他告诉督政府：“这个小岛值得我们不计一切代价去争取。”他给督政府列了三条远征理由：把埃及变成永久的法属殖民地；为法国产品开辟亚洲市场；建立可容6万将士的军事基地，为进攻英属亚洲领地奠定基础。他向战争部索要孟加拉（Bengal）与恒河（the Ganges）的英语地图，还让公民皮弗龙（Citizen Piveron）随行，此人曾担任过驻英国最头疼的印度敌人、“迈索尔之虎”蒂普苏丹（Tipu Sahib）处使节。上述举动也许反映了拿破仑的最大野心，或者说最终幻想。然而督政府打击了这些梦想，仅授权拿破仑入侵埃及，并告诉他自筹资金。按照预期，他要在六个月内回国。

远征将花费800万法郎。事后人们发现，拿破仑让贝尔蒂埃、茹贝尔和布吕内分别在罗马、荷兰与瑞士勒索“捐赠”，相对来说，他没费多大力气就筹到了这笔钱。他认真挑选远征军高级军官。出身贵族的路易·德塞（Louis Desaix）将军在德意志战场表现出色，显得前途无量。3月28日，德塞带另一位贵族将军路易-尼古拉·达武去胜利街初访拿破仑。勃艮第人达武现年28岁，拿破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很好，但德塞担保达武军事才能突出，为他在远征军争得一席之地。拿破仑后来欣赏达武在埃及的表现，不过两人私交平平，这对他的未来极为不利，因为达武日后跻身他麾下少数几个独立指挥也出彩的元帅之列。不出所料，拿破

仑任命贝尔蒂埃为参谋长，让已从沙隆炮兵学校毕业的弟弟路易和英俊的继子欧仁（绰号“丘比特”）当副官，并带上师级将军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Jean-Baptiste Kléber，莱茵军团老兵，嗓门大，比他的士兵们高整整一个头）、德塞、邦、雅克-弗朗索瓦·德·梅努、让-路易·雷尼耶（Jean-Louis Reynier）以及贝西埃、马尔蒙等14名旅级将军，其中很多人曾随他在意大利作战。

远征军骑兵由出身海地的达维·德·拉帕耶特里（Davy de la Pailleterie）将军指挥，他一般被称作老仲马（Thomas-Alexandre Dumas）[6]。1797年1月，老仲马成功阻止奥军返回阿迪杰河对岸，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黑魔鬼”（Schwarzer Teufel），因为他是法国贵族与加勒比女黑人之子。拿破仑还让埃尔泽阿·德·多马丹（Elzéar de Dommartin）将军统率炮兵，并派独腿的路易·卡法雷利·迪法尔加（Louis Caffarelli du Falga）主管工兵。奇怪的是，那个年代最勇猛的骑兵指挥拉纳却摊上文职军需总监。首席军医是勒内-尼古拉·德热内特（René-Nicolas Desgenettes），四年后他会从医生角度撰写埃及战局史，并把书题献给拿破仑。埃及军团军官队伍人才济济、前景光明，堪称劲旅。



拿破仑还特地建了个图书馆，他带了125本书，其题材涵盖历史、地理、哲学与希腊神话。这些书包括库克船长的三卷本《航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李维、修昔底德、普鲁塔克、塔西陀的著作，尤利乌斯·恺撒的书自然也少不了。他也带了蒂雷纳、孔代、萨克斯、马尔伯勒、萨伏依的欧根、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和百年战争时期法军著名指挥官贝特朗·杜盖克兰（Bertrand du Guesclin）的传记。诗集和剧作也名列书单，如莪相、塔索、阿廖斯托、荷马、维吉尔、拉辛与莫里哀的作品。[7] 拿破仑从《圣经》中获知德鲁兹派（Druze）与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的信仰，从《古兰经》中认识穆斯林，从《吠陀经》中了解印度教徒，不论战事最终把他带到何处，他对当地居民发表宣言时几乎都可尽情引用合宜素材了。他还带了希罗多德的书，因为书中有涉及埃及的内容（幻想色彩浓厚）。（多年后，拿破仑说，希罗多德“相信，照射在泥土上的阳光的热度形成了人类。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尼罗河的黏土会变成老鼠，可以看见它们的变化过程”。[8] ）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征伐埃及、波斯和印度时曾

让学者与哲学家随军。身为合格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希望这次征途不仅是征服战，还是科学文化盛事。为此目的，他在军中安置了167名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考古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印刷工、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建筑师、东方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记者、土木工程师和气球驾驶员，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学者，他们大多是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成员。拿破仑希望学者们的工作能赋予远征军事层面以外的意义。[9] 他没能劝服一位职业诗人同行，但他设法让51岁的小说家、艺术家、博学者维旺·德农入队。旅途中，德农画了200多幅速写。蒙日和贝托莱领导的学者队伍也包含当时的顶尖人才，如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他发现了热传导的傅立叶定律）、动物学家艾蒂安·圣伊莱尔（Étienne Saint-Hilaire）、矿物学家德奥达·德·多洛米厄（Déodat de Dolomieu，白云石“dolomite”以他命名）。学者们不知此行终点，只知共和国需要他们发挥才干，而他们自己也可在学术界留职加薪。“学者与知识分子就像风情女人，”拿破仑后来告诉约瑟夫，“你能与他们见面聊天，但别娶一个回家或招一个当部长。”[10]

1798年5月10日，拿破仑在土伦发表宣言：

> 地中海军团将士们！你们现在是英格兰军团侧翼。你们在山地间、平原上、要塞前战斗过，但不曾渡海作战。你们有时能和罗马兵团一较高下，但还不能与之比肩，而罗马兵团正是在这片海域迎战迦太基人……胜利从未离开他们……欧洲注视着你们。你们肩负伟大使命，需战斗不息、排除万难。你们手握法国的繁荣未来、人类的利益和自己的光荣。自由理想曾立共和国为欧洲主宰，亦将立它为遥海远境之主。[11]

拿破仑在这篇演说中许诺道，他将分给每位士兵6阿庞（arpents，6阿庞相当于5英亩）土地，但他没明说在何处分地。德农后来回忆道，登陆前，船上士兵看到埃及的贫瘠沙地，于是互相打趣道：“那就是他们要给你的6阿庞！”[12]

远征埃及是十字军东征后法国首次对中东用兵，拿破仑凭其惯有的细节掌控力准备此役。除了军队所需全部军事装备，他还收集了天文望远镜、气球设备、化学仪器、一台印刷机以及拉丁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的铅字。[13] 他致信蒙日，“你知道我们将多么需要好酒”，并告诉对方不仅要采购4800瓶酒（大部分是他最爱的勃艮第红葡萄酒），还要雇“一名优秀的意大利歌手”。[14] （远征军一共带了80万品脱葡萄酒去埃及。）如今，拿破仑的名望足以克服给养困难，他委派弗朗索瓦·贝努瓦耶（François Bernoyer）置办军装，此人着手雇佣裁缝和马鞍匠，并记载道：“只要我说远征的指挥官是波拿巴，一切就迎刃而解。”[15]

1798年5月19日（周六），天气晴好，拿破仑的大舰队从土伦驶向亚历山大，马赛、科西嘉、热那亚和奇维塔韦基亚的船队陆续入队。当时，这支队伍是史上最大的地中海舰队。远征舰队共有280条船，其中有13艘战列舰，其规格从74炮到118炮不等。118炮军舰是海军中将弗朗索瓦·布吕埃斯（François Brueys）的旗舰“东方号”（L’Orient），它是水上最大战舰。拿破仑一共集结了38000名陆军士兵、13000名水手与海军士兵、3000名商船海员。他的陆军有些头重脚轻，因为非军官人员与军官人数比一般为25∶1，而远征军共有2200名军官，这一比例为17∶1，可见很多壮志满怀的青年渴望投身拿破仑帐下。“你就当我会一路晕船，”出发前，拿破仑和布吕埃斯说笑道，“给我准备张舒服的床。”[16]

纳尔逊正率13艘战列舰寻找拿破仑，庞大的舰队在横渡地中海时幸运地躲过了他。拿破仑出港前夜，纳尔逊的舰队被强风吹散，漂向撒丁岛。6月22日晚，两支船队在克里特岛（Kriti）附近的海雾中擦肩而过，彼此仅隔20英里。纳尔逊根据经验猜出拿破仑要去埃及，但他在6月29日到达亚历山大，次日便走了，而30日正好是法军抵达的前一天。[17] 三次躲过纳尔逊堪称奇迹，但事不过三。

旅途中，拿破仑让学者在甲板上给军官办讲座。在某次讲座上，朱诺的鼾声太响，他只好叫醒朱诺，准其离开。他后来从图书馆管理员处获知，高级军官大多看小说。（他们已经开始赌博，直到“大家的钱很快进了几个人的口袋，再没出来过”。）拿破仑断言道，小说是写给“贵妇侍女”看的，并且命令图书馆管理员“只给他们历史书，男人应该只看历史”。[18] 他显然忽视了自己带来的40本小说，其中有英译法作品。

6月10日，舰队抵达掌控地中海东部入口的马耳他岛。拿破仑派朱诺去见圣约翰骑士团大头领费迪南德·冯·洪佩施·楚·博尔海姆（Ferdinand von Hompesch zu Bolheim），要求他打开瓦莱塔港（Valletta）并投降，两日后头领照办。卡法雷利对拿破仑说，投降是桩幸事，不然“大军根本没法入港”。[19] 马耳他岛曾挺过围攻，1565年的一次防御战尤其令人瞩目，当时土耳其人炮轰瓦莱塔港四个月，一共发射了13万发加农炮炮弹。二战期间，马耳他岛被围三十个月也未屈服。但是1798年骑士团正在内讧，亲法骑士不愿战斗，而且他们的马耳他臣民也起义了。

拿破仑在马耳他岛上待了六天。他驱逐骑士们，只留下其中14人；他废止中世纪的管理机构，改设政府会议；他关闭修道院，引进路灯照明和块石路面；他释放所有政治犯，安设喷泉；他革新医院和邮政系统，并改造大学，让它在人文科目外增设科学课程。[20] 他派蒙日和贝托莱劫掠金库、铸币厂、教堂与艺术品（但他们错过了圣约翰教堂的银门，因为人们明智地把它涂黑了）。6月18日，拿破仑写了14封急件，安排马耳他岛未来的陆军、海军、行政、司法、税收、租赁和警务。他在这些信中废除了奴隶、仆役、封建制度、贵族爵位，并解除了骑士团的武装。他允许犹太人修造岛上一直禁止的犹太教堂，甚至指定每位大学教授的薪水，规定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也得讲授地理，否则不对其发放1000法郎年薪。“我们现在拥有欧洲最坚挺的土地，”他对督政府自夸道，“想赶走我们可不容易。”[21] 他留下政治盟友米歇尔·勒尼奥·德·圣-

让·丹热利管理马耳他岛。大革命时期，丹热利是《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的编辑，他也当过法国罗什福尔港（Rochefort）的海军宪兵。

在从马耳他岛去埃及的路上，拿破仑下达总指示，指明军队上岸后马上要做的事：查封公共财产以及征税员的住宅与官邸；抓捕所有马穆鲁克，没收其马匹和骆驼；解除一切城乡武装。他指示道："入民宅盗窃马或骆驼的任何士兵都将受罚。"[22] 拿破仑尤其注意避免圣战。"不许顶撞他们，"他规定士兵应如何与穆斯林相处，"就像我们对待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对待穆斯林，你们要像尊重拉比和主教那样尊重他们的穆夫提（muftis）和伊玛目（imams）……罗马兵团保护所有宗教……这儿的人对妻子的态度和我们的不同，但不管在哪个国家，强奸犯都罪大恶极。"[23] 他接着补充道，法军要去的第一座城市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的，这一点对士兵的意义不及对他自己的。

7月1日（周日），舰队抵达亚历山大港边。晚上11点，拿破仑在8英里外的马拉布特（Marabut）登陆。次日上午，他力克亚历山大。梅努的部队轻松地翻过该城城墙。"我们先进攻（亚历山大的）一处没有防御工事的地方，"军团参谋上校皮埃尔·布瓦耶（Pierre Boyer）致信留在法国的好友基尔迈纳将军，"500名土耳其新军士兵（Janissaries，马穆鲁克精兵）防守那儿，他们几乎都不会用滑膛枪瞄准……我军折损150人，如果我们只传令该城（投降），也许就能避免损失，尽管如此，但军中认为开局时有必要震慑敌军。"[24] 拿破仑把死者葬在花岗岩雕成的庞培柱（Pompey's Pillar）下，在柱面上镌刻其姓名。[25]

拿破仑在亚历山大待了一周。他监督全军下船，收缴当地人的武器，仅伊玛目、穆夫提和谢赫（sheikhs）除外；他联系身在埃及的法国商人，占领附近的罗塞塔，设立一座传染病医院（lazaretto）；他致信开罗帕夏，表明自己敌视马穆鲁克，并告诉对方，"你知道法国是苏丹

在欧洲的唯一盟友”；他还用法军的印刷机印制宣言。“回历一千二百一十三年元月”的宣言提到马穆鲁克时称：

> 惩治他们的时刻已经来临。这帮从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买来的下贱奴隶在世上最美的土地上当了太久暴君，但是万物之父真主下旨，要他们的帝国灰飞烟灭！……埃及人民！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恢复你们的权利，是为了惩罚篡位者。我崇敬……真主，也尊重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和《古兰经》！……教皇煽动人们同穆斯林开战，我们不是打垮了他吗？马耳他骑士团那帮蠢货以为对抗穆斯林是神意，我们不是消灭了他们吗？[26]

只要能达成目的、赢得民心，拿破仑不怕援引神意，哪怕他看上去支持穆斯林对抗教皇。他惯有的夸张语句被精心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他很可能提到了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与苏丹苏莱曼大帝缔结的法土同盟，慷慨激昂地问：“难道这几个世纪来，我们不是至高阁下（Grand Signor）（愿真主允他遂愿！）的朋友和他敌人的敌人吗？”他从阅读中获益良多，这份宣言也模仿了《古兰经》的韵律与风格。

拿破仑把舰队留在阿布吉尔湾，命令布吕埃斯停泊在足以防御袭击的近岸海域。7月7日傍晚5点，他向开罗出发，在行军途中度过了整个月夜。这是近代西方军队首次穿越沙漠。通往开罗的路长150英里，次日上午8点时，法军抵达路上第一站达曼胡尔镇（Damanhour）。之后拿破仑的部队就得白日进军了。士兵们讨厌白天赶路，因为天气酷热、焦渴磨人、蚊蝇滋扰、蛇蝎出没、沙暴狂舞，不怀好意的马穆鲁克和贝都因阿拉伯人（Bedouin Arabs）也一直在旁骑行，准备杀死掉队者。一路上，很多水井和蓄水池要么被人下毒，要么塞满了石头。贝尔蒂埃回忆道，行军途中水和金子卖到一个价。沙眼（又叫颗粒性结膜炎或“埃及”眼炎）问题尤其棘手，灼人阳光会使内眼睑糙化，最终导致至少200人失明。[27] 年轻的炮兵参谋中尉让-皮埃尔·多格罗（Jean-Pierre Doguereau）终生难忘在柔软的沙地中拖曳加农炮多么吃力，那里的沙子可以一直淹到大炮车轴。“好吧，将军，你就这样带我们去印度？”一

名士兵冲拿破仑喊道。他仅仅回答道：“不，我不会带你这种兵去！”[28]

沙漠严重打击了士气。“军团初到埃及时的厌恶、不满、忧郁和绝望难以言表。”那个年代的历史学家安托万-樊尚·阿尔诺（Antoine-Vincent Arnault）写道。拿破仑甚至看见两个龙骑兵冲出队伍，投尼罗河自尽。[29] 在埃及战局中升为上校的优秀工程师亨利·贝特朗（Henri Bertrand）上尉看到，就连缪拉、拉纳等出色的将军都“把他们带花边的帽子扔进沙里，再狠狠踩几脚”。[30] 士兵从亚历山大到开罗一共走了十七天，他们的主要牢骚是路上没面包吃，也“没口酒喝”，而且正如布瓦耶对基尔迈纳所言，“我们沦落到吃甜瓜、葫芦、禽肉、水牛肉，喝尼罗河水”。[31]

拿破仑在尼罗河边的舒卜拉希特（Chobrakhyt）扎营，该地又叫谢卜雷西（Chebreis）。7月13日上午8点，马穆鲁克进攻法军营地。穆拉德（Murad）贝伊率领约4000人进攻，此人是切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也译作切尔克斯人），身材高大，脸挂伤疤，多年来，他与易卜拉欣（Ibrahim）贝伊联手统治埃及。拿破仑以营为单位围绕骑兵与辎重结成方阵，而马穆鲁克只是骑马绕法军打转。他们身着多彩丽装，装备中世纪武器，骑跨良马，显得非常华贵，但布瓦耶不喜欢马穆鲁克的方式，因为“他们四下散开围着我们并且乱转，活像一群牛。他们有时纵马疾驰，有时又十人、五十人、百人不等一起迈步缓行。过了一会儿，马穆鲁克多次试图冲破我们的方阵，他们的作战方式既荒唐可笑又古怪离奇。”[32] 拿破仑的副官苏乌科夫斯基和布瓦耶用了同一个词：“对训练有素的军队来说，这仅仅是荒唐可笑的。”[33] 马穆鲁克配有标枪、斧头（他们有时掷斧）、弯刀、弓箭和老式火枪，他们不敌受过训练的滑膛枪射击。穆拉德折损了近300人，骑马逃走。这次遭遇战对拿破仑有利，他趁机实践了某种战术，后来充分应用它。他告诉督政府，“法军习惯猛冲，相对而言，这种新型战斗需要很大的耐心”，它依赖坚定的防御。[34] 舒卜拉希特之战后，马穆鲁克依然狂妄不可一

世。“让法国佬来吧，”某贝伊（可能就是穆拉德）说，“我们会在马下把他们剁成肉泥。”[35]（另一个版本则是：“我会从他们中间骑过，像摘西瓜一样收人头。”[36]）

法军继续向开罗前进。7月19日在瓦尔丹（Wardan），朱诺肯定了拿破仑可能已经产生的疑心——约瑟芬一直和伊波利特·夏尔偷情。（约瑟夫·波拿巴早知道了，但兄弟俩焦虑地和她面谈时，他似乎没告诉弟弟此事。）朱诺举出一封信为证，我们不知寄信人是谁，而且法军登陆后还没收过信。他又补充道，拿破仑的绿帽子是巴黎的谈资。[37]尚不清楚为何他要在这个特殊场合摊牌，夏尔曾捉弄他，把他的剑粘在鞘里，但那是数月之前的事了。

“真相大白后，我心如刀割，”六天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在这世上只有你了。你的友谊对我弥足珍贵，只要失去它，只要我见你背叛我，我就会变成反人类者……我只能用单单一颗心盛着对同一人的这些感情，着实可悲。你能理解！”[38]此信令人想起克利松给欧仁妮的绝笔片段，它寄往法国时被皇家海军截获。英国发表了信中部分内容，但公开的段落不足以指明拿破仑在暗示什么。[39]

布列纳称，拿破仑归国后想离婚。他又致信约瑟夫：“我回来后，请你想办法在巴黎附近或勃艮第给我找个乡间住宅，我要在那把自己关一个冬天。我太烦人性了！伟大害了我，我需要孤身独处。我的感情耗尽了。”[40]拿破仑致约瑟芬的现存信件没有一封出自埃及战场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时的信遗失或损坏了，但解释成他压根没写明显更合理。下一封致她的现存信件所署日期已是1800年5月11日，彼时他更平静地称呼她为“我的好友”（ma bonne amie）。[41]

英国政府把在1798～1800年截获的信编成年鉴并出版，拿破仑感到很尴尬，这可以理解。编者们笑称他的军团“悲惨沮丧”，并再版很多人的信件以强调这一点，这些人中有拿破仑自己、路易·波拿巴、塔利

安、布列纳、德热内特、梅努、布瓦耶、老仲马、布吕埃斯和拉萨尔。（拉萨尔也许是军中最骁勇的骠骑兵，他写信给母亲诉苦，说自己脱发了，“因为我根本没有发粉和润发剂”。[42]）他们给友人、家人和情妇写信时都说实话，而且除了拿破仑，所有人都想尽快离开埃及，不少人还称该地为“鬼地方”。再版书信集收录了拿破仑向约瑟夫抱怨约瑟芬奢侈的信，尽管这几乎算不上国家机密。它也载有朱诺揭穿丑闻后欧仁写给约瑟芬的信，“他希望亲爱的母亲不像说的那么邪恶！”尼罗河小型舰队指挥官、海军师级将军让-巴蒂斯特·佩雷（Jean-Baptiste Perrée）致信一位友人：“贝伊给我们留了些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漂亮妞儿，我们让她们充公满足国家需要。”[43]

7月21日，穆拉德贝伊再度袭来，这回他率马穆鲁克6000人和阿拉伯非正规军54000人（大部分骑马）进攻尼罗河左岸的安巴莱镇。[44]20世纪前，吉萨（Giza）的胡夫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 of Khufu）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该地距战场近9英里，但仍清晰可辨，所以战前拿破仑发布的当日公告提到了它：“士兵们！你们到这国家来，是为了从野蛮中拯救居民，是为了把文明传到东方，是为了让世上的这片美丽土地摆脱英国统治。四十个世纪正从金字塔顶凝视你们。”[45][46]拿破仑后来常说：“终其一生，在所有给他留下印象的东西中，埃及金字塔和巨人弗里翁（Frion，法国个子最高的人）的身材最令他震撼。”[47]拿破仑提到了英国，但该国既无意干涉埃及事务，也完全不想从埃及牟利。此言纯属夸张，但它大概能得军心。

拿破仑让2万名士兵以师为单位排成五个方阵，并在每个方阵角上安置火炮，辎重、骑兵和学者则待在方阵中间。法军已在西瓜田解了渴，现在蓄势待发。他们知道，只要把刺刀指向马穆鲁克的坐骑的头部，照一位军官的话说，“战马就会用后腿站立，甩掉骑师”。[48]马穆鲁克最先进攻德塞师和雷尼耶师，布瓦耶称，两师“沉着应战，等敌军距自己仅剩十步时才猛烈开火……马穆鲁克接着攻击邦的师，该师也以

同样的方式对敌。简言之，他们白费几番功夫后匆匆逃走”。[49] 不出两小时，金字塔之战就结束了。多马丹的副官让-皮埃尔·多格罗撰写了军旅日记，他回忆道，很多马穆鲁克“跳进尼罗河，我们冲水上漂着的数千颗脑袋开火许久，并缴获他们所有的加农炮。敌军损失惨重”。[50]

法军折损了300人，其伤亡大都系方阵间友军误伤，而非马穆鲁克所致。马穆鲁克的20门大炮、400头骆驼以及全部装备和辎重被缴获。他们的传统是携带一生积蓄上阵，所以单单一具尸体就能让士兵发财。金字塔会战后，胜利者法军算金币时都用“一帽子”做单位。贝尔蒂埃向战争部报称，“我们的勇士所受苦难得到充足的补偿”，《箴言报》刊登了这句话。埃及人给拿破仑起了绰号“克比尔苏丹”（Sultan Kebir，意为“火之王”）。穆拉德逃往上埃及，拿破仑派德塞追击。德塞在上埃及取胜数场，某次胜仗后，士兵们在尼罗河上捞尸首，好从淹死的马穆鲁克身上抢一笔。

战后次日，拿破仑进入开罗，该城有60万居民，它与巴黎一般大小，其面积在非洲显然居首。他把司令部设在伊兹贝克耶广场（Ezbekyeh Square）上的埃勒菲（Elfey）贝伊宅邸，然后立刻开始下令改革：开罗16个行政区皆成立国务会议（diwan），由当地显贵担任议员；每个国务会议推选一名代表出席大国务会议（Grand Diwan），由亲法谢赫沙尔卡维（Sharqawi）任主席。拿破仑授予国务会议一些司法权与行政权，他希望会议最终能“让埃及权贵适应议会与政府理念”。他和大国务会议开会时，氛围似乎轻松活泼。一名穆斯林历史学家记载道，他“兴高采烈，同聚集人群融洽相处，和他们说笑”。[51] 拿破仑靠直接下令完成了下列事务：建立邮政系统，引入路灯和道路清洁；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安排公共马车；创设铸币厂，规定合理税收制度，比起马穆鲁克的讹诈性税率，他减轻了埃及农民（fallaheen）的负担。此外，拿破仑废除封建体系，让国务会议成为新的权力机关，并成立一家新的法国商业公司，修建近代传染病医院。他还印刷书籍，这在埃及历

史上是第一次（这批读物涵盖三种语言）。由于督政府没法传达信息，上述改革措施没有一项出自其命令。革新完全仰赖于拿破仑的主动性。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埃及。他在锡瓦（Siwa）参拜阿蒙神庙（Temple of Amon），向当地神祇祷告。拿破仑认为此举是“卓越的政治手段”，还说“这助他征服埃及”。[52] 7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是伊斯兰国家，所以拿破仑想尽量结好伊斯兰教，不过在这方面他从来不及他称之为“傻瓜梅努”的将军。梅努迎娶埃及女子，改信伊斯兰教，还取了中间名阿卜杜拉（Abdallah）。（马尔蒙问梅努是否“打算遵循这国家的习俗”，也娶多个妻子，他表示不会。[53] ）二十年后，有人问拿破仑曾否真心归顺伊斯兰教，他笑答：“军人信仰战斗，我对此矢志不渝。其他宗教都是女人和教士的勾当。我自己的话，我到哪国就接受哪国的宗教。”[54]

拿破仑尊重伊斯兰教，他认为《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作品，也是民事与政治著作。《圣经》则只宣讲道德”。[55] 他也欣赏穆斯林，“他们在十五年内归化的伪神信徒、推翻的神像、拆毁的异教神庙比摩西和基督的教众在十五个世纪内做到的还多”。[56] [57] 拿破仑不反对一夫多妻制，他说埃及男人是“贪心的爱人”（gourmands en amour），若条件许可，他们“更想娶各具风采的女人”。[58] [59] 他讨好乌理玛（ulama，神职人员），讨论《古兰经》，摆出一副可能改信伊斯兰教的样子，还试图用法国科学折服谢赫，上述举动皆为在埃及培养合作团体，但成果喜忧参半。事实证明，不管他如何遵从伊斯兰教仪式、称呼语和惯例，塞利姆三世仍然宣布对驻埃及法军发起圣战，这意味着今后他们所受袭击都蒙神明庇佑。

从埃及回来后，拿破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差点变成穆斯林。在厄尔巴岛上，他对一名英国议员“幽默地讲述”他与伊玛目的神学讨论。他还说，自己“在开罗时多次和他们开会或严肃交谈”，终于“为法军争得不

实施割礼的豁免权和饮酒许可，条件是每次旱季后军队要做一件好事”。[60] 拿破仑说，伊玛目允许法军不行成年人的割礼（他称之为“剪掉”）后，他同意出资修造清真寺（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桩划算的买卖）。[61] 这则故事在讲述中变长，历史学家仔细分析了这类轶闻，发现它们是夸大之谈，遂断言拿破仑撒谎成瘾。但人们不都是靠渲染一则好故事的细节来强化效果吗？

当然，拿破仑在埃及建立的宣传纸媒就像意大利战局中的一样，的确堪称谎话连篇。《政论家》（*Le Publiciste* ）报道，科普特人（Copts）歌唱赞美诗，称颂“新亚历山大大帝”。[62] 军中发行的《埃及邮报》（*Courrier de l’Egypte* ）称，他“就像穆罕默德继承人一样平易近人”。[63] 某日，他攀登大金字塔，观赏斯芬克斯像（法军炮兵并未 如某则传说所言轰掉它的鼻子），然后和穆罕默德（Mohammed）等三位伊玛目交谈。当日公告重点突出他们的对话，逐字记录了每人的发言。即便是最简短的谈话摘录也证明会谈在当时无可非议。

> 波拿巴：向真主（Allah）致敬！到底是哪个哈里发（Khalifah）打开这座金字塔骚扰死者骨灰？
>
> 穆罕默德：那些人认为是信士们的长官（Amir al-Mu’minin）马哈茂德（Mahmoud）……也有人认为是著名的哈龙·拉希德（Haroun al-Raschid，9世纪的巴格达统治者），他们说他想寻宝，但只找到木乃伊。
>
> 波拿巴：恶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
> 穆罕默德（点头）：此乃智慧之谈。
>
> 波拿巴：向真主致敬！世间仅有一位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而我是他的友人之一……
>
> 苏莱曼（Suliman）：也向您致敬，无敌的将军，穆罕默德的宠儿！
>
> 波拿巴：谢谢您，穆夫提。《古兰经》启发了我的思想……我爱先知，我想敬拜他在圣城的安息地，但我首先得消灭马穆鲁克。

> 易卜拉欣（Ibrahim）：愿胜利的天使为您的道路扫清尘埃，张开翅膀庇护您……噢，耶稣最英勇的子民之一啊，真主会让毁灭天使跟随您解放埃及土地。[64]

拿破仑提到“身环主赐荣耀的盟友大苏丹”时又说了很多类似上文口吻的话，这也许会令塞利姆惊讶，因为他正在招募两支军队，打算把法军赶出埃及。拿破仑接着凭记忆引用“一夜之间穿过所有天堂”的至圣穆罕默德的名言，还说了诸如“追寻会腐烂的财宝之人、贪恋好比渣滓的金银之人乃罪人、大罪人”之类的话。[65]

拿破仑享受所有这些装模作样，伊玛目们或许也喜欢。三人中的苏莱曼称，拿破仑“宽大仁厚”地对待教皇，他则说教皇陛下不该判穆斯林永受地狱火刑。拿破仑说，读过《古兰经》后自己相信，“穆罕默德希望”埃及人与法国人一同歼灭马穆鲁克，至圣喜好“与诚实之辈打交道”，支持他们去梵天神庙（即印度），他想让法国人在埃及港口建立兵站，显然也想让埃及人“驱逐被诅咒的耶稣之子——阿尔比恩（Albion）岛民”。为此，拿破仑承诺道：“法兰克人会用友谊报答你们，直到你们升入七重天堂，坐在永远年轻贞洁的黑眸天国美女（houris）身旁。”[66]

在法军占领埃及期间，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三位时代见证人是历史学家阿布德·拉赫曼·贾巴尔提（Abd al-Rahman al-Jabartī）、哈桑·阿塔尔（Hasan al-Attar）和尼库拉·图尔克（Niqula Turk）。贾巴尔提认为侵略军是真主对忽视伊斯兰教义的埃及所降之惩罚。他把法军看作新十字军，但毫不讳言自己钦佩法军的武器、军事战术、医疗进展、科研成果以及他们对埃及历史、地理、文化的兴趣。贾巴尔提喜欢和法国学者来往。他佩服拿破仑不讲排场，也欣赏其去苏伊士（Suez）时不带厨师与女眷，只带工程师与穆斯林商人。然而，贾巴尔提仍然觉得拿破仑是贪得无厌、不讲信用的野蛮无神论者，他欣喜地得知苏丹宣布要对异教徒发动圣战。[67]

大革命的平等信条和《古兰经》中的很多内容冲突，但贾巴尔提赞赏法国人修工程时善待当地工匠，他也兴致勃勃地模仿他们的化学与电学试验。他对法军士兵在露天市场砍价失败之事不以为意，认为他们想借此赢得民心。还有一件事令贾巴尔提生厌：法国异教徒（dhimmis）违背伊斯兰教律法，允许“最低贱的科普特人、叙利亚人、东正教教徒和犹太人”骑马佩剑。[68]

贾巴尔提的朋友哈桑·阿塔尔正好相反，他非常害怕被当作通敌者，所以拒绝学者的邀请，不肯参观他们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尼库拉·图尔克说，拿破仑“是个聪明幸运的人，他瘦小苍白，右臂比左臂长”。[69]（没有证据表明图尔克正确记载了拿破仑手臂的相对长度。）图尔克补充道，很多穆斯林认为拿破仑是人们盼望的伊斯兰教救世主马赫迪（Mahdi，得道者），如果他把西方服装换成中东服饰，相信这一点的穆斯林人数又会激增。没有变装是拿破仑的惊人疏忽，他只有一次换上包头巾和肥大长裤，结果逗得部下们大笑。多年后，拿破仑对廷臣妻子说，既然此前一直信仰新教的亨利四世认为，为了统治法国自己值得改信天主教，“难道你会觉得东方帝国或许还有亚洲至尊权位不值包头巾和肥大长裤？”他补充道，大军“肯定愿意让自己变成这种笑料”。[70]

拿破仑喜欢埃及那有益于健康的气候以及肥沃郊野，但他鄙视“愚蠢、可怜、木头木脑的”的埃及人。他在开罗待了一天就无缘无故地告诉督政府，开罗居民是“世上最邪恶的人”。乡村人口大多无知，“他们宁要士兵衣服上的一粒纽扣也不要价值6法郎的一枚埃居币（écu），村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剪刀”。[71] 埃及没有水力磨坊，风车磨坊也只有一座，不用磨坊时，当地人就靠牛拉磨石碾稻谷，这令拿破仑惊讶不已。他后来说，埃及不像意大利，“没有葡萄酒，没有叉子，没有伯爵夫人来共度春宵”，所以大军讨厌埃及。[72]（拿破仑指的不是当地出产的酒。他自己从法国带了酒来，12月时，他命令马尔蒙卖掉其中的64000品脱，并写道：“小心点，只卖看上去可能要变质的酒。”[73]）

拿破仑到开罗之后命令布吕埃斯将军驶往克基拉岛（Kerkyra），海军在那儿更安全，还能威胁君士坦丁堡，但信使赶到阿布吉尔湾时舰队已经覆没。1798年8月1日，纳尔逊将军发动格外大胆的进攻，击沉了法军舰队。当晚10点，“东方号”爆炸，布吕埃斯殉职。法军的战列舰中，2艘被毁（包括“东方号”），9艘被俘，只有海军师级将军皮埃尔·德·维尔纳夫（Pierre de Villeneuve）指挥的4艘脱身（原文如此）。纳尔逊前额受伤，他在阿布吉尔花了两周时间养伤，然后驶向那不勒斯，并留下舰队严密监视埃及海岸。“就算布吕埃斯曾在这场灾难中犯错，”拿破仑后来宽容地评价他，“他的光荣牺牲也足以弥补过失。”[74]

“我深深理解你的悲痛。”拿破仑给布吕埃斯遗孀写了一封诚挚的信，“永别爱人之刻太残忍了，我们从此在世间茕茕独立，身体感受到深切痛苦的迸发。灵魂的功能变了，它只在扭曲一切的噩梦中与宇宙交心。”[75] 上个月他才知道约瑟芬偷情，我们不禁猜想，他写下这句话时正想着她。拿破仑致信督政府时更加冷静，他照常篡改了数据，称此战中法军仅有800人伤亡，“不足为虑”。事实上，法军有2000人死亡、1100人受伤（相对而言，英军有218人死亡、678人受伤）。[76]

“看来你们喜欢这个国家，”获知尼罗河口之败的次日早上，即8月15日早上，拿破仑吃早餐时对部下们说，“那太好了，因为没有舰队送我们回欧洲了。”[77] 阿布吉尔灾难不仅切断了他同法国的联系、引发失联状态暗含的所有问题，还让他面临紧迫的现金周转困难，因为估价为6000万法郎的马耳他“捐赠”随“东方号”一起沉入大海。然而，拿破仑不承认他所谓的“这次挫折”证明幸运女神已经抛弃他。“她没有丢下我们，事情远非如此，”他告诉督政府称，“整场远征中，她比以前更卖力地为我们效劳。”[78] 他甚至对克莱贝尔说，灾难也许有利，因为英国人迫使他考虑进军印度，“兴许他们会逼我们干出超越计划的伟绩”。[79]

拿破仑一边尽力赢取当地民心，一边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反抗。8

月1日，他给贝尔蒂埃写了8封信，其中一封坚称应在反叛的达曼胡尔镇杀鸡儆猴，包括将五个最具影响力的本地居民斩首等，而且五人中至少得有一位律师。但是，他一般用鼓励手段来调和严厉措施。当年，开罗、罗塞塔（Rosetta）[80] 等地的伊玛目借口资金匮乏、政局不稳，不想庆祝至圣诞辰，但正如德农所说的，其真实目的是向信徒暗示，法国人“反对他们宗教的最重要圣礼之一”。拿破仑得知此事后坚持负担一切费用，尽管他手头紧。[81] 8月20日，三日庆典揭幕，节庆期间，柱悬彩灯，队朝寺院，乐音飘飘，诗声琅琅，熊猴表演助兴，魔术巧隐活蛇，彩绘麦地那（Madīnah）至圣墓妆点圣礼。一些男舞者表演淫秽舞蹈，就连前色情小说家德农看到后也惊呆了。至圣诞辰当天，法军鸣炮致敬，某个团的乐队加入人潮，军官们则参见赛义德·哈利勒·巴克里（Sayyid Khalil al-Bakri）阿訇，拿破仑宣称他是穆罕默德最尊贵的子民。百名阿訇举办盛筵，席上，他们允许法军饮酒，并宣布拿破仑是至圣的女婿，为他冠名“阿里-波拿巴”（Ali-Bonaparte）。他和埃及人互相迎合，正如一名法军军官回忆道：“士兵露出礼貌的表情，回到营地后，他们就嘲笑这出喜剧了。”[82]

庆典最后一日，拿破仑创立了埃及学院，他任命蒙日为院长，自任副院长。学院总部位于开罗郊区，其地址原是卡西姆（Qassim）贝伊的宫殿。这座宫殿足以安置学院的图书馆、实验室、九个车间、古董藏品乃至野生动物园。举办数学研讨会的厅堂本是后宫。首席气球驾驶员尼古拉·孔泰（Nicolas Conté）主管车间。除了风车磨坊零件、时钟、印刷机，学院车间还制造其他很多产品。德塞征服上埃及后，各种石头和珍宝被送至开罗、罗塞塔和亚历山大，只要能运载这些东西的船只到来，它们就会被送往卢浮宫。

埃及学院分为数学院、物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艺术院四个院，每五天开一次会。开幕式上，拿破仑建议学院选择研讨课题时应考虑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改善军队的烘焙技术、用他物取代啤酒花酿酒、把尼

罗河水净化成饮用水、判断开罗更适合水力磨坊还是风车磨坊、分析在埃及生产火药的可能性、考察埃及人的法律与教育现状。学者们有自己的报纸《埃及周报》（*La Décade Égyptienne* ）[83]，拿破仑也希望他们教埃及人了解独轮车和手锯的益处。然而，学者们的活动与思考并非全受商业和殖民影响。他们研究埃及的动植物、古迹、地理和海市蜃楼，这些方面的成果就很少用于实践。

拿破仑努力用启蒙科学和理性征服埃及人，甚至提议建造天文台。[84] 法国人充分利用印刷机、医疗器械、望远镜、时钟、电力、热气球等近代奇观，试图震慑埃及人，贾巴尔提爽快地承认的确“心灵大为触动”，但这些东西似乎不能促进法国人的政治事业。（贝托莱在学院展示化学实验，一名谢赫问这实验能否让他同时出现在摩洛哥和埃及，贝托莱答之以法式耸肩，谢赫遂下结论：“好吧，他根本算不上什么巫师。”[85] ）

拿破仑误以为塔列朗已去君士坦丁堡兑现承诺，在埃及学院成立之日，他给对方写信，称不久之后，埃及会运大米去土耳其，并保护通往麦加（Makkah）的朝圣路。[86] 同日，他派高级参谋官约瑟夫·博瓦松（Joseph Beauvoison）上校去圣地巴勒斯坦，试图同阿克（Acre）帕夏艾哈迈德·杰扎尔（Ahmed Jezzar）谈判（此人绰号“屠夫”，令人闻风丧胆）。杰扎尔敌视马穆鲁克，也对土耳其举起反旗。他的专长是伤人肢体、毁人容貌，但他也设计恐怖的折磨方式，比如给受害者的脚钉上马蹄铁、把活着的基督徒砌进墙里、先剥光50名腐败官员的衣服再砍死他们。[87] 杰扎尔杀了7个妻子，但他爱好赠送来访者他自己剪的纸花。既然易卜拉欣贝伊被迫从埃及逃往加沙（Gaza），拿破仑就希望能和杰扎尔联手消灭他。杰扎尔拒绝接见博瓦松，反倒与奥斯曼和解。（杰扎尔有时会砍掉他讨厌的信使的脑袋，博瓦松是个幸运儿。）

按照拿破仑的盘算，一旦征服埃及并稳固下来，他就返回法国。9

月8日，他却致信督政府（像其他书信一样，这封信也得经地中海上的皇家海军查验）：“我恐怕不能践行10月回巴黎的承诺，但我只会耽搁几个月。此地一切顺利，这个国家已经归顺，开始适应我们。剩下的必须由时间来完成。”[88] 然而，这回他又误导了督政府，因为埃及显然没有“开始适应”法国统治。他的很多书信涉及法军为巩固驻军采取的措施，如斩首、扣押人质、焚烧村庄。[89] 然而，拿破仑满足于军团的着装与待遇，他给巴拉斯写信时提不出别的要求，仅让对方送一个剧团来军中表演。[90]

10月20日，拿破仑得知一支土军在叙利亚（Syria）集结，预备来袭。他需要前去迎敌，但当天晚上，开罗全城的光塔（minaret）响起呼声，呼吁全民反抗法国统治者。次日上午，城中大部分地区公开起义。开罗总督多米尼克·迪皮伊（Dominique Dupuy）将军在街上被人一矛刺死，苏乌科夫斯基与拿破仑的15名私人警卫也遇难，他们的尸体被丢去喂了狗。[91] （共有8名副官随拿破仑去埃及，其中4人被杀、2人受重伤，这其中，欧仁在围攻阿克时负重伤。）埃及人弄沉尼罗河上的不少船只。拿破仑后来对督政府声称有53名法国人遇害，但死亡总数约为300人。[92] 反抗者占据了开罗最大寺院之一贾马-爱资哈尔（Gama-el-Azhar）大清真寺，把它当总部。有人传播谣言，说死去的迪皮伊其实是拿破仑本人，此事就像乌理玛（宗教学者）一样激化了起义。于是乎（正如布列纳回忆道），“波拿巴立刻上马，他只带30名向导，前往所有受威胁的地方，恢复我方信心，并且镇定自若地采取防御措施”。[93]

开罗城寨墙厚10英尺，高高在上掌控全城，守住这里是拿破仑最重要的目标。城寨安全后，多马丹随即居高临下，用8磅炮轰击敌军要塞。炮轰长达三十六小时以上，他毫不犹豫地把15发加农炮炮弹射入大清真寺内，之后步兵猛攻寺院，损坏了它。2500多名反叛者死亡，更多人后来在城寨中被处死。多年后，皮埃尔-纳西斯·介朗（Pierre-Narcisse Guérin）描绘拿破仑宽恕起义者，而他在这之后过了很久才原谅他们。

[94] 当时，他下令把抓到的所有武装反叛者斩首，并抛尸入尼罗河，尸体随河漂流，恐吓其他埃及人。他们的脑袋被装进口袋里，由骡子驮去开罗中心的伊兹贝克耶广场，那儿的头颅堆积成山。[95] “我没法描述这种恐惧，”一位目击者回忆道，“但必须承认，很长一段时间中它保障了安宁。”[96] 10月27日，拿破仑致信雷尼耶：“我们每晚都要砍30个脑袋。”拉瓦莱特称，埃及警长“出门必带绞吏。实施最轻微的违法行为就要被罚打脚掌”。这种手段被称作脚掌笞刑（bastinado），因为脚底有大量神经末梢、小骨头和肌腱，这种刑罚十分痛苦，就连女性也不能免刑。[97] 残酷的措施确保普通开罗人不像忠诚信徒一样成群地反抗法军，否则他们可没法对抗60万人。起义结束后，11月11日，拿破仑随即规定讯问时禁用脚掌笞刑。“殴打涉嫌掌握重要秘密的人这一野蛮传统必须废止，”他对贝尔蒂埃下令道，“折磨毫无价值。可怜的家伙们想到什么审讯者爱听的话就说什么。”[98]

11月30日，开罗已恢复正常，足以让拿破仑开放蒂沃利（Tivoli）休闲庭园了。园内一位“美艳动人、活泼爽朗的妙龄女子”吸引了他的目光，她就是第22猎骑兵团中尉让-诺埃尔·富雷斯（Jean-Noël Fourès）的20岁妻子波利娜·富雷斯（Pauline Fourès）。[99] 当时人士称，她有美丽的圆脸与金色长发，若此言不虚，则富雷斯中尉带妻子参战之举的确愚蠢。距拿破仑发现约瑟芬不忠已有六个月，他初次看到波利娜没过几天，两人就开始缠绵。他们的风流韵事有一层喜剧色彩。12月28日，拿破仑派富雷斯中尉携他所说的重要急件去巴黎，往返本需三个月，结果就在次日，皇家海军巡航舰“狮子号”（Lion）拦下了他乘坐的船。当时间或有放过军事小角色的惯例，所以英军没有关押富雷斯，反而送他回亚历山大。于是富雷斯中尉比预期返程日提早十周到达开罗，然后发现波利娜已经住进拿破仑的埃勒菲贝伊宫，她还得到了绰号“克娄巴特拉”（Cleopatra）。[100]

有种说法称，富雷斯随后与波利娜争吵，往她裙子上泼了一瓶水。

但另一种说法称，他用马鞭打得她头破血流。[101] 不管真相为何，两人离婚了。于是，拿破仑驻开罗时期，波利娜成了其正式的情妇（maîtresse-en-titre）。他设宴时，她在席上尽女主人之谊，两人还共乘马车驶过城市与郊区。（欧仁深感苦恼，拿破仑允许他不在这些场合出勤。）外遇分散了拿破仑绿帽子上集中的非议，对当时的法军将领来说，戴绿帽是个比找外遇严重得多的话柄。拿破仑离开埃及时把波利娜交给朱诺，但后者在决斗中负伤，不能回巴黎，于是又把她交给克莱贝尔。波利娜·富雷斯后来靠巴西木材生意赚了一笔钱，她穿男人的衣服，还抽烟斗。再后来，她带着宠物鹦鹉与猴子返回巴黎，一直活到了90岁。[102]

11月19日，拿破仑威胁杰扎尔："如果你继续庇护埃及边境的易卜拉欣贝伊，我就视你为敌，进军阿克。"这预示他决心发起战役。[103] 当代历史学家称这场战役为叙利亚战役，尽管拿破仑从没到达今叙利亚的地界，而一直待在今加沙、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12月上旬，杰扎尔回敬拿破仑，宣称要将埃及从法军手中解放出来，他侵入加沙、拉姆莱（Ramleh）[104] 和雅法三省，在阿里什（El-Arish）建立阵地，此地距拿破仑在西奈沙漠（the Sinai desert）边沿的埃及要塞卡提耶（Katieh）仅22英里。

12月下旬，拿破仑访问苏伊士，他既视察当地要塞，也追踪拉美西斯二世的运河。这条运河沟通尼罗河和红海，他沿河走了40英里，直到它消失于荒漠沙地。（他几乎不会料到，1869年，自己的亲侄子会继承苏伊士运河开凿事业。）拿破仑还宣称，"摩西和犹太民族的宇宙论源自上古，出于对他们的敬意"，他想去西奈山（Mount Sinai）。[105] 除了向导们，随行人员有贝尔蒂埃、卡法雷利、多马丹、海军师级将军奥诺雷·冈托姆（Honoré Ganteaume，他从尼罗河会战中生还，拿破仑说这是此战唯一的怜悯）、军务组织长官让-皮埃尔·多尔（Jean-Pierre Daure）、蒙日以及另外四名学者。[106] "我们走得快，"多格罗回忆

道，“司令疾驰出开罗，我们就驱马全速前进，累得它们气喘吁吁。”[107]

12月28日，拿破仑趁退潮跨越红海的一部分，[108] 但就像在任何战场上死里逃生一样，正是在这次从苏伊士去西奈的观光途中（不过他从没到达西奈山本身），他似乎同死神擦肩而过。“我们轻松到达对岸。”多格罗说。拿破仑一行参观了摩西泉（Spring of Moses）等古迹，中午时在纳拜井用餐饮马，但夜幕降临后，他们迷路了，在低洼的海岸湿地徘徊，这时潮水上涨了。

> 我们的坐骑很快有半个身子陷进泥沼，它们挣扎着，但脱身太难……我们丢下很多被困住的马，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另一片海湾……当时是晚上9点，潮水已经涨了3英尺。情况糟透了，这时有人说发现浅滩。波拿巴将军是最先过去的人之一，向导们四处分散，引导剩下的人……我们太高兴了，庆幸自己没落得法老军队的下场。[109]

---

[1] Murphy，Orville T.，‘Napole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How Much Did He Owe to the Past？’*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65，Volney，Constantin de，*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87，p.235

[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1908 p.1118，August 16，1797

[3] eds.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312

[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390 p.80，April 13，1798

[5] Abulafia，*The Great Sea* p.516

[6] 《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Alexandre Dumas）之父。

[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85，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1，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p.56

[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69

[9]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12

[1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15 no.12924 p.537

[1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4 no.2570 p.128

[12]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321

[13]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39

[1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415 p.94，April 19，1798

[15] eds. Tortel，Christian and Carlier，Patricia，*Bonaparte de Toulon au Caire* 1996，p.28

[1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391 p.81，April 13，1798

[17] Knight，Roger，*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6，p.284

[1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pp.ⅹⅴ-ⅹⅵ

[1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37

[2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519 p.142，June 13，1798，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84，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10，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76

[2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547，p.155，June 17，1798

[22]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p.239-40

[2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12-13

[24]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2

[25] 这很难说是理想图腾，因为公元前48年庞培刚踏上埃及海岸就遇害。布瓦耶提及的150人中，只有40人死亡，剩下的人负伤。

[2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10，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88，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p.244-6，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

p.3

[2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174 p.820，January 28，1799

[28]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46，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190

[29] Arnault，A.V.，*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Boston）1833，Ⅰ p.86

[30] Bodleian MS Curzon e1. p.15

[31]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4

[32]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3

[33] 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Ⅱ ch.5

[3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625 p.193，July 24，1798

[35]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8

[36]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248

[37]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Ⅰ p.66，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34

[38] ed. Howard，J.E.，*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Ⅰ 1961，Ⅰ pp.258-9

[39] BL Add. MSS 23003

[4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635，p.199，July 25，1798

[4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277 p.230，May 11，1800

[42]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Ⅱ p.111

[43]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21

[44] Gichon，Mordechai，'East Meets West：The Clash Between French and Oriental Societ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 in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106 n.12

[45] 事实上，从胡夫大金字塔竣工到1798年历经四十四个世纪。

[46] ed. Dufourcq，Albert，*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svernois* 1898，pp.121-2

[47]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70

[48] Duffy，Christopher，*Austerlitz* 1977，p.137

[49]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133

[50]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p.15-16，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78

[51] ed. Bierman，Irene A.，*Napoleon in Egypt* 2003，p.85

[5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09

[53] Solé，Robert，*La conquête de l'Égypte* 2006，pp.108-9

[54]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74

[55]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21

[56] 拿破仑指的是630年穆斯林征服麦加后破除异教。

[5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9 p.570

[58] 拿破仑曾建议一位法国主教允许法属西印度群岛实行一夫多妻制，"但是阁下他不听"。Kerry ed.，*The First Napoleon*，p.99.

[5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9

[60]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8

[61]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89

[62]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12

[63]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08

[6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6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67]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p.14

[68] ed. Bierman，Irene A.，*Napoleon in Egypt* 2003，p.85

[69] ed. Ainé，Desgranges，*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s français en Égypte* 1839，pp.13-14

[7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221-5

[7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 2625 p.193，July 24，1798

[7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64

[7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890 p.706，December 9，1798，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676 p.216，July 30，1798

[7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70 p.299，August 19，1798

[7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70 p.299，August 19，1798

[7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57 p.289，August 18，1798，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40

[7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70 p.299，August 19，1798

[78] Anon.，*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Ⅰ p.ⅹⅵ，Alison，Sir Archibald，*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vol.1 1843，Ⅰ p.580

[7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43，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2832 p.277

[80] 今拉希德（Rashīd）。——译者注

[81] Cole，Juan，*Napoleon's Egypt* （New York）2007，p.123

[82] Cole，Juan，*Napoleon's Egypt* （New York）2007，p.126

[83] 革命历的周，详见第四章。——译者注

[84] Byrd，Melanie，'The Napoleonic Institute of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4

[85]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16/7/2006 p.27

[86] 当天，拿破仑也给贝尔蒂埃写了12封信，其中一封命令对方让功勋卓著的第75战列步兵半旅中士拉特雷耶（Latreille）享受两个月的双倍军饷。CG2 no.2798，p.265. 从1798年7月登陆埃及到离开，拿破仑在这里待了十三个月，写了数千封平信和急件，现存2196封。

[87] 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p.315，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80 p.874

[8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112 p.399，September 8，1798

[89] 在亚洲，焚烧村庄是控制潜在敌对区的标准途径。正如一位研究威灵顿的亚洲战史的历史学家所说，"重整秩序"是驻印度英军的家常便饭，他们"经常一把火烧光村子或偷牲口"。Davies，*Wellington's Wars* ，p.25.

[9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424 p.523，October 11，1798，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148 p.414，September 12，1798

[9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54 p.574，October 27，1798

[9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57 p.576，October 27，1798

[9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0

[94] Prat，Louis-Antoine and Tonkovich，Jennifer，*David*，*Delacroix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2011，p.44

[9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29，p.564，October 23，1798

[96]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1

[97]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50，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557 p.576，October 27，1798

[9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656，p.613，November 11，1798

[9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38

[100]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p.260-64

[101]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23，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p.260-64

[102]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427

[10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3740 p.647，November 18，1798

[104] 今拉姆拉（Ramla）。——译者注

[10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39

[106] Derogy，Jacques and Carmel，Hesi，*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1992，p.99

[10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35

[108] 即便在今天，红海东北岸仍有大量盐水湿地，它们之间有一些干硬地块。这一带的涨潮势头凶猛。当人们穿过看起来像普通海滩的一段地面时，潮水可能突然上涌，迅速淹没它。

[109]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37

第八章 阿克

一国边境或是大河，或是群山，或是荒漠。三地皆难行军，而最难征服者当属荒漠。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一条

恺撒做出十分残忍的决策，砍掉每位士兵的一只手。内战中，他宽待部下，但无情冷待高卢人，常对其有残暴之举。

——拿破仑，《恺撒战史》

1799年1月，萨姆胡德（Samhoud）之战爆发，德塞击溃穆拉德贝伊，并俘获对方在尼罗河上的小型舰队，上埃及的威胁就此平息。拿破仑的统治几乎扩张至埃及全境，他可以着手进攻杰扎尔了。从开罗出发那天，他告诉督政府，自己打算阻止皇家海军使用阿克、海法（Haifa）、雅法等黎凡特（Levant）港口，并煽动黎巴嫩人（Lebanese）和叙利亚基督徒反抗土耳其人，然后再决定是去君士坦丁堡还是印度。[1]“这次远征，我们要战胜很多敌人，”他写道，“沙漠、当地人、阿拉伯人、马穆鲁克、俄国人、土耳其人、英格兰人。”[2]此信提到了俄国人，这不仅仅是拿破仑式夸张。沙皇帕维尔一世（Tsar Pavel I，即保罗一世）憎恨法国大革命代表的一切，自认马耳他骑士团保护人（事实上，沙皇安排自己当选骑士团大头领，接替冯·洪佩施的职位。）1798年平安夜，帕维尔一世同英国以及俄国的老敌人土耳其联手，计划派一支俄军深入西欧。但此时此刻，拿破仑并未暗示这一点。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此言表明拿破仑计划打到比阿克更远的地方，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他在埃及留下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只带了13000人。就算阿克失守，就算德鲁兹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全部加入法军，但军队仍受后勤体系与兵员素质制约，哪怕是拿破仑这样雄心勃勃、足智多谋的将军也无望入侵土耳其或印度。他后来声称，若有印度

的马拉塔（Mahratta）王侯相助，他能把英军逐出印度：他将向印度河（the Indus）进军，日行15英里穿越沙漠，途中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停留较长时间；行军时，单峰驼驮载病人、弹药和粮草，士兵每天伙食则为1磅大米、1磅面粉和1磅咖啡。然而，阿克和德里（Delhi）相隔2500多英里，军队得穿过今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全境以及印度北境部分地区，这比他从巴黎到莫斯科的征程长得多，后勤根本无法保障。这些规划只能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史诱发的黄粱美梦。

苏丹计划从东边陆地侵入埃及，杰扎尔将支援他。1799年2月，拿破仑的眼下目标是先发制人，事成之后，他得返回埃及应付等候多时的夏季攻势，届时土耳其会水陆并举进攻亚历山大，好在这两股攻势未经协调。拿破仑使用了其老计谋中央位置战略，并且把规模放大了很多。1799年1月25日时，他的确致信英国在印度的最大敌人蒂普苏丹，宣称即将“率一支兵力雄厚、所向披靡的军队开赴红海，摘除您所负英国铁轭的愿望鼓舞着它”。[3] 英军巡洋舰[4] 截获了此信。当年5月时，出类拔萃的英军中校[5] 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爵士[6] 率兵攻克迈索尔首都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7]，蒂普身亡。拿破仑知道他的信会落入敌手，所以其目的很可能只是传播假情报。

德塞待在上埃及，马尔蒙留守亚历山大，夏尔·迪加（Charles Dugua）将军坐镇开罗。拿破仑入侵巴勒斯坦时，雷尼耶打头阵，克莱贝尔、邦和拉纳各率一个步兵师，缪拉指挥骑兵。法军唱着鼓舞人心的1794年革命歌曲《出征曲》（*Le Chant du Départ*）走出开罗，这首歌后来成了波拿巴派圣歌。在军事会议上，只有约瑟夫·拉格朗日（Joseph Lagrange）将军公开反对出击。他指出，阿克在300英里之外，行军路上要经过酷热的沙漠和不少严密设防的城市，攻下城池后就得留分队防守，而拿破仑打算带去的兵力本来就比较少。拉格朗日提出不如在埃及俟敌来犯，从而迫使敌人穿越西奈半岛，而非在他们的地盘开战。[8] 然

而，敌军准备在6月水陆并行进犯埃及北部，拿破仑觉得时间宝贵，经不起消耗。他需要越过沙漠击败杰扎尔，并赶在夏季的沙漠变得不可通行之前归来。

1799年2月10日（周日），拿破仑从开罗动身，13日下午3点，他到达卡提耶。出发前夕，他给督政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一句密码文，破译后如下："如果3月时……法国与诸王开战，我就回国。"[9] 3月12日，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法国最后要对付俄国、英国、奥地利、土耳其、葡萄牙、那不勒斯的君主以及教皇。

为了穿过当时尚无地图的西奈半岛，拿破仑必须解决少粮、缺水、高温的问题，还得对付敌人贝都因部落。他组织单峰驼队，让士兵轮流练习快速射击，并配备插桩（pieux，一种曲柱，用于迅速搭建栅栏），直到一战时期，驻殖民地法军一直沿袭上述做法。[10] "我们已经在沙漠里走了70里格（league，相当于170多英里），累得筋疲力尽，"旅途中，他致信德塞，"我们喝盐水，有时完全没水喝。我们就吃狗、驴和骆驼。"[11] 后来他们还吃猴子。

5000年的历史中，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地区大约爆发了500场战斗。拿破仑避开山区和约旦河谷地通道，他选择的西部沿海路线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的行军线路反过来。拿破仑当然喜欢战役中的历史层面，他后来回忆道："经过《创世记》记载的地点时，我总会阅读书中相关的内容，惊讶地发现它们仍和摩西描述的一模一样。"[12]

阿里什要塞距开罗170英里，该地守军为土军前卫与其盟友阿拉伯人，他们共有2000人。2月17日，拿破仑与其主力已到阿里什，并修好了战壕与炮台。又渴又累的"士兵大肆抱怨"，还不公平地把整个远征归咎到学者头上，辱骂他们，但军队在发现有希望开战时就安静了。[13] 19日，炮弹在城墙上打开的缺口已能容法军进入，拿破仑遂要求阿里什投降。要塞守将易卜拉欣·尼扎姆（Ibrahim Nizam）、马格里布人

（Maghrebians）指挥官哈吉·穆罕默德（El-Hadji Mohammed）、雇佣兵（Arnautes）阿迦（Aga，军官）哈吉·卡迪尔同意献城，[14] 他们和麾下的高级阿迦以《古兰经》之名对拿破仑起誓，保证“自己和部下绝不投身杰扎尔帐下，而且今后一年内不回叙利亚”。[15] 拿破仑遂允许降军保留武器，放其回家，不过他没有对马穆鲁克履行承诺，缴了他们的械。20世纪下半叶以前，战争规则简单粗暴、大同小异，中东地区尤其如此；不过违背释俘誓言乃公认的重罪。

2月25日，拿破仑赶走加沙市的马穆鲁克，缴获了大量弹药、6门加农炮以及20万份饼干。“这里地形崎岖，生长着柠檬树与橄榄丛，样子极像朗格多克（Languedoc）郊野。”拿破仑告诉德塞，“我感觉如同身处贝济耶（Béziers）附近。”[16] 3月1日，拉姆莱的嘉布遣会修士告诉拿破仑，阿里什守军正去往10英里外的雅法，途经拉姆莱时他们说“不打算遵守投降条款，因为我们在缴他们械时先违约了”。[17] 修士们估计雅法守军有12000人，“君士坦丁堡也运去大量加农炮和弹药”。拿破仑于是在拉姆莱集结军队，然后继续向前。3月3日中午，法军开始围攻雅法。“波拿巴和其他几个人走近，离它不超一百码，”多格罗回忆雅法城墙时道，“我们回身时被发现了。敌军冲我们开火，有一发加农炮炮弹触地时离司令非常近，他落了一身土。”[18] 3月6日，守军发动突击，多格罗于是发现奥斯曼军队成分相当复杂。“有马格里布人、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库尔德人（Kurds）、安纳托利亚人（Anatolians）、尕勒莽尼阿人（Caramaniens）、大马士革人（Damascenes）、阿勒颇人（Alepese）和（塞内加尔的）塔克鲁尔（Takrour）黑人，”他写道，“他们被赶了回去。”[19]

次日黎明，拿破仑给雅法总督寄去一封礼貌的劝降信，称“如果城市陷入战火，煽动他的魔鬼就会降临全城”。总督的回应是愚蠢行为，他杀了信使，在城墙上悬其首级。拿破仑遂下令轰开城墙，下午5点，焦渴愤怒的数千法军拥入城中。“场面惨不忍睹，”一名学者写道，“枪

声四起，女人与父亲尖叫，尸骨成堆，一个女孩在母亲尸体上被凌辱，血腥味弥漫，伤者呻吟，胜者大吵着分赃。”法军“杀够了人、拿够了金子”，终于停手了，“他们脚下是一堆尸体”。[20]

拿破仑给督政府的报告承认：“整整二十四小时，我军洗劫雅法、制造所有战时恐怖事件，我从没觉得这些事如此糟糕。”[21] 他补充道，因为自己在阿里什、加沙和雅法的胜绩，“共和国军队已是巴勒斯坦之主”，但他说得太早了。雅法之战中，法军有60人死亡、150人受伤，尚不清楚敌方军民的死亡人数。[22]

法军在雅法俘虏了阿里什之战食言者，但也抓获了其他人。拿破仑残忍地对待雅法的战俘。3月9～10日，邦的师中的士兵把几千名战俘押至雅法以南1英里处的海滩，冷酷地屠杀他们。[23] “你……命令参谋军士把抓到的武装炮兵和其他土耳其人都带到水边，”拿破仑给贝尔蒂埃的命令明确写道，“枪毙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确保无人逃脱。”[24] 贝尔蒂埃则说，不管在阿里什发生了什么，他认为雅法回绝劝降时这些人就已放弃了生命，而他并不区分战死与无情谋杀。[25] 高级军需官路易-安德烈·佩吕斯（Louis-André Peyrusse）致母亲的信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 约有三千人放下武器，司令下令直接把他们带去营地。到了那里，埃及人、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就被分开。次日，所有马格里布人被押到海边，然后两个营开始冲他们射击，马格里布人无处可逃，只能跳海。逃到海里也躲不开子弹，海水瞬间被染成血红色，水面上漂着大量尸体。少数人本有机会靠礁石逃出生天，那两个营便派人坐船来解决他们。我们在海边留下一支分队。一些被残酷屠杀的人注意到了我们的背信弃义……命令建议我们不用火药，而我们也凶残到用刺刀杀人……这个事例将教会敌人不能相信法国人，三千名牺牲品的血迟早会叫我们血债血偿。[26]

他说对了。1801年5月，法军弃守尼罗河畔的阿夫特（El-Aft），没逃掉的人都被土军斩首。在场的英国人抗议暴行，土军的“回答则是几

声怒吼，‘雅法！雅法！’”。[27] 雅法屠杀的另一位目击者克雷特莱上尉看到：“我们枪决了第一队俘虏，剩下的遭骑兵冲击……他们被赶进海里，试图游到离岸几百码的礁石上……但这些不幸的可怜人被海浪吞没，最终未能获救。”[28]

当时的法国史料所载死亡人数大相径庭（土耳其没有相关材料，原因很明显），但它们给出的数字一般在2200～3500人。更严重的说法的确也有，但多出自心怀政治动机的反波拿巴主义者。[29] 雅法城破，全城沦陷，多语种的土军坚守仅剩的旅馆。欧仁承诺法军会宽待他们，但拿破仑下令处死所有人。因为在阿里什起誓者只有约2000人，他肯定处决了没参加阿里什之战的人。（佩吕斯说屠杀将教会敌人法国人不可信，他指的也许就是这一点。）个中自然有种族因素，拿破仑不会杀害欧洲战俘。

拿破仑本人声称死亡人数不足2000，并说：“他们这些魔鬼太危险了，不能再放一次。我别无选择，只能杀人。”[30] 又有一回，他承认死了3000人，对一位英国议员说：“好吧，我有权利……他们杀了我的信使，割了他的脑袋挑在长矛上……我没有足够补给养活法国人和土耳其人，其中一个必须完蛋。我没有犹豫。”[31] 以食物为由不能服人，因为他在雅法缴获了约40万份饼干和20万磅大米。然而，当时他很可能想到自己的兵力太少，没法分出一个营押送这么多战俘经西奈半岛回埃及。[32] 拿破仑对巴黎九月屠杀的看法以及他在比纳斯科、维罗纳和开罗的行为表明，若为情势所需，他觉得可采取无情措施。他特别在意确保受过训练的800名土耳其炮兵无力再战。（1795年，若他接受苏丹提供的职位，这些炮兵中会有很多人是他的学生。）拿破仑曾经相信土耳其人的誓言，但没法指望他再信一回。敌人杰扎尔现年79岁，半个多世纪来，他的极端暴行一直为人传说，当年，他将400名基督徒缝进口袋，然后把袋子丢进海里。拿破仑很可能认为自己也要像杰扎尔一样冷酷。[33]

屠杀期间，拿破仑于3月9日致信杰扎尔。他说自己严惩了违反战争规则的人，并补充道："几天后我就会向阿克进军，但我为何要让素昧平生的老人折寿呢？"[34] 信使走了运，因为杰扎尔选择忽视这一威胁。当天，拿破仑也对谢赫、乌理玛和耶路撒冷指挥官发表演讲，他说敌人将受到严酷惩罚，但接着宣称："真主宽大慈悲！……与人开战非我本意，我是穆斯林的朋友。"[35] [36]

历史上少有罪有应得（poetic justice）的例子，但这次它的确出现了——法军强暴并劫掠雅法居民后染上了他们的瘟疫。[37] 这种疾病致死率高达92%，只要身上出现它的横痃症状，就类似于被判死刑。[38] 克莱贝尔师老兵夏尔·弗朗索瓦（Charles François）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洗劫雅法后，"有士兵染上瘟疫，他们的腹股沟、腋窝和颈子很快长满横痃。不到二十四小时，病人的身体和牙齿都变成黑色。染上这种恶疾就会高烧身亡"。[39] 此疾病是鼠疫（la peste），当时，中东流行多种瘟疫，它是最严重的之一。拿破仑下令把旧雅法（Old Jaffa）海边的亚美尼亚修道院医院（今天它仍在此处）改成传染病医院。3月11日，他与德热内特探视医院。军饷官让-皮埃尔·多尔（Jean-Pierre Daure）称："他抱走躺在门口的瘟疫患者。我们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个病号的衣服上全是白沫与令人恶心的横痃脓水。"[40]

拿破仑与病人交谈，安慰人心，振奋士气。1804年，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Jean Gros）创作的不朽名画《波拿巴探访雅法传染病医院》描绘了这一场景。拿破仑后来说："身为司令官，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病人信心，让他们振作起来，而他履行职责的方式是和不同的患者谈话，并鼓励他们。他说自己也染上瘟疫，但很快康复。"[41] （最后一句话没有证据支持。）拿破仑相信鼠疫受毅力影响，多年后，他说："精神高昂、不被必死之念左右的人……大多痊愈，但心灰意冷者几乎都是恶疾牺牲品。"[42]

3月14日，拿破仑离开雅法，向阿克进军。次日，皇家海军巡航舰“忒修斯号”（Theseus）与“老虎号”（Tigre）到达阿克港边，船上有英国海军准将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爵士以及拿破仑的布列讷同窗、法国保王党人、军事工程师安托万·德·菲利波（Antoine de Phélippeaux）。除了逐退法国侵略军的渴望，英国-俄国-土耳其联盟没多少共同目的，可这一愿望已经足以让皇家海军努力阻止拿破仑拿下阿克了。1104年，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攻陷阿克，后来他在此修筑8英尺厚的城墙。几个世纪以来，阿克的城防大大削弱，但鲍德温修的城墙仍然矗立，尽管不算太高，而且城外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港口守军包括约4000名阿富汗人（Afghans）、阿尔巴尼亚人与摩尔人（Moors）以及杰扎尔的犹太裔优秀参谋长哈伊姆·法尔希（Haim Farhi，这些年来，主人割了他的鼻子，砍了他的一只耳朵，挖了他的一只眼睛），现在，史密斯准将、能干的菲利波以及200名皇家海军士兵与水手一同助他守城。他们增设斜坡工事，以某一倾角加固墙基，并建造斜土堤，以便把加农炮拉到城墙上（雅法城墙太脆弱，无法安置大炮）。部分防御工事以及史密斯布置的一些海军加农炮至今仍然可见。

3月15日，纳布卢斯的阿拉伯骑兵在卡孔（Kakoun）与法军小战，拿破仑、拉纳和克莱贝尔轻松打退进攻，仅折损40人。三天后，拿破仑就得在俯瞰海法的悬崖上惊恐地观望了。海军旅级将军皮埃尔-让·斯唐德莱（Pierre-Jean Standelet）率9艘船只运送拿破仑的所有攻城炮，这支小型舰队绕过迦密山（Mount Carmel）海角时正好落入“老虎号”与“忒修斯号”之手，6艘船被俘，另有3艘逃往土伦。于是拿破仑最重型的武器大都被送去阿克对付他自己了。事件进程也转入另一个同样明确的讯号：杰扎尔恢复老一套了，将他派去求和的信使斩首。[43]

3月19日中午，拿破仑开始围攻阿克，在300码外围着城池修工事、挖战壕。他准备先用自己的轻型炮轰城，打开缺口后即命令法军全力猛

冲，并希望仍可借此拿下城池。拿破仑司令部设在距阿克1500码的图龙山坡（Turon hillsides），此地恰是1191年狮心王理查围攻阿克时的司令部旧址，但他的部分围城战线被迫经过蚊虫肆虐的湿地，因此军中很快暴发了疟疾。法军着手挖掘战壕，并制作围城工事需要的束柴、堡篮（gabions）和导爆药卷（saucissons）。

“乍一看，这个地方守不住，”多格罗认为，“似乎很难撑过八天。我们以为，只要我们站在阿克城下，帕夏就会想起轻易失守的雅法命运多么悲惨，心生恐惧。”[44] 多格罗借事后诸葛之便总结道，此时拿破仑应该回埃及，因为杰扎尔失去了阿里什、加沙和雅法，3月18日又丢了海法，他已无法继续威胁埃及，而且拿破仑撤退前可留人驻守海法。但此次入侵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在大马士革（Damascus）集结的土军，拿破仑尚未达成目的。

接下来的九周时间里，拿破仑至少对阿克发起了9轮大攻势、3轮小攻势。与此同时，他还得派兵防备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与马穆鲁克，好在他们没有协同行动，而是一个接一个来袭。他一度紧缺弹药，只好花钱雇士兵捡拾皇家海军舰队和阿克城发射的加农炮炮弹，捡一发炮弹的报酬介于半法郎和一法郎间，视其口径而定。并非只有法军实施激励措施，土军之所以多次出击（达26次），原因之一便是他们可拿法国人的脑袋换杰扎尔的丰厚赏金。[45]（1991年，阿克战场出土了四具骷髅，其中两具的头颅被割。）3月28日，一发加农炮炮弹落入拿破仑的两名副官——欧仁与新任督政菲利普·梅兰·德·杜艾之子安托万·梅兰（Antoine Merlin）——之间，距他自己仅三步之遥。[46] 在一次炮击中，某座塔楼有些塌陷，法军随后进攻，但因为梯子太短，行动告败。法军士气于是遭受打击，这可以理解。有一次，土军出击后，法军战斗了好几个小时才击退敌人。战斗工兵开始在另一座塔楼下埋地雷，但被反雷对策挫败。

与此同时，为阻止大马士革增援，拿破仑分别派缪拉和朱诺夺取萨菲德（Safed）与拿撒勒（Nazareth）。4月8日，朱诺在卢比亚村（Loubia）附近的小战中击败土耳其突袭队，且自身未受损失。拿破仑称："这场著名战斗为法国人的冷静增光添彩。"[47] 六天后，一次重要得多的战斗爆发，事实上，整个叙利亚战役正因此战彰显意义。

塔博尔山（Mount Tabor）[48] 之战名不副实，虽然克莱贝尔曾绕行塔博尔山，但实际战场是8英里外的哈默雷山（Mount Hamoreh）。晚上，在大马士革集结的约25000名土耳其人与马穆鲁克会在泉水边给马和骆驼喂水（饮牲口耗时很久，因为一头口渴的骆驼能喝40升水）。克莱贝尔十分大胆，他想趁那时率2500人进攻兵力远超己方的敌军。然而，4月16日早上6点太阳升起来了，但克莱贝尔的部队还没出中央的杰兹里尔山谷（Vale of Jezreel），土军看清敌人全貌，从平原另一侧袭来。克莱贝尔有充足的时间让士兵结成两个大方阵，尽管很快被包围，他们仍保持队形，沿哈默雷山的平缓斜坡慢慢下山，而敌军骑兵在缓坡上能发挥的效力较少。中午时分，克莱贝尔已在高温下战斗六小时，他遭受了损失，水和弹药也不多了。然后他顺利完成危险复杂的机动，将两个方阵合为一个。

克莱贝尔先前曾警告拿破仑自己遇上大股敌军，所以后者接过邦的师，去拿撒勒支援前者。16日，拿破仑到达拿撒勒，此时克莱贝尔已经开战，于是他采取合围机动，将士兵从西边调至哈默雷山。大马士革帕夏阿卜杜拉（Abdullah）忽视了某条基本战术规则，他本该派侦察兵提防试图救援克莱贝尔的军队，就比如说这支援军。拿破仑向拿撒勒东南方行军，他能看见克莱贝尔以一敌十之地腾起烟雾与灰尘，中午左右他正好赶到土军后方的战场。拿破仑沿山脊分水岭上山，这条路完全避开了土耳其人的视线，就算他们骑马也看不见他。杰兹雷尔山谷远望平坦，但谷内有海拔30～60英尺的丘陵与天然弯道。今人若从（原样保存的）当年战场眺望峡谷，便可轻易明了为何拿破仑的部队绕行哈默雷山

时会被这些地形轮廓“掩藏”形迹、为何土军完全没料到法军会袭其后方，这是所有将军都梦想的组合，拿破仑将之发挥到极致。法军还没来得及重创敌人，奥斯曼军队就逃走了，但他们已然分崩离析，无望夺回埃及。

战后，拿破仑入住拿撒勒附近的修女院，并随人参观院中圣母玛利亚的卧室。院长指着一根破旧的黑色大理石柱，“尽可能用最庄严的语调”对他的部下说，天使加百列“前来宣告圣母荣耀神圣的归宿时”劈开了那根柱子。有些军官忍俊不禁，但正如其中一人记录的，“波拿巴将军严肃地看着我们，于是大家又变得一本正经”。[49] 拿破仑经常重游战地，次日，他再访塔博尔山之战战场后返回了阿克。整个4月下旬，他组织起更多的攻击与反击。

4月27日，最受欢迎的指挥官之一卡法雷利永别了法军将士。几天前，他的右臂中了加农炮炮弹碎片，伤口滋生坏疽，夺去他的生命。“全军的惋惜之情为卡法雷利将军殉葬，”拿破仑的当日公告写道，“军团痛失一员大勇指挥官，埃及痛失一名立法者，法兰西痛失一位优秀公民，科学界痛失一个杰出学者。”阿克会战的伤员包括迪罗克、欧仁、拉纳及四位旅级将军。5月10日，邦在城墙下负致命伤。所以说，战斗时军官待在前线，这是他们的关键职责，士兵也因此敬爱他们。有一次，阿克守军炮轰城下，贝尔蒂埃的副官中弹身亡，当时他就站在拿破仑的旁边，因为加农炮炮弹呼啸而过时的“空气颤动”，拿破仑自己也被震倒。[50] 弹药纸告罄后，某日公告要求士兵把没用过的纸都交给军需部。

5月4日晚，法军奇袭阿克未遂。三天后，拿破仑已经看见海平面上有前来驰援的土耳其海军，遂命拉纳猛攻阿克。颇有胆识的将军设法在东北塔楼插上三色旗，但他未能更进一步，然后被赶了回来。此时拿破仑已对贝尔蒂埃说，阿克不过是“一粒沙”，这表明他在考虑放弃围城。

他也确信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是个“疯子”，这是因为英国海军准将提出和他在城墙下单挑。（拿破仑回信称，史密斯不配当他的对手，“他不会来决斗，除非英国人能让马尔伯勒从坟里出来”。）[51] 史密斯还想了个主意，他伪造拿破仑给督政府的信，哀叹法军处境危险，然后又假装截获这封信。逃兵在法军中散发伪信，据说拿破仑见信后“勃然大怒，把它撕成碎片”，并禁止全军谈论它。这出军事诈术（ruse de guerre）肯定骗过了土耳其人，奥斯曼驻伦敦大使信以为真，还寄了一份副本给外交部。[52]

然而，史密斯最出色的心理战术并不复杂，这一招既不含假情报也不含误传，仅仅是给拿破仑提供信息。他打着休战旗，送来不少英国和欧洲的最新报纸，拿破仑拼凑报上信息便能明了最近打击法军的一系列灾难。早在1月，他就试着积极寻求报纸。现在他能读到下列消息了：3月，儒尔当在德意志的奥斯特拉赫（Ostrach）与施托卡赫（Stockach）战败；4月，谢雷在意大利马尼亚诺（Magnano）战败，整个意大利地区中，只剩热那亚还在法国手中。拿破仑的心血之作内高卢共和国已然灭亡，旺代又出现叛乱。如拿破仑日后解释时所说，报纸令他明白，“照法国当时的处境，不能指望它会派援军来，但没有增援就没有进展”。[53]

5月10日黎明，一个旅进攻阿克。先前进攻中战死的人正在腐烂，该旅士兵翻过战友尸身，但并未如英国宣传人员所说故意拿尸体当云梯。正如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有人进了城，但他们遭弹雨袭击，又发现城中修了新战壕，于是被迫退回缺口。”这些士兵在那儿战斗了两小时，因交叉火力而不断减员。[54] 这是最后的攻势，次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围城，返回埃及。“这个季节已经过了太久，”他告诉督政府，“我预想的目的也已达成。埃及需要我……阿克现在仅剩一堆石头，我应该涉沙返程。”[55]

阿克仅剩瓦砾当然是谎话，拿破仑致军队的宣言也一样虚伪："再过几天，你们就能在帕夏宫殿正中央抓住他，但在这个季节，不值得再花几天夺下阿克。"[56]［多年后，拿破仑重读阿克宣言，抱憾承认："这是个小骗局！"（C'est un peu charlatan！）[57]］他还告诉督政府，有人报称阿克城内每日有60人因瘟疫丧命，此言暗示不取城池也许更好，其实整个围城战期间，杰扎尔军没有任何人死于传染病。[58]然而，天气太热就没法穿越沙漠，他确实需要趁气温没那么高时回来。

事实上，拿破仑在塔博尔山之战中达成了"我预想的目的"，他攻打阿克纯粹是为了追逐梦想：经阿勒颇（Aleppo）侵入印度，在亚洲建立疆域延至恒河的法兰西帝国，抑或占领君士坦丁堡。但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念头仅仅是浪漫想象，算不上可行目标，而在叙利亚基督徒宣布继续忠于杰扎尔后，它们就更是泡影了（史密斯起了重要作用，他收集拿破仑致穆斯林的所有宣言，并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基督徒）。"但是，阿克人本来都会支持我。"多年后，拿破仑悲叹道。[59]"我打算在阿勒颇换上包头巾"，他认为此举会赢来20万名穆斯林追随者。

1799年5月20日，法军悄悄放弃了围城战线，撤军时间是晚上8～11点，以防"忒修斯号"与"老虎号"趁他们沿海滩行军数英里时开火。[60]法军被迫钉死无法运走的23门加农炮，他们把其中一些埋进沙里，将剩下的沉进海里。[61]多格罗回忆道，"撤退过程中，波拿巴将军一直待在小山上"，后卫撤离时他才随之离开。[62]拿破仑首次遭遇严重的军事挫折（因为巴萨诺和卡尔迪耶罗的败仗几乎算不上重大），而且他必须彻底放弃在亚洲化身又一位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日后他总结自己的光辉理想，宣称："我将建立一种宗教，我看到自己戴着包头巾、骑着大象向亚洲进军，手里拿着一本为我自己的需要而撰写的新古兰经。"[63]他描述雄心时无疑既自嘲又幻想。他显然考虑过改信伊斯兰教，但他看上去不大可能真的这样做。后来他告诉吕西安："我在阿克与命运失之交臂。"[64]

对错失命运一事恼火也好，防止杰扎尔追得太近也罢，不管原因为何，拿破仑一路采用“焦土”战术，在巴勒斯坦倾倒垃圾。1810年，威灵顿撤回里斯本时也用这招对付马塞纳，1812年时俄军当然亦用此计。拿破仑被迫在迦密山医院留下15名重伤员，拜托修士照顾他们，但土军赶到后，伤员尽遭毒手，修士也被逐出居住了数个世纪的修道院。[65] 法军撤往雅法时，黎巴嫩和纳布卢斯的阿拉伯部落袭扰其后方。拿破仑命令一些骑兵下马，把坐骑让给伤患。一名侍从武官问他想留哪匹马自用，他就用短马鞭抽打此人，大喊：“你没听见命令吗？所有人步行！”[66] 这是不错的戏剧素材（除非你是那个侍从武官）。拉瓦莱特说，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拿破仑打人。

5月24日下午2点，拿破仑抵达雅法，他面临艰难抉择。穿越前方沙漠能把人累垮，瘟疫患者将无力返回开罗，但因为疾病会传染，也不能让他们乘船，所以他必须决定病人的命运。“待在雅法港时，我们眼中的景象一直很惨烈，堪称平生所见之最，”多格罗回忆道，“到处是尸体和垂死者。有人经过，濒死之人就向他乞求治疗，或是恳求他带自己上船，生怕被丢下……瘟疫患者躺在帐篷里和鹅卵石路上，每个角落里都有人。医院已经挤满。我们离开时留下了很多病号，我确定走之前曾采取措施，确保他们不会活着落入土军手里。”[67] “措施”是指在食物中添加过量的鸦片酊。德热内特认为安乐死有违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拒绝执行，于是一名土耳其药剂师放了鸦片酊。根据法国目击者的记录，约有50人死亡。[68] 拿破仑说死者约有15人，但他为自己激烈辩护：“是提前几小时经历迅速的死亡，还是被那些野蛮人折磨到断气，处于类似境地中的人只要头脑清醒，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69] 叙利亚战役一结束，波旁王朝和英国就开始指责拿破仑待士兵冷酷至极，他回答：

> 如果我秘密毒死我的士兵，如果我像他们说的那样干些野蛮勾当，比如驾车碾过肢体残缺、血流不止的伤兵，你觉得全军上下还会热烈动情地为我而战吗？不不，我早被一枪崩了，就连伤员都会努力向我扣动扳机。[70]

虽说宣传人员歪曲雅法安乐死事件抹黑拿破仑，我们似乎也没道理相信其副官安德烈奥西的结论。安德烈奥西说："那些死者已然无法痊愈，他这么做是慈悲为怀。"[71]

法军穿越沙漠返回开罗，一路上天气酷热（拿破仑报称气温达47℃），士兵口干舌燥。这是一个极低谷，有些被截肢的军官"虽然花钱雇人抬自己，仍被扔出担架"。一名目击者指出，军队士气彻底消沉下去，"这摧毁了所有的慷慨情感"。[72] 法军不知道，在他们走的沿海路线上，地下水离表层很近，只要往下挖几码就能喝上水。"波拿巴骑单峰驼，迫使我们的马拖着疲惫步伐。"多格罗回忆道。[73] 正如拿破仑对督政府所言，这是因为"每天得走11里格（相当于29英里）到井边，井里有一点含硫黄的热盐水，我们迫不及待地灌下井水，比在餐馆里喝上好香槟还心急"。[74] 另一名士兵在信中写道："大家都不满……有些人当着司令的面自杀，大吼'看看你干的好事！'"[75] 英军拦截并发表了这封信。

6月14日，拿破仑重返开罗，他提前传令该城筹办庆典迎接凯旋之师，并在入城式上重点展示战俘与缴获的军旗。"我们已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多格罗回忆这件事时说，"但我们看上去依旧惨兮兮。我们什么都没有……大部分人不是缺帽子就是少靴子。"[76] 主要的谢赫赴开罗欢迎拿破仑，"对他归来一事致以最深沉的欣悦"，不过真实性几何就是问号了。[77] 在叙利亚远征中，拿破仑折损4000人，他向巴黎汇报时大大缩小战损数字，称500人战死、1000人负伤。[78] 回开罗一周后，拿破仑派冈托姆去亚历山大，让他安排威尼斯制造的巡航舰"卡雷尔号"（Carrère）与"米龙号"（Muiron，这艘船以拿破仑的前副官命名）为绝密长途航程做好准备。

"我们是沙漠全境之主，"6月28日，拿破仑告诉督政府，"并且打乱了敌人今年的计划。"[79] 第一句没多少自夸价值，第二句是谎言，因为

一支奥斯曼舰队已经动身。7月15日，拿破仑、蒙日、贝托莱和迪罗克刚从大金字塔里出来，就有人来报土军已到阿布吉尔沿海。[80] 拿破仑致信大国务会议，称入侵军队中有俄国传教会，他妙用俄国人的东正教教义为俄军树敌，并迎合穆斯林的信仰："他们谎称世间有三位神，所以憎恨一神论信徒。"[81] 拿破仑认为亚历山大的马尔蒙即将被围，便给他寄去一串忠告，如"只在白天睡觉"，"离天亮还早时就吹起床号"，"确保所有军官晚上披挂整齐"，以及在城墙外侧拴一大群狗来提防秘密进攻。[82]

拿破仑把所有可用兵员一并从开罗调至亚历山大，7月23日晚，他本人赶到那里。路上天气太热，很多士兵裹着斗篷露宿。接近亚历山大时，法军得知阿布吉尔港的小股守军溃败，并且在土军指挥官穆斯塔法（Mustafa）帕夏面前被斩首。"这则消息影响十分恶劣，"多格罗记载道，"法国人不喜欢这种残酷的作战方式。"[83] 由于雅法杀俘事件在前，这话听来是有些虚伪，但穆斯塔法的行径导致两天后的阿布吉尔会战中少有人被俘。当时，8000名法军大败穆斯塔法帕夏麾下的7000名土耳其人、马穆鲁克与贝都因人。"我们必须杀得他们片甲不留，"拉瓦莱特写道，"但他们很难杀。"[84] 许多土耳其人完全是被拉纳、缪拉和克莱贝尔赶进海里。"如果对手是欧洲军队，"多格罗写道，"我们会抓到3000名俘虏，但这儿却有3000具尸体。"[85] 事实上死者接近5000人。此言赤裸裸地承认，法军毫不关心不属于白种人和基督徒的敌人的命运。[86]

土军的第二次入侵破产，埃及已然安全。法国正面对英国、奥地利、俄国结成的新反法同盟，拿破仑决定尽快返回有危险的本土。长期以来，人们斥责他不过是丢弃部下出走，其实他是响应炮声召唤，当法国本身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它最好的将军还困在东方搞战略余兴节目就荒唐了。拿破仑临走前没有通知克莱贝尔和梅努，事实上，他去海边时还命令克莱贝尔去罗塞塔与己会合，以便分散他的注意力。拿破仑

给克莱贝尔留下一封长长的指示信，为了让奉命接过指挥权的将军不那么难受，他承诺将“格外尽心”地送来一队演员，“他们能在军中发挥重大作用，还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习俗”。[87] 克莱贝尔管拿破仑叫“那个科西嘉矮子”，他是个直率的阿尔萨斯人，发现拿破仑离开埃及后便对自己的部下说：“那混蛋扔下我们跑了，丢给我们一条他拉满屎的裤子。回欧洲后，我们要揍他的脸。”[88] 克莱贝尔未能享受那份快乐，1800年6月，24岁的叙利亚学生苏莱曼（Soliman）刺死了他。（处决苏莱曼时，长矛先从他的臀部刺入，再从胸口刺出。）[89]

拿破仑渡海之举远非胆怯，因为地中海几乎堪称英国内湖，过海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从距亚历山大9英里的贝达（Beydah）出发，资深班底大都随行，包括贝尔蒂埃、拉纳、缪拉、安德烈奥西、马尔蒙、冈托姆和梅兰，同行的还有学者蒙日、德农与贝托莱。拿破仑也带上了一个马穆鲁克装扮的奴隶男孩，他叫鲁斯塔姆·拉扎（Roustam Raza），生于格鲁吉亚，当时年龄则说法不一，介于15岁至19岁。在开罗时，贝克里（Bekri）谢赫把他当礼物送给拿破仑。此后十五年，鲁斯塔姆一直担任拿破仑的警卫，每晚都携带匕首睡在他房门外的垫子上。[90] 鲁斯塔姆11岁时就卖身为奴，他害怕航海，拿破仑告诉他：“什么都不用怕，我们很快就能到巴黎，那儿美人如云金钱成山。你看，我们会非常快乐，比在埃及时还快乐！”[91] 德塞仍在追击穆拉德贝伊，朱诺离登船地太远，拿破仑命令此二人留下。他致信朱诺，谈到“我对你的温柔友谊”，此信全篇皆称对方为“你”。[92]

拿破仑对军团撒了谎，称政府召他回法国。[93] “我很爱我的士兵，分别令我痛苦，”他说，“但我不会离开太久。”[94] 8月22日，他登上“米龙号”。次日早上8点，在“卡雷尔号”陪伴下，“米龙号”顺东北风起航。拿破仑向来运气好，接下来两天风向没变，所以他躲过了当地海域的英军巡洋舰。两艘威尼斯出产的巡航舰绕道回法国，走得很慢。它们先是沿非洲海岸线南下至迦太基湾（Gulf of Carthage），接着又北上至撒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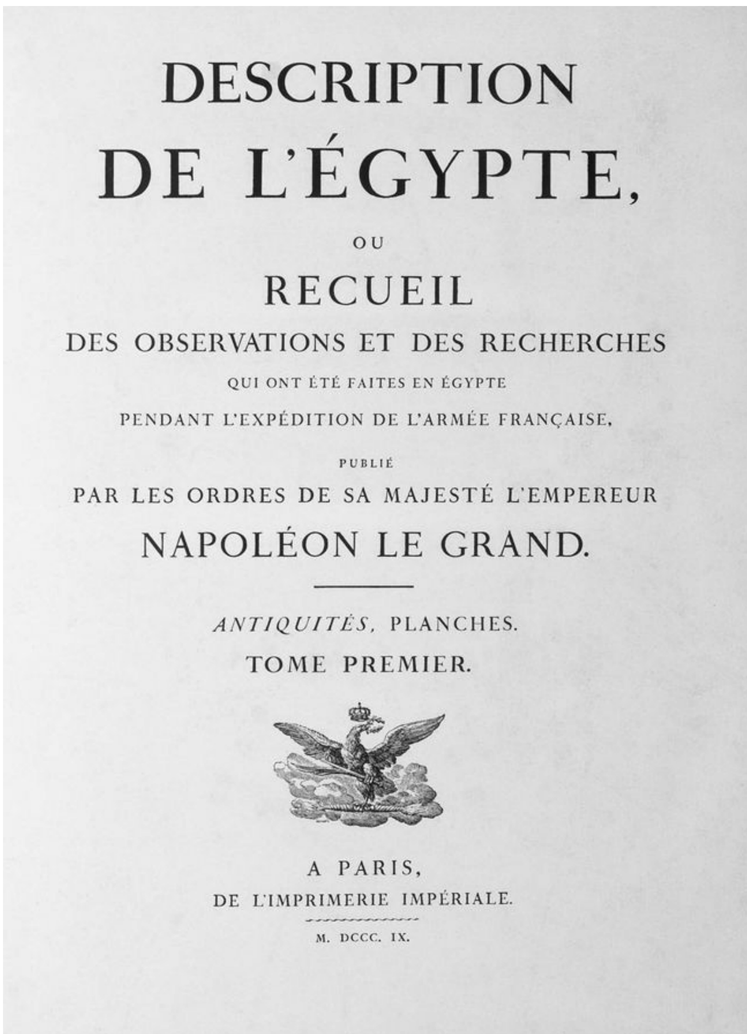
岛（Sardinia）。“冗长乏味的沿岸航行中，我们一条船也没看见。”德农回忆道，“乘客波拿巴无忧无虑，他或是埋头钻研地理与化学，或是放松身心与我们一同欢笑。”，[95] 旅途中，拿破仑不仅向学者求教，“还给我们讲鬼故事，故事里的他总是非常聪明……他每次提起督政府时都板着脸，并略带鄙夷之色”。[96] 布列纳给拿破仑读历史书，一直读到深夜，哪怕对方晕船。“有一次，他问我克伦威尔的生平，”德农回忆道，“我知道我没觉睡了。”[97] 保守派革命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发动政变，推翻了自己鄙视的政府，他对拿破仑的示范作用比德农能猜到的还要大。

德农记载道，他们“最先看到的友方陆地”是科西嘉岛。9月30日，两艘船驶入阿雅克肖港，“两侧炮台鸣炮致敬，所有人冲到船边，围住我们的巡航舰”。拉瓦莱特回忆说，拿破仑看见阿雅克肖后“深深感动”，当时这个短语一般指代流泪。[98] 在岛上这几天，他同旧日部下和家仆进餐，向约瑟夫·费施要了些现款，并“阅读公共报纸对我军”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所受灾难的悲伤报道”。[99] 今人可在波拿巴宅看到他这次返乡住的房间。此后拿破仑再未返回故居。

10月6日，巡航舰从阿雅克肖驶向耶尔（Hyères）。8日傍晚6点时分，有人发现了英国船只，冈托姆想返回科西嘉，但拿破仑命令他去蔚蓝海岸（Côte d’Azur）的弗雷瑞斯港（Fréjus），该地靠近戛纳（Cannes）。这是旅途中拿破仑唯一一次下达航海指令。1799年10月9日（周三）中午，他在圣拉斐尔（Saint-Raphaël）附近的海口踏上法国海岸，当晚就奔赴巴黎。他的回国经历是一段非凡之旅。1803年之后，拿破仑在书桌上放置了一件等比缩小的“米龙号”船模，后来还下令把该船本身“留作纪念，让它在某处保存几百年……若这艘巡航舰遭遇任何厄运，我将深信那是鬼神作祟”。[100] （1850年，“米龙号”报废。）

拿破仑的埃及冒险结束了，它长达一年又五个月。然而，对他留下

的法军来说，这还不算结束。他们继续待在埃及，直到两年后梅努被迫向英军投降。1802年，他的军队和剩下的学者获准回国。拿破仑承认，埃及战局中共有5344人死亡，但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实情，因为1801年8月法军投降时，约9000名士兵和4500名水手已不在人世，而且他走后，法军相对来说没怎么打仗，哪怕是在亚历山大围攻的最终阶段。[101] 不管怎么说，拿破仑照命令占领埃及，击退两次土军进攻，又在法国危急之刻归来。克莱贝尔给督政府寄去毁灭性的报告，他谴责整场战役中拿破仑的行为，描述痢疾与红眼疫情，并说大军缺乏武器、火药、弹药与制服。皇家海军截获此信，但它发表得太迟，未损及拿破仑的政治声誉。运气又帮了他一回，他却开始误把运气当命运。


DESCRIPTION
DE L'ÉGYPTE,
OU
RECUEIL
DES OBSERVATIONS ET DES RECHERCHES
QUI ONT ÉTÉ FAITES EN ÉGYPTE
PENDANT L'EXPÉDITION DE L'ARMÉE FRANÇAISE,
PUBLIÉ
PAR LES ORDRES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
NAPOLÉON LE GRAND.

ANTIQUITÉS, PLANCHES.
TOME PREMIER.

A PARIS,
DE L'IMPRIMERIE IMPÉRIALE.
M. DCCC. IX.

拿破仑征战埃及的最长远成就不是军事或战略成功，而是学术、文化与艺术成果。1809年，德农的《埃及记》（*Description de l'Égypte* ）第一卷出版。《埃及记》篇幅浩大、内容权威，标题页写有“奉拿破仑大帝陛下诏令出版”，序言则回顾了亚历山大大帝与恺撒征服埃及的历史，他们二人在当地的任务正是拿破仑效仿的模板。在拿破仑的剩余人生中，这部不折不扣的杰作又出版后续卷册。事实上，他去世后，此书继续推出续作。全书最终达21卷，创学术与出版史上一大高峰。学者们的工作详尽彻底。《埃及记》收录细节翔实的等比缩放图（长27英寸、宽20英寸），每张图皆有黑白版与彩色版，图中景观包括方尖碑、斯芬克斯像、象形文字、王名框 [102] 、金字塔、性欲勃发的法老以及被制成木乃伊的鸟、猫、蛇、狗，取景点为所有古埃及神庙遗址所在地，包括开罗、底比斯、卢克索（Luxor）、凯尔奈克（Karnak）、阿斯旺（Aswān）。（根据第12卷的记载，奥兹曼迪亚斯国王并不像诗人雪莱说的那样“瘪嘴冷笑、令人生畏”，他的笑容很迷人。）图画前景不时出现休班后闲逛的士兵，但此举并非意在宣传，而是表现缩放比。

除了古埃及文物学，《埃及记》也载有尼罗河及近代城镇的精细地图、光塔与风景的印制版画、灌溉渠道的草绘、修道院和寺庙的图片、各种不同的柱子，并尽收船运、露天剧场、坟墓、清真寺、运河、要塞、宫殿与城寨风光。书中还有精确到最后一厘米的百科全书式建筑蓝图和高地经纬度平面图。多卷本《埃及记》虽无政治夸耀价值，但它代表法国文明的高峰，事实上，它代表拿破仑时代法国文明的高峰。《埃及记》深深影响了欧洲艺术赏玩、建筑品味、美学悟性与设计鉴赏。

此外，差点在底比斯某座洞穴被一条“有角蛇”（horned serpent）咬了的埃及学院图书馆管理员、公民里波（Ripaud）也给艺术委员会写了104页报告，论述尼罗河大瀑布至开罗一线的古迹现状。 [103] 学者们最大的发现是罗塞塔石碑，这座石碑（stele）从三角洲的拉希德出土，上刻三种文字。他们复制了碑上文本，译出希腊语部分后着手研究象形文

字。[104] 1801年，根据法军的撤军和约，英军得到石碑，并把它交给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今天它仍安全地待在馆内。不幸的是，2011年，埃及爆发“阿拉伯之春”反抗运动，12月17日，位于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附近的埃及学院起火。院内192000份书籍、日志及其他文稿几乎全毁，其中包括德农所著《埃及记》的唯一手稿。

---

[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35 p.849，February 10，1799

[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35 p.850，February 10，1799

[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167 p.817，January 25，1799

[4] 巡洋舰（cruiser）并非军舰的种类，这个词指执行单舰巡航、护航、侦察等各类任务的军舰，包括巡航舰（frigate）、轻帆船（sloop）等多种军舰。——译者注

[5] 原文误作“中将”。——译者注

[6] 原文有误，韦尔斯利在1804年才封爵。——译者注

[7] 今斯里伦格伯德姆（Srirangapatna）。——译者注

[8] Derogy，Jacques and Carmel，Hesi，*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1992，pp.102-4

[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35 p.850，February 10，1799

[10] Shmuelevitz，Aryeh，*Napoleon and the French in Egypt and the Holy Land* （Istanbul） 2010，p.19

[1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65 p.867，February 27，799

[12]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40

[13]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p.81

[14] 马格里布人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与利比亚。雇佣兵中最远

的来自阿尔巴尼亚。

[15]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54

[1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65 p.867，February 27，1799

[1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0

[18]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4

[19]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6

[20] 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p.316，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7，ed. Weit，Gaston，*Nicolas Turc*，*chronique d’Égypte l798-1804* （Cairo） 1950，p.53

[21] ed. Jourquin，Jacques，*Journal de Capitaine François* 2 vols.19184，Ⅰ p.280

[22] 当时人们认为拒绝劝降的城市理应遭劫。1812年，英军在巴达霍斯（Badajoz）抢劫三日，并大肆强奸妇女，局面如此严重，以至于威灵顿在主广场上竖起绞刑架（并未使用），然后他才总算重振纪律。和拿破仑相比，威灵顿并非更纵容强暴与抢劫。

[23] 我们可以在1917年德军航拍的照片中找到屠杀地——旧雅法正南方的海滩。此地现在属于一座汽车公园，死者们想游去的礁石成了海滩防波堤的一部分。

[2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71 p.870，March 9，1797

[25] Berthier，Louis-Alexandre，*Relation d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801，p.56 19.ed. Quentin，Roger，*André Peyrusse* 2010，p.55，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Ⅳ p.271

[26] Coxe，Peter，*The Exposé* 1809，p.61

[27] ed. Millet，Stanislaw，*Le Chasseur Pierre Millet* 1903，p.262

[28] For the numbers debate，see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71 p.870 n.3，Jonquière，*L’Expédition* Ⅳ pp.270-71，Herold，C.，*Bonaparte in Egypt* 1962，p.306，eds. Tortel，Christian and Carlier，Patricia，*Bonaparte de Toulon au Caire* 1996，p.158，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01，Anon.，‘The French Expedition’

[29] p.197，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68，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76，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52，Berthier，Louis-Alexandre，*Relation d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801，p.56，ed. Millet，Stanislaw，*Le Chasseur Pierre Millet* 1903，Appendix ⅩⅤ p.262，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328

[30]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p.18-19

[31]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1

[32] 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Ⅳ p.273，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01

[33]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p.236，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86n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0

[35] 拿破仑从没去过耶路撒冷，但1996年时，以色列旅游局照样在巴黎地铁布设宣传海报："拿破仑多次享受耶路撒冷的午休时光，你为何不来呢？"

[3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77，pp.872-3，March 9，1799

[37] 当年1月，亚历山大出现疫情，军医布瓦耶（Boyer）不肯照料病号。拿破仑发明了又一项特殊惩罚，强迫布瓦耶穿女装走在街上，还在他身上挂了块牌子，上书："他怕死，不配当法国公民。"

[38]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 xix

[39] ed. Jourquin，Jacques，*Journal de Capitaine François* 2 vols.19184，Ⅰ p.281

[40] ed. Bulos，A.，*Bourrienne et ses erreurs voluntaires et involuntaires* 2 vols.1830，Ⅰ p.44

[41]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78

[42]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78

[4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294 p.881，March 13，1799

[44]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77

[4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59

[4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Ⅰ pp.215-16

[4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346 p.911，May 10，1799

[48] 今塔沃尔山（Mount Tavor）。——译者注

[4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58

[5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p.60-61

[51] 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150

[52]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191

[53]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88

[54]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90，Coxe，Peter，*The Exposé* 1809

[5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346 p.910，May 10，1799

[5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Ⅰ pp.215-16

[5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46

[5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362 p.920，May 27，1799

[5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69-70

[60] Smith，Sir William Sidney，*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p. x

[61] 1982年，一些火炮出土，今陈列于泰勒多尔考古博物馆（Tel Dor Archaeological Museum），其中有一门加农炮铸造于1793年，其上刻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冠。还有一门臼炮上刻有塞利姆三世书法化花押字，它是雅法之战的战利品。

[62]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93

[63]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6

[64] ed. Iung，Theodore，*Lucien Bonaparte et ses mémoires* 3 vols.1882，Ⅱ ch. 14

[65] Friedman，Elias，'On the Affair of the Murder of the French Soldiers in the Carmelite Monaster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Ariel Journal on the Land of Israel* no.37 March 1985（in Hebrew），pp.65-77

[66]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11

[6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99

[68] For the Jaffa plague debate see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63，Desgenettes，René-Nicolas，*Histoire médicales de l'Armée d'Orient* 1802，pp.104-5，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p.99-106，ed. Bulos，A.，*Bourrienne et ses erreurs voluntaires et involuntaires* 2 vols.1830，Ⅰ pp.34-5，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83-5，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p.317，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74，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8，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1，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235，Wilson，Sir Robert，*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Egypt* 1802，pp.91-2

[6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75-6

[70]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76

[71]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235

[7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6

[73]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02

[7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04 p.940，June 19，1799

[7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6

[76]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04

[77]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05

[7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54，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56，Smith，Sir William Sidney，*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p.9

[7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79 p.972，June 28，1799

[8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65

[8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33 p.1032，July 21，1799

[8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38 p.1035，July 21，1799

[83]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13

[8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66

[85] 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114

[86]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61，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66 p.1048

[8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58 pp.1086-8，August 22，1799

[88] Sauzet，Armand，*Desaix*，*le sultan juste* 1954，p.131

[89]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pp.413-14

[9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0

[91]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75

[9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57 p.1085，August 22，1799

[9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58 p.1086，August 22，1799，ed. Brindle，Rosemary，*Guns in the Desert* 2002，pp.120 n.26

[94]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Ⅰ p.263

[95] Denon，Vivant，*Travels in Upper and Lower Egypt* 3 vols.1803，Ⅲ p.119

[9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68

[9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p.1216

[9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69

[99]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50

[10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7 no.15677 p.809，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6

[10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79 p.972 n.2，June 28，1799

[102] 古埃及象形文字中用来署法老或神明名讳的框。——译者注

[103] Ripaud，Citizen，*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Arts* 1800

[104] Byrd，Melanie，'The Napoleonic Institute of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4

第九章 雾月

我回国时恰逢良机，当时政府已无可救药，我就成了国家首脑，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我的故事概括说来就这些。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改变世界之道从不在于争取高官权贵，且莫不在于激励人民大众。前者是诉诸阴谋，其成果寥寥；后者是挥洒天才，可令世间面貌焕然一新。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拿破仑从圣拉斐尔出发，经艾克斯（Aix，他的行李在此失窃）、阿维尼翁、瓦朗斯、里昂与讷韦尔（Nevers）去巴黎。1799年10月16日（周三）上午，他到达首都。他享受一路上的“凯旋之旅”，所到之处人们都当他是法国救星，热烈欢迎英雄。[1] 他到里昂时，街上人山人海，歌颂他的戏剧《英雄归来》便在人潮前上演。民众的高声欢呼完全盖过演员的念白，不过这很可能是幸事，因为这出戏是一夜之间写成的，剧组事先也没彩排。未来的骑兵军官让-巴蒂斯特·德·马尔博（Jean-Baptiste de Marbot）当时17岁，他回忆道：“人们在旷地上跳舞。空中响起呼声：‘波拿巴万岁！他会拯救国家！’”[2] 马尔博看见拿破仑和他的高级同僚后惊叹不已，尤其令他惊奇的是：“他们的军人风度、被东方太阳晒成古铜色的脸、古怪的衣着、用带子系在衣服上的土耳其马刀。”[3]

拿破仑必须先定婚姻立场再做政治决策。1799年2月，约瑟芬试图和伊波利特·夏尔终止情人关系，尽管拿破仑不知情。“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你大可放心，我不会再给你写信，不会再见你，你不用再受折磨。”约瑟芬致信夏尔，“被欺骗的诚实女人安静地退出。”[4] 事实上，两人后来仍有通信，他们讨论如何处理意大利军团合同滋生的各种肮脏

交易，直到10月方休，甚至在那之后，她还努力帮他的朋友谋职（此事未成）。英俊浪荡的骠骑兵夏尔终于抛弃了缺爱的约瑟芬，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没过多久，拿破仑攫取绝对权力。他没有追究或惩罚情敌。

十六个月前，拿破仑得知约瑟芬不忠，而此时他的怒火已减弱了不少，而且他靠波利娜·富雷斯狠狠报复了妻子。离婚也许会损害他的政治口碑，尤其是他在虔诚的天主教徒中的口碑。约瑟芬可在政事上助他一臂之力，她有保王党人脉与社交网，还能在感情上安抚他粗鲁回绝的人。虽然约瑟芬有病态的挥霍癖，商人们送来的账单仍有商量余地，他们通常乐得打半折，即便这样利润仍很可观。

拿破仑首先去了胜利街，也许此举本身就表明他打算原谅妻子。他在埃及时，约瑟芬花了325000法郎（借来的钱）买下美丽的马尔迈松城堡（Malmaison），该地位于巴黎以西7英里处。她离开马尔迈松，想在路上截住他，但搞错了路线。10月18日，她返回胜利街的家，接下来家庭风波全面爆发。约瑟芬的东西都被打包收好，她在上锁的门外哭叫，下跪哀求拿破仑。奥尔唐斯和负伤的欧仁也被母亲召来，恳请继父怜悯（拿破仑和继子女确有深厚感情）。最后一家人戏剧般地和解。次日早上，吕西安来看哥哥，他被引至卧室，发现兄嫂坐在床上。[5] 不难猜到拿破仑至少编排了这出戏的部分内容，从而赢得今后婚姻生活的绝对主导权。日后约瑟芬忠贞不渝，但他显然不忠。

拿破仑和约瑟芬没有离婚的原因亦有他说："她的眼泪打动了"他；他对她产生性欲，不在乎别的事了；她否认偷情一事，他相信了她（这个最不可能）；他忙于政治，无暇顾及家庭纷争；他想要孩子；他毕竟真心爱她。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说法或哪几种说法的组合，拿破仑完全原谅了约瑟芬，在她或其他任何人面前，他再也没有暗指她的背叛。两人渐渐过上了舒适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整整十年后王朝问题浮出水面。她似乎真的爱上了他，尽管她总是叫他"波拿巴"。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故

事当然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言情传奇，但他们的感情更微妙、更有趣，就其方式来说，他们的爱情不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平庸。

到达巴黎后，在与约瑟芬和好前，拿破仑还做了些别的事。他会见律师政客路易·戈耶（Louis Gohier），此人在当年6月就任督政。督政们轮流当主席，每隔三个月换一次人，此时正轮到戈耶。10月17日，拿破仑参加公众集会，并享受会上宴席。当时，他头戴埃及圆帽，身披橄榄绿外套，衣服上还用丝绸带子系着土耳其弯刀。戈耶称颂拿破仑，他答道，他拔剑只为保卫共和国与其政府。[6] 督政们得私下决定逮捕他还是祝贺他。一方面，他擅自脱队（他没接到命令就丢下驻埃及军队），违反检疫规定；另一方面，正如他的宣传人员指出的，他赢得金字塔会战、塔博尔山会战和阿布吉尔会战，征服埃及，为西方打开东方大门，并且新建了一片广阔的法属殖民地。贝纳多特建议把拿破仑送上军事法庭，如果说此提议曾被认真考虑，督政们也很快打消此念，因为他们听见，自己的卫队在会议室外认出他后立即自发地欢呼："波拿巴万岁！"[7]

接下来几天，胜利街被成群的观众与祝福者包围了。保罗·蒂埃博（Paul Thiébault）将军曾参与里沃利会战，他在王家宫殿听闻拿破仑归来。蒂埃博回忆道：

> 巴黎全城轰动，说明消息无疑是真的。城市卫戍部队的团级军乐队已在街上漫步，这是民心大悦的信号，他们身后跟着大群军民。晚上，每个角落仓促挂灯，剧院里的人们都在呼喊："共和国万岁！波拿巴万岁！"这呼声宣告他已回国。归来的不是将军，而是身着将军制服的领袖……法国政府已是风中残烛。督政府被各党派整得伤痕累累，任由第一波攻势摆布。[8]

然而，攻势仍需谋划。拿破仑曾庄严地宣誓捍卫《共和三年宪法》，密谋推翻宪法乃叛国罪，罪人可以被斩首。此外，巴黎城中到处都是推翻督政府的阴谋，他不必第一个反水。当年6月，立法院用前雅各宾党人戈耶换下让-巴斯蒂特·特雷亚尔（Jean-Baptiste Treilhard），仅

仅过了一天，一场小政变就爆发了，这就是所谓的“议会日”（journée parlementaire）。当天，茹贝尔将军得到巴拉斯和西哀士的授意后动用武力，逼迫拉雷韦利埃和杜艾把督政之位让给皮埃尔-罗歇·迪科（Pierre-Roger Ducos）与前雅各宾党人让-弗朗索瓦·穆兰（Jean-François Moulin）将军。除了巴拉斯、卡诺和西哀士，1795～1799年的13位督政都是特别平庸的政客。

之后的日子里，拿破仑的访客几乎都是政变主谋。塔列朗第一个上门。最高法院未来的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等三名刚正不阿的美国驻巴黎公使与塔列朗商议贷款偿还问题，后者却反复地索要25万美元“孝敬费”，不见钱就不肯屈尊谈判，7月时事情败露，他被迫辞去外交部长之职。[9] 塔列朗担心拿破仑怪他没去君士坦丁堡，但后者立刻原谅了前者。政客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Pierre-Louis Roederer）也早早来访，此人圆通灵活，但聪明睿智。1789年，勒德雷尔当选三级会议代表，从此以后，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他始终安然无恙，后来他成了拿破仑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拿破仑曾留前编辑米歇尔·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治理马耳他岛，这时他也登门。立法院下院五百人院议员、关键支持者安托万·布莱·德·拉默尔特（Antoine Boulay de la Meurthe）亦来做客。10月，布列斯特海军分舰队中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Eustache Bruix）、“温雅绅士”官吏于格-贝尔纳·马雷（Hugues-Bernard Maret）、高级警官雅各宾·皮埃尔-弗朗索瓦·雷亚尔（Jacobin Pierre-François Réal）也参与了密谋。[10]

政变后，这些人都在拿破仑手下官居要职，不少人成为国家参政院（Conseil d’État）参政，几乎所有人都被封为法国世袭贵族。吕西安·波拿巴也是政变支柱。1798年6月，23岁的吕西安当选五百人院议员，很快就任议长，因此阴谋者有机会为政变披上虚伪的宪政外衣。“他个子高高，脑袋小小，身材扭曲，四肢像田野蛛，”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描述吕西安道，“他非常近视，所以经常半眯着眼垂下头。”[11] 当选

五百人院议员的年龄下限是30岁，所以吕西安靠伪造的出生证明来满足条件。[12]

“雾月”（Brumaire）指“雾霭季节”。我们难以拼凑出未来政变的运作过程，这是恰当的，因为拿破仑故意不留文字信息。从10月16日返回巴黎到雾月十八日政变爆发历时二十三天，而他现存的信中仅有2封出自这二十三天，就连这2封信也未透露任何风声。[13] 对一个平均每天写15封信的人来说，这回他全在口头上交接事务。此前的人生中，有人彻查拿破仑的书信，试图找出证据送他上断头台，而他不会重蹈覆辙。在公共场合露面时，他把身上的将军制服换回法兰西学院院士服。

构思政变的不是拿破仑，而是西哀士教士。1799年5月，西哀士接替勒贝尔任督政，但他很快断定自己领导的政府太无能太腐败，无力解决法国面临的问题。西哀士的同党有督政同事兼密友迪科、警务部长约瑟夫·富歇、司法部长让-雅克-雷吉斯·德·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他们比拿破仑的朋友（除了塔列朗）明显更具政治分量。西哀士认为拿破仑不过是实施政变所需的“剑”或力量，在私交层面上，他俩全然相互鄙视。拿破仑返回巴黎时，西哀士私下说他擅离埃及岗位，建议枪决他，他则说西哀士替普鲁士卖命（并无证据），不配当督政。[14] 在热那亚以北的诺维（Novi），西哀士首选的“剑”茹贝尔将军在战斗中心脏中弹身亡（巧合的是，当天正是拿破仑的生日），所以除了拿破仑，他没多少可选人物。其他干将中，儒尔当支持宪法，谢雷战败后名誉受损，雅克·麦克唐纳（Jacques Macdonald，其父是苏格兰高地人、詹姆斯二世党人）与莫罗似乎拒绝了西哀士，而皮舍格吕已入敌营。就像葡月暴动时一样，拿破仑几乎是几经筛选后才成为主角的。

塔列朗最终劝服西哀士选择拿破仑，他的理由是，拿破仑具有无可指摘的共和派履历，而且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15] 据说塔列朗告诉拿

破仑："你想要权力，西哀士想要宪法，那么合作吧。"[16] 拿破仑在巴黎大受欢迎，这显然影响了西哀士的决策。当时，拿破仑和迪罗克去策肋定剧院（Celestins theatre）[17]，他让迪罗克坐包厢前排，自己坐后排，但"观众呼喊波拿巴的名字，呼声如此热情、如此一致"，以至于他们只好换位置，也许这不出他所料。[18]

10月23日下午，拿破仑和西哀士才首次见面。"我负责协商协议中的政治条件，"勒德雷尔回忆道，"他俩对未来宪法和自身将任职务各有看法，我居中传达。"[19] 拿破仑想保留选择权，他也考虑了其他人的合作提议，尽管他们的政治人脉都不及西哀士派过硬。这一时期，多达十起推翻督政府的活跃阴谋正在秘密地酝酿。

近四年来，督政府屡遭败绩，但拿破仑不在场，这些失败算不到他头上。法国在国外战败后不仅丢了1796～1797年他开辟的疆土，还同德意志与意大利市场断了联系。俄国、英国、葡萄牙、土耳其和奥地利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对法国开战。美国也就债务偿还问题和法国进行所谓的"准战争"（Quasi-War），它坚称自己的债主不是法国政府，而是法国国王。1799年的八个月内，至少有四个人当过法国战争部长。军队严重欠饷，导致逃兵、强盗与公路劫匪遍布乡野。普罗旺斯与旺代的保王党再度叛乱。皇家海军封锁海面，法国海外贸易遭受严重打击，纸币几乎一钱不值。当局征收土地税与门窗税，把涉嫌支持波旁的人扣作人质。1798年的《儒尔当法》几乎把先前的紧急状态普遍征兵令发展到全民皆兵的地步，民众大为不满。政府合同比往常更腐败，人们猜出巴拉斯等督政牵涉其中。媒体与社团自由严格受限。1798～1799年，三分之一的立法院议员靠广泛的诈骗当选。重要的是，国有财产（biens nationaux）购买者担心所有权无法得到保障。

超级通货膨胀对社会的破坏力的彻底性令大部分灾难望尘莫及，战胜它的人将得到丰厚政治回报。（立法院议员自己的薪水也经保值处

理，与30吨小麦现值呈指数挂钩。）《最高价格法》压低面包、面粉、牛奶、肉等主食物价，督政府废除此法后，1798年出现歉收，结果一磅面包的价格在两年内首次突破三个苏（sol），引发贮粮、暴乱与切实的不满。也许最糟的是，民众看不出事态可以改善，因为宪法修正案需经两院批准三次，每次批准要间隔三年，九年将尽时修正案还得再经特别会议认可。[20] 变化无常的立法院不大可能完成这种事，1799年年末的两院正是如此。当时，议员包括地下保王党、弗扬立宪派（Feuillant constitutionalists，稳健派）、前吉伦特派、新雅各宾“爱国者”，而督政府支持者在议会中占不到几席。相形之下，拿破仑最近在内高卢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莱芒共和国、海尔维第共和国与罗马共和国颁行宪法，在马耳他与埃及实施行政改革，上述举措塑造了热情精干、信奉强大执行力与集权控制的共和党人形象，这些信条在大都市化的法国可能亦有效。

1799年秋，法国并非一败涂地。事实上，督政府在某些领域有理由感到乐观。一些经济改革正在进行。俄国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旺代形势好转，英军也被逐出了荷兰。马塞纳在瑞士取胜，意味着法国不再面临紧迫的入侵威胁。[21] 然而，法国人认定督政府总体上已经失败，那些成绩都不足以消除这种印象，正如拿破仑所说的，政变“时机成熟了”。[22] 现行政治体制亦无他的位置，因为督政的年龄下限是40岁，而他时年30岁，戈耶似乎也没兴趣为他修改宪法。

人们指责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毁了法国民主，此言诚然，但19世纪晚期之前，就连英国议会也很难算得上杰斐逊理念的范本，它一直被贵族寡头集团牢牢把持，有很多议席只对应几十个选民。雾月政变亦被称作法国自由的灭亡，但自从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设立督政府后，1795年有未遂的葡月政变，1797年有果月肃清，1799年6月又有牧月（Prairial）议会日。尽管雾月政变完全违背宪法，但它很难算得上首开法国政坛先例。拿破仑曾发誓守护宪法，他之所以受欢迎，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共和党人。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夸张地对马尔蒙说，“改变必不可少。”[23]

10月26日，拿破仑在胜利街用早餐。他对比意大利战局中士兵的精神和当局的倦怠，当着蒂埃博的面公然批判督政府。“国家永远是个人智慧的结晶，”他说，“党派与纷争的胜利完全是当权者的错……强将手中无弱兵，同样的道理，良政治下无劣民……这些家伙拖累法国，把它变得和他们一样蠢。他们羞辱它，而它开始和他们断交。”大革命早期，有人因这种坦率的谈话而殒命，但拿破仑认为策动他想争取的战友足够安全。谈话结束时，他说了自己最常提的一句鄙视之语：“好吧，将军怎么能指望这个律师政府呢？”[24]

“我谋划军事行动时就成了世上最胆小的人，”27日，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我放大那种情况下所有潜在的危险与损害，陷入相当烦人的躁动状态，但我在周围之人面前仍然非常平静。我就像分娩的产妇。下定决心后，除了取胜途径，我把一切都抛之脑后。”[25] 拿破仑策划雾月政变时也应用了同样执着的注意力。由于完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我们无从得知他的确切行动，可政变一开始，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该去哪、该做什么。

政变之前这几天，督政府很可能就已经怀疑事情不对劲，遂让拿破仑自选国外指挥权，但他借口健康不佳，回绝了职位。督政们也借助媒体，暗中指责他在意大利贪污，而他强烈否认。[26] 这段时间中，一则故事开始流传：拿破仑在塔列朗家密谋时，楼下的街道忽然大声喧闹，害怕被捕的阴谋者们立即熄灭蜡烛，冲向阳台，然后他们发现骚动的原因是从王家宫殿归来的赌徒卷入大马车事故，于是大大松了口气。[27]

阴谋者们也在赌博，10月29日，他们赌运大升。当天，督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向政府合同当事人支付预定款项的时间延迟至账目审核完毕之后。康巴塞雷斯庇护的承包商让-皮埃尔·科洛（Jean-Pierre Collot）资

助政变，现在他更无所顾忌了。[28]

次日，拿破仑去了全体督政的工作生活之地卢森堡宫（Luxembourg Palace）。在和巴拉斯用餐时，促使他决定破釜沉舟的时刻来了。餐后，巴拉斯提议立加布里埃尔·戴杜维尔（Gabriel d’Hédouville）将军为法国的主席，从而“拯救”共和国，拿破仑则认为此人“平庸至极”。戴杜维尔曾参与瓦尔米之战，但黑人民族主义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的圣多明各革命（即海地革命）不久前逼得他逃离了该地区，而且他显然不是当主席的料。“而你呢，将军，”巴拉斯对拿破仑说，“你想回归军队。我病了，不得人心，心力交瘁。我只能退隐，别的都干不了啦。”[29] 关于拿破仑的回应人们说法不一：某版本称，他一言未答，只是盯着巴拉斯；另一版本称，“我答复时故意摆出某种态度，让他确信我不会上当。他垂下眼，嘀咕了几句，正是这几句话让我立刻下定决心。我离开他在卢森堡宫的公寓，下楼去找西哀士……我告诉西哀士，我决定和他联手”。[30]

巴拉斯察觉自己犯下了大错，次日早上8点，他造访胜利街，试图弥补错误，但拿破仑回答，自己“刚从干旱的阿拉伯沙漠回来，还不适应首都的湿热天气，现在疲倦不适”，并“用类似的陈词滥调”结束谈话。[31] 11月1日，拿破仑在吕西安家秘密会见西哀士，两人协调政变的细节。此时，塔列朗和富歇也都已参与政变。

约瑟夫·富歇不是个简单的警务部长。23岁前，富歇一直是奥拉托利会成员（Oratorian），有志加入教会。1793年，他成了雅各宾派弑君者。他关心权力甚于意识形态，与很多保王党人都有来往，而且他保护教士，特别是奥拉托利会成员，尽管他是反教权党派的领袖。“无人不晓这位要人，”拿破仑未来的副官菲利普·德·塞居尔（Philippe de Ségur）伯爵写道，“他中等身材，亚麻色的头发平直稀疏。他的体格瘦弱有活力，长脸变化不定，外貌如同激动的雪貂。人们会记得，他的凝

视尽管狡黠却锐利急切，他的小眼睛充溢血丝，他说话简短急促，这副腔调同他焦躁不安、心神不宁的态度相吻合。”[32]

富歇招募了大批探子，如街头小贩、屠夫、理发师、锁匠、假发匠、香料商、酒保、路易十六的前贴身男仆、前雅各宾分子“木腿科兰”（Collin）、洛泰堡（Lauterbourg）男爵夫人、王家宫殿133号的妓院老鸨等很多人。[33]“有一天他会查我的床，”拿破仑拿富歇说笑道，“接着翻我的钱包。”[34]对拿破仑来说，富歇的入伙是个好消息，因为他投靠的势力从未败过（不过他据信有紧急方案，若政变失败他会逮捕“叛徒”）。[35]在政变中和政变后，拿破仑对富歇的看法是：“富歇、单单一个富歇就能组织警务部。这种人我们无法创造，遇上了就必须收入帐下。”[36]

为了表彰拿破仑和莫罗，11月6日，立法院上下两院在圣叙尔皮斯（St-Sulpice）教堂举办700席的慈善宴会。大革命时期，这座教堂改称胜利殿（Temple of Victory），它像天主教大教堂一般规格宏大。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塔楼非常高大，以至于政府拿它们当可视信号塔[37]。无可否认，教堂的确威严壮观，但其墙壁呈黑色，其声响设计又旨在将说话声变成回响的诅咒，所以说，在11月的寒夜，此地也许最不适合举行盛筵。法国政客大都出席，但贝纳多特没来。（巴拉斯称）贝纳多特不肯在募捐名单上签字，“除非波拿巴能合理地解释抛弃军队的理由”，他还说，“我不想和心怀鬼胎的人吃饭”。[38]据说拿破仑担心督政府下毒，在席上“只吃鸡蛋”，并提前退场。[39]他演讲的中心是法国人团结一心的重要性，接下来数周乃至数月，他都会反复提及这个足够安全的主题。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后，除了两院，还有很多人提出为他设庆功宴，但他几乎只接受了康巴塞雷斯的邀请。他说自己“非常尊敬”此人。[40]康巴塞雷斯是同性恋、美食家与享乐主义者，他出身蒙彼利埃一个杰出

的法律世家，身材肥胖，为人浮夸。他曾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但主张死刑前提只能是奥军入侵。拿破仑很少喜欢律师，康巴塞雷斯是个例外，他和迪罗克都成了拿破仑最亲近、最信任的顾问。“他精于言谈之道，”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回忆道，“凭借语言切换，他的叙述风格显得新奇优雅……他是……这个国家最能干的公民。”[41] 她也补充道，他“特别丑……鼻子长，脸颊长，面色黄”。比起权力，康巴塞雷斯更追求影响力，而且他从不谋求抛头露面。后来他可以私下表达对拿破仑的反对意见，因为他的忠诚毋庸置疑。［拿破仑不偏执，他不仅亲近康巴塞雷斯，还任命出柜的同性恋约瑟夫·菲耶韦（Joseph Fiévée）担任涅夫勒省（Nièvre）省长，菲耶韦与其终身伴侣令当地百姓大为震惊。］

康巴塞雷斯看人看事的眼光准得堪称典范。“只有康巴塞雷斯和约瑟芬能抚平波拿巴的怒火，”一位部长回忆道，“催促或顶撞只让那个急躁的人更气恼，康巴塞雷斯肯定不会这么做，他反倒听凭对方发火。他任波拿巴口述最恶毒的命令，睿智耐心地等对方消气。波拿巴的这一阵怒火终于消散后，他才开口评价。”[42] 康巴塞雷斯的言辞“优雅得体”，尽管如此，就幽默感来说，他的性格层面不止于此。在某次晚宴上，拿破仑取胜的消息传来，约瑟芬即对席宣布他们已经“大胜”（vaincu），康巴塞雷斯假装听成“二十个屁股”（vingt culs），俏皮地说：“那我们必须选一下！”日后统治法国时，拿破仑力劝康巴塞雷斯不要嗑那么多药，但他承认，“这是顽固单身汉（vieux garçon）的习惯”，于是他没有再坚持劝说。[43] 拿破仑非常信任康巴塞雷斯，以至于在外征战时就让他管理法国。康巴塞雷斯也回报拿破仑的信任，每天给他寄送报告，其内容涵盖任何可想到的主题。

政变预计分为两个独立阶段。按照原计划，政变第一日为1799年11月7日（周四），即雾月十六日。届时，拿破仑将赴杜伊勒里宫出席上院元老院的特别会议，并告诉议员，英国人支持的阴谋和新雅各宾派的威胁使共和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必须批准元老院和下院五百人院明日

迁至巴黎以西7英里处的前波旁宫殿圣克卢宫开会。由于西哀士预先打通关节，元老院将任命拿破仑为第17军区（即巴黎）总司令。同日，西哀士和迪科会辞去督政之位，阴谋者也会巧妙并用威胁和贿赂，迫使巴拉斯、戈耶和穆兰辞职，这样权力就进入真空状态。于是乎，政变第二日，拿破仑要去圣克卢宫说服立法院。他得告诉议员们，考虑到国家陷入紧急状态，《共和三年宪法》理应废除，西哀士、迪科和他自己组成的三人制执行机关执政府（the Consulate，其罗马风格的言外之意颇为贴切）将取代督政府，然后议会按照西哀士的构想重新选举。西哀士相信他已控制了元老院。如果五百人院不肯自我废黜，新选议长吕西安就解散它。

计划的漏洞很大。首先，政变持续两日，所以阴谋家可能丧失最重要的主动权，但他们也有顾虑。要是不去圣克卢宫，左派议员便能鼓动巴黎郊区和各区捍卫《共和三年宪法》，若在巴黎市中心爆发冲突，政变也许会破产。其次，政变必须保密，以防巴拉斯、戈耶、穆兰采取应对措施，但是阴谋者仍然必须贿赂足够多的元老院议员，以确保次日去圣克卢宫开会的议案能够通过。

最后关头时，某些重要的元老院议员（拿破仑称之为“这些蠢货”）竟对整个前景心生动摇，需要重塑信心，结果整个行动被迫推迟四十八小时，这是政变过程中第一次出岔子。[44] 拿破仑乐观地说：“我给他们留了些时间，让他们相信自己不上阵我也会继续。”他充分利用这个空当劝说儒尔当不要阻拦政变，哪怕对方不会给予支持。他召集巴黎卫戍部队的军官，叫他们11月9日早上6点过来陪伴自己，那天是新的政变第一日。

7日晚上，拿破仑和儒尔当、莫罗在内高卢街（rue Cisalpine）与贝纳多特一家用餐，他试图让另外三位将军对将要发生的事件放心。拿破仑在埃及时，贝纳多特娶了他的前未婚妻、约瑟夫的妻妹德西蕾·克拉

里。此刻，贝纳多特深怀疑虑，冷眼旁观政变，并对拿破仑说：“你会掉脑袋。”后者冷冷地回答：“走着瞧。”[45] 莫罗与贝纳多特相反，他同意帮忙，答应政变第一日去卢森堡宫逮捕督政。儒尔当却固执己见，仅仅表示不会妨碍政变。（儒尔当信奉共和主义，所以他注定不会与拿破仑真正和解，帝国的26位元帅中，也只有他没被拿破仑封为贵族。）[46]

政变前一天，即11月8日，拿破仑对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Horace Sébastiani）上校透露了自己的阴谋。塞巴斯蒂亚尼在代戈之战中负伤，也曾参与阿尔科莱会战，他承诺道，明日上午，第9龙骑兵团任拿破仑差遣。晚上，拿破仑与康巴塞雷斯在司法部进餐，据说他极其放松，还唱了最爱的革命歌曲《新桥》（*Pont-Neuf*）。随员说，他只有“心旷神怡”时才唱这首歌。[47] 当然了，拿破仑可能是演戏给同谋看，背地里的他或许神经紧绷，就像他给拉瓦莱特写信自比“临盆的妇女”时暗示的那样。

1799年11月9日（周五）上午，即雾月十八日上午，天色灰蒙，寒意料峭。早上6点，60名第17军区军官与国民自卫军参谋军士在胜利街庭院集合。拿破仑身着便服，“向他们解释共和国所处的紧急状态，其言辞强势有力。他要他们既声明忠于他本人，又发誓忠于两院”。[48] 他要做的事就是摧毁两院，即便如此，他却提出自己其实想维护它们，这是个妙招。

与此同时，在杜伊勒里宫，由于西哀士的作用，早上8点，元老院已通过所有必需的法令，如任命拿破仑为第17军区与国民自卫军司令，严格来说议员们越权了，因为这道任命状属于战争部长职权范围，而他不向元老院汇报，只对督政府报告工作。[49] 第二道法令宣称，“为了恢复国内和平”，元老院决定将会场从杜伊勒里宫迁至圣克卢宫，并要求巴黎人民保持“冷静”，“不久之后，立法院就会回到你们身边”。[50] 部分元老院议员有反对倾向，但他们根本没有足够重视特别会议（也没意

识到会议开得特别早），这种花招是最古老的政治伎俩之一。戈耶未察觉政变正在进行，抱着轻信的态度副署了元老院令。

拿破仑得知元老院已下任命状，便换上将军制服，骑马驰往杜伊勒里宫。上午10点，他到达目的地，塞巴斯蒂亚尼与龙骑兵已在此待命。新雅各宾党人、新任战争部长埃德蒙·迪布瓦·德·克朗塞（Edmond Dubois de Crancé）特别规定，除非他本人下令，任何人不得在首都调动军队，“违者必处死刑”，但这一点完全被忽视了。元老院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拿破仑，他发表演说，再次呼吁全民一心，收获如潮好评。“你们是国家的智囊，”他奉承议员们，“在这情势下，应由你们指点对策挽救祖国。我代表所有将军向你们承诺，他们将对你们忠心不二。我任命勒菲弗将军为副手。我会忠实履行你们交付我的使命。不应回顾史册为正在发生之事寻求例证，18世纪末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51] 磨坊主之子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François-Joseph Lefebvre）务实勇敢。大革命爆发时，勒菲弗是中士，他也曾在比利时和德意志作战。勒菲弗似乎是革命美德的化身，能让人安心。

当晚，拿破仑骑过革命广场（Place de la Révolution），此地的断头台曾处决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丹东、巴伯夫、罗伯斯庇尔兄弟等很多人，据传他对同谋说：“明天我们要么在卢森堡宫睡觉，要么在这里死翘翘。”[52]

政变第二日为11月10日（雾月十九日）。当天凌晨4点，拿破仑起床，随后骑马前往圣克卢宫。与此同时，欧仁亲自去卢森堡宫送信，弄醒了戈耶。信是约瑟芬写的，她邀请戈耶夫妇上午8点来用早餐，他们若是赴约就会被关在拿破仑家。迪布瓦·德·克朗塞曾指控拿破仑密谋政变，但戈耶不信谣言，因为他问过警务部长有没有新消息，而富歇回答：“新？老实说，没有。”[53] 戈耶也没天真到完全相信此言，他让妻子代替自己应酬，她是约瑟芬的朋友。拉瓦莱特记载，约瑟芬只好“吓

唬戈耶夫人，从而制服她的丈夫”。[54]

上午晚些时候，莫罗来到卢森堡宫，策反宫殿卫队。他逮捕了巴拉斯、戈耶与穆兰，强令他们辞去督政职位。塔列朗和布吕克斯劝说巴拉斯，他们提出，他可以保留大片地产和担任政府首脑的数年中所获全部贪污收入，巴拉斯接受了交易。[55] 戈耶和穆兰顽抗二十四小时，但次日他们签字辞职了。[56] 塔列朗照例靠政变谋利。多年后，拿破仑问塔列朗从哪赚的钱，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再简单不过了。雾月十七日，我买了公债（rentes，政府债券），十九日，我把它们卖掉了。”[57]

拿破仑在圣克卢宫对元老院讲话，但这幕演说秀并不出彩，讲稿读起来比乍一听上去更有效果：

> 你们在火山口上。共和国缺失当局，督政府已然解散，各党派焦躁不安，决策的时刻来了。你们曾召集我和战友们，让我们增进你们的智慧，但时间宝贵。我们必须决定。我知道，我们在说恺撒和克伦威尔，仿佛昔可比今。不，我只希望共和国安宁，我会支持你们的决定。[58]

拿破仑提到自己的掷弹兵，“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了，就在议院门口”。他号召掷弹兵对元老院说说：“我骗过你们吗？在营地中，在物资匮乏时，我许给你们胜利与丰裕；在你们的最前方，我率领你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我可曾背叛自己的诺言？这是为了我的利益，还是为了共和国的？现在就告诉他们。”士兵自然喝彩欢呼，但是元老院议员兰格莱（Linglet）起身高声发言：“将军，我们为你的话鼓掌，那么，请你和我们一同宣誓效忠《共和三年宪法》，只有它能保住共和国。”此言一出，全场“一片死寂”，因为拿破仑掉进陷阱了。他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你们已经没有《共和三年宪法》了，果月十八日，政府试图干涉立法院的独立性，那时你们就违反了它。”接着他提醒他们回想牧月政变，并补充道，既然宪法已遭“破坏，我们就需要新协议、新保障”。他没指出自己正是果月肃清的主要煽动者之一。[59]

元老院听众对拿破仑还算尊重。在宫外战友的支持下，他沿小山上行100码左右，来到五百人院会场橘园厅（palace Orangery）。下院对他的态度大大不同。两日政变间隔让反对派有空组织反击，以图扼杀拿破仑和吕西安将要提出的临时执政府议案。与元老院相比，五百人院的人数是其两倍，院内的新雅各宾党人也多出不少，因此说服下院总要难得多。当天中午，五百人院召开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全院点名，被点到者皆发誓忠于《共和三年宪法》。[60] 点名依字母顺序进行，轮到吕西安、布莱等所有波拿巴分子时，他们都被迫起誓，新雅各宾派喝倒彩，嘲笑他们的虚伪。议员宣誓时也发表简短演说，谈论宪法的光荣史，议院卫队听到了他们的发言。

拿破仑带着军官同谋和其他士兵到达橘园厅。年轻的左派议员看到穿军装的人站在民主议院门口，顿时勃然大怒。拿破仑独自进门，走向讲坛，议员们呵斥他，他走到一半时只好迈开大步。新雅各宾党人让-阿德里安·比戈内（Jean-Adrien Bigonnet）当时在场，他听到拿破仑大喊："我不想要党派主义，这必须结束，我一点也不想要了！"[61] 比戈内回忆道："军队指挥官对立法权代表说话时咄咄逼人，我承认我愤怒了……所有人的表情几乎都说明，他们察觉到了这种危险。"据说拿破仑"脸色苍白，情绪激动，犹豫不决"，看起来似乎有人身危险，勒菲弗与四名佩剑的高大掷弹兵立刻进屋围着他，其中一名掷弹兵不戴熊皮帽身高也超过6英尺，但对议员们来说，此举只是火上浇油。[62]

议员开始高呼："打倒暴君！""克伦威尔！""暴君！""打倒独裁！""剥夺公民权！"（Hors la loi！）[63] 就阴谋者而言，这些喊声暗含凶险的弦外之音，因为恐怖统治才过去五年，那时褫夺公民权常是死刑的前兆，而且最近的"打倒独裁！"（À bas le dictateur！）呼声回响在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上。吕西安试图恢复秩序，他猛敲议长槌，大叫"安静"，但此时已有不少议员离席，他们来到橘园厅下方的主体部分，推挤摇晃拿破仑，冲他发嘘声，扇他耳光，有些人还揪着他的锦缎高领，

勒菲弗与掷弹兵不得不拦在他和愤怒的议员之间。[64]

当天早些时候，拉瓦莱特奉命去橘园厅会场，以便向拿破仑报告那里发生的一切。根据拉瓦莱特的回忆，拿破仑“被议员、他的部下和掷弹兵死死挤在中间……我一度以为他会闷死。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65] 拿破仑最后被挤出橘园厅，掷弹兵托梅（Thomé）还在扭打中扯碎了制服袖子。“他设法来到楼下庭院，”拉瓦莱特回忆道，“在楼梯口上马，派人叫吕西安出来见他。就在这时，议院窗户猛然大开，五百人院议员用手指着他，他们依然大喊‘打倒独裁！’‘剥夺公民权！’。”[66] 另一名目击者泰奥菲勒·贝利埃（Théophile Berlier）议员称：“他离开后，现场人声鼎沸，数声‘剥夺公民权’让场面更加喧闹，他的弟弟吕西安站在讲坛上维护他，但没人听得见他的话。事情大致如此，吕西安被刺痛了，他脱下议长服，离开了房间。”[67] 议员们提出褫夺拿破仑的公民权的议案，为了确保接下来的会议在严格意义上合法，有些人想按住吕西安的身体，不让他离开议长席，但掷弹兵亦成功把他带出橘园厅。[68]

塔列朗的秘书蒙龙（Montrond）后来告诉勒德雷尔，得知五百人院正在表决是否剥夺自己的公民权时，拿破仑的“脸色刷地白了”。[69] 可是这份证言存疑，因为塔列朗和蒙龙仅在宫殿的凉亭远观事态。[70] 科洛也在场，他带了1万法郎现金，以防事态进展不利。西哀士更接近政变中心（虽说他也备好了大马车和六匹马），他保持了理智，争辩道，任何宣布剥夺拿破仑公民权的人本身都被定义为无公民权者。[71] 这正是恐怖统治时期针对贵族捍卫者的理由，此言毫无逻辑，但它鼓舞了阴谋者。

有人指责拿破仑，说他被逐出橘园厅后惊慌失措，半小时后才恢复常态。拉瓦莱特认为，此时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假如“某个小有名气的将军（比如说，奥热罗、儒尔当或贝纳多特）站出来指挥内防部队，事态就难料了”。[72] 据某些非议所言，雾月十九日，拿破仑懦弱无力，

甚至昏倒在地被卫队抬了出来，那天他真的失去了勇气吗？[73] 厮打必定令人气恼，但是和大腿中矛、目击副官被加农炮射杀相比，它只是小巫见大巫。“我宁愿跟士兵说话也不和律师交谈，”次日，拿破仑谈及五百人院时称，“我还不适应议会，也许以后会好转。”[74]

议员们的野蛮回应令拿破仑大吃一惊，有说法称，他惊恐万状，把一切都交给吕西安，但这夸大了事实。拉瓦莱特说，他看到拿破仑“在一间寓所里踱步，室内家具只有两把椅子，他坐立不安”，然后对西哀士说，“‘现在你看到他们在搞什么了吧！’”，“他用马鞭抽地”，大喊“‘这必须结束！’”。虽有这段叙述，但此事发生在政变第二日他在元老院演说之前，而非他在五百人院讲话之后，所以它只能证明拿破仑失望焦躁，完全不能说明他懦弱。[75] 拿破仑逃出/被逐出橘园厅后，阴谋者利用这段时间制定紧急方案，吕西安一从宫里出来，计划就将付诸实行。这半小时中，他们等待吕西安露面、集结同党、散播拿破仑与议员扭打一事，并准备劝说立法院卫队支持政变。

奥热罗是五百人院议员，但他暂时保持中立。值此危急关头，他从会场走到战神长廊（Gallery of Mars），不太客气地对拿破仑说：“你蹚的水真深哪。”后者回答：“那又怎样，阿尔科莱的水深多了。”[76] 拿破仑后来回忆，他甚至威胁奥热罗道：“相信我，不想倒霉的话就闭嘴。不出半小时，你就能看到结果。”[77] 不论哪句回答更贴近实情，它们都暗含一个事实：拿破仑自知搞砸了政变第二阶段的开头，并陷入困境，但他很可能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大惊失色、一蹶不振。[78] 此外，两种回答都暗示了他打算逆转局面。

政变下一步是争取议会卫队支持，卫队共400人，由让-马里·蓬萨尔（Jean-Marie Ponsard）上尉指挥。拿破仑没有独自说动卫队，倒是靠一幕纯戏剧促成了倒戈。此举也许是蓄意的，甚至可能预先排演过。1794年，就在被捕前夕，拿破仑致信法国驻热那亚领事蒂利，谈及奥古斯丁

·罗伯斯庇尔：“但若他渴望暴政，要是他是我兄弟，我会亲手刺死他。”[79] 这幕戏剧与此言惊人地相似。五年后的现在，吕西安正好亮出一模一样的观点。他跳上马背，鼓动卫兵，声称五百人院的一小撮狂热分子被英国黄金买通，正恐吓大部分议员。接着他拔剑直指拿破仑胸口，高喊：“我发誓，只要我的亲哥哥想损害法国人民的自由，我就刺入他的心脏。”[80] 这句承诺有多夸张就有多虚伪，但它起效了。（在滑铁卢会战前，这也是拿破仑的兄弟们最后一次证明他们对他来说并非全是负担。）

至少一份很久之后的记录记载道，拿破仑对蓬萨尔说：“上尉，带上你的连，立刻驱散这次煽动叛乱的集会。那些人不再是国家代表，而是国家所有不幸的卑鄙的始作俑者。”蓬萨尔问若有反抗怎么办。“使用武力，”拿破仑回答，“甚至是刺刀。”“那就够了，我的将军（mon général）。”[81] 夏尔·勒克莱尔将军（他娶了拿破仑的妹妹波利娜）、缪拉（他和拿破仑的另一个妹妹卡罗琳订婚）、贝西埃、第8战列步兵半旅少校纪尧姆·迪雅尔丹（Guillaume Dujardin）、勒菲弗、马尔蒙等军官谴责据说被英国黄金收买了的律师政客，蓬萨尔的士兵于是不干别的，直接清场。议员们高呼“共和国万岁！”，呼吁诉诸法律与宪法，但士兵无视他们。[82]

“才过半小时，”贝利埃回忆道，“伴着一阵巨响，会场一扇主门洞开，我们看到缪拉带着装好刺刀的军队冲进来撵人。”部队入场后，议员约瑟夫·布兰（Joseph Blin）、路易·塔洛（Louis Talot）及比戈内（某说法称还有儒尔当）恳求士兵违抗长官命令，但他们不听。[83] 很多议员害怕被捕，逃出场外，传说有人从橘园厅一楼跳窗。拉瓦莱特记载道，他们“脱下罗马长袍和方帽，因为隐藏身份后逃跑更容易”。[84] 掷弹兵是推翻宪法的关键人物，但他们看待这一点时好像没有一丝不安。一边是很多掷弹兵曾随之征战的军官，而且所有人都在军营中听说这些人是从埃及归来的英雄，另一边是掷弹兵的民选代表，他们认为前者的

命令更优先。是遵从这些巨人的宣言，还是听从橘园厅中叫嚣着逮捕他们的政客，掷弹兵会选择谁毫无悬念。前战争部长皮埃尔·德·伯农维尔（Pierre de Beurnonville）到场支持拿破仑，更是促成倒戈。当月末，拿破仑赠予他一对手枪，上刻："圣克卢之日，共和八年雾月十九日。"勒菲弗与贝西埃也收到了类似的礼物。[85]

政变第二日将近时，吕西安尽量在橘园厅内集中他能找到的支持政变的议员，一直忙到深夜。到场议员人数说法不一，但似乎是50人左右，仅占下院总人数的10%。[86]"督政府经常企图越轨与犯罪，"议员们颁布法令，"故对其予以废除。"[87]议员按序任命西哀士、迪科、拿破仑为临时执政，并指出前两人是前督政。这体现了宪政连续性，不管那有多么虚伪。吕西安在五百人院中的余党提议两院休会四个月，最终结果却是永久闭会。他们还下令将61人逐出立法院，其中大多数人是新政权的反对者新雅各宾派，虽说只有20人遭流放。[88]两院各选2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起草新宪法，而所有人都认为西哀士已经写好了宪法。

政变支持者称，橘园厅中有人举起匕首刺向拿破仑，真有此事吗？很多相关的说法蕴含高度政治动机，彼此冲突，所以我们实在无法下定论，不过当天，不管是拿破仑还是谁，没有一个人流血，鉴于这个重要原因，刺杀的可能性实在寥寥。很多人携带小刀，但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应付削羽毛笔、剥牡蛎等日常需要。五百人院制服是仿照罗马长袍的蓝色天鹅绒长斗篷，方便藏刀。吕西安和马尔蒙当然告诉部队拿破仑遭匕首袭击。拉瓦莱特指名道姓，称科西嘉议员、反波拿巴分子巴泰勒米·阿雷纳（Barthélemy Aréna）挥舞着匕首，不过貌似只有他看见了匕首。［雾月二十三日，阿雷纳给《共和党日报》（*Le Journal des Républicains*）写信，指出自己当时在会场另一端，但他还是逃出法国以防不测。］[89]1814年，关于政变一事的早期反拿破仑论述出版。这部四卷本作品写道，会场中人高叫"克伦威尔"与"独裁者"，"五十名议员冲进场内，围住他、推挤他、和他说话，似乎推得他退后，其中一人

拔出匕首，不小心划伤离将军最近的掷弹兵的手。他丢掉武器，消失在人群中”。[90] 作者没有解释如何在那种局面下不小心用匕首划伤他人，而且掷弹兵托梅好像也没受划伤，他只是在扯碎袖子时稍微被刮了一下。[91]

匕首之说源于雾月二十三日（11月14日）的《箴言报》，那时波拿巴派已完全掌握政府的宣传机器。再无别的报刊提及此事，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的匕首袭击仍然有力地证明了驱逐议会的正当性，没过多久它就成了印制版画和版画的主要题材。例如，不到一年，印制版画《波拿巴在立法院》就在伦敦发表，画中愤怒的议员挥舞匕首，试图谋杀拿破仑，而他勇敢地面对他们。“波拿巴将军表示，”11月11日，拿破仑下达当日公告，“英勇的掷弹兵特别令他欣慰。眼看将军要被手持匕首的议员击倒时，他们救了他一命，令自己身环荣誉。”[92] 托梅成了英雄，他获得600法郎终身津贴。三天后，他在午宴上受赠价值2000埃居的钻戒和约瑟芬的香吻。[93]

真正的问题或许应该是这样——为什么连一个拔出匕首捍卫宪法的人都没有？就算圣克卢宫没有匕首，至少回巴黎后该有了吧？只要督政府或五百人院稍得民心，当晚巴黎就会有人抗拒政变，法国其他主要城市在获知消息后也会反抗。可事实是，没人应召前来保卫它们，没人为它们开一枪。圣安托万郊区（Faubourg Saint-Antoine）等工人阶层区对督政府并无感情，未能起义。事实正相反，从政变前一日到政变一周后，证券市场上利率为3%的公债价格从11.4法郎涨到20法郎。[94] 远离巴黎的部分地区有抗议，如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汝拉省（Jura）、东比利牛斯省（Pyrénées Orientales）的当局曾表示不安，但没人有心思同执政府和拿破仑内战，反对之声很快就平息了。

由于督政府正节节失利并摇摇欲坠，因此雾月政变的关键不在于推翻它，而在于立法院的两院与《共和三年宪法》实际上被废除。虽然督

政府不受欢迎，可立法院并未深受影响；新雅各宾派也算不上大的威胁；国家形势同样也并不危急。然而，西哀士和拿破仑成功地关闭元老院和五百人院，且未遇普遍抵抗。十年大革命后，法国人急求领导力，他们意识到议会程序与几乎不可能修改的宪法阻碍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愿意暂时抛开代议制政府，好让拿破仑和他的同党斩开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巴黎的公众舆论肯定不关心拿破仑是否靠武力上台。军官看重命令、纪律与效率，拿破仑认为此三者皆重于自由、平等与博爱，当时的法国人民亦表赞同。他将向法国献上关于国家胜利的故事，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些督政知道怎样不去管国民的想象力”。[95] 虽然胜仗是拿破仑的部分魅力，但法国被战争折腾得筋疲力尽，所以他带来的和平条约也属于他的吸引力。

在那个年代，“政变”是相当常见的政治术语（热月清洗就被称作政变），而且雾月事件当然是政变，但那时它不叫政变。对当时的人士来说，雾月政变仅仅叫“那些天”（les journées）。这次政变有不少戏剧化的因素，如吕西安拔剑指向拿破仑胸口、托梅很可能因为子虚乌有的匕首袭击获赠钻戒等，尽管如此，新雅各宾派已经证明他们比拿破仑预期的更顽强，只要立法院卫队稍稍忠于五百人院，阴谋者就会陷入极大的险境。雾月政变后第二天，为了实现自己的预言，拿破仑和约瑟芬住进卢森堡宫，他们的房间原是戈耶的寓所，位于卢森堡宫一层、沃日拉尔街主广场右侧。五年之前，约瑟芬曾在圣约瑟夫-德-卡姆教堂与死神为邻，该地距她现在的居所仅有100码。

---

[1]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71，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83

[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7

[3]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8

[4]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3

[5]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274，Mossiker，Frances，*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64，pp.195-200，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p.248-51

[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1

[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4，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0 p.305

[8]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3

[9] Adams，Henr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967，Ⅰ ch.14，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p.73-4

[10]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Ⅳ p.257，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3

[11]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50

[12]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48

[1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64 p.1090，October 31，1799

[14]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0

[1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14，Lefebvre，Georges，*The Directory* 1964，p.213

[16]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

[17] 策肋定剧院位于里昂，此事发生在拿破仑返回巴黎途中。——译者注

[1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1

[19]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3

[20]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p.230-31，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p.188，Crook，Malcolm，*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91，p.188，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254，Vandal，Albert，*L'Avènement de Bonaparte* 2 vols.1907，Ⅰ pp.8ff

[21] Bertaud，Jean-Paul，*Bonaparte prend le pouvoir* 1987，pp.188ff

[22]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 Ⅰ p.271

[23]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Ⅰ p.218

[24]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 Ⅱ p.17

[25]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4

[26]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53

[2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Ⅰ p.223

[28] Lefebvre，Georges，*The Directory* 1964，p.214

[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 ，1858，30，p.311

[3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73

[3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 ，1858，30 p.311

[32] Sparrow，Elizabeth，*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2013，p.131

[33] Cole，Hubert，*Fouch* é 1971，p.121，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47

[34] ed. Plenel，Edwy，*Joseph Fouché*，*minister de la police* 1993，p.ix

[35] Zweig，Stefan，*Joseph Fouch* é 1930，p.146

[3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5n

[37] 即沙普信号塔，参见第二十一章注释。——译者注

[38]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Ⅳ p.40

[3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 Ⅱ p.18，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 ，1858，30 p.307

[4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 ，1858，30 p.306

[41]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146

[4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59

[4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

no.15126 p.562，April 6，1807

[44]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5

[45]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234

[46]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36

[47]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4，Goodspeed，D.J.，*Bayonets at St-Cloud* 1965，p.107，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23

[4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5，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0 p.306，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1，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1

[49]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15

[5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0，p.315

[51] 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216

[52] Gueniffey，Patrice，*Le Dix-Huit Brumaire* 2008，p.15

[53] Gueniffey，Patrice，*Le Dix-Huit Brumaire* 2008，p.16

[5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5

[55] 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2

[56] 穆兰返回军队，效忠拿破仑；戈耶回自家庄园隐居，后来担任拿破仑的驻荷兰大使。

[57] ed. Broglie，Duc de，*Memoirs of the Prince de Talleyrand* 1891，p.ⅹⅷ n.1，Harris，Robin，*Talleyrand* 2007，p.113

[5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0 p.380

[5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0 p.381

[60] 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2

[61] Bigonnet，M.，*Coup d'état du dix-huit Brumaire* 1819，p.23

[62] Aulard，François，*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p.699

[63]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

[64] Sciout，Ludovic，*Le Directoire* vol.4 1895，Ⅳ pp.652-3

[6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7

[6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7

[67] Berlier，Théophile，*Précis de la vie politique de Tbéophile Berlier* 1838，pp.68-9

[68]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7，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Ⅰ p.225，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2

[6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Ⅰ p.224，Roederer，*Oeuvres* Ⅲ p.302

[70] Boissonnade，Euloge，*18 Brumaire An* Ⅶ 1999，p.93

[7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Ⅰ p.225

[72]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1

[73]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17

[74]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87

[7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6

[7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 Ⅰ p.234

[7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 ，1858，30 p.319

[78] Schlabrendorf，Graf Gustav von，*Bonaparte and the French People* 1804，pp.13-16

[79]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232 p.196，August 7，1794

[80]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p.5

[8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 Ⅰ p.239

[8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Ⅰ p.225

[83] Aulard，François，*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p.699

[8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77

[8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90 p.1103 n.2，December 7，1799

[86]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Ⅱ p.21

[87]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p.17-18

[88] Crook，Malcolm，*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p.3，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6，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2

[89] Lentz，Thierry，*Le 18-Brumaire* 1997，p.328

[90] Gallais，M.，*Histoire du Dix-Huit Brumaire* 4 vols.1814-17，Ⅰ p.90

[91] Lentz，Thierry，*Le 18-Brumaire* 1997，p.327

[9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270

[93] 议员奥古斯特-路易·珀蒂耶（Auguste-Louis Petiet）之子后来说，托梅的袖子只是缠到了战友的武器上。Lentz，*18-Brumaire* ，p.329；Sciout，*Le Directoire* IV，p.652，n.1.

[94]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3

[95]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243

第二部 文治武功

第十章 执政

若他撑过一年，他将长握权柄。

——塔列朗论拿破仑的执政之位

领导民众时……应不露声色。

——1804年9月，拿破仑致富歇

1799年11月11日（周一）上午阴雨连绵，10点时，六名龙骑兵护送拿破仑至卢森堡宫。他身着便服，在前督政会议室中着手建立临时执政府（provisional Consulate）[1]。[2]前一天他完成了雾月政变，现在他急于尽快发起二次政变，以便推翻首要的同党。1791年和1793年，西哀士为法国起草了两份宪法，他拟出的第三份宪法充斥着分权制衡机制，拿破仑认为它不能捍卫大革命。拿破仑后来描写西哀士道："此人只会纸上谈兵，他不了解人性，不懂如何发动人民。他的学识总是把他引向形而上学层面。"[3]

三执政首次开会时，迪科对拿破仑说："不必选举主席，你有权居首。"[4]西哀士闻言皱眉，拿破仑便提出折中方案，建议三人按姓氏字母顺序轮流当二十四小时首脑（也就是说他先当）。于是他坐在了桌子中央的大椅子上，那里原是督政府主席之位，后来他天天坐那。"来吧，"他催促迪科与西哀士，"宣誓吧，我们很急的。"[5]执政会议虽是执政府核心，但毕竟只有三人参加，所以谁是主席几乎不重要。大部分

议题常是拿破仑想出的，他也推动这些话题向前进展。

政变后第二天，市内张贴拿破仑的相关发言。他描述了政变，称“二十个刺客冲我胸口扑来”，并呼吁国民团结，但他没提迪科和西哀士。布告写道：“赶走煽动者后，稳定、保护与自由的思想已各自回归恰当的位置。”这番话迎合了法国人，他们厌倦了督政府，认为常胜将军管理的当局不会比它还差。[6]

拿破仑的宣传人员忙了一夜，他们印刷布告，在巴黎全城张贴，但西哀士派没有这么积极。奉命起草新宪法的五十人临时委员会内部又组成七人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布莱·德·拉默尔特去西哀士的公寓受领宪法，但西哀士能给他看的只是一捆笔记。于是两人坐下，拟出第一份草稿，后来前吉伦特党人、宪法专家皮埃尔·多努（Pierre Daunou）继续完善它。[7] 没过多久，勒德雷尔警告拿破仑，称西哀士计划让另外两名执政分主内外，并设置“大选长”（Grand Elector）监督他们。复杂的分权体系中，“名流”（notables）掌控参议院，只有他们可以罢黜大选长。[8] 西哀士显然自比哲学王，而迪科与拿破仑都是他的执政，一个处理内政一个统帅外军。这与拿破仑对情势的看法截然不同。[9]

五周之后，伴着鼓号齐鸣声，《共和八年宪法》在巴黎各大公共场所宣读。之前这段时间，雾月党人组成的各种非正式委员会或附属委员会激烈讨论宪法。争论期间，多努认为权力应当更集中，吕西安与布莱领导的波拿巴派把他拉入己方，并彻底智胜人数较少的西哀士派。康巴塞雷斯及时转投拿破仑阵营，帮了大忙。布莱最后对临时委员会明言，他们的“使命”是让拿破仑当第一执政，授予他十年决策权，而且他们不能安排什么“大选长”监督他，只需为他设置顾问机构国家参政院，立法动议权将归它专属。[10] 新宪法第41款规定：“第一执政颁布法律，自主任免国家参政院参政、公使、大使等首席驻外使节，以及海陆军军官、地方行政机关人员、政府驻法庭特派员。”[11] 第一执政还有缔约权，他

将住在杜伊勒里宫，领50万法郎年薪，这是大使薪水的50倍。实权在何处一开始就一目了然。第二执政与第三执政也住杜伊勒里宫，但作为宪法遮羞布，他们只领15万法郎年薪。

为推广新政权，并“结束革命”（政府自己的说法），执政府签署了大量法令：凡尔赛宫移交给伤兵居住；废止反流亡者的邪恶法律，拿破仑亲自去圣殿塔监狱释放人质；禁止警察骚扰归国流亡者或强迫他们“贷款”；把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与葡月一日（革命历元旦）设为公共假日。伤兵以及军人的遗孀与遗孤将受领抚恤金。拒宣誓派教士不再因为拒绝发誓效忠宪法而被驱逐出境。尽管美法之间仍进行准战争，执政府依然下令为乔治·华盛顿哀悼整整十日，而缅怀“美国辛辛纳图斯”的公开悼文对比了华盛顿和拿破仑的相似之处。[12] 拿破仑也没忘记临行前给克莱贝尔的承诺，他对新任内政部长、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侯爵下令，只要有船可用就送“一个喜剧班子”去埃及。[13] “新生政府必须新奇耀眼，”当时，他对布列纳说，“它平庸黯淡之日即是垮台之时。”[14]

正因为拿破仑是军人、雾月政变是军事政变，拉普拉斯这种卓越的科学家就任如此高位一事便能说明执政府显然不是军事独裁政府。塔列朗重任外交部长。政府只招纳了一名军人，即新任战争部长亚历山大·贝尔蒂埃。[15] “如果三四年间，热病让我死在床上，”次年拿破仑告诉勒德雷尔，“我就警告国民谨防军政府出现，我会叫他们任命平民裁判官。”[16] 不出所料，富歇就任警务部长。马丁·戈丹（Martin Gaudin）担任财政部长，此人是管理国库的前朝高官，从路易十六时代起，他侍奉过所有政权。戈丹马上着手改革太过复杂的法国税法，降低税率。财政管理权从地方政府集中到财政部，整个公共会计体系也终于实现了集权化。[17] 军饷原由各省支付，拿破仑很快建立起中央军饷给付系统，这是他及时打破官僚体制并毫不迟疑地实施急需的改革的经典例子。

三执政的名字将写入新起草的《共和八年宪法》，供国民知悉，1800年2月，宪法会交付全民公决。12月13日，宪法委员会召开最终会议。会上，拿破仑请西哀士提名执政人选。西哀士已收取凡尔赛宫外面的地产、一幢巴黎住宅（由国家付款），据说还拿到了35万法郎现金，于是他如预期的一般提议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康巴塞雷斯任第二执政、律师兼前议员夏尔-弗朗索瓦·勒布伦（Charles-François Lebrun）任第三执政。勒布伦永远见风使舵，在他的年代，除了雅各宾派，他投靠过所有党派。西哀士自己只分到了参议院议长职位，迪科则任副议长（他让出临时执政后得到10万法郎）。拿破仑的第二次政变比第一次稍长，但同样是不流血的胜利。预定在次年2月举行的正式全民公决将赋予执政府它所需要的合法性，但拿破仑从不怀疑自己统治法国有违道义。正如他提到尤利乌斯·恺撒时所言："在这种态势下，既然审议机构议会已无力统治，恺撒本人就保障着罗马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各党派公民的安全，所以他的独裁合法。"[18] 1799年，拿破仑对法国政府也持同样态度。

"法兰西人民！"12月15日，拿破仑发表宣言称，"一份宪法呈现在你们面前，它将结束共和国内政和军事形势（中的）……不稳定要素……宪法基础是代议制政府的真正原则，是神圣的财产权、平等权与自由权……公民们，大革命事业已经建立在发起它的原理上，它结束了。"[19]

拿破仑把财产权置于平等权与自由权之前，这表明他专注于维护商人、雇主、奋斗者与国有财产所有人（即努力经营桑树园等小产业的人）的权利。这些人是法国的脊柱，他理解他们的牵挂与需要。宪法全文共95条（其长度不及上一份宪法的四分之一），其中第94条明确规定，大革命期间君主国、教会、贵族失去或售出的财物与土地永远不会奉还原主。1802年及1804年，拿破仑重申上述承诺，但他没有许诺继续进行再分配。他提到平等时指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经济地位平等。军队是拿破仑最有力的天然支持者，它从政变中获益良多。军中饷

银增加、待遇改善、津贴提高，士兵也有望分得土地（不过似乎没人拿到那6阿庞）。延迟承包商受款时间的法律也被撤销了，他们很快收到全额给付的资金。

12月下旬，拿破仑日后的统治机构正式成形。国家参政院在卢森堡宫有会场，22日，他们在那儿举行就职典礼。参政院是法国新政府的主要审议部门，负责向第一执政提建议，并辅助他起草法律。很多国家参政是第一执政任命的对政事不感兴趣的技术专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他本人控制。50名参政中只有6位军人。只要参政们尊重拿破仑，他就请这些人在自觉必要时畅所欲言，并鼓励他们互相争论。新宪法授予国家参政院行政诉讼终审权与立法院议案文本先行审查权，这些职权一直保留到了今天。部长是参政院临时成员，若议程涉及自己的职责，他们就会列席会议。

12月25日（直到1802年，法国官方历才承认圣诞日）早上8点，《共和八年宪法》生效。宪法印刷本序言是布莱的讲话，他辩称，法国公民大众渴求的共和国既非“旧王朝（Ancien Régime）专制政权，亦非1793年暴政”。[20] 布莱说新宪法可以用一句格言总结：“信心来自下层，权力来自上层。”[21] 根据宪法，第一执政连任十年，掌握政治与行政大权，任期之中，另两名执政担任他的顾问。元老院最多有80人，先选60人，以后每年增选2人，议员“终身任职，不受侵犯”。元老院在四轮选举产生的全国名单中选择执政、300名立法院代表、100名保民官。最重要的是，元老院多数人通过的声明——元老院令（sénatus-consultes）——享有全部法律效力，尽管颁行它们的初衷只是修宪。

保民院将讨论第一执政和参政院制定的法律草案，但无权表决，立法院有权表决法律案，但无权讨论。保民院能够讨论执政府送来的立法案，并可将意见告知立法院，每年立法院要在至多四个月内开会考虑保民院的意见。只有元老院有权修宪，但三议院皆无权创设或变更法律。

拿破仑借这些举措确保议会权被拆分、各机构权限较小，自己则保留了大部分权力。

公民仍可选举首轮立法院代表候选人，尽管最终人选仍由元老院决定。一轮选举后，每个公社中10%的成年选民当选“公社名流”；各组“公社名流”分别举行二轮选举，其中10%的人当选“省名流”；“省名流”举行三轮选举，其中5000～6000人当选“国家名流”；“国家名流”中将有400人担任立法院代表与保民官。事实证明，此前的议院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了。60名元老院议员、100名保民官以及300名立法院代表中分别有38位、69位和240位前议员。[22] 他们的经验能派上用场，因为拿破仑正在巩固革命成果、修正革命方向、终结大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23] 特别复杂的宪法尤其是立法机关的三重投票系统非常适合拿破仑，因为他有充分的机会筛除反对意见。[24]

新宪法有大量安抚国民的条款：除非发生火灾与水灾，公职人员不得擅入法国公民住宅；若无审判，公民的最长在押期为十日；“拘捕中施加残酷行为”构成犯罪。[25] 1800年1月1日（根据革命历，这一天是共和八年雪月十一日，无甚特别意义），立法院与保民院首次开会。

立法机关的自由受限，但不能仅据此认为拿破仑政权不听谏言。请愿者总有机会发表意见。各省之中，省参政院（conseil de préfecture）和省议会（conseil généraux）的争论常具适度的开放性，尽管它们对政府政策没多少影响。[26] 拿破仑政权还算听取人民的怨言，它只是不给他们任何放大非议的手段。政坛上也很难出现协同的反对行动。

上任第一周，第一执政拿破仑就致信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提议媾和。“我冒昧提出，这场战火已烧遍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命运都与它的终结息息相关。”他如此告诉英国国王。[27] 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Grenville）勋爵回信称，拿破仑应让波旁复辟，他便答道，照此原则，英国应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他确保法国境内广泛

传阅格伦维尔阁下的信，此举巩固了执政府背后的支持。[28] 1799年9月下旬，第二次苏黎世（Zürich）会战爆发，马塞纳击败俄军，俄国遂退出第二次反法同盟。此后，奥地利开始与法国议和，和谈持续数月，但并无进展。当春天的新战季来临时，奥军已准备好力夺热那亚、入侵法国东南部。

弗朗索瓦·贝茨（François Beyts）原是五百人院议员，雾月政变时，他和另外60名议员被逐。“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召集人民大众，”拿破仑致信贝茨，谈论法国政治派系道，“近十年来，党派主义催生保王党、朱安党、雅各宾派、弗扬派等无数党派，法国公民的简单称呼比它们珍贵得多。这些党派把国家推入深渊，拯救它的时机终于来了，我们可以一劳永逸。”[29] 贝茨被说动，次年3月，他就任卢瓦和谢尔省（Loir-et-Cher）省长。然而，拿破仑无法吸引所有人，他也苛待质疑国民团结政策的人。某位前雅各宾派将军将到达里尔（Lille），当地市长不太想欢迎他，拿破仑驳斥道：“不得斗胆再提此言，难道你没发现我们都一样为法兰西效力吗？先生，我告诉你，雾月十七日与十八日，我竖起一面铜墙，没人能透过它回顾过去。所有回忆都得在这堵墙上撞得粉碎！”[30] 大革命开始后，执政府是第一个未彻底清洗前政府的新政权。三年后，立法院的确驱逐了反对派，但法国人不会再因政见而招来断头台之祸。

拿破仑的铜墙政策为他的政府广开言路。所有党派都参政，只有新雅各宾派除外。尽管他自己是雅各宾分子，抑或正因为这一点，他意识到，或许不少前雅各宾党人拥护他的事业，但新雅各宾运动本身将在意识形态层面反对他。抛开往日政治立场，促进国民团结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归顺（ralliement，字面意义为争取），尽管有些人加入拿破仑政权是出于自私动机，但很多人见到他改造法国的举措后就在爱国真情的驱使下归顺。[31] 另一政策融合（amalgame）与归顺相关，与单纯的支持不同，它旨在为政权注入积极的热情。[32]

凭借这些政策，拿破仑为他的政府网罗了一大批能干的公职官员。这些人由康巴塞雷斯（弑君者）领导，包括：路易-马蒂厄·莫莱（Louis-Mathieu Molé，保王党人，其父被送上断头台），后任司法部长；让-艾蒂安·波塔利斯（Jean-Étienne Portalis，反对督政府的稳健派人士），处理宗教事务；让-艾蒂安之子约瑟夫-马里（Joseph-Marie Portalis），与其父一样能干；科学家让·沙普塔尔（Jean Chaptal，吉伦特党人），后任内政部长；军事管理人员让-热拉尔·拉屈埃[33]（Jean-Gérard Lacuée，稳健派人士）将军；国家参政安托万·蒂博多（Thibaudeau，又一名弑君者）；警察局的艾蒂安-德尼·帕基耶（Étienne-Denis Pasquier，稳健派人士，其父被送上断头台）；国库部长尼古拉-弗朗索瓦·莫利安（Nicolas-François Mollien，路易十六的前大臣）。“人尽其才的艺术，”拿破仑告诉莫利安，“比用人艺术难得多。”[34]果月政变时，拿破仑赶走了卡诺，但他明白卡诺有非凡的才干，1800年4月2日，他任命卡诺为战争部长。贝尔蒂埃则调任预备军团司令。[35]

由于稳定、高效与完全竞争的新氛围，雾月政变后一周内，法郎兑美元、法郎兑英镑的汇率翻了一倍。100法郎政府公债价格本已跌至12法郎，1800年1月，它骤升至60法郎。财政部长马丁·戈丹迫使税务机关取得预计收益前先存款，凭借这道命令和其他措施，两年后他实现了收支均衡。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这是法国第一次达至平衡预算。[36]

拿破仑掌权后即言明，1800年1月末至2月初，政府将在所有法国公民中举行长达数日的全民公决，借此赋予新的《共和八年宪法》合法性。所有成年男性都能通过在登记簿上签字来投票。为了确保赢得公决，12月，拿破仑让吕西安接替拉普拉斯任内政部长。2月7日，吕西安正式公布全民公决结果，称3011007名法国人投票赞成《共和八年宪法》，仅1562人反对。[37]因为天气不好、农村人口缺乏交通工具等原因，只有25%的法国人参与了投票，即便投票率低，要说99.95%的法国

人赞成宪法当然仍显可笑，重要原因之一是南部和旺代省尽是保王党人。[38] 比如在土伦，官方声称有830人投赞成票，仅一名雅各宾派鞋匠投反对票。

国家档案馆藏有400多捆选票，它们清楚地证明吕西安书写选举结果时系统性造假。2月4日，他命令内政部停止计票，因为三天后他要公布总票数。因此，政府没有统计西南地区的选票，仅仅根据科西嘉省等25个省的已知计票结果推算出它猜测的票数。[39] 24省总票数与约讷省（Yonne）票数中各有8000张、16000张赞成票纯属吕西安手笔，于是，光是西南地区，他就多算了20万张赞成票。他给东南地区的省加了7000张赞成票，又给东北地区的省加了7000～8000张。吕西安甚至懒得用特殊数字造假，他只会整千整万地加票，好让赞成票数超过300万。2月4～7日，他一共加了约90万张赞成票。[40] 军中共有556021人赞成，无人反对，这两个数字纯属捏造。海军总计投了34500张赞成票，但一条船上经常只有军官投票，计票时又把剩下的人算了进去。真实结果很可能约为155万张赞成票对几千张反对票。[41] 所以拿破仑赢得了民主合法性，但到目前为止，他的胜利不仅远没有宣称的那么大，事实上还不及1793年罗伯斯庇尔的全民公决成绩。[42] 就连吕西安篡改的数字也早就被地方官改过了，不论谁在巴黎掌权，取悦当权者都是他们的重要工作。无人细查官员，投票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而且选民非常容易遭到威胁。有一半选民是文盲，但他们仍有资格投票，所以市长替他们填写选票。

吕西安篡改数据一事提供了观察拿破仑传奇最典型特征之一的绝佳视角。拿破仑总是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便如此，波拿巴派还是忍不住夸大数字，于是反对派（新雅各宾派、保王党、自由派、稳健派等派系）便在其沙龙和地下组织中争辩道，整个公决都是假的。拿破仑和他的宣传人员往往只是在不必要的事上搞得太过，如调整战场折损人数、添加档案中的文件、杜撰意大利军团演讲、更改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描

画拿破仑骑着用后腿站立的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结果真实的伟绩却招来奚落与非议。

剿灭乡间盗匪是执政府最受欢迎的政策之一。拿破仑认为，“警务之道在于少罚重罚”，但是匪徒威胁遍布法国广袤领土，为了消灭他们，他倾向于经常施加重罚。[43] 盗匪可能是保王党叛军（法国西部与南部尤多）、成群逃兵或逃兵役者、逃犯、路匪、纯暴徒，抑或是所有这些人的组合。旧王朝、公共安全委员会、督政府也曾在乡村整饬地方法纪败坏现象，但只有执政府才把能用的手段全都用了，也只有它成功了。拿破仑拘留涉嫌实施盗匪犯罪的人，抑或把他们驱逐出境，已定罪者则会被处死。这些罪犯常有令人讨厌的名号，如“魔龙”“打死”“基督徒的小屠夫”，他们袭击孤立的农舍，抢劫马车和独行的旅人。

1798年4月，宪兵（gendarmerie）或者说准军警成立，这支队伍共有10575人，但拿破仑重组宪兵，他将其扩编至16500人，及时支付高额军饷，提升军中士气，并涤清腐败现象。[44] 此前步行的巡警队配备马匹，且人数增加；特别法庭与军事委员会若有间接证据便可将嫌疑犯斩首，嫌疑犯也无权委托辩护律师；大批流动部队接受派遣，并以简易程序裁决案件。1799年11月，法国约有40%的领土实施戒严，但不出三年，境内出行又安全了，商贸也得以恢复，就连拿破仑的意大利胜绩也不比此事更得民心。[45]

1800年3月，执政府撤换了3000多名法官、公诉人以及院长与其任命的人。撤职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政见，倒不如说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来这些人不精于实务，二来拿破仑急着赶走年老、腐败或无能的律师。因为工作积压，七个月后司法系统才重新顺利运转，但此后司法操作有了改善。[46]

拿破仑一宣布大革命结束便力图消除一些更能象征革命的元素，令人取下装饰教堂尖塔和公共建筑的红色无边软帽[47]。“先

生”（Monsieur）、“夫人”（Madame）取代了“公民”（citoyen）、“女公民”（citoyenne）。圣诞节与复活节恢复了，1806年1月1日，革命历终于被废除。拿破仑一直在乎命名学的力量，于是他将革命广场（原路易十五广场）改名为协和广场，并拆毁当地的自由女神巨像。“协和，”他后来写道，“使法国战无不胜。”[48] 他热衷改名一事还有旁例可证：他创造的内高卢共和国改称意大利共和国；英格兰军团改称大军团（Grande Armée，1805年）；统一广场（Place de l’Indivisibilité）——原王家广场（Place Royale）——改称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执政府时期，拿破仑自己的文风也有微妙的改变。大革命期间，他会写“始终不渝”（inaltérable）、“清正廉明”（incorruptible）等陈词滥调，现在他用词更加透彻，如“大”（grand）、“严”（sévère）、“智”（sage）。[49]

接下来，拿破仑劝说流亡者（大革命时代逃走的贵族、资产所有人、保王党人、教士）回国，条件是他们肯定不能指望取回财产。他最终恢复了流亡者的选举权与公民权。[50] 大革命时期，禁止入境的流亡者多达10万人，1800年10月，拿破仑在名单中删去48000人，1802年4月，名单上仅剩1000名不肯妥协的保王党人。很多旧王朝贵族疏远拿破仑，但不少知名贵族愿为他效力，如塞居尔伯爵、吕讷（Luynes）公爵、纳博讷（Narbonne）伯爵、布罗伊（Broglie）公爵、塔列朗及莫莱。支持者中亦有1789年的底层贵族，如马尔蒙、雷米萨（Rémusat）、贝尔蒂埃、勒德雷尔。1803年5月，约有90%的流亡者回国，严重打击法国的大规模人才流失局面遂有好转。[51] 1800～1814年，拿破仑一共任命了281名省长，其中110人（在总人数中占到39%）是旧王朝贵族。[52]

拿破仑既迎合国外保王党，也安抚旺代保王党，并承诺大赦放下武器的朱安党人。他告诉叛党，督政府“不公正的法律”与“反复无常的法案”已经“侵犯了人身安全与意识自由”，若1800年2月18日那天，叛军上

交武器，他就“完全赦免所有人”过去的一切行为。[53] 艾蒂安-亚历山大·贝尼耶（Étienne-Alexandre Bernier）教士接受这些条件，不过朱安党领袖路易·德·弗罗泰（Louis de Frotté）、乔治·卡达杜尔（Georges Cadoudal）、路易·德·布尔蒙（Louis de Bourmont）伯爵继续斗争。拿破仑把忠于他的主教称作“神圣宪兵”（sacred gendarmerie），贝尼耶也是其中一员——他成了奥尔良（Orléans）主教。拿破仑指示戴杜维尔将军坚决对付叛军：“如果你要开战，那就打起精神、严肃对待，唯此方能缩短战争，进而减少人类的悲痛。”[54]

1801年年初，拿破仑成功“斩除”朱安党叛乱领导人，某些场合中，“斩除”既有比喻意也有字面意。他因诈术挨批，但游击战争总得采用例外的作战原则。2月18日，弗罗泰被斩首；3月5日，卡达杜尔与拿破仑共进早餐，但他后来去英国流放；布尔蒙最终彻底转换立场，为法国而战。从1793年起，朱安党就一直在西部12个省份对抗共和国，他们召集的武装叛军一度达到3万人，但1800年年底，旺代已安静下来。从此以后，朱安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密谋杀害拿破仑本人。

法国本有73家报社，1800年1月17日，拿破仑至少关闭了其中60家，他说自己禁止“报纸有任何不利于我的言论”。[55] 这道未经议会审查的法令宣称“塞纳河各省发行的”某些“报纸是共和国敌人的工具”，因此除了“科学、艺术、文学、商业和广告专刊”，“战时”只有13种报纸有权刊行。[56] 法令继续警告道，若报纸刊登“不尊重”社会秩序、人民主权、军队荣誉与友好政府的文章，“就立即取缔它”。拿破仑也禁止外国报纸在法国发行。[57] 他认为，如果允许保王党与雅各宾派的报纸煽动不满，那就根本不可能促成民族团结。

所谓的“报纸”中不乏极端小报，它们散布了很多言论，如拿破仑和亲妹妹波利娜有禁断关系，“报纸”这个词高抬了不少这类小报，但1月17日的法令无疑沉重打击了法国的言论自由。“若有政府控制，自由媒

体可成为强大盟友，”多年后拿破仑说，“任它发挥，则如睡在火药桶旁。”[58] 还有一回，他说：“纸媒是兵工厂，它不能是私有财产。”[59] 他在意大利和埃及悟到精心策划的宣言有多大威力，现在他不会不准备控制国内舆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没有媒体自由的传统。1789年，法国宣布言论自由乃普遍权利，官方批准发行的日报从4家激增至300多家，但早在1792年，政府就开始取缔日报，周期性的政治清洗也减少了报纸种类，1799年时仅73家报社尚在。[60] 那个年代，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亦无言论自由，1819年，就连英国政府也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六条法案》（Six Acts），这些法律把煽动定义改得更严，导致三名编辑被诉。那还是在和平年代，而1800年1月，法国正同五国作战，且每个敌国都发誓推翻它的政府。按照当代标准，我们可以批判拿破仑的措施，但在他的时代和环境中，这几乎是标准的常态。

法令颁行后，大部分记者没有改行，只是写稿时更倾向波拿巴主义。他们向贝尔坦（Bertin）兄弟的《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阿梅莉·叙阿尔（Amélie Suard）的《政论家》（*Publiciste* ）以及《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 ）等报纸投稿。保王党作家长期推崇拿破仑的严格法治立场，由于这个重要原因，他们开始歌颂他。报纸数量自然减少，但总阅读量在很大程度上没发生变化。[61] 拿破仑也将大批前保王党记者拉入政权，这表明他日趋保守。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成为参政院参政；1808年，帝国大学成立，路易·德·丰塔纳（Louis de Fontanes）任校长；夏尔·德·拉克雷泰勒（Charles de Lacretelle）进入法兰西学术院。

《世界箴言报》创立于1789年，莫莱伯爵称，它变得“什么都不是，只是温顺的工具和（拿破仑所有）心声的传声筒”。[62] 该报系私人产业，但政府官员为其撰稿，地方媒体也依赖它，当它是官方小报。[63] 内政部撰写《箴言报》“内政”栏；拿破仑的办公室撰写“巴黎”栏，这些文字特别是对英国的批评常常由他口授；警务部等其他部门撰

写“综合”栏。国家的宣传小报《箴言报》虽充斥着谎言与大话，但读起来很少乏味，它也刊登关于诗作、文学、戏剧和法兰西学院的稿件。拿破仑本人密切关注散播消息的策略。“用官方渠道传播下列报告，”他曾指示富歇，“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所以先去沙龙透露风声，再让纸媒发表。”[64] 正如1812年他对内政部长所言，总的来说，“我希望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能出版，但题材淫猥的以及任何可能扰乱国家安宁的除外。审查时应该只关注这两方面”。[65]

1790年，法国设立83个省（departément）或地区（region），从而分散了权力。1800年2月，全民公决结果公布，十天后，执政府颁布法律（保民院中，71人赞成，25人反对；立法院中，217人赞成，68人反对），规定各省或地区由内务部长任命的省长管理。大革命所确立的地方民主根基于是一下子就被彻底废除，大量的权力集中到了拿破仑手里。现在各省皆有中央选任的省长、专区区长和市长，专区区长和市长分别管理区（arrondissement）和公社（commune），若其下辖居民超过5000人，则他们也由中央选派。除了1790年时最初的83个省，1800年，执政府新增了20个省，并在各省内增设2～6个区。省-区-公社制保存至今。

1790年后的地方自治时期，每30名法国人中就有1人担任某个地方官职务。如今，自治政府被取代，新政府的主动性与控制力最终由第一执政赋予。地方上有民选委员会，但它们是纯顾问机构，一年只开两周会议。治安法官（juge de paix）原本经选举产生，现在则由省长任命。专区区长常是本省人，但省长几乎都是外省人，其平均任期只有4.3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们对拿破仑的最大忠心。[66] 然而，不管省政府制多么独裁，事实证明它比笨拙的原体制有效得多。[67] 第一执政拿破仑把所有公职官员编入带薪的国家公务员队伍，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训练。他废除依赖贪污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晋升机制，代之以回馈才能与功绩的升职系统。他坚持向省长索要系统性数据资料，命令他们每年全

面视察所辖省份，收集第一手信息。[68] 他后来说，省长们是小皇帝（empereurs au petit pied）。下比利牛斯省（Basses-Pyrénées）省长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内-诺韦让（Boniface de Castellane-Novejean）总结道，省长的职责就是“保障税收、征兵与法治”。事实上，他还有如下工作：为骑兵征收马匹；安排军队住宿；关押战俘；促进经济发展；在公决与选举中给予中央政府政治支持；剿灭盗匪；向中央政府汇报本省民意，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意见。[69] 只有在扶贫、基础教育等拿破仑不感兴趣的领域，各省才有较大的权力。[70]

一旦天气允许，法国与奥地利及其盟友（尽管不包括俄国）的战争就会一触即发，所以拿破仑需要重新装满几乎全空的国库。他指示戈丹向15家左右的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借1200万法郎。银行只肯出300万，并提出有用建议——靠发行国家彩券（national lottery）募集剩下的钱。拿破仑不为所动，1800年1月27日，他直接逮捕了法国最有实力的银行家、拥有很多海军补给合同的加布里埃尔·乌夫拉尔（Gabriel Ouvrard）。有传言说，近四年来，乌夫拉尔靠这些合同赚取了800万法郎。[71]（乌夫拉尔不肯资助雾月政变，这点也对他不利。）乌夫拉尔的命运让其他银行家对钱款数额松了口，但拿破仑想为法国财政打造坚实得多的基础。此前他实际上需经银行家和承包商同意才能调动军队，他不能继续这样做了。

2月13日，戈丹开办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第一执政是首位股东。他不想恳求天性谨慎又不愿合作的巴黎银行业创办法兰西银行，转而向鲁昂制造商让-巴泰勒米·勒库特·德·康特勒（Jean-Barthélémy le Couteulx de Canteleu）和瑞士银行家让·佩勒戈（Jean Perregaux）索求初始资金与指导，此二人位于最先管理法兰西银行的六位代理人之列。法兰西银行发行了面值为1000法郎的股份，其原始资本为3000万法郎。为鼓励民众认购股份，拿破仑规定该银行受执政府保护，并确保自己的班子参与认购，约瑟夫、奥尔唐斯、布列纳、克拉克、迪罗克和缪拉皆

持股。[72] 法兰西银行理论上独立于中央政府，其实在它正式开业之前，《箴言报》就不得不声明，把它“比作英格兰银行是不妥的，因为它的资金完全不会流向中央政府”。然而，政府最后悄悄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兰西银行的确资助了拿破仑战争。

1803年4月，政府授予法兰西银行十五年的巴黎纸币独占发行权。1808年，该银行发行的纸币成为法定货币，支持它的不仅仅是银行担保，还有国家。拿破仑的支持树立了法兰西银行的金融信用，因此一段时间之后，该银行使现金流通量翻了一倍，使私印纸币与私人贷款贬值，建立地方分行，增加收益，扩大股东基础，发放更多贷款，简言之，创立了经典的良性商业循环。法兰西银行也承担重要的政府职能，如管理国家所有年金与津贴。拿破仑牢牢控制如此重要的机构，1806年4月，他把银行代理人换成亲自任命的一名行长、两名副行长。拿破仑从未彻底摆脱国库得向其他银行借债的处境，但法兰西银行缓和了逮捕它们的老板的需要。

1800年2月19日，拿破仑从卢森堡宫迁居至杜伊勒里宫。1792年8月，还是年轻军官的他目击人们把路易十六从杜伊勒里宫押至圣殿塔监狱，从那以后，他是第一个入住这座宫殿的统治者。康巴塞雷斯就任第二执政后也有权入住杜伊勒里宫，但他明智地放弃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住不了多久，也就是说，一旦拿破仑赢得全民公决，他就会想独占杜伊勒里宫。

波拿巴夫妇搬进来后，拿破仑住进路易十六住过的二层房间，该地可俯瞰卡泰丽娜·德·美第奇（意大利语人名为Caterina de Médici）布置的花园。约瑟芬住进玛丽·安托瓦内特住过的一层套间。据说她告诉一位侍从：“我能感觉到王后的灵魂，她问我在她床上干什么。”拿破仑似乎没这种顾虑，传说他把约瑟芬抱进他们的卧室，说：“来吧，小克里奥耳人（Creole）[73]，到你主子的床上来。”[74] 他们充分利用杜伊勒里

宫，每十天宴请200人。凡尔赛宫库存的青铜器与壁毯被搬了出来，黄色与丁香色丝绸装饰了一间客厅。从这一时期开始，约瑟芬成了帝国风格的关键开拓者，这种风格影响了家具、时装、室内装潢与设计。十年革命后，她也引领礼仪复兴。

入住杜伊勒里宫后，拿破仑很快就在大长廊里摆放了22尊心中英雄的雕像。最先放进去的自是必不可少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但汉尼拔、西庇阿、西塞罗、加图、弗里德里希大王、乔治·华盛顿、米拉波及革命派将领当皮埃尔侯爵（Marquis de Dampierre）也摆在突出的位置。马尔伯勒公爵与迪戈米耶将军亦在列。马尔伯勒因布林德海姆（德语地名为Blindheim）会战闻名。迪戈米耶之所以能待在古斯塔夫·阿道夫、萨克斯元帅等真正的军事巨人身边，肯定是因为土伦会战中他慧眼识别拿破仑。大长廊里也有茹贝尔的雕像，他已然过世，不再构成威胁。这些英雄的雕像有一半身着长袍，被它们环绕着，拿破仑自然有所触动。让-奥古斯特·安格尔（Jean-Auguste Ingres）为第一执政画像时，他首次把手插进马甲。[75]

约瑟芬的瑞士裁缝桑多斯（Sandos）邀请出身英国名门的玛丽·贝里（Mary Berry）参观波拿巴家。贝里记载，马尔迈松“美轮美奂，令人震撼，因为它，共和国的简洁做派或可被谅解。我见过凡尔赛宫和小特里亚农宫，但我从没见过比马尔迈松更壮观的建筑”。她描述沙龙的样子，称“妆点环境的丁香蓝色光亮绸悬挂着，其上用忍冬花饰的纹路绣着maron，而且尽可能地体现品位”。她兴奋地说，第二个沙龙“饰有黄绸缎以及棕色与牛血红（sang-de-boeuf）须边”，甚至比第一个还瑰丽，“它的玻璃（即镜子）”尤其漂亮，它们“都蒙着黑纱（drapés），没有镶框”。接着她描写塞夫勒瓷花瓶、斑岩桌、镀有金色铜的支架、枝形吊灯、椅子、“精致壁毯”、枝形烛台等物的可爱细节。进入波拿巴夫妇的卧室后，贝里吃惊非小，只见家具上盖着镶白边与金边的蓝色丝绸织物，她还发现“他们其实睡一张床”。[76]

拿破仑照常希望这一切物有所值，他担心被室内装潢商骗，就问一位部长铃绳末端的象牙柄值多少钱。部长不知道，拿破仑遂剪下象牙柄，交给一位贴身男仆，命令他换上平民服饰去几家店询价并订购一打。结果拿破仑发现，象牙柄售价要比装潢商开的价便宜三分之一，于是他把所有商人的账单统统削减三分之一。[77]

“恢复大革命前巴黎的娱乐之都地位是第一执政的一项政策。”[78] 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如此回忆道。此举目的之一是振兴法国的老牌优势产业奢侈品业，如裙装业、马车业、银器业等，但拿破仑也觉得复兴的社会生活会折射出新政权的稳定性。大革命之前，奢侈品业是法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像欧洲丝绸业中心里昂等地更是仰赖奢侈品交易。他决心振兴奢侈品业。第一执政经常穿镶金边红色塔夫绸外套，即所谓的红礼服（habit rouge），约瑟芬和杰出的丝绸商勒瓦谢先生（M. Levacher）劝他收下这件衣服。“我不否认自己不太乐意穿这怪衣服，”他告诉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但人们会因此更欣赏我的决心。”[79] 他的这身打扮吸引了插画家们，有人便把自己的作品取名为《身着盛装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波拿巴》。[80] 执政卫队也领到了新制服：鞋子取代木鞋；掷弹兵头戴熊皮帽，身穿带白色贴边与红色肩章的品蓝色制服。[81]

普罗旺斯伯爵乃路易十六的弟弟，自从1795年他的侄儿死后，他便自称国王路易十八。当时，路易十八在库尔兰（Courland，今拉脱维亚）叶尔加瓦宫（Jelgava Palace）流亡。就在拿破仑搬进杜伊勒里宫后的第二天，他致信对方，请求获准返回法国，这时机可谓相当不巧。路易十八称，只要拿破仑助自己复位，他可以选择王国的任何职位。六个多月后，拿破仑回信了。他最后写道：“感谢您写下的衷心好意。”作为一名前雅各宾分子，他的话也许比人们预期的更富同情意味，但他传达的信息明确坚决：“您不要想着回到法国。您要回来就得踏过十万尸骨……为了法兰西的和平与安宁，牺牲您的利益吧。历史会记住这件

事。我对您家人的不幸并非无动于衷……我很乐意为您的退隐生活再添甜蜜与安详。”[82] 拿破仑和勒德雷尔、马雷说起路易十八的信：“信写得非常美，真的非常美！但结果是我回了信，它同样出色。”[83] 约瑟芬和拿破仑打趣，她说自己的保王党朋友承诺，只要他帮助波旁复辟，他们就在骑兵竞技场给他塑像，把他塑造成为国王加冕的天神。拿破仑于是开玩笑道：“是的，然后拿我的尸体垫基座！”[84] 然而，波旁家族不会那么轻易就接受流放生活。因为他给了路易十八那番斩钉截铁的回答，从1800年秋天开始，波旁势力便开始密谋杀死他。

在十五周不到的时间里，拿破仑有力地完成了下列事务：他结束法国革命，送走西哀士教士；他颁行法国新宪法，为法国财政打下坚实基础；他钳制反对派媒体言论，开始了结乡间盗匪与旷日持久的旺代战争；他设立元老院、保民院、立法院、参政院，不拘以往政治关系任命人才为官；他拒绝波旁王朝，向英奥求和（遭拒）；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全民公决（哪怕我们考虑造假的因素），重组法国地方政府，并开办法兰西银行。

“今天我有些像模特儿，失去了自由和幸福。”3月16日，拿破仑致信莱茵军团司令莫罗，当时法国正准备再战奥军，“伟大固然极妙，但只有回首过去或展望未来时才妙。我嫉妒你的福气，你将率英勇的部下成就伟业。我心甘情愿拿我的执政权位换你麾下的旅级将军肩章……我强烈希望情势允许我前来助你。”[85] 三周之后出现的正是他说的这种情势：奥军将领米夏埃尔·冯·梅拉斯（Michael von Melas）在卡迪博纳（Cadibona）之战中击败让-德-迪厄·苏尔特（Jean-De-Dieu Soult）将军[86] ，把后者赶回萨沃纳，并迫使马塞纳进入热那亚，随后热那亚被围。于是，重返疆场的时刻到了。

---

[1] 执政府经全民公决批准后才算正式成立。

[2] eds.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41，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24

[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0 p.306

[4] ed. Gaudin，Martin，*Mémoires*，*souvenirs*，*opinions et écrits du Duc de Gaëte* 1826，p.45

[5] ed. Gaudin，Martin，*Mémoires*，*souvenirs*，*opinions et écrits du Duc de Gaëte* 1826，p.45

[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6 pp.6-8

[7] Collins，Irene，*Napoleon and His Parliaments* 1979，p.10

[8]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26

[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231-2

[10] Boulay de la Meurthe，Count F.J.，*Boulay de la Meurthe* 1868，p.116，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27

[1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32

[12]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01，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p.188，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p.233-4

[1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s. 4766 and 4767 pp.1091-2，November 15，1799

[14]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Ⅰ p.315

[15] 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p.36

[16]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60

[1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pp.1237-47，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2

[1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2 p.84

[19]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34-5，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70

[20] France，*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00，p.16

[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29

[22]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8

[23] Ellis，Geoffrey，*Napoleon* 1997，p.2

[2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31

[2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p.24-33

[26] 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p.51

[2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817 p.1115，December 25，1799

[28]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 1964，p.275

[2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772 pp.1094-5，November 24，1799

[30]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2

[31]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117

[32] Broers，Michael，*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2005，pp.23ff

[33] 即第三章的让-吉拉尔·拉屈埃。——译者注

[34]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Ⅰ p.314

[35] Hicks，Peter，'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36]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38，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0，Markham，Felix，*Napoleon* 1963，p.80

[37]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13，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23

[38]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21，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32，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p.5，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28

[39]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59

[40]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1

[41]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3

[42]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p.234

[4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10 no.8922 p.674，Emsley，Clive，*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p.60

[44] Emsley，Clive，*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pp.54-7，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p.693

[45]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6，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p.133，150

[46]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03

[47] 自由帽，法国大革命的象征。——译者注

[4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006 p.60，January 11，1807

[49] Tomiche，Nada，*Napoléon écrivain* 1952，pp.208-12，Forrest，Alan，'Propaganda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Napoleonic France'*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p.428

[50] 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p.ｘｘiii

[51] eds. Carpenter，Kirsty and Mansel，Philip，*The French É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1789-1814* 1999，p.193，Lewis，Gwynne，*France 1715-1804* 2004，p.234

[52]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6

[53]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p.264-5

[5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825 p.1121，December 29，1799

[55] Holtman，Robert B.，*Napoleonic Propaganda*（Louisiana）1950，p.44，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33

[56]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p.37-8

[57]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94，p.23 n.4

[58]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Ⅱ p.88

[59]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78

[60]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94，p.9

[61] Popkin，Jeremy，*The Right-Wing Press in France 1792-1800* （Chapel Hill，NC）1980，pp.170-71

[62]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90

[63] Holtman，Robert B.，*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 Philadelphia）1967，p.165

[64] Rosen，Lew，*Napoleon's Opera-Glass* 1897，p.74

[6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894 p.1181，October 11，1812

[66]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37，Whitcomb，E.A.，'Napoleon's Prefect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79 1974，p.1101

[67] Godechot，Jacques，*Les institii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1985，p.590

[68]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ⅹⅴ，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4

[69]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4，Hicks，Peter，'The Napoleonic "Police" or "Security" State in Context'*Napoleonica La Revue* nos.2-10 2009，p.3

[70] Woloch，Isser，*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p.430

[71]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p.37

[72] Ramon，G.，*Histoire de la Banque de France* 1929，p.19，Lefebvre，Georges，*Napoleon 1799-1807* 2 vols.1935，p.77

[73] 克里奥耳人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含义，此处可理解为暗示约瑟芬是出生在海外殖民地的法国人。——译者注

[74]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310

[75] Carnavalet Portraits 229 Bonaparte，Ier Consul

[76]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p.163-5

[77]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p.213-14

[78]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74

[79]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52

[80] Carnavalet Portraits 229

[81] Baldet，M.，*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1964，p.34

[82]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639 p.386，September 7，1800

[83]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22

[8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3

[85]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110 p.148，March 16，1800

[86] 原文误作“尼古拉·苏尔特”（Nicolas Soult），尼古拉其实是当时人士给苏尔特取的蔑称。——译者注

第十一章 马伦戈

我们在冰天雪地、狂风暴雨、雪崩冰裂中艰难跋涉。大圣伯纳德山口横拦去路，惊讶地看着这么多人从自己身上翻过。

——1800年5月18日，拿破仑致第二与第三执政

恺撒引述他的好运，看起来他自信是个幸运儿。他做得没错，此举既影响他人的想象力，又未冒犯任何人的自爱。

——拿破仑，《恺撒战史》

拿破仑刚当上第一执政就着手准备再战奥地利。就这件事来说，接下来的六周他给马上要重任其参谋长的贝尔蒂埃送去28份备忘录。1800年1月7日，他下令秘密筹建屯于第戎的后备军团。该军团共3万人，其中有大量清楚战争多么艰苦的老兵。其他兵员来自外省卫戍部队的半旅。有些人是从旺代调来的，但也有很多人是新兵，战役开始后，他们才在进军途中学会装填滑膛枪和射击。军中设置“餐站”系统，8名老兵与8名新兵组成一个餐站，由一名下士指挥，一同行军、吃饭、宿营，新兵于是很快适应了军旅生活。

“你要守口如瓶，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所说的军团正在建立，”1月25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连你的工作班子也不能知道，除了绝对必要的信息，别问他们问题。”[1] 就连莫罗将军也以为正在集结的军队真是后备部队，他想不到拿破仑会率这支军团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突破奥地利将军米夏埃尔·冯·梅拉斯暴露的右翼，由此可见保密工作真是滴水不漏。（通过驻意大利特别是热那亚的法军部队，拿破仑能跟上奥军的动向。）冯·梅拉斯年事已高，但他仍是劲敌。梅拉斯曾是俄国名将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元帅的高级副将，苏沃洛夫一生未败，但是5月18日，他在圣彼得堡过世了。

拿破仑得决定翻越哪个山口进入北意大利。为了实施最爱的敌后机动战略（manoeuvre sur le derrière），他倾向于从最东边的施普吕根山口（Splügenpass）和圣哥达山口（San Gottardo，Passo del）入境，但是奥军迅速向西进军，所以他只能选择海拔8100英尺的大圣伯纳德山口（Grand Saint-Bernard，Col du）或海拔7100英尺的小圣伯纳德山口（Petit-Saint-Bernard，Col du）。小圣伯纳德山口太偏西，于是拿破仑仅派一个师去那儿翻山。他决定让军团主力翻越大圣伯纳德山口，但也命令阿德里安·蒙塞（Adrien Moncey）将军率一个师去圣哥达山口。

拿破仑指望着奇迹要素，因为汉尼拔之后，只有查理曼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拿破仑没带大象出行，但他的确把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8磅加农炮与4磅加农炮拖上山峦，它们的炮管重量就超过0.25吨。5月上旬，法军开始进军，此时积雪仍厚，马尔蒙便发明了运载炮管的雪橇。雪橇由树干制成，中间挖空，伴着鼓点声，100人同时拉着它爬上阿尔卑斯山脉，然后又拖它下山。（因为意大利一侧的山峰比法国一侧的陡峭得多，士兵们发现下山难得多。）金钱与补给提前运至一路上的修道院与救济院，当地向导受雇带路，法军也发誓不公开他们的身份。拿破仑派贝尔蒂埃去后备军团后，任命卡诺为战争部长，4月2日以后，他加入了他们的工作，三人一同全面安排的行动后来成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不管什么季节，”拿破仑对心存疑窦的迪马将军说，“军队总能通过任何可容两人下脚的地方。”[2]

这一时期，拿破仑几乎天天开执政会议，每两天又开一次参政院会议。3月17日，他先是主持执政会议与参政院会议，然后和他的首席制图师巴克莱·德·拉尔布（Bacler de l’Albe）将军召开军事战略会议。地板上横铺着巨幅大比例尺皮埃蒙特地图，他们就跪在上面。地图上扎着或红或黑的蜡顶大头针，代表军队的位置。（拿破仑和拉尔布沿着地图到处爬，有时他们会撞头。）战略会议上，据说拿破仑问布列纳他觉得何处是决战战场。“见鬼！我怎么会知道？”上过布列讷军校的私人秘书

回答。“怎么会不知道，看这儿，你个笨蛋。”拿破仑边说边指向旧圣朱利亚诺（San Giuliano Vecchio）的斯克里维亚河（the Scrivia），并解释了一下他认为自己一翻过阿尔卑斯山脉后梅拉斯会如何实施机动。[3] 三个月后，马伦戈会战正是在此打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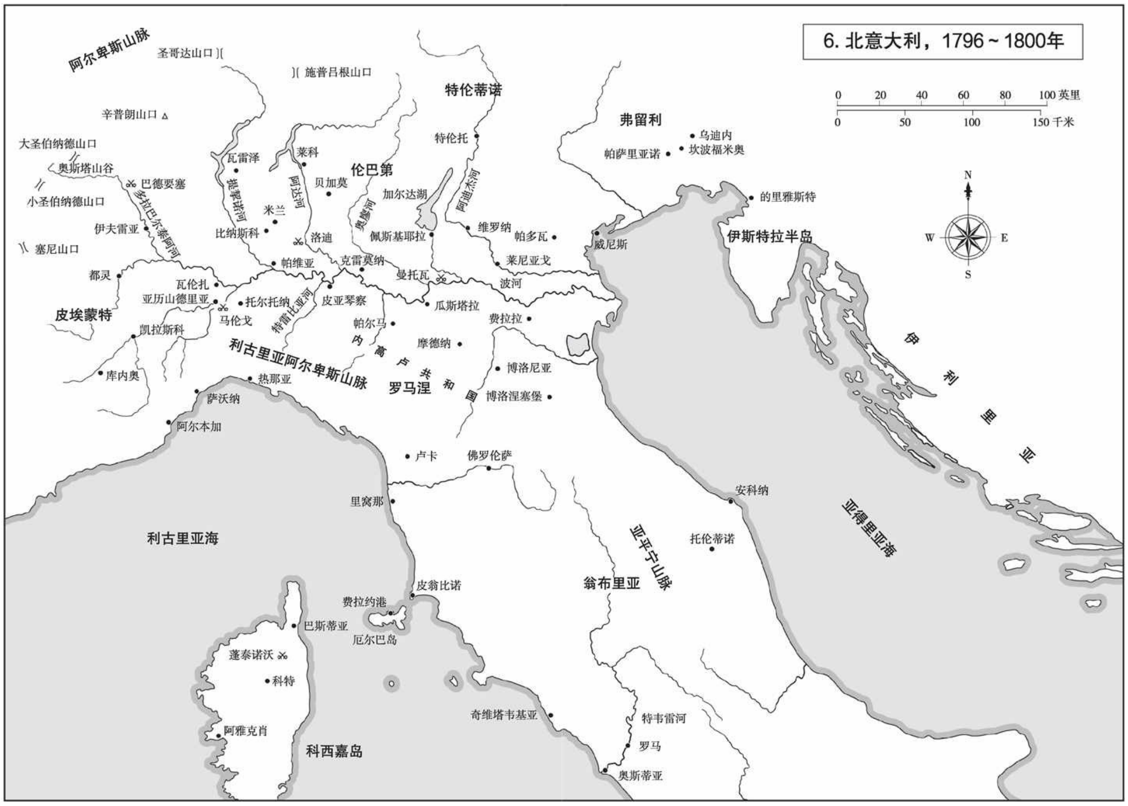
4月19日，奥军将领卡尔·冯·奥特（Karl von Ott）率24000人包围热那亚，马塞纳的12000人被困在城中。皇家海军正封锁热那亚，以致城中并无多少食物。马尔博中尉回忆，接下来那几周，他们赖以为生的“面包”是“劣质面粉、锯木屑、淀粉、扑发粉、燕麦、亚麻籽、腐臭果仁等恶心东西凑成的吓人货，每一块会加一点可可，让它有点儿固体形态”。[4] 蒂埃博将军把面包比作混了油的泥炭。青草、荨麻与叶子都加盐煮了，猫狗也吃完了，“老鼠卖到高价”。成千上万的平民与士兵开始饿死，营养不良也诱发疾病。只要4名以上的热那亚人结伴出现，法军就得照令向这些人开枪，以免他们献城。

拿破仑急着采取行动，4月25日，他致信贝尔蒂埃：“不管是意大利还是莱茵出事，只要某一天你觉得我应该来，我就会在收到你的信后一小时内动身。”[5] 为了平息猜测、应付未来战役中比较普遍的后勤问题，拿破仑待在马尔迈松和巴黎，他检阅了装备最差的军队，任民众（和奥地利间谍）把这个场面尽收眼底，5月5日（周一）晚上他又去观看歌剧。全部战争重心似乎向德意志战场倾斜。莫罗的兵力远比意大利军团的充足，他势头良好，在4月25日渡过了莱茵河。拿破仑热情地祝贺他，措辞几近恭敬。不熟悉权力政治现实的人甚至可能认为，看起来拿破仑是大选长，莫罗是他的军事执政。

然后，拿破仑出击了。看完歌剧后才过几小时，即在凌晨2点时，他离开了巴黎，次日上午到达第戎。5月9日凌晨3点，他已经在日内瓦了。他一到那就出席游行与阅兵，引人瞩目，并且散播消息说他要去巴塞尔，但事实却是弗朗索瓦·瓦特兰（François Watrin）将军的师的前卫

已经开始爬上大圣伯纳德山口，没过多久，拉纳、维克托和菲利贝尔·迪埃姆（Philibert Duhesme）将军的部队也跟着翻山。贝西埃的执政卫队与缪拉的骑兵则留在拿破仑身边。[6]（迪埃姆有一座葡萄园，他送给拿破仑一些葡萄酒，并收到如下回复："等你首战告捷，我们再开瓶庆祝。"[7]）

直到1905年，大圣伯纳德山口才通公路。当年冬季特别寒冷，厚厚的雪块压着结冰的山上小径，但就天气而言，拿破仑的运气特别好。从5月14日开始，军队花了十一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所用时间是汉尼拔的一半），而翻山前与翻山后的天气恶劣得多。40门加农炮中只有1门在雪崩中遗失。"查理曼之后，它还没见过规模这么大的军队。"18日，拿破仑致信塔列朗，"它最想阻拦我们的大型作战装备，但是有一半火炮最终到了奥斯塔（Aosta）。"[8]他没有亲率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自从他开始处理最重要的后勤问题（食物、军火与骡子），他就一直关注着翻山情况。[9]他不断给军务组织官施压，比如说，他曾抱怨："奥斯塔山谷只有干草和酒，我们待在那是拿生命冒险。"[10]5月20日，拿破仑本人在圣皮埃尔（Saint-Pierre）行过最险峻的山道，此时瓦特兰和拉纳已在皮埃蒙特境内前进了40英里。



共有51400人、10000匹马、750头骡子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有些地方仅容一人或一头牲口通行，并且法军得每天破晓时出发，以减少日出后遭遇雪崩的风险。[11] 巴德要塞（Fort Bard）高耸于多拉巴尔泰阿河（the Dora Baltea）之上，它俯瞰峡谷，把守奥斯塔山谷入口，看上去坚不可摧。拿破仑的重型装备包括大炮、36个弹药箱和另外100辆交通工具，法军到达巴德要塞后，贝恩科普夫·约瑟夫（Bernkopf Joseph）上尉率领400名匈牙利士兵坚守十二天，拦下了几乎全部的重型装备，结果它们远远落在后面，严重扰乱了战役步调。为了减小噪音，法军在小径铺撒粪便与干草，并包住货运马车的轮子，于是有些马车设法趁夜通过。然而，剩下的马车仍不能通行，直到法军在要塞墙上轰开好几处缺口并于6月2日攻克它，为此他们折损了200人。因为被巴德要塞耽搁，拿破仑在前进途中亟须火炮与军火，于是他彻查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尽全力征用物品。

操纵期望是拿破仑手中重要的治国之策，离开巴黎后，他不至于任

由国民的期盼愈演愈烈。报纸宣称，他预言一个月之内拿下米兰。拿破仑很生气，5月19日，他写道："那不符合我的个性。没错，我往往隐瞒已经知道的事，但我从不说将要发生什么。"[12] 他命令在《箴言报》上插入一句有那种效果的"玩笑话"。事实上，拿破仑的确在离开巴黎后一个月之内进入米兰。

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拿破仑几乎全程骑马，他仅在冰冻最严重的圣皮埃尔附近换乘骡子（因为骡子的脚步更稳健）。[13] 拿破仑身着便装，外面套着常穿的灰大衣。他问带他翻山的向导想要什么报酬，向导便说自己是个22岁的农民小伙，只盼着"有福气消受一座好房子、一群牛和绵羊等"，这样他就能迎娶女友。[14] 拿破仑下令给向导6万法郎置办这些东西，结果他发现小伙子已然27岁，而且有房有妻。于是向导的报酬不是6万法郎，而是1200法郎。[15]

5月22日，拉纳攻克伊夫雷亚，皮埃蒙特已在法军眼前，但冯·梅拉斯（他已占领尼斯）收到的报告仍然坚称奥斯塔山谷的法军只有6000人。拿破仑任由梅拉斯夺占尼斯，他打算先引诱奥军不断向西再出击。24日，拿破仑和33000名法军士兵已入奥斯塔山谷，12500人的蒙塞师也在路上。"我们攻击此地，势若闪电，"5月24日，拿破仑告诉已当选巴黎立法院议员的约瑟夫，"敌军根本没料到会有这种事，他们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做到了。壮举将要上演。"[16]

铁石心肠助拿破仑成为可畏的统帅，正当战役进展到此阶段时，这种无情再度显现。他的士兵乃至高级将领都认为他会向西进军，解救断粮的热那亚，但他反而折向东边的米兰，以便夺取当地的巨型补给站，并彻底切断梅拉斯去明乔河与曼托瓦的退路。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尽力坚守，拖住奥特的围城军队，于是他把梅拉斯摆了一道。梅拉斯想当然地以为拿破仑会去解热那亚之围，他离开尼斯，从都灵返回亚历山德里亚，以图截住对方。

6月2日，梅拉斯命令奥特解除热那亚之围，与己合兵。奥特没有理他，因为马塞纳刚刚要他开投降条件。当日下午6点30分，拿破仑冒着倾盆大雨从韦尔切利门（Vercelli Gate）进入米兰。他入住大公的宫殿，然后口述信件、接见曾治理内高卢共和国的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里尔、建立新市政府、释放奥地利人（他们把米兰当作地区首府）关押的政治犯，直到凌晨2点方才就寝。他还读了法军截获的梅拉斯寄往维也纳的急件，从中获知了敌军兵力、位置与士气状态。蒙塞师到达米兰，与拿破仑会合，但该师没有多少大炮和弹药。与此同时，拉纳进入帕维亚，在那儿缴获了30门大炮，虽然它们都被钉死，但他设法恢复了其中5门的战斗力。梅拉斯写给情妇的信也被截获，他说伦巴第不可能有法军，叫她别担心，拿破仑阅后觉得可笑。[17] 5月11日及16日，他致信约瑟芬，询问她的“小姐妹”，并写下其子欧仁的消息。29日，他又给她写信：“我的约瑟芬永远是美好的，只要她不哭不媚。我想在她的怀里依偎十天。”[18]

6月4日，热那亚投降。该城人口原有16万，献城时，已有3万名居民与4000名法军士兵或是饿死，或因营养不良病死。另外4000名还算健康、尚能行走的士兵享受降军礼遇，获准返回法国。此外，基思（Keith）勋爵将率皇家海军舰队送4000名法军伤病员回国。此人封锁了港口，但他明白送这么多法军士兵撤离战场的益处。[19] 马塞纳的身体垮了，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坚持餐餐吃士兵伙食。终其军事生涯，拿破仑不曾尝过被围困的滋味，马塞纳对他不来救援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同样，他也批评马塞纳没有多守十天。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拿破仑回忆道：“几个老人、一些妇女也许会饿死，但那样的话，他就不用交出热那亚。要是某人永远考虑人性、只考虑人性，他就别打仗了。我不知道怎么靠多愁善感的计划作战。”[20] 拿破仑甚至在回忆录中批评马塞纳，把他和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又译韦辛格托里克斯）麾下坚守阿莱西亚（Alesia）、对抗恺撒的围城大军的高卢人相对比。假如马塞纳真能成功地再守十天，或许奥特就无法及时赶到马伦戈战场。

拿破仑追求的东西比一座城市大得多——他想歼灭或俘虏米兰以西的所有奥军。[21] 正因为热那亚的抵抗，他才得以绕到梅拉斯背后。梅拉斯被迫放弃和基思联手攻打土伦的计划，不知怎的，他返回东边重建被切断的交通线。除了皮亚琴察和瓦伦扎，波河主要渡河点都已落入法军之手，于是梅拉斯派数支队伍去那两座城市。

拿破仑在米兰向双面（也可能是三面）间谍弗朗切斯科·托利（Francesco Toli）等探子询问奥军部署。6月4日，他去了斯卡拉歌剧院，人们热烈地鼓掌欢迎他。当天晚上，他同剧院歌星、27岁的美人朱塞平娜·格拉西尼（Giuseppina Grassini）风流，次日早上，贝尔蒂埃看到他俩一起吃早餐。[22] “我不会请你来，”拿破仑给约瑟芬的下一封信如是说，“用不了一个月我就到家了。我希望回来时能见你安然无恙。”[23] 当天晚些时候，大概在格拉西尼小姐走后，200名天主教教士进宫讨论神学。拿破仑请求获准“告诉你们，是何等感情驱使我心向使徒和罗马的宗教天主教”。[24] 然而就在不到一年之前，他还对开罗国务会议说：“真主是唯一真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他不但没提这事，反而解释道，天主教“特别适合共和制度。我自己就是哲学家，我知道不管在哪个社会，不知自己从何而来、往何而去的人都不会被奉为正人君子。简单理性无法引人获知自己的起源和去向，没有宗教，人就始终如同暗夜行路”。[25] 在拿破仑眼中，信仰是不断发展的概念，甚至是战略理念。他曾经相当认真地说，不论在哪儿作战，他都信奉当地宗教，在北意大利时，那意味着他信仰天主教。

梅拉斯可经三条路线到达安全地带：穿过皮亚琴察和波河南岸；去热那亚，在皇家海军的帮助下从海上撤退；在帕维亚渡过提契诺河。6月9日，拿破仑返回战场，他想一并封锁三条路，但此举违反了他自己的首要作战原则——集中兵力。当日，拉纳在蒙特贝洛（Montebello）和卡斯泰焦（Casteggio）击败奥特，后者被迫经斯克里维亚河退到西边的亚历山德里亚，与梅拉斯会师。“毫不夸张地说，”次日，拿破仑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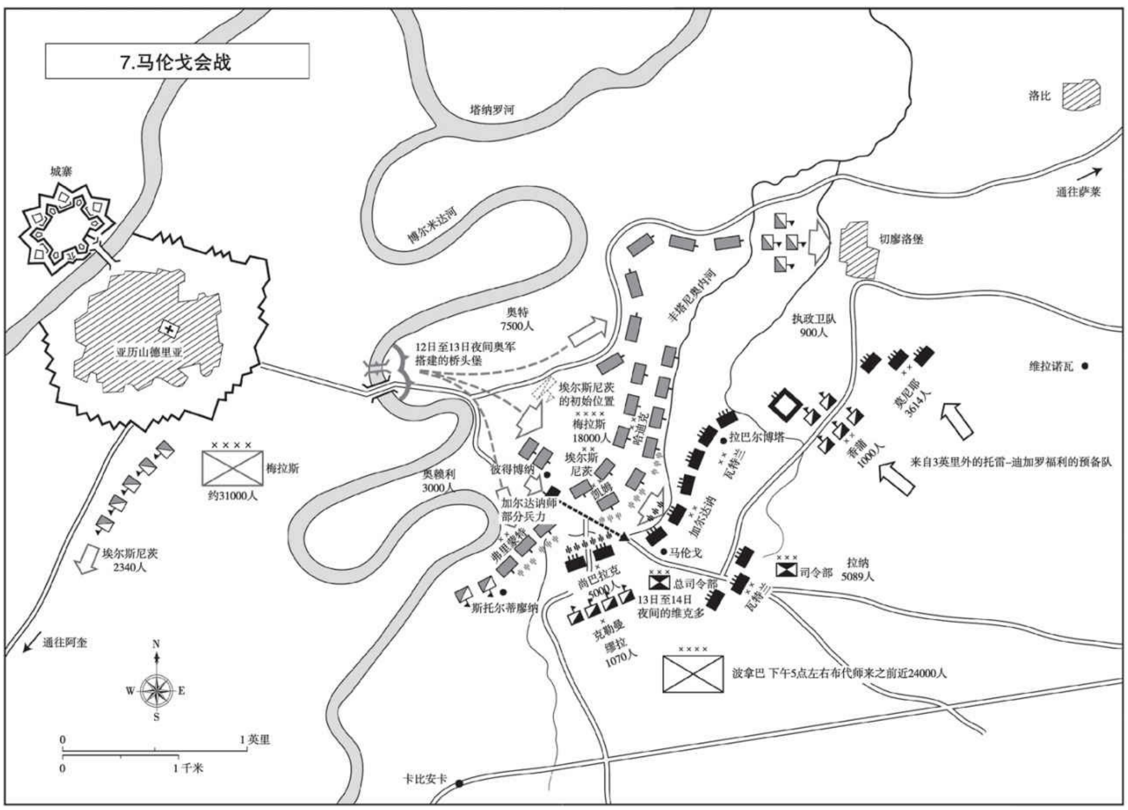
国家参政克洛德·珀蒂耶（Claude Petiet），“敌军有1500人死亡，可想而知，他们的伤员数量是战死人数的两倍。”他当然照例夸张了，因为奥军只有659人死亡、1445人负伤。[26]

接下来三天，拿破仑待在斯特拉代拉（Stradella），他想看看梅拉斯打算做什么。西德尼·史密斯与驻埃及法军签署短期停火协议，但它未经英国政府批准。德塞趁此停火期间从埃及回国，正好赶上即将爆发的战事，尽管他没带上自己的部队。6月11日，拿破仑与德塞夜谈。上个月，他致信德塞称，“我的心太老了、太了解人性了”，除了德塞，它“不会对任何人怀有这种友谊”。[27] 拿破仑立刻给了德塞一个军，该军下辖莫尼耶（Monnier）师与布代师。

13日上午10点，拿破仑骑至旧圣朱利亚诺。他的眼前是马伦戈村周边的郊野，该地位于亚历山德里亚以东约2.5英里处，塔纳罗河与博尔米达河在其附近合流。三条公路于马伦戈交汇，更远处有一座桥，该桥横越博尔米达河，通往亚历山德里亚。博尔米达河的S形河湾构成了天然的桥头堡。切廖洛堡村（Castel Ceriolo）、马伦戈村与斯皮内塔村（Spinetta）傍博尔米达河而立，位于圣朱利亚诺以西4英里处。博尔米达河与马伦戈之间有葡萄园、村舍、农场和一些湿地，所以地表破碎，但是从马伦戈再往前，地形就成了相当平坦开阔的平原，以至于军事史学家亨利·德·约米尼（Henri de Jomini）上校（数年后他担任拿破仑的参谋）说那里能容大群骑兵全速冲锋，在意大利当属罕见。（今天，当地田野的开垦程度远超当时，但1800年时，较高的作物仍能遮蔽视线。）6月13日，大雨如注，小股法军骑兵（一般认为他们有3600人）未充分侦察占地140平方英里的平原，仅随步兵去往托尔托纳。事实证明，法军要为这个错误付出惨痛的代价。

拿破仑在圣朱利亚诺待了一小时，然后得知梅拉斯准备去热那亚。看起来他已完全放弃平原，正坚守马伦戈来掩护撤退。拿破仑在波河北

岸留下拉普瓦佩师，命令他夺取瓦伦扎的渡河点，并允许德塞率布代师去诺维阻截梅拉斯。维克托指挥一个前卫军，奉命攻打马伦戈，下午5点，加斯帕尔·加尔达讷（Gaspard Gardanne）将军在此对战约3000名奥军士兵。阿希尔·德·当皮埃尔（Achille de Dampierre）将军从南边包围马伦戈时，加尔达讷的部队冲入村庄。瓢泼大雨一度延缓了战事，小溪与河流也涨满了水。法军随后拿下马伦戈村，俘虏100人，缴获2门大炮。傍晚7点，博尔米达河对岸的奥军大炮不断猛烈开火，阻止敌人追击，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停止炮轰。即便如此，法军仍然认为明日奥军不想在那开战。



没有可见的营火，法军巡逻队及其步兵岗哨（piquet）和骑兵岗哨（vedette）也未报告任何异常动向，所以拿破仑完全没料到次日梅拉斯会大举渡河反击。情报总显零碎。骑兵巡逻队用望远镜远观敌军并清点人数，而且常常冒着危险。他们得出的数字不可能精确，这回此地又有一条大河拦路。“执政与他的骑兵卫队环马伦戈而行。”执政卫队掷弹骑

兵约瑟夫·珀蒂（Joseph Petit）回忆道，“他越过平原，细心观察地形，时而陷入沉思，时而下达命令，我们几乎能一直远远看到他。”[28]

拿破仑“非常认真地”盘问逃兵，包括一位佩戴波旁圣路易十字勋章的流亡者军官。珀蒂回忆道：“战俘们得知他们刚刚在和波拿巴交谈，个个大吃一惊。”[29] 奥军后卫已秘密掉头并同其他部队会师，梅拉斯的炮兵与骑兵比拿破仑的多，他决定凭借此数量优势发动猛攻，然而战俘们提供的情报都未让拿破仑料到奥军的行为。于是，1800年6月14日（周六）上午马伦戈会战爆发时，拿破仑在战场上的兵力只有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合计15000人。莫尼耶和执政卫队还在后方的托雷-迪加罗福利（Torre di Garofoli）农舍，离马伦戈足足有7.5英里。从圣朱利亚诺出发，沿主干道向东走2.5英里便至托雷-迪加罗福利。前一天，拿破仑在圣朱利亚诺过夜，并在16世纪时的建筑圣阿格尼丝（St Agnes）教堂（保存至今）的钟楼上查看地形。开战时，维克托在马伦戈，但德塞正前往诺维，已经到达圣朱利亚诺后方5英里处，拉普瓦佩则在向波河北岸进军。[30]

博尔米达河两岸陡直，但是6月13日晚，奥军架设并系好了浮桥，还建立了桥头堡。然后奥军熄火就寝，从而麻痹法军，让他们无从得知己方真实位置及兵力。会战当天，天气酷热。清晨4点30分，太阳冉冉升起，此时马伦戈的15000名法军士兵只有15门大炮，对手奥军却有23900名步兵、5200名骑兵、92门大炮。[31] 然而，即便天已破晓，维克托也完全没有警告拿破仑。上午9点，奥军开炮，逐退加尔达讷的步兵岗哨，直到那时拿破仑才发现事态严重。假如法军早早猛攻桥头堡，他们也许能阻止奥军过河，但9点时已然太迟。为了一同前进，奥军浪费了一小时来集结队形，如果他们只是让各作战部队一个接一个过桥，或许就能打垮维克托。若法军在马伦戈大败，执政府就可被推翻，因为西哀士等人已在巴黎密谋。

弗朗索瓦-艾蒂安·克勒曼（瓦尔米会战胜者之子）的骑兵旅待在圣朱利亚诺，缪拉命令他们前进。此时，贝尔蒂埃在卡希纳布扎纳（Cascina Buzana）的小山上看得一清二楚，他要求维克托坚守，并派人告诉拿破仑尽快从拖雷-迪加罗福利调兵。上午9点30分，加尔达讷的部队陷入了猛烈的炮火之中。炮弹在那片坚硬平坦的平原上经常跳飞，但是法军排成横队作战，把损失降到最低。白热化的火力交锋长达两小时，法军使用全连齐射，沉着开火，但奥军大炮还是重创加尔达讷的六个营，迫使他们慢慢退到丰塔尼奥内河（the Fontanone brook）附近，今人可在马伦戈博物馆外见其陡峭的堤岸。当皮埃尔的小股部队巧妙地隐藏在奥军右侧的河渠沟壑中，直到晚上7点才溃败。当时，当皮埃尔打完了所有的弹药，还被骠骑兵包围，遂投降。

6月14日上午10点，拿破仑已派拉纳去卡希纳-拉巴尔博塔（Cascina La Barbotta）支援维克托右翼。第6轻步兵半旅和第22战列步兵半旅唱着《马赛曲》进攻，把奥军逐回因前夜降雨涨满水的丰塔尼奥内河。“奥军像狮子一样战斗。”维克托后来承认道。奥军反击，但法军不肯放弃丰塔尼奥内河阵线。士兵们不停开火，滑膛枪烫得握不住了，他们便在枪上撒尿，给枪降温。中午时分，法军战线被40门大炮和连续不断的滑膛枪射击重创，他们的弹药也不多了。“波拿巴带头前进，”珀蒂回忆道，“他鼓励遇上的每支队伍要勇敢坚强。他出现后，他们显然重新振作起来。”[32]

此时，卡尔大公的弟弟、奥地利的约瑟夫（Joseph）大公率步兵渡过丰塔尼奥内河（河岸太陡，炮兵和骑兵不好通过），法军没能赶走他们。约瑟夫的步兵开始搭建栈桥，奥军炮兵用霰弹掩护他们，狠狠打击奉命来阻止修桥的法军旅。下午2点，马伦戈已陷落：奥军的80门大炮全部投入战斗，丰塔尼奥内河上到处有人渡河，加尔达讷师崩溃逃跑，不过他们给拿破仑赢来了三个半小时的喘息时间来组织反击。克勒曼的骑兵旅所辖中队轮流撤退，只有他们吓得奥军不敢出动数量占优的骑

兵。奥军在马伦戈另一边的战场上组成战斗队形，维克托被迫后撤，他在平原对面命令部队排成方阵。奥军在很靠前的位置用15门大炮组成炮群，给维克托造成惨痛损失，他几乎退到圣朱利亚诺才重整队伍。此时奥军开始嘲弄敌人，他们从法军掷弹兵的尸体上剥下熊皮帽，用马刀挑着转。[33]

与此同时，奥特的步兵前进，拉纳被迫采取守势，他的右翼后倾且缺乏弹药。拉纳没有炮兵，几乎被包围，又遭敌军炮火重击，于是他下令以1英里不到的时速撤出平原。面对奥军大炮，拉纳的部队组成梯队后撤，他们有条不紊，但减员严重。拿破仑的预备队只有莫尼耶师和执政卫队，上午11点，他派人传令德塞，急切地命令对方尽快率布代师赶来。“我本想进攻敌军，结果反过来了，”他给德塞的消息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还能来就来！”因为斯克里维亚河涨水，德塞此前的行军大大受阻，这让拿破仑幸运地保住了执政之位。下午1点，德塞派人回报拿破仑，声称自己预计下午5点赶到。德塞和布代得命令麾下的师停止前进，然后掉头折返，去往炮响之地。他们冒着灼热往回走了5英里，但恰在最后关头赶到。拿破仑也给拉普瓦佩送去类似的回师命令，但拉普瓦佩要比德塞走得远得多，直到傍晚6点他才露面，那时已经太迟了。

下午2点，拿破仑和莫尼耶到达战场，此时情况简直不能再糟了。法军中路缓慢撤退，左翼崩溃，右翼面临严重威胁。[34] 拿破仑知道得守住托尔托纳公路，但他无力正面抗击奥军，于是在公路右侧部署预备队。他可以指望拉纳守住那儿的阵线，若有必要，该地也可充当备用撤退路线。奥特是最大的麻烦，只有600人在阻止他。为了解救拉纳，莫尼耶派克洛德-卡拉·圣西尔（Claude Carra Saint-Cyr，此人不是古维翁·圣西尔的亲戚）将军率第19轻步兵半旅的700名士兵进入防守薄弱的切廖堡村，与此同时，第70战列步兵半旅去袭击奥特后方，第72战列步兵半旅留作预备。一开始，奥特被赶回博尔米达湿地，但他和圣西尔交火

一小时后夺回了村庄。

于是乎，对于有两匹坐骑在其胯下被击毙、前臂也受轻微挫伤的梅拉斯而言，值此关头，他显然既不能离开战场、返回亚历山德里亚、向维也纳报捷，也不能把指挥权丢给副手，命令他们攻占圣朱利亚诺以及派骑兵追歼溃败法军。然而，奇怪的是，这正是他的所作所为。

下午3点，更多的奥军骑兵抵达平原，威胁拉纳侧翼。拿破仑决定派900名执政卫队步兵上阵。这900人在拉波吉（La Poggi）和维拉诺瓦之间的平原上排成纵队，唱着“我们要冲破他们的侧翼”（On va leur percer le flanc）。第96战列步兵半旅后来报称，他们把弹药分给前行的卫队，挽救了大局。奥特的一个龙骑兵团向卫队步兵发起冲锋，后者结成方阵，在卫队散兵和卫队半旅的4门大炮的支援下击退龙骑兵团。接下来，奥军步兵进攻卫队，双方在50～100码的距离内对射四十分钟，法军有260人死亡，负伤人数差不多也是260。卫队三次打退骑兵攻势，但是奥军步兵装好刺刀后掌控了局势，于是他们被迫组成方阵，向着拉波吉且战且退。无论如何，卫队的牺牲为莫尼耶争得完成机动的必需时间，莫尼耶的成功又为整个大军赢来重组时间。拿破仑后来说那天他的执政卫队犹如“花岗岩堡垒”，并且给他们颁发了勋章，步兵得24枚，骑兵得18枚，炮兵得8枚。

下午4点，奥军逼近圣朱利亚诺，执政卫队与莫尼耶师有序后撤。法军撤退秩序良好，他们一次撤一个营，且战且退。在此等境地中抵御四散奔逃的诱惑纯属检验军纪，这次考验也是有价值的。当天热浪逼人，士兵没水喝，也没多少大炮支援，他们还一直承受着奥军骑兵的攻势，但是从上午9点30分到下午4点，有些部队稳步撤退了超过5英里，并且始终没有崩溃。

一名卫队士兵说，拿破仑“照样沉着冷静”，他平静地鼓励部下，显露出领袖气场，确保他的步兵、骑兵、炮兵互相支持。[35] “执政好像不

惧死亡，”珀蒂回忆道，“并且置身险地，因为我们看见子弹不止一次射进他的坐骑腿下，打得尘土飞起。”[36] 拿破仑已经用光预备队，他仅仅在5英里前线上布置了6000名步兵、1000名骑兵和区区6门可用的大炮，而且他的军队筋疲力尽、口干舌燥、缺少弹药，三分之一的士兵已失去战斗力，但他显得胸有成竹。[37] 拿破仑甚至开了个玩笑。马尔博的坐骑腿部受轻伤，他发现后，“揪着我的耳朵笑道，‘你觉得我把马借给你是为了让它们受这种罪？’”。[38]

密密麻麻的奥军步兵准备前进，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组织军队安全地撤退，他自己则去了果利纳别墅（Villa Gholina），在屋顶上搜寻德塞的踪迹。德塞的纵队激起尘土，拿破仑看见后飞驰而来，催他们加速，然后他立刻取消给贝尔蒂埃的撤退指令。德塞骑马，比步行的部下早到一会儿，军队看见他后重振了士气。布代抵达圣朱利亚诺，拉纳、莫尼耶和瓦特兰把部队排成类似战斗队形的队伍，这时奥军纵队停下脚步，呈横队展开，准备发动他们以为的决胜一击。“我们今天退得够远了，”拿破仑鼓动部下道，“士兵们，记住，我习惯在疆场上宿营！”[39]

战场上仍有6门可用的火炮，预备队又运来5门，布代也拉来8门，所以马尔蒙能在稍稍凸起的高地上布置火力可观的炮群。布代命令4580名步兵在主干道上排成混合队形，其中有些人藏身树篱下与葡萄园中。拿破仑骑过战线，鼓舞士兵，现在他要用11000名步兵和1200名骑兵发动盼了很久的反攻。

下午5点，奥军前进。马尔蒙的炮群发射霰弹，把中路几个团的领头士兵炸得七零八落。里沃利的一幕重演，一发子弹幸运地引爆弹药马车，造成了混乱。奥军猛然回缩，这种震慑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布代师压向敌军后。奥军猛冲，迫使布代采取守势。近6000名奥军步兵先是射击，然后发起刺刀冲锋，但就在此时，克勒曼的骑兵已借助树上藤条的掩蔽成功上前，他派出了自己的部队。结果，第2、第20骑兵团

的400人切入匈牙利掷弹兵中路纵队左翼时，奥军还没装填好滑膛枪。第2骑兵团砍杀三个营，抓获2000名战俘，赶跑了4000人。2000名奥军骑兵呆呆地站着，克勒曼当即命令最后一次冲锋时位于后面的200人回身进攻他们，再次击溃敌军。

接着，法军全线前进。值此胜利之刻，德塞胸口中弹，战死沙场。拿破仑得知后悲痛万分，“为什么我不能哭呢？”，因为他得集中精力指挥下一次攻击。[40] 克勒曼再度进攻，逼得奥军骑兵掉头冲向奥军步兵，敌人于是乱作一团，拉纳、莫尼耶和执政卫队遂有机会全面推进，为会战划上胜利的句号。“一场战斗的命运仅仅在于一瞬间——一个念头，”拿破仑后来评价马伦戈会战时道，“如果在关键时刻来临时点燃精神火花，最小的预备队也可取胜。”[41] 奥军勇斗一天，眼看就要取胜，煮熟的鸭子却当面飞走，他们又惊讶又紧张，于是完全崩溃，仓皇逃往亚历山德里亚。

法军累坏了，当晚他们真的睡在了战场上。奥军共有963人死亡、5518人受伤、2921人被俘，他们有13门大炮被缴获，还有20门沉入博尔米达河。法军中，死亡人数为1000出头，另有3600人受伤，900人被俘或失踪，但是这些数字被拿破仑的压倒性战略胜利所遮盖。[42] 根据战后不久梅拉斯签署的停火协议，拿破仑得到了整个皮埃蒙特、热那亚、伦巴第大部分地区、12座要塞、1500门大炮和大型弹药库。六个月之前，政府公债价格稳定在11法郎，马伦戈会战前夕价格则为29法郎，捷报传至巴黎后，价格飙涨至35法郎。[43] 会战结束后，7月22日，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劫掠并焚烧皮埃蒙特境内率先造反的村庄”。11月4日，他对布吕内下令：“必须时时刻刻严肃对待外国人，但要特别留心意大利人。”[44] 然而，既然奥地利第二次被逐出北意大利，所以当地在经历了最低程度的反抗后很快就平静下来。此后十四年，北意大利一直很安静。马伦戈之战巩固了拿破仑的第一执政之位，也为他的不败神话再添一笔。

在马伦戈，拿破仑完美协同他的步兵、炮兵、骑兵，但他仍然赢得非常侥幸。重要的制胜因素有二：从心理角度看，德塞正好在适当时机赶到战场，震慑敌军；克勒曼精确地把握骑兵冲锋时间。奥军花八小时拿下平原，而法军只用不到一小时就夺回地盘。在老兵的指导下，法军新兵的表现相当出色。

“一场伟大的战斗后，”布拉兹上尉写道，“乌鸦和公报作者可以吃个饱了。” [45] 拿破仑犯了三个大错：根本不该进入平原；没有预计梅拉斯可能发动进攻；把德塞派得太远。但是，拿破仑最终赢了。由于政治原因，马伦戈必须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至少也得是他和过世的德塞共享的胜利。因此，战后公报纯属宣传文字，它暗示奥军落入拿破仑的陷阱。“战斗看上去失败了。”公报的话有些异想天开，“我军让敌军前进至圣朱利亚诺村的滑膛枪射程内，德塞将军的师已在那儿排成战斗队形。” [46] 拿破仑还发明了德塞的一些遗言：“告诉第一执政，我遗憾今生尚无青史留名之举。”（其实他中弹后立刻就死了。）贝尔蒂埃重写三遍马伦戈官方战史才得到拿破仑首肯。1815年1月，拿破仑忘恩负义，宣称在德塞到来之前马伦戈会战就已经赢了。 [47] 德塞的副官阿内-让-马里-勒内·萨瓦里（Anne-Jean-Marie-René Savary）将军认为：“要是德塞将军晚来一小时，我们就被赶进波河了。” [48]

战后次日，拿破仑致信其他执政，他说自己“悲痛欲绝，因为我最爱最尊敬的人死了”。 [49] 为了缅怀逝者，他把萨瓦里和德塞的另一个副官让·拉普（Jean Rapp）拉入自己的参谋部，此外，他允许第9轻步兵半旅在军旗上绣金字“无双”。 [50] 他叫人给德塞的遗体做防腐处理，并下令铸造两款纪念章，一款表彰德塞，一款铭记马伦戈会战。 [51] 战后，拿破仑仅对克勒曼说了句“你的冲锋很漂亮”，克勒曼于是发火了，火上浇油的是，拿破仑和贝西埃交谈时吹嘘道：“今天卫队骑兵身环荣誉。” [52] （据说克勒曼愤怒地回答：“将军，您满意我就高兴，因为我的冲锋为您戴上王冠”。 [53] 此事不大可能是真的。）拿破仑私下对布列纳承认

道，克勒曼“发动了一次幸运的冲锋，他出手的时机恰到好处，我们欠他大恩。你看，零碎小事也能左右事态”。不到一个月，克勒曼有了自己的师，在后来的军事生涯中，他大肆劫掠，而拿破仑对此视而不见。拿破仑对布吕内和迪马说：“你们看，那天有两场战斗，我输了第一场，赢了第二场。”[54] 此言或许是马伦戈会战的最好总结。

6月16日，拿破仑再次向弗朗茨皇帝求和：“我奉劝陛下聆听人世悲鸣。”他提出的媾和基础与《坎波福米奥条约》的一样。当日公告宣称，奥地利已经认识到，“我们互相残杀，结果只是英国的糖和咖啡卖得更贵”。[55] 次日，“意大利解放者”返回米兰，他享受朱塞平娜·格拉西尼的魅力，邀请她去巴黎为国庆庆典和德塞葬礼献唱。“贝尔蒂埃告诉我，他预计派比林顿（Billington）夫人或格拉西尼夫人来，”6月21日，拿破仑致信吕西安，他有些言不由衷，“她们是意大利最有名的艺术大师。用意大利语作一首好歌。意大利作曲家应该熟悉这两个女演员的嗓音。”[56] 格拉西尼抱怨道，拿破仑“总是摸她的私处”，经常害她欲求不满。不止她一人受到这种待遇。拿破仑从来就不在做爱上多花时间，他曾对一名副官说：“我三分钟就能搞定。”[57]

军事天才拿破仑智力超群、擅长管理、埋头苦干，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低估贯穿其生涯的旺盛运势。1800年5月法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天气一度好转；当年6月的雨导致德塞离开马伦戈时放慢行军速度，因此他能及时返回战场拯救总指挥。1792年，马亚尔上校向战争部汇报阿雅克肖事件，他的报告被战争爆发招来的文件淹没；1793年，拿破仑在土伦被长矛刺中，伤口未生脓毒；就像梅拉斯在马伦戈的弹药马车一样，1797年，夸斯达诺维希的弹药马车在里沃利被法军子弹直接命中；1799年，“米龙号”离开亚历山大港时遇上非常适宜的风向；同年，西哀士找不到其他军官来实施雾月政变，政变中托梅的袖子也被扯碎，足以激怒拿破仑的战友，而政变后克莱贝尔的报告才送抵巴黎。拿破仑认识到了运气成分，数次提及“幸运女神”。军政生涯后期，他自认被幸

运女神抛弃，但眼下他相信她正站在自己身边。

---

[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4903 pp.55-6，January 25，1800

[2]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07

[3]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153

[4]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39

[5]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198 p.189，April 25，1800

[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10 p.245，May 15，1800

[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75 p.275，May 27，1800

[8]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50 p.262，May 19，1800

[9]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28

[1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41 p.258，May 19，1800

[11]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19

[12]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43 p.259，May 19，1800

[13]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31

[1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2

[15]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p.31

[1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66 p.272，May 24，1800

[1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398 p.283，June 4，1800

[18]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MA 6939

[19]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5

[2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1

[21] Gachot，J.Édouard，*Siège de Gênes* 1908

[22] Masson，Frédéric，*Napoléon et les femmes* 1894，p.84

[23]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32 p.300，June 9，1800

[2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p.307-8

[2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633 p.1032，July 21，1799

[2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34 p.301，June 10，1799，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6

[2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295 p.238，May 14，1800

[28]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5

[29]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5

[30]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p.79

[31]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186-7

[32]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6

[33]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7

[34] Rouart，Jean-Marie，*Napoléon ou la destinée* 2012，pp.127-8

[35]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6

[36]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6

[37] Petit，Joseph，*Marengo* 1801，p.26

[38]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0

[3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58，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56

[40] Crowdy，T.E.，*Incomparable*：*Napoleon's 9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2012，pp.94-7

[41] eds. Bertaud，Jean-Paul，*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p.184

[42]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7

[43]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74

[4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s.5553 and 5743 p.351，July 22，1800，p.435，November 4，1800

[4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187

[46]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78

[47]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1 n.1

[48]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Ⅷ pp.96-7

[49]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35 p.301，June 15，1800

[50] Crowdy，T.E.，*Incomparable*：*Napoleon’s 9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2012，pp.94-7，Petit，Joseph，*Marengo* 1801，p.47

[51] 当年晚些时候，又有纪念章庆祝巴黎德塞滨河路（quai Desaix）开通。1805年，德塞的遗体迁葬至大圣伯纳德救济院，此事也铭刻在纪念章上。Crowdy，*The Incomparable*，pp.94-7；Petit，*Marengo*，p.47.

[52]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New York）1978，p.28

[53]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59

[54]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02

[55]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59

[5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61 p.313，June 21，1800

[57]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p.120

第十二章 正法直度

我必须赋予人民完全的宗教权利。哲学家会嘲笑我，但是国民会祝福我。

——拿破仑致沙普塔尔

我真正的荣耀不是四十场会战的胜利……我的《民法典》将永垂不朽。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拿破仑无意在马伦戈的桂冠下酣睡。随着政治资本增加，他决定赌一把，要是赢了，他将大大巩固国内的支持力量。“波拿巴在其旧基础上重建宗教崇拜，”让·沙普塔尔写道，“这是他掌权初期最大胆的举动。”[1] 拿破仑想确保一切独立教会皆无力聚集反对他的统治的人，为此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拉拢教皇。

反教权主义曾推动法国大革命，它剥夺天主教会的财富，驱逐并经常杀害其教士，亦侮辱其祭坛。可是拿破仑意识到，在保守勤劳、技艺精湛的乡下劳动力、技工和小业主等这些他的天然支持者之中，很多人没有放弃父辈的信仰，他们盼着罗马天主教会与自己日益敬佩的执政府和解。然而，解决方案必须保证从教会处取得国有财产的人——所谓的买主（acquéreurs）——获准保住财物，而且农民被迫向神职人员交纳什一税的日子不可重现。

拿破仑已然佩服教皇在意大利组织起义的能力，1796年10月，他告诉督政府：“同教权争执是个巨大的错误”。[2] 1800年6月5日，他在云雨之事后接见米兰神职人员，承诺“消除法国与教会之首走向完全和睦的一切障碍”。上一年8月，庇护六世逝世，享年81岁。新任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本质上是个单纯虔诚的教士，人们认为他看待社会问题时

没有公然反对法国大革命。[3] 拿破仑清楚谈判是微妙的，有时还显棘手，但若成功，天主教法国将拥护拿破仑的江山，此乃丰厚回报。如果与教皇达成协议，他既可消除旺代残余叛党的主要不满，也能和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莱茵的天主教改善关系。

法国约有2800万人口，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000的城市地区，剩下的人大多住在只有几百个居民的乡村公社。[4] 在这些公社中，通常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承担汇聚信息这一重要的社会职能，并宣读政府法令。拿破仑充分认识到，国家给他们发薪可换来无价利益。“教廷是永不沉寂的势力，”他曾说，“你不能被它役使，所以你必须驯服它。”[5] 某则中肯的评价称，拿破仑和教皇的协议试图“把教区神职人员拉入他的‘道德省长’队伍”。[6]

正如我们所见，拿破仑对基督教至多将信将疑。[7] “耶稣真的存在吗？”在圣赫勒拿岛上，他问秘书加斯帕尔·古尔戈（Gaspard Gourgaud），“我想同时代历史学家提都没提过他。”[8] （事实上，约瑟夫斯的《古犹太人》的确提及耶稣，可见他显然不熟悉此书。）尽管如此，他仍然喜欢神学讨论，还对自己的最后一位医生安托马尔基说：“想当无神论者不代表你就是无神论者。”[9] “波拿巴不是虔诚的信徒，”沙普塔尔的说法呼应了他的模棱两可之辞，“但他的确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灭。他谈起宗教时总是语带敬意。”[10] 在圣赫勒拿岛上，当拿破仑听人读山上宝训时，他对贝特朗说：“耶稣不应该在叙利亚的偏远地区降下奇迹，他应该去罗马那种城市，当着所有人的面施展神迹。”[11] 又有一回，他说：“假如我必须信教，我就信仰太阳，它是一切生命之源，是地球之真神。”[12] 还有一次，他说：“我最喜欢穆斯林的宗教，比起我们的教义，它没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13] 当时，针对《圣经》宣称的摩西击打磐石让200万以色列人解渴这件事，他口授了逻辑层面的反驳。[14] 正如拿破仑对贝特朗所说的，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太关心上天堂”，所以“不能激发勇气”。[15]

不管拿破仑自己怎么看待基督教信仰的实质，他毫不怀疑其社会效用。只有少数国家参政获准参与秘密会谈，他告诉其中一人勒德雷尔道："我在宗教中看到的不是转世之谜，而是社会秩序的奥秘。宗教赋予天堂平等内涵，防止穷人屠杀富人……没有不平等，社会不可立；没有道德准则，不平等不可忍；没有宗教，道德准则不可容。"[16] 拿破仑在埃及时已然表明，若为政治目的，他可以相当灵活地运用宗教，正如他对勒德雷尔打趣道："要是我统治犹太民族，我就重建所罗门圣殿！"[17] 启蒙思想家与作家常持这种本质上务实的宗教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句名言："罗马境内，诸礼拜方式盛行，老百姓视其一般真切，哲学家视其一般虚伪，政务官视其一般有效。"[18] "上帝的概念可维护良好秩序，保证人们行善去恶，"拿破仑说，"效果非常良好。"[19] "束缚强盗和船上苦役犯之肉体，"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对巴里·奥马拉（Barry O'Meara）医生说，"规制开明人士之精神。"[20]

1800年6月，拿破仑刚从米兰返回巴黎就同梵蒂冈国务卿埃库莱斯·孔萨尔维（Hercules Consalvi）红衣主教谈判，许诺恢复法国境内的公共礼拜，条件是法国主教需离职，然后教皇"任命"拿破仑选出的新主教。[21]（从1790年起，法国主教分为正统派与立宪派，前者只承认教皇权威，后者宣誓效忠政府。）会谈秘密举行，就连参政院也蒙在鼓里。法国代表是约瑟夫·波拿巴和前旺代叛乱领导人艾蒂安-亚历山大·贝尼耶，梵蒂冈代表是孔萨尔维、教皇使节乔瓦尼·卡普拉拉（Giovanni Caprara）红衣主教、教皇神学顾问卡洛·卡塞利（Carlo Caselli）。在为时一年的谈判中，双方交互传送1279份文件，至少拟定十个版本的协议草案。"上帝的归上帝，"拿破仑后来说，"但教皇不是上帝。"[22] 1802年4月，红衣主教孔萨尔维拜访杜伊勒里宫，在他来访前，拿破仑让人在房里喷洒香水。化学家富克鲁瓦评论了几句香气，他便揶揄对方："这是神圣的气味，能涤清你的旧孽。"[23]

1801年7月上旬，谈判进入高潮。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昨天我肩膀上长出第二个水疱。此刻正是卧床患者同教士达成协议的良机。”[24] 尽管7月时双方就正式签订了《政教协定》，但由于军队和立法机关的强烈抗议，拿破仑只好先努力平息反对之声，因此九个月后协定才获批准与发布。“共和国政府承认，使徒和罗马的宗教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国公民信仰的宗教。”《政教协定》开篇写道，“类似地，教皇陛下也承认，天主教的最大辉煌曾经来自于、将来也很可能来自于法国建立的天主教崇拜与共和国执政信奉天主教的公开声明。”[25] 接下来的17条法律规定，天主教“可在政府视为公众安宁所需的……法规限度内……自由活动”。

法国将设置新主教区和教区。拿破仑和教皇会一同任命10名大主教（每人年薪为1.5万法郎）和50名主教（每人年薪为1万法郎），这些人将发誓不“扰乱公众安宁”，并告知政府破坏安宁者的所有信息。圣礼需包括为共和国与执政所做之祈祷。主教可任命教区神甫，但不得选择政府不认可的人。《政教协定》规定，买主所获前教会财产“永久”归其所有，大革命期间转让的土地所有权随之巩固。

拿破仑对梵蒂冈有些许让步，但它们都不算太麻烦：取消十日周制，恢复周日为休息日；在1806年1月最终恢复格里高利历；为儿童起名时选择圣徒姓名、古典名讳，不给他们起纯世俗、纯革命名号；给全体神职人员发薪；小规模重建修女会与传教会；将基础教育交还神职人员管理。[26] 与此同时，教会人士演唱《感恩赞》歌颂拿破仑的胜利、在讲坛上宣读他的公报，并声明服兵役是爱国义务。拿破仑在所有争议的焦点上赢得了他想要的成果。教会统一后，至少有1万名立宪派教士回归罗马教廷怀抱，大革命切开的最深伤口之一得以愈合。[27] 然而，1802年4月8日，拿破仑未同教会商量便在《政教协定》后附加大量全新的管制规定，这一附件名为《组织条款》（Organic Articles），以维护法国境内70万名新教徒与5.5万名犹太人的权利。就算庇护七世相信拿

破仑信誉良好，此事也损害了教皇对他的信任。[28]

《政教协定》在法国大受欢迎，尤其受守旧的乡村人口拥护，但是军队、参政院与保民院非常排斥该协定——这些单位中仍有不少昔日的革命者与前雅各宾党人。1802年4月18日（周日）是复活节，当天，巴黎圣母院举行《感恩赞》弥撒，低音钟近十年来首次奏响，新任巴黎大主教让-巴蒂斯特·德·贝卢瓦-莫朗格莱（Jean-Baptiste de Belloy-Morangle）在钟声中欢迎拿破仑，值此时刻，《政教协定》在煊赫盛典中正式公布。高级国家官员奉命置办恰当的出场派头，但据发现，有些人的四轮大马车其实是租来的，马车上原有的编号被漆掩盖。[29]《政教协定》触怒了痛恨教权的军队，一些将军毫不掩饰愤怒，他们拿马刺和马刀刮擦天主教教堂地板，不肯给神职人员让座，还在仪式上聊天。奥热罗拒绝出席，但未获拿破仑准许。莫罗完全忽视命令，在杜伊勒里宫阳台上招摇地抽烟。有人听见安托万-纪尧姆·戴尔马（Antoine-Guillaume Delmas）将军说：“多无聊的说教（Quelle capucinade），只是少了当初牺牲自己赶走这一切的10万人！”于是，拿破仑便把他赶到了巴黎50英里之外的地方。[30]

因为《政教协定》，教会称拿破仑为“宗教复兴者”（Restorer of Religion），不过少有神职人员做到贝桑松（Besançon）大主教的地步，此人说拿破仑“像上帝本人”。[31]不到一个月，保民院以78∶7的比例通过了《政教协定》。它在法国全境的村庄与小镇完成了使命。1813年，拿破仑对立法院说，他认为宣传和公共秩序是宗教和睦的主要体现，并举例证明：“孩子更乐意听父母的话，年轻人更服从地方法官的权威，有些地区原本一听见征兵令就抗议，现在征兵令也在它们那儿生效了。”[32]此后一个世纪，法国与教皇的关系始终以《政教协定》为基。近日，有人考察了执政府时期的鲁昂。研究结果表明，拿破仑最受欢迎的前三项措施依次是《政教协定》、剿匪、确保买主的土地所有权。[33]

立法院最终通过《政教协定》后，吕西安为哥哥举办招待会。会上，拿破仑找到天主教哲学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éne de Chateaubriand），他的新著《基督教天才》（*Génie du christianisme*）忘情称颂天主教，大获成功。夏多布里昂在回忆录中写道：

> 人群一层层让开，每个人都希望执政在自己面前停下……结果我独自站着，因为人群先是退后，然后立刻聚起来围住我俩。波拿巴跟我打了个简单的招呼，他开门见山地谈论埃及与阿拉伯人，不道贺、不提空洞问题、不说开场白，仿佛我是他的密友、我们只是继续之前的话题。[34]

此乃假象。事后不久，夏多布里昂接受了驻梵蒂冈的外交职位。后来，他对拿破仑的仰慕之情淡化。1804年，他辞去外交职务。1807年7月，他把拿破仑比作尼禄，于是被逐出了巴黎。

1801年1月末，拿破仑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法律改革计划，它的影响甚至比《政教协定》还深远。旧王朝时代，有效的地方法典至少有366部，法国北方适用习惯法，南方的法律原则体系却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与地方法典截然不同。[35] 拿破仑凭本能察觉到，若法国欲在近代世界高效地履行国家职能，下列措施不可或缺：确立法律系统标准和司法公正准绳；统一度量衡；充分发挥内部市场作用；集中管理教育体系，让家境背景各不相同的青年才俊凭才能而非出身谋职。

拿破仑首先将42部法国法典融入单一法律系统，此举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无价的盟友康巴塞雷斯帮助他实施了这桩浩大工程。之前在1792年，康巴塞雷斯就在奉命全面修订民法典的委员会中担任秘书，他拟出了《民法典草案》（*Projet de Code Civil*）（1796年版）。“就算整个法典不见了，”拿破仑曾打趣道，“康巴塞雷斯里脑子里也还有一本。”[36] 现在，勒布伦、弗朗索瓦·特龙谢（François Tronchet）、费利克斯·比戈·德·普雷亚默纳（Félix Bigot de Préameneu）、让-艾蒂安·波塔利斯

（Jean-Étienne Portalis）等法国最杰出的法学家、政治家组成委员会，协助第二执政重新推进延误已久的改革。委员会开了107次全体会议，拿破仑至少主持了55次，他对离婚、收养和外国人权利格外感兴趣，经常插手这些领域。[37] 他总是反复问及“普遍利益”与民事正义：“这公平吗？这有用吗？”[38] 中午开始的会议有时会持续很久，到深夜才结束。新法转换为成文法的过程漫长烦琐，步骤依次如下：参政院最先讨论；法律草案起草；感兴趣的各党派提出批评，并试图修改法案；特别委员会审核；有特殊利益关切的群体和说客抗议；法案进入议院立法程序。拿破仑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踊跃投身其中。法典获批也非预断结果。1801年12月，立法院以142∶139的比例否决预备法案（preliminary bill），保民院的表决结果也是不予通过。若拿破仑本人不曾坚决支持法典，它永远不会成为法律。康巴塞雷斯为法典打下了基础，但它理应号称《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因为它是拿破仑拥护的启蒙运动理性化的普遍主义的产物。

《拿破仑法典》本质上是罗马法与普通法的折中，它包含一个理性的、和谐的法律体系，在法国所辖领土内普遍同等地适用，这在查士丁尼皇帝（Emperor Justinian）之后还是头一次。政府的权责与公民的权利义务被编入长达2281条、493页的法典中，它用词清晰易懂，以至于司汤达（Stendhal）说他每天都读。[39] 新法典巩固了国民团结，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建立在个人自由与契约自由的原则上。法典确认旧阶级特权走向消亡，肯定法国市民社会（基础教育领域除外）完全不受教会掌控。[40] 最重要的是，混乱的大革命结束后，它带来了稳定。

《拿破仑法典》简化了1789年以来诸革命政府制定的14000条法令、法律以及42部不同的地方法典，并把它们凝合成一套适用于全体公民的一元法律体系，规定了普遍原则，给予法官广泛的裁判空间。（“人不能因为太烦琐的法律累过头，”拿破仑告诉参政院说，“法律只能划定一般原则。试图预见所有可能性是徒劳之举，经验证明人们会忽

略很多事。”[41]）法典保证了如下内容：法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人身自由，不受任意逮捕；自由缔结的合法契约神圣不可侵犯；不承认血统特权。法典呼应《组织条款》，确立完全的宗教宽容（保护对象包括无神论者），分离政教。它还授予成年男性有自由择业权与私有财产所有权，规定法律需及时颁行、正式发布，而且法不溯及既往。法官办理各种案件时自然得解释法律，但他们无权创设法律原则，所以特殊案例不会成为判例，这一点与英国普通法不同。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法典制定者由于担心家庭解体，遂授予男性家长几乎全部权利，其权利标的包括其妻的财产。法典第148条规定，男满25周岁前、女满21周岁前需经父亲许可才能结婚，男女最低婚龄也分别提高至18周岁和15周岁。若不服管教的子女不满16周岁，父亲有权限制其人身自由一个月，若他们已满16周岁不满21周岁，限制期可达六个月。

两个世纪来，法典所受非议大多如下：社会立场太保守；太倾向中产阶级、公民个人与男性家长；导致妻子太依赖丈夫；其继承条款损害农业经济。根据21世纪的标准，法典的确深含男性优越主义，并带有强烈的家长制偏见。《民法典》（Civil Code）第231条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遵从夫。”[42]法定离婚事由仅限于通奸（这时，只有丈夫让其固定情妇介入家庭生活时，妻子才可主张离婚），触犯重罪，严重侮辱或虐待，但只要离婚事由属于私事范围，夫妻双方也能协议离婚。[43]妻子通奸可获刑二年，男性通奸只需缴纳罚金。若丈夫杀害犯罪时被当场抓获的妻子，他将免受起诉。《民法典》免除已婚或单身男性抚养私生子女的义务，甚至允许他们否认父亲的身份。[44]它也不准妇女缔结合法契约、参与诉讼、出庭作证，还禁止她们担任出生、死亡与结婚的见证人。妻子经丈夫同意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经丈夫书面同意才能赠予、转让、抵押房产。[45]未婚女性无权担任合法监护人与遗嘱见证人。法典中的这一切规定说明拿破仑深深信奉男性至上主义。“不可将男女二性等量齐观，”他说，“女人其实只是生育机器。”[46]

法典给了长子继承制致命一击：父亲有权将25%的遗产遗赠给非家庭成员，但他去世后，剩余遗产应由其子均分，私生子无继承权。[47] [48] 法典也格外偏袒雇主，在所有法律问题上，他们的证言都被采信。[49] 1802年12月1日，一条法律颁布：所有劳动者需持登记簿，并在雇佣期开始时交给雇主，期满后，雇主在登记簿上签字，然后交还劳动者，若无此登记簿，劳动者不得受雇，还可获刑六个月。[50] [51] 法典含有严格的反罢工、反工会条款，这并非拿破仑首创，1791年生效的《勒沙普利耶法》（Le Chapelier Law）已有此类规定，直到1884年它们才被废止。然而，他的确让这些条令生效了。1806年，一些建筑工人罢工，结果在床上被捕。[52] [53]

1804年，《民法典》生效。拿破仑颁行了多部修订后的法律，但《民法典》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1810年时，除了《民法典》，法国还有《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刑法典》极其严厉，但不及当时的英国刑法残忍。在英国，若儿童盗窃价值超过1英镑的财物，他可被送至澳大利亚，若成人有此行为，他能被绞死。）这一系列部门法日后合称《拿破仑法典》。1804年3月，《民法典》几乎在法兰西帝国全境生效，1808年，它延伸至实施戒严的西班牙地区，1810年又扩展至并入法国的荷兰。“罗马人把自己的法律给盟友，”拿破仑告诉弟弟路易，“为什么荷兰就不能适用法国法律呢？”[54] 《民法典》在那不勒斯等地只讨得口惠，但它在另一些地区大受欢迎，以至于在拿破仑下台后继续存留。[55] 直到1900年，普属莱茵地区一直适用《民法典》。今天，除了法国，它在比利时、卢森堡、毛里求斯、摩纳哥依然有效。世界上四分之一的法律体系保留了《民法典》的部分内容，它的影响力超出母国，最远抵达日本、埃及、魁北克与路易斯安那（Louisiana）。[56]

拿破仑想让法国人过上理性的生活，虽说《拿破仑法典》确立了法律圭臬，但他得实施同样激进的改革才能确立民生标准。举个例子，朗

格多克的科比耶尔地区（Corbières）共有129个教区，其中3个说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剩下的全说欧西坦语（Occitan），不说法语。在科尔比耶，卡尔卡松（Carcassonne）、纳博讷（Narbonne）、利穆（Limoux）、佩尔皮尼昂（Perpignan）这四个市的政府分别负责当地行政、司法、警务与税收，然而各市所辖公社经常变化。容量单位塞捷（setier，通常相当于85公升）有不下10个基准量。度量面积时至少有50种不同的单位，其中的塞泰雷埃（sétérée）分别用于低地和高地时还有所不同。[57] 拿破仑本人不喜欢拉普拉斯发明的米制，“我知道一英尺的十二分之一是多长，但我不懂一米的千分之一是多长”，但出于商业连贯性考虑，1801年他还是赋予米制效力。[58] 拿破仑还设立标准币制：铜币面值有2分、3分、5分；银币面值有0.25法郎、0.5法郎、0.75法郎、1法郎、2法郎、5法郎；金币面值有10法郎、20法郎、40法郎。1法郎银币重5克，这很快成为欧洲的标准通货单位。1926年之前，它的价值与金属成分一直未变。

在2800万法国人中，600万人完全不会说法语，另有600万人说法语时只能让他人勉强听懂。东北地区说佛兰芒语（Flemish），洛林（Lorraine）说德语，布列塔尼（Bretagne）说布列塔尼语（Breton），其他地区说巴斯克语（Basque）、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凯尔特语和朗格多克方言。[59] 拿破仑自己也不精通法语，但他凭个人经历获知，要想出人头地，学会法语非常重要。[60] 随着法语成为唯一的公文用语，他改革教育，只准学校用法语授课。

拿破仑保守对待基础教育，正如我们所见，他把它还给了神职人员，但对于11周岁后学生开始接受的第二阶段教育，他的态度是革命的。1802年5月，他颁行法令，建立45所旨在培养未来士兵、行政人员和技术人才的公立中学（lycées）。这些学校回答了如何培育一代爱国忠诚的未来领袖。[61] 现在，所有适龄法国儿童既学习希腊语、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数学、物理学，也学习一些其他学科与

当代语种。旧王朝时代，教会控制第二阶段教育，拿破仑不想这样做，他把宗教的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学校校规严格。14岁以下的学生需穿校服，它包括蓝色短外套、蓝色长裤和圆帽。学生被分入各“连”，每“连”有一个“中士”及四个“下士”，最好的学生担任“上士”，指挥所有“连”。

公立中学为6400名所谓的“国家学员”提供全额奖学金，但其他学生通过入学考试后也可就读，父母将为他们缴纳学费。[62] 在旧体制中，学生选择课程，如今教学计划只设必修课。省长、刑事法院院长、上诉法院院长监督这些新学校的管理，此外还有一名专职督学。[63] 1813年时，法国中学在欧洲首屈一指，两个世纪后，孔多塞（Condorcet）中学、查理曼中学、路易-勒-格朗（Louis-le-Grand）中学、亨利四世中学等拿破仑开办的学校仍属法国最佳的中学。公立中学的理念传至远离法国的地区，在西班牙与荷兰产生了示范效应，即便这两个国家反抗法国的侵占，它们依然接受了法国的教育思想。[64]

1806年，在某次参政院会议上，仅仅因为教育部长安托万·富克鲁瓦（Antoine Fourcroy）忘带报告，拿破仑便即兴发言。他的话几近诗歌：

> （教育是）过去一切之基，是未来一切之本，在所有制度中当属重中之重。正在成长的一代必须形成不为某日消息左右、不为某刻情势撼动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在喜好、性格等所有教育无法塑造修缮的方面，人类已有足够区分……让我们树立不变准则，让我们培育不朽教师。[65]

拿破仑打算在法国全境建立公立中学。总的来说，他的教育改革就像他的巴黎城建计划一样，虽诚然可敬，但未完成即早夭。1808年3月17日，拿破仑的重整方案推进至下一阶段。他颁布法令，号召建设帝国大学，由其监管全国教育。帝国大学分为五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数学与物理学院），所有教师都将隶属于其中一院。

他设计的层级结构蕴含军事特色：校长为路易·德·丰塔纳，此人意志坚决，于1804～1810年任立法院议长；校长之下的三十人委员会掌管法国所有中学及大学。[66] 大革命期间，索邦神学院被关闭，但是1808年拿破仑让它重新办学。

像其他领域一样，教育制度也体现出拿破仑严重的性别歧视观。“坏女人接受公共教育后，几乎都变得轻薄无良、搔首弄姿、水性杨花，”1806年3月，他告诉参政院，“男性受集中教育有诸多优势，特别是学会互相帮助、为战场上的袍泽之情做好准备，女性受集中教育却养成腐败习性。男人生来就该享受生命的全部光彩，女人生来就该住在家里，她们只应侍弄家庭生活。”[67] 《拿破仑法典》没有规定女孩的正式教育，不过评判这一点需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19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只有寥寥几所女子学校，而且它们全是私立的。

1800年7月至1803年5月，执政府实施最大的改革举措。这一时期，拿破仑常在巴黎召开参政院秘密会议，与会人员大多是稳健共和党人、前保王党人，不过参政们有时得坐在送自己的父兄上断头台的人身边。[68] “大革命的传奇已经结束，”某次参政院早会上，他说，“现在我们必须让它的历史开始。”拿破仑在参政院指示方向、目的与政策的一般准则，它们被准确归结为：“热爱权力与现实，鄙视特权和虚利，密切关注细节，尊重有序的社会等级。”[69] 拿破仑是最年轻的参政院成员。正如沙普塔尔所回忆的：

> 他几乎不了解一般行政工作的细节，但浑然不觉尴尬。他屡屡发问，询问最常见字词的释义与内涵。他挑起话头，让人们不停讨论，直到他形成意见。人们往往说此人极端自私，但在某次争论中，他对年迈可敬的法学家弗朗索瓦·特龙谢承认道：“讨论时，我不时发现自己一刻钟前说的话大错特错。我不想受谬赞。”[70]

参政院议题包罗万象。随便举个例子，单单是1802年6月17日，它的议程就涵盖下列主题；外科医生考察制度；化学家组织；重要区的专

区区长选派；收成状况；马耳他难民；有关国民自卫军的法律草案；修路责任；军需官管理；典当；较大公社的账目；猎场看守；商会；允许流亡者回归特定区域的法律；选举法；阿尔代什河（the Ardèche）架桥工程；科西嘉岛上两个省的合并；莱茵河左岸诸省行政界线划分。[71]

参政院会议有时持续八至十小时，沙普塔尔回忆道，拿破仑总是“说得最多、最神经紧绷。会后，他召集其他人探讨别的问题，我们从未见他头脑迟钝”。[72] 彻夜会议上，与会者疲倦了，拿破仑就说：“来吧，先生们，我们还没挣到工钱呢！”[73] （他认为“我洗一小时澡等于睡四小时”。会议有时开到清晨5点，休会后他就去泡澡。[74] ）除了战场，拿破仑在参政院的表现最令人钦佩。不管参政们日后支持还是抛弃他，不管参政们的文字写于当时还是他逝后很久，他们的话一致证明他深思熟虑、活力四射，迅速领会某事主旨后执着钻研它，直到掌握其本质，并采取必要措施。“他依然年轻，对不同行政领域一无所知，”一名参政回忆执政府初期时道，“但他为讨论注入清晰度、准确性、理性力量与宽阔视野，令我们震惊。他是不知疲倦的工人，拥有层出不穷的智计。他凭借无与伦比的智慧，连接并调和遍布庞大行政系统的事实与意见。”[75] 拿破仑很快无师自通地学会提小问题，而且只要求直接回答。于是，他问参政院参政、公共工程部长埃马纽埃尔·克雷泰（Emmanuel Crétet）：“我们在哪儿建凯旋门？”“我回来时能上耶拿桥吗？”[76]

参政院分为多个部门，覆盖各种政务：陆军、海军、财政、司法、内政、警务、外省。“出身和见解如此相异的人们坐在马蹄形长桌两侧，”莫莱伯爵回忆道，“一旦组织他们的天才站在马蹄底端的讲台上，桌上的阵营划分直接就变了。”[77] 另一人回忆道：“他的座位是把桃花心木椅，它的座面上铺着、把手上裹着绿色摩洛哥皮革。这把椅子看上去和办公椅无甚区别，安放在高出地板一级的台阶上。”[78] 椅子有损坏，因为拿破仑在会上表现出经典的神经紧张迹象：

> 讨论进展到中期时，我们看见他手握匕首或刮刀，在椅子把手上割出深深的切口。我们总是忙着给他换椅子零件，也清楚明天他又会把它切成碎片。要是他想找别的乐子，他就抓一支羽毛笔，给面前的每张纸划上粗大的墨水线条。等这些纸黑得差不多了，他就把它们揉成一团，丢在地上。[79]

有抱负者宁愿担任助理办事员（auditeurs）等参政院初级职位也不想去其他公务员部门另谋高就，因为参政院是吸引拿破仑注意的好地方。这些人构想参政们通过的法律议案。随着年岁渐长，如果拿破仑想让个别助理办事员向参政院汇报，他就用长柄望远镜搜寻他们坐着的窗台。很多人正确地察觉到，参政院职位比元老院席位更能助人升迁。

拿破仑有时会提前宣布他将赴会，其他时候，参政们直到听见杜伊勒里宫楼梯间响起鼓声才知道他要来。到会后，他入座、提犀利问题、沦入遐想、发表大段独白。“你知道我为何允许参政院如此畅谈吗？”他曾对勒德雷尔自夸道，“那是因为我是整个参政院的最佳辩手。我知道如何防御，所以任他们攻击。”[80] 会上，人们先读法令议案，再读特别委员会相关报告，接着拿破仑催促该领域公认专家发言。参政们言谈务实，在此地，慷慨激昂的作秀只会招来嘲讽。

拿破仑不怎么掩饰自己在立法、土木工程与开国方面效仿的榜样。“他改革历法，”拿破仑提及尤利乌斯·恺撒时道，“推敲民法典与刑法典文本；他发起工程，建造大量精美建筑，美化罗马；他汇编帝国全境地图和各行省数据，命令瓦罗建立收藏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他宣布动工排干庞廷湿地。”[81] 拿破仑创立的制度能否像恺撒留下的一样长久呢？现在说这个未免太早，但他显然已经埋下他所谓的“一些花岗巨岩，支撑法兰西的灵魂”。

---

[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236-7

[2]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no.980 pp.620-21，October 8，1796

[3]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30

[4]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p.124

[5]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392

[6] Woloch，Isser，*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p.431

[7] Pigeard，Alain，*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2000，p.182

[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2

[9] 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Ⅱ p.118，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0

[10]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p.236-7

[11]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84，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ⅹ，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73，276

[1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3

[1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80

[1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80

[15]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120

[16]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7，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18

[17]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p.16

[18] Gibbon，*Decline and Fall* Bk Ⅰ ch.2

[19]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182

[20] 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Ⅱ p.139

[21]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25

[2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1 no.17478 p.566

[23]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87

[2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359 p.72

[25] Anonymous，*The Concordat Between His Holiness Pope Pius Ⅶ and Bonaparte Chief Consul to the French Republic* （Dublin）1802，p.2

[26]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31

[2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81

[28] 从1804年起，新教牧师也领有国家薪俸。就当时的欧洲而言，宗教宽容绝非普遍现象，比如在英国，直到1829年，天主教徒才可竞选下院议员，而犹太人要到1858年才享此权利。

[29]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0

[30] Tulard，*Napoleon* p.142，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78，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882 p.966，May 2，1802

[31] Mansel，Philip，*Louis* ⅩⅧ 1981，p.235，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35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

[33]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0

[34] ed. Baldick，Robert，*The Memoirs of Chateaubriand* 1961，p.207

[35]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2

[3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405

[37] ed. Bredin，Jean-Denis，*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bicentenaire de 1804 à 2004* 2004，p.4，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 （New York）1956，p.106

[38]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 （New York）1956，p.109 n.44

[39]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 （New York）

1956，p.105

[40]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 （New York）1956，p.49，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3

[41]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 （New York）1956，p.104

[42]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3

[43] Holtman，Robert B.，*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 Philadelphia）1967，p.98

[44]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p.102

[45]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p.102

[46]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32

[47] 尽管如此，拿破仑把自家亲戚的财产放在阿雅克肖，一个多世纪后，这些遗产才再次分割。

[48] Gourgaud，General Baron Gaspard，*Journal de Sainte-Hélène* 2 vols.1944-47，Ⅰ pp.390-91，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p.39

[49]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6

[50] 当时，全欧洲的劳动法都苛待劳动者。1812年元旦，达勒姆（Durham）主教扩大解释其教权，要求英军武力镇压英国北部的矿工罢工。

[51]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117

[52] 不管怎么说，在拿破仑统治的十五年间，常年战争导致劳动力短缺，工资实际价值于是增长25%。

[53]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3

[54] eds. 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66

[55]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 （Florida）1989，p.220

[56] Rowe，Michael，'Between Empire and Home Town：Napoleonic Rule on the Rhine 1799-1814'*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42 1999，p.643

[57]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p.124

[5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6

[59]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p.164

[60]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p.165

[61] ed. n，Jacques-Olivier，*Napoléon et les lycées* 2004，p.382

[62] ed. Lentz et al.，*Quand Napoléon* p.411，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41，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34

[63] ed. Lentz et al.，*Quand Napoléon* p.410

[64] ed. n，Jacques-Olivier，*Napoléon et les lycées* 2004，p.381

[6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63

[66]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260

[6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72

[68] ed. Bourdon，*Napoleon au conseil d'état* p.18

[69]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31

[70]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6

[71] AN 29AP/75 p.141

[72]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28

[73]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6

[74]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14

[75]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56

[76] Lanzac de Laborie，Léon de，*Paris sous Napoleon* vol.Ⅱ 1905，Ⅱ p.92

[7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79

[78]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7-8

[7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3

[80]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6

[8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 ，1858，32 p.84

第十三章 阴谋

太可惜了，这人不懒。

——塔列朗论拿破仑

浩大革命之后，冷静局势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1800年1月，拿破仑致儒尔当

“我要出其不意地突降巴黎，”1800年6月29日，拿破仑从里昂致信吕西安，“我根本不想要凯旋拱门这种俗丽装饰（colifichets）。我太有自知之明，不会关心这些蠢物。真正的胜利唯有人民的满足。”[1] 7月2日凌晨2点，拿破仑到达杜伊勒里宫。共和历中的7月14日已然固定下来，当天，战神广场（今埃菲尔铁塔所在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缴获的军旗成了仪式亮点。此外，荣军院、协和广场与旺多姆广场也有典礼。拿破仑告诉执政同事们，他不想恢复古代战车比赛，“对乘车作战的希腊人来说，这种竞赛也许非常有利，但它对我们没多少意义”。[2] 当天上午执政卫队才到场，所以他们穿着破烂染血的制服接受检阅。露西·德·拉图尔·迪潘（Lucie de La Tour du Pin）惊讶地发现，场上的群众看到这批伤员后既震惊又沉默，她总结道，他们最盼望的事还是早日实现和平。[3] 早在7月时，法奥就开始磋商和约，但是直到霍恩林登（Hohenlinden）大捷后双方才正式签约。12月3日，莫罗在霍恩林登击败约翰大公，俘虏8000人，缴获50门大炮以及85辆弹药马车和辎重马车。奥军无精打采地继续战斗至圣诞日，当天，卡尔大公在距维也纳仅90英里的施泰尔（Steyr）同意停火。“这次战役中，你再度超越自我，”拿破仑致信莫罗，“这些卑鄙的奥地利佬非常顽劣。他们正依赖冰雪的庇佑，而且也还不了解你。我亲切地向你致敬。”[4]

约瑟夫代表法国与美国谈判，10月3日，他在卢瓦尔河上的自家宅

邸莫特方丹（Mortefontaine）城堡签订条约，美法两国的准战争随之结束，这意味着新生的美国海军不会再与英国皇家海军联手威胁法国。“第一执政表情严肃，”条约获批后，美国公使威廉·范默里（William Van Murray）写道，“他相当深思熟虑，有时还显严厉，他不吹嘘、不自私……他的动作一丝不苟，这立刻表明，他怀有技术精湛的击剑大师的……焦躁情绪与井然思维……他话中的坦率远超恐惧，你不禁认为他毫无保留。”[5] 四天后，法国与西班牙达成《圣伊尔德丰索密约》（secret Convention of San Ildefonso）[6]，条约规定：法奥媾和后，法国把哈布斯堡的托斯卡纳让给波旁家族的帕尔马公爵嗣子、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Carlos IV）的女婿唐路易斯（Don Louis）；作为回报，西班牙割让路易斯安那给法国。[7] 当时路易斯安那是一片广袤领土，从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延伸至加拿大边界，覆盖了现代美国的13个州。《圣伊尔德丰索密约》规定，法国承诺不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第三方。

与此同时，马耳他岛已被皇家海军封锁两年，它的命运为英国左右，于是拿破仑正式将马耳他岛赠予俄国沙皇帕维尔一世，配衬其圣约翰骑士团新任大头领的身份。9月5日，英军夺取该岛，赠送之举对他们全无影响了，但法俄关系得以改善，沙皇也提出承认莱茵河与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Maritimes）是法国的天然疆界。当年年底，帕维尔一世已创立武装中立同盟。普鲁士、瑞典、丹麦入盟，与俄国一同反对严厉苛刻、深惹反感的英国海商法，特别是任意搜查中立国船只来寻找法国走私货物的条令。1801年年初，拿破仑和帕维尔友好相处，以至于他们甚至拟定如下计划：马塞纳率3.5万人进入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同3.5万名俄军士兵及5万名哥萨克会师，然后法俄联军渡过里海（Caspian Sea），攻占坎大哈（Kandahar），并从该地入侵印度。[8] 拿破仑又在构想不切实际的东方蓝图了，尽管它没有起自阿勒颇的行军那么梦幻。

1800年12月24日（周三），晚上8点刚过时，拿破仑和约瑟芬去歌剧院欣赏海顿（Haydn）的清唱剧《创世记》（*The Creation*），两人各乘一辆马车。在圣尼凯斯街[9]上的骑兵竞技场一角，一匹小挽马拉着某位种子商的大车，一个月前刚从伦敦回国的朱安党人约瑟夫·皮科·德·利莫埃兰（Joseph Picot de Limoëlan）已在车上的水桶内布下火药。朱安党领袖乔治·卡达杜尔同党、前海军军官罗比诺·德·圣雷冈（Robinault de Saint-Régant）点燃引线，他把马缰交给一名小女孩，自己匆匆逃走。拿破仑幸免于难，因为引线有点长过头了，他的车夫塞萨尔（César）又飞快地赶车，急转弯超过了街上的货车。[10]当时，拿破仑的副官让·拉普和约瑟芬同乘后面的马车。“拿破仑靠一次不寻常的意外逃生，”拉普回忆道，“货车本来待在刺客们计划的位置，一名掷弹兵护卫无意间用马刀刀背赶走了一名正站在圣尼凯斯街中央的刺客，结果货车转了个方向。”[11]约瑟芬的马车远离大爆炸，所以车上乘客也全部存活，不过炸弹震裂的车窗玻璃碎片飞溅过来，浅浅地割伤奥尔唐斯的手腕。这次暗杀被称作“地狱阴谋”（machine infernale），它导致5人（包括牵马的小女孩）死亡、26人受伤。[12]至少有46座房子受损，可见它足以造成远超此数字的伤亡。

两辆马车都停下了。在这血腥的一幕中，拉普离开约瑟芬的马车，前去查看拿破仑的状况。约瑟芬得知丈夫无碍、事实上还坚持去歌剧院，她也勇敢地跟上，然后发现“拿破仑坐在包厢里，他沉着镇定，用观剧望远镜环视观众”。她进入包厢后，他说，“约瑟芬，这些流氓想把我炸飞”，然后他命令上演清唱剧。[13]不论当晚的舞台上有何表演，拿破仑的表现都和它们一般出色。观众知晓暗杀后，为他逃过一劫而欢呼。

拿破仑曾答复可能将成为路易十八的人，向他解释了为何波旁王朝不可能复辟。从那以后，阴谋者一直在策划数桩针对他的暗杀密谋，它们的恶性程度不等。9月4日，17人被捕，并因预谋暗杀被诉。[14]10月

11日，又一个诡计曝光：有人打算趁他离开歌剧院时刺杀他，传说在雾月政变中挥舞匕首的科西嘉议员的弟弟约瑟夫-安托万·阿雷纳（Joseph-Antoine Aréna）也是阴谋者之一。[15] 保民院祝贺拿破仑躲过一劫，他则说："其实我并未身处险地，不管那七八个卑鄙之徒有什么渴望，他们策划的犯罪注定要落空。"[16] 又有12人打算趁拿破仑返回马尔迈松时往他的马车里扔手雷（oeufs rouges），10月24日他们被捕。[17] 在这些阴谋者中，烟火技师亚历山大·舍瓦利埃（Alexandre Chevalier）与约瑟芬婚前的好友托马·德福尔热（Thomas Desforges）逃出法网。

两周后，即11月7日，保王党人舍瓦利埃终于被捕，他的多管枪（multi firing gun）和暗杀计划都被起获。按照该计划，舍瓦利埃盘算要用烟火惊吓拿破仑的马，并在街上撒播铁钉，以阻止执政卫队施救。富歇辛勤工作，一周后又揭发一桩密谋，此案涉及封锁拿破仑要经过的街道。拿破仑掌权后，富歇在官方报告中列出不下十起针对他的独立暗杀计划，其中一些牵涉为数仍多的舍瓦利埃同党。[18] 警务报告开始表明，公众认为拿破仑迟早会真的死于暗杀。

所有这些密谋中，地狱阴谋最接近成功。富歇的侦探做了一些非常不错的鉴定，他们重新组装现场的马蹄铁、挽具和货车，出卖这辆车的谷物商也认出了买主。[19] 警察开始抓紧时间逮捕犯人，利莫埃兰逃走，也许他去美国当教士了。[20] 所有证据都对朱安保王党不利，但地狱阴谋是个大好机会，拿破仑不想浪费其政治作用。他告诉参政院，自己要对付"恐怖分子"：支持恐怖统治、反对雾月政变的雅各宾派。1794年，拿破仑因忠于雅各宾派被捕，六年后他却认为，因为雅各宾派的意识形态、极强的组织性以及对权力的熟悉程度，这一党派比朱安党刺客更危害国家。"我派去一个掷弹兵连，圣日耳曼（Saint-Germain）郊区的人就会跑光，"当时，他评论在那儿发现的保王党沙龙，"但雅各宾党人更顽强，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就认输。"[21] 富歇大胆指责卡达杜尔等英国扶持的保王党人，拿破仑表示反对，他说起1792年的九月屠杀："他

们是九月之人（Septembriseurs），是染血的不幸之辈，此后他们结成坚强阵营，一直密谋对抗一切后继政府。我们必须找到恰当的解决方式。”他补充道：“只有摆脱这些无赖，法国才能平静地接受国家政府统治。”[22] 由此可见，拿破仑至少在情感上抛开了往昔的革命经历。

1801年元旦，中央警察局成员路易·迪布瓦（Louis Dubois，但次月他就任警察局局长）在参政院宣读报告时提及多起刺杀密谋：第一起中，策划者企图派杀手潜入执政卫队掷弹兵；第二起中，刺客梅特让（Metgen）想趁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Française）上演拉辛的《布里塔尼库斯》（*Britannicus*）时刺死拿破仑（当晚拿破仑不曾观看此剧）；第三起中，刺客贡博-拉雪兹先生（M. Gombault-Lachaise）发明了包含炸药“希腊火”的机器，他原打算在德塞葬礼上对拿破仑开火，然而沉重的装饰挡了他的去路。[23] “朱安党和流亡者像皮肤病，”拿破仑在会上说，“恐怖主义却是体内恶疾。”[24]

1月8日，根据三天前颁布的元老院令，130名雅各宾党人被捕后遭放逐，他们的流放地大多是圭亚那。（元老院令的使用初衷只是修改宪法，但是由于它可以绕开立法院与保民院，拿破仑发现它愈发有用。）圭亚那绰号“不流血的断头台”，因为当地气候如死刑一般致命。公众并未抗议。纵然这些雅各宾党人与地狱阴谋无关，其中很多人尤其是恐怖统治时期的决策者也与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有牵连。泰奥菲勒·贝利埃（Théophile Berlier）反对流放雅各宾党人德特朗（Destrem）与塔隆（Talon），试图和拿破仑争辩，第一执政便坦率地答道，两人之所以遭流放，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他们策划了地狱阴谋，而是因为他们在“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贝利埃反驳道，若无炸弹爆炸，根本不会有人提起流放德特朗和塔隆，拿破仑仅仅一笑置之：“啊，律师先生，你就是不肯服输！”[25] [26]

反常的是，除非另有一份已经遗失的议程，富歇的流放者名单可谓

奇怪草率。单上有名的雅各宾党人中，一个近五年来都在瓜德罗普（Guadeloupe）[27]当法官，一个六个月前就已去世，还有好几个同新政府和睦相处，甚至为它效力。这是最后一次体现前十二年间法国政治特色的大搜捕了。“从此以后，首都眨眼间变了风气。”拿破仑日后回忆道。[28]他一边彻底清除雅各宾派，一边缉捕真凶朱安党人。1月30～31日，舍瓦利埃等9人被送上断头台，不过布尔蒙伯爵仅仅入狱（1804年成功越狱，后来他在葡萄牙为拿破仑作战）。1804年12月，相关证据表明还有一桩效法卡达杜尔的暗杀阴谋，但涉事人员中只有让·德·拉罗什富科-迪布勒伊（Jean de La Rochefoucauld-Dubreuil）被拿破仑流放。[29]

地狱阴谋之前，拿破仑就想引入严苛的治安法律，将特别军事法庭延伸到民事层面。不过，参政院认为这些法条太独裁。因为皮埃尔·多努、诗人马里-约瑟夫·谢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出征曲》词作者）、作家邦雅曼·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等自由派、稳健派保民官反对，它们只好被撤回。[30]圣尼凯斯街爆炸案之后，立法机关迅速通过了这些法条。拿破仑几乎一创立保民院就对它态度强硬，他批评康斯坦、多努和谢尼埃，说这些人是“形而上学论者，对他们来说，躲进水里再好不过……你们一定不能指望我像路易十六一样任自己受害。我不准许”。[31]为了挫败日后的阴谋，每次临出行尚余五分钟时，拿破仑才公布目的地。[32]

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伯爵与约瑟夫、塔列朗谈判，前者最终筋疲力尽。1801年2月9日，法奥签订《吕内维尔和约》，长达九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吕内维尔和约》大致建立在《坎波福米奥条约》的基础上，它确认了法国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莱茵的新增领土，但是剥夺了奥地利四年前凭《坎波福米奥条约》从北意大利分得的大部分补偿土地。弗朗茨本该好好遵守《坎波福米奥条约》的。由于一来法俄修好，二来维也纳处于莫罗的进攻范围，科本茨尔没多少余地施展外交手腕。奥地利割让托斯卡纳给法国，根据法西两国在《圣伊尔德丰索密约》中达成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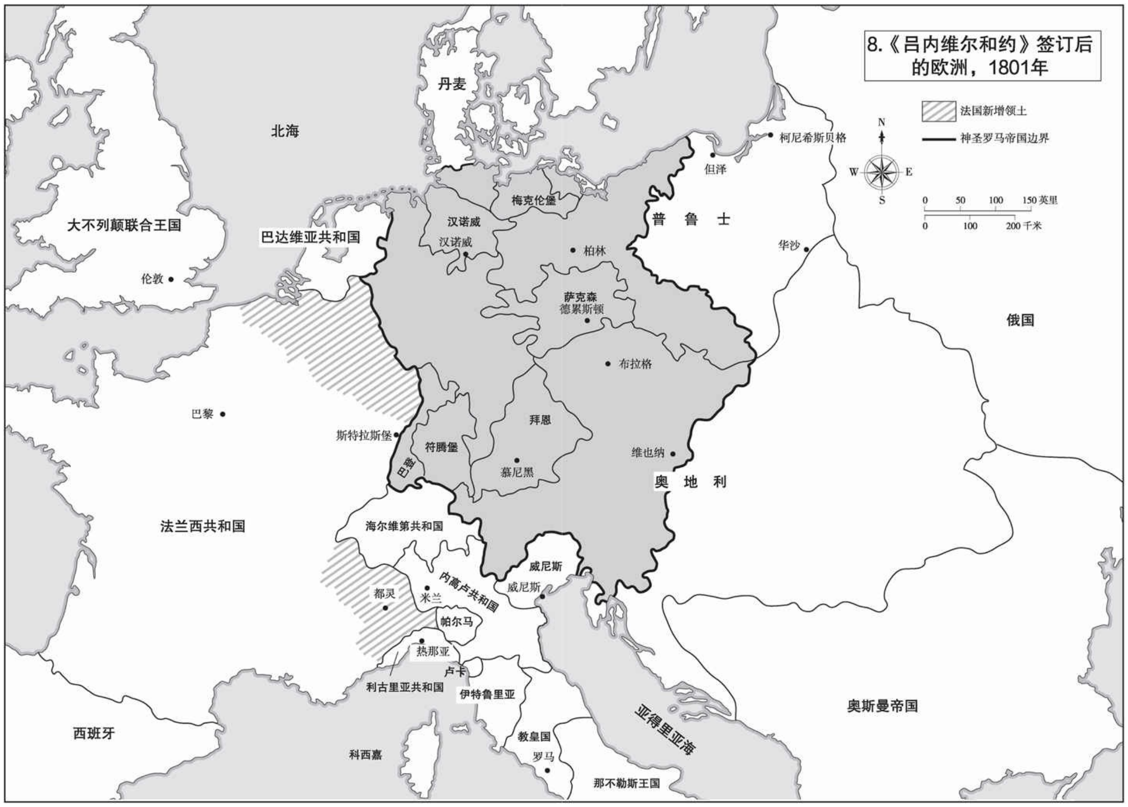
关约定，托斯卡纳改称伊特鲁里亚王国，并归唐路易斯所有。此人是路易十五的曾孙，现年28岁，“蠢得吓人”（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语），娶西班牙公主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为妻。“这家伙不会过卢比孔河，”拿破仑提到新国王时说，“罗马能安心了”[33]。[34]

当然，伊特鲁里亚王国仅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虽然该国有波旁君主，它却得支付巨款维持其境内的法国驻军。[35][36]拿破仑没有建立姐妹共和国，而是创立王国，法国人正确地认识到，他想让法国民众逐步接受在国内恢复君主制。1802年1月，伊特鲁里亚国王路易斯一世（Louis I）造访巴黎，拿破仑携他去法兰西喜剧院观看《俄狄浦斯》，该剧演至第二幕第四场时，剧中人物菲罗克忒忒斯说，“我扶植君主，但拒绝王冠”，观众为他的台词尽情欢呼。[37]不过，拿破仑仍需小心行事。

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法国民众欢迎《吕内维尔和约》，尤令人宽慰的是，它宣布免征1802年度新兵，声明参加过四场战役的士兵（在军中占八分之一）可以复员。[38]2月13日，拿破仑向元老院传信，宣称“只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而战”，不过野心包天的不列颠曾“羞辱”他，他忍不住威胁实施“报复”（他总是称不列颠为英格兰）。[39]然而，英国也已厌倦持续冲突，近十年战争之后，它差不多准备收剑入鞘了。

2月17日，拿破仑前往巴克街上的加利费公馆，出席塔列朗在外交部举办的《吕内维尔和约》庆功宴。巴克街从王家桥向南延伸，穿过圣日耳曼郊区。街上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旁边挨着一座剧院。美国总领事维克托·杜邦（Victor du Pont）[40]也是在场来宾，他回忆宴席道：“这是我见过的最盛大场面。”[41]朱塞平娜·格拉西尼“展示了美妙嗓音的全部魅力。她如花似玉，在我的记忆中，她是我见过的颈上、头上、胸上、臂上佩戴钻石最多的女人”。据说拿破仑在意大利时勾搭上格拉西尼，并赠给她这些钻石，不过钻石“非常丰富，因为将军和政府军需官花不

了几个钱就能买到它们”。拿破仑“看上去深深陶醉于她的歌声，波拿巴夫人妒火中烧，怏怏不乐”。约瑟芬也戴着“特别大的”钻石。



8.《吕内维尔和约》签订后的欧洲，1801年

音乐会后，歌舞剧院（Théatre de Vaudeville）的演员表演有关和平的轻喜剧。杜邦说，“剧中诗句几乎都称颂波拿巴”及“王室”。“王室”之称并不确切，却预见了未来。芭蕾舞小插曲过后，华尔兹开始。“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露出的肉体，”34岁的外交官回忆道，“她们的胳膊一直裸露到腋窝，她们的胸部全无遮蔽，她们的身体从肩膀到后背中部都无衣裳。”此外，她们的衬裙又短又薄，几近于无，所以“她们的四肢全部暴露在外”。[42] 拿破仑在数个房间中穿行，身边跟着四位高大英俊的副官，他们身着骠骑兵制服，帽子上的羽毛“几乎触到天花板”。与此同时，塔列朗“抖着他的瘸腿，亲切待人，尽筵席东道主之谊”。[43] 塔列朗的钱应付这些庆典开销绰绰有余。《吕内维尔和约》规定，在比利时发行的奥地利公债将以平价兑现，塔列朗知道后折价吃进这些债券，发了笔财。[44] 那个年代，内幕交易几乎是公认的工作福利，很少受到今

天的法律指控与道德谴责，即便如此，塔列朗依然堪称独一无二。

法国外交官路易-纪尧姆·奥托（Louis-Guillaume Otto）在英国首都滞留数年，组织战俘交换。1801年2月，小威廉·皮特的政府被天主教解放问题拖垮，于是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在伦敦组建新政府。3月，新内阁的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开始同奥托洽谈，可见两国有望达成甚至比《吕内维尔和约》还重要的和约。法国是小皮特内阁的死敌，虽然霍克斯伯里追随小皮特，但他开始谨慎寻求与法国和解的可能性。这一时期中的3月8日，英国远征军登陆埃及阿布吉尔。冈托姆将军本该接驻埃及法军回国，而皇家海军在土伦沿海封锁了他的舰队，结果法军将领弗里昂、贝利亚尔、拉尼斯（Lanusse）和梅努仍然无法撤军，导致拿破仑在埃及的地位严重恶化。

3月23日，沙皇帕维尔一世遇刺身亡，这打击了拿破仑，据说他听闻消息后大声怒吼。他怀疑幕后黑手是英国间谍，但真凶是一些俄国贵族及汉诺威将军莱温·冯·本尼希森（Levin von Bennigsen）。[45] 帕维尔精神状态不稳，不过他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VII）、葡萄牙“疯女王”玛丽亚（Maria ‘the Mad’）不同，没有被确诊为心智失常。当时，上述三位君主皆安坐欧洲某国王位，尽管是由他们的摄政王行使实权。保罗优待中产阶级，他的政策据信会威胁俄国贵族。帕维尔的嗣子亚历山大此时23岁，谋杀发生时他就在宫中，也许有人曾暗示他，贵族要逼他父亲退位。（他们的确成功逼宫，然后刀刺、绳勒、足踢沙皇，最终杀死了他。）当年年末，亚历山大加冕为沙皇。理论上他掌控绝对权力，但他清楚，想逃过父亲的下场就得和贵族联手。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是谜一般的人物。幼时，他在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开明宫廷中长大；少时，瑞士教师弗雷德里克·德·拉阿尔普（Frédéric de La Harpe）教授他卢梭主义信条。尽管如此，

他仍对司法大臣说：“你总想对我指手画脚，但我才是唯我独尊的皇帝，这是我的唯一身份！”有人说亚历山大既对全人类有抽象之爱，又对具体个人抱切实同情。他本性善良、耳软心活、自私自利，擅长装腔作势，以至于拿破仑后来戏称他为“北国塔尔马”，并在另一个场合给他起了绰号“狡猾的拜占庭人”。1801年，亚历山大承诺编纂俄国法典，几年后又命令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i）伯爵起草自由宪法，但他既不曾修法，也不曾批准自由宪法。亚历山大也宣称，只要俄国更加文明化，他就乐意废除农奴制，但他从未真正接近那一步，跟前两件事相比，废除农奴制一事并无更多下文。拉阿尔普起初兴致勃勃地向亚历山大讲述第一执政拿破仑的改革，不过帝师从巴黎回来后就感到幻灭，于是他写下《反思第一终身执政的真面目》。这本书称，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暴君”，它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最终成为推翻拿破仑的头号人物，所以父亲遇害、他登上欧洲舞台之刻可谓意义深远。

亚历山大和俄国贵族倾向于亲英，因为他们从波罗的海的英俄贸易中获利。拿破仑担心亚历山大等人会让俄国脱离沙皇帕维尔一世的武装中立同盟，事情果如他所料。4月2日，纳尔逊进攻哥本哈根，丹麦船只有12艘被俘、3艘被毁，武装中立同盟被严重削弱。多年后，拿破仑遇见哥本哈根海战参战者、皇家海军军官佩恩（Payne）上尉，对他说：“哥本哈根存在一天，你们就会和它爆发激烈冲突。”[46] 此言不假，丹麦人顽强抗击，此后一直忠于拿破仑阵营。拿破仑命令《箴言报》用不祥的语气报道沙皇被害与哥本哈根遇袭，“历史会揭晓二者之间的可能联系”。[47] （然而并没有。）他给沙皇亚历山大寄去友好书信，对信使说：“出发吧，先生，跑起来。别忘了，上帝只用了六天创世。”[48]

4月14日，霍克斯伯里勋爵提出，英军撤离梅诺卡岛（Menorca）后，作为回报，法军应当撤离埃及。也就是说，英国的媾和补偿将是马

耳他岛、多巴哥岛（Tobago）、马提尼克岛、特立尼达岛（Trinidad）、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以及产糖的荷属圭亚那殖民地埃塞奎博（Essequibo）、德梅拉拉（Demerara）[49]、伯比斯（Berbice）。拿破仑拒绝了提议，反而主张道，英国需完全放弃这些战时扩张的领土以及从过世的蒂普苏丹手中夺取的印度土地。两人的建议都令对方根本无法接受，此举暗示道，他们清楚讨价还价将持续数月、眼下只需铺设开局，于是乎他们开了这种条件。4月24日，拿破仑派迪罗克去柏林和圣彼得堡分别觐见普鲁士国王和沙皇，他告诉迪罗克，“说话时要显得我们定能守住埃及”，这显然说明他们守不住了。按照他的要求，迪罗克对普鲁士国王和沙皇说，若英国的埃及远征“成功，欧洲将蒙受巨大的不幸”。[50]然而，这回英国似乎占据上风。帕维尔一世遇刺后，5～6月，瑞典与丹麦先后同英国签订和约，俄国自己终于也加入了它们，武装中立同盟宣告破裂。

5月，拿破仑试图劝说海军将领布吕克斯、冈托姆、维尔纳夫、罗西利和利努瓦（Linois）解救驻埃及法军。将军们害怕这会变成对抗皇家海军的自杀性任务，为了避免渡过地中海，他们举出西班牙船只失踪的消息、搁浅的船舶、地方瘟疫等一切能想到的理由。（拿破仑的海军知识少得可怜，他从没真的弄明白两件事：英军每分钟侧舷开炮数遥遥领先，因此在一切战事中，单论参战船只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义；封锁法国海面非但没有削弱英军的战斗力，还强化了它。）由于谈判进展缓慢，失望的英军开始围攻亚历山大，以图将法国人彻底赶出埃及。

8月5日，霍克斯伯里告诉奥托，他也许会让马耳他岛独立。此言说明皇家海军不会利用战略要地马耳他岛，这正是拿破仑渴望的让步。梅努在围城中守了两周，9月2日，他向英军投降。拿破仑得知梅努已降，遂令奥托趁英国政府尚不知情时提出，为了实现和平，法国愿意撤走驻埃及、那不勒斯和教皇国的军队。[51]霍克斯伯里不知亚历山大的法军已经战败，接受了奥托的条件。

1801年10月1日，奥托在协议的前15条后签字，英法两国于是爆发欢庆浪潮。“先行和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公众急不可耐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泰晤士报》报道，“以至于昨晚几乎没有公共街道熄灯。”[52] 商店橱窗展示奥托的画像，民谣歌手吟唱赞美他的歌谣。几天后，拿破仑的副官雅克·德·洛里斯东（Jacques de Lauriston）将军携官方批准书赴伦敦，群众卸下他所乘四轮大马车的挽马，亲自拉车。他们先从牛津街（Oxford Street）去圣詹姆斯街（St James’s Street），又从唐宁街去海军部，并穿过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与此同时，尽管电闪雷鸣、大雨瓢泼，人们却一直庆祝到晚上。[53] 这些事令霍克斯伯里大感不悦，他认为在完整条约签署前，它们只会增加拿破仑的谈判筹码。[54] [55]

先行协定规定：英国向法国、西班牙、荷兰几乎悉数归还自1793年起攫取的领土，包括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荷属圭亚那、多巴哥岛、马提尼克岛、圣卢西亚岛（St Lucia）、梅卡诺岛、本地治里（Pondicherry），英国仅保留特立尼达岛和锡兰（第2条）；英国在一个月之内把马耳他岛还给圣约翰骑士团，最终条约将确定保护骑士团的第三个国家（最后达六个）（第4条）；埃及复归奥斯曼帝国所有（第5条）；法军需撤离那不勒斯与教皇国，英军需撤离厄尔巴岛以及“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中它能占领的所有港口和岛屿”（第7条）。其他条款的内容比较寻常，涉及伊奥尼亚群岛、战俘交换和纽芬兰海（Newfoundland）捕鱼权。[56]

为时九年的战争扰乱了欧洲贸易，英国几乎是急求和平，拿破仑遂能力争权益，使对方做出大量让步。条约是一大外交成就，因为梅努战败后，法军无论如何也得撤出埃及。就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英国人得知了真相。法国用一些意大利土地换回了它完整的海外帝国。俄国保有对地中海的兴趣，早在1800年就派军开赴瑞士，不管怎么说，拿破仑也会迫于俄国的压力放弃那些意大利土地，而且必要时他

可轻易夺回它。英国战斗近十年，花费2.9亿英镑（这个数字是其国债的两倍多），但它赢来的领土只有特立尼达岛和锡兰，不管怎么说，它们原本也不属于法国。[57] 相形之下，法国在莱茵、荷兰和意大利西北地区驻军，支配瑞士，并影响盟友西班牙，这些都未见诸条约。

尽管如此，伦敦继续庆祝。日记作者亨利·克拉布·鲁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收到友人来信：

> 和约激起一片狂喜，其盛况为我生平未见。公债价格下跌，国家会遭入侵的预期非常普遍……欢乐的游行几乎闹到疯狂。王国上下灯火通明……据说人们在街上反复呼喊“波拿巴万岁！”……考察政府文件的变化风格是件趣事。“科西嘉投机分子”“不信神的投机分子”现在是“威严的英雄”“公共秩序复兴人”，等等，事实上，他成了一切伟绩善行的化身。这让人想起哑剧中恶魔突然变天使的变装场面。[58]

1801年8月，拿破仑和拜恩签订了友好条约。1801年10月8日，他又同俄国缔结和约，6000名俄国战俘于是携带武器及制服回国。次日，他与土耳其人签约讲和，根据这一条约，双方互相开放港口。所以说，一年之内，拿破仑已同奥地利、那不勒斯、奥斯曼、俄国、英国及流亡者媾和。第二年夏初，法普议和。10月14日，人们在加来欢迎63岁的英军将领康沃利斯（Cornwallis）勋爵。1781年，此人在约克镇（Yorktown）向华盛顿投降。欢迎会上，加农炮鸣炮致敬，仪仗队接待贵宾。康沃利斯先被邀至巴黎，当地举办了庆典，设置公共照明[59]，然后他被请至亚眠（Amiens），与约瑟夫、塔列朗商谈条约细节。[60]（把谈判地设在亚眠是想图个吉兆。1527年，亨利八世与弗朗索瓦一世在此缔结和约。）

1801年11月20日，拿破仑任命第一批杜伊勒里宫工作人员，包括侍从、秘书、施赈员、侍从武官、男仆乃至切肉工（tranchants，他们的工作就是给他切肉）。[61] 米奥·德·梅利托发现，杜伊勒里宫中，高筒骑兵靴、马刀和帽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齐膝紧身马裤、丝绸袜、银纽

鞋、礼仪佩剑和夹在胳膊下的帽子。[62] 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前首席宫廷侍女向这些着制服的仆役与廷臣传授礼节，解释什么人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面见第一执政。[63] 不出六个月，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卢凯西尼侯爵报称，“第一执政夫妇的周围统统翻版凡尔赛宫的大体风格与礼仪”。[64] 难怪莫罗这样的人会寻思法国为何费心将路易十六斩首。

康沃利斯来法一周后，奥托告诉霍克斯伯里，既然大西洋已可安全通行，法国将从罗什福尔和布雷斯特派遣远征军12000人，从而“重整圣多明各地区的秩序”。[65] 圣多明各原是蓄奴殖民地，若论产量，18世纪90年代初期时，加勒比地区和美洲的其他欧属殖民地加起来也不及圣多明各的8000座种植园，它们出产的糖和咖啡在欧洲人的消费量中分别占40%和60%，并占到法国海外贸易总额的40%。[66] 然而，近六年来，杜桑·卢维杜尔领导圣多明各地区的奴隶起义，1801年时，当地蔗糖与棉花的出口量分别仅占1789年出口量的13%和15%。[67] 这狠狠打击了法国贸易，并严重殃及波尔多（Bordeaux）、南特（Nantes）、勒阿弗尔等港口的繁荣，商人大声呼吁法国在圣多明各重建直接统治，此言也意味着恢复奴隶制。1793年，雅各宾派解放了奴隶，1794年，该党又废除了奴隶贸易。可如今，雅各宾分子或已入土，或遭贬黜，或被囚禁。曾有一度，圣多明各供应法国国库1.8亿法郎岁入、雇佣1640艘船、招募成千上万的水手，并促使大西洋沿岸的法国港口蒸蒸日上。拿破仑急着重现旧日盛况，在他期盼的未来图景中，新法兰西帝国甚至可在圣多明各地区搭建起西半球战略跳板，何况法国也已用托斯卡纳换取路易斯安那。

拿破仑致圣多明各居民的布告声称上帝眼中人人自由平等，他致卢维杜尔的宣言则说（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使用王室自称“我们”），“我们欣赏这些黑人勇士的勇气，惩罚他们的叛乱行为将是我们的头等憾事”，但他只是装装样子而已。[68] 拿破仑曾在埃及收买奴隶，现在他对29岁的妹夫夏尔·勒克莱尔将军（波利娜的丈夫）下令，一旦

可以稳妥地恢复圣多明各地区的奴隶制，就动手重建它。1802年1月29日，勒克莱尔率远征军2万人登岛，次月，他很快等来8000名援军士兵。[69] 拿破仑警告当地居民，胆敢“背离司令（勒克莱尔）之人将被视作叛国者，共和国之怒会吞没他，你们枯萎的甘蔗也要被付之一炬”。[70] 他命令勒克莱尔遵循三阶段计划：第一阶段，攻占岛上战略要地，黑人要什么就许诺什么；第二阶段，逮捕并驱逐所有潜在的反对者；直到第二阶段完成，才进入恢复奴隶制的第三阶段。[71]

自由黑人杜桑·卢维杜尔魅力超凡但又冷酷无情，自己也蓄奴。1801年5月，他颁行圣多明各宪法，借此自封终身独裁官，而他的旗号显然是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信条。他把2万名前奴隶组建成一支军队，赶走圣多明各岛（St Domingue Island）东半部（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西班牙人，控制了整个岛屿。[72] 勒克莱尔的美言骗不过卢维杜尔，还没等他实施拿破仑的第一阶段计划，双方已然开战。勒克莱尔的大舰队共有54艘船，它们还在路上时，卢维杜尔就在岛上镇压内乱，处决了魁首（他的亲侄子）与2000名反叛者。为了击败法军，他准备先销毁他们能在海边找到的所有资源，然后退入内陆山区的丛林打游击战。

疟疾和黄热病令勒克莱尔损兵折将，他没料到这个可怕的打击。一旦补给短缺、疫情暴发，他就面临无法克服的障碍，而他的援军只有少数波兰人和瑞士人。[73]（在土伦时，两个瑞士旅得知目的地后立刻哗变。）战争很快演变成血腥的种族屠杀，拿破仑虽不在场，但他必须负重大责任。近来，某位历史学家指出，“波拿巴憎恶黑人”，但并无证据证明这类当代人的指控。然而，当时西方人普遍认为白人优于所有非白种人，拿破仑肯定也不例外，他指望勒克莱尔能靠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军队轻松战胜本土士兵，就像他的金字塔之战与阿布吉尔之战一样。[74] “如果我是黑人，”拿破仑说，“我就支持黑人。因为我是白人，我会支持白人。”[75] 正如我们所见，他在雅法处决数千名非欧裔战俘。现在他严厉对待混血种人，下了一道命令：“（圣多明各地区的）白人妇女

不论贵贱，向黑人出卖肉体者将一律被遣送回欧洲。”[76]

1802年5月20日，拿破仑根据1789年的相关规定颁布法律，在所有法属殖民地恢复奴隶贸易（虽说严格意义上并非奴隶制本身）。[77] 英国的奴隶制保持至1834年。1802年，巴巴多斯岛（Barbados）的一名奴隶被杀，英国官方仅判决凶手支付114先令罚款。此时，大批英军观察部队进驻特立尼达岛，以防止该岛发生奴隶暴动或被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渗透。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亦是奴隶主，他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和英国人一样紧张旁观。[78]

圣多明各岛上，战事惨烈。种植园遭焚毁，屠杀与酷刑盛行，市镇被夷为平地；很多人被淹死；螺丝刀被用来挖出法国战俘的眼睛，法军甚至在船上搭建临时毒气室（étouffier），他们用火山硫黄使400名俘虏窒息死亡，然后弄沉船只。[79] 5月1日，杜桑·卢维杜尔终于举起白旗，条件是法国正式承认圣多明各黑人是自由民，将黑人军官招入法军，并允许卢维杜尔及其部下在他的数座种植园中选择一处退隐地。[80] 然而，勒克莱尔自作主张，6月7日，他突然撕毁协议，把卢维杜尔绑架至法国监狱。游击战争继续进行，10月7日，勒克莱尔致信拿破仑：“除了12岁以下的儿童，山区黑人不论男女都应消灭，平原上的也得杀掉一半，这样的话，这个殖民地就没有身配肩章的有色人种了。”[81] 拿破仑并未直接回复此言，但他肯定没有制止对方。

波利娜勇敢地随丈夫勒克莱尔出征。11月27日，拿破仑致信妹夫时提及妹妹，他说自己“很满意波莱特（Paulette）[82] 的行为。她应当不畏死亡，因为死在军中、死在帮助丈夫之时是她的荣耀。世间万物转瞬即逝，唯我们留下的历史印迹长存”。[83] 勒克莱尔死于黄热病，到拿破仑写这封信时，他已去世近四周。“快回家，”拿破仑在得知勒克莱尔的噩耗后致信波利娜，“家人的关爱能慰藉你的不幸。我拥抱你。”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称，波利娜是个“不太孤寂的寡妇”。1801年1月1日，她

携勒克莱尔的遗体回国，到8月末时，她就再嫁给英俊富有的苏尔莫纳（Sulmona）与罗萨诺（Rossano）亲王、瓜斯塔拉公爵与亲王唐卡米洛·菲利波·卢多维科·博尔盖塞（Don Camillo Filippo Ludovico Borghese）。波利娜私下说此人是个“蠢货”，很快就肆无忌惮地出轨。[84] [85]

勒克莱尔死后，圣多明各的种族屠杀并未减少。法军副司令罗尚博子爵残忍至极，卢维杜尔的副手与继承者继续奋力反抗他。尽管罗尚博获得大批援军，1803年5月时他也只能让8000人乘船回法国。20名将军和3万法国人死亡，圣多明各居民（包括白人与黑人）的死亡人数可能达35万。[86] “黑色斯巴达克斯”杜桑·卢维杜尔被关进汝拉山脉（Jura mountains）的茹堡（Fort de Joux），1803年4月7日，他因肺炎死在冰冷的大牢房中，今人可参观他的囚室。[87]

“我在圣多明各干了件大蠢事。”拿破仑后来承认道，“这是我治政生涯中的最大错误。我应该像对待省政府官员一样对待黑人领袖。”[88] 他的确汲取了一条教训——黑人可以成为优秀的战士。1809年时，拿破仑创立“黑人劳工营”（Pionniers Noirs）[89]，它由埃及黑人与加勒比黑人组成，归黑人营长、“海格立斯”约瑟夫·多曼格（Joseph‘Hercules’Domingue）[90] 指挥，此人受赏3000法郎特别奖金。1812年，拿破仑已然认为不存在永久殖民地，他预言道，它们最终都会“效仿美国。殖民者的政府不肯为了你损害本土，它离你又远，又必然让你服从本土利益，你就会觉得它是外国当局。你厌倦了被它统治，厌倦了等待五千英里之外的命令。”[91] 拿破仑曾梦想建立西半球的法兰西帝国，圣多明各之败就此终结了他的幻想。

---

[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76 p.319，June 29，1800

[2]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62 p.314，June 22，1800

[3] Moorehead，Caroline，*Dancing to the Precipice* 2009，p.287

[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896 p.505，January 9，1801

[5] Nester，Wiliam R.，*Napoleon and the Art of Diplomacy* 2011，p.121

[6] 圣伊尔德丰索即今日的拉格兰哈（La Granja）。——译者注

[7] 1762年的《枫丹白露条约》规定，法国割让路易斯安那给西班牙。

[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34

[9] 已然拆除，起始段位于今莱谢勒街（rue de l'Échelle）与里沃利街交汇处。

[10]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p.221-2

[1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

[12] Thiry，Jean，*La machine infernale* 1952，p.167，*Moniteur* 29/12/1800

[13]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04，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

[14]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19

[1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03

[1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 p.325

[17]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17

[18]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p.219-21

[19] 今天，巴黎卡姆街（rue de Carmes）上的警察局博物馆（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展示了圣尼凯斯街炸弹的引爆机制。

[20]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22

[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04，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p.65-70

[22]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p.75

[2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31

[24] 1月13日，拿破仑致信儒尔当，其称："看样子，英国与这些事牵扯甚密。"CG3 no.5913，p.513.

[25] 1803年，德特朗在奥莱龙岛去世；1809年，塔隆返回政府。

[26]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p.75

[27] 一个位于加勒比海上的岛屿。——译者注

[28] Bonaparte，Napoleon，*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Ⅱ p.23

[2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450 p.978，December 17，1804

[30]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26，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83

[31]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24

[32]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77

[33] 拿破仑在此引用了西方典故。罗马共和国时代，卢比孔河是罗马直辖的意大利本土与内高卢行省分界线。当时的法律规定，行省总督不得带兵进入意大利，违者将处死刑，但内高卢总督恺撒无视禁令，率军渡过卢比孔河，引发罗马内战。后世也用"渡过卢比孔河"形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译者注

[3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Ⅰ p.364

[35] 托斯卡纳大公前脚刚走，新国王与王后就到了。托斯卡纳大公临行前把他的佛罗伦萨宫殿席卷一空，公主便用第三人称评论道："西班牙国王之女惯用金杯银盏，这是她第一次被迫使用瓷质餐具。"Etruria，*Memoirs*，p.309.

[36] 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510

[37]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11

[38]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347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41

[40] 经济学家皮埃尔·杜邦·德·内穆尔（Pierre du Pont de Nemours）之子。内穆尔在法国两度入狱，出狱后，他在美国创立一家相当成功的企业（今化工巨头杜邦公司）。

[41] 然而，宴会管理尚有改善空间。约有1200人赴宴，平均3人乘一辆马车，从晚上9点开始，每辆马车有90秒时间下客。杜邦发现，依然有人次日早上6点才到。

[42]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pp.27-8

[43]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p.28

[44]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55

[4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263，310

[4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37

[4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50

[48]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94

[49] 今乔治敦（Georgetown）。——译者注

[5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233 p.664，April 24，1801

[51] 拿破仑免除了梅努对埃及灾难的个人责任，但此后再未授予他战场指挥权。

[52] *The Times* 3/10/1801

[53] Ragsdale，Hugh，*Détente in the Napoleonic Era* 1980，p.105

[54] 先行协定签署前一日，即1801年9月30日，拿破仑的通信活动充分体现了其头脑分类理事的能力。拿破仑寄出十一封信：三封给沙普塔尔，其中一封信任命利亚莫讷省（Liamone）省长；一封给富歇，命令他把任何出口小麦的人抓进哈姆监狱；一封给财政部长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尔布瓦；一封给司法部长安德烈·阿布里亚尔（André Abrial）；三封给塔列朗；两封给贝尔蒂埃，命令他给还在睡干草堆的巴斯蒂亚驻军第23师安排床位。CG3 nos.6525-35，pp.795-8.

[55]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A Series of Letters of the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Ⅱ 1870，Ⅱ p.11

[56] Authority，*Preliminary Articles of Peace between His Britannick Majesty and the French Republick* 1801

[57]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15

[58] ed. Sadler，Thomas，*Diary*，*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Crabb Robinson* 3 vols.1869，Ⅰ p.105

[59] 庆典期间，拿破仑担心，“为了让外国人能从窗外观赏”，卢浮宫的画像与雕塑布局被打乱了。参观者要求在博物馆生火炉取暖，但他认为此举太危险，明智地拒绝了。CG3 no.6624，p.836.

[60] Barnett，Correlli，*Bonaparte* 1978，p.78

[61]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47

[62]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p.490，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103

[63]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2

[64] Philip Mansel in *TLS* 23/11/2001 p.18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73

[66] Stark，Nicholas，‘Society：Friend or Enemy of the Blac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20，James，C.L.R.，*The Black Jacobins* 1938，p.8，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73，Zamoyski，Adam，*Holy Madness* 1999，p.124，ed. Nesbitt，Nick，*Toussaint L’Ouverture* 2008，p. ⅹiii

[67] Dubois，Laurent，*A Colony of Citizens* （Chapel Hill，NC）2004，pp.121，214

[68] Branda，Pierre and Lentz，Thierry，*Napoléon*，*l’esclavage et les colonies* 2006，p.49，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647 p.853，November 18，1801

[6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no.4486 p.975，June 25，1799，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TN）1973，p.139

[7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75

[71]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TN）1973，p.147

[72]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TN）1973，p.147

[73]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TN）1973，p.146

[74] James，C.L.R.，*The Black Jacobins* 1938，p.269，Boudon，Jacques-Olivier，*Le roi Jérộme* 2008，p.36，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Ⅰ p.64，Branda，Pierre and Lentz，Thierry，*Napoléon*，*l'esclavage et les colonies* 2006，p.112，Stark，Nicholas，'Society：Friend or Enemy of the Blac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20

[75] Herold，C.，*The Mind of Napoleon*（ New York）1955，p.5

[7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627 p.841，October 31，1801

[77] Tulard，Jean，*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p.204

[78] *Edinburgh Review* No.ⅩⅢ pp.244-6

[79]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TN）1973，pp.178-9，Dubois，Laurent，*A Colony of Citizens* （Chapel Hill，NC）2004，p.403，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

[80]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 （Knoxville，TN）1973，p.159

[81] Tulard，Jean，*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p.205

[82] 波利娜的昵称。——译者注

[83]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317 p.1168，November 27，1802

[84] 1804年，卡诺瓦为波利娜的双峰之一塑了尊石膏像，该雕像今展示于罗马拿破仑博物馆。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说波利娜的耳朵过大，但她是个美人。

[85]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24

[86] eds. Ambrose，Douglas and Martin，Robert W.T.，*The Many Face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2006，pp.241-2，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63

[87] ed. Nesbitt，Nick，*Toussaint L'Ouverture* 2008，pp.ⅶ-ⅹⅹⅴ

[8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12

[89] 当时法军的“pionnier”并非工兵的简单同义语，而是劳工部队，他们没有武装，只有镐、锄等劳动工具。——译者注

[90] 海格立斯（即赫拉克勒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系多曼格的绰号。——译者注

[91]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305

第十四章 亚眠

如果法国人民认可我的优势，他们就得包容我的缺陷。我的缺点经不起侮辱。

——1800年，拿破仑致勒德雷尔

大使其实是有头衔的间谍。

——1805年，拿破仑致欧仁

1802年1月4日（周一）晚上9点，巴黎第1区区长为拿破仑的弟弟路易和约瑟芬的女儿奥尔唐斯主持婚礼。拿破仑包办过大量婚姻，这仅是其中一例，经他插手后，别人的婚姻生活几乎总是被毁，此例亦然。路易当时另有所爱，很快就难以忍受和奥尔唐斯同房，后者的态度也一样。拿破仑视奥尔唐斯如几出，她讨所有人喜欢，唯独不受他为她挑选的夫君待见。（她后来说，学园岁月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快乐时光，再没有比这更悲伤的说法了。）约瑟芬牺牲亲生女儿的幸福来巩固自家与婆家的关系，她也要对这桩婚事负责。

约瑟夫在谈判中展现了精湛的外交手腕，助法国签署《政教协定》、停止准战争，拿破仑也对加入法国海军的幼弟热罗姆感到满意，然而兄弟姐妹开始令他的公共生活喜忧参半。吕西安尤其桀骜不驯。1800年11月，内政部长吕西安允许路易·德·丰塔纳出版小册子《比较恺撒、克伦威尔、蒙克与波拿巴》（*Parallèle entre César*，*Cromwell*，*Monk et Bonaparte*），可想而知，它的结论必然奉承拿破仑，但第一执政却有明智的担忧，害怕人们注意到书中诸人皆靠违宪手段夺权，据说他因此大发雷霆。“我和克伦威尔无可比性，”他后来说，“人民三次选择了我，而且我的军队只和外国人作战，从未在国内对抗法国人。”[1]（针对最后一句，土伦联盟派、旺代民众和巴黎各区也许有话要说。）丰塔纳是第一执政的主要宣传人员之一，若说小册子的出版纯属意外未

免可疑。此书对比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实际上暗示拿破仑理应掌控绝对权力，它出版后立刻激起公众的非议，所以实情也许是拿破仑假装生气。小册子的刊印暂停了，没多久，吕西安出任驻西班牙大使。1800年5月，他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蒂娜·布瓦耶去世，后来他又迎娶一名心爱的女子亚历山德里娜·茹贝东（Alexandrine Jouberthon），她是寡妇，日后为他生了10个孩子。拿破仑想要个对家族更有利的弟媳，所以不承认弟弟的第二次婚姻，于是吕西安和他断交，退隐罗马。[2]

拿破仑想让将军们和旧王朝家族联姻，他恢复王室旧例，规定将领和高官要征得国家首脑同意再结婚。他反对的姻缘常比他和约瑟芬撮合的婚姻美满，这从吕西安的婚姻和热罗姆的（第一次）婚姻中可见一斑。即便促成佳偶，他也不太注重维系夫妻良缘。有一回，拿破仑的妹夫缪拉想去陪夫人卡罗琳和刚出生的孩子，请求离开意大利，但他不答应，理由是“军人必须忠于妻子，但是他断定自己无事可做后才能盼着和她再会”。[3] 拿破仑和一些家人关系不佳，这无疑对他不利。

1802年1月8日午夜，拿破仑和约瑟芬前往里昂，他将在那里就任意大利共和国最高行政官（相当于主席），这个新生的国家由内高卢共和国及《吕内维尔和约》划走的奥属意大利省份组成。康巴塞雷斯留守巴黎主持大局，次日他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详述一切令人感兴趣的本土事务。从这次开始，康巴塞雷斯一共写了1397封类似的信件，因此拿破仑不管身在欧洲何地都可紧追国内形势。他从一封早期信件中获知：巴黎大堂（Les Halles）的中心食品市场已建设妥当；布鲁塞尔市市长为宽宥走私犯一事道歉；贝利亚尔将军想在《箴言报》中插入一段特别文字；海军部长报称弗卢兴（Flushing）风势良好；某元老院委员会开会商讨修宪；朱诺收到的报告称，保民院内有人秘密煽动他人反对政府。[4] 从很多方面看，这些信都是1804～1814年拿破仑每日接到的警务部报告的前身。

里昂会议持续两周，其间有大量聚会、游行、招待会与工厂视察。1月25日，拿破仑在百花广场（Place Bellecour）[5] 检阅归来的埃及驻军，然后会谈的关键时刻来临——他在今安佩尔公立中学（Lycée Ampère）的前身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当选意大利共和国最高行政官。以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里尔为首的三十人委员会向在场的450名意大利代表提名拿破仑，为防任何人鲁莽地反对，他们话音刚落，小木槌就敲下。[6] 诸代表来自奥地利、皮埃蒙特、威尼斯和教皇国，梅尔齐蓄意使不和最大化、使反对可能性最小化，根据代表所属地区将他们分组。在法国，塔列朗也可以更好地监视代表们。对新生的意大利共和国来说，在法国成立是一个耻辱，但自从公元前5世纪罗马解体，这还是欧洲政治地图上首次出现“意大利”一词。拿破仑撰写的宪法根本没有体现大革命推崇的全面普选权，地主、神职人员、专业人员、学者与商人牢牢掌控选举权，他们组成选民团，选出立法机关成员。

3月18日，拿破仑返回巴黎。他在卢浮宫细赏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勋章，还在国家图书馆把玩亨利四世的佩剑，与此同时，康巴塞雷斯发动合宪政变，用一纸元老院令肃清了立法院与保民院。[7] “这个机构太热衷于制造混乱了，没法和它共事。”奔赴里昂前夕，拿破仑曾在参政院会议上如此评价保民院。被划为空想理论家和“狂热共和党人”的保民官遭到驱逐，包括谢尼埃、多努、邦雅曼·康斯坦、前吉伦特党人马克西曼·伊斯纳尔（Maximin Isnard）、政治经济学家夏尔·加尼（Charles Ganilh）。[8] 反对拿破仑的自由派人士大多是启蒙思想家，如哲学家皮埃尔·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安托万·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他创造了术语“意识形态”）、历史学教授兼编辑多米尼克·加拉（Dominique Garat）、立宪派主教亨利·格雷瓜尔（Henri Grégoire）、作家皮埃尔-路易·甘格内（Pierre-Louis Guinguené）、律师政客让-德尼·朗瑞奈伯爵，这些人尊崇已故的孔多塞（Condorcet）侯爵，平日遵纪守法，从未策划暗杀。[9] 拿破仑有时也对他们下手，比如说，他撤销了法兰西学院的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放

逐康斯坦和德·斯塔埃尔夫人，但是他很少干涉他所谓的“诚实之辈”，除非能说动其为己效力，让·德·布里（Jean de Bry）就同意担任杜省（Doubs）省长。[10] 拿破仑甚至把卡巴尼斯葬进先贤祠、让夏多布里昂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显然说明，被他蔑称为空想理论家（idéologues）的人在他眼中不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

英法和谈几乎长达六个月，1802年3月25日（周四），双方终于在亚眠市政厅（hôtel de ville）签署和约，法国盟友西班牙与荷兰也是签约国。谈判内容包括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也叫马尔维纳斯群岛）、捕鲸业、柏柏里（Barbary）海盗、国旗在公海上所受致敬礼，等等。会谈期间，两国互相怀疑对方不讲信用，英国提出封波旁王公为马耳他圣约翰骑士团大头领，更是严重加深了信任危机。[11] 尽管如此，法国公众依然喜气洋洋，他们绘制的彩色版画里有天使，还有戴着月桂树叶的法国最大的“平定者”拿破仑半身像女体版，画上亦有题诗：“举世皆敬/法兰西的英雄/他是战争之神/他是和平天使。”[12] 6月26日，拿破仑和土耳其人又签订了一份和约，把恰纳卡莱海峡（Çanakkale Boğazi）纳入法国贸易线路，人们于是更加相信他符合诗中的形象。

《亚眠条约》和先行协定基本相似：英国承诺放弃本地治里，并在批准条约后三个月内撤离马耳他岛，宣告该岛为自由港，届时它将复归圣约翰骑士团所有；法国取回殖民地，代价则是撤出那不勒斯、塔兰托（Taranto）以及不属于意大利共和国的教皇国领土，如安科纳。然而，《亚眠条约》未言之事几乎和它讲明的内容一样重要。条约没有提到商业。此外，1795年荷兰改称巴达维亚共和国，奥兰治-拿骚（Orange-Nassau）亲王威廉五世流亡他乡，丧失荷兰封地与收入。《亚眠条约》“充分补偿”亲王，但它只字未提荷兰、瑞士和皮埃蒙特的未来，也没承认意大利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与海尔维第共和国。1801年8月的法荷条约规定，全面和约签订后法军将撤离荷兰，《吕内维尔和约》

也确认瑞士独立，所以英国觉得不必用《亚眠条约》解决荷兰和瑞士问题。

英法政治条约没有附加经济协定，也就是说英国商业大亨在法国、荷兰、西班牙、瑞士、日内瓦及（后来的）伊特鲁里亚不享有市场准入特权，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始反对这种和平。有人认为拿破仑蓄意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他的做法有违亚眠“精神”，但是国家没有义务签订它明知对己不利的经济条约。[13] 1786年的英法贸易条约严重不平衡，拿破仑不想重现这一局面，打算对英国进口货物征收关税，这取悦了鲁昂等地的法国商人。法国保护性关税抬高了英国商品的价格，本国商贾可以继续借它的庇护来经营，他们也能去新的海域活动，且不受皇家海军的阻拦。大量外国原棉涌入法国，它的海洋经济也走向繁荣。法国盛行俘虏交换，因为当时有近7万名法国战俘人在英国，他们几乎都是水手，自1793年以来在数十起小型海战中被胜者英军俘虏。很多人在南海岸和泰晤士河（the Thames）入海口的大型监狱船中关了数年，船舱脏乱拥挤，环境极其恶劣。[14] [15]

约瑟夫从亚眠返回巴黎后，拿破仑引他至歌剧院包厢前接受观众欢呼。法国保住了从莱茵河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全部“天然”疆界，重掌西欧霸权，并收复全部殖民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约瑟夫和塔列朗赢过头了。英国没捞到多少好处，它的媾和立场也相应动摇。因为遇刺的沙皇帕维尔曾任圣约翰骑士团大头领，该骑士团大本营现位于圣彼得堡。《亚眠条约》规定：教皇监督骑士团大头领选举，新头领当选后，英国必须在条约获批后三个月内把马耳他岛还给骑士团；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西班牙和普鲁士保证该岛的独立与中立；骑士团不再招募英法两国公民。1803年3月，教皇任命意大利贵族乔瓦尼·巴蒂斯塔·托马西（Giovanni Battista Tommasi）为骑士团大头领，但英国不承认托马西的地位，把他赶到了西西里岛。三个月之限尚未到期，法军就已完全撤离条约载明的占领地，但英国拖拖拉拉，不肯从本地治里和马耳他撤

军，原因之一是它担心法俄正准备瓜分奥斯曼帝国（它想错了）。[16] 直到1816年，本地治里都还在英国手中。

《亚眠条约》缔结后，约有5000名英国人突然来到巴黎。有人好奇心切，有人想看卢浮宫藏品，有人打算用这个借口去王家宫殿逛夜店（该地生意兴隆），有人欲和朋友重修旧好。英国来客几乎都想见第一执政，最起码也要瞥上一眼。拿破仑乐得帮忙，命令部长们至少每十天设宴一次款待外国贵宾。[17] 爱尔兰议员约翰·莱斯利·福斯特（John Leslie Foster）曾出席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的招待会。福斯特如此描写第一执政：

> 他身材纤细，温文尔雅。他留平头，发质细直，发色深棕。他面相柔顺，脸色苍白蜡黄。他灰色的眼睛却炯炯有神，浅棕色的稀疏眉毛向外直翘。他的外貌，特别是嘴唇和鼻子精巧犀利，轮廓分明，生动传神，令人拙于言表……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他说话时特意强调重点，不慌不忙却流畅自如。发言时，他的面貌比言辞更富表现力。表现了什么？……一缕宜人忧思，只要他开口，它就融化成你能想到的最和蔼最礼貌的微笑……我没想到人类竟能有如此真实的尊严。[18]

其他英国人也有类似说法，曾被法军俘虏的辛克莱（Sinclair）写过“他那优雅迷人的微笑”，厄舍（Usher）上尉说他“举止高贵”。[19] 魅力以难以形容而著称，但若拿破仑愿意，他能让自己非常迷人。当时他定是费尽心思亲英，还在杜伊勒里宫壁炉架两边分别摆放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纳尔逊将军的半身像。[20] 安放福克斯的雕像也许并不出人意料，毕竟此人是辉格党亲法政客，但纳尔逊曾在阿布吉尔海湾击沉拿破仑的舰队，此事才过去四年，所以尊崇他着实令人称奇。（我们可以确信纳尔逊没有在他的壁炉架上放拿破仑半身像。）

在英国，一些激进分子和辉格党人崇拜拿破仑，甚至到滑铁卢之战时，他们的仰慕之情也几乎未减。未来首相墨尔本（Melbourne）勋爵读大学时为他写颂诗，济慈（Keats）的一个鼻烟盒上印有他的肖像，

拜伦为欧洲大陆之旅定做了和他的马车一模一样的车子，威廉·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周报》和丹尼尔·洛弗尔（Daniel Lovell）的《政治家》对他颇有溢美之词。英国自由派人士认为祖国深陷旧王朝的桎梏，向往拿破仑的改革。1802年9月，福克斯本人携三位家眷赴巴黎，他和第一执政之间有一系列非常亲切的会谈。拿破仑还见过以下英国人：另一位未来首相阿伯丁（Aberdeen）伯爵、爱尔兰阴谋分子托马斯·埃米特（Thomas Emmet）、古典学者G.H.格拉斯（G. H. Glasse）教士、霍兰勋爵夫妇、亨利·佩蒂（Henry Petty）勋爵暨未来的第三代兰斯当（Lansdowne）侯爵、斯潘塞·史密斯（Spencer Smith）爵士及数十位显贵名流。英国人纷纷冲向巴黎，詹姆斯·吉尔雷遂创作漫画《十年来的第一个吻！》，画中，一名清瘦的法国军官拥抱象征大不列颠的丰满女子。[21] 英国人也不是一头热，多佛尔（Dover）的法国人多得“惊人”，自然主义者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便说，看样子英法两国多半要“交换全部居民”。[22]

拿破仑趁机派间谍渗入英国，以便制定有关爱尔兰港口的计划，但他们很快就暴露了身份，被遣返回国。多年后，一名英国人告诉他，有人认为此事导致英国政府不相信他的和平诚意，他笑道：“噢！没那必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港口都不是秘密。”[23] 刺探行动是否成功当然不是重点，这种事根本就不该发生，事已至此，它被视作敌对行为也是理所应当。英国情报人员自然也趁着和平时期暗查法国港口。

执政府的十年任期到1810年才到期，但是1802年5月，某项元老院动议便提出让它续任十年。这项提议以60∶1的比例通过，只有前吉伦特党人郎瑞奈伯爵投了反对票。因为此事，人们呼吁制定《共和十年宪法》，这呼声看似自发，实则经人精心谋划。根据新宪法，拿破仑将出任第一终身执政。“你们判定，我应该再为人民牺牲一回，”他在元老院虚伪地说，“你们正在为这个议案表决，若人民要求它生效，我会奉献自我。”[24] 他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勉为其难接受终身权位，就像尤利乌

斯·恺撒两度拒绝罗马王冠一样。终身执政之职彻底颠覆了大革命的原则，但法国人支持拿破仑。全民公决的问题是："是否同意拿破仑·波拿巴任终身执政？"比起1800年2月的那次表决，这回波拿巴派操纵选票的力度甚至更大，也更没必要，最终结果是3653600张赞成票对8272张反对票。[25] 据说这是法国历史上首次有半数以上的选民参与全民公决，但是在某些地区，赞成派的双重投票未受质疑，再说法国人中有不少文盲，他们无法知道市长代自己投了什么票。[26]

8月2日，拿破仑适时宣布就任终身执政，并且有权任命继任者。元老院代表授予拿破仑尊位时，支持波拿巴分子的英国人霍兰勋爵也在场。"拿破仑的态度既非矫揉造作亦非目中无人，"霍兰回忆道，"但他显然想让自己轻松迷人，只有早年时代为人好友的习惯能实现这点。"[27] 拿破仑指名由约瑟夫继任，但是1802年10月10日，路易和奥尔唐斯生下一子拿破仑-路易-夏尔（Napoléon-Louis-Charles），这孩子日后被当作潜在的继承人（可一向刻毒的路易怀疑儿子非他骨肉）。约瑟芬快40岁了，拿破仑不再指望她诞下后嗣。6月，她又去普隆比耶尔泡温泉，为了缓和不孕将引发的问题，他给她写信："我爱你如初见，因为你贤淑，最重要的是，你还和蔼。"[28] 她之前去普隆比耶尔时，他写信嘱咐她照顾自己的"小姐妹"，但这种感情和两人"初见"时他的爱意有着天壤之别。[29]

1801年粮食歉收，次年春天食品价格上涨，令人忧心。1802年5月16日，拿破仑告诉沙普塔尔："我打算拼尽全力阻止城中面包涨价。所有施济处主管每月必须到你这儿领1.2万法郎，必要的话多给些，这样施济处分发的食物可以增加一两倍……此事太微妙，万万不可泄露。"[30] 这些措施颁行后，1802年收成也好转，于是拿破仑摆脱了他一向很在意的饥荒危机。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他着手建造并填充战略级谷仓。除了面包，拿破仑也组织盛会。他过生日时（1802年8月，他满33岁）、针对他的阴谋暴露时、他就任终身执政时、雾月政变纪念日时都

有相应庆典。与此同时，随着第一执政接近自立为君，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处决路易十六纪念日的庆祝活动在细心的安排下逐渐淡化了。

7月上旬，英军撤离厄尔巴岛，拿破仑立刻对重任战争部长的贝尔蒂埃下令：夺取厄尔巴岛，把它变成法国的省（而非意大利共和国的省）；解除费拉约港（Portoferraio）居民的武装；扣押12名重要人质，从而确保当地秩序良好；送上等家庭中年满12岁的孩子去法国上学，把他们变成法国人（不管怎么说，这招曾对拿破仑起效）。[31] 贝尔蒂埃给了三位岛民代表每人3000法郎后，法国在8月正式吞并厄尔巴岛。[32] 这些举动并未违反《亚眠条约》，而且完全在英国的预期范围内。

现在，拿破仑向元老院传信时就像君主一样只用教名。8月上旬，大革命以来的第五部法国宪法《共和十年宪法》生效，然后他宣布：各地区的成年男性公民有权在纳税最多的600人中选出选民团，区政府和省政府官员从选民团中产生，当选后终身任职。[33] 地方选举结束后，选民团分别为立法院和保民院提名两位候选人，他再从中各取一人。拿破仑仔细构建自己任命的政治干将队伍。元老院接过立法院的很多权力，有权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保民官减少了一半，只剩下50人，而且只能在秘密会议上辩论，正如拿破仑所说的，在这种会议上，“他们可以尽情叽叽喳喳”。[34] 就连参政院也受到限制，它的一些权力移至院内秘密委员会。新政体看似有政治参与，但拿破仑掌握全部实权。他的战绩、改革、《政教协定》以及和约赢来了狂热拥护，无怪乎最早当选的选民团成员常是言谈中最支持他的人。

9月5日，拿破仑命令雾月政变得力支持者奥拉斯·塞巴斯蒂亚尼去的黎波里（Tripoli）、亚历山大、开罗、雅法、阿克和耶路撒冷游历四月，为法国谋利。塞巴斯蒂亚尼去的那片地区已然受够了三色旗，这也情有可原。[35] 他带回了爆炸性的报告。在那一周晚些时候，拿破仑邀请皮埃蒙特-撒丁国王卡洛·艾曼努尔重登皮埃蒙特王座，实际上他想让

对方变成法国扶持的傀儡。艾曼努尔在第二王国撒丁安稳度日，拒绝了提议。9月21日，拿破仑正式吞并皮埃蒙特，把它变成了第六个法国新省。意大利共和国领导人希望厄尔巴岛和皮埃蒙特并入意大利，他们感到很失望，但法国此后可直达大小圣伯纳德山口等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山口，进而踏上富饶的伦巴第平原，那里出产稻米、谷物以及里昂奢华服装业与奢华家具业需要的生丝。[36]

伦敦方面认为，尽管拿破仑的行为没有违反《亚眠条约》文本，但有悖其精神。因为伦敦传出反对之声，《亚眠条约》在实施中出现偏差，英军就更不会撤离马耳他岛或本地治里了。当拿破仑在又一片《亚眠条约》没提到的地区行动时，英国鹰派更加恼火了，尽管该地长期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那里也没有任何国家利益。9月23日，拿破仑致信塔列朗，称必须稳固弗朗什-孔泰地区（Franché-Comté）的边境，所以得有"一个凝聚力强的亲法瑞士政府"，不然就得"抹去瑞士"。[37] 他想起了两年前自己需要翻越阿尔卑斯山脉，遂命令瑞士割让瓦莱地区（Valais），以便修建通往辛普朗山口（Simplon Pass）的军用公路。瑞士13州统治了瑞士联邦300年，其中一些州拒绝割地。

在瑞士13州中，贵族掌权的与平民控制的不和，说德语的、说意大利语的和说法语的互生嫌隙，这导致国家政局错综复杂。1802年9月30日，拿破仑颁布《调停法案》（Act of Mediation），把瑞士重新划分为19个州，并组建实力孱弱的中央政府和仅有15200人的瑞士军（这还不及瑞士根据近日的法瑞防御条约拨给拿破仑的19000人）。"这世上瑞士人最傲慢，或者说最挑剔，"他后来说，"他们的国家只有巴掌大，他们的自大却最超常。"[38]

《调停法案》违背了《吕内维尔和约》，10月15日，拿破仑派米歇尔·奈伊将军率4万人去瑞士确保法案执行，这更是违约行为。然而，奥地利任他自由行动，普鲁士和俄国未表异议，瑞士境内原本有人反对，

但他们很快默认了现实。拿破仑对他的瑞士支持者、共和主义哲学家菲利普·施塔普费尔（Philipp Stapfer）说："'夺取瓦莱是我最关心的事之一'……全欧洲都没法让他放弃。"[39] 尽管《亚眠条约》不涉及瑞士问题，英国却暂停履行义务，它既没把本地治里还给法国，也没把好望角还给荷兰，而且它还在亚历山大（条约第8条规定，英军承诺撤离该地）和马耳他岛继续驻军。

拿破仑欣赏瑞士事件中奈伊的表现。奈伊的父母是萨尔箍桶匠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侍女的女儿[40]，他与拿破仑同岁，1787年加入骠骑兵。[41] 奈伊以近乎疯狂的勇气著称，在桑布尔-默兹军团服役时表现优异。1801年5月，他应邀去巴黎拜访执政们，直到那时他才遇见拿破仑。1802年10月，塔列朗命令奈伊率小股军队去瑞士扶持亲法势力，他速战速胜，在两个月内完成了下列事务：兵不血刃占领苏黎世；关闭反法的施维茨州（Schwyz）议会；释放在押亲法分子；镇压伯尔尼政府领导的起义；监督亲法人士接任统治者；为本次行动征收62.5万法郎费用。[42]

12月12日，拿破仑在圣克卢宫会见瑞士州代表，官方报告称："欧洲承认，意大利、荷兰与瑞士听凭法国处置。"问题是英国完全不认这档事。两个月前，波旁家族的帕尔马公爵费迪南去世。法国依照《吕内维尔和约》达成的事项吞并帕尔马公国，拿破仑派法军军官梅代里克·莫罗·德·圣梅里（Médéric Moreau de Saint-Méry）去那儿施行法国法律。这次的兼并有据可循，但是新任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思（Whitworth）勋爵不这么想。法国吞并皮埃蒙特和帕尔马，又入侵瑞士，他主张英国应获补偿。惠特沃思暗示道，既然普鲁士和俄国尚未承认马耳他岛独立，不妨拿它充抵。事实证明，若拿破仑就此妥协倒也不坏。

《亚眠条约》签订后，拿破仑赢得喘息时间，他可以执行通过国家

干预与保护主义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了。这一政策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首创。1802年，拿破仑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本，但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太先进了，法国无力在公开市场上与英国抗衡。他依赖另一种做法，即由政府补贴战略级工业、技术培训学校、发明奖励、英国工厂参观活动（即工业间谍行为）、技术展览会、雅卡尔（Jacquard）丝织业改造、巴黎工业博览会与商会筹建。在巴黎工业博览会上，里夏尔·勒努瓦（Richard Lenoir）的棉纺企业收到价值40万法郎的订单；1802年12月，在政府的资助下，法国境内建立了22个商会。[43] 然而他下台时，法国的工业化程度仅及英国1780年的水平，可见革命党、督政府和拿破仑的经济政策以及他们一致遵从的科尔贝主义有多么糟糕。[44] 沙普塔尔回忆道："我从未见他否决鼓励或扶助工业的提议。"尽管拿破仑也有努力，但是论工业化规模，法国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强国始终相差甚远，战争爆发后情况更是如此。[45] （1815年，法国全境的工业化仍然只有这种程度：煤炭业有452座煤矿、43395名工人；冶铁业有41座铁矿、1202名工人；制造业有1219家工厂、7120工人；炼糖业有98家工厂、585名工人。法国肥皂业中心马赛有73个车间和1000名工人。[46] ）

科尔贝主义者的关税策略进一步扭曲了贸易：皮埃蒙特原本供应伦巴第生丝，因为意大利的高关税壁垒，它转而运生丝去里昂；荷兰制造商在法国售货得交税，但法国制造商在荷兰售货时无此义务；诸如此类。[47] 法国推行经济帝国主义，卫星国很难不生怨恨。拿破仑大费周章，试图提升人们对法国的财政及公债清偿力的信心，即便如此，英国依然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拿破仑最得意之时，他被迫接受的贷款利率都超过英国最不顺之时的利率。[48]

地狱阴谋爆炸案之后，法国驻伦敦公使奥托寄给塔列朗数份英国报纸、期刊、公报。这些出版物含蓄地说它们希望下次刺杀成功，有时还明言此意。[49] 流亡者在伦敦发行的法语报纸令拿破仑格外恼火，如让-

加布里埃尔·佩尔蒂埃（Jean-Gabriel Peltier）编辑的《年度巴黎》《杂报》，这两份报纸化用古典文学用典和诗歌典故，呼吁暗杀他。他甚至去英国法院状告佩尔蒂埃。[50] 国家参政约瑟夫·珀莱·德·拉洛泽尔（Joseph Pelet de la Lozère）称，英国媒体让“拿破仑大怒，他就像寓言里的狮子一样怒不可遏，被一群小虫子蛰得发疯了”。[51] [52] 1802年8月，他终于在法国全面封杀了英国报纸。就像拉瓦莱特在巴黎的地下办公室（bureau noir）一样，英国政府也拦截、复制、破译、开拆邮政局收发的信件，它从中获知波旁家族与流亡者的媒体关系密切。[53]

霍克斯伯里反复告诉奥托，英国不能限制“我国宪法保障的媒体自由”，但是奥托指出，根据1793年《侨民法》的部分条款，英国可将佩尔蒂埃这种具有煽动性的外籍作者驱逐出境。[54] 塔列朗补充道，英国宪法远非刚性法律，并无文本，而且革命战争期间，就连人身保护法也多次中止施行。有人说拿破仑太独裁，不能理解媒体自由的概念，其实问题不仅仅在于自由或压迫，因为有些报纸是政府部门控制的“内阁”刊物，首相的亲弟弟希利·阿丁顿（Hiley Addington）甚至还为它们撰稿。拿破仑也知道，心怀不满的法国人曾在伦敦发表同样恶毒的言辞，诽谤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55]

佩尔蒂埃、雅克·雷尼耶（Jacques Régnier）、尼古拉·迪泰伊（Nicolas Dutheil）等作者在伦敦发布攻击性言论，招惹仇恨，英国政府声称自己无能为力且与此事无关，拿破仑根本不会淡然接受这番辩解。针对此事，他在《箴言报》上登载了不下五篇自己炮制的论述文章。他还起了创作政治卡通形象的念头，下令草拟并推广。[56] 地狱阴谋事件之后，拿破仑认为照理可以期盼据信已趋向温和的权力将有助于抑制恐怖行为的动机。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是英国第一批全

职专业政治漫画家，今天他们仍是最杰出政治漫画大师。拿破仑不走运，他掌权时，这些漫画家恰巧很活跃，并且执着地拿他当牺牲品。吉尔雷曾参与约克（York）公爵的佛兰德战役，此人从没见过拿破仑，但他几乎一手开创了体格矮小的拿破仑形象——“小波尼”（Little Boney）。然而，就连英国漫画家的憎恶也比不上俄国人伊万·捷列别尼奥夫（Ivan Terebenev）和普鲁士人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对拿破仑的纯粹憎恨，更不用说拜恩人约翰·米夏埃尔·福尔茨（Johann Michael Voltz）了，他的漫画《1813年的胜利》中，拿破仑的头完全是一堆尸骨。[57] 当然，伦敦市面上也有支持拿破仑的版画，1801年它们卖到2先令6便士，这说明有英国人仰慕他。[58] 不过一般说来，英国的仇法主义和法国的仇英主义几乎不相上下。很明显，大肆辱骂拿破仑的印刷品比肯定他的更有市场。在英语漫画和讽刺文学中，反拿破仑主义标杆作品占了整整两卷，这还不包括插图。[59] 与此同时，一位同时代的人发现，1797年后，英国出版了大量拿破仑传，这些书“都描述他邪恶刻毒的外貌与扭曲沦丧的道德品格，口吻如出一辙”，因为传记太多，它们的“说法一个比一个过分”。[60] 除了报纸、漫画、书籍乃至儿歌，拿破仑还是英国民谣、歌曲和诗作的常见笑柄。那个年代差不多没有颂诗不能吟咏的事（有一首便是《意外淹死在渡口的醉酒老妇颂》），所谓的拿破仑之罪更是令诗人文思泉涌，但这些诗里没有一首是纪念他的。[61]

1802年8月至1803年3月，《箴言报》几乎每个月都粗鲁地辱骂英国政府，把它比作柏柏里海盗和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所以拿破仑的抗议颇为虚伪。[62] 《箴言报》甚至宣称，若地狱阴谋成功，朱安党恐怖分子乔治·卡达杜尔将获嘉德勋章。[63] 拿破仑想把卡达杜尔从英国赶去加拿大，虽然此举未成功，但为了表示自己支持英国君主，他还是驱逐了所有在法国避难的斯图亚特家族成员，哪怕最近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也已过去了五十八年。[64]

佩尔蒂埃是个怪人，他在自家花园用胡桃木制的小型断头台表演砍鹅头或鸭头，并向每位观看者收取1先令。英国检察总长斯潘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迫于法方压力，最终决定控诉佩尔蒂埃犯诽谤罪。1803年2月21日，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审理此案，陪审团只考虑了一分钟就一致判佩尔蒂埃有罪，但此后不久战事重启，所以他从未下狱，照样激烈地挖苦拿破仑。[65] 后来，佩尔蒂埃出版法国哥特式浪漫风吸血鬼小说家夏尔·诺迪埃（Charles Nodier）的反拿破仑作品，有人警告作者先移居境外，但他没拿这相当分明的预警当回事，结果在圣佩拉吉耶监狱（Saint-Pélagie prison）关了几个月。[66]

1803年3月，拿破仑派马蒂厄·德康（Mathieu Decaen）将军率4艘战舰及1800名水手赴印度。他显然怀疑《亚眠条约》也许命不久矣，命令德康“同最难忍耐英国公司（即东印度公司）铁轭的民众与亲王交流”。他考虑到，法国其实并非“海洋之主”，导致自己“几乎指望不上重要援助”，于是他让德康回报驻印度英军的要塞力量以及法国在当地驻军的可能性。[67] 拿破仑告诉德康，若1804年9月之前真的爆发战争，他将“有机会争取流芳百世的巨大荣耀”。拿破仑走在伟大与吹牛的狭窄界限上，但他给德康的指示表明，他没料到条约会那么早作废。

1802年9月时，拿破仑恢复了他惯有的反英状态。当月，他给内政部写信抱怨道，他去卢浮宫参观三小时，发现一面戈布兰（Gobelins）壁毯上绘有1346年英军围攻加来之战的场景。“巴黎公共场所不应展示这类主题。”[68] 12月28日，拿破仑从圣克卢宫致信塔列朗：“我们好像并没有实现和平，只是在休战……这都是英国政府的错。”[69] 《亚眠条约》面临着以下问题：塞巴斯蒂亚尼和德康的远征；卡达杜尔仍然享有的伦敦居留权；流亡者的媒体；撒丁国王和奥兰治亲王威廉五世的补偿；瑞士的独立；未从荷兰、亚历山大、本地治里、好望角特别是马耳他岛撤走的军队；法国关税制度。善意与信任或许能解决所有这些困难，但双方心存不轨，彼此怀疑。至少在头脑清醒时，乔治三世一向有

良好的判断力，他说和平只是“试验”，一语道破一切英国政府的不变观点。英国很快就发现这次试验显然是失败的。[70]

1803年1月30日，《箴言报》用八页篇幅刊载塞巴斯蒂亚尼的黎凡特之行报告。此文宣称，不足1万人的远征军就可夺回埃及。这是蓄意挑衅，英国自然又开始担心法俄瓜分奥斯曼帝国。“没人认为波拿巴会做毫无动机的事，”国家参政珀莱说，“推论显而易见。”[71] 拿破仑不肯和大使惠特沃思讨论报告，甚至拒绝发布澄清声明。若拿破仑真的考虑重返埃及，他不大可能在《箴言报》上大肆宣扬，然而报告毕竟还是发表了，这说明它是外交工具，而非严谨的行动计划。1803年，他不想重燃战火，但他也不想让法国为了避战而放低姿态。“每过一天，他们对近日所受挫败的深刻印象就少一点，我们通过胜利所获威望也淡一分。”当时，他对一位国家参政说道，“拖延只对他们有利。”[72]

2月9日，英国宣布暂停全部撤军行动，除非法国对它最近在伊特鲁里亚、瑞士和黎凡特的行为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九天后，拿破仑对惠特沃思抱怨道，英军没有撤离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抨击他的媒体也迟迟未见取缔。“让我们团结起来，不要为这些事争执了，”他围绕威胁和平的焦点总结道，“我们一起决定世界的未来吧。”惠特沃思认为这只是华丽辞藻，但拿破仑日后在蒂尔西特（Tilsit）[73] 对沙皇亚历山大说了大体相同的建议。从蒂尔西特的情况来看，他和惠特沃思交谈时可能完全当真了。然而，惠特沃思认为这事甚至都不值得参与，他回答时提及帕尔马、皮埃蒙特和瑞士的问题，拿破仑拒绝答复，说这些只是“小事”。战局重开后，英国谴责他漠不关心上述小国，可是拿破仑当时想说，自己希望广袤海外帝国统治者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之主法兰西建立伙伴关系、决断世界前景，站在这个角度上，他那句话非常理智。[74] 若拿破仑无联手之意，当时他定会据理力争（他也许会故意这样做），正如惠特沃思对阿丁顿报称：“我以为跟我说话的不是欧洲最伟大国度的首脑，而是龙骑兵上尉。”[75]

2月20日，拿破仑对巴黎立法机关说："因为君主退位、人民希冀，法国顺应必然之势接管皮埃蒙特。"[76] 同样地，为了"打开连接意大利的三重便利通道"，瑞士主权也遭侵犯。拿破仑还说，英军仍然占据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50万法军战士"准备自卫并复仇"，[77] 此言更含不祥意味。次日，英国把好望角还给荷属东印度公司，但在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问题上，奉承与恐吓都不能说服它履行承诺。

2月25日，神圣罗马帝国议会通过《帝国议会最后宣言》（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吕内维尔和约》遂在德意志生效。法国在莱茵河西岸扩张领土后，为了补偿一些德意志国家和亲王，奥地利等德意志大国需"附庸"或精简德意志国家，它们的主要手段是把教会领地划为世俗土地，并让"自由"城市、"皇家"城市与其更强大的邻邦相连，200多个德意志小国于是减少到40个。1945年之前，这是德意志境内规模最大的国家政权交接和财产转移，近240万人和1270万金币的岁入流向新统治者。塔列朗和一些德意志君主商谈数月，促成了这次整合，对这些君主来说，大举接纳此前一直自治的小国有利可图。留下来的国家割让莱茵河西岸领地给法国，但它们大多在莱茵河东岸分得更多土地。比如说，巴登所获领地是它所让地盘的数倍，普鲁士几乎拿到五倍，汉诺威分毫未让却得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主教辖区，奥地利也新增大量土地。符腾堡失去3万公民，但吸纳12万人，1803～1810年，它兼并了78个政治实体及施瓦本皇家骑士（Schwäbischer imperial knights）的土地，让自身疆域翻了一番。[78] 普鲁士失去14万人，但吸纳60万人。几百年来，德意志境内数百小国林立，如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之父的世袭国家温内堡-拜尔施泰因（Winneburg-Beilstein）。小国消亡后，德意志版图大大简化。

拿破仑不忘他的英雄——曾建立德意志王公联盟（Fürstenbund）来对抗奥地利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王。如今他试图让新添领土的德意志国家仰仗法国来抵制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于是他推动法国与

拜恩、巴登、符腾堡联姻，从而在1805年欧洲对法国的更深敌意爆发前同这三个国家结成战略同盟。[79] 1804年7月，拿破仑为欧仁择妻时相中16岁的拜恩公主奥古丝塔（Augusta）；1806年4月，约瑟芬的堂侄女斯特凡妮-博阿尔内嫁给巴登的卡尔（Karl）亲王；1807年8月，22岁的热罗姆迎娶符腾堡公主卡塔琳娜。

1803年3月8日，乔治三世发表英王敕语，要求议会筹集军需、动员民兵。他还指责法军在法国与荷兰港口准备大型战事，尽管惠特沃思后来寄去的快件表明法军并无此等行为。就像法国发布塞巴斯蒂亚尼的报告一样，英国发表演说只是威胁，并非宣战。“英国没有沉睡，”11日，乔治三世致信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它永远保持警戒，直到掌控世上一切殖民地和商业才会安歇。单单一个法国就能阻止它休息。”虽说他这么写，但英国已经根据《亚眠条约》让出马提尼克岛、多巴哥岛、圣卢西亚岛和梅诺卡岛。[80]

3月13日（周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招待会上看见惠特沃思。这位大使称，他“和我搭话时显然焦躁万分。他问我有没有收到英国的消息，借此挑起话头”。然后惠特沃思说，两天前他收到了霍克斯伯里的信。[81]

> 拿破仑：“所以你们决意一战。”
>
> 惠特沃思：“不，第一执政，我们太清楚和平的益处了。”
>
> 拿破仑：“我们打了十五年了。”
>
> 惠特沃思（顿了一下）：“那已经太长了。”
>
> 拿破仑：“但你们想让我再打十五年，并迫使我开战。”
>
> 惠特沃思：“那远非国王陛下所愿。”

拿破仑随后走开，同俄国大使马尔科夫（Markov）伯爵和西班牙大使阿萨拉（Azara）骑士交谈。“英国人想要战争，”他说，“可如果他们

率先拔剑出鞘，我将最后收剑入鞘。他们不尊重条约，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蒙上治丧黑纱。”[82] 惠特沃思称，拿破仑又转向自己，“令我非常恼火的是，他对我个人说了几句礼貌之词后继续刚才的谈话，如果那种谈话还能叫谈话的话”。拿破仑接着回到主题。

> 拿破仑：“为什么备战？这些预防措施针对谁？我的法国港口里没有一艘（在建）战列舰，但若你们备战，我也必须准备，若你们想战，我也奉陪。你们也许能毁灭法兰西，但绝对吓不倒它。”
>
> 惠特沃思：“谁也不打算备战或开战，我们想和法国友好相处。”
>
> 拿破仑：“那得尊重条约！在这件事上，它们对整个欧洲负责。”[83]

惠特沃思补充道，拿破仑“太激动了，继续和他交谈不可取，于是我一言不发，他便重复着最后一句话返回了自己的公寓”。[84] 多达两百人耳闻这次谈话，惠特沃思称，大家都“觉得那种场合非常讲求尊严和礼仪，而他极其失态”。

但是，拿破仑所言真的如此可怕吗？一个战争贩子不会像拿破仑那样“激动”，只有真正担忧海军备战的误会或可导致和平瓦解的人才会这样做。拿破仑被指在宴会上恐吓辱骂惠特沃思，然而，尽管他们的语调和手势已不可知，这番对话本身也不能说明他是否语带威吓。（日后有人斥责拿破仑咄咄逼人，吓倒惠特沃思，但这则指控的出处肯定不是目击者或惠特沃思本人，有理由相信它源自英国宣传人员。[85] ）4月4日两人再会后，惠特沃思冷静地报告：“他的态度我无可挑剔。”[86]

圣多明各远征尚未结束，德康驶往印度，法国也正在重建经济，所以拿破仑不想在1803年春夏时节开战。法国仅有42艘战列舰，其中只有13艘做好了服现役的准备，对手皇家海军则有120艘战列舰。然而，拿破仑清楚舰队得做好准备。“当前局势下，为预防海战，”3月13日，他问海军将领德尼·德克雷（Denis Decrès），“给英国商业造成最大打击的

最佳方式是什么？”[87] 两天后，拿破仑派旅级将军科尔贝（Colbert）给沙皇亚历山大送信，此信准确地将其立场总结为：“日理万机，忙着绘制运河地图、开办工厂、办理公共教育。”然而，“考虑到现存敌意之烈，若对英战争公开爆发，你会看到法兰西但求一决雌雄”。[88] 拿破仑照例一并处理各类事务，次月，他交代了鲁昂警长两件事：命令在押妇女利斯（Lise）和吉勒（Gille）迁居至鲁昂60英里之外；禁止妓女出入当地剧院顶级包厢。[89]

4月23日，英国提出以下主张：未来七年英国继续占有马耳他岛；法国把距突尼斯（Tunisia）70英里、人口稀疏的地中海岛屿兰佩杜萨岛（Lampedusa）让给英国当海军基地；法军撤离荷兰；法国补偿失去皮埃蒙特的撒丁。“你要显得冷酷、傲慢，甚至有些骄傲，”5月10日，拿破仑告诉塔列朗如何对付惠特沃思，指示道，“要是会谈记录提到‘最后通牒’，让他明白这意味着战争……要是没这个词，让他加进去，同时跟他说，我们必须真的弄清楚当前情势，并且我们深深厌倦这种不确定状态……说一旦出现最后通牒，一切就爆发了。”[90] 事实上，惠特沃思只是索要通行证，这是宣战前敌国大使的惯常请求。“难以想象这个伟大强盛、见识敏锐的国家竟选择宣战，因为这次战争定会招致非常可怕的悲剧，”大使离开巴黎时，拿破仑告诉他，“而它的起因微不足道，不过是一粒倒霉石子。”[91] 5月6日，在伦敦布鲁克斯俱乐部（Brooks’s Club），第九代萨尼特（Thanet）伯爵和第五代威廉斯-温（Williams-Wynn）准男爵沃特金（Watkin）爵士、前伦敦市市长哈维·库姆（Harvey Combe）议员、汉弗莱·豪沃思（Humphrey Howarth）议员打赌，“从今天起一个月内，英法不会进入敌对状态”。他对每人下了50几尼赌注，结果输得很惨。[92]

5月11日，拿破仑召集参政院外交组的七名参政，讨论英国的要求。这七人中，只有约瑟夫和塔列朗支持继续谈判。次日，惠特沃思离开了巴黎。16日，法国驻伦敦公使安德烈奥西将军在多佛尔登船，恰在

此时，英国签发私掠许可证和强制捕拿许可证，批准官民在英国港口及水域扣押所有法国船只。[93]“很明显，比起恐怖的战争，波拿巴仍然满心渴望和平，”次日，小威廉·皮特的心腹兼导师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伯爵写道，“此时此刻，我怀疑他终将完全同意我们的提议，战事也会随之暂歇。这场战争可以拖延，但不会彻底湮灭。”[94]《亚眠条约》废止后，惠特沃思告诉马姆斯伯里：“战争会深深影响法国人，让他们心生巨大怨愤和失望，这能动摇波拿巴的权力，军队已不像之前那样效忠他了。若他授权莫罗掌军，就得冒倒戈风险。”[95]至少在这些预言上，惠特沃思大错特错。

英国认为拿破仑可能接受它的诉求，为防这种（其实并不存在的）危险，1803年5月18日，它正式对法宣战。拿破仑回击英国，关押了已满服役年龄但仍在法国境内的英国青年，很多人后来被换走了，但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十年一直被软禁在家中。[96]5月20日，拿破仑传信参议院，辩称英国“严厉批判《亚眠条约》，因为它没令法国蒙羞，英国就认为它是致命的……白白认定仇恨！”，这番话纯属宣传之辞。[97]两天后，他命令德克雷制造可载100人及1门加农炮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平底船模型，并联系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和塔列朗，试图为港口修建工程拉到私人出资，这样建成的港口将以出资人的名字命名。[98]与此同时，德农铸造了一枚铜质纪念章，上刻一头撕咬条约的猎豹（英国的传统代表动物，而且带些褒义成分），以此铭记《亚眠条约》崩解。

根据《圣伊尔德丰索密约》，拿破仑答应西班牙不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第三方，现在他决定违约。惠特沃思在巴黎索要通行证之日，杰斐逊总统在大西洋对岸签字同意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他一笔下去，美国领土扩张一倍。路易斯安那从墨西哥湾延伸至加拿大边界，包括现代美国的13个州全境或部分地区。美国以每英亩4分不到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占地8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付给法国8000万法郎。[99]“犹豫和沉思已不合时宜，”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我放弃路易斯安那。我不仅让出新奥尔良

（New Orleans），还毫无保留地交出整个殖民地。我知道我付出了多少代价……试图坚守路易斯安那是件蠢事，我怀着最大的遗憾放弃它。”[100]

法军在圣多明各溃败，《亚眠条约》也作废，拿破仑便断言，他必须认识到自己最大的资产（眼下）毫无用处，而且它可能终将诱发美法冲突。他转而帮助美国拓展疆域，借此充填法国国库，于是他预言：“我刚刚塑造了英国海军的对手，它迟早会践踏英国海军的荣耀。”[101]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法无战事，美英倒是开战了。1812年美英战争拖住了一些英军，这些部队一直战斗到1815年2月，若无这场战争，他们也许会去滑铁卢战场。

国库部长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尔布瓦（François Barbé-Marbois）与美国谈判，原因之一是他曾在美国居住、娶了美国太太、认识杰斐逊。另一个原因则是塔列朗起初反对这桩交易，拿破仑便怀疑，若他主持谈判，他定会向美国人索贿。[102] 约瑟夫和吕西安恳求拿破仑不要卖掉路易斯安那，甚至威胁要当众反对。吕西安称，拿破仑从他的浴缸里半起身，告诉兄弟们他不容一丝异议，立法院也不会讨论此事，接着他倒进浴缸，只见水花飞溅、洒得约瑟夫浑身湿透。[103] 约瑟夫和吕西安的这次抗议令拿破仑大发雷霆，他还砸坏了饰有约瑟芬肖像的鼻烟盒。

美国全权代表之一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问法国谈判代表待售土地的确切西北部边界。很少有欧洲人去过那片土地，更不用说制图者了，法方于是告诉利文斯顿，这块地包括1800年西班牙卖给法国的全部土地，但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若尚无不清之处，”拿破仑建议道，“制造一个困惑兴许是明智之举。”[104] 《亚眠条约》前途愈发堪忧，利文斯顿和谈判同僚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完全在此背景下在巴黎艰难磋商。会谈长达三周，直到战事重启前几日才结束。英荷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Barings Brothers）与霍普银行

（Hopes）提供融资服务。事实上，银行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后以1125万美元的价格转卖给美国，美国政府用利率为6%的公债付账，因此不必马上筹资。[105] 纵然英法已然开战，巴林兄弟银行也为拿破仑提供服务，每月支付他200万法郎。亨利·阿丁顿首相要求巴林兄弟银行停止汇款，它同意了，但是大陆上的霍普银行继续付账，巴林兄弟银行也为它提供资金支持。拿破仑拿到了钱，两家银行也从这笔交易中赚取了近300万美元。

“我们活了很久，”买卖敲定时，利文斯顿说道，“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我们刚刚签订的条约不是靠技巧谋得的，也不是用武力强加的。缔约双方均分利益，广袤荒僻之地将变成繁华市区。从今天开始，美国跻身一流强国。”[106]

---

[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8

[2] Lentz，Thierry，*Le Grand Consultat 1799-1804* 1999，pp.264-8，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103

[3]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942 p.528，January 19，1801

[4] ed. Tulard，Jean，*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Ⅱ pp.19-20

[5] 当时叫波拿巴广场（Place Bonaparte）。——译者注

[6]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2

[7]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Ⅰ p.7

[8]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319-20

[9] Villefosse，Louis de and Bouissounouse，Janine，*The Scourge of the Eagle* 1972

[10] *TLS* 4/8/1972 p.912

[1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827 p.939，March 22，1802

[12] Buhl MSS 110 Box 1 fol.2 p.19

[13] Grainger，John D.，*The Amiens Truce* 2004，p.211

[14] 英军将领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爵士曾被法军俘虏，他抨击“把光荣战士在大船上关几年的念头……最臭名昭著的重犯所受刑罚远不及这种惩罚严厉……（此）乃当时政府之耻。在法国，拿破仑皇帝下令给予英国战俘体面待遇，这与我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Blaze，*Life in Napoleon’s Army*，p.66.

[15]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41

[16]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121

[1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632 p.845，November 2，1801

[18] ed. Foster，Vere，*The Two Duchesses* 1898，p.173

[19]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p.186，Alger，J.G.，‘British Visitors to Paris 1802-180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4 October 1899，p.254

[20]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2

[21] Alger，J.G.，‘British Visitors to Paris 1802-180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4 October 1899，pp.740-41

[22] BL Add. MS 51799 ff.54-5

[2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9，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Ⅰ pp.264-5

[2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21

[25]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1，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36

[26]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p.22-5，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65

[27]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194

[28]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948 p.998，June 19，1802

[29]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366 p.729，June 16，1801

[30]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892 p.970，May 15，1802

[31]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983 p.1014，July 3，1802

[3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89

[33] eds. Lewis，Gwynne and Lucas，Colin，*Beyond the Terror* 1983，p.238

[34]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p.324-5

[35]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142 pp.1089-90，September 5，1802

[36] Grab，Alexander，‘The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talian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p.21-22

[3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174 pp.1105-6，September 23，1802

[38]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93

[3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92

[40] 原文误作“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侍女”。——译者注

[41] *TLS* 3/2/2012 p.4

[42]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p.71-2

[43]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21

[44]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p.49-52

[45]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132

[46]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49

[47]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1

[48] 《亚眠条约》签订后，利率为5%的法国统一公债报价为48～53法郎，利率为3%的英国统一公债报价却为66～79法郎，尽管它承诺的回报率较低。Lefebvre，*Napoleon*，p.132.

[49]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109

[50]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08，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749 pp.899-900，February 2，1802

[51] 埃德蒙·伯克创办的《年鉴》（*Annual Register*）称，约瑟芬“几乎是天生的荡妇，因为她13岁时就和母亲的两个仆人鬼混，他们一个是黑人，一个是混血种人，把她搞怀孕了”。这期刊物说，约瑟芬嫁给博阿尔内时显然生了一个混血儿子，而拿破仑“一心想让教皇娶他妈”。*Annual Register*，1809，p.342.

[5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08

[53]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p.110-11

[54] PRO FO 27/66 28 August 1802

[55] Darnton，Robert，*The Devil in the Holy Water* 2010，pp.43-5

[5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490 p.326，July 4，1800，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pp.258-9

[57] Bryant，Mark，‘Graphic Warriors：War Cartoonists 1792-1945’*The London Library Magazine* Winter 2011，p.17

[58] Champfleury Jules，*Histoire de la caricature* 4 vols.1885，Ⅳ pp.247-397，Buhl MSS 110 Box 1 fol. 3 frontispiece

[59] Ashton，John，*English Caricature and Satire on Napoleon* Ⅰ 2 vols.1884

[60]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p.245

[61] Yale Center，‘Nelson and Anti-Napoleon Verse’*passim*

[62] *Moniteur* of 8/8/1802，9/10/1802，6/11/1802，1/1/1803，9/1/1803，28/2/1803，3/3/1803

[63]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p.117

[64]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6294 p.988，June 1，1802，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03 p.62，March 3，1805

[65] eds. Carpenter，Kirsty and Mansel，Philip，*The French É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1789-1814* 1999，p.56，Ashton，John，*English Caricature and Satire on Napoleon* Ⅰ 2 vols.1884，Ⅰ p.174，Welschinger，Henri，*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1882，p.86，Peltier，John，*The Trial of John Peltier，Esq，for a Libel Against Napoleon Buonapart* é 1803，p.ⅹⅷ

[66] Welschinger，Henri，*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1882，p.143

[6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425 p.30，January 15，1803

[68]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173 pp.1104-5，September 22，1802

[69]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386 p.1199，December 28，1802

[70] Grainger，John D.，*The Amiens Truce* 2004，p.210

[7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5

[72]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p.119

[73] 今苏维埃茨克（Sovetsk）。

[74]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41

[75] Aubry，Octave，*St Helena* 1936，p.214

[7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

[7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6

[78] Wilson，Peter H.，*War*，*Society and State in Württemberg 1677-1793* 1995，p.25

[79]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p.108-9

[8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15 p.68，March 11，1803

[81] ed. Browning，Oscar，*England and Napoleon in 1803*，*the Despatches of Lord Whitworth* 1887，p.116

[82] Madelin，Louis，*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1934，p.182

[83]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457

[84] ed.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116

[85] Alison，Sir Archibald，*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vol.1 1843，Ⅴ p.109

[86] ed. Brown，Howard G.，*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p.ⅸ

[8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21 p.74，March 13，1803

[8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16 p.69，March 11，1803

[8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573 p.100，April 14，1803

[9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629 p.127，May 10，1803

[9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p.11-12

[92] Brooks's Club Betting Book

[93] Hozier，Captain H.M.，*The Invasions of England* vol.Ⅱ 1876，p.312

[94]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Ⅳ p.253

[95]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Ⅳ p.258

[9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7778，7793 p.193，July 3，1803，p.200，July 7，1803

[97]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175

[9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683 p.151，May 29，1803

[99]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59

[100] Barbé-Marbois，François，*History of Louisiana* 1829，pp.270-75

[10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372

[102]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p.162

[103]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p.166

[104] *TLS* 20/2/2004 p.10

[105] Ziegler，Philip，*The Sixth Great Power* 1988，p.71，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142 n.1

[106]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p.173

第十五章 加冕

我们必须让波旁看到，他们害人就要遭报应。

——拿破仑论昂吉安公爵

我们在这里不商谈公众意见，而是引导它。

——1804年，拿破仑在参政院的发言

5月18日，英国对法宣战，此后事态迅速发展。当月末，法军入侵乔治三世的世袭选侯领地汉诺威，拿破仑还命令爱德华·莫尔捷（Édouard Mortier）将军（英国女人之子，曾在杜埃的英语学院就读）在当地的森林中伐木，以便制造侵英行动所需的平底船。[1] 皇家海军以牙还牙，封堵德意志境内的易北河（the Elbe）与威悉河（the Weser）入海口。7月，纳尔逊封锁土伦。到9月时，英军夺回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岛、伯比斯、德梅拉拉和埃塞奎博。与此同时，尽管俄国强烈抗议，拿破仑依然违背1801年法国与那不勒斯签订的条约，派杰出军人（兼失败的艺术家）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将军重新在意大利的塔兰托、布林迪西（Brindisi）和奥特朗托（Otranto）驻军。圣西尔为人冷漠，部下便昵称他为“猫头鹰”（The Owl）。

6月，拿破仑下令在布雷斯特、布洛涅、蒙特勒伊、布鲁日（Bruges）和乌得勒支兴建五座大型侵略军营地。布鲁日营地后来转至布洛涅附近的昂布勒斯特。算上菜园的话，布洛涅主营很快占据长达9英里的沿海土地。“我住在滨海军营中，”11月5日，拿破仑从蓬德布里克司令部致信康巴塞雷斯，“在这儿瞟上一眼就能轻松度量我们和英国的距离。”[2]

圣奥梅尔（Saint-Omer）、贡比涅（Compiègne）、阿拉斯

（Arras）、埃塔普勒（Étaples）、维默罗（Vimereaux）、巴黎和亚眠建立起支援兵营，供骑兵和预备队使用。英格兰军团吸收了旺代的西方军团兵员，后改称滨海军团（Army of the Ocean Coasts）。1804年1月军团共7万人，3月时全军达12万人。[3] 拿破仑后来声称，自始至终他只想威慑英国、麻痹奥地利、训练军队，从没真的打算实行入侵。此乃无稽之谈。爱德华·德布里埃（Édouard Desbrière）上尉的五卷本《登陆英吉利群岛的计划与设想》（*Projets et tentative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1900～1902年出版）回顾拿破仑的入侵方案，用了至少2636页精确概述各半旅的预备上岸地，虽说此书中格雷斯-瑟罗克（Grays-Thurrock）误作“弗雷-哈罗克”（Frey-Harock）、绿港（Greenhithe）误作“绿山”（Green-hill），但它表明拿破仑没有虚张声势。[4] 他让人发布书籍与文章，提及尤利乌斯·恺撒时代以来的成功侵英行动；他开始称英国为迦太基，在卢浮宫展示巴约壁毯（Tapisserie de Bayeux）[5]；他指示德农铸造“降临英国”的纪念章，其正面刻画近乎全裸的拿破仑成功战胜人鱼，其背面则是文字“1804年，伦敦铸造”。[6]

大规模地修建运河能保持南特、荷兰、安特卫普（Antwerp）、瑟堡（Cherbourg）、布雷斯特和罗什福尔之间的内陆交通，扩建弗卢兴码头后可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整个荷兰海军出海，然而这些工程直指拿破仑意图中的某处致命伤，[7] 他和海陆军将领们堆积如山的详细通信亦体现了这一死穴。1803～1804年，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553封信，给德克雷将军写了236封信。[8] 圣奥梅尔军营主将让-德-迪厄·苏尔特将军（拿破仑给他写了77封信）报称，全军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登船。拿破仑反驳道：“不可能，先生！我不认识‘不可能’，法语里也没这个词，从你的字典里删掉它。”[9]

贝尔蒂埃和拿破仑私下通信时称侵略军为英吉利远征军团（l’armée d’expédition d’Angleterre）。1803年12月23日，贝尔蒂埃列出军团兵力

组成：79000名步兵；17600名骑兵，15000匹马；4700名炮兵；4600名车夫，7800名平民；数不清的地中海轻帆船，每艘可载20人、2000发子弹、200块饼干、10瓶白兰地（eau-de-vie）与1份羊腰腿肉；大量半武装渔船。[10] 国家参政珀莱称，舰队规模如下：250艘单桅帆船，每艘载炮3门；650艘炮舰，每艘都配有大舢板；大量平底船，每艘载炮6门；750艘运输船，负责运送火炮。[11] 舰队规格达到顶峰时，各类船只达1831艘，人员达167000人。[12]

很多平底船满载时的最大吃水深度为6英尺，船底平坦意味着它们可以上岸。1804年春，平底船大多已就位，但其侧舷容易进水，而且船尾无风时它们才能平稳航行，此外英吉利海峡鲜有东南风。[13] 若舰载艇（pinnace）不能笔直前行，士兵也得划船穿过22英里的海面，他们会累得筋疲力尽。虽说法军准备夜袭，但是秋冬时节才会出现整整八小时黑夜，而那时天气太恶劣，军队不能冒险乘平底船渡海。[14] 英吉利海峡固然狭窄，但它靠出了名的变幻莫测弥补了这一点。后勤原因充分说明为何15世纪后再无人成功入侵英格兰（15世纪时，侵略军要经威尔士入侵英格兰）。19世纪早期，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训练最佳、指挥最好的海军部队。

拿破仑没有被吓倒。1804年7月30日，他告诉布吕内将军，我们“只要等来适宜的风，就能把帝国鹰旗插上伦敦塔。时间和命运本身就知道未来”。[15] 拿破仑的营地视察能花上二十五天，途中，他检查从防御工事到卫生管理的一应事务，但他尤其喜欢和士兵交谈。“他随心所欲地混入士兵中，”一名副官回忆道，“关心影响其舒适生活的一切小细节。他差别对待士兵，给予一些人赞赏、偏爱和所有应得的晋升，这激起了他们的最大热情。”[16] 7月22日，拿破仑致海军部长的信抱怨道，因为没有支付费用，海峡港口的工人只好卖掉他们的银袖扣。“他们绝不能受罪，”他坚称，“不管事态如何，工钱必须付。”[17] 人们也得喝酒。拿破仑致信德克雷，谈论将要充当营房的布洛涅地区的待征房屋及侵略军

物资供给，他告诉对方“要确保有酒窖”，接着补充道，侵英战事需要30万品脱白兰地。[18]

8月在巴黎时，拿破仑开始与爱尔兰人联合会领袖商谈。若法军登陆爱尔兰，他希望2万名爱尔兰起义者提供支持。[19] 他需要在英国安排117名翻译向导，想让这些爱尔兰人加入此队伍。他给他们设计制服，服饰构想包括“内衬红色的绿色龙骑兵外套、鲜红色饰面、白色纽扣”乃至马刺颜色，他还认定他们应设置两名鼓手。[20] 拿破仑执着于微观管理，以至于他下令在17世纪海军英雄让·巴尔特故乡的市政厅为此人塑一尊大理石半身像，从而激发对法国海军战绩的自豪感。

拿破仑照例需要军政事务以外的精神食粮。美国物理学家本杰明·汤姆森（Benjamin Thomson）爵士当时住在巴黎，10月1日，拿破仑感谢他的热量守恒说论文，评论道：

> 和极其稀薄的生热分子相比，未磨光物体的粗糙表层面积很大。同一物体磨光后，表层空间总面积会大大缩小。表层空间面积能够度量热量的流出与流入，从这个角度看，未磨光物体的热量出入量一定比磨光物体的大，所以它改变温度的速度应该更快。这些是我的想法，你的论文证实了它。为了发现真理，我们实施大量精确实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逐步前进，找到可在生活中全面适用的简明理论。[21]

最后一句足以证明拿破仑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此时拿破仑的云雨生活也非常活跃。11月初，他在布洛涅逗留，并致信不明人士“F夫人”，承诺下次见面时，“你要是喜欢，我还当门卫，但这回我决不让别人操心陪你去基西拉岛（Kíthíra）的事”，可见他似乎在当地找了个情妇。基西拉岛是爱情女神阿弗洛狄忒的故乡，当时他也不会只用首字母称呼其他收信人。拿破仑还和沙普塔尔的情妇、法兰西喜剧院女演员玛丽-泰雷兹·布古安（Marie-Thérèse Bourgoin）缠绵，沙普塔尔于是心生懊恼。

约瑟芬知道吗？1804年11月，他与她通信，回复他所谓的“哀伤”来信：“贤淑温柔的约瑟芬一直在我心里，除非她自己变得消沉、暴躁、烦人。只要有个毫无压力的温馨家庭，我就能承受充溢人生的悲伤。”[22] 但1805年1月时他却写“爱抚小姐妹一千次”，并且告诉她，欧仁正在“追求布洛涅所有女人，但状况未见好”。[23]

皇家海军的两支英吉利海峡中队拥有30多艘战列舰，永久驻于海峡。所有法国海军主将——冈托姆、厄斯塔什·布吕克斯、洛朗·德·特吕盖、皮埃尔·德·维尔纳夫及德克雷——为皇家海军海峡中队所制，他们在合理限度内尽力反对英国远征。路易·拉图什·特雷维尔（Louis Latouche Tréville）最能胜任法国海军总司令之职，但他从圣多明各回来后就抱病不起，于1804年8月辞世。布吕克斯接替了特雷维尔，却在1805年3月死于肺结核。拿破仑和他的高级顾问意识到，大军不可能只靠一次涨潮渡海，冒着雾色突然过海也注定会陷入不测之渊。1692年，路易十四筹划入侵英国；1779年，路易十六制定侵英计划；1797～1798年，拿破仑自己也考察了侵英可行性。无论上述哪一场合，法军能想出的最佳战略都是设局引诱皇家海军离开英国南海岸线，为横渡海峡争得足够的时间。然而，诱使伦敦的海军部从狭窄的英吉利海峡撤防纯属幻想，哪怕设想的撤防时间只有一次涨潮。

1803年11月23日，拿破仑致信冈托姆，谈及300艘武装大艇（chaloupes cannonières）、500艘炮舰（bateaux cannoniers）和500艘驳船组成的舰队，希望它尽快做好准备。“你觉得它能带我们去阿尔比恩海岸吗？它能载100000人。晚上对我们有利的八个小时将左右宇宙的命运。”[24] 次日，他让沙普塔尔为“入侵英国”写几首歌，还说其中一首要用《出征曲》的调子。[25] 12月中旬，他下令：旅级将军可携4名仆人去英国，上校只可带2名。[26] “此地的一切美妙悦目，”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我真心喜欢美丽宜人的诺曼底。它是真正的法兰西。”[27] 约一年后，即1804年12月12日，他从布洛涅致信奥热罗称：“近十天来我一直

待在这。我有理由指望自己实现欧洲期盼的目标。六个世纪的屈辱等着我们来复仇。”[28] 四天后，拿破仑告诉康巴塞雷斯，他能在昂布勒斯特悬崖上分辨英国沿海的“房屋与活动”，接着他又说，英吉利海峡是“一条水沟，只要我们敢试，就能跨过去”。[29]

1804年1月24日，拿破仑命令双面间谍梅埃·德·拉图什（Mehée de la Touche）向英国驻慕尼黑公使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透露：“布洛涅的筹备工作是虚招，不管耗资多么巨大，它都不及乍看上去的样子。造舰艇是为了日后能把它们变成商船，等等，等等。第一执政诡计多端，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地位稳如泰山，不想尝试危及大军的不可靠行动。”[30] 当月，拿破仑甚至力劝教皇支持远征，他致信对方，称英国人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压迫……令人忍无可忍”。罗马并无回音。[31]

十年后，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彼时他常常公开谈论自己的远征计划，说他只需要在英吉利海峡维持三四天的优势兵力来掩护舰队。“他理应立刻进军伦敦，所以他倾向于在肯特（Kent）海岸登陆，”拿破仑后来回忆道，“但风和天气必然是决定因素。”[32] 他声称会让海军将领和引航员替他决定10万大军及紧随其后的炮兵和骑兵在何处上岸。拿破仑自信能在“三天内到达伦敦”，到那时候，去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追击另一支法军舰队的纳尔逊也正好回来了，但他将无力回天。[33]

然而，就算拿破仑成功登陆英国，归来的纳尔逊也会切断他的再补给与援助，而且英国有1700万人待敌，其中很多人都有（虽说是临时的）武器，10万将士不足以征服他们。自1803年起，英国就开始大力准备入侵防卫战：南部城镇设防；烽火就位；富勒姆（Fulham）、布伦特福德（Brentford）、斯泰恩斯（Staines）等地的兵站堆满给养；从康韦尔（Cornwell）到苏格兰的登陆点皆列入清单。1805～1808年，南部海岸建起73座小型圆堡灯塔；防御胸墙环绕伦敦南部而建；1804年底，英

国陆军和皇家海军已招募约60万人（在成年男性人口中占11%～14%），另有8.5万人加入民兵。[34]

◆

1803年8月23日凌晨，皇家海军情报军官约翰·韦斯利·赖特（John Wesley Wright）上校暗中让乔治·卡达杜尔、凯雷勒（Querelle）医生等一小股朱安党人在诺曼底的比维尔（Biville）登陆。[35] 18世纪90年代，赖特与朱安党人并肩作战，被俘后逃出圣殿塔监狱。在叙利亚战役中，他扮作阿拉伯人刺探法军情报，并组织了数起类似的秘密行动。[36]

拿破仑坚持亲阅全部原始密报，以免依赖他人解读。他和富歇发现了凯雷勒及其同党特罗什（Troche）。“要么我错得离谱，”拿破仑提起凯雷勒时道，“要么这家伙知道点什么。”[37] 阴谋者达努维尔（Danouville）在赖特的一处登陆地被捕，后在狱中自缢身亡。拿破仑的副官菲利普·德·塞居尔评价道，此事“证明了阴谋的严重性，但未提供任何线索”。[38]

1804年1月16日，赖特接着送夏尔·皮舍格吕将军（前布列讷教员、法国革命战争英雄，原是雅各宾分子，后蜕变为保王党人）及另外7名同谋在比维尔登陆，然后他返回了肯特的英国海军情报基地沃尔默城堡（Walmer Castle）。[39] 赖特听命于北海舰队司令、海军将领基思勋爵，基思又向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将领圣文森特（St Vincent）伯爵汇报工作。圣文森特自己的指令则来自霍克斯伯里勋爵：“最重要的是，赖特上尉应全力参与。”其他文件使英国政府与卡达杜尔的阴谋紧密相连，这种联系对二者而言都达到了最密切的水平，其中一份源自基思的文件特别指出，赖特“奉命从事秘密微妙的工作”。[40] 数封书信进一步证明，1804年英国政府直接插手谋杀拿破仑的阴谋。在这些信中，第一封写于1803年6月22日，寄信人是沃尔特·斯潘塞（Walter Spencer）先

生，收信人是英国内阁高官卡斯尔雷（Castlereagh）勋爵。斯潘塞要求卡斯尔雷还他150英镑、还米歇尔·德·博纳伊（Michelle de Bonneuil）1000英镑。博纳伊是保王党阴谋者，拥有多重身份，在《亚眠条约》确立的和平时期，他去爱丁堡（Edinburgh）拜见了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Artois）伯爵，即未来的国王夏尔十世（Charles X），由此为人所知。斯潘塞说，“卡斯尔雷勋爵计划在1803年绑架波拿巴，为了实施这桩政治密谋”，在英国驻海牙（Hague）公使利斯顿（Liston）先生的协调下，他和博纳伊预支了这笔钱。[41]（当时，“绑架”拿破仑的阴谋是刺杀的透明伪装。）在这起交易中，政府并无直接罪责，这也不出所料。然而，卡斯尔雷最亲密的政治盟友、议员乔治·霍尔福德（George Holford）致信斯潘塞，告诉对方要是他“不嫌麻烦找来唐宁街，卡斯尔雷阁下就会找他麻烦”。如果斯潘塞是在异想天开，那么霍尔福德不大可能会这么做。

1月28日，皮舍格吕会见莫罗将军，后者对阴谋一事含糊其辞。问题的关键是，莫罗没有警告政府，结果自己受了牵连。他静观其变，因为万一拿破仑遭“绑架”，国民也许会转而拥戴他——霍恩林登的胜利者。此时莫罗已告诉蒂埃博将军，他认为拿破仑是“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军人”，让他当统治者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辛劳、所有这些希望、所有那些荣耀都会消亡”。[42]

1月29日，英国密探库森（Courson）被捕，此事助富歇拼凑出阴谋的概貌。一名法国情报官员耍了个花招，他化名罗塞（Rosey）上尉，设法说服英国驻斯图加特公使、西德尼·史密斯的弟弟斯潘塞·史密斯相信自己是法国异议派将军的副官。赢得史密斯的信任后，“罗塞”立刻获知了密谋的相关信息。[43]富歇在伦敦设有谍报网，根据它提供的情报，他告诉拿破仑，离皮舍格吕动身去法国还有三天时，此人曾在肯辛顿（Kensington）与一名英国大臣进餐，而且莫罗也和密谋者有联系。拿破仑着实吃了一惊。“莫罗！”他尖叫道，“什么！莫罗搞这种阴

谋！”在确认皮舍格吕的确在法国后，他当即下令逮捕莫罗将军。“整出密谋蠢不可耐，”拿破仑致信在汉诺威统军的让-约瑟夫·德索勒（Jean-Joseph Dessolle）将军，此人是莫罗的朋友和前参谋长，“唯有它的邪恶能和此等愚蠢相提并论。人心如深不可测的深渊，最敏锐的目光也无法判别它的想法。”[44]

没过多久，巴黎城门卫队就扩充了人手，并奉命搜寻高大魁梧的卡达杜尔；杜伊勒里宫和马尔迈松城堡高度戒备，并更改了通行口令；凯雷勒医生被捕，后来被关进首都的修道院监狱（Abbaye prison）。[45] 面对断头台的威胁，凯雷勒交代了卡达杜尔的藏身地（maison de confiance）金钟酒馆（Cloche d’Or tavern）。由于拿破仑不希望富歇过分集权，他此前便让萨瓦里指挥一支独立的秘密警察部队。因此在同一时间，萨瓦里便去了比维尔，力图截住赖特。2月8日，卡达杜尔的仆人路易·皮科（Louis Picot）在金钟酒馆被捕。安保部门在皮科身上动用拇指夹，他崩溃了，供出卡达杜尔在帕西（Passy）附近的沙约（Chaillot）的躲藏地，但卡达杜尔也不在那儿。卡达杜尔的副手布韦·德·洛奇耶（Bouvet de Lozier）试图自缢，可他“被救活了，重新陷入苦难之中”，于是他出言证实皮舍格吕和莫罗确曾参与阴谋。[46]

2月15日上午8点，莫罗在沙朗（Charenton）的桥上被捕，随后被押至圣殿塔监狱。[47] 次日，拿破仑下令逮捕将军让-雅克·利埃贝尔（Jean-Jacques Liébert）和约瑟夫·苏昂（Joseph Souham），理由是他们亲近莫罗（两人后来脱罪，官复原职）。19日，他告诉苏尔特，警察收缴了15匹马和一些制服，这些东西原本将用于在巴黎和马尔迈松之间的道路上袭击他，但他冷静地补充道：“你不可过分关注巴黎之事。”[48] 拿破仑还致信梅尔齐：“警察监视一切阴谋，所以我从未遇险。”[49]

2月26日晚，宪兵去第二区的沙巴奈街（rue Chabanais）逮捕皮舍格吕，当时他正在睡觉。警察上门后，他赤手空拳地与其中三人搏斗。

[50] “他激烈挣扎，”塞居尔回忆道，“宪兵狠狠地殴打他身体最柔软的部分，打得他昏死过去，搏斗这才停止。” [51] 次日拿破仑首次得知，有迹象表明阴谋可能牵涉昂吉安（Enghien）公爵。

英俊的昂吉安公爵路易·德·波旁·孔代（Louis de Bourbon Condé）现年31岁，他是路易十三的嫡系后代，其祖父孔代亲王曾在瓦尔米之战中指挥流亡者的军队。一名阴谋者作证说，某位主谋进门时所有人起立。富歇便断言道，波旁亲王中只有昂吉安公爵符合此人描述的主谋体貌，也只有他待在近得能去法国开会的地方。这是建立在间接证据上的悲剧性错误。

迟至3月12日，拿破仑还一直相信1793年投靠奥军的叛徒、法军将领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去了埃滕海姆（Ettenheim）的昂吉安公爵宅邸拜访他，而埃滕海姆距法国和巴登的边境仅有10英里。塞居尔回忆道，拿破仑对警长雷亚尔说：

> 什么？你不是告诉我昂吉安公爵离我的边境只有4里格（12英里）吗？难道我是条狗，得死在大街上吗？难道想杀我的凶手是一方神圣吗？为什么没人警告我他们就在埃滕海姆集会？我正是受害者。现在我该以牙还牙。罪行最深重的阴谋主谋必须赎罪。[52]

富歇告诉拿破仑，“你身边危机四伏”，并说服他相信昂吉安公爵是幕后推手，塔列朗也靠同一份薄弱的证据让他确信此念。[53]

3月9日晚上7点，卡达杜尔终于在洛代翁广场（Place de l’Odéon）落网，但被捕前，他在马车追逐中杀死一名宪兵，还打伤另外一名。两小时后，拿破仑对达武说，逮捕的消息“让民众开心，此景令人感动”。[54] 卡达杜尔痛快地承认他是来巴黎刺杀拿破仑，但未提到昂吉安公爵。

次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开会。塔列朗、富歇、康巴塞雷斯、勒

布伦和雷尼耶（Régnier）参加了会议，并同意绑架昂吉安公爵。多年后，拿破仑声称塔列朗劝服他采用此策，1828年的康巴塞雷斯回忆录也支持这一说法[55]。[56]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了他的决定。他命令掌马官阿尔芒·德·科兰古（Armand de Caulaincourt）将军监督起自奥芬堡（Offenburg）的行动，又选派执政卫队掷弹骑兵指挥官米歇尔·奥德内（Michel Ordener，康巴塞雷斯说他是“只会服从的人”）将军实施绑架。“从埃滕海姆来巴黎组织谋杀，以为待在莱茵河后就安全了，”3月12日，拿破仑告诉萨瓦里，“这要超出玩笑范围了！我要是放过这事就太蠢了。”[57]接着他去了马尔迈松，在那儿一直待到20日早晨。

1804年3月15日（周四）清晨5点，奥德内将军率一支龙骑兵分队在埃滕海姆的昂吉安公爵宅邸绑架了公爵，把他押至斯特拉斯堡的要塞，一同被带去的还有公爵的狗、文件以及他放在保险柜里的230万法郎。[58]没有迪穆里埃的痕迹，（人们很快就发现）出现他的名字纯属误会。与此同时，科兰古前往卡尔斯鲁厄（Carlsruhe）[59]，将塔列朗写的侵犯巴登主权的解释信呈给巴登公爵。3月18日上午，拿破仑和约瑟芬说了绑架之事。约瑟芬强烈反对，恳求拿破仑不要处死昂吉安公爵，她这样做既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誉，同样也是因为她潜意识里对昂吉安公爵怀有保王主义的同情或惋惜。[60]拿破仑对约瑟芬说她不懂政治，不听其言。[61]

次日上午，阿尔萨斯的信使告诉拿破仑，昂吉安公爵的文件不能证明他和卡达杜尔的阴谋有关，但这些文书的确表明他曾提出去英军服役，并收受来自伦敦的巨款、给予其他流亡者英国黄金，而且若奥军入侵法国，他也盼望能随行。[62]此外，他还和伦敦的侨民局（英国安保机关）官员威廉·威克姆（William Wickham）、斯图加特的斯潘塞·史密斯通信。[63]“除了少数情况，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左岸老战友的请求，”昂吉安在一封信中写道，“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无论是否在岗，他们只待聚集之刻，只盼奉命带自己的朋友来见我。”[64]1803年9月，

公爵承诺，若拿破仑遇刺，他就在阿尔萨斯发动正统王朝的（即保王党的反革命）政变，并写道，“我等待着，期盼着，但毫不知情”，所以他显然准备就绪，尽管他不是特别清楚卡达杜尔和皮舍格吕的阴谋。然而，这些情况很难构成处死公爵的充足理由，唯一的例外是他寄给路易十八的一封信，此信口吻坚定，要求对方终止进一步的阴谋活动，

“正统王朝血脉没什么不可侵犯之处。”拿破仑当时如此说道。[65] 1804年3月18日下午，他命令巴黎总督缪拉组建军事法庭。缪拉说（至少日后他自称说过）这实际上是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他不想插手。[66] 谁也不愿为接下来的一幕负责，因此整件事充斥声明、驳斥、指责与辩解。塔列朗和萨瓦里互相斥责，科兰古声称不知政府会处死昂吉安公爵。最终责任当然落在了拿破仑头上，事后也只有他辩称死刑判决合理，他为自卫权辩护，并如此评价波旁：“我的血到底不是泥做的，当时我应该叫他们看看，我的血和他们的等价。”[67] 在厄尔巴岛上，他替自己的行为申辩，“理由是（昂吉安公爵）牵涉反叛阴谋，曾两度乔装后前往斯特拉斯堡”。[68]

3月20日（周二）上午，拿破仑返回杜伊勒里宫。此前拿破仑同缪拉争执，威胁送对方回他在凯尔西（Quercy）的庄园，然后缪拉终于同意召集军事法庭。拿破仑随后去了马尔迈松，午后，塔列朗在当地花园同他散步。[69] 没多久约瑟夫来了。下午3点，信使报称法军正将昂吉安公爵带往可怕的主塔（Le Donjon），该塔是万塞讷城堡的主楼，也是欧洲第一高塔，高达150英尺，在纷繁年代中，米拉波、狄德罗、萨德（Sade）侯爵和玛塔·哈丽都当过塔中囚徒。下午5点30分，昂吉安公爵到达主塔。拿破仑派萨瓦里给缪拉捎信，要求确保“事情”当晚了结。他亲自拟定警长雷亚尔盘问昂吉安公爵的11个问题，如“你是否培植了对抗国家的武装力量？”“你接受英国的资金吗？”“你是否主动提出加入英军，以便去汉诺威同莫尔捷将军对战？”“你是否主动提出为共和国逃兵组建兵团？”公爵如实回答，没有为自己开脱。[70] 军事法庭首席法官皮

埃尔-奥古斯丁·于兰（Pierre-Augustin Hulin）将军曾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如今他是执政卫队掷弹兵指挥官。于兰日后抗议道，他也认为法庭会判昂吉安公爵死缓。

3月21日（周三）凌晨2点开始的审讯是审判界最简短的典型。庭审中，昂吉安公爵告诉于兰和五名上校，他喜欢运动，所以住在埃滕海姆。公爵也“坦率地宣称，他准备协助英国进攻法国，但他否认和皮舍格吕有任何关系，并为此高兴”。[71]《共和三年雾月二十五日法》第5章第1节第7条规定：“一旦在法国或其敌对国、征服国发现培植反法武装的流亡者，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对其实施逮捕与审判。”昂吉安公爵承认他接受英国资助，并扶持反法武装，这两件事在法国都是重罪。若他没有认罪，保险柜里那一大笔钱反正也能让他承担罪名。

塞居尔说，昂吉安公爵随后“被匆匆带往城堡护城河边，他在那儿遭到枪决，然后葬入已经挖好的坟墓”。[72]公爵的遗言是：“那么我必须死在法国人手中了！”[73]此言相当平淡，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情有可原。他的狗后来给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IV），它的项圈上写着：“我属于（原文如此）不幸的昂吉安公爵。”[74]

当晚，马尔迈松举办招待会庆祝《民法典》颁布。这部法典巧妙地凸显了拿破仑的两面——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与灵感充沛的立法者。处决昂吉安公爵一事公开后，欧洲一片哗然，所有人几乎都回想起科西嘉人的族间复仇嗜好，珀莱也记载道，巴黎人担心拿破仑已经“堕入”罗伯斯庇尔的“魔道”。[75]欧洲上下的自由派人士开始改变对拿破仑的看法。正是在此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和邦雅曼·康斯坦转而反对他。俄国抗议处刑，作为回应，拿破仑命令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戴杜维尔将军索取通行证。6月7日，大使照办，此后法俄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最终开战。[76]常有人误以为塔列朗说了一句质疑处死公爵的评价：“这是蠢事，比犯罪还糟。”然而，不管说这话的人是富歇还是布莱·德·拉默尔特，它都

是句实话。只有第一执政不明白这点。

拿破仑默认自己的行为不受欢迎。3月23日，他返回巴黎，“蓦地坐进”参政院的扶手椅，“眉头紧皱”，说：“巴黎人……是一群傻瓜（一帮看客）[77]，相信最荒谬的报道。”然后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学会轻视”公众意见的“反复无常”。[78]他接着说，“我探究人心不是为了揭露他们的隐秘悲伤”，此言（大概无意中）回应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话。拿破仑提及巴登公爵几乎没反应，《乌得勒支条约》签订后路易十八也被逐出斯图加特，以及俄国间谍。他还说自己恼火《巴黎日报》过早披露昂吉安公爵“阴谋”的细节。“拿破仑一边这样滔滔不绝，一边经常打断自己，”珀莱指出，“因为他显然感到有必要申辩，但是不确定该说什么，因此他的话含糊不清、语无伦次。”[79]他说完后，无人接腔，珀莱认为“这时的沉默相当显著”。拿破仑离开房间，会议结束。

周日的弥撒结束后，塞居尔注意到，拿破仑身边的人群“带着谨慎的好奇心听他说话，他们沮丧失望、局促不安，大部分时候保持无声的强烈抗议”。结果，“他那傲慢严肃的举止原本倾向于张扬，后来变得愈发严肃内敛”。[80]昂吉安公爵或许没有葬礼，但是人们仿佛在为他守灵。

4月6日上午，有人发现夏尔·皮舍格吕死在狱中。《箴言报》称，他当时在读塞内加笔下的加图自尽事件，现场遗留的书翻到了“阴谋者不应畏死”这句话。[81]官方解释称，他“通过用一根棍子拧紧自己的丝绸领结的方式”让自己窒息而死。[82]常有人指控拿破仑在处死昂吉安公爵后迅速下令谋杀皮舍格吕，甚至宣称他派四名马穆鲁克执行任务，次日又枪决了他们。[83]我们一向可以指望塔列朗口吐妙语，他如此描述皮舍格吕之死：“既非常突然又非常适时。”[84]然而，并无任何证据，哪怕是间接证据表明拿破仑与此事有关。事实上，他的支持者辩称，昂吉安公爵一事搞砸后，他特别希望有机会先在法庭上公开证实皮舍格吕

的罪行，然后对其罪恶施加同样公开的惩罚，所以谋害皮舍格吕对他全无益处。

次月，拿破仑欣慰地得知赖特上尉归案。因为无风，赖特的双桅横帆船滞留在布列塔尼的纳瓦洛港（Navalo），经过两小时的战斗，他被俘了。曾在叙利亚服役的一名法军军官认出了赖特，于是他被押回六年前曾从中脱身的圣殿塔监狱。皮舍格吕死后又过了十八个月，即1805年10月27日，人们发现赖特遭人割喉，横尸狱中。十年后，西德尼·史密斯调查此案，称赖特死于谋杀，但是当局再次声明他是自杀的。1815年拿破仑声称，直到一年前埃布灵顿（Ebrington）勋爵在厄尔巴岛提起赖特上尉，他才知晓此人。他还说赖特军衔太低，不足以让他“重视其死讯”。[85] 事实上，拿破仑曾致信西班牙大使、海军将领费德里科·格拉维纳（Federico Gravina），说赖特被俘一事令他满意，“霍克斯伯里勋爵和那些卑劣到把谋杀和犯罪当成作战手段的人将遗臭后世”。[86] 这并不能说明拿破仑是在撒谎。在此期间的几年之中，他寄了几万封信，因此他没准只是忘了，但是某人“军衔低得”不足以引他的注意的说法就不可信了。仅仅在赖特死前一个月，拿破仑还致信宗教事务部长，命令对方“向布尔日（Bourges）神父罗贝尔（Robert）先生传达我的不满，8月15日那天，他的布道糟透了”。[87]

昂吉安公爵、皮舍格吕及赖特之死被当作统治者拿破仑复仇心切的决定性证据，但这种观点过分解读了事实。昂吉安公爵受到了合法但不公平的死刑判决，如果说此举判断不周，它也纯属冷酷自卫。另外两人的死亡亦未坐实谋杀之名，更不用说是拿破仑指使的谋杀了。将被处死的囚犯（皮舍格吕）以及将在铁窗中度过漫长战争时期的俘虏（赖特）变得消沉，不过这两个案子的情形也指向其他可能性。[88] 最可能的解释是，凶手是富歇、萨瓦里或其他过分热心的下属，他以为下杀手符合拿破仑的意图，这好比亨利二世的骑士谋杀托马斯·阿·贝克特。[89] 6月，法庭将审判卡达杜尔、莫罗等阴谋者。

卡达杜尔的阴谋败露后不久，拿破仑在参政院说：“他们想靠打击我来毁灭革命。我会捍卫革命，因为我即革命。”[90] 他显然相信自己的话，某种程度上他也没说错，但恰在此时，他以最明显的姿态背离了大革命的共和主义宣言。昂吉安公爵死后没过几天，参政院向拿破仑写信道贺，用富歇的话说，祝贺信提出也许有必要设立“其他制度”，从而粉碎未来所有阴谋者的希望。[91] “伟人，”这封信奉承地敦促他，“完成你的业绩，让它像你本人的荣耀一样永垂不朽。”[92] 倘若日后的刺杀成功，“其他制度”可以保全拿破仑的遗产、保障国家安定。只有创立“其他制度”，他的业绩才能“永垂不朽”。不确定的继承权被视作阴谋的催化剂。

3月28日，拿破仑告诉参政院：“这一主题理应最受关注。就他而言，他一无所求，他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满意，但他有义务考虑法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可能性。”拿破仑修改了此前他对王权合法性的评价。“单单一条继承原则就能抑制反革命。”他用类似的口吻补充道。[93] 此后，诸省着手递交请愿书，恳求拿破仑称王。报纸开始刊文称赞君主国制度，官方鼓励让·沙（Jean Chas）的《反思君权继承》（*Réflexions sur l’hérédité du pouvoir souverain*）等小册子发行。这些小册子提出，挫败阴谋者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拿破仑王朝。[94]

3月下旬，这出精心策划的行动已经相当成功，参政院于是争论拿破仑用什么头衔最好。“没人提议国王！”珀莱注意到。参政们倒是讨论了“执政”“亲王”“皇帝”。前两个听来太谦虚，但是珀莱认为，参政院觉得“称帝听来太野心勃勃”。[95] 未来的帝国大司仪塞居尔伯爵当时也在会场，其子塞居尔声称，28名国家参政中有27人赞成让拿破仑采用某个世袭头衔。委员会主席汇报时一致推荐称帝，他们说：“唯有帝号才配得上他和法兰西。”[96] 拿破仑对碰巧在场的演员塔尔马说：“此刻我们说着话，仿佛在聊天，好吧，我们是在创造历史！”[97]

拿破仑准备好称帝时，很多可能反对他的共和国名将都已离开：奥什、克莱贝尔与茹贝尔已死，迪穆里埃正在流亡，皮舍格吕和莫罗将因谋反罪受审。只有儒尔当、奥热罗、贝纳多特和布吕内尚在，而拿破仑会用元帅权杖安抚他们。他对苏尔特解释道，“必须终结波旁家族的希望”，此言当然不是全部理由，因为他也想获得奥皇弗朗茨、俄皇亚历山大的地位，兴许还想同奥古斯都、哈德良与君士坦丁大帝平起平坐。[98] 1804年，法国其实已是帝国，拿破仑自称合法皇帝不过是承认了这一事实，就像1877年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自称不列颠女皇一样。距路易十六被处决仅过去十一年，可反对恢复世袭君主制的法国人少得惊人，至于那些的确反对的人，政府承诺允许他们在全民公决中投票。

1804年5月10日，小威廉·皮特重登首相之位。他取代摇摇欲坠的阿丁顿政府，决心组建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他甘愿花费250万英镑，并希望俄国和奥地利入盟。[99] 八天后，圣克卢宫举办了时长为十五分钟的典礼。庆典上，拿破仑正式称帝，封约瑟夫为大选侯，封路易为法国司马。此后他号称“上帝与共和国宪法庇佑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这头衔的风格有些复杂，又似乎自相矛盾。[100] 在当天的晚宴上，拿破仑一本正经地思忖家人争夺赏赐的方式：“真的，要是听信我的妹妹们，你会觉得我们的父亲是已故国王，而我没有妥善处理他的遗产。”[101]

万一拿破仑无嗣而终，约瑟夫和路易分别是帝位的第一与第二继承人。因为吕西安和热罗姆的婚事遭到哥哥的反对，所以继承序列不包括他们。1803年12月，在法国海军服役的热罗姆去美国休登陆假。休假期间，他没有把自己留作欧洲王朝的联姻对象，而是娶了漂亮的巴尔的摩（Baltimore）女继承人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拿破仑于是大为光火。他极尽权力范围内的手段来终结这桩姻缘，如强迫教皇宣布婚姻无效、命令法国官员“公开声明我不会承认19岁年轻人违背祖国之法缔结的婚姻”。[102] 除了路易，兄弟们都像他一样娶了心爱的女人，而这对法国无益。

4月20日，拿破仑对法国驻美国大使路易·皮雄（Louis Pichon）说，“我不欠兄弟们任何东西，他们纯粹是我的命运的工具”，并且坚决要求对方设法取消热罗姆的婚姻。后来，他告诉康巴塞雷斯称：“婚姻不过是一对在星月下、花园中、爱坛上结合的爱侣。”[103] 教皇不肯配合，声明这桩婚姻不可解除，然而拿破仑仍然称伊丽莎白为热罗姆的“情妇”以及“和他同居的女人”。1805年4月，拿破仑甚至威胁逮捕热罗姆。[104] 次月，热罗姆屈服了，他返回军队，同已有身孕的妻子断绝关系。伊丽莎白逃往伦敦，生下一子后返回美国，父亲的家人接待了她。（她的孙子后来当上了司法部长。）

拿破仑严厉指责波利娜在罗马的通奸行为。“要是你长这么大了还任由馊主意摆布，”他警告她，“那就别指望我帮你。”[105] 他提起她的丈夫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补充道：“如果你和他吵架，那要怪你，法国也会对你关起大门。”[106] 波利娜现年23岁，她为人虚荣，但毫无疑问性感撩人。拿破仑要求两人的舅父约瑟夫·费施转告妹妹：“我觉得她已不再美丽，过不了几年，她的容貌就会大大凋残，还有……她不应该沉溺于上流社会谴责的恶行。”尽管受了警告，波利娜和丈夫的关系依然恶化。当年8月，她6岁的儿子德尔米德·勒克莱尔（Dermide Leclerc）死于发烧，因为此事，她始终不肯原谅他。[107]

称帝后第二天，拿破仑册封4位荣誉“帝国元帅”与14位现役“帝国元帅”。14名现役元帅为亚历山大·贝尔蒂埃、若阿基姆·缪拉、阿德里安·蒙塞、让-巴蒂斯特·儒尔当、安德烈·马塞纳、皮埃尔·奥热罗、让-巴蒂斯特·贝纳多特、让-德-迪厄·苏尔特、纪尧姆·布吕内（Guillame Brune）、让·拉纳、爱德华·莫尔捷、米歇尔·奈伊、路易-尼古拉·达武和让-巴蒂斯特·贝西埃。[108] 1807～1815年，他又封了8位元帅。元帅之位并非军衔，却是一个荣誉头衔，它旨在承认并犒赏拿破仑日后所谓的“神圣火焰”，当然，它也旨在激励其他高级军官。[109] 元帅封号表明，拿破仑认为这14人是最优秀的法军指挥官。除了封号，他们也受赏

一根权杖，它放置在红色摩洛哥皮匣中，由白银与天鹅绒制成，并镶嵌着黄金苍鹰。[110] 元帅封号并未感动所有人，马塞纳的部下祝贺他时，他只哼了一声：“我们有14个呢！”马塞纳能拿到元帅权杖根本就是走运，因为他曾投票反对拿破仑就任终身执政，还批判莫罗将要面对的审判，但他的军事才干不容置疑。[111] 达武的确在执政卫队任职，可他尚未在战斗中指挥一个师，然而他还是受封了。假如达武的妻舅勒克莱尔还活着，他很可能不会跻身首批元帅之列。[112] 马尔蒙没能加入最早的18人，心情懊丧，朱诺则被视为缺乏帅才——有时甚至缺乏军事才能。[113]

拿破仑确保莱茵军团和意大利军团之间形成7∶7的均势，日后他提拔意大利军团的维克托、马尔蒙、絮歇和莱茵军团的麦克唐纳、乌迪诺、圣西尔、格鲁希，依然大致维持平衡。莫尔捷和苏尔特来自桑布尔-默兹军团，虽然拿破仑不太了解这两人，但他们显然是优秀的战士，苏尔特还能独立指挥。拿破仑也想实现政治均衡：册封布吕内安抚了雅各宾派；儒尔当和蒙塞曾统帅重要的共和国军团。贝纳多特是约瑟夫的襟弟，但他也是个反对派，拿破仑认为最好把他和自己的政权牢牢绑在一起。

很多元帅是工人阶级出身，这颇能叫人想起一句话：“每个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权杖。”10名元帅从列兵中崛起，其中有箍桶匠之子（奈伊）、制革工之子（圣西尔）、执达吏之子（维克托）、酿酒商之子（乌迪诺）、富农之子（莫尔捷）、磨坊主之子（勒菲弗）、旅馆老板之子（缪拉）、家仆之子（奥热罗）、店老板之子（马塞纳）。[114] 佩里尼翁、麦克唐纳、马尔蒙、贝尔蒂埃与达武是旧王朝贵族之后，但只有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ózef Poniatowski）公爵和格鲁希侯爵（两人分别在1813年和1815年封帅）是贵族。[115] 塞吕里耶曾吹嘘他的父亲有“王家职位”，但事实证明其父是拉昂（Laon）的王家种马场捕鼠人。[116] 就像称呼康巴塞雷斯和一些高阶帝国显贵一样，不论元帅

的身世为何，拿破仑写信时一律叫他们“我的兄弟”（Mon cousin）。[117]

元帅们加封头衔，如蓬泰科尔沃（Ponte Corvo）[118] 亲王（贝纳多特）、纳沙泰尔（Neufchatel）亲王（贝尔蒂埃）、伊斯特拉（Istra）公爵（贝西埃）和埃克米尔（Ec*km* ühl）[119] 亲王（达武）。除了头衔和权杖，拿破仑还给元帅们现金赠款（dotations），有些款项非常丰厚。他最终封了26名元帅，赏赐了其中24人赠款，只有地下共和党人布吕内和儒尔当没拿过这笔钱，尽管布吕内受封了伯爵。[120] 多年来，拿破仑分发的现金赠款非常不均，这显然说明了他的偏好。赠款共有600万法郎，受赏最多的4位元帅分到近一半：贝尔蒂埃，100万法郎；马塞纳，93.3万法郎；达武，81.7万法郎；奈伊，72.9万法郎。受赏仅次于这4人的元帅为苏尔特、贝西埃、拉纳和贝纳多特，他们分别领有20万～30万法郎。其他元帅收到的钱不足20万法郎，而圣西尔只有30211法郎，拿破仑尊重他的军事能力，但无法同他本人亲近。[121]

除了封帅，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又合并执政卫队和立法院卫队，正式建立帝国近卫军。近卫军包括参谋部、步兵、骑兵、炮兵，附有战斗工兵和海军的营，它后来分成三部分：老近卫军，由服役多年的老兵组成；中年近卫军，由1807～1809年的参战士兵组成；青年近卫军，由每年征召的优秀新兵组成。精锐部队帝国近卫军迅速膨胀，1804年它有8000人，1812年时却已扩充到10万人。近卫军清楚自己比普通的常规部队优越，拿破仑常把他们留作战略预备，就算把近卫军投入战场，那也只是在关键时刻。近卫军士气被公认为全军最高，不过他们也惹得大军团其他人不满。常规部队正确地认为拿破仑偏袒近卫军，于是嘲笑道，近卫军的绰号“不朽”源自皇帝保护他们的方式。

1804年6月，法院开庭审理莫罗与卡达杜尔重大阴谋案，但是当局差点搞砸了审判。公众依然认为莫罗是仅次于拿破仑的法国著名大英雄，他没留下任何危及信誉的书面记录，所以指控他的罪证多是道听途

说和间接证据。他对平民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做了一番动人的陈述，承认阴谋者们“向我提议（正如人尽皆知的一般），我应当指挥类似雾月十八日事变的广泛暴动”，但他声明自己拒绝了他们，因为尽管他有统军之才，但他“无意领导共和国”。[122] 法庭根据紧急状态法律审问莫罗，目睹了对他的普遍真实的同情。法官尽力做出最轻判决，仅判莫罗两年徒刑，这令拿破仑大怒，他随后改判将莫罗流放美国。莫罗夫人拜访拿破仑，恳求减刑，他反驳道：“法官们已经减到底了！”[123] 审判期间，莫罗在德意志的前副将克洛德·勒古布（Claude Lecourbe）当众和他握手。事后不久，勒古布去杜伊勒里宫，拿破仑便大叫：“你怎么敢进来！你脏了我的宫殿！”[124]

共21人无罪释放，但除了莫罗，还有4人被判监禁，而卡达杜尔和另外19人（包括贵族波利尼亚克兄弟中的一人）被判死刑。[125] 莫罗前往费城，两周后，拿破仑减轻了一些死刑犯的刑罚，其中有布韦·德·洛奇耶、波利尼亚克及另一名贵族里维埃侯爵。6月25日，连同皮科在内的其余罪犯在沙滩广场（Place de Grève）走上断头台，这是拿破仑治下唯一一起大规模斩首。[126] 缪拉恼火地发现阿尔芒·德·波利尼亚克（Armand de Polignac）得以减刑，他认为免死原因是其阶级背景，但阿尔芒是拿破仑的布列讷同窗，这点可能也起了作用。“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卡达杜尔在去断头台之时说道，“我们到法国来是为了给它一个国王，现在给了它一个皇帝。”[127] 有谣言称卡达杜尔已接受赦免，同党死后他将被宽恕，为免他们相信传言，他坚持率先赴死。

1804年6月12日，新的帝国政务会（本质上是原参政院）[128] 在圣克卢宫开会，商讨拿破仑的加冕形式。参政们短暂考虑了兰斯（法国国王的传统加冕地）、战神广场（因为天气可能不佳被否决）、艾克斯-拉-沙佩勒（因为它与查理曼有联系），最后决定在巴黎圣母院加冕。加冕日为12月2日，这个日期是拿破仑和教皇折中的结果，前者选择了雾月政变五周年纪念日11月9日，后者选择了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之日

圣诞日。[129] 政务会接着讨论帝国的纹章标记与官方徽章，克雷泰的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象征古高卢人的小公鸡，不过若此议案未获通过，还会有人支持鹰、狮子、大象、密涅瓦之盾、橡树和玉米穗。勒布伦甚至主张征用波旁的百合花（fleur-de-lis）。[130] 米奥正确地批评道，百合花是个“蠢主意”，他转而提出用王座上的拿破仑当徽章。

“公鸡属于农场，”拿破仑说，“它太孱弱了，算不上造物。”塞居尔伯爵赞成狮子，因为它据信是猎豹克星，让·洛蒙（Jean Laumond）则赞成公认不会下跪的王家动物大象（这种观点是错的）。康巴塞雷斯提议用蜜蜂，因为它们有一个强大的领袖（尽管是女王），拉屈埃将军补充道，蜜蜂既能蜇刺又能酿蜜。德农建议用鹰，可问题在于鹰已经是奥地利、普鲁士、美国和波兰的象征。政务会没有投票，但拿破仑选择了狮子。会议继续讨论新铸币上的题字，相当奇怪的是，大家同意保留“法兰西共和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09年。散会后不久，拿破仑决定把狮子改成展翅雄鹰，因为它“确认帝国威严，引人追忆查理曼”。[131] 鹰也能让人回想古罗马。

单单一个徽章满足不了拿破仑，他又把蜜蜂定为本人和家族的徽记，它后来成了地毯、窗帘、服饰、御座、盾徽、权杖、书籍等很多帝国行头的装饰主题。1653年在图尔奈（Tournai），克洛维（Clovis）之父、5世纪的法兰克国王希尔代里克一世（Childeric Ⅰ）之墓重见天日，墓中出土了数百只用黄金与石榴石制成的蜜蜂（也可能是蝉，甚至是画错了的鹰），它们象征不朽与繁衍。[132] 拿破仑就这样挪用了希尔代里克的蜜蜂，故意将波拿巴家族同法国本身的开国者古墨洛温王朝相连。

8月7日，是否创建世袭帝国的全民公决结果公布。[133] 陆军中有120032人赞成、海军中有16224人赞成，内政部长波塔利斯给拿破仑看军队的赞成票，而他仅仅掏出钢笔，把两个数字四舍五入，于是陆海军

的赞成票数变成了40万和5万，反对票则无记录。[134] 即便如此，比起终身执政的全民公决，此次公决最终结果（3572329人赞成，2579人反对）的赞成票还是少了8万张。[135] 有证据表明某些军官因投反对票而被革职，不过日后他们通常也回归了军队，索利尼亚克（Solignac）将军便是其中之一。四年后，他亲自恳求皇帝“恩准他去西班牙分享军事荣誉、承担军事风险”，于是他成了师级将军。[136]

1804年7月14日，伟大的法军元帅沃邦与蒂雷纳的遗骨迁葬入荣军院。值此场合，拿破仑初次封赏法国的新勋位阶层荣誉军团，不计出身地褒奖法兰西卓越功臣。首批荣誉军团勋章是纯白色珐琅彩“五星”[137]，上系红色绶带，但是除了勋章，受勋者还能根据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领取经济津贴。荣勋团有15支分队，成员等级有大军官级、指挥官级、军官级和士兵级。每支分队领受20万法郎，以便每年给适格人员发放奖金。

一些左派人士抱怨道，恢复荣誉称号彻底违反了大革命的社会平等理念。拿破仑先前也想重建荣誉制度，莫罗嘲讽此事道，这是授予自己的厨师“炖锅勋章”。然而，荣誉军团在军中可谓立竿见影。众所周知，要弄清楚在多少壮举背后“星星”至少是部分动因是不可能的。所有法军军旗上都绣着“祖国与荣誉”，拿破仑把这句话定为荣誉军团箴言。[138] 19世纪80年代，雅各宾派努力向“美德共和国”的军队灌输革命理论，教导他们为公众幸福牺牲自我，和那些理念相比，现在士兵们明显更看重直接来自拿破仑的奖章、晋升、津贴和认可。[139]

吸收平民进入荣誉军团系刻意之举。只要其余社会成员效法军事品德，特别是忠诚和服从，他们就能获得荣誉。拿破仑任军团长，但是“人们认为荣誉军团偏向军队，正是为了消除这一看法”，他拒绝任命协助创建军团的马蒂厄·迪马将军为大总监，反而选择自然主义者、元老院议员、法兰西学院副院长贝尔纳·拉塞佩德（Bernard Lacépède）管

理军团。[140] 拿破仑授予3.8万人红绶带（rubans rouges），其中3.4万人（或者说89%的人）是军人或水手，不过拉普拉斯、蒙日、贝托莱、沙普塔尔等学者也受封，省长及数名参与法典编撰的法学家亦然。拿破仑还在圣但尼（Saint-Denis）建立优异寄宿制学校荣誉军团教育学院（Maison d’Éducati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为服现役时死亡的受勋者之女提供免费教育。教育学院和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的军团公立中学保留至今。

1802年5月，在某次参政院会议上，参政们正讨论创立荣誉军团，律师泰奥菲勒·贝利埃对整个构想嗤之以鼻，拿破仑回答道：

> 你对我说，阶级殊荣是君主的花哨小伎俩。我不同意，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罢，你来给我找一个没有殊荣的共和国。你叫这些勋章和绶带花哨小玩意儿，好吧，正是这些小玩意儿能使唤人。我不会对公众说下面的话，但是我应该在贤明政客的集会上说：我看法国人并不热爱自由与平等，他们没有在十年革命中改变，依然是野蛮善变的高卢人。他们有一种感情——荣誉感。我们必须助长这种情怀。人民大声疾呼，要求殊荣。看看群众如何敬畏外国外交官佩戴的奖章和勋章。我们得恢复这些殊荣。已经有太多摧毁，我们必须将之重建。政府存在着，获得拥护与权力，可国家本身是什么？一盘散沙。[14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拿破仑说：“我们必须在法兰西土壤中埋入一些充当支柱的花岗巨岩。”引用“正是这些小玩意儿能使唤人”时，人们常常严重脱离语境，暗示拿破仑在冷嘲热讽，然而完整的引文表明，事实上他在称赞作为荣誉物质载体的“小玩意儿”。出席会议的24名参政中，有10人投票反对成立荣誉军团，因为他们不赞成照它的方式重建阶级殊荣。不过，其中9人后来接受了星章或伯爵头衔。[142] （贝利埃本人二者兼得。）

1804年8月16日（周四），布洛涅军营举行盛典。典礼上，拿破仑在军中分发第一批荣誉军团星章。展示的勋章搁在百年战争将领贝特朗·杜盖克兰的盔甲上，盔甲旁边还摆着16世纪法国骑兵代表人物巴亚尔

骑士的头盔。布洛涅、安特卫普和瑟堡响起炮声，宣告拿破仑当着6万名士兵和2万名观众的面授予2000人勋章。1000多名鼓手演奏《在田野》（*Aux Champs* ）的军乐调子，加农炮及时鸣炮回应。一名旁观者记载道，从法国的敌人手中缴获的200面军旗“血迹斑斑，被加农炮轰得破破烂烂，此时它们成了恰当的华盖”。[143] 次月，拿破仑致信教皇时首次使用“我的人民”。[144] 他也像亨利四世称呼玛丽·德·美第奇一样，开始叫约瑟芬“夫人与爱妻”。[145]

10月2日，西德尼·史密斯爵士进攻布洛涅舰队未遂，拿破仑不禁担忧港内火攻船的作用。他照例想着其他大大小小的事，命令富歇四天后取消皮埃蒙特剧院的禁令，允许观众对不喜欢的表演吹口哨。[146] 史密斯进攻失败后第四天，皇家海军又对西班牙宝船舰队不宣而战，这回英军的战果丰硕得多。他们击沉了1艘船，俘获其余3艘船，且被俘船只装载的西班牙银币与金锭一共价值90万英镑。此乃公然的海盗行径，但《圣伊尔德丰索密约》签订后西班牙一直是法国的盟友，英国怀疑，一旦这批财物在加的斯（Cádiz）安全卸下，西班牙就会对英宣战。

单单1804年10月某日，拿破仑就写了22封信，充分展示其娴熟的统治手腕。这些信的内容涵盖西班牙耶稣会的重建（“我绝不允许法国发生这种事”）、巴黎的英国人人数（“找到的那些都送走了吗？”）、对海军部长德克雷的质问（“留海军将领在巴黎究竟是图什么？”）、整合40座巴黎修女院对女性教育的益处、英国狩猎法的移植、对法律界人士的谴责（“只有犯罪和腐败能激励这帮话匣子与革命煽动者”）以及大量其他事务。[147] 拿破仑经常烦扰德克雷，也不时穿插片刻亲和力。“抱歉惹你生气了，”12月，他致信德克雷时提及自己的怒意，“气头终于过去了，一点都没留下，所以我希望你对我不再有一丝怨恨。”[148]

10月24日晚，法国人来到普鲁士保护的汉萨同盟（Dudesche Hanse）自由城市汉堡（Hamburg）附近，在英国外交官乔治·朗博尔德

（George Rumbold）爵士的乡下住宅绑架了他，把他押至圣殿塔监狱，此举就像不久前皇家海军的做派一样不尊重国际法。像慕尼黑的弗朗西斯·德雷克与斯图加特的斯潘塞·史密斯一样，朗博尔德支持流亡者的阴谋，在四十八小时的审讯后，他获释并返回了英国。普鲁士国王慎重地抗议法国侵犯汉堡主权。拿破仑认为，大使照理是“负责调解的官员，永远肩负道德基础上的神圣职责”，但是英国政府把朗博尔德“当成有权做任何事的战争工具”。他命令塔列朗提出对英国人的质疑：“难道欧洲君主至多是一大群印度土豪吗？”[149]

加冕礼正在筹备。“服装制作有些滞后，”康巴塞雷斯警告拿破仑道，“可我的已经做好了。”[150] 11月2日，教皇从罗马去巴黎，尽管众人皆知他曾为“伟大的无辜牺牲品”昂吉安公爵落泪。[151] 25日，拿破仑在内穆尔（Nemours）和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之间同教皇会面，三天后他们一起进入巴黎。拿破仑命令军官们把教皇当作身后聚集20万大军的人物来接待，这差不多是他对别人的最高赞誉。[152] 为了确保教皇主持加冕礼，他答应不再依靠1796年举办的政府婚礼的效力，而是按照天主教仪式同约瑟芬结婚。于是，12月1日晚，红衣主教费施在杜伊勒里宫当着塔列朗、贝尔蒂埃和迪罗克的面主持宗教婚礼。[153] 约瑟芬把婚姻证明交给欧仁保管，以防拿破仑矢口否认此事。

加冕使波拿巴家族和博阿尔内家族潜藏的矛盾浮出水面。约瑟夫反对约瑟芬加冕，因为这意味着奥尔唐斯和路易的孩子将是皇后的孙子，而他的子女只是中产阶级的孙子。[154] 拿破仑的三个妹妹都不肯捧约瑟芬的拖裙。吕西安根本不想参加典礼，太后也支持他，决定和他一同待在罗马，尽管拿破仑已经送给她一幢巴黎大宅。[155] “在法国，有成千上万人对国家的贡献比他们的大，”拿破仑怒从中来，对勒德雷尔说起自己的兄弟，“包括你。”[156] 相形之下，他疼爱欧仁和奥尔唐斯。“我喜欢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总是急着取悦我。”[157] 欧仁曾在埃及负伤，所以皇帝对他评价很高：“假如加农炮开火，是欧仁看见发生了什么；

倘若要跨过河沟，是欧仁帮了我一把。”兄弟姐妹们诽谤博阿尔内家族，拿破仑耸耸肩：“他们说我的妻子虚伪，说她的孩子们故意对我热情过头。嗯，我希望他们当我是老叔父，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一分甜蜜，我正在变老……我想休息一下。”[158] 当时他才35岁，但这一观点和他对约瑟芬的支持都成立。“我的妻子是个贤淑的女人，不曾伤害他们。她靠钻石、华服与衰老的不幸……满足自己。我对她的爱从不盲目。立她为后彰显公平。我归根到底是个公正的人。”[159] 7月，她去艾克斯泡温泉，他坚持要她在华盖下做礼拜，祭坛右侧也安排了她的御座。[160] 此后她莅临城市时，加农炮亦鸣炮致敬。

拿破仑对妹妹们几乎像对兄弟们一样慷慨。埃莉萨最先得到亲王国卢卡，但她依然不停地发牢骚。波利娜没什么政治野心，1806年3月，拿破仑封她为瓜斯塔拉藩属女公爵，还封卡罗琳为贝格（Berg）大公夫人。她们好像都没什么感激之情。1805年6月，拿破仑赠予太后布列讷附近的蓬城堡及其翻新维护费16万法郎，“在那儿，你拥有法国最美丽的一些乡村”，至少她表达了感谢。太后很可能比她的所有女儿都更适合统治，但她对权力没兴趣。[161] 她积攒多年的财物估计有40万法郎。[162] 拿破仑将头衔与财富倾泻在家人身上，与此同时，他也怀有更世俗的忧虑，担心士兵们分到的面包品质不佳。他冲贝尔蒂埃抱怨道，军队采购劣质谷物，下令“今后一律用黄豆取代白豆”。[163]

1804年12月2日（周日），拿破仑和约瑟芬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虽说组织工作一定程度上拖到了最后一刻，加冕礼仍是一次壮丽的盛典。早上6点，雪花飘落，第一批客人开始到场，他们步入抹有灰泥的木质新哥特式天棚，此物用于掩盖大革命时期偶像破坏行动造成的毁坏痕迹。四天前，暴风雪刮倒天棚，弄坏了它的固定物和木头支柱，直到上午10点30分教皇队列到达时，最后的风暴冲击才逐渐减弱。[164] 立法机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代表身着火焰色长袍）、地方诸省、荣誉军团、最高检察院、军需部、殖民地、商会、国民自卫军、法兰西学院、

政府各部门、农会及很多其他团体的代表们（军方代表人数尤多，他们的最低军衔是旅级将军）将请柬交给92名收票员。入场后，代表们随即在看台上闲逛，他们聊天、妨碍工作人员，大体上是在制造混乱。早上7点，460名音乐家与合唱队成员开始在教堂侧廊集合，其中有帝国教堂管弦乐队全员，还有人来自巴黎国立音乐学院（Conservatoire de Paris）、费多剧院、歌剧院、近卫掷弹兵与近卫猎兵。[165] 典礼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路易·德·丰塔纳最后只好指示士兵们命令大家坐下。[166]

上午9点30分，外交使团成员大都到场。昂吉安公爵尸骨未寒，但是俄国和瑞典大使照样来了。57辆大车装载的塞纳河河沙铺撒在杜伊勒里宫庭院的一小片泥泞土地上，工人们工作一晚能拿4法郎，这是史无前例的薪水。当日早晨，新任侍从泰奥多尔·德·蒂亚尔（Théodore de Thiard）进入拿破仑的更衣室，发现他“已经换上点缀着金色蜜蜂的白色天鹅绒长裤、亨利四世风格蕾丝立领，外面还套着一件猎骑兵制服”。[167] 蒂亚尔记载道，“若不是因为此刻气氛肃穆”，他“看到这不搭调的穿着会忍俊不禁”。拿破仑在去巴黎圣母院之前脱掉了军装。

上午10点，礼炮轰鸣，宣告拿破仑和约瑟芬从杜伊勒里宫启行。“加冕马车非常华丽”，一名侍臣写道，“它装着玻璃，没有挡板……陛下们上车时搞错了边，坐到前面去了，但他们立刻察觉到了错误，大笑着栽回后座。”[168] 队伍规模太大，有好几次他们不得不中途停下，等待通过堵塞的地段。巴黎总督缪拉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他的部下和四个卡宾枪骑兵中队，他们之后是胸甲骑兵、近卫猎骑兵和一个马穆鲁克中队（衣着最光鲜）。再往后则是传令兵，他们骑着马，身穿绣着雄鹰的紫色天鹅绒无袖制服，并携带饰有蜜蜂的权杖。

八匹佩戴白色羽饰的白马拉着拿破仑和约瑟芬的马车，车夫塞萨尔穿着镶金色蕾丝绿色长外套。拿破仑身着镶嵌黄金与宝石的紫色天鹅绒无袖制服。约瑟芬“妆化得相当好，衬得她仿佛只有25岁”，她穿着白色

礼袍和镶嵌金银的丝缎披风。她的小冠冕、耳环、项链和腰带上都有钻石。只有沿途列队的掷弹兵穿着那个时代的制服，否则一切派头纯属兼备古典与哥特风格的奢侈品。军人众多，有的说法估计他们有8万人。军队容易挡住群众视线，此外天气寒冷，所以观众虽在欢呼但也保持了冷静。[169]

上午11点，队伍来到大教堂旁边的大主教宫殿。拿破仑为典礼更衣，众人则坐在长木椅上发抖。拿破仑身着拖到脚踝的镶金丝缎长袍，外面套着内衬貂皮的绯红色天鹅绒披风，这件披风以金色蜜蜂为主题，其边缘镶着橄榄树叶、月桂树叶与橡树叶。披风的重量超过80磅，所以约瑟夫、路易、勒布伦和康巴塞雷斯合力才把它披到他身上。[170] “要是爸爸现在能看着我们就好了。”拿破仑和约瑟夫互相端详对方的华服时，他用意大利语对哥哥说。[171] 上午11点45分，拿破仑和约瑟芬已换上庆典礼服，准备好去见巴黎大主教、红衣主教贝卢瓦，他将在大教堂入口迎接皇帝夫妇，向他们泼洒圣水。[172]

侍女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距拿破仑只有十步，她指出：“典礼时间长，他好像倦了，我见他多次压住哈欠。不管怎么说，他恰当地完成了所有该做的事。教皇在他的头部和双手涂抹三层香油时，根据他的目光所指，我猜他只想着擦掉那些油。”[173] 仪式以波旁王朝礼制为基，但拿破仑打破了传统，他没有忏悔，也没有食圣餐。

拿破仑在加冕时用了两顶皇冠。第一顶是金色月桂花冠，这顶皇冠旨在引人回想罗马帝国，从进入大教堂到加冕礼结束，他始终戴着它；第二顶是查理曼加冕冠的复制品，大革命时期，传统的法国国王加冕冠被毁，奥地利人又不肯出借查理曼加冕冠，所以这顶皇冠需特别制作。就像和教皇事先排练过的一样，拿破仑将查理曼加冕冠复制品举过自己的头顶，但他实际上没有戴这顶皇冠，因为他已经戴着月桂冠。他的确为跪在自己面前的约瑟芬加冕了。[174] 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注意

到，约瑟芬祈祷时泪如雨下，眼泪滴到了手上。[175] 拿破仑非常细心地把小皇冠放在她的钻石头饰后面，然后他轻轻拍打几下，直到它安稳戴好。教皇祝福他们，拥抱拿破仑，吟咏“皇帝万岁，永垂不朽”（Vivat Imperator in aeternam）。弥撒也做完之后，拿破仑发表加冕誓言：

> 我立誓护得共和国领土完整：我发誓尊重《政教协定》、礼拜自由、政治与公民自由以及国有财产交易不可撤销的准则，并使它们受尊重；我发誓无法律规定绝不加税；我发誓维护荣誉军团制度；我发誓只为法兰西人民的利益、幸福与荣耀而统治。[176]

拿破仑的自我加冕既是自强人物的终极胜利，某种意义上亦是界定启蒙运动的时刻。此举本质上也是真诚的，他能走到那一步的确是靠自己。然而，他事后也许后悔了，因为它彰显了高调的自我主义。伟大的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奉命作画纪念加冕礼。1806年8月，他致信拿破仑的高级廷臣皮埃尔·达吕（Pierre Daru），询问“惊动观众”的“非凡时刻”（彩图32为大卫的自我加冕图草稿），结果他反而收到描绘拿破仑为约瑟芬加冕之刻的命令。[177] 1808年2月，大卫的正式作品《拿破仑一世皇帝与约瑟芬皇后加冕》在卢浮宫展出，观者甚众。大卫并不想准确地刻画史实：太后出场了；奥尔唐斯与拿破仑的三个妹妹站得离约瑟芬的拖裙远远的，事实上她们被说服了，同意在约瑟芬加冕时为她捧拖裙。[178] 红衣主教卡普拉拉不喜欢他在画中的秃头造型，要塔列朗强迫大卫给他画顶假发，但是大卫犹豫不决。[179] 玻利维亚独裁者曼努埃尔·马尔加雷霍（Manuel Malgarejo）以为波拿巴和拿破仑是两个人，进而对比“二人”相较对方的优点。马尔加雷霍的无知沦为后日笑柄，但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波拿巴将军很少觉得有必要在典礼上摆出某种姿态，拿破仑皇帝则不然。

波旁家族当然嘲笑加冕。一名评论者将拿破仑的无袖制服比作扑克牌里方片国王的穿着。另一人则嘲讽道：“这幕创举体现了少女学校绘画教师的水平。”[180] 然而，加冕礼针对士兵和观众，而非老于世故的

旧王朝人士，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都会惹他们反感。巴黎人民享受加冕礼，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晚有盛大的烟火表演和现金分发活动，公共喷泉还喷涌葡萄酒。[181] 有人向太后道贺，祝贺她的儿子帝王紫袍加身。太后没有出席加冕礼，但她的回答充满天生的宿命观与深邃的常识。“但愿长久，”她说，“让我们愿它长久。”[182]

---

[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813 p.209，July 11，1803

[2]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17 p.426，November 5，1803

[3]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p.10

[4] Wheeler，H.B.F. and Broadley，A.B.，*Napoleon and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2vols.1907，Ⅰ p. x

[5] 著名刺绣作品，上绣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场面，现藏于法国巴约博物馆。——译者注

[6] Peter Mandler in *TLS* 7/7/2006 p.9，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9，Anon，‘Descente en Angleterre’ pp.43-4

[7]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87，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p.101-3

[8] Hozier，Captain H.M.，*The Invasions of England* vol.Ⅱ 1876，p.313

[9]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4

[10] SHD GR2. C/571

[1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39，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2

[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81，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251

[13] Desbrière，Édouard，*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 5 vols.1900-1902，Ⅳ p.3，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45

[14]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p.240

[1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025 p.779，July 27，1804

[16]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8

[1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847 p.223，July 22，1803

[1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8285，7988 p.452，November 17，1803，p.317，September 1，1803

[1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7914 p.258，August 8，1803

[2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p.32-3

[2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096 p.369，October 1，1803

[22]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51，p.439，November 11，1803

[23]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457 p.557，January 3，1804

[2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313 p.463，November 23，1803

[2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347 p.478，November 29，1803

[26] 他照例沉浸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微观操作，命令戈丹以“侵犯通信秘密”为由开除昂热的女邮政局长（整整一个政府部门忙着帮他侵犯通信秘密）。CG4 no.8520，p.547.

[27]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7259 p.1145，November 2，1802

[2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53 p.440，November 12，1803

[2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273 p.448，

November 16，1803

[3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614 p.583，January 24，1804

[3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593 p.575，January 13，1804

[3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9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70

[34]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p.251-61

[35] 富歇和萨瓦里领导的法国安保部门估计，当时的首都里约有40起刺杀拿破仑的阴谋，但确认的案件总数远远小于40，所以他们也许高估了。Ségur，*Memoirs*，p.97.

[36] ed. Lloyd，Charles，*The Keith Papers* 3 vols.1955，Ⅲ p.31，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06

[3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25

[3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0

[39]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p.110-11

[40] Sparrow，Elizabeth，*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2013，p.164

[41] NYPL Napoleon Ⅰ folder 1

[42]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06

[43]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31

[4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17 p.628，8 March，1804

[45]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p.132-3，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99

[46]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0

[47]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87，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p.101-3

[4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679 p.614，February 19，1804

[4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681 p.615，February 20，1804

[50]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p.133-4

[5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4

[5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5

[53]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p.289

[5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18 p.629，March 9，1804

[55] 塔列朗先前干过类似的冒险行径。1797年年末，他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提议把路易十八从布兰肯贝格（Blankenberg）绑架至法国。Mansel，*Louis XVIII*， p.81.

[5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10，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6，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Ⅰ pp.710-11

[5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p.52-3

[5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6

[59] 今作“Karlsruhe”。——译者注

[60] Rémusat，Paul de，*Memoirs of Madame de Rémusat* 3 vols.1880，Ⅰ pp.126-31，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17

[61] 有一块地毯描绘约瑟芬跪地哀求的场景，只见她哭着抱紧拿破仑的腿，求他放公爵一条生路。1814年，正是这块地毯在枫丹白露宫展出，游客们便被误导了。求情事件发生时，波拿巴夫妇都在马尔迈松。North ed.，*Napoleon on Elba*， p.30.

[62] Welschinger，Henri，*Le duc d’Enghien* 1888，pp.219-39

[63]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35

[64] Bertaud，Jean-Paul，*Le duc d'Enghien* 2001，p.320

[65] eds. Forrest，Alan and Wilson，Peter H.，*The Bee and the Eagle* 2008，p.117

[6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51 p.649，March 20，1804

[67]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Ⅱ pp.622，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77-8，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p.118-19，122

[68]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 ，p.16，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122

[69] Cole，Hubert，*The Betrayers* 1972，p.43

[7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49 p.648，March 20，1804

[7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12

[7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12

[73]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1

[74]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30

[75]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45

[7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870 p.704，May 13，1804

[77] 原文为"un ramas debadauds"。——译者注

[78]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46-7

[79]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49

[80]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2

[8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54

[8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2

[83]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p.293

[8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5

[85]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32

[8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100 p.817，August 14，1804

[8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845 p.716，September 19，1805

[88] 有说法称，为了报复特拉法尔加之败，拿破仑杀害了赖特，但是10月27日赖特死亡，11月18日拿破仑首次得知特拉法尔加战役。事实证明此说为假。

[89] 据说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说了一句话后，骑士们误以为他想要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命，于是他们杀害了贝克特。——译者注

[90]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58

[9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24

[9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59-60

[9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55，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14 n.7

[94]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66

[95]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71

[96] Tissot，P.F.，*Souvenirs historiques sur la vie et la mort de F.Talma* 1826，pp.34-5

[9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804 p.672，April

14，1804

[98] Lentz，Thierry，*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p.50

[9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938 p.738，June 14，1804

[100]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211

[101]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039 p.785，July 30，1804

[10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037 p.300，May 13，1805

[10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877 p.224，April 22，1805

[104]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p.102-3

[10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89 p.666，April 6，1804

[106]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119

[10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36

[108] 4名荣誉元帅是弗朗索瓦·克里斯托夫·德·克勒曼、多米尼克-卡特林·德·佩里尼翁（Dominique-Catherine de Pérignon）、让·塞吕里耶以及弗朗索瓦-约瑟夫·勒菲弗。

[10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14

[110] 其中一根权杖今展示于斯德哥尔摩王宫（Stockholms slott）的贝纳多特长廊（Bernadottegalleriet）。

[111] Gallaher，John，'Davout and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3

[112] Currie，Laurence，*The Bâton in the Knapsack* 1934，p.11，ed. Chandler，David，*Napoleon's Marshals* 1987，p.ｘｘｘix

[113] 原文为"Junot wasn't considered of marshal-or even sometimes martial-calibre"，因水平有限，难以表现原文妙处。——译者注

[114]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p.54-5

[115] ed. Chandler，David，*Napoleon's Marshals* 1987，p.442

[116]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116

[117] 拿破仑倾向于亲自任命约三分之一的低级军官，剩余人选留给上校们决定。事关晋升时，他常常表现得像是中层保守军官，这种属性也是他的本质。只受过"短期非正式教育"的人发现，除非他们特别出色，否则很难升到少校和上校，相对而言，出身良好的年轻军校毕业生常常更容易升迁。高伤亡率导致军职经常空缺，这种倾向便不太明显，但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拿破仑怀有明显的社会偏见。即便如此，在招纳人才方面，拿破仑大军要比波旁军队乃至当时所有欧洲军队强得多。

[118] 今作"Pontecorvo"。——译者注

[119] 今埃格米尔（Eggmühl）。——译者注

[120]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116

[121]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4

[122] Moreau，Jean，*Bonaparte and Moreau*（Philadelphia）1806，p.25

[12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87

[12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53

[12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00

[126]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p.143

[12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80

[128] 作者在后文仍使用"Conseil d'État"，译者从。——译者注

[129] ed. Lentz，Thierry，*Le Sacre de Napoléon* 2003，p.105

[130] Fraser，Edward，*The War Drama of the Eagles* 1912，p.3

[131] Fraser，Edward，*The War Drama of the Eagles* 1912，p.9

[132] MacCulloch，Diarmaid，*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009，p.811

[133]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16

[134]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14 n.11

[135]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 （Florida）1989，p.65

[136]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Ⅰ p.59

[137] 最初的荣誉军团勋章呈“马耳他五星”形，末端带分叉，因此其实有十个角。——译者注

[138] Paris，*Napoleon's Legion* p.13

[139]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p.3

[140]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31

[141] Paris，*Napoleon's Legion* pp.17-18，Thibaudeau，Antoine，*Mémoires sur la Consultat 1799 à 1804* 1913，ch.26

[142]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4

[143]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48

[144]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015 p.775，July 21，1804

[145]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223 p.874，September 15，1804

[14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9310 p.917，October 6，1804

[147]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9318-34 pp.920-27，October 7，1804

[148]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473 p.529，December 19，1803

[149]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924 p.729，May 30，1804

[150] ed. Tulard，Jean，*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Ⅰ p.190

[15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8

[152] Rose，John Holland，*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p.130

[15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p.5-6

[154]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2

[155] Nester，William，‘Napoleon，Family Values and the Fate of Eur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06

[156]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08

[157]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3

[158]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4

[159]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114

[160]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s.9007，9009 pp.772-3，17 July，1804，p.773，18 July 1804

[16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342 p.452，June 24，1805

[162] 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p.197

[16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973 p.266，May 4，1805

[164]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25

[165] 加冕礼耗资194436法郎，这个数字几乎是初始预算的四倍。

[166]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20

[167] Thiard，A.M.T.，*Souvenirs diplomatiques et militaires* 1900，p.5

[16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7

[169]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30

[170]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 （Cambridge，MA）1963，p.151

[171]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36

[172]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310

[173]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63

[174]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 （Cambridge，MA）1963，p.228

[175] Brookner，Anita，*Jacques-Louis David 1980* ，p.153

[176] Anon.，*Description des cérémonies* p.5

[177] Prat，Louis-Antoine and Tonkovich，Jennifer，*David*，*Delacroix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2011，p.28，Brookner，Anita，*Jacques-Louis David 1980* ，p.153

[178]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 （Cambridge，MA）1963，p.229

[17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31

[180]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230

[181] ed. Yonge，Charlotte M.，*Memoirs of Marshal Bugeaud* vol.Ⅰ 1884，p.22

[182]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12/2/2005 p.11

第十六章 奥斯特利茨

> 战斗中某刻，最小的机动决定战局、赢来优势；正如洪峰起于滴水。
>
> ——拿破仑论恺撒的蒙达之战

> 胜利是我的唯一要求。
>
> ——1805年8月，拿破仑致德克雷

加冕礼告一段落。几天后，军队上校突然来到巴黎，他们去战神广场出席典礼，并领取御赐鹰旗。“战士们！”皇帝对上校们说，“这是你们的旗帜！这些雄鹰永远是你们的集结点……你们发誓用生命捍卫它们吗？”“我们发誓！”他们郑重地齐声回答。[1] 镀金鹰由六片焊合的铜片铸成，其耳尖至鹰爪长8英寸，翼长9.5英寸，重达3.5磅。[2] 鹰像立于蓝色橡木团旗杆顶上，鹰旗手之职非常光荣，不过士兵们向来不恭，因此军旗很快得到绰号“杜鹃”。[3] 1807年，拿破仑在第55期大军团公报中说：“丢失鹰旗抹黑团的荣誉，哪怕一百次胜仗、一百项战场荣誉也无法挽回颜面。”[4]

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军营中，军队继续训练，预备侵英。马尔蒙从乌得勒支营地向拿破仑报告：“我们每周以师为单位进行三次演习，每月实行两次三个师的合并演习。军队已然训练有素。”[5] 拿破仑命令马尔蒙：

> 密切关注士兵，细心安排他们的生活。初到营地时，你让各营列队，然后一口气花上八小时，一个接一个见士兵。你要聆听抱怨、检查武器，确保他们什么也不缺。七八小时的检阅益处多多。士兵习惯了武装和值勤，检阅向他证明，上司关怀他、全面照料他，这能大大激发士兵的信任。[6]

1804年12月，小威廉·皮特与瑞典结盟。1805年4月，英俄签署《圣

彼得堡条约》，第三次反法同盟核心随之成形。俄国每投入10万兵力对付法国，英国就用金几尼付它125万英镑。后来，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加入了同盟。[7] 拿破仑极尽外交威胁手段，力阻其他国家入盟。早在1月2日，他就致信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姐姐、弗朗茨皇帝的姑姑、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联合王国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Maria Karolina），坦率地警告她，“我手上有陛下写的好几封信，它们证实你暗中寻思”加入新同盟。“你已经亡过一次国，你引发了两场威胁全灭您的父系家族的战争（此言暗指那不勒斯支持先前的两次反法同盟），”他写道，“你想引发第三场吗？”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和妻子卡罗利娜儿女满堂，两人共有18名子女，拿破仑预言道，倘若战争因卡罗利娜爆发，“你和你的后嗣会失去权位，你那些不守规矩的小孩将在欧洲各国乞讨”。[8] 他要求她罢免其英籍首相（兼情夫）约翰·阿克顿（John Acton）爵士、驱逐英国大使、召回那不勒斯驻圣彼得堡大使、解散民兵。她什么也没做，但是1805年9月22日，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9] 的确同法国缔结了严格中立条约。

拿破仑加冕后没有休假，就连圣诞日那天，他也下令不得逮捕与凡尔登赌场庄家决斗的英国人戈尔德（Gold），因为“假释的战俘有权决斗”。[10] 后来在1月，拿破仑致信土耳其苏丹，整封信都用了非正式的“你”，因为这是同辈君主间的适当称呼。“伟大的奥斯曼王朝的后裔、统治世上最伟大王国中的一员的皇帝，”他问道，“你退位了吗？你怎么听从俄国摆布？”[11] 土属摩尔达维亚（Moldavia）[12] 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的亲俄总督出了问题。他警告道，在希腊支持下，克基拉岛的俄军“有朝一日会进攻你的首都……你的王朝将陷入沉睡的暗夜……醒醒吧，塞利姆！”拿破仑也给波斯沙阿（Shah）法特赫·阿里（Fat’h Ali）写了封辞藻华丽的信，自埃及战局以来，他致信东方君主时就使用这种文风。“传播一切的名望已经告诉你我的身份和业绩，告诉你我如何让法国登临西方诸国之首，又用何其惊人的方式展示对东方国君的兴趣。”他谈及昔日的伟大沙阿，然后说起英国：“像先祖们一

样，你不会听信在印度买卖君主性命和王冠的店老板民族[13]，你也会让你的人民英勇抵抗俄国侵略者。”[14]若说小皮特为防侵英花钱买盟友，拿破仑则奉承其他君主，他希望马屁至少能让他们保持中立。1805年4月，他致信普鲁士国王，称维持俄法和平希望渺茫，并把全部责任推到沙皇头上：“沙皇亚历山大太善变、太软弱，按道理，我们一点儿也不能指望他促进普遍和平。”[15]

早在1793年，小皮特就雇佣德意志诸侯的军队去低地国家战斗，由此开创了资助法国之敌的先例，但他经常对投资深感失望，因为1795年普鲁士更乐意和波兰人作战，1797年奥地利又在坎波福米奥索取威尼斯，以之作为割让比利时（与媾和）的补偿。然而总的来说，后任英国政府认为资助政策物有所值。拿破仑自然说，此政策的特色就是英国肯让盟友战斗至最后一滴血。“请让人画些漫画，”1805年5月，拿破仑命令富歇，“画英国人手握钱包请各国取钱，诸如此类。”[16]1794年，英国政府花费14%的收入资助盟友；二十年后，威灵顿的军队其实已进入法国，而这一比例仍是14%，但这些年中英国经济增长迅猛，14%的收入就成了巨款1000万英镑。英国政府与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义务的拿破仑为敌，它靠工业革命的利润支撑自己，也愿意为了事业分享这笔利润。1793～1815年，英国一共给了法国的敌人65830228英镑，这是个天文数字，但远远少于大规模正规军的维持费和作战费。

1805年2月1日，路易·德·博塞-罗克福（Louis de Bausset-Roquefort）男爵就任宫廷总管，这道任命状蕴含拿破仑及其最亲昵友人、宫廷司礼官迪罗克对他的私人照顾。正如某位熟识晚年拿破仑的人所说的：“一切顾虑都得为拿破仑的雄心让步，只要抱负不受影响，他就敏感多情，可以情深义重。”[17]最高统治者的真实友情因难以维系而著称，随着时间流逝，拿破仑最亲近的四名好友相继捐躯，亲密到能犯颜直谏他的人于是越来越少。虽然博塞只是廷臣，还算不上他的朋友，但除了他的家人，博塞待在他身边的时间几乎最长，此人忠心服侍他至

1814年4月，几乎陪他度过所有旅途与战役。要说有谁私下熟悉拿破仑，这人就是博塞。拿破仑逝世六年后，法国非常不提倡偏向波拿巴分子的著作，而博塞出版了回忆录。此外，博塞的政治身份可是保王党人，他也不属于拿破仑遗嘱里提到的几十人，可就算这样，他对拿破仑的感情也只有仰慕。“他的前额开阔高挺，彰显天才与权力。”博塞写道，“他的双目焕发火焰，表达思虑与情感。但是，只要他的和蔼性情未遭烦扰，他的高贵脸庞上就会浮现一抹最宜人的微笑，笑容随后让位于我在别人身上从来见不到的难言魅力。这种时候，看见他的人无法不爱他。”博塞随拿破仑一同生活，为他效力，如准备饭食、管理家务、下棋时允许他作弊，这种日子过了将近十年，但对博塞来说，他的魅力不曾减退。博塞说，拿破仑的“风度和举止永远不变，它们是天生的、自然的。我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他是世上唯一配得上‘越近观越显伟大’这句话的人”。[18]

1805年3月17日（周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御座大殿（Throne Room）举行盛大典礼，接过新生的意大利王国王位。他本来就是意大利共和国最高行政官，成为法国皇帝后，加封意大利国王顺理成章。拿破仑致信弗朗茨皇帝，谴责他对英军和俄军的决策，并争辩道，既然英俄继续占领马耳他岛和克基拉岛，“分离法国和意大利的王冠就是幻想”。[19] 两天后，拿破仑封妹妹埃莉萨和妹夫费利切·巴乔基为卢卡与皮翁比诺君主。[20] [21]

拿破仑去米兰自封意大利国王，他中途在里昂逗留了六日，虽有约瑟芬随行，他却同富裕金融家之妻弗朗索瓦丝-玛丽·德·佩拉法拉·内·勒鲁瓦（Françoise-Marie de Pellapra née LeRoy）欢好。[22] [23] 5月26日，加冕礼在壮观的米兰大教堂举行，出席人士有卡普拉拉等8名红衣主教以及约3万名观众。“教堂非常美丽，”拿破仑告诉康巴塞雷斯，“典礼就像巴黎的一样好，区别是这回天气极佳。我接过铁冠，戴上它，同时补充了一句话：‘上帝赐我此冠，他人碰触必遭灾祸。’我希望此言成为预

言。”[24] 伦巴第铁冠呈椭球形，相当沉重，由黄金制成，据说此冠中的一些金属来自真十字架[25] 上的钉子。1155年，“红胡子”弗里德里希戴上铁冠，从那以后，每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戴过它，因此用铁冠加冕是拿破仑对现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皇弗朗茨的进一步武力恫吓。

马伦戈会战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拿破仑重游战场。博塞回忆，他穿着“有些破烂的旧”制服，“拿着被打穿的老旧金边大帽子”。[26] 马伦戈会战时，他穿的就是这身制服，不管帽子上的洞是不是弹孔，这套衣服都让人想起他的公关天才。次月，拿破仑去了布雷西亚、维罗纳、曼托瓦、博洛尼亚、摩德纳、皮亚琴察、日内瓦和都灵，离开都灵后，他仅用八十五小时便在7月11日晚返回了300英里开外的枫丹白露宫（原波旁狩猎行宫，他喜欢在此游玩）。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意大利土地。拿破仑任命23岁的继子欧仁为意大利总督，后者温和明智，因而深得意大利民心。[27] 前意大利共和国副主席梅尔齐不停诉苦，但拿破仑不准他退休，于是他依然负责实际日常管理，即便如此，当年6月，拿破仑在三天内给欧仁写了至少16封信，谈论统治艺术：“学会倾听。你要相信，沉默和明晓经常产生同样的效果”；“不要耻于提问”；“若身处意大利总督之外的任何立场，法国国籍都是荣耀，但在这儿，你必须学会轻视它”。[28] 意大利的人才信任近代法国的行政体制，梅尔齐毫不费力地把他们招入政府。欧仁晋升之后，约瑟夫和路易自然懊恼，虽说只要肯放弃法国皇位继承权，他俩都能当意大利国王。[29]

“我的大陆秩序已定好，”1805年6月，拿破仑对塔列朗说，“我不想渡过莱茵河或阿迪杰河。我希望和平相处，但忍不了糟糕的争吵。”[30] 拿破仑并不渴求意大利与莱茵河之外的土地，但他的确希望法国保留欧洲最强国的地位和域外事件仲裁者的角色，不论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想“争吵”，他已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英国抵制拿破仑的欧洲蓝图，态度非常坚决。夏初，拿破仑似乎终

于占了英国的上风：一场暴风雨把纳尔逊的封锁舰队吹离土伦，3月30日，海军将领维尔纳夫趁机逃脱，他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同加的斯的西班牙舰队会合，随后驶往马提尼克岛，并于5月14日抵达目的地。纳尔逊发现维尔纳夫没有去埃及，立刻横渡大西洋追踪他，于6月4日到达西印度群岛。拿破仑的侵英总计划的下一阶段已就位。“只要我们做六个小时的海峡之主，”6月9日，拿破仑致信德克雷，“英格兰就不复存在。随便哪个渔民、倒霉记者、梳妆打扮的女人都知道，没法阻挡在布洛涅之前现身的海军分舰队。”[31] 事实上，皇家海军一心阻止任何规模的海军分舰队在布洛涅及一切侵略港口露面。然而，此时维尔纳夫再度横穿大西洋，试图打破布雷斯特的封锁，7月中旬时拿破仑便相信，也许期盼已久的入侵终于能开始了。“情况可能随时有变。让全军上船，”20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以便整个远征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启动……我打算在相距不远的四个不同地点登陆……通知四位元帅（奈伊、达武、苏尔特、拉纳）不得延误片刻。”[32] 意大利的信件在寄发前得花一天时间用醋消毒，拿破仑也下令取消这种做法，“要是瘟疫来自意大利，那么传播途径是旅行和军队调动。给信消毒纯属找麻烦”。[33]

在大雾弥漫的菲尼斯特雷角（Cape Finisterre），维尔纳夫迎战海军少将罗伯特·考尔德（Robert Calder）的规模更小的舰队，损失2艘船。7月23日，他按照拿破仑的命令驶向西班牙北部港口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附近的费罗尔（Ferrol），结果丧失了在大西洋横渡航程中赢取的关键时间优势。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批评考尔德战后次日不出击，放跑维尔纳夫。与他交谈的英国人指出，考尔德位于下风处，无法进攻，他否认此言，说对方“只是碍于国家荣誉感找借口，因为23日晚那个将军逃走了”。[34] 拿破仑不懂下风和上风的区别，再次证明自己是个海战白痴。

迫于拿破仑的不断烦扰（“欧洲屏息等待正在筹备的壮举”），8月10日，维尔纳夫率33艘战列舰驶出费罗尔，打算和位于布雷斯特、隶属

冈托姆的21艘舰船会师，如果加上位于罗什福尔、隶属扎沙里·阿勒芒（Zacharie Allemand）上校的海军分舰队，联合舰队将拥有不下59艘战列舰。[35] 次日，维尔纳夫却担心皇家海军正追踪他，于是他没去北边的英吉利海峡，反而南下至加的斯。8月20日，维尔纳夫在加的斯抛锚，不久即被纳尔逊封锁，后者已从大西洋彼端折返，靠直觉找到了前者。

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兼并热那亚，和拜恩、符腾堡、巴登结盟，这些举动都惹恼了奥地利。8月9日，奥地利秘密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而拿破仑不知情。8月3日，他曾私下对塔列朗说“没必要开战”，尽管如此，他也做好了战争爆发的准备。[36] 8月上旬的几天中，拿破仑插空命令圣西尔做好必要时从北意大利入侵那不勒斯的准备，授予马塞纳在意大利境内的指挥权，并派萨瓦里去法兰克福，要他尽量弄到最好的德意志地图、努力刺探维也纳宫廷会议的情报。[37]

8月13日（周二），拿破仑忙得脚不沾地。凌晨4点，他在蓬德布里克收到菲尼斯特雷角之战的消息。皇家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应召而来，他后来说，皇帝“看上去完全气疯了，他的帽子压到眼睛，整个脸色都难看”。拿破仑确信维尔纳夫被堵在费罗尔（虽说此时维尔纳夫其实已离开），大叫：“什么海军！什么将军！什么付出，都白费了！”[38] 独立消息称奥军似乎在动员，所以侵英行动显然得推迟了。“想和我开战的人一定彻底疯了，”他致信康巴塞雷斯，“时至今日，其他欧洲军队肯定比不上我的。”[39] 然而，当天晚些时候，情报表明奥军的确在动员，拿破仑立刻变得强硬。“我已下定决心，”他致信塔列朗，“我要在11月前进攻奥地利，侵入维也纳，以便迎战俄军，如果他们出现的话。”在同一封信中，他命令塔列朗努力恐吓“瘦骨嶙峋、靠祖宗本事登上帝位的弗朗茨”，使对方不敢开战，因为“我希望和英国作战时不受干扰”。[40] 拿破仑指示塔列朗对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外交大臣路德维希·冯·科本茨尔的堂亲说：“科本茨尔先生，那么你们想要战争了！那就给

你们战争。开战的可不是皇帝。”[41] 拿破仑不知道塔列朗能否成功吓倒奥地利，于是命令维尔纳夫（他对德克雷说，维尔纳夫“这个可怜家伙看东西眼带重影，他的勇气不及洞察力”）北上，他写道：“只要你在这儿待三天、哪怕二十四小时，你就完成了任务……为了入侵六个世纪来一直压迫法国的国家，我们都死而无憾。”[42]

拿破仑仍不想放弃侵英计划，但他明白双线同时作战不可取。现在他需要征服奥地利的详细方案，命令达吕坐下来记录自己的口述。达吕后来告诉塞居尔：

> 没有一点过渡，没有一次明显沉思，他毫不犹豫地向（我）口授从乌尔姆直到维也纳的全部战役计划，语气简洁明快、飞扬跋扈。滨海军团原本面海布阵，排成长达200里格（600英里）的战线，一声令下后，他们将解散成多个纵队，向多瑙河（the Danube）进军。这次匆忙口授预设了一切：关于各部队的行军与其时长的命令；各纵队应该集中或重新集合的地点；意外；全力进攻；不同调动；敌人的错误。[43]

“拿破仑果断放弃如此庞大的准备工作”，达吕于是佩服“那明确果敢的决心”。[44]

未来战役的基础之一是贝尔蒂埃的详细文书系统（堪比教练指导），之二则是拿破仑采用的军体系（corps system）——本质上大大放大了他在意大利和中东作战时使用的师体系（division system）。1803～1805年，拿破仑利用在布洛涅军营驻扎和实施持续机动的时间，把军队分成各单位紧张训练，每个单位有2万～3万人，有时甚至达4万人。为了和其他军密切配合，每个军实际上是一支微型军队，有自己的步兵、骑兵、炮兵、参谋部、情报人员、工兵、运输队、军粮部、军饷部、医疗部和军需部。行进时，各军始终相隔一天内的行军里程，拿破仑便可根据敌军动向瞬间调换后卫、前卫或预备队。所以，不论进攻还是撤退，整个大军都能绕着轴线井然旋转。各军也能靠行军拉大彼此距离，避免在乡间造成食物供应的问题。

每个军必须有足够的兵力，以便将整个敌军钉在战场上。其他军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赶来支援或救急，抑或采用更有效的侧翼包抄，甚至可以包围敌军。独立军司令常是元帅，他们奉命在指定日期到达指定地点，除此之外自主处理一应军务。拿破仑从没指挥过步兵或骑兵部队的连、营、团、旅、师或军作战，而且他信任元帅的经验和能力，一般说来，只要能完成任务，他乐意让他们自行安排后勤和战术。[45] 军也应具备在进攻时重创敌军的能力。[46]

这个颇具创意的系统原是吉贝尔和萨克斯元帅的构想。[47] 马伦戈会战中，拿破仑的军队太过分散，他不想重陷这种险境，遂在几乎所有未来的胜仗中采用军系统，这一点在乌尔姆、耶拿（Jena）、弗里德兰（Friedland）[48] 、吕岑（Lützen）、包岑（Bautzen）与德累斯顿（Dresden）最为显著。若军系统运用不当，拿破仑就会战败，阿斯佩恩-埃斯灵、莱比锡（Leipzig）和滑铁卢便是突出例子。

“革命战争时期，作战计划是拉长阵线，左右移动纵队，”多年后，拿破仑说，“这没什么用。老实说，我之所以赢得那么多战斗，那是因为开战前夜我没有下令延长战线，而是努力让全军齐聚我想要进攻的地点。我在那儿集中他们。”[49] 拿破仑开创了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军事行动级别。1812～1945年，他创设的军一直是欧洲所有军队的标准部队单位。这是他对战争艺术的独特贡献，其在1805年的首次使用也当属现代战争诞生的先兆。

“看来奥地利想要战争，”8月25日，拿破仑致信盟友拜恩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侯（Elector Maximilian-Joseph），“我解释不了这么奇怪的行为。然而战争会来临，并且比它希望的早。”[50] 次日，法国驻慕尼黑公使路易-纪尧姆·奥托传来消息，确认奥军将渡过因河，入侵拜恩。因为拿破仑已有所料，8月23～25日，大军团（滨海军团现已正式改称大军团）的一些法军部队离开了布洛涅。[51] 拿破仑称此举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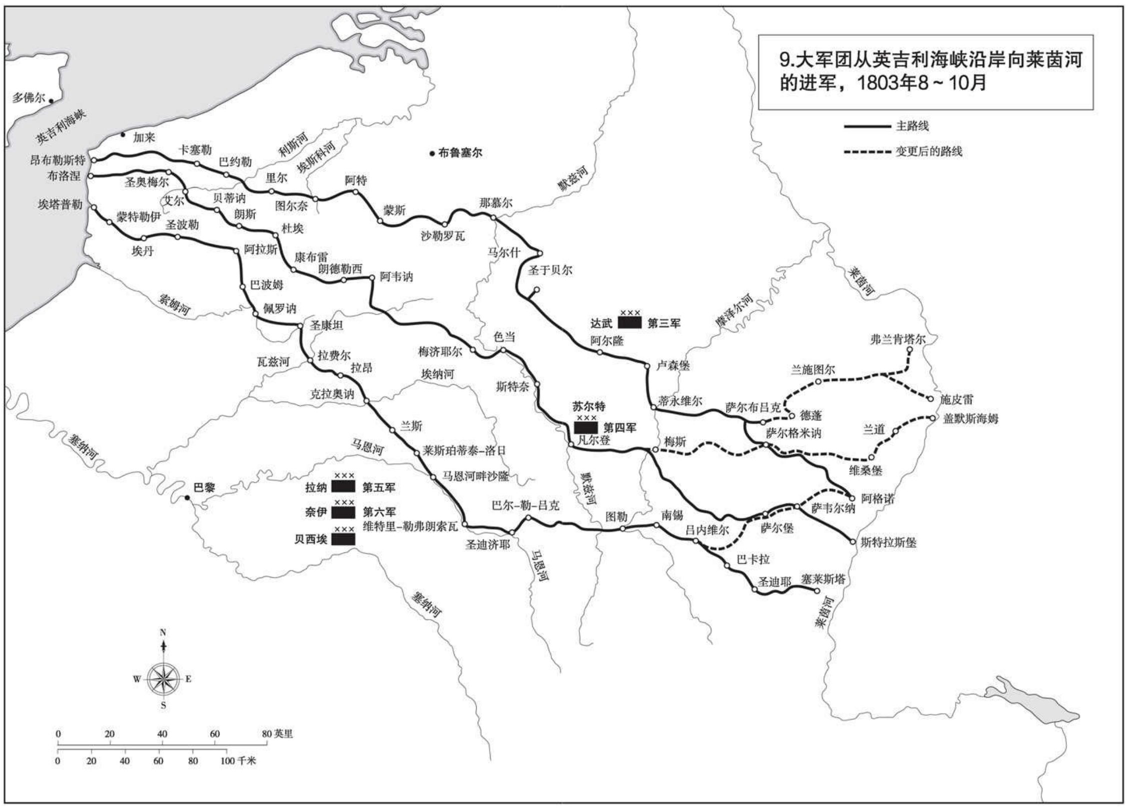
的“单脚尖旋转”，他和部下们谈论侵英计划时终于说：“好吧，如果我们必须放弃，至少还能去维也纳听午夜弥撒。”[52] 直到1813年，布洛涅营房才真正拆除。

为防普鲁士加入反法同盟，拿破仑要塔列朗提议出让汉诺威，“但他们必须明白，两周之内我不会再提这一好处”。[53] 普鲁士宣布中立，但依然坚称瑞士和荷兰应当独立。拿破仑着手备战，8月31日，他寄了一些信，贝尔蒂埃收到3封，贝西埃、康巴塞雷斯和戈丹各收到2封，德克雷、欧仁、富歇与巴尔贝-马尔布瓦各收到1封。虽说正在筹备战事，他还是下令：“帝国诸省应举办赛马，组织其境内饲养的最优良马匹参赛，并奖赏速度最快者。”[54] 赛马自然有军事用途，但它说明即便身陷危机他的思绪仍然庞杂，或者说，身陷危机时他的思绪格外庞杂。当月，拿破仑宣布不得禁止人们在教堂附近跳舞，“因为跳舞不是恶行……若完全听信主教们，那么舞会、戏剧、时尚都该被禁，帝国也得变成大修道院”。[55]

9月1日，拿破仑从蓬德布里克去巴黎，以便让元老院征募8万名新兵，他对康巴塞雷斯说：“布洛涅只剩下保卫港口所需的人手。”[56] 他完全封锁了部队动向，叫富歇禁止一切报纸“提及军队，就当它不复存在”。[57] 他也想出了追踪敌军行迹的点子，命令贝尔蒂埃找一个说德语的人“持续关注奥军各团的进度，把信息存入特制盒子的隔层……各团名称或番号要记在扑克牌上，某团调动后，对应它的扑克牌也要相应换层”。[58]

次日，奥军将领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Karl Mack von Leiberich）越过拜恩边界，很快就攻克设防城市乌尔姆。他指望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将军的俄军会马上来援，如此这片战场的联军总兵力会增至20万人。然而，对于尚未直接联系上俄军的奥军来说，乌尔姆太靠前了，超出他们的安全范围。由于某些原因（有的说法归咎于糟糕的参谋工作，有的

归咎于俄国历法儒略历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历法格里高利历之间的十一天时差），俄军的部署非常滞后。[59] 与此同时，卡尔大公准备进攻意大利，而拿破仑已让马塞纳接替儒尔当任当地司令。9月10日，拿破仑提醒欧仁及其将领提防奥军出击，并指示53岁的热那亚省省长皮埃尔·福尔费（Pierre Forfait）别再带他的年轻情妇（“这罗马女孩不过是妓女”）去剧院。[60]



大军团的七个军分别由元帅贝纳多特、缪拉、达武、奈伊、拉纳、马尔蒙和苏尔特指挥，总兵力达17万人。七个军向东进发，速度惊人，于9月25日渡过莱茵河。士兵们将在干燥的土地上战斗，不必乘脆弱的平底船冒险横渡英吉利海峡，所以他们心情愉悦，一边唱着《出征曲》，一边欢快地启程。（一个团能记住多达80首歌并不稀奇，乐手既能在行军时和进攻前鼓舞士气，又能在战斗中兼任担架队员和卫生员。）当天，拿破仑对奥托说：“一切总算有起色了。”[61] 当时，这是法军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战役。部队从布洛涅、荷兰等地奔赴前线，它

北起科布伦茨，南至弗赖堡（Freiburg），几乎长达200英里。

大军团抵达莱茵河前一天，流言在巴黎大肆传播。谣言称，拿破仑为了支付作战费用强行拿走法兰西银行的全部金银储备，因此流通的纸币缺乏足额的信用保障。（其实根本没人挪用黄金，但法兰西银行发行了总价值为7500万法郎的纸币，其中仅3000万有硬通货担保。）群众包围了银行，它先是慢慢兑现纸币，然后突然统统不兑，后来又以90%的兑换比龟速兑现。[62] 危机中，公众担心纸币指券时代重现，人心惶惶，当局只有召集警察平定慌乱。拿破仑极其关注这次危机。他觉得巴黎银行家看上去不够信任法国，意识到速胜及有利的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9月24日，拿破仑离开圣克卢宫。两天后，他在斯特拉斯堡与军队会合，让约瑟芬留在当地，然后他前往乌尔姆东边的多瑙河，力图包围马克，切断其与俄军的联系。乔治·穆顿（Georges Mouton）将军奉命去见符腾堡的选侯，为3万人的奈伊军索取通行权，选侯难以拒绝，并询问符腾堡是否可以升为王国，拿破仑大笑：“嗯，对我来说那再好不过。要是他只想着当国王，就让他当吧！”[63]

法军一过莱茵河，拿破仑便借助军体系让全军右转90度。塞居尔说，这次调动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前线变动”，它意味着10月6日大军团已在多瑙河畔面南列阵，其阵线从乌尔姆一路沿河而上至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64] 庞大的军队动作敏捷，迅速就位，不费一兵一卒切断马克的退路，而此人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堪称拿破仑最显赫的战绩之一。“与奥军媾和没有别的前提，”当时他告诉贝纳多特，“除了加农炮炮击。”[65] 巴登、拜恩和符腾堡的军队现在皆已加入大军团，这鼓舞了拿破仑。

战役结束后某年，拿破仑的玩具制造商制作了一辆四只老鼠拉拽的微型马车，供皇帝身边的孩子玩耍。马车动不了后，拿破仑告诉孩子

们，掐“前面两只的尾巴，它们动了，另外两只会跟上”。[66] 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他一直掐着贝纳多特和马尔蒙的尾巴，把他们推向斯图加特以远。贝纳多特穿过安斯巴赫（Ansbach）和拜罗伊特（Bayreuth）的普鲁士领地，柏林方面私下愤怒不已，但未做任何公开表态。“我在符腾堡宫殿。虽然是战争时期，但我正倾听非常美妙的音乐，”10月4日，拿破仑从路德维希致信内政部长尚帕尼（Champagny），评论莫扎特的“绝佳”作品《唐璜》（*Don Juan*）道，“然而，看来德式唱法确实有些巴洛克风。”[67] 他给约瑟芬的信补充道，天气极好，漂亮的选侯夫人“似乎非常友好”，尽管她是乔治三世之女。[68]

照塞居尔的说法，拿破仑“迫不及待地想见多瑙河第一面”[69]，10月6日晚，他前进至多瑙沃特（Donauwörth）。塞居尔的叙述里经常出现“迫不及待”，它几乎被视作拿破仑的全部军事特色，确切说来全部个人特质中最稳定的部分。战时最贴近他的人——贝尔蒂埃、莫尔捷、迪罗克、科兰古、拉普和塞居尔——都说过整场战役中他迫不及待，哪怕他的计划已超前运行。

尚在班贝格（Bamberg）时，拿破仑写了37期公报中的第1期，预言敌军将“全灭”。[70] 10月8日，缪拉和拉纳击败一股奥军，拿破仑在此战报告中写道：“莫珀蒂（Maupetit）上校冲在第9龙骑兵团前头，攻入韦尔廷根村（Wertingen）。他受了致命伤，留下遗言：‘告诉皇帝，第9龙骑兵团已证明自己名副其实，他们冲锋陷阵、克敌制胜，高呼皇帝万岁！”[71] 拿破仑的公报当小说来读也激动人心。他用公报告诉军队他举行的会议、城市的装饰，甚至说拜恩首相之妻蒙特格拉斯夫人是“绝色佳人”。[72]

10月9日，法军在金茨堡（Günzburg）小战中取胜，11日，他们又在哈斯拉赫-永京根（Haslach-Jungingen）战胜对手。次日晚上11点，贝纳多特已占领慕尼黑，此时距拿破仑前往伊勒河（the Iller）上的布尔高

（Burgau）还有一小时，他正给约瑟芬写信，已然这么说："敌军败了，掉了脑袋，一切都表明，这是迄今为止我最快乐、最迅捷、最出色的战役。"[73] 这一说法当然傲慢，但事实最终证明他没错。为了让马克待在没有掩护的位置，法军情报人员在奥军俘虏中安插了一些"逃兵"，他们告诉奥军，法军准备发动兵变并回国，甚至说巴黎传出了政变流言。

乌尔姆包围圈几近完成，10月13日，拿破仑命令奈伊返回多瑙河对岸，夺取乌尔姆面前最后一处主要障碍——埃尔兴根（Elchingen）的高地。在埃尔兴根修道院可非常清楚地纵览河漫滩（floodplain），视野远及6英里外的乌尔姆总教堂。次日，奈伊攻克目标。腾跃兵（voltigeurs）、卡宾枪手和掷弹兵冲上埃尔兴根的斜坡，拿下修道院。若端详此地斜坡，便会明了拿破仑在军中奋力培养的高昂士气与军旅精神多么重要。战斗时，曾在埃及军团服役的某个掷弹兵背部负伤，滂沱大雨中，他躺在地上，大叫"前进！"拿破仑认出了掷弹兵，遂脱下斗篷丢给他，说："想法子把这个还给我，我拿你非常当之无愧的勋章和津贴来换。"[74] 当日的战斗中，拿破仑一度在奥地利龙骑兵的手枪射程内。

当晚，一名副官给拿破仑做了一只煎蛋卷，但他找不到酒或干衣服。皇帝相当幽默地评价道，此前在外征战时自己从不缺香贝坦葡萄酒（Chambertin），"哪怕是在埃及沙漠中"。[75] "天气糟透了"，他描述攻克埃尔兴根之战时称，"泥泞一直浸到士兵的膝盖"[76]，但他现在完全包围了乌尔姆。

10月16日，在乌尔姆附近的哈斯拉赫村农舍，塞居尔发现拿破仑"和一个年轻鼓手分别在炉子两边打盹"。拿破仑有时仅小睡十分钟，但他能补足数小时精力。塞居尔回忆这个不和谐场面道："皇帝和鼓手在一起睡觉，将军和显贵在旁待命，围着他俩站成一圈。"[77] 次日，马

克开始谈判，他承诺道，若二十一天内俄军未解围就投降。拿破仑的补给开始不足了，他想一鼓作气，说最多只给马克六天。[78] 10月18日，缪拉在特罗赫特尔芬根（Trochtelfngen）击败陆军元帅韦内克（Werneck）的援军，并俘虏15000人，消息传来，马克大受打击，胸口如同挨了一拳，“他站不住，只能靠在公寓墙上”。次日，拿破仑从埃尔兴根致信约瑟芬：“八天来我一直湿淋淋的，脚冻得冰凉，有点不适，但今天我一整天都没出去，休息了一下。”[79] 他在某期公报中甚至夸口一周没脱靴。[80]

10月20日下午3点，马克投降，他交出乌尔姆以及约2万名步兵、3300名骑兵、59门野战炮、300辆弹药马车、3000匹马、17位将军和40面军旗。[81] 一名法军军官不认识马克，问他是谁，奥军司令回答：“你眼前的就是倒霉的马克！”[82] 此后人们一直记得他这绰号。拿破仑告诉约瑟芬，“我实现了全部计划，我只靠行军就消灭了奥军”，然后他又说谎道，“我俘虏6万人和30多名将军，缴获120门大炮和90多面军旗”。[83] 他在第7期公报中写道，“10万敌军中，最多只有2万人逃走”，即便算上从金茨堡开始的战斗，这也是大肆的夸张。[84]

投降仪式在乌尔姆城外的米歇尔斯贝格高原（Michelsberg plateau）举行。站在紧邻老城的瞭望塔（Aussichtsturm tower）上，便可看见奥军鱼贯出城的地方以及他们放置滑膛枪和刺刀的场所（部分地面现已造林）。这些人后来成了阶下囚，在法国的农场和巴黎的建筑工地上劳动。一名奥军军官评论拿破仑身上泥点斑斑的制服，他说天气如此潮湿，战役必然十分艰苦，拿破仑则说：“你的上司想提醒我，我不过是个当兵的。我希望他承认，帝王紫并未让我忘记我的第一职业。”[85] 他对被俘的奥军将领讲话时补充道：“你们的名字在你们战斗过的所有地方传颂，可奥地利内阁只会妄想疯狂的计划，他们危害国家威严时毫不脸红，遗憾啊，你们这样勇敢的人竟沦为这种愚蠢内阁的牺牲品。”[86] 他试图说服他们，称开战纯属多此一举，战争起因不过是英国为防伦敦

沦陷而收买了维也纳。拿破仑在某日公告中称，俄国和奥地利只是英国的“米娘”（mignons，指“玩物”或“巴儿狗”，不过这个词也有一点色情内涵，可指娈童）。

拉普回忆道，拿破仑“战胜后得意扬扬”，他完全有理由这样高兴，因为整场战役完美无缺，几乎兵不血刃。[87] “皇帝发明了新的作战方式，”拿破仑在一期公报中引用士兵的话称，“他只用我们的腿和刺刀。”[88]

尽管拿破仑四周后才知情，但反法同盟恰恰在乌尔姆投降后第二天就实施了复仇，这个时机选得几乎像写诗一般。在加的斯以西50英里处的特拉法尔加角（Cape Trafalgar），纳尔逊将军摧毁了维尔纳夫的法西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的33艘战列舰丢了22艘，而英军的27艘战列舰无一折损。[89] 英军将领指挥时发挥灵感，展示了日后为人著称的“纳尔逊式接敌”（the Nelson touch）。他把舰队分成两个中队，垂直切入联合舰队战线，敌军于是断成三股，其中两股后来被摧毁。大军团在多瑙河边，所以维尔纳夫完全不用开战，就算他赢了，侵英行动最早也得等到次年初，然而拿破仑执意作战的命令直接导致了灾难发生。[90] 因为此战，之后一个世纪英国海军称霸海洋。正如哲学家贝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所说的：“拿破仑是欧洲的主人，但他也是欧洲的囚徒。”[91] 纳尔逊战死沙场，这对拿破仑来说是唯一的小补偿。“纳尔逊的才华不是后天产物，”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说，“那是天才。”[92] 英军在特拉法尔加取胜后，英国得以抓紧开展对法经济战。1806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枢密令（本质上是法令），彻底封锁了从布雷斯特至易北河的欧洲海岸。

拿破仑没有完全放弃侵略梦想，反而继续花费大量金钱、时间与精力，力图重建舰队。他觉得舰队只靠数量优势就可再次威胁英国，却从来不明白一件事：皇家海军的战斗力正处巅峰，要是舰队八分之七的经

历仅仅是港口待命，它就无法掌握击败皇家海军所需的航海技术。大军团新兵可以在开赴前线时接受操练、练习射击，事实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在陆地上，水手没法学会如何对付被狂风从高处刮落的重物、如何在翻腾的大海上操作两次以上侧舷开炮，而他们的对手接受过训练，可在同等时间内操作两三次侧舷开炮。[93] 1805年秋的事件将证明，拿破仑精通陆军战事，英军则擅长海战，二者完美制衡。

到达维也纳之前，没有什么能阻挡大军团。可战役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库图佐夫的10万名俄军士兵正向西移动，卡尔大公的9万名奥军士兵则在意大利，拿破仑必须阻止两军会师。10月下旬，马塞纳在卡尔迪耶罗与奥军鏖战三天，设法战成平局，于是卡尔如拿破仑所愿未能守卫维也纳。

“我在大行军途中，”11月3日，拿破仑从豪斯鲁克山区哈格（Haag am Hausruck）致信约瑟芬，“天气严寒，这个国家的雪积了一英尺……好在不缺木头。我们总是在林间。”[94] 虽然拿破仑不可能知道，但普鲁士在当天与奥地利、俄国签署《波茨坦条约》，承诺收到英国资助后对法国实施武装“调停”。11月15日，《波茨坦条约》获批，少有条约像它这样迅速落后于事态进展。法军战线拉得太长，所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愿意对法施压，可他胆子太小，不敢出击，而且他也没能从英国那儿要到汉诺威当“调停”费。

拿破仑继续向维也纳进军。法军补给陷入混乱，列兵中传出抱怨之声，就连皮埃尔·马孔（Pierre Macon）将军这样的高级军官也发牢骚，但是拿破仑依然驱使军队向前。11月7日，他用一道“最严厉的命令”禁止抢劫，数百人在布劳瑙（Braunau）等地挨罚，他们失去战利品，甚至被战友鞭笞（这在法军中非常罕见）。[95] 11月10日在梅尔克（Melk），他可以对军队说，“我们身处酒的国度！”，但士兵只能喝军需官征收的酒。[96] 公报结尾是激烈斥责“欧洲悲剧缔造者”英国人的大

篇文字，这种抨击此时已成惯例。[97]

11月13日上午11点，法军几乎是只靠吹牛便拿下了横跨多瑙河的要地塔博尔桥（Tabor bridge）。他们到处说和约已经签订，而且当局宣布维也纳是不设防城市，这纯属谎言。陆军元帅奥尔施佩格（Auersperg）亲王的奥军炮兵和步兵准备迎敌，并且布下弹药，预备炸桥。乌迪诺的两个掷弹兵营正在前进，但是缪拉和军官们遮住了他们。掷弹兵们便“把可燃物丢进河里，往火药上洒水，切断引线”。有一则故事称，一名掷弹兵从奥军士兵手中抢下引火棒。[98] 真相大白时已然太迟，缪拉不容分说，命令奥军撤离。除了炸毁大桥，奥军高级指挥官没安排多少抵抗措施，但维也纳落入法军之手完全是因为军事诈术。拿破仑得知消息后“欣喜若狂”，他迅速前进，占领了哈布斯堡的美泉宫（Schloss Schönbrunn），当晚他在那儿过夜。次日，维也纳举办盛大的入城式，迎接他和法军入城，弗朗茨及其宫廷退往东边，投奔正在赶来的俄军。[99] 11月15日，霍拉布伦（Hollabrunn）的俄军[100] 从缪拉手中逃脱，这是这次胜利唯一的瑕疵。

拿破仑急着继续奔往他需要的胜利，16日，他带着对缪拉的“一腔怒火”离开美泉宫。[101] 皇帝对贝纳多特的态度也没见更好，他致信约瑟夫时提及此人：“一天就能决定命运，他却让我浪费了一天。我不允许一个人逃走。”[102] 17日，拿破仑在茨纳伊姆（Znaïm）获知特拉法尔加之战。他建立的审查制度滴水不漏，以至于大部分法国人直到1814年才初次听闻这一灾难。[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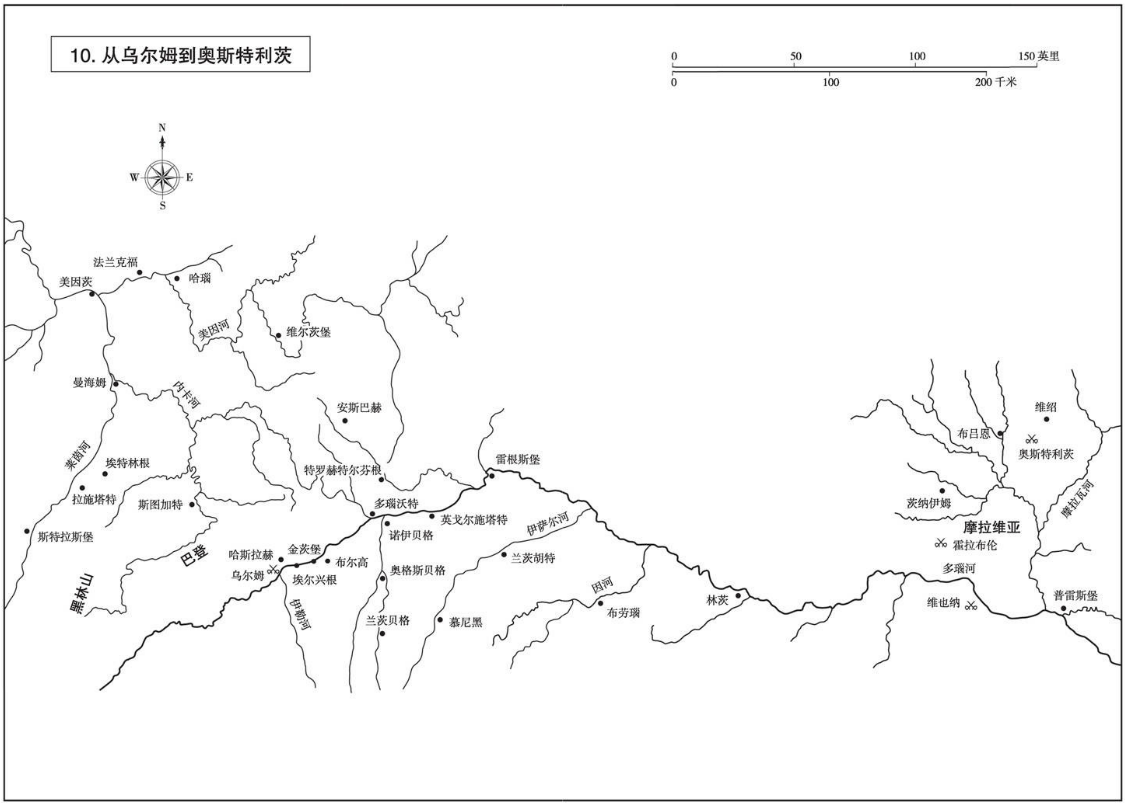
拿破仑想和敌军对战，11月下旬，他又向东走了200英里。由于法军需要驻守占领的城市、保卫补给线，其野战军便减至7.8万人。大军团的处境似乎非常危险：普鲁士威胁北方；约翰大公与查理大公从南面赶来；库图佐夫在东边的摩拉维亚（Moravia），拿破仑尚未追上他。法军走了整整三个月，现在又累又饿。帝国近卫军上尉让-罗克·夸涅

（Jean-Roch Coignet）估计，六周内他走了700英里。拿破仑在日后某份和约中借某一条款索要鞋革，以之作为部分战争赔偿。

布吕恩（Brünn）[104]的武器与给养充足，11月20日时，该城投降，拿破仑“又惊又喜”，把这里当作下一个基地。[105]在布吕恩以东10英里处的“公路旁有一座小山”，它叫桑顿山（Santon），邻近奥斯特利茨村（Austerlitz）[106]。次日，拿破仑在桑顿山上停下，下令挖空面向敌军的底层山体，好让小山更加陡峭。[107]接着他驰过这一地区，细心留意两片湖泊及无遮蔽的区域。他“多次在较高点停留”，而且大部分时候停在名唤普拉岑高地（Pratzen heights）的高原上，然后他对部下宣布：“先生们，仔细查看这片土地。这里将是战场，而你们将参战！”[108]蒂埃博的版本如下：“好好看看那些高地，不出两个月你们就要在那作战。”[109]这次侦察中，拿破仑还去了格日科维茨村（Grzikowitz）、蓬托维茨村（Puntowitz）、科贝尔尼茨村（Kobelnitz）、索科尔尼茨村（Sokolnitz）、泰尔尼茨村（Tellnitz）和默尼茨村（Mönitz），他对随员说：“如果我想阻止敌军通过，我就应该在此布阵，但那样的话我只能打一次普通战斗。另一方面，要是我调回右翼，让它撤往布吕恩，敌军（就算）有30万人也会陷入无处可逃的绝境。”[110]由此可见，拿破仑一开始就想打歼灭战。

俄军和奥军计划夹击拿破仑。两位皇帝将伴野战军主力8.6万人从奥尔米茨（Olmütz）[111]向西进军，与此同时，费迪南德大公从布拉格（Prague）向南出击，切入拿破仑敞开的后方。拿破仑让军队在布吕恩稍事休整，他一直在那待到11月28日。塞居尔回忆道，“我们的位置孤立遥远，每过一天就更危险一分”，而拿破仑决定利用这一事实。[112]11月27日，他在布吕恩会见奥地利使臣约翰·冯·施塔迪翁（Johann von Stadion）伯爵和久洛伊将军。为了让敌军变成骄兵，他假装担心法军的位置和孱弱的整体实力，还当着奥地利人的面下令撤退。蒂埃博将军描写了这一策略：

俄军以为法军不敢开战。法军放弃了俄军威胁的所有地点，趁夜从维绍（Wischau）、劳斯尼茨（Rausnitz）和奥斯特利茨溜走，一口气撤了8英里。法军没有威胁俄军侧翼，反倒集结队伍。俄军觉得，这些犹豫停顿的迹象和撤退的样子既充分证明我们的勇气已动摇，又预示他们定将取胜。[113]



10. 从乌尔姆到奥斯特利茨

次日上午，拿破仑接见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使臣克里斯蒂安·冯·豪格维茨（Christian von Haugwitz）伯爵，他显得强势些，否决了一切“调停”概念。中午时分，他去了波索西茨（Posorsitz）的驿站和驿车旅馆——旧驿站（Stara Posta）。

一名逃兵告诉拿破仑联军肯定会进攻，萨瓦里的情报人员也说，敌军不会等待1.4万名俄军士兵来援。拿破仑于是集中兵力，他需要让所有的军齐聚战场：马尔蒙在格拉茨（Graz）；莫尔捷在维也纳；贝纳多特在后方监视波希米亚（Bohemia）；达武去普雷斯堡（Pressburg）监视目前还算安静的匈牙利；拉纳、缪拉和苏尔特的部队散布在他前方的

布吕恩-维绍-奥斯特利茨轴线上。11月28日，他在波索西茨之外的奥尔米茨公路上会见沙皇的骄傲副官、27岁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多尔戈鲁基（Peter Petrovich Dolgoruky）公爵。“我和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年轻交谈，”一周后，拿破仑告诉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选侯，“他口吻傲慢，拿我当他要送往西伯利亚的波雅尔（boyar）[114]。”[115] 多尔戈鲁基要求拿破仑把意大利交给撒丁国王、把比利时与荷兰交给普鲁士或英国亲王，他报以适当的冷淡回应。然而，直到多尔戈鲁基瞧见看上去像撤退预备的场面，拿破仑才打发他走。[116]

第17轻步兵团的一名哨兵偶然听见公爵的要求。拿破仑对他说：“你知道吗，这些家伙以为他们会吞掉我们！”哨兵回答：“让他们随便试，我们马上叫他们噎着！”[117] 这让拿破仑好受了些。他与列兵的互动短暂却充满诚意，构成他对部下的影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作大部分联军将领，这种交往则是不可思议的行为。当晚，拿破仑下令紧急召回贝纳多特和达武（达武得令后仅用四十八小时便完成70英里行军），随后在旧驿站过夜。

拿破仑的原计划如下：苏尔特、拉纳和缪拉打防守战，引诱俄奥联军的69500名步兵、16565名骑兵及247门火炮前进；一旦敌军全部参战，明显暴露其弱点，达武和贝纳多特就上场。拿破仑身边一共只有50000名步兵和15000名骑兵，但他有282门大炮，而且他在奥斯特利茨集中的兵力甚至比联军（他们的情报部门办事不力）掌握的法军总兵力还多。拿破仑命令苏尔特仓促离开普拉岑高地，进一步欺骗敌军相信法军要撤离。虽说叫高地，普拉岑高地与其说是峭壁不如说是丘陵，其地面褶皱也能让较大规模的军队藏在相当接近高原顶点的地方。有些地段会令人误以为它陡直，而冒着火力上山时，这种错觉必然更强。

11月29日～30日，法军组织阅兵和侦察，围绕战场北端的小丘陵桑顿山挖战壕（土木工事今仍可见），并等待达武和贝纳多特。“这四天

来，我和掷弹兵住一起，”30日下午4点，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我只能在膝盖上写信，所以我没法对巴黎说什么，只能说我非常好。”[118]

联军也明白普拉岑高地多么重要。奥军参谋长弗朗茨·冯·魏罗特尔（Franz von Weyrother）将军为联军草拟作战计划：弗里德里希·冯·布克斯赫登将军监督（五路纵队中的）三路纵队从高地南下，进攻法军右翼，然后他掉头向北，席卷法军战线，与此同时，联军全军包围敌人。结果，南部战场的破碎地面上集中了太多人，兵力较少的法军便可阻挡他们，而大大敞开的中部也方便了拿破仑反击。[119] 沙皇亚历山大批准了这些计划，尽管他的战场指挥官库图佐夫不同意。相形之下，法军战略完全出自一名最高领导。

11月30日，帝国近卫军列兵托马·比若（Thomas Bugeaud）致信妹妹：

> “（在离敌人不出2英里的地方，）皇帝亲临，他的马车停在我们的营地中，而他就在里面过夜……他一直在所有军营走动，与官兵交谈。我们围着他。他的话我大都听见了。他总是依据军事义务说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拿破仑对士兵承诺，只要法军取胜他就远离战线，“可是，如果你们不幸有点犹豫，就会瞧见我冲进你们中间重整秩序”。[120]

12月1日，拿破仑得知贝纳多特已在布吕恩，次日可到战场，所以他能参战。傍晚6点，皇帝给将军们下达命令，随后口授了为荣誉军团成员之女建立圣但尼寄宿学校的一些构想。[121] 后来在8点30分，为了应对将要爆发的战斗，他口述了军队的整体部署。在这份口述记录和战后公报之间，他没有留下别的现存书面文件。当天深夜，拿破仑在屋外吃了土豆和炸洋葱，然后他和贝尔蒂埃走过一堆又一堆营火，与士兵们聊天。一名在场人士回忆道，“没有月亮，浓重雾气令人难以行路，也使夜色显得更加深沉”，因此近卫军猎骑兵携带松枝和稻草制成的火把。拿破仑和贝尔蒂埃接近营房时，“仿佛施了魔法一般，我们看见士

兵们手中的成千上万支火把瞬间点燃整条战线上的全部营火”。[122] 贝尔蒂埃的参谋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Louis-François Lejeune，他后来跻身最出色的拿破仑战争画家之列）补充道：“士兵烧光自己的床来点亮共同的家。在军营里很难搞到睡觉用的稻草，只有知晓这种艰难的人才明白他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123] 马尔博认为，次日是拿破仑加冕一周年纪念日，因为这一吉兆，迎接他的欢呼格外响亮。法军士兵高举大量火把，奥军看见火光后，误以为要撤走的敌人正焚烧营地，这是认知失调的经典例子。所谓认知失调，系指数宗迹象驱使人得出预设的假想。

蒂埃博记得当晚的一些趣谈。有那么一会儿，拿破仑对士兵们承诺，若战斗态势不顺，哪儿最危险他就去哪儿，第28战列步兵团的一名士兵便喊道：“我们保证明天你只用动动眼睛！”拿破仑问第46和第57团弹药是否充足，一名士兵回答：“不够，但俄国佬在格劳宾登（Graubünden，瑞士州）教了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光刺刀就够了。明天我们证明给你看！”[124] 蒂埃博补充道，士兵们跳了法兰多拉舞（farandole）[125]，高呼“皇帝万岁！”[126]

1805年12月2日（周一）凌晨4点，法军进入他们在奥斯特利茨战场的初始阵地。覆盖低地的浓雾在很大程度上隐去了法军的行迹，战斗前期，它也让联军高层将领搞不清拿破仑的意图。“在这明亮的刺骨寒夜，”蒂埃博回忆道，“我们的师悄悄集结。为了误导敌军，他们生火后丢下了火堆。”[127]

离天亮还早时，拿破仑就开始侦察了。早上6点，他叫缪拉、贝纳多特、贝西埃、贝尔蒂埃、拉纳、苏尔特这六位元帅以及尼古拉·乌迪诺等数名师长来他的野战司令部。拿破仑的司令部位于战场左中心的小丘陵茹兰山（Žurán），接下来的时间中，他可在此地非常清楚地看见将成为战场中心的普拉岑高地，但他看不见前期主要战斗地索科尔尼茨

村与泰尔尼茨村。7点30分，拿破仑确信每个人都准确理解了自己的任务，会议这才结束。

拿破仑的计划如下：右翼示弱，引诱敌军进攻南部，不过达武的部队正奔赴战场，他们将充分掩护右翼；在桑顿山上放置18门加农炮，拉纳的步兵和缪拉的骑兵预备军驻守此地，稳住北部的左翼阵线；克洛德·勒格朗指挥苏尔特军第3师，在中路抵御奥军，与此同时，贝纳多特军（拿破仑将该军调离桑顿山，让它在格日科维茨和蓬托维茨间重组）支援当天的主要攻势；主攻方向是普拉岑高地，苏尔特负责主攻，一旦联军开始走下高地去南部战场攻击法军，圣伊莱尔师和旺达姆师就会攻上去。

“参战，”拿破仑论及自己的战争艺术时道，“然后拭目以待。”[128]因此，他把帝国近卫军、缪拉的骑兵预备军、乌迪诺的掷弹兵留作预备，以便在南部侧翼投入应急兵力，抑或在拿下普拉岑高地后马上包围敌军。拜恩州档案馆有一份拿破仑的草稿，它记录了实际战斗过程的概要，其内容同他的最初构想惊人相似。拿破仑经常顺势变更作战计划，但有时战斗确实符合预设，奥斯特利茨会战便是一例。

早上7点才过不久，会议都没结束，苏尔特的部队也还没排列好，泰尔尼茨附近就开战了——奥军如拿破仑所料开始向勒格朗发动进攻。7点30分，苏尔特的部队在蓬托维茨列队，诱骗敌军相信自己要去右翼，但实际上他们将猛攻普拉岑高地，杀入战场中心。8点，俄军（参与了当天大部分战斗）从普拉岑高地南下，前往法军右翼，联军中路力量于是减弱。8点30分，联军已占领泰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但达武组织反击，亲率一个旅参战，在8点45分夺回了索科尔尼茨。35岁的元帅第一次指挥大规模战斗，他一进入索科尔尼茨村就收到泰尔尼茨守军的紧急求援，为了从俄军手中夺回烟雾弥漫的村庄，他命令襟兄路易·弗里昂（Louis Friant）将军率第108战列步兵团冲入村子。弗里昂的第2师

乃劲旅，它的有生力量一度减至3200人，仅达其正常规模的一半。第2师兵力相当紧张，但没有崩溃。火药时代常有严重的友军误伤，这回也不例外。第108战列步兵团和第26轻步兵团在索科尔尼茨村外对射，直到看见对方的鹰旗才停手。

勒格朗现在用两个团防守索科尔尼茨，其中之一的科西嘉散兵团（Tirailleurs Corses）绰号“皇帝的老表”（Emperor’s Cousins）。他的对手则是十二个俄军步兵营，他们正向紧挨村子的带围墙鸡舍进发，防守那儿的法军仅有四个营。争斗中，第26轻步兵团冲入索科尔尼茨，赶跑五个俄军营，恰在此时，弗里昂的第48团让另外4700名俄军士兵掉头。然而，俄军对索科尔尼茨城堡发起了猛烈总攻，9点30分，城堡已陷落。索科尔尼茨战场上，级别最高的12名法军指挥官中有11人死伤。一般说来，最后一支整好队伍的生力军登场时，他们就会影响战局，索科尔尼茨的战斗也不例外，这证明拿破仑向来保留预备队的决策是明智的。达武留下骑兵，缓缓投入步兵和炮兵，10点30分时，他的10000人已经抵御了敌军的36000人。达武为拿破仑争得了时间，这对占领中心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战场决胜点普拉岑高地上有17000名俄奥联军士兵，因为达武的战斗，拿破仑也能在那儿投入35000人，从而逆转兵力劣势。

普拉岑高地上有四路敌军纵队，上午9点，拿破仑在茹兰山焦急地等待其中两路下山。他问苏尔特：“你的部队登上高地要多久？”元帅回答二十分钟足够了，他便说：“非常好，那我们再等一刻钟。”十五分钟后，拿破仑立刻总结道：“让我们用雷霆一击结束这场战争！”[129] 圣伊莱尔师待在哥德巴赫山谷内，藏身于丘陵和久久不散的雾气中，此刻他们率先进攻普拉岑高地。10点，太阳升起，大雾消散，此后“奥斯特利茨的太阳”成了经典象征，代表拿破仑的天才和幸运。苏尔特鼓动第10轻步兵团，给了士兵三倍的白兰地份额，然后派他们上坡。法军采用横纵混合队形进攻，前方的一排散兵直接冲入正在下山的第四路俄军纵队

之中。库图佐夫察觉到了危险，派科洛夫拉特的奥军填补俄军纵队之间的缺口。此后双方陷入激战，俘虏寥寥，伤员几乎都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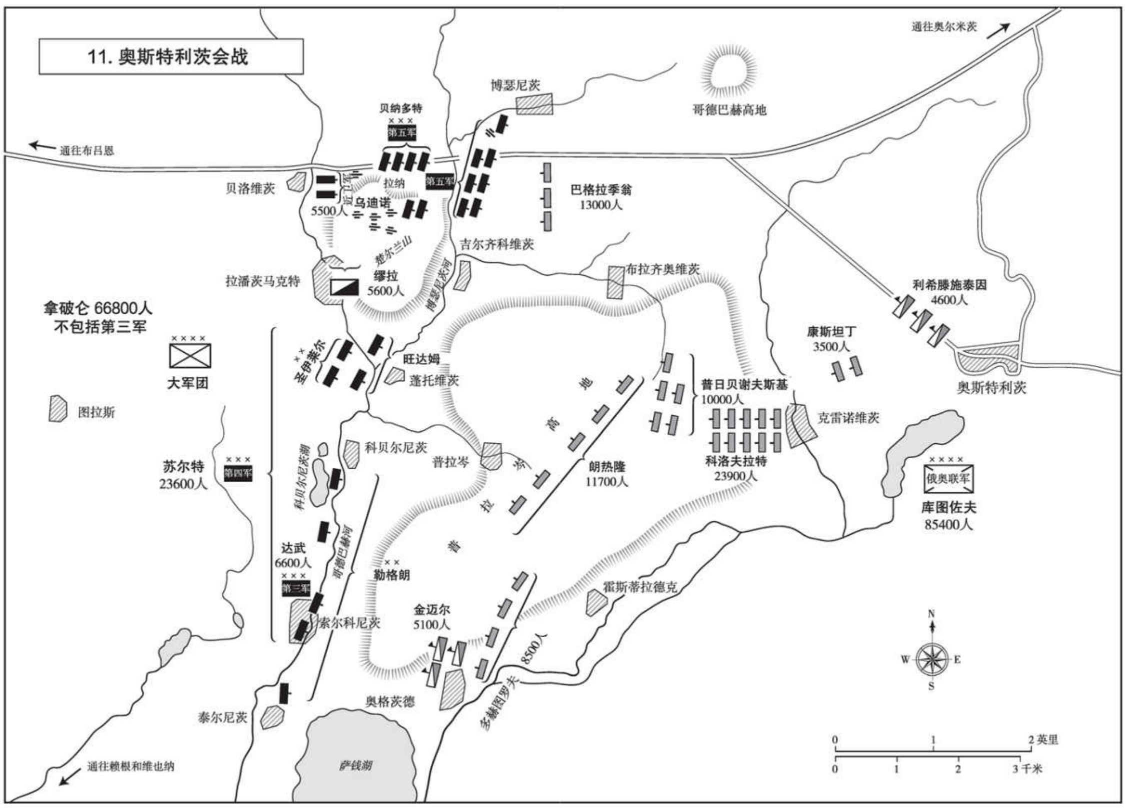
鏖战中，圣伊莱尔拿下普拉岑村和高原大部分制高点。士兵们折返，拾起先前撤退中丢下的武器。这时皮埃尔·普泽（Pierre Pouzet）上校提议由他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发起新攻击，以防敌军计算不断减少的法军兵力，他的建议似乎成功了。11点30分，圣伊莱尔已经到达高原。等苏尔特能投入数量远超俄军的法军时，他立刻这么做了。绰号“恐怖”（Les Terribles）的第57战列步兵团又一次表现出色。

尚在高地上的12000名联军士兵迎战24000名法军士兵。库图佐夫心灰意冷地观战，他让最后一路南下的纵队掉头，但这太迟了。拿破仑在茹兰山观战，他能看见密集的纵队爬上普拉岑的斜坡，副官也源源不断地送来报告。11点30分，他命令贝纳多特前进。贝纳多特要求带上骑兵，但他仅草率地回答：“我没人可拨了。”难以指望人们在战场上礼貌相处，这句答复也只是表述事实，可要说拿破仑的宫廷里谁最招他厌，那就是贝纳多特。

上午11点，在普拉岑高地的小丘陵旧葡萄园山（Stare Vinohrady）上，旺达姆师已经力克沙皇亚历山大的司令部。伴着成群乐队的音乐声，法军狂热地进攻，夸涅回忆道，那音乐声“能让瘫子动起来”。康斯坦丁（Konstantin）大公派俄军皇家近卫（包括骑兵，共30000人）上前进攻旺达姆，法军战线于是动摇了。俄军近卫胸甲骑兵冲向比加雷（Bigarré）少校指挥的第4战列步兵团（但其名誉上校乃约瑟夫·波拿巴），该团崩溃了，士兵回身逃跑，不过他们跑过拿破仑身边时还能镇定地喊一声“皇帝万岁！”[130]

下午1点，拿破仑派贝西埃和拉普协助旺达姆，以图从俄军皇家近卫手中夺回普拉岑高地上的主导权。他先是拨给两人五个近卫骑兵中队，后来又增派了两个（后两队之一是马穆鲁克中队）。马尔博目击了

下面这幕场景：拉普归来，他头部负剑伤，身挂破损马刀，向皇帝献上部队缴获的军旗以及他抓获的俄军近卫中队指挥——尼古拉·列普宁-沃尔孔斯基（Nikolai Repnin-Volkonsky）亲王。一名在场人士回忆道：“有一个猎兵受了致命伤，他呈上军旗，旋即倒地死亡。”[131] 弗朗索瓦·热拉尔（François Gérard）为战斗作画时，拿破仑要他画拉普到来之刻。马穆鲁克穆斯塔法（Mustapha）就没那么光荣了，虽然缴获了一面军旗，但此人对拿破仑说，要是他杀了康斯坦丁大公，他会献上大公的脑袋，皇帝回嘴：“野蛮人，管管你的舌头好吗？”[132]



在北部战场上，缪拉和拉纳迎战彼得·巴格拉季翁（Pyotr Bagration）将军，遭受了大量伤亡。中午时分，拿破仑完全可以满足了：苏尔特已拿下普拉岑高地；桑顿山的防御稳住了北部阵线；南部的达武岿然不动。下午1点，拿破仑司令部前进至旧葡萄园山，他可以在那儿俯瞰哥德巴赫山谷，并制订歼敌计划。皇帝的侍从蒂拉尔看见苏尔特来司令部找他，当时他称赞苏尔特表现出色。他说：“至于其他的，

元帅先生，你的军是我取胜的头号功臣。”[133] 拿破仑随后把圣伊莱尔师和旺达姆师派往靠近俄军后方的索科尔尼茨。达武依然以一敌三，但他下令在泰尔尼茨和索科尔尼茨之间发起总攻。下午2点时，战局已无悬念。

有贝纳多特占据普拉岑高地，拿破仑便能命令乌迪诺、苏尔特和帝国近卫军南下包围布克斯赫登，此时达武的骑兵也开始进攻南部的奥格茨村（Augedz）。拿破仑接着迅速离开普拉岑高地，去可以俯瞰整个湖区的圣安东尼（Anthony）小教堂塔楼指挥末段战斗。布克斯赫登的俄军分成两半，逃往对面的冰湖东岸，拿破仑则命令炮兵轰击冰面。此事后来成了一桩传说：冰层断裂，数千俄军溺毙。然而，近日有人挖掘了萨钱湖（Lake Satschan）的退耕土地，但仅找到12具尸骨和几门大炮。[134] 然而，联军逃离战场时，法军骑兵紧追不舍，拉到高地上的大炮也冲他们开火，所以总的来说联军损失惨重。（奥军骑兵的胸甲没有背甲，因此他们进攻时更轻便，但撤退时很容易被剑枪戳刺和霰弹轰击所伤。）一个俄军团和两个奥军营把自己关进了索科尔尼茨城堡，后遭法军屠戮，但从鸡舍往前，很多地方的大批联军得以投降，这时法军乐队奏响《胜利属于我们》（*La Victoire est à Nous* ）。

晚上10点，拿破仑返回了旧驿站。“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马尔博回忆道，“他容光焕发，但经常遗憾地说”，哥哥约瑟夫的团竟被亚历山大之弟康斯坦丁大公夺去了鹰旗。[135] 次日，拿破仑批评士兵把鹰旗丢给俄军近卫骑兵。有人目睹了这通严厉的训斥，虽说此人不是第4团的士兵，但他回忆道：“我必须承认自己心惊肉跳。我浑身冒冷汗，双眼一度流泪。我毫不怀疑，要是这个团刚好在下个瞬间奉命战斗，他们会创造奇迹。”[136]

奥斯特利茨会战当晚，拿破仑对胜利之师写了一番话，措辞照样华丽：

> 大军团的战士们，这个伟大的日子即将过去，从此淹没于永恒之海。即便是在这个时刻，你们的皇帝也必须对你们致辞，他得说，这场战斗名垂青史，而他欣赏所有有幸参战者的表现。士兵们，你们是世上最好的战士！人们将永远铭记今日与你们的事迹！千年之后，只要宇宙的故事继续流传，人们就会说，在奥尔米茨平原上，你们消灭了英国黄金买来的76000名俄军士兵。[137]

拿破仑补充道，法军缴获140门加农炮，俘虏10000人，“在战场上留下26000具尸体”。次日，他把加农炮数减至120门，但把战俘数扩大两倍，还添上20名将军。有可靠的近代资料称，俄奥联军共有16000人死伤（含9名将军和293名军官）、20000人被俘，还有186门大炮、400辆弹药马车和45面军旗被缴。[138] 法军折损达8279人，其中有1288人死亡。圣伊莱尔师和旺达姆师分别承受了23%和17%的损失，但是伤员中仅有2476人需要长期疗养。

大股俄军尚未参战，卡尔大公正从意大利赶来，普鲁士威胁对法宣战，因此联军理论上可以再战，但是奥军在奥斯特利茨被吓破了胆，亚历山大也害怕了，退往匈牙利。战后不久，利希滕施泰因（Liechtenstein）亲王约翰来旧驿站协商条约。迪马将军指出：“任何欧洲宫廷的政事也许都不及这破房子里的事情重要。”[139] 拿破仑对约瑟夫解释他的胜利，称敌军“实施机动时陷入无处可逃的绝境”（他显然喜欢这个短语）。他给约瑟芬的信几乎一样简洁：“我击败了两位皇帝指挥的俄奥联军。我有点累。我露宿了八天，晚上非常冷……俄军不止战败了，而且毁灭了。”[140] 精湛的计划，对地形的把握，卓越的时机安排，坚毅的勇气，布洛涅军营带来的纪律和训练，军体系，在决胜点利用瞬时数量优势的战术，高昂的军旅精神，当日弗里昂、达武、旺达姆、苏尔特和圣伊莱尔的出色表现，意见不一且时不时无能的敌军（布克斯赫登醉酒参战）：这些要素铸就了拿破仑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胜利。[141]

---

[1]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15-16

[2] 六面鹰旗今展示于伦敦的切尔西王家医院（Royal Hospital，Chelsea），荣军院陆军博物馆的鹰旗更多。

[3]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20

[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39

[5]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p.20

[6]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no.8731 pp.637-8，March 12，1804

[7]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p.345，368

[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s.9485，10200 p.22，2 January，1805，p.375，3 June，1805

[9] 始于1443年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联合王国国号。

[1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103

[1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536 p.50，January 30，1805

[12] 今摩尔多瓦（Moldova）。——译者注

[13] "店老板民族"最早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用这个短语刻画不列颠民族。1776年《国富论》出版，1802年该书被译成法文。

[1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566 p.63，February 16，1805

[1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009 p.287，May 9，1805

[1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163 p.358，May 30，1805

[17]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84-5

[1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29

[1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9700 pp.136-7，March 17，1805

[20] 《战争与和平》开篇时，安娜·帕芙洛夫娜-谢列尔说：“好吧，我的公爵，那么热那亚和卢卡现在只是波拿巴家族的私产了。”不过她搞错了热那亚的地位，它是帝国省。

[21]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289

[22] 佩拉法拉之女、希迈（Chimay）王妃埃米莉（Émilie）自称是他们的结晶，此言可以不予考虑，因为她生于当年11月。Pellapra，*Daughter of Napoleon passim* .国家参政夏尔-雅各·迪沙泰尔（Charles-Jacques Duchatel）之妻阿黛勒·迪沙泰尔（Adèle Duchatel）也是拿破仑的情妇，与她相比，佩拉法拉算是次要调剂品。1804年12月22日，皇帝给了阿黛勒6000法郎，1805年1月10日，他又给了她19000法郎。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 p.57. 但她不欣赏他的床技，并说出了看法。“皇后说你无能，”她笑话他（或者和他一起笑），“做了跟没做一样。”Tulard，*Dictionnaire amoureux*， p.218.在其他生活领域，拿破仑非常骄傲，但惊人的是，他似乎不介意阿黛勒的话。当时，他不止在她身上花钱。1805年7月，他给了格拉西尼小姐15000法郎。那时他很可能又勾搭了一名新人，因为6月上旬的开支记录显示，他赠予“一个热那亚美人”24000法郎。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 p.57.

[23]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 New York）2002，p.296

[2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137 p.348，May 27，1805

[25] 耶稣受难十字架，系基督教圣物。——译者注

[2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4

[27] Schneid，Frederick C.，*Soldiers of Napoleon’s Kingdom of Italy* 1995，p.7

[2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224 p.386，June 7，1805

[29]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 （New York）1965，p.2

[3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303 p.433，June 19，1805

[31] ed. Hinard，*Dictionnaire-Napoleon* p.200

[3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27 pp.495-6，July 20 1805

[3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74 p.520，July 28，1805

[3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55

[3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12 pp.489-90，July 16，1805

[3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493 p.530，August 3，1805

[37]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5

[3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6

[3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54 p.561，August 13，1805

[4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1 pp.565-7，August 13，1805

[4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1 pp.565-7，August 13，1805

[4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2 p.568，August 13，1805

[43]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6

[44]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7

[45]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46

[46] eds. Olsen，John and van Creveld，Martin，*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2011，pp.22-3

[47] Abel，Jonathan，‘Jacques-Antoine-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s Military Reform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37，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28

[48] 今普拉夫金斯克（Pravdinsk）。

[4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60

[5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661 p.620，August 25，1805

[5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4，Schneid，Frederick C.，*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 （New Haven，CT）2005，p.93

[5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48

[5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629 pp.598-600，August 22，1805

[5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p.147

[5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16，pp.541-2，August 6，1805

[5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29 p.659，September 1，1805

[5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86 p.685，September 12，1805

[5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56 p.673，September 7，1805

[59] eds. 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p.110

[6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775 p.680，September 10，1805

[6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887 p.742，September 28，1805

[6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282-3

[63]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3

[64]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54

[6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917 pp.757-8，October 2，1805

[66]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75

[6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61 pp.565-7，August 13，1805

[6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960 p.778，October 4，1805

[69]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61

[70]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1

[71]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6

[72]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19

[7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998 p.797，October 12，1805

[74]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72

[7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73

[7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10

[77]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75

[78]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4

[7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018 p.808，October 19，1805

[80]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Ⅱ p.10

[8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7，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05

[8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8

[8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018 p.808，October 19，1805

[8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0

[8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88，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159

[8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153

[87]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38

[88]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0

[89] 此战中，英军损失1666人，法西联军损失13781人。

[90] 维尔纳夫在特拉法尔加被俘，后获准返回法国，1806年4月，他在雷恩（Rennes）自尽。

[91]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13

[9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36

[93]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 1964，p.227

[9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067 p.830，November 2，1805

[9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196

[96]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 Ⅱ p.29

[97]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 Ⅱ p.29

[98]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59-62

[99]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2

[100] 原文误作“奥军”。——译者注

[101]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5

[10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01 p.850，November 15，1805

[103] Billings，Mark，‘Napoleon：A Dealer of H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79，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 ，3 vols.1885， Ⅰ pp.340-41

[104] 今布尔诺（Brno）。

[10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7

[106] 今斯拉夫科夫（Slavkov）。

[107]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8

[108]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8

[10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 Ⅱ p.154

[110]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 Ⅱ p.154

[111] 今奥洛莫乌茨（Olomouc）。——译者注

[112]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08

[113]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 Ⅱ p.149

[114] 俄国贵族阶层，地位仅次于王公。——译者注

[11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8 p.875，December 5，1805

[11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196，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p.210

[11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198

[11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38 p.869，November 30，1805

[119]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55

[120] ed. Yonge，Charlotte M.，*Memoirs of Marshal Bugeaud* vol.Ⅰ 1884，Ⅰ p.38

[12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15 & n

[12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4

[123]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Ⅰ pp.27-8

[124]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1

[125] 尼斯一带的舞蹈，不同于吉格舞和加伏特舞。

[126]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2

[12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3

[128]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3

[12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53

[130]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ic Cavalry* 2001，p.119

[131]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6

[13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7

[133] Thiard，A.M.T.，*Souvenirs diplomatiques et militaires* 1900，p.231

[134]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8，ed. Gamier，Jacques，*Dictionnaire Perrin des guerres et des bataill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2004，p.104

[135]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58

[13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2

[137] Bourne，George，*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 （Baltimore）1806，p.360

[138]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17

[139]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49

[14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4 p.873，December 3，1805

[141] 欧洲上下广泛传播并细致分析了拿破仑的战斗，特别是著名战斗。整个19世纪，这些战斗都是欧洲大陆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1807年，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对达武的一名部下说，打赢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是弗里昂的第48团。

第十七章 耶拿

普鲁士是加农炮炮弹孵出来的。

——据信出自拿破仑

陆军和海军的每月军情报告有厚厚的二十卷，收到它们后……我会开心地阅读，比年轻女士读小说还高兴。

——1806年8月，拿破仑致约瑟夫

奥斯特利茨会战结束了。次日一早，拿破仑换了套衣服，这是八天来的第一次，然后他驰过战场。在萨钱湖畔，皇帝看见一名大腿中弹的立陶宛中士躺在一块浮冰上。“他的血把冰染得通红，”马尔博回忆道，“可怕啊。”[1] 中士呼喊拿破仑，他便派两名士兵游了过去。事后他赏给两人朗姆酒，问他们有多喜欢这次泡澡。[2] （中士后来加入近卫枪骑兵。）

12月4日，拿破仑同意了弗朗茨的会面请求。下午2点，两人在名为焦磨（Spaleny Mlýn）的风车磨坊的墙角火堆旁会见，该地位于奥斯特利茨西南方10英里处通往匈牙利的公路上。他们热情地拥抱，谈了九十分钟。“他急着媾和，”拿破仑后来对塔列朗说，“迎合我的细微感受。”[3] 拿破仑回身上马，对参谋们说：“先生们，我们回巴黎；已经和平了。”[4] 他随后驰往奥斯特利茨村，探视伤员拉普。“哲学家会回顾这奇怪一幕！”一名目击者回忆道，“这个科西嘉小族之子不久前还是炮兵少尉，眼下德意志皇帝却向他求和，变得低声下气。他的才干、运气与法军将士的勇气使他登临诸国之首，造就欧洲命运的裁决者。”[5] 拿破仑致信塔列朗时不肯写下他对弗朗茨的看法：“我会口头上告诉你。”多年后，他说弗朗茨“恪守道德，只对妻子示爱（奥皇有四位妻子）”。[6]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没有求和，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就不那么厚道了。他致信约瑟芬时写道：“沙皇是个没本事的胆小鬼。”[7]

塔列朗建议拿破仑趁机和奥地利结盟，把它变成“能充分抵御野蛮人（指俄国人）的必要屏障”。[8] 拿破仑否决了此言，他认为只要法国掌控意大利，奥地利就会一直求战心切，愤愤不平。正如蒂埃博将军的一位朋友当年所说的：“他会征服，但不会将就”。[9]

战后不久，拿破仑颁布法令：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所有战死士兵的遗孀领受200法郎终身抚恤年金，所有战死将军的遗孀领受6000法郎终身年金。他也包办了战死士兵之子的就业，并允许他们用“拿破仑”当教名。他能负担得起这件事，因为捷报传来后，法国政府公债价格从其面额的45%跃升至66%，全国上下恢复了对财政的信心。[10] 然而，他还是未能原谅战局初期不够信任自己的银行家。国家参政约瑟夫·珀莱·德·洛泽尔指出，“他提到银行家和他所谓的‘银行家集团’时总是言辞激烈”。[11]

12月15日，豪格维茨伯爵拿到普法《美泉宫条约》，该条约承诺，法国将用英国君主的世袭领地汉诺威向普鲁士换取面积小得多的安斯巴赫、纳沙泰尔（Neuchatel）和克莱沃（Kleve）。条件相当诱人，豪格维茨立刻自作主张签了条约。上个月才和英国签订《波茨坦条约》的普鲁士放弃了该条约下的对英承诺，拿破仑在普鲁士与其前盟友之间打入有效楔子。《美泉宫条约》也要求普鲁士对英国封闭港口。1806年3月，豪格维茨强迫对手卡尔·冯·哈登贝格（Karl von Hardenberg）辞去普鲁士外交大臣一职。当年夏天，他写道：“法国无比强大，拿破仑又是世纪人物，若同此人联手，我们还有何惧？”[12] 然而，弗里德里希国王夫妇仍派哈登贝格处理秘密政务，此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保持俄普外交渠道畅通。梅克伦堡（Mecklenburg）公爵之女、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妻子路易丝皇后是个美人，她具有独立自主意识，激烈反对拿破仑。

《巴黎日报》等法国报纸随便写了写和平的福祉，这惹恼了拿破仑。“重要的不是和平，而是和平条件，”他对约瑟夫说，“而巴黎市民会觉得条件复杂得看不懂。我不习惯跟着巴黎懒汉的谈话决策。”[13] 他

一反常态地迷信，告诉塔列朗他想等来年再和奥地利签约：“因为我还有点偏好，而且我想让和平始于格里高利历的新循环之初，我希望这能预示我的统治和旧时的一样安乐。”[14] 塔列朗没有及时收到信，1805年12月27日，他在匈牙利古都签署《普雷斯堡条约》，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随之结束。

《普雷斯堡条约》内容如下：确认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享有亲王国卢卡和皮翁比诺；奥地利将此前从威尼斯分来的领土（主要是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意大利王国；承认拜恩为新王国，将蒂罗尔、弗兰科尼亚（Franconia）和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划归该国；符腾堡也成为王国，吞并五座多瑙河城市、一个郡、一处伯爵封地、一个专区；巴登成为大公国，攫取更多奥地利领土。弗朗茨无可奈何，只能承认拿破仑是意大利国王、支付4000万法郎赔款、保证与拿破仑“永远和平友好相处”。[15] 奥皇一夜之间失去250万臣民、六分之一的收入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了数百年的土地，所以他几乎不可能同拿破仑永远友好相处。[16] 与此同时，拿破仑承认瑞士与荷兰“独立”，担保奥地利帝国剩余版图的完整性，答应在他死后分离法国与意大利的王位，这三件事既无任何意义，也没让他付出一点儿代价。[17]

维旺·德农向拿破仑展示了一系列金制奥斯特利茨会战纪念勋章，其中一枚刻画法国雄鹰用爪子抓着英国狮子，拿破仑“猛地”把它扔到“房间另一头”，说：“卑鄙的马屁精！你怎么敢说法国鹰扼杀了英国狮子？我让单单一艘小渔船下海都是给英国人送俘虏。事实是狮子扼杀了法国鹰。把这枚勋章丢去制造厂，别再让我看见另一枚！”[18] 他也让德农熔掉其他奥斯特利茨纪念章，想一个平实得多的设计，后者照办（新勋章背面是弗朗茨和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头像）。1805年时，拿破仑身上还残留一点谦逊。克勒曼提议建造永久纪念碑为他记功，他拒绝了；大卫为他塑造了太过吹捧的镀金模型，他便命令对方销毁它。

《普雷斯堡条约》未提及那不勒斯。1804年1月，拿破仑非常明确地警告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两国随后签订中立条约，但那不勒斯依然加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11月20日，波旁王室欢迎英俄联军19000人在那不勒斯登陆，不过联军收到奥斯特利茨的消息后又离开了。相关文献记载，玛丽亚·卡罗利娜管拿破仑叫“那野蛮的畜生……那科西嘉杂种，那暴发户，那条狗！”[19] 因此，12月27日拿破仑仅仅宣布：“那不勒斯王朝不再统治。欧洲和平与我的帝王荣耀不容它存在。”玛丽亚·卡罗利娜声称联军登陆事件是个意外，拿破仑断然回绝了这番虚伪之辞。据传他对塔列朗说，“我最后会收拾那婊子”，可见他的恶言谩骂能力和王后的一样鲜明。[20]

马塞纳从米兰进军，很快征服那不勒斯大部分地区，1806年11月，他绞死土匪头目米凯莱·佩扎（Michele Pezza，号称魔鬼老兄）。尽管如此，波旁家族还是成功逃往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山区也出现肮脏战争[21]。多年来，卡拉布里亚农民游击队一直在抗击法军，这场冲突充满了血腥报复，拿破仑任命夏尔·马内斯（Charles Manhès）将军为当地军事总督后，嗜血复仇变得更加激烈。游击战争耗尽法军的能量、人力与士气，也摧毁卡拉布里亚及其人口。英国有时会帮忙，一小股英军曾在当地登陆，于1806年7月赢得马伊达（Maida）之战，但英国的主要贡献是防守墨西拿海峡（Straits of Messina）。“要是西西里岛再近些，我又和前卫在一起，”当月，拿破仑对约瑟夫说，“我就会出手。经验告诉我，我用9000人就能击败英军30000人。”[22] 这再次表明他对英军的评估低得离谱。直到滑铁卢会战，他本人才在战场上首会英军。

从1799年开始，新加封的拜恩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就以普法尔茨（Pfalz）的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四世（Maximilian-Joseph IV）选侯的名义统治拜恩。为了巩固法国与拜恩的同盟，拿破仑要求他将长女奥古丝塔（Augusta）公主嫁给欧仁，虽说她已同巴登的卡尔·路德维希（Karl Ludwig）亲王订婚，而欧仁也另有所爱。拿破仑

送给欧仁印有奥古丝塔画像的杯子，向他保证现实中的她“漂亮得多”。[23] 1806年1月14日，他们成婚。为了让自己的宫廷体面些，拿破仑坚持操办数桩婚事，事实证明，欧仁和奥古丝塔的姻缘要比其中的一些成功得多，譬如他强加给拉普和塔列朗的孽缘。奥古丝塔怀孕后，拿破仑只是半开玩笑地说，“千万不要给我们女孩”，并建议她“每天喝一点未稀释的葡萄酒”，以免造成那不幸局面。[24] 1807年3月，奥古丝塔诞下一女。拿破仑下令给她取名为约瑟芬（Josephine），他致信欧仁，祝贺对方：“现在你要做的就是确保明年生个男孩。”[25] （他们后来又生了个女儿。）

拿破仑为巴登的19岁亲王卡尔·路德维希另行安排终身大事。1806年4月8日，他娶了约瑟芬的堂侄女斯特凡妮·德·博阿尔内（Stéphanie de Beauharnais），不过两人一直分居，直到1811年6月他成为大公，此后七年中，他俩生育了5个孩子。热罗姆终于同漂亮的美国妻子、巴尔的摩的伊丽莎白·帕特森离婚，1807年8月，他娶了符腾堡的卡塔琳娜公主。为使他的王朝合法化并缔结战略级重要军政同盟，在短短十九个月内，拿破仑就让亲族和统治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三个重要缓冲国的家族联姻。

根据1806年1月的一份大军团税官报告，我们可知奥斯特利茨的胜利究竟给法国带来了多大利益。[26] 法国依据《普雷斯堡条约》从施瓦本征集1800万法郎，向奥地利索取4000万法郎。新征服领土中，英国货物被没收、变卖。法国的收入总计达7500万法郎，扣除费用和欠德意志国家的债务后，它将近盈利5000万法郎。[27] 拿破仑总是对兄弟们说，政府的首要职责是支付军饷，但士兵通常等战役结束才拿到钱，这样做有两个原因：抑制逃兵现象；彻底免除向死者和被俘者付饷的需要。[28] 1810年7月14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和苏尔特，对两人都说：“必须以战养战。”他试图用三种方法达此目的：直接从敌人处征收现金和财产（所谓的“普通捐赠”）；要求敌国国库支付和约中达成的款项（“特

别捐赠”）；让外国或盟国负担法军的宿营及维护。法国为法军提供训练、装备和军服，然后就指望他们大体上自筹资金。[29]

法国靠普通捐赠和特别捐赠取得了如下财物：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他国支付3500万法郎；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他国支付25300万法郎；1807年，普鲁士用实物抵偿9000万法郎征收款；1809年，奥地利支付7900万法郎；1808～1813年，西班牙支付巨款35000万法郎；意大利支付30800万法郎；1810年，荷兰境内价值1000万法郎的货物被征收，汉堡支付特别捐赠款1000万法郎。[30] 法国利用盟友部队，派法军去卫星国宿营，这两招分别省下25300万法郎和12900万法郎，加上普通捐赠总额80700万法郎与特别捐赠总额60700万法郎，十多年来，法国的收入几乎达到18亿法郎。可是钱仍然不够，因为从《亚眠条约》废止到1814年，拿破仑的战役至少需要30亿法郎军费。[31] 他需要筹集超过12亿法郎来弥补差额，其中8000万来自税收（1806年，君位既已稳固，他便对烟草、酒、盐征收旧王朝的间接税，此政策非常不受欢迎）、13700万来自关税、23200万来自国有财产与集体财产出售额，此外他还向法兰西银行贷款。国家官员（连同拿破仑本人）另外捐赠5900万法郎。[32] 拿破仑曾对参政院说：“我们得当心，不能给我们的驴子过多负担。”

由上可知，以战养战不成立，战争收入只能偿付60%的战争开支，剩余40%借各色名目落在法国人民头上。然而，除了针对饮酒者与吸烟者的自由裁量税，这些征款方式既不包括对拿破仑的最有力支持者——法国零售商、批发商、专业人员、农民——直接征税，也不包括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直接征所得税，即便英国采用了史无前例的税制，对一切200英镑以上的年收入征收10%的所得税。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彼时法国公共债务仅剩6000万法郎，而税收等征收款的年收入在4.3亿法郎和5亿法郎之间。[33] 拿破仑不征任何所得税却能支付十五年的战争费用，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旧王朝倒台的部分因素是支持美国革命的费用，考虑到那笔支出要比拿破仑的军费少得多，他的业绩就更

显不凡了。1806年5月，拿破仑对参政院许诺："等我拿下英格兰，我就取消2亿法郎税收。"[34] 此事不曾发生，可若他征服英国，他定会这么做，这一点毋庸置疑。

1806年1月，拿破仑铸成政客生涯中第一个真正的大错。他把那不勒斯王位给了哥哥约瑟夫，说："它会像意大利、瑞士、荷兰和三个德意志国家一样变成我的盟国，或真的并入法兰西帝国。"[35] 3月30日，约瑟夫加封国王，6月，路易成为荷兰国王。这是革命前的统治体系的复归，它打击了拿破仑最初主张的精英体制，给严重不合格的波拿巴兄弟安排关键职责，并给未来的问题埋下伏笔。1805年12月，拿破仑致信约瑟夫时提及热罗姆："我的意图非常明确，要是他的津贴不够，就任他因负债入狱……这个年轻人只会给我惹麻烦，对我的体制完全没用，我为此付的钱多得不可思议。"[36] 然而没过两年，拿破仑就封一点没变的热罗姆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他可以扶持不少本地亲法改革者上位，如意大利的梅尔齐、荷兰的吕特赫尔·扬·斯希梅尔彭宁克（Rutger Jan Schimmelpenninck）、德意志的卡尔·达尔贝格（Karl Dalberg）、波兰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乃至西班牙王储费迪南德（Ferdinand）王子，他们会比大部分法国人干得好，更别提吵闹、虚荣、不忠、经常无能的波拿巴家族成员了。

拿破仑给约瑟夫写了几十封信，粗鲁暴躁地斥责其统治方式，"你必须变成国王，像国王一样谈吐"，但他的确深爱哥哥。[37] 约瑟夫抱怨道，拿破仑不是他认识的弟弟了。1806年8月，他从朗布依埃狩猎城堡致信兄长（约瑟夫称呼他时用第三人称，他写这封信时也如此自称），称对方的这种感受令自己难过："等他40岁时，他对你的感情不像12岁时那样了，这是正常现象，但这份情谊更加真实，并大大深化。他的友谊承受灵魂印记。"[38]

荷兰曾在全盛时期震惊世界：它违抗西班牙帝国，并派其省督奥兰

治的威廉去英格兰称王；它建立黄金帝国，买下曼哈顿；它创造资本主义制度，陶醉于格劳秀斯、斯宾诺莎、伦勃朗和弗美尔的黄金时代。然而18世纪晚期，荷兰却是这样：英国已攫取它的大部分殖民地，且夺地常常不费一战；船运及海上贸易体系几乎全毁；城市人口衰减（同欧洲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制造业中只有杜松子酒酿造业经营良好。[39] 拿破仑封路易为荷兰国王（荷兰人没有反对），给了荷兰主权致命一击。从很多方面看，路易都是明君。盲眼荷兰老兵、大议长（raadspensionaris）[40] 斯希梅尔彭宁克开始逆转这个国家的长期颓势，着手推动邦联诸省向统一国家演变，路易上台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1807年，地方政府实施改革，消除各省和本地贵族的影响力；1808年，古老行会废止；1809年，司法系统精简。路易的宫廷从海牙经乌得勒支迁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当地市政会腾空了市政厅，用它当王宫。[41]

路易对立法机关说：“从踏上荷兰土地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荷兰人。”此言解释了其后越发不快的四年中他和拿破仑之间的问题。[42] 路易统治时期，拿破仑的粗暴信件如潮水般不停涌来，他埋怨弟弟太“善良”，当不了严厉冷酷、毫不妥协的君主，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一封典型信件写道：

> 要是你继续靠哀鸣统治，要是你继续任自己被欺负，那么……对我来说，就连巴登大公也比你有用……你给我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你思想狭隘，不怎么关心共同事业……别再拿贫穷当借口了，我了解荷兰人……女人才会哭诉，男人会付诸行动……如果你不强势点，你终将后悔自己的软弱……更强势，更强势！[43]

唯一令人惊讶的是，路易尽力保住了王位。妻子奥尔唐斯没怎么帮他。虽然她认真履行王室职责，深得荷兰的民心，但她痛恨路易，很快就和塔列朗的私生子、时髦的夏尔·德·弗拉奥（Charles de Flahaut）伯爵私通。1811年，她为他生下一子，即莫尔尼（Morny）公爵。

拿破仑花了太多时间抱怨兄弟们，甚至拿其中一个开玩笑，“真可惜，他不是私生子”，但在他们明显失败后很久，他依然保全他们。[44]某个紧迫问题在于教皇，他拒绝承认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还认定热罗姆的婚礼违背教规，这导致拿破仑和庇护七世之间产生了根本没必要的争执，结果1809年6月法军占领教皇国，而拿破仑也被革除教籍。他觉得兄弟姐妹们比外人更值得信任（尽管事实并未证明这一点），也想效仿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汉诺威家族的王朝扩张。多年后，拿破仑在一次典型的诚实自我评价中承认，“兄弟们给我造成很多伤害”，但那时已经太迟太迟了。[45]

1806年，拿破仑开始向帝国领导阶级分发头衔和土地，此举比分封亲人更合理。4月，缪拉成为藩属贝格大公，其辖域近似今鲁尔河谷（Ruhr valley）；塔列朗成为意大利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亲王，该地是那不勒斯西南方的前教皇领地；贝纳多特成为蓬泰科尔沃亲王，该地纯属新建亲王国，原为南拉齐奥（Lazio）的另一片教皇领地，邻近那不勒斯；富歇成为奥特朗托（Otranto）世袭公爵；贝尔蒂埃成为纳沙泰尔亲王，条件是他得结婚。[46] [47] 拿破仑致信缪拉，要求他精心治理贝格，“让邻国心生嫉妒，渴望融入同一版图”。[48] 加冕之后，他已经封了一批帝国大显贵，如首席司法官欧仁、海军元帅缪拉（虽说他是骑兵）、大司库勒布伦、大司法官康巴塞雷斯、侍从长塔列朗、大施赈官费施、宫廷司礼官迪罗克。不少职位享有慷慨的预算：1806年，侍从长领受近200万法郎，御厩总管（科兰古）领受310万法郎，大施赈官领受20.6万法郎，其他很多人也拿到了钱。[49] 其中一些头衔无疑有鲁里坦尼亚风格[50]，不出所料，波旁的势利之辈与宣传人员也冷嘲热讽，但头衔带来的土地与收入却是足够真实。[51]

1806年，拿破仑不止赏赐了元帅和大臣。3月24日，他从皇家金库拨出1万法郎，赠予17岁的情妇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Éléonore Denuelle de la Plaigne），她是位“美人，发色深棕，眼睛黝

黑”。[52] 埃莱奥诺尔是卡罗琳·缪拉的侍读女郎，她的丈夫因欺诈服刑时，卡罗琳把她介绍给拿破仑，此举的目的依然是打击约瑟芬。当年4月，拉普莱涅夫妇离婚。拿破仑急于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他让埃莱奥诺尔怀孕了，12月13日，她诞下私生子莱昂（Léon）伯爵（孩子的名字是父亲名字的后四个字母，给他取名的用意相当明显）。这次尝试后，拿破仑恢复了信心，确认若同约瑟芬离婚他可创建王朝。此事也解决了埃莱奥诺尔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她出嫁后。拿破仑把她嫁给陆军中尉，给了她一笔丰厚嫁妆。

1806年1月23日，小威廉·皮特死于消化性疾病胃溃疡，享年46岁。今天，一个短期疗程的胃酸抑制药片便能治愈此疾。1806年2月至1807年3月，小皮特继任者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领导所谓的“贤能内阁”，该内阁外交大臣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长期同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奥斯特利茨战后，拿破仑送列普宁公爵回圣彼得堡，借此向沙皇亚历山大求和，现在他也想靠福克斯实现和平。2月20日，福克斯从唐宁街写信来，从而“尽我君子之道”。他警告塔列朗，巴黎第16区的帕西藏有企图谋杀拿破仑的阴谋者，甚至列出了刺客名单。[53] 福克斯补充道，乔治三世会对“这桩卑鄙任务”“持同样态度”。福克斯的正直行为拉开全面和谈的序幕，整个夏天，英法两国都在磋商，主要谈判人是英国的雅茅斯（Yarmouth）勋爵、劳德代尔（Lauderdale）勋爵和法国的尚帕尼、克拉克。会谈甚至进展到所提议条约的准备阶段。

和谈秘密进行，因为倘若谈崩，双方都不想承认曾谈判，然而法国外交部档案中至少有148份独立文件源自1806年2～9月。[54] 持久谈判涉及马耳他岛、汉诺威、汉萨城镇、阿尔巴尼亚（Albania）、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西西里岛、好望角、苏里南和本地治里，8月9日，福克斯患病，和谈实际上停止了，但是9月13日谈判才彻底失败，因为57岁的英国外交大臣在那天去世了。[55] “我完全清楚，英国只是世界一角，巴黎则是世界中心，”和谈告败后，拿破仑致信塔列朗，“在巴

黎有个立足点对英国有利，哪怕是战时。”[56] 所以比起无法带来和平的关系，他情愿再也不同英国往来。1807年3月，格伦维尔政府下台，第三代波特兰（Portland）公爵上台组阁，重新奉行小皮特的对法求战政策，媾和希望于是彻底破灭。

1806年前九个月，拿破仑大都待在参政院，照例处理一堆范围甚广的议题。3月时，他抱怨装潢商给他的御座和六把扶手椅开出30万法郎账单，不肯付账，并坚称教士为穷人办葬礼时至多能要价6法郎。“不能仅仅因为人们贫穷，就剥夺其贫穷处境的宽慰，”拿破仑说，“宗教是一种疫苗，它满足我们热爱奇迹的天性，使我们避开江湖郎中和魔术师。教士们比卡廖斯特罗们、康德们和德意志所有空想家都好。”[57] [58]

1806年3月，拿破仑想出黄油和鸡蛋市场的征税办法，即宣布收益全归巴黎医院，所以市政府可相应减少投入医院的资金。[59] 他批准加于报纸的一项义务，称针对媒体时，“必须温和谨慎地贯彻著名的自由箴言，尺度太松会引发危险”。[60] 几天后，他对参政院说，在新《消费税法》（Excise Act）中写入“批发”“零售”“品脱”“罐子”这些词毫无不妥，因为法案“绝不是史诗”。[61] 3月11日，他告诉参政院，自己的床头读物是“三至六世纪的旧编年史”，他从中获知，古高卢人不是野蛮人，而“政府给了神职人员太多教育权”。[62]

当月，拿破仑并非全身心地忙于民生事务。他也冲战争管理部长让·德让（Jean Dejean）将军抱怨道，八天前当局已承诺拨给第3轻步兵团数千套军服与子弹带，但他们仍未收到。[63] 参政院还讨论大军团制服的颜色，因为靛蓝染料价格昂贵，且产自英国。“白军服可以省一大笔钱，”拿破仑说，“尽管可以说，军队穿蓝军服时的确挺成功。然而我认为大军团不是参孙，参孙的力量受制于头发长度，大军团的力量不在于外套颜色。”[64] 其他的反对理由则是，白制服会变得脏兮兮、血淋淋。

拿破仑拼命工作，但他相信“工作是放松方式”。[65] 4月19日，他致

信欧仁，认为只要起得够早，“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工作。我俩的生活一样，可我的妻子老了，她不用我陪同取乐，我也比你更忙，可我留给自己的休息和娱乐比你的多……前两天我和贝西埃元帅在一起，我们像15岁小孩一样玩耍”。当天拿破仑写了14封信，欧仁收到其中6封，所以确切说来他很可能并未像15岁小孩一样玩耍，但他觉得自己在放松，大概这种想法本身就有疗效。

4月，拿破仑寄给欧仁的一些信太像保姆说教，堪称荒唐。他在其中一封中下令道：“意大利贵族学习骑马乃要务。”[66] 他还对约瑟夫说了如何避免在那不勒斯被刺，这些建议要实际得多：

> 你的贴身男仆、你的厨师、在你的寓所过夜的警卫、夜里叫醒你的急件送信人必须是法国人。任何人夜间一律不得入内，唯你的副官例外，而他的卧室必须在你的前面。你必须从里面锁门，认出副官的声音才能开门；他不能敲你的门，除非他已锁上自己的卧室，确定无人跟踪，仅他在场。这些是重要的预警措施，不是麻烦事。它们能保全你的性命，还赋予你自信。[67]

1806年5月30日，拿破仑颁布《犹太人与高利贷法令》（Decree on Jews and Usury），该法令谴责犹太人“怀有贪婪恶念”、缺乏“公民道德情感”，给予阿尔萨斯一年债务宽限期，并召集犹太教大公会（Grand Sanhedrin），以图减少“可耻的权宜之计”——发放贷款（当然，他自己的法兰西银行天天干这事）。[68] 目前为止，拿破仑善待并尊重犹太人，这是他第一次露出反犹迹象。从此以后，他制定犹太人相关政策时似乎一反常态，举棋不定。童年和学生时代，拿破仑见过的犹太人不多，他也不曾结交犹太友人，但是意大利战局中，他在威尼斯、维罗纳、帕多瓦、里窝那、安科纳和罗马设立犹太人聚居区，下令不再强迫犹太人佩戴六芒星。[69] 在马耳他岛，他禁止贩卖犹太人为奴，允许他们建造犹太教堂。叙利亚战役中，他认可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结构。1799年4月20日，他甚至写了一篇宣言，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祖国，因为阿克之败，这番说辞成了废话（但《箴言报》仍然刊登了

它）。[70] 所有的战局中，他都将平等公民权延伸到法国境外的犹太人身上。[71] 可是奥斯特利茨战后，拿破仑一回巴黎就收到萨尔茨堡商人和银行家的请愿，他们要求限制犹太人借钱给阿尔萨斯农民。法国共有5.5万名犹太人，阿尔萨斯犹太人占了近一半，在这幕奇怪的反转剧（根据自由契约在公开市场借钱的人指责自己的债主）中，他们被控"过度"发放高利贷。[72] 参政院进一步调查此事，产生了严重分歧。拿破仑对参政们说，他不想因为认同阿尔萨斯反犹法律而"玷污我的后世荣誉"，于是接下来几个月他逐条废除了这些法令。[73]

犹太教大公会缓解了拿破仑的很多烦恼，也暴露了他对犹太教的无知——他似乎以为犹太教推行一夫多妻制。犹太老者睿智地回答拿破仑的提问，他们指出：犹太教徒就像基督徒一样不欢迎异族通婚；利率反映债务不能偿还的风险；法国犹太人热爱并支持拿破仑帝国。[74] 拿破仑于是宣布将犹太教列入法国三大官方宗教，说："我希望所有法国居民享受平等公民权，受我国法律眷顾。"[75] 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特别是教皇国普遍限制犹太人的权利，至少同上述国家相比，拿破仑对犹太人更宽容，自私也许是原因之一。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国给犹太人的权利比他国给得多，他们人口众多，可成群结队而来。所以我觉得宽待犹太人能吸引很多富人来法国。"[76]

尽管如此，若拿破仑认为犹太人和他的天然选民——法国地主、商人、富农——存在利益冲突，他就不太在乎自然正义，而是选择支持天然选民。1808年3月17日，他颁布《声名狼藉法令》，进一步限制犹太人，于是他们更难募集债务、回避兵役，还必须购买新的商业许可证。[77] 之后几个月，拿破仑在不少省份取消了《声名狼藉法令》的很多规定，但是它们在阿尔萨斯省保留至1811年。[78] 1807年，拿破仑下旨建立威斯特伐利亚，根据此诏令，德意志犹太人获得完全公民权，不再负担特别税。类似地，1811年，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500个犹太家庭、巴登所有犹太人（除放债人）也获得完全公民权。拿破仑的军队开进汉

堡、吕贝克（Lübeck）和不来梅（Bremen）后，这些地区的犹太人获得公民权，不论当地统治者和民众多么憎恨这一点。[79]

拿破仑的广袤帝国仅有17万犹太人，其中三分之一在法国旧疆界内，但是帝国内反犹风气强劲，费施、莫莱、雷尼耶和克勒曼元帅尤其排斥犹太人。军中盛行反犹主义，将军里只有亨利·罗滕堡（Henri Rottembourg）是犹太人，跟着辎重车队的食腐乌鸦也被戏称为“犹太人”。[80] 亦有人引用过拿破仑的反犹言论，他曾对一位秘书说，《圣经》中的犹太人是“懦弱残忍的卑鄙民族”。[81] 1806年1月，参政院开会讨论《犹太人与高利贷法令》，拿破仑在会上管犹太人叫“卑劣下贱的民族……国中之国……非公民”以及“蹂躏法国全境的毛毛虫灾和蝗灾！”他补充道：“那些犹太人吸真正法国人的血，我不能把他们看作法国人。”他还提到“贪婪无情的放债人”，尽管参政院助理办事员证明，阿尔萨斯的债务与抵押是“自愿达成的交易”，而且契约法则“神圣不可侵犯”。当代文明人都反感拿破仑的这些论调，但是19世纪早期，它们在中上层法军军官中相当普遍。看来，虽说拿破仑本人对犹太人的偏见和同阶级、同背景之人的差不多，但他发现，若比欧洲其他地区更善待犹太人，则法国有利可图，所以拿破仑很难配得上今日犹太人给他的非犹太裔君子之名。



12.莱茵邦联，1807年

拿破仑一向对大部分臣民信仰的宗教的本质无感，他对宣传活动的常见敏锐反应力也失灵了一次，结果他规定8月15日——他的生日和圣母升天节——为圣拿破仑日，并将这个新圣徒日写入法国天主教历。即便对通常静默的法国天主教会来说，这一步也太过了。拿破仑的想法在天主教徒中彻底失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渎神。他曾要求卡普拉

拉红衣主教为他的生日封一个新圣徒。卡普拉拉找到了罗马殉道者内奥波利斯（Neopolis），据说此人不肯向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宣誓效忠，以身殉教，但他纯属梵蒂冈虚构的人物。[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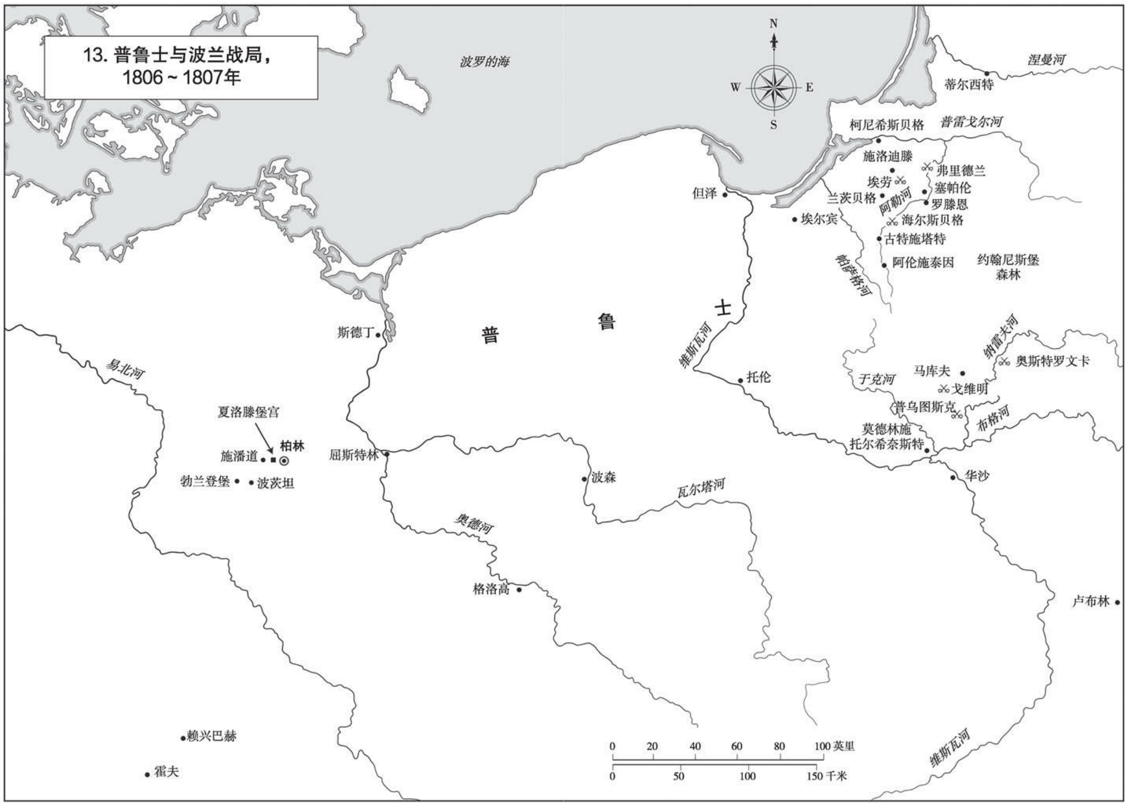
神圣罗马帝国的逻辑源自中世纪，当时，为了促进相互交易、保障彼此间的安全，数百德意志和中欧小国在此概念下结成松散集合体。然而，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已经为近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合法基础。待到1803年的帝国诏书确认德意志合法性时，神圣罗马帝国便彻底丧失存在的理由（奥斯特利茨会战消除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奥地利势力后，情况更是如此）。1806年7月12日，拿破仑自封莱茵邦联（Rheinbund）保护人，此后这一概念愈发无关紧要。新德意志政治实体莱茵邦联包括法国的16个附庸国盟友，引人注目的是，它没有吸纳奥地利和普鲁士。1806年年末，莱茵邦联已包括拜恩王国、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雷根斯堡亲王国、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亲王国、霍亨索伦-黑兴根（Hohenzollern-Hechingen）亲王国、伊森堡-比施泰因（Isenburg-Birstein）亲王国、莱恩（Leyen）亲王国、利希滕施泰因亲王国[83]、扎尔姆（Salm）亲王国、巴登大公国、贝格大公国、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大公国、维尔茨堡大公国、阿伦贝格（Arenberg）公国、拿骚（Nassau）公国、萨克森-科堡（Saxe-Coburg）公国、萨克森-哥达（Saxe-Gotha）公国、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Saxe-Hildburghausen）公国、萨克森-迈宁根（Saxe-Meiningen）公国、萨克森-魏玛（Saxe-Weimar）公国。1807年，威斯特伐利亚王国、9个亲王国和3个公国也加入邦联。美因茨大主教、神圣罗马帝国前掌玺大臣卡尔·达尔贝格就任邦联首席主教亲王，此人深深仰慕拿破仑。

成立莱茵邦联对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直接的是，由于邦联成员同时退出帝国，1806年8月6日，弗朗茨正式宣布源起自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此终结。（当日歌德指出，在他居住的旅

馆里，比起帝国末日，旅客们明显更关心自己的车夫和旅馆老板的争吵。）神圣罗马帝国既已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就成了单纯的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Franz I，1804年8月，他已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因此他是历史上唯一有两个帝号（Doppelkaiser）的皇帝。[84]

根据莱茵邦联创立时的条款，拿破仑现在可额外调配63000名德意志人，这个数字迅速增长，事实上，从1806～1813年邦联瓦解，“法军”这个词成了一种误称。[85] 另一后果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今后得彻底打消在本国疆界外发挥重要领导作用的盼头，除非他准备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与此同时，莱茵邦联催生了新兴德意志民族主义，使德意志人梦想建立自主统治的独立德意志国家。拿破仑竟然促成了半个世纪后灭掉其亲侄子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的国家，此乃无心结果的历史规律的最佳例证。

“陛下，您正处于同时和俄法结盟的奇怪立场，”1806年6月，前普鲁士外交大臣卡尔·冯·哈登贝格致信弗里德里希·威廉，“这种局面不会持久。”[86] 7月上旬，弗里德里希·威廉决定对法开战，但他担心此时作战对普鲁士不利，于是直到10月才付诸行动。普鲁士最先承认拿破仑的帝位，驱逐了领土内的波旁家族，头年12月还与法国签署《美泉宫条约》，可1806年10月它却同法国交战。[87] 弗里德里希·威廉渴望保持不受法奥影响的区域霸权，渐渐害怕法军入侵北德意志。[88] 哈登贝格的继任者冯·豪格维茨曾称赞普法联盟，1806年6月下旬和7月上旬他的三份备忘录却总结道，拿破仑正在寻找针对普鲁士的开战借口（casus belli），还设法让黑森脱离普鲁士的轨道。豪格维茨建议普鲁士同萨克森、黑森和俄国结成反法同盟，并放弃兼并汉诺威，以确保英国资助战争。颇具分量的恩斯特·冯·吕歇尔（Ernst von Rüchel）将军赞同豪格维茨的立场，但他对国王承认，在奥斯特利茨会战后一年内与法国开战是场危险游戏（Hazardspiel）。[89]



与此同时，7月20日在巴黎，沙皇使臣彼得·雅科夫列维奇·乌布里（Peter Yakovlevich Ubri）认可了俄法“永久和平与友谊”之条约的文本。只要圣彼得堡的沙皇批准条约，普鲁士就根本无望组建第四次反法同盟。可沙皇接到报告，获知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塞巴斯蒂亚尼将军唆使土耳其人进攻俄国，他一怒之下保持了静待，暂未在法国和普鲁士之间选择盟友。我们不知道塞巴斯蒂亚尼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奉拿破仑或塔列朗的命令，但奥斯特利茨会战后俄法未缔结和约，所以对法国来说，在君士坦丁堡采用这种外交手段合乎情理。[90] 然而，拿破仑并不想与俄或普开战，更不用说同时和两国交战了。8月2日，他命令塔列朗告诉法国驻柏林大使安托万·拉福雷（Antoine Laforest），“我希望不计一切代价保住与普鲁士的友好关系。有必要的话，让拉福雷坚信我不会真的拿汉诺威换英国的和约”。[91] 当天，拿破仑致信鲁尔河谷地国家贝格大公国的缪拉，下令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作反普之举的行动。“你的职责是安抚、大大地安抚普鲁士人，万不可让他们难受，”他

写道，“面对普鲁士这样的国家，行事再缓慢也不为过。”[92] 此信原件上有一句划掉的话：“不管你做什么，结果只有一个——你的国家会遭劫。”

1806年8月上旬，拿破仑初会新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伯爵。皇帝在圣克卢宫室内戴着帽子，梅特涅指出：“这怎么说也不合适，因为他的听众不是公众，而且我认为此举是错位的虚荣，表明他是个暴发户。”[93] 除了戴帽子，拿破仑给梅特涅留下的第一印象大体上还不错，因为奥地利大使后来成了皇帝的死敌，他记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令人感兴趣。梅特涅写道：

> 一开始，我震惊地发现他的思维及其过程特别简明。我总是沉醉于和他交谈，这对我的吸引力难以言表。他的谈话永远充满趣味：他抓住主题本质，抛开无用的次要成分；他陈述、不断阐释自己的观点，直到它非常清楚和毋庸置疑；他总能找到描述事物的贴切用词，若言语意像没有这个词，他就自创词汇。可他并非不听针对自己的评价和反对，而是接受、提问并反驳，始终保持公务会谈的语气和边界。我和他说起我认为的事实时，就算此事多半不能取悦他，我也丝毫不觉得困难。[94]

后来梅特涅的回忆录把拿破仑写成暴怒的自大狂，至少在两人关系的现在这一阶段，他还不这么想。

符腾堡人士、图书出版销售商约翰·帕尔姆（Johann Palm）售卖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反拿破仑的作品，他住在中立的纽伦贝格（Nuremberg），后被逮捕。8月25日，法庭审理帕尔姆一案，激怒了普鲁士人。帕尔姆曾出版小册子《德意志的严重衰落》，其作者据信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菲利普·耶林（Philipp Yelin）。帕尔姆不肯供出作者，次日便在布劳瑙遭枪决。[95] 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在法军占领地散布诽谤言论，以图激起居民反抗，这可不是寻常犯罪”，但帕尔姆很快就被视为殉道者。[96]

帕尔姆被诉当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在路易丝王后和柏林主战派（包括他的两个弟弟、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侄子以及冯·哈登贝格）影响下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最迟在10月8日撤走莱茵河西岸的所有法军。愚蠢的是，此时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没和俄国、英国或奥地利做好准备工作。[97] 普鲁士青年军官甚至在法国驻柏林大使馆门前的台阶上磨马刀。[98]

9月初，拿破仑意识到，既然沙皇亚历山大没有批准条约，那么只要战争爆发，俄国多半就会与普鲁士联手。5日，他命令苏尔特、奈伊、奥热罗在普鲁士边境集结。拿破仑估计，若他能在八天内让军队行过克罗纳赫（Kronach），那么进军柏林只需十天，所以他或许能在俄国来援之前打垮普鲁士。他召集5万名新兵，动员3万名后备兵员，并派间谍侦察班贝格至普鲁士首都的道路。

假如拿破仑要让总计20万人的六个军与帝国近卫军、骑兵预备军深入敌境数百英里，他就需要敌国地形的准确情报，特别是其河流、资源、烤炉、磨坊和军火库的情报。地形工兵为他绘制地图，奉命提供一切可想到的信息，尤其是“道路的长宽与路况……必须追踪河流流向，仔细测量其桥梁、浅滩、河深、河宽……应注明城村房屋数量与人口……应标出丘陵和山脉高度”。[99]

与此同时，拿破仑应当为敌人制造假情报。“明天你必须送走我的60匹马，”9月10日，他对科兰古说，“尽量办得隐秘些。争取让人们相信我是要去贡比涅打猎。”他补充道，他想要一个“结实的”行军帐，而非“看戏用的”观剧帐（tente d’opéra），“你要在帐子里添些厚地毯”。[100] 当日，他命令路易在乌得勒支集结3万人，“假称准备对英战争”。9月18日晚11点，帝国近卫军乘驿站马车从巴黎去美因茨，拿破仑则对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口授“大军团重新集合的总体部署”。这份口述记录是这场战役的奠基文件，它准确列出10月2～4日何元帅应于何日率何部

至何地。单单9月20日一天，他就写了36封信，创了他在1806年的记录。[101]

◆

9月25日凌晨4点30分，拿破仑携约瑟芬离开圣克卢宫，十个月后他才返回巴黎。[102] 四天后，他在美因茨收到贝尔蒂埃的报告，它和两名间谍的汇报完全改变了他对战略形势的看法。贝尔蒂埃曾担心普军占领前线阵地，但事态现已明朗，他们仍在爱森纳赫（Eisenach）、迈宁根、希尔德堡豪森附近，因此法军翻越山脉、渡过萨勒河、展开队列时不会受阻。拿破仑遂全盘变更计划，加之缪拉和贝尔蒂埃也正在发出指示，导致法军陷入一阵短暂的混乱。“我打算在右侧集结兵力，”拿破仑对路易说，“完全敞开莱茵河与班贝格之间的地面，以便在同一战场聚集约20万人。”[103] 法军得走很多路。奥热罗的第七军在连续三天中分别走了25英里、20英里、24英里。两个团在连续九天中平均每日行军24英里，这是项了不起的速度，而且最后三天他们行经山地。[104]

达武很快占领了克罗纳赫，拿破仑惊讶地发现普军没有守城。“这些先生很不在乎阵地，”他对拉普说，“他们想等大攻击时再出手。我们会满足他们的愿望。”[105] 10月2日，他已经在符腾堡，约瑟芬则留在美因茨。此时拿破仑的全局计划已成形，即一边夺取柏林一边谨慎地保卫交通线。7日，法军做好了出击准备。一周后，约瑟芬从美因茨致信贝尔蒂埃，请对方“精心照顾好皇帝，确保他不要（在危险面前）太暴露自己。你是他交情最久的朋友之一，我信赖的正是这份感情”。[106]

7日，拿破仑在班贝格等待敌军露出意图。他指望他们退往马格德堡（Magdeburg），或经富尔达（Fulda）前进。当天，普鲁士的宣战书到了，一并送来的还有长达21页的宣言。宣言的内容太好猜了，拿破仑都没读完，他嘲讽道，这不过是抄袭了英国报纸。拉普回忆道：“拿破仑轻蔑地丢开宣言，说：‘他（指弗里德里希·威廉）以为他在香槟（指

1792年的普军胜绩）吗？’。”然后，拿破仑说：“真的，我同情普鲁士，我可怜威廉。他不知道别人都让他写了什么狂想，这太荒唐了。”[107] 10月12日，拿破仑的军队正前往图林根（Thüringen），他也送出了给普鲁士的私下回复：

> 陛下将战败，并毫无理由地危及自身安逸与子民生存。现在普鲁士完好无损，它可以用适合自己尊严的方式对待我，不出一个月，它将堕入完全不同的境遇。您仍可挽救你的臣民，让他们免受战火的浩劫与痛苦。战争才刚刚开始，您可以阻止它，全欧洲都会感激你。[108]

这封信落下骂名：“混杂傲慢、挑衅、讽刺与假意求和，令人窒息。”[109] 但也可以这么理解：它给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剩的）最后一次体面退出的机会，并极精确地估计了未来战争中普鲁士的运气。事实上，说“不出一个月”灾难会降临还是低估了事态，因为没过两周时间，耶拿与奥尔施泰特（Auerstädt）会战就爆发了。真正傲慢又挑衅的是下达最后通牒的普鲁士亲王、将军与大臣。

普军潜在兵力庞大，达22.5万人，但其中9万人得守卫要塞。普鲁士也不能指望英俄会马上增援。普军指挥官们十年未上战场，尽管其中有些人曾在弗里德里希大王麾下作战。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现年70多岁，另一名高级将领约阿希姆·冯·默伦多夫（Joachim von Möllendorf）已然80多岁。更糟的是，不伦瑞克与普军左翼主将弗里德里希·冯·霍恩洛厄（Friedrich von Hohenlohe）亲王持相左战略，并且互相敌视，所以军事会议决策前可能先得恼火地讨论上三日。整场战役中，拿破仑不曾组织任何军事会议。[110]

在战役中，有些更奇怪的普军调动系委员会领导制的产物，哪怕从普军自身角度看，它们也都难以理解。10月9日晚，拿破仑根据报告断定，敌军正从爱尔福特向东进军，将在格拉（Gera）集中。其实，普军的真实机动是渡过萨勒河（the Saale），不过他们或许应该去格拉，因

为去那儿可以更好地掩护柏林和德累斯顿。[111] 拿破仑的假设错了，次日他发现不对头，随即飞快地纠正错误，以利用新形势。

法军前卫进入普军占领的萨克森，其掩护部队只有缪拉的六个轻骑兵团。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贝纳多特，在前；拉纳和奥热罗，在左；苏尔特和奈伊，在右；帝国近卫军，在中；达武和骑兵主力，组成预备队。10月10日，萨尔费尔德（Saalfeld）之战爆发，拉纳击败普军与萨克森军后卫。敌军统帅路易·费迪南德（Louis Ferdinand）亲王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侄子，他孤注一掷，率队冲向法军中央，结果被第10骠骑兵团军需官甘代（Guindet）砍死。普军有1700人死伤或被俘，法军只损失172人。这次败仗打击了普军士气。大军团随后背对柏林和奥德河（the Oder）列阵，切断了普军的交通线、补给线与退路。[112] 11日上午，大军团已经部署在萨克森平原上，准备好投身战役的下一阶段。拉萨尔迅速移动，晚上8点，他在格拉俘虏了霍恩洛厄的补给车队，迫使普军经耶拿离开。10月12日凌晨1点，拿破仑从缪拉处获知此事，他沉思两小时，然后开始下达铺天盖地的命令，全军遂往西旋转，变为背靠萨勒河、面朝普军。[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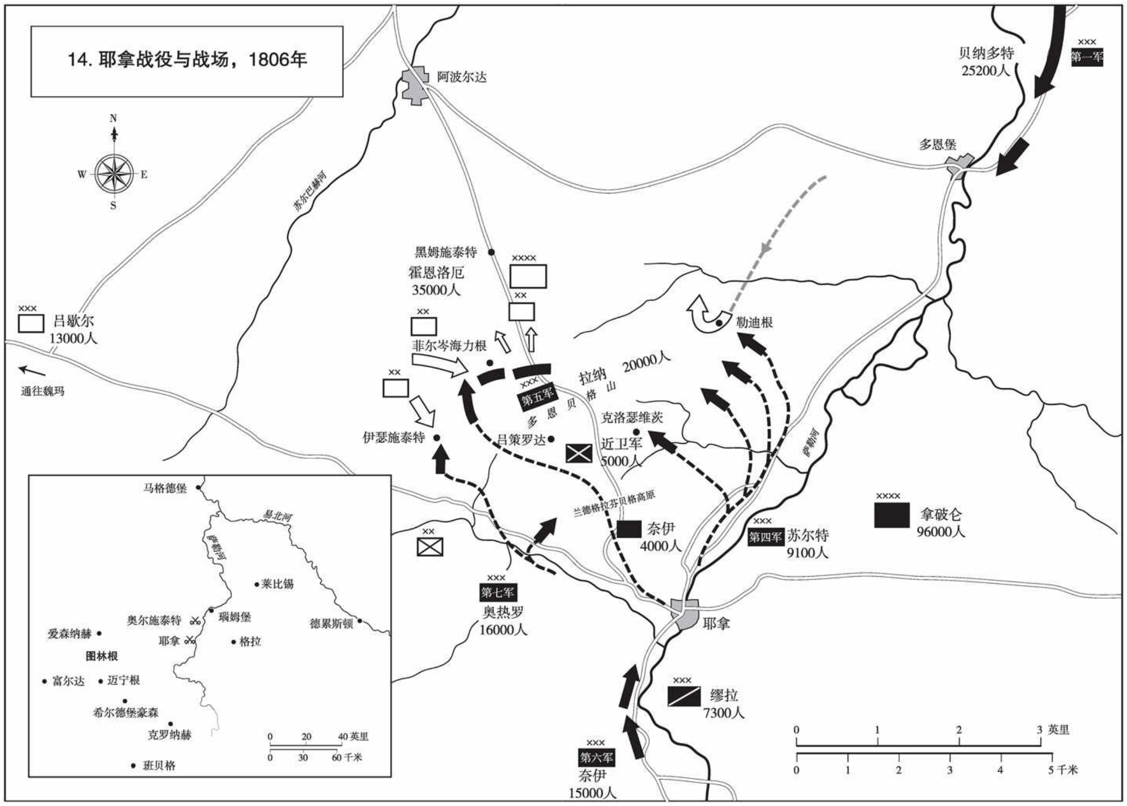
10月12日，缪拉的骑兵和间谍证实普军主力待在爱尔福特。缪拉让骑兵朝北展开，达武拿下瑙姆堡（Naumburg）渡口，导致不伦瑞克再也无法采取前进式防御。普军又一次开始大撤退，退往东南方。他们士气低落，心理上已落下风，哪怕大战压根还没上演。13日，拉纳率前卫冲入耶拿镇，赶走普军前哨。在反俄的萨克森籍教区神父的指引下，他马上派兵占据了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Landgrafenberg plateau）。

此时，拿破仑已正确推断出当前的态势：普军正退往马格德堡，所以拉纳被孤立了，他报称附近约有3万普军，而敌人可能发起强力攻击，置他于险境。拿破仑命令大军团全军于次日在耶拿集结。达武和贝纳多特奉命经瑙姆堡和多恩堡（Dornburg）去耶拿击退敌军左翼。达武

不可能知道其实普军主力正冲他而来，也没向贝尔蒂埃报告自己已遇上大股敌军，或许他太乐观了。贝纳多特和骑兵预备军疲惫不堪，他们前往耶拿的速度更慢。

10月13日下午，拿破仑驰过耶拿，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看向书房窗外时瞧见了他。当时，黑格尔正在写《精神现象学》的结尾，他对一位朋友说，他看见“身为世界精神（Weltseele）的皇帝骑马出城……这个人在马背上扬手指点天下，统治世界，观之者的确会深深震撼”。[114]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世上存在“优美灵魂”，那是不顾传统与他人关切、自主行事的力量。有人指出，这个词对拿破仑来说是个“不坏的描述”。[115]

13日下午4点左右，拿破仑到达俯瞰耶拿的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他看着高原更远处的敌营，命令拉纳军全军和帝国近卫军登上高原，这是个危险的举动，因为他们离敌军大炮只有1200码。[116] 今人在此地走一走便会立刻明白，只要没有持久炮击，高原上广阔平坦的荒野非常适合两个军布阵。当晚，拿破仑让拉纳的炮兵去高原上加入奥热罗军与帝国近卫军。奈伊正接近此地，苏尔特和骑兵预备军则在路上。拿破仑和贝尔蒂埃指望达武在次日击退敌军左翼，于是给他送去一封言辞草率的信。这封信说，“如果贝纳多特和你在一起，你们可以一同进军”多恩堡镇。[117]



1806年10月14日（周二）早上6点30分，浓雾弥漫，耶拿会战开始。凌晨1点时拿破仑就起床了，然后他同拉纳的师长路易·絮歇（Louis Suchet）将军侦察前卫阵地。法军左翼哨岗冲皇帝一行开火，直到鲁斯塔姆和迪罗克大喊他们是法国人。[118] 拿破仑返回营帐后，从3点开始发布了一连串命令。他的计划如下：拉纳把麾下的絮歇师和奥诺雷·加赞（Honoré Gazan）将军的师都调去进攻博吉斯拉夫·冯·陶恩青（Bogislav von Tauentzien）将军指挥的霍恩洛厄后卫，为大军开辟在高原上实施机动的空间；奥热罗在又称科斯佩达山谷（Cospeda ravine）的耶拿-魏玛公路列队，前进至拉纳左侧，与此同时，奈伊去拉纳右侧；苏尔特守右翼；帝国近卫军和骑兵留作预备，等敌军战线露出弱点后利用它们。

早上6点，拿破仑鼓动拉纳军，随后派他们攻击陶恩青。1804年，军事史学家亨利·德·约米尼男爵写了本战略专著，吸引了拿破仑的注意力，于是他成了皇帝参谋部里的官方史学家。约米尼赞赏道，拿破仑明

白“从不激起对敌军的过度鄙视乃必要做法，因为倘若遇上顽强抵抗，士气可能会随之动摇”。于是乎，拿破仑对拉纳军讲话时称赞普鲁士骑兵，但又保证道，“若他的埃及人亮出刺刀，它完全无力抵挡！”此言是指拉纳的老兵曾参加金字塔会战。[119]

絮歇的纵队前进至克洛瑟维茨村（Closewitz），准备一到高原就排成横队，但是他们在雾气中偏离方向，走到了村子左边，并进攻克洛瑟维茨村和吕策罗达村（Lützeroda）之间的敌军。随着雾气逐渐消散，鏖战已持续近两小时，法军陷入混乱，用掉了大量弹药，而大股敌军骑兵在战场最高点多恩贝格山（Dornberg）列队。尽管如此，娴熟的教官拉纳把第二条战线推至前线，靠战斗清扫高原，在此过程中，他打退了来自吕策罗达的反击，转而面向菲尔岑海利根村（Vierzehnheiligen）。菲尔岑海利根以远的战场地形突然变得非常平坦，很适合骑兵。战斗中，霍恩洛厄没有组织协调大规模反击，而是陆续派小股部队抵抗法军，从其手中收复菲尔岑海利根和多恩堡。在会战这一阶段，拿破仑加入拉纳军。雾气全消后，他立刻在7点30分左右聚集25门大炮，并命令第40战列步兵团进攻菲尔岑海利根。

苏尔特军赶到战场后，圣伊莱尔逐退克洛瑟维茨的普军，炮兵和骑兵一跟上来，他就前往勒迪根村（Rödigen）。普军顽强抵抗，但到上午10点15分时，圣伊莱尔已经可以继续穿过黑姆施泰特（Hermstedt）了，此举旨在击退敌军左翼。奥热罗把一整个师塞进了科斯佩达山谷，所以直到9点30分，他才在高原上露面，可他一到就遇上伊瑟施泰特（Isserstedt）东边的敌军。与此同时，奈伊率约4000人到达高原，发现拉纳左侧有缺口。正当拉纳被逐出菲尔岑海利根时，他自作主张跟随其后，进入拉纳左侧的战线。奈伊进攻，夺回村子，法军遂到达多恩贝格山南端。普军大炮猛烈开火，阻挠奈伊的步兵前进，但他们死守燃烧的村庄。普军骑兵冲锋，奈伊被迫躲进步兵方阵。拉纳军力克多恩贝格山，在10点30分同奈伊军会合。奈伊躲进方阵那会儿，拿破仑再次召唤

拉纳。恰在此时，霍恩洛厄派来5000名步兵，在约3500名骑兵与500名炮兵的支援下，他们保持完美的阅兵秩序，同菲尔岑海利根的守军对射，枪声如同雷鸣。至关重要的是，霍恩洛厄的军队没有猛攻村庄。

上午11点，奥热罗已拿下伊瑟施塔特，他和奈伊连上了。中午，苏尔特到达右翼。奈伊的两个师在拉纳左侧，多米尼克·克莱因（Dominique Klein）将军、让-约瑟夫·多特普尔将军、艾蒂安·南苏蒂将军的骑兵也来了，拿破仑遂断定此刻宜大举进攻。根据他的命令，法军密集的散兵线如浪潮般前进，营纵队跟随其后。普军顽强地后撤一小时，但是他们的损失不断增加。缪拉又率骑兵反复冲锋，导致陶恩青麾下的团终于崩溃奔逃。下午2点30分，霍恩洛厄的军队逃离战场，全军一片混乱，只有几个营方阵撤退时听从长官的指挥。缪拉手持马鞭，坚持不懈地追了6英里多，三个军的龙骑兵、胸甲骑兵、轻骑兵都跟着他。一路上，缪拉屠杀并俘虏了成千上万的萨克森人，傍晚6点，他到达魏玛，追击这才停止。耶拿会战后的长途追击乃演示如何最大化胜利的教科书级军事行动，教科书取字面意，因为它仍是当代军校授课的内容之一。

战胜之后，拿破仑才发现他遇上的根本不是不伦瑞克公爵的主力，只是霍恩洛厄的后卫。当日，达武在距耶拿13英里的奥尔施泰特击败弗里德里希·威廉和不伦瑞克，弗里德里希·威廉指挥了数小时后才逃走，战后不久不伦瑞克伤重而死。普军有5.2万人与163门大炮，达武有3万人和46门大炮，他对敌军实施了双重包围。在这场血战中，法军有7000人死伤，但普军的损失几乎是其两倍。[120] 奥尔施泰特会战是拿破仑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就像奥斯特利茨会战一样，它彻底扭转了达武不受拿破仑待见的局面。达武的副官法尔孔（Falcon）上校告诉拿破仑，他击退的不是普军主力，只是霍恩洛厄的部队。他不相信法尔孔的话，说："你的元帅一定看重影了。"[121] 然而，他获知真相后立刻盛赞达武。拿破仑对法尔孔说，"告诉元帅，我永远感激他和他的将士们"，

并授予达武军在10月25日的胜利入城式上率先进入柏林的荣耀。[122] 即便如此，奥尔施泰特会战从未变成绣在军旗上的战斗荣誉，因为达武战胜不伦瑞克的光辉战绩可使拿破仑击败霍恩洛厄的大胜黯然失色。

相形之下，贝纳多特两个战场都没去成，拿破仑和达武都不曾真正地原谅他的行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说，“我应该枪毙贝纳多特”，耶拿会战后他似乎短暂考虑过送此人上军事法庭。[123] 10月23日，拿破仑给贝纳多特写了封尖刻的信：“你的军不在战场上，这可能对我造成致命打击。”贝纳多特按字面含义执行贝尔蒂埃的命令，向多恩堡行军。10月9日至12月8日，他没有遇上拿破仑，而在12月8日之前，皇帝曾写信称赞他从布吕歇尔手中夺取吕贝克，可见关于两人愤怒地面谈的故事纯属传说。[124] 贝尔蒂埃的命令很少引起误解，但贝纳多特没在两个战场露面之事表明，假如贝尔蒂埃下达可被误解的命令会造成何等后果。不管怎么说，贝纳多特清楚他又成了拿破仑的出气筒，长期以来，他私下讨厌并嫉妒拿破仑，这只是让情况更糟。

会战结束了，次日凌晨3点，拿破仑从耶拿致信约瑟芬，自夸道：“我亲爱的，我针对普军实施了一些出色的机动。昨日我大获全胜。敌军有15万人，我俘虏2万人，缴获100门大炮以及诸多军旗。我看见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了，我设法靠近，但没能抓获他俩。我露宿了两天。我好极了。”[125] 数字照例是夸大版本，再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在奥尔施泰特，不在耶拿，所以他不可能看见国王或王后。可是拿破仑的确缴获了83门大炮，达武缴获了53门，而且在近乎完美的会战过后，拿破仑无疑真是“好极了”。

---

[1]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0

[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2

[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6 p.873，December 4，1805

[4]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69

[5]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4

[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42

[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49 p.876，December 5，1805

[8] ed. Bertrand，Pierre，*Lettres de Talleyrand à Napoléon* 1889，pp.209-12

[9]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83

[10]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57

[1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p.283-4

[12]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2

[1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86 p.892，December 15，1805

[1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223 p.910，December 25，1805

[1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09

[16]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100

[17]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13

[1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54

[19]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9

[20]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p.10

[21] 指军警针对国内民众的暴力回应，以绑架、恐吓、折磨平民为特征。——译者注

[22]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235 p.491，June 6，1806

[2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241 p.920，December 31，1805

[24]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823 p.768，August 31，1806

[2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927 p.471，March 27，1807

[26] Schneid，Frederick C.，*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New Haven，CT）2005，p.143

[27] Schneid，Frederick C.，*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New Haven，CT）2005，p.143

[28]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32

[29]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32

[30]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p.135-7

[3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5

[32]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35

[33]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45

[34]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64

[35]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335 p.63，January 27，1806

[3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1161 p.880，December 12，1805

[37]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223 p.484，June 5，1806

[3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785 p.752，August 23，1806

[39] Israel，Jonathan Ⅰ.，*The Dutch Republic* 1995，pp.1127-9

[40] 这个职务原指中央派驻各省的专员（而非政府首脑），他们辅助省督管理行政事务，并担任省议会议长。由于荷兰省实力较强，荷兰专员也成为共和国二把手，其权力仅次于荷兰

省督。——译者注

[41] Israel，Jonathan Ⅰ.，*The Dutch Republic* 1995，p.1130

[42]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 （New York）1965，p.13

[4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871 pp.1284-5，December 15，1806

[44]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9

[4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4

[46] 贝尔蒂埃当时恋慕维斯孔蒂侯爵夫人朱塞帕·卡尔卡诺（Giuseppa Carcano），不愿结婚。值得一提的是，贝尔蒂埃按拿破仑的要求成婚后不久，侯爵夫人就守寡了，据说他因此抱憾终身。——译者注

[47]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815 p.289，April 1，1806

[4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833 p.297，April 8，1806

[49] AN AF/IV/1231

[50] 鲁里坦尼亚（Ruritanian）是虚构的国家，出自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的浪漫风冒险小说《曾达的囚犯》，鲁里坦尼亚风格也就是浪漫国风格。——译者注

[51] 1799年，纳尔逊将军接受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德四世的赏赐——布龙泰（Brontë）公国与其3000英镑岁入。

[52]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p.195

[53] CAD P11778/16-18

[54] CAD P11778

[5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55

[5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748 p.729，August 18，1806

[57] 约瑟夫·巴尔萨莫（Joseph Balsamo）又名亚历山德罗·迪·卡廖斯特罗（Alessandro di Cagliostro，1743～1795年），乃著名术士、骗子。巴尔萨莫生前，其骗术未被揭穿。伊曼纽尔·

康德（Immanuel Kant）是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德意志唯心主义奠基人之一，所以拿破仑一并否认康德和如此臭名昭著的江湖郎中可谓奇怪。

[58]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58

[59]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2

[60]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2

[6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73

[62]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05

[6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655 p.213，March 12，1806

[64]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63

[65]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1898 pp.325-6，April 14，1806

[6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023 p.388，April 30，1806

[67]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206 p.475，May 31，1806

[68]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226

[69] Markham，J.David，‘Was Napoleon an Anti-Semite？Napoleon，the Jews and Religious Freedom’Speech to the Symposium o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Sanhedrin，Tel Aviv，Israel 31 May 2007，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 （Florida）1989，p.296

[70] *Moniteur* May 22，1799

[71] 1858年，英国在职犹太议员、伦敦代表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首次出席议会，不过此前他已三度当选下院议员，这还是在宗教相对宽容的国家。

[72] eds. Brenner，Michael，Caron，Vicki and Kaufmann，Uri R.，*Jewish Emancipation Reconsidered* 2003，p.80

[7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51

[74] Benbassa，Esther，*The Jews of France* （Princeton）1999，p.88

[75] Weider，Ben，‘The Assassination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3

[76] Weider，Ben，‘The Assassination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2

[77] Schwarzfuchs，Simon，*Napoleon*，*the Jews and the Sanhedrin* （Philadelphia）1979，pp.125-30

[78] Lentz，*La France et l'Europe* pp.254-8，eds. Brenner，Michael，Caron，Vicki and Kaufmann，Uri R.，*Jewish Emancipation Reconsidered* 2003，p.196

[79]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 （Florida）1989，p.299

[80] Mauduit，Hippolyte de，*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2 vols.1847-48，Ⅱ p.39

[8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7

[82] Hazareesingh，Sudhir，*The Saint-Napoleon* （Cambridge，MA）2004，pp.3-4

[83] 今译作“列支敦士登”。——译者注

[84] Koebner，Richard，*Empire* 1961，p.282

[85] 方便起见，本书有时仍用“法军”指代拿破仑的军队。——译者注

[86]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03

[87]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p.291

[88]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p.292

[89]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p.295

[90] 拿破仑照例一边关注国际形势，一边非常积极地投身帝国微观管理。“显而易见，昨日一车夫酿成事故，致一名幼童死亡，”7月16日，他致信富歇，“逮捕并重罚此人，不管其雇主是谁。”CG6 no.12507，p.616.

[91]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43 pp.684-5，August 2，1806

[92]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42 p.684，August 2，1806

[93]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70

[94]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71

[95] 在某次文学界宴会上，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提议为拿破仑干杯，席上嘘声一片，坎贝尔便高声辩解道："可他枪毙过出版商啊，先生们！"

[9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46 p.686，August 5，1806

[97]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1

[98]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67

[99]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p.42

[100]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897 p.816，September 10，1806

[101] 其中一封下令把撒丁国王的车夫关进费内斯特雷莱监狱（Fenestrelle prison），因为拿破仑怀疑此人是间谍。次日，他致信德农，谈及卢浮宫的短暂开放时间，抱怨道："公众必须等待。这最违背我的旨意。"1806年，他一共写了2679封信。

[102] Lentz，Thierry，*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p.327

[103] Maude，F.N.，*The Jena Campaign* 2007，pp.118-19

[104] Maude，F.N.，*The Jena Campaign* 2007，p.121 n.1

[10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73

[106] Napoleonic Historical Society Newsletter（Berthier Supplement）May 2014 p.13

[107]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74

[10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259 p.999，October 12，1806

[109]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5

[110] Hayman，Neil M.，'France Against Prussia：The Jena Campaign of 1806'*Military Affairs* vol.30 issue 4 Winter 1966，p.188

[111] Hayman，Neil M.，'France Against Prussia：The Jena Campaign of 1806'*Military Affairs*

vol.30 issue 4 Winter 1966，p.194

[112]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06

[113] Hay-man，‘France Against Prussia’p.188

[114] Paret，Peter，*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2009，p.21

[115] Paret，Peter，*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2009，p.21

[116] 俯瞰耶拿市市区的兰德格拉芬贝格高原上有一座拿破仑石碑（Napoleonstein），上刻此地距拿破仑一生中众多重要地点的距离。所以说，石碑上写着耶拿距巴黎700公里、距开罗2838公里、距马伦戈707公里、距马德里1657公里、距奥斯特利茨429公里、距博罗季诺1683公里、距滑铁卢503公里、距圣赫勒拿岛至少7626公里。石碑强有力地提醒人们此人精力充沛，那时还是马车与帆船的年代，而他在十七年中就经历了上述旅程，走过了这么多道路。

[117] Gallaher，John G.，*The Iron Marshal* 2000，p.26

[118]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35

[119] Jomini，General Baron A.H.de，*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 1854，p.73

[120]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225-6

[121] Cook，John，‘Bernadotte 1806：Is There a Case for the Defence？’*Napoleon Series* website，（unpaged）

[12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86

[12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123-4

[124]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312 p.1023，October 23，1806，Palmer，Alan，*Bernadotte* 1990，p.135，Cook，John，‘Bernadotte 1806：Is There a Case for the Defence？’*Napoleon Series* website，（unpaged）

[125]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267 pp.1003-4，October 15，1806

第十八章 受阻

人们经常听说拿破仑皇帝摘下自己的荣誉军团星章，亲手将它挂在勇士胸口。路易十四会先问这位勇士是不是贵族，拿破仑则会问这位贵族是不是勇士。

——帝国近卫军上尉埃尔泽阿·布拉兹

疲惫与匮乏时的坚忍不拔乃士兵首要资质。勇气只排第二位。艰苦、贫乏和穷困是最佳士兵学校。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58条

“我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溃败。”耶拿之战后，拿破仑如此评价普鲁士人。[1] 可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没有投降，他知道俄军要来了，于是反而退往东北方继续战斗。战后，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吉罗拉莫·迪·卢凯西尼（Girolamo di Lucchesini）侯爵开始与迪罗克谈判，但两人一无所获。拿破仑怀疑卢凯西尼曾是主战派主心骨，事实的确如此。[2] 他致信塔列朗：“我觉得再难找到比这老傻瓜更蠢的人了。”[3]

与此同时，大军团继续锲而不舍地穿越普鲁士，不给普军任何机会停留或重新集结。10月25日，施潘道（Spandau）向絮歇投降；29日，斯德丁（Stettin）[4] 向拉萨尔投降；11月1日，防卫森严的马格德堡向奈伊投降。至此，法军已拿下普鲁士西半部全境。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von Blücher）将军曾在奥尔施泰特力战，11月7日，他在吕贝克用光弹药，被迫率全军投降。

柏林店铺的窗户上挂着很多讽刺拿破仑的漫画，因为城市陷落得太快了，店主们都来不及撤下漫画。[5] 就像在威尼斯一样，皇帝下令把柏林勃兰登堡门上的双轮战车和胜利女神四马战车带回巴黎。普军近卫的战俘被押着经过法国大使馆，上个月，他们曾非常傲慢地在同一大使馆门前的台阶上磨马刀。[6] 1757年，弗里德里希大王在罗斯巴赫

（Rossbach）羞辱了法军。拿破仑造访罗斯巴赫战场，下令把当地竖立的纪念柱也挪去巴黎。[7] 10月23日，他从维滕贝格（Wittenberg）致信约瑟芬，重复道："我好极了，疲惫适合我。"[8] 他写给约瑟芬的海量信件都以"我很好"结尾，这种做法后来成了危险的习惯。[9]

当天突降暴雨，拿破仑便在狩猎小屋中避雨。一名年轻的寡妇对皇帝说，她的亡夫曾是第2轻步兵半旅少校，他在阿布吉尔之战中身亡，留下她和儿子两人。寡妇给拿破仑看了其子的婚生证明，于是他授予她1200法郎抚恤年金，她死后，这笔钱将复归她的儿子。[10] 次日，他在波茨坦参观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无忧宫（Sanssouci），玩赏原主的宝剑、腰带、肩带和所有装饰物，并把它们送往荣军院，从而继续"报复罗斯巴赫的灾难"。[11] （此后的人生中，拿破仑一直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闹钟放在床头，但没拿他的长笛。长笛今仍展示于无忧宫。）拿破仑评价自己的战利品道："我宁要这些也不要2000万。"他和部下凝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陵墓，谦虚地承认："脱帽，先生们。如果此人还活着，现在我不会站在这儿。"[12]

拿破仑差点在波茨坦实施了明显更猛烈的复仇。柏林派来的普鲁士代表团成员弗朗茨·路德维希·冯·哈茨费尔德（Franz Ludwig von Hatzfeld）亲王用密码信向霍恩洛厄报告波茨坦的法军兵力与状态。事情败露后，贝尔蒂埃、迪罗克、科兰古和拉普设法平息了拿破仑的怒火，即便如此，皇帝依然想让军事法庭以间谍罪传唤哈茨费尔德，还想枪决他。昂吉安公爵事件必然给科兰古留下了深重阴影，当拿破仑对所有建议者"彻底丧失耐心"时，贝尔蒂埃实际上离开了房间。[13] 皇帝察觉自己反应过激，遂安排一幕感人场面，让怀孕的哈茨费尔德夫人在他脚边哭求放丈夫一条生路，然后他大度地销毁证据，把截获的密码信投入火中。[14]

达武进入柏林、絮歇夺取施潘道之日，拿破仑致信富歇，谈及皮埃

尔·加德尔（Pierre Gardel）所创作的芭蕾剧《尤利西斯的归来》的舞台布景费用，并要求对方提供详细报告，“确保没有一点不良内容，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尤利西斯在国外时，有人追求珀涅罗珀[15]。）[16]然而，拿破仑有些虚伪，虽说害怕某种暗讽，他却非常乐意用完全相同的含沙射影之辞对付路易丝王后，在一期公报中他写道：“在波茨坦某间王后寓所中找到了那个亲王赠她的俄皇画像。”[17]

拿破仑坚持指责弗里德里希·威廉屈从妻子。“笔记、报告和国家文献都散发麝香味，”10月27日，他在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 Palace）发布这次战局的第19期公报，“同皇后梳妆台上的围巾等物混在一起。”[18]为防有人忽视要点，公报声称，这些“历史文件……证明允许女人干政的王公们多么不幸，如果这还需要证明的话”。就连忠诚的博塞也认为，拿破仑写路易丝王后时“愤怒又无礼”。约瑟芬抱怨公报给王后的待遇，于是他承认：“的确，这世上我最讨厌摆布他人的女人。我习惯了贤淑、温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但这也许是因为她们令我想起你。”[19]

“士兵们，”10月26日，拿破仑在波茨坦发表讲话称，“俄军夸口说要来我们这儿。我们会向他们进军，帮他们省下一半路程。俄军将在普鲁士心脏地带又一次遭遇奥斯特利茨。”[20]军队可不爱听这话，普鲁士首都既已陷落，他们就想回家。

27日，拿破仑进入柏林。他走在浩大队伍的最前头，后面跟着2万名身着军礼服的掷弹兵和胸甲骑兵。“皇帝骄傲地前进，他衣着简朴，头戴小帽子，上缀只值一个苏的帽徽，”夸涅上尉回忆道，“而他的部下穿着礼服。穿得最差的人统帅如此壮观的军队，这看起来是幕奇特景象。”[21]1840年，司汤达致信未来的欧亨妮（Eugénie）皇后[22]，回忆道，拿破仑“在士兵前方二十步处骑马，安静的群众离他的马只有两步远，任何一扇窗户里都能冒出一把来复枪射杀他”。[23]在柏林，拿破仑

住进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洛可可式大宫殿夏洛滕堡宫，并把司令部设在此地。他的金库开支记载，这段时间他给了一名女士23300法郎，她的身份信息仅有“柏林人”。[24] 10月30日，拿破仑开出媾和条件，要求普鲁士放弃易北河以西全部领土，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然准备这样做。可是拿破仑补充道，普鲁士王国必须在接下来的对俄战争中充当法军作战基地，国王便忽视其议事会的多数意见，继续战斗，退往波罗的海沿岸的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25] 。[26]

法国每年为拿破仑提供约8万名新兵。大群1806年度新兵正开赴普鲁士，而他已有野战军8万人（不包括所占普军要塞的守军）和莱茵邦联的各部队，所以1806年11月，拿破仑可在冬季停战期前大举渡过维斯瓦河（the Wisła），进入不久前还是波兰的地区。966年，波兰成为欧洲国家；1205年，波兰变成王国；1569年，卢布林联合体（Union of Lublin）成立，之后波兰和立陶宛结为联邦。[27] 1772年、1793年与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逐渐在地图上抹去波兰国。尽管波兰不再是国家，但这三个瓜分国根本无法削弱波兰人的民族意识。拿破仑一直鼓励这种情结，让波兰人相信有朝一日他会让他们复国。也许他最终会这样做，但短期内他无此计划。1797年，法国革命军创建“波兰兵团”，此后2.5万至3万名波兰人在两次意大利战局、德意志战局和圣多明各战局中服役。拿破仑明显同情波兰人的事业，这又激励了很多波兰人来拥护他，他们还组成了一些拿破仑麾下最强的部队，如大军团第一批枪骑兵部队。波兰枪骑兵相当出色，以至于1812年时，皇帝已经把九个龙骑兵团改成枪骑兵团。

为筹备未来战局，拿破仑在法国和德意志全境征集马匹，还把意大利军团的马拨给大军团。他在普鲁士征收制服、食物、马鞍、鞋子等物，但波兰路况不佳，因此法军经常缺乏物资。他一直关心士兵穿什么鞋子，光是11月和12月，他就写了23封谈论靴子和鞋子的信，其中一封写给波茨坦骑兵兵站站长弗朗索瓦·布尔西耶（François Bourcier）将

军，他在此信中下令用法军的鞋子换普军骑兵的靴子，解释道：“他们再也用不上靴子了，需求必须……”[28]

11月2日，拿破仑命令达武率博蒙（Beaumont）的龙骑兵前进至东边的波森[29]，派奥热罗尾随其后。[30]一到波森，他们就设立基地，建造面包房。拉纳军、苏尔特军、贝西埃军、奈伊军和贝纳多特军随后跟来，这五个军共有约66000名步兵和14400名骑兵。拿破仑占据奥德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地区，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俄军占领此地，但他也希望借此阻止普鲁士复仇，并说服奥地利保持中立。4日，他得知86000名俄军士兵正从格罗德诺（Grodno）向西进军，准备和安东·冯·莱斯托克（Anton von Lestocq）将军的20000名普军士兵会师。[31]“如果我让俄军前进，我就会失去波兰的支持与资源，”他说，“他们也会让奥地利下定决心，它之所以犹豫，仅仅是因为俄军还在远处。他们还会带来普鲁士全体国民。”[32]缪拉、达武、拉纳和奥热罗遂前进至维斯瓦河，在成群返回西岸冬营前建立桥头堡。面对两个敌国（南边还有第三个潜在敌国）的法军穿过一些最贫乏、最穷困的欧洲乡野，从巴黎向东行军1000英里，并迎来凛冽寒冬，这始终是个大冒险，不过这不比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糟。

战役下一阶段的战斗几乎都在东普鲁士，此地曾是波兰领土，如今则是占地5830平方英里的俄属飞地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是平原，地形平坦，沼泽众多，河湖纵横，森林密布。冬季，温度会降至零下30℃，仅早上7点30分至下午4点30分有光照。道路通常是地图上未标出的小径，就连华沙（Warszawa）至波森的主干道也没铺设路面，并且缺乏侧沟。大雨如注，整个乡间成了泥泞的海洋，加农炮在此的行进时速为0.25英里。拿破仑调侃道，他发现除了水、火、气、土外还可以加上第五大元素——泥！他派测绘部前进，命令他们绘制乡间地图与速写，并标明每座村庄的名称、人口乃至土壤类型。这些记录旁边都有军官签名，以便他事后传唤此人，询问更多细节。

纵然做好了再战俄国的准备，拿破仑的思绪还是转向英国，他认为这个国家对法国长期利益的威胁同样严重。1806年11月21日（周五），他签署《柏林敕令》（Berlin Decress）。该法令旨在强迫大不列颠和谈，可一旦他力图在葡萄牙、西班牙和俄国强行推行它，反而导致自己垮台。1806年5月16日，英国枢密令规定完全封锁布雷斯特至易北河的海岸线，拿破仑称《柏林敕令》（与其后继者——1807年的《米兰敕令》、1810年的《枫丹白露敕令》）创立的“大陆体系”是对此的报复。[33] 《柏林敕令》开头写道，“英国根本不承认所有文明人普遍遵守的国际法”，这意味着英国的敌人“享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天然权利”，所以封锁政策支持者塔列朗起草修改的条款语气强硬：

> 1.封锁不列颠群岛。
>
> 2.禁止一切与不列颠群岛的贸易与通信。
>
> 3.英国人不论处于何状态或境地……都将成为战俘。
>
> 4.凡英国人所有的仓库、商品、财产，不论其性质为何，皆被认可为合法奖励……
>
> 7.任何港口不得接纳直接来自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只，或自本敕令发布日起已在港口内的上述船只。[34]

英国三分之一的直接出口和四分之三的再出口流向欧洲大陆，因此拿破仑想靠法令对英国政府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它重启8月时失败的和谈。[35] 12月3日，他致信路易，解释道：“我将用陆权征服海洋。”[36] 后来他声称：“只有这种方法能打击英国，迫使它求和。”[37] 此言不假。法军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被摧毁后，唯有经济战可以直接伤害英国。

拿破仑盼望法国商人接手原属英国的贸易，他认为他们会欢迎《柏林敕令》，但法国商会的报告很快打消了他的念想。早在12月，波尔多商会就报称商业呈现危险的衰退势头。拿破仑信奉朴素的科尔贝主义，以为国际贸易是零和游戏，但事情完全不是那样。1807年3月，他得批

准用储备金发放特别工业贷款，以图抵消敕令引发的危机。[38]

英国辉格党期刊《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颇具影响力，除了那些批评华兹华斯（Wordsworth）诗作的文字，该刊物最激烈的文章呼吁求和以恢复贸易，但英国政府设法扛住了国内的反对意见。相形之下，大陆体系恰恰损害了那些从拿破仑政权得利、目前为止一直给予他最大支持的人——他总是设法保护的中产阶级、零售商、批发商、富农和国有财产所有人。“所有国家的店主都抱怨事态。”国库部长莫利安回忆道。可是拿破仑没心情听，更不用说妥协了。[39]

1807年1月7日，英国实施报复，继续颁布枢密令：“有待扣押在欧洲敌国港口间贸易的所有中立国船只……禁止敌国和中立国之间的沿海贸易。”[40] 11月，英国还签发更多枢密令，声明法国及其附庸国处于封锁状态，所有要去法国或来自法国的中立国船只必须先驶往英国，并缴纳税款，获取通行证。美法贸易于是也被禁，除非美国船只在英国港口用高价购买许可证。英国“强征”（也就是绑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去皇家海军服役，此举和1807年11月的枢密令是1812年美英战争的主要原因。

大陆体系有个重大的问题——无法普遍实施。举个例子，1807年，吕贝克、吕内堡（Lüneburg）、罗斯托克（Rostock）、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不来梅等汉萨城市及汉堡无法生产大军团需要的20万双鞋、5万件厚大衣、3.7万件马甲等物，各市总督只好凭允许打破封锁的特别许可证从英国制造商处采购物资。未来的波兰战局中，拿破仑的很多士兵穿着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利兹（Leeds）生产的制服。英国大臣在下院夸口道，要不是靠英国制造商，拿破仑都没法给军官制服绣徽章。[41]

大陆体系在帝国某些地区酿成了真实的惨剧：地方工业失衡混乱，有时全盘崩溃；贝格大公国出现严重的骚乱；法军得派两个团去美因茨

统统没收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运往全欧洲食品柜的食物被公开焚烧，最接近法国的德意志地区比英国更受罪。[42] 由于拿破仑颁行保护主义法令，迪耶普（Dieppe）和翁弗勒尔（Honfeur）的海岸燃起巨大的篝火，以焚烧没收的英国产品。

另一个问题是削弱体系之风盛行，甚至涉及帝国皇室。路易对荷兰境内的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缪拉成为那不勒斯国王后未能完全采用大陆体系，约瑟芬自己也在黑市上买走私货。[43] 1807年，忠心耿耿的拉普就任但泽（Danzig）[44] 总督，就连他也允许城中走私，拒绝焚烧商品。[45] “没我的命令，不管什么被禁货物都不得入境，”拿破仑愤怒地对财政部长戈丹说，“如果我放任我的家族和滥用职权行径牵扯如此之深，那我显然是玩忽职守。若有法律，则人人皆应遵守。”[46] 1810年，他解雇布列纳，此人任汉堡总督时收受商人贿赂、放宽体系禁令。同年，他废黜路易，杀鸡儆猴，但滥用职权的现象几乎一点没少。

拿破仑还没有天真到相信能彻底消灭走私的地步，但他下了大功夫阻止。比如说，1806年他在易北河上安设300名海关官员。然而英国花了更大功夫促进走私，在波罗的海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设立巨大的转运基地。[47] 1811年，840艘船从事马耳他岛和南地中海港口之间的贸易，它们通常在夜间活动。走私罪的刑罚是十年徒刑和烙印刑，1808年后累犯会被处死，但船只靠岸后，走私人员还是立刻携咖啡和糖入境。[48] （1736年，英国规定走私犯可判死刑，经常处死他们。）

法国海军遭封锁，无望巡查欧洲海岸线。不同数量的英国货物在不同时间通过里斯本、的里雅斯特、雅典、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巴利阿里群岛（the Balearics）、直布罗陀海峡、里窝那、伊奥尼亚群岛、圣彼得堡公开或秘密进入大陆。法国海关官员真的没收走私货后，其中一部分可靠贿赂赎回。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Lloyd’s）也适时推出没收险。与此同时，法兰西帝国关税收入从1806

年的5100万法郎跌至1809年的1150万法郎。1809年，英国粮食歉收，为耗尽其金银储备，拿破仑允许向英国出口高价谷物，那一年英国进口的小麦中约有74%来自法国。[49] [50] 因为商人们继续接受英国汇票，大陆体系无法生效，伦敦依然坐享资本净流入。[51] 1808～1810年，英镑兑欧洲货币的汇率跌了15%，英国货物更便宜了，这令拿破仑大为光火。1800～1809年，英国平均年出口额为2540万英镑。大陆体系迫使英国商人更灵活、更分化，于是他们大大增加了对亚洲、非洲、近东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因此，1810～1819年，英国平均年出口额涨至3500万英镑。相形之下，英国的进口额却跌了，所以它实现了贸易入超，自从1780年来这还是头一次。[52]

拿破仑阻止大陆消费者购买英国产品，他希望此举既能刺激欧洲工业，特别是法国工业，又能鼓励生产商寻找替代品。1810年，有人发现法国可种植甜菜和槐蓝，拿破仑便对秘书说，这好比发现了第二个美洲。[53] 圣但尼开办学校，尝试教授制糖方法。1808年3月，拿破仑要求贝托莱研究“芜菁能否制糖”。[54] 可是，他没法说服人们喝瑞士茶，更不用说拿菊苣根代替咖啡了。1810年，他计划用蓟草生产棉花，但也一无所获。[55]

大陆封锁导致英国经济在1810～1811财政年度出现下滑，假如英国只是“店老板民族”，这也许会激发政府的政治危机，但英国内阁成员大多来自上流社会，系小威廉·皮特的前盟友，为了支持反拿破仑战争，他们可以在一切商业顾虑上让步。事实上，1807～1809年，波特兰公爵政府完全抛开辉格和托利的标签，仅仅自称“皮特先生的朋友”。1809年10月，斯潘塞·佩瑟瓦尔（Spencer Perceval）接替波特兰任首相，狂热地推动反拿破仑战争。佩瑟瓦尔对妻舅托马斯·沃波尔（Thomas Walpole）说，拿破仑可以算是《启示录》里“那个娼妓之母[56]，骑着野兽，喝圣徒的血喝到醉”。[57] 1799年，拿破仑在阿克受阻，佩瑟瓦尔便写了本匿名小册子，其标题“旨在指出诗篇第十一篇的预言在法国应

验情况的评论”颇引人瞩目，其内容则是争辩《圣经》预示了拿破仑之败。（详细推算经文后，佩瑟瓦尔相信1926年是世界末日。）[58] 英国政客们秉持的信念如此排斥理性，所以福克斯死后，难以想象拿破仑究竟得做什么才能劝服英国求和。1812年，佩瑟瓦尔被比他还疯狂的人暗杀。小皮特的另一位追随者利物浦（Liverpool）勋爵（原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接任首相，他对毁灭拿破仑一事也同样执着，直到1827年才卸职。

1806年11月25日凌晨3点，拿破仑从柏林去波兰边境观光，还邀请在美因茨的约瑟芬来东边陪自己，[59] 他后来懊悔如此提议。27日晚，他到达波兰城市波森，出席当地居民举办的盛大招待会。拿破仑激起波森民众的复国希望，却回避做出任何要满足他们的承诺。日后他承认了不少错误，有一回，他说：“我不该渡过维斯瓦河。马格德堡的陷落吸引我进入波兰。我犯了错，导致可怕的战争，但是重建波兰国的想法高尚。”[60] 波森官绅恳求拿破仑恢复他们的王国，他谨慎地选择措辞：“演说和空洞的愿望还不够……武力推翻的只能靠武力复原……分裂而亡的只能靠团结重铸。”[61] 这话听来语调积极、蕴含军事意味，但离保证波兰复国还差得远。

次日，汉诺威籍俄军指挥官莱温·冯·本尼希森伯爵撤离华沙，北上40英里至普乌图斯克附近。当晚，缪拉进入华沙，自封总督。1795年，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大肆扩张领土，瓜分并毁灭了波兰。波兰人热烈欢迎拿破仑，但这不能驱使他疏远上述三国。“我熟知人性，”12月2日，拿破仑告诉缪拉，“我的伟业也不在于靠几千波兰人帮忙……我不会首先行动。”至于波兰末代国王的侄子、亲法派将军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拿破仑则说：“他比大多数波兰人更轻浮、更不重要，那意味着一笔划算的交易。”[62] 皇帝要求缪拉向波兰人传达：“我不会为家人求取波兰王座，我不缺给他们的王位。”[63]

大军团讨厌维斯瓦河上的生活，认为前方只有“贫困和坏天气”。[64] 军队里有个笑话，说整个波兰语可以简化为这句话：“面包？没。水？马上！”（Chleba？Nie ma.Woda？Zaraz！）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附近，某纵队的一名步兵冲拿破仑大喊：“爸，面包呢？”他立刻高声回答：“没。”整个纵队顿时放声大笑。[65] 军队进入冬营前遇上了暴风雪，另一名士兵便嚷道：“你撞坏脑子了？带我们到这种路上来，面包也不给！”拿破仑回答：“再耐心等四天，我就不让你们做任何事了，然后你们就能宿营。”士兵回喊：“好吧，还不算太久，但你要记着，因为那以后我们就自己扎营了！”[66] 牢骚兵的确有牢骚，行军途中，他们有时沦落到喝炖锅里的马血，但萨瓦里回忆战役这一阶段时说：“皇帝喜爱擅自同他说话的士兵，总是和他们一起笑。”[67]

约瑟芬来信称，她不嫉妒拿破仑和波兰女人过夜，12月5日，他回信：

> 我早就发现了，暴躁的人永远坚称他们不暴躁，害怕的人反复声明他们不害怕，所以你犯了嫉妒之罪，我高兴极了！不管怎么说，要是你认为我在波兰荒原思慕美女，你就搞错了。昨晚地方贵族举办舞会，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士漂亮有钱，但穿得差，哪怕她们已经努力模仿巴黎时尚。[68]

下一周，拿破仑的妙计达成：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选侯的军队曾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与普军并肩作战，但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解除了盟友关系，加入莱茵邦联。12月19日，拿破仑进入华沙，波兰人欣喜若狂地欢迎他。他立刻成立波兰贵族临时政府，虽说它几乎只有顾问权。他认为俄军已做好战斗准备，不会再退很远，于是对维斯瓦河上所有的军下令。拿破仑希望利用德意志籍俄军将领本尼希森和布克斯赫登之间的缺口，遂告知各军指挥官应当预期马上就会实施大举进攻。12月23日，达武军到达布格河（the Bug）上的恰尔诺沃村（Czarnowo）。拿破仑侦察该地后发动夜袭，成功赶走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69] 麾下过于分散的15000名俄军士兵。

战斗结束时，法军控制了华沙北边的水道。[70]

1806年圣诞日，本尼希森的军队退往东北方，拿破仑力图消灭俄军，派拉纳去切断其退路。与此同时，达武、苏尔特和缪拉北上，奥热罗从弗克拉河（the Wkra）去东北方，奈伊和贝纳多特从维斯瓦河去东南方。恶劣的天气导致每日行军里程减至7英里，毁了拿破仑的机会。“我们经过泥沼交错的黏土地带，”拉普回忆道，“路况糟透了。骑兵、步兵、炮兵都陷进泥里，脱身可谓最难。”[71] 次日，法军在普乌图斯克参战，“整场战斗中，很多军官一直困在泥泞里，成了敌人的靶子”。

在普乌图斯克的暴风雪中，本尼希森率35000人对战拉纳的26000人，他打赢了后卫战，次日撤走。[72] 当日在戈维明（Gołymin），缪拉、奥热罗和达武准备从三面突袭安德烈·戈利岑（Andrei Golitsyn）公爵，但他战至天黑，漂亮地率军脱离拿破仑的陷阱（次年7月，拿破仑在蒂尔西特与戈利岑会面，称赞他的脱逃行动）。[73] 次日，拿破仑查看戈维明战场，军人画家勒热纳回忆道：“皇帝和贝尔蒂埃亲王停步，听我们唱了几分钟巴黎最新歌剧的调子。”[74]

俄军成功撤退，进入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附近的冬营。12月28日，拿破仑休战，让军队沿维斯瓦河扎营。元旦日，他返回了华沙。他没有多少选择，毕竟天气恶劣，路况糟糕，而且任何时候军队里都有40%的人因发烧、负伤、饥饿或疲惫脱队。离队者大多去觅食了，但这一带的食物在和平时期都只能勉强养活本地人口，更不用说在战争时期养活两支庞大的军队了。[75] 拿破仑下令设立医院、制造车间、面包房和补给站。此时他也建立桥头堡与设防营地，这样的话，春天时大军团就不用强行渡河了。

法军首席军医皮埃尔·佩尔西（Pierre Percy）男爵指出：

这是法军最惨的日子。士兵总是在行军，他每晚宿营，白天就耗在淹到脚踝的泥泞里。他没有一盎司面包，没有一滴白兰地，没时间弄干衣服，又累又饿地倒下。我们发现有人死在侧沟里，一杯葡萄酒或白兰地就能救他们。这些事必然都令陛下心伤，但他向自己的目标进军，铺就他为欧洲准备的伟大前景。若他战败，或只取得平庸战绩，军队就会士气低落、大叫大嚷。[76]

据估计，到圣诞日时已有100名士兵自杀。[77]

长期以来，拿破仑非常重视伤员的待遇、撤离与护理，自从十年前意大利战局开始，他已经为此写了约600封详细信件。他经常致信他的两位高级医生佩尔西与多米尼克·拉雷（Dominique Larrey），称赞军队医疗卫生部（service de santé）“勇敢、热情、忠诚，最可贵的是，耐心且顺从”。[78] 他常常问军医们疾病情况、法国药品同他国药品的区别。[79] “在这儿啊，你这大庸医，”拿破仑揶揄自己的医生让-尼古拉·科维萨尔，“今天杀了很多人吗？”[80] 他喜欢并信任科维萨尔，这个医生治好了他的疥疮，让他的整体健康保持至俄国战局，从那以后，一系列恼人的小病开始折磨他。拿破仑有时又犀利地评价医生，1812年1月，他致信让-热拉尔·拉屈埃：“没经验的军医比敌军炮群更伤害军队。”[81]

1813年，拿破仑才把救护服务的建议付诸实践，而缺乏资源使它的实施效果不佳。[82] 然而，他的确扩充了法军卫生官员和战场军医编制，1802年，卫生官员与战场军医分别有1085人和515人，十年后则分别有5112人和2058人。[83] 这些医生人数不多，波兰战局中他们得治疗规模着实巨大的病人群体：1806年10月至1808年10月，法军医院接待了421000名士兵。那段时间，即便是战事最激烈时，真正因战斗负伤者在医院伤患中也占不到四分之一，剩下的都是病人，且大多是高烧患者。[84]

1807年1月1日，拿破仑从普乌图斯克返回华沙，中途在布沃涅（Błonie）的驿站换马，这时他邂逅了金发白肤的俏丽女郎、波兰伯爵夫人玛丽·措隆纳-瓦莱夫斯卡（Marie Colonna-Walewska），很快发现这

位20岁的少妇嫁给了比她大整整52岁的贵族地主。[85] 在他安排下，两人在舞会上再会，没过多久她就成了他最爱的情妇。参加舞会的另一名女士、喜好八卦的日记作者安娜·波托茨卡（Anna Potocka）称，一支舞曲终了时，自己“看见他捏她的手”。波托茨卡认为这是要约会的意思，并补充道，玛丽“长得漂亮，但没长脑子”。[86]

拿破仑马上收回先前的邀请，不让约瑟芬来华沙陪自己。结识瓦莱夫斯卡后第三天，他致信她：“美因茨离华沙太远了。我得在这儿处理很多事。我想你应该回巴黎，那儿需要你……我很好。天气糟糕。我全心爱你。”[87] 她随后请求他允许自己相伴，但他回答道：“对这件事，我比你更烦恼。我渴望与你共度冬日长夜，但人得服从情势。”[88] [89]

戈维明之战中，拉普左臂负伤，这已经是他第九次受伤了。在华沙时，拿破仑探望拉普，说：“好吧拉普，你又伤到了，而且伤的又是你那倒霉的胳膊。”拉普称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总是在战斗”。拿破仑回答：“也许80岁时我们就打完仗了。”[90] 这表明他期盼自己比父亲长寿很多，此时他寄给达尔贝格的一封信也佐证了这一推断，因为他在此信中写道：“60岁时，人生才过三分之二。”[91]

尽管拿破仑挺乐意让俄军在冬季休憩，但奈伊急缺补给。1月10日，他彻底违背军令，突袭北方。奈伊想出其不意地夺取柯尼希斯贝格的主要补给站，他知道如果成功，拿破仑会原谅自己冒险抗命。一周后，他到达海尔斯贝格（Heilsberg），无意中发现莱斯托克的普军，这揭晓了一个事实：本尼希森已然开始奇袭，正悄悄穿过华沙东北边占地500平方英里的约翰尼斯堡森林（Johannisburg Forest）。

奈伊和贝纳多特先后抓获若干战俘，拿破仑拼凑这些人提供的情报，得知大股来犯敌军正前往维斯瓦河，他立刻察觉有机会打反击歼灭战。拿破仑在南边有很多军队，因为俄军越往西走越容易被法军切断，他便想出了进攻本尼希森的侧翼，也许乃至后方的办法。他决定从华沙

出击，北上100英里至阿勒河（the Alle）上的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92]。1805年，勒菲弗元帅被现役名单除名。现在他又分到一个军，率领它围攻但泽，但在托伦（Toruń）受阻。奥热罗渡过维斯瓦河。贝纳多特的任务是掩护帕萨格河，做好必要时经埃尔宾（Elbing）[93]且战且退的准备。与此同时，拿破仑以托伦为支点，让全军从南边转到北边。达武守卫东岸，直到拉纳接替他，然后他推进至奥斯特罗文卡（Ostrołęka）和马库夫（Maków）。1月19日，拿破仑前卫已经遇上去但泽的本尼希森前卫。天气依然恶劣。“没有比这更艰苦的战役了。”炮兵将军亚历山大·德·塞纳蒙写道。泥泞淹没了塞纳蒙麾下加农炮的车轴和炮兵的膝盖。[94]没过多久，地面结霜，冻得坚硬。大雪积了好几英尺，行军速度便放慢了。

1月27日，大军团仍然向北强行军，与此同时，奈伊和贝纳多特奉命继续西撤，以图引诱本尼希森更加深入拿破仑的圈套。“我的健康达到最佳水平，”他对约瑟夫自夸道，“结果我比以前更风流。”[95]现在他积极求爱，称呼玛丽为“你”，而他原先仅称呼约瑟芬和波斯沙阿为“你”。[96]“噢，来我身边！来我身边！”他致信她，“你的愿望都会实现。如果你怜惜我可怜的心，我会珍视你的祖国。”几天后，他送给她一枚胸针，写道：

> 请收下这束花，愿它成为我们之间的秘密纽带，让我们穿越周边人群心连心。所有目光注视我们时，我们就有密码。当我的手触摸我的心，你就会知道那里面全是你。作为回应，你的手也会触摸你的花束！爱我，我可爱的玛丽，愿你的手永远放不开你的花束！[97]

他待她也慷慨大方，1809年10月，他已经给了她三笔钱，总计5万法郎。[98][99]

1月30日，拿破仑离开华沙去前线。次日，隶属俄军将领巴格拉季翁前卫的哥萨克抓获一名法军副官，此人身上带着拿破仑致贝纳多特的明文信，没来得及销毁它。（拿破仑命令副官把信缝进鞋后跟。“副官

可以在路上丢裤子，”他有次打趣道，“但绝不能丢信或马刀。”[100]）这封信命令贝纳多特秘密地夜行军，复归大军团左翼。它包括大军团全军部署，表明拿破仑打算从南部进攻，并切断整个俄军。本尼希森保持冷静，下令立刻撤往阿勒河。[101]拿破仑不知计划已遭破坏，继续在严酷的天气中沿劣质道路侵入北方。对统帅拿破仑来说，速度永远至关重要，所以波兰的冬天令他格外沮丧。2月2日，拿破仑得知本尼希森没有进军维斯瓦河，反而退向阿勒河，返回安全地。拿破仑尽快赶到贝格弗里德（Bergfried），试图在本尼希森逃走前钉住他。皇帝身边只有五个步兵师、缪拉的骑兵预备军和一部分帝国近卫军。次日，本尼希森渡过阿勒河，仅留下后卫阻挡法军。拿破仑取消进攻，第二天俄军走了。“我在追赶俄军，”他致信康巴塞雷斯，“要把它赶过涅曼河（the Niemen）。”[102][103]

2月6日在霍夫（Hof），缪拉在横跨弗里兴河（the Frisching）支流的桥上追上俄军后卫。让-约瑟夫·多特普尔将军命令胸甲骑兵径直冲向俄军加农炮，夺取阵地。多特普尔是个老兵，身材魁梧，嗓门洪亮，言谈粗鄙。半小时后，拿破仑当着整个师的面拥抱了他，然后他一如既往地转身冲部下大吼：“皇帝满意你们的表现，我也很满意，所以我亲你们大家的屁股！”[104]缪拉在霍夫折损1400人，苏格兰-立陶宛籍俄军将领米哈伊尔·巴克莱·德·托利（Michael Barclay de Tolly）损失2000人，但本尼希森再度成功脱险。[105]要是本尼希森北上20英里至柯尼希斯贝格，他就逃出了陷阱。为了保卫柯尼希斯贝格，他只能在东普鲁士埃劳镇（Eylau）[106]开战，该地有1500名居民，距俄国边境130英里。本尼希森身边有58000人，但他预计不久后莱斯托克又会带来5500人。拿破仑有48000人，可奈伊和达武还在路上，他们一个在西边12英里处，另一个在东南边10英里处，两人共有近30000人。然而，俄军在火炮上占据巨大优势，他们有336门大炮，而拿破仑只有200门。

兰茨贝格（Landsberg）至柯尼希斯贝格的主干道在平原和森林之

间穿行约9英里，然后进入地形起伏的平原，该平原距埃劳1.5英里，其末端为小高地。拿破仑可以在那儿清楚纵览宽阔山谷，只见它通往有俄军布阵的显著山脊。他的左前方是滕克尼滕湖（Lake Tenknitten），右前方是瓦施凯滕湖（Lake Waschkeiten）。两湖之间有个长1000码的小坡，它在距埃劳只剩0.5英里的路口更加明显。在此路口和埃劳之间，道路变成平缓的下坡路。1807年，由牢固房屋组成的埃劳镇坐落在一处重要的十字路口，镇子右侧的小丘陵上有一座带公墓的教堂。这一带冰湖和冰冻沼泽星罗棋布，在平原最高点塞帕伦村，有些地方雪深3英尺。

1807年2月7日（周六）午前，本尼希森的军队列阵备战。下午2点，缪拉的骑兵和苏尔特麾下步兵的先头部队到达格林霍夫申村（Grünhofschen）外面的树林。接着奥热罗赶到，面向滕克尼滕湖布阵。苏尔特派第18和第46战列步兵团进攻俄军前卫，但没安排增援。第18战列步兵团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走过冻住的滕克尼滕湖末段，但他们偏离方向，到了湖的右边。第18团严重动摇，又被刺刀攻击。为报霍夫之仇，圣彼得堡龙骑兵驰过冰湖，进攻第18团左后方。两个混乱的营都被俄军骑兵逮住，并被他们冲散，所以第18团丢了鹰旗。[107] 法军龙骑兵及时赶到，反击俄军，第18团于是逃过灭顶之灾，但很多人被杀。第46战列步兵团得以有序撤退。苏尔特在施韦亨（Schwehen）和格林霍夫申之间部署炮兵，但俄军前卫开始返回主力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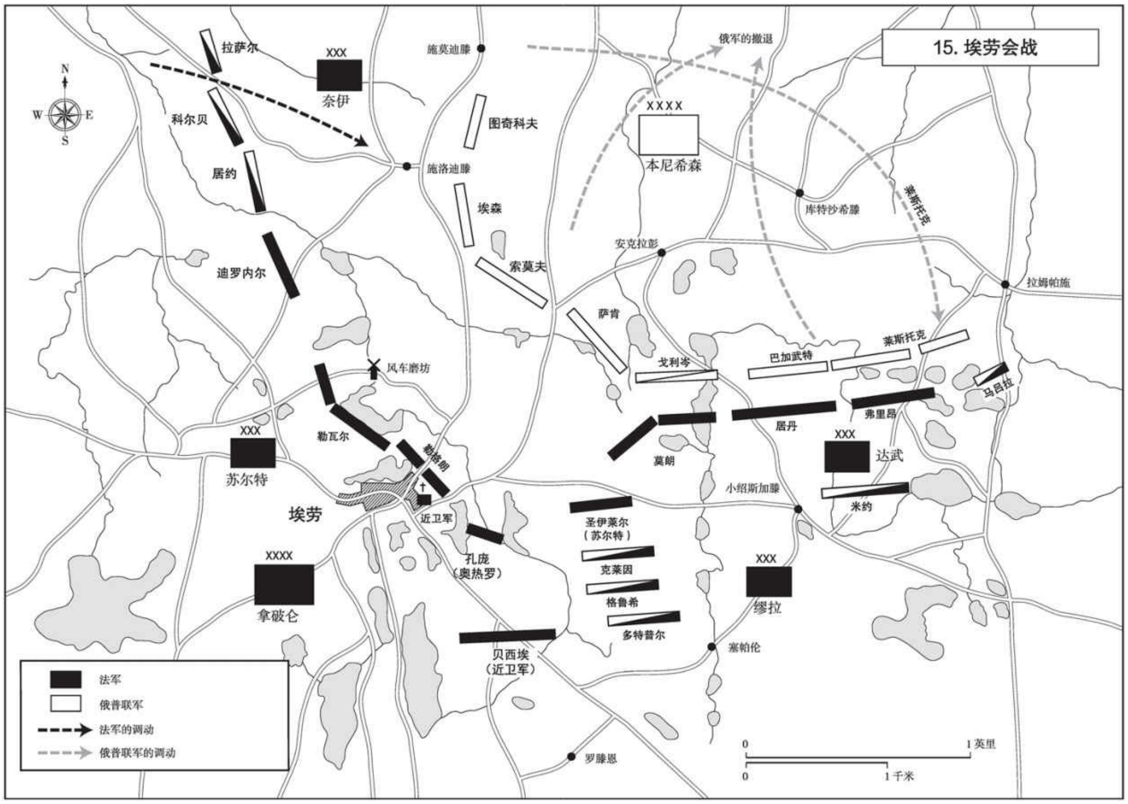
拿破仑现在占领了直到山谷的所有平原，但他损失惨重，三周后，战场上堆积的尸首依然显眼。他情愿等奈伊和达武到达，没打算当晚就猛攻埃劳，但实用短语“战争迷雾”（fog of war）概括的种种意外和误解驱使他发动了进攻。苏尔特的解释大概是最好的：骑兵预备军的一些士兵随俄军进入埃劳，他的第24战列步兵团跟着去了，于是教堂和公墓处爆发广泛的战斗，随着战事进展，自然有更多人被卷入战端。不管原因为何，现在埃劳会战将持续两天，在此期间，11.5万人在区区5平方英

里的土地上战斗。

圣伊莱尔师力克教堂和公墓。战斗中，俄军一流将领巴克莱·德·托利身中葡萄弹，他伤势严重，十五个月后才恢复战斗力。巴格拉季翁本想撤离埃劳，但本尼希森要他不计一切代价夺回小镇，于是他率三个纵队步行进入埃劳，对战法军步兵和发射霰弹的火炮。傍晚6点，俄军已收复城镇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尚未拿下教堂和公墓。本尼希森改变了主意，6点30分，他命令俄军退出城镇，前往小高地（当时的作者们称之为东边“高地”），法军遂再度占领埃劳。

夜幕开始降临。勒格朗师刚从埃劳前进了一点；圣伊莱尔师在罗滕恩（Rothenen）附近露营；米约（Milhaud）的骑兵在采森（Zehsen）；格鲁希在埃劳后方；奥热罗位于施托尔希奈斯特（Storchnest）和滕克尼滕湖之间的第二条战线；帝国近卫军在当日巴格拉季翁的开战地过夜，那儿地势较高。雪花飘落，两军将士挤在营火边。强行军时，补给马车跟不上快速前进的军队，所以不少士兵已经三天没吃过面包了，于是有人就啃战场上死马的肉。某士兵冲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抱怨道，他只能拿干草当烟抽。[108] 马尔博说，法军“数日来仅靠土豆和融雪为生”。[109]

离天黑还有一小时的时候，拿破仑查看了埃劳。“多么惨烈的景象，”弗朗索瓦-弗雷德里克·比永（François-Frédéric Billon）上尉回忆道，“街上遍布尸体。皇帝的眼里满含泪光。没人相信这位伟大战将能有那种情感，但我亲眼看见了这些泪水……皇帝尽力阻止坐骑践踏遗体，他失败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他哭了。”[110] 这天晚上天气严寒，午夜后开始下雪。在齐格尔霍夫（Ziegelhof）下方被毁掉的驿站内，拿破仑睡在了椅子上，没有脱靴。



2月8日（周日）上午8点，俄军开始猛烈地炮轰埃劳，他们的火炮靠庞大数量弥补了欠佳的准度。法军炮兵还击，暴露在风雪中的俄军队列损失惨重。寒风呼啸，大雪阵阵，可视度成了当日主导因素。能见度不时缩至10码，所以高地上的俄军有时看不见法军，指挥官也动不动就看不见部下。

9点30分，拿破仑命令苏尔特从阵线最左端向埃劳西北方移动。达武军也从反方向接近城镇，皇帝希望这能分散本尼希森的注意力。10点时，苏尔特却被俄军逼回埃劳。“两边各有300门加农炮，它们近距离倾泻葡萄弹，造成极大恐慌。”勒热纳回忆道。达武军来到拿破仑右侧，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骑兵猛攻弗里昂的前卫，阻挠了达武。左翼的苏尔特力量薄弱，达武又在缓慢痛苦地布阵，因此拿破仑得在右翼发起大规模佯攻。他指示奥热罗率9000人进攻俄军左翼，设法和达武连上。战前奥热罗病得很重，他觉得很冷，用围巾裹住头，把元帅帽塞在头顶。奥热罗靠副官帮忙才上了马，他冒着暴风雪前进，但迷失方向，直

冲俄军炮群去了。炮群在极近射程内发射葡萄弹，其方位只能靠炮管射出的火花辨认。（奥热罗在埃劳的进攻路线经过很多坡地和洼地，今人沿这条路走一走就能明白为何他麾下的旅在暴风雪中完全迷路。）十五分钟内，5000名官兵战死或负伤，奥热罗自己也受了伤。[111] 圣伊莱尔师坚持到底，力图解救达武，但也被逐退。尽管俄军炮兵轰击埃劳教堂，拿破仑仍在那观战。法军左翼实际上已溃败，右翼损伤严重，而增援又滞后。一路俄军纵队设法在战斗中进入埃劳，并接近教堂，这时皇帝发现自己也有危险。教堂随后经历一番检查，然后被毁。

上午11点30分，奥热罗显已失败，拿破仑随即突然发动其军事生涯中一次非常大胆的行动。暴风雪减弱后，他几乎把缪拉的骑兵预备军全部投入冲锋，这是拿破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骑兵冲锋。当时俄军骑兵正进攻崩溃的奥热罗军，拿破仑指向那儿，他要么对缪拉说了“你想让那些家伙吞掉我们吗？”，要么说了“带你所有的可用骑兵去击溃那纵队”（抑或两句都说了）。[112] 缪拉当时身着绿色波兰斗篷，头戴绿色天鹅绒无边软帽。他只拿了根马鞭，率领7300名龙骑兵、1900名胸甲骑兵和1500名帝国近卫军骑兵发动迅猛进攻。[113] “看在上帝份儿上，抬头！”近卫掷弹骑兵上校路易·勒皮克（Louis Lepic）大喊，“那是子弹，不是屎！”俄军骑兵遭到驱逐，退向自己的步兵战友；俄军炮兵在其大炮边被马刀砍死。法军夺回塞帕伦，缪拉冲到安克拉彭（Anklappen）才停下。（俄军反击时，勒皮克拒绝投降。因为勒皮克作战勇敢，拿破仑后来奖励他5万法郎，他同部下分享了这笔奖金。）

缪拉的冲锋阻挡了俄军中路，为拿破仑赢回主动权，但骑兵预备军伤亡惨重，折损2000人。多特普尔也身中葡萄弹，数日后死亡。与此同时，奈伊在暴风雪中沿糟糕的道路奔赴战场，速度慢得令人揪心。下午3点30分，达武已设法绕到本尼希森后方，几乎到达安克拉彭。拿破仑正要一把收紧陷阱来包围俄军时，莱斯托克突然出现，并攻击弗里昂师。离天黑仅剩三十分钟时，他把法军赶出安克拉彭，挽救了本尼希森

左翼。傍晚7点，奈伊终于到了，但他来得太迟了，没法实施拿破仑一直期盼的毁灭性进攻。夜幕降临时，双方都精疲力竭，无力再战，战事于是渐渐缓和。午夜时分，本尼希森急缺弹药，他察觉奈伊已到，遂下令撤退，把战场留给了法军。

“若两军一整天都在重创对方，”拿破仑评论道，“那么始终武装、不肯撤离的军队必将赢得战场。”[114] 可是拿破仑在埃劳赢来的只有战场。他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俄军后卫还是本尼希森主力，所以他的进攻杂乱无章、代价高昂，而且埃劳巷战是不必要的意外。因为8日上午缪拉错报俄军撤退，直到8点时拿破仑才召唤奈伊，那时已经非常迟了。冒着暴风雪进攻的奥热罗军损失太惨重，他康复期间，拿破仑便解散了这个军，把它的各部队划归其他元帅名下。因为此事，奥热罗从没真正原谅拿破仑。缪拉的骑兵冲锋壮观且有效，但这是绝望的补救措施，理由很明显——拿破仑自己的卫队都上场了。为了掩饰拿破仑的兵力劣势，近卫步兵直面敌军炮火，损失惨重。[115]

这的确是可怕的两天。鲁斯塔姆暴露在俄军面前，差点死了。他回忆道，埃劳“没多少俘虏，但有很多尸体。伤员被雪覆盖，你只能看见他们的头”。[116] 拿破仑照例试图最小化损失，声称仅有1900人死亡、5700人负伤，但更可靠的出处称，共有23名将军、924名军官以及约21000名士兵死伤。战后第12天，莱斯托克掩埋了约10000具尸体，其中法军占了一半以上。[117] 类似地，俄军有18000人死伤、3000人被俘，还有24门大炮被缴。普军损失了约800人。本尼希森仅损失不到总数1%的大炮，可见他的撤退有序，但他对沙皇说仅折损6000人，这证明不止拿破仑一人“像公报一样撒谎”。拿破仑对迪罗克承认道：“双方损失都很大，但我离基地更远，所以我的更严重。”[118]

随着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逐渐进行，战场折损率呈指数增长：在弗勒吕斯（Fleurus），总参战人员的折损率为6%；在奥斯特利

茨，折损率达15%；在埃劳，折损率达26%；在博罗季诺，损失率达31%；在滑铁卢，折损率达45%。之所以会这样，原因之一是招募的兵员越来越多，于是战斗时间经常延长（阿尔科莱会战后，埃劳会战是拿破仑的第一次两日战斗；1809年的埃克米尔会战、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瓦格拉姆会战和1813年的德雷斯顿之战也持续两日；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持续三日），然而主要原因则是战场上的加农炮数量大大增加了。在奥斯特利茨，每1000人有2门加农炮，但这一比例在埃劳跃升至4门、在博罗季诺达到4.5门。所以说，埃劳会战代表了拿破仑战争中的一种新型战斗。埃劳战事结束时，奈伊说了句话，最好地概括了这种战斗："多残忍的屠杀！又没一点战果！"[119]

---

[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5

[2] Butterfield，Herbert，*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 1929，p.7

[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2684 p.701，August 8，1806

[4] 今什切青（Szczecin）。

[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64

[6]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76

[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63

[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318 p.1028，October 23，1806

[9]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915 p.1303，December 31，1806

[1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p.287-8

[1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94

[12]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7，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97，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67

[13]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107-8

[1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Ⅱ p.317

[15] 珀涅罗珀是尤利西斯的妻子。——译者注

[1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355 p.1037，October 25，1806

[17]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97

[18]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97

[19]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482 p.1106，November 6，1806

[20]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01

[21] Coignet，Jean-Roch，*Captain Coignet* 2007，p.133

[22] 拿破仑三世的皇后。——译者注

[23] ed. Sage，Robert，*The Private Diaries of Stendhal*（New York）1954，p.253

[24]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

[25] 今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

[26]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08

[27] 中文惯称波兰立陶宛联邦，但该国国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联邦制，带有邦联色彩。——译者注

[2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426 p.1076，November 3，1806

[29] 今波兹南（Poznań）。——译者注

[30]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413 p.1070，November 2，1806

[31] 俄国5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农奴，若沙皇从农奴中征5%的人服兵役，他的军队就永远不缺人。Summerville，*Napoleon's Polish Gamble*，p.19.俄军普通士兵——农民——要服役二十五年，中途不得离队。这些人多是文盲，常常吃得差、住得差、得不到妥善照顾，而且几乎没有军饷，但他们仍是非常优秀的士兵。Lieven，*Russia Against Napoleon passim*.

[32]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0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9

[34]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230，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5 n.6

[35]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50

[36]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43 p.1222，December 3，1806

[3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11010，11064，11093，11217 and 11271

[38]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14

[39]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Ⅱ p.444

[40] *Edinburgh Review* No.23 April，1808 p.228

[41] *TLS* 15/2/1923 p.99，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29 n.1

[42] *TLS* 15/2/1923 p.99

[43]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11 n.13

[44] 今格但斯克（Gdańsk）。

[4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158-61

[4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785 p.1310，November 13，1807

[47]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7

[48]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p.402-4，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13

[49] 大陆体系的确有一个小成功：皇家海军拿不到最爱用的北德意志木材，被迫去非洲弄来更轻的木料，去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获取柚木。海军部不喜欢这些木材，因为其纤维含量不够高，战斗时会碎裂，结果造成更大伤亡。Albion，*Forests and Sea Power passim*，*TLS* 9/6/27，p.399.

[50]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03

[51]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46，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04

[52] Lentz，Thierry，*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p.265

[5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7

[5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215 p.165，February 18，1808

[5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45

[56] 《启示录》里的巴比伦大婊子。——译者注

[57] Gray，Denis，*Spencer Perceval* 1963，pp.45-6

[58] *Conservative History Journal* Ⅱ，Issue 1，Autumn 2012 p.40

[59]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36

[6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4

[6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38

[62]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19 p.1213，December 2，1806

[63]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19 p.1213，December 2，1806

[64]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19

[6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20

[66]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3

[6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3

[68]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no.13739 p.1220，December 3，1806

[69]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奥斯特曼-托尔斯泰（Alexander Ivanovich Ostermann-Tolstoy）伯爵是《战争与和平》作者的亲戚。

[70]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47

[7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28

[72]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1

[73]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6

[74]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57

[75]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p.56-7

[76] Percy，Pierre-François，*Journal des campagnes du Baron Percy* 1986，p.137

[77]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21

[78]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69

[79]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p.68-71

[8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61

[81]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p.170

[82]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p.70-71

[83]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p.251

[84]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9

[85] Sutherland，Christine，*Marie Walewska* 1979，p.61

[86] ed. Stryjenski，Casimir，*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Potocka* 1897，p.125

[8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3938 p.27，January 3，1807

[88] 1807年头三个月，拿破仑写了1715封信，那年他总共写了3000多封，比1806年写的都多。一半信件寄给军事人员，其中写给巴黎总督克拉克和海军部长德克雷的最多。另一半涉及外交（他给塔列朗写了200多封）、行政、家事与私事。鞋子和军靴的事占了63封信，有时引发了混乱。“我要面包，却给我送鞋来，”2月，拿破仑冲迪罗克抱怨道，“我要十九桶鞋干什么？跟着军队到处跑？疯了吧。”CG7 no.14341，p.207.

[89] eds.Keraú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3988 p.52，January 8，1807

[90]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29

[9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001 p.58，January 10，1807

[92] 今奥尔什丁（Olsztyn）。——译者注

[93] 今埃尔布隆格（Elbląg）。——译者注

[94] Arnold，James R. and Reinertsen，Ralph R.，*Crisis in the Snows* 2007，p.1295

[9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11 p.152，January 29，1807

[96] 原文如此，但十六章提到拿破仑也称呼奥斯曼苏丹为“你”。——译者注

[9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s.14134，14139，p.116，between January 17 and 24，1807，p.119，January 21 or 22，1807

[98] 据我们所知，二十年来，拿破仑找了21个情妇（也许是22个）。1804年12月至1813年8月，他一共给了她们48万法郎，这可是笔巨款。大量款项在他秘藏的情妇账簿上仅记作“给陛下”。

[99]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

[10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323 p.1100，September 7，1807

[10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63

[102] 然而追击并非一直紧迫。战役期间的某个晚上，拿破仑得空和贝尔蒂埃、迪罗克等人玩牌。他赢了钱，分给马穆鲁克护卫鲁斯塔姆500法郎。Cottin ed.，*Souvenirs de Roustam*，pp.140-41.

[10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

no.14270 p.174，February 5，1807

[104]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p.121

[10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41

[106] 今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Bagrationovsk）。

[107] 俄军未缴获鹰旗，所以有人推测它可能丢在了湖底。此后拿破仑只给第1营鹰旗，并且完全禁止轻骑兵携鹰旗上阵。CG6 no.13006，p.879.

[108]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0

[109]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84

[110]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123

[11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79

[112]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47

[113] 实际上仅有克莱因·格鲁希的两个龙骑兵师，多特普尔的胸甲骑兵师和近卫骑兵参战，合计约7000人。——译者注

[114]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87

[115] Uffindell，Andrew，*Napoleon's Immortals* 2007，p.245

[116]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38

[117]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42

[11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80 pp.177-8，February 9，1807

[11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294

第十九章 蒂尔西特

胜利吸引不了丧子之父。心灵开口时，就连荣誉也无幻象。

——拿破仑论埃劳会战

除了打仗，我也能做别的事，但责任最要紧。

——1807年3月，拿破仑致约瑟芬

“我亲爱的，昨天我们大战一场，”会战日晚上（2月10日凌晨3点），拿破仑从埃劳致信约瑟芬，“我是决胜者，但是折损了很多人。敌军的损失更严重，但我并未因此宽心。”[1] 当晚，他又给她写信，“为免你感到不安”，他声称法军有1600人死亡、3000～4000人受伤，并俘虏敌军12000人。约瑟芬的前掌马官、皇帝的副官克洛德·科尔比诺（Claude Corbineau）将军也战死了。“我非常喜欢这名军官，他有很多优点，”拿破仑写道，“我哀痛他的逝世。”

耶拿战役之后，大军团曾乘胜追击，但这回它损耗太多，无力再追。埃劳会战后，苏尔特的副官阿尔弗雷德·德·圣沙曼（Alfred de Saint-Chamans）上校回忆道：“皇帝走过士兵面前，他们高呼‘皇帝万岁！’但我听见其中很多人喊‘和平万岁！’还有人喊‘和平与法兰西万岁！’甚至有人喊‘面包与和平！’”[2] 圣沙曼头一次见到大军士气“有点动摇”，他认为原因是“埃劳的屠杀”。战后次日，拿破仑的公报称丢了一面鹰旗，“等这个营从敌军处缴获军旗后，皇帝会再赐他们一面”。[3] 他没有指明部队的名称，因为法军实际上丢了五面鹰旗。[4]

2月14日，拿破仑仍在埃劳，他致信约瑟芬：“这一带到处是死伤者。这不是战争最光鲜的一面。人会遭遇磨难，这么多牺牲者的景象也令灵魂崩溃。”[5] 不久之后，他开始担心军官们寄往巴黎的信太详写损失了。他致信富歇，称“他们所知军队内情就和杜伊勒里宫花园的行人

所知内阁内情一样多”，并无情地补充道：“一场大会战中死掉2000人算什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战争中，每一场战斗的死者都要多得多。”此言错得离谱。诚然，布林德海姆会战、马尔普拉凯会战、丰特努瓦会战和罗斯巴赫会战的死者更多，但绝不能说西班牙王朝继承战争、奥地利王朝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的每场战斗都如他所言。埃劳会战中，法军有近6000人死亡、约15000人受伤，而拿破仑照例掩饰死亡人数。[6]

埃劳会战后双方有两次大交锋。2月16日，两军在奥斯特罗文卡对战。2月下旬，贝纳多特与莱斯托克交手。然而除此之外无甚战事，法军和俄军分别进入帕萨格河畔与阿勒河畔的冬营，等待5月中旬战季再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拿破仑可以休息了。1807年3月，战时皇家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的往来书信中有几十封涉及军队缺乏的物资：现金、马匹、烤炉、牛羊肉、制服、衬衫面料、帽子、床单、面粉、饼干，特别是鞋子和白兰地。[7] 达吕尽了全力，比如说3月26日，他向拿破仑夸口道，军队有231293双鞋子。然而，士兵依然在受罪。12月，达吕在8个德意志城市征收5000匹马，其中3647匹于当月月底送出。[8] 至于法军在何时何地征集了多少黑麦、小麦、干草、肉、稻草、燕麦和面包，拿破仑总能收到列有上述信息的简洁清单。类似地，也有人向他通报他在德意志和波兰的105座医院里有多少人。（举个例子，7月1日，住院人员包括30863名法国人、747名法国盟国人、260名普鲁士人和2590名俄国人。[9] ）在极其严酷的战役结束后，法军需要时间来休整复原。

那不勒斯军团正同卡拉布里亚起义者战斗，约瑟夫试图把他们的艰辛和大军团的相提并论，但拿破仑完全不乐意：

> 参谋官、上校和军官两个月没脱衣服，其中有人四个月没脱了（我自己十五天没脱靴）。我们置身在雪与泥中，没有面包、葡萄酒、白兰地、土豆和肉。在长途来回行军中，我们拼刺刀时经常冒着枪弹与炮火，而且我们得疏散伤员，用敞开的雪橇拉着他们走过50里

> 格（130英里），这些艰苦没有丝毫宽慰。那不勒斯军团在美丽的那不勒斯乡间作战，那儿有葡萄酒、面包、土壤、衣服、床具、社交生活乃至女人，所以拿我们同他们相比有失品位。我们已经消灭普鲁士君权，正同剩余普军、俄军、哥萨克、（伏尔加）卡尔梅克人（Kalmyks）以及曾侵略俄罗斯帝国的北方民族战斗。[10]

因为俄国与普鲁士仍在同法国交战，拿破仑也利用这段时间补充兵员：他组建一支10000人的拜恩师，征募6000名波兰人；他从法国、意大利与荷兰调来援军，提前一年征召1808年度新兵。埃劳冲击了他的不败神话，如果他想让奥地利保持中立，就得抹去这个污点。这一需要在2月下旬尤为明显：法国提出的媾和条件已经比迪罗克呈给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卢凯西尼侯爵的宽松很多，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仍然不肯讲和。

若拿破仑想在春季发动进攻战役，他就得拿下防卫森严的富庶港口但泽，否则俄军可在皇家海军的帮助下袭击他的后方。1807年1月20日，25名普军士兵乔装成农民，在斯德丁绑架了维克托。此后勒菲弗元帅领到攻打但泽的任务，他时年52岁，头发斑白。5月24日，勒菲弗攻克但泽，稳固了法军左翼，拿破仑便送他一盒巧克力。元帅不以为意，直到打开盒子——他发现里面塞了30万法郎的钞票。一年后，骄傲的共和党人、雾月十八日拿破仑的代表勒菲弗加封但泽公爵。

拿破仑一边重建军队、筹备战役，一边继续管理帝国小事。得知但泽陷落（因为此事，克拉克奉命在巴黎安排礼炮齐射和《感恩赞》演唱）之日，皇帝命令荣誉军团总监拉塞佩德“致信第13战列步兵团下士贝尔诺达（Bernaudat），叮嘱他将饮酒量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他凭借勇气受赏勋章，不能仅仅因为他喜欢喝点酒就收回奖励。叫他别陷入可能有损他佩戴的勋章的境地”。[11] 1807年4月大概是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中最安静的月份，但他依然写了443封信。他住在芬肯施泰因城堡（Finkenstein Castle），那儿有很多火炉。（“我经常夜里起来，所以我喜欢看见明火。”）歌手奥布里（Aubry）小姐在巴黎歌剧院（Paris Opéra）[12] 演出时坠下机械云，摔断了手臂。舞台总管布特龙

（Boutron）与其代理人格罗迈尔（Gromaire）争论谁是事故责任人。在1000多英里外的芬肯施泰因，拿破仑站在格罗迈尔这边，他致信富歇："我总是支持弱者。"[13]

4月26日，俄普签订《巴滕施泰因条约》，双方确认依然进行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邀请英国、瑞典、奥地利与丹麦加入。前两个国家积极响应：6月，英国加入反法同盟，它用出资的方式出力，同时继续靠海军钳制法国的海外贸易；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在奥斯特利茨结束后，瑞典没有与法国媾和，这时它也派来一小股军队。拿破仑从未原谅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IV），说此人"是个疯子，比起斯堪的纳维亚的勇士国度，他更应该去小屋（Les Petites Maisons，巴黎疯人院）称王"。[14]

5月下旬，拿破仑完成了筹备工作：但泽已然拿下；病号离开了前线；补给足以维持八个月。他的野战军包括123000名步兵、30000名骑兵、5000名炮兵。拿破仑决定在6月10日大举进攻，但就像1月时一样，本尼希森抢先动手。6月5日，他在古特施塔特（Guttstadt）攻击奈伊。次日，拿破仑离开芬肯施泰因，天气极热，他便坐进敞篷马车，打趣道："我非常高兴敌军不愿让我们去找他们。"[15] 皇帝照样渴望来一场可能终结战役的决定性会战，当天他调动了所有的军。达武已命令阿伦施泰因的两个师上前威胁俄军左翼。他故意让一个信使被捕，此人身上的假消息称，达武的40000人已准备好进攻俄军后方，其实他的军总共只有28891人。次日，本尼希森下令撤退。与此同时，苏尔特军的大量士兵渡过帕萨格河，逼退俄军右翼。

6月8日，拿破仑盘问来自本尼希森后卫的战俘，得知他正进军古特施塔特。看来本尼希森可能在那儿开战，但他没有那样做，反而退回防卫森严的海尔斯贝格营地。拿破仑率军前进，缪拉、奈伊打头，拉纳、帝国近卫军跟随其后。后面的莫尔捷距他们有一日行军里程。达武在

右，苏尔特在左。军体系运转良好。巴格拉季翁掩护本尼希森撤退，他的军队冒着酷热走过尘土飞扬的长路，摧毁身后的桥梁和村庄。拿破仑认为本尼希森或许正前往柯尼希斯贝格，6月9日，他下令进攻。他以为对手只是敌军后卫，但他遇上的其实是整支俄军，对方有53000人与150门大炮。

海尔斯贝格镇位于阿勒河左岸谷地，系俄军的设防作战基地。数座桥梁通往右岸郊区。俄军建好了四个大多面堡掩护渡口，多面堡之间散布着箭头堡（flêches，箭头形土木工事），从6月10日清晨开始，他们便在那些工事中拼杀。缪拉和苏尔特指挥战斗，折损甚多人马，丢了3面鹰旗。下午3点时分，拿破仑赶到，冲他俩的作战方式大发脾气。战斗旋涡一度极其逼近皇帝，乌迪诺请他离开，称若他不走，自己的掷弹兵会带他走。“晚上10点，皇帝经过我们中间，”青年副官艾马-奥利维耶·德·戈纳维尔（Aymar-Olivier de Gonneville）中尉回忆道，“他似乎没注意到欢呼致敬，看上去忧郁消沉。我们后来得知，先前猛攻俄军不是出于他的意思，他尤其不想动用骑兵。（缪拉）为此挨批，颇为尴尬地跟着皇帝。”[16] 晚上11点战斗才结束，战后双方随营人员抢劫死伤者，此景令人作呕。法军有10000多人受伤，俄军伤员多达6000人，黎明降临在这片万分凄凉的战场上。日上三竿时，两军都离开了尸臭弥漫之地。

拿破仑在海尔斯贝格缴获大量库存和补给，但他盯上了柯尼希斯贝格，那里的给养远比海尔斯贝格的丰富。如果俄军想去柯尼希斯贝格，他们就得返回阿勒河对岸。拿破仑知道小集镇弗里德兰有座桥，遂派拉纳侦察该地。与此同时，他把其余军队分为两半：缪拉领自己的骑兵、苏尔特军、达武军（共60000人）攻打柯尼希斯贝格；他自己领80000人返回埃劳。

中型城镇弗里德兰掩映在马蹄形河湾中。6月13日，拉纳的前卫报

称大股俄军在弗里德兰集结。他按照军的宗旨开战，设法守了整整九个小时，直到援军赶来。下午3点30分，俄军前卫的3000名骑兵渡过阿勒河，赶走了弗里德兰镇的法军。埃劳在弗里德兰以西15英里处，本尼希森似乎以为，次日他可以渡过阿勒河，消灭拉纳，然后趁埃劳的拿破仑赶来前返回对岸。低估拿破仑的速度永远是不明智的，何况夏日将其行军地带的地面晒得坚硬。

阿勒河在弗里德兰拐弯，环绕小镇南面和东面，镇东则是米尔施特里姆湖（Lake Millstream）。阿勒河又深又急，岸高30多英尺。小镇前方的平原宽广肥沃，将近2英里宽，遍布齐腰高的小麦和燕麦。平原紧挨一片密林——索尔特拉克树林（Sortlack Wood）。米尔施特里姆湖亦有陡峭岸壁，并把平原分为两半。除了小镇的石桥，本尼希森在河上增修三座浮舟桥。俄军统帅携部下和他的英籍联络官约翰·希利-哈钦森（John Hely-Hutchinson）上校登上弗里德兰教堂钟楼，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在那儿可以非常清楚地纵览战场全景，但他们没察觉俄军左翼与其后方的三座浮舟桥相距太远，也没发现弗里德兰的危险性：小镇位于同牛轭湖相差无几的米尔施特里姆湖湖湾，一旦桥梁被毁，或被人群堵塞，它就会变成巨大的死亡陷阱。



6月14日（周日）——马伦戈会战纪念日——凌晨2点至3点间，乌迪诺到达波斯滕恩村（Posthenen）前方的平原。军人中的军人乌迪诺冲动强悍，深受部下爱戴。终其军事生涯，他挺过了34次负伤，1805年的战事中，他丢了好几颗牙齿，还几乎失去一部分耳朵。[17] 乌迪诺的父母生育了9名子女，但另外8个都夭折了。乌迪诺自己有10个孩子，他是个业余画家，爱收集陶制烟斗。这次战役期间，晚上他和达武用手枪射烛火。此刻乌迪诺派兵进入索尔特拉克树林，前线也出现了密集的散兵火力和加农炮炮击。萨克森轻骑兵已同拉纳会合，等出色的骑兵指挥官、贵族子弟埃马纽埃尔·德·格鲁希（Emmanuel de Grouchy）将军率一

个龙骑兵师赶到后，他便有足够兵力在拿破仑到来之前阻击约46000名俄军士兵。

俄军可在海因里希斯多夫（Heinrichsdorf）威胁法军后方。本尼希森派大队人马渡过阿勒河，进入弗里德兰，命令他们面向海因里希斯多夫展开。南苏蒂的胸甲骑兵奉拉纳的指令前往海因里希斯多夫，逐退俄军先头部队。波斯滕恩的格鲁希随后迅速上前，他从侧面冲锋，攻入俄军大炮之间，砍杀无人掩护的炮兵。此时法军骑兵阵型混乱了，俄军反冲回去，但上午7点时格鲁希已稳住海因里希斯多夫东边的法军阵线。

接下来的战斗乱作一团，狡猾敏锐的加斯科涅人（Gascon）拉纳元帅得心应手地指挥战事，他要阻拦已经过河的六个俄军师，但手头仍然只有9000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于是乎，拉纳在挺拔的庄稼间排出特别密集的散兵线，借其掩护，他不断派小股步兵和骑兵上上下下、进出树林，从而夸大自己的兵力。幸运的是，正当本尼希森列队进攻时，莫尔捷军到达战场。他冲进海因里希斯多夫，正好打退俄军步兵。迪帕在村里留下乌迪诺的三个掷弹兵营，然后在村子右边列阵。之后莫尔捷的波兰师也赶到了，亨利·东布罗夫斯基（Henri Dombrowski）将军的三个波兰团进入阵地，支援波斯滕恩的炮兵。索尔特拉克树林爆发了可怕的战斗，乌迪诺师牺牲自己，成功阻挡俄军步兵。上午10点，让-安托万·韦迪耶（Jean-Antoine Verdier）将军的师已同拉纳会合，他的总兵力遂达到40000人。

拿破仑尽快驰往弗里德兰。本尼希森意识到，战场外的拿破仑正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对付他，遂更改了自己的预期战果。现在他仅仅希望守住战线，等天黑后再次成功撤退。然而在那个纬度，仲夏夜晚来得非常迟，而且中午时分拿破仑就已到达战场。他骑着阿拉伯骏马从埃劳赶来，旁边跟着拼命追赶的警卫。乌迪诺的制服被子弹打穿了，他骑着一匹受伤的马来到皇帝面前，恳求道：“给我援兵，我就把俄军扔下

河！”拿破仑在波斯滕恩后方的小山上观望，立刻察觉本尼希森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米尔施特里姆湖分割平原，俄军左翼易被推往河边。

拿破仑确信本尼希森即便发现损害也无法弥补它，于是他一边和乌迪诺等待增援，一边允许两军暂歇。双方将士都高兴能有机会去找遮阴处和水。这个仲夏日万里无云，热浪令人窒息，阴凉处的气温也有30℃，士兵们又花了几小时不断咬开子弹袋（子弹内含硝石）[18]，更是渴得发狂。拿破仑坐在简陋的木椅上，在俄军炮兵射程内吃午饭——黑面包。侍者求他退后，他则说：“和我的午餐比，他们的晚饭会吃得更不痛快。”[19] 有些人担心现在进攻已然迟了，建议将攻势推迟到次日，拿破仑回答：“敌人不会让我们两次逮到这种错误。”[20] 军人兼外交官雅克·德·诺万（Jacques de Norvins）称，他看见拿破仑走上走下、用马鞭抽打长长的野草，还对贝尔蒂埃说：“马伦戈日！胜利日！”[21] 拿破仑一直擅长抓住机会宣传纪念日，而且他也很迷信。

下午2点，拿破仑下令5点时恢复战斗：奈伊向索尔特拉克进攻；拉纳继续守中路，乌迪诺的掷弹兵倾向左边，将敌人对奈伊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莫尔捷拿下海因里希斯多夫后驻守该地，维克托[22] 和帝国近卫军则在中后方留作预备。希利·哈钦森记载道，本尼希森与其部下在教堂钟楼上眺望，只见“地平线如同系上一条钢制厚腰带，闪闪发光”。[23] 本尼希森命令俄军撤退，但是太迟了。面对正在赶来的敌军，试图撤离太危险，于是他立刻取消撤军。

下午5点，20门大炮齐射三轮，宣告大军团开始进攻。奈伊的1万名步兵拥入索尔特拉克树林，6点时已扫清林子。他的纵队随后向俄军左翼进军。让-加布里埃尔·马尔尚（Jean-Gabriel Marchand）师冲入索尔特拉克村，把很多守军赶下了河。马尔尚接着沿河西行，封锁弗里德兰半岛，俄军被关在里面，很容易被法军炮兵击中。拿破仑命令维克托军顺着埃劳公路上行，从西南方前往弗里德兰。

奈伊军筋疲力尽，开始后退。塞纳蒙遂把他的30门大炮平分为两组，其火力配置为加农炮每门300发弹药、榴弹炮每门200发弹药。他用喇叭吹奏“向前进攻”的号令，炮兵队迅速跑上前，卸下大炮后开火。大炮的射程先是600码，再是300码，然后是150码，最后炮兵仅在60码内发射霰弹。俄军伊斯梅洛夫斯基近卫团（Ismailovsky Guards）和帕弗洛夫斯基掷弹兵团（Pavlovsky Grenadiers）奋力攻击炮群，但二十五分钟内，约4000人死在炮火之中。两发霰弹消灭了一整队冲锋的骑兵。俄军左翼一败涂地，又被阿勒河困住。塞纳蒙折损了一半炮兵，但他的行动成了军事教科书里著名的“炮兵冲锋”。奈伊军重整队伍，由第59战列步兵团开路，从西边杀过弗里德兰街道。晚上8点时，他们拿下城镇。俄军被逼得退到桥边，桥梁起火，很多士兵在试图渡过阿勒河时淹死了。

这时，拉纳和莫尔捷的师倾泻在平原上，弗里德兰右边的俄军部队纯粹是被他们推下了河。很多俄军士兵用刺刀战至最后一刻，尽管依然有二十二个骑兵中队沿阿勒河左岸逃走了。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没有像耶拿会战后那样追击俄军，人们对此提出了各种解释：天热；军队疲惫；夜幕降临；士兵在镇里抢食物。拿破仑可能也担心大举屠杀俄军会令亚历山大更不愿妥协，而那时他非常需要和平。他对康巴塞雷斯说：“他们的兵总体来说不错。”[24] 拿破仑先前没承认过这点，五年后他本该好好记住自己的话。

通力合作使弗里德兰会战成为奥斯特利茨和乌尔姆会战后拿破仑最辉煌的胜利。法军有11500人死亡、负伤和失踪；俄军彻底溃败，虽说只丢了20门大炮，但据估计他们损失约20000人，占其总兵力43%。[25] 佩尔西的100名军医得连夜工作，一名将军回忆道：“军队称之为野战医院的那些可怕地儿在搞截肢和解剖，草坪上满是从人身上切下来的肢体。”[26]

战后次日，莱斯托克撤离柯尼希斯贝格，拿破仑也发布了一期经典

公报：

> 士兵们！6月5日，俄军袭击我们的营地，他们误解了我军不行动的原因。俄军后来察觉我们的休憩只是狮子的休整，但为时晚矣，现在他们得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从维斯瓦河出发，像鹰一样迅猛奔向来自涅曼河的军队。你们在奥斯特利茨庆祝加冕纪念日，今年你们当之无愧地庆祝了终结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马伦戈会战纪念日。法军将士们，你们不负自己，也不负我。你们赢取了可确保自身持续性的和平，你们将戴着桂冠返回法兰西。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安逸下来，不受英国的恶毒影响。我给你们的奖励将证明我感激你们，深爱你们。[27]

6月19日，俄军返回涅曼河对岸，将蒂尔西特最后一座普鲁士城镇中的桥梁付之一炬，沙皇亚历山大也派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Dmitry Lobanov-Rostovsky）公爵请求停火。下午2点，拿破仑到达蒂尔西特。没有俄军相助，普军无力再战，只能完全跟随沙皇的外交步调。两日的和谈后，双方同意停火一个月。第三日晚上，拿破仑请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共进晚餐。他举杯祝福沙皇健康，提议两大帝国以涅曼河为天然疆界，此言暗示道，若达成完全友好的和平，他不会索求任何俄国领土。在此基础上，双方立刻安排拿破仑与沙皇会面。蒂尔西特附近的正式停火线涅曼河中央漂着一只木筏，其缆绳牢牢系于皮克图珀嫩（Piktupönen）两岸。近卫炮兵指挥官让-安布鲁瓦兹·巴斯东·德·拉里布瓦西埃（Jean-Ambroise Baston de Lariboisière）在筏子上支起一顶帐篷充当中立地。[28] 拿破仑在第85期战局公报中写道：“少有比这更有趣的场景了。”两岸确实有大群士兵围观会面。[29] 拿破仑重复道，会见旨在至少保证“现存一代的和平”。战争打响八个月后，他热盼和平，也急着返回巴黎继续监督深深影响法国人生活诸多方面的改革。

1807年6月25日（周四），两位皇帝会面。这次会见是史上最伟大的峰会之一，它本身比其古怪地点著名得多。虽说最高统治者不可能产生真实友情，但拿破仑用尽一切手段令29岁的俄国绝对主宰为己倾倒，同他建立融洽的私人关系与有效的合作关系。7月7日，俄国签署谈判达

成的和约，两天后普鲁士签约。此后，欧洲实际上划分为法国与俄国的势力范围。

拿破仑先到木筏上。亚历山大身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Preobrazhensky Guards）的深绿色制服，走上筏子同拿破仑拥抱。沙皇的开场白是："我将是仅次于你的英国之敌。"[30]（另一个帝威较少的版本是："我像你一样憎恨英国人。"）多年来亚历山大乐意接受英国的黄金，他并不像这番话说的那样讨厌这些金子。然而，不管他用了什么说法，拿破仑立刻意识到法俄可能达成广泛协议，事实上，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些话改变了一切"。[31] 然后，他们步入帐篷里的豪华沙龙，单独谈了两个小时。"我刚刚见了沙皇亚历山大，"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我对他非常满意。这位青年皇帝一表人才、贤德明智，比人们想象的聪明。"[32]

拿破仑称筏上帐篷的门造型华丽。门的顶端立着分别象征俄国和法国的鹰以及上了漆的巨大花押字"N"（代表拿破仑）与"A"（代表亚历山大），但那里没有"FW"（代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位置。弗里德里希·威廉也去了蒂尔西特，可现场情况令他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卑微的君主。第一天压根没人请他上筏，他只好裹了件俄军厚大衣，在右岸等待筏上两人决定普鲁士的命运，而他们对他的王国并无本能感情。[33] 次日，即6月2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获准上筏，以便亚历山大把他介绍给拿破仑。这时他发现，普鲁士得为法俄结盟的巨大成本埋单。木筏上的第二次会议结束后，亚历山大在下午5点进入蒂尔西特镇，100门大炮鸣炮致敬，拿破仑亲自迎接，而且他住进了镇上最好的宅邸。弗里德里希·威廉来了后，没有鸣炮、没有迎接，分给他的住处则是当地的磨坊主家。[34]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都认为普鲁士国王迂腐狭隘、惹人厌烦、只能谈有限话题，这无助于改善他的地位。[35] "他和我谈了半小时我的制服和纽扣，"拿破仑回忆道，"所以最后我说：'你得去问我的裁缝。'"[36] 之后的每个夜晚，三位君主早早用晚餐，然后互

道晚安，接着亚历山大瞒着弗里德里希·威廉返回拿破仑的寓所，同他长谈到下半夜。

拿破仑和沙皇经常交相检阅对方的近卫军、交互发放勋章与饰物（在亚历山大的请求下，拿破仑授予一名俄军掷弹兵荣誉军团勋章），还在盛宴上互相恭维祝酒，但两人关系的缔结归功于深夜的哲学、政治和战略谈话，有时他们一口气谈上四个小时。亚历山大致信妹妹时提过这些会谈。两人谈大陆体系、欧洲经济、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以及如何让英国走上谈判桌。“我在蒂尔西特时常常聊天，”拿破仑回忆道，“我叫土耳其人野蛮人，说应该把他们赶出欧洲，但我没打算这样做，因为……不论君士坦丁堡落入奥地利还是俄国之手，对法国都无益。”[37] 有一次他们聊到更超现实的话题——什么政体最好。专制君主亚历山大推崇君主选举制，拿破仑的皇冠好歹经全民公决确认过，但他支持独裁制。“因为谁有资格当选呢？”拿破仑问道，“一个世纪才出一个恺撒、一个亚历山大，所以选举肯定得靠运气，而继承无疑比掷骰子好。”[38]

俄国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eodorovna）认为，俄军为霍亨索伦王朝流的血够多了，而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也坦率地仰慕拿破仑。他们两人给亚历山大施压，要他求和。沙皇在蒂尔西特达成的交易没怎么反映他的失败程度：普鲁士几乎承担了全部代价，俄国除了伊奥尼亚群岛（包括克基拉岛，拿破仑称它为“亚得里亚海的钥匙”）外未失寸土。[39] 拿破仑保证不强迫奥尔登堡等沙皇近亲统治的德意志国家加入莱茵邦联。亚历山大同意撤出不久前占领的土耳其领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它们从来不是俄国领土），并获准自由入侵瑞典属芬兰。沙皇必须在蒂尔西特做出的大让步仅仅是答应加入大陆体系，拿破仑希望借此大大增加英国的求和压力。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邀请拿破仑去圣彼得堡。“我知道他怕冷，”沙皇对法国大使说，“但我定要他来。我会叫人把他的住处加热到像埃及一样暖和。”[40] 亚历山大还在俄国下令焚烧反拿破仑的文学作品，此后俄国人民绝不能叫他的新盟友“波拿巴”，

只能用“拿破仑”。[41]

拿破仑极其宽待俄国，但他对普鲁士完全相反，严厉惩罚该国。“没有废黜普鲁士国王是我在蒂尔西特犯下的最致命错误，”他后来说，“我本该那样做。我犹豫了一会儿。我确信亚历山大不会反对，只要我自己不戴上普鲁士王冠。”[42] 沙皇从普鲁士割走波兰东部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此举难以称得上盟友的行为，然而其他沉重义务都得由拿破仑履行。普鲁士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便在这两次瓜分中新增的普鲁士省土地上创建华沙大公国。波兰人希望这是重建波兰王国的第一阶段，但华沙大公国没有对外的外交代表权，其大公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萨克森国王）是德意志人，其议会也没多少实权。易北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组成新王国威斯特伐利亚，科特布斯（Cottbus）划归萨克森。拿破仑索要巨额战争赔款1.2亿法郎，为了付钱，弗里德里希·威廉只好变卖土地，并把整体税负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从10%提至30%。拿破仑还强迫普鲁士加入大陆体系，禁止它在内策河（the Netze）[43] 、布龙贝格运河（Bromberg Canal）[44] 等水路收费。[45] 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路易的荷兰王位、拿破仑的莱茵邦联保护人身份将获承认，法军继续在维斯瓦河、易北河与奥德河上的要塞驻军。普鲁士的人口缩至450万（为战前人口的一半），其领土减少三分之一，其军队只能留下42000人。在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几乎所有领土上，普鲁士国王的一切“实际或最终权利将被彻底抹去”。萨克森国王甚至有权借道普鲁士向华沙大公国派兵。拿破仑如此羞辱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侄孙，普鲁士必然永怀怨愤，但他估计自己与俄国的新友谊可以压制奥地利和普鲁士，阻止它们报复《普雷斯堡条约》与《蒂尔西特条约》。

英国一直算得上拿破仑的敌人，但随着权力开始接近巅峰，现在他的战略旨在确保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三个大陆国家绝不会同时对付他。所以，他既要让它们互相敌对，又得尽量让它们敌视英国。他利用

普鲁士对汉诺威的渴望、弗里德兰会战后俄军无力再战的局面、与奥地利的联姻、俄奥对奥斯曼帝国看法的分歧以及三国都害怕的波兰复国运动，以防四国一同与己开战。[46]《亚眠条约》废止后的十年间，虽说法国成了四国最害怕的欧洲霸主，但拿破仑避免了同时与它们为敌，这证明了他的政治才干。欧洲实际上划分为法国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此乃这一战略的决定性时刻。

某晚，晚年拿破仑在流放地圣赫勒拿岛谈论自己一生中最幸福之时，随员们提出了不同答案。“是的，就任第一执政时、结婚时、罗马王（他后来添的儿子）出生时，我都高兴，”他同意他们的看法，“但那时我并不完全相信自己地位稳固。也许我在蒂尔西特时最幸福。我刚刚克服埃劳会战等诸多动荡与焦躁，正决胜沙场、指点律令，皇帝与国王们向我献殷勤。”[47]选择这个时刻是明智的。

离法普签订条约仅剩三天时，普鲁士王后路易莎在7月6日到达蒂尔西特。她会见拿破仑，同他谈了两小时，恳求他归还易北河西岸的马格德堡。普鲁士王后乃倾城绝色，以至于1795年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为路易莎与其妹妹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所创作的雕像被裁定为太过撩人，不可公开展出。[48]（拿破仑仅仅评论道：“身为35岁人士，她的容貌达到了人们能想到的最佳水平。”[49]）他致信贝尔蒂埃时提起这次会面，说“美丽的普鲁士王后的确哭了”，并补充道，“她认为我来这儿就为了看她的漂亮眼睛”。[50]拿破仑曾研究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战役，非常清楚马格德堡乃战略要地，他不会被王后的泪眼征服，让出重要的军事要塞，他绝不可能如此轻率。[51]他后来把路易莎求取马格德堡一事比作高乃依剧作《熙德》（*Le Cid*）中希梅纳索求罗德里格伯爵头颅的“悲剧风格”场景：“‘陛下！公正！公正！马格德堡！’最后为了让她停下，我求她坐下。我清楚这个办法最能缩短悲剧情节，因为一旦坐下，后面就变成喜剧了。”[52]他声称某日晚宴上，路易莎从头到尾只说马格德堡的事，弗

里德里希·威廉和亚历山大离开后，她继续力争。拿破仑说要送她一朵玫瑰。“我收下了，”她说，“但我一并收下马格德堡！”“啊，夫人，”他回答道，“是我给你玫瑰，不是你给我。”[53]

马格德堡没有复归普鲁士，而是划归威斯特伐利亚。这个新王国由不伦瑞克、黑森-卡塞尔、易北河西岸的普鲁士领土组成，后来又兼并了部分汉诺威领地，占地1100平方英里。这个新政治实体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拿破仑却让一个22岁的男孩当它的国王，而他之前的成就不过是擅自在美国休假、没头没脑地缔结了一桩在法律上仅算半作废的婚姻、在近期战役中非常称职地指挥拜恩与符腾堡军队（但仅仅是称职）。[54] 热罗姆资历不够，当不来国王，可拿破仑依然觉得家人最可靠，尽管反面证据已然显著：吕西安流亡；热罗姆结婚；那不勒斯的约瑟夫无能；波利娜大肆通奸；荷兰的路易对英国的走私行为视而不见。

拿破仑希望威斯特伐利亚为其他德意志国家树立榜样，鼓励它们加入莱茵邦联，或者至少脱离普奥轨道。11月15日，他致信热罗姆：“你的人民要享受德意志人不知道的自由、平等与幸福，这至关重要。”他随信附上新王国宪法，预言道，一旦人们“尝到开明自由政府的好处”，就再没人想恢复普鲁士的统治了。拿破仑命令热罗姆“忠实遵循宪法……《拿破仑法典》的优势、公开审判与新设立的陪审团将决定你的统治……比起最伟大的战绩……我更看重它们的影响”。然后他开始称赞精英政权的益处：“德意志人民急切盼着非贵族出身的人才享有平等就业权之时，盼着农奴制等主权和人民之间的一切隔阂消亡之时。”考虑到收信人是谁，此言可谓讽刺。拿破仑没打算公开这封信，但它表露了他的最佳理念。“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意大利人民、西班牙人民一样，要求获得平等与自由的价值。”他写道，“我已经变得相信特权阶级施加的负担违背了普遍民意。当一个行宪政的国王。”[55]

拿破仑经常批评约瑟夫、路易和欧仁，热罗姆亦常常挨训。有一

次，拿破仑甚至指责他太幽默："你的信太风趣。战时不需要俏皮话。你的文字必须准确，并显得坚毅简洁。"[56] 兄弟们都不是合格君主，拿破仑无休止地对他们吹毛求疵，但这样做帮不上忙。"他具备成才的素质，"拿破仑对约瑟夫说起热罗姆，"但他听到这话会吃一惊，因为我给他的信全是训斥之辞……我故意把他放在孤立的领导位置上。"[57] 拿破仑知道自己对家人的要求有多严，可他的法子屡屡失败。

"你读到这封信时，"7月7日，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我已同俄普媾和，热罗姆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冠已得到承认，他的国家有300万人。这消息我只跟你说了。"[58] 拿破仑经常把寄给约瑟芬等人的信当作精妙的宣传工具，最后一句话表明他做到了何等地步。他还说："我非常想见你，而命运决定何时适宜见你。也许快了。"前一天他在信中写道，"小克庞男爵有些盼望拜访"，这隐隐表示想见约瑟芬是实情。[59] 玛丽将留在波兰。

拿破仑昼夜兼程坐了100小时马车，在7月27日早上7点返回圣克卢宫。特地为他建造的凯旋门前有路障，而他走得太快了，护卫们都来不及挪开障碍（他仅仅命令车夫绕行）。[60] 他在国外待了306天，这次离国是他军政生涯中最久的一次。"我们看着拿破仑从波兰腹地马不停蹄地赶回，"沙普塔尔回忆道，"他回来后就召集参政院。他就像前夜睡在自己的卧室一般，依旧头脑精明、思维连贯、思辨有力。"[61] 拿破仑从圣克卢宫给玛丽寄去自己的肖像和一些书，并写道："我温柔可爱的玛丽，我离开法国近一年后回国，你如此热爱你的国家，会理解我此刻的喜悦。如果你在这儿，这份喜悦会更完满，但我的心里有你。"[62] 接下来的18个月，他再没联系她。

---

[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277 pp.176-7，February 9，1807

[2] Saint-Chamans，Gén.Comte Alfred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Comte de Saint-Chamans*

1896，p.59

[3]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44

[4] 第10轻步兵团与第18、第24、第44、第51战列步兵团丢了鹰旗。

[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312 p.191，February 14，1807

[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240 p.608，April 13，1807

[7] SHD GR2/C 66

[8] SHD GR2/C 66

[9] SHD GR2/C 66

[10]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448 pp.249-50，March 1，1807

[1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743 p.837，May 27，1807

[12] 即前文提过的歌剧院，事实上，当时它的名称是帝国音乐剧院（Académie Impériale de Musique）——译者注。

[1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224，pp.600-601，April 12，1807

[1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947 p.926，July 4，1807

[15]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18

[16]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Ⅰ p.50

[17] Kiley，Kevin，*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p.200

[18] 拿破仑战争使用的子弹一般是定装弹药，也就是说，在发射之前把定量的发射药、底火和弹头用一个纸或者金属的弹壳装起来，使之成为一颗完整的子弹。士兵在咬开纸袋再往枪管里倒火药时，嘴唇和牙齿可能会触碰到火药（含有硝石）。——译者注

[19]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3

[20]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4

[21]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34

[22] 大军团已用布吕歇尔换回了维克托。——译者注

[23] Wilson，Sir Robert，*Campaigns in Poland in the Years 1806 and 1807* 1810，p.157

[2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74 p.898，June 19，1807

[2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250-51

[26] Woloch，Isser，*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1979，p.199

[27] La Bédoyère，Charles de，*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35，Ⅱ p.481

[28]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08

[29]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74

[3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787，July 1，1812

[3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787，July 1，1812

[3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68 p.895，June 16，1807

[33]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08

[34]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p.141

[35]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14

[3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5

[37]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84

[38]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 ，p.11

[39] Fox，Robert，*The Culture of Science in France 1700-1900* 1992，p.305

[40] eds. 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 （Moscow）2003，p.18

[41] Wesling，Molly，*Napoleon in Russian Cultural Mythology* （New York）2001，p.3

[4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4

[43] 今诺泰奇河（Noteć）。——译者注

[44] 布龙贝格即今比得哥什（Bydgoszcz）。——译者注

[45]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p.239-45，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13

[46] Butterfield，Herbert，*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 1929

[4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62-3

[48]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17

[49]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91

[5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51

[51] 那不勒斯王后玛丽亚·卡罗利娜、俄国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普鲁士王后路易莎与斯塔埃尔夫人意识到拿破仑深深厌恶女性干政，她们都痛恨他。"看看这个妓女（catin）能干什么，她长得又丑！"当年4月，他如此描写斯塔埃尔夫人，"要想不生气可真难！"CG7 no.15337，p.650.

[5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5

[5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5，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87

[54]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 （New York）1965，p.15

[5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812 p.1321，November 15，1807

[5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499 p.730，May 2，1807

[57]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528 p.743，May 4，1807

[58]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982 p.939，July 7，1807

[5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972 p.936，July 6，1807

[6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57

[6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27

[6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072 p.987，July 29，1807

第二十章 伊比利亚半岛

西班牙是外国干涉其内政后最无利可图的欧洲国家。

——1820年，威灵顿公爵致卡斯尔雷勋爵

那场倒霉的战争毁了我，它分散我的兵力、倍增我的负担、打击军队士气……我的灾难统统绑在那个致命的绳结上。

——拿破仑论半岛战争

拿破仑清楚有必要在法国建立新的社会等级制，并且新制度的基础应为对国家的贡献，而非偶然的出身。1807年夏，他返回巴黎，着手设立新的等级制。“在蒂尔西特时，新贵族阶级的主要头衔被设立了，”拿破仑的侍从长之子、达武麾下的炮兵军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Anatole de Montesquiou）回忆道，“欧洲所有的内阁长期指责皇帝不在身边设爵位，他们认为这让法国看起来像在闹革命。”[1] 设立荣誉军团有些倾向于创立新型精英特权体系，但它无法为整个社会体系奠定基础。1802年5月，拿破仑抱怨道，除非被“一些花岗巨岩”支撑，否则他的新秩序仍是“一盘散沙”。[2] 阶级和头衔组成的等级体系顺理成章地吸引了军官拿破仑，但他也想避开旧王朝的致命缺陷，即那些由世袭和合法特权引发的问题。他照常在古代世界寻求指导。“取消贵族对亲王毫无益处，”他后来在《恺撒战史》中写道，“相反，他顺其自然，根据新原则复建旧家族，进而让一切回归原轨。”[3]

1808年3月，帝国伯爵、男爵和骑士阶层建立。拿破仑在才干基础上引入贵族（新贵族中，20%的人来自工人阶级，58%的人来自中产阶级），从而利用法国革命民众的报国志愿。[4] 他并不认为重建贵族制违背了大革命精神。“法兰西人民只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战，”他告诉康巴塞雷斯，“现在，他们说我的制度是贵族制，其实它根本不是，因为它没有特权和世袭……新贵族的世袭取决于国家是否愿意承认已故者的

儿子或侄子继承其爵位。”[5] 同欧洲其他地区不同，若法国贵族家族下一代的作为不满足袭爵资格，其爵位就会失效，再无其他情况。[6] 因此，拿破仑的新贵族制近似不列颠的终身贵族理念，而后者直到1958年才制度化。

所谓的拿破仑治下法国民生的“再等级化”涉及重新排列整个社会体系。[7] 社会顶层是高级军官、大臣、国家参政、省长、选民团主席、高级法官、较大市市长，以及一些学者、专业人员和艺术家。往下是3万多名荣誉军团成员。再往下又是约10万人：专区区长，较小市市长，国家教育、司法、行政部门官员，选民团成员，商会，省参政院，其他官员与名流。[8] 这些人就是拿破仑的真正的“花岗巨岩”。法国大革命深藏自我灭亡的种子，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互斥。社会可以围绕其中两个组建，但绝不会一并包含三个：严格遵守自由和平等会消除博爱；平等和博爱必定摧毁自由；想实现博爱和自由只有牺牲平等。若像雅各宾派一样以结果绝对平等为最终目标，自由和博爱就会毁灭。拿破仑创立新贵族制，摈弃了那种平等理念，转而在法国政体中郑重引入自己深信不疑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

旧王朝贵族人数在8万与40万之间随意浮动，拿破仑王朝的贵族人数显然更精确、更受限。他分封的贵族数量如下：1808年，744人；1809年，502人；1810年，1085人；1811年，428人；1812年，131人；1813年，318人；1814年，55人。1789年，每1万名法国人中有7个贵族，但1814年每1万人中只有1个。[9] 拿破仑一共封了3263名贵族，其中59%的人是军官，22%的人是官吏，17%的人是名流。[10] 不少医生、科学家、作家与艺术家也封爵。[11] 拿破仑的131名省长中，至少有123人封爵。巴黎上诉法院享有4名伯爵、3名男爵和11名骑士。1811年，拿破仑册封了几乎所有大使，仅3人未受封。他也设立卡斯蒂廖内、奥尔施泰特、里沃利、埃克米尔这类亲王和公爵头衔，借贵族制永久铭记战绩名称。[12]

1806年，拿破仑还设立捐赠制，它和贵族制不同，但两者经常重叠。捐赠制下，忠实臣民系受赠人，受赏从征服的战败国领土中征收的土地和财产。捐款常常相伴而来，提供这笔钱的一般是意大利、德意志，后来又加上了波兰。1815年，已有6000人被赐予这类土地，其总价值为3000万法郎。

创立帝国新贵族制时，拿破仑对国内异议日渐无情。1807年8月9日，他召开参政院特别会议，提出废除保民院，“对君主政府来说，它的名称和目标听来像国外产物”。十天后，元老院令适时关闭了保民院。[13] 针对《政教协定》、荣誉军团、《民法典》各章节与称帝，少数保民官曾发言抗议、投票反对。即便建立保民院的初衷恰恰是听取异议，拿破仑却愈发用军官眼光审视立法人员的不同意见，事实上，保民院这种机构在他治下存续八年之久已不同寻常。萨瓦里的回忆录解释道，只要人们是出于忠心私下提异议，拿破仑就不介意。“他从不憎恨坦率反对他的人，他乐意让人讨论自己的看法。”[14] 拿破仑喜欢和康巴塞雷斯、参政院探讨他的观点，康斯坦、多努、谢尼埃等保民官也会发起这种讨论，但他对此的态度就没那么热情了。“盯着邦雅曼·康斯坦，”拿破仑和康巴塞雷斯提起这位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时说，“要是他插手任何事，我就送他去不伦瑞克见老婆。”[15] 元老院令废止保民院时，拿破仑也把进入立法机关的年龄下限一律定为40岁，而他自己当时仍然只有38岁。

拿破仑一回巴黎就能集中精力改善法国财政，近期的胜利帮了他非常大的忙。1807年9月，根据《蒂尔西特条约》部分安排，达吕详细列出22个普鲁士城市待交纳的现金和补给，其中现金共有72474570法郎7分，补给总价值达30994491法郎53分，若算上其他地区，总额立刻就超出1.53亿法郎。[16] 因为这些财物与和平宣言，巴黎证券交易所（Paris Bourse）对拿破仑政府的信心激增。1800年2月，利率为5%的政府公债交易价格为17.37法郎，1807年8月27日，它涨至93法郎，此后稳定在80

～90法郎。[17]

拿破仑所谓的波兰战争开始后，这段时间他并非一直工作。1807年10月4日，据记载他给了巴拉尔（Barral）伯爵夫人3万法郎。此人是波利娜的女侍长，其夫则是恶名昭彰的通奸之徒，在威斯特伐利亚给热罗姆当管家。[18] 1807年9月，拿破仑也展示控制欲天性，下令逮捕美国驻热那亚领事库恩（Kuhn）先生，理由是他身佩英国颁发的马耳他勋章。当月，拿破仑要求获知哪些波尔多贵族抵制元老院成员拉马蒂利埃（Lamartillière）的舞会及背后的原因。他甚至在一桩谋杀悬案中扮演业余侦探，指示富歇重新调查1805年5月的“某蒙彼利埃人士让-纪尧姆·帕斯卡尔（Jean-Guillaume Pascal）”投毒案，“据说这个无赖杀了自己的妻子”。拿破仑命令警方盘问帕斯卡尔的妻舅。他怀疑这对夫妻的狗可能也被下毒了，要求警察对它进行尸检。[19]

很久没打仗了，拿破仑头一回享受了将近一年的家庭生活。他在埃及时，约瑟芬借钱买下美丽的马尔迈松城堡，该地位于巴黎以西7英里处，此后他俩有时住马尔迈松，有时住杜伊勒里宫。马尔迈松逐渐变成300英亩的花园与林野，其雕塑收藏也很丰富。园内主要景观是大鸟舍、种植珍奇花木的植物温室、夏日凉亭、高塔、爱神殿以及毗邻塞纳河的葡萄园与田野。[20] 约瑟芬养了一群野生动物，其中有袋鼠、鸸鹋、飞鼠、羚羊、鸵鸟与美洲驼，还有一只凤头鹦鹉，它只会反复不断地说“波拿巴”。有一只母红毛猩猩身穿白色无袖宽衬衣，约瑟芬有时会请它上桌和客人一同吃芜菁。[21] 拿破仑从埃及带回羚羊，不时喂它们鼻烟。[22] “它们很喜欢烟草，”他的私人秘书回忆道，“一分钟就能吃空一个鼻烟盒，而且看起来毫无不适。”[23] 拿破仑在马尔迈松的书房放了一把卡宾枪，有时他会在窗边射鸟，但约瑟芬劝他不要射她的天鹅。[24] ［他想打也很可能打不中。拿破仑的男仆格雷瓜尔（Grégoire）回忆说，他“用肩膀托枪的姿势不对，又叫人把枪上满膛，结果他总是才开一枪就手臂发黑”。[25] 有一次，他连开七枪才打死受困的牡鹿。］

拿破仑的皇宫在鼎盛时有39座宫殿[26]，几乎相当于国中之国，尽管其中不少行宫他从没去过。[27]他效法路易十四，重设公开弥撒、筵席宴会、音乐盛典等太阳王的很多派头。[28]他相信这些公开展示的盛况既能激发民众的敬畏之心（“我们必须对眼睛说话”），又可刺激法国奢侈品业的发展。[29]皇宫每年预算达2500万法郎，在法国全部公共开支中排第六位。拿破仑认为其私人金库和法国国库是一回事（不过这在当时不算异常，1760年英国才开始实行王室年俸制），他的个人库藏中一共积聚了54514枚宝石。[30]

拿破仑巡视法国时，他的随行队伍达60辆马车，这么做是刻意给人留下印象。当代美国总统的汽车队可达45辆车，它也是类似的政府权力的有形象征，同拿破仑的车队是一个道理。然而，他私下保持小贵族军官的谦逊，其本性一向如此。“在御座上会客时，”沙普塔尔回忆道，“他摆出非常奢华的架势，其勋章、剑柄、帽绳、帽扣、搭扣都用漂亮的钻石制成。这些衣服令他难受，他似乎感到尴尬，一完事便立刻脱掉。”[31]拿破仑的日常穿着要么是帝国近卫掷弹兵上校的蓝色便服制服，要么是近卫猎骑兵的绿色制服。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发现弄不到与制服色泽吻合的绿色布料，干脆把衣服翻过来穿。

拿破仑本人在非正式场合不太重视装饰，他身边的人却穿着华服盛装，很多人如他所愿发现了这种对比。事实上，德农指示画家弗朗索瓦·热拉尔“注意充分强调皇帝身边官员的华服，他们的盛装同他的简朴形象形成对照，立刻在人群中突出他”。[32]布拉兹上尉也指出，“亲王和将军的衣服上，每条缝都镶边，而皇帝戴着小帽子，穿着猎骑兵的绿色长外衣，在他们之中显得与众不同”。[33]除了荣誉军团勋章，拿破仑也戴意大利铁冠勋章，他曾被授予其他很多饰物，但从来不戴，假如戴上那一排东西，他可能会在战斗中吸引狙击手的目光（或许纳尔逊应该好好考虑这一点）。1811年，拿破仑全部衣物的清单制成，其中仅有9件外套（供未来三年使用）、2件晨衣、24双丝绸袜子、24双鞋子、4顶帽

子。清单上注明："非经陛下准许不得花费。"后来侍从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伯爵真的在拿破仑的衣服上花了太多钱，结果他被解雇了。[34]

拿破仑的宫廷体系完全以工作为中心。傍晚6点晚餐开始，但皇帝非常容易误点，他倒是趁工作允许时开饭，不论那是什么时候。厨房成天在烤架上放几十只鸡，这样他想吃饭时总有一只准备好了（很不符合他的节俭愿望）。人们拿什么他就吃什么，也不讲究顺序。他不是美食家，吃通心粉也会非常开心。"拿破仑喜欢最简单的菜，"一位管家回忆道，"葡萄酒他只喝香贝坦，而且经常是稀释过的。"[35] 就连香贝坦也没能一直保住最佳葡萄酒的地位，奥热罗被问及意见时评价道："我知道更好的。"[36] 拿破仑白兰地是个错误名称，因为他从不喝烈酒，他习惯了每日早餐前和晚餐后来一杯咖啡。据我们所知，他没有醉过。拿破仑明白自己不是美食家。"要是你想吃得好，找康巴塞雷斯。"执政府时代，他对蒂埃博将军说，"要是你想吃得差，找勒布伦。要是你想吃得快，找我。"[37] 他在餐桌上一般待不到十分钟，除非是周日晚上的家庭聚餐，这时他最多会待上半小时。[38] "我们都遵守皇帝在桌旁站起来的讯号，"一名和他一同进餐的人回忆道，"他的礼仪举止草率又惊人。他会突然推开椅子，像被电击了似的起身。"[39] 拿破仑曾说，虽然很多人，特别是约瑟芬对他说应该在餐桌边多待一会儿，但他认为自己在那儿花的时间"已然是权力的腐败"。[40]

他在家时就像战时一样，不问时间，只有需要时才睡觉。"若他入睡，"财政部长莫莱伯爵回忆道，"那只是因为他发现有必要睡觉，并且能靠睡眠恢复以后所需的活力。"[41] 他一天要睡七小时，但一名秘书回忆道，他的睡眠是"多次打盹，晚上他也能像白天时一样想醒就醒"。[42] 拿破仑的所有宫殿中，他的卧室都靠近书房，所以无论昼夜何时，他都能穿着晨衣工作，对轮班的秘书口授指示。"以前他常常睡一小时就起来，"另一名秘书回忆道，"这时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明晰，仿佛他差不多

睡了一整晚。”[43]

拿破仑相当擅长掌控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总是马上处理紧急事务，将重要但不紧迫的文件放进待办文书堆，并把他认为不重要的东西统统扔到地板上。路易十八用邮票代替自己的签名，而拿破仑会在亲自签字前通读所有信件，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口述的速度太快，秘书有时可能会错记。“思维跑得最快，”拿破仑解释为何他需要秘书时道，“然后它就对信和字说再见了！我现在只能口授，这样做非常方便，就像是谈话一般。”[44] 他几乎从不在书桌旁坐下，除非是给妻子和情妇写信（只有她们收到的信是他亲笔写的），或是签署文件。他有三个私人秘书：布列纳，1797～1802年在职；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1802～1813年在职；阿加顿·费恩（Agathon Fain），1813～1815年在职。秘书坐在小书桌边记录口述，他们都发明了自己的速记法，以便跟上他的言语激流。在杜伊勒里宫书房口授时，皇帝坐在绿色塔夫绸沙发上，不远处是一面屏风，隔开他和火炉，其他宫殿的书房都复制了这一格局。若凌晨1点拿破仑和秘书还在工作，有时他们便会微服前往圣奥诺雷街，在那儿喝几杯热巧克力。[45] （某次出访后次日，皇帝冲警察局长抱怨道，宫殿大门的灯都坏了。“他想不通我是怎么发现的。”[46] ）

每个秘书和大臣都对拿破仑的惊人记忆力和口述能力有一番说辞。内政部长让·沙普塔尔讲述的一则故事也许可被视作非常典型的事例：拿破仑想在枫丹白露开办军校，他让沙普塔尔坐下，口授了517封信，其间他根本不看笔记。沙普塔尔彻夜起草信件，完工后，拿破仑“对我说，写得不错，但还不全”。[47] 他曾对梅纳瓦尔说，离开布列讷后，他开始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天天如此。[48]

拿破仑身边的一切事务进展极快。据莫莱回忆，1806年夏某日，皇帝离开弥撒仪式，前往圣克卢宫参加招待会，他“走得飞快，随行的外国亲王和……法国大显贵努力跟上他，累得气喘吁吁”。[49] 他一分钟都

不愿浪费，经常同时做好几件事。他喜欢长时间泡热水澡，几乎天天泡很久，19世纪早期欧洲很少有人这样做。不过，就像贴身男仆给他刮胡子时和某些早餐时间一样，他一边泡上一两小时，一边听人读报纸或政治文章。读到英国报纸时，拿破仑的秘书不愿翻译，因为他几乎变得自虐，坚持要听所有写到自己的文字，不论它们多么不堪入耳。[50] 历史小说家让利斯（Genlis）伯爵夫人每周都为他列出新出版的小说清单，长途马车旅程中，约瑟芬就从中挑一些简短的念给他听。[51]

拿破仑让自己的班子工作得很累，但他体贴属下，他们几乎都仰慕他。贴身男仆、副官和传令兵觉得他是真英雄，愿意陪他流放的私人侍者也远超英国允许的人数，这是他帝王之才的有力证明。约瑟芬的侍女阿夫里永（Avrillon）小姐回忆道，他“极有礼貌”，“对待小错误时非常宽容”。拿破仑的侍从博塞伯爵写道：“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那卓越的人格、文雅的举止鲜有人可以匹敌。”阿加顿·费恩认为，“拿破仑是忠实的朋友和最好的统治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宠爱所有人”。[52] 某位酗酒的车夫曾在马伦戈驾驶货运马车，因为这一点，即便他被解雇了，其后数年他也留在工资名录上。

“我原以为他粗鲁无礼、脾气多变，”梅纳瓦尔回忆道，“但与之相反，我发现他耐心宽厚、平易近人、绝不严苛，喧闹和调侃常令他开怀，有时他的温和也让人着迷。”[53] 秘书布列纳经常批判拿破仑，因为严重贪污，1802年他被降职。拿破仑后来又给布列纳找了个工作，任命他为汉堡总督，但他再次滥用职权谋私利，接着又用多年诽谤回报善待他的上司。

拿破仑一生中的所有平常夜晚包含法国普通资产阶级家庭的很多乐事。梅纳瓦尔回忆道：

> 他和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去自己的私人办公室（cabinet）查看，除非被那儿的一些工作拖住，接着他会返回客厅下棋。一般说来，他乐于用亲切的口吻交谈。他热爱讨论，但不强加自己的观点，也不会

卖弄高深学问、炫耀显赫地位。如果只有女士在场，他就喜欢批评她们的着装，或是讲悲剧故事与讽刺故事——大多是鬼故事。就寝时间到了，波拿巴夫人便随他进卧室。[54]

拿破仑在周日晚上的马尔迈松小型舞会上跳舞，表扬继子女的短剧，“沉醉于这种家长生活”。[55] 他狩猎成年牡鹿和野公猪，不过比起享受追逐，他的目的更偏向于锻炼身体。下棋打牌时，他不时使诈，但常常把借此赢来的钱还了回去。他只是忍不了不能赢。

1808年年初，法国已征服普鲁士，并同俄国达成重要的和解，拿破仑遂能转而思考可能强迫英国谈判的方法。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他显然不能重启侵英计划，但英国人想摧毁大陆体系，他们仍然在欧洲全境积极促进走私，并封锁法国港口，完全没有想停战的意思。拿破仑希望打击英国贸易，他始终认为这是让“店老板民族”屈膝的关键，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南方。1800年11月，他致信约瑟夫：“对我们来说，占领葡萄牙最能打击英国商业。”[56] 甚至从那时开始，拿破仑就一直认为英国的老盟友是它的死穴。[57] 1807年7月19日，他一边驰过德累斯顿，一边要求葡萄牙到9月时对英国船只关闭港口、逮捕里斯本境内所有英国人、没收一切英国货物。1801年时葡萄牙向法国求和，同意支付赔款，但一直拖延未付。葡萄牙允许英国船只入港采购该国出口量最大的商品葡萄酒，坐拥广阔的殖民地和庞大的舰队，但它的陆军只有2万人。葡萄牙统治者若昂（João）王子性格懒散、身材肥胖、头脑愚钝，却实行绝对专制，1805年，若昂的西班牙王妃卡洛塔（Carlota）曾试图推翻他。[58

1807年8月29日，法军入侵伊特鲁里亚，力图抑制当地长期上演的英国货走私现象。西班牙首相唐曼努埃尔·德·戈多伊-阿尔瓦雷斯·德·法里亚（Don Manuel de Godoy y Álvarez de Faria）明白，为了合理补偿玛丽亚·路易莎公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之女、伊特鲁里亚王后，1803年5月，其夫路易一世国王死于癫痫），他得和拿破仑合作。拿破仑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戈多伊。1801年，戈多伊向吕西安求取拿破仑的肖

像，他回绝了："我永远不会把自己的画像送给将前任关进地牢[59]、采用异端裁判所传统的家伙。我也许会利用他，但我对他只有鄙视。"[60]耶拿会战当天，戈多伊曾动员西班牙军队，但他在知道会战结果后就快速解散了军队，因此拿破仑非常怀疑他的行为。戈多伊断定，允许法军经西班牙入侵葡萄牙是明智之举。

"为了迫使英国求和，"1807年9月7日，拿破仑致信国王卡洛斯四世，"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其势力范围中夺取葡萄牙。"[61]10月27日，戈多伊的代表签署《枫丹白露条约》，该条约秘密条款计划将葡萄牙一分为三：北部归玛丽亚·路易莎公主，补偿她的伊特鲁里亚；中部由法西联军占领；南部成为戈多伊的私人封地，他将加封阿尔加维斯（Algarves）[62]亲王。这位英俊、狡猾、粗鄙、浮夸的首相已然使用自夸头衔"和平亲王"（Príncipe de la Paz），意指1795年他与法国缔结《巴塞尔条约》。[63]戈多伊的家乡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是西班牙养猪业中心，所以他有绰号"做香肠的"。比起这个流行戏称，他更喜欢那两个亲王封号。条约保证了卡洛斯四世的统治疆域，允许他使用头衔"两美洲皇帝"。[64]

10月29日，拿破仑批准条约，此时法军已深入伊比利亚半岛。朱诺向葡萄牙进军，10月18日，他已渡过比达索亚河（the Bidasoa），进入西班牙。就连里斯本也没有抵抗他。11月29日，葡萄牙王室登上皇家海军战舰，早早逃往里约热内卢，他们离去时，群众在码头上喝倒彩。[65]拿破仑命令朱诺确保他的工兵沿途绘制西班牙公路草图。他写道，"告诉我村庄间的距离以及该国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这表明甚至在那时他就考虑要侵略盟友了。[66]

西班牙政局腐败透顶，波旁家族又颓废无能，看起来这正是推翻他们的大好时机。卡洛斯四世的妻子、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María Luisa）为人专横，两人的长子兼继承人是24岁的阿斯图里亚斯

（Asturias）亲王费迪南德，即未来的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 VII）。国王夫妇憎恨儿子，儿子也憎恨他们，两股怨愤之情不相伯仲。戈多伊家里既有妻子又有一位情妇，但他还是王后的情人。几年前，拿破仑致信卡洛斯，警告对方戈多伊给他戴绿帽。戈多伊截获了这封信，但卡洛斯太顺从了，以至于前者什么也没做，只是任由这封信送达后者。戈多伊在西班牙权势滔天，他一次海也没出过都能受封海军将领。费迪南德像父亲一样孱弱胆怯，他和戈多伊彼此憎恶。其实整个西班牙都痛恨戈多伊，因为1808年时他已经祸国殃民，被英国夺走的殖民地、特拉法尔加的灾难（西班牙损失了11艘战列舰）、疲软经济、腐败、饥荒、教会土地的售卖、斗牛禁令乃至南部暴发的黄热病疫情令他格外可憎。[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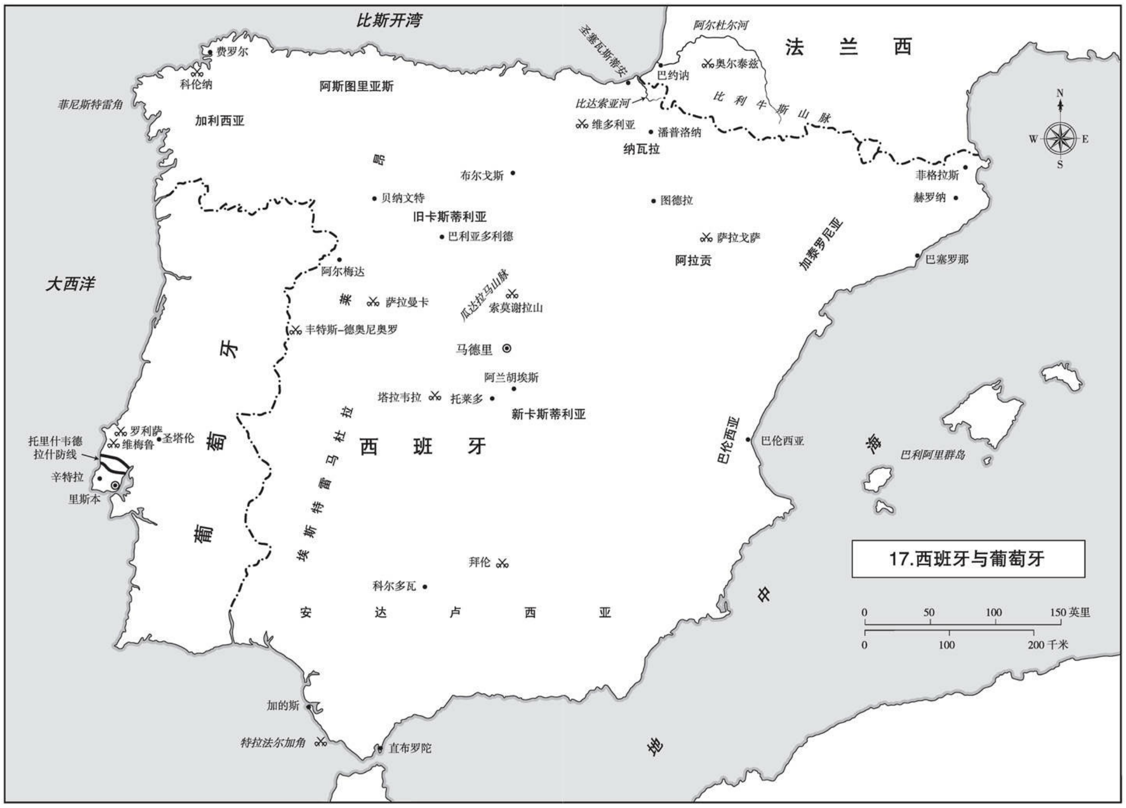
1807年10月，费迪南德王子致信拿破仑，或者说“超越所有前人的英雄”（王子的奉承话），求娶波拿巴家族的女子，这展示了诱人前景。[68] 当月，卡洛斯曾以（莫须有的）谋反罪为由监禁费迪南德，但他后来只能十分勉强地释放了儿子，所以费迪南德很可能既想智胜父母，又想保住王位，使它免遭法军侵犯。这本是理想的解决之道，可让拿破仑避开他日后所谓的“西班牙溃疡”（Spanish ulcer），但最佳候选人、他最大的侄女、吕西安之女夏洛特（Charlotte）才12岁。夏洛特在拿破仑宫中短暂寄居时给罗马的父母写了好几封信，抱怨这里道德败坏，恳求让她回家，拿破仑拦截了这些信后同意了她的请求。[69] [70]

占领里斯本后，朱诺随即采取行动，他废黜已经离开的布拉甘萨王朝、没收王室财产、强征“捐赠”款1亿法郎、颁行宪法。宪法内容包括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71] 他宣布将修建道路、挖掘运河、促进工农业、扶持公共教育，但葡萄牙人依然小心观望。拿破仑颁布的法令称，朱诺的士兵除常规补给外每日可领一瓶葡萄牙产的葡萄酒。[72]

看起来法军已拿下葡萄牙，1808年1月，拿破仑便派缪拉去西班牙

北境。此举表面上是支援朱诺，但实为夺取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73]、潘普洛纳（Pamplona）、菲格拉斯（Figueras）、巴塞罗那（Barcelona）这四座巨大要塞。戈多伊一心依据《枫丹白露条约》秘密条款自立为君，全力支持拿破仑的行动。西班牙首相正帮助法军侵略西班牙，唯一算不上入侵之处仅在于他们没打着入侵的旗号。3月13日，缪拉已率10万人到达布尔戈斯（Burgos），正在向马德里进军。为了麻痹西班牙人，拿破仑命令“散播消息，就说我要围攻直布罗陀[74]，然后去非洲……进入西班牙是计划的一部分”。[75]

有流言称戈多伊打算带着国王夫妇经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去美洲，1808年3月17日，在这则谣言的煽动下，马德里以南25英里处的王家冬宫爆发“阿兰胡埃斯暴动”（Tumult of Aranjuez），推翻了戈多伊。一群暴民冲进戈多伊家里，想用私刑处死他，但他躲进阁楼上卷起的毯子（也可能是垫子）里，逃过一劫。[76]费迪南德王子支持反叛，两天后卡洛斯四世退位。逊位前日，他不情愿地被迫罢免戈多伊，马德里城中于是热烈欢庆。“我已做好充分准备，要在西班牙实施一些改变，”拿破仑得知消息后对萨瓦里说，“但我想事态没有按我期望的轨道发展。”[77]他发现有机会扩张势力，于是不肯承认费迪南德的王位，称卡洛斯是自己的忠实盟友。



17.西班牙与葡萄牙

戈多伊躲了三十个小时，饥渴万分，他试图去当局自首，但被暴民抓住了。他们几乎搞瞎他的一只眼睛，还弄伤他的臀部，不过他还是活着归案了。[78] 西班牙财政大臣在马德里被杀。暴民洗劫了戈多伊及其朋友的家，然后又去抢葡萄酒商店。当时，西班牙公众和英国媒体认为是拿破仑煽动了暴动，但实情并非如此。然而，他挑拨各派的关系，设法借此来利用暴动提供的机会。拿破仑怀疑费迪南德既是保守贵族和教士的傀儡（他的确是），又是英国的秘密盟友（当时他不是），而西班牙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他不能让此人继续统治它了。

拿破仑承受不起南部邻国的混乱状态，何况该国此前一直每月给他500万法郎，再说它甚至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仍拥有庞大的海军，只要他还想重拾侵英梦想，他就需要这支海军。1700年，路易十四立波旁族人为西班牙国王，然后这个家族才统治西班牙。此刻，波旁家族实际上制造了权力憎恶的真空。雾月十八日的事件已然证明，如果拿破仑认为有利可图，他非常乐意发动政变，而且在操作上他也相当在行。

蒂尔西特会议已经结束，现在大军团的陆上军务仅剩卫戍任务和卡拉布里亚的一些反游击战斗。“（我）入侵西班牙不是为了立（我的）家人为王，”1814年，拿破仑声称，“而是为了让它革命，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废除异端裁判所、封建特权和某些阶级的过分特权。”[79] 现代化方案似乎在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莱茵邦联西部特别成功，他指望这套法子也能安抚西班牙，让它接受自己的统治。这一过程总是颇有事后文饰的意思，但他的确希望西班牙的一些阶级欢迎他的改革，某种程度上他也做到了。拿破仑说他并不想要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巨额财富，称该国只需每年给他6000万法郎，以便在其境内实施法国化的措施（pour la francifer）。[80] 尽管有这些渴望，但西班牙战争系王朝战争，和他之前的所有战争都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看，西班牙战争表明他背离了过去的革命战争。

3月21日，卡洛斯四世撤回逊位声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退位是被迫的。[81] 两天后，缪拉率蒙塞军和杜邦军的5万人占领马德里。起初一切似乎平静下来了，即便次日费迪南德返回马德里时受到狂热的欢迎。费迪南德认为拿破仑只想罢免戈多伊，4月10日，他离开马德里，去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巴约讷（Bayonne）和拿破仑开会。国王夫妇也各自赴会。西班牙人民和费迪南德本人都认为拿破仑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合法国王，在王子去巴约讷途中，百姓们便脱掉夹克衫，放在他的马车车轮下，以便“保存旅程印迹，这次旅行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82]

4月15日，拿破仑到达巴约讷，入住附近的马拉克城堡（Chateau de Marracq）。一支帝国近卫军部队在城堡草坪上扎营，陪他待了三个月。他在战场上总是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接合部，借此占他们的便宜，这回他同波旁王室谈判时也用了这一招。国王夫妇和王子这两代人的互相仇恨要比卡洛斯和玛丽亚·路易莎对费迪南德的任何感情深得多。拿破仑非常乐意侵扰这个严重不正常的家庭的悲伤私事，再说他在马德里

有5万人，哪一方想上台都得靠他支持，于是他策划了一个着实不寻常的构想。

在巴约讷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规定，费迪南德把西班牙王位让给父亲卡洛斯四世，条件是卡洛斯四世立刻让位于拿破仑，然后拿破仑再传位于自己的哥哥约瑟夫。[83] 与此同时，缪拉偷偷把戈多伊带出马德里，玛丽亚·路易莎于是能和他在一起了，她感到很高兴。似乎又一个国家落入了波拿巴家族手中。“除非我搞错了，”4月25日，拿破仑告诉塔列朗，“这出悲剧已经演到第五幕，马上就要演结尾了。”[84]

他错了，将要开演的只是第二幕。5月2日，巴约讷流出一些传言，此时马德里民众（madrileños）也做了最坏打算，于是他们起来反对缪拉的占领行为。这次起义被称作“五月二日起义”（El Dos de Mayo），缪拉的部队中约有150人丧命。[85] 就像在帕维亚、开罗和卡拉布里亚一样，法军残暴地镇压反抗，然而他们并未在西班牙遇上全民团结一心的起义。在阿拉贡（Aragon）等地区，几乎没人反抗法国的统治；在纳瓦拉（Navarre）等地区，反抗却非常激烈。加的斯议会发现难以征税或征兵，他们的困境就和日后约瑟夫面临的一样棘手。[86] 西班牙疆域广大，因此在确实反抗的省份中，地方反叛政府（juntas）可能到处都是，而法军既要和西班牙正规军作战，又得对付地方游击队。

法军在战争开局时围攻赫罗纳（Girona）、巴伦西亚（Valencia）、萨拉戈萨（Zaragoza）等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事实上，半岛战争的围城战比拿破仑战争中其他战场的加起来还要多。[87] 所以说，即便卡拉布里亚尚未平定，拿破仑又开始征服另一片辽阔得多的土地，而很多相同因素在这两个战场发挥作用：糟糕的交通；疯狂的天主教教士；坚毅落后的农民；明显比波拿巴家族候选人更有资格要求人民效忠的正统波旁君主；皇家海军轻易提供再补给的所有可能性。1794～1795年，法军轻松击败了西班牙军。拿破仑以为，既然西班牙没

有任何精兵良将，当年的战况便会重演。尽管有卡拉布里亚的先例，他却不明白有时游击抗争可以非常成功地对付最强大、最训练有素的军队。拿破仑离开后继续插手将军们的西班牙战事，但帮不上忙。部队开始熟悉某地地形后，他又把他们调离；而当军官们收到他的命令时，它们已经跟不上军情变化了。

“葡萄弹和刺刀扫清了街道。”缪拉从马德里向拿破仑报告道。[88] 起义被镇压后，缪拉命令火枪小队枪决了一群起义农民，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后来画下了这一幕，使它永载史册，该画作今展示于普拉多（Prado）。据说1808年3月29日拿破仑在巴约讷致信缪拉，力劝他谨慎克制，但这封信纯属杜撰——多年后拿破仑的秘书把它加进了回忆录。[89] 事实上4月15日拿破仑才到巴约讷，尽管如此，真相揭晓前波拿巴分子的谎言却瞒过了历代历史学家。拿破仑确曾致信缪拉，并谈论五月二日起义，然而这封真实信件写道：“我会给你那不勒斯或葡萄牙的王位。马上答复我，就当我今天就要册封你。”[90] （缪拉选择了那不勒斯，他很走运，因为不出三个月一支英军就进入了葡萄牙。）

五月二日起义定然有爱国、反法、反无神论、支持费迪南德的属性，但它也涉及其他问题：阶级、土地所有权、军队开小差、走私、地区主义、反征兵的法纪废弛状态、反教权主义、食物短缺，以及贸易崩溃。所以，接下来的战争不仅仅是西班牙英勇民众和法国贪婪侵略者的对抗，虽然它肯定具有这一性质，但还要复杂得多。[91] 一些军事化反法队伍组织良好，如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胡安·马丁·迭斯（Juan Martín Díez）与纳瓦拉的弗朗西斯科·埃斯波斯·米纳（Francisco Espoz y Mina）所率部队，但是相对于拿破仑当第一执政时镇压的那种法国匪帮和所有政府碰到都得对付的反叛者而言，西班牙大部分反法队伍好不了多少。像所有游击战一样，有些游击队员受爱国主义鼓舞，有些队员是为了报复无可辩驳的暴行，另有队员抱着机会主义心态，不少

匪帮还劫掠西班牙同胞。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发现，很多村庄的村民根本不区分法军和西班牙土匪。[92]

马德里传来五月二日起义的消息，拿破仑决定加快促成一件事，而那正是暴动者最希望避免的结果。5月6日，他举行了一小时的典礼，所有出席者都得站着，就连身患痛风与风湿的可怜老人卡洛斯四世也不例外。仪式结束后，费迪南德签署《巴约讷条约》，让位于父。[93] 卡洛斯憎恨儿子，热切希望王子无法继承王位。两天后他就把所有权利让给拿破仑，并要求在法国获得庇护。[94] 拿破仑致信约瑟夫，劝他接受王位："西班牙不是那不勒斯，它有1100万人口，岁入超过1.5亿法郎，这还没算上殖民地的巨额财富和'两美洲'领地。若接受王位，你将在马德里称王，那儿离法国只有三天路程，守护着它的一条边疆。那不勒斯却在世界另一头。"[95] 后来，他懊悔自己的草率，说："我让约瑟夫那个蠢货当西班牙国王，犯了巨大的错误。"[96] 7月，约瑟夫在马德里即位，缪拉则接过他的那不勒斯王位。路易和奥尔唐斯存活下来的子嗣中，时年3岁的长子拿破仑-路易亲王接替缪拉成为贝格大公。

如果西班牙人民反对《巴约讷条约》的安排，拿破仑就得控制住费迪南德。因此，王子住进了塔列朗在瓦朗赛（Valençay）的乡间城堡，任自己的支持者说他被绑架监禁了。[97] 王子麾下近卫的勇敢上校、28岁的唐何塞·德·帕拉福斯（Don José de Palafox）建议他设法逃走，但他说宁愿待在这儿绣花剪纸。[98] （1814年春，费迪南德真的返回了西班牙，然后他废止拿破仑的所有自由化改革，甚至重建异端裁判所。）"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比，普鲁士国王就是英雄了。"拿破仑告诉塔列朗，"王子什么都不关心。他非常追求物质，一天吃四顿，脑子里一点想法都没有。"[99] 皇帝要求塔列朗保证费迪南德享受瓦朗赛的生活。"假如阿斯图里亚斯亲王爱上一个美人，那没有害处，"他写道，"她要是可靠的话就更无妨了。"[100] 费迪南德患有今人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的症状太严重了，以至于1808年11月他致信拿破仑，

祝贺法军在图德拉（Tudela）战胜西班牙军队，并再次试图向波拿巴家族求亲。他的父亲卡洛斯先是去了马赛，后来在罗马平静地度过了余生。拿破仑同意每年支付波旁家族1000万法郎年金，但他确保西班牙人全额偿还这笔钱，而且早在1808年7月，他就致信莫利安："不用急着给西班牙国王年金，他不缺现金。"[101]

虽说人们批评拿破仑在西班牙强取豪夺，但他们经常忘了，那一年，沙皇亚历山大发动了一场短暂但同样非法的战争，轻轻松松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拿破仑说，"我用芬兰换了西班牙"，但他做了笔最不划算的买卖。[102] 为了获得西班牙王位，他不用明目张胆地威胁任何人，甚至根本不用开战，但5月时他对塔列朗说的话表明，他错在相信"西班牙民族和其他民族一般无二，他们会乐意接受帝国的制度"。与之相反，西班牙人给约瑟夫起了"入侵者之王"（El Rey Intruso）的绰号，哪怕他还没进入马德里，比斯开（Biscay）、加泰罗尼亚、纳瓦拉、巴伦西亚、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加利西亚（Galicia）、莱昂（León）、阿斯图里亚斯全境以及新旧卡斯蒂利亚的部分地区就已爆发全面起义，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港口也已交给皇家海军。拿破仑焦躁过头了。就像萨瓦里日后承认的一样，"我们急着奔向结果，没有充分考虑民族自尊心"。[103]

6月2日，拿破仑在巴约讷集中他能召集的所有西班牙贵族，以便批准西班牙语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04] 其内容有：废除特权和异端裁判所；保留三级议会（Cortes）；立天主教为唯一国教。宪法自然迎合所谓的"亲法派"（"josefinos"或"afrancesados"），即亲法合作者，这些人大多出身自由、开明、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在西班牙人口中仅占极少数。当时，西班牙仍是农村面积广大、文盲众多、经济非常落后、天主教思想相当激进、保守性特别强的国家。（1804年之前，西班牙的市政会席位是世袭的，而且异端裁判所仍在运作。）

“幸运给我重建西班牙的机会，我抓住了其中一丝。”拿破仑后来对一位秘书说。[105] 他指望西班牙人同他的政权合作，原因之一也许是其父正好是这种亲法合作者，要果真如此，他就该回想自己年少时如何痛恨法国人占领科西嘉，并把西班牙看作放大版科西嘉岛。就连拿破仑的仰慕者、侍从博塞也承认，在法军占领的西班牙地区，居民“沉默不语、含糊其辞地漠视”宪法，其他地区也都“强烈鄙视”宪法。[106]

帕拉福斯上校乔装成农民，从法国逃回西班牙。5月25日，他领导阿拉贡首府、设防的中世纪城市萨拉戈萨起义。帕拉福斯麾下只有220人，其金库里的西班牙货币仅相当于20镑6先令8便士，可他还是对法兰西帝国宣战了。[107] 6月8日，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Charles Lefebvre-Desnouettes）将军在图德拉赶跑帕拉福斯之兄拉桑（Lazán）侯爵的军队，但一周后他率6000人力图猛攻萨拉戈萨时被西班牙人击退，折损700人。这座有60000人口的城市开始经历第一次围攻。勒菲弗-德努埃特要求帕拉福斯投降，前者说了两个词，“投降”（La capitulation），后者回答了四个字，“血战到底”（Guerra al cuchillo）。[108]

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设法掌控西班牙海军，以便重拾侵英梦想。然而6月14日，维尔纳夫将军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德·罗西利-梅斯罗（Admiral François de Rosily-Mesros）将军被迫率6艘船组成的一小股法军舰队向西班牙海军投降，这些没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沉没或被俘的船停泊在加的斯。[109] 6月25日，拿破仑听闻卡尔大公已经下令在奥地利征募15万人，这对他又是一击。他让尚帕尼警告维也纳他仍有30万人，但此举全无效果。一个月后，他告诉热罗姆：“奥地利不承认正在武装自己，所以它是为了对付我们而武装……若奥地利在武装，我们也得这么做……我和奥地利之间没有仇恨。我不向它索要任何东西，我武装的唯一理由是它在武装。”[110]

拿破仑认为，即便约瑟夫不是受西班牙人欢迎的救世改革家，自己

也总能在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事实上，7月14日，贝西埃的确在里奥塞科城（Medina de Rioseco）之战中战胜西班牙加利西亚军团和敌军总司令唐格雷戈里奥·德·拉奎斯塔（Don Gregorio de la Cuesta）。然而才过八天，灾难便降临到法军头上。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将军在拜伦（Bailén）战败，率全军18000人向弗朗西斯科·卡斯塔尼奥斯（Francisco Castaños）将军的安达卢西亚军团投降，并将36门大炮与全部军旗交给敌军。卡斯塔尼奥斯承诺让皇家海军遣返杜邦的军队，但皇家海军不是投降条约缔约方，拒绝照办。杜邦和高级军官获准回家，但他的军队被送去巴利阿里群岛中的卡夫雷拉岛（Cabrera），一半以上的人在那里饿死了。[111]

拜伦之战是1793年以来法国陆军的最惨败绩，消息传来后，欧洲上下一片轰动。拿破仑当然大发雷霆。皇帝把杜邦送上军事法庭，让这位将军在茹堡坐了两年牢，还剥夺其贵族封号（他原本是帝国伯爵）。拿破仑后来说："我们应该在西班牙战场选出一定数量的将军，然后送他们上断头台。杜邦为了保护他的赃物害我们失去半岛。"[112] 诚然，杜邦的军队洗劫科尔多瓦（Córdoba）后携带过多辎重，但少有法军将领能逃出卡斯塔尼奥斯为他设下的陷阱。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坚持解雇约瑟芬的侍女、投降条约签署人阿尔芒·德·马雷斯科（Armand de Marescot）将军之妻塞西尔（Cécile），"不论她有多无辜"。某次杜伊勒里宫招待会上，他抓住另一名条约签署人勒让德尔（Legendre）将军的手腕，苛刻地说："这只手怎么没烂掉？"[113]

"他在师里打头阵时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得非常漂亮，"拿破仑致信克拉克时论及杜邦称，"但他做指挥官时表现差劲。"[114] 拿破仑的下属动不动就出这种问题，以至于他为此挨批，被指太过集权、扼杀部下主动性。似乎只有拿破仑在场时，他的大部分属下甚至元帅才能发挥最佳水平，有时他还因此自责。然而，虽说进入安达卢西亚是奉命而行，但拿破仑也没有塞给杜邦铺天盖地的命令。8月30日，他致信约瑟夫："战

争中，人算不上什么，但一人就是一切。”[115] 此言长期被解读为无情地对待麾下军队的自私之言，实际上这句话指的是杜邦，它出自一封充满自我批评的信件：“此前我们只在敌人的历史中见过这类事例，不幸的是，今天我们身边也发生了这种事。”所谓的自私之言远非称赞拿破仑自己的天才，它实为承认一个糟糕的指挥官可能带来灾难。

“你不要觉得征服王国有多不寻常，”拿破仑尚未得知拜伦之败时致信约瑟夫，“费利佩五世和亨利四世都被迫征服他们的王国。高兴点，别受影响。不要怀疑，事情的解决一定比你想的更快更好。”[116] 约瑟夫在首都待了十一天就匆忙逃往马德里以北135英里处的布尔戈斯。8月14日，赫罗纳围攻开始，16日萨拉戈萨围攻开始，贝西埃从葡萄牙边境撤退，帝国其他地区的大批军队也开始调往西班牙战场。“军队组织良好，可以解决叛军，”8月16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但它需要一个统帅。”[117] 他当然应该亲任统帅，但此前在6月，他和沙皇亚历山大约好9月时再度会晤，所以就连约瑟夫的退位请求信也没说动拿破仑去西班牙，尽管他为此还大发脾气。接下来的三个月他不在西班牙，其间局势稳步恶化。

7月22日晚，拿破仑离开巴约讷。当约瑟夫在布尔戈斯发抖时，他的足迹却遍及下列地区：波城（Pau）；图卢兹（Toulouse），他参观了当地的南部运河（Canal du Midi）；蒙托邦（Montauban）；波尔多，8月2日，他在此获知拜伦之战；蓬斯（Pons）；罗什福尔，他参观了当地省政府、造船厂、兵工厂和医院；尼奥尔（Niort）；丰特奈（Fontenay），他在此参观三年前自己下令建造的新城拿破仑-旺代（Napoléon-Vendée）；南特，他与前来陪同的约瑟芬一起去了当地的红帽子圆形广场（Rouge Chapeau Circus）出席舞会；索米尔（Saumur）；图尔（Tours）；圣克卢，他在此打猎，还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谈了七十五分钟，激烈争论奥地利重整军备之举；凡尔赛，他在此观看芭蕾舞剧《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énus et Adonis*）；杜伊

勒里宫，他在此接见波斯大使。拿破仑-旺代据称是模范城市，但皇帝发现那儿的房屋全是泥巴和稻草盖的。他怒不可遏，拔剑刺进一堵墙，直到剑柄以下全部没入墙中，然后他解雇了施工责任人。在图卢兹，他召见在南部运河上架桥的人。拿破仑问了主动露面的总工程师一些问题，发现他虽盼着邀功，却不可能造出那座桥。皇帝于是叫省长特鲁韦（Trouvé）先生领来真正的造桥人，然后对此人说："我很高兴能亲自来一趟，否则我不会知道是你造了如此出色的建筑，并剥夺你的应得权利。"拿破仑随后任命造桥人为总工程师，这体现了史上罕见的诗中的正义。

9月7日，拿破仑收到更糟的消息：阿瑟·韦尔斯利爵士率小股英国远征军进入葡萄牙，他只有1.3万人，却在罗利萨（Roliça）和维梅鲁（Vimeiro）击败朱诺，使对方投降。[118] 8月30日，两军签订《辛特拉条约》（Convention of Cintra），根据其中非常宽松的条款（事后韦尔斯利为此接受军法审判，不过他后来脱罪），朱诺的军队携其武装乃至战利品乘皇家海军军舰返回法国，但什么也掩盖不了法军丢失葡萄牙的事实。有人批评拿破仑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更重视威灵顿（即韦尔斯利，1809年8月，他被加封为威灵顿子爵），但考虑到英国此前的水陆远征失败过（1799年的荷兰远征；1805年的那不勒斯远征；1805～1806年的北德意志远征；1807年的斯特拉斯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南美远征；1808年的瑞典远征），他的态度可以理解。接下来五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正规军与游击队把法军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威灵顿帮了他们很大忙，而他的英军仅有不到1万人战死。1810年8月，威灵顿已经表明事实上他多半是个强敌，拿破仑遂在《箴言报》中插入一段话，说他只是个"印度将军"，即仅仅指挥过印度军队的军人。兴许拿破仑不知为英国效力的印度士兵中有一些出色的战士。[119]

9月18日，拿破仑在圣克卢发布又一篇经典宣言，承诺道，一旦法军击败"猎豹"（英国）、攻克直布罗陀、报复拜伦之败，和平就会降

临。他宣称：

> 士兵们，我需要你们。丑恶的猎豹盘踞在半岛，玷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你们要走近它，把它吓跑。让我们带着胜利的鹰旗走向海格立斯之柱（即直布罗陀），在那儿我们也要一雪前耻。士兵们，罗马军队在同一场战役中决胜于莱茵河、幼发拉底河、伊利里亚与塔古斯河（the Tagus）[120]，论声望你们已经超越当代军队，论荣誉你们赶上罗马人了吗？你们的辛劳将赢来长久和平与持久繁荣。[121]

这种胜利本该简单许多，因为正如拿破仑对约瑟夫所说，他的新臣民"西班牙人卑鄙懦弱，令我想起我认识的阿拉伯人"。[122]

拿破仑有效利用在巴黎的时间，确保立法院通过一项措施——在所有阶级中征召1806～1809年度新兵16万人。21日，他在卡皮西纳林荫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观赏蒂尔西特全景图。次日，他动身前往400英里外的爱尔福特，五天后到达目的地。

爱尔福特会议的背景是明显冷淡下来的法俄关系。正如拿破仑对萨瓦里所说的，这是"检验我在蒂尔西特所获成果可靠性的时候"。[123]之前一年，拿破仑一直给沙皇亚历山大寄去热忱信件："在这几行文字中，我向陛下展示了自己的全部灵魂……我们在蒂尔西特的业绩将左右世界命运。"[124]可是弗里德兰之败的危机缓和了，芬兰也已落入俄罗斯帝国之手，亚历山大于是对法俄同盟渐失兴趣，因为严重不受欢迎的大陆体系让他在国内付出了不少代价。当月的前一阵子，他致信自己的母亲、皇太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称"我们的利益迫使我"同拿破仑结盟，但"我们会冷静地见他垮台，如果这是天意……最明智的政策是等待采取措施的良机"。[125]他对她说，他得去爱尔福特，因为"这可以拯救奥地利，让它把实力保留到可以真正实现普遍利益时。这个时刻也许近了，但还不确定。催它加速将毁灭一切、失去一切"。与此同时，俄国"必须能自由地喘一会儿气，并利用这宝贵时间增加财富和兵力……我们只应在最深沉的沉默中工作，不应同我们正在反对的人大声

叫板”。[126] 在这些私人信件中，亚历山大依然称拿破仑为“波拿巴”，有时还叫他“科西嘉佬”。[127] 沙皇一边命令外交大臣尼古拉·鲁缅采夫（Nikolai Rumiantsev）亲近法国，一边在外交和军事上为“采取措施的良机”做准备。

美丽的图灵根城镇爱尔福特是法国在莱茵邦联的飞地，蒂尔西特会议之后，这个王公封地就是拿破仑的私人领地，所以两国在此开会。9月28日（周三），拿破仑在距离小镇5英里的公路上会见亚历山大。两位皇帝走下马车，“热情拥抱”。[128] 亚历山大戴着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拿破仑戴着俄罗斯帝国圣安德烈勋章。沙皇曾在蒂尔西特赠送拿破仑孔雀石家具（此时它放置在凡尔赛大特里亚农宫的皇帝沙龙中），所以后者在爱尔福特回赠前者一套埃及风格塞夫勒瓷餐具。法国只有两套这种瓷器，其表面上凸显德农作品《上下埃及游记》（*Voyage dans la Basse et la Haute Égypte*）中的场景。拿破仑的礼物被恰当地划入史上君主间赠送的最昂贵礼物之列。[129] [130] 宴席上，拿破仑让亚历山大坐在他右手边。两人造访对方的寓所，每次互道再见时都把对方领到楼下门厅，并且几乎天天一起用餐。他们甚至轮流给司礼官每晚的值夜口令。

沙皇住在昂格普拉茨，拿破仑住在今天的州政府，两人在1715年建造的古典巴洛克宫殿恺撒殿会面。皇帝们的住宅和会晤地点今仍可见。拿破仑带了很多随员，包括贝尔蒂埃、迪罗克、马雷、尚帕尼（外交部长）、雷米萨、萨瓦里、科兰古、达吕、洛里斯东、梅纳瓦尔、费恩、御医伊万（Yvan）、4名侍从武官和8名听差。[131] 拜恩和符腾堡国王抱怨塔列朗索取巨额贿赂，1807年8月，他便解除了此人的外交部长职务。[132] 然而拿破仑还是留下了塔列朗，任命他为次大选侯，允许他出入宫廷、觐见自己。由于这些权利，塔列朗可以随时贩卖情报。拿破仑喜欢有塔列朗陪伴，他曾对拉普说，“你知道我尊敬并依恋那位大臣”，所以他愿意忽视这一点，或许他对此的认识也不够充分。皇帝带塔列朗

去了爱尔福特，想听取其经验和建议。既然塔列朗曾鼓励他处决昂吉安公爵、起草创立大陆体系的《柏林敕令》、支持入侵西班牙，他要是还听此人的意见就奇怪了，可事实就是这样。此时携塔列朗赴会是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被撤职后他没有原谅自己的上司，而且（为了换钱），他向俄国和奥地利泄露法国情报，与此同时，他还建议拿破仑撤出德意志。[133] 在爱尔福特，塔列朗多次秘密会见沙皇，首次密会时，他说："陛下，您为何要来这儿呢？您的使命是拯救欧洲，而挽救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您来反对拿破仑。法兰西民族是文明民族，但其君主不是文明人。"[134]

亚历山大带了26名高级官员随行。与会者还有4位国王（拜恩国王、萨克森国王、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和符腾堡国王），莱茵邦联首席主教亲王卡尔·达尔贝格，2名大公以及另外20位亲王，这些人的地位由其加入莱茵邦联的日期顺序决定。（博塞明智地指出，这是拿破仑给予莱茵邦联更多威望的巧妙手段。[135] ）爱尔福特有舞会、音乐会、检阅、招待会、宴席、戏剧、狩猎旅行和烟火，表面上会议氛围良好，但这并不代表谈判轻松。大部分重要讨论是两位皇帝的单独对话。"你的亚历山大皇帝顽固得像头骡子，"拿破仑对科兰古说，"他不愿意听时就装聋。"[136] 拿破仑嘲讽科兰古亲俄（所以他用了"你的"），但沙皇的确不想听拿破仑证明俄国海关检查员偷偷允许英国货物流入圣彼得堡等地。谈判时，拿破仑一度把帽子扔在地上，开始踹它。"您发火，我固执，"亚历山大镇定地说，"但没人能靠发脾气从我这得到什么。我们坐下谈谈，不然我就走了。"[137]

俄国遵守大陆体系，无法向英国出售小麦、木材、兽脂和大麻，因此经济受损。单是华沙大公国的存在就令俄国担心波兰王国复国。就拿破仑而言，他不希望俄国的不冻港舰队去地中海，所以不赞成俄军的对土作战计划。亚历山大想夺取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理论上拿破仑支持他（法国将获得补偿）。与此同时，哪怕奥地利再败后欧洲

权力天平将更倾向于法国，理论上亚历山大还是承诺道，倘若法奥开战，他会和拿破仑“联手”。

看起来拿破仑有可能谈了他同约瑟芬离婚的可行性，因为亚历山大返回圣彼得堡后才过八天，俄国皇太后就宣布把自己的女儿、沙皇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帕芙洛夫娜（Ekaterina Pavlovna）女大公嫁给奥尔登堡公爵嗣子的弟弟、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Holstein-Oldenburg）的乔治亲王。奥尔登堡公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不属于莱茵邦联。根据沙皇帕维尔一世的特别敕令（ukaz），亚历山大的妹妹们经母亲的同意方可结婚，所以他可以诚实地说，尽管身为“全俄罗斯的主宰”，他对妹妹的婚事却无最终决定权。亚历山大的另一个未婚妹妹安娜当时只有13岁，所以罗曼诺夫家族的两个女孩似乎都躲过了与拿破仑联姻，也许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认为那是科西嘉弥诺陶诺斯（minotaur）[138] 的危险暴行。

歌德是拿破仑最崇拜的尚在人世的文豪，他住在魏玛，离爱尔福特仅有15英里。拿破仑趁自己在爱尔福特时召见歌德，1808年10月2日，两人一同用餐，在场人士还有塔列朗、达吕、萨瓦里和贝尔蒂埃。歌德进屋时，皇帝惊叹道：“来了一个人物！”（Voilà un homme！）［也可能是“您是一个人物！”（Vous êtes unhomme！）］[139] 两人讨论《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翻译过的伏尔泰剧作《穆罕默德》以及戏剧的一般概况。[140] 拿破仑埋怨伏尔泰，说他的剧作《恺撒之死》不应该把“世界征服者”尤利乌斯·恺撒“刻画成如此不佳的形象”。[141] 歌德后来说，拿破仑“睿智地评价，像是用刑事法官的眼光研究悲剧场景”。拿破仑告诉歌德，他认为法国戏剧太偏离自然和真实了。皇帝问道：“我们现在能对命运做什么呢？”这里他指的是预设命运是决定力量的戏剧。“政治就是命运。”[142] 苏尔特来了后，拿破仑花了点时间处理波兰事务，让作家观赏壁毯和画像，等他办完事后，两人又如歌德日后所说，继续“平等地”（Gleich gegen Gleich）谈论歌德的私生活与家人。

四天后，拿破仑和歌德在魏玛的舞会上再会。皇帝对作家说，悲剧“既是诗人的最高成就，也应该是国王和人民的训练场”。[143]（他致信约瑟芬，称亚历山大“经常跳舞，我没怎么跳，40岁就是40岁啊”。[144]）拿破仑建议歌德再创作一部以恺撒遇刺为题材的戏剧，把这一事件描写成巨大的错误。他接着谴责塔西陀的偏见、蒙昧主义和“卑鄙风格”，批评莎士比亚把悲剧与喜剧、“恐怖与滑稽”相结合，他还惊讶地说，像歌德这样的“伟大灵魂”竟然欣赏定位如此模糊不清的体裁。[145]拿破仑没有像说教一样表达看法，而是在说完后照常问道：“您怎么看，歌德先生？”[146]他说歌德可以在巴黎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获得丰富的诗歌素材，竭力劝作家搬去那儿，不过对方没答应。分别前，他授予歌德荣誉军团勋章。歌德后来说，同拿破仑谈论文学和诗歌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147]

皇帝与沙皇彼此相伴，在爱尔福特待了十八天，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观剧，并且同坐和其余观众隔开的御座。此外，两人检阅对方的部队（拿破仑热切盼望亚历山大尽可能多地看大军团实施机动）、长谈至深夜、出行时同乘马车、一起射杀牡鹿和雄獐（一共猎杀了57头）。他们还游玩耶拿战场，在开战前夜拿破仑的宿营地用餐。亚历山大发现把佩剑忘在宫里了，拿破仑便解下自己的，“尽可能优雅地”呈给他，沙皇于是说：“我收下它，视它为您的友谊的象征。陛下，您大可放心，我绝不会对您拔出此剑！”[148]10月3日，两人观看《俄狄浦斯》。第一场戏中，饰菲罗克忒忒斯的演员对英雄的朋友兼知己季马斯说：“伟人友谊乃天赐恩泽！”这时亚历山大转向拿破仑，“尽可能优雅地向他伸出手”。观众热情鼓掌，只见拿破仑鞠躬回礼，“他的神情表明，他拒绝受领这个令他如此尴尬的赞誉”。[149]几天后，他们在晚饭后单独谈了三个小时。“我喜欢亚历山大，我想他也喜欢我，”10月1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芬，“如果他是女人，我想我会把他收为情妇（amoureuse）。我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保重，希望能见到丰满鲜亮（grasse et fraîche）的你。”[150]

爱尔福特会议巩固了在蒂尔西特形成的法俄分享欧洲的共识，然而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很少达成具体协议，尽管他们私下谈了很久。就肢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事，两人意见不一，但是10月12日签署的《爱尔福特条约》中有这样一条秘密条款：拿破仑承认芬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俄罗斯帝国领土，若奥地利武力反对上述安排，他会站在俄国这边。亚历山大同意承认约瑟夫的西班牙王位，并答应道，如果奥地利进攻法国他就援助拿破仑，可关键在于，两人根本没有详细讨论确切的援助范围。当日，拿破仑致信乔治三世，再次用熟悉的口吻对英求和，“我们齐聚此地，恳求陛下听一听人道之声”，[151] 然而英国政府又忽视了他的请求。10月14日，在爱尔福特-魏玛公路上的两人相遇点附近，两位皇帝相拥后分别，之后他们再没见过面。

此时，拿破仑的敕令通行于英吉利海峡港口至易北河地区、奥德-尼斯线（Oder-Neisse line）以西的德意志中部地区、因河以北至因河以南的南德意志地区。除了教皇国和卡拉布里亚，他控制了意大利全境；丹麦是他的盟友；荷兰国王是他的弟弟。拿破仑掌控了西欧，但西班牙是个显著的例外。此后六年，他至少在西班牙战场投入了50万人，其中有很多荷兰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一次巧妙机动可以一举结束战争，”10月13日，拿破仑致信约瑟夫，谈及西班牙战事，“但我必须在场。”[152] 11月5日，他已到达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Basque）城市维多利亚（Vitoria）。他照例生军需部的气，给战争管理部长德让将军写了一系列抱怨信件，比如，“你给我的报告只是一堆废纸……然而我的军队又在即将作战时赤身裸体……这像拿钱打水漂……”“我听到的是漂亮故事……你的部门的头头不是蠢货就是小偷。从来没人遇上过这样恶劣的服务和背叛”。[153] 当地承包商卖给炮兵68头骡子，但他根本不肯付账，因为“我下令只买五岁的骡子”，而这些骡子只有三四岁。[154]

据估计，西班牙游击队只有3.5万～5万人。即便在游击队完全控制

的地区，队伍之间也没多少合作，很多游击队员在赶走法军后仅仅是返回乡下的老家。[155] 然而，纵然当年年末拿破仑夺回马德里，试图从中央向外扩大控制范围，太远的距离和糟糕的路况还是令法军难以遂愿。[156]

游击队经常在非常适合埋伏的乡间袭击交通线，以至于法军的一封急件都需要200人护送。1811年，光是为了保证马德里至法国的交通线安全可靠，马塞纳就需要7万人。[157] 西班牙和葡萄牙游击队杀死的法军士兵总数比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正规军杀死的加起来还多。亲约瑟夫派（josefino）平民给法军提供信息或食物，但如果他们在通敌时被游击队抓获，则必然会被立刻处决。[158] （英国故技重施，立刻伸手资助拿破仑的敌人。1808～1814年，英国平均每年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的各地军政府265万英镑。[159] ）游击队的恐怖战术包括切断肢体（特别是阴茎）、弄瞎、阉割、钉十字架、钉到门上、锯成两段、斩首、活埋、活剥皮肤等，一旦法军开始用几乎同样凶残的手段回击，西班牙战事马上就和拿破仑之前的战事大不相同了。此前战事的特征是冲锋、军旅精神和华丽制服，虽说那些战事也有杀戮，但总体上不存在蓄意折磨与虐待。[160] 法军俘获西班牙“盗匪”（banditti，不穿正规军军服的人）后绞死他们。若在战场上杀死身着制服的正规军士兵，却不绞死抓获的盗匪，那也不合逻辑。

拿破仑在埃布罗河（the Ebro）接过军队指挥权，决心进军马德里。“我很好，”11月5日，他致信约瑟芬，“我盼着能迅速了结这一切。”[161] 在以前的战局中，他靠击败正规军、占领首都战胜敌国，若他在西班牙战场也能这样取胜，那我们就能有把握地认定他将迅速克敌制胜。然而，拿破仑很快明白了老策略不适用于西班牙。迪马将军埋怨道，自己被留在苏尔特军的后方布尔戈斯，他便说：“将军，这个战场没有前线和后方……你在那儿有足够的活要干。”[162]

索莫谢拉山（Somosierra）的山口掩护通往马德里的道路，11月30

日凌晨3点，拿破仑距该山口仅有5英里。皇帝裹着沙皇亚历山大赠送的“上乘毛皮大衣”，围着营火取暖，他“知道自己就要发起重要的战事，难以入眠”。当日晚些时候，两军开战，拿破仑的11000人艰难下山，逐退兵力更少的西班牙正规军（7800人），然后他发动两次波兰枪骑兵冲锋、一次近卫猎骑兵冲锋，夺取了山口与16门大炮。波兰骑兵中队折损甚多，战后，拿破仑命令帝国近卫军全军在他们驰过时举枪致敬。[163]

12月2日，拿破仑到达马德里，他发现城中防守最严密之处是缪拉加固过的丽池宫（Retiro Palace）。双方互相炮击了一阵。博塞会说西班牙语，于是充当皇帝的翻译。他记载道，3日早上，拿破仑走出墙外，“不太留心从马德里最高处投下的炮弹”。[164] 4日早上6点，马德里投降，但他依然待在查马丁（Chamartin）的司令部，该地是紧挨马德里的小型乡间住宅。拿破仑只进了一次首都，他微服潜入，视察约瑟夫的王宫，惊讶地发现西班牙人很尊敬这座宫殿。在约瑟夫宫中，皇帝查看了大卫创作的他跨越阿尔卑斯山脉的画以及王室地窖中“珍贵的酒”。法国流亡者圣西蒙（Saint-Simon）侯爵在马德里丰卡拉尔门（Fuencarral gate）上冲法军开火，被当场抓获。侯爵的女儿恳求放父亲一条生路，拿破仑便赦免了他。[165]

拿破仑一直在查马丁待到12月22日，那天他得知英军将领约翰·穆尔（John Moore）爵士率一支远征军返回位于马德里以西110英里处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博塞记载道，他“发现终于能在坚实的陆地上会会这些敌人了，非常开心”。[166] 12月23日，穆尔开始退往科伦纳，为了追赶他，拿破仑得冒着狂风与暴雪翻越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法军曾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参与埃劳会战，因此他相信部下们顽强得可以挺过任何气候，这一结论对他的未来决策造成了灾难性影响。拿破仑翻山时摔下马背，但没受伤。[167] 天气严寒，博塞的仆人喝白兰地喝得烂醉，冻死在山上，而拿破仑就冒着这种酷寒翻山，大

部分时候他徒步走在一个纵队的最前头。[168]“我们顶着可怕的飓风翻过瓜达拉马山脉，”戈纳维尔回忆道，“旋风夹着雪花，雪下得特别猛，在我们身上包裹了厚厚一层，浸入我们的斗篷中……带火炮翻山无比困难。”[169]然而他们还是成功运走了大炮，在此过程中，拿破仑不断在旁催促，尽管有一回牢骚兵当面咒骂他。“我亲爱的，”1808年最后一天，他从贝纳文特（Benavente）致信约瑟芬，“我在追赶英军，已经追了一阵子，但他们一直惊慌逃窜。”[170]英军其实并不惊慌，面对远超己方的敌军兵力，他们只是务实地撤退。

拿破仑盼着追上穆尔，把英军赶出半岛，但他安插在维也纳的间谍警告道，奥地利正在迅速整备武装，事实上它可能在动员。多年后，威灵顿声称，拿破仑“不确定能否战胜”穆尔，遂离开了西班牙，但他显然说错了。[171]“我正在追赶英军，剑指他们的肾脏。”1809年1月3日，拿破仑如此写道。[172]然而次日，奥地利传来可怕的消息，拿破仑只好派苏尔特去追穆尔，这样他自己便能先回贝纳文特，再回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从而与法国取得更畅通的联系。[173]在巴利亚多利德，他派波兰副官亚当·赫瓦波夫斯基去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卡塞尔和德累斯顿警告德意志亲王们务必“立刻准备好参战兵力”，并派另一名副官、波拿巴家族在科西嘉的恩人马尔伯夫伯爵之子去斯图加特和慕尼黑传达同样的讯息。[174]

有人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水井中发现一具法军军官的尸体，拿破仑于是下令关闭该修道院。[175]博塞一本正经地回忆道，修道院中共有40名修士，拿破仑召集了他们所有人，狂怒地“说着稍显军事风格的话，而且直截了当地使用强烈措辞”。外交官泰奥多尔·戴杜维尔（Théodore d’Hédouville）充当翻译，传译了脏话，拿破仑“命令他”听到脏话时“用同样的语调坚定传达自己口中的恶毒词语”。[176]1月中旬，拿破仑确信得回巴黎，他叫约瑟夫在王宫里留几间房，供自己返回马德里时居住。[177]此后他再没回来过。

因为“西班牙溃疡”，1808年冬，拿破仑被迫在伊比利亚半岛驻扎30万人；1810年春法军进攻时，这个数字升至37万人；1811年，法军兵力又升至40.6万人。此后法军兵力开始减少，在1812年跌至29万人，在1813年又跌至22.4万人。除了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根本承受不起抽走这些军队。[178] 绝大多数情况下，他派去的是没打过仗的新兵营，他们的指挥是大龄老兵、负伤老兵或缺乏经验的国民自卫军军官。新兵们也没有加入已有团弥补损失，而是聚在一起。[179] 拿破仑经常在西班牙战场的军队中搜寻兵员，以便填补其他地区的炮兵、卫戍部队、宪兵、运输队、帝国近卫军和工兵的空缺，所以在西班牙，四个营组成的旅其实只有约2500人，而它本该有3360人。拿破仑并未从西班牙调走很多人参加1812年的俄国战局，但他大大减少了派往那儿的新兵。没有增援的话，什么军队也无法战斗，何况伊比利亚半岛经常减员，病号一直在当地法军中占到五分之一。[180] 总而言之，法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折损了约25万人。[181] “我不得不说，这件事我搞得很砸，”数年后，拿破仑承认道，“道德败坏得太明显，不公正行为让人太愤世嫉俗，整件事仍然十分肮脏。”[182]

---

[1] Montesquiou，Anatole de，*Souvenirs sur la Révolution*，*l’Empire*，*la Restauration et le Règne de Louis-Philippe* 1961，p.113

[2] Blaufarb，Rafe，‘The Ancien Régime Origins of Napoleonic Social Reconstruction’*French History* vol.14 no.4 2000，p.408

[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32 p.84

[4] Bergeron，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Princeton）1981，p.106

[5]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344

[6]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65，Tulard，Jean，*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1979，p.97

[7] Ellis，Geoffrey，*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p.77

[8] Ellis，Geoffrey，*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p.114

[9] Tulard，Jean，*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1979，p.93

[10] Ellis，Geoffrey，*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p.114

[11] 1884年，英国首次授予诗人爵位，受封人是阿尔弗雷德·坦尼森（Alfred Tennyson）；1896年某日，英国首次授予艺术家爵位，次日受封人弗雷德里克·莱顿（Frederic Leighton）去世。

[12] 撇开为家人考虑时，拿破仑的确相信精英政权，但他也有些势利。1813年，他对莫莱说：“‘有些家庭没法封爵。有多少上校是小姐和夫人的侍女的兄弟？’莫莱回答道，拿破仑的某位参政院顾问有个巴黎街道清洁工兄弟。”Noailles，*Count Molé* ，p.197.勒菲弗夫人曾是随团洗衣妇，但拿破仑的确封勒菲弗为但泽公爵（见页边码448页）。某次招待会上，男仆当众将勒菲弗之妻介绍成但泽公爵夫人，她便对他使眼色：“呃，小伙子，你觉得那称呼怎么样？！”Haythornthwaite，*Final Verdict* ，p.231.

[13]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141

[1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36

[1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4909 p.457，March 26，1807

[16] SHD GR2/C 66

[17] Tulard，Jean，*Napoleon*：*The Myth of the Saviour* 1984，p.185

[18]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7

[1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560，p.1208

[20] 约瑟芬带贵族露西·德·拉图尔·迪潘参观马尔迈松时，曾向她解释道，所有画作与雕塑都是外国宫廷的礼物，迪潘于是指出：“这个好女人撒谎成性。就算直白的真相比谎话更令人震撼，她也情愿扯谎。”Moorehead，*Dancing to the Precipice* ，p.286.

[21]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p.284

[22] 据一名侍从回忆，拿破仑自己吸鼻烟可谓“得不偿失。与其说吸烟是他的实际需要，不如说是爱好和某种娱乐。他的鼻烟盒造型非常简单，呈椭圆状，由黑贝壳制成，内衬黄金。它们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只有盖子上的古典风味的银质漂亮奖章。”Bausset，*Private Memoirs* ，p.428.虽说拿破仑有烟瘾，他却认为吸烟“无益，只能让懒人快活”。

Constant，*Memoirs II*， p.11.

[2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 Ⅰ pp. 125-6

[24]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238 n.3，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305

[25]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208

[26] 包括杜伊勒里宫、枫丹白露宫、圣克卢宫、贡比涅宫、凡尔赛的大小特里亚农宫、朗布依埃宫（狩猎行宫）、默东宫、巴约讷外面的马拉克城堡、美因茨附近的德意志宫（Deutschhaus）、布鲁塞尔附近的拉肯宫（Laeken Palace）、米兰王宫（Palais Royal）、佛罗伦萨碧提宫、热那亚杜拉佐宫（Palazzo Durazzo）、都灵斯图皮尼吉堡（Castello Stupinigi）、罗马蒙特-卡瓦洛宫（Monte-Cavallo）。

[27]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29

[28] Mansel，Philip，*The Eagle in Splendour* 1987，p.67

[29]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3/2/2012 p.4

[30] 拿破仑的开销极大，但他总是设法节省，在248页（页边码）我们就看到他削减装潢商的账单。“这里的人曾经每天喝155杯咖啡，”有一次，他在杜伊勒里宫对一位大臣说，“每杯咖啡花掉我20分，一年下来我就花掉56575法郎。我停止供应咖啡，补偿每人7法郎6分。现在我要付21575法郎，节省了35000法郎。”Chaptal，*Souvenirs*， p.335.

[3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38

[3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ⅶ

[33]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74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18

[3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5

[36]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84

[3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 Ⅱ p.17

[38]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140，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17，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156

[3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51

[40] Roederer，Pierre-Louis，*Bonaparte me disait* 1942，pp.85-6

[41]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89

[42] ed. Jones，Proctor Patterson，*Napoleon*，*How He Did It* 1998，p.184

[4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22

[4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1

[45]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35

[4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92

[47]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54

[48]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07

[49]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01

[5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01，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48

[51]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48

[52] Branda，Pierre，*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p.271

[53]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p.125-6

[54]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p.121-2

[55]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Ⅰ p.123

[56]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no.5751 p.438，November 8，1800

[57] 英葡同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同盟：1376年，两国初次结盟；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1815年、1899年、1904年、1914年，两国都重申同盟关系（1899年两国系秘密结盟）；1982年马岛战争中，英国引用了英葡同盟关系。

[58] Esdaile，Charles，*The Peninsular War* 2002，p.5

[59] 1792年某次战斗中，法军击败西班牙军，此后戈多伊囚禁原西班牙首相阿兰达（Aranda）伯爵。

[6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49

[6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336 p.1106，September 8，1807

[62] 今阿尔加维（Algrave）。——译者注

[6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78

[64] Esdaile，Charles，*The Peninsular War* 2002，p.7

[65]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3

[6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554 p.1204，October 17，1807

[67]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68

[6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52

[69] 两年后，吕西安试图逃往美洲，中途被皇家海军俘虏。他去了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流放，之后好几年过得舒适惬意，还写诗贬低"查理曼"（他二哥）。

[7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49

[71] 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p.156

[7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349

[73] 今多诺斯蒂亚（Donostia）。——译者注

[74] 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把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

[75]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350 pp.236-7，March 9，1808

[76]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0

[7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51

[78]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1

[7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50

[8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50

[8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18

[82]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125

[83]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3，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255

[8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699 p.423，April 25，1808

[85]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nford，CA）1996，p.73

[86]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50

[87]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51

[88] Sarrazin，General，*History of the War in Spain and Portugal* 1815，p.33

[89]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1， ed. Tulard，Jean，*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e Consultat et l'Empire* 1971，p.175， Anon.，'The Unpublished Letters of Napoleon'p.358

[9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759 pp.451-4，May 2，1808

[91]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3

[92]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57

[93] 7月5日，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布鲁克斯俱乐部，议员汉弗莱·豪沃思同第四代乔姆利（Cholmondeley）伯爵打赌，赌"现阶段约瑟夫·波拿巴不在马德里或其周边地区行使君主权力"，前者下注100几尼，后者下注25几尼（Brooks's Club Betting Book）。法国人其实已在马德里掌权，不过7月20日约瑟夫才到。

[9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III p.352，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180

[95]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829 p.489，May 10，1808

[9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0

[97] 塔列朗靠这一安排赚了不少：费迪南德铺设价值20万法郎的地毯，购置水力发动机给庄园供水，甚至花钱购买厨房菜园的蔬菜。Kolli，*Memoirs* ，p.3.

[98]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283

[99]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699 p.423，April 25，1808

[10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7826 p.487，May 9，1808

[10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480 p.831，July 4，1808

[102] Tulard，Jean，*Le grand empire* 1982，p.146

[103]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III p.358

[104]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ford，CA）1996，pp.75-6

[105] eds. 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p.220 n.9

[10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p.188-9

[107] Vaughan，C.R.，*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Zaragoza* 1809，p.5，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p.281

[108] Vaughan，C.R.，*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Zaragoza* 1809，p.22

[109] 可就连这件事也没让拿破仑取消海军计划。1808年，他写给德克雷的海量信件涉及造船的不同方面，如所需木材种类、伐木、木材运输、木材储存。1810年7月，他致信德克雷，提到他计划在1812年年底建成由110艘船组成的海军。Bingham ed.，*Selection III*，p.50.

[11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401 p.797，June 25，1808，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18659 p.930，July 25，1808

[111]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52

[11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7

[113]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86，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835 p.1036，September 6，1808

[11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685，p.945，August 3，1808

[115]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797 p.1007，August 30，1808

[116]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619 p.909，July 19，1808

[117]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707 p.957，August 16，1808

[118] 五个月后，拿破仑和蒂埃博回顾维梅鲁之战细节，蒂埃博佩服他“能指出我军部署的大部分薄弱点，我惊讶地发现，他的确比我还记得清我的报告内容”。Butler ed.，*Baron Thiébault II*，p.238.

[119] Aldington，Richard，*Wellington* 1946，p.48

[120] 今塔霍河（the Tajo）。——译者注

[12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951 pp.1090-91，September 18，1808

[122]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869 p.1055，September 9，1808

[123]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Ⅲ p.450

[12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685 p.945，August 3，1808

[125] Grimsted，Patricia Kennedy，*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Ⅰ（Oakland，CA）1969，p.166

[126] Grimsted，Patricia Kennedy，*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Ⅰ（Oakland，CA）1969，p.166

[127]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0

[12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2

[129] 另一套是为约瑟芬制造的，但是1818年路易十八把它送给威灵顿。该套瓷器今展示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

[130]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p.64

[13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3

[13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5，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33

[133]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p.99，116，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13

[1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p.413-14

[13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212

[136] eds. 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Moscow）2003，p.18

[137] eds. 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Moscow）2003，p.18

[138] 希腊神话中牛首人身的怪物。——译者注

[139] *TLS* 12/5/1927 p.325，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pp.12ff，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7 n.1

[140] 歌德的书信体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拿破仑有一本翻烂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其封面和封底上凸印着帝国金盾徽。该书今展示于纽约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拿破仑经常读它，以至于有些页纸几乎要脱落了。这本书是1804年巴黎出版的版本，可见他甚至在称帝后常读此书。

[141] 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pp.12ff

[142]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p.546-7

[143]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7

[14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42 p.1126，October 9，1808

[145]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7

[146] Williams，John R.，*The Life of Goethe* 1998，p.39

[147]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Ⅱ p.546，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pp.12ff

[14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23

[14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17

[15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50 p.1130，between October 11 and 13，1808

[15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

no.19053 p.1131，October 12，1808

[152]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056 p.1133，October 13，1808

[153]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s.19184，19270，p.1186，November 4，1808，p.1225，November 14，1808

[154]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327 pp.1248-9，November 19，1808

[155]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8

[156]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p.217-18

[157] 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p.4

[158] 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p.182

[159]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p.367-8

[160]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p.58-9，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p.290，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Ⅰ p.61

[16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197 p.1192，November 5，1808

[162]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80

[163]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45

[16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3

[16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5

[16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2

[167] *The Nation* ，16/7/1896 p.45

[16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39

[169]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p.65

[170]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650 pp.1388-9，December 31，1808

[171]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355

[172]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675 p.1402，January 2，1809

[173] Bonaparte，Napoleon，*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Ⅱ p.411

[174]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72

[17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42

[17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42

[177]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855 p.1497，January 15，1809

[178]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6，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p.4

[179]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2

[180]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2

[181]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3，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3，Fraser，Ronald，*Napoleon's Cursed War*（New York）2008

[182] Lentz，Thierry，*Savary* 2001，p.188

第二十一章 瓦格拉姆

在大炮安全可以保障的前提下，应当始终把炮兵置于最有利的位置，让他们待在骑兵和步兵阵线前面，越靠前越好。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54条

加农炮面前人人平等。

——1819年4月，拿破仑对贝特朗将军说

“维也纳宫廷表现非常糟糕，”1809年1月15日，拿破仑从巴利亚多利德致信约瑟夫，“它会为此后悔的。不要不安。就算不动西班牙的军队，我也能在一个月内带足够兵力去维也纳……其实只要我在巴黎，奥地利又会衰退得像往常一样无关紧要了。”[1] 当时，他不知道英国已经给了奥地利一大笔资助，并说服它开战，此战后来成为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卡尔大公已让所有18～45岁的健壮男子穿上新组建的国民后备军（Landwehr）军装。国民后备军是民兵，但其中一些部队和正规军并无区别。奥斯特利茨会战结束后，卡尔大公一直在奥军中实施深层变革：精简指挥结构，改善服役待遇；简化移动操练，引入密集编队（Bataillons-masse，这种编队方式让步兵组成更牢固的方阵以抵御骑兵）；废除团级炮兵，以便组织规模更大的炮兵预备队；修改散兵战术，招募九个猎兵（Jäger）团；最重要的是，采纳了军体系。1806年，大公与人合著军事战略著作《将军的战争艺术》（*Grundsätze der Kriegkunst für die Generale*），他打算检验自己的设想。

1807年4月时，塔列朗曾建议拿破仑要鼓励奥地利去爱（aimer）法国及其功绩，他回答：“爱，我不知道政治里的爱是什么意思。”[2] 此言不假。拿破仑看待国际事务时预设国家间会不断竞争，所以他的观点颇为自私。他明白奥地利想为曼托瓦、马伦戈、坎波福米奥、吕内维尔、乌尔姆、奥斯特利茨和普雷斯堡的屈辱复仇，但他觉得奥地利要犯蠢才

会开战，毕竟它的盟友只有英国和西西里，何况英国还不会出兵。相形之下，拿破仑的盟友包括意大利、比利时、瑞士、那不勒斯、荷兰、拜恩、符腾堡、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普鲁士已毁，”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梅特涅总结普遍形势道，“俄国是法国的盟友，法国是德意志之主。”[3] 对奥地利来说，此时并非宣战良机，但它又一次想赢回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地位，还是对法宣战了。欧洲列强之所以能拖垮法国，恰恰是因为1805年之后没有长期的和平，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的坚持必然占了大功。

拿破仑确认自己的情报后，立刻像闪电一样从巴利亚多利德赶往巴黎。他和萨瓦里、迪罗克、鲁斯塔姆、一名副官、一个猎骑兵小队飞驰四小时，到达70英里外的布尔戈斯，途中他们经过很多游击队出没的地区。蒂埃博看见拿破仑超过他的马车，“一边策自己的马，一边鞭打副官的马”。[4] 1809年1月17日早上7点，拿破仑动身，23日早上8点他已到达巴黎。他在六天中走了600多英里，这是个非凡成就。“反法同盟国家的内阁都以为他在西班牙北部作战，”迪马将军记载道，“但他已返回帝国中心，正组建另一支伟大的军队……此事不可思议，叫那些本想让他吃惊的人大吃一惊。”[5] 拿破仑日后致信达武，对比西班牙和奥地利战局，称奥地利“民族如此优秀、理智、冷静、包容、安分守己，以至于在德意志作战时没有一个法国人被他们谋杀”，而西班牙人却是疯子。[6]

立法院已被削弱，1809～1810年它一共只开了四个月的会。拿破仑一回到巴黎就命令立法院提前一年征召1810年度新兵，因此他能动员23万人，这是目前为止他指挥过的规模最大的军队。1808年12月23日，弗朗茨就已决意开战，次年2月，他确认了这一决策。拿破仑的谍报网不仅让他非常了解奥地利的想法和动作，还警告了一件危险的事——富歇与塔列朗和解了。两人本是宿敌，现在却串通密谋，计划等拿破仑死在西班牙后立缪拉为法国国君。拉瓦莱特拦截了富歇和塔列朗友人的信

件，欧仁传来的信息也佐证了这些信，拿破仑遂掌握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1809年1月28日（周六）下午，他在杜伊勒里宫办公室召集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德克雷、富歇和塔列朗，然后骂了富歇和塔列朗半个小时（出自帕基耶，他是听雷米萨夫人说的，而她又是听塔列朗说的）或两小时（出自莫利安，他不在现场，但认识所有在场者）。

拿破仑埋怨道，富歇和塔列朗不顾西班牙战局相对顺利的事实（苏尔特在科伦纳把英军赶出半岛，于1月16日击杀穆尔），在沙龙里批评战事。两人还扶持缪拉，阴谋反对约瑟夫的帝位继承权，这表明他们已经背离了效忠拿破仑的誓言。“哟，”拿破仑总结时对塔列朗说，“你只是丝袜裹着的一泡屎。”[7] 塔列朗依然十分镇定，“明显无动于衷地”听皇帝说话，他仅仅在事后对一位朋友说：“太遗憾了，这么伟大的人竟这么没教养。”[8] 面谈后第三天，拿破仑解除了塔列朗的次大选侯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别的头衔和地位。皇帝也没流放塔列朗，这令人难以理解。富歇也依旧当他的部长。没过多久，梅特涅花费30万～40万法郎向“X先生”购买法军作战序列的详细信息，而塔列朗被视为此事的首要嫌疑人。[9]

索取通行证前，梅特涅尽可能待在巴黎，也许他是为了继续从“X先生”处搜集秘密情报。拿破仑照例严厉警告敌人开战的后果。3月23日，法奥外交关系即将崩盘，这天他看见了梅特涅，问道：

> 你们被狼蛛咬了吗？什么在威胁你们？你们又恨谁？你们仍想让世界燃起战火？为什么？我的军队在德意志时，你们不觉得自身存在受威胁，如今它在西班牙，你们倒觉得自己陷入危机了！这思维有些奇怪。结果会是怎样？我将武装起来，因为你们在武装。我终于有害怕的东西了，所以它值得我小心对付。[10]

梅特涅用圆滑的外交辞藻反驳，但拿破仑打断了他：“你们的忧虑从何而来？先生，如果是您将这些忧虑传达给了您的宫廷，那这么说吧，您需要什么解释来安抚它，我全给您……先生，我同您的宫廷交易

时总是被耍，我们得开诚布公地谈谈。”[11] 就像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一样，拿破仑既不渴望，也不需要打这场仗，并且言明自己想阻止它。然而这回，他还是根本不肯为避战而妥协，因为他自信会赢。为筹备未来战事，光是3月9日这一天，他就写了29封信。[12]

卡尔大公计划一边率八个军进入拜恩，一边派一个军去波兰、派两个军去意大利。他希望普鲁士对法宣战、德意志全境激烈反抗拿破仑的统治，但局势表明这两件事都不会发生，于是他转而把多瑙河南岸当作主战场，以便掩护维也纳，并同意大利的奥军保持联络。卡尔的决策导致来回穿行于这一地区的奥军出现严重混乱，还浪费了宝贵时间。萨拉戈萨英勇抵抗法军，2月20日该城终于陷落，两天后约瑟夫重新在马德里称王，而拿破仑也能全力应对盟友拜恩面临的威胁。

达武和马塞纳都是志骄意满、战功赫赫的资深元帅，认为彼此平起平坐，拿破仑知道没法让两人中的一人指挥另一人，所以在亲临战线前，他任命贝尔蒂埃为德意志军团司令。3月30日，他已经替贝尔蒂埃拟好整个战略。按照预期，4月15日前后奥军将进攻，届时法军将组成巨型营方阵，以便引诱奥军进入巨大的陷阱。勒菲弗的拜恩军充当法军前卫，屯于伊萨尔河（the Isar）岸边。勒菲弗军的三位师长为拜恩的路德维希（Ludwig）王子、卡尔-菲利普·弗雷德（Karl-Philipp Wrede）亲王、贝尔纳·德鲁瓦（Bernard Deroy）伯爵，其参谋长则为让-巴蒂斯特·德鲁埃（Jean-Baptiste Drouet）将军，即未来的埃尔隆（Erlon）伯爵。卓越的战士拉纳从西班牙回来后会立刻率自己的军同勒菲弗会合。在拜罗伊特和纽伦贝格之间，左侧是规模颇大的达武军，该军下辖三个步兵师、第2重骑兵师、一个轻骑兵旅，还新添了一个预备队、一个德意志师，全军共有55000人与60门大炮；右侧是乌迪诺军，该军下辖步兵和轻骑兵，屯于法费诺芬（Pfaffenhoffen）。马塞纳军在奥格斯堡（Augsburg）充当后卫。贝西埃的骑兵预备军由两个轻骑兵师、两个重骑兵师组成，它和帝国近卫军、旺达姆的符腾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列

队。德意志军团共有16万人与286门大炮，各军彼此相隔较近的行军里程，雷根斯堡则是军团布阵的中心枢轴。拿破仑给贝尔蒂埃的命令称，如果奥军在4月15日前进攻，法军就转而在奥格斯堡和多瑙沃特集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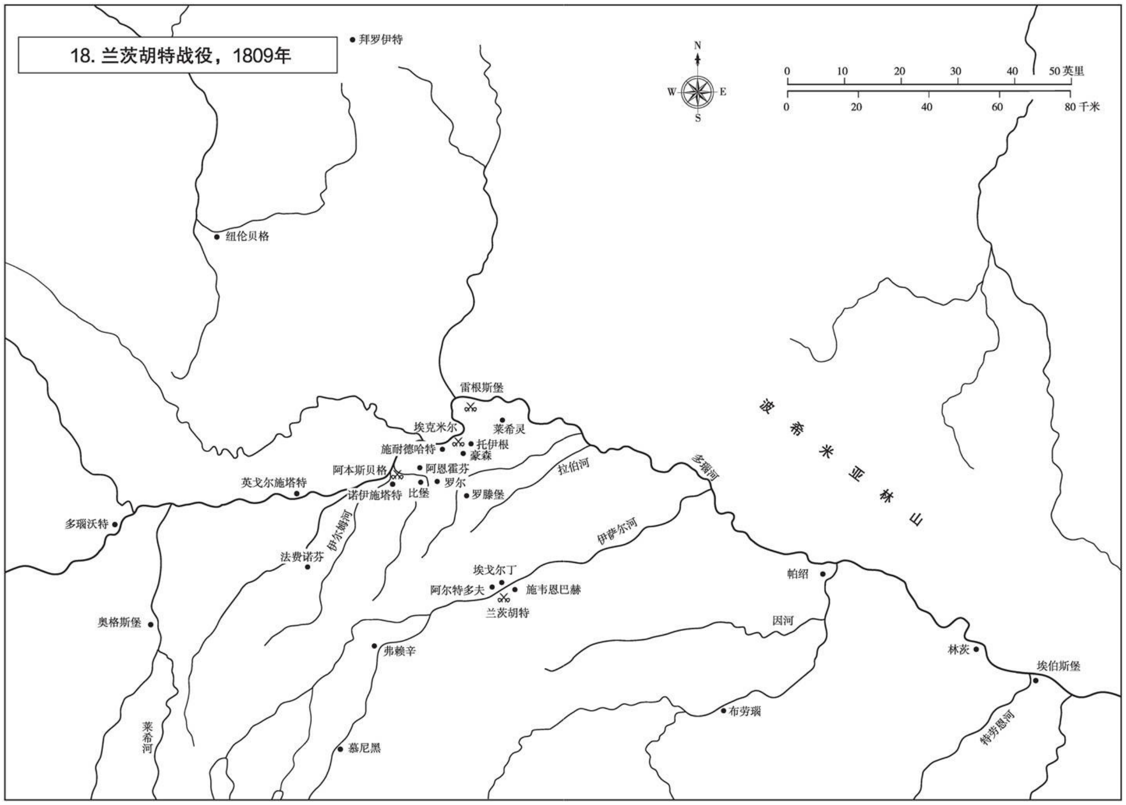
拿破仑依据《爱尔福特条约》请求俄国支援对奥作战，作为答复，沙皇亚历山大派戈利岑亲王率70000人驰援，但直到5月22日，俄军才设法穿过边境，到达伦贝格（Lemberg）附近的奥属加利西亚（Galicia），结果他们完全没有与敌人交锋，整场战役中仅折损两人。[13] 因此，奥地利只需在东边部署最少的军力，并可集中几乎一切力量对付拿破仑，这令他火冒三丈。

4月3日，奥地利正式对法国和拜恩宣战。卡尔大公本人反对宣战，他认为现在开战太早了，但6日他还是对奥地利民众发布军事宣言。[14] 四天后，127000名奥军士兵渡过因河，侵入拜恩，但行军速度未达卡尔大公的期望，反而因为天气恶劣降至一日6英里。15日，卡尔大公才到伊萨尔河，当天奥军也入侵了华沙大公国。贝尔蒂埃误解了拿破仑的指令，奥军比预期日提前五天进攻时，他又慌了手脚，结果他搞砸了法军战役的开局着数。4月14日，贝尔蒂埃没派达武军去奥格斯堡，反而命令他们在雷根斯堡集结，此外他还沿莱希河分散军队，分别让52300人和68700人待在北岸与南岸，其中很多部队的间距超出行军里程。与此同时，奥军集中大股兵力，突袭兰茨胡特（Landshut）。4月12日时，拿破仑收到可视信号系统的报告，获知奥军已过因河的警报。[15] 五天后，他赶到多瑙沃特，当地司令部这才恢复镇静。“士兵们！”他宣称，“我像雄鹰一样飞奔至你们中间。”[16]

“我到达战场时，贝尔蒂埃已经慌得丢了魂了。”拿破仑日后回忆道。[17] 此言不假，然而一旦他到达战场，发现己方军队严重分散，他便察觉奥军进攻兰茨胡特一事既是威胁，又是机会——德意志军团各军可以立刻从不同方向朝卡尔大公的位置集中。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和乌迪

诺进军兰茨胡特，威胁敌军交通线，派旺达姆与勒菲弗去阿本斯贝格（Abensberg）。达武则奉命经80英里艰难行军返回至主力部队，并留下自己的堂姐夫、上校路易·库塔尔（Louis Coutard）男爵的第65战列步兵团驻守雷根斯堡的桥梁。这些命令非常重要，以至于拿破仑传达每个指令时都派了四名副官送信，平常他只会派三个。马塞纳的任务如下：迅速推进至法费诺芬，进攻敌军侧翼，与此同时，确保作战基地奥格斯堡固若金汤。

到4月18日时，奥军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如己所想地追赶退兵，反而面对着反抗的敌军。拿破仑前往英戈尔施塔特，拉纳陪在他身边。路过德意志部队时，皇帝鼓励士兵。当日，奥军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被俘，然后被带至拿破仑面前接受盘问。上校拒绝回答问题，皇帝便说，“别担心，先生，反正我什么都知道”，接着他马上准确地描述奥军所有的军甚至他面对的团的位置。奥军上校心生佩服，问道：“我有幸与之说话的是何人？”“这时，”赫瓦波夫斯基回忆道，“皇帝倾身向前，摸摸他的帽子，回答道：‘波拿巴先生。’”[18]（上校的观察力一定特别迟钝，因为赫瓦波夫斯基指出，面谈时法军步兵不断从旁边列队经过，同时高呼“皇帝万岁！”）



当晚，拿破仑致信马塞纳，解释道，卡尔“已经率三个军从兰茨胡特去雷根斯堡，他约有8万人。达武离开了雷根斯堡，正前往诺伊施塔特（Neustadt）……假如你的军天亮前经法费诺芬动身，然后进攻卡尔大公的后方，敌军就输了。那样的话，18日至20日之间德意志所有的战事就结束了”。他还亲笔写了一则附言：“行动，行动，速度！我指望着您。”（Activité，activité，vitesse！Je me recommande à vous.）[19] 马塞纳回信，承诺必要时连夜行军，并且言行一致。此次战局中，他非常勇敢坚韧。卡尔大公收到报告，得知达武已率约3万人来到多瑙河南岸。就像本尼希森在弗里德兰对拉纳打的算盘一样，大公也想歼灭拿破仑大军的这支孤军，他显然忘了三年前达武军在奥尔施泰特独立作战的战果。

次日，法奥两军在德意志战局中首次真正接触，这次遭遇战奠定了该战局其余战斗的套路。卡尔大公想在多瑙河下方的托伊根村（Teugen）和豪森村（Hausen）消灭达武，但后者设法逃脱了，与拿破

仑安全会合。两军对敌军实力的看法都一样不确定。天空低沉，战事在丘陵地带展开，奥军缓慢严谨地作战，达武的老兵娴熟地实施机动。奥军战败后退往东方，拿破仑遂能组织追击。同日，勒菲弗与蒙布兰（Montbrun）分别在阿恩霍芬（Arnhofen）和施耐德哈特（Schneidhart）取胜。卡尔的野战军有9.3万人，拿破仑的有8.9万人，可如今，法国-拜恩联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主动权。

拿破仑计划切断卡尔去维也纳的退路，把他困在拜恩。此时达武在左翼，勒菲弗和拉纳在中路，乌迪诺在右翼。拿破仑对马塞纳下令：派兵援助阿本斯贝格，并率自己的主力去兰茨胡特攻击敌军交通线。4月20日，库塔尔上校偃旗投降，交出雷根斯堡。面对兵力远超自己的奥军，库塔尔设法守了超过二十四小时，使敌军折损达到己方损失的两倍。在多瑙河南岸、英戈尔施塔特以东20英里处有一系列小村庄，同日，拿破仑沿覆盖这些村子的宽广战线发动持续进攻。凌晨3点时他已经醒了，正向勒菲弗、马塞纳与旺达姆传令。早上6点30分，他和拉纳、贝西埃骑马前往阿本斯贝格。在城外的一座小山坡上（它日后得名拿破仑斯山[20]），拿破仑为拜恩军的军官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词，它由拜恩王储路德维希译成德语，并作为当日公告发布：

> 拜恩士兵们！我来到你们中间，但我现在不是法国皇帝，而是你们的国家和莱茵邦联的保护人。今天你们将独自迎战奥军。你们的前排队列里面没有法军，我完全相信你们的勇气。两百年来，拜恩旗帜在法国的保护下抵抗奥地利。奥地利频繁伤害你们的国家，而我们要去维也纳，在那儿我们将知道如何惩罚它的行径。奥地利想瓜分你们的国家，解散你们的部队，把你们分入它的团。拜恩人！这是你们最后一场反抗敌人的战争，用刺刀进攻吧，消灭他们！[21]

拿破仑随后沿两条轴线攻击奥军：第一条从阿本斯贝格和派辛（Peissing）向东南方延伸，直至罗尔（Rohr）和罗滕堡（Rottenburg）；第二条从比堡（Biburg）向东南方延伸，直至普费芬豪森（Pfeffenhausen）。奥军的兵力和法军的一样多，还占据有利位

置，当天大部分时候，他们表现不错，但拿破仑得知左翼的拉纳有所进展后立刻从拿破仑斯山骑马前进，以便监督左翼战事。

战后，第2猎骑兵团少校（chef d’escadron）向拿破仑呈现他缴获的两面军旗，这是此次战局中法军缴获的首批军旗。少校受了刀伤，伤口中的鲜血顺着他的脸流下。拿破仑问他叫什么，而他有一个很妙的名字——迪厄多内·利翁（Dieudonné Lion）[22]。“我会记住你，而你会感激我，”拿破仑对少校说，“你非常引人瞩目。”几个月后，贝尔蒂埃举荐一人填补近卫猎骑兵空缺，拿破仑否决了这一提议，说他想让“雄狮”晋升。

拿破仑认为自己正追着敌军主力前往兰茨胡特，事实上卡尔大公正在向雷根斯堡进军。约翰·冯·希勒（Johann von Hiller）男爵的两大股奥军纵队在兰茨胡特集结，导致当地两座桥梁附近出现大面积交通堵塞。雅克·德·洛里斯东将军（像很多拿破仑的高级指挥官一样，他也是从西班牙战场调来的）的炮兵在阿尔特多夫（Altdorf）和埃戈尔丁（Ergolding）之间的山脊上布阵，向人口密集的城镇倾泻炮火。（今人若站在兰茨胡特的桥上，便能发现奥军能开火反击的地方非常少。）奥军一过桥就试图烧桥，但雨下个不停，浇灭了火焰。12点30分，拿破仑对副官乔治·穆顿将军说：“你去那路纵队最前头，夺下城镇。”[23]

当时，这句话听来肯定像死刑判决，但穆顿率领掷弹兵冲锋，小岛岸边的密集滑膛枪射击掩护了他们。穆顿的战斗工兵用斧头劈碎城门，第13轻步兵团的士兵、三个拜恩营、两个拜恩中队、一些符腾堡人加入战团，到下午1点时，兰茨胡特已陷落。卡尔大公损失了11门大炮、近5000人、全部辎重车队（共226辆货运马车）。[24]拿破仑后来送给穆顿一幅描绘桥上战事的出色画作，并且一反常态地说了句不太巧妙的俏皮话——他的“绵羊”（“Mouton”意为“绵羊”）变成狮子了。“拿破仑给的这件纪念品比最高赞誉都珍贵。”画中的另一名副官说。战局结束时，

穆顿已经受封洛鲍（Lobau）伯爵。[25] [26]

“铁元帅”（Iron Marshal）达武设法在莱希灵（Laichling）阻挡了卡尔大公，就像1806年时那样，拿破仑战后才发现达武在那儿遇上了敌军主力。4月21日早上7点至傍晚5点，达武给拿破仑送了4封信，告诉他卡尔正调来预备队，准备大举反击。从22日凌晨2点开始，拿破仑蓦地行动起来，命令拉纳、旺达姆和圣叙尔皮斯（Saint-Sulpice）率20000名步兵与5500名骑兵尽快北上。乌迪诺和其余的拜恩部队已经奉命去和达武会师，所以不出一小时，拿破仑的50000名步兵、14000名骑兵和114门大炮就逼近卡尔大公了。

22日，拿破仑在埃克米尔迎战卡尔大公，这次会战是兰茨胡特机动的高潮，也是军体系的又一次胜利。达武军钉住了54000名奥军士兵与120门大炮，但卡尔推迟了进攻，直到约翰·科洛夫拉特（Johann Kollowrath）将军的军从战场以北15英里处的雷根斯堡赶来，拿破仑遂有时间让拉纳和马塞纳从兰茨胡特急行军25英里至埃克米尔解救达武。拜恩和符腾堡骑兵到达战场，迫使一个奥军师退到城镇后方的高地上，卡尔大公发现后取消了整个进攻。下午2点刚过时，皇帝随拉纳军与马塞纳军赶到，并攻击敌军左翼。拿破仑取胜，折损了3000人，奥军则损失了4100多人与39门大炮。事后不久，他封达武为埃克米尔亲王。

“随军时，白天我一般会穿着厚厚的优质皮大衣坐马车出行，因为总司令应该在晚上上班，”多年之后，拿破仑说，“假如白天他徒劳地累着了，晚上他就会太疲惫，无法工作……如果埃克米尔会战前夜我睡觉了，我就不可能实施如此出色的机动，那是我最好的一次机动……通过行动，我一个人能变成几个人。拉纳睡得太死了，我不停踹他才把他弄醒。”[27] 德塞死后，拉纳和迪罗克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拉纳在元帅里面最得皇帝的宠爱，有些玩笑只有他开拿破仑才会接受。拉纳甚至说，“人们应该同情他，因为他如此不幸地热爱这婊子（cette catin）”，

即拿破仑。正如沙普塔尔所回忆的："皇帝知道，当他需要元帅时对方总是在自己身边，所以他听到这些玩笑后付之一笑。"[28]

法军在埃克米尔取胜后，有些混乱的奥军被迫退到雷根斯堡，希望逃到多瑙河对岸。4月23日，拿破仑到达雷根斯堡。他决定不围城，因为那太耗时了，与之相反，他坚持靠攀登猛攻城镇。法军在距城墙20步处架设云梯，试了三次后终于拿下雷根斯堡。卡尔唯一的退路经过宽30英尺的坚固石桥。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这座桥都是多瑙河上最大的桥之一，它有六个石质大桥墩，不易被加农炮摧毁。卡尔过桥后安全了，但在此过程中，他又损失了5000人和8门大炮。在今天的铁轨附近，拿破仑的右脚踝被一发冲力已尽的子弹击中，受了挫伤。他坐在一面鼓上，让伊万医生处理伤口。医生在他的靴子上剪了个洞，这样他骑马时不会太疼。[29] 为免军队士气受挫，伤口刚处理完毕，拿破仑就"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从整条战线前骑过"。[30] 战事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时他说："那些子弹看上去像在侦察我们，难道不是吗？"[31] 5月6日，他安抚约瑟芬道："擦到我的子弹没有伤到我，它差点削掉了我的阿喀琉斯之腱。"[32]

雷根斯堡之战结束后，一个牢骚兵自称曾在"酷热"的雅法给了拿破仑一个西瓜，于是向他索要荣誉军团星章。他说这个理由太微不足道，拒绝了对方，老兵便愤怒地补充道："那好，难道你不认为我在阿尔科莱桥、洛迪、卡斯蒂廖内、金字塔、阿克、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受的七处伤以及我参加的十一场战役，十一场在意大利、埃及、奥地利、普鲁士、波兰……"皇帝大笑，打断了老兵，然后他封此人为享有1200法郎津贴的荣誉军团骑士，当场将星章挂在对方胸口。"皇帝正是靠这种亲密赢得士兵的仰慕，"马尔博指出，"但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因累累战功闻名于世的指挥官，其他将军这么做就会损害自己的名誉。"[33]

拿破仑在阿本斯贝格、兰茨胡特、埃克米尔和雷根斯堡度过的连续

四天中，胜利频繁降临，频率世所罕见。4月24日，趁大军休整之时，皇帝则与一些军官进行面谈。据布拉兹上尉的记载，皇帝与一名显然熟记所属团名册的上校展开了如下对话：

“现在多少人有武器？”

“陛下，48人。”

“今年招了多少新兵？”

“22人。”

“多少士兵已经服役四年了？”

“65人。”

“昨天多少人受伤？”

“18人。”

“战死的呢？”

“10人。”

“被刺刀杀死的？”

“是的，陛下。”

“不错。”[34]

刺刀拼杀被视作最勇敢的行为。5月3日的战斗结束后，拿破仑高兴地发现第26轻步兵团最勇敢的战士其实是卡宾枪手下士巴约内特（Bayonnette[35]），于是他封此人为享有津贴的荣誉军团骑士。[36]

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到达维也纳城门，他的波兰副官亚当·赫瓦波夫斯基记载道：

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不会相信眼中景象，即便当时我也觉得难以置信。城墙并不拥挤，但仍有很多富裕的居民待在护墙上。

> 皇帝直接骑马上斜堤，所以他和人群只隔一条10码宽的沟。他上一次来这儿是在1805年，他们根据那时的记忆认出了他，于是纷纷脱帽，我想这可以理解。然后人群开始欢呼，我觉得这不必要，而且更不恰当……我对几个法军军官述说自己的惊讶之情，这些人便向我保证道，这正是1806年他们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的见闻。[37]

拿破仑花了半小时骑马环绕维也纳城防，只有25名护卫骑马随行，他“不停举帽回应欢呼，仿佛正骑马环绕巴黎”。然后他转向城外的美泉宫（像1805年一样，他住在那儿），并对赫瓦波夫斯基说：“等我们到那儿，你的床就已经备好了。你在马背上度过了那么多夜晚，现在该承蒙法兰西皇帝的照料休息一下了。”[38]

维也纳遭受了非常短暂的炮击，5月13日凌晨2点，该城向拿破仑投降。此时卡尔大公已毁掉所有的桥，正屯兵于多瑙河右岸。今天的多瑙河水流平稳，有大量运河，但当时的水道截然不同，要湍急得多。“这个家族的王公们抛弃了他们的首都，”当日，拿破仑发表宣言称，“他们不像是屈服于战场环境和挫折的光荣战士，倒像是被自身悔恨追赶的伪证者。”[39] 然而，虽说他不介意指责哈布斯堡王朝，他却不想疏远维也纳市民，他们已然保证自行承担城中警务。“围捕所有以疲惫为借口离队去抢劫的掉队士兵，”14日，他命令道，“将他们移交临时宪兵法院审判，并在一小时内实施处决。”[40] 每个纵队都设有惩罚劫掠的审判庭。

拿破仑的军队花了三天时间在维也纳下游架设浮舟桥，以便去河对岸攻击奥军。5月18日傍晚5点，加布里埃尔·莫利托（Gabriel Molitor）将军的步兵师开始乘船横渡多瑙河。他们只到达了宽2英里的洛鲍岛，然后开始在小岛和对岸间架设更多的牢固桥梁。拿破仑日后被指没有造出足够坚固的桥，但他的军队里没有多少专业工兵，而且水流湍急，奥军又不断在河中投放漂浮的树干和其他碎屑，让它们顺流而下摧毁浮桥，有一次他们甚至投放了拆解后的整个风车。

就像在奥斯特利茨和波兰一样，拿破仑再次到达漫长补给线的尽

头，并且深入敌境，直面首都沦陷后也不求和的敌人。5月8日，欧仁在皮亚韦河之战中击败弗朗茨皇帝和卡尔大公的弟弟约翰·冯·哈布斯堡（Johann von Habsburg）大公。此刻，约翰大公正率军从意大利返回多瑙河。魅力超凡的领袖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也率领蒂罗尔人反抗拜恩。反对法国霸权的德意志人心存不满，而卡尔大公的战略似乎旨在让拿破仑无法决战。可是19日近傍晚时，多瑙河上已然横跨一座长825码的桥，它由86条船和9个筏子组成。次日中午，大批法军已经上桥，向洛鲍岛进发。连接洛鲍岛和对岸的另一座桥长100码，由15艘缴获的平底船和3个支架组成。这座桥看起来明显摇摇晃晃，但拿破仑决定冒险过河。

阿斯佩恩村和埃斯灵村位于多瑙河东北岸、维也纳以东22英里处，彼此相隔3英里。5月20日午夜，马塞纳登上阿斯佩恩的教堂塔楼，发现营火较少，于是他告知拿破仑奥军正在撤退，可事实上他们正在列队，将要发动进攻。马塞纳犯了埃劳会战日早上缪拉的错误。5月21日（周日）黎明，拿破仑过河，他显示出惯有的远见，立刻下令加强桥头堡防务。不幸的是，马塞纳没有充分巩固阿斯佩恩的防御，大概他认为，既然卡尔大公在撤退，这样做并无必要。上午8点，事态已然非常显著——大公没有撤退。

1809年，阿斯佩恩的布局如下：106栋两层高房屋连同其带墙花园散布在两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上，几条南北走向街道横贯其间；齐胸高的墙环绕教堂（今天的教堂内设有博物馆）及墓地；村子西头地势稍高，那儿有一栋坚固的教区神父住宅和一座大花园。东边某处河岸连着通往埃斯灵的路（今亦然）。埃斯灵村的广场两边各有一组房屋，合计56栋。村中还有一个大谷仓，其石墙厚3英尺。拿破仑打算一边把这两个村子和连接它们的路当作防御阵地，一边穿过村庄前方的马希费尔德平原（Marchfeld plain）展开攻势。这个平原非常平坦，所以奥军拿它当阅兵场。

多瑙河一夜之间涨水3英尺，上午10点，最北端的浮舟桥已被满载的驳船撞碎。让·德帕涅（Jean d’Espagn）将军的重骑兵上桥前，法军及时修好了它，重骑兵遂用下马中队队形过桥。拿破仑正位于阿斯佩恩东边，他得知桥受损后考虑撤退，因为忌背水而战乃战争首要原则之一，但将军们（只有贝尔蒂埃一言不发）保证自己能守住战场。下午1点，他听闻大股奥军正穿过马希费尔德平原，若奥军散兵没有干扰法军轻骑兵收集情报，他本该早点发觉这一点。投入战斗的奥军数目惊人：5月21日（周日），有约3.7万名奥军士兵进攻；次日，有8.5万名奥军士兵与292门大炮进攻。周日，约3万名法军士兵过了河，周一时又有2万名法军士兵过河，但他们只有58门大炮。[41] 如果达武军设法到达多瑙河对岸，这一不利比率会更均衡，但桥梁的状态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

下午1点至2点，阿斯佩恩率先爆发战斗。5000名法军士兵驻守阿斯佩恩，他们得击退兵力远超己方的敌人。法军炮兵痛击进攻纵队。第67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站在墓地墙后射击，压制攻势，但奥军不屈不挠地前进，两军遂在村子的街道上激战。浓烈的炮击烟雾让战斗更加可怕。3点之后，奥军用90门大炮组成炮群，进一步轰炸村子，并清扫外围路障。

在大致位于两村正中间的小坑里（靠近今阿斯佩恩制瓦厂），拿破仑坐在一面鼓上，关注战事进展。他命令贝西埃派四个师保卫中部，这一职责同缪拉在埃劳的类似。贝西埃发起四次大规模骑兵冲锋，完成了任务。冲锋队伍前进时，拿破仑集中炮兵，痛击太靠近的奥军骑兵，从而支援阿斯佩恩的防御。奥军发动大举炮击，随后派三路纵队进攻，下午4点30分，守军已被迫撤出教堂和墓地。一小时后，勒格朗师奉命进入教堂和墓地，第26轻步兵团和第18战列步兵团也夺回阿斯佩恩。可是半小时后，卡尔大公亲率六个营进攻，另有十三个营支援他们。大公高呼：“为了祖国！勇敢前进！”（人们说他亲自擎着一面军旗，但他后来否认了。）村子着火了，与此同时，奥军猛攻教堂和墓地，法军开始撤

离。

浮舟桥又有好几处塌掉了，但马塞纳第四军的克洛德·卡拉·圣西尔将军设法率其师渡过多瑙河，冲向阿斯佩恩，并夺回村子南部边缘。两军一直战斗到晚上9点。约8000名奥军士兵与7000名法军士兵在战场上过夜。晚上10点时，桥又修好了。近卫军的十四个营、拉纳军和多门大炮（足够让拿破仑的大炮总数变为152门）随后成功渡过多瑙河，但达武军仍未过河。21日下午4点40分，奥军曾进攻埃斯灵村及其附近坚不可摧的谷仓（谷仓木门上的子弹孔今仍可见），拉纳亲自监督防御，让士兵凿枪眼、瞄准炮群、在街上安放路障、在墙上加筑雉堞，直到晚上11点战斗停止。

次日凌晨3点30分，战斗再次开始。在第26轻步兵团、第46战列步兵团和巴登猎兵团（Baden Jägers）的支援下，马塞纳的第4、第18战列步兵团冲入阿斯佩恩，在两条主街上发起纵队冲锋。到凌晨4点时，法军已夺回村庄大部分地区，不过教堂仍在奥军手中。日出后战斗继续进行，早上7点，马塞纳向拿破仑报称，阿斯佩恩四度易手后他夺回了全村，尽管到11点时奥军又夺回村子的大部分地区。青年近卫军推进至埃斯灵村，正好阻止了奥军攻陷它。

早上6～7点，拿破仑准备好让三个师用密集营纵队队形大举进攻。拉纳随圣伊莱尔师去右翼，乌迪诺在中路，让·塔罗（Jean Tharreau）将军在左翼。他们后面是安托万·德·拉萨尔（Antoine de Lasalle）将军的轻骑兵和南苏蒂的重骑兵。虽然晨雾笼罩，密集的奥军炮火还是狠狠痛击了法军。战士们非常勇敢。圣伊莱尔一度派第105战列步兵团对一个奥军胸甲骑兵团发起刺刀冲锋，迫使他们退向身后的掷弹兵预备队。因为货运马车无法过桥，上午9点时法军弹药已然不足。拿破仑曾承诺封圣伊莱尔为元帅，战斗中，他的脚被一发加农炮炮弹炸断了，此后法军攻势陷入停滞。（十五天后，圣伊莱尔死于伤口坏疽。）

桥又断了，卡尔也把巨大的炮群拉到中部，因此法军更不可能在那儿进攻了。拿破仑开始考虑全军经临时浮舟桥撤退的复杂问题，于是传令拉纳逐渐减少进攻。拉纳把他的营排成两排方阵，然后他们非常整齐地撤离，如同阅兵一般。撤退时，乌迪诺的参谋不是战死就是负伤，他自己则再添一伤。多尔塞纳（Dorsenne）将军胯下至少有三匹坐骑被击毙，他提出派老近卫军进攻奥军炮兵，拿破仑唯有回绝这一自杀性建议。

下午3点，奥军已攻占埃斯灵大部分地区，仅谷仓尚在让·布代（Jean Boudet）将军手中。拿破仑亲自命令老近卫军去埃斯灵以左阻挠卡尔大公前进，而士兵坚持要他在他们进攻前退回安全地带。幸好他离开了，因为接下来的战斗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伤。上午11点，马塞纳率青年近卫军的三个营步行进入阿斯佩恩，但到下午1点时，奥军已再度夺回村子。一小时后，双方都筋疲力尽了，当日会战此时已历经约十一个小时，其间战斗几乎一刻未停。下午3点30分，卡尔大公已在中部组织大炮群，他集中了150～200门大炮（当时这是战争史上最大的炮群），一个接一个地压制拉纳的炮群。然后，奥军炮兵转而轰击任何暴露在外的法军队伍，两日会战中，他们一共发射了44000发炮弹。大量法军战士命丧炮火之下，包括拉纳本人。他盘腿坐在一条沟边，这时一发3磅重加农炮跳弹炸碎了他的双膝。40岁[42]的元帅被带至多瑙河以南的埃伯斯多夫（Ebersdorf）营地，首席军医拉雷截掉了他的左腿，并奋力保住右腿。那个年代还没有麻醉剂，这些手术的痛苦无法想象，但目击拉纳负伤的人一致认为他是位模范勇士。

下午4点左右，浮舟桥刚好能通过了，拿破仑遂命令全军渡过多瑙河，退至洛鲍岛。他调来24门大炮和所用可用的火力掩护桥头堡。法军按照伤员、炮兵、近卫步兵（不包括轻步兵中仍在埃斯灵战斗的散兵）、重骑兵、步兵、轻骑兵、后卫步兵师的顺序过桥。一些腾跃兵直到深夜才乘船至洛鲍岛。尽管好几个奥军将领激烈反对，但卡尔大公认

为军队太累了，已经无力骚扰法军撤退，所以他们继续待在多瑙河对岸。晚上7点，拿破仑难得召开了军事会议。贝尔蒂埃、达武、马塞纳都想远远撤离多瑙河，但他说洛鲍岛需充当未来战事的基地，撤离该岛就得放弃维也纳。皇帝说服了元帅们。

自从十年前在阿克战败后，这还是拿破仑第一次失败。到目前为止的军事生涯中，他仅有四次败仗。（规模相对较小的巴萨诺之战和卡尔迪耶罗之战发生在1796年11月。）据估计，法军总损失如下：2万～2.3万人死伤，3000人被俘。可是他们只丢了3门大炮，这证明撤退是有序的。奥军的损失差不多，他们共有1.9万人死伤，不过仅有700人被俘。[43] 次日，拿破仑发布公报，仅承认有4100人死伤，并称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为“法军荣誉与顽强毅力的新纪念”，这是他能写出的最接近承认失败的声明了。他日后声称，拉纳恢复意识后说：“不出一个小时，您就会失去带着自己一直是、现在也是您最好的朋友这一点信念和荣耀而死的人了。”拉纳的一条腿刚做了截肢，另一条也可能被截掉，所以他的脑子里多半不会蹦出这种语法结构。[44]

奥军宣称赢了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而拿破仑封马塞纳为埃斯灵亲王，尽管会战中他没去埃斯灵。巴黎警察局局长奉命张贴布告，通知巴黎人点亮前屋庆祝胜利。[45] 然而5月23日，法军拆除了连接洛鲍岛和多瑙河北岸的桥，并把小岛改成要塞。当晚，疲惫不堪的法军士兵坐下吃马肉。马尔博回忆道，马肉“在胸甲里煮着，调味的是火药”，而非胡椒。渡船运补给和军火去洛鲍岛，伤员被送至维也纳。法军设立了野战医院，搭建更牢固的新桥，他们也在河床中插入柱子，以便保护桥梁。

拉纳的腿生了坏疽，九天后他去世了，其间拿破仑每天探望他两次。元帅断气后不久，皇帝又来看他。[46] 不久之后，皇帝的贴身男仆路易·康斯坦（Louis Constant）在司令部里看见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匆匆做好的早餐前，沉默不语，呆呆地盯着前方。拿破仑的眼中满含泪水，

眼泪越聚越多，静静地滴入他的汤中”。[47] 塞居尔、拉斯卡斯、珀莱[48]、马尔博、勒热纳和萨瓦里证实了拿破仑心怀悲痛。[49] 康斯坦和皇帝的药剂师卡代·德·加西古（Cadet de Gassicourt）称拉纳谴责拿破仑野心勃勃，但马尔博、萨瓦里和珀莱强烈反对此说。[50] 今天，拉纳长眠于先贤祠（Panthéon）22号墓穴（caverne），墓室墙上挂着写有他参加过的战斗的九面旗帜，而他的棺材包裹着三色旗。“今早蒙特贝洛公爵死了，我悲痛万分，”5月31日，拿破仑致信约瑟芬，“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再见，我亲爱的。只要你能做点什么安慰不幸的元帅遗孀，就去做吧。”[51]

6月上旬，拿破仑对萨瓦里提起俄国人：

> 我没搞错，那些盟友靠不住。如果我未与俄国人媾和，有什么事会变得更糟吗？如果他们不能保证德意志的和平，我同他们结盟又有何用？那时候，要不是残存人性阻止俄国人马上背叛信誓旦旦的信义，他们更愿意反对我。我们不能受辱。他们都想在我的坟上聚会，但不敢去那儿会合……我这边得到的不是盟友。我被耍了。[52]

爱尔福特会议多多少少维持了蒂尔西特的友善，但6月5日拿破仑返回美泉宫时，这一善意已经严重受损。

然而，当时的气氛也非全然愤怒，玛丽·瓦莱夫斯卡一来怒意就更少了。[53] 某晚在美泉宫，拿破仑迟迟才用晚餐，叫人上一只冷鸡。鸡端上来后，他问道：“什么时候生下来的鸡只有一条腿一只翅膀了？我看有人指望我靠仆人的剩饭过活吧。”然后，他揪住鲁斯塔姆的耳朵，笑话他吃了另外半只鸡。[54] 拉普记载道，尽管失去了拉纳，当时皇帝“总的来说心情挺好”，不过他看到巴黎警务报告后情有可原地发火了。该报告包括最新流言——他发疯了。“圣日耳曼郊区编了这些不错的故事，”他关注该地区向来令他心烦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沙龙，“这些人最终会气得我把他们统统赶去虱子肆虐的乡下。”[55] 他对科兰古说，问题在于“沙龙社群总是敌视政府，在那儿什么都被批评，全无赞扬”。[56]

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后，卡尔大公沿维也纳以北的多瑙河集中军队。6月9日，奥军入侵萨克森，五天后，欧仁却在匈牙利拉布（Raab）[57] 大败约翰大公。这取悦了拿破仑，因为拉布之战后卡尔大公无法获得急需的增援，而欧仁的意大利军团能同他会师了。波尼亚托夫斯基公爵的波兰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对战奥军，与根本不乐意参战的俄军形成鲜明对比，拿破仑也欣赏这些波兰人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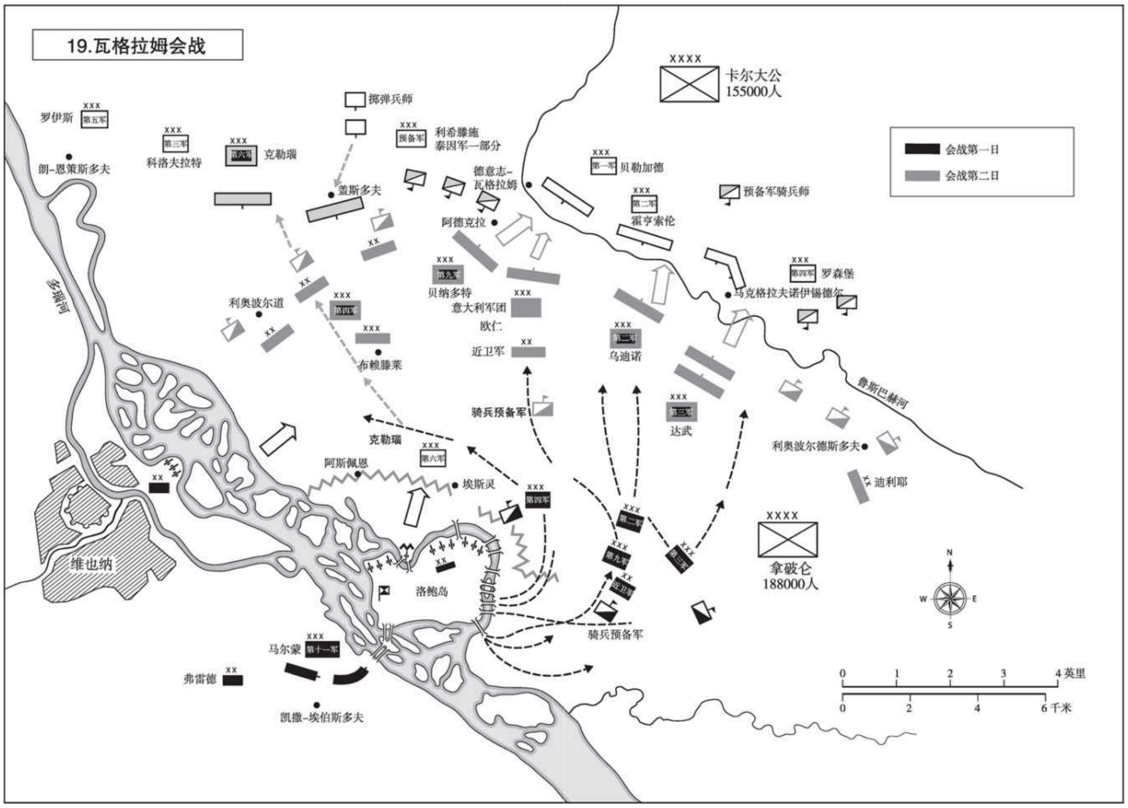
7月上旬，德意志军团[58] 工兵已在多瑙河南岸和洛鲍岛之间修了足够坚固的桥，以至于拿破仑自夸道："多瑙河不存在了，它废掉了。"[59] 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后第七周，洛鲍岛与北岸之间的灵活浮桥可以晃荡着投入使用了，所以拿破仑已做好复仇准备。他穿着中士的长外套，亲自来到对岸奥军哨兵射程内侦察，寻找最佳的过河点。拿破仑原先选择的过河点位于正北岸，但这回他决定改去东边城镇大恩策斯多夫（Gross-Enzersdorf）。1809年7月4日晚，军队开始过河。

拿破仑现在集中了130800名步兵、23300名骑兵以及至少544门大炮（由10000名炮兵操纵），这是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中法军兵力的三倍。布拉兹上尉回忆道，洛鲍岛上"能听到欧洲的所有语言"，有"意大利语、波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每一种德语"。这支庞大的多语种军队的人数和D日进攻诺曼底的盟军兵力差不多，通过细致策划与筹备，拿破仑只用一个晚上就让全军与其全部马匹、加农炮、货运马车、补给、弹药渡过了欧洲最大河流之一，进入敌境，而且没让一个人掉队。[60] 这是项惊人的后勤成就。法军刚到远岸就穿过马希费尔德平原，迎战卡尔大公的113000名步兵、14600名骑兵和414门大炮。当时，将要爆发的战斗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

就像阿尔科莱会战、埃劳会战、埃克米尔会战和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一样，瓦格拉姆会战持续了两日。7月5日（周三）上午8点，法军拿下大恩策斯多夫。晚上9点，乌迪诺、达武、马塞纳都已经过河。

（马塞纳在洛鲍岛摔下马，受了伤，于是他乘坐马车。）拿破仑在拉斯多夫（Raasdorf）的一个小土墩上设立司令部，马希费尔德平原其余地区都是平坦地块，这座小土墩是方圆数英里内唯一的凸起。鲁斯巴赫河（the Russbach）宽25～30英尺，水流湍急，卡尔大公让士兵在这条小河后排成横队，盼着弟弟约翰大公及时从东南边的普雷斯堡赶来，该地距此处约有30英里。

拿破仑的布阵如下：达武军和两个龙骑兵师在右翼，乌迪诺在中路，马塞纳和轻骑兵在左翼；14000名萨克森人组成的贝纳多特军就近支援；欧仁和麦克唐纳的意大利军团、马尔蒙军和帝国近卫军结成第二条大战线；贝西埃的骑兵预备军构成第三条战线。葡萄牙兵团守卫起自洛鲍岛的桥头堡，大量弹药马车、补给马车不断拥向对岸。按照拿破仑的盘算，乌迪诺和贝纳多特要正面迎敌，钉住奥军，马塞纳会保护通往小岛的交通线，与此同时，达武则击退敌军左翼。意大利军团将适时突破敌军中路。若约翰大公在右翼的达武身后露面，拿破仑的计划就会严重受损，所以两军一直都在找他。



下午2点，烈日炎炎，法军穿过马希费尔德平原上齐腰高的玉米丛，一边行军一边在16英里宽的战场上展开队伍。3点30分，贝纳多特一枪没放，迅速拿下拉斯多夫。到5点时，他已在阿德克拉村（Aderklaa）前布阵，该地是战场上的关键村庄，占领它几乎等于将奥军切为两半。拿破仑攻击从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Markgrafneusiedl）延伸至德意志-瓦格拉姆（Deutsch-Wagram）的整条奥军战线，他壮志满怀，命令乌迪诺“稍稍前进，天黑前给我们来点音乐”。[61] 乌迪诺派士兵蹚过鲁斯巴赫河，他们过河时将滑膛枪和子弹袋举过头顶。晚上7点，乌迪诺的7300人进攻鲍默斯多夫村（Baumersdorf），该村位于河畔，有30栋房屋。1500名奥军把守鲍默斯多夫村，法军伤亡惨重。拿破仑7月5日的夜袭为时太迟、太缺乏明确目标，而且不协调。鲁斯巴赫河几乎只是一条小河，但它扰乱了步兵队形，此外骑兵和炮兵只能靠寥寥几座桥梁过河。法军攻势的确钉住了奥军，但晚上9点时，各地法军都已被逐回鲁斯巴赫河南岸，乌迪诺也损失了很多人手。

晚上8点，欧仁的意大利军团中有人进入德意志-瓦格拉姆镇，尽管有4名将军负伤、2000名意大利人崩溃奔逃。9点，贝纳多特率9000名萨克森步兵与14门大炮进攻卡尔大公。战场混乱不堪，但他一直战斗到11点，折损了一半兵力。事后，贝纳多特大肆抨击拿破仑，批评他命令自己发动这次进攻。[62] 达武明智地暂停了攻击，11点时战事已经平息。会战第一日，奥军占据上风。晚上，他们往多瑙河上投放了18艘着火的筏子，想冲垮下游的浮桥，但法军插进河床的柱子拦下了它们。

6日（周四），达武正在准备黎明攻势时，他的副官勒热纳上校路遇数千名奥军士兵，发现他们正在列队，预备进攻，但他来不及回去警告元帅。[63] 凌晨4点，奥军进攻大霍芬（Grosshofen），好在达武已经准备好了，重要原因之一是各团军乐队没有接到卡尔大公的命令，不知道攻击前应该保持绝对安静。拿破仑吃早餐时，右翼的喧闹惊动了他，他担心约翰大公已从东边赶来，于是派一些重骑兵预备队支援达武。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奥军拿下大霍芬，但法军又夺回该地。

贝纳多特没收到命令就退出阿德克拉，奥军遂不费一卒拿下村子，同时两组大炮群开始对轰。在咨询了马塞纳后，拿破仑只好在早上7点30分派圣西尔的法国-黑森师夺回阿德克拉。双方展开激战，他们对射子弹时仅仅相隔80步，然后法军攻克村庄。这一天，44000名奥军士兵与35000名法国-德意志联军士兵在阿德克拉村作战，而贝纳多特相当淡然地放弃了它。拿破仑讽刺地问贝纳多特："你就想靠那科学机动让大公放下武器？"接着他解除了此人的指挥权，说："像你这种笨蛋对我没用。"[64] 9点45分，马塞纳军的莫利托将军夺回阿德克拉，但因为贝纳多特自愿犯错，很多人已经战死。

俯瞰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的高地上有一座瞭望塔[65]，上午10点，达武拿它当瞄准点，派10000名骑兵穿过开阔的平原，奔赴右侧。他们清扫奥军骑兵，为弗里昂和莫朗的步兵师开辟前进空间，奥军被迫

延长战线，以防侧翼被击退。若约翰大公此时出现，拿破仑定会陷入灾难，但约翰允许士兵们中途停下吃午餐，还对哥哥说下午5点前来不了，所以卡尔只好投入预备队。约翰的侦察兵终于赶到后，他们却说奥军已败，现在去战场毫无意义，于是约翰就没去。若他不是皇帝的手足，这一决策会让他上军事法庭。

现在，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是奥军阵地的关键。一处平缓山崖在此折向东北方，而村子就在崖底。在石屋、风车、修道院和壕沟环绕的老教堂之间，两军挨家挨户地激烈肉搏，村子很快着火了。然而，反击的奥军欠缺协调性，未能夺回村子。此前七十二小时中，拿破仑在马背上过了六十小时。会战进展到此刻，他却惊人地再次小睡十分钟，这既表明他有多疲惫，同样也体现他有多冷静。他醒来后，发现马克格拉夫诺伊锡德尔仍在达武手中，于是宣布会战胜利。[66] 当日，在拉斯多夫的小土墩（司令部所在地）及其附近至少有26名参谋官死伤，考虑到这一点，拿破仑能在700门加农炮轰鸣的战场上睡着便更显不凡。近卫猎骑兵下辖两个团，这两个团的两名指挥都丢了一条腿：皮埃尔·多梅尼（Pierre Daumesnil）少校失去了左腿，他浑身是伤，受全军爱戴；埃居尔·科尔比诺（Hercules Corbineau）少校失去了右腿，他是多梅尼少校的朋友，在埃劳战死的拿破仑的副官的弟弟。数年后，科尔比诺要当塞纳省（the Seine department）[67] 稽税员，他来找拿破仑商量此职位所需预付定金。据说皇帝说，他会用科尔比诺的腿代替需要的任何定金。一枚榴弹袭来，拿破仑的坐骑受惊，乌迪诺便大叫：“陛下，他们在轰炸司令部。”“先生，”皇帝回答道，“战争中一切意外皆有可能。”[68] 一发加农炮炮弹掀飞了一名参谋官的头盔，拿破仑于是打趣道：“还好你就这么高！”[69]

上午11点刚过时，卡尔大公派14000人沿多瑙河向洛鲍岛进军，他希望切断拿破仑的退路，绕到法军后方。马塞纳军实施了整个战局中最雄心勃勃的机动之一，他们正对着奥军的两个军行军5英里，径直横穿

战场。[70] 拿破仑随后命令贝西埃派骑兵冲击科洛夫拉特军和奥军掷弹兵预备队的结合处。他看着4000名重骑兵驰过自己身边，他们高呼“皇帝万岁！”他回答道：“别拿刀砍，用你们的刀尖，用刀尖。”[71] 贝西埃胯下的坐骑被击毙，他自己也中了一发加农炮炮弹，被人带离战场。拿破仑担心这会打击士气，于是敦促那些知道不该关心发生了何事的人继续战斗。贝西埃一康复，拿破仑便同元帅开玩笑，说对方不在场导致他少抓20000名俘虏。[72] 贝西埃的冲锋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决定性的骑兵战斗，正如整个瓦格拉姆会战是炮兵主导战场之始。此后，骑兵不再是战争中的关键部队，不过数十年后人们才彻底明白这点。

法军在瓦格拉姆折损了大量战马，但贝西埃的冲锋让洛里斯东有时间将112门大炮组成密集的大炮群，其中包括60门帝国近卫炮兵的12磅炮，它们号称“拿破仑的爱女们”，位于战场中部。洛里斯东朝奥军发射了15000枚炮弹，这些炮弹经常在平坦坚硬的地面上弹跳，并点燃玉米地，从而烧死了很多伤员。战场上回响着巨大的震荡喧嚣。

当奥军后撤时，法军大炮群开始前进。拿破仑要求老近卫军的每个步兵连派20名志愿者跑去前方，帮炮兵调动并操作大炮，各连照办。下午1点左右，达武正沿鲁斯巴赫河行军。拿破仑命令麦克唐纳进攻，以便钉住奥军预备队队列，阻止他们去攻击达武。1804年拿破仑初次册封元帅时，麦克唐纳盼望封帅，但他从事共和派政治活动（他依然身穿旧制服，佩戴三色腰带），又是莫罗的朋友，所以被排除在外了。麦克唐纳是欧仁的副司令，他非常称职，在意大利干得相当漂亮，在瓦格拉姆也表现卓越。他的8000人现在组成宽900码、深600码、背部开口的巨大空心方阵，向奥军战线进军，骑兵掩护其敞开的后背。这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后一次有人采用这种编队，原因是它太难控制：前面的营可以开火，但后面的不行，而且这种阵型自然会吸引大量炮火。不管怎么说，附近的奥军骑兵太多，步兵不得不结成方阵，这种编队也让麦克唐纳的兵力看起来增加了不少。

意大利军团重骑兵与轻骑兵分别在左右两侧支援麦克唐纳的方阵，大炮群也为其提供炮火掩护。尽管方阵损失惨重，麦克唐纳还是为马塞纳和达武争得了必要时间，两人遂能各自包抄奥军右翼与左翼。拿破仑发现麦克唐纳需要更多的增援，便派弗雷德的拜恩师（共5500人）和一部分青年近卫军驰援。（弗雷德在进攻时受轻伤，于是夸张地大喊："告诉皇帝，我为他牺牲了！"结果弗雷德只听见麦克唐纳铿锵有力地回答："你死不了，自己去跟他说。"[73]）

下午2点时，卡尔大公决定分阶段撤退。两军继续争夺施塔德劳村（Stadlau）、卡格兰村（Kagran）、利奥波尔道村（Leopoldau）和施特雷伯斯多夫村（Strebersdorf），与此同时，奥军预备军的掷弹兵师和骑兵师互相掩护。正是在战役的这一阶段，法军骑兵名将安托万·德·拉萨尔在部下面前被击毙。拉萨尔在奥斯特利茨、埃劳和斯德丁表现出色，在1800年战局中用坏了七把刀，还分别在埃及和海尔斯贝格救了达武和缪拉的命。"30岁还没死的骑兵是孬种，"他曾经评价骠骑兵，"我不指望活过30岁。"[74]拉萨尔战死时33岁。

这四十个小时中，法军一些部队几乎一直在战斗。大部分法军士兵纯粹是太累了，所以才没有追击敌军。晚上7点左右，拿破仑和一名腾跃兵共享汤、面包和鸡肉，并察觉到自己不能在战场上乘胜追击。虽说瓦格拉姆会战和奥斯特利茨会战、阿尔科莱会战并排刻在荣军院拿破仑墓的大理石基座上，但它实际上是某种皮洛士式胜利[75]。在瓦格拉姆会战中，德意志军团至少有30000人死伤，此外有4000人被俘。法军还折损了大量战马、11门大炮、3面鹰旗和9面军旗。奥军有23000人死伤、18000人被俘，虽然损失严重，但他们退向茨纳伊姆时秩序良好，所以只丢了9门大炮、1面军旗。"瓦格拉姆会战结束后，晚上法军全军都喝醉了，"布拉兹上尉回忆道，"有很多甘醇美酒，士兵们放肆痛饮。"[76]经历了前两天的那种战斗后，他们有资格享用这些酒。

◆

“不要怨恨，”战后，拿破仑与麦克唐纳谈话，承认两人昔日的政治差异，“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昨天你非常光荣地赢得了元帅权杖，我将把它授予你，从而证明我们的友谊。”[77] 拿破仑仅在战场上封过两名元帅，除了麦克唐纳，另一人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他将在莱比锡会战中封帅。皇帝不满意会战第一日乌迪诺造成的大量损失，也批评马尔蒙过多瑙河时磨磨蹭蹭，但一周后他俩也受赏元帅权杖。马尔蒙只有34岁，这导致现役元帅平均年龄降至43岁。当时，士兵们如此评价瓦格拉姆会战后的三项册封，“一个为了友谊，一个为了法国，一个为了军队”，因为马尔蒙从土伦会战开始一直追随拿破仑，麦克唐纳是优秀军人，乌迪诺深受部下爱戴。[78]

“我的敌人战败了，他们一败涂地，一片混乱，”会战结束后当晚，凌晨2点时拿破仑致信约瑟芬，“他们人数众多，被我击溃了。今天我很健康。”[79] 三个小时后，他又给她写信，说缴获了100门大炮（此乃荒唐夸张），还抱怨晒伤。7月10～11日，马尔蒙和卡尔大公又在茨纳伊姆对战，此战无决定性战果。次日，大公提出停火，拿破仑同意了。此后三年，他没再上过战场。

瓦格拉姆会战后第七天，弗朗茨一世否决拿破仑与卡尔大公的停火协议。35艘战列舰和200艘其他船只刚刚送约40000名英军士兵在荷兰瓦尔赫伦岛登陆，而弗朗茨想在求和前看看英军如何进攻。这次远征是一场灾难，疟性痢疾立刻打垮了英军，一半的人无力战斗，超过10%的人病死（相比之下，战死者只有106人）。“热病和洪水会弄死一批英军，”早在8月9日，拿破仑就致信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显示出卓越的远见，“只要他们待在瓦尔赫伦岛，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沼泽里鞭打自己的屁股，还追赶猎物的影子，随他们去吧。”[80] 就在圣诞节前夕，远征军带着11000名患病士兵艰难地回国。富歇曾迅速行动，他

招募了一大股军队保卫安特卫普，以防英军也在那儿上岸，但拿破仑只是稍稍欣赏他："你可能考虑招募一支军队反对我！"富歇予以回击。[81]甚至在英军失败之前，9月时弗朗茨就承认瓦尔赫伦远征无法挽救他，奥地利遂开始谈判，准备结束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

---

[1]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9856 p.1498，January 15，1809

[2]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264 p.617，April 14，1807

[3]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44

[4]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241，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1，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78 n.22

[5]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87

[6] ed.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30

[7]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p.76-80，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120，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Ⅱ pp.334ff，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9

[8]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p.120，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80

[9]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pp.25-6

[1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46

[1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47

[12] 1809年，他像往常一样勤奋写信，这一年他总共写了3250封信，其中一封给富歇的信指出警务部账务记录有1法郎45分的偏差。

[13]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1，Adams，

Michael，*Napoleon and Russia* 2006，p.288

[14] 当日，拿破仑要求妹妹埃莉萨（上个月他封她为托斯卡纳女大公）在佛罗伦萨颁行帝国其余地区通行的禁赌令，理由是“赌博破坏家庭，树立恶例”。CG9 no.20738，p.443.巴黎不在此限之列，因为“那儿无法禁赌，当地警察也利用赌博”。

[15] 沙普可视信号系统以发明人沙普兄弟命名，它能把可动臂板组合成196种形式，从而表示单个字母或整句短语。该系统可传达相对准确的信息，其最快传讯速度为每日250英里。法国最早启用沙普系统，拿破仑大大扩张其应用地域，让它深入德意志和意大利。Olsen and van Creveld，eds.，*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p.17.

[1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48

[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2

[18]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56

[19]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0869 p.510，April 18，1809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Ⅰ p.218

[20] 该山坡今位于麦当劳餐馆停车场后方。

[21]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p.106

[22] 意为“天赐雄狮”。——译者注

[23]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33

[24]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291

[25] 不止副官们获得了奖励。法军成功攻下兰茨胡特后，拿破仑问第13轻步兵团上校，该团最勇敢的战士是谁。上校犹豫不决，也许他认为特地挑出某个人会招来怨恨。拿破仑于是问军官们，他们也沉默不语。最后，一位年长的上尉回答鼓手长最勇敢。拿破仑在士兵的欢呼声中对鼓手长说，“你被称作勇士部队的最勇敢之人”，然后当场封他为荣誉军团骑士。Haythornthwaite ed.，*Final Verdict*，p.220.

[2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33

[2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3

[28]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252

[29]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204

[30]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26，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52，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0

[31]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3

[32]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0975 p.569，May 6，1809

[33]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37

[34]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p.181-2

[35] 意为“刺刀”。——译者注

[36]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p.220-21

[37]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4

[38]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p.64

[39]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199

[40] 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p.130

[41]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10

[42] 拉纳生于1769年，原文误作“30岁”。——译者注

[43]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10

[4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05

[45] 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Paris

[46]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p.242，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67，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96，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25

[47] Martin，Brian，*Napoleonic Friendship* 2011，p.40

[48] 军官，全名为Jean-Jacques-Germain Pelet-Clozeau，非前文中的国家参政珀莱。——译者注

[49] 拉斯卡斯本人不在场，但他有很多机会在圣赫勒拿岛上和拿破仑谈论此事。

[50] Martin，Brian，*Napoleonic Friendship* 2011，p.43

[51]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105 p.634，May 31，1809

[5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45

[53] 当月，拿破仑的特别情妇账户为“维也纳冒险”支出12000法郎。瓦格拉姆会战后，他返回王宫陪伴玛丽，9月，特别账户又支出了17367法郎。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57.

[54]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88

[5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40

[56] Caulaincourt，*Mémoires* Ⅰ p.368

[57] 今杰尔（Györ）。——译者注

[58] 原文误作“大军团”。后文的类似错误已被译者修改，不再特地标出。——译者注

[59]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p.122

[60]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Gill，John H.，*Thunder on the Danube* 3 vols.2008-2010，Ⅲ p.223

[61]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102，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128

[62]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172

[63] 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p.135-6

[64] Rothenberg，Gunther E.，*The Emperor's Last Victory* 2005，p.181，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pp.172-3

[65] 当地现有的塔系战后所建。

[66] 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155

[67] 塞纳省今已不存在，其领土划归巴黎、上塞纳省（Hauts-de-Seine）、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瓦勒德马恩省（Val-de-Marne）。——译者注

[68]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3

[69] Arnold，*Napoleon Conquers Austria* p.147

[70] Gill，John H.，*Thunder on the Danube* 3 vols.2008-2010，Ⅲ p.239

[71]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206

[72] Lachouque，Henry and Brown，Anne S.K.，*The Anatomy of Glory* 1978，p.163

[73] Rothenberg，Gunther E.，*The Emperor's Last Victory* 2005，p.193

[74]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p.254

[75] 西方谚语，意指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的胜利。——译者注

[76]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31

[7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87

[78]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11

[79]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467 p.833，July 7，1809

[80]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739 p.975，August，1809

[81]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96

第二十二章 登峰造极

人人都知道，政治筹谋中家庭纽带只占很少一点，而且二十年后它就断了。费利佩五世就对自己的爷爷开战。

——1808年7月，拿破仑致沙皇亚历山大

公主应该恋爱吗？她们是政治奴隶。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必须让一个至高国度统治其他国家，”拿破仑赤裸裸地宣称，“且该国度应有足够权力强制它们和谐共处。法国最适合担当此任。”[1]在他掌权时，法国凭借人口（当时它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产品、科技革新、歌剧、家具、绘画、设计、戏剧、文学、欧洲通用的法语、开阔美丽的巴黎这些要素的综合实力，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主导国家。

从17世纪晚期开始，欧洲迭出开明独裁者。拿破仑相信理性化进程，认为温和独裁可行，所以他是最后一位开明独裁者。他本人尊重最著名的独裁者典范弗里德里希大王，此举凸显了他这一自我认知。像很多法国人一样，他认为可以靠大军团在欧洲上下推广近代治理思想。[2]“你们只有特别法，”1805年，他在里昂与一名意大利代表交谈，“因此你们必须制定普通法。你们的人民只有地方习惯，他们必须养成民族习性。”[3]用英国历史学家H.A.L.费希尔（H.A.L.Fisher）的话说，很多意大利与德意志公职官员认为，拿破仑帝国“粉碎旧俗的坚硬外壳，用有效结合的广泛思想取代狭隘、散漫、倦怠的地方主义”。[4]到1810年时，他正在建立进步的一元制帝国，这个帝国拥有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的统一法律、开明的世俗主义和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一的度量衡与货币。[5]然而，法国行政模式几乎从来不曾简单适用于被征服领土，倒不如说它会根据当地普遍情况做微妙调整。若法典多半会

激起反抗，或阻碍“捐赠”和征兵，法国就会推迟实施它。[6] 举个例子，拜恩和巴登的行政人员按照拿破仑帝国的方式彻底改造了政府结构，然而相对不太亲法的梅克伦堡及其邻国萨克森就没有进行改革。[7]

在被兼并领土上，支持拿破仑的政治力量有很多种：不希望本地正统统治者复位的城市上层阶级；重视效率的行政改革者；自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较小宗教信徒，如新教徒和犹太人；信奉世俗教育、离婚自由权等理念的自由派人士；盼望实现民族自决的民族，如波兰人；商人（至少在大陆体系开始伤害他们之前）；《拿破仑法典》简明性的仰慕者；反对行会限制贸易的方式的人；中产阶级改革者；收购了国家没收的教会或王公财产，希望法律保护这笔交易的法国人；不用再缴纳封建税款的农民，特别是德意志农民。[8] 拿破仑想完全废除封建社会的头衔、限嗣继承以及特权的所有痕迹，但帝国中的威斯特伐利亚、波兰、西班牙、伊利里亚（Illyria）[9] 、卡拉布里亚等地区太落后了，所以除了名字，它们仍处于封建时代。[10] 为使拿破仑的体系平稳运行，最需要的是时间。

当然，在拿破仑之前，一些正统政府就曾推行近代化改革，但教会阶级、特权秩序、根深蒂固的行会、横加阻拦的司法机关、一毛不拔的议会（parlements）、保守贵族和疑虑重重的农民常常反对它们。[11] 拿破仑政府的能力比其所有前任的都强得多，因此他能斩开这些戈尔迪之结，实现所谓的辽阔帝国中“行政、官僚和财政制度的系统化重塑”。[12] 结果，他建立了统一的等级制行政体系，而巴黎是其控制中心。照当时一名仰慕者的说法，从巴黎开始，“执行链向下传达至被管理者，不受大臣干扰，法律和政府命令也传递至社会秩序最远的分支”。[13] 18世纪开明独裁者的梦想实现了。

欧洲上下，很多人认为拿破仑似乎代表着进步、精英政权和理性未来的理念。1806～1817年，实际上的拜恩首相马克西米利安·冯·蒙特格

拉斯（Maximilian von Montgelas）伯爵让修道院世俗化、引入义务教育和疫苗、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废除国内通行费，并给予当地犹太人和新教徒公民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改革符合他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14] 拿破仑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认为应对人才开放就业渠道，与他相比，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德意志的律师、医生、建筑师、商人怎会更想被某个近亲结婚生下的幼年王公统治呢？当然，现实中他们通常无甚选择余地，只能为法国短期效力，但是法军的胜利让很多人有机会从革命体系中汲取近代惯例，而且这一过程跳过了断头台和恐怖统治。此外，如果这些人不喜欢拿破仑和法国，他们也能理解他和它的做法更有效。比如说，拿破仑下台后，他在意大利设立的税收制度延续了一个世纪。[15] 然而，拿破仑信奉泛欧主义之说乃一则神话。1812年，他鼓吹自己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守护人，正抵御俄国的野蛮亚裔部落。他构建遗产时也充分利用了欧洲统一的思想。可是他的帝国本质上始终是法兰西帝国，而非欧洲帝国。

拿破仑固守大陆体系，此举在很多方面损害了他，其中之一是他和教皇的关系。庇护七世曾经不准热罗姆离婚、不承认约瑟夫的那不勒斯王位，现在他又拒绝加入欧洲封锁体系，不限制对英贸易和英国产品。这些事凑一块后，拿破仑就认为梵蒂冈看上去有他的敌人。1808年2月，他派塞克斯修·米奥利斯（Sextius Miollis）将军沿意大利西海岸南下占领教皇国，包括特雷韦河（the Tevere）上的教皇城堡圣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法军加农炮很快就可以直接对准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Papale di San Pietro）。然而，教皇还是不肯对英宣战，拿破仑指出英国是异教国家，他也无动于衷。事态已然明了，教皇不会向拿破仑屈服，不会驱逐教皇国境内的英国货物和英国商人。拿破仑当即采取行动，1809年6月10日，他把教皇国并入法兰西帝国。庇护七世立刻报复法兰西皇帝，开除了他的教籍。

此前在1807年7月，拿破仑曾对塔列朗嘲讽教皇处罚这一概念。“他

们只剩一招，那就是把我关进修道院，像鞭打路易·德·德博奈尔一样抽我。”[16]（查理曼之子路易一世曾下令把红热匕首刺入侄子贝尔纳亲王的眼球，后来他为此鞭打自己。）然而，开除教籍不是什么玩笑，因为波兰、意大利和法国的数百万虔诚天主教徒现在得重新考虑是否效忠不信教的皇帝。更麻烦的是，当时拿破仑正希望赢得西班牙激进天主教徒的拥护，而西班牙天主教的教士将利用他新得到的异端地位，有效推行反对法国占领的宣传活动。

接下来的十三个月，法国和梵蒂冈的关系继续恶化。瓦格拉姆会战前夜，即1809年7月5日，萨瓦里奉拿破仑的命令采取出格行动，派艾蒂安·拉代（Étienne Radet）将军逮捕梵蒂冈教皇。拉代只给了教皇半小时收行李，然后把他押至意大利西海岸小港口萨沃纳港的主教宫殿。庇护七世于是说了一句话，此言堪称19世纪最睿智言论之一。“相信我，我的儿子，”他对拉代说，“那些指令不会让你听到神的旨意。”[17]与此同时，拿破仑告诉自己的妹夫，即阿尔卑斯地区总督卡米洛·博尔盖塞亲王（其辖区包括萨沃纳），“教皇的看守应该打扮得和仪仗队一个样”。[18][19]

庇护七世的表现非常高贵，但这则铁腕战术的悲剧故事对拿破仑绝无益处。唯一的实质改变是，此前公开登陆码头的英国货物现在得靠走私进入里窝那。虔诚天主教徒私下为教皇所受待遇愤愤不平，而拿破仑替他的行为找到了历史先例，宣称罗马一直是查理曼帝国一部分。他补充道，现在罗马将成为“帝国自由都市”“帝国第二大都市”，法国也将每年捐赠200万法郎负担教会开支。[20]卡诺瓦还轻松说服他每年花20万法郎保护罗马古迹。“教皇是好人，”8月6日，拿破仑告诉富歇，“但他无知又疯狂。”[21]唉，这些形容词其实更适合描述拿破仑自己对教皇的态度。

1809年7月27～28日，塔拉韦拉（Talavera）会战爆发，威灵顿和西

班牙军总司令奎斯塔大败约瑟夫、儒尔当和维克托。儒尔当报称，威灵顿损失10000人（英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还丢失了战场。这份报告误导了拿破仑，所以他格外恼火。等皇帝发现英军其实只损失了4600人，而“一整天下来”法军都“被击退”时，他便说儒尔当的谎言是“直截了当的犯罪”，并且因这些谎话很可能影响了他的西班牙战略而大发雷霆。“在马德里报纸上，他爱说啥说啥，”拿破仑写道，这等于承认媒体文字常常弄虚作假，“但他无权对中央政府掩盖真相。”[22] 比起麾下将军的报告，拿破仑更愿意相信英国媒体的报道，并告诉克拉克：“你必须对塞纳蒙将军说，他没有正确报告自己的炮兵部队状态，英军缴获的大炮比他承认的多。”[23] （塞纳蒙报称丢了6门，但他丢了17门。）“只要他们进攻占据有利位置的英军等精兵，又不确定能否占领敌人的阵地，”他继续说，“我的人就被毫无意义地引向死亡。”[24]

1809年8月15日，拿破仑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遂封马塞纳、贝尔蒂埃和达武为亲王，并给予每人大笔赠款。当天，他举行大阅兵，检阅恩策斯多夫的近卫军，并出席庆祝晚宴。这一切活动结束后，晚上，他和贝尔蒂埃微服潜入法军占领的敌国首都维也纳（在那儿他可能被认出来），观看向他致敬的烟火表演。[25] 然而当日白天，他还是照常勤奋工作，从美泉宫写信：致康巴塞雷斯的信提及给元老院的信；致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兰古将军的信提及英国试图从俄国购买滑膛枪的谣言；致战争部长克拉克的信提及西班牙。此外，他命令德意志军团军务总监皮埃尔·达吕给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所有战死者的孩子每人300法郎。当日，拿破仑还给缪拉和贝尔蒂埃写了几封信。致缪拉的信称，一旦“清理完”西西里的敌人就在那儿设立公国；致贝尔蒂埃的信谈论造船——修造可载6600人横渡多瑙河的船只。[26]

到9月时，弗朗茨被迫开始和谈。“你的主子和我像两头公牛，”拿破仑对奥地利谈判代表、奥军上校费迪南德·布勃纳（Ferdinand Bubna）伯爵说，“都想跟德意志和意大利配种。”[27] 接着，他对缪拉的

副官夏尔·德·弗拉奥上校（奥尔唐斯的情人）说：“我需要德意志，也需要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意味着西班牙，而西班牙是法兰西的延伸。”[28]这几乎确保了奥地利的永久敌意，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它曾世代控制意大利和德意志。“我不怕他，”拿破仑私下说起弗朗茨，“我太鄙视他了。他不无赖，恰恰相反，他像路易十六一样思想单纯，但总是被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影响。永远不能信任他。”[29]对于将要展开的和谈，他则说：“放弃几个省对他们来说又怎样呢？他们如此不讲信用，难道不会一有机会就夺回来吗？”1796～1797年、1800～1801年、1805年、1809年的经历当然说明此言不假。“这是我第二次来奥斯特利茨战场，”9月17日，拿破仑和将军们在布吕恩用餐，他说，“我还会第三次来这儿吗？”“陛下，”他们回答道，“根据我们每日所见，谁也不敢打赌这不会发生。”[30]

10月14日，尚帕尼和利希滕施泰因在《美泉宫条约》上签字。次日，拿破仑批准条约，没过多久弗朗茨也批准了。弗朗茨收到数次警告后依然发动战争，所以他没什么资格抱怨条款严苛。拿破仑把奥军兵力限制在15万人，还兼并伊利里亚省份，奥地利保住了阜姆（Fiume）[31]，但几乎成为内陆国，于是他成功地把奥地利贬为二流国家。奥地利割让伊斯特拉半岛、克恩滕给法国，割让萨尔茨堡[32]、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以及上奥地利部分地区给拜恩。此外，它被迫加入大陆体系，并承认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实施的所有改变。奥属加利西亚被瓜分，占其面积五分之四的西部领土归华沙大公国，剩余的五分之一（基本上是东加利西亚）归俄国。俄罗斯帝国增加了40万人口，尽管如此，圣彼得堡还是新添恐惧，担心拿破仑想重建波兰王国。[33]总的来说，奥地利得放弃350万人口，还要支付巨额赔款。弗朗茨也得保证“永远……和平友好”。仅仅四年前，他曾做出同样的承诺，这一回他的诚意也和上次的一样。[34]

早在4月时，蒂罗尔就爆发了拥护奥地利的起义。《美泉宫条约》

签订之日，拿破仑派欧仁帮助拜恩平定反叛。[35] 10月17日，欧仁率5.6万名拜恩军和法军士兵进入蒂罗尔，镇压反抗运动。颇具魅力的起义领袖、前旅馆老板安德烈亚斯·霍弗被出卖了，1810年1月下旬，他在南蒂罗尔圣马丁村（St Martin）被俘。（抓获霍弗的士兵想从这个可怕的敌人身上弄点纪念品，于是扯他的胡子，直到其双颊流血。）[36] 欧仁请求宽待霍弗，但2月11日，拿破仑回答道，自己正全力和奥地利商讨将要来临的联姻，不希望奥地利官方请求放过霍弗，导致事态复杂化，因此需召集军事法庭，在二十四小时内枪决霍弗。[37]

人们批评《美泉宫条约》，称这种迦太基式和平[38] 迫使奥地利再度与拿破仑开战，最终损害他自己的利益，但1812年他在俄国惨败后奥地利才动手。当时，《美泉宫条约》似乎建立了防止持续复仇战争所需的新型法奥关系。10月8日，梅特涅就任外交大臣，他已然总结道，十二年来奥地利连续四次战败，现在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和法国联手，视它为主要伙伴。他谈及“适应胜者法国的体系”。[39] 如果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迎娶弗朗茨的女儿、12月时将满18岁的玛丽·路易丝（Marie Louise）女大公，奥地利就能一下子融入法国体系。双方已有尝试性初步试探。1809年，拿破仑尚未放弃娶罗曼诺夫公主的念头，但他仍是约瑟芬的丈夫，所以不可能娶到奥地利或俄国新娘。

两年前的事和刚刚才发生的一件事或许促使拿破仑将思绪集中到继承前景上，让他再度渴望让亲生子继承王朝。[40] 拿破仑可能曾考虑立路易和奥尔唐斯之子、荷兰王储拿破仑-路易-夏尔为最终继承人，1807年5月5日早上，这个孩子在海牙死于类似哮喘的疾病，年仅4岁。奥尔唐斯非常悲伤，别人寄来的信件也不太能宽慰她，比如6月16日拿破仑的信：“你的不幸令我触动，但我希望你更加勇敢。活着就是受罪，有资格受人尊敬者必须力争掌控自己。”他又写了三句话，然后用弗里德兰会战作结：“6月14日，我取得大胜。我很好，我非常爱你。”[41] 就算奥尔唐斯对路易尚有苟延残喘的感情，儿子的死也让它破灭了，后来她

和弗拉奥伯爵生了个孩子。[42] “愿我此刻在你身旁，让你在悲痛中克制和理智。”拿破仑致信约瑟芬，提及她的外孙之死，“你很幸运，没有失去任何子女，但这种失去系人类悲剧的境遇和痛楚之一。愿我只听闻你头脑理智，状态良好！你要让我更加悲伤吗？”[43] 拿破仑自己也许没有立刻察觉到，小路易夭折后他的婚姻压力也增大了，但现年45岁的约瑟芬情商要高得多，她明白这一点。她之所以不能“在悲痛中理智”，原因之一是她不仅为女儿和外孙哀伤，也为自己的婚姻哀痛——她意识到丈夫现在没准想要亲生继承人了。拿破仑知道自己有生育能力，因为他曾和前情妇埃莱奥诺尔·德·拉普莱涅生下私生子莱昂伯爵，而且1809年夏末，玛丽·瓦莱夫斯卡也怀了他的孩子。

1809年10月12日（周四）9点，在美泉宫后屋的马蹄形复式楼梯附近，拿破仑准备面见一些获释的法国战俘。就在此时，爱尔福特路德会牧师之子、18岁的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Friedrich Staps）打算假意向拿破仑递交请愿书，借机刺杀他。施塔普斯本会成功，但拉普在几步之外抓住了他，然后拉普、贝尔蒂埃和两名宪兵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大餐刀。“他看我的眼神令我一震，”拉普回忆道，“他的坚决态度让我起疑。”[44] 事后不久，贝纳多特、贝尔蒂埃、萨瓦里和迪罗克陪拿破仑和施塔普斯面谈，阿尔萨斯人拉普充当翻译。皇帝希望这个年轻学生精神失常，这样便可宽恕他，但科维萨尔宣布，尽管施塔普斯是个政治狂热者，但他健康理智。拿破仑问刺客，假如获释他会做什么，而他回答：“再找法子杀你。”17日早上7点，施塔普斯被枪决。他对行刑队高呼“德意志万岁！”，还喊了“暴君去死！”。[45] 拿破仑通过非常直接的方式亲身体会到，尽管这片土地仅仅三年前还在历经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臂弯中微眠，但在它之上，不屈不挠的新德意志民族主义精神已然兴起。[46] 拿破仑对秘书说，“我一直害怕疯子”，并回忆起某晚在剧院，一个从比塞特（Bicêtre）疯人院逃走的疯子找他搭话。“我爱皇后！”疯子大叫。“你好像找了一个不得了的倾诉对象。”[47] 拿破仑回答道。[48]

拿破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暴露了他的无情。从埃及回国后，他和约瑟芬过上亲密、宜人、友善的婚姻生活，她抱怨他寻花问柳，但对他忠贞不贰。现在，这段婚姻阻碍了他的政治和王朝野心以及他眼中的法国最大利益，所以它得结束了。他多次在战场上接近死者、幸运地躲过地狱阴谋、在雷根斯堡负伤，最近又经历了一起未遂刺杀，这些都促使劝说他的人集中思虑。10月16日，拿破仑离开美泉宫，26日上午9点，他返回枫丹白露宫。当晚，波利娜和她的一位侍女来访。这名侍女是皮埃蒙特人士克里斯蒂娜·德·马蒂斯（Christine de Mathis）男爵夫人，她现年25岁，丰满俏丽，担任波利娜的侍读女郎。克里斯蒂娜几乎立刻就成了拿破仑的情妇，这一风流关系一直持续到他结婚前夜。他后来说她“接受了礼物”。[49] 他的卧室和约瑟芬的有一扇门连通，而他下令砌墙堵死这道门，这堪称最抽象、最明确的离弃讯号。“皇帝的温柔、为我母亲的考虑统统消失了，”奥尔唐斯描述这些痛苦时光时道，“他的态度变得不公正又无理……我希望他们已经宣布离婚了。”[50] 11月15日，皇帝一家离开杜伊勒里宫。博塞近距离目睹了这桩婚姻步入病态的最终阶段，27日，他已经发现“皇后的相貌大大改变，而拿破仑则沉默收敛”。[51]

如果拿破仑帝国是稳固的古老王朝，兄弟或侄子继位也许不会让它灭亡，但这个帝国还不满五年，于是他得出结论——他需要一个儿子来延续波拿巴王朝。他尝试了十三年，但46岁的约瑟芬显然不会生孩子了。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过世时没有留下明确的继承人，导致他们身后出现血腥的权力斗争，拿破仑清楚这些历史。目前他的继承人是约瑟夫，但其妻朱莉·克拉里没生下一个儿子，约瑟夫自己也在西班牙大败。早在1806年7月，雾月十八日后归国的流亡者莱维（Lévis）公爵就已警告皇帝：“阿特拉斯[52] 肩扛世界，但他之后混乱来临。”[53]

11月30日，拿破仑告诉约瑟芬他想离婚。“你有孩子，”他说，“但我没有。你必须明白，我身负巩固王朝的必要职责。”[54] 约瑟芬抽泣，

她说没有他她活不下去，恳求他重新考虑。“我一共见她哭了几小时，”拉普回忆这一时期道，“她说她眷恋波拿巴，以前我们在场时，她就这么叫他。辉煌生涯即将结束，她感到惋惜，这非常自然。”[55] 当日晚餐桌上，她戴着大白帽，以便掩饰泪痕，但博塞发现，“她显得悲伤绝望”。[56] 拿破仑和约瑟芬单独用餐，他们都没吃多少。两人始终沉默，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问博塞天气如何。拿破仑回忆道，晚餐中，“她尖叫一声，然后昏倒了”，侍女只好带她离去。[57] 又有一次（或许是同一件事，但是博塞和拿破仑的记忆不同），博塞听到“皇帝的卧室中传来约瑟芬皇后的激烈哭喊”。他走进房间，发现她躺在地毯上，“嘤嘤哭泣，喃喃抱怨”，诉说离婚后她“绝对活不下去，哭声与怨言直入肺腑”。拿破仑要博塞和一名秘书带她经私人楼梯回楼上卧室，他们照办，尽管博塞差点被自己的礼仪佩剑绊了一跤。

12月5日，欧仁来了，这让他的母亲冷静了些。没过多久，波拿巴家族和博阿尔内家族也能着手讨论细节问题了。拿破仑的下一场婚礼需要举行教会仪式，为了满足这一礼仪需求，加冕前夜他和约瑟芬的宗教婚礼得宣告无效，哪怕主持婚礼的是教会亲王、红衣主教费施。拿破仑遂辩称道，那场婚礼是秘密的，没有足够见证人，而且当时他为约瑟芬所迫。[58] 约瑟芬同意陪他干这桩荒唐事，但27名法国红衣主教中，至少有13人拒绝出席拿破仑的下一次婚礼。（拿破仑禁止他们穿鲜红官袍，这些异议者便被称作“黑衣红衣主教”。）政府司法官员借助路易十二和亨利四世的先例，宣布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无效。[59]

12月7日的会议上，约瑟芬被迫当着帝国高官的面宣布同意离婚。她侄女的丈夫、大臣安托万·拉瓦莱特记载道：“她的心智非常勇敢坚定，旁观者都被深深打动。次日，她离开杜伊勒里宫，再没回来。”[60] 她和侍女上马车时，“不止一个人留在那儿，感激地看着她”。这就是宫廷的残酷。然而，我们很难说约瑟芬被逐出了巴黎，因为爱丽舍宫仍是她的一处住所。拿破仑分给她马尔迈松、14世纪建成的诺曼底纳瓦尔城

堡（Château Navarre，花了他90万法郎），她也保留皇后头衔以及全部荣誉和特权。她的200万法郎账单清偿了，余生中她每年可享300万法郎。[61] 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弗里德里希大王评价玛丽亚·特蕾莎时道：“她哭了，但收下了东西。”[62] 此言也适用于约瑟芬。

对拿破仑和约瑟芬来说，财政方面的安排不错：她获得大笔收入；他幸运地能让国家为离婚埋单。虽说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是为了生下帝国继承人，结果却是讽刺的：下一任法国皇帝是她的外孙，而非他的任何后代；今天，她的嫡系后裔依然端坐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和卢森堡的王座，而他的嫡系后裔里连一个国王都没有。

11月22日，拿破仑尚未对约瑟芬摊牌，即便如此，他仍然致信法国驻俄大使科兰古，要求对方私下打探沙皇对其妹妹安娜·帕芙洛夫娜（Anna Pavlovna）女大公未来婚事的看法：“我不是正式请求，而是想听听你的意见。”[63] 于是，他开始同时追求俄国和奥地利的公主。12月中旬，拿破仑明确表示他更想娶安娜，并且不介意宗教问题。他曾考虑过信奉伊斯兰教，并接受被开除教籍，所以她的俄国东正教徒身份算不上无法逾越的障碍。萨克森的公主也是一种选择，但若论联姻实现的地缘政治利益，娶她比不上娶沙皇亚历山大的妹妹或奥皇弗朗茨的女儿。1月时安娜才满15岁，她和拿破仑的年龄差很可能意味着她将在圣彼得堡住几年，然后再搬去巴黎。

12月16日，一纸四句话的元老院令解除了拿破仑和约瑟芬的婚姻。他当即命令科兰古代表他向安娜求婚，并要求俄国皇室两日内答复。三十八天后，俄国方面回话了。“老实跟你说，”亚历山大对科兰古说，“我妹妹不会做得更好。”[64] 沙皇没有说老实话，对于罗曼诺夫王朝屈尊同科西嘉暴发户联姻一事，他的反对态度不亚于其母。同样，当时法国如此占上风，俄国又没有盟友，所以他得罪不起拿破仑。亚历山大希望法国最起码和他签署有关波兰未来命运的条约，以之换得他的首

肯。为此目的，12月28日，科兰古和俄国外交大臣鲁缅采夫草拟了一份条约：第一条，“互相约定永不允许波兰复国”；第二条，不得在一切公共活动中使用词语“波兰”或“波兰人”；第五条，完全禁止华沙大公国继续扩张领土。[65] 亚历山大暗示道，他可以解决太后的阻挠，于是科兰古签字了。由此可见，若能确保瓜分波兰，俄国沙皇非常乐意牺牲自己的妙龄妹妹，让她嫁给罗曼诺夫家族眼中的40岁科西嘉暴发户。我们无法判断这一切会导致拿破仑麾下的波兰枪骑兵勇士做出什么事。次年1月10日，科兰古收到拿破仑的命令——在得令后十天内让俄国王室明确答复提亲（当时，从巴黎到圣彼得堡送信要花近三周时间）。[66]

2月6日，拿破仑已然认为，为安娜而把自己束缚在波兰问题上不值得。他说已经签字的条约“荒唐可笑”，命令尚帕尼不要批准它。他不承认科兰古的行为：“我不能说波兰王国永远不会复国，因为那等于是说，假如有一天立陶宛人或其他人要重建它，我就得派兵镇压他们。这有辱我的尊严。我的目标是安抚俄国。”[67] 拿破仑提出另一份条约，承诺不帮助任何其他国家复建波兰，但沙皇认为这不够。[68] 结果拿破仑感觉被冷落了，他开始盼着维也纳给他未来新娘，而亚历山大意识到波兰问题上拿破仑不可信。[69] 没过多久，他也疑心法国同时向两国求亲，因此生气了，或者说至少假装生气了。[70]

“我不知道这一切之后需要什么，”1809年最后一天，拿破仑致信亚历山大，希望保住他们的友谊，“我不能消灭怪兽，或同云雾战斗。”[71] 1810年2月上旬，亚历山大正在推行俄军的彻底变革。[72] 早在1月，他就已任命现代化改革者巴克莱·德·托利将军为战争大臣，沿西德维纳河（Zapadnaya Dvina）[73] 与别列津纳河（the Berezina）一线防御俄国西部疆界的方案也已拟定。当年，俄国还出现了民族主义宣传运动，媒体则再次获准批评法国。反法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俱乐部亦解禁了。[74] 1810年5月4日，玛丽·瓦莱夫斯卡生下一子，拿破仑给他取名亚历山大，但这并未改善俄法关系。

多年后，拿破仑回忆道，当时他曾短暂地考虑娶一个巴黎女人。他说他列出了五六个女人的名单，但是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投票时，五名参政支持和奥地利联姻，两名参政支持和萨克森联姻，而富歇和康巴塞雷斯仍然主张娶安娜。拿破仑怀疑，富歇和康巴塞雷斯之所以反对娶奥地利公主，仅仅是因为他们曾投票赞成处决玛丽·路易丝的姨祖母玛丽·安托瓦内特。康巴塞雷斯否认这一点，他说自己清楚，不论哪个国家没被选中，拿破仑最终都会和它开战，“我觉得进军圣彼得堡比进军维也纳更可怕”。[75]

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婚姻有着不祥的先兆：小时候，她在自己的儿童房内玩弄他的“凶恶雕像”；14岁和18岁时，她被迫离家躲避他的军队。玛丽·路易丝曾写道，“我同情他选中的公主”，那时她完全不知被选中的就是自己。一旦她意识到这一点，便写道，“我将命运交付神圣上苍”，并请求一位朋友“祈祷那永不会发生”。[76] 拿破仑明显更喜欢这桩婚事。“我非常高兴地得知玛丽·路易丝不错。”他回忆道。[77] 她不只是不错。拉瓦莱特称，她“高挑匀称，特别健康，年轻人常有的优雅与美丽都装点了她的形象”，此外，她“神情和蔼，和家族中其他人不同，她的笑容亲切甜美”。[78] 拿破仑给玛丽·路易丝的信现存318封，其中第一封是求婚信，1810年2月23日，一位秘书在朗布依埃宫执笔写了这封信：

> 我的姊妹（Ma cousine），您的卓越特质令您出类拔萃，也让我们激起服侍您、尊重您的渴望。为遂此愿，我等与令尊皇帝接洽，恳求他将殿下您的幸福托付给我们。希望促使我等如此行事的感情没有冒犯您？希望果如我等自夸，您并非单纯履行顺从令尊令堂的义务？倘若皇女殿下的感情偏向我们，我等将殚精竭虑地培育它，始终不渝地用一切方式取悦您，如此，我等便能期盼有朝一日赢得您的尊敬。此乃我们欣然拥抱的目标，有鉴于此，我等恳求殿下您的眷顾。[79]

这是40岁男人致18岁姑娘的礼貌求婚信。两天后，他亲笔写信（字迹糟糕），称她为“我的亲姊妹”（Ma Soeur），这一称呼一直用到结

婚。婚后，他开始使用“夫人”，后来还用“我亲爱的路易丝”（ma chère Louise）、“我的好路易丝”（Ma bonne Louise）以及其他变体。

欧洲大陆最古老君主国和最年轻君主国的联姻过程很复杂。3月11日，维也纳霍夫堡宫（Hofburg Palace）嘉布遣会小教堂举行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的代理婚礼，仪式上，卡尔大公代表玛丽，而贝尔蒂埃代表拿破仑。拥有旧王朝荣誉头衔法国首席施赈官的贵族人士、大主教费迪南·德·罗昂（Ferdinand de Rohan）给拿破仑写了一封荒唐的奉承信，祝贺对方即将结婚，皇帝便对迪罗克说，他必须“从戏剧资金中掏12000法郎给首席施赈官”。[80]

在代理婚礼和世俗婚礼之间，拿破仑细心策划了1810年3月27日（周二）那天他和新娘的初遇。他们将在距苏瓦松（Soissons）3英里的帐篷之中相会，他要向她鞠躬，但她鞠躬回礼时他会扶她起身。事与愿违，天下雨了。不管怎么说，他太不耐烦了，于是和缪拉驾车经过帐篷，在库尔塞勒（Courcelles）的教堂前拦下玛丽·路易丝的马车。“夫人，”他一边钻进她的四轮大马车，一边说了句不太威风的话，“见到您万分高兴。”[81] 接着他携她坐进自己的四轮大马车，前往贡比涅宫。9点30分，他们到达目的地，然后违反礼节一同用餐，在场人士还有他的近亲，包括卡罗琳（身为那不勒斯王后，她夺走了玛丽·路易丝的另一位姨祖母玛丽亚·卡罗利娜的地位）。[82]

这次晚餐的地点是贡比涅宫弗朗索瓦一世长廊（François I Gallery）。席上，当着玛丽·路易丝的面，拿破仑问一向派得上用场的红衣主教费施他们是否已依法结婚。费施保证道，因为维也纳的代理婚礼，他们已是合法夫妻。当晚，为了遵循礼节，拿破仑照理应入住附近的掌玺大臣公馆（Hôtel de la Chancellerie），而玛丽·路易丝将在王宫过夜。可是次日中午，皇帝下令把他的早餐端到皇后床边来，所以博塞认为，“我们觉得他差不多没去掌玺大臣公馆睡觉”，真去了的可能性不比

世俗婚礼当晚他睡在圣克卢意大利式帐篷中的可能性高。[83]

拿破仑日后和一位心腹交谈，回忆他和玛丽·路易丝的初夜："她太喜欢了，叫我再来一次。"[84] 虽然她感到不安，但这段姻缘之初两人美满幸福。1810年7月至1811年9月，他们每晚睡在一起。拿破仑曾把玛丽·瓦莱夫斯卡安置在巴黎，再婚后他离开了她。事实上，至少在玛丽·路易丝找情夫之前，尚不清楚拿破仑是否对她不忠。梅特涅写道，"妻子们对他的个人举止从无怨言"，并回忆玛丽·路易丝对自己说的话，"我不怕拿破仑，但我开始认为他怕我"。[85] 然而，她并非他的一生挚爱。"我想，"数年后，他说，"虽然我的确深爱玛丽·路易丝，但我更爱约瑟芬。那是自然的。我们一同崛起，而且她是我选中的真正发妻。她举手投足间充盈优雅，甚至准备上床时也优美自如。她解衣时楚楚动人……如果她给我生了儿子，我绝不会离开她，但是，我的诺言……"[86] 拿破仑最终后悔再婚，将垮台归咎于第二次婚姻。"毫无疑问，要是没娶玛丽，我绝不会和俄国开战，"他说，"但我确信奥地利将支持我。我错了，因为奥地利天生是法国的敌人。"[87]

1810年4月1日（周日），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在圣克卢宫大长廊（Grand Gallery）举行了世俗婚礼。典礼上，奥地利大使卡尔·冯·施瓦岑贝格（Karl von Schwarzenberg）身着陆军元帅服，看上去"和磨坊主一样白"。太后也出席了婚礼。次日，一行人去杜伊勒里宫参加宗教婚礼和公共庆典。[88] 卢浮宫阿波罗沙龙（Salon d'Apollon，这间方屋常用来展示画作）中竖起一座镀银圣坛，在它之上，红衣主教费施祝福新婚夫妇。巴黎有如下庆祝活动：燃放烟火；向穷人分发3000条羊腿、1000条香肠；在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es Champs-Élysées）举办舞会；赦免囚犯；表演马术；组织音乐会；游行；在战神广场上升起热气球。没人比现代恺撒更懂"面包和马戏"的重要性，和他同日结婚的6000名老兵各自领到600法郎。[89] 哪怕和约瑟芬比，玛丽·路易丝也没给拿破仑省下太多钱。他曾经平均每年给约瑟芬花899795法郎，现在他平均每年给

新妻子花772434法郎（或者说，至少法国国库要花这笔钱）。[90]

婚礼当天，玛丽·路易丝接见了1500人。“我戴着钻石皇冠，一直不舒服，”事后她对一位朋友说，“它太沉了，我几乎戴不住。”这次婚礼效仿1770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婚礼，也许这是人们能想到的最不浪漫的先例，但它也最符合拿破仑眼中王室婚礼的应有之义。婚礼后次日，拿破仑致信沙皇亚历山大：“先生，我的兄弟（mon frère），我对您心怀完美敬意和温柔友谊，凭此成为陛下您的好兄弟。”[91] 根据当时的官方礼节，他也许是沙皇的兄弟，但亚历山大不会当他的妻舅。他写下这些话后才过两天，亚历山大就对其波兰心腹、前外交大臣亚当·恰尔托雷斯基（Adam Czartoryski）公爵预言，“从现在起，九个月后”法俄关系将陷入危机。[92] 沙皇和恰尔托雷斯基保持联系，问他华沙大公国对拿破仑有多忠诚。不久前的1807年，拿破仑已把选侯封地拜恩、符腾堡大公国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变成王国，亚历山大担心华沙大公国将是下一个。

拿破仑大婚后又过了三个月。7月1日，施瓦岑贝格在勃朗峰街（rue de Mont Blanc）奥地利大使馆举办庆祝舞会，结果一支蜡烛点着了薄纱窗帘，火舌随后席卷了整个大使馆。共有600人出席舞会，其中4人死亡，包括施瓦岑贝格的大嫂，人们靠她手上的戒指才认出那具尸体。[93] “我不害怕，可要是皇帝没强迫我离开房间，我会被烧着，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一周后，玛丽·路易丝对波利娜说。拿破仑把妻子带到安全场所，然后返回火灾现场监督救援。他很不满意针对救火的反应速度，于是彻底重整巴黎的火警系统，创建了消防队（sapeurs-pompiers）。[94] 拿破仑迷信意外事件，所以他认为自己或施瓦岑贝格被诅咒了。

拿破仑适合在卢浮宫举行婚礼，因为那儿的视觉艺术是当时人士与子孙后代认识其帝国的关键。拿破仑对达吕说，“我打算让艺术转向倾

向于永久铭记近十五年成就的题材”，他的慷慨资助也取得了丰硕成果。[95] 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鲜有文学巨著面世，若他为此挨批（有时的确如此），那么照这逻辑，既然他大力赞助帝国艺术杰作，他也应该因它们而受赞。当然，拿破仑利用文化宣传政治，干过这种事的有路易十四、法国革命党，事实上还包括他崇拜的很多罗马皇帝，如奥古斯都皇帝。[96] 然而，只要某个时期享有雅克-路易·大卫（他有一次说起拿破仑时道：“在我的英雄的身影里，我将名垂后世”）、弗朗索瓦·热拉尔、泰奥多尔·热里科（Théodore Géricault）、阿内-路易·吉罗代（Anne-Louis Girodet，1812年，他奉命创作了至少36幅一模一样的拿破仑全身像。皇帝第一次退位前，他完成了26幅）、安托万-让·格罗、让·于尔班·介朗（Jean Urbain Guérin）、让-奥古斯特·安格尔（Jean-Auguste Ingres）、皮埃尔-保罗·普吕东（Pierre-Paul Prud’hon）、卡尔·韦尔内（Carle Vernet）与其子奥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Élisabeth Vigée-Lebrun）以及小像画师奥古斯丁（Augustin）和伊萨贝（Isabey）这样的人才，它就必须冠上用烂了的绰号“黄金时代”。[97] （在西班牙，就连戈雅也曾在约瑟夫朝中工作。）拿破仑每年安排6万法郎预算额鼓励绘画，而且经常超支。光是在1810年的沙龙，他就花4.7万法郎买下20幅画，把它们送入卢浮宫。[98]

拿破仑的形象和事迹在画作、印刷品、壁毯、勋章、瓷器、艺术品和雕像中不朽，除了让其统治合法化，照一位艺术史学家的说法，这也是为了“使法国人民永远铭记他”。[99] 午餐时间，只要画家和雕塑家来了，他就会坐下，同时给两人当模特，并且一言不发。摄影发明之前，没人指望艺术准确写实。举个例子，大卫的画中，拿破仑骑着一匹前蹄一直腾空向后仰的雄马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但无人信以为真。与其说大卫描绘了真实场景，不如说此画旨在为这一业绩的荣耀提供宏大寓言式点评。画作左下角的阿尔卑斯山脉石块上涂写着“汉尼拔”、“查理曼大帝”（Karolus Magnus）[100] 、“波拿巴”。

反对派们冷落拿破仑时代的艺术，认为那不过是宣传工具，但是很多眼光敏锐的非法籍收藏家欣赏并收集这些作品，甚至委托艺术家创作它们。比如说，1811年，第十代汉密尔顿（Hamilton）公爵委托大卫画《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书房》。英国摄政王买下了伊萨贝的《杜伊勒里宫阅兵》。第二代兰斯当侯爵买了很多拿破仑时代艺术品，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收集拿破仑帝国的书籍封皮，约翰·鲍斯（John Bowes）在巴纳德城堡（Barnard Castle）楼梯间挂上拿破仑麾下元帅的肖像。[101]

拿破仑有时谦和虚心，不肯让别人把他刻画成半神。安托万·卡诺瓦为他塑了一尊大理石雕像，把他塑造成“缔造和平的战神”（他为这尊雕像当了五回模特，创了自己的记录）。1811年4月，塑像即将公开展出，但是拿破仑看过后立刻下令储藏它。直到他下台，这尊雕像一直藏在木制帆布屏风后。[102] 皇帝担心，人们会嘲讽塑像近乎全裸，并对比1803年卡诺瓦开工时他的体格和八年后他胖了几圈的身材。这尊拿破仑像现藏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楼梯井，当年威灵顿公爵的客人经常把雨伞挂在它身上。

拿破仑扶持艺术，而约瑟芬的赞助明显更积极。两人的资助开创了整个新古典派艺术风格，它涉及的领域包括房屋、家具、时钟、餐厅、餐具、纺织品、墙纸、卧室、带描画的装饰、枝形吊灯、镜子、灯具以及园艺。督政府时代，旧王朝时的奢华装饰已略有重现，但真正奠定这种风格的是拿破仑帝国。[103] 皇帝迷恋古埃及和古罗马，所以他总是偏好古典风格的建筑。佩西耶（Percier）、方丹、贝尔托（Berthault）等建筑师以及很多室内设计师也从他的埃及远征中汲取灵感，尝试埃及主题。[104]

帝国风格的很多成就今仍可见，它们进一步证明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建筑和装饰艺术领先世界。随便举几个例子，这些成就包括：贡比涅宫

的舞厅和图书馆；波尔多附近的马尔戈酒庄外观；普雷莱宅邸的纺织品；巴黎的博阿尔内公馆大沙龙和布列纳公馆一楼，艾蒂安·勒孔特（Étienne Leconte）作品；爱丽舍宫的楼梯间；雅各布-德马尔泰（Jacob-Desmalter）的写字台（secrétaires）；查茨沃思（Chatsworth）的太后雕像，卡诺瓦作品；圣克卢宫约瑟芬闺房；马丁·比耶奈（Martin Biennais）的银芥末罐；枫丹白露宫中庇护七世的卧床和约瑟芬的坐浴盆；布莱兹·德阿尔姆（Blaise Deharme）的涂清漆金属茶几；凡尔赛大特里亚农宫皇帝沙龙（拿破仑在凡尔赛的寓所不是凡尔赛城堡本身，因为它有旧王朝意味）；安托万-德尼·肖代（Antoine-Denis Chaudet）的青铜雕塑；朗布依埃宫浴室装潢，奥古斯特·法曼（Auguste Famin）作品（诚然，拿破仑不太喜欢它）；皮埃尔·贝朗热（Pierre Bellangé）的扶手椅；达尔特·弗雷尔（Darte Frères）的天鹅形茶杯；约瑟夫·雷韦尔（Joseph Revel）的时钟；马尔迈松图书馆的天花板，佩西耶作品；马尔迈松爱神殿，贝尔托作品；产自欧比松（Aubusson）的地毯，萨朗德鲁泽（Sallandrouze）作品；约瑟夫·图弗南（Joseph Thouvenin）的书籍封皮；朗瑟洛（Lancelot）公司的双烛灯罩；约瑟芬的笛形香槟杯，产自勒克勒索（Le Creusot）的蒙塞尼（Montcenis）工厂；约瑟夫·迪富尔（Joseph Dufours）的墙纸；戈布兰工厂的壁毯；马里-约瑟夫·热尼（Marie-Joseph Genu）的银制船形调味碟。[105] 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艺术界迅速百花齐放，令人惊叹，不能说这一现象与拿破仑全无干系，十多年来，他是欧洲最大的艺术赞助人。当然，不少工匠也能在欧洲其他地方找工作，1799年前和1815年后，很多人也处于高产状态，但若无皇帝夫妇的鼓励与灵感启迪，辉煌的帝国风格不大可能发展到这种水平。

1810年4月16日，拿破仑不顾安德烈·马塞纳元帅本人的请求，任命他指挥新的葡萄牙军团。在洛鲍岛摔下马后，马塞纳一直苦于呼吸系统的毛病，而且1808年9月，拿破仑在打猎时意外击中他，几乎射瞎他的一只眼睛。（马塞纳得到的全部道歉是：“你躲过了那么多危险，现在

被一枪打伤，真不走运。”[106]）可是两人面谈时，拿破仑设法说服了马塞纳接过葡萄牙军团指挥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承诺给元帅战略决策权，并保证道：“你不会缺任何补给。”[107]拿破仑曾仔细考虑亲征，决定率10万多人从威灵顿手中夺回葡萄牙，但他现在只给马塞纳三个军，总兵力不足7万人。5月29日，拿破仑又败给微观管理癖了，他开始通过马塞纳的仇敌贝尔蒂埃寄去详细命令，指示元帅应该在何时向何地进军。

7月下旬，马塞纳已有一腔怨言：他的军队已经欠饷六个月了；因为缺乏货运马车，他只好抛弃数千份补给；三分之一的炮兵没有骡子，只能留在西班牙；承诺的增援没来；诸如此类。马塞纳的抱怨完全正当，而听者贝尔蒂埃并不同情他。不管怎么说，马塞纳追赶威灵顿，在一个月之内到达离里斯本不足20英里的地方，就在此时，他遇上强大的防御阵地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Lines of Torres Vedras），被迫停下。如果马塞纳有重炮和大量补给，他也许能找到防线最薄弱点，并猛攻该点，但这两个条件他都不具备。拿破仑认为，马塞纳的兵力远超威灵顿的2.5万人，可以轻松取胜，但他完全没算上和威灵顿一同作战的另外2.5万名葡萄牙人。他不曾亲见防线，低估了其防御能力，直到11月24日马克西米利安·富瓦将军向他解释情况。

如果参观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特别是被巧妙复原成其1810年形态的部分，今人就会明了马塞纳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在长29英里的里斯本半岛上，7000名葡萄牙劳工至少修了三条横跨半岛的防线，它们包括由628门大炮防守的165座设防多面堡。[108]皇家海军建立了可视信号系统，以便沿每条防线快速通信。炮艇停泊在塔古斯河与海面上，掩护防线侧面。

拿破仑可以在《箴言报》上嘲笑威灵顿，说他只是个“印度将军”。然而，皇帝私下还是欣赏威灵顿退往托里什韦德拉什时采取的无情焦土

战术，并对沙普塔尔说："欧洲只有威灵顿和我能采用这些措施，但他和我有个区别，就是说，法国……会谴责我，而英国会赞成他。"[109] 此言不假，威灵顿在葡萄牙战局中使用焦土战术，拿破仑也在巴勒斯坦战役、普鲁士战役与未来俄国战局中采用几乎相同的手段，但威灵顿不曾广受非议，拿破仑却备受责难。马塞纳的军队待在防线外的圣塔伦（Santarém），到1811年1月时，只有德鲁埃率6000人来援。这时，法军已然饥肠辘辘、开小差、抢劫。马塞纳一直待到不得不撤，3月5日晚，他竖了一些稻草人冒充哨兵，然后离开圣塔伦。"他被榨干了，"拿破仑评价马塞纳，"他现在都没本事指挥四个列兵一个下士了！"[110]

◆

1810年5月，61岁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Karl XIII）的继承人去世。[111] 埃劳战役中，贝纳多特善待瑞典战俘，所以瑞典人突然想到让他当未来国王。贝纳多特曾是狂热的共和党人，在胸口刺了文身"打倒国王"，但瑞典人显然不介意这一点。他们还认为，败于俄国且丢失芬兰后，立法国元帅，特别是和拿破仑有姻亲关系的元帅为王可建立有效的同盟。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拿破仑和贝纳多特根本不像瑞典人想的那样友好共处。"那个人自负过头，"1809年9月，拿破仑从维也纳致信富歇，"我已经命令战争部长召回他。他的资质十分平庸。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他。这座伟大首都里阴谋者泛滥，而他乐意听他们所有人的……他差点害我输了耶拿会战；他在瓦格拉姆表现无能；他不在埃劳，尽管他可以去那儿；他在奥斯特利茨也没做任何他能做的事。"[112] 拿破仑说的都是实话，而且早在雾月政变之前，他对贝纳多特的蔑视可能就添了不少——毕竟贝纳多特娶了德西蕾。然而，能在未来的对俄战争中发挥无价作用的瑞典人恳请拿破仑允许他们授予贝纳多特（永久）王冠时，他还是同意了，不过他犹豫了一阵，这足以惹恼贝纳多特，此人仍因瓦

格拉姆战后他对自己的讥讽之言而心存芥蒂。

沙皇亚历山大认为贝纳多特去瑞典就像拿破仑放弃安娜·帕芙洛夫娜一样，是针对俄国的侮辱与挑衅。贝纳多特的晋升表面上体现了任人唯贤，只有军队才赞赏这一点。“贝纳多特的例子改变了所有人的看法，”布拉兹上尉回忆道，“我们都幻想自己的剑鞘里藏着一把王权之杖。一个士兵成了国王，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像他那样。”[113]

1810年6月3日，拿破仑罢免了富歇，理由是他擅自与英国秘密和谈。“我清楚你对我的一切效劳，”他写道，“我也相信你的感情与热忱，然而我无法让你继续留职。警务部长一职需要绝对的完全信任，因为你扰乱了我和国家的安宁，那种信任已无法维系。”[114] 通过法国银行家加布里埃尔·乌夫拉尔（此人借助隐形墨水和富歇通信）、英国银行家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爵士等中间人，富歇尽情地同英国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的长兄韦尔斯利勋爵详细磋商媾和事务，把拿破仑蒙在鼓里。[115]

富歇让韦尔斯利勋爵以为他奉拿破仑的命令行事，皇帝发现后大发雷霆，这可以理解。富歇的行为既能代表“我的政治关系彻底改变”，也是“我的人格污点”。拿破仑希望借大陆体系强迫英国和谈，但未经授权的手段只会给伦敦传达复杂的信息。他抱怨道，富歇的阴谋导致“我被迫一直监督，这使我疲惫”。[116] 他派富歇去罗马当总督，任命其竞争对手萨瓦里为警务部长。[117] 乌夫拉尔被关进圣佩拉吉（Saint-Pélagie）债务人监狱，三年的牢狱之灾中，他过着有些奢华的生活，玩猜字谜和惠斯特牌。[118]

1810年7月，拿破仑察觉大陆体系没有如他所愿起效，但他没有根除该体系，倒是决定修改它。于是他创立“新体系”（Le Nouveau Système），允许出售特别许可证，这种证件容许特定个人与公司和英国交易若干指定产品。许可证售卖滋生腐败，比如说，布列纳在汉堡卖

许可证，大捞一笔。很多人也指责出售者偏心。帝国境内非法籍制造商确信（他们想的没错），政府倾向于把许可证发给法国人，并深深怨恨这种偏袒。1810～1813年，同是和美国交易，波尔多领到181张普遍许可证和607张一次性许可证，相形之下，汉堡只领到68张普遍许可证和5张一次性许可证。[119] 就连国库部长莫利安也怀疑，拿破仑“想牺牲大陆体系，以便利用许可证体系垄断部分（与）英国的（贸易）”。[120] 1812年4月，拿破仑致信贝尔蒂埃，称“科西嘉没有海关人员，所以糖和咖啡畅通无阻地进来了，这些东西未获任何许可，但有人视而不见，放它们上岛”。[121]

接下来几年，随着法令继续颁行，官僚政治拖累了许可证体系。举个例子，在英吉利海峡的安特卫普和比斯开湾的洛里昂（Lorient）之间，六分之一的出口产品需是葡萄酒，其余的则是白兰地、种子（草种除外）和没有被禁的法国商品。下夏朗德省（Charente Inférieure）[122] 可以出口谷物，但葡萄酒和白兰地也得在其出口产品中占一半。若船只从奥斯蒂亚（Ostia）和阿格德（Agde）之间的港口出发，它就只能去黎凡特和西班牙的九个指定港口。1810年7月，法国颁布通告，允许省长拒绝授予非法国船只许可证。[123] 价格不同的不同类型许可证授权不同省份的不同公司与不同外国港口交易不同的规定产品。规则经常变化，似乎反复无常，而数不尽的条和款又涵盖排列组合所有可能。拿破仑凭借其惯有的细节注意力监督这一切。“7月11日，‘调停人号’（Conciliateur）把乌木载至热那亚，谁批准它进来的？”8月14日，他如此询问巴黎的消费税总长。

俄国人认为新体系冒犯了他们，因为俄国仍然不能和英国贸易，而法国制造商似乎正在回避障碍。亚历山大在蒂尔西特把拿破仑当朋友，在爱尔福特也温厚待人，一件事或许可以说明在蒂尔西特甚至爱尔福特之后他发生了多大的转变。1810年7月，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副官弗里德里希·冯·弗兰格尔（Friedrich von Wrangel）男爵拜访沙皇，宣告路易莎

王后的噩耗——她死于肺部损伤和心脏息肉。亚历山大显然悲伤，他荒唐地把王后之死归咎于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待她的行径，对弗兰格尔说："我向你发誓，我要为她的死复仇，凶手一定会受到惩罚。"[124] 沙皇补充道，他正在迅速重新武装军队，但此举的目的既不像某则假谣言所称是帮助拿破仑入侵印度，更不是继续和当前敌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作战，而是与法国开战。"根据我的最确切估计，"亚历山大说，"1814年，我就能让一支全副武装的40万大军参战。我要率20万人过奥德河，另外20万人将过维斯瓦河。"[125] 沙皇还说，他希望到时候奥地利和普鲁士起身反抗，跟随他的步伐。

拿破仑盼望家庭义务能让奥地利留在法国的政治轨道上，但这种义务并未阻止他推翻亲弟弟路易。路易把荷兰臣民的利益置于法兰西帝国利益之上，事关征兵和大陆体系时尤其如此，所以拿破仑在1810年6月3日废黜了弟弟。"虽然他犯了那么多错误，但我无法忘记自己曾像父亲一样养育他长大。"拿破仑如此致信玛丽·路易丝。[126] "我还是炮兵中尉时，"他告诉萨瓦里，"我用自己的军饷抚养他。我有什么面包都分给他吃，而这就是他对我做的事！"[127] 法国吞并荷兰，把它变成一系列帝国省份。路易去了奥地利各温泉城镇流亡，他泡葡萄皮热水浴，还用自封头衔圣勒伯爵（Comte de Saint-Leu）的名义书写反对拿破仑的短文。

拿破仑没有天真地对待他和亚历山大关系恶化一事。8月上旬，他致信萨克森国王，要求他秘密强化武装，特别是增援波兰的莫德林要塞（Twierdza Modlin），以防备俄军可能发动的攻势。"我和他的感情非常好，"拿破仑说起亚历山大时道，"但人必须做好准备。"[128] 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看上去开始和好了，拿破仑便让科兰古警告亚历山大，他愿意见俄国取走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多瑙河左岸，然而，"要是它在右岸留任何东西，或干涉塞尔维亚人（Serbians），它就违背了和我的约定"，那是因为，"如果俄国在多瑙河右岸占有单单一地，土耳其就彻底丧失了独立性，时局也会完全改变"。[129] 皇帝要求获得俄军调动

的情报，10月中旬，他开始增强驻但泽和北德意志的兵力，俄军则在西德意志维纳河与别列津纳河加筑防御工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火药桶地区大大增加，形势日益危险起来。

1810年，拿破仑喜忧参半，尽管帝国权力和疆域登峰造极，但他犯的错误预示它未来的厄运。大部分错误都不是被迫的，而且正如我们现在所见，很多麻烦是他自找的：他没必要公开和教皇翻脸，并且当然不需要吵架吵到逮捕对方；他等不及建立王朝同盟，结果得罪了亚历山大，还让对方怀疑他对波兰的态度，哪怕他并不想重建波兰王国；与奥地利联姻永远不足以缓和《美泉宫条约》缔造的严苛和平；他应该充分援助马塞纳，或者说根本不该派马塞纳去葡萄牙——亲征威灵顿会更好；他判断不周，任由不可信任、满腹牢骚的贝纳多特去了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瑞典，还让明摆着的叛徒富歇基本上没受惩罚；类似地，他应该像帝国其余地区、盟国特别是俄国一样，看出大陆体系的新许可证制度乃虚伪产物。亚历山大正在重整武装，计划打一场复仇战争，但现阶段，大军团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德意志境内与俄军进行边境战争，何况奥地利已同法国联姻。拿破仑帝国是古罗马之后欧洲最大的帝国，甚至比查理曼帝国还大，任何敌人都无法威胁到它的存在，只有拿破仑自己可以。

---

[1]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66

[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p.10

[3] Fisher，H.A.L.，*Bonapartism* 1961，p.84

[4] Fisher，H.A.L.，*Bonapartism* 1961，p.84

[5]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p.142-3

[6]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9

[7]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p.16-17

[8]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p.8-9，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pp. 88，126-7，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p.105，Davis，J.A.，*Conflict and Control* 1988，p.23

[9] 位于巴尔干半岛（Balkans）西部。

[10]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9，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p.1，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7

[11] eds. 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p.1

[12] Davis，J.A.，*Conflict and Control* 1988，p.23

[13] Woolf，Stuart，'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Period'*Past and Present* no.137 1992，p.95

[14] eds. 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p.204

[15]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p.11

[16]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6057 p.979，July 22，1807

[17] 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p.120

[18] 1812年5月，拿破仑察觉皇家海军巡航舰可以足够接近萨沃纳，从而解救教皇，于是他把教皇带到枫丹白露宫。庇护七世在那里过得比较奢华，直到1814年获释。今人仍可在枫丹白露宫见到教皇入住的房间。“教皇不得穿教皇礼服出行，”拿破仑致信博尔盖塞，显示其对公众意见的典型眼光，“他只能穿教士服装，这样的话，路上没人……能认出他。”CN12 no.8710，p.417.

[19]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2074 p.1179，September 14，1809

[20] 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pp.114-19

[21]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717 p.959，August 6，1809

[22]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865 p.1052，August 21，1809

[23]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971 p.1116，September 4，1809

[24]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1865 p.1052，August 21，1809

[25] *The Nation*，16/7/1896 p.46，Hazareesingh，Sudhir，*The Saint-Napoleon*（Cambridge，MA）2004，p.4

[26]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s.21801-21807 pp.1009-12，August 15 and 16，1809

[27] Lanfrey，*History of Napoleon the First* Ⅳ p.218

[28]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7

[2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7

[3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217

[31] 今里耶卡（Rijeka）。——译者注

[32] 1805年，奥地利兼并了萨尔茨堡。——译者注

[33]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4

[34]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Maryland）1994，pp.290-94

[35] ed. Caisse，A.du，*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ène* 10 vols.1858-60，Ⅵ pp.557-79

[36] Eyck，F.G.，*Loyal Rebels*（Maryland）1986，p.191

[37] Eyck，F.G.，*Loyal Rebels*（Maryland）1986，p.194，ed. Caisse，A.du，*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ène* 10 vols.1858-60，Ⅵ p.277

[38]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败于罗马，被迫接受条件严苛的和约。所谓"迦太基式和平"，是指强国强迫弱国接受的短暂且不平等的和平。——译者注

[39] Adams，Michael，*Napoleon and Russia* 2006，p.240

[40] Tulard，Jean，*Napoleon*：*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 1994，pp.140，172

[41]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

no.15867 p.894，June 16，1807

[42] Wright，Constance，*Daughter to Napoleon* （New York）1961，p.213

[43]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619 p.782，May 14，1807

[44]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42

[4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45，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221

[46] 瓦格拉姆会战后某晚，拉普用少有人获准的打趣方式揶揄拿破仑。当然，他俩玩21点，赌注是1803年开始铸造的面值为20法郎的金币，它们被称作"拿破仑"。这时，皇帝想说句双关妙语，问道："拉普，德意志人非常喜欢这些小拿破仑，难道不是吗？""是的，陛下，"拉普回答道，"比起那个大的，他们明显更喜欢小的。""我想，"皇帝笑道，"这就是你所谓的德意志式坦诚。"Rapp，*Memoirs* ，p.26.

[4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84

[48] 拿破仑不仅害怕疯子，还给他们灵感。1840年12月他在巴黎下葬时，比塞特疯人院里至少有14个病人认为自己是他。

[49]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 New York）2002，pp.183，296

[50]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Ⅰ p.289

[5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53

[52] 古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译者注

[53] Blaufarb，Rafe，'The Ancien Régime Origins of Napoleonic Social Reconstruction'*French History* vol.14 no.4 2000，p.409

[5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5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52

[5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41

[5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and n.1

[58]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7

[59] BNF NAF 4020 pp.9-10

[6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99

[61]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17

[62] 奥地利太后玛丽亚·特蕾莎曾反对瓜分波兰，最后仍获得了波兰领土。——译者注

[63] Swanson，William C.，*Napoleon's Dual Courtship* （privately published）1923，pp.6-7

[64]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2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2

[6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

[67]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5

[68]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4

[69]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210

[70]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4

[71]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no.22761 p.1554，December 31，1809

[72]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10

[73] 今道加瓦河（the Daugava）。——译者注

[74]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11

[7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9

[7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

[7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5

[7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99

[7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19-20

[8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4

[8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33

[82]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p.60

[8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279

[84] Palmer，Alan，*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 2001，p.99

[85]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279

[8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136-7

[8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7

[88] Clary-et-Aldringen，Prince Charles de，*Trois mois à Paris lors du marriag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Ⅰ *et de L'Archduchesse Marie-Louise* 1914，pp.70-71

[89] Woloch，Isser，*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1979，p.314

[90]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52，Philip Mansel in *TLS* 16/1/2004，p.23

[91] NYPL Napoleon Ⅰ folder 3

[92]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89

[93] 施瓦岑贝格的大嫂保利娜（Pauline）本已脱险，但她为了寻找女儿重返火场，其实她的女儿安然无恙。——译者注

[94]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08

[95]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no.10517 p.543，August 6，1805

[96] 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p.ix

[97]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p.313

[98]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p.183

[99] Stourton，James and Montefiore，Charles Sebag，*The British as Art Collectors* 2012，p.153

[100] 括号中为拉丁文。——译者注

[101] O'Brien，David，'Antonio Canova's 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 and the Limits of Imperial Portraiture'*French History* vol.18 no.4 2004，pp.354-5

[102] O'Brien，David，'Antonio Canova's 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 and the Limits of Imperial Portraiture'*French History* vol.18 no.4 2004，p.358

[103]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p.8

[104] Wilson-Smith，Timothy，*Napoleon*：*Man of War*，*Man of Peace* 2002，p.ｘｘⅸ

[105]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Wilson-Smith，Timothy，*Napoleon and His Artists* 1996

[106]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no.18931 p.1083，September 15，1808

[107] Horward，Donald D.，'Masséna and Napoleon：Abandonment in Portugal'*Military Affairs* vol.37 issue 3 October 1973，p.84

[108]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29

[109]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04

[110]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 （New York）1978，p.94

[111] 1809年3月，瑞典贵族废黜卡尔的侄子古斯塔夫四世（又一个智商低下的欧洲君主），从那时起卡尔才登基。

[11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72

[113]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141

[11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42

[115] Woolf，Otto，*Ouvrard*：*Speculator of Genius* 1962，p.115

[11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42

[117]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96，Brice，Raoul，*The Riddle of Napoleon* 1937，p.139

[118] Woolf，Otto，*Ouvrard*：*Speculator of Genius* 1962，pp.116-18

[119]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04 n

[120]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Ⅱ p.444

[12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 no.18636，p.359

[122] 今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译者注

[123]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1919，pp.238-9

[124]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95

[125] Schmitt，Hans，'1812：Stein，Alexander Ⅰ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Napoleon'*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1 March 1959，pp.326-7

[12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3

[12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346

[12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1 no.16762 pp.12-29

[12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50

第三部 尘埃落定

第二十三章 俄国

一个法国人是勇士，但是长期困苦与恶劣气象会拖垮他的身体，打击他的信心。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冬天将与我们并肩作战。

——1811年年初，沙皇亚历山大致科兰古

向幸运索求时万万不可超出她的能力范围。

——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

每年有好几个星期，拿破仑飞快地巡视帝国。1811年秋，他用二十二天造访40座城市，尽管中途耽搁了几天：弗卢兴狂风呼啸，导致他在军舰“查理曼号”上困了两天半；默兹河水淹两岸，因此他又在日韦（Givet）滞留一天。比起听地方贤良的称颂演说，他显然更关心收集资料。有一次，一名市长费了很大功夫背讲稿，而拿破仑“几乎不等他说到关键词，就急躁地命令车夫前进，市长于是落得鼓动空气”。次日，《箴言报》登载了演讲关键词和讲稿全文，市长看到后也许会感慰藉。公务员特奥多尔·冯·法贝尔（Theodor von Faber）回忆道：“‘不要高谈阔论，先生们！’波拿巴经常用这句令人扫兴的呼语打断那些发抖的代表。”[1] 拿破仑向市长问的问题证明他对什么信息都感兴趣，他当然会问人口、死亡人数、岁入、林业、费用、城镇化率、征兵、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这些人们可以料到的主题，但他也想知道“最高上诉法院推翻了多少你下的判决？”以及“你找到办法给修道院院长提供舒适住宅了吗？”[2] [3]

“有证据表明，”1810年11月4日，拿破仑致信沙皇亚历山大，“700辆货运马车把殖民地商品从俄国运至最近的一次莱比锡集市……英国人用20艘军舰护送1200艘挂着瑞典、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旗帜的英国商船，其中一些已在俄国卸货。”[4] 接着他要求沙皇没收“所有英国人带来的货物”。12月，拿破仑同时命令尚帕尼和科兰古分别向俄国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库拉金（Alexander Kurakin）和沙皇发出直接警告：如果俄国径自违反《蒂尔西特条约》，允许装载英国商品的船只入港，战争就不可避免。[5]

1810年12月19日，拿破仑将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汉萨城镇并入法国，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付德意志西北部海岸的走私活动。继罗马、汉诺威与荷兰之后，这是近十二个月来拿破仑第四次兼并领土。像前三回一样，吞并汉萨城镇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执着于对英国的保护主义经济战。然而，若他不取威悉河左岸的奥尔登堡公国，亲自统治这些主要城市并无地缘政治或商业意义。奥尔登堡占地2000平方英里，其摄政公彼得（Peter）公爵乃亚历山大的妹妹叶卡捷琳娜·帕芙洛夫娜女大公的公公。拿破仑反复警告奥尔登堡，但它仍然相对公开地与英国贸易，以至于被比作巨大的走私库房。[6] 《蒂尔西特条约》保证了奥尔登堡公国的独立地位，但拿破仑决定堵上漏洞。在吞并汉萨城镇那天，他也兼并了奥尔登堡。一个月后，他提出用王公封地爱尔福特补偿彼得公爵，但这块土地的面积只有奥尔登堡的七分之一，亚历山大于是愈发恼火。[7]

早在拿破仑之前，法俄之间就有嫌隙：路易十六帮助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的扩张主义，还同波罗的海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联合。[8]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出行，遍访欧洲主要宫廷（凡尔赛宫除外），从那以后，历任沙皇和女皇都把目光投向西方，圣彼得堡便是一例证明。亚历山大吞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西亚，把俄国疆界推进至多瑙河，并垂涎土耳其属巴尔干领土。亚历山大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是

德意志公主，长期视法国为潜在敌人，在她治下，1772～1795年，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亚历山大的父亲帕维尔一世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大头领，并派名将苏沃洛夫侵入伦巴第和瑞士。由此可见，很久很久以前，俄国就怀着跻身欧洲主要势力的雄心，不管某个时代的欧洲霸主是谁，俄国几乎总是会和它产生矛盾。18世纪的很多时期，法国就称霸欧洲，而拿破仑时代肯定也不例外。

甚至在拿破仑兼并奥尔登堡前，亚历山大就谋划再战法国。[9] 从1810年10月开始，沙皇的战争大臣巴克莱·德·托利、军事顾问恩斯特·冯·普菲尔（Ernst von Pfuel）、前参谋军士路德维希·冯·沃尔措根（Ludwig von Wolzogen）伯爵以及法国流亡者阿隆维尔（Allonville）伯爵都给亚历山大送去详细计划，其内容涵盖攻防中的所有意外事件。12月上旬，巴克莱拟定如下计划：俄军迅速先发制人，摧毁拿破仑的波兰基地，然后在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et Marshes）两岸（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打防御战。[10] 蒂尔西特的亚历山大是热情的友人（拿破仑希望沙皇如此），爱尔福特的亚历山大是更勉强的盟友，现在的他则越来越像未来的敌人了。



《蒂尔西特条约》限制贸易，因此俄国国库顶着无法承受的巨大赤字：1808年，亏损1.26亿卢布；1809年，亏损1.57亿卢布；1810年，亏损7700万卢布。俄国国债涨了13倍，导致其货币严重贬值。1808年，俄属波罗的海海域出口量跌至1806年的三分之一。[11] 12月19日，拿破仑吞并汉萨城镇和奥尔登堡，同日，沙皇亚历山大实施报复，颁布敕令：从年末开始，俄国向中立国（如美国，不过不包括英国）开放贸易，禁止法兰西帝国特定奢侈品入境，并对葡萄酒等其他法国商品征收巨额进口税。[12] 康巴塞雷斯认为，敕令“毁了我们和俄国的商业关系……表露出亚历山大的真实意图”。[13] 敕令的确规定焚烧所有英国出产的货物，但它补充道，这一条很快也将适用于法国和莱茵邦联制造的某些丝绸与衣物。拿破仑听闻消息后，说：“我宁愿脸上挨一拳，也不愿见臣民的工业产品和劳作成果被焚。”[14] 没过多久，英国船只挂上星条旗，以便避开敕令，而俄国海关官员与它们暗中勾结。[15]

1811年，欧洲大陆爆发历时两年的经济危机，英国也被卷了进来，

受到歉收、大规模失业、降薪、勒德运动[16]和食物短缺的冲击。[17]法国东部的米卢斯（Mulhouse）有6万名劳动力，其中三分之二失业了。里昂也有2万多人失业。[18]拿破仑需要刺激增长，但他持科尔贝主义经济观，否认竞争和自由交易的积极意义，结果他复归原轨，试图比以往更严格地执行大陆体系，哪怕此举可能最终导致俄法再战。拿破仑担心，假如俄国获准离开大陆体系，他国会效仿，但1811年时，诸国不大可能尝试脱离。

1812年，拿破仑认为大陆体系正在生效，为了佐证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伦敦各大银行与企业纷纷破产。正如他的私人秘书费恩男爵所说的："再下点功夫，封锁就能折服英国的骄傲。"[19]拿破仑认为英国不能同时承受费恩列出的事："英国占领印度、与美国开战、在地中海建立势力、保卫爱尔兰和它自己的海岸线、派海军大军驻防，与此同时，它还在半岛和我们打一场……顽固的战争。"[20]事实上，既然英国刚好能够同时应付这些任务，这就表明其政府与基础经济实力值得认可，但拿破仑确信，若想打击英国商业，大陆体系需要遍布全欧洲。1807和1809年，他分别把普鲁士和奥地利纳入体系，现在他绝不会允许俄国打破体系，哪怕英俄贸易对英国经济来说根本不重要——肯定不及对俄国经济来得重要。当时，约19%的英国出口商品流入伊比利亚半岛，这也说明为何拿破仑不应给俄国施压，而应重返半岛。[21]

拿破仑认为，1811年全年和1812年上半年，他的大陆体系狠狠打击了英国，事实的确如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英国的大危机年代"。[22]贸易额迅速下跌；1810年，3%的政府统一公债价格为70英镑，1812年，它跌至56英镑；1811年和1812年，粮食歉收，导致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1810年，预算赤字为1600万英镑，军费开支致使1812年赤字涨至2700万英镑。1811年与1812年之交的冬天，17%左右的利物浦人口失业。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到处是潜在的暴徒和勒德分子，政府得部署民兵对付这些人，他们中的首犯被判流放澳大利亚，有时甚至被处死。[23]

1812年6月，英美因贸易和强行征用问题开战，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经济进入最糟糕时期。[24] 然而，斯潘塞·佩瑟瓦尔一边铁了心地坚持半岛战争资助计划，一边应付费恩列出的其他任务。由于拿破仑发动俄国战局，1812年年末至1813年年初，英国才卸下身上的巨大压力。要是他没有征俄，我们无从得知英国在大陆体系面前还能撑多久。

当时，拿破仑能组建起60多万人的大军，而沙皇敕令直接违反《蒂尔西特条约》与《爱尔福特条约》，威胁了他的帝国体系。然而，即便1812年拿破仑击败俄国，他能否贯彻大陆体系也存疑。他要兼并波罗的海南部其他海岸线，并在圣彼得堡设置法国海关官员吗？皇帝很可能认为，如果亚历山大战败，此人就会像1807～1810年一样重新为他执行大陆体系，这是计划的关键部分，但我们也不确定它是否系深思熟虑的产物。拿破仑的大量书信显然提都没提战后他想如何实施对英贸易禁令。

1810年圣诞节，亚历山大致信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公爵。他提及“波兰复国”时，赤裸裸地说：“俄国不是不可能让波兰复国……我一直最喜欢这个想法，受情势所迫，我两度被迫推迟行动，但无论如何它留在我心里，现在就是实现它的最佳时机。”[25] 亚历山大让恰尔托雷斯基调查波兰人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任何团体给予的”国民身份，“是否不加区分，只要某国真诚忠实地拥护他们的利益，就愿意与它联手？”沙皇一边要求绝对保密，一边问恰尔托雷斯基“哪个军官最能影响军队的意见？”，并坦率地承认，他的“波兰复国”提议的“基础不是对抗拿破仑的天才的希望，而完全在于让华沙大公国脱离，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并利用德意志全境对他的普遍愤慨”。沙皇附上表格，表明俄军、波兰军、普军、丹麦军共有23万人，而他们的对手——拿破仑的德意志驻军——则有15.5万人。（亚历山大只算了6万名法国人，再说丹麦也是法国的忠实盟友，所以此表格无甚意义。）亚历山大写到结语时警告恰尔托雷斯基：“这种时机只有一回，任何其他组合只会导致法俄两国在你的国家死战。拿破仑本人终有一死，波兰人只能指望他提供有限的

援助。”[26] 恰尔托雷斯基谨慎地回信，他质疑沙皇的数字，并指出，“法国人是波兰人的战友……俄国人是波兰人的仇敌”。恰尔托雷斯基还说，2万名波兰人在西班牙作战，如果他们陡然转换阵营，就容易遭到“拿破仑的报复”。[27]

因为这次通信，1811年春，亚历山大转而反对打进攻战，尽管直到1812年春，拿破仑依然担心奇袭。此时，亚历山大试图和奥地利、普鲁士缔结秘密军事条约，若拿破仑知晓，他会更加担心。1810年9月，亚历山大已批准巴克莱的建议，同意扩充军队、实施深层军事与社会变革。[28] 俄军采纳军与师的体系；军事学院废止，军权统一收归战争部；军用物资工厂奉命在宗教节假日保持运营；《现役大军管理条例》颁行，这部法律规定了更好的食物收集与分配方式以及其他很多事项；军事指挥官权限法典化、规范化；建立更有效的参谋部结构。[29] 俄国最近的战争是北伐瑞典与南征土耳其，所以其西部边界的保护措施相对较少。亚历山大亲自负责在西部边境广泛修建防御工事的计划。此外，俄军在西伯利亚、芬兰和多瑙河的驻军也调至波兰边境。拿破仑认为这些修造与调动是挑衅。梅纳瓦尔称，1811年年初，皇帝总结道，俄国打算“和英国联手”。[30] 1811年1月第一周，亚历山大致信妹妹叶卡捷琳娜：“看来洪水又得泛滥了，但至少我已尽人之所能阻止它。”[31] 上年他的行动和通信显然证明此乃谎言。

双方开始集中大量军力。1811年1月10日，拿破仑把法军重组为四个军：达武的第一军和乌迪诺的第二军驻易北河；奈伊的第三军占据美因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和但泽。1812年1月，但泽已变为主要的卫戍城市，其库存足以养活40万人和5万匹马。1811年4月，单是斯德丁和屈斯特林（Küstrin）[32] 就积累了100万份补给。[33] 拿破仑操办一切，上至大事——“如果我和俄国开战，”2月3日，他告诉克拉克，“我估计需要给波兰起义者20万支滑膛枪和刺刀”——下至几天后的一次抱怨：100名新兵向罗马行军，其中29人在鲁瓦亚河畔布雷伊（Breil-sur-

Roya）逃走了。[34]

比起1805年和1809年的法奥战争，拿破仑并非更积极地追求法俄开战，但他担心退让会损害帝国，所以不会让步。1812年2月下旬，他让沙皇的副官、俄国驻巴黎大使馆人员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Alexander Chernyshev）上校转交致亚历山大的信。信中，拿破仑用友善平和的语句历数他的不满，表示自己从未谋划恢复波兰王国，还坚称两人在奥尔登堡、敕令等问题上的分歧可用非冲突的方式解决。[35] 拿破仑不知道，切尔内绍夫是俄国安插在巴黎的间谍头目，其谍报工作成果赫赫。切尔内绍夫用了十八天把信送到亚历山大手中，俄国方面又在必要的讨论和写回信上花了二十一天。[36] 切尔内绍夫返回巴黎时，波尼亚托夫斯基已听闻恰尔托雷斯基探听波兰贵族的口风，而拿破仑预计3月中旬至5月上旬俄军将发动进攻，他已让德意志和波兰的驻军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拿破仑致亚历山大的信有如下内容：

> 我无法欺瞒自己，陛下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奥尔登堡一直是英国走私商的温床，我没有拒绝给予它同等补偿，您却因为这个问题提出种种刁难……请允许我直言不讳，陛下，您忘了您从这一同盟中所获的利益，而蒂尔西特会议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根据《蒂尔西特条约》，您应该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还给土耳其，然而您不但没有恢复这些省份，还把它们并入您的帝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中占三分之一，这次吞并是一次大扩张，它支撑陛下的辽阔帝国的多瑙河领土，剥夺土耳其的全部力量。[37]

拿破仑继续辩称，要是他想恢复波兰，弗里德兰之战后就动手了，但他刻意没有那样做。

3月1日，亚历山大下令从农奴中征募一批新兵。在此之后，他回复了拿破仑的信："我的感情和我的政治都不曾改变，我只愿维持并巩固我们的同盟。难道我不能认为，倒不如说陛下对我改变了态度？"[38] 沙

皇提及奥尔登堡，并用有些夸张的话作结：“假如必有一战，我知道如何战斗，就算死，我也要让敌人付出巨大的代价。”[39]

1811年3月19日，玛丽·路易丝感到分娩阵痛，此时距她初遇拿破仑已将近一年。博塞回忆道：“整个宫廷、全体政府高官群集杜伊勒里宫，他们等待着，耐心已然低到极限。”[40] 拿破仑最不耐烦，拉瓦莱特回忆道，他“非常焦躁，不断在客厅和卧室之间来回踱步”。[41] 他听取科维萨尔的建议，用10万法郎高薪请来产科医生安托万·迪布瓦（Antoine Dubois），但他对迪布瓦提议：“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在给皇后接生，把她当成圣但尼街的资产阶级妇女。”[42]

1811年3月20日（周三）上午8点，拿破仑-弗朗索瓦-约瑟夫-夏尔（Napoléon-François-Joseph-Charles）出生。这次生产困难重重，甚至满含痛楚。“我并非天生心软，”多年后，拿破仑承认道，“但我见她那么痛苦，深受触动。”助产要用工具，意味着分娩过程需要“很多摩擦”，而孩子出现时“头上也有一点刮痕”。[43] “他的脸红扑扑的，表明他降生于世时一定经历了很多疼痛与艰辛。”博塞写道。抛开拿破仑对继承人的一切付出不谈，他指示医生们，倘若面临抉择，必须优先保障皇后的生命。[44] 拿破仑宣布封婴儿为“罗马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波拿巴派宣传人员则昵称他为“雏鹰”（L’Aiglon）。

孩子的第二个名字乃是致敬其外祖父奥地利皇帝，第四个名字进一步表明拿破仑爱卡洛，纵然他并不仰慕父亲。官方曾宣布，若生下女儿，就鸣炮21次，若生下儿子，则鸣炮101次。于是乎，加农炮第22次轰鸣后，巴黎热烈欢庆，庆典规模如此盛大，以至于几天后警察局长还得暂停市中心的全部交通。[45] “我的儿子块头大，身体健康。”拿破仑致信同自己保持亲密联系的约瑟芬，“我希望他能茁壮成长。他的胸口、嘴唇和眼睛像我。我相信他会完成自己的天命。”[46] 拿破仑溺爱儿子。“皇帝把手伸进酒杯，然后让孩子吮吸手指，借此喂他一点波尔多

葡萄酒，”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回忆道，“有时他用肉汁涂抹小王子的脸，孩子会尽情大笑。”[47] 当时，很多王族对子女严苛无情，西班牙的波旁家族和英国的汉诺威家族几乎树立仇恨子女的典范，但拿破仑疼爱儿子。小王子的血缘背景让皇帝过分自豪，他指出，罗马王分别通过姨丈、母亲、婶婶、母亲的姨祖母继承了罗曼诺夫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汉诺威家族、波旁家族的血统。他说：“我的家族和欧洲所有君主国结盟。”[48] 事实上，这四个家族现在都盼望拿破仑倒台，但他的满足感完全没有因此减少。

1811年4月上旬，拿破仑致信符腾堡国王，要求他和萨克森国王、拜恩国王、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一同出兵，以防皇家海军袭击但泽。信中，拿破仑使用某种诗化的无奈口吻，谨慎地说谈论战争常常注定会引发战争，还说沙皇可能被迫开战，不管他自己是否想一战。

> 如果亚历山大渴望战争，公众意见和他的意图一致。如果他不想开战……下一年他会被战争之念控制，所以不管他怎样，不管我怎样，不管法国和俄国的利益怎样，战争都会爆发。我常见这种事发生，以至于我的过往经历能揭开未来的面纱。所有这些都是歌剧场景，英国人操纵其情节变动……假如我不想开战，假如我远远不想当波兰的堂吉诃德，我就有权坚持要求俄国继续忠于同盟。[49]

拿破仑也害怕俄国与土耳其和解的影响，很久以前他就在考虑此事，并采取了预防措施。

拿破仑应该在运筹谋划时给另一个问题分配大得多的权重，那个问题就是西班牙。1811年5月上旬，丰特斯-德奥尼奥罗（Fuentes de Oňoro）会战爆发，威灵顿击败马塞纳。自此，法军被彻底赶出葡萄牙，再没回来。拿破仑用马尔蒙换下马塞纳（马尔蒙对付威灵顿时表现更糟），不再授予“胜利的宠儿”任何要职。可是马塞纳的补给和增援一直不足，所以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拿破仑的错误。然而，1811年中期，西班牙局势并未陷入绝境：游击队依然四处蔓延，但西班牙正规

军完全算不上威胁；威灵顿在西葡边界上，远离马德里；西班牙的大部分要塞（除了加的斯）都在法军手中。假如拿破仑未下令在巴伦西亚集结，或者提供更多增援，抑或亲征，形势将大大改善，甚至可能逆转。[50]

由于疾病、逃兵现象、游击战、英军的行动、俄国战局和几乎为零的增援，1812年，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队只有29万人，1813年中期，这个数字跌至仅剩22.4万人。法国每年征召8万名新兵，而西班牙战事平均每年折损5万人，中欧地区也需要卫戍部队，新兵人数只是刚刚足以填平这两个缺额。所以说，拿破仑根本没有足够的法国人在俄国发动大战局。[51] 1810年或1811年，要是他重新立费迪南德为王并撤回比利牛斯山脉，从而治愈“西班牙溃疡”，未来他就不会受那么多的创伤。

尚帕尼反对将要爆发的战争，1811年4月17日，未来的巴萨诺公爵于格-贝尔纳·马雷接替他任外交部长。据说资产阶级人士马雷温顺驯服，甚至毕恭毕敬，所以他肯定无法制造任何障碍。[52] 康巴塞雷斯、达吕、迪罗克、拉屈埃、洛里斯东、科兰古和尚帕尼或多或少口头批评了拿破仑的征俄计划。[53] 也许康巴塞雷斯等人的警告并不像这些人日后说的那样深谋远虑、言辞响亮，但不管怎么说，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曾建议不要和俄国开战。问题之一在于，早些年拿破仑可能会听一些人的话，而其中很多人已然无法给他意见了：莫罗和吕西安各自去了美国和英国流放；塔列朗、马塞纳、富歇被贬职；德塞与拉纳已死。再说，昔日别人表示反对时，事实往往证明拿破仑是对的，所以他不会认为异议者才是对的，哪怕有一群人抗议。法国外交人员几乎都反对开战，可拿破仑也不在意。[54] 当时，战争看来并不像大赌局，因为他没打算深入俄国内部。此外，之前他的鲁莽行动也成功过。

5月中旬，洛里斯东接替科兰古任驻俄大使。拿破仑召科兰古回巴黎，询问正在成形的危机期间他掌握的俄国内部的情报。1811年6月某

日，科兰古花了五个小时劝皇帝不要开战。据他所述，亚历山大佩服西班牙游击队丢了首都也不求和，称俄国冬季严酷，并自夸道：“我不会率先拔剑出鞘，但我将最后收剑入鞘。”[55] 科兰古还说，蒂尔西特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与俄国彻底改变了，但拿破仑回答道：“只要一场大胜，我就能了结你的朋友亚历山大的全部妙招和沙堡！”[56] 6月21日，他对马雷说了类似的自矜之辞：“我接受挑战后，俄国看上去害怕了，但一切尚无定论。俄国的目标似乎是让波兰割出两块地区，以便补偿奥尔登堡公国。他们会完全毁了大公国，而且我顾及荣誉，所以不会同意。”[57]

拿破仑所谓的“荣誉”指的是他的威望，但他显然没意识到，为了波兰的两块地区以及华沙大公国已然丧失的完整性，他正拿荣誉、威望和自己的御座冒险。他仍然期盼来一场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瓦格拉姆那样的战局，相信攻势激烈、力量集中的1807年战局再现版（尽管规模大一些）不会招致巨大风险。然而1812年，俄国三次紧急征兵，招募了至少40万人（1805～1813年，俄国一共征召了110万名新兵）。拿破仑没有考虑到，他将要对付的俄军已今非昔比，尽管它仍具备普乌图斯克之战和戈维明之战中令他钦佩的顽强。一半以上的俄军军官是老兵，拥有丰富的经验，三分之一的俄军军官参加过至少六次战斗。俄军已然变了，但拿破仑并未注意到。所以说，虽然他并非积极追求开战，但他非常乐意“接受”沙皇敕令的“挑战”。

1811年7月，又一条避免再战的充足理由出现：诺曼底的法国北部全境以及法国南部很多地区遇上粮食歉收，导致拿破仑私下称为饥荒的食物短缺。[58] 大臣帕基耶负责资助烘焙业、防止民众骚乱，他说此举成了“政府的巨大负担”。9月15日，一条4磅重面包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涨至14个苏，而拿破仑“非常不愿意”见到价格再涨。[59] 他主持食品委员会，频繁召开会议，调查价格控制措施。与此同时，照帕基耶的说法，在乡下，“恐慌开始代替焦躁”。玉米市场爆发暴力事件，诺曼底

乡间遍布大群饥饿的乞丐，面粉磨坊遭抢劫，甚至被毁，所以拿破仑一度下令封闭巴黎城门，以防面包流出。他还分发了430万份干豌豆和大麦汤。[60] 军队奉命去卡昂（Caen）等城镇镇压面包暴乱，暴徒（包括女人）被处死。最终，谷物和面包价格的管制措施、各省省长协调下地方名流的善举、施食处、食物库存的隔离、暴民受到的严惩一并缓和了困难。[61]

1811年夏天，洛里斯东和鲁缅采夫继续协商奥尔登堡的补偿与敕令的缓和等事项，但两国依然在波兰边境备战。8月15日，杜伊勒里宫举办拿破仑的生日宴，席上，他冒犯了俄国大使库拉金。长期以来，他和大使交谈时都非常坦率，这类事例包括与孔萨尔维红衣主教谈《政教协定》、与惠特沃思谈《亚眠条约》、1809年开战前夕与梅特涅谈话等，但全面坦诚的言谈只是大使工作的一部分。这一回，拿破仑责备了俄国半小时。他对库拉金说，俄国支持奥尔登堡、实施牵涉波兰和（据说涉及）英国的阴谋、违反大陆体系、筹备军力，这意味着战争多半会爆发，但俄国将像1809年的奥地利一样孤立无靠，而法俄新同盟则能避免这一切。库拉金说他无权商谈这一事项。“无权？”拿破仑大叫道，“你必须立刻写信给沙皇，问他要。”[62]

次日，拿破仑和马雷费力处理奥尔登堡的补偿、波兰的承认、土耳其瓜分计划、大陆体系这些问题，回顾上溯至蒂尔西特会议的所有相关文件。此举令皇帝确信俄国人谈判时不讲信用。当晚，他告诉参政院，囿于天气原因，1811年无法发动俄国战局，可一旦确保普鲁士和奥地利与法国合作，1812年时俄国就会受到惩罚。[63] 俄国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军事条约，这两个国家害怕拿破仑报复，遂打破了它的希望。不过奥地利和普鲁士暗中对亚历山大口头承诺道，它们只会给法军最少援助，就像1809年俄军入侵奥地利那样。照梅特涅的说法是，“有名无实”。

拿破仑再度关注军中鞋子的状况，这证明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意图。11月29日，达武向拿破仑报称（该报告现藏于国家档案馆）："1805年战局中，很多人因为没鞋子落在后面，现在他正给每人积累6双鞋。"[64] 没过多久，拿破仑命令战争管理部长拉屈埃为40万人提供五十天战役的补给，要求获得以下物资：2000万份面包和大米；6000辆货运马车，可载能供20万人食用两个月的面粉；200万蒲式耳燕麦，可供马匹食用五十天。[65] 战争部档案的每周报告证明，1812年年初，拿破仑正组织庞大的行动。随便举个例子，1812年2月14日，整个帝国西部的法军向东进发，前往20多座德意志城市。[66] 1811年12月，拿破仑命令其图书馆管理员巴尔比耶（Barbier）收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立陶宛和俄国的书，这更加体现了他的想法。巴尔比耶找了不少书，有伏尔泰的作品，有论述1709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侵俄遭惨败、其军队在波尔塔瓦会战中被歼灭的书，但也有描述俄国资源与地理的500页著作，以及讨论俄军的两本新著。[67] [68]

1812年1月初，如果沙皇真的在意回避战争，他仍有六个月的时间防止开战，此时，他致信妹妹叶卡捷琳娜："魔鬼般的政事统统变得更糟了，身为人类祸害的那个丑恶家伙每日愈发可憎。"[69] 切尔内绍夫的下属中有个代号"米歇尔"的间谍，此人在巴黎战争管理部工作，1812年2月下旬，他和三个同谋落网，然后被处决。被捕前，"米歇尔"一直向亚历山大传递情报，这些报告让沙皇获知法军筹备与调动的规模有多浩大，甚至给他提供了拿破仑的作战序列。[70]

1月20日，拿破仑又干了一件目光短浅的事。他吞并瑞典属波美拉尼亚，以便沿波罗的海执行大陆体系。康巴塞雷斯回忆道，拿破仑对待贝纳多特时"很缺练达手腕"，毕竟贝纳多特已是王室的亲王，需要某种新层次的尊重。迟至1809年9月，瑞典与俄国的战争才结束，而这次兼并把它推向俄国一边。[71] 假如拿破仑与北方的瑞典成功结盟，他就能靠它分散俄军的注意力，可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还确保了贝纳多特愿与

俄国签订友好条约。1812年4月10日，贝纳多特真的在奥布（Åbo）与俄国订立友好协议。

2月，奥地利同意让施瓦岑贝格亲王率3万人参与侵俄，但正如梅特涅对英国外交部所说的，“按照我的原则和设想，不只要欺瞒法国政府，还得骗过欧洲大部分地区”。[72] 当时，梅特涅没什么可辨原则，而且他的设想就是观望侵俄事态。一周后，普鲁士承诺提供2万人，整整四分之一的普军军官辞职抗议，其中很多人实际上加入了俄军，如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73] 昔日，拿破仑常说“公然的敌人比可疑的盟友更好”，但1812年时，他没有照此信条行事。[74] 达武报称俄军兵力庞大，皇帝便认为，他既需要尽可能多的外籍部队，又得给他们精良装备。[75] “我已下令给轻骑兵配卡宾枪，”1月6日，他致信达武，“我也想给波兰人配卡宾枪。我得知每个波兰连只有6把卡宾枪，荒唐，他们可是要对付满身披挂的哥萨克。”[76]

2月24日，拿破仑致信亚历山大，他说自己“决心和切尔内绍夫上校谈谈最近十五个月的不幸事件。只要陛下愿意就可结束一切”。[77] 沙皇回绝了这一进一步的开放性求和之举。同日，欧仁开始让意大利军团的27400人开赴波兰。费恩称，此时拿破仑一度考虑肢解普鲁士，从而“确保从第一声加农炮响开始，他就有对付俄国战局所有不利风险的保障”。[78] 然而，圣彼得堡和华沙大公国之间聚集了20多万名俄军士兵，拿破仑得先应对他眼中的俄国的重大威胁，承受不起扰乱后方的影响。[79]

拿破仑盼望再次速战速决，但1811～1812年，他留给敌人的备战时间比之前任何战局的都充裕得多。1811年年初，他初次对莱茵邦联部队发布动员令，从那时起，俄军足足有一年多时间来筹备，他们也把这个机会用到了极致。此前所有战局中，拿破仑的敌人能在他发动猛攻之前准备几个星期就不错了。1812年春，冯·普菲尔将军草拟了沿德里萨（Drysa）[80] 集中兵力的计划，他的方案未被采纳，但俄军高级指挥官

一直在思考其他战略，显然比拿破仑想得深远。当时，拿破仑的策略已然明朗——迅速在边境上打一场决胜会战。

拿破仑称这次战事为“第二次波兰战局”，但他私下里对部下说：“我们不用管对波兰事业的轻率热情。我的政治就是法国绝对优先。波兰人不是本次战争的主体，他们不能阻挠和平，但我们能利用他们当战争工具。如此巨大的危机前夕，我也不会不给他们意见或指导。”[81] 他任命普拉特（Pradt）教士为法国驻华沙大使。“按照拿破仑的路子，战局开始时没有任何补给，”普拉特后来在（激烈反对拿破仑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些崇拜他的傻瓜以为这就是他的制胜秘诀。”[82] 普拉特说的不对，战局之初军队给养充足，但此言后来成了中肯批评，原因之一是普拉特自己的错误，因为波兰是此次战争中的主要补给点，而他疏忽大意且能力不足。拿破仑还想过任命塔列朗为驻华沙大使。他甚至会考虑普拉特和塔列朗，这说明其惯有的识人之明严重受损，而且他在塔列朗的问题上依然失察。

亚历山大将在北部和南部施展重大的外交策略，这能让他集中兵力应付未来的侵略，而拿破仑过了很久才察觉，此时情势已然凶险。迟至1812年3月30日，他告诉贝尔蒂埃：“普鲁士、奥地利支持我，瑞典很可能也帮助我，土耳其又开始敌视俄国了，它会发动新战事，苏丹将亲征。这一切导致俄军不大可能轻易违抗我。他们不会不明白，所以我认为俄军将避免任何调动。”[83] 实际上，由于拿破仑对待贝纳多特和瑞典无法做到尊重与包容，他已经丢了北岸。1812年5月下旬，他又丢了南岸，尽管他派安德烈奥西将军去君士坦丁堡对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ahmud II）说：“如果苏丹率10万名土耳其人渡过多瑙河，我保证不仅拿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来换，还会把克里米亚给土耳其。”[84] 亚历山大开出了与之相当的条件——给予苏丹多瑙河省份。5月29日，他与土耳其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这意味着俄军的多瑙河军团可以开始威胁拿破仑的南岸了。

“土耳其人将为这个错误付出高昂代价！”拿破仑听闻俄土条约后说，“这招蠢得我都无法预料。”[85] 其实这回犯蠢的却是他自己——他太自信奥斯曼会支持他。1799年，奥斯曼迫使拿破仑在阿克折返，1812年，它又允许俄军将巴尔干半岛的兵力调去对付他，可见所谓的“欧洲病人”其实在他的两次大挫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我被指发动这场战争，”8月，拿破仑对费恩说，“为了洗刷我的罪名，就请想想，我的事业和土耳其的联系那么少，瑞典还那样骚扰我！”[86]

3月15日，大军团所有的军皆已到达易北河。同日，拿破仑命令法国驻维也纳大使路易·奥托以每瓶10个苏的价格收购200万瓶匈牙利葡萄酒，并将酒运至华沙。[87] 为了增强入侵兵力，比利时国民自卫军部队接替法军驻守大西洋沿岸，波利娜·博尔盖塞公主的私人卫队应召而来，海军加农炮被挪用，医院也搜寻装病逃兵役者。后备部队解散后再集结，以便让能去俄国的兵力增至最大。举个例子，没过多久，巴黎国民自卫军第10大队几乎全由扁平足者组成。[88]

4月8日，在大军团到达奥德河一周后，亚历山大发布最后通牒，要求拿破仑立刻撤出普鲁士、瑞典属波美拉尼亚、华沙大公国，并裁减但泽卫戍部队。这将是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先行协定，根据其规定，俄国有权与中立国贸易，但它会协商补偿奥尔登堡一事，并削减针对法国货物的关税。[89] 拿破仑显然无法接受这些条款，而且无论如何，比起真实的媾和基础，这份通牒听来更像宣传公报。4月21日，亚历山大离开圣彼得堡，前往维尔纽斯（Vilnius）的俄军基地。早在17日时，拿破仑已向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求和，他开出的条件如下：若英军撤出伊比利亚半岛，他也会撤离那儿；若英国承认缪拉的那不勒斯王位和约瑟夫的西班牙王位，波旁家族便可继续统治西西里。“要是第四次像前几次一样失败，”他总结《亚眠条约》废止后他的诸多求和举措，“法国至少能想想又可流动的血河最终全落到英国头上，借此自我宽慰”。[90] 这次求和，特别是涉及缪拉和约瑟夫的荒诞条款乃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

行为，卡斯尔雷是小皮特的忠实信徒，可想而知他定会对此嗤之以鼻。

针对沙皇的最后通牒，4月25日，拿破仑派副官路易·德·纳尔博纳-拉腊（Louis de Narbonne-Lara）伯爵（此人很可能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送去更现实的对应提议，其内容不包括撤离盟国领土。“这些可向陛下证明，我渴望避免战争，并且忠于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的情谊，”拿破仑写道，“然而，陛下您将允许我向您保证，若命运使然，你我之间必有一战，我对陛下的感情也不会变，它将安然度过动荡与沧桑。”[91] 历史学家常常怀疑此言，既然拿破仑打算摧毁俄国，他们就质疑他为何屡屡设法保住与俄国君主的私人友情，然而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相信皇帝之间存在超越现实的手足之情。同亚历山大相比，蒂尔西特的相伴时光对他的意义明显大得多。5月，拿破仑奔赴前线，临行前，他对帕基耶说，将要来临的俄国战局是“我尝试过的最伟大、最艰巨的事业，但既然开了头，就得干到底”。[92]

5月9日（周六）早上6点，拿破仑携玛丽·路易丝与婴儿罗马王离开圣克卢宫，动身去前线。出发前一天，他征收小麦税，大力采取食品价格控制措施。帕基耶总结道，“他希望自己不在时，这套法子能保证他们依旧满意”，但此举仅能解决短期问题。[93] 拿破仑像往常一样快速行动，皇帝一家乘坐马车，分别在13日与29日渡过莱茵河和易北河，6月6日他们又过了维斯瓦河。七天之内，一家人在没有铺碎石且车辙纵横的路上走了530英里，其平均日行里程超过75英里。然而，拿破仑仍有时间在德累斯顿举行会议，出席者有符腾堡国王、普鲁士国王、萨克森国王和拜恩国王。1810年，符腾堡国王拒绝派兵去西班牙，但他答应对付俄国。拜恩国王仍然生拿破仑的气，因为他从未偿还1805年的军费，不过国王还是派兵参与征俄。玛丽·路易丝婚后第一次见父亲，而拿破仑和岳父的上一次会面还是在奥斯特利茨附近的风车磨坊。弗朗茨也见了他的外孙。孟德斯鸠夫人是照顾罗马王的保姆，她的官方头衔是“皇家子女保姆”，这说明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想要更多孩子。事实上，拿破

仑后来说，自己打算生个次子，让他当意大利国王，然后为保险起见要第三个儿子。

很久之后，梅特涅声称，他在德累斯顿会见拿破仑时，对方跟他说了俄国战略。“胜利归于最耐心的人，”根据不可靠又相当自私的梅特涅回忆录的相关记载，皇帝说道，“我的战局始于横渡涅曼河，终于斯摩棱斯克（Smolensk）和明斯克（Minsk）。我将停在那两个地方，并修筑防御工事。总司令部要在维尔纽斯度过下个冬天，我会在那儿忙着组织立陶宛人……也许我自己会在巴黎度过冬季最恶劣的几个月。”[94] 梅特涅问道，假如亚历山大不求和会怎样，据说拿破仑回答道：“那样的话，明年我就进军帝国中心，1813年，我会像1812年时一样耐心！”梅特涅和俄国人的联系渠道极好，而且拿破仑必然疑心对方不希望自己战胜俄国，所以我们也许能怀疑他是否对此人吐露了这些秘密。

5月29日黎明时分，拿破仑离开德累斯顿，把玛丽·路易丝留在她的父母身边。当天上午，他致信妻子，称两个月之内就会回来。“我将信守对你的一切承诺，”他说，“所以我们只是短暂分离。”[95] 将近七个月后，他们才重逢。拿破仑奔赴东边，途经包岑、赖兴巴赫（Reichenbach）、海瑙（Hainau）[96] 、格洛高（Glogau）[97] 、波森、托伦、但泽、柯尼希斯贝格，在6月23日到达涅曼河畔。他故意没去华沙，一位俄军将领估计，要是他在华沙宣布成立波兰王国，他可以招募到20万人，并煽动立陶宛、沃伦（Volhynia）、波多利耶（Podolia）这几个波兰民族的省份反抗沙皇。[98] 拿破仑没有那样做，他情愿不得罪盟国奥地利与普鲁士。

6月4日凌晨1点，在托伦，皇帝的参谋官马莱谢夫斯基上校听见他一边哼着《出征曲》，一边在卧室里踱步，其中有一句是“颤抖吧，法兰西的敌人”。[99] 光是那一天，拿破仑又写了一些信：致达武的信埋怨符腾堡士兵在波兰劫掠；致克拉克的信提及招募一个易北河战斗工兵

连；致玛丽·路易丝的信说，从凌晨2点开始，他在马上待了十二个小时；致康巴塞雷斯的信称前线宁静；致欧仁的信下令筹集3万蒲式耳大麦。此外，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至少24封信，它们涵盖从应当受惩的一位无能出纳员直至需要搬迁的一座热病医院。[100] 为了准备征俄，从1812年1月初至法军横渡涅曼河，拿破仑给贝尔蒂埃写了近500封信，致达武、克拉克、拉屈埃和马雷的信合计则有631封。

6月7日，拿破仑和拉普待在但泽。比起梅特涅，他显然更可能和拉普谈战略思想。皇帝说，他的计划限于渡过涅曼河、击败亚历山大、攻占俄属波兰领土。他会把这些领地并入华沙大公国，使它成为波兰王国。他还要广泛武装波兰，留给它5万骑兵，从而建立对付俄国的缓冲国。[101] 两天后，他对费恩等人进一步阐释自己的方案：

> 等我们了结北部后，我希望苏尔特仍然待在安达卢西亚，马尔蒙也在葡萄牙边境挡下威灵顿。只有摆平俄国和西班牙的摊子，欧洲才能喘口气。唯有那时我们才可指望真正的和平来临。复兴波兰将巩固这一和平，因为奥地利会多关心多瑙河，少关心意大利。最终，筋疲力尽的英国将拱手投降，同意和大陆船只分享世界贸易。我的儿子还小，你们得让他做好平静治国的准备。[102]

这些战争目的都是有限的，甚至是可实现的，就连与英国媾和这一条也不例外（6月1日，美国对英宣战）。人们普遍认为，侵俄前夕，拿破仑陷入疯狂的自大，但上述目标显然与此说相去甚远。举个例子，他没有谈进军莫斯科（在这一点上，他说到的内容不比所谓的拿破仑和梅特涅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提到的内容多）。法兰西帝国有居民4230万人，“大帝国”卫星国另有4000万居民，相对而言，1812年，俄国有4600万人口。[103] 拿破仑曾两度战胜俄军。此时，他的军队有60多万人，比俄国野战军的两倍还多。6月20日，他仅仅指定给帝国近卫军十二天的行军补给，这暗示他只想打一场短期战役，肯定没打算从涅曼河行军800英里至莫斯科。

6月22日，拿破仑发布此次战局的第2期公报：

> 士兵们！第二次波兰战争开始了。第一次终结于弗里德兰和蒂尔西特。俄国在蒂尔西特发誓，它将永远与法国结盟，并对英国开战。今天，它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它认为我们衰弱了吗？我们不再是奥斯特利茨的战士了吗？它置我们于屈辱和战争之间，我们的选择无须多想……让我们渡过涅曼河！……五十年来，俄国在欧洲事务上施加恶劣影响，我们缔结的和平将终结这种现象。[104]

1812年6月24日（周三）拂晓，拿破仑的浩大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自从公元前49年他的英雄尤利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还没有哪次渡河比他的这次更显不祥。几天前，亚历山大司令部打发洛里斯东走了，并且没有回复最后关头拿破仑的求和条件，所以双方不用正式宣战——宣战必要性至少是像奥地利王朝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的一样少。

渡河之日，拿破仑在涅曼河畔巡逻。他的坐骑被一只兔子吓到了，结果他摔在河岸沙地上，臀部受了瘀伤。[105]“不祥之兆，罗马也会退缩！”有人喊道。不过我们不知此言是出自皇帝本人还是他的某个部下，但是他嗜好古代史（其他人也不想发表这么明显的观点，这可以理解），所以这句话很可能是他自己说的。[106]拿破仑命令原先率领炮兵的工兵指挥官让-巴蒂斯特·埃布莱（Jean-Baptiste Éblé）将军在波涅曼村（Poniémen）附近架三座浮舟桥，然后他在帐篷和临近的屋子里过了这一天。塞居尔称，皇帝在“凝滞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热浪中无精打采地躺着，徒劳地想休息”。[107]

拿破仑大军兵多将广，其规模难以计算。1812年，他共有100万武装力量，扣除卫戍部队、后备部队、国民自卫军的88个营、留在156个法国兵站的士兵、各沿海炮台的部队、驻于帝国各地的24个战列步兵营以及西班牙的军队后，还剩45万人待在征俄第一战线，第二战线也动员了16.5万人。因此，合理准确的总兵力可能是61.5万人，这比当时巴黎的全部人口还多。[108]当时，拿破仑大军显然是人类史上兵力最多的入

侵军队，而且其国籍成分非常复杂。波兰人组成最大的外籍部队，但大军也包括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威斯特伐利亚人、符腾堡人、萨克森人、拜恩人、瑞士人、荷兰人、伊利里亚人、达尔马提亚人、那不勒斯人、克罗地亚人、罗马人、皮埃蒙特人、佛罗伦萨人、黑森人、巴登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共发起七次反法同盟，这些联盟的确非凡重大，关于其规格颇有论述，但那个年代最广泛的同盟却是协助法国征俄的联盟。[109] 在拿破仑的步兵中，约48%是法国人，约52%是外国人；骑兵中，64%是法国人，36%是外国人。[110] 就连帝国近卫军中也有葡萄牙和黑森的骑兵部队，一支马穆鲁克中队亦附属于老近卫军猎骑兵。如此依赖外籍部队产生了问题，正如符腾堡人雅克布·瓦尔特（Jakob Walter）在日记中所承认的，很多人“对战局结果漠不关心”，他们对法国人和俄国人一视同仁，自然也不忠于拿破仑本人。[111] 打个比方，再怎么鼓动也不能让一个普鲁士人狂热地忠于法国事业。

由于军队人数众多，展开的阵线又相当长，拿破仑无法像从前一样把部队编成六个或七个军，只好采用新的军团编队。第一战线分为三个军团。中央军团由拿破仑亲自指挥，兵力达18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该军团下辖缪拉的两个骑兵预备军、帝国近卫军、达武军、奈伊军和贝尔蒂埃的总参谋部（现在总参谋部有近4000人）。拿破仑的右侧有欧仁第四军（该军有4.6万人，朱诺任参谋长）、第三骑兵预备军以及位于更南方的波尼亚托夫斯基第五军。拿破仑的左侧是守卫北岸的乌迪诺军。大军团共有1200多门大炮。[112]

拿破仑带了约25万匹马征俄，其中炮兵有3万匹，骑兵有8万匹，其余的拉拽2.5万辆各类车辆。然而，要为这么多马匹补给饲料，这种工作完全超出了拿破仑或任何人可实施的系统的能力。[113] 皇帝推迟入侵，直到草料充足，但是天气炎热，军队又给马匹喂湿草和没熟的黑麦，结果光是战局第一周就有1万匹马死亡。[114] 每匹马每天要吃20磅

饲料，因此拿破仑最多能维持三周的充足补给。他有26个运输营，其中18个由600辆重型货运马车组成，每辆重型马车靠6匹马拉拽，它们一共可载货近6500磅。可是俄国道路变泥泞后，军队立刻发现这些马车对路来说太沉了，其实他们本该从第一次波兰战局中汲取这个教训。[115] 每个士兵背了四天的补给口粮，跟着军队的货运马车另载有二十天的食物，这些物资足够应付拿破仑预想的超短战役，然而，如果他不能在渡过涅曼河后一个月内大败俄军主力，他要么得撤退，要么得停下再补给。所以，此次战局的关键时刻将于7月第三周出现，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拿破仑此前的战局中，军队具有旨在追赶并迅速包围敌军的高机动性，横渡涅曼河的大军却不然。单单他的司令部就有50辆马车，需650匹马拉拽。[116] 缪拉的随员里有一位波兰名厨，很多军官也把晚礼服装进行李箱，还带了私人马车。[117] 拿破仑战争前期战局有很多典型特征：敌将老迈无力；敌军民族杂融，语言多样，法军系出同源；拿破仑紧咬敌人薄弱处不放；军队调动速度比敌军的快很多；集中兵力，在恰好足以决胜的时间内实现数量优势。在广袤的俄属欧洲土地上，这些因素要么不存在，要么根本不可能存在。俄军将领常常比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对手年轻不少（俄军将领平均46岁，相对而言，法军将领平均43岁），而且俄军比拿破仑的军队更加同一。这次战局完全异于他之前的战局，事实上，它和史上任何战局都不同。

---

[1] Faber，Theodor von，*Sketches of the Internal State of France* 1811，pp.187-8

[2] 根据法贝尔的原文，最后两个问题分别针对法官和主教。——译者注

[3] Faber，Theodor von，*Sketches of the Internal State of France* 1811，p.191

[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69

[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1 nos.17179 and 17187 pp.297-302

[6]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53，Méneval，Baron Claude-François，*Napoléon et Marie Louise* 3 vols.1843-45，Ⅰ p.342，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9911

[7]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New York）1985，p.ⅹiii

[8]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202

[9] Riehn，Rich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New York）1991，p.33

[10] Riehn，Rich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New York）1991，pp.34-5

[1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17

[12]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6

[13]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387

[14] Thiers，Louis Adolphe，*History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of France under Napoleon* vol.Ⅻ 1893，Ⅻ p.477

[15]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90

[16] 英国手工业工人发起的捣毁机器的运动，也叫卢德运动。——译者注

[17]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p.251，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ch.13

[18]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52

[19]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6

[20]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p.48

[2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3-4

[2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9

[23]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412

[24] Knight，Roger，*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pp.410-12

[25]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Ⅱ p.214

[26]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Ⅱ p.216

[27]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Ⅱ p.221

[28]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

[29] eds. 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pp.115-16，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1

[30] Méneval，Baron Claude-François，*Napoléon et Marie Louise* 3 vols.1843-45，Ⅰ pp.341-2

[31]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199

[32] 今科斯琴（Kostrzyn）。

[33] Nafziger，George，*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ovato，CA）1988，p.85

[3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84

[35]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3

[36]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2

[3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89

[38]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p.307-8，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391

[39] 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09

[4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290

[41]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02

[4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Ⅴ p.147

[4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152-3

[44]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02

[45] 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46]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231

[47] D’Abrantès，Duchess，*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p.360

[4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3

[4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98

[50] Esdaile，Charles，‘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p.219，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p.25

[51]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p.196

[5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35

[53]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32

[54] Whitcomb，Edward A.，*Napoleon’s Diplomatic Service*（Durham，NC）1979，pp.152-8

[55]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3

[56]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3

[5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10

[58]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2

[59]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4

[6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no.18568 p.302

[61] Bergeron，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Princeton）1981，pp.102-3

[62]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p.204-5

[63]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5

[64] AN AF Ⅳ 1656

[65] 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499

[66] SHD GR 4.C/73

[67] 拿破仑照常忙于其他事务。“我刚刚看了送给皇后的新年礼物，就是那套瓷餐具。”12月31日，他致信尚帕尼，“它好丑，明年弄个漂亮点的。”Bingham ed.，*Selection III* ，p.132.

[68]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 （New York）1985，p.70

[69]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7

[70]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7，Arboit，Gérard，‘1812：Le reseignement Russe face à Napoléon’*Revue de l’Institute Napoléon* no.204 2012，p.86，ed. Lentz，Thierry，*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p.310，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27，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289

[71]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Ⅱ p.391

[72] Buckland，C.S.B.，*Metternich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1809 to 1813* 1932，p.219

[73]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p.208，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p.254

[7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81-2

[75] AN AF Ⅳ 1654

[7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 ，1858，Z3 no.18420，p.160

[7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 ，1858，23 no.18523 p.253

[7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16-19

[79] 拿破仑发了数百道命令，涉及向东行军的每一个方面，直至是否有足够的煮锅和白兰地酒瓶。他还给孟德斯鸠-费藏萨克伯爵寄去巴黎的“舞会邀请的青年男女名单”，并指出，“只

要年轻女士的姑姨和母亲收到请柬，她就能赴会。没过问她们的母亲前，不宜邀请年轻女士”。CN23 no.18482，p.208.

[80] 今上德温斯克（Verkhnedvinsk）。——译者注

[8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49-50

[82] Pradt，Abbé de，*Histoire de l'ambassade dans le Grand Duché de Varsovie* 1815，p.122

[8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0343 p.429，March 30，1812

[8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32

[8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310

[8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311

[8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12 no.30225 p.374

[88] Dague，Everett，'Henri Clarke，Minister of War，and the Malet Conspirac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p.2-3

[89]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70，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57-8

[9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3 no.18652 p.371

[9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0492 p.517，April 25，1812

[92]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9

[93]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18

[94]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122

[9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49

[96] 今霍伊努夫（Chojnów）。——译者注

[97] 今格洛古夫（Głógów）。——译者注

[98]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 （New York）1985，p.127

[99] ed. Ernouf，Baron，*Souvenirs d'un officier polonais* 1877，pp.232-3

[10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s.30799-30827 pp.666-77，June 4，1812

[10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p.168-9

[10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88-9

[103]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199，Evstafiev，Alexis，*The Resources of Russia*，*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2，p.6

[10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3 no.18855 p.528

[105] *TLS* 10/4/1959 p.206，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8，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pp.8-10

[10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5

[10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5

[108]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Weigley，Russell，F.，*The Age of Battles* （Bloomington，IN）1991，p.443，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36，Gill，John H.，*With Eagles to Glory* 1992，p.9

[109]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3

[110] Gill，John H.，*With Eagles to Glory* 1992，p.9

[111]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p.ｘｘiii

[11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2

[113]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p.128

[114]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

[115]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Nafziger，George，*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ovato，CA）1988，p.86

[11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2

[117]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第二十四章 进退维谷

他不想征服俄国，甚至不想重建波兰，他放弃与俄国结盟时只觉遗憾。但他的目标是占领首都，按照他的条件签订和约，并彻底禁止俄国港口与英国通商。

——尚帕尼的回忆录

战争之书第一页第一条准则是："不要进军莫斯科。"

——1962年5月，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在英国上院的发言

1812年6月24日清晨5点，拿破仑渡过涅曼河，然后他待在附近的小山丘上。行军队伍经过小山丘时，高呼"皇帝万岁！"，[1] 他则自顾自哼着儿歌《马尔伯勒去战场》（*Malbroughs'en va-t'en guerre* ）。（"马尔伯勒去战场/谁知何时回故乡？"）[2] 当天，拿破仑穿着一件波兰制服，还骑着象征意味同样分明的战马弗里德兰。接着，他在下午渡过维利亚河（the Viliya），进入考纳斯（Kaunas）。全军花了五天渡河。

1812年，俄军共有65万人，但他们广泛散布，遍及俄罗斯帝国全境。俄军各部队位于摩尔达维亚、高加索、中亚、克里米亚、西伯利亚、芬兰等地，在西部对抗拿破仑的三个军团仅有25万人和若干门大炮。巴克莱·德·托利的西方第一军团有12.9万人，驻扎在维尔纽斯两侧的宽广土地上；巴格拉季翁的西方第二军团有4.8万人，屯于维尔纽斯以南100英里处的沃尔科维斯克（Volkovysk）[3]；亚历山大·托尔马索夫（Alexander Tormasov）将军的西方第三军团有4.3万人，其位置比第二军团靠南得多，因为俄土媾和，第三军团不用在多瑙河战斗，正在北上。拿破仑想阻止三路军团会师，各个击破敌军。趁巴格拉季翁的第二军团和巴克莱的第一军团尚未会合，他派欧仁和热罗姆实施大范围包围调动，以图围住第二军团。拿破仑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继子和弟弟，却不让达武、缪拉、麦克唐纳这些有经验的资深军人上阵，个中原因不

明。1806～1807年战局中，热罗姆曾指挥第九军（军团的德意志部队），但他并无显著过人的表现。拿破仑在考纳斯修女院建立司令部，他致信玛丽·路易丝，称“天气酷热”，并补充道，“你可以送一堆书和版画给帝国大学。学校会非常高兴，而你什么也不用花。这种东西我有不少”。[4]

俄军高级指挥官意见不一，贵族将军支持巴格拉季翁的反击战略，而“外籍人士”（通常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支持巴克莱·德·托利的撤退战略。巴克莱的战略本质上和1807年时本尼希森的一致，区别在于前者的实施地域要大得多。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撤退派占了上风，原因之一是大军团规模庞大，如何反击它变得难以想象。由于后勤原因，拿破仑需要早早开战，矛盾的是，减少征俄兵力能助他引诱俄军早日战斗，还可给他更多的战斗时间（因为补给需求较少）。亚历山大任命巴克莱为战争大臣兼西方第一军团司令，假如他选择了俄军军官会欢迎的人选巴格拉季翁，拿破仑或许就能在维尔纽斯，甚至在到达维尔纽斯前消灭俄军。亚历山大没有那样做，而是选中了更踏实、更具洞察力的巴克莱，并坚持后者的计划，即诱骗大军团深入俄国境内，使其补给线向前延伸，远离美因茨、但泽、柯尼希斯贝格等地的巨型兵站。



俄军离开维尔纽斯前带走了部分给养，还把剩下的烧光了。6月28日，拿破仑进入波兰民族省份立陶宛的首府维尔纽斯，将它变为巨大的补给中心。他告诉玛丽·路易丝，自己把司令部设在“一间挺不错的宅邸，几天前亚历山大皇帝也住在这儿，那时他万万没想到我这么快就进来了”。[5] 维尔纽斯大学校长扬·施尼亚德茨基（Jan Śniadecki）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离入城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拿破仑命令参谋班子里的波兰炮兵军官罗曼·索尔蒂克（Roman Soltyk）伯爵找他来谈话。施尼亚德茨基坚持出门前换上袜子，索尔蒂克便反驳道：“校长，没关系的。外在只能打动普通人，皇帝不在乎那个……咱们走吧。”[6]

“我们以胜者的姿态入城，”另一名波兰军官写道，“街上……人山人海，女士们装点了所有窗户，表露出最狂烈的热情。”[7] 列队进城时，拿破仑走在波兰部队中间，这体现其对公众意见的惯有敏感性。皇帝为立陶宛的波兰人设立临时政府。维尔纽斯的大教堂举行统一仪式，

于是立陶宛和波兰在礼仪上重新结为一体。在格罗德诺（Grodno）[8]，游行群众拿着圣像与蜡烛欢迎法军。队伍里还有唱诗班，他们赞美法军将自己从俄国统治下“解放”出来。[9]格鲁希将军在明斯克递送捐献盘，当地还演唱了《感恩赞》。然而，一听说法军像之前所有战局一样征集食物时，农民就把牲口赶进了林子。“法国人带走了我们的镣铐，”当年夏天，俄国西部的波兰农民说，“但他也拿走了我们的靴子。”[10]

“我爱你们的民族，”拿破仑对维尔纽斯的波兰民族代表说，“这十六年来，你们的士兵一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与我并肩作战。”他提出给波兰“我的尊重与保护”。然而，施瓦岑贝格正掩护拿破仑的南岸，所以他得补充道：“我已经向奥地利保证，我会让它保持领土完整。它和平占领着手中剩下的波兰省份，我不能批准任何倾向于干扰这种占领的行为。”[11]他只好施展微妙的平衡术。

拿破仑在维尔纽斯待了十天，让大量士兵休息重整，他还准许没经验、未受考验的热罗姆率大军右翼（包括达武的两个师、施瓦岑贝格的奥地利人、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人、雷尼耶的萨克森人，共计8万人）前进至别列津纳河下游，力图夹击巴格拉季翁的军队。前卫继续向前，6月29日，猛烈的冰雹和暴雨打断灼人热浪。雹暴和大雨停止后，帝国近卫军中士让-罗克·夸涅发现，“附近的骑兵营地中躺着冻死的战马”，他自己的也死了3匹。[12]雨后，地面亦成为泥沼，道路则变得泥泞，这导致补给出现问题，还拖慢了追赶俄军的前卫。有时，士兵要蹚过没到下巴的沼泽和湿地。[13]

6月26日、29日和30日，贝尔蒂埃先后从维尔纽斯致信热罗姆，鼓励他紧跟巴格拉季翁并拿下明斯克。[14]“要是热罗姆奋力向前，”拿破仑告诉费恩，“巴格拉季翁就有大危险了。”[15]热罗姆从西出发，达武从北出发，他们本该在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16]击溃巴格拉季翁。可是热罗姆不擅指挥，巴格拉季翁又娴熟地撤退，结果俄军第二军团逃

走了。7月13日，热罗姆显已失败。“要是军团各军更快、更协调，”军务总监迪马将军日后认为，“战局一开始目标就能实现，胜利就成定局。”[17] 得知行动失败后，拿破仑任命达武来指挥热罗姆的军队。幼弟于是大怒，战局才到第三周，他就气鼓鼓地回威斯特伐利亚了。[18]

“总是下雨，”7月1日，拿破仑从维尔纽斯致信玛丽·路易丝，“这个国家的暴风雨糟透了。”[19] 我们没有见过皇后的信，但那个月她隔天就给他写信。“上帝保佑我早日见到皇帝，”当时，她对父亲说，“因为这次分离是我不能承受之重。”[20] 拿破仑在每封信里提到自己的健康状态时，总是说自己身体不错，不仅如此，他还过问儿子，恳求听到罗马王“是否开始说话、是否走路”等消息。

7月1日，拿破仑接见沙皇的副官亚历山大·巴拉绍夫（Alexander Balashov）将军。巴拉绍夫说，拿破仑仍可撤出俄国，避免战争，此言已然有些太迟。皇帝给沙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提醒对方他曾在蒂尔西特发布反英言论，并指出自己在爱尔福特迁就了他对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多瑙河的需求。拿破仑说，从1810年开始，沙皇一直“大兴重整武装之事，拒绝协商途径”，并要求修改欧洲形势的当前安排。他回忆道，“有时你表露对我本人的敬意”，但他又说，4月8日，对方下达让自己撤离德意志的最后通牒，“显然”旨在“置我于战争和屈辱之间”。[21] 拿破仑写道，即便“这十八个月来，你什么也不肯解释，我却始终愿意聆听和谈提议……你会发现，我永远怀有相同的感情与真正的友谊”。他指责沙皇的糟糕顾问，批评库拉金对战争的傲慢态度，还写下往日致信教皇、奥皇等人时用过的短语：“那些人给陛下出这种馊点子，我对他们的恶意表示遗憾。”拿破仑接着辩称，如果1809年他不用与奥地利战斗，“1811年西班牙战事就能结束，那时我也很可能与英国媾和了”。他在总结时开出如下条件：

> 将停战协议建立在最慷慨的基础上，如不把医院病号看作战俘（这样两军都不用仓促撤退，可防止严重损失）、每过两周双方就按

照军衔对等的交换制度各自放归俘虏，以及适用文明民族战争传统允许的所有其他规定。陛下会发现我准备好了一切。[22]

拿破仑的结尾再次声明，尽管两人之间爆发战争，“我对您的私人感情完全不受这些事影响……（我仍然）对您那伟大贤良的品质满怀感情与敬意，渴望向您证明这一点。”[23]

亚历山大根本没采纳拿破仑的提议。俄军在大军团面前稳步撤退，四周后才出现双方皆折损1000多人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俄军不曾抵抗。俄军意识到，在这场战争中，后勤与会战一样重要，于是他们有组织地销毁所有带不走的东西。长达好几英里的道路两侧，凡是将要到来的法军可能派得上任何用场的东西，不是被带走了就是被烧掉了，如庄稼、风车磨坊、桥梁、牲畜、兵站、饲料、避难所、谷物。拿破仑自己撤离阿克时干了同样的事，他也佩服威灵顿撤往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时娴熟地实施类似的焦土策略，因为正如沙普塔尔记载的，“他评价将才时就以这些品质为尺度”。[24]

北意大利和奥地利林木繁茂、土壤肥沃，波兰东部和白俄罗斯却是另一片天地。这里穷困潦倒、人口稀疏，哪怕在和平时期，营养不良也是普遍的现象。陡然要求当地落后的农业经济额外养活几十万张嘴总是会引发严重的补给困难。然而，俄军撤退时彻底焚毁村庄，导致法军很快陷入了绝境。更糟糕的是，俄军轻骑兵中队在法军战线背后行动，威胁其延长的交通线，比如说，亚历山大·切尔内绍夫就曾领导一次著名英勇之举。[25]

湿漉漉的6月下旬一结束，炽热的太阳就回来了。淡水不足，新兵累晕了。热浪扬起令人窒息的灰尘，这些尘土太厚了，所以鼓手得待在营的前头，以防跟在后面的行军队伍中有人掉队。由于货运马车经过浮舟桥时陷入交通瓶颈，7月5日大军团便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伙食困难依然存在，”洛鲍伯爵的副官博尼法斯·德·卡斯特拉内（Boniface de

Castellane）指出，“士兵没有吃的，马匹也没有燕麦。”[26] 莫尔捷告诉拿破仑，不少青年近卫军士兵其实已饿死。皇帝说：“不可能！他们的二十天补给呢？统领得当的士兵绝不会饿死！”[27] 饿死者的指挥官来了，他说士兵们“要么是因为懦弱要么是因为不确定”，他们实际上死于醉酒。对此，拿破仑便总结道：“一场大胜就能弥补一切！”[28]

大军团在俄国待了175天，平均每天有1000匹马死亡。塞居尔回忆，1万多匹马只能吃没熟的黑麦，结果死于脱水和中暑，马尸“臭得没法闻”。[29] 拿破仑的御厩总管科兰古累垮了，他记载道：

> 高速的强行军、不足的马具和备件、匮乏的补给以及不到位的照料都导致马匹死亡。士兵缺少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东西，不怎么乐意照顾自己的马。这些人看着马匹死去，毫无悔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解除了身负任务，此后自己的补给也不再缺乏。关于我们的早期灾难和最终败局，你已经知道了其秘密与原因。[30]

早在7月8日，拿破仑就不得不致信巴黎的克拉克，称没必要扩招骑兵，原因是“在这个国家中，我们正损失大量马匹，以至于算上法国和德意志的全部资源，我们也很难保住目前部队里有马者的人数”。[31]

当日，拿破仑得知俄军主力部队西方第一军团屯于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强大要塞德里萨。他满怀希望，派前卫去那儿。17日，法军前卫到达目的地，但他们发现俄军已放弃要塞。7月16日，拿破仑获知达武已占领明斯克，可是巴格拉季翁又设法逃走了。离开维尔纽斯前夕，皇帝和约米尼将军一同用餐，两人说莫斯科离这儿很近（其实它在500英里之外），后者便问前者是否打算向那儿进军，前者大笑道：

> 我觉得，两年之内再去要好得多……要是巴克莱先生认为，我会一路追他追到伏尔加河（the Volga），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最远跟到斯摩棱斯克与西德维纳河，在那儿，我们会打一场大胜仗，然后就能扎营了。我和司令部将返回维尔纽斯过冬。我会让法兰西喜剧院派歌剧班子和演员来。接下来，要是双方未能在冬季媾和，明年5月我们会完成这项工作。我想那比跑去莫斯科更好。你怎么看，战术家先

生？[32]

约米尼同意这一看法。

此时，拿破仑正面临灾难性的新威胁，而那个年代的军队对此皆无防备。斑疹伤寒系污垢之疾，其病原体普式立克次体（Rickettsia prowazekii）介于诱发梅毒、肺炎的较大细菌和微小的天花、麻疹病毒之间。携带普式立克次体的虱子进入肮脏的衣缝内，寄身在未清洗过的身体上。斑疹伤寒病原体的传播渠道不是虱子叮咬，而是排泄物和尸体。[33] 多年来，这种疾病一直在波兰和俄国西部蔓延。

下列因素都是传播斑疹伤寒的理想条件：高温；缺乏洗澡水；大股军队挤在一起过夜，住在破烂的小屋里；身上某些部位瘙痒时，人会忍不住去挠；士兵不换衣服。光是战局第一周，每天就有6000人感染斑疹伤寒。7月第三周，已有8万多人死亡或患病，其中至少有5万人死于或患上斑疹伤寒。入侵开始后第一个月，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已然折损五分之一的兵力。[34] 大军团首席军医拉雷是良医，然而当时人士尚未把斑疹伤寒和虱子联系起来，虽然他们觉得虱子是讨厌的寄生虫，却没想过它是杀手，因此拉雷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疫情。但泽、柯尼希斯贝格、托伦的医院能够治疗痢疾病人和伤寒病人，但斑疹伤寒是另一种疾病。拿破仑支持疫苗特别是天花疫苗，罗马王两个月大时，他就给儿子注射疫苗，但那时并无斑疹伤寒疫苗。近来，有研究者在维尔纽斯大墓出土的2000具尸骨的牙齿上提取DNA。研究表明，这些人都携带病原体斑疹伤寒病菌（typhus exanthematicus），即所谓的“战争瘟疫”（war plague）。讽刺的是，拿破仑坚称住院士兵应当洗澡，但他不知道健康士兵同样需要洗浴。[35] 法军从莫斯科撤退时，天气一度特别冷，以至于皇帝连续几天没脱一件衣服，结果就连他身上也长了虱子。[36] 用沸水清洗内衣、用热熨斗烫熨外衣可消灭虱子，但从11月4日开始，气温却一直在零度以下，所以这两个办法都不可行。[37]

随着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逐渐展开，法国本土的斑疹伤寒（它和伤寒、痢疾等“贫穷之疾”大大不同）问题也愈发严重，主干道上的村庄普遍暴发这种瘟疫。1806年后，斑疹伤寒一直在塞纳和马恩省（Seine-et-Marne）肆虐，几乎从未间断，巴黎东部的公社亦然，而莱茵河上的部队回国后就待在那里。1810～1812年，斑疹伤寒致死率居高不下。卫生官员梅伦（Melun）和内穆尔（Nemours）奉命解释此事，两人一致认定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战争”。[38] 1814～1815年，联军侵入法国，斑疹伤寒随之卷土重来。当时最杰出的医师认为，若同时具备“非常艰苦的状况、寒冷、生活必需品匮乏以及由其引发的食用腐烂食物”这些条件，斑疹伤寒便可暴发。[39] 1812年，J.R.L.德·凯尔克霍弗（J.R.L.de Kerckhove）曾任某法军医院院长，甚至在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他也还没认清斑疹伤寒的病因。凯尔克霍弗写道：“斑疹伤寒夺走大量法军士兵的生命，它源于匮乏、疲惫、呼入挤满病人与疲乏者之地的污浊空气，然后通过接触传染。”[40] 直到1911年，人们才发现斑疹伤寒和虱子的联系。然而，凯尔克霍弗描述的症状完全正确：

> 感染症状如下：全身不适，通常伴随倦怠无力；脉搏虚弱、缓慢，或不规律；面相改变；运动有困难……疲惫至极，难以站立，食欲不振；频繁发生眩晕、耳鸣、恶心与头痛；病人有时呕吐；病人的舌头上有时粘着白色或黄色黏液。

大约四天之后，病人会发烧。“开始时”，发烧的“明显症状是发抖，随后病人不定时感到热……发烧继续恶化，转为持续性症状，皮肤干燥……大脑充血，有时肺部充血”。[41] 大部分情况下，死神随后来临。1812年，拿破仑麾下多达14万名士兵病死，大部分人死于斑疹伤寒，但亦有不少人死于痢疾或相关的疾病。

拿破仑不会让疾病阻挠整个入侵行动，他加紧向东，希望分离俄军西方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皇帝参谋部的军械官加斯帕尔·古尔戈上尉估计，在这次战局中，拿破仑本人“非常健康”，他每天在马上度过数小时，并无身患重病的说法。[42] 新兵缺乏经验，而大军团高速行军，因

此很多人跟不上队伍。“掉队者犯了严重的错误，”卡斯特拉内写道，“他们掠夺洗劫，移动纵队便组织起来了。”[43] 7月10日，拿破仑命令贝尔蒂埃派一个宪兵纵队去沃罗夫诺逮捕“第33团的抢劫者，在那儿，他们正实施着可怕的毁灭行径”。[44] 到7月中旬时，士兵也开始成队逃跑。

7月18日，拿破仑抵达格卢博科耶（Gloubokoïé）。皇帝在当地加尔默罗会修女院住了四天，他出席弥撒，建立一座医院，检阅近卫军，并听人汇报大军因连续行军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数百人自己了断了，”符腾堡近卫军中尉、梅克伦堡人卡尔·冯·祖科（Karl von Suckow）回忆道，“他们害怕忍不下来这种艰难的生活。道路旁的树丛每天都传来零星枪响。”[45] 几乎已经取不到药物，除非拿钱买。拜恩人冯·舍勒（Scheler）将军向其国王报称，甚至早在横渡维斯瓦河时，“所有常规食物补给和有序分发就断了，从那里一直到莫斯科，没有一磅肉、一磅面包、一瓶白兰地来自合法分配或常规征收”。[46] 此言语带夸张，但情有可原。

有证据表明，在食物补给和军中健康士兵人数这两方面，拿破仑都被误导了。他闻知某些部队有十日伙食，可他们其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迪马将军回忆道，达武的襟兄、两个近卫掷弹兵团的指挥官路易·弗里昂将军“想让我出具一份关于第33战列步兵团的报告，表明它有3200人，可我知道实际上它至多还剩2500人。弗里昂奉缪拉的命令行事，他说拿破仑会冲自己的上司发火。弗里昂情愿引入一个错误，普舍隆（Pouchelon）上校便制作了他需要的虚假报告”。[47] 于是，单单这一桩造假行径就牵涉3名高级军官（可能还涉及缪拉），或者说，它至少需要他们听之任之。不知为何，军队文化已然改变，拿破仑曾如此亲近士兵，现在他却经常被高级指挥官蒙蔽。他依然亲自巡查，但大军团规模庞大，其进军跨度又宽广，所以同此前任何战局相比，他对指挥官的依赖大大增加。皇帝的警卫中亦有一人在回忆录中记载，12月，拿破仑

在撤退途中问贝西埃近卫军情况如何。“非常舒服，陛下，”贝西埃回答道，“几处火堆上转着烤肉叉，他们也有鸡肉和羊腿。”卫兵称：“要是元帅动动两只眼睛，他就会发现这些可怜的家伙几乎没任何吃的。大部分人患了重感冒，所有人都累坏了，而且近卫军人数也已大大减少。”[48]

7月19日，缪拉的副官马里-约瑟夫·罗塞蒂（Marie-Joseph Rossetti）少校告诉拿破仑，俄军已放弃德里萨，这令“他抑制不住喜悦之情”。[49] 他从格卢博科耶致信马雷：“敌人已然撤离德里萨的设防营地，还烧毁了当地所有的桥梁和巨量库存。之前好几个月，俄军的工作中心就是这些建筑和补给，现在它们都被牺牲了。”[50] [51] 罗塞蒂的日记记载道，皇帝“迈开大步”，快步“走上走下”，对贝尔蒂埃说：“你看，俄军既不懂打仗也不懂媾和。他们是衰弱的民族，一枪没放就丢了自己的屏障！来吧，只要我们再来一次真正的行动，我的兄弟（即沙皇）就要后悔听取我的敌人之言了。”[52] 拿破仑向罗塞蒂详细询问骑兵士气与马匹状况，后者给予了肯定回答，然后当场晋升上校。可事实上，缪拉太折腾骑兵了，他让马匹连续工作，导致它们的体质衰退。“缪拉总是待在散兵线前沿，”科兰古抱怨道，“成功毁了骑兵，最终他害了军队，把法兰西与皇帝推向深渊的边缘。”[53]

7月23日，巴克莱到达维尔纽斯以东200英里处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如果巴格拉季翁前来会师，他就准备迎敌。然而，当日出现了战局第一场主要战事——萨尔塔诺夫卡（Saltanovka）之战[54]。对战双方为达武和巴格拉季翁，前者麾下有4100人死亡、受伤和失踪，但他设法阻止了后者北上。巴格拉季翁被迫改道去斯摩棱斯克。两天后，在维捷布斯克以西的奥斯特罗夫诺（Ostrovno），缪拉的前卫与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率领的巴克莱军团后卫小战。拿破仑盼望打一场大会战。他照常在（第10期）公报中大肆夸张战果，称缪拉的对手是“1.5万名骑兵与6万名步兵”（事实上俄军士兵共有1.4万人），还说敌人有7000人

（实为2500人）死亡、受伤和失踪。公报称法军损失为200人死亡、900人负伤、50人被俘，然而当代最佳估计结果为3000人死伤、300人被俘。[55]

拿破仑怀抱厚望，他盼着俄军战斗，而非献出维捷布斯克城。26日，他致信欧仁："要是敌军想开打，我们就走大运了。"[56] 同日，他思索战略时似乎首次用心思考了约米尼询问的进军莫斯科的可行性。7月22日，拿破仑对雷尼耶将军说，"威胁如此逼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时"，敌人不敢进攻华沙。四天后，他致信马雷："我倾向于认为，正规师想夺取莫斯科。"[57] 照他原先的计划，要是敌军不战斗，他就在维捷布斯克或斯摩棱斯克停下，但这套方案显然正变得更庞大、更野心勃勃。他任由自己被拽入巴克莱·德·托利的陷阱。

7月28日黎明，缪拉派人传话，称俄军已离开维捷布斯克，而他正追踪他们。俄军带走了一切，没留下任何线索指示自己去了哪个方向。塞居尔指出，"他们的失败看上去比我们的胜利更有序！"[58] 拿破仑同缪拉、欧仁、贝尔蒂埃开会，他必须面对某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如此渴望的决胜会战"刚从我们手中溜走了，就像在维尔纽斯一样"。[59] 胜利近得诱人，它总是就在下一座山上，抑或下一片湖泊、平原、森林的另一边——这当然是俄军的算盘。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待了十六天，其间他非常认真地考虑在此结束战役，等1813年再恢复战事。他正位于旧俄罗斯的边境，此地的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the Dnyapro）构成天然防线。他可以建立军火库和医院，在政治上重组立陶宛人，他们已经为他招募了五个步兵团、四个骑兵团。他也能增加中央军团兵力，该军团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或染上斑疹伤寒、痢疾。如有必要，他还可以从维捷布斯克威胁圣彼得堡。[60] 缪拉的参谋长奥古斯特·贝利亚尔（Auguste Belliard）将军对拿破仑坦言，骑兵筋疲力尽，"急需休息"，因为下令冲锋时，他们已无法奔驰。此外，马掌钉、铁匠乃至适合做钉子的金属都不够了。据塞居尔回忆，拿破仑在28日进入维捷布斯克时说："我就停

在这儿！我必须看看我的四周，集结并重整我的军队，我还要重新组织波兰人。1812年战局结束了，剩下的交给1813年战局。”[61]

拿破仑在维捷布斯克的防线自然不错：左翼固守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Riga）；大军接着穿过迪纳堡（Dünaborg）、波洛茨克（Polotsk）、设防城市维捷布斯克，其中央位于维捷布斯克地区林木覆盖的高地；军队随后沿别列津纳河下行，穿过无法通行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其右翼位于里加东南边400英里处的要塞城镇博布鲁伊斯克。库尔兰、萨莫吉希亚（Samogitia）、克卢博科奥平原（Klubokoë plains）可分别为麦克唐纳军、乌迪诺军和拿破仑自己提供食物和补给，施瓦岑贝格也能停在肥沃的南部省份。维尔纽斯、考纳斯、但泽和明斯克有巨大的补给站，能够支持军队过冬。拿破仑下令在维捷布斯克造29座大烤炉，它们一共可烘烤29000磅面包，他还叫人拆毁房屋，以便改善其住所冬宫广场（Palace Square）的外观。显而易见，他的确考虑过停下。然而冬营之事在当时难以想象，因为正如他致信玛丽·路易丝时所言：“气温达27度，热得我们受不了。这儿和法国南部一样热。”[62] 塞居尔谴责缪拉劝拿破仑继续向前，尽管皇帝据称说了这么一句话：“1813年我们会到莫斯科，1814年我们会到圣彼得堡。俄国战争将持续三年。”[63]

出于多个非常合理的军事原因，拿破仑选择继续追赶巴克莱。他在一个月内前进了190英里，且其战场折损不到1万人；假如7月时他决定停止当年战事，这对战局历表来说就早得太荒唐了；目前为止，他的冒险成果一直很好，1812年时，假如他那么早就在维捷布斯克停下，他就会让出主动权；7月24日，沙皇在莫斯科召集8万名民兵与40万名农奴，合理之举便是趁他们受训并列阵之前进攻；此前他只在马伦戈和阿斯佩恩-埃斯灵被迫打防御战，而那两场会战中他开局不顺。缪拉也指出，不断撤退一定会摧毁俄军士气。拿破仑要继续蹂躏多少俄国国土，沙皇才会求和呢？他不会知道，亚历山大曾在圣彼得堡宣布永不求和：“我

宁愿胡子及腰，去西伯利亚啃土豆。”[64]

法军得知巴克莱军团仅在85英里外的斯摩棱斯克，8月1日，它同巴格拉季翁军团会师了。拿破仑认为，俄军不会一场大战不打就让出旧俄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到头来，他还是决定不在维捷布斯克停留，而是先去斯摩棱斯克对战俄军，并保留了战后返回那儿的选项。拿破仑决策前，迪罗克、科兰古、达吕、纳尔博纳劝他留在维捷布斯克，波尼亚托夫斯基、贝尔蒂埃和勒菲弗-德努埃特也持类似意见，而缪拉主张前进。[65]据塞居尔回忆，皇帝不时问别人半截句子，如“好吧！我们该怎么办？待在原地，还是前进？”，但是“他不等回答，反倒继续转来转去，好像正寻找某人某事来了结自己的踌躇”。[66]我们可从一些句子中窥见拿破仑的想法，如8月7日他致玛丽·路易丝的信：“我们这儿离莫斯科只有100里格。”[67]（事实上，维捷布斯克距莫斯科有124里格，即322英里。）

继续进军斯摩棱斯克的决策不是说着玩的。据塞居尔记载，11日前后，拿破仑对达吕和贝尔蒂埃说：

> 他们认为他疯了吗？他们觉得他打仗是因为想打？他说西班牙和俄国战争侵蚀法国根基，它无法同时承受这两个溃疡，难道他们没听见吗？他急切渴盼和平，但媾和得靠两个人出力，他只是一个人。[68]

拿破仑还指出，冬季时俄军可在冰冻河面上行军，而在斯摩棱斯克，他要么能占领大要塞，要么能赢得决胜会战。他说：“流血尚未开始，俄国非常强大，不会不战而退。大战后亚历山大才会和谈。”[69]谈话持续整整八小时，其间贝尔蒂埃突然失声痛哭，他哭着对拿破仑说，大陆体系和重建波兰不是过分拉长法军交通线的充足理由。皇帝决定向前，他和迪罗克的友谊几乎因此破裂。

不管怎么说，拿破仑坚信“勇敢是唯一谨慎之道”。[70]他的考虑如下：假如自己停步，奥地利和普鲁士也许会重新思考结盟一事；只有在

迅速取胜后返程才能缩短交通线；“长期留在原地防御不符合法军天性”。他也害怕英国对俄国的军事援助将生效。据费恩记载，拿破仑总结道：“也许二十天就够我们实现目标了，为何还要在这儿停八个月呢？……我们得赶快进攻，否则一切都有危险……战争的一半是机遇。如果总是等待有利的条件组合，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总而言之，我的战役计划是一场会战，我的政治都是胜利。”[71] [72]

8月11日，拿破仑下令继续进军斯摩棱斯克。13日凌晨2点，他本人离开维捷布斯克。卡斯特拉内受托陪伴他，此人指出：

> 这些天，陛下骑行的速度大大放慢。他胖了好多，骑马时比以往更加吃力。上马时，御厩总管（科兰古）得扶他一把。皇帝出行时大都乘车。跟着他的军官非常累，因为当陛下得骑马时，他已然休息好了……陛下的旅途中，别指望二十四小时之内能休息一会儿。（将军让-巴蒂斯特·）埃布莱对皇帝说马匹不足，陛下回答：“我们能在莫斯科找到一些不错的马车挽马。”[73]

在拿破仑全速前进时，人们得往他的马车车轮上浇水，以防轮子过热。

8月中旬时，拿破仑两翼的情况看来都挺好：麦克唐纳成功地保护了他的北面；12日，施瓦岑贝格在戈罗杰奇纳（Gorodeczna）痛击托尔马索夫的西方第三军团（拿破仑遂要求弗朗茨升他为陆军元帅）；四天后，乌迪诺和圣西尔在波洛茨克拦下彼得·维特根施泰因（Peter Wittgenstein）将军的芬兰军团。因此，拿破仑能够实施“斯摩棱斯克机动”，这是一次大行动，其意图如下：钉住第聂伯河北岸的俄军，与此同时，凭借埃布莱麾下工兵出色的造桥工作，大军团大部分兵力马上前往南岸。可是14日那天，俄军涅韦罗夫斯基（Neverovski）将军的第27师在克拉斯内（Krasnoi）打了一场后卫战，该师英勇对敌、奋不顾身，导致法军未能迅速赶到斯摩棱斯克。因为第27师且战且退，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遂有时间去斯摩棱斯克设防。

16日早上6点，缪拉的骑兵接近斯摩棱斯克，冲入俄军前哨。下午1点，拿破仑和贝尔蒂埃巡视阵地，他们的位置距城墙不到200码（有说法称还要更近），这时前者对后者说："我总算抓到他们了！"[74] 8月17日，斯摩棱斯克之战爆发，拿破仑希望击退俄军左翼，切断敌人去莫斯科的路，迫使他们返回西德维纳河下游。然而，斯摩棱斯克城防牢固，有结实的城墙与深邃的沟谷掩护，巴克莱损失6000人后便找到机会继续往东撤，而奈伊军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军折损了8500多人。洛鲍炮轰斯摩棱斯克，点燃该城，拿破仑与其部下在司令部观看城中大火。塞居尔称，"皇帝静静地凝视这幕盛大奇观"，但是据科兰古回忆，拿破仑当时说："那难道不美妙吗？我的御厩总管？""太可怕了，陛下！""呸！"皇帝回答道，"先生们，记住罗马皇帝的话：'敌人的尸体闻着香！'"[75][76]

8月18日，法军进入硝烟弥漫的城市。他们踩着瓦砾与尸首，发现俄军已弃城而走。拿破仑听闻俄国人在圣彼得堡演唱《感恩赞》，纪念他们所谓的胜利，于是他讽刺地说："他们不但骗人，还骗上帝。"[77] 他检阅了战场。塞居尔称："皇帝面部紧缩，焦躁恼火，也许可以据此判断他的痛苦。"拿破仑极少召开军事会议，但在第聂伯河附近的城寨门边，他破例了。与会者有缪拉、贝尔蒂埃、奈伊、达武、科兰古（可能还有莫尔捷、迪罗克和洛鲍），他们坐在找来的垫子上。"无赖们！"皇帝说，"幻想放弃这样的阵地！来吧，我们必须进军莫斯科。"[78] 因为这句话，大家"激烈地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缪拉的副官罗塞蒂听见，所有人都赞成停在斯摩棱斯克，唯达武表示反对，"但达武一向顽固，他坚称我们只能在莫斯科缔结和约"。[79] 此言亦被当作缪拉的观点，而且它当然是拿破仑后来不断重复的台词。多年后他承认道："我应该让军队在斯摩棱斯克入住冬营。"

拿破仑打算紧紧追赶俄军，就在第二天，他的愿望破灭了。当日，瓦卢季诺山（Valutina-Gora）之战[80] 爆发，俄军重创奈伊，再度成功

逃走。此战中，一发加农炮炮弹掠过地面，炸断能干的师级将军居丹（Gudin）将军的双腿，致他死亡。战后医疗物资急缺，为了给伤员包扎，军医们先是撕下自己的衬衫，然后用干草，接着又用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文件。然而，战局这一阶段的伤员是幸运儿，数据表明，和继续向东的健康士兵相比，他们的生还率高得多。

奈伊想在瓦卢季诺山钳住俄军，但朱诺未能及时推进军队，导致计划失败。可想而知，拿破仑发火了。“朱诺别想要元帅权杖了”，他说，然后把威斯特伐利亚士兵的指挥权交给拉普，“此事也许会阻止我去莫斯科。”拉普说军队还不知莫斯科现在是最终目的地，拿破仑回答：“玻璃杯满了，我得干掉这杯。”[81] 阿克战役之后，朱诺没打过一次胜仗。《辛特拉条约》签订后，法军丢了葡萄牙，朱诺本该被贬职，但拿破仑看在友情的份上留下了他。[82]

瓦卢季诺山之战后次日，拿破仑授予居丹的第7轻步兵团和第12、第21、第127战列步兵团至少87项奖励与晋升，他“非常清楚，在这种毁灭性灾难中，士兵尤其会想到不朽”。[83] 居丹师身处“战友与俄军士兵的尸首之间，四周是残破林木的树桩。他们脚下的大地被战士踩过、被炮弹划过，布满武器碎片、破烂制服、翻倒的马车、零落的肢体”。[84] 由于疾病、饥饿、逃跑与战死，此时拿破仑的中央军团已减至12.4万名步兵和3.2万名骑兵，另有4万人留下来，保护补给路线。[85]

巴克莱再度成功逃走，撤往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毕竟俄军将士相当不喜欢撤退策略），8月20日，沙皇任命陆军元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亲王接替他任总司令。库图佐夫现年67岁，曾在奥斯特利茨战败。拿破仑闻之欣喜，认为“召他来指挥军队的条件是要他战斗”。[86] 事实上，上任后头两周，库图佐夫继续退向莫斯科，并仔细搜寻立足点。他选中了莫斯科以西65英里处的博罗季诺村（Borodino），该地正好位于莫斯科河（the Moskva）西南岸。虽

说拿破仑难以补给军队，但8月24日他还是决定追赶库图佐夫。

次日下午1点，拿破仑离开斯摩棱斯克，5点时他到达多罗戈布日。圣城莫斯科是俄罗斯帝国的庄严旧都，他的确认为，库图佐夫不会一场大战没打就交出莫斯科，而大战后沙皇就得求和，于是他对部下说："胜利就在眼前。"[87] 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强迫俄军开战，他已经转而考虑打算施加的投降条款。皇帝告诉德克雷，不管缔结什么和约，他都会设法弄来多罗戈布日地区的木材，以之为船只桅杆原料。[88] 缪拉的副官夏尔·德·弗拉奥从维亚济马（Vyazma）致信母亲，说自己确信"一场胜仗就能结束战争"。前线将士给母亲写信时不受誓言制约，而法军高级指挥官普遍像弗拉奥一样，认为"沙皇自然会求和了"。[89]

一个月没下雨了，约瑟夫·德赛（Joseph Dessaix）将军的副官吉罗·德·兰（Girod de l'Ain）上尉便写道："太热了，我在西班牙从没遇上过比这还热的天。高温和灰尘让我们渴得嗓子冒烟，水又很少……我看见有人趴在排水沟边喝马尿！"[90] 他也发现，士兵第一次违抗拿破仑的命令。皇帝认为某辆私人马车是多余的奢侈品，下令烧掉它，可是他"几乎才走出100码远，人们就匆匆扑灭火焰。马车复归纵队，像之前一样平稳疾驶"。

8月26日，拿破仑致信缪拉。此信称，他听闻"敌军决定在维亚济马等我们。几天后我们会到维亚济马，然后我们就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中间了，我想那儿距莫斯科有40里格。要是我们在维亚济马战胜敌军，那座伟大的首都又没有守护，9月5日我就会到莫斯科"。[91] 然而，俄军也不在维亚济马。29日，大军团进入维亚济马，发现1.5万名城中居民已然离开。当地某教士得知拿破仑接近后吓死了，他听说后便按全套军礼的规格安葬此人。俄国东正教圣议会曾正式宣布拿破仑其实是《启示录》中的敌基督，教士可能因此承受不住。[92]

7月22日，萨拉曼卡会战爆发，威灵顿击败马尔蒙。9月2日，拿破

仑收到马尔蒙的相关汇报。“读不到比这更差的报告了，”拿破仑致信克拉克，“文中的噪音和咔嗒咔嗒比时钟里的还多，而且没有一个词解释真实的事态。”然而，报告字里行间的信息足以让他明白，马尔蒙不等约瑟夫来援就离开了防守牢固的萨拉曼卡，与威灵顿开战。“时机恰当时，你必须让马尔蒙元帅知道，他那不可理喻的行为令我非常生气。”皇帝告诉战争部长。[93] 不过，因为法军集结，10月时威灵顿被迫离开马德里，撤回葡萄牙，拿破仑可感宽慰。11月2日，约瑟夫返回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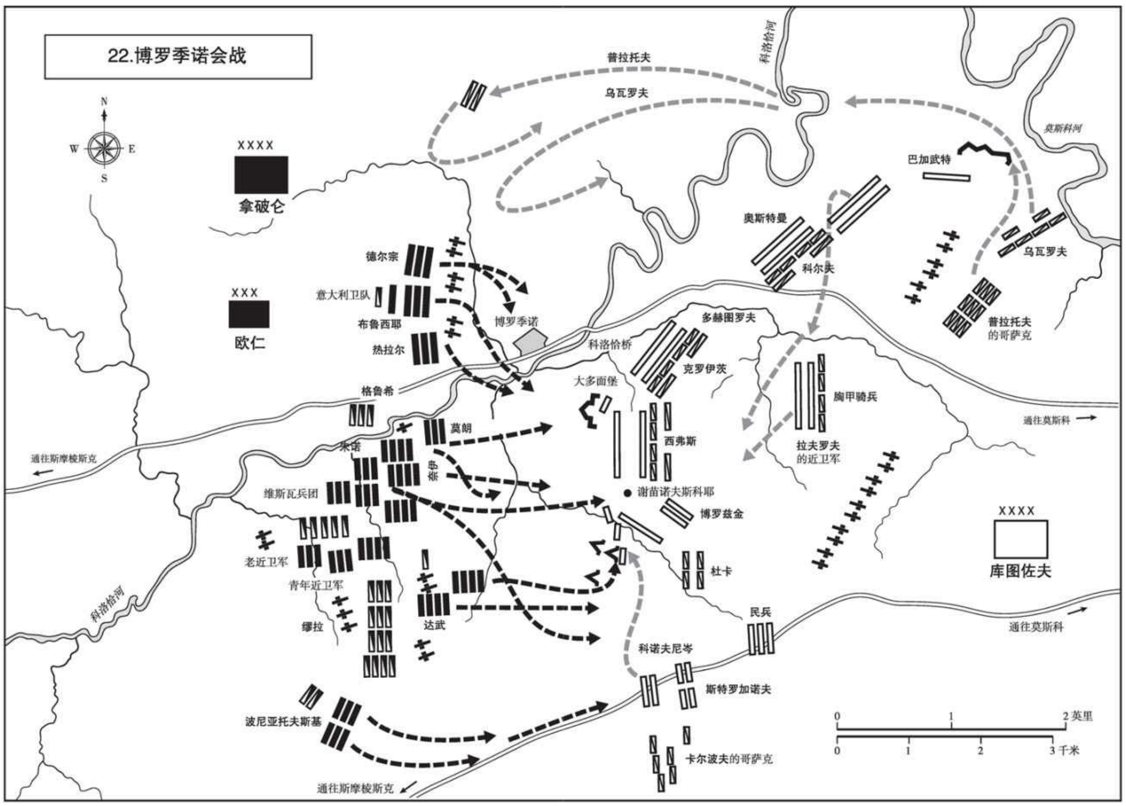
食物短缺导致的危险不仅仅是饥饿。如果法军士兵觅食时离主力部队太远，他们有时便会落入俄军非正规军之手。这些非正规军由正规军军官指挥，在远离主干道的地方行动。塞居尔的哥哥奥克塔夫（Octave Ségur）就中招了。9月3日，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假如我们开战，战损也不及”奈伊正损失的人手，原因是法军派小队外出寻粮。他还说：“敌人每天都抓走好几百个俘虏。”[94] 皇帝只要看到失职和疏忽现象就会发怒，特别是涉及照顾伤病员时。当日，他致信拉屈埃：

> 二十年来，我一直指挥法军，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没用的军事管理……派来这儿的人既无能又无知。没经验的军医比敌军炮群更伤害军队。军需总监身边的四个组织官员一点阅历也没有。卫生委员会派来这种废物医生，极其该骂……医护连的组织就像其他作战管理一样彻底失败。我们一给大炮和军服，他们就不想在医院效力了。[95]

拿破仑忽视的简单事实也是最明显的事实：俄国疆域辽阔，一次战役只能侵入至维亚济马，无法继续向前大幅度推进。他的军事管理体系不能应付他施加的巨大压力。他日复一日地急切盼望决胜会战，在巴克莱的陷阱里越陷越深。

9月5日，拿破仑夺取博罗季诺战场西南端的舍瓦尔季诺（Shevardino）多面堡，该地离俄军主要阵地太远，故而防守不充分。俄军约有6000人死亡、负伤或失踪，法军中这一数字则为4000。自从十

周前横渡涅曼河，拿破仑一直渴望这种战斗，于是他为此勉励军队。这十周来，11万人染上斑疹伤寒，尽管有些人没病死，另有很多人被击毙或掉队。[96] 若大会战爆发，拿破仑麾下可参战军力尚余10.3万人与587门大炮，相对而言，库图佐夫则有12.08万人与640门大炮。之前三天，俄军建造了难以攻克的多面堡与箭头型土木防御工事箭头堡，挖深战壕，并清理战场上的火炮射界。后来，不少多面堡和箭头堡按照其1812年的规格复建，今人仍可观看它们。



会战开始的前一天，博塞男爵到达司令部，其所乘马车车顶捆着弗朗索瓦·热拉尔画的罗马王肖像。费恩写道，拿破仑收下画像，“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遂把肖像放在帐篷外的椅子上，让部队瞻望未来的皇帝。[97] “先生们，”拿破仑对前来做简报的军官们说，“相信我，要是我儿子15岁了，站在这儿的就不是画，而是他了。”[98] 次日，皇帝说：“把画拿走，好好保管。他太小了，还不能看打仗。”（事实上罗马王只有十八个月大。撤退途中画像丢了，但热拉尔留了副本。）

博塞发现，拿破仑“状态挺好……如此快速复杂的入侵未令他感到丝毫不适”。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日皇帝患病，他们的诊断结果各不相同，如膀胱炎、热病、流感、脉搏不稳、呼吸困难、重感冒、膀胱炎症，这同博塞的说法相反。[99] 会战前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此信说他“特别疲惫”，但战后次日，他又宣称自己“非常”健康（他常常在信里这样说）。会战前，他断断续续地睡了一晚上。会战日，他在凌晨3点起床，直到晚上9点后才睡觉。索尔蒂克伯爵证明，拿破仑指挥会战时正患重感冒，但塞居尔写道，皇帝苦于“滚烫高烧，何况那痛苦恶疾凶猛地复发了，折磨着他。只要他动作狂暴、情绪高涨，此疾就会发作”。（复发的疾病可能指痔疮，五年多以前，水蛭治好了他的痔疮。[100] ）会战大部分时间，拿破仑一直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坐着。勒热纳后来回忆道：“我执行了很多任务，每当我完成使命后返回那儿，我都看见他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用袖珍望远镜追踪所有动向，并镇定自若地下达命令。”[101]

会战前日，拿破仑、贝尔蒂埃、欧仁及一些参谋官侦察战场边缘。俄军发射葡萄弹，哥萨克骑兵也威胁到皇帝一行，他们只好离开了。[102] 拿破仑能看见俄军阵地有多牢固，他派一系列军官观察防务，可他们没发现战场中央的大多面堡。莫斯科民兵建成内含18门（这一数字很快增至24门）大炮的大多面堡。军官们也没发现战场中部的大多面堡和两座箭头堡位于完全相隔的两块高地上，而且视线外还藏着第三处箭头堡。

博罗季诺会战前夜，拿破仑发布宣言：

> 士兵们，这就是你们盼望已久的战斗！从现在开始，胜利就靠你们了。我们必须赢。打了胜仗后，你们就有充裕的物资，可住进舒适的冬营，还能马上返回家乡！拿出你们在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维捷布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样子来，最末代的后人也会自豪地引述这一天你们的表现。让他们这样说你们：“他参加过莫斯科城墙下那场伟大的会战。”[103]

1812年9月7日（周一），博罗季诺会战爆发。当时，它是史上最血腥的单日会战，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第一次马恩河会战打响。[104] “皇帝几乎没睡。”拉普回忆道。他不断叫醒拿破仑，并送上前卫的报告，表明当晚俄军没有再逃。凌晨3点，拿破仑起床，他喝了些潘趣酒，对拉普说：“幸运是自由的情妇。我经常这么说，现在我开始体会到了。”[105] 他补充道，大军清楚只能在莫斯科找到补给。“这支可怜的军队已少了很多人，”拿破仑说，“但留下的是精兵，此外我的近卫军未受影响。”[106] 后来他撩开帐篷帘子往外走，路过帐外的两名卫兵，说：“有点冷，但太阳不错，这是奥斯特利茨的太阳。”[107]

早上6点，100门法军大炮组成炮群，炮轰俄军中部。6点30分，达武开始进攻。他派出三个精锐步兵师，共计2.2万人。这三个师由将领路易·弗里昂、让·孔庞（Jean Compans）、约瑟夫·德赛指挥，组成旅纵队，另有70门大炮密切支援他们。奈伊的三个师跟随其后，他的兵力共有1万人。7500名威斯特伐利亚士兵留作预备。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上午，战况的确惨烈。达武胯下坐骑被击毙，他自己也负伤。俄军士兵照常不愿让出战场。最后，法军得派4万名步兵与1.1万名骑兵去力克箭头堡。法军靠密集方阵刺刀战拿下两处箭头堡，然后他们才发现第三处箭头堡，那时它开始朝前两处箭头堡后无掩护的地区倾泻炮火。拿下第三处也得付出巨大代价。箭头堡七度易手，这正是俄军擅长的消耗战，而拿破仑远离本国，需要避免这种战斗。

到7点30分时，欧仁已经靠刺刀冲锋攻占了博罗季诺村，但他随后走过科洛恰河（the Kolocha）上的桥，冲向戈尔基（Gorki），这就走得太远了。欧仁的士兵退回博罗季诺时遭蹂躏，但他们设法守住了村子，直至会战结束。10点，波尼亚托夫斯基拿下乌季察村，莫朗将军的一个步兵旅也攻克大多面堡，但没有部队充分增援该旅，于是没过多久，莫朗就被逐出大多面堡，并遭受惨重的伤亡。与此同时，法军终于攻下了巴格拉季翁箭头堡，而巴格拉季翁本人在反击中遭受致命伤——他的左

腿被炮弹碎片炸得血肉模糊。近午时分，达武攻占由120栋房屋组成的谢苗诺夫斯科耶村（Semyonovskoe），拿破仑遂能调炮兵上前，让他们轰击俄军左翼。中午，会战进入紧要关头。俄军战线仍然拉得过长，数名元帅（7位现役元帅和2位未来元帅）便恳求拿破仑投入帝国近卫军，以便切断敌军战线。在这次会战中，拉普四度负伤，他也求拿破仑让近卫军参战。

拿破仑拒绝了，他不带其他预备队，来到距巴黎1800英里远的地方，就连这种冒险也有个限度，所以说，如果当时确有战机，也无人利用它。塞居尔回忆道，奈伊、达武和缪拉派贝利亚尔将军来见皇帝，请求他让青年近卫军进攻半敞开的俄军左翼。拿破仑“犹豫不决，命令那位将军再去看看”。[108] 这时贝西埃来了，他说俄军只是有序退往第二处阵地。皇帝对贝利亚尔说，投入预备队前，他想“把棋局看得更分明”，这一暗喻他用过多次。

塞居尔认为，决策背后可能有政治动机。“团结外籍军队的纽带只有胜利”，由于大军的多语言性质，拿破仑“断定有必要保留一路忠诚的精兵”。[109] 俄军将领普拉托夫（Platov）正威胁他的左翼和后方，所以他不能投入近卫军；战场南侧有一条旧驿道（Old Post Road），中午时分，波尼亚托夫斯基尚未夺取该道的任何一边，假如此时他派近卫军沿旧驿道下行，俄军炮兵可能会狠狠打击他们。后来，达吕、迪马和贝尔蒂埃再次力劝拿破仑投入近卫军，他回答道：“假如明天还有一场会战，我要拿什么军队去打呢？”不管战前宣言说了什么，此刻他离莫斯科尚有65英里。当日早上，皇帝命令青年近卫军进入战场阵地，他急切地对莫尔捷强调道，没有直接命令绝不能行动：“听我之令，仅此而已。”[110]

没过多久，库图佐夫就收紧战线。阿尔芒·德·科兰古称，大多面堡的加农炮继续“向法军中央喷射，营造出真实的地狱”，并阻挡其他地方

的全部主要进展。[111] 下午3点，欧仁率三路步兵纵队进攻大多面堡。一队骑兵冲锋，设法从多面堡后方进入堡内，但蒙布兰、御厩总管的弟弟奥古斯特·德·科兰古（Auguste de Caulaincourt）都战死了。奥古斯特的死讯传至司令部，拿破仑便对科兰古说："你听到消息了，想退下吗？"[112] 科兰古没有回答。他只是借举帽承认这一点，唯有眼中的泪水表明他听见了弟弟的噩耗。[113]

下午4点，大军团已拿下战场。欧仁、缪拉和奈伊再次请求拿破仑投入近卫军，这回他们想动用骑兵，可拿破仑又拒绝了。[114] "我不想见它被毁，"他对拉普说，"它不参战，我也自信能赢。"[115] 到5点时，缪拉仍然主张让骑兵上阵，但贝西埃已然反对这一提议，他指出："皇帝和法国之间还有欧洲。"此时贝尔蒂埃也改了主意，他补充道，不管怎么说，现在出动近卫军太迟了。[116] 到此时俄军已后撤半英里，然后他们停下了，准备防守阵地。大军团筋疲力尽，他们准备好炮轰敌军阵地，但无意进攻。拿破仑命令近卫炮兵指挥官让·索尔比耶（Jean Sorbier）将军冲俄军新阵地开火："既然他们想要，就给他们！"[117]

晚上，库图佐夫在夜色掩护下离开。他折损了大量士兵，很可能达43000人，但俄军非常顽强地抵抗，因此他麾下只有1000人和20门大炮落入敌手。[118]（"我俘虏数千人，缴获60门大炮。"拿破仑仍对玛丽·路易丝这么说。[119]）会战持续十小时，其总损失可以这样算：整整十小时中，每隔五分钟就有一架满载乘客的大型喷气式飞机在占地6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坠毁，机上乘员非死即伤。库图佐夫立刻致信沙皇，宣称俄军大胜，圣彼得堡于是又演唱《感恩赞》。拿破仑的帐篷在舍瓦尔季诺多面堡后面，当晚7点，他在帐篷里同贝尔蒂埃、达武用餐。"我发现他一反常态，非常激动，"博塞记载道，"他头发蓬乱，看上去疲惫不堪。失去了这么多英勇的将士，他心怀悲伤。"[120] 据说皇帝还自嘲道，他保住了战场，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路，己方战损（6600人死亡，21400人受伤）也比俄军战损少很多，但他仍没取得自己如此急需的决定性胜

利，这既是因为他的正面进攻缺乏想象力，也是因为他不肯拿预备队冒险。在此意义上，他和库图佐夫都输了博罗季诺会战。“人们批评我没有死在滑铁卢，”拿破仑日后在圣赫勒拿岛上说，“我想我更应该死在莫斯科会战。”[121]

对于应该在中午时分投入近卫军这一看法，拿破仑显然敏感。晚上9点，他召迪马和达吕两位将军来帐篷，询问伤员的护理情况。接着他睡了二十分钟，又忽然醒来，继续谈话。“我没有让预备队去争取更大战果，人们会感到惊讶，”他说，“但敌军将在莫斯科之前打一场大会战，所以我得保存近卫军，让他们到时候实施决胜一击。今日胜利已收入囊中，而我得考虑整个战局的胜利。”[122] 他很快失声了，只好写下所有其他命令，秘书们却发现他的笔迹难以释读。费恩回忆道，拿破仑“沉默地工作着，堆起文件。命令都要誊一遍，每当要誊写时，他都会敲桌示意。”[123]

当日，拉雷截了200具肢体。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步兵攻占了一片树林，会战结束后，近卫军第2轻骑枪骑兵团（即荷兰红枪骑兵）就在那里过夜。树旁堆满了遗体，枪骑兵只好拖走路上的数十具尸体，然后才清出一块地面来搭帐篷。[124] “找水的话，必须远离战场，”中年近卫军少校、老兵路易·约瑟夫·维奥内（Louis Joseph Vionnet）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场上找到的水全被血染透了，马都不喝。”[125] 第61团夺取了大多面堡，次日，拿破仑来到该团残部面前，感谢并犒赏他们。他问第61团上校为何第3营不来接受检阅。“陛下，”上校回答道，“他们在多面堡里。”[126]

---

[1]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7

[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67

[3] 今瓦夫卡维斯克（Vawkavysk）。——译者注

[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46 p.775，June 25，1812

[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6 p.786，June 30，1812

[6] 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pp.35-8

[7] 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p.293

[8] 今作"Hrodno"。——译者注

[9] 从1569年起，立陶宛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1772～1795年，俄国三次参与瓜分波兰，吞并立陶宛。

[10] Zamoyski，Adam，*1812*：*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 2005，pp.161-3

[1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no.18962 p.61

[12] Coignet，Jean-Roch，*Captain Coignet* 2007，p.201

[13]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53

[14] AN 400AP/81/pp.22-5

[1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188

[16] 今巴布鲁伊斯克（Babruysk）。——译者注

[17]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232

[18] AN 400AP/81/p.30

[1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77 p.793，July 1，1812

[2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75

[2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787，July 1，1812

[2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068 pp.787-90，July 1，1812

[23] 拿破仑写完了这封特殊又坦诚的信，然后他问巴拉绍夫去莫斯科走哪条路最好，这很可能是句玩笑话。"陛下，"巴拉绍夫巧妙地反驳道，"想走哪条就走哪条。卡尔十二世走的是经过波尔多瓦那条。"Foo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p.75；Mowat，*Diplomacy of*

Napoleon， p.256.

[24]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p.302

[25]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p.219

[26]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13

[2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5

[2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6

[29]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1

[30]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p.66-7

[3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51150 p.829，July 8，1812

[32]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47

[33]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p.83ff

[34]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1

[3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201 p.858，July 12，1812

[36]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p.101-2

[37]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182

[38] Cobb，Richard，*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1970，p.111 n.1

[39] Prinzing，Friedrich，*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1916，p.106

[40] Kerckhove，J.L.R.de，*Histoire des maladies observées à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36，p.405

[41] Kerckhove，J.L.R.de，*Histoire des maladies observées à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36，pp.406-7

[42] Gourgaud，General Baron Gaspard，*Napoleon and the Grand Army in Russia* 1825，p.12

[43]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13

[4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184 p.847，July 10，1812

[4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51

[46]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53

[47] 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p.160

[48]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p.66

[49]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p.217-19

[50] 拿破仑照常考虑法国的情况。"我必须提醒你，我打算买下整个耶尔群岛（islands of Hyères）。"6月21日，他致信克拉克（他指的是法国南部的一组小岛），"并设法让人移居该地。"CG12 no.31281，p.899.他也担心巴黎的大型谷仓不能在他规定的时间内完工。"凯旋门、耶拿桥、荣耀殿、斗兽场可以方便地推迟两三年，"他告诉自己的商务部长，"与之相反，这座巨大仓库必须建成，此乃最重要的事。"CG12 no.31255，p.885.

[5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261 p.889，July 19，1812

[52]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p.217-19

[53]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634

[54] 此战又叫莫吉廖夫（Mogilëv）之战。

[55]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262，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82

[56]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335 p.926，July 26，1812

[5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s.31291，31337 p.904，July 22，1812，p.927，July 26，1812

[5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4

[5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5

[60]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 （New York）1912，p.80

[61]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6

[6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396 p.952，August 2，1812

[6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38

[64] Nicolson，Nigel，*Napoleon* 1985，p.99

[6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86

[6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40

[6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435 p.971，August 7，1812

[6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44

[6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45

[70]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41-4

[71] 那一周，拿破仑的秘书梅纳瓦尔致信皇帝的图书馆管理员巴尔比耶。"皇帝想看一些有趣的书。要是有不错的新小说，或者他不知道的旧小说，抑或读来愉悦的回忆录，麻烦您寄给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儿难以打发空闲时间。"CN24 no.19052，p.128.拿破仑称，他忙得没空读拉普拉斯的《概率分析理论》。"能收到您写的论概率计算的论文，我感到高兴，"他致信元老院议长，"以后我会津津有味地阅读它，但今天我必须仅限于告诉您，只要我见你出版促进并拓展这门首要科学的书，我就感到满意。它们有助于国民启蒙。数学的发展完善与国家繁荣联系密切。"CG12 no.31388，p.949.

[7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Ⅰ pp.321-4

[73]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12

[74]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50，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23

[75] 此言出自韦斯帕西安（Vespasian），又译维斯帕西亚努斯。

[7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84 n.5

[7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7

[7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9

[79]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p.232-3

[80] 又叫卢比诺（Lubino）之战。

[8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93

[82] 朱诺的判断力可能受梅毒影响，后来他被此疾逼疯。次年，在拉古萨的舞会上，他几乎全裸出场，身上只有肩章、手套、舞鞋、勋章和饰物。D’Abrantès，*At the Court*，p.21.1813年7月，朱诺以为自己能飞，他从二层窗户跳楼，结果受伤。他死于伤口坏疽。（奇怪的是，朱诺的身体一直健康，他一天能吃300只牡蛎。）Strathearn，*Napoleon in Egypt*，p.422.

[8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61-2

[84]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1

[85]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passim*

[8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68

[8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265

[8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08 pp.1046-7，August 26，1812

[8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20

[90] Girod de l’Ain，Général，*Dix ans de mes souvenirs militaires* 2000，pp.252-4

[9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10 p.1047，August 26，1812

[92] Wesling，Molly，*Napoleon in Russian Cultural Mythology*（New York）2001，p.154

[9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59 p.1071，September 2，1812

[94]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66 p.1075，September 3，1812

[9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71 pp.1076-7，September

3，1812

[96]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4

[9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8

[98] Castelot，André，*La Campagne de Russie* 1991，p.143.

[9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15，Weigley，Russell，F.，*The Age of Battles*（Bloomington，IN）1991，p.449，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4，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8

[100]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82，*TLS* 10/4/1959 p.206，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New York）1966，p.131

[101]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Ⅱ pp.216-18

[102]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1，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Ⅱ pp.205-6，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11

[10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4 no.19182 p.207

[104] 当天，法军一共发射了6万发加农炮炮弹和140万发滑膛枪子弹。整场会战中，哪怕俄军开火频率较小（没有迹象表明这一点），平均算来，双方仍然每秒发射3枚以上加农炮炮弹和77发滑膛枪子弹。Cate，*War of the Two Emperors*，p.235.一名俄军副官称，他穿过战场时得张嘴，从而缓和耳膜受到的震荡压力。

[10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2

[106]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3

[10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19

[10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5

[10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82

[11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41

[111]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3

[112] Headley，J.T.，*The Imperial Guard of Napoleon* 1851，p.127

[113] Headley，J.T.，*The Imperial Guard of Napoleon* 1851，p.127

[11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20

[11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08

[11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82，84

[11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3

[118]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389-90

[11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678 p.1080，September 8，1812

[12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19

[12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8

[122]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Ⅱ p.440

[12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45

[124] Pawly，Ronald，*Napoleon's Red Lancers* 2003，pp.37-8

[125] ed. North，Jonathan，*With Napoleon's Guard in Russia* 2013，p.61

[126]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70

第二十五章 大撤退

败给绝望多于败给流血。

——据说出自拿破仑

撤退总是比最血腥的行动更折损人员与物资。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6条

博罗季诺会战结束了，次日下午，拿破仑造访战场。“整排整排的俄军各团躺着，这些人身下的土地浸透了自己的鲜血，表明他们死也不退一步，”博塞回忆道，“在这令人悲伤的地方，为了确认敌人投入的军的特征与位置……拿破仑尽可能地收集信息，甚至按序观察敌军士兵的制服上有多少枚扣子，但他最关心伤员护理问题。”[1] 皇帝的坐骑踩中一名垂死的俄军战士，他的反应则是“慷慨地给予这个可怜的家伙人道关怀”。一名参谋官指出，这个士兵“只是个俄国人”，拿破仑立刻反驳道，“胜仗后没有敌人，只有人”。[2]

麦克唐纳在北，施瓦岑贝格在南，照皇帝的盘算，夺取莫斯科或可缓解他们两人的压力。9月10日，拿破仑致信施瓦岑贝格：“敌人的心脏既已受创，他就只能集中精力关注心脏，不会考虑四肢。”[3] 缪拉开始追赶撤退的俄军，他占领莫扎伊斯克（Mozhaisk），俘虏了1万名俄军伤员。法军主力休息了两天，在11日继续前进。此时事态已然明朗——俄军不会在莫斯科城下打另一场大会战。库图佐夫决定献城，并说：“拿破仑是激流，但莫斯科这块海绵会吸干他。”[4] 14日早上，俄军径直穿过莫斯科。军队显然已放弃该城，于是全体居民几乎都离家外逃。只要侵略者能用得上某个带不走的东西，他们就隐藏或摧毁它。莫斯科市民有25万人，仅有1.5万人留下，其中很多人并非俄国人，不过附近乡村里的确有人入城抢劫。[5] 9月13日，莫斯科大学校长与法籍莫

斯科居民的代表拜访拿破仑司令部。他们告诉他，莫斯科已是空城，所以不会有人代表显贵送来传统礼物面包和盐，或交出钥匙。[6] 与之相反，一个大胆的老农悄悄走来，提出带皇帝参观城中的主要名胜，后者婉拒了这个机会。[7]

站在救赎山（Salvation Hills）上的士兵看到城市就在眼前，他们高呼“莫斯科！莫斯科！”，重振精力，向山下行军。“莫斯科有副东方外观，或者这么说，有副迷人外观，”维斯瓦兵团上尉海因里希·冯·勃兰特（Heinrich von Brandt）回忆道，“城中五百个穹顶或是镀金，或是涂了最花哨的色彩，零零星星地耸立于名副其实的屋宇海洋。”[8] 拿破仑的话更平淡：“总算到了那座名城，是时候了！”[9] 缪拉与俄军后卫达成休战协议，占领莫斯科。皇帝既考虑了补给和安全问题，也不想让大军团大规模洗劫城市，所以他只让帝国近卫军和意大利王国近卫在城中宿营。其他士兵仍待在城外郊野，但他们很快便去郊区抢劫。

15日（周二）上午，拿破仑进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地雷刚清理干净，他就住了进去，早早就寝。[10] “这座城市和巴黎一样大，”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提供了一切。”[11] 塞居尔回忆道，“拿破仑看到宫殿后重燃先前希望”，可是当日黄昏，城中各地同时起火。二分点时的东北风势头强劲，而莫斯科总督费奥多尔·罗斯托普钦（Fyodor Rostopchin）离城前挪走或销毁了所有消防车，并凿沉了消防舰队，因此火势无法控制。[12] 罗斯托普钦在莫斯科城外的沃罗诺沃（Voronovo）有一处宅邸，他在那儿贴了致法国人的告示：“我宁肯烧了自己的房子，也不想见它被你们玷污。”[13] （罗斯托普钦下令焚烧莫斯科，他释放了一些囚犯，这些人便制造了最初的部分火灾。后来，人们纪念罗斯托普钦的决策，但终其一生，他一直否认此事，这令其亲朋迷惑不解。[14] ）当晚的火焰特别明亮，以至于在克里姆林宫中，不点灯都能阅读。

法军踏入莫斯科，开始彻查城市，紧接着他们就得努力拯救该城，以免它被自己的居民毁灭。法军不清楚莫斯科的地理环境，也无灭火装备，所以他们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法军枪决了约400名纵火犯，但莫斯科的9000座主要建筑中，6500座不是被焚就是被毁。[15] 据拿破仑回忆，很多士兵“竭力在火中抢劫”，结果葬身火海。[16] 法军走后，莫斯科居民清理城市，他们找到了近12000人与12500多匹马的焦尸。[17]

拿破仑的铁行军床放在克里姆林宫枝形吊灯下。9月16日凌晨4点，皇帝在床上睡得正熟，这时他被叫醒了，得知城中失火。“多么壮丽的奇观！”他在窗边（窗格玻璃已经热得烫手）观看大火，高喊道，“他们自己干的！这么多地方！多么非凡的决心！什么人！这些的确是锡西厄人！”[18] （他照例回顾古代寻找比喻，这回他指的是希罗多德提过的波斯部落。这些人离开伊朗故土，去中欧干草原作战，他们因冷酷无情名声而在外。）卫兵不够称职，允许一个火炮运输队（包括火药马车）在克里姆林宫中拿破仑下榻处的窗下列队，所以他没被火舌吞没当属幸运。着火的木屑飞来飞去，塞居尔指出，要是有一块落在这儿，“军中精锐和皇帝就毁了”。[19] 当日大部分时间，拿破仑把士兵组织成消防部队，令人拆除火灾蔓延路线上的房屋，还审问了两位纵火犯。贝尔蒂埃、缪拉、欧仁力劝他离开莫斯科，下午5点30分，大火烧到克里姆林宫军火库，他便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塞居尔回忆道：“我们已然只能呼吸烟尘。”[20] 皇帝一行前往位于城外6英里处的皇宫彼得罗夫斯基宫（Petrovsky Palace），这段长达两小时的旅程危机四伏。马匹怕火，所以他们有时得步行。此时，烈焰与残骸已封锁克里姆林宫的前门，拿破仑便从河上岩石中的秘密后门脱身。[21] “他绕了很多路，”老将方坦·德·奥多阿尔（Fantin des Odoards）回忆道，“然后脱险。”[22] 皇室审计官纪尧姆·佩吕斯（Guillaume Peyrusse）也被带离该地，他告诉哥哥：“我们坐在马车里，要被蒸熟了……马不想前进。我最担心宝库。”[23] 宝物逃过一劫，不久后还增加了，因为法军在宝库里建了一座锻造间，熔掉11700磅黄金和648磅白银，其中很多金银来自宫殿和教堂。[24]

两年后，拿破仑讨论俄国战局时承认道：“（我）到莫斯科时，（我）以为事情结束了。”[25] 他声称，莫斯科储备充裕，自己本可在那儿度过整个冬天，但它起火了。“我无法预料这一点，因为我相信它是史无先例的事，可上帝啊，必须承认那体现了惊人的人格力量。”[26] 城市未被焚毁的部分足以充当冬营，法军也在那儿的私人地窖中找到一些补给，但莫斯科远远不能让10多万人的军队度过长达半年的冬季。马匹饲料不够，法军得用桃花心木家具和镀金窗框生营火，士兵很快就能靠腐烂的马肉为生。[27] 回头看的话，我们发现烧光整座城市对法军更好，因为那可迫使他们立刻撤退。

从横渡涅曼河到进入莫斯科的这八十二天中，大军团的核心打击力量已经减少到不足初始规模的一半。据拿破仑当时得到的数据，博罗季诺会战结束时，他已损失92390人。[28] 然而，他却不像选择受限的人一样行事。皇帝在美丽的彼得罗夫斯基宫待了两天，其间他考虑了某种策略：实施循环调动，差不多立马撤至西德维纳河下游，与此同时派出欧仁军，营造法军正进军圣彼得堡的表象。[29] 拿破仑对费恩说，他认为自己可在10月中旬到达里加和斯摩棱斯克之间。他开始查看地图、起草命令，可是只有欧仁支持这个主意。其他高级军官的态度都显“勉强”，他们辩称军队需要休息，而且去北方是“找冬天，就好像它来得还不够快！”这些人催促拿破仑向亚历山大求和。[30] 军医需要更多时间看护伤员，他们争辩道，莫斯科灰烬下仍有资源。[31] 拿破仑对建议者说：“别以为烧了莫斯科的人几天后会媾和。我见你们心怀希望，要是该为放火决策负责的家伙现已控制亚历山大的内阁，你们的那些愿望都是泡影。”[32]

亚历山大的宫廷位于圣彼得堡，该地距莫斯科近400英里。也有人提出向那儿进军的计划，但贝尔蒂埃和贝西埃马上让拿破仑确信这不可行，理由是从后勤角度看，“他没有时间、补给、道路，也没有完成如此庞大的远征的任何一个必要条件”。[33] 他们转而探讨向南行军近100

英里、到达俄军的谷仓卡卢加（Kaluga）和军火库图拉（Tula），抑或退往斯摩棱斯克。9月18日，拿破仑最终选择返回没被烧掉的克里姆林宫，他打算等一阵子，看亚历山大是否愿意结束战争。事实证明，此举乃下下之策。“我最多只应该在莫斯科待两周，”拿破仑后来说，“但我每天都被骗。”[34] 此言不实。亚历山大没有骗拿破仑相信他有意媾和，他仅仅是积极或消极地拒绝回复。拿破仑也没自欺，莫斯科大火后，他确信和平无望，哪怕他愿意接受的媾和条件很可能少到只需让俄国重返大陆体系。[35] 他之所以在莫斯科待了那么久，是因为他觉得有充足时间率军返回斯摩棱斯克的冬营，而且他更想靠敌人的资源过活。

9月18日，拿破仑向无家可归的莫斯科居民分发抢来的5万卢布。他还探望一家孤儿院，消除他要吃掉当地居民的普遍谣言。[36] “莫斯科曾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他致信马雷，并使用过去时，“俄国得花两百年才能挽回它遭受的损失。”[37] 20日，秋雨终于浇灭了火焰，此时有些地方已经烧了六天。当日，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了封信。俄国驻卡塞勒（Cassel）公使的弟弟将信送交沙皇。在法军于莫斯科抓获的俄国俘虏中，此人地位最尊贵，可见贵族的撤离行动多么彻底。这封信的开头写道：

> 若陛下先前对我的感情尚有些许残痕，您将欣然接受此信……壮丽名城莫斯科不复存在，罗斯托普钦焚毁了它……行政系统、地方法官和国民卫队都应保留，我曾两度在威尼斯、柏林和马德里这么做……我与陛下开战时并无敌意。最后一场会战之前或之后，您的一封信就能让我停止进军，我甚至乐意牺牲进入莫斯科的益处。[38]

沙皇收信后迅速召来英国大使卡思卡特（Cathcart）勋爵，并对他说，20场莫斯科大火一样的灾难也不能诱使自己放弃抵抗。[39] 拿破仑在信中列出的城市（他还可以多列些）证明，他从经验中得知，攻占敌人首都并不能让对方投降，而莫斯科甚至不是俄国的政治首都。拿破仑在马伦戈、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消灭敌军主力后才取胜，但这回，他未能在博罗季诺歼灭俄军主力。

皇帝一边等待亚历山大的答复，一边为莫斯科的士兵组织娱乐活动，好让他们的生活尽量轻松点，不过他有时也划定界限。“尽管有反复警告，”一份命令称，“士兵们仍然在庭院里，甚至在皇帝本人的窗户下解手。兹令每个部队惩罚违令者挖公厕……营房角落将放置便桶，两日清理一次。”[40] 在克里姆林宫，拿破仑精简军中各单位、考虑它们的损失，并检阅各部队、收受关于其状态的详细报告。他由此得知，援军来后他还有10万多名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法军在博罗季诺战场上收集加农炮炮弹，用大车将它们运至莫斯科。[41] 拿破仑喜欢摆出总是勤勉操劳的样子。他的门房安热尔（Angel）后来透露，自己奉命每晚在他的窗前放两支蜡烛。“这样军队就会惊呼：‘看，皇帝白天晚上都不睡。他一直在工作！’”[42]

奥萝尔·比尔赛（Aurore Bursay）夫人的剧团里有14名法籍男女演员，他们被俄军和法军打劫了。拿破仑得知剧团困境后便来帮助夫人，要她在波斯尼亚科夫剧院（Posniakov Theatre）表演11场，其中大部分演出是喜剧和芭蕾舞剧。[43] 他自己没去观剧，但他的确听了莫斯科著名歌手塔尔奎尼奥（Tarquinio）先生唱歌。拿破仑为法兰西喜剧院起草新规章，还决定把伊万大帝钟楼的金十字架迁至荣军院穹顶上。[44] 法军取下金十字架后，发现它只是镀金的木十字架。撤退途中，米歇尔·克拉帕雷德（Michel Claparède）将军的波兰师将十字架丢进了别列津纳河。[45]

农奴终身被贵族地主束缚，如果拿破仑打破这种枷锁，他可给俄国统治阶级带来大麻烦。18世纪70年代中期，叶梅利安·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曾领导激烈的农奴暴动，这次起义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法国大革命来临，俄国上流社会担心拿破仑将回顾它的理念。[46] 他自然令人从克里姆林宫档案馆取来涉及普加乔夫暴动的文件，还向欧仁询问韦利基耶（Velikiye）农民起义的相关信息，“告诉我，我们可用何等命令和宣言激励俄国农民起义，并召集他们？”[47] 然而，尽管拿破

仑在所有征服地废除封建主义，他却认为俄国农奴既无知又不文明，没有解放他们。[48] 这当然无助于让亚历山大同意和谈。

库图佐夫在塔鲁季诺（Tarutino）固守，该地又叫温科沃（Vinkovo），位于纳拉河（the Nara）后方、莫斯科西南方45英里处。10月的第一周，拿破仑派原驻俄大使雅克·德·洛里斯东去见库图佐夫。塞居尔称，拿破仑告别信使时说："我渴望和平，我必须要和平，我绝对会得到和平——只拯救我的荣誉！"[49] 库图佐夫不肯授予洛里斯东去圣彼得堡的安全通行权，他说对方的信可由谢尔盖·沃尔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公爵代交。这封信亦无回音。现阶段，莫斯科郊区的哥萨克突击队导致缪拉每天折损40～50人，而库图佐夫的兵力增加了，此时他麾下兵力为：正规军88300人，正规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s）13000人，非正规的哥萨克与巴什基尔（Bashkir）骑兵15000人，622门大炮。拿破仑在莫斯科待了三十五天，与库图佐夫相比，这段时间他的援军只有15000人，而且法军中还有10000人伤重而死或病死。

10月6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称莫斯科"像巴黎一样暖和"。在始自涅曼河的灼人旅程中，士兵扔了冬装，因为莫斯科天气不错，此事看来不太重要，不过他们马上就需要鞋子、靴子与马匹，而皇帝担心买不到这些东西。[50] 当日，他给玛丽·路易丝写了第二封信，要她劝父亲支援施瓦岑贝格军，"以便为他增光"。[51] 拿破仑不会知道，梅特涅已对沙皇秘密承诺道，奥地利绝不会做这种事。大约在这时候，施瓦岑贝格开始采取可疑的独立行动，尽力避免与俄军战斗。"现在，"9月中旬，拿破仑承认当年的其他外交失策，对费恩说，"贝纳多特本该在圣彼得堡，土耳其人本该在克里米亚。"[52]

拿破仑收集了关于俄国冬季的所有可得历书与图表，他从中获知，11月时才能指望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在那件事上，没有一条信息、没有一次计算被忽视，所有可能性都令人安心，"费恩回忆道，"俄国通常

只在12月和1月经受严酷凛冬。11月的温度不会比6℃低很多。”[53] 之前二十年的冬季观察记录证明，11月中旬，莫斯科河才结冰，拿破仑遂认为他有充足时间返回斯摩棱斯克。他的军队只用了不足三周的时间便从斯摩棱斯克到达莫斯科，其间他们还在博罗季诺待了三天。[54]

拿破仑在莫斯科阅读伏尔泰的《卡尔十二世史》，此书称俄国冬季严寒，以至于空中飞鸟会冻住，如中枪一般坠下。[55] 皇帝也读了三卷本《卡尔十二世军事史》，该书系卡尔国王的侍从古斯塔夫斯·阿德勒费尔德（Gustavus Adlerfeld）所著，于1741年出版。[56] 《卡尔十二世军事史》以波尔塔瓦的灾难作结，阿德勒费尔德认为，瑞典国王败给了顽抗的俄军和“深入骨髓”的冬季严寒。第三卷某段写道：“在这些行军中，有一回冻死了2000人。”另一段则称，瑞典士兵“沦落到奋力用兽皮暖和身子，他们常常连面包都缺。因为没有马匹拉炮，他们只好把几乎所有加农炮沉入沼泽与河流。昔日的浩大雄师如今……即将饿死”。[57] 阿德勒费尔德写道，夜晚“极其寒冷，很多人死于异常凛冽的天气，更有无数人的四肢、脚和手冻得僵死”。若无别的渠道，拿破仑也能从此书中深刻领会到俄国的冬季有多严寒。10月18日，军队终于离开莫斯科，这时他对部下们说：“抓紧了，我们得在二十天内进入冬营。”[58] 十七天后，天降第一场大雪，所以他只耽误了三日。后来他没有执行原计划，被迫改走另一条远路去斯摩棱斯克，此举仅仅出于军事考虑，并不能说明他不关心天气。

13日时，第一波雪花飘落。此时马匹饲料的情况已变得危急。队伍早上离开莫斯科，天黑前很难回来，他们的马累得筋疲力尽。[59] 亚历山大不回话，而冬天显然即将到来。10月13日，拿破仑终于下令五天后撤离。17日，洛里斯东返回莫斯科，他告诉皇帝，库图佐夫拒绝缔结停火协议，这件事支持了撤军决策。大军团现在有107000名士兵、数千平民、3000名俄军战俘、550门加农炮、40000多辆车，这些车满载此前一个多月的劫掠成果（比起食物，人们更想带上它们）。18日，大军团开

始撤出莫斯科，这时库图佐夫对塔鲁季诺发动出色的奇袭，导致缪拉麾下有2000人死伤、1500人被俘、36门大炮被缴。[60]

1812年10月19日中午，阳光明媚，拿破仑本人离开莫斯科。他选了南路，它通往西南方110英里处的卡卢加［他昵称它为“卡利古拉”（Caligula）[61]，就像他叫格洛高为“古尔戈”一般］。[62]拿破仑留下了去图拉的选项，他希望摧毁那儿的俄军兵工厂、到达肥沃的乌克兰，并调来斯摩棱斯克的援军，或是在必要时北上，返回斯摩棱斯克和立陶宛。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他都能把撤离莫斯科之举变成纯战略撤退，即打击亚历山大的战局的下一阶段。然而，衰弱笨重的大军速度太慢，不能完成现在他所急需实施的行动。10月21日晚，天降大雨，地面变得泥泞，这让法军动作更慢。两天后，库图佐夫方知拿破仑已撤军，可大军团排成长达60英里的纵队，跌跌撞撞地前进，所以他此时才察觉也无甚要紧。库图佐夫派出多赫图罗夫（Dokhturov）将军的第六军去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yaroslavets）阻截拿破仑。23日，多赫图罗夫到达目的地。次日，他径直撞上亚历克西斯·德尔宗（Alexis Delzons）将军指挥的欧仁前卫。

拿破仑命令莫尔捷炸毁克里姆林宫，人们指责他实施科西嘉式复仇，但此举实为保留选择权。他对拉里布瓦西埃将军说，“我可能返回莫斯科”，而且他认为，如果莫斯科没有牢固的防御工事，再次占领它会容易些。[63]莫尔捷在克里姆林宫拱门下堆放了180吨炸药，20日下午1点30分，拿破仑在25英里之外听到爆炸声。他在公报中吹嘘道：“与（罗曼诺夫）王朝同时崛起的古老城堡、沙皇宫殿克里姆林宫已不复存在。”可事实上，克里姆林宫保存了下来，法军毁掉的只有军火库、一座塔楼、尼科利斯基门（Nikolsky Gate），此外还有伊万大帝钟楼受损。[64]拿破仑也催促莫尔捷把所有伤员带出莫斯科，他引用古典先例，说：“罗马人授予拯救平民者公民荣誉冠，特雷维索公爵应得此冠，只要他拯救士兵……他和部下们应当把马让给他们骑，皇帝在阿克

就是这么做的。”[65] 莫尔捷尽可能带走所有伤员，但他不得不在弃婴堂留下4000人。出发前夕，拿破仑以纵火罪为由枪毙了10名俄军战俘。[66] 这次枪决很难算得上雅法事件，但它是无法解释的冷酷行径，也不大可能改善他被迫抛下的法军伤兵的命运。

10月24日，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在俯瞰卢扎河（the Luzha）的地方打响。此战是俄国战局中规模第三大的战斗，其影响远远超出直接战果。法军最终攻占城镇，库图佐夫退至卡卢加路，但是小雅罗斯拉韦茨之战极其激烈（当日对战中，镇子九度易手），战斗就要结束时拿破仑才到场，惨烈的战况令他确信俄军会在南路上奋力拼杀。（“杀死俄国佬还不够，”大军团中流传一句赞赏俄军的话，“你还得推倒他。”）皇帝的公报称，法军赢了小雅罗斯拉韦茨会战，尖刻批评者、制图师欧仁·拉博姆（Eugène Labaume）上尉却回忆道，当时有人说：“再来两场这种‘胜利’，拿破仑就成光杆司令了。”[67] 战斗中，小雅罗斯拉韦茨被焚毁，只有石砌修道院及其门上的弹孔保存至今，但皇帝看见阵地上堆满了焚烧过的尸体，因此他能知道俄军曾多么顽强地战斗。

戈罗德尼亚村（Gorodnya）位于莫斯科西南方约60英里处，拿破仑在该村的桥边织工小屋内设立司令部。晚上11点，贝西埃到达司令部，他对皇帝说，自己认为库图佐夫设在道路前方的阵地“固若金汤”。次日凌晨4点，拿破仑出门，试图亲眼看看情况（在沟谷另一边的小山上，人最多只能看到城镇），结果差点被大群鞑靼人（Tartars）组成的乌兰枪骑兵（uhlans，系轻骑兵）俘虏。鞑靼人离他只有40步不到，高喊“抢劫！抢劫！”200名近卫骑兵赶走了他们。[68] 拿破仑后来和缪拉笑谈这次侥幸脱险，但从此以后，他把一小瓶毒药挂在脖子上，以防万一被俘。“事态正在恶化，”25日，离破晓还有一小时的时候，他对科兰古说：“我次次击败俄军，但还是没完没了。”[69]（此言不太对，缪拉曾在塔鲁季诺大败，尽管拿破仑本人不在场。）

费恩说，拿破仑被小雅罗斯拉韦茨的大量伤员“震住了”，他们的命运触动了他。此战中，德尔宗等8位将军非死即伤。[70] 继续沿卡卢加路南下几乎必将引发又一场伤亡惨重的战斗，相反，若法军向北撤退，去往上个月走过的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公路上的补给站，他们便可回避这一必然事件。法军还可选择第三条路线，这条路穿过梅登（Medyn）和叶利尼亚（Yelnya），来自法国的增援部队在那儿等待他们，这批援军有一个师的生力军。（11月6日，拿破仑写到叶利尼亚：“据说该地区风景秀丽，补给充足。”[71] ）地图未指明第三条路线路况，但若法军选了这条路，或许他们能在第一场大雪前到斯摩棱斯克。货运马车、大车、战俘、随营人员、战利品现在成了大军团的巨大尾巴，这是不是拿破仑的考虑因素？文献记录不曾提及这一点。另一件事倒是真的影响了拿破仑的思绪：如果去叶利尼亚，库图佐夫的9万人可以一路跟踪他的左翼，此外，一支沿道路延伸60英里的军队将有不少薄弱点。在乡间瞎转是军需官的梦魇，这比经莫扎伊斯克返程更危险，至少他知道那儿有食品站。然而冬天将要来临，去莫扎伊斯克的话，行程会长很多，实际上，那等于循着长达数百英里的急转弯向正北方行军。

拿破仑通常不开军事会议。对抗普军与俄军的整个1806～1807年战局中，他没开过一次会，但他现在召人议事了。司令部所在地织工小屋只有一个房间，靠单单一张帆布床单分为皇帝的卧室与书房。10月25日（周日）晚，这座小屋接待了一群元帅和将军，拿破仑做出关键决策前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在这间卑微工人的破旧住宅内，”他的一位副官后来写道，“有一个皇帝、两个国王、三个将军。”[72] 拿破仑说，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胜利代价高昂，没有弥补缪拉的塔鲁季诺之败，他想南下，向卡卢加以及横跨道路两侧的俄军主力出击。缪拉因为打了大败仗而闷闷不乐，他同意皇帝的看法，力主马上进攻卡卢加。达武支持走另一条路，即经过梅登的南路。该路当时尚无防备，法军可穿过乌克兰北部和第聂伯河畔未受损的肥沃土地，若一切顺利，此后他们能在斯摩棱斯克重返主干道，甩开库图佐夫好几天的行军里程。“铁元帅”的担心如下：

大军团尚未赢取决定性会战，若跟随库图佐夫沿卡卢加路南下，那么最东边还没下雪时，他们就愈发深入俄国境内了；反之，若让全军转向，改去莫扎伊斯克-斯摩棱斯克公路，军中就会出现延迟、拥堵和补给问题。

“目标是斯摩棱斯克，”塞居尔记载道，“他们该向哪行军呢，卡卢加，梅登，还是莫扎伊斯克？在场人士必定面露苦色。拿破仑坐在桌边，他用双手枕着头，遮住脸和苦闷的情绪。”[73] 会上，大部分人认为，部分军队以及不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大量火炮已屯于通往莫扎伊斯克的博罗夫斯克（Borovsk），所以博罗夫斯克-莫扎伊斯克-斯摩棱斯克线路最理想。他们指出，“炮兵和骑兵已筋疲力尽，事实将证明，若改变方向（转而追踪库图佐夫），士兵会非常累，我们领先俄军的距离也会完全丧失”。他们辩称道，假如库图佐夫“不想在小雅罗斯拉韦茨这种绝佳阵地立足并开打”，他也不大可能在60英里之外的地方开战。欧仁、贝尔蒂埃、科兰古和贝西埃持这种观点。达武提议进军梅登，缪拉狠批这一计划，因为法军侧翼将暴露在敌军面前。两位元帅长期不和，这一争执导致他俩激烈争吵。“好吧，先生们。”当晚，拿破仑总结会议时说，“我来决定。”[74]

拿破仑选择从北路返回斯摩棱斯克。对他的统治来说，这也许是最为致命的单独的一项决策。他的现存文件中，只有给贝尔蒂埃的一封信解释了这一决定。拿破仑在信中叫贝尔蒂埃致信朱诺，向他转告俄军情况。“26日，我们去进攻他们，可对方在撤退。（达武）去追他们了，但是天气寒冷，我们又需要让随军伤员下车，皇帝遂决定去莫扎伊斯克，从那儿退往维亚济马。”[75] 然而此言毫无意义。如果敌军正撤退，现在就是攻击他们的理想时机；北方多半会冷得多；伤员的需求从来不曾左右战略。多年后，古尔戈批评缪拉和贝尔蒂埃，设法把大军选错路线一事算到他们头上，拿破仑便纠正他道：“不，我是统帅，这是我的错。”[76] 他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英雄一样，明明有其他路可走，偏偏

选了灭亡之路。塞居尔日后称，小雅罗斯拉韦茨是“征服世界之途的终点，在这片命定的战场上，20场胜利随风而逝，我们的伟大帝国开始土崩瓦解”。俄国人更直接，但其准确性不输塞居尔的。他们在战场上竖起一块小纪念匾，上面仅仅写道：“进犯之终，敌亡之始。”

库图佐夫察觉拿破仑正在撤退，他立刻调转军队，采用“并行战略”，以便将对方赶出俄国。“并行战略”的内容如下：库图佐夫随法军一同行军，瞧见弱点便进攻，但不给拿破仑机会实施决定性反击。拿破仑曾从阿克和阿斯佩恩-埃斯灵撤军，但那两次的情况和他眼下的处境连像都不像，何况10月下旬时温度骤跌至零下4℃。拉博姆在其回忆录《1812年之罪》中记载，后卫炸毁自己的弹药马车，于是不断传来爆炸声响，“声音远远震荡，如雷霆咆哮”。可以拉弹药马车的马死了，其中一些死于食用了从村舍茅草屋顶上扯下的不洁稻草。法军抵达乌瓦罗斯科耶（Ouvaroskoe）时，拉博姆看见了“大量士兵和农民的尸体、被割喉的婴儿、被杀害的迷人少女”。[77] 拉博姆和凶手同处一军，所以他没理由编造这些暴行。纪律一崩溃，法军就开始施暴了。

到达莫斯科后，有士兵开始留面包，现在他们则“躲到一边，悄悄吃掉面包”。[78] 10月29～30日，军队拖着沉重的步伐（已然算不上行军）经过博罗季诺战场，那儿堆满“饥饿的狗与猛禽啃过的骨头”。大军找到一名折了双腿的法军士兵，两个月来，此人靠药草、植物根以及从尸体上搞来的一点面包为生，晚上他就睡在剖了内脏的马腹里。拿破仑下令让所有幸存者坐上大车，但没过多久，士兵们就粗鲁地推下了一些人。[79] 10月下旬，就连将军也只能吃死马肉了。[80] 11月3日，俄军试图包围达武，奈伊、欧仁、波尼亚托夫斯基（他受了伤）回头救援，在维亚济马挫败敌人的计划。此战中，3000名法军士兵被俘，这个大得离谱的数字表明大军团士气接近崩溃。

11月4日，第一场大雪来临，而混乱的法军正从维亚济马撤退。“比

起饥饿，很多人明显更苦于极寒，他们丢掉装备，”拉博姆回忆道，“躺在自己点燃的大火堆边，但是该出发时，这些可怜的、不幸的家伙没劲站起来了，他们宁愿落入敌手也不想继续行军。”[81] 那样做也需要勇气，因为流言表明，农民和哥萨克对待法军战俘的做法往往同土耳其人、卡拉布里亚人、西班牙人的相当，包括活活剥皮。（哥萨克卖战俘给农民，一个人卖2卢布。）最幸运的人只是被剥光衣服，赤条条躺在雪地里，但酷刑则是家常便饭（所以撤退途中，法军中出现很高的自杀率）。[82] 就算成群法军士兵设法向俄军正规军投降，他们的下场也近似于被判死刑。某队法军战俘有3400人，其中仅400人幸存；另一支队伍有800人，其中仅16人幸存。农民抓住50名法军士兵，将他们活埋进坑里，“一个少年鼓手勇敢地率领忠诚的人，跳进坟墓”。[83] 偶尔也有博爱无私的故事。举个例子，拉博姆曾记载，一名法军士兵在墓地里发现一个俄国妇女，她刚刚分娩，饥肠辘辘，他便把食物分给她。可是总的来说，撤退现在令人想起希罗尼穆斯·博施（Hieronymus Bosch）笔下的哈得斯。[84]

11月5日，奈伊接过后卫指挥权。这时，降雪覆盖了路标并让路面结冰。除了波兰人和近卫军的部分团，没几个人想过给马匹钉上耐冰马掌，结果很多马滑倒或摔倒。11月第二周，“大军全无士气和军队组织。士兵不听军官的话了，军官不在乎将军了。七零八落的团尽全力行军。他们搜寻食物，散布于平原，烧掉或抢走路上所有东西……他们饿得难受，一见马匹倒地就冲上去，像饿狼一样争抢肉块”。[85] 与此同时，脚趾、手指、鼻子、耳朵、性器官因为冻伤而坏死。[86] “士兵们倒下，”卡斯特拉内回忆意大利王国近卫时道，“一点血涌上他们的嘴唇，然后一切就完了。战友们看到这种濒死征兆后，往往不等他们彻底气绝就上去推一把。这些人把垂死者扔在地上，并拿走他们的衣服。”[87]

11月6日，拿破仑在多罗戈布日收到康巴塞雷斯的信，此信内含的消息非同小可：两周前，克洛德-弗朗索瓦·德·马莱（Claude-François de

Malet）将军企图在巴黎发动政变。马莱伪造文件，称拿破仑死在莫斯科城下。他还炮制假元老院令，任命莫罗将军为临时总统。[88] 马莱的同谋不到20人，10月23日凌晨3点，他却控制了1200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政变者逮捕警务部长萨瓦里，将他关进拉福斯监狱（La Force prison），警察局长帕基耶则被逐出其警局。[89] 巴黎总督于兰将军下颚中弹，子弹未被取出，于是他得了个绰号“食弹者”（Bouffe-la-balle）。[90] 塞纳省省长、参政院成员弗朗索瓦·弗罗绍（François Frochot）认可了马莱的故事，完全没有阻止政变，因此他后来被免职。

值得称道的是，康巴塞雷斯似乎保持了冷静头脑。他给圣克卢宫中保护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的哨兵增派一倍人手，还命令宪兵指挥官蒙塞元帅从附近省份调来军队、释放萨瓦里、恢复帕基耶之职。[91] “上午9点，一切都结束了。”拉瓦莱特回忆道，“快乐的巴黎居民一觉醒来，然后听说了这起特别事件，他们便对此事开了一些可以接受的不错玩笑。”[92] 拿破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他“死后”，除了康巴塞雷斯，似乎根本没人想到过玛丽·路易丝或他的儿子是法国正统统治者，这令他大怒。“拿破仑二世，”皇帝对费恩吼道，“没人想起他！”[93] 前政治犯、忠实的共和党人马莱接受短暂的军事审判，法庭让他供出同党，他回答：“谁是我的同伙？要是我得手了，你们都是我的同伙！”10月29日，他和另外12人被枪决。[94] 拿破仑担心马莱的话是真的。这桩阴谋提醒了他——他刚刚才开创的王朝几乎全靠他一人支撑。

11月7日，温度降至零下30℃，暴风雪似乎一刻不停，撤退也开始慢得像爬行。几天之内，约有5000匹马死亡。士兵呼吸时，气体刚出口就冻成冰柱，他们的嘴唇牢牢粘在一起，鼻孔也冻住了。埃及战局中，军中流行沙漠眼炎，与之相应，军队现在被雪盲折磨。袍泽情谊不复存在：要烤火得付一个金路易；食物和水不再共享；士兵吃马的饲料，驾着马车碾过前方道路上倒下的人。[95] 俄军将领、法国流亡者路易·德·朗热隆（Louis de Langeron）伯爵指挥一个师，他曾看见“一个死人的牙齿

深深咬入还在颤抖的马腿”。[96] 11月8日，欧仁警告贝尔蒂埃：“这三天的苦难太打击士兵的精神了，我认为他们几乎不可能再努力。很多人死于寒冷或饥饿，其他人眼巴巴盼着被敌人抓走。”[97] 同类相食的例子有很多翔实的记载。库图佐夫的英籍联络官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爵士发现，假如围着营火的一群法军士兵被俘，“很多战俘便忙于用手剥下战友尸体的衣服，并用这些烧焦的遗体当饭吃”。[98]

德意志籍俄军将领彼得·维特根施泰因从北而来，海军将领帕维尔·奇恰戈夫（Pavel Chichagov）从南而来，两人皆直奔别列津纳河，所以法军可能全军被俘。11月9日，拿破仑到达斯摩棱斯克。鲍里索夫（Borisov）有一座桥横跨别列津纳河，而他尚在鲍里索夫以东近160英里处。库图佐夫位于拿破仑和桥之间，他在克拉斯内布阵拦路，准备开战。两天前，拿破仑就已焦急地给维克托元帅写了封密码信，命令对方立刻从维捷布斯克附近的阵地向南行军：

> 这次调动万分重要。几天后，哥萨克就会淹没你的后方。明天，军队和皇帝将到斯摩棱斯克，但他们连续行军120里格，现在非常疲惫。采取攻势，大军能否得救在此一举，每耽搁一天都是一场灾难。马都冻死了，军中骑兵得步行。行军，那是皇帝的命令，也是必要的命令。[99]

冷静顽强的维克托恰好赶到。

拿破仑的军队减至6万人不到，尽管再没人做记录了。因为无马拉炮，士兵钉死很多大炮，然后把它们丢在路边。沃皮河（the Vop）附近方圆3英里内，举目所见只有弹药马车、加农炮、马车、枝形大烛台、古铜器、油画和瓷器。一个好开玩笑的人说，那儿“半是炮场，半是拍卖商的仓库”。另一名士兵回忆道，与此同时，猎犬“发疯般狂吠，它们一怒之下，常常和士兵争抢路上遍布的死马。渡鸦……被尸臭吸引，它们在我们头顶盘旋，如同黑云”。[100]

整支军队花了五天进入斯摩棱斯克，但城中大部分补给第一天就吃光了，所以奈伊的后卫进城后什么也没找到。拉雷的外套上系着支温度计，它的读数为-16℉（零下26.7℃）。拉雷还指出，因为天气极寒，就连最轻微的伤情也可导致坏疽。[101] 11月14～18日这五天中，拿破仑在克拉斯内孤注一掷地战斗。严重减员的欧仁军、达武军、奈伊军力图突破库图佐夫的军队，去往别列津纳河。法军中，约13000人死亡，26000多人被俘，其中包括7位将军。[102] 法军在斯摩棱斯克一共钉死112门大炮，俄军又在克拉斯内缴获123门大炮，于是除了骑兵，拿破仑的炮兵几乎也耗尽了。[103] 然而，整场会战中，他始终泰然自若，奋力让通往鲍里索夫的路继续保持通畅。库图佐夫的兵力近似于法军的两倍，但他未能施展致命一击。如果库图佐夫在恰当时机部署托尔马索夫的部队，他本能取得成功。俄军也损失惨重。在塔鲁季诺时，库图佐夫有105000人，但是克拉斯内会战后，他还剩60000人。然而，他依然能实施并行战略。

拿破仑以为奈伊军从克拉斯内返回时全军覆没，博塞记载过这一时期："皇帝得知他的勇敢元帅中最勇敢的一位陷入绝境，悲痛得无法形容。这一天，我多次听他说出一些流露内心极大痛苦的字眼。"[104] 11月21日，奈伊终于在奥尔沙（Orsha，差不多在斯摩棱斯克和鲍里索夫中间）追上主力部队，但他的军只有800人幸存，而6月时，随奈伊渡过涅曼河的军有4万人。"那些回来的，"奈伊声称，"都拿铁丝吊着蛋。"[105] 拿破仑得知奈伊生还，说："我的杜伊勒里宫地窖里有4亿多（法郎），我情愿把这些钱全拿去换我忠实的战友。"[106] [107]

"你们中很多人抛弃军旗，独自前进，这就背叛了你们的职责、荣誉以及大军的安全。"11月19日，拿破仑在奥尔沙发表宣言，"立刻逮捕并惩罚违犯者。"这一次，他的话没多少效果。他正为自传做笔记，当日，他将这些文字付之一炬。关于这本传记，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别列津纳河宽300英尺，两岸遍布泥沼。曾有"大军团"之尊称的军队如今已

是一群武装暴民，11月21日，他们中的第一批队伍到达别列津纳河，发现俄军将领奇恰戈夫已经占据了河流西岸。他已经夺取该段河流上的唯一桥梁鲍里索夫桥，并焚毁了它。维特根施泰因沿河流东岸下行，威胁法军右翼。库图佐夫跟在后面。总而言之，约14.4万名俄军士兵正拥向法军的4万名有生力量（维克托军、乌迪诺军增援后）以及成千上万的掉队者、随营人员。朗热隆回忆道，俄军士兵“管不幸掉队者叫‘莫斯科纵火犯’，用滑膛枪枪托砸烂他们的脑袋”。[108]

始自莫斯科的撤退进入最危险的阶段，接下来发生的事成了拿破仑史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拿破仑曾命令埃布莱销毁舟桥工兵（pontonniers）的六车架桥工具，以便减轻辎重车队负重，幸运的是，埃布莱没有听令。乌迪诺建议在斯图江卡村（Studzianka，在白俄罗斯语中意为“非常非常冷”）渡过别列津纳河，拿破仑同意一试。别列津纳河水位高涨，河上漂满“大块浮冰”，有时冰块长6英尺。埃布莱和400名工兵（大多是荷兰人）就在别列津纳河的冰凉河水中工作，他在鲍里索夫以北8英里处的河面上架好两座浮舟桥。[109] 第一座给骑兵、大炮和辎重用，第二座在第一座上游180码处，供步兵使用。

乌迪诺用诱兵引诱奇恰戈夫向南。在所谓的别列津纳之战中，维克托在东北方拦下维特根施泰因的3万人，与此同时，奈伊、欧仁和达武经博布尔（Bobr）去斯图江卡。[110] 11月24日，军队在博布尔附近的树林里焚烧鹰旗，以防它们沦为战利品，可见当时形势多么绝望。[111] “天气非常冷。”当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非常健康。替我吻小国王，永远不要质疑你的忠实丈夫的感情。”[112]

次日傍晚5点，荷兰工兵开始架桥。他们拆除了村中木屋，在七八英尺深的河床里插入桩子。圣西尔的回忆录将这次渡河称为“奇迹般的别列津纳河横渡行动”，此言不虚。渡河开始时，温度已骤降至零下33℃。[113] 乌迪诺的勤务兵弗朗索瓦·皮尔斯（François Pils）回忆道，

因为这次行动得瞒过奇恰戈夫在对岸的巡逻队，“造桥者被警告不得说话，各军种的士兵都奉命离开视线范围。我们的工兵在河岸边的小丘陵后做完所有预备工作，搭完全部支架，所以敌人的瞭望哨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114]

11月26日（周四）凌晨3点，拿破仑到达。此时，所谓的“脆弱脚手架”已然显眼。[115] 他身着毛边大衣，头戴镶毛边绿色天鹅绒帽，其帽舌盖过眼睛。当天，他在河边鼓励舟桥工兵，向他们递送白兰地。他也确保工兵们每隔十五分钟能休息一下，并烤火取暖。拿破仑还组织了河流更上游处的另一出骗局。费恩回忆道，士兵们一边“盯着皇帝”，一边说，“他会带我们离开这儿”。[116] 早上7点刚过不久，乌迪诺来了，拿破仑携他和贝尔蒂埃下行至河边。“好吧，”皇帝对乌迪诺说，“你将是锁匠，为我打开这条通路。”[117] 一批骨干部队已乘筏子过河，他们未遇上敌人，此刻正保护着对岸，所以从8点开始，舟桥工兵便准备好在冰凉的河水中放入3～9英尺高的支架。它们保持相等间距，连成一线横穿河流。“水没到士兵的肩膀，”某旁观者回忆道，“他们展示了非凡的勇气。有人倒下身亡，被激流吞噬。”[118]

上午9点30分左右，皇帝返回贝尔蒂埃的指挥部。侍者端上肉排，他站着吃完了它。御膳总管（maître d’hôtel）呈上盐皿，那是一个纸卷，内含灰色陈盐，于是他开玩笑道：“你装备充足，只缺白盐。”[119] 在那种时候，人要是还能发挥幽默感，这就表明他意志如钢，或者确如奈伊所说，“用铁丝吊着蛋”。然而，灾难正让皇帝付出代价，这不出所料。乌迪诺军的瑞士军官路易·贝戈斯（Louis Bégos）上尉认为，拿破仑看起来“疲惫焦虑”，另一名瑞士军官雷伊（Rey）上尉则“看到皇帝的忧虑神情，大为震撼”。[120] 拿破仑对埃布莱说：“花了很长时间了，将军，相当长了。”“陛下，”埃布莱答道，“你能看见，水浸到我的士兵的脖子，冰也在拖慢他们的进度。我没有食物和白兰地让他们暖和身子。”皇帝看着地面，回答道：“那就行了。”[121]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

忘了埃布莱的话，又开始埋怨。

将至11点时，法军建好第一座桥。拿破仑命令约瑟夫·阿尔贝（Joseph Albert）第6师第1团下辖的第1营过河。“我的星星回来了！”他们安全过河时，他喊道。[122] 他也高兴地发现，“我骗过了那个将军（即奇恰戈夫）！”诚如此言。[123] 下午，乌迪诺军其余部队过河。浮舟桥没有护栏，几乎贴着水面，它们也不稳定，向河底下陷，冻僵了的舟桥工兵只好频繁修桥。粪便很快覆盖了骑兵桥，士兵得把死马和残骸丢进河里，以免造成拥堵。军队过桥前，掉队者和随营人员留在原地。[124] 当晚，奈伊和他的部队不能过桥，因为三座支架吃重不住，垮掉了。在那三座支架修过两次后，奈伊才最终过桥。[125]

据雅克布·瓦尔特的日记记载，大军过河时，能听见有人咒骂拿破仑。

> （瓦尔特的部队）来到拿破仑吃饭的地方，他也在那儿下令给自己的驮马解下马具。他看着陷入最悲惨境地的军队走过。猜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感觉。他的外在样子似乎表明，他对士兵的可怜处境漠不关心、毫不在意……法军和联军的很多士兵冲他耳边赌咒谩骂，斥责他为人邪恶，但他仍能无动于衷地听着。[126]

拿破仑更习惯听“皇帝万岁！”，最差也是听友善玩笑，所以这对他来说是个新体验。军中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缺乏统一动机，牢骚遂变成坦率的异议。瑞士人、威斯特伐利亚人、巴登人、黑森-达姆施塔特人认为这是法国的战争，怨恨参战，但他们在别列津纳河照样表现出色。在河流两岸的激战中，瑞士人和威斯特伐利亚人赢取了大部分荣誉军团星章。（四个瑞士团一共受赏34枚星章。）[127]

11月27日中午，拿破仑走过摇摇欲坠的栈桥。当晚，他睡在扎尼夫斯基（Zaniwski）的小村舍。“我刚刚渡过别列津纳河，”他致信维尔纽斯的马雷，“但是河上漂下的浮冰导致桥梁非常危险……天气很冷，军

队特别累。我会马不停蹄地赶往维尔纽斯，以便稍稍重整队伍。”[128] 埃布莱的栈桥虽然不稳，但最终发挥了效力，据信共有5万多名士兵和改组过的掉队者靠这两座桥过了别列津纳河。11月28日，维特根施泰因的军队开始靠近，维克托遂毁掉了桥。前夜，约1.5万名掉队者以及8000名随营人员和平民没来得及过桥，现在他们任凭俄军处置了。“我看见一个不幸的女人坐在桥上，”流亡者罗什舒阿尔（Rochechouart）伯爵回忆道，“她的脚垂在桥边，冻在冰里。她把一个冻僵的孩子紧紧抱在怀中，抱了二十四小时。她求我救救孩子，却没意识到她拿给我的是一具尸体！”[129] 一名哥萨克打碎了她的脑壳，终于“了结了她那骇人的痛苦”。法军在东岸丢下1万多辆车，其中有四轮双座篷盖马车、折篷轻便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拿破仑反复下令烧掉这些车辆，但它们依然保存下来。朗热隆看到了“莫斯科的教堂的圣杯，圣约翰（伊万）大帝教堂的镀金十字架，一堆版画，来自布图尔林（Buturlin）伯爵和拉祖莫夫斯基（Razumovsky）伯爵杰出图书馆的很多藏书，以及银盘乃至瓷器”。[130] 十年后，一名普军军官造访此地，他发现了“成堆……忧郁的遗物，里面混杂着人骨、动物骨头、头颅、锡制设备、子弹带、马笼头、近卫军熊皮帽碎片”。[131]

11月29日和30日，米洛拉多维奇（Miloradovich）将军和库图佐夫先后到达鲍里索夫。斯图江卡有一尊纪念石，石上文字称，此乃库图佐夫“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地。此言颇为不实，事实上，因为奇恰戈夫未能那样做，人们一直没忘记他的耻辱。拿破仑听取乌迪诺的建议，并据此修改计划，这体现了他在战场上惯有的灵活性。他迅速行动，运用诈术实施出色的佯攻，引诱俄军向南。另外，两天之内，他的整个军队便靠两座临时建成的木制栈桥过河。这次脱险是个奇迹，不过他付出了高昂代价，以至于法语中出现了形容灾难的常用短语——“一条别列津纳河”（une bérézina）。“食物，食物，食物，”29日，他从河流西岸致信马雷，“要是没有食物，这一大群涣散的人到维尔纽斯后什么可怕的事都干得出。也许军队到涅曼河才会集结。维尔纽斯不能有外国代理人。

现在大军看上去不大好。”[132]

12月3日，拿破仑已到达明斯克西北方45英里处的莫洛杰齐诺（Molodechno）[133]。这天，他发布了1812年战局第29期公报，这也是所有公报中最著名的一期。皇帝把灾难完全归咎到天气头上。“如此凛冽的季节，”他写道，出乎意料，气温降至零下27℃，“每天晚上，骑兵、炮兵和辎重队都有马匹死亡，数量不是几百匹，而是几千匹……我们必须放弃并销毁大量加农炮、弹药与补给。6日，军队状态非常好，14日，它却大大变样，如今它几乎没有骑兵、没有炮兵、没有运输队。”俄军取胜了，拿破仑未称赞对手，他仅仅写道：“可怕的灾难击垮了法军，敌人看见了它留在路上的痕迹，便努力利用这个机会。”他瞧不起哥萨克，认为“这支卑鄙的骑兵只会制造噪音，无法突破一个腾跃兵连”，但他被迫说了句实话——路易·帕尔图诺将军的整个师（隶属维克托军）在鲍里索夫附近被俘。

拿破仑承认损失严重，以至于“为了组成各有150人的四个营，有必要集合仍有一匹马的军官。将军代行上尉之职，上校代行中尉之职”。[134]12月16日，这期公报（比普通公报长两倍）在巴黎出版，法国人惯于从字里行间寻找真相，所以他们大吃一惊。拿破仑尚未完全摆脱夸大胜绩并缩小损失的习性，可现在，他趁更糟的谣言到达首都前公布自己笔下的灾难情况，试图创造一个自然之手导致的关于失败的故事。他给出的数字统统非常不准，不过很久以后才有人开始精确计算。

法国人的愤怒大都针对公报最后一句话：“陛下的身体再好不过。”人们说，此言“显然无情地表露皇帝的自私”，事实上，拿破仑这么说几乎是习惯使然。[135]到达莫斯科前，他给玛丽·路易丝的30封信都包含短语“我很健康”，屯于莫斯科时以及在撤退途中，又有12封致她的信写了这句话，所以它差不多是句口头禅。次年的五个月中，他说了22次“我很健康”。[136]更重要的是，马莱阴谋刚刚结束，拿破仑得彻底

消除一切声称他可能健康欠佳的谣言。

12月5日，在斯莫尔贡（Smorgoniye）村（据博塞回忆，那儿有一座“兽医学校，训练俄国熊跳舞”），拿破仑告诉欧仁、贝尔蒂埃、勒菲弗、莫尔捷、达武和贝西埃，“假如我要威慑欧洲，让它选择战争或和平，就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巴黎”。[137] 他说当晚10点，他会带科兰古、迪罗克、洛鲍、费恩和康斯坦一同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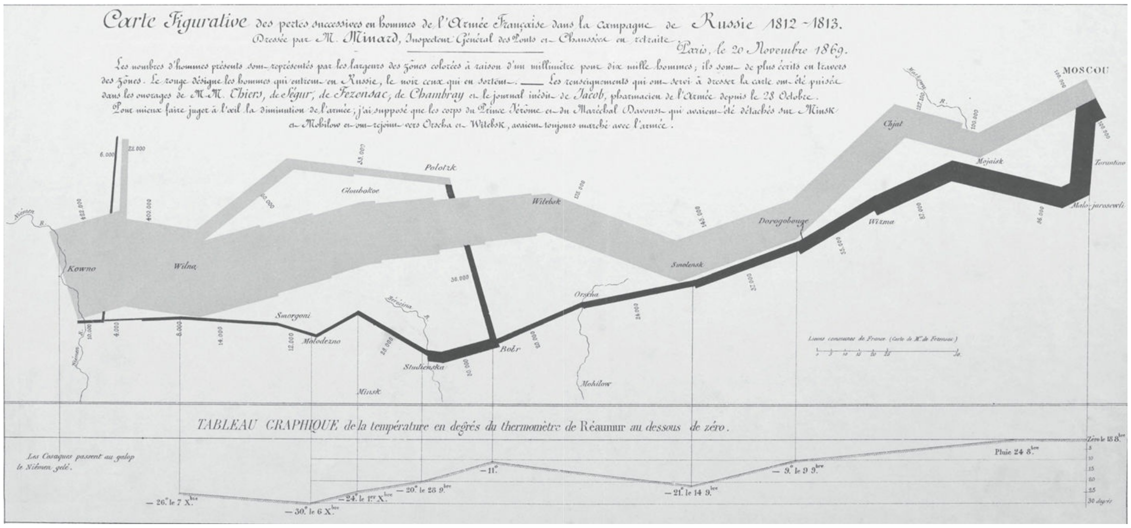
拿破仑选择让缪拉继续指挥军队。皇帝走后，随着后备部队、新兵和调动过来的部队拥入波兰，这位浮夸的元帅试图稳住维斯瓦河阵线，但事实证明，面对前进的俄军，他不可能完成任务。普军将领约翰·约克·冯·瓦滕堡（Johann Yorck von Wartenburg）[138] 突然宣布，12月30日，他和俄军缔结《陶罗根条约》（Convention of Tauroggen，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曾参与条约谈判），根据这份互不侵犯协议，现在他的军队保持中立。[139] 缪拉先是被迫放弃波兰，后来又弃守奥德河防线。缪拉同奥地利密谈，然后他忽然把大军团指挥权交给欧仁，自己则去了那不勒斯，试图保住他的王位。勒菲弗、莫尔捷与维克托已回国，乌迪诺和圣西尔在养伤，奈伊因疲惫与神经衰弱而丧失战斗力，因此欧仁、达武与波尼亚托夫斯基拯救了大军团残部。三人一同重组、再补给各军，并创立新战力的核心。《箴言报》声称缪拉抱病，但拿破仑大为光火，他告诉欧仁：“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逮捕他示众……他是战场勇士，但他根本没有智慧和气节。”[140]

“法国人像女人，”回程路上，拿破仑对科兰古说，“你绝不能离开她们太久。”[141] 皇帝完全清楚战败报告在维也纳和柏林会造成什么影响，对他来说，尽快返回巴黎才是正确之举。[142] 大军团残部离维尔纽斯只有一两天行军里程，并且比较安全。[143] 尽管像埃及战局时一样，很多人批评他离开（拉博姆称，士兵们说了“能用我们的语言骂出的最激烈的词语，因为他们从未遇上过如此可耻的背叛”），但拿破仑必须

返回巴黎，以便对付灾难的政治和外交影响。[144] 卡斯特拉内（战局中他一共折损了17匹马）认为军队并不愤怒。“我没有看到那种事，”他说，“虽然经历了灾难，我们对他的信心并未受损。我们只担心他会在路上被俘。”他补充道，军队理解拿破仑的动机，他们“非常清楚，只要他回国就能阻止德意志反叛，重组一支有条件拯救我们的军队也需要他出马”。[145] 从横渡别列津纳河到1813年2月中旬，法军与俄军再无冲突。“当他们知道我在巴黎，”拿破仑评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道，“见我身处国家元首之位，后面跟着120万名我将要组织的士兵，他们在开战前就会三思了。”[146]

拿破仑化名热拉尔·德·雷纳瓦尔（Gérard de Reyneval）伯爵，这显然是科兰古的惯用套路。他从斯莫尔贡出发，经维尔纽斯、华沙、德累斯顿、美因茨（他在那儿给儿子买了些小糖果）到达巴黎，这十三天内，他一共走了1300英里的冬季道路。在华沙，他对普拉特教士说：“从伟大崇高到荒唐可笑只有一步之遥。”[147] 此言恰当地形容了这次战局。携科兰古回国途中，拿破仑反复说这句话，它后来成了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在莱比锡，他会见萨克森国王，用雪橇换了对方的马车。经过爱尔福特时，他还派人向歌德问好。12月18日（周五），离午夜还有一刻钟时，他到达杜伊勒里宫，走下马车。

次日早上，拿破仑开始了整整一天的工作。他对康巴塞雷斯、萨瓦里、克拉克、德克雷说，他在莫斯科花了太长时间等待求和提议的回复。“我犯了大错，”他说，“但我有办法弥补它。”[148] 某侍臣没有出征，他摆出一副“非常忧郁的神情”，评论道：“我们，的确，遭受了惨痛损失！”拿破仑回答：“是的，巴里利（Barilli）夫人死了。”[149] 他提到那位著名的歌剧演员，借此嘲笑侍者对这明显事实的愚蠢评价，但撤离莫斯科的恐怖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的家仆里至少有44人死在撤退途中。



法军在俄损失的著名示意图，**1830～1836**年的路桥总监夏尔**-**约瑟夫·米纳尔（**Charles-Joseph Minard**）作，于**1869**年发布。淡色阴影代表进入俄国的兵力，深色阴影代表离开俄国的兵力。热罗姆国王和达武元帅的部队被派往明斯克和莫吉廖夫，后来在奥尔沙和维捷布斯克附近回归大军，而米纳尔假设他们的部队仍随大军行军。下方与其平行的示意图代表撤退时的气温（单位为华氏度）。

一到达安全地区，大军团官僚体制就变得一丝不苟。某份字迹整洁的150页文件堪称代表性的战争部档案记录，该文件列出1806～1813年第88战列步兵团的1800名官兵，记载了每个人的姓名、编号、出生日期、出生地、父母双方的姓名、出生地所属行政区与省、居住地所属行政区与省、身高、脸型、鼻子尺寸、嘴唇尺寸、瞳色、发色、眉色、特殊体征、开始服兵役日或志愿从军日、到达兵站日、职业、所属连和营的番号、晋升历史、所有行动的细节、伤口、荣誉、退伍日或死亡日。[150] 假如整个半旅参与征俄，翻阅其名册就会看到一页接一页的如下文字：“据推测被敌军俘虏”“被俘”“负伤”“死亡”“住院时死于热病”“住院时死于伤寒”“掉队”“逃跑”“获准离队”“不明”。名册偶尔会记载道，极少数的幸存者中有人“离队休养”，也许记录者希望此人最终能摆脱今人所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151]

拿破仑折损了约524000人，其中有100000人到120000人被俘。俄国

将迅速组建新军对付拿破仑，约20000名非法籍战俘志愿投身其中，尽管如此，接下来几年，很多俘虏都死了，而且滑铁卢会战前，几乎没人返回法国。北岸的麦克唐纳军有32300人，在很大程度上未受损失，但该军士兵有一半是普鲁士人，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摆开阵势来对付拿破仑。施瓦岑贝格的34000名奥军士兵如今亦不可信。从别列津纳河撤至维尔纽斯时，渡过该河的生还者队伍又少了15000人。[152] 12月14日，奈伊最后一个返回涅曼河对岸。那时他身边几乎只有400名步兵、600名骑兵，此外他一共还有9门加农炮。[153] （战局中没有元帅死亡，但有4位元帅受伤。）接下来几周，掉队者三三两两地回来了，不过他们去西边时，不少人被普鲁士村民悄悄地谋杀。现在大军团的核心兵力不到25000人，其中能战斗者仅有约10000人。[154] 哪怕算上麦克唐纳军的法军部队以及来自法国的60000名援军官兵，1812年与1813年之交，拿破仑在波兰和德意志的驻军也会少得可怜，而且他严重缺乏炮兵与骑兵。[155] 很多部队的兵力仅及其编制的五分之一：达武军原有66000人，减至2200人；乌迪诺军起初有47864名有生力量，现在仅4653人尚在；帝国近卫军原有51000人，此时其兵力还剩2000人多一点；27397名意大利人曾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如今只有不到1000人返程（意大利王国近卫有350人，仅8人生还）；荷兰近卫掷弹兵原有500人，仅36人生还。[156] 400名勇敢的荷兰舟桥工兵在别列津纳河拯救了大军，但这批工兵中只有50人回到了荷兰。

1812年12月，缪拉撤离维尔纽斯。后来在当月下旬，立陶宛小说家、贵妇人索菲·德·蒂森豪斯（Sophie de Tisenhaus）在当地与沙皇亚历山大用餐。亚历山大提到了拿破仑的“浅灰色眼睛，它们凝视着你，要把你看穿，让你无法忍受”。沙皇接着说：“他毁了多好的事业啊！他赢取了那么多荣誉，本可赐予欧洲和平，但他没有那样做。诅咒已然破除。”[157] 索菲指出，亚历山大多次重复最后一句话。

---

[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319

[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86

[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708 p.1091，September 10，1812

[4] Palmer，Alan，*Napoleon in Russia* 2003，p.132

[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144，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6] Vaskin，'Three Mistakes of Napoleon'p.1，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pp.26-70

[7]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0

[8]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172

[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0，Olivier，Daria，*The Burning of Moscow* 1966，p.43

[10] 克里姆林宫中，数不清的时钟仍在滴答作响，但酒窖里的部分葡萄酒的确被俄国人掺了酸，导致蒂雷纳伯爵的贴身男仆的嘴唇“严重烧伤”。Merridale，*Red Fortress*，p.212；Bausset，*Private Memoirs*，p.328.

[11]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2

[1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0

[13]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14] Olivier，Daria，*The Burning of Moscow* 1966，p.189，Rostopchine，Fyodor，*L'Incendie de Moscou* 2000，p.103

[15]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0，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24，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6

[16]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18

[17]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6

[1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6

[1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4

[20]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97

[21]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22]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266

[23] Peyrusse，Guillame，*Mémorial et archives de M.le Baron Peyrusse* （Carcassonne）1869，p.97

[24]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25]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2

[26]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12

[27]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1

[28] SHD GR C2/167

[29]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p.93-94

[3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5

[3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6

[3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7

[3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00

[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8

[35] eds. 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p.118

[3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99

[3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731 p.1101，September 18，1812

[3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736 p.1103，September 20，1812

[3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76

[40] ed. North，Jonathan，*With Napoleon's Guard in Russia* 2013，p.37

[41] SHD GR C2/524，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pp.156-7

[42]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61

[4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p.330-31

[44]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10

[45]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5

[46]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pp.89，134-5

[47]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411 p.959，August 5，1812

[4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99

[49]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09

[50]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862 pp.1160-61，October 6，1812

[5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863 p.1161，October 6，1812

[52]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55

[5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p.151-2

[5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152

[55]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36

[5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15

[57] Adlerfeld，Gustavus，*The Military History of King Charles* Ⅶ *of Sweden* 3 vols.1740，Ⅲ p.96n

[5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152

[59]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68

[60]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395，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23，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p.130

[61] 罗马皇帝。——译者注

[62]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Ⅰ p.171

[63]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s.31938，31941 pp.1201-3，October 18，1812

[64]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p.215

[6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958 p.1211，October 21，1812

[66] 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p.184

[67]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3

[68]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132-5，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250

[69]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p.298

[7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253

[71]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19 p.1240，November 6，

1812

[72]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136-8

[73]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p.136-8

[74]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p.138

[75]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1971 p.1219，October 26，1812

[7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59

[77]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5

[78]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6

[79]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89

[80]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93

[81]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95

[82]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18

[83] Wilson，Sir Robert，*Narrative of Event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ussia by Napoleon Bonaparte* 1860，pp.225-60

[84]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163

[85]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New York）1912，p.206

[86] 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p.261

[87] *The Nation*，16/7/1896 p.45

[88] ed. Tulard，Jean，*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p.14

[89] Emsley，Clive，*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p.62，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p.4，53，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p.105-9，Lentz，*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p.271n，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0，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p.120-21，eds. 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88

[90] Dague，Everett，‘Henri Clarke，Minister of War，and the Malet Conspirac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p.10 n.25

[91]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29

[92]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09

[9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285

[94] Guérard，Albert Léon，*Reflections on the Napoleonic Legend* 1924，p.91

[9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p.233-9

[96]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p.93

[97] Wilson，Sir Robert，*Narrative of Event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ussia by Napoleon Bonaparte* 1860，pp.255-60

[98] eds. Hennet，Léon and Martin，le Commandant，*Lettres interceptées par les Russes* 1913，p.319

[99]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26 p.1242

[100]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 （New York）1912，p.224

[101]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105

[102]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404

[10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84

[10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349

[10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07

[106] 当然，他的杜伊勒里宫里根本没那么多钱。

[107]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p.350

[108]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p.89

[109]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0]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Battle of the Berezina* 2010

[111]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33

[11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71 p.1270，November 24，1812

[113] SSaint-Cyr，Laurent 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4 vols.1831，Ⅲ pp.230-31

[114]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5]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 37

[11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Ⅱ p.329

[117]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8]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19]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p.140-45

[120]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56

[121]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p.256-7

[122]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39

[123]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p.38

[124]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58

[125]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46

[126]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p.81

[127] Kiley，Kevin，*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p.196

[128]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79 p.1276，November 27，1812

[129]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60

[130]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p.218

[131]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62

[132]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no.32084 p.1278，November 29，1812

[133] 今马拉泽齐纳（Maladzyechna）。

[13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p.310-13

[135]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56

[136] Namier，Sir Lewis，*Vanished Supremacies* 1970，pp.1-3

[13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64

[138] 原文有误，约克在1814年才被封为瓦滕堡伯爵。——译者注

[139]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p.358-90

[14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 ，1858，24 no.19490，p.430

[141] ed. Hanoteau，Je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Ⅰ p.203

[142]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p.98

[143] Schneid，Frederick C.，‘The Dynamics of Defeat：French Army Leadership，December 1812-March 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issue 1 January 1999，pp.7-8

[144]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 （New York）1912，p.205

[145] *The Nation* 16/7/1896 p.46

[146]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50

[14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195

[14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8

[149]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24

[150] SHD GR21.YC/679

[151] SHD GR21.YC/36

[152] 如何评价1812年战局中拿破仑大军的死亡、受伤或被俘人数？有一个粗略但比较可靠的方法，即只是加总每次行动的战损，并用总损失524000人减去战损总和。从7月9日的第一次行动到11月26日的最后一次行动，大军团参与了46次会战、交锋、小战、包围和伏击，一共有186500人因此死伤。由于还要考虑缺乏明确数据的更次要行动，我们将这个数字四舍五入，算成20万人。这说明，拿破仑大军在俄总损失中，只有不到40%的折损归于重要战斗中俄军正规军的军事行动。这次战局中，士兵的死因还有很多种，如疾病、挨冻、饥饿、农民的行为、自杀等，这些其他因素导致了另外60%的折损。进军莫斯科与撤离莫斯科时，死于其他因素的士兵人数相同。Muir，*Tactics and Experience of Battle*，p.9；Smith，*Data Book*，pp.379-408.

[153] Kiley，Kevin，*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p.293 n.3

[154]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p.ｘｘⅵ

[155] Schneid，Frederick C.，'The Dynamics of Defeat：French Army Leadership，December 1812-March 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issue 1 January 1999，p.12

[156]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14，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 （New York）1912，p.233

[157] ed. Brett-James，Antony，*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1966，p.282

第二十六章 重整旗鼓

如果你的精神不曾历经逆境，后世将无从知晓它的极限。

——1813年3月，莫莱致拿破仑

他能对家庭不幸心生悲悯，却对政治灾难淡然处之。

——1813年7月，梅特涅论拿破仑

“一旦见识了他到巴黎后那二十天的创举，”圣西尔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仓促离开波兰的决定是正确的。”[1] 拿破仑发起了一系列大动作，他明白俄军很快就会与普军合作，还可能同其岳父奥地利皇帝联手，他们会先把法国势力逐出波兰和德意志，然后设法推翻他。拿破仑试图弥补由俄国灾难造成的损失，即将就任司法部长的莫莱伯爵认为，他“表现出极强的活力，也许超越了他之前展现过的所有精力”。[2] 奥尔唐斯赶到杜伊勒里宫，发现她的前继父虽心事重重，但坚决刚毅。“我觉得他疲惫忧虑，但并不沮丧。”她写道，“我经常见他对一些琐事发脾气，比如一扇本该关上的门打开了或该打开的关上了，又如房内照明太亮或太暗，但遇上厄运或困难时，他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意志。”她想稍稍劝慰他，说：“我们的敌人一定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吧？”他回答：“那当然，但这并不能安慰我。”[3]

从1812年12月中旬返回巴黎到1813年4月发动战争，拿破仑在十七周不到的时间里完成下列事务：他将国民自卫军的8.4万名步兵与9000名炮兵编入正规军，征召1809～1812年度兵员10万人与1814～1815年度新兵15万人；他把数十个新半旅改组成30个步兵团，向兵工厂订购15万支滑膛枪；他仔细搜寻各兵站和卫戍部队的多余人员，把1.6万名海军士兵调入陆军，并将海军炮手中的老兵补入炮兵；他对1.2万个帝国行政区下令，让它们各出一人一马；他彻查西班牙常规部队，以便重建帝

国近卫军；他尽一切可能购买或征用马匹，要求盟国重建自己的军队，并创建易北河、莱茵河及意大利观察军。[4]《箴言报》自然说应征新兵是“雄壮战士”，但是有些人仅有15岁。在骑兵竞技场的一次检阅中，莫莱注意到，“新兵们年龄过小，体格瘦弱，周围的人群不禁深深同情他们”。[5]这些年轻新兵绰号“玛丽·路易丝们”，这既是因为拿破仑不在时皇后签署了新兵征兵令，也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不谙世事、面颊光滑的少年时代。牢骚兵还管骑兵叫“骑小公马的鸡崽”。法国新兵来不及操练，所以他们战斗时的机动性大大降低。此后两年，法军之所以采取缺乏创意的正面攻击，原因之一便是需要让训练不足的大群士兵共同行动。

如果拿破仑帝国的统治残暴专制，他在俄国一败涂地后，我们便能期盼忍了最久的欧洲地区率先反抗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813年，法军没有占领的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反叛了，但柏林、勃兰登堡等从1806年开始就被占领的普鲁士地区并无任何动作。[6]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其他大部分德意志地区也是如此，它们或是根本没有反抗拿破仑，或是等待自己的政府宣布反抗，或是静观其变直至联军到来。在法国本土，除了布列塔尼的几次面包暴动以及旺代与南部地区的小骚乱外，反抗直到1813年、1814年甚或1815年才出现。1813年，法国境内大量地区弥漫着强烈的厌战情绪，地方人士也激烈反对征兵，收获季节时反对声尤烈，但法国人并不想赶走正同祖国之敌战斗的皇帝。只有公开谴责拿破仑的人才可能被捕，即便是这一温和的镇压也采用了18世纪的法式古典方式。保王党人夏尔·德·里维埃（Charles de Rivière）“表达自己的希冀时稍显恶意与不成熟”，结果被关进拉福斯监狱，但其友人和萨瓦里玩桌球时为他赢得了自由，于是他获释了。[7]一些心怀抱负的军官甚至希望战争继续。“有件事困扰着我们，”帝国近卫军上尉布拉兹写道，“我们说，假如拿破仑早早结束他的光辉事业，假如他不幸要考虑和平，挥别我们的所有希望。幸运的是，我们的恐惧没有成为现实，因为他取消了我们无法胜任的工作。”[8]

1812年，俄军损失严重，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整场战争中，俄军约有15万人死亡、30万人负伤或冻伤，而平民伤亡远远超出军队伤亡。俄军野战军沦为10万名疲惫之卒。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很多地区都毁灭了，导致俄国国库损失数亿卢布税款。尽管如此，亚历山大仍然一心要消灭拿破仑。1813年年初，四个俄军师渡过维斯瓦河，侵入波美拉尼亚，法军被迫撤出吕贝克与施特拉尔松德，不过他们留下部队防守但泽、斯德丁等普鲁士要塞。根据《1812年奥布条约》，瑞典一直保持中立，但它现在已被贝纳多特掌控。1月7日，瑞典对法国宣战。贝纳多特告诉拿破仑，他这样做不是反对法国，只是为了瑞典，两国关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对方吞并了瑞典属波美拉尼亚。贝纳多特不顾接下来的话多么虚伪，补充道，他对自己的老统帅始终怀有前战友的感情。[9]贝纳多特身为法国人，自然不愿让法国人流血，此外他也明白，对法宣战意味着永远放弃亚历山大之煽风点火的念想，即有朝一日君临法国。

“因为寒季提前，”12月20日，拿破仑对元老院说，“我的军队遭受了损失。”[10]他利用约克的背叛激起爱国义愤，定下招募15万人的目标，还命令地方官组织集会支持他的征兵行动。1月9日，他致信贝尔蒂埃：“我这儿一切都在运作。”[11]一切需要运作起来，因为从1812年圣诞节到1813年1月14日，俄军已经前进了250英里，抵达普鲁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12]。俄军从科夫诺出发，尽管他们还得在北境的凛冬中夺回柯尼希斯贝格等法军要塞。[13]欧仁别无选择，只好退守柏林。

拿破仑谈起俄国败局的严重性时惊人坦率。费恩写道：“他第一个说到灾难，甚至把它当话题。”[14]然而，倘若皇帝愿意承认他的厄运，他也没有一直说实话。“俄军完全不曾缴获大炮或鹰旗，他们只抓到了散兵，”1月18日，他告诉热罗姆，“我的近卫军从未参战，不曾在行动中折损一人，所以它根本不可能如俄军所称的丢了鹰旗。”[15]近卫军鹰旗在博布尔遭焚毁，所以没丢，但拿破仑很清楚克拉斯内会战中近卫军

损失惨重。他也对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VI）说，俄军一门大炮也没缴获。就这一点而言，1812年战局中俄军共缴获了1131门法军大炮。沙皇亚历山大曾计划用这些大炮组建庞大的纵队，但他的设想从未付诸实践，数十门拿破仑的大炮至今仍展示于克里姆林宫。[16]

为了将国内民怨降至最低，1月下旬，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与教皇重新缔结《政教协定》。早在上一年12月29日，他就写道："我们非常渴望消除政府与教会的不合，也许能达成目的了。"此言看来野心勃勃，但不出一个月，双方就签署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广泛详尽，涵盖大部分分歧点。[17]"教皇陛下将在法国和意大利行使教皇权力，"《政教协定》开头写道，"教皇国驻外大使享有外交人员特权……教皇领地中，未被兼并的不用交税，已被兼并的将获总计200万法郎的补偿……教皇将在六个月内为皇帝的大主教辖区建立教会制度。"也就是说，教皇承认皇帝任命的大主教。此外，拿破仑也获准任命10名主教。[18]《政教协定》对皇帝有利，但教皇立刻后悔，试图食言。"你能相信吗？"拿破仑告诉克勒曼元帅，"教皇心甘情愿地签订这份《政教协定》，然而八天后，他却写信给我……急切地恳求我把整个协定当作无效文件。我在回信中写道，因为他是万无一失之人，所以这回他不可能搞错了，而且他的良知太过警惕了。"[19]

2月7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举行大阅兵，随后他召开参政院会议，以便建立君主出征时的摄政制度。马莱阴谋令皇帝不安，他想防止任何人趁他不在时又设法推翻帝国。他也急于确保自己死后人们能承认他的儿子的继承权，就算到时孩子还是婴儿。（和怒斥君主的少年时代相比，他已然变了很多。）康巴塞雷斯起草了一份含19条条款的元老院令，其规定道：若拿破仑死亡，玛丽·路易丝将行权，并听取摄政会议的意见，直到罗马王成年。按照皇帝的设想，康巴塞雷斯将是法国的实权统治者，但玛丽·路易丝将"以她的名义授予中央政府权力"。[20]康巴塞雷斯、雷尼耶、戈丹、马雷、莫莱、拉塞佩德、丹热利、蒙塞、奈

伊、内政部长蒙塔利韦（Montalivet）伯爵以及又被原谅的塔列朗出席了这次摄政筹备会议。莫莱称，“从表面上看来”，拿破仑“冷静自信地面对他将要发起的战役，但他提到战况变迁与命运无常，这让他镇定自若的表情成了假象”。[21] 皇帝命令康巴塞雷斯只“给皇后看适合让她知道的东西”，叫他别向她送每日警务报告，因为“要是和她谈令她担心或污染她思想的事，那没意义”。[22]

2月13日，拿破仑已收到非常不祥的消息——奥地利正在动员至少有10万人的野战军。事后不久，梅特涅提出“靠调停促成”和平处置欧洲的方案，很少有人会指望盟友做出这种事。当日晚餐后，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桌球室与莫莱长谈，坦陈自己对多个问题的看法。他对玛丽·路易丝评价颇高，称她身上有其祖先奥地利的安妮的印迹。他说“她很清楚哪些人曾投票赞成处决路易十六，也知道每个人的生日与记录”，但她从不偏爱旧贵族，也不歧视弑君者。皇帝接着谈到雅各宾派，他说“巴黎有很多”雅各宾党人，“他们特别强大”，但“只要我活着，那些人渣就不敢行动，因为葡月十三日那天那伙人完全看清了我，而且他们也明白，不论何时，我一有麻烦就要立刻打压他们”。[23] 拿破仑知道，“俄国灾难后”自己的外敌与内敌会“大胆得多。我必须再打一仗，战胜那些卑鄙的俄国佬。我们必须把他们赶回边境，让他们决定再也不离开那儿”。[24] 然后，他埋怨元帅们道：“没人能指挥其他人，他们全都只会听我的命令。”[25]

拿破仑对莫莱说，他看好欧仁，尽管此人“仅具平庸才能”。皇帝批评缪拉给孩子写信时“对着信纸号啕大哭”，还说后者从莫斯科撤退时饱受“意志消沉”之苦。

> （与他相反，）就我而言，我花了数年培养自控力，从而防止自己流露真情实感。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世界征服者，指挥当代最大、最强的军队。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想想，我完全保持了镇静，我甚至要说我的高昂精神始终不曾动摇……然而，别认为我的心比其他人的更冷酷。我非常善良，但从最年幼之时开始，我就致力于压抑自己的

> 心弦，如今它已不发一音。假如我将要开战时，有人告诉我，我那爱得发狂的情妇正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会冷淡地回应，但此时我就像承受不住打击一样悲痛……战后若有时间，我会哀悼我的情妇。要是没有这种自控力，你觉得我能取得业已实现的这些成就吗？[26]

对现代人的脾气来说，如此严格地收敛情绪也许惹人厌，但在那个年代，此举被视作古典美德。毫无疑问，它帮助了拿破仑应对命运中的重大挫折。

2月14日，拿破仑在立法院和元老院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明显展示了这种自控力。据一名目击者回忆，他在议员的欢呼声中走上御座台阶，“不过他们的焦虑脸色比他的不知多到哪去了”。[27] 自从拿破仑从他所谓的俄国“荒漠”返回法国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议员们面前做完整讲话。他解释失败的原因时说：“冬季寒流提前到来，冷得超常，导致我的军队损失惨重。”他接着宣布，自己和教皇已然化解“矛盾”，波拿巴王朝将永远统治西班牙，而且法兰西帝国拥有贸易盈余1.26亿法郎，“哪怕海洋遭封锁”。[28] （三天后，蒙塔利韦发布数据，支持皇帝的一切言论，此乃独裁者的惯常做派。）不过，皇帝也说了句实话：“《亚眠条约》破裂后，我曾四次（对英）求和。”他补充道：“我绝不媾和，除非和平是光荣的，并与我的伟大帝国相称。”[29] 十字军东征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一短语就时有出现（诗歌《拉纳之死颂》中亦有此言），但直到1813年，它才因为拿破仑的命令推广开来。[30]

1812年战局摧残了法国财政。直到1811年，法郎对英镑的汇率都是坚挺的，甚至稍有上涨。1810年，预算约有930万法郎的少许盈余，公债利率则为6%，处于可控水平。但在臭名昭著的第29期公报发布后，公债利率从6%激增至10%，这表明民众对拿破仑的未来缺乏信心。此外，1812年预算赤字也高达3750万法郎，只有征收新税、再次出售国有财产才能弥补缺口，但因为所有权太难保障，国有财产出售额只占此前拍卖额的一小部分。政府公开售卖价值3.7亿法郎的国有土地，但仅筹

得5000万法郎，因此销售税得上涨11.5%，土地税得上涨22.6%。[31] 与此同时，拿破仑本人也采取一些节俭措施，他对自己的总管说，他想要“更少的厨师、更少的盘碟，等等。在战场上，就连给我上菜也只能上汤、一道热菜、一块烤肉、蔬菜，不要布丁”。[32] 军官不能再任选葡萄酒或啤酒，他们拿到什么就得喝什么。内政部提议，若拿破仑在位时身亡，就用10%的省长薪水为他操办葬礼，对此他草草批复道：“驳回。为何想方设法花更多钱？”[33] 加泰罗尼亚军团驻地有充足的葡萄酒、白兰地、燕麦、腌肉，于是法国本土不再拨给该军团上述物资。“迪马将军正在搞的都是疯狂交易，”拿破仑论及军务总监的奥德河要塞补给计划时道，“他显然视金钱如粪土。”[34] 俄国战局前，国家建设工程都搁置了，并且再未重启。1813～1814年，尚无迹象表明政府将取消大规模的动员与高昂的军费开支，财政赤字持续攀升。

因为约克将军在陶罗根与俄军签订互不侵犯协议，1813年1月上旬，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便提出将约克送上军事法庭，但他此举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蒂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普军经历了近代化改革，因此拿破仑面对的敌人远非将近七年前他在耶拿击溃的对手了。这个国家改变了，战败是它革新的动力，而它效仿的正是拿破仑的军事管理体系。冯·施泰因（vom Stein）男爵、哈登贝格男爵、冯·格奈泽瑙（von Gneisenau）将军、冯·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将军都主张“理性变革”，它将消除“过时的偏见”，从而重振普鲁士“沉睡的实力”。普鲁士实施重大的财政与行政改革，其内容包括以下措施：废除大量内部关卡税；取消限制性的垄断与惯例；解除农民的世袭奴役地位；打破职业管制、人口流动管制与土地所有权管制。普鲁士创立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调和税收，给予大臣更多直接职责，并撤销了针对犹太人的财产制约、婚姻制约与出行制约。[35]

军事方面，普鲁士有下列举措：整肃高层指挥官（1806年共有183名将军在职，到1812年时只有8人仍在）；向平民开放军官职位；在军

官学校中引入竞争性考试；废除鞭刑；动员国民后备军（Landwehr，民兵）和国民军（Landsturm，后备部队）的成年男性。1813年，普鲁士总人口中有超过10%的人参军，这一比例超过其他国家。在此后两年的持续战事中，普军中开小差者也最少。[36] 普军在将要来临的战局中坐拥优秀指挥官，如冯·比洛（von Bülow）、冯·布吕歇尔、冯·陶恩钦（von Tauentzien）、冯·博延（von Boyen）等将军，这得益于总参谋部的巨大改观。[37] 拿破仑不得不承认，在早期战局之后，普军有了长足进步。他相当粗鲁地说："这群畜生多少学会了点。"[38] 奥斯特利茨会战后，卡尔大公效仿他的许多做派，实施军事变革；弗里德兰会战后，巴克莱·德·托利的不少改革措施也复制了他的举措。普鲁士就像奥俄两国一样，从拿破仑身上学习良多，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宽慰。1812年，欧洲军队已全面采纳军体系，因此联军实施机动时的灵活性大大提高，这是在向法军致敬，但也是在威胁他们。

1813年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与亚历山大签署《卡利什条约》（Kalicz Treaty）。沙皇在条约中承诺道，如果普军出8万人对付拿破仑，他就恢复蒂尔西特会议前的普鲁士疆界，并提供15万名士兵。条约刚刚签订，英国船只就把武器、装备、制服运至波罗的海港口，供普军与俄军使用。欧仁被迫放弃柏林，并留下部队驻守马格德堡、托尔高（Torgau）与维滕贝格（Wittenberg）。俄军野战军已在斯德丁、屈斯特林、施潘道、格洛高、托伦、但泽围攻法军，所以其兵力减至4.6万名步兵与1万名哥萨克，不过6.1万名普军士兵将同他们会合。联军的计划如下：进军德累斯顿，以便从拿破仑手中夺取萨克森；与此同时，大量哥萨克部队将奉命穿过北德意志平原，并设法煽动汉萨城镇与莱茵邦联反叛。

"只要普鲁士城村稍有反抗，就烧了它，"3月3日，拿破仑命令欧仁，"就算是柏林也不例外。"[39] 幸运的是，当日俄军就进入普鲁士首都，所以法军不可能烧毁它了。拿破仑听闻消息后对欧仁大发雷

霆：“你遵循的方向最无军事意义，经验丰富的将军会在屈斯特林前建立营地。”[40] 他接着抱怨道，自己没收到欧仁帐下参谋长的每日报告，“只有英国媒体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拿破仑更生热罗姆的气。幼弟埋怨道，威斯特伐利亚人得交很多税来补给马格德堡等要塞。“战争状态允许我们使用这些方法，自从世界诞生，人们就经常动用它们，”皇帝在一封典型的激烈回信中大发脾气道，“你会看到我放在西班牙的30万人、今年我征募的所有军队、我正在装备的10万名骑兵要花费多少……你总是争辩……你的论证都不讲道理……你的看法错成这样，你的脑子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你要惹恼自己的保护者来满足虚荣心？”[41] 3月4日，拿破仑派兵守卫马格德堡，在这支部队出发前，他同其指挥官过了一遍熟悉的清单。“务必确保每人的脚上有一双鞋子、背包里有两条裤子。务必确保他们按时领军饷，要是未及时发饷，需支付欠饷。保证每个士兵的子弹袋里有40发子弹。”[42]

拿破仑致信蒙塔利韦，称自己将去不来梅、明斯特（Münster）、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和汉堡，但出于新的节俭精神，他在这些城市的寓所和仪仗队“一定不能花费国家的钱”。[43] 然而此举是诡计，旨在欺骗敌军相信他将如此行动。不过幸好他没去汉堡，因为就在3月18日，哥萨克到达汉堡，如联军所愿地促使汉萨城镇起义。梅克伦堡率先叛离莱茵邦联。3月下旬时，情势相当恶劣，以至于拿破仑告诉易北河观察军现任司令洛里斯东，他已经不敢向欧仁写信述说防卫马格德堡和施潘道的计划了，因为他没有密码，而“哥萨克可能截获我的信”。[44] 还有两件更为糟糕的事：如果英国资助瑞典100万英镑，后者就答应出3万人参加第六次反法同盟；4月上旬时，皮埃尔·迪吕特（Pierre Durutte）将军的小股守军被迫放弃了德累斯顿。

与此同时，拿破仑和莫莱谈论恢复1791年的法国战前“旧”疆界的可行性，他说：

> 我的一切都归于我的荣誉，要是我牺牲它，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 我靠荣誉才取得了所有权利……这个国家如此强烈地渴望和平、厌恶战争，假如我让它缔结令我本人蒙羞的和约，它会彻底丧失对我的信心。你将看到我的威望与优势损失殆尽。[45]

拿破仑把俄国灾难比作一场风暴，它撼动了树根，却“未刮走泥土，这棵树会更加牢牢地扎根于这片土壤”。除了暧昧不清的树之比喻，他还讨论了法兰西民族：“比起喜欢我，它更怕我，我的死讯一开始会令它宽心，但是，相信我，如果它喜欢我却不怕我，那要糟得多。”[46]（被喜爱与被畏惧的对比响应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非常熟悉这本书。）拿破仑接着说，他会战胜俄军，原因是“他们没有步兵”，而且他将把奥德河定为帝国疆界，因为“普鲁士背叛了，我会寻求补偿”。他也认为奥地利不会宣战，理由是：“婚姻是我的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举措。”[47]至少在论述最后三点时，他显然是在努力振奋莫莱的情绪，并未真正考虑现实事态。

拿破仑从俄国回来后，其军队的核心部分仅剩1万名有生力量，但他仍在四个月内投入15.1万人参加易北河战役，另有大量士兵正开赴战地，这既可说明他多么擅长重整旗鼓、多么足智多谋，也可体现他依然具备怎样的自信。[48]4月15日凌晨4点，他离开圣克卢宫，奔赴战场。随行人员有丹麦国王、符腾堡国王、拜恩国王、萨克森国王、巴登大公、维尔茨堡大公这些盟友，尽管其中有些人态度比较勉强。“每周给弗朗索瓦（François）[49]爸爸写一封信，”三天后，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给他寄军事详情，告诉他我对他的爱。”[50]西班牙的威灵顿正在进攻法军，缪拉与奥地利商谈那不勒斯事务，贝纳多特将率瑞典军队登陆，西德意志有反叛的忧患，而且奥地利正迅速重整武装，至多提供“调停”。在此态势下，拿破仑明白，他需要迅速打出决定性大捷。“我会去美因茨，”3月，他致信热罗姆，“假如俄军前进，我会制订相应计划，但我们迫切需要在5月前取得胜利。”[51]4月，库图佐夫去世，此后维特根施泰因指挥联军。联军在莱比锡附近集结，已聚集10万人，其中3万人是配有良马的骑兵，而且他们还有大量增援力量。相形

之下，因为上一年在俄国的集体湮灭，法军匆匆组建的大军团中只有8540名骑兵。

4月25日，拿破仑到达爱尔福特，接过军队指挥权。他惊讶地发现，有些军官严重缺乏经验。他调走第123、第134战列步兵团的上尉，任命他们为第37轻步兵团少校，并冲战争部长亨利·克拉克将军抱怨道："让没打过仗的人当上尉是荒唐行径……你带走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甚至没上过圣西尔（Saint-Cyr，军校）的年轻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你竟然就把他们招进新的团里！"[52] 可是拿破仑在俄国折损了50多万人，因此克拉克只能从这些人选中挑人。

抵达目的地后，拿破仑在三天内率领法军渡过易北河，进入萨克森，其兵力共计12.1万人。他打算收复北德意志，并解除对但泽等城市的包围，以便救出5万名老兵，他还盼着打回维斯瓦河一线。拿破仑准备对付莱比锡的敌军，他采用营方阵编队：洛里斯东军充当前卫，走在最前面；麦克唐纳军和雷尼耶军位于左翼；奈伊军与亨利·贝特朗将军的军位于右翼；马尔蒙军组成后卫。拿破仑左侧的欧仁还有5.8万人。5月，波尼亚托夫斯基归队，但皇帝任命达武为汉堡总督，没有充分利用他麾下最好的元帅，这是个危险举动。

5月1日，贝西埃出去侦察敌军阵地。一发加农炮炮弹击中墙壁后反弹，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贝西埃胸口，致他身亡。博塞写道："这位卓越人物的噩耗狠狠打击了拿破仑。"从1796年开始，贝西埃参加了拿破仑的所有战局。"我深深地信任你，"拿破仑曾致信贝西埃，"如同我深深地欣赏你的军事才华、你的勇气、你对秩序和纪律的热爱一般。"[53]［为了安抚皇后，他要康巴塞雷斯"让她明白，伊斯特拉公爵（贝西埃）遇难时离我很远"。[54]］此刻，他致信贝西埃的遗孀："你和你的孩子无疑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对我来说，这一损失更深重。伊斯特拉公爵之死最为壮丽，而且他没受苦。他留下了无可挑剔的身后名誉，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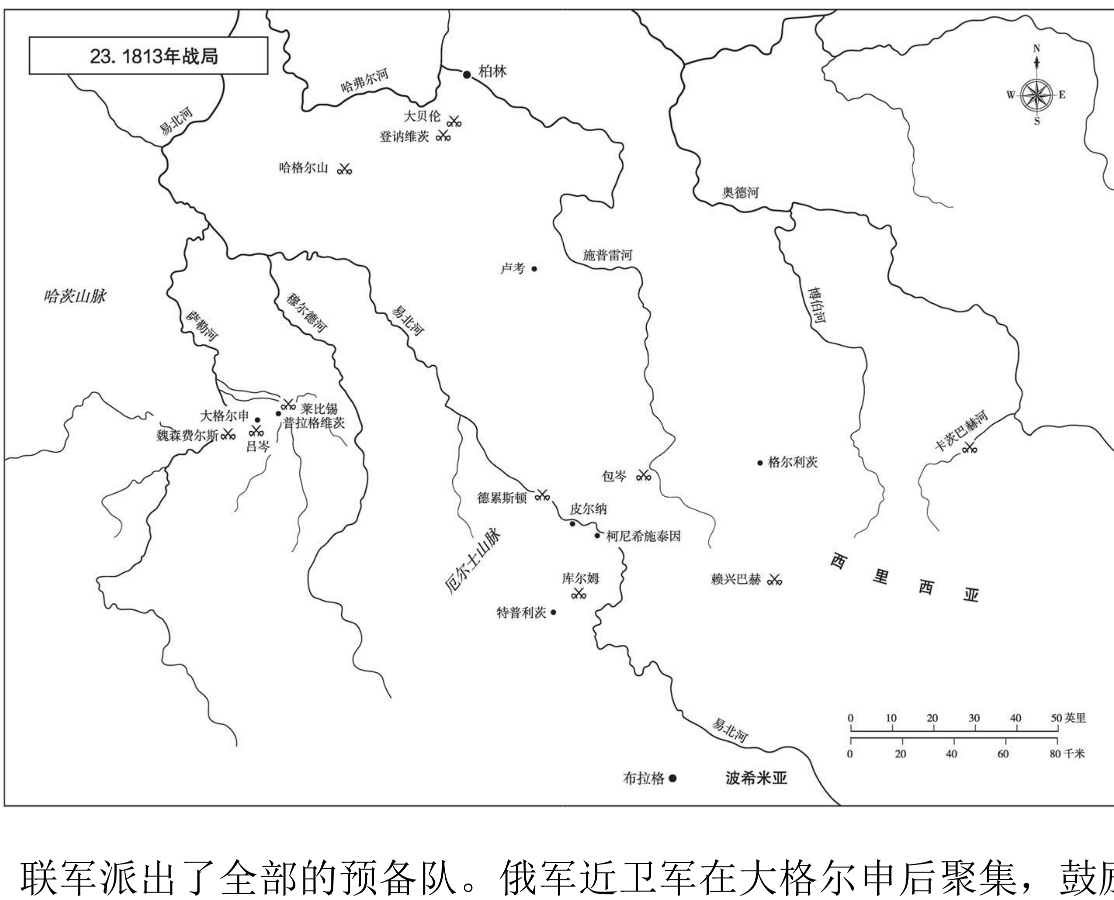
他能给孩子们的最好遗产。”[55] 她也许能理直气壮地同他争辩谁的损失更大，但不管怎么说，他写了封诚挚恳切的信，还附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

现在，拿破仑面对的敌军共有9.6万人。[56] 5月2日（周日），他看着洛里斯东前进，这时他听说，当天上午10点时维特根施泰因在吕岑村附近奇袭奈伊。他专心听加农炮连续轰鸣，命令奈伊守住阵地，并调转军队：贝特朗和麦克唐纳实施教科书般的军级机动，分别进攻敌军左右两翼，洛里斯东则组成新预备队。[57] “我们没有骑兵，”拿破仑说，“没关系。这将是埃及式会战，任何地方有法军步兵就够了，我并不害怕屈从于年轻新兵的内在资质。”[58] 很多新兵到爱尔福特后第一次领到滑膛枪，而那时离开战仅剩几天了，还有人会战日前一天才拿到枪，[59] 然而，“玛丽·路易丝们”在吕岑表现得不错。

下午2点30分，拿破仑来到战场，他走在近卫骑兵前头，驰往卡亚村（Kaja）。他迅速拟定计划：奈伊继续守中路，与此同时，麦克唐纳从其左侧奔来，马尔蒙保护其右侧，博内（Bonnet）则设法从魏森费尔斯-吕岑（Weissenfels-Lützen）公路绕到敌后。14100名近卫步兵留作预备，他们在视线外集结，并在吕岑和卡亚之间布阵。奈伊军的一些年轻士兵退向后方，有人甚至扔掉了滑膛枪，拿破仑看见后便让近卫骑兵排成行拦下他们。他鼓动并劝说这些人，直到他们返回队伍。总的说来，奈伊却告诉拿破仑，他认为新兵比老兵打得好，因为老兵常常计算行动的可行性，以便减少风险。《箴言报》随后报道：“我们的年轻战士不惧危险。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他们彰显了法兰西血脉的无上崇高。”[60]

会战地中心为大格尔申（Gross-Görschen）、卡亚、拉那（Rahna）、小格尔申（Klein-Görschen）这四个村庄。沙皇和弗里德里希·威廉都在战场，不过联军总司令维特根施泰因制定一切重要军事决策。沙皇派出俄军骑炮兵。每个村子都数度易手，里卡尔师的战斗便停

滞不前。奈伊在前线负伤，苏昂师所有的高级军官非死即伤，唯独他本人安然无恙。维特根施泰因的预备队逐渐耗尽，他也发现法军每小时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但他选择再次攻击卡亚。傍晚6点，拿破仑断定马上就该发动最后一击了。德鲁奥率近卫炮兵的58门大炮上前，加入大炮群，因此198门大炮可炮轰敌军中路。在博罗季诺会战中，拿破仑未让近卫军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回他吸取了教训，命令莫尔捷带青年近卫军（四个纵队，共9800人）发动进攻，老近卫军的六个营组成四个方阵，支援他们。近卫骑兵的两个师（共3335人）在青年近卫军后面排成横队，他们一边高喊“皇帝万岁！”，一边前进，从拉那冲向大格尔申。与此同时，博内师开始从施塔西德尔（Starsiedel）发动进攻，而莫朗师继续从西边策动攻势。



联军派出了全部的预备队。俄军近卫军在大格尔申后聚集，鼓励撤退的联军队列集结。夜幕降临，五个燃烧着的村庄照亮了黑夜，法军重新发动进攻，继续扰乱敌军。联军的骑兵数量远远超出法军的，但他们

未能利用这一优势，在会战后秩序井然地撤走。拿破仑胜利了，但他遭受了重大损失：2700人死亡，多达16900人受伤。俄军与普军的战损同法军的相当（尽管他们只承认折损了11000人）。拿破仑无法实施骑兵追击，在整个1813年战局中，这都是个大问题。然而，他的确开始收复萨克森与易北河西岸。战后他对科兰古说，“我的鹰又成了凯旋之鹰”，然后补充了一句不祥之言，“但我的星星正沉向地平线”。[61]

“我特别累，”当晚11点时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彻底战胜了亚历山大皇帝与普鲁士国王的俄军和普军。我损失了1万名死伤者。我的士兵身环荣誉，用触及我心的方式证明对我的爱。吻我的儿子。我非常健康。”[62] 他还致信岳父，称玛丽·路易丝“继续给予我极大快乐。现在她是我的首相，我非常满意她的履职表现。我不希望陛下不知道此事，我清楚它会令她的父辈之心多么愉快”。[63] 拿破仑迎合弗朗茨身为父亲的骄傲，此举显然旨在阻止对方同自己的敌人联手。他刚好能应付俄国和普鲁士，但若奥地利加入它们，他取胜的机会将大大减少。

拿破仑在战后公报中激动地说：“士兵们！你们让我满意，你们实现了我的期望！”然后，他奚落亚历山大，提起“弑父阴谋”与俄国的农奴制：“这些鞑靼人应该再也不离开自己的可怕地区，我们要把他们赶回那儿。让鞑靼人待在他们的冰封荒原，在那里，奴隶制、野蛮与腐败盘踞，人类沦落到和野兽一般无二。”[64]

联军排成两路大纵队（一路大都是普军士兵，一路大都是俄军士兵），撤回易北河对岸，而法军只能用步兵的速度追赶他们。普军自然想退往北方，以便保护柏林，而俄军想去东边掩护贯穿波兰的交通线。维特根施泰因仍在找机会攻击法军侧翼，还猜到了拿破仑打算夺回柏林，于是他在包岑附近聚集军队。包岑距奥地利边境仅有8英里，维特根施泰因可在此地掩护柏林和德累斯顿。

5月8日，拿破仑到达德累斯顿，在那待了十天。他得到了青年近卫

军的一个师、老近卫军的四个营，把萨克森军队编入大军团的一个军，并派欧仁去意大利，以防奥地利入侵。此外，他确立了三条通往法国后方的独立交通线。“我有理由喜欢奥地利的盘算，”他告诉克拉克，“我不怀疑它的条款，然而我的意图将处于和它无关的立场。”[65] 此乃明智政策，但在德累斯顿市民代表欢迎拿破仑时，他发火了。他对代表们说，他知道联军占领德累斯顿时他们曾为之提供帮助。“你们的女仆在君主脚下铺撒鲜花，现在这堆花仍然丢在你们的街道上，你们的房子也照样挂着花环碎片，”他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忽视这一切。”[66]

拿破仑随后干了一桩他往往能做出的惊人之举。他致信前首席情报官富歇，指示对方尽快悄悄赶往德累斯顿，以便等普鲁士失陷后立刻管理该国。“在巴黎的人不可知晓此事，”皇帝告诉富歇，“你必须装出要去参战的样子。只有摄政皇后知道你离开。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召你承担新职责，并见你依恋我的新证明。”[67] 富歇与英国秘密和谈后突然被解职，从那以后，他对拿破仑再无依恋之情，次年之事会证明这一点。由于军事形势，富歇从未掌管普鲁士，但就像对待塔列朗一样，拿破仑已无法分辨谁支持他、谁反对他，或者说，他太相信自己的权力，以至于不在乎。他能信赖的忠实顾问圈子正在缩水。

奥地利正在武装起来，而且看上去比往日更加好战，这个消息令拿破仑忧心。他经常致信玛丽·路易丝，叫她在父亲面前说情。举个例子，5月14日，他写道：“人们力图误导弗朗索瓦爸爸。梅特尼克（Metternik，即梅特涅）纯粹是阴谋家。”[68] 三天之后，他致信弗朗茨本人，称对方为“兄弟和我亲爱的岳父”。此信开头写道，“没人比我更热盼和平，我答应启动全面和谈、召集会议”，但是，“像所有热血法国人一样，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接受条件，我宁愿握剑战死也不投降”。[69] 与此同时，拿破仑派科兰古向沙皇求和，说：“我打算为沙皇造一座金桥 [70] ……你必须在此基础上设法和他直接谈妥。”事到如今，皇帝还相信两人能重归于好。“一旦对话开始，”他说，“我们总能在结束时达

成共识。”[71] 当科兰古到达联军司令部后，沙皇却只肯当着普鲁士国王、奥地利大使、英国大使的面接见他。

5月18日下午2点，拿破仑离开德累斯顿，他要去施普雷河（the Spree）上的设防城镇包岑进攻联军主力。人们难以根据次日他写给玛丽·路易丝的信猜到这一点。此信称：“这个季节，蒙莫朗西山谷（valley of Montmorency）非常秀丽，但我猜，6月初樱桃成熟时它最宜人。”[72] 当日，他命令意大利的欧仁“立刻忙于组织你的六个团。首先，你要让他们穿上短外套、裤子，戴上筒帽……”欧仁的女儿、洛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的约瑟芬现年6岁，拿破仑特地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地区为她创立加列拉（Galliera）公国，他给欧仁的另一封信详细解释了小约瑟芬将如何获得加列拉的收入。[73]

联军约有9.7万人，他们退往俯瞰包岑的低矮丘陵上。联军修筑野战工事，迅速改善了这一天然的牢固阵地。报告皆表明敌人欲在此立足，这正中拿破仑下怀。拿破仑共有9万人：贝特朗军、马尔蒙军、麦克唐纳军的6.4万人直面敌军，乌迪诺军和帝国近卫军提供支援。联军已在山上建了11座多面堡，也在城里造了一些，他们的第二道防线上还有3个设防村庄。然而，联军的北部侧翼敞开了，这是个危险迹象，而拿破仑就打算派奈伊军和洛里斯东军去北边。到会战结束时，他调动的总兵力将达到约16.7万人。军官们告诉他，他们要对付一些曾在弗里德里希大王麾下作战的普鲁士军团，他便明确指出：“不错，但弗里德里希已经不在了。”[74]

1813年5月20日（周四），乌迪诺猛攻联军左翼，包岑会战随之爆发。奈伊指挥的大军团侧翼部队扩充至约5.7万人，拿破仑等待他们前进至阵地，然后他要给敞开的联军右翼决定性一击，将对方赶入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 mountains）。第一日，计划进展相当顺利，因为沙皇

犯了个错，他正如拿破仑所愿，把大部分联军预备队投入左翼。次日，拿破仑确信奈伊和洛里斯东会投身战场，打赢这场会战。乌迪诺再度猛攻联军左翼。麦克唐纳和马尔蒙进攻中路，等到拿破仑认为时机恰当时，他派出帝国近卫军。可是一道令人迷惑的命令让奈伊停留了一小时，结果他来迟了，此时联军已察觉险情，于是退往安全地带。伤亡人数可体现出这场战斗的残酷性：法军有2.1万人死伤；联军得益于牢固的防御工事，其损失只是法军战损的一半。因为缺乏骑兵，拿破仑还是不能让战术胜利发挥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我今天打了一仗，”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占领了包岑。我赶走了俄军与普军……这仗打得不错。我很不好，这天我湿了两三回。吻你，请你替我吻儿子。我身体不错。我没有失去任何重要的人。我认为自己损失了3000名死伤者。”[75] “我身体不错”紧跟在“我很不好”后面，这暗暗表明，现在他写下这一讯息不过是本能使然。

拿破仑说他没失去任何重要的人，但这封信写完后才过几小时，他最亲密的友人弗柳尔（Frioul）公爵热罗·迪罗克就中弹了。当时是5月22日，双方在赖兴巴赫（Reichenbach）交战，拿破仑和迪罗克待在俯瞰下马克斯多夫（Nieder-Markersdorf）的小山上。一发加农炮炮弹掠过皇帝面前，击中了迪罗克，他的肠子都被炸出来了。《箴言报》称，拿破仑对友人说：“迪罗克，死者有灵，你会在幽冥等我来。”据说，迪罗克的答复为“是的，陛下，等你实现祖国的所有愿望后，我们会重逢”云云，然后他又说：“啊，陛下，你走吧，你看到我会心痛。”[76] 一年后，拿破仑谈起当时的真相，承认道：“我眼看着他的肠子流出来，他不断冲我喊，要我了结他的痛苦。我对他说：‘朋友，我同情你，但我没法救你，你只能忍到最后。’”[77]

迪罗克能解读拿破仑的情绪，辨明他是真怒还是佯怒，失去了这样的朋友之后，拿破仑在情感和政治上立刻遭遇毁灭性打击，何况1813年

春天时，他急需明智公正的顾问。“昨天一整天，我深深哀悼弗柳尔公爵之死。”次日，皇帝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和他做了二十年朋友。我从来没有抱怨他的由头，他给我的全是安慰。他的离去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我在军中遭受的最大损失。”[78]（皇帝立遗嘱时还惦记迪罗克的女儿。）“弗柳尔公爵之死令我心痛，”几周后，拿破仑致信儿子的保姆孟德斯鸠夫人，“这是二十年来他唯一一次没猜中该如何取悦我。”[79]如今，皇帝已在战场上挥别很多友人及亲密战友，这份亡者名录令人悲伤。米龙死在阿尔科莱，布吕埃斯死在尼罗河，卡法雷利死在阿克，德塞死在马伦戈，克洛德·科尔比诺死在埃劳，拉纳死在阿斯佩恩-埃斯灵，拉萨尔死在瓦格拉姆，贝西埃死在吕岑会战前一天，现在他最好的朋友迪罗克又死在赖兴巴赫。迪罗克还不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人。

法军在吕岑和包岑取胜后，拿破仑遂能控制萨克森全境与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但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6月4日，他只好接受临时停火协议。起初，双方打算让《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Armistice of Pläswitz）维持至7月20日。“两件事导致我如此决策，”拿破仑告诉克拉克道，“一是我缺乏骑兵，无法实施强力攻击；二是奥地利敌视我。”[80]他的战争理念是迅猛奔袭，并一直保持主动权，接受停火协议完全有违这一点，不是他的风格。（事实上，波旁王朝的情报人员给他起的代号是“激流”。）拿破仑后来承认，联军比他更有效地利用了《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规定的停火时间，他们几乎增加了一倍兵力，并强化了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的防务。英国也趁此时组织签订《赖兴巴赫条约》，根据这份条约，它慷慨资助俄国与普鲁士700万英镑，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一笔资助款。[81]然而，科兰古（他已接替迪罗克的职责，担任顾问与宫廷司礼官）和贝尔蒂埃都赞成停火，只有苏尔特认为这是个错误。

这一时期，拿破仑急需完成下列事务：训练、重组、支援他的部队，特别是骑兵；在易北河渡口筑防；再补给军火和食物库存。“必须把士兵的健康置于经济计算等一切事之上。”他试图购置200万磅大米，

对达吕说：“大米是预防腹泻与痢疾的最佳渠道。”[82] 整个休战时期，他办公的速度像平常一样疯狂。6月13日，他在马上待了一下午，结果中暑了。拿破仑需要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劝说奥地利不向自己宣战。停火期间，梅特涅分别派施塔迪翁伯爵和布勃纳（Bubna）伯爵去盟国和拿破仑那儿，以便商讨法军撤离德意志、波兰和亚得里亚海之事。梅特涅要求各国在布拉格开会，并商讨媾和事项，但拿破仑担心那只是奥军加入联军的借口。会议也将讨论法军撤出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事宜。

拿破仑愤怒地发现，奥地利是要一仗不打就从他手中取走伊利里亚。“如果有可能，我想等9月时再猛攻，”他写道，“所以我得处于可以打击敌人的位置，越远越好。那样的话，当奥地利发觉我能如此行动时，它将……直面自己那虚伪荒唐的借口。”[83] 然而，他也对费恩承认道：“假如盟国并非诚心求和，这次停火对我们来说可能非常致命。”[84] 不过，拿破仑并非一直忧郁，他得知玛丽·路易丝在床上接见同性恋康巴塞雷斯时，便告诉她：“我求你了，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床上见任何人，只有30岁以上的人能这么做。”[85]

拿破仑的一些元帅主张道，要是停火协议废止，法军就撤回莱茵河，但皇帝本人指出，这意味着永久放弃奥德河、维斯瓦河、易北河上的要塞以及丹麦、波兰、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这些盟国。“上帝啊！”他说，“你们的聪明才智呢？十场败仗也难以让我退到那儿，你们却叫我立刻过去！”元帅们提醒他别忘了通往德累斯顿的漫长交通线，他则说：“当然，你们不用轻易拿行动路线冒险，我知道，这是常识规则和基础工作……但重大利益瓦解之刻，有时人就必须为胜利牺牲，不惧破釜沉舟！……假如战争只是不冒任何风险的艺术，庸才也可摘取荣誉。我们需要全胜！”[86]

拿破仑打算利用德累斯顿的地理环境，他对费恩说：

> 我将以德累斯顿为枢纽实施机动，从而应对所有攻击。在柏林和布拉格之间，敌人从外围出现，而我占据中央。在敌军必须循着的轮廓线上，他们的最短交通线变得更长。我的话，靠一些行军就能让自己和预备队去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可我不在时，我的部将们得明白，他们绝不能碰运气，必须等我到达……联军可以长时间跟上如此广泛的行动吗？至于我，早晚有一天，我可以趁他们的某次错误调动时发动奇袭，难道我的盼头不理智吗？[87]

拿破仑的推断有理，但是，这种策略完全仰仗他本人的明智判断以及内线机动。

有些法军高级指挥官争辩道，俄军可能让轻骑兵渡过易北河甚至莱茵河，拿破仑遂反驳道：“我等着了，我有东西对付他们。撇开美因茨、韦瑟尔（Wesel）、爱尔福特、维尔茨堡的大批守军不算，奥热罗正在集结美因河（the Main）观察军。”“只要一场胜仗，”他补充道，“我们就能迫使联军求和。”[88] 在早年的军事生涯中，拿破仑的胜利确实会很快带来和谈，如今他却犯了个核心错误——他以为还能靠那一套实现和平。现在，他的敌人像他自己一样意志坚决，不久前他们还下定决心，非要强迫他投降。萨瓦里再次告诉他，巴黎人民非常渴望和平。“你老是跟我说有必要媾和，搞得我心烦。”6月13日，他回复萨瓦里道，“没人比我更关心媾和，但我不会达成屈辱和平或者不出六个月就让我们再开战的和平。不要回信，这些事和你无关，别插手。”[89]

6月19日，塔尔马与其十年前的情妇、艺名为乔治小姐（Mademoiselle George）的玛格丽特·魏默尔（Marguerite Weimer）以及另外15名演员到达德累斯顿。没有迹象表明拿破仑特地叫玛格丽特·魏默尔来，但他似乎很感激剧院提供的消遣活动。“拿破仑的口味变了很多，”侍从博塞回忆道，“此前他一直喜欢悲剧。”[90] 现在，他只让剧团表演喜剧以及表现近距离观察到的“行为与人格刻画”的戏剧。也许到那时候，他已经看够了真实悲剧。

接下来的这一周，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今天下午梅特涅到了

德累斯顿。我们会看看梅特涅要说什么，弗朗索瓦爸爸又要什么。他仍然在波希米亚增兵，我则增加我在意大利的军队。”[91]

1813年6月26日，拿破仑与梅特涅在德累斯顿马科利尼宫（Marcolini Palace）的中华室（Chinese Room）会面，谈了八小时（有的版本为九个半小时），要想知道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得靠猜测，因为当时只有他俩在场，而且两人的说法截然相反。在相关记述中，最不可靠的当属数十年后问世的梅特涅回忆录，但若比较此书与其他可得的资料，如当日梅特涅致弗朗茨的简短官方报告、两日后梅特涅致其妻埃莱奥诺蕾（Eleonore）的信、当时拿破仑告知科兰古的情况、1824年马莱对费恩的陈述、拿破仑在生命还剩六周时对蒙托隆伯爵说的话，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次颇能决定欧洲命运的高峰会见中发生了何事。[92]

上午11点刚过不久，会谈开始。拿破仑想吓唬欧洲最冷静的政客梅特涅，以让对方放弃奥地利的调停计划。他觉得自己可以说服梅特涅返回法国阵营。相形之下，梅特涅则执意靠和谈缔结全面覆盖德意志、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未解决的领土问题的和平协议。两人的视角大相径庭，这是会谈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外交官梅特涅曾与法国议定拿破仑的婚姻，维也纳人士便认为他亲法。大军团在俄国崩溃时，他（至少当众）面露忧色。拿破仑日后指责梅特涅对和约确切条款含糊其辞，真是这样吗？或者说，他是故意玩拖延战术，好让祖国重整武装？他是否想让拿破仑看上去丧失理智，明知某事完全超出对方的接受范围还把它列入条件？抑或他真的想媾和，但又认为只有在欧洲各地的法军大规模撤离后和平才有保障？梅特涅向来反复无常，他很可能被一堆不断变化的要素驱使，这个要素集合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多个动机。梅特涅肯定认为，他在德累斯顿之时，大陆命运的主宰不是拿破仑，而是他自己。“数月前，我独自为欧洲定好轴线，那时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的想法是琐碎愚念或浅薄幻想，”他对妻子自夸道，“现在，我让整个欧洲围绕

着那轴线旋转。”[93]

关于会谈的各种叙述有多处矛盾。拿破仑承认，他一度把帽子扔到地上。梅特涅则告诉妻子，拿破仑扔了“四回”，他把帽子“……丢到屋角，像魔鬼一样咒骂”。[94] 费恩说，会面结束时拿破仑答应参加布拉格会议。梅特涅则说四天后他才同意，当时自己正要乘车离开德累斯顿，而他钻进了马车。梅特涅称，自己警告拿破仑说“陛下，您输了！”，而对方则指责他收钱替英国人办事。[95] 拿破仑的最后一句话是句蠢话，临终时，他承认自己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把梅特涅变成了“不共戴天之敌”。[96] 当时，差不多话一出口他就设法弥补失误，假装那只是个玩笑。两人似乎彬彬有礼地结束了会谈，但梅特涅开始确信（或者说，他声称自己开始确信）拿破仑冥顽不灵、执意一战。

“你忘了过去的经历，”拿破仑对梅特涅说，“我三次赶走弗朗茨皇帝，坐上他的宝座。我承诺永远与他和平共处，我娶了他的女儿。那时我对自己说，你在干蠢事，但木已成舟，现在我后悔了！”[97] 拿破仑随后跑题，他谈论奥军的兵力和战略，并吹嘘道，他对其部署了如指掌，所掌握信息细至“你方军队中那些鼓手”。为了证明他的谍报网工作多么厉害，两人返回他的书房，接下来一个多小时，他们挨个浏览纳博讷的间谍送来的奥军各团每日清单。

梅特涅提出，法军士兵“年纪轻轻”，据说拿破仑打断了他：“您不是军人，不懂军人心思。我在战场上长大，像我这样的人，死一百万人也不太在乎。”[98] 梅特涅在回忆录中写道：“拿破仑当时说的话恶劣得多，我不敢写下来。”拿破仑因百万生命之谈被狠批，人们认为此言明摆着证明他根本不关心士兵，可语境是关键之所在。当时他拼命想办法让梅特涅相信，除非和约条款适当，他非常乐意重回战场。拿破仑的这句话常被当作无情讥讽之论，然而，就算他真的说过，它也只是吓唬人的狂言。

梅特涅主张的和平条件远远超出把伊利里亚还给奥地利。他似乎提出了下列要求：半个意大利和整个西班牙实现独立；普鲁士收回《蒂尔西特条约》割让的几乎全部领土，包括但泽；教皇返回罗马；拿破仑卸下莱茵邦联保护人的身份；法军撤离波兰与普鲁士；汉萨港口取得独立；华沙大公国就此废止。有那么一会儿，拿破仑在挨着书房的地图室里喊道，他不介意放弃伊利里亚，但其他条件门儿都没有，这声音响到他的随员都听见了。[99]

梅特涅的要求实际上是恢复法国的战前边界，而拿破仑多次告诉自己的宫廷，如果他签署“屈辱”和约，让法国恢复旧疆界，法兰西人民就会推翻他。皇帝的警务报告常常指出，比起荣誉（la Gloire），法国人显然更想要和平，但他清楚国家荣誉是支持自己统治的四大重要柱石之一，其他三个则是国有财产权利、低税、集权政府。或许梅特涅诚心渴望和平（不过通常说来，“梅特涅”和“诚心”这两个词最兼容时也只是不和谐地搭在一起），但他索要的对价明显太高昂了。

“我和梅特涅的谈话又长又累，”次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希望能在几天内议和。我想要和平，但和平必须光荣。”[100] 同日，奥地利与普鲁士、俄国秘密签订又一份《赖兴巴赫条约》。奥地利在条约中承诺，要是拿破仑拒绝布拉格会议的和平条款，它就对法国宣战。此举当然导致普鲁士和已经变成法国死敌的俄国增加条件。

6月30日，拿破仑再次召见梅特涅。这回他们谈了四小时，把停火时间延长至8月10日。布拉格会议开幕日定为7月29日，拿破仑同意届时接受奥地利在会上的调停。“我觉得，”会面后，拿破仑告诉妻子，“梅特涅是个阴谋家，非常严重地误导弗朗索瓦爸爸。”[101] 他批评道，假如弗朗茨皇帝对女婿开战，那将“有违人性”，但是在1807年[102] 时，他自己也曾要求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对其女婿葡萄牙国王开战，所以他的理由不太站得住脚。

6月21日，威灵顿在西班牙北部的维多利亚大败约瑟夫及其参谋长儒尔当元帅，约瑟夫损失了8000人和几乎所有西班牙王家艺术藏品。今天，这些艺术品展示于伦敦阿普斯利邸宅，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滑铁卢展馆则陈列着儒尔当的镶金蜂红色天鹅绒元帅权杖。7月2日，维多利亚会战的消息传来，严重削弱了拿破仑在将要召开的会议中的地位。皇帝称，维多利亚会战的败因是“约瑟夫睡了太久”，此乃荒谬之言。[103] 与此同时，他致信玛丽·路易丝，说约瑟夫“不是个军人，什么也不知道”，不过这话不禁引人思考为何他要让哥哥统帅47300人去对付马尔伯勒之后最伟大的英国军人。[104] 因为在西班牙的灾难，兄弟俩的感情与信任几乎完全破裂，他们都把责任算到对方头上。五天之后，拿破仑告诉玛丽·路易丝，如果约瑟夫常住瓦兹河（the Oise）岸边他那可爱的莫特方丹城堡与其小岛、橘园、大鸟舍、两座公园以及全欧洲风景最美丽的一些花园，则“他必须使用化名，而你一定要忽视他。我不要他干涉政治，也不允许他在巴黎策划阴谋”。为了保护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蒂安，拿破仑命令苏尔特接手约瑟夫麾下溃败的军队，并让卓越干将奥诺雷·雷耶（Honoré Reille）、贝特朗·克洛泽尔（Bertrand Clauzel）、埃尔隆伯爵让·巴蒂斯特以及奥诺雷·加赞任其主要副手。

7月12日，俄军、普军与瑞典军的总参谋部在特拉申贝格（Trachenberg）[105] 协调战略，以防布拉格会议失败。从领导人的表现来看，这一回，他们难得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联军指挥官明白，拿破仑常常包抄敌军侧翼，然后痛击中路，于是他们采纳奥军将领约瑟夫·拉德茨基（Joseph Radetzky）的战略：全军分成三个军团后进军萨克森，不给拿破仑本人开战的机会，而是在他面前撤退，并集中兵力攻击其部将的弱势部队。要是拿破仑进攻一个军团，另外两个就攻其侧翼或后方。这个主意将迫使他从下列三种决策中选择：采取守势；敞开交通线；分散军队。[106] 联军制定的特拉申贝格战略明确地旨在制约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它将产生巨大的威力。

7月29日，布拉格会议终于召开，科兰古和拿破仑代表法国出席。当时，皇帝对费恩说：

> 俄国有权获得对其有利的和平，它打了两年仗，首都丢了，省份毁了，而它将用那一切换来这种和平。相反，奥地利不配得到任何东西。在当前形势下，我不反对可让俄国增光的和平，但奥地利背叛了我们的同盟，我的确不愿见它摘取平定欧洲的果实与荣誉，把它们当作背叛罪行的奖励。[107]

拿破仑认为弗朗茨和梅特涅正在策划背信弃义之事，他不想为此给他们好处。收到间谍的情报后，他在8月4日警告元帅们："布拉格会议上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们不会得出任何结论。联军想在10日打破停火状态。"[108]

8月7日，梅特涅提出下列要求：重新瓜分华沙大公国；解放汉堡（停火协议签订前，达武占领了汉堡）；但泽和吕贝克成为自由城市；以易北河为界重建普鲁士；割让伊利里亚（包括的里雅斯特）给奥地利。[109] 如果执行梅特涅的提案，那么此前七年的战事就付诸东流，联军会陷入尴尬境地，成千上万牺牲者的血也白流了，尽管如此，那个年代的其他政客几乎都会答应这些条件。然而，法兰西皇帝、恺撒与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完全不能接受他眼中的屈辱和平。

---

[1] Saint-Cyr，Laurent 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4 vols.1831，Ⅳ p.2

[2]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38

[3]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Ⅱ p.51

[4] Bowden，Scott，*Napoleon's Grande Armée of 1813* 1990，pp.27-8，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19689 p.51

[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47，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p.40

[6]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p.152

[7]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373

[8]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p.3

[9] ed. Chandler，David，*Napoleon’s Marshals* 1987，pp.30-32

[1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388 p.341

[1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09

[12] 今克维曾（Kwidzyń）。——译者注

[13] Evstafiev，Alexis，*The Resources of Russia*，*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2，p.71

[1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8

[1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462 p.402

[1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424 p.368

[1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402 p.354

[1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p.193-5

[19]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73

[20]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68

[21]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56

[2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10 p.232

[23]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61

[24]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61

[2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2

[26]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63

[2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172

[2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p.77，219-23

[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581 p.520

[30] Schmidt，H.D.，'The Idea and Slogan of "Perfidious Alb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4 1953，pp.610-13

[31]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7，Woloch，Isser，*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pp.152-3

[3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608 p.539

[3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457 p.397

[3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4 no.19625 p.556

[35] Simms，Brendan，*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Germany 1779-1850* 1998，pp.75-82

[36] Simms，Brendan，*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p.173

[37] Leggiere，Michael，*Napoleon and Berlin* 2002

[3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7 no.21231 pp.150-51

[3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664 p.30

[4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688 pp.46-51

[4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706 pp.70-72

[4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659 p.25

[4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632 p.5

[4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640 p.9

[4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93

[46]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94

[47]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95

[48]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5

[49] “Franz”的法语变体。——译者注

[5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40

[5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647 p.15

[5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14 pp.235-6

[53]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New York）1978，p.22

[5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41 p.253

[5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77 p.276

[56]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75

[57]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p.81

[5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349

[59]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p.23

[6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51 pp.258-62

[61]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p.24

[6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 149

[6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63 pp.268-9

[64]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pp.33-7

[6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899 pp.222-3

[6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2，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p.374-7

[6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19994 p.285

[6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4

[6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40

[70] 指退路。——译者注

[7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017 pp.299-300

[7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7

[7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029 and 20030 pp.307-8

[7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102

[7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58

[7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042 pp.321-2

[77]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pp.18-19

[7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60

[7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096 p.368

[8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070 pp.346-7

[8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65

[8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140 pp.393-7

[8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5 no.20070 p.347

[8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Ⅰ p.449

[8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111 p.250

[86]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26-31

[8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26-31

[8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26-31

[8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19 p.382

[90]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383

[9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69

[92]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p.482-503

[93]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503，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75 pp.423-6，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36-42，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5，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413 n.67 and Ⅱ pp.538-40

[94]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501

[9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75 pp.423-6

[96]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p.494，503

[97]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p.185-8

[98]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Ⅰ p.190

[9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5 no.20175 pp.423-6

[10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69

[10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71

[102] 原文误作“1800年”。——译者注

[10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3

[10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171-2

[105] 今日米格鲁德（Żmigród）。——译者注

[106] Sked，Alan，*Radetzky* 2011，p.41

[10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79-80

[10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327 pp.2-3

[109]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93

第二十七章 莱比锡

恐惧与不确定性会加速帝国的崩溃；它们比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的危险和损失更致命一千倍。

——1804年12月，《箴言报》所载拿破仑的发言

两支排成作战序列的军队相遇，若一军需经桥梁撤退，另一军占据敞开的包围圈外缘，则后者掌控全部优势。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25条

1813年8月8日，拿破仑从德累斯顿致信达武，警告对方："毋庸置疑，敌人定会在10日取消停火协议。16日或17日，敌对状态将卷土重来。"照他预计，届时奥地利会派12万人、3万人和5万人分别对付他、拜恩与意大利的欧仁。[1] 然而，他还是总结道："不管这事让联军增加多少兵力，我认为自己都能应对。"8月10日，他便提前五天庆祝生日，这是他在位期间最后一次正式庆生。萨克森骑兵上校恩斯特·冯·奥德莱本（Ernst von Odeleben）男爵在回忆录中记载道：军队举行了一次两小时长的阅兵式，共4万名士兵参加；伴着礼炮轰鸣，德累斯顿的一座大教堂中响起《感恩赞》的歌声；易北河畔的椴树下，帝国近卫军与萨克森王国近卫军宴乐；乐队演奏军乐；每个士兵都领到两倍军饷和双份肉；萨克森国王在军中分发成千上万瓶葡萄酒。至于拿破仑，他"身着盛装，全速驰过队列，这时'万岁'呼声回荡不息"。法军炮兵和萨克森炮兵"一同痛饮狂欢"，没几个人能猜到要不了几周他们就会对轰。晚上8点，拿破仑去萨克森国王的宫殿出席生日宴。筵席散场后，他们的士兵共同庆祝，在桥两边燃放烟火。"蔚蓝天空给无数火箭平添一层魅力，"奥德莱本回忆道，"它们飞过城中阴暗的屋顶，彼此交错，照亮浩渺夜空……停了一阵后，拿破仑的花押字高悬皇宫上空。"[2] 一名渔夫太靠近火箭，结果受了致命伤，等人群散去后，岸边传来他的"悲切哭声"。"这是否算个不祥之兆，"奥德莱本想，"预示庆生的英雄前途堪

忧？”

1813年8月中旬，拿破仑已聚集4.5万名骑兵，他们散布于四个军和十二个师。[3] 与停火协议刚签订时相比，他的骑兵数量大大增加，但仍然不足以对抗集结起来的敌人。11日中午，联军宣布废止停火协议，这和拿破仑的估计结果相差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声称将在17日午夜重新开战。[4] 12日，奥地利对法宣战。在梅特涅的操纵下，奥地利先离开盟友，再奉行中立，接着它实施所谓的客观调停，停火协议终止后次日，它又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梅特涅的巧妙手腕被称作“外交艺术杰作”。[5] 拿破仑只觉得他耍两面派。“布拉格会议从未正经议事，”他告诉符腾堡国王，“奥地利借此挑明立场。”[6] 皇帝致信奈伊和马尔蒙，他告诉两人，自己将在格尔利茨（Görlitz）和包岑之间立足，并观察奥军与俄军的动向。他在总结时老调重弹，写了一句已然为人熟知的话：“依我看，除非先来场大会战，当前战役不会有好结果。”[7]

战略形势固然严峻，但并不绝望。正如拿破仑所说，虽然强敌从三面包围他，但他拥有萨克森境内的内线优势。施瓦岑贝格率波希米亚军团从波希米亚北部赶来，该军团由奥地利人、俄国人、普鲁士人组成，其兵力合计23万人；布吕歇尔率西里西亚军团从上西里西亚向西，该军团由普鲁士人、俄国人组成，其兵力合计8.5万人；贝纳多特率北方军团从勃兰登堡南下，该军团由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组成，其兵力合计11万人。这三路军团共有42.5万人，另有联军部队正奔赴前线。拿破仑用35.1万人对付他们，他的军队分布在汉堡与奥德河上游之间。[8] 此外，9.3万人驻守德意志与波兰的城镇，5.6万人在法军兵站受训，但这些人不能马上投入战斗。拿破仑需要实施往日他常常采取的策略，也就是在中央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反倒分散兵力，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其军事箴言中最重要的两条：“保持兵力集中”；“不要小股小股地浪费军队”。[9]

拿破仑的计划如下：他亲率25万人对战施瓦岑贝格，与此同时，乌迪诺（尽管元帅抗议）率6.6万人北上，力图攻克柏林，让-巴蒂斯特·吉拉尔（Jean-Baptiste Girard）将军则率9000人去守马格德堡，该地位于乌迪诺军以西80英里处。他还对达武下令：留下1万人驻守汉堡，另派2.5万人支援乌迪诺。昔日，拿破仑只会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主力，这套战略他屡试不爽，但就像进攻莫斯科时一样，现在他抛开了这种做法，反倒被次要的政治目标干扰，如攻克柏林并惩罚普鲁士的渴望。他也没规定达武和乌迪诺谁指挥谁，这导致北部战场缺乏统一调度权。

就算乌迪诺攻下柏林，和1806年时相比，在1813年拿下柏林并非更能保障胜利；如果法军集结起来，击溃施瓦岑贝格，则贝纳多特无论如何也守不住柏林。拿破仑明白，战役将在萨克森或波希米亚北部见分晓，他让乌迪诺阻止贝纳多特夺取易北河、保卫法军后方，但他仅仅拨给对方一支骨干军队。[10] 达武元帅的独立指挥战绩最能体现其才干，拿破仑却让他处理德意志西北部不存在的威胁，此乃惊人的浪费人才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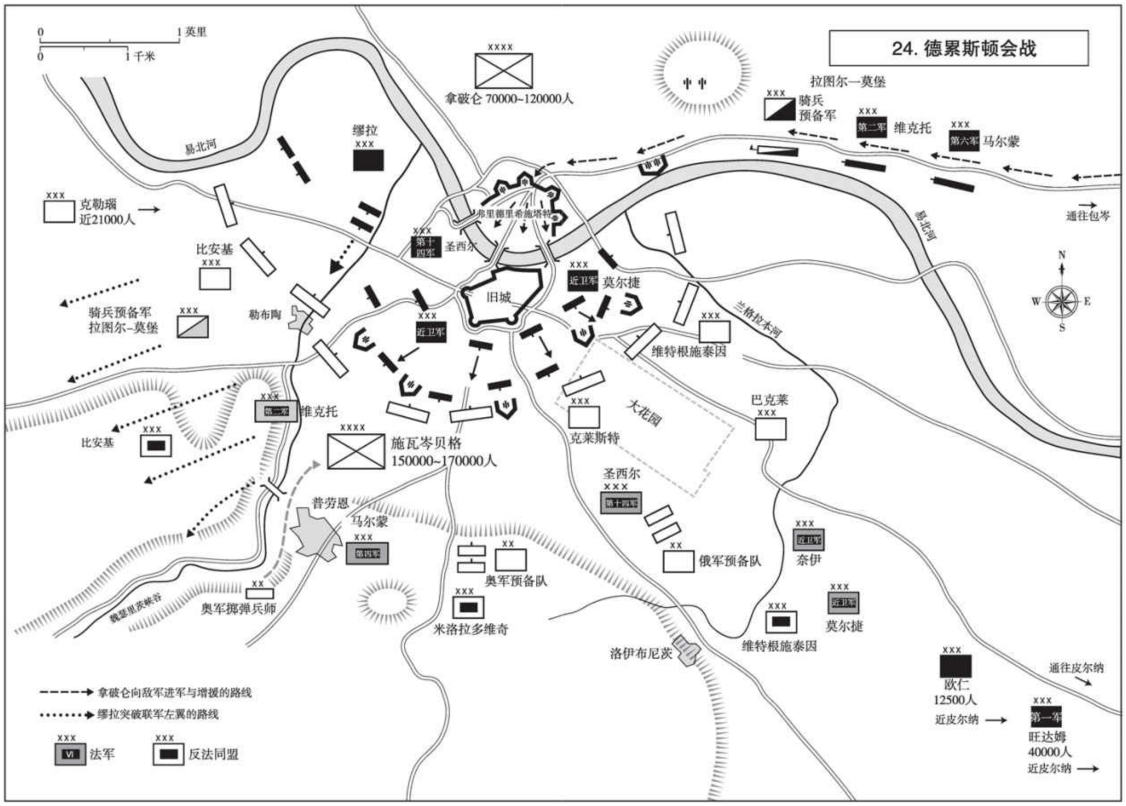
8月15日是拿破仑的44岁生日。这一天，皇帝从德累斯顿去西里西亚，打算在那攻击布吕歇尔，此人已占领布雷斯劳（Breslau）[11]。途中，他在包岑同缪拉会合。出乎意料，缪拉重新拥护他的事业。皇帝回报了缪拉，让他重任骑兵总指挥。当日，拿破仑告诉乌迪诺，马格德堡的吉拉尔师有8000～9000人，这是实话。然而就在第二天，他便对麦克唐纳保证道，吉拉尔师有12000人。[12]

“是他想要开战。”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提及其父时称，“因为他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事件会决定态势。”[13] 从那以后，他只称呼弗朗茨皇帝为“你爸”（ton père）或“弗朗索瓦爸爸”，8月17日的信便是如此，那天他写道：“你爸被梅特涅骗了，同我的敌人联手。”[14] 身为法国摄政皇后与贤妻，玛丽·路易丝忠于丈夫而非父亲，待在法国而非祖

国。

联军如约践行特拉申贝格战略，他们在拿破仑面前撤退，并寻找他的主要部将。8月16日，布吕歇尔便准备好在博伯河（the Bober）[15] 与卡茨巴赫河（the Katzbach）[16] 之间进攻奈伊，但拿破仑率野战军主力的大股部队前来，于是他撤走了。乌迪诺进军柏林，瓢泼大雨几乎令炮兵寸步难行，拖慢了他的进度。8月21～23日，乌迪诺在大贝伦（Gross-Beeren）三度与敌交手。比洛的普军与斯特丁克（Stedingk）伯爵的瑞典军猛攻乌迪诺，击败了他。如果拿破仑处于这种境地，他会倾向于退往卢考（Luckau），但乌迪诺却撤退至维滕贝格（Wittenberg）。拿破仑对贝尔蒂埃说，“真难当一个比雷焦公爵[17] 更没脑子的人”，然后他派奈伊接手乌迪诺的指挥权。[18]

8月20日，拿破仑在波希米亚，他想阻止施瓦岑贝格去布拉格。“我赶走了奈佩格将军，”当天，他告诉玛丽·路易丝，“俄军与普军进入了波希米亚。”[19] 才过一年，时髦的独眼奥军将领亚当·冯·奈佩格（Adam von Neipperg）就在私生活领域狠狠报复了他。拿破仑听闻波希米亚军团大举进攻德累斯顿，22日他便调转军队，奔回该地，并留麦克唐纳提防布吕歇尔。与此同时，他致信圣西尔：“我认为，要是敌人成功实施大调动，前往德累斯顿，那将是非常好的消息，它甚至可驱使我在数日内打一场大会战。决定事态的永远是会战。”[20] 当日，他还致信侍从长孟德斯鸠伯爵，声称自己不满巴黎的生日庆典。“我听说，8月15日那天，管理乱糟糟的，以至于皇后听糟糕的音乐时耽搁了很长时间，”他写道，“这导致公众烟火等了两小时。此事令我非常不悦。”[21]



◆

1813年8月26～27日，德累斯顿会战爆发。拿破仑的情报人员送来警报，准确地指出庞大的联军部队正在向城市集中。19日，巴克莱·德·托利的俄军已同施瓦岑贝格会师，他们组成一支浩大军团，其兵力有237700人，包括172000名步兵、43500名骑兵、7200名哥萨克与15000名炮兵，而且该军团共有698门大炮。8月21日，扩充后的波希米亚军团分五路纵队进入萨克森。维特根施泰因率28000人的纵队前往德累斯顿。然而，拿破仑控制了易北河上所有的桥梁，因此法军可在河流两岸行军。

在德累斯顿本身，旧城（Altstadt）防御工事实际上呈半圆形，其两端固定在易北河上。圣西尔军的三个师驻守旧城防线，其兵力约为19000名步兵与5300名骑兵。城市卫戍部队的八个营在城墙上就位。26日上午10点，拿破仑驰至战场，准许圣西尔如此布局。他犯了胃病，战

前因胃疼而呕吐，但他还是下达了连珠炮般的指令。旧城外有5座大多面堡，新城内有8座，这些堡垒中皆设大炮。旧城街道和大门上都布置了障碍物。以城墙为基，方圆600码之内的树全被砍了。30门大炮在河流右岸组成炮群，以便轰击维特根施泰因侧翼。[22] 冯·克勒瑙（von Klenau）将军的奥军纵队行动迟缓，导致总攻延迟至次日，这有利于法军开展上述准备工作。

沙皇亚历山大、让·莫罗将军（他离开了流放地英格兰，前来见证联军大举进攻拿破仑）、亨利·德·约米尼将军（奈伊的瑞士籍参谋长，停火期间他改投俄军阵营）都认为拿破仑的阵地非常牢固，不宜进攻，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争辩道，不进攻会损害军队士气，他坚称联军应开战。上午9点30分，双方皆已做好战斗准备，但直到下午3点左右两军才有动作。当时，拿破仑命令圣西尔夺回城外某座紧挨城墙的工厂。法军只是稍稍前进，联军指挥官却误以为那是开战讯号，所以战斗爆发本质上是个意外。

下午4点时，维特根施泰因投身战团。青年近卫军抵御俄军进攻，而他冒着猛烈的炮火前进。五个猎兵团（轻步兵精兵）、一个骠骑兵团进攻城墙外的正宗巴洛克园林大花园（Gross-garten），步兵和炮兵支援他们。法军坚守大花园，他们设法让一个炮群穿过安东亲王园（Prinz Anton Gardens），上前轰击敌军侧翼。与此同时，法军在易北河对岸发射猛烈炮火，困住了正在进攻的两路俄军纵队。当日结束时，双方各占据半个大花园。今人可在高达300英尺的圣母教堂（Frauenkirche）穹顶上清楚地纵览战场。在5号多面堡，奈伊元帅率领青年近卫军和圣西尔军的部队冲锋，迫使奥军投入预备队，即便如此，一个黑森营也被包围，全营被迫投降。夜幕降临后，第一日战斗结束，联军有4000人死伤，这是法军伤亡的两倍。

晚上，维克托军增援拿破仑，进军弗里德里希施塔特

（Friedrichstadt），马尔蒙前往中路，而老近卫军则渡过了易北河，组成中路的预备队。拿破仑有效地利用军体系，已为次日的会战调集155000人。整晚大雨如注，8月27日早上，天降大雾。浓雾散去后，拿破仑发现深邃的魏瑟里茨峡谷（Weisseritz ravine）把联军分成两半，只见峡谷一边是久洛伊·伊格纳茨（Gyulay Ignácz）伯爵指挥的联军左翼，另一边是其右翼与中路。[23] 早上7点，他决定大举进攻，为此投入了两个步兵军和几乎所有的骑兵。缪拉肩披镶金边斗篷，头戴羽饰，他预备用第1骑兵军的68个中队、30门大炮进攻久洛伊军，维克托军的36个营、68门大炮也将加入战团。

上午10点，克勒瑙终于同波希米亚军团会合，但奥军面临巨大压力。维克托军与艾蒂安·德·博德苏勒（Étienne de Bordessoulle）将军的重骑兵成功击退奥军侧翼。11点，缪拉下令发动总攻，他高呼“皇帝万岁！”，冲向前方。法军炮兵充分支援勒布陶（Löbtau）一带，在那儿，街上设置了路障，房中开凿了供滑膛枪射击的枪眼，当地的奥军步兵遂陷入困境，他们的散兵被赶了回来。奥军从似有若无的雾气中看到，缪拉的步兵排成大股纵队，上前进攻。法军冒着猛烈炮火，填上村子间的缺口，并经过奥军队列，然后他们调转方向，袭击敌后。奥军反击，但其退路变得非常危险。

从凌晨4点开始，中路的奥军与普军便已做好准备，盼望战事重启。马尔蒙负责钉住他们，与此同时，法军侧翼将击败敌军。上午8点，圣西尔进攻施特雷伦高地（Strehlen heights）上的普军第12旅，迫使对方退往洛伊布尼茨（Leubnitz），俄军第5师与该旅在那会合。虽说滑膛枪有保护性火镰，但大雨浸湿了它们的火药池，所以在这场缠斗中，刺刀成了主角。

上午10点，拿破仑已在施特雷伦高地聚集了一个大型炮群，这些大炮控制了战场中央。圣西尔暂时停下，重组军队，这时奥军步兵对他发

起反击。他力图前进，但联军的猛烈炮火把他推回原地。中午时分，拿破仑来到圣西尔身旁，他一边命令对方继续对敌施压，一边把青年近卫军投入洛伊布尼茨，试图从西里西亚步兵手中夺占村庄。下午1点，拿破仑直面联军中右翼。他置身可怕的炮兵对轰之中，亲自指挥一些骑炮兵，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奥军的很多大炮。在这次交火中，一发加农炮炮弹炸断了莫罗的双腿。正午后不久，普军骑兵开始前往右翼。圣西尔对敌军施加的压力慢慢打破平衡局面。

早上7点30分时，法军左翼的奈伊发动进攻。普军已被逐出大花园，他便借这座园林掩饰自己的部分进军行动。11点，拿破仑到达，他鼓励散兵积极进攻，尽管普军和俄军的骑兵不时阻挠他们。巴克莱·德·托利手上至少有65个俄军骑兵中队、20个普军骑兵中队，但他没派他们出击。倾盆大雨中，大炮轰鸣声间或打断这场刺刀和马刀的战斗。施瓦岑贝格仔细地策划大反击，结果发现麾下部队皆已深陷缠斗，这正如拿破仑所料。

下午2点，拿破仑返回中路，他在拉赫尼茨（Rachnitz）附近用32门12磅炮组成炮群，轰击联军中路。5点30分，施瓦岑贝格得知，旺达姆已在皮尔纳（Pirna）渡过易北河，正向他的后方进军。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放弃战斗。（旺达姆是个肆无忌惮的流氓，拿破仑曾说，每个军队都需要一个旺达姆，但假如有两个，他就得枪毙其中一个。[24]）傍晚6点，法军停留在上午时联军曾占据的阵地。双方都损失了约10000人，但缪拉在右翼取胜，俘虏了13000名奥军士兵，法军还缴获了40门大炮。[25]拿破仑听说施瓦岑贝格战死了，大喊道：“施瓦岑贝格解除诅咒了！”皇帝希望施瓦岑贝格之死最终驱散1810年他婚庆时的火灾阴影，他日后解释道：“我闻言欣喜，这不是说我盼着那个可怜人死，而是因为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26]他后来才发现，战死的将军不是施瓦岑贝格，而是莫罗，于是懊恼万分。9月2日，莫罗伤重不治，就在临终前，他致信妻子：“那个无赖波拿巴总是很走运。原谅我的潦草

字迹。我全心全意地爱你、拥抱你。”[27] 变节的将军辞世时还能勇敢地为自己的笔迹道歉，但他没有正确地评价拿破仑一连串的超常好运。

“我刚刚在德累斯顿大败三位君主亲自统领的奥军、俄军与普军，”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我正在追赶他们。”[28] 次日，他纠正了自己的话：“弗朗索瓦爸爸明智地没来。”他接着说，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打得非常好，并迅速撤退”。拿破仑对奥军更加苛刻。“这是弗朗索瓦爸爸麾下最糟糕的士兵，”他告诉奥地利妻子，“他们在哪儿都打得惨兮兮。我俘虏了25000人，缴获30面军旗与无数大炮。”[29] 事实与之相反，联军君主与将领错误布阵，缺乏协作，他们在战略与战术上都对不住部下，完全是靠坚强勇敢的士兵，这次两日会战才没有变成溃败。

拿破仑冒着大风雨驰过战场，他的感冒由此而加重了，战后，他上吐下泻。队列里的一个牢骚兵冲他喊：“你得回去换衣服。”然后，他终于回到德累斯顿，并泡了个热水澡。[30] 晚上7点，他告诉康巴塞雷斯：“我太累，太心事重重，所以没法多写。（马雷）会替我写。此地事态进展非常好。”[31] 拿破仑承受不起长期患病，就在一周前，他还给高级指挥官下达总指示：“从我的立场看，绝不能制订任何不以我本人为中心的计划。凡是把我移至远处的方案皆会引发常规战争，那么敌军骑兵乃至将军的数量优势将彻底毁了我。”[32] 此言公开承认，当元帅们面对比自身兵力多出70%的敌军时，不能指望他们完成胜利所需的必要军级调动。事实上，拿破仑觉得大部分元帅刚刚达到能够独立指挥的水平。

下面这件事佐证了拿破仑的判断。8月26日，即德累斯顿会战第一日，在卡茨巴赫河畔的普鲁士西里西亚，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击溃麦克唐纳元帅的67000人（由法军和莱茵邦联部队组成）。[33]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重申自己的观点：“要是麦克唐纳等人知道自己在哪儿，

并且听我命令行事，他们便是良将，超越这一层，情况就不同了。”[34]就在麦克唐纳战败后次日，普鲁士国民后备军和一些哥萨克在哈格尔山（Hagelberg）成功歼灭吉拉尔将军的部队，而国民后备军一直装备长矛，不久前才换用滑膛枪。吉拉尔的军队遭受打击，严重减员，他费了很大功夫才返回马格德堡。8月29日时，雅克·皮托（Jacques Puthod）将军的第17师（3000人）被困在普拉格维茨（Plagwitz），其身后便是泛滥的博伯河。他们打光了所有弹药，被迫集体投降。第17师丢了三面鹰旗，战后，人们在河里找到了其中一面。[35]

拿破仑打算阻止施瓦岑贝格退往波希米亚，他命令旺达姆率37000人离开彼得斯瓦尔德（Peterswalde）[36]，然后“切入波希米亚，逐退符腾堡的亲王”。此举旨在切断通往杰钦（Dě čín）、奥西希（Aussig）[37]、特普利茨（Töplitz）[38]的敌军交通线，但是巴克莱、康斯坦丁及普军将领克莱斯特（Kleist）的总兵力比旺达姆多出一倍。旺达姆的部队英勇奋战，给敌军造成大量伤亡，但是30日时，他被迫率麾下10000人在库尔姆村（Kulm）[39]附近投降。在旺达姆勇敢对战奥军前卫时，拿破仑派缪拉、圣西尔、马尔蒙去特普利茨进攻奥军后卫，但他们救不了他。拿破仑自己病了，没法离开卧室，甚至直到29日下午时，他能去的最远地点也只是皮尔纳。[40]次日，让-巴蒂斯特·科尔比诺（Jean-Baptiste Corbineau）带来了灾难性消息，皇帝只能说：“战争就是这样，早上来个大高潮，晚上又来个大低潮。胜利与失败仅一步之遥。”[41]

到8月末时，部将们已耗尽拿破仑靠德累斯顿胜绩所获得的优势，坏消息则继续传来。贝纳多特击败乌迪诺后，拿破仑派奈伊再度进攻柏林，以便重振形势。9月6日，奈伊和乌迪诺在勃兰登堡登讷维茨（Dennewitz）与冯·比洛将军交手，两人告败。拜恩随后宣布中立，其他德意志国家不由得重新考虑自身立场，特别是在当月末联军宣布废除莱茵邦联之后。

9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拿破仑都待在德累斯顿。他不时冲出去迎战太接近的敌军，但无法采取任何大型攻势来左右战事，因为联军决心不给他任何开战机会，并继续集中兵力对付其部将。这几周，他沮丧灰心，间或急躁失态。600名哥萨克在德累斯顿和托尔高之间进攻萨米埃尔-弗朗索瓦·莱里捷·德·谢泽勒（Samuel-François l’Héritier de Chézelles）将军的2000人（隶属第5骑兵军），拿破仑便致信贝尔蒂埃，称谢泽勒的部队应该更积极地战斗，哪怕“他们没有马刀或手枪，只用扫帚柄作战”。[42]

这种战斗损伤士气。在瓦格拉姆会战中，某个萨克森营曾归贝纳多特指挥，9月27日，该营全体官兵改投贝纳多特。在巴黎，玛丽·路易丝要求元老院签发征兵令，招募28万人，其中至少有16万人是提前征召的1815年度新兵，而且1814年度新兵已全部应征。然而，在法国境内的很多地区，民众们已然普遍抗议继续征兵了。

蒂埃博将军在这次战役中任师长，他准确地总结了1813年秋天的事态：

> 这次庞大斗争的舞台扩张得令人心惊胆战。在这种战场上，可在几小时内，或者说至多一两天内完成的聪明、秘密、突然的机动不再构成优势。拿破仑……不能像马伦戈会战和耶拿会战时那样击退敌军侧翼，甚至不能像瓦格拉姆会战时那样，靠消灭敌军一翼击溃敌军。拿破仑发起出人意料的迅捷调动，它靠单单一次会战决胜战役或战争，并助他成名。贝纳多特带16万人去北边，布吕歇尔带16万人去东边，施瓦岑贝格带19万人去南边，他们用前线威胁我们，同时保持甚远间距，不给他机会实施这种调动。空间毁了他。重申一遍，在那之前，拿破仑从来没有同时对付一支以上的敌军，现在他面临三路敌人，若他攻击其中一路，侧翼就会暴露给另外两路。[43]

10月上旬，联军在法军交通线上自由穿梭，拿破仑有好几天不能收发信件。10月6日，拜恩对法宣战，形势大大恶化。“拜恩不会认真地向我们进军，”皇帝豁达地对费恩说，“要是奥地利全胜、法兰西遭灾，它的损失就太大了。它很清楚，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天敌，一个是必要支

援。”[44] 次日，威灵顿渡过比达索亚河，离开西班牙。自从二十年前胡德将军撤离土伦后，这是外国军队第一次侵入法国本土。布吕歇尔率6.4万人横渡易北河，波希米亚军团（20万人）则进军莱比锡。拿破仑留圣西尔守德累斯顿，自领12万人北上。他打算先把布吕歇尔赶回易北河对岸，再回身对付施瓦岑贝格。与此同时，他一直对柏林施加切实威胁。

施瓦岑贝格、布吕歇尔、贝纳多特指挥的联军共计32.5万人，拿破仑屯于莱比锡，其兵力远远少于他们的。10月10日，三路联军向莱比锡集中，打算困住他。10月13日清晨5点，他致信奈伊："莱比锡必将爆发大会战。"同日，他发现拜恩军同奥军会合，正威胁莱茵河。[45] 拿破仑陷入严重的敌众我寡境地（他能指挥的总兵力只比20万多一点），但他决定为守卫莱比锡而战。次年，英国记者弗雷德里克·肖伯尔（Frederic Shoberl）称，莱比锡"无疑是德意志第一商都和欧洲大陆的巨大交易场"。[46] 拿破仑怀疑很多士兵自己弄伤头部，拉雷医生则说，那是因为士兵装填弹药和开火时，其滑膛枪靠近前排跪着的战友的脑壳。皇帝相信了军医的话，于是他把部队分成两排，而非三排。"这种新阵型有个优势，"拿破仑说，"它让敌人以为军队人数比其实际兵力多三分之一。"[47]

10月14日，帝国近卫军从迪本（Düben）来到莱比锡。当晚，拿破仑待在城市东部的罗伊德尼茨（Reudnitz）郊区，入住韦斯特（Wester）先生家。宫廷营房总管（maréchal de logis）照例用粉笔在每个将军的卧室房门上写下其姓名。拿破仑的房间里很快生起火，"因为陛下非常喜欢温暖"。[48] 皇帝随后和韦斯特的首席书记员聊天。

拿破仑："你老板是干什么的？"

书记员："做生意的，陛下。"

拿破仑："什么生意？"

书记员：“他是个银行家。”

拿破仑（微笑）：“噢！那他轻如一根鸿毛。”

书记员：“请陛下宽恕，事实不是那样。”

拿破仑：“好吧，也许如两根鸿毛？”

他们讨论折扣的账单、利率、书记员的薪水、当前的（糟糕）商业形势和房主一家。“谈话中，皇帝的心情一直非常好，他经常微笑，吸了很多鼻烟。”冯·奥德莱本上校回忆道。[49] 拿破仑住得很开心，临走时便留下200法郎，一名副官指出，此举“肯定不是惯常做法”。

次日，施瓦岑贝格的20万人在南部遇上缪拉，然后把一整天花在巡逻与小战之上。与此同时，布吕歇尔沿萨勒河、埃尔斯特河（the Elster）前进。当日，拿破仑骑着奶油色母马，向三个营分发鹰旗与军旗。伴随着鼓声，每一面将交给军官的未展开旗帜渐次从盒中取出。一名目击者回忆道：

> （拿破仑的）语调清晰庄重，但并不十分响亮，或许可同轻声的（mezza voce）乐章区分开。他说：“轻步兵第26团的士兵们，我把法兰西的鹰旗托付给你们。它将是你们的集结点。你们愿意誓死守护它吗？发誓吧，你们永远不会容忍别人侮辱法国，你们可杀而不可辱！你们发誓！”他特意强调最后一句话，不仅换了副独特腔调，而且精神勃发。此讯号一出，军官们举剑，全体士兵热情高涨，在平常的欢呼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大喊：“我们发誓！”

昔日，军乐队常出席这种仪式，如今他们不再露面。“音乐家寥寥无几了，绝大部分人已葬身俄国雪原。”[50]

莱比锡会战号称“民族会战”（the Battle of the Natiions），当时它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共有50万人参战，他们来自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双方都有德意志人）、俄罗斯民族、瑞典民族、意大利民族、波兰民族、奥地利帝国所有民族，联军中甚至有英军火箭队。[51] 会战打了三日，分别为1813年10月16日、18日、19日。拿破仑几乎聚集

了法军所有野战军，他共有203100人（其中仅有28000名骑兵）和738门大炮。未上阵的有圣西尔军（在德累斯顿，有30000人）、拉普军（被困在但泽，有36000人）、达武军（在汉堡，有40000人）和住院伤病员（约90000人）。会战最后一日，联军一共能投入362000人与1456门大炮，这几乎是法军兵力的两倍。[52] 埃尔斯特河与普莱瑟河（the Pleisse）将广阔的战场分为两半，丘陵与通往东边的空旷平原为炮兵提供了平台，并掩护其后的军队。[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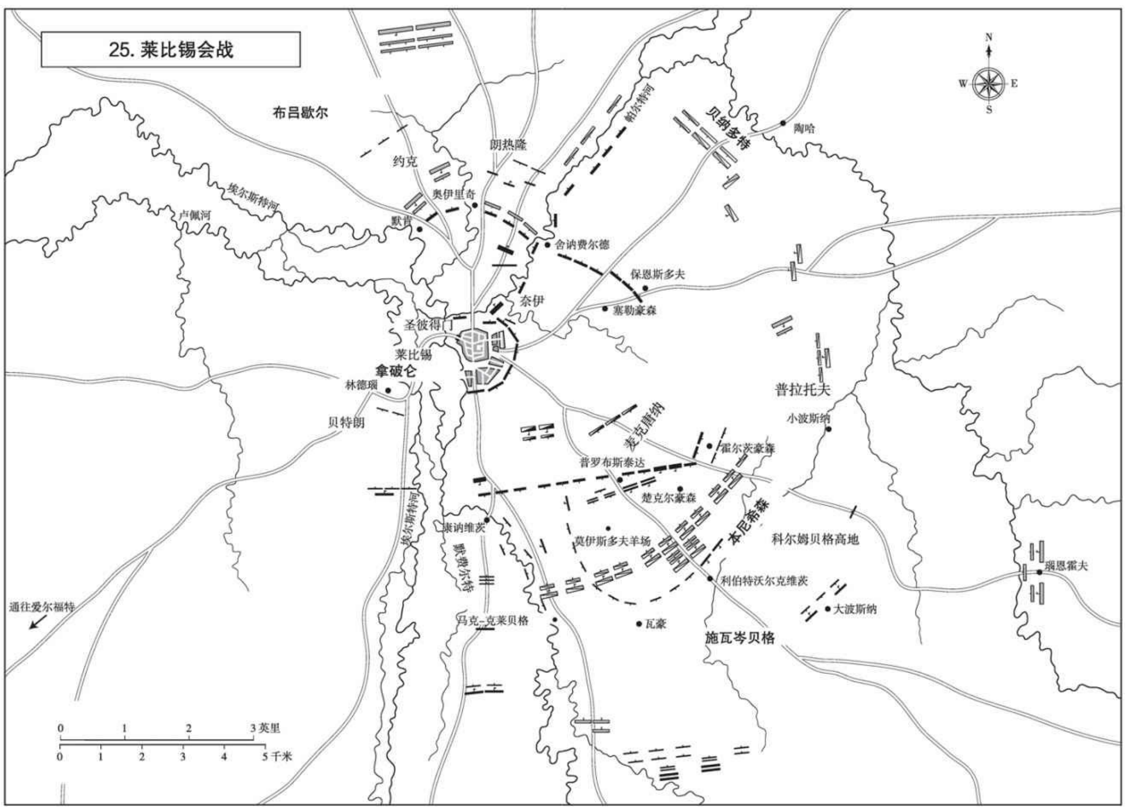
阿道夫·德·戈维尔（Adolphe de Gauville）上尉在莱比锡负伤，他后来回忆称，10月16日早上，天色昏暗阴沉，天空落雨。“清晨5点，拿破仑让人把扶手椅和桌子搬到战场上。他有很多地图。他给许多军官和将军下令，他们一个接一个来听令。”[54] 根据拿破仑的计算，他可用138000人在城市以南对战施瓦岑贝格的100000人。他清楚，在西北边的布吕歇尔、北边的贝纳多特、东边的本尼希森赶到之前，他有一天、至多两天时间来战胜施瓦岑贝格。（会战第一日，本尼希森的前卫——哥萨克——到达战场，17日，其主力部队跟着抵达，并预备于次日交战。那时，贝纳多特也到了。）

16日一早，普军从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人手中夺走马克-克莱贝格村（Mark-Kleeberg），会战随之爆发。普军和波兰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种族仇恨更是激化了战斗。瓦豪（Wachau）的守军相对较少，在一个普军旅的支援下，俄军迅速攻陷瓦豪，但法军炮兵完全阻止他们继续前进。中午至下午1点之间，拿破仑来了。他用177门大炮组成炮群，在其猛烈的连射下法军大举反击。俄军被迫退至莱比锡平原，那儿没有掩护，很多人被葡萄弹轰倒。

若有必要，拿破仑可退往西边。奥军将领久洛伊·伊格纳茨正威胁着这唯一一条逃生之路，他便派亨利·贝特朗将军的军去保护退路，导致他的主要攻势大大减弱。久洛伊占据公路附近的林德瑙

（Lindenau），并站稳脚跟。将近傍晚时，奥军不顾密集炮火，猛攻燃烧的村庄，法军真的陷入危机了。贝特朗后退，重整队伍。下午5点，他开始反击。贝特朗设法扫清了公路，但久洛伊拖住他的军，立下了大功。

上午10点，克勒瑙进军至利伯特沃克尔维茨（Liebertwolkwitz），除了教堂和村子北端，该村很快失守。法军迅速反击，径直把奥军推回村外。热拉尔将军率其师（其中有很多意大利人）进攻小波斯纳（Klein-Posna）时负伤，随后，莫尔捷率领青年近卫军的师上前，并夺下该地。11点时，联军退回初始战线，他们筋疲力尽，也用光了预备队。联军的攻势令拿破仑震惊，他本不想这么早动用预备队，但被迫让他们上场。弗里昂的老近卫军拿下莫伊斯多夫（Meusdorf）羊场，青年近卫军的两个师（由乌迪诺指挥）和大群骑兵预备队在瓦豪后集结。



战场雾气散去后，拿破仑可以评估他的显著优势。瓦豪是联军战线

最薄弱之处，他发现有机会在那儿切断敌军阵线。中午时分，他便派麦克唐纳军去击退敌军右翼。下午2点，皇帝亲自鼓励第22轻步兵团猛攻俯瞰大波斯纳（Gross-Posna）的高地科尔姆贝格山（Kolmberg），他开玩笑说，他们只是在猛烈炮火下交叉着双臂站在基地边。[55] 第22团攻下了高地，不过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威廉、施瓦岑贝格看见了该团，遂派普军预备队去拦下敌人。（像战局前期一样，两位君主只是提供建议、鼓舞士气，专业军人制定军事决策。）

缪拉来到平原上，他在瓦豪和利伯特沃克尔维茨之间集结密集的骑兵纵队，以支援乌迪诺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下午2点30分，博德苏勒率骑兵在中路冲锋，他突破维特根施泰因亲王的步兵，进入联军大炮群的炮兵之中。博德苏勒的18个中队共有2500把马刀，他们冲向俄军近卫骑兵师，打败敌人，接着前往联军司令部。然而，法军步兵未能跟上冲锋。泥泞的地面也拖慢了博德苏勒的部队，他们只好撤走。撤退时，这些骑兵挨了很多下攻击，包括被友军误伤。

拿破仑一直在等待北边的马尔蒙赶来，但下午3点时，他决定用手头的兵力发动总攻。他让炮兵来到很靠前的地方，以便炮轰敌军中央；他命令骑兵连续冲锋和反冲锋，派步兵近距离射击。拿破仑差点突破联军战线，但奥军投入生力军，为了快点投入战斗，他们中有些人蹚过及腰深的普莱瑟河，俄军和普军队列也殊死抵抗，因此他未能成功。

拿破仑听见默肯方向不断传来加农炮响，他驰至战场北部，布吕歇尔和马尔蒙正在此交手。默肯的狭窄街道上，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马尔蒙设法进入村子另一边的高地，而约克派骑兵冲锋，并让步兵提供支援。马尔蒙军被迫退入莱比锡城中。奈伊逐渐退向城市，他不但未能阻止布吕歇尔和贝纳多特前进，反而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牢固阵地。

联军从三面包围，拿破仑只好分散进攻的兵力，结果战场各地的法军攻势都太薄弱了，无法发挥决定性作用。下午5点，双方都准备好结

束当日战斗。此战伤亡惨重，法军折损约2.5万人，联军折损约3万人。[56] 当晚，拿破仑本该沿通往西边的路溜走，趁大股军队增援施瓦岑贝格前逃出陷阱，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10月17日一整天，他让军队休整，请求签订停火协议（被拒），并派当日被俘的奥军高级将领马克西米利安·冯·默费尔特（Maximilian von Merveldt）给弗朗茨皇帝送去斥责俄国的粗鲁信件。“这个半游牧民族本质上是征服者，他们的广大帝国从这儿一直延伸到中国，奥地利、法国乃至普鲁士费不了多大力气就能在维斯瓦河拦下他们那泛滥的人口，”之后他补充道，“我得靠牺牲结束事态。我知道，我准备好牺牲了。”[57] 拿破仑告诉费恩，为了和平，他愿意立刻牺牲华沙大公国、伊利里亚、莱茵邦联。他也同意考虑西班牙、荷兰、汉萨城镇的独立问题，尽管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全面处置方案而言，这只是部分内容。拿破仑想让意大利“王国保持完整与独立”，此言听来模棱两可，不像他给奥地利开出的实际条件，即撤离德意志，退至莱茵河以西。[58] 三周之后，弗朗茨才回复拿破仑的提议，彼时，他所处形势已严重恶化。[59]

威灵顿后来说，如果拿破仑早点撤离莱比锡，联军将不会冒险靠近莱茵河。[60] 可是，假如他不签订停火协议就撤出莱比锡，那么他实际上放弃了戍守东部要塞的数万人。他怕自己一走，萨克森和符腾堡就会像拜恩一样离开他。因为这些原因，拿破仑没有退至爱尔福特，相反，他组织军火补给（会战中，法军炮兵一共发射了22万发加农炮炮弹，比瓦格拉姆会战中他们使用的炮弹多出三倍），命令全军在城市东北侧和南侧集结，排成半圆形，与此同时，他还派贝特朗和莫尔捷掩护出口，以便在必要时脱身。[61] 17日晚，皇帝被重感冒击倒，但他决定和敌人一决雌雄。会战开始后，雷尼耶军的1.4万人增援拿破仑，然而，贝纳多特和本尼希森的师来了，因此施瓦岑贝格的援军超过10万人。[62]

10月18日上午8点，拿破仑驰往林德瑙。当天大部分时间，他待在托恩贝格（Thonberg）的烟草工厂，老近卫军与近卫骑兵在该地留作预

备。[63] 此时，阳光闪耀，军队准备作战。为了应对新一轮战事，施瓦岑贝格动用29.5万人与1360门大炮，组织了六次大规模集中进攻。他打算先攻占康讷维茨（Connewitz）、马克-克莱贝格（Mark-Kleeberg）、普罗布斯泰达（Probstheida）、楚克尔豪森（Zuckelhausen）、霍尔茨豪森（Holzhausen）、林德瑙和陶哈（Taucha），再击溃莱比锡本地的法军。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本尼希森来了。他已从麦克唐纳手中夺下霍尔茨豪森及其邻近村庄。雷尼耶的援军位于麦克唐纳以左，这支部队里有5400名萨克森人与700名符腾堡人，但上午9点时，这些到达战场的生力军突然带38门大炮改投联军，导致拿破仑的阵线出现大缺口。让·德弗朗斯（Jean Defrance）将军的重骑兵师试图填补口子。[64] 事实上，萨克森炮群的炮兵掉过头来，卸下大炮，开始冲法军战线开火。耶拿会战后这些人背叛了普军，此后七年他们一直在拿破仑麾下作战。如此冷酷的叛离沉重打击了法军士气。

冯·比洛很快占领了保恩斯多夫村（Paunsdorf）。拿破仑派老近卫军和青年近卫军夺回该村，但普军人数众多，就连这些精兵也被赶了回来。维克托和洛里斯东守卫普罗布斯泰达，该地成了名副其实的要塞，一整天都没陷落，尽管沙皇本人也在密切关注攻占行动。两个普军旅试了三次都没成功，俄军第3步兵师也得闷闷不乐地退回其轻步兵屏障后。拿破仑非常担心这些攻势的力度，遂派老近卫军屈里亚尔（Curial）师上前增援，但他感激地发现战事不需要他们。

在莱比锡以北，马尔蒙和俄军将领、法国流亡者朗热隆激烈争夺舍讷费尔德（Schönefeld）。马尔蒙调走苏昂军所有大炮来补充自己的，所以他能用137门加农炮对付朗热隆的180门。两个大炮群炸平了它们之间的地面。猛烈的炮击连续不断，6名法军将领非死即伤。午夜时分，马尔蒙撤回莱比锡城外的战壕，炮轰这才停止。朗热隆对付马尔蒙时，

布吕歇尔正向莱比锡郊区推进。奈伊派两个师反击，攻打塞勒豪森村（Sellerhausen）。在这次战斗中，英军发射了声音大、破坏力强的康格里夫（Congreve）火箭。这种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比如沉重打击法军士气。十六年前人们就知道火箭了，在1807年哥本哈根海战中，火箭的威力得到证实，但拿破仑没有建立自己的火箭队。

下午4点30分左右，在茨韦-瑙恩多夫（Zwei-Naundorf），拿破仑亲率老近卫军和近卫骑兵上前反击，他们投身战斗，直到最后一刻才抽身。可是联军打得老近卫军无法前进，俄军和普军的人潮也渐渐逐退法军。“这时，我看见皇帝置身敌人的一大波霰弹之下，”法军某腾跃兵连的军士长约翰·勒里希（Johann Röhrig）回忆道，“他面色苍白，像大理石一样冷淡。他的脸上仅仅偶尔闪过怒气。他明白一切都完了。我们只是为撤退而战。”[65] 勒里希给了一些老近卫军掷弹兵2克朗（即6法郎，相当于三日军饷），买来8个土豆。事后，他如此记载当日情况：

> 我不明白，为什么皇帝这样的聪明统帅竟让我们挨饿。要是有充足食物，军旅生活将大大不同。然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出，皇帝亲临时，腹中半饱、疲惫不堪的士兵会爆发出怎样的热情。假如所有人士气消沉，而他出现了，那士兵就会像被电击了一样。大家高喊“皇帝万岁！”，盲目地冲进火海。[66]

当天，激烈的连续炮轰和肉搏战导致双方各损失约2.5万人。

10月19日上午，拿破仑终于决定撤军。三天前，他授予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权杖。19日那天，他对波尼亚托夫斯基说：“公爵，你来守南部郊区。”“陛下，我的人太少了。”波兰人回答道。“嗯，你有什么就用什么守卫自己！”拿破仑说。“啊，陛下！”新近册封的元帅说，“我们会坚持到底！我们都准备为陛下献身。”[67] 当天晚些时候，波尼亚托夫斯基践行了承诺。很多萨克森人叛变了，而萨克森国王的战场指挥官没有背叛。拿破仑造访了萨克森国王，上午10点左右，他离开城市。“拿破仑离开莱比锡，他骑着马，慢慢穿过圣彼得门（St Peter’s Gate）。他看

上去沉着镇静，”冯·奥德莱本上校回忆道，“但他汗流浃背，原因也许既是体力消耗，又是精神紊乱。” [68] 撤退陷入了混乱，“弹药马车、宪兵、炮兵、牛羊、女人、掷弹兵、驿马车、健康人、伤员、垂死者全挤作一团，奋力向前。队形如此混乱，以至于几乎不可能盼着法军继续行军，更别提保护自己了”。 [69] 10点30分，联军开始攻城，大大加剧了混乱形势。

普莱瑟河、卢佩河（the Luppe）、埃尔斯特河上没有建浮舟桥，因此所有人都得经过城中唯一一座桥。该桥位于一连串狭窄街道的末端，横跨普莱瑟河。11点30分，灾难发生了。此时离全军完成过桥尚需很久，但桥被炸毁了，无须被俘即沦为战俘的士兵人数远远超出2万，战败变成了溃败。拿破仑的第50期公报点名批评蒙福尔（Montfort）上校，说他把任务交给“一个下士，这人是个白痴，不懂自己身负何等职责”。 [70] 爆炸撼动城市时，人畜尚在桥上，人与马的肢体便如下雨般落在街上与河里。 [71] 一些军官决定游泳过河，以免被俘。麦克唐纳成功了。波尼亚托夫斯基骑马下水，但那匹马爬不上对岸，摔倒在主人身上，结果他连人带马被激流卷走。 [72] 一名渔夫从河中打捞上波尼亚托夫斯基的尸体，一些波兰军官想把元帅的镶钻肩章、戒指与鼻烟盒还给其家人，渔夫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赚了一大笔钱。 [73] 拿破仑有一个装外国报纸的红皮公文包，上映醒目烫金字“外国报纸”（Gazettes Étrangères）。此公文包和他的马车一同被缴获，它在贝纳多特眼皮底下被人打开。 [74]

“胜负相隔无穷距离，”莱比锡会战前夜，拿破仑说道，“帝国横亘其间。” [75] 从死者算到伤员的话，三天之内，拿破仑损失了4.7万人。约3.8万人被俘，另有325门大炮、900辆货运马车、28面步兵和重骑兵的军旗（包括3面鹰旗）被缴获。从数据上看，这显然是拿破仑军事生涯中的最大败仗。 [76] 皇帝在公报中承认的战损是1.2万人与数百辆货运马车，他还说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桥梁被炸毁。“炸桥导致军队陷入混

乱，改变了局面，”他写道，“凯旋的法军像败军一样抵达爱尔福特。”[77] 后来又有士兵逃跑、叛变，因此他只能带着8万人返回萨勒河对岸，而战局开始时，他的大军团有20多万人。“我们的混乱队伍中暴发了伤寒，疫情可怕，”巴雷斯（Barrès）上尉回忆道，“所以也许能这么说，离开莱比锡时，我们遭遇了能吞噬军队的一切灾祸。”[78]

拿破仑且战且退至莱茵河畔；21日，他分别在克森（Kösen）和弗赖堡（Freiburg）驱散奥军与普军；27日，他在赫瑟尔贝格（Hörselberg）赶走俄军；30～31日，他在哈瑙（Hanau）战斗两日，逐退拜恩军。11月2日，他在美因茨渡河，返回莱茵河对岸。次日，他致信妻子：“要冷静，要高兴，并笑话那些杞人忧天的家伙。”[79]

然而，拿破仑的军队中仍有12万人被困在易北河、奥德河与维斯瓦河的要塞中：拉普在但泽（他的4万名有生力量最后减至1万名）；阿德里安·迪塔伊（Adrien du Taillis）将军在托尔高；让·勒马鲁瓦将军在马格德堡；让·拉普瓦佩将军在维滕贝格；路易·格朗多（Louis Grandeau）将军在斯德丁；路易·达尔布（Louis d’Albe）将军在屈斯特林；让·德·拉普拉内（Jean de Laplane）将军在格洛高；还有部队在德累斯顿、爱尔福特、马林堡（Marienburg）[80] 、莫德林、扎莫希奇（Zamość）与韦瑟尔（Wesel）。达武守住了汉堡和易北河下游，但是1813年年末，大部分东部要塞一个接一个陷落，原因常常是饥饿。一些守军一直坚持到1814年战役结束，但围城期间，除了镇压本地民兵部队外，没有一个要塞发挥了任何作用。拿破仑在离他如此远的东方留下这么多人，可见他的乐观心态不曾动摇。到1814年时，要塞守军大都被俘。

1813年战局中，2名元帅（贝西埃与波尼亚托夫斯基）、至少33位将军身亡，缪拉也叛变了。10月24日，他和拿破仑待在爱尔福特，但他暗中答应加入联军，条件是对方保证继续让他当那不勒斯国王。然而，拿破仑并未气馁，至少他不曾当众面露沮丧神情。11月9日，他到达巴

黎，（照费恩的说法）他“竭尽全力，把剩余资源转化为最佳筹谋”。[81] 皇帝命令科兰古接替马莱任外交部长（他两次提出让在野人士塔列朗恢复此职，表示自己有意与对方和解）；他颁布紧急征兵令，下令征募30万人，尽管现在国内激烈地反对征兵，但他仍招到了12万人；他的前侍从武官、科兰古夫人的堂兄圣艾尼昂（Saint-Aignan）男爵从法兰克福带来联军的求和条件，而他认真考虑了这一提议。[82] 根据名为“法兰克福和平基础”的条款，法国将恢复所谓的“天然疆界”。这一边界由利古里亚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莱茵河与阿登高原（Ardennes）组成，它也是所谓的“波旁疆界”（哪怕波旁王朝攻城略地时经常跨越这些山河）。拿破仑得放弃意大利、德意志、西班牙与荷兰，但不用放弃比利时全境。[83] 当时，西班牙仅剩少量卫戍部队坚守，而防守莱茵河对拿破仑来说不过是一通狂言，于是他告诉费恩，自己乐意交出伊比利亚半岛与德意志，但不愿让出意大利与荷兰。意大利可在战时“分散奥地利的注意力”，荷兰则“提供了那么多的资源”。[84]

11月14日，法兰克福提议送抵目的地。同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对元老院领导人发表演说。“就在一年前，整个欧洲随我们一同进军，”他坦率地说，“今天，整个欧洲向我们进军。事实是法国或英国决定世界的意见……后世会说，对法国或者我而言，如果重大危机爆发，它们也算不上十分要紧。”[85] 次日，他指示科兰古，若英军到达巴约讷附近的马拉克城堡，就“烧掉它，还要烧掉我的所有房子，让他们没法睡在我的床上”。[86]

为了筹集1.8亿法郎，拿破仑下令对烟草和邮资征收双倍间接税，并把盐税税率上调一倍，但他也对莫利安承认，这些措施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国库里仅剩3000万法郎，所以该动用这根稻草了。[87] 拿破仑要求延迟支付所有津贴与薪水，从而继续执行战争管理部的命令。

12月1日，反法同盟公布法兰克福条款，声称将“保证法兰西帝国疆域超过所有法国国王的领土”。帕基耶与拉瓦莱特告诉拿破仑，他们的情报人员指出，法国人民希望他接受盟国的条件。[88]“聚会[89]时刻已到，”拿破仑煞有介事地对萨瓦里说，“他们看着狮子，认为他死了。复仇姗姗来迟，谁会第一个动手？假如法兰西抛弃我，我什么也做不了，但他们很快就会后悔。”[90]次日，科兰古致信梅特涅，同意接受“总体概要基础”。[91]威灵顿渡过了尼夫河（the Nive），苏尔特退至阿杜尔河（the Adour），12月10日，梅特涅便回信称盟国正等待英国答复。拿破仑战争可以立刻结束了，但是，外国军队能从比利时海岸线入侵英国，只要法国占据这条海岸线上的任何地区，特别是安特卫普，英国就会抗议媾和。卡斯尔雷对梅特涅条件的反对破坏了法兰克福求和尝试，特别是自1814年1月他来到欧洲并鼓励沙皇彻底拒绝与拿破仑媾和之后，和平更是无望。[92]卡斯尔雷认为，只要拿破仑是法国君主，和平局面就不会长久。

“战局中，辉煌胜绩让法军增光，”12月19日，拿破仑告诉立法院道，“史无前例的背叛让这些胜利付诸东流。一切都反对我们了。要是法国人孱弱涣散，就连法兰西也会有危险。”他说只有丹麦和那不勒斯继续忠于法国，但他私下里还是怀疑那不勒斯。小妹卡罗琳和妹夫缪拉返回意大利，再度和奥地利人谈判。拿破仑致信妹妹、托斯卡纳女大公埃莉萨，叫她不给缪拉夫妇任何滑膛枪。他对立法院说“他不会反对重建和平”，并轻蔑地总结道：“我从不迷恋繁荣，我将战胜逆境的打击。”[93]

拿破仑在元老院讲话时同样态度强硬。“如果外国人看到我们全民皆兵，他就会逃走，抑或在他自己提出的基础上签订和约。问题不再是收复我们征服的土地。”[94]元老院仍然忠诚，可是12月30日，立法院以223张赞成票对51张反对票的比例通过声讨拿破仑的长文，此文结尾主张政治与公民权利。文章总结道：“无止境的野蛮战争定期吞噬从学

校、农田、商界、艺术界拉走的年轻人。”[95] 皇帝在俄国首次战败时，法国人容忍了他，但是莱比锡的灾难紧随其后，导致很多人反对他。要是拿破仑还想掌权，他没多少别的选择，只能放逐以约瑟夫·莱内（Joseph Lainé）为首的作者们，并禁止该文出版。次日，他宣布立法院休会。

拿破仑麾下仅剩8万人不到，现在他不仅要对付莱茵河畔的30万名俄国人、普鲁士人、奥地利人，还需应对正在跨越比利牛斯山脉的10万名西班牙人、英国人、葡萄牙人。[96] “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这不是跟我说宪法和人民权利的时候。”拿破仑告诉萨瓦里，“敌人正在靠近，我们不能浪费时间玩小鬼游戏。”[97] 既然联军正在渡过莱茵河，国民团结就比政治纷争更重要。敌军即将侵略法国，拿破仑决意一战。

---

[1]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ⅹⅴ

[2]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189

[3] 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pp.42-3

[4] 甚至在这种危机时刻，拿破仑也设法确保法兰西喜剧院演员在战事重启前返回巴黎。Bausset，*Private Memoirs*，p.395.8月12日，他给了乔治小姐2万法郎，此举可能只是回馈她的歌声。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57.

[5] Menzl，Wolfgang，*German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vol.Ⅳ 1898，Ⅳ p.1585

[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375 pp.48-9

[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360 pp.34-6

[8]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pp.900-902

[9] Gallaher，John，‘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y：The Dresden Phase of the Leipzig Campaign’*Military Affairs* vol.49 issue 2 April 1985，p.68 n.2

[10] Gallaher，John，‘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y：The Dresden Phase of the Leipzig

Campaign’*Military Affairs* vol.49 issue 2 April 1985，p.68

[11] 今弗罗茨瓦夫（Wrocław）。——译者注

[1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6 nos.20381 and 20390 pp.71-2，80-82

[13]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84

[1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86

[15] 今布布尔河（Bóbr）。——译者注

[16] 今卡恰瓦河（Kaczawa）。

[17] 指乌迪诺。——译者注

[18]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15

[1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86

[2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6 no.20445 pp.118-19

[2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262

[22] Karlen，Arno，*Napoleon’s Glands* 1984，p.11

[23]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65

[24] *TLS* 12/5/1927 p.325

[2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443-5

[2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4 and n.1

[2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III p.266

[2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90

[2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190-91

[3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191

[3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482 p.147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67

[33]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67，Nafziger，George，*Napoleon at Leipzig* 1997，p.70

[34] Chandler，David，*On the Napoleonic Wars* 1994，p.112

[3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446-7

[36] 今彼得罗维采（Petrovice）。——译者注

[37] 今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译者注

[38] 今特普利采（Teplice）。——译者注

[39] 今赫卢梅茨（Chlumec）。——译者注

[40]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2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312

[41]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2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312

[4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546 p.190

[43]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381

[4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p.351-2

[4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77

[46] Shoberl，Frederic，*Narrativ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and near Leipzig* 1814，p.ⅶ

[4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791-3 pp.349-52

[48]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 Ⅱ p.312

[49]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 Ⅱ pp.315-16

[50]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 Ⅰ p.187，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6 no.20809 pp.361-2

[5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p.367

[52]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461-70，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p.43

[53] 今天，观看战场的最佳地点为高达270英尺的民族会战纪念碑（Völkerschlachtdenkmal）顶端平台。

[54]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323

[55] Nafziger，George，*Napoleon at Leipzig* 1997，p.113

[56] ed. Pope，Stephen，*The Cassell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1999，p.299

[5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 Ⅱ pp.410-11

[58]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 Ⅱ p.412

[59]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26

[60]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p.164

[61] Bruyere-Ostells，Walter，*Leipzig* 2013，p.177

[62] Nafziger，George，*Napoleon at Leipzig* 1997，p.189

[63] 在英戈尔施塔特的拜恩陆军博物馆（Bavarian Army Museum）的宏大立体模型中，这座工厂最引人注目。

[64] eds. Nafziger，George，Wesolowski，Mariusz T. and Devoe，Tom，*The Poles and Saxon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Chicago）1991，pp.244-5

[65] Smith，Digby，*1813 Leipzig* 2001，p.188

[66] Smith，Digby，*1813 Leipzig* 2001，p.189

[67]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Ⅱ p.432

[68]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42n

[69]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43

[70]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p.400，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30 p.378

[71]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p.371

[72] ed. Brindle，Rosemary，*With Napoleon's Guns* 2005，p.187n

[73]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Ⅱ p.4511

[74] 这只公文包今展示于斯德哥尔摩王宫旁边的绝佳展馆——军械博物馆（Armoury Museum）。

[75]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300

[76]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7

[7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30 pp.374-9

[7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0

[79] ed. Barrès，Maurice，*Memoirs of a French Napoleonic Officer*：*Jean-Baptiste Barrès* 1988，p.193

[80] 今马尔堡（Malbork）。——译者注

[8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

[82]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39

[83] Koebner，Richard，*Empire* 1961，p.284，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6

[8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8

[8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86 p.424

[8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895 p.429

[8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6 no.20902 pp.434-5

[88]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39 n.10

[89] 关于拿破仑提到的聚会，参见第二十一章中他说的话。——译者注

[90]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239

[9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1

[92] Watson，Stephen，*The Reign of George* Ⅲ 1960，p.560

[9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86，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2

[94]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86

[95]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2

[96]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

[97]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262

第二十八章 困兽犹斗

若一军兵力、骑兵数、炮兵数皆处劣势，则它绝对需要规避普遍战斗。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10条

庞培需保住罗马，他应该在那儿集中所有兵力。

——拿破仑，《恺撒战史》

1709年、1712年、1792～1793年、1799年，法国曾先后面临被侵略的危机。当时，数量庞大的法军和17世纪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德·沃邦（Sébastien de Vauban）建造的边境大要塞保护了它。[1] 这回情况不同了。联军兵力浩大，可以从侧面包抄并围困由凡尔登、梅斯（Metz）、蒂永维尔（Thionville）、梅济耶尔（Mézières）等东北部要塞组成的强大战线，此外，他们能把这个任务交给国民后备军、民兵、次要德意志国家的军队等二线部队。1792～1793年，奥军和普军仅派8万人入侵法国，但他们的对手是22万名法军将士。1814年1月，拿破仑面对的联军共有95.7万人，可他的野战军不到22万人，其中6万人与3.7万人分别随苏尔特和絮歇在法国西南部对付威灵顿的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联军，5万人随欧仁守意大利。在接下来的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几乎不到7万人，而且他极其缺乏骑兵和炮兵。[2]

很多人是新兵，除了外套和军便帽，他们基本上没有军人样儿。然而，新兵们坚守在军旗下。1814年战役中，共有5万名年轻的新兵经过库尔布瓦（Courbevoie）主兵站，在这些人中，只有1%的人当了逃兵。[3] 人们常说，拿破仑是吃人妖魔，他为了维持统治，送孩子们去战场当炮灰，但他其实不想这么做。“给我的得是成人，不能是孩子，”1813年10月25日，他致信克拉克，“我们的少年最勇敢，但是……需让成人保卫法国。”1807年6月，他告诉克勒曼元帅：“18岁的孩子太小了，不能

去远方作战。”[4]

拿破仑试图重塑1793年的爱国情怀，甚至允许街头音乐家演奏先前被他禁掉的共和派圣歌《马赛曲》，但昔日的革命呼声“祖国有危险了！”（La Patrie en danger！）不再振奋人心。[5] 然而，他仍然盼望靠军队和自己的能力战胜敌人。“我和6万人在一起时，”他说，“我们相当于10万人。”[6] [7] 可是，若法国人如拿破仑所愿动员起来，联军入侵时，法国境内就会爆发游击抗争，但根本没人打游击战。“公众意见是神秘莫测、不可抵御的无形力量，”拿破仑日后沉思道，“没有什么比它更善变、更模糊、更强大。虽然公众意见反复无常，但不管怎么说，它常常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真实、理智、正确。”[8]

从大革命爆发到雾月政变历时十年，这一时期，波旁王朝大权旁落。此后十五年中，拿破仑继续阻止波旁王朝掌权，于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大革命的政治和社会进步成果。所以说，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法国已经换了一代人，民众也渐渐习惯了新近确立的自由与制度。然而，正统王朝连续组建六个反法同盟，对革命法国和拿破仑法国宣战。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很多法国人流血蚀财，对他们来说，这些代价已超出新自由与新制度的利益。法国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今他们渴望和平。哥萨克在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点燃营火，为了实现和平，法国人欢迎这种羞辱。拿破仑很快就发现，就连省长们也靠不住了，只有两人——斯特拉斯堡的阿德里安·德·勒泽-马尔内西亚（Adrien de Lezay-Marnésia）与贝桑松的德·布里（De Bry）——照其命令在省会避难，并抵御入侵。其他人要么“退休”（也就是说，一获知小战的消息就逃往内陆），要么像孚日省（Vosges）的安贝尔·德·弗莱尼（Himbert de Flegny）那样干脆投降。下塞纳省（Seine-Inférieure）[9] 省长路易·德·吉拉尔丹（Louis de Girardin）等人则升起百合花旗（fleur-de-lys）。[10] 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后，好几个省长设法再度拥护波拿巴主义，结果他们只是在滑铁卢会战后三度倒向保王主义。[11] 1800～1838年，

马恩省（Marne）省长克洛德·德·热桑（Claude de Jessaint）成功挺过每一次政权交替，他始终在职，也无人控诉他。

拿破仑失望地发现，没多少法国人响应1814年征兵令，只有约12万人应征，而名义上的征募人数要多出几倍。但等新兵真的到达兵站后，他也很难给他们制服和滑膛枪。近些年的征兵导致他的核心支持者富农疏远了他，国内亦出现激烈的反征兵暴动。1804年3月至1813年11月，法兰西帝国签发15项法令、18份元老院令、1道参政院令，一共招募2432335人。1813年应征人数占了将近其中一半，因为征兵者忽视了年龄与身高的下限。[12]（青年近卫军的身高要求原为5法尺4法寸，现在变为5法尺2法寸。）[13] 1800～1813年，逃兵役者的比例从27%降至10%，但是1813年年末，这一比率超过30%，沃克吕兹省（Vaucluse）等北部省份也爆发大规模的反征兵暴动。[14] 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的1200多名暴民几乎杀死当地专区区长（sous-préfet），其中4人被处死。1804年，拿破仑预断道，不受欢迎的征兵令与间接税有朝一日将毁灭他。据珀莱记载，他的“预言的确成真了，1814年，复辟王朝的旗帜上就绣着‘更多征兵、更多间接税’（Plus de conscription-plus de droits réunis）的口号”。[15] 应税对象从酒、烟草、盐扩张至金银、邮票和扑克牌。法国人虽交税，但心怀怨愤。[16]

俄国灾难后，拿破仑能在战端重启前用四个月的时间重组并再补给军队，但这回他只有六周。自知之明是其人格中更具魅力的层面，1814年年初，他便带着这种自知说：“我不怕承认自己打了太多仗。我想确保法国当上世界之主。”[17] 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但皇帝打算利用内线痛击一切对巴黎构成较大威胁的敌军，他希望靠这招强迫反法同盟接受法兰克福和平基础，从而挽救自己的帝位。与此同时，拿破仑豁达地看待失败。他问廷臣们：“要是我死了，人们会说什么？”没等他们想出一句恰当的油滑之词，他就耸耸肩，接口道：“他们会松一口气：‘呼！’”[18]

1814年元旦，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御座大殿设宴。一名在场人士回忆道："他镇静严肃，但其眉间凝结着一团阴云，表明暴风雨将临。"[19] 他考虑了1813年年底时英国开出的和平条件，但拒绝了那一主张。1月4日，他告诉科兰古：

> 要是法国失去奥斯坦德（Oostende）与安特卫普，它就没法和欧洲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英国等国都明白法兰克福的这些限制。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曾获得波兰与芬兰的土地，英国在亚洲有地盘，不能把法国在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脉征服的疆土当作这些地区的补偿……我已接受法兰克福提议，但盟国很可能有别的主意。[20]

拿破仑也能把俄国在巴尔干半岛所获地块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所占土地列入单子。他提出继续抵抗，给出了下列论据：意大利"完好无损"；"哥萨克劫掠当地后，居民就会武装起来，则我军规模可翻一倍"；他的兵力够打好几次战斗。他不服逆境，意志坚决："假如幸运离我而去，我也下定了决心，我不在乎帝位。我不会答应这些屈辱的条件，让国家和自己丢脸。"拜恩、巴登、萨克森、符腾堡改投敌营，塔列朗、富歇等大臣叛离，就连缪拉和亲妹妹卡罗琳也反水了。拿破仑可以挺过这些背叛，但幸运一直是其最大支持者，如果它也抛弃他，他就挺不住了。在理智层面上，他自然非常清楚，天命和幸运不会左右自己的命运，但终其一生，这两个概念都影响着他。

1月16日，拿破仑致信梅特涅，他恭维对方，请求与奥军停火。[21] 此信开头写道："亲王，我正致信像您这样开明的大臣。您本人很信任我，我自己也非常信赖您的坦率谈吐，您总是流露出高尚的情感。"拿破仑要梅特涅保密，这当然不可能，后者让其他盟国的人看了信。然而，1814年春天，以科兰古为主的皇帝的全权代表们一直和反法同盟商谈和约可行性，而盟国每天都根据军队的运气换条件。为迎合民意，1月21日，拿破仑释放教皇，允许他从枫丹白露宫返回梵蒂冈。

1月11日，缪拉与奥地利签署协议。他同意率3万人进攻意大利的欧

仁，条件是对方给他安科纳、罗马涅，并确保他和他的继承人安坐那不勒斯王位。至此，缪拉的背叛已是板上钉钉。就在一周后，他占领了罗马，拿破仑便对萨瓦里说："他不太聪明，但他准是瞎了眼才会认为，一旦我倒台后，或者等我战胜这一切后……他还能留在那儿。"[22] 拿破仑说的没错，不出两年，缪拉就被那不勒斯火枪队枪决。"那不勒斯国王的行径臭名昭著，王后干的事也没名声，"拿破仑回应妹妹和妹夫的行为道，"他们如此侮辱我和法国，做出如此可怕的忘恩负义之事。我希望我活得够长，能为自己和国家复仇。"[23] 相形之下，波利娜给哥哥送去一些珠宝，好让他付军饷。约瑟夫则留在巴黎，指导摄政会议。3月24日，拿破仑允许费迪南德七世回国，即便如此，约瑟夫仍自称西班牙国王。

1月23日，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元帅厅（Hall of the Marshals）举行了令人动情的仪式。"我将皇后与罗马王托付给勇敢的国民自卫军。"典礼上，他对国民自卫军军官说，"我自信地动身去迎敌，把我最珍视的东西留给你们，那就是皇后和我的儿子。"[24] 在场军官高呼"皇后万岁！"（l'Impératrice！）、"罗马王万岁！"（Vive le Roi de Rome！），帕基耶看到"很多人流泪了"。[25] 拿破仑明白婴儿皇子的宣传价值，下令创作一幅版画来刻画儿子对天祈祷的场景，画上题字为："我请求上帝拯救父亲与法兰西。"他宠爱罗马王，这男孩能让他产生奇怪思绪。有一次，孩子跌了一跤，受了点伤，结果引发一场大骚动。"皇帝变得忧心忡忡，他说：'我见识过一发加农炮炮弹炸死一整排的二十人。'"[26] 拿破仑宣称"有信心"取胜，但24日晚上，他烧掉了所有私人信件。次日早上6点，他离开巴黎奔赴前线。之后，他再没见过妻儿。

塞纳河、马恩河、埃纳河（the Aisne）贯穿巴黎以东的香槟地区，这些河谷是联军进军法国首都的天然走廊。双方在此开战时，西欧遭遇了一百六十年来最凛冽的寒冬，天气冷得就连俄军也惊讶。军中一直存在低体温、冻伤、肺炎、疲惫与饥饿现象。斑疹伤寒又成了特殊问题，

尤其是在美因茨营地暴发大规模疫情之后。“我的军队！我的军队！他们真的以为我还有一支军队吗？”当时，拿破仑告诉警察局长帕基耶，“他们难道不明白，我从德意志带回来的人其实都死于这恶疾吗？事实证明，继其他灾难后，它是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还一支军队！从现在开始，我能在三周后聚集3万～4万人就走运了。”[27] 这场战役共有12场战斗，其中9场发生在仅仅长120英里、宽40英里的地区，其面积相当于半个威尔士。此地地形平坦，覆盖积雪，是理想的骑兵战场——如果拿破仑真有骑兵的话。他的敌人是联军的两支主力，即布吕歇尔的西里西亚军团与施瓦岑贝格的波希米亚军团，他们有35万人。联军野战军共有近100万人。[28]

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太庞大了，他只好指望元帅们行使相当独立的指挥权。军队一旦缩编至7万人，他就能像征战意大利时一样亲自指挥部队了。贝尔蒂埃、奈伊、勒菲弗、维克托、马尔蒙、麦克唐纳、乌迪诺、莫尔捷这8位元帅在他身边，十多年前，有几个人还只是他麾下的将军或师长，如今，他能再像那时一样指挥他们——每个元帅只率领3000～5000人。（其他元帅的动向如下：贝纳多特与缪拉已是敌人；圣西尔被俘；儒尔当、奥热罗及马塞纳管理军区；苏尔特和絮歇在南部；达武仍然坚守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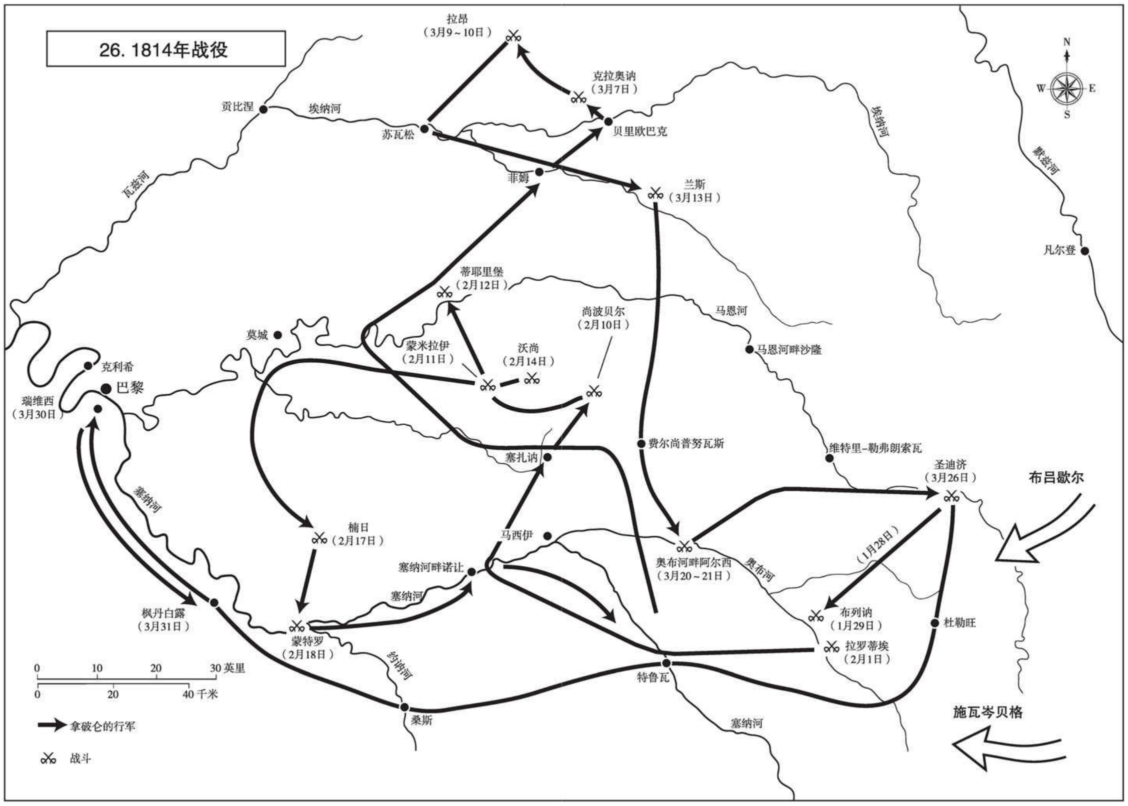
1月26日，拿破仑在维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接过指挥权，他只有3.6万人与136门大炮。他命令贝尔蒂埃在军中分发30万瓶香槟酒和白兰地，“我们自己喝比留给敌人喝要好”。拿破仑发现布吕歇尔很靠前，而施瓦岑贝格的进军方向稍稍偏离了布吕歇尔的，29日下午，他便在布列讷进攻西里西亚军团。[29] “我不认识布列讷了，”他后来说，“一切全变了，就连距离都好像缩短了。”[30] 他只能认出自己曾在哪棵树下阅读塔索作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此战中，当地本堂神父给他当向导，此人原为他的老师。向导骑着鲁斯塔姆的马，后来它被一发加农炮炮弹击毙，当时它紧跟拿破仑之后。[31] 法军奇袭布列讷城

堡，差点俘虏布吕歇尔与其参谋部，尽管俄军奋力反击，他们还是守住了城堡，因此拿破仑取胜了。“等战斗打响时，再过一小时天就要黑了，于是我们彻夜作战，”拿破仑告诉战争部长克拉克，“要是士兵们年龄大些，战绩会更好……但是，考虑到我手上军队的状态，我们必须对战果心怀庆幸。”[32] 皇帝开始尊敬自己的对手布吕歇尔：“如果他战败，下一秒他就能像之前一样蓄势待战。”[33] 拿破仑返回梅济耶尔司令部，途中，一队哥萨克离他太近了，其中一人举枪刺他，结果只是被古尔戈击毙。“天色非常暗，”费恩回忆道，“在混乱的夜间营地中，各方只能靠营火之光认出彼此。”[34] 拿破仑奖赏了古尔戈，授予对方自己在蒙特诺特、洛迪、里沃利所用之佩剑。

战后，拿破仑评估形势，他发现己方折损3000人，乌迪诺再度受伤。普军从布列讷退至奥布河畔巴尔（Bar-sur-Aube），他们在两镇之间的平原上同施瓦岑贝格的一些部队会师。为了阻止布吕歇尔进军特鲁瓦，法军已自毁首要退路，即在莱蒙（Lesmont）横跨奥布河（the Aube）的桥，所以拿破仑不得不开战。他停留了一天，这时间太长了。马尔蒙军来援后，他的兵力增至4.5万人，但2月1日，8万名联军士兵在拉罗蒂埃（La Rothière，距布列讷3英里）的空旷地面上攻击他。法军成功守卫村庄至天黑，但拿破仑折损了近5000人，他很难承受得起这种消耗，尽管联军的损失更大。他还丢了73门大炮，最后被迫撤退。他睡在布列讷城堡，命令军队经刚刚重建的莱蒙之桥撤至特鲁瓦。次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叫她别去歌剧院看《军旗》（*L’Oriflamme*）：“只要敌人蹂躏帝国领土，你就不能看任何演出。”[35]

拉罗蒂埃之战后，联军认为拿破仑将撤往巴黎，于是他们又分兵了。施瓦岑贝格前往正西方的奥布河谷、塞纳河谷，布吕歇尔则进军马恩河谷、小莫兰河谷（Petit Morin valley），这两座河谷与奥布河谷、塞纳河谷平行，位于拉罗蒂埃以东30英里处。从后勤角度看，施瓦岑贝格与布吕歇尔的士兵确实太多了，没法一同行军，而拿破仑能利用两人

之间的缺口灵活行动。威灵顿后来说，拿破仑的1814年战役“让我更了解他那超越所有人的天才。要是他稍微再坚持一下那套方案，我认为他能保住巴黎”。[36] 威灵顿指的是接下来的四场战斗。



“敌军到哪儿都干可怕的事。”拿破仑从一片萧瑟的布列讷致信科兰古，“居民全躲进树林里，村里找不到农户。敌人吃掉一切，拿走农民的所有牛马、衣物及全部破衣烂衫。他们见人就打，不分男女，还强暴平民。”[37] 科兰古曾参与俄国战局，他当然非常清楚连同法军在内的侵略军会干出什么勾当。拿破仑写这封信是为了记录吗？下一句话就体现了他的意图。“我刚刚亲眼看见了这幅画面，它应该能让你迅速明白，我多么渴望尽快将我的人民从不幸与苦难中解救出来，现在这状态着实可怕。”[38] 2月5日，双方开始在塞纳河畔沙蒂永（Chatillon-sur-Seine）议和。拿破仑写这封信，好让科兰古依据人道主义理由接受联军开出的任何合适条款。[39]

沙蒂永会议一直开到3月5日。反法同盟此前曾在法兰克福提出让法国恢复“天然”疆界，现在他们知道己方凭借浩大兵力占据上风，便否决了那一提议。以英国全权大使阿伯丁（Aberdeen）勋爵为首的盟国代表转而要求法国恢复其1791年疆界，那意味着法国彻底失去比利时。拿破仑在加冕礼上发誓“护得共和国领土完整”，他有意践行誓言。贝尔蒂埃和马雷催他结束战争，哪怕要接受这些惩罚性条款。拿破仑质问他们道：

> 你们怎么能指望我签订这样的条约，进而违背我的庄重誓言！因为史无前例的厄运，我要答应放弃的不是自己征服的土地，而是法国在我之前征服的土地！人们如此信赖我，而我背叛他们的信任？流血之后，胜利之后，我留下的法国比我认识它时还小吗？绝不！要是我这么做了，难道我不该被称作卖国贼和懦夫吗？[40]

拿破仑后来承认，他觉得自己不能放弃比利时，因为“法国人不会让（我）留在帝位上，除非我是征服者”。他说，法国就像“压得太紧的一团空气，一旦爆炸，势如雷霆”。[41] 因此，拿破仑不听贝尔蒂埃、马雷、科兰古的建议，他指望盟国分裂、法国人爱国（尽管这两点都无多少迹象），然后继续战斗。现在，法军靠本国村民的支持过活，于是他哀叹道：“军队不但没有保卫祖国，反而滋生祸害。”[42]

2月6日，在杜伊勒里宫庭院中，人们用大车装载国库的金银条，悄悄地把它们运出巴黎。德农请求拿破仑准许自己挪走卢浮宫画作，他以士气为由拒绝。他试图让玛丽·路易丝振作起来，当日凌晨4点，他写道：“听说你正担心，我感到遗憾。打起精神来，高兴点。我非常健康。我的事情虽然都不简单，但不算糟糕，上周它们还有改观。我希望在上帝的眷顾下办成这些事。”[43] 次日，他致信约瑟夫，“我由衷地希望皇后不要离开”，否则“民众会震惊绝望，这可能导致灾难与悲剧”。[44] 当日晚些时候，他告诉哥哥：“杞人忧天的家伙们觉得巴黎陷入绝境了，事态还没那么坏。邪恶天才塔列朗等人试图让国民无动于衷，阻挠我征兵。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通路！”[45] 拿破仑终于认清了塔列

朗的本来面目。此时，塔列朗和富歇在巴黎策划政变，两人与联军公开讨论投降协议。[46] 面临入侵时，国民反应冷淡，这表示他们已然厌战，而皇帝自己接受不了这一点。教堂举行长达四十小时的“悲痛”礼拜，祈求联军解放法国。拿破仑致信康巴塞雷斯，他提起这种新狂潮，问道：“巴黎人疯了吗？”他致信约瑟夫时评论道：“要是他们继续耍这些猴戏，我们都会怕死了。很早以前就有个说法——教士和医生让死亡变得可怕。”[47]

在计划废黜拿破仑的人中，塔列朗、莱内（Lainé）、郎瑞奈、富歇等主谋都曾反对或背叛他，但他既没关押这些人，更没处死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与其敬仰的英雄尤利乌斯·恺撒相像。苏拉与奥克塔维安先后让恺撒面对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但他却宽待他们的同党，决定不记仇，结果正是这些人刺杀了他。

随着沙蒂永的政治形势恶化，拿破仑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他致信约瑟夫，谈及巴黎失守的可能性。“等那一天到来，我就辞世，所以我不是为自己说话，”2月8日，他写道，“我重申一遍，我有生之年，巴黎绝不能被占领。”[48] 约瑟夫的回信没有多大帮助：“如果你渴望和平，那就别计较媾和的代价。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像君士坦丁堡的末代皇帝那样毅然赴死吧。”[49] （1453年，大股奥斯曼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拿破仑的答复更实际：“那不是问题。布吕歇尔从蒙米拉伊（Montmirail）沿公路前进，我正要想法子打败他。明天，我会战胜他。”[50] 拿破仑的确成功了，在接下来的一连串快节奏战斗中，他不断取胜。这些战斗的时间、地点挨得非常近，但它们彼此独立。

拿破仑派维克托去塞纳河畔诺让（Nogent-sur-Seine），调乌迪诺去布赖（Bray）。他自己带着奈伊、莫尔捷北上至塞扎讷（Sézanne），路上，马尔蒙与他会合。西里西亚军团仍和波希米亚军团保持平行，但

前者进军速度快得多。拿破仑位于两路联军之间，西里西亚军团太靠前了，因此它不仅把侧翼暴露给他，还几乎露出了后方。皇帝发现俄军没有骑兵，而且被孤立了。2月10日，他便在尚波贝尔（Champaubert）进攻敞开的俄军侧翼，并击退拉得太长的西里西亚军团中路。他歼灭了扎哈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奥尔苏菲耶夫（Zakhar Dmitrievich Olsufev）将军所辖军的最精锐部队，俘虏了一整个旅，而他的损失仅仅是600人死伤和失踪。当晚，拿破仑和奥尔苏菲耶夫在尚波贝尔的旅馆用餐。他致信玛丽·路易丝，给她寄去奥尔苏菲耶夫的佩剑。“让荣军院发射礼炮，在一切娱乐场所发布消息……我预计午夜时分到达蒙米拉伊。”[51] 歌剧院正在上演让-巴蒂斯特·吕里（Jean-Baptiste Lully）的《阿米德》（*Armide* ），该剧院合唱团还演唱了《胜利属于我们》。

11日，冯·扎肯（von Sacken）将军违反特拉申贝格战略，在马尔谢（Marchais）直接攻击拿破仑，该地位于俯瞰小莫兰河谷的布里高原（Brie plateau）之上。[52] 奈伊守卫马尔谢，与此同时，莫尔捷和弗里昂在莱皮讷-欧布瓦（L’Épine-aux-Bois）反击俄军，居约（Guyot）的骑兵则绕至敌后，击溃俄军与普军。拿破仑一边成功拖住敌军次要力量（约克的部队），一边战胜敌军主力（扎肯的部队），此战是他这套战术的经典示例。当晚，他睡在格雷诺（Grénaux）的农场。费恩回忆说，此地的“尸体被清走后，司令部设在那儿”。[53] 晚上8点，皇帝致信妻子，要她用60门大炮在巴黎鸣炮称颂。他说自己“抓获了整个炮兵部队，俘虏7000人，缴获40多门大炮，这支军队溃败了，无一人逃脱”。[54] （其实他只俘虏1000人，缴获17门大炮。）

次日，拿破仑不顾以二敌三的兵力劣势，在蒂耶里堡（Chateau-Thierry）进攻扎肯和约克。事实上，在前一天的战斗中，他俩麾下的很多士兵从法军手中逃脱，蒂耶里堡之战爆发时，这一点便显而易见了。皇帝发现战场最右端的一个俄军旅被孤立了，遂派自己的少量骑兵追赶敌人。法军骑兵取得成功，又缴获了14门大炮。[55] 然而，麦克唐纳未

拿下蒂耶里堡的桥梁，导致联军逃往马恩河北岸。拿破仑从蒂耶里堡致信皇后："我的好（ma bonne）路易丝，我在马上待了一整天。"他提及下一批宣传活动的日期，并写下结尾："我非常健康。"[56] 法军战胜了西里西亚军团，但乌迪诺军（2.5万人）和维克托军（1.4万人）根本守不住塞纳河上的五座桥，他们完全无力阻止施瓦岑贝格的波希米亚军团（15万人）渡河。[57]

2月14日，拿破仑在沃尚（Vauchamps）再败布吕歇尔。凌晨3点，他让莫尔捷留在蒂埃里城堡，自己则掉头回援马尔蒙。布吕歇尔正迫使马尔蒙从埃托日（Étoges）退往蒙米拉伊。7000名近卫骑兵突然发动进攻，于是布吕歇尔和克莱斯特被迫撤至让维利耶（Janvilliers）。在那儿，格鲁希包抄敌人侧翼，德鲁奥的50门大炮加剧了混乱场面，因此西里西亚军团未能拿下马恩河。法军战胜并驱散了敌军，但他们并未如官方公报所称"消灭"对方。现在，拿破仑可以赶去对付波希米亚军团了。该军团正逼迫乌迪诺和维克托退出塞纳河上的桥，并深入法国境内，攻占内穆尔、枫丹白露、莫雷（Moret）和楠日（Nangis）。[58] 更偏南的法国城镇甚至开始向小股联军部队投降，这说明国民士气的确低落。朗格勒（Langres）和第戎不战而降，埃皮纳勒向50名哥萨克投降，马孔（Macon）向50名骠骑兵投降，兰斯向半个连投降，南锡向布吕歇尔麾下跑得快的侦察兵投降，肖蒙（Chaumont）向区区一个骑兵投降。[59] 拿破仑希望国民起身反抗侵略军，并打出堪比西班牙和俄国游击战的游击抗争，他的愿望将成泡影。

五天之内，拿破仑在尚波贝尔、蒙米拉伊、蒂耶里堡和沃尚四战四捷。2月15日上午10点，他离开蒙米拉伊司令部，去巴黎东南边25英里处的吉涅（Guignes）同维克托军与乌迪诺军会合。途中他停了一下，只为送8000名普军与俄军战俘去巴黎，好让他们在林荫大道上游街示众，从而证明他口中的（真实）胜绩。16日晚，拿破仑已在通往首都的主干道上布阵。他发现施瓦岑贝格的军队排成长达50多英里的队伍，于

是打算一点点击败他们。他致信科兰古："要是敌人肯签署法兰克福提议的先行基础条款，我乐意结束敌对状态，让他们平安回国。"[60] 然而，阿伯丁勋爵仍然不允许拿破仑继续控制安特卫普，战事只能继续。

2月17日，拿破仑向楠日进军，维特根施泰因的三个俄军师屯于该地。他把克勒曼和米肖将军分别置于左右翼，发动进攻，突破了俄军方阵，并用德鲁奥的大炮蹂躏敌人。为了守住塞纳河上的桥，拿破仑在楠日公路分叉口分兵。维克托南下，前往12英里之外蒙特罗（Montereau）的桥。途中，维克托在维勒讷沃（Villeneuve）进攻一个拜恩师，但在长途行军和多日的连续战斗后，他没能稳住自己的优势。拿破仑很少莫名其妙地换人，但这回他如此行事，让艾蒂安·热拉尔（Étienne Gérard）将军代替维克托。他也在居约的部队面前羞辱居约将军。亚历山大·迪容（Alexandre Digeon）将军的炮群打光弹药后，他下令以军法审判此人。"拿破仑的严苛行为令他自己都吃惊，"他的辩护人费恩男爵写道，"但他认为，值此事态紧急之刻，有必要这样做。"[61] 军令自然简短生硬。拿破仑的高级指挥官能力各异，但都是勇敢负责的军人，而他经常粗鲁地对待他们。然而，即便在此刻，他也能幽默地审视形势。"假如幸运继续眷顾我们，"他致信欧仁，"我们能保住意大利。到那时候，没准那不勒斯国王又要换阵营了。"[62]

2月18日，天气晴好，万里无云。下午3点，拿破仑率帝国近卫军到达塞纳河与约讷河交汇处。他在俯瞰城镇的叙维尔高地（Surville heights）上组织炮群，向正在穿过两座桥梁的联军步兵发射满射程霰弹，并阻止施瓦岑贝格的工兵毁桥。（若从桥上仰视，则高地像丘陵，但若站在拿破仑放上大炮的地点，就能很快明了高地控制着城镇。）路易·于盖-沙托（Louis Huguet-Chateau）将军进攻奥军，他战死沙场，但其部队仍然落败。拿破仑随后派帕若尔（Pajol）将军率领骑兵冲锋，他们冲下铺满鹅卵石的笔直街道，驰过两座桥梁，进入城镇里面。[63] 事后，帕若尔的副官于贝尔·比奥（Hubert Biot）听见拿破仑对其上司

说："你的表现令我满意。假如我的将军都像你这样为我效力，敌人进不了法国。去治伤吧，等你康复后，我将给你1万匹马，让你代表我向拜恩国王打招呼！……前天上午，要是有人叫我用400万法郎购买蒙特罗之桥的自由支配权，我会毫不犹豫地付钱。"[64] 比奥随后同上司开起了玩笑，他说在那种情况下，皇帝可能会相当爽快地掏出100万法郎奖赏帕若尔。

次日，拿破仑致信科兰古，否认奥军已经抵达莫城（Meaux），但他们的确到了。俄军指挥官得知拿破仑打算再次进攻布吕歇尔，遂率军后撤，但巴黎人能清楚地听见扎肯的部队的加农炮声。[65] 警务部长萨瓦里向来可靠，当日，拿破仑致信他时发火了。当时有诗歌称，皇帝总是击败三倍于己的敌军，堪称伟大军人，而萨瓦里允许巴黎报纸刊载这种诗作。"你一定是在巴黎丢了脑子才搞出这种东西，我可是一直对外说我有30万人。"拿破仑写道（事实上，他仅仅指挥蒙特罗的3万人），"夸大己方兵力乃战争首要原则之一，可诗人们努力地拍我马屁、迎合国民的自爱，他们怎么会懂这一点？"[66] 蒙塔利韦在信中说，法国渴望和平，拿破仑回信道："你和（萨瓦里）对法国的了解至多跟我对中国的了解一个水平。"[67]

拿破仑急于分裂反法同盟。2月21日，他致信弗朗茨皇帝，请求对方"立刻"重提法兰克福和平基础。他说沙蒂永条款会"实现伯克的梦想，从欧洲地图上抹去法国。所有法国人宁死也不当英国的奴隶"。然后，他忧虑地说，信奉新教的乔治三世之子将成为比利时国王。[68] 拿破仑的信像此前的求和尝试一样，并无效果。

拿破仑任命奥热罗为罗讷军团司令，元帅却已无心战斗。驻西班牙部队支援奥热罗，但他仍未在战役中立下大功，拿破仑考虑到这一层，遂从里昂致信对方："如果你还是卡斯蒂廖内的奥热罗，那就继续指挥；如果六十年的岁月让你扛不住了，那就把指挥权交给你的高级将领

们。”[69] 此举只有一个效果——不抱幻想的老战士更加疏远皇帝了。奥热罗没有北上，反倒放弃里昂，退至瓦朗斯。21日在诺让（Nogent），奈伊和乌迪诺在与拿破仑交谈时提及媾和一事，最后他狠狠地训了两位元帅一通，并邀请他们吃午餐。然而，威灵顿已渡过阿杜尔河，2月27日，他在奥尔泰兹（Orthez）大败苏尔特。战略形势于是变得更加绝望。[70]

2月24～28日，弗拉奥伯爵在吕西尼（Lusigny）与联军商讨停火协议。拿破仑希望磋商最终能回到法兰克福和平基础上，但他坚称必须继续战斗。他告诉费恩：“我不想被这些谈判束缚。”也就是说，上年他曾遵守《普莱斯维茨停火协议》，如今他不想重蹈覆辙。1814年3月1日，所有盟国签署了《肖蒙条约》，同意不与拿破仑单独媾和。此条约宣称，盟国的目标是各出15万人，从而赶走拿破仑，并清除在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与荷兰的法国势力。

丈夫的帝国即将遭灾，玛丽·路易丝也暴露了自己的本性：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女人，很不适应严峻危机。“我没收到皇帝的消息，”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做事如此随性。我能说他正在忘记我。”她的信提及宫中碎语、她与罗马王的保姆共处时的事、礼节事务等琐事，从他的回信看，她似乎不了解也不关心身边的地震。或许她只是全神贯注地听宠物鹦鹉叽叽喳喳。皇后的侍女蒙特贝洛公爵夫人（拉纳的遗孀）想让她摆脱帝国将倾的喧嚣以及其夫与其父的战争，于是送给她这只鹦鹉。玛丽·路易丝和侍女们裁下日用织品给伤员缝衣服，但她真正感兴趣的是画素描、绣手绢、听音乐、玩牌、赏花。她甚至问拿破仑能否给卡罗琳·缪拉写信，他回信称：“我的回答是不能 。她不过是个无名之辈，我让她当了王后，而她对我的行为不当。”[71] 3月2日，他试图让妻子做些有用的事，要她组织枫丹白露宫、贡比涅宫、朗布依埃宫等宫殿向陆军医院捐赠1000份担架、草垫、床单和毛毯。他补充道，自己正追赶普军，“他们相当暴露”。次日，他误报“布尔歇尔”（Bulcher，即布吕歇

尔，原文如此）负伤。[72]

拿破仑不公正地贬黜维克托后，拨给他青年近卫军的一个师。克拉奥讷镇（Craonne）位于巴黎东北方55英里处，三条深谷保护着俯瞰该镇的高原，俄军还用60门大炮掩护峡谷。即便如此，维克托仍然在3月6日夺下高地。次日，克拉奥讷之战爆发，拿破仑欲击退敌军两翼，但失败了。为了击败布吕歇尔的俄军前卫，他最后只好发动血淋淋的正面进攻。德鲁奥用88门大炮组成的炮群发动攻势，奈伊向敌军右翼进军，一场当属1814年战役中最血腥交锋之一的交火结束后，他俩终于为拿破仑赢来战场。发生战斗的地区从于尔特比斯（Hurtebise）农场延伸至塞尔尼村（Cerny），始终不曾超出长2英里的贵妇小径高原（Chemin des Dames pleateau）。克拉奥讷之战始于上午11点清理农场，结束于下午2点30分。战场的前线非常狭窄，几乎不比单单一块地宽，这是双方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今天，高地草场开满罂粟花，这幅田园诗般的画面已然不能说明俄军曾多么激烈地抵抗。因为法军筋疲力尽，俄军撤退时才不受干扰。法军在克拉奥讷取胜，但消息传到巴黎后，人们认为战争将继续，结果证券交易所的股指下跌。[73]

次日，两军休息并重组。9日和10日，拿破仑在拉昂（Laon）进攻普军主力。埃纳省（Aisne）省会拉昂位于巴黎东北方85英里处，该城防卫森严。（就像当年的俄军与普军军官一样，若站在拉昂城墙上，便可看见整片战场在脚下展开。）与奥斯特利茨会战相反，上午11点，阳光驱散了平原上的雾气，布吕歇尔的部下们便能算出拿破仑的兵力。他们发现，虽然他的大炮更多，但他只有21000名步兵和8000名骑兵，相形之下，联军有75000名步兵与25000名士兵。然而，布吕歇尔的部下们太看重他的战术才能，认定其中有诈，因此没有全力反击，不过他们投入的兵力的确比法军的多。

马尔蒙有9500人和53门大炮，他离拉昂只有4英里，但他可能没听

见平原上的厮杀声，所以未支援皇帝。由于马尔蒙日后的行径，他被指在拉昂之战中背叛，但强劲的西风刮过战场时可湮灭一切噪声。然而9日晚上，马尔蒙与其部下没安排哨兵，对此他们也难辞其咎。这样说是因为，普军之中，约克和克莱斯特指挥的一个军趁夜奇袭马尔蒙的军营，彻底驱散了他的军队。次日，拿破仑决定重新发动进攻，这是灾难性的决策。直到下午3点，他才发现自己严重寡不敌众。法军有4000人死伤、2500人被俘，另有45门大炮被缴获。

3月10日结束时，拿破仑的军队（包括马尔蒙的部队）从38500人减至24000人，但他体现了非凡的韧性，立刻奔袭兰斯，打算在此切断联军的交通线。可是10日那天，交通线的整个概念都开始丧失意义：塔列朗的信送抵沙皇亚历山大的司令部，他说约瑟夫相当忽视巴黎的围城筹备工作，鼓励联军直接进军首都。

塔列朗最终叛变了，这只是意料中的事。五年前，拿破仑叫他为丝袜裹着的一泡屎，从那以后，他就不时谋划叛离。然而，3月11日，拿破仑倾向于认为，亲哥哥约瑟夫正在实施更私密的背叛——他似乎想勾引弟媳。玛丽·路易丝对蒙特贝洛公爵夫人说：“约瑟夫国王跟我说的话非常烦人。”[74] 拿破仑显然担心此事，他从苏瓦松致信皇后：

> 不要和国王亲昵。同他保持距离，绝不允许他进你的私人房间，像康巴塞雷斯一样礼貌地接待他。你在客厅时，别让他对你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指手画脚……我离你不远，所以要是国王想给你提建议，他就是多管闲事……冷落他。你要非常矜持地对待国王，别亲近他。你和他说话时，尽可能选公爵夫人在场的时候，并待在窗边。[75]

约瑟夫试图扮演《克利松与欧仁妮》中的贝维尔吗？拿破仑怀疑他想这样做。次日，皇帝致信皇后：

> 难道我命中注定被国王背叛？果真如此，我不会惊讶，也不会变脆弱。只有一件事能打击我的毅力，那就是你背着我和他有任何瓜葛，你对我来说不再是曾经的你。别相信国王。他在男女关系方面声名狼藉，他在西班牙时就常怀野心……我再说一遍，别相信国王，远

> 离国王……这些事都令我相当灰心。我需要家人的宽慰，但他们一般只会惹恼我。可是，如果是你的话，那将出乎意料，令人无法承受。[76]

拿破仑给约瑟夫本人写信："如果你想要我的帝位，拿去吧，但我只求你帮我一个忙，请把皇后的心和爱留给我……要是你想打扰摄政皇后，那就等着我的死讯吧。"[77][78]拿破仑写这些信时得了被害妄想症吗？约瑟夫已经不去见蒙特埃莫索（Montehermoso）侯爵夫人、圣-让·丹热利伯爵夫人这两位情妇，而不出一年，玛丽·路易丝的确肉体出轨，与敌将欢好。[79]据马尔蒙记载，此时约瑟夫变得狂妄自大，严重脱离现实。他认为，1813年拿破仑之所以解除他在西班牙的指挥权，是因为"嫉妒他"。约瑟夫还坚称，"没有军队，没有弟弟"，他也能成功统治西班牙，欧洲其他国家会承认他。[80]当然，要是马尔蒙不曾编造这些话，那约瑟夫纯粹就是痴人说梦。

3月16日，拿破仑特意对约瑟夫下令："不管发生什么，你绝不能让皇后和罗马王落入敌手……留在我的儿子身边。别忘了。我宁愿见他在塞纳河里淹死，也不想见法国的敌人俘虏他。我认为，被希腊人俘虏的阿斯蒂阿纳克斯（Astyanax）的故事是史上最悲伤的一页。"[81]男婴阿斯蒂阿纳克斯是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之子，欧里庇得斯和奥维德称，他被人扔下城墙，不过塞内加说他自己跳下了墙。"轻吻我的儿子，"同日，拿破仑致信玛丽·路易丝，他的话不那么夸张了，"你跟我说的一切都让我盼着他快快长大；他快满三岁了。"[82]

3月13日，拿破仑力克兰斯。20日和21日，他在奥布河畔阿尔西（Arcis-sur-Aube）对战施瓦岑贝格的奥军与俄军，此战既是其军事生涯中第四次防御战，也是最后一次。奥布河水流湍急，河水呈焦糖色。皇帝只有23000名步兵与7000名骑兵，他以为自己的对手是联军后卫，可事实上，波希米亚军团的75000多人屯于河上桥梁的对面。1814年战役历时六十五天，其间，拿破仑走了1000英里，在48个不同的地点过

夜。然而，尽管他如此调动，他的三场败仗——拉罗蒂埃之战、拉昂之战、阿尔西之战——都归咎于在同一地点待了太久，比如说21日那天，他就在阿尔西耗了太长时间。战斗中，一发榴弹炸出了拿破仑胯下坐骑的内脏，但他本人无伤。“我想光荣战死于争夺一寸寸国土之时，”他后来回忆此战时道，“我故意暴露自己。炮弹飞过我身边，它们划破了我的衣服，但都没击中我。”[83] 日后他经常说，阿尔西、博罗季诺与滑铁卢是他最有可能战死之地。

3月21日，拿破仑前往圣迪济耶（Saint-Dizier），他又盼着在此切断联军的交通线。只要巴黎坚持得够久，他就能进攻敌军后方。可是巴黎人能忍受围城吗？或者说，他们会像其他法国人一样崩溃吗？同日，奥热罗任奥军不费一卒拿下里昂。拿破仑仍然指望巴黎的工人和国民自卫军会在街上设置路障，阻止联军进城。24日，他致信科兰古：“唯有剑能了断当前纷争，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84]

23日，联军抓获一名信使，此人身上有拿破仑致玛丽·路易丝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前往马恩河，“从而驱使敌军尽量远离巴黎，并接近我的位置”。联军也截获了萨瓦里致拿破仑的信，发现他恳求皇帝回巴黎，因为政权正在瓦解，还有人公然策划反叛。[85] 因为这两封信，联军高级指挥官确认了进军巴黎的计划。拿破仑分别派轻骑兵和近卫军去奥布河畔巴尔和布列讷，尽全力袭扰联军。次日，他在圣迪济耶附近打了一系列小仗，击败了成群的俄军骑兵，但联军主力正在向严重疏于防务的巴黎集中。[86] 首都缺乏强大的防御工事，拿破仑日后完全承认了这一错误。他计划在凯旋门和蒙马特尔（Montmartre）胜利殿的顶端各安放一长列加农炮，但这两个炮台都没完工。[87]

3月27日，麦克唐纳给拿破仑带去了敌军的当日公告。此公告宣称，25日，马尔蒙和莫尔捷在费尔-尚普努瓦斯（Fère-Champenoise）之战中告败。皇帝不相信，并争辩道，既然这是29日公告，那它定是联军

的宣传手段。德鲁奥能提明智的建议，故拿破仑昵称他为“大军团圣贤”。德鲁奥指出，印刷工制作这份公告时误把“6”印倒了。“不错，”拿破仑检查时惊叫道，“那一切都变了。”[88] 现在他得不计一切代价去巴黎。当晚，他命令军队沿通往特鲁瓦的道路离开圣迪济耶，借塞纳河掩护左翼，并准备进攻右侧的布吕歇尔。

28日晚，巴黎诸人开会，商谈良久。约瑟夫已尽失勇气，他对摄政会议说，拿破仑希望皇后和政府从首都逃往卢瓦尔河（the Loire）上的布卢瓦（Blois）。约瑟夫举出一个月前的信为证，说服了摄政会议，但拿破仑下达此令后曾两度更改它。塔列朗（他已着手起草拿破仑倒台后自己的临时政府下辖大臣的名录）、弑君者康巴塞雷斯（他不想落入波旁王朝手中）、克拉克（没过多久，路易十八就封他为法国世袭贵族）和皇后本人（“她迫不及待地想走”）支持约瑟夫。[89] 萨瓦里、帕基耶与立法院议长马萨（Massa）公爵认为，要是皇后留下，她可为自己与儿子争取到好得多的条件。奥尔唐斯也警告她：“离开巴黎就是丢掉皇冠。”然而，3月29日上午9点，皇室车队与1200名老近卫军士兵从首都前往朗布依埃，于4月2日到达布卢瓦。[90] 康巴塞雷斯带着装有国家印章的桃花心木大盒，“一些忠诚的朋友没有抛弃他，与他同行”。[91]

1814年3月30日（周三），拿破仑的军队用最快的速度从特鲁瓦经桑斯（Sens）去巴黎。此时，施瓦岑贝格的30000名普鲁士人、6500名符腾堡人、5000名奥地利人、16000名俄国人在蒙马特尔等巴黎郊区对付马尔蒙和莫尔捷的41000人。3月29日，约瑟夫发布宣言：“让我们拿起武器，保卫这座城市，保卫它的纪念碑与财富，保卫我们的妻儿，保卫我们珍爱的一切。”然而，30日的战斗刚打响，约瑟夫就离城而走。[92] 马尔蒙和莫尔捷很难算得上陷入绝境，但两人认为形势不可逆转，加之施瓦岑贝格威胁毁灭巴黎，他们便屈服了。次日早上7点，双方开始商讨献城事宜。[93] 莫尔捷军出城，前往巴黎西南边，但接下来几天，马尔蒙军的11000人留在原地。随着敌军接近，荣军院院长、老元

帅塞吕里耶监督下属烧毁并藏匿战利品，包括法军缴获的1417面军旗以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和肩带。

3月30日晚上10点后，皇帝到达瑞维西（Juvisy）的驿站法兰西之心（Le Coeur de France），此地距巴黎仅14英里。不多时，贝利亚尔将军来了，他告诉拿破仑，双方只打了一天，尚未分出胜负，但巴黎投降了。皇帝叫贝尔蒂埃过来，问了贝利亚尔一堆问题，他说："要是我早到一步，一切尚有救。"[94] 他筋疲力尽，坐了一刻钟，双手掩面。[95][96] 他打算不顾巴黎形势，就这么向那儿进军，但被将军们劝阻了。[97] 于是他没去巴黎，反而成了继英国占领期（1420～1436年）之后第一个丢掉首都的法国君主。拿破仑派科兰古去巴黎求和，自己则前往枫丹白露，在31日早上6点时到达目的地。法军在枫丹白露的森林中对旗帜与鹰旗实施"信仰行动"（auto-da-fé）[98]，不过其中一些躲过营火，今展示于巴黎陆军博物馆（Musée de l'Armée）。[99]

4月1日，联军穿过圣但尼门，进入巴黎，其袖子上缠着白色绶带，其筒帽上缀着绿色小枝。民众总是喜气洋洋地欢迎得胜之师，巴黎百姓亦然。拉瓦莱特看见"女人们穿得像过节，她们几乎高兴疯了，一边挥手帕一边喊'亚历山大皇帝万岁！'"，这令他特别恶心。[100] 亚历山大的军队在香榭丽舍和战神广场宿营。仅仅十八个月前，俄国人烧掉了莫斯科，他们宁愿焚毁自己的城市也不向敌人献城，但无迹象表明巴黎人也有此意图。有件事或可说明帝国其他地区多么反复无常。某米兰代表团去巴黎恭贺皇帝战胜所有敌人，他们打算称呼他为"拿破仑大帝"。路上，代表团听说首都被围，但仍决定前进。他们到巴黎后，立刻祝贺联军"推翻了暴君"。[101]

十五年前，塔列朗支持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如今他亲自上阵了。1814年3月30日，塔列朗成立临时政府，旋即与反法同盟议和。[102] 除了让波旁王朝复辟，沙皇亚历山大也考虑过其他安排，如立贝纳多特或

奥尔良家族（Orléans）成员为王，也许他甚至想到为罗马王建立摄政制度，但塔列朗说服沙皇与反法同盟其他领导人接受路易十八。另一位弑君者富歇也进入临时政府。4月2日，元老院颁布元老院令，废黜皇帝，邀请“路易·格扎维埃·德·波旁”（Louis Xavier de Bourbon）即位。全体法军将士曾发誓效忠拿破仑，临时政府也解除了他们的誓言。消息传至军中之后，有人指出，高级军官在认真考虑此事，但其他官兵都面露鄙夷之色。[103]（当然，人们在对待这些效忠誓言的庄严性时可能会道貌岸然——拿破仑也曾发誓忠于路易十六与共和国。）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考虑不断减少的选择。他自己仍想进军巴黎，可马雷、萨瓦里、科兰古、贝尔蒂埃、麦克唐纳、勒菲弗、乌迪诺、奈伊、蒙塞一致反对这个决定。后来有说法称奈伊粗鲁地直谏皇帝，但他不曾那样做；[104]有几个人主张去布卢瓦与皇后会合。矛盾的是，1812年和1813年，拿破仑分别在俄国和莱比锡大败，元帅们并未逼他退位，但1814年他仍能打胜仗时，他们的确赞成他下台了，虽说这次战役中法军兵力远远少于敌军的。皇帝曾反复声称只会做对法国最有利的事，元帅们刻意提醒他这句话。[105]拿破仑怀疑，他们是想保护他所赏赐的城堡和财富，所以才要他退位。激辩中，他说出了这一看法。

1814年，拿破仑曾命令让他退位的一些元帅——麦克唐纳、乌迪诺，特别是维克托——打出不可能的战绩，若其战果仅至超常水平，他就痛斥他们。尽管如此，这些元帅之所以要他退位，其真实理由并不是自私，而是对战略形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从所处的战略地位看，哪怕法军继续在法国内部作战，这场战役也注定失败。只有拿破仑退位，战争才能结束，所以元帅们这样做合乎情理，即使他们态度恭敬。4月3日，拿破仑检阅近卫军与其他部队，他说想进军巴黎，他们便高呼“皇帝万岁！”然而，不管再来多少次检阅，元帅们都知道现在的兵力根本不够（如果说这场战役里他们曾有足够兵力的话。）[106]麦克唐纳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想让首都落得莫斯科的下场。[107]奈伊和麦克唐纳希

望拿破仑立刻退位，以便在一片残局中挽救摄政制度。拿破仑派他俩和科兰古去巴黎，想看看法国是否仍有可能建立摄政制度。可是4月4日，马尔蒙率其军径直进入联军军营，向敌人投降，他还带上了所有武器与弹药。正因为此事，沙皇要求拿破仑无条件退位。[108] 亚历山大率其浩大的军队横穿整个欧洲，如今他不会答应比无条件退位更宽容的条件了。

终其余生，拿破仑一遍遍地回顾马尔蒙的背叛行径。皇帝说，自己“一路带大了16岁的马尔蒙”，此言稍显夸张，不过情有可原。[109] [110] 马尔蒙则说，拿破仑“是个骄傲的恶魔”，向来“疏忽大意、冷漠无情、懒惰倦怠、疑神疑鬼、反复无常，而且一直优柔寡断”。[111] 拿破仑自然骄傲，但他肯定不懒，若说他疑神疑鬼，那么拉古萨（Ragusa）公爵马尔蒙曾是主要受益人。“忘恩负义的混蛋，”拿破仑说，“他会比我更不爽。”拉古萨（ragusard）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近卫军中原隶属马尔蒙的连也得绰号“犹大连”。三十年后，老迈的马尔蒙流亡威尼斯。甚至在那时，小孩们还跟着他，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叫喊：“那就是背叛拿破仑的人！”[112]

---

[1] Crouzet，François，‘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French History* vol.10 1997，p.441

[2]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183

[3] Elting，John，*Swords around a Throne* 1986，p.329

[4]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830 p.875，June 4，1807

[5]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4

[6] 威灵顿完全赞同这一评价。1814年，有人问他是否和拿破仑交过手，他回答：“没有，我非常高兴没遇上他。不论何时，我宁愿听说有4万人援助法军，也不想听到他来指挥了。”Longford，*Years of the Sword*，pp.248-9.

[7] Dziewanowski，Lieutenant M.K.，‘Napoleon：Legend and Propaganda’*Military Affairs*

vol.9 issue 1 January 1945，p.91

[8] Las Cases，*Memorial* Ⅰ p.232

[9] 今滨海塞纳省（Seine-Maritime）。——译者注

[10] Richardson，Nicholas，*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1966，pp.44-6，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25

[11]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5

[12] Pigeard，Alain，*La conscription au temps de Napoléon* 2003，pp.269-70

[13] 1法尺为12法寸，约合0.325米；1法寸约合0.027米。此处的身高要求仅指青年近卫军狙击兵的身高要求，不包括其他兵种。Alain Pigeard，*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p.294. ——译者注

[14]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p.500

[15]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61

[16]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p.267

[17] Markham，Felix，*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1954，p.174

[18] Guérard，Albert Léon，*Reflections on the Napoleonic Legend* 1924，p.94

[19] D'Abranès，*At the Court* p.21

[2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93

[21]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298

[2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289

[23]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3

[2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48

[25]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45，Rovigo，

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Ⅵ p.301

[26] Boigne，Countess de，*Les 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 1999，pp.280-81

[27]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138

[28] 1814年战役中，普军与奥军分别参加了一半的战斗，但沙皇执意攻克巴黎（拿破仑在科西嘉的老对头波佐·迪·博尔戈伯爵建议他这样做），因此除了蒙特罗之战，俄军参与了所有的主要战斗。

[2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1

[3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9

[3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p.77-80

[3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1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3

[34]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79，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p.346-7

[3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6

[36] Stanhope，5th Earl，*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1888，p.6

[3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2

[3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2

[39] 事实上，除了哥萨克，1814年，在法国的联军纪律非常严明。圣迪济耶某博物馆纪念拿破仑的1814年战役，馆内藏有联军军官签署的征收单，它用于向农民和商人支付货款。

[40]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94

[41] 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p.53

[4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20

[43]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7

[4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9

[4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9

[46] 1814年时，如果波旁王朝复辟，塔列朗、富歇之流也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们可以抛弃拿破仑了。假如很久以前波旁王朝就回归，政府将处决这类弑君者，哪怕他们倒戈。

[4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2

[4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06

[4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2

[5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97

[5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4

[52] 蒙米拉伊之战的战场不是今日纪念碑所在地，而是马尔谢附近的村庄及其四周。当地人称这场战斗为马尔谢-蒙米拉伊之战。奥拉斯·韦尔内曾描绘这一地区，若参观战场便可发现，韦尔内的杰作显然非常精确地刻画了此地的地理环境。这幅画今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

[53]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02

[5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15

[55]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496

[5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216-17

[57]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56

[58] 希莫尼·约瑟夫（Simonyi Josef）上校率匈牙利骠骑兵进入枫丹白露宫，然后他把烟斗里的灰倒在拿破仑的御座上。希莫尼是刻意模仿先代匈牙利骠骑兵指挥官哈迪克·安德烈亚斯

（Hadik Andreas）伯爵。1757年，哈迪克大胆突袭柏林，还把烟斗里的灰倒在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御座上。Hollins，*Hungarian Hussar* ，p.44.

[59]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2，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04

[60]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5

[6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116

[62]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7

[63] 据说，当日拿破仑说了句话：“别害怕，我的朋友们。能炸死我的加农炮炮弹还没造出来呢。”遗憾的是，这句话似乎是《法国概况日报》（*Journal Général de France* ）记者日后杜撰的言论之一。

[64]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358

[65]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7

[66]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16

[6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25

[68]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p.322-3

[6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Ⅲ p.321

[70]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0

[7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3

[7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4

[73] Foch，Marshal，'La battaille de Laon'*Revue de France* May 1921，p.11

[7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p.236-7

[75]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7

[7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38

[77] 这封信藏于国家档案馆，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拿破仑通信集》初版未收录它。

[78] AN 440 AP 12

[79] Ross，Michael，*The Reluctant King* 1976，p.228

[80] Marmont，*Memoirs* p.69

[81]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1

[8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1

[83]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25，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7，McLynn，Frank，*Napoleon* 1997，p.584，Anon.，'More about Napoleon'p.228

[84]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5，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4

[85] Chardigny，Louis，*L'Homme Napoléon* 1986，pp.154-5

[86]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p.272

[8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87-8

[88]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5

[89] ed. Lacour-Gayet，Robert，*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p.46，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p.398-402

[9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9

[91]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05

[9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49

[93]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21，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Russian Eagles over the Seine”：Russian Occupation of Paris in 1814’*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p.155-6

[94] eds. 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p.444

[95] 拿破仑陷入逆境时常摆出这姿势，但此举或许是头痛产物。他对医生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头疼“不时困扰他”。BL Lowe Papers 20156 fol.28.

[96]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22

[97] 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p.53，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2216

[98] 原指异端裁判所强迫被定罪的异教徒公开忏悔。忏悔仪式后，这些异教徒将受刑，最严厉的刑罚是火刑。后来这个词一般指在情势危急之日焚烧东西。——译者注

[99] INV AA 1751-1758，1761

[100]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23，Mikaberidze，Alexander，‘“The Russian Eagles over the Seine”：Russian Occupation of Paris in 1814’*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p.158

[101]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Ⅳ p.230

[102] Waresquiel，Emmanuel de，*Talleyrand* 2011，p.125

[103]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68

[104]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69

[105]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51

[106]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2

[107]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p.246-7

[108]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2

[109] 马尔蒙生于1774年，根据其回忆录推断，1789～1791年，他在第戎初遇拿破仑。——译者注

[110]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3，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5

[111] Cronin，Vincent，*Napoleon* 1971，p.554，Raguse，Duc de，*Mémoires du Maréchal Marmont* 9 vols.1857，Ⅵ p.274

[112]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499

第二十九章 厄尔巴

1815年，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因为之后的历史平庸无奇。

——梅特涅，《回忆录》

真正的英雄精神在于战胜厄运，不论它们对战斗提出何等挑战。

——1815年，“诺森伯兰号”上的拿破仑

奈伊、麦克唐纳、勒菲弗、乌迪诺明显不愿参与内战，反法同盟也在4月5日告诉科兰古，他们会让拿破仑终身统治意大利海岸线上的地中海岛屿厄尔巴岛。皇帝随即在枫丹白露宫签发临时退位诏书，供科兰古用于和谈。[1]“你们渴望休息，”他对元帅们说，“好吧，你们将实现愿望。”[2]退位只限于他自己，与他的继承人无关。他想让科兰古对此保密，因为涉及厄尔巴岛、保障拿破仑及其家人享有财产与人身安全的条约签订后，他只需确认一次退位之事。然而，消息自然很快走漏，官员和廷臣于是离开王宫，去找临时政府讲和，宫中遂空空如也。在离开的大群人中，国家参政约瑟夫·珀莱·德·拉洛泽尔说：“人们会认为皇帝已经入土。”[3]儒尔当、奥热罗、迈松（Maison）、拉格朗日、南苏蒂、乌迪诺、克勒曼、勒菲弗、于兰、米肖、塞居尔、拉图尔-莫堡（Latour-Maubourg）等人声明效忠路易十八，4月7日，《箴言报》专栏都没有足够版面登载他们所有人的宣言。[4]政府甚至任命贝尔蒂埃在路易十八的近卫军中指挥一个军。[5]“陛下伤心欲绝，很少开口。”鲁斯塔姆回忆那些日子时如此说道。[6]路易十八原先住在拉脱维亚叶尔加瓦宫，1800年，他从此地致信拿破仑，要求对方还他王位。1807年，路易十八迁至英格兰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哈特韦尔邸宅（Hartwell House），他一得知拿破仑退位，就立即准备回法国收回王座。

然而，哪怕拿破仑失去了军官和总参谋部，他要是愿意，他仍可发

动内战。4月7日晚上，退位流言蔓延，枫丹白露的4万名士兵于是离开住处。他们擎着武器与火把游行，高喊“皇帝万岁！”“打倒叛徒！”“去巴黎！”[7] 奥尔良、布里亚尔（Briare）、里昂、杜埃、蒂永维尔、朗多（Landau）等地出现类似场景，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等地，军队公开焚烧波旁王朝的白旗。奥热罗军差点哗变，忠于拿破仑的卫戍部队试图在安特卫普、梅斯、美因茨发动起义。里尔的士兵公开造反，真的对军官开枪，迟至4月13日，这场三日反叛才结束。[8] 正如戴高乐日后所评论的：“他给士兵带来的苦难最多，但他们恰恰是最忠于他的人。”[9] 忠诚士兵的抗议震动了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他警告战争大臣巴瑟斯特（Bathurst）勋爵：“拿破仑还待在枫丹白露，他身边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忠于他，这是危险的迹象。”经过五天的谈判，1814年4月11日，卡斯尔雷的警告终于促使反法同盟签署《枫丹白露条约》。[10]

科兰古、麦克唐纳携条约从巴黎至枫丹白露宫，现在只要拿破仑签字，和约就会生效。皇帝请他们用晚餐，发现奈伊没来，因为他留在首都，与波旁王朝讲和。[11] 《枫丹白露条约》规定：拿破仑使用皇帝头衔，终身统治厄尔巴岛；整个波拿巴家族将得充裕钱款，尽管约瑟芬那高得骇人的赡养费减至每年100万法郎，拿破仑自己每年可获250万法郎，玛丽·路易丝能分到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达拉这三个意大利公国。[12] 4月13日，皇帝致信皇后：“我会招你厌，但那是我已老去、你尚年轻之时……等你既厌倦我的厄尔巴岛，也开始讨厌我时，你还有至少一座宅邸与一个美丽的国家。”他补充道：“我很健康，我的勇气不曾受挫，若你安于我的厄运，自认仍可与我幸福地共享命运，那我将格外健康勇敢。”[13] 他还不明白，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愿把女儿嫁给一个波拿巴，是因为那个波拿巴是法兰西皇帝，如今他仅仅是厄尔巴岛皇帝，他们就觉得这桩婚事毫无益处了。拿破仑找到一本关于厄尔巴岛的书，对博塞说：“那儿的空气对身体非常好，当地居民也是杰出人士。我的日子不会太差，我希望玛丽·路易丝也别太难过。”[14] 按照皇帝的命

令，皮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将军率一支骑兵去54英里之外的奥尔良，欲接皇后和罗马王去枫丹白露宫。4月12日，他们到达目的地，但仅仅两小时前，梅特涅派来的奥地利代表团已把皇后及其随员带到朗布依埃城堡，他们告诉她，其父将来此同她会合。一开始，玛丽·路易丝坚称没有拿破仑的准许，她不能离开，但奥地利代表轻松地说服她改变主意，尽管她致信丈夫时称自己是被他们强行带离。如果她曾打算与他相伴，没过多久她也彻底抛弃了那些计划，转而去了维也纳。她并不想要不太难过的日子。

12日，拿破仑和科兰古、麦克唐纳吃完晚餐，当晚剩余时间和13日凌晨，他试图自杀，尽管他致信玛丽·路易丝时态度乐观。[15] 他在小雅罗斯拉韦茨险些被哥萨克俘虏，从那以后，他就在脖子上挂了个丝绸小包，里面装着一剂混合毒药，“其大小和形状像一片蒜瓣”。[16] 他没有尝试其他自杀方式，重要原因之一是鲁斯塔姆与他的侍从蒂雷纳伯爵（Comte de Turenne）亨利（Henri）拿走了他的手枪。[17] 拿破仑本人日后解释道：

> 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的国家，因为最后几天的事，我又能处置自己的性命了。“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多苦难？”我沉思，“谁又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死可让我的儿子继位？”法国已得救。我不再犹豫，从床上跳起来，往毒药里掺了一点水，带着某种幸福感喝下了它。但它放得久了，已经失效。可怕的痛苦导致我呻吟，有人听见了动静，医疗援助便来了。[18]

皇帝的贴身男仆于贝尔（Hubert）睡在紧挨他卧室的房间里。此人听见拿破仑呻吟，便找来伊万医生。伊万让皇帝呕吐，他的法子可能是强迫对方吞服壁炉炉灰。[19]

晚上，马雷和科兰古也应召而来。拿破仑显然不会死了，次日上午，他随即在朴素的独脚桌边签署条约，同意逊位，“没有继续犹豫”。签字地点是映红耀金的前厅，现在它叫退位室（Abdication

Room）。“盟国已宣布，拿破仑皇帝是恢复欧洲和平的唯一障碍，”条约写道，“拿破仑皇帝信守誓言，声明他和他的继承人放弃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君位。为了法兰西的利益，他愿意牺牲一切个人利益，哪怕是生命。”[20]

4月13日上午9点，麦克唐纳来皇帝的寓所取签过字的条约，此时马雷和科兰古尚在。麦克唐纳发现，拿破仑“坐在炉火边，穿着简单的麻纱（轻薄棉纱）晨衣。他裸着双腿，踩着拖鞋，双手托头，膝盖撑着胳膊肘……他的脸泛黄发青”。[21] 对此，拿破仑只是说：“前夜一直病得厉害。”他对忠诚的麦克唐纳说了些溢美之词：“我不太了解你，我对你有偏见。我满怀好意地为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事，结果他们丢下我，忽视我。我没给过你什么，你却仍然忠于我！”[22] 皇帝赠予麦克唐纳穆拉德贝伊的佩剑，两人拥抱，然后元帅携签好字的条约赴巴黎。此后，他们再未见面。

拿破仑自杀未遂后，鲁斯塔姆逃离了枫丹白露宫。他后来说，假如皇帝成功自尽，他害怕人们可能会错怪他，把他当成波旁和盟国的刺客。[23]

4月15日，陪拿破仑去厄尔巴岛的将军人选定下来了：贝特朗、德鲁奥、皮埃尔·康布罗纳。一小股帝国近卫军也将随行，他们共有600人。根据《枫丹白露条约》某特殊条款，反法同盟已经承诺，它们将保护厄尔巴岛免遭“柏柏里国家”（即北非国家）侵扰。（厄尔巴岛所处的地中海海域，柏柏里海盗猖獗。）次日，四位盟国专员来到枫丹白露宫，他们要去厄尔巴岛与皇帝相伴，尽管只有英军上校尼尔·坎贝尔（Neil Campbell）爵士和奥军将领弗朗茨·冯·科勒（Franz von Koller）真的住到岛上。拿破仑和坎贝尔关系不错，此人曾在费尔-尚普努瓦斯之战中负伤。当时，一个俄国人错把坎贝尔当成法军军官，用枪刺他的后背，与此同时，另一个俄国人挥舞马刀砍他的脸，纵然他已大

喊：“英军上校！”（Angliski polkovnik！）坎贝尔欣喜地得知，卡斯尔雷命令他“去厄尔巴岛照顾前法国政府首脑”。（这种说法表明，拿破仑的确切地位已然很不确定。）[24]

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阅读巴黎的报纸。据费恩回忆，报纸的辱骂“没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它们的仇恨达到荒谬程度时，他也只是遗憾地微笑”。[25] 他告诉弗拉奥，2月时未接受沙蒂永和平条款一事令他高兴：“假如我在立誓护得法国领土完整之日签署条约，导致它损失单单一个村子，我都会更悲伤。”[26] 他一点也不肯违背关于法国荣誉（la Gloire de la France）的誓言，这是他重新掌权的关键因素。眼下，拿破仑对其贴身男仆康斯坦说：“好吧，我的儿子，收拾好你的大车，我们要去种卷心菜了。”[27] 然而，摇摆不定的康斯坦[28] 没这打算。在服侍了主人十二年后，他在4月19日晚上带着5000法郎现金逃走了。（萨瓦里下令替拿破仑藏匿7万法郎，这笔钱比法兰西银行行长的年薪多出许多。[29]）

坎贝尔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17日，他会见了拿破仑，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 我眼前是一个看上去活跃的矮子。他飞快地从寓所这头踱步至那头，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他穿着上绣金色肩章的绿色旧制服与蓝色长裤，脚踩红色长筒靴。他没刮胡子，没梳头发，上唇和胸口落满鼻烟灰颗粒。他意识到我来了，迅速转身冲我打招呼，礼貌地向我微笑。他显然努力地故作镇定，以掩饰紧张与焦虑。[30]

拿破仑抛出坎贝尔开始熟悉的连珠炮般的问题，问英国人其伤口、军事生涯、俄国勋章、英国勋章。他得知坎贝尔是苏格兰人后，又向对方询问诗人莪相。话题接着转到半岛战争的各场围城战，他称赞了英军将领的才干。4月10日，威灵顿和苏尔特在图卢兹交手，各自折损3000多人。拿破仑“急切地”问起不幸的堪称多此一举的图卢兹之战，[31] 他“非常赞赏”威灵顿，打听其“年龄、习惯等”，并评价道：“此人精力

充沛，具备这一素质才能打胜仗。”[32]

“你的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拿破仑对坎贝尔说，“我最尊重你的民族。我很坦率地说，我曾是你的民族的最大敌人，但现在不是了。同样，我曾想提升法兰西民族，但我的计划失败了。这都是天意。”他之所以说出部分恭维之辞，可能是因为他不愿乘分给自己的法军轻型巡航舰“山林女仙号”（Dryade）去厄尔巴岛，想改乘英军战舰。也许他既考虑到海盗问题，又担心被支持国王的船长或船员刺杀。[33] 会面结束时，拿破仑热诚地说：“非常好，我任你差遣。我是你的人，完全指望你了。”然后，他鞠了一躬，“丝毫不带傲慢神气”。[34] 很多英国人发现他惊人地讨人喜欢，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商谈条约之时，拿破仑指示科兰古询问自己是否可去英国流放，他认为厄尔巴社会不及伦敦市“单单一条街”。[35]

法国新任战争大臣不是别人，正是1808年率其军在西班牙拜伦投降的杜邦将军。杜邦下令，拿破仑到达厄尔巴岛前，“必须挪走”岛上“所有属于法国的库存”。4月18日，皇帝得知此事，于是他拒绝离开枫丹白露，理由是小岛今后易遭攻击。[36] 然而，次日他还是送走了行李（但不包括其金库里的48.9万法郎，他将带这笔钱上路），并向宫中尚存的支持者分发书籍、手稿、佩剑、手枪、勋章和硬币。沙皇亚历山大去朗布依埃拜访玛丽·路易丝，拿破仑听说后发火了，这可以理解。他抱怨道，征服者去见悲伤的妻子是“希腊式”做派。（也许他想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接纳大流士家族一事。）沙皇还拜访了约瑟芬，拿破仑便又大骂。“呸！他先是和奈伊吃早饭，然后去马尔迈松看她，”皇帝说，“他图个啥？”[37]

4月中旬，贝尔蒂埃的前副官夏尔-特里斯坦·德·蒙托隆（Charles-Tristan de Montholon）将军造访枫丹白露宫，他带来一份逃往卢瓦尔河上游的计划（这套方案有些姗姗来迟）。“昔日，宫中有一群廷臣，阔

大走廊都挤不下他们，如今，除了巴萨诺公爵（马雷）和副官维克托·德·比西（Victor de Bussy）上校”，蒙托隆“发现走廊空无一人。整个宫廷、皇帝的全部私人侍者……抛弃了不幸的主人，匆匆赶往巴黎”。[38] 此言并非全部真相。贝特朗将军、古尔戈将军、让-马丁·珀蒂（Jean-Martin Petit）将军（老近卫军指挥官）、廷臣蒂雷纳、廷臣梅格里尼（Megrigny）、私人秘书费恩、翻译弗朗索瓦·勒洛涅·迪德维尔（François Lelorgne d’Ideville）、副官阿尔贝·富莱·德·勒兰格（Albert Fouler de Relingue）将军、副官茹阿纳（Jouanne）骑士、副官拉普拉斯（la Place）男爵、助手路易·阿塔兰（Louis Atthalin）、波兰人科萨科夫斯基（Kossakowski）将军、波兰人翁索维奇（Wąsowicz）上校继续侍奉拿破仑，直到最后关头。科兰古和弗拉奥不在宫中，但这两人依然忠于他。[39] 此后，蒙托隆一直服侍皇帝，再未离开。在政治灾难中，忠诚与感恩都是罕事，但拿破仑仍有能力激发这两种情感，尽管他无力回报。“我从枫丹白露宫去厄尔巴岛时，并无重返法国的雄心壮志。”他后来回忆道。这些最后的忠诚随员只能盼来波旁王朝的敌意。[40] 想报复的不止波旁家族。一群暴民从米兰元老院中拖出拿破仑在意大利的财政部长朱塞佩·普里纳（Giuseppe Prina），花了四小时实施私刑，杀死了他，然后把税收记录塞进尸体的嘴里。

1814年4月20日（周三），拿破仑离开枫丹白露宫，前往厄尔巴岛，这一幕当属拿破仑史诗中最伟大的场景之一。宽阔的枫丹白露宫白马庭（Cour du Cheval Blanc）——如今它叫告别庭（Cour des Adieux）——铺就雄壮背景，其庞大的马蹄形复式楼梯构成舞台，老近卫军队列则是心怀恰当感恩与悲伤之情的观众。（杜邦的恶意命令被取消了，但巴黎的信使尚未送来相关保证，所以专员们甚至不确定拿破仑是否真的会走。上午9点，宫廷司礼官贝特朗将军肯定了他会走，于是他们松了一口气。）拿破仑先在宫殿上层的一间觐见室中分别接见盟国专员。他和科勒恼火地谈了半个多小时，说自己仍然被迫与妻儿分离。谈话中，“泪水真的滚下他的脸颊”。[41] 他也想知道科勒是否认为英国政府

会允许他住在英国，奥地利人的反驳道出应有之义：“会，陛下，因为您从未在那个国家打仗，和解要更容易。”[42] 科勒后来说，布拉格会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媾和“机会”，拿破仑回答：“我的计划也许出错了。我在战争中造成了损害，但那些都像一场梦了。”[43]

拿破仑同士兵和仅剩的几个廷臣握手，“匆匆走下”大楼梯。然后，他命令两排老近卫军（grognards）围住他，对他们说话。他语调坚决，可普鲁士专员弗里德里希·冯·特鲁克泽斯-瓦格德堡（Friedrich von Truchsess-Waldburg）伯爵回忆道，他的嗓音不时激动地颤抖。[44] 坎贝尔等人记下的演讲内容中有大段重复文字，这既是因为那些话代表此次大危机中他的口才，也是因为它们大致体现了日后他力图讲述这段历史时使用的论据。

> 老近卫军的军官们、军士们、士兵们，永别了！二十年来，我一直见你们勇敢忠诚，沿着荣誉之路进军。全欧洲联合起来对付我们。敌人瞒着我们进行了三次行军，已经进入巴黎。我向首都进军，想把敌军赶出来，他们在那儿待不过三天。在此形势下，你们在同一地点表露高尚情感，我感谢你们，但是一部分军队没有这种感情，他们抛弃了我，迈向敌营……凭借仍然忠诚的三股军队以及人民大众的同情与努力，我可以退往卢瓦尔河或要塞，继续打上好几年。然而，内外交战的烽火将撕裂美丽祖国的疆土。就算我们愿意承受所有这些牺牲与灾难，一个党派已经控制了巴黎，我们还能指望借助巴黎的影响力战胜联合的欧洲吗？在此形势下，我只考虑国家利益与法兰西的安宁。我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权利，还准备献出生命，因为我的一生旨在追求法兰西的幸福与荣耀。士兵们，你们总是忠于责任与荣誉的道路。向你们的新君主尽忠。从今往后，让你们的伟大壮举尽皆流传后世将是最快乐的事业……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不能拥抱你们每一个人，所以我让你们的将军做代表。[45]

然后，拿破仑亲吻珀蒂的双颊，并宣布：“我要拥抱这些鹰旗，它们在那么多光荣的日子里指引我们。”他三次拥抱其中一面旗帜，用时长达半分钟，接着他举起左手，说：“再见！不要忘记我！永别了，我的孩子们！”近卫军乐队随后鼓号齐鸣，奏响称颂曲《为了皇帝》（*Pour l’Empereur* ）。拿破仑在音乐声中走上马车，迅速驶离。不消

说，官兵们流泪了，就连在场的一些外国军官都哭了，还有人痛不欲生，其余的人则高喊“皇帝万岁！”

拿破仑一行共有14辆马车，由一队骑兵护送。夜幕降临，车队与护卫到达近70英里外的布里亚尔，拿破仑住进驿站。“再见了，亲爱的路易丝，”他致信妻子，“爱我，想想你最好的朋友和儿子。”[46] 接下来六天，他先后在讷韦尔、罗阿讷（Roanne）、里昂、栋泽尔（Donzère）、圣卡纳（Saint-Canna）、吕克（Luc）过夜。4月27日上午10点，他到达南部海岸的弗雷瑞斯。500英里的旅程途经保王传统浓厚的法国南部，并非平平安安。在不同场合下，拿破仑得分别穿戴科勒的制服、俄军斗篷乃至波旁帽徽，以防被认出。在奥朗日（Orange），好几块大石头从车窗砸进皇帝的车里；在阿维尼翁，人群损坏马车上的拿破仑之鹰，还逼迫一个侍从喊“国王万岁！”，否则就杀了他（一年后，布吕内元帅在阿维尼翁被保王党刺客刺杀，其尸体被扔进罗讷河）。4月23日，拿破仑在瓦朗斯遇见奥热罗。老元帅曾是1796年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首批师长之一，除了荣誉军团红绶带，前者已经不戴后者授予的任何饰物。如今，奥热罗“骂拿破仑野心勃勃，为个人尊严浪费鲜血”。元帅还相当直率地对皇帝说，他应该死在战场上。[47]

根据坎贝尔的安排，海军上校托马斯·厄谢尔（Thomas Ussher，后升任将军）在弗雷瑞斯接拿破仑上皇家海军巡航舰“无畏号”（Undaunted）。皇帝在弗雷瑞斯遇见了波利娜，她提议随他流放。波利娜对丈夫们不忠，但哥哥倒台后，她却非常忠于他。28日上午，拿破仑原想离开法国，但他错过了涨潮。午饭时，他吃了一只变质的小龙虾，结果呕吐了。直到晚上8点，他才起航。若依皇家海军惯例，日落后他们不鸣炮，但拿破仑登船后坚持要礼炮，于是英军比照君主待遇，用21响礼炮声向他致敬。[48] （《枫丹白露条约》确认了他是退位君主，享有相应礼节规格。）他离开时的码头正是十五年前他从埃及回来时登陆的码头，这种呼应真令人伤感。[49] 厄谢尔上校检查了皇帝的佩

剑，确保他可以轻松地拔剑出鞘，以防万一他需在众人面前自卫。可事实正相反，厄谢尔发现了一桩“最有趣的事”——拿破仑离开时人群向他欢呼。[50] 坎贝尔指出，在整个旅程中，“拿破仑对我们所有人……抱着最大的热忱……随他而行的军官说，他们从没见他比现在更放松”。[51] 拿破仑对坎贝尔说，他认为英国人会强迫波旁王朝签订商业条约，这将导致波旁家族“在六个月内被赶走”。[52] 他要求巡航舰在阿雅克肖登陆，向厄谢尔讲述自己的童年轶事，但科勒恳求上校不要考虑此事。或许科勒担心，要是拿破仑逃入阿雅克肖的山中，他可能会制造混乱。[53]

5月3日晚上8点，“无畏号”在厄尔巴岛主要港口费拉约港抛锚。次日下午2点，拿破仑下船。他上岸时，专区区长、当地神职人员、地方官前来迎接，他们带上了小岛的礼节性钥匙，但最重要的欢迎是人海中响起的呼声：“皇帝万岁！”“拿破仑万岁！”[54] 他们在海港炮台上升起他设计的旗帜，那是一面白旗，上映镶嵌蜜蜂的红色对角线。在埃劳战场上，拿破仑曾授予一名中士荣誉军团星章。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在人群中认出此人，对方立刻哭了。[55] 众人列队前往教堂，聆听《感恩赞》，然后拿破仑去市政厅会见了岛上首要的显贵。最初几天，他住在市政厅，后来他住进宽敞舒适的穆里尼别墅（Palazzina dei Mulini），该地俯瞰费拉约港。他还把圣马蒂诺别墅（Villa San Martino）当作夏宫，站在此地台阶上可清楚地纵览小镇。[56] 登陆后第二天，拿破仑视察了费拉约港的防御工事，第三天，他又巡视那里的铁矿。他很快就会严重缺钱，所以铁矿需要创造财富。

拿破仑认为他的钱不能满足需要。他从法国带来50万法郎，此外，司库佩吕斯给他汇了258万法郎，玛丽·路易丝也寄来91.1万法郎，所以他的钱加起来不足400万法郎。[57] 根据《枫丹白露条约》，理论上他每年可得250万法郎，但波旁王朝其实没给他汇过一分钱。1814～1815年，厄尔巴岛总岁入分别为651995法郎、967751法郎，但1814年，拿破

仑的民生、军事与家庭开支达到180多万法郎，1815年，这些开支将近150万法郎，因此他的钱只够再撑二十八个月，尽管他与五位贴身男仆显然能采取节俭措施。更糟的是，12月时，波旁王朝扣押了波拿巴家族的动产与地产。[58]

1803年，厄尔巴岛被割让给法国。当时拿破仑写道，岛上有“宽厚勤恳的居民、两个优良港口、一个富饶铁矿”，但既然他是厄尔巴君主了，他就把占地2万英亩的小岛称作“小王国”（royaume d’opérette）。[59] 其他君王可能都会在环境优美、气候温和、氛围宜人的小岛上放松，尤其是刚刚经历了两年艰难岁月的人，可拿破仑没有。因个性使然，他精神抖擞地投身小岛生活的每个方面，并且一直找机会回国，如果法国政治环境改善，他将从坎贝尔身边溜走，返回法国。拿破仑在厄尔巴岛待了近十个月，其间他办成下列事务：组织新王国防务，向11400名居民中的最穷苦者发钱，在波焦（Poggio）外的公路上安设一座喷泉（今天，它仍然提供新鲜的凉饮用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在费拉约港市政府留下一座图书馆，其内有1100卷藏书），与宠物猴热纳尔（Jénar）玩耍，一边哼唱意大利咏叹调一边沿着海边山羊道漫步；在大街上种植桑树，建成林荫道（或许他终于摆脱苗圃诅咒了）；改革关税与消费税，修补营房；建造一家医院，设立数座葡萄园；让费拉约港的部分地区首次铺上路面，并灌溉土地。他还组织人员定期收垃圾，并颁布法律规定一张床最多只能睡五个小孩，成立上诉法院，并组建了一个旨在拓宽道路、修建桥梁的视察团。无可否认，和拿破仑昔日的领土比，厄尔巴岛好比小人国，但他想让它成为全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小王国。[60] 他对最小细节的兴趣不但未曾消减，甚至还延伸到他要给猎狗喂什么面包上面。[61]

拿破仑长胖了，但他仍做完了所有这些事。5月20日，坎贝尔发现他爬不上一块岩石，于是写道：“虽然他不知疲倦，但他胖得走不了多远。道路崎岖时，他被迫挽着别人的胳膊。”[62] 这种状态会让其他人变

迟钝，可拿破仑不同。“我从没见过任何人在任一人生境遇中展示如此强大的个人活力与不息的毅力。”坎贝尔指出，“他看上去相当喜欢动个不停、让那些陪他的人累垮……昨天清晨5点至下午3点，他在烈日下步行造访巡航舰与港口，现在……他骑马骑了三小时，事后跟我说，这是为了‘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63]

1814年5月29日（周日）中午，约瑟芬在马尔迈松因肺结核过世，享年50岁。五天之前，马尔迈松举办舞会，舞会散场后，她在凉夜中陪沙皇亚历山大外出散步。“她是愿随我去厄尔巴岛的妻子。”拿破仑后来说。他下令为她哀悼两日。（1800年，他下令为乔治·华盛顿哀悼十日。）贝特朗夫人告知了他约瑟芬的噩耗，她日后说：“他面不改色，只是大喊：‘啊！现在她幸福了！’”[64] 上一年，拿破仑给约瑟芬写了有记录可查的最后一封信，其结尾是：“再见了，我的爱人，告诉我你安好。我听说你像诺曼农夫的贤妻一样发胖了。拿破仑。”[65] 这句幽默亲昵之语终结了据信是史上最浪漫爱情之一的恋情。她的生活开销甚至超出丰厚收入，但她接受了新身份——前皇后。拿破仑迷信地想，给他带来好运的是不是约瑟芬。他发现了一个巧合：离婚之后，他的运势也变了。11月，他和前来拜访的两位英国议员交谈。谈到她可能死于债务时，他感到惊讶：“再说了，当初我每年都替她付裁缝的账单。”[66]

8月上旬，太后从罗马来厄尔巴岛，陪伴儿子流放。坎贝尔发现，她“非常友善自然。这位年长的女士长得很美，她个头中等，身材匀称，肤色靓丽”。[67] 周日晚上，莱蒂齐娅与拿破仑吃饭、玩牌。她抱怨：“儿子，你出老千。”他回答：“妈，你有钱。”[68] 三个月后，波利娜来了，兄弟姊妹中只有她来访。拿破仑在两处住宅内都给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留了房间，并装饰它们，此举或是令人心伤的乐观行为，或是可疑的宣传手段，抑或兼而有之。8月10日，玛丽·路易丝致信拿破仑。她说，尽管她承诺尽快来陪他，但她得按照父亲的旨意返回维也纳。[69] 8月28日，拿破仑从焦韦山（Monte Giove）上的马尔恰诺马东

纳隐修院（hermitage of La Madonna di Marciano）给她写信。在现存的318封拿破仑致玛丽·路易丝的信件中，这是最后一封信，它凸显了他处理数据时惯有的严谨态度：“我在海拔3834英尺的隐修院，它俯瞰四周的地中海，位于栗子树森林中。太后住的村子在隐修院下方958英尺处。这座港口非常宜人……我渴望见你和我的儿子。”他在结尾处写道：“再见了，我的好路易丝。全部属于你的拿。”[70] 然而，玛丽·路易丝已经找了个骑士护送她回维也纳，此人便是时髦的独眼奥军将领亚当·冯·奈佩格，1813年战局中，拿破仑曾在波希米亚击败他。奈佩格据信“技巧娴熟，精力充沛，乃当世严谨之辈，亦是高明的廷臣与出色的音乐家”。[71] 奈佩格年轻时和一个已婚妇女私奔，当他负责照顾玛丽·路易丝时，他也已经结婚了。到9月时，他俩已成情人。[72]

马尔恰诺马东纳隐修院（今人爬三小时山后可至此地）是浪漫的隐居地点，此地视野极佳，可纵览岛屿海湾与海口，科西嘉与意大利本土的海岸线也能映入观者眼帘。9月1日，玛丽·瓦莱夫斯卡带着4岁大的拿破仑亲生子亚历山大来隐修院，母子俩陪他住了几天。1812年，瓦莱夫斯卡同丈夫离婚。拿破仑在娶玛丽·路易丝之前和她断绝情人关系，并赠予她那不勒斯的土地，如今她也失去了地产，但忠诚驱使她来到他身边，不论这相伴时间多么短暂。德鲁奥警告拿破仑，岛上闲言已经泄露了他的秘密。事实上，所有人都以为皇后来了，当地某市长还爬上山，想正式向“皇后”致敬，所以玛丽只好离开。[73]

拿破仑数次会见来访的英国辉格党贵族与政客。11月中旬，他见了第一批辉格党人：议员乔治·维纳布尔斯-弗农（George Venables-Vernon）与其同僚约翰·法扎克利（John Fazakerley）。他们聊了四小时。12月上旬，他两次接见埃布灵顿子爵，他俩一共谈了六个半小时。平安夜，他会见了未来的首相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次年1月中旬，又有两个英国人——约翰·麦克纳马拉（John Macnamara）与英国大臣格伦伯维（Glenbervie）勋爵之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来访。这些人头脑聪颖、广结人脉、言谈老成，他们都惊叹道，拿破仑拥有敏锐的理解力，并且愿意谈论任何话题：他仰慕英国上院，打算在法国建立类似的贵族体制；他计划靠一夫多妻制巩固殖民地；他还谈到表里不一的沙皇亚历山大、威灵顿公爵的“杰出才干”、维也纳会议、奥地利大公卡尔的平庸之处、意大利人（“懒散孱弱”）、昂吉安公爵之死和皮舍格吕之死（他不将这俩人的死亡归咎于自己）、雅法屠杀（他承认这是他的错）、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他管普鲁士国王叫“一个下士”）、他麾下元帅的相对优势、英国骄傲与法国尊严的区别、他在埃及逃脱割礼的故事。[74]

“你们英国人的士兵很勇敢，”在某次邂逅中，拿破仑说，“他们是最好的战士。”[75] 英国人报称，他“谈话时兴高采烈，心情愉悦，举止文雅”，并捍卫自己的履历。有一次他指出，虽然他没烧莫斯科，英国人却在当年8月纵火焚烧华盛顿。[76] 也许拿破仑盼望最终能搬到伦敦，他试图给英国人留下好印象，但他的聪颖机智和直率坦诚的确诱使拜访者们放松了警惕。“就我而言，”他经常说，“我无足轻重了。我的时代结束了。”他也常常说：“我死了。”[77] 然而，他数次询问波旁王朝有多受欢迎，驻法国南部的英军和法军各部队又屯于何处。皇帝问坎贝尔这些问题时更不含蓄，以至于1814年10月，英国专员致信卡斯尔雷，警告对方拿破仑可能谋划回国。[78] 然而，监视他的皇家海军只多了一艘巡航舰“山鹑号”（Partridge），他自己甚至获得16炮双桅船“无常号”（L’Inconstant），它成了厄尔巴海军的旗舰。

在梅特涅和塔列朗鼓动下，1814年9月15日，欧洲大国召开维也纳会议，想借此解决所有大分歧——这些争议涉及如何处置波兰、萨克森、莱茵邦联与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后，欧洲版图需重新划定。各国希望靠普遍协议实现永久和平，所以它们各自的迫切需求得彼此相容。[79] 拿破仑倒台后，国家间长期存在的一些领土争端复燃。1815年2月下旬，他决定离开厄尔巴岛——尽管从

形式上看，维也纳会议一直开到当年6月——但涵盖主要问题的协议大纲此时已拟好，他并不走运。

1814年5月，联军护送路易十八回巴黎。我们不知道拿破仑究竟在何时决定夺回君位，但他密切关注路易十八登基后波旁王室犯下的无尽错误。他越发相信，波旁王朝很快将经历他所谓的“利比亚风暴”，那是风速堪与飓风比肩的猛烈的沙漠热风，当时人们认为它源自利比亚属撒哈拉（Libyan Sahara）。[80] 国王签署内容广泛的宪章，承诺回国后保障民权，可民众怕政府暗暗打算重建旧王朝制度。当局未能打消这种恐惧感，事实上，他们离那一点差得远。官方称，现在是路易十八治下的第19年，似乎1795年其侄路易十七死后，他就一直在统治法国，而国民公会、督政府、执政府、帝国只是打断正统统治的非法政权。波旁王朝同意恢复1791年疆界，于是法国的109个省减至87个。[81] 旧王朝时代的间接税增加，食物价格上涨。天主教会重掌革命前的某些权势与名望，激怒了自由派与共和派。[82] 雷恩举行官方仪式，纪念“殉道者”朱安党人。政府从马德莱娜公墓（Cimetière de la Madeleine）中挖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体，非常隆重地把他们葬入圣但尼修道院（Abbey of Saint-Denis）。凡尔赛的建筑工程重启，国王还任命了一位“首席推椅人”（pousse-fauteuil），他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件事——当国王坐在桌旁时推入他的椅子，但政府取消了津贴，就连伤残老兵也拿不到钱了。[83] 拿破仑在卢浮宫内聚集的画作被取走，回到占领国手中。

不出拿破仑所料，英法重新签订大革命前的1786年贸易协议。法国降低或取消一些英国货的关税，导致本国制造商遭遇新一轮萧条。[84] 英国政府派威灵顿当驻法大使，这几乎无助于改善事态。[85] “任命威灵顿勋爵一定让军队火冒三丈，”拿破仑对埃布灵顿说，“国王对他的深切关照亦将如此，这好比把他的个人感受置于国民情感的对立面。”[86] 皇帝后来谈了他眼中波旁家族该做的事。“他不应自称路易十八，而应自称新王朝奠基人，他也根本不该触及旧怨。要是他那样做，十之八九永

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诱我离开厄尔巴岛。”[87]

波旁王朝针对军队的政策最令它自拆台脚。二十年来，三色旗指引法军士兵在全欧洲决胜沙场，如今，白旗与百合花旗代替了它。荣誉军团勋章降级，论地位不及旧王朝勋章（牢骚兵立刻给某款旧王朝勋章起了个绰号——“臭虫”）。[88] 曾与法军对战的流亡者就任高级军官，新的王家近卫军取代了帝国近卫军。1806年，拿破仑创立中年近卫军，它享有大量战场荣誉，如今却被彻底取消。[89] 遭人鄙视的杜邦让大批军官退役，另有3万名军官只能领半薪。[90] 与此同时，政府依然积极搜寻逃兵役者。[91] “我读官报时发现，只有贵族夫人出席市政厅舞会，”拿破仑日后回忆道，“军官夫人都没去，于是我第一次产生了希望。”[92] 1814年8月15日，很多士兵严重抗命，公然庆祝拿破仑的生日。加农炮鸣炮致敬，战士们高喊“皇帝万岁！”，哨兵只向身佩荣誉军团勋章的军官举枪致敬。

拿破仑决定拿一切去赌君位，而波旁王朝的错误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弗朗茨皇帝也犯了错——不让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去找女婿。此外，他的花销实际上达到收入的2.5倍。他还觉得生活非常无聊，冲坎贝尔抱怨道，自己“被关在这座监狱里，与世隔绝。没有有趣活动，没有学者陪伴，我的社会也无多样性”。[93] [94] 另一个因素是报纸文章与维也纳会议传出的流言，这些言论称，盟国计划强迫他离开厄尔巴岛。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提出，可以把澳大利亚小殖民地植物湾（Botany Bay）当作终点，这一建议令人十分紧张。亦有人提到格外偏远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它是大西洋中部的一个英属小岛。[95]

1815年1月13日，拿破仑和约翰·麦克纳马拉聊了两小时，他高兴地得知法国“骚动不安”。[96] 对于在莫斯科待了太久这一点，他表示认可，并且说：“我错在试图征服英国。”他坚称自己已卸下国际事务中的

职责。“历史上有三位伟人，”麦克纳马拉说，“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时，拿破仑定定地看着他，一言不发。麦克纳马拉“认为，他看到皇帝的眼睛湿润了”。麦克纳马拉的说法是拿破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想听的话，最后他回答：“要是我在莫斯科会战[97]中被炮弹击毙，你的话就没错，但我后来的挫折将抹去我早年的一切荣耀。”[98]他补充道，威灵顿是个“勇士”，可此人不该当大使。谈话中，拿破仑经常大笑。麦克纳马拉说，摄政王子憎恨其妻不伦瑞克的卡罗琳，他欣然接受拿破仑同约瑟芬离婚，因为他可以循此先例休妻，皇帝闻言后忍俊不禁。麦克纳马拉问拿破仑是否害怕刺杀。他说，“我不怕被英国人暗杀，他们不是刺客”，但他承认自己得提防附近的科西嘉人。[99]拿破仑走后，麦克纳马拉对贝特朗说，皇帝“一定脾气非常好，从来不会情绪激动”。贝特朗微笑着回答：“我比你多了解他一点点。”[100]

2月初，坎贝尔发现，拿破仑已经“暂停道路修缮工作，他也搁置了其乡间住宅的尾期修造工程”，原因完全是费用问题，而且他打算卖掉费拉约港市政厅。[101]坎贝尔再次警告卡斯尔雷：“要是扣下退位时承诺付给他的钱，他又面临金钱压力，我想他会狗急跳墙。”[102]后来，沙皇亚历山大痛斥塔列朗不向拿破仑支付属于他的钱：“要是我们对他食言，我们怎能指望他信守诺言？”[103]

1815年2月，拿破仑的前秘书弗勒里·德·沙布隆（Fleury de Chaboulon）来访，并捎来马雷的信。马雷称，法国已经充分准备好迎接皇帝回来。拿破仑问弗勒里军队的态度。弗勒里说，士兵们被逼着喊“国王万岁！”，但他们常常轻声加点内容，喊成“罗马王万岁”。[104]“所以说，他们仍然爱我？”拿破仑问道。“是的，陛下，容我大胆说句，他们比以前更爱您。”法国的很多消息来源与驻法谍报网向拿破仑提供了与此言一致的信息。他的谍报网里有个来自格勒诺布尔的医生约瑟夫·埃梅里（Joseph Emmery），此人帮他制订了接下来的远征计划，他日后写遗嘱时留给对方10万法郎。弗勒里说，军队斥责马尔蒙，说联

军打赢怪他，拿破仑于是宣称：“他们说得没错。要不是拉古萨公爵那臭名昭著的背叛行径，联军会输。我掌控了敌人的后方与一切资源，一个人都逃不掉，他们会发布（自己的）第29期公报[105]。”[106]

2月16日，坎贝尔乘皇家海军军舰“山鹑号”离开厄尔巴岛，“因为健康原因，我旅行至离这不远的大陆”。坎贝尔或是需要去佛罗伦萨拜访其耳科医生，或是需要探访其情妇米尼亚奇（Miniacci）伯爵夫人，抑或两种情形兼而有之。[107]拿破仑的机会来了。次日，他下令整修“无常号”。这条船装载短途航程储备，还被漆成皇家海军舰艇的颜色。[108]坎贝尔到佛罗伦萨后，卡斯尔雷的副手、英国外交部官员爱德华·库克（Edward Cooke）对他说：“你回厄尔巴以后可以跟波拿巴说，欧洲差不多忘了他了，现在没人惦记他。”[109]几乎与此同时，太后对儿子说：“是的，你必须去，这是你的命运。你活着不是为了死在这荒岛上。”[110]波利娜一直是兄弟姐妹里最慷慨的人，她送给哥哥一条非常昂贵的项链，叫他拿去卖钱，好为接下来的冒险筹资。拿破仑的贴身男仆马尔尚设法安慰波利娜，称兄妹将很快重逢。波利娜颇有先见地纠正了马尔尚，她说这次告别是永别。[111]一年之后，有人问拿破仑，德鲁奥是否真的力劝他不要离开厄尔巴岛，他回答不是。不管怎么说，他草率地反驳道：“我不会屈从建议。”[112]离岛前夜，他阅读了奥地利皇帝查理五世的传记，等他走后，书就摊在桌上。拿破仑的老家政工没有碰这本书以及四处散落、“撕成小片的书写纸”。事后不久，英国来访者很快就询问家政工，她“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淳朴地说他向来脾气好”。[113]

1815年2月26日（周日）晚，拿破仑乘“无常号”离开厄尔巴岛。重300吨的16炮双桅船刚起锚，船上的607名老近卫军掷弹兵就得知他们要去法国。他们高呼：“巴黎或死亡！”拿破仑带上了贝特朗、德鲁奥、康布罗纳、铁矿矿主庞斯（Pons）先生、医生舍瓦利埃·富罗（Chevalier Fourreau）、药剂师加特（Gatte）先生。他们计划用八艘小船征服一个

欧洲大国，除了“无常号”，船队里规格最大的三艘船分别重80吨、40吨、25吨。八艘船载有118名波兰枪骑兵（无马）、一个不足300人的科西嘉营、50名宪兵、约80名平民（包括拿破仑的仆人）——这支军队一共有1142人与2门轻型加农炮。[114] 一阵和煦的海风送船队去法国，路上，他们差点撞上了法国海军的两艘巡航舰。拿破仑在甲板上待了很久，同军官、士兵、水手聊天。枪骑兵指挥官扬·耶马诺夫斯基（Jan Jermanowski）上校记载道：

> 他们在他身边躺着、坐着、站着、溜达着，亲切地问个不停。他们很不慎重，好几次问他怎么看待活着的某人、某国王、某元帅、某大臣，还讨论他自己的战局中乃至内政政策中臭名昭著的部分。可他毫无保留地回答，没有露出一丝愤怒或不耐烦。[115]

在此过程中，拿破仑坦率地说了“现在想做的事、做此事的困难、他的手段、他的期盼”。

3月1日（周三），“无常号”到达法国南部海岸，驶入儒昂海湾。下午5点，拿破仑的军队下船。“关于这个计划，我考虑了很久，想得非常周到了，”队伍将要上岸前，他鼓动他们道，“我不用详述成功后我们将获得何等荣誉与利益。从年轻时起，我等军人就见多了死亡形态，对我们来说，失败后的下场也不可怕。我们知道那是什么，却不在乎，因为一次挫折就能招来最恶劣的境地，而我们曾千百次地面对它们。”[116] 次年，他回忆登陆之事时道：“一大群人一下子围上来，他们惊讶地看到我们出现，又震惊地发现我们的兵力那么少。人群里有个市长，他见我就带了这么点人，便对我说：‘我们正要安静下来好好过日子，你又跑来给所有人惹事。’”[117] 人们能和拿破仑说这种话，说明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暴君。

拿破仑知道，普罗旺斯和罗讷河下游谷地盛行保王主义，他最需要做的事则是避开波旁军队，于是他选择经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路去格勒诺布尔的兵工厂。他派拉穆雷（Lamouret）上尉带20人去昂蒂布，当地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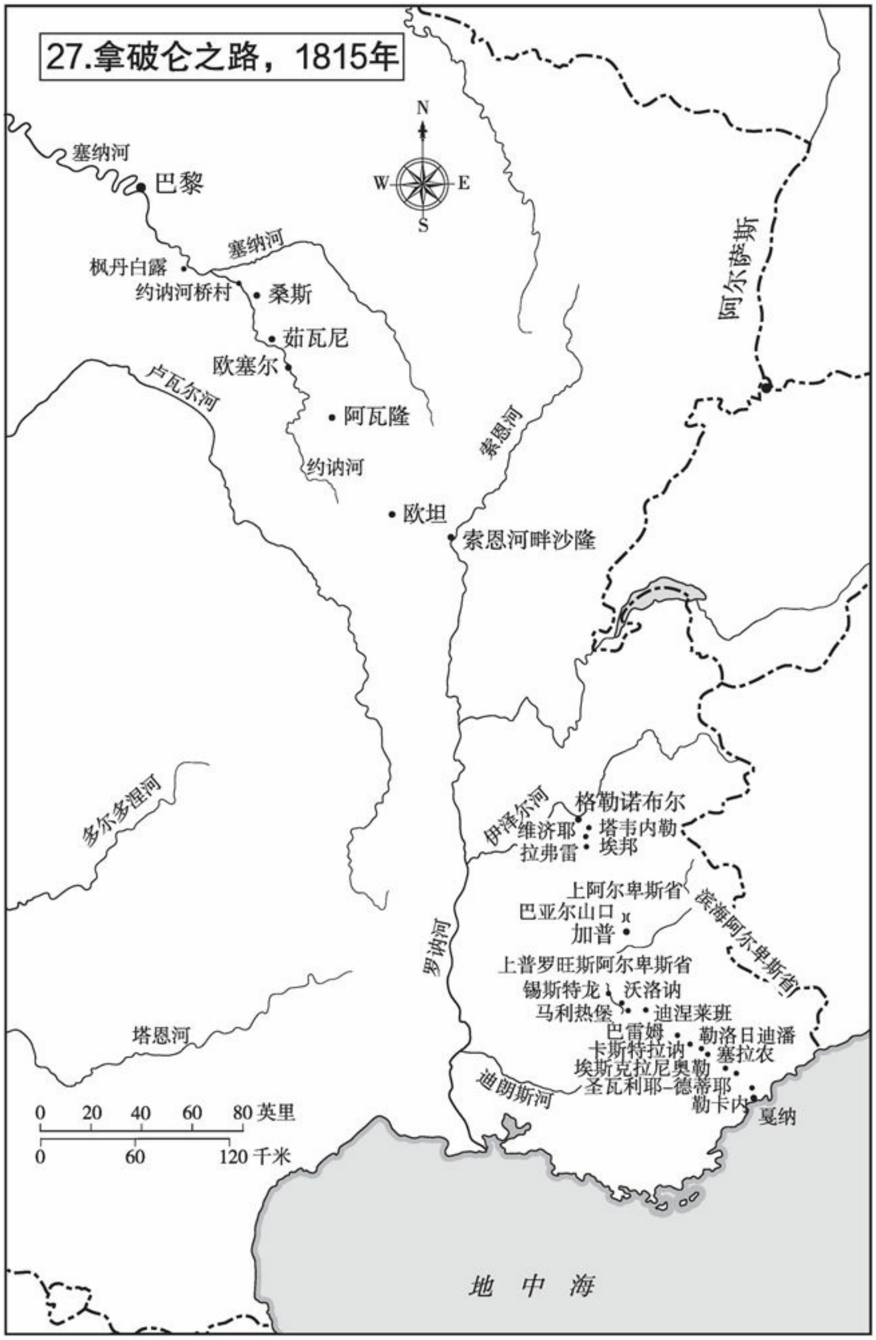
戍部队逮捕并关押了他们，这证明他的直觉没错。拿破仑的人手不足以攻打土伦，他也清楚，至少在兵力增加前，他得抢在自己归来的消息传开前进军。“因此我急忙赶去格勒诺布尔，”他后来对秘书古尔戈将军说，“那里有军队、滑膛枪、加农炮，它是个中心。”[118] 他的资本只有快速行动的能力（他立刻为枪骑兵买了马）和宣传天才。上岸后，他分别对法国人民和法军发布宣言，在船上时，所有识字的人就做好了这两篇宣言的手抄副本。

致军队的宣言称，1814年之败完全归咎于马尔蒙和奥热罗的背叛：“我们的队伍中出了两个叛徒，这两人背叛了我们的桂冠、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君主、他们的恩人。”[119] 接着他抛开了好战性，宣布道：“我们必须忘记自己曾是各国之主，但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人干涉自己的事。”致民众的宣言则称，巴黎失陷后，“我的心碎了，但我的精神仍然坚毅……我把自己流放到海中岩石上”。[120] 拿破仑说，他之所以动手，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八想靠二十五年来一直“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恢复封建权利与统治，尽管波旁王朝肯定还没复兴封建主义。“法国人，”他接着说，“在流放途中，我听到了你们的怨言和愿望。你们要求得到自己选择的政府，只有它才合法。你们埋怨我久久沉睡，斥责我为一己安逸牺牲国家的伟大利益。”于是乎，“虽然困难重重，我还是来到你们中间。我来赢回我的权利，那也是你们的权利”。[121] 此言当然是极其夸张之辞，但拿破仑知道如何取悦士兵（他们想拿回荣誉与全薪）、富农（他们害怕恢复封建税赋）、数百万名国有财产所有人（他们想保护财产，因为流亡者和教士回来了，这些人欲取回1789年前的资产）、工人（泛滥的英国货物打击了他们）、帝国公务员（保王党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122] 因为波旁王朝失败得太彻底，就算经历过1812年与1813年的败仗，拿破仑也能在一年之内聚集相当广泛的国内同盟。

登陆那天，拿破仑在戛纳的沙丘宿营，该地靠近今十字大道（Boulevard de la Croisette）。营地对面则是一座陈年小教堂（今圣母

院）。次日凌晨2点，他同康布罗纳的前卫会合，这支队伍包括无马的枪骑兵与2门加农炮。拿破仑没去普罗旺斯地区首府艾克斯，而是取道通过勒卡内（Le Cannet）的路。他走了15英里上坡路，到达格拉斯，因为城中只有5把滑膛枪可用，市长投降了。皇帝一直休息到中午时分，然后他丢下辎重和加农炮，用骡子驮运补给，沿山路北上。海拔较高处覆盖着冰雪，一些骡子滑倒了，有些地段的隘路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行。拿破仑随掷弹兵步行，他们亲昵地戏弄他，叫他的绰号，如“我们的小平头”（Notre petit tondu）、“仗剑的让”（Jean de l’Epée’）。[123]

1934年，法国政府创设“拿破仑之路”（Route Napoléon）来拉动旅游业。这条路上安设了壮观石鹰，少数鹰像今仍可见。拿破仑经过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张贴告示，自豪地宣布这一事实。这次行程后来成了传奇般的北上之旅，我们可以看到他沿途住过的很多地方。拿破仑从滨海阿尔卑斯省出发，经过下阿尔卑斯省（Basses-Alpes）[124]、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3月7日晚他抵达伊泽尔省（Isère）格勒诺布尔，只用六天就走了190英里。拿破仑或是步行，或是骑马。他走过挺拔高原与平坦原野，穿过光秃岩石与葱郁草场，经过瑞士风格的村庄；他翻越海拔6000英尺、陡然下倾的雪山，并沿盘绕的傍山滨海路下山。今天，拿破仑之路是公认的世界级优质自行车与摩托车骑行路线。



离开圣瓦利耶（Saint-Vallier）之后，拿破仑经过了下列地区：埃斯克拉尼奥勒（Escragnolles）的村子，他在此地再度停留；塞拉农（Séranon），他在当地的布龙代尔城堡（Chateau de Brondel）过夜，该城堡是古尔东（Gourdon）侯爵的乡间住宅；勒洛日迪潘（Le Logis-du-Pin），他在那儿喝肉汤。3月3日，他到达卡斯特拉讷

（Castellane），在其专区用午餐，该地位于今马塞尔索韦尔广场（Place Marcel Sauvaire）。在卡斯特拉讷，康布罗纳要求市长提供5000份肉、面包和葡萄酒，拿破仑的军队（仍然少于1000人）于是有了数日补给。（坎贝尔认为，康布罗纳“是个拼老命、没教养的恶棍”，所以他正好适合干这种冒险之事。[125]）当晚，拿破仑待在巴雷姆村（Barrême），住进主干道上塔尔唐松（Tartanso）法官的家。3月4日，他到达迪涅莱班（Digne-les-Bains），在小宫殿旅馆（Petit-Palais hotel）休息，大军团的一些老兵来此投奔他。迪涅居民恳求驻军指挥官、支持波旁王朝的尼古拉·洛韦尔多（Nicolas Loverdo）将军不要把他们的城镇变成战场。洛韦尔多发现自己缺少忠诚的士兵，于是没开战。拿破仑遂继续推进，他在马利热城堡（Chateau de Malijai）过夜，该地如今是市政厅。[126]

次日上午，即3月5日（周日）上午时，拿破仑在沃洛讷村（Volonne）停下。当地人传说，他在亨利四世建造的喷泉边喝水。在相当壮观的锡斯特龙堡垒（castle of Sisteron）面前，他首次遇上真正的考验。这座大堡垒的大炮可以轻易摧毁迪朗斯（the Durance）河上唯一的桥。他非但没有停下，还在金臂旅馆（Bras d’Or hotel）同市长和显贵吃午餐，饭后不久便动身。假如站在锡斯特龙堡垒的钟楼顶端俯瞰，则视野中的迪朗斯河流域长达40英里。拿破仑没有其他渡河点。或是因为疏忽，或是因为节俭，或是因为指挥官需要一个不毁桥的借口，堡垒中并无火药。从那以后，只要康布罗纳趁拿破仑来之前对各市市长采取哄骗、协商、行贿的手段，并在必要时威胁他们，就没有桥梁被毁。

拿破仑后来回忆道，他到达加普（Gap）时，“一些农民从口袋里掏出印着我肖像的五法郎硬币，喊道：‘是他！’”[127]。[128]针对上下阿尔卑斯省的居民，他在加普写了一篇宣言：“我的归来驱散了你们的所有焦虑，保全了所有财产。”其他文字则称，他反对那些“想要恢复封建权利、毁灭阶级平等、取消国有财产售卖”的人，此举乃特意夸大波旁治

下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但它们尚未出现）。[129] 3月6日下午2点，拿破仑离开加普。此地之后，地势陡然升高，直上海拔3750英尺的巴亚尔山口（Col Bayard）。当晚，他睡在科尔城（Corps）主街的宪兵营地。

旅途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很快到来。几天后，在拉弗雷镇（Laffrey）以南几百码的地方，拿破仑在两座山林夹着的狭窄地带碰上第5战列步兵团的一个营，该地如今叫相遇草地（La Prairie de la Rencontre）。波拿巴分子的传说称，拿破仑站在这个营面前，完全处于其射程之内，保护他的帝国近卫军人数少得多。接着他往后一扔标志性灰大衣，指着自己的胸口，问士兵是否想对他们的皇帝开枪。士兵扔掉滑膛枪，围住他，这证明他的魅力仍有效力。[130] 两名军官曾告知拿破仑，团里的士兵支持波拿巴，但若保王党军官开了区区一枪，结果就截然不同了。萨瓦里当时不在场，而他的说法所含英雄色彩要少一点。照萨瓦里的话，那一天，拿破仑靠谈话风格和提问习惯赢得胜利：

> 皇帝走近了，这个营依然鸦雀无声。指挥官命令士兵举起滑膛枪瞄准，他们照办了，我们无法知道要是他下令开火会发生什么事。皇帝没给营长时间，他和士兵们聊天，像往常一样问："喂，你们在第5团过得怎样？"他们回答："非常好，陛下。"然后皇帝说："我回来看你们了，你们中有人想杀我吗？"士兵们大喊："噢，没有！"于是皇帝照例检阅他们，进而掌控了第5团。营长看上去不高兴。[131]

拿破仑本人也讲过这个故事。他说自己愉快地对待士兵，拿他们当老战友。"我走上前，向一个士兵伸出手，说：'什么，你这个老流氓，你要冲你的皇帝开枪吗？'他回答，'你瞧'，并且给我看滑膛枪，只见里面没子弹。"[132] 他认为身边的老兵也是成功的因素："这件事靠的是近卫军熊皮帽。它们引人回忆我的光辉岁月。"[133] 值此紧张时刻，不管拿破仑是慷慨陈词还是与人交谈，他都显示了极大的勇气。拉弗雷也是个分水岭，因为倒戈的不再是农民或国民自卫军——正规军第一次倒向拿破仑。

在维济耶（Vizille），群众向拿破仑欢呼，夏尔·德·拉贝杜瓦耶（Charles de La Bédoyère）带第7战列步兵团投奔他。在塔韦内勒（Tavernelles）时，他在维吉耶（Vigier）夫人咖啡馆休息。在埃邦（Eybens），他泡了个脚，这对他来说已然非常受之无愧。3月7日晚11点，拿破仑进入格勒诺布尔。镇民拆掉城门，将大门碎片呈给他，以此当作他们忠心的纪念品。“从戛纳去格勒诺布尔时，我是个冒险者，”拿破仑后来说，“到达格勒诺布尔后，我又成了君主。”[134] 他不肯去省长官邸留宿，而是住进蒙托日街（rue Montorge）三条海豚旅馆（Les Trois Dauphins）2号房，此举显示了其惯有的公关天才。旅馆老板是意大利与埃及战局的老兵之子。1791年拿破仑驻于瓦朗斯，当时他曾在这座旅馆留宿。（出于敬意，司汤达亦在1837年住进三条海豚旅馆2号房。）不管住在那儿多不舒服，他也在里昂弥补了缺憾。某日上午，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迫仓促离开其住所大主教宫殿（今市图书馆），同日，拿破仑入住他的房间。他在里昂检阅了如今已颇具规模的军队，批评一个营在实施机动时表现不够好。他后来说，这样做“有很大效果，表明他有信心夺回权力”。[135] 值此关键时刻，如果他持恳求态度，士兵会立刻察觉。相反，甚至在他战败并退位后，他们仍愿意追随他。

3月5日中午，沙普空中可视信号系统将拿破仑归来一事传至巴黎，但政府直到7日才公布消息。[136] 新任战争大臣苏尔特派奈伊、麦克唐纳、圣西尔解决此事，奈伊告诉路易十八：“我向你保证，我要抓住波拿巴。我会把他关进铁笼子，然后带给你。”[137] 苏尔特给军队的命令称，只有叛徒才会投靠拿破仑，“现在这家伙只是个冒险分子，他最后的疯狂揭示了他是什么货色”。[138] 尽管如此，仅有的两位陪伴拿破仑征战滑铁卢的元帅就是奈伊和苏尔特了。

3月13日，拿破仑离开里昂。当日，仍在开会的盟国颁布了《维也纳宣言》：

（拿破仑）带着骚乱与动荡的计划返回法国，他让自己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并向世界宣告，不能与他媾和或停战。有鉴于此，各国宣布：拿破仑·波拿巴已将他本人置于国民与社会的关系之上，身为世界的敌人和扰乱者，他把自己变成公众的复仇对象。[139]

拿破仑继续北上。14日晚，他在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15日晚，他在欧坦；16日晚，他在阿瓦隆（Avallon）；17日晚，他在欧塞尔（Auxerre）的省长官邸。路上，大批热情的群众向他欢呼，更多部队前来投靠。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的奈伊元帅有3000人，拿破仑派两个军官乔装去见他。他们告诉元帅，皇帝说了，要是他改变阵营，“我会像在莫斯科会战次日时那样接你”。[140] 奈伊离开巴黎时一心想和拿破仑交战，但他不想发动内战，哪怕他能说服士兵开火。“我置身暴风雨中，”他后来谈到自己的决定，“昏了头。”[141] 3月14日，奈伊带着勒古布将军、布尔蒙将军（他俩都非常不情愿）以及几乎所有部队改投拿破仑，只有少数保王党军官没有倒戈。“唯独拿破仑皇帝有权统治我们的美丽祖国。”奈伊告诉他的部队。[142] 他后来说，军中盛行波拿巴主义，他不能“徒手逆转大潮”。[143]

18日上午，拿破仑和奈伊在欧塞尔相会，但是元帅带来了一份文件，此文件警告皇帝，要他“考虑法国人民的福祉，努力弥补他的野心所酿罪孽”，所以这次重逢冷冷冰冰、一板一眼。[144] 拿破仑没有像“莫斯科会战次日时”一样对待奈伊，而是询问他军队士气、东南部省份的情绪以及他向第戎行军的经历。奈伊简要回答一番，然后奉命进军巴黎。

19日，拿破仑在茹瓦尼（Joigny）用午餐，下午5点他到达桑斯。晚上，他在约讷河桥村（Pont-sur-Yonne）吃饭并过夜。3月20日（周一）凌晨1点，他前往枫丹白露宫，阔别白马庭十一个月后，他返回此地。当日凌晨1点30分，在杜伊勒里宫，人们把痛风患者路易十八抬进他的马车（考虑到他的体重，这不是个轻松活），然后他逃离巴黎。路易十

八先是去里尔，当地卫戍部队似乎态度不善，于是他进入比利时，在根特（Ghent）静待事态发展。拿破仑向来尊敬周年纪念日，他想在20日进入巴黎，因为那天是罗马王的4岁生日。果然，当晚9点，他进入杜伊勒里宫，再次成为事实上的法兰西皇帝。

杜伊勒里宫庭院挤满士兵与平民，他们来见证皇帝的回归。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多种说法，但所有版本一致认为，拿破仑的归来引发了激烈的喧闹与普遍的拥护。莱昂-米歇尔·鲁捷（Léon-Michel Routier）上校曾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加泰罗尼亚作战，他和战友在杜伊勒里宫楼钟旁走动聊天，这时

> 非常简朴的马车突然出现在河上侧门边，车旁没有任何护卫，有人宣布皇帝回来了……马车进来了，我们都冲过去围住它们，并且看见拿破仑走出马车。接着人人都激动得发狂，我们混乱地向他扑去，我们围着他，我们紧紧拥抱他，我们差点害他窒息……这是史上独一无二之刻，每当回忆当时之景，我的心仍会快乐地怦怦狂跳。像我这样幸福的人见证了这次奇迹般的回归，见证了在十八天内不费一滴血就穿越200英里法国国土的旅程之果。[145]

直到当日早些时候，蒂埃博将军还在守卫巴黎南部，对抗拿破仑。就连他也觉得，“无可阻挡的狂潮瞬间爆发……你会觉得天花板要塌了……我好像又变成了法国人。我激动万分，大叫大嚷，力图向人群证明我要向他效忠，什么也比不上我那时的激动心情与呼喊”。[146] 拉瓦莱特回忆道，拿破仑走上杜伊勒里宫楼梯，他“像盲人一样，步履缓慢，半闭两眼，向前伸出双臂，只用微笑表达自己的喜悦”。[147] 欢呼的支持者挤得太猛了，结果他进入寓所后，人们费了一番功夫才关上门。当晚，莫利安来道贺，皇帝拥抱他，说：“够了，够了，我亲爱的，恭维的时刻已然结束，他们让我来时它就过去了。”[148]

始自儒昂海湾的传奇旅程结束后，巴黎轻松地完成政权更迭。有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晚，杜伊勒里宫觐见室地毯上印着的百合花可以被抹去了，而在花下面仍然可见昔日拿破仑帝国的蜜蜂。“所有女士立

刻着手工作，”一名目击者谈及西班牙王后朱莉、荷兰王后奥尔唐斯以及回来侍奉她俩的侍女时道，“不出半小时，地毯又变成了帝国的，她们非常开心。”[149]

---

[1]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0，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p.250，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36

[2] Houssaye，*The Campaign of 1814* p.507，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3，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12

[3]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7

[4]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8

[5] SHD GR6.YD/1

[6]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91

[7]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08

[8]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p.511

[9] Kauffmann，Jean-Paul，*The Black Room at Longwood* 1997，p. ⅹⅶ

[1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2 n.31

[11]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197

[1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

[13]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58

[14]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8，p.423

[1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58；Philip Dwyer dates it to April 7 in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91；Wairy says April 11 in ed. Jones，*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p.420

[16]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p.66

[17]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p.196-7，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62

[18]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Ⅲ p.135，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59

[1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63

[20] Lentz，Thierry，*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p.574，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59

[21]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199

[22]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Ⅱ p.199

[23]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198

[2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

[25]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64

[26]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p.71-2

[27] ed. Jones，*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p.420

[28] 原文为“the inconstant Constant”，因水平有限，难以表现原文妙处。——译者注

[2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0

[30]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8

[31] 拿破仑签署退位诏书时，威灵顿和苏尔特尚不知情，导致图卢兹之战爆发，故此才说双方是多此一举。——译者注

[3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9

[3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37-8，46

[3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0

[3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7

[36]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5

[3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27

[38]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Ⅰ p.1

[39] 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p.158-9

[4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67

[41]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31-2

[4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2

[4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3

[44] 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159，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p.267

[4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34-5，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p.159-60，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Ⅶ pp.212-13，AN 400AP/5

[46]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69

[4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9

[48]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7

[49] BNF NAF 20071 p.2

[50]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32

[51]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47

[52]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36

[53]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46

[54]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1

[55]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2

[56] 1851年，拿破仑的一位远亲扩建圣马蒂诺。新增建筑豪华得离谱，其室内有一个杰出展览，展示了拿破仑的漫画的原件。圣马蒂诺的这个展览值得一看。

[57]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62

[58]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64，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2

[5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Ⅱ p.4，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31

[60]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p.52，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62，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pp.8-9，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4

[61]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 （Boston）1897，p.ⅹⅶ

[6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74

[6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81

[6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8 n.2 and p.56

[65]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p.234

[66]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9

[6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05

[68] Christophe，Robert，*Napoleon on Elba*，1964，p.138

[69]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77

[70]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77，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pp.222-3

[71] Saint-Amand，Imbert de，*Marie Louise and the Decadence of the Empire* （New York）1902，p.2

[72] 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p.223

[73] Pocock，Tom，*Stopping Napoleon* 2004，pp.211-12，Sutherland，Christine，*Marie Walewska* 1979，pp.218ff

[74] Kissinger，Henry，*A World Restored* 1957

[75]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82，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 ，p.27

[76]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5

[77]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05

[78]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5，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p.54

[7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40

[80]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5

[81]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22

[82]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280.Some priests even refused the sacrament to purchasers of *biens nationaux.*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p.3

[83]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28-42，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714 p.30

[84]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6，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8

[85] 1818年，波拿巴分子、前军人马里-安德烈·康蒂永（Marie-André Cantillon）欲趁威灵顿乘车归宅时刺杀他，但康蒂永射出的子弹不知所踪，所以他和同谋被无罪释放。

[86] Ebrington，Lord，‘A Conversation with Napoleon at Elba’*Macmillan’s Magazine* December 1894

[87] Bodleian MS Curzon e.1.p.18

[88] Fleischmann，Théo，*En écoutant parler les grognards de Napoléon* 1962，p.31

[89]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p.4

[90] 要想知道被迫领半薪有什么影响，可参见霍雷肖·纳尔逊的愿望。1788～1793年，他的

薪水减为半薪，于是他赤裸裸地渴望与法国重新开战。Knight，*The Pursuit of Victory*，pp.118-30.

[91]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Ⅱ p.65

[9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67

[93] 然而，当拿破仑真的遇上这种多样性时，他却成了卖弄学问的学究。举个例子，1815年1月，挪威绅士昆德措（Kundtzow）来见他。“挪威有多少人口？”拿破仑问昆德措。对方回答：“200万，陛下。”拿破仑纠正昆德措道：“180万。”North ed.，*Napoleon on Elba*，p.171.

[9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4，159

[9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40 n.75，165，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p.196

[9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p.178-83

[97] 指博罗季诺会战。——译者注

[98]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3

[99]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7

[100]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8

[101]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66

[102]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7

[103]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7 n.86

[104] 喊“罗马王万岁！”（Vive le Roi de Rome！）是在喊完“国王万岁！”（Vive le Roi！）后加了点内容。——译者注

[105] 指1812年战局第29期公报，详见第二十五章。——译者注

[106] Fleury de Chaboulon，Baron，*Memoirs of the Private Life*，*Return and Reign of Napoleon in 1815* 2 vols.1820，Ⅰ pp.55-6

[107]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2，Pocock，Tom，*Stopping Napoleon* 2004，p.216

[108] Kircheisen，Friedrich，*Napoleon* 1931，p.685

[109]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2

[110]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Ⅱ p.213

[111]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216

[11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25

[113]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66 n.2

[114]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p.188-9，Mudford，William，*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817，p.56

[115]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5

[11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5

[1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2

[11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8

[11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682 p.3

[12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681 p.1

[121]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p.195-6

[122] Jarrett，Mark，*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2013，p.158

[123]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7

[124] 今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Alpes-de-Haute-Provence）。——译者注

[125] ed. North，Jonathan，*Napoleon on Elba* 2004，p.179

[126] “拿破仑在这住过，”村子入口的告示写道，“你干嘛不住呢？”

[127] 这款独特硬币并非理想的指示物，因为上面印着的拿破仑年轻许多。硬币上的侧面像准确刻画了彼时他的形象：一头浓密卷发，下颚轮廓分明，头戴月桂树叶王冠。

[12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

[1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684-6 pp.6-7

[130]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41-2，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58

[13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Ⅶ pp.351-2

[13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55

[13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3

[1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75

[135]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90

[136]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66，Reiset，Le Vicomte de，*Souvenirs du Lieutenant Général Vicomte de Reiset 1814-1836* vol.Ⅲ 1899，Ⅲ p.75

[137] Waresquiel，*Les cent jours* p.241

[138]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67，BNF Micr D71/86，*Le Moniteur* 9/3/1815

[139] Thornton，Michael，*Napoleon after Waterloo*（Stanford，CA）1968，p.54

[140]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170

[141]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170

[142]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110

[143] Houssaye，Henry，*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p.108

[144]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p.172

[145]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pp.390-91，ed. Routier，Colonel Léon，*Récits d'un soldat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l'Empire* 2004，pp.175-6

[146]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1896，Ⅱ pp.418-19

[147]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54

[148] Villemain，Abel-François，*Souvenirs contemporain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2 vols.1854，Ⅱ p.48

[149]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 （Philadelphia）1832，p.150

第三十章 滑铁卢

我觉得幸运正弃我而去。我再无终将胜利之感。如果时机成熟时不做好冒险准备，人将一事无成。

——拿破仑论滑铁卢战役

白天，主将应多次自问，若敌军此刻在我面前、右侧或左侧出现，那将如何？

——拿破仑军事箴言第8条

1815年3月21日（周二）凌晨3点，拿破仑上床入眠，此时他已在很大程度上重建政府。《维也纳宣言》表明，盟国不会让他重登帝位，所以他得让法国做好抵御入侵的准备，但他希望情况和1814年的不同，也就是说，经历过波旁王朝这一选项后，法国平民会积极拥戴他。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如此，接下来几个月，新兵人数达到兵站最大负荷量。这是法国人决定向谁真正尽忠的痛苦时刻。波拿巴家族的情形如下：23日，拿破仑亲切地迎接约瑟夫，已经不怀疑哥哥想勾引玛丽·路易丝了；吕西安离开罗马，结束自我的流亡生活，拿破仑完全原谅了他，"立刻允许"他露面；热罗姆就任第6师师长；红衣主教费施回国；奥尔唐斯成了杜伊勒里宫女主人；路易没有来；欧仁听从岳父拜恩国王的话，也没有来。1月1日，玛丽·路易丝给拿破仑写了最后一封信。如今她留在奥地利，热盼他战败。[1] 4月6日，这位深陷热恋的女人致信朋友，提及自己与奈佩格将军分别后度过的确切天数——十八天。没过多久，玛丽·路易丝最后一次给拿破仑捎去口信，要求分居。[2]

波旁王朝怀疑拿破仑归来是广泛阴谋的产物，但康巴塞雷斯这种资深政客听闻消息后着实惊讶不已，这一点否认了波旁王朝的猜测，证明回归是一个人凭意志力与机会主义所获的成果。[3] 康巴塞雷斯不情愿地返回司法部，他抱怨道："我只想休息。"[4] 拿破仑保证当一个立宪制君

主，尊重法国人的公民权利，少数人真信了，于是支持他，坚定的共和党人卡诺就是其中一员，他去了内政部就职。[5] 其他大臣中，拉瓦莱特等人是彻头彻尾的波拿巴分子，德克雷、莫利安、科兰古、达吕分别返回海军部、国库部、外交部、战争管理部。马雷就任国务卿，布莱·德·拉默尔特与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重掌参政院要职，莫莱又任路桥总监。[6] 萨瓦里执掌宪兵。就连富歇也获准返回警务部，此事说明，就算富歇向来不可靠，他也不可或缺。总的来说，拿破仑迅速聚集能人与经验丰富者，假如他设法清算军事形势，这些人能让行政机关高效运转。波旁王朝让拉普指挥一个师，拿破仑见到他后便开玩笑，给了他的心口一拳（或许打得有点疼）："什么，你这流氓想杀我？"然后，拿破仑任命他为莱茵军团司令。拉普逝世后，其自传出版，此书称，"拿破仑徒劳地想戴上严肃面具"，但"友善感情总是占据支配地位"。[7] 皇帝拒绝了少数写信要求重投帐下的人，如鲁斯塔姆。"这人是个懦夫，"他对马尔尚说，"把信丢进火里，别再跟我提这事。"[8] 上一年，鲁斯塔姆趁夜逃离枫丹白露宫，所以拿破仑不想让他担任主要警卫，这可以理解。路易-艾蒂安·圣德尼（Louis-Étienne Saint-Denis）接替了鲁斯塔姆的职务。圣德尼是法国人，出生在凡尔赛，但是从1811年起，拿破仑就把他打扮成马穆鲁克，叫他阿里。

拿破仑重新掌权后，《箴言报》再改报道政策。3月21日，该报用四页篇幅宣告他胜利归来的消息，这些文字里至少有26个大写的"NAPOLEON"。[9] 早上6点，拿破仑起床，他只睡了三小时。下午1点，他在杜伊勒里宫庭院举行大阅兵。指挥官亚历山大·库德勒（Alexandre Coudreux）向其子如此描述他的到来：

> 皇帝骑在马上，检阅所有的团，上个政府一度把这些勇士当成凶手、马穆鲁克和土匪，这样一个人露面后，他们焕发热情，热烈欢迎他。四个小时中，军队一直处于武装状态。拿破仑同围着他的军官和军士讲几分钟话，只有这时候，欢呼声才会暂停。皇帝讲话时使用一些专属于他的辞藻，它们优美动人、朝气蓬勃，总能让我们忘却所有的不幸、蔑视所有的危险！（"皇帝万岁！"与"拿破仑万岁！"的呼声）

> 重复了成千上万遍，（而且）整个巴黎一定都听见了。我们所有人兴高采烈，不分等级与军衔，彼此拥抱。超过5.5万名巴黎人见证了如此美好的景象，面对我们流露出的高尚慷慨之情，他们全心全意地鼓掌。[10]

拿破仑的工作准则未变，从重返杜伊勒里宫到滑铁卢会战历时三个月，其间他写了900多封信，绝大部分涉及在法国重建战时体制，以便及时应付将要来临的敌对状态。23日，他命令贝特朗把厄尔巴岛的各种东西带去巴黎，包括一匹特定的科西嘉马、他的黄色马车、他剩下的衬衣。[11] 两天后，他已然致信侍从长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费臧萨克（Anatole de Montesquiou-Fezensac）伯爵，谈论当年的剧院预算。[12]

1813年和1814年战局中，达武没有率兵对付法国的敌人，而是困守汉堡，对他来说，这种大材小用堪称可耻，但除了勒菲弗，元帅里只有他立刻去杜伊勒里宫报到。拿破仑退位后，少数元帅拒绝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达武是其中之一。可是皇帝犯了个大错，他任命达武为战争部长、巴黎总督、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所以他在比利时战场上没法调用最好的元帅。有人推测，两人私交不佳可能是决策的背后原因。亦有人如此猜想：拿破仑认为，万一巴黎被围，他需要达武守城。然而，要是他不能在野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谁掌管巴黎都无意义。[13] 皇帝的确充分理解这一点，5月12日，他对达武说："我们需要担心的最大厄运是，我们在北方太缺兵力，早早战败。"[14] 滑铁卢会战那天，达武却在签署关于和平时期军饷等级的官僚文件。[15] 多年后，拿破仑后悔没有改派克洛泽尔将军或拉马克（Lamarque）将军去战争部。[16] 当时，他给达武寄去一大堆惯常信件，以5月29日的信为例：他用锐利目光检阅将赴贡比涅的五个炮兵营，然后写道，"我发现好几个大炮弹药箱没有小罐油或全部备件，这不符合命令的要求"。[17]

19位现役元帅中（4月15日，格鲁希获得元帅权杖），只有达武、苏尔特、布吕内、莫尔捷、奈伊、格鲁希、圣西尔、马塞纳、勒菲弗、

絮歇这10人宣布忠于拿破仑（算上缪拉的话有11个。缪拉是实打实的第一个叛徒，但他决定效忠拿破仑，事实证明，这种堂吉诃德式决策是自杀之举）。[18] 然而，直到4月10日，马赛的马塞纳才发布宣言，支持“我们选出来的君主、伟大的拿破仑”，然后他什么也没做。[19] 类似地，圣西尔留在自家庄园，勒菲弗、蒙塞、莫尔捷等人病得太重，不能征战。（莫尔捷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但他仍指挥帝国近卫军。）[20] 拿破仑认为贝尔蒂埃将回到他身边，他打趣道，除了强迫参谋长穿路易十八的近卫军的制服来杜伊勒里宫，自己不会实施报复。可是贝尔蒂埃离开法国，去了拜恩班贝格，6月15日，他跌出窗外，告别人世。尚不清楚贝尔蒂埃之死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其家族有癫痫病史），但真相很可能是自尽。[21] 近二十年来，拿破仑的参谋长格外贴心地为上司效劳，我们只能猜测是何等内心冲突与绝望才催他走上绝路。失去贝尔蒂埃一事狠狠打击了未来几周的情势。

元帅中，14人参加过奥斯特利茨战役，15人参加过耶拿战役，17人参加过波兰战局，15人参加过伊比利亚战局，12人参加过瓦格拉姆战役，13人参加过俄国战局，14人参加过莱比锡战役，11人参加过1814年战役，但只有格鲁希、奈伊、苏尔特这三人参加了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可用的人手不多，为了击败威灵顿，他得让经历过战场考验的人来指挥北方军团左翼，于是他召来奈伊。迟至6月11日，奈伊才来到军中，可他已然厌战，在整场战役中，他的表现相当不尽如人意。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提出，奈伊“适合指挥1万人，但超过那个数，他的能力就跟不上了”。[22] 皇帝应该让苏尔特代替奈伊指挥左翼，苏尔特却领到参谋长之职，他干得也很差劲。拿破仑没有任命絮歇或苏尔特的副手弗朗索瓦·德·蒙蒂翁（François de Monthion）将军为参谋长，相反，他派絮歇去阿尔卑斯军团，浪费了元帅的才干，而且他不喜欢蒙蒂翁，于是分给此人次要职务。

其他元帅的情况如下：1814年，马尔蒙和奥热罗已背叛拿破仑；维

克托仍然忠于波旁王朝；到目前为止，儒尔当在政治上一直不可靠，现在他是法国世袭贵族、贝桑松总督、第6军区司令；麦克唐纳和乌迪诺保持消极中立。乌迪诺的部队宣布忠于拿破仑，于是他返回巴勒迪克的家宅。据说，皇帝提出任用乌迪诺时，他回答："我不会为任何人效力，陛下，因为我不会为您效力。"[23]

拿破仑先后在里昂和杜伊勒里宫发布一系列宣言，马上废止波旁王朝治下很多特别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他叫停法庭、勋位和勋章的变化，复原三色旗与帝国近卫军，扣押波旁王室的财产；他废除荣誉军团的变动，恢复各团的旧数字番号（波旁王朝很不尊重军人心理，给各团改取了保王主义的名字）。拿破仑还解散立法机关，并号召帝国选民团6月时来巴黎战神广场集会，届时，他们将称颂他正在酝酿的新宪法，并"辅助"皇后与罗马王的加冕事宜。[24]"巴黎失守后，不论人们做了什么、写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承诺道，"我永远当作不知情。"[25]皇帝信守诺言，这是重建国民团结的唯一合理基础，但此举并未阻止旺代人再度反抗，他只好拨给卢瓦尔军团2.5万人，让拉马克率该军团镇压起义。卢瓦尔军团包括新组建的青年近卫军，他们本可在滑铁卢发挥宝贵作用。拿破仑也得派兵去马赛（直到4月中旬，当地才升起三色旗）、南特、昂热、索米尔等很多地方，除了1814年战役，过往战局中他不必这样做。[26]

拿破仑承诺重新掌权后废除令人反感的间接税，他如约而行，但战事将至，减税削弱了筹集军费的能力。[27]戈丹重任财政部长，4月3日，他得知，为了置办未来战局中的军队物资，皇帝还需要100万法郎。"大臣们留给自己的都远远超出其实际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拿破仑对戈丹说，"我认为其他预算皆可削减。"[28]（尽管他采取节俭措施，但他仍为皇室预算觅得20万法郎，用于"音乐家、歌手等"。[29]）戈丹大举动用皇室年俸，从巴黎总出纳处取走价值300万法郎的金银，靠木材税募得67.5万法郎。他还向法兰西银行贷款126万法郎，并售卖

价值38万法郎的南部运河股份。最后加上1816年公债等政府资产的出售额、盐矿等产业的税收收入，戈丹一共筹得17434352法郎。[30] 在这场战役中，拿破仑必须迅速行动，立刻取胜，因为法国显然无法承受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事。

拿破仑声称，他希望在法国实行自由统治。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召回在国内旺代流放的稳健派人物邦雅曼·康斯坦，要求此人起草新宪法——《帝国宪法附加法案》（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附加法案设立参照英国模式与皇帝分享权力的两院制立法机关，规定两阶段选举制、陪审制、言论自由乃至弹劾大臣的权力。邦雅曼·康斯坦曾出版小册子，说拿破仑像成吉思汗和阿提拉。如今他在日记中写道，拿破仑“听取谏言”。[31] 皇帝后来解释道，他想靠新宪法巩固“后期的一切革新举措”，好让任何人都更难复辟波旁王朝。[32] 此外，他取消了所有的审查制度（措施很彻底，以至于法国媒体可报道敌军将领的声明），彻底废除奴隶贸易，邀请斯塔埃尔夫人与美国革命战争英雄拉斐特（Lafayette）侯爵加入他的新同盟（他们都不信任他，因此拒绝了[33]），还下令不得拘留或骚扰英国人。他也对参政院说，自己已完全打消关于帝国的念想，“此后，我的思虑只会指向”法国的“幸福与巩固”。[34] 4月4日，他致信欧洲各国君主：“世界已见证伟大战局的奇观，从今往后，它最乐意见到的竞争是和平利益的竞争，它最乐意见到的冲突是人民福祉的神圣冲突。”[35]

历史学家常常嘲讽这些措施与声明，然而，1815年时法国已筋疲力尽至斯，民众大都渴望和平，所以说，如果拿破仑继续掌权，他非常可能重建执政府时代团结国民的和平政府。可是老敌人不相信他会放弃帝国野心，他们肯定不会冒着他重建帝国这一风险。老对头们也猜不到，他只剩六年寿命了。相反，一名英国议员称，人们认为“只要此人在”，和平“一定永远不稳……他统治时需常整军备，而敌对状态的筹备比战争本身叫人更不能忍”。[36] 此言不无道理。盟国仍在维也纳开会，3月

25日，它们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共同对抗拿破仑。

拿破仑利用迅速复位的优势，重启巴黎的各种公共项目，包括巴士底狱的大象喷泉、圣日耳曼的新市场、奥尔赛滨河路（Quai d’Orsay）和卢浮宫的外交部。[37] 塔尔马回音乐学院任教（波旁王朝关闭了学院）；艺术界和医学界中，卢浮宫馆长德农、画家大卫、建筑师方丹、医生科维萨尔各归旧职；卢浮宫再度悬挂卡尔·韦尔内创作的马伦戈图；元老院和立法院内摆上拿破仑战争中缴获的一些军旗。[38] 3月31日，拿破仑探访荣誉军团已故成员的孤女，波旁王朝削减了她们在圣但尼的学校的资金。同日，他在原有基础上重建法兰西帝国大学，拉塞佩德伯爵重任校长。法兰西学院亦恢复拿破仑的院士身份。3月，杜伊勒里宫举办音乐会，庆祝皇帝归来。音乐会上，号称“火星小姐”（Mademoiselle Mars）的36岁著名女演员安妮·伊波利特·布泰·萨尔韦塔（Anne Hippolyte Boutet Salvetat）和第二次意大利战局中拿破仑的老情人乔治小姐都佩戴紫罗兰花枝。拿破仑在春天回归，波拿巴分子受此启发，以紫罗兰花枝为新徽章。

然而，大部分法国人越发相信灾难正在逼近，这些公关活动都不能打消此念。4月，征兵范围打破先例，扩大至已婚男士。激进作家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时年28岁，客居巴黎，日后他成了英国的内阁大臣。当年4月，霍布豪斯指出：“只有真正的军人和某些省的居民欢迎拿破仑，甚至在他们面前，兴许他也只是相对受欢迎。”霍布豪斯是狂热的波拿巴分子，就连他也得承认：圣日耳曼的贵族憎恨拿破仑；店主们想要和平；皇帝驰过全城时，各团动情高呼“皇帝万岁！”，但民众并无回应，他们“既不闹腾，也不称颂，只能听见一些轻声嘟哝和低语”。[39] 4月中旬，玛丽·路易丝和罗马王（宣传人员称母子俩为“玫瑰与玫瑰蕾”）显然没从维也纳回来，这进一步警告巴黎人战争不可避免。[40]

4月16日，在杜伊勒里宫，霍布豪斯观看拿破仑检阅国民自卫军的24个营。现在，国民自卫军接受20～60岁这一年龄段中所有的体格健壮者。军队花了两小时列队走过，而霍布豪斯的站位离拿破仑仅10码远，所以他有机会好好观察自己的英雄。霍布豪斯认为，拿破仑和他的画像一点都不像。

> 他脸色煞白，如同死人；他下颚前凸，不过没有我听说的那么明显；他嘴唇薄薄，但有些扭曲……他的棕发又深又暗，稀稀拉拉地盖在太阳穴上；他的额头秃了……他上身不胖，但小肚子鼓得厉害，以至于马甲下的亚麻衣服都露出来了。他一般站着，双手在身前交握或交叠……他玩弄自己的鼻子，吸了三四回鼻烟，并看表。他叹气或咽口水，胸腔似乎在忙活。他几乎不说话，但他开口时会露出某种宜人的微笑。在冗长的仪式中……他一直带着沉静的不耐烦神色。[41]

一些士兵走出队伍，向掷弹兵岗哨请愿，此乃革命军的残留传统，但其他人好像不敢这样做，于是拿破仑示意收集他们的诉求。请愿者中有个6岁小孩，他穿着劳工队制服，戴着配套的假胡子，站在战斧一端向皇帝递交请愿书，他“接过来，聚精会神地阅读（它）”。[42]

1815年4月22日，邦雅曼·康斯坦发布附加法案。政府将法案交付全民公决，结果1552942人赞成，5740人反对。不过，我们看待这些数字时，要像对待先前的全民公决一样保守。（举个例子，有人既投赞成票又投反对票，这种错票就被当作赞成票。选民总投票率只有22%。[43]下塞纳省共计只有11011张赞成票与34张反对票，相对而言，在1804年的全民公决中，该省有62218人投票。[44]）拉瓦莱特每日向拿破仑汇报，他回忆道，“我从没见皇帝比现在更泰然自若”。拉瓦莱特认为，这是因为附加法案通过了。附加法案蕴含所谓的“革命波拿巴主义”，设法借此淡化自由派、稳健革命派、雅各宾派、波拿巴派的政治差别。[45]

总体看来，联盟派（fédéré）民兵运动系自发产生。联盟派不断壮大，到1815年4月下旬时，法国已有成千上万人加入此运动，他们认为巴士底狱陷落时法国具有民族团结感，希望恢复这种意识。[46]联盟派

每两周集会一次，要求成员用书面承诺、口头宣誓这两种形式声明对波旁势力动武。在国内的很多地方，联盟派都让保王党保持安静（这一状态至少持续到滑铁卢会战。战后，联盟派遭到残酷镇压）。[47] 法国境内，革命波拿巴主义只在激烈反对波拿巴派的地区——佛兰德、阿图瓦、旺代和南部——无所适从。其他地方，它渗透到地区社会各阶层。在雷恩，中产阶级主导当地联盟派组织；在第戎，联盟派由工人组成；在鲁昂，联盟派则与国民自卫军混同。联盟派对战争没有影响，但其说明拿破仑在国内享有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也意味着，滑铁卢之战后，要是他愿意，他或可挑起游击战。

拿破仑搬去爱丽舍宫，因为那儿有僻静的花园。5月15日，反法同盟正式对法宣战。两天后，莫莱在爱丽舍宫看见他，发现他“虽忧郁消沉但镇静”。他们谈到国家可能被瓜分。[48] 然而，拿破仑在公共场合照常保持冷静。当月晚些时候，他在杜伊勒里宫检阅常规部队的5个营与青年近卫军的4个营。他揪掷弹兵的鼻子，还跟一名上校开玩笑，打了此人的脸。接着，“那名军官走开，微笑着展示被打红的脸颊”。[49]

6月1日，政府在巴黎军校外的战神广场举行盛大的露天仪式“五月广场”（Champ de Mai，它的原名和战神广场的易混淆）并批准了附加法案。“阳光照耀6万把刺刀，”蒂埃博回忆道，“似乎要点燃这一大片土地。”[50] 这场典礼松松地建立在查理曼的某项传统上，系宗教、政治与军事的奇怪混合体。拿破仑穿着类似加冕斗篷的紫色服装，向在座的法国人（1.5万人）和更加乱哄哄的群众（10万多人）讲话。“身为皇帝、执政与军人，我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他说，“不论坐享荣华还是身陷逆境，不论征战、执政、称帝或流放，我的思绪和行动始终以法国为唯一宗旨。我像雅典国王 [51] 一样，为人民牺牲自己，以图履行承诺，即护得法国的天然领土完整，守护它的荣誉与权利。”[52] 他接着解释道，法国所受待遇激起众怒，促使他重掌权力，他也相信可达成长期和平，因为盟国已同法国订立条约。盟国正撕毁条约，它们在荷兰屯集兵力，

瓜分阿尔萨斯-洛林，并准备开战。这篇演说的结尾如下：“我自己的光荣、荣耀、幸福和法兰西的不可分离。”不用说，演讲之后是长久的欢呼，接着军队、各省代表、国民自卫军排成密集队伍，列队而过。[53]整个宫廷、参政院、高级法官、高级外交官、军官皆着制服出席，女士们则佩戴钻戒。这次壮观的盛典包括100门礼炮齐射、鼓乐、浩大圆形露天剧场、炫示各省名称的鹰旗、镀金马车、庄重誓言、《感恩赞》合唱、身披红外套的枪骑兵、大主教主持的祭坛、服装鲜丽的信使。[54]举行弥撒时，拿破仑用观剧望远镜扫视群众。霍布豪斯得承认，皇帝“猛地坐到御座上，裹起斗篷，他看上去非常笨拙又相当矮胖”。

上月选举后，不少立宪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地下保王党人和雅各宾分子当选议员，即便如此，两天后，新当选议员几乎轻而易举地向皇帝宣誓效忠。拿破仑的老对头、前元老院议员朗瑞奈伯爵当选下院议长，拉斐特也成了议员，但立法机关不大可能马上给他招来很多麻烦，因为下院立刻分散注意力，激烈争论议员能否把纸条藏进帽子，供发言时查看。次日晚上，协和广场举行盛大的烟火表演，火焰描画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乘船而来的场景。一名目击者记载道：“群众高呼‘皇帝和烟火万岁！’，君主立宪制开始了。”[55]当然了，新制度不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因为拿破仑是自己的首相，任命所有大臣，但这种体制也不是1814年前的绝对独裁制，看起来它可能走向自由化。

拿破仑知道，只有战场才能最终决定他的胜负。6月7日，他命令贝特朗准备好自己的望远镜、制服、马匹和马车，“以便我能在下令后两小时内动身”。他补充道：“因为我会常常扎营，配备铁床和帐篷乃要务。”[56]同日，他告诉德鲁奥：“今天早上两个营离开了，我难过地发现。他们每人只有一双靴子。”[57]两天后，即1815年6月9日，反法同盟签署《维也纳条约》。条约第一条重申，盟国意在强迫拿破仑下台。第三条则声明，它们同意绝不放下武器，除非他倒台。[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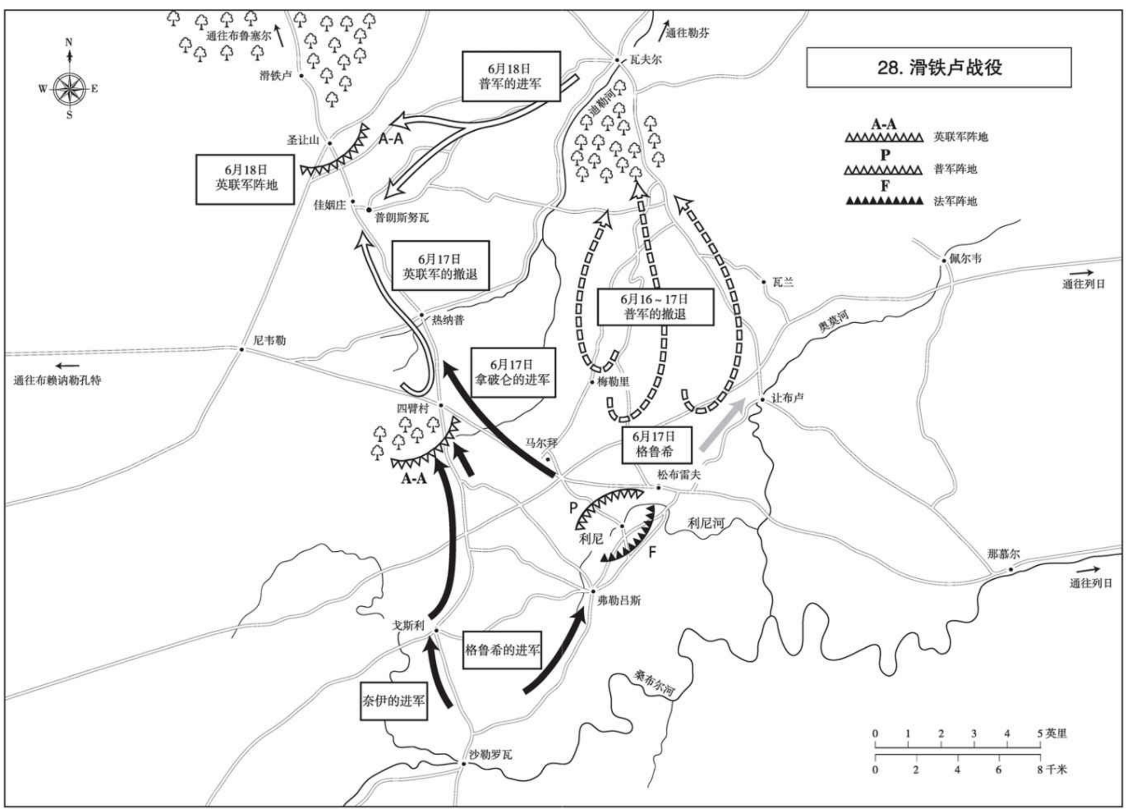
早在3月27日，拿破仑就对德鲁奥说“北方军团将是主力”，因为最近的联军部队位于佛兰德，而他肯定不想等施瓦岑贝格返回法国。[59] 6月12日（周一）清晨4点，拿破仑离开爱丽舍宫，去阿韦讷（Avesnes）指挥北方军团，次日，他在那儿与奈伊用餐。15日中午，他已到达比利时沙勒罗瓦（Charleroi），预备在弗勒吕斯附近迎战布吕歇尔的普军。他想先击败布吕歇尔，再对付威灵顿的英国-荷兰-比利时-德意志联军。在威灵顿的军队中，39%的人是英国人，49%的人以德语为母语。

拿破仑后来说：“他依靠的主要策略是，假如在比利时挫败英军……他足以让英国政府产生变动，那样的话，他就有机会立刻缔结普遍的停战协议。”[60] 1814年之前，法兰西帝国的版图一直包括布鲁塞尔，夺取此地也可鼓舞士气。开战是冒险，但更冒险的是按兵不动，坐等奥军和俄军准备好再攻巴黎。纵观整个欧洲，28万名法军士兵将对付80万名联军士兵，尽管数周后奥军才会上战场，而俄军也要几个月后才能到。“要是他们进入法国，”6月14日，拿破仑从阿韦讷指示军队称，“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坟墓……对所有法国勇士来说，现在不是胜利就是死亡！”[61]

战役开局阶段，拿破仑恢复了上一年他展示的最佳战略能力。一开始，法军散布在宽175英里、纵深100英里的地区，甚至比联军更分散，但他趁机佯攻西边，然后采用经典的营方阵系统，在中部集中兵力。6月6～15日，拿破仑调动北方军团的12.5万人，让部队在马谢讷（Marchienne）、沙勒罗瓦、沙特莱（Chatelet）过河，而联军并无任何重要的反应。4月5日，威灵顿已从维也纳飞速赶来，眼下，他只好让军队沿62英里宽的前线列队，与此同时，他设法守住通往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和根特（Ghent）的道路。6月15日晚，威灵顿同样沮丧地承认：“天哪，我被拿破仑耍了。”[62]

近二十年来，拿破仑一直在敌军交合处进攻，凭借速度和战术能

力，现在他又可以用这招了。法军有一半人是刚入伍的新兵，他的机动因而更显不凡。西班牙、俄国和奥地利战俘营释放了法军老兵，但最初的热情与冲劲过后，只有1.5万名志愿者从军，所以征兵弥补了兵员缺口。法军军心不稳，15日上午，前朱安党领袖布尔蒙伯爵与其部下改投联军，更加动摇士气。[63] 苏尔特、奈伊、克勒曼、布尔蒙等将领曾宣誓效忠波旁王朝，但后又获准归队，有士兵便提出质疑，这不难理解。士气低迷导致军纪松弛。帝国近卫军在比利时肆意劫掠，嘲笑奉命来阻止他们的宪兵。[64] 法军也缺少装备，第14轻步兵团没有筒帽，第11胸甲骑兵团没有胸甲。（6月3日，拿破仑漫不经心地对达武说："打仗不需要胸甲。"）3月13日，拿破仑在里昂重建帝国近卫军，而普军则报称，近卫军的一些营看起来更像民兵，他们没有戴可怕的熊皮帽，反而戴着某种便帽或两角帽。波旁王朝解散了中年近卫军，直到上个月，拿破仑才召回他们。



6月16日，拿破仑兵分三路。奈伊位于左翼，率三个军攻打四臂村

（Quatre Bras）路口，以图阻止两路敌军会师。南北走向的布鲁塞尔-沙勒罗瓦干道与东西走向的那慕尔-尼韦勒（Namur-Nivelles）公路在四臂村交汇，那慕尔-尼韦勒公路至关重要，它是布吕歇尔和威灵顿的主要横向联络线。格鲁希与其军组成右翼。拿破仑、帝国近卫军和另一个军留在中路。[65] 当天晚些时候，奈伊在四臂村战斗，他的对手先是奥兰治亲王，后是威灵顿本人。此时，拿破仑和格鲁希在利尼进攻布吕歇尔。“你必须去那个尖顶，”皇帝对热拉尔说，“然后把普军赶走，越远越好。我会支援你。我已对格鲁希下令。”[66] 这些划定任务的命令听来随意，但热拉尔将军经验丰富，知道对方希望自己做什么。值此时刻，拿破仑命令埃尔隆将军的军（2万人）去利尼进攻暴露的普军右翼。埃尔隆原归奈伊指挥，先前他去四臂村时，苏尔特把他调离奈伊麾下。

拿破仑在利尼取得可观胜绩，如果埃尔隆如期而至，他将会击溃敌军，但事态与之相反。埃尔隆正要参战时，奈伊却下达紧急迫切的命令，说四臂村需要他，于是他转身去四臂村战场。[67] 还没等埃尔隆去四臂村发挥作用，苏尔特又要他掉头回利尼。筋疲力尽的埃尔隆军来得太迟了，也没赶上利尼之战。因为奈伊、苏尔特和埃尔隆之间存在混乱，拿破仑在利尼失去了决定性的胜利。利尼之战中，布吕歇尔折损约17000人，拿破仑折损11000人。晚上，普军被逐出战场。[68] 与此同时，奈伊损失4000人，而且他没能拿下四臂村。

“我也许会输，”之前在1796年，拿破仑就曾对皮埃蒙特信使说，“但人们绝不会看到我因自负和懒惰浪费时间。”[69] 普军似乎正沿其补给线退往东边的列日（Liège），所以6月17日（周六）天一亮拿破仑就能攻击威灵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上午8点才起床。接着他又浪费了五个小时：他阅读巴黎送来的报告，造访利尼战场，并指示部下照顾伤兵；他对被俘的普军军官讲话，论及普鲁士外交政策；他还“用惯有的随和语气”同自己的将军聊各种政治话题。[70] 直到中午时分，拿破仑才派格鲁希率一个庞大的军（36000人与96门大炮）追赶普军，照

他设想，次日他会和威灵顿大战，可他没有集中兵力，却分兵了。[71] “那么，格鲁希，跟上那些普军，”他说，“用兵刃抵着他们的肾，但你务必通过左翼与我保持联系。”[72] 然而，拿破仑派出格鲁希时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战斗前日不可分兵，因夜间局势或生变。敌军可能撤退，亦可能等来大批援军，重启攻势，并置你先前的阵地于险境。”[73]

拿破仑造访利尼战场，从而获知了普军作战序列、敌人的哪个军受损最严重，但这些情报不足以弥补放走普军的损失。要是他在16日或17日一大早派格鲁希出击，普军也许走不脱。苏尔特派帕若尔去那慕尔侦察。帕若尔缴获一些大炮，抓获若干战俘，拿破仑于是更加相信，大部分普军正沿其补给线混乱地撤退。[74] 当日及之后，他的很多言论都表明，他以为普军已在利尼受重创，不能在战役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结果，法军再也没派人侦察北边。

格鲁希比普军晚走十五个小时，他也不知其行军方向。布吕歇尔在战场上遭遇脑震荡，其参谋长奥古斯特·冯·格奈泽瑙（August von Gneisenau）不但没有下令向东，反而命令普军退往北边，以便和威灵顿的军队保持近距离。照威灵顿的说法，这次反常调动是19世纪最重要的决策。此后五年，拿破仑在脑海里反复重演滑铁卢会战，他给失败找了很多借口，但他承认，自己应该要么让更积极的旺达姆或絮歇拖住普军，要么让帕若尔率单单一个师对付普军。“我本该带上所有的其他部队。”他悔恨地总结道。[75]

直到6月17日晚些时候，拿破仑才悠然地去四臂村。下午1点，他到达该地，与奈伊会合。此时威灵顿已知利尼之战，他在倾盆大雨中谨慎地退往北边，亦有充足时间在圣让山（Mont Saint-Jean）山岭建立阵地。威灵顿把司令部设在滑铁卢村，圣让山位于该村以南几英里处。他先前侦察过圣让山，已然察觉它是非常优良的防御战场。圣让山仅宽3英里，有很多“隐藏”地面，某条山脊前还矗立着乌古蒙（Hougoumont）

和拉艾圣（La Haie Sainte）这两座石质大农舍。“公认的战争准则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如敌人所愿行事，”拿破仑曾说，“原因就是它本身，因为这是敌人所愿。由此可见，应当避开敌人曾调查或侦察的战场。”[76]他在博罗季诺没投入近卫军，在莫斯科和莱比锡待了太久，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中分兵，最后，他又在敌人选择的战场发动决定性会战。拿破仑之所以干出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军事箴言。

6月17日，拿破仑花了些功夫检视在利尼表现出众的营，并训斥其他的营。他认出了第22战列步兵团上校奥多阿尔，此人曾隶属近卫军。拿破仑问奥多阿尔，他带了多少人列队行军（1830人）、昨日他损失了多少人（220人）、他如何处置普军丢弃的滑膛枪。[77] 奥多阿尔说普军的枪被毁掉了，拿破仑则说国民自卫军需要那些枪。他开出悬赏，称每收集一杆枪可得3法郎。除此以外，17日上午，法军彻底一反常态，呆滞不动。

几十年后，热罗姆和拉雷声称，利尼之战后，拿破仑的痔疮发作，令他丧失了行动能力，所以他无精打采。[78] “弟弟，听说你患了痔疮，”1807年5月，拿破仑曾致信热罗姆，“最简单的疗法就是敷上三四条水蛭。十年前我用过这招，然后我再没疼过。”[79] 但他实际上还疼？这也许解释了为何滑铁卢会战中他几乎不骑马（下午3点，他一度造访大炮群，傍晚6点，他骑马经过战场前线），为何他两次退到位于战线后方1500码处的罗索姆（Rossomme），在那儿的农舍待了短短一阵。[80] 他大骂听差居丹（Gudin），因为当日上午，居丹在勒卡尤（Le Caillou）扶他上马时用力过猛。后来他道歉了：“你帮人上马时最好温柔点。”[81] 滑铁卢会战中，奥古斯特·佩蒂耶（Auguste Pétiet）将军任苏尔特的参谋，此人回忆道：

> 对45岁的人来说，他的将军肚大得超常。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役中，他待在马上的时间比以前少得多。他下马来查看地图，或发信件、收报告，这时部下们就在他面前摆上一张冷杉木小桌子、

一把冷杉木粗糙椅子，他能在那椅子上坐很久。[82]

根据某些历史学家的诊断，拿破仑也有膀胱炎或嗜睡症，但贴身男仆马尔尚说，这段时间主人没得膀胱炎，嗜睡症之说亦缺乏可信的证据。“这是皇帝一生中最显精力、威信、领导力的时刻。”拿破仑最亲近的副官之一弗拉奥回忆道。[83] 然而，1815年时，拿破仑年近46岁，身材肥胖，不具备25岁左右时那股强大能量。到6月18日为止，他在六天中只睡了一晚好觉。弗拉奥解释道，他之所以无所作为，只是因为，“经历了激战和前日那种行军后，黎明时才能指望我军行动”。[84] 1814年时这些因素亦存在，拿破仑却在五天内连战四场。

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证明，6月18日那天，拿破仑的任何决策源自身体状态，而非误判与所获的错误情报。“战争中，”次年，他对一位俘获自己的人说，“谁犯错最少，谁就是赢家。”[85] 威灵顿曾研究拿破仑的战术和军事生涯，滑铁卢战役中他严谨地部署军队，走遍战场。相形之下，拿破仑、苏尔特和奈伊打出了拿破仑战争中指挥最不力的战斗之一。滑铁卢会战开始之前，拿破仑遇上的最棒的沙场军人是卡尔大公，所以威灵顿这种水准的战术大师出现时，他根本没做好准备，再说了，威灵顿从没败过。

17日，拿破仑在四臂村遇见埃尔隆，说：“你害了法国的事业，将军。”另一个版本出自埃尔隆本人，他更愿意把皇帝的话记成这样：“法国败了，我亲爱的将军。你去骑兵最前头，尽力逐走英军后卫。”[86] 当晚，拿破仑仿佛快要对战英军骑兵后卫。天降大雨，他延缓了追击速度，法军前卫也把英军骑兵后卫赶往北边的圣让山山脊，但正如埃尔隆回忆录所说的，他没有参与骑兵冲锋。[87] 然而，拿破仑确有时间停在负伤的英军第7骠骑兵团上尉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面前。他从身后裤袋掏出酒瓶，给埃尔芬斯通倒了一杯葡萄酒，还让医生照料此人。[88] 他憎恨英国政府，但他大可友好对待单个英国人。

埃尔隆力劝拿破仑停止进攻英联军后卫，晚上7点左右，他叫停了攻势，说："让部队做汤，整理好他们的武器，我们且看中午会怎样。"[89] 当晚，他巡视前哨，吩咐士兵好好休息，因为，"如果明天英军还在，他们就是我的囊中之物"。[90] 他把勒卡尤农舍当作司令部，在其一楼睡行军床，而苏尔特在二楼睡稻草。拿破仑知道自己要收报告，所以他不想多走3英里来返回热纳普镇（Genappes）。夜里，科尔比诺、拉贝杜瓦耶、弗拉奥等副官冒雨骑马，他们穿行在各个军中，记录军队的调动与位置。

据拿破仑的法国警卫"马穆鲁克阿里"回忆，在房间布置好之前，他睡在一捆稻草上。"他占有房间后……我们给他脱靴，这有些麻烦，因为它们湿了一整天。他脱掉衣服后上床。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睡，每分钟，来来往往的人都会打扰他。这个是来汇报的，那个是来接令的，诸如此类。"[91] 至少拿破仑是干爽的。"我们的厚大衣和裤子粘了好几磅泥泞，"第1掷弹兵团（Grenadiers à Pied）中士伊波利特·德·莫迪（Hippolyte de Mauduit）回忆道，"一大群士兵丢了鞋子，光着脚走到宿营地。"[92] 此言最能证明拿破仑对鞋子的执念没错。

拿破仑日后对拉斯卡斯说，凌晨1点，他和贝特朗侦察，查看威灵顿的军队是否还在。他可能撒谎了（尽管没有证据）。凌晨2点，他被叫醒，然后收到四小时前格鲁希写下的信。格鲁希报称，他在瓦夫尔（Wavre）附近遇上普军，认为那可能是主力部队，但他碰上的只是布吕歇尔的后卫。十小时后拿破仑才回信，尽管当日上午晚些时候，他已经知道威灵顿会守圣让山。他没有立刻命令格鲁希返回战场进攻威灵顿左翼，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啊，我的天哪！"次年，拿破仑对古尔戈将军说，"6月17日的雨和滑铁卢之败的关系也许比人们想的更大。要是我不那么累，我会在马上待一整晚。看起来非常小的事常有非常大的影响。"[93] 拿破仑深信自己

赢在全面侦察战场，如埃克米尔会战，但那场雨的真正意义在于，18日那天，炮兵指挥官德鲁奥将军建议等土地变干再开战，这样的话，他可以更轻松地安放大炮，加农炮炮弹射出后也能弹得更远。德鲁奥后来终生懊悔这一提议，因为他和皇帝都不知道布吕歇尔已经避开格鲁希，当日早上，此人再度向威灵顿承诺，下午时普军至少有三个军能到战场。事实上，威灵顿之所以决定在圣让山开战，完全是因为他知道普军会来。

6月18日（周六）上午11点后，拿破仑才发动进攻，要是他把开战时间改为日出时分（凌晨3点48分），那么在比洛军突然猛攻法军右翼前，他能多出七小时来击破威灵顿的战线[94]。[95]他命令奈伊喂饱士兵、检查部队装备，“以便9点整时每个人能做好准备，可以一战”，但9点后又过了两小时，战斗才开始。[96]会战爆发前，在勒卡尤农舍，拿破仑和高级军官在紧挨其卧室的餐厅举行早餐会议。苏尔特、雷耶、富瓦等多名将领曾在西班牙对战威灵顿，他们建议皇帝不要太指望轻松突破英军步兵，他回答：“威灵顿打败了你们，你们就觉得他是个好将军。我说他是个差劲的将军，英军也是差劲的部队。这就是一顿午饭的功夫！”苏尔特显然不信，只好说：“但愿如此！”[97]拿破仑经常真心称赞威灵顿和英军，这番看上去骄傲自大的评价与他之前的话截然相反。这肯定是因为，离大战就剩几小时了，他需要鼓励部将。

早餐会议上，热罗姆告诉拿破仑，6月16日，威灵顿在热纳普的西班牙国王旅馆用餐，旅馆侍者无意中听见一位副官说，普军将在苏瓦涅森林（Forêt de Soignes）前方与英联军会合，该地正好位于圣让山之后。事实最终证明，这条消息准得可怕，而拿破仑却回答：“弗勒吕斯（即利尼）之战那种战斗后，普军还被庞大军队追赶，所以两天之内，他们不可能与英军联上。”他接着补充道：“即将爆发的战斗会拯救法国，名垂世界史册。我要让炮兵开火，派骑兵冲锋，迫使敌人暴露位置。等我比较清楚英军在哪儿后，我就派老近卫军直取他们。”[98]侍者

汇报了太贫嘴的副官的对话，拿破仑没有据此情报更改整个战略，这情有可原，然而，就连他自己的相关解释也说明，他打算采取的战术根本就不精明。威灵顿预计拿破仑会派法军左翼实施大规模侧翼机动，遂派17500人去阿尔（Hal）[99] 防备这招。结果，拿破仑的计划不比他在埃劳、博罗季诺、拉昂采取的方案出彩。

上午9点30分，拿破仑离开勒卡尤。据他的传令兵雅尔丹·艾内（Jardin Ainé）回忆，他“前进半里格，在一座丘陵上站定，在那儿他可以观察英军调动。到达丘陵后，他下马，用野战望远镜努力搜寻敌军战线的任何动向”。[100] 他选择了佳姻庄旅馆（La Belle Alliance inn）附近的小土丘，在桌子上铺开地图，其坐骑立于附近，并未卸鞍。[101] “我用望远镜看见他走上走下，”富瓦回忆道，“他穿着灰大衣，经常趴在放置地图的小桌上。”[102] 晚上的雨停了，18日白天，天气阴沉却干燥。苏尔特建议早早进攻，但拿破仑答道，他们“必须等待”，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想等大炮群能更轻易地穿过泥泞。据上校蒂雷纳伯爵与蒙蒂翁回忆，会战前两小时，皇帝感到疲惫，他“在桌边坐了很久……而且……他们经常看见他架不住瞌睡，睁不开眼睛，一头倒在眼前摊开的地图上”。[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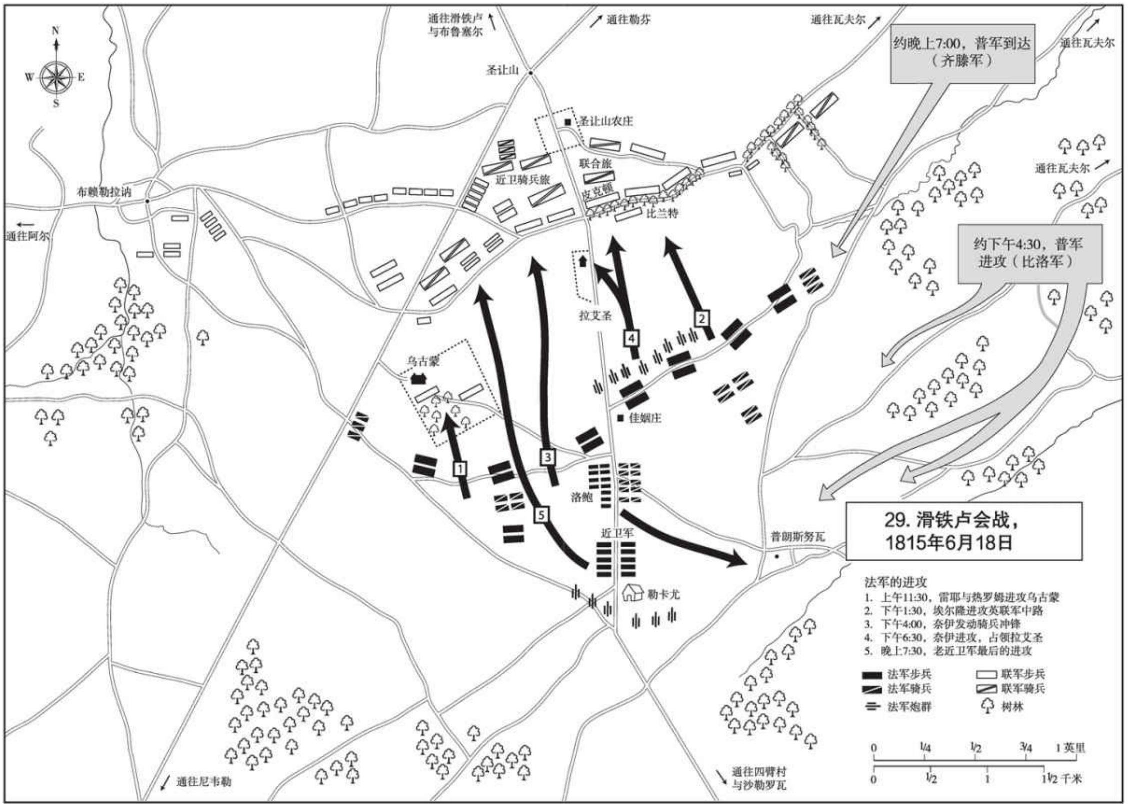
中午，拿破仑致信格鲁希，命令对方立刻与己会合，下午1点，他再度下达此令。[104] 可那时已经太迟了。（下午6点前，其中一封信甚至一直没送到。）拿破仑日后声称，此前他就要格鲁希返回，但我们并未找到这类命令，格鲁希也激烈地否认此事。[105] 万塞讷战争部档案的文件堆叠如山，它们见证了格鲁希和热拉尔的争执。近午时分，大炮群开火，两人都没有收到拿破仑的直接命令，遂争论格鲁希应该怎么做。他得继续去瓦夫尔对付普军后卫，还是无论如何都去大炮群轰鸣处？[106]

在半岛战争中，威灵顿打过好几场防御战，如1808年维梅鲁会战、1809年塔拉韦拉会战、1810年布萨库（Bussaco）[107] 之战，他有信心

守住阵地。威灵顿是英籍爱尔兰贵族、严肃强硬的托利党人，为人坚忍不拔，直截了当。他仰慕拿破仑，称对方为“战场第一人”，但撇去这一点，他就蔑称对方为政治暴发户。“此人的政策就是恐吓，”滑铁卢之战后，威灵顿说，“抛开军事不谈，他就是乔纳森·怀尔德（Jonathan Wild）。”怀尔德是臭名昭著的罪犯，1725年，他在泰伯恩（Tyburn）被绞死。[108] 威灵顿选取的阵地严重限制了拿破仑的战术选择：乌古蒙掩护其右翼；森林掩护其左翼；其中路位于设防农舍拉艾圣后方几百码处，占据下陷的横向公路。[109] 可是威灵顿这样做非常冒险，因为他背靠苏瓦涅森林，如果拿破仑强迫英联军退出公路，他不可能有序撤离。

上午11点左右，滑铁卢会战开始。雷耶军的炮兵为热罗姆师开道，该师将进攻乌古蒙、牵制英联军，富瓦师跟随其后。热罗姆未能攻克农舍，随着战事推移，乌古蒙不断引来法军士兵。不知为何，法军没有试着用骑兵炮炸碎农舍前门。当天，威灵顿支援乌古蒙，它和拉艾圣都成了无价的“防波堤”，扰乱并汇聚前进的法军。热罗姆英勇战斗，当他的师减员到只剩两个营时，拿破仑召回他，说：“弟弟，我后悔这么晚才认识你。”[110] 热罗姆日后回忆道，此言安抚了“他心中郁积的诸多伤痛”。

拿破仑用83门大炮组成大炮群，下午1点，他开始炮轰威灵顿的战线。轰击造成的损害不及应有水平，或许这是因为威灵顿命令部队躺在山脊之后。1点30分，拿破仑发动主要的步兵攻势。埃尔隆军攻击威灵顿的中左翼，该军在长有齐胸高黑麦的泥泞田地上穿行，经过左侧的拉艾圣。就像奥斯特利茨会战中对付俄奥联军时一样，埃尔隆军打算把威灵顿的阵线一切为二，再分别碾压之。中左翼是威灵顿最薄弱的位置，故而是正确的进攻地点，但埃尔隆执行计划时犯了错。



进攻开始时，埃尔隆派出整个军，让所有的营结成250人宽的多排横队。或许他想增强接敌时的火力，但此举完全违背了法军的常规模式，即组成纵队后实施机动，再展开成横队。埃尔隆的布局导致整个队列臃肿笨重，难以控制，极易受损。皮埃尔·迪蒂（Pierre Duthilt）上尉隶属马尔科涅将军的师，他回忆道，那是个“奇怪的编队，我们无法组成方阵对付骑兵冲锋，敌军炮弹也能在队伍中犁过20排，所以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111] 埃尔隆军的进攻旨在钉住敌军前线，地位至关重要，虽然没人知道该军所用队形是谁的点子，但埃尔隆必须为如此重要的战术决策负最终责任。[112] 拿破仑的另一条箴言称：“若步兵、骑兵或炮兵单打独斗，则它们如同无物。”可这一回，埃尔隆率步兵进攻，其他兵种却没有充分掩护他，他也没钉住威灵顿的前线，随后被击退。[113] 埃尔隆军不但没达成目的，还被英军骑兵的联合旅（Union Brigade）与近卫骑兵旅（Household Brigade）冲击。他们逃回法军战线，丢了十二面鹰旗中的两面。埃尔隆撤退后，下午3点，英军骑兵紧

接着被赶离大炮群，拿破仑随即来到炮兵指挥官让-雅克·德沃·德·圣莫里斯（Jean-Jacques Desvaux de Saint-Maurice）将军身边，以便在更近处观察战场。德沃和皇帝并肩骑行时，一发加农炮炮弹把他炸为两半。[114]

普军的三个军来了，下午1点30分左右，拿破仑右翼所在地开始显现打头的一个军。法军猎骑兵某中队在瓦夫尔和普朗斯努瓦（Plancenoit）之间俘虏一名普军骠骑兵，这提前警告了拿破仑普军会来，他已经花了近半小时调兵去右翼。此刻他下令告诉军队，地平线上那些穿着深色外套的人是格鲁希军，他们要来此赢取胜利。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谎言逐渐破产，这打击了士气。下午，为了对付普军，拿破仑被迫逐渐增派军队去右翼。4点，比洛的普军士兵（3万人）在弗里谢蒙（Frischermont）和普朗斯努瓦之间进攻洛鲍的法军步兵与骑兵（7000人）。[115] 上午时，拿破仑有7.2万人和236门大炮，威灵顿有6.8万人与136门大炮，因此法军兵力占上风。一旦联军合兵，他们就可部署10万人与200多门大炮，所以拿破仑立刻陷入严重的兵力劣势。

下午4点左右，奈伊对威灵顿的中右翼发动一系列大型骑兵冲锋，一共调用1万人。继缪拉驰骋埃劳之后，这是规模最大的骑兵冲锋，但我们仍不清楚下令之人究竟是谁（若确有此人的话），因为拿破仑和奈伊事后都不承认那是自己所为。[116] “奈伊在摧毁马上要赢的战斗，”拿破仑看到他冲锋后告诉弗拉奥，“现在却必须支援他，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117] 皇帝认为，这次冲锋“太早了，时机不当”，但他对弗拉奥说：“奈伊派部队去深谷对面对付敌人，命令（你）能找到的所有骑兵协助他们。”[118] 今人可在戈登纪念碑（Gordon Monument）看到道路有多深，但它不是深谷。弗拉奥日后豁达地说：“战争中，有时只能靠坚持错误来弥补错误。”[119] 不幸的是，对拿破仑来说，这次的情况不属于弗拉奥所谓的“有时”。

此时，威灵顿的步兵组成13个方阵（其实它们呈矩形），迎击骑

兵。奈伊曾在四臂村突破第42、第69步兵团的方阵，1807年和1813年，法军骑兵也在霍夫和德累斯顿分别冲破俄军与奥军的方阵，但战马天生不愿冲入闪亮的刺刀丛，所以英军方阵在骑兵面前几乎固若金汤。炮兵和步兵横队尤能克制方阵，但法军骑兵冲锋时，没有炮兵和步兵支援，这证实了某种猜测：拿破仑和奈伊并未刻意下令，发生冲锋是一次意外。13个方阵中，没有一个被击破。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承认，“那一天，英军凭良好的纪律赢得胜利”，然后他指责重骑兵指挥官居约将军，说此人没有得令就冲锋。此言毫无道理，因为居约只参加了第二波冲锋。[120]

那群才能突出、经验丰富的法军三兵种战场指挥官曾在那么多的战斗中协调行动，但这一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未能协同作战，此乃滑铁卢会战之谜。[121]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拿破仑最爱的兵种——炮兵。整场会战的各大重要阶段，炮兵一直错失密切支援步兵的机会。很多法军骑兵筋疲力尽，战马喘着气，下午4点15分后，大股普军也来了，所以拿破仑理应尽力撤退。[122] 事实正相反，6点后的某时，奈伊成功占领战场中部的拉艾圣及其附近的地洞，它叫沙坑（Sandpit）。奈伊让射程为300码的骑兵炮上前，所以他能用滑膛枪和加农炮轰击威灵顿的中路，以至于组成方阵的第27恩尼斯基林步兵团（27 Inniskilling Regiment of Foot）折损了90%的兵力。会战迎来关键时刻，在数量庞大的普军碾压法军之前，这是他们突破英军阵线的最好机会。奈伊派副官奥克塔夫·勒瓦瑟（Octave Levasseur）恳求拿破仑派出更多部队，以便利用这种局面，但皇帝的骑兵疲惫不堪，他自己的司令部也在普军炮兵射程之内，于是他拒绝了。“部队？”他讽刺地对勒瓦瑟说，“你让我上哪儿找？要我给你变出来吗？”[123] 事实上，他说这句话时，近卫军还有十四个营未参战。半小时后，拿破仑改了主意，但威灵顿已用不伦瑞克人、汉诺威人以及一个荷兰-比利时师填上了中路的危险缺口。

拿破仑骑过战场前线，他随即命令中年近卫军组成一串方阵，沿通

往布鲁塞尔的主干道前进，此时已是晚上7点左右。滑铁卢会战后期，负责进攻的帝国近卫军仅占其总野战兵力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人要么与普军争夺失守的普朗斯努瓦，要么掩护撤退。拿破仑命令奈伊支援近卫军，可近卫军上阵时，一个步兵师还未离开乌古蒙的树林，也没人召回尼韦勒公路上的任何骑兵旅。[124] 威灵顿的战线又有严密防守了，近卫军上坡攻击它时，没有骑兵团掩护其侧翼，只有雷耶军的少数部队提供支援。近卫步兵一共可用96门大炮，但只有12门参与进攻。

150名乐手走在近卫军前头，演奏阅兵式上的凯旋曲，但近卫军没带鹰旗，此举或可说明攻击乃孤注一掷。[125] 拿破仑来到拉艾圣西南边的射击死角，该地位于通往山脊的长斜坡脚下。近卫军列队走过他身边时，纷纷欢呼"皇帝万岁！"[126] 开始时，近卫军的八个营出动，其总人数很可能不足4000，他们靠一些骑兵炮掩护自己。然而，近卫军在路上甩下三个营，让他们留作预备。更硬的地面有利于威灵顿的炮兵，正如勒瓦瑟回忆的，很快，"子弹和葡萄弹袭来，路上遍布死伤者"。威灵顿用来承受攻击的大量火力（既有滑膛枪子弹，又有葡萄弹）瓦解了帝国近卫军的意志，于是他们沮丧地退回。有人喊道："近卫军撤退了！"（La Garde recule！）自从1799年执政卫队成立，一切战场上都不曾响起这句话，直到此刻。这个信号一出，法军的整条前线开始崩溃。几天后，奈伊在上院就滑铁卢会战发言，他说自己没听到这句话。可是当晚8点左右，战场上有人喊，"谁来救救我们！"（Sauve qui peut！），士兵们扔掉滑膛枪，试图趁天黑前逃走。事态已然明朗，拿破仑便拽过一位将军（不知其名）的胳膊，说："来吧，将军，事情结束了。我们输了。我们走吧。"[127]

老近卫军在沙勒罗瓦-布鲁塞尔公路两侧组成两个方阵，掩护大军匆匆撤退。在佳姻庄以南约300英里处，珀蒂将军指挥第1掷弹兵团第1营结成方阵，拿破仑躲进该方阵中。[128] "全军极其混乱，"珀蒂回忆道，"不管是步兵、骑兵还是炮兵，所有人都四散奔逃。"方阵稳步撤退

时，皇帝命令珀蒂奏响振奋人心的鼓乐《掷弹兵》（*Grenadière* ），以便集结“被逃命的人流困住”的近卫军。“敌军紧紧跟在后面，我们害怕他们突破方阵，只好向被追击的人开火……现在天几乎黑了。”[129]

在罗索姆以远某地，拿破仑、弗拉奥、科尔比诺、拿破仑的传令兵雅尔丹·艾内、一些军官、猎骑兵值勤中队离开方阵，沿主干道骑行而下。皇帝在勒卡尤换了马车，但他发现奔逃的士兵阻塞了热纳普的路，遂丢掉马车，骑马驰过四臂村和沙勒罗瓦。[130] 据弗拉奥回忆，他们去沙勒罗瓦时遇上拥堵人潮，结果骑马比走路快不了多少。“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非常不安，但他本人没有露出丝毫害怕的迹象。”弗拉奥论及拿破仑道，“然而，疲惫和前几天的辛劳压垮了他，有好几次，他克制不住涌上来的睡意，要不是我撑着他，他就从马上栽下去了。”[131] 清晨5点左右，一行人经过沙勒罗瓦。艾内记载道，皇帝“发现，右边的草坪上有个小火堆，那是一群士兵弄出来的。他在火边停下，烤火取暖，还对科尔比诺将军说，‘我亲爱的先生，我们干了件好事’”。甚至在那时，拿破仑也能开玩笑，不论他的笑话多么糟糕。据艾内回忆，“当时”，皇帝“变了很多，其脸色非常苍白，其神情相当憔悴。他喝了一小杯葡萄酒，吃了某侍从武官口袋里的一小块面包。过了一会儿，他上马，询问马匹能否疾驰”。[132]

在拿破仑战争中，博罗季诺会战是伤亡人数最高的单日战斗，滑铁卢会战仅次于它。法军有25000～31000人伤亡，另有很多人被俘。[133] 威灵顿损失了17200人，布吕歇尔又损失了7200人。1815年，拿破仑麾下有64名高级将领，其中26人在那一年遇难或负伤。“不可思议的一天”，他后来如此评价滑铁卢会战。他承认，“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这场战斗”，并将战败归咎于“命运异数的组合”。[134] 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他和他的高级指挥官究竟主动犯了多少错误。会战前一天，他呆滞不动；他调派格鲁希时犯下战略错误；他未能协调进攻；拉艾圣陷落后，他不肯利用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机会。看看利尼之战后拿破

仑的表现，我们便会回想起近二十年前他征战意大利时那些更呆板的奥军敌将。滑铁卢会战中，威灵顿和布吕歇尔赢得当之无愧，不止如此，拿破仑也输得非常理所应当。

---

[1]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13

[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p.281

[3] AN 286 AP3 dossier 32

[4]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 Ⅰ 1923，p.213

[5] 拿破仑像使唤之前所有的内政部长一样对待卡诺。“你会发现，”5月中旬，拿破仑论及列明军队部署的表格时道，“印出的报告漏掉了东比利牛斯省。”CN28 no.28198.

[6] BNF Micr D.71/86 *Le Moniteur* 21/3/1815

[7]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p.4

[8]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p. ｘｘｘｖ

[9] BNF Micr D.71/86

[10] ed. Schlumberger，Gustave，*Lettres du commandant Coudreux* 1908，p.245

[1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696 p.20

[1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711 p.29

[13] Gallaher，John，‘Davout and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p.7

[14]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896 p.177

[15] SHD GR16/C21 and SHD GR 15.C/39

[1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7

[1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 21987 p.241

[18] 原文有误：圣西尔保持中立；奥热罗宣布效忠拿破仑，但是拿破仑未接受他。——译者注

[19] Marshall-Cornwall，James，*Marshal Massena* 1965，p.259

[20]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pp.70-71

[21] SHD GR6.YD/1，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420，Macirone，Francis，*Interesting Facts Relating to the Fall and Death of Joachim Murat* 1817，pp.146-8

[22] Chandler，David，*On the Napoleonic Wars* 1994，p.112

[23] ed. Stiegler，Gaston，*Récits de guerre et de foyer* 1894，p.307

[24]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116-17

[25]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18

[2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s.21813，21948 pp.102，214

[27] Mudford，William，*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817，p.193

[2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61 p.66

[2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876 p.162

[30]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73

[31] Charvet，P.E.，*A Literary History of France* vol.Ⅳ 1967，p.57

[32]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72

[33] 奥地利人监禁了拉斐特五年，1797年，拿破仑设法释放了他，但感激之刻早就过了。

[34] Beslay，Charles，*Mes souvenirs* 1873，p.50，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88，122-4，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p.88，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s.21743 and 21753 pp.51，60

[3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er*，1858，28 no.21769 p.76

[3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60

[37]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26

[3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713 p.29

[39]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87

[40] 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p.226

[41]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8

[42]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8

[43] Bluche，Frédéric，*Le plébiscite des cent jours*（Geneva）1974，p.36 n.109，ed. Fontana，Biancamaria，*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 1988，pp.11-13，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p.199

[44]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7，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p.29

[45]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50

[46] Emsley，Clive，*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p.116，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p.258

[47]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p.284

[48]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225

[49]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189

[50]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1896，Ⅱ p.420

[51] 拿破仑很可能指科德鲁斯国王（King Codrus）。公元前1086年，特尔斐神谕（Delphic Oracle）预言到，只有雅典国王安然无恙，多利安人才会成功入侵。科德鲁斯遂唆使多利安人杀害自己。

[52] BNF Micr D.71/86，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997

P.246

[53] *Le Moniteur* 2/6/1815

[54]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p.190-94，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60

[55]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66

[5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30 p.265

[57]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30 p.265

[58] Thornton，Michael，*Napoleon after Waterloo*（Stanford，CA）1968，p.56

[59]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733 P.44

[60]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p.45-6

[61]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52 p.281

[62] Davies，Huw，*Wellington's Wars* 2011，p.226

[6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1999 p.249

[64] Houssaye，Henry，*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Ⅲ p.48

[65]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p.1040

[66] Muir，Rory，*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p.147

[67] 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p.227

[68]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29

[69]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88

[70]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127

[71]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182

[72]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17

[73]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31

[7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9

[75]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50

[76]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28

[77] Fantin des Odoards，Louis-Florimond，*Journal de Général Fantin des Odoards 1800-1830* 1895，p.431

[78]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21，*Quarterly Review* July 1875 p.225，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8

[79]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no.15797 p.862

[80] Adkin，Mark，*The Waterloo Companion* 2001，p.79

[81]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23

[82] Pétiet，Général Baron Auguste，*Souvenirs militair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1844，pp.195-6

[83]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5

[84]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0

[85] 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Ⅰ p.140

[86] Germain，Pierre，*Drouët d'Erlon* 1985，pp.175-6，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32，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96

[87]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p.96-7

[88]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17

[89]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p.96-7，ed. Maricourt，Baron André，*Mémoires du Général Noguès* 1922，p.270

[90]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33，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183

[91]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p.113

[92] Mauduit，Hippolyte de，*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2 vols.1847-48，Ⅱ p.231

[9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3

[94] 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后马上解散军中的气球侦察部队（aérostatier），事实证明这是个灾难性决策。如果他在滑铁卢用气球侦察，他能提前三个多小时发现普军来了。Chandler ed.，*Military Maxims*，pp.19-20.

[95]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37 n.18

[96] SHD GR15/C5/18 June 1815

[97] 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p.228，Houssaye，Henry，*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Ⅲ pp.244ff

[98] ed. Girod de l'Ain，Maurice，*Vie militaire du Général Foy* 1900，pp.278-9

[99] 今哈勒（Halle）。——译者注

[100]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Philadelphia）1911，p.183

[101]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222

[102] Adkin，Mark，*The Waterloo Companion* 2001，p.79

[103]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p.236 n.148，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p.21，*Quarterly Review* July 1875 p.225

[104] SHD GR15/C5/18 June 1815，Houssaye，Henry，*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Ⅲ pp.191-2，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p.230

[105]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p.43

[106] SHD GR15/C5/18 June 1815

[107] 今作"Buçaco"。——译者注

[108]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340

[109] 战后，人们在威灵顿的战线上修筑了高141英尺的假山铁狮山（Lion Mound），所以今人几乎看不出阵线轮廓。

[110] Bonaparte，Jérộme，*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du Roi Jérome et de la Reine Catherine* vol.Ⅶ 1866，Ⅶ p.95，Boudon，Jacques-Olivier，*Le roi Jérộme* 2008，p.442

[111] ed. Levi，*Mémoires du Capitaine Duthilt* pp.391ff

[112] 埃尔隆之所以如此决策，可能是因为奈伊、埃尔隆、师长皮埃尔·德·比内·德·马尔科涅（Pierre de Binet de Marcognet）将军都在西班牙打过仗，他们知道，法军试图展开成横队时，英军便会集中火力攻击其侧翼，其常常能成功阻止变队。然而，让部队排成宽战线后，指挥很快就会失效，因为士兵离军官和军士太远了。Interview with John Lee，June 21，2013.

[113]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p.187

[114] Linck，Tony，*Napoleon's Generals*：*The Waterloo Campaign* 1993，p.62

[115] Davies，Huw，*Wellington's Wars* 2011，p.239

[116] Roberts，Andrew，*Waterloo* 2011，pp.126-8

[117]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6

[118]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p.126，129

[119]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29

[120]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9

[121] 后人推演滑铁卢会战时，法军经常取胜。扮演拿破仑者早早进攻，最多用一个师掩蔽乌古蒙，并派雷耶军剩余兵力支援埃尔隆的历史性进攻。埃尔隆军组成纵队，洛鲍军的两个师与其相伴，骑兵预备军提供密切援助。奈伊率骑兵冲锋时，步兵和炮兵支援他。早在普军到来之前，奈伊就冲垮了威灵顿的方阵。

[122]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pp.96-8

[123] ed. Brett-James，Antony，*The Hundred Days* 1964，p.139

[124] Ropes，John，*The Campaign of Waterloo* （New York）1892，p.337

[125] Levasseur，Octave，*Souvenirs militaires* 1914，pp.303-4

[126] Fuller，J.F.C.，*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70，p.204

[127]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184

[128] 此地位于今维克托·雨果纪念碑（Victor Hugo monument）的正南方，与纪念碑同处道路一侧，其后拐弯处通往普朗斯努瓦。

[129] Smith，G.C.Moore，‘General Petit’s Account of the Waterloo Campaig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8 no.70 1903

[130] 普军少校冯·凯勒（von Keller）缴获了马车，他在车里找到拿破仑的帽子和佩剑，还发现一对手枪、一顶绿色天鹅绒帽子、一张铺着美利奴羊毛垫的钢床架、一副钻石冕、一件御用斗篷、好几盒钻石、一个银制大钟。今人可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看到马车及车内的很多物品。

[131]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131

[132]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 （Philadelphia）1911，pp.184-5

[133]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539

[1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87，Lancesseur，Pierre de，*L’Enigme de Waterloo* 2012，p.146

第三十一章 圣赫勒拿

灵魂耗尽了肉体。

——拿破仑致玛丽·路易丝

他客居波斯平原中部，永远怀念故国。

——拿破仑论地米斯托克利

战后，拿破仑致信约瑟夫：

> 我们并未一败涂地。我估计，军队重新集结后尚有15万人，联盟派和国民自卫军可提供10万人（他们中适合战斗的人），团级兵站还能再出5万人。所以说，我可以投入30万名整装待发者对付敌人。我要用马车挽马拉炮。我会征募10万人，并收缴保王党与国民自卫军中不适合服役者的滑膛枪，从而武装他们。我将组织普遍征兵……碾压敌人，但人民必须帮助我，而非大声提建议，吵得我什么也听不见……奥军行军慢，普军害怕农民，不敢太上前。仍有时间挽救形势。[1]

拿破仑认为，如果他成功聚集格鲁希（格鲁希军脱身了，且毫发无损）、拉普、布吕内、絮歇、勒古布麾下所有兵力，并可攻击拉长的联军补给线，边境大要塞守军也坚守至解围，那么他或能赢得喘息机会。[2] 经历了滑铁卢会战那样的溃败后，他还能认真思考这些事务，别的姑且不论，这说明他拥有非凡的意志力与持久的精力。苏尔特命令全体指挥官集中掉队者，去拉昂、拉费尔（La Fère）、马尔勒（Marle）、圣康坦（Saint-Quentin）、贝泰勒（Bethel）、韦尔维耶（Vervier）、苏瓦松、兰斯集结，未受损的各部队正驻守上述地区。[3] 与此同时，热罗姆和莫朗也在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与阿韦讷召集了部分军队。

拿破仑知道，为了战斗，他需要在波旁宫（Palais Bourbon）开会的议院支持自己，所以他迅速骑马赶往巴黎，甚至乘邮车，以图领先战败的消息一步。皇帝一行途经罗克鲁瓦（Rocroi），在当地旅馆吃晚饭，

老板不接征收单，非要他们付300法郎现金。如果说拿破仑的权威衰退了，这无疑是征兆之一。[4] 6月21日（周三）早上7点，拿破仑到达爱丽舍宫，他召集家人和大臣，并且泡澡，他已经好几天没洗过澡了。埃及战局和莫斯科会战后，拿破仑也曾径直奔回巴黎，但这一次，他的回归显得有些绝望。就连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也发现，自己的英雄“急躁慌张，完全无法为他开脱”。他迅速返回，却只鼓励了敌人，尽管两个多星期前，他们还在五月广场仪式上庄重宣誓忠于他。[5]

6月18日，巴黎的101门加农炮轰鸣，宣告利尼胜绩。官方称，法军在利尼击败了威灵顿和布吕歇尔，但此后一直没有公报，于是巴黎人开始担心。拿破仑打算一回来就“带着战场尘埃”（一位支持者的说法）去波旁宫，呼吁立法机关爱国。[6] 康巴塞雷斯、卡诺、马雷匆匆应召而来，他们都支持此念，庭院中，他的马车也准备好了。可是大部分大臣认为，考虑到议员情绪狂热，去见他们太危险了。[7] 于是皇帝没去议院，而是送去一封信，声称自己已返回巴黎，“与我的大臣们商谈拯救国民的措施”。[8] 他日后悔恨没有亲自去：“我可以打动他们、领导他们，我的口才能鼓舞他们。我会砍掉郎瑞奈、拉斐特和另外十个人的脑袋……我得说，我不敢去。”[9]

拿破仑也没获得支持。拉斐特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在上下两院中各挑五人行使大臣权责，此举实际上是议会政变。[10] 勒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和吕西安力图阻止议员这样做，但拉斐特谴责拿破仑时能言善辩，令人信服。吕西安指责拉斐特背叛，他回答：“我们跟着你哥哥去了埃及沙漠，去了俄国荒原。法国人的尸骨散落各地，见证了我们的忠诚。”[11] 当日，部队开始进入首都，士兵没有武器，情绪低迷，他们“一边走，一边逢人就说一切都完了”。[12]

6月21日，拿破仑撰写公报，辩称滑铁卢会战就要赢了，这时，“邪恶的罪人”（malveillants）喊道，“谁来救救我们”，所以“一瞬间后，全

军只剩一片混乱”。公报结尾写道：“这就是圣让山会战的问题，它为法军赢来荣誉，但如此致命。”[13] 少数人相信他，但他三次使用词语“致命”（funeste），巴黎人便确信这是一场灾难，眼下，这对他保住君位的机会来说也是致命的。当晚，拿破仑可能又想服毒。1818年，皇帝的药剂师卡代·德·加西古告诉蒂埃博将军，1815年6月21日，他奉召来爱丽舍宫。原来拿破仑像上年一样服毒了，但接着又改变主意。加西古吓坏了，设法给他催吐，然后开了一些药液。[14] 虽然没有其他证言，但加西古很可能说了实话。

次日中午，就连最忠实的大臣——拉瓦莱特、萨瓦里、科兰古——也主张道，退位不可避免，于是拿破仑再度逊位。“如同他在战场上行使特有组织力时常做的那样，他迅速下定决心”，口述一份文件。[15] 此文开头写道：

> 法兰西人民！凭借集中起来的一切努力与意愿，凭借所有国家机关的支持，我发动了旨在维持国家独立的战争。我有理由期盼胜利，凡是反对我的盟国宣言，我一概勇敢面对。情况看来有变。我牺牲自己来弭平法国之敌的仇恨……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我宣布我的儿子继承法兰西皇位，并使用帝号拿破仑二世。现任大臣将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我传给儿子的利益驱使我邀请议院立刻依法建立摄政制度。为了拯救公众、维持国家独立，必须团结一切。[16]

拿破仑仍然盼望立法机关任命他为法军总司令，派他对付进犯的联军，但他也对拉瓦莱特说，要是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不需要自己效力，他就想去美国当一个安静的平民。[17] 美英战争打了三年，两国刚刚媾和，所以说，如果他能去美国，美国政府八成会允许他在本国隐居。据拉瓦莱特记载，拿破仑退位后，“那一整天，他一直保持冷静。他建议军队去某些位置，也提出未来与敌议和（时）采用何种方式”。[18]

临时政府感激地接受退位声明，并做出如下人事安排：麦克唐纳就任法军总司令；拉斐特出任国民自卫军司令，乌迪诺任其副司令；卡诺获准保留旧职，继续担任内政部长。6月24日，富歇成为临时政府主

席。塔列朗四任外交部长。[19]《帝国日报》（*Journal de l'Empire*）宣布，“拿破仑·波拿巴”已去马尔迈松。如果波拿巴派首要报纸都不用帝号，那么他肯定确已告败，因此，称呼的改变令民众大为震动。然而，有些人赤胆忠心，仍然坚持战斗。滑铁卢会战过去八天后，莱茵军团上校保罗-亚历克西斯·德·梅尼（Paul-Alexis de Menil）男爵率第37战列步兵团在塞尔茨森林（Seltz Forest）作战。直到8月和9月，吉韦、沙勒蒙（Charlemont）、隆维（Longwy）、梅济耶尔、沙勒维尔（Charleville）、蒙梅迪（Montmédy）等城镇才投降。

这是拿破仑最后一次离开巴黎。临行前夕，他和维旺·德农告别，对方不安又激动。他把手放在德农的肩膀上，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多愁善感，在这种危机中，人要冷静（sang froid）行事。”[20]德农记述埃及和埃及战局，设计铜制纪念章，鼓励帝国艺术风格，并管理卢浮宫，他对波拿巴主义中文化层面的贡献仅次于拿破仑本人。拿破仑倒台后，军队之外的很多杰出人士都感到遗憾，德农是其中之一。

换一个没那么自信的人，逃跑路线或许就规划好了。6月25日，拿破仑携奥尔唐斯、贝特朗、马雷从巴黎去马尔迈松，7月15日，他向英军投降。在6月25日到7月15日之间，他完全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联军和波旁王室正接近巴黎，准备再度复辟波旁王朝，普军派骑兵巡逻队去更远处，于是拿破仑的选择余地开始变窄。他待在马尔迈松，向临时政府申请去美国的通行证，并请求政府拨两艘巡航舰，从罗什福尔送他去美国。[21]此举荒唐可笑。皇家海军74炮军舰“柏勒洛丰号”（Bellerophon）正封锁罗什福尔港，不管是富歇的政府还是谁给他签发通行证，皇家海军都会统统不认。[22]6月26日，拿破仑在马尔迈松接见瓦莱夫斯卡，与她道别。

29日，富歇的特使德克雷与布莱·德·拉默尔特告诉拿破仑，政府把“萨勒号”（Saale）与“美杜莎号”（Méduse）这两艘巡航舰拨给他使

用，而且普军正在接近，所以他需要离开马尔迈松。他去了约瑟芬过世时住的房间，最后一次同母亲和奥尔唐斯告别，除此以外，他再未逗留。下午5点30分，他和贝特朗、萨瓦里离开马尔迈松。拿破仑的首席厨师费迪南（Ferdinand）决定不走，因为他去厄尔巴岛后没拿到说好的报酬。“要是我去了美国，”拿破仑后来沉思道，“或许我们能建立一个国家。”[23] 7月2日，他到达德塞夫勒省（Deux-Sèvres）的尼奥尔，但他还没打定主意。同行者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他应当去奥尔良找军队，也有人提出，一艘美国商船停泊在海岸线外8英里处，他应该设法偷渡上船。[24]

拿破仑不但没有听取建议，反而住进罗什福尔海军军区司令部。他在那待了十二天，研究如何让“萨勒号”、“美杜莎号”、一艘20炮轻型巡航舰以及一艘双桅船躲过“柏勒洛丰号”。“美杜莎号”上的海军上校菲利贝尔（Philibert）不肯参与任何进攻，两名年轻的海军军官——让蒂（Genty）上尉与多雷（Doret）少尉——便毛遂自荐，提议用小帆船送拿破仑横渡大西洋。让蒂和多雷违规了，结果被法国海军部除名，直到19世纪30年代波旁王朝垮台，他们才返回军队。[25]

7月5日，约瑟夫到达罗什福尔。他慷慨地提出和弟弟换身份，因为他们相貌相仿。[26] 拿破仑没有抓住时机，又犹豫了。三天后，波旁王朝正式重掌权力，于是他失去了巡航舰的控制权。此时，海军将领亨利·霍瑟姆（Henry Hotham）爵士已派莱萨布勒（Les Sables）的皇家海军舰艇去吉伦特（Gironde）搜寻他。拿破仑也拒绝了数个别的冒险机会，如趁夜乘一艘丹麦船脱身。9日，他在艾克斯岛（Île d’Aix）检阅部队，当地民众向他欢呼，但他睡在“萨勒号”上，该船停在“柏勒洛丰号”附近。

按照拿破仑的命令，7月10日，萨瓦里和侍从拉斯卡斯侯爵登上“柏勒洛丰号”，同船上的38岁海军上校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k

Maitland）商议他的投降条款。拿破仑得躲开波旁势力（7月12日，罗什福尔升起波旁旗帜）和普军，因为他们会处决他。他后来说："知道了奥皇对付自己的方式后，他根本无法接受其好意。"[27] 7月14日，协商重启，谈判人为拉斯卡斯与夏尔·拉勒芒（Charles Lallemand）将军，后者曾在滑铁卢会战中指挥猎骑兵。梅特兰声称，拿破仑将在英格兰享受良好待遇，当地天气比他想的更好。[28] 拿破仑以为这意味着他是英国的客人，将受该国庇护，不会沦为战俘。然而，这个海军军官无权缔结正式协议，如此解释他随口说出的话堪称荒唐。事实上，梅特兰言明他仅仅有权保证拿破仑安全抵达英国水域。[29] 甚至在此时，拿破仑仍可采纳约瑟夫的建议，走陆路去更偏南的港口，等他到吉伦特后，事情或许仍有转机。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在6月13日同哥哥告别。拿破仑曾从科西嘉、埃及、厄尔巴起航，但比起这类冒险的航行，如今他更喜欢尊严和一定程度的安全。

14日午夜左右，拿破仑致信摄政王。"王子殿下，"信件开头写道，"我暴露在分裂我国的党派和欧洲诸国的敌意前，已然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并像地米斯托克利一样来到英国人民身边。我愿意接受英国法律的保护，请求殿下您给予我这一权利，您是我最强大、最恒定、最慷慨的敌人。"[30] 这一回，拿破仑所受的古典教育失效了，因为雅典名将地米斯托克利实际上和波斯人一同对付他的雅典同胞，但拿破仑根本没有这类念头。不过，用"恒定"评价英国倒是没错。光是1815年，英国就资助了至少30个欧洲国家，上至最大国度（普鲁士得210万英镑，俄国得200万英镑，奥地利得160万英镑），下至西西里（该国得33333英镑）。[31] 奥法之战、普法之战、俄法之战分别长达108个月、58个月、55个月，但在1793～1815年，英法之战总计长达242个月。二十年来，皇家海军封锁法国，在特拉法尔加葬送法军作战舰队。1808～1814年，英军征战伊比利亚半岛，这六年中，威灵顿不曾离开一天。英军还发动1801年埃及远征、1806年卡拉布里亚远征（英军赢得马伊达之战）、1807年哥本哈根远征、1809年瓦尔赫伦远征（一次灾难性的远征）、

1814年贝亨奥普佐姆（Bergen op Zoom）远征（该地位于荷兰，这次远征也失败了）。蒂尔西特会议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除了葡萄牙和西西里）都和拿破仑达成妥协，即便如此，英国仍然保留反抗其霸权的火焰。

拿破仑召集顾问开会，说：“我不认识摄政王，但根据我对他的所闻，我便不禁仰赖他的高尚人格。”[32] 这回拿破仑的信息也是错误的，因为摄政王是所有英国君主中最卑鄙的人之一。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泰晤士报》如此报道：“已故国王是同胞们最不愿惋惜的死者。谁会为他流泪？哪颗没被金钱收买的心脏会悲伤地搏动？……假如说国王曾有朋友、来自任何阶层的忠实朋友，我们就要反驳，因为我们从未听说他或她的名字。”[33] 摄政王只会宽待其裁缝、装饰设计师、情妇，恳求的皇帝拿不出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没收到任何回信。吕西安曾在伍斯特郡过着文雅的软禁生活，拿破仑可能盼着能像弟弟一样，抑或住进他在厄尔巴岛上接见的辉格党贵族的乡间住宅。

1815年7月15日（周六）早上8点，拿破仑登上“柏勒洛丰号”，向梅特兰上校投降。联络官贝克（Beker）将军负责他和临时政府的联系，于是他允许贝克不随行，以免任何人指控对方把他出卖给英国人，此乃得体之举。[34] 贴身男仆马尔尚回忆道，“每个人都流露出最深切的悲痛，英军快艇接皇帝上船时”，对岸的军官和水手中响起“最令人心碎的呼号‘皇帝万岁！’”，直到他抵达“柏勒洛丰号”。[35] 有人绝望地踩帽子。拿破仑登上“柏勒洛丰号”后，海军立正，水手操纵桅杆，但没有人向他鸣炮致敬，因为还要等好一阵子才到皇家海军条例规定的白日开炮时间。拿破仑一边脱帽，一边对梅特兰说了第一句话：“我登上你的船，将自己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36] 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终于结束了。

梅特兰把自己的舰长室让给拿破仑。他返回甲板后，上校带他参观

船只。拿破仑问梅特兰是否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走，但英军上校让他确信，“柏勒洛丰号”74炮战列舰抵得过三艘巡航舰，所以逃跑困难“重重”。[37] 两人在船上走动，拿破仑轻拍一位见习船员的头，友善地揪他耳朵，还向他询问水手长、船员、他自己的职责。另一位见习船员乔治·霍姆（George Home）说，拿破仑“看上去相当自在，他就像乘坐自己的御用游艇轻松旅行一样，完全把这里当家了”。[38] 他很快赢得船上所有人的心。一名军官写道：“他的牙齿很整齐，像象牙一样白，我从未在任何人脸上见到如此有魅力的嘴唇。”梅特兰自己也承认：

> 我替他惋惜，与此同时，或许我还遗憾地想，他拥有那么多迷人特质，享有如此非凡的地位，却沦落到我见他时的境地。一个英军军官竟偏爱给祖国带来那么多灾难的人，这种事看上去令人惊讶，但他非常擅长取悦他人，以至于像我一样和他同桌共处近一个月的人大都怀着这种惋惜与遗憾。[39]

在前往英国的航程中，拿破仑“没有消沉低落”，他享受了对待国家元首的正式尊贵待遇。他投降后没多久，霍瑟姆（Hotham）将军上船。拿破仑给梅特兰和霍瑟姆看其流动图书馆以及宽30英寸的行军床。他用磕磕巴巴、别人几乎听不懂的英语问了许多问题，并且说，如果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还活着，“事情绝不会到如此地步”。[40] 在次日晚餐时，他拍了拍梅特兰的头，说：“要不是你们英国佬，我就成了东方皇帝；但只要有一片水域能行船，你们一定会去那挡我们的道。”[41]

对英国来说，如何处置战俘是个棘手的问题。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后建立百日王朝，结果各方死伤总人数几乎达到10万人。不能再冒此景重现的风险了。[42] 7月20日，利物浦勋爵致信身在维也纳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告知对方英国内阁的意见：

> 我们的想法十分坚决，不会答应把他囚禁在我们的国家。他可能引发非常好的法律意见，那将特别尴尬……他能立刻诱发好奇心，接下来几个月，或许他还会招来同情。只要他在英国，确切地说，只要他在欧洲的任何角落，他就会促使法国保持一定程度的骚乱……在这

个世界上，圣赫勒拿岛最能算得上为此人打造的监狱……当地状态格外良好，只有一处……可容船舰抛锚，我们也能排除一切中立国船只……待在离欧洲那么远的那种地方，人根本没法搞阴谋。在他严重脱离欧洲世界之后，人们也会马上忘了他。[43]

拿破仑在军政生涯中说过一些过于乐观的话，但其敌人亦然。

7月23日，拿破仑最后一次见到法国，他“多次忧郁地”看着“海岸线”，但几乎没说什么。[44] 次日，“柏勒洛丰号”停在英国南部海岸的托贝（Torbay），游客们立刻按捺不住“对他的好奇心”，有人甚至从格拉斯哥（Glasgow）那么远的地方赶来，只为瞅他一眼。事实上，“柏勒洛丰号”被迫派其小船环绕自己，阻止游人过来。拿破仑走上甲板，在跳板上与钢窗边露面，从而取悦公众，还说托贝令他想起费拉约港。梅特兰指出，拿破仑“只要看到衣着考究的女人，就会向她们脱帽鞠躬”。[45]

27日在普利茅斯（Plymouth），拿破仑享受的名人待遇甚至更胜一筹。三天后，梅特兰估计，多达1000艘游船围着“柏勒洛丰号”，平均每艘船载客8人。与此同时，拿破仑“常常在沙发上睡着，这两三年间，他变得非常懒散了”。梅特兰和他的交情只有十二天，所以这是句奇怪的评价。[46] 然而，7月31日那天，宜人的过渡状态结束了。当日，海军将领基思勋爵以及战争次长亨利·邦伯里（Henry Bunbury）爵士登上“柏勒洛丰号”。他们称呼拿破仑为“波拿巴将军”，并且告诉他，他命中注定要去圣赫勒拿岛。就这一点而言，之前他阅读英国报纸时已获知警告。基思和邦伯里还说，他能带3个军官、12个家仆，但不能带走萨瓦里和拉勒芒将军。萨瓦里和拉勒芒将去马耳他岛服刑，因为前者谋杀昂吉安公爵，后者背叛波旁王朝。

拿破仑答复基思（他的话或是高卢式宏大气魄，或是荒唐做作，视读者诸君心意而定），声称“自己宁愿血染‘柏勒洛丰号’甲板”也不去圣赫勒拿岛，英国政府的决策“将给未来的英国历史蒙上一层阴云”。[47] 他补充道，圣赫勒拿岛的气候会让他在三个月内丧生。基思和邦伯里走

后，拿破仑对梅特兰说：“这比帖木儿的铁笼子还糟。我情愿落入波旁王朝手中。除了其他羞辱……他们还叫我将军，真不如叫我大主教。”[48] 一些随员脑子更发热，他们赞同他的看法，认为死在圣赫勒拿岛上“非常可耻！”，“不如为保卫自己而死，或是点燃弹药库”。贝特朗的英籍妻子范妮（Fanny）歇斯底里，忧郁消沉，当晚，她试图跳下舷窗。蒙托隆将军在窗边拽回范妮，阻止了她投海自沉。[49]

拿破仑又给摄政王寄去一封信，抗议道：“我不是战俘，我是英国的客人。”尽管如此，8月7日左右，他转到80炮皇家海军军舰“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上，乘坐这艘船前往4400英里之外的圣赫勒拿岛，其舰长是海军少将乔治·科伯恩（George Cockburn，上一年，此人和其他指挥官一道烧毁了华盛顿）。[50] 拿破仑的随员有26人，他们愿意追随他去地球另一端。另有不少人申请陪他去，如妹妹波利娜和梅纳瓦尔，但英国政府不允许。随员如下：亨利·贝特朗将军，他那明显不情愿的妻子，他们的3个孩子；蒙托隆，他的漂亮妻子阿尔比娜，他们的3岁儿子特里斯坦（Tristan）；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侯爵（他谙熟文秘技能，能讲一口流利英语，不过他假装说不好英文）及其子（13岁）；加斯帕尔·古尔戈将军；贴身男仆马尔尚与诺韦拉（Noverraz）；贴身男仆/警卫“马穆鲁克阿里”；马夫兼车夫阿尔尚博（Archambault）兄弟，两人分别叫阿希尔（Achille）与约瑟夫（Joseph）；脚夫真蒂利尼（Gentilini）；御膳总管弗兰切斯基·奇普里亚尼（Franceschi Cipriani）；司酒官兼糕点师皮埃龙（Piéron）；厨师勒帕日（Le Page）；科西嘉籍门房兼理发师圣蒂尼（Santini）；灯夫兼玩具制作人鲁索（Rousseau）。蒙托隆和贝特朗也带了4个仆人。[51] 拿破仑的医生路易·曼戈（Louis Maingault）不肯同去，于是“柏勒洛丰号”的军医、爱尔兰人巴里·奥马拉替他去。除了拿破仑，所有人的佩剑都被收走。科伯恩还没收了4000枚金拿破仑，他留给他们的钱只比玩牌用的零花钱多一点。[52] （不管怎么说，有8个随员的藏钱腰带没被发现。他们一共藏匿了25万法郎，在圣赫勒拿岛上，这笔钱相当于5000英

镑。[53] ）

在“诺森伯兰号”上的第一夜，前皇帝和船上英军军官玩21点，输了七八枚拿破仑。正如某人回忆时所言，他“心情非常好，和所有人聊天”，“晚餐时，他大吃大喝，几乎尝了每一道菜。他称赞一切，看起来非常安于他的命运”。[54] 虽然拿破仑捞不到任何好处，但在十周的航程中，他至少在晕船不“厉害”时彰显了魅力：他询问驻印度英军的状态和特性，断言自己一直盼着格鲁希来滑铁卢；他宣称沙皇亚历山大“比欧洲其他君主更活跃、更聪明，但此人极其虚伪”；他声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815年私下承诺不与他交战；他向船上牧师询问英国国教；8月23日，军舰驶过马德拉岛（Madeira），他便问英国驻马德拉总领事该岛的出产、海拔与人口。此外，拿破仑谈论夺取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的计划，预言贝纳多特在瑞典待不下去，管德塞叫“他所知的最好将军”。他还否认曾与女演员圣奥班（Saint-Aubin）风流：“和最漂亮的女人做爱最难。”[55]

航程中，拿破仑的日程安排大都如下。上午10～11点，他起床，在卧室吃早餐（肉和葡萄酒），然后一直待在那儿。下午3点，他穿好衣服，在甲板上走短短一段路，接着和蒙托隆下棋（蒙托隆一般故意下输），直到5点时晚饭开动。据科伯恩记载，晚餐桌上，拿破仑“大快朵颐，很少说话。他喜欢精加工过的各种肉类，从来不碰蔬菜”。[56] 饭后，他和科伯恩在甲板上走九十分钟。晚上8～10点，他玩牌，随后就寝。拿破仑上英语课，抱怨天热，在甲板上冒雨散步，而且长胖了。他也同古尔戈解数学题，开平方根和立方根。8月15日，他提到先前的生日，“噢，多么不同啊！”直到晚上11点30分，他才上床休息。[57] 同日，玛丽·路易丝致信弗朗茨皇帝，谈论自己的丈夫：

> 我希望他得到友善宽厚的待遇，亲爱的爸爸，我恳求您确保这一点……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他的命运操劳。他没有让我不高兴，而是让我的生活变得淡漠冷静（ruhige Indifferenz），我欠他的情。[58]

拿破仑想看特内里费岛（Tenerife）的山峰，科伯恩乐于助人，遂修改航线，驶过加那利群岛（Canarias）的戈梅拉岛（Gomera）和拉帕尔马岛（La Palma）之间。9月23日，“诺森伯兰号”穿过赤道，前皇帝下令将100枚拿破仑扔出船舷外，把它们送给海神涅普顿。贝特朗认为扔得太多，科伯恩则说，他觉得涅普顿拿到5枚就高兴了。[59] 下一周，拿破仑谈到滑铁卢会战时道，“啊，要能再来一遍就好了！”此后五年，他常常会说“再来一遍”。

10月14日（周六），拿破仑一行的目的地终于映入眼帘。火山岩小岛圣赫勒拿岛仅仅占地85平方英里，其周长只有28英里。圣赫勒拿距安哥拉（Angola）1150英里，距巴西2000多英里，距最近的陆地阿森松岛（Ascension Island）也有700英里，它号称“最远离世上一切地方之地”。[60] 17世纪中期至1834年，大英帝国把这块位置极偏远、名声极暗淡的微小领土当作补水站，供来往印度的船只使用。1815年，圣赫勒拿岛上有3395名欧洲人、218名黑奴、489名中国人、116名马来人。[61] 圣赫勒拿岛管理者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支付监禁拿破仑的费用。

若走水路去圣赫勒拿岛上的唯一城镇詹姆斯敦（Jamestown），便可看到一幅壮观画面：600英尺高的黑色悬崖在小港口两侧陡然升起，令人望而生畏。10月15日，拿破仑靠着马尔尚的肩头，透过他在奥斯特利茨所用的望远镜观察小岛。“这个地方无趣，”他说，“我情愿留在埃及。”[62] 两艘皇家海军巡航舰一直在圣赫勒拿岛巡逻，岛上亦有很多彼此联络的信号站，只要任何方向有船来，信号站都能发现它。所以，拿破仑一定知道，他会葬身于此。

10月17日，圣赫勒拿岛盛行的东南风猛烈地刮过。拿破仑下船，他被带往亡林高原（Deadwood Plateau）上的长林（Longwood），在那稍事停留。长林已经布置好了，可供他居住。[63] 这座房子原是小岛总督

的住宅，但它高出海平面1500英尺，导致它在和煦的热带小岛上自成与众不同的小气候区，所以一年之中，总督只在长林住三个月。圣赫勒拿岛上的英军军官言之凿凿，称小岛“或许”拥有“世上最温和、最有益健康”的气候。1805年，威灵顿从印度回国时途经圣赫勒拿岛，他写道：“据我生平所见，当地气候显然最有利于健康。”[64] 可是这些访客大都待在詹姆斯敦城中或其周边地区。相形之下，每年有300多天，长林云遮雾罩。[65] 当地湿度一般是74%，但非常容易达到100%。因此，所有东西虽湿得不严重，但一直不干，就连墙纸也不例外。树木被风压弯，全长了苔藓。拿破仑的扑克牌得在烤炉里加热，以防它们粘在一起。

长林也闹白蚁、老鼠、蠓虫、蚊子和蟑螂。今天，前句列出的最后三害仍在该地肆虐（尽管长林住客、法国名誉领事米歇尔·当夸纳-马蒂诺精心地修复并维护住宅）。夏季，即9月至次年2月，长林气候一直湿冷，这意味着拿破仑与其随员总是患上支气管炎、黏膜炎、咽喉炎。然而，除了3英里外的总督府，只有长林又大又偏僻，足以安置前皇帝及其廷臣与仆役班子，而且高原上的长林引人注目，因此附近的亡林营房看守它时更方便。长林旗语通信站向总督汇报拿破仑在做什么，所报事项有六种，上至“波拿巴将军一切安好”，下至“波拿巴将军不见了”。[66]

人们花了七周时间翻新并扩建长林，在此期间，拿破仑住进比长林更靠近詹姆斯敦的漂亮平房荆园（The Briars）。他和东印度公司总经理威廉·巴尔科姆（William Balcombe）一家共处，分到一个房间与花园里的一座阁楼。[67] 荆园的七周成了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最快乐时光，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巴尔科姆之女贝琪建立了纯洁又迷人、令人不可思议的友谊。巴尔科姆家有4个孩子存活下来，贝琪在他们中排行第二，她现年14岁，生气勃勃。她说法语时可能不讲究语法，但别人能听懂，而拿破仑像长辈一样宠爱她。贝琪说，一开始，她所受教导告诉她，拿破仑是“巨大的食人魔或巨人，他的额头中心长了一只燃烧的大

眼睛，他用嘴里伸出的长长獠牙把小女孩咬成碎片，然后吞噬她们”[68]，但她立马就喜欢上他了。“画布无法表现拿破仑的微笑和眼神，这些是他的首要魅力，”她后来写道，“他的深棕色头发像小孩的发丝一样柔顺丝滑。事实上，他的头发对男人来说太顺滑了，因为它非常软，以至于显得稀薄。”[69]

拿破仑拿欧洲各国首都考贝琪，两人的友谊随之开始。他问俄国首都是哪座城市，她回答：“现在是圣彼得堡，以前是莫斯科。”于是“他突然转身，其锐利目光全盯着我的脸，然后他严厉地问，‘谁烧了莫斯科？’”。她吓得目瞪口呆，直到他忍俊不禁：“是是是。你非常清楚是我烧的！”少女纠正他：“先生，我想是俄国人烧的，他们要赶走法国人。”[70] 拿破仑大笑，于是他和“贝琪小姐”（Mademoiselle Betsee[71]）、“小猴子”（lettle monkee[72]）、“娃儿”（bambina）、“小迷糊”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唱歌，并且一边哼着跑调的“亨利四世万岁”（Vive Henri Quatre）一边在房间里齐步走。“我从没见过谁比拿破仑更能忍耐小鬼的肆意胡闹，”贝琪回忆道，“每逢开心事或快乐事，他似乎都像小孩一样高兴。我经常严重挑战他的耐性，但我从未见他失态，也从未见他变回他那地位或年纪的样儿。”[73]

拿破仑和巴尔科姆一家同住，他下棋、打桌球、玩惠斯特牌（和贝琪玩，赌注是水果糖）、“抢位置”（儿童游戏）、捉迷藏、打手枪、传播岛上闲言。很多时候，他泡热水澡，看云朵从长林飘落，在日落后“听成千上万只蟋蟀鸣叫”，还驾着他的爱尔兰旅游马车疾驰在为数不多但险峻陡峭的小岛公路上。拿破仑卸下职责，充分享受轻松生活，几近返老还童。贝琪的弟弟亚历山大（Alexander）叫他波尼（Boney，意为“瘦骨嶙峋”），这是英国人给他起的绰号，但他不懂他们在影射什么，特别是拉斯卡斯解释了绰号的字面意义后。拿破仑指出：“我一点也不瘦。”这一点已然再明显不过。[74]

拿破仑告诉贝琪，玛丽·路易丝“和蔼可亲，是出色的贤妻”。他还说，“如果她获准随他来圣赫勒拿岛，她会来”，此言不像前句那么可信。他还称赞波利娜、乔治小姐、阿尔比娜·德·蒙托隆（Albine de Montholon）的美貌。贝琪称，阿尔比娜“身材高挑优雅，故而为人称道”。在去圣赫勒拿岛途中，阿尔比娜怀孕了，孩子受洗时得名拿破仑-玛丽-埃莱娜（Napoléone-Marie-Hélène），但其生父据信不是拿破仑。然而，阿尔比娜后来成了拿破仑的最后一个情妇。[75] 贝特朗夫人、古尔戈等人都如此认为，因为她的房间在他的食品储藏室对面。事实上，贝特朗夫人嫉妒阿尔比娜，哪怕她自己曾拒绝了拿破仑的勾引。[76] 阿尔比娜看起来非常理解拿破仑。“他的火焰需要燃料，耗尽了他和他身边的人。”她日后写道。1818年1月26日，阿尔比娜又诞下一女约瑟芬-拿破仑（Joséphine-Napoléone），她很可能是拿破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私生孩子。可是阿尔比娜返回欧洲后，1819年9月30日，约瑟芬-拿破仑在布鲁塞尔佳景庄（Hôtel Belle-Vue）夭折。［阿尔比娜之所以离开，要么是出于她所谓的“健康原因”，要么是因为她想逃离圣赫勒拿岛，以便继续和巴兹尔·杰克逊（Basil Jackson）少校欢好。圣赫勒拿岛总督副官杰克逊曾是滑铁卢的老兵。阿尔比娜离岛后过了一周，杰克逊跟着她去了布鲁塞尔。］[77]

一些当代作者认为，这种三角关系（ménage-à-trois，如果算上杰克逊，也能说是四角）意味着蒙托隆恨拿破仑，但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在法国贵族界，这是常见的安排。拿破仑已经睡过马雷和国家参政迪沙泰尔两人的妻子、沙普塔尔的情妇、波利娜的侍读女郎，可见他的宫廷显然承认初夜权（droit de seigneur）理念。阿尔比娜回欧洲后，俯首帖耳的蒙托隆留在圣赫勒拿岛，终其一生，他都是首要的波拿巴分子。1840年，拿破仑的侄子政变未遂，蒙托隆也参与了此事，结果坐了七年牢。假如蒙托隆痛恨拿破仑，他很可能不会做出这些事。

1815年12月10日，拿破仑搬入长林，心情沉重。贝特朗住在附近的

哈特门（Hutt’s Gate），其房子是一座木屋。贝特朗告诉拿破仑，他的“新宫殿”准备好了，他回答：“别叫它我的宫殿，叫它我的坟墓。”[78]长林包括桌球室（因为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绿油漆，桌球室墙壁绿得刺眼，令人震惊）、客厅、餐厅、图书馆、仆役宿处以及蒙托隆一家的卧室。英国政府坚称，拿破仑只享有“退役将军”的地位，它害怕得罪波旁王朝，所以拿破仑绝不能被称为皇帝（哪怕乔治三世治下的前四十二年中，英国国王根据中世纪的权利，在头衔中正式写入“法兰西国王”）。[79] 于是英国人常常叫他先生、“阁下”或“波拿巴将军”。一份请柬送至长林，邀请“波拿巴将军”参加舞会，拿破仑俏皮地说：“把这张卡片送给收件人，我在金字塔和塔博尔山最后一次听人说起他。”[80]

战争大臣巴瑟斯特勋爵不准拿破仑看报纸，他的理由是保障国家安全，但消息仍然渗透进长林。[81] 拿破仑听闻约瑟夫成功逃脱抓捕，如今住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博登敦（Bordentown），于是“思索了一阵子”（他无疑在想，假如自己采纳替身策略会怎样），“然后说感到满意”。[82] 1815年8月19日，波旁王朝实施骇人暴行，枪决拉贝杜瓦耶将军。拿破仑哀悼拉贝杜瓦耶之死，但波旁王朝枪毙奈伊元帅之事传来后，他的反应却丢人现眼。拿破仑对古尔戈说：“奈伊应有此下场。他在战场上是无价的，所以我为他惋惜，但他太冲动、太愚蠢，除了打仗干不了别的事。”[83] 拿破仑后来说，1814年时奈伊在枫丹白露宫背叛了他，这些话解释了他的怒火。[84]

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在卡拉布里亚处决缪拉，起初，拿破仑的反应和他对奈伊的并无不同：“缪拉应有此下场。”不过前皇帝继续反思，说：“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让他一直当元帅，根本不该封他为贝格大公，更不用说那不勒斯国王。他昏了头。他野心包天。”[85] 为防别人认为此言虚伪，拿破仑补充道：“我一步步崛起，但缪拉想一步登天。”拉瓦莱特被关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Conciergerie prison），他将因叛国罪被处决，其妻（此前，拿破仑认为她是个“小傻瓜”）却和他调包，让

他穿她的衣服逃走。拉瓦莱特脱身一事轰动巴黎，拿破仑听闻后心生敬佩。[86]（向来“宽大”的波旁王朝监禁了拉瓦莱特夫人，直到她发疯。）1816年，玛丽·瓦莱夫斯卡嫁给波拿巴分子奥尔纳诺（Ornano）公爵，拿破仑听说后声称自己“欣慰”。前皇帝说，他一度每月给她1万法郎，“她一定攒下不少，所以她富有”。[87]玛丽没有多少时间来享用这些钱了，次年，她在公爵的流亡地列日去世，死因是肾脏衰竭。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与古尔戈讨论他和女人交往时的“上好运势”（bonnes fortunes），他非常乐意说出情妇的名字，但坚称自己只有六七名情妇，而真实人数至少多出两倍。[88]

让拿破仑这种大人物待在这么小的岛屿上，他的监禁生活自然不会舒适，而且绝不愉快，不过相对而言，这种日子尚可忍耐，但是1816年4月14日，情况有变。当日，赫德森·洛（Hudson Lowe）抵达圣赫勒拿岛，并接替和蔼的马克·威尔克斯（Mark Wilks）上校任新总督。拿破仑初会洛时送给他一只金表，该表今展示于伦敦国家陆军博物馆（National Army Museum），但两人迅速交恶。拿破仑的命运已经让他自己窝火，而新任监狱看守一丝不苟、机械刻板、死守规矩，不适合担当此任。蒙托隆后来承认，“从天堂下凡的天使都不能取悦圣赫勒拿总督”，可洛的军事履历几乎意味着冲突不可避免。[89]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藏有未出版的洛自传，他在书中写道，1794年2月上旬，纳尔逊夜袭科西嘉圣菲奥伦佐海湾（San Fiorenzo Bay）的国民公会多面堡，他参加了这次攻击，并指挥一个连。

> 然后，全军冲上去。和我一同向前的队伍进入缺口，发现法军卫戍部队的尸体堵死了口子，他们都隶属拉费尔团，奉命守卫此地……很多人堆叠在缺口上，我们为了前进，只好踩过死人和垂死者。[90]

几个月前，拿破仑才离开拉费尔团，此刻，洛和王家科西嘉突击营（Royal Corsican Rangers）并肩作战，正践踏其战友的伤残之身或尸体。王家科西嘉突击营是一支反法的科西嘉部队，被拿破仑蔑称为叛

徒，而洛最后亲自指挥他们。

洛也曾在巴斯蒂亚和卡尔维（Calvi）战斗，并住进阿雅克肖波拿巴宅，然后他在葡萄牙和梅诺卡岛服役，还去埃及指挥科西嘉突击营。1801年，驻埃及法军投降，这是拿破仑的执政府受辱之刻。当时洛在埃及，他也与此相关——押送开罗的败军去登船地罗塞塔。洛在卡普里（Capri）待了两年，他主管印刷厂，确保那不勒斯等意大利城市秘密张贴布告，宣告半岛战争中联军的所有胜绩。[91] 拿破仑不会尊重此举，他认为士兵不该干这种事。不止如此。洛还认识沙皇亚历山大，并且深深仰慕他。洛参加了莱比锡会战，在战后加入布吕歇尔的参谋部，他也敬重此人。拿破仑在拉罗蒂埃和拉昂战败时，洛在场。马尔蒙投降后，洛进入巴黎。1815年年初，洛甚至提议在滑铁卢山脊设防（不过他没有参加滑铁卢会战，当年7月，他率领一支军队把布吕内赶出了土伦）。[92] 所以说，洛在总离队时间不超过十二个月的三十四年服役生涯中多次见证拿破仑最惨的耻辱与败仗，还逆转了他最早的胜利。两人不可能惺惺相惜，洛也不大可能认为拿破仑的人格中有丝毫迷人之处。“你仅仅指挥过科西嘉叛徒，”两人最后一次面谈时，拿破仑嘲讽洛道，“你算不上将军，只是个文员。”[93]

拿破仑的支持者把洛刻画成无知又残忍的虐待狂，但他不是这种人。他们也把洛塑造成粗鲁冒失、傲慢自大、心胸狭窄之辈，这倒没错。第五代阿尔比马尔（Albemarle）勋爵曾在滑铁卢作战，据他记载，科西嘉突击营的不少军官认为，洛“不讲礼貌，暴躁傲慢”。[94] 威灵顿甚至更严厉地说，洛是“非常糟糕的人选，这家伙缺乏教养和判断力。他是个蠢货，对世界一无所知，就像所有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人一样，他猜疑且嫉妒”。[95] 拿破仑和其他英国人关系很好，如福克斯、康沃利斯、雅茅斯、坎贝尔、麦克纳马拉、埃布灵顿、罗素、法扎克利、维纳布尔斯-弗农、道格拉斯、厄谢尔、梅特兰、奥马拉、科伯恩、巴尔科姆一家以及圣赫勒拿岛上的很多访客，考虑到这一点后，英国派这

样一个冷漠无情、严格执行纪律的人当总督真是浪费机会。英国本可让拿破仑开口，盘问前十六年中欧洲宫廷的无数政治秘密。他已经和科伯恩说过瑟堡港的水雷，这是有用的海军机密。

拿破仑和洛的住处仅隔3英里，但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拒绝见洛的次数超过六次。此后，两人爆发了规模特别小的战争，直到五年后拿破仑去世。洛埋怨长林烧的木柴太多；贝琪骑了拿破仑的马后，洛训斥威廉·巴尔科姆；洛不让人给拿破仑的钢琴重新调音，也不让人给他送历史书、罗马王半身像、上刻帝号“N”的象牙棋子。［英国完全禁止拿破仑联系其子。罗马王不能学法语，1818年，他受封奥地利头衔赖希施塔特（Reichstadt）公爵。］洛规定，1818年圣诞节后出生的孩子都不是奴隶，但他不准拿破仑花钱替马来人托比（Toby）赎身，此人是巴尔科姆家的老奴/老园丁。[96] 更有甚者，拿破仑请求看看海军上校默里·马克斯韦尔（Murray Maxwell）的王蛇（它能吞下一头山羊），洛拒绝了；拿破仑赠予岛上高级牧师鼻烟盒，洛认为他试图贿赂官僚，不许牧师收。[97]

1820年5月，洛干了一桩最荒唐的事。当时洛向巴瑟斯特勋爵报称，蒙托隆告诉岛上法国专员蒙舍尼（Montchenu）侯爵长林的蔬菜长势喜人，还说要把花园厨房里的绿豆和白豆送给侯爵。洛认为此举含有深沉的政治用意，因为绿色是波拿巴派的颜色，白色是波旁王朝的颜色。“我觉得，”洛的报告写道，“要是侯爵一概不收，或仅限于索要白豆，他的行为会更得体。”洛不止一次向战争大臣（估计巴瑟斯特完全不知所措）提到豆子颜色的问题。[98] 拿破仑想学英语，让人送来一本儿童寓言，其中一则故事写道，病狮坚毅地挺过其他动物的攻击，直到它的脸最终被驴子踢中。“我可以忍受一切，但这个不行。”狮子咽气前说。“这讲的是我和你的总督。”拿破仑告诉贝琪。[99]

然而，挑衅和多疑也非限于一方，拿破仑亦有份。他修了墙，挖了

壕沟，以便挡住洛的哨兵的视线；他让人挪走椅子，所以洛和他谈话时被迫站着，如同会见国家元首；他叫人在桌球室百叶窗上剪开小孔（事实上，根据圣赫勒拿岛民的说法，他亲自用小折刀剪了洞），从而暗中监视花园里的岗亭，即便该岗亭背屋而设，并未面向房子。[100] 拿破仑管洛叫“西西里走狗”，他经常说，总督是“英国寡头政权”（即英国政府）派来的刺客，房子周围的卫兵都奉命来杀他，有一天他会被刺刀戳中，“意外”身亡。[101] “我忍不了红色，”反英情绪发作时，他曾说，“这是英国的颜色。”[102]

洛想把监禁拿破仑的年费从2万英镑减至1.2万英镑（相当于从40万法郎减至24万法郎），这是两人的主要争议点。费用之争细至长林所用黄油的价格和质量。洛很难明白为何拿破仑需要糕点师和灯夫，不过，尽管贝特朗抗议削减费用，长林住户几乎不缺物资。[103] 举个例子，1816年最后三个月，3700瓶葡萄酒（包括830瓶波尔多葡萄酒）被送至长林。[104] [105]

虽然洛不可能知道，但拿破仑从没想过逃离圣赫勒拿岛。在人生的其他阶段，他追求冒险，在罗什福尔之前，他的海上出逃记录（科西嘉、埃及、厄尔巴）也不错，考虑到这两点，他不打算逃跑也就显得有些奇怪了。囚禁前期，拿破仑的确搞过假逃跑的恶作剧。他突然骑上悬崖，甩下他的传令军官、第53团上尉托马斯·波普尔顿（Thomas Poppleton）。可是科伯恩未能警觉，并对波普尔顿说，他很可能会发现拿破仑回长林了，诚如此言。[106] 随员经常讨论逃跑，商议了很多计划，包括拉塔皮（Latapie）上校和拉勒芒将军共同制定的方案。拉勒芒在马耳他岛过了两个月囚徒生活，然后逃走了。[107] ［葡萄牙监狱岛费尔南多·迪诺罗尼亚（Fernando de Noronha）距巴西海岸线220英里，拉塔皮打算攻占该岛，煽动岛上的2000名囚犯造反，并率他们乘船去圣赫勒拿岛，从而解救拿破仑。拿破仑自己指责整个想法：“他俩发明一则无稽之谈，好让赫德森·洛爵士[108] 的恼火更具威信。”[109] ］古尔戈夸

口称，他们经常讨论，如果拿破仑“躲进一篮脏衣服、一桶啤酒、一箱糖里，他或可脱身”。但古尔戈补充道，皇帝明确地说他既不会伪装自己，也不会为了逃跑做出一丁点实质性努力，因为那样的话，他会大丢面子。[110] 此外，洛疑心深重，所以白天时他至少在长林附近布置125人，晚上时则至少布置72人。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待了五年半，这比他的第一执政任期更长。下个世纪，长林毁于白蚁，需要重建。除了长林，拿破仑只能在岛上留下一个纪念物——回忆录。1802年，他说“丧钟敲响时，自己不会遗憾，也不会担心身后评说”，但流放圣赫勒拿岛后，他的首要活动就是毫不掩饰地试图影响后世评价。[111] 他非常善于赋予他要讲的故事非凡特性，亦具备斐然文采。“演讲者必须劝服他人，”拿破仑对贝特朗说，“同样，历史学家也必须令人信服。”[112] 于是，1816年6月，他开始对拉斯卡斯父子、古尔戈、蒙托隆口述过去的事，间或也讲给奥马拉听，有时他一天能讲十二个小时。拿破仑去世两年后，拉斯卡斯出版了他的口述内容，即四卷本《圣赫勒拿回忆录》（*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19世纪，它是卖得最好的国际畅销书。[113] 拿破仑讲完自己的事后，口述了一本论尤利乌斯·恺撒的书。此书有238页，正如我们所见，它富含自传色彩。

拿破仑在整张桌球桌上摊开地图，用桌球固定它们，并借助他的公报回忆那60场战斗的场景。一位访客问，为何他能记住每次行动的参战部队细节，他回答：“夫人，这好比情夫回忆其前情妇。”[114] 然而，就像其他追忆生平的政客一样，他回想的事实根本不准确。他说：“我的人生是怎样一部小说啊！”拿破仑复述的人生中，虚构和事实成分必然占据同等分量。[115] 他夸大成就，淡化败绩，假装自己推崇泛欧主义，但他从未采取这类政策。（拉斯卡斯甚至插入了第二十章提到的假文件。）不出所料，拿破仑想靠回忆录战胜诋毁者。[116] “我的生涯里肯定有很多错误，”他说，“但阿尔科莱、里沃利、金字塔、马伦戈、奥斯

特利茨、耶拿、弗里德兰是花岗岩，嫉妒之齿拿它们毫无办法。”[117] 拿破仑也觉得需要抹黑历史上其他伟人（除了尤利乌斯·恺撒），他之所以这样做，估计是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所以，古斯塔夫·阿道夫没有实施多少彰显才华的机动，弗里德里希大王不懂“炮兵”，“亨利四世根本没有丰功伟绩……圣路易是个傻瓜”，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也不曾采取“体现伟大将才的卓越机动”。[118] 在拿破仑死后、回忆录出版前，古尔戈发表了拿破仑口述的一些记忆。格鲁希元帅阅读后，认为古尔戈的文字严重篡改并歪曲了自己和奈伊元帅在滑铁卢的表现，于是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质疑所谓的拿破仑的历史回忆录真实性》，声称这些话不可能是拿破仑说的。[119] 可拿破仑的确说了。

1820年，拿破仑患病，至少在此之前，他在长林的每日作息如下。早上6点，他起床，喝茶或咖啡，洗漱，刮面，还用古龙水做全身按摩。（“用力搓，”他对自己的贴身男仆说，“就当你是给驴子搓。”）[120] 上午10点，他吃午饭，然后口述回忆录，接着他泡澡，一泡就是一至三小时，有时他甚至在浴缸里吃饭。傍晚时分是会客时间，他会站在客厅壁炉边，把帽子夹在胳膊下。会客结束后他走去贝特朗家，随后返回长林，在晚饭前修正口述文本。[121] 晚餐时，他回忆伟人与伟大事件，令高级随员入迷，但晚饭后，他对他们大声朗读高乃依、伏尔泰、莪相、荷马的作品，有时还读《圣经》，这令他们厌烦。直到晚上11点，他才停止读书，上床就寝。[122] 拿破仑的小宫廷中，有两人在暗中谋划这样一件事：要是他提出再读一遍伏尔泰所著悲剧《扎伊尔》（*Zaïre* ），他们就让那本书“丢失”。[123]

1816年6月中旬，海军将领普尔特尼·马尔科姆（Pulteney Malcolm）来到圣赫勒拿岛，接替科伯恩任岛上高级军官。拿破仑喜欢让马尔科姆夫妇陪伴自己，滑铁卢会战前一天，他恰好帮过马尔科姆夫人的弟弟埃尔芬斯通上尉。马尔科姆夫妇与拿破仑多次面谈，事后，马尔科姆夫人迅速记下这些详细长谈。[124] 马尔科姆发现，拿破仑“比其画像高瘦一

些……他的举止平易近人”。他们讨论的话题有：海军元帅圣文森特勋爵的痛风、小皮特的个人所得税（“几乎所有人都抱怨这种税，此举表示他们都要交税”）、奴隶制的“可耻处”、波旁王朝的命运、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所用战术、为何说滑铁卢会战中威灵顿冒了太大风险。谈话还涉及昂吉安公爵与雅法屠杀，这说明马尔科姆夫妇可以和拿破仑聊任何事。[125] 在单单一次会面中，他们就谈到苏格兰贵族制、威灵顿和纳尔逊如何选择头衔、谢里登（Sheridan）的剧作《对手》（*The Rivals*）、约翰·弥尔顿的共和主义、莎士比亚之后英语有多大改变、德莱顿（John Dryden）和艾迪生（Joseph Addison）是否让英语走向现代化。拿破仑询问拜伦，对比意大利诗歌与散文，然后他坐下，同马尔科姆夫人下棋。据马尔科姆夫妇记载，拿破仑经常大笑。有一回，冷藏业先锋莱斯利（Leslie）教授把他发明的新型冰淇淋机带到岛上，拿破仑看到后设法打碎了机器的温度计，并恰当评价自己的笨拙行为：“符合我的水平。”[126]

为了打发无聊时光，如果有船只在圣赫勒拿岛再补给，拿破仑就接见船上下来的数十名访客。1817年6月7日，他会见正要去中国的西藏探险者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博士。拿破仑想知道拉萨的达赖喇嘛有多少岁入，并“提出成百上千的问题，询问中国人及其语言、风俗等”。除此之外，圣赫勒拿岛上的生活单调乏味，而长林鼠灾不时增添趣味。有一次，拿破仑对贝琪说：“他正要戴帽子时，一只大老鼠从里面跳出来，吓了他一跳。”[127] 他也模仿伦敦货郎的著名叫卖声，借此自娱自乐。

从1816年10月下旬开始（距拿破仑的死期还有整整四年半），拿破仑开始露出重病迹象。这既是因为他和洛交恶后不再经常骑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隐士，也是因为他很少吃果蔬，还拒绝服用给他开的药，只同意泡热水澡，而且泡澡时间越来越长。（给他开的药包括吐酒石、氯化亚汞、树皮熬的汁，所以拒绝服药也许没多大害处。）此外，对于置

身这片“被诅咒的”“可怕的”“糟糕的”“令人伤心的”（不同场合下，他有不同说法）礁石上的命运，拿破仑越发感到消沉，这也折磨着他。[128]

巴里·奥马拉定期向洛汇报其病人的身体状况，他每周写下详细总结，有时每天都写。根据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获知拿破仑的症状。奥马拉诊断后，认为病人患有肝炎，1817年10月，他和洛为此争吵。洛认为，这种结论一出，人们会指责英国政府把拿破仑送来这个骨子里有些不健康的地方。吵架后，因为拿破仑不肯见洛任命的医生亚历山大·巴克斯特（Alexander Baxter），他只好记下奥马拉的口述内容，然后向总督报告。这种荒唐局面一直持续到1818年8月，当月，洛把奥马拉赶出圣赫勒拿岛。（此时古尔戈也被洛赶走了，因为他试图联系吕西安·波拿巴。）

1816年10月20日，奥马拉报称，拿破仑（洛坚持要求奥马拉在报告中称他为“波拿巴将军”）抱怨道，他的“牙龈松软……轻轻一碰就流血，脸色也更苍白了”。[129] 此后，拿破仑的病况如下：“呼吸困难”（10月21日）；下肢“肿胀发冷”（11月10日）；患有“间歇性神经性头痛（多年宿疾）……和轻微腹泻”（1817年3月5日）；“脸颊稍肿，牙龈发红”（3月28日）；“脸颊肿大……极其疼痛”（6月30日）；患有“严重的黏膜炎”（7月3日）；“脚踝水肿（膨胀）……晚间想休息，常有尿频倾向”（9月27日）；“右疑难症区”有钝痛，“右肩有类似感觉”，脉搏从一分钟60下升到68下，肠子易受刺激，脸颊疼痛，肋骨疼痛（10月9日）。奥马拉据此推测，“要是这些症状存留或加剧，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他的慢性肝炎发作了”（10月1日）。

1817年秋，奥马拉拔掉了拿破仑的一颗牙，这是后者一生中唯一一次做手术。10月9日，拿破仑的“右肋钝痛，痛感更加深入体内，他的双腿有些消肿”；“右肋感觉不变。昨夜，他有一些心悸症状……更确切地说，肩胛骨下剧痛，右肋断断续续发痛，一定程度上影响呼吸……昨

日，他在阳台台阶上坐了很久，这很可能是疼痛原因……”（10月11日）；“右肋钝痛，想睡觉”（10月13日）。[130] 拿破仑寿数未尽，但他的身体显然不好。

1817年末，拿破仑苦于消沉、肝病、胃疼，或许他还得了乙肝。“想到夜晚就令人不快。”他对贝特朗说。[131] 1814年，他试图在枫丹白露宫自杀，1815年，他可能也试着在爱丽舍宫自杀，但不管怎么说，眼下他似乎没有认真想过自我了断。只有一条线索表明他兴许曾在圣赫勒拿岛上考虑过自杀，它出自他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二手材料：1877年，阿尔比娜·德·蒙托隆的情夫巴兹尔·杰克逊出版回忆录，此书称，在圣赫勒拿岛上，古尔戈“会……说奇怪的话，有一回他谈论烧炭自杀，甚至不仅仅是暗示拿破仑曾和他提起自裁”。[132] （烧炭可产生一氧化碳。）到1818年时，拿破仑的状况的确如下：他写完了回忆录；他再也见不到家人；他抱怨记忆力下降、性欲衰退；他显然病了，经常疼痛。他可以立刻鼓起勇气自杀，而且他缺乏宗教信仰，所以“我没有害怕地狱的妄想”。[133] “死亡不过是无梦长眠”，“至于我的身体，它会变成胡萝卜或芜菁。我不怕死。在军中时，我见过许多正和我说话的人死去”。[134]

“人有权自尽吗？”1786年，拿破仑在其随笔《论自杀》中问道。“有，只要他的死不伤及他人，且生命于他而言是痛苦。”[135] 拿破仑知道塞内加、普林尼、马提雅尔、塔西陀、卢坎都歌颂自杀。[136] 然而，就1802年掷弹兵戈班（Gobain）殉情自杀一事（当月第二起殉情事件），拿破仑发布当日公告，严肃地说：“士兵应该知道如何克服其激情的痛苦与忧郁。不断承受精神痛苦与坚守在葡萄弹雨下彰显同等勇气。在懊丧面前不战而降并自尽，此乃征服战场前就放弃战场。”[137] 马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自杀后，同时代人称赞此人的行为，但拿破仑在其所著的恺撒传记里问道：“他的死对谁有用呢？恺撒。让谁高兴呢？恺撒。给了谁致命打击呢？罗马和他的党……蔑视和绝望催他自

尽。加图之死是伟大灵魂的弱点、斯多葛信徒的错误、他自己一生的污点。”[138] 拿破仑之所以没有在圣赫勒拿岛上自杀，很可能是因为那会让他的敌人高兴得不得了。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活着受罪比死亡更需要勇气。”[139] 1817年6月，他对马尔科姆夫妇说：

> 我赢得了法兰西帝冠与意大利铁王冠，现在英国给了我一个比它们更大更光荣的荆棘冠，因为这是救世主戴过的冠冕。针对我的压迫和一切侮辱只会为我增光，我的声誉中最光辉的部分归功于英国的迫害。[140]

这句典型的夸张之言异常渎神，在很多层面也不符合事实，但是对统治过大半个欧洲的人来说，住在圣赫勒拿岛上的确是严惩（尽管波旁王朝和普鲁士想实施明显更严酷的惩罚——处决）。当年夏天，圣赫勒拿岛发生轻微地震，拿破仑便对一名副手说：“我们这座岛和我们所有人都该被吞掉。一起死真叫人开心。”[141] 他抓住所有可让他获释的政治前景，提到“法国叛乱”、霍兰勋爵就任首相、路易十八死亡。他还说，摄政王的独女夏洛特（Charlotte）公主成为英国女王后，“她会让我回欧洲”。事实上，这些猜想根本不具备解救拿破仑的可能性，特别是1817年11月之后。当月，夏洛特死亡，没有同情心的摄政王之弟取代她成为继承人，他后来成了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142]

1818年，巴尔科姆一家离开圣赫勒拿岛，奥马拉被打发走，拿破仑此前常常念叨的科西嘉人奇普里亚尼也去世了。贝琪临走前发现，某次发病后，拿破仑的健康水平严重恶化了。她写道：

> 疾病破坏并改变他的样貌，见他这样让人忧伤。他的脸简直是蜡黄色，两侧脸颊都有肉块下垂。他的脚踝肿得厉害，以至于肌肉几乎是挂在鞋子两侧。他非常虚弱，无法站立，除非他把一只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并把另一只手搭在侍者肩上。[143]

拿破仑和贝琪永别，说：“你很快就会驶往英国，留我在这片令人悲伤的礁石上等死。看那些可怕的山，它们是我的狱墙。”他一直清楚

礼物的力量：贝琪哭着把脸埋进他的手帕里，他就把这块手帕送给她；她想要他的一缕头发，他便让马尔尚剪了四缕，分别赠给她和她的家人。[144]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认为拿破仑患有如下疾病：淋病、胆结石、癫痫、偏头痛、消化性溃疡、疟疾、布氏杆菌病、变形虫肝炎、痢疾、坏血病、痛风、脑下垂体过度活跃、裂体血吸虫病、胀气、消化不良、肾病、性腺机能减退症、心脏衰竭、膀胱炎、躁狂抑郁症以及各种综合征，如克兰费尔特综合征、弗勒利希氏综合征、佐林格-埃利森综合征。[145] 除了痔疮、他小时候染上的轻度肺结核（已彻底痊愈）、结石性膀胱炎、疥疮、头痛这些他来圣赫勒拿岛之前就有的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否认几乎所有诊断结果。1947年，《拿破仑的每日行程》（*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le jour*）首次出版，此书特别详细地记录了成年拿破仑每日在何地做何事。书中内容显然说明，他很少因为生病而休息。事实上，迟至1815年1月，他还夸口："我这辈子就没生过病。"[146] 征战时，他得过流感。在瓦格拉姆会战日、博罗季诺会战日、莱比锡会战第三日以及或许也能算上的滑铁卢会战日，他的身体状况也许的确低于一般水平，但我们不能认为疾病可能影响了上述任一战斗的决策，因为他的病没那么严重。

1818年，这一切都变了，拿破仑开始出现下列症状：长期腿肿、更易头痛、经常呕吐、缺乏食欲、"漏汗"、心悸、右肋疼痛、严重便秘、精神状态非常低落（这不出所料）。[147] 1818年初期至中期，杀手胃癌在他体内扎根，但过了两年多，医生才正确地诊断出他患有胃癌。1818年年初某月，拿破仑压根儿就没出门。"从一开始，"亡林营地成员、第66步兵团助理军医沃尔特·亨利（Walter Henry）指出，"拿破仑似乎就知道他的病有何特征。他说（那是）胃病，害父亲35岁时辞世，而（波利娜·）博尔盖塞公主也有患此病的危险。"[148] 波利娜和卡罗琳分别在44岁和57岁时死于癌症，拿破仑的亲生子夏尔·莱昂也死于胃癌，尽管

那时他已81岁。[149]（假如拿破仑能活这么久，那么1848年其侄当选总统时，英国会释放他。）

1809年，拿破仑对科维萨尔说他想学解剖，于是人体部位被带到马尔迈松，午饭前，两人在他的书房里解剖这些肉体。约瑟芬发现，拿破仑的"脸色比平常更苍白，他吃不下饭"。她劝科维萨尔不要在午饭后继续解剖，他随后为此感谢她。[150] 拿破仑在战场上见过那么多失去内脏的尸体，考虑到这一点，他对解剖的反应显得神经质，可谓怪哉。然而，这次短暂的课程帮助他理解了人体机理，他所学知识肯定足以在1818年时告诉他，自己的病危及生命。

许多年来，人们提出各种富含想象力的阴谋论，声称蒙托隆和/或其他人毒杀拿破仑，给他下了砒霜，理由是其头发据说含有高浓度的砷。可是不少同时代人（如约瑟芬和罗马王）的头发样本所含砷浓度与他的差不多高，去圣赫勒拿岛之前的不同人生阶段中，拿破仑的头发也留下了含砷量高的记录。举个例子，拿破仑的头发的含砷量为百万分之十点三八，这还不及乔治三世的水平，后者的头发的含砷量为百万分之十七。[151] 太后和费施派来弗朗切斯科·安托马尔基（Francesco Antommarchi）医生（拿破仑根本不肯见洛选派的医生），1819年9月，他开始医治拿破仑。安托马尔基勉强具备行医能力，如果拿破仑有更好的医生，他的确可能会受益，但胃癌一旦扎根，做什么都无力回天了。[152] 拿破仑死后第二天，其尸体被放在桌球室的一些木板上，下边有支架支撑。七名英国军医和安托马尔基实施验尸，剖开尸体。官方尸检报告称：

> 几乎整个胃部内表面都长着大块肿瘤，抑或出现正在癌变的纤维病变，幽门附近特别明显。看来，只有靠近食道终点的一小块贲门顶端处于健康状态，胃里近乎充满大量咖啡渣般的体液。肝脏左叶的凸起表面粘着隔膜。[153]

在抑制胃酸的医疗手段出现之前，良性胃溃疡常常演变成恶疾。从

拿破仑患病的症状和时间过程来看，情况可能不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得了癌症，癌细胞不断扩散，直到占领了几乎整个胃。验尸报告表明，癌细胞扩散至淋巴结以及与胃相连的组织，但未波及肝脏。胸腔里有黏液，说明此处曾被感染（早年的肺结核或此前某时的细菌性肺炎），但这和他的死亡无关。胸膜和心包里有染血液体，原因可能是胃穿孔诱发感染性休克。咖啡渣般的体液则是血液，胃酸和消化酶使它变成暗棕色。[154]

医生的诊断结论都是癌症，只有安托马尔基除外。贝特朗和蒙托隆向安托马尔基施压，强迫他说拿破仑得了胃肝炎，这样的话，人们可以指责“英国寡头政权”把拿破仑关在环境不利于其健康的长林。[155] 验尸报告第三页写道，“肝脏可能大得有点不正常”，此言暗示道，拿破仑虽死于癌症，但他或许同时患有肝炎。[156] 于是，洛删掉了这句话，我们在出版的报告里读不到它。阴谋论者执着于此，可这句话基本上无关紧要，因为正如在场医生沃尔特·亨利描述拿破仑的胃部时所说的：

> 这个器官的紊乱区域非常大，事实上，它全都溃烂了，像蜂巢一样。病灶核心恰恰是拿破仑曾多次指出的部位——幽门或连接肠子的胃部末端（有好几次，他提到自己最后的疾病时都这样说）。我把手指伸进溃疡在那儿引发的孔。溃疡穿透了胃部，但邻近器官肝脏的轻微黏附阻止了它扩大。[157]

沃尔特·亨利补充道：“拿破仑的胃没有一点地方是健康的，只要他带着这种器官活下来，那就是奇迹。”[158]

拿破仑在悲伤中度过了50岁生日，他忧愁地回忆往事。“我变得铁石心肠，”他说，“我从没爱过谁，约瑟芬除外，或许我稍稍爱她。27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真心喜欢玛丽·路易丝。”[159] 1821年1月，随员在桌球室内安放一架跷跷板，好让皇帝锻炼身体，但他很少用跷跷板。[160] 2月，他把安托马尔基的一些药扔出窗外，几乎每天都会呕吐。[161] 当月晚些时候，“干咳、呕吐、几乎无法忍受的肠部灼痛、全

身兴奋、焦虑、焦渴感”折磨着他。[162] 拿破仑人生的最后阶段，身边之人痛苦地看着他衰弱。他的脸被比作兽脂，亦有人比较他和幽灵的相似之处。

红衣主教费施派来博纳维塔（Buonavita）教士。1821年3月17日，拿破仑接见了博纳维塔，告诉此人应该对太后及波拿巴家族说什么。教士“发现疾病残害了他的容貌，心生哀伤，与此同时又被他的冷静和无奈深深触动”。拿破仑试图和蒙托隆上马车，但他进不去，于是“他回来了，打着寒战”。蠓虫群聚长林，蚊子亦在此筑窝。[163] “难道你不觉得，死亡对我来说是天赐解脱？”3月下旬，拿破仑问安托马尔基时道，“我不怕死，但既然我根本不会加快死亡进程，我也不会抓住任何救命稻草。”[164]

英国医生托马斯·阿诺特（Thomas Arnott）告诉洛，安托马尔基谎报拿破仑发烧，迟至4月6日，此人还说：“波拿巴将军压根没有重病，他的问题最可能出在精神上。”[165] 于是洛被说服，坚持认为拿破仑至多患了疑难病症。阿诺特承认，拿破仑的一脸大胡子看上去“可怕”。（两天后，他刮了胡子。）其他人向洛报称，拿破仑的脸“非常白，如同死人”，他的卧室肮脏不堪，“但寝具尤脏，波拿巴将军有时会吐在上面。他咳嗽，经常吐痰，根本不会转头来避开床铺，只吐在眼前”。[166] 人生的最后六个月中，拿破仑的体重掉了22～33磅，但他去世时，其心脏上的脂肪还有1英寸厚。不管怎么说，从安托马尔基给他制作的模制遗容看，他的双颊明显凹陷。

1821年4月15日，拿破仑立下了遗嘱。“五十多年前，我在使徒与罗马的教义中呱呱坠地，”遗嘱开头写道，“如今，我在它怀中与世长辞。我希望把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畔，安葬在我如此珍爱的法兰西人民之中。”[167] 他把财物分给家人、仆役和昔日的将军，其中的数百万法郎实际上不是他的。康蒂永刺杀威灵顿未遂，拿破仑给此人留了10万法

郎，说，“那个寡头政客有权送我去圣赫勒拿礁石上等死”，康蒂永“同样有权杀他”。[168] 拿破仑对洛的指控像对威灵顿的一样拙劣：“英国寡头政权和它雇佣的刺客谋害我，致使我过早辞世。”[169] 他声称，“因为马尔蒙、奥热罗、塔列朗、拉斐特背叛”，法国在1814年和1815年遭到入侵，但他补充道，“我宽恕他们，愿法兰西的后代如我一般宽恕他们”，不过此言的真实性几何就存疑了。

拿破仑也在遗嘱中分配了很多不属于他的物品，比如“我从波茨坦带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闹钟”。遗嘱还列出其衣柜所含物件，包括“1对吊带、4套白色羊绒衬衣裤、6条领巾、6件法兰绒马甲、4条内裤……1个塞满鼻烟的小盒……1双拖鞋、6条腰带”，等等。[170] 他“留在牙医那的金制盥洗用具盒”给罗马王。拿破仑没有放下给别人做媒的癖好，要贝西埃之子娶迪罗克之女，还要马尔尚娶老近卫军官兵的遗孀、妹妹或女儿。对昂吉安公爵一事，他不知悔改，说：“法兰西人民的安全、利益、荣誉需要我这样做……假如遇上类似情况，我会采取同等行动。”[171] 拿破仑给约瑟夫留了一对金鞋扣，给吕西安留了“一对金制吊袜带小搭扣”，给热罗姆留了一只金领钩。[172] 他送发束给玛丽·路易丝、太后、所有兄弟姊妹、侄子、侄女，把“最多的一束留给我儿子”。比起家人（除了罗马王），他的遗嘱对仆役们慷慨得多，不过他的确说：“我和最珍爱的配偶玛丽·路易丝在一起时总是非常高兴。最后时刻，我对她怀有最多温情。”玛丽·路易丝和奈佩格缱绻风流，在拿破仑生前，他们一共生了两个孩子。他死后，他俩成婚。假如他知晓此事，他可能不会写下这句话。[173]

“我感谢既善良又非常杰出的母亲，”拿破仑写道，“感谢红衣主教（费施），感谢我的兄弟约瑟夫、吕西安、热罗姆，感谢波利娜、卡罗琳、朱莉（约瑟夫之妻）、奥尔唐斯、卡塔琳娜（热罗姆之妻），感谢他们一直关心我。”[174] 考虑到卡罗琳曾背叛他，把她列入名单显得格外宽大。上年8月，埃莉萨在意大利去世。路易不在名单里，但拿破仑

也原谅了“1820年他出版的诽谤之词，它充斥着伪命题与伪证”。（路易出版了一本历史文献摘要，谈论他治下的荷兰。书中，他反抗拿破仑以保护荷兰的内容引人瞩目。）

4月26日，拿破仑呕血，次日，他吐出咖啡渣一般的深色液体。他要求把覆顶行军床搬到通风更好的客厅。贝特朗发现，他几乎没力气吐痰，所以他的马甲染上了红色唾液。[175] 据马尔尚回忆，他仍然“端庄、冷静、友善”，就算他在抱怨右肋的疼痛“像剃须刀一样刮过我的身体”。[176]

在4月29日之前，拿破仑遗嘱的八份附件就已拟出，其中几份的订立日期经篡改后提前至27日。29日和30日，他开始不断重复自己的话。拿破仑的遗言要么是“法兰西……陆军……陆军统帅”，要么是“法兰西……陆军统帅……约瑟芬”。此时他丧失了语言能力，其遗言是一通胡言乱语，别人几乎听不清。尽管如此，他最后的清晰发言更有趣。[177] 拿破仑曾给贴身男仆兼遗嘱执行人马尔尚口述关于恺撒的书。马尔尚在此书的一份抄本上记载，5月2日晚上8～9点，拿破仑口授道：“我在阿雅克肖的地产留给儿子；萨利讷（Salines）郊区的两座房子及其花园；阿雅克肖之内，我所有可获5万法郎年租金的不动产。”[178] 马尔尚用铅笔在书的序言页记下皇帝的话，然后他小心地把纸片缝入凸印皇帝的盾徽的红色小皮盒衬里。马尔尚的后人把盒子赠给拿破仑时代历史学家亨利·拉舒克，如今，拉舒克家族仍然拥有此盒。所以说，叱咤欧洲之后，走完近现代世界中最冒险的人生之后，临终病榻上的拿破仑回到了三十年前努力协商桑树事务之时，他又成了小贵族阶级里的科西嘉地主，急于保护家族的财产权利。

5月3日，安杰洛-保罗·维尼亚利（Angelo-Paulo Vignali）教士私自为拿破仑行临终涂油礼。终其一生，拿破仑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天主教徒，他曾对一位教皇开战，还曾监禁另一位，但临终之时，教会重新接

纳了他。濒死之刻，拿破仑要贝特朗在他死后替他阖眼，“因为死人一般会继续睁眼”。经历了60场战斗之后，他必然会注意到这一点，并为之久久不安。[179] 4日，拿破仑苦于长时间打嗝，晚上，他神志不清，询问儿子的名字。次日上午，即1821年5月5日（周六）上午，狂风呼啸，暴雨倾注。下午，拿破仑三次叹气，每次叹气之间都间隔很久。5点49分，小岛上的日落鸣炮刚刚结束，51岁的前皇帝溘然长逝。[180] 夏多布里昂所谓的“赋予肉体生命的最强大的生灵气息”消散了。

拿破仑葬在美丽的景点托贝特喷泉（Torbett’s Spring），他的葬礼配有全套军事荣典。托贝特喷泉距长林1英里，不时被柳树隔断，他生前也来过此地。遗体穿着猎骑兵上校制服。英军第66团和第20团的掷弹兵沿着山羊道，把棺材抬到墓地，一位目击者遂指出：“讽刺的是，皇帝在绣有金字‘塔拉韦拉’、‘阿尔武埃拉’（Albuera）、‘维多利亚’、‘比利牛斯山脉’的团旗下安葬，这些文字如同奇怪的嘲讽。”[181] 15门礼炮轰鸣三次，滑膛枪三度齐射，“山谷间传来一连串清晰的回声”。[182] 然而，拿破仑的墓碑上没有文字。甚至在前皇帝死后，洛也不准其墓碑印上帝号“拿破仑”，他提出刻上不具帝王内涵的“拿破仑·波拿巴”，贝特朗和蒙托隆不同意，结果墓碑成了无字碑。[183] （墓碑今展示于长林庭院，仍无文字。）1840年，贝特朗和古尔戈把拿破仑的遗骨从岛上墓地带到巴黎。12月2日，即奥斯特利茨会战和皇帝加冕纪念日，巴黎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当日天寒，但是葬仪队伍穿过巴黎时，据估计有100万法国人排在其路线两侧。拿破仑葬在荣军院，苏尔特、蒙塞、乌迪诺、格鲁希这四位元帅出席了葬礼。其他人中，贝纳多特、马尔蒙和维克托尚在人世，但他们已经反对他，所以没来。

拿破仑死后，路易·马尔尚（Louis Marchand）给长林图书馆开出清单，上列370本书。书单证明，皇帝的文学品味和兴趣不拘一格。单上书籍包括《诺桑觉寺》，《失乐园》，约翰逊博士的《词典》与《高地游记》，各种军事列表，《鲁宾逊漂流记》，埃及史，乔治三世的传

记，伏尔泰的《卡尔十二世》（他在莫斯科读过此书，包括它对俄国天气的苛责），夏多布里昂的《君主制》，至少20本关于宗教的书，喜剧小说《拉克伦特堡》，拜伦的不少作品，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本关于“风情”的书，《德布雷特贵族》，八卷《旁观者报》，埃德蒙·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此书激烈反对雅各宾主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是他遵循斯密的理念，或许能给自己省去很多麻烦），纳尔逊将军的传记。[184]

书单上自然也有很多古代史书籍，如不久前才出的新版《伟大统帅传记集》（科奈利乌斯·奈波斯著），四十多年前，拿破仑初读这本书。去圣赫勒拿岛时，他可以确信，如果当代人撰写《伟大统帅传记集》，则书中必有一章讲他。他在布列讷军校产生凌云壮志，此后从未动摇理想，并最终实现抱负。拿破仑改革了领导艺术，开创帝国，留下传承数代的法律，可与古代巨人比肩。



---

[1] ed. Lecestre，Léon，*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 ^{er} 2 vols.1897， Ⅱ pp.357-8

[2]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191

[3] SHD GR17.C/193

[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

[5]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240

[6]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Ⅰ p.4

[7] 富歇没出席会议，这据信是不祥之兆，因为众所周知，他从不和败者为伍。约瑟夫建议逮捕富歇并把他关在万塞讷，但拿破仑未听其言。皇帝后来说，他希望自己当初枪毙了富歇。Latimer ed.，*Talks*，p.195.

[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62 p.299

[9] Villepin，Dominique de，*Les cent jours* 2001，p.450

[10]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pp.189-91

[11]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p.244，Unger，Harlow，*Layfayette* 2002，p.345

[12]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25

[13]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61 p.293，*Le Moniteur* 21/6/1815，BNF Micr D.71/86

[14] ed. Calmettes，Fernand，*Mémoires du Général Thiébault* vol.Ⅴ 1895，Ⅴ pp.373-4

[15]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Ⅰ p.7

[16]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63 p.2-99，BNF Micr D.71/86，*Le Moniteur* 23/6/1815

[1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72

[18]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p.171

[19] BNF Micr D.71/86，*Le Moniteur* 24/6/1815

[20]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62

[21]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Ⅷ pp.175-6

[22]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328

[2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4

[24]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3 vols.1885，Ⅰ p.68

[2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2 n.2

[26]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39

[27]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p.48

[28]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42

[29]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p.175-6，Bodleian MS Curzon d.2 *passim*

[30]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28 no.22066 p.301

[31]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Cambridge，MA）1969，pp.345，368

[32]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Ⅳ p.161

[33] *The Times* 15 July 1830

[34]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PP.535-60

[35]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47

[36] ed. Jones，Proctor Patterson，*In Napoleon's Shadow*（San Francisco）1998，pp.285-6

[37]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p.48，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p.212

[38]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77

[39] 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p.227

[40]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p.587

[41]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85

[42]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98

[43] ed. Londonderry，2nd Marquess of，*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Viscount Castereagh* 12 vols.1848-53，Ⅹ p.415

[44]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07

[45]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18

[46]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37

[4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30

[48]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41

[49]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54

[50]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73

[51]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p.15-16，ed. Kemble，James，*St Helena During Napoleon's Exile* 1969，pp.7-8，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12，80，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40

[52]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p.189，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15

[53]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51

[54]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p.17-18

[55]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9-31

[56]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60

[5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9，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 （Boston）1833，p.40

[58] Palmer，Alan，*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 2001，p.201

[5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1

[60]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1，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33

[61] Blackburn，Julia，*The Emperor's Last Island* 1991，p.5

[62] Tulard，Jean，*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p.505

[63]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11

[64]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13

[65] Interview with Michel Dancoisne-Martineau at Longwood 4/5/2013

[66]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37

[67] Tyrwhitt MSS Osborn fc112 no.22

[68]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34，135

[6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42-3

[70]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43-4

[71] 原文如此。——译者注

[72] 原文如此。——译者注

[73]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55

[74]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56

[75]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83-5，166

[76] Bodleian MS Curzon e1.p.12，ed. Kemble，James，*St Helena During Napoleon's Exile* 1969，p.2，Giles，*Napoleon Bonaparte* p.111

[77] Montholon，Albine de，*Journal secret d'Albine de Montholon* 2002，p.8

[78] Vernon，B.J.，*Early Recollections of Jamaica to Which are Added Trifles from St Helena* 1848，p.168

[79] Rosebery，Lord，*Napoleon*：*The Last Phase* 1900，p.62

[80]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22

[81] Brunyee，Paul F.，*Napoleon's Britons and the St Helena Decision* 2009，p.81

[8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2

[83]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91

[84]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36

[85]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21

[8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45

[87]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59

[8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45

[89] 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Ⅰ p.137

[90] BL Add.MS 56088 fols.89-90

[91] BL Add.MS 56088 fols.97ff

[92] BL Add.MS 56088 fol.101

[93]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p.55-6

[94]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103

[95] Rosebery，Lord，*Napoleon*：*The Last Phase* 1900，p.68

[96]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17，BL Add.MS 80775 143，20202 fol.42，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15

[97] BL Lowe Papers 20202 fol.20

[98] Unwin，Brian，*Terrible Exile* 2010，pp.184-5，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Ⅲ pp.224-5

[99]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88

[100]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199

[101]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p.ⅷ

[10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40-42

[103]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p.77

[104] 拿破仑在巴黎的银行家拉菲特（Lafite）定期给他汇款，监禁期间，就他自己的钱而言，他一共花了1818245法郎，其中100多万法郎最后用于何处仍是个谜。Branda，*Le prix de la gloire*，p.81.太后每年寄6万法郎，以改善儿子的经济处境。然而，费施、约瑟夫、吕西安、热

罗姆起初承诺汇来10万法郎，后来什么也没给。Martineau，*Napoleon’s St Helena* ，p.62.1821年，拿破仑的班子返回欧洲，欧仁补偿了他们650768法郎。

[105]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4

[106]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p.67-9

[107]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p.149，153-5

[108] 1816年，洛加封骑士。

[109]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161

[110]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pp.166-7

[111]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p.138

[112]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Ⅱ p.344

[113] Tulard，Jean，*Napoleon*：*The Myth of the Saviour* 1984，p.346，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ford，CA）1996，p.36

[114]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286

[115] Rouart，Jean-Marie，*Napoléon ou la destinée* 2012，p.9

[116]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08

[117]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301

[11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07，210，218

[119] Grouchy，Count de，*Doubt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Memoirs Attributed to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0，pp.3-4

[120]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39

[121]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p.197

[122]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p.49

[123]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p.82

[124]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7

[125]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p.29，31-2，Bodleian MS Curzon e.1.p.17，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Ⅰ pp.284-6

[126]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50

[127]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63

[128]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82，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103

[129] BL Lowe Papers 20156 fol.2

[130] BL Lowe Papers 20156 *passim*

[131]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Ⅰ p.118，AN 390/AP/32

[132] Jackson，Basil，*Note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Staff Officer* 1903，p.153

[133] 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09，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58-60

[134]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76，Constant，Louis，*Memoirs of Constant* 4 vols.1896，Ⅰ p.162

[135]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1 p.579，Browning，Oscar，*Napoleon*，*the First Phase* 1895，pp.283-4

[136] Griffin，Miriam，‘Philosophy，Cato and Roman Suicide’*Greece & Rome* vol.33 no.1 April 1986，p.1

[137]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Ⅰ p.392

[138]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1858，32 p.70

[13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45

[140]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p.152

[141]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265

[142]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p.201-3

[143]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54

[144]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82

[145] Richardson，Robert，*The Apocalypse of Napoleon* 2009，p.223，Weider，Ben and Hapgood，David，*The Murder of Napoleon* 1982，pp.175-6，ed. Jones，*Napoleon*：*An Intimate Account* p.425，Forrest，Alan，*Napoleon* 2011，p.310

[146]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Ⅰ p.185

[147] BL Lowe Papers 20156 fols.3 off

[148]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5

[149]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p.500，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p.250，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New York）2002，p.331

[150]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é* vol.Ⅰ 1923，p.124

[151] Richardson，Robert，*The Apocalypse of Napoleon* 2009，p.229

[152] Bodleian MS Curzon e1.pp.2-3

[153] Bodleian MS Curzon c.2.pp.1-2

[154] My thanks for Drs Guy O’Keeffe and Michael Crumplin

[155] 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166，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0

[156] NYPL Napoleon Ⅰ folder 3

[157]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0

[158]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0

[159]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p.139

[160] eds.Chevallier，Bernard，Dancoisne-Martineau，Michel and Lentz，Thierry，*Sainte-Hélène*，*Île de Mémoire* 2005，p.70

[161]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5，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6

[162]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7

[163]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8

[164]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p.248

[165] BL Lowe Papers 20157 fol.3 Arnott

[166] BL Lowe Papers 20157 fol.3

[167] AN 400AP/5

[168]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78

[169]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36

[170]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46

[171]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36

[172]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46

[173] "我对他从来没有强烈感情，"拿破仑死后，玛丽·路易丝写道，"但我不会忘记，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人们大都认为他待我恶劣，但事实远非如此，他总是对我表露最深敬意，只能期盼政治婚姻当事人做到这地步……我可以祝愿他长命百岁、幸福安康，只要他远离我。"Palmer，*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p.213.

[174]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p.36

[175] 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163

[176]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p.3

[177]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p.15，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p.163-4，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Ⅱ p.152

[178]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p.14

[179]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Ⅱ p.105

[180]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7，

Richardson，*Napoleon's Death* p.164，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Ⅱ p.105

[181]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1

[182]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Ⅱ p.11

[183]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p.116

[184] BNF NAF 25548

结语：拿破仑大帝

尤利乌斯·恺撒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军事家。

——温斯顿·丘吉尔论拿破仑

他曾是大智大勇之人。

——拿破仑论尤利乌斯·恺撒

邪恶精神：“……我的论点是，战争构造上佳历史，但和平读来乏味。于是我支持波拿巴，因为他能取悦后世。”

——托马斯·哈代，《列王》

何等统治者才能赢得“大帝”或“大王”之称？亚历山大、阿尔弗雷德、查理曼、彼得、弗里德里希、叶卡捷琳娜都是大人物，深深影响其所属时代的历史。然而，我们不费什么功夫就能想到影响同样深远、成就同样显赫的另一群人，如“红胡子”弗里德里希、英国国王亨利二世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与女王伊莎贝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查理曼之后、拿破仑之前，他统治的欧洲领土最多）、“太阳王”路易十四等，这些人确实在人性上往往更胜一筹（至少依今日标准看），但他们却无这种称呼。[1] 为何本书主角配得上“大帝”之称呢？

拿破仑·波拿巴是现代法国奠基人，一个时代也以他命名。1793年拿破仑来法国时，他几乎还是个一文不名的政治难民，仅仅六年后，他就靠军事政变上台。他其实是个军官，这一身份是他余生中的首要定位。大量文字论述他的科西嘉血统、他的小贵族出身、他汲取的启蒙思

想、古代世界赋予他的灵感，但布列讷军校与巴黎王家军校的教育甚至比上述因素更具影响力，他的大部分信念和设想也出自陆军思潮。军队既让他深深信奉实用智慧的重要性、以才能为基的等级制、法律与秩序、艰苦奋斗、勇毅身心，也令他厌恶自私的律师与政客。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是贵族，大革命见证了他满腔热忱地接纳了其早期信条，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激进民族主义。所有这些理念正好适合于他那些将有利于法国陆军的设想。相形之下，他又认为结果平等、无序社会、代议制政体、媒体自由（他认为这是鼓励煽动行径的许可证）与军事原则冲突。曾有短短一阵，他拥护雅各宾主义，即便在那时，他也不提倡平等主义。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身为深受军事思潮和气质熏陶的法军军官拿破仑崭露头角，证明自己对大革命有益，然后夺权，并维持统治。

拿破仑24岁时拜将。战果是评价任何将军的最终标准。拿破仑的征服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沦为屈辱的阶下囚，然而，他的军事生涯短暂却充实，终其一生，他一共打了60场战斗和围城战，仅仅输了7场：阿克会战、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莱比锡会战、拉罗蒂埃之战、拉昂之战、阿尔西之战、滑铁卢会战。拿破仑拥有非凡的战斗感觉和战场决策力。他的60片疆场中，我去过53处。当我走过战场时，他对地形的直觉、他判断距离和选择战场的精准度、他的时机感常常令我震惊。“战斗中某刻，最小的机动决定战局、赢来优势。”他写道，“正如洪峰起于滴水。”[2] 他当然从不对自己拥有作为一位军事领导人的才能缺乏信心。在圣赫勒拿岛上，有人问他，为何参观无忧宫时不拿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他回答：“因为我有自己的。”（事实上，他的确把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佩剑带至荣军院。）

七年战争中，法国落败，击败它的重要对手之一正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剑。从那以后，法国军事战略家与军事理论家思索如何改善法军步兵、骑兵与炮兵以及如何大大提高三个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他们提出

了很多重要观点。拿破仑深入钻研吉贝尔、格里博瓦尔、布尔塞、萨克斯元帅等人的著作，在战场上践行他们的思想。他没有发明营方阵、中央位置战略、混合队形、敌后机动乃至军系统这些理念，但他的确完善了它们。因为这些理念，他能打任何一种军事战斗，还能把几乎所有局势转化为对己方有利。单单是1796～1797年的意大利战局，他就不断钉住敌军，并击退其一股侧翼（他在蒙特诺特击退右翼、在罗韦雷托击退左翼），有时一并击退两翼，如蒙多维之战。他善于鼓励士兵攻上窄桥，如洛迪之战、阿尔科莱会战；他精于靠直觉从情报中判断形势，如马伦戈会战前；他长于追赶败退的敌军，如米莱西莫之战、普里莫拉诺之战。在洛纳托和里沃利，他阻止敌军进攻自己的后方，并成功反击。在卡斯蒂廖内，他用两个军包夹敌军，并攻击其后方。战局中可能产生各种战术形势，一代宗师（virtuoso）才会次次胜出，近二十年来，拿破仑的表现一向如此。事实上，1814年香槟战役中，他在五日内连续赢取四场独立的战斗，彰显了其最佳将才的一部分。

普遍征兵令造就了革命军，按照昔日标准，这支军队不仅非常庞大，而且焕发爱国热情。鼓舞军队需要至关重要的军旅精神，拿破仑自封皇帝后马上意识到，若想塑造军旅精神，他要动用超出纯粹革命品格的东西。于是，他迎合军人的荣誉观，激发他所谓的军事勇气的“神圣火焰”，如撰写宣言、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发布当日公告，最重要的则是创立荣誉军团。[3] 拿破仑设法融合旧王朝军队和革命军的元素，开创新型军事文化。这种文化受荣誉、爱国主义、对他本人的狂热个人崇拜鼓舞，指引他的军队穿过埃及沙漠，横渡欧洲大河，最终走向灾难之地——俄国冰冻荒原。

马伦戈战役和奥斯特利茨战役之间有五年和平时间，在此期间，拿破仑教授军队如何实施机动，此后很多战役中，他能靠这些机动获得出色的战果。因为皇家海军阻挠，他一直没机会率屯于布洛涅的英格兰军团侵英，尽管如此，军队连续操练三年，拔营东进时，士兵已经被训练

到完美地步。18世纪，军队带着大型辎重队，征收战役所需物资，因此士兵行军时蔚为壮观，但革命军及后来的拿破仑大军不同，他们靠分兵（限度受严格控制）来因地自给。于是，如果指挥官和拿破仑一样精力旺盛，那么法军行军速度和敌军的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拿破仑明白，当代战争（他的战争）赢在闪击敌人的野战军主力，所以他不会为了围城放慢脚步。凭借所知地形学与数学，他在土伦、耶拿、瓦格拉姆、蒙特罗等很多地方把炮兵运用到极致。哪怕看上去就要战败，他仍可镇定自若，并分析形势，有时甚至保持幽默感，如里沃利会战和瓦格拉姆会战。对拿破仑来说，其他指挥官可能视为潜在危机的事是个机会。举个例子，当他得在严重拉长的交通线末端战斗时（如奥斯特利茨会战和弗里德兰会战，但博罗季诺会战不在此列），暴露的战略位置似乎鼓励他采用更大胆的战术。拿破仑的将才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保持主动权。他的60场战斗中只有5次防御战（金字塔会战、马伦戈会战、阿斯佩恩-埃斯灵会战、莱比锡会战、拉罗蒂埃之战），其余的都是进攻战。

最重要的是，拿破仑行动迅捷，此乃个人性格。我们已经见识过下列记录：1807年7月，他在四天内从德累斯顿抵达圣克卢；1808年9月，他在五天内从巴黎抵达爱尔福特；1809年1月，他在六天内从巴利亚多利德抵达巴黎。拿破仑大军在穿越欧洲以及在战场上时，也往往快敌一步。1805年8月29日，英格兰军团撤营，到10月5日时，该军团已至多瑙河畔，开始包围乌尔姆城中的马克。二十天行军中，苏尔特军走了400英里，达武军不曾停留一整天，走了370英里。两军到达时，没有一人因开小差或患病脱队。“行动，行动，速度！”1809年4月，拿破仑致信马塞纳。这是他最典型的指挥方式，只有兵力太多导致他不能亲自监督每个方面时（如1812年俄国战局），军队才变得臃肿笨重，无法实施为他带来早年胜绩的大规模包围机动。拿破仑也没意识到敌人已从他身上学习良多。卡尔大公、巴克莱·德·托利、冯·沙恩霍斯特分别在奥地利、俄国、普鲁士主持深层次军事改革，他们既向拿破仑与其作战方式致

敬，也对他构成威胁，等他醒悟时已然太迟。1812年，欧洲所有军队都采用拿破仑的军系统，他们效仿此前赋予拿破仑大军优势的革新举措，有时甚至加以改进。

海洋是另一个关键领域，就此而言，拿破仑的问题在于他几乎一无所知。尽管他出生在海港，但他从没弄懂海军机动，甚至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后，他还相信能建立入侵舰队，有朝一日羞辱英国，结果他把太多太多财力、人力、物力砸进注定一败涂地的事业。然而，他的确是陆军天才。威灵顿公爵曾被问及谁是当代最伟大的统帅，难怪他如此回答："拿破仑，前无古人，今无匹敌，后无来者。"[4]

拿破仑算不上伟大的征服者，即便如此，他仍是近代史巨人，因为其政绩不输战绩，而且其政绩存续时间长得多。1794年7月，恐怖统治结束，可雅各宾派仍然强大，但是1795年10月，拿破仑在巴黎街头用葡萄弹扫射雅各宾派与葡月暴动中的其他反叛者，从此以后，雅各宾派在政界便黯然失色。法国人经历了恐怖统治与腐败混乱的督政府时代，大都渴望安稳的共和国，拿破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眼中的理想社会似乎只是超大型军队，而总司令是其军政统帅。"大革命的传奇已经结束，"某次参政院早会上第一执政说，"现在我们必须让它的历史开始。"[5] 18世纪，欧洲出现开明独裁者，他们首次建立理性政府，改善臣民生活。从很多方面看，拿破仑是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开明独裁者。歌德说，拿破仑"一直被理性启迪……永远处于开明状态"。[6] 他是马背上的启蒙者。

1804年，拿破仑自封"法兰西共和国皇帝"，表面上看这个概念自相矛盾，事实上它却切实刻画了其统治特征。他刻意仰赖并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最好层面，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性政府、精英政权。与此同时，他丢弃无法维系的十日一周制革命历，抛开荒唐的至上崇拜，并了结共和国衰亡时出现的腐败、任人唯亲、超级通货膨胀。精英政权、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财产权、宗教宽容、世俗教育、健全财政、高效政府等概念是巩固并激励现代民主政治的最佳理念，在十六年统治生涯中，拿破仑从大革命旋涡中挽救了很多这类概念，他把这些东西写入法典，并巩固它们。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拿破仑政权审查媒体，动用秘密警察（他们建立了效率较高的监视系统）。他举行全民公决，似乎给了法国人民政治发言权，但这些活动一般受人操纵。可他的确赢得了全民公决，就算他夸大了胜果。拿破仑不是极权独裁者，也没兴趣控制臣民生活的所有方面。他行使非常庞大的权力，但科西嘉族间复仇风俗并未驱使他变得暴虐无道、报复心切。富歇、缪拉、塔列朗等人不断背叛他，假如拿破仑变成了那种人，他几乎不会忍这么久。我们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政治因素致使拿破仑处决了多少人，即昂吉安、帕尔姆、霍弗、皮舍格吕（可能死于他之手）、卢维杜尔（实际上死于他之手），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原谅他在雅法屠杀土耳其战俘，也不能免除他试图重新征服圣多明各的责任，这两件事的残忍层面中定有种族因素（尽管他本人没参加圣多明各远征）。拿破仑的确一度在法属西印度群岛恢复奴隶制，但是1815年，他最终在法属殖民地全境废除了奴隶制。

1815年年末，法国被迫恢复前拿破仑时代的疆界，可是拿破仑重新构建的国家已然稳固，足以让波旁王朝无法在复辟后逆转局面。于是，他的很多内政改革措施存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拿破仑法典》为现代欧洲的大量法律奠定了基础，在五片有人口定居的大陆上，都有国家（一共40个）移植法典各方面的内容。他在塞纳河上架桥，修筑水库、运河、阴沟，这些工程今天仍发挥效用；他沿塞纳河修建长2.5英里的石砌滨河路，如今，法国外交部位于这条路的某段之上；他设立审计院（Cour des Comptes），两个多世纪后，它依然检查公共开支记录。中学继续提供优质教育。参政院仍在每周三开会，以便审查法国的法律议案。拿破仑自夸道，他扔下“花岗巨岩”，支撑法国社会，这些“花岗巨岩”传承至今。有人向拿破仑的母亲道贺，称赞其子的成就，她回答：“但愿长久！”（Mais pourvu que ça dure！）[7] 的确长久。

1792年，法国成了革命急先锋，一心向欧洲其他地区输出大革命的价值和理念。欧洲君主根本不吃这一套，于是他们组成七个反法同盟中的第一个，从而抵御侵蚀。拿破仑正是继承了这些战争，凭借其军事能力，他一度赢取胜利结局。一百四十年前，英国已经发生了政治革命，所以它享受大革命带给法国的种种利益。拿破仑先是谋划侵英，然后试图靠经济战绞杀英国、迫使它臣服。不出所料，这些威胁举动必然导致英国历届政府决心推翻他。同样不出所料的是，统治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的王朝也不愿接受他提出的媾和条件。因此，拿破仑被宣战的频率远远高于他主动宣战的频率：1800年，奥地利对法宣战；1803年，英国对法宣战；1805年，奥地利入侵法国盟友拜恩；1806年，普鲁士对法宣战；1809年，奥地利对法宣战。1807年和1808年，法军分别攻击葡萄牙和西班牙，1812年，法军侵略俄国，这些战事的确是拿破仑挑起的，因为他想贯彻大陆体系（不过正如我们所知，1812年，沙皇也在计划进攻他），可是1813～1815年的敌对状态全是出于别国对他宣战。他在每次敌对状态前求和，事实上，从1803年《亚眠条约》废止到1812年，他至少四次给英国送去不同的求和提议。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一共牺牲了约300万名军人与100万名平民，法国人占到140万（帝国时期，死者有91.6万人，其中战死者不足9万）。[8] [9] 拿破仑自然必须为这些死亡负重责。“要是某人永远考虑人性、只考虑人性，”拿破仑曾说，“他就别打仗了。我不知道怎么靠多愁善感的计划作战。”但他不能被指控为那个时代唯一的战争贩子，甚至不能被指控为首要的战争贩子。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15年滑铁卢会战的这一百多年中，几乎有一半时间英法都在打仗，而革命战争爆发时，拿破仑只是个中尉。

“国际秩序有两种建立方式，”亨利·基辛格论及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时道，“一是通过决心与征服建立，二是通过弃权与正统建立。”[10] 拿破仑只能选择决心与征服，并遵循此径。他夸口道，自己“属于开创帝国的种族”，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部中反复所见，他非常清楚其政权合法性有赖于维持欧洲境内的法国势力，有赖于他所谓的他的荣耀、

法兰西的荣耀。1810年或1812年时，拿破仑的实力强劲，但他明白，他征服的土地尚未历经足够时间，还不能赋予他的政权正统地位。一些杰出历史学家断定，拿破仑帝国根本不能维系，因为它的性质是殖民帝国，而一个欧洲民族无法长期统治另一个欧洲民族。可是，土耳其人统治了希腊363年，西班牙人统治了荷兰158年，奥地利人统治了北意大利与荷兰80年。“化学家能用一种粉末制成大理石，”拿破仑说，“但它需要时间来固化。”[11] 假如他没有犯下一些关键的军事错误，他的欧洲秩序很可能稳固下来：涅曼河与英吉利海峡分别是帝国两界，奥地利是不情愿的盟友，普鲁士是一蹶不振的附庸国，拿破仑的内政改革或许也能在法国境外扎根。然而，从1810年开始，欧洲旧王朝君主（梅特涅灵活地指点他们，塔列朗暗中鼓励他们，卡斯尔雷资助他们）动用一切力量驱逐他。[12] 拿破仑倒台后，正统政权再度强行实施明显更保守的统治，这种治国方式最终被大革命催生的民族主义推翻。19世纪，普鲁士统治了德意志，然后它把自己的秩序强加给欧洲大陆。普鲁士政权远远不及拿破仑的温和，其欧洲秩序最终瓦解。假如在那个年代，开明的法国统治欧洲，有谁能说情况会更糟呢？

最后，拿破仑有魅力。现在拿破仑基金会郑重提供33000封信，本书即以此为基。这些信是出色证言，证明他思绪宽广。他和天文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的通信说明，他尊重他们的研究，还能参与其中，鲜有政客能做到这一点。“我不停工作，经常沉思，”1809年3月，皇帝告诉勒德雷尔，“假如我看上去总能备好一切答案、满足一切要求，那是因为我动手前已沉思许久，并预见到可能发生什么。在别人没料到的场合，突然悄悄告诉我如何说话、如何行事的不是天才，而是反思和沉思。”[13] 拿破仑相当聪明，他治理国家时不断运用自己的智力，就此而言，他很可能是史上无人能及的统治者。

拿破仑划分生活的能力达到了非凡水平，甚至远远超出大部分伟大领袖。他可让脑海中某区域同其余区域的思绪完全隔离，他自己把这比

作开关橱柜抽屉。[14] 博罗季诺会战前夕，副官们来来往往，一会儿给元帅送去命令，一会儿捎来将军的报告，而他还能口述为荣誉军团成员遗孤建立女子学校的设想。他占领莫斯科后，很快制定法兰西喜剧院新管理规章。他拥有不知疲倦、刨根究底的精力，所以对他来说，帝国上下没有一处太渺小的细节。他指示某省长别带年轻情妇去观剧，批评默默无闻的某乡村神父在皇帝生辰日不好好布道；他警告某下士，称对方喝了太多酒；他告诉某半旅，他们可在军旗上绣金字“无双”。从拿破仑的信件和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充满魅力，间或坦率地评价自己，并具备一种极好的幽默感，使他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开玩笑，哪怕正面临灾难。熟悉他的人提供无数证言，佐证其人格魅力与无尽精力。他可能失态，有时其怒火会如火山爆发，但他发火常常事出有因。拿破仑亦有缺陷：他偶有冷酷无情之时，但这种状态绝不会一直持续；随着年岁渐长，他越发自恋，也愈发质疑人性。拿破仑自然野心勃勃，但他具备非凡的精力、管理能力、看上去近似照相机的对人和资料的记忆力、训练有素又机敏深刻的头脑、对法国可获成就与如何规划欧洲的清晰思绪，如果算上这些，我们就不应该对其野心感到惊讶了。拿破仑废黜了弟弟路易的荷兰王位，就连后者最后也说：“拿破仑需要克服困难，并对抗无数内奸外敌，各种陷阱包围了他。他一直紧绷思绪，从不停止行动，还得应付超常疲惫感。假如我们回顾这一切，批评之声就会立刻融于仰慕之情。”[15]

拿破仑所受批判中最常见的是：他决定在1812年侵俄，当时他患有某种“拿破仑情结”（Nepoleon Complex），也就是说，不管牺牲多少臣民与士兵，他也要实现统治世界的傲慢愿望。然而，他并不渴求俄国领土，他只是想强迫沙皇践行五年前在蒂尔西特做出的实施经济封锁的承诺。他自信能取胜，事后诸葛亮或许认为他目中无人，但他的自信也没到那地步：他曾经两次大败俄军；他原计划最多打一个月，没想过深入敌境；他的兵力远远超出俄军西方第一军团的两倍；他以为沙皇会求和，根本没料到俄国人会实施如此严格的焦土防御，以至于自己烧掉莫

斯科；战争爆发后、斑疹伤寒开始摧毁其中央军队后，他经常考虑停在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等地；进入莫斯科后，他立刻非常在意俄国的凛冬，在冬季变得不可忍耐前，他留出足够时间让部队返回斯摩棱斯克营地。拿破仑制定了成千上万的军事决策，可是1812年10月25日晚上的决定毁灭了他。

所以说，虽然效仿古希腊戏剧的某当代剧作以及强加给拿破仑的数十篇历史解读都认为他是注定受天罚的怪物，但他不是那种生物。事实正相反，决定论者分析历史时用庞大的客观力解释事件，淡化个人作用，而拿破仑的人生和履历批判了他们。我们应该认为这一点振奋人心，因为正如皇家海军军舰“柏勒洛丰号”上的见习船员乔治·霍姆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告诉了我们，像我们一样的渺小个人在短短一生中能成就什么。”[16]

拿破仑可称大帝吗？当然。

---

[1] 不过，伊丽莎白·詹金斯为伊丽莎白一世写了本不错的传记——《伊丽莎白大王》。

[2] Henri Plon，*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 ，1858，32 p.82

[3]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

[4] Longford，Elizabeth，*Wellington*：*Pillar of State* 1972，p.413

[5]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Ⅰ p.266

[6] Horne，Alistair，*The Age of Napoleon* 2004，p.52

[7] Hazareesingh，Sudhir，‘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February 12，2005

[8] 大部分欧洲军队中，病死者多于战死者。事实上，1793～1815年，皇家海军有6663人战死，另有13621人死于沉船、火灾，抑或溺毙。此外，病死者特别多，达72102人，他们大都死在西印度群岛。

[9] Gates，David，*The Napoleonic Wars 1803-1815* 1997，p.272

[10] Kissinger，Henry，*A World Restored* 1957，p.172

[11]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p.93

[12] 君主们谴责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此言自然纯属虚伪之辞。英国在全球特别是亚洲大肆扩张。叶卡捷琳娜大帝、弗里德里希大王、约瑟夫二世都试图拓展其欧洲领土，人们对这一切记忆犹新。这些征服者的继承人本身并不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只是反对成为输家。

[13] Lt-Col Pierron，'Les Methodes de Guerre Actuelles'（Paris 1878），*RUSI Journal* vol.23，no 99 1879

[14] *Quarterly Review* 1833 pp.179-84

[15]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 1829，p.39

[16] 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p.223

尾声

1815年6月，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来，维也纳会议亦于同年结束。此后，大国联合起来，共同压制欧洲人民要求自由宪法和民族自决的呼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其统治方式越发趋向神秘与专制。1825年，沙皇去世，他生前一直镇压那不勒斯、希腊和德意志的自由派起义。奥皇弗朗茨一世越发依赖梅特涅。他收回了奥地利的古老领土，建立保守的神圣同盟（Heilige Allianz），但再未重建神圣罗马帝国。1835年弗朗茨去世，享年67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亦变成顽固保守分子，1813年他承诺制定普鲁士宪法，日后却忽视诺言。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梅特涅仍然在欧洲外交舞台上扮演主角，维持维也纳会议确立的均势体系，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彼时他被迫乔装成洗衣妇，逃出维也纳。1859年，梅特涅去世。庇护七世也转而反对启蒙运动，《维也纳条约》把教皇国还给他后，他便在教皇国重塑专制主义。1823年，教皇去世。1820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迫接受自由宪法。1823年，西班牙人民把费迪南德赶下台，法国又帮他复位。由于他渴望复仇，事后他疏远了法国。1833年，费迪南德七世去世，无人哀悼。

1815年，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多亏了拿破仑的法律与政治改革，波旁家族无法重建旧日的统治方式。路易十八的弟弟、保守分子阿图瓦伯爵试图阻挠任何民主化的让步，自由宪政派则推动法国效法英国，从而实施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八在位时，他一直设法在两派之间行事。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阿图瓦伯爵继位，是为夏尔十世。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夏尔十世倒台，更温和的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

夏尔的表弟）登基。夏尔流亡国外，1836年，他在意大利身亡，顽固保王党人的愿望随之破灭。

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的家人大都住在罗马，受教皇保护，其母莱蒂齐娅亦然，她和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费施在此隐居。莱蒂齐娅85岁时已失明，她缩在扶手椅里，向女伴罗莎·梅利尼（Rosa Mellini）口述回忆。“人人都说我是世上最幸福的母亲，”她说，“但我的人生一直悲伤痛苦。”1836年2月，莱蒂齐娅逝世。三年后，费施在绝妙的艺术藏品之中过世。他把其中很多藏品捐给了阿雅克肖市和里昂市。路易继续在罗马追求文学事业，但1840年，他化名后造访荷兰，而昔日的臣民认出路易，向他欢呼。1846年7月，路易在里窝那去世。路易的妻子奥尔唐斯和他长期分居，1817年，她在瑞士买下阿雷嫩贝格城堡（chateau of Arenenberg），此后一直住在那儿。1837年10月，奥尔唐斯去世，享年54岁。后来，她和弗拉奥将军的私生子被拿破仑三世封为莫尔尼公爵。洛伊希滕贝格公爵欧仁·德·博阿尔内同妻子和7个孩子平静地生活在慕尼黑，他的一个女儿日后成了巴西皇后。1824年2月，欧仁过世。1823年，他的另一个女儿约瑟芬公主嫁给贝纳多特之子、瑞典王储奥斯卡（Oscar）王子。约瑟芬与奥斯卡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娶了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kolai I）之女。

滑铁卢之战后，吕西安被捕，但他获准在教皇国隐居。1840年6月，吕西安去世，留下两次婚姻的结晶——11名子女。约瑟夫住在新泽西州博登敦，长达十六年，他自称叙维利耶（Survilliers）伯爵。1820年，他明智地拒绝了墨西哥王位。约瑟夫曾在英格兰萨里郡（Surrey）短暂居住。他成功捍卫了二弟的名誉。1844年7月，约瑟夫在佛罗伦萨过世。1816年，热罗姆在流亡地的里雅斯特定居。他自称蒙福尔（Montfort）伯爵，但一直认为自己是君主。1847年，热罗姆返回法国。1850年，他成为荣军院院长，后来又担任元老院议长。1860年，热罗姆去世。缪拉被处决后，卡罗琳·缪拉再婚，此后她一直住在佛罗伦

萨，并使用自封头衔利波那（Lipona，这个词是“Napoli”倒过来）伯爵夫人。1839年5月，卡罗琳过世。波利娜声称，哥哥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她正要去圣赫勒拿岛。卡米洛·博尔盖塞已经和一个情妇交往了十年，但他仍允许波利娜搬回他在佛罗伦萨的房子，三个月后，即1825年6月，波利娜去世。（博尔盖塞被卷入波拿巴分子的阴谋，直到1832年他过世。）

荷兰国王路易的三个儿子中，夏尔-路易-拿破仑（Charles-Louis-Napoléon）最小。1831年，夏尔参加意大利革命；1836年，他试图从斯特拉斯堡入侵法国；1837年，他造访美国；1840年，他又想入侵法国，结果被捕，但他在1845年越狱。1848年，夏尔凭借990万张赞成票当选总统。1851年，他实施政变，成为皇帝拿破仑三世。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1873年，他死在流放地。所以说，1796年时始于阿雅克肖的帝国时代历经104年，在肯特郡（Kent）的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灰飞烟灭。拿破仑三世生前一直佩戴叔叔赠给外祖母约瑟芬的婚戒。

拿破仑去世后过了四个月，玛丽·路易丝与庶民奈佩格缔结婚姻。在拿破仑死前，他们已有两个私生子女，后来他们又添了一个婚生孩子。1829年，奈佩格去世，然后玛丽·路易丝嫁给邦贝勒（Bombelles）伯爵。从1814年起，她统治过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特拉。1847年12月，玛丽·路易丝去世。

拿破仑的孩子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马尔蒙教导罗马王、赖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二世，他试图让学生憎恨其父，未能成功。罗马王加入奥军，但1832年7月22日，他在美泉宫死于肺结核，年仅21岁。罗马王的模制遗容今展示于罗马拿破仑博物馆（Museo Napoleonica）。1940年，阿道夫·希特勒欲促进奥地利与法国维希政府的友谊，遂把罗马王的遗体运至荣军院。玛丽·瓦莱夫斯卡去世时，其子亚历山大·瓦莱

夫斯卡伯爵只有7岁，但亚历山大的叔父、某法军军官让他接受了良好教育。他加入外籍兵团，征战北非，后任驻伦敦大使。在职期间，亚历山大安排了堂兄拿破仑三世的访英之旅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访法之旅。亚历山大还当选立法院议长。1868年，他在斯特拉斯堡死于心脏病，享年58岁。拿破仑曾与埃莱奥诺尔·德努埃勒·德·拉普莱涅生下莱昂伯爵夏尔·德努埃勒（Charles Denuelle），他长大后特别像生父，以至于街上行人都会盯着他看。奥尔唐斯曾送给莱昂一枚纽扣，1832年2月，他和威灵顿的传令兵决斗，认为这枚纽扣救了他一命。莱昂后来成了喜欢争吵的酗酒浪子，拿破仑三世替他偿债，给他津贴，但他仍因贫困患上胃癌。1881年4月，他在蓬图瓦兹（Pontoise）病逝。1812年战局中，莱昂的母亲守寡了。1814年，她嫁给夏尔-埃米尔-奥古斯特-路易·德·吕克斯堡（Charles-Émile-Auguste-Louis de Luxbourg）伯爵，两人一直相伴，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去世。1868年，埃莱奥诺尔过世。

再看拿破仑的元帅们。1835年，某次阅兵式上发生爆炸，导致莫尔捷等12人身亡。凶手是一名心怀不满的意大利人，他本想刺杀路易-菲利普国王。在莫尔捷的葬礼上，国王落泪。达尔马提亚公爵让-德-迪厄·苏尔特流亡德意志，他在那一直待到1819年，但他后来成了波旁王朝的大臣以及路易-菲利普的首相、战争部长。出任战争部长期间，他奉行改革。1838年，苏尔特代表法国出席维多利亚女王加冕礼，威灵顿设宴为他庆祝。1851年，苏尔特去世。1818年，贝纳多特继承瑞典王位，此后一直统治该国。1844年，贝纳多特过世，他的后代至今仍是瑞典君主。儒尔当元帅不肯加入审判奈伊的军事法庭，但1819年，他加封伯爵，并进入上院。他支持1830年革命，三年后去世。拉古萨公爵马尔蒙曾是罗马王的短期教师。1852年，马尔蒙去世，在拿破仑的元帅中，他是最后一个辞世的。马尔蒙死后，他的回忆录出版，某个评论者把他比作“一位神枪手，躲在自己的墓碑后，冲那些无法回击的人开火”。

然后是拿破仑昔日的大臣们。第二次复辟时期，让-雅克-雷吉斯·德

·康巴塞雷斯逃往布鲁塞尔，但他在1818年获准回国，此后他过着非常舒适的退隐生活。1824年，康巴塞雷斯去世。复辟时期，路易-马蒂厄·莫莱就任路桥总长，后改任海军大臣。在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他成了外交大臣，并且在1836～1839年出任首相。1855年，莫莱过世。路易十八将阿尔芒·德·科兰古列入危险分子名录，而沙皇亚历山大说服国王抹去了他的名字。1827年，科兰古去世。路易-菲利普封巴萨诺公爵于格·马雷为法国世袭贵族，1834年，他当了八天法国首相。1839年，马雷逝世。1828年，勒内·萨瓦里出版了八卷本回忆录。1831年，他曾短暂出任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在职期间，他显得非常冷酷。1833年，萨瓦里去世。

拿破仑死后，圣赫勒拿岛上的班子迅速解散。亨利·贝特朗返回巴黎，入住尚特雷纳街上拿破仑和约瑟芬的旧宅。1844年1月，贝特朗去世。1840～1846年，蒙托隆伯爵和拿破仑三世一同在哈姆监狱（Ham prison）服刑。蒙托隆曾伴三世的叔父度过六年，现在又陪了他六年。1853年8月，蒙托隆在巴黎过世。阿尔比娜·德·蒙托隆早已和丈夫分居，她待在布鲁塞尔，继续与巴兹尔·杰克逊欢好。1848年3月，阿尔比娜的孙辈们举办舞会为她庆祝，她在舞会上逝世。1823年，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出版四卷本《圣赫勒拿回忆录》。终其一生，他不断发布修订版。1831年，他当选下院议员。1842年，拉斯卡斯过世。路易·马尔尚在欧塞尔过上了舒适生活，并撰写回忆录。1822年，贝琪·巴尔科姆嫁给查尔斯·埃布尔（Charles Abell），他日后抛弃了她。贝琪带着他们唯一的孩子搬到澳大利亚悉尼，但她后来回到伦敦教音乐。她出版回忆录时，拿破仑三世授予她阿尔及尔（El Djazaïr）的土地，但她选择留在伦敦。1871年，贝琪在伦敦去世。1825年，弗朗切斯科·安托马尔基出版《拿破仑的最后时刻》。1833年，他试图出售拿破仑的模制遗容副本，但这些东西应当属于弗朗西斯·伯顿（Francis Burton）医生，所以他因制作人身份问题被诉。安托马尔基在其墓碑上刻下墓志铭：“为皇帝和穷人服务的意大利医生。”拿破仑死后，赫德森·洛爵士离开圣赫勒拿

岛。1825～1830年，他在锡兰指挥英军，但未就任锡兰总督。1844年1月，洛爵士过世，享年74岁。1836年6月，维尼亚利医生在科西嘉岛的家中被谋杀。

接下来是拿破仑的其他追随者。1815年，夏尔·勒菲弗-德努埃特将军负伤，后移居美国。1822年，勒菲弗-德努埃特回国，但他所乘船只中途失事，导致他溺毙。让·拉普成了议员，代表上莱茵省（Haut-Rhin），后来他出任路易十八的司库。1821年10月，拉普去世。1815年后，雅克-路易·大卫在布鲁塞尔定居，再度描绘古典题材。1825年，大卫逝世。安托万-让·格罗发现，他的新古典风格历史画作越来越不好卖。1835年，格罗过世。鲁斯塔姆最后穿上马穆鲁克戏装，在伦敦表演节目。1845年12月，鲁斯塔姆去世，享年65岁。1827年，克洛德-弗朗索瓦·德·梅纳瓦尔出版回忆录。1840年，他参加了拿破仑遗体迁回巴黎的典礼。1850年，梅纳瓦尔在巴黎过世。1812年，奥克塔夫·塞居尔在俄国受伤，然后被俘。他活了下来，并于战后回国。1818年，塞居尔发现妻子不忠，遂投塞纳河自尽。

拿破仑的数名敌人与诋毁者落得悲惨的下场。1829年，路易·德·布列纳出版了恶毒回忆录，诬蔑拿破仑。1834年，他在卡昂疯人院去世。1838年，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洛尔贫病交加，死在租来的破房子里，享年54岁。1822年8月12日，卡斯尔雷勋爵用小折刀割喉自杀。激进诗人庆祝此事，但英国失去了它最伟大的外交大臣之一。

拿破仑的其他敌人结局如下。波旁王朝治下，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多次出任大臣和大使，但他一直反对路易·菲利普，给对方起了绰号“资本家国王”。1848年，夏多布里昂逝世，其遗著《墓后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 ）痛斥拿破仑，骂他是暴君，就处决昂吉安公爵一事，此书骂得格外厉害。1830年，波旁王朝被推翻，邦雅曼·康斯坦就任参政院参政，但那年他过世了。保罗·巴拉斯曾见波旁人士没

收康巴塞雷斯的身后文件。1829年1月29日晚上11点，巴拉斯去世，当日早些时候，他把教子保罗·格朗（Paul Grand）叫来床边，将回忆录托付给对方。次日，当局来清理巴拉斯的文件，但他们来得太迟了。由于各种私人与法律原因，直到19世纪80年代，巴拉斯回忆录才出版，结果这本书充斥着诽谤之词，以至于没多少史料价值。1837年，伊波利特·夏尔将死，他在病榻上要别人烧掉约瑟芬的来信，只有5封信保存下来。卡尔·冯·施瓦岑贝格满载荣誉与勋章，但他在1817年患上中风。三年后，施瓦岑贝格造访莱比锡战场，出席莱比锡会战七周年纪念典礼，可是他的中风复发了。10月15日，施瓦岑贝格逝世。1840年，西德尼·史密斯爵士葬于拉谢斯公墓，其棺椁裹着英国国旗。三篇致他的颂文皆出自法国人之手。史密斯曾在阿克逆转拿破仑的命运，他虽是荣誉军团成员，但军团没给他派去传统仪仗队。

贝内文托亲王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的一名助手说，拿破仑之死是“事件”，他批评了对方，说此事不过是“消息”。塔列朗继续侍奉一切愿意接纳他的政权，他是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与高级侍从，1830年革命后他是路易-菲利普的驻伦敦大使。1838年，塔列朗去世，当时国王守在他床边，巴黎红衣主教给他行临终涂油礼。

威灵顿公爵听说拿破仑死了，便对友人阿巴思诺特（Arbuthnot）夫人说：“现在我也许能说，活着的将军里我最成功。”他和拿破仑的两个情妇——朱塞平娜·格拉西尼与乔治小姐——风流。1828～1830年，威灵顿当上首相，他干了两年，政绩平平。1852年，威灵顿去世，享受了对他来说非常当之无愧的国葬大典。1840年，威灵顿听闻拿破仑迁葬巴黎的盛大场面，他评论道，“迟早有一天，法国一定会让此事变成对英国的胜利”，但就他个人而言，“我他妈一点也不在乎！”

参考文献

著作

关于拿破仑的参考文献出了名的多。打着他的名头出版的图书数量比自他死后已经过去的天数更多。我的个人网站（www.andrew-roberts.net）上有我写作本书时参考的所有书籍，但限于版面原因，我只在这份参考文献中列出自己引用过的作品。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的书都是在伦敦或巴黎出版的。

有拿破仑签名的33000封信全部收录进了拿破仑基金会从2004年起出版的*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这一出版事业是拿破仑时代学术研究的里程碑，它既是不朽的，又是无价的。本书引用*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时将它写为“CG”，以下是引用过的卷册的编号：

Ⅰ ed. Lentz，Thierry，*Les Apprentissages 1784-1797* 2004

Ⅱ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Égypte et l’Avènement 1798-1799* 2005

Ⅲ ed. Lentz，Thierry，*Pacifications 1800-1802* 2006

Ⅳ ed. Houdecek，François，*Ruptures et fondation 1803-1804* 2006

Ⅴ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Boulogne*，*Trafalgar*，*Austerlitz 1805* 2008

Ⅵ ed. Kerautret，Michel，*Vers le Grand Empire 1806* 2009

Ⅶ eds.Kerautret，Michel and Madec，Gabriel，*Tilsit*，*l’Apogée de l’Empire 1807* 2010

Ⅷ ed. Madec，Gabriel，*Expansions méridonales et résistances 1808-Janvier 1809* 2011

Ⅸ ed. Gueniffey，Patrice，*Wagram Février 1809-Février 1810* 2013

Ⅻ ed. Lentz，Thierry，*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2012

本书引用由Henri Plon编辑、于1858年出版的拿破仑通信集*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I er* 时将它写为“CN”。

Adams，Henry，*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967

Adams，Michael，*Napoleon and Russia* 2006

Adkin，Mark，*The Waterloo Companion* 2001

Adlerfeld，Gustavus，*The Military History of King Charles* Ⅶ *of Sweden* 3 vols.1740

ed. Ainé，Desgranges，*Histoire de l’expédition des français en Égypte* 1839

Albermarle，Earl of，*Fifty Years of My Life* 2 vols.1876

Albion，Robert Greenhalgh，*Forests and Sea Power* 1927

Aldington，Richard，*Wellington* 1946

Alexander，Robert S.，*Bonapartism and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France* 1991 *Napoleon* 2001

Alison，Sir Archibald，*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vol.1 1843

Allison，Charles W.，*Ney* （Charlotte，NC）1946

eds.Ambrose，Douglas and Martin，Robert W.T.，*The Many Faces of Alexander Hamilton* （New York）2006

Anonymous，*Copies of Original Letters from the Army of General Bonaparte in Egypt*，*Intercepted by the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Admiral Lord Nelson* 3 vols.1798，1799 and 1800

The Concordat Between His Holiness Pope Pius Ⅶ *and Bonaparte Chief Consul to the French Republic* （Dublin）1802

A Short View of the Causes Which Led to and Justified the War with France 1803

The Atrocities of the Corsican Daemon，*or*，*a Glance at Buonaparte* 1803

Description des cérémonies deset des fêtes qui ont eu lieu pour le coronnement de leurs majestés 1807

An Exact and Impartial Account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Which have Occurred in Aranjuez，*Madrid and Bayonne* 1808

Relation de la bataille de Mont St Jean par un Temoin Occulaire 1815

Napoleon’s Appeal to the British Nation on His Treatment at St Helena 1817

A Review of Warden’s Letters from St Helena Containing Remarks on Bonaparte’s Massacres at Jaffa and El Arish （Boston）1817

The Battle of Waterloo （New York）1819

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27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Philadelphia）1845

Antommarchi，Francesco，*The Last Days of Napoleon* 2 vols.1826

ed. Appleton，D.，*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

Arnault，A.V.，*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Boston）1833

ed. Arnold，Eric，*A Documentary Survey of Napoleonic France* （Maryland）1994

Arnold，James，*Crisis on the Danube* 1990

Arnold，James R. and Reinertsen，Ralph R.，*Crisis in the Snows* 2007

Ashby，Ralph，*Napoleon against Great Odds* 2010

Ashton，John，*English Caricature and Satire on Napoleon* Ⅰ 2 vols.1884

Assier，Alexandre，*Napoléon* Ⅰ *à l’École Royale Militaire de Brienne*

1874

Atteridge，A.H.，*Marshal Ney* 2005

Aubry，Octave，*St Helena* 1936

Aulard，François，*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

Austin，Paul Britten，*1812* 2000

Authority，*Preliminary Articles of Peace between His Britannick Majesty and the French Republick* 1801

Babbage，Charles，*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 1830

Balcombe，Betsy，*To Befriend an Emperor* 2005

Baldet，M.，*La vie quotidienne dans les armées de Napoléon* 1964

ed. Baldick，Robert，*The Memoirs of Chateaubriand* 1961

Barbé-Marbois，François，*History of Louisiana* 1829

Baring-Gould，S.，*Th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97

Barnett，Correlli，*Bonaparte* 1978

Barral，Georges，*Histoire des sciences sous Napoleon Bonaparte* 1889

ed. Barrès，Maurice，*Memoirs of a French Napoleonic Officer*：*Jean-Baptiste Barrès* 1988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François de，*Private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Napoleon* （Philadelphia）1828

Bell，David A.，*The First Total War* 2007

ed. Bell，Nancy，*Memoirs of Baron Lejeune* 2 vols.1897

Benbassa，Esther，*The Jews of France* （Princeton）1999

Bergeron，Louis，*France Under Napoleon* （Princeton）1981

Berlier，Théophile，*Précis de la vie politique de Tbéophile Berlier* 1838

Bertaud，Jean-Paul，*Bonaparte prend le pouvoir* 1987

La France de Napoléon 1987

Le duc d'Enghien 2001

Quand les enfants parlaient de gloire 2006

Berthier，Louis-Alexandre，*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

Relation des campagnes du Général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801

Bertrand，Henri-Gratien，*Cahiers de Sainte-Hélène* 3 vols.1951

Napoleon at St Helena 1952

ed. Bertrand，Pierre，*Lettres de Talleyrand à Napoléon* 1889

Beslay，Charles，*Mes souvenirs* 1873

ed. Bierman，Irene A.，*Napoleon in Egypt* 2003

Bigonnet，M.，*Coup d'état du dix-huit Brumaire* 1819

ed. Bingham，D.A.，*A Selection from the Letters and Despatches of the First Napoleon* 3 vols.1884

Blackburn，Julia，*The Emperor's Last Island* 1991

Blaufarb，Rafe，*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2002

Blaze，Captain Elzéar，*Life in Napoleon's Army* 1995

Blond，Georges，*La Grande Armée* 2005

Bluche，Frédéric，*Le plébiscite des cent jours* （Geneva）1974

eds.Bogle，James and Uffindell，Andrew，*A Waterloo Hero* 2013

Boigne，Countess de，*Les 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de Boigne* 1999

Boissonnade，Euloge，*18 Brumaire An* Ⅶ 1999

Bonaparte，Caroline，*Memoirs* （New York）1910

Bonaparte，Jérộme，*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du Roi Jérome et de la Reine Catherine* vol.Ⅶ 1866

Bonaparte，Joseph，*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10 vols.1855

Bonaparte，Louis，*A Reply to Sir Walter Scott’s History of Napoleon*（Philadelphia）1829

Bonaparte，Lucien，*Memoirs of Lucien Bonaparte*，*Prince of Canino* 2009

Bonaparte，Napoleon，*The 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of Napoleon Bonaparte with his Brother Joseph* 2 vols.1855

Supplément à la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l er 1887

Boswell，James，*An Account of Corsica* 1769

Boudon，Jacques-Olivier，*Le roi Jérộme* 2008

Les habits neuf de Napoléon 2009

ed. Boudon，Jacques-Olivier，*Napoléon et les lycées* 2004

Boulay de la Meurthe，Count F.J.，*Boulay de la Meurthe* 1868

Bourgogne，Adrien，*Memoirs of Sergeant Bourgogne* 1929

Bourgoing，Chevalier，*Quelques notices sur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Buonaparte* 1797

Bourne，George，*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onaparte*（Baltimore）1806

Bourrienne，Louis-Antoine Fauvelet de，*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36

Bowden，Scott，*Napoleon’s Grande Armée of 1813* 1990

Bowle，John，*Napoleon* 1973

Boycott-Brown，Martin，*The Road to Rivoli* 2001

Branda，Pierre，*Le prix de la gloire* 2007

Napoléon et ses hommes 2012

Branda，Pierre and Lentz，Thierry，*Napoléon*，*l'esclavage et les colonies* 2006

Bredin，Jean-Denis，*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bicentenaire de 1804 à 2004* 2004

eds.Brenner，Michael，Caron，Vicki and Kaufmann，Uri R.，*Jewish Emancipation Reconsidered* 2003

Brett-James，Antony，*Europe Against Napoleon* 1970

ed. Brett-James，Antony，*The Hundred Days* 1964

Eyewitness Accounts of Napoleon's Defeat in Russia （New York） 1966

Brice，Raoul，*The Riddle of Napoleon* 1937

ed. Brindle，Rosemary，*Captain Joseph-Marie Moiret* 2001

Guns in the Desert 2002

With Napoleon's Guns 2005

Campaigning for Napoleon：*Maurice de Tascher 1806-1813* 2006

Broers，Michael，*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 1996

Napoleonic Imperialism and the Savoyard Monarchy 1997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in Italy 2002

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2005

Napoleon's Other War 2010

ed. Broglie，Duc de，*Memoirs of the Prince de Talleyrand* 1891

Brookner，Anita，*Jacques-Louis David 1980*

Brown，Howard G.，*War*，*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1995

End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2006

Brown，Peter Hume，*Life of Goethe* 2 vols.1920

Browning，Oscar，*Napoleon*，*the First Phase* 1895

ed. Browning，Oscar，*England and Napoleon in 1803*，*the Despatches of Lord Whitworth* 1887

Bruce，Evangeline，*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95

Brunyee，Paul F.，*Napoleon's Britons and the St Helena Decision* 2009

Bruyere-Ostells，Walter，*Leipzig* 2013

Buckland，C.S.B.，*Metternich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1809 to 1813* 1932

ed. Bulos，A.，*Bourrienne et ses erreurs voluntaires et involuntaires* 2 vols.1830

Burdon，William，*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Bonaparte* 1804

Burrows，Simon，*French Exile Journal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 1792-1814* 2000

ed. Butler，A.J.，*The Memoirs of Baron Thiébault* ， 1896

Butterfield，Herbert，*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1806-1808* 1929

ed. Caisse，A.du，*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Prince Eugène* 10 vols.1858-60

ed. Calmettes，Fernand，*Mémoires du Général Thiébault* vol.Ⅴ 1895

Campbell，Neil，*Napoleon at Fontainebleau and Elba* 1869

Carnot，Lazare，*Reply of L.N.M.Carnot* 1799

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militaires sur Carnot 1824

Carpenter，Kirsty，*Refuge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Émigrés in London 1789-1802* 1999

eds.Carpenter，Kirsty and Mansel，Philip，*The French É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evolution 1789-1814* 1999

Cartwright，Frederick and Biddiss，Michael，*Disease and History*

1972

ed. Castellane，Boniface de，*Journal du Maréchal de Castellane* vol.1 1896

Castelot，André，*La Campagne de Russie* 1991

ed. Castle，Alison，*Stanley Kubrick's Napoleon* 2009

Cate，Curtis，*The War of the Two Emperors* （New York）1985

ed. Cerf，Leon，*Letters of Napoleon to Josephine* 1931

Chadwick，Owen，*The Pop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1981

Champagny，J.-B.Nompère de，*Souvenirs* 1846

Champfleury Jules，*Histoire de la caricature* 4 vols.1885

Chandler，David，*Campaigns of Napoleon* 1965

Napoleon 1973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New York）1993

On the Napoleonic Wars 1994

Jena 1806 2005

ed. Chandler，David，*The Military Maxims of Napoleon* 1987

Napoleon's Marshals 1987

Chaptal，Jean-Antoine，*Mes souvenirs de Napoléon* 1893

Chardigny，Louis，*Les maréchaux de Napoléon* 1977

L'Homme Napoléon 1986

ed. Charles，David W.，*Victor Marie du Pont* 1961

Charvet，P.E.，*A Literary History of France* vol.Ⅳ 1967

Chateaubriand，F.A.de，*Of Buonaparte and the Bourbons* 1814

ed. Chatel de Brandon，Laurence，*Cambacérès*：*mémoires inédits* 2 vols.1999

Chevallier，Bernard，*Empire Style* 2008

eds.Chevallier，Bernard，Dancoisne-Martineau，Michel and Lentz，Thierry，*Sainte-Hélène*，*Île de Mémoire* 2005

Chlapowski，Dezydery，*Memoirs of a Polish Lancer* 2002

Chrisawn，Margaret，*The Emperor's Friend* 2001

Christophe，Robert，*Napoleon on Elba* ，1964

Chuquet，Arthur，*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3 vols.1897-99

ed. Cisterne，Raoul de，*Journal de marche du Grenadier Pils* 1895

Clark，Christopher，*Iron Kingdom 2006*

Clary-et-Aldringen，Prince Charles de，*Trois mois à Paris lors du marriag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Ⅰ *et de L'Archduchesse Marie-Louise* 1914

Cobb，Richard，*The Police and the People* 1970

Cobban，Alfred，*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vol.Ⅱ 1961

Cockburn，Sir George，*Buonaparte's Voyage to Saint Helena*（Boston）1833

Coignet，Jean-Roch，*Captain Coignet* 2007

Cole，Hubert，*Fouch* é 1971

The Betrayers 1972

Cole，Juan，*Napoleon's Egypt*（New York）2007

Collins，Irene，*The Government and the Newspaper Press in France 1814-1881* 1959

Napoleon and His Parliaments 1979

Connelly，Owen，*Napoleon's Satellite Kingdoms*（New York）1965

Blundering to Glory 1993

Constant，Louis，*Memoirs of Constant* 4 vols.1896

Coston，F.G.de，*Biographie d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Napoléon Bonaparte* 1840

ed. Cottin，Paul，*Souvenirs de Roustam* 1911

Coxe，Peter，*The Exposé* 1809

Croker，John Wilson，*An Answer to O'Meara's Napoleon in Exile* 1823

Cronin，Vincent，*Napoleon* 1971

Crook，Malcolm，*Toulon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91

Napoleon Comes to Power 1998

ed. Crook，Malcolm，*Revolutionary France 1788-1880 2002*

Crowdy，T.E.，*Incomparable*：*Napoleon's 9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 2012

Currie，Laurence，*The Bâton in the Knapsack* 1934

D'Abrantès，Duchess，*Memoirs of Napoleon*，*his Court and his Family* 2 vols.1857

At the Court of Napoleon 1991

Daly，Gavin，*Inside Napoleonic France* 2001

Darnton，Robert，*The Devil in the Holy Water* 2010

Davies，Huw，*Wellington's Wars* 2011

Davies，Norman，*Vanished Kingdoms* 2011

ed. Davis，J.，*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

Davis，J.A.，*Conflict and Control* 1988

Decaux，Alain，*Napoleon’s Mother* 1962

DeConde，Alexander，*This Affair of Louisiana* 1976

Denon，Vivant，*Travels in Upper and Lower Egypt* 3 vols.1803

D’Erlon，Le Maréchal Drouet，Comte，*Vie militaire* 1844

Derogy，Jacques and Carmel，Hesi，*Bonaparte en terre sainte* 1992

Desbrière，Édouard，*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 5 vols.1900-1902

Desgenettes，René-Nicolas，*Histoire médicales de l’Armée d’Orient* 1802

Dubois，Laurent，*A Colony of Citizens* （Chapel Hill，NC）2004

Dubroca，Louis Jean，*Life of Bonaparte*，*First Consul of France* 1802

Duffy，Christopher，*Austerlitz* 1977

ed. Dufourcq，Albert，*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svernois* 1898

Dumas，Lt-Gen.Comte Mathieu，*Memoirs of his own Time* 2 vols.1839

ed. Duruy，George，*Memoirs of Barras* 4 vols.（New York）1895

Dwyer，Philip，*Talleyrand* 2002

Napoleon：*The Path to Power* 2008

ed. Dwyer，Philip，*Napoleon and Europe* 2003

eds.Dwyer，Philip and Forrest，Alan，*Napoleon and His Empire* 2007

eds.Dwyer，Philip and McPhee，Peter，*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2002

Ebrington，Lord，*Memorandum of Two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Emperor*

Napoleon and Viscount Ebrington 1823

Ellis，Geoffrey，*Napoleon's Continental Blockade* 1981

Napoleon 1997

The Napoleonic Empire 2003

Elting，John，*Swords around a Throne* 1986

Emsley，Clive，*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Napoleonic Europe* 1993

Gendarm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99

Napoleon：*Conquest*，*Reform and Reorganisation* 2003

Englund，Steven，*Napoleon* 2004

ed. Ernouf，Baron，*Souvenirs d'un officier polonais* 1877

Esdaile，Charles，*The Wars of Napoleon* 1995

The Peninsular War 2002

Fighting Napoleon （New Haven，CT）2004

Espitalier，Albert，*Vers Brumaire* 1914

Etruria，Maria Louisa，Queen of，*Memoirs of the Queen of Etruria* 1823

Evstafiev，Alexis，*The Resources of Russia*，*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2

Eyck，F.G.，*Loyal Rebels* （Maryland）1986

Faber，Theodor von，*Sketches of the Internal State of France* 1811

Fain，Agathon-Jean-François，Baron，*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treize* 2 vols.1824

Manuscrit de mil huit cent douze 2 vols.1827

Memoirs of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Allied Armies in 1814 1834

Mémoires 2001

Fantin des Odoards，Louis-Florimond，*Journal de Général Fantin des Odoards 1800-1830* 1895

Field，Andrew，*Waterloo* 2012

Fisher，H.A.L.，*Studies in Napoleonic Statesmanship* 1903

Bonapartism 1961

ed. Fleischmann，General，*Memoirs of the Count Miot de Melito* 1881

Fleischmann，Théo，*Histoire de la ferme du Caillou* 1954

Napoléon en bivouac 1957

En écoutant parler les grognards de Napoléon 1962

Napoléon et la musique 1965

ed. Fleischmann，Théo，*L'Épopée Impériale* 1964

Fleury de Chaboulon，Baron，*Memoirs of the Private Life*，*Return and Reign of Napoleon in 1815* 2 vols.1820

Florange，Charles and Wunsch，A.，*L'Entrevue de Napoleon et de Goethe* 1932

Foladare，Joseph，*Boswell's Paoli* 1979

ed. Fontana，Biancamaria，*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 1988

Fontanes，Louis，Marquis de，*Parallèle entre César*，*Cromwell*，*Monck et Bonaparte* 1800

Foord，Edw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 1914

Forrest，Alan，*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1989

Napoleon's Men 2002

Napoleon 2011

eds.Forrest，Alan and Jones，Peter，*Reshaping France* 1991

eds.Forrest，Alan，Hagemann，Karen and Rendall，Jane，*Soldiers*，*Citizens and Civilians*：*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0-1820* 2009

eds.Forrest，Alan and Wilson，Peter H.，*The Bee and the Eagle* 2008

Forsyth，William，*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53

ed. Foster，Vere，*The Two Duchesses* 1898

Fox，Robert，*The Culture of Science in France 1700-1900* 1992

Foy，General，*Discours du Général Foy* vol.Ⅰ 1826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 2 vols.1829

France，*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1800

Fraser，Edward，*The War Drama of the Eagles* 1912

Fraser，Flora，*Venus of Empire* 2009

Fraser，Ronald，*Napoleon's Cursed War* （New York）2008

ed. Frayling，Christopher，*Napoleon Wrote Fiction* 1972

Freedman，Lawrence，*Strategy* 2013

French Government，*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1805

Friedman，Dr Reuben，*The Emperor's Itch* （New York）1940

Fuller，J.F.C.，*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1970

Gachot，J.Édouard，*Siège de Gênes* 1908

Gaffarel，Paul，*Bonaparte et l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1895

Gallaher，John G.，*The Iron Marshal* 2000

Gallais，M.，*Histoire du Dix-Huit Brumaire* 4 vols.1814-17

ed. Gallatin，Count，*The Diary of James Gallatin* 1914

Gardner，Dorsey，*Quatre Bras*，*Ligny and Waterloo* 1882

ed. Gamier，Jacques，*Dictionnaire Perrin des guerres et des bataill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2004

eds.Garnier，Jacques and Tulard，Jean，*Nouvelle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époque napoléonienne* 1991

ed. Gaskill，Howard，*The Reception of Ossian in Europe* 2006

Gates，David，*The Napoleonic Wars 1803-1815* 1997

ed. Gaudin，Martin，*Mémoires*，*souvenirs*，*opinions et écrits du Duc de Gaëte* 1826

Germain，Pierre，*Drouët d'Erlon* 1985

Geyl，Pieter，*Napoleon*：*For and Against* 1949

Gibbs，Montgomery B.，*The Military Career of Napoleon the Great*（Chicago）1895

ed. Gielgud，Adam，*Memoirs of Prince Adam Czartoryski* 2 vols.1888

Gildea，Robert，*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The French 1799-1914* 2008

Gill，John H.，*With Eagles to Glory* 1992

Thunder on the Danube 3 vols.2008-2010

Gillevoison，C.A.G.Duchesne de，*Le Maréchal Moncey* 1902

Gilmour，David，*The Pursuit of Italy* 2011

Girod de l’Ain，Général，*Dix ans de mes souvenirs militaires* 2000

ed. Girod de l’Ain，Maurice，*Vie militaire du Général Foy* 1900

Giubelli，Antonio，*Napoleon on the Island of Elba* 2008

Godechot，Jacques，*Les instititi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 1985

Gonneville，Aymar-Olivier de，*Recollections of Colonel de Gonneville* 2 vols.2009

Goodspeed，D.J.，*Bayonets at St-Cloud* 1965

Gourgaud，General Baron Gaspard，*The Campaign of 1815 1818*

Napoleon and the Grand Army in Russia 1825

Journal de Sainte-Hélène 2 vols.1944-47

ed. Gourgaud，General Gaspard，*Memoirs of the History of France During the Reign of Napoleon dictated by the Emperor at St Helena* 2 vols.1823

Grainger，John D.，*The Amiens Truce* 2004

ed. Gray，Daniel Savage，*In the Words of Napoleon*（Troy，AL）1977

Gray，Denis，*Spencer Perceval* 1963

Grimsted，Patricia Kennedy，*The Foreign Ministers of Alexander* Ⅰ（Oakland，CA）1969

Grouchy，Count de，*Doubts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Memoirs Attributed to Napoleon*（Philadelphia）1820

Grouchy，Marquis de，*Mémoires de Maréchal de Grouchy* 5 vols.1873

Gueniffey，Patrice，*Le Dix-Huit Brumaire* 2008

Guérard，Albert Léon，*Reflections on the Napoleonic Legend* 1924

Haig，Diana，*Walks Through Napoleon and Josephine's Paris* 2003

Hales，E.E.Y.，*Napoleon and the Pope* 1961

Hamelin，Antoine，*Douze ans de ma vie* 1926

ed. Handel，Michael，*Leaders and Intelligence* 1989

ed. Hanoteau，Jean，*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2 vols.（New

York）1927

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 vols.1935

Harris，Robin，*Talleyrand* 2007

Hastier，Louis，*Le grand amour de Joséphine* 1955

Hayman，Peter，*Soult*：*Napoleon's Maligned Marshal* 1990

ed. Haythornthwaite，Philip，*The Napoleonic Source Book* 1990

Napoleon：*The Final Verdict* 1996

Napoleonic Cavalry 2001

Napoleonic Infantry 2001

Hazareesingh，Sudhir，*The Saint-Napoleon* （Cambridge，MA）2004

Headley，J.T.，*The Imperial Guard of Napoleon* 1851

Healey，F.G.，*The Literary Culture of Napoleon* 1959

eds.Hennet，Léon and Martin，le Commandant，*Lettres interceptées par les Russes* 1913

Henry，Walter，*Trifles from My Portfolio* 2 vols.（Quebec）1839

Herold，C.，*The Mind of Napoleon* （New York）1955

Bonaparte in Egypt 1962

The Age of Napoleon 1963

Hibbert，Christopher，*Napoleon*：*His Wives and Women* （New York）2002

ed. Hicks，Peter，*Clisson and Eugénie* 2009

Lieutenant Woodberry 2013

Higonnet，Patrice，*Paris* 2002

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The Substance of Some Letters Written by an Englishman Resident at Paris* 2 vols.1816

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 6 vols.1909

Holland，Lord，*Foreign Reminiscences* 1850

Hollins，David，*Hungarian Hussar 1756-1815* 2003

Holtman，Robert B.，*Napoleonic Propaganda* （Louisiana）1950

The Napoleonic Revolution （Philadelphia）1967

Home，George，*Memoirs of an Aristocrat*，*and Reminiscenc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1837

eds.Horn，Colonel Bernd and Walker，Robert W.，*Le Précis de leadership militaire* （Ontario）2008

Horne，Alistair，*Napoleon*，*Master of Europe 1805-1807* 1979

How Far from Austerlitz？ 1996

The Age of Napoleon 2004

Horward，Donald D.，*Napoleon and Iberia* 1994

Houssaye，Henry，*Napoleon and the Campaign of 1814* 1914

Le dernier jour de Napoléon à la Malmaison 1914 *1815* 3 vols.1917

The Return of Napoleon 1934

ed. Howard，J.E.，*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vol.Ⅰ 1961

Howard，Martin，*Napoleon's Doctors 2.006*

Hozier，Captain H.M.，*The Invasions of England* vol.Ⅱ 1876

Hughes，Michael，*Forging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2012

Israel，Jonathan Ⅰ.，*The Dutch Republic* 1995

ed. Iung，Theodore，*Lucien Bonaparte et ses mémoires* 3 vols.1882

Jackson，Basil，*Notes and Reminiscences of a Staff Officer* 1903

James，C.L.R.，*The Black Jacobins* 1938

Jarrett，Mark，*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its Legacy* 2013

Jefferson，Thomas，*Memoirs*，*Correspondence and Private Papers* 4 vols.1829

Jenkins，E.H.，*A History of the French Navy* 1973

ed. Jennings，Louis J.，*The Croker Papers* ，3 vols.1885

ed. Jimack，Peter，*A History of the Two Indies* 2006

Johnson，David，*Napoleon’s Cavalry and its Leaders* （New York）1978

Johnson，Paul，*Napoleon* 2003

ed. Johnston，R.M.，*The Corsican* （New York）1930

In the Words of Napoleon 2002

eds.Jomard，E.F.，et al.，*Description de l’Égypte* 21 vols.1809-23

Jomini，General Baron A.H.de，*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Campaign of Waterloo* 1853

Summary of the Art of War 1854

Life of Napoleon 4 vols.（New York）1864

ed. Jones，Proctor Patterson，*Napoleon* 1992

Napoleon，*How He Did It* 1998

In Napoleon’s Shadow （San Francisco）1998

ed. Jonge，Alex de，*Napoleon’s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1977

Jonquière，Clément de la，*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4 vols.1908

Jordan，David P.，*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2012

Jourdan，Annie，*Napoléon* 1998

Jourquin，Jacques，*Dictionnaire des marechaux du Premier Empire* 1999

ed. Jourquin，Jacques，*Journal de Capitaine François* 2 vols.19184

eds.Kafker，Frank and Laux，James，*Napoleon and His Times*（Florida）1989

eds.Kagan，Frederick W and Higham，Robin，*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sarist Russia* 2002

Karlen，Arno，*Napoleon’s Glands* 1984

Kauffmann，Jean-Paul，*The Black Room at Longwood* 1997

Kemble，James，*Napoleon Immortal* 1959

ed. Kemble，James，*St Helena During Napoleon’s Exile* 1969

Kerckhove，J.L.R.de，*Histoire des maladies observées à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36

ed. Kerry，the Earl of，*The First Napoleon* 1925

Kiley，Kevin，*Artille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2004

Once There Were Titans：*Napoleon’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2007

Kircheisen，Friedrich，*Napoleon* 1931

Kissinger，Henry，*A World Restored* 1957

Knapton，Ernest John，*Empress Josephine* （Cambridge，MA）1963

Knight，Roger，*The Pursuit of Victory* 2006

Britain Against Napoleon 2013

Koebner，Richard，*Empire* 1961

Kolli，Baron de，*Memoirs of the Baron de Kolli* 1823

Labaume，Eugene，*The Crime of 1812 and its Retribution* （New York）1912

La Bédoyère，Charles de，*Memoir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35

Lachouque，Henry and Brown，Anne S.K.，*The Anatomy of Glory* 1978

Lacour-Gayet，G.，*Talleyrand 1754-1838* 1933

ed. Lacour-Gayet，Robert，*Mémoires du Comte Beugnot* 1959

The Memoirs of Chancellor Pasquier 1967

Lancesseur，Pierre de，*L'Enigme de Waterloo* 2012

Langeron，L.A.-A.，Comte de，*Mémoires de Langeron* 1902

Lanzac de Laborie，Léon de，*Paris sous Napoleon* vol.Ⅱ 1905

ed. Lanzac de Laborie，Léon de，*Mémorial de J.de Norvins* 3 vols.1896

eds.Larichev，E. and Ostarkova，Ⅰ.，*Paris-St Petersburg 1800-1830*（Moscow）2003

Las Cases，Comte Emmanuel de，*Memoirs of Emanuel Augustus Dieudonné Count de Las Casas* 1818

Le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4 vols.1823

Memorial de Saint-Hélène：*Journal of the Private Life and Conversation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at St Helena* 4 vols.1823

The Life，*Exile*，*and Conversation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4 vols.1835

Laskey，Captain J.C.，*A Description of the Series of Medals Struck at the National Medal Mint by Order of Napoleon Bonaparte* 1818

ed. Latimer，Elizabeth，*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1903

Lavalette，Count Marie，*The Memoirs of Count Lavalette*（Philadelphia）1832

eds.Laven，David and Riall，Lucy，*Napoleon's Legacy* 2000

ed. Lecestre，Léon，*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er* 2 vols.1897

Lefebvre，Georges，*Napoleon 1799-1807* 2 vols.1935

The Directory 1964

Leggiere，Michael，*Napoleon and Berlin* 2002

Lentz，Thierry，*Roederer* 1989

Le 18-Brumaire 1997

Dictionnaire des ministres de Napoléon 1999

Le Grand Consultat 1799-1804 1999

Savary 2001

Napoléon et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1804-1810 2002

L'Effondrement du système napoléonien 1810-1814 2004

La France et l'Europe de Napoléon 1804-1814 2007

La conspiration du Général Malet 2012

Napoléon diplomate 2012

ed. Lentz，Thierry，*Le Sacre de Napoléon* 2003

1810：*Le tournant de l'Empire* 2010

Lentz，Thierry and Imhoff，Denis，*La Moselle et Napoléon* 1986

Lentz，Thierry and Macé，Jacques，*La mort de Napoléon* 2009

eds.Lentz，Thierry et al.，*Quand Napoléon inventait la France* 2008

Levasseur，Octave，*Souvenirs militaires* 1914

Levy，Arthur，*Napoléon intime* 1893

Lewis，Gwynne，*France 1715-1804* 2004

eds.Lewis，Gwynne and Lucas，Colin，*Beyond the Terror* 1983

ed. Lewis，Theresa，*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of Miss Berry* vols.Ⅱ and Ⅲ 1866

Lieven，Dominic，*Russia against Napoleon* 2009

Linck，Tony，*Napoleon’s Generals*：*The Waterloo Campaign* 1993

Lipscombe，Nick，*The Peninsular War Atlas* 2010

ed. Lloyd，Charles，*The Keith Papers* 3 vols.1955

Lockhart，J.G.，*The History of Napoleon Buonaparte* 2 vols.1831

ed. Londonderry，2nd Marquess of，*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Viscount Castereagh* 12 vols.1848-53

Longford，Elizabeth，*Wellington*：*Years of the Sword* 1971

Wellington：*Pillar of State* 1972

Lullin de Châteauvieux，Jacob Frédéric，*Manuscript Transmitted from St Helena by an Unknown Channel* 1817

ed. Luvaas，Jay，*Napoleon on the Art of War* 1999

Lyons，Martyn，*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1975

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94

Macbride，Mackenzie，*With Napoleon at Waterloo* （Philadelphia） 1911

MacCulloch，Diarmaid，*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009

Macirone，Francis，*Interesting Facts Relating to the Fall and Death of Joachim Murat* 1817

McLynn，Frank，*Napoleon* 1997

McPhee，Peter，*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2004

Madelin，Louis，*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1934

ed. Madelin，Louis，*Lettres inédites de Napoléon* Ⅰ*er à Marie-Louise* 1935

Maitland，Sir Frederick Lewis，*The Surrender of Napoleon* 1904

ed. Malmesbury，3rd Earl of，*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Harris*，*1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Ⅳ 1844

A Series of Letters of the First Earl of Malmesbury vol.Ⅱ 1870

Mansel，Philip，*Louis* ⅩⅧ 1981

The Eagle in Splendour 1987

The Court of France 1789-1830 1988

Prince of Europe 2003

Marbot，Baron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Baron de Marbot* 3 vols.1891

ed. Marchand，Louis，*Précis des Guerres de César*，*par Napoléon*

1836

ed. Maricourt，Baron André，*Mémoires du Général Noguès* 1922

Markham，David，*Napoleon's Road to Glory* 2003

ed. Markham，David，*Imperial Glory* 2003

Markham，Felix，*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1954

Napoleon 1963

Marshall-Cornwall，James，*Marshal Massena* 1965

Martin，Andy，*Napoleon the Novelist* 2001

Martin，Brian，*Napoleonic Friendship* 2011

Martineau，Gilbert，*Napoleon's St Helena* 1968

Napoleon Surrenders 1971

Masséna，André，*Mémoires* 1848

Masson，Frédéric，*Napoleon at Home* 2 vols.1894

Napoléon et les femmes 1894

Napoléon dans sa jeunesse 1907

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1911

The Private Diaries of the Empress Marie-Louise 1922

Napoleon at St Helena 1949

eds.Masson，Frédéric and Biagi，Guido，*Napoléon inconnu* 2 vols.1

Maude，F.N.，*The Jena Campaign* 2007

The Leipzig Campaign 2007

Mauduit，Hippolyte de，*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2 vols.1847-48

Melvin，Frank Edgar，*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 （New York） 1919

Memes，John，*Memoirs of the Empress Josephine* （New York） 1832

Méneval，Baron Claude-François，*Napoléon et Marie Louise* 3 vols.1843-45

ed. Méneval，Baron Napoleon，*Memoirs to Serve for the History of Napoleon* Ⅰ *from 1802 to 1815* 3 vols.1894

Menzl，Wolfgang，*Germany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vol.Ⅳ 1898

Merridale，Catherine，*Red Fortress* 2013

ed. Metternich，Prince Richard，*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1773-1815* vols.Ⅰ and Ⅱ 1880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Battle of Borodino* 2007

The Battle of the Berezina 2010

ed. Millet，Stanislaw，*Le Chasseur Pierre Millet* 1903

Mollien，Comte，*Mémoires d'un ministre du trésor public* 3 vols.1898

Montefiore，Simon Sebag，*Jerusalem* 2011

Montesquiou，Anatole de，*Souvenirs sur la Révolution，l'Empire，la Restauration et le Règne de Louis-Philippe* 1961

Montesquiou-Fezensac，Raymond de，*The Russian Campaign 1812* 1970

Montholon，Albine de，*Journal secret d'Albine de Montholon* 2002

Montholon，General Count Charles-Tristan de，*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of Napoleon at St Helena* 3 vols.1846

Moorehead，Caroline，*Dancing to the Precipice* 2009

Moreau，Jean，*Bonaparte and Moreau* （Philadelphia）1806

ed. Moreh，Schmuel，*Napoleon in Egypt* 1993

Mossiker，Frances，*Napoleon and Josephine* 1964

Mowat，Robert，*The Diplomacy of Napoleon* 1924

Mudford，William，*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817

Muir，Rory，*Britain and the Defeat of Napoleon* 1996

Tactic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attl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98

Nafziger，George，*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Novato，CA）1988

Napoleon at Dresden 1994

Imperial Bayonets 1996

Napoleon at Leipzig 1997

Nafziger，George，Wesolowski，Mariusz T. and Devoe，Tom，*The Poles and Saxons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Chicago）1991

Namier，Sir Lewis，*Vanished Supremacies* 1970

Nasica，Abbé T.，*Mémoires sur l'enfance et 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1852

Nepos，Cornelius，*Vies des Grands Capitaines* 1818

ed. Nesbitt，Nick，*Toussaint L'Ouverture* 2008

Nester，Wiliam R.，*Napoleon and the Art of Diplomacy* 2011

Nicolson，Nigel，*Napoleon* 1985

ed. Noailles，Marquis de，*The Life and Memoirs of Count Mol* é vol. Ⅰ 1923

ed. North，Jonathan，*With Napoleon in Russia* 2001

Napoleon on Elba 2004

With Napoleon's Guard in Russia 2013

Odeleben，Baron Ernst von，*A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Saxony in 1813* 1820

Olivier，Daria，*The Burning of Moscow* 1966

eds.Olsen，John and van Creveld，Martin，*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from Napoleon to the Present* 2011

O’Meara，Barry，*Napoleon in Exile*，*or*，*a Voice from St Helena* 2 vols.1820

Orieux，Jean，*Talleyrand*（New York）1974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1994

Ott，Thomas，*The Haitian Revolution 1789-1804*（Knoxville，TN）1973

Palmer，Alan，*Alexander* Ⅰ 1974

An Encyclopaedia of Napoleon’s Europe 1984

Bernadotte 1990

Napoleon and Marie Louise 2001

Napoleon in Russia 2003

ed. Palmstierna，C.-F.，*My Dearest Louise* 1955

Paoli，François，*La Jeunesse de Napoléon* 2005

Paret，Peter，*The Cognitive Challenge of War* 2009

Paris，William Francklyn，*Napoleon's Legion* 1927

ed. Park，Julian，*Napoleon in Captivity* 1827

Pawly，Ronald，*Napoleon's Red Lancers* 2003

Pelet de la Lozère，Baron Joseph，*Napoleon in Council* 1837

Pellapra，Emilie de，*A Daughter of Napoleon* （New York）1922

Peltier，John，*The Trial of John Peltier*，*Esq*，*for a Libel Against Napoleon Buonapart* é 1803

Percy，Pierre-François，*Journal des campagnes du Baron Percy* 1986

Pétiet，Général Baron Auguste，*Souvenirs militaires d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1844

Petit，Joseph，*Marengo* 1801

Peyrusse，Guillame，*Mémorial et archives de M.le Baron Peyrusse* （Carcassonne）1869

Pigeard，Alain，*L'Armée de Napoléon 1800-1815* 2000

La conscription au temps de Napoléon 2003

Napoléon amoureux 2007

ed. Plenel，Edwy，*Joseph Fouché*，*minister de la police* 1993

Plumptre，Anne，*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Residence in France 1802-1805* 3 vols.1810

Pocock，Tom，*The Terror Before Trafalgar* 2002

Stopping Napoleon 2004

Pontécoulant，Philippe-Gustave，*Napoleon à Waterloo* 2004

ed. Pope，Stephen，*The Cassell Dictiona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1999

Popkin，Jeremy，*The Right-Wing Press in France 1792-1800*（Chapel Hill，NC）1980

Poultier，François，*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in Europe*（New York）1798

Pradt，Abbé de，*Histoire de l'ambassade dans le Grand Duché de Varsovie* 1815

Prat，Louis-Antoine and Tonkovich，Jennifer，*David*，*Delacroix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2011

Price，Munro，*The Perilous Crown* 2007

Prinzing，Friedrich，*Epidemics Resulting from Wars* 1916

ed. Quentin，Roger，*André Peyrusse* 2010

ed. Raeff，Marc，*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1991

Ragsdale，Hugh，*Détente in the Napoleonic Era* 1980

Raguse，Duc de，*Mémoires du Maréchal Marmont* 9 vols.1857

Ramon，G.，*Histoire de la Banque de France* 1929

Rapp，General Count，*Memoirs of General Count Rapp* 1823

Reiset，Le Vicomte de，*Souvenirs du Lieutenant Général Vicomte de Reiset 1814-1836* vol.Ⅲ 1899

ed. Rémusat，Paul de，*Memoirs of Madame de Rémusat* 3 vols.1880

A Selection of the Letters of Madame de Rémusat 1881

ed. René，François，*Original Journals of the Eighteen Campaigns of Napoleon Bonaparte* 2 vols.1817

Reynier，General Jean，*Mémoires du Comte Reynier* 1827

Ribbe，Claude，*Le crime de Napoléon* 2005

Richardson，Hubert N.B.，*A Dictionary of Napoleon and His Times* 1920

Richardson，Nicholas，*The French Prefectoral Corps 1814-1830* 1966

Richardson，Robert，*The Apocalypse of Napoleon* 2009

Riehn，Richard，*Napoleon's Russian Campaign* （New York）1991

Ripaud，Citizen，*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Arts* 1800

Robb，Graham，*Parisians* 2010

Roberts，Andrew，*Waterloo* 2011

Rodger，A.B.，*The War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1798-1801* 1964

Rodger，N.A.M.，*Command of the Ocean* 2006

Roederer，Pierre-Louis，*Autour de Bonaparte* 1909

Bonaparte me disait 1942

ed. Roncière，Charles de la，*The Letters of Napoleon to Marie-Louise* 1935

Ropes，John，*The Campaign of Waterloo* （New York）1892

Rose，John Holland，*The Life of Napoleon* 2 vols.1903

The Personality of Napoleon 1912

ed. Rose，J.H.，*Napoleon's Last Voyages* 1906

Rosebery，Lord，*Napoleon*：*The Last Phase* 1900

Rosen，Lew，*Napoleon's Opera-Glass* 1897

Ross，Michael，*The Reluctant King* 1976

Rostopchine，Fyodor，*L'Incendie de Moscou* 2000

Rothenberg，Gunther E.，*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1977

The Napoleonic Wars 1999

The Emperor’s Last Victory 2005

Rouart，Jean-Marie，*Napoléon ou la destinée* 2012

ed. Rousset，Camille，*Recollections of Marshal Macdonald* 2 vols.1892

ed. Routier，Colonel Léon，*Récits d’un soldat de la République et de l’Empire* 2004

Rovigo，Duc de，*Mémoires du duc de Rovigo* 8 vols.1828

ed. Rowe，Michae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Europe* 2003

Rudé，George，*Revolutionary Europe* 1964

ed. Sadler，Thomas，*Diary*，*Reminiscenc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Crabb Robinson* 3 vols.1869

ed. Sage，Robert，*The Private Diaries of Stendhal* （New York） 1954

Saint-Amand，Imbert de，*Marie Louise and the Decadence of the Empire* （New York）1902

Marie Louise，*the Island of Elba*，*and the Hundred Days* （New York）1902

eds.St-Cère，Jacques and Schlitter，H.，*Napoléon à Sainte-Hélène* n.d.

Saint-Chamans，Gén.Comte Alfred de，*Mémoires du Général Comte de Saint-Chamans* 1896

Saint-Cyr，Laurent Gouvion，*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militaire* 4 vols.1831

Saint-Denis，Louis Étienne（Known as Ali），*Napoleon from the Tuileries to St Helena* 1922

Souvenirs du Mameluck Ali 1926

Saint-Hilaire，Émile de，*Napoléon au Conseil-d'État* 1843

eds.Saint-Pierre，Louis and Saint-Pierre，Antoinette，*Mémoires du Maréchal Soult* 1955

ed. Sanderson，Edgar，*Bourrienne's Memoirs of Napoleon Bonaparte* 1900

Sarrazin，General，*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é to the Abbé Maury* 1811

History of the War in Spain and Portugal 1815

Sauzet，Armand，*Desaix*，*le sultan juste* 1954

Savary，Anne-Jean-Marie，*Memoirs Relative to the Duke D'Enghien* 1823

Savatier，René，*L'Art de faire les lois* 1927

Schlabrendorf，Graf Gustav von，*Bonaparte and the French People*

1804

Napoleon and the French People Under his Empire 1806

ed. Schlumberger，Gustave，*Lettres du commandant Coudreux* 1908

Schneid，Frederick C.，*Soldiers of Napoleon's Kingdom of Italy* 1995

Napoleon's Italian Campaigns 1805-1815 2002

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 （New Haven，CT）2005

Schom，Alan，*Napoleon Bonaparte* 1997

Schroeder，Paul，*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1994

Schur，Nathan，*Napoleon in the Holy Land* 1999

ed. Schwartz，Bernard，*The Code Napoleon and the Common-Law World* （New York）1956

Schwarzfuchs，Simon，*Napoleon*，*the Jews and the Sanhedrin* （Philadelphia）1979

Sciout，Ludovic，*Le Directoire* vol.4 1895

Ségur，General Count Philippe de，*Memoirs of an Aide-de-Camp of Napoleon 1800-1812* 2005

Ségur，Paul de，*Napoléon et la Grande Armée en 1812* 1824

Shepherd，Rev.William，*Paris in 1802 and 1814* 1814

Sherwig，John M.，*Guineas and Gunpowder* （Cambridge，MA）1969

Shmuelevitz，Aryeh，*Napoleon and the French in Egypt and the Holy Land* （Istanbul）2010

Shoberl，Frederic，*Narrativ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Events which Occurred in and near Leipzig* 1814

Simms，Brendan，*The Impact of Napoleon* 1997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Germany 1779-1850 1998

Europe：*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2013

Simonetta，Marcello and Arikha，Noga，*Napoleon and the Rebel* 2011

Six，Georges，*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généraux et amiraux françai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1792-1814* 2 vols.1934

Sked，Alan，*Radetzky* 2011

Smith，Digby，*The Greenhill Napoleonic Wars Data Book* 1998

Napoleon's Regiments 2000

1813 Leipzig 2001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Napoleon's Empire 2005

'*Charge*！'2007

Smith，Sir William Sidney，*The French Expedition into Syria* 1799

Solé，Robert，*La conquête de l’Égypte* 2006

Soltyk，Roman，*Napoléon en 1812* 1838

ed. Soult，fils，*Mémoires du Maréchal-Général Soult* 3 vols.1854

Sparrow，Elizabeth，*Secret Service* 1999

Shadow of the Guillotine 2013

Staël，Madame Germaine de，*An Appeal to the Nations of Europe against the Continental System* 1813

Dix années d’exil 2 vols.2000

Stanhope，5th Earl，*Notes of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31-1851* 1888

Starke，Mariana，*Letters from Italy Between the Years 1792 and 1798* 2 vols.1800

Stendhal（Henri Beyle），*The Red and the Black* 2004

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 2006

ed. Stiegler，Gaston，*Récits de guerre et de foyer* 1894

eds.Stoker，Donald，Schneid，Frederick and Blanton，Harold，*Conscription in the Napoleonic Era* 2009

Stourton，James and Montefiore，Charles Sebag，*The British as Art*

Collectors 2012

Strathearn，Paul，*Napoleon in Egypt* 2007

ed. Stryjenski，Casimir，*Mémoires de la Comtesse Potocka* 1897

Stuart，Andrea，*Rose of Martinique* 2003

Suchet，Marshal Louis Gabriel，*Memoirs of the War in Spain* 2 vols.1829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Polish Gamble* 2005

ed. Summerville，Christopher，*Napoleon's Expedition to Russia* 2003

ed. Summerville，C.J.，*The Exploits of Baron de Marbot* 2000

Sutherland，Christine，*Marie Walewska* 1979

Swanson，William C.，*Napoleon's Dual Courtship* （privately published）1923

ed. Tarbell，Ida M.，*Napoleon's Addresses* （Boston）1897

Thiard，A.M.T.，*Souvenirs diplomatiques et militaires* 1900

Thibaudeau，Antoine，*Bonaparte and the Consulate* 1908

Mémoires sur la Consultat 1799 à 1804 1913

Thiers，Louis Adolphe，*History of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of France under Napoleon* vol.Ⅻ 1893

Thiry，Jean，*La machine infernale* 1952

Thody，Philip，*French Caesarism from Napoleon to Charles de Gaulle* 1989

Thornton，Michael，*Napoleon after Waterloo* （Stanford，CA）1968

Thrasher，Peter，*Pasquale Paoli* 1970

Thuillier，Guy，*Regards sur la haute administration de France* 1979

Tissot，P.F.，*Souvenirs historiques sur la vie et la mort de F.Talma* 1826

Histoires de Napoléon 2 vols.1833

Tolstoy，Leo，*War and Peace* 1869

Tomiche，Nada，*Napoléon écrivain* 1952

Tone，John L.，*The Fatal Knot* 1994

Tone，Theodore Wolfe，*The Life of Theodore Wolfe Tone* 1828

ed. Tortel，Christian，*Avec Bonapart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976

eds.Tortel，Christian and Carlier，Patricia，*Bonaparte de Toulon au Caire* 1996

Tranié，Jean，*Napoléon et son entourage* 2001

Tranié，Jean and Camigniani，J.-C.，*Napoléon Bonaparte*，*la première campagne d'ltalie 1796-97* 1990

Troyat，Henri，*Alexander of Russia* 1982

Tulard，Jean，*L’Anti-Napoléon* 1965

Napoléon et la noblesse d’Empire 1979

Le grand empire 1982

Napoleon：*The Myth of the Saviour* 1984

Napoleon：*une journée particulière* 1994

Murat 1999

Les vingt jours 1-20 March 1815 2001

Napoléon：*les grands moments d’un destin* 2006

Dictionnaire amoureux de Napoléon 2012

ed. Tulard，Jean，*Proclamations*，*orders du jour*，*bulletins de la Grande Armée* 1964

Bibliographie critique des mémoires sur le Consultat et l’Empire 1971

Cambacérès，*lettres inédites à Napoléon* 2 vols.1973

Dictionnaire Napoléon 1989

La Berline de Napoléon 2012

eds.Tulard，Jean and Garros，Louis，*Itinéraire de Napoléon au jour de jour* 1992

Turnbull，Patrick，*Napoleon’s Second Empress* 1971

Uffindell，Andrew，*The Eagle’s Last Triumph* 1994

Napoleon’s Immortals 2007

Napoleon’s Chicken Marengo 2011

Underwood，Thomas Richard，*A Narrative of Memorable Events in Paris in the year 1814* 1828

Unger，Harlow，*Layfayette* 2002

Unwin，Brian，*Terrible Exile* 2010

Vandal，Albert，*Napoléon et Alexandre* Ⅰ 3 vols.1893

L’Avènement de Bonaparte 2 vols.1907

Van-Ess，Willem Lodewyk，*The 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 4 vols.（Philadelphia）1809

Vaughan，C.R.，*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Zaragoza* 1809

Vernon，B.J.，*Early Recollections of Jamaica to Which are Added Trifles from St Helena* 1848

Villefosse，Louis de and Bouissounouse，Janine，*The Scourge of the Eagle* 1972

Villemain，Abel-François，*Souvenirs contemporain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2 vols.1854

Villepin，Dominique de，*Les cent jours* 2001

Volney，Constantin de，*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 1787

Vossler，Lieutenant H.A.，*With Napoleon in Russia 1812* 1998

Wairy，Constant，*Mémoires de Constant* 1831

ed. Walter，Gérard，*Le Comte de Las Cases* 2 vols.1956

Warden，William，*Letters Written on Board HMS* Northumberland *and at St Helena* 1817

Waresquiel，Emmanuel de，*Talleyrand* 2011

Watson，Stephen，*The Reign of George* Ⅲ 1960

Weider，Ben and Forshufvud，Sten，*Assassination at St Helena Revisited*（New York）1995

Weider，Ben and Hapgood，David，*The Murder of Napoleon* 1982

Weigley，Russell，F.，*The Age of Battles*（Bloomington，IN）1991

ed. Weit，Gaston，*Nicolas Turc*，*chronique d'Égypte l798-1804*（Cairo）1950

Weller，Jac，*Wellington in India* 1972

ed. Wellington，2nd Duke of，*Despatches*，*Correspondence and Memoranda of Field Marshal Arthur*，*Duke of Wellington*，*K.G.* 15 vols.1858-72

Welschinger，Henri，*La censur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1882

Le duc d’Enghien 1888

Wesling，Molly，*Napoleon in Russian Cultural Mythology* （New York）2001

Wheeler，H.B.F. and Broadley，A.B.，*Napoleon and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2vols.1907

Whitcomb，Edward A.，*Napoleon’s Diplomatic Service* （Durham，NC）1979

Williams，Helen Maria，*A Narrative of the Event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France* 1815

Williams，John R.，*The Life of Goethe* 1998

Williams，Kate，*Josephine* 2013

ed. Wilson，Sir Arnold，*A Diary of St Helena*，*the Journal of Lady Malcolm* 1929

Wilson，Peter H.，*War*，*Society and State in Württemberg 1677-1793* 1995

Wilson，Sir Robert，*History of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Egypt* 1802

Brief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and Composition of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Years 1806 and 1807 1810

Campaigns in Poland in the Years 1806 and 1807 1810

Narrative of Event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Russia by Napoleon Bonaparte 1860

Wilson-Smith，Timothy，*Napoleon and His Artists* 1996

Napoleon：*Man of War*，*Man of Peace* 2002

Winograd，Lee，*Strateg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Battle of Acre during Napoleon's Holy Land Campaign* （Tel Aviv）1973

Wolff，Sir Henry Drummond，*The Island Empire* 1855

Woloch，Isser，*Jacobin Legacy* （Princeton，NJ）1970

The French Veteran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Restoration 1979

The New Regime：*Trans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c Order 1789-1820S* 1994

Napoleon and His Collaborators 2001

ed. Woloch，Isser，*R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Free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nford，CA）1996

Woolf，Otto，*Ouvrard*：*Speculator of Genius* 1962

Woolf，Stuart，*Napoleon's Integration of Europe* 1991

Wright，Constance，*Daughter to Napoleon* （New York）1961

ed. Wright，O.W.，*History of Charles Ⅻ by M.de Voltaire* 1887

Yevstafiev，Aleksye Grigoryevich，*The Resources of Russia in the*

Event of a War with France 1813

ed. Yonge，Charlotte M.，*A Man of Other Days* 2 vols.1877

Memoirs of Marshal Bugeaud vol. Ⅰ 1884

Zamoyski，Adam，*Holy Madness* 1999

1812：*Napoleon’s Fatal March on Moscow* 2005

Zarzeczny，Matthew，*Meteors that Enlighten the Earth* 2013

Ziegler，Philip，*The Sixth Great Power* 1988

Zweig，Stefan，*Joseph Fouch* é 1930

文章、随笔与未发表论文

Abel，Jonathan，‘Jacques-Antoine-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s Military Reform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Abramova，Inna，‘Les médailles relatives à la guerre de 1812 et à Napoléon du Musée de Vitebsk’*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Alexander，Don W.，‘French Replace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Military Affairs* vol.44 issue 4 December 1980

Alger，J.G.，‘Napoleon in Egypt’*Westminster Review* vol.150 no.4 1898

‘British Visitors to Paris 1802-1803’*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4 October 1899

Allégret，Marc，‘Autour de la rédaction du Code Civil’*Revue du Souvenir Napoléonien* no.495 April-June 2013

Anonymous，‘Bonaparte’s Campaign in Russia’*Edinburgh Review* no.24 February 1815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éxpeditions en Égypte et en Syrie par J.Miot’*Quarterly Review* no.25 April 1815

‘Letters from France’*Edinburgh Review* no.51 February 1816

‘Descente en Angleterre’*Notes and Queries* 21 July 1855

‘Marshal Marmont’s *Memoirs’Edinburgh Review* no.106 July 1857

‘The Napoleon Correspondence’*Edinburgh Review* no.258 Oct 1867

‘More about Napoleon’*Quarterly Review* vol.139 July 1875

‘The Unpublished Letters of Napoleon’*Quarterly Review* vol.187 1898

‘The French Expedition to Egypt in 1798’*Edinburgh Review* no.208 July 1908

Arboit，Gérard，‘1812：Le reseignement Russe face à Napoléon’*Revue de l’Institute Napoléon* no.204 2012

Arnold，James R.，‘A Reappraisal of Column versus Line in the Peninsular War’April 2004 *Napoleon Series* website

Beaucour，Fernand，‘Les besoins en voitures pour le chauffage de l’armée au Camp de Boulogne en Janvier 1804’*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Beerbuehl，Margrit Schulte，‘Crossing the Channel：Nathan Mayer Rothschild and his Trade with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lockades 1803-1808’*The Rothschild Archive Review of the Year* 2007/8

Bertaud，Jean-Paul，‘Napoleon’s Officers’*Past and Present* no.111 1986

Biagi，Guido，‘A Coincidence in Napoleon’s Life’*Century Magazine* November 1894

Billings，Mark，‘Napoleon：A Dealer of H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Blaufarb，Rafe，‘The Ancien Régime Origins of Napoleonic Social Reconstruction’*French History* vol.14 no.4 2000

Boisson，Daniel，‘Maréchaux et généraux français tués et blessés en 1812’*Les Amis du Patrimonie Napoléonien* no.35 July 2012

Brack，General de，‘Waterloo’*La Revue de France* vol.4 July 1932
Branda，Pierre，‘Did the War Pay for the War？An Assessment of Napoleon’s Attempts to Make his Campaigns Self-Financing’*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Brier，Bob and Wood，Mary Mendenhall，‘Napoleon in Egypt：The Battle of Chobraki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Broers，Michael，‘The Napoleonic Police and Their Legacy’*History Today* May 1999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a European Context？’*Past and Present* no.170 2001

‘Napoleon，Charlemagne and Lotharingia：Acculturation and the Boundaries of Napoleonic Europe’*Historical Journal* vol.44 2001

Brown，Howard G.，‘From Organic Society to Security State：The War on Brigandage in France 1797-1802’*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69 1997

Bryant，Mark，‘Graphic Warriors：War Cartoonists 1792-1945’*The London Library Magazine* Winter 2011

Burrows，Simon，‘Culture and Misperception：The Law and the Press in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803’*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18 1996

Byrd，Melanie，‘The Napoleonic Institute of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Chandler，David，‘Napoleon and Death’*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Chaplin，Dr T.H.Arnold，‘Napoleon’s Funeral：A Lost Record’*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0 September 1915

Choffat，Thierry，‘La Bérézina：victoire française’*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a Bonapartisme* no.48 Spring 2013

Cook，John，‘Bernadotte 1806：Is There a Case for the Defence？’*Napoleon Series* website

Crook，Malcolm，‘Time for a Hero？Reappraising Napoleon on the Bicentenary of his Rise to Power’*History* vol.87 issue 288 October 2002

Crouzet，François，‘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French History* vol.10 1997

Dague，Everett，‘Henri Clarke，Minister of War，and the Malet Conspirac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Davies，Huw J.，‘Diplomats as Spymasters：A Case Study of the Peninsular War 1809-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6 no.1 January 2012

Davies，Peter，‘Who Killed Napoleon Bonaparte？’*The Waterloo Journal* vol.32 no.3 Winter 2010

Desclaux，Dr，‘A propos de la “Gale” de Napoléon’*Journal des Patriciens* April 1932

‘Détenu’，‘The Journal of a Detenu：An Eye-witness of the Events in Paris’*London Magazine* September 1825

Dhombres，Nicole，‘Napoléon et les scientifiques Part Ⅰ：1779-1798’*La Revue du Souvenir Napoléonien* no.350 1985

Dufraisse，Roger，‘Napoleon et l’Empereur’*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Dunne，John，‘Napoleon’s Mayoral Problem’*Modern & Contemporary French History* vol.8 2000

Dupâquier，J.，‘Problèmes démographiques de la France

Napoléonienne'*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vol.17 1970

Dusoulier，Louis，'En vendant La Louisiane'*Les Annales de les Compagnons de l'Empire* no.4 2003

Dutcher，George Matthew，'Napoleon and the Napoleonic Period'*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 no.3 September 1932

Dwyer，Philip G.，'From Corsican Nationalist to French Revolutionary：Problems of Identity in the Writings of the Young Napoleon 1785-1793'*French History* vol.16 2002

'Napoleon Bonaparte as Hero and Saviour'*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

'"It Still Makes Me Shudder"：Memories of Massacre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War in History* vol.16 no.4 2009

Dziewanowski，Lieutenant M.K.，'Napoleon：Legend and Propaganda'*Military Affairs* vol.9 issue 1 January 1945

Ebrington，Lord，'A Conversation with Napoleon at Elba'*Macmillan's Magazine* December 1894

Eidahl，Kyle，'Marshal Nicolas Charles Oudino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Ela，Alfred，'Napoleon's Wounds'*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vol.174 nos.22 and 24 June 1916

Epstein，James，'Politics of Colonial Sensation：The Trial of Thomas Picton and the Cause of Louisa Caldero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ne

2007

Esdaile，Charles，‘Spanish Guerrillas：Heroes or Villains？’*History Today* no.38 April 1988

‘Recent Writing on Napoleon and His Wars’*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73 issue 1 January 2009

Feinberg，Herb，‘North to Palestine：Napoleon Marches Against the Tur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Field，Andrew，‘The Famous Words：The Capture of Cambronne at Waterloo’*Waterloo Journal* vol.35 no.1 Spring 2013

Fitzsimmons，Michael P.，‘The Debate on Guilds under Napoleon’*Proceedings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vol.36 2008

Foch，Marshal，‘La battaille de Laon’*Revue de France* May 1921

Forrest，Alan，‘Propaganda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Napoleonic France’*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

Friedman，Elias，‘On the Affair of the Murder of the French Soldiers in the Carmelite Monaster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Ariel Journal on the Land of Israel* no.37 March 1985（in Hebrew）

Gallaher，John，‘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Strategy：The Dresden Phase of the Leipzig Campaign’*Military Affairs* vol.49 issue 2 April 1985

‘Davout and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Gates，David，‘The Wars of 1812：A French Perspective’*Mars & Clio* no.34 Summer 2012

George，Christopher T.，‘The Eroica Riddle：Did Napoleon Remain Beethoven’s “Hero”？’*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Gichon，Mordechai，‘Jaffa，1799’*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East Meets West：The Clash Between French and Oriental Society during Napoleon’s Campaign in Egypt’*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Gill，Conrad，‘The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rance in 1802’*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4 1909

Glover，Richard，‘The French Fleet 1807-181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9 no.3 September 1967

Grab，Alexander，‘Army，State and Society：Conscription and Desertion in Napoleonic Italy 1802-181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7 1995

‘State Power，Brigandage and Rural Resistance in Napoleonic Italy’*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vol.25 1995

‘The Geo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talian Peninsula Under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Griffin，Miriam，‘Philosophy，Cato and Roman Suicide’*Greece & Rome* vol.33 no.1 April 1986

Groutso，Igor，‘Le sort des aigles napoléoniennes pendant le campagne de 1812’*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Hartley，Janet，‘Napoleon in Russia：Saviour or Anti-Christ？’*History Today* vol.41 no.1 1991

Harvey，A.D.，‘European Attitudes to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Era’*History* vol.63 1978

Hayman，Neil M.，‘France Against Prussia：The Jena Campaign of 18o6’*Military Affairs* vol.30 issue 4 Winter 1966

Hazareesingh，Sudhir，‘Memory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The Legend of Napoleon Revisited’*French History* vol.18 2004

‘God of War’*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ruary 2012

Hicks，Peter，‘The Napoleonic “Police” or “Security” State in Context’*Napoleonica La Revue* nos.2-10 2009

‘Late 18th Century and very early 19th Century British writings on Napoleon：Myth and History’*Fondation Napoléon* website

Hochel，Marian，‘Dominique-Vivant Denon：Napoleon’s Chief Arts Adviser’*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 1 no.4 November 2011

Hollins，Dave，‘The Hidden Hand：Espionage and Napoleon’*Osprey Military Journal* vol.2 no.2 25 March 2000

Holmes-Wilson，Captain C.，‘Nelson and Napoleon：A Criticism of Sea Power’*Minutes of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vol.30 1903-4

Horward，Donald D.，‘Masséna and Napoleon：Abandonment in Portugal’*Military Affairs* vol.37 issue 3 October 1973

‘Napoleon in Review：A Bibliographical Essay’*Military Affairs* vol.43 issue 3 October 1979

Innocenti，Claudio，‘Souls Not Wanting：The Marshalate’s Betrayal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Jourdan，Annie，‘Napoleon and History’*French History* vol.10 1996

‘The Grand Paris of Napoleon：From a Dream of Magnificence to a Dream of Utility’*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Keene，Edward，‘The Treaty-making Revolu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34 no.3 September 2012

Lamy，Gautier，‘La cavalerie française de 1813’*La Revue Napoléon* no.9 June 2013

Lewin，Peter K.，Hancock，Ronald G.V. and Voynovich，Paul，‘Napoleon Bonaparte：No Evidence of Arsenic Poisoning’*Nature* vol.299 14 October 1982

Lochet，Jea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ande Armée and its Cavalry in Russia 1812’www.magweb.com

Lugli，Alessandro et al.，‘Napoleon Bonaparte’s Gastric Cancer：A Clinicopathologic Approach to Staging，Pathogenesis，and Etiology’*Nature Clinical Practice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vol.4 no.1 2007

Maamar，Sayah，‘Propos critiques sur l’Université Impériale vers

1810’*Études Napoléoniennes* nos.31-34 1994

McErlean，J.M.P.，‘Governor Raffles’Fifteen Minutes with Napoleon’*The Waterloo Journal* vol.27 no.1 Spring 2005

Markham，Felix，‘The Emperor at Work’*History Today* September 1963

Markham，J.David，‘Napoleon’s Last Hours in Fra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Was Napoleon an Anti-Semite？Napoleon，the Jews and Religious Freedom’Speech to the Symposium on the Bicentenary of the Sanhedrin，Tel Aviv，Israel 31 May 2007

Mikaberidze，Alexander，‘“The Russian Eagles over the Seine”：Russian Occupation of Paris in 1814’*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Murphy，Orville T.，‘Napole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How Much Did He Owe to the Past？’*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

Nester，William，‘Napoleon，Family Values and the Fate of Europ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Norris，A.H. and Bremner，R.W.，‘The Lines of Torres Vedras’*The Brit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Portugal* 1986

O’Brien，David，‘Antonio Canova’s Napoleon as Mars the Peacemaker and the Limits of Imperial Portraiture’*French History* vol.18 no.4 2004

Ocampo，Emilio，‘Rescuing Napoleon from St Helena’*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Packwood，Allen，‘A Tale of Two Statesmen：Churchill and Napoleon’*Finest Hour* no.157 Winter 2012-13

Parker，Harold T.，‘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

Paz，Ignacio，‘1808，the Point of Implosion for the Napoleonic Empire’*Napoleonic Series* website

Pierron，Lt.-CoL.，‘Les methodes de guerre actuelles’（Paris 1878）*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Journal* vol.23 no.99 1879

Pratt，Fletcher，‘Vignettes of Napoleon in Italy 1796’*Journal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vol.2 issue 2 Summer 1938

Price，Munro，‘Napoleon and Metternich in 1813’*French History* vol.26 no.4 December 2012

Promyslov，Nikolay，‘The Grande Armée’s Retreat as Seen from the Intercepted Soldiers，Correspondence’*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Reid，Loren，‘The Last Speech of William Pitt’*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vol.49 issue 2 1963

Riaud，Xavier，‘Napoleon and His Teeth’*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3 May 2010

Rose，J.Holland，‘A Document Relating to the Continental

Syste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no.69 1903

Ross，Steven，'Napoleon and Manouver Warfare'28th Harmon Memorial Lecture in Military History，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Colorado 1985

Rossetti，Marie-Joseph，'Journal du Général Rossetti'*La Revue de France* vol.5 March 1933

Rowe，Michael，'Between Empire and Home Town：Napoleonic Rule on the Rhine 1799-1814'*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42 1999

Sainsbury，J.，'Thirty Facsimiles of the Different Signatures of the Emperor Napoleon and a Sketch of the Events Connecting Them'1836

Schmidt，H.D.，'The Idea and Slogan of "Perfidious Albio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o.14 1953

Schmitt，Hans，'1812：Stein，Alexander Ⅰ and the Crusade against Napoleon'*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1 March 1959

Schneid，Frederick C.，'The Dynamics of Defeat：French Army Leadership，December 1812-March 1813'*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3 issue 1 January 1999

Schroeder，Paul W.，'Napoleon's Foreign Policy：A Crimi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54 April 1990

Sibalis，Michael，'Conspiracy on St Helena？（Mis）remembering Napoleon's Exile'*French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vol.4 2011

Siegfried，Susan L.，'The Politicisation of Art Criticism in the Post-

Revolutionary Press’in ed. Orwicz，Michael R.，*Art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1994

Smith，G.C.Moore，‘General Petit’s Account of the Waterloo Campaig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8 no.70 1903

Sparrow，Elizabeth，‘The Alien Office 1792-1806’*Historical Journal* vol.33 no.2 1990

Stark，Nicholas，‘Society：Friend or Enemy of the Black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4 November 2011

Uffindell，Andrew，‘Napoleon Fights for Paris’*Military Illustrated* no.251 April 2009

Vaskin，Alexander，‘Three Mistakes of Napoleon’*Nezavisimaya Gazeta* 30 August 2012

Weider，Ben，‘The Assassination of Napoleon’*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1 April 1997

‘Napoleon and the Jews’*Napoleonic Scholarship* vol.1 no.2 December 1998

Weigall，Arthur，‘Napoleon’s “Great Adventure”’*Blackwood’s Magazine* no.191 April 1912

Whitcomb，E.A.，‘Napoleon’s Prefect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79 1974

Woloch，Isaac，‘Napoleonic Conscription：State Power and Civil Society’*Past and Present* no.111 1986

Wood，William J.，‘Forgotten Sword’*Military Affairs* October 1970

Woolf，Stuart，‘French Civilisation and Ethnicity in the Napoleonic Empire’*Past and Present* no.124 1989

‘The Construction of a European World-View in the Revolutionary-Napoleonic Period’*Past and Present* no.137 1992

Yale Center，‘Nelson and Anti-Napoleon Verse’Yale University pamphlet[n.d.]Yarrow，Dr H.，‘The Death of Napoleon on St Helena’*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Waterloo Committee* December 1982

一些关于拿破仑的网站

Fondation Napoléon www.napoleon.org

Musée de l’Armée www.invalides.org

Napoleonic Alliance www.napoleonic-alliance.com

Napoleonic Guide www.napoleonguide.com

Napoleon Internet Guide www.napoleonbonaparte.nl

Napoleonic Literature www.napoleonic-literature.com

Napoleonic Series www.napoleonseries.org

La Souvenir Napoléonien http：//www.souvenirnapoleonien.org

War Times Journal www.wtj.com

档案

Prince Piotr Bagration，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ical Archive，Moscow

Antoine-Alexandre Barbier，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

Hortense de Beauharnais，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Marshal Alexandre Berthier，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and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General Henri Bertrand，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Paris

Sir Charles Blagden，Beinecke Library，Yale

Carolin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Elisa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érom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oseph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and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Josephine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etizia Bonaparte（Madame Mèr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ouis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Lucien Bonapart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Emperor Napoleon Ⅰ，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Pauline Bonaparte，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Theodore D.Buhl，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Yale

Cabinet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Jean-Jacques Cambacérès，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Vicomte de Charrier-Moissard， 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 Paris

Thomas Cholmondeley（Lord Delamore）， Beinecke Library， Ya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a Justice，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de la Légion d’Honneur，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Conseils d’Administration de la Maison de l’Empereur，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and 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 Paris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s，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Conseil d’État，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Lord Curzon，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Comte Pierre-Antoine Dam，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Vincennes

Louis-Nicolas Davout，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Sir William Fellowes，Beinecke Library，Yale

French Foreign Ministry，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La Courneuve

Sir William Gell，Beinecke Library，Yale

Sir John Harper，Beinecke Library，Yale

Keith Hearl，Rhodes House Library，Oxford

General Lazare Hoch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Marshal François-Christophe Kellermann，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General Jean-Baptiste Klébe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Stanley Kubrick，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London

La Grande Armée，Service Historiques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Jean Lannes，Service Historiques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General Bernard Lauriston，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Sir Hudson Lowe，British Library，London

Susan Marie Mackenzie，Beinecke Library，Yale

Hugues Maret，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Marshal Joachim Murat，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Comte Louis de Narbonne，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Frederick Sheldon Parker，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Yale

Louis-Marie de la Revellière-Lépeaux，Beinecke Library，Yale

Count Pierre-Louis Roedere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Fyodr Rostopchin，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ical Archive，Moscow

Marshal Gouvion Saint-Cy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General Barthélemy Schérer，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Marshal Nicolas Soult，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Adolphe Thiers，Bibliothèque Thiers，Paris

Sir Thomas Tyrwhitt，Beinecke Library，Yale

Marshal Claude Victor-Perrin，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Jane Waldie Watts，Beinecke Library，Yale

War Ministry，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Vincennes

Sir Nathaniel Wraxall，Beinecke Library，Yale

索引

（以下页码皆为本书页边码，加粗页码表示地图所在页，“拿破仑”在小标题中缩写为“N”。）

Abdullah，Pasha of Damascus 194

Abensberg，battle of（1809）503

Aberdeen，Earl of 310，695，701

Abo，Treaty of（1812）570，638

Aboukir，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1801）295

Aboukir，battle of（1799）200-201

Aboukir Bay，battle of（1799）177-8

Abrantès，Laure，Duchess d’ｘｘｘiv，58-9，68，819

on Josephine 69

on Lucien Bonaparte 210

on Cambacérès 216

on Pauline Bonaparte 302

on coronation 355

on N’s son 565

Académie Celtique 14

Académie Française 244

Acre 180，185-205

siege of 181，192-4，195-7

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1815）745，748

ratification 749

Acton，Sir John 358

Addington，Henry，Viscount Sidmouth 319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5-6

Ajaccio，Corsica 3，4，33，34，202

fighting（1792）37

Albe，General Louis d’684

Albenga，Italy 81

Albert，General Joseph，at Berezina river 627

Alexander the Great，N’s inspiration 165，168，174，186，187

Alexander Ⅰ，Tsar of Russia 295-6，729

N’s view of 359

and Austerlitz 381，390

peace proposals 400，613-14

meeting with N at Tilsit 456-8

and conference at Erfurt 488-93

and N’s proposed marriage to Anna Pavlovna 538，547

army reforms 539

N’s letters to 542，556，563-4，585，586

and Swedish throne 547

relations with N 549，550，573-4

preparations for war（1810-12）551，557，560-66，570

ukaz on Russian trade with neutral countries 557，561

and Poland 561-2

and Austria 562

and Prussia 562

and Turkey 572

on N（after Russian campaign）635

at Lützen 647

at Leipzig 677

Talleyrand and 705

in Paris 710，711

visit to Josephine 718

visit to Marie Louise 718

after Napoleon 815

Alexandria（Egypt）168，200

British siege of 297

Allemand，Captain Zacharie 364

Allonville，Comte d’557

Alps，crossing of（1800）251，252-3，256

Alsace，and Jews 402-3

Alvinczi，General József（Austrian army）119，126，127

at Arcole 121-3

Amberg，battle of（1796）78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27

see als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iens，Peace of（1802）294-9

initial approaches 294-7

signing of 297-9，307

terms 298，307-8

lack of commercial treaty 308

resumption of travel between France and Britain 309-10

Amiens，Peace of（1802）-*cont.*

failure of implementation 313-14，319-20，321-2

and preparations for war 321，322-6

collapse of 324-5 Amsterdam 398

Andréossy，General Antoine 151

as envoy to London 323

in Constantinople 572

Angély，Michel Regnault de Saint-Jean d’772

and N’s return（1815）741

Annual Register （journal）316*n*

anti-Semitism 404-5

Antommarchi，Francesco，doctor 796-7，798，799，819

Aosta（Italy），Fort Bard 253

Archambault，Achille and Joseph，St Helena 779

Arcis-sur-Aube，battle of（1814）707

Arcole，battle of（1796）121-3

Aréna，Barthélemy，deputy 225

Aréna，Joseph Antoine 288

aristocracy，N’s new 464-6

Arnault，Antoine-Vincent，historian 170

Arnhofen，battle of（1809）506

Arnott，Thomas，doctor 798

art treasures

from Italy 85*n*，87-8，89，105-6，107，129-30，151

from Malta 167

from Egypt 179-80

from Berlin 423

from Moscow 612，629

from Spain 660

artillery

prestige of 16-17

technological advances 25

and crossing of Alps 251，253

and casualty rates 445

Borodino 604 and *n*

lost in retreat from Moscow 621，624

Leipzig 681

shortage of（1814）688

arts，N’s patronage of 543-5

Aspern-Essling，battle of（1809）512-16

al-Attar，Hasan 177

Atthalin，Louis 719

Aubry，Captain，war minister 58

Auersperg，Field Marshal Prince von 376

Auerstädt，battle of（1806）420，421

Augereau，Marshal Pierre 75，79，89，109，111，344，345，744

Castiglione 112

in Italy 115-16，119-20，121-2

and Fructidor Coup 146-7

and Brumaire coup 223

and Concordat（1801）274

Jena 413，414，418，419

in Prussia 426

Eylau 439，442，443，444

and 1814 campaign 703

surrender of Lyons 707

Augusta，Princess，of Bavaria 321

marriage to Eugène 395

Austerlitz，battle of（1805）383-4，385，386-7，388-90

manoeuvres towards 368-9，375-8，378-9，381-3

Pratzen heights 377，381，384，385

post-battle address 389-90

casualties 390

aftermath 391-2

profits from 395-6

Austria

declaration of war（1792）38

invasion of France（1792）39

counter-attack（1795）64

and N’s campaign in Italy（1796）81-2，90-91

and relief of Mantua 108-9，119，123

peace with after Italian campaign（1797）138-60

N’s proposal of peace （1799）237

renewal of hostilities （1800）249，250-51

armistice（1800）285-6

and Peace of Lunéville （1801）290，291

and Third Coalition 364-5

preparation for war（1805）366-8

rearmament（1808）485，496

and War of Fifth Coalition 498，502，526

and 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532-3

and Russia 569

mobilization（1813）640

rearmament（1813）652

and second Treaty of Reichenbach（1813）659

declaration of war（1813）663

and Sixth Coalition 663，693，694，695，701

see also Francis Ⅱ，Emperor

Austrian army

Marengo campaign 250-69

and Austerlitz 377-8，381

corps system 498

at Wagram 518

troops for Russian campaign 570

Autun，N’s education at 10-11

Auxonne

School of Artillery at 24-6

riots（1789）29

Avignon 721

Avrillon，Mademoiselle 472

Azara，Chevalier d’，Spanish ambassador 321

Babeuf，François-Nöel，journalist 144

Baciocchi，Felice（Prince of Lucca），marriage to Elisa Bonaparte 143，361

Baden，grand duchy of 393

Baden，Prince Karl of 321

Bagration，General Pyotr

Austerlitz 388

in Poland 437

Eylau 439，442

Heilsberg 450

Russian Second Army 580，581

strategy of withdrawal 585

at Smolensk 594

Borodino 605

Bailén，battle of（1808）485-6

al-Bakri，Sayyid Khalil 179

Balashov，General Alexander 585，586

Balcombe，Betsy 782-4，787，792，795，819

Balcombe，William，East India Company superintendent，St Helena 782，787-8，795

balloonists，military 759*n*

Balsamo，Joseph，occulist and fraud 401 and *n*

Bamberg，Prussia 413

bankers 245

Banque de France 246

run on，before Austerlitz 370

Barbé-Marbois，François，Marquis de 147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5

Barbier，Antoine-Alexandre，N’s librarian 569，595*n*

Barclay de Tolly，General Michael 438，539，808

Eylau 438，439

as war minister 557，562

Russian First Army 580

strategy of withdrawal 581，598

at Vitebsk 592

N’s pursuit of 594

at Smolensk 594，596

dismissal 598

Dresden 668，670

at Kulm 672

Baring，Sir Francis 548

Barings Brothers 325-6

Barral，Comtesse de 467

Barras，Paul，member of Directory 51，144，156，209，820

and Sections’rising 65

and Josephine 70

and choice of N to command Army of Italy（1796）72

N and 94-5，148，214

and Fructidor Coup 146-8

and Brumaire plot 214，219-20

Barrès，Captain 685

Bartenstein，Convention of（1807）449

Barthélemy，Marquis，member of Directory 147

Barthélemy，Marquis de，member of Directory 144

Bassano，battle of（1796）119-20

Bassano（Italy）115

Baston de Lariboisière，General Jean-Ambroise 456

Bathurst，Lord，secretary for war 714，785

‘Battle of the Nations’*see* Leipzig

Bausset-Roquefort，Baron Louis de 134，601，607

memoirs ｘｘｘｖ

as Prefect of the Palace 360-61

chamberlain 472，656

Bautzen，battle of（1813）651-4

Bavaria 393

treaty of friendship 299

alliance with France 394-5

declaration of neutrality 672

declaration of war（1813）674

Bavaria，Crown Prince Ludwig of507

Baxter，Alexander，doctor 792

Bayonne，conference between N and Ferdinand 479-84

Bayonne，Treaty of（1808）482

Beauharnais，General Vicomte Alexandre de 69

Beauharnais，Eugène（Josephine’s son）69，70，71，219

as aide-de-camp in Egypt 163

marriage to Princess Augusta of Bavaria 321，395

as viceroy in Italy 362

at Raab 518

Wagram 519，522

and Army of Italy in Poland 571

and Russian campaign 581

at Borodino 605，606

on retreat from Moscow 623

at Berezina 626

command of Grande Armée in Russia 630-31

withdrawal to Berlin（1813）639

Lützen 646

and Army of Italy 688

and N’s return（1815）740

last years 816

Beauharnais，Hortense de（Josephine’s daughter）71，155，287，709，773-4

marriage to Louis Bonaparte 304，398

illegitimate child 534

on Josephine’s divorce 535

on N 636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affair with Flahault 816

later years 816

Beauharnais，Josephine（daughter of Eugène）816

Beauharnais，Josephine（Marie-Josèphe-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Vicomtesse de *see* Bonaparte，Josephine

Beauharnais，Stéphanie de，marriage to Prince Karl of Baden 321

Beaulieu，General Johann，Austrian commander 81-2，89

Beaumont，General，in Prussia 426

Beauregard，Marquis Henry Costa de，Savoyard colone l86，87

Beauvoison，Colonel Joseph 180

bee，as N’s personal emblem 348，739

Bégos，Captain Louis 627

Beker，General 776

Belgian National Guard，and Russian campaign 572

Belgium698，703，750-51

Bellerophon，HMS 774，775，776-7，778-80

Belliard，General Auguste 306，593，709，718

Borodino 605-6

Belloy-Morangle，Jean-Baptiste，archbishop of Paris 274

Bennigsen，General Levin von 295，433

at Pultusk 431-3

retreat to Alle 436-8

Elyau 439-45

attack at Guttstadt 449

Friedland 450，451-4

Leipzig 676，681

Berezina，River 625-6

crossing of 626-9

Dutch engineers at 626-7

Berlier，Major，Augustin 54

Berlier，Théophile 289-90，349

on Brumaire coup 222，224

Berlin 639

fall of 423

Charlottenburg Palace 424-5

N in 424-5

abandoned by Eugène 643

Berlin Decrees（1806）427-8

Bernadotte，Marshal Jean-Baptiste 132，145，344，399，437

marriage to Desirée Clary 60，145，547

and Brumaire coup 217-18

taking of Munich 372

Austerlitz 380，381，382，383，385

relations with N 385，421

and Jena 414，418，421

in Poland 426，436

Wagram 519，522，818

and Leipzig 674，676，681

as King of Sweden 547，638；treaty of friendship with Russia 570；and Northern Army（1813）664

Bernier，Étienne-Alexandre，Vendée leader 242，272

Bernkopf，Captain Joseph 253

Bernoyer，François 166

Berry，Mary，on Tuileries 247-8

Berthier，General César-Gabriel 61

Berthier，Marshal Alexandre，N’s chief-of-staff 80-81，91，344，345，399

in Italy 83

N’s reliance on 106

Egypt 163

as war minister 233

command of Army of the Reserve 238，250-51

Marengo 263，266

and plans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8-9

filing system 365-6

Austerlitz 383

Jena 413，418，421

and war with Austria（1809）501，502-3

created prince 531

and marriage of N to Marie Louise 540

and Jérôme 585

in Russia 595

at Berezina river 627

and Louis ⅩⅧ 713

death（suicide）743

Berthollet，Claude-Louis，scientist 89

Bertin brothers 243

Bertrand，General Henri ｘｘｘｖ，170，718，774，801-2，818

Lützen 646，647

Bautzen 652

Leipzig 676

and Elba 716，719

with N in 1815 return to France 730

at Waterloo 758

on St Helena 779，784

Bessières，Marshal Jean-Baptiste 100，344

in Egypt 163

Consular Guard 253

Austerlitz 383，388

in Prussia 426

in Spain 485，486

in Germany 502

Aspern 513

Wagram 519，524

Borodino 606-7

Maloyroslavets 618

death 646-7，685

Beurnonville，General Pierre de 224

Beyts，François 237

Bidasoa，River，Wellington’s crossing of 674

Bigarré，Major，Austerlitz 388

Bigonnet，Jean-Adrien 221，224

Bigot de Préameneu，Félix，and Code Napoléon 276

Billon，Captain François-Frédéric 442

Binasco，burning of 98-9

Binet de Marcognet，General Pierre de 764 and *n*

biographies，British 317

Biot，Colonel Hubert 702

Blaze，Captain 268，469，638

Eylau 442

in Spain 482

in Austria 510

Blin，Joseph，deputy 224

Blücher，General Gerhard von 643

surrender of Lübeck 422

and Army of Silesia 663-4，693，700-701

and Leipzig campaign 665，674，675

Katzbach 672

crossing of Elbe 674

Leipzig 676，680，682

Brienne 693-4

and1814campaign 694

Champaubert 699

Craonne 704

Ligny 754，755

and Waterloo campaign754，759

Bobr，French eagles burned at 626

Bodin，Louis，army contractor 159-60

Bohemia 672

Bologna 105

Bon，General Louis-André 121

in Egypt 163

Holy Land 186

death 195

Bonaparte（Buona Parte）family 3-4，6，7-8

support for Revolution 29-30

split from Paolist nationalists 33-4，41

exile from Corsica 44-5

with N in Milan 143

relations with Beauharnais 352，536-7

and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41

under papal protection in Rome 816

Bonaparte，Carlo（father）5，6

death7，17-18

recognition as noble 9-10

financial problems 18-19

Bonaparte，Caroline（Maria-Annunziata）7，352，796，816

marriage to Murat 144

and N’s marriage to Marie Louise 541

Bonaparte，Charles（son）*see* Bonaparte，Napoléon-François-Joseph-Charles

Bonaparte，Charles-Louis-Napoléon（son of Louis），as Napoleon Ⅲ 817

Bonaparte，Charlotte（daughter of Lucien）475

Bonaparte，Elisa（Maria-Anna）（sister）7，352，393，502*n*，686

marriage to Felice Baciocchi 143，361

Bonaparte，Jérôme（Girolamo）（brother）7，68，304

marriage to Princess Caterina of Württemberg 321，395

marriage to Elizabeth Patterson 343

as King of Westphalia 397，461

and Russian campaign 581，584-5

N and 644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Waterloo 756，760，761

after Waterloo 771

last years 816

Bonaparte，Joseph（elder brother）5，7，8，18，706-7

early career 15-16，24，27，31，33

marriage to Julie Clary 53

as diplomat 67，108

in Italy 107

and Compagnie Bodin scandal 159

in Egypt 163

and Josephine’s affair with Charles 171

and negotiations with Vatican 272

and treaty with America 286

and Peace of Amiens 308

as heir to N 311，343，536

as Grand Elector 342

as King of Naples 397，399

and Army of Naples 447-8

as King of Spain 480，482，483，486，501，692

and Talavera 531

relations with N 660，705-7

and Vitoria660

and Marie Louise 705-6

and escape of Marie Louise and son from Paris 708-9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last years 816

Bonaparte，Joseph（grandfather）9

Bonaparte，Josephine（wife）68-71，311

incarceration（1794）69-70

marriage to N（1796）70-72

N’s letters to 82，92-3，99-100，102-4，107-8，124

affair with Hippolyte

Charles 93，100，159-60，171，207

relations with N 104，207-8，330-31

travels to Italy 107-8，110，116，124

extravagance 155，207，247-8，468

and Compagnie Bodin scandal 159-60

and *machine infernale* bomb attack 287

Bonaparte，Josephine（wife）-*cont* .

and Hortense 304

and d’Enghien 336-7

coronation 352，353-6

religious ceremony 352

at Mainz 413，431

divorced by N 535-7，538

descendants 537

patronage of arts 544

death 723-4

Bonaparte，Letizia（Maria-Letizia Ramolino）（mother）3，5，6-7，8，11，60

as widow 19，60

and d’Enghien affair 336-40

and coronation 352-3，356

and civil marriage of N to Marie Louise 541-2

on Elba 724，730

N’s farewell to 774

funds for N on St Helena 789*n*

last years in Rome 816

Bonaparte，Louis（brother）7，343，813，816

schooling 34-5，58，67

marriage to Hortense Beauharnais 304，398，816

as Constable of France 342

as King of Holland 397-8，549-50

and N’s return（1815）740

at Rochefort 774

Bonaparte，Luciano，archdeacon of Ajaccio（great-uncle）4，6，19，36

Bonaparte，Lucien（Luciano）（brother）7，24，30，114，816

marriage to Christine Boyer 54，305

and Brumaire coup 209-10，222，223，224-5

as interior minister 239，304

and plebiscite results 239-40

marriage to Alexandrine Jouberthon 305

and coronation 352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and deposition of N（1815）772

Bonaparte，Marie Louise *see* Marie Louise，Archduchess of Austria

BONAPARTE，NAPOLEON

reputation and legacy ｘｘｘｉ，805-14

early years

birth 3

love of reading 8-9，12-14，2.0，25

education 8-9，10-15；ability in mathematics 11，16；at École Royale Militaire 16-18，806；languages 11-12

Corsica

views on 14-15，21-2，40-41

return visits 19，24，30-34，36-8

with National Guard in 40-41

and recapture of（1796）45

expedition to recapture（1795）57

last visit（1799）202

and Revolution 26-8，29-52，806

view of monarchy 39

Jacobinism 40-41，806

arrest and imprisonment（1794）55-6

early military career

commissioned 19-20

at School of Artillery at Auxonne（1788-9）24-6

return to Auxonne（1791）34-5

promotion to first lieutenant，4th Regiment of Artillery 35-6

with Corsican National Guard（1792）37

deemed to have resigned（1792）37，38

with Corsican Volunteers（1792）40-41

first command（Sardinia）（1793）42-3

transfer to Army of the South（1793）45

rapid promotion in 1790s 52

as artillery commander of Army of Italy（1794）53

promotion to brigadiergeneral（1794）54

in Paris on half pay（1795）58

rejection of appointment in Vendée 58，60，61

attachment to Topographical Bureau 61-2

as second-in-command of Army of the Interior（1795）65-6

and Vendémiaire（1795）65-7，809

command of Army of the Interior（1795）67-8

command of Army of Italy 72

relations with Directory 79，80，83，91-2，93-5，101-2，106，114，142，148，155-6

as military commander 133-4，805-8

attention to detail（micro-management）48-9，54，330，448-9

personal bravery 49，50，122，265-6

ignorance of naval warfare 57，297，363，375，809

ability 72-3

capacity for hard work 79

relations with soldiers 79-80，380，382，432，510

on pillaging and‘living off the land’84-5

speed of marching 85，808

speeches to troops 90，165-6，389-90

nickname of *le petit caporal* 91

post-battle reports（exaggeration in）92，197，268，639

public adulation 94，133-4，154

and use of punishments 99，125 and *n* ，126，178-9，181and *n* ，182

and aides-de-camp 101

concern for soldiers 125-6，134-7，807

appointment of officers 133-4，345*n*，671-2

and *esprit de corps* 134，807

military philosophy 134-7

military reviews 135

role of luck 269

bulletins 372，455-6，576，629-30，772

underestimation of British 394

and peace negotiations 656-7

military strategy 806-8

early grasp of 61-2

‘strategy of the central position’82，133

manoeuvre sur les derrières 88

bataillon carré system 112-13，116，646，751

ordre mixte 132

military campaigns and battles *see individual campaigns and battles*；Sixth Coalition，war of；Third Coalition，war of

foreign strategies 91-2，499

in Syria/Middle East 186

plans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7-32，357-8，364-5

‘Continental System’427-31，548-9，560-61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806

and early Italian nationalism 95-6，118，241

religious reforms in Italy 118

negotiation of treaties 138-40，142

role in Fructidor Coup 146-8

peace negotiations with Italy 148，149-51，154

reforms in Egypt 169，174

and Brumaire coup（1799）206-28

policy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238-46，809-10

marriage alliances 304-5，320-21

concern with minutiae of administration 351，367，401-2，467，549，742，813

enlightened authoritarianism 809-10，812-13

see also N-，as emperor；N-，as First Consul（*below*）

as First Consul

appointment as Consul 225，231-49

moves into Tuileries 246-8

religious settlement（1800-1801）270-75

and Code Napoléon 275-9，809，810

social reforms 279-81

and Conseil d’État 281-4

declared Consul for life 310-11

as emperor 809-10

and renewal of war against Austria 250-51

campaign for imperial throne 341-2

proclamation as 342

and succession 342，343，533-4

appointment of Marshals 344-5

and use of honours 349-50，399-400，464-6 and *n* ，531

strategy in Europe 362-3，459-60，490-91，493，499

view of Austria 365，499

and Joseph as king of Naples 397，399

imperial household468and *n* ，469

and Portugal 473-5

and Spain 474-5，478-88，493-7

and height of empire 527-51

excommunication by Pius Ⅶ 530

political errors（1810）550-51

preparation for war with Russia 556-79

coup against（Malet）（1812）622-3

on return from Russia 636-7，639-42

Concordat with Pius Ⅶ（1813）639-40

government after Leipzig 685-7

and prospect of failure（1814）690-91

options for peace terms（1814）691-2

deposition and abdication（1814）710，711，713-16

exile on Elba 722-30

decision to retake throne 726，727，728-9

escape from Elba 729-31

Hundred Days（***return to France1815***） 730-39

size of force 730-31

proclamations at Golfe-Juan 731-2

Hundred Days*（*return to France 1815*）*-cont .

Route Napoléon（to Grenoble）732，733，734-7

reversal of Bourbon reforms 744-5

proposals for European peace 746

ratification of Acte Additionnel 749

Waterloo campaign 750-69

return to Paris after Waterloo 770-73

second abdication 772-3

contemplation of escape from France 774-6

surrender to Royal Navy 774，776-7

last years on St Helena and death 778-802

will 799-801

death and burial 801

remains reinterred 801-2

appearance 58-9，68，75，101，149，177，247

dress 469-70

on Elba 717

in1815：747，777

character 812-14

Corsican accent 9

handwriting 9，16

heroes 12，13，136，158，284，491

social and political beliefs 17-18，25-6，29，38，97-8

religious views 22，32-3，99，258，271-2，401

confidence 72-3，75

identity as French 73

spelling of name 73 and *n*

and public image 106

use of histrionics 149

view of women 157-8，278，281，460-61*n*

and *savants* on Egyptian expedition 165，167

relations with Muslims in Egypt 169-71，174-7

conservatism 243

dynamism 282-3

impatience 371，471-2

speed of travel 462，499，555，595-6，808

dislike of dissent 466-7

relations with staff 472

emotional self-control 641

enlightenment 809-10，812-13

health 8，795

scabies 49-50

complaints about 148-9，434

fever at Borodino 601

reports in letters 630，653-4

at Dresden 668，671

Leipzig campaign 672，681

suicide attempts 715，772

haemorrhoids 756-7

at Waterloo 756-7，760

deterioration on St Helena 792-4，795-9

depression 793

alleged arsenic poisoning 796

stomach cancer 796-8

personal life 468-73

courtship of Désirée Clary 53-4，56-7，59-60

social life in Paris（1795）58-9

marriage to Josephine de Beauharnais（1796）70-72

acquisition of art from Italy 85*n*，87-8，89，105-6

wealth 143，247-8

election to Institut de France 156-7

divorce from Josephine 171，535-7，538

affair with Pauline Fourès 182-3

reconciliation with Josephine 207-8

mistresses 330-31，361and *n*，399-400，437*n*，533，780-81；Marie Colonna-Walewska 435，437，462-3，517，534

daily regime 470-71，790-91

marriage to Marie Louise of Austria 539-43，655

parting from Marie Louise and son 692

relations with family 7-8，304-5，398-9，461-2，772

and mother 6，7，11，724，730，774，789*n*

allegations of illegitimacy 10

Joseph15-16，660，705-7

and father 18-19

Jérôme 644，740

Pauline 692，721

and will 799-800

letters ｘｘｘｖ-ｘｘｘvi，48-9，297-8*n*，359，412 and *n*，435*n*，812

to Joseph Fesch 15-16

to Joseph 29，39，58，59-60，707

to Directory 94-5

to Josephine 82-3，92-3，99-100，102-4，107-8，124，373，462；published（1833）104

intercepted，published by British goverment 171-2

from Egypt 180 and *n* to Cambacérès 305-6

on administrative detail 351，367，402，448-9

on art of ruling 362

from Prussia 423

from Poland 446，447

to Jérôme 461-2

dictation and secretaries 471-2

from Vienna 531-2

to Marie Louise 540，615-16，645，650，653，706，714-15，724-5

from Russian campaign 575

to Berthier（1812）575

reading and books

purposeful love of reading 8-9，12-14，20，25

interest in history 12-13

admiration for Rousseau 13，22

collection of books for Egypt expedition 163，165

collection of books for Russia 569，595-6*n*

library at Longwood 802

writings and essays 21-4，25-6

‘On Suicide’21-2，794

The Hare 22

history of Corsica 24，27，31，32，34

‘A Parallel between Love of Glory and Love of Country’24

‘Dissertation sur l’Autorité Royale’25

melodramas 26

‘New Corsica’31

‘Dialogue sur l’Amour’35

and Lyons Academy essay prize（1791）35

pamphlets on Corsica 43-4

Le Souper de Beaucaire 45-6，56

Clisson et Eugénie 62-3

Caesar’s Wars 464-5，790

notes for autobiography 625

memoirs（on St Helena）789-91

Bonaparte，Napoléon-François-Joseph-Charles（son by Marie Louise）6，564-5，817

Bonaparte，Napoléon-Louis-Charles（son of Louis）311，482，533-4

Bonaparte，Pauline（Maria-Paola）（sister）7，352，779，796，816

marriage to Charles Leclerc 143-4，343-4

and death of Leclerc 302

marriage to Don Camillo Borghese 302

infidelities 343-4

bodyguard in Russian campaign 572-3

loyalty to N 692，721

on Elba 724，730

Bonaparte，Stéphanie（daughter of Joseph），marriage to Karl Ludwig of Bavaria 395

Bonnet，General，Lützen 647，650

Bonneuil，Michelle de 333

Bordessoulle，General Étienne

Dresden 669

Leipzig 677

Borghese，Don Camillo Filippo Ludovico 530，816

marriage to Pauline Bonaparte 302

Borghetto，battle of（1796）100

Bormida，River 259，262-3

Borodino，Kutuzov at 598-9

Borodino，battle of（1812）601，602-3，604，606-8

battlefield 601，604

aftermath 609-10

Boswell，James on Ajaccio 4

Account of Corsica 19，30

Bouchotte，Jean-Baptiste，war minister 48，55

Boudet，General Marengo 264，266

Aspern 515

Boulay de la Meurthe，Antoine 774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209

and new constitution（1799）232

and N’s return（1815）741

Boulogne，invasion camp at 329，331-2，350

Bourbon，House of

requests for restoration 248-9

restoration 713-14

Bourbon，House of ⅩⅧ second restoration（1815）815-16

see also Louis

Bourcet，Pierre de 112，806

Principes de la guerre des montagnes （1775）78

Bourcier，General François 425

Bourgoin，Marie-Thérèse 330

Bourgoing，Chevalier de 10

Bourmont，Comte Louis de 242，290

defection to N（1815）737，751

Bourrienne，Louis-Antoine de，private secretary 5，38-9，150，471，472

memoirs ⅹⅹⅹⅳ，819

on Fructidor Coup 147-8

on N’s intention to divorce Josephine 171

as governor of Hamburg 429

and trade licences 548

Bouvet de Lozier，Athanase Hyacinthe 347

Boyen，General von 643

Boyer，Christine，marriage to Lucien Bonaparte 54

Boyer，General Pierre，in Egypt 168

Brandt，Captain Heinrich von 610

bread

prices 311-12

riots 560，568

Brescia，‘Surprise of’（1796）110

Breslau，Blücher at 664

bridges and bridgeheads 90*n*

Berezina 626-9

Brienne，battle of（1814）693-4

Brienne-le-Château，Royal Military School of 11-15，16 brigandage，rural 240-41

Brno（Brünn），surrender of 377

Broglie，Duc de 242

Brueys，Vice Admiral François 166

and loss of fleet at Aboukir Bay 177-8

Bruix，Vice-Admiral Eustache 209，296，331

Brumaire coup（1799）206-28

N’s role in 212-15

plans for 217-18

alleged attack on N in Orangery 221-2，223-4，225-6

abolition of legislature 226-7

Brune，Marshal Guillaume 126，329，344，721，743

Brunny，Madame de 10

Brunswick，Duke of 414，420

Brussels 751

Bry，Jean de 307

Bubna，Colonel Count Ferdinand 532，655

Bucharest，Treaty of（1812）572

Bugeaud，Thomas 381-2

Bülow，General von 643，665

Dennewitz 672

Leipzig 681-2

Waterloo 759，765

Bunbury，Sir Henry 778-9

Buonaparte，Francesco 3

Buonavita，Abbé 798

Burdon，William，biographer 7-8

Burke，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42

on N’s reputation 67

Bursay，Madame Aurore，actress 614

Burton，Dr Francis 819

Bussy，Colonel Victor de 718

Buttafuoco，Matteo 5，34，41

Buxhöwden，General Friedrich von 381，433

Austerlitz 389

Byron，Lord 310

Cabanis，Pierre 306，307

Cacault，François，French agent in Rome 106，129

Cadibona，battle of（1800）249

Cadoudal，Georges 242，289，317

conspiracy to assassinate N 333-6，346-7

Caffarelli du Falga，General Louis 163，167，195

Cairo

marches to 169-71，172-3，199

N’s reforms 173-4

celebration of Prophet’s birthday 178-9

uprising 181-2

Calder，Admiral Sir Robert 363

Caldiero，battle of（1796）120

Caldiero，battle of（1805）375

calendar，restoration of（1801）273

Calliano（Italy）115

Cambacérès，Jean-Antoine-Régis 399，467，818

memoirs ｘｘｘｖ

and Brumaire coup 215-16

as Second Consul 234，238

and Code Napoléon 276

letters to N 305-6

constitutional purge 306-7

and plans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7

and d’Enghien 336

and Russian trade *ukaz* 557

and Malet’s attempted coup（1812）622-3

and Marie Louise as regent-designate 640

and flight of Marie Louise 708-9

and N’s return（1815）741

Cambacérès，Jean-Jacques-Régis，as justice minister 210

Cambronne，General Pierre 716，730，732，734-5

Campaign of 1814：688-712，**696-7**

Campbell，Colonel Sir Neil，and N on Elba 716-18，720，721-4，726，729-30

Campo Formio，treaty of（1797）148，150-51

and Congress of Rastatt 150，151，154

Camus，Armand-Gaston，president of Institut de France 157

canals 328

cannibalism，on retreat from Moscow 624

Canova，Antonio，sculptor 95，531，544

Cantillon，Marie-André，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Wellington 727*n*

Cape Finisterre，battle of（1805）363，364

Cape Town 320

Caprara，Cardinal Carlo，papal legate 272，356，406

caricaturists，British 317

Carnot，General Lazare 61，65，72，123

member of Directory 144，147，209

as minister of war 238，251

and N’s return（1815）741and *n*

as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773

Cartreaux，General Jean-François 45，47，49

Caselli，Charles，papal adviser 272

Castaños，General Francisco 485

Castellane-Novejean，Boniface de，Russia 587，631

Castellane-Novejean，Boniface de，prefect 245

Castiglione，battles of（1796）111，112-13

Castlereagh，Lord 333-4，686，729，778，819

N’s peace offer to（1812）573

and N’s abdication 714

casualties 811

Castiglione 113 and *n*

siege of Mantua 116，125

Rivoli 128

and care of wounded 135-6，434-5

Aboukir 200

Marengo 267

Austerlitz 390

Jena 420，421

Hof 438

Eylau 444-5，447

increased rates 445

Heilsberg 450

Friedland 455

French army in Iberia 497

Aspern-Essling 516

Wagram 525-6

Talavera 531

Ostrovno 592

Smolensk 597

Borodino 607-8

Maloyroslavets 619

Russian campaign 634-5and *n* ； from disease 587-8；retreat from Moscow 629-30

Lützen 650

Bautzen 653-4

Leipzig 680，683，684

Brienne 694

Lâon 705

Waterloo 768-9

Caterina，Princess，of Württemberg 321，395

Cathcart，Lord，British ambassador to Russia 614

Caulaincourt，Auguste de 606

Caulaincourt，General Armand de ｘｘｘiv-ｘｘｘv，399，412，818

and d’Enghien 336，337

and N’s second marriage 537，538

opposition to war with Russia 566，567

on loss of horses in Russia 587-8，592

at Borodino 606

and N’s return from Russia 631，634

and proposal of peace to Russia（1813）652，654

at Prague Congress 660-61

as foreign minister 685

and abdication of N 713，714-16

and N’s return（1815）741

censorship，abolition（1815）745

Cerea（Italy）115-16

Cervoni，Colonel Jean-Baptiste 47

Ceva，Italy 78

Chaboulon，Fleury de，secretary 729

Châlons-sur-Marne，artillery school 58

Champagny，Jean-Baptiste Nompère de，foreign minister 489，566

Champaubert，battle of（1814）699

Championnet，General Jean-Étienne 154

Chaptal，Jean，interior minister 238，2.82，471

on religious settlement 270，271

Chardon，Abbè 11

Charleroi 750，768

Charles，Archduke *see* Habsburg，Archduke Charles

Charles Emmanuel Ⅳ，King of Piedmont 117，148，313

Charles，Hippolyte 820

affair with Josephine 93，100，159-60，171，207

with Josephine in Italy 107，108

Charles Ⅳ，King of Spain 474，475

abdication（1808）478，479

cedes throne to N 480，482

retirement to Rome 483

Charles X，King of France 815-16

Chas，Jean，*Réflexion sur l’bérédité du pouvoir souverain* 342

Château Navarre 537

Château-Thierry，battle of（1814）700

Chateaubriand，François-René de 339，819-20

Le génie de christianisme 275

Châtillon，Congress of 695-8，699

Chaumont，Treaty of（1814）703-4

Chauvet，Félix，chief *ordonnateur* of Army of Italy 48，73，79，81

Chénier，Marie-Joseph，poet 290

Cherasco（Italy），armistice with Piedmont at 86-7

Chernyshev，Colonel Alexander 563，570

Chevalier，Alexandre 288

Chézelles，General Samuel-François L’Héritier de 673

Chichagov，Admiral Paul 624，626，629

Chlapowski，Dezydery Adam，aide-de-camp to N 109，496，503，506

at Vienna 511

Chobrakhyt（Chebreis），Mamluk attack at 170-71

Choiseul，Duc de 5

Chouan royalists Vendeée 43，57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288，290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

Cintra，Convention of 487

Cipriani，Francesco，St Helena 779，795

Cisalpine Republic constitution 145

renamed as Italian Republic 241

Cispadane Republic，creation of 118

Civil Code（1804）278，339

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1790）32-3

civil war，threat of（1814）713-14

Clarke，General Henri 62，123，148，412，646，709

Clary，（Eugénie）Désirée

N’s courtship of 53-4，56-7

rejection of N 59-60

marriage to General Bernadotte（and queen of Sweden）60，145

Clary，Julie，marriage to Joseph Bonaparte 53

Clary，Nicolas 107

Clausewitz，Carl von and N’s Russian

campaign 570

and Tauroggen 630

Clauzel，General Bertrand 660，743

clergy，rural parish 271

Clichy，royalist club 144，145

Cobbett，William 8，310

Cobenzl，Count Ludwig von，Austrian plenipotentiary 148，149

and Peace of Lunéville 290，291

Cockburn，Rear-Admiral Sir George，HMS *Northumberland* 779-80

Code Napoléon 275-9，528，809，810

patriarchal bias 277-8

and women 277-8

Coignet，Sergeant Jean-Roch 584-5

coinage，standardization 2-79

Colbert，Brigadier 323

Colbert，Jean Baptiste 315

Collot，Jean-Pierre 222-3

and Brumaire coup 214

Colombier，Caroline de 20

Comédie-Française 614

Commission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165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64

creation（1793）41，42

communication，lines of

Italy 88，98，111，114

in Spain 494

Russia 587，595

Dresden 651，655-6

communications，telegraph503 and *n*，546，736

Compagnie Bodin（army contractors），war profiteers and 159-60

Compagnie Flachat（army contractors）118，159

Compagnon，Colone l36

Compans，General Jean，Borodino 605

Compoint，Louise，companion to Josephine 107

Concordat（1801）272-5

Concordat（1813）639-40

Condorcet，Marquis de 306

Congreve’s rockets，at Leipzig 675，682

Consalvi，Cardinal Hercules，Vatican secretary of state 272-3

conscription 42，211，425，448，488，499-500

popular opposition to 637-8，673，685，690

Conseil d’État

in1799Constitution 233，235

N’s use of 281-4

auditeurs 283

powers of 312

as Imperial Council 347

Constant，Benjamin，writer 290，306，339，467，820

exiled 307

and new constitution（1815）745，748

Constant，valet 717

Constantine，Grand Duke of Russia 388，389，458

at Kulm 672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Ⅲ（1795）63-5，146，217

end of221，226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Ⅷ（1799）232-3，234-7

role of First Consul 232-3

and property rights 234-5

plebiscite 239-40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Ⅹ（1802）310，312

Constitutional Monarchy（1815）750

Consulate 249

established by Brumaire 225，231

N as First Consul 232-3

new decrees 233

extension（1802）310

Conté，Nicolas，balloonist 179-80

‘Continental System’（Berlin Decrees）427-31，811

N’s belief in 362，560-61

and Prussia 459

effect on Russia 490-91

Papacy and 529

‘Le Nouveau Système’548-9

Cooke，Edward 730

Copenhagen，battle of（1801）296

Corbineau，General Claude 446

Waterloo 768

Corbineau，General Jean-Baptiste，Dresden 672

Corbineau，Major Hercules，Wagram 523

Cornwallis，Lord，and Peace of Amiens 299，300

Coronation，as Emperor

heraldic insignia for 347-8

preparations for 351-3

ceremony 353-6

crowns 355

David’s painting 356

Corps Legislatif guard，and Brumaire coup 223-4

corps system

French army 365-6

Austrian army 498

adoption by European armies 643，808

Corsica 3-6，7-8，9-10，41

revolt（1793）21，43-4

and French Revolution 29，30-34，37-8，40-41

National Guard battalions 36，37

as French province 40-41

British occupation 43，45，106-7，124

collapse of Jacobin power 44-5

expedition to recapture（1795）57

French control re-established 108，124-5

N’s last visit（1799）202

Corvisart，Jean-Nicolas，doctor 49，434，796

Coste，Trenta 32-3

Coudreux，Commandant Alexandre 742

coups

Fructidor（1797）146-8

Brumaire（1799）206-28

‘Prairial’（1799）209，220

Malet’s attempted（1812）622-3

Talleyrand’s planned（1814）698-9，708

Courrier de l’Armée d’Italie 130

Coutard，Colonel Baron Louis 503，506

Craigmillen，Cuming de 15

Crancé，Edmond Dubois de，war minister 219

Craonne，battle of（1814）704-5

Crétet，Emmanuel，member of Conseil 283，347

Croker，John Wilson 104

Cromwell，Oliver，role-model for N 202

Cruikshank，George 317

Cuesta，Captain-General 531

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pantheist）（1793）32

currency

paper money 246

standardization of coinage 279

customs revenues 430

Czartoryski，Prince Adam 542

and Poland 561-2，563

Dalberg，Karl，archbishop of Mainz 406

Prince Primate of Rhine Confederation 490

Dallemagne，General Claude 89，110，111

Damanhour（Egypt）178

Dampierre，General Achille de，Marengo 259，263

dancing lessons，at Valence 20-21

Dancoisne-Martineau，Michel，French consul on St Helena 782

Danican，General 66

Danton，Georges 54

Danube，River 371

Danzig 436，448，565，575

Daru，Intendant-General Pierre 356，364，365

Poland 447

and Tilsit settlement 467

Borodino 607

and N’s return（1815）741

Daumesnil，Major Pierre，Wagram 523

Daunou，Pierre 290，306

Daure，Jean-Pierre 192

David，Jacques-Louis，painter 356，543，819

Davidovich，General Baron 115，120

Davout，Marshal Louis-Nicolas 11，344，345

Egypt 162-3

Austerlitz 380，381，384-5，388，389，390

Jena campaign 413，415，418，421

Auerstädt 420-21

in Poland 426，433，436

Eylau 438，442-3

Friedland 449-50

in Germany 502

Landshut 503，506

Wagram 522-3，524

created prince 531

and Russian campaign 563，570，584-5，635

Saltanovka 592

Borodino 604-5

and route to Smolensk 619-20

at Berezina 626

command of Grande Armée in Russia 631

governor of Hamburg 646，664，675，684

as war minister（1815）742-3

De Bry，Jean，prefect 689

Decaen，General Mathieu，in India 318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1789）27

Deerès，Admiral Denis 322-3，324，331，599，774

and N’s return（1815）741

Defrance，General Jean，Leipzig 681

Dego，battle of（1796）84

Dejean，General Jean 401-2

war administration minister 493

Delmas，General Antoine-Guillaume，and Concordat（1801）274

Delzons，General Alexis 617，619

Denmark 296，686

Dennewitz，battle of（1813）672

Denon，Vivant 773

in Egypt 165，179，202

Description de l’Egypte （1809）203-5

medals for Austerlitz 393-4

departments（regions）244

Deroy，Count Bernard 501

Desaix，General Louis

Egypt 162-3，173，185

at Marengo 259，262，264，266

death 267，268

Desbrière，Captain Édouard，*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îles Britanniques* 328

Desforges，Thomas 288

Desgenettes，René-Nicolas military doctor in Egypt 163

and plague victims in Jaffa 192，198-9

Desmoulins，Camille，journalist 27，54

Despinoy，General Hyacinthe 109，113

Dessaix，General Joseph，Borodino 599，605

Dessolle，General Jean-Joseph 334

Destutt de Tracy，Antoine 306

Desvaux de Saint-Maurice，General Jean-Jacques，Waterloo 764

d’Hilliers，General Louis Baraguey 141-2

Digeon，General Alexandre 701-2

Directory，the（executive government）64，144-5

responsibility for army 78，87-8，93-4

N and 79，80，83，91-2，93-5，114，155-6

and Italian campaign 101-2

and German campaign 106，115

and popularity of N 117-18

balance of power with N 139-40，142 and *n*，148

tensions with Assembly 145-6

Brumaire coup against 208

failures of 211-13

diseases

scabies49-50 and *n*

ophthalmia 170

plague（Jaffa）191-2and *n*，198-9

malaria 193，301

of malnutrition 252，257

yellow fever 301

typhus fever 588-9，684，693

dysentery 589

enteric fever 589

divorce，under Code Napoléon 277-8

Doguereau，General Jean-Pierre 170，173

retreat from Acre 197

Dokhturov，General 617

Dolgoruky，Prince Peter Petrovich 380

Dolomieu，Déodat de，mineralogist 165

Domairon，Louis 16

Dombrowksi，General Henri 453

Domingue，Joseph‘Hercules’303

Dommartin，General Éléazar August Cousin de 47

in Egypt 163，173，181

donation system 466

Donauwörth 371，503

Doppet，General François 49

Doret，Ensign 774

Dorogobuzh 598-9，622-3

Dorsenne，General，Aspern 515

Douglas，Sir Andrew 10

Douglas，Frederick，Elba 725

Drake，Francis，British envoy in Munich 332

Dresden

N at 574-5，651，655-7，673

Sixth Coalition advance on 643-4

French evacuation of 644

secret meeting of N and Metternich 657-9

N’s birthday celebrations（1813）662-3

Dresden，battle of（1813）665，**666-7**，668-71

Drissa，Russian First Army at 588，591

Drouet，General Jean Baptiste（Comte d’Erlon）501-2

in Portugal 546

Drouot，General Antoine 25

Lützen 650

1814 campaign 700，701

Craonne 704

to Elba 716

with N in 1815 return to France 730

Waterloo 759

du Belloy，Cardinal 355

du Pont，Victor，American consul-general 291，294

du Teil，General Baron Jean-Pierre，artillery pioneer 25，26，36

du Teil，General Jean 45

Dubois，Louis，prefect of police 289

Ducos，Pierre Roger 209，210

and Brumaire coup 217

as consul225，231

as vice-president of Senate 234

Dugommier，General Jacques 50-51

Dugua，General Charles 186

Duhesme，General Philibert，crossing of Alps 253

Dujardin，Major Guillaume 224

Dumas，Alexandre ｘｘｘiv

Dumas，General Mathieu 64，349

in Spain 494-5，499

Borodino 607

Dumas，General Thomas-Alexandre

in Egypt 163

and crossing of Alps 251

Dumberion，General Pierre 53

Dumolard，Joseph，deputy in National assembly 144，145-6，147

Dumouriez，General Charles 40，44

and d’Enghien 335-6

Dupas，Colonel Pierre-Louis 90

Dupont，General Pierre surrender at Bailén 485-6

as minister of war 718

Dupuy，General Dominique 181

Dupuy，Père 32

Duroc，Grand Marshal Géraud 211，360，399，418

aide-de-camp to N 101

envoy to Russia 296

N and 509

and N’s decision to move on Smolensk 595

death 653-4

Durutte，General Pierre 644

Dutheil，Nicolas，writer 316

Duthilt，Captain Pierre，Waterloo 764

eagle，as imperial symbol 347

eagle standards 357

losses 446-7，684

burned at Bobr 626

distributed at Leipzig 675

Éblé，General Jean-Baptiste，engineer 25，577

and bridges over Berezina river 626，627，628

Ebrington，Viscount，Elba 725，727

École Royale Militaire，Paris 16-18

teachers at 16-17

economy

financing of army 79，87

under Directory 87，211-12

and Brumaire coup 226，238-9

plans to stimulate 245-6，314-15

internal market 275

French compared with British 360

and revenues from wars 395-7

effect of British blockade on 427-8

budget deficit（1812）642

shortage of treasury funds（1813）685-6

see also Stock Exchange；taxation

Edinburgh Review 428

education

primary 273

centralized 275，280

secondary 280-81

standard curriculum 280

Eggmühl，battle of（1809）508-9

Egypt

plans for invasion 158-9

reasons for invasion 161，162

Napoleonic rule over 169，185

N’s negotiations with Muslims 169-71，174-7

pyramids 172

Arab witnesses to French Occupation 176-7

French army stranded in 178，295，296-7，298

salt-water marshes on Red Sea 184 and *n*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fluences203-5，544

Egyptian campaign（1798-9）161-84，164

commanders162-3

savants 165，167，179-80，183-4，201，203，205

voyage from Toulon 166-8

General Orders for 168

loss of fleet 178

army morale 199

N’s secret departure 01-2

El-Arish，fort 187-8

Elba，island of 107，723-6

French annexation 312

offered by Allies to N 713，715

journey to 716，721-2

Palazzina dei Mulini 722

Villa San Martino 722

hermitage of La Madonna de Marciano 723，724

British visitors 725-6

Elbe，River

Grande Armée at 573

retreat of Allies across（1813）650

Elchingen 372-3

Elders（upper house）

Brumaire coup and 217，218-19，227

N’s address to 220-21

Elliott，Grace 69

Elphinstone，Captain 758

Embaleh，battle of（1798）172-3

emblems

bee 348，739

violets 747

émigrés，N’s enticements to return 241-2

Emmendingen，battle of（1796）78

Emmery，Joseph 729

Emmet，Thomas 310

Empire style 544-5

employers，Code Napoléon and 278

Enghien，Due d’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5-40

court martial and execution 338-9

Enlightenment 22，29

in Italy98

and French Empire 528-9

Erfurt，N at（1813）646

Erfurt，conference（1808）488-93

Erlon，General Jean-Baptiste d’660

and Waterloo campaign754，757-8

Waterloo 764 and *n*

Espagne，General Jean d’，Aspern 513

Espoz y Mina，Francisco 482

Essling *see* Aspern-Essling

Etruria，kingdom of 291

Europe

after Campo Formio（1797）**152-3**

economic crisis（1811-13）560

resistance to French expansion 810-12

after Napoleon 812，815

Eylau，battle of（1807）438-45，**440-41**

aftermath 446-7

Faber，Theodor von 555

Fain，Agathon，private secretary 471，472，719

memoirs ｘｘｘｖ

Faipoult，Citizen 87

minister in Genoa 9

Falcon，Colonel 421

Farhi，Haim，at Acre 192

Fazakerley，John，Elba 725

fédéré （anti-Jacobin）movement（1793）45，46，48，51

fédéré militia movement（1815）748

Ferdinand，Duke of Parma，death（1802）314

Ferdinand Ⅲ，Grand Duke of Tuscany 107

Ferdinand Ⅳ，King of Naples and Sicily 358

Ferdinand Ⅶ，King of Spain 478，479-80，815

as Prince of the Asturias 475，482-3

and Treaty of Bayonne 480，482

return to Spain 692

Fère-Champenoise，battle of（1814）708

Fersen，Baron Axel von 154

Fesch，Joseph（uncle）15，36，143，343，399

at coronation 352

support for N’s return（1815）740

last years in Rome 816

fêtes 312

to celebrate Lunéville 291，294

feudalism 528

Fiévée，Joseph 216

Fifth Coalition，War of 498

Fiorella，General Pascal 113

fire service，creation of *sapeurs-pompiers* 543

Five Hundred（lower house）

Brumaire coup and 217，227

N’s expulsion from Orangery 221-5

Flahaut de la Billarderie，Colonel Comte Charles de 599，703

and Hortense Beauharnais 398，534

Waterloo 765，768

Flegny，Himbert de，prefect 690

Florence，art from 107

Fontaine，Pierre，architect 9

Fontainebleau

N at（after fall of Paris）710，718-19

N’s departure from for Elba 719-21

N’s return（1815）738

Fontainebleau，Treaty of（1807）474

Fontainebleau，Treaty of（1814）714，721，722

Fontanes，Louis

chancellor of Imperial University 244

Parallèles ...（pamphlet）304-5

Foster，John Leslie，Irish MP 309

Fouché，Joseph，police chief 210，233，399

and Brumaire coup 214-15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288-9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34-5，336

and Talleyrand 500，698-9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Britain 547-8

summoned to Dresden（1813）651-2

and N’s return（1815）741

after Waterloo 771*n* Fourcroy，Antoine，education minister 280

Fourès，Pauline 183

Fourier，Joseph，mathematician 165

Fourreau，Chevalier 730

Fourth Coalition，War of 396

Fox，Charles James 309-10

death 400-401

Foy，General Maximilien 85，546

Waterloo 761

France ｘｘｖ，527

population 271

and Russia 286-7，556-64

N’s reforms of social hierarchy 464-6

allies in 1813 645-6

prospect of returning to pre-1791borders 645，685，695，810

border fortresses 688

and invasion by Allied armies（1814）688-712，**696-7**

popular desire for peace（1814）689-90

surrender of towns to Allied armies 701

under Louis ⅩⅧ 726-8

return to 1791

borders 727

support for N’s return 729，732

new constitution（1815）745，748

provisional government（after Waterloo）771-3

N as founder of modern 805，809-10

imperialism of Napoleonic Empire 811-12

see also French Empire；French Republic

Francis，Emperor of Austria 78

after Napoleon 815

Francis Ⅱ，Emperor of Austria 132，237，393

N’s offers of peace terms 116-17，269

interview with N after Austerlitz 391-2

and abolition of Holy Roman Empire 407

and decision for war（1808）500

and armistice after Wagram 526，532

deterioration in relations with N 636，651，665

N’s letters to 650，652，665，703

and rearmament（1813）652

François，Captain Charles 191

Frankfurt bases of peace（1813）685，686，690-91

British opposition to terms 686

French acceptance 686

N’s request for renewal of 703

Frederick Augustus，Elector of Saxony 432-3，459

Frederick the Great Sans Souci palace 423

as N’s hero 527

Frederick Ⅱ，Elector（King）of Württemberg 380，393，663

Frederick William Ⅲ，King of Prussia 375，407，424

ultimatum to France（1806）411-12

Jena 413-14，420，422

rejection of peace terms（1807）448

at Tilsit 457

and Russia 549

reforms 642-3

at Lützen 647

at Dresden 668

at Leipzig 677

after Napoleon 815

freedom of speech 243

see also press freedom

freemasonry 154

Freiburg，battle of（1813）684

French Armies

Army of Italy 57，72-3，78，82；need for reinforcements（1796）117，118-19；rewards for，151

Army of the West 57

Army of the Rhine and Moselle 78

Army of the Sambre and Meuse 78

Army of England 151；renamed as Army of the Ocean Coasts 328；renamed as Grande Armée，241

Army of the Reserve 238，250-51

Grande Armée 241，367；records（after Russian campaign），634-5 and *n*

Army of Portugal 545-6

Army of the North（1815）750，751

French army

and support for overthrow of monarchy 30

Directory’s responsibility for 78，87-8

‘wretched state’of（1796）78-9

financing of 79，87

discipline 80*n*

footwear 80，425，569

Orders of the Day 80 and *n*

living off the land 84-5，808

speed of marching 85，133

contractors 118，159-60

regimental *esprit de corps* 134

and Brumaire coup 235

‘canteen’system 250

demobilization after Lunéville 291

corps system 365-6

pensions for widows of Austerlitz 392

horses for 425，578-9，587-8，592，593

uniforms of British

manufacture 428-9

ambulance service 434-5

in Iberian peninsula（1808）493-7

size，at Wagram 516；Russian campaign 575-6，612；at Borodino 599；at end of 1813：685；in 1814：688-9

reorganization（1812）563

reinforcements for Russian campaign 573-4，615

multi-national composition（1812）577

size（in1812）577

army groups（1812）578

retreat from Moscow 621-2，623-5

rebuilding after Russian campaign 637，638，645

cavalry，lack of （1813-14）644，647，651，653，686；before Leipzig 663

at Lützen 647

provisions 655；in Poland 446；for Russian campaign 567，576，588-9；for Waterloo campaign，745，751-2

desertion of Saxon battalions at Leipzig（1813）673，681

Bourbon alienation of 727-8and *n*

continuing loyalty to N 728

N's proclamation to（1815）on landing in France 731-2

defections to N on Route Napoléon 735-6

morale at Waterloo 751

retreat from Waterloo 767-8

after Waterloo 770-71

N’s influence on 806-8

French army-*cont* .

units：Régiment de la Fère（N commissioned into 1785）19-20；Black Pioneers 303；Imperial Guard 346；‘Polish Legions’425；Bavarian division 448；Corps of Observation 637，644，656；National Guard 747；Waterloo 767

see also conscription；French Armies；French generals；*individual battles and campaigns* ；Marshals of France；soldiers

French Empire

application of Code Napoléon 278-9

establishment 347-50，356height of 527-51，**558-9** political support for N 528

uniformity of administration 528-9

as French construct 529

after 1812 war 637-8

and prospect of returning to pre-1791borders 645

French generals and marshals

from military school at Brienne 11

artillery commanders 25

turnover in 1790s 52

social origins 345

titles and *dotations* 345

in1815 742-4

after Napoleon 817-18

French Guiana，deportations to 289

French language，official 280

French navy 158，322-3

L'Orient 166，178

flotilla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8-9

opposition to planned invasion of England 331

N's attempts to rebuild 375，484-5*n*

and smuggling 429-30

French Republic

and Corsica 5，6

declaration of war on Austria and Prussia（1792）38

declaration of Republic 40

declaration of war on Britain and Holland（1793）41

mass conscription 42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Ⅲ（1795）64-5，146，217

economy under Directory 87，211-12

Brumaire coup（1799）206-28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Ⅷ（1799）232-3，234-7，239-40，244

Constitution of the Year Ⅹ（1802）310，312

French Revolution 809

outbreak（1789）26-8

and Corsica 29，30-34，37-8，40-41

abolition of symbolic aspects 241

see also Terror，Reign of

Fréron，Louis-Stanislas 51

Friant，General Louis 591

Austerlitz 384，390*n*

at Eylau 444

Wagram 523

Borodino 605

Friedland，battle of（1807）450-56，**452**

Frochot，François，member of Conseil 623

Frotté，Comte Louis de 242

Fructidor Coup（1797）146-8

Fuentes de Oñoro，battle of（1811）566

Galitzin，Prince Andrei 433

Gallo，Marquis de 138，141

Ganilh，Charles 306

Ganteaume，Rear Admiral Honoré 183，295，331

Gap 735

Garat，Dominique 306

Garda，Lake 109-10，114

Gardanne，General Gaspard 259

Marengo 262，263-4

Gasparin，Thomas 51

Gasparin，Thomas de 47and *n*

Gassicourt，Cadet de 517，772

Gatte，M.pharmacist 730

Gaudin，Martin，as finance minister 233-4，745

and bankers 245-6

Gauville，Captain Adolphe 676

Gaza City 188

Gazan，General Honoré 418，660

gendarmerie，reorganized 240-41

Genoa 55

and Corsica 4-5

riots 142-3

besieged 249，252，256-7

surrender 257

Gent，Lieutenant，French navy 774

Gentilini，footman，St Helena 779

George Ⅲ，King of England45 and *n* ，237，321

on Peace of Amiens 318-19

George Ⅳ，King，as Prince Regent 776，794-5

George，Mademoiselle（Marguerite Weimer）656，747，820

Gérard，François，painter 469，543，601

Austerlitz 388

Gérard，General Étienne 701

Leipzig 677

Gèricault，Thèodore，painter 543

Germany**292-3**

First Coalition campaign（1792-7）115，131

N’s northern campaign（1797）131-2

Imperial Rescript（rationalization） 320-21，406

Jews in 404

Rhine Confederation **405** ，406，407

modernization 528

incipient nationalism 535

see also Bavaria；Prussia；Rhine Confederation

Geyl，Pieter ｘｘｘｉ

Gillray，James 310，317

Girard，General Jean-Baptiste

and Leipzig campaign 664-5，672

at Magdeburg 664

Hagelberg 672

Girardin，Louis de，prefect 690

Girodet，Anne-Louis，painter 543

Girona，French siege of480-81，486

Girondin Club 30*n*

Girondins

arrest of 44

defeat of Jacobins 55，57-8

and new constitution（1795）63-4

Giulay，General 377

Glasse，Rev.G.H.310

Gneisenau，General von 642-3

Waterloo campaign 755

Godoy y Álvarez de Faria，Don Manuel，Spanish premier 474，475，480

overthrown（1808）478-9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ｘｘｘvi，491-2，634，809

Gohier，Louis ｘｘｘｖ，208，219-20

Golitsyn，Prince 502

Golymin，battle of（1806）433

Gonneville，Lieuteant Aymar-Olivier de 450

Gourgaud，General Gaspard 7，271，621，694，718，731，801-2

Russian campaign 590，620-21

Waterloo 759

St Helena 779，780，789，792

Goya，Francisco，painter 543

Grandeau，General Louis 684

Grassini，Giuseppina，singer 258，269，294，361*n* ，820

Gravina，Admiral Federico，Spanish ambassador 340

Great Britain 151，359，811

and war with French Republic 42

occupation of Corsica（1793-6）43，45，106-7

Gordon Riots（1780）66*n*

N’s plans for invasion of 158，327-32，357-8，363

N’s proposal of peace（1799）237

religion 274*n*

penal code 278 and *n*

and Peace of Amiens 294-9，318-20

and Russia 296

and slave trade 301-2

resumption of travel to France 309-10

admiration for N in 310

press propaganda 315-17

biographies of N 317

preparations for war（1803）321，322，323-4

declaration of war（1803）324

defences against invasion threat 331

plots against N333-4

N’s views of 359 and *n* ，360

peace negotiations（1806）400-401

N’s strategic plans against 427-31，473-4，487-8，809

Orders-in-Council 428

and War of 1812 428，561

trade 430，560-61

and Portugal 487

and opposition to N in Spain 494

subsidy to Austria 498

Napoleonic art in 544

economy 560-61

subsidies to Sixth Coalition 644，654-5

opposition to terms of Frankfurt peace proposals（1813）686

consistency of opposition to N 775-6

N’s request for exile in 775

see also Peninsular War；Royal Navy

Great St Bernard pass 251，253

Grégoire，Henri，bishop 307

Grenoble 732，734，736

Grenville，William，Prime Minister 400

Gribeauval，Jean-Baptiste de，new artillery practice 17，806

Gros，Antoine-Jean，painter 543，819

Bonaparte Visiting the Plague House at Jaffa 192

Gross-Beeren，battles at（1813）665

Grouchy，Marshal Emmanuel，Marquis de 344，345

Eylau 442

Friedland 453

1814 campaign 700

and N（1815）743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4，755，758-9，761

Waterloo 765，769，770

Gudin，General 597，598

Guérin，Jean-Urbain，painter 543

Guérin，Pierre-Narcisse，painter 182

Guibert，General Comte Jacques de 112，366，806

Essai général de tactique （1770）17

Guinguené，Pierre-Louis 307

Günzburg，battle of（1805）372

Gustav Ⅳ Adolph，King of Sweden 449

Guyot，General 701-2

Waterloo 761，766

Gyulai，Count Ignaz

at Dresden 669

Leipzig 676

Habsburg，Archduke Charles von

and Italy（1796-7）78，115，131，132

armistice（1800）285-6

Austerlitz 375，390

army reforms 498，808

and War of Fifth Coalition 498，501，502

at Landshut 506，507-8

and surrender of Vienna 511-12

and Aspern-Essling 512-13，514，515-16

Wagram 518-19，522-6

armistice after Wagram（1809）526

and marriage of N to Marie Louise 540

Habsburg，Archduke Johann von 512，518

Hohenlinden 285

Wagram 523

Habsburg，Archduke Joseph von，Marengo 263

Hadik，Count Andreas 701*n*

Hagelberg，battle of（1813）665，672

Haifa 193

Haiti *see* Saint-Domingue

Hamburg，Hanseatic revolt 644

Hamelin，Antoine 93，107

Hanau，battle of（1813）684

Hanover，invasion of（1803）327

Hansa towns 428

annexation 556

Hardenberg，Baron Karl von 392-3，642

harvests，bad

（1801）311

（1811-13）560，568

Hatzfeld，Prince Franz Ludwig von 423

Haugwitz，Count Christian von 380，392-3，407-10

Hautpoul，General Jean-Joseph d’11

Jena 420

Hof 438

Eylau 444

Hawkesbury，Lord *see* Liverpool，Earl of

Hédouville，General Gabriel d’214，242

ambassador to Russia 339

Hédouville，Théodore d’，diplomat 496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at Jena 415，418

Heilsberg，capture of 450

Heligoland 429

Hely-Hutchinson，Colonel John 451，454

Henry，Walter，surgeon 796，797-8

heraldry

for coronation 347-8

personal 348

Hercules Ⅲ，Duke of Modena 94

Hiller，Baron Johann von 507-8

Hobhouse，John Cam 747，749，771

Hoche，General Lazare 52，57，139

and Josephine 70

as war minister 145

Hof，battle of（1807）438

Hofer，Andreas，and Tyrol rebellion 512，533

Hohenlinden，battle of（1800）285

Hohenlohe，Prince Friedrich von 414，415，419，420，423

Holford，George 334

Holland 393，397-8

Franco-Dutch convention（1801）307-8

Louis Bonaparte as king 397-8，549-50

annexation 550

Holland，Lord 158，311

and Lady Holland 310

Holstein-Oldenburg，Prince George of 491

Holy Land

N’s invasion 186

scorched earth tactics 198

Holy Roman Empire 154

Final Declaration of the Imperial Deputation（1803）320

crown of 361-2

formal abolition（1806）406，407

Home，George 814

Hompesch zu Bolheim，Ferdinand von，Grand Master of Knights of St John 167

Hood，Admiral Alexander，in Toulon 46

Hopes bank 325-6

Horselberg，battle of（1813）684

horses 425

lack of（1813-14）646，650，653，654，688

Russian campaign 578-9，587-8，592，593，617；retreat from Moscow 621，623

Hotham，Admiral Sir Henry 774，777

Houdon，General Pierre-Victor 61

Huguet-Château，General Louis 702

Hulin，General Pierre-Augustin

and court martial of d’Enghien 338

as governor of Paris 623

Hyères 591*n*

Ibrahim Bey 180

Illari，Camilla，nursemaid 9

Imperial Council，and coronation 347

Imperial University 244，281

India 318

N’s ambitions in 186

French claims under Peace of Amiens 298

industrialization 315

‘Infamous Decree’，against Jews（1808）404

Ingres，Jean-Auguste，painter 247，543

Institut de France 162

N elected to 156-7

N reinstated as member 746

Institut d’Égypte 179-80

destruction（2011）205

intelligence gathering 109，412

before Marengo 262

spies 310

Ireland 329-30

Isnard，Maximin 306

Italian campaign（1796-7）74-102，**76-7**，807

preparations 72-3

N’s early victories 83-4

siege of Mantua 100-101

later stages 105-37

peace treaties 138-60

see also Marengo

Italian Republic 241

N elected as chief magistrate 305，306

Italian Revolution（1831）817

Italy

art treasures from 85 *n*，87-8，89，105-6，107，129-30，151

creation of Lombardic Republic 95-6

giacobini governments 95-7

revolt against French occupation 98-9

creation of Cispadane Republic 118

N’s religious reforms 118，129-30

Ligurian Republic 142

Cisalpine Republic 145

N as king of 361

see also Genoa；Naples；Piedmont；Two Sicilies，Kingdom of

al-Jabarti，Abd al-Rahman 176-7

Jackson，Major Basil 784，793，818

Jacobin Club 30

Jacobins 55，640

collapse of power in Corsica 44-5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288-90

Jaffa，siege of 188-91

massacre 189-91

plague 191-2 and *n* ，198-9

retreat to 197-8

Janvilliers 700-701

Jar din Ainé，N’s orderly 760，768

Jefferson，Thomas，American President 302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4

Jena，battle of（1806）**416-17** ，418-21

Cospeda ravine 419

aftermath 422-3

Jena campaign 391-421

Jermanowski，Colonel Jan，with N in return to France（1815）730-31

Jerusalem 191*n*

Jessaint，Claude de，prefect 690

Jews 402-5

in Alsace 402-3

‘Infamous Decree’（1808）404

Jezzar，Ahmed，pasha of Acre 180-81，183，185，192.

and siege of Acre 193-4，197

João，Prince of Portugal 473

Johann of Liechtenstein，Prince 390

Jomini，General Baron Henri de，military historian 259，588

at Jena 419

Dresden 668

Joseph Ⅱ，Emperor of Austria 161

Jouanne，Chevalier 719

Joubert，General Barthélemy 120，126，127，209，210

Jouberthon，Alexandrine，marriage to Lucien Bonaparte 305

Jour dan，Marshal Jean-Baptiste 344，818

Würzburg 78，115，210

Talavera 531

and Vitoria 660

Journal de Bonaparte et des Hommes Vertueux （1797）130

Journal de Paris 243，393

Journal des Débats 243

judiciary，N’s reforms 241

Julius Caesar，as N’s hero 136，284

Jullien，Marc-Antoine，editor 130

Junot，General Andoche 306

as aide-de camp to N 47，54，73

marriage to Laure d’Abrantès 59

in Italy 107，111

and Venice 139

informs N of Josephine’s affair with Charles 171

invasion of Portugal（1807）474-5，478

surrender to Wellington in Portugal 487

in Russia 597-8

insanity598 and *n*

Kaliningrad 426

Kalisch，Treaty of（1813）643-4

Kaluga（Russia）617，619-20

Karl Ludwig，Prince of Bavaria 395

Katzbach river，battle of（1813）672

Keats，John 310

Keith，Admiral Lord257，258，333，778-9

Keller，Major von 768*n*

Kellerman，General François-Étienne 689，701

Marengo 263，264，266，267，268-9

Kellermann，General François-Christophe 40，121，147

Army of the Alps 93-4

as honorary marshal 344*n*

Kellermann，General François-Étienne 110

Kéralio，Chevalier de 14

Kerckhove，J.R.L.589-90

Kilmaine，General Charles‘Brave’89，109

Castiglione 113

Kissinger，Henry 811

Kléber，General Jean-Baptiste

in Egypt 163，178，201，203

Holy Land 186

battle of Mount Tabor 194-5

Klein，General Dominique，Jena 420

Kleist，General Friedrich von 672，700

and Lâon 705

Klenau，General Johann von Dresden 668

Leipzig 676-7

Koller，General Franz von，and Elba 716，719，722

Kollowrath，General Johann 385

Eggmühl 508-9

Wagram 524

Königsberg 436，438，450，451，455

Kosakowski，General 719

Kosen，battle of（1813）684

Krasnoi，battle of（1812）624，625

Krettley，Captain，on Jaffa 190

Kronach，Prussia 413

Kundtzow，Mr 728*n*

Kurakin，Alexander，Russian ambassador 556，568-9，586

Kutuzov，General Mikhail，Prince 367-8，615

and Austerlitz 381，385

to replace Barclay 598-9

at Borodino 606，607

refusal of armistice 617

Maloyroslavets 618，620

‘parallel mark’strategy 621，624

Krasnoi 625

at Berezina river 626

at Borisov 629

death（1813）646

La Bédoyère，Charles de 736，785

la Cuesta，Don Gregorio de 485

La Favorita，near Mantua 116，128

La France Vue de l’Armée d’Italie 130

La Harpe，Frédéric de，tutor to Tsar Alexander I 295-6

La Plaigne，Éléonore Denuelle de 400，534，817

La Révellière-Lépeaux，Louis de 72

member of Directory 144，209

La Rochefoucauld-Dubreuil，Jean de 290

La Rothière，battle of（1814）694

La Tour du Pin，Lucie de 285，468*n*

La Vallette，General Antoine 111

Labaume，Captain Eugène 618，621-2，631

The Crime of 1812 621-2

labour laws，Code Napoléon 278

Lacépède，Bernard，naturalist 349

as chancellor of Légion d’Honneur 449

as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France 746

Lachouque，Henry 800-801

Lacretelle，Charles de，Académie Française 244

Lacuée，General Jean-Gérard，military administrator 61，238，347，434，569

Lafayette，Marquis de 746，773

and aftermath of Waterloo 771-2

Laffrey 735-6

Laforest，Antoine，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 410

Lagrange，General Joseph 186-7

Laharpe，General Amédée 75，89，91*n*

l’Ain，Captaun Girod de599

Lainé，Joseph 687，698-9

Lalande，Jérôme de 124

l’Albe，General Bacler de 251-2

Lallemand，General Charles 775

Lamarque，General Jean-Maximilian 743，745

Lamouret，Captain 731

Lampedusa，island 323

Landgrafenberg 418 and *n*

Landshut Manoeuvre（1809）503，**504-5**，506-8

Langeron，General Comte Louis de 623

at Berezina river 629

Leipzig 682

languages，France 279-80

Lanjuinais，Comte Jean-Denis 8，307，310，699

Lannes，Marshal Jean 89-90，91，126，344

and revolt in Pavia 98

in Italy 121，122，258

as quartermaster-general in Egypt 163

Holy Land 186

at Acre 196

crossing of Alps 253，256

Marengo 263，264，266，267

Austerlitz 380，383，388

Jena 414-15，418-19，420

in Prussia 426

Pultusk 433

Friedland 451，453，454

in Germany 501-2，508

N and 509

Aspern 514，515

death 516-17

Lâon，battle of（1814）705

Laplace，Marquis de 16，233，239，595*n* ，719

Laplane，General Jean de 684

Lapoype，General Jean 47，51，684

Marengo 259，262，264

Lariboisière，General Jean de 25，617

Larrey，Dominic，surgeon 434，674

and typhus 588

Borodino 607-8

and retreat from Moscow 624

on N at Waterloo 756

Las Cases，Marquis de，chamberlain 775，819

St Helena 779

and N’s memoirs 790

Lasalle，General Antoine de 415，422

Aspern 514

Wagram 525

Laumond，Jean 347

Lauriston，General Jacques de 297

Landshut 507-8

as ambassador to Russia 567，568

in Russia 615

Observation Corps of the Elbe 644

Lützen 647

Bautzen 653

Leipzig 681-2

Lavalette，Antoine，aidede-camp to N 124，144，225，500，785

and Brumaire coup 222

on Josephine 537

on Malet’s attempted coup 623

and N’s return（1815）738-9，741

on 1815 plebiscite 748

Law of the Maximum（price restraints）212

Le Couteulx de Canteleu，Jean-Barthélémy，manufacturer 246

Le Sueur，Jean-François，*Ossian* （opera）14

Le Tourneur，Étienne-François 72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286-7

collapse of 296

Lebrun，Charles-Françoi s276，399

as Third Consul 234

Leclerc，General Charles Victor-Emmanuel 151，224

marriage to Pauline Bonaparte 144

and Saint-Domingue expedition 300-302

Lecourbe，General Claude 346

defection to N（1815）737

Lefebvre，Marshal François-Joseph 219，221-2，344*n* ，345

in Poland 436，448

Bavarian Corps in Germany 501-2

Landshut 503，506

and N（1815）743

Lefebvre-Desnouettes，General Charles 484，819

legal system

reforms of judiciary 241

Code Napoléon 275-9

Legendre，General 485

Légion d’Honneur 464，807

founding of 348-50

Maison d’Éducation 349，746

Legislative Body

in 1799 Constitution 236，244

voting system 236

and Code Napoléon 276

purge（1802）306-7

and electorate 312

1813 session 641-2

and Frankfurt peace terms 686-7

oath of allegiance to N（1815）750

Legitimists 528

Legrand，General Claude

Austerlitz 383，384

Eylau 442

Aspern 513-14

Leipzig 631，634，646

Allied advance on 674

N at 674-5

Leipzig，battle of（‘The Battle of the Nations’）（1813）675-7，**678-9**，680-83

British rocket section 675，682

battlefield 676

N’s mistakes at 680-81

N’s proposals to Emperor Francis 680

N’s participation 682

N’s retreat from 683-4

Leipzig campaign（1813）**648-9**，662-87

secret meeting with Metternich in Dresden 657-9

splitting of army by N 664

Lejeune，Colonel，Wagram 522

Lejeune，Louis-François，painter 382，433

Lemarois，General Jean 684

Lenoir，Richard，businessman 315

Leoben，Preliminaries of（1797）139-41

Léon，Comte（Charles Denuelle）（illegitimate son of N）400，534，796，817

Lepic，Colonel Louis，Eylau 443

Lestocq，General Anton von 426，436

at Eylau 438，444

Friedland 455

Leuchtenberg，Josephine of（daughter of Eugène）653

Levasseur，Octave 761，766，767

Lévis，Duc de 536

Lezay-Marnésia，Adrien de，prefect 689

Liébert，General Jean-Jacques 335

Ligny，battle of（1815）754，755

Ligurian Republic，N’s constitution for 142

Limoelan，Joseph Picot de，Chouan 287，288

L’Inconstant （ship）729-31

Linois，Admiral 296

Lion，Dieudonné 507

Lithuania 581-2

Liverpool，Earl of 776，777-8

as Lord Hawkesbury 333，431；peace

negotiations（1801-2）294-5，296，297，300；on press freedom 316

Livingston，Robert，American negotiator 325，326

Lloyd’s of London 430

Lobanov-Rotovsky，Prince Dmitry，and Tilsit 456

Lobau，General Georges Mouton de，Count 370-71，596

Landshut 508

Waterloo 765

local government 555-6

reforms 244-5

administrative reforms 2-79

Lodi，Italy，storming of bridge at 90-91

Lolorgne d'Ideville，François 719

Lombardic Republic 95-6

Loménie de Brienne，Étienne-Charles de，finance minister 26

Lonato，battles of（1796）111，112

Louis（Bourbon），King of Etruria（Tuscany）286，291

Louis，Prince of Bavaria 501

Louis ⅩⅤ，King of France5 Louis ⅩⅥ，King of France attempted escape from France（1791）36

captured by mob（1792）38-9

execution 41

Louis ⅩⅧ（Comte de Provence），King of France 248-9，815

restoration（1814）710，713-14

policy errors 726-8，732

flees Paris 737

and return of N 737

Louis-Philippe，King 816

Louise，Queen，of Prussia 424

and Magdeburg 460-61

death 549

Louisiana Purchase 324-6

Louisiana territory 286

Louvre，Musée du，art treasures from Italy 88

Lovell，Daniel，*Stateman* 310

Loverdo，General Nicolas 734

Lowe，Sir Hudson 819

governor of St Helena 786-9

and N’s illness 792，798

and O’Meara 792

Lübeck，capture of 421，422

Luccesini，Marquis Girolamo de 299，422

Lullin de Châteauvieux，Frédéric ｘｘｘvi

Lunéville，Peace of（1801）290，291，292-3

violations of 313-14

Lusignan，General Marquis de 127

Lusigny，armistice proposals（1814）703

Lützen，battle of（1813）646-7，650-51

Luxembourg Palace，N and Josephine at 227

luxury trade 469

revival 248

Luynes，Duc de 242

lycées，establishment 280-81

Lyons

The Hero's Return（play）（1799）206

surrendered（1814）708

N at 736

Lyons，Consultation of 305-6

Macdonald，Marshal Jacques 210，344，345，526，744

Wagram 519，524-5

Russia 596，609，634

Lützen 646，647

Bautzen 652

Leipzig 665，677，681，683

Katzbach 672

Château-Thierry 700

and N’s abdication 711，716

in command of armies（1815）773

Mack von Leiberich，General Karl，at Ulm 367-8，373

Macnamara，John，Elba 725，728-9

Macon，General Pierre 376

Madrid

El Dos de Mayo revolt against Murat 480，481

recapture of（1808）494

Magdeburg 413，415，644

surrender of 422

to Westphalia 460-61

Maghrebians188 and *n* Mahmud Ⅱ，Sultan 572

Maillard，Colonel 37-8

Maingault，Louis 779

Mainz 413，693

Maitland，Captain Frederick，HMS *Bellerophon* 775，776，777，778

Malcolm，Admiral Sir Pulteney，St Helena 791

Malcolm，Lady 791

Maleszewski，Colonel 575

Malet，General Claude-François de，attempted coup（1812）622-3

Malmaison château 207，468，473，537

N at（after Waterloo）773-4

Malmesbury，Earl of 324

Maloyaroslavets 617

Maloyaroslavets，battle of（1812）618-19，620-21

Malta 162，286

N’s administration 167-8

British control of 297，323

and Peace of Amiens 307，308-9

Order of Knights of St John and 308

Mamluks

in Egypt 170-71，172-3

Gaza City 188

Manhès，General Charles 394

Manin，Doge Ludovico，Venice 139

Manning，Dr Thomas，visitor to St Helena 791-2

Mantua 98

siege of 100-101，108-9，110，114-16，118，123，125-6

fall of 128-9

maps 412

Poland 426

Spain 474

Marbeuf，Comte de 5，6，9，10

Marbot，Jean-Baptiste de 206

Austerlitz 388，389

Eylau 442

Marchand，General Jean-Gabriel，Friedland 454

Marchand，Louis，vale 730，800-801，802，819

St Helena 779

Marengo，battle of（1800）259，260-61，262-9

campaign 250-59，**254-5**

analysis 267-9

visit to battlefield（1805）362

Marescot，General Armand de 485

Maret，Hugues-Bernard，foreign minister 209，566，567，818

and abdication 715-16，718

and support for N’s return 729，741

and N’s second abdication 774

Maria Carolina，Queen of Naples and Sicily 358，394，460-61*n*

Maria Feodorovna，Dowager Empress of Russia 458，460*n*

María Luisa of Parma，Queen of Spain，and Godoy 475，480

Marie Antoinette，Queen of France 38-9，41

Marie Louise，Archduchess of Austria 533，665

marriage to N 539-43

birth of son 564-5

at Dresden 574-5

and Malet’s attempted coup（1812）623

provision for regency of 640

character 704

Joseph and 706

flight from Paris（1814）709

provisions for after abdication 714-15

moves to Vienna 715

affair with Neipperg 724-5，741

and N’s return（1815）740-41

refusal to leave Vienna（1815）747

on N in exile 780-81，799-800and *n*

marriage to Comte de Bombelles 817

marriage to Neipperg 817

Markov，Count，Russian ambassador 321

Marmont，Marshal Auguste de 25，89-90，344，345，744，818

as aide-de camp to N 47 in Egypt 163，200

and training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57-8

Austerlitz 380

Wagram 519

Znaïm 526

in Spain 566

Salamanca 599-600

Lützen 646，647

Bautzen 652

Dresden 669

at Töplitz 672

Leipzig 677，680，682

and Lâon 705

and capitulation of Paris 709，711-12

Marshals of France

appointment of 344-5

declared for N（1815）743

Martín Diez，Juan 482

Masséna，Marshal André 53，75，344，345

in Italy（1796）75，89，91，109-10，111，115-16，119-20

and pillaging 85 *n*

Castiglione 113

at Rivoli 126-7

besieged in Genoa 249，252，256-7

conquest of Naples 394

in Germany 502

at Landshut 503，507

Aspern 514，515

Wagram 522，524

created prince 531

and N（1815）743

Mathis，Baroness Christine de 535

Mattei，Cardinal Alessandro，papal negotiator 129

Mauduit，Sergeant Hippolyte de 758

Maximilian-Joseph Ⅳ（Maximilian I），Elector（King）of Bavaria 366-7，394-5

Mazis，Alexandre de 35

Meaux，Allied armies at 702

Mecklenburg 644

medals，commemorative 120，131

Marengo 268

for invasion of England 328

for Austerlitz 393-4

Medina del Rioseco，battle of（1808）485

Megrigny，Baron 719

Mehée de la Touche，Jean-Claude-Hippolyte，spy 332

Melas，General Michael von 249，251，256，257，258-9

Marengo 259，265

Melbourne，Lord 310

Mellini，Rosa，companion to Letizia Bonaparte 816

Melzi d’Eril，Francesco 95，257，306，362

Méneval，Claude-François de，private secretary 17，471，472-3，779，819

memoirs ｘｘｘｖ

on Russia 563

Menil，Colonel Baron Paul-Alexis de 773

Menou，General Jacques-François 64，174

in Egypt 163，201，203，297

Merlin de Douai，Philippe，member of Directory 147，209

Merveldt，General Count Maximilian von 141，680

metric system 279

Metternich，Prince Klemens von 4，320，500-501

on Josephine 70

first meeting with N 410-411

and Talleyrand 500

and 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533

on Russian campaign 570

meetings with Nat Dresden 574，657-9

and Russia 616

proposal for peace settlement 640

N’s view of 652

and Prague peace conference（1813）655，659-60，661

and Austria in Sixth Coalition 663

and Frankfurt peace terms（1813）686

N’s request for armistice（1814）691

and Holy Alliance 815

Meynier，General Jean-Baptiste 75

Michaud，General 701

Milan 89-90，91

N’s triumphal entry（1796）95-6，98

N and Josephine in 116

N at（1800）257-8

N crowned in 361

Milhaud，General，Eylau 442

Millesimo，battle of（1796）83-4，86

Miloradovich，General，at Borisov 629

Minsk 585

captured by Davout 588

Miollis，General Sextius 529

Miot de Melito，André-François

French minister to Tuscany 101，102，123

and Berthier 106

and re-occupation of Corsica 124

with N in Milan 143

on Tuileries 299

Mirabeau，Comte de 33

Modena 105

Modena，Duke of 140-41

Molé，Comte Louis-Mathieu 640，641，645，818

as minister of justice 238，636

on Conseil 283

as finance minister 470

on new recruits（1812）637

and N’s return（1815）741

Molitor，General，Wagram 522

Möllendorf，General Joachim von 414

Mollien，Nicolas-François treasury minister 238，548，685-6

and N’s return（1815）739，741

Molodechno（Maladzyechna），N’s bulletin from 629-30

Mombello palazzo，Milan，N at 143-4

Moncey，Marshal Bon-Adrien de 251，257，344，623

Mondovi，battle of（1796）84

Monge，Gaspard 10，89，167

Monge，Louis 16

Moniteur Universel（journal）130，140，226，244

N’s use of 316

on British government 317

and N’s return（1815）742

Monnier，General，Marengo 264，265，266，267

Monroe，James，American negotiator 325

Montalivet，Count Jean 703

Montbrun，General 506

death at Borodino 606

Montenotte，battle of（1796）83

medal 131

Montereau，battle of（1814）702

Montesquiou，Madame de 574

Montesquiou-Fezensac，Comte Anatole de464，571 *n*，665

grand chamberlain 742

Montfort，Colonel 683

Montgelas，Count Maximilian von 529

Monthion，General François de 744

Montholon，Albine 779，783-**4**，793，818-19

Montholon，General Charles-Tristan de 718，719，779，780，784，786

St Helena ｘｘｘⅳ，779

and Napoleon Ⅲ 818

Montmirail（Marchais-Montmirail），battle of（1814）700 and *n*

Montrond，Talleyrand’s secretary 222

Monvoisin，Captain 67

Moore，General Sir John

retreat to Corunna 495

death of 500

Morand，General

Wagram 523

Borodino 605

Lützen 650

after Waterloo 771

Moreau de Saint-Méry，Médéric 314

Moreau，General Jean 78，79，139，210，349

and Brumaire coup 217-18，219-20

and re-engagement with Austria 249，250-51

crossing of Rhine（1800）252

and Concordat（1801）274

Hohenlinden 285-6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4，335，346

and Malet’s coup 622

Dresden 668，671

Mortefontaine，Treaty of（1800）286

Mortier，Marshal Édouard Adolphe 327，344，345，817-18

Austerlitz 380

Friedland 453，454

destruction of Kremlin 617-18

Lützen 650

Leipzig 677

and capitulation of Paris 709

and N（1815）743

Moscow

as N’s objective **583-4** ，592-3，597

burning of 610-12

French army in 610-17

shortage of supplies 612

destruction of Kremlin 617-18

Moulin，General Jean-François 209，220

Mount Tabor（Mount Hamoreh），battle of（1801）194-5

Mozhaisk（Russia） 609-10

Muiron，Colonel Jean-Baptiste 51

as aide-de-camp 58，122

Muiron （French ship）202-3

Munich 372

Murad Bey，Mamluk ruler of Egypt 170-71，172-3

Murat，Caroline 400

Murat，Marshal Joachim344，345，399，500

Vendémiaire 65

and Mantua 108，121

illness 110

marriage to Caroline Bonaparte 144，305

Holy Land 186

and Brumaire coup 224

crossing of Alps 253

Marengo 263

and d’Enghien affair 337

Trochtelfingen 373

at Vienna 376

Austerlitz 380，383，388

Jena 413，415，420

in Prussia 426

at Hof 438

Eylau 439；cavalry charge，443-4

Friedland 451

in northern Spain（1808）478

Madrid 479；and El Dos de Mayo revolt 480，481

as King of Naples 482，630-31，692

Russian campaign 578-9，592-3，609，620，630-31

Ostrovno 592

Borodino 606-7

Tarutino 617，619-20

abandonment of Poland 637

and Leipzig 664，675，677

Dresden 669，670

at Töplitz 672

defection to Allies 685，692

and N（1815）743

execution 785

Murray，William Van，American envoy 286

Mustafa Pasha，Turkish commander 200

Nangis，battle of（1814）701-2

Nansouty，General Étienne 11

Jena 420

Friedland 453

Aspern 514

Napier，Sir Charles 308 *n*

Naples 101，686

peace treaty（1796）117

conquest of（1806）394

Joseph Bonaparte as king 397，399

Murat as king 482，630-31，692

see also Two Sicilies，Kingdom of

Napoleon Ⅲ，Emperor（Charles-Louis-Napoléon，son of Louis Bonaparte）817

Napoléon-Vendée，new town 486，487

Narbonne-Lara，General Comte Louis de，aide-de-camp to N 242，573

National Assembly，opposition to N in 144，145-6

National Convention（1793）44

Nazareth 195

Neipperg，General Adam von 665

and Marie Louise of Austria 724-5，817

Nelson，Admiral Horatio，Lord 124，364

and French fleet bound for Egypt 166

Aboukir Bay 178

Copenhagen 296

at Toulon 327

West Indies 363

Trafalgar 364，374-5

neo-classical style 544-5

Neufchâteau，François de，member of Directory 147

Neverovski，General，at Krasnoi 596

Ney，Marshal Michel 52，344，345，764*n*

Switzerland 313-14

and Austerlitz 371

Jena 415，418，419-20

and Magdeburg 422

in Prussia 426

and Königsberg 436

at Eylau 438，444

Ney，Marshal Michel-*cont* .

at Guttstadt 449

Friedland 454-5

at Danzig 563

at Smolensk 596

at Valutina-Gora 597-8

Borodino 605，606

and retreat from Moscow 622，625，635

at Berezina river 626

Lützen 646，647，650

Bautzen 653

Leipzig 665，680，682

Dresden 668，669

attack on Berlin 672

at Marchais 700

and1814campaign 703

and abdication710-11

defection to N（1815）736，737-8，743

Waterloo 744，750，754，764，766

execution 785

Nice

N at（1793）45

captured by Melas 256

Niemen，River 574

crossing of 576-7，580

Nisas，Carrion de，playwright 108

Nizam，Ibrahim，co-commandant 188

Nodier，Charles，novelist 318

Normandy，bread riots 568

Northumberland，HMS，voyage to St Helena 779-80

Norvins，Jacques de，at Friedland 454

Nouvelles Politiques（newspaper）130

Noverraz，Jean-Abram，valet，St Helena 779

Odeleben，Baron Ernst vo n 662-3，675，683

Oder，River

Grande Armée at 573

as border of French Empire 645

Odoards，General Fantin des 612，756

O’Hara，General Charles，captured 51

Oldenburg，duchy of annexation 556-7，564，568

compensation for annexation 568-9

Oldenburg，Duke Peter of 556

Ollioules，Toulon 47

arsenal 48，49

Olsufiev，General Zakhar Dmitrievich 699

O’Meara，Dr Barry 272

on St Helena 780，795

and N’s illness on St Helena 792-3

Ordener，General Michel 336

Oriani，Barnaba，astronomer 97

Orsha（Russia）625

Orthez，battle of（1814）703

Ossian（James Macpherson），poet 13-14

Ostermann-Tolstoy，Count Alexander 433

Eylau 443

Ostrovno 592

Ostrolenka（Poland）447

Ostrovno，battle of（1812）592

Ott，General Karl von 258

siege of Genoa 252，256-7

Marengo 264，265

Otto，Louis-Guillaume 366-7

peace negotiations（1801-2）294-5，297，300

and British press 315-16 ambassador to Vienna 572

Ottoman Empire 161，185

Oudinot，Marshal Nicolas 344，345，744，773

Austerlitz 383，389

Friedland 450，451，453，454

in Germany 502

at Landshut 503

in Bavaria 506

Aspern 515

Wagram 522

Russia 563，596，635

at Berezina river 626，627-8

Bautzen 652-3

and Berlin 664，672

Leipzig 664，665，677

Brienne 694

1814campaign 701，703

Ouvaroskoe（Russia）621

Ouvrard，Gabriel，banker 245，548

painters，French 543

Pajol，General 702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5

Palafox，Don José de 483，484

Palm，Johann，Württemberg publisher，trial 411

Paoli，Pasquale，Corsican nationalist leader 4-5，10，28

N and 6，21，27，33-4

and French Revolution 31，37

return to Corsica 33

opposition to French Republic 41

and Great Britain 43-5

and Sardinian expedition 43

Papacy

N’s view of 271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272-4

N’s relations with 529-30

excommunication of N 530

Papacy Ⅶ

see also Pius

Papal states

armistice with（1796）105-6

N and 129-30

annexation of（1809）530

authoritarianism in 815

Paris ｘｘⅵ-ｘｘⅶ

food riots（1792）37

rising of‘Sections’（1795）64-7

Jar din des Plantes 89

N in（1797-8）155-9

N’s house in rue Chantereine 155，207，208，818

St Sulpice banquet 215

bridges and quays 810

N’s return after Marengo 285-6

industrial exhibition（1802）315

threatened by Allies（1814）698-9，708-9

N’s march on 709-10

capitulation to Allies（1814）710

N’s entry（1815）738-9

public works（1815）746，810

N’s final return after Waterloo 771-3

see also Tuileries

Parma，Duke of 89，116

Partouneaux，General Louis 629

Pasquier，Étienne-Denis police prefecture 238，693

on bread riots 568

Passarge，River 450

Patterson，Elizabeth，wife of Jérôme Bonaparte 343，395

Paul I，Tsar of Russia 185，286

assassination 295

Pavia 98

Pavlovna，Grand Duchess Anna 537-8

Pavlovna，Grand Duchess Catherine 491，563，570

Pedicoste，battle of（1763）5

Pelet de la Lozère，Joseph，State Councillor 316，319，328-9，339，392

Pellapra，Françoise-Marie de361 and *n*

Pelletier，General Louis 110

Peltier，Jean-Gabriel，émigré newspaper editor 316，317-18

Penal Code（1810）278

Peninsular War **476-7** ，531，546，561，566，599-600

living off the land 85 *n*

Vitoria 659-60

see also Portugal；Spain

pépinière （mulberry orchard）18-19

Perceval，Spencer，Prime Minister 317-18，431

and Peninsular War 561

Percy，Baron Pierre，surgeon-in-chief 434，455

Pérignon，General Dominique-Catherine de 345

as honorary marshal 344 *n*

Perrée，Rear Admiral Jean-Baptiste 172

Perregaux，Jean，Swiss banker 246

Petiet，Claude，state councillor 258

Pétiet，General Auguste 757

Petit，General Jean-Martin 718，720

Waterloo 767-8

Petit，Joseph 262，265

petitions，under1799Constitution 236-7

Petty，Lord Henry（Marquess of Lansdowne）310

Peyrusse，Guillaume 612

Peyrusse，Louis-André，on Jaffa 189-90

Pezza，Michele 394

Phélippeaux，General Antoine 11

with Royal Navy 192

Philibert，Captain，French navy 774

Phull，General Ernst von 557，571

Piacenza 88-9，258

Pichegru，General Charles 11，144，147，210

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34，335，340

Pichon，Louis，ambassador to America 343

Piedmont（Italy）75，78

declaration of war 41-2

campaign（1794）53，54-5

armistice 86-7

annexation（1802）313

Piéron，butler，St Helena 779

Pignatelli，Prince de Belmonte-101-2

Pijon，General Jean-Joseph 111

pillaging 84-5 and *n*

Russia 590

during 1814 campaign 698

Pils，François 626

Pitt，William，the Younger 42，294-5，342

and Third Coalition 358

foreign policy 359-60

death 400

Pius Ⅵ，Pope 105，118

and peace（1797）129-30

death 271

Pius Ⅶ，Pope 271，274

officiation at Coronatio n351-2

quarrels with N 399

refusal to join blockade against British trade 529-30

arrest by General

Radet 530-31

Concordat with（1813）639-40

return to Rome（1814）692

and reinstatement of Papal States 815

Piverou，Citizen 162

plague，at Jaffa 191-2and *n*，198-9

Plagwitz，battle of（1813）672

Platov，General，at Borodino 606

plebiscites

（1800）239-40

（1802）311

（1804），to establish hereditary empire 348

（1815）748

Pleischwitz，Armistice of（1813）654-5

Pleisse，River 683

plots，assassination 287-90

bomb（*machine infernale* ）287-8

hand grenades 288

knife attack 288

Cadoudal conspiracy 333-41，346-7

Friedrich Staps 534-5

Plumptre，Anne 88

Plymouth 778-9

Po，River 86

crossing of（1796）88-91

Poland **408-9** ，425，431-8，538，569

winter weather 434，435，436，437-8

partitions 459

Polignac，Armand de 347

Polish campaign 425-45

Pomerania，Swedish，annexation 570

Pondicherry，India 307

Poniatowski，General Prince Józef 345，432，518，563

and Russian campaign 584-5，631

at Smolensk 596

Borodino 605，608

Lützen 646

Leipzig 676，683-4

death 683-4，685

Pons，M.，inspector of mines 730

Ponsard，Captain Jean-Marie 223-4

Ponte Nuovo，battle of（1769）5，33

Poppleton，Captain Thomas 789

Portalis，Jean-Étienne，minister 238

and Code Napoléon 276

Portalis，Joseph-Marie，minister 238

Portland，3 rd Duke of 401，430-31

portraits 543-4

first prints and engravings of N 130-31

Bonaparte at the Corps Legislatif （print）226

N as First Consul（Ingres）247

Portugal

declaration of war 41-2，487

N’s attack on（1807）473-5，478

deposition of Braganza royal family 474，475，478

Masséna in 545-6

Lines of Torres Vedras 546

see also Peninsular War

Posen，Poland，N in 431

Potocka，Countess Anna 20 *n* ，435

Potsdam，N at（1806）423

Potsdam，Treaty of（1805）375，392

Pouchelon，Colonel 591

Pouzet，Colonel Pierre，Austerlitz 385

Pozzo di Borgo clan 41

Pozzo di Borgo，Count Charles-André 33，41，693*n*

Pozzo di Borgo，Matteo 37

Pradt，Abbé de，ambassador to Warsaw 571，631

Prague，Congress of（1813）655，659，660-61

Metternich’s demands 661

‘Trairial’coup（‘parliamentary day’）（1799）209，220

prefects，of departments 244，245，689-90

press 130-31

block on foreign newspapers 243，316

British 315-17

and peace 393

duty on newspapers 401

press freedom

restrictions 211，242-4

abolition of censorship 745

Pressburg，Treaty of（1805）393，394

Primolano（Italy）115

Prina，Count Giuseppe 719

Pripet Marshes 593

propaganda

N and power of 130

in Egypt 175

British 196，316-17

post-Marengo report 268

Provence，Royalist revolt 211

Provence，Comte de *see* Louis ⅩⅧ

Provera，General Giovanni di（Austrian army）119-20，126-7

at Arcole 122

surrender 128

Prud’hon，Pierre-Paul，painter 543

Prussia

declaration of war（1792）38

invasion of France（1792）39，40

neutrality 367，637

alliance with Austria and Russia 375，377

and France 392，407，410

and Russia 407，410，412，426，569，637

advance into **408-9** ，413-16

ultimatum to France（1806）411-12

French advance through 422-4

and Tilsit 456，459-61

and Continental System 459

major reforms 642-3

treaty with Russia 642-4

and Sixth Coalition 663-4，693，700-701，705

Prussian army 414-15

and Russian campaign 570

modernization 643

Waterloo 754，755，764-5

Prussian campaign 391-421

Publiciste （journal）243

Pultusk，battle of（1806）433-4

Puthod，General Jacques，Plagwitz 672

Pyrenees，Wellington’s crossing of 674，687

Quasdanovich，General Peter von

in Italy 109-10，111，119-20

at Rivoli 126，128

Quatre Bras，battle of（1815）754

Querelle，Dr，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34-5

Quiberon Bay 60

Raab，battle of（1809）518

Radet，General Étienne，arrest of Pius Ⅶ 530

Radetzky，General Joseph 660-61

Ramleh monastery 188

Rapp，General Jean 268，287，535*n* ，819

Austerlitz 388

and Jena 413

as governor of Danzig 429，575，675，684

in Warsaw 435-6

on N’s divorce from Josephine 536

at Borodino 605

and N’s return（1815）741

Rastatt，Congress of 150，151，154

Ratisbon（Regensburg）502，506

storming of 509-10

Raynal，Abbé，*Histoire philosophique* ...（1770）31-2

Réal，Pierre-François 209

Regency，provision for（1813）640

Regnaud de Saint-Jean D’Angé1y，Michel 130，168

and Brumaire coup 209

Régnier，Jacques，writer 316

Reichenbach，Treaty of（1813）654-5

Reichenbach，Treaty of（1813），Second 659

Reille，General Honoré 660

Waterloo 761，767

Reims 706，707

religion，social utility of 272

religious toleration274and *n* ，277

Jews and 403-4

Relingue，General Albert Fouler de 719

Rémusat，Claire de ｘｘｘｉ-ｘｘｘiv

Rémusat，Comte Charles de，chamberlain 470

Repnin-Volkonsky，Prince Nikolai 388，400

Reubell，Jean-François 72

member of Directory 140，144

Revolutionary Bonapartism（1815）748

Rey，Captain 627

Rey，General Gabriel 126-7，128

Reynier，General Jean-Louis

in Egypt 163，173，186

and Russian campaign 584-5

Lützen 646

Leipzig 681

Rhine

crossing of（1797）139

crossing of（1805）370

French fighting retreat to（1813）684

Rhine Confederation **405** ，406，407

N as Protector 459

defection of Mecklenburg 644

abolition（1813）672

Ricard，General，at Lützen 647，650

Ripaud，Citizen 205

Rivière，Charles，Marquis de 347，638

Rivoli，battle of（1796）126-8

Rivoli（Italy）109-10，123

roads and road-building 85

Robespierre，Augustin 46，54，56

Robespierre，Maximilien，Jacobin leader 32，55

and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42

and Reign of Terror 44，54-5

Robinson，Henry Crabbe，on Peace of Amiens 298-9

Rochambeau，Vicomte de 303

Rochechouart，Comte de，on Berezina river 628-9

Rochefort 774

Roederer，Pierre-Louis211and Brumaire coup 209，213

on Conseil 243-4

on religion 272

Rohan，Archbishop Ferdinand de 540

Röhrig，Johann 682

Roliça，battle of（1808）487

Roman Catholic Church Revolutionary condemnation of 32-3

and land transfers 270，273

N’s religious settlement（Concordat）（1800-1801）270-75

Organic Articles（regulations） 274，277

Concordat（1813）639-40

restoration of powers（1814）727

Roman Catholic Church Ⅵ，Ⅶ

see also Papacy；Papal States；Pius

Rosetta Stone 205

Rosily-Mesros，Admiral François de 296，484

Rossbach，battlefield 423

Rossetti，Major Marie-Joseph 591-2

Rostopchin，Fyodor，governor of Moscow 610-11

Rottembourg，General Henri 404

Rousseau，Jean-Jacques 8，13，22

Rousseau，lamplighter，St Helena 779

Roustam Raza，N’s bodyguard 201，418，741，819

at Eylau 444

and abdication 715

and N’s attempted suicide 716

Route Napoléon（to Grenoble）732，733，734-7

Routier，Colonel Léon-Michel 738

Roverbella（Italy）110

Rovereto（Italy）115

Rowlandson，Thomas 317

Royal Navy 162，430 *n* ，811 *n*

at Toulon 47，48

Quiberon Bay 60

evacuation of Corsica 124-5

Acre 192

blockades 211，327，375，427-31

and evacuation of Genoa（1800）257

French fear of 297

capture of Spanish bullion ship 350-51

and N on Elba 726

N’s surrender to 774，776-7

see also Nelson，Admiral Lord

Royalists

Chouan（in Vendée）43，57，288，290

and Directory 144-5

purge of（1797）147-8

revolts 211

Rüchel，General Ernst von 410

Rumbold，Sir George，diplomat 351

Rumiantsev，Count Nikolai 489，538，568

rural communes，and parish clergy 271

Rusca，General Jean-Baptiste 125

Russell，Lord John，Elba 725

Russia

and Turkey 185，550

and Second Coalition 212，237

and League of Armed Neutrality 286-7，296

peace with Britain 296

and d’Enghien affair 339

and Third Coalition 358

and Prussia 407，410，412，426，569，637，642-4

relations with France 410，542

N’s plans for 425，814

and Tilsit 459-61

effect of Continental System on 490-91，549

and Treaty of Schönbrunn（1809）532-3

and French annexation of Oldenburg 556-7，564

economy 557

and Austria 569

serfs 615

winters 616-17

invasion of Pomerania（1813）638

Russian army 426 and *n*

Austerlitz 367-8，375，377-8，381

Eylau 438，444

size 549，562，567-8，594，615，643

reforms（1811）562-3，571

generals 579

disposition 580-81

strategic withdrawal from Poland and Lithuania 581，585，586

Cossacks 615，629，695

advance into Prussia（1812-13）638-9，644

losses in 1812 war 638

and 1814 campaign 704，707

Russian campaign（1812），French army 556-79，**583-4**，639

advance towards Poland，Grande Armée at the Elbe 572

N at Dresden 574-5

N’s strategy for 575-6，814

bulletins 576，629-30

weather，heat 578，581，584，593-4；cold and snow 584-5，589，616-17，621-2

supply problems 587-8，590-91，621-2

typhus 588-90

army administration 600-601

capture of foragers 600

Borodino 601，604，606-8

in Moscow 610-17

Grande Armée losses 612

N’s options after Moscow 612-13，619-21

retreat from Moscow 617-31，634-5

council of war（at Gorodnya）619-21

conditions 623-5

N’s return to Paris 630-31，634

Ruty，General Charles-Étienne 25

Saalfeld，battle of（1806）415

Sacken，General von 699-700，702

Sahuguet，General Jean-Joseph de 114

St Helena 782

decision about N’s exile on 776-7

N’s staff 779

voyage to 779-81

Longwood 781-2，784-5

limited news 785

costs of imprisonment 788-9

N’s daily routine 790-91

visitors and interviews 791-2

library 802

St Napoleon，saint’s day 406

St Petersburg，Treaty of（1805）358

Saint-Aignan，Baron de 685

Saint-Chamans，Colonel Alfred de 446

Saint-Cloud，palace of 217-18

Saint-Cyr，General Claude Carra

Marengo 264

Aspern 514

Wagram 522

Saint-Cyr，Marshal Laurent de Gouvion 327，344，345，364

Russia 596

Dresden 665，668，669，670，675

at Töplitz 672

and N（1815）743

Saint-Denis，Louis-Étienne（‘Mamluk Ali’）741，758

St Helena 779

Saint-Dizier，N at 707，708

Saint-Domingue，expedition after slave revolt（1802-3）300-303

Saint-Hilaire，Étienne，zoologist 165

Saint-Hilaire，General

Austerlitz 385，388，390

Jena 419

Eylau 442，443

Aspern 514

Saint-Just，Louis，and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42

Saint-Régant，Robinault de 287

Saint-Sulpice，General 508

Salamanca，battle of（1812）599-600

Saliceti，Antoine-Christophe，Corsican deputy to National Assembly 30-31，37

arrest of Paoli 44

exile from Corsica 44-5

as political commissioner 47，51，55

and Army of Italy 87

and re-occupation of Corsica 124

and N’s political powers 142

Salò，Lake Garda 109

Saltanovka（Mohilev），battle of（1812）592

Salvetat，Anne Hippolyte Boutet（Mademoiselle Mars）747

Samhoud，battle of（1799） 185

San Ildefonso，Convention of 286，324

Santarém（Portugal）546

Santini，usher-barber，St Helena 779

Saragossa

French siege of 480-81，484，486

revolt under Palafox 484

fall of（1809）501

Sardinia，expedition to‘liberate’（1793）43

Sarrazin，General Jean，*Confession of General Buonaparte*（1811）67

Sauret，General Pierre-François 109，114，121

savants（intellectuals）

Egyptian campaign（1798-9）165，167，179-80，183-4，201，203，205

Légion d’Honneur for 349

Savary，Anne-Jean-Marie-René，Desaix’s aide-de-camp 268，818

and arrest of Pius Ⅶ 530

as chief of police 548，623，703

and N’s return（1815）741

Saxe，Marshal de 366，806

Schadow，Johann Gottfried，caricaturist 317，460

Scharnhorst，General von 642-3，808

Scheler，General von 590-91

Schérer，General Barthélemy 57，210-11

Schimmelpenninck，Grand Pensionary 398

Schneidhart，battle of（1809）506

Schönbrunn palace 376

Schönbrunn，Treaty of（1805）392，407

Schönbrunn，Treaty of（1809）532-3

School of Artillery，at Auxonne 24-6

Schwarzenberg，Prince Karl von，Austrian ambassador 541，570，820

ball for N’s wedding to Marie Louise 542-3

and Russian campaign 584-5，634

Russia 596，609，616

and Army of Bohemia（1813-14）663，665，693，701

Dresden 665，668，670-71

and Leipzig 674，675，676，677，681

and 1814 campaign 694，695

at Arcis 707

and fall of Paris 709

scorched earth policies

Holy Land 198

Torres Vedras 546，586

Russia 586

Sébastiani，Colonel Horace 218，219

Levant tour 312-13，319

in Turkey 410

Sebottendorf，General，Austrian army 90

Second Coalition，War of 211

start of 187

Second Polish War *see* Russian campaign（1812）

‘Sections’，rising of（Vendémiaire）（1795）64-7

security laws 290

Ségur，Octave 600，818

Ségur，Comte Louis-Philippe de 242，347

Ségur，Comte Philippe de，aide-de-camp 242，342，347，373，620-21

on Cadoudal conspiracy 333

Selim Ⅲ，Sultan161-2，176，186

Sénarmont，General Alexandre-Antoine 25，436

in Poland 436

Friedland 454-5

in Spain 531

Senate

1799 Constitution 235-6

increased powers 312

1813session 641-2

and Frankfurt peace terms 686

oath of allegiance to N（1815）750

sénatus-consulte ，use of 289，306-7

Serbelloni，Duke of 95，145

Sérurier，General Jean 4-5，89，114，121，709

and siege of Mantua 109，126

as honorary marshal 344 *n*

Seurre，riot（1789）26

Seventh Coalition 746

declaration of war 748-9

and Treaty of Vienna（1815）750

al-Sharqawi，Sheikh 173

Shephard，Rev.William 88

Shoberl，Frederic，British journalist 674

Sieyès，Abbé Emmanuel 65

and Brumaire coup 210-11，217，218-19，222

as consul 225，231-2

and appointment of consuls 234

as president of Senate 234

Simonyi，Colonel Josef 701 *n*

Sinai desert 187

Sinai，Mount 183-4

Sisteron 734-5

Sixth Coalition 643-4

Treaties of Reichenbach 654-5，659

Austria and 663，693，694，695，701

Treaty of Chaumont（1814）703-4

Vienna Declaration（1815）737

Sixth Coalition，War of

Lützen 646，647，650-51

Bautzen 651-4

Treaty of Reichenbach 654-5

Allied strategy 660-61

1814 campaign 693-709，696-7

N’s personal command 693-4

slave trade

reintroduction 301-2

abolition（1815）745，810

Smith，Commodore Sir Sidney 259，340，350，820

at Acre 192，196

Smith，Sir Spencer 310，334，337

Smithson，James 310

Smolensk 594-5，598

N’s decision to move on 594-6

choice of routes to 619-21

return to 624-5

Smolensk，battle of（Manoeuvre）（1812）596-7

Smorgoniye（Russia）630

smuggling，of British goods 429-30，530，556

Śniadecki，Jan，astronomer at Vilnius 581，584

social reforms 279-81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14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 30，36

soldiers

N’s relations with 79-80，380，382，432，510

N’s concern for 125-6，134-7

care of wounded 135-6，434-5

conditions in Poland 434

suicides（1806）434

desertions in Russia 590

suicides in Russia 590，622

prisoners-of-war in Russia 621，622，631

Solignac，General 348

Soltyk，Count Roman 581，601

Somosierra，battle of（1808）495

Sor，Charlotte de ｘｘｘiv

Sorbier，General Jean，Borodino 607

Sorbonne university 281

Souham，General Joseph 335

at Lützen 647，650

Soult，Marshal Nicolas Jean-de-Dieu 249，344，655，818

and invasion of England 328

Austerlitz 380，383，384，385，388，389，390

Jena 414-15，418，419，420

in Prussia 426

Eylau 442-3

Friedland 450

in Spain 494，496，500，660

against Wellington in France（1814）688

Orthez 703

as war minister（1815）736-7

and N（1815）743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4，755，756-7；aftermath 770-71

Spain

declaration of war 41-2

and Convention of San Ildefonso 286

and N’s overthrow of Portuguese monarchy 474-5

weakness of 474-5，479

guerrilla war against French 481-2，494，566

new constitution（1808）483-4

and French defeat at Bailén 485-6

insurrection against Joseph 486

French army in 493-7，566

see also Peninsular War Spandau，surrender of 422

Spanish navy，N’s interest in 479，484

Spencer，Walter 333-4

Speranski，Count Mikhail 295

Stadion，Count Johann von 77，655

Staël，Madame Germaine de ｘｘｘvi，157-8，307，460-61 *n*，745-6

Standelet，Commodore Pierre-Jean 193

Staps，Friedrich，assassination attempt 534-5

Starke，Mariana 79

Stedingk，Count，and Leipzig campaign 665

Stein，Baron vom 642

Stendhal（Marie-Henri Beyle），on N in Berlin 424

Stettin，surrender of 422

Stock Exchange（Bourse）

and Brumaire coup 226

and news of Marengo 267

government bonds 315，392

confidence after Tilsit 467

Suard，Amelie 243

Suchet，Marshal Louis 344，422

Jena 418，419

fighting Wellington（1814）688

and N（1815）743

Suckow，Lieutenant Karl von 590

Sucy de Clisson，Simon 61，62

Suez 183-4

sugar

trade 300

production from beet 430

Sulkowski，Joseph，aide-de-camp to N 101

in Egypt 170，181

Suvurov，Marshal Alexander 251

Sweden 296，449

and Third Coalition 358

Bernadotte as king of 547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France（1813）638

and Sixth Coalition 645

Switzerland 319-20，393

reorganization under Act of Mediation（1802）313-14

Syria181，183

Tagliamento，battle of（1797）132

Taillis，General Adrien du 684

Talavera，battle of（1809）531

Talleyrand，Charles-Maurice de 399，729，820

as foreign minister 146，148，151，233，489，773

relations with N 146，155，489-90

N’s letters to 149-50

and Egypt 180

and Brumaire coup209，210-11，220，222-3

fête to celebrate Lunéville 291，294

and press 316

and d’Enghien 336 and *n*， 337

on Austria 392

and Ferdinand of Spain 482-3

selling of secrets 490， 500

and Fouché 500

planned coup（1814）698-9， 708

and fall of Paris 705

provisional government（1814）710

Tallien， Jean-Lambert 65

Tallien， Thérésa 70

Talma， François-Joseph， actor 62

Talot， Louis， deputy 224

tariffs 315

Tarutino， battle of（1812）617

Tascher， Gaspard 68

Tauentzien， General Bogislav von418-19， 643

Tauroggen， Convention of（1812）630

tax reforms 238-9

Consulate 234

taxation

British income tax 396

revenues 396

droits réunis （discretionary taxes）396，683，688，724；extended（1814）688；abolition by N（1815）745

butter and egg markets 401

to service deficit（1812-13）642，685-6

telegraphs

Chappe system 503 and *n* 736

Royal Navy 546

Terebenev，Ivan，caricaturist 317

Terror，Reign of（1793）44，54-5，63-4，69

Tharreau，General Jean，Aspern 514

theatre，suppression（1795）68

Thermidor 55，56，69

Thiard，Théodore de，chamberlain 353-4

Thibaudeau，Antoine，councillor of state 238

Thiébault，General Paul 208-9，213，252

Austerlitz 377，380，382-3

on war of Sixth Coalition 673

and N’s return to Paris 738-9

Third Coalition 342，358

War of 366-90，393，396

Thomé，Grenadier 222，225-6，227

Thomson，Sir Benjamin 330

Thouin，Andre，botanist 89

Tilly，Jean，consul in Genoa 55

Tilsit，Treaties of（1807）456-61

terms of 458-9，460-61，557

Tipu Sahib 186

Tisenhaus，Sophie de 635

Tocqueville，Alexis de 64

Tolentino，peace treaty with Papal States 129-30

Toli，Francesco，spy 258

Tommasi，Giovanni Battista 309

Tone，Wolfe 158

Töplitz，battle of（1813）672

Topographical Bureau（Historical and Topographical Bureau，war ministry）61-2

Torbay 778

Tormasov，General Alexander，Russian Third Army 580-81

at Gorodeczna 596

Torres Vedras，Lines of 546

Toulon

Bonaparte family at 45

siege of（1793）46-52

Fort Mulgrave 48，50-51

blockade 327

Toussaint l'Ouverture，Pierre 300-303

death 303

Trachenberg，Sixth Coalition meeting at 660，665

trade

Peace of Amiens and 308

effect of British blockade on 427-8

effect of Continental System on 428-31，548-9，560-61

British 430，560

Russian 557

and War of 1812 561

Trafalgar，battle of（1805）374-5，479

Tribunate

in 1799 Constitution 236，244

and Code Napoléon 276

purge（1802）306-7

abolition（1807）466

Trielhard，Jean-Baptiste 209

Trochtelfingen，battle of（1805）373

Tronchet，François 282

and Code Napoléon 276

Truchsess-Waldburg，Count Friedrich von 719-20

Truguet，Admiral Laurent de 43，331

Tuileries

invaded by mob（1792）38-9

Bonapartes in residence at 246-8

resemblance to royal court 299-300

N’s return（1815）738-9

Turenne，Henri，Comte de，chamberlain 715，719，76o

Turin，Piedmont 78

Turk，Niqula 177

Turkey 60

peace with 299

treaty with Russia（1812）572

Turkish forces

at Acre 193-4

at Aboukir 200

Tuscany，to France 291

Two Sicilies，Kingdom of，treaty of neutrality（1804）358

Tyrol，Hofer’s revolt 512，533

Ubri，Peter Yakovlevich，Russian envoy in Paris410

Ulm 367-8，372-3，378-9

United Irishmen，N’s negotiations with 32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Quasi War’with 211，286

and Louisiana Purchase 324-6

and War of 1812：428，561

Russian trade and 557

University of France 157，746

Ussher，Admiral Thomas，HMS *Undaunted* 721，722

Valais region 313，314

Valence

N at（1785-6）20-21

N at（1791）35-6

Valencia，French siege of 480-81

Valenza 258

Valladolid，N at 496

Valmy，battle of（1792）40

Valutina-Gora（Lubino），battle of（1812）597-8

Vandamme，General 502

Austerlitz 385，388，390

Landshut 503，507-8

Dresden 670

at Kulm 672

Vauban，Sébastien de，military engineer 688

Vaubois，General Claude-Henri de 114，120

Vauchamps，battle of（1814）700-701

Vaux，Comte de 5

Venables-Vernon，George，MP，Elba 725

Vendée

Chouan uprising 43

royalist uprising 57

Royalist revolt 211

offer of amnesty 242

uprising（1815）744-5

Vendémiaire revolt 65-7

‘whiff of grapeshot’66-7，809

Venice124，139

ceded to Austria 140

N’s war with（1797）141-2

Verdier，General Jean-Antoine 453

Verdun，fall to Prussians（1792）40

Vernet，Carle，painter 543

Vernet，Horace，painter 543，700*n*

Verona 120-21

uprising（1797）139

Versailles，Palace of，storming of（1789）27

Vial，General Honoré 127

Vicenza 119-20

Victor Amadeus Ⅲ，King of Piedmont-Sardinia8 7

Victor（-Perrin），Marshal Claude 51，129，344，345，744

crossing of Alps 253

Marengo 259，262-3，264

kidnapped at Stettin 448

Friedland 454

Talavera 531

in Russia 624

at Berezina river 626，628

Dresden 669

Leipzig 681-2

and 1814 campaign 701

Craonne 704-5

Vienna 131

Grande Armée advance to 375-6

bridge of boats 511-12，513

Lobau Island 511-12，515-16，518，523-4

surrender of 511-12

Vienna，Congress of（1814）726，815

Vienna Declaration（1815）737，74。

Vienna，Treaty of（1815）750，815

Vigée-Lebrun，Élisabeth，painter 543

Vignali，Abbé Ange-Paul 801，819

Villemarest，Charles Maxime de ｘｘｘiv

Villeneuve，Rear Admiral Pierre de 178，296，331，365

and chance to invade England 363-4

Trafalgar 374-5

Villetard，Joseph，French legation 141

Vilnius

Tsar Alexander at 573

N in 581-2

Vimeiro，battle of（1808）487

Vionnet，Major Louis Joseph，Borodino 608

Vistula，River 425，630

French army on 432，434

Vitebsk 592，593-5

Vitoria，battle of（1813）660

Vitry-le-François 693-4

Vizille 736

Volkonsky，Prince Sergei 615

Volney，Constantin de 161

Voltaire 97

Voltz，Johann Michael，caricaturist 317

Vousowitch，Colonel 719

Vyazma，battle of（1812）621

Vyazma（Russia）599

Wagram，battle of（1809）518-19，**520-21**，522-6

assault on Aderklaa 519，522

Markgrafsneusiedl 522-3

Wagram campaign 498-526

Walcheren Island，Holland，British expedition 526

Walewska，Countess Marie Colonna-435，437，462-3，517，541，817

pregnancy 534

birth of son Alexandre 539

visit to N on Elba 725

at Malmaison 774

marriage to Due d’Ornano 785

Walewski，Alexandre（son by Marie Walewska）539，725，817

Walpole，Thomas 431

Walter，Jakob 577

on Berezina river 628

War of 1812，between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428

war，profits from 395-7

Warsaw 431-2

Warsaw，Grand Duchy of 542，567

Washington，George 233

Washington，DC 726

Waterloo，battle of（1815）**752-3**，761-9，**762-3**

preparations for 750-60

N’s errors at 755-6，757，764，765-6，768-9

battlefield 756

Hougoumont 756，761

La Haie Sainte 756，761，764，766，767

Le Caillou farmhouse 758，768

Mont Saint-Jean 758，759

N’s breakfast conference 759-60

Forest of Soignes 760，761

La Belle Alliance inn 760

war-gaming 766 *n*

aftermath 770-71

and N’s return to Paris 770-73

Watrin，General François

crossing of Alps 253

Marengo 266

weights and measures 275

metric system 279

Weimer，Marguerite（Mademoiselle George）656，747，820

Wellesley，Lord 548

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and Indian campaigns 85 *n* ，186

and Convention of Cintra（1808）487

N’s view of 487，759

Talavera 531

in Portugal 546

retreat to Portugal（1812）600

crossing of Pyrenees 674，687

in south-west France 688

Orthez 703

as ambassador to France 727

and Waterloo campaign 750，751

Waterloo 756，757，761，761 and *n* ，765，766

on N 809，820

West Indies，British in 327

Westphalia，N’s plans for 461-2

Weyrother，General Franz von 381

Whitworth，Lord，British ambassador 314，319，321-2，324

Wickham，William 337

Wilks，Colonel Mark，governor of St Helena 786

Willem V，Prince of Orange-Nassau 307

Wilson，Sir Robert，Russian liaison officer 624

Wittgenstein，General Peter at Polotsk 596

and French retreat from Moscow 624

at Berezina river 626，628

Allied army at Leipzig 646

at Lützen 647，650

at Bautzen 651

Dresden 668

Nangis 701

Wolzogen，Count Ludwig von 557

women

and Code Napoléon 277-8

lack of education for girls 281

ban on miscegenation in Saint-Domingue 301

Maison d’Éducation for daughters of recipients of Légion d’Honneur 349

Wrangel，Baron Friedrich von 549

Wrede，Prince Carl-Philippe 501

Wagram 525

Wright，Captain John Wesley，and Cadoudal conspiracy 333，340-41

Wurmser，General

and siege of Mantua 108，109，110，111，114-16，118，126，128

Castiglione 112-13

Württemberg 369

as kingdom 393

Württemberg，Prince William of，at Leipzig 672，677

Würzburg，battle of（1796）78，115

Yelin，Philipp，*Germany’s Profound Degradation* 411

Yorck von Wartenburg，General Johann 630，638，642

Leipzig 680

Montmirail 700

and Lâon 705

Zeitgeist，of modernization 529

Znaïm，battle of（1809）526

Zurich，Second Battle of（1799）237

译后记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前辈和同人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我尤其要感谢《鏖战欧罗巴——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译者吴畋的悉心指导以及中国拿破仑论坛版主黎炜健在资料查询和译稿审阅上的长期支持。

由于个人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批评指正。

补充一点，国内曾翻译不少拿破仑时代的作品，其中一些译名存在争议。本书译名主要依照新华社标准，与常见译名有一定区别，故列出对照，供读者参考。

本书译名	常见译名
柏柏里（Barbary）	巴巴里
拜恩（Bavaria）	巴伐利亚
巴格拉季翁（Bagration）	巴格拉季昂
本尼希森（Bennigsen）	本尼格森
布列讷（Brienne）	布里埃纳
布列纳（Bourrienne）	布里昂

布洛涅（Boulogne）	布伦
布吕内（Brune）	布律纳
昂吉安（Enghien）	当甘
弗里德里希（Frederich）	腓特烈
海尔斯贝格（Heilsberg）	海尔斯堡
约翰·穆尔（John Moore）	约翰·摩尔
康沃利斯（Cornwallis）	康华里
柯尼希斯贝格（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拉斐特（Lafayette）	拉法耶特
曼托瓦（Mantova）	曼图亚
莫尔捷（Mortier）	莫蒂埃
奈伊（Ney）	内伊
纽伦贝格（Nuremberg）	纽伦堡
维梅鲁（Vimeiro）	维米埃罗
维斯瓦河（Wisła）	维斯杜拉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拿破仑大帝：全2册/（英）罗伯茨（Roberts，A.）著；苏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2019.10重印）

ISBN 978-7-5097-8717-5

Ⅰ.①拿… Ⅱ.①罗…②苏… Ⅲ.①拿破仑，B.（1769～1821）-传记 Ⅳ.①K835.6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2447号

拿破仑大帝（上、下册）

著者/〔英〕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

译者/苏然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7.375 插页：1 字数：845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6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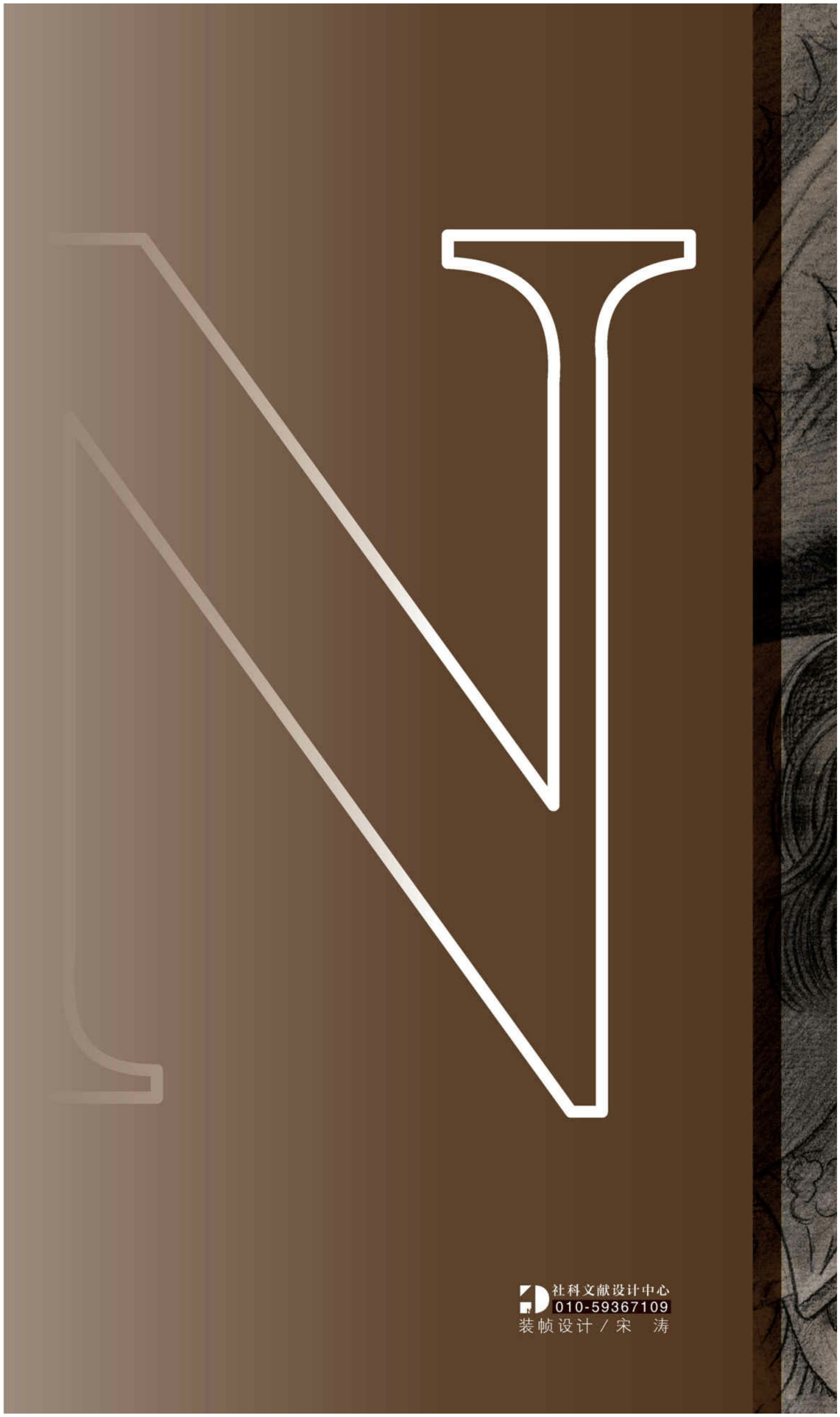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87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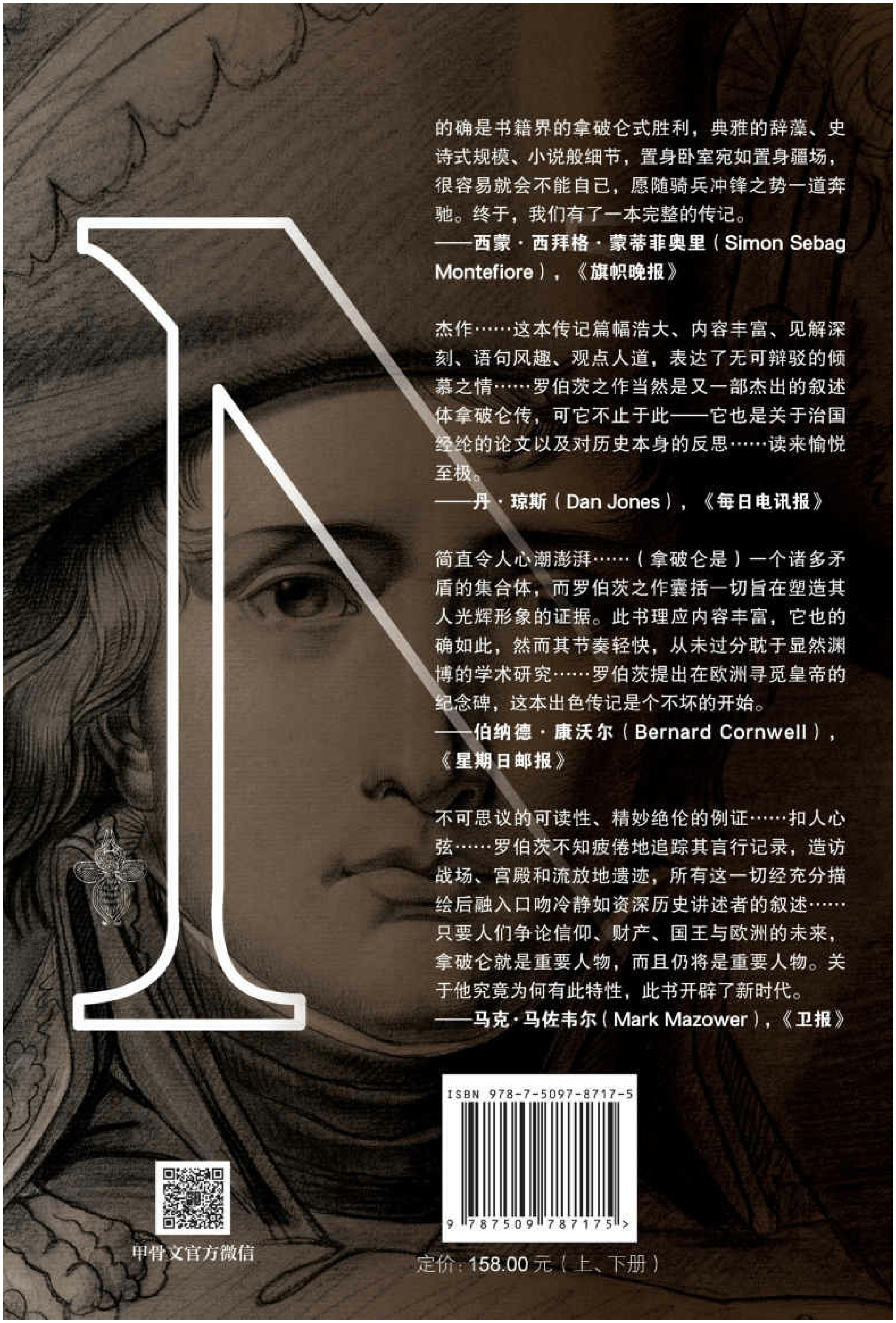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7476号

定价/158.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的确是书籍界的拿破仑式胜利，典雅的辞藻、史诗式规模、小说般细节，置身卧室宛如置身疆场，很容易就会不能自已，愿随骑兵冲锋之势一道奔驰。终于，我们有了一本完整的传记。

——**西蒙·西拜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旗帜晚报》**

杰作……这本传记篇幅浩大、内容丰富、见解深刻、语句风趣、观点人道，表达了无可辩驳的倾慕之情……罗伯茨之作当然是又一部杰出的叙述体拿破仑传，可它不止于此——它也是关于治国经纶的论文以及对历史本身的反思……读来愉悦至极。

——**丹·琼斯**（Dan Jones），**《每日电讯报》**

简直令人心潮澎湃……（拿破仑是）一个诸多矛盾的集合体，而罗伯茨之作囊括一切旨在塑造其人光辉形象的证据。此书理应内容丰富，它也的确如此，然而其节奏轻快，从未过分耽于显然渊博的学术研究……罗伯茨提出在欧洲寻觅皇帝的纪念碑，这本出色传记是个不坏的开始。

——**伯纳德·康沃尔**（Bernard Cornwell），**《星期日邮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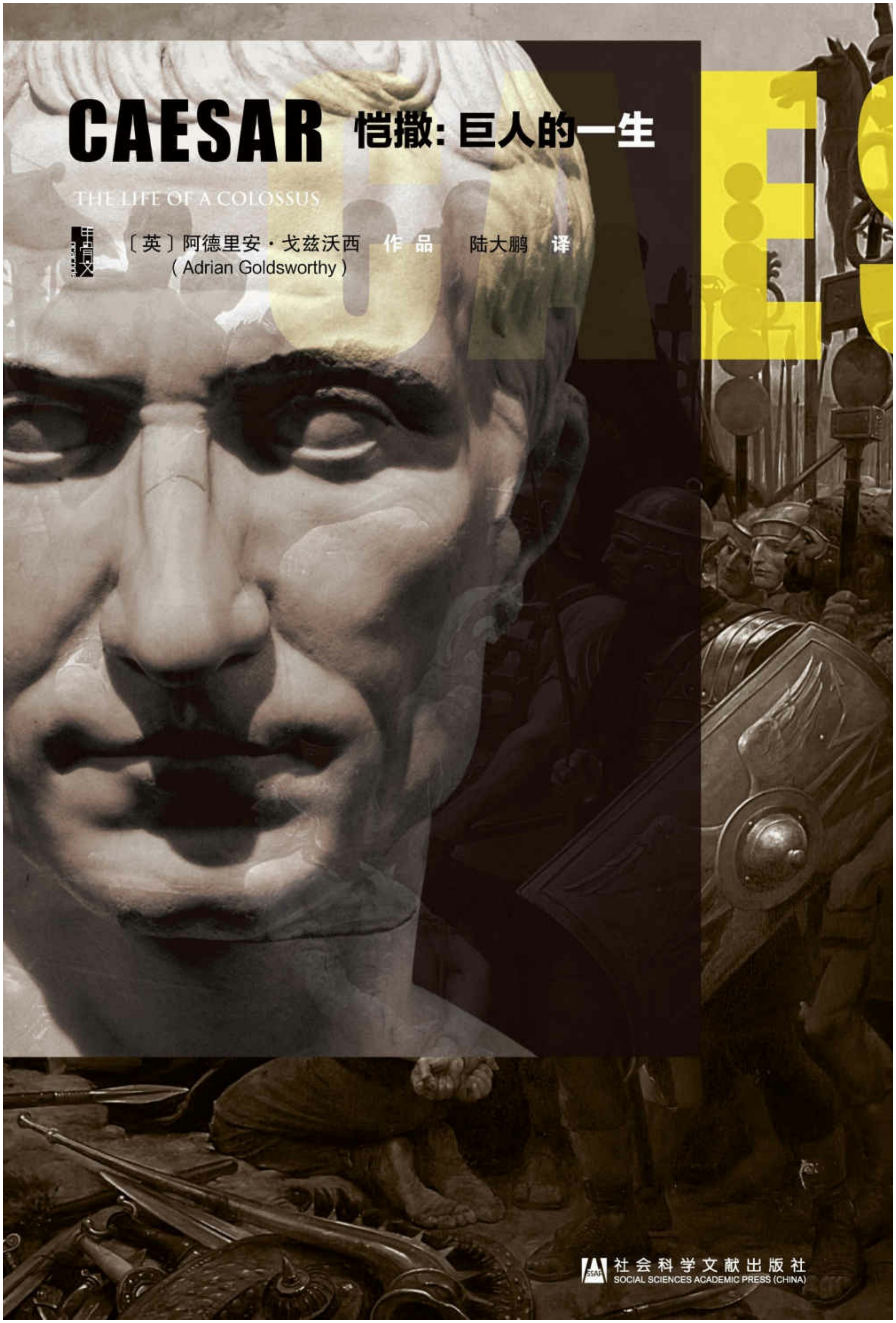
不可思议的可读性、精妙绝伦的例证……扣人心弦……罗伯茨不知疲倦地追踪其言行记录，造访战场、宫殿和流放地遗迹，所有这一切经充分描绘后融入口吻冷静如资深历史讲述者的叙述……只要人们争论信仰、财产、国王与欧洲的未来，拿破仑就是重要人物，而且仍将是重要人物。关于他究竟为何有此特性，此书开辟了新时代。

——**马克·马佐韦尔**（Mark Mazower），**《卫报》**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8717-5

定价：158.00 元（上、下册）


CAESAR
恺撒：巨人的一生
THE LIFE OF A COLOSSUS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作品 陆大鹏 译
（Adrian Goldsworth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SAR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Adrian Goldsworthy）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在牛津大学获得古代史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他著作颇丰，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西方的没落：超级大国罗马的灭亡》和《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他创作了五部小说，讲述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群英国士兵的命运沉浮，其中最新一部是《驱敌靠岸》（*Run Them Ashore*）。他目前是纽卡斯尔大学的访问学者。

陆大鹏

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By ADRIAN GOLDSWORTHY

Copyright：©Adrian Goldsworthy 2006

First published by Weidenfeld & Nicolson，a division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Lond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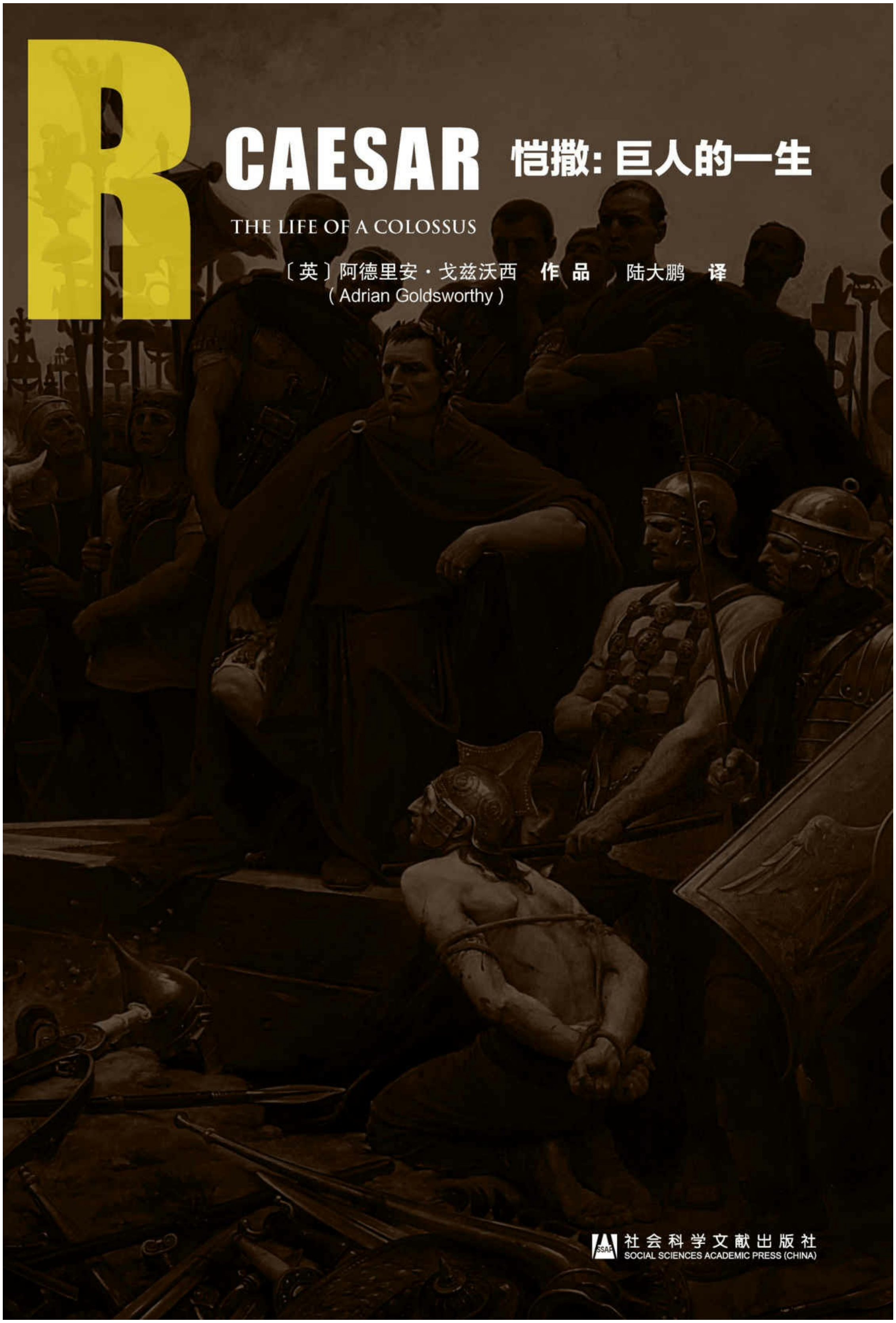
2015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CAESAR 恺撒：巨人的一生

THE LIFE OF A COLOSS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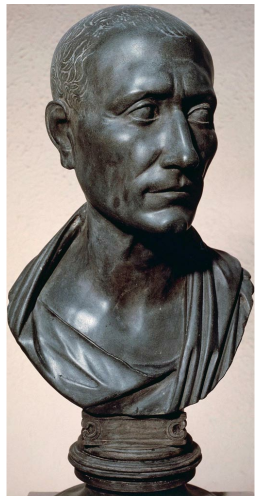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作品 陆大鹏 译
（Adrian Goldswort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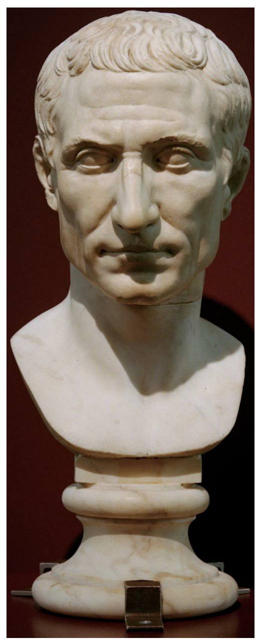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这尊半身像出土于图斯库鲁姆，可能是恺撒在世时制作的雕像中唯一流传于世的。它表现了恺撒后移的发际线，可能是对中年恺撒外貌的最准确表达了。（**Gautier Poup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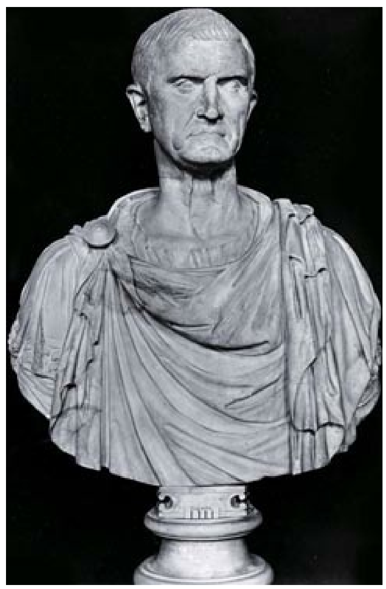
这尊用青色板岩制成的恺撒像出土于埃及，可能是**1**世纪时制作的。和很多后期塑像一样，有些面貌特征很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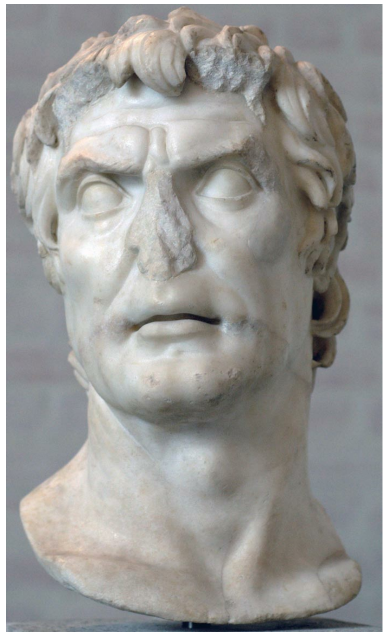
这尊半身像体现出在后期恺撒雕像中，面貌特征被风格化处理的程度。清晰的线条和强有力的颚部是为了展现恺撒的人格力量。注意浓密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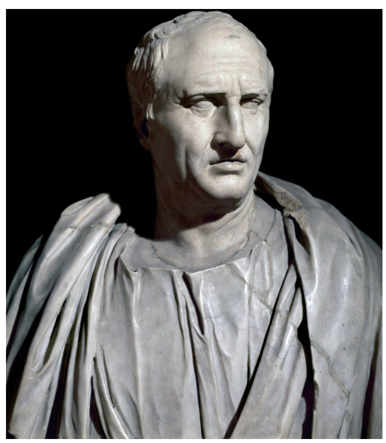
伟大庞培的政治生涯在他年轻时便开始了，光辉灿烂，但不符合正统。这尊雕像表现的是中年的他，此时他非常注意保持体面、持重的举止行为。（**Author’s Col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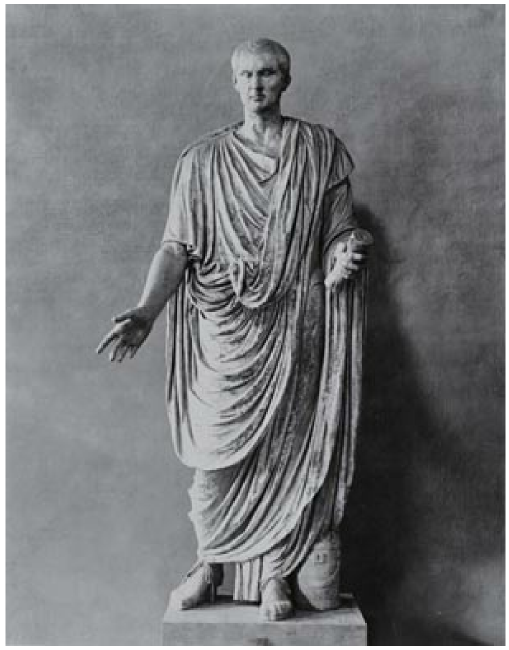
通过聪明地利用财富和大规模的人情交易，克拉苏为自己赢得了极其强大的地位。但他缺乏魅力，从来没有像庞培或恺撒那样赢得人们的爱戴。



苏拉的政治生涯和后来恺撒的崛起之路十分相似。苏拉出身贵族，但家族早已经衰败。他借镇压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之机筹备了第一支军队，最终依靠军队实行独裁统治。



西塞罗的政治生涯建立在他的精彩演讲之上。他的大量著作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重要窗口。在私人关系上，西塞罗喜欢恺撒，但在政治上对恺撒抱有怀疑。



老加图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追寻美德，视美德高于一切，但非常极端，简直走火入魔。与恺撒奢侈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但两人都在政治生涯早期赢得了广泛认可和名誉。



小加图在政治上的突出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其先祖——监察官加图——的刻意模仿，以及精明地利用家族人脉。他憎恨恺撒，既恨这个人，也恨他的政治立场。而恺撒与塞维利娅的长期私情更使小加图对恺撒咬牙切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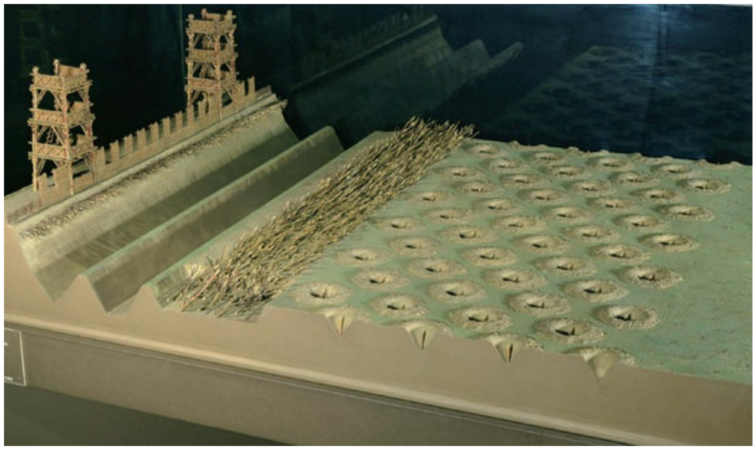
今天可以看得到的罗马广场遗迹都建于恺撒之后的时代。前景中是尤利乌斯会堂，由恺撒开始建造，前**46**年开放，后来被多次重建；后面的三根立柱标志着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奥古斯都时期被重建。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纪念碑建于前**1**世纪，是该时期留存至今的少数详细描绘罗马士兵的图像之一，恺撒军团的士兵制服应当与图中类似：蒙泰福尔蒂诺式头盔、椭圆形盾牌和链甲。（**Musée du Louvre**）



这面浮雕来自美因茨的罗马军团要塞，时间是恺撒死后至少一个世纪，展现的是更为经典的罗马军团士兵形象。此处描绘的部分装备在恺撒时代可能就已经使用了。（**De Agostini/akg-images**）



这是**19**世纪恺撒在阿莱西亚围攻阵地的复原模型，基于《战记》和拿破仑三世时期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围困的高卢人面前难以逾越的障碍。



罗马钱币：
1.迪纳厄斯（银）；
2.阿斯（铜）；
3.苏拉（金）；
4.尤利乌斯·恺撒（金）；
5.马克·安东尼和马尔库斯·李必达（金）；
6.屋大维（银）；
7.塞克斯图斯·庞培、**“**伟大的**”**庞培和格奈乌斯·庞培（金）；
8.布鲁图斯（银）。



罗马迪纳厄斯银币，公元前**44**～前**43**年，正面为**“**伟大的**”**庞培，反面为航行中的划桨帆船。



尤里乌斯·恺撒时期的罗马金币（复制品），为了庆祝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取得胜利，铸造于公元前**48**～前**47**年。正面可能是维纳斯的头像，反面为缴获的高卢人武器。



阿莱西亚攻防战时恺撒修筑的围城工事（重建后），法国勃艮第地区。



在尤利乌斯·恺撒脚下，维钦托利丢下武器》，**Lionel Royer**，**1899**。这幅画描绘了阿莱西亚攻防战后高卢人首领投降的情景。注意一名武士（左下角）戴有金属项圈。然而，事实上，只有神和皇室家族成员才有资格佩戴。画中对高卢

人长头发、长胡须的描绘在今天看来也是有问题的。作者笔下维钦托利所骑的马属于佩尔什马，但是当时的高卢地区并不存在此种马。另外，图中的挽具和马鞍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一时期高卢人骑马并不使用马鞍。依据历史记载，当时士兵多配以椭圆形盾，而不是图中的矩形盾。（**Musée Crozatier**）



公元前**55**年，尤利乌斯·恺撒登陆不列颠。



丹达拉的哈索尔神庙内的巨大浮雕表现的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儿子恺撒里昂（右侧）向诸神（左侧）献祭。



《恺撒面前的克里奥帕特拉七世》，**Jean-Léon Gérôme**，**1866**。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从毯子里出来，站在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面前。这位埃及皇后被她的弟弟/丈夫托勒密十三世驱逐出皇宫，因此她不得不通过伪装重新进入皇宫，从恺撒那里寻求庇护和夺取王位。



这尊半身像被认为是马克·安东尼，的确与钱币上的安东尼肖像有相似之处。安东尼与恺撒是远亲，似乎一直对后者很忠诚，但两人的关系并非始终很亲密。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安东尼负责管理罗马，表现不佳。（**National Trust/Simon Harris**）



这尊半身像被认为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即刺杀恺撒的密谋集团领导人之一。恺撒与布鲁图斯的母亲塞维利娅是情人关系。一直有谣言称恺撒是布鲁图斯的生父，但这种说法毫无根据。（**Florence**，**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这尊帝国时期的雕像展现的是理想化的恺撒。从奥古斯都开始，历代皇帝对于应当赞颂恺撒的哪些方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在元首制帝国时期，加图和布鲁图斯在元老当中仍然受到广泛仰慕。



《尤利乌斯·恺撒之死》，**Vincenzo Camuccini**，**1804**～**1805**。（**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Rome**）

本书获誉

了不起的成就……是古代人物传记写作的榜样。

——《文学评论》

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本书对恺撒军事艺术的分析非常精彩；尤其是对高卢战争的记述，简直登峰造极。

——《观察家报》

戈兹沃西是年轻一代古典学家之一，他将学术研究与精彩叙述融为一体，让古代世界跃然于纸上：在他的杰作《恺撒：巨人的一生》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伟大罗马人的不同形象：男人、政治家、军人和情人。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戈兹沃西是著名的军事史学家，他在本书中对混乱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历史的梳理是非常权威和明晰的。他帮助我们了解到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和当时的罗马社会，尤其是那位超越时代的、令人着迷的人物本身的巍峨形象。

——《星期日独立报》

这部令人惊艳的传记……非常晓畅，非常全面，非常中肯。

——《每日电讯报》

一部扣人心弦的尤利乌斯·恺撒传记，记述了他那跌宕起伏的精彩一生。

——《金融时报》

丰富的细节生动地展现了那种敢于冒险、自我宣传和顽强的意志力，正是这些因素让恺撒的一生如此非同寻常。

——《BBC历史杂志》

一个传奇人物，一部详细、全面而内容丰富的传记。

——《每日邮报》

读起来非常愉悦……戈兹沃西文笔优美，非常有权威性。

——《乡村生活》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作品肯定对得起这一宏大主题，证据也集合得非常完美。

——《星期日邮报》

戈兹沃西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史学家，他对高卢战争的记述堪称典范。

——《独立报》

我强烈推荐《恺撒：巨人的一生》。选择推荐这本书，是我今年做出的最轻松的决定。恺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生活在一个令人迷惑的复杂时代，但阿德里安·戈兹沃西以强劲而明晰的笔触完美地处理了这个主题。恺撒本人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欣赏这部著作。

——菲利普·西德耐尔，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读书俱乐部

强烈的戏剧感……贯穿着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恺撒：巨人的一生》……一幅权威而激动人心的恺撒肖像，也描绘了他所处的整个复杂社会。

——《纽约时报》

非常精彩……戈兹沃西先生以娴熟的技巧和卓越的叙事能力，讲述了这个故事，运用了恺撒本人的著作及其他史料。

——《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序

十多年前，我花了三年时间创作《恺撒：巨人的一生》。即便在今天，我仍然感到恺撒和他的一生非常精彩，而且和当年一样觉得很难评判他。他才华横溢，涉猎极广；他聪明机敏，精力充沛；他是一位文笔晓畅的作家，也是一位能够指挥和激励大军的将领；他能编纂法律，也能承担乏味但必需的日常行政工作。他的魅力的确罕见，既能用自己的言辞和风格赢得群众、军队的支持，也能引诱其他男人的妻子。如果你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恺撒，很难不感到些许自卑。你未必想做他做过的那些事情，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希望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才干。

但恺撒也是那个渡过卢比孔河、打响内战的人，这场内战激荡着整个地中海世界，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他自立为独裁官。他的这个头衔和其他荣誉，是元老院和人民投票决定的。但是因为他的军队占领着罗马城，所以他们别无选择。恺撒的行动在我们所谓的罗马共和国体制（国家领导人是每年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他们接受元老院的指导）灭亡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对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前1世纪）研究得越多，就越认识到它是多么腐朽无能。少数富裕的贵族豪门主宰着共和国，几乎所有高级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的重要成员都出身于豪门。这样的权力垄断本身或许并不会让国家垮台，但这个小小的精英集团统治共和国的手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内部瓜分官职和荣誉，丝毫不会考虑得到这些官职和荣誉的人是否有才干。罗马人认识到当时存在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

如他们必须为罗马的无业人群寻找土地。但元老们互相嫉妒，不愿意让自己的竞争对手解决问题从而独揽功劳，于是没有人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压榨各行省。所有人都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但因为那些应当对问题负责的人占据高位，所以很少有人挑战他们。西塞罗私下将在他之前担任奇里乞亚行省总督的人描述为“发疯的野兽”，但在公开场合对此人非常礼貌，并急于得到此人的好感，因为他是最重要的门阀贵族成员。

恺撒虽然借助武力夺取政权，但更为负责地行使了权力。他安排政府收购土地，将这些土地（或者政府已经拥有的土地）分配给公民，帮助他们养家糊口。恺撒对各行省的治理比以前好得多，并且他努力阻止罗马总督们滥用职权。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平民一边。大多数人，无论是罗马公民还是外省居民，在恺撒统治下都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宽泛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了好结果而使用坏手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杀害了恺撒，原以为人民会响应他们的自由呼声，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支持他们。即便这极少数人，也几乎全都是富人、贵族和他们的亲密盟友，因为只有他们曾经享受过许多自由。

前49年，恺撒陷入困局，他的对手们只给了他两个选择——退出政坛或者反叛，因此主要是他的对手们让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根据罗马人的标准，他并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以至于要遭受这样的命运。恺撒为了个人荣誉和地位而战，因此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的敌人同样自私自利，因为他们仅仅为了逼迫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退出政坛，而不惜发动战争。加图憎恶恺撒，后来宁愿以特别残酷、恐怖的方式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独裁官有权饶恕他。布鲁图斯接受了恺撒的仁慈，后来却又改变了主意。后世元老们对由他们所在阶级主宰的共和国充满了怀旧之情，因此把加图和布鲁图斯这样的人吹捧成英雄，对他们的许多人格缺陷视而不见，也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加图和布鲁图斯在他们的

整个政治生涯中并没有取得任何建设性的成就。

我曾周游世界，宣讲本书。我惊讶地发现，很多国家的很多人仍然对恺撒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处于政治两极的人都喜欢他、仰慕他，并认为他的故事佐证了他们自己对现代世界的看法。在美国尤其是这样。美国人对古罗马的兴趣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创立者们更喜欢加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这样的人，以及这些人（据说）代表的共和国美德。约瑟夫·艾迪生的剧作《加图》比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更强烈地激励了18世纪70年代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领导人。在美国独立战争的低谷，乔治·华盛顿让人为饥肠辘辘、憔悴不堪的士兵们上演了《加图》。今天，喜欢恺撒的美国人更多，不管是把他看作反对贵族集团的英雄（尽管他自己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还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个高效的实干家。很多美国人都觉得，如果出现一个新“恺撒”，那么就能解决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尽管大家对美国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奇怪的渴望，因为恺撒这样的人只有在混乱年代才能获得最高权力，而希望出现这种混乱局面的人肯定很少。

恺撒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或许，我们应当希冀一个更好的社会，在那里，拥有恺撒那般才华的人不需要动用武力就可以攀登高位，用他们的才干为民造福，并得到鼓舞和奖励（而不是被迫走上反叛的道路），并最终让位于新一代人才。我越来越坚信，恺撒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其他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挠，他会继续在体制内活动。然而如果他留在体制内，还会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吗？我们又一次不得不面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2015年6月

致谢

一些朋友审阅了本书全文或部分章节，首先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要感谢我的本科导师Nicholas Purcell，他非常爽快地答应审阅本书手稿的一个版本。Philip Matyszak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他对这一时期罗马元老院的运作了然于胸，远胜于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Ian Hughes一如既往地对每一章做了极其细致的审读和评论，对我帮助极大。Kevin Powell审阅了全文，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Ian Haynes审读了第二部，给出了一些建议。对这几位朋友，以及其他所有阅读过本书全文或部分章节的人，我都十分感激。其次，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Georgina Capel，她通过谈判签订了合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好好地阐述这个主题。最后，我还必须感谢Keith Lowe和Orion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莫大热情以及他们不懈的努力。

引言

尤利乌斯·恺撒的故事极富戏剧性，令一代又一代人心驰神往，吸引了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注意力，更不消说数不胜数的小说家和编剧。恺撒是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家之一，并且他挥毫记述了自己的历次战役，文采斐然，鲜有出其右者。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政治家，最终获得了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在方方面面都算得上一位君主，尽管他始终没有采用国王的头衔。作为统治者，恺撒并不心狠手辣，对落败的敌人往往宽大为怀。然而，最后正是两个被他宽恕的人领导了反对他的密谋（恺撒的许多支持者也参加了这个密谋），将他刺死。后来，他的养子屋大维（全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公元68年，尼禄死去，恺撒的血脉就此断绝，但后来的所有皇帝都仍然采用“恺撒”这个名字，尽管他们与恺撒没有任何血缘或收养的亲属关系。“恺撒”起初仅仅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名号，而且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家族，后来却演变为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头衔。这种含义如此之强大有力，以至到20世纪初，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依然采用“恺撒”的称号：“kaiser”（德国皇帝）和“tsar”（俄国沙皇）都是“恺撒”这个名字的变体。今天，在西方国家的教育中，古典学已经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但尤利乌斯·恺撒仍然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古人。很多不懂拉丁语的人也会记得莎士比亚笔下恺撒的临终遗言：“你也有份，布鲁图斯？”（et tu Brute）其实，恺撒临死前最后一句话可能不是这个，但这也不重要了。其他罗马人当中，只有尼禄，或许还有马克·安东尼，享有可以与恺撒相提并论的名望。其他民族的古人当中，或许只有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哲学家们、汉尼拔，以及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公众记忆中的地位能够和恺撒媲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恺撒的情人，安东尼是

恺撒的主要副将之一，所以他们俩也是恺撒故事的一部分。

恺撒是一位伟人。许多威名赫赫的军事家承认自己通过研究恺撒的战役获益良多，拿破仑便是其中之一。在政治上，恺撒对罗马历史的影响极其深远，在共和国政体（它持续了四个半世纪）的终结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恺撒头脑聪颖敏锐，受过极好的教育，但他也是个实干家，正是这一点让他名垂青史。他才华横溢，涉猎广泛，既是优秀的演说家和作家，也是立法者和政治家，还是伟大的战士和军事统帅。最重要的是，他是个魅力十足的人，常常能够赢得罗马群众和军团战士的爱戴与支持，并且在风月场上春风得意，令诸多女性神魂颠倒。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恺撒犯过许多错误，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非常了不起的本领就是能够从挫折中迅速地恢复过来，至少是向自己承认犯了错误，然后相时而动，放眼长远，设法取胜。

很少有人会质疑恺撒的伟大，但我们很难说他是个有善心的人，也很难说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全都是正面的。他不是希特勒，不是斯大林，也不是成吉思汗。即便如此，有史料称，在他的军事行动中，有一百多万敌人丧生。古人的思维与今天不同。对于恺撒的对外战争，比如针对高卢诸部落的战争，罗马人很少会感到良心不安。在历时八年的南征北战中，恺撒的军队至少杀戮了数十万高卢人，并奴役了更多的人。有时候，恺撒完全是冷酷无情，眼睛眨都不眨就下达屠杀和处决敌人的命令；有一次还将大批战俘的手全部砍掉，然后将其释放。在更多的时候，他对败北的敌人宽大仁慈，这是出于非常务实的考虑：他希望这些人接受罗马的统治，成为新行省内缴纳赋税的顺民。他的务实到了冷酷的程度，是慈悲为怀还是血腥镇压，完全取决于哪一种决策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他是一个积极活跃而精力充沛的帝国主义者，但他并非罗马帝国主义的创始人，只是其诸多执行者之一。他指挥的军事行动并不比罗马的其他战争更为残暴。在当时更具争议的是他在罗马的活动。当他感到自己的政敌决意要终结他的政治生涯时，不惜发动一

场内战。恺撒的愤愤不平的确有道义上的支持，但当他于公元前49年率军从高卢进入意大利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叛国者。恺撒遇刺之后爆发的内战最终给罗马共和国敲响了丧钟。由于恺撒的所作所为，共和国的绝症已经到了晚期。共和国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其中第一位皇帝便是恺撒的继承人。在独裁期间，恺撒拥有最高权力，总的来讲治国有方，采纳了一些符合理智、有政治家风范而且利国利民的政策。在此之前，主宰共和国的是一小群元老院精英，他们往往滥用职权，剥削、压榨罗马贫民和外省居民，鱼肉百姓，中饱私囊。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共和国体制确实出了严重的问题，却不愿意动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贵族们害怕某一位元老会因此独揽功劳。恺撒采取了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体制已经相当败坏，早在恺撒出生之前，政界就充满了暴力流血；在他幼年时，甚至爆发了内战。恺撒凭借军事实力赢得了最高权力，我们也知道在他政治生涯的其他阶段，他也曾运用贿赂和恐吓的手段。恺撒对手们的策略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了摧毁恺撒的地位，他们不惜诉诸内战，就像恺撒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甘愿动武一样；但这只能说明，恺撒比对手们好不到哪儿去，但也不比他们更坏。在得胜之后，他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统治国家。与元老院贵族截然不同的是，他的政策旨在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受益。他没有压迫民众，甚至赦免和提拔了一些之前的敌人。在恺撒的统治下，罗马、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处境都比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好得多。但不管他的统治是多么贤明，自由选举都不复存在；不管他的治理是多么公正，君主制最终必然导致像卡里古拉和尼禄那样的暴君登场。在罗马，撰写历史的一般是富裕的精英阶层，而恺撒的崛起则意味着这个阶层权利的丧失。正因如此，许多史料对恺撒持批评态度。

恺撒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他似乎毫无道德观念可言。他的天性似乎和蔼、慷慨，一般不计前嫌，能够把敌人转化为朋友，但有时也能做到彻头彻尾的残酷薄情。他是个根深蒂固的好色之徒，对自己的历任妻子和为数众多的情人并不忠诚。克利奥帕特拉

七世是他的情人中最有名的一位，他们之间似乎确实是两情相悦；但即便如此，恺撒仍然很快又和另一位女王卿卿我我，并且继续追求罗马的贵妇名媛。他极其骄傲，甚至是虚荣，尤其是对自己的外貌非常自豪。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自少年时起，恺撒就坚信自己远远比其他人优越。这种自我评价大体上是有道理的，他的确比绝大多数元老精明能干。或许就像拿破仑一样，恺撒也对自己的个性非常陶醉，因此能够轻松地迷住其他人。和法国皇帝一样，他的个性中也有许多矛盾之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曾如此描述拿破仑："他是个了不起的伟人，或许是史上曾有过的最了不起的伟人。最令我瞩目的是，我们没办法对他的性格下个定论。你刚刚打定主意，认定他是个无药可救的恶棍，然后又发现他有一些高贵的闪光点。你刚对他敬仰起来，却发现他做过无比卑劣的丑事。"[1] 恺撒身上也有着类似的矛盾之处，但或许没有拿破仑那么极端。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学者在研讨往昔时，理应保持中立和超然的态度，但很少有古代史专家能对恺撒没有强烈的爱憎。过去，有些历史学家仰慕他，甚至对他顶礼膜拜，将他视为一位远见卓识的梦想家，能够看清共和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并且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也有些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更为严厉，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贵族，他的雄心壮志也不过是凡夫俗子的野心，丝毫不顾自己的行为会给法律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会立下多么糟糕的先例，爬到了权力巅峰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这样的批评者一般会强调，恺撒的崛起有着很大的机会主义成分。恺撒当然是个机会主义者，但差不多所有成功的政治家都是这样。他坚信人世间的所有事务均由机遇掌控，并且感到自己特别地幸运。今天，我们可以凭借后见之明，知道屋大维（他更常用的名号是奥古斯都）创建了帝国制度，之后的历代皇帝借助这种制度统治了罗马帝国数百年之久。恺撒主宰罗马的岁月给奥古斯都后来完成的事业打下了多少基础？或者也许恺撒的举动都是错误的，他的养子有意识地从中吸取了前车之鉴，避免重蹈覆辙？关于这些问题，学术界有着很激烈的

争论，各执一词，将来也不大可能出现公认的统一意见。真相或许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本书的旨趣是以自己的方式研讨恺撒的生平，并且始终将他的故事置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社会大背景之下。本书不会涉及他死后发生的事情，因此不会真正探讨他的政权与奥古斯都执政时演化出的政权之间的区别。本书关注的焦点是恺撒做了哪些事情，并且努力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如何做到的。后见之明自然是无法逃避的，但本书会尽量避免这样的两个极端：内战和共和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共和国好得很，没有任何问题。在过去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许多著作要么将恺撒看作一位政治家，要么把他当作军事家来描写。与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一回事。罗马的元老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会接受军事和民政的使命，这两方面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因此本书会同样细致地审视这两个方面。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丰富，但它不可能完整地记述恺撒在世时罗马的政治，也不可能全面地分析高卢战役和内战。聚焦点始终是恺撒，对于他没有亲自参与的事件，本书会尽可能言简意赅地描述。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罗马某项法律或某次审判的细节，或与军事行动相关的地形和其他问题，我将一笔带过。这些方面不管多么有趣，如果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恺撒，都不应当赘述，否则就是跑题了。读者若对这些方面感兴趣，可以查看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出于类似的理由，本书正文尽可能避免直接提及那些曾经研究过恺撒的著名学者，以及避免讨论他们的具体阐释。这些方面在学术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一般读者只会觉得乏味。相应的著作列在本书末尾的注释中。

尽管恺撒的令名无人不知，而且他生活的年代或许是罗马史上文献记载最翔实的时期，但是我们对恺撒的许多方面仍然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手头的证据已经不新鲜了。考古发掘会继续揭示恺撒生活的世界的更多细节。例如，写作本书之时，在法国和埃及进行的考古工作很可能会

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恺撒时期高卢的情况，以及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亚历山大港的信息。但是，不大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的考古证据来极大地改变我们对恺撒生平的理解。我们掌握的主要文献是古典世界传承至今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史料，有时还辅之以青铜或石碑铭文。恺撒自己的《战记》流传至今，详细记述了他在高卢的征战，以及内战的最初两年。恺撒死后，他的军官们还写了四部书，讲述了内战的后续阶段。另外，我们还能读到西塞罗的信函、演讲和理论著作，从中了解到这一时期的大量细节。西塞罗的通信是在他死后发表的，包括共和国的许多权贵给他写的信，其中就有恺撒写给他的一些短信。我们知道，西塞罗与恺撒的通信全集以及西塞罗与庞培的通信全集都曾出版过，但遗憾的是它们都已经遗失了。恺撒的其他文学作品和发表的演讲稿也没能留存至今。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古典世界的文学只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流传到今天。西塞罗出版的通信集中刻意删去了一些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公元前44年的前三个月给友人阿提库斯的信。阿提库斯参与了这些通信的出版工作，但这是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统治者之后的事情。被删去的信极有可能包括对阿提库斯不利的内容，比如他参与了谋害恺撒的阴谋，或者他对阴谋知情不报，或者后来对阴谋分子表示过赞赏。为了自保，阿提库斯将这些信删去了。另外一个差不多同时代的史料来源是撒路斯提乌斯，他写了好几部史书，其中包括记述喀提林阴谋的内容。在内战期间，撒路斯提乌斯为恺撒效力，后来恺撒为了奖赏他，恢复了他的元老地位。随后撒路斯提乌斯被派去管辖阿非利加行省[2]，因为搜刮民脂民膏而被定罪，恺撒又放了他一马。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评价比西塞罗的评价更正面，而且由于他是带着后见之明写作的，因此他对独裁官恺撒的看法似乎也更复杂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自己是个贪官污吏——当然他自己一直坚决否认——但其史书的主题却是，罗马的灾祸全都是贵族的道德败坏造成的。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的叙述。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和恺撒都积极参与政治，尤其是恺撒会通过写作来自我颂扬，并为将来的事业争取支持。他和其他人都绝不是

客观中立的观察者，也绝不是只对原原本本地叙述事实感兴趣。

大多数的其他史料都来源于更晚近的时期。李维在奥古斯都时期写作，当时的人们对恺撒时期的某些历史事件还记忆犹新，但李维写的涉及恺撒时期的著作已经遗失，只有简略的概述保存至今。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创作的时代要晚一些，他简洁地叙述了恺撒时期的历史，其中有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但是，我们掌握的关于恺撒的史料大多是公元2世纪初之后编纂的，那已经是他遇害一百五十多年之后了。希腊作家阿庇安创作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史，其中有两部涉及公元前133年至前44年的内战和动乱。普鲁塔克也是希腊人，对我们来讲，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该书将希腊和罗马的显赫人物并置。他把恺撒与亚历山大大帝并列，称他们为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军事统帅。普鲁塔克为马略、苏拉、克拉苏、庞培、西塞罗、加图、布鲁图斯和马克·安东尼创作的传记也很有帮助。苏埃托尼乌斯是个罗马人，他为从恺撒开始的十二位皇帝写了传记（如果恺撒也可算作皇帝的话）。卡西乌斯·狄奥出生于希腊，但是一位罗马公民和元老院成员，于3世纪初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的著作是关于恺撒时期的最详细的连贯叙述。上述这些作家都能参阅到一些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史料，其中许多是与恺撒同时代的，还包括恺撒本人的一些业已遗失的著作。但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些作家都是在恺撒去世多年之后开始写作的，他们未必能理解或准确地表达公元前1世纪人的情感态度。我们掌握的史料证据中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空白。苏埃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的恺撒传记的开头部分都遗失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恺撒的出生年份。每一位作者都有着自己的偏见、利益或视角，而且他们使用的史料也是有偏见的，往往是一些政治上的宣传材料。在使用任何史料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与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不同，古代史研究者往往必须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可能不可靠的史料，并且要将互相矛盾的叙述加以协调与平衡。在本书中，我努力展现了这样的研究过程。

对于恺撒内心世界的有些方面，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的。如果能更多地了解他的私生活，他与家人、妻子、情人和朋友的私人关系，那么一定会非常有趣和有益。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在晚年，恺撒没有一位与他地位平等的朋友；他喜爱许多下属和助手，并与他们很是亲密。对于他的宗教信仰，我们知之甚少。仪式和宗教浸透了罗马世界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恺撒是罗马最高级的祭司之一，会定期执行或主持祈祷、献祭与其他仪式。他还尽可能地利用了自己家族的传统，声称自己是女神维纳斯的后裔。但这一切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宗教上的顾虑极少地影响了他的决策，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常常将宗教作为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完全没有信仰的玩世不恭之徒。对他的宗教信仰，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恺撒之所以如此令人心醉神迷，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很难对他下个定义，另外还因为他在死前的最后几个月里究竟做了何种打算，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在他五十六年的生命中，他扮演着五花八门的角色：逃亡者、犯人、飞黄腾达的政治家、军队统帅、律师、反叛者、独裁者——甚至或许还扮演过神——同时，他还是个丈夫、父亲、情人和通奸者。很少有一位小说主人公像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这样丰富多彩。

---

[1] M.Booth，*The Doctor，the Detective and Arthur Conan Doyle* （1997）.p.204.

[2]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年～前146年）中，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在其领土上建立阿非利加行省，范围约在今日的突尼斯北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和利比亚西部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是罗马帝国西部最富庶的一个行省。今日非洲大陆的名称即是从该省的名称而来。（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 引言
- 第一部 攀登执政官的高峰（前100年～前59年）
  - 一 恺撒的世界
  - 二 恺撒的童年
  - 三 第一位独裁者
  - 四 年轻的恺撒
  - 五 候选人
  - 六 密谋
  - 七 丑闻
  - 八 执政官
- 第二部 资深执政官（前58年～前50年）
  - 九 高卢
  - 十 移民与雇佣兵：最初的军事行动，前58年
  - 十一 “高卢各民族中最勇敢者”：比利时人，前57年
  - 十二 政治与战争：卢卡会议
  - 十三 “越过波涛”：远征不列颠与日耳曼，前55年～前54年
  - 十四 叛乱、灾祸与复仇
  - 十五 恰逢其时，恰遇其人：维钦托利与前52年的大叛乱
  - 十六 “高卢全境已被征服”
- 第三部 内战与独裁（前49年～前44年）
  - 十七 通往卢比孔河之路
  - 十八 闪电战：意大利和西班牙，前49年秋冬
  - 十九 马其顿，前49年11月～前48年8月
  - 二十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埃及与东方，前48年秋～前47年夏
  - 二十一 阿非利加，前47年9月～前46年6月
  - 二十二 独裁官，前46年～前44年
  - 二十三 3月15日
- 后记
- 大事年表
- 术语解释
- 参考文献
- 缩写词
- 译名对照表

第一部 攀登执政官的高峰（前100年～前59年）

一 恺撒的世界

> 因为，罗马不必再畏惧迦太基，争夺帝国霸业的对手被消灭了。在此之后，美德之路遭到摈弃，罗马人选择了腐化的道路，不是逐渐堕落，而是在这条丑恶的路上迈步疾驰。古老的风纪被抛弃，新的取而代之。国家从警醒变为酣睡，从追求武德变为沉溺于享乐，从积极进取变为慵懒怠惰。
>
>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1]

> 共和国不过是个虚名，没有实质，没有形态。[2]
>
> ——尤利乌斯·恺撒

到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共和国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宰西方多年的商业帝国迦太基（它原先是腓尼基殖民地）于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军团夷为平地。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亚历山大大帝的家乡马其顿也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的庞大帝国非常短命，在他驾崩之后，他的将领们瓜分了帝国，建立起一系列强大的王国，但这些王国都在罗马的威势下屈服并大大衰落了。地中海及其周边的许多国度，包括整个意大利半岛、高卢南部、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嘉岛、马其顿、伊利里库姆[3]部分地区、小亚细亚、西班牙的大部分和北非一角，均由罗马人直接统治。在其他地方，人们不管多么不情愿，都必须承认罗马的霸权，或者至少对它心存畏惧。与罗马人发生接触的诸王国、部落或国家都无力与之匹敌，也没有团结一致、对抗罗马的意愿。公元前100年，罗马雄霸天下，富得流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状况

会发生变化。今天我们知道，在前100年之后，罗马还将继续扩张，变得更强大、更富庶，不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就将成为一个延续五个世纪之久的庞大帝国。

罗马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地中海的霸主，速度之快令希腊语世界震惊不已，毕竟他们之前很少注意到西方的这群蛮族。罗马与迦太基的对抗历时一个多世纪，其间罗马蒙受了严重损失，但征服诸希腊化王国只花了一半的时间，付出的代价也很轻微。在恺撒出生几十年前，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写了一部《历史》，专门解释罗马是如何赢得霸主地位的。他本人亲历了罗马征服过程的收尾阶段，并且参加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2年～前167年），与罗马人对抗。后来，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在一位罗马贵族家中生活，并陪伴他参加了灭亡迦太基的战役。尽管波利比乌斯注意到了罗马在军事制度上的优势，但他相信，罗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功，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体制上的优越。在他看来，罗马共和国的政体具有巧妙的平衡，能够阻止任何一个人或者社会的任何一个群体取得绝对的统治权，因此罗马得以避免频繁的革命和内乱，而这些问题令大多数希腊城邦元气大伤。罗马共和国内部稳定，因此能够以远远胜过任何竞争对手的规模和执着对外开疆拓土。罗马曾被汉尼拔打得落花流水，蒙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仍然生存了下来，并且最终赢得了战争。在当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做不到这一点。[4]

恺撒呱呱坠地时，共和国已经有大约四百年的历史，在稳步崛起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罗马将会攀上更高的巅峰，但共和国体制已经快要寿终正寝了。恺撒将会亲眼看见共和国被内战摧残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也将在这些冲突中扮演主要角色。有些罗马人感到，恺撒死后，共和国就灭亡了；很多人认为，恺撒是葬送共和国的罪魁祸首。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当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自立为罗马的首任皇帝时，共和国已经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罗马共和国尽管之前取得了长期的辉煌胜利，

但到公元前2世纪末，显然已经奄奄一息；许多迹象表明，它的运转很不正常。

公元前105年，一些迁徙的日耳曼部落（称为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在阿劳西奥（今法国南部的奥朗日）歼灭了一支兵力雄厚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可以与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相提并论（当时汉尼拔在仅仅一天之内就屠戮了近五万名罗马及其盟军的士兵）。阿劳西奥战役是这些日耳曼蛮族给罗马带来的一连串惨重失败中最新、最严重的一次。公元前113年，罗马军队第一次与这些蛮族产生交流碰撞，向其发起挑衅，于是双方爆发了长期战争。辛布里人和条顿人是正在迁徙以寻找新土地的民族，并非致力于全面战争的职业军队。在战斗中，他们战士的外表令人心惊胆寒，而且作战勇敢，但是他们缺乏纪律。在战略层面上，这些部落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阿劳西奥战役之后，他们游荡到西班牙，在随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侵犯意大利。虽然有了这段暂时的喘息之机，罗马人仍然处于普遍的恐慌当中，尤其是老百姓回想起了公元前390年的惨剧——大批肤色白皙的蛮族战士（是高卢人，而非日耳曼人）洗劫了罗马城。因此，罗马人对所有来自北方的蛮族都心存畏惧。罗马群众对最近几次军事灾难中指挥失当、昏庸无能的贵族将军们非常不满。他们坚持要求，将对抗日耳曼蛮族部落的重任托付给盖乌斯·马略。他前不久在努米底亚[5]赢得了一场胜利，结束了那里的战事。在努米底亚战争的初期，同样也是由于罗马高层的腐化无能，罗马人蒙受了不少损失。马略娶了恺撒的姑姑，是马略家族中第一个参政的成员，在公元前107年当选为两位执政官之一，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执政官是共和国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任期一年，执掌最重要的军政大权。按照规定，执政官卸任之后要等十年才能再次担任执政官，但马略在公元前104年～前100年曾连续五年当选执政官。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虽然违背了罗马法律的限定，但的确收到了人民所期望的效果：马略于公元前102年击败了条顿人，次年又打败了辛布里人。[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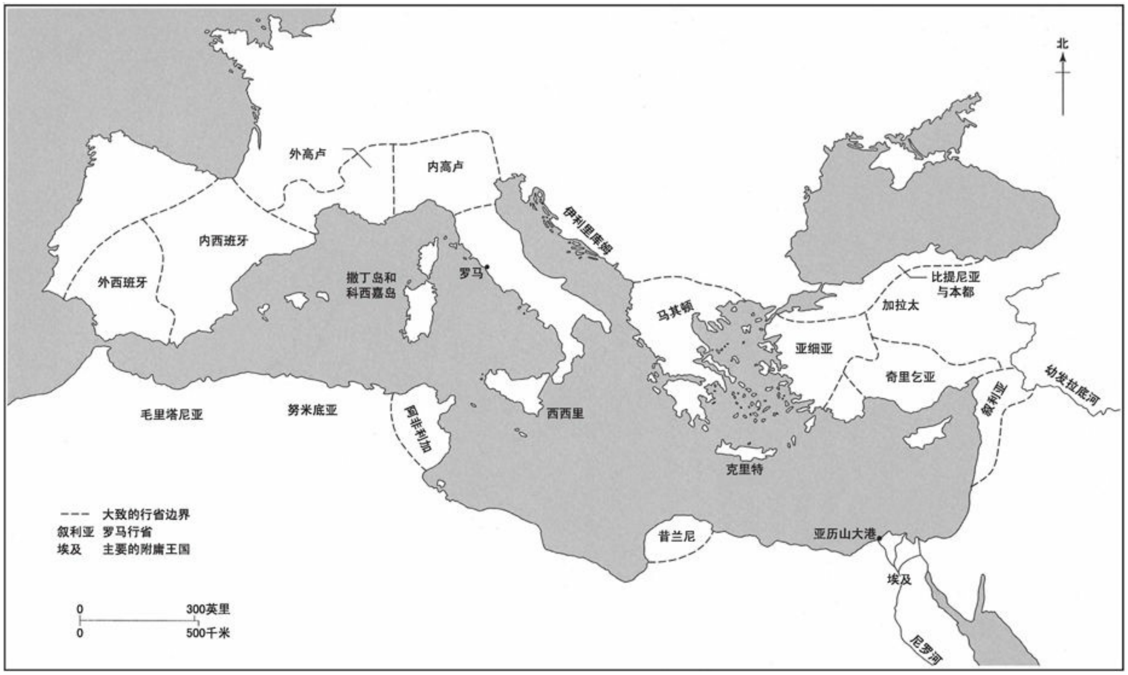


图**1**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

马略连任多届执政官，违背了罗马政治的一项根本原则，但这也可以解释为国家危难之际的非常之举。在过去，共和国为了应对危机，也曾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出现了一种趋势，即政治争端常常演变为暴力冲突。公元前100年秋季，当选为次年执政官的元老迈密乌斯在广场[7]被竞选失败的对手的爪牙活活打死。这起凶案的幕后元凶盖乌斯·塞维利乌斯·格劳基亚和他的同伙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在此之前就曾用威胁、恫吓及群体暴力的手段迫使他们的法案通过。群众普遍相信在前一年的选举中，他们还谋杀了另一名竞争对手。迈密乌斯遭受的虐杀过于残暴，很快便引起了激烈的反应。马略此前也曾利用萨图尔尼努斯给自己办事，现在转而反对他，并响应了元老院发出的挽救共和国的呼吁。他率领自己的武装支持者，将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的党羽围堵在卡比托利欧山[8]上，并很快就迫使他们举手投降。马略或许曾经许诺饶这些过激分子一条性命，但民愤激昂，不愿意宽大为怀。大多数犯人被关押在元老院议政厅内，遭到暴民的围攻。有些暴民爬上屋顶，拆除砖瓦，然后将这些沉重的砖瓦投入室内，

置犯人于死地。为了保卫共和国，常规的法度被暂时中止；为了消灭暴力，不得不动用更残酷的暴力。这与波利比乌斯曾歌颂的理想化的完美而平衡的宪法相去甚远，尽管他也承认，罗马的内部稳定未必能永久地延续下去。为了理解恺撒的故事，我们必须先考察罗马共和国的本质，既研究理论方面，也探查在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处于变革中的政治实践。[9]

共和国

据传说，罗马城于公元前753年建立。对罗马人来说，这一年就是“元年”，随后的纪年法便“从建城起”（ab urbe condita）开始计算。但是，关于罗马起源的考古证据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因为我们很难判断后来成为罗马城的许多小型定居点（它们分布在若干山丘周围）究竟在何时融合为一座城市。罗马最早期的记录很少能够保存至今，而且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撰写史书时，很多事情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关于罗马城早期的传说或许包含一定的真实元素，但要想证实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罗马最初是个君主国，但传说中的七位国王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无法一探究竟了。公元前6世纪末（传说中的年份是公元前509年，它或许是准确的），内部动乱导致君主国灭亡，被共和国取代。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来都不是僵化不变的。罗马更像是现代的英国，而不像美国。它没有成文宪法，但拥有一系列法律、判例和传统。我们今天的“共和国”（Republic）一词源于拉丁文res publica，它的字面意思是“公共之物”，或许最好的译法是“国家”或“政体”。这个术语比较模糊，所以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不同。恺撒后来认为“共和国”不过是个空虚的词语。[10] 共和国体制的松散使它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数百年间，这种灵活性就是它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本质保证了任何新的判

例或法律（不管好坏）都很容易永久性地改变行事之道。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努力阻止任何一个人获取太大的永久性权力。罗马人普遍害怕君主制的复辟，尤其是那些垄断了高级官职的贵族。因此，共和国的权力被赋予一些不同的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长官[11]、元老院和公民大会。

行政长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其中最高级的官员掌控着军权和司法权，但这些权力在本质上都是短期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在每个级别会有多名行政长官拥有平等的权力，互相制约。每年有两名执政官，次一级的裁判官则有六名。担任某一官职的人卸任后，要间隔十年时间，才能寻求再次担任同一官职。要想竞选裁判官，候选人必须年满三十九岁；竞选执政官的最低年龄是四十二岁。军事和民政权力融为一体，行政长官必须按照形势需求执行军事或民事的使命。最重要的职责和军权由执政官控制，次级的职责则被托付给裁判官。大多数资深的行政长官在一年的任期内会被派遣出去，治理一个行省。执政官或裁判官掌控军政大权的时间可以延长，每次可以延长一年，那时他们就被称为资深执政官（proconsul）或资深裁判官（propraetor）。为了拥有足够多的行省总督来统治幅员辽阔的国家，常常必须采取这种延长任期的做法，但这并没有改变权力的根本特征：有时间期限。任期延长至两年（也就是说，担任资深执政官或资深裁判官两年）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因此，尽管这些官职拥有极大的权力，但执政官或其他行政长官的人选是每年更换的。

与之相对，元老院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正式职能，而在于其恒久性。元老院拥有约三百名成员，由一名行政长官（一般是一名执政官，如果有执政官在场的话）召集开会。元老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两名监察官每五年对罗马公民进行人口和财产普查，选拔新元老。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元老也会被两名监察官弹劾。两名监察官一般会将自上次普查以来曾当选为行政长官的人士吸纳进元老院，尽管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的

法律义务。行政长官的职位数量比较少，而许多元老（或许有一半）从来没有当选过行政长官。元老的人选必须是骑士阶层成员，这是人口普查中最富裕的地主阶层。骑士阶层之所以如此得名，因为传统上他们要在罗马军队中作为骑兵作战。但是，绝大部分骑士一辈子都不会从政，因此元老一般来自骑士阶层内部一个非正式的精英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都是富人，并且拥有执掌政权的突出地位，因此维护共和国符合他们的利益。元老院的辩论由曾担任行政长官的人主持，因为按照规程，若有问题，必须先征询前任执政官们的意见，然后询问前任裁判官，最后一直到曾担任最下级官职的人。曾经担任要职、为共和国效力的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权威，而元老院作为一个团体的集体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将这样的人吸纳为元老的基础之上。元老院没有立法权，但经由其辩论而产生的决议会被送到公民大会，并获得极其强烈的推荐。当行政长官们身处罗马的时候，元老院就是他们的顾问委员会；元老院还负责决定每一年哪些行省的职位需要填充，并有权延长行政长官的任期（即任命资深执政官或资深裁判官），授予他们军权和司法权。另外，元老院负责接待外国使节、派遣使节出访，以及派遣专员前往各省督查行政事务，因此元老院在外交政策上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共和国内，罗马人民五花八门的投票会议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基本上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些会议负责选举所有的行政长官、通过法律、正式批准宣战和缔结条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只要在场，都可以投票，但他们投票的分量不一样。在拥有选举产生执政官等重要职能的百人会议中，公民依据其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按照各自的财产状况，分成若干单位进行集体投票。百人会议的结构源自上古罗马军队的组织，最富有的人负担得起昂贵的装备，因此能够在战斗中扮演更突出、更危险的角色。最高级别的投票单位的人数也最少，因为富人的数量肯定比穷人要少得多。每个投票单位的票在理论上是等值的，但由于富人单位先投票，因此往往还没轮到穷人投票，就已经达到了足以做出决议的多数票。其他的会议是根据部落[12]划分的，部落也是由人口

普查决定的，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同样很明显，只是性质略有不同。每个部落根据在场成员的多数意见，作为一个集体来投一票。但是，因为乡村部落中只有富人才有可能旅行到罗马去参加投票，而且城市中的部落包括了罗马的许多贫民，因此在选举日城市部落往往比乡村部落拥有更多的投票公民。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富裕公民对投票结果的影响远远超过为数众多的贫民。这些会议中都没有辩论的环节，只是简单地从候选人名单中挑选，或者投票决定支持还是反对某项提案。会议由一位行政长官召集，他负责主持会议并决定议程。与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公民大会相比，罗马体制中的民主元素看上去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这并不说明民主不重要。投票结果，尤其是选举的结果，仍然是不可预测的。

只有在人口普查中被登记为骑士阶层（最高的地主阶层）的人才有资格从政[13]。能否当上行政长官，取决于能否赢得选民的欢心。在罗马不存在任何与现代政党有一丝一毫相似之处的团体——鉴于现代政党令人窒息的影响力，罗马或许比今天的许多国家都更民主——每一位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都以个人身份参选。候选人很少有具体的政策，更常见的是对时局发表评论。总的来讲，选民们期望的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在他当选之后能够承担国家所需要的职责。曾经的业绩足以证明突出的才干，但如果候选人自己没有业绩，尤其是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就会夸耀自己祖先的成就。罗马人相信明显的性格特征是可以遗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经在对外战争中建功立业，那么他也一定有类似的军事才华。显贵家族花费极大的力气去宣扬自己成员的功业，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好让家族的美名在选民中流传。名望和财富使少数家族得以垄断行政长官的职位，尤其是执政官的位置。即便如此，祖上从未有人成为元老的人士也有可能攀到执政官的高位。成为自己家族史上首位执政官的人被称为“新人”，史无前例地连任多届执政官的马略就是一位“新人”。而对大多数“新人”来讲，能够担任一届执政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政界竞争极其激烈，即便

是长期从政的名门望族也需要努力才能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随着级别升高，每一个级别的职位数量越来越少，因此在政界越往上攀登就越困难。每年有六位裁判官，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希望成为执政官。这种激烈的竞争扼制了长期执政的政治集团的形成，永久性的政党更是不可想象，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分享行政长官的职位。

从很多方面看，这种体制非常有效，每年为共和国提供一批新的行政长官，这些人都努力在自己一年任期结束前为罗马建立丰功伟绩。正式权力的期限只有一年时间，但如果一位行政长官在任期内取得了成功，那么他的威望（Auctoritas）会极大地增加。和罗马的许多概念一样，Auctoritas也很难被准确地翻译为英文，因为它包含了权威、声誉、影响力、地位和重要性等多重含义。一位行政长官卸任后，他的威望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但如果他后来行事不端或者出了丑闻，他的威望也会减少，或者与其他元老的威望相比黯然失色。一个人的威望决定了元老院开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行政长官会不会频繁地征求他的意见，是不是优先征询他的意见，以及他的意见能有多少分量。只有在得到其他人承认的时候，一个人的权威才会存在；但人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有时也会直截了当地运用自己的威望。公元前90年，功勋卓著的前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现任首席元老[14]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被人指控收受敌国君主的贿赂。指控者是籍籍无名的昆图斯·瓦里乌斯·塞维鲁，他虽然是个罗马人，但出生于西班牙的苏克罗城。斯考卢斯为自己辩护时，仅仅转向法庭和围观群众，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苏克罗的瓦里乌斯·塞维鲁声称，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收了敌国君主的贿赂，背叛了罗马人民。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否认这个指控。诸位相信谁？"最后，瓦里乌斯被冷嘲热讽地赶出了法庭，指控也被撤销了。[15]

即便是当上了执政官之后，竞争依然没有结束。一位执政官日后的地位取决于与其他执政官相比，他在任期内的表现如何。率军在战场上打败共和国的敌人是一项伟大成就，尤其是班师回国时被授予举行凯旋

式的荣誉，以此作为对其功绩的肯定。在凯旋式上，胜利者乘坐战车穿过城市中心，凯旋队伍还包括战俘、战利品和其他象征胜利的标志物，以及身穿最精美甲胄的士兵们。得胜将军会穿戴上罗马最重要神祇“至善至伟朱庇特”的宝器华服，甚至会把脸涂成红色，以模仿古老的朱庇特赤陶塑像的颜色。他身后会有一名奴隶，将胜利者的桂冠举过将军的头顶，同时小声提醒他，他仍然只是个凡人而已。凯旋式是一项莫大的荣誉，将会永载史册，获得这项荣誉的命运宠儿的宅邸门廊上会悬挂或雕刻月桂花环，以资永久纪念。这样的成就具有极大价值，但人们也会将其与其他元老的胜利做比较，评头论足。如果希望自己的威望胜过前任将领，就必须打赢更大规模的战役、收获更多的战利品、击败更强大的或者更稀罕的敌人。大多数当选执政官的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赢得了这个职位，一年任期结束后还可以在元老院活跃数十年。他们能否在政治生活中继续维持崇高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威望；他们也许会有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就是竞争。元老们在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在努力赢得荣耀和影响力，并阻止同僚们赢得太多的荣耀和影响力。每年选举新的行政长官的制度，以及对任期的限制，使许多元老能够有机会在崇高的位置上为共和国效力，并防止任何一个人垄断荣耀和影响力。所有贵族都希望得到卓越的地位，但他们最害怕的局面始终是：有一个人会远远胜过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获得永久性的突出地位，以至于复辟君主制。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太多成功，那么其他人获得荣誉的机会就减少了。

尽管罗马共和国于公元前2世纪末崛起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但政治生活所有方面的焦点仍然在罗马城。只有在罗马城，元老院才可以会商，法庭才可以开庭，公民大会才可以召开会议来选举行政长官或通过立法。到公元前100年，罗马已经成为已知世界最大的城市，远远胜过最有实力与其竞争的对手，比如亚历山大港。到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城的人口可能已经达到100万，即便在公元前100年，其居民肯定也有约10万人，或许有50万人。我们没有证据，所以无法给出更精确的数

字，但这些概述至少可以给读者一个概念去了解罗马城的庞大。尽管人口极多，但在这个时代，交通运输尚不发达，主要依靠徒步或骑马，因此罗马城的地理范围并不及较为现代的城市。住房极其拥挤，尤其是贫民区。但在罗马城的中心，也是共和国的中心，屹立着开阔的广场。这里是商业场所，广场的宏伟建筑旁排列着时髦的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都是国家的珍宝；大型商行和粮食供应商的代表也常驻于此。这里也是法律和正义的场所，法庭在这里审理案件，律师们巧舌如簧地陈述各自的案情，陪审团做出裁决，全都在室外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凯旋大游行的路线——圣道[16]——横亘广场。最重要的是，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就是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开展的。行政长官，如保民官、市政官[17]和裁判官，在广场有固定的位置，在那里处理政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元老院开会的场所是广场边缘的一座建筑，要么是元老院议政厅，要么是某座大型神庙。元老院议政厅之外是演讲台（Rostra，字面意思是战船船首的冲角），它装饰着迦太基战争期间俘获的敌船船首，由此得名。行政长官和其他大人物常常在演讲台向非正式集会的罗马人民发表演讲，努力说服他们投票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法案，或者在选举中支持某位候选人。在一位合适的行政长官的命令下，罗马群众可以聚集起来，召开平民大会或部落会议，并通过立法。除了选举会议之外，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会或部落会议都在广场上举行。从很多方面看，广场都是罗马持续跳动的心脏。[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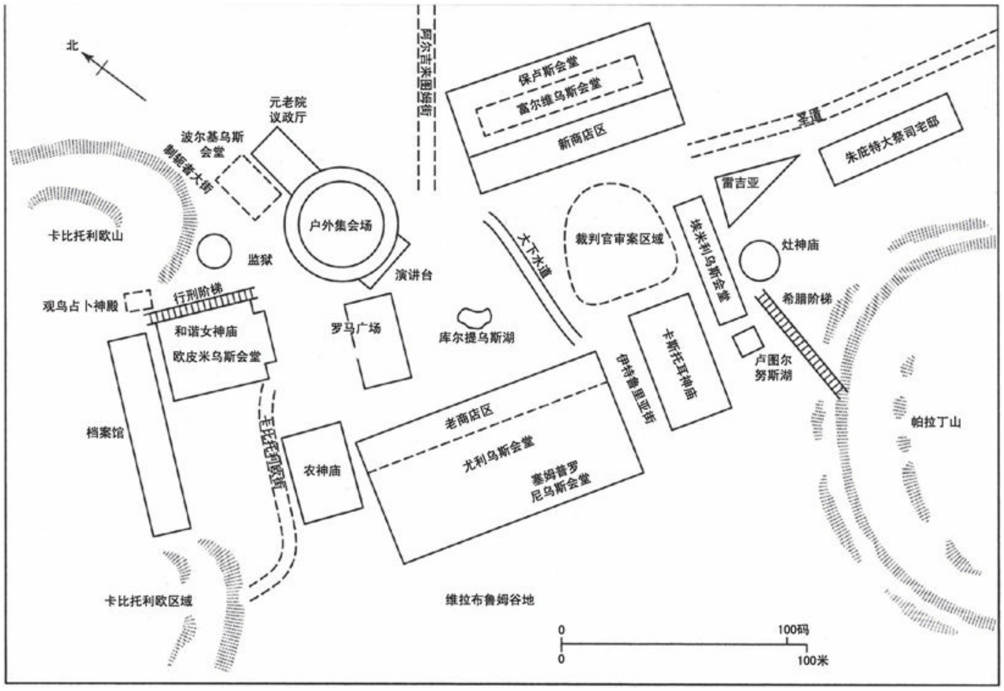


图**2** 罗马城：中心区域、广场等

帝国霸业的收益与代价

罗马共和国常常处于战争之中，在很长的时期内几乎每年都在打仗。在古典世界，战争司空见惯，人们往往只需要相信邻国比较脆弱，就是足够的开战理由。古典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艺术、文学和哲学都蓬勃发展）恰恰就是希腊各城邦厮杀不休的时期。但从很早开始，罗马的战争就独具特色，不仅因为它屡战屡胜，而且因为罗马特别擅长永久性地巩固自己的胜利，将败北的敌人转化为可靠的盟友。到公元前3世纪初，几乎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在这片领土之上，有些人群被授予了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些人群，再加上在被征服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19]，使罗马公民的人数迅速增长，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城邦的人口。意大利半岛的其他一些民族则被授予“拉丁人”的地位，享有虽比罗马公民少但仍然相当可观的特权，而剩余的人们则只是罗马的同盟者（socii）。从很早的时期开始，“罗马公民”和“拉丁人”的地位就不再与种族或语言族群有任何明确的联系，而主要是法律上的区分。

随着时光流逝，没有这些特权的社区也有希望提高自己的地位，逐渐从拉丁人提高到没有投票权的公民，最终成为拥有全部权益的罗马公民。每个社区都通过具体的条约与罗马联系起来，条约明确规定了其权利和义务。显而易见的是，在任何这样的协定中，罗马都是占据优势的一方，这种协定绝不是平等条约。各种形式的同盟者（包括拉丁人）最常见的义务就是在战时为罗马提供士兵和资源。任何一支罗马军队中至少有一半是同盟者士兵。通过这种方式，曾经被打败的敌人可以帮助罗马去赢得现今的战争。除了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对罗马的忠诚之外，同盟者群体还被允许分享战争产生的利润，虽然比例不大，但数量很可观。罗马战事频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为了提醒同盟者不要忘记他们的义务，共和国需要不停地打仗——因此就有很多为罗马效力和从战争中获利的机会。[20]

公元前264年，罗马人首次派遣军队到意大利境外作战，挑起了与迦太基人的长期冲突。迦太基人是腓尼基血统，因此罗马人称其为布匿人（源自“腓尼基”）。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年～前241年）为罗马赢得了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战事结束后不久又征服了撒丁岛。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年～前201年）的结果是，罗马在西班牙永久性地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干预马其顿事务。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战胜迦太基，公民和同盟者庞大的人力后备资源以及承受巨额损失的能力是主要因素。这些战争也使罗马人掌握了派遣远征军作战并为其提供后勤补给的技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重建的大规模海军使之成为可能。共和国变得惯于同时在多个差别极大的战区作战。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罗马击败了马其顿和塞琉古帝国。塞琉古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属于最强大的希腊化君主国之列，都是崛起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废墟之上。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消灭了迦太基和科林斯，这标志着罗马主宰了地中海世界的旧势力。罗马在马其顿和非洲建立了更多的行省，完成了对波河河谷的征服，巩固了自己在伊利里库姆的势力。该世纪末，罗马征服了外高卢（今天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建立了与西班牙诸行省之间的陆地联

系，正如伊利里库姆将意大利本土与马其顿连成一线。罗马人很快就修建了公路，以宏伟而极其实用的方式将各个行省连接起来。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罗马还征服了富裕的亚细亚行省[21]。此时，罗马与其海外行省之间的联系还远不及罗马与意大利各民族间联系的程度紧密，也没有向各省的本土居民大规模地授予拉丁人或罗马公民的身份。各省居民常常提供兵员，为罗马军队效力，但这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义务。各省最重要的义务是定期缴纳贡金或赋税。

海外扩张给许多罗马人带来了极大利益。贵族有了许多机会，在自己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通过战争赢得荣耀。讨伐西班牙、高卢、伊利里库姆与色雷斯各部族的战役开展得十分频繁。罗马与希腊化世界的国家之间虽然交战比较少，但每次交战规模却更大。战事如此频繁，元老们之间的竞争焦点就是看谁能够赢得更大规模的胜利，或者打赢更危险的战争。首次击败某民族的荣耀也同样受到珍视。除了光荣之外，战争还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并可将战俘变卖为奴，这都会带来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中有一部分被交至共和国国库，部分被赏赐给士兵们，但更大的份额被高官纳入囊中，指挥官们获益最多。在地中海东部赢得胜利的油水尤其丰厚。在公元前2世纪，连续多位将领从地中海东部的战争中胜利归来，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奢华而宏伟的凯旋式。就在这个时期，得胜将军们利用部分战利品来建造雄伟豪华的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以永久性地纪念自己的成就，于是罗马城被重建得更加恢宏富丽。争夺名望和影响力的竞争仍然主宰着政治生活，但这种竞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因为有些人打了胜仗，带回了巨大的财富，所以攀比就越来越厉害。那些未能在利润最丰厚的战役中获得军事指挥权的家族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无力维持从政的巨大开销。元老阶层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导致有能力竞选最高行政长官职位和军事统帅地位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在帝国霸业的创建过程中渔利的不仅是元老们，一般来讲，在这种新环境里，富人最游刃有余。共和国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来管

理各省，因此行省总督们手下只有一小群官吏，于是他们用自己的亲信来填补空缺。所以，大部分日常事务都被托付给地方社区，其中很大一部分则由富裕罗马人控制下的私人企业来执行。这些企业主一般属于骑士阶层，因为法律禁止元老承揽这种生意。（法律做出这样的禁令，是为了防止商业利益影响元老们在元老院中的意见表达。但很多元老依然会秘密投资企业，这些企业由骑士们公开经营。）由骑士们管理的企业会竞标购买在某地区征税的权力、出售战俘或其他战利品的资格，以及承揽大宗合同，为军队提供粮食和装备。他们执行共和国的任务，被称为包税人（就是詹姆斯一世钦定本《圣经》中所谓的“税吏”），但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营利，而不是为公众服务。一旦一家企业与国库签订合同，同意向国库缴纳一定费用以换取在某地区或某省征税的权力之后，肯定会向民众征收比额定税款更多的金钱，这样才能赢利。企业的各级工作人员一般都会谋取私利，因此最后老百姓缴纳的赋税就会不可避免地高于国库收到的数额。但总的来讲，共和国对这种安排很满意，如果行省居民怨声载道、揭竿而起，大不了用武力镇压。除了包税人之外，其他许多罗马人及其代理人在各省的生意中也是高度活跃。仅仅罗马人的身份——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会被其他民族视为罗马人——就能给商人带来相当大的好处，因为他们与帝国的力量有着联系。影响力比较大的人——往往是最富裕的人或其代表——常常能够直接从行省总督那里获得帮助。在古代史料中，关于商人活动的记载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但我们绝不能低估商人的数量，或者他们经营活动的规模。这些商人从罗马的帝国主义扩张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尽管他们绝不可能对指导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进程产生影响。[22]

长久以来，罗马男性公民从军的比例非常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实施普遍兵役制之前，在所有规模相当的国家中，只有罗马能够长时期地对如此雄厚的人力进行军事动员。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以前，似乎很少有人拒绝服兵役，绝大多数男子都乐意从军。尽管罗马军团的纪律极其严格残暴，服兵役仍然是件非常吸引人的事情，因为获取战利品和赢得

荣耀的机会非常多。而且罗马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强烈，高度重视服兵役，因为这表现了他们对共和国的忠诚。军队的兵员来自有产阶级，因为每一位士兵都要自备武器装备，非常富裕的人可以当骑兵，大多数人当重步兵，穷人和年纪较小的士兵则担任轻步兵。罗马军团的核心成员是自耕农，因为土地仍然是最普遍的财产形式。兵役一直持续到军团解散，这往往是在一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在共和国早期，兵役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周，顶多是几个月，因为敌人往往近在咫尺，战斗规模小、时间短。最理想的状况是自耕农军人们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然后回家收割庄稼。随着罗马的扩张，战争离家门口越来越远，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在布匿战争期间，数万名罗马人在远方征战，一连好几年都不能回家。有些海外行省需要长期驻军，因此不幸被分配到西班牙等地的士兵们往往要连续服役五年或十年。更糟糕的是，为了获取更多兵员，征兵的最低财产标准被降低了，许多原本就靠近贫困线的人被征募进了军队。长期兵役使得许多小农破产，他们丧失了土地，意味着将来他们就没有足够的财产，进而没有资格进入罗马军团。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开始，政府开始担忧，有资格参军的公民数量在直线下降，已经岌岌可危。

在许多小农遇到困难的同时，其他因素也在改变着意大利农业。征服的利润给很多元老和骑士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这些人将财产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在大庄园上，往往会将之前许多农户的土地兼并。这样的大庄园总是由奴隶劳工耕种，因为频繁的战争使奴隶既多又便宜。大庄园的规模、庄园里奴隶的数量、主人别墅的奢华程度，这些都是富人们展示自己神话般财富的新方式。从更务实的角度看，大庄园可以专注于商业化耕作，这能赢得稳定而低风险的利润。从很多方面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持续的战争让越来越多的公民远离自己的土地，使他们及其家人陷入赤贫；同时，战争使社会精英阶层更加富有，为其提供财力来修建更多的大庄园。考古学上很难量化这一时期意大利农业模式的变化，至少在有些地区，小农经济似乎能够维持下去。但无论如何，在广

大地区，农业模式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罗马人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问题。[23]

政治与流血

公元前133年，当年任职的十位平民保民官[24]之一——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旨在解决这个问题。保民官与其他行政长官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职权仅限于罗马城之内。最初，之所以设立保民官，是为了给平民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防止高级行政长官滥用职权；但到这个时期，保民官实质上已经只是政坛攀升的阶梯之一。提比略三十出头，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曾担任监察官和两届执政官，可谓前程似锦。在担任保民官期间，他将注意力投向所谓的“公共土地”，即几个世纪以来从意大利敌人那里没收的土地。在法律和理论上，公共土地应该被分割为许多块小地产，分配给许多公民，但实际上大片公共土地被富人的大庄园吞并了。提比略提出了一项法案，确认每位公民能够合法占有的公共土地份额，然后将剩余土地分给贫困公民，将这些人提升到有资格服兵役的有产阶级。有些元老支持提比略，但很多元老以及大量有影响力的骑士，不愿意失去自己原先非法占有的公共土地。提比略的这项法案没能在元老院获得通过，于是他违背了传统，将法案直接呈送到公民大会。另外一名保民官行使了自己的否决权，试图阻止公民大会的议程。提比略组织了投票，将这位同僚罢免了。提比略的手段是否合法很难说，因为在理论上人民可以为任何事情立法，但他的举动触及了共和国体制的心脏，他挑战了传统观念——同一级别的所有行政长官是平等的。

有些元老或许同情提比略立法的目标，但现在开始担心，这位保民官的雄心或许是建立个人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大公无私的改革，因为提比略一旦成功地改善如此之多的公民的境况，必然能够赢得极大的威望。贵族们越来越害怕，提比略或许并不满足于自己这样的名门贵胄生

来就注定享有的辉煌事业，他还有更多的期许。提比略还指定自己、自己的岳父和弟弟盖乌斯为重新分配土地的监督专员，这让贵族们更加恼怒，因为他们三人会从中获得极大的势力。有人开始指控他企图夺取君主式的永久权力。令局势失控的最后一步棋是，提比略声称他需要保证自己的法律不会很快就被撤销，于是参加了公元前132年的保民官竞选。他能否成功当选是很难说的，因为许多从他的改革中受惠的公民已经到远离罗马的农庄定居，未必能赶来投票。但是，主持元老院的执政官拒绝针对提比略采取行动，导致群情激奋。一群怒气冲冲的元老在提比略的表兄西庇阿·纳西卡率领下冲出了元老院会议，对提比略及其许多支持者施以私刑。提比略被人用椅子腿打碎了脑袋。他和许多支持者的尸体被扔进了台伯河。

这是首次以普遍和致命的暴力流血而告终的政治争端，整个罗马呆若木鸡（共和国早期有些故事流传下来，讲到威胁国家的煽动者被施以私刑，但这些早就被罗马人当作古代史，并不当真）。此次暴乱之后，提比略的大部分立法仍然有效，尽管他的一些支持者遭到了攻击。暴乱发生的时候，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正在西班牙服兵役。他最终返回罗马后，被允许继续从政。此时盖乌斯只有二十岁出头，他为提比略的命运感到愤怒，但直到公元前123年，他当选保民官的时候，才开始了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而他的改革比其兄长的更为激进，涉及范围也更广。这部分是由于他的时间更充裕。他在公元前122年连任保民官，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障碍。他的许多改革旨在让更广泛的人民分享到开疆拓土的战利品。盖乌斯确认了兄长的立法，并继续努力让更多公民成为有产阶级，具体措施是在迦太基原址上建立一个殖民地。他还建立了一个法庭（勒索财产追回法庭）来审理那些在担任行省总督时行为不检的元老，并组建由骑士组成的陪审团，借此赢得了许多骑士的支持。在此之前，只有元老才能审判元老。盖乌斯的其他一些政策，如为更多的拉丁人和意大利人授予公民权，就不是很得民心，他连任第三届保民官的努力也失败了。从一开始，盖乌斯及其反对派就比十年前的提比略更胆大妄

为，肆无忌惮地使用恐吓与威胁的手段。一次斗殴导致执政官欧皮米乌斯的一名仆役丧生，于是局势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元老院通过了一道法令——学者们称其为“元老院终极议决”[25]，即最后通牒法令，这个术语源自恺撒曾使用的说法，但在当时并没有这个名字——呼吁执政官以任何必要手段保卫共和国。正常的法律被暂时搁置，斗争双方的党徒都拿起了武器。欧皮米乌斯在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外，还调来了一群克里特雇佣兵弓箭手，这些雇佣兵之前在罗马城外等候，说明欧皮米乌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预谋的。盖乌斯及其支持者的人数不敌对方，他们占据了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但执政官拒绝谈判，率军杀入了神庙。盖乌斯在厮杀中丧生。欧皮米乌斯之前曾许诺，谁将盖乌斯的首级送来，就赏赐与首级同等重量的黄金。果然，盖乌斯的首级被送到了他面前。[26]

格拉古兄弟究竟是真心实意的改革家，致力于解决他们眼中共和国遇到的问题，还是狼子野心之徒，唯一目的是哗众取宠，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们的动机两方面兼而有之，我们很难相信一位罗马元老会认识不到，如此影响深远的立法会给他个人带来极大的好处。不管他们的个人动机如何，他们都凸显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许多贫穷公民的困境，以及那些被排除在权利之外的人（不管是骑士还是意大利的民众）渴望拥有更多权利的诉求。格拉古兄弟事件对罗马政治并没有即刻产生影响——绝大多数保民官仍然继续由选举产生，每次只任职一届，政治暴力仍然很罕见——但对后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高度依赖前例的体制中，许多根本原则被粉碎了。格拉古兄弟的事迹表明，如果以新的方式向一些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就可能赢得极大的影响力，不管这影响力是多么转瞬即逝，多么摇摇欲坠。将来出现一个有足够威望的人来效仿格拉古兄弟，只是个时间问题。更糟糕的是，对于格拉古兄弟事件中凸显出来的那些社会问题，元老院反应迟钝，而且倾向于哪怕什么也不做，也不肯让任何人来解决问题，进而赢得威望。更何况，在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行政长官们普遍昏庸无

能、贪污腐败。

北非的努米底亚王国是罗马的盟邦，争夺该国王位的斗争引发了一连串丑闻。王位竞争者朱古达向罗马元老们大肆行贿，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在锡尔塔城，数千名罗马和意大利商人惨遭屠杀，在罗马引发了莫大民愤。于是共和国不得不派遣一支军队去讨伐朱古达，但作战非常不力，指挥层稀里糊涂，导致这支军队于公元前110年惨败，向敌人举手投降。随后，共和国派遣了一位较有才干的执政官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整个事件严重损害了元老院精英的公信力，广大群众对其领导能力颇感怀疑。盖乌斯·马略利用这种局面，于公元前107年竞选执政官，将自己——坚韧不拔且久经沙场的老将，通过个人才干取得成功——与那些依赖祖先的光荣而非个人能力的豪门子弟做了对比。马略轻松赢得选举，并通过一位保民官的帮助——此人在公民大会中通过了一项法律，否决了元老院对各省的分配——获得了在努米底亚的指挥权。元老院又给他使绊子，不准他征募新的军团去非洲作战，而只允许他带志愿兵前往。马略战胜元老院的办法是从最穷的阶层中征募志愿兵，这些人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资格服兵役的。这是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罗马军队原先是一支公民军队，兵员来自有产阶级，如今却慢慢转变为一支主要由穷人组成的专业化军队。这个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影响极其深远，对共和国的灭亡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7]

公元前105年末，马略最终打赢了努米底亚战争，但此时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已经对意大利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罗马人与这些部落的早期接触中，同样出现了许多丑闻，罗马的行政长官们（其中许多人来自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显得笨拙无能。罗马人普遍感到，只有马略值得信赖，能够打败这些蛮族。不仅穷人这么想，比较富裕的群众也这么想，因为主宰百人会议投票的就是这些富人。于是，马略史无前例地连任多届执政官，这比盖乌斯·格拉古连任保民官更严重地违背了先例。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支持马略，希望利用他的成功为自己谋利。公元前

103年，萨图尔尼努斯担任保民官，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北非的一些土地授予努米底亚战争时期马略的一些老兵。恺撒的父亲就是被指派监督此项法案实施的专员之一，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督导了萨图尔尼努斯于公元前100年通过的另一项类似法案的实施。从最贫穷阶层征兵意味着这些人退役和返回平民生活之后，仍然没有谋生手段。萨图尔尼努斯公元前100年立法的部分目标就是为攻打辛布里人的退伍老兵们提供生计。萨图尔尼努斯在保民官任期内的举措与格拉古兄弟很相似，他采取非常亲民的分配土地（尤其是外省的土地）措施，并恢复了一种不管市场情况、以固定价格向所有公民提供小麦的政策。这种供粮措施是盖乌斯·格拉古引入的，但在他死后就被摒弃了。然而，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从一开始就没有格拉古兄弟那样的好名声，也更趋向于动用暴力。最后，他们做得太过分，失去了马略的支持。就像欧皮米乌斯在公元前122年镇压格拉古兄弟一样，马略遵照元老院的终极议决，领导了对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的镇压。恺撒降生的这个共和国对自身的一些问题处理得很不得当。

---

[1] Velleius Paterculus，*History of Rome* 2.1.1 ［Loeb translation by F.Shipley（1924），pp.47-49］.

[2] Suetonius，*Caesar* 77.

[3] 伊利里库姆，或称伊利里亚，是公元前167年～公元10年罗马的一个行省，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大约包括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公元10年，伊利里亚行省被分割为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行省，但伊利里库姆/伊利里亚作为地区名仍然被广泛使用。该地区的人民以孔武有力著称，是罗马帝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地之一。多位皇帝，包括君士坦丁大帝，出生于伊利里库姆。

[4] 关于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共和国的描述与分析，见Polybius，6.11.1-18.8，43.1-57.9，另见F.Walbank，*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1（1970），pp.663-746.A.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对这个主题做了详细讨论。

[5] 努米底亚（前202年～前46年）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柏柏尔人王国，如今这一国家已经消亡。其领土大约相当于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北以及突尼斯的一部分（皆位于北非）。当时以出产精锐骑兵闻名。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就是凭借努米底亚骑兵赢得了早期多场战争的胜利，后

来也因努米底亚骑兵投向罗马而战败。其后，努米底亚先后成为罗马的行省之一和附庸国。努米底亚领土西端与罗马帝国的另一行省毛里塔尼亚（即现今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接壤，东端则与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迦太基故地，即现今的突尼斯）接壤，北临地中海，南接撒哈拉沙漠。

[6] 对于这些战役的描述，见A.Goldsworthy，*In the Name of Rome* （2003），pp.126-136。

[7] 广场是古罗马的城市中心，呈长方形，周围是罗马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一些建筑。它既是罗马公共生活的中心——凯旋游行、选举、公共演讲、罪案审判、角斗士竞技的场所——也是商业中心。广场及周边有纪念伟人的雕像和纪念碑。

[8] 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是罗马城七座山丘中最高的一座，在广场附近，是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美国国会大厦所在的“国会山”（Capitol Hill）就得名自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

[9] 关于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见Appian，*BC* 1.28-33，Plutarch，*Marius* 28-30。

[10] Suetonius，*Caesar* 77.

[11] 罗马共和国的行政长官（magistrates）经选举选出，可分成正规长官（Magistratus ordinarii）与特殊长官（Magistrarus extraordinarii）两类，执掌政治、军事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宗教权力。
正规长官按照级别从低到高包括：财务官（Quaestor）、市政官（Aedile）、裁判官（Praetor）、执政官（Consul）、监察官（Censor）等。正规长官每年由选举产生（监察官除外），任期一年。每个级别通常分别选出至少两位正规长官，以防范一人权力过大。
特殊长官包括独裁官（Dictator）、骑兵统帅（Magister Equitum）等。
有元老身份的人可以通过所谓的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字面意思为“荣耀之路”），在服完兵役后，依次参选和担任官职。不同的职位对候选人均有最低年龄的限制。官员在各职位间晋升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法律禁止连续担任同一职位。当然，这些规定并不总是得到遵守。在规定的最低年龄（拉丁文：in suo anno；英文：in his year）担任某项职务会被视为政治上很大的成就。
严格来讲，平民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lebs）在技术上并不属于行政长官，将在下文介绍。

[12] 每一个罗马公民都属于一个部落。共有4个城市部落和31个乡村部落。

[13] 因为骑士阶层的界定是根据财产数量，所以骑士阶层既包含贵族，也包括平民。罗马的贵族和平民只是祖先血统的区分，贵族可能很穷，平民可能很富。

[14] 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或简称元首（princeps），又译“第一公民”，是罗马元老院的领导人。虽然该职务不属于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的范围，并且不拥有统治大权，但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威望。首席元老原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荣誉职衔，后来在屋大维所创建的元首制度中，该职衔即是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

[15] Valerius Maximus 3.7.8.

[16] 圣道（Via Sacra）是古罗马的主街道，从卡比托利欧山山顶，经过罗马广场的一些最重要的宗教遗迹（这里是最宽的一段），到达斗兽场。这条路是传统的凯旋式路线，开始于罗马郊区，经过罗马广场。

[17] 市政官（Aedile）是罗马共和国的一个官职，负责公共建筑的维护与公共节日的设定。他们有权去强化公共秩序。一半的市政官来自平民阶级，另一半来自贵族。市政官不是晋升体系中必经的级别，仅仅是一个有利的出发点。

[18] 关于人口及准确计算人口的困难，见N.Purcell，‘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Plebs Urbana* in the Late Republic’，in *CAH2* IX，pp.644-688，esp.648-656，and also K.Hopkins，*Conquerors and Slaves* （1978），pp.96-98.关于广场作为罗马公共生活场地的重要性，见F.Millar，*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 （1998），esp.pp.13-48。

[19] 古典时代的殖民地大多是与母邦（metropolis，英语中“大都市”一词即来源于此）领土不相接的海外殖民城邦。殖民城市与母邦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但与近代的殖民主义不同的是，这种联系并不以母邦直接控制殖民城市的形式存在。母邦与殖民地也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20] 对罗马帝国主义的最有影响的讨论包括E.Badian，*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1968），W.Harris，*War and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327-70 BC* （1979），and Hopkins （1978），esp.1-98。

[21] 亚细亚行省在今天土耳其的西部沿海地区。今日“亚洲”的名称即是从该省的名称而来。

[22] See E.Badian，*Publicans and Sinners* （1972）.

[23] See in particular Hopkins （1978），*passim* .

[24] 平民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lebs）是一个仅由平民可以担任的官职，任期一年，每年十人。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平民保民官是对元老院和行政长官的最重要的约束力量。平民保民官有权召开和主持平民大会、召开元老院会议、提议立法、干预法律事务以保护平民利益。他们最重要的权力是否决元老院、各种公民大会和行政长官（包括执政官）的行动。平民保民官事实上独立于行政长官，任何人都不可以否决平民保民官的行动。只有独裁官不受平民保民官的否决的影响。

平民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伤害他们的人都会被剥夺法律保护，人人皆可诛之。不过，平民保民官必须亲自在场，才能行使否决权。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一般也只在罗马城及近郊范围内有效。

[25] 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戒严”和“紧急状态”。

[26] 关于格拉古兄弟的政治生涯，见D.Stockton，*The Gracchi* （1979）。这方面的主要史料是Plutarch，*Tiberius Gracchus* and *Caius Gracchus* ，and Appian，*BC* 1.8-27；关于盖乌斯·格拉古首级的故事，见Plutarch，*Caius Gracchus* 17。

[27] 马略生平的详细介绍，见R.Evans，*Gaius Marius*：*A Political Biography* （1994）。

二 恺撒的童年

他出身最高贵的尤利乌斯氏族，祖先血统可上溯到安喀塞斯和维纳斯——所有研究古代史的人都认可这种说法——他的外貌远远胜过其他所有公民。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公元1世纪初 [1]

这个恺撒身上有许多个马略。

——苏拉 [2]

按照现代的历法计算，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日期是确定无误的，年份则有一些疑问，因为苏埃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写的恺撒传记的开头部分都遗失了。有几位学者将他的出生年份定为公元前102年或前101年，但他们的论据不是很有说服力，普遍的意见仍然是公元前100年。根据罗马历法，恺撒出生于盖乌斯·马略和卢基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也就是“建城纪年”第654年，日期是罗马历5月的“月中日”之前的第三天。在罗马历中，每年是从3月开始的。后来在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他出生的这个月被更名为“尤利乌斯”（Julius）以示纪念，也就是现代的7月（July）。“月中日”是这个月的第15天，但是罗马人从某个日期往前或往后推算的时候，会把这一天也算在内，所以恺撒的出生日应该是13日。

在罗马，一个人的名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他的社会地位。恺撒拥有罗马公民所特有的完整的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个人名，其功能与现代的名差不多，用来区分一个家族内部具体的成员，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使用。大多数家族的一代代男性成员往往使用同一个名字。恺撒的父亲和祖父都叫盖乌斯，尤利乌斯家族许多代的长子可能都叫作盖乌斯。第二个名字是最重要的氏族名，因为它是这个人所属的“氏族”（由

许多血缘相近的家族组成的集团）的称呼。第三个名字是家族名，说明这个人属于氏族的哪一个具体分支，但即便是许多贵族家庭也没有第三个名字。恺撒的主要对手格奈乌斯·庞培和他的副将马克·安东尼的家族都没有第三名。有些人会得到一个额外的、半正式的绰号，而且罗马人幽默感极强，所以这种绰号一般用来取笑其主人的外貌。庞培的父亲被称为“斯特拉波”，意思是“斜眼”；恺撒的一个远房亲戚叫作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恺撒始终没有得到一个额外的绰号。他是个男孩，所以得到了完整的三个名字，但假如他是个女孩，就只会有一个名字，即氏族名的阴性形式。恺撒的姑姑、姐妹们和女儿都被简单地称为“尤利娅”，尤利乌斯氏族的所有女性成员都叫这个名字。如果一个家庭有不止一个女儿，那么正式的场合里就在名字后加上数字，以示区分。男女名字的差异很能说明罗马世界的特点。只有男性可以参与政治，而在竞争激烈的政界，人们需要准确地知道谁是谁。女性没有政治角色可以扮演，因此不需要这样具体的标识。[3]

尤利乌斯氏族是贵族，而且是罗马最古老的贵族阶层的成员。在共和国早期，贵族曾垄断权力，统治着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平民。在共和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尤利乌斯氏族有大约十几位成员曾当选为高级行政长官，但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与更成功的贵族氏族（如费边氏族、曼利乌斯氏族）相比，尤利乌斯氏族似乎没能有效地记载和宣扬自己祖先的丰功伟绩。好几个贵族世家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贵族对权力的垄断逐渐消失了，因为平民不断要求获得更多的权力，富裕的平民家族也挤进了统治集团。从公元前342年起，每一年的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一人是平民。到公元前2世纪末，元老院精英集团中最有影响的名门世家大部分是平民出身。有一些荣誉仍然只有贵族才能享有，而贵族不可以担任平民保民官，但总的来讲，贵族和平民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家族即使拥有贵族身份，也未必一定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因为不存在建立新的贵族家族的程序，所以许多世纪以来，一些贵族家族由于绝后或者被人遗忘，逐渐消失了。尤利乌斯氏族生存了下来，但在

政坛并没有什么突出地位。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曾有个叫尤利乌斯·恺撒的人当选为裁判官，他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拥有“恺撒”这个家族名的人。多年之后有个作家声称，这个人之所以采用了“恺撒”这个家族名，是因为他在战斗中杀死了敌人的一头战象，而“恺撒”在布匿语中就是大象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恺撒”意为“多毛”，因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以头发浓密而著称。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的。不过，似乎的确是在这个时期，尤利乌斯氏族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家族，但都叫“尤利乌斯·恺撒”，在普查中登记于不同的部落里。公元前157年，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当选执政官，他是公元前2世纪恺撒家族中唯一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人。他不是本书主人公的祖先，而是来自另一个略微更成功一些的恺撒家族。在公元前1世纪初，尤利乌斯·恺撒家族的一些成员开始在选举中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公元前91年，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担任执政官；前90年，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也当选执政官，他的弟弟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在同一年担任市政官。市政官是级别较低的行政长官，职责包括主持公共节日和娱乐活动。卢基乌斯和盖乌斯都来自家族的另一个分支，是本书主人公父亲的远房亲戚。斯特拉波是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享有盛誉。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有点神秘，我们不知道他来自家族的哪一个分支。他甚至有可能是本书主人公的叔伯，即他父亲盖乌斯的哥哥或弟弟，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塞克斯图斯也有可能是盖乌斯的堂兄弟。[4]

尽管尤利乌斯氏族对共和国历史的影响没有其他氏族那么大，但大家公认，他们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罗马的第三代国王图卢斯·霍斯提里乌斯攻占并摧毁邻近的城市阿尔巴朗格之后，尤利乌斯氏族就在罗马定居了。但他们与罗马早期历史的联系甚至更久远，因为他们自称得名自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特洛伊陷落后，埃涅阿斯率领一群特洛伊流亡者到意大利定居。而埃涅阿斯是凡人安喀塞斯与女神维纳斯之子，所以尤利乌斯氏族的祖先是神祇。这时，这些早期神话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变成奥古斯都时代的那种形式。在奥古斯都

时代，诗人维吉尔和历史学家李维会比较详细地讲述这些故事。即便是李维也承认关于埃涅阿斯及其后嗣的故事，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他不确定究竟是尤卢斯还是埃涅阿斯的另一个儿子建立了阿尔巴朗格，并成为其开国君主；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母亲雷娅·西尔维亚就出自这个王朝。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应该很少有罗马人知道尤利乌斯氏族和罗慕路斯之间可能有联系。而尤利乌斯氏族自称为维纳斯的后代是妇孺皆知的，应该不是近期才捏造出来的。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公元前69年，恺撒在自己姑姑的葬礼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 我姑姑尤利娅的家族，母系祖先是国王，父系祖先是不朽的神祇。因为她母亲的氏族——马尔基乌斯·雷克斯氏族——是安库斯·马尔基乌斯[5]的后裔；我们家族属于尤利乌斯氏族，可以上溯到维纳斯。因此，我们的血统既有国王的神圣（他们在凡人中行使极大的权力），也与对神祇的尊崇相联系；即便是国王，也在神祇的统治之下。[6]

恺撒显然认为他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表达，不会感到意外。有学者指出，雷克斯（Rex，意思是“国王”）这个名字可能源自共和国早期宗教仪式中的一个角色，而并非与君主制有关。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这是正确的，但在公元前1世纪，国王和祭司之间的区别也不是那么明确。

对于恺撒的祖父（也叫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可能曾担任裁判官。他的妻子马尔基娅是昆图斯·马尔基乌斯·雷克斯的女儿，后者曾在公元前144年担任裁判官。他们至少有两个孩子：恺撒的父亲盖乌斯和恺撒的姑姑尤利娅（后来嫁给了盖乌斯·马略）。上文已经讲到，盖乌斯和马尔基娅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塞克斯图斯，他于公元前91年登上了执政官的高峰。恺撒的父亲盖乌斯在政坛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儿子出生前不久或之后不久担任了财务官[7]。他的妻子也就是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出身于非常成功的平民望族。奥雷利娅的父亲和祖父分别在公元前119年和前144年担任执政官，她的三个堂兄弟[8]盖乌斯、马尔库斯和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后来都获得了这

项荣誉。与奥雷利乌斯家族的联姻，很可能在盖乌斯·恺撒的仕途上给了他不少帮助。对他提携更大的是妹妹与马略的婚姻。前文已经讲到，前103年或前100年在萨图尔尼努斯对北非开启殖民运动以安置马略老兵的时候，盖乌斯就是负责监管此计划的十名专员之一。后来，盖乌斯晋升为裁判官，但具体是在哪一年，众说纷纭，从公元前92年至前85年不一，因此无法确定。在担任行政长官之后，他在亚细亚待了一段时间，担任行省总督，所以我们估计他担任裁判官的年份极有可能是公元前91年前后。盖乌斯在公元前84年英年早逝，所以我们不知道如果他活得更久，他那些显赫的亲戚们能不能帮他当上执政官。如果他的确是在公元前92年担任裁判官，那么他一定满足了竞选执政官的最低年龄要求。如果塞克斯图斯·恺撒的确是他的兄弟，那么塞克斯图斯于公元前91年的成功当选一定鼓舞了盖乌斯。但是，即便盖乌斯曾经参选执政官，也一定失败了。我们对恺撒家族的了解非常之少，而且证据都含糊不清，所以我们很难确定任何东西。因而只能泛泛地总结说，他父亲的仕途尽管不是非常辉煌，但还算成功。盖乌斯自己及其家人对他的成就是否满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盖乌斯和奥雷利娅有三个孩子：恺撒和两个姐姐（都叫尤利娅）。盖乌斯和奥雷利娅很可能还有别的孩子，但都早早夭折了，因为罗马（以至整个古典世界）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即便贵族家庭也是如此。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据说生了十二个孩子，其中只有三个——提比略、盖乌斯和他们的姐姐塞姆普罗尼娅长大成人。这种情况或许很特殊，但元老家庭有两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算是正常情况了。当然也有例外。梅特卢斯家族是平民望族，非常富裕且颇具影响，似乎特别丰饶多产，因此他们家族在共和国历史的最后一百年中占据了许多高级行政长官的职位。[9]

幼年时代和教育状况

对于恺撒的幼年，我们也知之甚少。但我们对当时罗马贵族的生活有一定了解，可以从中做一些推断。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在绝大多数社会里，婴儿都是在自己家中出生的。对元老家庭来说，婴儿诞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按照传统，必须有见证人。在孕妇快要分娩的时候，家人会通知亲属和政治盟友，他们通常会赶到家里来。传统上，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证明这个孩子的确是贵族家庭的一员，这种传统元素还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了下来。产妇由接生婆或许还有一些女性亲属陪伴。孩子的父亲和客人们当然都不会进入产妇分娩的房间。有些情况下会有一名男性医生到场，他是唯一一个和产妇待在同一房间的男性。虽然后来剖腹产（caesarean section）的医学术语用的是“恺撒”（Caesar）这个名字，但没有古代文献能证明恺撒是剖腹产出生的，尽管古典世界已经有了剖腹产术。事实上，恺撒基本上不可能是剖腹产出生的（一部晚近得多的史料称，恺撒的一位祖先是剖腹产出生的），因为这种手术在当时往往会造成产妇死亡，而奥雷利娅后来还活了几十年。事实上，没有任何史料能说明恺撒不是顺产出生的，因为臀位分娩或者其他分娩困难会被视为凶兆，并被记录在案；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尼禄皇帝。婴儿出生后，接生婆会将孩子平放在地上，检查是否有畸形或缺陷，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评估孩子生存下去的概率。在这之后，孩子的父母才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孩子并将其抚养成人。在法律上，这个决定由父亲做出，但要说母亲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是极不可能的，尤其是像奥雷利娅这样个性强悍的人。[10]

婴儿得到接纳之后，父母会在家中祭坛上点起火来。许多客人在返回自己家中后会举行同样的仪式。罗马人高度重视生日，一生中都会加以庆祝。男孩诞生之后的第九天，全家会举行正式的净化仪式。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如果是女孩，同样的仪式则在其出生后的第八天举行。净化的目的是保护婴儿免受出生时可能进入其身躯的恶灵或污染的侵害。净化的前夜，全家守夜，执行一系列仪式；次日施行献祭，观察飞鸟行迹，以预测孩子的未来。男婴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护身符，通常是黄金制

成的。护身符被放在一个小皮囊中，系在男孩的脖子上。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家长为孩子取名，随后将名字正式登记入册。每一个罗马人，尤其是贵族，终其一生，每一个阶段都被仪式和宗教围绕。[11]

一般来讲，在孩子成长的早期岁月中，母亲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奥雷利娅不大可能亲自哺乳，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老加图的妻子亲自为孩子哺乳，就被看作不寻常的事情。这个故事以及其他一些故事告诉我们，贵族妇女一般不会亲自哺乳。[12]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贵族家庭——哪怕是恺撒家这样并不算是很富裕的家庭——会在豢养的大量奴隶中寻找一位乳母。母亲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选择乳母和其他奴隶来照顾婴儿，母亲会仔细监督这些奴隶，自己也会做许多工作。还有一个故事赞颂了加图对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的重视：他的妻子李锡尼娅给孩子洗澡的时候，他总是会在场。这个故事暗示了在这种场合中，母亲是一定会在场的。孩子主要是由奴隶照料，但母亲并非不管不问，实际上其权威是相当大的。在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写作的塔西佗曾讨论母亲在抚养儿女过程中的作用，还把奥雷利娅视为典范：

> 在美好的往昔，所有人的儿子，只要是合法婚生的，都不是在雇佣乳娘的房间里长大，而是在母亲怀中和膝下成长。而母亲能够得到的最高颂扬就是：持家有方，全身心贡献给孩子……在这样一位母亲面前，任何人胆敢口出恶言或者胡作非为，都是极大的冒犯。她不仅要严格遵守宗教要求，勤勤恳恳地照料年幼的儿女，还要管理他们的娱乐和游戏。我们得知，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和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就是以这种精神培养自己的儿子的：这几位母亲就是这样养育了她们君王一般尊贵的孩子。[13]

奥雷利娅对儿子的影响力显然非常大，在他成年之后依然如此。奥雷利娅去世时，恺撒四十六岁，此时奥雷利娅已经寡居了三十年，这在贵族阶层不算稀奇，因为丈夫一般比妻子年长许多，尤其是在元老们为了政治原因缔结的第二段、第三段或第四段婚姻中。假如妻子在分娩的危险中存活下来，那么她很有可能活得比丈夫长久。因此一位元老在开始担任要职时，他的母亲一般都还在世，而父亲很可能已经不在了。母

亲，尤其是奥雷利娅那样符合理想母亲形象的贤妻良母，非常得到罗马人的推崇。罗马人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是伟大的将领科利奥兰纳斯受到政敌的迫害，叛逃到敌人那边，率领他们攻打罗马。在即将摧毁罗马的时候，他却撤军了，不是因为受到爱国心的感召，而是因为他母亲的呼吁。[14]

贵族子弟的教育是在家中进行的。许多罗马人对此引以为豪，并将其与很多希腊城邦中由国家强制规定的教育做对比。在罗马，中等收入家庭一般会把孩子送到收费的小学，孩子大约七岁入学。贵族则在家中受教育。至少是在最初阶段，男女学童一同接受教育，学习阅读、书写及基本的计算和数学。在恺撒的时代，元老的孩子绝大多数都从小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希腊语入门教师一般是一名希腊奴隶，他负责照管孩子。孩子还会学习许多宗教仪式、家族传统和罗马历史。罗马历史的课程当然要强调学童的祖先的功业。历史课宣扬这些祖先和其他伟人的事迹，教导孩子们做一个罗马人意味着什么。孩子们被教导去仰慕罗马人的品质，如尊严、虔敬和美德，这几个术语的含义都比相对应的英文词要强有力得多。尊严是冷静庄重的仪态，公开地显示一个人的重要地位和责任感，因此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对任何罗马公民来说，尊严都是非常重要的；贵族对其特别看重，担任行政长官的人更是重视。虔敬不仅仅是对诸神的崇敬，还包括尊重家庭、父母，以及共和国的法律和传统。美德带有强烈的军事意味，不仅包括简单的蛮勇，还有军人和指挥官必需的自信、道德、勇气与技能。[15]

在罗马人看来，罗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罗马的先人表现出了上述三种品质，且远远胜过任何其他民族。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墓葬雕塑上人的面容极其严峻，这些雕塑细致地刻画了死者生前的所有特质与不足，因此与古典希腊的理想化塑像不同，而表现出极大的自豪与自信。罗马人自视甚高，教育自己的孩子不仅要相信，而且是刻骨铭心地牢记作为罗马人，他们是多么特殊。即便是最穷的公民，也因为自己罗马人

的身份和共和国一分子的归属感而自豪；那些富甲天下、出身高贵的人更是无比骄傲。罗马元老们素来认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外国君主都更优越。年轻贵族们从小就被教育去铭记这一点，同时也坚信不疑，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恺撒的家族虽然没有多少祖先攀升到高位或者为共和国建立伟大功业，但无疑仍然有许多成就可以夸耀，并且可以宣扬自己家系的古老血脉，以及作为神祇后嗣的荣耀。与这种自傲如影随形的，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不辜负家族与共和国期望的使命感。孩子们接受了这样的教导，视自己与家族和罗马的过去息息相关。正如西塞罗后来宣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是通过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先人联系在一起，那还算是什么生命？"[16]

恺撒自幼受到的谆谆教导就是，他不是凡俗之人。这本身不算稀罕，但作为家庭的独子，要承担传承家业的重任，而且母亲又是个特别强悍和受人爱戴的角色，所以恺撒从一开始就自视极高，尽管或许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如此自傲。罗马的教育非常务实，目标就是帮助孩子做好准备，去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对贵族子弟而言，这意味着从政、为家族赢得新的荣耀，以及有朝一日成为一家之主，承担抚育下一代人的责任。从大约七岁开始，男孩开始与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父亲出门处理事务的时候，儿子也跟在身边。在同一阶段，女孩会跟在母亲身边，观察母亲掌管家务、监督奴隶；至少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母亲还会为全家织布。男孩们观察着父亲与其他元老会面、打招呼，并被允许坐在元老院议政厅敞开的门外，旁听辩论。他们开始了解到谁在元老院里的影响力最大，为什么会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男孩们从幼年起就亲眼看见如何处理共和国的重大事务，自然而然地会感到自己属于这个世界，到年龄足够大的时候就会参与其中。将罗马社会维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称为恩主-门客机制。恩主享有财富、影响和权力，而不是那么富裕的人（即门客）前来寻求恩主的帮助；恩主可能会帮助门客获得一个官职或赢得一项合同，帮助处理其生意或法律纠纷，或者给门客提供礼物或三餐。作为回报，门客要以很多方式协助自己的

恩主。每天早上，大多数门客都会来向恩主请安。一个人的门客越多，他的威望就越高，尤其如果这些门客本身的地位就很高，或者是稀罕的外国人的话。整个社区，包括意大利的大小城镇和整个行省，都可能是一位元老的门客。一位恩主或一位地位较低的元老，也可能是另一个更有权势的人的门客，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不用“门客”这种说法。元老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接见自己的门客，为其提供帮助，以保证他们继续效忠自己，同时也确保门客们会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罗马政治的很大一部分是在非正式场合进行的。[17]

与此同时，更为正式的教育也在继续进行。孩子可能会去二十多所传授语法的学校中的一所；更常见的情况是在自己家中，或与其他孩子一起在亲戚家中接受类似的教育。恺撒是在家中接受教育的，我们知道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他的教师是一个叫作马克·安东尼·格尼弗的人。格尼弗来自希腊化的东方，在亚历山大港接受教育，曾经是个奴隶，后来被安东尼家族授予自由，可能是因为他对安东尼家的孩子教导有方，家长对其很满意。他是个传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修辞学的名师，极受尊重。在教育的第二阶段，孩子会更细致地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学，以及练习修辞。文学是核心课程，贵族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买得起手稿抄本。在印刷机发明之前，手抄本是非常昂贵的。许多元老在自己家中设有藏品丰富的图书馆，他们的年轻亲属和朋友可以借阅。恺撒未来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拥有数量惊人的藏书，主要涉及伊壁鸠鲁学派的哲学。现代学者在赫库兰尼姆古城附近皮索的别墅遗址中发现了他的部分藏书。贵族们还常常在家中接待到访的学者与哲学家，这进一步增强了年轻贵族们成长环境的文化氛围。对恺撒及其他许多年轻贵族来说，仅仅饱读伟大文学著作还不够，还要亲自从事创作。苏埃托尼乌斯提到，幼年恺撒曾写过一首颂扬赫拉克勒斯的诗和一部悲剧《俄狄浦斯》。这些不成熟作品的文学价值或许不算很高（与其他后来成就大业的贵族的作品相比，不算好也不算差），后来被恺撒的养子奥古斯都皇帝查禁了。[18]

孩子们还要继续死记硬背地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十二铜表法》[19]，即罗马法律的基础。前92年的一道法令关闭了所有用拉丁语教授修辞学的学校，理由是用希腊语教学更好，即使教学的目的是培养用拉丁语演讲的能力。这项措施的部分目的可能是防止演讲术这项对政治生活非常有用的技能变得过于普及，因为这些学校很可能会从元老贵族阶层之外招生。在罗马的政治环境中，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本领仍然很关键，因此教育强调实用技能，而不是完全学术性的知识。比恺撒年长六岁的西塞罗回忆说，在前91年的时候，他“几乎每一天”都去聆听公民大会与法庭中优秀演说家们的精彩表演。他自称“孜孜不倦，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争分夺秒地读、写、练习演讲，但并不满足于纯粹的修辞练习”，而是很快就开始观察当时一位卓越法学家的活动。恺撒似乎受到了亲戚恺撒·斯特拉波演讲风格的极大影响，他可能在现场听过斯特拉波的演讲。[20]

体育训练的目标和文化学习一样，都是实用性的。在希腊化世界，体育方面的卓越被当作训练的目标本身，而并不是直接为了成年人的义务做准备。在体育馆中，体育锻炼是裸体进行的，许多城市的体育馆往往成为同性恋活动的场所。这两方面对罗马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在他们看来，体育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且有着强烈的军事意味。最常用的锻炼场地是战神广场（战神玛尔斯的训练场），在罗马还是座小城市的时候，军队就在这里集结。在战神广场，年轻贵族们学习跑步、在台伯河中游泳，以及使用兵器格斗，主要是剑和标枪。另外，他们还学习骑术。差不多与恺撒同时代的瓦罗自称一开始就不用马鞍，直接骑乘。传授大部分这些技能的教师应当是孩子的父亲或另一位男性亲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体育锻炼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年龄相仿的男孩们在将来会成为政坛的竞争者，如今在一起训练。即便在幼年，他们也可能开始树立起自己的名望。恺撒身材瘦削，不是非常强壮，但他的顽强意志力足以弥补这些缺陷。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恺撒是个天生的好骑手。我们还读到，恺撒惯于将两手背在背后骑行，只用膝盖驾驭自己的

马。后来，他的武艺也赢得了赞誉。罗马人相信，所有的优秀指挥官都应该既能熟练使用剑、标枪和盾牌，也能指挥整个军团。[21]

沉寂与风暴

前100年，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遭到血腥镇压，此后罗马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尽管马略率领共和国军队镇压了这两名政客，但他毕竟曾经与其往来甚密，因此马略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有传闻称，马略曾受到诱惑，打算加入萨图尔尼努斯一伙。有一个比较夸张的故事说，在最后冲突的前夜，马略在家中同时接待了激进派领导人和元老院的代表团，他将双方代表留在不同房间内，先是与其中一方商谈，然后假装腹泻发作，冲出屋去，和另一方讨价还价。但除了他在此事中值得商榷的行为之外，马略其实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军事荣耀。元老们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日常的结党营私上，每天要问候朋友和同盟者，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帮助，使其在对自己感恩戴德的同时并不感到自卑。这些事情都不是马略所擅长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很少有人去寻求他的帮助，尽管他在广场附近为自己建造了新宅，并宣称这样访客们来找他就不用走远路。我们不知道，在前90年代，年轻的恺撒与声名显赫的姑父有过多少接触，但恺撒在元老院扩大影响的本领应该不是从马略那里学到的。[22]

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尔尼努斯的立法激起了许多反对声音，但最终令这三位激进派保民官惨死的主要原因，却是人们害怕他们会凭借这些措施赢得权力与影响。说到底，罗马的精英们都宁愿让共和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不愿意看到有人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获得莫大声望。但争端仍然遗留下来，其中许多涉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谁应当从帝国霸业的扩张中得利？如果一位行政长官提议对土地进行再分配、国家出资为城市贫民提供粮食，或者扩大骑士阶层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那么一定能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在前1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几位激进派

保民官的成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惨死也表明，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犬牙交错，想要长期维系民心是多么困难。

获得意大利同盟者这个群体的支持对一位元老来说，不能带来多少直接的好处。提比略·格拉古招致了意大利贵族的敌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霸占了大片公共土地。这些人在罗马并没有直接的权力，但他们能够影响到数量足够多、影响力足够大的元老去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盖乌斯·格拉古希望通过向意大利人授予罗马公民权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但这样做又疏远了许多原本支持他的罗马人。罗马精英阶层不愿意有富裕的新公民来与他们竞争公职，而罗马的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则害怕大批意大利人在公共竞技和娱乐活动中分一杯羹，压倒自己并且减少自己在公民大会中投票的价值。意大利同盟者原先就对自己得到的待遇满腹怨言，因为任何一支罗马军队中至少一半的兵员都由意大利同盟者提供。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个比例有可能还在上涨，而且他们也蒙受了相应的伤亡，而到此时似乎并没有在扩张中分享到与损失程度相匹配的战利品。盖乌斯·格拉古立法的失败似乎更加深了意大利同盟者的不满。罗马的一些行政长官在与同盟者打交道时的傲慢举止更是令后者愤愤不平。前125年，弗雷格莱殖民地（拥有拉丁公民权，因此享有一定的特权）起兵反抗罗马，遭到残酷镇压。许多意大利人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非允许他们成为罗马公民，否则不接受罗马的统治。有些人来到了罗马，设法获得了公民身份，但在前1世纪初期，连续多位特别严格的监察官尽了很大努力去剔除这些冒牌罗马人。[23]

前91年，保民官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又一次鼓吹向所有同盟者授予公民身份。这是一系列改革的核心部分，而这些改革令人回想起格拉古兄弟当年的改革，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德鲁苏斯的父亲曾是盖乌斯·格拉古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德鲁苏斯和格拉古兄弟一样，也来自影响力极大的名门望族，所以他在立法时胆子比较大，但也使人们害怕他会过于野心勃勃。德鲁苏斯的改革，尤其是扩大公民群体的计划，

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在公民大会就扩大公民群体的立法进行投票表决之前，德鲁苏斯在自己家的门廊上向访客问候时，被人用皮匠的刀子刺死。凶手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楚，但现在很明显，他的法律永远不可能通过了。许多意大利贵族，其中有些是德鲁苏斯的亲密盟友，很快决定自己动手来处理这个局面。结果就是意大利的很大一部分人举兵反抗罗马，即所谓的“同盟者战争”。叛乱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首都设在科尔菲涅乌姆，参照罗马体制制定了自己的宪法，主要的行政长官是每年轮选的两名执政官和十二名裁判官。他们还铸造了自己的钱币，上面的图案是意大利的公牛用角戳死罗马的狼；迅速动员了一支大军，其装备、训练和战术思想与罗马军团如出一辙。到前91年底，双方已经爆发了激烈冲突，都有相当大的损失。斗争双方的内部关系极其复杂，在许多时候更像是一场内战，而不是叛乱。意大利的许多社区，包括几乎所有的拉丁城镇，都忠于罗马，而一些被俘的罗马士兵则愿意加入叛军，与自己的公民同胞作战。[24]

恺撒当时年纪太小，没有参加同盟者战争，但一些将在他的故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人，特别是西塞罗和庞培，在这场冲突中首次尝到了战争滋味。恺撒的父亲可能也以某种身份参加了这场战争，但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如果他的确在前91年担任亚细亚行省总督，那么他就错过了战争的爆发，可能在战争结束前返回了意大利。在前90年担任执政官的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恺撒家族另外一个分支的成员）在平叛战争中表现平平。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上文说过，他可能是盖乌斯·恺撒的兄弟）在前91年担任执政官，也参加了同盟者战争。他以资深执政官的身份指挥军队时病逝。同盟者战争规模宏大，再加上多位行政长官阵亡，以及其他一些行政长官昏庸无能，所以许多经验丰富的元老都作为资深行政长官指挥作战。马略在战争第一年起了很大作用，打赢了一些小规模战役，最重要的是避免了失败。他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罗马人认为他年事已高，不适合继续作战，而且有人批评他的指挥过于谨慎。不知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他身体状况不佳，在前90年之后的

战争中他就退居二线了。另外两名指挥官——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和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波——被认为是罗马最终取胜的主要功臣。但罗马人打赢同盟者战争不仅靠武力，也依赖外交手段与和解。从一开始，元老院就逐渐做出妥协，将意大利人以和平手段未能成功索取的那些权益赋予他们。保持忠诚的同盟者被授予公民地位，那些迅速投降的叛乱者也获得了公民身份，后来那些被打败的人也得到了公民地位。罗马人如此心甘情愿地向波河以南意大利的几乎所有自由人授予公民权，恰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毫无意义。妥协的方式也说明罗马人仍然不愿意改变罗马现有的政治平衡，因为新公民被集中在几个投票部落中，这样就可以尽量压制他们的影响力。[25]

苏拉在镇压叛军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到前89年底，他回到罗马，胜利当选了次年的执政官，被他打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就有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苏拉的政治生涯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恺撒将来的道路。苏拉和恺撒都出身贵族，但他们的家族都早已经衰败，因此他们在政界的奋斗几乎和任何一位“新人”一样艰难。苏拉的政治生涯开始得比正常情况要晚。在努米底亚，他曾在马略麾下担任财务官，在使朱古达遭到背叛并落入罗马人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拉无时无刻不在吹嘘自己的这桩业绩，令他的老上司马略越来越妒火中烧。在针对辛布里人的战争中，苏拉起初在马略麾下服役，但很快就调到了另一位执政官的军中，此后苏拉和马略两人的关系始终不是很融洽。前88年，苏拉担任执政官，元老院将讨伐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的使命交给了他。本都是东方的希腊化王国之一，在马其顿和塞琉古王朝衰落之后崛起。在罗马人被意大利的同盟者战争缠住手脚的时候，米特里达梯六世攻占了罗马的亚细亚行省，下令屠杀了该地区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此番得手之后，米特里达梯六世又率军入侵了希腊。对苏拉来说，这是个天赐良机，他可以在诸多富裕的东方名城南征北战，于是他开始筹备一支军队。招兵买马非常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东方的作战十分轻松，战利品又特别丰厚。[26]

在正常情况下，苏拉只需要率军东征，尽力为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即可。但是，一位叫作苏尔皮基乌斯的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东方的指挥权从苏拉手中夺走，交给了马略。这是苏尔皮基乌斯提议的一系列法律之一，他努力效仿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尔尼努斯，利用保民官的职位来开展涉及面极广的改革。他的另一项法案的目标是将新公民更平均地分到各个投票部落中去。马略乐于利用苏尔皮基乌斯，就像曾经利用萨图尔尼努斯一样；苏尔皮基乌斯也同样乐于从这位深受群众爱戴的战争英雄身上沾光。但是，如果分道扬镳比联手合作更有利，这两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反目成仇，尤其是在他们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之后。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在罗马，政治斗争是为了个人的成功，而不是为了政党的利益。目前，马略显然已经清楚地决定，他需要再打一场战争，去赢回自己在击败朱古达和北方蛮族之后曾经享有的万丈荣光。苏尔皮基乌斯作为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为他提供赢得新辉煌的机遇。马略已经六十九岁高龄，自前100年以来不曾当选过行政长官；而苏拉成绩斐然，表明他非常精明强干，因此苏尔皮基乌斯没有理由违反传统的分配指挥权的方法。但是格拉古兄弟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公民大会可以就任何事务立法。群众同情苏拉，法律上的先例也支持苏拉，但苏尔皮基乌斯夺走其指挥权的做法在法律上是说得通的。苏尔皮基乌斯还利用一群暴徒来支持自己的法案，据说苏拉躲到了马略家中，才躲过了暴徒的追杀。[27]

苏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作为一位贵族、元老和执政官的尊严受到了极大侵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但他做出的反应却令世人瞠目结舌。他离开了罗马，来到自己的军队中，告诉士兵们他在东方的指挥权被剥夺了，马略肯定会征募自己的军团去作战。他不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呼吁军团士兵追随他进军罗马，从已经夺取政权的那群人手里解救共和国。在拥有元老身份的军官中，除了一个人之外，无人响应他的号召，但其他官兵的反应就不是这样了。不管是因为害怕丧失从战争中获取战利品的机会，还是因为自己的统帅受到伤害而义愤填膺，军

团跟随着苏拉，开进了罗马。这是第一次有一支罗马军队向罗马城开进。元老院派出两名裁判官去直面苏拉的军队，他们遭到了粗暴的对待，袍服被撕碎，侍从扛着的法西斯束棒[28]（象征裁判官拥有的军权）也被愤怒的军团士兵捣毁。后来，元老院派代表去请求执政官苏拉暂停进军，进行和平磋商；虽然得到了友好的接待，但依然被置之不理。苏拉的一支小部队企图进入罗马城，但被匆匆集结起来的忠于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的军队阻拦。苏拉的对策是派出了一支兵力更强大的军队，强行攻入街巷，还纵火焚烧了一些房屋。马略党人的反抗起初非常激烈，但由于他们的装备很差，所以很快就被打垮了。苏拉宣布反对派的十二名领导人（包括马略和他的儿子，以及苏尔皮基乌斯）不受法律保护，人人皆可诛之，可以拿着人头向苏拉领赏。苏尔皮基乌斯被自己的一名奴隶出卖，惨遭杀害（苏拉赏给这名奴隶自由，然后命人将他从塔尔皮娅悬崖[29]上扔下去摔死，以惩罚他对主人的不忠诚。如此严厉的姿态非常符合罗马人尊重法律和义务的传统）。其他反对派则逃脱保命、销声匿迹了。马略经历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冒险——后世的传说无疑对其添油加醋不少——最终抵达阿非利加，受到了在那里定居的努米底亚战争老兵们的欢迎。苏拉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常态，然后率军东征，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差不多五年之后才重返意大利。[30]

前87年的两名执政官很快闹翻，其中一名执政官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因企图撤销苏拉的立法，而被视为共和国公敌，遭到罢免和驱逐。秦纳效仿苏拉，逃到仍然在镇压意大利人叛乱余烬的一支军队那里，说服士兵们支持他。很快，马略也率领一支庞大的志愿军（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从阿非利加回国，与秦纳联手。马略麾下最臭名昭著的是巴蒂埃卫队。这是一群释奴[31]，担任马略的私人保镖，常常扮演刽子手的角色。快到年底的时候，马略和秦纳率军进逼罗马。执政官格奈乌斯·屋大维[32]是个原则性很强但才干平庸的人，无力抵抗他们。庞培·斯特拉波仍然统领着一支军队，他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再次当选执政官。他的态度非常暧昧，只能令局势愈加恶化。苏拉派遣

昆图斯·庞培（前88年曾与苏拉一同担任执政官）去接管斯特拉波的军队。昆图斯和斯特拉波是远房亲戚，但我们可以肯定，斯特拉波指使自己的士兵杀害了昆图斯。斯特拉波可能在举棋不定，不确定应该加入冲突的哪一方，也有可能与双方都取得了联系。最终，他加入了屋大维那边，但没有有效地支援他，导致他们的军队被击败。斯特拉波不久之后就死去了，可能是病死的，也可能是被雷电劈死。

马略军队杀进城的时候，屋大维不肯逃离，而是端坐在雅尼库鲁姆山[33]官衙的椅子上，惨遭杀害。他的首级被送给秦纳。秦纳将屋大维的首级固定在广场的演讲台上。另外一些元老的首级很快也被悬挂在那里。在史料中，马略被斥责为随后一系列处决的元凶，但秦纳很可能也在这场厮杀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著名的演说家马克·安东尼（后来恺撒的副将马克·安东尼的祖父）被处决，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的父亲和兄长，以及卢基乌斯·恺撒和他的兄弟恺撒·斯特拉波也被杀害。有少数受害者经历了掩人耳目的作秀审判，但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在被抓住的时候就惨遭杀害。苏拉的宅邸被彻底烧毁，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信号，因为一位元老的宅邸不仅仅是政治活动的场所，也是其重要地位的明显标志。马略党人到处搜捕苏拉的妻子和其他亲属，但他们躲过了抓捕，最终逃到希腊，与苏拉团聚。苏拉当年占领罗马的举动令人震惊，而马略占领罗马则更加残暴。马略和秦纳当选为前86年的执政官，但马略就职几周后就突然死去，享年七十岁。[34]

恺撒的父亲在这些事件中有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如果有，那么是何种角色，我们不得而知。城市几次遭到围攻的时候，年轻的恺撒在不在罗马城，他有没有目睹台伯河上漂浮着的死尸，以及演讲台悬挂着的人头，我们也没办法了解。年轻贵族接受的教育是非常传统的，很多东西是通过观察长辈处理日常事务学习的。但在这些岁月里，政治生活如此混乱、如此血雨腥风，因此贵族子弟对共和国的印象不可避免地与前辈大相径庭。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1] Velleius Paterculus 2.41.1.

[2] Suetonius，*Caesar* 1.3.

[3] 关于罗马姓名的意义，见B.Salway，‘What’s in a Name？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AD 700’，*JRS* 84（1994），pp.124-145，esp.124-131。

[4] 关于这个名字起源的故事，见*Historia Augusta*，*Aelius Verus* 2；关于恺撒的家族，见M.Gelzer，*Caesar*（1968），p.19，C.Meier，*Caesar*（1996），pp.51-55，and 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pp.75-76。

[5] 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四代国王（约前642年～前617年在位），执政时与拉丁人发生了战争，扩大了罗马的疆土。

[6] Suetonius *Caesar* 6.1；关于埃涅阿斯纪及其儿子的故事的不确定性，见Livy 1.3。

[7] 财务官（Quaestors）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民选官员，负责监督国家的国库与财政事务，以及军队和官吏。该项职务可以回溯至罗马的王政时代。大约前420年之后，由百人会议（Comitia Centuriata）选出每个年度的四位财务官，而在前267年之后，增至十位。一些财务官被指派在罗马城中工作，也有的被指派为将领或行省总督的副手。不过其职责仍为监督军中财务。

[8] 也是她的同母异父兄弟，因为他们的母亲先后嫁给了兄弟俩。

[9] Plutarch，*Tiberius Gracchus* 1.

[10] *Historia Augusta*，*Aelius Verus* 2.

[11] B.Rawson，*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2003），esp.pp.99-113；关于古代对剖腹产的知识，见p.99 with references.See alsothe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B.Rawson（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Ancient Rome*（1991）。

[12] Plutarch，*Cato the Elder* 20.3.对这个主题更详细的讨论见K.Bradley，‘Wet-nursing at Rome：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in B.Rawson，*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1986），pp.201-229。

[13] Tacitus，*Dialogues* 28.6［Loeb translation by Sir W.Peterson，revised M.Winterbottom（1970），p.307］.

[14] Plutarch，*Coriolanus* 33-36，Livy 2.40.

[15] See H.Mar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1956），pp.229-291，A.Gwynn，

Roman Education：*From Cicero to Guintilian* （1926），esp.1-32；Cicero，*de Re Publica* 4.3.

[16] Cicero，*Orator* 120.

[17] 关于门客制度，见R.Saller，*Personal Patronage inthe Early Empire* （1982）；关于男童伴随父亲处理事务，见Gellius，*NA* 1.23.4，Pliny，*Epistulae* 8.14.4-5；关于孩子七岁起受到父亲的影响，见Quintilian 2.2.4；相关评论见Marrou （1956），pp.231-233。

[18] 关于恺撒的早期作品，见Rawson （2003），pp.153-157；Suetonius，*Grammaticis et rhetoribus* 7 for Gnipho；Suetonius *Caesar* 56.7。

[19]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这是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共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贵族的权力做了一些限制。

[20] Cicero，*Brutus* 305，Suetonius，*Caesar* 55.2.

[21] Plutarch，*Caesar* 17，Suetonius，*Caesar* 57，61.

[22] Plutarch，*Marius* 30，32.

[23] 关于盟友的问题，见E.Gabba，*The Roman Republic*，*the Army andthe Allies* （trans.P.Cuff） （1976），P.Brunt，*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1971），pp.101-104，A.Sherwin-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 （1973），pp.119-149.

[24] 对这场战争记录最完整的古代史料是Appian，*BC* 1.34-53，另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3.117.3；现代学者的解读见E.Gabba，‘Rome and Italy：The Social War’，in *CAH2* （1994），pp.104-128。

[25] Appian，*BC* 1.4046，Plutarch，*Marius* 33，*Sulla* 6.

[26] 关于苏拉的完整生平，见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1-63。

[27] Plutarch，*Marius* 34-35，*Sulla* 7-8，Appian *BC* 1.55-57，and 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56-77.

[28] 束棒（fasces），音译“法西斯”，在古罗马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束棒是一根斧头，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着。在官方场合下，高级官员的卫兵在他的前面持束棒来代表到来的官员的级别和权力。按官员级别的不同，束棒的数量也不等。

[29] 塔尔皮娅悬崖是古罗马城俯瞰广场的一座悬崖，高约25米，用来处决谋杀犯、叛徒、

伪证者和盗窃的奴隶。得名自曾背叛罗马人的维斯塔贞女塔尔皮娅。

[30] Plutarch，*Sulla* 9-10，*Marius* 35-40，Appian，*BC* 1.57-59.

[31] 在古罗马，被主人授予自由的奴隶可以成为公民，享有全部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原主人则成为他的恩主和保护者。释奴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能担任公职，不能担任国家祭司，不能成为元老。但后来释奴也能成为高官。释奴在获得自由后生的孩子生来自由，享有全部公民权。一些释奴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甚至成为巨富。

[32] 与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是远亲。

[33] 雅尼库鲁姆山，今天的意大利语名字是贾尼科洛山，是罗马西部的一座山丘。它是现代罗马的第二高山丘（仅次于马里奥山），但并不是古罗马七座山丘之一，因为它位于台伯河以西，在古代城市的城墙以外。

[34] Appian，*BC* 1.63-75；Plutarch，*Marius* 41-46，*Sulla* 22，*Pompey* 3，Velleius［Paterculus 2.20.1-23.3，and also R.Seager，*Pompey* （2002），pp.25-29.］

三 第一位独裁者

> 不仅在罗马，在意大利的每一座城市，都张挂了被放逐人员的名单。没有一个地方不沾染了鲜血的污迹，神庙、友人的宅邸或家庭居所，全都不能幸免。丈夫在自己妻子怀中惨遭屠戮，儿子在母亲的怀抱里丢掉性命。死者中只有极少数是因为得罪了某人，或与某人结下怨恨而被害；更多人是因为自己的财产而丧命，甚至刽子手们也说，这个人是被自己的豪华宅邸杀死的，这个人被自己的花园害死，那个人是因为自己的温泉而丧命。[1]
>
> ——普鲁塔克，2世纪初

恺撒父亲的去世非常突然。一天早上，他在穿鞋时突然倒下。那时他的儿子快十六岁了，但可能已经正式行了成人礼，即脱下镶紫边的托加长袍（只有未成年男孩和行政长官穿这种长袍），换上成年人穿的朴素的成年托加。成年礼上，男孩还要解下脖子上戴的护身符，永远不会再戴。他还要第一次接受剃须修面，并将孩童留的较长头发剪短，变成成年公民的发型。孩子在什么年龄接受成年礼，并无定规，如同罗马教育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由各个家庭自行决定。孩子接受成年礼的年龄一般是十四岁至十六岁，但也有十二岁和十八岁的例子。成年礼一般在自由神节[2]举行，也就是3月17日，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只能在这一天举行成年礼。除了在家中举行仪式之外，贵族子弟还要在父亲及其朋友的陪伴下走过城市中心的大街小巷，以象征他已经作为成年人进入了共和国的集体。经过广场之后，他们还要登上卡比托利欧山，在朱庇特神庙中献祭，向青春女神尤文塔斯[3]献上祭品。[4]

父亲去世后，恺撒不仅是个成年人，还成了一家之主。他没有多少亲近的男性亲属可以指导自己未来的前程，但这个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极大的自信。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解除了父母之前为自己包办的婚约。这门婚约的未婚妻是一个叫科苏提娅的女子，她的父亲属于骑士阶层，而非元老。她的家庭非常富裕，无疑会给恺撒带来一大笔嫁妆，

这些钱肯定能帮助他踏上从政之路，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好处了。恺撒和科苏提娅可能已经结婚了，而不是仅仅处于订婚状态，因为苏埃托尼乌斯的措辞的意思是两人离了婚，而普鲁塔克显然将科苏提娅看作恺撒的妻子之一。两人年纪尚小，因此不大可能已经正式结婚。不管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此时都算是一刀两断了。恺撒自己选择的新娘是秦纳之女科尔内利娅。秦纳也是贵族，在前87年～前84年连任四届执政官，是罗马最有权势的人。[5]

秦纳为什么会屈尊俯就地收恺撒为女婿，我们不得而知。显然，两位尤利乌斯·恺撒被处决并没有影响到恺撒，这也说明恺撒家族中两个分支的关系是多么疏远。马略是恺撒的姑父，这无疑给恺撒加了分，但马略在前86年初去世之后，这一层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的确，在马略生前最后几周内，他和秦纳联合提名恺撒为朱庇特祭司，这是罗马威望最高的祭司职位之一。前一任朱庇特祭司——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梅卢拉——于前87年被屋大维任命为代理执政官，以取代被罢免的秦纳。马略和秦纳的军队占领罗马的时候，梅卢拉为了避免被敌人处决，自己抢先一步自杀了。担任朱庇特祭司的人必须是一位贵族，其妻子也必须是贵族，而且两人必须举行一种非常古老而罕见的称为“麦饼婚”的婚礼仪式。前86年的时候，恺撒的年纪还太小，不能就任，所以让他在前84年与贵族少女科尔内利娅结婚的部分原因是准备让他当朱庇特祭司。但是，如果恺撒要担任朱庇特祭司，他可以迎娶的贵族少女绝非只有秦纳的女儿一个；而且秦纳作为一位元老，也不可能仅仅为了让恺撒当祭司，就把女儿嫁给他。事实上，恺撒并不符合祭司的资格，因为一位朱庇特祭司的父母必须都是贵族，也必须采纳“麦饼婚”的仪式来结婚，但实际上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是平民。秦纳对年轻的恺撒一定是非常器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恺撒担任朱庇特祭司的决定就非常奇怪了。祭司[6]是罗马最古老的宗教团体之一，一共十五人，每一位专注于侍奉一

位神祇，其中三位祭司的地位和威望要比其他祭司更高，分别是奎里努斯[7]、玛尔斯和朱庇特的祭司。朱庇特是罗马最重要的神祇，他的祭司自然也是地位最高的。祭司制度的历史非常悠久，祭司们必须遵守千奇百怪的禁忌，因为祭司及其妻子必须永久性地抚慰神灵，因此不可以冒任何玷污神灵的风险。比如，朱庇特祭司的禁忌包括，他不可以发誓，不可以在城市之外度过超过三个晚上，不可以看到死尸、正在作战的军队或者在节日劳作的人。另外，他不可以骑马，家中或他的衣服上不可以有任何结扣，不可以看到没有食物的桌子，因为他绝不能显得生活拮据无着。而且，必须有一名奴隶用青铜刀为他剃须或理发——这足以说明这项禁忌的古老——剪下来的头发以及指甲等物件必须埋在秘密的地方。祭司要戴一种特殊的帽子，叫作“阿佩克斯帽”，似乎是用皮毛制成的，顶端有尖，有两个帘盖住耳朵。有了这些禁忌，根本不可能从事元老的正常活动。[8]

朱庇特祭司的威望极高，在公元前1世纪，朱庇特祭司们有权出席元老院会议，并担任一些不需要他们离开罗马的行政长官职位。行政长官在就职时一般要宣誓，朱庇特祭司如果担任行政长官，就会被免除宣誓的义务。禁止祭司担任军职的限制是很难绕过的。如果不是秦纳在前87年被罢免，梅卢拉是不大可能当上执政官的。梅卢拉后来曾宣称自己并不想参选，是被百人会议以常规方式选举为执政官的。祭司身份所带来的许多禁忌都使他没有办法非常活跃地干预政事。或许恰恰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屋大维才希望他来当执政官。秦纳和马略夺取罗马之后，梅卢拉主动放弃了执政官职位，但他很快意识到，单单这样做还不足以保住自己的生命。他来到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摘掉阿佩克斯帽，正式放弃了自己的祭司职务，然后割腕自杀。他死前放声咒骂秦纳及其支持者，但小心地留下遗书，解释自己避免了玷污自己的祭司职务。[9]

恺撒和科尔内利娅以独特的“麦饼婚”仪式喜结连理。麦饼婚这个名

字源自双粒小麦（拉丁文为far），这种小麦被用来制作向谷物神朱庇特献祭用的圣饼。仪式中，有人端着圣饼走在新人前方，新人可能还会将圣饼吃掉。仪式需要有十名见证人在场，并且应当由罗马最高级的两位祭司——祭司长和朱庇特祭司——主持。梅卢拉死后，朱庇特祭司的位置就空缺着，因此恺撒的麦饼婚仪式在这一点上不合规矩。考虑到恺撒即将成为朱庇特祭司，他的妻子将成为祭司夫人，他们的婚礼上还献祭了一只羊。然后，新人蒙着面纱，坐在铺着羊皮的座位上。[10]

恺撒被选为下一任朱庇特祭司，这是极大的荣誉，他将因此成为共和国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元老院成员。但这项崇高荣誉的代价是，他未来的政治生涯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恺撒顶多能像他父亲那样成为裁判官，但他不能离开罗马去治理一个行省，肯定也不可能获得军事荣耀。考虑到恺撒家族在过去成就平平，人们认为能当上朱庇特祭司，对这个孩子来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当时没人会想到，他最终能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有人感到，这个孩子才智有限或者身体状况不佳（恺撒当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受到癫痫的折磨），因而无法以正常方式做出优秀业绩。秦纳将自己的女儿科尔内利娅嫁给恺撒，说明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孩子缺乏才干。秦纳和马略一致同意要任命恺撒为朱庇特祭司，而秦纳在盟友马略死后坚持了这个任命。我们始终无法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知道年轻的恺撒对此的态度。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整个事情似乎并不紧迫，尽管有一个史料说恺撒的确正式就职了，但据其他史料记载，恺撒并没有就职，后一种说法最有可能是正确的。首先，他的年纪还小，这是个障碍。其次更重要的是，秦纳本人无权直接任命恺撒为朱庇特祭司，事实上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由罗马的另一位高级祭司——祭司长——来任命。此时的祭司长是昆图斯·穆齐乌斯·斯喀埃沃拉，他不是新政权的朋友，此前秦纳曾派人去暗杀他，没有成功。斯喀埃沃拉曾担任执政官，还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祭司长不像普通祭司那样受到各种禁忌的束缚，因此可以在政坛高度活跃），他可以从技术角度（比如奥雷利娅是

平民出身）否决恺撒的任命，或者干脆拒绝屈从于秦纳的压力。这毕竟是一件小事，秦纳必须专注于其他更重要的大事，因此恺撒的祭司任命问题悬而未决。[11]

等待苏拉

秦纳及其支持者主宰罗马的几年在史书中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除了史书记载的空白之外，还有许多证据表明，秦纳没有努力去推动任何大规模的改革。尽管他上台之前曾利用新近获得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和其他心怀不满的团体的力量，但执政之后没有去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罗马的第一次内战，以及后来的冲突，并不涉及互相抵触的意识形态或政策，而是许多个人之间传统竞争的暴力延伸。秦纳并没有改革共和国的革命性的雄心壮志，而是渴望在现行体制中获取个人权力和影响。因此，在通过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维持自己的地位。前86年，已经当上执政官的秦纳用计确保自己在前85年和前84年也当选执政官——或许只有他和另外一名由他内定的人士被允许参加竞选。作为执政官，他拥有军权，因此可以合法地调遣军队来保护自己，对付苏拉或其他竞争者。作为行政长官，他享有豁免权，任何人不得起诉他。当时罗马的法庭中似乎有人在反对他，尽管几位著名的律师选择不再出庭。秦纳和马略杀死了一些元老，迫使另外一些元老流亡国外，但大多数元老仍然留在罗马，并且继续召开会议。许多元老并不是秦纳及其同党的铁杆支持者，但对苏拉同样没有好感。元老院的辩论似乎还比较自由，但是有些议题一定会令秦纳不悦，比如元老院开启了与苏拉的谈判。但元老院无法控制秦纳，也无法阻止他连任执政官，这是因为秦纳控制着一支军队，而元老院没有军队。在秦纳治下的罗马，元老院照常开会，法庭照常运作，选举也依旧举行，至少是表面上显得很正常。共和国的主要机构有一种惊人的弹性，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某种形式运转，暴乱和流血冲突只会暂时打断它们。元老们生活的主要部分是提携他人以赢得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谋求晋身。不管局

势如何，他们自然会尝试尽可能继续这样下去。[12]

秦纳的位置与正常运转的共和国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他的地位最终是依赖他的军队。他没有急流勇退的意思，而他连续担任执政官，就剥夺了其他人获得高位的机会，导致行政长官人数有限，没有足够的人员去治理各省。但只要苏拉还逍遥法外，并且指挥着自己的军队，秦纳就不能高枕无忧。前86年，马略被授予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指挥权，以本都为辖区，但他还没有出征就去世了。接替他担任执政官的卢基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也继承了征讨米特里达梯六世的使命，并率军东征。很快，形势就更明显了，苏拉不会允许自己被取代，而弗拉库斯可能也曾尝试与他讲和，希望与苏拉联手进攻米特里达梯六世。但是，弗拉库斯很快被自己麾下的财务官盖乌斯·弗拉维乌斯·费穆布里亚谋杀，后者接管了军队，企图独立地打败本都。费穆布里亚犯上作乱和谋害长官的本事不小，军事才干却有限，他在自己的士兵暴动之后自杀。在随后几年中，元老院与苏拉有过一些接触，希望他能与秦纳和解，以避免内战，但双方都对和好不感兴趣。苏拉坚称自己是合法当选的行政长官，作为资深执政官被元老院派去攻打共和国的敌人，他的地位必须得到承认，他的使命必须完成。到前85年，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争眼看就要结束，秦纳及其同党开始招兵买马、囤积物资，因为他们认为与苏拉必有一战。[13]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相貌英俊，引人注目，皮肤白皙，灰色眼睛炯炯有神，头发微红。后来，他患上了一种皮肤病，面部出现了许多红斑，毁坏了他的容貌（几个世纪之后一部鲜为人知的军事法律声称，苏拉只有一个睾丸；他的伟大成就告诉世人，这种缺陷无碍于成为一名成功的军人）。苏拉可以做到风度翩翩，能够赢得普通士兵和元老的欢心，但许多贵族对他仍然没有把握。尽管他进入政界较晚，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屡建战功，展现出了军事才华。他到五十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当选执政官，这算是非常晚了，而在之前的十年中，他尝试了两

次才获得裁判官的官职。许多元老可能不愿意忘记，苏拉少年时穷困潦倒，他的家族也早已败落。在体制内春风得意的人往往会感到，其他人的失败是理所应当的。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苏拉曾经生活潦倒，喜好结交演员和乐师，这些职业被认为是非常伤风败俗的。一个青年如此浪荡已经很不像话，他当了元老和行政长官之后仍然无所忌惮，就更是不成体统，但苏拉对自己的老朋友始终非常忠诚。他嗜酒如命，酷爱宴饮；人们普遍相信他风流成性，男女通吃。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公开地与专门扮演女性角色的演员梅特罗比乌斯交好，人们相信他们是一对情人。元老院的内层精英们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苏拉在政坛的成功，尽管有的时候他们显然宁愿选择他，也不愿意支持其他一些人。苏拉对这一点嗤之以鼻，但他在一个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他坚持要让公众认可自己的成功，并保住自己的成就不被抢走。前88年，他率军进逼罗马，宣称自己才是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并且他需要将罗马从一个派系的非法统治下解放出来。此后，他始终自我标榜为罗马的一位资深执政官，否认马略与秦纳宣布他为国家公敌的合法性。苏拉为自己设计了墓志铭：他始终做到善待朋友、伤害敌人。[14]

在苏拉看来，他的军权和指挥权是完全合法的，他的对手们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他们才是共和国的敌人。因此，他有权利也有义务，用一切手段去镇压这些对手。他还必须要保护自己的尊严，因为他的成就斐然，他本人及其家族理应得到尊重。罗马人公开地强调幸运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尤其是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就像后世的拿破仑一样）相信运气好是一位将领最重要的优秀品质之一。指挥官们不应当盲目地依赖偶然，而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去保障胜利。但是，在战争的混乱中，最精细的计划也可能落空，胜负往往取决于偶然。苏拉大肆宣扬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好运气。运气好说明有神明保佑，他自我标榜是得到了维纳斯的佑助，有时候则是阿波罗和其他神祇的支持。苏拉声称自己在完成人生的许多大事之前都曾得到神祇托梦，神会敦促他按照计划行事，并许诺他一定会得胜。马略也曾得到过预示他锦绣前程的神谕，

最有名的就是他将会担任七届执政官的预言。苏拉和马略都因为野心而到了残酷无情的程度，但他们都坚信自己的成功是上天注定，因此是正义的，这无疑增强了他们原有的自信心。我们现代人往往对这种事情抱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得到神佑的说法往往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材料。[15]

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苏拉已经动用过一次武力。秦纳占领罗马城时的残暴使得苏拉确信，敌人不可能心慈手软。前85年，苏拉签订了《达耳达诺斯和约》，结束了针对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争。按照罗马人的标准，这算不得完全的胜利，因为本都国王仍然保持着独立地位，而且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但他被从罗马领土驱逐了出去，他的军队也一败涂地，蒙受了奇耻大辱。苏拉还不能立刻返回意大利，因为他有许多行政工作要处理，以平定东部各省。前84年，秦纳决定在希腊，而不是在意大利与对手交战，但他的计划遭到多次耽搁，因为亚得里亚海天气情况恶劣，一支运兵船队被暴风吹回了意大利。不久之后，秦纳的军队发生了哗变（可能是因为士兵们不愿意与罗马人同胞交战，但关于这一点，各种古代史料互相矛盾），秦纳被自己的士兵杀死。秦纳一派的领导权转到了格奈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手中，他在这一年和前一年与秦纳一同担任执政官。前82年，他还将第三次担任执政官，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是马略的儿子，尽管后者年纪太轻，不符合资格。越来越多的元老们要么断定意大利不再是个安全之地，要么猜到了风向会转到哪一边，于是纷纷逃往东方，加入苏拉阵营。前83年秋天，苏拉终于在意大利南部的布隆迪西乌姆（今天的布林迪西）登陆，更多的元老选择去投奔他。[16]

苏拉在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他的对手们始终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兵力优势，一连多支部队都被苏拉击败，甚至有一支军队被苏拉说服倒戈。与苏拉对阵的领导人大多没有什么军事才干可言。冬季暂时停战之后，来年再战，苏拉于前82年占领了罗马。秦纳派突然发动反击，两

军在科利内城门外陷入鏖战。在战斗中，苏拉本人险些丧命，他军队的一翼瓦解，但其他部队最终坚持下来，取得了胜利。秦纳派渐显颓势，却越发睚眦必报。小马略下令处死祭司长斯喀埃沃拉，据说小马略的母亲尤利娅谴责了儿子的这个举动。小马略自己被包围在普雷尼斯特，最后城市投降时，他要么是被杀，要么是自尽。当他的首级被送到苏拉面前时，已经得胜的苏拉评论道，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应该“先学划桨，然后才能驾船”。卡尔波逃到了西西里，继续抵抗，但被苏拉的一名部下击败并处决。[17]

当年马略占领罗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处决，血雨腥风，人人自危，残暴程度超过了之前苏拉占领罗马时的情况。如今，苏拉重返罗马后也大开杀戒，野蛮程度远远超过之前两次。胜利者在罗马郊外的贝罗纳[18]神庙向元老院发表演说时，不远处传来成千上万战俘被屠杀的惨叫声，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人，他们比罗马人受到了更残忍的待遇。被虐杀的不仅仅是敌人的普通士兵。敌方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在被俘之后旋即被处死，或者为了防止受辱而自尽。更多的元老和骑士因为被认为是苏拉的敌人，而在苏拉得胜之后被他的部下杀死。[19]

起初，苏拉党人预先不做任何警告就将反对派处决，但神经紧绷的元老院希望事先知道下一个牺牲品是谁，于是这个程序变得更为正式了。苏拉命令将放逐名单——被放逐的人将丧失法律保护——张贴在广场，其抄本随后被发往意大利的其他地方。被放逐的人置身法外，人人皆可诛之，任何人皆可取了他们的首级去向苏拉领赏，然后苏拉会将政敌的首级挂在演讲台周围示众。通常，受害者的财产会被没收并拍卖，其中大部分都被苏拉的党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受害者主要来自元老或骑士阶层。放逐名单公布了好几批，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人数，但一定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大多数人曾反对过苏拉，但也有人仅仅因为财富受到苏拉垂涎而被处死。据说有一位不问世事的骑士在放逐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宣称是自己在阿尔班的地产害死了自己。他很

快就被杀害了。[20] 苏拉党人常常借此机会报私仇，在许多情况下是先杀了人，然后才将他的名字添加到放逐名单，以将谋杀罪行合法化。苏拉本人似乎没有非常关注这个过程，但他解放了许多被放逐者的奴隶，并将他们组成一个私人卫队，为自己服务。这些释奴常被指控滥用自己新近获得的权利。放逐于前81年6月1日正式结束，但它造成的恐怖阴云长久地笼罩着罗马，令这个世纪余下时光里的罗马人谈之色变。[21]

苏拉的权力直接来自对军队的控制，正是依靠这支军队，他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他曾做了很大努力去捍卫自己作为资深执政官的合法性，很快就给了自己一个更正式的位置，从而将自己的大权独揽合法化。在危机极其严重的时候，共和国也曾暂时搁置对个人独裁的恐惧，指定一位独裁官，即单独一位拥有最高军权的行政长官。在此之前，独裁官始终是临时性的职位，期限只有六个月，但苏拉抛弃了这些限制，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任期。通过公民大会的投票，他被任命为“立法与改组国家的独裁官”。他的官职以及他镇压反对派的暴力，都是前所未有的。有一次，他轻描淡写地下令将他自己麾下的一位高官处死在广场，因为这个人不听独裁官的命令，坚持要竞选执政官。[22]

逃亡者

苏拉军队第二次占领罗马的时候，恺撒大约十八岁。他在这场内战中没有扮演过任何角色。他的岳父秦纳已经死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小马略的关系特别亲密。更重要的是，尽管他还没有正式成为祭司，但可能已经开始遵守朱庇特祭司的规则。阻止他参战的禁忌意味着在城市被占领、科利内门外爆发激战的时候，恺撒应当待在城内。他目睹了苏拉对政敌的放逐和血洗。祭司不应当看见死尸，但在当时一定很难遵守这项禁忌。不管他有没有看见死尸，这个青年一定知道，城市中心悬挂着罗马许多名人的首级。有一次，他自己也差一点丧命。

恺撒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可观的财富，因此不至于被纳入放逐

名单。但是他的妻子是秦纳的女儿科尔内利娅，这样的关系不可能赢得新政权的好感。苏拉命令年轻的恺撒与妻子离婚。他曾向其他一些人发出过同样的命令，有时还为他们安排更有利的婚姻，常常将自己的女性亲属嫁给他们。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格奈乌斯·庞培，他是庞培·斯特拉波的儿子，也是苏拉麾下最能干的指挥官之一。苏拉命令格奈乌斯·庞培休了结发妻子，而与独裁官的继女结婚。此时苏拉的继女已经是有夫之妇，而且怀有身孕，但还是迅速离婚，并同样迅速地与庞培结婚。我们知道，至少还有一个人遵照苏拉的指示休了自己的妻子。只有恺撒拒绝服从。尽管苏拉对他百般威逼利诱，甚至很可能提议让恺撒与他自己的家庭联姻，但恺撒仍然不为所动。考虑到之前的局势，恺撒的态度是非常勇敢的，何况他还是个无足轻重的青年，可以轻易地被除掉，而且本来就与反对派有关联。他为什么坚决不肯离婚，我们不得而知。他与科尔内利娅的婚姻似乎的确琴瑟和谐，但也可能是因为他天性固执或者非常骄傲。

苏拉加大了威胁的力度。作为对恺撒的惩罚，苏拉没收了科尔内利娅的嫁妆，将其收入共和国的国库。后来，恺撒被剥夺了祭司的身份。他可能本来就保不住这个职位，因为是马略和秦纳给他安排的祭司职位，但史料一般将此事与恺撒拒绝与科尔内利娅离婚联系起来。也有细心的人指出，从技术上讲，恺撒其实不符合祭司的资格。自前87年以来，罗马就一直缺少一位朱庇特祭司，现在显然也不着急去任命一个新人选。事实上，这个职位一直空缺到前12年。贵族们对这个受限制太多的荣誉没有什么兴趣。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恺撒还曾尝试竞选另一个祭司职位（具体是什么职位不详），但被苏拉暗地里使绊儿，因此失败了。普鲁塔克的这种说法可能指的就是朱庇特祭司的职位，只不过搞混了（但朱庇特祭司不是选举产生的）或是虚构出来的桥段，为了突出年轻的恺撒面对强大的独裁官是多么坚贞不屈。[23] 不管恺撒于公开场合在多大程度上反对苏拉，这都是一条险象环生的路途。很快，逮捕恺撒的命令就发出了。逮捕一般是处决的前奏。我们不知道逮捕恺撒的指示

是不是苏拉亲自发出的，也许是苏拉的部下做了主。如果是这样，那么独裁官也会很快就得知此事，但他并没有去制止自己的部下。[24]

恺撒逃离罗马，在东北方的萨宾人领地避难。独裁官的兵马活跃在整个意大利。不久后，他就下令让约12万名老兵退役，并安顿他们的生计，这足以说明他的军队规模是多么庞大。恺撒没有办法销声匿迹、无声无息地混入某个小社区。他几乎每天夜间都在转移，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出卖，因为放逐期间悬赏缉拿逃犯的法令可能仍然有效。这位年轻贵族在近几年中可能不得不遵从祭司的严苛规程，现在则必须经历一番磨难。他身边可能有一些奴隶，或许甚至还有朋友陪伴，但逃亡者的生活方式与之前的养尊处优形成了极大反差。雪上加霜的是，他染上了疟疾。在患病期间，一天夜里，他在从一个躲避处逃往另一个安全地点的途中被苏拉的一群士兵拦住了。这些士兵的指挥官是一个叫科尔内利乌斯·法基特斯的人，可能是个百夫长。他们正在扫荡这一地区，搜捕独裁官的敌人。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他们已经搜寻恺撒多日了。恺撒向他们行贿，让他们放自己一马，最终用1.2万银迪纳厄斯[25]的巨款（这差不多相当于一名普通士兵一百年的军饷，当然百夫长的军饷会高许多）买下了自由。[26]

最终是母亲救了恺撒。奥雷利娅说服了维斯塔贞女[27]，以及她的一些亲戚（其中最重要的是她的堂兄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28]以及马梅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去向独裁官求情，请他开恩饶过她的儿子。科塔和李必达在内战中都是苏拉党人，在随后几年中都赢得了执政官的职位。这些位高权重人士的说情，再加上恺撒其实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使得苏拉赦免了他，不仅饶了他的性命，还允许他开始从政。这对苏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因为通常被放逐者的儿孙都会被禁止担任公职或者进入元老院。据传说，苏拉最终开恩的时候宣称："就让他们称心如意，把他（恺撒）带走吧。但他们应当知道，他们如此急切地要救的这个人，终有一日会把最优秀人士的派系斩尽杀绝，而我和他们

都曾保卫这个派系；因为这个恺撒身上有许多个马略。”这也许只不过是后人的传说，但独裁官完全有可能已经认识到，这个胆敢与他对抗的高度自信的青年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苏拉也完全有可能看到了恺撒的才干。[29]

前80年底或前79年初，苏拉卸去了独裁官职务。他扩充了元老院，增加了三百名来自骑士阶层的新元老，并做了很大努力去恢复元老院在共和国中突出的指导地位。苏拉大大削弱了保民官的权力，剥夺了他们向公民大会提出新立法的权力，因为苏尔皮基乌斯曾利用保民官的职权将东方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马略。更重要的是，苏拉还禁止保民官在卸任后担任任何其他行政长官职位，有效地保证了只有那些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谋求保民官的职位。苏拉通过立法确认了担任官职的传统年龄限制，并明确禁止任何人在同一个岗位上连任多届，同时还对各省总督的活动进行了管制。苏拉始终自认为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任命的共和国公仆，现在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力，重建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共和国。更重要的是，元老院里如今挤满了他的党羽。如果这种体制要正常运转，那些党羽就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苏拉的法律致力于恢复的传统界限之内行事。新体制不需要一名独裁官来督导，因此苏拉退居二线了。在一段时期内，他就像其他元老一样，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行走，被他的朋友们簇拥着，但没有保镖的护卫。他能够不带保镖就四处活动，而不受任何骚扰，这足以证明人们对他的尊重和畏惧。但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年轻人四处尾随苏拉，对他口出恶言。于是苏拉宣称，由于这个年轻人的存在，未来的任何一位独裁官都不会放弃权力了。这个故事可能也是虚构的。多年之后，恺撒曾说：“苏拉辞去独裁官职务之后，就变成了政治上的文盲。”[30]

不久之后，苏拉退隐到乡间的庄园。他的妻子在分娩了双胞胎之后死去，于是他续弦再娶。苏拉是观鸟占卜师[31]之一，因此他小心谨慎地遵守这个团体的规则，在妻子临死之前与她离婚，因为根据祭司的禁

忌，在节庆时期，他的房子不可以被死亡所污染。甚至在妻子濒死之际，他也不肯去见她最后一面。但是，既是为了严格遵守义务，也是为了显示对妻子的挚爱，他为她举办了盛大奢华的葬礼。后来，他在观看竞技时遇见了一位离了婚的少妇。两人起初只是调情做戏（是少妇先主动挑逗苏拉），但很快就开始按照贵族阶层的正当方式发展下去，心醉神迷的苏拉谨慎地打探了她的家庭背景，然后安排与她结婚。他退隐乡间之后，与新婚妻子和许多少年时便结交的伶人朋友们一起生活，据说举办了许多骄奢淫逸的狂欢聚会。前78年初，他突然去世了。[32]

罗马初尝内战与独裁的滋味。我们必须牢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恺撒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目睹了元老权贵们之间的私人竞争演变成野蛮的流血冲突。执政官和其他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也惨遭处决或被迫自杀，这表明即便是共和国中地位最崇高的人的政治生涯也会被凶残地、骤然地中断。恺撒自己也险些丧命。他也曾坚决地反抗独裁官一手遮天的势力，不肯屈服，并且生存了下来。元老的子弟从小就自视甚高，恺撒也不例外。最近几年的经历让他变得更加自傲。在其他所有人都卑躬屈膝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反抗暴政。也许，约束其他人的那些规则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

[1] Plutarch，*Sulla* 31［translation by R.Waterfield in *Plutarch*：*Roman Lives* （1999），p.210］.

[2] 自由神是古罗马神话中主管葡萄种植、葡萄酒、生育和自由的神祇，也是罗马平民的保护神。他的节日与言论自由和成年人的权利有关。他与希腊酒神狄俄倪索斯的罗马化形式有关联。

[3] 尤文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女神，是大神朱庇特和天后朱诺所生的女儿，对应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赫柏。尤文塔斯拥有少女般的青春和活力，在奥林匹斯圣山的神宴上侍候诸神，专门给他们斟酒。尤文塔斯的双耳壶中盛有的长生不老酒拥有恢复青春美貌的神力。同时尤文塔斯还是青少年的守护神，所有罗马少年在即将成年之时都要前往神庙中祈求尤文塔斯的庇佑。

[4] 关于自由神节的重要性，见Ovid，*Fasti* 3.771-788；关于向青春女神尤文塔斯的献祭，

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4.15.5；关于与穿上成年托加有关联的仪式，见B.Rawson，*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pp.142-144。

[5] Suetonius，*Caesar* 1.1；关于恺撒父亲的突然去世，见Pliny，*Natural History* 7.181；关于恺撒穿上成年托加，见H.Mar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1956），p.233，A.Gwynn，*Roman Education*：*From Cicero to Quintilian* （1926），16，and B.Rawson，'The Roman Family'，in B.Rawson （ed.），*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 （1986），pp.1-57，41。

[6]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古罗马的神职人员。古罗马没有专门的教会阶层和团体，普通公民都可以扮演神职人员的角色，比如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可以在家中作为祭司主持宗教仪式。神职人员的身份往往被授予贵族和豪门世家成员，是一项很大的荣誉，但也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神职人员往往要自掏腰包来主持祭祀等宗教活动。
最重要的神职人员团体有四个：1. 大祭司团（College of Pontiffs），包括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其他大祭司（Pontiff）、15名祭司（Flamen，分别侍奉一位神）、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祭典之王（Rex Sacrorum）。2. 观鸟占卜师（augur）。3. 十五人团（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主要负责保管《西卜林书》。4.司膳（Epulones），负责安排节庆活动和公共宴席等。

[7] 奎里努斯（Quirinus）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之一，在罗马城建立与古罗马早期曾具有重要意义。后地位衰微，仅为祭祀之用。后来被认为与罗马的建城者罗慕路斯等同。

[8] 关于朱庇特祭司受到的限制，见Gellius，*NA* 10.15。

[9] Velleius Paterculus，2.22.2，Appian，*BC* 1.74.关于梅卢拉和恺撒被提名为祭司，见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in *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pp.113-132，esp.pp.114-116。

[10] 关于麦饼婚，见see S.Treggiari，*Roman Marriage*：*Iusti Coniuges from the Time of Cicero to the Time of Ulpian* （1991），21-24；关于麦饼婚的名称及与双粒小麦的关系，见*Gaius* 1.112，Pliny，*NH* 18.10，Festus 78L；关于仪式，见Servius，*Ad G.* 1.31。

[11] Velleius Paterculus 2.22.2称恺撒被指定为朱庇特祭司，而Suetonius明确地说恺撒只是被提名（*destinatus* ），Suetonius，*Caesar* 1.1.见M.Gelzer，*Caesar* （1968），pp.19-21，以及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in *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pp.113-132，esp.，pp.115-116.Tacitus，*Annals* 3.58 and Dio 54.36.1 都明确表示梅卢拉是最后一任朱庇特祭司。

[12] 关于这些年的讨论，见*CAH2* IX （1994），pp.173-187；关于西塞罗及其恩师们在这些年里的行为，见T.Mitchell，*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 （1979），pp.81-92。

[13] Appian，*BC* 1.76-77.

[14] 关于他的外貌、未当选裁判官和墓志铭，见Plutarch，*Sulla* 2；另见A.Keaveney，

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关于苏拉只有一个睾丸的故事，见Arrius Menander Bk. *On Military Affairs* . 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11称这个说法可能源于他的士兵们唱的一首下流歌曲。

[15] 关于苏拉的好运气，见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40-41。

[16] Appian，*BC* 1.78-80，Plutarch，*Pompey* 5.

[17] 关于内战，见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129-147。

[18] 贝罗纳是古罗马神话中专司战争的女神。

[19] Plutarch，*Sulla* 27-32，Appian，*BC* 1.81-96.

[20] Plutarch，*Sulla* 31.

[21] 关于苏拉对政敌的迫害，见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148-168，Appian，*BC* 1.95，Velleius（Paterculus 2.28.3-4，以及Plutarch，*Sulla* 31包含关于阿尔班的地产的轶事）。

[22] 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160-203.关于奥菲拉被处决，见Plutarch，*Sulla* 33。

[23] 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in *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pp.113-132，esp.，p.116.

[24] See Suetonius，*Caesar* 1.1-3，Plutarch，*Caesar* 1，and also L.Ross Taylor，'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Greece and Rome* 4 （1957），pp.10-18，esp.11-12，and 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in *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pp.113-132，esp.，p.116.

[25] 迪纳厄斯是古罗马从公元前211年，也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开始铸造的小银币，起初币重4.5克，后来不断贬值，3世纪中期废止。

[26] Suetonius，*Caesar* 74.

[27] 维斯塔贞女，或称护火贞女（Vestal Virgin），是古罗马炉灶和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维斯塔贞女共六位，六岁至十岁开始侍奉，必须守贞、侍奉神祇至少三十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守护维斯塔神庙的炉灶，不让圣火浇熄。三十年期满退休后，她们会得到丰厚的退休金，可以结婚。与前维斯塔贞女结婚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且能带来不菲的嫁妆。

[28] 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既是奥雷利娅的堂兄，也是同母异父的哥哥，因为他们的母亲先后嫁给了兄弟俩。

[29] Suetonius，*Caesar* 1.

[30] Plutarch，*Sulla* 1.104，Suetonius，*Caesar* 77.

[31] 古罗马人的一个习俗是通过观察鸟类的飞行（是单飞还是成群、飞行方向、发出何种声音、何种鸟类等）来预言占卜。

[32] 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 （1982），pp.204-213.

四 年轻的恺撒

> 我理想中的优秀演说家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他将发表演讲的消息传来之后，当即人满为患，裁判的位置座无虚席，文书们忙忙碌碌、热心殷勤地安排座位或让出座位，听众摩肩接踵，主持的裁判腰杆笔直、聚精会神；演说家起立时，整个人群鸦雀无声，然后是表示赞同、不断鼓掌；演说家希望听众放声大笑，他们就大笑，需要他们哭泣，他们就落泪；一个路过的行人，即便在远距离之外、不明白演说的内容，也会知道这位演说家必胜无疑，一位罗斯基乌斯（当时的一位著名演员）正在台上献艺。
>
> ——西塞罗，前46年 [1]

恺撒的一些肖像以半身雕塑或钱币铭刻的形式保存至今，有些是在他生前制作的，有些是他在世时作品的复制品，但描绘的都是人到中年的恺撒。这些肖像表现的是伟大的将军或独裁官，面貌严厉强硬，面部有不少皱纹，而且至少从那些少数比较写实的肖像看，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这些肖像折射着恺撒的权力、阅历和极强的自信，并且至少暗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尽管任何肖像，不管是雕塑、绘画甚至照片，都不能真正地捕捉到这种力量。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的肖像常常显得特别拘谨和沉闷。我们有种根深蒂固的误区，以为古典世界只有大理石等石雕，但事实上很多肖像最初都是绘制而成的。即便是上了色彩（为雕塑上色的伟大画师就像伟大的雕塑家一样受到景仰），半身雕像也只能揭示人的个性的一部分。恺撒的肖像的确能表现出他的聪明，却不能揭示出他常常为同时代人赞叹的活泼、机智和魅力。

在观看成年恺撒的肖像时，我们也很难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尽管文字史料对他的外貌做过一些描述。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恺撒“据说身材高大、皮肤白皙、肢体纤细、面庞略微发胖、眼珠漆黑、炯炯有神”。普鲁塔克的描述也印证了苏埃托尼乌斯的一些说法，他称恺撒身材瘦削、皮肤苍白，因此他后来在南征北战中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就更显

得了不起。当然这些描述都是高度主观的，比如我们很难知道他究竟有多高。苏埃托尼乌斯评论的意思也许仅仅是，恺撒尽管相当纤细，但并不让人觉得瘦弱。前1世纪的罗马人会把什么样的身高视为高大，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恺撒外貌的大多数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因为肯定有很多贵族的眼睛是深色的、头发是褐色或黑色的（这是我们的推测，因为史料中没有明确讲到恺撒的发色），以及皮肤是苍白的。年轻的恺撒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仪态。上文已经讲到，当其他所有人屈从于苏拉的淫威时，恺撒不畏权势，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恺撒喜欢表现得卓尔不群，穿衣打扮也与众不同。元老们一般穿短袖短袍，白底且带有一道紫色条纹（这道条纹是在前胸垂下来，还是在腰间呈水平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佐证），而恺撒却有自己不拘世俗的打扮。他的短袍是长袖的，袖子一直到手腕处，袖口有流苏。穿这种短袍时一般不系腰带，但恺撒配了腰带，而且刻意将腰带束得非常松。据说苏拉曾警告其他元老要提防这个“腰带松散的男孩”。这种穿衣风格也许是为了提醒大家，他曾经拥有祭司身份，因为祭司的衣服上不可以有任何结；但也许仅仅是他故作姿态而已。不管目的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恺撒的奇装异服既能让人认出他是元老家族的一员，同时又令他与众不同。[2]

对罗马人尤其是贵族来说，外貌和打扮是非常重要的。浴室为公民们提供舒适和清洁，其中包含了罗马人的一些最高级的工程技术，这绝非偶然。政治生活的特点（即元老们要不断地拜访和接待潜在盟友与门客，而且要行走于大街小巷、参加公共集会）决定了他们的服装和仪表始终处于别人的仔细观察之下。恺撒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尽管衣着有些奇特，但外表仪态是无可挑剔的。在富裕的罗马，贵重和稀罕的材料应有尽有，其他许多年轻贵族都是衣冠楚楚。元老贵族子弟有足够的金钱花在穿衣打扮上，也有大群奴隶伺候。那些囊中羞涩、没办法维持奢华生活的人往往宁愿债台高筑，也要跟上时髦的风尚。但即便在罗马的“时尚人士”当中，恺撒对自己仪表的挑剔讲究也被认为是太过分了。将胡须刮干净、留着清爽的短发是非常合宜的，但有传闻说，恺撒将自

己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发也剃掉了。在很多方面，或许是他自相矛盾的复杂性格令观察者困惑不解。罗马的大多数纨绔子弟一掷千金地狂欢纵饮，在自己的仪表上大肆挥霍。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恺撒饮食节制，但招待客人的宴席总是山珍海味。因此，他既具有传统的节俭，又像现代人一样自我放纵。[3]

恺撒的家族按照贵族的标准不算特别富裕，而且科尔内利娅的嫁妆被没收对他而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一位元老的地位有多高、有多富有，往往体现在其宅邸的位置上。共和国的最高级权贵们住在帕拉丁山坡上圣道一线。圣道就是穿过城市中心的游行队伍的必经之路。马略为了庆祝和宣扬自己战胜蛮族的丰功伟绩，在这个地区买了一栋宅子，离广场很近。有些豪门大宅非常古老，但很少有一个家庭能够在一座房子里连续居住好多代。这部分是由于罗马贵族没有长子继承的概念，往往将财产分给所有的孩子们，常常还要将部分财产馈赠给重要的政治盟友。因此，房屋和其他财产常常被买来卖去，频频易手。演说家西塞罗在政治生涯巅峰时拥有的那栋宅邸原先属于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后者于前91年被谋杀。西塞罗是从另外一位元老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手中买下了这座宅子。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是苏拉的重要支持者，在苏拉放逐政敌期间收购了不少房产。西塞罗于前43年死去之后，这座府邸先后有了两位互相没有关联的主人。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位置极佳，印证着其主人的显赫地位。作为对比，年轻的恺撒的房子较小，位置也在不时髦的苏布拉区。苏布拉区位于埃斯奎里努斯山和维米那勒山之间的峡谷中，离主要广场较远，此地有大片的贫民区，许多穷困潦倒的人就住在狭窄小巷两旁粗陋恶劣的楼房中。这个地区终日熙熙攘攘、喧嚣嘈杂、人满为患，而且臭名昭著，因为一些不光彩的行当——主要是卖淫——就在这里运营。此地的居民可能主要是罗马公民，包括许多释奴，但可能也有很多外国人。有证据表明，后来此地曾有一座犹太会堂，也许在恺撒时代就已经存在了。[4]

元老日常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家中进行的，这体现在房子的设计上。必须要一条门廊，用来接见客人，包括那些每天早上前来向恩主请安的门客。门廊上还会陈列主人先祖的半身雕像，以及象征他们或当前主人的荣誉与成就的纪念物。同样重要的是用来进行密谈的房间，以及招待客人的宴会厅。通常的布局是，房子中央设有庭院，以便提供一定的私密性，但雄心勃勃的人不愿意将世人隔离在外。据说，李维乌斯·德鲁苏斯的建筑师曾向他提议，可以把房子设计得非常私密，让外界无法窥见主人的隐私。他的回答是如果可能的话，他更愿意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他的一举一动。[5] 政界人士虽然拥有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但他们绝不能将自己与外界生活及活动隔绝。因此，尽管恺撒无疑居住在苏布拉的边缘，但极不可能住在该地区最贫穷的部分，他也不可能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充耳不闻。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与穷人的日常接触教会了他一些重要技能，让他后来能够驾轻就熟地操控人群，并极富感染力地向罗马军团的普通士兵们讲话。

居住在苏布拉或许对他有好处，让这个纨绔子弟能够更好地理解广大群众；但他之所以住在那里，只是因为他家境一般，没有足够的钱居住在更时髦的地区。苏拉年轻时甚至更穷，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租住在一座公寓楼上，他的房租比住在他楼上的释奴只贵一点点。恺撒的房子表明他手头不宽裕，而且在共和国中没有什么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他对出人头地的渴望与他的现有条件是矛盾的，而且他往往还毫不犹豫地挥霍金钱，超过自己财力的承受范围。他花钱一般是为了促进自己的事业，但有时似乎仅仅是心血来潮。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决定在自己的一处庄园建造一座乡间别墅。在地基已经打好的时候，他却对设计感到不满意。他当即命令将未完成的别墅拆除，然后在原地重新建造。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不详，很可能是在他政治生涯的较晚时期，但它足以说明至少在某些事情上，恺撒是个完美主义者。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喜欢收藏艺术品、宝石和珍珠，这对并不十分富裕的他来说，是一项昂贵的爱好。[6]

冠冕与国王

恺撒逃脱苏拉的爪牙之后，离开了罗马，直到独裁官死后才回国。这些年中，他开始服兵役。根据法律，服兵役是从政的必要前提。他起初在亚细亚行省总督——资深裁判官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泰尔姆斯——麾下效力。恺撒的父亲在大约十年前曾治理这个行省，因此当地人对恺撒家族的名字已经很熟悉了。恺撒继承了父亲与当地一些重要人物的友好关系。泰尔姆斯是一位重要的苏拉党人，恺撒成了他的“帐篷伙伴”之一，即与指挥官一同用餐、执行他分配的任务的青年。理想情况下，这些青年对总督而言是有用的部下，可以执行一些初级的幕僚职能，而青年们可以从总督那里学习军事和指挥。“帐篷伙伴”通过观察长官来学习，和小男孩们通过观察显赫的元老们在罗马处理日常事务来学习进步一样。与贵族子弟早年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他在何地服兵役、与谁一起服兵役，不是由国家控制的，而是由个人的家庭自主安排。恺撒与泰尔姆斯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能是通过与双方都有政治友谊的第三方而联系起来的。[7]

在正常情况下，亚细亚是一个安定繁荣的行省，是一位罗马总督及其幕僚的理想任职地，在此服役有希望获取丰厚的油水。但就在七年前，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占领了这整个地区，并命令当地人屠杀所有居住在此的罗马人。苏拉击败了米特里达梯六世，这位国王暂时与罗马修好，但他的一些盟友还没有屈服。泰尔姆斯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击败米蒂利尼城[8]。他围攻这座城市，最终将其攻克。在战斗中，十九岁的恺撒赢得了罗马表彰英勇壮举的最高荣誉——橡叶冠[9]。根据传统，这项荣誉只授予冒着生命危险挽救另一位公民的勇士。得救的人会用橡树叶（橡树是朱庇特的圣树）编织一顶朴素的冠冕，送给他的救命恩人，以公开认可他的恩情。但到了恺撒时代，橡叶冠一般由指挥军队的行政长官授予。获得这项荣誉的人可以在阅兵时佩戴橡叶冠，也可以在罗马的节庆活动中佩戴。史料没有详细说明恺撒究竟凭借什么功劳获得了橡

叶冠。但因为橡叶冠绝不会轻易被授予，因此获得此殊荣的人能够赢得极大的尊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危急时刻，罗马元老院的损失极大，需要补充人员，曾获得橡叶冠的人就是被选为新元老的主要群体之一。苏拉可能曾制定类似的政策，让获得橡叶冠的贵族立即获得元老身份；即便这不是史实，这项荣誉也注定会令选民印象深刻，能够推动获得者的政治前程。[10]

恺撒第一次在海外服兵役时并不总是如此光荣。在攻打米蒂利尼之前，总督派他去比提尼亚（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北部海岸）国王尼科美德四世的宫廷，安排国王调遣一队战船去支援罗马军队。比提尼亚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与其结盟，有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尼科美德四世年事已高，无疑曾与恺撒的父亲相识，因此他对恺撒的到来也许特别欢迎。年轻的恺撒似乎在宫廷纵情享乐，有人指控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太久，远远超过了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恺撒很年轻，之前由于祭司的重担，生活得相对不谙世事，现在第一次品尝到了广阔世界和宫廷生活的乐趣。而且他所处的新环境正是罗马贵族特别崇尚的希腊文化氛围。这些都可以解释他对国王的宫廷为什么流连忘返，但很快就开始流传一种谣言，说他不肯离去的真正原因是这个青年被尼科美德四世勾引了。流传的故事将恺撒描绘为心甘情愿与国王缠绵的情人，说他曾在一次众人酩酊大醉的节日聚会上担任国王的斟酒人，有一些罗马商人也参加了此次聚会。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室仆役将他领进了国王的寝室，他身穿精美紫袍，斜卧在黄金榻上，恭候尼科美德四世临幸。谣言如野火般迅速传播。恺撒离开宫廷不久之后又回到了比提尼亚，声称他需要处理关于他的一名释奴的事务。[11]

这桩丑闻将伴随恺撒的一生。罗马贵族仰慕希腊文化的大多数方面，但从来没有公开地接受某些希腊城邦贵族推崇的同性恋。那些拥有男性情人的元老们会对此讳莫如深，遮遮掩掩，即便如此仍然会遭到政敌的公开讥讽。罗马社会的大多数阶层普遍对同性恋很反感，认为这种

行为会削弱男性气概。在军队中，至少从前2世纪起，同性恋就是死罪。在针对辛布里人的战役中，曾有一名军官企图强暴一名士兵，被后者杀死，马略向这名士兵颁发了橡叶冠。这名士兵的行为得到表彰，被颂扬为美德与勇气的榜样，而那名军官的暴死则被视为对其过度肉欲和滥用职权的恰当惩罚，而且死者是一位执政官的亲戚。元老们不像普通士兵那样受到如此严厉规则的约束，但如果他们表现出对男性感兴趣，至少会遭到批评和嘲讽。老加图在担任监察官期间曾弹劾了一名元老，因为此人仅仅为了讨自己青睐的男孩的欢心，就在宴会上下令处死一名犯人。此人的错误在于滥用权力，但人们认为他的动机使他的罪行更严重。同性恋中扮演被动角色的男孩或青年特别受到鄙视。这样的角色意味着此人极端阴柔，比年纪较大的、更主动的同性恋者更可恶。有人说恺撒就曾扮演这样屈从的角色，这些谣言的杀伤力更大，因为这意味着这位年轻贵族的所作所为比奴隶更低贱。传闻中还说他热情洋溢地扮演着被动角色，更令其罪名昭著。[12]

说到底，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传闻，基于罗马根深蒂固的固有思维。罗马人对东方人满腹狐疑，将亚洲的希腊人视为腐朽堕落之徒，与受到罗马人仰慕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毫无共同之处。罗马人尤其憎恶希腊人的国王们，将他们的宫廷视为充满政治阴谋和荒淫纵欲的藏污纳垢之所。因此，年迈而淫荡的统治者诱奸第一次出国的天真烂漫的年轻贵族的故事特别有吸引力。尤其是恺撒喜好奇装异服，又极度倨傲，而他自己或他的家族并没有足够多的荣耀可以允许他这样虚荣，因此他无疑不讨人喜欢，更容易成为谣言的靶子。如此趾高气扬的青年却卑躬屈膝地满足一位老朽情人的肉欲，这样的故事特别劲爆。后来，随着恺撒在政治生涯中四面树敌，关于尼科美德四世的事件给了政敌们充足的武器来攻击他。恺撒一生中，这个故事都在流传，有时他甚至被称为“比提尼亚王后”。一位政敌称他为“所有女人的丈夫，所有男人的妻子”。像西塞罗这样的人兴高采烈地重复这些传闻，但他们自己是否相信，就很难说了。不管信不信，他们都希望这些传闻是真的，并且乐于以此为武

器攻击这个令很多人反感、被某些人憎恶的人。罗马政界的辱骂攻击常常极其污秽，只要有一个关于荒淫放纵或者性变态的绘声绘色的八卦消息，就没有人会去管真相究竟如何。但是，并非只有政敌会为了此事嘲讽恺撒，后来他自己的士兵也喜欢重述这个笑话。有意思的是，这并没有让他们对统帅的尊重减少一丝一毫，他们的嘲讽尽管非常粗鲁，却是亲切和善意的。[13]

关于恺撒和尼科美德四世同性恋关系的故事流传了很久，今天已经无法确定它究竟是真是假。恺撒本人坚决否认，有一次要当众发誓此种指控没有半分真实，但这提议只是让人们加倍地挖苦他。后来，他对这个话题极其敏感，这是极少数能让他当众暴跳如雷的事情之一。当年他刚离开宫廷没多久就迅速返回，给传闻增添了不少可信度。是因为他沉醉于肉欲不能自拔吗？或者他太天真，没有想到匆匆返回会授人以柄？或者他有意识地对流言置之不理，因为传闻完全是子虚乌有？考虑到恺撒一贯不肯让自己受制于那些束缚人的规则，最后一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无从得知真相。或许，这个十九岁的青年的确感受到了一位更成熟男子的吸引力，并为之倾倒。用现代人的一句时髦的委婉说法就是“尝试不同的性体验”。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是恺撒的唯一一次同性恋经历，因为我们完全确定，在他随后的生活中，完全没有同性恋的影子。考虑到罗马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对恺撒同性恋行为的指责差不多只有比提尼亚这么一桩，这倒是值得注意的。其他性质类似的传闻，包括诗人卡图卢斯的一部恶言诽谤的作品，并没有多少人信以为真，但它显然令恺撒本人非常烦恼。恺撒的风流韵事为大量的传言和丑闻提供了丰富材料，令他的名誉受损，但通常他的婚外情人都是女性。他与女性情人缠绵享乐时表现出的放纵也表明，他极不可能还与男人或男孩睡觉，但当时的人没有对这一点做出任何评论。恺撒对女人的胃口几乎是贪得无厌，被他征服的女性为数众多，而且往往来自最顶端的名门望族。因此其他人更会喜滋滋地重复那指控，即这个欲求不满的登徒浪子自己也曾扮演女性角色侍奉过尼科美德四世。这个故事究竟是真是

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触动了恺撒的一根敏感神经，令他窘迫难当。总的来讲，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传闻是假的，当然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14]

恺撒将近十六岁时娶了科尔内利娅，这应当不是恺撒的第一次性经验，但很有可能是新娘的第一次。已订婚的女孩常常住在未婚夫家中，直到年龄足够结婚，因此科苏提娅（恺撒抛弃了她，以便与科尔内利娅结婚）可能已经在恺撒家中居住了一两年。但是，未婚夫妻极少在婚前发生关系，何况科苏提娅的年纪比恺撒小好几岁。但我们必须牢记，罗马人完全接受奴隶制，视其为生活中很正常的一部分，而且在任何贵族家中都会有大群奴隶，他们完全是主人的财产。贵族为自己的家庭挑选奴隶时常常看重他们的外貌，因为这些奴隶的日常工作意味着主人及其朋友会经常看到他们。相貌美丽的家用奴隶在拍卖时总会卖出高价。如果一名女奴或男孩被主人看中，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去抵抗，因为说到底他们是财产，而不是人。罗马贵族与奴隶发生性关系，以此取乐，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少有人会大惊小怪。旧式美德的榜样老加图在妻子去世后常常与一名女奴同寝。内战期间，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逃到了西班牙，得到他父亲的一名门客的庇护。克拉苏藏匿在一个洞穴中，以躲避马略党人的搜捕，东道主则定期给他送去饮食，但很快就觉得，这位“客人”将近三十岁，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这样的招待还不够。于是他派了两名漂亮的女奴与克拉苏一起生活在洞穴中，以满足这个充满男子气概的青年的生理需求。在该世纪晚些时候写作的一位史学家声称曾见过其中一名女奴，后者虽然年事已高，但对那些日子还有着美好回忆。奴隶在这些事情中没有任何选择，因为主人可以用暴力惩罚他们或者心血来潮将他们出售。无疑有些女奴非常乐意受到主人或少爷的注意，并希望能够过上更舒适的生活。但有这种希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她们很可能会招致其他奴隶的嫉妒，甚至是女主人的不满。与奴隶同床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此恺撒很可能将自己的第一次交给了家中的女奴。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他或许也曾拜访过比较高档的妓院。罗马的

妓院非常多，因此狎妓在相当程度上也被认为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曾写道，日耳曼部落成员认为“在二十岁之前就与女人发生关系是一件特别羞耻的事情”，恺撒对这种观念表示震惊。恺撒的这种态度很能说明问题。[15]

学生与海盗

米蒂利尼被攻克一段时间之后，恺撒调到了奇里乞亚[16]担任总督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苏利库斯[17]的幕僚，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清剿在该地区肆虐的海盗。但在前78年，苏拉的死讯传到了东部各省，恺撒决定立即返回罗马。罗马又一次面临内战的威胁，因为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与元老院的大部分成员都发生了冲突。李必达很快开始招兵买马，准备用武力夺取政权，就像苏拉、秦纳和马略之前做过的那样。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曾考虑加入李必达一派，而且李必达还向他发出了极有诱惑力的提议。但恺撒很快决定不支持执政官，因为他对李必达的才干和野心都很怀疑。苏埃托尼乌斯的这个说法或许是后人牵强附会，意在指出恺撒始终企图掀起一场革命。然而，恺撒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完全说得通的。恺撒曾受到苏拉的迫害，虽然逃得性命，并且最终得到赦免，但他对挤满了苏拉党羽的元老院绝无好感。我们还要记住，在他的童年，野心勃勃的元老曾三次率领军队攻打罗马城。这种事情很可能会重演，如果的确重演了，那么最好是加入获胜的一方，所以恺撒的抉择也许仅仅是机会主义的，他考虑的只是加入李必达是否有利。[18]

最后，恺撒选择了一条比较常规的仕途，首先在罗马的法庭当了一名律师。苏拉对先前的立法进行编纂，建立了七个法庭，每个法庭由一名裁判官主持，陪审员来自元老阶层。庭审是非常公开的，场地有时是广场的高台，有时是大型会堂[19]之一，总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罗马法律中没有国家对某人提起公诉的概念，指控总是由个人提出，尽管他

可能是代表其他人（或整个社区）来起诉的。行政长官在任期间享有豁免权，但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卸任之后就有可能受到起诉。理论上，对自己卸任后可能遭到起诉的畏惧能够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当时并没有真正的职业律师。尽管存在一个起诉人阶层，但他们都不是贵族，而且并不十分受到尊敬。控诉双方通常由一名或多名非职业律师代理，他们一般都是政界人士。律师自身的地位和权威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代理一方的胜算。代理他人出庭是巩固政治友谊或卖人情的重要方式，也是让潜在选民了解自己的途径。

前77年，恺撒起诉了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指控他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鱼肉百姓。多拉贝拉于前81年卸去执政官职务之后前去治理马其顿，并凭借军功赢得了一次凯旋式。他是苏拉的支持者，在独裁官治下顺利当选就是明证，但如果将此案理解为恺撒对苏拉党人的复仇，就大错特错了。恺撒并不是在寻求攻击苏拉政权，而仅仅是选择了一个地位很高的人，作为自己起诉的对象。一位前任执政官，而且还是举行过凯旋式的功臣受审，注定会比地位卑微之人吸引更多的眼球，而且也能让年轻的起诉人受到万众关注，哪怕只是短暂的关注。这个案件很可能是马其顿当地的一些曾经受过多拉贝拉压榨的社区提起了申诉。他们不是公民，所以不能亲自起诉多拉贝拉；他们必须前往罗马，说服一个罗马公民代理他们提出诉讼。他们为什么选择恺撒作为他们的起诉人，我们不得而知，但也许是由于恺撒与这些社区领导人有着某种友好关系，可能源自他父亲或先祖的时候。多拉贝拉很可能确实滥用职权、中饱私囊，因为这种贪腐行为在当时的罗马行政长官中司空见惯。为了在罗马赢得选举，政客们需要一掷千金，因此前往各省任职时往往债台高筑，急需金钱来偿付高额债务。行省总督们只有数目不大的津贴，没有薪金，但他们在自己治理的省内是最高长官，可以为行省居民或商人提供便利，也可以对其施加阻挠。总督们受到的受贿诱惑是极大的，常常也会没收或者劫掠自己垂涎的财物。诗人卡图卢斯后来写道，他从一位行省总督幕僚的下级官职卸任回国后，一位朋友问他的第

一个问题就是：“你捞了多少？”外省居民很难利用法律武器来抵抗总督，因为他们必须长途跋涉到罗马去寻找律师为自己辩护，因此腐败更加猖獗和普遍。前70年，演说家西塞罗曾起诉了一位臭名昭著的西西里总督。据说此人曾发表如下妙论：当官要当三年才行，第一年捞到足够的钱让自己富得流油；第二年捞够雇用最好的辩护律师团的钱；第三年攒足够的钱去贿赂法官和陪审团，以保证自己能逃脱法律制裁。[20]

从多拉贝拉的案件审理中可以看到外省居民在起诉长官时常常遇到的一些障碍。起诉多拉贝拉的人是恺撒，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没有多少成就，而且来自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家族。而为资深执政官多拉贝拉辩护的人则是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和享有崇高地位的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科塔是恺撒母亲的堂兄，但亲戚在法庭上分别代理敌对双方并不罕见。这被认为是非常正当的事情，能让他们逢迎其他元老，或者让其他元老对家族感恩戴德，而并不会影响互相敌对的律师之间的亲戚关系。科塔是劝说苏拉赦免恺撒的人之一，之后当选为前75年的执政官。西塞罗后来回忆了霍尔腾西乌斯和科塔在此案以及其他案件中的精彩表演：

> 那时候，有两位演说家胜过了其他所有人，我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与他们比肩，那就是科塔和霍尔腾西乌斯。其中一位仪态沉着放松、温文有礼、才思敏捷、口若悬河……另一位辞藻华丽、激情四射……我也曾观看他们为同一方辩护，比如马尔库斯·卡努雷乌斯的案子，以及为前任执政官格奈乌斯·多拉贝拉代理的案子。尽管科塔是主要律师，但霍尔腾西乌斯起到的作用更大。广场喧哗嘈杂，需要强有力的演说家，他必须具有激情和技艺，嗓门必须洪亮。[21]

因此，恺撒的对手是当时法庭上最令人生畏的金牌律师组合。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辩方律师比起诉方更光荣。为了让司法体系正常运作，必须要有起诉人，但他们的成功往往意味着另一位元老的政治生命终结了。理论上，被认定犯有敲诈勒索罪行的总督会面临死刑，因为罗马的监狱很少，所以倾向于将所有重犯处以死刑。但实际上，被定罪的

人会有机会带着自己的所有财产逃离罗马城，在流亡中也能过得舒舒服服。高卢海岸的古老希腊殖民地马西利亚（现代的马赛）此时是罗马的外高卢行省的一部分，是畏罪潜逃者最喜爱的避难地。然而，尽管马西利亚的生活能够提供不少慰藉，但这样的流亡是永久性的，罪人永远不能返回罗马了。因此，起诉是咄咄逼人的行径，为被告辩护更光彩。按照元老贵族的标准，最好是支持一位受到指控的朋友（即便他确实有罪），而不是寻求结束他的政治生命。被告的辩护律师几乎总是年纪较长、经验更丰富的人，他们在法庭上已经身经百战。对这些人来说，展示自己对政治盟友的忠诚更为重要。起诉方一般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希望能够立身扬名，推动自己在政界的晋升。

庭审过程中，恺撒发表了演说，令旁观者刮目相看。后来恺撒将此次演讲的稿子公开发表。这种做法是很常见的，后来西塞罗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尽管这份演讲稿没有保存至今，但我们从古代的评论者那里可以知道，它广受赞誉。这份演讲稿可能表明恺撒受到恺撒·斯特拉波修辞风格的很大影响。在恺撒发表的另一份演讲稿中，他甚至照抄了恺撒·斯特拉波一份演讲稿的大部分。演讲稿的言辞只是表演的一部分。西塞罗承认，演讲就是一种表演。比如在本章开头的引文中，西塞罗将天才演说家与著名演员相提并论。演说家的站姿、穿着打扮、仪态举止、如何以正确的方式让自己的托加袍落下、神色表情、嗓音的力度与音调，都是律师工作的关键部分。在法庭上，恺撒赢得了观看庭审的人以及参加庭审的人的景仰。演讲稿的发表更是进一步巩固了他已经赢得的名望。他的嗓音略有些高，但说话方式显然给嗓音以力量。尽管起诉最终失败，多拉贝拉被判无罪，但恺撒作为律师的首次表演大获成功。审判的结果或许不算意外，因为大多数被控贪腐的总督最终都能被免罪。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被告律师的经验比起诉人丰富得多，权威也高得多，因此败诉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恺撒虽然赢得了很大名望，但那些将此案托付给他的马其顿人或许仍然大失所望，不过他们能够将一位前任总督送上法庭（尽管他逃脱了定罪）的事实至少已经证明了他们的

能量。[22]

在同一个法庭，恺撒第二次出庭时的表现更好一些，但被告又一次逃脱了惩罚。这是在前76年，被告是盖乌斯·安东尼[23]，罪名是在对米特里达梯六世作战时搜刮民脂民膏。主持法庭的是马尔库斯·李锡尼·卢库鲁斯，他的兄弟卢基乌斯是前88年苏拉进军罗马时唯一一位站在苏拉那边的元老。盖乌斯·安东尼的罪行昭然若揭，恺撒对他的起诉非常有力，但安东尼向平民保民官求援，促使一名或多名保民官否决了庭审程序。于是，审判被终止了，没有做出任何裁决。安东尼躲过了制裁，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有过不少大起大落：他于前70年被监察官逐出元老院，前68年又恢复了元老身份，最终于前63年当选执政官，当年的另一位执政官是西塞罗。尽管又有一位贪官逍遥法外，但恺撒的名望与日俱增。但是，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的活动招致了许多大人物的敌意，尤其是多拉贝拉的盟友们，于是恺撒在前75年决定出国，表面上的理由是深造学业。[24]

恺撒先是来到了罗德岛，打算师从当时最杰出的演讲术教师阿波罗尼奥斯·莫罗。几年前，阿波罗尼奥斯曾作为罗德岛人使团的一员拜访罗马，并获准用希腊语向元老院发表演讲，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到前1世纪初期，罗马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最后阶段往往是前往希腊化的东方，在著名的哲学与修辞学校中进修。与恺撒类似，西塞罗在法庭活跃了几年之后也离开了罗马，寻求深造。前78年～前77年，他先在雅典和小亚细亚的几座城市学习，然后也去了罗德岛，师从阿波罗尼奥斯。西塞罗对阿波罗尼奥斯的描述是：

> ……他是辩护过重大案件的名律师，也为他人撰写演讲稿，并且擅长分析和纠正错误，应用睿智的教学法，因此闻名遐迩。他尽可能地剔除我文章中冗余和过于华丽的部分。那时我还年轻，过于张扬，不懂得节制，就像一条河不愿意受到河岸的约束一样。[25]

恺撒从这位名师那里学到了哪些具体的东西，我们不得而知。

在抵达罗德岛之前，恺撒乘坐的船只在小亚细亚外海的法玛库萨岛被海盗截住了。在前1世纪初期，整个地中海都受到海盗的严重骚扰。这部分是由罗马人自己的成功导致的，因为罗马人灭亡了马其顿王国，重创了塞琉古帝国，还加速了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衰败。这些曾经辉煌的希腊化大国在过去拥有强大的海军，但它们衰落之后，爱琴海就滋生了海盗活动，最终蔓延到整个地中海。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则鼓励和直接支持海盗活动，把这些杀人越货的海盗视为对抗罗马的有用盟友。奇里乞亚（位于小亚细亚）曲折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海盗据点，塞维利乌斯·伊苏利库斯（恺撒曾在他麾下效力）等罗马将领清剿海盗的努力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海盗多如牛毛，有时能够以大编队活动，甚至袭击和劫掠意大利本土的沿海地区。尽管海盗并没有统一的领袖，而是由许多头目领导，但不同的海盗群体之间似乎确实有相当程度的配合。前70年代是海盗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他们甚至能够劫掠奥斯提亚[26]，有一次还绑架了罗马的两名裁判官及其所有侍从。尽管他们偶尔会杀死被俘的罗马人（据说曾让一名傲慢的贵族在大海中央“下船”，这个桥段有点像后世海盗传说中屡见不鲜的逼迫人走跳板坠海的故事），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勒索赎金。[27]

年轻的贵族恺撒是价值极高的战利品，因此俘虏他的海盗们决定索要20塔兰同[28]白银，作为赎金。据说恺撒听到这个数字之后放声大笑，宣称自己的价值比这多得多，并许诺给海盗50塔兰同。然后，他让大多数旅伴都前往最近的城市，去募集赎金。恺撒则留在海盗巢穴中，身边只有他的医生和两名奴隶。普鲁塔克记载，恺撒对凶残的海盗毫无惧色，而是：

> ……他对他们极为鄙夷，他每次躺下打算睡觉的时候，就派人命令他们安静下来不要说话。一连三十八天，他若无其事地与海盗们一同进行体育锻炼，似乎他们不是他的看守，而是他的皇家卫队。他还创作了诗歌和五花八门的演讲稿，大声向他们朗读。如果有人不欣赏他的作品，他就当着他们的面骂他们是文盲、野蛮人，常常大笑着威胁要把他们全都钉在十字架上。海盗们对此捧腹大笑，认为他如此出

言不逊是由于天性单纯和幼稚的傻气。[29]

恺撒的朋友们轻松地募集了足够的赎金。与罗马结盟的社区很乐意结交恺撒，因为他将来可能成为他们在罗马的有力盟友，于是心甘情愿地凑齐了这些金钱。赎金到位之后，恺撒就被释放了。赎金的大部分是由亚洲西海岸的米利都城提供的，于是恺撒立刻赶往那里。他此时年仅二十五岁，是个普通公民，从未担任过任何民选官职，但仍然说服和诱导米利都人集结了一队战船，并配备了水手。他指挥着这支舰队，径直返回法玛库萨，攻击先前囚禁他的海盗。海盗们洋洋自得，仍然待在岸边的营地里，他们的船只停在岸上，没有办法抵抗。恺撒临时征集的舰队将海盗全部俘虏，缴获了他们积攒的战利品，包括他自己的赎金。50塔兰同的赎金应当是被还给了出资人，同时恺撒将俘虏押往帕加马，将他们囚禁在那里。然后他去找亚细亚的罗马总督，安排将海盗处决。虽然恺撒多次承诺要将海盗全部处死，但资深裁判官马尔库斯·荣库斯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他正忙于将比提尼亚改组成一个罗马行省，因为尼科美德四世前不久驾崩了，将自己的国家馈赠给了罗马。荣库斯打算把被俘的海盗们卖为奴隶，从中渔利，并且也热切地希望将缴获的部分战利品占为己有。恺撒认定荣库斯不会按照他的要求办事之后，就迅速赶回了帕加马，命令将俘虏全部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权力去做这个决策，但没有人会质疑处死一群海盗的决定。于是，恺撒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但是，他在与这些海盗朝夕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显然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尊重，并且希望表现自己的宽大仁慈，于是命令在将海盗钉上十字架之前先将他们的喉咙割断，免得他们在十字架上缓慢而极度痛苦地死去。[30]

故事就是这样。在很多方面，这个故事概括了恺撒的传奇：不管形势如何，他始终掌控着局面。这个年轻贵族对俘获他的海盗冷嘲热讽，鄙视他们索要的赎金，始终镇静自若。这就是恺撒不畏独裁官苏拉的淫威，与其分庭抗礼的那种莫大的自信。他还表现出了极大的魅力，能够

轻松地赢得一群歹徒、罗马公民和士兵的欢心。获释之后，恺撒迅速采取行动。尽管他没有实权，但他的人格力量迫使其他人遵从他的命令，并赢得了一场辉煌胜利。恺撒曾发誓要俘虏并处决这群海盗，后来果然兑现了誓言，尽管实际掌管该省的总督无所作为。这个故事展示了恺撒的勇敢无畏、坚韧不拔、果敢迅捷和果断无情的军事才干，而让俘虏死个痛快的做法则体现了他的宽大，后来他会将仁慈标榜为自己最了不起的品质之一。这是个非常棒的故事，每一次讲述的时候无疑都会得到新的美化。恺撒的旅伴们离开了他，他在海盗巢穴的时候只有他的医生和奴隶陪伴在他身边，这就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最初是谁讲了这个故事？这是恺撒自我宣扬的一个早期例证吗？或许并非如此，但即使是他获释之后故事才开始流传，或者由他的朋友们大力传播，恺撒无疑也没有去驳斥传闻。故事中有多少真实成分，又有多少浪漫的虚构，显然已经无法厘清。

这段冒险结束之后，恺撒终于抵达罗德岛，在阿波罗尼奥斯的指导下学习。他是个优异的学生，修辞风格流畅而简朴（这种简朴非常有欺骗性）。西塞罗和其他人都认为恺撒是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并表示如果恺撒专注于演讲术而不涉猎其他领域，甚至或许可以拔得头筹。但对恺撒来说，演讲术始终只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工具。他非常擅长演讲，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极为突出，尤其是军事。他在罗德岛学习期间还获得了一个机会来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前74年，罗马再一次与米特里达梯六世开战，一支本都军队入侵了亚细亚，袭击和劫掠了与罗马结盟的地区。恺撒搁置了学业，乘船前往亚细亚行省，在那里招兵买马，率领这支匆匆征集的队伍击败了入侵者。恺撒的此次行动一如既往地迅猛、自信而有力。原本一些盟友打算投奔到米特里达梯六世阵营，因为罗马人无力保护他们。恺撒的行动阻止了他们的叛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事件中，恺撒仍然只有普通公民的身份，并没有征募军队作战的权力。如果他只是待在罗德岛没有发起抵抗，也不会有人为了亚细亚遭到蹂躏而责怪他。但在恺撒看来，他有义务采取行动，因为当地没有

正式的罗马军官。这也是立身扬名的良机。对元老贵族而言，为共和国效力，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赢得荣耀，是完全正当的雄心壮志。[31]

重返罗马

前74年底或前73年初，恺撒获得了一个祭司职位的任命，但这个职位受到的限制比朱庇特祭司小得多。大祭司团（共十五人，以祭司长为首）中有一人去世，于是投票决定由恺撒来填补这个空缺。去世的这个人就是奥雷利娅的亲戚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他曾在苏拉面前为恺撒说情，救了他的性命；后来在多拉贝拉案件中，科塔是恺撒的对手。大祭司理应以口头形式传承其宗教知识，因此大祭司团成员的年龄差别很大，实属正常。恺撒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职位，很可能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但也说明这个年轻人已经表现出了很大才华。大祭司之一是塞维利乌斯·伊苏利库斯，恺撒在荣获橡叶冠之后曾在他麾下效力。由于大部分大祭司都是苏拉指派的，而恺撒能够成为大祭司，说明他没有被视为危险的过激分子。这项任命是极大的荣誉，标志着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将来很可能在政界平步青云。十五名大祭司，再加上另外两个重要的宗教团体——观鸟占卜师和保管《西卜林书》[32]的祭司团（各有十五人）——代表着元老阶层内部的一个精英小集团。正常情况下，大祭司团只接受贵族出身并有先祖担任执政官的人，如果有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入选，一定是因为他特别出类拔萃。这些祭司如果活得足够久，大多能当上执政官。[33]

得到自己被任命的消息后，恺撒立刻放弃了学业，返回罗马，准备正式就职。他在仅仅两位朋友和十名奴隶的陪同下搭乘一艘小船出发，不得不又一次穿过海盗肆虐的海域。考虑到他前不久的所作所为，海盗们对他可不会有好感。航行途中，这群罗马人以为看到了一艘海盗船，于是恺撒脱掉了华美的外衣，将一把匕首缚在自己大腿上。他可能打算混入仆役和船员当中，寻找有利时机逃走。后来证明大可不必如此，因

为他之后看清那只是长着树木的海岸线，并非船只的轮廓。回到罗马之后，他很快就在法庭上活跃起来，这可能因为曾在处置贪腐勒索的法庭上起诉过马尔库斯·荣库斯。此案中，恺撒极有可能是代理比提尼亚人，因为他与该国的王族仍然保持着联系。后来，他曾在一起法律争端中代理尼科美德四世的女儿妮萨，并在陈词中列数了比提尼亚人国王对自己的恩惠。据说西塞罗当时也在场，打断了恺撒的话："拜托别说那事了，大家都知道他给了你什么，你又给了他什么。"那桩丑闻一直纠缠着恺撒，但似乎并没有在政治上对他造成伤害。荣库斯案件的结果不详，但他极有可能被判无罪，因为许多罪恶昭彰的前任总督都逃脱了法律制裁。和恺撒之前几次出庭一样，对他本人的政治前程更重要的不是审理结果，而是他个人在庭审中的表现。[34]

前70年代末，恺撒第一次竞选公职，成功当选24名军事保民官之一。他的任期可能是在前72年或前71年，史料在这个问题上很含糊。军事保民官与平民保民官迥然不同，完全是军职。罗马军队的每个军团有大约6名军事保民官，由于同时存在的军团数量远远超过4个，所以还有许多军事保民官是由上级任命的。但选举产生的军事保民官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个职位常被视为贵族子弟测试自己能否赢得选民欢心的第一个机遇。史料没有提及恺撒被派驻外省，所以他应当是在意大利本土服役的，因为当时的奴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前73年，一小群角斗士在一名叫作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率领下，从卡普阿城外一所角斗士训练学校逃出，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燃起了奴隶大起义的熊熊烈火。斯巴达克斯赢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击溃了一支又一支罗马军队，直到前72年才最终被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击败。恺撒很可能在克拉苏麾下效力，如果的确如此，这就是他们二人的最早联系。[35]

克拉苏当选了前73年的裁判官，在两名执政官都被奴隶起义军打败之后，克拉苏受命指挥镇压起义的军事行动。他时年四十岁，但在内战中已经担任过高级指挥官，经验丰富。克拉苏的父亲和兄弟被马略党人

谋杀之后，他被迫逃离意大利，起先躲藏在西班牙。就是在这个时期，他藏匿在一座洞穴中，他家族的一位门客给他提供了饮食和两名女奴。后来他加入了苏拉阵营，为他骁勇作战，在前82年罗马城外科利内门的战斗中建立功勋，挽救了当日战局。克拉苏对苏拉有些心怀不满，因为他相信独裁官没有充分肯定他的成就。但在其他方面，克拉苏在苏拉的统治下收获颇丰，占据了大量放逐受害者的财产。他是个狡黠精明而冷酷无情的生意人，很快就成了罗马巨富之一。他镇压奴隶起义军的行动同样高效。由于之前遭受的惨败，部队士气有些低落。为了重整军纪，克拉苏对一些军事单位实施了十一抽杀。每十名士兵中抽签抽出一人，将其活活打死，然后另外九人要接受各种象征性的羞辱：吃大麦而不是小麦，并将自己的帐篷搭在军营护墙之外。克拉苏将奴隶起义军围困在意大利半岛靴型的脚趾处，建造了庞大的防御工事，将他们围住。斯巴达克斯设法逃脱了克拉苏设下的天罗地网，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卓越才华和人格魅力，正是这些品质使他将一群逃亡奴隶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支精干的军队。罗马军队穷追不舍，最终与起义军决战，将其歼灭。克拉苏下令将6000名男性俘虏钉在从罗马到卡普阿的阿庇乌斯大道[36] 沿途的十字架上。他可不会像恺撒那样先割断俘虏的喉咙，以示“仁慈”；因为奴隶起义令罗马人心惊胆战，制造这个恐怖景象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所有的奴隶，警告他们不要有犯上作乱的心思。[37]

对于恺撒担任军事保民官期间的事迹，我们知之甚少，也不能确定他究竟有没有参加对奴隶起义的镇压；如果参加了，我们同样无法得知他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多年后，在率军与日耳曼部落作战时，恺撒会回忆当年被击败的奴隶起义军中有许多日耳曼人，以此鼓舞自己的士兵，但在他自己的著述中未曾提及他本人是否参加过镇压奴隶起义。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恺撒自己的著作中很少包含其本人生平的信息。综合各方面考虑，他很可能参加了镇压奴隶起义的战争，应当像以往一样表现出了军事才干，但或许并没有立下值得大书特书的奇功。我们知道，他在担任军事保民官期间，曾表示支持恢复平民保民官权力的动议

（是苏拉剥夺了平民保民官的权力）。选民显然普遍对此充满热情，恺撒或许是想赢得民众的好感，因此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这种机会主义在谋求政界晋升的人当中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不能说明恺撒对苏拉政权或仍然挤满苏拉党羽的元老院抱有深深的敌意。恺撒的亲戚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在前75年担任执政官期间曾提出一项法案，允许前任平民保民官谋求其他行政长官的职位，以阻止平民保民官的职位像苏拉图谋的那样，成为政治上的死胡同。[38]

恺撒与克拉苏这么早便存在联系的可能性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克拉苏非常擅长利用自己的财富获取政治影响力，具体手段是提携那些虽然雄心勃勃但没有足够资金的人。在随后十年中，恺撒肯定从克拉苏的大量借款中获益良多，或许他在早期已经得到了克拉苏的类似援助。但我们不应当夸大此时恺撒的重要性，因为他只是克拉苏出资帮助的许多元老之一，很少有人能猜到他最终能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恺撒仪表绚丽浮夸、才华横溢——他服兵役的记录和在法庭的活动足以证明他的才华——而且拥有自我宣扬的天赋，能够吸引选民的眼球，而围绕他的丑闻至少能让他保持很高的知名度。对于一个憧憬政治生涯的人来说，这些品质都是优势，但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多多少少也拥有这些优势。而且也并不是说有了这些品质，就必然能平步青云。个人才华确实能吸引选民，但这并非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赢得选民支持的因素。尽管恺撒穿衣打扮很有个性，而且自视甚高，但他目前为止的履历在最重要的方面上只能算是中规中矩。他独立自主地讨伐海盗和抵抗袭扰亚细亚的本都劫掠者的行动十分不合常规，但对有责任心的公民来讲也是很正当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取得了成功。这些行为充分表明了他的美德，这是罗马贵族自我形象的核心品质。到三十岁的时候，恺撒已经显得前程似锦（他被接纳为大祭司就是明证），而且绝没有被视为革命党。虽然才华横溢，但他相对来讲是比较穷的，而且他家族祖先们的成就十分平庸。他在政界究竟能攀登多高，我们拭目以待。

[1] Cicero，*Brutus* 290［Loeb translation by G.Hendrickson （1939），p.253］.

[2] 关于Suetonius对恺撒的描述，见*Caesar* 45.1；Plutarch的评论见*Caesar* 17；恺撒的奇装异服和苏拉对其的评论见Suetonius，*Caesar* 45.3。

[3] Suetonius，*Caesar* 45.2.

[4] 西塞罗的宅邸，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4，and E.Rawson，'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in M.I.Finley （ed.），*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1976），pp.85-102，esp.86；关于苏布拉的犹太会堂，见*Corpus Inscriptionum Judaicarum* 2.380。

[5] Velleius Paterculus 2.14.3.

[6] Suetonius，*Caesar* 46-47.

[7] Suetonius，*Caesar* 2.

[8] 米蒂利尼是莱斯博斯岛的首府和港口。

[9] 严格来讲，橡叶冠并非表彰军人英勇壮举的最高荣誉，比它级别更高的是禾草冠（corona graminea）。禾草冠只会颁授给直接挽救整个军团或全军的将军、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禾草冠是以在战场上采取的禾草、花卉、野草和各种谷物等植物编织而成的。不过，普通士兵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确实是橡叶冠。

[10] See L.Ross Taylor，'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Greece and Rome* 4 （1957），pp.10-18，and M.Gelzer，*Caesar* （1968），p.22.关于橡叶冠，见Gellius，*NA* 5.6.13-14，Pliny，*NH* 16.12-13，and discussion in V.Maxfield，*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1981），pp.70-74，119-120。

[11] Suetonius，*Caesar* 2 and 49.1-4，52.3.

[12] Plutarch，*Marius* 13-14，Polybius 6.37；关于作为监察官的加图，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 17。

[13] Suetonius，*Caesar* 22 and 49.1-4.

[14] 关于恺撒的公开誓言，见Dio 43.20.4；Catullus 54，cf.Suetonius，*Caesar* 73。

[15] 关于加图，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 24；Plutarch，*Crassus* 5；关于日耳曼人，见Caesar，*BG* 6.21.关于罗马人的态度，见P.Grimal，*Love in Ancient Rome* （trans.A.Train）（1986）。

[16] 奇里乞亚在今天土耳其的东南部沿海地区。

[17] “伊苏利库斯”这个称号来自他战胜伊苏利亚（大约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安塔利亚省）海盗的战功。

[18] Suetonius，*Caesar* 3.

[19] 会堂（Basilica）是古罗马的一种公共建筑形式，其特点是平面呈长方形，外侧有一圈柱廊，主入口在长边，短边有耳室。Basilica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王者之厅”。在古罗马的城市，会堂一般是作为法庭或大商场的豪华建筑。基督教沿用了罗马会堂的建筑布局来建造教堂。随着历史的变迁，会堂这个词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在天主教中，有特殊地位的教堂被赋予Basilica的称号，中文的说法是“宗座圣殿”。

[20] Catullus 10；Cicero，*Verr.* 1.40.

[21] Cicero，*Brutus* 317.

[22] See Suetonius，*Caesar* 4.1，55，Velleius Paterculus 2.93.3，and M.Gelzer，*Caesar*（1968），pp.22-3；关于一般的行省行政工作，见A.Lintott’s *Imperium Romanum*：*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1993）；关于恺撒演讲时音调高，见Suetonius，*Caesar* 55.2。

[23] 后来恺撒的副将、后三头同盟者之一马克·安东尼的叔叔。

[24] Plutarch，*Caesar* 4.

[25] Cicero，*Brutus* 316.

[26] 罗马城附近的一座海港城市。

[27] 关于海盗问题，见Appian，*Mithridatic Wars* 91-93，Plutarch，*Pompey* 24-5；关于恺撒被俘，见Suetonius，*Caesar* 4.2，Plutarch，*Caesar* 2。

[28] 塔兰同是古代中东和希腊-罗马世界使用的重量单位。一般的说法是，希腊人使用的塔兰同的实际质量约相当于今日的26千克，1罗马塔兰同相当于1.25希腊塔兰同。

[29] Plutarch，*Caesar* 2［Loeb translation by B.Perrin （1919），p.445，slightly amended］.

[30] 关于海盗被割喉，见Suetonius，*Caesar* 74。

[31] Suetonius，*Caesar* 4.2.

[32] 《西卜林书》是一部神谕集，用希腊文写成，据说是罗马末代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从一名西比尔女预言家手中购得的。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重大危机时期，人们都会寻求这部神谕集的指导。

[33] 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pp.113-132，

esp.p.117-118.

[34] 关于返回罗马的旅程，见Velleius Paterculus 2.93.2；关于审判，见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p.528；关于西塞罗的评论，见Suetonius，*Caesar* 49.3。

[35] 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in *Classical Philology* 36（1941），pp.113-132，esp.，pp.120-122；关于斯巴达克斯起义，见Plutarch，*Crassus* 8-11，Appian，*BC* 1.116-121。

[36] 阿庇乌斯大道是古罗马时期一条把罗马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得名自开始兴建此工程的罗马监察官和演说家“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前340年～前273年）。

[37] 关于克拉苏和苏拉，见Plutarch，*Crassus* 6。

[38] Suetonius，*Caesar* 5.

五 候选人

恺撒“……挥金如土，有人认为他花费巨资只买到了转瞬即逝的名望；而事实上，他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宝贝……就这样，人们都对他颇有好感，都帮他获得新的官职和荣誉，作为对他的慷慨大方的报偿”。

——普鲁塔克，2世纪初 [1]

前70年，恺撒到了而立之年。即便按照罗马贵族的标准，他也算是接受过极好的教育。他是一位有天赋的演说家，还是一位英勇无畏、久经考验的军人。他的私人生活也很顺利。他和科尔内利娅结婚已经大约十五年了。这十五年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即恺撒在海外学习和服兵役的时间，夫妻俩是两地分居的。但按照罗马贵族的标准，他们的婚姻肯定是很成功的，也许还是非常幸福的。科尔内利娅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当然叫作尤利娅。她是恺撒唯一一个合法的孩子，尽管她很重要，我们却不知道她的出生年份。史学家的估计从前83年到前76年不等，但晚一些的年份应该可能性更大。尤利娅于前59年结婚，那时她应当是十四五岁或者十八九岁。依据恺撒身处国外的时期推测，科尔内利娅怀上女儿的时间应当是前78年他从东方回国和前75年再次离开罗马之间。[2]

恺撒对科尔内利娅非常尊重，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拒不服从苏拉的命令，不肯与科尔内利娅离婚。在罗马的传统中，妻子理应受到尊重，但不一定会得到充满激情的挚爱，因为这种感情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可耻的。夫妻床第是制造下一代罗马儿童、延续家族血脉的场所，而肉欲的享受应当是在其他地方。这不是否认有些夫妻——或许甚至是大部分夫妻——多多少少有着很深的感情，并享受着活跃的性生活；而是说根据罗马贵族社会的理想观念，性爱并不是婚姻中特别重要的方面。人们普遍接受贵族阶层的丈夫们可以在妻子之外猎艳逐芳，而不去强求自己的妻子满足自己较为可耻的欲望。对比较年轻的男子（罗马人称之

为adulescens）来说尤其如此。尽管adulescens是英语中“青少年”（adolescent）的词根，但在罗马人的理解中，这个词指的是任何没有完全成熟的男人，可以包括将近四十岁的人。这些“青年”的行为举止可以略微放纵一些，而那些已经成年的共和国领导者必须更负责任，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私下里与女奴或妓女淫乐很少会受到批评。[3]

很多年轻贵族男子在婚后还金屋藏娇。有一个很明确的高级妓女（或称交际花）群体，依赖情人为他们提供宅邸（或者公寓）、仆役和财富。这些交际花常常受过很好的教育，机智风趣、魅力十足，擅长歌舞或演奏乐器，因此除了能为情人提供肉体愉悦之外，还能与之相伴。这种情人关系从来就不是长久的，成功的交际花会从一位情人和金主转到下一位。这让风月场更加刺激有趣，因为情人必须努力赢得情妇的欢心，然后还要对她关怀备至、馈赠礼物，以维持关系。最有名的交际花通常与罗马最重要的大人物过从甚密，因为包养情妇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元老。情夫和交际花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交际花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人们普遍相信，在前74年，执政官卢基乌斯·李锡尼·卢库鲁斯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个重要的行省总督职位，就是因为他用礼物和溜须拍马收买了普雷基娅——一位重要元老的情妇。这位元老是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基泰古斯，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他没有正式的官职，但凭借自己的威望以及对元老院程序的熟悉和利用，在元老院中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尽管这影响力也是暂时的）。情妇们还能够以其他方式扮演政治角色，如另一位交际花弗洛拉的经历所示。庞培年轻时曾疯狂地爱上弗洛拉。后来，她曾常常吹嘘说与庞培做爱后，她的背上常常会留下指甲抓痕。但庞培发现自己的一个叫作格米尼乌斯的朋友多次尝试引诱弗洛拉，就主动把她让给了格米尼乌斯。庞培对朋友十分慷慨，他再也没有拜访过弗洛拉，而欠了他人情的格米尼乌斯则成了一位有价值的政治支持者。这对庞培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牺牲，因为他仍然深深爱着弗洛拉。弗洛拉也仍然爱着庞培，据说她后来病了很长时间。情妇们的地位实质上是极不稳定的，因为即便她们有时能够赢得很大的

影响力，但她们毕竟没有法律地位，所以一旦失去了情人的爱慕，也就失势了。[4]

贵族男子包养交际花或者与女奴发生关系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种关系绝不会威胁现行的社会秩序，也不会破坏家庭。大多数交际花都出身卑贱，是发达起来的娼妓。她们常常是奴隶或曾经是奴隶，做过某种形式的伶人。前40年代中期，马克·安东尼曾深深爱上了一个叫作西塞莉丝的哑剧演员和舞者；她曾是奴隶，被恩主解放，并赐名沃鲁姆尼娅。安东尼带她到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在宴会上让她坐在贵宾席，几乎把她当作自己真正的妻子，这令西塞罗私下里长吁短叹。沃鲁姆尼娅后来成了刺杀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的情妇，还和其他著名元老有过情缘。贵族与情妇所生的孩子都是不合法的私生子，不会拥有父亲的姓氏，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要求父亲抚养。如果母亲是奴隶，那么孩子也是主人的财产。即使贵族阶层的丈夫可以如此这般地包养情妇，社会道德观念也不允许妻子享有相同的权利，因为她的孩子的血统绝不可以存在疑问。贞洁（指的是对丈夫，且仅对丈夫保持忠诚）是理性的罗马贵妇的主要品德之一。在更古老的时期，妇女一辈子都生活在父亲或丈夫的掌控之下；他们如果愿意，就可以将她们处死。到公元前1世纪，这种传统的、严峻的婚姻（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如同父亲对女儿一般）形式已经非常罕见。婚姻变得轻松了许多，离婚也更常见了，但妻子仍然被要求对丈夫保持绝对忠诚，哪怕丈夫常常在外寻欢作乐。[5]

恺撒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很可能也宠幸过交际花、女奴和其他女性。我们的史料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既然这种行为是司空见惯的，并不值得大书特书，所以没有记载下来。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常常斥巨资购买美丽的奴隶，就连恺撒自己也因如此靡费而感到羞耻，因此在账本中隐去了这些开销。苏埃托尼乌斯没有明说这些美丽的奴隶仅仅是装饰性的，还是要与主人同寝。但苏埃托尼乌斯确实告诉我们，人们“坚信不疑”，恺撒“性欲旺盛，超出常人”，而且他勾引了“许多名媛

贵妇”。苏埃托尼乌斯举了五个例子，说出了恺撒情妇的名字，她们都是重要元老的妻子，但还暗示说恺撒在情场的猎物远不止这些。被指名道姓的贵妇之一是特尔图拉，即克拉苏的妻子。在镇压奴隶起义的战争中，恺撒可能曾在克拉苏麾下服役。特尔图拉原是克拉苏一位长兄的妻子，这位长兄在内战中死去，于是克拉苏娶了寡嫂。特尔图拉可能比恺撒年长几岁，与克拉苏的婚姻按照贵族的标准也算是很成功的，生了几个孩子。她与恺撒的私情是何时开始的、维持了多久，我们都不清楚。关于恺撒生平这个方面的记载都是非常模糊的。我们也不知道，克拉苏自己是否知道被恺撒戴了绿帽子。不过恺撒风流成性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所以克拉苏有可能是知道的。假如他知道，他也没有对妻子的情夫采取任何行动，而是将恺撒收为自己的政治盟友。[6]

恺撒与有夫之妇的私情数量极多，但通常都不会维持多久，恺撒会不断地追逐新的情人。一个明确无误的例外是他与塞维利娅的关系，这段感情占据了恺撒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爱她胜过爱其他所有人”。塞维利娅的第一个丈夫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于前78年支持李必达的政变，失败后被处决了。成为寡妇的塞维利娅在前85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字也叫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最高贵的罗马人”，是前44年刺杀恺撒的密谋集团领导人之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塞维利娅还是小加图——他在二十多年中始终是恺撒的不共戴天之敌——的同母异父姐姐。恺撒非常喜爱布鲁图斯，即便后者在前49年～前48年的内战中反对他，这疼爱也丝毫未减。因此有长期流传的谣言称，恺撒其实就是布鲁图斯的生身父亲；普鲁塔克甚至暗示说，恺撒自己也对此信以为真。布鲁图斯出生的时候，恺撒只有十五岁，因此这肯定只是个传说，但这些故事的存在也说明恺撒和塞维利娅的关系是很早就建立起来的，可能是在前70年代。塞维利娅再婚之后，两人仍然维持着关系，但这也没有阻止恺撒与其他许多女人寻欢作乐。塞维利娅与恺撒显然是两情相悦、激情四射且维持了许久，尽管经过这么多年这爱意的强度会发生些许变化。这说明

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肉欲吸引。塞维利娅极其聪慧，对政治很感兴趣，一直在努力协助丈夫和儿子的政治生涯。她的三个女儿都嫁给了位高权重的元老。恺撒死后，塞维利娅也参加了布鲁图斯召开的议事会，商讨下一步应该如何是好，而且她的意见压倒了包括西塞罗在内的著名元老的意见。演说家西塞罗对一个女人在专属于男性的政治世界越权行事愤愤不平，但在其他一些时候也曾积极地就属于女性范畴的话题征询塞维利娅的意见。西塞罗及其家人在为他的女儿图利娅寻找合适的丈夫时，曾咨询过塞维利娅。图利娅后来因难产去世时，塞维利娅曾写信给悲痛的西塞罗，以示安慰。尽管作为女性不能担任官职，也不能正式掌权，塞维利娅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许多名门望族的关系和友谊。[7]

美丽、聪颖、满腹诗书、精明、雄心勃勃——这些词既可以用来形容恺撒，也适合描述塞维利娅。然而，塞维利娅的雄心是间接的，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自己家庭的男性成员追求荣耀。恺撒和塞维利娅在许多方面的确很相像，这部分解释了他们关系的亲近和长久。两人关系的长久足以说明恺撒对塞维利娅的爱比对其他情人深得多。除了与恺撒的私情之外，塞维利娅对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忠贞不贰。这与她的妹妹——按照常规，她也叫塞维利娅，这很容易混淆——形成了对照，后者因为放荡成性而被丈夫休了。恺撒勾引了许多有夫之妇。如果他对自己诸多情人中的一位或者所有情人都有过炽热的爱，那么这种爱很少能够长期维持；他的爱至少是兼收并蓄、高度博爱的。在此时的罗马社会，通奸和寻花问柳司空见惯，但恺撒猎艳活动的规模之大也算非常突出的了。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放荡不羁。最显而易见的回答是，他喜欢与许多美女享受性爱之乐。但这本身还不足以解释恺撒的风流成性，因为他完全可以玩弄女奴或者包养出身较卑贱的情妇，这样的话不会引起多少非议。比较优秀的交际花们除了能够满足男人的生理需求，还能谈笑风生地与他相伴。但是，引诱元老家庭的有夫之妇要冒很大风险，比如会招致臭名，而政敌可以利用恺撒的臭名来攻击他。根据传统习惯（尽管到这时法律已经不允许），丈夫

如果将妻子及其情夫抓奸在床，就有权将情夫杀死。如此直接地杀人是不大可能的，但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很可能成为奸夫的政敌。[8]

或许恰恰是这种被抓住的风险让偷情显得更刺激有趣。恺撒的逐芳猎艳甚至可以理解为政治竞争的延伸，他与其他元老的妻子上床，是为了证明自己不仅在广场上，而且在卧室内也比他们强。或许，恺撒是为了扼杀关于他屈从于尼科美德四世肉欲的传闻，而有意识地、肆无忌惮地玩弄女性。但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恺撒为什么主要在贵族女性那里追寻肉体满足。他能够追求的贵族女性几乎全都已婚，因为元老家庭的女儿在建立和加强政治纽带上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女孩年纪很小时就被嫁出去，而离婚或丧夫的青年或中年女子往往也会很快被安排再婚。只有那些年纪较大、有成年儿女的寡妇才被允许独居。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就是这样，塞维利娅在第二任丈夫去世后也单独生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罗马极少有单身的贵族女性可以供恺撒追逐。但是，罗马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元老们要担任一系列职务，其中很多职务需要他们多年待在海外，因此已婚妇女们往往要长期独守空房。

在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的妻子们能够享受相当大的自由。许多贵妇在丈夫的财产之外还有大量的私房钱，其中包括她们结婚时带来的嫁妆。嫁妆虽然补充了家庭收入，但始终独立于丈夫的财产之外。上文已经讲到，在这个时代，女孩接受与男孩同样的教育，至少在学术方面如此。因此她们能够熟练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对文学和文化也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但与兄弟们不同，女孩很少有机会出国深造，到伟大的希腊学术中心之一学习。由于很多哲学家和教师会在罗马长期逗留，所以不能出国学习也不算是太大的缺憾，何况还有传授各种文化技艺的学校。撒路斯提乌斯对一位元老夫人的描绘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女性：

> 其中有塞姆普罗尼娅，她做了许多男人才会做的鲁莽大胆之事，着实惊世骇俗。这个女人出身高贵、非常美丽，就像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一样得到命运恩宠；她饱读希腊和拉丁文学，擅长演奏里拉琴，舞姿优美（体面的妇女不应有这样高超的舞艺），还拥有许多其他方面

> 的天赋，注定会生活得多姿多彩。但她却视自己的荣誉和贞洁若粪土。很难说她在金钱和贞操中更看轻哪一个。她性欲旺盛，经常追逐男人，而不是被男人追逐……她常常背弃诺言、拖欠债款和参与谋杀。她囊中羞涩，却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因此走上了一条疯狂的道路。即便如此，她仍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会写诗、打趣，能够端庄地、温柔地或者放荡地与人交谈。总的来讲，她有许多突出的天赋和许多魅力。[9]

塞姆普罗尼娅嫁给了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是塞维利娅第一任丈夫的堂兄。塞姆普罗尼娅的儿子后来成为恺撒在高卢和内战期间的一名高级军团长，但后来转而反对恺撒，参与了对恺撒的行刺。恺撒无疑认识塞姆普罗尼娅，但他有没有追求她或者被她追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撒路斯提乌斯对塞姆普罗尼娅的描述饱含对她不守妇道和狂野放荡的谴责，但她的许多成就本身并不是坏事。普鲁塔克以钦佩的笔调描写了另一位贵妇，她青年守寡，后来再婚：

> 除了美艳可人的地方，这位少妇还有其他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她饱读诗书、琴艺精湛、擅长几何学、定期聆听哲学讲座，从中获益良多。对知识的兴趣往往让年轻女人产生令人不快的好奇心，她却完全没有这种令人讨厌的品质……[10]

如果一个女人头脑精明、有文化、机智敏锐或甚至懂得音乐舞蹈，都不会被认为是坏事，只要她们保持贞洁，也就是对丈夫忠贞不贰。但在恺撒的时代，许多女人并没有贞洁的美德。这一代妇女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受过更好的教育，但仍然被要求仅仅掌管家务。差不多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们就被安排结婚，然后由于丈夫去世或政治同盟关系的变化，再从一个丈夫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手中。如果能在婚姻中找到幸福和自我实现，那实在是太幸运了。妇女没有选举权，也不能从政，因此像塞维利娅那样的女人只能将自己对政治的浓厚兴趣转移到协助男性亲属的仕途上。在富庶的罗马，军事征服的战利品和财富都聚集于此，经济独立的贵妇们往往受到诱惑，互相攀比，极尽奢侈之事。有些贵妇则

追求刺激，与一个或多个情夫来往。

综合来看，恺撒可能从他的情妇们那里也寻求一定程度的陪伴和机智聪明的交流。有些优秀的交际花或许能满足这种要求，但在这方面，很少有交际花能和罗马豪门大户的千金小姐们相提并论。恺撒的风流韵事给他的不仅仅是性欲的满足，还有其他方面的刺激。前文已述的其他方面的刺激——与有夫之妇偷情的风险，给政界同僚们（他每天与这些人相处、与他们竞争）戴上绿帽子的额外乐趣——无疑也增加了他的愉悦。对坠入他的情网的女人们来说，恺撒魅力十足，很少有人能够抵御他的魅力。他可是恺撒，穿着打扮极有个性；他决定着时尚的基调，令许多青年争相效仿；他极其重视自己的仪表和姿态，永远与众不同。能够得到他的青睐（哪怕只是暂时的），贵妇们也感到受宠若惊；而他风流成性的坏名声也许更让妇人们感到刺激。不管根源是什么，他连续成功引诱多位贵妇，说明他的确是个本领高强的风月老手。不断寻找新的风流韵事，也可以理解是他的充沛精力和雄心的体现，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也许他始终在寻找一个能和他匹敌的人，让他的兴趣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塞维利娅与他在许多方面相似，显然比任何其他女人更接近他的理想情人，所以他们的关系才维持了那么久。但是，尽管双方互相爱慕，但各自都保持着一定的超脱和独立。恺撒遇刺身亡之后，尽管塞维利娅很可能哀悼了情人的死，但绝没有停止努力去促成儿子的事业。同样，尽管风流成性、纵情享乐，恺撒从来没有允许儿女情长影响自己对官职和地位的雄心。当然，关于他寻欢作乐的一些故事也有可能是假的。在他得到好色之徒的名声之后，说不定仅仅和一个女人待在一起，就可能会有人嚼舌根，说他们之间有奸情。

风水轮流转：庞培的崛起

总的来讲，苏拉死后的岁月对恺撒来说是春风得意的时期，他逐渐进入了政界。尽管他曾招致独裁官的怒火，但他已经被重新接纳，因此

没有理由加入仍然反对苏拉及其政权的阵营。他没有参加前78年李必达的反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西班牙加入反对派。马略和秦纳的许多支持者仍然在西班牙坚持抵抗。这些反对派的领导人是昆图斯·塞多留，他或许是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他将西班牙各部落争取到了自己这边，成功抵抗元老院的军队近十年之久。塞多留及其追随者都是被苏拉放逐的流亡者和难民，被苏拉的法令禁止返回罗马，也不可能重新进入政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尽管塞多留曾多次表达了思乡之情，希望能够回家，哪怕只当一名普通公民。虽然恺撒得罪了苏拉，但他家族的人脉关系使他仍然能够从政。因此，他没有必要加入绝望的反政府叛乱。[11]

这些年中，苏拉对共和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元老院几乎是他一手炮制的，所有未及时向他倒戈的政敌全被清洗出去，元老院挤满了他的党羽。他加强了元老院的地位，恢复了仅有元老可以担任法庭陪审员的制度，并严格限制保民官的权力。其他的立法，比如一项限制行省总督行为的法律，旨在防止任何其他将领效仿苏拉率领军队对抗国家。正式禁止此种行为，显然没有多少实际用处，西班牙持续的战争和李必达的叛乱就说明了这一点。苏拉没有办法撤销自己设立的前例，也不能消除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由于同盟者战争和内战，意大利依然风雨飘摇。大片地区饱受兵燹之苦，而新近获得公民权的意大利人还没能完全地、公平地融入公民团体。为了向自己的退伍老兵授予田地，苏拉没收了大量土地，剥夺了许多农民的财产。斯巴达克斯的奴隶大军连续几年的劫掠和袭扰使意大利乡村面临的问题越发严峻。[12]

在苏拉退隐之后，经他改革的元老院对重重危机的处理不是很好。在镇压奴隶起义的战争中，一支又一支的军队在合法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的指挥下，被奴隶起义军打得屁滚尿流，甚至惨遭全歼。为了赢得最终胜利，罗马人不得不采纳非常措施。两名执政官交出了指挥权，由克拉苏接替，尽管后者仅仅被选为地位较低的裁判官。这不符合常规，但

与格奈乌斯·庞培的平步青云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庞培是庞培·斯特拉波的儿子，生于前106年，在父亲麾下参加了同盟者战争。斯特拉波死后，庞培在秦纳的阵营待了一段时间，但受到猜疑，于是退隐到位于皮基努姆[13]的自家大庄园。前83年，苏拉在意大利登陆，庞培决定加入他的队伍。越来越多对秦纳政权不满的人或者预测到战争结局的人，都投奔了苏拉。与许多难民不同的是，二十三岁的庞培来到苏拉帐下，不是哀求搭救，而是作为有价值的盟友前来的。他自筹军费，从皮基努姆民众中征募了1个军团，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团。这种做法不论怎么说都是违法的，因为庞培只是个普通公民，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拥有军权的职位，无权征募或者指挥军队。他甚至根本不是元老。但借助家族的财富和影响力，以及自己的人格力量，他把事情办成了。庞培的父亲是他那个年代最不得民心的人之一，而庞培却深得士兵们爱戴。尽管他无权指挥他们，但士兵们对此不以为然。在南下投奔苏拉的行军途中，这位年轻的将军和他的私人军队很快就证明自己非常骁勇善战。

苏拉毫无顾虑地将庞培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先后派遣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作战。在每一场战役中，这位闯劲十足的年轻将领都轻松取胜。苏拉为他欢呼，称他为“伟大的庞培”（苏拉这么说也许带有讽刺的意味，但苏拉的性格如此复杂，实在让人难以确定他的真正意思），并允许他举行凯旋式。对一个并不拥有合法军权的人来说，凯旋式着实是史无前例的荣耀。在这些年里，庞培春风得意、扬名立威；但同时他残忍的名声也传扬出去，据说他在俘获尊贵的元老后将其处死，从中获得虐待狂的快感。在有些人眼中，他不是什么“伟大的庞培”，而是“年轻的刽子手”。与恺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庞培服从了独裁官的命令，与妻子离婚，改娶了独裁官的继女。这位新娘当时已经是有夫之妇，而且怀着孕，在与庞培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即便如此，这仍然标志着苏拉对庞培的恩宠。虽然独裁官授予他许多荣耀，但庞培没有被吸纳进元老院，仍然是普通公民（不过能够动用自己的私人军队）。但他对政治兴趣盎然，支持李必达竞选前78年的执政官。李必达

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庞培的支持。但当李必达转而反对元老院的时候，庞培迅速与他划清了界限。面对李必达的叛乱，自己手中又没有足够的军队来进行反抗，苏拉党人控制下的元老院不得不依赖庞培及其军队。二十八岁的庞培像在之前历次战役中表现的那样，势如破竹地击溃了李必达及其军队。庞培惯常的残酷又一次显露出来，比如他在此役中处决了塞维利娅的第一任丈夫马尔库斯·布鲁图斯。[14]

此次得胜之后，庞培又怂恿元老院派他去西班牙镇压塞多留，去支援已经在那里指挥作战的、通过常规途经获得任职的总督。前77年的两位执政官都不愿意去西班牙作战，这对庞培的帮助很大。这一次，庞培被授予资深执政官的军权，他的地位得到了合法化。一位支持他的元老打趣地说，庞培此行不是作为资深执政官去的，而是“代替两位执政官”而去。庞培过去曾面对的敌人在军事上都昏庸无能，但是在西班牙，塞多留是个更难对付的敌手，庞培第一次遭受了一些挫折。对这样一位屡战屡胜、春风得意的将领来说，尝到败绩的确是极大的耻辱；但年轻的庞培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对敌手产生了尊重，但并没有一丝的畏惧。西班牙战争残酷且漫长，但随着一年年过去，庞培和元老院的其他军队逐渐取得进展，对马略派军队占了上风。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塞多留在前72年被部下谋杀，战争很可能还要持续几年。塞多留死去之后，杀害他的凶手自己指挥马略派军队，此人野心勃勃且极端倨傲，却志大才疏，几个月间就败给了庞培。庞培于次年返回意大利，恰好拦截和歼灭了数千名斯巴达克斯的残兵败将。有了这场小小的胜利，庞培很快就公开夸耀自己：是他而不是克拉苏，最终结束了奴隶起义。

庞培和克拉苏之间的宿怨可以追溯到内战期间，当时他们都是苏拉麾下的将领。克拉苏比庞培年长六七岁，看到这个过分张扬的小弟获得了如此多的荣誉、吸引了这么多的眼球，不禁怀恨在心。庞培竟然要抢走战胜斯巴达克斯的功劳，克拉苏自然是愤愤不平。这个事件揭示了庞培个性中比较卑鄙的一面，他曾多次企图抢夺其他人的荣耀。其实庞培

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打赢西班牙的战争比镇压斯巴达克斯的威望要高得多；战胜西班牙为他赢得了第二次凯旋式，而克拉苏仅仅得到了小凯旋式[15]而已。但庞培对元老院和公民们的赞颂心花怒放，不愿意被任何人抢走风头，哪怕只是一瞬间。庞培很讨人喜欢，他的圆脸庞虽然没有古典美，但被认为非常直率和英俊。熟悉他的人会更加小心，因为他在公共场合的发言并不总是与他的行动相符，而且他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相反，克拉苏受到尊敬，虽然并不非常讨喜，但他言出必行，不会辜负他人，同时也绝不会忘记别人欠他的金钱或者好处。庞培在有些方面相当不成熟，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他第一次凯旋式的时候，他打算乘坐一辆大象战车。如果不是凯旋路线上的一座拱门的高度不容许如此庞大的巨兽通过，他还真能做出这么怪诞的事情。他很喜欢“伟大”这个称号，也非常高兴听到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他有的时候特别刁滑奸诈，这对指挥打仗的将军来说不是坏事，但他不是特别擅长罗马的政治游戏。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几乎不间断地打仗。从二十三岁起，他就亲自指挥军队，大部分时间里都远离任何上级，独立作战。庞培习惯于发号施令，而不习惯使用计谋操纵或者说服他人。与其他年轻贵族不一样的是，他很少有机会观察元老院和广场的日常运作，没有时间向年纪较长的元老学习政治活动是如何开展的。但从西班牙回国后，他认为正式踏入政界的时机到了。

前71年，庞培三十五岁，但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民选官职，而且仍然属于骑士阶层，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吸纳进元老院。他宣布将参加次年执政官的竞选，这直接违背了苏拉对从政的规定。苏拉的政策确认了之前的相关立法：参选执政官的人必须符合的条件是年龄不小于四十二岁，并且已经担任过财务官和裁判官。克拉苏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宣布准备竞选，他符合年龄的要求。庞培到目前为止的履历完全与苏拉制定的规则相左。克拉苏和庞培各自带着自己的军队驻扎在罗马城外，这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在等待举行自己的小凯旋式和凯旋式。双方都没有

公开地威胁对方，但自从苏拉率军进攻罗马城消灭了自己的政敌以来，人们一直担忧其他人会效仿苏拉。庞培和克拉苏暂时搁置了互相之间的芥蒂，联合竞选执政官，很少有人愿意反对他们。克拉苏显然是凭借镇压奴隶起义的成功获得了这个官职，而庞培被许多民众奉为英雄。让并非元老的人获得这个身份并同时成为执政官，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情；但如果让一个已经连续担任多个高级指挥官职位的人再去当下级行政长官，也很荒唐。元老院免除了对他们的年龄和其他方面的资格要求——他们都需要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参加竞选，因为他们如果要进城就必须交出军权，而交出军权则意味着解散各自的军队。一旦解散了军队，他们就没办法举行凯旋式。于是，庞培和克拉苏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执政官。

苏拉在自己制定的从政规则之外，允许庞培保有一个颇不符合常规的地位。在随后的年月中，元老院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向这种违规行为发出挑战。共和国体制中始终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军事危机时期。授予庞培的超乎寻常的荣誉和破格晋升是针对他个人的，并不意味着规章制度已经被摈弃、所有人都可以效仿庞培。即便是在当选之前，庞培和克拉苏也已经宣布，他们打算废除苏拉制度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他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了平民保民官的传统权益和权力。这是广得民心的措施，所以恺撒在担任军事保民官期间支持这项事业。前70年，奥雷利娅的一位亲戚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通过了一项措施，解决了争议极大的陪审团构成问题，无疑也得到了庞培和克拉苏的批准。从此刻到共和国覆灭，陪审团成员由三个阶层的成员组成——元老、骑士和仅次于骑士的有产阶级，而且三个阶层在陪审团中人数均等。这项措施也颇得民心，被认为是一个理智的妥协方案。这一年选举产生了两名监察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两名监察官都是前72年的执政官，都曾被斯巴达克斯打败，但这并没有严重影响他们此后的仕途。尽管人口普查要在一年多之后才能完成，但登记在册、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的数量已经激增。上一次未彻底完成的人

口普查是在前85年举行的，当时仅有46.3万名公民，而新的数字已经差不多翻倍，达到91万人。作为普查的一部分，监察官还负责审核和修订元老的花名册，增添新元老，并将行为不端或有道德问题而不适合继续指导共和国的人罢免。多达64人受到了这样的惩罚。[16]

尽管庞培和克拉苏联手竞选执政官，而且合作恢复了平民保民官的职权，但他们互相的憎恶和嫉妒很快就浮出水面。较年轻的庞培新官上任便耍了一番富丽堂皇的排场。他在同一天之内做了三件事情：就任执政官、加入元老院和举行凯旋式。然后，新的监察官决定恢复一种老式仪式（无疑受到了庞培的极力鼓动）：让骑士们佩带兵器策马列队行进，以展示自己承担传统义务（在罗马军队中担任骑兵）的决心。盛典进行之时，庞培威风凛凛地驾到，前方由十二名伺候执政官的执法吏[17] 开道，引导他走到监察官面前。监察官按照仪式规矩正式地询问他有没有对共和国尽到义务。庞培声若洪钟地答道，无论罗马需要他去哪里，他都在那里为罗马效劳，并且可以始终独当一面。群众欢呼雀跃，监察官陪伴他走到自己家中。这是一场辉煌的政治大戏，再加上他的凯旋式以及作为庆祝的斗兽和角斗表演，克拉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克拉苏的对策是将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赫拉克勒斯，并自掏腰包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宴会（餐桌多达一万张，摆满各色饮食），并向所有公民免费发放三个月的粮食。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与胜利和凯旋密切相关，上一个以这种方式庆祝军事胜利的人是苏拉。两位执政官绞尽脑汁地想要独占风头、压倒对手，他们的关系极其冷淡；到任期结束时，在一个叫作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的人的呼吁下（我们对此人的其他事迹一无所知），他们才公开做了一次和解。两人卸任后都退隐了，都不愿意遵照常规在结束高级行政长官的任期之后去外省当总督。[18]

恺撒担任财务官

对于恺撒在前71年至前70年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庞培和克

拉苏担任执政官期间，恺撒曾支持过普洛提乌斯（或称普劳提乌斯）提出的一项旨在允许流亡在外的塞多留党人与李必达党人回国的法案。恺撒发表了一次演讲，支持这项法案，这对他个人来说也很有意义；因为法案若是通过，他的内兄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就可以回国了。这份演讲稿只有一句话保存至今：“依鄙人愚见，就我们的关系，我始终兢兢业业、勤恳行事。”对自己所在的大家族以及对朋友和门客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者推测，恺撒在这背后还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也许他曾鼓励庞培和克拉苏联手角逐执政官的职位。甚至有人推断，是恺撒安排了庞培和克拉苏的和解，因为上文提到的盖乌斯·奥雷利乌斯与恺撒母亲的家族有亲戚关系。这当然并非绝不可能，但史料不曾提及恺撒参与此事，所以这只是猜测而已。[19]

我们知道，大约在这一时期，恺撒参加了财务官竞选，这或许是他此时主要关心的事情。前70年，他三十岁，这是符合苏拉规定的参选财务官的最低年龄。一位贵族如果在刚刚达到参选最低年龄的那一年当选，那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因此，恺撒极有可能在前70年秋季当选了20名财务官之一，并于前69年初上任。执政官的选举一般是在7月底进行，但没有固定的日期。每年有大约150天可以召开罗马公民大会，但如果增添额外的节日或进行公共感恩活动（其间不可以开展任何政务），那么可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就会减少。较低的职位如财务官，是在执政官选举后不久召开的另一种公民大会上决定的。拉票活动可能在选举一年前就开始了，但在投票前的最后24天内尤其激烈。在这期间，候选人在负责监督选举的行政长官那里正式登记之后，会换上一种特别的白色托加袍［toga candidus，意思是“纯白的托加袍”，英语中“候选人”（candidate）一词就来源于此］，好让他们在广场活动时特别显眼。候选人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心走来走去，问候其他公民，尤其是那些富裕的、有地位的，在投票中特别有影响力的人士。候选人身后一般会站着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称为“指名者”。当有人走近时，指名者会向候选人小声提示来人的姓名，好让候选人以恰当的方式问候他

们。几乎所有候选人都依赖这种奴隶，但优秀的政治家会尽可能掩饰自己对这种辅助记忆方式的依赖。候选人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和谁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候选人拉票的时候，支持他的其他元老一般会陪伴他，这些支持者的威望有助于笼络选民。候选人的支持者还会在房屋墙壁上涂写支持他的标语，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微妙含蓄，显得太露骨了。进入罗马城的主路两侧有许多墓地，上面常有禁止在墓地涂写或张贴竞选标语的警示。[20]

财务官是由部落会议选举产生的，即罗马公民三十五个部落的大会。如果是为了选举行政长官，而不是支持或反对某项立法，部落会议的集会地点一般是战神广场，即位于城市西北部正式边界之外的一个开阔地，主要是园林和操练场。这可能是因为在选举的时候，到场投票的人会很多，狭窄广场的人员承载量不够。候选人可能会有机会向在场选民发表演讲（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然后主持选举的行政长官会发出命令："公民们，各就各位！"于是各部落的成员就集合到各自的临时围场。投票的时候，部落的每一位成员会依次离开自己部落的围场，走过一条狭窄的、较高的过道（称为"桥梁"），到负责监督每个部落投票的监票人面前。然后，选民将自己手写的选票放入一个篮子。被称为"守护者"的官员会监督着选民；这些官员随后还负责计票，并向主持选举的行政长官汇报结果。每个部落作为一个团体来投票，各部落的选择按照事先抽签决定的顺序公布。各部落的人数差距相当大，四个城市部落中即便是最穷的成员也可以轻松参加选举，不会受到多少阻碍。但现在大多数罗马公民都居住在远离罗马城的地方，所以其他部落中只有最富裕的成员才有能力或愿意旅行到罗马去参加选举。这些人的投票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目前居住在罗马城但仍然属于乡村部落的穷人的投票也很重要。尽管各部落能够到场投票的人数差别很大，但每个部落投票的权重是相同的。对一位贵族来说，赢得自己部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恺撒所在的是法比亚部落——因此他们会努力去笼络自己部落的同胞。选举不是由总体多数票决定的，而是当空缺的职位有了足够的候选

人去填充，这些候选人各自都赢得了十八个部落的支持之后，就算结束了。这的确算是多数制投票。[21]

恺撒的胜算很大。他在法庭上表现出色，在东方还立过战功。关于尼科美德四世的丑闻，以及其他风流韵事的传言，至少使他声名远播，当然奇装异服也起到了这个作用。他的家族不属于元老院的内层贵族圈子，但尤利乌斯·恺撒家族在近些年也出了一些行政长官。其中一些人来自家族的另外一个分支，但这仍然意味着恺撒家族的名字始终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他母亲的亲戚们在政坛春风得意，最近五年出了两名执政官，还有一人在前70年担任裁判官。每年要选举产生二十名财务官，这是最容易当选的职位了。意大利人获得公民权之后，许多富家子弟来到罗马，希望进入政界，但根基牢固的罗马贵族世家成员不必害怕这些人的竞争。恺撒顺利当选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苏拉的政治改革保证了所有财务官都自动获得元老身份。财务官负责一系列财务和行政工作，但大多数财务官都兼任一位行省总督的副手，而行省总督一般是前任执政官或前任裁判官。于是，恺撒被派往外西班牙，即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西边的一个省。[22]

前69年，在离开罗马之前，恺撒在家庭生活方面遭到了两次打击：他的姑姑尤利娅和妻子科尔内利娅相继去世。贵族家庭的葬礼都会大操大办，利用这个机会来宣扬整个家族的丰功伟绩，提醒选民们，他们曾有过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将来又会如何前程似锦。出殡的队伍中有身穿官袍、面戴祖先面具的演员。队伍先走到广场，在那里会有人在演讲台发表演讲。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

> ……致悼词的人讲完死者的生前事迹后，会叙述他的祖先（他们的形象会由在场的演员来饰演）的成功业绩，从最古老的远祖开始讲。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不断重述勇士们的美名，那些曾经缔造丰功伟绩的人能够永垂不朽，而那些为祖国做过贡献的人也能威名传扬，成为留给后人的遗产。[23]

在尤利娅的葬礼上，恺撒站在演讲台，讲到了她显赫的祖先（尤利乌斯氏族是女神维纳斯的后嗣），以及她母亲的家族与上古先王的关系。这些话是在提醒前来送葬的人们，他的血统是多么古老而高贵。比较有争议的是，他在送葬队伍中加入了象征马略胜利的纪念物，或许还让一名演员扮演马略。苏拉曾禁止公开尊崇他的竞争对手，但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表示了抗议，而且在遭到其他人的斥责后就闭嘴了。苏拉虽然打赢了内战，但并没有争取到许多民心，甚至在罗马精英阶层中也有很多人不买他的账。罗马公民们对他的所有决策并非照单全收，比如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得到了广泛支持就是一个例证。在很多罗马人心目中，马略仍然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他让在阿非利加受挫的罗马人重新扬眉吐气，又从北方蛮族的威胁下挽救了意大利。西塞罗曾严厉抨击马略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但在自己的演讲中常常热情洋溢地讴歌马略对朱古达和辛布里人的胜利，因为他知道听众一定会赞同。恺撒宣扬马略功绩的姿态受到了普遍欢迎，他强调自己与这位大英雄的紧密联系，也有助于赢得民众的好感。[24]

贵族世家的老年贵妇去世后得到一场风风光光的公开葬礼，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恺撒授予科尔内利娅同样的荣耀，就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了。据普鲁塔克说，恺撒是第一个为如此年轻的女人公开举办盛大葬礼的罗马人。这个姿态也非常得民心，很多人把这视为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的哀恸表达。虽然在世人眼中，罗马人的特质就是严峻而冷淡，但其实他们常常颇为多愁善感。葬礼就像贵族生活的许多环节一样，也是公开举行的，对政治也会产生影响。在恺撒的青年时代，没有亲近的男性亲属去世，因此在这层意义上说，姑姑和妻子的葬礼也是一个自我宣扬的良机。恺撒抓住了这个机遇，尽其所能地加以利用。这并不是说他的哀恸是虚伪的，因为在罗马，情感和政治常常可以和谐共存。他与科尔内利娅的婚姻很成功，或许也是非常恩爱的。但史料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妻子去世后才开始寻芳猎艳；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他极有可能已经有了几段私情。我们不知道他在科尔内利娅的葬礼队伍中有没有展示岳

父秦纳的纪念物，就像前不久在尤利娅的葬礼上展示秦纳的盟友马略的纪念物那样。马略更能触动广大群众的情感，因此对恺撒来说，他与马略的关系重要得多。

前69年春季或初夏，恺撒动身前往外西班牙，可能是和他即将为之效力的总督安梯斯提乌斯·维图斯一起去的。总督们常在已经当选的财务官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人选。有可能是维图斯将恺撒挑到了自己的幕僚当中，他们可能之前就有交情。两人交情甚笃，七年后，恺撒在卸去裁判官职务并开始就任外西班牙总督的时候，提携维图斯的儿子做自己的财务官。财务官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主管行省的账目，但他有可能被派去作为总督的代表，参加五花八门的活动。总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周游各个主要城镇、听取请愿申诉、解决问题以及主持司法工作。维图斯派遣恺撒去一些地方处理了司法事务。恺撒很好地完成了所有任务，二十多年后，当地人还会记得恺撒对他们的贡献。担任财务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在外省的权贵显要中收纳许多门客。

我们知道，恺撒是在西班牙任职期间第一次受到了癫痫病的折磨，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在前69年，还是他于前61年～前60年担任行省总督的时候。在他担任财务官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尽管普鲁塔克把此事发生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即在他造访加的斯城主持当地法庭期间。据说，恺撒在赫拉克勒斯神庙看到了一座亚历山大大帝的塑像，不禁潸然泪下，因为马其顿国王在同样的年龄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而他却还没有什么成就。更令他心烦意乱的是，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强暴了母亲奥雷利娅。他惴惴不安地去请教一位预言家，后者将他的梦解释为“他注定会统治世界，因为被他强暴的母亲代表着大地母亲，即万物的母亲”。苏埃托尼乌斯说，正是这个梦促使他提前离开了外省，急于返回罗马政坛去奋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很可能得到了维图斯的批准，因为似乎没有人批评或指责恺撒抛弃了自己的岗位。他对行省账目的审查可能已经结束了，所以他的主要使命都已经圆满完成。总的来

讲，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位财务官的活动对罗马选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25]

纪念建筑与角斗士：作为市政官的恺撒

在返回意大利途中，恺撒在波河以北高卢（波河河谷地区）短暂停留。此地是内高卢[26]行省的一部分，这是唯一一个在意大利半岛的行省。此地的居民既有罗马和意大利殖民者的后代，也有高卢部落。到此时，这些高卢部落中的名门望族在文化上已经高度罗马化了。同盟者战争结束之后，许多社区获得了公民权，但这种恩惠只到波河一线为止，波河以北的社区仍然只有拉丁人的地位。波河以北高卢的当地人对此非常不满，尤其是富裕和有势力的人，因为他们从完整的公民权中获利最大。恺撒鼓动了当地人的这种不满情绪，因为将来他会需要富裕新公民们的选票。有人说他极力煽动波河以北高卢，几乎将其推到揭竿而起的边缘，仅仅是由于附近驻扎着一支罗马军队，才没有公开叛乱。这种说法很不具有真实性，很可能是后人附会，是基于恺撒始终企图掀起革命的论断。恺撒曾拒绝参加李必达和塞多留的叛乱，因此不大可能会自己发动一场叛乱。在他政治生涯的这个阶段，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27]

回到罗马之后，恺撒开始做的几件事情包括再婚。他的新娘是庞培娅，是苏拉的外孙女，也是昆图斯·庞培（于前88年和苏拉同时担任执政官）的孙女。因此，尽管恺撒大肆宣扬自己与马略的亲戚关系，并且支持旨在破坏苏拉政权的立法，我们仍然很难简单地把恺撒算作马略党人，也不能说他是苏拉的反对派。即便是在内战肆虐的时候，罗马的政治也很少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元老们结婚的时候几乎总是着眼于这门婚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有价值的关系。我们对庞培娅的亲戚不是很了解，很难准确地理解恺撒对这门婚姻的想法，新娘能够如何帮助他的仕途，毕竟贵族家庭之间的关系网是极其复杂的。恺撒与科尔内利娅结婚时举

行了“麦饼婚”仪式，第二次结婚则不是这样。我们对罗马的传统婚礼仪式相当了解，但不知道恺撒于前67年举办的婚礼是否遵循了所有规则。与罗马的私人和政治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相同，婚礼上也要向神祇献祭，并听取神谕。按照传统，新娘要穿橘黄色拖鞋和家织的裙子，腰带上打着复杂的“赫拉克勒斯”结，让新郎在新婚之夜将其解开。如果庞培娅遵循了传统习俗，她的头发会被梳成六根辫子，并以亮橘黄色面纱遮盖。顺便说一下，如果恺撒真的成了朱庇特祭司，那么科尔内利娅离开家的时候要始终佩戴这种面纱。庞培娅会在被火炬照亮的队伍中，在亲人陪伴下从娘家走到新郎的住处，新郎会在那里等候。新娘抵达的时候，新郎家的门柱会饰有木制环，并涂上油或动物油脂。然后新娘被抱过门槛，这个习俗据说可以追溯到罗马人掳掠萨宾女人的故事。最初罗马人只能把邻近社区的女儿们抢来当老婆，因此最早的罗马新娘们是被迫来到新家的。这种习俗一直流传到现代，尽管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它所谓的起源。但罗马人的风俗与现代人不同，抱新娘的是新娘的侍从而不是新郎本人。

新郎等在门前，手执火炬，并备好盛满水的器皿，象征着他愿意为新娘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婚礼仪式一般都比较短暂。传统的仪式非常淳朴简单，新娘说出宣言：“你是盖乌斯，我是盖娅。”盖乌斯和盖娅分别是一个普通名字的阳性和阴性形式，象征着一对夫妇的喜结连理。宅邸的会客厅内摆放着一张象征性的新床，装饰华美，不过夫妻俩显然不会真的在这张床上度过新婚之夜，而是会到正式的卧室（有些希腊人相信，罗马的新郎会熄灭所有的灯，在他来到新床与新娘共度良宵之前，房间一片漆黑。据说这是对良家女子表示尊重，她不会像妓女一样，仅仅能提供肉体愉悦。或许这只是希腊人好奇地议论罗马人时讲的一个故事）。次日早上，新婚妻子第一次向夫家的家庭守护神祇（拉瑞斯和皮纳特斯）献祭。她和丈夫还会宴请宾客。[28]

庞培娅与伟大的庞培只是远亲，两家之间非常疏远，所以恺撒的第

二段婚姻并没有让他与罗马当时最伟大、最受爱戴的名将直接拉上关系。卸去执政官职务之后的两年，庞培似乎安于现状，尽管他在元老院中表现平平。到前67年，他显然在怀念胜利曾经给自己带来的万民赞颂，于是开始寻求获得一个新的指挥岗位。他到目前为止的功业辉煌灿烂，因此他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按照常规治理一个行省，而是需要更宏伟的事业。地中海仍然饱受海盗袭扰，一位名叫奥卢斯·加比尼乌斯的保民官提议设立一个特别指挥部，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海盗问题。这并不完全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元老院曾派遣前74年的执政官之一马克·安东尼（恺撒麾下大将马克·安东尼的父亲）流动作战，专门清剿海盗。但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在前72年遭到一次惨败，不久之后就死去了。局势持续恶化，威胁到了罗马依赖的粮食进口交通线。加比尼乌斯提议的目的并不新颖，但其细节非常激进，授予新的指挥官统领数量庞大的船只和军队，以及横跨整个地中海和从海边深入内陆50里范围内的军权。他的权力至少相当于所有辖地在此范围之内的行省总督权力的总和，甚至比那还高。加比尼乌斯在其最初的提议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庞培，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显然是唯一的人选。许多重要元老反对这一措施，宣称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将如此之大的权力托付给单独一个人，是个错误。和以往一样，充满惰性的元老院宁愿让严重的问题继续恶化下去，也不愿意看到有人解决问题、建功立业。[29]

据说，恺撒是唯一一个公开表示支持此法案的元老。保民官加比尼乌斯在广场上企图说服群众支持自己的时候，无疑请了恺撒为他摇旗呐喊。公民以部落会议的形式再次聚集之后，热情洋溢地通过了这项法案。说除了恺撒之外没有一位元老支持这项法案的确是不大可能的，但恺撒可能是特别坚决、表达特别强烈的支持者之一。和以往一样，他特别注重站在得民心的决策那边，而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告诉他，海盗的威胁是多么严重。据说，法案通过之后，罗马的粮价立即跌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可见市场对庞培信心十足。许多有权势的元老为庞培完成使命提供了重要帮助，为庞培配备的二十四名军团长可谓精英荟萃。这

表明，应该不是只有恺撒一个人支持加比尼乌斯的法案。庞培开始将自己的组织天赋投入实践，去解决问题。他的表现完全值得人民的信任。他将地中海划分为若干区域，仅仅几周之内就扫清了意大利以西海域的海盗。而击败困扰地中海东部的海盗的战斗也只用了比这多一点的时间。得胜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就是，庞培很愿意接受海盗及其家眷的投降，把他们安置在肥沃的农田上，往往是在新的社区中，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而不需要用暴力来谋生计。庞培又一次成了共和国万众敬仰的大英雄，但他狭窄的心胸又一次表现了出来。克里特的行省总督击败了该岛上的海盗，庞培却不肯承认他的功劳。这位总督的胜利只是刺激了庞培对更多荣耀的胃口。[30]

前66年，一名叫作盖乌斯·马尼利乌斯的保民官利用庞培和克拉苏重新赋予保民官的权力，向公民大会提出了一项法案。自前74年以来，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争由卢基乌斯·李锡尼·卢库鲁斯指挥，前文说到，他是通过交际花普雷基娅的帮助才得到了这个职位。卢库鲁斯是苏拉的亲信，很可能是前88年苏拉第一次进军罗马时唯一一个陪伴在苏拉身边的元老。卢库鲁斯是一位勇敢且颇有谋略的将军，有着战略和战术才华，却没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在历次战役中，卢库鲁斯连续多次击败米特里达梯六世及其盟友——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但他始终不能像马略、苏拉和庞培那样赢得麾下官兵的爱戴。更危险的是，他非常严密地管制了亚细亚境内罗马商人与包税人的活动。这些群体势力很大，已经习惯了和当地总督官商勾结、剥削民众，因此他们对卢库鲁斯颇为怨恨。卢库鲁斯非常担心疏远当地居民，害怕他们会把米特里达梯六世看作将他们从罗马的压迫下挽救出来的解放者。但很多富商更看重利润，而不是这样的政治考虑。于是从前69年起，卢库鲁斯的指挥权就被逐渐削减，他的辖区一个个被夺走，交给其他总督。他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之前在战争中占据的大片土地都相继沦陷，最终的胜利越来越遥远了。在这种局面下，派遣庞培去执掌大局，一劳永逸地解决米特里达梯六世，是个很有诱惑力的设想。恺撒又一次支持这项法案，法案也轻松

通过了。庞培取代了卢库鲁斯，又一次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战争差不多已经打赢的时候，庞培赶来摘桃子，夺走了其他人的功劳。[31]

恺撒对前67年和前66年授予庞培超常权力的法案均表示了支持，但他的意见应该对这些问题的投票结果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当时有许多前任财务官，还有几位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蔑视常规的年轻元老。我们还要牢记，在这个时期，恺撒的地位还不是很重要。他目前为止的记录表明，他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好前程，但有希望高升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个。发表演讲支持《加比尼乌斯法》和《马尼利乌斯法》也不大可能为恺撒赢得庞培的深深感激，因为恺撒起到的作用很小；虽然这两项法律都颇有争议，一些重要元老在元老院和广场大声疾呼表示反对，吸引了许多眼球。恺撒抓住机会去争取世人的关注，并将自己与这两部法律和庞培的成功联系起来。庞培广受拥戴，那么支持庞培也许会给恺撒带来名望的提升，让他沾上一点好运。更重要的是，他的观点与许多公民的观点相同，包括很多骑士和其他比较富裕的罗马人，这些人的投票在公民大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以这种方式支持广受民众欢迎的事业，意味着他成了一名平民派。较早的研究著作中常将平民派描绘为一个几乎是有明确定义的政党或群体，但其实平民派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倾向，即依赖群众的支持。格拉古兄弟就是平民派，马略有时是，萨图尔尼努斯和苏尔皮基乌斯也是平民派。尽管这些人曾提出相同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共同观念。恺撒从政治生涯早期就倾向于平民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行事类似的其他人就是同党，因为持他这种政治态度的人还有很多。政治在实质上仍然是各自为战的斗争，其他所有人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不仅仅是赢得群众支持的问题，而是要比其他人赢得更多的支持。[32]

恺撒笼络选民的另一种手段是花费巨资。他被委派为阿庇乌斯大道的管理者，花了不少自己的私人财产去翻新和改良道路及其附属建筑。他的钱不是白花的，如此投资的回报会很大，因为阿庇乌斯大道仍然是

通往罗马的最重要道路之一；旅行到罗马城的选民们会记起，恺撒为他们做过什么。愿意自掏腰包去为其他公民谋福利，这无疑推动了他在前65年当选席位市政官（curule aedile）。市政官职位共有四个，但其中有两个是平民专有，而恺撒是贵族，不符合资格。而平民和贵族均可担任席位市政官，席位市政官可以像裁判官和执政官一样坐在行政长官的高座上。苏拉并没有将市政官定为晋升体系中必需的一步，也就是说，如果要担任更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不一定需要当过市政官。但苏拉将担任市政官的最低年龄设定为三十七岁。恺撒成为市政官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他极有可能获得了元老院的特别许可，才得以提前两年竞选市政官。这种破格照顾似乎相当常见，以至于在前67年一名保民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元老院做这种破格批准，除非在场的元老达到200人的法定人数。恺撒得到这样的照顾，或许是由于他母亲家族的影响、橡叶冠获得者的荣耀以及他的祭司身份。有些学者利用恺撒担任市政官的时间作为证据，认为恺撒的出生年份是前102年。这与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证据不吻合，比如如果恺撒晚了两年才当上财务官，就有些奇怪了。[33]

市政官的职责几乎全部与罗马城的管理有关，负责监管神庙的维护，道路、高架渠和下水道的清扫和养护，监督粮食供应、市场活动，甚至妓院的经营。另外，市政官有时还会承担司法职责，但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个官职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负责公共娱乐和节庆活动。两名席位市政官特别要负责主持4月间纪念大神母库柏勒[34]的七天节日（美珈利西亚节，包括竞技和表演），以及9月的十五天“罗马节庆”娱乐活动。尽管国库会给行政长官提供资金来支付这些娱乐活动的开销，但长期以来的惯例是市政官自掏腰包，以补充国库的专项资金。每一位希望声名远扬的市政官都竭尽全力地举办最奢华的娱乐活动，这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他的继任者们会努力与之匹敌或者超过他们。恺撒就像一位天生的剧团经理，活力四射地投入到表演的准备工作中去，并决心绝不节约开支。他私人收藏的大部分艺术品都被放到广场及

其周围的会堂陈列，并专门为此搭建了临时的柱廊。此时的罗马还没有希腊城市中那样宏伟的剧场，因此需要搭建看台和临时礼堂。另一位席位市政官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也承担了部分费用，与恺撒联手组织斗兽表演和戏剧演出。但毕布路斯抱怨说，全部的功劳和风头似乎都被恺撒独占了。据说毕布路斯曾评论道，就像神的双生子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的神庙一样，为了顺口而被人们简称为卡斯托耳神庙；大家嘴里说的总是市政官恺撒，而不是市政官恺撒和毕布路斯。[35]

恺撒在担任市政官期间决定举办角斗表演，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在大约二十年前辞世）。角斗表演的起源是葬礼上的表演。起初这种表演只是私人的、家庭内部的活动，但到前3世纪末演化成了公开表演的盛景，规模迅速扩大，也越来越恢宏壮观。根据传统，只有在纪念去世的亲人时才可以举行角斗表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恺撒的时代。而斗兽表演可以在多种不同的场合举行。但缅怀先人只是个借口而已，角斗表演这种凶残的娱乐在罗马和整个意大利都非常风靡。但恺撒的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年了，隔了这么久突然宣布要举办角斗表演，肯定是十分不寻常的事情。但在很多方面，更令人咂舌的是他计划的宏大规模。他从意大利各地搜罗了许多角斗士，令元老院为之惴惴不安。大家对斯巴达克斯起义还记忆犹新，有人甚至害怕，像恺撒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在罗马城内掌握着这么多武装人员，会不会对政府不利。或许更重要的是，其他元老不愿意允许恺撒如此大操大办，因为这会让观众的期望值增高，以后其他人再想用表演来争取群众的欢心，代价必然会更高昂，也会更困难。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对任何个人举办的表演中的角斗士人数做了限制。史料告诉我们，即便如此，还是有多达320对角斗士在恺撒举办的表演中登场，而且他们全都装备了精美的镶银铠甲。在恺撒与毕布路斯联袂举办的斗兽表演中，斗士们也配备了类似的豪华武器。[36]

在担任市政官期间，恺撒花费了数额惊人的私人财产，在他与毕布

路斯联合举办的表演项目中，得到了毕布路斯的资金支持。罗马群众纵情欣赏这些免费的表演和比赛，如痴如醉。如果举办表演的人吝啬小气，会让群众反感，将来的仕途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对主办了真正宏伟壮观的表演的人，群众则会打心底里感激。但也不仅仅是花大钱就足够了，因为有的时候成本极高的表演如果操作得不好，也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恺撒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高端大气的，他主办的表演非常成功。在他看来，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每一个铜板都物超所值。他花费的私人资金其实也是借来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即便在当官之前，恺撒已经欠下了超过1300塔兰同的债务，按照罗马货币计算，相当于31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37]（为了让读者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我们举个例子：在略晚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也是这样，骑士阶层成员资格的最低财产要求是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这已经是惊人的巨款，后来他在担任阿庇乌斯大道管理者和市政官期间又欠下了更多的债务。恺撒这是在放手一搏，寄希望于自己的仕途一片光明，能够得到丰厚的油水来偿还这些债务。他的债主们也在冒同样的风险，但他们应该对恺撒的未来很有信心。这笔巨额债务中最大的一部分应当是欠克拉苏的。他资助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后辈元老不止恺撒一个，但他不大可能对其他人也如此慷慨，允许他们借了又借、越借越多。[38]

恺撒担任市政官期间还有最后一项事迹。当年的某个时期，很可能是在某一轮大型表演之前，他下令在广场重新竖立起纪念马略战胜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纪念碑。由于之前苏拉已经下令将这些纪念碑拆除或捣毁，所以恺撒竖立的可能是复制品。就像尤利娅的葬礼一样，大部分群众对他的这个姿态非常认可。还有足够多的人记得当年的恐怖气氛——北方蛮族随时可能如潮水般地拥入意大利，再一次血洗罗马城。马略在危难之际挽救了罗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值得纪念的。有一个人却不这么想，他是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39]，前78年的执政官。和恺撒一样，他也是祭司。他的父亲曾在前102年与马略共同担任执政官，在前101年担任资深执政官，对马略非常怨恨，因为马略独占了两人联手

取得的成功的全部风头。卡图卢斯尽管还不是首席元老（元老名册中的第一人），但差不多算是元老院中最德高望重的一位。恺撒宣扬马略的光荣，就等于压制卡图卢斯的家族。卡图卢斯对此非常不满，而且如果传说属实的话，他也开始觉得恺撒是一个鲁莽放肆的政客，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卡图卢斯在元老院宣布：“恺撒，如今你不是在暗中破坏共和国的防御，而是发动了正面进攻。”尽管这位年纪较长的资深政治家威望很高，恺撒还是言之凿凿地为自己辩护，令大多数元老相信了他的无辜。他们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恺撒的仕途在多个方面虽然有些招摇，但不逾常规。然而，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40]

---

[1] Plutarch，*Caesar* 5.

[2] 关于尤利娅的出生，见M.Gelzer，*Caesar* （1968），p.21，C.Meier，*Caesar* （1996），p.105，and P.Grimal，*Love in Ancient Rome* （1986），p.222。

[3] Grimal （1986），pp.112-115.

[4] 关于普雷基娅和卢库鲁斯的故事，见Plutarch，*Lucullus* 6.2-4；关于基泰古斯的影响，见Cicero，*Brutus* 178；关于庞培、格米尼乌斯和弗洛拉的故事，见Plutarch，*Pompey* 2。

[5] 关于西塞莉丝，见Cicero，*ad Fam.* 9.26；Cicero *ad Att.* 10.10；Servius，on E10；*devir.Ill.* 82.2.西塞罗公开表示不满，见*Philippics* 2.58，69，77。

[6] Suetonius，*Caesar* 47，50.1-52.

[7] Suetonius，*Caesar* 50.2，Plutarch，*Caesar* 46，62，*Brutus* 5，Cicero，*ad Att.* 15.11；see also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pp.23-24，116；关于卢库鲁斯与塞维利娅的妹妹（也叫塞维利娅）离婚，见Plutarch，*Lucullus* 38。

[8] Grimal （1986），pp.226-237，S.Treggiari，*Roman Marriage* （1991），esp.pp.105-106，232-238，253-261，264，270-275，and 299-319.

[9] Sallust，*Bell Cat.* 25.

[10] Plutarch，*Pompey* 55 ［translation by R.Waterfield in *Plutarch*：*Roman Lives* （1999），p.273］.

[11] 关于塞多留的生平，见A.Goldsworthy，*In the Name of Rome* （2003），pp.137-151。

[12] 关于苏拉的立法，见A.Keaveney，*Sulla*：*The Last Republican*（1982），pp.169-189。

[13] 今天意大利东部、沿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地区。

[14] 关于“年轻的刽子手”，见Valerius Maximus 6.2.8；关于处死布鲁图斯的父亲，见Plutarch，*Brutus* 4；关于庞培的早期生涯，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20-39。

[15] 小凯旋式的荣誉在以下情况授予得胜的将军：非国家之间的正式战争；敌人特别卑贱（如海盗或奴隶）；己方不曾遇到危险或危险极小，就轻松得胜。

[16] 关于军事失败对政治前途的影响，见N.Rosenstein，*Imperatores Victi*（1993），*passim*.

[17] 执法吏（Lictor）是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负责侍奉和保卫行政长官的公务人员，其实相当于保镖。执法吏从平民当中挑选，不少是释奴。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在退役后自动获得担任执法吏的资格。执法吏都是强壮有力的大汉，免服兵役，有固定薪金。在长官命令下，他们有权逮捕和处罚公民。不同级别的行政长官拥有的执法吏数量是不同的。例如，独裁官拥有24名执法吏，执政官拥有12名。

[18] 关于庞培和监察官们，见Plutarch，*Pompey* 22；关于克拉苏的宴会，见Plutarch，*Crassus* 2.2，12.3；*Comp.Nic.* Crassus 1.4；A.Ward，*Marcus Crassus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1977），pp.101-102。

[19] Suetonius，*Caesar* 5，Gellius，*NA* 13.3.5；关于他在前70年的事件中起到更大作用的理论，见Ward（1977），pp.105-111。

[20] 关于选举，见L.Ross Taylor，*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1949），esp.pp.50-75，and *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1966），esp.pp.78-106，A.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RS* 80（1990），pp.1-16，F.Millar，*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1998），H.Mouritsen，*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2001），esp.pp.63-89，A.Yakobson，‘Petitio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RS* 82（1992），pp.32-52；关于墓碑铭文，见 *ILS* 8205-8207。

[21] L.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1966），pp.78-83，A.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pp.43-49.

[22] 关于恺撒担任裁判官，Lintott（1999），pp.133-137；关于橡叶冠获得者被接纳进入元老院的说法，见L.Ross Taylor，‘The Rise of Caesar’，*Greece and Rome* 4（1957），pp.10-18，esp.12-13。

[23] Polybius，6.54.1-2.

[24] Suetonius，*Caesar* 6.1，Plutarch，*Caesar* 5；关于西塞罗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马略的态度，见T.Mitchell，*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 （1979），pp.45-51。

[25] *Spanish War* 42，Suetonius，*Caesar* 7.1-2，Velleius Paterculus 2.43.4，and comments in M.Gelzer，*Caesar* （1968），p.32；关于恺撒看到亚历山大像的反应和他令人不安的梦，见Plutarch，*Caesar* 11，Suetonius，*Caesar* 7.1-2，and Dio 37.52.2；关于西塞罗结束裁判官任期归来，见*pro Planco* 64-66。

[26] 内高卢也叫山南高卢，“山”指的是阿尔卑斯山。内高卢是意大利北部由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前220年被罗马征服，约前81年～前42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后来被并入意大利。内高卢以波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前49年，内高卢全体居民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27] Suetonius，*Caesar* 8.

[28] Suetonius，*Caesar* 6.2，Plutarch，*Caesar* 5；关于婚礼仪式，见S.Treggiari，*Roman Marriage* （1991），pp.161-180.

[29] Dio 36.20.1-36，Plutarch，*Pompey* 25-26；关于《加比尼乌斯法》颁布的详细情况，见P.Greenhalgh，*Pompey*：*The Roman Alexander* （1980），pp.72-90。

[30] 关于恺撒对《加比尼乌斯法》的支持，见Plutarch，*Pompey* 25，and also 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1 （1928），pp.170-173；关于清剿海盗的战役，见Appian，*Mithridatic Wars* 91-93，Plutarch，*Pompey* 26-28。

[31] 关于卢库鲁斯生平，见A.Keaveney，*Lucullus*：*A Life* （1992），esp.75-128 for his campaigns in the east；关于他被解职，见Plutarch，*Pompey* 30-31，*Lucullus* 36。

[32] 关于恺撒的支持，见Dio 36.43.2-3；*pro Lege Manilia* ，西塞罗支持《马尼利乌斯法》的演讲稿保存至今。

[33] Plutarch，*Caesar* 5-6，Suetonius，*Caesar* 10-11，Velleius Paterculus 2.43.4；关于市政官，见Lintott （1999），pp.129-133；关于恺撒担任市政官，见M.Gelzer，*Caesar* （1968），pp.37-39，L.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pp.113-132，esp.125-131，and （1957），pp.14-15。

[34] 库柏勒原是小亚细亚的地母神。她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弗里吉亚（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地区）神祇。迁居到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者学会了对库柏勒的崇拜，并于前6世纪将其传播到希腊本土和希腊在西方的殖民地。在希腊的一些地方，库柏勒与大地之母盖娅、米诺斯的瑞娅女神及谷物女神德墨忒尔融合起来。库柏勒象征着肥沃的土地，为溶洞、山峦、墙壁、堡垒、自然、野生动物（特别是狮子与蜜蜂）之神，是天上众神和地上万物的母亲，能使大地回春、

五谷丰登。罗马人后来也接纳了对库柏勒的崇拜，并将其视为特洛伊的女神，因此就是罗马人的祖先。

[35] Suetonius，*Caesar* 10.1.

[36] Dio 37.8.1-2，Pliny，*NH* 33.53.

[37] 塞斯特尔提乌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一种小银币，在帝国时期是一种较大的铜币。

[38] Plutarch，*Caesar* 5.

[39] 注意与前文提及的诗人卡图卢斯（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图卢斯）没有亲缘关系。

[40] Plutarch，*Caesar* 6，Suetonius，*Caesar* 11，Velleius Paterculus 2.43.3-4，and see also R.Evans，*Gaius Marius*：*A Political Biography* （1994），p.4，认为纪念碑不大可能是原品，而是复制品。

六 密谋

一旦财富得到尊崇，给人带来荣耀和权力，德行就开始黯淡无光。清贫被视为可耻，纯真被当作恶毒。由于财富，我们的青年沉溺于奢侈、贪婪和骄傲。他们偷盗，他们挥霍。他们对自己的财产不以为意，却垂涎他人的财产。他们蔑视端庄和贞洁，鄙夷符合天道人伦之事，毫无头脑，毫无节制。

——元老与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前40年代[1]

前66年底，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和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派图斯当选为次年的执政官。这位苏拉是之前大独裁官苏拉的侄子，在流放政敌期间积攒了巨额财富。他是庞培的内弟，可能凭借与这位名将的关系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但他取得成功的更主要原因是他在竞选中大规模地运用贿赂和恐吓手段。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当局先后通过了许多法案来解决选举舞弊的问题。但不断提出此类立法，恰恰说明了这些法案的空洞无力。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选举中有不端行为的候选人不仅会被褫夺官职，还会被逐出元老院、被禁止展示任何公职的象征物，并永远不得再进入政界。此次竞选中落败的那一对——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和卢基乌斯·曼利乌斯·托夸图斯——立刻援引这项法规，对两位胜利者提起诉讼。科塔在前70年担任裁判官，提出了改变法庭陪审团构成的法律。到这时，他已经比担任执政官的法定最低年龄长两岁，所以失败会更令他恼羞成怒，何况他的两位兄弟都已经当过执政官。而曼利乌斯出身于非常显赫的贵族门阀，与选举的两位胜利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奥特洛尼乌斯自保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一群支持者对法庭成员进行恫吓，如果不成功的话，就用暴力打断庭审。苏拉可能也曾用过类似的策略（多年后，他受到另一项指控时，西塞罗为他辩护，并将之前的暴力冲突都归罪于奥特洛尼乌斯）。尽管如此，起诉还是成功了，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都被罢

免，并被逐出政界。科塔和托夸图斯成了前65年的执政官，这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得票数仅次于苏拉和奥特洛尼乌斯，要么是因为重新举行了选举。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不愿意永久性地被排除在政坛之外。有传闻说，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蓄谋在科塔和托夸图斯于前65年1月1日就职的日子将他们刺杀。密谋者还要杀死其他一些重要元老，并自立为最高长官。两位新执政官预先得到了警报，元老院为他们安排了武装警卫，于是就职日安然度过。当局封锁了消息，将此事掩盖下去，所以在前66年担任裁判官的西塞罗几年后宣称，他当年对此事一无所知。没有确凿的证据可言，于是各种传闻纷纷出现，并广为流传；尤其是随着时间流逝，政客们都会指责自己的对手参与过这种见不得光的丑事，以攻击对方的名誉。后来有人说，奥特洛尼乌斯的主要同党是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本章下文会再次讲到此人）。喀提林此前作为资深裁判官治理阿非利加行省，刚刚回到罗马本土。在苏拉和奥特洛尼乌斯被罢免之后，喀提林也想竞选执政官。主持选举的行政长官拒绝了他的请求，据说他就因此与奥特洛尼乌斯联手，筹划武装夺权。此事的另一个角色是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他当选了前65年的财务官，被认为是一个狂野不羁、不知节制的人。不久之后，元老院决定派遣皮索以资深裁判官的身份担任西班牙总督——这对一个如此年轻和资历尚浅的行政长官来说是极其不寻常的任命——有人将此理解为元老院害怕皮索继续留在罗马会滋生事端，于是将他调走了。这些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尤其是皮索后来在自己的行省被麾下的一些西班牙士兵杀害之后。有人说，这些辅助部队的士兵是因为不堪忍受总督的残暴统治才将他杀死。这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必须记住，残酷压迫人民的罗马总督有很多，其中被暗杀的却极少。另一种理论是，这些西班牙士兵曾经在庞培麾下讨伐塞多留，因此对庞培忠心耿耿，在他的授意下（或是自作主张）为庞培除掉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此荒诞不经的故事也能流传，足以说明这些年里人们的神经是多么紧张。[2]

我们必须先考虑上述背景，才能研究苏埃托尼乌斯的版本：克拉苏和恺撒与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是一伙，他们计划将元老院内的政敌尽数屠杀，恢复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的执政官职位，让克拉苏当独裁官，让恺撒当克拉苏的副手（独裁官的副手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头衔：骑兵统帅）。据说按照计划，恺撒将会发出开始屠杀的讯号——让托加袍从肩膀上落下——但克拉苏由于“良心不安或者心存恐惧”而没有露面，于是恺撒放弃了计划。苏埃托尼乌斯描写此事的资料全都来源于后来敌视恺撒的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的另一个故事——恺撒与皮索勾结，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但由于皮索遇害，不得不罢手——也是基于敌视恺撒的史料。除此之外，指责恺撒很早就企图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说法还有一些，但这些都很可能是后来炮制出的宣传。在前65年才当选市政官的恺撒没有理由希望发生革命。他极不可能参与任何旨在刺杀他的亲戚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的密谋。同样，刚刚当选为监察官的克拉苏（他的同僚是卡图卢斯）从武装叛乱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在执政官选举期间和之后发生了一些有政治动机的暴乱，也许真的有过某种密谋，但恺撒或克拉苏参与其中的说法肯定是后人附会。[3]

古代和现代的史学家有种倾向，认为克拉苏与庞培的竞争和对抗主宰着这些年。前67年，卡图卢斯曾提出，清剿海盗的行动给了一个人过多的权力。庞培后来又得到了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指挥权，于是他统领的军队比内战爆发时苏拉麾下的部队强大得多，能够获取资源的地区也比苏拉当年广大得多。前62年底，庞培终于班师回朝，返回意大利，此时他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权柄。后来帝国时期的作家们都对此表示惊讶。人们推测，任何有力量将自己确立为罗马唯一主宰的人一定会渴望这种霸权。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这种信念是错误的，因为庞培更愿意以常规的途径来追逐荣耀、满足野心。西塞罗在这些年的书信中丝毫没有表示出担心这位伟大的将军会效仿苏拉。不大可能有许多元老预料会发生新的内战，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相信可能发生内战。在这些年中，活跃在政坛的人们年纪都足够大，都还记得前80年代的血雨腥风、

针对显贵们的放逐名单，以及那些装饰着演讲台的人头。这一切都发生在罗马的中心，谁敢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呢？庞培曾经是苏拉的嗜血副将之一，是“年轻的刽子手”。随着他逐渐成熟，似乎性格温和了一些，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度过，只有少部分时间在罗马参与政界的日常活动。闯劲十足的军事统帅形象大家有目共睹，他在阿非利加、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屡战屡胜，最近又在亚细亚旗开得胜。但有多少人真正熟悉庞培这个人，又如何能确定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庞培面对的局势与苏拉当年面对的迥然不同，他能做的选择很少。但是，如果有人企图在罗马用武力夺权，就像当年心怀不满的执政官秦纳那样，那么谁又敢说庞培不会以此为由率领大军杀回来。这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发生，因为选举和审判遭到扰乱，重要元老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残酷。[4]

与庞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家对克拉苏很熟悉，他在罗马待的时间比庞培久得多，而且在政坛非常活跃。他是共和国的巨富之一，很可能仅次于庞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个人不能组建自己的军队，就算不上富人。虽然他富得流油，而且生活在一个奢靡和放纵的年代，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却非常朴素。像卢库鲁斯和演说家霍尔腾西乌斯（西塞罗的主要对手）这样的人用豪门大宅、别墅和花园来炫富，纵情享用山珍海味。他们还致力于建造咸水池塘，在里面饲养海鱼，有的用来当食物，有的是宠物。克拉苏不会在这些心血来潮的事情上浪费金钱，而是花了很大力气去增加自己已经非常惊人的财富。他对五花八门的生意都感兴趣，与外省的包税人和其他公司联系密切。最显眼的生意是房地产，他豢养着数百名技艺娴熟的奴隶，开发房产并为其增值。他名下拥有一支消防队，这在当时的罗马仅此一家。城市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房屋非常密集的贫民区，街巷非常狭窄，两侧是拥挤的高楼，建筑质量往往非常低劣。地主们将这些房屋出租，尽可能地榨取利益。在这样的城区很容易发生火灾，一旦起火，火势蔓延也非常快，尤其是在酷热的意大利夏季。克拉苏会静候火灾发生，然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受

大火威胁的房产；交易敲定之后，他会派来自己的消防队，去扑灭大火，通常的做法是拆除房屋以制造隔离带。他新买的房产有些能够得救，而他的奴隶工匠们也可以在被拆除的房屋原址重新建造。就这样，罗马城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克拉苏收购了。他的房地产生意似乎主要涉及富人区的高档住宅，但像其他许多罗马名流一样，他也可能拥有许多贫民窟公寓楼。他的很大一部分财产是通过果断而无情的手段挣来的。某个时期，可能是前73年，他曾与一位叫作李锡尼娅的维斯塔贞女过从甚密。她被正式以不守贞洁的罪名起诉，由于她是维斯塔贞女，如果罪名成立，会被活埋。克拉苏宣称自己想从李锡尼娅那里买一座房屋，她的名字表明她可能是房主人的亲戚，于是起诉被撤销了。大家对克拉苏收购新地产的热情坚信不疑，以至于相信他的确是要买房子，而不是和李锡尼娅有私情。李锡尼娅被无罪开释，但克拉苏据说一直围绕在她身边，直到她最终把房子卖给他。[5]

克拉苏不仅仅是一位坐拥大庄园、银矿和许多房产的地产大亨，他敛财也不仅仅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满足他的政治野心。上文已述，恺撒可能从克拉苏那里借钱，来做出收买人心的大手笔。克拉苏非常大方地把钱借给很多政界人士。他很少收利息，但约定的还款日一到，他就会无情地收回欠款。他大力积累政治资本，为他人帮忙出力，好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这些年中，全部元老（共约600人）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欠克拉苏的钱，要么曾经享受过他的无息贷款。这些人极少是最伟大家族的成员，因为后者通常已经足够富裕，无须借款。很多人像恺撒一样，来自上层圈子的边缘，怀揣雄心壮志。更多的人则是地位较低的元老，他们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长官，但作为元老院成员，拥有投票权，尽管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言。克拉苏慷慨大方地允许其他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因而对这些人的影响极大。他还同样乐意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人，使其欠下人情。克拉苏在法庭特别活跃，即便与西塞罗这样的人（西塞罗的仕途主要依赖作为辩护律师的技能）相比，也显得格外活跃。西塞罗说：

> 克拉苏虽然只接受过平庸的修辞训练，天赋也很有限，但通过勤奋和努力，尤其是他的门客们谨慎精明地为他效劳，他在许多年中一直是最优秀的辩护律师之一。他的演讲词清楚晓畅，遣词造句非常用心，没有过多的雕饰，他的思路也很清晰，但他的表达和嗓音很一般，所以他不管说什么，音调都是一样的。[6]

普鲁塔克也强调，克拉苏在每次出庭前，必然会精心准备演讲词。他的辩护依靠的是刻苦，而不是天生的能言善辩。但他的辩护仍然非常有效，而且他常愿意接下别人拒绝的案子，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感激涕零。与之类似的是，他总是很乐意帮助竞选的候选人拉票，这也是能让人感恩的事情，将来也许能得到回报。他特别喜好交际，热衷于结识新朋友，所以有时显得反复无常，往往先是在法庭或广场为一个人辩护，没过多久又为此人的对头摇旗呐喊。克拉苏在政治上非常勤奋，然而庞培在罗马的时候很少涉足广场。庞培的财富和威望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但他很不情愿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威望，他不喜欢拥挤的人群，也很少为人辩护。克拉苏则总是抛头露面，为他人代言或支持他们，并且非常小心，即使遇到地位比较低微的人，他也会亲切地直呼其名，向其问好。他始终未能赢得群众的好感，但他的影响力极大，保证了人们对他的尊重。起诉名人是政治活动的一个正常且频频出现的部分，但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攻击克拉苏。普鲁塔克提到，有一名平民保民官因热衷于攻击名人而臭名远扬。有人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攻击过克拉苏，他的理由是“克拉苏的角上挂着稻草”。意大利有种风俗是在危险的公牛角上挂稻草，以警示人们与其保持距离。这可能是个文字游戏，因为拉丁语中“稻草”与“放债人”的词根相同。[7]

克拉苏显然为自己前65年的监察官任期制订了宏伟的计划。他宣布了向内高卢大量居民授予公民权的计划。恺撒已经表示支持该地区的人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克拉苏非常希望赢得如此之多的新选民的感激和支持。其他元老害怕这项政策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影响力，而他的同僚卡图卢斯坚决拒绝接受这些人为新公民。克拉苏还打算吞并埃及，将其变为

一个行省，并向其征收赋税——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事情一般不是由监察官来处理的。埃及正处于动荡之中，腐朽的托勒密王朝内部争斗不休，国内叛乱风起云涌。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在自己担任市政官期间赢得的民众支持的鼓舞下，也企图说服一些平民保民官投票推举他为埃及总督，去平定当地战乱。在这件事情上，他和克拉苏可能是同盟军。当然，他们也可能是都看到了主宰这个著名的富饶之乡并借以从中渔利的机会。不管怎么说，反对的声音太强烈，所以克拉苏的两个计划都流产了。克拉苏和卡图卢斯的争吵非常激烈，以至于两人在担任监察官仅几个月后都同意辞职。他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主要职责，即对公民及其财产进行新一轮普查。几十年后，才真正执行了一次新的普查。监察官这个关键职位已经跟不上政治局势的新发展。[8]

加图、喀提林和法庭

前64年，恺撒首次作为行政长官主持庭审。市政官和前任市政官常被请来担任法官，因为案件实在太多，裁判官无力应对。前64年，谋杀案的法庭庭审特别多，部分是由于一位叫作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的财务官的活动所致。据说，加图比绝大多数担任财务官（这是官场晋升体系中的最低一级）的青年都对自己的职责更较真。加图被指派去管理国库，但他不满足于遵循常规，也不会将日常管理工作下放给长期任职且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吏，而是亲力亲为，仔细查看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据说他的严格和渊博令专业吏员们瞠目结舌。官吏们拼命反抗，企图借助当年其他财务官的力量来阻挠他。加图的对策是解雇了级别最高的一名国库吏员，并以欺诈罪名起诉了另一名吏员。在他任职的这一年，他还调查了苏拉当独裁官期间留下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苏拉曾允许得宠的亲信从共和国的国库“借款”。加图穷追不舍，将这些钱全都追了回来。他专门挑选了一个群体并对他们进行特别调查，即那些因杀死被放逐者而领到1.2万迪纳厄斯（合4.8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赏金的赏金猎人。加图披露了这些人的姓名，并勒令他们退还这些“刽子手的酬金”。

加图的行动广得民心，因为苏拉流放政敌的恐怖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些人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纷纷以谋杀罪起诉这些赏金猎人。这种起诉是否合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那些赏金猎人是代表苏拉去惩罚被认定为共和国公敌的人，因此受《放逐政敌法》保护。就像恢复保民官地位与权力的政策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一样，这些审判同样质疑了苏拉独裁官的基础与合法性，表达了人们希望政局恢复到苏拉之前状态（那时的共和国还是“正常”的）的心声。罗马人正在努力挣扎着，去接受近期历史的暴力和动乱。[9]

恺撒无疑会欢迎主持这些审判的任务。他自己在苏拉独裁期间的经历使他对这些参与放逐政敌并从中渔利的人没有什么同情。在政治上，再一次参与受民众欢迎的事业，也不是坏事。尽管法官无法控制法庭的陪审团，但他可以有倾向性地支持其中一方，而恺撒似乎是非常积极地去谴责那些凶手，毕竟国库的官方档案已经将这些人的罪行记录在案。被定罪的人包括卢基乌斯·鲁斯吉乌斯，他是苏拉麾下的一名百夫长，在流放政敌期间积攒了多达1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巨大财富。另一名凶手是喀提林的姑父卢基乌斯·安尼乌斯·贝利艾努斯，被他杀死的受害者包括昆图斯·卢克雷提乌斯·奥菲拉，也就是那个违抗苏拉的特别命令、坚持要参选执政官的人。喀提林本人也受到审判，并且显然是有罪的，不过西塞罗后来对他的激烈詈骂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了。西塞罗宣称，喀提林曾挥舞着自己内兄（马略的一位近亲）的首级，招摇过市。但不管怎么说，喀提林被无罪开释。喀提林能够逍遥法外，主持法庭的恺撒是不是与他串通，我们不清楚。但喀提林的地位确实比审判中其他被告的地位要更重要，靠山也更强大。仅凭他的人脉就可能影响陪审团的意见，如果再加上贿赂和其他好处的话，脱罪是很轻松的事情。喀提林或许不需要恺撒的帮助，但恺撒也可能感到对喀提林穷追猛打，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随后几年中，这两人在政治上有合作关系，这表明当年的审判并没有在他们之间造成敌意；但这究竟能说明多少问题，很难判断。尽管恺撒与马略关系密切，但他在此事中并没有扮演对私人仇

怨睚眦必报的复仇者角色。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恺撒坚决拒绝起诉科尔内利乌斯·法基特斯。当年恺撒逃离苏拉的怒火时，就是此人逮捕了恺撒，恺撒花了一大笔钱贿赂他，才得以脱身。科尔内利乌斯·法基特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恺撒强调自己绝不会忘记任何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许是觉得科尔内利乌斯逮捕他是奉命而为，而最终让他逃脱才更重要。[10]

这不是喀提林第一次从庭审中全身而退。他曾因在阿非利加担任总督期间施政不当、贪污腐化而被送上法庭，但他在元老院高级成员中的人脉帮助他躲过了惩处。他可能的确有罪，但卡图卢斯这样的大人物也在法庭上支持他，于是他得以像其他许多总督一样，逃脱法律制裁。在此案中，甚至起诉人也对被告格外照顾。与苏拉和恺撒一样，喀提林也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但他的家族在数百年间也逐渐衰败，退缩到了政界边缘，挣扎着与更富裕、更成功的对手们竞争。内战帮助他恢复了自己的财富，因为他最终成为苏拉的忠实党徒。在随后的一些年中，丑闻始终伴随着他，据说他到处寻芳猎艳，甚至勾引了一名维斯塔贞女。随后他娶了奥雷利娅·奥利斯提拉，据我们所知，她与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没有亲戚关系。奥雷利娅·奥利斯提拉非常富有，但名声不佳。撒路斯提乌斯尖刻地评价道："她除了美貌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好人的赞扬。"有惊世骇俗的传闻称，喀提林对她爱得如痴似狂，因为她不愿意与这个差不多已经成年的继承人生活在同一座房子里，喀提林甚至谋杀了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喀提林是个声名狼藉的浪荡子，他的朋友，无论男女，一般都属于贵族中比较疯狂的分子。但他同时魅力十足，而且能够令追随者们忠心不二、至死不渝。喀提林与恺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很容易把喀提林看作恺撒有可能变成的样子。虽然有着许多丑闻，但喀提林的仕途到目前为止都是很传统的，除了内战时期之外，当然在内战期间正常的规则丧失了效力。他无比渴望成功，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一点也让人想起恺撒。他在前66年被禁止参选执政官，在次年也没有参选，可能是因为他仍然因为担任行省总督期间的

腐败问题而接受审判。但在前64年底，他再一次成为执政官候选人。克拉苏和恺撒可能都支持他参选。[11]

与喀提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与恺撒截然相反。他是老加图的曾孙。老加图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凭战功被擢升为元老的“新人”，后来一直做到执政官和监察官。老加图一直将自己与门阀世家中软弱娇气的贵族们做对照，鄙夷他们对希腊语言和文化的追捧；他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以严格的责任原则指导自己。老加图还是第一个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在史书中刻意不提具体行政长官的名字，因为他想要赞颂的是罗马人民的事迹，而不是纪念贵族的成就。元老家族自我推销的一个有趣例子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刻意通过模仿自己著名的曾祖父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获得了极大的名誉和尊重。加图一方面坚决奉行罗马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许反映了古代史实，也许只是后人附会，但不管怎么说都受到广泛的仰慕，尽管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另一方面又特别严格地遵照斯多葛派哲学。这种思想强调追寻美德，视美德高于一切，但加图非常极端，简直走火入魔。加图名誉高洁，从来没有过任何丑闻，也从来没有被人指责生活奢侈。与恺撒热衷穿着打扮和不寻常的时尚形成对照的是，加图对自己的外表极不关心。他常常光着脚在罗马街头行走，据说作为行政长官处理政务时也只披着托加袍，里面也不穿惯常的短上衣。旅行时，他从不骑马，总是步行，据说能够轻松地赶上骑马的旅伴。又一次与恺撒形成对照的是，普鲁塔克记载称，加图在新婚之夜之前一直保持童贞。而他的妻子却没有这样的自制力，后来因为与人通奸而被加图要求离婚。他的同母异父姐姐塞维利娅也不像他这样恪守贞洁，而是与恺撒有着长期私情。[12]

在行为举止上，恺撒和加图似乎迥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其实是相同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需要吸引大家的注意，才能从众多竞争同一职位的人当中脱颖而出。在这方面加图有优

势，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恺撒要好。一个人当选为行政长官后，必须压倒担任同一官职的其他人的风头。个人才干很重要，但吸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事迹也很重要。担任财务官期间，加图确保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事方式与众不同，在工作中不仅投入了自己的才华，还运用了自己独特且严格的美德。起诉那些在流放政敌期间杀人渔利的赏金猎人是一项非常得民心的事业，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赢得了民众的认可。恺撒和加图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恺撒整洁潇洒、引领时尚潮流；而加图表面上不拘小节、邋里邋遢——推销自己，树立了与众不同的形象。恺撒喜好奢侈、竞技和表演，一掷千金；而加图非常节俭，这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加图和恺撒都在其政治生涯早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名誉，拥有锦绣前程。尽管风格不同，但他们玩的其实是同一种游戏。

旧的罪行，新的阴谋

前64年底，竞争激烈的竞选又如火如荼地上演了。恺撒要到下一年才有资格参选裁判官，所以他不是候选人，但他肯定在选举现场支持其他人。这样有利于自己在将来得到别人的支持，而且也能让即将上任的行政长官对自己感恩戴德。执政官的竞选尤其激烈。喀提林终于可以参选执政官了，他的盟友是同样恶名昭彰但远远不及他有天赋的盖乌斯·安东尼[13]。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候选人是著名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西塞罗是个“新人”，完全靠个人才干取得成功。他通过在法庭上做辩护律师而声名远扬，尤其是参与著名的案例，例如他在前80年曾反对苏拉的一名党羽，在前70年起诉了一名特别腐败但富有且人脉极广的总督。和恺撒一样，西塞罗也曾支持将东方军事指挥权交给庞培的《马尼利乌斯法》，并继续与这位深得民心的英雄的追随者们交好。在同盟者战争中，他和庞培曾短暂地一同在庞培·斯特拉波麾下服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喀提林也曾在同一支部队服役。西塞罗将自己展现为骑士阶层的捍卫者，在担任市政官期间还尽心尽力地举办了优质的娱乐活动。但他以这种方式向群众邀宠，使元老院中的重要贵族们

——他们喜欢自称为“贵人”——对他颇为反感，而且已经连续几十年没有一位“新人”当选执政官了。最后结果是大家对喀提林非常猜疑，于是演说家就显得是个更好的选择。西塞罗轻松当选，而安东尼勉强获得第二名。[14]

前63年1月1日，西塞罗和安东尼正式上任，随即就有一位叫作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卢路斯的保民官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土地法案。该法案要求将土地大规模地分配给贫困公民，从位于坎帕尼亚[15]的国有土地——这差不多是格拉古兄弟的土地再分配之后仅剩的公共土地——开始。因为这些土地面积不足，所以共和国还需要收购额外土地。该法案保证向国家出售土地的人能够得到一个好价钱，宣布所有的土地出售都将自愿进行，并明确豁免了苏拉老兵们的农场（内战结束后，苏拉将自己的退伍军人安顿在没收来的土地上）。显然，为了筹集所需款项，甚至外省土地也可以被拿来出售。此项目的执行将由一个十人委员会负责监管，这十名委员在五年之内享有资深裁判官级别的权力。这个委员会的人选由一个较小的公民大会（包括十七个部落，而不是三十五个部落）选举产生。这项计划的规模极其宏大，十人委员会的权力也非常大，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最近几十年来，意大利农村遭受了惨重损失，有大量贫民的处境非常糟糕。很多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流落到罗马，往往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城市有机遇和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所有进城的人都能取得成功。房租很高，拥挤公寓楼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肮脏，很多穷人不堪忍受沉重的债务负担。与贵族不同，他们没有希望通过担任公职来发家致富。

卢路斯土地法案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够对问题起到缓解作用。起初，这一年的十名保民官全都支持该方案。克拉苏和恺撒极有可能也是卢路斯的热情支持者，或许还希望能够入选十人委员会。庞培的态度较难判断。一方面，他的军事行动快结束了，大批老兵回国后需要安置，《卢路斯法》或许能够为其提供农田。另一方面，如果克拉苏在

此计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就意味着这些老兵和其他许多公民会欠下庞培对手的人情。有几位保民官是庞培的铁杆支持者，这意味着庞培不大可能会积极地反对该方案，但是他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斟酌此事，因为他还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西塞罗从一开始就反对此法案，终其一生都不喜欢类似的立法。许多重要元老也反对卢路斯，因此新任执政官或许感到这是个拉拢他们的好机会，因为这些元老对他的态度到目前为止顶多只能算是不温不火。西塞罗向元老院和聚集在广场的群众发表了一系列演说，猛烈攻击卢路斯的提案。西塞罗将十人委员会妖魔化为“国王”，因为他们的权力超乎寻常；还暗示提案背后有神秘人物支持，其目的不可告人。西塞罗始终没有明说这些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不过大家一般认为他指的是克拉苏，也许还有恺撒。西塞罗说，这些幕后指使的人想建立自己的地位，与庞培争斗。至少有一名保民官已经打破了共识，宣布将否决此法案。西塞罗的唇枪舌剑得胜了，土地法案被放弃了。[16]

在随后几个月内，恺撒起诉了不久前卸下内高卢总督职务的前任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皮索受到的指控包括敲诈勒索和营私舞弊，以及非法处决了一个来自波河河谷的高卢人。恺撒又一次努力捍卫内高卢人民的利益，但这一次仍然没有成功。皮索的辩护律师是西塞罗，后者在自己的能言善辩之外还加上了现任执政官的威望，成功地为皮索开脱了罪名。但恺撒提起了这番诉讼，还精神抖擞地穷追不舍，招致了皮索永久的敌意。当年晚些时候，恺撒出庭为一名努米底亚客户辩护，此人是一名贵族，企图脱离希耶姆普萨尔二世国王独立。法庭上双方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国王的儿子朱巴也出席了庭审。有一次，恺撒动手抓住了朱巴的胡须。他可能是有意为之，希望利用绝大多数罗马人内心深处对外国人的憎恶和敌视，但更有可能是一时怒火中烧。恺撒的礼节风度和贵族仪态是无可挑剔的——他在做客时，哪怕主人的招待再粗劣，他也会优雅地接受；如果他的同伴发出抱怨，他还会批评他们。但终其一生，他有时也会爆发。无论如何，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国王

胜诉。恺撒没有抛弃自己的客户，而是将他藏在自己家中，最后偷偷送出罗马。[17]

前63年，恺撒多次与当年的保民官之一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合作。他们可能是老相识，年龄相近，在前70年代都曾在奇里乞亚和亚细亚作为塞维利乌斯·伊苏利库斯的部下服兵役。拉比埃努斯的家乡似乎是皮基努姆，庞培家族在那个地区拥有强大的地产势力，拉比埃努斯与他们可能有某种联系。作为保民官，他通过了一项法案，授予庞培超乎寻常的荣誉：这位伟大的将军被允许在观看任何竞技和表演时头戴凯旋将军的月桂花环、身穿紫袍；若观看赛车，还可穿戴全副华服宝器。据说恺撒是这些政策的幕后推动者和主要支持者。苏埃托尼乌斯还说，是恺撒推动拉比埃努斯起诉盖乌斯·拉比里乌斯——一位老朽而平庸的元老。罪名是“大逆”，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罪名，有点像叛国罪。具体的案情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也就是恺撒出生不久之后。拉比里乌斯曾经追随当年的两位执政官，去屠杀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的支持者。死者中包括拉比埃努斯的叔叔。一部非常晚近且很可能不可靠的史料称，拉比里乌斯在杀人后不久的一次宴会上展示了萨图尔尼努斯的首级。拉比埃努斯可能以杀害萨图尔尼努斯的罪名起诉拉比里乌斯，因为萨图尔尼努斯是保民官，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当年有一名奴隶因为杀死萨图尔尼努斯而得到赏赐，所以拉比里乌斯应该不是杀害萨图尔尼努斯的凶手。前100年，元老院发布了终极议决，授权马略和另一位执政官以一切手段保卫共和国。恺撒和拉比埃努斯似乎并不是在挑战元老院发布此种命令的权力，也不是质疑行政长官执行该命令的权力，而是关心命令的具体实施方式。他们相信，马略已经接受了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等极端分子的投降，但一群暴民爬到元老院会堂的屋顶上，将这些俘虏杀死了。元老院终极议决授权行政长官以武力镇压威胁共和国的公民，但在这些人举手投降、不再有危害能力之后，是不是仍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并不明确。[18]

此次审判的许多细节都晦暗不明。尤其是我们对起诉方的论点不甚清楚，只能从西塞罗为拉比里乌斯辩护的演讲词中窥探究竟。同样，我们对《卢路斯土地法》的大部分情况也不清楚，也只能通过西塞罗详细而极其敌视的演讲词中了解一二。拉比里乌斯案件非常奇怪，首先是案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为什么突然又追究起来？其次，当年的目击证人很少有仍然在世的，尤其是因为内战期间罗马的精英阶层损失惨重。在大逆罪名的指控上，也没有近期的审判程序可供参考。苏拉曾建立一个永久法庭来裁决一种类似的但程度较轻的罪行——叛逆，它实际上是一种侵犯罗马人民尊严的罪行，很像某些现代体育中所谓“损害了这项运动的声望”的罪名。但是，恺撒和拉比埃努斯刻意选择了“大逆”这项尘封已久的罪行，专门处置此种罪行的立法可以上溯到五百多年前，那时罗马还是君主国。根据旧时法律，惩罚大逆的刑罚是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刑罚已经不用来处置公民，而且似乎也不允许犯人按照常规，自行流亡外邦。抽签指定了两名法官来审理此案。恺撒是法官之一，他的远房堂兄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一年的执政官）是另一名法官。偏偏抽中了他们两人，显得非常可疑，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恺撒串通了监督抽签的裁判官，因此这可能只是巧合。

拉比里乌斯被判有罪，刑罚是死刑。他被允许向代表罗马人民的百人会议上诉。为年迈的拉比里乌斯辩护、反对拉比埃努斯的律师不仅包括西塞罗，还有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西塞罗取代了他，成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庭审上做了后来公开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西塞罗强调萨图尔尼努斯罪有应得，指出拉比里乌斯不是杀死萨图尔尼努斯的人。不过西塞罗一再宣称，他倒是希望拉比里乌斯拥有杀死萨图尔尼努斯的荣誉。他指责拉比埃努斯之所以重启早已被人遗忘的古代法律，是因为他内心的残酷；按照罗马法庭上的常规，他还对拉比埃努斯的名誉进行攻击，神秘莫测而意味深长地暗示，拉比埃努斯的道德败坏是“世人皆知”的。西塞罗抱怨说，法庭允许他发言的时间短得不合常规。这个抱怨是有道理的。他的努力似乎没能说服聚集

在百人会议上的投票者，尽管作为法官的恺撒对拉比里乌斯毫不掩饰的敌意使许多人转而同情被告。很快局势就变得明朗起来，投票结果必然是判定拉比里乌斯有罪。但就在这时，这个非常规的事情突然以奇特的方式戛然而止了，这倒也算合宜。百人会议的结构是早期罗马军队的翻版，总是在战神广场（位于城市的正式边界之外）集会。在早期历史中，罗马还很小，敌人则很近。如果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全都聚集起来投票，那么城市在遭遇突袭时就会很脆弱。因此，为了防止这种威胁，罗马人会在雅尼库鲁姆山的制高点安排哨兵。只要哨兵在自己的位置上守卫，山顶上就会悬挂一面红旗，百人会议就可以安然处理事务。如果旗帜被降下，就说明罗马处于危险之中，公民们必须立刻解散大会，拿起武器。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恺撒的时代，而且还会延续数百年，尽管它的功能早已不存在了。在百人会议决定拉比里乌斯命运的投票结束之前，裁判官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凯列尔命令将山顶的旗帜降下。于是，大会还没有做出裁决，就解散了。没有人尝试重新进行一次审判。[19]

史料没有解释，梅特卢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在保护拉比里乌斯吗？或者他在给拉比埃努斯和恺撒一个台阶下，免得他们当真要将一名年迈而人微言轻的元老定罪、处死？拉比埃努斯和恺撒事后都非常愿意放弃追查此案，显然说明惩处拉比里乌斯并非他们的主要目标。在此案中，他们质疑了元老院终极议决是否高于其他一切法律和公民权利，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没能对法律做出任何改变。在实践层面，他们最大的成绩或许在于，将来任何一位行政长官在遵照元老院终极议决行事时一定会格外小心。在个人层面上，此次审判对拉比埃努斯和恺撒来说都是一次成功。这次负责裁决拉比里乌斯的百人会议中，可能大多数成员都是他们的支持者，或者是那些被此案及更大范围的问题触动的人，所以它的构成应该不算很典型。很多公民没有时间、兴趣或者机会来参加大会，事实上要把全部有资格的公民塞进百人会议的场地，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如此，此次大会比以往的大会都更趋向于富人的利

益。大会显然愿意判拉比里乌斯有罪，这的确说明许多公民同情起诉方。恺撒这一次仍然是确保自己在政界抛头露面，并且站在顺应民意的那一边。当年晚些时候，百人会议的另一次会议选举他为前62年的裁判官，这足以证明他是多么受欢迎。此时他刚刚达到参选裁判官资格的最低年龄。

裁判官是一个重要职务，任期结束后，只要当事人愿意，肯定会得到一个行省总督的职位。裁判官的竞争非常激烈，而超过一半的裁判官的仕途都到此为止，没有办法当选更高的职位，即执政官。但是，对恺撒来说，当选裁判官的成功还远远没有前63年底他另一项竞选的成功那么富有戏剧性。大祭司团（共十五人，恺撒是其中之一）的首领——祭司长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去世了，于是这个职位就空缺了出来。梅特卢斯是枝繁叶茂的梅特卢斯氏族的又一位代表；这个氏族原本就很有势力，由于支持苏拉，更是如日中天。苏拉把祭司长和其他大祭司的任免权交给了元老院。但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拉比埃努斯通过了一项法案，恢复了旧的做法，即祭司长的职位由公民选举产生。一个精简版的部落大会（只有十七个部落参加，而不是全部三十五个部落，具体是哪十七个部落，抽签决定）被赋予了选举祭司长的任务。我们不知道这项法律是何时通过的，不知道是抢在梅特卢斯去世前通过的，还是在他死后匆匆通过的。在法案公开发表之后，必须在三个集市日之后，也就是至少要等二十四天，才可以将该法案提交公民大会投票。恺撒发表讲话对此法案表示支持，在它正式成为法律之后，他就宣布自己要参选。[20]

祭司长的威望极高，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罗马最重要的祭司。正因如此，共和国的许多名流权贵都会积极地争夺这个职位。卡图卢斯[21]也参加了竞选，恺撒在奇里乞亚时的老上司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伊苏利库斯也参加了。他们两人都比恺撒更有名望，做过的官职比他高，获得过的荣誉也比他多。如果仍然由元老院任命祭司长，那么卡图卢斯

几乎一定会得到这个任命。但现在既然是选举，结果就难说了，因为选民们还记得恺撒当市政官时花费巨资为群众提供娱乐和福利，以及他常常与民众站在一边。在竞选过程中他似乎也是一掷千金，馈赠礼物、提携帮助他人、争取每个部落的关键人物。他的竞争对手们也在这么做。仅有十七个部落投票，而不是全部三十五个部落，这让贿赂选民容易了一些。随着竞选活动继续，卡图卢斯开始深切地担忧，恺撒这个后起之秀现在变成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尽管卡图卢斯威望很高，但如果此次选举失败，必然会损害他的声望，尤其是输给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人，就更说不过去了。卡图卢斯知道，恺撒在竞选开始之前已经债台高筑，于是写信给他，提出如果他主动退出祭司长的竞选，就会给他一大笔钱。恺撒对此的理解是卡图卢斯软弱心虚。于是恺撒立刻借了更多的钱，去笼络投票的各个部落。这是一场绝望的赌博。他的债主们将赌注压在他将来有一个锦绣前程上，主要是寄希望于他能够得到很高的官职，并借此获得巨额利润。祭司长的职位本身没有多少油水，但恺撒在任何选举中都输不起了。如果他不能赢得选民的支持，那么对他的债主来讲，他就开始像是个不值得承担的风险了。在他的好运彻底耗尽、本人彻底垮台之前，债主们就会登门讨债。

选举日到来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天，没有留下记载，但肯定是前63年末——恺撒知道，这场选举对他来讲不仅仅是能不能得到这个职位的问题。这一天恺撒离家之前，奥雷利娅向他亲吻道别。恺撒告诉她，他要么以祭司长的身份回来，要么就永远不会回来了。这是记载这些年的史料中罕见的一个提及奥雷利娅的例子，再一次表明了她在儿子生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恺撒的这番话是对他母亲说的，而不是对妻子庞培娅或任何一位情妇。尽管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但貌似奥雷利娅确实住在儿子家中。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她象征着恺撒欠自己家族的债，每一次成功不仅仅对他本人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复兴家族地位与荣光的必要步骤。竞选祭司长是一场赌博，失败的代价非常沉重，肯定会严重阻碍他的政治生涯，或许让他彻底退出政界。但在豪赌

之前，恺撒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知难而退（就像卡图卢斯劝他的那样）有悖于恺撒的天性，因为他内心深处是个赌徒，但从来不是疯狂的赌徒。他花了更多钱，背上了更大的风险，但他判断自己成功的概率很高，因此冒险是值得的。失败是完全可能的，但恺撒似乎估计自己的胜算极大。考虑到卡图卢斯在过去对他抱有敌意（尤其是最近恺撒竖立马略的胜利纪念碑之时），而此时卡图卢斯要用金钱买他的出局，暗示着这位劲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2]

最后恺撒胜利了。普鲁塔克说恺撒是险胜，但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且他在卡图卢斯和塞维利乌斯所属的部落中的得票数比这两位对手得到的总票数还要多。对恺撒来说，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尤其是因为对手如此强劲。作为祭司长，将来他在国家宗教与仪式的许多方面都会扮演核心角色。他没有权力对其他大祭司发号施令，因为大祭司团的多数表决可以否决祭司长的意见。即便如此，他的威望和声誉也是非常崇高的。另外，与朱庇特祭司不同，祭司长在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这个职位还给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祭司长会得到一座宅邸，即位于圣道边上的祭司长府。恺撒从比较偏僻的苏布拉搬到了毗邻共和国心脏的地方。祭司长府坐落于广场东端，邻近灶神庙和雷吉亚，大祭司团的档案和文件就储存在雷吉亚，并且那里也是大祭司团开会的场所。雷吉亚的意思是“宫殿”，说明它可能与罗马的王政时代有关联。考古发掘也表明，这里在非常古老的时期就有一座建筑，在后来的阶段和重建时大体上都遵循了相同的不寻常设计。关于雷吉亚早期建筑的具体性质及它是否曾是王宫，学术界有着激烈的争论，但我们无须关心这一点。在共和国末期，祭司长府和雷吉亚由于历史悠久和长期与神祇相关联而受到尊崇。[23]

竞选祭司长对恺撒来说至关重要。不过，尽管竞选的结果出人意料，但它的意义却远远比不上执政官竞选。喀提林又一次参加竞选，塞维利娅的丈夫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也是候选人。这是西拉努斯

的第二次尝试。几年前，西塞罗曾说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作为执政官，西塞罗负责监督选举。在另外一名候选人的鼓励下，西塞罗制定了一项新的且更严厉的打击选举舞弊的法案，对舞弊者的刑罚是十年流放，并确保此法案得到通过。该法案无助于制止已经非常猖獗的贿赂（喀提林也许是始作俑者，很快其他候选人也纷纷效仿）。加图宣布，不管谁最终获胜，他都要起诉当选者，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诚实的人是不可能得胜的。但他对自己的姐夫西拉努斯却网开一面。在现代人看来，这也许很虚伪，但罗马贵族对家庭关系非常重视，因而完全可以理解加图的做法。喀提林目前处于非常危险的低潮期，他显然已经心急如焚，将自己描述为穷人的捍卫者；他因为自己的贫困，而非常理解穷人的处境。他公开谴责一个昏庸无能、粗俗不堪、只顾自己利益的小集体把持了共和国。执政官在元老院质询他的时候，他说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广大群众，力量强大，却群龙无首；而另一个共和国就是他的对手们，只有脑袋，没有身躯，因为他们得不到人民的真正支持。他宣布自己要成为广大人民急需的领头人。显然有很多人投奔他，而且他的部下在农村地区特别活跃。但许多曾经在法庭上支持他的大人物却渐渐对他不再友好。克拉苏和恺撒也许仍然支持他的竞选。西塞罗将选举推迟了一次，选举最终于9月底举行，他到场时带着一队骑士阶层的卫兵（这是元老院投票决定为他安排的）。他还确保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在托加袍下“秘密地”穿着胸甲。最后当选执政官的是西拉努斯和卢基乌斯·李锡尼·穆里纳，后者在米特里达梯战争中曾是卢库鲁斯的高级副手。[24]

喀提林甚至在选举之前就考虑动用武力，但后来决定用更常规的方式取得成功。竞选失败后，他只能面对政治上的破产和流亡海外，因为和恺撒一样，他也是债台高筑，很多债务将于11月13日到期，那时他必然会破产。但与恺撒不同的是，喀提林的狂赌胜算并不大，他似乎也举棋不定，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的追随者之一盖乌斯·曼利乌斯正在伊特鲁里亚[25]忙着招兵买马，但喀提林留在罗马，继续参加元老院的会议，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曼利乌斯曾经是

苏拉军中的一名百夫长，在内战中发了大财；但自苏拉当上独裁官以来，他已经将自己的财产挥霍殆尽。他似乎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不属于元老阶层，因此永远只能当个副手。喀提林的支持者中也有一些贵族，但这些人都是名声败坏、缺乏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大多数人都不会把这些庸碌之辈放在眼里，再加上喀提林仍然继续待在罗马，给元老院制造了一种不确定的气氛。有传言说喀提林在图谋不轨、准备起事，但目前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能证明这些传言是真实的。西塞罗的消息比较灵通，因为他组织了一个间谍网络，对密谋者进行监视。其中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昆图斯·库里乌斯，他为了让自己的情妇富尔维娅刮目相看，曾吹嘘过密谋计划。富尔维娅出身贵族，而且是一位元老的妻子，于是西塞罗得以说服她，让她去劝情夫将同党招供出来。因此，执政官大体掌握了当时的局势，能够自我保护，挫败了对方的暗杀企图。能够挫败密谋者固然好，但执政官还不能在元老院站出来公开证明喀提林在密谋造反。到目前为止，密谋者还没有真正做任何应当制裁的事情。喀提林显然是在利用公众的紧张不安，但也许他只是还没有确定应该何时行动、如何行动。[26]

10月18日夜间，克拉苏和其他几位元老收到了匿名信，警示他们赶紧逃跑，因为在28日名流权贵们将遭到屠杀。他们立刻拿着信去找西塞罗，西塞罗让他们在元老院当众宣读这些信。关于曼利乌斯在伊特鲁里亚活动的更多消息传到了罗马城，西塞罗于21日将情况报告给元老院。元老院发布了终极议决。西塞罗宣称，叛军将于27日公开起事。事实的确如此，但叛军威胁的屠杀并未发生。元老院派遣了多支军队，包括一些在罗马城外等候自己的指挥官举行凯旋式的部队，去镇压叛军。11月8日，元老院再次开会，西塞罗当面口若悬河地斥责喀提林，指控他在过去的累累罪行，并宣称自己已经知道喀提林当前的阴谋。尽管喀提林反唇相讥，以贵族对“新人”的极大鄙夷称西塞罗为“归化了的外国人”，但这次会议终于促使他采取行动。他于当夜离开了罗马，声称自己为了让共和国避免内部纷争，自愿流亡。在给卡图卢斯的信中，他抱怨政敌

们对他的压迫欺凌，以及他的努力和才干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以恰当的罗马人的方式，他请求卡图卢斯保护他的妻女。很快人们就发现，喀提林并没有逃往国外，而是与曼利乌斯及其军队会合了。他们两人都被宣布为全民公敌。他还有一些支持者留在罗马城内，他们开始与阿洛布罗基人的一些使节谈判。阿洛布罗基人是高卢的一个民族，他们派使节来罗马是为了申诉自己的绝望处境。密谋者们希望这个部落会起兵造反，开辟第二战场，以分散元老院军队的兵力。但是，阿洛布罗基人去找西塞罗，告发了他们。阿洛布罗基人将一名密谋者诱骗进伏击圈，将他逮捕，另外四名领头人物不久之后也被抓获。[27] 他们起初自称清白无辜，但因为铁证如山，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现在的问题是，对他们应当如何发落。[28]

---

[1] Sallust，*Bell.Cat.* 12.1-2.

[2] Dio 36.44.3-5，Cicero，*pro Sulla* 14-17，Sallust，*Bell.Cat.* 18.

[3] See Suetonius，*Caesar* 9，Sallust，*Bell.Cat.* 17-19.关于“第一次喀提林阴谋”，见E.Salmon，‘Catiline，Crassus，and Caesar’，*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6 （1935），pp.302-316，esp.302-306；E.Hardy，*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 in its Context*：*A Re-study of the Evidence* （1924），pp.12-20；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 （1928），pp.234-235；D.Stockton，*Cicero* （1971），pp.77-78；and M.Gelzer，*Caesar* （1968），pp.38-39。

[4] 关于克拉苏与庞培间的斗争，见A.Ward，*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pp.128-168；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 （1928），pp.221-283，esp.242-249.关于庞培归来的帝国主义观点，见Velleius Paterculus 2.40.2-3，Plutarch，*Pompey* 43，Dio 37.20.5-6。

[5] See Plutarch，*Crassus* 2-3，and Ward （1977），pp.46-57；关于李锡尼娅事件，见Plutarch，*Crassus* 1，with sceptical comments in Ward （1977），74-75。

[6] Cicero，*Brutus* 233.

[7] Plutarch，*Crassus* 3，Cicero，*de Officiis* 1.25，Sallust，*Bell.Cat.* 48.5-7.关于“角上挂着稻草”和可能的双关语，见Ward （1977），pp.78。

[8] Plutarch，*Crassus* 13，Suetonius，*Caesar* 11，Dio 37.9.3-4；Ward （1977），pp.128-

135，M.Gelzer，*Caesar* （1968），pp.39-41.

[9] 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16-18，Suetonius，*Caesar* 11，Dio 37.10.1-3.

[10] Suetonius，*Caesar* 74.关于喀提林，见Asconius 84C；关于奥菲拉，见Plutarch，*Sulla* 33。

[11] Sallust，*Bell.Cat.* 5，14-17，Plutarch，*Cicero* 10，Ward （1977），p.136，145，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 （1928），p.241，Stockton （1971），p.79-81，97，100.

[12] 关于老加图，见Plutarch，*Cato the Elder*，and A.Astin，*Cato the Censor* （1978）；关于小加图，见Plutarch，*Cato the Younger*，esp.1，5-7，9，24-25。

[13] 后来恺撒麾下大将马克·安东尼的叔叔，后与西塞罗同年担任执政官。

[14] 见Stockton （1971），esp.71-81，E.Rawson，*Cicero* （1975），T. Mitchell，*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 （1979），esp.p.93 ff.提及庞培·斯特拉波的幕僚中有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一般认为是喀提林）的铭文是*ILS* 8888/*ILLRP* 515。

[15] 在今天意大利的西南部。

[16] 对这些年的绝佳介绍材料是T.Wiseman，‘The Senate and the Populares，69-60 BC’，in *CAH2* IX （1994），pp.327-367；关于《卢路斯土地法》，见M.Gelzer，*Caesar* （1968），pp.42-45，Stockton （1971），pp.84-91，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 （1928），pp.242-249，Ward （1977），pp.152-162。

[17] 关于皮索，见Sallust，*Bell.Cat.* 49.2，Cicero，*pro Flacco* 98；关于朱巴，见Suetonius，*Caesar* 71。

[18] 关于庞培得到的荣耀，见Dio 37.21.4。关于拉比埃努斯的出身，见R.Syme，‘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JRS* 28 （1938），pp.424-440。

[19] 关于大逆审判，见Dio 37.26.1-28.4，Suetonius，*Caesar* 12，Cicero，*Pro Rabirio perduellionis*，with W.Tyrrell，*A Leg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to Cicero's Oratio Pro Rabirio perduellionis* （1978）；佚名作者的*de viribus illustribus* 声称拉比里乌斯展示了萨图尔尼努斯的首级。

[20] See L.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p.16.

[21] 指前文讲到的那个与恺撒作对的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不是著名诗人卡图卢斯。

[22] 关于祭司长的选举，见Suetonius，*Caesar* 13，Plutarch，*Caesar* 7，Dio 37.37.1-3，Velleius Paterculus 2.43.3。

[23] 关于雷吉亚及其历史，见T.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 （1995），pp.239-241。

[24] Sallust，*Bell.Cat.* 23-24，Cicero，*pro Murena* 51-58，Dio 37.29.1-30.1，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21.2-6.

[25] 伊特鲁里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拉齐奥和翁布里亚。前9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在这一地区兴起，出现许多城邦。前650年前后达到极盛，影响力超过意大利半岛上的各个民族。罗马早期受到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极大影响，前509年之前有多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统治罗马。但伊特鲁里亚最终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完全被罗马同化。

[26] Sallust，*Bell.Cat.* 22.1-4，26.1-31.3.

[27] 但不久之后，阿洛布罗基人发动了反对罗马的叛乱，被罗马镇压下去，不得不再次归顺罗马。

[28] Sallust，*Bell.Cat.* 31.4-48.2，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1 （1928），pp.259-272，Stockton （1971），pp.84-109.

七 丑闻

> 正如诸君所见，今天，共和国、公民们、你们所有人的生命、你们的产业、你们的财富、你们的妻儿以及我们光荣国家的心脏——这座最有福、最美丽的城市——得以虎口脱险，躲过了烈火和刀剑之灾。不朽诸神对你们莫大的爱，再加上我本人的辛勤工作和百倍警惕以及我经历的危险，已然挽救了国家，帮助它安然度过这场风波。
>
> ——西塞罗，前63年12月3日 [1]

在很多人看来，恺撒在这几个月中的态度是非常模棱两可的。他和克拉苏一起支持了喀提林参选。他可能和喀提林很熟识，不过罗马贵族的世界很小，绝大多数元老都互相认识。尽管西塞罗在前63年和之后的演讲中把喀提林塑造成不可救药的恶魔，但他对喀提林的看法并非始终如此。就在不久前的前65年，他还曾考虑在法庭上为喀提林辩护，“希望这能鼓励他们与我们联手”， [2] 为前63年的执政官竞选拉票。恺撒公开支持喀提林的时间更久，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他与喀提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倾向于支持“民众欢迎的”事业，而且都热衷于将自己和马略联系起来。喀提林与曼利乌斯的军队会合后，公开展示了一面鹰旗，这曾经是马略麾下某军团的军旗。恺撒也有可能加入这个由负债累累的亡命徒计划的阴谋，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与喀提林多有相似。西塞罗在广场向群众发表讲话的时候，将许多密谋者描述为：“头发精心梳理过，油光水滑，有人的头发像姑娘一样光滑，有的留着乱蓬蓬的大胡子，外衣一直披到脚踝和手腕，穿着罩衣而不是托加袍。” [3] 这描述几乎就是恺撒形象的一个夸张版本，他可能开启了穿长袖衣服的习气，他的腰带非常松垮，外衣下摆很低。在后来的岁月里，西塞罗对恺撒做的任何事情都满腹狐疑。即便如此，西塞罗仍然说过这样的话：“另一方面，每当我看到恺撒的头发梳理得如此精致，看他用一根手指挠头，我绝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竟能犯下颠覆罗马政体的弥天大罪。” [4] 与许多密谋者一样，恺撒也是个风流倜傥的纨绔子弟，风流成性、债台高

筑，因而臭名远扬。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非常成功。晋升体系中的每一个官职，他都是以法定最低年龄顺利当选，而且刚刚在竞选祭司长的竞选中赢得了辉煌胜利。恺撒没有必要去干革命，但这并不是说假如他认为叛军能够得胜，他也一定不会加入他们。

克拉苏的态度与之类似，因为他曾公开支持喀提林参选。或许和恺撒一样，克拉苏会确保自己站在得胜的那一边，而不管哪一方会得胜。但局势的不确定性让所有被怀疑参与密谋的人在这段日子里都很不好过。甚至在喀提林的部下公开征募军队的时候，他本人仍然留在罗马。他离开之后，大家也知道其他的密谋者留在城内兴风作浪。执政官几乎每天都会宣布破获了新的暗杀与纵火阴谋，所以元老们对许多同僚心生猜忌也不足为怪。恺撒和克拉苏都必须格外谨慎。正因如此，克拉苏刚收到匿名信，就立刻拿着它去找西塞罗。即便这样，在逮捕了一些密谋者之后，有一名密探被带到元老院，声称自己曾被克拉苏派去向喀提林通风报信，告诉喀提林不必为这些逮捕担心，只管继续干下去就是。据撒路斯提乌斯记载：

> 塔奎尼乌斯指认了克拉苏——一位极其富有、影响极大的名流。有些人认为这指控不可信，也有人认为它是真的，但他们相信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最好把克拉苏这样一位强有力的大人物争取过来，而不是疏远他。他们中有不少人在私人交易中欠了克拉苏的债，他们全都高声疾呼，说塔奎尼乌斯是在诬陷克拉苏……[5]

元老们投票认定塔奎尼乌斯的指控是假的，并将他关押起来，听候审判。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称，他后来听克拉苏说，这个密探听命于西塞罗，西塞罗希望借此迫使克拉苏公开与喀提林及其叛军决裂，而不是继续骑墙。西塞罗与克拉苏的关系本来就不和睦，这下子更加糟糕了。[6]

西塞罗在这几周内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甚至在当时，他就已经知道这是他的巅峰时刻，他这样一位来自阿尔皮努姆[7]的“新人”将要拯救共

和国了。他后来终其一生都酷爱讲述自己的伟大胜利。但这胜利来之不易。从一开始，他就很难说服所有元老，叛乱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可以向元老们报告。最终，对罗马城内主要密谋者的逮捕和审讯说服了全体元老，威胁是真实存在且非常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是镇压叛乱，但西塞罗的难处在于他的执政官任期已经只剩下几个星期了。像任何一位罗马行政长官一样，他急于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挫败叛乱的主要威胁，既是为了把事情处理好，也是为了独占功劳。对西塞罗来说特别棘手的是，加图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起诉了当选前62年执政官的穆里纳。穆里纳在选举中显然有舞弊行为，但加图偏偏在这个时机起诉，实在是有些不识时务。在国家危难之际，把几周之后就要开始领导共和国的两名高级行政长官之一罢免，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于是，西塞罗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穆里纳辩护，强调了国家面临的严重威胁，以及他的客户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能够为受威胁的共和国做出的贡献。他的这份演讲稿后来被公开发表，据说当时西塞罗非常疲惫，所以状态不佳，但穆里纳仍然顺利地被无罪开释。穆里纳大体上对加图的指控置之不理，嘲讽了这位起诉人的动机，将他描绘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者，指责他企图将不合实际的哲学原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据说加图听了这些话，冷冷地说："我们的执政官是个多么风趣的家伙。"西塞罗总是喜欢在其他辩护律师（此案中为穆里纳辩护的另外两名律师是霍尔腾西乌斯和克拉苏）都发言完毕之后才做最后讲话。克拉苏和西塞罗在此案和其他一些事情中都处于同一阵营，足以说明罗马政治中义务与关系网络的复杂。他们两人都喜欢为被告辩护，一旦成功，就能赢得客户及其家人和亲密盟友的感激。[8]

在这令人心急如焚的几周内，此次庭审对执政官西塞罗来说是额外的负担。在有人指控克拉苏不久之后，就有人劝说西塞罗将恺撒作为密谋者进行镇压。煽动此事的是卡图卢斯——他仍然因为竞选祭司长时输给了恺撒而耿耿于怀——以及当年早些时候恺撒曾起诉（但失败）的盖

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西塞罗不肯逮捕恺撒。也许他根本不相信恺撒参与了叛国阴谋，因为他可能和恺撒非常熟识，极有可能在前70年代他与科塔兄弟[9]交好的时候也和恺撒过从甚密。或者，西塞罗只是在便宜行事，因为他觉得把恺撒这样一个人逼急了，会将他推到革命党的怀抱里。后来，在克拉苏和恺撒均已去世之后，西塞罗在一部著作中称克拉苏和恺撒当年都参与了喀提林的阴谋。但我们不知道西塞罗在当时是否就持有这样的信念，也不知道他的这种论断是否正确。但在前63年的剩余时光里，他决定不管自己个人意见如何，都公开地相信克拉苏和恺撒对共和国是忠诚的。五名主要密谋者在元老院受审之后，各自被交给一名重要元老看押，等待元老院做最终发落。克拉苏和恺撒都在获得看押犯人任务的元老之列，西塞罗非常刻意地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信任。当然，这也不能阻止皮索和卡图卢斯继续散播谣言，诽谤他们的私敌恺撒。[10]

五名犯人的成分很复杂。其中两人——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素拉和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基泰古斯——在前70年被监察官罢免的六十四名元老之列。兰图鲁斯在前71年担任执政官，被褫夺元老身份之后一直在稳步重返政界。前63年，他第二次当选裁判官，但被捕之后就被解职。垮台之后再次通过竞选攀升到高位的人不止他一个。与西塞罗同年的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曾与兰图鲁斯同时被剥夺元老身份。库里乌斯——他的情妇富尔维娅说服他出卖了喀提林密谋集团——也曾被监察官罢免。兰图鲁斯对自己的命运坚信不疑，常常念叨一个预言——科尔内利乌斯氏族将先后有三人统治罗马，前两个是苏拉和秦纳，很快就轮到他了。他的妻子叫尤利娅，是前64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11]的妹妹。这个尤利娅在之前的一段婚姻中生的儿子就是马克·安东尼，当时只有十岁左右。喀提林在整个叛乱过程中都不肯征募奴隶，而选择依赖公民。兰图鲁斯不仅为了这事与他争吵，还将这个争端写在一封信里，后来这封信被缴获，在元老院宣读。所有的密谋者都留下了铁证。他们在受审起初都拒不承认——基泰古斯声称，他家中藏

着的大量武器只不过是他收藏的古代军事纪念品——但看到用他们的印章封印、以他们的笔迹写成的证明罪责的书信，就垮了。12月3日，他们被带到元老院，其罪行被证明确凿无疑。两天后的12月5日，元老院又一次开会，商讨如何裁决他们的命运。[12]

辩论

元老院这一次的开会地点是和谐女神庙，而不是元老院议政厅。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元老院除了在议政厅开会之外，也会去一些神庙。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和谐女神庙显得特别恰当，甚至还有些讽刺，但也许是由于和谐女神庙位于广场西侧，邻近卡比托利欧山的山坡。这个地方比较利于防御，有大群武装人员，其中许多是年轻的骑士，簇拥在执政官身边，摆好阵势，准备为会议提供安保。作为主持会议的行政长官，西塞罗以正式的祈祷开始会议，然后向元老们讲话，询问他们决定如何处置犯人。在过去的元老院终极议决时期，执政官会自行决定将犯人视为共和国的敌人，并直接处死，不必咨询元老院的意见。但总的来讲，这样的处决都是在激战过程中进行的，那时可以将“叛贼”视为重大威胁。与之前的元老院终极议决时期不同，此次密谋者均已束手就擒，处于武装控制之下。有传闻称，基泰古斯曾企图与他的奴隶互通消息，安排一群武装人员劫狱。但即便如此，执政官也不能以此为由处死犯人，并将其粉饰为群众激愤之下对犯人的私刑。前不久的拉比里乌斯案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元老院终极议决之下，哪些行动是说得通的？西塞罗可能因此特别谨慎。元老院不是法庭，但如果元老们明白无误地达成了一种共识，去批准一种决策，那么执政官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会更有道义支撑。西塞罗宣布自己将遵从元老院做出的任何决定，但他显然相信，犯人理应被处死，共和国需要将其处死。

元老院没有固定的发言顺序，但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即按照惯例，先请执政官们发言，然后是裁判官，最后是级别更低的行政长官。

每个群体中个人的发言顺序由主持会议的行政长官决定，他点名决定由谁发言。元老院中资历很浅的成员，尤其是那些从未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很少得到发言的邀请。但是，每一位到场的元老都可以投票，而且罗马投票体制中非常独特的一点是，每一位元老投票的权重是相同的。投票时，元老们会分成两队，各自走到会议厅的一边，以显示自己支持还是反对动议。在辩论中，支持发言者的元老们常常会走过去，坐到发言者身边。资历浅、很少发言但仍然有投票权的元老有时被称为“走路派”。11月8日的会议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喀提林落座后，元老们迅速离开，并走到离他较远的地方，这让他在政治上和人身上都受到孤立。[13]

12月5日，西塞罗先请塞维利娅的丈夫西拉努斯发表意见，由此开启了辩论。一般会先征询已当选的下届执政官的意见，然后才请前任执政官们发言，因为下届执政官可能会将元老院的决议付诸实施。西拉努斯宣称，犯人应当受到“最终极的惩罚”，这被大家理解为死刑，他的本意显然也是这样。下一个受邀发言的是穆里纳，他表示同意。当天出席会议的全部十四位前任执政官都主张将犯人处决。克拉苏的缺席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态度仍然有些暧昧不清。但恺撒就在现场，他是当选的下届裁判官，受到邀请后便勇敢地独抒己见。目前为止，所有人的意见都是死刑，其他人则喃喃低语或大声地表示赞同——我们无法确定，元老院会议是嘈杂的还是肃穆的——表明这差不多是全体的意见。恺撒在近日受到了一些怀疑，因此大家估计他会特别热切地主张将犯人处死，以证明自己对共和国的忠诚。就在不久前，他还控告拉比里乌斯非法杀死罗马公民，并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站在广受民众支持的事业那边，抨击元老院或行政长官滥用权力。如果现在要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就会显得很奇怪，但恺撒很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点。从他挑战苏拉的时候起，他从来就不害怕单枪匹马。仅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说服元老院，令元老院改变主意的人会受到贵族们的颂扬。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据说他在前278年说服了元老院，不

要与得胜的皮洛士谈判，而是继续打下去。如果是在人云亦云和特立独行之间选择，恺撒永远会选择后者。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可能的确受到了自己良心和真诚信念的驱动。赢得名望和按照自己的信念做事，并不是彼此排斥的。[14]

恺撒此次演讲的稿子没有保存下来，但撒路斯提乌斯的转述似乎表达了其主要论点，尽管用的是撒路斯提乌斯的写作风格，并且可能缩减了不少。任何书面演讲稿都有这个缺点，即很难设想演讲者面对听众侃侃而谈时所能形成的冲击力。恺撒演讲时优雅有力的手势、立姿和仪态，以及他略高的音调都受到了赞扬。根据撒路斯提乌斯的版本，恺撒的精彩表演是这样开始的：

> 诸位元老，任何人若要决断棘手的问题，就必须摈弃仇恨、友谊、愤怒和怜悯的影响。因为这些情感干预人的时候，人是不可能正确判断真相的。意气用事从来就不可能符合人的最佳利益。如果你运用头脑来处理一项任务，头脑便会得胜；但如果让激情占了上风，它就会吞噬你，而头脑无能为力。[15]

在整个演讲中，他始终保持冷静、礼貌与理智，他温和地嘲讽了在他之前的发言者们，那些人个个都绘声绘色地描述，假如喀提林成功了，会发生怎样的屠杀、强奸和劫掠，说得一个比一个恐怖。恺撒曾经在暴怒中抓住朱巴的胡须，现在没有一丝一毫那种暴怒的痕迹。被告的罪责铁证如山，任何刑罚对他们都不算严酷。但是，回到演讲开始时的主题，元老院的位置太重要，责任太重大，因此它的成员们不可以屈从于自己的情感。元老们知道，他们今天的决策将会成为一个可以援引的先例，因此必须选择对共和国未来最好的决定。恺撒小心地赞扬了西塞罗，并宣称任何人都不会猜疑现任执政官会滥用职权。但大家都不能保证，将来的执政官们都会像西塞罗一样克制。他提醒大家，苏拉的流放政敌是以处决一些大家普遍认为有罪的人开始的。很快屠杀就大大升级，成为令人震惊的血洗，很多受害者因为“他们的宅邸或别墅”而被消灭。[16]

恺撒指出，死刑不符合罗马人的风俗习惯（当然，前不久的大逆审判威胁要对被告处以死刑）。他温和地批评了西拉努斯，赞扬他的爱国主义，但同时指出西拉努斯因为看到犯人的罪大恶极，被冲昏了头脑。正常情况下，罗马公民（至少是富裕公民）如果犯下了严重罪行，一般都被允许流亡；因此死刑事实上只是理论上的刑罚，实践中极少采用。恺撒自问自答：西拉努斯为什么没有提出，在处决犯人之前先对其进行鞭笞？当然因为这是违法的。他赞扬了祖先的智慧，过去一代代元老系统性地废止了针对公民的死刑和其他严酷惩罚。无论如何，死亡是“逃脱痛苦，而不是惩罚……它结束了生命中的不幸，不会留下任何忧愁或喜悦的空间”。[17] 恺撒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释放这些犯人是荒唐的，因为他们会去加入喀提林。罗马也没有真正的监狱可以长久地关押犯人，因为大多数法律规定的惩罚要么是付款，要么是流放。恺撒建议将犯人交给不同的意大利城镇，它们将承担将其终身监禁的使命。任何没有完成任务的城镇都将受到严重的处罚。犯人的家产将被充公，这就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孩子将来从政或寻求报复。恺撒还建议向公众宣布，元老院和人民将永远不可以考虑将密谋者召回，就像恺撒本人曾为了帮助李必达的支持者归国而努力一样。恺撒认为自己的建议比死刑严厉得多，因为密谋者将会一辈子承担自己罪行带来的后果。[18]

在演讲中，恺撒印证了祖先们的例子。这是很常规的策略，因为罗马贵族对祖先非常尊崇，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听祖先的故事，以及他们为共和国做出的伟大贡献。但他提出的建议既极端，又新颖。罗马人此前从来没有将公民终身监禁过，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新方法。尽管他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寻求将犯人释放并恢复地位，但这个条款能否真正执行还是个问题。格拉古兄弟和其他保民官不断借助公民大会的权力来对所有事务投票。将来会不会有人主张将犯人释放，是值得怀疑的，但也不能将这个可能性完全排除。元老院面对的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终极议决的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冷静地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对付已经在押的人。恺撒在演讲中提到，元老院做出的决定将会被视

为一个先例，而他建议的是用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去应对一个全新的问题。恺撒建议的目的是避免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尔尼努斯遭镇压之后出现的那种极大争议。密谋者的蓄谋令人震惊，但即便如此，也不应当剥夺他们的全部公民权。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去伤害共和国，而将他们囚禁就能确保他们将来也不会有机会兴风作浪。[19]

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恺撒始终保持冷静和克制，非常理性地呼吁元老们不要让感情冲动影响了他们对共和国的义务。元老们出身门阀世家，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因此一定会信服恺撒的呼吁。在会议开始时大家都还坚定不移地要将犯人处决，恺撒劝导后开始渐渐动摇，最后就完全不确定了。执政官的弟弟昆图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也是下届裁判官之一，他在恺撒之后发言，对其表示完全赞同。他很可能按照元老院的传统，坐到了恺撒身边，以表示对他的支持。前62年的另一名裁判官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后来提比略皇帝的祖父[20]——的观点则略有不同。他认为目前喀提林仍然逍遥法外，而且掌握着一支军队，现在就裁决犯人的命运为时尚早；应当暂时将犯人羁押，并定一个新的日子再进行一次辩论，到时再决定他们的命运。[21]还有很多人犹豫不决。这时，西拉努斯站起来发言，说大家误会了他的意思，他并没有主张将犯人处死，他说的“最终极的惩罚”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他素来不愿意为任何有争议的事情承担责任，优柔寡断是他的典型特征。

西塞罗看到先前的共识逐渐消失，决定采取行动。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演讲，其文本后来以“第四次反喀提林演说”为题发表。演讲的原稿肯定至少有一部分是在辩论过程中现场起草的，所以或许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那样精湛完美。但如果要低估这样一位伟大演说家的修辞才华和技艺，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便是事先毫无准备的即席演说，西塞罗对语言、韵律和结构的运用也是出类拔萃的。从一开始，他就确保让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牢记：他是执政官，是危机时刻的共和国领导人，并且不管元老院最终的决定如何，他都将为其负责。他恢复了

在恺撒克制而理性的干预之前的辩论论调，大谈密谋集团可能做出的屠杀、强奸和洗劫神庙等罪行：

> 在座诸君，请你们自己加以考虑；起来保卫你们的祖国，挽救你们自己、你们的妻儿和你们的财产，捍卫罗马人民的名誉和他们的生存；不要再专注于保护我，请不要再担忧我的安危。首先，我坚信，佑助这座城市的诸神一定会按照我应得的份额报偿我；其次，如果我遇到不测，我一定会沉着冷静、听天由命地死去。[22]

然后他转而探讨西拉努斯的提议——西塞罗仍然将西拉努斯的提议理解为支持处死犯人——和恺撒的提议。死刑是符合传统的。西塞罗提到，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尔尼努斯的罪行比这轻得多，都被处死了；而恺撒的提议素无前例且极不务实。西塞罗问道，究竟如何选择哪些城镇来羁押犯人？让元老院选择似乎不大公平，但各城镇难道会自愿承担这个任务吗？但他没有质疑恺撒提议的严厉程度——恺撒强调，在很多方面，终身监禁和没收财产是比一死百了更残酷的惩罚。

西塞罗刻意对恺撒非常礼貌，因为恺撒的演讲和行动都已经表明了他“对共和国的忠诚”。他称赞恺撒为“心系民众的真正的平民派”，将他与煽动暴徒的奸诈政客做对照。此时他狡黠地讥讽了一下克拉苏，说“某位将自己打扮为平民派的人士”缺席了会议，“或许是为了逃避决定是否杀死罗马公民的投票”。西塞罗没有指名道姓，但他说的毫无疑问就是克拉苏。在最近两天内，克拉苏负责关押其中一名犯人，投票赞同公众向西塞罗感恩，并批准奖励揭发密谋者的人。然后西塞罗试图利用恺撒在场的事实来攻击后者的论点。如果恺撒承认元老院有权审理密谋者，那么就一定会承认这些犯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公民身份，因此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西塞罗知道，如果元老院接受了恺撒的提议，那么由于恺撒个人深得民心，聚集在广场的群众一定会比较容易接受元老院的裁决。但西塞罗也宣称，他坚信人民的智慧将引导他们接受处决犯人的必要性。然后，他又重述了犯人的罪大恶极，“他一想到母亲们哭泣、男童和女童逃命、维斯塔贞女们遭到强暴，就浑身发抖”。[23] 他向与会

者们保证，他已经采取措施来保护会议现场以及整个城市，并明确告诉元老们，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自由决策。作为执政官，他愿意为他们的决定负责，处决犯人可能造成的耻辱和仇恨都将由他一人承担。为了共和国的福祉，他愿意付出任何个人代价。

执政官的演讲重新鼓舞了一些元老的决心，但大家仍然意见不一、犹豫不决。于是元老们听取了更多意见。加图作为下届保民官之一，也应邀发言。对于加图的发言内容，我们又一次只能大体上依赖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载，但普鲁塔克告诉我们，西塞罗部下的书记员旁听了整场辩论，将加图的演讲内容记录下来，后来发表了。根据撒路斯提乌斯的说法，时年三十二岁的加图在讲话开头宣称，元老们似乎忘记了，喀提林依然逍遥法外，密谋者仍然是共和国的潜在威胁。国家命悬一线，如果“为了饶恕少数恶棍的性命，导致所有好人遭到灭顶之灾”[24]，就太愚蠢了。他对恺撒的观点——死亡终止了苦难，因而是仁慈的——嗤之以鼻，追溯了关于为非作歹之徒在死后遭到种种惩罚的传说故事。他对恺撒的建议——将犯人送到不同城镇羁押——同样做了严厉批评。将犯人关押在各城镇，就一定会比关押在罗马更安全吗？如何能阻止喀提林叛军将这些犯人解救出去？加图一生中始终坚决主张苛刻严峻、坚定不移的行事之道，此次亦是如此。在共和国遭到的威胁解除之前，不宜对敌人心慈手软，因为那样太危险：

> 诸位尽可以确信不疑……在裁决普布利乌斯·兰图鲁斯和其他人命运的时候，你们同时也在审判喀提林的军队及所有的密谋者。你们的行动越严厉，他们的勇气就越颓丧；但如果他们发现你们有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软弱，他们就会勇气倍增，即刻杀到此地……一群衔级最高的公民图谋不轨，要纵火焚毁生养他们的城市，他们煽动罗马人民的不共戴天之敌——高卢人——来危害罗马。敌人的魁首率军来攻打我们了。即便到了这关头，你们还在犹豫不决，还要满腹疑虑地问自己，该如何处置在城墙之内擒获的贼人吗？[25]

像恺撒一样，加图也谈到了罗马历史上的例子，努力以传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尽管这些传说故事的真实性都是非常可疑的。意见针锋相

对的人都声称罗马历史悠久的风俗习惯支持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在罗马，革新几乎总是披着传统的外衣，才能成功。撒路斯提乌斯将此次辩论描绘为恺撒和加图之间的斗争。这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了伏笔，加图将会成为恺撒最无法和解的死敌。撒路斯提乌斯的这种观点是很流行的，尤其是随着岁月流逝，人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点。布鲁图斯后来写了一份记录，贬低了西塞罗在此次辩论中所起的作用，突出了加图的影响。西塞罗为此非常恼怒。撒路斯提乌斯的这个版本有极大的吸引力，并成为一个经典故事：加图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元老院的意见，指明了责任的道路。加图在此刻肯定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就像刚才发言的恺撒那样，加图也一定对辩论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加图发言完毕，刚刚坐下，所有前任执政官和许多其他元老都鼓掌叫好。恺撒不为所动，继续鼓吹自己的观点。恺撒和加图的座位相距不远，加图的回答越来越愤怒，但恺撒没有被他激怒。与西塞罗不同的是，加图毫无顾忌地攻击恺撒在最近几个月中的行为，将他妖魔化；还宣称恺撒不肯支持处决犯人，说明他同情叛党，甚至是密谋的共犯。辩论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人（可能是恺撒的一名奴隶）悄悄地递给恺撒一张字条。加图抓住这个机会，宣称恺撒显然在与敌人私通消息。恺撒默默地读了字条，没有做出回应。加图要求他大声宣读字条时，他拒绝了。加图认为恺撒这是心里有鬼，于是言辞愈发激烈，四周的元老们也都呼喊着支持他。最后，恺撒将条子交给了加图。加图目瞪口呆地发现，这是塞维利娅给恺撒的一封激情洋溢的情书。加图绝望地喊道："拿回去，你这酒鬼！"话毕，加图将条子丢还给恺撒。在整个交锋中，恺撒始终保持着贵族的尊严、沉着和自信，丝毫没有动摇。加图的辱骂有些奇怪，因为恺撒是有名的饮酒非常节制的人，加图自己才嗜酒如命。[26]

这场风波从侧面印证了恺撒和塞维利娅的关系，非常有趣。这显然说明他们之间情意绵绵，不在一起的时候也要不断地交流和联系。恺撒正在元老院开会，而且与会者还包括塞维利娅的丈夫与同母异父弟弟，塞维利娅竟然在这时给恺撒送情书，说明她的确是相当大胆。或许她或

者她和恺撒两人，都对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感到非常刺激。西拉努斯的态度很难判断，我们也不清楚他究竟知不知道妻子正与恺撒私通。即使他知道，也没有对自己的对手采取行动。对西拉努斯来说，恺撒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政治盟友，尤其是因为西拉努斯第二次竞选执政官才成功，而且他的才干很平庸。甚至有人推测，西拉努斯鼓励自己的妻子与恺撒结交，以赢得后者的支持。尽管恺撒和塞维利娅之间的爱情很真挚，但他们都不会放过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

最终的投票是由加图发起的，而不是由他的姐夫西拉努斯发起，因为大家觉得加图的措辞更好。投票结果是大多数人支持处死犯人。兰图鲁斯的内兄卢基乌斯·恺撒支持这一决议，基泰古斯的兄弟（也是元老）似乎也支持。恺撒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在他离开和谐女神庙的时候遭到了一群愤怒群众的骚扰。元老院辩论的惯例是将会议厅大门敞开，以使聚集在室外以及广场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得知里面的情况。群众非常害怕叛乱的阴谋，尤其是有传闻说密谋者企图在罗马纵火，这对生活在极其拥挤且易燃的公寓楼里的许多人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因此大家普遍非常敌视喀提林集团。西塞罗继续公开支持恺撒，确保他不会受到暴民的伤害。这场风波的最后一幕在附近的图利亚努姆监狱上演。这是短期拘押候审犯人的监狱，空间很小，像洞穴一样。密谋者被押解到那里。兰图鲁斯的裁判官职位已被褫夺，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享受了特殊待遇——执政官亲自押他入狱。五名犯人被带进图利亚努姆监狱，在公众视线之外被杀死。不久之后，西塞罗走了出来，简单地宣布："他们已经死了。"尽管处死犯人是元老院投票决定的，但最终为此负责的只是西塞罗一个人。[27]

后续：恺撒担任裁判官，前**62**年

没过多久，就有人为此事开始攻击西塞罗。前63年12月10日，新一届保民官上任了，其中有一个叫作昆图斯·梅特卢斯·尼波斯的人。此人

莽撞轻率、肆无忌惮，以至于他刚刚宣布自己要参选保民官，加图就决定参加这年的保民官竞选。尼波斯很快开始谴责西塞罗惩罚密谋者的方式是“非法的”。执政官会在12月的最后一天正式卸任，按照惯例会发表演说，讲述自己的成就。尼波斯和另一名保民官卢基乌斯·贝斯提亚运用保民官的否决权禁止西塞罗做这样的演讲，这是几乎闻所未闻的侮辱。但他不能阻止即将卸任的执政官按照规矩宣誓，于是西塞罗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是他挽救了共和国。尼波斯是庞培的内弟，曾在东方的庞培麾下担任军团长，但后来返回了罗马。大家一般认为他代表着庞培的利益。战争已经结束了，庞培即将班师回国。但他将以何种方式回国，则是个问题。已经有人建议将共和国最著名也最成功的将军召回，来镇压喀提林的叛军。[28]

1月1日，恺撒正式就任裁判官，立刻开始攻击卡图卢斯。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在前83年毁于大火，五年后，卡图卢斯担任执政官期间受命修复神庙。但修复工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于是新官上任的恺撒将卡图卢斯传唤到广场的一次公民大会上，要求他为这样的渎职做出解释，指控他侵吞了元老院拨出的工程款。恺撒精心筹划了对这位前任执政官的侮辱：卡图卢斯正要登上演讲台，被恺撒拦住，于是他不得不在较低的一层地面上发言。恺撒建议通过一项法案，将修复神庙的任务交给别人。他建议的新人选很可能是庞培，因为此时恺撒还在通过大张旗鼓地支持这位伟大英雄来争取民心。但是，卡图卢斯的许多支持者赶到会场，迫使恺撒让步。就像恺撒目前为止政治生涯中的许多事件一样，取胜并非他的目的，他更看重的是在公众面前露脸，并让大家都知道，他对某项事业抱有何种态度。[29]

然后，恺撒积极支持尼波斯，后者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将庞培及其军队召回，将恢复意大利秩序的任务交给他们。另一位保民官加图激烈地反对恺撒和尼波斯，在元老院中严厉斥责他们，并发誓赌咒，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允许庞培率领军队进城。在此项法案的投票

日，尼波斯按照惯例召开了罗马公民大会。他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的演讲台就座。这座高台和广场上的演讲台一样，也常被用来当作讲坛，因为广场东端比较宽敞。恺撒命人将他的座位摆在保民官尼波斯旁边，以示支持。人群中有一些壮汉，包括一些角斗士，负责在出现麻烦时保护保民官们。麻烦果然来了：加图和另一位保民官昆图斯·米努基乌斯·泰尔姆斯在支持者的簇拥下赶到，前来对法案行使否决权。加图和米努基乌斯登上演讲台。加图泰然自若地在尼波斯与恺撒之间坐下，他的大胆令尼波斯和恺撒稍微乱了一些方寸。人群中的大多数现在开始为加图欢呼，但其他人仍然忠于尼波斯，现场气氛越来越紧张。尼波斯恢复了平静，命令一名文书员大声宣读法案。加图利用自己的否决权，禁止文书员宣读法案。尼波斯自己拿起法案文件，开始朗读，加图劈手将文件夺过。尼波斯对文件内容已经烂熟于心，于是开始背诵。泰尔姆斯用手捂住他的嘴，阻止他继续背下去。然后，尼波斯向他的武装支持者们发出讯号，于是一场暴乱开始了，起初还只是用棍棒和石块殴打，最后却动用了刀剑。加图和泰尔姆斯都遭到了粗暴的对待，但执政官穆里纳保护了加图的安全（就在不久之前，加图还起诉过穆里纳）。最后，尼波斯的党徒和追随者散去了。当天下午，元老院开会，通过了元老院终极议决。有人提议免去尼波斯的保民官职务，但加图为他说情，于是作罢。尼波斯在广场又一次召集了大会，指控加图和元老院阴谋反对庞培，并宣称他们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随后，尼波斯逃离了罗马。保民官在任职的一年中是不应当离开城市的，他甚至走得更远：从意大利出海，到罗德岛与庞培会合了。大家看他自己离去，都松了一口气，没有人追究他离开城市是否合法。[30]

恺撒对局势的判断严重失误。所有的史料都将尼波斯描绘成暴力冲突的幕后元凶，说他是个极度危险、冲动狂野、一点就爆的人，而恺撒至少在一开始热情地支持了他。尼波斯支持庞培，因为他的同母异父姐姐穆齐娅[31]是庞培的妻子，而且他希望能够从庞培的返回中得益。恺撒与庞培没有亲戚关系，与他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不过，在庞培远征

海外期间，恺撒与穆齐娅享受了鱼水之欢。他之所以支持庞培，无非在贯彻自己的老策略，即赞颂和力挺罗马的这位伟大英雄，借以沾光，增加自己的声望。恺撒这一次剑走偏锋，元老院宣布剥夺他的裁判官职务，此时他只当了几周的裁判官。起初恺撒打算若无其事地硬撑下去，继续公开穿戴裁判官的服饰，执行公务。这一次，他仍然没有理解群众的普遍情绪，以及最近事件所造成的极大民愤。他听说有一些元老打算用武力对付他，于是解散了侍奉他的六名执法吏。执法吏携带法西斯束棒，即用棍棒和一支斧子捆扎成的束棒，象征着军权持有者及其施行肉体惩罚和死刑的权力。然后他脱掉了镶边托加（元老在官方场合的服装），静悄悄地溜回自己的宅邸祭司长府，宣布打算退出政界。次日，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家门外的广场，大声宣布他们愿意帮助他恢复官职。恺撒走出家门，对他们讲话，安抚他们的情绪，劝说他们各自散去。群众声援恺撒的事情可能是恺撒自导自演的，可能是群众自发的，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但这是一场庄重而负责任的表演，劝服了元老院，于是元老院决定让恺撒官复原职。尽管在这段时间里，恺撒的政治本能出了好几个错，但他表现出了知错能改的本领。[32]

此时，喀提林已经被一支名义上由西塞罗的前同僚安东尼统领但实际上由他的一名部下指挥的军队击败。加图的论调——强有力的行动会震慑叛军，令其魂飞魄散——被事实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大多数叛军都始终忠于喀提林，与他一起死战到底。不管人们对活着的喀提林有什么看法，但普遍都承认（尽管不太情愿地承认），他死得非常光荣，表现出了一位贵族应有的视死如归的勇气。然而，尽管喀提林已经死了，叛军也被打败了，但罗马仍然笼罩在互相猜忌、互相攻击的气氛中。向当局提供重要情报的人会得到奖赏，这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出现了大规模的揭发检举行为。昆图斯·库里乌斯曾在情妇的劝说下出卖了密谋者，因此得到了恢复元老地位的奖励。现在，他列出了一个名单，上面都是据说曾参与阴谋的人，恺撒也名列其中。另外一名告密者卢基乌斯·威提乌斯也指控恺撒，声称自己手中有一封恺撒写给喀提林的

信。在元老院，为了驳斥库里乌斯的指控，恺撒（此时已经恢复了裁判官职位）寻求了西塞罗的帮助。西塞罗作证，恺撒曾向他提供一些信息，并且自始至终是忠诚可靠的。于是，库里乌斯丧失了因自己告密而得到的赏金。威提乌斯是个人微言轻、名誉不佳的骑士，比较容易对付。恺撒以裁判官的身份命令他来到演讲台前，命人将他狠揍一顿，扔进了监狱。威提乌斯可能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此后再也没有人公开指控恺撒曾参与喀提林阴谋。[33]

善良女神节

除了上述的故事，我们对恺撒担任裁判官期间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或许是保持低调（至少按照他的标准算是低调），并执行他的主要任务，即审理案件。这一年年底，他卷入了一场通奸丑闻，但这一次，他是清白无辜的一方。每一年“善良女神节”[34] 的庆祝活动都在一位高级行政长官的家中举行。恺撒的住宅被选为前62年的节庆地点，可能是因为他既是高级大祭司，又是裁判官。尽管节庆在行政长官家中举行，但他或其他任何男人都不得在场，因为仪式完全由女性执行，主要是罗马的贵妇及其女仆们。献祭和其他仪式之后，音乐和宴饮要持续整夜。维斯塔贞女主持各项仪式，据普鲁塔克记载，行政长官的妻子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组织工作。奥雷利娅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可能比庞培娅大，恺撒的姐姐尤利娅也在场。

庞培娅有一个情夫，三十岁的下届财务官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这对奸夫淫妇觉得，节庆活动是幽会的良机。克洛狄乌斯假扮为一名女竖琴师。参加节庆活动的专业艺人有很多，其中大多数是奴隶。夜间，克洛狄乌斯被庞培娅的贴身女仆哈布拉（她知晓女主人与克洛狄乌斯的奸情）带进宅邸。然后哈布拉让克洛狄乌斯在那里等候，自己去找女主人。克洛狄乌斯等得不耐烦了，开始四处乱走，撞上了奥雷利娅的一名奴隶，她立刻劝说这位年轻的、非常羞涩的音乐家加入其他

人。克洛狄乌斯摆脱不了她的纠缠，最后说“她”不能过去，因为“她”在等“她的”朋友哈布拉。克洛狄乌斯的嗓音明显是男人的，于是他暴露了。奴隶尖叫着逃走，呼喊着说家里有个男人，立刻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克洛狄乌斯在夜色掩护下仓皇逃窜。奥雷利娅非常沉着、高效地做出了反应，她和她的儿子的性格都是这样。她立刻中止了仪式，命人将仪式所用的神圣器皿遮盖起来，免得它们被男人看到而受到污染。她派遣奴隶锁住宅邸所有的门，以阻止闯入者逃走。然后，恺撒的母亲带着奴隶，举着火炬，仔细搜查宅邸，最终发现克洛狄乌斯藏在哈布拉的房间内。奥雷利娅仔细看了看这个男人，辨认他的身份——罗马贵族的世界是很小的，大多数人都互相认识——然后将他逐出家门。然后奥雷利娅让女人们各自回家，告诉她们的丈夫，克洛狄乌斯犯下了渎神罪行。[35]

随后几天内，恺撒休了庞培娅。虽然罗马最早的法典——《十二铜表法》（在恺撒的时代，贵族儿童还被要求熟记和背诵《十二铜表法》）——中没有关于离婚的条款，但离婚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和罗马社会的许多方面一样，离婚也被认为是家庭私事。到共和国晚期，丈夫或妻子均可单方面地宣布与对方断绝夫妻关系。最简单的离婚方式是丈夫会对妻子说“你的财产还归你！”恺撒也许用的是这种传统的宣示离婚的方法，也许是给了庞培娅一封休书，但不管怎么说，这段婚姻很快就结束了。他们并没有公开宣布离婚的原因，这很平常，尽管之前导致他们离婚的事端是非常稀奇的。恺撒与庞培娅从来没有像和科尔内利娅那样亲密，尽管夫妇俩婚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却没有一男半女。恺撒的另外两位妻子有没有过情夫，史料中没有记载，但在第二段婚姻中，恺撒的魅力也不足以确保庞培娅的忠贞。或许这些年里他和塞维利娅及其他情妇待的时间太长了，或许这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妻子非常怨恨家庭被婆婆主宰着。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克洛狄乌斯的诱惑力，他非常聪明、英俊（他的家族以相貌好而闻名遐迩）、魅力四射，有着风流浪荡子的名声，这让他的诱惑力更大。这些描述当然也可以用

在恺撒身上，而且克洛狄乌斯也和恺撒一样喜欢勾引人妻。不管庞培娅红杏出墙的原因是什么，恺撒自己风流成性，却不能容忍她的出轨。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持这种态度是不足为奇的。[36]

婚姻的终结对当事人来说是件大事，而这场风波在整个共和国造成的冲击也不可低估。善良女神节的庆祝活动此前从未遭到过这样的玷污。有些元老，包括西塞罗和恺撒，私下里对神祇或者至少是传统宗教的诸多方面存疑，但在公开场合，没有人会怀疑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毕竟宗教渗透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般认为，罗马的成功得益于诸神保佑，因此任何保障国家富强安康的宗教仪式都必须一丝不苟地执行，不能马虎，也不能有任何纰漏。元老院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此事，并决定如何处置。节庆活动则被安排在另一个夜晚，妥善地举行了。在征询维斯塔贞女和大祭司团的意见后，元老院决定对克洛狄乌斯进行审判。恺撒似乎从一开始就希望将此事遮掩住，但他作为祭司长，虽然是大祭司团的首脑，但职责更像是会议的主持人，没有控制其他大祭司的权力。在随后的审判中，他拒绝提供不利于克洛狄乌斯的证据，声称自己对整个事情一无所知。有人公开地质询他，假如他不认为自己的妻子通奸，那么为什么要把她休掉。他的回答后来非常有名：他之所以将妻子休掉，是因为“恺撒的妻子必须绝对清白，不能引起任何怀疑”。克洛狄乌斯是个前程大好的青年，有很强大的人脉，他的朋友们都在尽其所能地帮助他，确保法庭会赦免他。恺撒可能觉得与这样一个人交恶没什么意义，会带来没有必要的风险；或者他甚至认为，克洛狄乌斯在将来也许是个有价值的盟友。今天我们知道，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但在当时，这未必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尽管恺撒常常起诉和攻击卡图卢斯这样的人，但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在努力争取朋友，而不是消灭敌人。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的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而加图的名望是由于他毫不动摇的严峻，加图就是主张严惩克洛狄乌斯的人之一。

元老们的脑袋里永远抱着政治上的考虑，但我们不应当忘记私人层面的因素。古往今来，被人戴绿帽子始终是件让人窘迫的事情。假如恺撒出庭作证，那么克洛狄乌斯的辩护律师极有可能会将恺撒自己的风流韵事拿出来，作为攻击他的武器。或许，他认为自己都经常做这种风流之事，如果要为了同样的事情攻击另外一个男人，未免显得他太虚伪了，尽管他的奸情没有克洛狄乌斯那么奇特和亵渎神灵。但是，虽然他不愿意作证反对克洛狄乌斯，但奥雷利娅和尤利娅都做了证，指认了克洛狄乌斯的罪行。西塞罗也出庭作证，声明他在节庆当天在罗马遇见了克洛狄乌斯，这就推翻了被告的不在场证明——他声称自己在案发当天远在城外。克洛狄乌斯尽管显然有罪，但由于他和他的朋友们联合使用威吓与贿赂手段，最后还是被无罪释放了。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陪审员们要求为他们提供人身保护，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最后投票结果是三十一比二十五，法庭认定克洛狄乌斯无罪。卡图卢斯讥讽道：“你们为什么要求警卫保护？你们是害怕被抢劫吗？”这是史料中关于这位年迈元老的最后一桩轶事，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37]

西班牙

在克洛狄乌斯案件审结很久以前，恺撒就离开了罗马，以资深裁判官的身份治理外西班牙。之前他曾为一位努米底亚客户辩护，在法庭上起诉努米底亚国王希耶姆普萨尔二世。后来败诉，这名客户就藏匿在恺撒家中达几个月之久。此次出行，恺撒让努米底亚客户混在自己的侍从队伍中，溜出了罗马。陪同恺撒的还有他的财务官维图斯，恺撒曾经作为财务官，为维图斯的父亲效力。他的幕僚中还有一个叫作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的人，他的头衔是“工兵长官”，是一种类似于总参谋部军官的职务。巴尔布斯是个西班牙人，出生于富裕家庭，曾有恩于庞培，因此获得了公民权。新官上任的恺撒将罗马城和丑闻抛在脑后时无疑长舒了一口气，但在有一个时刻，他险些未能成行。他的一些债主开始焦躁不安，或许仅仅是因为还款期到了，或许是因为当年早些

时候他曾短暂地被罢免，这让债主们对他的长远前程产生了怀疑。有人要采取行动，阻止他离开，但恺撒向克拉苏求助。克拉苏出了830塔兰同作为保证金。这已经是一笔巨款，但对恺撒的全部债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这是史料中第一次明确地记载恺撒向克拉苏借款，但他极有可能在此之前就从克拉苏的巨额财富中分了一杯羹。即便如此，他也险些没能出城，最后在元老院正式宣布这一年的各行省总督名单之前才得以成行。元老院的宣布仅仅是走过场，因为各行省已经被分配给相应的总督了，但这有悖于惯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抵达西班牙后首先要处置的一批问题当中就包括普遍的负债。许多百姓由于负债累累，被迫落草为寇，啸聚山林，导致这一地区的匪情特别严重。恺撒颁布法令，要求债务人在偿清债款之前，应将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二交给债权人，余下三分之一用于供养自己和家人。[38]

担任行省总督是捞油水的大好机会。恺撒曾多次起诉已经卸任的贪污腐败的行省总督。很快他在元老院的政敌们就宣称，他在西班牙毫无必要地挑起了一场战争，甚至攻击同盟者社区，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敛财。这种指控是司空见惯的，不少罗马总督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但由于证据不足，所以不能判断恺撒是否的确犯有此种罪行。前61年，西班牙的许多地区仍然因为镇压塞多留的战争而伤痕累累。长久以来，掳掠和抢劫一直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偏远山区，那里的人们仅凭农耕很难生存。恺撒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卢西塔尼亚[39]西北部，该地区在当时并不富庶，我们很怀疑在这里征战劫掠能让指挥官发财。他开展军事行动的机会也很充裕，因为所有史料都强调该地区毫无法纪可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恺撒积极地把握这些机遇，以极其活跃的方式做出反应。他几乎刚刚到任就征募了十个新的大队，将现有的驻军兵力增加了一半。他率军开进塔霍河与杜罗河之间的山区，此地有不少据守山巅的部族。恺撒命令其中一个部族投降并定居到平原上。如他所料，该部族拒绝服从，于是他率军攻占了其住地。然后他转而去对付周边城镇。卢西塔尼亚人试图用牲畜群引诱他进入伏击圈，但恺撒识破

了这个计谋，对牲畜置之不理，进攻并击败了对方的主力部队。西班牙山民惯用伏击战术，恺撒的部队没有选择崎岖地域中很明显的道路，躲过了又一次伏击。后来恺撒率军返回，在自己选择的地点作战，取得了胜利。他乘胜追击，一直把卢西塔尼亚人驱赶到大西洋海岸，他们躲到一座小岛上避难。恺撒第一次进攻小岛失败了，但后来从加的斯[40]调来战船，迫使守军投降。然后他率领舰队沿着海岸巡游，至少有一个部族看到了他的雄壮军力——桨帆战船在这一地区是前所未闻的——大为敬畏，当即举手投降。[41]

我们从他撰写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中知晓的恺撒的许多特点，在西班牙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他行动迅捷、筹划缜密，不肯屈从于天然障碍，对起初的挫折不以为意，并且能够无情地利用胜利来扩大战果。同时他也乐意接受敌人的投降，仁慈慷慨地对待被征服者，以便将他们转化为从事生产、缴纳赋税的行省居民。他的胜利本身并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恺撒被誉为“凯旋将军”。有了这个称号，他作为行省总督，在返回罗马时便可以要求举行凯旋式。但他的任期并非全部被用于征伐，他还做了许多工作去重组该省的民政，裁决当地部族之间的纠纷；他还禁止了某些地方宗教崇拜中的人祭活动。他的这项政策在长期看来究竟有多大效果是很难说的，因为该省的其他总督在过去也曾反对人祭。铁器时代的欧洲和其他地区都曾出现过人祭，可以说是相当常见的。罗马人上一次执行人祭就在恺撒出生几年前，当时罗马受到了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严重威胁。但是，人祭是罗马人在外省积极禁止的少数宗教活动之一。史料中关于恺撒在西班牙担任总督的情况记载得并不详细，但他似乎一如既往地精力充沛、高度活跃。他在这段时期可能积攒了一些金钱，但也顶多只能清偿他的巨额债务中的一部分。他赢得了当地人的赞扬，并有希望在返回罗马时获得凯旋式的荣誉。这个职位给了恺撒想要的东西，但他始终着眼未来。在继任者尚未抵达时，他便离开了行省，返回罗马。这有些不寻常，但并非史无前例。西塞罗在担任执政官十年之后终于去外省当总督时，也会这

么做。恺撒临走时可能授意他的财务官留下来掌管行省。[42]

据普鲁塔克记载，恺撒及其随从在当初前往西班牙的途中，曾途经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座小村庄。他的朋友们开玩笑地问，在这样污秽的环境中，人们是不是仍然在争权夺利。恺撒非常严肃地宣称，他宁愿在这样一个地方当老大，也不愿意在罗马屈居老二。这个故事也许是捏造的，但正如普鲁塔克所认识到的，它充分说明了恺撒的个性。此时恺撒在政治上春风得意，几乎一定能有个好前程。这也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期望，但仅仅仕途成功还不够，他的目标是顶峰。他渴望做出比其他任何人都伟大的成就。[43]

顶峰有足够的空间，因为随着这十年即将落幕，真正能够与庞培对抗的人只剩下了克拉苏。共和国的一些巨富，尤其是卢库鲁斯，已经淡出政坛，过着奢靡的退隐生活。这些年里，元老院大约有六百名成员，但鲜有真正有才干的人。内战夺取了许多有名望、有才华人士的生命，这种影响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喀提林辩论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理应有许多重要政治家到场，结果却只有十四名前任执政官参加，这非常引人注目。克拉苏刻意避免到场，而庞培和其他一些执政官级别的大人物都在海外征战。我们粗略地估计，一个人在担任执政官之后至少还能活二十年，那么在世的前任执政官应当有四十人左右，这是实际到场人数的两倍还多。与之前相比，这个时期拥有足够威望且能够引导元老院辩论的优秀元老要少得多。正因如此，恺撒和加图这样的人才能在三十多岁就获得如此之高的地位。

---

[1] Cicero，*In Catilinam* 3.1-2［Loeb translation by C.MacDonald（1977），p.101］.

[2] 关于和喀提林一起拉票的引文，见Cicero，*ad Att.* 1.2。

[3] Cicero，*In Catilinam* 2.22［Loeb translation by C.MacDonald（1977），p.91］.

[4] Plutarch，*Caesar* 4.4［Loeb translation by B.Perrin（1919），p.451］.

[5] Sallust，*Bell.Cat* .48.5.

[6] Sallust，*Bell.Cat.* 48.9；Plutarch，*Crassus* 13.

[7] 今称阿尔皮诺，是罗马以南约100公里的一个小镇。

[8] Cicero，*pro Murena* ， and 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21.3-6.

[9] 指恺撒母亲的三个堂兄弟盖乌斯、马尔库斯和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

[10] Sallust，*Bell.Cat.* 49.1-4，Plutarch，*Crassus* 13，and *Cicero* 20.See also D.Stockton，*Cicero* （1971），pp.18-19.

[11] 本文主人公恺撒的远房堂兄。

[12] Sallust，*Bell.Cat.* 44-47，Plutarch，*Cicero* 19，Dio 37.34.1-4，Appian，*BC* 2.4-5.

[13] 关于一般的辩论，见Sallust，*Bell.Cat.* 50.3-53.1；关于喀提林在元老院最后一次露面，见Cicero，*Cat.* 1.16。

[14] 关于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见Cicero，*de Sen.* 16，*Brutus* 61。

[15] Sallust，*Bell.Cat.* 51.1-3.

[16] Sallust，*Bell.Cat.* 51.33.

[17] Sallust，*Bell.Cat.* 51.20.

[18] 关于恺撒的演讲，见Sallust，*Bell.Cat.* 51。

[19] 对恺撒观点的讨论，见M.Gelzer，*Caesar* （1968），pp.50-52，and C.Meier，*Caesar* （1996），pp.170-172。

[20] 原文有误。主张将喀提林党徒暂时羁押的应当是德鲁苏斯·克劳狄·尼禄（前105年～？），他的确是后来的提比略皇帝的祖父。这里的提比略·克劳狄·尼禄是德鲁苏斯·克劳狄·尼禄的儿子，也就是提比略皇帝的父亲。

[21] See Plutarch，*Cicero* 20-21，*Caesar* 7-8，Suetonius，*Caesar* 14，and Appian，*BC* 2.5.

[22] Cicero，*Cat* .4.3［Loeb translation by C.MacDonald （1977），p.137］.

[23] 关于恺撒，见Cicero，*Cat* .4.9-10；关于克拉苏，见4.10；关于荣誉感，见4.12.

[24] Sallust，*Bell.Cat.* 52.12.

[25] Sallust，*Bell.Cat.* 52.17-18，24-25.

[26] Plutarch，*Brutus* 5 and *Cato the Younger* 24.1-2；关于西塞罗对布鲁图斯对辩论说法的反应，见Cicero，*ad Att* .12.21.1。

[27] Sallust，*Bell.Cat.* 55.1-6，Plutarch，*Cicero* 22 and *Caesar* 8，Dio 37.36.1-4，Ampelius，*lib.mem.* 31；撒路斯提乌斯说恺撒受到威胁的时间更早一些，见*Bell.Cat.* 49.4。

[28] Cicero，*ad Fam.* 5.2.7-8.

[29] Suetonius，*Caesar* 15，Dio 37.44.1-3.

[30] Dio 37.43.1-4，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26.1-29.2.

[31] 尼波斯和穆齐娅的母亲先嫁给前文讲到的大祭司昆图斯·穆齐乌斯·斯喀埃沃拉，生了穆齐娅；然后离婚，改嫁尼波斯的父亲。

[32] Suetonius，*Caesar* 16.

[33] 关于喀提林之死，见Sallust，*Bell.Cat.* 60.7，61.4；关于告密者，见Suetonius，*Caesar* 17。

[34] 善良女神是古罗马宗教中的一位女神，与妇女的贞洁和丰产、医疗和保护罗马国家与人民有关。

[35] Plutarch，*Caesar* 9-10.

[36] Cicero，*ad Att.* 1.12.3，1.13.3，Suetonius，*Caesar* 74.2，Plutarch，*Caesar* 10.关于离婚的一般情况，见S.Treggiari，*Roman Marriage* （1991），pp.435-482 以及‘Divorce Roman Style：How Easy and Frequent Was It？’ in B.Rawson （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pp.131-146。

[37] See Cicero，*ad Att* .1.13.3，and Catulus in Cicero，*ad Att* .1.16，Dio 37.50.3-4.

[38] Plutarch，*Caesar* 11，Suetonius，*Caesar* 18，Cicero，*Pro Balbo* 28.

[39] 卢西塔尼亚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包括今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部分地区，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外西班牙行省的一部分，在帝国时期设立卢西塔尼亚行省。

[40] 加的斯是今天西班牙西南部的滨海城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著名的贸易海港和海军基地。

[41] See Suetonius，*Caesar* 18，Appian，*Bell.Hisp.* 102，Plutarch，*Caesar* 12，Dio 37.52.1-53.4.关于西班牙形势和恺撒的军事行动，见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pp.235-236。

[42] *Spanish War* 42.2-3，Cicero，*pro Balbo* 19，23，28，63 and 43；关于人祭的暗示，见Strabo，*Geog.* 3.5.3 and 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1928），pp.302-8。

[43] Plutarch，*Caesar* 11.

八 执政官

恺撒习惯于劳心劳力、很少休息；他集中力量为朋友办事，常常忘记自己的私事，而且从不会忽略能够给他人的恩惠。他渴望得到极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好展示他的才华。

——撒路斯提乌斯，前40年代末 [1]

但是，六百年之后，历史会对我做出何种评价？我更害怕这个，而不是当今在世之人的无聊闲扯。

——西塞罗，前59年4月 [2]

前61年9月28～29日，伟大的庞培庆祝了他的第三次凯旋，以纪念他击败海盗和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功绩。凯旋式正好赶上他的四十五岁生日，举办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壮丽的表演和盛大游行。他的第一次凯旋式是在二十年前。但这一次，不会再有乘坐大象战车的荒唐想法了。庞培年纪更大，也更成熟了，不需要那样的哗众取宠，因为他的辉煌胜利令史上所有伟大将领的成就黯然失色。即便如此，凯旋式永远不是克制或谦虚的时候。像任何一位罗马贵族一样，庞培也仔细地对自己的成功进行量化。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牌子，宣称庞培杀死、俘虏或击败了1218.3万人，缴获或击沉了846艘战舰，并接受了1538座城镇或设防据点的投降。运载着战利品的游行花车依次标示了他击败的每一个王国、民族或地点。还有表现战争中他的著名故事的图画。其他的标语则宣称，他麾下的每一位士兵都得到了1500迪纳厄斯——相当于10年以上的军饷——的赏金，另有多达2万塔兰同金银被纳入国库。庞培吹嘘说，由于他的努力，共和国的年收入翻了一倍以上，从5000万迪纳厄斯猛增到1.35亿迪纳厄斯。游行队伍的末尾是一辆硕大无朋的花车，作为战胜已知世界的战利品。人们说，庞培战胜了三大洲：非洲（他第一次凯旋的部分战功）、欧洲（尤其是西班牙，他为此赢得了第二次凯旋），现在又打败了亚洲，赢得了第三次凯旋。在庞培前方有超过三百名高级俘

虏徒步行进，包括国王、王后、公主、酋长和将领，全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庞培本人则乘坐着一辆以宝石装饰的战车，身披一件从米特里达梯六世那里缴获的斗篷，据说这件斗篷曾属于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穿过它。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写作的阿庇安认为这不大可能是真的，但庞培非常喜欢别人把他与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相提并论。[3]

庞培的成就之恢宏，毋庸置疑。在镇压海盗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果敢迅速地采取行动，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但这还仅仅是更伟大胜利的序曲。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是罗马最顽强的敌人之一。苏拉曾将米特里达梯六世逐出希腊，收复了亚细亚行省，但苏拉不得不返回意大利，因此未能取得完全胜利。卢库鲁斯在亚细亚执政七年，做了更大努力，在一系列战役中重创米特里达梯六世及其盟友。卢库鲁斯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利品，积攒了巨额财富，但疏远了在亚细亚活动的包税人以及他自己的许多士兵。一位成功的将军在元老院一定会四面树敌，因为元老们本能地不喜欢看到任何人得到太多的荣耀、财富和威望。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说，战争拖延太久，甚至有人指责卢库鲁斯故意拖延战争，以便继续敛财。于是，元老院将他属下的幅员辽阔的行省分割，将其若干部分交给新的总督，断绝了他继续作战所需的兵员和物资。卢库鲁斯势力遭到削弱之后，米特里达梯六世就有机会夺回自己之前丢失的土地。前66年，庞培驾临之后，局势大变。他拥有其前任们只能梦想的极其丰富的资源，到这一年年终时他已经一劳永逸地粉碎了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势力。在镇压奴隶起义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显然是克拉苏，不过庞培后来居上，企图夺走他的功劳。但在米特里达梯战争中，若是说卢库鲁斯在庞培赶来摘桃子之前就已经打赢了战争，就有些不符合事实了，尽管卢库鲁斯对罗马的最终胜利的确贡献很大。

使命完成之后，庞培并不打算立刻返回罗马，而是率领自己麾下的军队，继续寻找赢得荣耀的机遇。在随后的两年内，他把握住一切机

会，指挥他的军队远征到此前任何一支罗马军队都不曾涉足的地方。他率军征讨伊比利亚人[4]和阿尔巴尼亚人，绕过黑海，进入今天的俄罗斯南部。他干预了犹太王族的内乱，攻打耶路撒冷三个月之久，最终将其占领。所有这些光辉灿烂的胜利都在他的凯旋式游行中得到了庆祝。庞培在这些战役中将他的军事指挥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早期战役中或许也曾偶尔身先士卒地在一线冲杀，以效仿亚历山大指挥风格的英雄气概。在耶路撒冷，他和他的指挥官们进入了圣殿的至圣所[5]，除了高级祭司之外，此地是禁止任何人进入的。庞培没有劫掠圣殿的任何财宝，以示尊敬，但他进入圣殿的举动就是为了宣扬他这位伟大的罗马将军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功业。对罗马人来说，恢宏壮举常常与务实的辛劳紧密结合。庞培花了许多时间来组织罗马在该地区的旧行省以及他建立的新行省的行政管理。前63年，消息传来，米特里达梯六世死了，于是战事大体上结束了。米特里达梯六世一生中长期服用解毒药，对毒药形成了免疫能力。他企图服毒自杀，但就是死不了，于是让一名卫兵将他杀死。虽然大局已定，但庞培在东方还是停留了一年多时间，以平定这些地区。他相当有组织天分，他设立的许多法规在此后数百年中始终有效。[6]

梅特卢斯·尼波斯在担任保民官期间的疯狂活动让人们愈加担忧，不清楚庞培返回意大利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尼波斯是庞培的内弟，曾在他麾下担任军团长，所以尼波斯的行径——为了让庞培保留军队指挥权，不惜使用暴力和恫吓手段——令人忧心忡忡。据说克拉苏为了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带领家人去了国外。尼波斯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庞培的授意之下，很难说得清，但庞培对这样的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却招致了许多元老的猜忌——肯定不会满意。前62年春，他写信给元老院，并私下里写信给一些重要元老，保证自己只希望能够安宁地退隐。他的另外一名军团长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已经在罗马为前61年的执政官竞选拉票。庞培请求元老院将选举推迟到年底，好让他赶回去支持自己的朋友皮索。元老院对推迟选举的意见不一，但加图

通过操纵元老院的程序，阻止元老院就此问题投票。有人在辩论中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直到这一天结束，会议无果而终。没有人尝试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最后皮索还是当选了执政官，但这是庞培第一次受到元老院的怠慢，这样的冷落还会有很多。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努力向元老院表忠心。前62年12月，庞培终于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他当即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指示士兵们只有在前来参加他的凯旋式的时候才可以聚集起来。[7]

在庆祝凯旋式之前，庞培被法律禁止跨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于是他暂居在罗马城外阿尔班山上的一栋别墅中。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城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已经处于神圣边界之外。有好几次为了让庞培也能出席，元老院会议或公共集会的地点就选择在了神圣边界之外的场所。前70年，庞培成为执政官的时候，曾请资深元老和著述颇丰的作家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他写一本小册子，以解释元老院的程序。征战六年之后，他重返政坛，却对政治游戏仍然不甚了解，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的第一次演讲效果平平，不能令人满意。特别不幸的是，他返回罗马城的时候正好赶上克洛狄乌斯渎神罪的审判，当时争议正处于最高潮，人们为了决定应当采用的程序，尤其是在陪审员的选择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曾在庞培军队中担任军团长的皮索是克洛狄乌斯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与皮索同年担任执政官的人却坚决反对克洛狄乌斯。庞培不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演说家，也没有演讲的天赋。有人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时，他努力表达自己对元老院的坚定支持和尊重，但他的演讲几乎无人喝彩。西塞罗对庞培也很不爽，因为庞培没有热情地赞扬他镇压喀提林的事迹。于是，西塞罗对这个自己过去常常支持的人做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前61年1月25日，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阿提库斯，说庞培“表面上大吹大擂地夸耀对我的友谊，但私下里对我非常嫉妒，而且掩饰得不好。他这个人没有真诚的礼貌、直率和政治家的才干，也没有荣誉感、坚定或慷慨的性情”[8]。克拉苏开始在元老院颂扬西塞罗的时候，西塞罗很高兴，可能主要是由于庞培没有这么做。[9]

庞培在私人生活上也不顺利。庞培几乎刚刚回到意大利，就把妻子穆齐娅休掉了。在庞培征战海外期间，她和恺撒发生了私情，但恺撒也不是她唯一的情夫，她的放荡风骚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丑闻。在政治上，离婚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导致庞培与穆齐娅的同母异父弟弟们——梅特卢斯·尼波斯和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凯列尔——疏远了，因为梅特卢斯家族对遭受到的怠慢冷落总是睚眦必报。西塞罗曾经遭到尼波斯的攻击，后来花了很大力气才安抚了为自己的兄弟尼波斯出气的梅特卢斯·凯列尔，尽管争端是由尼波斯引发的。凯列尔在前6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胜算很大，因此他是个特别危险的敌人。无论如何，离了婚之后，庞培有了一个机会去缔结新的政治联盟。他显然希望再一次向元老院精英集团表忠心，证明自己不是革命党。他去找了加图，表示希望迎娶他的外甥女，即塞维利娅的女儿，同时，他还代自己的儿子向塞维利娅的另一个女儿求婚。但令这两个姑娘和她们野心勃勃的母亲大失所望的是，加图拒绝了庞培的求婚。这更增加了加图的声望：更看重道德，而不是政治上的好处。尽管加图失去了与元老院首富和最成功将领联姻的机会，但他有意识地用行动举止构建的道德传奇被发扬光大了。[10]

在这些年里，庞培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是搞到足够的土地来安顿他军队中的退伍老兵。前70年，有一项法案获得通过，旨在为在他麾下参与西班牙作战的老兵提供生计，但没有产生实效，因为元老院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合理地分配土地。他的第二个目标是让他击败米特里达梯六世之后在东方制定的法规获得批准。正常情况下，制定法规的工作应当由一个元老委员会完成，庞培并没有立法权，但他先斩后奏了。尽管他的立法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但仍然受到了相当激烈的指摘。卢库鲁斯为了举行自己的凯旋式已经苦等多年，他在东方的指挥权被夺走并转而交给庞培，他恼怒之下自行退隐。现在，他重返政坛，来跟庞培作对。他尤其批评了庞培对他之前制定的法规的任何改动。庞培希望他在东方制定的所有法规只经过一次提案就获得一次性通过。卢库鲁斯、加图和其他许多主要元老却主张对每一项法规单独讨论，逐个处理。前61

年，在皮索担任执政官期间，此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部分原因是皮索正忙于克洛狄乌斯的审判。庞培知道梅特卢斯·凯列尔几乎一定会当选前60年的执政官，于是大规模行贿以确保另一位执政官是他自己的亲信。他相中的人选是其麾下的另一位军团长，一个叫作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的“新人”。阿弗拉尼乌斯或许曾经是一位能干的军官，但他的舞技比政治才干更有名。他是个糟糕透顶的执政官，另一位“新人”西塞罗认为阿弗拉尼乌斯是个跳梁小丑。当年的一位叫作卢基乌斯·弗拉维乌斯的保民官比较有才干，也乐意听命于庞培。他提出了一项土地法案，旨在为庞培的退伍老兵和相当一部分的城市贫民提供农田。梅特卢斯·凯列尔领导着反对庞培的派系，对庞培大肆攻击辱骂，以至于弗拉维乌斯命人把他带去监狱。梅特卢斯·凯列尔是政治游戏的精明玩家，懂得如何把握机遇、利用局势。他当即在监狱中召集元老院开会。弗拉维乌斯的回应是将他的保民官专用长凳摆在监狱门口，以阻止任何人入内。梅特卢斯毫不畏惧，命令他的仆役在监狱墙壁上打了一个洞，好让元老们进来。庞培意识到弗拉维乌斯输了，于是指示他释放执政官。这件事就像前62年加图与尼波斯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的演讲台上的对抗一样，体现出元老们对常规的尊重达到了可笑的程度。但在弗拉维乌斯和梅特卢斯·凯列尔的斗争中，没有走到暴力流血那一步。庞培还试图通过不准梅特卢斯去外省担任总督来威吓他，但也失败了，于是土地法案最终被放弃。[11]

过了两年时间，庞培的两项关键目标都没有达成。批准东方法规和为退伍老兵提供土地都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对共和国有好处。梅特卢斯之所以反对土地法案，主要是因为他憎恶庞培——庞培把梅特卢斯的同母异父姐姐穆齐娅休掉了，还因为如此固执己见是非常有威望的事情。他的祖父之所以扬名，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拒绝宣誓遵守萨图尔尼努斯某项法律的人，并为此付出了流亡的代价。卢库鲁斯反对土地法案，则是为了报复庞培在前66年对他的不义。加图和其他人的目的则是尽可能地压制庞培的气焰，防止他凭借巨大的财富和声望主宰元老院。在这些

年里，倍感挫折的元老不止庞培一个。克拉苏看到庞培受到挫折，起初还很开心，但后来发现反对庞培的那些元老小集团同样热衷于阻挠他的大事。前60年初，元老院和控制包税人大公司的骑士们发生了争吵。这些人从政府购买了在亚细亚及东方其他省份征税的资格，但是因为那些地区经受了多年的战乱摧残，他们征敛不到足够的金钱，因此无法兑现向国库上缴若干数目的承诺。这些包税人原以为能从征税工作中大捞一笔，不料现在却要亏本。颓丧之下，他们希望与政府重新拟定合同，减少上缴国库的金额。克拉苏与主要的包税人联系紧密，或许在这桩生意中也有利益，因此热情地支持包税人。西塞罗认为包税人的要求不可理喻，但愿意支持他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需要安抚富裕的骑士阶层，确保他们站在自己这边。最近刚颁布了一部新的《反贿赂法》，对骑士以及元老阶层的腐败陪审员施以重罚，这让骑士阶层非常不满。加图从来不会约束自己的怒火，他坚决反对包税人，劝说元老院驳回他们的请求。西塞罗绝望地评论道，加图“以最高尚的精神和毋庸置疑的诚实，对国家造成了伤害：他提出的建议更适合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不是罗慕路斯的罪恶渊薮”。[12]

庞培和克拉苏——共和国中最富裕、在某些方面也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都遭到了主宰元老院的一小群贵族的掣肘和阻挠。尤其是庞培企图成为这个内层精英圈子的成员，却遭到了排斥。不管是必需的、理智的和得民心的改革，还是比较可疑的措施，只要是庞培或克拉苏提出的，都会横遭一小群贵族的封堵。共和国心脏的惰性将从上到下所有阶层的许多公民都疏远了。几十年后，曾在恺撒麾下任职的一位史学家在撰写内战历史时，将会从梅特卢斯·凯列尔和阿弗拉尼乌斯担任执政官这一年写起。后来许多人凭借后知之明，将前60年视为共和国进入患病晚期的时刻。[13]

回家

前60年夏季，恺撒从西班牙回国了。这一年，他四十岁，有资格参加前59年的执政官竞选（他可能享受了一些优待，能够以比正常规定小两岁的年龄担任官职）。显然，为了参加竞选，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在身处西班牙、不能亲自拉票的时候，他写信给包括西塞罗在内的主要元老。恺撒写信极多，非常多产，但他的书信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至今，实为遗憾。据说他能同时向多名文书员口述信件，并且他是第一个身在罗马城时也定期给同在城内的朋友和政治盟友写信的人。他可能是以一纸书信休掉了庞培娅。他可能也是通过书信与另一名候选人达成协议，共同参选。他的竞选搭档是卢基乌斯·卢凯依乌斯，此人相当有钱，但没有什么名望和魅力。他的金钱和恺撒的声望可谓强强联合。前60年6月初，甚至在恺撒抵达罗马之前，他就被视为执政官竞选中胜算极大的候选人，西塞罗说他"如有神助"。恺撒给西塞罗的信显然让这位演说家很高兴，因为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说，他打算"让恺撒更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这对共和国有益。[14]

恺撒就像两年前的庞培一样，已经到达罗马城外，但在举行凯旋式（以庆祝他在西班牙的军事胜利）之前，不能越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一步。凯旋式的盛大游行和庆祝活动将会增加他在选举中的胜算。罗马选民和社会普遍将军事荣耀视为高于一切的功绩，一位执政官极有可能受命去指挥一场重要的战争，因此能够证明自己的军事才干。西塞罗有时喜欢吹嘘，在法庭上当辩护律师的优异表现差不多与战功受到同样的重视。但他显然知道，大多数选民并不这么想。根据法律，候选人必须亲自参加一场在广场举行的会议。凯旋式的庆祝活动需要很多时间来准备，而凯旋式只能在元老院规定的日子举行。选举日已经确定了，因此恺撒没有办法参选，除非他跨越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但这样就必须放弃举行凯旋式。于是他请求对他破格，允许他不亲自参加广场会议就能够成为候选人。我们推测，恺撒是通过书信或中间人与元老院沟通此事的，因为没有记载表明元老院在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之外的某座神庙开会，以便与恺撒当面商谈。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人们普遍反对恺撒

的这个请求。其他的史料则特别指出，加图是反对恺撒的核心人物。他又一次运用了自己的老策略，即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直到辩论时间耗尽，会议不得不在未能投票的情况下结束。由于元老院只能在某些固定日子开会，不能与公民大会在同一天开会，因此元老院下一次开会的日期只能在正式宣布候选人名单之后。加图拖延会议的策略在过去奏效过，这一次也确保了恺撒无法既举行凯旋式又参选下一年执政官。[15]

加图以冗长演说阻挠会议做出决定的策略奏效了，但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恺撒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立刻放弃了凯旋式，越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进入城市，以便成为候选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凯旋式是一位罗马贵族能够赢得的最高荣耀之一，获此殊荣的人可以在自家门廊上陈列凯旋纪念品，以永久性地纪念这项荣誉。庞培的整个政治生涯都非常不合常规，享有三次凯旋式的莫大荣耀。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获得一次以上的凯旋式。不仅如此，在公元前1世纪，凯旋式一般只会被授予一小群资深裁判官，即便是资深执政官也很少获此荣誉。放弃凯旋式的决定清楚地表明，恺撒着眼未来，坚信自己将来必然会做出更伟大的成就，更多的机遇还在后面。凭借在西班牙的战功而获得凯旋式的荣誉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也尽力去确保这项荣誉，但执政官的职位是好得多的奖品。

加图的动机也值得考虑，因为乍看起来，他的行动似乎毫无意义，而我们在事后看来，他的做法也是非常欠考虑的。他顶多能让恺撒推迟一年参选执政官。那样的话，恺撒既会举行他的凯旋式，也会进一步增加他原本就很不错的胜算。或许加图的盘算是在下一年中恺撒的累累债务会最终把他压垮，让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但是恺撒刚刚从行省总督的任上回国，就像所有罗马总督，尤其是那些打了胜仗的总督一样，无疑已经捞了不少油水。他的债务太多，不可能一口气偿清，所以恺撒在竞选中显然需要卢凯依乌斯的资金支持。但总的来讲，他返回罗马时

的财务状况肯定比离开时要好得多。卸去总督职务之后，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恺撒可能遭到起诉，所以加图也许是希望在贪腐法庭上控告他。但是，许多被指控贪腐的前任总督都逃脱了制裁，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恺撒或许真的是无辜的，当然在很多案件中，当事人是否无辜并不一定是最关键的因素。加图企图让恺撒推迟一年竞选，还有一个更私人的原因：加图的女婿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这一年也在竞选执政官。毕布路斯就是那个在前65年与恺撒同时担任市政官，但风头完全被恺撒盖过的那个人。毕布路斯的才干很一般，与姿态高调、极其精明强干的恺撒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但罗马官职晋升体制的特点是每个官职都有最低法定年龄，因此在攀升过程中，一名政治家可能不断地与同一位对手发生竞争或与其担任相同的官职。恺撒和毕布路斯在前62年都是裁判官，不过没有记载表明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矛盾。迫使恺撒推迟一年参选执政官，意味着毕布路斯终于有机会独占风头了，同时也能避免“新人”卢凯依乌斯在其盟友恺撒的光环照耀下，将毕布路斯击退到第三名。对贵族世家成员来说，输掉一场选举是莫大的耻辱和打击。

因此，阻挠恺撒对加图家族来说很有好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恺撒与加图的个性水火不容。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加图对恺撒非常憎恶，相信自己已经看穿了恺撒光鲜的外表。塞维利娅与恺撒的长期私情更是令她同母异父的弟弟越发恼怒。在罗马贵族看来，元老们公报私仇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做的不是太过分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加图不过是在给自己的一名政敌穿小鞋。另外，加图本来就热衷于改变元老院的意见或阻止元老院的决议，因为这样能提升他的名望。他只有三十五岁，目前担任过的级别最高的官职就是保民官，但他已经被确立为主宰元老院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因为他是加图，旧式道德的楷模（他的著名祖先老加图也是这种道德的模范），固执己见、从不屈服，也从来不会害怕表达与民意相左的意见。有人说早在前60年，加图就将恺撒视为共和国之敌。这种说法不大可能是真的。西塞罗的书信清楚地表明，在选举之前，这种观点并不普遍。恺撒受到怀疑的最初迹象出现在元老院

为前59年的执政官们分配任期满后的行省总督职位之时。按照盖乌斯·格拉古的一道法律规定，这种分配必须在选举之前进行。也就是说，虽然还不知道下一年的执政官会是谁，但已经安排好他们卸任后将去何地担任总督。这一次，元老院决定派下一届的两位执政官去管理“意大利的林地与乡间小道”。意大利农村在近几十年里确实蒙受了许多创伤，但这样的任务对一位执政官来说还是太有失颜面了，更不要说两位执政官了。有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让执政官们担任预备队，以应付高卢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因为这不是罗马惯常的政策。这种安排是一种侮辱，史料还认为它是刻意针对恺撒的；尽管如果毕布路斯当选，也将蒙受这样的侮辱。[16]

执政官是由百人会议选举产生的，它与部落会议的结构差别很大。恺撒曾在百人会议中成功当选裁判官，但每年裁判官职位有八个，而执政官位置只有两个，因此后者的竞争肯定更激烈。执政官选举通常在7月底举行，因此恺撒只有几周时间来亲自拉票。百人会议在战神广场召开会议，其仪式带有非常明显的早期罗马军事制度的色彩，比如上文曾提到，在拉比里乌斯受审时，雅尼库鲁姆山上升起红旗。主持竞选的是当年的执政官之一，他向大会发出指示的形式非常传统，听起来像是军事命令。在选举程序启动之前，会有一场非正式会议。但我们不知道，候选人是否会有机会向选民做最后一次呼吁。执政官会以祈祷开始选举程序，然后是一套固定的程式，命令人们选举两名新的执政官。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中记录的财产状况，选民被分为若干百人团。各个百人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同一部落的人，但选举的部落元素仅此而已。第一等级的70个百人团先投票，然后是骑士阶层的80个百人团。每个百人团从候选人名单中选择两人，以填充下一届执政官的空缺。一共有193个百人团，因此常常在第二等级投票的过程中，选举结果就已经确定了。第一等级的人肯定拥有相当程度的财富，但在这个时期，需要多少财产才能进入第一等级，我们不是很清楚。如果把第一等级的人全都看成巨富，那么就错了。其中有些人的财产和骑士们差不多，但也有人家境普通。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第一等级的成员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或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先投票的各百人团的决定会对随后投票的人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往往都想要选择最有可能获胜的人。第一等级的各百人团抽签决定谁先发言，而第一个发言的百人团的影响力最强。这就是所谓的“优先百人团”，人们普遍相信，获得这个百人团的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必胜无疑。[17]

像其他选举一样，百人会议的投票也是在战神广场的“羊圈”内进行的。“羊圈”是临时性的木结构围场，面积很大，供一个选举单位使用。我们不知道一般有多少公民会参加选举。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公民有90多万人，其中至少有几十万人在部分时间里居住在罗马城。但考虑到“羊圈”的大小，即便是居住在罗马城的公民，去参加投票选举的应该也是少数。曾有人根据“羊圈”的大小来推算投票选民的人数，并根据选举程序耗时（整个过程必须在日落前结束）的猜测对这个推断人数进行修正。估计的投票人数多至7万或5.5万，最少的估计是3万。每一位研究者都倾向于指出，这些估算数字都是最大值，实际人数通常要少得多。信任这些猜测的数字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可以推断，有投票资格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会去投票。很难判断聚集到每一次投票现场的选民大体上是不是同一群人；有的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但我们实际上没办法知道。执政官选举肯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相当数量的公民会特意从意大利各地赶到罗马。当然，长途旅行到罗马城投票的肯定是富人，由于骑士阶层和第一等级的意愿极富影响力，所以这些人也显得更重要。选举结果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很少同时出现两位均被认为是必胜无疑的候选人。“优先百人团”是在选举当天抽签决定的，这给选举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18]

西塞罗在竞选执政官的时候曾考虑去内高卢，在当地的富裕公民中拉票；而且他一生自始至终都努力与意大利不同地区的人保持联系。如果曾经的人情和友谊还不够，那么金钱也许能买到胜利。在每个部落都

有一些影响力超强的人，不管是整个部落作为一个单位投票，还是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百人团投票，这些人都能左右自己部落同胞的投票。前61年，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很多影响力大的人来到庞培家的花园，从他那里接受赏赐，因为他们支持了庞培的亲信阿弗拉尼乌斯。在前60年，虽然贿赂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但所有候选人都会使用这种手段。卢凯依乌斯用金钱支持自己和恺撒，而毕布路斯不仅动用自己的财产，还得到了一些重要元老的资助。加图认可毕布路斯的行贿，就像他在前63年对自己姐夫[19]的贿选视而不见，却大肆攻击做出同样事情的穆里纳一样。和任何其他元老一样，加图也希望自己的亲戚成功。苏埃托尼乌斯称，加图和毕布路斯的支持者的另一个动机是，他们害怕恺撒及其政治盟友同时担任执政官，做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来。这或许仅仅是后见之明，毕布路斯家族的人脉和地位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20]

选举日这天，恺撒轻松拔得头筹，毕布路斯是第二名，因此卢凯依乌斯的开销没有得到多少收益。肯定有很多选民选的是恺撒和毕布路斯。恺撒已经攀登到了最高的行政长官职位，现在的问题是在他的十二个月任期内，他将有何举动、如何行事。

土地法

前60年12月，就在恺撒正式就任执政官（上任日期为前59年1月1日）的几周前，西塞罗在自己的乡村别墅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访客叫作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是个罗马公民，来自西班牙的加的斯。不久前他还是恺撒的幕僚成员，现在开始当他的政治助手。巴尔布斯与西塞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恺撒打算在自己执政官任上推行土地法。西塞罗是个地主，终其一生都对任何土地再分配非常反感。三年前，卢路斯的土地法案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塞罗的反对。这一次，西塞罗有两个选择：要么反对这项新法案，暂时离开罗马城一段时间，以免卷入事端；要么支持它。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

说，恺撒希望他支持这项法案。巴尔布斯“向我保证，恺撒在所有事务上都将遵照我和庞培的意见，并努力促使克拉苏与庞培和解”。如果西塞罗支持恺撒的立法，他将有希望“与庞培建立亲密的盟友关系；如果我愿意的话，还能与恺撒交好，并与我的敌人们和解，与暴民们和平相处，安度晚年”。恺撒在为自己的任期精心准备，尽可能多地笼络政治盟友。西塞罗尽管作为执政官非常成功，但他毕竟是个“新人”，始终不曾为元老院门阀贵族所接受；而且他在前63年处死密谋者的做法颇受非议，常有人指责他逾越了自己的本分。在最近十年中，他的形象始终是庞培的忠实支持者。现在庞培显然与恺撒的土地法案有着密切联系，两人都希望高明的演说家西塞罗能够帮助他们的事业。[21]

西塞罗在斟酌一番之后，决定拒绝参与此事。恺撒对此固然感到失望，但这算不得严重的挫折，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另外两个更强大人物的支持。巴尔布斯向西塞罗暗示，庞培和他的死敌克拉苏可能会携起手来。在这几个月中，恺撒成功地将庞培和克拉苏拉到了一起，与他们建立起紧密的关系纽带，以至于（用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共和国内的任何事情，若是令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不悦，就必然办不成”[22]。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的政治联盟被学者们称为“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指的是马克·安东尼、屋大维和李必达[23]于前43年11月为了共同反对杀害恺撒的凶手而组成的同盟。“三头同盟”的意思仅仅是三个人的理事会。不过，后三头同盟是由法律正式设立的，三人享有独裁权力；而克拉苏、庞培和恺撒之间的联系则是非正式的。前三头同盟起初是秘密的。在前60年12月，巴尔布斯说庞培和克拉苏有可能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头同盟还没有建立，而仅仅能说明此时它还不为公众所知。恺撒与克拉苏过从甚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恺撒因为债台高筑险些没能离开罗马去外西班牙当总督的时候，克拉苏花了一大笔钱为他担保。恺撒多次大张旗鼓地支持有利于庞培的措施。他无疑曾见过庞培——罗马贵族的世界是很小的，两人在前70年～前67年的很长一段时期都在罗马——尽管没有书面材料能证明他们之间特别密切的联系。在庞培身处海

外期间，恺撒勾引了他的妻子，这肯定不会让庞培对恺撒有好感。恺撒也曾和克拉苏的妻子私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与克拉苏在政治上的合作。在最近几年中，庞培和克拉苏都备受挫折，发现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还不足以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庞培需要一位比皮索或阿弗拉尼乌斯更有才干、更坚决果断的执政官来替自己办事。恺撒为了尽快当上执政官，牺牲了一次凯旋式。要想让这牺牲不白费，他在自己一年期满之后必须要有机会进行更伟大的军事冒险，而元老院为他规定的“意大利的林地与乡间小道”肯定不行。要获得在军事上成功的机会，他需要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支持者。如果他与庞培或克拉苏中的任何一人联手，那么这两人之间的互相憎恨就会导致另外一人反对他。加图、毕布路斯及其同党肯定会对他处处阻拦，他实在不能再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因此，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庞培和克拉苏联合起来，他们两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应当是所向披靡的。而庞培和克拉苏之所以能够捐弃前嫌，是因为有加图和其他贵族处处阻挠和冒犯共和国的这两位最强大的人物。即便如此，恺撒一定还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说服这两个互相敌视的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他，他一定能满足他们的愿望。[24]

建立三头同盟的谈判可能是通过书信开始的，但实质性的决定应当是在前60年恺撒返回意大利之后才做出的。而真正达成协议则可能是在执政官选举之后，恺撒的顺利当选增加了他讨价还价的砝码。庞培和克拉苏有没有公开联合起来帮助恺撒拉票，我们不清楚。如果他们都帮助恺撒竞选，这也不会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即便两个人互相敌视，但如果他们都与第三个人是朋友，那么都支持后者参加竞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最早到前59年1月，才有人怀疑克拉苏、庞培和恺撒结成了同盟。后来，这个同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招致了很多人的愤怒，他们照例大呼小叫一番，说共和国要毁在这三人手里了。博学之士瓦罗曾在前70年教授庞培元老院程序，后来还担任过他的军团长，此时却写了一份小册子，公开谴责“三头野兽”。一个半世纪之后，普鲁塔克坚信三位盟友之间的友谊，尤其是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友谊，是内战和罗马共和国灭亡的

根源。通过三头同盟，恺撒获得了极大的权力，甚至能够战胜庞培。普鲁塔克的这个看法是基于后见之明，但肯定不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他的看法带有宿命论的意味，仿佛世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从某个角度讲，普鲁塔克理解，三头同盟实质上不是一个由拥有相同的政治理想和野心的人组建的同盟。庞培、克拉苏和恺撒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庞培需要土地来安置他的老兵，并希望他在东方的立法获得批准。克拉苏希望帮助亚细亚的包税人。恺撒在三头同盟中是个小弟。面对执拗、难对付的执政官同僚，他要想取得任何成就，并在期满之后获得一个重要的行省总督职位，就需要强大的靠山。他实际上是另外两人的工具，因为他们需要一位行政长官来提议并通过他们需要的立法。帮了庞培与克拉苏的忙之后，恺撒会得到奖赏。三个人都知道，另外两人会从同盟中获得很大好处；但只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很乐意对方得到好处。这最终是一场以利益为重的婚姻，只要它不再符合任何一名成员的利益，就会立即破裂。如果把三头同盟看成一种更稳固、更长期性的关系，就是对这一年及随后几年中发生的事件的误解。狄奥说这三人曾庄严宣誓，但这极可能只是后人的传说。在罗马人眼中，秘密宣誓始终是件凶险的坏事。据说喀提林就曾与其党羽秘密宣誓。后来，早期基督徒受到的指控之一就是秘密宣誓。[25]

两名执政官的权力平等，但每个月里其中一人的权力获得优先权，随后两人轮流。恺撒是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第一名，因此在前59年1月1日他和毕布路斯上任的时候，恺撒先获得了优先权。他以祈祷和献祭宣告共和国的新一年开始了。每一位执政官都由十二名肩扛法西斯束棒的执法吏护卫，法西斯束棒象征行政长官的权力。在某个月享有优先权的执政官被称为“掌控法西斯束棒”。通常情况下，执法吏走在行政长官前面，人群太拥挤时，负责为行政长官开道。恺撒在这一年开始时宣布，为了表示对同僚的尊重，在轮到毕布路斯掌控法西斯束棒的时候，他（恺撒）自己的执法吏将会跟随在毕布路斯身后，而他（恺撒）则只会让一名级别较低的官吏（文书）走在他前面。在这一年开始时，恺撒还

做出了许多非常理智的姿态，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让公众知晓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言行。因此，元老院和公共集会的演讲都将由文书员记录在案，然后在广场公开发表。过去这种做法只是偶尔为之，例如在西塞罗当执政官期间。[26]

但恺撒的头等大事是土地法案，该法案可能早至1月1日或2日就在元老院宣读，并做了辩论。时间紧迫，因为一项法案在公布二十四天之后，才可以传唤部落会议对其进行投票。如果恺撒要在1月，也就是他享有优先权的这个月，对此事进行投票，那么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无比珍贵，因为元老院在3日或4日不可以开会。在上一年结束之前，恺撒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来为此法案做准备，并确保它一定会通过。上文已述，恺撒派遣巴尔布斯去拉拢西塞罗，希望后者能够积极支持土地法案。恺撒仔细地吸取了卢路斯和弗拉维乌斯土地法案失败的教训。位于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即所谓的坎帕尼亚公地，为国库提供了不错的收入，因此被正式排除在新法案涉及范围之外。法案条文还明确规定：尊重私人财产；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管收购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庞培的老兵和大批城市贫民的过程。委员会被禁止强买土地，只能从自愿出售土地的人那里收购，并且收购价必须符合上次普查的记录。用于收购土地的资金来自庞培的军事胜利带来的巨额盈余。法案的其他条款还明确承认现有的土地占有状况，以免有人害怕当局对土地占有者的权利合法性展开调查。法案还禁止新的定居者在二十年之内将土地出售，这是为了强调法案的目的是建立稳定、永久性的新社区。委员会将由二十名成员组成，以防止任何一两个人拥有过大的权力，但似乎委员会内部的确出现了五个人的内层小圈子，决定权都在他们手里。委员会成员将由选举产生，并且明确将恺撒排除在外，这样就不会有人说他提议此法案是为了谋求私利。罗马的法律往往冗长和复杂，它给全世界留下的最有生命力的遗产之一就是佶屈聱牙、烦琐晦涩的法律语言。恺撒在向元老院宣读法案的全部文本之前宣布，他将修改或删除任何有人反对的条款。[27]

法案的起草非常细致，也很理智。其中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可以挑出刺的内容，而元老们也知道，他们在辩论中说的任何话都会被公之于众。很可能是在1月2日，恺撒开始征询个别元老的意见。在所有的前任执政官当中，恺撒最先问的是克拉苏，后者应该是表示赞同。恺撒第二个问的应该是庞培，他也表示认可。其他元老有些愠怒，但不愿意被记录在案，说自己是反对此法案的人。前任裁判官们也是这样，大家的意见都是没精打采的勉强支持或模棱两可。直到恺撒开始询问前任保民官们并请加图发表意见的时候，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就连加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法案，但他觉得时机不好，在这一年中进行任何革新都不是好主意。之前的一些发言者会离题万里，借以拖延时间，但加图是操控元老院规程的真正大师。恺撒向他征询意见的时候，他就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钟头。他显然打算故伎重演，不停地讲下去，直到元老院当天的会议时间结束，以此阻挠投票。他在过去多次运用这种策略，总能成功。

这一次，恺撒大发雷霆，命令侍从将加图逮捕并投入监狱。恺撒的这个行动虽然显得极端，但既然已经询问了加图本人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办法能阻止他滔滔不绝，因为像他这样振振有词、气场强大的人，是不可能被吼下去的。可见恺撒是多么受挫，但他的做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个错误。加图懂得如何利用这个场面，将自己打扮为正义凛然、不肯向“暴政”低头的共和国捍卫者。至少在元老院内，加图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尽管辩论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一名叫作马尔库斯·佩特列乌斯的元老（他在前62年击败了喀提林，从军已经有三十年之久）站起身来，离开了会议厅。恺撒询问他，为什么在议程尚未结束时就离开会场。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将尖刻地回答道，他宁愿和加图一起坐牢，也不愿意和恺撒待在一起。恺撒已经意识到，他对形势的判断有误。恺撒原本希望加图会呼吁一名平民保民官否决恺撒对他的逮捕令。但是，已经被捕的加图在享受这个时刻，不肯给恺撒台阶下。最后，恺撒不得不下令释放加图。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元老院没有就土地法案进行投票。[28]

加图取得了胜利，又一次名望大增。但就像他政治生涯中的许多成功一样，这是一场空虚的胜利，在长远看来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一次，他的对手不是皮索或阿弗拉尼乌斯那样容易对付的角色。恺撒已经表现出了和解的极大善意，既然对方不领情，他就宣布因为元老院什么都不肯做，所以他会直接呼吁罗马人民。可能是在次日，他在广场召集了一次会议，并且又一次表现得非常理智。他请他的同僚毕布路斯到演讲台，当着群众的面，问他对土地法案有何高见。我们很难判断，参加这些公共集会的究竟是什么人，以及这些与会者是否真的能够代表更广泛群众的意见，或者这些会议是否更像是现代的政党集会。一方面，在罗马城的任何公民（或者非公民）都可以到场观看会议。另一方面，广场空间有限，顶多只能容纳罗马城庞大人口的一小部分。我们很怀疑，有没有5000人能够听得见演讲，尽管广场的部分空间能够容纳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人。大多数学者都推断，召集会议的行政长官会确保参会者都是他的支持者。的确如此，但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行政长官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行政长官能否严格控制会场，我们应当保持谨慎。这一次，群众的情绪显然有利于恺撒。但毕布路斯重复了加图的论调，即不管法案有多少好处，在他的这一年任期内都不宜做任何革新。恺撒不断努力说服同僚，并告诉群众，只要毕布路斯同意，这项法案就能通过。他带领群众呼吁毕布路斯，请他同意；但毕布路斯在这压力之下，只是喊道："今年这法案绝不会通过，哪怕你们全都要它！"发出这愚蠢的言辞之后，毕布路斯怒气冲冲地走了。[29]

罗马的行政长官被选举出来，不是为了代表任何人，他们及元老们也无须对任何选民团体负责。在这方面，罗马的政治与现代民主制理论（实践未必如此）泾渭分明。但不管怎么说，罗马人民的意志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一名执政官如此公开表达对选民的鄙夷是严重的错误。恺撒迫使他犯下了这个错误，现在开始利用这个胜利来扩大战果。他不再传唤行政长官参加他的会议（这样的会议有几次，我们不得而知），而是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资深元老。这完全是常规的手段。恺撒先请来了

克拉苏和庞培。两人都热情洋溢地支持法案，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地明确表示自己与恺撒的关联。庞培谈到，将士们在他的指挥下为罗马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对他们封赏土地。他还提醒群众，他的军队赢得的战利品为共和国带来了足够的资金，因此给老兵分配土地是完全办得到的。恺撒又开始诱导群众，让他们哀求庞培，一定要让这项法案通过。素来喜欢听奉承的庞培看到群众如此哀求他，不禁心花怒放。恺撒问他，假如有人“拿起剑”来阻挠法案，该怎么办。庞培答道，他“会拿起盾牌，严阵以待”（根据另一个版本，他的说法是“拿起剑和盾牌”）。这威胁虽有些笨拙，但让群众欢欣鼓舞，也令很多元老惴惴不安。加图和毕布路斯在元老院曾阻挠恺撒，但把事情闹大并没有吓倒恺撒，也没有震慑住恺撒的靠山们。说到底，恺撒至少和加图等人一样的固执和坚定。就像前133年的提比略·格拉古一样，恺撒的立法未能获得元老院的批准，于是他直接向选民发出呼吁。群众确定在1月的最后一天召开部落会议，就土地法案进行投票。恺撒把公共集会引导和调教得很好，一切迹象都表明法案将顺利通过。尽管加图和毕布路斯以共和国的真正卫士自诩，但他们实际上代表的很可能只是一小群公民的利益。事实上，在元老院中，支持他们观点的也只是少数派（尽管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少数派）。不过，这个少数派包括了许多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强的贵族。[30]

尤利乌斯和恺撒担任执政官

在部落会议就土地法案投票当天的早些时候，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者们开始占据广场周边的关键位置。其中可能有庞培军队的一些老兵，因为法案的通过对他们大有好处。有些人携带着武器，至少是将武器半遮半掩起来。他们能否控制广场的所有入口，是值得怀疑的。随着太阳升起，更多公民加入了聚集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前的人群。选择这个地点作为人民集会的场所，说明恺撒等人期待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广场的这一端比演讲台周围宽敞得多。我们必须记住，恺撒

提议的土地分配方案的确得到了广泛支持，并且更重要的是，积极反对它的人是非常少的，很多人只是漠不关心。也许有很多人对恺撒的动机吃不准，但看到既然庞培也公开支持法案，于是就被说服了。在场的人看到广场周围一群群膀大腰圆的壮汉，是感到害怕还是觉得自己得到了保护，就更难说了。恺撒在神庙的演讲台发表了演讲，又一次解释了自己新法案的必要性。就在这时，他的同僚执政官赶到了。与毕布路斯一同前来的有他的侍从和执法吏，还有加图、三名保民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毕布路斯走向恺撒那里时，人群分开，为他让出一条路来。狄奥说，这部分是出于对最高行政长官的尊敬，但也是由于群众以为毕布路斯已经回心转意，不再反对法案。毕布路斯走到神庙平台上恺撒的身边时——或许是想起了他自己曾说过的关于他和恺撒同时担任市政官的苦涩笑话——明确表示，他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有保民官到场，说明毕布路斯和加图打算利用保民官的权力来否决整个会议进程，阻止会议召开。他也许还考虑要宣布，他看到了不吉利的预兆；宣布凶兆的话，会议也会被迫终止。但是，此时局势的进展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宣布凶兆必须是在公民按照部落分列之前，恺撒此时可能已经发出了让群众分成部落的命令。[31]

群众对毕布路斯立刻表现出了敌对态度。随后爆发的暴力冲突显然是由那些武装的支持者开始的。毕布路斯在企图讲话反对恺撒的时候，被人从神庙台阶上推了下去。他的执法吏被制服，他们携带的法西斯束棒被打得粉碎，这对一位执政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性侮辱。据阿庇安记载，毕布路斯掀开衣领，露出自己的脖子，并大声喊道，既然他阻止不了恺撒，就宁愿以自己的死亡来玷污会议进程。他企图摆出一副英雄姿态，却以闹剧告终。有人向毕布路斯头上倒了一篮粪便；有人动用了投射武器，导致多名侍从受伤；据某些版本的史料记载，一名或多名保民官也负了伤。

好几个侍从是被投射武器打伤的。没有人丧命，这表明恺撒及其盟

友严格地控制着暴力活动。向执政官泼粪而不是伤害他，这给人的印象是恺撒一派对使用武力是精心谋划且有节制的。这与前133年以来发生的暴力冲突迥然不同。加图毫发未伤，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他一直向其他公民们呼喊，企图说服或者恫吓他们，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观点。阿庇安说，恺撒的一些支持者把加图抬了出去，但他后来偷偷溜了回来，直到他意识到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才自讨没趣地放弃了。然后公民大会开始了，并以多数票批准了法案。这部新法律包含一个条款，要求每一位元老都宣誓遵守它和绝不寻求将它撤销。若背弃此誓言，将被判处流放。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是五天，因为另一部法律的类似条款要求在五天之内宣誓——所有元老都宣了誓。前任执政官梅特卢斯·凯列尔（一年前，他曾呼吁元老们到他的牢房里开会）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据说加图是被西塞罗说服的，理由是加图留在城内肯定比流亡海外更有利于国家。在公民大会投票的次日，毕布路斯就召集了元老院开会，以抗议恺撒的行为。这次会议极有可能是在2月1日举行的，也就是他掌握优先权的那个月的第一天。毕布路斯希望元老院谴责恺撒，或者宣布终极议决并剥夺恺撒的官职（就像前78年镇压李必达那样），但他的希望落空了。没有一位元老愿意公开反对恺撒或他的法案，因为这二者都得到了如此之多民众的热情支持。何况许多元老原本就是恺撒的靠山——庞培和克拉苏——的亲信。[32]

毕布路斯退隐家中，在他执政官任期的余下时间里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忙于撰写恶言诽谤的小册子和谴责恺撒、庞培及其支持者的宣言，并命人将这些文件张挂在广场上。但他自己却始终不肯露面。很快大家就开始说，这一年的执政官是“尤利乌斯和恺撒”，而不是“毕布路斯和恺撒”。苏埃托尼乌斯记载了这一时期流行的一些歌谣：

> 不久之前，通过了一项法案，是在恺撒当执政官的那一年，不是毕布路斯的那一年。
>
> 我不记得毕布路斯当执政官那一年发生过任何事情。

但毕布路斯并非完全蛰伏不出，他仍然在试图阻挠恺撒的行动。两位执政官有一项任务，就是确定那些日期无须固定的节庆的日子。毕布路斯把这些节日定在可以召集公民大会的日子，以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但他的同僚没有服从其决定的义务，恺撒也常常对他置之不理。在元老院投票决定举行感恩庆祝活动，以嘉奖得胜的将领时，毕布路斯会宣布庆祝活动的具体日期。因为在庆祝期间不能执行任何政事，而恺撒不能阻止他的这种做法，所以恺撒及其盟友损失了一些时间。但是，因为这些手段不足以阻止当年的所有活动，所以在恺撒召开的所有会议和集会上，毕布路斯都会派人去宣布他看到了凶兆，因此这些活动就必须停止。“观测天象”的占卜有着悠久的历史，受到人们的尊崇，但由于不是观测者亲自到场宣布，因此力量不足。毕布路斯所谓的看到凶兆自然是骗局，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古老的仪式对政治生活仍然有影响力，就像降下雅尼库鲁姆山上旗帜来终结拉比里乌斯审判的做法一样。但是，毕布路斯的做法让人不确定恺撒颁布的那些法律是否有效力。罗马人自己对此似乎也拿不准。恺撒自己就是祭司长，而庞培是一名观鸟占卜师，即专门负责解释征兆的祭司。[33]

恺撒不肯接受毕布路斯的宣言，因为恺撒有太多的措施需要通过。尽管恺撒在任职的一年中受到许多阻挠，但他还是颁布了许多新法律，具体的时间顺序我们已经不清楚了。土地法案实现了庞培的目标之一。在某个时期，他的东方立法也由部落会议投票最终核准了。或许就是在讨论此事的一次会议上，卢库鲁斯发言攻击恺撒。恺撒以极其激烈的言辞长篇大论地抨击他，吓得这位资深元老匍匐在地、哀求宽恕。克拉苏的目标也达成了，有权在亚细亚征税的包税人需要向国库上缴的定额被削减了三分之一。但恺撒正式警告这些包税人公司，在将来的投标中不要如此莽撞。恺撒从此事中可能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因为后来西塞罗声称，恺撒用一些大公司的钱财奖赏了自己的亲信。恺撒早就对罗马各行省的治理充满兴趣，他在法庭上最有名的活动就是起诉压迫人民的总督们。现在他颁布了一道新法规，以严密地管理行省总督们的行为，还对

苏拉担任独裁官时期的一项法规做了澄清和改良。恺撒的这道新法规非常成功，在之后的数百年中一直发挥效力。西塞罗后来称其为“绝妙的法律”。早些年，恺撒和克拉苏都曾努力获得派驻埃及的特别任命。庞培曾亲自重组地中海东部的广袤地区，对埃及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前59年，他们确保罗马共和国正式承认托勒密十二世（托勒密九世的私生子）的统治。托勒密十二世的绰号是“奥勒忒斯”（吹笛人），在埃及非常不得民心，但是以重金贿赂了庞培和克拉苏。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托勒密十二世给庞培和克拉苏的贿金多达6000塔兰同，相当于3600万迪纳厄斯，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其中一些法案是以恺撒本人的名义颁布的，所以不管它们的主题是什么，都被称为《尤利乌斯法》。其他法案则是与恺撒亲近的保民官提出的。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保民官是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他在史料中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无耻之徒。有一次，他率领一大群人冲进了毕布路斯家，企图让他出来公开宣布那些所谓的凶兆。甚至有人说要逮捕毕布路斯。瓦提尼乌斯是恺撒的支持者，但如果把他仅仅看作恺撒的鹰犬，就错了。因为他和任何元老一样，有着自己的野心。他帮助恺撒，是因为这给他带来了私人利益，包括上述征税公司的一些钱财。西塞罗说，后来恺撒曾挖苦道，瓦提尼乌斯当保民官的时候，没有“免费”做过任何事情。[34]

在前59年，恺撒虽然忙于立法，但还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他仍然与塞维利娅沐浴爱河，在这几个月里赠给了她一颗价值150万迪纳厄斯的珍珠（可能是用托勒密十二世的贿金买的）。恺撒自前62年与庞培娅离婚后一直单身。我们掌握的史料都没有提及恺撒和塞维利娅是否有结婚的打算。塞维利娅如果要和西拉努斯离婚，并与恺撒结婚，都需要得到加图的许可，因此这显然不是很现实。恺撒唯一的孩子尤利娅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前59年4月底或5月初，有两桩婚事被公之于众。恺撒迎娶了卡尔普尔尼娅，她的父亲是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35]。皮索显然极有希望当选下一年的执政官，并且在三头同盟的支持下，应该能轻松取胜。恺撒的这门婚事保证将有一位友好的继任执政官来保护他的利

益。这门婚姻在政治上很成功，据我们所知，也算相当幸福，尽管夫妇俩的大部分时间都天各一方（因为恺撒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征战）。第二门婚事是尤利娅嫁给了她父亲的政治盟友——伟大的庞培。庞培比恺撒年长六岁，而他与尤利娅的年龄差距即便按罗马的标准也算是非常大的了。庞培之前休掉了不贞的妻子，因为她与多人私通，其中就包括庞培的新岳父。尤利娅和庞培的婚姻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是突然宣布的。尤利娅原本已经被许配给昆图斯·塞维利乌斯·凯皮欧，而且婚礼几天后就要举行。婚约被解除，凯皮欧自然很难过。为了安慰他，庞培将自己的女儿庞培娅嫁给了他，而庞培娅原本与独裁官苏拉的儿子福斯图斯·苏拉订了婚，于是也和他解除了婚约。恺撒和庞培之间缔结如此亲密的姻亲关系，一般被解释为执政官开始为自己这位盟友的忠诚担忧。狄奥和其他史料都明确地认为，这门婚事是恺撒主动提出的。为了让庞培的立法通过，恺撒冒了很大风险，而他自己去外省当总督的时候，也需要强有力的朋友在罗马为他撑腰。另外，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行省，恺撒也需要庞培的支持。但这门婚姻也完全可以说明，三头同盟非常成功。恺撒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本事，因此庞培也许感到值得和恺撒缔结更长久的关系。庞培的新妻子年轻貌美、蕙质兰心，似乎继承了父亲的许多魅力。四十七岁的丈夫很快就深深地爱上了年轻的妻子。尤利娅显然也很爱他。他们的婚姻无疑是很幸福的。庞培素来喜欢接受他人的爱戴和倾慕，只要别人真心爱他，他也乐意以真心相报。[36]

反冲

从4月中旬到5月，大多数元老都会离开罗马，去自己的乡间庄园小住。因此，在这几周内，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很少会召开会议。可能在这个非官方的休会期开始之前，恺撒就已经提出了另一项土地法案。这一次，新法案针对的是他的第一道土地法不曾涉及的位于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第一道土地法的执行专员们已经选举产生，并开始工作。也许他

们觉得，除了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之外，没有多少现成的土地可供收购；或许恺撒始终觉得迟早要将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也分配出去；或者他逐渐意识到，他的第一道土地法还不够。如果我们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能搞清楚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争取元老院支持他的第一道土地法，还是仅仅在诋毁元老院在选民心中的形象。现在，国家从罗马的贫困公民中挑选了两万人——实际上是两万个家庭，因为只有生养了三四个儿女的已婚男子才符合资格——将其安置在坎帕尼亚的农场上。监管第一道土地法执行的专员们可能被指派去负责此事。共和国政府强调安置有家庭的男子。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后来在帝国时期，类似的殖民计划也是优先考虑有妻儿的男子，政府显然相信这能鼓励更为严肃认真和值得帮助的定居者。元老们又一次被要求庄严宣誓，遵守此法，绝不寻求将其撤销。[37]

大约在发布新土地法案的同一时期，保民官瓦提尼乌斯也提出了一个建议：授予恺撒五年的特别指挥权；将伊利里库姆和内高卢这两个省合并，交给恺撒治理。这两个省驻扎着3个军团，并且离意大利很近。他还将拥有自行选择军团长的特权，其中至少一人将被授予资深裁判官级别的军权。恺撒的新土地法和瓦提尼乌斯的提案都通过了，时间可能是在5月底。元老院还投票决定，将恺撒的辖区扩大，让外高卢也包括其中。外高卢的现任总督梅特卢斯·凯列尔还没有抵达自己的行省，就病逝了。五年的任期、强大的军队（外高卢驻扎着1个军团）以及在巴尔干半岛或高卢（这些地区近年来一直在酝酿动乱）建功立业的机遇，这些都是恺撒想要的。毕布路斯尽可以留下去处置“林地和乡间小道”，尽管他实际上没有就任这个职务，而且在差不多十年之后才担任行省总督。但是，尽管三头同盟中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们的成功还谈不上稳固：政敌大有人在，将来也许会给他们制造麻烦。最糟糕的情况是，下一年或随后某一年的行政长官会宣布，在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颁布的法律都是无效的。因此，三头同盟仍然神经紧绷，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做出强烈回应。

4月初，西塞罗的执政官老同僚盖乌斯·安东尼遭到指控，罪名是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中饱私囊。前63年，元老院投票决定将这个富饶的行省交给西塞罗，但他在喀提林阴谋期间为了把安东尼拉到自己和共和国这边，主动将马其顿让给了安东尼。尽管西塞罗对安东尼评价不高，而且可能猜到他确实有罪，但还是为他辩护。起诉人的靠山则是恺撒，可能也有克拉苏。起诉人最后得胜，安东尼流亡海外，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为安东尼辩护时，西塞罗犯了个错误：他公开批评三头同盟，并哀叹共和国的糟糕状况。庭审是在上午举行的。当天下午，他的私敌克洛狄乌斯——曾侵犯善良女神节、与恺撒前妻庞培娅私通的那个人——的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恺撒作为祭司长主持了仪式，庞培以观鸟占卜师的身份参加，将克洛狄乌斯"收养"为平民。克洛狄乌斯多年来一直想当保民官，但是贵族被禁止担任这个官职，因此他多次尝试将自己的身份改为平民，不过都没有成功。他已经开始用比较低俗的克洛狄乌斯作为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贵族风格的克劳狄。这场仪式的确是场闹剧，收养克洛狄乌斯的那个平民其实年龄比他还小。[38]

在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西塞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而惴惴不安，时而突然乐观起来。4月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位于安提乌姆[39]的别墅里，用他自己的说法是"避避风头"。到外地度夏的人不止他一个，许多元老都离开了罗马城，于是元老院的出席率大大降低。有一次，恺撒询问一位年迈的元老，为什么出席会议的人这么少。这位名叫孔西迪乌斯的老人答道，因为其他人害怕恺撒的武装支持者。恺撒询问孔西迪乌斯为什么还继续出席会议。孔西迪乌斯的回答是，他年纪很大了，什么都不怕，因为他已经时日无多。西塞罗对《坎帕尼亚土地法》持欢迎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会让很多元老与三头同盟疏远。他指出，这次土地再分配会导致国库损失相当多的收入。在意大利征收的赋税肯定是减少了，但庞培军事征服带来的收益弥补了这种损失。三头同盟又一次努力拉拢西塞罗。恺撒提议让西塞罗担任其麾下的军团长，一起去高卢。但这个提议和其他任何提议都不能改变西塞罗的想法，他坚信三头

同盟的做法是错误的。西塞罗对加图也有些温和的不满，因为他觉得加图在当年早些时候的行为让形势更糟糕了。西塞罗对主要的贵族们也颇有微词，因为如果他要摆明立场，就不能指望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到4月底，他开始希望政界的平衡发生改变，于是写信给阿提库斯说："如果元老院的势力满含恨意，那么你可以猜猜，既然权力没有到人民手中，而是被三个不知克制的人控制，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不仅我们当中那些不曾犯错的人会得到赞扬，甚至犯下了诸多错误的加图也会得到赞扬。"[40] 4月18日，西塞罗得知，克洛狄乌斯计划竞选保民官，并公开宣布他将撤销恺撒的所有立法。这可能是因为恺撒拒绝将油水丰厚的埃及职位交给克洛狄乌斯，而是给了他一个利润较少的位于亚美尼亚的职位。有流言称，恺撒和庞培现在否认他们曾执行了将克洛狄乌斯收养为平民的仪式。这消息令西塞罗很振奋，但他在5月的信中写到庞培时又显得很绝望，甚至暗示庞培在图谋建立暴政。当年晚些时候，一名年轻的元老盖乌斯·加图在广场公开指控庞培要当暴君，险些被私刑处死；但我们不知道，攻击这位元老的是三头同盟的党徒，还是更广泛的群众。西塞罗对这位年轻元老的描述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青年，但……毕竟姓加图"。这清楚地印证了一个著名的姓氏在罗马能够有多么大的影响力。[41]

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西塞罗发现，最大张旗鼓地反对三头同盟的人是盖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库里奥，他的父亲是前76年的执政官。和盖乌斯·加图一样，库里奥也很年轻。显要的元老和前任行政长官当中很少有人公开批评三头同盟，这是相当惊人的事情。这又一次佐证了元老院高层在这些年的软弱，主要是由于内战和近期的动荡。但有时普通公民会聚集起来向三头同盟发出抗议。在加比尼乌斯（他担任保民官的时候，为庞培搞到了清剿海盗的指挥权，后来又担任庞培的军团长）举办的一次竞技比赛上，庞培在贵宾席落座时遭到了群众的起哄。在一场戏剧表演中，当一位演员着力强调"你的伟大建立在我们的悲惨之上"这句台词时，观众热烈响应，这显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伟大的庞培。据

西塞罗记载：

> 恺撒到场的时候，欢呼声逐渐平息了。然后，库里奥跟了上去，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共和国还稳固的时候，庞培曾得到过这样的掌声。恺撒非常恼怒。据说有人给身在卡普阿的庞培送去了一封信。骑士们站起来为库里奥欢呼，他们（三头同盟）如今是众矢之的。[42]

毕布路斯发表了许多恶毒攻击三头同盟的宣言，其中往往充斥着污言秽语，很多公民喜滋滋地阅读这些宣言。西塞罗还讲道，广场常有一大群人围观毕布路斯的宣言。群众的捧腹大笑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困守家中的毕布路斯感到同情。古往今来，政治讽刺常常也能让并不认同它的人哈哈大笑。罗马人有着强烈的幽默感，非常喜欢这种粗鲁的辱骂。毕布路斯大多时间里攻击的目标都是恺撒，但恺撒对此似乎视而不见。庞培素来不擅长应对别人的批评，他于7月25日在广场发表演讲，为自己辩护。西塞罗感到庞培自我辩护的景象非常可悲，因为西塞罗仍然希望能和庞培重归于好，毕竟他过去曾常常赞扬庞培。但根据西塞罗的说法，庞培演讲的唯一结果就是，毕布路斯的小册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到这时，庞培不断向西塞罗保证，克洛狄乌斯不足为虑。克洛狄乌斯显然已经放弃了攻击恺撒立法的想法。当然，或许他从来就没有当真地考虑过，而一直以当上保民官为目标。到这年秋季，西塞罗感到或者说愿意相信，庞培为年初的动乱懊悔，并为自己当时与元老院的贵族们疏远感到后悔。[43]

夏末或秋初，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仍是个谜团。威提乌斯（前62年，他指控恺撒参与了喀提林阴谋，后来因此遭到殴打和囚禁）又被带到元老院，宣称自己知晓另一桩“阴谋”。威提乌斯与库里奥交情不错，后来告诉库里奥，他打算杀死庞培（按照另一个版本的记载，是杀死庞培和恺撒）。库里奥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后者立刻告知了庞培。于是元老院召集了会议，传唤威提乌斯来答话。威提乌斯却指控毕布路斯唆使库里奥去杀害庞培，也许还要谋杀恺

撒。他还指认了其他几名密谋者，其中包括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此时是二十五六岁）。布鲁图斯和另外一名被指认的人也许有谋害庞培的动机，因为庞培在内战期间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据说毕布路斯的一名仆人给年轻的密谋者们提供了一把匕首，来作为凶器。此时，西塞罗相信，威提乌斯的幕后靠山就是恺撒，恺撒的目的是除掉对三头同盟口诛笔伐的库里奥。但恺撒极不可能愿意将自己情人的儿子卷入其中。库里奥面对着指控，做了有力的自我辩护；而几个月前毕布路斯曾向庞培发出警示，说有人要暗杀他，庞培还向毕布路斯表示了感谢。威提乌斯的故事受到了极大的怀疑，他也被监禁起来，因为他在广场时被搜出了身上藏匿的匕首。次日，恺撒和瓦提尼乌斯传唤他到演讲台参加一场公共集会。这一次，威提乌斯没有提到布鲁图斯。西塞罗狡黠地指出："显然，这是有人吹了枕边风。"[44] 他无疑是在暗示恺撒与塞维利娅的关系。这次威提乌斯指认，卢库鲁斯和其他一些人参与了暗杀阴谋，其中包括西塞罗的女婿。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准备将他送上法庭。但在庭审开始之前，他就暴死在狱中。

威提乌斯的死因不明。据普鲁塔克记载，官方的说法是自杀，但他的脖子上有明显的勒杀痕迹。苏埃托尼乌斯宣称，恺撒是整个事情的幕后指使人，是他派人毒死了威提乌斯。几年后，西塞罗将此事的罪责从恺撒推到了瓦提尼乌斯身上。后世的学者们对此事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莫衷一是。有些人怪罪恺撒，也有人指责克洛狄乌斯，甚至庞培本人。一方面，此事或许能够使庞培紧张（因为他始终对暗杀有种病态的恐惧），确保他虽然遭到毕布路斯的大肆攻击，但仍然忠于三头同盟。但既然布鲁图斯也被指认为密谋者，那么这不可能是恺撒指使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恺撒仅仅是等待真相暴露，进而从中榨取利益。威提乌斯在第二天的指控中不曾提及布鲁图斯，说明他受到了压力。威提乌斯所谓的检举可能是他自作主张的行为，因为他渴望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者希望作为告密者得到赏赐，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恺撒显然尝试利用他，但很快意识到，这对自己没什么好处，而且威提乌斯并不值得

信赖。很有可能是恺撒下令除掉了威提乌斯，毕竟威提乌斯在过去曾经攻击过恺撒。但我们没有证据。[45]

毕布路斯成功地将执政官选举从7月推迟到了10月。但是，尽管他有权主持执政官选举，却仍然待在家中，将任务留给了恺撒。当选前58年执政官的是恺撒的新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和加比尼乌斯[46]，两人都对三头同盟很友好。随后几个月的形势对恺撒的命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立法延续时间越久，将来任何人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就越困难。在恺撒担任执政官这一年的年末，他在罗马或附近待了好几个月，静观事态发展。克洛狄乌斯已经被选为保民官，由于他是在获得恺撒的批准后转变为平民身份的，所以他必须认可恺撒作为执政官行动的合法性。因此，他显然会花很大力气去确认恺撒立法的效力。据狄奥记载，毕布路斯在执政官任期的最后一天，终于出现在公共场合，企图发表演讲，但被克洛狄乌斯禁止，就像前63年底梅特卢斯·尼波斯阻止西塞罗演讲那样。两名新裁判官攻击恺撒，他在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对他们的批评做了答复。他在这些辩论中三次演讲的稿子后来被公开发表，对自己在前59年的行动做了永久性的辩白。遗憾的是，这些演讲稿没有保存至今。但是三天之后，元老院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一名新保民官企图起诉恺撒，但被大多数保民官否决。直到前58年3月，恺撒才终于动身前往高卢，那里的事态急需他来处理。[47]

恺撒在执政官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土地再分配的大规模项目已经开始，并将在随后十年中持续开展。庞培的东方立法得以通过，克拉苏庇护的包税人们得到了救助。恺撒通过与这两位大人物结盟，达成了这些目标，战胜了反对派，而他起初的和解措施未曾将这些反对派争取过来。这是风云激荡的一年，多次出现高度紧张、一触即发的局面。西塞罗在他的书信中讲道，他害怕出现暴政和内战。暴政和内战都没有出现，但管理政治生活的许多传统和先例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遭到了进一步破坏。毕布路斯和加图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恺撒，而恺撒同样坚

决要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自己的政策，双方均对共和国造成了同等的损害。但恺撒目前占了上风，并且获得了开展大规模战争、赢得军事荣耀的机会。现在他有了一个任期较长且非常重要的行省总督职位，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共和国赢得胜利。只要他的军事胜利足够辉煌——恺撒下定决心，一定要获得辉煌的胜利——那么即便是他的那些不共戴天之敌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执政官，或许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公仆。这样的话，他在执政官任上的一些比较可疑的行动也会被忘却或者原谅。《瓦提尼乌斯法》顺利通过，将内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交给恺撒治理，后来又加上了外高卢，这让恺撒很高兴。在此项成功的鼓舞之下，他在元老院宣布，由于“他的最大心愿业已达成，他的敌人们也遭到了惨重打击，他现在要爬到他们的头顶上去”。不管这是不是有意的双关语，一位元老反唇相讥，说一个女人要做到这些会很困难。他指的是恺撒和尼科美德四世的老故事，毕布路斯的大字报猛炒了这碗冷饭。恺撒诙谐地答道，那应该不难，因为“塞弥拉弥斯[48]……曾是叙利亚女王，而古时的阿玛宗人曾主宰亚细亚的很大一部分”。关于这一年的记述以这个粗鲁的笑话，以及展现恺撒自信与自满的逸闻结束，似乎是恰如其分的。[49]

---

[1] Sallust，*Bell.Cat.* 54.4.

[2] Cicero，*ad Att.* 2.5.

[3] Pliny，*NH* 7.97，Plutarch，*Pompey* 45，Dio 37.21.1-4，Appian，*Mithridatic Wars*，116-117.

[4] 注意此处的伊比利亚指的是“高加索伊比利亚”或称“东伊比利亚”，以别于现今西班牙、安道尔及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罗马人称之为“西伊比利亚”）。东伊比利亚大致在今天的格鲁吉亚东部。

[5] 在犹太教中，至圣所是帐幕和后来耶路撒冷圣殿的最内层，是存放约柜的场所。约柜内存放着十诫。

[6] 关于东方的战争，见P.Greenhalgh，*Pompey*：*The Roman Alexander*（1980），以及A.Goldsworthy，*In the Name of Rome*（2003），ch.7，esp.pp.164-179。

[7] Plutarch，*Pompey* 42-46，*Cato the Younger* 30，Velleius Paterculus 2.40.3；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75-76；关于克拉苏，见Plutarch，*Pompey* 43，and A.Ward，*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pp.193-199.

[8] Cicero，*ad Att.* 1.13；关于克拉苏，另见*ad Att.* 1.14。

[9] Cicero，*ad Att.* 1.13，12；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77-79.

[10] Cicero，*ad Att.* 1.12，Plutarch，*Pompey* 42，*Cato the Younger* 30.1-5，Suetonius，*Caesar* 50.1；关于前62年安抚梅特卢斯·凯列尔的努力，见Cicero，*ad Fam.* 5.1，2。

[11] Dio 37.49.1-4，Plutarch，*Pompey* 44，*Cato the Younger* 30.5，Cicero，*ad Att.* 1.18，19.

[12] Cicero，*ad Att.* 2.1.

[13] Horace，*Odes* 2.1.1；对这些年的深刻洞察，见P.Wiseman，'The Senate and the *Populares*，69-60 BC'，in *CAH* 2 IX （1994），pp.327-367，esp.pp.358-367。

[14] 关于12月17日恺撒与卢凯依乌斯讨论结盟的会谈，见Cicero，*ad Att.* 2.1，1.17.见M.Gelzer，*Caesar* （1968），p.60，fn.1，将Suetonius的话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为恺撒通过书信休了庞培娅。

[15] Appian，*BC* 2.8，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31.2-3，Dio 37.54.1-2.

[16] Suetonius，*Caesar* 19.2；关于此举的目的是让执政官们做预备的理论，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84；关于私人仇隙和敌意，见D.Epstein，*Personal Enmity in Roman Politics 218-43 BC* （1978）。

[17] See L.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esp.pp.84-106.

[18] L.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pp.54-55，H.Mouritsen，*Plebs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2001），pp.27-32；关于此时期罗马的人口，见N.Purcell，'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plebs urbana* in the Late Republic'，in *CAH* 2 IX （1994），pp.644-688。

[19] 指塞维利娅的丈夫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

[20] Suetonius，*Caesar* 19.1；Cicero，*ad Att.* 1.1；关于意大利人投票的重要性，见L.Ross Taylor，*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pp.57-59。

[21] Cicero，*ad Att.* 2.3.

[22] Suetonius，*Caesar* 19.

[23] 这个李必达是前文讲到的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起兵叛乱，后被镇压身死）的儿子，与父亲同名。

[24] Suetonius，*Caesar* 19.2，Dio 37.56-58，Appian，*BC* 2.9；see also 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82-85，Ward （1977），pp.210-216，M.Gelzer，*Caesar* （1968），pp.67-69，C.Meier，*Caesar* （1996），pp.182-189.

[25] Plutarch，*Caesar* 13，*Pompey* 47；关于誓言，见Livy，*Pers.* 103，Appian，*BC* 2.9，and Pliny，*Epistulae* 10.96；关于两个政敌拉拢同一个选民，见Cicero，*ad Att.* 2.1。

[26] Suetonius，*Caesar* 20.1，cf.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23.3.

[27] Dio 38.1.1-7，Suetonius，*Caesar* 20.1；关于这一年事件的时间顺序，见L.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 （1968），pp.173-193；另见M.Gelzer，*Caesar* （1968），pp.71-74，Meier （1996），pp.207-213，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86-87；关于五位"内部"委员，见Cicero，*ad Att.* 2.7。

[28] Dio 38.2.1-3.3 Suetonius，*Caesar* 20.4 的说法略有不同，将加图被逮捕的时间定为该年晚些时候。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33.1-2也认为此事件的时间较晚；关于佩特列乌斯的军事经验，见Sallust，*Bell.Cat.* 59.6。

[29] Dio 38.4.1-3.

[30] Dio 38.4.4-5.5，Plutarch，*Pompey* 47；关于投票的日期，见L.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 （1968），pp.179-181。

[31] Dio 38.6.1-3，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32.2；关于毕布路斯的意图，见Taylor （1969），p.179。

[32] Dio 38.6.4-7.2，Appian，*BC* 2.11，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32.2-6，Suetonius，*Caesar* 20.1.

[33] Suetonius，*Caesar* 20.2，Dio 38.8.2；L.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 （1968），pp.177-179.

[34] Suetonius，*Caesar* 20.3-4，54.3，Dio 38.7.4-6，Cicero，*In Vatinium* 29，38；see M.Gelzer，*Caesar* （1968），pp.75-6，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88；关于瓦提尼乌斯的性格，见他给西塞罗的信，*ad Fam.* 5.9，10 and 10A；关于恺撒管束行省总督的法律，见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 （1928），p.319，and Cicero，*pro Sestio* 64，135，*In Pisonem* 16，37，*In Vatinium* 12，29，*ad Att.* 5.10.2。

[35] 注意，恺撒的岳父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与前文讲到的几个叫皮索的人，如前65年财务官、内西班牙总督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前67年执政官、被恺撒指控贪赃枉法的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以及庞培的党羽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都没有直接关系。

[36] Suetonius，*Caesar* 21，50.1-2，他喜爱珍珠，见Plutarch，*Pompey* 47-48，*Caesar* 14，Dio 38.9.1。

[37] Dio 38.7.3，Suetonius，*Caesar* 20.3，Cicero，*ad Att.* 2.15，16，17 and 18.

[38] Dio 38.12.1-3，Cicero，*de Domo* 41，*ad Att.* 8.3，*de provincii sconsularibus* 42，Suetonius，*Caesar* 20.4，Plutarch，*Caesar* 14；see also M.Gelzer，*Caesar* （1968），pp.76-78.

[39] 即今天的安济奥，意大利西部沿海城市。

[40] Cicero，*ad Att.* 2.9.

[41] Cicero，*ad Att.* 2.16 and 17；on C.Cato see *ad Quintum Fratrem* 1.2.5.

[42] Cicero，*ad Att.* 2.19.

[43] Cicero，*ad Att.* 2.21，22 and 23.

[44] Cicero，*ad Att* .2.24.

[45] Cicero，*ad Att* .2.24，*In Vatinium* 24-26，*pro Sestio* 132，Dio 38.9.2-10.1，Suetonius，*Caesar* 20.5，Appian，*BC* 2.12-13，Plutarch，*Lucullus* 42.7-8；关于恺撒是这些事件的主要幕后推手，见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1（1928），pp.323-324 and M.Gelzer，*Caesar* （1968），pp.90-92，Meier（1996），p.221；关于克洛狄乌斯，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98-99；关于庞培的参与情况，见Ward（1977），pp.236-241，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pp.95-96；关于更复杂的解释以及当时可能有阴谋的理论，见D.Stockton，*Cicero* （1971），pp.183-186。

[46] 即奥卢斯·加比尼乌斯，前文讲到，他帮助庞培获得了清剿海盗的指挥权。他可谓是庞培迅速崛起的功臣之一。

[47] Suetonius，*Caesar* 23，73，*Scholia Bobiensia* on Cicero，*pro Sestio* 40 and *In Vatinium* 15.

[48] 塞弥拉弥斯是传说中亚述国王尼诺斯的传奇王后，成功地接替了他的亚述王位。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很多已被遗忘或不知出处的古迹上，都用到了塞弥拉弥斯这个名字。古幼发拉底河或伊朗的每一项巨大工程最终似乎都归结于她，甚至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亦是如此。希罗多德曾认定是她兴建了幼发拉底河围堤。塞弥勒弥斯的名字流传在亚述各地和整个美索不达米

亚、米底、波斯、黎凡特、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和高加索，只是稍有变化。

[49] Suetonius，*Caesar* 22.2 （Loeb translation）；关于西塞罗害怕内战，见*ad Att.* 2.20，21 and 22。

第二部 资深执政官（前58年～前50年）

九 高卢

> 恺撒“打了五十场正面交锋的战役，他是唯一一个超过马尔库斯·马凯鲁斯[1]的指挥官，后者的记录是三十九场”。
>
> ——老普林尼，1世纪中叶[2]

> 恺撒拥有最纯熟的技艺和优雅的文风，也有解释自己计划的最高超本领。
>
>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前44年[3]

恺撒离开罗马前往行省上任的时候，时年四十一岁。随后九年中，他始终不曾返回罗马城。他的余生几乎完全被战争主宰。从此刻起，除了两年（前50年和前44年）之外，他在每一年都参与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前50年，高卢被征服，恺撒忙于平定这一地区，所以没有大规模作战。前44年，他正打算踏上新的宏伟征程，先是讨伐达契亚[4]，下一个目标是帕提亚[5]，但就在率军出征的前几天，他惨遭谋杀。在大多数年份里，他都会进行至少一场大规模战役或攻城战。普林尼声称恺撒率军历经五十场战役，而阿庇安说其中三十场战役发生在征讨高卢期间。对于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我们既不能证实，也无法否认，因为对历史的任何时期，人们都很难达成共识，究竟怎样才算是一场战役，或仅仅是一场交锋或小规模冲突。但这些作者的说法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普遍相信，恺撒比其他任何一位罗马将军都更加身经百战，也更加常胜不败。人们常将恺撒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亚历山大只参加了五场大规模战

役和三场重要的攻城战，尽管他也参加了很多规模较小的战斗。汉尼拔面对的敌手完全不同，打了更多的大战役，但或许仍然不能超过恺撒的战绩，甚至不能与他比肩。一直到拿破仑时代，那个战争烈度猛增的时期，才有一些军事统帅经历了比恺撒和古典世界的其他伟大指挥官们更多的大战役。[6]

恺撒在前58年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前58年之前，他在意大利之外待的时间顶多只有九年，其中差不多一半是在服兵役。这对一位罗马元老来说，是相当典型的，虽然在海外服役的时间比平均水平要少，但比西塞罗那样的人还是多得多。西塞罗依赖于不断出现在法庭上，来确保自己能够在公众面前混个脸熟。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恺撒非常高调浮夸，与可疑的角色有联系，并且在执政官任上做了一些有争议的事情，但他的政治生涯总的来讲仍然是很常规的。他比常规年龄早两年达到执政官的高度，但比资深执政官的平均年龄只小一点点。与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庞培相比，他的机遇来得非常晚。亚历山大三十五岁驾崩，而汉尼拔打最后一场战役时只有四十五岁。拿破仑在滑铁卢和威灵顿公爵交锋的时候，比汉尼拔只大一岁，尽管布吕歇尔已经七十三岁了。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内战爆发时，罗伯特·E.李已经五十多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巴顿也已经五十多岁了。无论是根据罗马的标准，还是现代人的标准，恺撒在前58年都不算老，但他的同时代人也不会预料到，他竟然能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在过去服兵役时，他表现出了才干、勇气和自信，但还有很多雄心勃勃的人表现出了类似的素质。在审视恺撒的故事时，我们要切记，不能因为我们拥有后见之明，就认为万事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即便在前不久因庞培的辉煌成就而眼花缭乱的罗马，恺撒在高卢的战功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但胜负只在一瞬间，恺撒可能在归国之前战死，也可能死于事故或疾病。当时没有人能想到，恺撒最终会以反叛者的身份返回，并攻击他先前的盟友和女婿庞培。恺撒出征高卢的时候，有着自己的计划和雄心，无疑也考虑过许多可能的前景，但最终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幸运，勇

往直前。

恺撒的《战记》

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重要的指挥职位，恺撒做出了极大努力，欠下了巨额债务，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并且四面树敌。要让这一切都值得，他需要极其辉煌的胜利，但若是要从胜利中获取实际的好处，他必须确保让人们都知晓他的成就。米蒂利尼的希腊学者狄奥法内斯曾伴随庞培的幕僚，记录了他讨伐海盗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役。恺撒不需要其他人捉刀代笔，而是自己记载了自己的胜利。他已经发表了一些演讲稿和一些现已遗失的作品，其中部分是他年轻时写下的。奥古斯都皇帝后来禁毁了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其中包括悲剧《俄狄浦斯》，以及他的《赫拉克勒斯颂》和《箴言集》，而他的演讲稿除了一些残章断简之外，都没有保存到今天。罗马将军们有一种传统，就是撰写“战记”以纪念自己的成就，这种体裁与史书不同，常被当作供后世史学家使用的史料。恺撒最终写了十卷《战记》，其中七卷记载前58年～前52年讨伐高卢的战争，另外三卷讲的是前49年～前48年反对庞培的内战。恺撒去世后，他的几名军官补充了四卷，涉及恺撒前51年在高卢的作战、前48年～前47年在埃及和东方的战役、前46年在阿非利加的军事行动，以及前45年在西班牙的作战。除了恺撒的著作之外，其他战争记录都只有少量残篇保存至今，所以我们不知道恺撒的著作是否符合传统的战记风格。[7]

恺撒的《战记》从一开始就被认可为拉丁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西塞罗对恺撒的演讲术赞不绝口，对他的《战记》也不吝赞美之词：

> 的确值得赞美……就像是裸体雕像，挺拔而美丽，削去了所有矫饰，如同脱去了袍服一般。尽管他希望为其他作家提供撰写史书的材料，但他或许只会让无能之人满意，这些庸人会将自己的“才华”施加于他提供的材料，而所有头脑健全的人读到他的作品，都不敢再写作；因为在撰写史书时，最好的就是晓畅和精练。[8]

这些话是在前46年写下的，此时西塞罗对恺撒的独裁越来越不安，所以他说“头脑健全的人”读了恺撒的作品之后都不敢记载自己的成就，或许有一丝双重含义。但是，西塞罗对恺撒文笔的赞誉显然是诚心实意的，这或许是因为恺撒高度洗练的文风与西塞罗自己的演讲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恺撒曾宣称，演说家应当“避开怪僻罕见的词语，就像航船的舵手避开暗礁一样”。除了必需的技术词汇或外来语之外，恺撒严格遵守这项原则，他的叙述风格清楚明晰、节奏轻快。他极少使用情绪化或戏剧性的言辞，而让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和重要性自己显露出来。在《战记》中，他始终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而将他的士兵们称为“我们的人”，讲述了罗马人民的军队在依法任职的统帅的指挥下，与凶残的敌人和严酷的大自然顽强斗争。在每一个阶段，恺撒都将自己的行动描绘为完全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尽管现代读者会对《高卢战记》中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屠杀、集体处决和奴役感到震惊，但同时代的罗马人不会对这些事情吃惊。即便是恺撒的政敌，也很难不被他的《战记》感染，为之血脉偾张。[9]

很多政治和军事领袖曾以自己亲身参与的事件为蓝本，写下他们自己版本的史书，但很少有作品的文学水准能与恺撒的《战记》相提并论。在近期历史中，丘吉尔或许是在文学水平上最接近恺撒的，他的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过多久就完成了自己的著述。但恺撒的著述与丘吉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名将的作品有一个主要区别：后者全都是为后人而写作，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已经落幕，所以要著书立说，用自己版本的记述来影响后世的观念。而恺撒更关注的是同时代的受众，他写作是为了继续推动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多的机会去争取荣耀（丘吉尔撰写他的早期著作时应当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七卷本《高卢战记》是在何时撰写及发表的，并不十分清楚，但一般的意见是七卷于前51年～前50年一起推出。学界一般推测在最终导致内战爆发的几个高度紧张的月份里，恺撒写下了这七卷书，希望能够在罗马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虽然常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深信不

疑，但这其实只是推测而已。从前58年他启程前往高卢开始，他就一直在著书立说，以吸引罗马人民的注意力；因为他或者任何一位在仕途奋斗的人都必须确保，选民和城内有影响力的群体不会将他们遗忘。他等了那么久才出书，倒有些奇怪了。另外，各卷中对个别人物的描写有所不同，细节上也有矛盾冲突之处，这说明七卷书更有可能是一卷一卷逐步发表的。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每一卷都是在其描述的战役结束后的冬季休战期写下的。即便是主张七卷本同一批出齐的学者们也推测，恺撒会向元老院发送年度报告，而这些报告流传很广，可能已经和我们现有的《战记》的形式相似。有人认为，在高卢的冬季，恺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一卷书来。这种看法不足为信。恺撒的高级军团长之一希尔提乌斯后来补写了《高卢战记》的第八卷，他转述了西塞罗对恺撒优美文风的赞誉，但也讲到恺撒下笔如有神、倚马可待。另外一名军官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相信，恺撒的计划是在将来重写《战记》，所以这些书可能是非常快速地创作出来，以满足紧迫的政治需求。希尔提乌斯和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说法都无法证明七卷书是分批发表的，但总的来讲，分批发表的可能性极大。毕竟，在高卢战争之后的几个月中要一口气写出全部七卷书，任务实在是太艰巨。[10]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战记》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元老和骑士们。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曾命令将元老院的会议记录全部公开发表，这显然不是为了给元老们看。罗马世界的识字率很难判断，我们不知道在富裕的精英阶层之外，还有多少人能够阅读。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当时每本书都需要手抄，所以书籍肯定是昂贵的奢侈品。西塞罗曾提到，地位低微的人比如手工艺人，也会如狼似虎地阅读史书。史料中有迹象表明，公共朗读会是很常见的，听众很多。恺撒始终是个平民派，依赖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他很有可能将普通群众也当作自己著作的受众。值得注意的是，《战记》中很少出现元老和骑

士阶层的军官，而且有时对他们加以贬抑。相反，军团的普通士兵却始终被刻画得英勇雄壮。即便是批评士兵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批评他们过于热切、忘了纪律。与普通士兵相比，领导他们的百夫长们更是被描绘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书中有名有姓的百夫长不多，但一般来讲，总是百夫长这个群体在危急时刻能够镇静自若、英勇奋战，为赢得统帅的认可而不惜牺牲生命。对百夫长和普通士兵的正面描绘可能会取悦爱国的贵族与骑士，但肯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恺撒寻求与普通罗马人结交，而不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对他来讲，或许某些群体会更重要一些，比如那些在百人会议的第一等级里投票的人。但由于我们对精英阶层之外的生活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确定。[11]

从高卢战争开始到内战结束，我们对恺撒的活动有较多的了解，但这些信息的绝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战记》。尤其是关于高卢战争，其他史料的几乎所有信息都源自恺撒的版本。如果我们对《战记》的基本真实性存疑，那么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替代它。

拿破仑极其仰慕恺撒的军事才华，曾说任何有进取心的将军都应当仔细研究恺撒的军事行动。但即便是拿破仑，也对《战记》中一些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流亡期间还花了一些时间来批评《战记》。但拿破仑自己的战报和回忆录中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所以他或许仅仅将历史真实方面的弹性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恺撒著书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鼓吹自己作为共和国卓越公仆的名望，并昭示天下他的辉煌地位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战记》是宣传材料，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雕琢粉饰。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相信，恺撒在撰写《战记》时并不特别寻章摘句，也并不特别重视真实性，因为恺撒往往非常乐于相信别人对其行动的描述或者自己对事实进行歪曲，不管他这么做是有意为之，还是由于已经忘了真相……"[12]

波利奥在内战期间追随恺撒，但并没有陪伴他征讨高卢，因此波利

奥的说法可能主要是针对恺撒的《内战记》。波利奥说恺撒太容易相信别人对自己行动的描述，这可能带有个人的哀怨，因为波利奥是阿非利加的一次灾难性登陆作战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而此役的指挥官在《战记》中被描绘得光辉伟大。如果波利奥说的是真的，恺撒的确会歪曲事实，那么究竟歪曲到什么程度呢？考古学已经证实了恺撒对高卢战争的一些说法，但考古学很难重现军事行动的细节，更不用说其背后的动机和思考了。更重要的是，很显然在整个高卢战争期间，在恺撒军队中服役的许多元老和骑士都会定期给他们的亲友写信。后来，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成了恺撒的一名军团长。保存至今的昆图斯书信中很少有军事方面的细节，但令人吃惊的是，昆图斯随恺撒大军于前54年在不列颠的几个月期间，仍然能够给自己的哥哥发去书信。罗马城和军队之间显然有着持续的信息交换。前56年，西塞罗在元老院攻击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的不端行为。皮索无视常规，没有定期向元老院发送报告；但西塞罗说，即便如此，他和其他每一位元老都对皮索的一举一动和劣迹非常清楚。

大多数批评恺撒著述真实性的人都利用恺撒文中的细节来批评他。批评者提及了恺撒的一些失败和有争议的行动。说到底，恺撒不可能大范围地捏造虚构或者肆无忌惮地扭曲事实，因为他的受众不好蒙蔽，很容易识破真相。但他可以用最正面、最有利的色彩来描绘所有事实，将失败的罪责推到其他人身上，故作冷静地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低调处理那些成就很小的行动。但他必须紧密地贴合事实，尤其是那些与罗马受众关系最大的事实，这样《战记》才能达到其目的，即争取民意的支持。在研读恺撒的著述时，就像对待任何其他史料一样，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他对基本事件的记述是真实可靠的。[13]

恺撒的军队

前58年，驻扎在恺撒行省的军队相当于他带去西班牙的军队兵力的

两倍，后来逐渐扩大，达到了原先的两倍和三倍。他只服过五年兵役，对这一地区的战事不熟悉。但正如前文所述，这对一位罗马指挥官来说不算特别稀罕。恺撒游刃有余地应对了自己遇到的挑战，但如果说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沉稳的军事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他后来被广泛认可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那就错了。他需要先熟悉自己的新军队，并学会如何最好地运用它，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是，他的最高级军官都是他亲自精挑细选并带到行省的。

最重要的军官是军团长。军团长（Legatus）的原意是代表，可以是大使，也可以是“代表”总督处理事务的高级军官。军团长一定是元老阶层的成员。据我们所知，恺撒麾下的军团长的军事经验都不及他丰富。他曾邀请西塞罗担任自己的军团长，这说明对于这个职务来说，有用的政治人脉比军事才干更重要。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但从战役一开始，恺撒的幕僚中就有5～10名军团长。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拉比埃努斯，他实际上被授予了独立的资深裁判官级别的军权，而不仅仅是上级下放的权力。拉比埃努斯是前63年的保民官，曾与恺撒合作起诉拉比里乌斯。《战记》中拉比埃努斯的出场机会比其他军团长的都要多，他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但在前58年，他的战争经验或许并不比恺撒多；到了高卢之后，他才得到机会让自己的才华大放光彩。前70年代，拉比埃努斯曾在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苏利库斯麾下在亚细亚服役。在那些年里，他也许和恺撒打过交道，但他也可能是在恺撒返回罗马之后才抵达亚细亚行省的。史学家推测，拉比埃努斯曾在庞培麾下参加了许多战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许多学者还推测，拉比埃努斯在前60年或前59年担任过裁判官，但这也只是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推测，并没有实际的证据。[14]

巴尔布斯是恺撒的另一个老熟人，又一次担任他的“工兵长官”。但他似乎在高卢没待多久就返回了罗马，为恺撒办事。恺撒麾下的另一名“工兵长官”是马穆拉，他来自福尔米亚[15]，因为在高卢期间以不光

彩手段暴富而臭名昭著。帮助恺撒获得五年指挥权的保民官瓦提尼乌斯似乎在高卢也待了一段时间，但可能是在前60年代的晚些时候。昆图斯·佩蒂乌斯似乎从一开始就追随恺撒。前58年恺撒麾下的另外几名军团长的身份不详。有几个人在这一年如果不是在他军中效力的话，应当很快就会加入他的幕僚。其中包括奥卢斯·希尔提乌斯，他后来为《高卢战记》补充了第八卷。另外一名军团长是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在阿洛布罗基人叛乱期间，他在彭普提努斯[16]麾下效力，因此对近期的高卢战事比较有经验。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和卢基乌斯·奥隆库勒乌斯·科塔可能都是从一开始就在恺撒身边（尽管后者的家族名是科塔，但他不大可能是恺撒母亲那边的亲戚，因为恺撒母家的氏族名是奥雷利乌斯）。科塔曾写过一篇关于罗马宪法的专题论文，所以恺撒的幕僚有着不错的文学修养。从前58年到前56年，克拉苏的幼子普布利乌斯也在恺撒的军队中，他热衷于文学和哲学，因此和西塞罗过从甚密。克拉苏把儿子交给恺撒，说明两人的关系仍然非常亲密，不需要缔结婚姻来巩固盟约。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当时二十五六岁，后来被证明是一位勇敢而有天赋的军人。他在高卢战争初期是骑兵指挥官，次年晋升为军团长。另一位从战役伊始便在恺撒麾下效力的青年才俊是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的母亲塞姆普罗尼娅卷入了喀提林阴谋，因而臭名昭著。恺撒幕僚中还有一名财务官，但我们不清楚他的身份。[17]

恺撒的军团长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对而言出身低微、默默无闻。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和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出身于名门望族（布鲁图斯的地位比克拉苏低一些），他们的父亲都当过执政官。拉比埃努斯是个“新人”，此前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就是保民官，瓦提尼乌斯也是如此。科塔的家族已经好几代没有出过大人物了，而萨比努斯和其他几名军官的背景更加平淡无奇。总的来讲，门阀贵族（尤其是那些在苏拉治下及后来混得不错的家族）的成员都不愿意到恺撒麾下效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庞培剿灭海盗的时候，其麾下的军团长可谓群

英荟萃。在高卢的绝大多数军团长似乎都希望恢复或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后来其中不少人果然飞黄腾达。许多级别更低的军官可能也是这样。在对前58年的记述中，恺撒写道："军事保民官、各级指挥官和其他人追随恺撒离开城市，争取他的友谊，但他们没有多少军事经验。"在前58年，地位已经稳固的人不需要和恺撒结交。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一位如此伟大的统帅，毕竟他完全可能在高卢山区战败身死。人们也许会猜到，恺撒不管取得怎样的成功，或许都会慷慨大方，因为他在这方面已经名声在外。与恺撒结交是一场赌博，一般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才出此下策。据我们所知，恺撒似乎是来者不拒，像以往一样，热衷于卖人情给别人，让更多人对他感恩戴德。[18]

恺撒的高级军官是他自己挑选的，但他即将指挥的军队是现成的。伊利里库姆和内外高卢加起来一共有4个军团的驻军，分别是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军团。我们不知道这几个军团是在何时组建、由何人组建的；它们可能是在几年前建立，已经打过一些仗。在这个时期，1个军团的纸面兵力是略少于5000人，但正如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所有军队一样，作战中的部队往往缺编严重。内战期间，恺撒某个军团的可动兵员竟然只有1000人。各军团没有永久性的指挥官，但其最高级军官是6名军事保民官，他们通常出身于骑士阶层。有的军事保民官是尚未进入元老院的年轻贵族，有的则是半职业军官，他们会在多个军团中谋求职务。每年由罗马人民选举产生24名军事保民官，根据传统这24人将被分配到2个军团，历史上的常规是每位执政官指挥1个军团。恺撒自己就曾当选为军事保民官，但现在军团的数量太多，选举产生的24名军事保民官远远不够。恺撒的大多数军事保民官都是由他任命的，尽管其中有些人可能之前就在这4个军团中。《战记》中从来没有提及有军事保民官实际指挥着1个军团，恺撒通常将这样的任务交给他的军团长和财务官。但军事保民官显然有着重要的参谋和行政职责，可以指挥相当大的军事单位。[19]

军事保民官之下是百夫长。百夫长实际上是一个等级，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衔。1个军团里有60名百夫长。每位百夫长指挥一个80人的百人队（“百夫”实际上指的可能仅仅是大约100人），6个百人队组成一个480人的大队，大队就是军队的基本战术单位。尽管史料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最资深的6名百夫长很可能在战斗中可以指挥其所在的整个大队。1个军团有10个大队，第一大队的威望比其他大队的要高，因为它负责保护整个军团的银质或镀金鹰旗。第一大队的百夫长威望极高，他们和能够指挥其他大队的百夫长们组成了所谓的“第一级百夫长”，常常有权参加指挥官会议。百夫长常被描绘为“军士长”，被认为是只有长期服役才能得到晋升的两鬓如霜的老兵，但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很少。恺撒在整部《战记》中不曾提到有普通士兵晋升为百夫长，但他也没有讲到百夫长们的来源，或许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读者都知道，所以不必赘述。很多人可能是被直接任命为百夫长的，我们知道这在帝国时期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骑士也以这种方式从军。百夫长具有重要的行政职能，需要具备识文断字、精于算数的能力，普通士兵很少符合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肯定，百夫长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上要远远优于普通士兵，因为他们的军饷是普通士兵的好几倍或许高达十倍。大多数百夫长可能来自比较富裕的阶级，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则来自贫困阶层。如果是这样的话，百夫长在《战记》中的突出地位就显得尤为有趣。百夫长很可能来自在百人会议的投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第一等级。对恺撒这样一位指挥官来说，百夫长的任命和随后的晋升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而是要与决定罗马社会的门客提携制度相符合。但与更高级别的军官相比，百夫长的确会随军较长时间，他们实质上是职业军官。[20]

早先罗马军团的兵员来自社会的一个横断面，排除了全部没有足够财产以自备武器装备的人。但这已经是遥远过去的事情了。马略公开征募最底层贫民，他们穷困潦倒，只是人口普查中的数字而已。但马略这么做，可能仅仅是顺应了业已出现的趋势。现在家境优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参军已经不感兴趣。军纪极其严酷，鞭笞是家常便饭，而更严

重的渎职则要判处死刑。一名军团士兵的年薪是125迪纳厄斯（500塞斯特尔提乌斯）——这个数字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恺撒欠的债务究竟有多高——还不及农场劳工的薪水。不过吃军饷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稳定。穷苦公民将从军看作一种可供选择的职业，或者是改善生活的渠道。一位将军如果赏赐起来慷慨大方或许诺为老兵们搞到土地的话，就能赢得士兵们至死不渝的忠诚，马略、苏拉和庞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百夫长常常从一个军团调到另一个，但我们没听说过普通士兵也会这么做。军团士兵们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但我们不知道兵役的时间一般有多长。后来的奥古斯都规定兵役为十六年，此后又延长至二十年，如果继续服役五年就算是老兵，可以免除一些职责和杂役。军团就是他们的家，比较好的军团会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自豪感。每个军团还包括很多具有专业技能的人，他们会训练其他人。军团中没有特种单位，也没有专门的工兵或攻城兵单位，只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比如需要建造桥梁或攻打一座城镇时，专业人员才会从各个大队抽调出来。这个时期的罗马军队特别擅长工程技术。

罗马军团的士兵是重步兵，以密集队形作战，但在恺撒时代，罗马军团士兵的外形与好莱坞传播的经典形象和电视纪录片中重演历史的演员大不相同。著名的绑结加强甲或分段甲可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为已知最早的胸背甲碎片源自公元9年（但是在发现这个碎片之前，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胸背甲是在1世纪中叶出现的，所以说不定在恺撒的时代已经有了这种胸背甲）。罗马军团士兵穿的是链甲，头戴青铜头盔，有时是铁盔。罗马头盔会让人的眼睛和耳朵露在外面，但宽阔的护颊可以为面部的其他部分提供一定的防护。早先希腊军队有时使用的封闭式头盔具备更好的防护力，但罗马军团士兵需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对上级的命令做出及时反应，所以配备了使眼睛和耳朵露在外面的头盔。半圆柱形的大型盾牌能够提供较多防护。这种盾牌高约4英尺，宽约2英尺～2英尺6英寸，正面可能是椭圆形的，不过经典的“好莱坞式”罗马军团士兵的矩形瓦状盾牌可能也已经使用了。罗马军队的盾牌上很可能已

经有标志性的符号：要么是绘制的，要么是凸起的装饰物，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盾牌是用三层木板胶合而成的，覆盖小牛皮，边缘有青铜绲边保护。这种盾牌很灵活，防护力不错，但重约22磅。盾牌中央饰钉的背面有一个水平的握柄，士兵在战斗中可以借助它来举起盾牌。盾牌也可被用于攻击，士兵可以将盾牌饰钉往前猛推，以将敌人推倒。

军团士兵的主要武器是标枪和短剑。标枪的木柄长4英尺，前端有2～3英尺长的狭窄铁柄，最前端是金字塔形的小枪尖。投掷出去之后，标枪的全部重量集中在小枪尖上，使它足以穿透敌人的盾牌，而细长的铁柄使它具有足够的攻击范围，能够继续飞行、杀伤敌人。与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不同的是，标枪的金属不会弯曲。到1世纪，罗马军团士兵的短剑较短，剑刃的长度一般不到2英尺。但在恺撒时代，短剑较长，至少有2英尺6英寸长，有时甚至更长。剑刃较重，由高质量的钢制成，既可以劈砍也可以刺杀；剑尖较长，很适合穿透铠甲和皮肉。罗马军团士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战士，但罗马军队的强大威力在于严明的纪律和指挥结构，使集体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21]

罗马军队的辅助单位主要依赖外国士兵，他们被称为辅助部队。其中很多人是在当地征募的盟邦居民，恺撒征召了大量高卢诸部落的人，尤其是吸收他们的骑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辅助部队由各自的酋长指挥，但至少有一些高卢人曾在由罗马军官指挥的单位里服役，可能接受过罗马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在《内战记》中，恺撒提到在前49年，他拥有“3000名骑兵，这支部队在他过去的所有战役中一直追随他”。他还告诉我们，他有5000名辅助步兵，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步兵是不是也从前58年起一直为他效力。《高卢战记》中没有具体提到辅助骑兵或步兵，他们可能是盟军、雇佣兵或正规军（就像后来帝国时期有组织的常备辅助部队一样）。恺撒提到了一些特种单位，包括克里特和努米底亚弓箭手，以及来自巴利阿里群岛[22]的投石手[23]。克里特人和巴利阿里人分

别凭借娴熟的弓箭和投石本领而闻名遐迩，几个世纪以来长期作为雇佣兵南征北战。努米底亚人最有名的是轻骑兵，恺撒麾下或许也有一些努米底亚轻骑兵。恺撒书中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麾下还有一些西班牙骑兵。盟军士兵的数量年年有所浮动，但职业雇佣兵和辅助兵的总兵力可能更稳定一些。盟军部队的兵力有时会比罗马军团强大不少，但恺撒军队的骨干始终是罗马军团。[24]

“整个高卢分为……”

前58年，恺撒兵锋将指向何处，并不显而易见。起初元老院授予他的行省是内高卢和伊利里库姆，后来由于外高卢总督突然去世，才将外高卢也交给他。恺撒最初的打算很可能是讨伐巴尔干，可能是为了遏制正在扩张的达契亚国王布雷比斯塔的势力。布雷比斯塔正在其腹地（位于今天的特兰西瓦尼亚）周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达契亚地区很富庶，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罗马军队涉足此地，因此若是能征服达契亚，打败一个罗马人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民族，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可能在前58年和之后的岁月里始终在筹划攻打巴尔干，但在高卢军事冒险的机遇纷至沓来，所以巴尔干远征始终未能成行。尽管如此，恺撒一直对达契亚念念不忘，他在前44年遇刺前还在计划进攻达契亚。[25]

在公元前1世纪，高卢包括现代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一部分，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海岸。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高卢都算不上一个国家。正如恺撒在《高卢战记》开篇所说（这句话已经成为经典名句），高卢居民分成三个民族和语言群体。在高卢西南方毗邻比利牛斯山的地方，居住着阿基坦人，恺撒认为阿基坦人与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多有相似之处。北方，尤其是东北方，生活着比利时人。而高卢中部的居民被罗马人称为“高卢人”，他们自称为凯尔特人。这三个大群体各自分为不计其数的部族，他们尽管语言和文化相近，却往往互相敌对。基本的政治单位是氏族，而若干个氏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部落（“氏

族”和“部落”这两个词不是非常准确，有些学者会用“国家”来取代“部落”，但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在恺撒抵达高卢前的一个世纪里，部落的重要性似乎大大增加，有些学者认为部落是近期形成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松散的亲缘和宗教关系已有悠久历史，但高卢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进而给这种关系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即便如此，各部落内部的几个氏族之间的团结程度还是会差别很大；在高卢战争期间，有时同一个部落内的几个氏族会各自独立行动。有些部落出现了君主或者在氏族这个层级就有君主，但有些部落则没有。大多数部落由议事会或长老会议治理，日常政务则被交给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罗马最古老的盟友埃杜依人的最高行政长官被称为大酋长，任期一年。每个人一生中至多担任一届大酋长，而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他的任何亲戚都不得担任大酋长，这就能够阻止个人或群体专权。这种理想体制与罗马共和国体制极其相似。高卢诸部落在很多方面与地中海世界的城邦很像，尽管处于一个较早的发展阶段。[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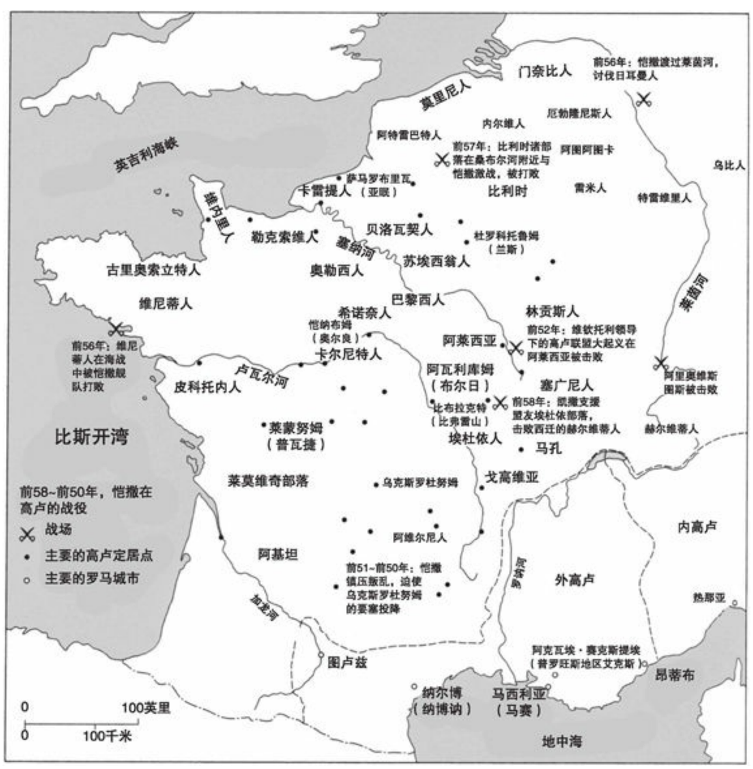


图3 高卢及其各部落

高卢人和其他说“凯尔特”语言的部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同一个民族，并拥有大体上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这是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不必考虑这个问题。恺撒注意到高卢各部落之间既有相似，也有差异，但在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将莱茵河描绘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界线，但他也承认事实上不是这样泾渭分明，有些日耳曼群体在莱茵河西岸已经定居多年。考古学并不支持如此清晰的分野，而是指出高卢和日耳曼中部的定居模式和物质文化（陶器、金属制品等）有极强的相似性。日耳曼中部/南部地区和北部的差别倒是很大，北部的设防定居点极少。但是，如果以此为由驳斥恺撒和其他古代作家的说法，那就错了；因为考古学往往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很难揭示种族和政治边界。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差别很大，这两个大类当中无疑还有极多的方言和地区差异。日耳曼语部落定居点的规模和布局可能与高卢居民相似，使用器物的形状和风格可能也相似。但这两个群体互相并不认为是亲戚关系，而仍然视对方为外国人。他们更有可能将讲相同或类似语言、以相似的方式尊崇相同神祇、在自己周边长期居住的人视为亲族。但是，即便是有亲缘关系的两个群体，互相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而血缘较为疏远的群体之间也可能和平相处。高卢人或日耳曼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个人对所谓的民族没有什么归属感和忠诚，反而与部落和氏族以及它们内部的家庭、邻居或酋长的联系更为紧密。[27]

高卢诸部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接触有着悠久的历史，二者间常常发生战争。前390年，一群高卢人洗劫了罗马，而其他一些部落则占领了波河河谷，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罗马人也开始向波河河谷殖民，于是和当地的高卢人发生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于前2世纪末结束，罗马人征服和吸纳了当地的高卢诸部落。前125年前后，为了开辟一条通往西班牙各行省的安全的陆路通道，罗马人开始征服外高卢。参与这些军事行动的资深执政官中有一位叫作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就是尼禄皇帝的先祖。一位同时代的人对他的描述

是“面如铁，心如铅”，据说曾骑在大象背上，令高卢部落为之震撼。但他最持久的遗产是多米提乌斯大道，即通往西班牙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道。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迁徙的时期，外高卢是血雨腥风的战场；但在恺撒抵达之前，罗马人在高卢不再有集中力量的扩张。罗马人在高卢巩固自己的势力，建造了一些设防的前哨据点，并于前118年在纳尔博（现代的纳博讷）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随着意大利本土大庄园的产品大规模地涌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纳尔博很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葡萄酒是主要的产品，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些用于运输葡萄酒的双耳瓶的碎片，可以借此追踪当时的葡萄酒贸易。市场上流通的葡萄酒的数量非常惊人，一位学者估计在前1世纪，有约4000万瓶葡萄酒在高卢进行交易。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太低了。每个双耳瓶一般是3英尺～3英尺6英寸高，容量为35～45品脱。主要的贸易路线是沿着罗讷河-索恩河流域；或者向西取道奥德河和加龙河，通往大西洋海岸。罗马商人出售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收购原材料，包括来自不列颠西南部的锡以及最重要的货物——奴隶。有史料称，一位高卢酋长愿意用一名奴隶交换一双耳瓶的葡萄酒。这可能是个误会，因为根据高卢人的风俗习惯，东道主有义务用高价值的货物交换客人的低价值货物，以此夸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即便如此，这个故事也印证了葡萄酒对高卢贵族的重要性。葡萄酒贸易的部分活动可能是由当地的掮客进行的，但罗马商人在高卢的很多地区一定是很常见的。这个时期对罗马人来说是商业蓬勃发展、机遇极好的时期，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为了赚钱，深入到罗马军队不曾涉足的远方。在诺里库姆[28]的一个地方，到前1世纪初，罗马人在当地人的城镇之外建了一个贸易社区和自己的小广场。[29]

与罗马世界的贸易促进了许多高卢部落的中央集权化。前2世纪末和前1世纪，高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些有围墙的大型城镇，恺撒称之为市镇，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词。很多部落已经在铸造具有标准尺寸和重量、以希腊化钱币为蓝本的钱币，这说明远途贸易很常见。有些遗址显示出大规模生产活动的迹象，并且是根据有组织的计划来布局的。

前124年左右，在征服外高卢期间，罗马人攻占了一座叫作昂特勒蒙的山顶城镇。昂特勒蒙是用石料建造的，风格非常像希腊城镇。但这种文化的影响不算特别大，因为即便是希腊化风格的圣所内部也会有壁龛，用于盛放敌人的首级。位于主要贸易路线沿途的社区从贸易中获利最大，其城镇规模也比较大。阿维尔尼人居住在向西的贸易路线上，而罗讷河-索恩河流域则是埃杜依人和塞广尼人争夺的对象。埃杜依人的主要城镇是比布拉克特（今天的比弗雷），城墙内的面积是135公顷，出土了数量极大的葡萄酒双耳瓶。这样的城镇一般是部落政府的中心，但始终没有起到希腊和罗马城市那样的核心作用。以农村为势力范围的领袖们仍然能够主宰自己的部落。[30]

说到底，高卢的所有部落多多少少都是贵族政体。普通百姓依附于强大的酋长，与其联系紧密。在恺撒眼里，高卢的普通百姓比奴隶强不了多少。他将高卢的贵族分为骑士和祭司（即德鲁伊）。这两个群体并非来自固定的种姓，一个家庭的成员中可能既有德鲁伊，也有骑士。德鲁伊不会打仗，他们的权力源自他们接受的多年训练，他们是宗教、法律和部落习俗方面的专家。恺撒说，德鲁伊刻意不将自己的信仰书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依赖文字就会削弱记忆力，也就可能损害他们的权威。因此，我们对德鲁伊信仰知之甚少，在历史上人们往往用浪漫的想象来填补这个真空。当时的希腊哲学家喜欢把德鲁伊看作原始的斯多葛派，而恺撒确实说过德鲁伊相信灵魂不死。按照恺撒的说法，这种信仰鼓励高卢战士们在战斗中视死如归。每年一次，高卢大部分地区的德鲁伊会聚集在卡尔尼特人领地内的一座圣所，但德鲁伊作为一方势力将各部落联合起来的本领是极其有限的。德鲁伊还可以主持献祭，对部落成员的一种惩罚就是禁止他们参加这类仪式。献祭的形式五花八门，但恺撒和其他古代史料都坚持认为，高卢人有时会用活人献祭。恺撒说，高卢人将很多人——通常是罪犯或敌人，但如果没有罪犯或敌人，就用其他人来充数——塞进很大的柳条架，然后将其点燃。有些学者认为，这纯粹是希腊和罗马人的宣传；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在辛布里人威胁意大

利的时候，罗马人自己也曾向神祇献祭活人，而且罗马元老院直到前97年才禁止人祭。罗马社会乐于观看竞技场中的杀戮，以此为乐，却不敢杀人来祭奠宗教。考古记录无法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高卢诸部落存在普遍的人祭现象，尽管人祭现象在日耳曼和布立吞民族[31]中确实存在。但我们可以确定，高卢的很多仪式的确会使用人的肢体器官，但我们无法明确判断这些是不是通过人祭得来的。另外，猎取人头在高卢战士当中是很常见的行为，在北欧许多民族中可能都是如此。昂特勒蒙的圣所以及罗克佩尔蒂斯附近的类似圣所，都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32]斯特拉波[33]告诉我们：

> 他们（高卢人）结束战斗后，将敌人的首级悬挂在自己马匹的脖子上，带回家后将人头钉在家门口。波希多尼说他自己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景象，起初对它非常憎恶，但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可以冷静地对待了。至于名望较高的敌人的首级，他们会用雪松油对其做防腐处理，展示给外邦人看。即便敌人为了赎回这些首级，愿意支付与人头等重的黄金，高卢人也不肯同意。[34]

波希多尼是个希腊哲学家，于前1世纪早期在高卢南部游历，为他的民族学研究搜集资料。他后来定居在罗马，恺撒很可能见过他。前1世纪中叶的一枚高卢钱币上的图像是一名武士一只手拿着一个人头。考古学家还在昂克尔河畔里布蒙发现了一个恐怖的纪念物：许多武士和一些马的尸体被钉在一个木制结构上，笔直地立着。这些人的脑袋全都没有了，我们不清楚他们究竟是被打败的敌人，还是人祭的牺牲品。恺撒曾提到，高卢人会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堆成一座小丘，奉献给神祇；这种小丘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因为高卢人尊重这种仪式，不敢从小丘上偷窃任何东西。他还说在他抵达高卢之前，各部落“几乎每年都会打仗，要么是肆意攻击，要么是打退这样的攻击”。斯特拉波将整个高卢种族描述为“醉心于战争，以致癫狂”；我们也可以确定，骑士是一个军人贵族阶层。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取决于他豢养了多少忠于他的武士。一位领主麾下私人武装的实力和名望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令部落内部或外部的敌人不敢攻击他，也不敢冒犯忠于这位领主并受他保护

的群体。[35]

高卢的武装冲突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的袭击劫掠，但部落间战争的规模有时会很大，比如埃杜依人和塞广尼人为了争夺罗讷河-索恩河流域的贸易路线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与地中海世界贸易往来的增多未必是高卢诸部落好战的原因，但肯定促使了更多战争的爆发。涌入高卢的商品主要是进入贵族市场。宴饮能将酋长和武士们紧密联系起来，葡萄酒在这种宴饮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奢侈商品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地位，或者可以作为贵重礼物赏赐给忠实的追随者。贸易路线沿途的部落能够大量获取这些商品，也可能征收过路费，而大部分的利润都被贵族收走：他们有了财富才能供养更多的武士。如果要吸引著名的武士投奔自己，并长期供养他们，领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富，还需要崇高的军事威望。成功的劫掠是获得威望的最好办法之一，获取战利品也是。领主可以将部分战利品赏赐给追随者，以巩固他们对领主的忠诚。为了控制贸易路线，有些领袖乃至整个部落，不惜动用武力。另外，奴隶（酋长们似乎会用奴隶交换葡萄酒）的来源之一便是掳掠人口。拥有大批武士的贵族常常会用这支武装力量对付自己部落的敌人，但他也可能受到诱惑，利用这支力量去争夺部落内部的权力。高卢中部的部落大多已经不再有国王，甚至在其他地区，国王的权力也很有限，但君主制或绝对权力的梦想仍然诱惑着许多强大的领袖。部落机构、行政长官和长老议事会往往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约这些野心勃勃的人。[36]

与罗马军团截然相反的是，高卢的军队都是非常笨拙的，极少有足够的后勤能力，因此无法长时间作战，指挥官们也很难调动人马。武士们作为单兵都很勇猛，但除了大贵族的私人武装之外，极少受过集体的操练或训练，因此格外强调个人的猛力。追随强大酋长的半职业化武士的人数相对较少，虽足以开展劫掠行动，但顶多只能算是部落军队的小小内核，军队的大部分人还是能够自备武器的普通人。罗马人的链甲和最普通的头盔在设计上可能模仿了高卢人的装备，但罗马的装备生产数

量远远超过高卢人。罗马的每一位军团士兵都拥有剑、盾牌、胸背甲和头盔；但在高卢，只有富人和部分半职业武士，才可能拥有全副装备。绝大多数武士在作战时唯一的防具就是盾牌。高卢的剑相当普及，但一般比罗马剑更长（罗马剑其实是模仿西班牙的设计），而且更多用来劈砍，而不是刺杀。大多数部落都会养马，这种马的尺寸比大部分现代骑乘马都小，但质量很高。高卢骑兵闻名遐迩，罗马职业化军队中的骑兵在装备、训练和术语等很多方面都以高卢骑兵为模板。高卢部落的骑兵基本都是比较富裕的武士，他们虽然在冲锋时杀伤力很强，但往往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执行巡逻这样的重要任务。[37]

恺撒抵达高卢的时候，高卢的时局恰好非常动荡。罗马的外高卢行省还没有从阿洛布罗基人的叛乱中恢复元气。前63年，阿洛布罗基人曾帮助西塞罗镇压喀提林集团，但没有得到回报，于是揭竿而起。阿洛布罗基人的叛乱于前60年被镇压下去，但是埃杜依人与塞广尼人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事态严峻，因为它影响了行省的稳定、减少了贸易的利润。埃杜依人与塞广尼人都是罗马的盟友，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都愿意寻求外界的帮助。前71年前后，塞广尼人向日耳曼人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求援。大约十年之后，阿里奥维斯图斯大败埃杜依人，杀死了埃杜依人的许多主要贵族。为了报答阿里奥维斯图斯，塞广尼人给了他一些土地，以便安置他的追随者。不久之后，赫尔维蒂人（来自今天的瑞士）也开始袭击埃杜依人。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位叫作狄维契阿库斯的德鲁伊（他曾担任大酋长）来到罗马求助。元老院派遣了一个使团到该地区，但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前59年，也就是恺撒当执政官期间，元老院承认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国王地位和“罗马人民之友”。这项外交政策给外高卢边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我们必须强调，恺撒进入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高卢各部落以及部落内部的力量平衡不断发生变化。高卢诸部落绝不会只甘于做受害者，被动地等待罗马帝国主义者的屠戮。但他们的确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而恺撒将无情地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38]

[1]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268年～前208年），五次当选执政官，是高卢战争（前225年）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年～前201年，对手是汉尼拔）的名将和英雄，曾与敌军领袖单挑并将其杀死，获得了罗马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征服了叙拉古城，发明家阿基米德就死在那场战役中。

[2] Pliny，*NH* 7.92.

[3] 希尔提乌斯的前言，*BG* 8。

[4] 达契亚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乌克兰的一小部分。达契亚人是色雷斯人的一支。公元前82年～公元106年，此地存在一个一度非常强盛的达契亚王国，后被罗马征服。

[5] 帕提亚帝国，中国古书称为安息，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统治波斯，与罗马长期对抗，后在内乱中被萨珊王朝取代。

[6] Pliny，*NH* 7.92，Appian，*BC* 2.150.

[7] 关于狄奥法内斯，见Cicero，*pro Archia* 24；关于恺撒的早期作品，见Suetonius，*Caesar* 56.5-7；关于《战记》的一般问题，见K.Welch & A.Powell （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8] Cicero，*Brutus* 262.

[9] “演说家应当避免……”，见Gellius，*NA* 1.10.4；另见L.Hall，‘Ratio and Romanitas in the Bellum Gallicum’，in Welch & Powell （1998），pp.11-43，esp.p.23。

[10] 关于《战记》的成书时间，见M.Gelzer，*Caesar* （1968），pp.170-172，C.Meier，*Caesar* （1996），pp.254-264；主张《战记》逐年成书的论据，见Welch & Powell （1998），P.Wiseman，‘The Publication of the *De Bello Gallico* ’，pp.1-9，T.Rice Holmes，*Caesar’s Conquest of Gaul* （1911），pp.202-209；另见also Hirtius，*BG* 8 preface and Suetonius，*Caesar* 56.3-4。

[11] Cicero，*de Finibus* 5.52；see also Wiseman （1998），esp.pp.4-7.

[12] Suetonius，*Caesar* 56.4.

[13] Cicero，*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3.5，*ad Quintum Fratrem 2* .14-16，3.1-9.

[14] 关于拉比埃努斯，见R.Syme，‘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JRS* 28 （1938），pp.113-128，esp.p.120 以及 W.Tyrrell，‘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Historia* 21 （1972），pp.424-440。

[15] 今天意大利西海岸的一座滨海城市，在阿庇乌斯大道沿途。

[16] 盖乌斯·彭普提努斯于前61年打败了叛乱的阿洛布罗基人。

[17] 关于科塔的著作，见Cicero，*ad Att.* 13.44.3，cf.Athenaeus 273b and Hall（1998），pp.11-43，esp.p.25；关于恺撒的军团长们的身份，见Broughton，*MRR* 2，pp.197-199。

[18] Caesar，*BG* 1.39；Cicero，*ad Att.* 2.18.3，19.5，*de provincii sconsularibus* 41；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pp.112-116.

[19] For Caesar's legions see H.Parker，*The Roman Legions* （1957），pp.47-71，esp.55-56.关于这一时期的军队，见F.Adcock，*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1940），P.Brunt，*Italian Manpower*，*225 BC-AD 14* （1971），P.Connolly，*Greece and Rome at War* （1981），M.Feugere （ed.），*L'équipment Militaireet L'Armement de la République.JRMES* 8 （1997），E.Gabba，*The Roman Republic*，*the Army and the Allies* （1976），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Y.Le Bohec，*The Imperial Roman Army* （1994），J.Harmand，*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ôtre ère* （1967）。

[20] 对这个问题的介绍及更多资料，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31-32。

[21] 关于装备，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83-84，209-219，M.Bishop & J.Coulston，*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1993），Connolly（1981），and Feugere（1997）。

[22] 巴利阿里群岛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以东，著名的旅游胜地马略卡岛就属于这个群岛。

[23] 投石手用的是一种叫作机弦（也叫投石带、撂抛子）的兵器，由一个兜子和两端连接的绳子组成。使用时，把石块或土块放在兜子里面，一根绳子末端固定在手上，另一根绳子末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然后甩动兜子，在适当的时刻松开拇指和食指，石子或者土块就会沿切线飞出，这样可以比人用手扔石头远得多。经过一定的训练，士兵可以将石子或者土块准确地击向目标。历史上机弦被用于打猎、战斗、放牧等。《圣经》里，大卫就是用机弦投石击倒巨人歌利亚的。《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记载："大卫用机弦将石子击中歌利亚的额头，歌利亚就扑倒，面伏于地。大卫将歌利亚的刀从鞘中拔出来，割了他的头，将他杀死。"

[24] 参考D.Saddingt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 （1982）；关于辅助骑兵和步兵的数量，见Caesar，*BC* 1.39。

[25] 讨论详见C.Goudineau，*César et la Gaule* （1995），pp.130-148。

[26] Caesar，*BG* 1.1，6.11-20；对高卢社会的介绍，见N.Roymans，*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ingula* （1990），esp.pp.17-47，and 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esp.pp.38-58，80-105。

[27] See M.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 （1987），pp.11-13，*The Early Germans* （1992），pp.8-13，C.M.Wells，*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pp.14-31，and most recently the useful survey in P.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Empire* （1999）.

[28] 诺里库姆相当于今天奥地利的大部分和斯洛文尼亚的一小部分地区。

[29] 关于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见Suetonius，*Nero* 2；关于用双耳瓶换一个奴隶，见Diodorus Siculus 5.26.3-4；关于高卢人和罗马人的关系和外高卢历史，见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pp.126-173；关于葡萄酒贸易，见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esp，59-105，esp.p.74，和Roymans （1990），pp.147-167 and A.Tchernia，'Italian Wine in Gau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in P.Garnsey，K.Hopkins & C.Whittaker （eds.），*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1983），pp.87-104。

[30] Wells （1999），pp.49-78，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esp，pp.48-49，86-87，96-97，132-134，Dyson （1985），pp.137-139，154，and C.Goudineau （1995），pp.141-143.

[31] 布立吞人是在铁器时代、罗马时代和之后的一段时期生活在今天的不列颠的一些凯尔特族群。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定居不列颠后，布立吞人要么被同化吸收，成为后来的"英格兰人"的一部分；要么退居到威尔士、康沃尔、苏格兰等地，也有的迁徙到今天法国的布列塔尼。

[32] 关于罗马的人祭，见Pliny，*NH* 30.12-13；关于猎头，见Polybius 3.67，Livy 10.26，23.24，Diodorus Siculus 5.29.2-5，M.Green，关于日耳曼的人祭，见Todd （1992），pp.112-115。

[33] 斯特拉波（公元前64年或前63年～公元23年），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生于现在土耳其的阿马西亚（当时属于罗马帝国），著有《地理学》十七卷。

[34] Strabo，*Geog.* 4.4.5［Loeb translation by H.Jones （1923），p.247］.

[35] Caesar，*BG* 6.15，cf.Strabo，*Geog.* 4.4.2；on Ribemont-sur-Ancre see T.Derks，*Gods*，*Temples and Ritual Practices*：*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and Values in Roman Gaul* （1998），p.48，234-5.

[36] Caesar，*BG* 1.18，31-33；see also Dyson （1985），pp.169-170，B.Cunliffe，*Greeks*，

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esp，p.94，118.

[37] 关于高卢军队的更详细介绍，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53-60。

[38] Dyson （1985），pp.168-171；Caesar，*BG* 1.36，40，44，Cicero，*ad Att.* 1.19，20.

十 移民与雇佣兵：最初的军事行动，前58年

> 目前，在罗马，对高卢爆发战争的恐惧是人们的主要话题；因为“我们的兄弟”埃杜依人刚刚吃了败仗，而赫尔维蒂人无疑在磨刀霍霍，准备袭击我们的行省。
>
> ——西塞罗，前60年3月15日 [1]

前58年3月28日，一个被称为赫尔维蒂人的部族开始在日内瓦湖附近的罗讷河两岸聚集。据说参加迁徙的人多达36.8万人，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作战年龄的男子，剩余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希望离开自己的家园（在今天的瑞士），前往高卢西海岸，寻找新的更广袤和肥沃的土地定居下来。他们的迁徙路线直接穿过罗马的外高卢行省。这个月早些时候，恺撒得知了赫尔维蒂人即将迁徙的消息，于是加紧奔向自己的行省。在此之前，他一直待在罗马城外，密切关注元老院和广场的政治斗争。赫尔维蒂人希望通过最便捷的路途横穿外高卢，到达自己的目的地。恺撒庞大行省的最北部边境遭到了威胁；而作为总督，在自己的辖区出现危机的时候仍然逗留在罗马城外，必定会遭到民意谴责。为了获得这个职位，恺撒已经冒了许多风险，现在绝不能出错。他火速北上，其速度之快，令同时代人咂舌。他每天平均前进90里，8天后就到了罗讷河。危机也可能是机遇。[2]

赫尔维蒂人的迁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多年的筹划。迁徙计划的始作俑者是奥尔吉托利科斯（恺撒将他描述为赫尔维蒂部落中“最高贵、最富有的人”），但他似乎也是利用了赫尔维蒂部落中已经存在的怨恨。赫尔维蒂人是个人口众多、尚武好战的民族，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家园太小，四面都受到限制：崇山峻岭、罗讷河以西的罗马行省和东面的莱茵河。“局势如此，他们的活动空间很小，也很少有机会向邻居开战；他们是一个渴望战争的民族，因此感到非常沮丧。”[3] 打家

劫舍在高卢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赫尔维蒂人渴求的就是能够更自由、更便利地发动劫掠袭击。但恺撒声称，奥尔吉托利科斯还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即他相信以此为理由将部落团结起来，有助于自立为王。赫尔维蒂人和其他许多部落一样，已经不再是君主制政体，而是由酋长们的议事会以及选举产生的领袖或行政长官来统治。奥尔吉托利科斯已经笼络了其他很多贵族，显然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一时期铸造的钱币上有他的名字，不过拼写为ORCIITIRIX。在部落领袖们的认可下，他受命开展外交活动，访问其他部落，为迁徙做准备。他发现与个别酋长打交道，要比拉拢行政长官或部落议事会容易得多。他争取到了塞广尼酋长卡斯提库斯和埃杜依酋长杜诺列克斯的支持。这两个部落控制着高卢中部，赫尔维蒂人在西进途中会通过他们的领地或其附近地区。塞广尼人和埃杜依人的支持，或者哪怕仅仅是不干预，都会让赫尔维蒂人的迁徙轻松许多，并有助于他们在目的地安顿下来。奥尔吉托利科斯怂恿卡斯提库斯和杜诺列克斯在各自部落内谋求最高王权，并极可能向他们许诺等赫尔维蒂人迁徙结束后，可以为其提供武士以示支持。卡斯提库斯的父亲事实上曾是塞广尼人的唯一统治者，还被罗马元老院正式称颂为“罗马人民之友”。杜诺列克斯是德鲁伊狄维契阿库斯的弟弟，在部落中一呼百应。三位领袖秘密地庄严宣誓（秘密起誓在罗马人看来总是非常邪恶的事情），约定彼此鼎力相助，共图霸业。杜诺列克斯还娶了奥尔吉托利科斯的女儿。杜诺列克斯喜欢通过婚姻来缔结盟约，他的母亲被嫁给了比图里吉人的领袖，他的同父异母妹妹和其他的女性亲属被嫁给了周边许多部落的酋长。这三位领袖将会统治高卢中部最强大的三个部落，他们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们。[4]

赫尔维蒂人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完善。他们的领袖判断至少需要两年——前60年和前59年——才能做好出征的准备。他们征集了作为役畜的牛群（有些显然是从邻居那里抢来的），并种植了尽可能多的谷物，以便获得足够多的剩余粮食来维持他们的迁徙。罗马元老院收到了关于赫尔维蒂人计划的令人忧心的报告，这些消息无疑来自各部落中亲罗马

的领袖以及外高卢总督。前60年，元老院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高卢，其中包括熟悉该地区和在各部落有亲戚关系的人。罗马人似乎与日耳曼人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取得了联系，他曾受邀进入高卢帮助塞广尼人打击其对手，但此时已经率领他的武士及其家人在塞广尼部落的一大片土地上定居下来。除此之外，我们对罗马代表团的活动知之甚少，但局势似乎很快就转为对罗马有利。尽管奥尔吉托利科斯取得了外交成功，但赫尔维蒂的其他贵族得知了他的野心，于是将他送上法庭，指控他企图建立暴政。此项罪名一旦成立，被告就会被活活烧死，于是奥尔吉托利科斯决定对其他领袖加以威吓。在他预定受审的那天，他带来了武士、臣属和所有依附于他的部落成员（有的是出于社会义务，有的是因为欠债）。他控制的兵力超过了1万人，差不多是赫尔维蒂人全部兵力的八分之一。这将是羽翼初生的国家机构与传统的部落领导模式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办法对奥尔吉托利科斯进行审判，但其他领袖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很快开始全面征集部落武装，准备一劳永逸地将奥尔吉托利科斯消灭掉。但在内战爆发之前，奥尔吉托利科斯突然死去了，有传言说他是自杀的。尽管他死了，迁徙的准备工作仍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的死亡并没有影响赫尔维蒂部落实施计划的决心。罗马人或许没有认识到，尽管迁徙计划背后的领导人已经死了，但计划本身仍然在继续进行。前60年5月，西塞罗觉得高卢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已经消失，这让执政官梅特卢斯·凯列尔很不高兴，因为他即将到外高卢担任总督。[5]

以上就是恺撒对赫尔维蒂人迁徙原因的解释，即该部落渴求更多劫掠的机遇，以及奥尔吉托利科斯个人的野心勃勃。并不是所有学者对恺撒的话全盘接受，许多学者指出恺撒隐匿了真相，以便为自己随后的行动辩护。例如，学者们指出，《战记》没有提到日耳曼人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他曾帮助塞广尼人作战，后来定居在他们的土地上。从这可以推测出，赫尔维蒂人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另一个部落（埃杜依人）打败阿里奥维斯图斯和他的日耳曼人。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这位日耳曼领袖

被元老院授予“罗马人民之友”的称号。那些热衷于阴谋论的人说，恺撒在前58年若是要对付赫尔维蒂人，就需要阿里奥维斯图斯的中立甚至共谋。击败赫尔维蒂人之后，恺撒又对阿里奥维斯图斯翻脸，将他逐出了高卢。根据这个版本的解释，恺撒不希望赫尔维蒂人将阿里奥维斯图斯逐出，因为那样他就失去了干预高卢的借口。[6]

这种说法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它主要依赖后见之明。首先，恺撒的《战记》不大可能如此严重地歪曲事实，因为它会受到很多敌视恺撒的人士的批评，而且这些人士往往对局势很了解。罗马也不大可能认为赫尔维蒂人驱逐阿里奥维斯图斯对自己完全有利。罗马的外高卢行省与埃杜依人和塞广尼人的领土接壤，这两个部落目前都是罗马的盟友。阿里奥维斯图斯则是在前不久被纳入这个体系。外高卢行省刚刚将阿洛布罗基人的叛乱平定下去，如果要保障贸易和税收，就需要一个稳定期。一个强大部落的到来将会打乱现有的盟约体系。还有一个问题是，赫尔维蒂人迁徙之后，他们原先的家园怎么办。如果有新来者（或许是日耳曼部落之一）定居在被赫尔维蒂人抛弃的土地上，那么这将对罗马的外高卢行省构成新的威胁。总的来讲，罗马人对民族迁徙（这在铁器时代的欧洲司空见惯）抱着疑虑的态度，一般会努力阻止自己行省的周边地区发生迁徙。高卢诸部落若是独立于罗马之外地统一起来，也不符合罗马的利益。

因此，即便赫尔维蒂人打算与阿里奥维斯图斯交战，恺撒也有充分的理由去干预，而完全不需要隐匿这个情况。综合来看，恺撒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斯提库斯和杜诺列克斯显然都相信赫尔维蒂人的迁徙对自己有好处，无疑都认为自己能够得到奥尔吉托利科斯的帮助，以对付所有敌人，不管是外部敌人还是部落内的敌人。曾经邀请阿里奥维斯图斯进入高卢的塞广尼部落的领袖们，以及在将来的年月里向恺撒求援的许多酋长，都抱有这样的动机。对一位酋长来说，若能与一支强大的外部力量结盟，将大大提升自己的威望，还可能得到直接的军事援助。这些

部落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亲罗马或反罗马派系，也没有亲日耳曼或反日耳曼、亲赫尔维蒂或反赫尔维蒂群体。每一位领袖都寻求对自己利益最大的外来援助，所有酋长都在争夺部落内的主宰权。有些领袖，包括统治某些部落的议事会，觉得与恺撒和罗马结盟最有利，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7]

但在前58年春季，一切迹象均表明赫尔维蒂人的行动让恺撒陷入了非常窘困的境地。或许赫尔维蒂人迁徙的时机出乎他的意料，或许迁徙的规模让他吃惊。他麾下有4个军团，但其中只有1个在外高卢，另外3个军团驻扎在阿奎莱亚（内高卢边境附近，毗邻伊利里库姆）。我们不知道是谁把3个军团部署在那里，但即便不是恺撒，他也没有做任何努力去调动部队。甚至在他火速奔赴罗讷河的时候，也没有向那3个军团发出新命令。我们可以推测，他此时仍然在憧憬一场巴尔干战役。或许直到他抵达日内瓦附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赫尔维蒂人和与其一同迁徙的氏族已将自己的财产装上大车，坚定不移地开拔了。为了防止有人因为旅途艰险而打退堂鼓，他们破釜沉舟，将自己的城镇村庄付之一炬。他们的背后是一座座冒烟的废墟。恺撒声称，赫尔维蒂人的所有定居点都被烧毁（这暗示着没有一名部落成员留在后面）。他这话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番迁徙的确非常浩大。

据恺撒说，从缴获的赫尔维蒂文件得知，参加迁徙的部落成员多达36.8万人。赫尔维蒂人的文件使用的是希腊字母。高卢南部出土了许多高卢-希腊铭文（使用凯尔特语言，但用希腊字母书写），这印证了马西利亚[8]对高卢的长期而深远影响。对于古代文献中的任何数字，我们都必须保持高度谨慎，因为在许多世纪中，手稿不断传抄，很容易发生讹误和扭曲。而且，罗马人希望对军事胜利进行量化（计算杀敌数量和占领的城市数量），所以常常出现故意夸大的情况。36.8万肯定是个极高的数字，说明赫尔维蒂家园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预期，尽管此地原先就人口过多，迫使他们不得不迁徙。但毕竟我们对古代人口密度知之甚

少，太过教条肯定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认可恺撒给出的数字，那么我们也没有别的数字来取而代之。现代人提出的“更可信”的数字只是猜测而已。即便恺撒的确夸大其词了，或者他对错误的数字信以为真，也可以肯定有数量极大的人口和牲畜在迁徙。迁徙很可能是分成若干批次，而不是一整列长队，那样的话难以克服实际操作和后勤方面的问题。但在某些地点，比如河流渡口和山口隘道，各支迁徙队伍可能会聚集在一起。[9]

恺撒不大可能知道具体有多少移民在等待渡河进入他的行省，但他们的数量肯定远远超过他手下的区区1个军团。他最早发布的命令之一就是指示军团士兵拆毁日内瓦处的河上桥梁。他还在行省内尽可能多地征兵，那里的各部落为他提供了骑兵队伍。他上任不久之后，便有一个赫尔维蒂领袖代表团到访。他们请求他允许赫尔维蒂人穿过这个罗马行省，并许诺沿途不会劫掠物资。恺撒不愿意批准他们的请求。在《战记》中，他提醒读者大约五十年前曾发生一场战役，赫尔维蒂人的一个氏族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当年赫尔维蒂人的攻击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暴行；更糟糕的是，罗马幸存者还被强迫从轭门[10] 下走过，这象征着他们丧失了武士的地位，是极大的羞辱。这是前107年的事情，当时罗马军队与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交战，连续遭到灾难性打击。恺撒希望让罗马人心头重新燃起那些年的恐惧（曾亲历那些恐怖岁月的一些人仍然在世），然后向罗马人保证，马略的侄儿会保护他们。

但在一开始，恺撒还没有足够的手段来达成这一目标。他要先争取时间，于是回复赫尔维蒂代表们，他会斟酌此事；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4月中旬（即13日，大约是一两周之后）返回，他会宣布自己的决定。在此期间，他命令部队建造一道防线，沿着罗讷河罗马一侧的河岸，从日内瓦湖一直到汝拉山脉边缘。这是他的军队的许多建筑壮举之一，很快就完工了。防线全长19罗马里（1罗马里等于1618.5码或1.48公

里，比现代的英里小一点），全线为高约16英尺的土墙。在防线的关键点如河流渡口，设有堡垒，驻扎着罗马军团的分队和恺撒征募的其他部队。土墙可能并不是连续的，在有自然障碍、敌人无法通行的地方就不设土墙，但这种理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对这个时期的罗马军队来说，建造这种壁垒并不是新鲜事。克拉苏镇压斯巴达克斯的时候建造了类似的设防壁垒，而庞培在米特里达梯战争中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这种防线非常务实，构成了一道屏障，至少能够迟滞敌人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强有力的象征，表达了守军的意图和决心。[11]

赫尔维蒂人回来听取恺撒的决定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说，“根据罗马人民的习惯和先例，他不能允许任何人穿过行省。假如他们企图用武力强行通过，他一定会阻止他们”。[12] 新的防御工事足以证明，他这话是当真的。但是，迁徙中的一大群人不可能突然间改变前进方向或目标。在河边等待了那么久，很多赫尔维蒂人一定倍感挫折，尤其是他们已经准备多年，并且还自愿摧毁了自己以前的家园，因此他们决心一定要继续前进。小群赫尔维蒂人开始渡过罗讷河，有的是借助渡口，有的是自己搭建木筏来运送人员、牲畜和车辆。这些抢先渡河的小群人可能是被酋长们派去试探恺撒的防御强度的，但更可能是因为赫尔维蒂人缺乏中央集权，部落成员的独立性很强，高卢的很多部落也都是这样。这些行动肯定不是对罗马防线的全面进攻。大多数小规模渡河行动都是借助夜色进行，但也有一些人胆子够大，在白天就冒险行动。这些人都没能成功渡河，因为恺撒的部下得以集中兵力，对敌人各个击破，在对方挣扎着渡河的时候就用投射武器将其击溃。赫尔维蒂人最终承认失败，但到此时，他们的一些领袖已经决定走另一条更为艰险的道路，离开自己的家园。这意味着他们将通过汝拉山脉的隘口，进入塞广尼人的土地。如果塞广尼人决定抵抗，赫尔维蒂人就无法通过这条路径，但埃杜依酋长杜诺列克斯说服了塞广尼人，让他们允许赫尔维蒂人通行。杜诺列克斯之所以能够说服塞广尼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声望很高，而且他与许多势力强大的酋长有着姻亲关系。奥尔吉托利科斯固然

已经死了，但对杜诺列克斯来说，如果强大的赫尔维蒂人在安顿下来之后能够支持他，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不过，在赫尔维蒂人缓慢地转向新路途之前，恺撒已经得知了他们的计划。[13]

“一场新的战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恺撒终于决定，在高卢开展一场全面战争，对付赫尔维蒂人。他在《战记》中给出的解释是，赫尔维蒂人打算定居于“桑托内人领地的边界，距托洛萨特人的领地边界不远，托洛萨特部落居住在外高卢行省。他（恺撒）明白，该地区丰产粮食，但没有防御；如果大群敌视罗马人民的武士定居于此，将给行省带来莫大威胁”。他前不久的行动肯定是得罪了赫尔维蒂人，但从罗马的角度看，他的推论是很有道理的。如上文所述，新定居者的入侵至少会打乱现有的政治平衡。罗马此前通过外交和军力确保了行省的安全稳定，新移民的到来将打破这一切。恺撒将高级军团长拉比埃努斯留下主持罗讷河的防御——这或许也能说明，赫尔维蒂人是分成若干大群体逐次行动的，数量如此之多的人员、牲畜和车辆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改变前进方向——然后自己火速赶往阿奎莱亚，去找他的主力部队。除了已经驻扎在阿奎莱亚的3个军团和留在罗讷河的1个军团之外，恺撒还征募了2个新军团——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团。

《战记》给人的印象是恺撒抵达阿奎莱亚之后才征召了这两个新军团，但军队的征募和组织需要时间，因此他很可能早就下达了征兵的命令。两个新军团最初的用途可能是加强主力部队，以便在巴尔干半岛作战，但赫尔维蒂人迫在眉睫的威胁是征兵的更好借口。恺撒其实无权组建新的军团，因为只有元老院可以指示一位总督组建新军团。但是，恺撒先斩后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年轻的时候，虽然仅仅是一位普通公民，仍然自作主张地征集了同盟者军队去镇压海盗，以及抵抗本都对亚细亚的侵犯；他以资深裁判官的身份担任西班牙总督时也曾征募了10个

大队，这相当于1个军团。恺撒始终坚信，自己深刻地知道什么事情符合罗马和各行省的利益。因此，他直接自行决断，相信自己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既然元老院没有批准新军团的组建，就不会从国库中拨款为其提供给养，这意味着恺撒必须从本省的税收以及战利品中获取军费。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新军团的大部分士兵来自内高卢，并非罗马公民，因此没有资格在罗马军团中服役。在过去，恺撒曾支持内高卢人民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意愿；作为总督，他始终视他们为真正的公民。新军团的征募就是他的这种政策的第一个例证。[14]

恺撒很快就做好了准备，可以率领全部5个军团返回外高卢了。最便捷的路径是越过阿尔卑斯山，尽管它被多个罗马行省环绕，但还没有被罗马征服。恺撒的军队花了一周时间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击退了当地部落的连续多次伏击。这些部落的独立意识极强，怨恨罗马人的侵犯，无疑也希望劫掠一些战利品。对新兵来说，初次征战杀敌会非常艰苦，但此次行军似乎很顺利，损失并不严重。翻过山之后，恺撒就进入了阿洛布罗基人领地，与他之前留在行省内的部队会师。他现在掌握着6个军团，总兵力约2.5万～3万人，还有一支盟军骑兵部队（很快达到约4000人），以及一些轻步兵。此外，每个军团还有一些奴隶，用于看管辎重，军官们无疑也带来了一些奴隶。很可能还有一些随军人员（商贩、娼妓等）。这么多人都需要粮食，成千上万的战马和役畜也需要粮草。对任何一位军队指挥官来说，维持部队的给养始终是第一要务。在正常情况下，恺撒应当征集所需的给养物资，将其囤积在外高卢的若干便利地点。但由于针对赫尔维蒂人的军事行动发展之快出人意料，他没有多少时间准备给养。主力部队从阿奎莱亚强行军至外高卢的途中，不可能携带大量的补给物资。此时还是春天，收割的季节还远在几个月之后——恺撒在《战记》中说，北方气候较冷，收成季节较晚——所以军队也不可能从它经过的地区获取多少给养。于是，他向罗马的盟友们发出讯息，尤其是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埃杜依人，要求他们征集粮草，并提供给他的部队。

与此同时，赫尔维蒂人已经穿过了莱克吕斯隘口，进入塞广尼人领地，正要进入埃杜依人领地的边境地带。埃杜依人向恺撒派出代表，控诉迁徙的赫尔维蒂人对他们的劫掠袭击。“埃杜依人素来忠顺于罗马，理应得到善待。我们的土地横遭蹂躏，我们的儿女被掳走为奴，我们的城镇惨遭洗劫，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一支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这怎堪忍受？”安巴里人（与埃杜依人结盟的一个部落）和阿洛布罗基人（不久前曾发动叛乱，后被罗马击败）也发出了类似怨言。我们不知道，赫尔维蒂人的领袖是不是故意发动了这些劫掠袭击。即便这不是他们的本意，要控制这样一个分成许多独立群体的庞大而人员复杂的队伍，也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由于途中耽搁，有些赫尔维蒂移民可能已经缺乏粮草了。当地人对如此之多的陌生人的入侵感到非常紧张，因此也完全有可能是当地人先攻击了赫尔维蒂人。发生流血冲突不足为怪。保卫盟友或者为盟友复仇是罗马人一个经典的开战理由。我们必须说，这非常务实。如果罗马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自己的朋友，那么任何部落（尤其是不久前还心怀不满的阿洛布罗基人）都不会与罗马结盟了。在执政官任上，恺撒曾通过一部法律，管束了行省总督们的行为举止，并限制他们率军离开自己行省的自由。在《战记》中，他向读者证明，自己向赫尔维蒂人开战是完全正当的。[15]

在索恩河附近，恺撒追上了赫尔维蒂移民。近二十天的时间里，赫尔维蒂人一直在用木筏和捆缚在一起的小舟渡河，四分之三的人已经到了西岸。这又一次证明，赫尔维蒂人并非以井然有序的单一队伍行进，而是分成许多群体，各自单独行动，只有在道路狭窄的地方才会聚集起来。赫尔维蒂人的一支——提古里尼氏族——还没有渡过河，与罗马人处在河流的同一侧。于前107年击败并羞辱罗马人的就是提古里尼氏族。恺撒又一次提醒读者们，不要忘了这番耻辱；并补充说，他也有私仇要报，因为其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的祖父就战死在那场战役中。侦察兵向恺撒报告之后，他决定发动一场突袭，并在黎明之前率军出动了。随后发生的不是一场战斗，而是屠杀。赫尔维蒂部落成员及其

家眷毫无防备、队伍分散，被打得措手不及。罗马人如同虎入羊群，杀得对方血流成河，幸存者抛下了车辆和财产，各自逃窜。随后，罗马人在索恩河上架桥，一天之间就全部渡河。[16]

罗马军队逼近其他赫尔维蒂人的时候，酋长们向恺撒派出了新的代表团。为了再一次强调前107年的羞辱，恺撒宣称，这个代表团的头领就是当年击败罗马军队的指挥官——狄维克，他此时一定已经非常年迈。赫尔维蒂部落提议，不管恺撒建议他们定居何处，他们都愿意从命，也愿意与罗马媾和。但他们同时也表现出，提古里尼氏族遭到的突袭并没有震慑他们。他们警告罗马人，不要低估他们的军力，并提醒罗马人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战役；他们“从父母和先祖那里学到，通过勇气而不是奸计或偷偷摸摸来取胜”[17]。罗马人会觉得赫尔维蒂人过于傲慢，不肯承认和屈从于罗马的威势，这是非常危险的。恺撒告诉他们，卡西乌斯[18]的军队于前107年战败，仅仅是因为当时赫尔维蒂人与罗马人并非处于交战状态，而赫尔维蒂人不加警告地突然发动偷袭。除了这宿怨之外，他还提醒对方，赫尔维蒂人近期还攻击了罗马的盟友。他警告他们不要盲目自信，因为不朽诸神往往先给罪犯一个短暂的春风得意的时期，然后才对其施加可怕的惩罚（恺撒是祭司长，但他在著作中很少提到神祇，这是比较罕见的例子之一）。恺撒表示，除非赫尔维蒂人交出人质以保证自己忠顺服从，并向埃杜依人和其他遭受他们劫掠侵扰的部落赔偿，否则他绝不会给他们和平。狄维克回答说，赫尔维蒂人“只会扣押人质，从来不会交出人质”，随后便率领代表团怒气冲冲地离去了。恺撒原本也不大可能向赫尔维蒂人授予土地，因为高卢的人口已经很稠密。他无权将自己行省之外的土地分配出去，将赫尔维蒂人安顿在高卢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管赫尔维蒂人去哪里，都注定会造成纷扰，这不符合罗马人的利益。[19]

赫尔维蒂人的队伍继续前进，恺撒率军追击，派出4000名骑兵作为前驱部队。这些骑兵中有一支相当大的队伍是由埃杜依人组成，由杜诺

列克斯指挥。杜诺列克斯曾与奥尔吉托利科斯结盟，后来又帮助过赫尔维蒂人。恺撒的盟军骑兵过于粗心大意，遭到兵力远逊于己的赫尔维蒂骑兵伏击，被打得落花流水。杜诺列克斯和他的埃杜依人最先溃败。在这场轻松胜利的鼓舞下，敌军后卫的行动开始放慢，并且胆子更大，敢于更频繁地交战。恺撒不愿意冒险与其不断小规模地交锋，而是对敌人进行严密监视，并阻止小股敌人离开其主力队伍去沿途劫掠。他的军队紧随着赫尔维蒂人，追踪着他们的每一个行动，他的前锋离敌人后卫始终保持着五六里的距离。此时他已经越过行省边界一段距离，越来越担忧自己的补给问题。他在索恩河附近的时候，补给还不是问题，因为他可以用这条贸易路线上的大量驳船运送粮草。但赫尔维蒂人已经远离了索恩河，所以他也不得不离开那里。埃杜依人许诺为他提供粮食——毕竟，恺撒打击的是侵犯和劫掠埃杜依人领地的敌人——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粮食抵达，虽然多番催促，但仍徒劳无功；尽管埃杜依人一再承诺，粮食已经在路上了。再过几天，军中存粮将告罄，而恺撒手中没有任何新的粮草。在很短的时期内，指挥官可以说服麾下将士依靠最低限度的粮食继续前进，但通常只有领导力非常强的指挥官才能做到这一点。恺撒和他的士兵之间还比较陌生，其军队的三分之一都是缺乏经验的新兵。[20]

恺撒急于避免灾祸，于是召来了埃杜依人的领导人，为首的是德鲁伊狄维契阿库斯和李斯库斯（后者目前担任大酋长，即每年选举产生的最高行政长官）。恺撒训斥他们未能履行义务，即向保护他们的罗马军队提供粮食。李斯库斯解释说，这全是部落内一些强势人物的错，那些人故意耽搁粮食的征集和运输。因为他们觉得宁愿让同为高卢血统的赫尔维蒂人主宰自己，也不愿意被罗马人统治；这些酋长在向敌人通风报信，并恐吓所有反对他们的人。李斯库斯没有指名道姓，但恺撒显然已经开始怀疑杜诺列克斯，并猜到他就是幕后黑手。他命令其他酋长退下，单独与李斯库斯会谈，好让他更自由地发言。李斯库斯证实了恺撒的怀疑。杜诺列克斯野心勃勃，想要称王——这一时期带

有“DUBNOREIX”铭文的钱币很可能就是他授意铸造的。他控制着索恩河沿线的贸易，利用收缴的过路费豢养了大批武士。他与赫尔维蒂人的勾结已经被揭露出来，恺撒觉得有了足够的证据，可以严惩杜诺列克斯。但是，他珍视狄维契阿库斯的忠诚，所以犹豫不决。因此，他传唤狄维契阿库斯到他营帐中，进行一次更私密的商谈。他命令平常为他服务的译员退下，而请盖乌斯·瓦列里乌斯·普罗基鲁斯翻译。此人是一名来自外高卢的贵族，他的父亲为全家赢得了罗马公民身份。在罗马法庭上有过很多经验的恺撒将杜诺列克斯通敌的事实告知狄维契阿库斯，并提议必须由狄维契阿库斯或埃杜依人对其进行审判。狄维契阿库斯告诉恺撒，他的弟弟杜诺列克斯之所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完全是仰仗他的帮助，但后来却反对哥哥，成了哥哥的竞争对手。杜诺列克斯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哥哥德鲁伊狄维契阿库斯前不久担任过大酋长，而部落的规矩是曾担任大酋长的人只要还在世，他的任何亲戚就都不能担任大酋长。但狄维契阿库斯恳求恺撒不要惩罚他野心勃勃的弟弟，一方面是出于兄弟亲情；另一方面，狄维契阿库斯不希望被人指责说是勾结罗马人打击自己的亲弟弟，那样的话对他的伤害太大。狄维契阿库斯泪如雨下，苦苦哀求。恺撒唤来了杜诺列克斯，当着他哥哥的面，与他对质。恺撒告诉杜诺列克斯，看在他哥哥的面子上，再给他一次机会，但在将来务必忠心不二，绝不能再给罗马人怀疑他的理由。恺撒在高卢期间经常使用这种直截了当、面对面的外交手段。和罗马政治生活一样，行省总督的大部分工作也都是在私人层面完成的。在罗马，恺撒以宽宏大量、乐于助人而闻名。在高卢，他有时遵从同样的原则，但从来不会天真地轻信他人。会议之后，恺撒命令部下对杜诺列克斯进行持续的监视，并将他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他。[21]

尽管粮草补给的障碍已经被排除，但恺撒的问题并没有当即得到解决，埃杜依人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将粮食运到他的军中。恺撒需要迅速结束战役。就在他与狄维契阿库斯和杜诺列克斯密谈当天，他相信自己捕捉到了机遇。侦察兵回来报告称，赫尔维蒂人在8里之外的一处小山

旁安营扎寨。恺撒派遣了另一支侦察队去进行更细致的勘察，观察每一侧的山坡是否利于攀登，尤其是离敌人最远的那一侧。这支侦察队回来报告称，这座小山坡度不大，易于攀登。恺撒决定向敌营发动全面进攻，希望就像袭击提古里尼氏族那样，取得出其不意的奇袭效果。恺撒命令拉比埃努斯指挥2个军团——可能是2个有作战经验的军团——于凌晨出发，并占领小山。2小时之后，恺撒将率领其余部队，行军8里，直奔敌营。拉比埃努斯将在看到恺撒发动攻击的时候，率领自己的部队从高地俯冲。两支部队的行军路线差不多，由前一天参加侦察地形的士兵引导。

这是个大胆的计划，但也完全切实可行，其准备手法与现代军队相差无几。恺撒对突袭和奇袭很有经验，比正面对垒的经验多，因为西班牙半岛的战事往往都是突袭和奇袭。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前102年，在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22]，马略也曾将一支强大的部队秘密地穿插到条顿人背后的死角。夜战的风险总是很大，因为很容易发生混乱，导致部队迷路。在这次战斗中，开始进展非常顺利。拉比埃努斯率军开拔，消失在夜色中。在预定的时间间隔之后，恺撒率领主力部队出发了。骑兵打头阵，并派遣巡逻队掩护行军队伍。这些巡逻队的指挥官是普布利乌斯·孔西迪乌斯，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享有很高的军事声望。他曾在苏拉和克拉苏麾下服役，因此至少有四十多岁了。恺撒没有说孔西迪乌斯的衔级，但他可能是一名军事保民官或长官，但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百夫长。他可能是元老孔西迪乌斯（在前一年，这位元老宣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年纪太大，已经无所谓危险，不怕恺撒）的亲戚。[23]

黎明时分，主力部队离敌营只有1.5里，拉比埃努斯已经就位，但他与恺撒的联系中断了。赫尔维蒂人就像很多部族武装一样，对侦察漫不经心，丝毫不知道两支罗马军队就在近处。这时，孔西迪乌斯疾驰赶来向恺撒报告，说小山并不在拉比埃努斯手中，而是处于高卢人的控制之下。孔西迪乌斯对此非常肯定，说他看得清清楚楚，山上有高卢人的

武器、羽饰和徽记。这意味着拉比埃努斯要么是迷了路，未能赶到指定地点，要么已经被击败。此时恺撒手中有4个军团，其中2个很可能是新建的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在夜间行军之后，他的士兵已经很疲惫，虽然无疑能够攻击毫无防备、队形分散和受辎重与家属拖累的敌人，但未必能够应付长时间的两军对垒。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进攻，意味着不得不以少击多，而且地形完全由敌人控制，这是非常不利的。他命令部队撤到附近一座山岭上，排好阵型，准备抵御敌人的进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赫尔维蒂人开始起身，准备继续前进，此时仍然不知道追踪他们的且兵分两路的罗马军队已经近在咫尺。拉比埃努斯严格执行命令，在看到恺撒的部队发动进攻之前，绝不打草惊蛇。话说回来，他手里只有2个军团，也做不了什么。直到当天晚些时候，主力部队的侦察兵才与拉比埃努斯的部队取得联系，并证实是拉比埃努斯，而不是敌人，控制着小山上的关键位置。当天余下时间里，恺撒率军追击赫尔维蒂人，当夜在距敌人3里的地方扎营。[24]

这是一场令人尴尬的失败，但假如赫尔维蒂人认清了形势，攻击两支罗马军队中的任何一支，都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拉比埃努斯的部队在山上尤其脆弱。恺撒吸取的教训是他可以信任高级军团长的判断和理智，但未必可以信任其他军官的能力，不管他们是多么有名。在复杂的军事行动中，注定会有风险，而且偶然性在战争中会起到很大作用。恺撒没有写他是否处罚了稀里糊涂的孔西迪乌斯，但《战记》的发表确保了孔西迪乌斯的耻辱为世人所知。在《战记》中，恺撒将失败的罪责推给了自己的下属。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他的士兵在当时或许不这么看。发布命令的是恺撒，根据错误情报让主力部队停止前进的也是他，而且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验证了情报的准确性。在此期间，拉比埃努斯2个军团的士兵们身处险境。恺撒率军继续追击赫尔维蒂人，但形势不妙。粮食将在两天后耗尽，但补给物资还没有到位。次日早上，恺撒决定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于是命令暂时放弃对赫尔维蒂人的谨慎追踪。他的军队调转方向，赶往18里之外的比布拉克特。他打算在那里补

充给养，然后再一次追击赫尔维蒂人。赫尔维蒂人行动迟缓，再赶上他们应该不是难事。[25]

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个决定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恺撒的高卢盟军中的一些武士很快抛弃了他，投奔敌人，并告诉他们，罗马军队撤退了。赫尔维蒂人可能认为罗马军队羸弱不堪，于是决定追击。恺撒也想知道，赫尔维蒂人是否会企图将他去往比布拉克特的路途切断。罗马军队的后卫部队很快遭到攻击。恺撒以自己的全部骑兵来加强后卫，并利用骑兵来掩护自己部队的部署。他占据了附近一座山丘，将久经沙场的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团投入主要战线。如果他此时也遵循了后来常见的做法，那么第十军团可能是在战线右翼，这是更荣耀的位置。每个军团都按照常规阵型部署，分成3列，第一列是4个大队，后面两列各有3个大队。士兵们放下了自己的包裹——一般是挂在一根木杖上，将木杖搭在肩膀上——以便轻松自如地作战。他们将盾牌从皮质护套中取出，露出了盾牌上各单位的徽记，并将羽饰安装到头盔上。在山坡较高处，恺撒部署了经验较少的第十一军团、第十二军团以及辅助步兵。他们负责保护包裹和辎重，并开始在自己周围挖掘一道小堑壕，并搭建壁垒。但他们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修建完整的行军营地。任何一支罗马军队在一天行军结束后都会建造行军营地。让战争中的士兵们知道他们的财产安然无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恺撒显然还不太信任缺乏经验的新兵，所以他这样部署。4个有经验的军团可能是构成了一道防线，覆盖了大部分山坡。但与恺撒的大部分战役一样，我们无法确定此次交锋的具体地点，因此也没有办法确切地讨论地形地貌。不过恺撒告诉我们，由于山坡的缘故，2个后备军团和辅助部队都可以被敌人看得清清楚楚，漫山遍野都是人马，因此敌人会高估罗马人的兵力。

部队的部署需要时间，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其间由骑兵掩护，但赫尔维蒂人也需要很多时间来行军和备战。他们连续迁徙了多个星期，出于形势所迫，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但即便如此，将足够多的

武士聚集在一个地方以打败罗马人，仍然是个艰巨任务。与战士一起前来的还有他们的家人、奴隶和辎重。赫尔维蒂人将他们的大车在战线后方组成了一个防御阵型。他们的军队渐渐开始成形，但有些队伍仍然没有赶得上战斗开始。恺撒没有告诉我们，战役开始之时，他面对的敌人有多少兵力，但赫尔维蒂人求战心切，说明双方的兵力应当大体上是差不多的，除非赫尔维蒂人非常鄙视罗马人的战斗力。在这个时期，战役打响前的漫长耽搁是很常见的，士兵们只能干等，别无他法，所以这个等待期一定是非常紧张的。恺撒觉得此刻需要摆出一个雄伟的姿态，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翻身下马，将他的坐骑和所有高级军官的坐骑都送往后方，以便“让所有人面临同等的危险，并消除逃跑的诱惑”。前62年，在喀提林的追随者被兵力远胜于他们的元老院军队包围时，喀提林也是这么做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在最后决战前做的更进一步。他割断了自己昂贵战马（在之前的一场战斗中从一位罗马将军手中俘获的）的喉咙，以示绝不逃跑、死战到底。徒步将军的机动性会下降很多，因此对战局的把握更少。恺撒为了鼓舞将士，其实上是牺牲了一些务实的优势。在后来的历次战役中，他再也没有这样做过。这的确说明，他知道士兵们对他还不是很熟悉，而且最近几天的战事也不算顺利。或许这也说明，他对自己作为军事统帅的本领还不是非常自信。为了进一步鼓舞士兵，他发表了战前演说，可能是沿着战线行走，挨个向每一个大队讲话，因为全部4个军团不可能同时听到他讲话。[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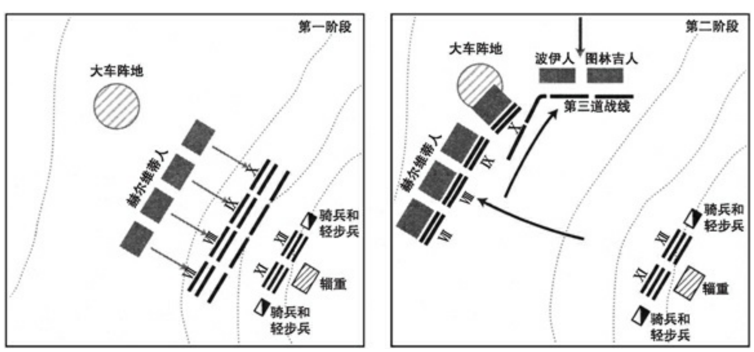


图**4** 比布拉克特战役

战斗于下午三四点钟打响，赫尔维蒂人沿着山坡推进，攻击罗马战线。赫尔维蒂人秩序井然、队形紧密。在两军交锋之前，士兵们会努力震慑对手，高声呐喊、吹奏军号，或者以自己凶悍的外表吓唬敌人。有时，交战的一方会被吓得魂飞魄散，甚至还没等到交战就溃散了。正因如此，让新建军团去承受战斗的主要压力，风险会很大。此次战斗中，罗马军团士兵们在原地等待，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常规策略是保持沉默，以自己的镇静自若来威吓敌人。赫尔维蒂人接近的时候——两军相距约10～15码——罗马军团士兵们投掷了标枪。沉重的标枪穿透了赫尔维蒂人的盾牌，有时甚至能将两面重合的盾牌钉在一起。有些赫尔维蒂武士当场死伤，其他人则被迫丢弃笨重的盾牌。进攻的势头被粉碎了，罗马人乘胜利用自己的优势，高声欢呼，拔出利剑，开始冲锋。他们居高临下、士气高涨，而且冲杀的势头极猛；但即便如此，赫尔维蒂人仍然在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开始动摇并撤退到山下的平原。罗马人追了上去，但似乎是有秩序地缓步追击，因此敌人得以很快逃走，跑到山谷另一侧大约1里之外的高地上。此时罗马人遇到了一个新的威胁：一支1.5万人的生力部队从罗马军队敞开的右翼杀了过来。这些是波伊人和图林吉人，两个与赫尔维蒂人结盟的民族，此前一直在赫尔维蒂人队伍的后方。有人猜测，波伊人和图林吉人的抵达是预先计划的行动，而之前赫尔维蒂人的第一次进攻只是佯攻，目的是将罗马人从山坡引诱到下方的平地上。这种猜测不大可能是真的，波伊人和图林吉人的赶到可能只是个巧合，但对赫尔维蒂人来说是幸运的巧合。若是一支部族军队——即便是希腊化军队（其战术思想是将步兵集中于单一的密集战线，预备队很少）——遇到此刻罗马人的处境，麻烦就大了，其整体战线都可能被新近赶到的敌方生力部队席卷。但罗马的军事体制强调预备队的重要性，在战斗打响之时一般会将至少三分之二的兵力保留在战线后方。罗马战线第三列的各大队立刻构建了一条新战线，以对付波伊人和图林吉人。赫尔维蒂人看到自己盟军抵达，重整旗鼓，杀回战场。罗马战线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去对付这些赫尔维蒂人。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二军

团似乎仍然处于预备队状态，没有被调往前方，仅仅在原地观战。[27]

战况很激烈，一直打到夜幕降临之后，罗马人在克服了敌人新部队抵达的冲击之后，就取得稳步进展。争夺大车阵地的战斗特别激烈，赫尔维蒂武士们拼命保卫自己的财产和家人。恺撒在《高卢战记》中没有讲到自己在战斗中做了什么，只是简单地说“罗马人”调转阵脚，与两个方向的敌人作战。他可能就像任何一位罗马指挥官一样，待在战线后方不远处，鼓舞将士拼杀，并视情况投入预备队。最后罗马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罗马军队的损失相对较重，在原地停留了三天以照料伤员、掩埋死者。罗马人抓了一些俘虏，包括奥尔吉托利科斯的一双儿女，但恺撒说13万人逃离了战场，奔向东北方的林贡斯人领地。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定很难做精确的计数，但显然有相当多的赫尔维蒂移民生存了下来。很多赫尔维蒂人可能根本没有及时赶到战场，但那些参战的人损失了绝大部分辎重。恺撒没有穷追不舍，因为他自己的补给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对己方死者和伤员的关切也赢得了士兵们的好感，让官兵与统帅之间越来越信赖。他派遣信使向林贡斯人的酋长们传话，命令他们若是不想被罗马人当作敌人，就不要援助赫尔维蒂人。

三天后，他启程追击敌军，但很快遇见了赫尔维蒂人的投降代表团。恺撒指示他们回去告诉赫尔维蒂人，原地等他抵达并听候发落。他们果真停下来等他，这说明他们不是在简单地争取时间。恺撒抵达之后，要求赫尔维蒂人交出人质，对方果然从命。恺撒还要求赫尔维蒂人返还逃亡到他们那边或他们在迁徙期间掳掠的奴隶。第一夜，某氏族的约6000人脱离营地，奔向东方的莱茵河。恺撒向他们必经之路上的各部族派遣信使，严厉警告他们不得帮助这些赫尔维蒂人。这逃跑的6000人被驱赶回来，卖为奴隶，无权享受恺撒给其他人开出的条件。恺撒然后命令赫尔维蒂人及其盟友返回各自的家园，重新安顿下来。恺撒还命令高卢行省内的阿洛布罗基人为返回的各部落提供粮食，直到他们重新在旧家园定居、重建被烧毁的房舍、重新耕种土地。根据埃杜依人的请

求，恺撒允许波伊人定居在埃杜依人的领地。外高卢周边地区重新恢复了稳定，但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根据恺撒的总结，从赫尔维蒂人那里缴获的文件中说，参加迁徙的有36.8万人，而回家的只有约11万人；定居在高卢的波伊人有3.2万人，当然这是排除了死者的数目；6000名逃亡者被卖为奴隶。这样的话，还有多达22万人的巨大缺口。和所有涉及数字的情况一样，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精确性也没有把握，估计很多人面对罗马军队的进攻就散去了，像提古里尼氏族在索恩河那样。即便如此，也有很多人或许成千上万的人丢了性命。对这惊人的死亡数字，现代人会感到毛骨悚然，但我们不能忘记恺撒的罗马读者们对这样的统计做出了何种反应。对罗马人来说，敌对民族的迁徙构成了很大威胁；如今被阻止了，而距意大利本土不远的高卢行省也得到了挽救和保全。在《战记》中，恺撒常常使用“平定”这个动词。任何与罗马的权威分庭抗礼、拒不屈服的人群，若是被罗马人打败了，都可以说是被“平定”了。罗马的胜利造就了和平。从罗马人的视角看，北方边疆恢复了和平。[28]

罗马人民之友

此时已是夏季。适合作战的季节还剩几个月，但不足以将部队调往巴尔干，在那里展开全新的战事。恺撒已经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但还渴望更多的胜利，因此不愿意闲坐片刻。很快，他就有了开展新的军事冒险的机遇。高卢中部的绝大多数高卢/凯尔特部落都派使节来恭贺他对战赫尔维蒂人的胜利。高卢人的赞誉也许部分是真诚的，但与进入高卢的新势力建立友好关系自然是非常聪明的。这些使节请求恺撒允许全体部落召开一次大会，在会上拜见他，并向他请愿。在大会上，酋长们（德鲁伊狄维契阿库斯是他们的发言人）痛哭流涕地匍匐在恺撒脚下，哀求恺撒保护他们，抵御日耳曼人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的侵犯。据他们说，阿里奥维斯图斯原是受邀前来援助塞广尼人的，后来却带来了12万族人，将其安顿在高卢土地上，并从所有部落索取了人质。高卢酋

长们抱怨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暴政，斥责他为“狂野不羁的蛮子”。据说更多日耳曼人正前来加入他们的领袖。高卢酋长们恳求恺撒“保护整个高卢，抵御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大举进犯”。塞广尼人的代表沉默地支持酋长们的哀求。恺撒询问他们为什么沉默不语。狄维契阿库斯回答说，他们不敢讲话，因为害怕被日耳曼人知道。恺撒向聚集于此的酋长们保证，他会处理此事，运用自己的权威说服阿里奥维斯图斯，让他有所克制。私下里，他对此事非常重视，觉得他应当支持对罗马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埃杜依人。另外，他担心日耳曼人会惯于渡过莱茵河迁徙，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得过于频繁，就可能导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那样的大规模迁徙。[29]

恺撒派遣使节去见阿里奥维斯图斯，请他到两军之间的某地与恺撒会谈。阿里奥维斯图斯拒绝了，说如果恺撒想和他会谈，必须来见他；并问罗马人为什么要干涉高卢的这个地区。恺撒回复说，阿里奥维斯图斯理应记得自己的义务，因为在恺撒任执政官期间，罗马人民承认阿里奥维斯图斯为“国王和朋友”。这一次，恺撒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首先，阿里奥维斯图斯不可以带领更多的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定居于高卢。其次，他必须将埃杜依人的人质归还，将来也不得袭击或威胁埃杜依人。如果阿里奥维斯图斯服从，罗马将与他继续保持友好关系；若是拒绝，恺撒将不得不采取坚定的措施，保卫埃杜依人和共和国的其他盟友。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回复表明，他和恺撒一样不肯妥协。他是个征服者，就像罗马人一样，他在处置被征服者时没有理由听任其他人指手画脚。罗马人如何治理自己的行省，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他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也享有同样的自由。他打败了埃杜依人，只要他们年年纳贡，人质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他和他的武士们自抵达高卢起，未尝败绩，不畏惧任何敌人。恺撒向读者渲染了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极度倨傲，然后说在他收到这封信的一个小时之内，埃杜依人就派来使者报告，他们的土地遭到了日耳曼人的劫掠。另外，北方的特雷维里人也送来消息，称数量极大的苏维汇人（这是一个日耳曼民族，阿里奥维斯图斯及其部下就

属于这个民族）来到了莱茵河畔，准备渡河进入高卢。据说企图渡河的氏族多达100个，这场大迁徙将令赫尔维蒂人的迁徙黯然失色。[30]

恺撒决定采取行动，但这一次在出征之前，他先确保自己的粮食供应安全无虞。他率军快速行动，因为这一次他们追击的可不是行动迟缓的赫尔维蒂人。三天后，他得到消息称阿里奥维斯图斯及日耳曼军队正逼近韦松蒂奥（现代的贝桑松），也就是塞广尼人的主要城镇。塞广尼人此时显然已经与先前的盟友阿里奥维斯图斯断交。韦松蒂奥是塞广尼部落的中心，是中枢之地，有天然屏障防护，贮藏有大量粮食，对任何军队都非常有诱惑力。恺撒不愿意让韦松蒂奥落入敌手，于是驱使部下日夜兼程地行进，只做短暂休息，火速赶到韦松蒂奥，在那里派驻了军队。赢了这场赛跑之后，他让部队休息了几天以恢复体力，并等待给养送抵。士兵在闲坐无事时肯定比忙碌备战时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韦松蒂奥城内谣言满天飞：

> 高卢人和商贩告诉罗马士兵们，日耳曼人个个魁梧雄壮、勇猛无畏、武艺娴熟；他们（高卢人和商贩）说，他们遇见日耳曼人的时候，甚至不敢承受对方的目光和严峻表情。罗马士兵们听到这些传闻，开始惴惴不安。然后突然间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导致各级官兵都灰心丧气。恐慌从军事保民官和指挥官，以及那些缺乏军事经验、从罗马城追随恺撒到此以赢得他友谊的人开始：有些人找借口离去，其他人请求允许离开，有些人害怕羞辱而不得不留下……他们掩饰不了自己的抑郁，有时甚至不能隐藏自己的眼泪。他们蜷缩在帐篷内，哀哭自己的命运；他们与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叹惋大家共同面对的危险。整个军营中，官兵都开始写遗嘱。在这些绝望的哀叹声中，甚至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百夫长和骑兵军官们也受到了影响。[31]

有些人说，更让他们担心的是，进军下一阶段的地形特别困难。其他人则说，他们对粮食供应忧心忡忡。前不久在针对赫尔维蒂人的战役中给养出了问题，因此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一些军官甚至宣称士兵们将公开哗变，不肯服从恺撒的进军命令。这段情节也足以证明，在后来的历次战役（尤其是内战）中，恺撒麾下将士对他的狂热忠诚并非恺撒抵

达高卢伊始就有的，而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有意思的是，根据恺撒的描述，制造不满情绪的是军事保民官和其他军官们，因为这些人一般是骑士，且往往是元老子弟。这支持了下面的观点：这些阶层不是《战记》的核心受众，甚至不一定是主要读者群。狄奥声称，有些军官抱怨道，针对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战争未曾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因此他们完全是在为了恺撒的个人野心而拿生命冒险。[32]

恺撒召集了会议。全部百夫长（如果6个军团的所有百夫长职位都满员的话，应该一共约有360人）都受命参加，其他高级军官应当也到场了。现在演说家恺撒要晓之以理，用自己的魅力笼络官兵，就像他之前常常在广场引导群众那样。演讲开始的时候，他非常严厉地——这符合一位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军权的将军的身份——训斥他们竟敢质疑获得合法任命的统帅的计划。强调了纪律之后，恺撒转而开始说理。官兵们的紧张说不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阿里奥维斯图斯很可能会记起自己对恺撒负有的义务（因为他在前一年被罗马承认是朋友），头脑变得理智起来。即便需要动武，罗马军队也曾经与日耳曼武士交手并将其击败，当年马略就大败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不久前斯巴达克斯的奴隶军队中也有很多日耳曼人。阿里奥维斯图斯能够打败埃杜依人和其他高卢人，凭借的是诡计和偷袭，不是堂堂正正的战争。他的粗劣伎俩对罗马军队是没有用的。那些公开对粮食补给表示担忧的人简直是在侮辱恺撒的能力，何况同盟部落已经送来粮草，而且农田里的庄稼已经成熟，随处可见。有人说士兵们会拒绝服从进军命令，但他并不担心：

> ……一支军队不听从统帅，要么是因为遇到背运倒霉的事情，要么是因为发现了严重的错误……我一生的履历足以证明我的正直，针对赫尔维蒂人的战争也证明了我在战争中的幸运。因此，我决定实施原先打算推迟的计划，于今夜第四班岗时开拔。我要看看，在你们心中，责任和荣誉是不是能够压倒恐惧。不管怎么样，即便没有其他人追随我，我也要带着第十军团出发，因为我对它的忠诚没有丝毫怀疑，它会担任我本人的卫队。

恺撒对第十军团非常偏爱，也最为信任。[33]

恺撒的整个演讲对百夫长们的自豪感——对他们自己和对自己所在单位的自豪感——发出了挑战。恺撒的语气流露出对他们的失望，因为他们竟胆敢威胁拒绝服从命令，一定是懦弱怯战或者对他的领导能力缺乏信任。第十军团听了这话，非常受用；它的军事保民官们当即报告称，本军团决心服从恺撒的任何命令，以证明恺撒对本军团的信任完全正确。各单位都不愿意被其他军团遮蔽光芒，百夫长们请求军事保民官和高级军官们向恺撒保证，官兵们绝不敢抗命不遵。[34]

恺撒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于次日黎明前率军开拔。不过他对自己的计划做了一点修改，这表明他或许认识到官兵们的批评也有合理之处。他原打算穿过山区继续前进，在听了狄维契阿库斯的建议之后，决定改为穿过开阔地域。这会多走50里的路，但能防止军官们又一次大发怨言。一周后，侦察兵报告称日耳曼军队就在24里之外。阿里奥维斯图斯派来使节称，尽管他之前拒绝与恺撒当面会谈，但现在愿意见一见。在《战记》中，恺撒声称自己此时仍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他这么说也许是真心实意，并非只是为了向读者强调自己的公道明理。包括苏拉在内的许多罗马军事统帅都举行过这样的盛大仪式：在罗马行政长官的威仪排场之下，在罗马军团官兵杀气腾腾阵势的簇拥下，他们与外国君主会谈，向其发号施令。这种事迹尽管潜在利益较少，没有掳掠财货和人口的机遇，但几乎和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一样光荣。[35]

五天后，会议举行了，地点是两军之间差不多中间处的一片平原。这块平坦地域上只有一座小山。会议的细节是在前几天的谈判协商中敲定的。阿里奥维斯图斯坚持要求双方都只带骑兵作为侍从。恺撒对自己的盟军骑兵不是完全信任，于是借了他们的坐骑，让第十军团的士兵骑着这些马匹，陪伴他去谈判。这些士兵们又一次在全军中得到特殊待遇，非常高兴，他们开玩笑说总督要封他们为骑士（这是个双关语，

equites一词既指骑马的人或骑兵，也指富裕的骑士阶层）。双方谈判代表在相距200码时停下。根据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意愿，双方领袖各自只带10人的护卫队，迎面骑行。双方谈判的语言是高卢语，阿里奥维斯图斯在莱茵河以西的岁月里学会了这种语言。恺撒应当是借助一名翻译的帮助。首先，恺撒提醒对方，共和国给了他多少恩典，他又应当承担多少义务。埃杜依人是罗马的长期盟友，日耳曼人对埃杜依人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即刻停止。恺撒的要求与之前相同：不准再有更多的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并须将埃杜依人的人质返还。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他凭借武力征服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东西。任何一支罗马军队都不曾涉足此地，恺撒为什么要插手？此地是他的“行省”，正如外高卢是恺撒的行省一样，双方都不应当干涉另一方的领地。阿里奥维斯图斯怀疑，“尽管恺撒侈谈友谊，但是率军进入高卢就是为了消灭他”。除非罗马人撤军，否则阿里奥维斯图斯将视其为敌人。在《战记》中，阿里奥维斯图斯尖刻地说，如果他杀死了恺撒，那么罗马的“许多大人物和贵族”一定会额手相庆。或许的确如此，但恺撒的政敌们不会因为恺撒死亡而表现出对罗马军队战败的欢欣，因为那样他们就会被斥责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阿里奥维斯图斯做了此番威胁之后，提议只要恺撒此刻撤军，将来恺撒的一切行动都会得到他的支持。[36]

恺撒为罗马的立场做了辩护，但一些日耳曼武士开始向骑马的罗马士兵投掷标枪或用投石器投石，于是谈判破裂了。恺撒决定暂不还击，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觉得是罗马人背信弃义。两天后，阿里奥维斯图斯传话要求再进行一次会商，或请罗马人派遣使节到他的营地。恺撒不愿意让他的任何一名高级军官冒险，这一次选择了瓦列里乌斯·普罗基鲁斯担当使节，显示出对他的极大信任。与他一同前往的是商人盖乌斯·梅提乌斯，此人在过去曾拜访过阿里奥维斯图斯，受过他的款待。这一次，罗马人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两名使节都被谴责为奸细，被日耳曼人囚禁起来。[37]

阿里奥维斯图斯显然已经决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但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其军队的凝聚力胜过绝大多数的部族武装，而且他本人也非常谨慎小心。在扣押罗马使节的同一天，他率军向前推进，在距罗马军营6里的高地上扎营。次日上午，他又率军继续前进，越过了恺撒的营地，在其背后2里的地方设置了一个新基地。于是，恺撒与同盟部落之间的补给线被切断了。一连五天，恺撒命令他的部队出营布阵，准备迎敌。日耳曼人不肯从高地上下来，恺撒显然觉得冒险进攻阿里奥维斯图斯的营地不是良策，这也表明敌营的确坚固。这些日子里，双方有小规模交锋，大多是骑兵之间的冲突，但没有大规模战事。阿里奥维斯图斯的骑兵与精锐轻步兵密切协作。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这种轻步兵被日耳曼人称为“百人队”，他们会抓住马鬃，在短距离内与骑兵一同行进。这些徒步的武士为骑兵提供重要支援，骑兵若是受挫，可以撤回步兵阵线之后休整再战。这种战术以及日耳曼武士的高素质一般使他们能够战胜高卢骑兵。[38]

恺撒不能待在原地不动，因为他毫无建树，而每天都要消耗手边的相当一部分粮食。直接进攻的风险太大，于是他决定重新打通补给线。他将军队分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都可以迅速转化为由三条阵线构成的战斗队形。辎重和一些卫兵仍然留在主营地，因为恺撒的目的仅仅是在日耳曼人阵地之外建立一个前哨据点。罗马人前进到日耳曼营地之外仅1000码处。就位之后，罗马军队面对敌人，严阵以待。日耳曼骑兵和1.6万步兵出营迎战。这只是阿里奥维斯图斯麾下步兵的一部分，因为他不大可能有时间让更多步兵快速做好战斗准备。恺撒命令第三道阵线的部队开始修建一个足以容纳2个军团的新营地，而第一阵线和第二阵线的士兵抵挡日耳曼人的进攻。敌人的攻击或许仅仅是试探和佯攻，而非全面进攻。如果6个罗马军团的绝大部分士兵都参加了此次行动，那么其三分之二的力量再加上骑兵和轻步兵，兵力至少与日耳曼人相当。几个小时之后，新营地的防御工作已经就绪。2个罗马军团进驻新营地，其余部队则原路返回主营地。规模较小的新营地能够保障从同盟部

落来的运输给养的车队安全通过。恺撒蒙受的压力（速战速决，否则只能可耻地撤退）消除了，他现在可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和形势来与敌人交锋。[39]

次日，恺撒命令两个营地中的罗马军队尽数出动，组成标准的三层阵线，面向敌人。这是非常自信的姿态，意在鼓舞己方士气，震慑敌人。他说在这个时期，这是他常用的策略。阿里奥维斯图斯不肯迎战，于是恺撒在中午命令士兵回营。下午，日耳曼人开始进犯，派遣部队攻击较小的罗马营地，但被那里的守军逐退。当晚，恺撒亲自审问了抓到的一些俘虏。俘虏供称，阿里奥维斯图斯之所以不肯发动全面作战，是因为日耳曼军队中占卜的巫女宣称，他必须等到满月才能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军队在战前都会举行仪式和献祭，但作为祭司长的恺撒在整部《战记》中却不曾提及这些活动，尽管仪式是罗马军队日常活动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次，他决定利用敌人的迷信。次日，他命令绝大多数部队出营，排成三线阵型，骑兵可能在两翼，营地中只留下最少量的卫兵。然后他率军沿着山坡而上，进逼日耳曼人，离敌营的距离比先前几天都更近。对如此放肆的挑战，阿里奥维斯图斯若是置之不理，就太丢人了，而且他的武士们也有可能被罗马人吓倒。于是阿里奥维斯图斯率军出击，他的军队按照氏族和部落分成若干单位。据《战记》记载，他们有7个各不相同的单位。战线后方是武士的妻子们，她们坐在大车上，为男人们欢呼鼓劲，请求他们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奴役。[40]

全部6个罗马军团都参加了此次战斗，恺撒显然觉得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已经有了足够的作战经验，足以应付战斗的压力。这两个较稚嫩的军团可能都被经验更丰富的军团夹在中间，全军的两翼可能都是有经验的军团。恺撒的5名军团长和财务官各自负责指挥1个军团，“好让每个人都能证明自己的勇气”。恺撒本人的位置是在右翼，他认为那里的敌人最弱，最有可能溃败。战斗开始得很突然，双方都没有按照惯例使用投射武器，而是直接冲杀起来。恺撒成功地突破了敌人左翼，但

身陷于激战中，无暇控制战场的其他区域。日耳曼军右翼开始将罗马军左翼逼退，幸亏年轻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他是骑兵指挥官，机动性强于主战线的其他军官）果断采取行动，挽救了全军。克拉苏命令第三线部队上前，他们恢复了之前的阵线。不久之后，日耳曼军左翼的颓势在全军中滋生了恐慌情绪，导致全军开始溃逃。恺撒亲自率领骑兵追击敌人，这场追杀既坚决又无情。后来一份史料记载的可能就是这场战斗，据说有一群日耳曼人殊死抵抗，于是恺撒故意网开一面，让他们逃跑，因为屠戮逃跑的敌人更轻松。阿里奥维斯图斯本人逃脱了，此后就从历史中销声匿迹。他的两个妻子（其中一位是诺里库姆某位国王的妹妹）和一个女儿就没有那么幸运，在混乱的大屠杀中殒命。另一个女儿则被俘虏。即便是一些逃过了莱茵河的日耳曼人也遭到了其他部落的攻击。据说在河边等待与在高卢亲属会合的苏维汇人返回了自己的家园。让恺撒非常高兴的是，他率领的部队幸运地找到了瓦列里乌斯·普罗基鲁斯，将他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恺撒声称，与瓦列里乌斯·普罗基鲁斯重逢给他的快乐与胜利本身一样多。这情感肯定是真诚的，但这个故事也有助于证实恺撒忠于友人的美名。普罗基鲁斯无疑更加高兴，因为他告诉朋友们，日耳曼人曾三次询问占卜者，是否应当将他活活烧死，幸亏占卜者三次都给了否定的答复。另外一名被俘的使节商人梅提乌斯也得到解救，毫发未伤。[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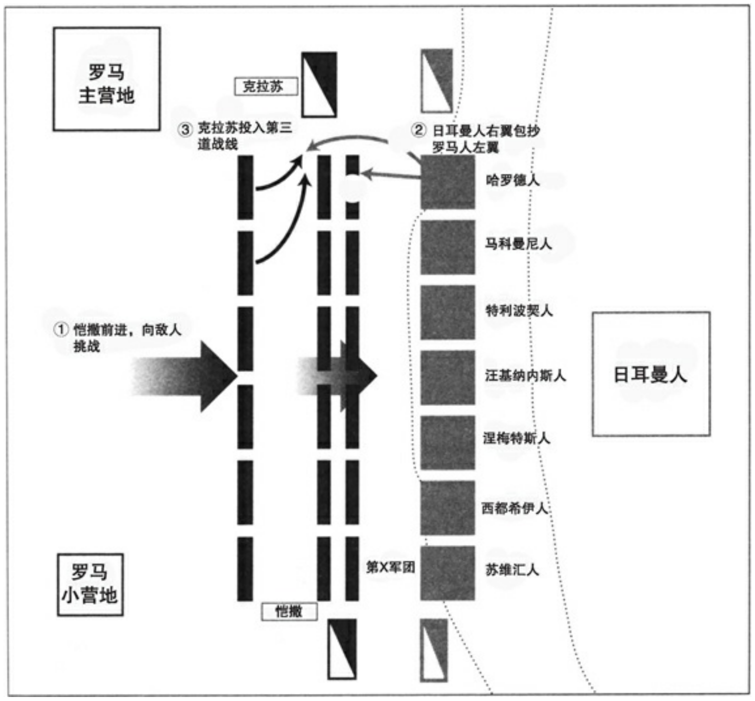


图**5** 与阿里奥维斯图斯交战

作战季节行将结束，用恺撒自己的话说，他“在一个夏季完成了两场宏大的战争”。在他抵达行省之前，或许不曾预料到会打这两场战争，但他紧紧把握住了机会。至少在当下，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高卢，在近期也会一直关注那里。这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恺撒都待在内高卢，履行作为罗马总督的行政与司法职责，同时密切关注着罗马的动向。他的军队留在塞广尼人领地，在那里过冬。他们将做好准备，来年春天便可以继续深入高卢征战。[42]

---

[1] Cicero，*ad Att.* 1.19.

[2] Caesar，*BG* 1.6-7，Plutarch，*Caesar* 17.

[3] Caesar，*BG* 1.2.

[4] Caesar，*BG* 1.2-3，18，cf.C.Goudineau，*César et la Gaule* （1995），136-137.

[5] Caesar，*BG* 1.4，Pliny，*NH* 2.170 记录了罗马大使与一位苏维汇国王的会面，这位国王可能就是阿里奥维斯图斯；另见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pp.169-

170.172，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pp.114-117。

[6] For a discussion see T.Rice Holmes，*Caesar's Conquest of Gaul* （1911） pp.218-224，and H.Delbru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ume 1：*Warfare in Antiquity* （1975），pp.459-478.

[7] Caesar，*BG* 6.11；关于罗马人希望盟友部落在行省边疆，见Dyson （1985），pp.170-173。

[8] 即现代的马赛，最初是希腊人的殖民地。

[9] Caesar，*BG* 1.5-6；关于聚焦于巴尔干，见Goudineau （1995），pp.130-148；关于赫尔维蒂部落的人数和队伍的规模，见Holmes （1911），pp.239-240，Delbruck （1975），pp.460-463。

[10] 高举轭架或以三支长矛形成拱状，令失败者从下面走过以示屈服的仪式。

[11] Caesar，*BG* 1.7-8，cf Appian，*Mithridatic Wars* 99，Plutarch，*Crassus* 10.

[12] Caesar，*BG* 1.8.

[13] Caesar，*BG* 1.10.

[14] Caesar，*BG* 1.10-11，Cicero，*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28，Suetonius，*Caesar* 24；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98.

[15] Caesar，*BG* 1.11，16；关于罗马军队的后勤，包括奴隶和随军人员的数量，见P.Erdkamp，*Hunger and Sword*：*Warfare and Food Supply in Roman Republican Wars 264-30 BC* （1998），J.Roth，*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264 BC-AD 235* （1999），A.Labisch，*Frumentum Commeatusque.Die Nahrungsmittelversongung der Heere Caesars* （1975），and 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 （1996），pp.287-296。

[16] Caesar，*BG* 1.12.

[17] Caesar，*BG* 1.13.

[18] 卢基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在前107年与马略一同担任执政官，被赫尔维蒂部落的提古里尼氏族击败阵亡。

[19] Caesar，*BG* 1.13-14.

[20] Caesar，*BG* 1.15-16.

[21] Caesar，*BG* 1.16-20，cf.Goudineau （1995），p.138.

[22] 即今天的法国南部城市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23] 夜战的威胁和困难，见Arrian，*Alexander* 3.10.1-4.

[24] Caesar，*BG* 1.21-22；关于此次战役，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128-130。

[25] Caesar，*BG* 1.23.

[26] Sallust，*Bell.Cat.* 59，Plutarch，*Crassus* 11.6；关于指挥官在战前和战斗期间的作用，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131-163；关于战斗前的演讲，见M.Hansen，'The Battle Exhortation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Fact or Fiction'，*Historia* 42 （1993），pp.161-180。

[27] 关于战役，见Caesar，*BG* 1.24-26；关于这一时期战役的性质，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171-247。

[28] Caesar，*BG* 26-29.

[29] Caesar，*BG* 1.30-33.

[30] Caesar，*BG* 1.34-37.

[31] Caesar，*BG* 1.39.

[32] Dio 38.35.2.

[33] Caesar，*BG* 1.40.

[34] Caesar，*BG* 1.39-41.

[35] 关于他作为第一个接见帕提亚使节的罗马行政长官而获得的名望，见Caesar，*BG* 1.41，cf.Plutarch，*Sulla* 5。

[36] Caesar，*BG* 1.42-46.

[37] Caesar，*BG* 1.46-47.

[38] Caesar，*BG* 1.48，cf.Tacitus，*Germania* 6；关于日耳曼军队，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42-53。

[39] Caesar，*BG* 1.49.

[40] 关于日耳曼妇女对其丈夫的鼓舞，见Tacitus，*Germania* 7-8。

[41] Caesar，*BG* 1.51-54；关于放日耳曼人逃跑，见Frontinus，*Strategemata* 2.6.3。

[42] Caesar，*BG* 1.54.

十一 “高卢各民族中最勇敢者”：比利时人，前57年

> 他们不准商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他们不准进口葡萄酒或其他奢侈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会削弱他们的精神，减少他们的勇气。
>
> ——恺撒 [1]

> 这整个种族叫作高卢人，对战争如癫似狂……但在其他方面不算头脑简单……因此，若是受到鼓舞，他们便立刻聚集起来打仗，公开且缺乏审慎。因此，如果善用谋略，是很容易对付他们的……
>
> ——斯特拉波，1世纪初 [2]

前58年至前57年冬，恺撒又组建了两个新军团，番号分别是第十三军团和第十四军团。他这一次仍然是自行决定征兵，用自己作为总督控制的资金为新军团提供薪饷和装备。就这样在一年之内，他就将自己行省内分配到的军队人数扩充了一倍。有作战经验的军团中的百夫长们得到晋升，并调往新单位。这种做法在军事上很有意义，久经战阵的老兵能够支撑和培养新兵，恺撒在历次战役中始终是这么做的。军官的调动在原先的老军团中造成了空缺，所以必须从军团内部提拔后进或者从外部调来人手。在《战记》中，提拔或奖赏百夫长的理由总是作战英勇。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不管部下的“生活方式或财富，只关心他们是否勇猛”。他的军事保民官和指挥官中的很多人都是受人推荐或出于人情关系而被任命的，在前一个夏季的作战中表现不佳，令人失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因为韦松蒂奥的骚动而被免职。恩主提携门客的关系渗透了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要说恺撒任命百夫长时完全不考虑人情关系，也是不可能的，但他主要关注的显然是个人才干。他的百夫长们肯定相信，有真本事的人一定会得到褒奖。恺撒非常认真地栽培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就像他和其他元老努力记住所有人的名字，以便在广场对其直呼其名地打招呼一样。恺撒与这些军官们之间的关系纽带完全是个人层面上的。百夫长必须身先士卒，因此伤亡率非常高。极高的损失率再

加上恺撒不断扩军，确保了总是会有空缺的岗位需要填补，英勇的初级军官总会有晋升空间。到高卢战争结束时，恺撒军中绝大多数百夫长的初次晋升或提拔至高级军官职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都是由于恺撒的提携。他的军队不只是他碰巧管辖的行省的军队，现在已变成了他的私人军队，提携后进便是这个过程的重要一环。[3]

冬天也是训练的季节。根据罗马的旧传统，指挥官们理应极其严厉，为了遵守死板而无情的纪律，可以随意鞭笞或处决部下。恺撒不是这样残酷的指挥官。他似乎很少鞭笞或处决士兵，仅仅将当逃兵和叛变视为严重罪过。在平静的几个月里，他的士兵们在无须执勤的时候享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据说恺撒曾说过，他的部下即便是“浑身香水味”也会把仗打得同样好。马略治军亦是如此，恺撒可能刻意效仿了自己的著名亲戚，或许他也觉得宽厚待下是符合平民派风格的治军方式。但是，尽管在和平时期非常宽大仁慈，马略和恺撒在战时对官兵的要求却极为严格。在军事行动期间，恺撒要求部下严守铁的纪律、即刻服从命令、娴熟机动。为了保证士兵们能够做到这些，恺撒对军队进行了严格的训练。在这方面，他就是理想的贵族指挥官，因为所有优秀的将领都必须在战前通过严酷的训练来让部队做好准备。恺撒“常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命令部下进入临战戒备状态，尤其是在节日或者雨天。有时他命令部下紧盯着他，不要脱离视觉接触，然后不管白天黑夜，突然溜走，迫使士兵们紧跟上去。他会这样带着士兵们进行长途行军，刻意将那些跟不上来的人累垮”[4]。为了鼓励士兵们达到他的高标准、严要求，他本人必须做出表率。在训练行军和野战中，恺撒亲自带领队伍，他有时骑马，但更多的时候是和普通士兵一样徒步。他的这个姿态是向大家证明，他对别人高要求，但他自己也必须做得到。据普鲁塔克说，士兵们常被他惊呆：

> 他看上去不算特别强健……因为他身材清瘦、皮肤白皙，受到癫痫病困扰……却能承受极大的劳苦，他并不以自己体弱为由沉溺于舒适的生活。恰恰相反，他的军事生活对治疗他的羸弱是一剂良药，因

> 为通过令人疲惫的行军、朴素的饮食、长期露宿户外并忍受各种艰难困苦，他战胜了疾病困扰，锻炼了自己的体魄。他的大部分睡眠都是在马车车厢内或轿子上进行的，所以即便睡觉也不耽误行动。白天，他乘车或乘轿子前往军队驻地、城市或军营，总有一名惯于记录口授内容的奴隶陪伴在他身旁，还有一名佩带利剑的士兵站在他身后。[5]

恺撒向部队讲话的时候，总是称他们为“兄弟们”，从来不说“士兵们”。他和广大将士都是优秀的罗马人，通过杀敌为共和国效劳，顺便也赢得荣耀和战利品。他总是仔细而慷慨地与官兵们分享荣耀和战利品。他们已经打赢了两场大仗。统帅、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逐渐熟悉起来，也逐渐互相依赖，因此也就形成了互信。恺撒还认真地培养士兵们的自豪感和对部队的归属感。他会发放装饰精美的兵器（有的镶嵌金银），极有可能是作为奖励英勇行为的奖品，使受奖者脱颖而出，让他们感到自己与众不同。罗马军事体制始终鼓励士兵们英勇作战，但在恺撒军队中，这种理想被发扬光大到了极致。[6]

这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恺撒都待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因此很多训练一定是由他的军团长、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们监管的。在过去，他曾为内高卢居民的权益摇旗呐喊。在总督任上，他也竭力去争取该地区人民（尤其是贵族）矢志不渝的支持。他的幕僚中有很多高卢血统的公民，其中不少是外高卢部落的贵族。除了在最初战役中表现突出的瓦列里乌斯·普罗基鲁斯之外，《战记》后来还提及了其他一些人。高卢史学家庞培·特洛古斯的父亲也作为恺撒的幕僚效力，负责处理他的一些信函。恺撒在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他可能是处理恺撒大量书信的文书员之一。据说，即便是骑马检阅部队的时候，恺撒也能同时向两名文书员口授书信。他的很多信是写给罗马的重要人物的，有时还会派他的亲信巴尔布斯去拜访这些大人物。当然，也有很多人给恺撒写信。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旅行到北方，请求恺撒的帮助与提携，比如到他的帐下任职。恺撒总是乐于卖人情，差不多总会同意别人的请求。但总的来讲，来找他的人主要还是在其他地方碰壁的失败者或

者没有好背景的人。[7]

在社交生活中，恺撒设宴款待当地贵族，也受到他们的招待，其中很多人获得罗马公民权只是这一代人的事情。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定期在两个宴会厅招待客人，其中一个坐满了他的军官和希腊籍幕僚人员，另一个则用来款待非军人的公民。有一次在梅迪奥拉努姆（现代的米兰），他在一个叫作瓦列里乌斯·梅托的人家中用餐。有一道菜是芦笋，调味品误用了苦味的没药，而不是惯常的橄榄油。恺撒把这菜吃了下去，面不改色，也没有说什么。他的伙伴们却大声抱怨，遭到了他的批评。恺撒毕竟出身于罗马最古老的门阀家族之一，是一位完美的客人，也是一位活泼的伙伴。罗马精英阶层流行涉及哲学或文学的机智聪颖的谈话，而内高卢的贵族能否有这样的雅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当地贵族举办的宴会无法企及罗马的那种风雅，恺撒麾下许多军官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因此一定能为他带来不少消遣。恺撒与诗人卡图卢斯的父亲也很友好，其家族来自波河河谷。卡图卢斯去了罗马，在仕途混了一段时间之后，放弃了从政，专心写诗。他的很多诗作的主题是爱情，但也有不少是对当时权贵的尖刻攻击，攻击对象包括加图和恺撒。他在一首诗中将恺撒描绘为“贪婪无耻的赌徒”，另一首诗则更为恶毒，暗示恺撒与其指挥官之一马穆拉有同性恋关系：[8]

> 可憎的浪荡子们，娘娘腔的马穆拉和恺撒交情甚笃，这不足为怪。一个来自罗马城，一个来自福尔米亚，像两点污迹，深深地互相沾染，永远洗不干净。患有同样的病，如同双胞胎，两人同榻，都是三脚猫作家，都贪恋通奸，在情场既是对手也是搭档。这对可憎的浪荡子交情甚笃。[9]

恺撒勃然大怒，但并没有和诗人的父亲断交。卡图卢斯道歉之后，恺撒立刻邀请他赴宴。[10]

似乎没有人相信恺撒和马穆拉是情人关系，马穆拉不得人心，在卡图卢斯的其他一些诗中也是挖苦攻击的靶子。在关于尼科美德四世的传

闻之后，恺撒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但是人们普遍相信，恺撒在高卢期间仍然继续过着风流洒脱、寻花问柳的生活，这肯定是真的。多年后，在恺撒的凯旋式上，他的士兵们会在歌谣中唱道，他从罗马借了许多钱，全都挥霍到他的高卢女人们身上。在塔西佗关于公元70年莱茵兰某次叛乱的记述中，我们读到一位高卢贵族声称自己是恺撒的后代。据说恺撒在征战高卢期间曾与此人的曾祖母有过一段露水情缘。很难说清恺撒在这些年里的情妇们都是谁，但大多数应当是行省内的贵妇名媛，或许有些也来自其他地方的部落。有些女人，尤其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或许受过教育，能够与他进行高水平的对话，之前他常在罗马的已婚妇女中寻求这种乐趣。然而，有些女人仅仅是满足恺撒的肉欲而已。[11]

比利时人

恺撒将自己的军队留在塞广尼人领地过冬，说明他对高卢事务的干涉并不是短期的。他自己也承认，某些部族领袖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觉得如果驱逐阿里奥维斯图斯后却被一位罗马总督主宰，他们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年冬天，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恺撒听到了一些传言和报告，声称高卢北部的比利时部落躁动不安，图谋对罗马不利。高卢/凯尔特民族的一些酋长也怂恿比利时人起事。据恺撒说，这些酋长野心勃勃，企图自立为王；但他们判断，在被罗马控制的地区掀起革命非常困难。比利时人也感到，一旦罗马人控制（《战记》中用的词是“平定”）了凯尔特人的高卢中部地区，那么罗马军队很快就能出征讨伐比利时人。鉴于随后的形势，比利时人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恺撒确实是这么打算的。前一年，他率军跨过外高卢边界，先是逐退了赫尔维蒂人，然后赶走了阿里奥维斯图斯，他已经向世人证明，罗马愿意帮助自己的盟友干预高卢事务。在过去，罗马的外高卢行省在其边境周围维持了一圈友好的邦国。恺撒决定将罗马的势力范围继续往北推进，他这么做的理由在于必须防止其他势力主宰该地区并最终威胁外高卢行省的安

全。这些动机对一位罗马总督来说是完全正当的，即便恺撒以极端咄咄逼人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行为仍然没有超越一位共和国行政长官的本分。庞培在征讨东方时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但他和恺撒的军事行动与之前许多罗马将领的行动只有规模上的区别。其中很少有人因为自作主张而在事后受到质疑，更少有人受到惩罚。在《战记》中，恺撒声称比利时人筹划并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挑战罗马的权威。恺撒实际上也是先发制人。根据当时的标准，双方的举动都是有道理的。[12]

恺撒使用的“比利时人”概念很模糊，用来指代居住在凯尔特各部落以北的所有民族。比利时地区比现代的比利时大得多，不仅包括荷兰的一部分，还包括法国北部。“真正”的比利时人似乎生活在今天的加来海峡省和上诺曼底的部落。恺撒认为所有比利时人都属于高卢种族，但也说其中很多人是日耳曼定居者的后嗣。上文已述，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区别并非古代史料说的那样泾渭分明，但恺撒这番话也许有一定的真实性。1世纪末的时候，塔西佗也相信内尔维人和特雷维里人都是日耳曼人。恺撒提到比利时人与日耳曼人的关系，或许是为了让读者觉得比利时人更具危险性，因此更需要罗马的“平定”。他还特意提到，比利时人的一个部落吹嘘自己是唯一一个曾成功抵抗迁徙的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民族，而另一个部落则声称自己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都是罗马的死敌）的后代。比利时人比凯尔特各部落更好战，部分是由于他们离罗马的影响范围更远。古代作家们相信，文明生活的奢侈令民族软化，而简朴的生活方式能够保持天然的美德与勇气。考古发掘证明，罗马葡萄酒在高卢北部比在离贸易路线较近的地区少见得多。据说内尔维人禁止进口葡萄酒，但其他的部落贵族很喜欢葡萄酒；拥有葡萄酒，哪怕只是很少量，也能提高他们的地位。我们对高卢北部设防城镇的了解比对凯尔特各部落市镇的了解要少得多。但一般来讲，高卢北部的城镇似乎较小，发展程度也较低。有些部落由国王统治，有些国王还很强大；在其他部落，贵族议事会的地位更重要。据说仅仅在一个世代之前，有一位君主控制了比利时人的大部分地区和不列颠部分地区。[13]

在一位领袖统治下的政治统一已经不复存在，但比利时各部落似乎很愿意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抵御他们眼中罗马人的威胁。冬季，他们互相交换了人质，同意组建一支联军，每个部落提供固定数量的武士。联军将由苏埃西翁人国王加尔巴指挥，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其他领袖都认可他的才干。在作战季节开始之前，恺撒开始集结自己的兵力，命令军团长昆图斯·佩蒂乌斯带领2个新建的军团与主力部队会合。恺撒本人则留在内高卢，一直等到春暖花开、粮草充足之时，才动身北上。他立刻要求各同盟部落向他报告北方的局势，并得知比利时人正在备战。罗马军队开拔北上，恺撒以他惯常的迅速催促官兵前进。不到两周的时间，他们便接近了雷米人的地界。雷米人是第一个被认为属于比利时人而非凯尔特人的部落。雷米人的使节向恺撒保证，他们不曾与罗马为敌，并当即答应了恺撒的要求：交出人质、提供粮草。他询问使节，他可能会遇到多少武士。使节为他提供了准确的比利时各部落人数的清单。贝洛瓦契人许诺提供6万人，苏埃西翁人和内尔维人各出兵5万，莫里尼人提供2.5万名士兵，阿杜亚都契人1.9万，阿特雷巴特人1.5万，安比亚尼人和卡雷提人各有1万名武士，而另外6个部落一共出兵5万人，因此总数是28.9万名武士。雷米人提供了这些数字，恺撒仔细地将其记录在《战记》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否相信这些估算数字。从《战记》的叙述看，比利时联军的兵力的确特别雄厚（但尾大不掉），规模可能比罗马军队大很多。恺撒要确保比利时人各部落不能将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他让狄维契阿库斯指挥埃杜依人袭击贝洛瓦契人，让后者不得不保留兵力来保卫自己的土地。[14]

雷米人与苏埃西翁人有很近的血缘关系，遵守相同的风俗和法律，有时接受同一位领袖的统治。雷米人如此积极地加入罗马人那一边，究竟是由于他们很务实地承认自己没有力量抵抗突然杀到的恺撒，还是由于和其他部落的竞争与敌对关系，这很难说得清。雷米人是比利时联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联军袭击了雷米人的主要城镇比布拉克斯（可能是现代的老拉昂）。恺撒已经渡过埃纳河（位于雷米人的边界），并在河

北岸扎营。他在南岸留下一支部队，由军团长萨比努斯指挥，建造了一座堡垒，以保护桥梁。比布拉克斯就在8里之外，其领袖——率领代表团面见恺撒的酋长之一——送来消息称，除非得到援助，否则他坚持不了多久。恺撒命令他的努米底亚、克里特和巴利阿里轻装部队在送消息的信使的引导下，借夜色掩护进入了比布拉克斯。比利时人攻城的办法很简单——投石射箭将守军压制住，同时武士们举着盾牌冲上去破坏城墙。恺撒派去的技艺娴熟的弓箭手和投石手让比利时人的攻城极其困难，于是他们放弃了攻城，满足于在周边地区烧杀抢掠，纵火烧毁了一些小村庄和农场。然后他们去对抗恺撒，在离罗马阵地2里的地方扎营，两军隔着一道山谷。据恺撒说，比利时人营地中的篝火蔓延约8里的距离。[15]

一连几天，双方互相观察，都没有轻举妄动。两军的骑兵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恺撒据此判断，新敌人的战斗力不强，他的部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完胜敌人。他的营地居高临下，背后是埃纳河。他将6个有作战经验的军团部署在山坡上，让2个最近征募的军团看守营地。这种策略和之前与赫尔维蒂人作战时的部署相同。军队两翼没有自然屏障，于是罗马军团士兵们在自己两翼各挖掘了一条长400步（约130码）的堑壕，堑壕与主战线呈直角。每条堑壕的末端都有小型堡垒，部署着轻型投石机或蝎弩，这种武器能够以极其猛烈的力量和极高的精准度发射重型弩箭，而且射程远远超过比利时人拥有的任何投射武器。苏拉曾经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保卫自己的侧翼，以应对兵力远胜于己的敌人。比利时人要想正面进攻罗马阵地，必须在坡度缓和的山坡上攀登，而罗马人的这种阵地优势在前一年比布拉克特附近的战役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对比利时人来说更糟糕的是，两军之间的谷底有一条小溪和一片沼泽地。这些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会拖慢进攻方的脚步，导致其战线发生混乱。防守方不大可能会给进攻方时间停下来重新整队，以便继续前进。[16]

恺撒的阵地固若金汤，完全可以击退哪怕是最猛烈的进攻。但比利时大军没有冲过来送死的意思，只是在山谷另一侧排兵布阵，等待罗马人穿过沼泽地来吃瘪。占据了极好地形的指挥官们都要面对这样的风险，那就是假如他的地形优势太明显，敌人就没有兴趣来主动交战。双方都派出了骑兵，罗马的同盟骑兵占了一点点上风，恺撒将他们撤回。恺撒认识到今天不会发生全面对抗，于是命令部下回营休息。比利时指挥官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于是派遣一支部队渡过埃纳河，要么是企图占领保护桥梁的罗马堡垒以威胁罗马军的补给线，要么是打算劫掠恺撒的新盟友雷米人的土地，以转移他的注意力。桥梁处的罗马前哨阵地报告了这个新威胁，于是恺撒亲自率领他的努米底亚骑兵和其他轻装部队，返回河流南岸。比利时的少量武士渡河之时，被恺撒抓了个正着。恺撒的骑兵将已经抵达南岸的比利时武士包围并消灭，同时使用投射武器的部队则将正在涉水的比利时人射倒在地。比利时人损失很重，不得不撤退。

部族武装很难长时间作战，因为他们的后勤供给往往很弱。武士们和陪同他们上战场的妻子与仆人能够携带的粮食是有限的。在夏季，常常能够从乡村获得粮草，但以这种方式攫取的粮草数量不会很多，而且如果军队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过久，这些粮草就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尽管恺撒给出的数字值得怀疑，但前57年比利时军队规模的确特别大，他们的补给问题也特别严重。比利时人对比布拉克斯的攻击失败了，渡河摸到罗马人后方的企图也被挫败了。恺撒只有在比利时人处于严重劣势的时候才肯出战。他无疑会告诉部下，敌人不肯直接攻击罗马阵地，说明他们被吓坏了。加尔巴和比利时酋长们也完全可能向他们的武士们保证，罗马人待在山顶上的堑壕里不肯下来应战，来证明他们畏惧比利时各部落的威力。对比利时人来说，战事到目前为止不算特别顺利，但他们向新敌人展示了自己的雄厚兵力和自信，而恺撒也不敢贸然攻击他们的主力部队。加尔巴和其他领袖可能觉得他们已经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这或许已经足以震慑罗马人，令其不敢继续进犯。部落间的战争常常带

有强烈的表演意味，因此我们不一定要相信恺撒的说法，将比利时人的下一步行动视为完全务实的举动。但务实的因素是无可辩驳的，因为比利时军队的粮草几乎已经耗尽，不能再长时间待下去了。另外，有消息传来说，埃杜依人遵照恺撒与狄维契阿库斯的约定，进逼贝洛瓦契人领地的边界。比利时的高级酋长会议决定，解散联军，各自回家，每个部落回到自己的领地，在那里可以较轻松地得到供养。酋长们宣誓约定，在随后几个月内，若恺撒进攻任何一个部落，其他部落必须施以援手。于是，庞大的联军解散了。解散也不是以井然有序的方式进行的，各部落和群体在夜间收拾行囊，各自离去了。[17]

罗马前哨据点报告称，夜间喧哗嘈杂，比利时军队撤退了，但恺撒怀疑这是个圈套。前一年奇袭赫尔维蒂人的失败或许让他对夜间行动愈发谨慎。黎明时，他的侦察兵证实敌人确实是简单地各自散去，没有任何掩护殿后的行动。罗马骑兵部队在佩蒂乌斯和科塔的指挥下追击敌人，而拉比埃努斯率领3个军团紧随其后，提供支援。敌人的抵抗非常微弱，大批比利时武士在逃跑时被斩杀或俘虏。比利时大军暂时瓦解了，要过一段时间各部落才能再次将力量集中起来。恺撒要确保他们没有时间重新联合。次日他便率军进攻苏埃西翁人，其领地与雷米人接壤。他一番强行军，抵达了苏埃西翁人的一座主要城镇——新堡（与恺撒提及的绝大多数比利时城镇一样，新堡的具体位置也不详，但极可能在现代的苏瓦松附近）。根据报告，新堡无人把守，于是恺撒率军径直发动进攻。新堡城内的武士的确很少，但罗马人没有云梯，也没有其他攻城器械，因此少量守军便足以将他们打退。此次受挫后，恺撒确保做好攻城准备，命令士兵们建造土坡、攻城塔和活动防盾，以便他的士兵能够攀登和翻越城墙。新堡还没有受到封锁，之前被解散的一些武士来到城内避难。但他们士气低落，看到罗马攻城武器的景象更是令他们魂飞魄散。苏埃西翁人举手投降，由于雷米人替他们说情，因此获得了有利的和平条件。他们交出了一些来自世家大族的人质，包括加尔巴国王的两个儿子，并交出了一些武器，数量可能不多，只是象征性地缴械投

降。[18]

既已占了上风，宜将剩勇追穷寇，于是恺撒开始攻击贝洛瓦契人。贝洛瓦契人的抵抗很弱，很快也投降了。这一次，埃杜依人的狄维契阿库斯为贝洛瓦契人求情，说埃杜依人与贝洛瓦契人世代修好。贝洛瓦契人前不久对罗马的敌意被解释为一些酋长的过错，他们把埃杜依人与罗马的盟约视为奴役。这些酋长已经逃到了不列颠，再也不能影响部落政策。恺撒很乐意接受对方的恳求，以宽大的条件接受了贝洛瓦契人的投降，但他要求对方交出600名人质，这显然超过了惯常的标准。贝洛瓦契人如数交出了人质。恺撒乐于接受贝洛瓦契人投降，这部分是由于他想给狄维契阿库斯和埃杜依人一个面子，部分是因为他希望尽可能分化敌人，削弱敌人的联盟。人质如此之多，差不多所有苏埃西翁人的贵族家庭都有成员被送到恺撒军中，这显然是为了确保苏埃西翁人不再兴风作浪。《高卢战记》从头到尾常常提及人质，但恺撒从来没有解释，假如有部落背弃誓言，那么它之前送来的人质会怎么样。如果这些人质在这种情况下不被处决，就很让人意外了。恺撒就这样在处置了两个强大部落之后，转而对付较弱的安比亚尼部落，随后它也迅速投降了。年初比利时人集结的庞大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已经被打败，现在恺撒占了上风。但是，轻松得胜的日子结束了，敌人的抵抗越来越顽强。[19]

桑布尔河战役

恺撒转向西北方，讨伐内尔维人，这是仍然在抵抗他的最大部落。

3天后，罗马军队离桑布尔河还有大约10里，俘虏称内尔维部落军队就在河对岸。阿特雷巴特人和维洛曼杜伊人与内尔维人结盟，另一个部落阿杜亚都契人则在赶来的途中。据雷米人的估计，在这年夏季的联军中，内尔维人、阿特雷巴特人和维洛曼杜伊人一共出兵7.5万人，而恺撒对内尔维人的兵力高估了1万人。正如上文所述，这些数字的可靠性都是存疑的，而且他们在之前的作战中一定已经损失了一些人马，何

况还有一些武士尚未归队。恺撒的8个军团可能有3万～4万人，还有数千名骑兵以及同等数量的轻装部队。内尔维人及其盟军的兵力至少与恺撒相当，或许比恺撒的兵力强，但应当没有达到恺撒兵力的两倍。比利时人决心死战到底，已经将妇孺和其他非战斗人员疏散到难以接近的沼泽地躲避。恺撒军队中的一些高卢人和比利时人（作为盟友或人质）也偷偷向内尔维人通风报信。这些奸细告诉内尔维人，根据恺撒惯常的行军顺序，每个军团独立行动，守卫自己的辎重。这意味着作战部队被分割为8个主要队伍，其间夹着由仆役、大车和役畜组成的笨重队伍，很难组成战斗队形。[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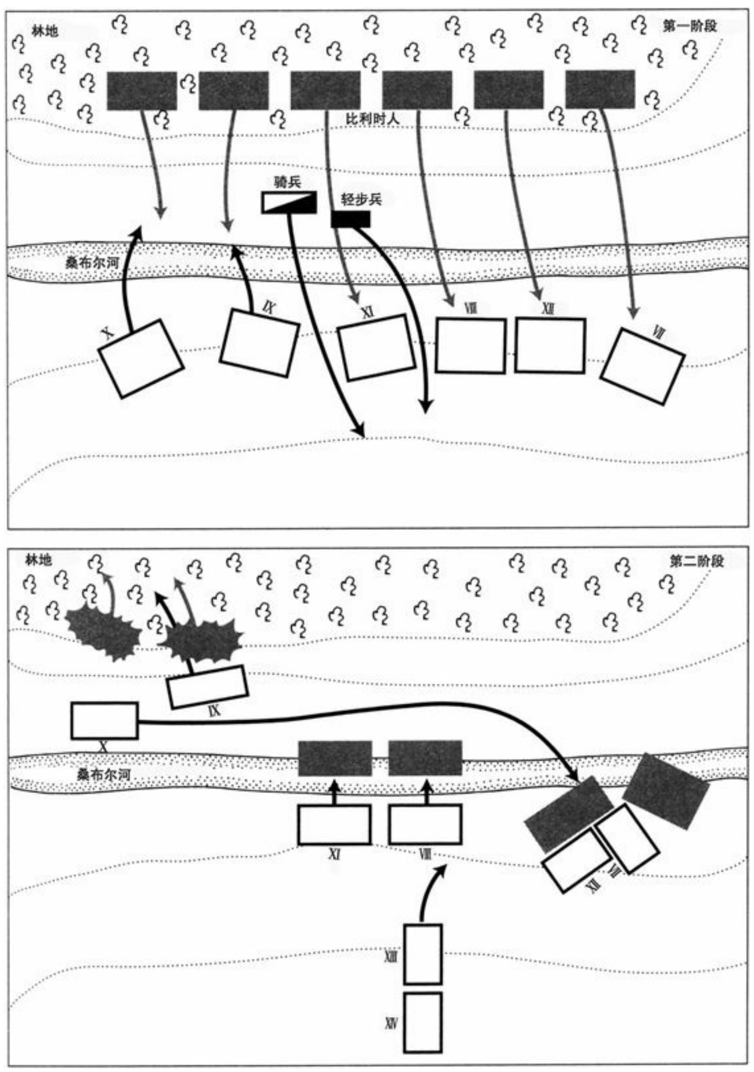


图6 桑布尔河战役

这种队形让罗马人在行军时很脆弱，而内尔维人仔细挑选了战场。和以往一样，我们对此次战役的具体地点也不清楚，但应当是离莫伯日[21] 几里远的地方。内尔维人可能曾经在这个地点击败过其他入侵者。他们显然知道恺撒会在何处渡河，说明他走的是一条很常用的道路，各部落的贸易活动与行军都常用这条道路。河两岸是低矮山丘，在这个季节，河水只有约3英尺深，所以很容易渡过。在河对岸，山谷一侧有约200步的开阔地，其他地方林木繁茂，武士们可以藏身其中。在罗马人这一岸，许多道茂密的高树篱将地形切割得四分五裂，内尔维人故意培植了这些树篱，以阻滞敌人骑兵。树篱既阻滞行动，也遮挡视线，意在向侵袭者发出这样的信息：他们一旦离开树篱地带，就将遭到强有力的抵抗，而抵抗他们的部落对自己的赫赫武功非常自豪。他们打算给恺撒一个下马威，一旦罗马军团后面的辎重队伍进入视野，就发动全面猛攻。[22]

俘虏（可能是被罗马的巡逻骑兵或在主力部队之前行动的侦察兵抓来的）已经向恺撒发出警告，内尔维人将顽强防守渡口。于是，他改变了行军队形，采用了在遇敌危险时的标准队形。打头阵的是骑兵和轻装部队；随后是6个有作战经验的军团，不带辎重，以集团形式前进；2个新建的军团负责殿后。这一天，先锋部队是第十军团，随后是第九、第十一、第八、第十二和第七军团。一群百夫长跟随着侦察队前进，负责选择和标定夜间扎营的地点。罗马军队在野战时惯于修建行军营地，挖掘堑壕以保护营地，并用挖出的泥土筑墙，相当于现代步兵在行军结束时掘壕据守。营地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建成，一旦建成，就不必害怕敌人突袭，并且营地的布局设计是有定规的，所以各单位都知道自己的位置。百夫长负责在临近河流的山丘选择一个地点。主力部队开始抵达后，骑兵和轻步兵涉水过河，在敌人占据的那一岸构成掩护。内尔维部族武装的主力隐藏在树丛中，但有一些群体冲了出来，与罗马人发生小规模交锋。内尔维人的骑兵极少，因此罗马的辅助部队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打得很轻松，但也小心地避免追击过远而进入树林。罗马各军团抵

达后，便开始建造营地，士兵们放下背包，将头盔、盾牌和标枪堆起来，但在挖掘土方时一般还穿着铠甲。每一位军团长都监督着自己指挥的军团，因为恺撒指示他们在修建营地时与部下待在一起。这可能是一道长期有效的命令。可能有少量全副武装的士兵被派去担任警卫，但并没有做很大努力去保护干活的人们免遭敌人的全面进攻。

前一年，恺撒曾在离阿里奥维斯图斯军队很近的地方建造营地，当时他让各军团的第一线和第二线士兵摆好作战阵型，面向敌人，同时第三线的大队负责施工。拿破仑和其他很多评论家批评恺撒这一次没有采取类似的警戒措施。恺撒已经知道敌人聚集在河对岸某处，或许也能看到自己的骑兵和轻步兵在对岸与敌交战。内尔维人及其盟军近在咫尺，因此有可能发动进攻，但恺撒或许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一天已经过去不少时间，但敌人却仅仅对他的前哨做了一些骚扰。几周前，他面对更为强大的比利时联军时，敌人不肯越过地形复杂的地域来进攻。因此，他觉得河流应当是足够安全的屏障了。如果让很大一部分士兵保持武装戒备状态，那么修建营地的进度就会放慢。前58年，只有第三线的大队负责施工，他们只能建造仅可容纳2个军团的营地，而无法容纳全军。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粗心大意，或许由于在最近几周内轻松地连续击败三个敌人，恺撒冒险让全军投入营地施工，而没有为其提供保护。这个决定险些酿成大祸。[23]

比利时人在等待进攻时机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严明纪律性。军队的指挥官们（最高统帅是一个叫作博铎纳图斯的内尔维酋长）同意，必须等到罗马辎重队伍出现，才发动进攻。尽管罗马辎重队伍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紧随打头阵的军团出现，但武士们保持镇静，一直等到罗马全军的辎重队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他们才离开了藏身的树林，开始前进。罗马的辅助骑兵和轻步兵无力抵抗如此猛烈的攻击，很快败退。在林木掩护下，比利时各部落队伍组成了战线，潮水般涌下山坡，冲过河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队形发生了一些混乱，河对岸的

树篱或许更进一步地破坏了他们的秩序。即便如此，他们的战斗准备也比罗马人充分得多。罗马人匆忙抛下手头的活计，手忙脚乱地组成战斗队形。针对赫尔维蒂人和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战役都是事先精心准备的，花了很长时间来排兵布阵，并鼓舞士兵们奋勇拼搏。其实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大规模交战都是如此。这一次就大不相同了："恺撒不得不在同一时刻做许多事情：升起军旗，这是命令官兵们各就各位的讯号；吹响军号，召唤正在干活的士兵们；召回离开营地去寻找修建壁垒材料的士兵；命令士兵们组成作战队形；向士兵们讲话鼓气，并发出作战命令。"[24]

恺撒没有三头六臂，他后来赞扬了自己的军团长，他们没有坐等他的指示，而是积极主动地开始组织离他们最近的部队。同样，士兵和百夫长们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开始就近组成混编单位。碰巧在一起的人，不管先前属于什么单位，立刻集合起来。战线构成的速度快得惊人，尽管战线没有像往常那样整肃威严（官兵们没有时间取下盾牌的皮套，也没有时间将羽饰安装到头盔上），但足以抵抗敌人。如果放在前一年，部队能否如此妥当地应对这样的危机，是很值得怀疑的。毕竟在那时候，军队和统帅之间还很陌生，还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只有通过训练才能形成这种凝聚力），也没有足够的自信（只有胜利才能带来自信）。恺撒骑马巡视了每一个军团，先去了他最心爱的第十军团，它位于参差不齐的战线的左翼。恺撒鼓励了他们几句，要求他们保持冷静，记住自己久经考验的勇气。比利时人（在这一翼主要是阿特雷巴特人）已经冲到了不到100码之外，于是恺撒命令第十军团冲锋。第十军团的冲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轮标枪齐射，阿特雷巴特人被打得踉跄着停住脚步。此处的山坡主要对罗马人有利，敌人因为刚才的快速冲锋已经疲惫了，于是第十军团和邻近的第九军团很快将敌人赶下了山坡。在中军，第十一军团和第八军团也站稳了脚跟，将维洛曼杜伊人逼退到河边。比利时军队的右翼和中路开始瓦解，第十军团和第九军团甚至渡过了桑布尔河，将敌人驱赶到远方的山坡上。但是，比利时人的主要力量

以及博铎纳图斯指挥下的大部分内尔维人，向罗马军右翼猛扑了过去。罗马军官们很难判断战局的发展情况，因为高高的树篱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但恺撒凭借本能或敏锐的洞察力，策马奔向了己方右翼：[25]

> 向第十军团讲话之后，恺撒匆匆奔向右翼，他看到那里的官兵受到沉重压力，第十二军团的单位挤为一团，士兵们摩肩接踵，施展不开，难以作战。第四大队的全部百夫长都阵亡了，旗手也战死了，他的军旗被敌人缴获；其他大队的百夫长非死即伤，包括首席百夫长[26]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巴库鲁斯，他是一位勇冠三军的猛士，身负多处重伤，已经无法站立；其他士兵精疲力竭，有些处于后方的士兵已经放弃战斗，开始撤离到敌人的武器射程之外；敌军正面一步一步地在山坡上推进，并向罗马军两翼施压。恺撒看到形势十万火急，也没有其他预备队，于是从后方阵线的一名士兵手中夺过盾牌（恺撒来的时候没有带自己的盾牌），冲到最前线，指名道姓地呼喊百夫长们，鼓舞士兵们，命令战线向前推进，好让部队有足够的空间挥剑砍杀。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恢复了他们的斗志。即便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每一名士兵都争先恐后，免得在将军面前丢脸。敌人的进攻被阻滞了一段时间。[27]

罗马将领一般会身处战线最前方的背后，受到敌人投射武器的威胁，也有勇敢的敌人士兵会企图斩杀罗马指挥官以扬名立威。所以，罗马将领承担着普通士兵的部分风险，这有助于巩固领袖与士兵之间的纽带。这一次，恺撒更进一步，身先士卒，带头砍杀，表现出极大的个人勇气。这种勇气与指挥官所需的更高层次的技能一样，都是贵族美德至关重要的方面。这种与士兵们并肩死战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证实了恺撒与官兵之间逐渐增强的信任。他抵达前线后，便鼓舞身边的官兵，呼唤各位百夫长，称普通士兵们为“弟兄们”，并改良了部队的部署。传说庞培常身先士卒地拼杀，用剑或矛斩杀敌人，表现出莫大的英雄气概。亚历山大大帝打仗的方式也是这样。庞培听到有人将他与亚历山大相提并论，心花怒放。据说恺撒本人也是武艺娴熟，但他在书中很少提及自己参加战斗。或许他这是假谦虚，因为他说到自己借了一名士兵的盾牌，读者们会根据这个暗示想象他的英雄气概。但恺撒似乎不想强调自己的勇武，而是集中描写自己作为领袖和统帅的角色。最终，他在书

中承认桑布尔河战役是一场普通士兵的战斗，罗马军团士兵们的决心和纪律赢得了胜利。

在战斗的一个间歇，恺撒重新部署了第十二军团和第七军团，将它们调转回来，形成一个大致呈方形或圆形的阵势，以便抵御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战斗中常常出现暂时停歇，这与好莱坞塑造的战斗场面（双方疯狂地鏖战，每个人都拼命冲锋，与敌人纠缠厮杀，两两单挑，整场战斗几分钟结束）不同。战斗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但肉搏战非常消耗体力和精神；一般是经过若干次短暂的猛烈交锋，双方战线会分开，相隔几码远，双方都抓紧时间喘息一下，积攒足够的斗志再次接敌。恺撒抵达前线的时候，罗马战线正在瓦解，后方的士兵开始溜走。许多百夫长非死即伤，溃败似乎迫在眉睫。他的榜样（无疑还有其他军官的榜样，因为他鼓励百夫长们奋战，并通过军事保民官们传达转换阵型的命令）暂时稳住了前线，但第十二军团和第七军团仍然承受了巨大压力，或许崩溃只是时间问题。[28]

罗马右翼坚持住了，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其他地方。一些比利时人绕过了罗马右翼，冲上山坡去攻击营地。在队伍尾部保护辎重的2个军团发现了这些比利时人。罗马生力部队的抵达令比利时人灰心丧气，鼓舞了那些能看得到他们的罗马人。指挥罗马左翼得胜的拉比埃努斯自行决定派遣第十军团回到河对岸，支援其他部队。第十军团意识到战局不妙，于是匆匆上前，从背后袭击内尔维人。罗马右翼得以向前推进，击退它对面的敌人。与此同时，护送罗马辎重的奴隶甚至也加入了重整旗鼓的骑兵和轻步兵，击退了营地周围的比利时人。内尔维人没有很快让步，很多人坚持战斗了很久。恺撒说有些内尔维武士甚至站在己方的死尸堆上，坚持战斗。这无疑是夸张，但印证了他在特别近的距离亲眼观察到的战况激烈程度。他声称6万名敌军士兵中只有500名武士逃脱，而600名部落领袖中只有3人存活，这些数字无疑有些夸大其词，他《战记》的后来一卷也反驳了这些说法。不管怎么说，内尔维人及其盟友损

失惨重，再也没有决心打下去。他们派来使节，向恺撒投降。恺撒命令他们将来各安天命，停留在自己的疆界之内，不得攻击他人。他还指示周边各部落，不得趁内尔维人虚弱之时发动进攻和入侵。[29]

清扫残敌

在上面这场战斗打响之前，阿杜亚都契人未能赶来与其他部落会师。他们在得知内尔维人战败之后，返回了自己的家园，但并不打算屈服于罗马，而是准备进行顽强抵抗。他们吸纳了来自其他社区的人，决定占据一座有城墙环绕的城镇，它位于一座崎岖山顶之上，具有天然地理优势，易守难攻。他们还搜集了粮草，以防止恺撒封锁他们。守军自信满怀，甚至敢于不断出城攻击在城外扎营的罗马军队。恺撒命令部队围绕着山顶挖掘堑壕、建造壁垒，并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立堡垒，以建立一个封锁圈。封锁圈全长430码，这说明敌人的要塞规模相当小。罗马的各个堡垒内可能部署着轻型投石机，就像之前在埃纳河边用过的那种，很快就打压得守军不敢出城。阿杜亚都契人不能出城，但起初他们对罗马人建造的斜坡和攻城塔还不以为意、十分鄙夷。恺撒告诉我们，阿杜亚都契人嘲讽罗马人为“侏儒”，并补充说所有高卢人都很鄙视意大利士兵的矮小身材。阿杜亚都契人对攻城塔闻所未闻，看到罗马人推着它走上斜坡、逼近城墙时，不禁惊愕沮丧。守军绝望之下，派遣代表来投降，唯一的要求是允许他们保留武器，以免遭到邻居的袭击。恺撒拒绝答应，说他会保护他们，就像他会保护内尔维人一样，将其置于罗马的羽翼之下，并命令周边各部落不准攻击阿杜亚都契人。守军开始从城墙上往下丢弃武器，武器堆最终差不多与城墙等高。[30]

尽管城门已经打开，恺撒部队中只有少数人被允许入内。天黑之后，他命令已经进城的少数士兵也返回营地，因为他担心没有军官监督，这些士兵在漆黑的街道上会为非作歹。军饷很少，只有穷人和在社会上走投无路的人才对参军感兴趣，罗马的大多数军团都有不少罪行较

轻的罪犯和其他不安分的分子，这些人很容易失控。在其他时候，恺撒也会采取类似的谨慎措施。他将城门紧闭，以保护那些已经向罗马投降、信任罗马道义的阿杜亚都契部落族民。但是，有些阿杜亚都契人要么是后悔了，要么是始终不赞成投降。天黑之后，他们便用藏匿的武器和临时拼凑的盾牌武装起来。凌晨，他们冲出城来，攻击他们判断的恺撒防线上最薄弱的环节。罗马人早有准备，哨兵们点燃了预先准备的烽火，这就是命令全军就位的讯号。增援部队赶往受到威胁的地点，攻击者遭到投射武器劈头盖脸地袭击。所有攻击者要么被杀死，要么被赶回城内。次日，恺撒命令全体阿杜亚都契人对背弃和约的恶行负责。他的士兵捣毁了城门，逮捕了城内所有人。此时还能不能以严肃的纪律约束罗马军团的士兵们，很成问题。城内所有人（据恺撒说是5.3万名男人和妇孺）被随军的一群商人买下，将来会作为奴隶出售。在被卖为奴隶之前，大多数女人都可能遭到强奸，这在此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出的价钱的一部分会被分给所有士兵，更大的份额则被分给百夫长和军事保民官们。将俘虏变卖为奴是利润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则是劫掠，但《战记》中极少提及这一点。恺撒说，高卢人有很多圣所，将贡奉神祇的黄金和珍贵物品堆放在公共场合。所有部落都尊重这些圣所，没有人敢从里面偷东西。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恺撒对这种禁忌不以为然，总会将其洗劫一空。他在高卢获得的财富改善了他的财务状况，但他对金钱感兴趣的理由始终是他要用金钱收买盟友、笼络人心，无论是在军中，还是在意大利本土。[31]

击败比利时各部落是又一场伟大胜利，延续了前一年的好运气。如果《战记》在每年冬天发表一卷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罗马人民已经知道了战胜赫尔维蒂人和阿里奥维斯图斯的胜利。现在，新的捷报传到罗马，群众欢呼雀跃。恺撒骄傲地告诉我们，元老院投票决定举行十五天的公共感恩活动，以颂扬他的功绩，这比之前任何一位将军（包括庞培）得到的感恩时间都要久。官方的庆祝活动将他的行动合理化，让企图否认他的职务合法性的政敌难以启齿。但是，罗马的形势并不是完全

按照恺撒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庞培对自己岳父的成功和声望有些不高兴。据狄奥说，庞培开始鼓吹在恺撒五年任期结束前就将他召回。三头同盟似乎即将瓦解。恺撒遇到的下一个威胁并非来自外国敌人。[32]

---

[1] Caesar，*BG* 2.15.

[2] Strabo，*Geog.* 4.4.2 （Loeb translation by H.Jones （1923），p.237）.

[3] 百夫长因作战英勇被提升，见Caesar，*BG* 6.40；Suetonius，*Caesar* 65.1；百夫长的指挥风格和高伤亡率，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 （1996），pp.257-8，cf.Caesar，*BG* 7.51，*BC* 3.99；关于互相竞争、英勇作战，以获得晋升或奖赏，见*BG* 5.44，7.47，50，*BC* 3.91。

[4] 关于突然的行军和纪律松懈，见Suetonius，*Caesar* 65，67；关于马略指挥风格的讨论，见A.Goldsworthy，*In the Name of Rome* （2003），pp.113-136 （or 2004 edn，pp.127-153）。

[5] Plutarch，*Caesar* 17［Loeb translation by B.Perrin （1919），p.483］.

[6] 关于“战友”和镶嵌金银的兵器见Suetonius，*Caesar* 67.2；个人英勇，见Polybius 6.39 and 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264-282。

[7] 关于庞培·特洛古斯，见Justin，43.5.12；关于恺撒骑着马口述，见Plutarch，*Caesar* 17；关于在内高卢过冬时接见请愿者，见Plutarch，*Caesar* 20。

[8] 关于瓦列里乌斯·梅托，见Plutarch，*Caesar* 17；关于宴会安排，见Suetonius，*Caesar* 48；Catullus，29。

[9] Catullus，57［Loeb translation by F.Cornish （1988），pp.67-69］.

[10] Suetonius，*Caesar* 73.

[11] Suetonius，*Caesar* 51；Tacitus，*Histories* 4.55；关于其他攻击马穆拉的歌谣，见Catullus，41，43。

[12] Caesar，*BG* 2.1；庞培军事行动的概括，见A.Goldsworthy，*In the Name of Rome* （2003），pp.169-179 （or 2004 edn，pp.190-201）。

[13] See N.Roymans，*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ingula 12* （1990），pp.11-15，cf.Tacitus，*Germania* 28，Caesar，*BG* 2.4，15，5.12；关于反抗辛布里部落，见*BG* 2.4，关于阿杜亚都契部落是其后裔，见2.29。

[14] Caesar，*BG* 2.2-5；关于数字，见T.Rice Holmes，*Caesar’s Conquest of Gaul*（1911），p.71，and L.Rawlings，‘Caesar’s Portrayal of Gauls as Warriors’，in K.Welch & A.Powell，*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1998），pp.171-192，esp.175，and fn.13.对恺撒给出数字的极其严厉的批评，见H.Delbru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1：*Warfare in Antiquity*（1975），pp.488-494.Delbruck相信，蛮族的战斗力比文明的罗马人强得多，因此始终缩减蛮族的兵力，而夸大恺撒军队的兵力。

[15] Caesar，*BG* 2.5-7.

[16] 关于苏拉用壕沟保护自己的侧翼，见Frontinus，*Strategemata 2*.3.17。

[17] Caesar，*BG* 2.8-11.

[18] Caesar，*BG* 2.11-13.

[19] Caesar，*BG* 2.13-15.

[20] 关于此次战役中内尔维部落的兵力，见Caesar，*BG* 2.16-18，cf.28。

[21] 莫伯日是今天法国东北部城市，靠近法国与比利时的边境。

[22] 关于此地点可能的意义，见Rawlings（1998），pp.176-177；关于莫伯日的推测，见T.Rice Holmes，*Caesar’s Conquest of Gaul*（1911），p.76。

[23] Caesar，*BG* 2.19；cf.T.Rice Holmes，*Caesar’s Conquest of Gaul*（1911），拿破仑的评论见p.77；关于行军营地，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1996），pp.111-113。

[24] Caesar，*BG* 2.20；关于战前的耽搁，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1996），pp.143-145。

[25] Caesar，*BG* 2.20-24.

[26] 首席百夫长是一个军团中最资深的一位百夫长，同时也是最精锐的第一大队的指挥官，还要辅佐军团长。一般的大队有5～8个百人队，而首席百夫长指挥的那个大队兵力更强，拥有约10个百人队，还拥有一些非战斗人员（文书、伙夫等）。在一个军团里，首席百夫长的地位仅低于军团长、军事保民官和营地长官。

[27] Caesar，*BG* 2.25.

[28] 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1996），pp.154-163，esp.160-161，and（2003），pp.155，176，195（or 2004 edn，pp.175，198，219）；关于战斗的性质，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1996），pp.191-227。

[29] Caesar，*BG* 2.27-28.

[30] Caesar，*BG* 2.29-32.

[31] Caesar，*BG* 2.33；关于恺撒不愿意让士兵在夜间进入城镇，见*BC* 1.21，2.12，*African War* 3；关于仪式的献祭，见*BG* 6.17，Suetonius，*Caesar* 54.2。

[32] Caesar，*BG* 2.35，Dio 39.25.1-2，cf.M.Gelzer，*Caesar* （1968），pp.116-118.

十二 政治与战争：卢卡会议

庞培言辞激烈地回答他，并露骨地暗示克拉苏的方向，公开表示他会比阿非利加努斯[1]（被C.卡尔波[2]杀害）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盖乌斯·加图得到了克拉苏的支持；克洛狄乌斯也得到了资助，他和加图都受到克拉苏的怂恿。

——西塞罗，前56年2月15日[3]

诸位元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不赞同的时候，我与他也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但如今他成就斐然，已经改变了你们的意见和情感，那么我不仅与你们的看法相同，还赞颂它。

——西塞罗，前56年5月[4]

恺撒离开罗马已经有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里，罗马并不平静。他担任执政官期间的行动颇有争议，但与后来惊涛骇浪的岁月（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成为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相比，还算和缓。在政治上，很少有恒久不变的东西，在罗马共和国尤其如此。元老们获取或丧失影响力，与旧盟友断交，缔结新盟约；有时弥合旧的嫌隙，但更多的时候是树立新的敌人，以及觉得他们对某些事情的观点需要调整。前59年，西塞罗公开批评三头同盟，促使他们将西塞罗私敌克洛狄乌斯的身份改为平民，以帮助他当上保民官。两年后，元老院投票决定举行公共感恩活动以颂扬恺撒，而此动议最早就是西塞罗提出的。在此之前，演说家西塞罗被流放了（即便恺撒不是流放他的幕后主谋，也肯定接受西塞罗被流放），后来被召回，这一次是得到恺撒的默许后才得以返回罗马。尽管此次流亡对西塞罗个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被他以感情洋溢的语言记录在通信中并公开发表，但他被逐出罗马只是这些年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小事，毕竟没有任何事情、任何人能够躲过攻击。恺撒在这些政治斗争中主要扮演观察者的角色，但他对此密切关注，因为尽管他本人不能去罗马，他仍会受到罗马局势的深刻影响。他顶多只能希望对政治游戏

中的主要玩家们施加影响，因为他肯定控制不了他们。当时的事件并非注定发生、不可避免，其结局也不是命中注定。最后，恺撒的地位（至少是暂时地）得到了巩固，但这也不是必然发生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他在执政官任上的工作似乎会遭遇危机，而他在高卢的特别指挥权似乎也会被提前终止。他能够安然度过这些危机的原因在于他利用人脉与影响力的本领，以及他的想象力。无论在罗马还是在战场，运气都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是最重要的作用，福尔图娜女神[5] 仍然继续宠爱着恺撒。

前59年，罗马最富有和最有影响的两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携起手来，利用恺撒以克服此前难以逾越的障碍。庞培的东方立法得以通过，他的退伍老兵们也得到了土地。而克拉苏重新制定了包税人的合同。庞培和克拉苏都心愿得偿，恺撒的土地改革取得了成功，他还获得了军事指挥权。但三人的合作都只是暂时顺利，因为三头同盟中的每个人都有着更大的野心。说到底，与罗马的所有政客一样，他们的目标都是满足私欲。在一段时期内，合作对他们比较有利，能够得到单打独斗所无法想象的成果。但他们的联盟不是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或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旦脱离同盟比留在同盟内更有利，同盟的寿命就到头了。恺撒与另外两人的关系很融洽，但这并不是说，他或者另外两人没有考虑过与旧盟友撕破脸皮。尽管恺撒最近在高卢取得了成功，但他仍然是三头同盟中的小弟弟，继续与另外两人交好对他仍然大大有利，尤其是因为他们还在罗马，而他不在。庞培和克拉苏始终不是很亲近，因为他们互相憎恶，他们一生中始终在互相竞争，这竞争只是被暂时遮掩起来而已。庞培和克拉苏合作，利用恺撒这样一位执政官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得到了自己希冀的东西，不过也是经过了一番斗争。前58年的两位执政官都对三头同盟较为友好，但他们都不具备恺撒的才华和干劲。在罗马，没有一个人的财富、声誉和威望能够与庞培和克拉苏相提并论，但这些东西能给人带来的是影响力，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即便联合起来，他们也不可能长久地掌控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没有办法钳

制加图的口舌，而加图和贵人派的其他人也有自己的声望、财富与门客。其他许多有着野心的人也是如此。世人对三头同盟这个群体以及其中每一个人的看法，只是影响他们行为举止的一个因素而已，而且往往是个不重要的因素。担任公职的人，尤其是那些有权主持元老院会议或公民大会的人，有自行其是的机会和自由；而其他元老，不管地位多么崇高，都缺乏这种自由。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恢复了平民保民官的完整权力。现在，对他们的主宰地位发起挑战的主要是平民保民官。

“贵族”平民保民官

前59年，庞培和恺撒（可能是在克拉苏的认可下）安排将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的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但如果说这时以及之后，克洛狄乌斯便成了庞培和恺撒的党羽，那就错了，就像把恺撒视为庞培或克拉苏的党羽的错误一样。庞培和恺撒卖了个人情给克洛狄乌斯；根据常规，克洛狄乌斯应当对其感恩戴德，但绝不能说他处于庞培和恺撒的掌控之下。这部分是由于罗马的政治最终还是为了个人的成功而奋斗，与个人强悍独立的个性有更大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控制克洛狄乌斯，也不可能控制恺撒、庞培、克拉苏、加图、西塞罗或其他主要元老。克洛狄乌斯出身的家族——克劳狄家族——是最伟大的贵族世家之一；与尤利乌斯家族不同，许多代人始终处于共和国的核心，连续出了很多执政官和著名政治家。克劳狄家族[6]的自豪感或者说是倨傲，妇孺皆知。克劳狄家族的一位成员——普布利乌斯·克劳狄·普尔喀——曾于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率领一支罗马舰队，后来不幸战败，造成灾难性后果。在战前，他命令举行占卜；如果圣鸡按照某种方式吃掉食料，就说明诸神支持罗马人，他们对迦太基舰队的进攻会得胜。但圣鸡不配合，让普布利乌斯非常恼怒。他立刻抓起这些圣鸡，把它们抛入大海，并宣称：“如果它们不肯吃，那就喝吧。”几年后，他的妹妹坐轿子穿过罗马街巷时，被拥挤的人群阻碍行进，于是大声说，希望她哥哥能把这些穷鬼淹死一些。尽管克劳狄家族并不招人喜欢，但他们总是

很重要。尽管克洛狄乌斯已经将自己的身份正式改为平民，但在所有人心目中，他仍然是克劳狄家族的成员，享有这个姓氏的威望，并得到这个豪门世家几百年来获得的门客及其他人脉关系的支持。[7]

克劳狄家族像其他贵族世家一样，竭力宣传和推销自己。克洛狄乌斯年幼时，他的父亲便去世了，因此家族由他的长兄阿庇乌斯·克劳狄·普尔喀执掌。阿庇乌斯痴迷于维护家族的声望。仅仅凭借克劳狄这个姓氏，就不会有人忽视他们，但这一代克劳狄的高调张狂使他们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人数也能带来力量。克洛狄乌斯还有另外一个哥哥盖乌斯和三个全都嫁入豪门的姐姐。克洛狄乌斯的姐姐之一就是卡图卢斯诗歌中的莱斯比娅，因此青史留名。莱斯比娅与卡图卢斯有过一段短暂但激情四射的私情，但后来拒绝了卡图卢斯，于是卡图卢斯写了一些极其恶毒的诗歌来攻击她。普布利乌斯是六兄妹中最年幼的一个，或许也是最疯狂的一个，尽管他们全都以喜怒无常和淫逸放荡闻名。善良女神丑闻已经体现了克洛狄乌斯对神圣传统的蔑视，但他从此案全身而退，说明他生命力极强，是个不容小觑的角色。除了与许多有夫之妇私通之外，还有流传甚广的传闻称，他与三个姐姐均有乱伦关系。他的姐夫之一马尔库斯·卢库鲁斯[8]最终将妻子休掉，并同时公开宣传她与其弟克洛狄乌斯乱伦。这或许仅仅是恶意诽谤，当时一些著名的罗马人也被指控犯有这种罪行，但在当时及以后都很难证明克洛狄乌斯及其兄弟和姐姐们是否清白。自克洛狄乌斯在亚细亚的卢基乌斯·卢库鲁斯帐下服役起，他便与卢库鲁斯兄弟交恶。贵族子弟在亲友指挥下服役以获得作战经验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克洛狄乌斯却不肯受制于传统，竟然煽动士兵哗变来反对自己的姐夫。不久之后，他调往担任另一位姐夫的幕僚，似乎在那里完成了兵役，没有和这位姐夫翻脸。[9]

克洛狄乌斯于前59年12月上任时，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位保民官打算做些什么。几个月前，他曾威胁要攻击恺撒的立法。或许他还没有确定，自己究竟要不要兑现这个诺言。但他的这个威胁或许仅仅是为了让

三头同盟知道，他可不是好惹的。他的主要目标是私人层面的，即巩固自己在罗马群众，尤其是穷人当中的地位。为了讨好群众，他最重要的立法是一股脑儿地重新组织由国家补贴的对意大利的粮食供应，包括专门的条款，以保证居住在罗马城的公民能够定期得到免费粮食。他还解除了前64年对根据不同行业或城区组建的行会或社团的禁令。他的其他改革包括禁止利用不吉利的征兆来阻碍公共事务（显然是指毕布路斯不久前的活动，因为这项法律不能追溯过往，因此不能推翻毕布路斯的决定），以及限制监察官弹劾元老。他的这四项立法均于前58年1月通过。免费粮食的法案受到了城市平民的极大欢迎，克洛狄乌斯还利用行会社团来组织自己的支持者。他做了不少事情帮助两位新执政官在卸任后获得利润丰厚的行省，这两人都债台高筑，急需油水足的职位。然后，克洛狄乌斯开始发威了。[10]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西塞罗。西塞罗很快发现，庞培甚至克洛狄乌斯本人向他做的保证都是一纸空文。克洛狄乌斯攻击西塞罗的主要事由是，西塞罗在前63年处死了喀提林密谋者。克洛狄乌斯对西塞罗的发难是从前58年初开始的，当时恺撒还在罗马城外（由于他已经接任行省总督，所以不能再进入城市），静观事态发展并抵御两位新裁判官的攻击。在弗拉米尼乌斯广场举行了一次公共集会，这是罗马城正式边界之外的一座赛车场，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为了让恺撒也能参会。但恺撒对克洛狄乌斯的支持很有限。恺撒又一次重复了自己在讨论如何处置喀提林密谋者的辩论中的观点，说他觉得处决密谋者是不对的。但他补充说自己并不赞成克洛狄乌斯的想法，即制定可以追溯过往的法律来正式禁止过去的行动，以便起诉西塞罗。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恺撒再次邀请西塞罗担任他的军团长，那样就能保护他免遭起诉。如果西塞罗接受了这个邀请，那么恺撒就取得了极大胜利，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卖了一个极大的人情给西塞罗，同时也将一个强大的潜在政敌带离罗马。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元老院提议任命西塞罗为特别大使，出国办理公事，也被他拒绝了。他意识到自己指望不了庞培的支持，而他原以为忠

于他的很多主要元老也靠不住，于是他的自信开始动摇。太多的权贵与克劳狄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不愿意为了帮助一位“新人”而得罪克洛狄乌斯。3月中旬，大约也就是恺撒动身前往高卢的时候，西塞罗主动逃离罗马城，开始流亡。很快，他陷入了深沉的忧郁，责怪所有人害他到了这样的困境，并哀叹自己一时的怯懦。克洛狄乌斯通过了一项法案，正式宣布将西塞罗放逐，并没收他的财产。克洛狄乌斯的一群支持者烧毁了西塞罗的宅邸，在原地建起了自由女神的圣所。克洛狄乌斯除掉了一位著名的前任执政官（尽管西塞罗是个爱自吹自擂的“新人”，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和靠山），展示了自己的能耐。他还以更巧妙的手腕把加图排挤了出去。他安排加图去督导吞并塞浦路斯的工作。罗马吞并这个富裕的王国，部分原因是为新通过的免费给罗马城公民供应粮食的法律提供资金。同时，大家也觉得此事的诱惑太大，需要派遣罗马最道德高尚的人去。加图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进一步增加了他刚正不阿的声誉，尽管他知道克洛狄乌斯的真正动机。加图这么做等于承认克洛狄乌斯这样的保民官有权干涉外交事务，尽管外交理应是元老院的职责。[11]

塞浦路斯的事情对庞培来说是个侮辱，因为它改变了他对东方所做的规划。更大的侮辱是，克洛狄乌斯安排亚美尼亚王子（作为人质，被软禁在庞培家中）逃跑了。克洛狄乌斯还指使他的爪牙把执政官加比尼乌斯狠揍了一段，打碎了他的法西斯束棒，仅仅因为加比尼乌斯在此事中站在庞培那边。到前58年夏季，克洛狄乌斯开始公开质疑恺撒在执政官任上制定的法律的合法性，并在一次公共集会上传唤毕布路斯来作证反对他的前同僚。克洛狄乌斯回到了前一年4月的立场，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他的平民身份是恺撒给的，如果恺撒的决定不合法，那么他自己就没有平民身份，自然也无权担任保民官。6月，庞培鼓励元老院投票召回西塞罗，但动议被否决了。8月，克洛狄乌斯让自己的一名奴隶在一次公共集会上故意掉落一支匕首。刑讯之下，此人声称自己是被派来刺杀庞培的。庞培在战场上神勇无比，但非常害怕暗杀，考虑到他年轻

时的经历，他的这种畏惧也不足为怪。于是他闭门谢客，几个月没有出门。克洛狄乌斯的保民官任期结束后，他损失了一些力量，于是有人受到鼓舞，再次企图召回西塞罗。克洛狄乌斯仍然掌控着以行会社团为基础的暴徒支持者，常用这些打手威胁政敌或驱散集会。庞培的办法是支持两位新保民官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和普布利乌斯·塞思提乌斯，他们组成了自己的暴徒帮派，跟克洛狄乌斯的人对抗。双方的暴徒队伍都包括许多角斗士，有时会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有死伤。这些武装冲突比恺撒担任执政官时期更频繁，规模更大，程度也更凶残。庞培还周游意大利，约见自己的许多门客，并敦促他们到罗马来支持召回西塞罗的法案。前57年夏季，元老院通过了召回西塞罗的法案，只有克洛狄乌斯一个人投反对票。元老院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公民大会的批准。[12]

恺撒起初不情愿，但后来效仿庞培，写信给自己的门客们，要求他们支持召回西塞罗的法案。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很希望西塞罗被流放，尽管他希望阻止西塞罗继续攻击他在执政官任上推动的立法。现在，有机会卖个人情给西塞罗，于是恺撒抓住了这个机会，支持召回西塞罗。他起初的犹豫不决（普布利乌斯·塞思提乌斯亲自到高卢行省去说服他）可能是故作姿态，要让西塞罗知道他欠了恺撒的人情。西塞罗后来在元老院关于举行感恩活动以歌颂恺撒的提议和其他一些公开表态证明恺撒的策略奏效了，西塞罗的确在偿付自己的人情债。西塞罗欠庞培的人情更大（尽管西塞罗不会忘记，若是庞培从一开始就保护他，也不会有这么多纠葛了），并且已经有一些机会来报答庞培了。意大利的粮食进口不稳定，而克洛狄乌斯建立的由国家控制的新供应体系还不能良好地运转。西塞罗提议授予庞培特别指挥权，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是庞培的任期为五年。尽管有一位保民官可能是在庞培的默许下，提议赋予庞培在整个共和国境内的军权，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一位总督，并给他相当一部分陆海军的控制权，不过这个提议没能通过。庞培又一次拥有了权力，尽管这意味着他在理论上不可以进入罗马城，但元老院乐意帮助他——要么是给他特别豁免权，要么是在城市正式边界之

外开会。后来，埃及出现了风波，于是有人努力活动，希望将埃及的指挥权也交给庞培，但因为其他人也对这个位置垂涎欲滴，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13]

前56年，庞培有了一个官方职位，但克洛狄乌斯也再一次得到了一个官职：他被选为市政官。他以政治暴力的罪名起诉米罗，但后者得到了庞培和西塞罗的辩护，双方都带来一群暴徒，恫吓威胁对方。西塞罗后来向自己的弟弟昆图斯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 庞培开始发言，或者说是企图发言；但他刚站起来，克洛狄乌斯的党徒就开始大呼小叫，庞培在发言的全程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对方不仅高声叫嚷打断他，还嘲讽和辱骂他。在混乱的局面下，他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丝毫不曾动摇，把自己想说的一吐为快。即便是沉默的时候，他强大的人格力量也能表达他的心声。他坚持说完，刚刚结束，克洛狄乌斯就跳了起来。我们的支持者也呼喊起来，骚扰他的讲话，我们很高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丧失了斗志，精气神垮了下来。庞培是在第六个钟点[14]结束讲话的，克洛狄乌斯的发言一直持续到第八个钟点，庞培的支持者不断发出辱骂，唱起讽刺克洛狄乌斯与克洛狄娅的歌谣。他怒火中烧，脸色发青，开始向他的党徒提问。尽管会场非常嘈杂，人们还是清楚地听到他的问题："是谁让人民挨饿？"他的党徒答道："庞培！""谁想去亚历山大港？"他们喊道："庞培！""你们想让谁去？""克拉苏！"他们答道。克拉苏也在现场，但他对米罗没有任何好感。[15]

庞培与克拉苏这两个老对头之间的敌意似乎又开始酝酿了。庞培告诉西塞罗，他相信克拉苏在支持克洛狄乌斯和盖乌斯·加图（曾在前59年指控庞培独裁的那个青年，现在担任保民官）。庞培甚至宣称克拉苏企图谋害他，于是又一次陷入了病态的恐惧，要求他在乡下的门客送来额外的保镖。庞培对克拉苏不信任，有迹象表明他也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还需要恺撒。粮食供应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更糟糕的是，国库严重缺乏资金。加图还没有把塞浦路斯的财富带回来充实国库。从前59年起，共和国将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分配给国民，于是失去了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西塞罗和其他人鼓吹废除恺撒的立法，将这一重要收入来源

收归国有。西塞罗似乎并不相信庞培是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的。恺撒的立法受到了威胁，他的指挥权也受到了质疑，不过质疑来自另一个方向。一位保民官似乎提议将恺撒即刻召回，而很有希望当选前55年执政官的一位候选人则公开表示，希望自己卸任后取代恺撒。此人是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的祖先就是骑着大象平定外高卢的那个人，他的家族与高卢的联系对他的主张很有利。这不是他第一次攻击恺撒。前58年，他作为裁判官，曾质疑恺撒在执政官任上举动的合法性。据西塞罗的说法，此人简直是生来就要当执政官的。这一次，恺撒的成功对他自己反而造成了不利影响，因为他在辉煌胜利后既然得到了公共感恩，就没有必要在高卢待满五年了。庞培应该不是完全反对将恺撒提前召回，而克拉苏则一言不发。克拉苏近期对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虽然始终不是公开的，但人尽皆知。这说明他仍然有很大能量，庞培不可以忽视他。庞培得到了新的职位，并且元老院投票决定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他似乎也在考虑继续维持三头同盟是否值得。三头同盟似乎濒临解体。[16]

随后发生的事情被后世看作一次相当公开化的峰会，三巨头同意互惠互利地瓜分罗马世界。苏埃托尼乌斯称："恺撒让庞培和克拉苏到卢卡来，这是他省内的一座城市。他说服他们再次竞选执政官，挫败多米提乌斯，并将他在高卢行省的指挥权延长五年。"[17]阿庇安和普鲁塔克说，200名元老带着侍从，长途跋涉到卢卡（据普鲁塔克说，执法吏就有至少120人），在会议室外等待，而三巨头在里面敲定了合作细节。这个故事在不断流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夸张，而写作时间上距离此事较近的少数史料则表明，协议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而是在最后关头临时想出来的。前56年春季的某个时候，克拉苏开始对庞培新近获得的势力感到担忧，于是匆匆赶往拉文纳（这座城市位于恺撒的行省内）以北，与恺撒商谈西塞罗又一次企图将坎帕尼亚土地收归国有的问题。庞培预定于4月11日离开罗马，先去撒丁岛，然后去阿非利加，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西塞罗说至少他之前对此事毫无察觉，但庞培在开始公差之前，先

去了内高卢西海岸的卢卡，与恺撒会面。从西塞罗的记述判断，克拉苏并不在场，恺撒代表了他的利益，但这很难说得准。正如后来的史料所称，此次会议的结果是庞培和克拉苏决定联手竞选前55年的执政官，而恺撒的任期被延长五年。由于庞培和克拉苏在卸去执政官职务后都会得到主要的行省，三巨头在随后几年内都将拥有军队和正式的军权。

此次协议表明，恺撒已经不再是三头同盟建立时那样的小弟弟了，我们甚至可以将他视为协议的主要推动者。他的个人魅力无疑大大有助于平息庞培和克拉苏之间的敌意与狐疑。妥协或许是他设计的，但就像之前的盟约一样，真正的秘密在于每个人都认识到盟约对自己有利。庞培和克拉苏作为执政官以及之后的统领军队的总督，个人安全会有保障，也会有能力采取行动。他们也会有机会寻求新的军事冒险，这对克拉苏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克拉苏开始感到不仅仅是庞培，就连恺撒的军事成就也开始盖过了他。庞培对此也很满意。与另外两人相比，庞培在最近几个月更显颓势，如果三头同盟破裂了，对他最终是没有好处的。即便他转而反对恺撒，元老院的很多重要贵族仍然不肯接受他，加图仍然会批评他，克洛狄乌斯也仍然会敌视他。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月前，一位朋友建议庞培与尤利娅离婚，被他拒绝了。这或许是由于他很爱尤利娅，但也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与恺撒的关系目前还是非常有利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恺撒指挥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北部，这对庞培仍然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他得到自己的军队之前。从很多方面讲，三巨头从前56年的协议中得到的好处比从最初的盟约得到的好处要多得多。[18]

要过一段时间，世人才能真正理解此次协议的涉及范围和全部意义。西塞罗似乎真的颇感震惊，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4月初，他成功地为年轻贵族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辩护，战胜了克洛狄乌斯及其家人。鲁弗斯被指控的罪名是组织政治暴力、谋杀以及企图谋杀克洛狄乌斯的姐姐克洛狄娅。西塞罗在法庭上的演讲技巧娴熟，对克洛狄乌斯姐弟进行了极其凶狠的人格攻击，大肆宣扬包括乱伦在内的许多丑事，

说“那个女人的丈夫——抱歉，我指的是她弟弟”。私仇得报，西塞罗会觉得三头同盟的新协定就比较容易忍受了。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是庞培在粮食委员会的军团长之一。庞培让昆图斯给西塞罗传递一个直言不讳的提醒：庞培和恺撒帮助西塞罗回到罗马，可不是为了让他继续批评他们。大约在5月初，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演讲，反对恺撒政敌的提议，即免除恺撒内外高卢总督的职务，以新总督取而代之。西塞罗对恺撒的赞颂颇为过分，甚至到了肉麻的程度。他说尽管他过去与恺撒颇有嫌隙，但恺撒在高卢的胜利太辉煌，值得这样的赞美之词：[19]

> 在盖乌斯·恺撒的指挥下，我们在高卢境内打了一场战争。在过去，我们仅仅是击退敌人的攻击而已。我们的将军们始终觉得，需要打一场战争，将这些人逐退……即便是盖乌斯·马略——在可怕的灾祸与伤亡之后，他那神圣的、举世无双的勇武保护了罗马人民，将潮水般涌入意大利的高卢人打退——也不曾讨伐高卢人自己的城镇与巢穴……我看到盖乌斯·恺撒的思想迥然不同。因为他相信，仅仅与那些已经拿起武器敌对罗马人民的高卢人作战还是不够的，必须征服整个高卢。于是他凭借惊人的幸运，在战争中粉碎了最强大、最凶狠的日耳曼与赫尔维蒂部落，令其他民族魂飞魄散，遏制了他们，并将其置于罗马人民的主宰和统治之下；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士兵们和罗马人民的武力，抵达了此前的传说不曾讲述、文字不曾记录的地区和国家。[20]

在西塞罗的雄辩以及庞培和克拉苏的联合支持下，恺撒的指挥权得到确认，后来期限又被延长。元老院还投票决定，为恺撒自己征募的额外军团买单，这不是因为（按照西塞罗的说法）恺撒自己本省内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是因为元老院不想如此苛待这样一位共和国功臣，以免显得自己太吝啬。恺撒的统帅地位得到了巩固，但要确保克拉苏和庞培成为前55年的执政官，还需要更多努力。保民官盖乌斯·加图制造的事端（显然得到了克洛狄乌斯的力挺）阻止了选举于前56年底举行。盖乌斯·加图和克洛狄乌斯显然都已经被说服，与缔结新约的三头同盟合作。他们做出这个决定是很务实的，但也可能是被克拉苏说服的，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克拉苏在最近几年里一直在支持他们。庞培和克拉苏直到法

定日期之后才宣布自己要参选执政官，而主持选举的执政官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马尔凯利努斯不肯破例准许他们参选。于是，选举被推迟到前55年1月，此时马尔凯利努斯已经卸任，于是选举由一名被称为摄政者的临时官员主持，此人允许庞培和克拉苏参加竞选。其他候选人大多已经主动放弃，但阿赫诺巴尔布斯不肯认输，他拒绝放弃自己的雄心壮志。

克拉苏的儿子普布利乌斯前不久从高卢返回了罗马，并带回了一大群得到特别假期回来投票的军人。其中有些是军官（或许是百夫长，肯定有军事保民官和指挥官），但其他人或许仅仅是膀大腰圆的普通士兵。选举日爆发了激烈的暴力冲突，阿赫诺巴尔布斯负伤，他的一名侍从丧命，最后克拉苏和庞培被宣布为胜利者。三头同盟又一次牢牢控制了罗马，但这一次比之前那次动用了更多暴力。三头同盟的恫吓使得小加图未能当选裁判官。选举席位市政官的时候，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斗殴，以至于庞培身上也溅上了别人的血。庞培和克拉苏当执政官的时候，其他人很难攻击他们，但他们任期满了之后，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如果他们中的一人或两人都离开罗马城去当行省总督的话。克洛狄乌斯还在，很难判断他将来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而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加图这样的人比之前更加敌视三头同盟了。在罗马，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掌权。但目前，三头同盟的风头正盛。[21]

进军大西洋

前56年，高卢境内仍然有很多军事行动，但规模比前一年小得多。赫尔维蒂人、阿里奥维斯图斯和比利时联盟都被打败了，因此恺撒觉得“高卢得到了和平”也有道理。他没有为这年夏季筹划任何大规模战役，因此他得以在内高卢一直待到4月，并在卢卡处理好三头同盟的事务。高卢已经没有明显的敌人，所以他可能又一次开始考虑将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半岛。在下一年，他将远征不列颠，所以他在前56年初极有可

能已经在盘算这个计划。在卢卡会议之前，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会议之后，他得到了额外的五年任期，这意味着他的时间很充裕，可以让这一年平静地过去，而不必打一场大攻势。他的军团长已经在指挥部分军队开展一系列小规模行动，这些行动太小，不需要统帅和主力部队。前57年秋季，第十二军团在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的指挥下尝试占领大圣伯纳德山口，以保障这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畅通无阻，让军队运输队伍和商旅能够安全通过。此次行动失败了，加尔巴不得不撤退。其他部队在自由高卢[22]深处过冬。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所在的第七军团在西面，那里的各部落于前一年夏末归顺罗马。当地的部族领袖们服从了罗马的要求，即交送人质，一切似乎都很平静。[23]

前56年夏初的某个时间，这些西方部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被派到部落中心安排军粮的罗马军官被扣押。部落向克拉苏送去消息：除非交还人质，否则不会释放这些军官。这或许是因为当地人起初并没有意识到，罗马人会长期待下来，不断地索取更多的粮食。后来，在他们发现了这个真相后，便很快对罗马人产生了怨恨。第一个起事的是居住在今天布列塔尼南部的维尼蒂人。这个部落擅长航海，是大西洋沿岸贸易的活跃分子。狄奥声称，维尼蒂人得知恺撒打算远征不列颠，担心这会扰乱他们与不列颠的贸易，或者将市场开放给他们的竞争对手。在恺撒和他的罗马读者们看来，维尼蒂人这是叛乱，他们竟撕毁了不久前还接受的条约，将恺撒的军官们（其中好几个还是骑士）扣为人质。他命令在卢瓦尔河上建造一支舰队，然后率军奔向维尼蒂人所在的地区。叛乱迅速蔓延，恺撒担心如果其他部落觉得罗马人软弱，也会受到诱惑而加入叛乱。这是因为高卢人这个种族“喜好犯上作乱，很容易被煽动去打仗”。他也承认，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高卢人“挚爱自由，仇恨奴役”。于是，他将自己的军队分为若干梯队。拉比埃努斯受命留下监视前一年被击败的比利时各部落，克拉苏则率领12个大队（可能是第七军团，并加强了其他一些部队）进入阿基坦。一支较大的部队（3个军团）在萨比努斯的指挥下开往诺曼底。[24]

恺撒亲自率领剩余部队讨伐维尼蒂人，打击他所认为的叛乱核心。维尼蒂人不肯集结军队、公开与罗马军队对阵，所以罗马人攻击他们的城镇，其中许多城镇都建在滨海岬角上。罗马军队猛攻了一些城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城镇居民带着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乘船逃走了。维尼蒂人的主要力量是舰队，据恺撒说共有约280艘舰船。在罗马的新舰队抵达之前，罗马人还没有办法与敌人的舰队对抗。高卢船只是大型帆船，用于贸易而非作战，但对罗马人使用的桨帆船而言仍然很有优势。地中海世界海战的标准手段是撞击和登船。维尼蒂船只的木制船体很厚实，撞击没有多少效果，而且船舷很高，登船也极其困难。罗马舰队在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指挥下，凭借聪明才智和好运气，一次交战便歼灭了敌人海军。罗马人使用攻城战中的那种装置，刺穿并拉下敌人舰船的风帆和索具。不过起到主要作用的还是风力突然减弱，维尼蒂人的船只没有桨，于是动弹不得，只能任人宰割。恺撒和罗马军队主力仅仅是在岸上观战。维尼蒂人损失了舰队，又没有力量抵抗罗马人对其城镇村庄的攻击，不得不投降。

与罗马结盟的部落没有一个来为维尼蒂人求情，于是恺撒对其加以严惩。统治维尼蒂人的整个议事会（可能有几百人）全部被斩首，而其他族民被卖为奴隶。要说整个维尼蒂地区的人口都被消灭或掳走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搜捕大群部落族民是很困难的事情，肯定有人漏网。或许只有那些被俘或投降的处于服兵役年龄的男子被卖为奴隶。无论如何，这对维尼蒂人来说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沉重打击，他们的所有领袖、长老，以及很大一部分族民都损失掉了。这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上的大规模变动。恺撒对此次可怕惩罚的辩护是有必要杀一儆百，教训各部落尊重会谈代表或使节。有些学者正确地指出，被派去征粮的军官一般不能被视为使节。但恺撒的态度可能得到了许多同时代罗马人的赞同。他的军官在拜访与罗马结盟的民族时竟被扣押。他没有讲到这些军官后来的命运如何，以及有无将其中的一些人或所有人营救回来。对维尼蒂人的严惩是向各部落发出的警告：若胆敢虐待任何罗马人，尤其是高级军官

和骑士，都必将遭到最严厉的恐怖惩罚。对恺撒来说，向各部落索取人质是保证其忠诚的重要手段，无论是欢迎罗马的部落还是被罗马打败的部落都必须交出人质。维尼蒂人竟敢扣押罗马人，企图颠覆人质制度，这是绝不容许的。因此，恺撒对维尼蒂人的惩罚特别严酷，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罗马人对此种残暴手段的态度是非常务实的。毫无缘由的残忍会遭到谴责，但能够给罗马带来好处，而且施加于外国人的暴行是可以被接受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克拉苏于前71年将斯巴达克斯的追随者大批钉死在十字架上。若是形势需要，恺撒可以做到冷酷无情。[25]

拉比埃努斯的存在确保了比利时各部落不敢再生事端。克拉苏和萨比努斯分别在阿基坦和诺曼底取得了胜利。夏末，恺撒亲自讨伐了门奈比人和莫里尼人，他们居住在今天的加来海峡省和比利时沿海地区。这两个部落之所以遭到征伐，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派遣使节到恺撒那里，承认他和罗马的权威，并寻求与其建立友好关系。据说，这两个部落都曾向前一年集结的比利时大军提供武士。门奈比人和莫里尼人没有大型城镇，散居在若干村庄。罗马人到来时，门奈比人和莫里尼人抛弃了村庄，带着自己的牛羊和财产，躲进了茂密森林和沼泽地。罗马人在这种地域行动艰难，也没有可以攻打的固定目标。他们烧毁了村庄和农场，但敌人仍然没有屈服。随后罗马军队开始扫荡林地，俘虏了一些敌人及其牲畜，但罗马人自己也遭到许多伏击，有所损失。此次行动与目前为止的历次战役都不同，在作战季节余下的几周内，建树甚少。天气状况变得恶劣之后，恺撒撤军了，没能打败门奈比人和莫里尼人。这是一场失败，但并不是严重的失败，也并非不可挽回。总的来看，这一年还算顺利，高卢战事进展不错，罗马的事务也得到了稳妥的解决。地位得到巩固之后，恺撒便可以自由地筹划来年夏季的大规模行动。这是他严惩维尼蒂人的另一个原因。他可能已经选定不列颠为下一个目标，但他也可能又一次开始考虑将注意力转向伊利里库姆战线。不管去哪里，他都要确保在自己率主力部队远征期间，高卢不会突然再次燃起狼烟。对单独一个部落的残暴惩罚是为了警告其他部落：若是激怒恺撒，后果不堪

设想。[26]

---

[1] 指小西庇阿（前185年～前129年），罗马政治家、名将。两次出任执政官，率军攻陷迦太基城，结束了罗马与迦太基的百年争霸。小西庇阿是继姑父大西庇阿之后获得“阿非利加努斯”（非洲征服者）称号的第二人。他坚决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他的死因不明，可能是自杀或被谋杀。

[2] 指格奈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前120年执政官），被怀疑是杀害小西庇阿的凶手。注意他与前文讲到的秦纳派领导人格奈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不是同一个人。

[3]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2.3.3-4.

[4] Cicero，*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25.

[5] 福尔图娜（Fortuna）一词源自“Ferre”，意为“多产”“增殖”。最初是丰收女神、母亲、妇女的保护神，后演变为幸福、机遇、成功女神。她的形象为一个少女，手握聚宝角，正在撒落金币，有时蒙着双目，站在象征祸福无常的球体和车轮上。她的形象常出现在钱币、印章、辟邪物和各种艺术品上。

[6] 克劳狄氏族的名字应当是克劳狄（Claudius），克洛狄乌斯为了凸显自己的“平民”身份，将名字改成了不那么有贵族气的克洛狄乌斯（Clodius）。

[7] 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克劳狄和克劳狄娅的故事，见Livy，*Pers.* 19，Cicero，*de natura deorum* 2.7，Florus 1.19.29，Suetonius，*Tiberius* 2.3，Gellius，*NA* 10.6。

[8] 原文有误，应当是卢基乌斯·卢库鲁斯，即马尔库斯·卢库鲁斯的哥哥。

[9] Plutarch，*Lucullus* 34，38，Cicero，*pro Milone* 73；关于这个家族的地位，见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pp.97-100；关于莱斯比娅的身份，见Apuleius，*Apologia* 10。

[10] Dio 38.12-13，see also M.Gelzer，*Caesar*（1968），pp.96-99，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1979），pp.104-119.

[11] Plutarch，*Cicero* 30-32，*Cato the Younger* 34-40，see also D.Stockton，*Cicero*（1971），pp.167-193，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01-103.

[12] Plutarch，*Cicero* 33-34，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103-109.

[13] Cicero，*pro Sestio* 71，*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43，*In Pisonem* 80，*ad Fam.* 1.9.9 关于庞培和在埃及的指挥权，见Cicero，*ad Fam.* 1.1-9；另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

pp.107-109，M.Gelzer，*Caesar*（1968），pp.117-119。

[14] 古罗马人将白天和黑夜各分为十二个钟点，每个钟点的时间不等长。关于其计算方法也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从黎明或黄昏开始计时，所以第六个钟点就应当是午夜或正午，此处应为正午。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午夜开始计算。

[15]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2.3.2.

[16] 关于阿赫诺巴尔布斯，见Cicero，*ad Att.* 4.8b；关于坎帕尼亚的土地，见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2* .1.1，6.1，*ad Fam.* 1.9.8。

[17] Suetonius，*Caesar* 24.1.

[18] Appian，*BC* 2.17，Plutarch，*Pompey* 50，*Caesar* 21，*Crassus* 14；see also M.Gelzer，*Caesar*（1968），pp.120-124，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10-119，C.Meier *Caesar*（1996），pp.270-273，A.Ward，*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1977），pp.262-288.

[19] Cicero，*ad Fam.* 1.9.8-10，*ad Quintum Fratrem 2* .7.2；关于克洛狄娅被控与其兄长乱伦，见*pro Caelio* 32。

[20] Cicero，*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32-33.

[21] Plutarch，*Crassus* 15，*Pompey* 51-52，*Cato the Younger* 41-42，Dio 39.27.1-32.3；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20-122.

[22] 自由高卢也称“长发高卢”，即高卢未被罗马征服的部分。

[23] “高卢全境获得和平”见Caesar，*BG* 3.7，加尔巴在阿尔卑斯山，见3.1-6，克拉苏见2.34，3.7。

[24] Caesar，*BG* 3.8-11.

[25] Caesar，*BG* 3.11-16；cf.Gelzer（2002），p.126，and Meier（1996），pp.274-275 指出恺撒的军官们不是使节。

[26] 萨比努斯见Caesar，*BG* 3.17-19；克拉苏见3.20-26，恺撒与莫里尼部落见3.27-28。

十三 “越过波涛”：远征不列颠与日耳曼，前55年～前54年

> 10月24日，我收到了弟弟昆图斯以及恺撒的信，这些信的起草日期是9月25日，是从不列颠海岸最近处发来的。不列颠业已屈服，交出了人质。我军没有劫掠战利品，而是收缴了贡金，正从不列颠返回。
>
> ——西塞罗，前54年10月底 [1]

> 神圣的尤利乌斯是第一个率军渡海抵达不列颠的罗马人。他打赢了一场战役，控制了沿海地区，令当地居民心惊胆寒。但我们必须公正地说，他仅仅是向他的后人介绍了这个岛屿，而并未将它赠送给他们。
>
> ——塔西佗，约公元98年 [2]

前56年，高卢战事的节奏放缓了，但恺撒决心要恢复前两年那样的强力攻势。冬季，他似乎终于下定决心要讨伐不列颠，如果他不是在更早时候就打定这个主意的话。他说之所以有必要攻打不列颠，是因为该岛的部落曾向与他敌对的高卢人提供军事援助。高卢北部的沿海部落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民族肯定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在过去，双方之间可能还曾有过政治联系，但在恺撒记述打败维尼蒂人和其他沿海部落的书中，没有关于布立吞人曾大规模参与战事的记载。但是，北欧各部落有一种普遍的风俗：个别武士可能会为其他部落的著名酋长效力，因此可能有一些布立吞人曾以这种方式与恺撒的军队为敌。说到底，所谓布立吞各部落对罗马在高卢的利益构成威胁，不过是个借口。不列颠吸引了恺撒的注意力，这是出于其他原因。传闻称不列颠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在那里作战油水会很充足。苏埃托尼乌斯声称，恺撒对珍珠的喜爱也是动机之一，因为他相信不列颠海岸有最好的珍珠，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是，作为首次率领罗马军队进入此前不曾探索过的异邦的统帅，他将获得莫大的荣耀。不列颠能给他带来额外的

光荣，因为它位于大海的另一边，在浩瀚大洋的边缘，罗马人相信这片大洋环绕着地球上可居住的土地。希腊人或罗马人对不列颠知之甚少，所以对不列颠有着很多荒诞不经的传说，描绘了那里的奇异生物和怪诞习俗，这在很多方面很像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对新大陆的传说。若在不列颠取得成功，必将吸引各阶层罗马人的注意。[3]

背叛与屠杀

和往常一样，恺撒在内高卢过冬。他还在那里的时候，得知外界发生了一次新的迁徙。两个日耳曼部落——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离开了位于莱茵河以东的家园，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恺撒声称，参与迁徙的有43万人，如果按照赫尔维蒂人的比例计算，即1名武士带着3名妇孺或仆役，那么就有10万多名武士。我们对数字的精确性始终要保持谨慎，它们的意思仅仅是“有很多人”在迁徙。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极有可能和赫尔维蒂人一样，不是以庞大的单一纵队前进，而是分成许多群体，分布在广阔地域。此次迁徙的原因仍然是战争和劫掠，但这一次两个部落是在逃离更大更强的邻居苏维汇人的定期袭击。苏维汇人是由一些有亲缘关系的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在恺撒笔下，苏维汇人比其他日耳曼民族更凶悍，也更危险。据恺撒说，苏维汇人供养着数量极多的武士，每年均可出动一半武士参战。日耳曼各部落在其边界周围会保留没有定居点的空地，这样的空地越多，就越能证明他们武力之强大，以此震慑劫掠者。他们对自己的这种空地深感骄傲。《战记》重复了一个传言，恺撒对其既没有证实也没有证伪：没有任何人敢居住在苏维汇人领地外600里范围内。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尽管无力抵抗更强大邻居的袭击，但仍然是非常尚武的民族，只有据守莱茵河渡口的比利时人门奈比部落能够短暂地抵挡他们。日耳曼人佯装撤退，向东行进了三天，然后派遣骑兵在夜色的掩护下火速赶回，发动突袭。门奈比人上了当，看到日耳曼人撤退，便各自散去，因此无法集中力量反抗。日耳曼人缴获了门奈比人的船只，利用这些船只渡河。两个日耳曼部落依

靠从门奈比人那里抢来的粮食，度过了冬天，在他们占领的村庄内躲避严寒。[4]

恺撒决定比往常提前返回主力部队处。在他抵达之前，日耳曼移民再次开始行动，南下进入了厄勃隆尼斯人和康德鲁西人的土地。随后的军事行动很快便引发了争议，加图在元老院公开指责恺撒的行动是严重的过失。因此，《战记》对此事的记载比以往更致力于为他的一举一动辩护，证明他的行为是符合理智和荣誉的，并且像以往一样冷静而高效。但即便是最严厉批评恺撒的人也必须承认，两个日耳曼部落的抵达威胁了罗马的利益。在过去三年中，恺撒将罗马的势力扩张到高卢全境。高卢还没有被正式吞并、设立行省，而且各部落仍然自治，但差不多所有部落都公开或默认地接受了罗马的统治。门奈比人是少数例外之一，还没有向恺撒臣服并交出人质，但厄勃隆尼斯人和康德鲁西人在前57年肯定已经臣服了。恺撒从一开始就强调，他一定会保护盟友部落免遭任何敌人的攻击。他在每一场战役中都明确表示，与罗马结盟十分有利，若敢敌对罗马军队，则必将遭受严惩。

日耳曼移民给业已建立的力量平衡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高卢没有空余的土地可供他们定居，他们也已经表明会向任何阻挡他们的人动武。高卢的某些部落或者某些酋长可能会欢迎新移民，认为这些武士数量浩大、声望很高，是有价值的盟友。有些高卢领袖欢迎阿里奥维斯图斯、赫尔维蒂人或恺撒本人，正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自罗马人征服高卢以来处境不佳的人，尤其是那些新近被罗马军队打败的人，现在尤其愿意欢迎日耳曼人。高卢各部落间面临新的竞争和矛盾；更糟糕的是，有人或许会借助日耳曼人而不是罗马的支持来取胜。恺撒将阿里奥维斯图斯逐出高卢的时候，公开宣布他不会允许日耳曼各部落渡过莱茵河。如上文所述，他显然夸大了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区别，并继续将后者描绘成罗马的潜在威胁。然而，尽管他夸大其词，但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确有区别，日耳曼人对罗马利益也确有威胁。罗马人从来不会欢迎

外族进入他们边界周围的地区。[5]

恺撒抵达驻扎在高卢的罗马军队处时，得到了更多关于日耳曼移民的情报。我们推测这些情报以及之前他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收到的报告，都来自留在高卢掌管冬季营地的军团长。这些军团长似乎没有对日耳曼人采取直接行动。这部分是由于冬季作战始终会很困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军团长不应当过于积极主动；如果他们独立开展大规模作战的话，就太不妥当了。恺撒还从同盟部落那里接到了一些报告。《战记》后来的一个段落说，他在高卢旅行时，常住在高卢贵族家中。这样有助于表现自己是多么重视与高卢贵族的友谊，因为热情待客是高卢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也给了他机会去观察高卢贵族的情绪和立场。如同在罗马城，罗马行政长官的许多重大事务都是在很私人的场合里进行的。总的来讲，他的各方面信息给出的总体局面是令人担忧的。已经有一些酋长和部落在与日耳曼移民商谈，寻求与其结盟，提议用土地换取他们的军事援助。恺撒传唤所有部落领袖开会，要求他们按照惯例提供骑兵和粮食。他明智地没有表现出他已经知道某些酋长在与日耳曼人眉来眼去。如果他能迅速击败两个日耳曼部落，那么高卢人与他们的协商也就没有关系了。罗马军队集结起来，开始北上。[6]

罗马军队行进到离两个日耳曼部落还有几天路程的地方时，他们派来了代表团。使节们告诉恺撒，他们是被苏维汇人逐出家园的。他们请求恺撒给他们土地，或者至少允许他们保留已经用武力抢到的土地。和往常一样，恺撒在书中强调这些蛮族的傲慢。代表们宣称如果恺撒拒绝他们的要求，他们也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因为他们除了苏维汇人之外谁都不怕。恺撒以“恰当的方式”回答他们，但明确表示绝不允许他们在高卢定居。但他提议安排他们在乌比人（另一个日耳曼部落，居住在莱茵河东岸）的领地定居。乌比人也受到了苏维汇人的压力，前不久派来使节请求恺撒的帮助。两个日耳曼部落的使节同意将恺撒的建议带回去商议，三天后将决议带给恺撒。他们请求恺撒在这三天内停止前进。恺撒

不肯答应，因为他怀疑这只是对方争取时间的诡计，他知道日耳曼骑兵主力正在四处劫掠。[7]

罗马人继续推进，一直来到离日耳曼主营地只有12里的地方。这趟行军可能花了三天时间，因为恺撒遇到了按照预先安排返回的同一个代表团。他们又一次请求恺撒停止前进、原地等候，但罗马军队继续推进。不过恺撒同意了日耳曼代表的另一项请求，即向前进的骑兵部队传令，不得与遇到的日耳曼人交战。若辅助部队与盟军骑兵遭到攻击，则只可以自卫。此外，日耳曼人还希望得到许可派遣使节去乌比人那里，直接与其商讨定居的事情。他们请求恺撒给他们三天时间以便与乌比人商谈。恺撒仍然对其动机抱有怀疑，认为他们这不过是在争取时间以等待在外劫掠的骑兵返回。恺撒这么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即便日耳曼人真诚地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在更强势的地位上谈判肯定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样，如果他们打算与罗马人交战，肯定也需要这些部队；他们是攻击门奈比人的先锋，其中无疑包括了一些最优秀的武士。另外，如果劫掠部队带着粮草返回，两个部落在随后的谈判或军事行动期间就能保障自己的给养。

恺撒做了一个小小的让步，说他在白天只会前进4里，抵达一个供水充足的地方扎营。与此同时，双方的骑兵已经交了手。日耳曼营地还有约800名骑兵在守卫。恺撒有5000名骑兵，但如果这些骑兵在正常执行巡逻警戒的任务，就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即便如此，高卢辅助部队在兵力上仍可能胜过日耳曼人，而且他们的战马体型比敌人的坐骑更大。然而，日耳曼人还是迅速抢占了上风，这的确很了不起。据恺撒记载，日耳曼骑兵先发起冲锋，逐退了部分高卢骑兵，但遇到了高卢人的支援部队。随后许多日耳曼人下了马，改为徒步作战，这或许是得到了精锐步兵的支援。在有些日耳曼部落里，常有精锐步兵伴随骑兵，为其提供支援。高卢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溃败下来，他们在一大群辅助部队和盟军骑兵中制造了极大恐慌，这些部队狂奔着逃回几里之外的主力部

队那里。恺撒坚持认为日耳曼人毫无缘由地突袭毫无防备的高卢盟军，因此破坏了停战协定。他在其他地方称，日耳曼人骑马时不用鞍具，对使用马鞍的高卢骑兵非常鄙视，往往一看到他们就发起攻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或许在当时就难以判断。高卢人和日耳曼人都是极富个人主义的武士，热衷于展示过人的勇气和武艺。他们的领袖很难用严格的纪律约束这些人，当不同部落的大群武士相遇时，总是很容易发生暴力冲突。言语讥讽极容易升级为个人之间的决斗或者大规模斗殴。在整个高卢战争中，日耳曼武士总是能够战胜高卢武士，每次胜利都增加了日耳曼人的威望。这一次，恺撒的高卢盟军有七十四人阵亡，恺撒极少具体给出己方的伤亡数字，这就是一个例外。死者当中有一位叫作皮索的阿基坦贵族，他的祖父曾经是部落国王，被共和国称颂为“罗马人民之友”。皮索在溃败中调头去救自己的兄弟，但在逃跑过程中不慎落马，遭到包围，最终殒命。他的兄弟立即策马冲向敌人，也被杀死。[8]

恺撒声称，此次交锋说明两个日耳曼部落背信弃义，拖延谈判，等待自己聚集力量之后再来攻击他。他这种说法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但对日耳曼人来讲，在这个阶段挑起战争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恺撒担心此次交锋会被传为大败而在高卢诸部落中引发动荡，于是他召集了自己的军团长和财务官，下令于次日发起全面进攻。第二天上午，在罗马军队准备作战的时候，日耳曼人派来了一个大型代表团。代表团包括他们的全部主要领袖和酋长，他们想为前一天的战斗道歉，并解释称他们并不希望这样破坏停战协定，仍然热切地希望谈判。《战记》强调了日耳曼领袖们的“奸诈与伪装”，并热情洋溢地（这在全书里是很罕见的）说“恺撒大喜”，因为敌人自己送上门来了。恺撒忘记了之前在得知军官被扣押时自己的愤怒（这就是关键的区别，因为那些军官是罗马人，是他的部下），逮捕了这些使节。罗马军队以三路纵队前进（这种队形很容易转换成三线作战阵型），推进8里，抵达了日耳曼营地。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措手不及，失去了领导人，因此随后发生的是一

场屠杀，而不是战斗：[9]

> 他们六神无主，张皇失措，显露出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而我们的士兵们为敌人前一天的奸诈行为义愤填膺，潮水般冲进敌营。在那里，所有快速拿起武器的人在大车与辎重之间打了一段时间。一大群乱哄哄的妇女和儿童……开始四面逃窜；恺撒派遣骑兵去追杀他们。
>
> 听到后方传来的喧哗，看到自己的人民惨遭屠戮，日耳曼武士们放下了武器，丢掉了自己的军旗，开始逃离营地；他们逃到默兹河与莱茵河的汇流处，无路可逃，陷入绝望；很多人已经死亡，剩余的人则跳入大河，溺死于浪涛中，被恐惧、疲劳和激流吞噬了。[10]

在这场一面倒的战斗中，恺撒的军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只有少数士兵负伤。他没有告诉我们日耳曼人的损失数字，但肯定很多，许多人被杀或被卖为奴。更多人逃脱了，但他们的财产都在大车上，大车也被丢弃了。如果两个部落并不是待在单一营地中，而是分成若干群体，分散在相当广阔的地域（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么其他群体应该能够较轻松地逃走。唯一有组织的逃亡者是之前外出劫掠的骑兵队伍，他们重新渡过莱茵河，来到苏刚布里部落领地避难。在两个部落的族民被消灭或驱散后，部落领袖们获得了自由，但他们选择留在罗马营地，以免遭到曾被他们劫掠的高卢人的报复。[11]

罗马人欢庆了这场轻松的胜利，他们可以不必“害怕大规模战争”了。此次胜利巩固了罗马对高卢的主宰（是恺撒先前的战役确立了这种主宰地位）。如果他打算在这一年远征不列颠，那么此次战役的迅速得胜使他拥有足够多的准备时间。从务实的角度讲，此次胜利对罗马有利，但消息传到罗马城的时候，一些元老十分不悦。最早的报告不大可能来自恺撒本人，更可能是他的幕僚成员写的书信，或者（不管直接还是间接）来自随军的商人。加图领导了对恺撒的攻击，他声讨的主要问题不是屠杀本身，而是他认为恺撒扣押外国使节并发动突然袭击的做法破坏了停战协定。罗马人喜好标榜自己的“信誉”，并将其与其他种族的奸诈做对比。虽然罗马人在信誉方面根本谈不上白璧无瑕，历史上背

信弃义之事也屡见不鲜，但他们深知尊重条约和其他正式协定有一个实际的好处，那就是有助于将来的谈判协商。在更根本的层面上，罗马与神祇的特殊关系（罗马的屡战屡胜就表现了这种特殊关系）依赖于美德和遵守神圣义务或誓言。在元老院，“加图敦促他们将恺撒交给那些被他坑害的人，而不能允许他的罪行玷污了罗马城”。“但是，”他说道，“让我们向诸神献祭，感谢他们没有因为这位将军的愚蠢和疯狂而迁怒于他的士兵们，而是饶恕了罗马城。”[12]

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罗马人正式将自己的一位行政长官交给外敌，以弥补他的罪过。最近一次发生在前137年，执政官盖乌斯·霍斯提里乌斯·曼基努斯指挥的军队在努曼西亚[13]城镇之外被凯尔特伊比利亚人[14]包围。曼基努斯选择投降，让士兵们保住了性命。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释放了罗马败兵，条件是罗马人必须接受一项对努曼西亚人有利的条约。后来元老院拒绝批准条约，将条约的担保人曼基努斯披枷带锁地留在努曼西亚城外。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并不因此而感到满意，对他置之不理。曼基努斯返回了罗马，由于他是贵族，所以命人制作了他赤裸身躯、身披镣铐的塑像。这塑像被安放在他家中的显眼位置，以便向到访者宣示，他曾为了共和国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加图将恺撒比作曼基努斯，不是很有说服力。在过去，罗马人将自己的同胞交给敌人，原因都是为近期的失败寻找替罪羊，或者是为了逃避不利于己方的条约。恺撒屡战屡胜，只要他继续赢得胜利，元老院就绝不会同意加图的要求，尤其这一年的执政官是庞培和克拉苏。但元老们当中显然有一些不安情绪，很可能就是这一次元老院投票决定派遣一个委员会去“调查高卢各省的局势”[15]。但据我们所知，元老院最终没有真正派遣这样的委员会。加图的批评显然刺痛了恺撒，因为他给一位朋友写信，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并让这位朋友在元老院会议上当众宣读这封信。“恺撒的书信饱含对加图的侮辱和谴责，它被宣读时，加图站了起来，并无愤怒或好斗的表现，反而好像是经过冷静的盘算和充分准备，表明恺撒对他的指控全都是恶意诽谤，只能表现出恺撒的幼稚和粗俗。”[16]加图是

个技艺精湛的演员，充分利用形势，使其对自己有利。假如恺撒本人在场，他的演讲或许会更有说服力，至少他会意识到自己即将输掉这场辩论，会改变策略。在这些年里，他的弱点就是不能亲自到罗马参加元老院会议或公共集会。恺撒的书信被读完之后，加图对恺撒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细致的攻击。目前，加图和其他敌视恺撒的人顶多只能逞一时口舌之快，但他们坚持不懈地对恺撒口诛笔伐，始终上蹿下跳，即便是在元老院正式庆祝恺撒的胜利之时。[17]

滕科特利人和乌西皮特人遭屠杀的消息应当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传到罗马，所以上述辩论的发生时间应当不早于前55年底。得胜之后，恺撒立即决定率军渡过莱茵河，向其他日耳曼部落炫耀武力，威吓他们，令其不敢再次侵犯高卢。乌比人已经向他交出了人质，并请求他保护他们、抵御苏维汇人，这为恺撒的远征提供了另一个借口。乌比人提议为恺撒提供船只，将他的军队运过河，但他感到这种做法“风险太大，也有悖于他本人和罗马人民的尊严”。他命令部队建造一座桥梁，并在《战记》中对这座桥梁的设计做了描述，因为罗马人对其军人的工程技术和战场上的胜利几乎同等珍视。桥梁十天便竣工了，并在两端设立堡垒和派驻部队，以提供保护。这座桥梁的具体位置我们无从知晓；尽管恺撒做了描述，但我们对它的一些建造细节仍不清楚。我们估计它是位于现代的科布伦茨和安德纳赫[18]之间。[19]

罗马军队渡河后，却找不到敌人。滕科特利人和乌西皮特人的骑兵之前逃到苏刚布里人的领地避难，敦促他们逃跑，于是苏刚布里人带着财产藏进了森林深处。与此类似，苏维汇人也撤离了自己的定居点，将家眷和牲畜送进森林，以躲避入侵者。苏维汇武士则受命到其领地中心的一个知名地点集合，准备在那里迎战罗马人。恺撒并不打算深入敌境或者与敌交手。连续十八天的时间里，他蹂躏了苏维汇人的土地，烧毁农场村庄，收割或销毁庄稼。然后他撤回莱茵河西岸，并拆毁了桥梁。他已经向日耳曼人展示，罗马军队愿意并且能够打到哪些地区。乌西皮

特人和滕科特利人的命运，以及此前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惨败，已经向所有企图定居到高卢的日耳曼人发出了严重警告。恺撒向乌比人领袖保证，假如苏维汇人再次侵犯他们，他一定会回来支援他们。目前，高卢的边疆稳定了。[20]

强力武装侦察——第一次远征不列颠，前55年

此时已是夏末，但恺撒仍然决心进攻不列颠。这是一次准备仓促的小规模袭击，计划是完事之后回到高卢过冬。为了讨伐维尼蒂人而建造的舰队和在那次战役中俘虏的船只，还有盟友们能够提供的舰船，都被集结在莫里尼人领地的海岸（今天的加来海峡省）。恺撒本人率军从莱茵河去与舰队会合，他的到达迫使此前敌视罗马的莫里尼人决定与罗马讲和。除了划桨船之外，恺撒还有不到100艘帆船用于运输。对当前的任务而言，这些船只不算多。恺撒决定只携带最基本的物资，粮食带的很少。因为在这个季节，他可以收割田地里的成熟庄稼。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被塞进80艘运输船中。此时一个军团的兵力可能不超过4000人，所以每艘船平均装载100人。有些罗马军团士兵可能在战舰上担任桨手。另外18艘运输船被用来运载骑兵，或许能容纳数百名骑兵及其坐骑。他的高级军官、幕僚以及他们觉得最重要的财产则被装在拥挤的桨帆船上。与前些年他曾指挥的大军相比，此次入侵不列颠的军队规模不大。军队主力留在高卢，相当规模的部队由其军团长指挥着去镇压门奈比人和尚未投降的莫里尼人。另外一支部队则驻守着他的出发港口，它极有可能位于现代的布洛涅附近，今天加来的周边土地当时应该还淹没在海平面之下。准备工作就绪后，罗马舰队起航时已经是8月底了。[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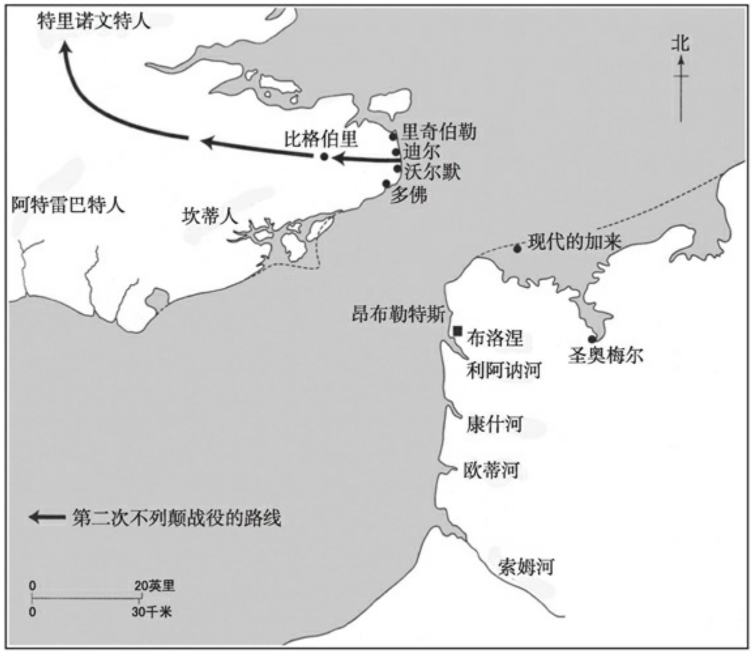


图7 不列颠与高卢的海岸线

在出征前的几周内，恺撒努力搜集关于不列颠及其居民的信息，但收获极少。他询问了曾旅行到不列颠的商人，但他们自称对其知之甚少。恺撒计划在不列颠东南角登陆，而当时的主要贸易港在更西面，其中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在亨吉斯特伯里角。所以这些商人可能确实对他的目的地不了解，不过也可能是不愿意为他提供任何信息。与不列颠的贸易似乎主要掌握在高卢人手中，这些贸易路线上很少有罗马人。这些商人中有不少来自前不久被恺撒镇压的沿海高卢诸部落。这些人怨恨罗马对不列颠岛的干涉，害怕罗马竞争者会蜂拥而至，这是完全有道理的。恺撒从商人那里没有得到多少有用的情报，于是派遣一艘战舰渡过海峡，开展一次侦察。他麾下的军官盖乌斯·沃卢森努斯负责指挥此次行动。他于五天后返回，报告了关于海岸线的一系列情况，但由于他没有冒险登陆，所以他能够报告的信息一定很有限。这个时期的英格兰东南部与今天大不相同，今天许多地势较低的地方，比如罗姆尼沼泽，当时还在海面之下。萨尼特[22]在当时是个真正的岛屿，而瓦恩特萨姆海峡周边的潟湖[23]可以为入侵者提供足够大的安全锚地。但沃卢森努斯似

乎没有发现这个锚地。罗马人即将进攻的消息传到了不列颠各部落，一些领袖派遣代表到高卢海岸去访问恺撒的营地。这些代表愿意接受与罗马人结盟的条件，即交出人质作为担保。恺撒决定派遣自己的使节与不列颠部落的代表们一同返回，于是选择了一位叫作科密乌斯的高卢酋长（恺撒立他为阿特雷巴特人的国王）作为自己的特使。据说，科密乌斯在不列颠各部落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人脉。但他没能发挥作用，因为他差不多刚抵达不列颠就被俘虏了。关于他的使命，没有任何消息传到恺撒那里。恺撒起航前往不列颠的时候，的确是在驶向完全未知的土地，但他急于出发，并想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取得更为辉煌壮观且没有太多争议的成果。风向转为对他有利时，他便率领战舰和罗马军队离港出发了。[24]

从一开始，他就遇上了麻烦。当骑兵匆匆赶到另一个港口，登上分配给他们的18艘运输船的时候，天气已经变了。尽管恺撒曾在地中海东部对航海有过一些经验，但他经常低估大海，尤其是英吉利海峡的强大力量和喜怒无常。运载骑兵的船只没能赶上主力部队。主舰队于黎明前起航，其先头部队将近中午时抵达了不列颠，可能是现代的多佛附近。沃卢森努斯之前可能已经发现了多佛这一天然良港，恺撒也很可能选择了这里作为登陆点。但是，在这个时期，海滩上方耸立着高高的峭壁，成群的布立吞武士已经在那里守株待兔。恺撒停船并等到下午晚些时候，此时他船队的大部分船只已经集结起来。他的高级军官们乘坐划桨小船到他的旗舰上开会。他告诉大家，此次行动的性质要求他们快速地对他的信号做出反应。所有船只抵达后，应当沿着海岸行驶7里，去往沃卢森努斯之前侦察时发现的一个合适的登陆点。布立吞人在岸上跟踪着罗马舰队，但只有骑兵和战车能够跟得上舰船的速度，并阻击罗马人的登陆。沃卢森努斯选择的登陆海滩可能在迪尔或沃尔默附近，很开阔且周围没有高高的峭壁。但即便如此，布立吞人熟悉地形和潮汐，而罗马人对其一无所知。罗马军团士兵们企图登陆时，遭到了敌人骑兵和战车的突然袭击。罗马的运输船不是用来直接将人员和物资卸载到海滩上

的，因此还在水相当深的地方就搁浅了。罗马军团士兵们背负着沉重的装备，不得不涉水上岸。他们在海水中艰难前进，很难躲避或者用盾牌挡住敌人的投射武器，因此在抵达海滩时非常零散，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没有证据表明，罗马军团士兵们曾接受过登陆作战的特殊训练。恺撒说在此次抢滩战斗中，他的老兵们未能表现出惯常的斗志和热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海滩上的战斗确实难成气候。[25]

恺撒向他的战舰发出讯号，命令舰长们冲向海滩，尽可能地接近岸边，好让船员用投石器、弓箭和重型弩炮轰击布立吞人。这有助于减轻抢滩步兵的压力，但即便如此，仍然进展甚微：

> 这时，我们的士兵们还逡巡不前，主要是因为水太深。第十军团的旗手快速做了祈祷，然后喊道："弟兄们，要是不想让鹰旗被敌人抢了去，就快下船！所有人都会知道，至少我尽了对共和国和指挥官的义务！"他这么高声呼喊一番之后，跳下船，举着鹰旗冲向敌人。然后我们的"大兵"们互相鼓励，绝不能蒙受那样可怕的耻辱（即丢失自己的军旗），从运输船上跳了下去。附近其他船只上的士兵看到了，也纷纷跟上去，开始与敌人交锋。[26]

战况仍然很激烈，罗马军团士兵们围绕着他们遇见的第一名军官和旗手，组成阵线，就像他们在桑布尔河遭到突袭时那样，因此战线参差不齐。战线大致形成之后，恺撒站在旗舰甲板上观战，并向遭到敌人切断的兵团派去乘坐划桨船的增援士兵以及轻型侦察船。尽管布立吞人拼命抵抗，但骑兵和战车本身就不适合用来防御，因此他们最终不得不败退。他们的机动性强，因此大多逃脱了。有意思的是，恺撒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位勇敢旗手的名字，不过恺撒一般倾向于赞颂第十军团的集体战功，而不是个别士兵的事迹。这位旗手可能出身低贱，不足以记名。其他官兵们会知道他是谁。另外，尽管恺撒没有说，但他作为一名罗马将军，应当会晋升这位旗手，为他授勋并以金钱作为奖赏。[27]

恺撒成功登陆了，但他的军队没有骑兵，不仅无法追击溃败的敌人，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展侦察活动，以便从周边乡村搜集情报。罗马

军队按照惯例修建了营地，位置可能离海滩不远。按照一般做法，划桨船被拖上岸，而运输船则停靠在海边的锚地。幸运的是，罗马人面对布立吞武士的坚决抵抗仍然成功登陆的战绩足以令邻近的各部落肃然起敬，他们的领袖向恺撒派来使节，自愿交出人质，以求得罗马的友谊。恺撒可能还向他们索取了粮食。科密乌斯被俘虏他的人释放，回到了恺撒身边。他带来了约三十名侍从和一些布立吞人，全都骑着马，于是恺撒至少拥有了一支小规模的骑兵队伍。如《战记》记载："于是，缔结了和平。"但有些事情不是恺撒能控制得了的。四天后，罗马骑兵的运输船又一次从高卢起航，来到了距离恺撒营地很近的地方，但这时刮起了风暴，将这些运输船吹走了。天气愈发恶化（在夏末的英吉利海峡，往往如此），但罗马人要么（按照恺撒的说法）没有得到关于天气的警报，要么是没有听取在该海域航行的高卢水手们的意见。这次风暴可能特别凶猛，罗马舰队损失惨重，12艘船粉身碎骨，剩余大多数船只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恺撒的军队缺少足够的粮食给养，目前又与欧洲大陆断了联系，因此处境非常困难。布立吞人很快意识到了罗马人的脆弱，于是决定再开战端。酋长们悄悄溜出了罗马营地。他们知道罗马军队缺少粮食，决定切断粮食供应。他们打算以饥饿迫使罗马人屈服或者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如果将罗马人的第一次远征彻底挫败，那么他们或许就再也不敢入侵了。[28]

一些罗马士兵尽可能修复船只，另外每天都有一些士兵被派去收割营地周边农田里的庄稼。每一片农田被收割完之后，罗马人就必须去更远的地方，所以布立吞人很容易猜到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布立吞人准备了一次伏击，将自己的部队隐藏在农田旁的林地内。几天后，第七军团的搜粮队遭到大群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一次敌人仍然以战车和骑兵为主。高卢人早已不用战车，但不列颠和爱尔兰还用了几个世纪。战车是昂贵的作战装备，只有部落贵族才负担得起。贵族武士驾着战车打斗，而一名无武装的车夫负责操纵拉车的两匹小马。战车从欧洲大陆消失，或许是由于社会的变革以及可用的体型更大且更适合骑乘的马匹越

来越充足。不列颠的战车非常迅捷、轻快，但它们不是用来冲杀敌阵的。以前有神话称布立吞人战车的轮子上配有镰刀，但这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根据。恺撒知道他的读者们会对这种令人回想起荷马史诗英雄的车辆感兴趣，于是对战术做了详细描述。

> 布立吞战车的战术是这样的：先在全场横冲直撞、投掷标枪，马匹狂奔的恐怖景象和车轮的轰鸣声常常能令敌人胆寒而发生混乱；在己方骑兵中间向前冲锋时，武士会跳下战车，徒步战斗。与此同时，车夫则逐渐退出战场，在近处等候，如果武士们受到敌人的很大压力，就能回到战车那里逃跑。因此，战车武士在战斗中能够结合骑兵的速度和步兵的稳健。通过日常训练，他们技艺娴熟，能够驾车在最陡峭的山坡往下狂奔，同时仍能牢牢控制好马匹，瞬间停下或者转弯；能够从轭猛冲出去，然后闪电般地回到战车上。[29]

战车能够帮助一位贵族武士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是机动性很强的投射武器平台，还能让武士徒步单打独斗，若有需要还能随时乘战车撤退。战车来自一个更古老的战争传统，颂扬个人武力和单兵英雄主义。它与布立吞人的轻骑兵相结合，而且罗马军队又完全是步兵，所以战车是非常危险的对手。罗马的一些搜粮士兵被砍倒，其他人则被包围，遭到标枪的袭击，完全无法追上投掷标枪的战车武士。罗马营地之外的前哨阵地（在主营地外设前哨是罗马军队的惯例）报告称，在搜粮队伍去往的方向出现了漫天烟尘。徒步的罗马军团士兵是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烟尘的。恺撒猜到了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立刻率领前哨部队去营救自己的部下。在动身前，他命令2个大队接管前哨部队在营地壁垒之外的阵地，并指示全军其他单位在装备和列队完毕后立刻跟进。此次远征不列颠的规模与之前历次战役相比要小，即便如此，一位统领着8个军团和许多辅助部队的总督竟身先士卒地指挥不到1000人的队伍参战，也令人惊讶。这些队伍的抵达足以遏制住布立吞人。恺撒率军摆开阵势，与敌人对阵了一段时间，但随后带着搜粮队伍和援军撤回了主营地。布立吞人赢得了一场小胜利，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阻止了罗马人获取粮食。在此次胜利的鼓舞下，他们集结了军队，向罗马营地发动了一次全面进

攻。恺撒将他的军队以及科密乌斯的小股骑兵部署在壁垒之外的平原上迎敌。大规模正面交锋正是罗马军队最擅长的，布立吞人很快就溃败了，但很少有人被追击的罗马军队俘虏。恺撒的部下只能从纵火烧毁附近的农场和村庄中获得满足。[30]

这次挫折足以让许多布立吞领袖又一次决定求和。恺撒现在要求对方交出先前数量两倍的人质，并要求布立吞人将人质送往高卢，因为他急于返回高卢，再也不愿耽搁。罗马全军设法挤进了剩余的战舰和68艘修复的运输船中。此时已经接近秋分时节，但恺撒的运气不错，天气很好，他于一天午夜后起航。所有船只都安全返回了，不过有2艘运输船偏离航向，停靠在了莫里尼人的海岸。当地的武士觉得这是一个发横财的好机会，于是开始攻击这2艘运输船。消息传开后，更多武士聚集到海岸。恺撒得到报告后，派遣自己的全部骑兵前去援救。被围困的人安全得救，没有一人死亡。次日，拉比埃努斯率领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疲惫的士兵们对莫里尼人部落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惩罚性扫荡。与前56年的情况不同，这年夏季天气干燥，因此该地区的沼泽面积缩减了不少，也较容易通行。莫里尼人很快投降了。门奈比人也被恺撒出征不列颠之前派去的军队击败了。[31]

从实际的角度看，第一次远征不列颠失败了，险些酿成大祸。就连恺撒对该地域居民的了解也没有增加多少，因为他在不列颠的几周全都困于一个狭小地域。就像在高卢那样，作为人质来到罗马军中或前来求援的土著酋长们为他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不知道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有多少人渡过海峡来投奔恺撒，但至少有一位被敌人逐出自己部落的王子来到了恺撒那里。到前54年，恺撒掌握的情报比以前多了一些，但与之相比，付出的努力实在太大了。第一次远征不列颠的出发时间太晚，准备工作也不充分，参加行动的兵力又太少。恺撒应当对这些错误负责。从这个角度看，此次战役当然算不得他最伟大的成就，尽管他像往常一样，非常足智多谋，使他自己和军队安然度过了许多难关。但到这年年

底，恺撒一定认识到在宣传方面，远征不列颠是一次极其辉煌的成功。此次冒险的消息传到罗马时，人们欢呼雀跃、如痴如醉，为罗马军队终于抵达那个陌生而神秘的岛屿而欢欣鼓舞。元老院投票决定举行二十天的公共感恩活动来庆祝恺撒的胜利，这比他在前57年赢得三次真正有价值的战役之后得到的感恩还要多五天时间。元老院对他成就的正式认可封住了加图的嘴，尽管他可能在同一次会议上对恺撒发起了攻击。这一年很顺利地结束了，但恺撒已经下定决心要在来年夏天重返不列颠。他对不列颠以及它传说中的财富仍然充满了好奇。罗马的反应也让他觉得有必要再一次远征不列颠。庆祝活动的规模如此浩大，他不能让大家失望。[32]

入侵

第二次远征的准备工作更为充分。冬天还没结束，恺撒便指示军中的工匠开始建造船只。恺撒向工匠们发布的标准设计是一种宽阔的侧舷低矮的运输船，既有风帆，也有划桨。在随后几个月内，一共建造了600艘此种船只，所需的绳索、索具和其他设备由西班牙各行省提供；从前54年起，这些省份就由庞培控制。另外还建造了28艘桨帆战船。和以往一样，恺撒在内高卢过冬，履行其行政与司法职责。他正要动身前往军中，却得到消息称伊利里库姆遭到了袭击。他火速赶往出事地点，在当地征募部队，迫使犯上作乱的部落议和。他随后北上，巡视了军队的冬季营地，赞扬了官兵们的造船工作。他指示整个舰队集结在波图斯伊提乌斯（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现代的布洛涅），做好渡海前往不列颠的准备。在远征开始之前，他又一次被其他事情分了心。这一次，特雷维里部落发生了内部纠纷，酋长们钩心斗角，争夺主宰地位。恺撒率领4个军团和800名骑兵轻装急进，前去支持他最喜欢的一名酋长。敌对的酋长举手投降，立刻交出了恺撒要求的200名人质，包括这位酋长的儿子和其他近亲。恺撒目前对形势感到满意，希望尽快开始远征不列颠的行动。他返回海岸，开始最后的筹备工作。因为他这一次打算带去兵力

比先前大得多的部队，因此非常希望确保高卢在自己远征期间能够保持安定。各部落酋长聚集到他的营地，带来了他为来年作战索要的4000名骑兵。这样，罗马军队就有了足够多的骑兵来支援其行动。这些武士，尤其是领导他们的贵族们，也是额外的人质，迫使他们的部落保持忠顺。

其中有一队埃杜依骑兵的指挥官是杜诺列克斯，也就是德鲁伊狄维契阿库斯的弟弟。前58年的时候，恺撒曾对杜诺列克斯的野心感到怀疑，并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前不久，他从另一名高卢贵族那里得知，杜诺列克斯在埃杜依人的一次议事会上声称，恺撒打算立他为埃杜依人之王。其他大多数酋长虽然不愿意屈从于一位君主的统治，但不敢对恺撒的任何行动表示异议，因此没有去查证杜诺列克斯的话是真是假。高卢骑兵中只有一半会跟随恺撒讨伐不列颠，但恺撒已经决定，杜诺列克斯必须要去，因为他是个“渴望兴风作浪”的人。杜诺列克斯偏偏不肯随军出征，给出了一系列借口：身体不适、害怕航海、宗教禁忌不允许他离开高卢等。恺撒无动于衷，于是杜诺列克斯寻求从人数上求胜，企图劝说其他高卢酋长们和他一样，拒绝前往不列颠。他说罗马人打算把他们带离各自的部落，到了不列颠之后，就要把他们一网打尽。一些酋长向恺撒打了小报告。由于风向不利，出征的日期被推迟了大半个月，因此有的是时间来耍弄阴谋诡计和嚼舌根。最后，在天气转好、部队开始登船的那天，杜诺列克斯及其武士溜出营地，逃之夭夭。恺撒大感意外，但立即派遣很大一部分的骑兵去追赶。尽管他急于出航，但还是决定先把杜诺列克斯发落了再说。恺撒命令部下尽可能将杜诺列克斯生俘并带回，但假如他敢于反抗，就格杀勿论。杜诺列克斯并不缺乏勇气，向攻击他的人喊道，他是“自由民族的自由人”。即便他的武士们都不愿支持他，他还是选择武力抵抗，于是被杀死了。这个残酷的事件公开证明了恺撒的强大：即便是高卢最富裕贵族之一，也没有办法违抗他的意志。关于前57年之后事件的记载中没有提及狄维契阿库斯，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无法为弟弟求情。但无论如何，杜诺列克斯都是个棘手难题，恺

撒没有时间慢慢处置他，于是下令将他处死。[33]

第二次远征军队的规模比第一次大得多。恺撒此行带去了5个军团，包括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但另外3个军团的番号不详）以及一半的辅助部队和盟军骑兵。剩余3个军团以及2000名骑兵留守高卢，由拉比埃努斯指挥。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各港口，确保一旦需要便可向在不列颠的军队输送粮草，同时对各部落加以监视。罗马舰队于日落时分起航，但恺撒及其军官们又一次低估了英吉利海峡的力量。风力减弱，潮水将他们带离航线。在短时间内建造这么多船只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有足够多的有经验的水手来驾驶这些舰船。新型运输船的设计虽然非常适合运载人员、马匹、装备以及抢滩登陆，但抵御恶劣天气的能力不强。好在这些船只上都配有桨，再加上罗马军团士兵们吃苦耐劳，因此情况还算支撑得过去。通过划桨，罗马舰队才终于抵达预定的登陆滩头。恺撒告诉我们，他选择了最合适的登陆地点，但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清楚。有人猜测，恺撒已经知晓瓦恩特萨姆海峡，并利用了那里的有利条件，但考虑到随后的事态进展，这种猜测不是很有说服力。对文本的解读告诉我们，此次登陆地点应当与前一年的登陆点相去不远，或者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不管登陆点在哪里，布立吞人集结了兵力前来迎战，但看到数百艘舰船逼近的壮观景象，不禁心惊胆寒，便撤退了。大多数舰船到中午时分便已靠岸。罗马人开始上岸，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海滩附近建造一座营地。他们派出的侦察兵发现，布立吞军队撤往了内陆的一个新地点。[34]

恺撒决定立刻发动进攻，于是在夜色掩护下率领40个大队和1700名骑兵出发了。罗马军团其余的士兵和骑兵则留在营地，由昆图斯·阿特里乌斯指挥。罗马舰队的大部分船只停靠在岸边，因为恺撒很自信，在“平静而开阔的岸边”停泊会很安全。恺撒的队伍进展迅速，在破晓前行军约12里，发现布立吞人在一条河后方等候，这很可能是现代坎特伯雷附近的斯陶尔河。在林木茂盛的山地上有一个围墙环绕的围场，可能

是比格伯里树林的山地堡垒，布立吞部落的主力部队就守候在那里。不时有小股骑兵、战车和袭扰部队从这个掩蔽处冲出来，用投射武器攻击罗马人。在部落间的战争中，此类战术无疑很有效，但对久经沙场的罗马军队来说却不是问题。恺撒展开了进攻，他的骑兵将布立吞人扫到一边，于是第七军团得以向山地堡垒发动直接的正面进攻。罗马军团的士兵们站成了著名的龟阵，将互相重叠的盾牌举过头顶，构成一个屋顶状的防护盾，足以抵御绝大部分投射武器的侵袭。罗马人在攻城战中常用的更复杂的工程技术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他们在敌人的围墙下堆建了简单的坡道，然后发起猛攻。敌人四散逃窜，但罗马人并没有追击多远。恺撒的部下经过渡海峡的航行、夜间行军和战斗之后十分疲惫，而且恺撒希望他们建造一个常规的行军营地。于是罗马军队停下来过夜。[35]

次日上午，恺撒派出三支队伍，各自搜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军队常常一边行进，一边烧杀抢掠，直到当地领导人前来求和。恺撒显然相信，布立吞人在战败不久之后无力迅速重建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因此最好是派出若干快速队伍，以求覆盖更大范围。他似乎没有亲自陪同任何一支搜索队伍，而是留在行军营地中，后来昆图斯·阿特里乌斯派来的信使在那里找到了他。消息很糟糕，前一夜刮起了大风暴，停泊在岸边的舰队遭到重创。恺撒召回了三支搜索队伍，骑马奔回主营地检查损失状况，发现40艘船遭到毁坏，无法修复。军中的工匠被召集起来，回到营地去修理船只。恺撒还向在高卢的拉比埃努斯发出命令，指示他派遣部下建造更多船只。辛劳十天之后，大部分船只都被修复了。一些士兵建造了壕沟和壁垒，从营地一直通到海边。所有修复的船只都被拖上岸，安放在防御工事保护范围之内。恺撒的问题根源在于，他没有一个港口能让船只停靠避风以及更轻松地装卸人员物资。萨尼特岛周边的瓦恩特萨姆海峡应该能为他提供一个安全良港，但既然他在风暴中蒙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那么他应当没有利用瓦恩特萨姆海峡。罗马人或许还不知道它的存在，或者是缺乏寻找和进入其入口的知识。历史

上，对海上入侵行动来讲，天气始终是个极大的问题。1944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军队将他们的“桑葚”人工港拖到了诺曼底，但在6月19日～23日的大风暴中仍然损失惨重，物资集结受到严重影响。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恺撒在前55年就因风暴而损失惨重，却没有吸取教训，在前54年以同样的计划行动，确实显得不够明智。新的防御工事能够保护船只免遭敌人攻击，却无法抵抗大自然的威力。许多人批评恺撒没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些批评大部分都是有道理的，但是除非他将船只送回高卢并寄希望于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便能回来，否则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干脆不要发动第二次远征。恺撒下定决心开展第二次远征，在本质上是出于政治和私人层面的考虑。在两次远征不列颠的过程中，他的好运气险些耗尽，但每一次他都安然脱身。[36]

罗马军队修船和建造营地期间，布立吞人得以恢复元气。好几个平日里互相敌对的部落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之时，联合起来，并任命了一位叫作卡西维拉努斯的指挥官。恺撒告诉我们，此人来自泰晤士河以北的一个部落，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也不能确定他究竟来自哪个部落。恺撒重新来到内陆的行军营地，与主力部队会合，并继续前进。他的巡逻队不断遭到小股战车和骑兵的骚扰。在近距离作战，尤其是大部队的正面对垒中，恺撒的罗马军团士兵和辅助骑兵的表现始终优于敌人；但在一些小规模交锋中，他的一些部下被诱入伏击圈，蒙受了严重损失。卡西维拉努斯受到鼓舞，在罗马人结束行军开始建造营地的时候，对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恺撒派遣了2个大队去增援他的前哨阵地，但需要更多的增援部队才能将布立吞人击退。他的一名军事保民官在战斗中丧生。次日，布立吞人的进攻不是那么猛烈。恺撒派一名军团长率领3个军团去搜粮。当大部分罗马军团士兵各自搜粮时，布立吞战车和骑兵突然杀到，利用了罗马人兵力分散的弱点。但罗马人迅速集结起来，排兵布阵，将敌人打退。一段时间内，布立吞各部落一盘散沙，抵抗力很微弱。[37]

恺撒决定攻打卡西维拉努斯的家园，于是向泰晤士河挺进。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何处渡河的，可能是在今天伦敦的中部某处。恺撒的部下涉水过河，轻松扫荡了防守对岸的敌人。布立吞指挥官决定不再冒险公开对垒，而主要依赖自己的战车部队来袭扰罗马人。恺撒说布立吞军队拥有4000辆战车，这个数字很可能夸大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需要8000匹马。在罗马人行军沿途，布立吞人坚壁清野，将牲畜从田地中赶走，将粮食销毁或者隐藏起来。战车时常伏击罗马的搜粮队。在这些小规模交战中，恺撒的部下开始持续地蒙受损失，于是他不得不命令部下时刻紧靠主力部队，不得脱离过远。幸运的是，就像在高卢时常发生的那样，恺撒得到了一个当地盟友的帮助。特里诺文特部落（在泰晤士河以北、今天的东安格利亚境内）王子曼杜布拉库斯的父亲被卡西维拉努斯杀害，他本人则被迫流亡，加入了恺撒的阵营。特里诺文特人向恺撒投降，请求他恢复曼杜布拉库斯的君主地位，并主动交出人质和粮食。很快，其他一些小部落也纷纷效仿，归顺罗马。若不是有这件事情，这些小部落的名字怕是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在长期嫌隙的压力之下，布立吞各部落之间的脆弱联盟开始瓦解。恺撒从这些新盟友那里得知了卡西维拉努斯要塞的位置，它隐匿于森林和沼泽之中。他立即率军攻打那里，缴获了不少牛。卡西维拉努斯的威望因此大受折损。大约在同一时间，卡西维拉努斯让肯特诸部落去攻击阿特里乌斯和负责守卫船只的罗马部队，不料被罗马军队打退且伤亡惨重。[38]

遭受了双重打击之后，卡西维拉努斯决定求和。此时已将近9月底，恺撒急于结束战事、返回高卢。又一次陪同恺撒出征的科密乌斯推动了双方的谈判。布立吞军事领袖承诺交出人质并年年纳贡，并发誓不会攻击曼杜布拉库斯与特里诺文特人。恺撒一边等待人质抵达，一边开始收拾行装。但是，即便所有受损船只均已修复，也没有足够空间来运载全部官兵及大群人质和奴隶。恺撒决定分两批渡海。第一批进展顺利，但在船到达高卢海岸之后，却无法返回不列颠来运载剩余人员。同样，拉比埃努斯建造或搜罗的船只也无法抵达不列颠。几天之后，恺撒

觉得在原地继续等待的风险太大。此时已是9月，天气很可能会持续恶化，他和部分军队被困在不列颠的危险也越来越大。他命令部队挤进现有船只，航行一夜，黎明时抵达了高卢。恺撒此次离开不列颠，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有一支新的罗马军队入侵这个岛屿，将它变为罗马的一个行省。[39] [40]

两次远征不列颠过程中，恺撒险些遭遇大祸，最终都安然渡过难关。一般认为，布立吞各部落承诺的岁贡实际上从来没有交付过，或者至少很快就被布立吞人遗忘了。恺撒造访之后的岁月里，不列颠和罗马世界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去往不列颠西南角的老路线变为他曾涉足的东南角。维尼蒂部落的灭亡无疑推动了这一转变，但随着这个世纪一天天过去，的确有更多的罗马商人来到了不列颠。但即便是那些臣服于恺撒的部落也不能说是成了罗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尽管罗马的宣传家们有时会这样鼓吹。西塞罗写道，罗马人很快意识到讨伐不列颠的战役并不会带来大家翘首以待的利益。罗马人并没有从不列颠得到白银，“除了奴隶之外，也没有任何战利品。但我觉得其中应当不会有书记员或者乐师”，换言之，就是没有能卖出高价的奴隶。但西塞罗仍然对此事血脉偾张，非常热情洋溢地写到了自己的弟弟昆图斯·西塞罗（此时是恺撒帐下的军团长）对远征的记述。尽管受到了这种私人关系的影响，他的情绪似乎是许多罗马人的典型表现。两次远征不列颠极大地提高了恺撒的声望，令他受到万众瞩目。群众对关于战车和野蛮人（他们用靛蓝将自己身体涂成蓝色）的新奇故事激动不已。尽管在不列颠的登陆作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而且冒了太大风险，但在宣传上无疑是一次辉煌的成功。加图于前55年对恺撒的攻击让我们看到，恺撒由于本人不在元老院或广场，因而很难对付自己的政敌。但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恺撒善于利用自己的机遇，去赢得荣耀，并在此过程中大量敛财。尽管不列颠战役的收益有点令人失望，但连续五年成功的军事行动仍然带来了极好的利润，他从一个濒临破产、债台高筑的人变成了共和国最富有的大人物之一。[41]

[1] Cicero，*ad Att.* 4.18.

[2] Tacitus，*Agricola* 13.

[3] Caesar，*BG* 4.20，Suetonius，*Caesar* 47，Plutarch，*Caesar* 23.

[4] Caesar，*BG* 4.1-4，Plutarch，*Caesar* 22；对此事件的详细讨论，见A.Powell，'Julius Caesar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ssacre'，in K.Welch & A.Powell （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pp.111-137。

[5] 见Powell （1998），esp.pp.124-129；关于罗马人对进入边疆地区的异族的抵抗，见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esp.pp.172-173。

[6] Caesar，*BG* 4.5-7；前52年他提及不愿意将自己的人身安全寄托给部族领袖，见*BG* 7.6。

[7] Caesar，*BG* 4.7-9.

[8] Caesar，*BG* 4.11-12；日耳曼人对马鞍的鄙夷见cf.4.2；日耳曼马匹的矮小，见7.65，Tacitus，*Germania* 6。

[9] Caesar，*BG* 4.13-14.

[10] Caesar，*BG* 4.14-15.

[11] Caesar，*BG* 4.14-16.

[12] 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1.1-2 （Loeb translation）.

[13] 努曼西亚是一座现已消失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城市。遗址位于如今西班牙北部索里亚城以北的穆尔拉山。它对抗罗马达二十年之久，最后被小西庇阿消灭。

[14] 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居住在古罗马时期的伊比利亚半岛，使用一种凯尔特语族的语言，后被罗马消灭和同化。

[15] Suetonius，*Caesar* 24.3，and M.Gelzer，*Caesar* （1968），pp.130-132，C.Meier，*Caesar* （1996），pp.282-284.

[16] 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1.2 （Loeb Translation）.

[17] 加图的攻击，见Powell （1998），pp.123，127-128，Gelzer （1968），pp.131-132。

[18] 安德纳赫是一座位于德国西部的城镇。

[19] Caesar，*BG* 4.16-18，cf.T.Rice Holmes，*Caesar's Conquest of Gaul* （1911），p.100.

[20] Caesar，*BG* 4.18-19.

[21] Caesar，*BG* 4.20，22.关于恺撒远征的详细叙述，及其在后来罗马征服不列颠的更广泛背景下的意义，见G.Webster，*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rev.edn （1993），pp.43-40，and M.Todd，*Roman Britain* ，3rd edn.（1999），pp.4-22.最详细的论著是T.Rice Holmes，*Ancient Britain and the Invasions of Julius Caesar* （1907）.另见近期的优秀著作G.Grainge，*The Roman Invasions of Britain* （2005），esp.pp.83-109.在本书框架内无法纳入关于恺撒远征诸多细节的激烈辩论。

[22] 今天英国东南部肯特郡沿海的一个地区。

[23] 潟湖是一种因为海湾被沙洲封闭而演变成的湖泊，一般都在海边。这些湖本来都是海湾，后来在海湾的出海口处由于泥沙沉积，使出海口形成了沙洲，继而将海湾与海洋分隔，因而成为湖泊。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潟湖。

[24] Caesar，*BG* 4.20-21；see the comments in N.Austin & B.Rankov，*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1995），p.13，他对恺撒未能获取更多情报持批评态度，cite Polybius 3.48 in support.关于不列颠的港口及其与欧洲大陆的贸易，见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 （1988），pp.145-149；关于海岸线，见G.Grainge，*The Roman Invasions of Britain* （2005），pp.17-42，105-107。

[25] Caesar，*BG* 4.23-24；关于选择多佛作为登陆地点的可能性，见G.Grainge，*The Roman Invasions of Britain* （2005），pp.101-105。

[26] Caesar，*BG* 4.25.

[27] Caesar，*BG* 4.25-26.

[28] Caesar，*BG* 4.27-30；"建立了和平"，见4.28；see also G.Grainge，*The Roman Invasions of Britain* （2005），pp.107-109。

[29] Caesar，*BG* 4.33.

[30] Caesar，*BG* 4.32-35.

[31] Caesar，*BG* 4.36-38.

[32] Caesar，*BG* 4.38，Dio 39.53.1-2.

[33] Caesar，*BG* 5.1-7.

[34] Caesar，*BG* 5.5，8.

[35] Caesar，*BG* 5.9.

[36] Caesar，*BG* 5.10-11；see also G.Grainge，*The Roman Invasions of Britain* （2005），p.105-106.

[37] Caesar，*BG* 5.11，15-16.

[38] Caesar，*BG* 5.17-22.

[39] 公元43年，克劳狄皇帝在位时，罗马征服了不列颠，设立行省。

[40] Caesar，*BG* 5.22-23.公元16年，一支航海的罗马军队的部分兵力因风暴偏离航线，在不列颠登陆。士兵们带回了关于不列颠居民的狂野故事，见Tacitus，*Annals* 2.24。

[41] Cicero，*ad Att.* 4.17；西塞罗从弟弟昆图斯那里得知不列颠战役的情况，感到很兴奋，见*ad Quintum Fratrem 2* .16.4。

十四 叛乱、灾祸与复仇

因为萨比努斯事先对此毫无预料，一时间手足无措，惊慌地奔来跑去，部署各大队。即便如此，他仍然怯懦且糊里糊涂。一般来讲，人在混乱局势中被迫做出许多决策时，往往都会这样。相比之下，科塔已经猜到行军时可能发生此种情形，因此之前就反对率军出行。此刻，他竭尽全力去保障部队的安全，他在鼓舞士兵时尽到了一位将军的责任，而在战斗时又像普通士兵一样冲锋陷阵。

——恺撒 [1]

前54年8月，恺撒在不列颠征战之时，他的女儿尤利娅因难产死亡。婴儿（有的资料说是男孩，有的说是女孩）比母亲仅仅多活了几天。对罗马贵族而言，事实上对现代之前的绝大部分人而言，分娩造成的死亡实在不足为奇。尤利娅此前在与庞培的婚姻中已经至少怀孕过一次，但看到丈夫浑身是血地从选举中返回（后来发现是别人的血），大受惊吓，导致流产。因为我们不知道尤利娅的出生日期，所以也无法计算她去世时的年龄，但她顶多只有二十五六岁。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也于前54年去世，死因不详，但她这时已经六十多岁，当了三十多年寡妇。一年之内，恺撒失去了两位最亲近的家人。当年他参选祭司长时，曾向母亲宣称自己若是不能当选，就不会回家了。母亲在他家中主持了善良女神庆祝活动。她是个令人生畏的精明强干的女人，对自己的独子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并且目睹了他的一些伟大成功。现在她与世长辞了。女儿和母亲去世的噩耗都是以书信的形式送抵恺撒手中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在离开罗马的四年中见过母亲或女儿。这些对他个人而言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尤其是他唯一孩子的死亡。西塞罗给恺撒写了一封真挚恳切的吊唁信。西塞罗对自己的女儿图利娅也非常宠爱（或许是溺爱过头），几年后她也去世了，令西塞罗伤心欲绝。在这种时候，西塞罗的哀悼和感情是真诚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护与恺撒在政治上的纽带。庞培也为自己年轻妻子的去世而哀伤不已。尽管年龄差距很大，而且最

初结婚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是这对老夫少妻却非常恩爱。近些年来，庞培常常受到批评，因为他总是与妻子一起待在奢华的庄园享乐，而不是去处理共和国政事。普鲁塔克声称，庞培在与尤利娅的婚姻生活中从来没有出过轨。[2]

尽管翁婿俩对尤利娅之死的哀伤是非常真诚的，但元老们始终不会忘记对政治的关注。庞培打算将尤利娅火葬，然后将骨灰埋在自己在阿尔班的庄园之一（在罗马附近）。但在城内的公开葬礼之后，大群旁观者将她的遗体抬到了战神广场，并将她安葬在那里。据说群众此举是出于对尤利娅的同情，而不是出于对恺撒或庞培的好感。但和历史上的很多事件一样，我们很难判断此事究竟真的是群众自发的，还是有人在幕后安排的。葬礼结束后竖立了纪念碑，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可以看到。恺撒宣布将为女儿举办葬礼的竞技活动，但到十年后才真正举办。尤利娅之死使庞培与恺撒之间最亲密的纽带消失了。在随后几个月中，恺撒到处寻找一位女性亲戚，以便与庞培再续联姻。他提议让庞培娶他的甥孙女屋大维娅[3]，而他则与庞培的女儿庞培娅结婚。这就需要恺撒、屋大维娅和庞培娅分别与现任配偶离婚——庞培的女儿已经嫁给了苏拉的儿子福斯图斯。庞培否决了这个提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表现出再婚的想法，或许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罗马元老始终在考虑政治，但他迟迟不肯续弦，的确有可能是出于对亡妻的悼念。他对尤利娅情真意切，他的哀悼也是非常真实和深刻的。

尽管庞培和恺撒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但肯定没有破裂，两人目前都认为继续保持同盟关系对自己有利。到前54年，三头同盟的成员都已经是资深执政官，如果不辞职的话，就不得踏入罗马半步。前55年，庞培和克拉苏当执政官的时候，他们指使保民官特雷博尼乌斯通过了一项法案，授予他们两人在多个行省的五年指挥权（类似于恺撒在前59年得到的任命）。庞培得到了两个西班牙行省。在那里，罗马人可以发动征服战争，将自己的疆土一直扩展到北方和大西洋海岸，但已经五十一岁的

庞培并不打算重返沙场，尤其是在尤利娅还在世的时候。他已经庆祝了三次凯旋式，相信没有任何一位统帅能够有希望与自己平起平坐。于是他派遣军团长去治理行省并指挥那里的罗马军队，而他自己留在意大利，一般是待在罗马城外不远处的诸多别墅之一。庞培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常规的，此前没有任何一位罗马总督这么干过，不过他仍然负责粮食供应，因此有了个借口。[4]

克拉苏的情况则不同。他当年为苏拉效力时作战英勇，但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斯巴达克斯起义的时候，罗马连吃败仗，克拉苏力挽狂澜，表现出了军事统帅的才干。但战争结束后，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的危险，往往仅将这场战争视为镇压奴隶的行动。到前55年，克拉苏下定决心，要指挥一场在异邦的大规模战争，于是他得到了叙利亚作为自己的辖区。但在他上任之前，叙利亚行省的现任总督完成了在埃及的一场战役，夺去了一个获得荣耀与利润的良机[5]。于是克拉苏计划征服帕提亚，这个伟大王国位于亚美尼亚以南。即便按照罗马的标准，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进攻帕提亚人。庞培在东方战役中，以及恺撒在高卢，都已经将合乎罗马利益的军事行动的诠释延伸到了最大限度，但他们从来没有跨越那条界线，仅仅为了个人利益而发动战争。克拉苏则是明目张胆地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打仗，完全没有顾及共和国的需求。他的计划为人所知之后，两位保民官公开发出了抗议。其中一名保民官甚至在克拉苏于前55年11月离开罗马城的时候紧随队伍，对其发出了可怕的诅咒，因为他让共和国卷入了一场毫无意义且非正义的战争。西塞罗冷淡地说，克拉苏此役没有开个好头，而且他的远征有许多不和谐音。

克拉苏已经快六十岁了，这对罗马的野战指挥官来说已经非常年迈，而且他已经十六年没有打过仗了。在过去也曾有高龄人士被召来担任将领、为共和国效力，但通常只是在危机时刻。这一次，罗马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而克拉苏的指挥能力迟缓而平庸。前54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叙利亚，征收税款；表面上是在为计划中的远征筹款，但有

人恶毒地攻击他，说他在中饱私囊。从战争中赚取利润显然是克拉苏希望得到军事指挥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攀比和竞争的因素，因为如果庞培和恺撒都控制着自己的行省和军队，那么三头同盟中的另一位大人物当然也要有自己的指挥权，否则就会相形见绌。但从绝大多数方面来看，克拉苏在人生中的主要目标均已实现：他地位显赫，担任过两届执政官；富甲天下，影响力极强，而且正如喀提林辩论时所体现的那样，他几乎可以免受任何政治攻击或起诉。所以我们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他如此渴望得到军事指挥权，主要是为了与两位政治盟友竞争。克拉苏和庞培自一同在苏拉帐下效力时便互相嫉妒，克拉苏对庞培赢得的名望一直非常怨恨。现在恺撒也证明了自己是个伟大的将领，因此克拉苏作为三头同盟中最年长的一位，不肯被另外两人比下去。[6]

从前54年开始，三头同盟成员都不在罗马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代理人开展政治活动。三头同盟仍然处于主宰地位，但和以往一样，并不能一手遮天。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当上了前54年的执政官，他的同僚是克洛狄乌斯的长兄阿庇乌斯·克劳狄·普尔喀。同时，加图是裁判官之一。两位执政官都抱怨称，他们连军事保民官这样的下级官职都无法自由任命。三头同盟一共控制着20多个军团，这占了当时罗马军队的很大比例。阿庇乌斯为了给自己的一位门客弄到保民官的职位，甚至不得不北上内高卢去拜访恺撒。庞培待在罗马附近，或许并不怀念定期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旧时光，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演说家。克拉苏离开罗马城之后，影响力就削弱了不少，因为他不能始终吸引群众的眼球，也不能通过当律师为其他人辩护来卖人情。恺撒已经很熟悉自己远离意大利期间维护自己在罗马利益的问题了。他的亲信们非常活跃，尤其是巴尔布斯。从西塞罗的书信中，我们能瞥见恺撒的司令部与罗马的显赫权贵们之间潮水般的通信往来。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曾是庞培麾下的军团长之一，协助他监管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后来于前54年又去了高卢，担任恺撒的军团长。昆图斯先后为庞培和恺撒效力，也与西塞罗欠这二位的人情有关，当初是他们帮助西塞罗从流

亡中返回罗马。西塞罗自己不愿意离开罗马，而且他待在罗马对三头同盟更有用，于是昆图斯代替兄长为庞培和恺撒效力，这对他们家族有好处。西塞罗在给弟弟的信中时常询问恺撒情绪如何，以及恺撒是否表现出对西塞罗兄弟的善意。他还写道，自己将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寄给恺撒，以征询他的意见。这种通信并不是特别具有政治意义的信函，但在非正式层面上巩固了西塞罗与恺撒的关系。我们知道恺撒在第二次远征不列颠期间，给身处罗马的西塞罗写了至少三封信。[7]

西塞罗给自己的门客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泰斯塔的几封信保存至今。特雷巴提乌斯担任恺撒幕僚的职位就是西塞罗帮助他谋得的。年轻的特雷巴提乌斯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学家，这时他已经开始致力于法律事业。西塞罗最初向恺撒引荐特雷巴提乌斯的那封信也保留至今。西塞罗后来告诉昆图斯，恺撒“非常礼貌、非常机智地向我表达谢意。他说在他庞大的幕僚群体中，连一个能够写出像样的具结书的人都没有”。特雷巴提乌斯并没有得到一个军职（尽管西塞罗为另一名门客搞到了一个军事保民官的职位），而是负责处理行政和法律工作。即便如此，特雷巴提乌斯在很长时间内对自己的新职位仍然没有热情，非常思念罗马城。前54年8月，西塞罗写信给特雷巴提乌斯，说他刚收到了恺撒的信，恺撒在信中“非常礼貌地”告诉他，他（恺撒）还没有机会去了解特雷巴提乌斯，但向西塞罗保证，一定会去认识了解特雷巴提乌斯。西塞罗告诉自己年轻的门客，他已经在恺撒面前替他说了不少好话，请恺撒好生栽培和提拔他。西塞罗在这封信以及其他信中表达出对门客的恼火，因为后者缺乏耐心又不够积极主动。如果自己推荐的人没有得到赏识，那么推荐者自己的威望也会受损。尽管恺撒或许会为了继续卖人情给西塞罗，愿意接受西塞罗推荐的任何人选，但西塞罗也急于发挥自己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恺撒正在作战、百事缠身，他和西塞罗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讨论的都是罗马元老们一贯关心的问题。西塞罗和恺撒之间的通信虽然被公开发表，但大部分都已遗失。我们有理由相信，恺撒和其他许多元老也有着同样频繁的通信往来。[8]

叛乱

尽管恺撒从来不会忽视政治问题，但在随后几个月里，他将持续奔波作战，很少有闲暇时间。从不列颠返回后，他召集高卢各部落的领袖开会，然后监督自己的军队进入冬季营地。这一年的农业收成很差，恺撒的解释是这年夏季特别干旱，但实际上他近些年中的作战很可能扰乱了很多地区的农耕。于是他的8个军团没有驻扎在一处，而是分散在非常广大的地域。大部分军队都驻扎在比利时部落的领地，这些部落新近与罗马结盟，还没有得到完全信任。在前几年里，恺撒很快就返回内高卢过冬，但这一年等待的时间比过去久。他确保部队安全地驻扎下来，才动身离去。每个军团的指挥官是一名军团长或他的财务官，这一年的财务官是克拉苏的长子马尔库斯。新的军团长中包括特雷博尼乌斯，此人在前55年担任保民官，为庞培和克拉苏搞定了五年的总督职权，还为恺撒延长了任期。每个军团的指挥官都被要求在部队安排就绪、营地建立起恰当的防御工事之后向恺撒发出报告。我们知道昆图斯·西塞罗被允许自行选择其军团扎营的具体地点，其他军团长应该也有自行选择驻地的权力。军队进行过冬准备的同时，恺撒注意到一些部落在骚动不安。他指定的卡尔尼特部落国王被其他酋长杀死了，迫使他不得不改变军队部署，将1个军团从比利时人领地调到卡尔尼特人领地那里过冬。[9]

恺撒来到高卢之后，有些酋长得到了好处。但对有的酋长来说，只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春风得意而已。在杜诺列克斯开始给罗马人制造麻烦的时候，恺撒就草草地将他解决了，这让很多高卢酋长意识到谁要是不听恺撒的话，就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虽然高卢处于罗马主宰之下，但部落内部贵族的权力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如果在恺撒统治下处境困难的部落能够成功地反抗他，也许能够带来名望和权力。在前54年夏季出征不列颠之前，恺撒曾干预特雷维里部落里互相竞争的领导人之间的纠纷。其中一个叫因杜提奥马鲁斯的酋长输给了罗马支持的另一位

酋长。当时因杜提奥马鲁斯与恺撒达成了谅解，亲自去恺撒营地交了200多名人质。冬季，罗马军队兵力分散，颇为脆弱，因杜提奥马鲁斯感到打击罗马人的时机到了。因杜提奥马鲁斯计划召集所有忠于他的特雷维里人，攻击拉比埃努斯指挥的罗马军团（驻扎在特雷维里人领地）。但他知道单凭特雷维里人是不可能打败恺撒的，于是花了不少时间怂恿邻近部落的酋长们（他们同样怨恨罗马的统治）一同造反。这并不是一场由单一领袖进行有力协调的大叛乱，而是差不多在同时期爆发的一系列独立叛乱，分散了罗马的兵力，因此形成各部落之间互相支持的局面。最先发难的不是特雷维里人和因杜提奥马鲁斯，而是厄勃隆尼斯人，他们居住在今天的阿登地区。厄勃隆尼斯人指定了两位指挥官，分别是阿姆比奥雷克斯和卡图沃尔库斯，他们击败了恺撒的军队，这是后者仅有的三次严重失败中的一次。[10]

罗马人的15个大队驻扎在厄勃隆尼斯人领地上，位于一个叫作阿图阿图卡的地方（可能位于现代的列日或通厄伦[11]附近，具体位置不详）。这支部队包括了整个第十四军团，但另外5个大队究竟是从其他军团配属来的，还是独立单位，我们不得而知。恺撒在外高卢征募了至少20个大队，其士兵甚至没有拉丁人的身份（来自外高卢行省的士兵有拉丁人的身份）。恺撒说道，驻扎在阿图阿图卡的这支队伍包括一些西班牙骑兵，或许还有其他辅助部队，因此总兵力应该有6000～8000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恺撒的两名军团长科塔和萨比努斯，两人都曾在作战中独当一面，虽然没有突出的军事才华，但也算相当精干。前55年，他们曾联手讨伐门奈比人。恺撒没有说明科塔和萨比努斯中是不是有一人是最高指挥官，但从他的叙述判断，两人应当是联合指挥，地位平等。他们轻松击退了厄勃隆尼斯人对其营地的第一次进攻，但随后阿姆比奥雷克斯前来谈判，声称自己是被部落族民强迫起兵打仗的。他告诉罗马代表，高卢全境都已密谋，各部落约定在今天各自攻击当地的罗马军队。由于恺撒过去曾对他照顾有加，他现在知恩图报，提议允许罗马人安全撤离，与50里之内另外2个罗马军团中的任意一个会合。当夜，

两位军团长为了下一步如何行动争论起来。萨比努斯主张接受对方的提议；科塔认为他们不可以违背恺撒的命令，应当留在营地中，因为他们拥有足够多的粮草，可以坚守到得到救援。最后萨比努斯占了上风，于是次日黎明时，罗马军队开拔了。厄勃隆尼斯人熟悉地形，在罗马人经过的一道峡谷处设了埋伏。罗马人被包围了，连续损兵折将。科塔在战斗初期便被石弹打伤，但仍然坚持鼓舞士兵奋战，并努力组织抵抗。萨比努斯陷入绝望，遭到包围，与阿姆比奥雷克斯谈判时被杀。科塔组织起来的抵抗力量也被敌人消灭，他在敌人最后的冲锋中阵亡。少数幸存者在随后几天内陆续逃到拉比埃努斯的营地，但15个大队基本上被全歼了。[12]

在《战记》中，恺撒将此次惨败的责任全都推给萨比努斯。在恺撒笔下，科塔与萨比努斯据理力争，就像一位罗马贵族在危机中应当表现的那样。科塔与萨比努斯的出身都不是特别显赫，因此恺撒不必过于担心冒犯元老院中势力强大的派系。他声称自己是根据幸存者讲述的故事和后来作战中抓到的俘虏的审讯，复原了当时的事件经过。《战记》给出的版本并没有本质上说不通的事情，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一些军事灾难，比如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期间埃尔芬斯通[13]和麦克诺顿[14]的悲剧，也很相似。恺撒记述的情节完全有可能是真实的，但他显然致力于减小这场灾难造成的影响，并将他本人与战败的罪责拉开距离。他的叙述非常详细，描绘了两位指挥官之间的辩论，以及行军队伍遭到伏击时的混乱。除了科塔鼓舞官兵拼杀时振奋人心（尽管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英雄事迹，比如一位百夫长为了营救自己的儿子而牺牲，以及旗手（与在不列颠登陆作战时的英雄不同，这一位旗手的名字被记载下来）在临死前将鹰旗投掷到安全地带（躲在营地内的幸存者于当夜全部自杀，因此鹰旗最后还是被敌人缴获了）。恺撒试图向世人证明，此次战败完全是军团长萨比努斯的错，但同时代人很少上他的当。所有史料都认为，战败是恺撒的责任。作为执掌军权的总督，他应当为自己麾下的全军负责。当时罗马总督写给元老院的信一般这样开头：“我一

切皆好，军队亦如此。”萨比努斯和科塔作为他的军团长或“代表”，都是由他挑选出来，根据他的命令行事。如果他们两人联合指挥，职权不分高下，那么恺撒就是犯了大错。拿破仑曾说，一位糟糕的指挥官也好于两位共享权力的优秀指挥官。萨比努斯选择率军出营，或许是违背了恺撒的命令，但这意味着恺撒要么没有将自己的想法明确表达出来，要么没有勒令军团长严格服从命令。恺撒要对失败负最终责任，即便是他的部下犯了错误，战败也要算在他的账上。他的相当一部分军队被高卢名望最低的部落之一全歼了。这种事情是史无前例的，让人对罗马不可战胜的形象（正是他到目前为止的常胜不败让人形成了这种印象）产生了质疑。[15]

罗马不可战胜的光辉形象受损的第一个迹象是，阿姆比奥雷克斯及其侍从骑马来到邻居阿杜亚都契人的领地，然后进入了内尔维人的领地。绝大部分厄勃隆尼斯人已经作鸟兽散，就像历史上许多部族武装或非正规军那样，携带着战利品各自回家了。但他们得胜的消息足以鼓舞其他部落，内尔维人也被说服去攻击在他们土地上过冬的罗马军队。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昆图斯·西塞罗，他之所以能够当上军团长，仅仅是为了巩固他哥哥与恺撒之间的友好关系。昆图斯尽了家族义务，但他不是一位激情洋溢的军人。在他的家信里，他常抱怨军旅生活的艰苦，而且他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职责上。前54年秋季，在率领自己的军团进驻冬季营地时，他告诉自己的哥哥，他在仅仅十六天内便创作了四部悲剧。当内尔维人突袭他的营地时，昆图斯·西塞罗的反应很迅猛。因为萨比努斯和科塔的噩耗还没有传来，所以他的部队事先并没有防备，但他仍然击退了敌人的第一轮进攻。内尔维人在同盟氏族以及一些阿杜亚都契人与厄勃隆尼斯人的支持下，开始安顿下来攻打罗马营地。一夜之间，西塞罗的部下修建了120座小塔楼来加强营地的壁垒。建造这些塔楼所需的材料是预先备好的，储存在营地内，但显然防御工事并未完全竣工。现在，罗马士兵们开始拼命施工。次日，他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二轮全面进攻。不管昆图斯·西塞罗的个人性情和才干如

何，他都做到了一位罗马元老应该做的。白天作战时，他鼓舞将士；夜间，他监督士兵们劳作以继续巩固防御工事，并制作新的投射武器。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最后在士兵们的劝说下回到自己营帐休息。我们很容易觉得，西塞罗部下的军官们才是防御作战的真正核心，而他本人有时候会碍手碍脚。恺撒希望与昆图斯及其兄长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在《战记》中一定会把昆图斯的表现描绘得比较正面。尽管昆图斯·西塞罗缺乏军事才华，经验也有限，但他表现出了真正的勇气，尽了最大努力去防守营地，并且冷冷拒绝了敌人停战并允许他的人马撤往安全地带的建议。围攻在继续，比利时人以壕沟和壁垒将罗马要塞包围，并建造了活动防盾和其他攻城器械。就在几年前，攻城器械在高卢还是新鲜玩意儿，但各部落对恺撒军队做了观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攻城器械的技术。罗马守军逐渐消耗，伤员越来越多，这意味着身体健全者的负担越来越重。罗马守军的数量远少于敌人，恺撒说此地有6万名内尔维人，显然是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内尔维人在前57年蒙受了极大的损伤。如果得不到援救，昆图斯·西塞罗全军覆灭只是时间问题。[16]

昆图斯·西塞罗遭到攻击后立刻派信使去向恺撒报告，但这些信使都没能穿过比利时人的战线。好几名信使被敌人俘虏，带回城墙下，当着罗马军团士兵们的面处死。围城战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之后，才有一名信使通过了敌军阵线。这名信使是个高卢人，是一位仍然忠于罗马、在西塞罗身边的高卢贵族的奴隶。一天深夜，恺撒在位于萨马罗布里瓦（现代的亚眠）的营地接到了告急文书。西塞罗的书信除了报告自己的处境外，还为恺撒提供了萨比努斯与科塔部队遭歼灭的最早线索。到目前为止，恺撒完全不知道高卢人发动了叛乱，这足以证明他的情报是多么依赖各部落中亲罗马的贵族。这消息着实令人震惊。恺撒意识到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昆图斯·西塞罗的部队必须即刻得到救援，否则必然覆灭。若是让高卢人取得第二场胜利，叛乱的势头会更猛烈，越来越多的领袖和部落会加入叛乱。在萨马罗布里瓦，恺撒手头只有1个军团，守卫着全军的主要辎重、档案资料、军饷资金、从高卢全境搜罗来的粮

食，以及自前58年以来获得的数百名人质。西塞罗的门客特雷巴提乌斯以及其他许多行政官员和文书人员都在那里。若是带着这些非战斗人员，恺撒就无法迅速行动，但他也不能将他们丢下不管。因此他的第一道命令是发给财务官马尔库斯·克拉苏的，后者及其军团就驻扎在不到25里的范围内。克拉苏接到的命令是火速赶往萨马罗布里瓦，他开拔时已是午夜。克拉苏应该是先行派出了自己的前哨警戒部队，军团的其余人员则是在做好准备后出发。次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克拉苏军团的先头巡逻队（可能是骑兵）抵达了恺撒的营地，并告诉他大部队就在后面不远处。[17]

恺撒让他的财务官留在萨马罗布里瓦，保护那里的人员和珍贵物资，然后亲自率军出发，第一天行军20里。除了他手头的1个军团之外，他还拼凑到了400名辅助骑兵和同盟骑兵，行军途中还有希望得到另外2个军团的增援。他派遣信使去找盖乌斯·费边（此时驻扎在莫里尼人领地），指示他穿过阿特雷巴特人领地行军，与经过同一地区的恺撒会师。他还向拉比埃努斯发去命令，指示他尽量在内尔维人领地边境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允许他视情况而定，若原驻地的形势有需求，他也可以留在原地。费边迟到了一点，但还是与恺撒会合了。拉比埃努斯派来一名信使骑兵称他无法调动，因为特雷维里人征募了一支军队，就驻扎在离他3里路的地方。他还证实了萨比努斯和科塔的命运，将逃到他那里的一些幸存者的说法转述给恺撒。恺撒同意他的高级军团长的决策，但他现在只有2个军团，而且是2个长期作战、师老兵疲、缺编严重的军团。即便加上骑兵，他的兵力也只有7000人多一点，而且在随后几周内都没有希望得到增援。如果他耽搁不前，那么西塞罗的营地可能陷落，那就又会损失一个军团，这必然会给叛乱煽风点火。他此次行军只带了少量辎重和最低限度的粮草。此时已是深秋，部队在经过的田地中无法找到足够的粮食或草料。罗马人必须速战速决，而绝不能打一场谨慎而缓慢的运动战。恺撒催动部队拼命狂奔，去营救被围友军。他的决定在战略上是很有意义的，也符合罗马的军事思维，即强调积极主动，但风

险肯定很大。还有另一个更私人的动机促使恺撒继续前进。他的部下此刻面临危险，而官兵与统帅之间逐渐培育出的信任就建立在守信的基础之上。只要还有希望挽救被围困的士兵，恺撒就不能放着他们等死。在得知15个大队被全歼的噩耗后，他发誓在为阵亡将士复仇之前绝不剃须理发，这表达了他对死者的深切感情。对于特别重视仪表的恺撒来说，不剃须理发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因此他的这个姿态非同小可。满脸胡楂的恺撒鞭策着他的7000名士兵强行军。[18]

侦察兵捕获的俘虏供称，西塞罗的人马还在坚守。一名高卢骑兵被劝服穿越敌军战线去送信。这封信是用希腊字母写的，恺撒相信比利时人读不懂它。这名信使无法进入西塞罗的营地，于是按照指示将书信缚在一支长矛上，然后将其投射到营地。这支长矛插到了一座塔楼的侧面，但一连两天都没有人注意到这封不寻常的书信，最后终于有人发现了它，将它送到西塞罗手中。军团长检阅了部队，向他们宣读了恺撒的信，告诉他们恺撒正在赶来救援。他们看到远方升起了烟柱，那是一支罗马军队在逼近，按照惯例沿途纵火焚烧“敌人”的农场和村庄。比利时人巡逻队也发现了恺撒正在逼近，于是围困西塞罗的军队立刻放弃围困，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即便比利时人的兵力没有恺撒宣称的6万之众，也肯定远远超过恺撒此次带来的小队伍。西塞罗请求之前帮助他的那名高卢贵族再派一个人穿越敌军战线去告诉恺撒，比利时军队正在准备迎战他。高卢信使于午夜抵达恺撒的营地，恺撒立刻将西塞罗的书信内容告诉部下。据苏埃托尼乌斯说，若是有坏消息，恺撒总是亲口将坏消息告诉部下，并且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自信地告诉他们，以便让他们觉得大可不必担心。有时他甚至会夸大危险的程度。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位谨慎小心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总是在天亮前就开始行军；但在次日，他一直等到黎明才将队伍向前推进了4里。在这个季节，北欧的白昼较短。内尔维人及其盟友在一条小溪后方的山岭上严阵以待。在前57年，比利时人曾选取类似的阵地，他们很可能占据了进入其领地的主要道路，部落间交战时常常利用这些道路。[19]

恺撒的兵力远不及敌人，他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来支撑长时间作战。越过小溪然后爬山去攻击居高临下且早有准备的敌人，那样对他非常不利，或许会导致灾难。因此，他需要诱使比利时人放弃自己的阵地来攻击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刻意将自己的营地设计得比正常情况小——尽管这样一支没有辎重的小部队营地本来就够小了——让在营地中划分各单位宿营地的街道比正常情况更加狭窄。他希望内尔维人轻敌，主动来攻击他。为了防止这个计策不奏效，他还派出了侦察兵，去寻找越过小溪的其他路径，希望找到从侧翼包抄敌人阵地的办法。白天，两军在山谷两侧对峙，只有骑兵冲上去进行了小规模交锋。次日拂晓，局势与先前一样，但恺撒命令他的辅助部队在敌人面前退让。内尔维人的骑兵很少，声望也不高，因此他们将恺撒的骑兵打回营地，这对内尔维人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为了制造畏敌的假象，罗马人将其营地的壁垒修建得比一般情况要高，并用由一排草皮制成的墙封死了四个出入口。内尔维人吞下了诱饵，越过小溪，来到了山谷的罗马人这边。罗马人故意假装慌乱，诱骗敌人一点点接近。罗马军团士兵们甚至放弃了壁垒，似乎是害怕正在逼近的内尔维武士。比利时人派来传令官宣布，恺撒的部下若是弃他投降，将受到欢迎；但在期限之后若是还不投降，就不会得到宽恕。过了一会儿，内尔维人来到壁垒前，有些武士开始拆毁封堵大门的草皮墙。直到这时，恺撒才命令进攻。此前等候在大门后的罗马部队开始冲锋，轻松地推倒了薄弱的屏障。内尔维人惊慌失措地逃窜，罗马军团士兵猛追上去，恺撒还命令骑兵冲出来支援。有些内尔维人当场丧命，有的丢盔弃甲地逃跑；但罗马人没有追多久，恺撒便命令他们返回，因为他担心如果士兵们追击敌人太远，会在附近的树林和沼泽中遭到伏击。[20]

敌军溃散后，恺撒继续推进，去营救西塞罗。他特意夸奖了这位军团长，并分别视察和表彰了守军的军官和士兵。西塞罗麾下只有十分之一的官兵安然无虞、没有负伤，尽管很多伤员伤势不重，还可以作战。次日，恺撒检阅了部队，这一次讲到了科塔和萨比努斯的战败，将后者

作为替罪羊，并鼓励将士们将来奋勇作战。罗马人胜利的消息传到特雷维里人那里，他们的军队从威逼拉比埃努斯营地的位置上撤退了。恺撒派遣费边及其军团返回其位于莫里尼人领地的营地，然后带领西塞罗的军团和他自己的部队返回了萨马罗布里瓦。在整个冬天，他始终把这些部队和克拉苏的军团留在萨马罗布里瓦附近，以便保留一支打击力量，应付可能发生的新叛乱。恺撒也留在军中，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前往阿尔卑斯山以南过冬。高卢局势一触即发，他不能离开。这一年也许是没有发表《战记》的唯一一年。《战记》的第五、第六卷很可能是在前53年～前52年冬季发表的。恺撒实在太忙，而且在扑灭叛乱的全部余烬之前，他也不愿意发表一部关于尚未结束的冲突的书。到前54年12月，高卢爆发激战的消息已经传到了罗马，西塞罗写信给特雷巴提乌斯说，他听说他们最近“打得很激烈”[21]。整个冬季，恺撒始终对各部落保持密切关注：“听说萨比努斯的战败和死亡之后，几乎所有高卢部落都开始考虑打仗，向该地区派遣使节和代表团，去打探风声（看其他人是怎么想的，战争将在何处开始），并在偏僻的地方召开夜间会议。”[22]

在阿莫利卡（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布列塔尼），一支部族武装集结在卢基乌斯·罗斯基乌斯和第十三军团的营地附近，但后来被解散了。恺撒支持的一位酋长——希诺奈人国王卡瓦里努斯——遭到其他酋长的攻击，险些丧命，逃到萨马罗布里瓦的恺撒营地。这年冬季余下时间里的作战是由拉比埃努斯指挥的。因杜提奥马鲁斯曾尝试获得日耳曼人的支持，但失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集结了一支由他的部落同胞组成的军队，去袭击拉比埃努斯的营地。一连几天，特雷维里人在拉比埃努斯营地外的平原上排兵布阵，挑战罗马人。拉比埃努斯连续多次拒绝应战，但有一天，在特雷维里人没有得到答复准备散去之时，拉比埃努斯派出了同盟骑兵去追杀特雷维里人。他给己方骑兵的命令是杀死因杜提奥马鲁斯，对其他人置之不理。杜提奥马鲁斯丢了性命，他的首级被带到拉比埃努斯面前。失去了领袖之后，特雷维里武士们便散去了。[23]

焦土政策：惩罚各部落

这年冬季，恺撒不仅补充了兵员损失，甚至还征募了之前兵员人数两倍的新兵，这让高卢人渐渐相信，罗马的人力资源是无穷无尽的。他在内高卢组建了3个新军团，包括新的第十四军团以取代惨遭全歼的部队，以及第十五军团和第一军团。第一军团尽管是在恺撒的行省组建的，但按照原计划应为庞培在西班牙的军队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向他宣过誓，所以它的番号来自不同的序列。庞培自己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计划，于是同意将这个新军团“借”给恺撒，“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以及我们的私人友谊”。恺撒现在拥有10个军团，但叛乱部落也在集结力量。阿姆比奥雷克斯在鼓动各部落起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还与特雷维里人正式结盟。另外，内尔维人、阿杜亚都契人和门奈比人都已经公开与罗马交恶，而其他一些部落，如希诺奈人和卡尔尼特人，都排斥了亲恺撒的领导人，并拒绝听从恺撒的召唤去开会。恺撒决定，必须在作战季节的常规开端（初春）之前就展开行动。他希望夺取主动权，因为在叛乱一开始，主动权就掌握在叛军手中。罗马军队将会发动进攻，并证明罗马尽管蒙受了一次失败，但仍然强大，与罗马作对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各部落没有统一的领袖，没有首都，看上去似乎也没有能力集结一支野战军。击败了一个部落，其他部落也未必会投降，因此罗马人需要逐个击败敌人。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恺撒便攻击部落武士们的家园和农场。罗马军队将会焚毁敌人的房舍，吃掉或销毁敌人的庄稼和牲畜，将敌人杀死或奴役。罗马人用“焦土政策”（Vastatio）一词来指代这种活动，Vastatio是英语词devastation（毁灭、大破坏）的词根，甚至还有一个动词vastare来表示这个过程。这种行动极端残暴，但很有效，能够震慑敌人，迫使其承认失败、举手投降。历史上占领外国军队常常使用类似手段，但很少有军队能够在残忍和高效上超越恺撒的罗马军队。[24]

冬天还没过完，恺撒便集结了4个军团，集结地可能是萨马罗布里

瓦附近，并攻击内尔维人。部族武装要集结起来总是需要不少时间，因此内尔维人没有多少机会自卫或者逃跑。罗马人的进攻显得格外出其不意，因为在这个季节高卢人无法组建一支大军来作战。前57年，即便在夏季，比利时大军也因为缺乏粮草而被迫解散。而罗马军队拥有有序且高效的后勤补给体系，所以能够在冬季作战。恺撒的部队俘虏了许多人口，将其牲畜搜刮一空，并烧毁了村庄。面对这场屠戮，内尔维人迅速投降，向罗马人交出人质。恺撒撤军了，并向各部落发去讯息，传唤他们来年初春前来开会。希诺奈人和卡尔尼特人又一次不肯来开会，特雷维里人也拒绝参加，此时特雷维里人的领导人是因杜提奥马鲁斯的家人。恺撒这次会议的地点是塞纳河上的卢泰提亚，此地是巴黎西部落的主要城镇，今天法国首都巴黎的名字就源自此部落。在会议召开之前，恺撒率军讨伐希诺奈人。希诺奈人还没来得及躲到自己的城镇围墙之内，便遭到突然袭击，很快投降了。埃杜依人为希诺奈人求情，于是恺撒对希诺奈人的发落相对宽大。他对希诺奈人高抬贵手的部分原因是希望对罗马的老盟友埃杜依人表示尊重，部分原因则是希望尽快展开镇压其他叛乱部落的行动。希诺奈人交出了一百名人质，但罗马人没有大规模奴役希诺奈人。卡尔尼特人意识到自己极可能是恺撒的下一个讨伐对象，于是向他派遣使者，并请雷米人的代表作陪。恺撒又一次接受了卡尔尼特人的投降。按照惯常的做法，他在会议上要求各部落提供骑兵部队。他私下里决定将希诺奈人提供的骑兵始终保留在自己身边，以便随时监视其指挥官——酋长卡瓦里努斯。[25]

高卢中部就这样被“平定”了，于是恺撒将目光转向东北方。阿姆比奥雷克斯是与恺撒敌对的部族领袖中最有影响力和领导力的一位，但恺撒判断阿姆比奥雷克斯不大可能冒险公开对阵。于是他决定先拿阿姆比奥雷克斯的盟友或潜在盟友开刀。恺撒将辎重和补给物资送往拉比埃努斯处，并以2个军团押运。恺撒本人则率领5个军团和最低限度的粮食与重装备，去征讨门奈比人。此时3个新建军团中似乎只有1个与主力部队会合了。门奈比人和以往一样，避免正面交锋，躲藏在难以通行的森林

与沼泽中。但这一次罗马人早有准备。恺撒将部队分为三个独立纵队，各自在门奈比人领地清扫道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罗马军队的工程技术极其高超，只要领导得力，没有什么地方是他们去不了的。门奈比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安全，看到烧毁村庄时的黑烟之后，不禁垂头丧气，于是派遣使节向恺撒投降。罗马主力部队继续前进，留下阿特雷巴特酋长科密乌斯及其武士，以确保门奈比人不会反悔。此次行动还在进行中的时候，特雷维里人向拉比埃努斯发起了攻击。拉比埃努斯表现出了他一贯娴熟的指挥技艺，将敌人诱入险境，然后向其发动猛攻，据说拉比埃努斯要求他的部下“把经常在将军面前表现的勇气拿出来”。他的3个军团（他自己的军团，以及在交战前护送辎重抵达的2个军团）将特雷维里人杀得血流成河。此次惨败之后，特雷维里部落中敌对罗马的酋长们逃到了莱茵河以东，该部落的权力被重新交给了亲罗马的秦格托利克斯。[26]

因杜提奥马鲁斯和阿姆比奥雷克斯都向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部落求援，但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因为按照恺撒的说法，日耳曼人仍然在为阿里奥维斯图斯、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的命运而心惊胆寒，所以只有少量武士前来支援因杜提奥马鲁斯和阿姆比奥雷克斯。即便如此，恺撒仍然决定第二次渡过莱茵河，既是为了震慑日耳曼各部落，防止他们向他在高卢的对手提供哪怕是最微薄的援助，也是为了阻止阿姆比奥雷克斯躲到莱茵河以东。罗马军队推进到莱茵河，修建了一座新桥梁，地点与他们在前55年建造又拆毁的桥梁相去不远。恺撒没有详述这座桥梁的细节，只是说他的士兵们之前有过架桥的经验，因此这次很快就完工了。前55年在莱茵河上架桥还算是一次对未知异乡的激动人心的探索，但这次就仅仅是常规行动了。这就是此次渡河作战的核心意义，即明确无误地向日耳曼人宣示，大河对罗马人来说不是障碍；只要恺撒愿意，随时都可以攻击日耳曼人的家园。和第一次远征日耳曼一样，这一次也没有发生真正的交战。乌比人很快派来使节告诉恺撒，他们始终信守与罗马的盟约。苏维汇人退回自己的家园腹地。乌比人告诉恺撒，苏维汇

人正在集结军队，假如恺撒入侵，就将迎战他。恺撒做好安排，保障自己的供应充足，命令乌比人藏好自己的粮草与牲畜，以防为敌所用，然后开始挺进。苏维汇人得知消息之后，继续撤退，决定在自己领地更深处与恺撒交战。可能是恺撒兵力之雄厚令苏维汇人吃惊，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集结更多武士，方可与恺撒对阵。恺撒决定不再继续东进，声称由于日耳曼人主要是畜牧民族而非农耕民族，他很难就地获取粮食，因此难以为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考古学表明，恺撒将日耳曼人定性为畜牧民族是颇具误导性的，因为日耳曼地区有着悠久的农耕传统。即便如此，与高卢大部分地区相比，日耳曼人口的分布可能较为稀疏，小麦和大麦产量也较少。在日耳曼地区，罗马军队也许能够维持给养，但肯定会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同盟部落从自己的盈余粮食中取出一部分来供养罗马军队。对恺撒而言，与苏维汇人交锋并将其打败并不是特别重要。他又一次夸耀了自己的武力，并迫使苏维汇军队一退再退。双方都非常谨慎地尊重对方的实力，不大可能发生交战，尤其是因为恺撒和苏维汇人各自都有更紧邻也更弱的对手要处置。[27]

恺撒夸大了莱茵河作为边界的重要性，也夸大了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差别，但他这么做是为了支持一项明确的战略。尽管他自前58年以来一直乐于捕捉机遇去开展新的战争，但他并没有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追求无止境的征服梦想。他知道自己的指挥权是有时间限制的，并热切渴望最终返回罗马，去享受他的新荣耀与财富所带来的利益。他从很早就决心集中力量于高卢，并将整个高卢地区纳入罗马的主宰范围。这是一个完全有希望达成的目标——他最初产生这个想法可能是在最初的五年任期内，在前55年任期得到延长时一定已经明确了这个目标。在现有任务之外再征服日耳曼，显得不切实际，而莱茵河以东的作战总会分散他的力量，阻碍他在高卢取胜，尽管有时必须进军莱茵河以东。他可能也相信自己除了高卢之外还能征服不列颠或者至少是不列颠的东南角，但他起初的想法是基于对不列颠非常模糊的地理概念。在第二次远征不列颠之后，恺撒即便有意愿，也没有时间去取得对不列颠的永久性

控制。随着岁月流逝，在伊利里库姆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计划也被搁置了。恺撒集中力量于高卢，其他一切在他的战略中都处于从属地位。对意大利人来讲，可以将莱茵河理解为一道自然疆界，绝不能允许此疆界之外的任何人挑战罗马对新的高卢行省的统治权。[28]

返回莱茵河西岸后，恺撒拆毁了他的很大一部分桥梁，并留下部队驻守。此时已是夏末，庄稼成熟了，部队可以就地取食。恺撒将兵锋转向厄勃隆尼斯人和阿姆比奥雷克斯，其腹地位于阿登地区的森林中。他派遣骑兵先于主力部队前进，并命令部队夜间不准点火，以防止篝火或者云层反射的火光被敌人发现。他们突然杀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俘虏了很多人。俘虏供出了阿姆比奥雷克斯的下落，罗马骑兵袭击一座村庄时，差一点将阿姆比奥雷克斯生擒。罗马的盟军骑兵缴获了阿姆比奥雷克斯的绝大部分财产、马匹和战利品，但阿姆比奥雷克斯本人溜走了，和他的追随者一起藏匿在茂密森林中。曾与他一同击败萨比努斯和科塔的卡图沃尔库斯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这样躲藏，于是在一根紫杉树上自缢了。（他的自杀可能带有某种宗教仪式的意味，或许是一位国王在未能保护子民免于灾祸后引咎自尽。不过恺撒没有说到这一点。）恺撒率军赶往阿图阿图卡，也就是前一年冬天发生灾祸的地点。大约在这个时期，另外2个新建的军团也与他会合了。他将辎重留在阿图阿图卡，指示新建的第十四军团在昆图斯·西塞罗指挥下守卫辎重，然后将其余部队分成若干快速纵队，袭扰敌人。恺撒率领3个军团奔向斯海尔德河[29]，拉比埃努斯指挥3个军团讨伐门奈比人，特雷博尼乌斯也带领3个军团攻打阿杜亚都契人。兵贵神速，各部队行军时只带最基本的口粮，因为按照计划，所有部队都将于一周后返回阿图阿图卡。各部队都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但掉队士兵和脱离主力的小群士兵常遭到埋伏。恺撒觉得继续这样扫荡下去，罗马军团士兵会持续蒙受损失，太不值得。于是他向高卢全境下令，允许任何人袭击劫掠厄勃隆尼斯人及其盟友。很多高卢武士欢迎他的这个号召，很快就有许多高卢人的队伍开始积极地攻击厄勃隆尼斯人。[30]

在恺撒返回阿图阿图卡之前，西塞罗的营地遭到了一群日耳曼人的袭击。这些日耳曼人原先是渡河进入高卢来参加劫掠厄勃隆尼斯人的，但后来发现罗马军队的辎重是一个无法抵御的诱惑。西塞罗击退了敌人，但几个处于营地之外的大队损失惨重。在《战记》中，恺撒温和地批评西塞罗没有服从他的命令，让部队过于远离营地，但这种批评非常轻描淡写，因为恺撒不想疏远这位军团长或其兄长。这次挫折令人尴尬，尤其是因为它发生在去年冬天灾难发生地的不远处，但仍然只是个小挫折。在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恺撒继续追捕阿姆比奥雷克斯，但始终未能得手。越来越多的高卢盟友参与追剿阿姆比奥雷克斯，景象非常惨烈：

> 每一座村庄，每一座房屋，只要是能找得到的，都被付之一炬；缴获的牛群被聚拢起来；小麦不仅被士兵和牲畜吃掉，还被这个时节常见的瓢泼大雨冲毁，所以即便是那些藏匿起来的人，在军队离开之后也注定会饿死。[31]

在前5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恺撒都在南征北战，冬天尚未结束就开始作战，一直持续到初秋，但没有打过一场大战役。唯一一场比较重大的战斗是由拉比埃努斯完成的，恺撒本人并不在场。这一年里，罗马人在广袤地区大肆破坏、制造恐怖气氛，不过以震慑恫吓为主，因为他们的劫掠破坏只发生在他们途经的地方。高卢东北部元气大伤，值得注意的是，在恺撒征服高卢之后，该地区遗址中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的数量急剧下降。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区物质文化的质量与数量都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说明此地区至少经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得以恢复。这种恐怖镇压政策的危险在于，它播下了人民怨恨的种子，但恺撒认为只有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才能磨灭人们对萨比努斯惨败的记忆。我们不知道，恺撒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为阵亡将士复仇的誓言已经兑现，并吩咐奴隶为他理发剃须。作战季节结束后，他率军撤退，并又一次传唤高卢酋长们开会，这次的地点在杜罗科托鲁姆（现代的兰斯），这是雷米人的主要城镇之一。这一年早些时候，他曾满足于对希诺奈人与卡尔尼特人的骚动

袖手旁观。现在他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希诺奈部落的显贵阿科是骚动的幕后黑手。恺撒决定施加比“他的惯例”更严酷的惩罚，将阿科公开鞭笞并处决。此事比杜诺列克斯之死更令部落领袖们震惊，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恺撒这个决定也许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但也许是因为他急于前往内高卢，因此特别焦躁。他的一个高卢亲信被杀，而另一个亲信被竞争对手驱逐，也促使他施加了特别严厉的惩罚，因为恺撒始终强调自己对“朋友”（不管是罗马人还是外国人）的忠诚与关切。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恺撒下令将全军拆分：2个军团在利于监视特雷维里人的地方过冬，2个军团负责监视林贡斯人，剩余6个军团则集中在希诺奈人的一个主要城镇附近。[32]

恺撒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度过了一年半时间，因此内高卢和伊利里库姆无疑有很多事务急待他的处理。可能就是这个时期，他撰写并发表了《高卢战记》的第五卷和第六卷，涉及前54年和前53年的事件。第五卷详细讲述了科塔与萨比努斯的战败，不仅将两位军团长的行为做了对比，随后还记述了昆图斯·西塞罗成功保卫营地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以及他麾下百夫长和士兵们的英雄事迹。第六卷包括探讨高卢与日耳曼文化的长篇漫笔，并记述了惩罚叛乱部落行动，其中很少涉及实际的战斗，读起来不是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些细节似乎是从民族志著作中照抄的，所以这一卷很可能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他在书中转述了一些怪诞奇谭，比如一种叫作驼鹿的动物，它生活在日耳曼森林深处，因为没有膝盖，所以睡觉时要倚靠树木。捕猎这种动物的办法是将树干锯到只差一点就倒下的程度，于是当驼鹿靠上睡觉时，就会连树带鹿一起倒下。虽然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远方国度很难掌握确切的信息，但我们难以相信，像恺撒这样聪明且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会对这类怪谈信以为真。这应当是一段罕有的幽默桥段，用于给全篇笔调严肃的《战记》调剂，但我们不知道他的读者们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33]

自恺撒上一次待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罗马政

坛仍然风云激荡，但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罗马世界遥远的东端。前54年底，克拉苏风流倜傥的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1000名从高卢带来的骑兵，来到东方与父亲会合。随后，父子两人开始了期待已久的对帕提亚的入侵，但在作战季节结束前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前53年春，他们继续进攻。他们军队的骨干是7个罗马军团。他们满怀自信，因为在过去卢库鲁斯和庞培曾证明，罗马人粉碎兵力远胜于己的亚洲军队是多么轻松的事情。帕提亚人同样踌躇满志，因为他们也早已习惯了把弱小的邻居打得屁滚尿流。因此双方都非常震惊地发现，新敌人与之前的对手截然不同。罗马军队尽管有盟军骑兵和轻步兵，但本质上仍然是一支步兵部队。而帕提亚人则依赖两种骑兵：手持长枪、人马皆有护甲的铁甲骑兵和配备强有力的复合弓、行动迅捷的骑射手。两军在卡莱第一次交锋时，帕提亚的骑兵部队占了上风，但优势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显著。普布利乌斯·克拉苏被诱骗离开了主力，他和他的部下全部阵亡，但此役的结局其实是战术上的僵局，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罗马人的伤亡肯定更重，何况他们远离家乡。在此役中，克拉苏年轻时的军事才华有所体现，但在战役结束后的夜间，他和他的军队都丧失了斗志。他们开始撤退。罗马人徒步行进，而帕提亚人骑马追击，因此撤退非常困难。罗马军队遭到追杀，几乎全军覆灭。克拉苏在与敌人谈判时被杀，他的首级被送到帕提亚国王那里。这对罗马人来说是一场屈辱的失败，与它相比，几个月前在阿登地区损失15个大队也不算什么了。三头同盟的第一位成员死去了，而罗马最富裕、影响力最大的显贵之一的死亡必然给共和国的政治平衡造成影响。非常巧合的是，帕提亚战役为克拉苏的财务官赢得了声望，此人率领一些幸存者撤回了叙利亚，并击退了帕提亚人对这个行省的袭击。他的名字是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九年后，他成了刺杀恺撒的密谋集团的两位领导人之一。[34]

---

[1] Caesar，*BG* 5.33.

[2] Plutarch，*Pompey* 53，Suetonius，*Caesar* 26.1，Vellieus Paterculus 2.47.2，Dio 39.64.

[3] 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的姐姐，后成为马克·安东尼的第四任妻子。

[4] Plutarch，*Caesar* 23；关于特雷博尼乌斯的法律，见Velleius Paterculus 2.46.2，Plutarch，*Crassus* 15，Dio 39.33.2；关于庞培在这时期的立场，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20-132，esp.123-124。

[5] 即前文讲到的奥卢斯·加比尼乌斯。担任保民官时，他帮助庞培获得了清剿海盗的指挥权。他于前58年和恺撒的岳父皮索同时担任执政官。前55年，他获得庞培的授意，在未得到元老院批准的情况下，出兵扶植托勒密十二世复位。随后他将叙利亚总督的职位移交给克拉苏。

[6] Plutarch，*Crassus* 15-16，Dio 39.39.5-7，Cicero，*ad Att.* 4.13.2，and A.Ward，*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1977），pp.243-253，262-288.

[7]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2* .15a.3；关于不列颠战役期间恺撒给西塞罗的信，见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3.1.17 and 25，*ad Att.* 4.18.5；关于昆图斯担任恺撒的军团长，见M.Gelzer，*Caesar*（1968），pp.138-139。

[8] 关于给恺撒的推荐信，见Cicero，*ad Fam.* 7.5，给特雷巴提乌斯的信，见*ad Fam.* 7.6-19，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2* .15a.3 for quote；see also M.Gelzer，*Caesar*（1968），pp.138-139。

[9] Caesar，*BG* 5.24-25；Cicero，*ad Att.* 4.19.

[10] Caesar，*BG* 5.26.

[11] 今天比利时林堡省的一座城市，讲佛兰芒语。

[12] Caesar，*BG* 5.26-37.

[13] 威廉·乔治·凯斯·埃尔芬斯通（1782年～1842年），英国陆军少将，曾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包括滑铁卢战役），还曾担任英王乔治四世的副官。1841年，在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他率军驻防喀布尔。他年迈、优柔寡断、软弱，严重失职。他的部队（大部分是印度人）从喀布尔撤退时全军覆没。他本人死于被俘后。

[14] 威廉·海伊·麦克诺顿爵士（1793年～1841年），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高官，在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他被阿富汗人谋杀，后来导致埃尔芬斯通部队的惨败和覆灭。

[15] For a discussion see A.Powell，'Julius Caesar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ssacre'，in K.Welch & A.Powell（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1998），pp.111-137，esp.116-121，& M.Gelzer，*Caesar*（1968），p.143；此役被认为是恺撒的一次失败，见Suetonius，*Caesar* 25.2，Plutarch，*Caesar* 24，Appian，*BC* 2.150；在罗马战略的框架内考量此次战役，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1996），pp.79-84，90-95。

[16] Caesar，*BG* 5.38-45，52；关于十六天内上演四部悲剧，见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3.5/6.8。

[17] Caesar，*BG* 5.46-47；关于特雷巴提乌斯在场，见Cicero，*ad Fam.* 7.16，11，12。

[18] Caesar，*BG* 5.47-48，Suetonius，*Caesar* 67.2.

[19] Caesar，*BG* 5.48-49，Suetonius，*Caesar* 66.

[20] Caesar，*BG* 5.49-51.

[21] Cicero，*ad Fam.* 7.10.2.

[22] Caesar，*BG* 5.53.

[23] Caesar，*BG* 5.52-58.

[24] Caesar，*BG* 6.1-2；关于劫掠，见J.Roth，*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264 BC-AD 235* （1999），pp.305-309；关于军团兵力，见see 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87。

[25] Caesar，*BG* 6.3-4.

[26] Caesar，*BG* 6.5-8.

[27] Caesar，*BG* 6.9-10，29.

[28] 关于河流重要性的宽泛讨论，见D.Braund，‘River Frontiers in the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of the Roman World’，in D.Kennedy （ed.），*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JRA Supplementary Series 18* （1996），pp.43-47。

[29] 斯海尔德河是荷兰语的名字，法语称埃斯科河，发源于法国埃纳省，流经比利时，最终在荷兰注入北海。

[30] Caesar，*BG* 6.29-34，卡图沃尔库斯之死见6.31。

[31] Caesar，*BG* 6.43.

[32] Caesar，*BG* 6.35-44；关于恺撒的军事行动对该地区的影响，见N.Roymans，*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ingula 12* （1990），pp.136-144 and ‘The North Belgic Tribes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in R.Brandt & J.Slofstra （eds.），*Roman and Native in the Low Countries*，*BAR 184* （1983），pp.43-69。

[33] 关于发表时间，见Wiseman，‘The Publication of the *De Bello Gallico* ’，in Welch &

Powell （1998），pp.1-9，esp.5-6；on the elk see Caesar，*BG* 6.27。

[34] 卡莱战役的主要资料见*Crassus* 17-33和Dio 40.12-30。

十五 恰逢其时，恰遇其人：维钦托利与前52年的大叛乱

> 高卢的酋长们在森林深处的偏远地点集会，哀悼死去的阿科；他们意识到，同样的命运完全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怜惜高卢民众普遍的悲苦；他们宣誓团结互助，互赠礼物，鼓舞民众起来反抗，为了高卢的自由而视死如归。
>
> ——恺撒 [1]

在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统治若要取得成功，不能仅仅依赖军事力量，还要仰仗外交与政治安排，对后者的依赖程度甚至更高。军队可以粉碎正式的反抗，也能够遏制游击队，但或许没有能力将其根除。如果要避免持续不断的兵燹，就需要达成一项能够让足够多的占领区人民接受的协议，尤其是让那些拥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接受协议。这项原则，无论是对英属印度的韦尔斯利 [2] 、法属北非的比若 [3] 还是在高卢的恺撒，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三位都是有才华的军事家，都在战场上赢得了辉煌胜利，但他们都认识到有效的外交与精明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只有军事手段是不够的。罗马的元老们素来熟知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往往能够承担行省总督的外交与行政职责。同样重要的是，罗马在意大利境外的扩张不是为了消灭土著居民并以罗马殖民者取而代之，甚至也不是给土著居民强加一个罗马精英阶层来剥削他们。尽管罗马帝国主义扩张过程中伴有屠杀和大规模奴役，但恺撒抵达高卢时那里的土著部落将成为他创建的行省的子民。在大多数日常政务中，统治各部落的仍然是原有的贵族阶层领导人。要获得永久性的征服，就必须劝服各部落及其领导人：对他们来讲，接受而不是反对罗马的统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4]

恺撒从一开始就懂得这一点，因此将他的军事行动稳固地置于政治考量之下。他对高卢的最初干预全部是对盟友部落的求援做出的反应。他击退了入侵者，但他对高卢对手的惩罚远不及对日耳曼敌人那样严

酷。敌对的高卢部落被击败之后，也会被罗马接受为盟友，得到罗马的保护。恺撒频繁与部落领袖们会晤，每年至少有一次大会，通常会有两次或更多。他密切关注每一个部落内部的权力平衡，并努力了解每一位领袖的性格和癖好。他会支持某些部族领袖，加强其在各自部落内的地位，卖人情给他们，好让他们对恺撒感恩戴德。得到恺撒提携的高卢领袖包括狄维契阿库斯，他在一些年里实际上是埃杜依人的统治者，并且他还会卖人情给其他部落，帮助他们从恺撒那里求得恩惠。曾在不列颠担任恺撒使节的科密乌斯被恺撒扶植为阿特雷巴特人部落的国王，并且成为门奈比人的宗主。如果说这些人仅仅是卖国贼，是罗马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就错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雄心壮志。恺撒率领的罗马军队抵达高卢，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其他势力，如赫尔维蒂人、阿里奥维斯图斯和日耳曼移民，全都被驱逐了出去，因此高卢人无法利用他们来与罗马人抗衡。得到恺撒撑腰能够为酋长们带来极大好处，并且从他们的角度看，恺撒在利用他们，他们何尝不是在利用恺撒呢。恺撒的影响力很大，但他无法控制各部落的内政，一个例子就是他在希诺奈人和卡尔尼特人当中扶植的国王遭到了排斥。恺撒到来之后，高卢贵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酋长们仍然在争权夺利。与罗马结盟能够带来一些优势，但不一定是压倒性的优势，而且除了罗马人之外，他们还能从其他渠道得到威望与财富。在绝大多数部落里，国王如履薄冰，所以即便恺撒将某人提升为国王，后者也未必能稳坐江山。[5]

恺撒对部落政治的理解和操纵一般来讲都很到位，但在前53年到前52年冬季，他的政策遭遇了惨败。此次失败有许多原因，但其根源是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他的存在改变了高卢局势。对高卢中部和南部的凯尔特/高卢民族（也就是《战记》将“全体高卢人”划分的三大类之一）来说，尤其如此。这些部落与恺撒并没有多少大规模对抗，尽管针对赫尔维蒂人和阿里奥维斯图斯的战争都是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的。埃杜依人、塞广尼人和阿维尔尼人等部落控制着与罗马世界开展贸易的路线，因此比北方各民族更富裕，在政治上也更精明些。他们帮助了恺撒，而

恺撒也最为优待那些忠于他的部落和领袖，并且（至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帮助他们打败了赫尔维蒂人和阿里奥维斯图斯。在下一年里，几乎所有这些部落都转为反对他。不仅那些不曾得到恺撒恩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平步青云的人起来造反，很多在罗马统治下风生水起的酋长也举兵起事。这些新情绪的核心是高卢人认识到，恺撒和他的罗马军队是打算在高卢长期待下去的，并非在几次速战速决后就返回狭小的外高卢行省。罗马现在希望高卢全境永久性地承认其权威。凯尔特民族的盟友已经变成了征服者，且不曾受到这些民族的有力反抗。

恺撒自己的一些行动将新的现实残酷地暴露出来。他草草处死了杜诺列克斯，还将阿科鞭笞并斩首。这或许格外具有侮辱性，因为在高卢宗教中，人头具有极大意义。这表明对于那些被指控谋反的酋长，他是铁面无情的。位高权重的酋长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剪除，这说明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事后来看，恺撒的行动或许欠妥，但很难说在这两件事情中，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阿科被处决点燃了叛乱的烈火，但即便没有这件事情，叛乱或许也迟早会发生。在《战记》中，恺撒公开承认，他的许多对手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为了罗马的利益，他必须剥夺他们的自由。很大一部分高卢贵族认为，若是继续接受罗马的主宰，他们将得不偿失。罗马人说和平是胜利的产物，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是恺撒通过军事镇压强加于各部落的。长期以来，战争一直在高卢文化与社会中起到核心作用，酋长们首先是军事领袖，他们麾下拥有多少武士，就体现了他们拥有多大的实力。各部落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自由地互相攻伐倾轧，而要想获得军事荣耀，唯一途径就是作为罗马军队的盟友并为其效力。强大的酋长们知道，如果在自己部族中自立为王，而没有得到罗马总督的批准，必然会很快遭到惩罚。在罗马人统治下，想在其他部落中建立一个伙伴、盟友和门客的网络，也就更困难了。世界已经不是旧日世界，各部落的领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自由地按照传统方式治理部落。尽管恺撒只是偶尔干预各部落的日常事务，但他显然有大范围干预的能力。在罗马这个所谓盟友的统治下，酋长们的政治自由遭到

了扼杀，他们再也不能自由地袭击和杀伐自己的邻居，也不能凭借武力在自己部落内攫取权力。酋长们的地位取决于他能够豢养多少武士，但没了频繁的战争和袭击，很难维持这样的队伍。高卢全境弥漫着怨恨的气氛，在冬季，许多人秘密集会，商讨和筹划叛乱。很多秘密会议都是在卡尔尼特人领地举行的，或许是因为这里有对全体高卢人来说神圣的宗教崇拜场所。领袖们不能互相交换人质来巩固他们的新联盟，因为这很容易引起罗马人的注意。于是他们非常有象征意义地将旗帜堆在一处，并庄严宣誓。[6]

高卢人对罗马强占高卢越来越不满，密谋者们加紧行动，他们发现了一个机遇。恺撒去了南方的内高卢，他们根据经验知道在恺撒来年春天返回之前，他的军团长们不大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希望恺撒根本不会再回来，因为有传言说罗马城陷入了混乱。这些传言并非捏造，因为自克拉苏和庞培离开罗马城去担任行省总督之后，罗马政界就一直非常动荡。在前53年执政官的选举中，有贿选丑闻被揭发出来，涉案金额以共和国的标准也算是惊人的了。此后就始终动荡不安，一直到前53年初，选举还没有举行。克洛狄乌斯参选了前52年的裁判官，许诺将开展对释奴有利的选举改革，许多释奴加入了支持他竞选的暴徒队伍。克洛狄乌斯的老对手米罗在参选执政官，他手下也有一大群打手和角斗士，双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使选举无法再次举行。于是这一年年初，共和国竟然既没有执政官，也没有高级行政长官。前52年1月18日，双方的武装人员在罗马城外的阿庇乌斯大道狭路相逢，克洛狄乌斯在随后的打斗中丧命。次日，他的支持者将他的尸体抬进元老院厅堂，在那里堆起了柴堆将他火葬，结果把房子也烧掉了。有人主张任命庞培为独裁官，通过武力恢复秩序。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提议了。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当局下令征召居住在意大利的所有处于服兵役年龄的男性公民。恺撒在内高卢也征召了公民，并显然是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罗马局势。他在两年多之后的一封信中偶然写下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西塞罗在这个时候北上来到内高卢行省的拉文纳，与恺撒会谈。演说家无

疑不是孤身一人来拜访恺撒的。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恺撒提出与庞培再续联姻。高卢人相信罗马城的风波会阻止恺撒返回外高卢，这是错的；他们的另一个猜测很正确，即在这几个月里，他们不是恺撒关注的焦点。如果恺撒在高卢的军团长发现了潜在叛乱的蛛丝马迹，要么是对其置之不理，要么是不相信自己得到的报告。叛乱的爆发对罗马人来说完全是晴天霹雳。[7]

卡尔尼特人许诺首先对罗马人发难。他们的两位酋长率领武士前往凯纳布姆镇（现代的奥尔良），将居住在那里的罗马商人尽数屠戮。由恺撒任命的一名负责粮食供应的骑士也在那里被杀。这场屠杀的消息不胫而走，《战记》说到当天午夜，160里之外的地方就已经知道了此事。随后揭竿而起的是一个叫作维钦托利的年轻阿维尔尼贵族。他的父亲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主宰高卢的大片地区，但后来企图自立为王，被部落族民杀了。恺撒认识维钦托利，他可能是恺撒努力笼络的年轻贵族之一。维钦托利摈弃了与恺撒的友谊，开始征募一支军队，但被他的叔叔和阿维尔尼部落的其他领导人强行赶出了阿维尔尼人的主要城镇戈高维亚（可能在距现代的克莱蒙几里处）。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征募了更多人。恺撒说他招到的这些人都是流浪汉和无家可归之徒，但他们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没有酋长供养的武士。他率领这支新军队返回了戈高维亚，将对手逐出，并被他的部下推举为王。向西一直到大西洋海岸的差不多所有部落很快都加入了他的阵营，酋长们拥戴他为军事领袖。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与大多数高卢指挥官不同，他努力以纪律管束自己的军队，并组织后勤补给。据恺撒说，维钦托利会将不服从他的人处死或摧残肢体。[8]

维钦托利很快做好了进攻准备，他的目标是那些与罗马结盟的部落。另一位酋长率领一支部队攻打雷米人，而维钦托利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攻居住在领地以北的比图里吉人。比图里吉人是埃杜依人的附庸，立刻向其求援。埃杜依人则向恺撒的军团长征求意见，后者建议埃杜依

人立即派遣军队援助比图里吉人。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军官们自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说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叛乱的规模之大。除了拉比埃努斯之外，恺撒的军团长似乎都才干平庸，恺撒也不鼓励他们过于积极主动。此时仍是冬季，作战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正如恺撒前一年所证明的。叛乱在刚开始的时候最薄弱，因为很多人还持观望态度，还在等着看它究竟有几分成功的把握。一般来讲，罗马指挥官们会尽可能将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但他们这一次非常三心二意。埃杜依人的反应同样也只是试探性的。他们的军队抵达了卢瓦尔河，这是他们与比图里吉人的边界。他们在那里徘徊了几天，然后撤退了，声称比图里吉人已经与维钦托利勾结，打算在他们渡河之后就发起进攻。恺撒说即便是在叛乱平息之后，他也说不准是埃杜依军队的领袖当真相信比图里吉人已经投靠维钦托利，还是埃杜依人已经在图谋不轨。埃杜依人撤退后，比图里吉人公开加入了叛乱。[9]

或许到了这个阶段，恺撒的军官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大事不好，他们对此事的报告足以让恺撒决定立刻返回军中。此时罗马形势已经稳定下来：庞培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而不是独裁官；他率军进城，用武力恢复了秩序。恺撒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了外高卢。到此时，已经有更多部落加入了维钦托利的叛军，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遭到了胁迫。叛乱的势头变得猛烈起来。忠于罗马的部落或其亲密盟友都遭到了攻击，大多数部落改弦易张。对一位将军来说，恺撒此时的处境是最糟糕的，敌人在攻击他，而他离自己的军队还有数百里之遥。如果他命令部队前来与他会合，部队就可能在行军途中遭遇敌人主力，那样就不得不在没有主帅指挥的情况下与敌交战。罗马军队可能战败，即便战胜了，功劳也是拉比埃努斯或其他军团长的。但如果他奔去部队那里，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他的卫队兵力薄弱，而现在有这么多部落投靠叛军，他并不知道哪些酋长值得信赖。他应该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做出了决定。恺撒宁愿自己蒙受危险，也不愿让自己的军队冒险。他知道，即便屡战屡胜六年之后，仅仅一场严重失败就足以让国内政敌们败坏他的名誉。他也知道

他本人、侍从或许还有一些幕僚人员，再加上400名日耳曼骑兵奔向部队，要比部队过来找他快得多。但在他出发之前，外高卢行省本身也受到了威胁。居住在边境地带的一些部落加入了叛军，现在有一支叛军入侵了外高卢行省，正在进逼纳尔博殖民地。[10]

反击

　　恺撒匆匆赶往纳尔博城，组织那里的防御工作。省内没有罗马军团，但有一些在当地征募的大队和他从内高卢带来的新兵。他也许还掌握着省内部落的骑兵。他将一些士兵部署在防线上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很快就迫使叛军撤退；但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赫尔维人（这是居住在外高卢行省的一个高卢部落）领地上。恺撒从那里出发，率领这支临时拼凑、大体上缺乏作战经验的部队越过塞文山脉隘口，下山进攻阿维尔尼人。他取得了奇袭效果，因为当时当地人认为道路会被冰雪封闭。恺撒的部下在厚达6英尺的积雪中艰难地开辟出一条道路，然后继续推进，抵达了阿维尔尼领地。到达那里之后，恺撒将他的骑兵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命令他们在广大地域流动作战，烧杀抢掠。他们造成的破坏可能很轻微，但这些袭击给高卢人造成的印象是罗马大军即将发动全面入侵。阿维尔尼人向维钦托利派去了信使，后者正率领主力部队驻扎在北方100里处的比图里吉人领地。这位高卢领袖开始率军南下，以安抚自己的人民。在袭击劫掠周边乡村两天之后，恺撒将指挥权交给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指示他继续派遣骑兵进行袭扰作战。恺撒宣称他需要返回外高卢行省以征募更多部队和盟军骑兵，三天之后一定回来。他似乎确信这个消息很快会传到敌人那里，因此再次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骑马迅速赶到了维埃纳（注意不是现代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而是罗讷河谷的维埃纳）。此前他已经安排一支骑兵部队在那里等待他。他甚至没有休息一晚，就带着这支部队疾驰穿过埃杜依人领地，赶到了驻扎在北方林贡斯人领地的2个罗马军团处。到了那里之后，他停住脚步，但派遣信使赶到其他罗马军团那里，命令军团到阿格丁库姆集结

（可能是现代的桑斯附近）。他此次疾驰穿过的是潜在的敌境，因此这是非常勇敢的举动（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在叛乱期间，恺撒为了抵达自己的部队，曾经乔装打扮为高卢人。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应该指的就是这一次）。统帅和他的军队会合了。现在的问题是夺回主动权。[11]

恺撒越过塞文山脉的袭击打乱了维钦托利的阵脚，维钦托利过了好几天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一次佯攻。然后，他继续打击仍然忠于罗马的部落。他率军北上，袭击波伊人。前58年的时候，波伊人曾与赫尔维蒂人一同行动，后来由于埃杜依人说情，才被允许在埃杜依人领地定居。高卢军队攻打了波伊人的一个主要城镇高戈比纳。此时仍是隆冬，罗马军队若是展开作战，补给会很成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做准备，也没有时间搜集粮草和役畜。但如果恺撒有所耽搁，波伊人就可能被迫投降维钦托利并加入叛乱。然后维钦托利就可以自由地攻击与埃杜依人结盟的其他部落和氏族，向所有人证明即便是最亲近罗马的埃杜依人也无力保护自己的朋友。如果发展到了那一步，任何部落就都没有理由继续忠于罗马了。恺撒不愿意接受这样“可耻的羞辱”，于是派遣使节到波伊人那里，告诉他们他会率军来援救他们。他还命令埃杜依人搜集足够的粮食。随后，恺撒将2个军团留在阿格丁库姆守卫辎重，然后率领8个军团去援救波伊人。他的部队中只有少量骑兵，因为他没有时间像惯常那样从各盟友部落中征募骑兵。罗马人的粮食也不多，这意味着除非他们能找到新的补给来源，否则无法长时间作战。恺撒这是在赌博，但这比闲坐着看叛乱势力越来越强大要好。若是枯坐无为，就会被认为软弱；但如果摆出勇猛的姿态发动反击，就有可能让正处于观望中的部落和酋长踌躇不前，哪怕只是短期的踌躇。[12]

一天之后，恺撒抵达了维劳诺杜努姆，这是希诺奈人的设防城镇之一。罗马军队开始攻打这座城镇，到第三天的时候，城镇居民投降了，并许诺交出武器、600名人质和罗马军队当前急需的役畜。罗马人继续

前进，很快抵达了凯纳布姆，也就是叛乱开始的地方，那里的罗马商人此前遭到了叛军屠杀。恺撒仅用两天时间便抵达那里，令尚未做好守城准备的当地居民措手不及。罗马军队抵达凯纳布姆时天色已晚，于是恺撒决定推迟到次日早上再攻城。但为了防止城镇居民在夜间逃往卢瓦尔河对岸，他命令2个军团在夜间保持戒备状态。他的防备是正确的，大约午夜时分，罗马侦察兵报告有人群正从城镇赶往河上桥梁。他派遣2个军团进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而大桥上的拥堵使很多人束手就擒。恺撒命令将该城镇洗劫一空后烧毁，并且应当是将大部分俘虏卖为奴隶。之后他渡过卢瓦尔河，进攻比图里吉人。罗马人已经夺回了主动权，迫使维钦托利疲于奔命地对其行动做出反应。维钦托利已经放弃了对波伊人的攻击，匆匆赶回去保护比图里吉人。高卢军队抵达时，罗马人正在接受新堡的投降。城镇居民看到援军赶到，于是继续作战，将已经进城的罗马百夫长和少量士兵赶了出去。城外爆发了一场骑兵的对战，恺撒投入了他的400名日耳曼骑兵，于是罗马人最终得胜。罗马人的这次小胜，再加上罗马军队已经兵临城下，而高卢军队主力还在一段距离之外，使新堡居民又一次改变了主意，第二次投降并交出了之前破坏停战的罪魁祸首。恺撒继续挺进，奔向阿瓦利库姆（现代的布尔日），这是比图里吉人最重要且防御最牢固的城镇之一。在重新掌握主动权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牢牢握住主动权，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13]

维钦托利从一开始就不太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正面交锋中击败罗马军队，而罗马人迅速占领三座城镇更是让他愈发尊重其战斗力和攻城术。他打算跟踪敌军，伏击其小股部队，而避免发生大规模交战。他希望切断罗马人的给养，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必须做到绝对的冷酷无情："……必须无视任何私人财产，在敌人搜粮队伍的最大行军范围内，必须烧毁所有村庄和房屋。"[14] 如果无法守住城镇，那么为了阻止罗马军队获得城镇中的粮食，就必须将其彻底摧毁。为了响应他的号召，比图里吉人烧毁了二十个主要定居点。维钦托利坚称，尽管

坚壁清野的战术非常可怕，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武士们会丧命，家人会被卖为奴隶。他的策略比恺撒先前对手们的水平高得多，而他能够说服自己的追随者采纳如此极端的措施，也说明他肯定具有极强的领袖魅力和人格力量。各部落能够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的确不简单，但他们有时对这种残酷的前景感到犹豫，也情有可原。在比图里吉人所有领袖的恳求下，阿瓦利库姆才没有被摧毁。维钦托利勉强同意将这座城镇作为例外，但他并不认可比图里吉人的自信，即阿瓦利库姆拥有天然屏障和人造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15]

阿瓦利库姆显然比罗马人在前几周内轻松攻克的那些城镇更难对付。它周边几乎完全被河流或沼泽环绕，只有一条实际可行的攻击道路，而且几乎无法对其形成牢固的封锁。恺撒的军队在山坡脚下扎营，开始修建坡道，以便接近城墙。罗马军团士兵们还建造了活动防盾和棚子来掩护逐渐接近敌人的劳工，并搭建了两座攻城塔，以便在坡道完工之后使用。恺撒的8个军团极有可能不满编，因此他的兵力应该在2.5万～3万人，再加上数千人的辅助部队以及更多的奴隶和随军人员。这样一支部队在行进的时候，口粮很成问题。而在军队安顿下来围攻阿瓦利库姆的时候，后勤补给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外出搜粮收效甚微且非常危险，因为维钦托利就在不到16里之外的地方扎营，并且密切追踪着罗马人派出去的每一个分队，将落单的群体切断并吃掉。恺撒多次写信给埃杜依人和波伊人，要求他们送来给养物资，但实际送到他手中的少之又少。埃杜依人对此项任务没有任何热情，尽管他们自前58年来一直是恺撒的主要粮食来源（或者恰恰是因为他们一直给恺撒供粮，现在反倒不乐意了）。波伊人对恺撒的支持仍然很感激，但他们人口很少，没有多少余粮可以拿出来。维钦托利的坚壁清野战略开始发挥威力。有一次罗马人的存粮完全耗尽了，幸亏搜粮队伍及时返回并带回了足够多的牛，为部队提供了肉食。恺撒赞扬了官兵们尽管只得到微薄而单调的食品却仍然坚持作战的坚毅精神（由于对这一段落和其他一些段落的误解，出现了一种流传了很长时间的神话，即罗马军团士兵是素食

者。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膳食很均衡，肉类、蔬菜和谷物都有。此事的特殊之处并不是罗马军团士兵吃肉，而是他们除了肉没有别的东西可吃）。[16]

尽管粮食短缺，而且始终处于高卢主力部队的威胁之下（维钦托利与阿瓦利库姆守军保持着通信联络），罗马军团士兵们仍然辛勤劳作着，准备攻城。士兵们工作时，恺撒巡视战线，为他们鼓劲。有好几次他向士兵们表示，如果大家觉得无力承担任务，可以放弃攻城而撤退。他这是在非常聪明地利用罗马军团士兵对自己及作战单位的自豪感，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个半途而废的军人。士兵们恳求他允许他们完成工作，而不要让他们承受中途放弃的耻辱。对罗马人在凯纳布姆遭屠杀的记忆还很清晰，并且引起了士兵们普遍的愤怒。据恺撒记载，士兵们请求他们的长官向恺撒强调，他们决心继续打下去，并且对自己的最终胜利抱有绝对的信心。此时坡道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攻城塔可以接近城墙，但还不够近，攻城塔上安装的撞城槌还无法发挥威力。

被补给问题困扰的不仅仅是罗马人，高卢军营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的季节以及大量人员待在一处，但也凸显了部落军队缺乏后勤组织的弊端。维钦托利是一位比绝大多数高卢领袖都更优秀的指挥官，他的军队也比一般的部族武装更灵活，准备也更充分，但在后勤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罗马军队。攻城战的进展也让他觉得，他需要一场新的胜利来鼓舞自己的部下。高卢军队向城镇方向前进了一点距离。然后维钦托利亲自率领骑兵和轻步兵出战，希望能够伏击罗马的搜粮队。恺撒发现了对方的企图（可能是通过巡逻队的报告，也可能是通过俘虏或敌方逃兵的口供），率领自己的主力部队出来威胁高卢营地。高卢军队排兵布阵，前来迎战，阵势非常稳固；恺撒若是强攻，必然会蒙受严重损失。罗马军团士兵们一心求战，他们因为之前的屡战屡胜而非常自信，并且由于攻城的艰辛与口粮短缺而倍感挫折。恺撒告诉他们，他不会允许部队遭受无意义的伤亡，因为“他们的生命比

他自己的需求更重要”。罗马人与敌人对峙了一段时间，然后撤退回营了。此次威胁足以促使维钦托利改变计划，返回自己的主力部队。恺撒已经证实如果他不愿意出战，维钦托利也不能逼得太近。一段时间内，高卢军队中出现了争吵，甚至有人说维钦托利与罗马人勾结，希望在恺撒的帮助下成为全高卢的国王。维钦托利与恺撒极有可能曾经见过面，并且在恺撒与阿维尔尼贵族交好的时候，甚至可能对维钦托利有过恩惠。最终维钦托利安抚了自己的部下，带出了一些俘获的罗马奴隶，并声称他们是罗马军团士兵。维钦托利事先已经教导这些奴隶讲述关于罗马军营内生活困苦、衣食无着的凄凉故事。维钦托利就这样让部下相信他的英明计划，然后与其他酋长一道挑选了1万名武士，派遣他们去增援阿瓦利库姆。[17]

围城战既考验人的聪明才智，又挑战人的意志力。阿瓦利库姆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该地区拥有铁矿，因此城内拥有经验丰富的矿工，可以让他们挖地道，破坏罗马人建造的坡道。其他人则快速地建造木制塔楼来加强自己的城墙，随着罗马人增加工事的高度，塔楼也将进一步增高。无论是防守方还是进攻方占据了某种优势，另一方就会努力采取反制措施来消除这种优势。毕竟罗马人更精通工程技术，因此尽管守军频繁出动企图破坏，但在二十五天后，坡道还是基本竣工了。坡道宽330英尺，高80英尺，差不多与城墙高度齐平，因此攻城塔内的撞城槌很快就能发挥威力了。当夜，守军点燃了地道内的支撑木料，希望能够让整个坡道坍塌，或者将其烧毁。凌晨时分，罗马哨兵发现木制坡道上升起浓烟。片刻之后，城墙上响起一声呐喊，两群守军携带着火把、易燃物和兵器，冲了出来。根据恺撒的命令，当夜有2个军团处于警戒状态。战况激烈之时，更多的罗马部队投入了战斗。一些罗马军团士兵与敌人交锋，另一些士兵则将攻城塔拖到安全处，尽管坡道高处的一些活动防盾和棚子被烧毁了。这是一场绝望的拼杀，恺撒在《战记》中提及了他亲眼看到的一个小事件（他很少记述这样的小事）。一名高卢武士站在一座城门附近，不停地向罗马人的工事投掷成团的沥青和油脂。他

被蝎弩的一支弩箭射死。蝎弩是罗马人的一种轻型床弩，精度极高、杀伤力极强。此人刚倒下，就有另外一个人接替了他的位置，但被同一蝎弩杀死，随后蝎弩每杀死一人，就有人源源不断地补充。恺撒显然对敌人的勇敢肃然起敬，他在《战记》中从来不会否认高卢人的勇气，尽管他倾向于将其描述为逊于罗马军队的那种纪律严明的勇敢。[18]

激战之后，守军被赶回城内，他们未能给罗马人造成很大损害，无法阻止其攻城。一天之后，维钦托利敦促守军逃出城，后者服从了命令。在黑暗掩护下，武士们企图溜出城镇，通过沼泽地前往维钦托利的主力部队。被武士们抛下的家眷老小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高声哭喊起来，武士们害怕自己的目的被罗马人发现，于是逃跑计划也夭折了。次日，也就是围城战的第二十七天，罗马军团士兵们的坡道完工了。此时大雨倾盆，恺撒判断敌人可能会放松戒备，于是决定立刻发动进攻。他发出了总攻的命令，部队做好了准备，进攻部队在攻城武器的防盾掩蔽下排好队形，以隐藏己方的战术。罗马将军们始终特别鼓励个人的勇敢。恺撒许诺，第一个冲上城头的士兵将得到重赏。一声令下，士兵们从掩蔽处猛然杀出，向前冲锋，压倒了措手不及的守军，迅速攻占了城墙。一些高卢人在集市等开阔地列队迎战，但他们看到罗马人从城墙上潮水般涌入，丧失了斗志。历史上，攻城的部队一旦杀进城，往往会疯狂地横冲直撞、大肆杀戮。围城战始终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而实际的冲锋甚至更为冒险，所以承受住了围城战和总攻艰险的人一旦冲进了城，就很难控制住自己，尤其是在狭窄的街道上，他们不再处于长官的密切监视之下。在城镇遭到进攻时，任何表现出一点点抵抗的人都会被杀死，而妇女会遭到强暴。这一次，罗马士兵甚至比通常的情况更加凶残。恺撒说，罗马军团士兵们“没有忘记凯纳布姆的屠杀和围城战期间的艰辛，因此没有饶恕老人、妇女和婴儿。最后，全城约4万人中只有800人左右逃到了维钦托利那里”。[19]

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波利比乌斯曾描述罗马人有时会刻意地将攻陷

的城镇居民尽数屠戮，甚至连牲畜都杀掉，用这种恐怖气氛来震慑未来的敌人，威吓他们自动投降，这样将来就不必发动这样的袭击了。如果恺撒下令屠杀阿瓦利库姆居民来杀一儆百的话，他没有理由不告诉我们。他对其他的屠杀和大规模处决都直言不讳，而罗马读者应该不会为外国敌人的命运而感到过于不安。此次屠杀之所以发生，似乎的确是由于罗马军团士兵们的愤怒，毕竟他们在严冬缺粮的条件下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围城战，倍感挫折和疲惫。即便阿瓦利库姆居民可能没有像恺撒暗示的那样被屠戮殆尽，死亡人数也一定很多。屠杀敌人其实并不符合罗马人的实际利益，因为杀了一个敌人，就少了一份将其变卖为奴的利润。不过恺撒似乎也没有试图控制自己的部下。即便他想去控制疯狂杀戮的士兵们，能不能控制得了也还是个问题。[20]

在戈高维亚的挫折

洗劫阿瓦利库姆之后，恺撒让军队休整了几天。他们在城内找到了大量存粮和其他给养，因此补给问题得到了缓解。已是初春，外出搜粮也比较容易了。之前负责守护辎重的2个军团被调来与主力部队会合。恺撒希望尽快重新发动攻势，以阻止维钦托利抢夺主动权，但这时他收到了埃杜依人的一项呼吁，他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埃杜依部落有两个人都自称当选为部落的最高行政长官——大酋长。埃杜依人是恺撒最强大也最重要的盟友，在叛乱时节，若是这个部落的酋长间发生纠纷，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其中一方很可能会寻求维钦托利的帮助。于是恺撒匆匆南下去见这两个互相争斗的酋长。大酋长在任职的一年内不得离开部落领地，而且恺撒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冒犯盟友，因此他不能命令这两位酋长赶来见他。恺撒发现，根据部落的法律，其中一人不符合担任大酋长的资格，因此另外一人是合法的大酋长。然后他命令埃杜依人为他提供尽可能多的骑兵和1万名步兵来保护补给线。恺撒匆匆赶回自己军中，决定将部队分为2个纵队。拉比埃努斯将率领4个军团北上讨伐希诺奈人和巴黎西人，而恺撒自己则率领余下6个军团南下攻击阿维尔尼

人。这样分散兵力显然很危险，但由于叛军不肯冒险正面交锋，他一定觉得这个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叛乱者没有统一的首都，甚至没有统一的军队，因此无法做到击其要害令其全局崩坏。纵使维钦托利富有领袖魅力，他领导的仍然是许多独立性极强的部落，恺撒必须逐个击破。如果对一个叛乱地区放任自流，那么就会助长叛军的士气，使更多邻近部族受到鼓舞或者胁迫而加入叛乱，于是叛军的规模就会扩大。[21]

战斗的短暂间歇让维钦托利从阿瓦利库姆的失败中恢复了元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战败反而增加了他的威望，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坚守阿瓦利库姆，在别人劝说下才不情愿地同意。他的计划大体不变，仍然是骚扰恺撒及其军队而避免正面对抗，同时努力笼络更多部落和酋长加入他。罗马人沿着阿列河一线行军时，维钦托利在另一岸紧跟着他们，派遣部下摧毁所有桥梁，并派人守卫所有可能建造新桥梁的地点。恺撒若是要威胁戈高维亚（维钦托利最初就是在这里自立为阿维尔尼部落领袖的），就必须渡过阿列河，但在这个季节，部队无法涉水渡河。当天，罗马军队在一座林地（附近有一座被摧毁的桥梁）宿营。军队于次日开拔时，恺撒和2个军团留下，隐蔽在树林中。另外4个军团“将各大队的队形拉得很分散，好让单位的数目看上去与6个军团相同”。罗马军队继续前进，并像之前每一天那样安营扎寨，高卢人对其计策毫无察觉，只是同样继续前进，准备阻止罗马人使用更远方的渡口。但在当天晚些时候，恺撒判断己方主力部队已经停下的时候，便带着隐藏的2个军团出来架桥。桥梁竣工后，他们便过了河，并开始修建壕沟与护墙，准备扎营。恺撒派出传令兵去通知主力部队。维钦托利发现真相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没有办法应对。他率军远离河流，急于和恺撒拉开距离，因为他不希望与敌人靠得太近。他的计划仍然是避免大规模交战。恺撒尾随着他，五天后抵达了戈高维亚。[22]

恺撒骑马去查看敌人阵地，发现它非常牢固。戈高维亚位于一座山顶上，而维钦托利将其军队部署在城镇周围连绵起伏的高地上，每个部

落的队伍都负责防守一个区域。对罗马人来讲，正面进攻很不实际，代价必然会很高昂。也许可以切断敌人粮道，用饥饿迫使其屈服，但罗马人自己的补给都没有保障，何谈对敌人进行有效的封锁。埃杜依人的一支运粮队正在路上，但还没有赶到军中。恺撒在等待粮草时发动了一次夜袭，夺取了高卢人的一个前哨阵地，对敌人的饮水供应和搜粮路径形成了威胁。罗马人在这个地点建了一个较小的足以容纳2个军团的营地，此营地与主营地之间有道路连接，道路两侧均有深沟防护。双方都安顿下来，警惕地监视对方，派出骑兵与轻步兵进行小规模交锋，但双方都不愿意冒险开始全面对战。维钦托利每天都召集酋长们商议，目前他仍然能够以高水平的纪律约束部队，这对一支部族武装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23]

埃杜依人对罗马的忠诚开始动摇。孔维克多李塔维斯（就是在恺撒力挺下当上大酋长的那个人）秘密地与阿维尔尼人代表接触，并接受了他们的赠礼。在他的唆使下，一个叫作李塔维库斯的酋长（他负责指挥1万名武士，押送粮草给恺撒）决定反水。他带着押送粮草的队伍走到离戈高维亚还有30里的地方时，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并向部下宣布为恺撒效力的埃杜依骑兵已经全部被罗马人以通敌罪处决了。要逃脱同样的命运，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加入维钦托利的阵营。和阿维尔尼酋长的伎俩一样，据说李塔维库斯也找来几个自称是此次大屠杀幸存者的人，让他们向大家讲述罗马人阴险背叛他们的恐怖故事。奸计奏效了，埃杜依人很快开始攻击与他们一起押送粮草的罗马人，用酷刑将其折磨致死，然后抢走了粮食。这消息传到正在恺撒骑兵部队效力的埃杜依酋长们那里，其中一位酋长立即去找恺撒，向他报告。恺撒立刻率领4个军团出发，催促部队强行军，狂奔了25里路，发现了李塔维库斯的部下。恺撒命令埃杜依骑兵走在最前面，让同胞们看到他们，以此揭穿李塔维库斯的谎言。押送粮草的武士们当即投降，而李塔维库斯及其侍从逃走了，去投奔维钦托利。恺撒只给他的罗马军团士兵们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命令他们再次强行军返回戈高维亚城外的阵地。途中，他们遇到了

费边（留下指挥城外2个军团的军团长）派来的信使。他报告称，在一整天的时间里，他们遭到了敌人的猛攻，2个军团要防守6个军团的阵地，非常吃紧，在重武器的支援下才勉强守住。恺撒命令部下加快步伐，终于在黎明前返回了营地。4个军团驰援赶到，足以震慑维钦托利，令其放弃了直接进攻罗马阵地的打算。[24]

恺撒派遣使者去安抚埃杜依人，但李塔维库斯派去的骑手先行抵达，促使孔维克多李塔维斯领导其民众掀起了反对罗马的叛乱。在卡比隆努姆，一位军事保民官和一些罗马商人被劝说离开，但随后遭到了暴徒袭击。在越来越多的高卢武士赶来分享战利品时，恺撒的使者赶到并告诉他们，埃杜依骑兵和1万名步兵此时全在恺撒营地内，不仅仍然忠于恺撒，而且完全处于他控制下。埃杜依领袖们正式表示懊悔，责怪是部落的普通老百姓煽动叛乱。在当下，恺撒只能满足于提醒埃杜依人，他过去给过他们多少恩惠，并敦促他们继续保持忠诚。但私下里，恺撒心知肚明，埃杜依人与罗马的盟约岌岌可危。他的处境再也不是那么乐观了。尽管他通过发动攻势，暂时夺得了主动权，但他目前被困在戈高维亚城外，没有足够的资源驱逐维钦托利及其军队，也没有能力攻克这座城镇。继续在原地等待的话，于事无补；若是撤退，实在又太丢脸。自几个月前从外高卢袭击阿维尔尼人以来，恺撒就一直马不停蹄地进攻和挺进。在务实层面上，他持续不断的进攻迫使维钦托利疲于奔命，但更重要的是，给世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罗马的实力远胜于敌人，极其自信并且必将最终得胜。这种印象大体上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但这没有关系，因为它让那些仍在观望、尚未决定是否参加叛乱的人对罗马心怀忌惮。一旦恺撒停止前进并开始撤退，罗马不可战胜的幻象就破灭了。在敌人威逼之下撤退总是非常危险的；而在当前局势下，撤退会被视作承认失败，极有可能会让尚在骑墙观望的部落相信，叛乱将会取得成功。但如果撤退，他就能重整旗鼓，并与拉比埃努斯的4个军团合兵一处，有了10个军团，应该就足以攻破戈高维亚。恺撒选择了危害较小的办法，决定撤退。但他希望在撤退之前先小胜一场，给自己脸上增添一

点光彩。[25]

在视察小营地时，恺撒发现前几天还有大量高卢人驻守的一座山头如今却空空如也。审讯了一些投奔罗马阵线的高卢逃兵（这样的逃兵有很多）之后，他得知维钦托利非常担心罗马人会攻占另一座山头，于是将大多数人派去防守它了。恺撒看到这是一个机遇，于是开始设法增强敌人的不安全感。当夜，他派遣巡逻骑兵去窥伺维钦托利正在加强防御的那座山头。恺撒指示这些骑兵要比平时制造更多的喧哗，为的是让高卢人发现他们的存在。次日上午，他让军中的大群奴隶骑上驮马和骡子，给他们戴上头盔，并派遣一些真正的骑兵混杂其中以加强说服力，然后命令他们前往敌人加强防守的那座山头，不过绕了点路。有一个罗马军团紧随其后，但在敌人的一个盲区内停下，并掩蔽在一片树林中。高卢人的注意力被转向了他们害怕遭到攻击的地方。恺撒看到敌军调兵遣将去应付，然后他悄悄将自己的部队调往小营地，命令官兵遮蔽自己的盾牌和头盔羽饰。这些部队不是以组织有序的大队行动的，而是三两成群地分批行进，闲庭信步，似乎漫无目的。恺撒向指挥各军团的军团长做了指示，解释自己对他们的具体要求，并强调他们“必须控制住自己的部队，不能让他们由于求战心切或者渴望战利品而过于积极主动”。[26]

讯号发出后，罗马军队便沿着山坡向上进攻，而埃杜依人从同一山坡的另一面发起进攻。各单位都竭尽全力地攀登，但山岭上有不少凹陷处，各单位常常看不见对方。守军很少，罗马军团士兵们轻松地翻越了高卢人在半山腰用碎石堆起的6英尺高的护墙。这道障碍没有阻滞罗马人很长时间，但一定给其队形造成了混乱，而他们冲过山坡上星罗棋布的高卢营地时，队形就更分散了。不久前投诚维钦托利的一个部落国王在营帐中遭到袭击的时候，衣服都没穿好，但他还是骑马逃走了。恺撒随同第十军团行动，他觉得此次进攻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破坏的时候，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指示号手吹响集结号。但号声传不了多远。有

些军官听到了集结号，努力要求士兵们服从命令，但是大多数士兵仍然继续推进。他们潮水般冲过营地，开始攻击城镇本身的护墙。在过去，他们曾经借助突袭战术，打败和歼灭过比这多得多的敌人，或许正是对昔日胜利的记忆激励他们奋勇向前。有一段时间，戈高维亚似乎眼看就要陷落了，因为这一地段的守军极少，居民恐慌起来，手足无措：

> 已婚妇女们从城墙上抛下衣物和银器，裸露自己的胸部，伸出双手哀求罗马人高抬贵手，不要像在阿瓦利库姆那样屠戮妇女和儿童。有些妇女甚至从城墙上爬下，投奔到罗马士兵那里。第八军团的一位百夫长卢基乌斯·费边曾向自己的部下宣布，在阿瓦利库姆第一个登城的人得到了重赏，他今天也要率先登上敌城，绝不允许任何人和他争抢这个荣誉。他让三名士兵将他举起，帮助他爬上城头。然后他把这三名士兵也逐个拉了上去。[27]

此时，在城镇另一侧修筑防御工事的高卢人听到了罗马军队进攻的嘈杂，才意识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维钦托利也接到了城镇居民发来的求援消息。他派遣骑兵去迎战罗马人，武士们则徒步跟进。他们抵达时，城镇居民就抛弃了投降的念头，城墙上的妇女们开始恳求她们的男人们拯救她们。罗马军队的进攻失去了迅猛的势头，士兵们很疲惫，而且队形混乱，没有做好迎战敌人生力部队的准备。这时埃杜依人突然从他们右翼出现，令许多罗马士兵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误以为这些埃杜依人是敌对的高卢人，在激烈战斗中却没有注意到埃杜依人都裸露着右肩，这是恺撒军队中高卢盟友的标志。先前胜利的狂喜很快就变成了苦涩：

> 与此同时，百夫长卢基乌斯·费边以及与他一起登上城墙的人被敌人包围并斩杀，尸体被从城墙上丢了下去。同一军团的另一位百夫长马尔库斯·佩特罗尼乌斯曾尝试猛杀进城门，被大群敌人包围，处境万分危急。他多处负伤，向跟随自己的士兵们呼喊道：“我贪图荣耀，却将你们带入了险境。既然我不能既保住自己的性命又挽救你们，那么就让我至少拯救你们吧。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就照顾好自己！”他立刻冲进敌群，杀死两名敌人，并迫使其他敌人稍稍退离城门。他的部下要上来援助他，他却说：“我的血快流尽了，力气也没了，你们救不了我了。你们还有机会，就赶紧逃走吧，回部队去！”不久之后，他便战死

了，但他挽救了部下的性命。[28]

恺撒此时能做的很有限，只能利用第十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并迅速将之前留下守卫小营地的第十三军团调来助阵。因此高卢人没能追击多远，但即便如此，罗马人仍然伤亡惨重。大约有700名士兵和不少于46名百夫长阵亡。百夫长们身先士卒，因此伤亡率极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时候。此次战败的次日，恺撒检阅了部队，向他们讲话，赞扬他们的勇气，但严厉批评他们缺乏纪律性。作为结论，他向官兵们保证，此次他们之所以战败，仅仅是因为地形复杂、敌人防御稳固以及他们自己没有服从命令，而高卢人的战斗力不值一提。为了让官兵们领会他的精神，他在随后两天选择了一个有利位置（可能是在一座山岭上），排兵布阵，挑战维钦托利。高卢领袖自然不肯冒险在有利于敌人的地域交战，于是恺撒以此为由告诉士兵们，敌人仍然对他们非常畏惧。次日，他率军撤退了，前往埃杜依人领地，而不是从原先来的路途返回。罗马人花了三天时间抵达阿列河，重建了一座已被摧毁的桥梁，并顺利过河。高卢军队没有认真地尝试阻拦他们。恺撒已经决定，尽管撤退给世人造成的印象不佳，但他必须接受事实。他努力以一场象征性的胜利来减轻撤军造成的坏影响，却未能如愿。罗马人战败并撤退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随后几周内又有更多的部落加入了叛乱。埃杜依人就是这一批中最早叛变的部落之一。在恺撒军队中效力的埃杜依骑兵领导人请求恺撒允许他们回家。尽管恺撒不再信任他们，但他也不想强留，免得更多关于罗马人“奸险歹毒”的谣言散播出去，于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不久之后，新堡的埃杜依人屠杀了驻扎在那里的少量罗马士兵和商人。这对恺撒来说是严重的双重打击，因为新堡不仅储备着大量粮草，而且罗马军队的主要辎重、档案和从各部落抓来的人质都在那里。埃杜依人判断自己无力守住新堡，于是将它付之一炬，将所有粮食运走或销毁了。然后他们利用这些人质，开始与其他部落谈判。维钦托利和高卢

全境的酋长都被召唤到比布拉克特。在这次会议上，埃杜依人努力让他们的人取代维钦托利作为最高统帅，但是失败了。他们闷闷不乐，但只得同意为了大家的利益服从维钦托利的指挥。此时几乎所有凯尔特或高卢部落都反对恺撒，绝大多数比利时部族也加入了叛乱。维钦托利决心将自己的战略贯彻下去，即避免正面交锋，而是不断袭扰罗马人，并坚壁清野，阻止罗马人获得粮草。罗马的军事俚语将这种战略称为“狠踢敌人的肚子”。现在，维钦托利手头有一些步兵和1.5万名骑兵，他没有补充步兵，而是要求各部落提供更多骑兵。为了分散罗马人的兵力，他安排埃杜依人和其他部落向外高卢发动新的攻击，希望那里的民族（尤其是仅仅十年前还起兵反叛罗马的阿洛布罗基人）也会加入叛乱。[29]

得知埃杜依人叛变后，恺撒火速北上，希望与拉比埃努斯会合。他以强行军出人意料地赶往卢瓦尔河。尽管冬季融雪使得河水暴涨，他还是设法率军涉水渡河。罗马军团士兵们将自己的装备放在盾牌上，将盾牌举过头顶，在齐胸深的河水中艰难前进，在他们的上游，骑兵组成了一条链条队形。几天后，刚刚在卢泰提亚（今天的巴黎）打了一场胜仗的拉比埃努斯与他会师了。罗马野战军又一次集中了兵力，10个军团大约有3.5万～4万人，还有一些辅助部队。高卢盟友越来越少，恺撒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骑兵，于是派人到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各部落，要求他们提供骑兵和轻步兵。日耳曼援兵抵达后，恺撒将他的军事保民官和其他骑士阶层的军官以及一些重新入伍的富裕老兵的优良坐骑交给日耳曼人，换下了后者的体型较小的日耳曼小马。高卢叛军对外高卢的攻击令他担忧，于是他率军穿过林贡斯人领地边界，进入塞广尼人领地，以便接近外高卢行省。最后，外高卢行省当地征募的士兵和省内各部落在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指挥下击退了叛军。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是恺撒家族另一支的成员，是恺撒的远房堂兄，曾于前64年担任执政官，目前担任军团长。但主动权再一次落入了维钦托利手中，这位高卢领袖决心加大力量压制罗马人。他拥有强大的骑兵，可以在罗马人行军途中受辎重所累时袭击他们。罗马军队要么抛弃辎重、继续前进，要么

停下来保护辎重，那样的话就会慢如龟爬，令其补给问题愈发严重。高卢武士们自发宣誓，若不能骑马冲杀、两次贯穿罗马行军纵队，就绝不“返回自己的家，也不去看望父母、儿女和妻子”。次日，高卢骑兵分三路袭击了罗马行军纵队，一路攻击罗马队伍的首段，另外两路袭击罗马人的两翼。恺撒的骑兵人数远少于敌人，但他也将自己的骑兵分成三路，并将步兵调上前，支援承受重大压力的骑兵。罗马军团的士兵都是重步兵，抓不住敌人骑兵，但能够提供一道坚固的防线，让己方骑兵得到掩护并进行重组。最后，右翼的日耳曼人（为恺撒效力）得胜，将对面的高卢武士击溃，迫使其他高卢人撤退。罗马人开始推进，2个军团留在后方保护辎重，而另外8个军团紧随着己方骑兵。高卢人伤亡惨重。恺撒相当满意地看到一些重要的埃杜依人被俘了，包括两名当年早些时候曾在他麾下作战的酋长，以及那个由于他的反对而没有当上大酋长的人。恺撒没有记载这些人的命运如何。[30]

高潮——阿莱西亚攻防战

战局又一次发生逆转。维钦托利对形势的判断失误，他相信恺撒是在败退，因此必须无情地袭扰罗马人，以防止他们将来以更强大的兵力卷土重来。事实上，恺撒和他的部下远远没有被打败。现在高卢军队近在咫尺，形成了明确的目标，于是罗马人迅速转入攻势。维钦托利撤到了阿莱西亚（今天法国科多尔省山区的奥索瓦山）城外扎营，这座位于山顶的城镇属于曼杜比伊人。一天后，恺撒在阿莱西亚对面扎营，并开始侦察地形。这座城镇坐落在一座长长的山岭上，山坡很陡峭。西面有一块宽广开阔的平原，其他三面都是高地，间或有一些山谷。这些山峰和山脊大体上呈半月形。阿莱西亚所在的中央山地的南北两面都有溪流。维钦托利及其人马占据地利，因此直接进攻必然会有很大风险，可能造成严重伤亡，而且还没有必胜的把握。恺撒声称自己此时除了骑兵之外还拥有8万名步兵，但和往常一样，这个数字的可靠性很难说。拿破仑不大相信这个数字，并且怀疑高卢人的兵力是否真的超过罗马人。

即便如此，直接强攻也不是个好主意，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此地的局势与戈高维亚大不相同。此刻恺撒手中握有重兵，并且在察看了地形之后，自信能够将阿莱西亚和高卢军队包围并封锁起来。[31]

罗马人开始建造规模浩大的围城工事，包括长达11里的护墙、23座小型堡垒和一些可供士兵休息的大型营地。高卢人当然不会听任罗马人怡然自得地干活，派出骑兵下山进攻。罗马军中的辅助部队和盟军骑兵上前迎敌，但直到恺撒派出他的日耳曼骑兵预备队和一些罗马军团士兵去助战，才将高卢人打退。维钦托利接受了将遭到围困的事实，在罗马人的包围圈封闭之前将自己的骑兵送走，指示他们返回各自的部落，征集一支援军。高卢的命运将在阿莱西亚得到裁决，因为正如维钦托利被困，恺撒也被牵制在那里，不得脱身。维钦托利将阿莱西亚的存粮集中起来管理，公平公正地按照配给制分发给所有人，并将牛群分给一些人照管（后来将牛宰杀了）。高卢人安顿下来，等待援军以及与恺撒的最后决战。罗马人艰苦劳作，完成了包围圈，将阿莱西亚山围得水泄不通。拿破仑三世在位时对这个地点进行了确认和发掘，因为他对法国的这段历史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更近期的考古学家利用现代技术做了更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阿莱西亚的实际情况与《战记》的描述惊人地吻合。堑壕的具体布局并不总像恺撒描述的那样规整，但由于堑壕规模很大，所以这也并不令人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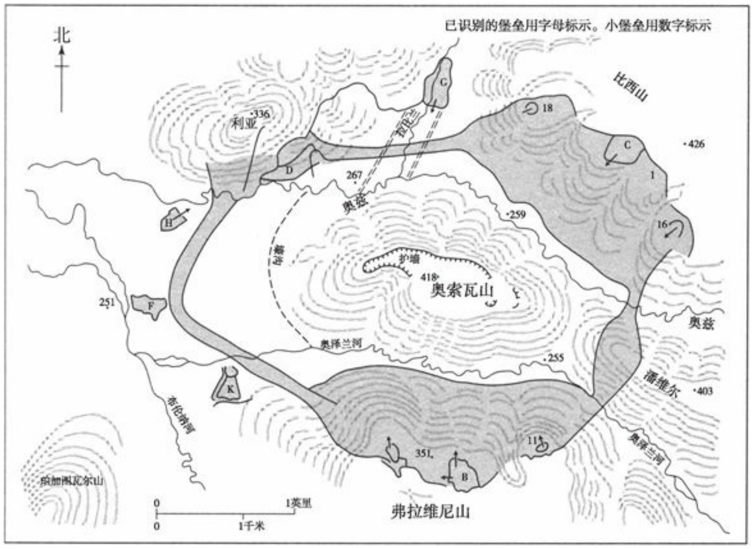


图**8** 阿莱西亚攻防战

在西面，也就是有开阔平原的那一面，罗马人挖掘了一道笔直的壕沟，宽约20英尺，从一条小溪延伸到另一条。这道壕沟的用途是阻滞敌人的进攻，当敌人逼近时提供预警。壕沟以西400步（约130码）的地方是罗马人的主防线，包括两道壕沟，其中内层那一道壕沟可以灌水，在壕沟以西是一道12英尺高的壁垒，每隔80英尺筑有高塔。壕沟前方是一系列障碍物和陷阱，罗马军团士兵们给它们取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绰号。一端被削尖且经火烤后变硬的木桩称作“路标石”；隐藏在圆形陷阱（陷阱顶端覆盖着树叶）内的尖木桩叫作“百合花”，这是由于它们的外形；而半埋在地表的铁蒺藜和尖刺叫作“马刺”。这些陷阱能够给进攻者造成一些伤亡，尤其是当敌人夜间来袭，但其主要功能是拖慢敌人冲锋的速度，破坏其势头，因为士兵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才能避开这些陷阱。罗马人的防御非常坚固，即便是少量部队也能抵挡住敌人的进攻（除非是特别猛烈的攻击），所以大部分部队可以自由地外出搜粮或者继续建造工事。这道防线竣工后，恺撒派遣士兵们去建造一道新的、更长的对垒防线，面向西方，以便抵挡注定会杀到的敌人援军。罗马人需要在敌人援军抵达之前尽可能多地搜集粮草和牲口，所以恺撒指示他的部下搜罗可供全军维持三十天的给养。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投入不

少人力物力，但恺撒此刻掌握着全军，最精明强干的军官也都在他身边。除了军团长们（包括昆图斯·西塞罗和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之外，他身边还有年轻的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以及新任财务官马克·安东尼，也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罗马人劳作的时候，阿莱西亚城内的高卢人观察着对方，偶尔发动袭扰攻击，但在援军抵达前不肯冒险进行大规模交锋。双方都在等待决战时机。[32]

各部落花了不少时间才聚集一支援军。酋长们进行磋商，商定了每个部落应当提供的武士数量。恺撒列出了各部落派遣部队的长长清单，声称敌人最终集结了8000名骑兵和25万名步兵。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不准确，他也可能刻意夸大了这些数字，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与《战记》全书中关于高卢部落军力的信息相吻合。当然，或许这顶多能说明他在夸张记述时做到了前后一致。不过就算他夸大了敌人兵力，但高卢各部落的确组成了空前的大联盟，他们也知道关键的大决战迫在眉睫，因此这很可能是史上最庞大的一支高卢军队。据恺撒说，高卢各部落并没有将所有能够作战的人全部征召，因为他们觉得那样的话军队就会过于庞大，难以指挥，而且几乎没有办法供养。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很多在正常情况下只会为了防御自己家园而上战场的人如今也被包括在野战军当中，不管他们是自愿的还是被酋长命令的。高卢军队指派了四位领导人。其中之一是阿特雷巴特人国王科密乌斯，另外两人是在这年初曾指挥恺撒麾下埃杜依骑兵的酋长。第四位领袖是维卡西维尔劳努斯，他是维钦托利的表弟，也是四位领袖中唯一一个从来不曾为恺撒军队效力的人。这支军队的集结很缓慢，行进更慢，兵力如此庞大的部队也实在快不起来。被围困在阿莱西亚的高卢人看到援军迟迟不来，开始变得焦躁，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城内居民（不能作战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驱赶出城，免得这些“无用”的人继续消耗理应供给武士的粮食。维钦托利或许认为，罗马人会允许这些平民穿过其战线，前往安全地带。如果他这么想，就注定要失望了。恺撒加强了壁垒上的警戒，不准任何人通过。他或许担心让如此多的难民通过会造成问题，敌军可能

借着难民群的掩护发动进攻；或许他不愿意让这么多难民进入他的军队正在搜粮的地区，和他的军队争夺口粮。或许他只是觉得，高卢人将会被迫重新接纳这些平民，这样就能让他的封锁更快地发挥效力，但高卢人没有接纳平民。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双方的指挥官都已经非常冷酷无情。两军对平民的哀求充耳不闻，于是他们就被夹在两军之间，注定要被活活饿死。恺撒可能认为，大批平民饿死的惨状能够破坏高卢人的士气。这肯定会使得最终的决战更加惨烈。[33]

高卢援军终于赶到，驻扎在一处高地上，可能是在阿莱西亚西南方，离罗马军队的外层防线只有1里多远。次日，高卢援军聚集起来发动进攻，骑兵在平原上推进，数量惊人的步兵在后面的山坡上，向罗马人和被围困的战友展示自己的雄壮兵力。作为回应，维钦托利率领他的武士们从城镇和营地冲出。他们向前挺进，填平了罗马人防线前方宽阔壕沟的一段。他们随后在那里等待与援军一同发动进攻。罗马军队严阵以待，围城战线两侧的士兵都做好准备，迎战来自两个方向的敌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自信，恺撒派遣他的骑兵冲出去，与高卢援军的骑兵交战。随后爆发了一场混战，持续了整个下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卢人似乎都稳占上风，但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又一次投入战斗，帮助罗马人赢得了胜利。高卢人没有投入步兵。天黑后，双方都各自回营。次日，高卢人做了准备。武士们制作梯子，收集绳索，攀爬罗马人的壁垒；准备柴捆，用来填满罗马人的壕沟。高卢援军于午夜发动进攻，大声欢呼，好让维钦托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罗马人隔挡在两支高卢军队之间，他们没有直接的通信手段。维钦托利命令吹响号角，指示自己的武士也发动进攻，配合包围圈外的援军，攻击罗马防线的同一地段。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组织起来，后来又花了更多时间才把罗马壕沟的更多地段填平。最后他们因为太晚到达，没能与外面的战友协调好。战斗非常激烈，马克·安东尼和军团长特雷博尼乌斯（他们负责战线的这一地段）调来预备队，击退了内外两支高卢军队的进攻。恺撒部下花了那么大力气修建的防御工事证明了自己的价值。[34]

在发动又一次进攻之前，援军的四位领袖仔细地侦察，并向熟悉地形的当地人了解情况。他们判断，罗马人的薄弱环节是环绕阿莱西亚的半月形高地西北角山坡上的一处营地。由于修建防线的工程量太大，罗马人没能将这座小山纳入防线之内。此处营地只有2个罗马军团，而科密乌斯及其他酋长决定投入将近四分之一的步兵，也就是约6万名精锐武士，来攻打这个营地。维卡西维尔劳努斯率军于夜间出发，来到这座小山的背坡，在罗马人的视野之外等待。真正的总攻将于午间开始，在此之前将会在其他地段发动一些牵制性攻击。维钦托利看到了援军的一些准备工作，尽管他不知道援军的具体计划细节，但还是决定向罗马人的内层防线发动全面进攻，以支援友军。中午，维卡西维尔劳努斯及其部下从山坡上潮水般地拥向脆弱的罗马营地。罗马守军在许多地方同时遭到攻击，兵力被分散了，受到了极大压力。战线很长，但恺撒来到了一个可以总览大部分战场的地方，开始命令将预备队调上前线，去支援受到威胁的地段。即便如此，他仍然非常依赖他的高级军官们向他报告战局，而高级军官们在没有时间征求他意见的时候能够自行决断。维卡西维尔劳努斯对山坡营地的攻击取得稳步进展，于是恺撒派遣拉比埃努斯（他最能干的部下）率领6个大队去支援那里的守军。恺撒指示这位高级军团长自行斟酌形势，如果觉得守不住那里，可以带领守军放弃阵地突围。

恺撒知道仅仅观察和指示是不够的，于是开始行动。他走到最前线，鼓舞士兵们奋勇拼杀，告诉他们这一天将会决定整个战争的结局。维钦托利及其武士对罗马防线最薄弱环节的进攻被打退了。现在他们转而攻击几个虽然地形利于防守但罗马守军较少的地点。在一个地点，他们爬过了壁垒，用抓钩和绳索拉倒了一座罗马塔楼。恺撒派遣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带领一些部队赶去支援，但抵挡不住敌人。军团长盖乌斯·费边率领更多大队前去增援，终于填补了防线上的这个缺口。度过这次危机之后，恺撒骑马去看拉比埃努斯在山坡堡垒处的战况。他不是孤身一人去的，而是从邻近的一座小堡垒匆匆集结了4个大队。罗马军队的大

部分骑兵都还没有投入战斗，于是他将骑兵分为两队，将其中一队带在身边，将另一队派出防线，令其包抄维卡西维尔劳努斯的侧翼。此时，拉比埃努斯的部下已经失去了对堡垒护墙的控制，但他除了自己带来的6个大队和堡垒原先的2个军团之外，还收拢了14个大队。有了这支强大的力量，他在堡垒内和附近拼凑起了一条新战线，并派遣传令兵向恺撒报告这个新进展。围城战和整个战役的危机开始了。在很多方面，至少从《战记》来看，这也是恺撒自前58年以来历次战役的高潮。他记述了拉比埃努斯和其他军团长的精彩表现，但最终的聚焦点还是作者本人：

> ……在战斗中，他总是身穿颜色鲜明的斗篷，作为显著的标志。因此士兵们都知道他驾临了。他带来的骑兵和重步兵也很显眼，因为从山地较高处可以看清这些大小山坡发生了什么。然后敌人前来交锋：双方都呐喊起来，堡垒与护墙内的士兵们也跟着呼喊。我们的士兵们投出标枪，开始挥剑砍杀。突然间，高卢人看到了自己背后的骑兵；其他罗马大队也在逼近。敌人转身逃跑，被骑兵追上了。随后是一场大屠杀……罗马人缴获了74面敌军战旗，将其献给恺撒；庞大的敌军中很少有人能够毫发未伤地逃回营地。[35]

罗马人的反击将战局彻底扭转到对他们有利的方向。突入恺撒战线的企图以血腥的惨败而告终。维钦托利及其部下的突围企图也失败了，他们看到援军败退，于是也撤退了。尽管这一天战局的扭转或许不像恺撒说的那样迅速和轻松，但他的这次胜利毋庸置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叛军士气涣散，斗志全无。维钦托利及其部下此时已经接近粮草断绝，也看不到逃跑的希望。高卢援军的两次大规模进攻都失败了。这样庞大的一支部族武装在野战中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还没有机会取得一次胜利就必须解散了。[36]

次日，维钦托利召集酋长们开会。他提议投降，并表示愿意将自己交给罗马人。与会者似乎没有一个反对。他们向恺撒派去使节。恺撒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并勒令其领袖投降。《战记》对投降过程描述得很简略。据普鲁塔克和狄奥记载，维钦托利穿上他最好的甲胄，骑上最好的战马，离开了城镇。恺撒端坐在审判台的行政长官席位，阿维尔尼酋长

骑马绕着自己的对手走了一圈，然后翻身下马，放下武器，坐在恺撒脚边，等候被带走。《战记》当然不会让自己的英雄被敌人这样抢风头。[37]

参加叛乱的部落几乎全部举手投降了。从很多方面看，恺撒的最终胜利尤其辉煌，因为如此之多的部落联手反对他。凯尔特/高卢诸部落对罗马军队的武力做了最终考验，被彻底击败了。现在差不多所有部落都接受了被征服的现实。恺撒对埃杜依人和阿维尔尼人的俘虏很慷慨大方，或许对其臣属部落也网开一面。这些人没有被卖为奴隶，不过维钦托利一直被关押着，后来在恺撒的凯旋式上，根据罗马的传统，被当众扼死。但还有很多俘虏可以被变卖，罗马全军都可以分享利润。埃杜依人和阿维尔尼人是重要的部族，恺撒更希望他们成为罗马的盟友（情愿不情愿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对他们比较宽大。恺撒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他知道要想创建永久性的和平，现在需要的是政治手腕和宽厚的外交。埃杜依人和阿维尔尼人都彻底归顺了。[38]

---

[1] Caesar，*BG* 7.1.

[2] 理查·韦尔斯利，第一代韦尔斯利侯爵（1760年～1842年），英国政治家和殖民地管理者，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和爱尔兰总督。他担任印度总督期间，彻底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扩张为一个帝国。他的弟弟阿瑟·韦尔斯利就是著名的在滑铁卢战役打败拿破仑的第一代威灵顿公爵。

[3] 托马-罗贝尔·比若，拉皮孔纳里侯爵，伊斯利公爵（1784年～1849年），法国元帅和政治家。他在拿破仑时期官至上校，在拿破仑垮台后解甲归田，后在路易-菲利浦一世时期参加远征阿尔及利亚，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在殖民地的统治相当成功。

[4] 关于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之间的“殖民地”战争的经典研究，见C.Calwell，*Small Wars*（1906）；D.Porch，*Wars of Empire*（2000）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容易读到的论著。

[5] 关于科密乌斯的当选，见Caesar，*BG* 7.76。

[6] 关于对阿科之死的反应，见Caesar，*BG*，7.1-2；扈从的重要性，见 *BG* 1.18，6.15；德鲁伊在卡尔尼特部落领地上一年一度的集会，见*BG* 6.13；恺撒对高卢人的态度，见J.Barlow，‘Noble Gauls and their other，’ and L.Rawlings，‘Caesar’s Portrayal of the Gauls as

Warriors，’ both in K.Welch & A.Powell （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pp.139-170，and 171-192 respectively。

[7] 关于这几个月里罗马的局势，见 M.Gelzer，*Caesar* （1968），pp.145-152，C.Meier，*Caesar* （1996），pp.297-301，and 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126-135；Cicero in Ravenna，*ad Att.* 7.1.4；关于军团长扮演的角色，见K.Welch，‘Caesar and his Officers in the Gallic War Commentaries’，in Welch & Powell （1998），pp.85-103。

[8] Caesar，*BG* 7.4；关于维钦托利和恺撒之间的友好关系，见Dio 40.41.1，3。

[9] Caesar，*BG* 7.5；关于叛乱，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 （1996），pp.79-95，esp.90-95。

[10] Caesar，*BG* 7.6-7；关于400名日耳曼骑兵，见7.13。

[11] Caesar，*BG* 7.7-9；关于乔装打扮为高卢人，见Suetonius，*Caesar* 58.1。

[12] Caesar，*BG* 7.10；关于主动权，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90-92，94-95，99-100，114-115，和Calwell （1906），pp.71-83。

[13] Caesar，*BG* 7.11-13.

[14] Caesar，*BG* 7.14.

[15] Caesar，*BG* 7.14-15.

[16] Caesar，*BG* 7.16-17；关于罗马士兵吃的食物类型，见R.Davies，‘The Roman Military Diet’，in R.Davies，*Service in the Roman Army* （1989），pp.187-206。

[17] Caesar，*BG* 7.18-21；关于部落军队的补给问题，见A.Goldsworthy. *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 - AD 200* （1996），pp.56-60。

[18] Caesar，*BG* 7.22-25；cf.Rawlings （1998），pp.171-192.

[19] Caesar，*BG* 7.28.

[20] Caesar，*BG* 7.26-28；Polybius 10.15.4-6，cf.W.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 （1979），pp.51-53.

[21] Caesar，*BG* 7.32-34.

[22] Caesar，*BG* 7.28-31，35.

[23] Caesar，*BG* 7.36.

[24] Caesar，*BG* 7.37-41.

[25] Caesar，*BG* 7.42-44.

[26] Caesar，*BG* 7.45.

[27] Caesar，*BG* 7.47.

[28] Caesar，*BG* 7.50.

[29] 关于戈高维亚的叙述，见Caesar，*BG* 7.44-54，and see also the comments on the style of this passage in A.Powell，'Julius Caesar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ssacre'，in Welch & Powell，（1998），pp.111-137，esp.122-123；关于"狠踢敌人的肚子"，见Plutarch，*Lucullus* 9.1。

[30] Caesar，*BG* 7.55-56，63-67；关于拉比埃努斯的行动，见7.57-62。

[31] Caesar，*BG* 7.68-69；关于此次战役，见J.Harmand，*Une Campagne Césarienne*：*Alésia*（1967），J.Le Gall，*La Bataille D'Alésia*（2000），and H.Delbru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1：*Warfare in Antiquity*（1975），pp.495-507，p.501提到了拿破仑的评论。

[32] Caesar，*BG* 7.69，72-73，and comments in Le Gall（2000），pp.64-77.

[33] Caesar，*BG* 7.70-71，75-78；关于援军兵力，见Le Gall（2000），pp.82-84。

[34] Caesar，*BG* 7.79-81.

[35] Caesar，*BG* 7.88.

[36] 关于最后一场战斗，见Caesar，*BG* 7.82-88。

[37] Caesar，*BG* 7.89，Plutarch，*Caesar* 27.5，Dio 40.41.1-3.

[38] Caesar，*BG* 7.89-90.

十六 “高卢全境已被征服”

> 关于恺撒，出现了许多传闻，都不是什么好话。有人说，他的骑兵已经被全歼了，不过我觉得这肯定是捏造的谎言；还有人说，第七军团损失惨重，恺撒本人被包围在贝洛瓦契人领地，与其他部队音讯断绝。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即便这些未经证实的故事，流传也并不广泛，只是在一个小集体中被当作公开的秘密——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人；不管怎么说，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在讲话之前都要先用手捂住嘴。
>
> ——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给西塞罗的信，约前51年5月26日 [1]

身在高卢期间，恺撒做了很多努力去防止罗马忘记他的存在，并大力宣扬自己的成就。《战记》是他这种努力的一个主要部分，但并非他这些年中唯一的文学创作。前54年初，在从内高卢北上前往军队的途中，他撰写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论类比》。书名是希腊文，内容是对拉丁文语法的分析，主张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使用精确、朴素的语言，反对当时嗜好古旧词汇和复杂表达方式的时尚。这本书是献给西塞罗的，赞扬他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和“几乎是雄辩术的创始人”；但随后又说，本书对研究日常语言很有助益。这部书只有一些残章断简保存至今。恺撒当时要考虑高卢事务并为第二次远征不列颠做准备，但依然能写出这样详尽和权威的学术著作，足以印证他的聪慧渊博和充沛精力。与《战记》相比，《论类比》的目标读者群要小得多，但包括了许多爱好文学的元老和骑士。作为文学家的恺撒比作为平民派政治家的恺撒更容易被人接受，争议性也更小。对西塞罗的赞扬是很自然和真诚的，与两人之间新的更亲密的纽带有关系，毕竟是恺撒帮助西塞罗结束了流亡并得以返回罗马城。西塞罗将自己作品的稿件发给恺撒，两人切磋文艺，这愈发巩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友谊。 [2]

文学对罗马的精英阶层而言至关重要，但要赢得更广泛群众的好感，需要其他的手段。罗马有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即功勋卓著的伟

人，尤其是得胜的将领，会在罗马城建造纪念性建筑，以这种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方式纪念自己的成就。前55年，庞培在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期间，为了纪念自己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建造了一座超越前人的恢宏纪念建筑，正式开启了他的大剧场建筑群工程。这是罗马城内第一座永久性石质剧场，差不多三个世纪之后的狄奥仍然认为它是罗马最壮观的建筑之一。剧场的石质座席可容纳约1万人，比较讲究的人在看演出时会带上软垫。庞培剧场屹立在战神广场，雄踞于数百年来其他得胜将领建造的一排神庙之上。这个建筑群中还有不少于五座神龛，其中最主要的是献给“得胜维纳斯”的，其他的则献给象征荣誉、勇气和幸运等美德的神祇。这座半圆形剧场附有一座柱廊，仅柱廊的占地面积就达约257400平方英尺。从设计到建材，整个建筑群的一切都印证着工程的巨额花费。

剧场建筑群对公众开放时的奢华庆祝活动同样耗费了巨资。当时有音乐演奏、体操表演、赛车和在邻近的弗拉米尼乌斯广场举行的斗兽表演。在五天的表演中有五百头狮子丧生，有一场表演是身披重甲的猎手对抗约二十头大象。大象企图逃离竞技场，拼命撞击铁栏杆，令观众心惊胆战，但后来被逐退了。恐惧很快变成了同情，群众开始怜悯这些动物，而愤怒地指责下令屠杀它们的庞培。尽管罗马人酷爱斗兽场里的暴力表演，但仅仅花费巨资来提供演出未必能够赢得群众的欢心，以便让他们对提供演出的人感恩戴德。西塞罗私下里觉得，庞培的剧场和柱廊的规模太过分了。一些比较保守的元老则低声抱怨，在罗马城内建造一座永久性的剧场（这是最具希腊特色的公众场所）是个错误。在过去，任何表演的绝大多数观众都是站着的，元老们担心给他们座席会鼓励更多公民终日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3]

恺撒有着自己的谋划，要给城市留下永久性的印迹。前54年，他开始扩建广场北侧和尤利乌斯会堂，他的新建筑将与尤利乌斯会堂毗邻。他还不满足于此，而是效仿庞培，将目光投向战神广场，打算用永久性

的大理石建筑取代那里用于投票的围场。工程规模浩大，侧面有1里长的柱廊。西塞罗帮助恺撒的亲信奥庇乌斯[4]来筹划和安排这些工程，这又一次公开表明了西塞罗与恺撒之间新的政治关系。这些宏伟工程耗资巨大，据西塞罗说，仅仅为了购买广场扩建工程所需的地皮就花了6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而苏埃托尼乌斯说是1亿塞斯特尔提乌斯。这些资金全部来自征服高卢的收益。竣工之后，城市将拥有更宽广、更壮观的广场。作为城市中心，广场将为公共事务和私人商贸提供更大空间，而战神广场上将有更宏伟的投票场地。从短期来看，这些工程为城内许多贫困公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为提供建材的企业带来了利润丰厚的合同。

恺撒还宣布，将为了纪念他的女儿而举行角斗士表演。这是史上第一次为了悼念一位去世的女性而举行角斗士表演。他在过去曾为自己的姑姑尤利娅和第一任妻子科尔内利娅举办公开葬礼。为了此次表演，他搜罗了大量角斗士。为此，恺撒做了安排，饶恕了之前角斗士竞技中落败者的性命。这些角斗士不是按照常规在角斗士学校里接受训练的，而是在以擅长武装格斗而闻名的元老和骑士家中学习武艺。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从高卢写信给这些传授武艺的元老和骑士，请他们认真培训角斗士。到前49年，恺撒已经拥有至少5000名角斗士，其中许多在卡普阿的角斗士学校。恺撒是个天生的表演艺术家，他决心要让自己举办的表演与众不同。为了缅怀他的女儿，除了角斗士表演外，还将举办公众宴会。其中有些菜肴是他家中自己的厨师准备的，但很多是从一些高档餐馆买来的，罗马有很多这样的昂贵餐馆。商人从中得利，群众也得以尽情享受饕餮之乐，或许还能够让更多公民对恺撒产生好感。尽管纪念尤利娅的角斗士表演和宴会要几年之后才会真正举行，但准备工作都非常公开地进行着，令大家充满期待。[5]

尽管恺撒想方设法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有的时候要让身在罗马的人注意远方的事情，实在太难了。在这个十年的末尾，共和国的体制

似乎要无可挽回地瓦解了。选举舞弊非常猖獗。在前53年的执政官竞选中，有两名候选人联手向“优先百人团”（即被选中在百人会议首先投票的第一等级百人团）行贿1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还向负责主持选举的两位前54年执政官行贿3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恺撒和庞培都间接卷入了此次丑闻，都对它的大白于天下不太高兴。但选举直到前53年夏季才举行，元老院请求资深执政官庞培来监督选举。前52年的候选人同样腐败，雪上加霜的是，米罗和克洛狄乌斯的党徒爆发了暴力冲突，最终导致克洛狄乌斯被谋杀。在近期历史中，曾有元老随从在政治暴乱中丧生，也有一些权贵受伤。而克洛狄乌斯这样一位名人，不仅是前任行政长官，而且目前还是候选人，竟死于暴力，着实糟糕。况且他是被蓄意谋杀，这更令人震惊。克洛狄乌斯在最初的冲突中负伤，躲进一家酒馆。米罗刻意派人到酒馆把他的老对手拖出来杀掉。

随后，克洛狄乌斯的家人和支持者大肆破坏以泄愤，造成了很大动乱，共和国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anarchy）这个词源自希腊语，原先的意思是动乱使得雅典高级行政长官执政官（archon）的选举无法进行。元老院召开了会议，发布了终极议决，授权庞培尽一切努力保卫国家。元老院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却没有自己的警察或军队来控制混乱的局面。庞培拥有资深执政官的军权，手中掌握着军队。关于应当授予庞培何种头衔和权限，元老们产生了一些疑虑。又一次有人建议任命他为独裁官。也有人建议将恺撒召回，让他与庞培共同担任执政官，直到危机平息下去。全部十位平民保民官都支持这一提议。恺撒写信向他们表示感谢，但请他们撤回这一提案，因为高卢战事需要他。最后，毕布路斯（就是前59年恺撒的同僚，对恺撒和庞培都没有好感）提议任命庞培为单一执政官，任期一年。加图支持这一动议，于是它顺利地通过了，因为庞培的政敌们也感到，现在只有庞培出面才能恢复城市秩序。但他们刻意避免使用“独裁官”的头衔，并明确表示没有授予庞培像当年苏拉那样的永久性权力，这仅仅是个处理危机的临时性措施而已。[6]

庞培的第三次执政官任期有许多不合常规之处。首先，他是唯一的执政官，没有同僚，这违反了执政官职务的最根本原则。他也不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元老院任命。通常情况下，执政官只有自己的执法吏为其开道，庞培却将武装士兵带入城市来维持秩序。米罗受审的时候，法庭被执政官的士兵团团围住，阻止米罗的追随者干扰庭审。庞培为了处理前不久的选举舞弊和政治暴力，自行建立法庭和程序。陪审团成员由执政官亲自挑选。米罗的罪行铁证如山，尽管这在罗马的审判中并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但在此次庭审过程中，法庭和围观群众对被告抱有极大敌意。西塞罗同意为米罗辩护，因为米罗曾是西塞罗的不共戴天之敌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西塞罗站起来发言的时候，群众发出了鼓噪抗议，表达对米罗的憎恨。于是西塞罗丧失了勇气，没敢发言。米罗被判处流放至外高卢的马西利亚。西塞罗相当不知趣地给米罗寄去了他原先打算在庭审中演说的稿子。米罗讥讽地回答，他很高兴西塞罗没有发表演讲，否则他就没有机会品尝马西利亚的美味海鱼了。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对庭审结果欢呼雀跃，但他的一些主要盟友在随后几个月内也受到审判并被定罪。庞培对履行自己的职责非常认真，的确在努力控制蔓延政界的暴力和舞弊现象。与之前元老院终极议决的执行情形不同，前52年没有发生草率的处决，一切都是通过法庭处理的，尽管这些法庭是专门为应对当时的局势而设立的特别法庭，并且根据新规定来运作。[7]

贿选，尤其是执政官竞选中的贿选，已经非常普遍。庞培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对选举舞弊施加更严厉的惩罚。但是，参加竞选的花费惊人，很多候选人都寄希望于一年期满之后得到一个富裕的行省。那样他们就可以压榨不幸的外省居民，以及收受包税公司的贿赂（这些公司不希望自己对人民的剥削受到政府的任何干预），来还清自己的债务。这种局面对各行省来说很糟糕，但绝大多数元老更关心它对选举的影响。为了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庞培颁布了一项新法律，规定执政官卸任后要等五年时间才可以就任行省总督。他认为这样的话，债主们会很不情愿等这么久才去收回欠款。但这项法律不可避免地导致没有足够多的人选

来治理行省，于是在短期内必须尽可能任用卸任后不曾担任过行省总督的前任行政长官。西塞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于前51年被任命为奇里乞亚总督，他对这个任务没有多少热情。同时，毕布路斯被派去治理叙利亚。庞培的措施似乎很有效，前51年、前50年和前49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贿赂和腐败的现象大大减少。加图参加了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宣称自己绝不会去哗众取宠、笼络选民。尽管他受到普遍的敬佩，但其实并不很得民心，而他的竞选手段极其怪诞且不符合传统。加图在竞选中输得很惨，这丝毫不奇怪。庞培不大可能会支持加图竞选，但他也控制不了选举结果。这三年的选举展现了名门望族的强大实力。胜利者是三位贵族和三位最显赫的平民世家子弟。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和大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兄弟分别在前51年和前49年当选，而他们的堂兄弟小盖乌斯则当选为前50年的执政官。这位小盖乌斯娶了恺撒的甥孙女屋大维娅，也就是前不久恺撒提议嫁给庞培的那个姑娘。我们不确定恺撒是否知晓，马凯鲁斯更愿意与自己的堂兄弟们联手，而后者对恺撒非常敌视。[8]

庞培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是他极其成功但毫不循规蹈矩的政治生涯中又一座重要里程碑。他再一次被元老院认定为唯一一位有能耐处理危机的人，即便他的私敌也承认必须请他出山。庞培在过去要对付的是李必达，然后是塞多留、海盗、米特里达梯六世和粮食供应问题，如今他的任务是对付城内的政坛暴力。和以往一样，他圆满完成了任务，但如果他在这一过程中不抓住机遇来谋求私利，就不算是罗马的元老了。他确保自己在两个西班牙行省的任期被延长五年，保证自己在卸去执政官职务后仍然能手握军权和控制军队。前52年初，米罗和仍然在世的另外两名执政官候选人被定罪并放逐。而最后一个候选人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纳西卡出身罗马最鼎盛的门阀贵族家庭，他超长的名字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此人出生于高贵的西庇阿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9]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击败了汉尼拔，而另一位成员[10]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摧毁了迦太基。但他后来被梅特卢斯家族的一支收

养，这是最显赫的平民家族之一。因此梅特卢斯·西庇阿既有巨大的财富，又有极强的家族人脉，同时还拥有威望极高的祖先。他自己的才干非常有限，但有一个美丽的女儿科尔内利娅，嫁给了克拉苏玉树临风的儿子普布利乌斯，在卡莱战役后便成了寡妇。庞培决定第四次结婚[11]，向梅特卢斯·西庇阿提亲，受到了欢迎。梅特卢斯·西庇阿受到的指控被悄悄取消，婚礼举行了。和尤利娅一样，庞培的新娘非常年轻，差不多可以当他的女儿，甚至是孙女，但这门婚姻又一次非常幸福和成功。科尔内利娅不仅貌美，而且睿智、精明而魅力十足。庞培素来非常享受别人的崇拜，而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位妻子非常爱他，于是他也加倍地宠爱她。他已经五十四岁，对一个少年得志、喜欢别人夸奖自己英俊的人来说，到了这个年纪，一定感到不轻松。或许连续娶了两位年纪比自己小得多的娇妻让他觉得自己迎来了第二春。从政治角度看，这门婚姻也非常有利，让这位不是很擅长政治游戏的将领与处于共和国精英阶层核心的一些家族建立了联系。科尔内利娅的父亲也得到了好处，不仅逃脱了法律制裁，还在8月被提名为庞培的同僚执政官。[12]

恺撒看到自己的前女婿在其他地方另谋婚事，很可能感到失望。凭借后见之明，我们知道仅仅两年半之后，恺撒和庞培就将兵戎相见；但在当时，三头同盟中仅剩的两人似乎仍然关系融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嫌隙。恺撒不愿意回来担任庞培的同僚，因为除了需要镇压高卢叛乱之外，他还没有完成对新征服地区的巩固。恺撒已经开始展望未来，并明确表示希望自己在离开高卢后可以直接去当执政官，这将是他第二次担任这个职务。他不希望卸去总督职务后还要作为普通公民等待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期间他很可能会遭到起诉，为了他在执政官任上的作为而受到指控。庞培在前52年的一些举措似乎与恺撒的意愿相抵触。执政官卸任后必须间隔五年才能担任行省总督的规定，间接地对恺撒的地位构成了威胁。目前为止，即将被分配给新任执政官的行省都会在选举之前宣布，因此能够提前很长时间（大约十八个月）知道现任总督是否会被取代。而在新体制下，一位前任执政官可以随时被任命

为任何一个行省的总督，包括恺撒的行省，尤其是外高卢（恺撒的外高卢总督职务是由元老院任命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这很令人不安，但庞培和恺撒在罗马的其他朋友应该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那样的人会对恺撒不利。

更值得担忧的是庞培颁布的另一项法律，禁止执政官候选人缺席参选，也就是禁止在竞选时本人不在罗马城内。这意味着恺撒若想第二次当上执政官，就必须先放弃军权（才能回到罗马城），但那样的话他就面临被起诉的风险。这一年早些时候，在谢绝保民官们让他回到罗马城担任庞培同僚之后，恺撒劝说保民官们提出一项法案，特别允许他缺席参选。恺撒在元老院的盟友迅速提醒庞培，这项法案与后来庞培自己提出的立法（禁止执政官候选人缺席参选）相矛盾。记载新法律（禁止缺席参选）的青铜匾额已经被送到元老院档案中存放，但庞培亲手写了一个补充条款（允许恺撒缺席参选），下令将它附加到新法律文本中。显然，补充条款的法律效力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对恺撒的怠慢或许不是庞培有意为之，但庞培也可能只是想提醒自己的盟友，不要以为庞培帮助他是理所应当的。目前，恺撒和庞培若是分道扬镳，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到前52年末，两人的联盟或许比前些年衰弱了不少，但仍然有效。击败维钦托利的捷报传来后，元老院投票决定再次为恺撒举行为期二十天的公共感恩活动。庞培仍然愿意庆祝自己盟友的胜利，但也没有忘记纪念自己的成就：他建造了一座献给胜利女神的神庙。[13]

高卢的结局

“高卢全境已被征服……”希尔提乌斯在为恺撒《高卢战记》续写的篇章开头如此写道。但希尔提乌斯自己的叙述很快就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投降后，很多叛乱部落都投降了，但还有一些部落负隅顽抗。前52年12月31日，恺撒离开比布拉克特，率领第十一军团和第十三军团从冬季营地出发，前去讨伐比图里吉人。罗马人突然发

动攻击，而且恺撒命令部下不要按照惯例纵火焚烧农场和村庄，因此没有烟柱来警示比图里吉人。他们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数千人被俘。这一年夏季，比图里吉人的土地曾是两军厮杀的战场，他们还自愿服从维钦托利的命令，烧毁了自己的城镇和存粮，因此他们无力抵抗，很快投降了。恺撒对其他叛乱部落的宽大条件对比图里吉人来说也是个鼓励，而恺撒也愿意对比图里吉人开恩。这一次没有奴隶和战利品可以分发给士兵们，于是恺撒给每位士兵发放了2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奖金，每名百夫长则得到20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以表彰他们在此次冬季作战中的良好表现。两个半星期之后，他率领第六、第十四军团前去讨伐卡尔尼特人。高卢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于是在一段时间内，恺撒将他的许多部下安置在凯纳布姆的房屋内，这座城镇在前一年曾经是大屠杀的场所。恺撒定期派遣步兵和骑兵队伍扫荡周边的乡村。卡尔尼特人东躲西藏，饱受严寒之苦，很快就粮草断绝，损失惨重。很多人逃到其他部落避难。[14]

恺撒将特雷博尼乌斯留在凯纳布姆指挥，然后命令第七、第八和第九军团离开冬季营地，第十一军团与他们会师，随后一同攻击贝洛瓦契人。贝洛瓦契人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之前没有派许多武士去参加援救阿莱西亚的大军。只是由于和贝洛瓦契人特别友好的科密乌斯的特别请求，贝洛瓦契人才派去了几千人。其他人则更愿意独立地以自己的方式与罗马人作战。前51年初，贝洛瓦契人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指挥官是科雷乌斯，其副手是在阿莱西亚战败后没有投降的科密乌斯。恺撒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的计划是假如恺撒只带来不超过3个军团，就向他发起攻击；但若是他手中的兵力更多，就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于是，恺撒将手中的第4个军团藏在辎重队后方，希望诱惑贝洛瓦契人出战，并速战速决。高卢人没有上当，两军隔着一座山谷扎营对峙。双方都不愿意在不利条件下仰攻敌人。为了安全起见，恺撒命令部下格外加强自己的阵地，使它比一般的行军营地更坚固。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双方都使用日耳曼部队，因为科密乌斯说服了500名日耳曼人加入了贝洛瓦

契人。有一次，高卢人伏击并歼灭了雷米人（作为罗马盟友为其效力）的一支袭扰队伍。恺撒觉得自己手中的兵力不够，于是命令第六、第十三和第十四军团前来增援。此次战役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关于此役的消息传到罗马城后，恺撒严重受挫的谣言流传开来。在贝洛瓦契人的侦察兵发现更多罗马军队赶来之后，贝洛瓦契人决定撤退，利用预先秘密准备的稻草捆和干燥木柴放火，在浓烟烈火的掩护下安全脱离罗马人。此后他们主要进行伏击而不是正面对抗，将自己的主力与罗马人保持距离。随后几天内，罗马人遭受了一些小挫折。在这种行动中，情报的作用极大。恺撒审讯一名俘虏时得知，科雷乌斯正带着6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准备伏击他的一支搜粮队，于是感到机会来了。罗马的辅助骑兵事先得到警示，抵挡住了科雷乌斯的伏击部队，等待罗马军队赶来支援。大多数高卢人逃跑了，但科雷乌斯不肯逃跑，也拒绝投降，最终被标枪刺死。恺撒率军继续前进，打算袭击敌军主营地。据恺撒的侦察兵判断，敌营就在约8里之外。

科雷乌斯的战死和其败兵的抵达促使贝洛瓦契人派使节向恺撒求和。使节企图将叛乱的全部罪责推给已死的科雷乌斯。恺撒告诉他们，他不相信完全是一个人的错，但他愿意接受贝洛瓦契人的投降，不再继续惩罚他们。贝洛瓦契人交出了人质。其他一些部落看到恺撒如此宽宏大量，在随后几周也陆续投降。恺撒说得对，仅仅一位酋长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他肯定知道，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能够让叛乱继续坚持下去。不久之后，他率军征讨厄勃隆尼斯人，因为他们的酋长阿姆比奥雷克斯仍然逍遥法外。贝洛瓦契人战败后，科密乌斯逃走了，他和他的部下遭到了罗马人的追捕。有一次，拉比埃努斯假装愿意与这位阿特雷巴特人国王谈判，希望借机将他杀死，但科密乌斯安全逃脱，只是受了伤。后来，另外一支罗马巡逻队差一点就抓住了他。科密乌斯宣称自己愿意议和，只要他再也不需要看到罗马人。恺撒对此的回应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最终科密乌斯渡海逃往不列颠，自立为南海岸某部落的国王，建立了一个王朝。[15]

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发生在西南方诸部落中，以高墙环绕的山地城镇乌克斯罗杜努姆（今天的多尔多涅）为中心。叛乱的两位领导人之一是卢克特里乌斯，他曾于前52年初遵照维钦托利的命令袭扰外高卢。主要的战斗是由恺撒的军团长指挥的，但最后恺撒亲自彻底平定了叛乱，途中还接受了卡尔尼特人的投降，卡尔尼特人将叛乱的主要领导人交给恺撒发落。据希尔提乌斯说，恺撒不得不将此人处决，因为他的士兵们仍然对凯纳布姆大屠杀愤慨不已。叛军被包围在乌克斯罗杜努姆城内，恺撒运用麾下士兵的工程技术切断了高卢人的水源。守军出城投降后，恺撒决定对其严惩，以儆效尤，“因为他的宽大仁慈已经世人皆知”（这是希尔提乌斯的话）。叛军武士均被砍掉双手，然后释放，以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有些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希尔提乌斯的这句话指的是内战，而不是恺撒在高卢的战争，但这犯了用现代人的眼光揣摩古人的错误。在《高卢战记》之前的篇章里，希尔提乌斯已经举例说明恺撒在叛乱部落投降后不予严惩，并说他的宽厚鼓励了其他叛乱部落前来投降。在军事胜利之后，恺撒急于赢得政治上的和平，手段则是劝服高卢全境的领袖们，忠于罗马方为上策。恺撒的绥靖政策很快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乌克斯罗杜努姆逃脱被俘命运的卢克特里乌斯被另一位阿维尔尼酋长交给了罗马人。希尔提乌斯将恺撒在前51年～前50年的活动描述为：“恺撒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与各部落的友好关系，不给他们犯上作乱的机会和理由……就这样，他光明正大地与各部落相处，向酋长们赏赐丰厚的战利品，并且没有给他们施加任何负担，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臣属地位，于是很轻松地在高卢维持了和平，毕竟高卢在遭受如此之多的军事失败后已经疲惫不堪。”[16] 尽管恺撒在前52年大叛乱之前对形势的判断有误，但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处理外交关系。下一年的夏季平静地过去了。前49年初，他离开高卢，最终带走了他的大部分军队。在罗马放松了对高卢的控制之后，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贝洛瓦契人在前46年又一次举兵谋反，后来被镇压下去。除此之外，高卢在随后十年中都很安定。[17]

恺撒在高卢度过了九年时光，将罗马的统治向东扩展到莱茵河，向北拓展到英吉利海峡，向西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海岸。在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将始终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高卢都将享有内部和平（只是在被征服几十年内有过一些叛乱，然后偶尔受到罗马内战的波及，在帝国末期遭到一些蛮族的袭扰）与普遍繁荣。高卢贵族赢得了罗马公民权，在恺撒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之内，曾以武力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后代就进入了罗马的元老院。高卢人民或者至少是比较富裕的阶层，获得了玻璃窗、流动供水、排污系统、浴室和中央供暖等便利的生活设施。高卢文化受到了罗马思想和理念的改良与影响，成了后人所称的高卢-罗马文化。拉丁语得以普及，尤其是在城镇和贵族当中。读写能力和书面文献得以广泛传播。德鲁伊祭司遭到镇压，猎取人头和人祭等实践停止了，但高卢宗教的其他许多方面仍然流传下去，尽管高卢的男女神祇有时会被赋予新的罗马名字。后来，古老的宗教将受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起初只是一种秘密的地下崇拜，但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新的宗教只是抵达高卢的诸多思想与理念之一，因为高卢成了更广阔的罗马世界的一部分，人们能够更轻松、更安全地旅行。罗马对高卢及其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而持久，远远超过罗马对不列颠的影响。不列颠在脱离罗马帝国几十年之后，罗马文化的绝大多数踪迹便从那里消失了。

由于恺撒的征战，高卢后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们不知道假如恺撒不曾征服高卢（比如当初他率军远征巴尔干，而不是高卢），后事将如何发展。两千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罗马人很可能仍然会在某个时间征服高卢，但或许不会像恺撒做的那样迅速和彻底。考虑到前1世纪中期罗马扩张的可选择方向很有限，对高卢的征服应当会很快发生。罗马的统治给高卢和其他行省带来了许多好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有理由说与被罗马征服之前或者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相比，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更多人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罗马社会有很多缺陷，但其他文化，比如高卢文化，也往往有着同样的缺陷。奴隶制

是个很明显的例子。竞技场上的残暴娱乐（它与文学、艺术和戏剧一同构成了罗马的文化影响）在高卢则较为少见。恺撒并不为罗马的帝国主义或罗马文化负责，但他肯定是共和国武力扩张的积极分子。他征服高卢，并非为了达成长期目标与野心，而只是满足了自己长期以来对荣耀的渴望。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高卢，主要是由于机遇和偶然。

我们可以说，罗马的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但罗马的征服的确非常残酷。普鲁塔克说，在恺撒的高卢战争中，有100万高卢人丧生，还有100万人被俘，其中绝大多数被变卖为奴。据普林尼记载，在内战中，恺撒的军队歼敌119.2万人，尽管恺撒并不认为这样的成就能够增添他的光彩。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说高卢战争中有40万敌人死亡，“俘虏的人数更多”。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数字的出处。《高卢战记》中给出的敌人伤亡数字加起来也远远没有这么多，而《内战记》很少提到敌人的伤亡数字。对于高卢诸部落的损失，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但根据档案应当能计算出抓获和奴役的俘虏数量。这些数字或许夸张了，但仍然能说明恺撒的胜利造成了多么沉重的生命损失。恺撒的历次战役对高卢的影响一定是极大的。有些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一连几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前50年，恺撒将新高卢行省的年度税赋定为4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这还不及他为广场扩建工程买地的价钱高。这个较低的税赋标准也许能够说明八年的激烈战争给高卢造成的破坏。而恺撒将维尼蒂部落统治议事会全体成员处死这样的事情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只能留待我们自己想象。恺撒在选择对敌人开恩还是屠杀时，完全是务实的，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考虑。在征服高卢的战争期间，他的士兵犯下了一些恐怖暴行，有时是上级的命令，比如屠杀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有时则是自发的，比如屠戮阿瓦利库姆的妇孺。在过去，其他统帅指挥下的其他罗马军队也有过类似的战争暴行，将来也还会有。事实上，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军队都有过同样严重或更加凶残的恶行。这么说不是为了替恺撒的所作所为辩护，而只是将他的暴行置于时代背景之下。在古代，战争普遍是极端残酷的。[18]

为了获得指挥大军的机会，恺撒努力了许多年。前58年，他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将其紧紧抓住，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个战争与征服的机遇。在随后的历次战役中，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跻身于罗马史上最优秀的将领之列。他的指挥风格是典型的罗马式：身处最前线，控制战局，调动预备队，一边观察官兵的行动，一边鼓舞他们奋勇拼杀。他的战略非常积极，始终活跃地抢夺和控制主动权，不管多么困难，也从不怀疑自己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是罗马的作战方式，或许现代观察者会认为它过于鲁莽，但当时的罗马元老不会这么看。在同时代的军事统帅中，只有庞培的成就和技艺能够与恺撒相媲美。卢库鲁斯尽管是极佳的战术家，但缺乏恺撒那种领导力。恺撒和庞培在作战中同样积极主动，极富攻击性。军事才干不是与生俱来的，恺撒在早期战役中也曾失手。他花了很长时间，需要持续的胜利，才能用他的魅力、慷慨和才干来赢得将士的爱戴。恺撒犯过错误，打过败仗，其中最重要的是远征不列颠的草率、科塔与萨比努斯部队的损失，以及在戈高维亚的失败。但恺撒能够让部下相信：在他的统领下，最终他们会胜利。连续八年的激烈战争中，恺撒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坚定了士兵们的信心。到前50年，他已经打磨出一支对他赤胆忠心的军队。恺撒赢得了无上荣耀和巨大财富，为了在罗马城争取更多支持，他能够一掷千金。他能否顺利返回罗马，与庞培并列成为共和国最伟大的公民，我们拭目以待。[19]

---

[1] Cicero.a*d Fam.* 8.1.4

[2] Suetonius，*Caesar* 56.5，Cicero，*Brutus* 252-255，a*d Quintum Fratrem 2* .16.5，3.9.6-7.

[3] 关于庞培剧场的开幕，见Dio 39.38.1-6，Pliny，*NH* 7.34，8.21-22，Plutarch，*Pompey* 52-53.1；关于庞培受到的批评，见Cicero，*de Officiis* 2.60，关于其他人，见Tacitus，*Annals* 14.20；大象的数量有17、18和20等不同说法。

[4] 盖乌斯·奥庇乌斯是恺撒的密友和亲信。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奥庇乌斯为他打理私人事务。奥庇乌斯和恺撒的另一名亲信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一起，对罗马施加了很大影响。奥庇乌斯撰写了关于恺撒征战阿非利加等地的史书，还写过一部恺撒传记。

[5] Cicero，*ad Att.* 4.17.7，Suetonius，*Caesar* 26.2，Pliny，*NH* 36.103；关于卡普阿角斗学校中的角斗士，见Caesar，*BC* 1.14，关于竞技比赛的重要性，见Z.Yavetz，*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1983），pp.165-168。

[6] See Dio 40.48.1-52.4，Plutarch，*Pompey* 54-55，and also 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30-135，M.Gelzer，*Caesar*（1968），pp.148-152.

[7] Plutarch，*Cicero* 35，Dio 40.54.1-4，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pp.338-342.

[8] 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37-139，Gruen（1974），pp.150-159.

[9] 即大西庇阿。

[10] 即小西庇阿。

[11] 原文有误。梅特卢斯·西庇阿的女儿科尔内利娅是庞培的第五任妻子。

[12] Plutarch，*Pompey* 55.1-2，*Cato the Younger* 49-50，Dio 40.56.3-58.4，Suetonius，*Caesar* 28.3；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31-132，Gruen（1974），pp.154，454.

[13] Caesar，*BC* 1.32，Suetonius，*Caesar* 26.1，Appian，*BC* 2.25，Dio 40.51.2，and M.Gelzer，*Caesar*（1968），pp.146-148，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37-139.

[14] Caesar，*BG* 8.1-5.

[15] 关于针对贝洛瓦契部落的战役，见Caesar，*BG* 8.6-23；Commius，8.23，47-48；Ambiorix，8.25。

[16] Caesar，*BG* 8.49.

[17] 关于乌克斯罗杜努姆，见Caesar，*BG* 8.26-44，对处决战俘的评论，见A.Powell，‘Julius Caesar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ssacre’，in K.Welch & A.Powell（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1998），pp.111-137，esp.129-132；Carnutes，8.38；关于前46年贝洛瓦契部落的叛乱，见Livy *Pers.* 114。

[18] 关于伤亡数字，见Plutarch，*Caesar* 15，Pliny，*NH* 7.92，Velleius Paterculus 2.47.1，and see comments in C.Goudineau，*César et la Gaule*（1995），pp.308-311。

[19] 对作为军事家的恺撒的评论，见A.Goldsworthy，‘Instinctive Genius：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in K.Welch & A.Powell（1998），pp.193-219。

第三部 内战与独裁（前49年～前44年）

十七 通往卢比孔河之路

> 卢比孔河是他的行省的边界。在那里赶上他的大队之后，他停了片刻。他知道自己即将做出的事情的重大意义，于是转过身来，向士兵们讲话："即便到了现在，我们还可以调头；一旦我们走过了这座小桥，一切将由武力决定。"
>
> ——苏埃托尼乌斯，1世纪末 [1]

> 这一切让他（恺撒）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对抗他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一名公民（庞培）身上。我真希望庞培当初没有给恺撒那么大的权力。庞培养虎为患，一直等到恺撒非常强大了才与他作战。
>
> ——西塞罗，前50年12月9日 [2]

高卢给恺撒带来了荣耀与财富。到前50年，战争已经基本平息，一切迹象都表明，恺撒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已经奏效，高卢人的每一次叛乱都遭到毁灭性的镇压，而恺撒审慎的外交手腕也发挥了效力，为共和国重建了一个稳定的新行省。绝大部分部族领袖向罗马俯首称臣，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恺撒个人的忠诚。六年后，恺撒遇害，高卢并没有发生新的动乱。像其他成功的罗马将领一样，他从军事胜利中获取了极大的私利，但我们不应当忘记，他的征服也给罗马带来了莫大好处。共和国如今有了新的税收来源，当然在行省驻军也有开支。外高卢和通往西班牙的重要陆路通道得到了保障，而意大利本土得到了新的防护屏障，可以更好地抵御追随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脚步的北方蛮族部落的入侵。意大利在这个方向上并没有受到任何直接威胁，而恺撒在启动高卢战争时并未

将这样的战略考虑置于优先地位。即便如此，意大利北方边陲的安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征服高卢对罗马十分有利。但在人类历史上，军事扩张往往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更大，对国家的益处较少，罗马的帝国主义肯定是这样的。在恺撒来到高卢之前，罗马人与高卢的贸易就已经很重要，但他的征服为罗马商人开辟了新市场（比如不列颠），并让他们能够在新的高卢行省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开展商贸活动。恺撒的高级军官和幕僚更是迅速地发了大财，因为他们分享了战利品和奴隶，而且恺撒非常慷慨。恺撒不是个守财奴，而是一掷千金地开展建筑工程、筹备公共娱乐活动。在更私人的层面上，他向自己希望结交的人提供无息贷款，甚至直接赠送金钱。很多从来没有接近过高卢的罗马人从其征服中得到了实惠。

高卢的胜利给共和国带来了益处，给个人带来了更多实利，但获利最大的还是恺撒自己。他的财富和地位发生了迅速的、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其平步青云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到前50年，他更富裕了，人脉更强，有了更多的朋友和门客，而他的成就比其他所有元老（庞培除外）都更伟大、更辉煌。几年来，他明确表示，自己返回罗马后将寻求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他在竞选中几乎稳操胜券，因为他一直受到选民的欢迎，而如今他有了更多的金钱，可以笼络他们。历史悠久的法律规定，任何人的两次执政官任期之间必须间隔十年，苏拉在独裁时期重新确立了这项法规。前52年庞培当选为执政官（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诸多非常规步骤之一），这项法规被暂时搁置，但它仍然有效。不过恺撒不打算也不需要在这方面得到特殊优待。他计划于前49年秋季参加竞选，于前48年1月就任执政官，到那时离他第一次执政官任期结束就已经过了十年。当年他当执政官时的争议仍然困扰着他，他知道自己一旦成为普通公民就会遭到起诉。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直接从总督过渡到第二任执政官。前52年全部十位保民官推出的法律（其中至少一人起初有些不情愿）破例让他不进入罗马城便成为候选人。庞培和克拉苏在前71年做过同样的事情，率领军队在罗马城外等候，直到当选为执政官

才跨过城市的正式边界。恺撒一旦当上了执政官（最理想的情况是让他的盟友担任另一名执政官，或甚至让他的一名前任军团长当执政官，如拉比埃努斯），就有能力颁布新法，向自己的老兵们赏赐土地，并确认他在高卢的安排。他还可以引入其他法案来笼络社会的不同阶层。重新回到政坛核心之后，他会有一年时间来将政敌拉到自己这边，或者至少巩固自己的地位，让自己足够强大，令政敌们不敢在法庭上攻击他。我们不知道他对往后的计划是怎样的，他在目前阶段很可能还没有更长远的计划，而是静观其变。也许他会再一次担任行省总督，或许去讨伐帕提亚人，洗净克拉苏在卡莱惨败的耻辱。或者他也希望得到类似于庞培的那种任命，能够控制军权、掌握军队，同时在罗马城外待着。[3]

最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没有遵循恺撒计划的方向。他没有回来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没有凭借自己在高卢的胜利而得到凯旋式的褒奖，没有能够举办纪念女儿的竞赛表演，也没有被普遍认为是可以与庞培比肩的共和国伟人。他是以反叛者的身份回国的。他的对手们不希望看到恺撒衣锦还乡并再登高位，而庞培也越来越不愿意看到恺撒这么春风得意。各方尝试着谈判，提出了许多妥协建议，但最终找不到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各方的顽固、傲慢和猜忌，以及有些人的私人仇怨，都促使这样的僵局出现。而人们盲目乐观，相信自己的敌手一定会让步，这也是导致后来局面的原因。早在内战爆发一年多之前，就有人预感到了这场迫近的风暴，但内战的主要参与者中很少有人希望发生内战。包括恺撒和庞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逐渐地且不情愿地被卷入这样的局面，让他们感到自己除了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很难说，战争在何时变得不可避免。内战的动因不是重大的问题或互相抵触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为了个人地位与尊严，尤其是恺撒的地位与尊严。后来，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治下，有些人倾向于认为恺撒从少年时代便致力于革命。同时代的证据不能支持这种理论，而恺撒的行动肯定不能证明他有这样的想法。恺撒渴望的是和平地回国，在共和国获取一个显赫的地位，并让所有其他元老，甚至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元老，全都承认他的

威望、影响力和权威。无论是对庞培还是对恺撒来说，被迫动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地位，都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失败了。[4]

联盟的瓦解

恺撒受到的压力是逐渐增强的。前55年，加图谴责恺撒屠杀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时，元老院根本不可能接受加图的建议，将恺撒交给日耳曼人。当时三头同盟刚刚在卢卡重新缔结盟约，而庞培、克拉苏和恺撒（尤其是前两人，因为他们当时身在罗马）的联合势力太强大，反对派无计可施。三头同盟只能在一年内阻止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当选执政官，但可以很轻松地扼杀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另一项野心，即取代恺撒成为高卢总督。尤利娅的去世削弱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纽带。克拉苏的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政界的平衡，因为有很多显赫的大人物都借过他的钱或者得到过其他好处，还欠着他的人情。克拉苏仅有的儿子马尔库斯年纪太小，也缺乏足够的才干去继承父亲的地位，控制由门客和政治盟友组成的网络。这些人如今有的投奔了庞培，有的依附于恺撒，但他们与庞培或恺撒的联系不可能瞬间就变得像之前与克拉苏那样牢固；毕竟克拉苏多年来不仅扩张自己的财富，还始终加强自己的政治资本。许多严厉批评恺撒的人过去也曾敌视庞培，所以庞培在前52年能够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而且是由毕布路斯提议并得到加图的支持，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加图的确强调自己仍然是独立的，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庞培，他会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辅佐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两人成了朋友。加图的这个姿态无疑也是他未能当上执政官的原因之一。但至少在当前，庞培的新婚姻和他恢复国家秩序的决心让元老院的很多主要人物都更容易接受他。这些主要人物喜欢别人称他们为“好人”或“贵人”，主要来自地位极其显赫的门阀望族。前52年，他们心甘情愿地支持庞培，请他处理扰乱政坛的暴力冲突，这主要是因为除了米罗之外，被新法庭审判和处罚的人都是克洛狄乌斯党徒。加图甚至说，应当宣判米罗无罪，因为是他除掉了自己危险的竞争对手克洛狄乌斯，对共和国

做出了很大贡献。[5]

前51年，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担任执政官，开始集中力量攻击他的私敌恺撒。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仇恨究竟根源何在，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三头同盟几乎垄断了所有显赫与重要的官职。在正常情况下，为共和国效力并赢得荣耀的机遇理应属于门阀贵族的世家子弟，比如马凯鲁斯和他的兄弟、堂兄弟那样的人。庞培势力太强大，马凯鲁斯还得罪不起他，但恺撒的地位似乎很脆弱。马凯鲁斯公开宣布打算将恺撒从高卢总督任上召回，因为战胜维钦托利的伟大胜利（共和国还为此举行了公共感恩活动）表明高卢战争已经结束了。他需要这样的理由，因为在前55年克拉苏和庞培的法律给了恺撒在高卢新的五年任期。马凯鲁斯还主张，庞培近期的立法（关于行省总督的职位）应当压倒保民官们允许恺撒不进入罗马城便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的法律。早在这年3月，庞培便表达了对马凯鲁斯计划的不认可。除了因为庞培和恺撒的关系之外，马凯鲁斯如此挑战庞培的法律，对庞培来说也是极大的侮辱，尤其是法律文本已禁止将来的元老院会议或公民大会对其做任何更改。庞培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支持任何企图在恺撒的总督任期结束前便将他召回的动议。

7月，元老院有人询问，科塔和萨比努斯战败后庞培向恺撒“借出”的那个军团的情况，并敦促庞培将这个军团收归自己所有。庞培不情愿地宣布自己会这么做，但拒绝忍受他人的强迫，并且没有为这个军团的归来设置任何时间表。马凯鲁斯继续施加压力，并在一次推迟会议之后，成功地确保元老院将于9月1日讨论恺撒的行省问题。为了让庞培也能参会，元老院在罗马城正式边界之外开会。庞培又一次表示，元老院当前就此问题做任何决定都是不合适的。他的岳父梅特卢斯·西庇阿提议在前50年3月再次讨论此事，庞培应该没有反对这项动议。事实上，马凯鲁斯确保在比这更早的时间——9月29日——对此事做正式的辩论。庞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马凯鲁斯提出了与西庇阿的动议非常类

似的提案，要求元老院在前50年3月1日当天或之后商谈“执政官行省”的问题。此提案通过了。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措施，其中一项是阻止任何保民官否决此次辩论的决议；另一项是开始遣散恺撒麾下服役期满（此时的兵役期极可能是十六年）的士兵，以及其他虽然服役期未满但可以荣誉退役的士兵；第三项提议涉及资深裁判官级别的行省总督任命，会影响到恺撒任期满后等待总督职位的人数。这三项提议均遭到两名或更多保民官的否决。[6]

马凯鲁斯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也没有完全失败。马凯鲁斯于这年年底卸任时，恺撒仍然被认定为三个行省的合法总督。这年早些时候，恺撒表现出一些挫折感，因为他只能通过元老院的正常渠道来做事。前59年，作为土地法的一部分，恺撒在诺乌姆·科姆（位于内高卢境内，波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在高卢期间将波河以北高卢的居民视为罗马公民，尽管他们目前只有拉丁人的地位。马凯鲁斯命令对诺乌姆·科姆的一名前任行政长官施以鞭刑（罗马公民会被豁免此种刑罚），并让此人去见恺撒，“给他看看鞭笞的伤痕”。马凯鲁斯此举愚不可及，西塞罗得知此事后感到极为憎恶。此事表明了马凯鲁斯是多么仇恨恺撒。马凯鲁斯尽管未能将恺撒从总督任上召回，但对恺撒的未来提出了严峻挑战。庞培于9月29日辩论期间或之后的一些言论无疑鼓舞了恺撒的对手们。他表示，他不能接受在前50年3月1日之前免除恺撒的总督职位，但在那个日子之后，他的态度会不同。这说明庞培相信自己与克拉苏的立法授予恺撒的总督职务将在那一天到期。有人问庞培，如果到那一天有保民官否决元老院的决议，他的态度将如何。庞培的回答表明他与自己的盟友和前岳父已经非常疏远了。他说，不管是恺撒亲自来反对元老院的决议，还是借助一名保民官来反对，都无关紧要。他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恺撒的反对都是错误的。西塞罗此时不在罗马城，因为根据前52年设立的新规定，他满心不情愿地去治理奇里乞亚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位通信伙伴，就是西塞罗在前56年成功为之辩护的凯利乌斯·鲁弗斯（此时担任市政官），给他发去了详细的记述。庞培得到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恺撒）想当执政官，但还想保留自己的军队，怎么办？’另外一人问道。庞培温和地答道：‘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这些话让大家怀疑庞培正在和恺撒争吵。”[7]

恺撒的行省总督任期究竟在何时结束，长久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不大可能有令众人信服的最终结论。庞培选择前50年3月1日作为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后便可以考虑免去恺撒的职务，说明这个日期显然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前55年通过的延长恺撒任期的法律是于当年2月生效的。因此，恺撒的五年任期从那时候算起，一直到前50年3月1日结束。从这一天起，元老院便可任命一位新总督。新官到任后，恺撒的任期便结束了。恺撒对此法律的理解显然不同，可能认为是在自己原先的五年任期基础上再延长五年，新的五年任期从原先任期结束那一天开始。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正式地宣布他认为自己的任期应当在何时结束。延长任期的法律可能不是很严谨，因为它极可能颁布地十分仓促，而且当时三头同盟的关系还很亲密。令局势愈发复杂的是，全部十位保民官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恺撒不必亲自到罗马城便可成为执政官候选人。恺撒对此的理解是在选举举行之前，他在高卢的任期仍然有效。而他打算在前49年秋季参加执政官选举，如果他的任期在前50年3月结束的话，那就意味着他还可以在总督任上多待约十八个月。[8]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想当高卢总督，而自他担任裁判官以来，也攻击过恺撒在执政官任上的一些作为。加图同样高声疾呼地批评恺撒，并重申自己打算为了前59年的事件起诉恺撒，甚至为此发誓赌咒。更近期的时候，他还宣布审判恺撒将会像审判米罗一样，让武装士兵包围法庭。毕布路斯同样对恺撒非常怨恨，不过目前他像西塞罗一样，被外放担任行省总督（他此时是叙利亚总督）。马凯鲁斯及其兄弟和堂兄弟都敌视恺撒，而梅特卢斯·西庇阿对恺撒至少也不算友好。恺撒希望回国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并逃脱被起诉的命运，而这些人联合起来要粉碎他的美梦。然而，不管这些人多么仇恨恺撒，只要

庞培力挺恺撒，这些人的反对就都没有什么效力。只要有庞培的支持，恺撒一定能够称心遂愿。庞培拥有资深执政官级别的军权，在西班牙掌握着一支军队。没有庞培，反对派就没有力量来威胁恺撒，一旦发生公开冲突，更谈不上与恺撒交战。马凯鲁斯在前51年将恺撒从高卢召回的企图破灭了；这足以说明，若是没有庞培的支持，恺撒的敌人们根本成不了事。同样，如果得不到庞培的支持或至少是中立，恺撒的心愿（留在总督任上，随后返回罗马当执政官）也极难达成。正如以往常常发生的一样，庞培的态度究竟如何，其他人难以揣摩。在前51年秋季，凯利乌斯已经怀疑三头同盟剩下的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庞培的地位极其强大，说到底，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从这种主宰地位中获利，并将此地位维持下去。他的老盟友恺撒若是想称心遂愿，就需要他的支持。恺撒的对手们也需要庞培的支持，近几年来庞培和这些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如果恺撒带着高卢胜利的全部财富和荣耀归来，就能与庞培平起平坐，而且他的政治手腕比庞培要厉害，假以时日说不定能压倒庞培。但如果按照加图、多米提乌斯和马凯鲁斯氏族及其盟友所希望的那样将恺撒彻底除掉，那么他们将来就不怎么需要庞培了；庞培会很容易陷入政治上相对弱势的处境，就像他于前62年从东方返回时原本注定的命运那样。目前庞培稳占优势，向恺撒和反恺撒派表明，他们双方都需要他庞培，但都不能认为庞培理所应当帮助他们。[9]

新的一年对恺撒的敌人们来说前景不错。另一个马凯鲁斯当上了执政官（他此前曾被指控选举舞弊，但被判无罪），其同僚为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保卢斯[10]，他是前78年起兵反叛后被庞培镇压的那个李必达的儿子。尽管和庞培有家仇，但李必达·保卢斯对恺撒也不友好，而且目前正忙于富尔维乌斯与埃米利乌斯会堂的扩建工程，此项工程是为了纪念他的一位先祖。新的保民官包括小库里奥，他是在前59年公开批评三头同盟的少数人之一。与西塞罗通信非常活跃的凯利乌斯此时与小库里奥很亲密。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罗马人的典型代表，因为生活放荡而臭名昭著，再加上他们野心勃勃，常常债台高筑。马克·安东尼

也是这群放荡不羁的青年之一，据说是库里奥最初向安东尼介绍了包养情妇、纵酒狂欢和骄奢淫逸生活的乐趣。结果是，安东尼很快就欠了一屁股债，而库里奥的父亲禁止安东尼登他们家的门，以防止儿子帮哥们儿付账。前不久，库里奥花费了巨资来举办盛大的比赛，以纪念于前53年去世的老库里奥。他甚至建造了一座木制的圆形剧场，它能够旋转，还可以分成两个半圆形剧场，上演不同的戏剧。不久之后，他娶了克洛狄乌斯的寡妇——直言不讳且性格强硬的富尔维娅。这些青年在罗马民众眼中还是“青少年”，他们才华横溢，但在老一辈人看来不够踏实。

凯利乌斯坚信库里奥打算向恺撒发动全面攻击，但库里奥在保民官任上最早的举措之一却是提出了向贫民分配土地的新计划。两位执政官的反对使得此计划未能通过，于是库里奥提出了新的法案，要求向罗马城的公民发放新一批粮食，以及在意大利开展为期五年的修路工程。同时，他在公共集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恺撒的事业。后来有人说，恺撒用高卢战利品的黄金帮助库里奥还清了他的巨额债务，以此换得了他的支持。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说恺撒向库里奥行贿250万迪纳厄斯，而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11]提出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500万。流言蜚语无疑让这数字夸大了不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恺撒现在为库里奥做的事就像当年克拉苏为他做的那样，即帮助对方还清巨额债务，以获得一个有价值的政治盟友。还有传闻称，保卢斯收到了900万迪纳厄斯的贿金，完成了他的建筑工程。库里奥和保卢斯都是野心勃勃的罗马贵族，他们转换阵营，选择支持恺撒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目前他们确信，支持恺撒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库里奥的法案未能通过，他或许感到挫折，因此对支持元老院权贵不是很感兴趣。[12]

胜利带来的收益使得恺撒能够在行政长官当中争取到一些有价值的朋友。马凯鲁斯按计划在前50年3月1日提出了恺撒任期的问题，他的同僚执政官没有支持他。但真正的反攻是库里奥领导的，他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火力集中在庞培的地位上。这位保民官提出，如果要免去恺撒的高

卢总督职务，为了保证公平，就需要庞培同时也放弃自己在西班牙诸行省的超乎寻常的总督职位，这样对共和国也更安全。库里奥在公共集会上已经表达过这种观点，得到了群众的赞同。恺撒对库里奥的这种策略一定很认可，或者这种策略最初就是恺撒提出的。庞培的西班牙总督任期在前52年得到了延长，还有好几年时间，因此库里奥的提议并没有法律基础，但它足以说明庞培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库里奥的提议将庞培和恺撒摆在了同样的层面上，主张要么他们两人都可以享有罗马人民投票给他们的荣誉，要么都不可以享有。在更私人的层面上，这显然也是在提醒庞培，继续与恺撒站在同一战线对他仍然有利，因为他自己的地位或许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稳固。库里奥的提议使恺撒面临的风险更大，但从恺撒的对手那里夺回了一些主动权。他们起初不知所措，于是一连几个月双方僵持不下，而库里奥否决了元老院反对恺撒的任何企图。4月，凯利乌斯在给西塞罗的信中写道：

> 至于共和国的局势，所有的争吵议题都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即各行省。目前庞培似乎支持元老院，要求恺撒在11月13日前离开他的行省。库里奥则一心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全部其他计划。我们的“朋友们”（你对他们可是很了解的！）害怕把问题推到危机的地步。情况就是这样，全部的情况。庞培责怪库里奥惹是生非，就好像他（庞培）不是在攻击恺撒，而是公平地帮恺撒解决问题一样。同时，庞培坚决反对让恺撒在放弃自己的行省和军队之前就成为执政官。庞培遭到了库里奥的穷追猛打，他的整个第三次执政官任期都遭到了攻击。你就牢记我的话吧，如果他们想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倒库里奥，恺撒一定会来援救他。而假如他们不敢冒险这么干（这似乎更有可能），那么恺撒想在高卢行省待多久都可以。[13]

我们不知道庞培为什么选择前50年11月13日作为恺撒的任期结束日。这不算是庞培在让步，因为恺撒仍然需要大半年时间才能等到前49年秋季的执政官选举。如果恺撒想在前50年底竞选执政官，或许11月13日这个日子还可以接受；但他似乎没有努力去争取豁免权，因为法律规定，任何人在执政官任期满了之后，要间隔十年方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不管怎么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恺撒也许觉得在前50年底参选不

大可能成功。到6月，凯利乌斯报告称，马凯鲁斯建议与保民官们谈判，但元老院投票反对做任何这样的妥协。库里奥仍然坚持，不应当单独讨论恺撒的总督职务，而必须对恺撒和庞培一视同仁。一年前，曾有人说庞培要前往西班牙。现在有人提出，应当派庞培或恺撒去对付帕提亚人。西塞罗非常担心在自己的奇里乞亚总督职务期满之前，帕提亚人会向罗马的东部各行省发动全面进攻，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他再离开岗位就显得不是很光彩了。这年夏天，元老院决定从庞培麾下抽调1个军团，再从恺撒麾下抽调1个军团，将这些部队派去增援罗马-帕提亚边境上的罗马军队。庞培决定把自己在前54年借给恺撒、此后一直在恺撒麾下作战的那个军团派去帕提亚边境。这意味着恺撒一下子失去了2个军团，但在调离这些士兵之前，他向每位士兵赏赐了250迪纳厄斯的奖金，这比一整年的军饷还要多。这2个军团返回意大利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没有人努力将他们送往海外，因而整个事情就愈发显得可疑了。克劳狄家族的一位年轻成员前去将这些部队从高卢调来，返回后声称恺撒的全军都心怀不满。这正是庞培愿意看到的。

不久之后，庞培病倒了，持续发烧，可能是患上了疟疾。意大利各地人民显然是自发地为这位共和国的大功臣祈祷，祝福他早日康复。他痊愈后，群众欢欣鼓舞。他从那不勒斯返回罗马郊区的全程都有人群聚集，向他问候。庞培素来喜欢别人对他感恩戴德，不管是他的妻子、士兵还是群众，因此他深受感动。更危险的是，他将群众的这种热情理解为他的事业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还在病榻上的时候，他写信给元老院，表示愿意辞去总督职务，并向他们保证恺撒会做同样的事情。库里奥的回应是这固然很好，只要庞培先辞职。到8月，凯利乌斯已经向西塞罗表示，内战已经成为可能。“如果这两人都不去征伐帕提亚人，那么我能预见到严重的纷争，这将由冰冷的兵器和残酷的暴力来决定。两人在精神上都做好了准备，而且都掌握着蓄势待发的军队。”[14]

但除了庞培和恺撒的亲信之外，大家对冲突没有多少热情，12月1

日元老院就此事进行辩论时的场面就证明了这一点。库里奥又一次提议恺撒和庞培应当同时卸任。执政官马凯鲁斯将此事分成两部分，分别提交动议给元老们投票。第一项动议，即恺撒应当辞职，以多数票通过了；但第二项动议，即庞培也应辞职，却以类似的多数票被否决了。库里奥要求元老院对“两人都应当辞职”的动议进行表决，其结果非常能说明问题。只有22名元老投了反对票，而支持的人多达370人。“走路派”后座议员们名不虚传，用脚投票，尽管大部分最重要的元老都在投反对票的22人之列。马凯鲁斯解散了会议，宣称：“如果这就是你们想要的，那就当恺撒的奴隶吧！”投票结果被无视了。这对恺撒来说算不上胜利，因为多数人希望他放弃自己的行省和军队，同时支持庞培保留职位。但说到底，此次投票表明，几乎所有元老都希望和平。他们肯定不支持恺撒的事业，但他们也不愿意为了庞培而冒战争的风险，更不愿意为了加图、多米提乌斯及其党徒而冒险。此时西塞罗已经从自己的行省返回了意大利，他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认为恺撒的要求太过分，但为了让共和国避免纷争，他愿意满足恺撒的要求。西塞罗和很多其他人一样，还记得苏拉与马略党人争斗的黑暗日子，因此不愿意让这样恐怖的内斗重演。在西塞罗看来，还有机会达成妥协、和平解决争端。这样的机会也许的确存在，但到此时，纷争的主要参与者们的情绪已经十分坚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5]

一些最显赫的核心元老非常憎恶恺撒，其中很多人既有私人因素也有政治原因去恨他。这种仇恨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非理性的。人们还记得恺撒在担任市政官和裁判官时的平民派举措，更糟糕的是他当执政官时的动荡时局。在加图及其党徒看来，恺撒就是喀提林第二，只不过始终没有露出狐狸尾巴而已。他们看到恺撒的魅力对其他人的影响（对其他男人的妻子和对广场上的群众的影响），但坚信自己看穿了恺撒的表面功夫，而其他人却被恺撒蒙蔽，这让他们尤其感到受挫。加图的同母异父姐姐成了恺撒最亲密的情人之一，这让加图愈发恨他。加图、他的女婿毕布路斯和姐夫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在过去曾与恺撒对抗，

也曾有过成功。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仅仅是促使恺撒走得更远而已，而且恺撒一次又一次顺利脱身，在前59年狠狠地打败了他们。他们鄙视恺撒这个人，因此恺撒极其突出的政治才干与军事才华更加让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克洛狄乌斯的哥哥阿庇乌斯·克劳狄曾长期与恺撒合作，他痴迷于维护其古老贵族血统的尊严。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也就是加图的外甥），另一个女儿嫁给了庞培的长子。反对恺撒的人不仅仅是加图的亲戚，因为像马凯鲁斯和兰图鲁斯这样的家族也不愿意看到自己在选举中被别人盖过风头。而梅特卢斯·西庇阿既要不辜负自己的著名先祖（有血缘关系的先祖以及养父母那边的先祖），也急于从他与庞培的姻亲关系中得到好处。

说到底，没有一位罗马元老愿意看到其他人压倒自己，获得更多的荣耀与影响力。让他们如此敌视恺撒的原因，并不是恺撒曾经做出的业绩。如果同样的事业，尤其是在高卢的胜利，是由另外一个人完成的话，这些元老会很高兴地赞扬他；如果做出这些功绩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元老们就更高兴了，因为他们不喜欢看到一个人独享荣光。门阀贵族的世家子弟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想法，即他们生来是要领导共和国的，而恺撒的杰出表现让他们丧失了很多机会。现在有机会结束恺撒的政治生涯了，最好是在法庭上打败他，并且是在像他们一样憎恨恺撒并势必要除掉他的法庭；如果在法庭上做不到，那就用武力消灭恺撒。庞培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战胜恺撒，庞培在当下对他们还是有用的，所以他们愿意忽视庞培不符合常规的地位。而在将来，也许能够抛弃庞培，或者至少削弱他的主宰地位。自从庞培第一次暗示自己并不是坚定地支持恺撒以来，恺撒的对手们大受鼓舞。至少加图似乎确实希望避免内战，而且在内战爆发后努力去减轻它的激烈程度。他希望能够迫使恺撒屈服。加图盟友们的态度就不是那么明确了。其中有些人显然希望从战争中渔利。西塞罗对许多人的嚣张好战颇感惊讶和厌恶。他觉得这么多年来元老院一直允许恺撒积聚力量，如今却要与他作战，很没有意义。[16]

庞培的态度完全不同。甚至到了最后，他也会很高兴看到恺撒重返政坛，只要恺撒的地位明显低于他。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这种欲望（确保自己的地位高于恺撒）越来越强，何况库里奥花了很大力气才把恺撒摆到与庞培平起平坐的层次上去。庞培愿意接受克拉苏与自己平等，因为克拉苏比他年长好几岁，而且曾经为苏拉效力。或许更重要的是，庞培一直很自信，认为自己的魅力和辉煌的军事成就（三次凯旋式，而克拉苏只有一次小凯旋式）使自己很轻松地优胜于克拉苏。恺撒的年纪只比庞培小六岁，但更重要的是，当庞培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并且得胜的时候，恺撒还没有任何成绩，因此可以说恺撒的军事生涯比庞培晚了几十年。庞培对恺撒比对克拉苏更有好感，这部分是由于庞培并不把恺撒视为竞争对手，至少在最初不是。即便恺撒已经在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取得了成功，庞培仍然把他看作小弟弟。毕竟，庞培曾经在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赢得了多次凯旋式，打败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敌人，其中有些是罗马人，而不仅仅是蛮族部落。“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庞培这话不仅暗示了消除这样的威胁是多么轻松，也表明这种事情是多么荒诞，多么不可能发生。庞培并不希望发生内战，但他没有任何疑问，如果事情到了最糟糕的关头，内战的确爆发了，他一定能够打赢。大约这一时期，他开始自吹自擂，他只消跺跺脚，意大利的泥土中就能崛起一支支大军。恺撒最终必须认识到，他需要尊重庞培，遵照他的条件回国，并依赖他的友谊在法庭上得到保护。库里奥对庞培地位的攻击使他越来越不愿意向高卢总督做太多让步。恺撒必须识时务，但他对庞培仍然很有用，因为庞培知道，加图及其盟友对他也没有多少好感。

恺撒后来声称自己之所以要打一场内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他认为自己在执政官任上制定的法律，尤其是土地法，是必需的，也是有效的。自那以后，他为共和国忠心耿耿地效力，捍卫共和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让罗马军队以前不曾涉足的地区都对罗马的力量毕恭毕敬。由于这些成就，元老院奖励他多达三次的公共感恩庆祝活动，而且其延续

时间也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元老院竟然要提前结束他的任期（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而前52年全部十位保民官推出的法律（允许恺撒不到罗马城就参选执政官），虽然表达了罗马人民的意志，却从细节到精神都被搁置。他的敌人们对他的胜利视若无睹，竟然为了差不多十年前他在当执政官时做的事情攻击他、谴责他。共和国的伟人不应当受到法庭控诉。庞培只是在青年时代组建自己的军队时受过起诉，此后就再也没有被起诉过。从来没有人敢起诉克拉苏。竟然需要为自己辩护，这本身就是对恺撒的骄傲与威望的沉重打击。而且他的确有可能被法庭定罪，尤其是在法庭被敌人控制的情况下。他当执政官时的举动也是有争议的，不过在罗马的庭审中，被告有罪还是无辜从来都不是决定性因素。米罗的命运就是一个警示，加比尼乌斯的结局也是如此。加比尼乌斯在前67年担任保民官时帮助庞培获得了清剿海盗的指挥权；前58年，加比尼乌斯与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一同担任执政官，帮助三头同盟巩固了地位。此后他担任叙利亚总督，后来大体上是自作主张地率军进入埃及，帮助被废黜的托勒密十二世复辟，此事让他获利不少。但他非常不得人心，虽然很有钱，而且有庞培给他撑腰，但他于前53年最终返回罗马后还是被判有罪，被迫流亡。

恺撒很容易落到同样的下场，至少在政治上会受到迫害，而他一旦显露出脆弱的迹象，就会吸引政敌更多的攻击。因此，如果恺撒寄希望于庞培的保护而放弃自己的职位，就是在冒一个极大的风险。即便庞培支持恺撒，也未必有能力救他。何况，西塞罗的被迫流亡已经表明，庞培并不总是靠得住。如果恺撒放弃了自己的职位，那么他可以保留军权和部分军队的指挥权，等候在罗马城外，期待自己的凯旋式，而他在高卢的胜利必然得到凯旋式的表彰。在他进入城市、放弃军权之前，他仍然享有不受起诉的豁免权。但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也未必会被允许成为执政官候选人，也就是说保民官们制定的法律未必会得到尊重。在他还掌控着3个行省和10个军团的大军时，讨价还价的资本就比较强。在自己的地位遭到一年多的持续攻击后，他非常不愿意牺牲目前的强势地

位。他知道，他的敌人们一心要把他彻底打倒。而庞培的立场始终难以断定。到前50年底，恺撒觉得自己被逼到了墙角，他不愿意对自己的老盟友抱有太多的信任。[17]

一个世纪之后，诗人卢坎[18]写道："恺撒不能接受别人的地位优于自己，庞培不能接受别人与自己平起平坐。"在卢坎看来，尤利娅的死切断了恺撒与庞培间的亲密纽带，而克拉苏在帕提亚的阵亡使得恺撒和庞培都不再害怕孤身一人与另外两人对抗，因此内战不可避免了。卢坎的观点在古典世界是普遍的看法，的确有不少真实可信的成分。但这种暗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不能过于绝对化。即便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恺撒和庞培也都不相信对方会顽固到底，还希望对方至少能够提出可以接受的条件。但长期的纷争使他们之间的信任少了许多，这让他们难以妥协。他们加大了赌注，承担了更大风险，因此都很紧张，担心自己在最后关头犯错误。这年秋季选举的结果更加强了紧张气氛。马凯鲁斯氏族的第三位成员将成为新一年的执政官，他的同僚也来自豪门贵族。他们在选举中击败了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此人在高卢历次战役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担任恺撒的军团长，非常精明强干，也是在恺撒麾下长期效力的少数贵族之一。阿庇乌斯·克劳狄和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当选为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开始清洗元老院中被他认为不称职的人，他的这个举动被普遍认为很有讽刺意味，因为他本人的名誉也非常可疑。他的目标大多是被认为与恺撒有联系的人。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撒路斯提乌斯在这一时期被逐出元老院，并很快加入了恺撒阵营。阿庇乌斯·克劳狄攻击库里奥，但被皮索和执政官保卢斯挫败，不过在元老院仍然导致了一场争吵，库里奥撕破了阿庇乌斯·克劳狄的袍子。观鸟占卜师祭司团也出现了一个空缺，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希望获得这个位置，但被马克·安东尼击败，不禁暴跳如雷。马克·安东尼还当选为下一年的保民官。恺撒大多数政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仇恨恺撒，但如果说这些政敌的行动协调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们觉得高卢总督很脆弱，于是大受鼓舞，群起攻之，这就使得

恺撒愈发满腹狐疑和高度紧张。斗争双方的情绪都不利于达成妥协。[19]

马克·安东尼将在随后的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因此有必要在此处介绍一下这个张扬浮夸的人。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勇猛善战的军人，在加比尼乌斯征伐犹太和埃及期间指挥他的骑兵部队。前52年，他担任恺撒的财务官，参加了讨伐维钦托利的战役和次年的平叛作战。安东尼与恺撒是远亲，因为安东尼的母亲也叫尤利娅，不过是来自恺撒家族的另外一支。这个尤利娅的兄弟是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即前64年的执政官。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安东尼的父亲和祖父也都叫马克·安东尼。他的祖父是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但在前87年马略返回罗马后的大清洗中丧生。他的父亲曾于前74年受命清剿海盗，但没有获得后来庞培得到的那样强大的资源，不幸战败，不久之后就含恨死去。安东尼当时只有九岁。他的母亲很快再婚了，因此这个男孩的成长期主要是在继父兰图鲁斯家中度过的，而兰图鲁斯是喀提林密谋者之一，于前63年被西塞罗下令处决。安东尼或许因此对演说家没有好感，但两人之间的不共戴天之仇应当是很久之后才燃起的。恺撒死后，西塞罗的如簧之舌，尤其是他著名的演说《反腓利比克之辩》，把安东尼的名誉抹得一团黑。《反腓利比克之辩》演说是一系列言辞激烈、刻毒凶残的攻击，其效仿的蓝本是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警示雅典人提防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演说。虽然西塞罗的抨击夸大其词，而且他对安东尼偏见极深，但其他史料表明，安东尼的确劣迹斑斑，为西塞罗提供了不少可供攻击的黑材料。上文已述，据说是库里奥让安东尼初尝了狂欢、酗酒和美女的乐趣。不管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安东尼毫无疑问立刻热情洋溢地沉溺于这些享乐，几乎毫无自制力。此人激情满怀，似乎随时都会沸腾，这让他的一切作为都显得特别有力和坚决。他的演讲术、他的军事生涯以及他的酗酒和贪恋女色，似乎全都受到其人格力量的驱动，而不是技巧或训练。他身材魁梧强壮，据说他喜欢听别人将他比作赫拉克勒斯，就像庞培喜欢别人把他比作新的亚历山大一

样。作为保民官，安东尼张扬跋扈的性格使人们很难忽视他，而恺撒的政敌更难恫吓他。但在更微妙的谈判中，恺撒更仰仗巴尔布斯这样的人。巴尔布斯是来自西班牙的骑士，私下里担任恺撒的代理人。安东尼的一言一行都让人觉得，恺撒并不希望取得妥协，而是打算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并做出一些激进过分的事情来。[20]

“骰子已掷出”

在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中，谣言和虚假信息也起到了一定作用。10月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恺撒已将4个军团集结到内高卢，显然在备战。事实上他在内高卢境内只有1个军团，即第十三军团，他声称该军团在那里的任务是保卫边境地区，抵御蛮族的袭掠。12月初，元老们为了避免冲突，投票决定将恺撒和庞培都解除职务，马凯鲁斯[21]恼怒地解散了元老院会议。不久之后，消息传到罗马城，恺撒已经集结大军，入侵了意大利。这个传闻是假的，但执政官马凯鲁斯或许并不知道，于是敦促元老院采取行动。无疑在库里奥的推动下，但也是由于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战争爆发，元老院拒绝了马凯鲁斯。马凯鲁斯在下一年的执政官[22]的陪同下（但他自己的同僚执政官[23]没有到场），去找庞培，向他呈上一支剑，呼吁他保卫共和国。马凯鲁斯将前不久从高卢召回、表面上要投入帕提亚战争的2个军团交给庞培，并指示他征募更多军队。马凯鲁斯的举动并不合法，因为元老院并没有批准他这么做，也没有授予他应对紧急状态的权力。庞培告诉他们，他愿意接受这个任命，如果形势需要，他愿意为共和国而战。他开始努力征募军队，但没有采取任何攻击性措施。这部分是由于新征募的军队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但后来谣言被证明是假的，一定也起到了作用。

罗马的公共事务照常进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恺撒事实上并没有发动战争，所以他的政敌决心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骂名。马凯鲁斯和庞培或许更致力于做一个姿态，他们给同党元老们和恺撒写信，表

明如果恺撒挑衅，他们会坚决战斗到底。他们或许还在希望恺撒让步。恺撒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不能离开自己的行省亲自参加谈判，而只能依赖书信或代表。库里奥企图说服元老院颁布法令，谴责庞培征兵的行动，并指示守法公民要对庞培的征兵呼吁置之不理。库里奥的努力失败了。由于保民官的任期短于常规的政治周期，因此库里奥的任期结束了，于是他离开罗马城，去找恺撒商议。恺撒的亲信没有做的事情，就像他们实际做过的事情和说过的话一样，受到人们急切的审视。12月6日，恺撒非常信任的部下希尔提乌斯来到罗马城，但待了几个钟头就离开了。他没有去拜访庞培，也没有参加预定于次日上午举行的与梅特卢斯·西庇阿的会议。庞培告诉西塞罗，他对此事的理解是，他与恺撒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无法修补了。尽管庞培和其他人现在已经预见战争迫在眉睫，但仍然不愿意主动开战。[24]

1月1日，新的执政官走马上任。兰图鲁斯债台高筑，而且（据恺撒说）自夸要当苏拉第二，比马凯鲁斯更极端。但现在马克·安东尼当上了保民官，和另一名保民官昆图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一起扮演着库里奥之前的角色。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恺撒的一封信被拿到元老院当众宣读，尽管两位执政官不准对其展开辩论。在信中，恺撒重述了自己对共和国的伟大贡献，并再一次表示只有在庞培也辞职的情况下，他才会放弃总督职位；他似乎还威胁，假如庞培拒绝辞职，就只能兵戎相见了。刚刚抵达罗马近郊的西塞罗将这封信描述为“凶悍而带有威胁的书信”。梅特卢斯·西庇阿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恺撒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前离职，否则将被视为公敌。元老院对此动议进行了投票表决。动议通过了，但随即被安东尼和卡西乌斯否决了。恺撒私下里的口吻更为温和，他似乎给包括加图在内的许多主要领导人都写了信或者派遣了代表。他提议只要元老院允许他保留部分指挥权，并继续享有保民官们在前52年授予他的特权，他就愿意交出外高卢以及除了2个军团之外的所有军队。那样的话，他就有力量与意大利本土处于庞培指挥之下的军队相抗衡，但完全没有主动进攻的力量。西塞罗参与了这些协商，因为他相信

应当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他认为绝大多数元老的意见与他一致。他与恺撒的政敌和朋友都进行了磋商，恺撒的朋友同意进一步妥协，让恺撒仅仅保留内高卢和1个军团。但是，这还不够。加图宣称，他不会同意任何私下里提出而不是在整个元老院面前提出的建议。但说到底，他和他的亲密盟友都不会允许恺撒不受阻挡地第二次当上执政官。到12月底，西塞罗觉得庞培已经到了主动希望打仗的地步。关于庞培的态度，各方面的史料互相矛盾，但他可能拒绝了第一个建议（恺撒交出外高卢，只保留2个军团）。他对第二个建议（恺撒只保留内高卢和1个军团）感到满意，但加图、梅特卢斯·西庇阿和其他人还不肯罢手。总的来讲，在这充满猜忌和仇恨的气氛中，任何人都不能轻信别人。地理上的距离也无助于和解。即便对温和派来讲，恺撒率领着一支久经沙场的大军远在高卢，也是非常不祥的局面。恺撒虽然魅力非凡，但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也束手束脚。[25]

元老会议越来越僵持不下，两位执政官不断提出攻击恺撒的动议，但一次又一次地被安东尼和卡西乌斯否决。局面僵持不下，即便如此，安东尼的火爆脾气也无助于解决问题。他的性情非常暴烈，需要不断地努力才能遏制住怒火。多年后，西塞罗说安东尼在演讲时“像惯常那样，把词句狂吐出来”。几周前，安东尼在元老院做了一次特别刻薄恶毒的演讲，攻击了庞培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以武装冲突相威胁。随后，庞培评论道：“恺撒手下一个小小的财务官都如此嚣张跋扈，你们觉得如果恺撒主宰了共和国，会是什么样子？”在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之后，庞培将所有元老请到他府上（位于城市的边界之外），希望向他们保证，他坚决支持元老院，如果需要的话，还愿意作战。恺撒的岳父皮索请求在元老院采取任何措施之前，给他和一名裁判官六天时间前往内高卢，与恺撒直接面谈。其他人则主张派遣更多代表去与恺撒会商。兰图鲁斯、加图和梅特卢斯·西庇阿都反对这个建议，于是此事就不了了之了。前49年1月7日，元老院发布了终极议决，呼吁“各位执政官、裁判官和保民官以及在城市周边的所有资深执政官，确保共和国的安全”。

此次命令并未具体提及恺撒（不过说到资深执政官，显然是要让庞培处于中心地位），但其针对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恺撒宣称，兰图鲁斯、庞培、加图、西庇阿和他的许多其他政敌，此时已经决心要打仗。其中有些人或许确实想打仗，但对其他人来说，元老院的终极议决是最后一次提高风险；要明确无误地向恺撒表明，他除非借助武力，否则绝无称心遂愿的可能，因此他必须妥协。元老院的终极议决暂时中止了正常法律的效力，因此保民官的否决权也无效。兰图鲁斯警告安东尼和卡西乌斯，如果他们继续留在罗马城，他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两位保民官和库里奥（他可能从恺撒身边返回了罗马城，带来了1月1日宣读的恺撒书信）乔装打扮为奴隶，乘坐一辆租来的大车，溜出了罗马城。[26]

随后几天发生的诸多事件的具体时间顺序已经无法准确地确定下来。恺撒已经在内高卢待了一段时间，他此行是为了帮助马克·安东尼竞选观鸟占卜师拉选票（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他抵达内高卢的时候安东尼已经顺利当选观鸟占卜师，于是他又帮助安东尼竞选保民官。最近一段时间，恺撒住在拉文纳，离他的行省边界不远。他身边有第十三军团和约300名骑兵。好几份史料称第十三军团此时接近齐装满员，有5000人，但这些史料的信息来源值得怀疑。第十三军团更有可能并不满员。初秋以来，恺撒对自己的军队做了新部署，让几个军团做好准备，抵挡在西班牙的庞培军队的威胁，而相当于3或4个军团的兵力则随时准备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来到他身边。但他刻意避免将大量兵力集结于一处，以免他的政敌以此为由，指责他企图发动战争。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庞培似乎相信，恺撒还没有做好入侵意大利的准备。在从拉文纳到阿里米努姆（现代的里米尼）的道路上，内高卢行省与意大利本土的边界是一条叫作卢比孔河的小河，它的具体位置至今不明。恺撒很快得到风声，元老院在1月初对他发动了攻击，通过了终极议决，随后两位保民官逃离了罗马城。这些消息很可能在安东尼和卡西乌斯抵达之前就已经传到了恺撒耳边。不管怎么说，他决定采取行动。

《战记》跳过了此后发生的事件，根本没提卢比孔河，但后来的史料做了更详细的记述。这一天，恺撒待在拉文纳，冷静地处理日常事务，就好像不会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一样。这一天可能是1月10日，但这古典世界历史上关键一幕的具体日期仍然无法确定。他已经派遣了一些百夫长和士兵穿着便服，隐秘地携带武器，去控制阿里米努姆。恺撒花了好几个小时观看角斗士的训练，并查看了他打算建造的一所角斗士训练学校的蓝图。天黑之后，他洗了澡，然后去吃饭，向应邀与他一同用餐的客人们问好。他的离席时间比惯常早得多，临走时请求客人们留下，等他回来。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和侍从事先已经得到通知，在外面等他。其中之一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他后来写了一部关于内战的史书，是普鲁塔克（或许还有苏埃托尼乌斯）的资料来源。恺撒还命令第十三军团和骑兵准备就绪后立刻随同他行进。他和几名军官乘坐的是一辆租来的马车。苏埃托尼乌斯说拉车的是从附近一家面包店借来的一组骡子。他们乘着夜色前往阿里米努姆。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此事过程中出现了一场闹剧，恺撒和他的马车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转来转去直到黎明才找到一名向导，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普鲁塔克和阿庇安没有讲到这个桥段，只说恺撒到天亮时已经来到了阿里米努姆。因此，在11日清晨的某个时间，他赶上了行军队伍，来到了卢比孔河。据说，在过桥之前，他停了下来，沉默地思索了片刻，然后开始对他的军官们讲话，其中就有波利奥。他谈到如果他不走这一步，他将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而他如果走出了这一步，整个罗马世界将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据苏埃托尼乌斯说，这时出现了一个幽灵，先是吹了笛子，然后从军中一名乐师手里夺过喇叭，吹响一声，然后大步跨过河，鼓舞士兵们跟上去。这个奇闻怪谈的来源应当不是波利奥。波利奥记述了恺撒决定过河时的最后一句话，不过对于这句话，我们也有好几个存在细微差别的版本。普鲁塔克说，恺撒用希腊语引用了诗人米南德的一句诗：“让骰子飞起来吧！”（aneristho kubos！）苏埃托尼乌斯给出了大家更熟悉的拉丁文版本：“骰子已掷出。”（iacta alea est.）[27]

以赌博做比喻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他投入内战时身边只有全军兵力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即便他的全军集结起来，资源仍然比不上敌人。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恺撒赢得了内战，但在当时他不算是稳操胜券，得胜的希望甚至不是很大。他选择战争，是因为在他看来其他的选择都更糟糕。目前主宰共和国的派系完全无视常规的法治，尤其拒绝承认保民官的传统权力与权益。但恺撒非常坦率地说，他起兵反对这些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攻击他。罗马世界之所以陷入了混乱与流血冲突，是因为恺撒决心捍卫自己的尊严，而其他人同样坚定地要消灭他的尊严。在之前十八个月，双方都一再将事态严峻化。双方态度都越来越坚决，疑心越来越重，互相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根本没有希望达成妥协。若不是加图、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等人对恺撒恨之入骨，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一心要阻止他重返政坛、当上执政官，前49年1月的内战就不会发生。但是，不管这些人多么仇恨恺撒，假如庞培不支持他们，内战还是不会爆发。偏偏庞培抓住这个机会，要展示自己的强大地位，并让这些人和恺撒都知道，他们需要讨好他。最后，假如恺撒不是那么看重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战争也不会爆发。他到目前为止的经历已经表明，如果战利品足够丰厚，他是愿意孤注一掷的。他极少主动让步，有一个例外是在他被解除裁判官职务的时候；但即便是那时，他之所以让步也是因为别无选择，不然就要彻底退出政坛。在前49年，他已经没有让步的选择，或者至少让步的风险比战争的风险更大。罗马的贵族精神赞赏果断的决心，尤其仰慕那些不肯接受失败的将军。尽管政敌的行动合法性值得怀疑，但对恺撒而言只有一件事情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在卢比孔河以北，恺撒拥有合法的军权；在卢比孔河以南，他没有。一旦跨过了卢比孔河，恺撒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反叛者，不管他此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他的敌人算是赢了一招，可以宣称自己是为了保卫合法的共和国而战。他们决心用武力将他粉碎，就像之前镇压喀提林和更早的李必达那样。恺撒不得不诉诸战争，说明他的政治手段失败了，未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骰子已经被掷了出去，但它停下来的时候会显示

什么数字，目前还不得而知。

---

[1] Suetonius，*Caesar* 31.2.

[2] Cicero，*ad Att.* 7.3.

[3] 关于争取十位保民官通过此法律的努力，见Cicero，*ad Fam.* 6.6.5，and *ad Att.* 7.3.4，8.3.3。

[4] 关于恺撒所谓的野心，见Suetonius，*Caesar* 9，Plutarch，*Caesar* 4，6，28，Cicero，*Philippics* 5.49。

[5] 关于加图和庞培，见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48.1-2，*Pompey* 54；加图和米罗，见Asconius on Cicero，*pro Milonem* 95，pp.53-54，Velleius Paterculus 2.47.4，Cicero，*ad Fam.* 15.4.12。

[6] Suetonius，*Caesar* 28.2-3，Appian，*BC* 2.25，Dio 40.59.1-4；关于此军团的辩论，见Cicero，*ad Fam.* 8.4.4；关于9月29日的辩论，见8.8.4-9；关于一般的讨论，见M.Gelzer，*Caesar*（1968），pp.175-178，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40-143，J.Leach，*Pompey*（1978），pp.150-172，esp.161。

[7] 关于行政长官被鞭笞，见Suetonius，*Caesar* 28.3，Appian，*BC* 2.26，Plutarch，*Caesar* 29，Cicero，*ad Att.* 5.11.2；see Caelius' quote from Cicero，*ad Fam.* 8.8.9。

[8] 关于恺撒任期结束日期的讨论，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91-193，T.Mitchell，*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1991），pp.237-239，P.Cuff，'The Terminal Date of Caesar's Gallic Command'，*Historia* 7（1958），pp.445-471，D.Stockton，'*Quis iustius induit arma*'，*Historia* 24（1975），pp.222-259，and in general 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pp.460-497。

[9] Suetonius，*Caesar* 30.3；对庞培态度的讨论，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38-147。

[10] 后三头同盟之一马尔库斯·李必达的兄弟。

[11] 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是1世纪的作家，著有一部历史轶闻集。

[12] 关于收买库里奥和保卢斯，见Suetonius，*Caesar* 29.1，Plutarch，*Caesar* 29，*Pompey* 58，Dio 40.60.2-3，Appian，*BC* 2.26，Valerius Maximus 9.1.6，Velleius Paterculus 2.48.4；关于旋转剧场，见Pliny，*NH* 36.177；关于凯利乌斯相信库里奥计划反对恺撒，见Cicero，*ad Fam.* 8.8.10，moderated at 8.10.4。

[13] Quotation from Cicero，*ad Fam.* 8.11.3；关于更早一次的辩论，见Velleius Paterculus 2.48.2-3，Plutarch，*Pompey* 57，*Caesar* 30，*Cato the Younger* 51，and Dio 40.62.3；for discussion see 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144，and M.Gelzer，*Caesar* （1968），pp.178-181。

[14] Quotation from Cicero，*ad Fam.* 8.14.4；more generally see Cicero，*ad Fam.* 8.13.2，8.14，Appian，*BC* 2.27-30，Plutarch，*Caesar* 29，Dio 40.60，1-66.5.

[15] Appian，*BC* 2.28，with a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in Plutarch，*Pompey* 58，cf.Dio 60.64.1-4；关于西塞罗的态度，见Mitchell （1991），pp.243-248。

[16] Cicero，*ad Att.* 7.3.4-5，7.4.3，7.5.5，7.6.2，7.7.5-6，*ad Fam.* 8.14.3；Mitchell （1991） pp.232-248.

[17] 关于恺撒的态度，见Suetonius，*Caesar* 30.2-5；关于加比尼乌斯，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 （2002），pp.128-130。

[18] 即马尔库斯·安奈乌斯·卢坎努斯（39年～65年），他未完成的史诗《法萨利亚》描述了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被誉为是继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文史诗。

[19] Lucan，*Pharsalia* 1.25-26，and in general 1.98-157；关于阿庇乌斯·克劳狄担任监察官，见Dio 40.57.2-3，63.2-64.1。

[20] Plutarch，*Antony* 2-5.

[21] 前50年执政官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22] 前49年的两位执政官是大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50年执政官小盖乌斯的堂兄弟）和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克鲁斯。

[23] 前50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保卢斯。

[24] 关于希尔提乌斯，见Cicero，*ad Att.* 7.4；Plutarch，*Pompey* 59，Caesar，*BG* 8.52.3，Dio 40.64.3-4，Appian，*BC* 2.31。

[25] Caesar，*BC* 1.1-5，Plutarch，*Pompey* 59，*Caesar* 31，Suetonius，*Caesar* 29.2，Appian，*BC* 2.32；关于西塞罗参与谈判，见*ad Fam.* 16.11.2，*ad Att.* 8.11d。

[26] Caesar，*BC* 1.5，Dio 41.1.1-3.4，Appian，*BC* 2.32-33，Cicero，*ad Att.* 7.8，*ad Fam.* 16.11.3；关于安东尼呕吐出话语，见*ad Fam.* 12.2。

[27] Suetonius，*Caesar* 31-32，Plutarch，*Caesar* 32，Appian，*BC* 2.35.

十八 闪电战：意大利和西班牙，前49年秋冬

> 我想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回事？我完全是不明就里。有人说：“我们坚守着秦古鲁姆，我们丢掉了安科纳；拉比埃努斯从恺撒阵营叛逃了。”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罗马人民的将军，还是汉尼拔……他说，他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捍卫尊严。没有诚实，如何有尊严？
>
> ——西塞罗，前49年约1月17～22日 [1]

> 让我们看看，用这种办法，我们能否赢得所有人的支持，获得永久性的胜利；其他人由于残暴，未能逃脱世人的仇恨，也未能让他们的胜利延续千秋万代。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卢基乌斯·苏拉，但我不打算效仿他。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征服，我们通过怜悯和慷慨，逐渐壮大自己。
>
> ——恺撒，前49年3月初 [2]

内战开始时，恺撒检阅了第十三军团，向士兵们发表讲话。据他自己的记载，他告诉士兵们，他的敌人对他如何不公，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庞培如今嫉妒他的成就，以至于被诱惑到了敌人那边。最重要的是，恺撒向士兵们展示了敌人对保民官神圣权力的蔑视，竟敢无视保民官的否决权，就连苏拉也不曾如此嚣张。他没有质疑元老院颁布终极议决的权力，只是否认它的必要性；他明确表示，历史上在类似情况下从来不曾发布元老院终极议决，只有在罗马城本身受到直接威胁时才会这么做。其他史料告诉我们，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恺撒把安东尼和卡西乌斯带到了士兵们面前。他们还穿着从罗马城出逃时穿的破衣烂衫，据说这景象令士兵们大受震动，先是怜悯他们，然后对敢于践踏保民官（这个官职是为了保护普通公民的权益而设立的）的敌人义愤填膺。恺撒的演讲结束时，士兵们高声呼喊，表示愿意为他和保民官们蒙受的冤屈复仇。此次检阅的地点是拉文纳，还是卢比孔河对岸的阿里米努姆，我们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部队的反应。第十三军团是恺撒七年前组建的，

此后追随他南征北战。士兵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像以往那样，领导他们打胜仗。他们记得，恺撒在分配战利品、表彰和奖赏官兵时非常慷慨大方。在某个时间，他将普通罗马军团士兵的基本年薪差不多提高了一倍，从125迪纳厄斯提高到225迪纳厄斯。第十三军团的很多士兵可能来自波河以北地区，他们严格来讲只有拉丁人的身份，但恺撒将他们视为正式的罗马公民。该军团的军官们，包括六七名军事保民官和六十名百夫长，完全是拜恺撒所赐才得到任命和随后的晋升。有些军官原先是庞培引荐来的。恺撒允许这些人携带全部财产，安全无恙地离开，前提是他们仍然忠于庞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借机离去了。不仅是第十三军团，全军将士都从恺撒那里得到了很多好处，并有希望在将来得到更多奖赏，退伍老兵还可以得到土地。被恺撒的敌人把持的元老院在这方面不大可能会慷慨大方。因此，既然内战已经爆发，在高卢的罗马军队希望恺撒得胜，因为这样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在恺撒麾下已经服役多年，对他很熟悉也很信任，但很少有人熟悉他的对手们。

恺撒的军队在内战期间对他保持忠诚，甚至在他死后依旧忠心耿耿，的确令人惊叹。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这种忠诚很大程度上以将军与官兵之间的关系纽带为前提，它是在高卢战争期间逐渐形成的，恺撒也小心地呵护这种纽带，不断地犒赏将士。但如果说全军无一例外地对他忠贞不贰或者否认政治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军官们可能已经对罗马城之前发生的事情相当了解。我们有理由认为，恺撒军队的绝大部分人都逐渐相信，恺撒和他们所有人都遭到了一群元老的冤屈虐待，而这些元老自己劣迹斑斑，不配当共和国的合法领导人。很多罗马人，不管贫富，对保民官都有着强烈的感情。坚信自己是正义一方的信念、旧日的忠诚以及自身利益，这三个因素联合起来，确保恺撒的军队毫不犹豫地去与罗马同胞作战，来涤荡弊端。[3]

对绝大多数士兵来说，选择加入哪一方并不需要多少思考。但对大

多数罗马人来说，这仍然是个艰难的选择。内战爆发时，只有少数人深深卷入其中。甚至那些以前看起来非常坚决的人现在也退缩了。其中就有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他在前50年担任执政官时曾向庞培奉上宝剑，呼吁他保卫共和国。现在内战真正爆发了，他却选择中立，或许是想到了他的妻子就是恺撒的甥孙女[4]。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当然不会反对自己的女婿，但他也没有积极地参与战争，尤其是在最初几个月。对许多人来说，在决定加入哪一方时，亲戚关系和长期友谊会起到很大作用；但罗马精英阶层是个很小的圈子，很多人与内战双方领导人都有联系，因此面临艰难的抉择。大多数人对加入任何一方都没有兴趣，但苏拉与马略党人之间的斗争历史告诉人们，保持中立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一向不肯与庞培说话，因为庞培在前78年镇压李必达叛乱时处决了布鲁图斯的父亲。但布鲁图斯现在认为他母亲的长期情人是错误的，于是宣布愿意在杀父仇人麾下作战。这部分是出于他的原则性，但考虑到他的家庭关系，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毫无争议的。他是在加图家中长大的，和舅舅一样热爱哲学，而且他的妻子是阿庇乌斯·克劳狄的女儿。[5]

1月中旬，拉比埃努斯离开了恺撒，他是恺撒阵营中一个主要的变节者。拉比埃努斯从一开始就担任恺撒的高级军团长，陪同他在高卢征战，并且证明了自己是恺撒麾下最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与其他军团长相比，拉比埃努斯在《战记》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写。有学者推测，拉比埃努斯在前往高卢之前，或许是前60年，曾担任裁判官，但这种说法绝对没有任何证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拉比埃努斯到内战时至少已经五十岁了，早就有资格竞选执政官了。为了辅佐恺撒，拉比埃努斯事实上推迟了自己的从政生涯，以便在高卢继续作战。作为军团长，拉比埃努斯赢得了一些荣耀，尽管大部分荣耀都归属恺撒。如果拉比埃努斯自己是一位行省总督，而不是别人的下属，那么他独立开展的一些行动，如前54年至前53年之间和前52年镇压叛乱部落的行动，一定能为他赢得一次凯旋式。他在高卢战争期间也发了财，因为恺撒在赏赐钱财上极其

慷慨大方，但在与他人分享荣誉上却很吝啬。西塞罗为拉比埃努斯的暴富感到遗憾。如果卡图卢斯诗中的“屌人”（Mentula）的确指拉比埃努斯的话，拉比埃努斯可能还招致了卡图卢斯的讥讽。恺撒极可能打算进一步赏赐拉比埃努斯，并希望拉比埃努斯与自己一同在前48年担任执政官。早在前50年夏季，就有传闻称，拉比埃努斯开始对恺撒三心二意，但恺撒对自己的高级军团长仍然表示信任，派他去内高卢；内高卢离意大利较近，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反对派的影响。但最终恺撒的这个姿态未能奏效，拉比埃努斯加入了恺撒的敌人。他可能仅仅是选择忠于旧主，因为他来自皮基努姆，那个地区受到庞培家族的极大影响。有学者推测，拉比埃努斯过去曾在庞培麾下服役，也曾得到过庞培的支持。这些原因都是可信的，但私人恩怨也同样重要。历史上成功的军事家们往往极其自负，常常贬低其他人的才能，嫉妒其他人的名望。拿破仑的元帅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军高级将领们就是例子，其他的例证还有很多。拉比埃努斯最好年华的很大一部分都给了恺撒，似乎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他也许感到高卢战争期间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得胜，要感谢他的能力和行动，而不是恺撒。史料给人的印象是，拉比埃努斯颇为粗鲁无礼，绝不是讨人喜欢的角色。他背叛恺撒很可能是对自己始终只能屈居第二而心怀不满，并且坚信自己的真正价值没有得到认可。拉比埃努斯或许还判断，恺撒有可能会输掉内战，尤其是在恺撒失去了他的才华支持之后。恺撒得知拉比埃努斯叛逃后，决定做一个新的姿态，命令将拉比埃努斯的行李辎重全部送给他。[6]

面临战争，许多人都希望站到正确的队伍中，为自己谋利益。早在前50年8月，西塞罗的通信伙伴凯利乌斯·鲁弗斯就表达了自己玩世不恭的观点：

> 你当然不会忘记，在国内纠纷中，只要是在宪法框架之内进行，而不诉诸武装冲突，那么人们就应当拥护更符合荣誉的一方；但在战争中，人们却支持更强大的一方，并坚持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在这场斗争中，我可以预见元老院和“律师”们，所有那些心惊胆寒、没有希

望加入恺撒阵营的人，都会支持庞培，而恺撒的军队要强得多。[7]

凯利乌斯说到做到，加入了拥有更强军队的一方，而不是得到大多数权贵拥护并且占据道德高地的一方。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对内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恺撒拥有10个军团，全都是高卢战争的老兵，还有22个在内高卢征募的独立大队（相当于2个军团），以及来自高卢和日耳曼的辅助部队和盟军。由于战损、事故和疾病，这些军团的实际兵力应当与纸面数字有差距，尤其是那些服役时间最久的军团。往高了估计，恺撒在前49年初实际掌握的兵力可能有4.5万人，但数字也可能更接近3万～3.5万人。这些士兵的军事素养比敌人的任何部队都要强。有2个军团原先在恺撒麾下，如今驻扎在意大利南部。其中第一军团在组建时曾向庞培宣誓效忠，但另一个（原先的番号是第十五军团，现在改称第三军团）则是由恺撒征募的。这2个军团都在高卢参加过三次战役。庞培很快意识到，之前的乐观说法（这2个军团都对旧主心怀不满）完全是胡说八道。至少在目前，他对这些部队不太信任，不愿意率领他们去攻击其老战友和统帅。庞培在西班牙各行省的确拥有7个齐装满员、训练有素的军团，但这些部队的实际作战经验极少或者根本没有经验，因此不像恺撒部下那样久经沙场、自信满怀。更重要的是，这7个军团尚在远方，无法参加内战的最初阶段。长远来看，庞培及其盟友能够动员的人力、资金、牲畜和装备资源比恺撒多得多。他们自信地估计意大利全境会有潮水般的新兵加入他们；另外，两位执政官都在他们这边，因此他们能够动用国库的财富。在西班牙、北非和整个东方，庞培的门生故旧满天下，这些人都能为他提供兵员和金钱。但动员所有这些资源、征募军队、提供装备和后勤支持，以及训练新兵，都需要时间。庞培及其盟友在战争爆发前最后几个月中固执己见、拒绝妥协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绝对自信，认为自己拥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轻易地压倒恺撒。总的来讲，如果恺撒给他们时间来准备的话，他们的这种判断倒可能是正确的。

意大利战役，1月～3月

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消息令其对手目瞪口呆。在1月，野战军的补给非常困难。虽然之前有一些传闻，但他们很可能知道，恺撒的军队主力仍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即便在颁布元老院终极议决和开始动员之后，很多人仍然真心实意地相信，恺撒在看到他们如此团结、无比强大之后，一定会妥协。还有人推测，恺撒会等待作战季节的到来，在采取行动之前小心地集结兵力；或许会保持防御状态，以等待时机与元老院继续谈判。1月7日之后的几天内，元老院多次开会。为了让庞培安慰元老们，会议是在城市界线之外召开的。他的岳父获得了叙利亚总督的职位，而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将前往外高卢担任总督。恺撒在《战记》中说，他们没有按照惯例在公民大会投票以批准这些任命。但这两人都按常规举行了外放行省总督的仪式，并匆匆赶往各自的辖区。获得其他任命的资深裁判官也是如此。其中一名资深裁判官被任命为内高卢总督。恺撒的敌人们公开决定以武力镇压他，但他们尚未做好准备。征兵工作正在进行，军队和装备正在集结，但意大利绝没有做好抵挡入侵的准备。恺撒在采取行动之前一定希望手边拥有更多兵力，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没有准备好。他已经指示其他几支部队前来与他会合，但他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抵达。他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就绪，如果继续等待，敌人就会变得更强大。恺撒是个雷厉风行、从来不会耽搁的人（除非耽搁对他绝对有利），他仅仅率领着第十三军团，开始推进。[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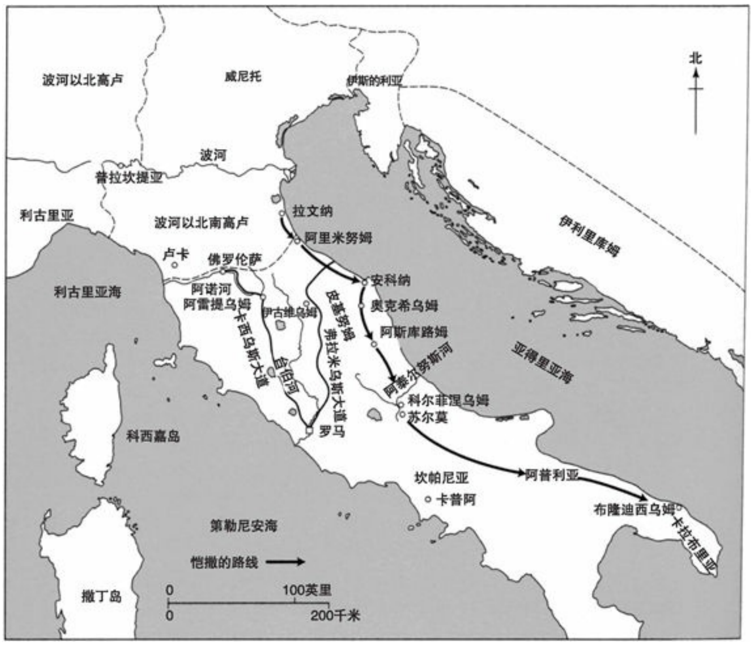


图**9** 前**49**年，意大利战役

他的部下已经占领了阿里米努姆，这座城市没有抵抗他。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同时派遣安东尼率领5个大队去占领阿雷提乌姆（今天的阿雷佐）；还派遣了3个大队，分别去占领皮索鲁姆、法努姆（现代的法诺）和安科纳。目前没有发生交战。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消息似乎于1月17日抵达了罗马。庞培及其主要盟友迅速离开了罗马城，因为庞培很快意识到，他目前没有足够兵力去阻挡恺撒。这意味着所有的行政长官都抛弃了罗马城，目前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已经停止了正常运转。许多骑墙派元老想起了马略和苏拉攻入罗马城时的血雨腥风，于是和庞培一起撤退了。其他元老则离开罗马城，躲到自己的乡间别墅，保持低调。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些非正式的使节来到了阿里米努姆去见恺撒。其中有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的父亲曾担任执政官，他本人则担任恺撒的军团长达数年之久[9]。他带来了庞培的书信。庞培向恺撒保证，他的行动不是出于对恺撒的私人仇隙，而是为了履行对共和国的义务。庞培敦促他的老盟友自行放弃指挥权，以避免内战。裁判官卢基乌斯·罗斯基乌斯带来了类似的请求。恺撒回答说，他的全部意愿就是行使罗马人民以合法方式授予他的权力。他的敌人招兵买马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如果他们要和平，那么庞培应当前往自己的行省，然后庞培与恺撒两人都应当放弃指挥权，同时解散各自的军队，以及意大利境内的所有其他军队。恺撒请求庞培前来与他面谈，这不是他最后一次提出这样的请求。到1月23日，小卢基乌斯·恺撒来到了庞培身边，此时庞培在阿普利亚[10]的忒阿努姆。根据西塞罗两天后的书信：

> 庞培愿意接受恺撒的条件，前提是恺撒必须立刻撤离他占领的在他行省边界之外的城镇。他们答复说，完成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应当返回罗马城，在元老院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维持和平。一方的领导人悔恨自己的鲁莽和愚蠢，另一方则懊恼自己的力量薄弱。[11]

庞培的提议被以书面形式送到恺撒那里。用恺撒自己的话说，这提议就是他应当“返回高卢，放弃阿里米努姆，解散他的军队”。在他看来，这是“不公平的买卖”。提议中未提及庞培将于何时前往其行省，也没说他将在何时放弃指挥权、解散军队。很显然，庞培实际上是要求恺撒放弃他凭借突然入侵意大利而占据的军事优势。敌人要求恺撒撤退并相信他们会在元老院未来的某一次会议上同情地倾听他的要求。恺撒没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会议会比过去十八个月的辩论对他更有利。庞培及其盟友并不信任恺撒，也不期望他会接受这个提议，因此仍然继续招兵买马。恺撒也不信任他们，不肯迈出和平的第一步，即返回自己的行省。让恺撒感到特别挫败的是，庞培不肯与他面谈。过去两人相处融洽，恺撒似乎相信能与自己的前女婿达成真正的协议。庞培或许拿不准主意，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恺撒说服。庞培害怕暗杀到了病态的地步，而且曾经目睹一场极其残酷的内战，因此他或许不肯冒险去面见恺撒。不过，说到底，他不肯与恺撒面谈，也可能是为了他与加图和其他新盟友的关系。他与这些人的联盟是前不久的事情，而他与恺撒的友谊则更悠久，维系的时间也更长。不管庞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他深知如果他私下会见恺撒，加图等人就不会再信任他的诺言和坚定不移。加图已经敦促元老院任命庞培为最高统帅，直到击败谋反的资深执政官恺撒。两

位执政官和前任执政官们过于倨傲，不肯接受其他人的指挥，于是驳回了加图的请求。盟友内部的嫉妒和猜忌就像敌对双方的互不信任一样，都无助于通过谈判达成妥协。[12]

恺撒继续前进。他得到消息称，伊古维乌姆有5个大队的驻军，指挥官是资深裁判官昆图斯·米努基乌斯·泰尔姆斯，但市民们支持恺撒。和恺撒一起在阿里米努姆的2个大队连同驻扎在皮索鲁姆的1个大队，在库里奥指挥下奔向伊古维乌姆。泰尔姆斯撤退了，他手下的新兵开了小差，各自回家，库里奥的部下在伊古维乌姆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恺撒信任当地居民对他的善意，继续前往奥克希努姆，并很快占领了皮基努姆，这里据说是庞培家族势力范围的腹地。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抓了一些俘虏，但群众普遍不愿意起来反抗恺撒及其部下。反对恺撒对平民没有什么吸引力，何况恺撒的军队纪律森严，并没有抢劫或侵害平民。一些庞培派士兵甚至倒戈，加入了恺撒军队。很多社区还记得，恺撒曾将在高卢获得的一些战利品馈赠给他们。让恺撒特别满意的是，就连曾受到拉比埃努斯特别照拂的秦古鲁姆也自愿为恺撒打开了城门。[13]

此时已是2月，恺撒将第十三军团各单位集中了起来，第十二军团也赶到了他身边。在阿斯库路姆，又一支庞培派军队望风而逃。一直到科尔菲涅乌姆，恺撒才遇到一些像样的抵抗。在那里指挥的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目前还没有办法接近自己的行省。他和自己的部下集结了30多个大队的军队，但这些完全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庞培并不希望阿赫诺巴尔布斯坚守该城，因为他知道，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兵与恺撒的老兵对抗，必然只能有一个结果。庞培本人此时在更远的南方，掌握着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一些新兵。但他并没有权力向阿赫诺巴尔布斯发号施令，只能给他写信，敦促他放弃科尔菲涅乌姆，前来与他会合。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不是个容易改变主意的人，他回信请求庞培来与他会合。恺撒那边在战略上就没有这样的分歧了。他包围了

科尔菲涅乌姆，驱散了一些企图摧毁城外桥梁的敌军。不久之后，苏尔莫镇发出求援呼吁，于是安东尼率领全军的四分之一开赴苏尔莫。这又是一场不流血的胜利。庞培派军队的指挥官被俘虏，押送到恺撒面前，很快被释放了。与此同时，恺撒军队在搜集粮草，准备攻打科尔菲涅乌姆。三天后，恺撒军队实力大增，第八军团和22个在外高卢征募并得到罗马军团士兵的标准训练和装备的大队赶到了。这些部队开始建造一道围城防线，并加强一些堡垒，以包围该城。

在包围圈封闭之前，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收到了庞培的最后一封信。庞培明确表示，他不打算率军来援救科尔菲涅乌姆。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判断科尔菲涅乌姆前景不妙，于是公开宣布援军已经在路上，私下里却准备自己逃跑。但他鬼鬼祟祟的动作很快让部下得知了真相。他们召开了一次议事会来决定如何是好，与会者包括多名军事保民官、百夫长们（如果33个大队齐装满员的话，应当一共有近200名百夫长）和普通士兵代表。一些士兵是马尔西人[14]，与他们的指挥官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的家族地产就在那个地区。起初他们坚决忠于阿赫诺巴尔布斯，甚至威胁要用武力对付其他士兵。但是，在他们确信自己的指挥官打算临阵脱逃后，情绪就变了。阿赫诺巴尔布斯被自己的部下逮捕了，官兵们立即派遣使节去向恺撒投降。这对恺撒来说是好现象，因为他虽然肯定能攻破这座城镇，但那样的话就要被牵制在原地达几周之久。敌军既已投降，问题在几天之内就解决了。但他不愿意立即进城，因为天已经黑了，他担心自己的士兵进城之后在漆黑的大街小巷上胡作非为。目前为止，他的军队还没有像以往经常做的那样，在行军沿途烧杀抢掠。他命令部队在包围科尔菲涅乌姆的防线上彻夜保持警戒状态，以阻止敌人逃跑。快到黎明时，城内的一名庞培派主要将领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斯宾特尔（他于前57年担任执政官）出来投降。很快，其他的高级军官也投降了。

恺撒对阿赫诺巴尔布斯的描述当然不是很正面，其他史料对阿赫诺巴尔布斯就更加严厉了。据说阿赫诺巴尔布斯打算自尽，命令他的医生提供毒药。但他听说恺撒不会处决重要的犯人时，立刻懊悔了自己的鲁莽行为。医生告诉他，他已经服下的毒药剂量极小，对身体无害。他听了这话不禁喜上眉梢。然后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出去向恺撒投降，他和恺撒的对抗至少持续了十年。投降的庞培派人士有50名元老和骑士，日期可能是2月21日。恺撒命令将这些俘虏带到自己面前，重述了自己的观点（他遭到了元老院不公平、不合法的待遇，被强迫诉诸武力），并提醒其中一些人，他在过去可没有亏待他们。之后，所有俘虏都被释放了。恺撒之前已经贯彻了宽大为怀的政策，但此前还没有这么多、这么高贵的俘虏享受到他的仁慈。阿赫诺巴尔布斯携带了6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公款，用来支付军饷。科尔菲涅乌姆的行政长官将这笔钱交给了恺撒，但他命令将钱退还给他的敌人，免得让世人觉得“恺撒不伤害敌人的性命，却贪恋钱财”。投降的士兵则被要求向恺撒宣誓效忠。不久之后，这些降兵就将在库里奥的指挥下，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为恺撒而战。[15]

恺撒在科尔菲涅乌姆的宽大为怀很快就流传开来，他的温和节制也成为其宣传攻势的核心部分。所有人都以为恺撒会像苏拉或马略，或者像庞培那样大开杀戒。当然没有人敢指责庞培，尽管曾经他的绰号是“年轻的屠夫”。恺撒的士兵纪律严明，从不抢劫平民，只有在遇到抵抗的时候才动武。即便他的死敌也被释放，不过兰图鲁斯和阿赫诺巴尔布斯获释后马上又跟恺撒作对。意大利的绝大部分人民对内战的原因不感兴趣。大部分群众对庞培和恺撒都十分尊重，认为他们是共和国的优秀公仆。假如恺撒的军队一路烧杀抢掠地穿过意大利，就可能让更多平民转而反对他。他宽大为怀的政策是非常务实而有效的。庞培几个月前吹嘘会有一支支大军从意大利土壤中崛起并为他效力，事实并非如此。一位元老尖刻地说，现在伟人庞培或许应当跺跺脚了。庞培很早就断定，罗马城是守不住的。后来他又得出了新的结论，他手中只有2个具

备作战经验但或许不可靠的军团，以及一些毫无战斗力的新兵，因此他在意大利本土没有办法打败恺撒。他打算改换战场，将自己的军队带到大海对岸的希腊，在那里训练部队，并在东方各行省的支持下集结一支大军。其他元老不会支持他的这个计划，再加上他要向恺撒隐瞒自己的意图，因此起初庞培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其他人。在科尔菲涅乌姆的抵抗浪费了相当于3个军团的兵力，但庞培成功地将自己军队的剩余部分集中在了布隆迪西乌姆（现代的布林迪西）。他征用了一些商船，开始将人员和装备运过亚得里亚海。这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任务，但庞培一直擅长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开始以自己的娴熟技能着手此事。[16]

恺撒于3月9日兵临布隆迪西乌姆城下。他手中有6个军团，包括久经沙场的第八、第十二和第十三军团，以及一些新兵和可能来自外高卢的大队。其中部分兵力很快将被正式改编为一个新的军团，即第五“云雀”军团，这个名字的来源可能是该军团士兵与众不同的头盔羽饰或盾牌徽记。庞培则只有2个军团的后卫部队，正在等待登船。恺撒命令部下开始建造障碍物，以封锁通往港口的狭窄水道。守军也利用自己的工程技能，阻止恺撒军队的行动。双方又多次尝试谈判，但始终无果。庞培又一次拒绝与恺撒面谈。庞培军队最后准备就绪，于3月17日夜间撤离布隆迪西乌姆。除了2艘船在恺撒军队建造的障碍物处搁浅之外，庞培全军安然逃脱。城镇居民向恺撒军队指出了敌人撤离前设置的陷阱。据恺撒说，平民终于可以表达他们对庞培军队的憎恨了，但他们帮助恺撒军队无疑也是为了避免遭到军队的虐待。庞培带领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撤退了，假以时日，他能够以此为骨干，组建一支大军。万事俱备之后，他便可以从希腊入侵意大利，就像当年苏拉那样。庞培常说：“苏拉这么干过，我为什么不行？”[17]

罗马

恺撒目前无法追击敌人。庞培军队已经将该地区的绝大部分商船集

中起来带走了，要从其他地区搜集和调动船只需要很长时间。恺撒不愿意原地坐等，不愿意处于守势，更不愿意将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此时已是春季，是常规作战季节的开端，军队在此时行动会比较便利。恺撒的军队主力（约7个军团和为数众多的盟军及辅助部队）仍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庞培最好的几个军团在西班牙半岛，与其统帅断绝了联系，由他的军团长指挥。目前他们还很消极，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尤其是假如恺撒集中全部力量渡海入侵希腊的话。去西班牙不需要舰队，而且从那里军队也能够轻松地进军高卢或意大利。但是，庞培组建和训练军队则要花费好几个月时间，所以他在前49年不大可能从希腊入侵意大利。庞培也没有无所事事，他和他的盟友计划切断各行省通往意大利的粮食补给线。击败庞培的西班牙军队就相当于打击他的最精锐部队，削弱他的力量，尽管这不会是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战役。这种策略十分有效，而且它是完全可行的。恺撒毫不犹豫地决定攻击在西班牙的庞培军队。他开玩笑地说，他要先收拾掉“一支没有将军的军队”，然后去希腊对抗庞培，消灭“一位没有军队的将军”。同时，库里奥将负责保卫西西里的安全，确保当地的余粮继续被运往意大利。另一支部队将占领撒丁岛。[18]

恺撒在军事上控制了整个意大利，没有一座设防城镇或都市抵抗他。时间紧迫，庞培的力量一天天强大，所以恺撒急于开赴西班牙。大多数行政长官和一些显赫元老投奔了庞培。更多元老留在意大利，仍然在骑墙观望。恺撒希望元老院照常开会，好让世人觉得国家机器在这样的危机时期仍然在运转。他的敌人声称，他们才是真正共和国的代表。恺撒要挑战敌人的这种观点，表明国家机器仍然在罗马运作，它也理应在罗马；也明确表示自己的事业是合法的，他并不是反对共和国，而是反对一个篡夺了共和国权力的派系。因此，他希望尽可能多的元老参加4月1日的会议。西塞罗还在意大利，恺撒的盟友们给西塞罗写了很多信，劝说他来开会。演说家曾经非常努力地避免战争局面的出现，并且对很多人的热情好战感到惊恐失望。战争开始后，他看到庞培迅速放弃

了罗马城，深感震惊；后来意识到庞培打算完全撤出意大利，更是愤怒。西塞罗对庞培抱有长期的、深切的忠诚，从一开始，他的本能和判断都告诉他，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都应当站在庞培那边。庞培常常辜负西塞罗，并不总是给予西塞罗应得的赞誉，并且与克拉苏和恺撒结为盟友。最严重的是，当克洛狄乌斯迫使西塞罗流亡时，庞培没有出手相助，而是袖手旁观。即便如此，西塞罗对庞培仍然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还希望伟大的庞培有一天能够发挥出西塞罗相信他拥有的全部潜力，成为共和国内一支为善的力量。但自西塞罗结束流亡归国以来，庞培和其他人就鼓励他与恺撒交好。西塞罗除了与恺撒进行热情洋溢的通信，参加恺撒的建筑工程，以及让昆图斯在恺撒军中服役之外，还从恺撒那里借了一大笔钱。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西塞罗如坐针毡，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以为他被恺撒收买了，但他更不愿意让人觉得，他是因为想赖恺撒的账才反对他的。[19]

西塞罗对自己奇里乞亚总督的职位不感兴趣，但还是小心地履行义务。在针对阿玛努斯山区部落的战役中，他（实际上是他的更有经验的军团长）赢得了一场小胜。演说家算不上一位军人，却渴望为了自己的这次成功赢得凯旋式。前50年，元老院投票决定为他举行公共感恩活动，按照常规，这是授予凯旋式荣誉的前奏。加图曾反对这项动议，后来一本正经地告诉西塞罗，他之所以反对给西塞罗公共感恩，是因为他觉得西塞罗值得奖赏的是他稳妥、清廉的为官之道，这对共和国更有价值。库里奥起初也反对授予西塞罗公共感恩的荣誉。感恩活动期间政务不能运作，库里奥或许是担心恺撒的政敌会借机操控处理政务的日程，对恺撒不利。但恺撒迅速指示库里奥支持这一动议，于是动议最终轻松地通过了。加图给西塞罗的伤口上撒盐，成功地推动元老院授予毕布路斯二十天的公共感恩，毕布路斯也曾在阿玛努斯山区作战，此地是奇里乞亚（西塞罗的行省）和叙利亚（毕布路斯的行省）的边界。加图的女婿毕布路斯事实上在战役中建功甚微，遭遇过至少一场大败。向他授予任何荣誉都是值得商榷的，何况是这么长时间的感恩，但加图就是要让

自己女婿得到的感恩时间超过庞培曾经得到过的；只有恺撒曾得到过二十天的公共感恩。西塞罗接受了加图的虚伪行为，认为若是要在政坛取得成功，虚伪是少不了的。在西塞罗之前担任奇里乞亚总督的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他对行省百姓万般压榨，中饱私囊。西塞罗私下里将克劳狄的行径描述为“野兽”恶行，但与克劳狄本人交往时始终保持礼貌，甚至是热情。尽管如此，加图的这一招还是让西塞罗颇感怨恨。表决之后，恺撒写信祝贺西塞罗，无疑让西塞罗赢得凯旋式的信心大增，并且大肆宣扬他的老对手加图的双重标准。[20]

内战爆发时，西塞罗的处境十分窘迫。他还没有放弃自己的资深执政官军权，因为他还在等待自己渴望的凯旋式。因此他身边还有执法吏侍奉，还有权指挥军队。尽管他十分不赞同庞培、加图和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及其同党的态度和行为，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不能反对这些人，也不能不支持当年合法选举产生的执政官。西塞罗得到了征兵的任务，但很快就放弃了，认为此事已经不切实际，后来就没有在战争中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西塞罗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弥天大罪，但后来他听说恺撒对被俘的庞培军队宽大为怀，对恺撒的态度又软化了一些。西塞罗写信给恺撒，赞扬他的仁慈，尤其是对兰图鲁斯的宽容（兰图鲁斯在前63年曾支持过西塞罗）。庞培前往布隆迪西乌姆后，西塞罗与庞培便断了联系。西塞罗也没有努力投奔到庞培身边，因为他痛恨庞培撤离意大利的战略。西塞罗待在自己的一座乡间别墅，静观事态发展。3月初，可能是在布隆迪西乌姆陷落之前，恺撒给演说家写了一封短信，敦促他：

> 不必怀疑，我曾多次对你感恩戴德，并且希望将来能有更多感激你的理由。这是你应得的。但在此之前，我有求于你。因为我很快将到罗马，所以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听取你的建议，享有你的善意，目睹你的尊严，得到你的援助。此信结尾如同开端。请原谅我的匆忙和此信的简略。[21]

西塞罗于3月19日回信，询问恺撒信中所谓他的“善意”与“援助”具

体指的是什么。他重申自己愿意为了和平而努力，只要和平能够保护“我们共同的朋友庞培”；因为如果恺撒和庞培两人和解，将最有利于共和国的利益。26日，恺撒又写了一封信，感谢西塞罗赞扬他的仁慈，并表示“我的天性中绝无残酷的念头”。恺撒又一次敦促他到罗马来，这一次说他需要西塞罗的“建议和资源”。另一个鼓励因素是，演说家的女婿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目前在恺撒军中，恺撒向演说家保证，自己对这个年轻人很是器重。两天后，恺撒与西塞罗在福尔米亚会面了。西塞罗决心不被对方利用，坚决不肯前往罗马：

> 他（恺撒）反复说，我的拒绝是对他的谴责。如果我不去的话，其他人去的可能性就小了。说了很多之后，恺撒说道：“那么来吧，来谈谈和平。”“是作为完全自由的人来吗？”我问道。他说：“难道我会教你该说些什么吗？”“如果那样的话，”我说，“我会在元老院发言，说元老院不会批准你率军前往西班牙或者派遣军队去希腊。何况，我会为格奈乌斯（即庞培）的命运而哀叹。”然后他说：“我真的不希望你这么发言。”“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但我不想去那里。因为我一旦去了那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一定会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更多。因此我就干脆不去罗马。”

恺撒敦促西塞罗再好好考虑。西塞罗确信恺撒此时对他已经没有好感，但觉得自己收回了一些自尊。会谈快结束时，恺撒唐突地说，如果西塞罗不肯辅佐他，他就会寻找其他人的协助。这话显然有威胁的意味。在演说家看来，恺撒的军官们鱼龙混杂，这让恺撒的威胁显得更加严重。[22]

在保民官安东尼和卡西乌斯的传唤下，元老院于指定日期召开了会议。为了让资深执政官恺撒能够参会，会议是在城市的正式边界之外举行的。这种做法是合乎规程的，尽管后来至少西塞罗不愿意承认它是正式会议，只肯说这是一次非正式集会。与会者少得可怜，显赫人士们都没有到场。即便如此，恺撒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地重申自己受到的冤屈：他仅仅希望能够行使保民官们以合法程序授予他的特权。但庞培的态度却渐渐发生了变化，认为是恺撒的私敌们对他的刻骨仇恨才迫使

他诉诸武力。更为务实的举措是，恺撒请求元老院派遣使者去与庞培谈判、和解。恺撒宣称，他自己的雄心壮志便是在“司法和正义”上表现出与他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出的同等的才华。恺撒的动议通过了，但没人愿意去当这个使者。恺撒始终是个平民派，并没有将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元老院。安东尼召开了平民大会，对一些措施做了表决。在这次集会之前，恺撒向群众做了演讲，又一次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并责怪是他的政敌挑起了战争。他向群众保证，罗马城仍将得到粮食，甚至许诺给每一位公民3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赠礼。和元老院里的情形一样，群众的反应是沉默。人们还记得马略和苏拉的凶残报复，而战争的前景并不明朗。在《战记》中，恺撒声称，庞培曾威胁将留在意大利的人也视为恺撒同党。说到底，所有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对内战双方都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只希望保持中立，安全地度过这场内战。有些人被恺撒的言辞和态度说服了，但大多数人仍然很谨慎。唯一公开反抗恺撒的是一个叫作卢基乌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的保民官，他开始在元老院里阻挠恺撒。[23]

恺撒决定动用国库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大冲突。征服高卢为他赢得了极大的财富，但他从来就不是守财奴，而是一掷千金地去笼络他的军队，以及收买库里奥和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这样的人的忠诚。现在，支撑一场庞大战争的成本极高。仅仅几个月之间，他就组建了3个新军团，征募了一些新兵（这年年初时，他握有10个军团、一些独立大队和辅助部队）。后来他还征募了更多部队。所有这些士兵都需要军饷。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在敌人那边服役的士兵，就更不能让他们有不满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这些军队都需要装备和给养。在高卢，恺撒主要依赖同盟者为他提供粮草，但内战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并不是所有的行省和同盟社区都支持他，但他也不能过于严酷地对待那些不支持他的社区，因为他最终还是需要将他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若有需要，恺撒不得不自掏腰包来为军队的很大一部分需求买单。克拉苏曾吹嘘，只有能够用自己的资源征募军队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富人。恺撒很富有，但他现

在的任务是为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提供资金，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那么多钱。

但是，当他去国库（或者是派人去国库，因为如果他亲自去国库，就必须跨越罗马城的边界）时，梅特卢斯堵在大门口，禁止他进入。国库位于广场上的农神庙。两位执政官在撤离罗马城时将国库大门紧锁，并将钥匙带走。但是，恺撒的士兵们完全无视梅特卢斯，用斧子将大门砍倒了。据普鲁塔克的说法，恺撒唤来铁匠将大门打开，并且恺撒和梅特卢斯在神庙外发生了对抗。保民官不断企图阻挠，恺撒大发雷霆，威胁要把他杀掉。梅特卢斯最后终于让步，恺撒声称自己天性宽宏仁慈，让他发出这样的威胁比让他真正杀人更难。恺撒在1月曾宣称自己要捍卫保民官的权力，如今却和他的敌人一样，随时可以压制和威胁一位保民官。他从来没有隐瞒过，他最终的目标是捍卫自己的尊严。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要捍卫自己尊严的唯一办法就是打赢战争；而要打赢，他就需要现金。他控制了国库的现金，共1.5万根金条、3万根银条和3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另外，恺撒还取走了几百年来一直保存着以防范高卢人于前390年洗劫罗马城那样的悲剧重演的特别资金。恺撒宣称，国家不需要这笔特别资金了，因为他已经永久性地解除了高卢人的威胁。即便如此，他在《战记》中也没有提及此事，仅仅说梅特卢斯在恺撒政敌的撺掇下，处处与他作对。[24]

这是恺撒九年来第一次返回罗马城。他在那里顶多只待了几周，然后便匆匆前往军中。他的大军正在集结，准备远征西班牙。他让马克·安东尼留下掌管意大利。从西塞罗的通信中，我们得知库里奥、凯利乌斯和多拉贝拉[25]等人都坚信，西班牙战役将是非常短暂的，恺撒很快就会得胜。恺撒军队很快占领了撒丁岛和西西里，没有遇到多少强烈的抵抗。恺撒赢得了意大利战役的胜利，但这胜利是空虚的，因为庞培及其军队全身而退了。战争将持续下去，并且已经在蔓延。后来，地中海周边几乎所有国度都被卷入战火。恺撒的敌人仍然很强大，并且越来越

强。在意大利，人们看到恺撒没有像苏拉那样草菅人命，不禁松了一口气，但很少有人转变为他的热情支持者。[26]

伊莱尔达战役，前49年4月～8月

恺撒将在西班牙的庞培派军队描述为“没有将军的军队”。庞培在西班牙半岛拥有7个军团，由3名军团长指挥。其中之一是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他是一位广受尊重的学者，著作颇丰，涉猎极广。他与庞培有着长期的政治联系，在前70年为庞培撰写了一部解释元老院程序的手册。他之前就担任过庞培的军团长，在前49年负责掌管外西班牙，但似乎没有多少军事才干。在随后的战役中，他的部队没有与庞培的主力军队会合，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参战的主要是剩余5个军团，指挥官是马尔库斯·佩特列乌斯和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佩特列乌斯是两人中较有经验的一位。前63年击败喀提林的那支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就是他。据撒路斯提乌斯说，佩特列乌斯当时就已经有了三十年的从军经验。他可能是马略的一位资深百夫长的儿子。到内战爆发时，他一定已经约六十岁了，虽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但大多时候都是担任别人的副手。阿弗拉尼乌斯是前60年的执政官之一，他最有名的地方是擅长舞蹈，其他方面则很平庸。他参加过庞培的几次战役，因此有一些军事经验，但从来没有独当一面。作为一名前任执政官，他的资历比佩特列乌斯深，但我们不知道是他指挥佩特列乌斯，还是两人联合指挥。除了5个罗马军团之外，他们还拥有相当多的辅助部队，包括约1万名骑兵和8个大队的西班牙步兵。这些西班牙步兵大多是重步兵，但也包括一些装备标枪和小型圆盾的轻步兵。[27]

恺撒命令他的军团长盖乌斯·费边带领位于外高卢行省以西（驻扎在纳尔博）的3个军团，控制比利牛斯山的山口通道。费边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继续进军，逼近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这两人的军队集中在伊莱尔达（今莱里达）。恺撒还命令另外3个军团（以及5000名辅

助步兵和6000名盟军及辅助骑兵）与费边会合。恺撒本人随后出动，但途中在马西利亚城外稍事停留。这个古老的希腊殖民地是罗马最古老的盟友之一。作为高卢总督，他也曾小心地尊重和优待这座城市，但此地与庞培联系紧密，与他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镇压塞多留的战争时期。马西利亚紧闭城门，不准恺撒进入。马西利亚行政长官声称，他们不懂复杂的罗马政治，但他们觉得不能支持恺撒和庞培中的任何一方去反对另一方。马西利亚人所谓的中立其实是虚假的。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率领由他自己的扈从和奴隶组成的军队乘船进入马西利亚港口，得到允许。阿赫诺巴尔布斯家族与马西利亚地区的联系可能也是促使马西利亚人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并没有因为前不久的投降和被释而羞赧，而是终于抵达了他垂涎多年的高卢行省。马西利亚人立即请他指挥城防，并做好抵抗的准备。恺撒将3个军团调到城外，交给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指挥。此外还有一队战舰提供支援，其指挥官是曾经率领舰队打击维尼蒂人的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部队调动就绪准备开始攻城后，恺撒将攻城任务交给部下，自己则在900名日耳曼辅助骑兵的护卫下继续前进。这段时间他非常忙碌，需要制订计划、发布恰当的命令。对敌人来讲，马西利亚失守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是一个重要港口，其设施和商船队能够为在西班牙作战的军队提供强有力的后勤支持。但恺撒的时间很紧迫，他等不起。虽然指挥军队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挤出一些时间给显贵们写信。就在抵达马西利亚之前，他写了一封信给西塞罗，敦促演说家不要鲁莽地加入庞培阵营。[28]

6月，恺撒与费边会合了，此时他的6个军团以及大多数盟军和辅助部队已经合军一处。这6个军团可能是第六、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和第十四军团。从数字上看，敌人的兵力可能略占优势。不过我们不知道双方每个单位的具体兵力，所以也很难说。但恺撒军队的士气高涨、斗志旺盛，远胜于敌人。虽然恺撒控制了国库资金，但要满足这场战争的开销仍然是很困难的。于是，“此时，他向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

们借钱，然后将现金发给士兵们。他这么做是一箭双雕，因为百夫长们在战争中投了资，必然忠于他；而金钱的赏赐也换得了军团士兵们的热情”。恺撒军队的信心高涨，但是敌人占据了非常有利的防御位置。他们的主营地和伊莱尔达镇在同一座山脊上。一支较小的部队控制着西科里斯河（今塞格雷河）上的桥梁，这条河分隔着两军。恺撒抵达之前，费边已经建造了两座间隔约4里的桥梁，来到了敌人占据的西岸。两支雄壮的大军互相虎视眈眈地据守着。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补给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双方都定期派遣搜粮队到河流东岸寻找粮草。费边的2个军团有一次去搜粮的时候，刚刚过桥，桥就坍塌了。阿弗拉尼乌斯派遣4个军团和一支强大的骑兵去攻击他们，所幸恺撒的援兵经过另一座较远的桥梁及时赶到。[29]

战斗两天之后，恺撒抵达了。此时断桥已经修复地差不多，在恺撒的命令下，当夜就完全修好了。这一天，他进行了一次仔细的侦察，尤其查看了地形。次日上午，他只留下6个大队看守营地和桥梁，并率领余下的所有部队推进到庞培军队营地前方的山坡脚下，严阵以待。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回应了这一挑战，但将自己的阵线部署在半山坡处，离自己营地的壁垒不远。然后，按照这一时期常规的作战习惯，两军都虎视眈眈地盯了对方一段时间，谁都不愿意冲杀出去。恺撒不愿意冒险出战，因为敌人居高临下，占有地利。当天的某个时间，他自称得知（可能是通过俘虏或敌方逃兵）阿弗拉尼乌斯过于谨慎，不肯出战。于是恺撒决定在原地建造一个新营地。和过去类似的情况一样，恺撒小心地确保己方部队在建造营地的时候不会被敌人抓住可乘之机。恺撒的军队排成常规的三道战线，他将构成第三道战线的大队后撤，命令他们挖掘一道15英尺宽的壕沟。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没有建造壁垒；因为那样会太暴露，容易遭到敌人攻击。即便没有壁垒，这么宽的壕沟也足以阻滞敌人的任何攻击了。到晚上，壕沟挖好了，恺撒将其余部队也撤到壕沟之后。夜间，他让部下保持戒备状态，但敌人没有任何动作。次日，3个军团摆好阵势，准备迎敌，而其余部队则派人搜罗建造壁垒所

需的材料，同时挖掘与第一道壕沟呈直角、向后延伸的两道壕沟，让营地更加完备。敌人发动了一些骚扰，但被恺撒的掩护部队轻松击退，于是新的壕沟竣工了。第二天，终于在壕沟后方建起了壁垒。[30]

随后，恺撒尝试去占领能够俯视庞培军营与伊莱尔达镇之间地域的一座小丘。他率领3个军团进发，派遣其中一个军团的先遣部队去占领小丘。阿弗拉尼乌斯观察到恺撒军队的动向，他的部下抢先抵达小丘，将企图登山的恺撒军队逐退。《战记》解释说，恺撒之所以遭到此次失败，是因为敌人的作战风格就像西班牙部落，快速奔跑而不顾阵型。事实可能的确如此（恺撒说，在一个地方驻扎太久的部队的作战风格会受到当地人的影响），但他或许是刻意将敌人描绘为非罗马的蛮族。恺撒的读者们对描写与高卢诸部落交战的狂野情节热血沸腾，对描写同胞的手足相残就不是很感兴趣了。双方都投入预备队，战斗持续了近一整天。地形非常狭窄，顶多只能挤进去3个大队，以便组织战线。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但鏖战5个钟头之后，第九军团的将士们还有足够的精力，手握利剑，最后一次冲向敌人。庞培军队退缩了一段时间，于是恺撒的部下得以撤退。恺撒这边有70人阵亡，包括第十四军团的1名资深百夫长，还有约600人负伤。敌人则损失了约200人，包括1名首席百夫长和另外4名百夫长。双方都相信自己赢了，但事实是恺撒未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即占领小山。[31]

随后天气对战局产生了影响，瓢泼大雨导致河水猛涨，冲垮了费边的两座桥梁。于是，恺撒及其军队的补给线（给养由盟军运来）被切断了，也无法得到增援。一群前来加入恺撒军队的高卢人遭到敌军一支强大袭扰部队的攻击，损兵折将，最后撤到了一个防御阵地。士兵们努力修桥，但起初都未能成功，于是口粮配给下降到很糟糕的程度；若是长时间这样，士兵们的健康必然会受到严重损害。过了几天之后，士兵们开始搭建覆盖皮革、木制框架的简易小舟，就像他们在不列颠见过的那种。在夜色掩护下，他们将这些小舟装到大车上，运到22里之外的一个

地点，并在河边的一座小山后建立了一个小营地。随后1个军团被派到那里，一些士兵乘小舟到达河对岸，两天之内就建造了一座新桥梁。高卢人和他们押运的粮草利用这座桥过了河，与主力部队会合。危机暂时解除了，但恺撒还远远没有打败敌人。出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迹象：一些西班牙社区感到战局在向有利于恺撒的方向扭转，于是派遣使节来，承诺要投奔他。恺撒要求这些西班牙社区都向他提供急需的小麦。新桥是一道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但距离较远，不是非常方便。恺撒的士兵们开始挖掘运河，将西科里斯河的河水引走，开辟了一个简单的渡口。此时庞培军队的两位军团长感到自己的位置太暴露，因为恺撒的骑兵数量在增加，也越来越自信，这让庞培军队的搜粮行动越来越困难。他们决定撤往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居住的地区，这些人对庞培特别友好。[32]

他们做了精心准备，命令将船只和驳船集中到埃布罗河沿岸，运往奥克托格萨（距他们的营地约30里）。他们利用这些船只在宽阔的埃布罗河上搭建了一座类似浮桥的桥梁。恺撒的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这个动向。凑巧的是，庞培军队的桥梁与恺撒军队在西科里斯河的临时渡口在同一天竣工。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拥有了一条通道，可以去逾越面前的最大障碍。他们知道，渡过埃布罗河之后，他们就有至少几天的喘息之机，不必担心敌人的追击。但他们也知道，必须先将自己的部队调到奥克托格萨。他们的2个军团利用伊莱尔达城外的那座桥梁过了西科里斯河，在东岸扎营。夜间，庞培军队的剩余部分（除了2个留下驻防伊莱尔达的大队之外）开拔，与这2个军团会合，随后全军开赴埃布罗河。恺撒的前哨阵地报告了敌人的动向，于是恺撒派遣骑兵去骚扰和阻滞敌人的行军队伍。太阳升起来之后，他从自己营地附近的高地上可以看到，庞培军队的后卫被他自己的骑兵步步紧逼，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列队以击退追兵。恺撒的士兵们知道战局的发展，通过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们敦促恺撒允许他们冒险通过人造渡口，到河对岸作战。看到士兵们如此斗志昂扬，恺撒便率领5个军团出击，其余部队留下驻守营地。骑兵在渡口上下游的地方掩护，部队安全地涉水过河，没有任何损失。

尽管他们出发得较晚，但前卫部队还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追上了庞培军队的后卫。两军都排兵布阵，准备迎战，但庞培军队无心恋战，并且占据了高处，而恺撒的部下已经很疲惫。双方都扎营过夜。庞培军队前方是一道山峦，两位军团长打算在夜间行军，以便抢在恺撒前面抵达并穿越这些山峦的隘道。但恺撒从俘虏那里得知了敌人的计划。尽管天色已晚，他还是命令吹响集结号。庞培军队听到号声，知道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于是回营了。[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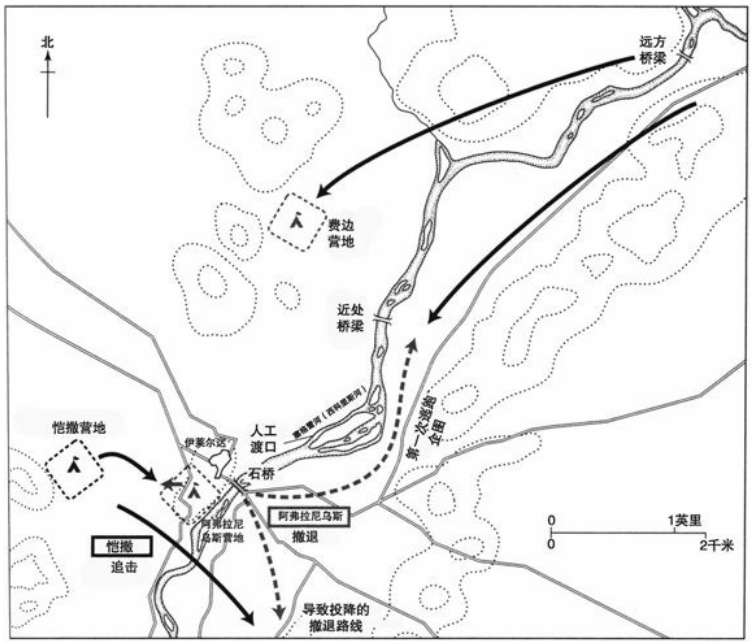


图**10** 伊莱尔达战役

次日，双方都派遣小队侦察兵去勘察穿过山地的路线，并确认约5里之外有一个关隘。谁占据了这个关隘，谁就能阻止对方通过。庞培军队夜间行军的计划破产，于是决定在黎明时分行动。他们的营地位于恺撒和关隘之间，但他们携带着辎重，行动迟缓，而恺撒军队只带着基本装备和最低限度的口粮。恺撒在拂晓前开拔，奔向不同的方向，令敌人大吃一惊。敌人先是松了口气，但看到恺撒军队慢慢右转，奔向关隘，便沮丧起来。庞培军队也出发了，两军展开竞赛，看谁先冲到关隘。恺撒军队走的路比较崎岖，但他们抢先出发，而且轻装疾行。他的骑兵也

继续骚扰敌人的队伍，拖慢其速度。恺撒军队赢得了这场赛跑，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命令垂头丧气的部下停住脚步。恺撒军队的官兵都热切希望尽快与敌交战，因为敌人缺少地形优势且士气低落，于是敦促恺撒下令进攻。恺撒拒绝了，因为他觉得敌人断绝了给养，迟早会投降。他认为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士兵流血牺牲，也没有必要让为敌人作战的公民同胞丧命。恺撒的一些老兵颇为不满，嘀嘀咕咕了一番，还三心二意地说，等他最终下令进攻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作战。

随后几天内，两军都开始建造防御工事，庞培军队的目标是保障水的供应，恺撒的目标则是将敌人围堵起来，阻止其得到供水。在这期间，双方都有很多人开始与敌人友好地接触，寻找亲戚、朋友和邻居。庞培军队的一些军官已经谈到要投降，阿弗拉尼乌斯的儿子派了一位朋友去与恺撒谈判。阿弗拉尼乌斯似乎已经无心继续战斗，但佩特列乌斯仍然坚定不移，带领自己的卫队（西班牙骑兵和轻步兵）去屠戮每一名与自己部队攀谈的恺撒士兵。有些恺撒士兵杀出了一条血路，而其他人则被庞培士兵藏起来，在夜间溜走。而走到恺撒军中的庞培士兵则被允许自由离去或者留下。佩特列乌斯恳求他的士兵们继续保持忠诚，并要求他们宣誓“绝不当逃兵，绝不背叛军队及军官，也绝不将个人安全置于集体利益之上”。他哄骗阿弗拉尼乌斯发出了这个誓言，然后是高级军官和级别较低的军官，最后是普通士兵。[34]

庞培军队做了最后一次突围的努力。恺撒紧追不放，持续骚扰敌人撤退的队伍。敌人又一次被包围起来，这一次的处境更艰难，没有任何水源。恺撒仍然希望避免交战，于是双方又一次开始建造防御工事。庞培军队企图重新渡过西科里斯河，但被拦截住。粮草已经告急，阿弗拉尼乌斯开始向恺撒求和。恺撒斥责敌军将领毫无必要地浪费士兵的生命。但他就像在科尔菲涅乌姆和整个内战期间一样，允许所有敌军将领自由离去。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的军队被解散，恺撒亲自监督了这个过程。此时在外西班牙，庞培军队的军团长瓦罗受到阿弗拉尼乌斯

先前极其乐观的报告的鼓舞，决定证明自己是庞培及其事业的一员干将。他开始征募军队，囤积粮草。在伊莱尔达的庞培军队全部投降之后，恺撒率军奔向外西班牙。瓦罗此时已经得知恺撒得胜，大感泄气，而且他的行省居民普遍拥护胜利者恺撒。他的部队弃他而去，于是他迅速向恺撒写信投降。西班牙全境现在处于恺撒的控制之下。尽管有过一些困难的时刻，但恺撒速战速决的计划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到夏末，马西利亚也停止了抵抗。这一次，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在城市投降前不久乘船逃走，因此没有第二次被俘。他将再次与恺撒交手。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也是如此，他们和阿赫诺巴尔布斯一样，愿意接受恺撒的仁慈，对恺撒的仇恨却并没有因此减少一分。庞培和他的盟友们也一心要赢得战争。战争将持续下去。[35]

---

[1] Cicero，*ad Att.* 7.11.

[2] Cicero，*ad Att.* 9.7C.

[3] Caesar，*BC* 1.7-8，Appian，*BC* 2.33，Suetonius，*Caesar* 33，Dio 41.4.1；关于庞培推荐的百夫长，见Suetonius，*Caesar* 75.1；关于士兵的军饷，见Suetonius，*Caesar* 26.3，对军饷的讨论见 G.Watson，*The Roman Soldier* （1969），pp.89-92。

[4] 即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的姐姐，后来成为马克·安东尼的第四任妻子。

[5] 关于马凯鲁斯，见R.Syme，*Roman Revolution* （1939），p.62；关于布鲁图斯，仅Plutarch，*Brutus* 4。

[6] See Caesar，*BG* 8.52，Cicero，*ad Att.* 7.7.6，7.12.5，7.13.1，*ad Fam.* 16.12.4，Dio 41.4.2-4，and R.Syme，‘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 *JRS* 28 （1938），pp.113-125，& W.Tyrell，‘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Historia* 21 （1972），pp.424-440.

[7] Cicero，*ad Fam.* 8.14.3.

[8] Caesar，*BC* 1.6，Cicero，*ad Fam.* 16.12.3.

[9]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是本人主人公恺撒的远方堂兄，曾担任前64年执政官。他的父亲也叫卢基乌斯，是前90年执政官。他的儿子，即下文的“小卢基乌斯·恺撒”，在内战中站在庞培一边，反对自己的父亲和叔叔。

[10] 阿普利亚（拉丁文古名），或称普利亚（现代意大利语的名字），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东南邻伊奥尼亚海，南邻近奥特朗托海峡及塔兰托湾。该区南部知名的萨伦托半岛，组成了意大利“皮靴”脚后跟的一部分。

[11] Cicero，*ad Att.* 7.14.

[12] Caesar，*BC* 1.8-11，Dio 41.5.1-10.2，Appian，*BC* 2.36-37，Plutarch，*Caesar* 33-34，*Pompey* 60-61，*Cato the Younger* 52.

[13] Caesar，*BC* 1.12-15.

[14] 马尔西人是古意大利的一个民族，曾长期是罗马的盟友，但在同盟者战争中反对罗马，后被接纳为罗马公民。

[15] Caesar，*BC* 1.16-23 and quote from 1.23，cf.Dio 41.2-11.3；关于多米提乌斯和庞培的书信，见Cicero，*ad Att.* 8.11A，12B，12C，12D。

[16] Plutarch，*Pompey* 57，60.

[17] Caesar，*BC* 1.24-29，Dio 41.12.1-3，Appian，*BC* 2.38-40；关于内战的开始，见M.Gelzer，*Caesar*（1968），pp.192-204，C.Meier，*Caesar*（1996），pp.364-387，and 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52-161。

[18] Caesar，*BC* 1.29-31，Cicero，*ad Att* .7.11.3，9.1.3，11.3，Appian，*BC* 2.37；Suetonius，*Caesar* 34.2 for the quote.

[19] T.Mitchell，*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1991），pp.243-266.

[20] Cicero，*ad Fam.* 2.15，8.11.2，*ad Att.* 7.1.7，2.5-7，3.5，cf.Mitchell（1991），pp.235-236.

[21] Cicero，*ad Att.* 9.6a；see also *ad Att.* 8.13，9.13.4，15.3，16.1-2，9.1.2，5.4，8.1.

[22] 西塞罗3月19日的信，见Cicero，*ad Att.* 9.11a；恺撒3月26日的信，见9.16；两人的会面，见9.18。

[23] Caesar，*BC* 1.32-33，Dio 41.15.1-16.4.

[24] Caesar，*BC* 1.32-33，Dio 41.17.1-3，Appian，*BC* 2.41，Plutarch，*Caesar* 35，Pliny，*NH* 33.56，Orosius 6.15.5.

[25] 西塞罗的女婿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

[26] See，for example，Cicero，*ad Att* .10.4.8，*ad Fam.* 8.16.2-5.

[27] Sallust，*Bell.Cat.* 59.6，Pliny，*NH* 22.11；Caesar，*BC* 1.38-39.

[28] Caesar，*BC* 1.37，39，Dio 41.19.1-4，Velleius Paterculus 2.50.3，Cicero，*ad Att.* 10.8b.

[29] For the quotation see Caesar，*BC* 1.39；more generally see 1.37-40.

[30] Caesar，*BC* 1.41-42.

[31] Caesar，*BC* 1.44-48.

[32] Caesar，*BC* 1.47-55，59-61.

[33] Caesar，*BC* 1.61-65.

[34] Caesar，*BC* 1.66-76.

[35] Caesar，*BC* 1.77-87，关于围攻马西利亚，见see 1.56-58，2.1-16，22，Varro 2.17-21。

十九 马其顿，前49年11月～前48年8月

看看格奈乌斯·庞培的处境，他的赫赫威名，他往昔的丰功伟绩，甚至他常常吹嘘的对他唯命是从的诸多君主和国家，竟都不能保障他的安全；他竟连体面地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哪怕是最低贱的人也享有这样的机会；他被赶出意大利，又丢掉了西班牙；他的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当了俘虏，现在他又遭到了封锁，我觉得历史上不曾有第二位将军遭遇过这样的窘困。

——前48年5月～6月，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在恺撒营地（狄拉奇乌姆城外）给西塞罗的信[1]

幸运女神对所有事务都有着极大的控制力量，对战争的影响力最大，她用一点点纷扰便能极大地改变人的命运。

——恺撒[2]

恺撒将昆图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留在西班牙，让他掌管那里。这对一位平民保民官来说是个不寻常的任命，但这毕竟是非常时期，而且卡西乌斯担任财务官时已经在西班牙服役过，对该地区及其人民有一些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恺撒的这个选择不是很明智。恺撒欢迎所有前来投奔他的人，用荣耀、官职和财富奖赏忠诚的部下。他曾说，哪怕是一个土匪帮助了他，他也会信守诺言去奖赏他。一大群浪荡子奔去投靠恺撒，西塞罗和其他人对这些人十分鄙夷。他们觉得这些浪荡子糟践了自己的遗产，现在却觊觎共和国的统治权。苏埃托尼乌斯说在前49年之前，恺撒常开玩笑地告诉这些人，他们需要一场内战。的确有很多落魄绝望之徒来投奔恺撒，恺撒的胜利对他们来讲是获取财富和取得政治成功的最后一线希望，但我们不能太过相信西塞罗以偏概全的评价和庞培派的宣传。在内战期间，恺撒的军团长和高级下属们（除了少数特例之外）的确才干平平或品行败坏。其中有好几位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庞培军中很多高级军官的能力和人品同样成问题，尽管这些人的出身更显赫。庞培阵营的许多前任执政官都曾遭到选举舞弊的指控。恺撒

的优势在于，他的命令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不需要和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这样目无纪律、我行我素的人打交道。不过，肯定是在恺撒亲自指挥的时候，情况要更好一些。特雷博尼乌斯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攻打马西利亚的战役很出色。库里奥无须作战就控制了西西里，因为被庞培军队派去保卫西西里的加图手中没有多少可以调用的军队，并且他认为在一场必败无疑的防御战中浪费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库里奥取得此次胜利后，便于前49年率军前往北非。起初他打得不错，击溃了一支强大的庞培军队，但后来被努米底亚国王朱巴一世的军队诱骗进了埋伏圈。库里奥和他的许多士兵死战到底，血洒沙场。其他人逃跑时惨遭屠戮，或者投降之后被国王下令处决。只有少数人得以逃生，包括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可能就是因为恺撒对库里奥的过分褒奖，才让波利奥后来对《战记》中一些段落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马克·安东尼的弟弟卢基乌斯吃了一场小败仗，他在伊利里库姆率领15个大队向敌人投降了。[3]

恺撒从西班牙返回意大利的时候，得知了这些挫折。这些失败很不幸，但主动权仍然在他手中，他决心尽快与庞培及敌人的主力部队决战。或许更令他担忧的是，他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普拉坎提亚（今皮亚琴察）驻扎时发生了哗变。比较棘手的是哗变从第九军团开始，该军团在西班牙为恺撒效力，战绩不错。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哗变一样，此次兵变也有诸多诱因，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在相对安定无聊的时期浮出水面。战争远远没有结束，将军还需要他们，所以很多士兵一定猜到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和将军讨价还价。有些士兵已经服役期满，希望退伍回家。许多人发牢骚，恺撒当年早些时候在布隆迪西乌姆许诺给他们每人500迪纳厄斯赏金，至今还没有兑现。还有人抱怨，恺撒对敌人过于温和宽大，使己方迟迟不能得胜；或许更重要的是，士兵们没有机会掳掠战利品。恺撒得到哗变报告时还在马西利亚，但立刻赶往现场，与哗变士兵对质。恺撒严厉而毫不留情地解释，这样一场宏大的战争是急不得的。然后他宣布，他打算对第九军团施行十一抽杀刑罚。这是一种

古老的惩罚，在每十人中抽签选出一人，由战友们将他活活打死。军团的其余人则将灰溜溜地被逐出军队。老兵们听到这话，灰心丧气，军官们则开始恳求严酷的统帅开恩。恺撒深知如何操控人群，逐渐让步，最后只需要让120名带头闹事的人抽签，抽出12人处决。抽签应当是预先操纵好的，确保让主要的闹事者被抽中。但据阿庇安说，一个在哗变期间根本不在军营的士兵被抽中了。恺撒发现此事之后，立刻将他释放，并让企图以这种方式害死一名无辜者的百夫长代他受死。这是前58年以来恺撒第一次遇到麾下士兵抗命不遵的情况，但这次哗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在随后的战事中，第九军团将为恺撒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其他部队表现也非常精彩。《战记》中没有提及这整个事件。[4]

庞培自3月从布隆迪西乌姆逃脱以来，一直在运用他的全部组织技能，创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希望借此赢得最终胜利。与此同时，他利用自己在该地区的人脉（这里的几乎所有社区，所有主要统治者都是他的门客）来动员地中海东部的人力和资源，为他的士兵提供军饷、粮草和装备，并征募盟军和辅助部队，充实军力。他拥有9个军团和从意大利带来的一些混合部队，以及从定居或暂居希腊和亚细亚的公民当中征募的一些新部队。梅特卢斯·西庇阿动身去了叙利亚，后来带来了2个原先驻扎在帕提亚边境的军团。庞培进行了一系列手忙脚乱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帕提亚不会出兵威胁叙利亚行省。史料告诉我们，庞培还曾认真地努力寻求帕提亚人的军事援助。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庞培确实大量使用了外籍军队，并集结了一支特别强大的骑兵。用来组建一支大军的原材料已经备齐，庞培就在这几个月里集中精力训练新兵。他已经五十七岁，而且在内战爆发前已经有十三年没有打过仗，但所有人都对他的充沛精力肃然起敬。统帅与士兵们一起操练，穿戴罗马军团士兵的装备，或者骑马向骑兵演示如何作战。普鲁塔克说，庞培投掷标枪比任何年轻人投得更远、更准，力道也更猛。在他的鼓舞下，一支强悍而高效的军队正在逐渐成形。这一年中，庞培军队越来越强大。[5]

在恺撒远征西班牙期间，一些元老渐渐离开了意大利，决定结束自己的中立，投奔庞培军队。有些人判断庞培会打赢，因此要加入胜利者那一边。也有人是出于良心考虑或者被亲戚朋友劝服了。这场内战的一个奇怪之处是通信仍然畅通无阻，人们可以随意与交战双方通信。在这一阶段决定积极参与内战的人当中，最显赫的要数西塞罗，他在长时间的纠结苦思之后决定渡海前往希腊。他仍然认为内战是不必要的，并且憎恨庞培放弃罗马和意大利的计划。恺撒的宽宏大量让西塞罗大受鼓舞，但他说不准恺撒的仁慈能够维持多久；一旦恺撒确立了主宰地位，会不会像前80年代的秦纳那样杀人不眨眼。库里奥在入侵西西里的途中拜访了西塞罗，但未能缓解后者的恐惧。库里奥公开表示，他认为恺撒的仁慈完全是出于政策考虑，因为这与他残酷的天性相抵触；假以时日，恺撒的面具会被抛弃，他会露出本性。库里奥是恺撒的盟友，这样说话显得有点奇怪，但库里奥素来是个口无遮拦的人。他和恺撒并不熟悉，一年前才加入恺撒阵营，因此他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后来事实证明，恺撒始终对敌人抱以宽大的态度，从来没有试图用恐惧来压服世人。终其一生，很难说恺撒是个真正残酷的人。如果他认为无情对自己有利，那他完全可以表现得无情；他有一种冰冷的暴脾气，但他从来不会仅仅为了残酷而残酷。西塞罗不确定恺撒将来会如何行事。他对庞培的态度也是类似的。他判断不管谁打赢了内战，都会成为独裁者，拥有君主般的生杀大权。但西塞罗内心深处始终爱戴庞培，并且极其尊重这位曾与他并肩作战的伟人。西塞罗敬佩的其实是他心目中的庞培，而不是实际的庞培，但他对庞培的感情并不因此而削弱一分。西塞罗不愿意无所事事，也不愿意参加由恺撒控制的元老院的政治活动。尽管恺撒阵营里有他的亲戚朋友，他们给他写了信，恺撒本人也来了信，但最终西塞罗还是决定加入庞培阵营。他的弟弟昆图斯虽然在高卢担任恺撒的军团长多年，但也加入了庞培派。[6]

有些元老跑去投奔庞培，但大部分元老仍然保持中立，恺撒也继续在罗马维持表面上正常的政治生活。他希望担任前48年的执政官，但没

有现任执政官来主持选举。倒是有一位裁判官，但之前从未有过裁判官监督选举新执政官的先例。恺撒提出这个建议，被观鸟占卜师们否决了。最后裁判官马尔库斯·李必达任命恺撒为独裁官，好让他主持选举。这种做法有过一次先例，那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恺撒返回了罗马，召开了百人会议，顺利当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他的同僚是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苏利库斯。这种做法尽管不太符合常规，但严格来讲是合法的，不过在当时的选举中很可能没有别的候选人了。恺撒于前48年再次担任执政官，距他上一次担任这个官职已经过去了十年，符合法律规定。他的同僚是他于前70年代在亚细亚服兵役时的老上司的儿子，是门阀贵族成员，娶了加图的一个侄女。这也说明在内战期间，效忠关系是多么复杂，多么令人眼花缭乱。

其他的行政长官职位也进行了选举，凯利乌斯·鲁弗斯当选为裁判官。随后恺撒利用自己独裁官的权力，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其中一部法律召回了所有于前52年被庞培的特别法庭流放的人。米罗被刻意排除在外，因此从此法律获益的人大多是克洛狄乌斯的党羽。恺撒还召回了撒路斯提乌斯（他被担任监察官的阿庇乌斯·克劳狄驱逐）和加比尼乌斯（帮助埃及法老托勒密十二世复辟的前任叙利亚总督）。这两人后来在内战期间都为恺撒作战。苏拉迫害政敌时受害者的子女也被恢复了全部的政治权利。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巩固追随者们对他的忠诚，并赢得一些新的支持者。更受大众关注的是债务问题，因为自开战以来，房地产的价值大幅跳水。很多人大声呼吁废除债务，尤其是那些债台高筑的人（其中很多加入了恺撒阵营）。要求“新账本”（意思是销毁所有现存的账本，从头开始）的呼声在近几十年中频频发出，也是喀提林叛乱的主要口号之一。恺撒是世人皆知的平民派，也常常欠债，所以很多人担心他会用这种手段笼络人心。但独裁官拒绝运用这么极端的措施，而是寻求妥协方案。他任命了评估员，按照财产的战前价值估值，并迫使债务人将这些财产交给债权人，以此抵债。恺撒还恢复了一项旧规定，即任何人都不得拥有超过1.5万迪纳厄斯现金。这项规定的目的是防止囤积

货币，因为那样会对罗马和意大利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这些措施当然都很难真正落实。[7]

大冲撞

恺撒担任独裁官仅11天后便辞去这个职务，离开了罗马。他没有按照常规等到1月就任执政官，而是火速赶往布隆迪西乌姆。此前他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在那里集结。尽管他的军官们在过去6个月里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严重缺少运输船只。恺撒在布隆迪西乌姆及其周边地区拥有12个军团（实际可以动用的兵力为2.5万～3万人，因为这些军团之前有伤亡，而且在从西班牙返回的途中留下了很多掉队士兵和伤病员），船只却只够运送1.5万名步兵和500名骑兵。即便这么少的部队也只能携带最低限度的辎重给养，而骑兵的比例之所以如此低，是因为他们的马匹需要更大空间。很显然，要往返多次才能将大军全部运到对岸，但如果这样操作，先期抵达的部队就可能在后续部队到来之前被敌人消灭。而且第一批渡海的部队也会遇到很大危险，因为庞培军队已经集结了一支非常强大的舰队，约有500艘战船和许多用于侦察的小船。舰队主力由毕布路斯指挥，驻扎在亚得里亚海东岸，以拦截恺撒的入侵军队。恺撒手中只有12艘武装桨帆船，如果运输船队在海上遭遇敌人海军，那么肯定没有办法保护运输船，而且每一趟跨越亚得里亚海的运输航行都需要面对这么严重的威胁。恺撒知道这些情况，但也知道局势在近期不会有任何改观。他深知拖延时间只会让庞培变得更强大，准备得更充分，因此他急于直捣敌军的心脏。由于天气恶劣，他耽搁了几周，直到前48年1月4日才起航。一年前，没有人想到恺撒竟然会在冬季发动进攻，因为冬季一般要休兵。这一次，敌人仍然没有想到他会在冬季出战。庞培的军队分散驻扎在许多冬季营地，而毕布路斯的舰队尚未做好准备。恺撒轻松渡海，在伊庇鲁斯海岸的派赖斯特登陆，未曾受到任何抵抗。他的部队迅速上岸，船只于当夜返回布隆迪西乌姆去装载下一批部队，但这一次敌人已经察觉，拦截了一些船只。据恺撒说，毕布路斯大发雷霆，

下令将缴获的这些船只连同其水手全部付之一炬。恺撒的大部分运输船都安全返回了，但很显然，下一次敌人将会严阵以待。[8]

恺撒在短期内被切断了援兵和补给线。他手中有7个军团（每个军团平均有2140人）以及500名骑兵，但船上没有空间运载足够多的粮食，所以他们必须就地取粮。罗马历法比实际的季节要早几个星期，所以现在实际上是秋末。恺撒必须想办法让部队集中起来，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吃饱穿暖，同时与敌人作战。登陆后的第二夜，恺撒率军攻打奥利库姆，这里的市民组织起来反对驻扎在那里的一小队庞培派士兵，很快向恺撒献城投降。据《战记》记载，奥利库姆市民不愿意反抗一位代表罗马人民、拥有合法军权的统帅。他们很可能还做了理性的推断，认为此地兵力单薄的庞培军队不可能打赢。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都没有明确地支持内战的任何一方，大多数行省居民也没有什么强烈的好恶，这不足为奇。恺撒像往常一样饶了驻军指挥官卢基乌斯·曼利乌斯·托夸图斯的性命，后者选择为恺撒效力。此番得胜之后，恺撒向阿波罗尼亚推进，那里的平民也不愿意反对他，迫使驻扎在那里的庞培军队逃跑。伊庇鲁斯的大部分地区很快效仿这些城镇，投奔了恺撒。于是他在希腊有了一个稳固的基地，目前这些城镇能够为他的军队提供足够的给养。他还缴获了敌军搜罗的一些储备粮食，不过有一队停在奥利库姆附近的运粮船被护航的庞培军队凿沉了。庞培的主要补给站位于沿海更北面的重要贸易港口狄拉奇乌姆（今天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恺撒率军去夺取这个重要战利品，但此时敌军已经开始做出反应。庞培命令他的军队集结起来，以强行军火速赶往狄拉奇乌姆，抢在恺撒前头抵达那里。于是，恺撒迅速撤退了。敌军有9个军团，而且兵力接近满员，所以对恺撒有着超过二比一的兵力优势。但恺撒军队出其不意的登陆和起初的胜利似乎让庞培军队大受震撼，士气低落。拉比埃努斯公开对庞培表忠心，发誓绝不背弃他，与他同甘共苦。保民官和百夫长们接着宣誓，最后所有军团士兵集体宣了誓。[9]

恺撒撤到了伊庇鲁斯。尽管他控制着阿波罗尼亚和奥利库姆这两个港口，但毕布路斯的舰队现在非常活跃，实施了严密封锁。恺撒的一队运兵船被迫返回布隆迪西乌姆，还损失了1艘船。毕布路斯将这艘船上的所有人，不管衔级高低，一律处死。或许他希望用这样的暴行来震慑对方，威吓他们不要去增援恺撒，但他对恺撒（在担任市政官、裁判官和执政官期间，恺撒一直是他的同僚）的仇恨显然让他愈加残暴。私人的悲恸或许对他也有影响，因为他的两个年纪最大的儿子前不久在埃及被谋杀了。毕布路斯打仗的时候带着一种令人胆寒的残忍野蛮，但他并非独一无二。从内战一开始，庞培军队中就很少有人表现出像恺撒那样的宽宏和节制。恺撒的宽宏大量显然表明他比敌人略胜一筹，这让庞培派更加恼怒，促使他们做出更多暴行。西塞罗看到庞培阵营的这种态度，不禁大吃一惊。庞培派的主要领导人宣称，那些保持中立的人简直和恺撒党羽一样可恶，等他们杀回意大利之后，要来一场大范围的惩罚。[10]

恺撒驻扎在阿普苏斯河附近，离阿波罗尼亚不远。庞培的军队（比恺撒兵力更强）驻扎在河对岸的一个地方，但没有要来进攻和交锋的意思。恺撒将一名被俘的庞培派军官（此人已是第二次被俘）送回，希望与庞培谈判。恺撒建议，他和庞培都宣誓在三天之内解散各自军队（这看起来公平，不过很不实际），然后请元老院和人民来仲裁他们之间的纠纷。庞培起初没有回复，但恺撒很乐意等待，希望自己的更多部队能从意大利赶来。与此同时，他封锁海岸，阻止毕布路斯的舰队停靠，对其施加压力。武装桨帆船虽然尺寸不大，但船员非常多，因为它的速度和机动性都依赖许多桨手的体力。因此船上没有多少空间来运载食物和饮用水，甚至没有空间让桨手们自由活动或休息，因为他们的身体就是压舱物，用来保持船体平衡。所以，桨帆船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就靠岸，最少也要三天一次，以补充给养并让桨手和水手们休息。古代的舰队能够有效发挥战斗力的条件是附近有自己的基地，或者能够得到陆军的紧密支持。恺撒的士兵们控制着港口，监视着海岸，攻击任何企图靠岸的

敌船，迫使毕布路斯的水手们频繁地返回基地（位于克基拉岛[11]）。再加上冬季天气恶劣，海上封锁的任务给庞培舰队带来了极大压力。毕布路斯要求休战，但自己不去谈判，而是派了高级军团长卢基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利博。这样做的理由是，他对恺撒的私人仇恨和他的火爆脾气对谈判不利。利博的女儿嫁给了庞培的幼子塞克斯图斯，这也表明庞培派许多领导人之间存在紧密的姻亲联系。恺撒去参加谈判，但是大失所望，因为利博只是要求停战，好让庞培的船只能够随意靠岸，而其他一切事物都要请庞培定夺。恺撒回答说，只有在庞培派停止海上封锁的情况下，他才同意停战。他要求利博保证他即将派往庞培处的使者的人身安全。恺撒的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正如《战记》中的记载："恺撒认识到，利博的一席话完全是由于庞培军队目前的危险处境和补给困难，而并无和谈的诚意，于是恺撒将注意力转回到作战计划上。"[12]

毕布路斯积劳成疾，不久后去世了。没有人被指定去接替他舰队总司令的职务，而庞培军队不顾困难，继续封锁大海。在阿普苏斯河，两军仍然隔河对望。双方进行了更多次的谈判。有一次，瓦提尼乌斯来到河边，向敌军前哨阵地喊话，最后对方告诉他，次日将有一名军官前来会谈。谈判果然开始了，但拉比埃努斯怒气冲冲地插手干涉，最后放了一轮箭，谈判不欢而散。恺撒的前任军团长后来叫嚷着说，他们将"停止任何和谈；除非把恺撒的脑袋送来，否则绝不讲和"。据说，在这不久之前，庞培曾说如果让世人以为他是因为"恺撒的慷慨仁慈"才活下来，他绝不会考虑和谈。两军就这样僵持不下，随着时间流逝，恺撒越来越绝望，因为没有任何援军从意大利赶来。有好几份史料称，他开始疑心留在意大利的部下们的信念和忠诚。他认为只有自己亲自到场，才能推动援军的行动，于是决定亲自前往布隆迪西乌姆。他乔装打扮成自己的一名奴隶（此人常担任信使），登上一艘停泊在奥斯河口附近的小商船。小商船沿河驶向大海，海上刮来一阵劲风，船员们挣扎着逆风行驶。过了一会儿，水手们决定放弃努力，调头返回。这时恺撒突然抛下

自己的斗篷，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们运载着“恺撒和恺撒的好运气”。桨手和舵手们百倍努力，想要将船划到海上，但最终被迫放弃。一位将军在当前的形势下会不会抛弃自己的部队，哪怕是为了召来援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或许正因如此，《战记》中不曾记录此事。但据普鲁塔克说，恺撒麾下将士得知此事后并未感到自己被统帅抛下了，而是觉得有些恼怒。在他们看来，统帅居然如此不自信，不相信仅凭他们就能打赢战争，反而还要去搬救兵。据说他返回军营时，士兵们围在他身边，恳求对他们多一些信心。这表明自高卢的早期岁月起，将军和士兵之间已经培养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密纽带和高度信任。[13]

狄拉奇乌姆

最终，4月10日，马克·安东尼率领大部队从布隆迪西乌姆渡海来到希腊，在北面的利苏斯[14]附近登陆。他带来了4个军团和800名骑兵。庞培动作迟缓，未能阻止恺撒两支军队的会师。现在恺撒手中有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他的总兵力仍然少于敌军，尤其是骑兵远少于敌军，但他的老兵们经验丰富、战斗力超强，足以弥补人数上的劣势。但是，大批援军的抵达增加了补给困难，尤其是如果大军要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时间的话。他派遣了一些较大的分队离开主力部队，去保护他在色萨利和马其顿的盟友。恺撒带着剩余部队向庞培求战，后者拒绝迎战。庞培仍然坚信，只要切断恺撒军队的粮食供应，就能将其拖垮。恺撒深知这个威胁，于是决定再一次尝试占领位于狄拉奇乌姆的庞培军队主要补给基地。这一次，他比敌人先抵达那里，但还不够快，没能够夺取城镇及其补给物资。他在狄拉奇乌姆与庞培军队之间扎营，而庞培军队驻扎在一座名叫佩特拉的山上，俯瞰一处天然港口。庞培借助通畅的海路，可以与狄拉奇乌姆城和其他地区的部队保持联系。他发出命令，指示从远至亚细亚的地方直接向前线军队输送粮食。恺撒的营地在内陆的高地上，他的部队需要从周边地区搜罗粮草。他决定在山上建造一道防线，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搜粮队，也是为了阻挡庞培军队的搜粮队。庞培军

队的骑兵马匹和运送给养的牲口更多，所以需求也更大。另外，“恺撒还想让庞培在外国人面前丧失颜面，让世人都知道庞培遭到恺撒围攻，却不敢正面交锋”。庞培绝不能撤退，绝不能将狄拉奇乌姆及其补给站拱手让给恺撒。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下也修建一道防线，与恺撒对峙。为了控制高地上的一些关键地点，两军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有一次第九军团的一支队伍暴露在敌人弓箭手和投石手的火力之下，不得不撤退。第九军团在马克·安东尼的指挥下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将追击他们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以此表明自己撤退不是因为被打败了，而是自己愿意撤退。庞培军队的防线竣工后全长15里，建有24座堡垒。恺撒军队在外面，因为他希望将敌军完全包围起来，所以他的防线最终长达约17里。[15]

恺撒军队缺少粮草，因为此刻仍然是冬季，尽管按照历法已经算是春季了。牲口还算不少，所以肉食供应一般没有问题，口粮中肉食的比例比平日要高。粮食毕竟难以获得，士兵们往往不得不吃大麦（通常是牲口饲料），而不是小麦。就连大麦有时也搞不到，他们就只能吃一种叫作“卡拉克斯”的植物的根，将其与牛奶掺和，烤制成一种面包。庞培看到这种面包后懊恼地说，他的这些敌人是野兽，不是人。恺撒军队有充足的水源，但他命令士兵们将经过他们战线并流向敌军阵地的小溪改道或者筑坝拦截。庞培军队的粮草很充足，因为他们可以持续地从海上获得给养，但开始缺水了。庞培命令士兵们挖井，但效果不好。在战线形成的狭窄空间内聚集了数量极多的人，除了士兵和仆役之外还有很多牲口。草料和饮水优先供给骑兵的马匹，所以搬运辎重的役畜开始大批死亡或被刻意杀死。狭窄的军营内还开始暴发疾病，可能是斑疹伤寒，但史料对病状的描述很含糊。双方都承受了很大苦痛，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场规模极大的围城战。但既然已经投身于此，双方的指挥官都不肯让步，而敌人的苦难只会鼓励己方坚持下去。恺撒感到，他的士兵们和他一样自信。有时他们将卡拉克斯面包片扔到敌军战线，嘲讽敌人，展示自己的决心。时间一周周过去，田地里的庄稼开始成熟，估计会丰收，

这对士兵们是新的鼓舞。据恺撒说，他的一些哨兵曾表示，他们宁愿吃树皮，也绝不让庞培逃跑。[16]



图**11** 狄拉奇乌姆的战线

防御工事的修建仍在进行，恺撒希望对敌军形成合围，迫使庞培要么从海路逃跑，要么强行突围，要么看着自己的军队一天天衰弱下去。小规模战斗和袭击还在持续。庞培军队的弓箭手和投石手开始攻击恺撒战线上可以看得见的篝火或其附近。于是恺撒的士兵们坐在或卧在离篝火较远的地方，宁愿安全但寒冷，也不愿温暖却危险。后来，庞培向恺撒战线的一些地段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试探其实力，寻找薄弱点。庞培军队进攻了一座关键的山头，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他是独裁官苏拉的侄子，独裁官的儿子福斯图斯·苏拉为庞培效力）率领2个军团赶到，支援受到威胁的堡垒，打退了敌人。庞培军队被击溃了，但苏拉没有即刻乘胜追击。恺撒对他的决定表示认可，认为一位军团长如此谨慎是正确的，重大的决定应当由总司令来做出。《战记》自豪地细数了恺撒麾下士兵的英勇事迹。在一个地段，第九军团的3个大队阻挡了敌军的一整个军团以及大批盟军的弓箭手和投石手。鏖战一天之后，守

军几乎所有人都负了伤，不过显然还有很多士兵具有战斗力，并且愿意继续作战。大多数伤员都是被投射武器打伤的。据说，在击退敌军的最后一波进攻之后，在堡垒内捡到了3万支箭。有一个大队的6名百夫长中有4人面部中箭。一个叫作斯凯瓦的百夫长的盾牌被不少于120件投射武器击中。其他史料告诉我们，斯凯瓦的一只眼睛也被射中，大腿和肩膀也负了伤，但他仍然坚持战斗。有一次，他假装愿意投降，等敌人冲上前来的时候，斩杀一名敌军，将另一人的胳膊砍断。随后斯凯瓦和他的部下坚守阵地，岿然不动，以至于敌人不敢上前。斯凯瓦可能已为恺撒效力多年，或许恺撒在西班牙担任总督的时候以及在高卢的时候，斯凯瓦就在他麾下。恺撒慷慨大方地褒奖了整个大队，把他们的军饷翻了一倍，给许多人授勋，给他们发放新服装和额外口粮。口粮在有些时候对士兵们来说是最珍贵的奖励；不过我们永远都不要怀疑，对优秀士兵来说，自豪感也是极为重要的。斯凯瓦被晋升为首席百夫长，即罗马军团中的资深百夫长，并得到了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赏金。这不是他最后一次为恺撒效力。后来他可能成了一名骑士，有一段时间还指挥了一支辅助骑兵，该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斯凯瓦部队”。[17]

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但恺撒的兵力少于敌军，却要防守比敌军长的战线，是非常困难的。据《战记》记载，庞培军队在此役中损失了约2000人，包括一些百夫长，其中一人还是一位前任裁判官的儿子。而恺撒方面只有20人死亡，不过他也暗示说，负伤的人很多。斯凯瓦和他的很多士兵要过多久才能重返前线，是很值得商榷的。此次激战之后，庞培的士兵花了几天时间加固自己战线上的薄弱地点，将壁垒的高度提升到了15英尺。恺撒的对策是每天早上率军出战，将部队部署在敌人工事内投石机射程之外的地方。庞培感到如果不做出任何回应，他自己的威望会受损，部队的自信心也会受到打击。于是他也排兵布阵，但他的三列阵线的最后一线大队就在壁垒前方不远处。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饥饿迫使敌军屈服，因此不愿意交战。如果真打起来，对恺撒更有利，因为恺撒的士兵久经沙场，而庞培的士兵经验不足；另外两军之间地形崎

岖，庞培的骑兵优势也发挥不出来。恺撒拒绝发布进攻的命令。庞培军队在山坡的高处，居高临下，而且还可以在他们背后的壁垒上用投射武器支援前方。恺撒对这种形势感到满意，因为他知道他的士兵们会觉得庞培军队怯战，不敢出来正面交锋。恺撒目前已经不指望与庞培进行成功的和谈，但他做了一番间接努力，派人给梅特卢斯·西庇阿送信。梅特卢斯·西庇阿刚率领从叙利亚来的军队抵达马其顿。与此同时，为了给庞培施加更大压力，恺撒的士兵们扩建了自己的战线，以封堵通往狄拉奇乌姆的两条道路。庞培从海上运送了一支骑兵部队到狄拉奇乌姆附近。大约在同一时期，他可能还曾尝试以夜间奇袭攻克城市，或许是恺撒那边有叛徒表示愿意为他打开城门。此次攻城尝试失败了，但恺撒扩建的战线使庞培的骑兵更难找到草料，于是几天之后他们被船运回庞培的主阵地。到这时，马的主要饲料是树叶和芦苇，因为没有办法从克基拉或更远的地方运来正规的饲料。[18]

庞培认识到自己部队受到的折磨和敌军一样厉害，甚至比敌军更惨，于是决定重新夺回主动权。两位高卢贵族路基鲁斯和艾古斯从恺撒阵营叛逃，给了庞培一个机会。这兄弟俩是外高卢阿洛布罗基部落一位主要酋长的儿子，在恺撒麾下效力多年，指挥一队部落骑兵，战绩不错。恺撒按照自己的一贯做法，慷慨地奖赏他们的忠诚，授予他们元老地位。这很可能指的是在他们自己部落内的元老，但也有人根据更合理的史料解读方法，认为恺撒让他们当上了罗马的元老。这兄弟俩很可能已经有了罗马公民身份。但在最近一段时间，兄弟俩开始贪污他们麾下士兵的军饷，还故意夸大自己队伍的人数，以便冒领军饷和粮食。最后，他们自己的士兵跑去向恺撒告状。恺撒暂时没有做正式的处理，但私下里和他们谈了话，命令他们停止这种贪赃枉法的行为。兄弟俩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受欢迎了，害怕将来受到惩罚，于是开始密谋逃跑。他们借了很多钱（据传闻，他们想要补偿自己的部下），开始收购马匹。他们还想谋杀恺撒骑兵部队的总指挥官，但觉得不切实际，于是路基鲁斯和艾古斯干脆变节投敌。他们私人所属的武士们也跟他们一同离去了，

因为他们向酋长发过誓，必须始终追随自己的酋长。庞培很高兴，因为内战打到现在，还不曾有人从恺撒军中反水。他将两个高卢贵族在自己的整条战线上展示，让士兵们都看到他们，以此表明敌军肯定正在衰落，因为两位重要人物都选择背弃他们。更重要的是，两兄弟之前在恺撒军中占据高位，因此对恺撒的战线及其军队的日常工作非常熟悉。[19]

得到这些情报之后，庞培开始准备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打算一举突破恺撒的战线，结束封锁。白天，他的士兵们为自己的头盔制作柳条罩。柳条罩既能避免青铜头盔闪光，防止在光照下暴露士兵的位置，也能增强防护力，吸收投射武器的部分冲击力。这特别有助于抵御投石器发射或人手投掷的石块，因为石块即便不穿透头盔，也能造成脑震荡。攻击目标是恺撒战线的最南端，也就是最靠近大海的地方。恺撒也知道这一地段比较薄弱，已经命令在第一道战线后方修建第二道战线，并将两道战线连接起来，但工事还没有完成。庞培军队用船将弓箭手、轻步兵以及填充敌人壕沟和爬墙的装备运到了指定地点。午夜时分，庞培亲自率领60个大队的主力部队出发了。攻势于破晓前不久开始，防守这一地段的第九军团遭到了沉重打击。庞培军队头盔上的柳条罩被证明是抵御石块攻击的极佳保护装备，而此地未完成的防御工事使庞培军队迅速从侧翼包抄守军、渗入战线。恺撒的2个大队被打退了，而被派来支援的其他单位也无法阻止己方的溃散，很快也逃跑了。该军团第一大队的所有百夫长，除一人外，全部阵亡。旗手将鹰旗抛过最近一座堡垒的护墙，保住了鹰旗。直到马克·安东尼从战线远处调来了12个大队，才稳定了局势。信号（事先安排好烟雾信号，以便在战线的不同堡垒之间通信）唤来了更多的预备队，恺撒本人也亲自赶到。堡垒守住了，但庞培军队控制了最靠近大海的阵地，开始在那里建造营地。他们在恺撒战线上打出了一个缺口，现在可以更自由地在广阔的地区搜粮了。[20]

恺撒建造了一个新营地，集中了强大兵力来对付庞培军队新建的营

地。在这个地区，据庞培的主营地约半里的地方还有一座堡垒。它原先是第九军团建造的，但在该地段的防御工事布局发生改变之后，就被放弃了。后来，敌军占据了这个堡垒，并对其加以改良，但几天后敌军也放弃了这个堡垒。现在，恺撒的侦察兵报告称，庞培那边大致相当于1个军团的兵力正赶往该阵地。后来的侦察证实，这座旧堡垒内如今驻扎着1个军团。恺撒感到敌人考虑不周，让这个军团孤立暴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赢得一场局部胜利，有助于抵消敌军最近的胜利。他留下2个大队守卫自己的阵线，然后率领剩余可以即刻动用的部队（约33个大队，不过其中包括损失了许多百夫长的第九军团）立刻迂回赶往那个孤立的堡垒。对敌人的欺骗很成功，一直到恺撒的士兵发动进攻，庞培才发现了这个威胁。一番激战后，恺撒军队猛攻进去，砍倒了堵住大门的木栅栏。但是，战局从此刻起却开始恶化。尽管恺撒的士兵攻入了堡垒的外墙，但里面还有一层防卫圈，守军仍在顽抗。与此同时，恺撒的右翼由于对这一段战线不熟悉，迷失了方向，沿着一堵墙越走越远，误以为这就是堡垒的外墙。这些部队虽然大感困惑（为什么找不到堡垒大门？），但仍然继续前进，恺撒的骑兵也跟着他们前进。此时庞培已经做出了反应，命令修建新营地的5个军团立刻发动一次反击，他们的到来鼓舞了被困在堡垒内的幸存守军。一大群庞培骑兵也冲向恺撒的右翼，而恺撒的骑兵害怕返回己方阵线的撤退路线被切断，开始惊慌失措。局势非常混乱，恐慌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恺撒的右翼最先崩溃，当士兵们看到这景象时，其余的进攻部队也开始逃窜。部队作鸟兽散，每个人都拼命逃窜，一些士兵被困在营地周围的壕沟内。正如《战记》所载：“到处混乱不堪、惊恐万状、四处奔逃，以至于当恺撒拉住逃跑士兵手中的军旗，命令他们停下时，有些人竟然催动战马，从他身边冲了过去。士兵们没有停下，而是继续逃命。其他人在胆战心惊中竟然丢弃了军旗，没有一个人停住脚步。”这一次，恺撒没有办法像在桑布尔河和其他许多地方那样控制战线。其他史料的描述甚至更加负面，说有一名逃跑的士兵甚至想用军旗旗杆一端的尖钉去刺恺撒。幸亏一名

卫兵眼疾手快，砍断了那人的胳膊，才救下恺撒。[21]

恺撒的此次进攻一败涂地，伤亡惨重，损失了960名士兵、32名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庞培军队缴获了32面军旗，作为胜利的标志，还抓了一些俘虏。但是庞培仅仅满足于击退恺撒的进攻，而没有一鼓作气去攻打恺撒的战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此时他的士兵欢欣鼓舞，而恺撒军队士气低落。恺撒本人宣称，敌人“若是由一位有本领的将军指挥，今天就能得胜”。事后，拉比埃努斯要求将被俘的恺撒士兵交给他。他讥讽地称他们为“战友”，在恺撒军队的视线之内将他们全部处死。第二天，恺撒检阅了部队，向其发表讲话，就像戈高维亚战役失利之后那样。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在戈高维亚挫败之后，迎来了怎样光荣的胜利。他鼓舞将士们，说他们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将兵力超过自己的敌人围困如此之久；鼓励他们下一次奋勇作战，以弥补前一天的失败。他的批评很温和，也没有做任何严厉的惩罚，只是降了一些旗手的职。士兵们斗志昂扬，一些军官甚至敦促他冒险再次与敌交锋。恺撒对于部队是否已经从失败中恢复元气不是很有信心，而且他可能也意识到，庞培没有理由接受他的挑战。现在看来很明显，合围庞培军队的尝试已经失败。敌军已经占领了他的包围圈一端，而他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建造一条新的、更长的战线，再一次将敌军包围起来。庞培军队现在不仅可以从海上获取补给，还能在当地搜粮。恺撒知道自己的目标已经无法达成，但就像他向士兵们讲的那样，他仍然决心要取得最终的胜利。他决定撤退，离开海岸，因为敌军在那里可以轻松地获得补给。夜间，他派遣1个军团护送辎重和大批伤员前往阿波罗尼亚。黎明前一两个小时的时候，他率领其他部队出发了，只留下2个军团担任后卫，留在阵地上。后卫部队照常吹响唤醒士兵的起床号。庞培军队上了当，恺撒的后卫军队得以安全撤离，与主力会合。庞培派遣骑兵追击，但这些骑兵被恺撒的骑兵（数量少于庞培骑兵）和400名以作战队形行进的军团士兵打退了。几次小规模冲突之后，两军脱离，因为庞培没有选择立刻追击恺撒。[22]

法萨卢斯，前48年8月9日

恺撒军队撤退的时候，进入了此前两军的搜粮部队都不曾涉足的地区。此时已是夏季，新的庄稼已经成熟，饥肠辘辘的士兵们可以收割庄稼了。一些之前被分散出去的部队也和恺撒会合了，于是他的兵力得到了一些补充。但是，随着他在狄拉奇乌姆战败的消息传开，一些社区觉得帮助这样一位很可能输掉战争的领袖是个错误。在戈姆菲，该城的行政长官紧闭城门，不准恺撒军队进入。恺撒不肯纵容这种挑战。他的军队猛攻入城，将其洗劫一空，酩酊大醉的士兵们恣意杀戮、强奸和掳掠。该城的行政长官自杀了。据一些史料记载，第二天，恺撒军队离去时，更像是醉醺醺的狂欢，而不是纪律严明的行军。有意思的是，史料还称，这场放纵让许多在狄拉奇乌姆城外忍饥挨饿、在战线上干苦工的士兵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这是内战爆发以来恺撒第一次允许士兵蹂躏被占领城市的平民，这显然是刻意要显示自己无情的一面。该地区的其他城镇害怕遭到与戈姆菲同样的命运，纷纷欢迎恺撒的军队。[23]

狄拉奇乌姆战役对庞培军队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胜，欢欣鼓舞的情绪笼罩整个军营，因为这是自内战开始以来恺撒第一次吃败仗。庞培的高级军官们最为踌躇满志，他们现在觉得只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就能结束战争。阿弗拉尼乌斯敦促庞培利用他的海军将部队运回意大利，收复罗马城，打破恺撒代表真正元老院的假象。其他人，尤其是像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那样的人，坚持认为恺撒现在已经任凭他们发落，因此应当尽快与恺撒交战，将其彻底打垮。庞培仍然很谨慎，而且对恺撒老兵们的战斗力依然充满敬重。他一直打算在某个时间重返意大利，但是恺撒现在仍然自由活动。如果此时返回意大利，他担心会有人说他是被迫又一次从海路撤退。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返回意大利，就会让他的岳父西庇阿（他率领的来自叙利亚的部队尚未与庞培主力会合）孤立无援，被兵力超过西庇阿的恺撒吃掉。庞培更愿意留在希腊，但仍然相信目前正面对垒是不明智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更好的办法是追踪敌

军，切断补给，将其拖垮。

他的那些比较显赫的盟友们很不喜欢他的主张。阿赫诺巴尔布斯开始把庞培称为阿伽门农（率领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十年之久的迈锡尼国王）或“众王之王”，指控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崇高地位而故意拖延战事。就连非常爱戴庞培的西塞罗都公开宣称，内战其实就是庞培和恺撒争夺最高权力，所以其他人就更加猜疑庞培的动机了。现在万众期待的胜利就在眼前，很多人开始考虑为自己保留一份丰厚的战利品。有些人派人去罗马，为他们购买靠近广场的宏伟宅邸，尤其是属于恺撒党人的宅邸。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梅特卢斯·西庇阿和兰图鲁斯·斯宾特尔已经为应当由谁接替恺撒担任祭司长而争吵不休。庞培派的许多领导人曾从几十年前苏拉的胜利中获利，现在则希望摆脱债务，跻身于政坛最前沿。西塞罗觉得军营中的气氛令人生厌，后来曾对加图及其同伙自称的“好人”做了一个黑色幽默的双关语——“这些人除了有一个好的事业之外，没有任何好的地方”。他的这个批判显然不包括加图。此时加图也不在军中，而是被留在狄拉奇乌姆，指挥那里的驻军。有恶毒的流言称，庞培之所以给加图这个任务，就是为了防止在打败恺撒之后，加图对时事产生任何影响。庞培派的各个领导人之间有许多纠纷和内讧，他们都对庞培满腹猜疑。阿弗拉尼乌斯被指控在西班牙战役期间背叛了军队。还有人为了下一年谁有权参加竞选而争吵。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更关心的是，不仅要惩罚恺撒的支持者，还要惩治那些在意大利保持中立的人。恺撒在指挥作战时拥有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庞培却处处受到掣肘和拖累。

在狄拉奇乌姆战役之后的日子里，庞培阵营高级军官的气氛混杂着自负与骄傲、贪婪和野心、嫉妒和猜忌。庞培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迫他去与敌军决战。他在面对其他人的敌意时，始终不能很好地自持，而且就像战争的每一位参与者一样，他也关心自己在战后的地位。自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以来，他和元老院的既得利益贵族集团越走越近，现

在更不能疏远他们。狄拉奇乌姆战役之后，庞培变得优柔寡断，更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西塞罗说，狄拉奇乌姆胜利之后，庞培开始过于信任自己的军队，“不再是一位统帅了”。[24]

庞培等到西庇阿前来与他会师，然后进军色萨利，与敌人交战。此时是8月初，在几天中，两军在近距离按照当时常规的作战方式不断机动转移。与撤退开始时相比，恺撒觉得自己的士兵在健康状况和士气上都有很大改善。于是，他排兵布阵，准备正面交锋。庞培拒绝出战，这说明他受到的压力并没有大到非战不可的地步。他仍然具有一位统帅的本能，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在更有利的地形交战。两军的骑兵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恺撒的骑兵虽少，但在一些精锐步兵的近距离支持下，能够抵挡敌人的优势骑兵。庞培军队驻扎在一座山上，他将部队部署在山前的坡上，诱导恺撒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进攻。补给状况已有很大改观，但即便如此，恺撒仍然不愿意让军队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僵持了几天之后，在8月9日早上，他鸣金收兵，率军撤退，希望另择良机交战。他正在撤退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庞培军队从山坡上走下，来到了开阔平原上。恺撒的部分士兵已经组成了行军队形。这时恺撒命令部队停下，宣布：“我们必须推迟行军，开始考虑作战，就像我们一直渴望的那样；大家做好战斗准备；这样的机会很难再来了。”士兵们放下背包，身披甲胄，只携带兵器前进。整个战争中最宏大的一场战役即将拉开大幕，双方都由当时最优秀的军事家指挥。史料不能免俗地记载了这次命运大逆转之前出现的重要征兆。阿庇安告诉我们，在决战前夜，恺撒向战神玛尔斯和他的祖先维纳斯献祭，发誓若是自己得胜，将在罗马城为女神维纳斯建造一座新神庙。而恺撒自己的记述像以往一样，没有讲到这种事情，只涉及更务实的事情。不过史料中的细节不足，我们无法百分百地确定战场的具体地点。[25]

法萨卢斯平原宽广而开阔，一边是埃尼培乌斯河。庞培军队的右翼就在河边。这一翼有600名骑兵，可能还有一些轻步兵和盟军部队。中

路是主力部队，共11个军团，按照常规的三列阵线布阵。最精锐的军团被分配在两翼和中路。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也就是曾经为恺撒效力的两个军团，如今在左翼。每个大队的纵深都有十排，这个深度比一般情况要大得多。大纵深的队形使得前排的人更难逃跑，因此有助于减轻缺乏经验的士兵的战斗压力。这种阵型的主要缺点是，真正能够作战的人较少，后排的人连有效投掷标枪都很困难。据《战记》记载，庞培共有110个大队，总兵力约4.5万人，但其他史料记载的数字比这少几千。右翼的指挥官是阿弗拉尼乌斯（据阿庇安的说法，是兰图鲁斯），梅特卢斯·西庇阿指挥中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指挥左翼。军团士兵们奉命在原地等待，而不是前进迎击敌军，因为他们在战斗中的任务主要是牵制和缠住敌军的步兵。庞培希望凭借自己的骑兵取胜。他在左翼集中了约6400名骑兵，由拉比埃努斯直接指挥。骑兵得到了数千名轻步兵的支持，但庞培的想法是，他的骑兵能够压垮恺撒数量较少的骑兵，然后攻击恺撒的侧翼和后方。这是个简单的计划，但很合理，利用了己方骑兵的数量优势，尤其是骑兵在开阔平原上驰骋的极大优势。计划的主要缺陷是，庞培没有考虑如果骑兵冲锋失败，下面该怎么办。庞培自信必胜无疑，他的军团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抵抗恺撒的士兵，好让骑兵席卷敌阵。庞培鼓舞将士之后，拉比埃努斯向士兵们做了演讲，向他们保证恺撒军中基本上已经没有高卢战争的坚韧老兵了。[26]

恺撒排兵布阵，其左翼在河边。他有80个大队，但单位兵力比庞培少得多，一共不超过2.2万人。两军都在各自营地留下了一些部队守卫，恺撒留下了7个大队。恺撒的军团像敌人一样排成三列，但纵深肯定比敌人小，可能是四排、五排或六排。像庞培军队一样，恺撒军队的两翼也都是最精锐的部队。第十军团在右端，即最荣耀的位置，而左翼是第九军团（在狄拉奇乌姆伤亡特别重）和第八军团的混编队伍。马克·安东尼负责指挥左翼。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统领中路，普布利乌斯·苏拉指挥右翼。普布利乌斯·苏拉的指挥权是名义上的，因为恺撒本人在第十军团；在整个战役中恺撒一直待在那里，他正确地判断

出，关键性的战术机动将在那里发生。他只有1000名骑兵，似乎将骑兵全都部署在第十军团旁边，以对抗敌军聚集在那一地段的大量骑兵。庞培的计划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他这么强大的骑兵部队肯定不是用来防御的。为了对付敌军骑兵，恺撒从第三列部队抽调了6个大队，将其部署在自己的右翼后方，组成第四道战线，长度比较短，与第三道战线呈斜角。这第四道战线被前面的士兵挡着，而且平原上如此之多的人员和马匹运动肯定要掀起烟尘，所以敌人没有发现恺撒的这个部署。[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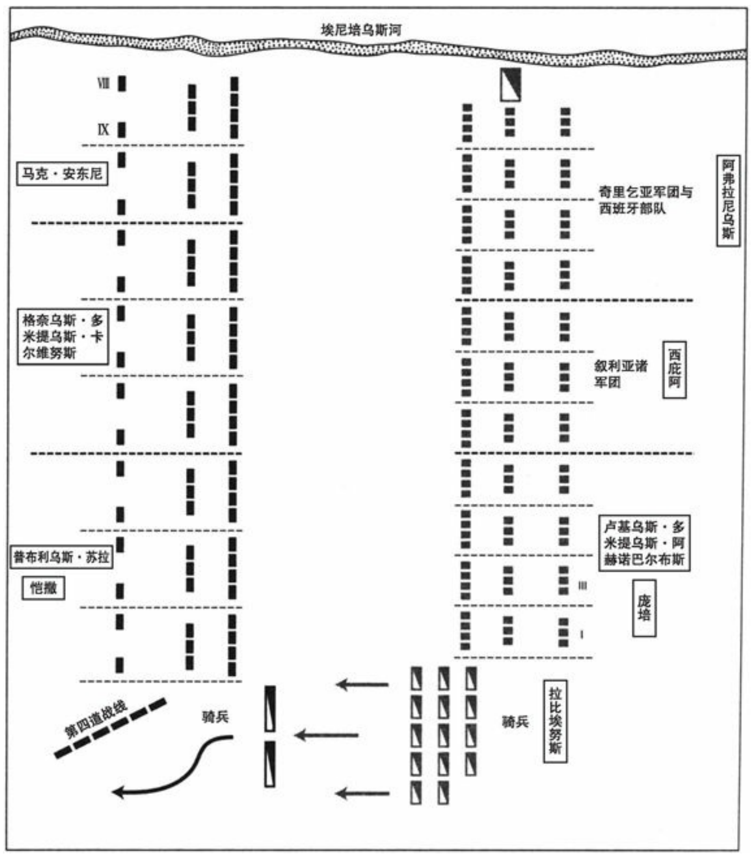


图**12** 法萨卢斯战役（**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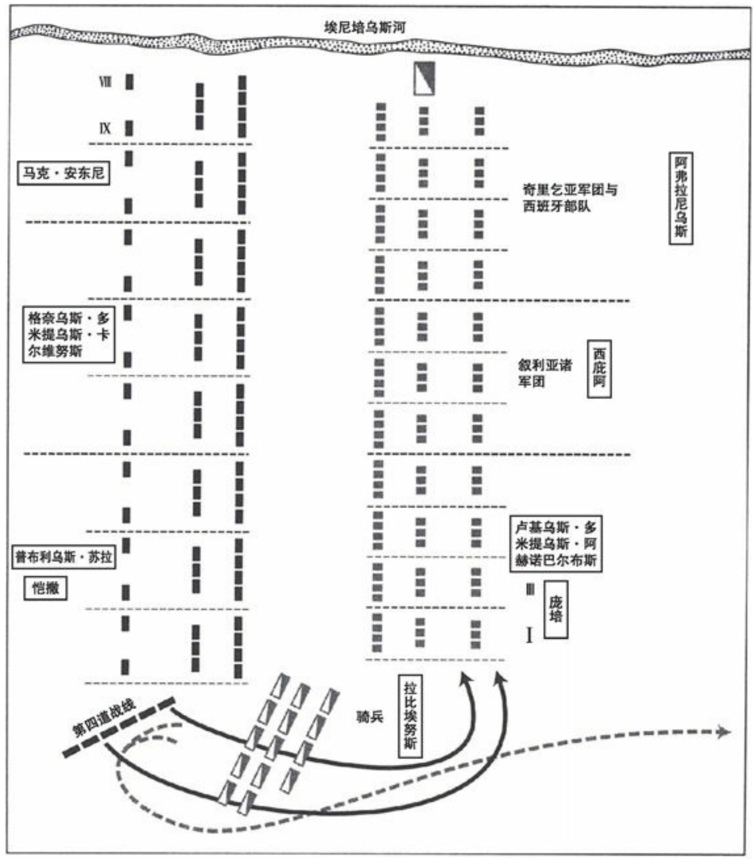


图12 法萨卢斯战役（2）

两军进入阵地肯定需要好几个小时，前线之间的距离可能不到1里。战斗中总是很混乱，内战中尤其如此，为了降低误判敌友的概率，双方都发布了口令暗号。恺撒的口号是他的神圣祖先的名字，并与军事胜利相联系——“赋予胜利的维纳斯”。庞培军队的口号是“不可战胜的赫拉克勒斯”。后世的史料讲，双方在即将屠戮同胞之前有过片刻的犹豫，但这极可能只是浪漫的虚构。两军似乎都志在必得。恺撒骑马查看战线，与士兵们交谈，并检查各单位是否在指定位置上，士兵们的昂扬斗志对他鼓舞很大。据恺撒自己的说法，他又一次向士兵们讲述了他遭受的冤屈，以及他为了达成和解而做的努力。他检阅了全线，最后在第十军团那里发出前进的命令。喇叭吹响时，他身边站着克拉斯提努斯——第十军团一位已经退役的首席百夫长。克拉斯提努斯喊道：“弟兄们，跟我上，好好地为你们的将军效力！只剩这最后一战了；打完之

后，他会重新获得尊严，我们会得到自由！”然后他转向恺撒，说道：“今天，将军，不管我是死是活，都会赢得你的感激！”说完这话，他从右翼冲杀出去，约120名精兵（来自同一个百人队，全都是志愿者）跟了上去。[28]

恺撒的步兵秩序井然地向前推进，以稳健的步伐行进，保持队形。接近敌人后，最前方的各大队冲了上去，准备进入有效射程（约15码）后投掷标枪。一般的规矩是除了百夫长和其他军官们发出命令和鼓舞士兵之外，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一直到投出沉重的标枪、奔向敌人时才发出呐喊。这一次，庞培军队一动不动，没有上来迎战。恺撒的百夫长们之前以为敌军也会冲上来，据此判断投掷标枪的时机。现在他们意识到敌人没有冲上来，因此他们可能会将标枪投掷得太早，以至于抵达敌阵时乱了己方的队形。恺撒的老兵们表现出了令人生畏的高度纪律性，停下脚步，冷静地重新调整队形，然后又一次秩序井然地推进。然后，在正确的时机，他们第二次加速前进，投出标枪，呐喊起来，手执利剑冲向庞培军队。恺撒认为庞培让自己的部队原地不动是个错误，因为那样的话士兵们就没有了冲锋的激情。但是，庞培军队毕竟人多势众，而且纵深特别大，所以抵挡住了冲锋。全线爆发了激战。

庞培并不需要自己的军团士兵打败敌人，只需要牵制住敌人即可，好让骑兵有战胜敌人的时间。战斗打响之后，拉比埃努斯率军冲向数量处于劣势的恺撒骑兵。恺撒骑兵败退了，可能是故意后撤，诱敌深入。拉比埃努斯在很小的地域聚集了6000名骑兵。他们是许多种族的混合集团，缺乏经验，其指挥官是热情澎湃但欠缺经验的青年贵族。庞培的骑兵此前还没有许多大规模行动的机会。他们的马匹在狄拉奇乌姆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肯定状态不佳，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骑兵冲锋的速度并不快。这么多的骑兵原本应当分成好几列，并注意保留预备队，以便扩大战果或者提供支援。但是，庞培骑兵前进并打退恺撒骑兵的时候，秩序荡然无存，骑兵及其坐骑都因为己方势力强大而洋洋自得。拉比埃

努斯和他的军官们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他们的骑兵不再是一支有秩序的队伍，变得乱七八糟。这时，恺撒命令他的第四道战线上的6个大队出击。军团士兵们冲上前去，以历史上罕见的方式，用步兵攻击骑兵。他们紧握标枪，把它们当作长矛来使用。拉比埃努斯的部队丧失了秩序和冲击力。他们可能停了下来，因为他在尝试恢复对部队的控制，以便攻击恺撒步兵的侧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结果是骑兵部队溃散了，一大群人马乱哄哄地跑到后方，此后就没有在战役中发挥作用。负责支持他们的轻步兵要么逃窜，要么被砍倒。

恺撒严密控制着自己的第四道战线。他们没有追得太远，而是调转过来，攻击庞培步兵的左翼。在战线的其余地段，恺撒的前两道战线已经陷入鏖战，这两道战线一般是要紧密配合的。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当敌军战线偏转后，又取得了更多进展。现在恺撒下令投入最后的预备队，即第三道战线的生力部队，指示他们奔向前线。庞培军队步步败退，然后他们的战线瓦解，开始溃散。恺撒手中还掌握着一些部队，并带领他们猛攻敌营。他和他的军官们指示部下尽可能饶恕同胞的性命，但据说也命令士兵屠杀敌军的辅助部队，以明确表示他们的宽宏仁慈是对同胞的特别礼遇。据恺撒说，他歼敌1.5万人，俘虏2.4万人，缴获了9个军团的鹰旗和180面其他旗帜。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给出的庞培军队死亡数字是6000人，这可能更准确。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阵亡，但庞培军队的大多数领导人都逃跑了。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也被俘了，据说恺撒曾派人去寻找他，发现他还活着，大喜过望。他自己这边的损失相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胜利来说是很轻微的，有200名士兵和30名百夫长阵亡。百夫长的伤亡比例非常高，因为他们必须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克拉斯提努斯也牺牲了，敌人的剑插入他的口腔，从脖子后面戳了出来，但他已经取得了英雄战绩。据阿庇安记载，恺撒厚葬了克拉斯提努斯，甚至为他追授勋奖，这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因为罗马人一般不会为死者追授荣誉。恺撒告诉我们，他和他的部下都对敌营的奢华和傲慢感到憎恶，敌营的帐篷和住地已经装饰好了胜利的标志。据

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记载，恺撒眺望遍地敌人死尸的平原时说：“是他们想要这样的；即便在我的所有伟大功业之后，我，盖乌斯·恺撒，如果不是得到了我的军队的支持，也会灭亡。”[29]

即便考虑到史料的不客观记载，庞培在法萨卢斯的表现也很差劲，在战斗打响后对战局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在骑兵冲锋失败不久之后，他就返回了营地。过了一会儿，看到全线崩溃的迹象，他便脱去将军的服饰，逃跑了。如果他留在军中，可能也无力回天，但抛下部队逃跑对一位罗马将军来说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因为罗马将军永远不应当认输。即便战况不利，罗马将军也应当努力挽救尽可能多的部队，以尽可能好的秩序撤退。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将军的任务是确保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在法萨卢斯，庞培陷入了绝望，或许是因为在整个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希望避免这样的正面交锋。此后他没有真正努力在希腊重建一支军队，而是带着谋士们逃往海外。有传闻说，他甚至考虑过逃到帕提亚人那里并寻求他们的帮助，但最终他选择逃往埃及。此时，托勒密十二世国王的儿女们正在争夺王位。在前不久的军事行动中，埃及曾为庞培提供军事援助，而且埃及很富庶，所以似乎是个东山再起的好地方。庞培带着妻子科尔内利娅、一些军官和侍从，乘船来到亚历山大港。年轻的国王（或者说是他的谋臣们，因为国王只有十多岁）表面上发去了欢迎庞培的信息。庞培登上了一艘从岸边驶来的小船。船上有几名埃及人，但也有两名多年前曾在庞培麾下效力的罗马军官，他们后来加入加比尼乌斯军中，托勒密十二世复辟后留在埃及。庞培的妻子和朋友们从大船的甲板上眼睁睁地看到，这些军官将庞培刺死。伟大的庞培，一位曾经享有三次凯旋式、三度担任执政官的英雄豪杰，就这样死去了。他遇害时离五十九岁生日还有一天。他的首级被砍下，保存起来，等待将来呈送给恺撒，以赢得胜利者的好感，但尸体的其余部分被丢弃在海滩上，直到他的一名释奴将其掩埋。[30]

---

[1] Cicero，*ad Fam.* 9.9.

[2] Caesar，*BC* 3.68.

[3] Suetonius，*Caesar* 56.4，72，Cicero，*ad Att.* 9.18；关于双方的党羽，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39），pp.50-51，61-77；关于“需要一场内战”，见Suetonius，*Caesar* 27.2；关于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战役，见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3.1-3，Caesar，*BC* 2.23-44。

[4] Appian，*BC* 2.47，Dio 41.26.1-35.5，Suetonius，*Caesar* 69.

[5] Caesar，*BC* 3.3-4，Plutarch，*Pompey* 63-64，Appian，*BC* 2.40，49-52.

[6] Cicero，*ad Att.* 8.11.2，9.7，9.10.2，10.4，西塞罗的态度，见T.Michell，*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1991），pp.252-266。

[7] Cicero，*ad Att.* 9.9.3，for Servilius see *CAH* 2 IX，p.431，Dio 41.36.1-38.3，Caesar，*BC* 3.1-2，Plutarch，*Caesar* 37，Appian，*BC* 2.48.

[8] Caesar，*BC* 3.2-8，Dio 41.39.1-40.2，44.1-4，Appian，*BC* 2.49-54，Plutarch，*Caesar* 37.

[9] Caesar，*BC* 8-13，Appian，*BC* 2.55-56.

[10] Caesar，*BC* 3.14；关于毕布路斯儿子的死，见*BC* 3.110 and Valerius Maximus 4.1.15；关于西塞罗对庞培派的态度，见Cicero，*ad Fam.* 7.3.2-3。

[11] 即科孚岛。

[12] 引文见Caesar，*BC* 3.15-17，17；关于此种古代宗教崇拜的特点，见B.Rankov，‘The Second Punic War at Sea’ in T.Cornell，B.Rankov，& P.Sabin，*The Second Punic War*：*A Reappraisal*（London，1996），pp.49-57，as well as more generally J.Morrison & J.Coates，*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1996）。

[13] 关于此次会议，见Caesar，关于毕布路斯之死和庞培的评论，见*BC* 3.19，3.18；关于渡海前往布隆迪西乌姆的企图，见Appian，*BC* 2.50-59，Plutarch，*Caesar* 65，Dio 41.46.1-4.

[14] 今天阿尔巴尼亚北部亚得里亚海畔的莱什。

[15] Caesar，*BC* 3.39-44，Dio 41.47.1-50.4，Appian，*BC* 2.58-60.

[16] Caesar，*BC* 3.45-49，Plutarch，*Caesar* 39，Appian，*BC* 2.61.

[17] Caesar，*BC* 3.50-53；关于斯凯瓦，见Suetonius，*Caesar* 68.3-4，Appian，*BC* 2.60，Dio 提到，前61年在西班牙有一个叫斯凯维乌斯的人为恺撒效力，Dio 38.53.3，关于斯凯瓦部队，见*CIL* 10.6011 and comments in J.Spaul，*ALA 2*（1994），pp.20-21；关于苏拉的警告，见A.Goldsworthy，‘Instinctive Genius：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in K.Welch & A.Powell

（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1998），pp.193-219，esp.p.205。

[18] Caesar，*BC* 3.54-58.

[19] Caesar，*BC* 3.59-61.

[20] Caesar，*BC* 3.61-65.

[21] Caesar，*BC* 3.66-70，quote from 69，Plutarch，*Caesar* 39，Appian，*BC* 2.62.

[22] Caesar，*BC* 3.71-75，Appian，*BC* 2.63-64，Dio 41.51.1.

[23] Caesar *BC* 3.77-81，Plutarch *Caesar* 41，Appian，*BC* 2.63，Dio 41.51.4-5.

[24] Caesar，*BC* 3.72，82-83，Cicero，*ad Fam.* 7.3.2；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5，*Pompey* 40-41，Appian，*BC* 2.65-67，Dio 41.52.1；关于庞培的战略和态度，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57-163，166-167。

[25] Caesar，*BC* 3.84-85，quotation from 85；Appian，*BC* 2.68-69，Plutarch，*Pompey* 68，*Caesar* 42，Dio 41.52.2-57.4.

[26] Caesar，*BC* 3.86-88，Appian，*BC* 2.70-71，76，Frontinus，*Strategemata 2* .3.22；关于这一时期的阵型，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1996），pp.176-183。

[27] Caesar，*BC* 3.89.

[28] Caesar，*BC* 3.90-91，Dio 41.58.1-3，Appian，*BC* 2.77-78，Plutarch，*Pompey* 71，*Caesar* 44.

[29] 关于此次战役和损失，见 Caesar，*BC* 3.92-99，Appian，*BC* 2.78-82，Plutarch，*Caesar* 42-47，and also Dio 41.58.1-63.6 不过他的叙述比较模糊；Suetonius，*Caesar* 30.4。

[30] Caesar，*BC* 3.102-104，Dio 42.1.1-5.7，Plutarch，*Pompey* 72-80，Appian，*BC* 2.83-86，Velleius Paterculus 2.53.3；and R.Seager，*Pompey the Great*（2002），pp.167-168.

二十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埃及与东方，前**48**年秋～前**47**年夏

> 恺撒也曾和女王们享受鱼水之欢……其中最有名的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他常和她彻夜宴饮到黎明，若不是他的军队拒绝跟随，他还会乘坐她的王室画舫，穿过埃及全境，一直航行到埃塞俄比亚。
>
> ——苏埃托尼乌斯，1世纪末/2世纪初 [1]

>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美艳惊人，当时正值青春年少，最为娇艳欲滴；她的嗓音魅力十足，懂得如何讨所有人的喜欢。她容貌秀美，嗓音宜人，有本事让任何人拜倒在她的裙下，哪怕是一个上了年纪、对爱情腻烦的男人。她觉得自己应当去会一会恺撒，她将夺得王位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美貌上。
>
> ——狄奥，3世纪初 [2]

法萨卢斯大捷之后，恺撒以他一贯的迅捷和充沛精力乘胜追击，在庞培遇害仅三天后便抵达了亚历山大港。他必须阻止敌人重整旗鼓，这样才能彻底赢得战争。尽管庞培已经落败，但他本领高强、威望极高，而且拥有数不胜数的门客，因此仍然是最危险的敌人。恺撒集中力量去猎杀他的前女婿。他轻装急进，只带了少量部队。有一次，他在海上遇见了数量远胜于他的敌军战舰，但他凭借着无比的自信，直接要求对方投降，而对方竟也立即投降了。恺撒在亚细亚海岸停留了几天，平定该行省，安排各社区（尤其是那些曾经大力支持庞培军队的社区）为他提供资金和粮草，以便支持他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此时，他得知庞培正在逃往埃及，于是恺撒立刻继续追击，带着约4000名士兵于10月初赶到了亚历山大港。随后他得知了庞培的死讯；不久之后，庞培的图章戒指和首级就被小国王的使臣送来了。恺撒看到了图章戒指，放声大哭，不愿再去看首级。他的愤怒和悲痛完全可能是真诚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以宽大仁慈而自豪。但庞培会不会接受恺撒的宽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庞培在这年早些时候曾宣称，他不愿意靠着“恺撒的慷慨”生

存。玩世不恭的观察者也许会说，恺撒可以将杀害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英雄之一的罪责推到外国刺客身上。在过去，庞培和恺撒之间除了政治盟友的关系之外，的确有过真挚的友情。即便他们成了竞争对手，恺撒也极不可能想要杀掉庞培。他的目标是让包括庞培在内的所有人都承认，他的成就与功业可以和庞培平分秋色，甚至将来会比庞培更强。庞培死掉并不能让恺撒满意。[3]

但不管怎么说，埃及人杀死了庞培，说明他们希望取悦恺撒。于是恺撒决定率军登陆。他身边带着第六军团（由于连续作战，现在兵力不足1000人）以及庞培的一支老部队（现在被编为第二十七军团），共约2200人。除此之外，他还有约800名辅助骑兵，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高卢人，剩余的是日耳曼人。这支骑兵很可能就是在最近的历次战役中负责保护恺撒的卫队。这不是一支特别强大的部队，但恺撒不认为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他登陆之后，占据了王宫区的一座宫殿，安顿下来。作为执政官，他有20名肩扛法西斯束棒（象征他作为一位罗马行政长官的军权）的执法吏为他开道。这景象令城内的皇家军队和许多亚历山大港居民产生了敌意。罗马人遭到嘲讽辱骂，随后几天内，一些在大街小巷落单的罗马军团士兵遭到暴徒的攻击和杀害。恺撒误打误撞地卷入了埃及内战，很快将遭到围攻，为保卫自己的生存而殊死搏斗，与地中海其余地区完全断了联系。在描述随后发生的亚历山大港战争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托勒密王朝暮年的埃及。[4]

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及其女王

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人手中夺取埃及，并于同年建立了亚历山大港，这是若干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之一，但亚历山大港后来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去世后，将军们互相争斗，将庞大帝国撕扯得四分五裂，纷纷裂土称王。其中最成功的将军之一是拉古斯之子托勒密，他后来被称为托勒密一世索特尔（意思是“救主”）。他将埃及的亚历山

大港作为自己的都城，甚至将亚历山大的葬礼队伍转移到那里，让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在亚历山大港安息。托勒密建立的王朝延续了近三个世纪，控制着一个强大帝国，不仅包括埃及，还囊括昔兰尼加[5]、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它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边缘领地有时因为叛乱而丢失，或者被其他重要的亚历山大继业者（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帝国）重新占领。这三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力量平衡不断发生变化，但到前48年，另外两个国家已经灭亡了。马其顿于前146年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庞培于前64年废黜了塞琉古末代君王，使叙利亚臣服于罗马的统治。马其顿人和塞琉古人选择抵抗罗马，但都失败了。而托勒密王朝甚至在罗马共和国向这一地区扩张之前就与其结盟。托勒密王朝生存了下来，但它从罗马的扩张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而在前2世纪，罗马的征服就是托勒密王朝持续衰落的原因之一。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王族内部几乎无休止地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托勒密二世娶了自己的姐姐，开创了乱伦婚姻的传统。兄妹、姑侄、叔伯与侄女结婚，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王朝末日。这种乱伦婚姻（不过偶尔与外国公主，通常是塞琉古公主通婚）使贵族世家无法争夺王位。但这种做法的代价是王位继承模式非常含糊。围绕着王族的不同成员出现了不同派系，每个派系都渴望将自己的候选人推举为国王或女王，从而作为君主的谋臣获得影响力。内战时常爆发，后来罗马越来越频繁地扮演仲裁者的角色，罗马人的正式认可能够极大地帮助一位君主获得合法性。王国的独立性就这样逐渐遭到侵蚀。

埃及仍然非常富庶。部分原因在于商贸，因为亚历山大港是古典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农业。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在阿斯旺大坝建造之前，仍然如此。潮水退去后，农民可以在被河水浇灌得非常肥沃的土地上播种。每年河水泛滥的程度不同，就像《创世纪》里说的，可能有饥荒的年份，也可能有丰饶的年份，但一般来讲，庄稼收割之后都会有不少盈余。许多个世纪以前，尼罗河流域无可匹敌的肥沃曾使得古埃及文明繁荣昌盛，成就了恢宏的建筑。在更晚近的时期，这使

埃及成为波斯人和后来马其顿人征服的目标。托勒密王朝的力量始终稳固地以埃及为基础。借助复杂的官僚机器（其很大一部分是从之前的历史时期继承来的），王朝善加利用丰饶的土地。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神庙，其中许多仍然保存着古埃及宗教的崇拜和仪式，很少受到外来希腊思想的影响。神庙是主要的大地主，但也是制造业和手工业的中心，拥有特权地位，免于缴纳大部分赋税。到埃及的罗马访客惊讶于该国的丰饶和富裕，也震惊于王族宫廷的阴谋诡计和穷奢极欲。到前1世纪，对一些野心勃勃的罗马人来说，埃及似乎让他们看到了暴富的希望。[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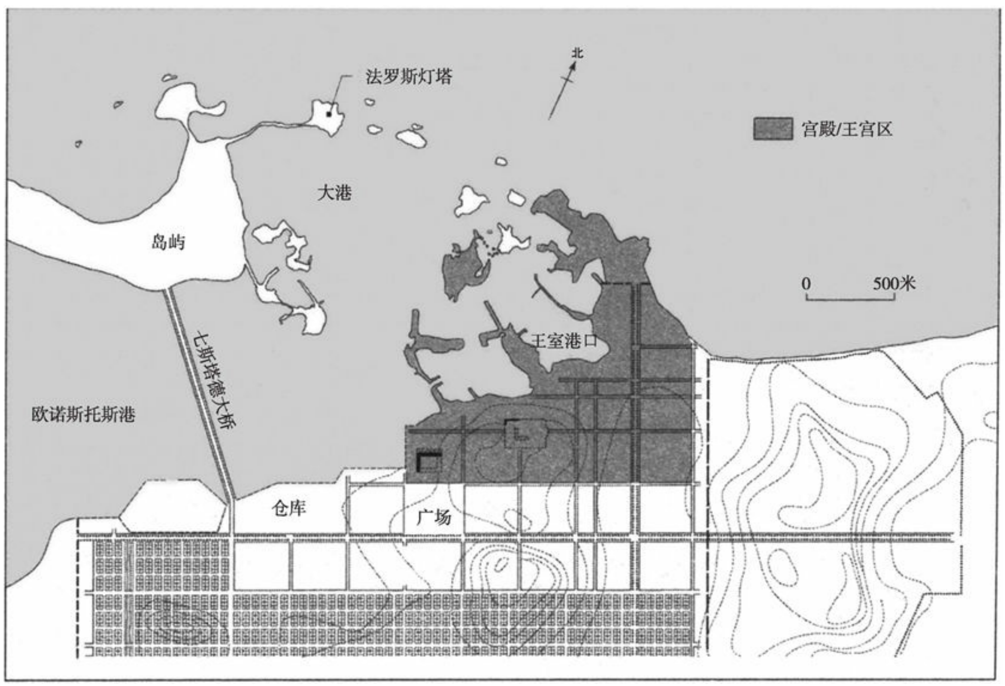


图**13** 亚历山大港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父亲的政治生涯表明了埃及政治的不稳定，以及它对罗马越来越明目张胆的依赖。他就是托勒密十二世，是托勒密九世的私生子，其母可能是托勒密九世的一位妾。前116年，托勒密九世被其母选为共治君主，于是登上王位。后来被推翻，王位被他的弟弟——极其肥胖的托勒密十世——篡夺。最后托勒密九世归来，借助武力驱逐

了母亲和弟弟，一直执掌政权到他于前81年驾崩。继承托勒密九世的是他的侄子托勒密十一世 [7] ，他娶了继母，旋即将她杀害，随后自己也被刺杀。之后，苏拉认可托勒密十二世为埃及国王。他自称为“新狄俄倪索斯”，但常被不是很客气地称为“奥勒忒斯”（意思是“吹笛人”） [8] 。有人说，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吹双簧管的人”，但“吹笛人”的说法更常用。前75年，争夺王位的不同派系都去罗马元老院游说，但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离去了。

但埃及的财富对野心勃勃的罗马人来说仍然是极大的诱惑。十年后，时任监察官的克拉苏希望吞并埃及，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可能以托勒密十世在遗嘱中将埃及赠予罗马为理由。这份遗嘱的一个抄本被送到了罗马。前文讲到，恺撒据说也曾有类似的计划。克拉苏和恺撒都没有成功，但在前59年，时任执政官的恺撒与庞培分享了托勒密十二世奉上的6000塔兰同巨额贿金。托勒密十二世许诺以这笔巨款换取“罗马人民的朋友与盟友”的身份。收取这笔钱很困难，可能促使埃及爆发了起义，导致托勒密十二世于次年逃离埃及。他去了罗马，希望赢得罗马人的支持以夺回政权。他这一次很可能带去了他十一岁的女儿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此事在罗马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因为很多人都渴望在埃及打一场战役，以及从一位感恩戴德的国王那里得到奖赏。前57年，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兰图鲁斯·斯宾特尔（就是后来在科尔菲涅乌姆向恺撒投降的那个人）奉命帮助托勒密十二世复辟。但斯宾特尔的政敌成功地“发现”了一道神谕，声称不可以给斯宾特尔一支军队以完成此任务。最终在前55年，加比尼乌斯自作主张地完成此项大业，因为奥勒忒斯许诺给他1万塔兰同。然而奥勒忒斯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加比尼乌斯回到罗马，遭到审判和定罪，后来在前49年加入了恺撒阵营，才开始走上坡路。 [9]

托勒密十二世在前58年被驱逐之后，他的女儿贝勒尼基四世被立为统治者（起初与她的姐姐克利奥帕特拉六世共同执政），但在克利奥帕

特拉六世死后，贝勒尼基四世嫁给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儿子，这让罗马承受了很大压力，不得不加以干预。奥勒忒斯回国后下令将贝勒尼基四世处死，但他没有筹到足够的钱给加比尼乌斯和其他罗马债主。他非常不得民心，但埃及人民更仇恨支持奥勒忒斯的罗马人，而罗马人现在要寡廉鲜耻地剥削他们的国家。亚历山大港经常发生针对罗马人的暴乱和袭击。前51年，奥勒忒斯终于死了，将王位留给了他的第三个女儿——芳龄十七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以及他的长子——十岁的托勒密十三世。奥勒忒斯死前已经将自己遗嘱的一份抄本送到罗马保存，以明确表示他承认共和国的权力。姐弟俩很快按照惯例结婚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尽管年轻，显然已经有极强的个性，她在位初期的诏令中不提托勒密十三世的名字。男孩的年纪太小，还不能捍卫自己的权力，但他的大臣和谋士们，在宦官波提纽斯和军队统帅阿基拉斯的领导下，很快开始反对他的姐姐。亚历山大港处于动荡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连串的歉收（前48年，尼罗河水位处于历史记载的最低点）使广大群众愈发不满。前49年，庞培派他的儿子格奈乌斯去埃及，为他正在马其顿集结的军队争取支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欢迎了格奈乌斯（很久之后有传闻说，她与格奈乌斯有过风流韵事，不过这可能仅仅是传言或者宣传），并派遣加比尼乌斯留下的一队士兵以及50艘船去支援庞培。服从罗马人的做法是很理智的，毕竟罗马人非常强大，而且她父亲欠了庞培的债，但支持罗马人非常不得民心。摄政大臣们控制着军队的很大一部分，并且得到了亚历山大港居民的大力支持，于是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逐出了埃及。女王躲在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得到了亚实基伦城的支持，这是《旧约》中提及的古老非利士城市之一，在最近几个世纪里一般处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之下。到前48年夏季，她已经集结了一支军队，要回来争夺王位。她的军队和忠于她弟弟的军队在尼罗河三角洲谨慎地互相追逐之时，庞培和恺撒先后来到了埃及。[10]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极少数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古代人物之一，但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对她的早期生涯以及她与恺撒的关系其实了解不

多。我们对她的晚期生活以及与马克·安东尼的关系了解得比较多，但这方面的绝大多数史料都是在她离世很久之后撰写的，而且受到奥古斯都宣传的影响，毕竟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安东尼这对情人曾与奥古斯都对抗并且失败。不过，这位女王令一代代人为之心醉神迷，许多世纪以来常常成为艺术、文学、戏剧以及影视作品的主题，这些作品都对古代史料做了随心所欲的修饰。任何考量这一时期的人都很难摆脱这些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大众艺术形象的影响，但我们应当从更可靠的资料开始。恺撒抵达埃及的时候，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将近二十一岁，在位已经差不多四年。她非常聪颖，而且受过极好的希腊传统教育。后来有人说，她撰写了一些涉及面极广的著作，从化妆品和发型发式到科学与哲学，不一而足。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据说与周边邻国领导人会谈时很少需要翻译。托勒密王朝是马其顿人的王朝，用武力强行统治着埃及；但他们过去发现，在土著臣民面前将自己打扮为古代法老的真正继承人，非常有利于统治。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不是第一位支持埃及传统宗教崇拜的君主，但她似乎的确对这些仪式的细节非常感兴趣。在她生涯的晚期，她没有像父亲那样以一位希腊神祇自命，而是自称为新伊西斯。伊西斯是一位埃及女神，不过她的崇拜仪式已经传播到了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她是托勒密王朝第一位能说埃及语言的君主。她的这些做法在政治上都很明智，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统治受到挑战，所以需要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而神庙在国家生活中不仅起到精神上的作用，也起到关键的经济作用。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内部分裂，面对着力量处于压倒性优势的罗马。这种局面是无法置之不理的，但也许能加以缓和。任何一位统治者都不可能高枕无忧，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无情。到了这个阶段，托勒密王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不冷酷无情。[11]

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经常引起争次的问题是她究竟长什么样子、她是否真的很美丽，我们永远都不大可能给出确凿的答案。在钱币上，她的肖像相当严峻，或许因为钱币肖像的目的是展现权力与权威的形

象，而不是歌颂她的容貌。在有的钱币上，金属腐蚀后突出了她长长的弯钩鼻子和尖尖的下巴。在亚实基伦铸造的一些钱币上则是一位更显青春活力、五官略微柔和的女性。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发现了许多被认为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半身雕像，但其中很少被普遍接受。用传统埃及风格描绘她的形象，比如神庙的浮雕，遵循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法，但同样无助于展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真实容貌。钱币和半身雕像都将她描绘为头发在脑后束成一个发髻（学术界习惯称其为西瓜形，这个说法不是很好听），并戴着希腊化君主的冠冕。她的颧骨似乎的确很高，但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鼻子。她的鼻梁很高，鼻子相当长，可能有一定的弧度，浪漫小说家无疑会称其为鹰钩鼻。狄奥告诉我们，她国色天香。普鲁塔克说，让观看者最为震撼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魅力、个性和音乐般悦耳的嗓音。常有人错误地将普鲁塔克的话理解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不美。普鲁塔克并没有否认她的美艳，而是说她之所以给男人们留下深刻印象，除了美貌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俗话说，情人眼中出美女，不同时代的人对理想化的美有着非常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容易想到，有些著名的电影明星让观众神魂颠倒，显然有着巨大的魅力，但其实她们并不是非同寻常地漂亮。一个人的活泼和活力很难用雕塑来捕捉，这样的东西也几乎完全不可能表现在钱币上。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女性，把她放到任何时代，应当都会被奉为美女。她不仅貌美，而且聪慧、成熟、机智、活泼，魅力无穷。再加上她的女王地位所带来的吸引力，以及她重要的政治地位，当时最伟大的两位罗马人为她倾倒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不知道她的发色和肤色。有些人认为她是黑皮肤的，但这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托勒密王族是马其顿人，不过他们记录在案的家系中有一些希腊血统，并且由于和塞琉古王朝通婚，也有一点点波斯血统。我们不知道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祖母的身份。关于她的母亲是谁，也有一点疑问，不过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她的母亲是奥勒忒斯同父同母的妹妹，所以她祖母的身份就更重要了。一般认为，她的祖母是一个小

妾，所以可能不是马其顿人，也许是埃及人或者来自更远的地方。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假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也许有一些非洲血统。不过没有实际的证据能够支持这种假说。同样，她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是金发的，因为有些马其顿人的头发是金色的（不过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说法），但史料也同样不能对此给予支持。这种不确定性将会继续让不同的人想象出迥然不同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12]

与罗马相比，亚历山大港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它可能也比罗马要小（有人估计亚历山大港的人口约50万），但仍然比希腊-罗马世界的其他城市（叙利亚的安条克除外）大得多。它肯定比罗马光辉灿烂得多，因为它是被有意识建造出来的，所以遵循了希腊化建筑的传统风格，非常整齐。两条呈直角交叉的主干道可能宽达100英尺。港口非常庞大，在港口边缘的岛上屹立着巨大的法罗斯灯塔[13]，这是世界奇迹之一。王宫区面向大海，包括数量众多的奢华宫殿，因为有一个传统，每一位新的统治者都要建造自己的宫殿群。城市的王宫区如今已经大部分被海水淹没，但近些年里，考古学家开始了发掘调研，取得了不少成果。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是，许多古埃及纪念碑被搬运过来装点城市。托勒密王朝的君主们显然希望凸显他们统治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但是亚历山大港是由一位马其顿国王建造的，最初大多数的殖民者是马其顿人或希腊人。自那以后，当地人口混杂了许多民族，城内拥有犹太之外最大的犹太人社区。这也是一座熙熙攘攘的繁荣港口，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世时，香料、象牙和其他来自印度的奢侈品的贸易似乎愈发繁荣了。虽然各种民族的人们川流不息，但从文化上讲，亚历山大港仍然明显是希腊的，而且成了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学术中心之一。它的图书馆规模宏大，不仅装满了书籍，还收藏了各种珍奇物品和科学奇迹（有史料称，图书馆内有一个用蒸汽机驱动的模型），而且托勒密王朝长久以来一直鼓励哲学家到这座城市从事研究和讲学。[14]

亚历山大港战争

没有证据表明，恺撒在前48年10月抵达亚历山大港以前曾经到过这座城市或到过埃及。他吃惊地发现，他的执法吏和军团士兵耀武扬威地穿过城市的景象竟招致了群众的敌意。目前天气条件不利于他离开，于是他决定做些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奥勒忒斯十年前承诺给他的很大一部分钱款始终没有交付，于是恺撒宣布，他打算收缴1000万迪纳厄斯的欠款。法萨卢斯战役的胜利让他的经济压力愈发沉重，因为成千上万的庞培士兵向他投降，他必须养活这些人。与此同时，他还宣布，既然是他帮助托勒密十二世奥勒忒斯获得了罗马共和国的承认，那么他现在要仲裁埃及的王位继承纠纷。担任托勒密十三世（此时不超过十三岁或十四岁）摄政者的宦官波提纽斯没有公开表示抗议，但秘密传唤阿基拉斯及其军队到城里来。据《战记》记载，阿基拉斯有2万人，主要是加比尼乌斯的老兵（他们留在埃及，娶当地女子为妻）和雇佣兵（其中很多人是从罗马各行省逃出的奴隶）。恺撒的兵力远少于敌人，很快被围困在王宫区有围墙环绕的宫殿群和其他一些建筑内。起初双方维持着紧张的对峙状态，但阿基拉斯很快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打退敌人一次进攻时，恺撒的士兵纵火烧了一些房屋，火势失控。据一些史料记载，大火蔓延到了图书馆，但对馆藏图书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图书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学术中心。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支持皇家军队或保持中立；很多人议论纷纷，若是要阻止埃及被吞并，就必须反抗罗马人。恺撒派信使召唤援军，但援军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抵达，所以他很明显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随时可能兵败身死。[15]

起初，托勒密十三世和他的妹妹阿尔西诺伊四世都在恺撒的战线上。他们的许多侍从，包括波提纽斯，也在那里。波提纽斯故意羞辱罗马人，用粗劣的餐具给罗马人吃糟糕的食物，并粗暴地告诉他们，所有金银餐具都被拿去偿付恺撒要求的钱款了。就在这时，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出人意料地登场了，在黄昏时偷偷溜入宫殿。陪同她前来的只有一名仆役——罗德岛的阿波罗多洛斯，他划着一艘小船将她送过了港湾。然后他把她带到了恺撒面前，不是按照好莱坞的说法将她卷在地毯里，而

是将她装在装衣服的袋子里。袋子被解开，女王现身了，或许是在袋子落下时站起身来，就像一名舞者从蛋糕中出现一样。据狄奥说，女王已经知道恺撒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因此精心打扮，既激起了他对她丧失王位的同情心，也燃起了他这样一个有名的风流浪子的欲望。两人成了情人。大约在这一时期，恺撒宣布，奥勒忒斯的遗嘱很明确，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的弟弟应当共同执政。男孩对此无动于衷，或许已经认识到，他的姐姐与罗马执政官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向一群亚历山大港人发表演说，群众掀起了暴乱。宫殿群内部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传闻说有人企图刺杀恺撒。在过去恺撒从来不会贪杯，如今却和军官们在晚宴后一起饮酒，一直喝到深夜。据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恺撒的一名家奴偷听到波提纽斯在搞阴谋诡计，于是恺撒派人监视波提纽斯，很快发现他果然与宫外的围攻者秘密联络，下令立即将他处决。阿尔西诺伊四世后来逃到了埃及军队那里，军队当即推举她为女王。阿尔西诺伊四世在她之前的教师——宦官该尼墨得斯——的帮助下，派人杀死了阿基拉斯，控制了军队。对杀害庞培负有直接责任的两个人在很短时间内也被处死。[16]

埃及军队加紧攻打宫殿群。围攻者污染了恺撒士兵占据地区的水源，于是恺撒命令士兵们掘井。用庞培降兵组建的第三十七军团通过海路来到了恺撒身边，带来了补给物资、重武器和其他装备。恺撒必须控制通往港口的道路，因为一旦他与大海失去联系，任何援助就很难抵达他那里。随同恺撒前来的一小队战船和匆匆组建的埃及海军（用的是在尼罗河上巡逻的船只，以及几乎被遗忘在皇家旧船坞的战船）在港口和周边发生了一连串小规模交战。为了制作船桨，人们从大型建筑的天花板拆下房梁。在大部分战斗中，恺撒的战船都占了上风，这鼓舞他发动一次进攻，以控制整个法罗斯岛（以岛上的灯塔得名）[17]。法罗斯岛与大陆之间有一座桥梁，长近1里。恺撒已经控制了法罗斯岛的一部分，然后发动进攻，用船将10个大队送上岛，同时其他战船在岛的另一侧发动佯攻。第二天，他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以控制通往桥梁的道路。

攻势起初进展顺利，但一群上了岸的水手因为敌军的反击而惊恐，出现了混乱。局面越来越乱，很快就连罗马军团士兵也奔向离他们最近的船只，绝望地拼命逃跑。恺撒让一些士兵坚持战斗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意识到他的兵力太少，会被敌人打垮，于是也撤退了。他自己的船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士兵，以至于水手无法驾船离岸。看到这景象，执政官脱下胸甲和斗篷，纵身跃入海中。然后，他将左手伸到海面以上，以保全一些重要的文件，镇静地游到了安全地点。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把他有名的斗篷也带走了；但也有史料表明，敌军缴获了他的斗篷，后来将其作为战利品展示。这时他之前乘坐的船已经倾覆了，但他派了其他船只去营救一些被困的士兵。这是整个埃及战争期间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损失了约800人，其中将近一半是罗马军团士兵，剩余的是水手。但他的士兵仍然斗志昂扬，继续击退了敌人的进攻。[18]

不久之后，可能是前47年1月底或2月初，亚历山大港人派来了一个代表团，请求恺撒将托勒密十三世释放，因为他们厌倦了阿尔西诺伊四世和该尼墨得斯的暴政。恺撒同意了，但首先敦促男孩停止进攻，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人民的利益，然后要记住自己对恺撒和罗马应有的忠诚。男孩泪流满面，哀求恺撒不要把他送走。执政官说，如果他真的那么想，就应当迅速结束战争并返回。托勒密十三世离开罗马阵地之后，立刻兴高采烈地与妹妹会合，开始煽动他的士兵努力消灭罗马入侵者。据《亚历山大港战争史》的作者[19]说："恺撒的许多军团长、朋友、百夫长和士兵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一个男孩的背信弃义让恺撒过分的宽大仁慈显得荒唐。"但这位作者本人不相信恺撒那么天真，据他的记述，此事中的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在耍弄敌人。埃及军队加紧进攻，但没有取得进展。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恺撒的方向发展，因为一支援军在帕加马的米特里达梯[20]的指挥下，从叙利亚赶来了。这是一支盟国军队而不是罗马人的军队，包括3000名犹太士兵（由祭司长赫卡努斯二世[21]提供，安提帕特[22]指挥；安提帕特就是大希律王[23]的父亲）以及一些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赫卡努斯二世的参战使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更加支持恺

撒。米特里达梯攻克了佩卢西乌姆城，这个消息迫使托勒密十三世和埃及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将主力部队派往东方，希望在敌人完全渡过三角洲水道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在同一时间，米特里达梯的一名信使来到了恺撒身边。恺撒带着自己的一些部队乘船绕过海岸，在援军与埃及主力部队交锋之前与援军会合了。在随后的战斗中，托勒密十三世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乘船逃跑，但逃亡的士兵蜂拥到他的船上，导致船体倾覆，托勒密十三世溺水而亡。这个事件让人想起几周前恺撒自己险些丧命的经历。[24]

战争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安定埃及。阿尔西诺伊四世成了恺撒的俘虏，将在恺撒的凯旋式上游街示众，随后被允许流亡国外。后来她被马克·安东尼下令杀死，安东尼这么做肯定是受到了她的姐姐的怂恿。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现在立她另一个弟弟托勒密十四世为共治君主，但实权显然在她手中。在早期的谈判中，恺撒曾许诺立阿尔西诺伊四世和这个弟弟为塞浦路斯的共治君主。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因为塞浦路斯前不久刚刚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恺撒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的军事力量还很薄弱，也可能是为了攻击加图，因为就是加图负责监督将塞浦路斯改为行省。但是，塞浦路斯被重新纳入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及其弟弟的王国。我们不知道恺撒是否得到了他抵达亚历山大港时索要的那笔金钱，他很可能是得到了。《亚历山大港战争史》暗示，他在得胜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埃及。这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他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可能长达三个月。他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乘坐她的豪华皇家游船游览了尼罗河。据阿庇安说，有400艘船和几乎所有部队跟随着他们，说明这不仅仅是一次观光旅游，很可能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统治者地位以及支持她的罗马的强大力量。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很少会忘记政治方面的考虑，但这还不足以解释这次游览的全部目的。埃及局势早就不需要恺撒亲自处置了，当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他的关注。他离开罗马已经一年多了，而他在遭到围攻期间，更是与亚历山大港之外的世界完全断了联系。据苏埃托尼乌斯说，如果不是军

队（可能最重要的是所有高级军官）拒绝跟随他前进，恺撒很可能会兴高采烈地继续沿着尼罗河南下。这有点像使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戛然而止的那次军队哗变，但这不一定说明恺撒的这个故事是捏造的。[25]

为了解释恺撒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旅行，人们提出了很多理论，但这些理论都不够充分。说到底还是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恺撒仅仅是想休息休息。十多年来，他几乎不间断地南征北战，而自渡过卢比孔河以来更是没有过较长时间的休息。尽管他精力充沛、高度活跃，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他不会感到疲劳或者感到空虚。从他的角度看，他是被迫打了一场自己并不希望看到的内战，而在法萨卢斯战役和庞培死亡之后，他的世界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他最了不起的对手，即在很短时期内与他敌对的那个人，已经与世长辞。如今在罗马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恺撒的对手，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在亚历山大港的几个月里，他宴饮到深夜，也许不只是因为害怕敌人的阴谋诡计，更是因为疲惫或抑郁。前47年7月，他的五十三岁生日快到了。他的发际线也在快速地后退，这让始终非常重视仪表的恺撒感到很苦恼。在这个背景下，奢靡的生活和悠闲的泛舟尼罗河，不需要心急火燎地奔向下一个任务，显然有着极大吸引力。除此之外，还有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当他的伴侣和情人。她青春年少，如果恺撒开始感到自己正渐渐老去的话，这种洋溢的青春对他特别有诱惑力，而且她聪明、机智，并受过极好的教育。除了美妙的性爱之外，还有私情的愉悦，轻浮的和高深的交流，以及与一位精明世故的女性相伴的快乐。他过去曾与罗马贵妇人们一起享受这些快乐，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更胜一筹：她出身王族，有着希腊文化的魅力，或许还有埃及充满异国情调的吸引力。在很多方面，她都很像他，或许比他的许多其他情妇更配得上他，在心智上与他更平等。这些因素混合起来令他心醉神迷。从恺撒个人的角度看，这次尼罗河旅行或许正是他需要的东西。与一位希腊化君主待在一起，或许还让他回想起了自己最初的一些海外旅行。有一些史料说他坠入了爱河，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说法。但他在此前和此后的经历都明确地告诉我们，即便如此，他也不会

感到自己有义务对任何一位情妇保持忠诚。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只能猜测。她能夺回王位，要感谢恺撒，而且她无疑深知罗马对埃及命运的影响力，所以知道讨好在世的最强大的罗马人才是明智的做法。不过她或许也的确爱上了恺撒。恺撒的年龄比她大得多，但他拥有极大的权力，这为他增添了莫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他本人也风度翩翩、魅力无穷，在过去曾经让许多女人神魂颠倒。有些史料，尤其是后人的想象，常将托勒密王朝的宫廷描绘成风流淫荡的场所，并将女王描绘成在性爱方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的荡妇。但我们对她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很难证实也很难否认这些说法。与恺撒的关系完全可能是她的第一次爱情体验，她在见到他时完全可能是个处女。[26]

最后，消息传来，亚细亚发生了危机，恺撒不得不离开埃及。他与女王的交好肯定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从长远看来，他长期待在埃及，造成了相当大的问题。他留下了3个军团以保障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地位，并防止庞培军队的残余势力占领埃及以及利用该国的财富和资源。此时，恺撒已经获得一些信息，不得不承认内战还没有结束，他还需要继续作战。有意思的是，他选择了一个叫作鲁菲奥的军官来指挥留在埃及的3个军团。鲁菲奥是恺撒一名释奴的儿子。后来，罗马皇帝们的政策是任命一名骑士担任埃及总督，而禁止任何元老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埃及。恺撒的人选不是有元老身份的军团长，这常被认为是后世皇帝们实施这项政策的先例，但他如此决策可能也是为了照顾亚历山大港人的感受。有元老身份的军团长会被认为是实际上的总督，而不仅仅是诚心诚意支持女王的盟军指挥官。恺撒在埃及留下的不仅仅有3个军团。据史料记载，他动身前往亚细亚的时候，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怀孕了。[27]

最迅速的胜利，前**47**年**8**月**2**日

恺撒现在已经认识到，内战还会继续打下去。但最终促使他从埃及

动身的是外国的威胁。博斯普鲁斯国王法尔纳基斯二世是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儿子，但很早就改换门庭，与罗马结盟，因此没有受到他父亲战败的影响。庞培平定东方后，让法尔纳基斯二世成为其父领地仅仅一小部分的国王。法尔纳基斯二世认为罗马内战是收复失地的天赐良机，在一次迅猛的攻势中很快攻克了卡帕多细亚、亚美尼亚、本都东部和小科尔基斯。法尔纳基斯二世得胜之后犯下了残忍的暴行，下令将所有被俘的罗马人阉割。这些俘虏中的大部分可能是平民，因为庞培已经将这一地区的军队全部调走了，而在恺撒的军团长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于前48年12月率军进攻法尔纳基斯二世之前，法尔纳基斯二世还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卡尔维努斯的部队是罗马军团和外籍部队的混合，其中大多数人是原先庞培征募来的，全都缺乏经验。有些部队仗打得不错，但加拉太[28]国王从其子民中征募并以罗马方式组织和装备的2个军团还没有怎么交战就逃跑了。卡尔维努斯的军队中路被打垮，很快就溃败了。[29]

恺撒可能直到夏季才离开埃及，具体时间仍然很有争议。在前往亚细亚的途中，他在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奇里乞亚的大数城[30]稍事停留。我们知道，祭司长赫卡努斯二世和安提帕特都因为在埃及战役中的战功而得到了奖赏。恺撒的开销越来越大，手头仍然非常紧张，于是向该地区的许多社区索取金钱，尤其是那些曾经效忠庞培的社区。当时传来了一些坏消息，恺撒在意大利的副手们进行了一些政治上的争吵，出现了一些不端行为。但恺撒仍然率军进入卡帕多细亚，与法尔纳基斯二世对抗。如果让一个外国敌人恣意妄为而不对其加以惩罚，那么他的威望会大大受损。他从埃及带来了久经沙场但减员严重的第六军团。除此之外，他还有1个加拉太人的军团和另外2个在卡尔维努斯指挥下落败的军团。法尔纳基斯二世派使者去见恺撒，希望能够缔结和约并保住他已经征服的土地，同时提醒恺撒，他之前曾拒绝支援庞培。使者向恺撒献上一只黄金花冠以显示他的胜利。恺撒没有做出任何让步，而是提醒使者，法尔纳基斯二世摧残和毒打了被俘的罗马人。他要求法尔纳基斯二

世立即从本都撤军，返还从罗马人那里抢走的财物，并释放俘虏。罗马军队继续前进，在山顶城镇济莱[31]附近遇到了敌军。恺撒以为战斗会按照常规逐渐地展开，不料当罗马人在高地安营扎寨的时候，法尔纳基斯二世竟然发动了全面进攻。这样贸然的进攻与当时的军事惯例背道而驰，但这次突然袭击在最初的确造成了一些混乱。不过，恺撒和他的部下迅速恢复过来，组成战线，将敌人赶下了山。第六军团的老兵们在右翼取得突破，敌人全军很快就溃散了。法尔纳基斯二世逃走了，但在返回自己的王国后被一名竞争对手杀死。[32]整个战役在仅仅几周内就决定性地结束了，恺撒对该地区做了安排。他给一名在罗马的部下写了封信，介绍了此次神速的胜利，后来这句精练有力的话被写在牌子上，在他的凯旋式上公之于众：“我来，我见，我征服。”与此同时，他还说因打败了这样脆弱的敌人而得胜成名的将军是多么幸运。他这是在嘲讽庞培。[33]

---

[1] Suetonius，*Caesar* 52.1.

[2] Dio 42.34.3-5［Loeb translation by E.Cary（1916），p.169］.

[3] Caesar，*BC* 3.106，Plutarch，*Caesar* 48，*Pompey* 80，Dio 42.6.1-8.3，Appian，*BC* 2.86，88；see also M.Gelzer，*Caesar*（1968），pp.246-247，and C.Meier，*Caesar*（1996），p.406.

[4] Caesar，*BC* 3.106，*Alexandrian War* 17，29，and 69.

[5] 今天的利比亚东部沿海地区。

[6] 关于埃及的财富及其给罗马人留下的印象，见Diodorus Siculus 28 b.3；关于这一时期的埃及，见S.Walker & P.Higgs（eds.），*Cleopatra of Egypt*：*From History to Myth*（2001），especially the papers by A.Meadows，‘The Sins of the Fathers：The Inheritance of Cleopatra，Last Queen of Egypt’，pp.14-31，and J.Ray，‘Alexandria’，pp.32-37，and also S.Walker & S.Ashton，*Cleopatra Reassessed*（2003），esp.G.Grimm，‘Alexandria in the Time of Cleopatra’，pp.45-49。

[7] 就是托勒密十世的儿子。

[8] 因为他喜好音乐。

[9] See chapter 6；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可能去过意大利，见G.Gouldaux，‘Cleopatra’s Subtle Religious Strategy’，in Walker & Higgs （2001），pp.128-141，esp.131-132。

[10] 关于托勒密王朝末期历史，见*CAH* 2 IX，pp.310-326，esp.323；关于尼罗河的枯水期，见Pliny，*NH* 5.58；关于格奈乌斯·庞培的故事，见Plutarch，*Antony* 25。

[11] In general see M.Grant，*Cleopatra* （1972），and for a useful survey E.Rice，*Cleopatra* （1999）；关于她的语言天赋，见Plutarch，*Mark Antony* 27；关于她支持埃及本土宗教崇拜，见Goudchaux （2001），pp.128-141，and Walker & Ashton （2003），esp.J.Ray，‘Cleopatra in the Temples of Upper Egypt：The Evidence of Dendera and Armant’，pp.9-11，and S.Ashton，‘Cleopatra：Goddess，Ruler or Regent’，pp.25-30，D.Thompson，‘Cleopatra VII：The Queen of Egypt，’ pp.31-34。

[12] 关于她的外貌，见Plutarch，*Mark Antony* 27，Dio 42.34.3-5，and also Grant （1972），pp.65-67，Rice （1999），pp.95-102，Walker & Higgs （2001），esp.S.Walker，‘Cleopatra’s Images：Reflections of Reality’，pp.142-147，G.Goudchaux，‘Was Cleopatra Beautiful？The Conflicting Answers of Numismatics’，pp.210-214，and also in Walker & Ashton （2003），esp.S.Walker，‘Cleopatra VII at the Louvre’，pp.71-74，and F.Johansen，‘Portraits of Cleopatra - Do They Exist？’，pp.75-77。

[13] 即亚历山大港灯塔，位于亚历山大港对面的法罗斯岛上，因此也叫“法罗斯灯塔”，是古典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大约在前283年由小亚细亚建筑师索斯特拉特设计，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建造。由于历史记载很模糊，估计高度在115～140米。

[14] See Ray （2001），Grimm （2003），pp.45-49，and G.Goudchaux，‘Cleopatra the Seafarer Queen：Strabo and India’，in Walker & Ashton （2003），pp.109-112.

[15] Caesar，*BC* 3.106-112，*Alexandrian War* 1-3，Plutarch，*Caesar* 48，Appian，*BC* 2.89.

[16] *Alexandrian War* 4，Plutarch，*Caesar* 48-49，Dio 42.34.1-38.2，39.1-2，Suetonius，*Caesar* 53.1.

[17] 原文如此。应当是先有法罗斯岛，后来建了灯塔，以岛的名字命名。

[18] *Alexandrian War* 5-22，Plutarch，*Caesar* 49，Dio 42.40.1-6，Suetonius，*Caesar* 64，Appian，*BC* 2.90.

[19] 《亚历山大港战争史》的作者不详，可能是盖乌斯·奥庇乌斯或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20] 帕加马的米特里达梯是前文讲到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的私生子。他拥有波斯、马其顿和凯尔特血统。他在帕加马接受教育。凭借到埃及援救恺撒的功劳，他被恺撒立为博斯普鲁斯国王，称为米特里达梯一世。后来奥古斯都夺去了他的王位。

[21] 赫卡努斯二世是前1世纪的犹太国祭司长和国王。他被弟弟篡位，后在庞培的帮助下恢复了大祭司职位，但没有恢复王位。犹太国从此实际上被罗马人控制。

[22] 安提帕特凭借文中提到的这段营救恺撒的功绩，获得了恺撒的许可，成为犹太国的统治者。

[23] 大希律王（约前74年～前4年）是犹太国王，罗马的附庸。他以残暴著称，为了权位，曾下令杀害自己的家人与多位拉比。但他也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建设者，他扩建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又称希律圣殿），修建了该撒利亚的港口，建造马萨达与希律宫的城墙。在《新约》中，他知道伯利恒有个君王诞生了，就派三智者先行，假意跟随朝拜。当三智者从另一方向离开后，他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边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而耶稣一家在其死后才回到拿撒勒。

[24] *Alexandrian War* 23-32，Dio 42.41.1-43.4，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 14.8.12，*Jewish War* 1.187-192.

[25] *Alexandrian War* 33，Dio 42.35.4-6，44.1-45.1，Suetonius，*Caesar* 52.1，Appian，*BC* 90；关于学者们对此次巡航旅行的有趣观点，见M.Gelzer，*Caesar* （1968），pp.255-259 and also Meier （1995），pp.408-410，412。

[26] 关于恺撒的脱发，见Suetonius，*Caesar* 45.2。

[27] Suetonius，*Caesar* 76.3，*Alexandrian War* 33，Plutarch，*Caesar* 49.

[28] 加拉太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加拉太北面是比提尼亚和帕弗拉哥尼亚，东面是本都，南面是吕高尼和卡帕多细亚，西面是弗里吉亚。此时加拉太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

[29] *Alexandrian War* 34-41.

[30] 大数（Tarsus）位于今日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的东南部，是罗马帝国时期奇里乞亚省的首府、使徒保罗的出生地。

[31] 在今天的土耳其北部。

[32] 法尔纳基斯二世被他的女婿阿桑德杀死。随后阿桑德统治博斯普鲁斯王国，直到帕加马的米特里达梯在恺撒的支持下夺得王位。恺撒死后，奥古斯都将博斯普鲁斯王国交还给阿桑德。

[33] *Alexandrian War* 65-78，Dio 42.45.1-48.4，Josephus，*Jewish War* 1.190-195，*Jewish Antiquities* 14.8.3-5，Plutarch，*Caesar* 50，Suetonius，*Caesar* 35.2，37.2.

二十一 阿非利加，前47年9月～前46年6月

没有消息显示恺撒已经离开亚历山大港，大家都知道，自3月15日以来根本没有任何人离开那里。自12月13日以来，他也没有发来任何信函。

——西塞罗，前47年6月14日 [1]

“因为，”他（加图）说，“如果我愿意接受恺撒的宽大为怀，以此挽救自己，那么我就会亲自去找他，单独与他会面；但我不愿意欠这样一个非法暴君的人情。如果他要挽救人们的性命，那也是非法的举动，因为他不是人们的主子，他没有资格当他们的主人。”

——普鲁塔克，2世纪初 [2]

快到9月底的时候，恺撒抵达了意大利。这离他启程开展马其顿战役已经过去了二十个月，离他在法萨卢斯的胜利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在前4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与他的主要副手和其他权贵们保持着联系。但据狄奥说，他没有向罗马发回正式的公报以宣布庞培失败，因为他觉得那样做太粗俗。在亚历山大港战争期间，他惯常雪片般的通信完全停止了。起初是由于他被敌人封锁，但即便在打破敌人包围圈之后，他还是沉默了一段时间。前47年6月，西塞罗写道，恺撒已经杳无音信达六个月之久。这对恺撒来说是不寻常的现象，更让我们相信他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毫无疑问，恺撒在埃及待得太久，给他造成了极大问题，给了敌人喘息之机来重整旗鼓，并且在罗马和意大利制造了一种危险的、游移不定的气氛。恺撒的支持者们除了对他保持忠诚之外，并没有多少共同点；而他们的忠诚往往也主要是由于之前得到过恺撒的好处，因而对他感恩戴德，并热切地期待将来得到更多的好处。马其顿战役进行的时候，很少有人能确定谁会打赢，因为大家都知道，恺撒的力量处于下风。

与西塞罗通信非常活跃的凯利乌斯·鲁弗斯在内战开始时加入了拥

有更强大军队的一方，他的这个做法可谓玩世不恭。恺撒在前48年以裁判官的职位奖赏他，但城市裁判官中最高级别的职位被赏给了另外一个人，即在前一年攻克马西利亚的军团长特雷博尼乌斯。这让凯利乌斯颇感恼火。心怀不满的凯利乌斯企图培植自己的势力，宣布废除全部现有债务的计划。这是一项极端的措施，旨在吸引那些觉得恺撒做得还不够的人。凯利乌斯带着一群支持者掀起了暴动，反对特雷博尼乌斯和恺撒的同僚执政官塞维利乌斯。元老院迅速通过了终极议决。尽管两名保民官反对，执政官还是调遣了一队正在前往布隆迪西乌姆的士兵，将他们带到了罗马。凯利乌斯被赶出了城市。在一段时期内，凯利乌斯希望与米罗联合。虽然恺撒拒绝赦免米罗，但米罗还是结束了在马西利亚的流亡生活，返回了意大利。米罗企图以庞培的名义煽动叛乱，而其实当初正是庞培确保米罗被流放。米罗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很快就被击败处死，而凯利乌斯还未来得及与他会合。凯利乌斯不久之后遭到了类似的命运。恺撒的派系居然也使用元老院终极议决，这很有讽刺意味。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恺撒从来没有挑战过它的有效性，只是认为用元老院终极议决对付他的做法不恰当。[3]

前48年10月，恺撒又一次被任命为独裁官，但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他当上独裁官不仅仅是为了主持选举。这一次没有选举下一年的执政官或其他行政长官（平民保民官除外）。这或许是因为恺撒无法返回罗马城，但又不想将主持选举的任务下放给其他人。按照常规，独裁官的任期只有六个月。苏拉对这项规矩置若罔闻，担任独裁官一直到他自愿辞职为止。恺撒虽然不想让大家觉得他在模仿一手炮制了流放政策以迫害政敌的苏拉，但他需要官方权力。执政官塞维利乌斯任命恺撒为独裁官，任期一年，于是对他的权力施加了一些限制，尽管这已经是正常任期的两倍。独裁官没有与他平起平坐的同僚，而是有一名下属，这名下属的头衔是“骑兵统帅”。这个官位在最初设立的时候，独裁官负责指挥重步兵，即罗马军团，而他的副手负责指挥由贵族组成的骑兵。恺撒的骑兵统帅是马克·安东尼。在一段时间内，观鸟占卜师的祭司团（安东

尼本人也是其成员）抗议说，让一名骑兵统帅任期超过六个月是不合适的。但这个奇怪的抗议很快被撤销了。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安东尼返回了意大利。从前47年1月到恺撒于秋季返回，安东尼在意大利就是实际上的头号实权人物。他作为二把手是非常优秀的，但在独掌大局的这几个月里，他的行为越来越放肆。他经常大摆筵席，非常奢靡和公开地宴饮。他酒量惊人（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饮酒的书，其中似乎包含了许多吹嘘自己酒量的狂言），据说他处理政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醉醺醺的或者至少还在遭受宿醉的折磨。至少有一次，他打断了广场上的集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呕吐。有的时候，他带领盛大的车队巡游全国各地，他本人操作一辆高卢（可能是不列颠风格）战车，后面的马车上载着一名著名的女戏子（当时是他的情妇），还有一辆车载着他母亲。整个车队的最前面有为他开道的执法吏，这是非常不像话的景象。他有时将自己打扮成赫拉克勒斯。有的史料甚至说，他尝试用一组狮子给他拉车。除了这个情妇之外，他还毫不避讳地和一些元老的妻子通奸，造成了极大的丑闻。马克·安东尼醉心于权力，而他的行为让温和派的人们相信，从长远来看，恺撒的胜利肯定会带来暴政。[4]

安东尼没有办法很好地处理他在前47年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全都直接或间接缘于恺撒的长期不在。在庞培的图章戒指被送回罗马、公开展示之前，人们普遍不相信他已经死了。庞培派的很多人在法萨卢斯投降了，其他人则在随后的几周内投降。西塞罗当时不在法萨卢斯，但他立刻判断，战争已经输掉了。加图提议让西塞罗当最高统帅，遭到西塞罗的拒绝。庞培的儿子格奈乌斯想要当场杀掉演说家，被加图拦住。西塞罗返回了意大利，但是安东尼告诉他，在得到恺撒的具体指示之前，不能赦免他，也不能允许他返回罗马。但一连几个月都没有恺撒的消息，而且也不确定他是否能战胜敌人、在埃及战争中生存下来。与此同时，加图率领狄拉奇乌姆的驻军渡海来到了昔兰尼加，随后通过陆路来到阿非利加行省，与梅特卢斯·西庇阿、拉比埃努斯、阿弗拉尼乌斯、佩特列乌斯和其他许多庞培派的顽固分子会合。他们全都决

心将战争继续打下去。努米底亚国王朱巴一世支持他们。多年前在一次庭审中，恺撒曾拉扯朱巴一世的胡须。朱巴一世在前不久击败库里奥的作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到夏季的时候，人们已经担心，他们可能会进攻西西里或撒丁岛，甚至意大利本土。对西塞罗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令人心急如焚的事情。他们开始考虑，自己向恺撒投降是不是操之过急了；他们还记得，庞培派许多领导人对那些仅仅保持中立的人也抱有莫大仇恨。西塞罗所希冀的仅仅是能够恢复一定程度的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紧张焦虑更使他对恺撒感到愤怒，因为恺撒没有更快地结束战争。

恺撒的老兵们同样感到沮丧，因为大多数经验丰富的军团，包括第九军团和第十军团，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就被送回了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坐等，一连几个月无所事事，只能思考着自己蒙受的冤屈。有些服役期满的士兵希望退役回家，而所有人都记得，在过去几年里，恺撒曾承诺给他们赏金和土地。在一些百夫长和军事保民官的领导下，这些军团很快处于哗变状态，将被派去恢复秩序的军官们乱石打死。安东尼不得不亲临军营，但他也无法解决问题、恢复秩序。他不在罗马期间，一些平民保民官在罗马城兴风作浪。其中之一是西塞罗的女婿多拉贝拉，他也开始像凯利乌斯那样鼓吹废除债务。一些人感到机会来了，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地位，于是广场上又一次发生了暴乱。最后，安东尼带领一些没有参加哗变的部队返回了，利用这些部队恢复了秩序。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支持安东尼。安东尼有效地平定了暴乱，但这更让世人觉得，恺撒政权仅仅是凭借武力而存在的。安东尼非常讨厌多拉贝拉，多拉贝拉也憎恶他。安东尼相信多拉贝拉与他的妻子有奸情，这更让两个男人间的关系恶化。安东尼很快就和他的妻子离婚了。[5]

哗变士兵、债务人和旧敌人

恺撒在从布隆迪西乌姆前往罗马的途中遇到了西塞罗，热情洋溢地欢迎他，随后立刻赦免他，并鼓励他返回罗马。原本胆战心惊的西塞罗松了一口气，感到很开心。在恺撒不在罗马城期间，元老院授予他自行决断以对付敌人的权力。当然自内战爆发以来，恺撒一直都是自行其是。如今元老院的法令给他的做法增加了一些官方合法性。此外，他还获得了缔结条约和对外宣战的权力，以及主持（实际上就是控制）所有高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权力。尽管恺撒直到10月初才返回罗马，他决定使用这最后一项权力，在本年度的余下时间指定一些行政长官。他选择昆图斯·弗费乌斯·卡雷努斯和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为执政官。瓦提尼乌斯就是在前59年帮助他获得高卢总督职位的那个保民官。这两人都曾担任他的军团长。其他的行政长官职位和一些由于近些年的战争而空缺的祭司职位，也被赏给了他的支持者。这些新任行政长官的任期其实都极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任何事情，但需要奖赏的人太多，恺撒不希望自己慷慨大方的美名受损。他为下一年设立了十位裁判官，而不是通常的八位。目前他不再继续担任独裁官，而是第三次被选为执政官。他不在罗马期间，元老院授予他的另一项权力是可以连任五年执政官。他为自己挑选的同僚是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此人非常忠诚可靠，但没有突出的才干，想象力也很匮乏。李必达而不是马克·安东尼被选为执政官，这也许能够表明安东尼在最近一年太放肆，已经失去了恺撒的宠信。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们必须记住，恺撒需要奖赏许多人，他也许不愿意过于突出某一个人的地位，让他成为永久性的第二把手。[6]

恺撒返回意大利的消息并没有让军队的哗变平息下来，因为士兵们的怨念已经酝酿了太久。恺撒派遣撒路斯提乌斯（未来的历史学家，前不久被选为下一年的裁判官）去直面哗变部队，但撒路斯提乌斯遭到暴乱士兵的袭击，险些丧命。哗变士兵开始从位于坎帕尼亚的营地开赴罗马。到这时，哗变的主谋——那些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们——的目的似乎已经是迫使恺撒做出一些妥协，并承诺在将来给予更大的赏赐。他们知道，恺撒很快要去阿非利加对抗庞培派军队，因此他需要最优秀的士

兵，这样也许他会更容易让步。大部分士兵或者甚至绝大多数军官其实可能都没有这样明确的目标，他们有的只是一股强大的但不集中的怨气。为了应对最糟糕的情况，恺撒做了一些保卫罗马的准备工作，但对外仍然保持冷静。尽管他的一些幕僚劝阻他，他还是亲自去见哗变士兵。哗变士兵在罗马郊外扎营，这时恺撒出人意料地、静悄悄地骑马来到他们的阵线，登上了演讲台（通常建在指挥部附近）。他抵达军营的消息传开后，士兵们围着他，听他要说什么。他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叙述了自己长期而艰辛的服役经历，并提醒他在近些年曾向他们许过什么样的诺言。最后，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全部退役回家。这个要求的目的可能是提醒恺撒，他在新的战役中需要他们，但不能认为他们的忠诚是理所应当的，可以随意践踏。恺撒开始非常冷静地回答，这种冷静更让人震惊。在过去，他总是称士兵们为“兄弟们”，而如今却称他们为“公民们”。恺撒告诉他们，既然他们想退役，他很愿意让他们退役，他们从现在起就仅仅是平民了。他还温和地保证，假以时日，他一定兑现诺言，赏赐他们。士兵们被这漫不经心的举动和保证震惊了。

就像在打仗时一样，恺撒夺回了主动权，现在他的士兵们拼命要恢复自己的信心和决心。士兵们开始呼喊，表示自愿继续为他效力，然后一名哗变领导人更正式地重复了这个请求。恺撒拒绝了这一请求，但重复了自己的诺言（将来一定会向所有官兵分配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和赏金）。到这时，他似乎开始使用温和的、批评的口吻，他自己的士兵居然怀疑他的诺言，让他很伤心。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他转身要离去，让哗变士兵更加绝望。他们哀求他让他们留在军中，带领他们去阿非利加；向他保证依靠他们就能打赢战争，而不需要其他部队的帮助。恺撒缓和了自己的态度，但与前58年在韦松蒂奥的演讲完全相反，他说他愿意收留所有部队，但第十军团除外。他提醒第十军团的老兵们，他在过去给了他们多少恩惠，并表示他现在会让他们全部退役；尽管他们忘恩负义，但他还是会兑现诺言，在阿非利加得胜之后会给之前向他们承诺过的全部赏金和土地。第十军团士兵们的集体荣誉受到了挑战，他们对

老统帅的忠诚也被重新点燃。他们哀求恺撒，只要他收留他们，对他们实施十一抽杀也可以。恺撒逐渐缓和下来，假装不情愿地听从了对方，并宣布这一次不会处决任何人。但是，他记住了那些煽动哗变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据说他在随后的战役中特意将这些人安排到最暴露、最危险的地方。[7]

恺撒已经向他的士兵们强调，他不会效仿苏拉，在意大利各地攫取土地以赏赐老兵。他会用属于国家或由国家收购的土地来赏赐他们。这种措施再加上持续的战争开销，使恺撒原本就很沉重的经济负担变得愈发沉重。前47年秋季，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些开支。他从意大利各城镇贷款（表面上这些城镇是自愿借钱给他，但没有一个社区敢于让恺撒失望），并且显然不打算偿还，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偿还。打败庞培之后，东方各行省的居民常给他送来黄金白银的冠冕或花环，既是为了祝贺他的胜利，也是给他提供资金。现在，他鼓励意大利人也做出这样的姿态。凯利乌斯和多拉贝拉的活动表明，此时很多债务人仍然有很大的怨气。恺撒现在缓和了自己的一些政策，效仿多拉贝拉的一些法律，对本年度的地租设了一个相对较低的上限。但他仍然拒绝废除所有债务，说现在他自己也借了那么多钱，如果废除债务，他本人就是主要的受益者，所以他不能考虑这么做。已经死亡或仍然在反抗恺撒的庞培派领导人的一些财产被拍卖了。安东尼买了庞培在罗马的豪宅，因为他认为只需要付豪宅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即可。苏拉曾允许他的许多党徒（其中主要的有克拉苏、庞培和卢库鲁斯）以这种方式获取昂贵的地产和房产。恺撒的许多部下也希望能以类似的方式获益。如果他们这么想，就要大失所望了，因为恺撒坚持要求他们按照房地产在战前的市场价格来全额购买。恺撒这么决定的部分原因当然是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和苏拉相比，但从根本上也是由于他承受着极大的经济压力。只有少数人得到了物美价廉的好处，其中之一便是他的长期情人塞维利娅。恺撒显然对她还有很深的感情，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有肉体关系。大约在这个时期，恺撒和塞维利娅的一个女儿特尔提娅（字面意思是“第

三”或“三分之一”）也有私情，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和塞维利娅的关系。甚至有流言称，是塞维利娅安排女儿和恺撒私通。另外，塞维利娅是布鲁图斯的母亲，而布鲁图斯是法萨卢斯战役之后投靠恺撒的最优秀也是最广受尊重的庞培派领导人之一。塞维利娅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一些昂贵的地产。西塞罗开玩笑地说，大家不知道这些地产是多么物美价廉，因为价格砍掉了“三分之一”。[8]

阿非利加战役

在罗马恢复秩序并做好准备去攻击在阿非利加的庞培派军队之后，恺撒便离开了罗马。部队和补给物资被集中部署在西西里的利利俾港[9]，入侵阿非利加的军队就在那里集结。这一次仍然严重缺少船只，尤其是运输船，所以仍然无法一次将全军运过大海。而且此时已是冬季，这意味着天气很糟糕，马其顿战役遇到的问题又一次出现了。军中的占卜师宣称，近期内不宜发动一场战役，但恺撒对占卜预言之类的事情素来不关心，这一次也是充耳不闻。他急于出发，希望打败阿非利加的敌人之后就能结束战争。前47年12月17日，他抵达利利俾，将自己的营帐搭建在海岸上，以示他的急切心情，并警示部下“时刻准备出发”。他在埃及时的懒散早已消失，一贯的充沛精力又回来了，或许因为心情焦灼而显得更加活跃。恺撒只带来了1个军团，但在随后一周内又有5个军团赶到。其中只有1个军团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即第五“云雀”军团，他在外高卢组建了这支部队，并赋予其官兵罗马公民权。另外5个军团（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和第三十军团）都是在内战时期组建的，很可能包括大量庞培派的降兵。

每个单位抵达后便登上船，挤进等候在那里的运输船。恺撒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携带任何非必需的行李或装备。2000名骑兵及其坐骑也上了船，但没有空间携带许多粮草，也无法容纳登陆之后搬运粮草的牲畜。恺撒寄希望于抵达阿非利加后就地获取足够的粮草和牲

口。12月25日，他扬帆起航，但此次行动的筹划不是很周密。在过去，他惯常的做法是下发密封的命令，让部下在指定时间打开信封，查看关于在敌境海岸何处登陆等重要细节。这一次，他没有足够的情报，不知道军队可以在何处登陆，而是寄希望于舰队行驶到阿非利加海岸后便能找到合适的登陆场。强劲的风增加了混乱，舰队被吹散了，每艘船各自单独前进或者以小群前进。12月28日，恺撒看到陆地时，他身边只有少量船只。他沿着海岸航行，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也希望更多船只赶上来。最终他在敌人占据的哈德鲁门图姆港附近登陆了。他身边只有3500名军团士兵和150名骑兵。据说他下船时跌倒在海滩上，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但他立刻用两手抓住砂石，宣布："我抓住你了，阿非利加！"于是大家对凶兆付之一笑。[10]

他要面对的敌军相当强大。在离开西西里之前，他得到报告称，西庇阿现在指挥着多达10个军团（无疑是不满员和缺乏经验的，但恺撒的很多部队也是如此），再加上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以及朱巴一世国王的部队（包括4个按照罗马人的方式组织、训练和装备的"军团"）。努米底亚人为数众多的轻骑兵和轻步兵袭扰部队非常有名，尤其是骑兵享有极高的声望，而朱巴一世拥有极多这样的轻装部队。朱巴一世还有120头战象，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了。大象令人恐惧，但对敌我双方都很危险，因为它们常常受惊，胡乱践踏自己的部队。后来，梅特卢斯·西庇阿小心地训练战象，以帮助它们应对战场的混乱和喧嚣。恺撒的兵力远少于敌人，即便在随后几天内他的大部分船只都到齐了，仍然在数量上处于下风。他把部队集结起来也花了不少力气，派遣军官带领小队战船去搜寻分散落单的运输船。有一次，恺撒秘密离开军队，亲自去寻找迷失的船只，但还没有出发，这些船只就出现了。就像前48年在马其顿一样，他占有出其不意的优势，因为敌人这一次仍然没预料到他会如此迅速地杀到，并且是在冬天赶来。敌军非常分散，要花一点时间才能集结起来，并形成足够打垮恺撒的强大兵力。与此同时，他派遣自己的舰队返回西西里，命令它们尽快运来更多的部队。但就像在内战

初期一样，庞培派仍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所以恺撒的援兵未必能够抵达他的身边。恺撒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部队的粮草供应充足。他不能为了搜集粮草而走得太远，因为那样会遭到敌人的阻截。并且为了迎接援兵，他必须待在海岸附近。庞培派军队已经将很大一部分可用的粮草搜集起来了。另外，他们大量征召农民到军中服役，严重扰乱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战役的最初几周，恺撒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补给。他传令到其他行省（包括撒丁岛）搜集粮草，并火速运到他身边。[11]

登陆不久之后，他便试图劝降哈德鲁门图姆驻军的指挥官，但没有成功。恺撒没有能力攻城，于是继续前进，在鲁斯皮纳设立了大本营。前46年1月1日，他抵达了莱普提斯镇[12]，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就像在科尔菲涅乌姆一样，他小心地部署了警卫，以防止自己的士兵进城抢劫。次日，他留下6个大队驻防莱普提斯，然后返回了鲁斯皮纳。1月4日，他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搜粮行动，于是带领30个大队出发了。出营走了3里之后，发现了敌人，于是恺撒命令将自己的400名骑兵和150名弓箭手带到前线，他目前手头只有这么多骑兵和弓箭手。他亲自带领一支巡逻队前去侦察，让军团士兵的队伍随后跟进。这支庞培派军队由拉比埃努斯指挥，包括8000名努米底亚骑兵、1600名高卢和日耳曼骑兵以及众多步兵。但是他将部队部署成了非常紧密的战线，比骑兵的正常队形要紧凑得多，所以恺撒从远距离之外误以为这是一支常规的步兵部队。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他将自己的部队部署成单一战线。罗马人极少这样布阵，一般情况下至少还有第二道战线，但恺撒的兵力远少于敌人，所以他决定让己方的正面尽可能宽大，以防被敌人包抄侧翼。他的小群骑兵（很多骑兵还没有登陆）被分配在两翼，数量极少的弓箭手则被派到战线前方袭击敌人。他做好了准备，但没有主动攻击敌人，因为他不愿意交战，除非是绝对必须。拉比埃努斯突然开始行动，命令骑兵在两翼展开。努米底亚轻步兵从自己的主战线蜂拥上前，恺撒的士兵则向前推进迎战。本次战役到目前为止都还只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这是恺撒军队第一次见识到土著军队的典型战法。敌人雄厚的兵力迫使

恺撒的骑兵后退，但恺撒中路的军团士兵在与难缠的敌人拼杀。双方还没有交锋，敌人就逃跑了，但很快又集结起来，卷土重来，在这一系列袭扰过程中一直用冰雹一般的标枪攻击恺撒军队。恺撒士兵的右侧没有盾牌保护，所以特别容易被投射武器杀伤。他们也不能追得太远，因为敌人非常敏捷，能够轻易吃掉得不到支援的落单士兵或小群体。恺撒下令，任何人不得追击敌人超过本大队战线四步远。[13]

恺撒军队承受了极大压力，伤员可能比阵亡者更多。恺撒的士兵发现自己被敌人重重包围，却无力攻击敌人，而敌人逐渐消磨了他们的力量。恺撒的士兵大多缺乏经验，紧张情绪在全军弥漫开来。恺撒像往常一样保持镇静，鼓舞士气。可能就是在这一次行动中，他比较成功地劝服了一名打算逃跑的旗手。恺撒抓住那人，将他扭转过来，说道："看，敌人在那边！"在恺撒努力鼓舞正在动摇的己方士兵时，拉比埃努斯在战线后面嘲讽恺撒军队。《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14]做了这样的描述：

> 拉比埃努斯不戴头盔，在战线上来回奔驰，鼓励自己的士兵，有时向恺撒的士兵呼喊："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新兵蛋子？你们真的很凶猛，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被恺撒的花言巧语欺骗了？他把你们带到了一个倒霉的地方。我真的可怜你们。"然后恺撒的一名士兵答道："拉比埃努斯，我可不是新兵，是第十军团的老兵。"拉比埃努斯说："我没看见第十军团的徽标。"那名士兵反驳道："你很快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与此同时，他脱掉自己的头盔，好让对方看清他的面目，然后瞄准拉比埃努斯，使出全身力气投出自己的标枪，深深刺入了拉比埃努斯战马的前胸。随后他说道："拉比埃努斯，你看到了吧，攻击你的是第十军团的一名士兵。"[15]

但总的来讲，恺撒军中的老兵很少，很多新兵正在努力承受压力。就像十多年前在桑布尔河一样，高度紧张的士兵往往会聚成一团，这就限制了他们的战斗力，也使他们成为更好的靶子。恺撒命令将战线扩展开，并命令各大队交错面向前后两个方向，让一半兵力对抗已经包围恺撒后方的敌人骑兵，一半则对付前方的敌人步兵和袭扰部队。布阵完成

后，各大队同时发动进攻，投出雨点般的标枪，这足以将敌军逐退一会儿。于是，恺撒迅速停止追击，开始撤回营地。大约在同一时间，敌军得到了佩特列乌斯的增援，他带来了1600名骑兵和大量步兵。庞培派军队的斗志再次高涨起来，开始骚扰撤退中的恺撒军队。没走多远，恺撒就不得不改为作战队形，迎击敌人。恺撒的士兵已经很疲惫，而他的骑兵战马还没有从海运旅途中恢复元气，又被长时间的运动搞得很劳累，有的战马还负了伤，因此已经精疲力竭。但经过了一天漫长的战斗之后，大多数敌军也远远谈不上精神抖擞。恺撒敦促士兵做最后一次努力。等待敌人的压力稍微减轻一些之后，他发动了最后一次坚决的反击。佩特列乌斯负了伤，拉比埃努斯很可能在战马负伤之后坠落，被抬离了战场，所以敌军在一段时间内损失了两位最具攻击性也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这次反击的胜利足以让恺撒安全地继续撤退。在鲁斯皮纳城外的这次交锋（有时被称为一场战役）对恺撒来说无疑是一场失败，因为他此前在为军队搜粮时从来没有这样被阻拦过。但他毕竟还是且战且退地撤到了安全地带，否则结局还要糟糕得多。总而言之，这对恺撒来说是一场挫折，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失败。库里奥的军队被以相同方式作战的敌人全歼了，而恺撒逃脱了同样的命运。[16]

此后，恺撒极大地加固了位于鲁斯皮纳的营地，并将舰队的水手带上岸，当作轻步兵使用。而军中的工匠开始制作各式各样的投石器弹丸和标枪。他发出了更多的急令，要求搜集粮食和其他给养物资并运到他那里。与此同时，一些士兵发挥了出色的想象力，为自己急需的东西寻找替代品。一些老兵搜集了海藻，用淡水洗净后晾干，当作草料喂马。这样的话，马匹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至少能活命。梅特卢斯·西庇阿率军前来支援庞培派军队，此时联合的敌军在距恺撒营地3里的地方扎营。朱巴一世国王也在赶来加入他们的途中，但他的国土遭到了竞争对手——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二世——的进攻（其军队的指挥官是罗马雇佣军人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于是被迫返回。西提乌斯曾参与喀

提林叛乱，后来逃到了阿非利加。博库斯二世的进攻不是恺撒安排的，但他和西提乌斯如此积极主动且高效地开辟了第二战场，对恺撒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博库斯二世国王显然愿意与自己的死敌朱巴一世的敌人结盟，因为庞培派军队的支持大大增强了朱巴一世的力量。恺撒在宣传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情况，宣称庞培派辱没了他们作为罗马元老的身份，竟与一位外国君主联合，并且为他效力。据《阿非利加战争史》记载，敌军最终会师的时候，梅特卢斯·西庇阿就不再穿将军的斗篷，因为朱巴一世看了不爽。另外，据说庞培派的残暴统治让大多数行省居民离心离德。消息传来，是恺撒本人，而不是他的一名军团长，来到了这个地区，于是一些当地人投奔了他。据说有些人记起了自己对恺撒的姑父马略负有义务。六十年前马略在努米底亚得胜，到如今他的威名仍然能够激起人们的忠诚。庞培派军中不断有人倒向恺撒这边，但恺撒的士兵没有一个投敌。从战役一开始，庞培派军队就定期处决战俘，有一次是一名被俘的百夫长拒绝投降而被斩杀。双方都没有努力以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仍然在作战的庞培派极其憎恶恺撒，恺撒则非常鄙视他们。有传闻说，西庇阿家族在阿非利加一定会常胜不败，于是恺撒雇用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西庇阿家族成员，叫作西庇阿·萨尔维托或萨路提奥，此人除了拥有一个著名姓氏之外，各方面都是饭桶。[17]

在鲁斯皮纳城外，两军不断互相试探，进行小规模交锋，庞培派军队经常尝试伏击任何远离营地的恺撒队伍。梅特卢斯·西庇阿常在自己营地外不远处排兵布阵，一连几天恺撒都没有出营迎战，于是西庇阿命令自己的部队逼近对方。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够自信，不敢发动全面进攻。恺撒命令所有可能暴露的巡逻队或搜粮队都撤回营地，并指示外围警戒哨仅仅在受到压力时才撤退。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他懒得登上壁垒观察敌军，而只是在指挥部营帐里沉着地接收报告、发布合适的命令，“因为他的军事素养和知识就是这样卓越”。他对敌人的谨慎态度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西庇阿看到恺撒营地戒备森严、固若金汤，壁垒和塔楼都有重兵把守且部署了重武器，因而不

敢发动进攻。另外，恺撒的毫无动作也让庞培军队非常紧张焦躁，害怕恺撒要将他们诱骗到陷阱里去。但是，西庇阿宣称恺撒不敢与他们交战，以此鼓舞自己的士兵。不久之后，一支船队从西西里抵达，给恺撒带来了第十三军团和第十四军团，以及800名高卢骑兵和1000名轻步兵。除了这些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之外，船队还运来了足够的粮食，能够解恺撒的燃眉之急。庞培军队不断有人叛变和临阵脱逃。1月25日夜间，恺撒突然转入攻势，率领他的主力部队离开了营地。起初他们远离敌军，撤退时经过鲁斯皮纳镇，但随后突然转身，占领了一些足以威胁庞培派军队战线的山丘。为了牢牢占据这些山丘，发生了几次交战。次日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骑兵对抗，恺撒的部下得胜。拉比埃努斯的努米底亚骑兵大多数都逃跑了，但他们的撤退导致与其协同的日耳曼和高卢武士暴露出来，其中很多人被杀死。骑兵逃窜的景象令庞培军队的其他单位士气溃散。次日，恺撒进逼乌齐塔镇，这是当时庞培军队的主要水源地。梅特卢斯·西庇阿以作战队形出战迎敌，但双方都没有继续进逼和挑起交锋。[18]

塔普苏斯战役，前**46**年**4**月**6**日

此时梅特卢斯·西庇阿已经得到了增援，因为朱巴一世留下了一名军官和一支强大的部队以牵制西提乌斯，然后率领自己的3个“军团”、800名重骑兵以及大量努米底亚骑兵和轻步兵前来与庞培军队会合。朱巴一世国王抵达的消息传遍了恺撒营地，随着口口相传，对其兵力和战斗力的描述也越来越夸张。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决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他的士兵们：

> 我告诉你们，再过几天，国王就会率领10个军团、3万名骑兵和300头战象到此。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可以不要再打听或者猜测了，可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此一清二楚。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保证一定会把这些人放到一艘旧船上，让风把他们吹到任何什么地方去。

这口吻和在韦松蒂奥的演讲类似，既表达了绝对的自信，也有一些

轻微的不满——士兵们对他的信心和对纪律的尊重竟然动摇了。他故意夸大了朱巴一世军队的实力，所以在敌人援军的真实兵力显现出来之后，恺撒士兵们感到松了一口气。随后，在乌齐塔周边，两军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双方争夺两军阵地之间的一些高地，拉比埃努斯企图伏击恺撒的前锋，但是失败了，因为他的一些部队纪律太差，不肯耐心等待敌人抵达。恺撒军队轻松击溃了敌人，在山上建造了一个营地。恺撒的主力部队于黄昏回营，庞培派军队发动了一次突如其来的骑兵攻势，但也被打退了。小规模的交锋还在继续，恺撒的士兵开始修建防御工事，既是为了限制敌人的行动自由，也是为了威胁乌齐塔。

不久之后，消息传来，有人看到又一支运送援兵的船队正在靠近鲁斯皮纳。随后耽搁了几天，因为船队将等待护送他们的一些恺撒战船误以为是敌人，但最终消除了误会，第九军团和第十军团登陆了。恺撒还记得第十军团在意大利哗变中扮演的角色，于是决定抓住机会惩罚一下哗变的主谋分子，以儆效尤。军事保民官阿维艾努斯就是主谋分子之一，他自私地坚持用一整艘船来运输他的亲眷和行李。当时船运空间非常紧张，需要运输士兵和关键的补给物资，所以阿维艾努斯的行为显得特别放肆。恺撒剥夺了他的军职，让他灰溜溜地回家。另一名军事保民官和几名百夫长也有类似的不端行为，同样被解职。这几个人都只能在一名奴隶的陪同下回国。恺撒现在拥有10个军团，其中一半是有经验的作战单位。更多敌人倒戈，并且恺撒说服了一些盖图里[19]酋长反叛朱巴一世国王，于是国王不得不调遣更多的部队去镇压他们。[20]

乌齐塔的防御工事现已完工，几天后，两军排兵布阵，在不足半里的距离上对峙，但双方都没有主动挑起对抗。双方的骑兵和轻步兵进行了一些小规模交锋，庞培派军队占了上风。两军继续在乌齐塔城外对峙，恺撒让他的部下扩展防线。第三支援军船队也在靠近阿非利加，但这一次庞培军队得到了风声，俘虏或摧毁了一些被恺撒派去护送援军船队的战船。恺撒得知此消息，立刻离开了在乌齐塔的军队，火速行进6

里，抵达沿海的莱普提斯。他指挥着自己的一队战船，追击并打败了敌人的战船。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但之前第三支援军船队也在靠近阿非利加的消息可能是错误的，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可能没来得及在战役结束前赶到恺撒身边。

为大军征集粮草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恺撒得知当地的风俗是将粮食埋藏在地下，于是率领2个军团去搜寻尽可能多的粮食埋藏地点。他还从敌军逃兵那里得知，拉比埃努斯在筹划一次伏击，于是在随后几天内，派遣其他队伍沿着同样路线去搜粮，好让拉比埃努斯志得意满。然后，在某一天黎明之前，他率领3个久经战阵的军团和骑兵出发，去捕猎敌人的伏击部队。敌人被遏制住了，但补给问题还没有解决。连续抵达的援军使恺撒实力大增，但这也意味着吃饭的人更多了。他还没有办法迫使敌人在对他有利的条件下交战，而且暂时也没有希望占领乌齐塔，剥夺敌人的主要水源供应。恺撒判断，继续待在原地没有好处。于是他的军队纵火烧毁了自己的营地，在一天凌晨撤走了，随后在阿嘎尔镇附近停留。他从这里派遣了许多搜粮队，找到了大量粮食（不过大多是大麦，而非小麦）和其他食物。[21]

恺撒还尝试突袭敌人的搜粮队（庞培派军队也是大队人马集中于一处，对粮草问题也感到非常头疼），但看到敌人援兵正在赶来，就撤退了。恺撒军队在前进时常常遭到努米底亚骑兵的骚扰，因此常常需要停下来击退他们。这种袭击令恺撒军队疲于奔命，严重阻滞了行军。有一次，队伍在4个小时内仅仅前进了100步（约33码）。恺撒将他的大多数骑兵撤到步兵后方，这样的话他的军团就能比较顺利地行军，因为敌人骑兵看到恺撒骑兵接近时总会撤退。他继续前进，但直到天黑之后才抵达一个比较适合扎营的地点。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思考如何训练他的士兵，研发新的战术来对付敌人的战法。尽管他在撤退，但许多城镇仍然向他投降，不过有一次朱巴一世得知一座城镇向恺撒投降，而恺撒还没有来得及往那里派驻部队，朱巴一世就攻打了那里，屠杀了居民。3月

21日，恺撒军队举行了净化仪式，这是军队每年都要举行的一种仪式庆典。《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记述了此事，而恺撒在《战记》中没有提及。第二天，他向敌人发出挑战，但敌人不肯应战，于是他继续行军。

恺撒发布了一项长期有效的命令，让每个军团随时保持300名步兵以作战队形前进，随时为骑兵提供支持，以击退追击他们的努米底亚骑兵。他抵达了萨尔苏拉镇，将其攻克，夺取了相当数量的粮食，那都是敌军之前搜罗并存放在那里的。西庇阿没有努力去阻止他。下一个敌占城镇太强大，需要正式的围城战才能攻下，于是恺撒调转方向，在阿嘎尔附近扎营，并且打赢了一次骑兵交锋，尽管他的骑兵数量远少于敌人。他又一次向敌人发起挑战，但庞培派军队不肯从他们占据的高地上下来，而恺撒也不愿意进攻居高临下的敌人，让自己的士兵吃亏。4月4日，他又一次在凌晨出动，走了16里，抵达滨海城镇塔普苏斯，开始攻打这座城镇。西庇阿追了上去，兵分两路，驻扎在距塔普苏斯约8里的两个营地里。通往塔普苏斯的主要道路有两条，但都很狭窄，一侧是大海，另一侧是一个大盐湖。恺撒预料到敌人的打算，于是建立了一座堡垒，封锁了最明显的道路。受挫的西庇阿率军在夜间绕了一个大圈子，绕过盐湖，利用一块宽仅1.5里的狭窄陆地，从另一侧逼近城镇。他于4月6日早上抵达那里。朱巴一世和阿弗拉尼乌斯可能留在营地中，以包围恺撒。[22]

恺撒将2个军团的新兵留在围攻城镇的战线上，然后率领其他部队组成了常规的三道阵线，面对西庇阿。他在两翼部署了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辅之以弓箭手和投石手，第十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右翼，第十三军团和第十四军团在左翼。为了增强防御，尤其是为了抵挡敌人的战象，他将第五“云雀”军团一分为二，利用其兵力在两翼后方组成了第四道阵线，两翼分别有5个大队。3个比较缺乏经验的军团（具体番号不详）部署在中路。按照惯例，骑兵在两翼，不过在这个狭窄的地带，骑兵施展

不开。地形对庞培军队的限制更大，因为他们的骑兵比恺撒多得多，不过大部分努米底亚骑兵应当在朱巴一世身边。恺撒做出了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举动，他命令自己的一些战船在战斗打响后通过水道，威胁敌军后方。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庞培派军队的部署情况，也没有给出可靠的数字，告诉我们西庇阿手边有多少兵力，又有多少兵力留在朱巴一世和阿弗拉尼乌斯手中。庞培派军队的部署可能是循规蹈矩的：骑兵在两翼，军团列为三道阵线，战象在主战线前方，可能集中在两翼。这对恺撒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庞培军队分散了自己的兵力，而且选择了只能与敌人简单地迎头抗击的地形。在这样的交锋中，恺撒的更有经验的部队胜算更大。士兵斗志昂扬，自信必胜。大多数军官也敦促他立刻下达进攻命令。恺撒在巡视战线、鼓舞士兵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即便如此，《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仍然告诉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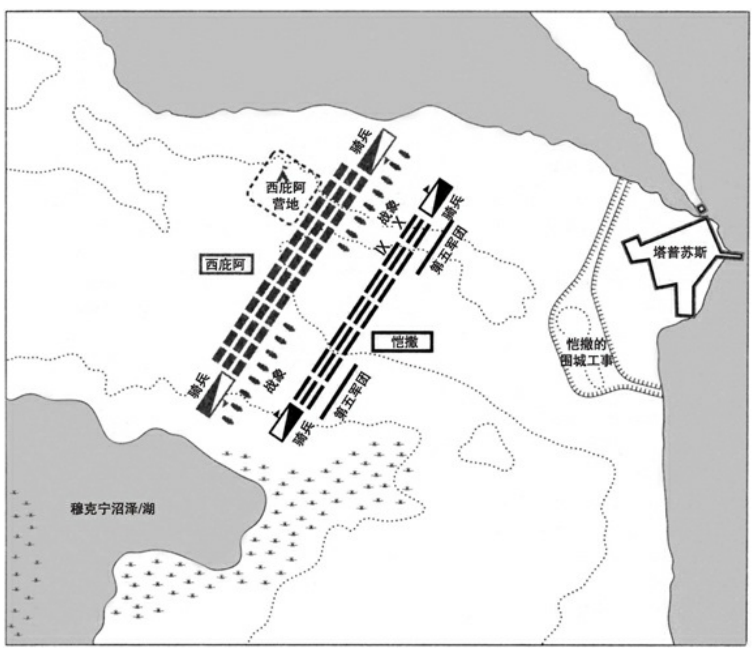


图**14** 塔普苏斯战役

恺撒感到疑虑，要抑制士兵们急切求战的热情。他喊道，他不赞同如此鲁莽地冲杀出去，并一次又一次地制止士兵们。这时，右翼有一名喇叭手在没有得到恺撒命令的情况下，在其他士兵的怂恿下，吹响了喇叭。所有大队都跟着喇叭声，开始向敌军推进。尽管百夫长们挡在战线前方，企图以武力阻拦士兵们，阻止他们未经将军命令便发

动进攻，但这些都是徒劳。

恺撒看到自己没有办法抑制士兵们高涨的热情，于是发出了“祝好运”的口令，催动战马冲向敌军。[23]

士兵们的绝对自信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庞培派军队抵挡不住这样的突然袭击，很快就溃败了。普鲁塔克讲的故事有所不同，据他说，在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恺撒感到自己的癫痫病要发作了，不得不让人把他抬到阴凉处，所以进攻开始时才发生了混乱。关于恺撒癫痫病的记载极少，这是唯一一个讲到他的病情影响指挥作战的故事。[24]

攻击恺撒右翼的战象被散兵射出的冰雹般的投射武器吓得惊慌失措，乱哄哄地逃跑了。庞培派军队的整个左翼很快土崩瓦解。虽然有人努力重整旗鼓，但在恺撒军队凶悍的追击之下，都失败了。恺撒的军团士兵情绪高涨，比法萨卢斯战役之后更为恣意地杀戮。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不愿意看到敌人得到宽恕，然后又卷土重来。恺撒已经下令处决了一名庞培派将领，此人于前49年在西班牙投降后被释放，如今是第二次被俘。这是他一贯的政策，第一次会原谅对方，但如果对方得到宽恕后仍然与他为敌，那么第二次就不客气了。在塔普苏斯，恺撒的士兵们可不管这么多，杀死了许多想要投降的庞培派士兵。恺撒的几名军官在企图阻止这种屠杀时，甚至被己方士兵砍倒。到这一天结束时，庞培派军队有1万人死亡，恺撒仅有50多人伤亡。敌军的主要将领逃走了，但大多数都在随后几周内丧命。阿弗拉尼乌斯和苏拉的儿子福斯图斯被西提乌斯俘虏，然后交给恺撒。恺撒在士兵们的呼吁下将他们处死。其他一些俘虏也被处决，但对于有些人，比如小卢基乌斯·恺撒（恺撒的堂兄和军团长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被恺撒下令处决的，还是被他的下属杀死的。佩特列乌斯和朱巴一世国王组织了一场相当诡异的自杀对决，通过互相决斗来了断自己。关于决斗的结局，各种史料说法不一，但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佩特列乌斯杀死了朱巴一世，然后在一名奴隶的帮助下自尽。梅特卢斯·西庇阿从海路逃走，但他的船只被追击而来

的恺撒海军拦截，于是就自杀了。在少数逃脱的人当中，拉比埃努斯最后逃到了西班牙，与庞培的儿子格奈乌斯和塞克斯图斯会合。[25]

在整个阿非利加战役期间，加图一直负责驻守乌提卡城，所以大军溃败的时候他不在场。事实上，他在整个内战的军事行动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败兵很快带来大军溃败、恺撒即将杀到的消息。加图与城内的罗马人（他将数百名居住在当地的罗马人组成了一个议事会）进行了会商，但认识到不管做出怎样的决定，都不可能继续打下去了。于是他们只有三个选择：逃跑、投降或自杀。晚饭（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加图就拒绝按照惯常的方式侧卧用餐，而是坐下吃饭。他还做了许多类似的姿态，据说他从内战爆发以来就不再剃须或理发）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注意到他的儿子和仆人拿走了他的剑，于是发出了抱怨，坚持要求他们把剑拿回来，但随后就去读书了。他这一天读的书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是柏拉图的《斐多篇》[26]，这部书讨论的是灵魂不朽。加图一生都努力研究哲学。最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放下书卷，拿起剑，刺向自己的腹部。伤势很重，但还不至于立刻丧命。听到声响后，他的儿子和奴隶们冲了进来。他们传来了一名医生，清洗了加图的伤口，并包扎起来。但他从来就不缺乏决心或勇气。其他人离开后，这个四十八岁的男子便撕开缝伤口的线，开始掏出自己的内脏。其他人还没来得及控制住他，他便咽气了。恺撒得知此事后，感到很可惜，没有机会去宽恕自己的不共戴天之敌。但在很大程度上，加图就是为了避免被敌人宽恕而自杀的。

在恺撒越过卢比孔河后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大多数迫使他走出那一步的权贵都已经死了，幸存者也几乎全部放弃了战斗。流血冲突还没有结束，因为一年之后西班牙还会有一场战役，甚至更加野蛮和残酷。内战开始的时候，恺撒的敌人错误地判断，恺撒不敢打仗；后来又错误地认为，他们手里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必胜无疑。尽管困难重重，恺撒还是打赢了内战。现在人们拭目以待的就是，他能不能赢得和

平，建立长期的稳定。这是头等大事，但首先，就像在亚细亚一样，他需要平定阿非利加。像往常一样，曾经支持庞培派军队的社区受到了惩罚性的罚款，而那些支持恺撒的人则得到了奖赏。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与摩尔人国王包古达的妻子尤诺娅有了一番私情。直到6月，也就是登陆差不多五个半月之后，他才离开了阿非利加。[27]

---

[1] Cicero，*ad Att.* 11.17a.3.

[2] 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66.2［Loeb translation by B.Perrin（1919），p.397］.

[3] Dio 42.17.1-19.4，22.1-25.3，Caesar，*BC* 3.20-22，Velleius Paterculus 2.68.1-3，Livy *Pers.* 111；关于凯利乌斯和米罗失败的叛乱，见see 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3（1923），pp.223-225，M.Gelzer，*Caesar*（1968），pp.227-228。

[4] Dio 42.21.1-2，26.1-28.4，Plutarch，*Antony* 8-10，Cicero，*Philippics* 2.56-63，and in general see Holmes（1923），pp.226-229，M.Gelzer，*Caesar*（1968），pp.253-254；关于饮酒的书，见Pliny，*NH* 14.148；关于狮子，见Pliny，*NH* 8.21，Plutarch，*Antony* 9。

[5] Appian，*BC* 2.92，Dio 42.29.1-32.3，Plutarch，*Antony* 9，*Alexandrian War* 65，*African War* 54，Cicero，*ad Att.* 11.10.2，*Philippics* 6.11，11.14；关于庞培派进攻意大利的传言，见Cicero，*ad Att.* 11.18.1，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8。

[6] Dio 42.19.2-20.5，Plutarch，*Brutus* 6，and *Cicero* 39；and T.Mitchell，*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1991），pp.264-265.

[7] Appian，*BC* 2.92-94，Dio 42.52.1-55.3，Suetonius，*Caesar* 70，Plutarch，*Caesar* 51，Frontinus，*Strategemata* 1.9.4.在Dio的记述中，部队被允许进城，对抗是在城内发生的，而不是在城外的营地。

[8] Dio 42.49.150.5，Suetonius，*Caesar* 38.2，51.2，Plutarch，*Antony* 10，Cicero，*Philippics* 2.65，71-73；and M.Gelzer，*Caesar*（1968），p.262，Holmes（1923），pp.234-235.

[9] 今天西西里岛西海岸的马尔萨拉。

[10] Quote from *African War* 1；关于军团的数量，见*African War* 60；关于恺撒跌倒的故事，见Suetonius，*Caesar* 59，Dio 42.58.3；关于恺撒无视不吉利的征兆，见Cicero，*de Divinatione* 2.52，他以此为证据，说明这种预测的虚假。

[11] *African War* 1-3，10-11，19，27，Appian，*BC* 2.96.

[12] 注意是小莱普提斯（Leptis Parva或Leptis Minor），不要与更有名的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在今天的利比亚）混淆。

[13] *African War* 4-15.

[14] 《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不详，可能是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15] *African War* 16.

[16] *African War* 16-19，Dio 43.2.1-3，Appian，*BC* 2.95，他认为庞培军队是故意撤退的，and Holmes （1923），pp.242-245，J.Fuller，*Julius Caesar*：*Man*，*Soldier and Tyrant*（1965），pp.267-270；给旗手鼓劲，见Suetonius，*Caesar* 62，Plutarch，*Caesar* 52。

[17] *African War* 20-21，24-26，28，33-35，44-46；关于用海藻喂马，见*African War* 24；on Scipio Salvito see Dio 42.58.1，Plutarch，*Caesar* 52，Suetonius，*Caesar* 59。

[18] *African War* 24-43，quotation from 31.

[19] 盖图里人是古时居住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的柏柏尔游牧部落，擅长养马。

[20] *African War* 48-55，Suetonius，*Caesar* 66.

[21] *African War* 56-67.

[22] *African War* 68-80.

[23] *African War* 82-83.

[24] Plutarch，*Caesar* 53.

[25] *African War* 81-86，91，94-6，Appian，*BC* 2.100.

[26] 《斐多篇》是柏拉图的第四篇对话录，内容为苏格拉底饮下毒药前的对话。叙事者为斐多，一个曾受过苏格拉底帮助的年轻人，后成为其弟子，在苏格拉底死亡当年亦跟随在他身旁。斐多的对话对象为弗里乌斯的伊奇，一个同是哲学家的朋友。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试图从多方面证明人的灵魂的存在。

[27] *African War* 87-90，97-98，Dio 43.10.1-13.4，Appian，*BC* 2.98-99，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6.4，59.1-73.1；on Queen Eunoe see Suetonius，*Caesar* 52.1.

二十二 独裁官，前46年～前44年

内战的结尾都是一样的，胜利者的意愿也未必能实现，因为他还需要安抚那些帮助他赢得战争的人。

——西塞罗，前48年12月 [1]

恺撒作为胜利者回到了罗马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赦免了所有曾经用武力反对他的人。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 [2]

前46年将近7月底的时候，恺撒返回了罗马。元老院已经投票决定为他举行长达四十天的公共感恩活动（这时间之久非常惊人），名义是庆祝战胜朱巴一世国王，而不是打败他的罗马盟友，这种说法是很有策略性的。四十天的感恩甚至超过了为庆祝战胜维钦托利而举行的活动。十四年前，为了参选执政官，恺撒放弃了举行凯旋式。如今，在数周疯狂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举行了多达四次凯旋式，分别是庆祝打败高卢、埃及尼罗河、亚细亚和朱巴一世国王与阿非利加的胜利。庞培在其漫长的军事生涯中赢得了三次凯旋式。大多数人也许能意识到，恺撒如今庆祝的四次胜利分别是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三块大陆赢得的，和庞培一样。庆祝活动于9月21日开始，但不是连续举行的，所以一直延续到10月2日。庆典规模空前，极其奢华，有战俘的示众游行，战俘包括维钦托利、朱巴一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妹妹阿尔西诺伊四世。据说阿尔西诺伊四世激起了围观群众的同情。她和那个男婴逃脱了高卢军事领袖的命运。在高卢凯旋式的结尾，维钦托利被按照宗教仪式扼杀了。为了给恺撒一些特权，还打破了一些传统（肯定是近期才有的传统）。恺撒享有的特权之一是多达七十二名执法吏为他开道。执政官一般有十二名执法吏侍奉，独裁官有二十四名。恺撒的七十二名执法吏是执政官的六倍、独裁官的三倍，这可能是为了表明恺撒曾三次担

任独裁官。另外，按照仅在共和国往昔历史中才出现过的先例，恺撒乘坐的是一辆由一组白马拉的战车。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的说法，那么在第一场凯旋式，也就是庆祝战胜高卢的那场开始后没多久，他的战车车轴就断了，于是不得不匆匆换了另外一辆。或许是为了避免这个凶兆，在仪式结束时，恺撒双膝跪地，爬上卡比托利欧山上朱庇特神庙的台阶。据普林尼说，恺撒由于之前乘车出过事故，所以在坐上战车之前总会说一句有魔力的咒语，但显然这一次咒语也没用。[3]

在每一场游行中都有运载战利品（通常是武器、甲胄以及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大车。有的车上载着带有标语的牌子，包括著名的“我来，我见，我征服”，或者列举各项功业的清单。常有人认为，普林尼给出的恺撒历次战役杀敌总数（119.2万人）是根据他的几次凯旋式宣扬的敌军伤亡数字计算出来的。对互相竞争的罗马贵族来说，对自己的成功加以量化是很重要的。另外一项传统是展示描绘战役中重要场景的图画，恺撒的凯旋式上有很多这样的图画。按照官方的说法，他庆祝的是打败共和国的异族敌人的胜利，因此没有提到庞培和法萨卢斯战役。据说其中包括梅特卢斯·西庇阿用剑自尽和加图撕扯自己伤口的图画。这些场景令群众发出哀叹，群众认为这是对落败敌人的耀武扬威，非常粗鲁，与恺撒通常的宽大仁慈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史料并没有表明这些景象让群众对恺撒产生了敌意，而内战中这些生灵涂炭的恐怖景象肯定会促使群众为了避免未来的冲突而接受新政权。游行队伍中的士兵佩戴奖章，身穿最精良的甲胄，他们没有丝毫道德顾虑，肯定不怕激起群众的敌意。根据历史悠久的传统，士兵们不仅可以高唱自己在战争中的功绩，还敢于唱下流歌曲来嘲讽自己的统帅。因为在凯旋式的日子里，正常的军纪都被放松了。恺撒的老兵们歌唱恺撒在高卢的情妇们，声称他把元老院给他拨的款都花在情妇们身上了。老兵们还警示罗马人，让他们“把老婆锁好”，因为“秃头的通奸者”回来了。他们开玩笑地说，违法乱纪通常会遭到惩罚，但恺撒通过目无法纪、挑战元老院，竟然成了罗

马的主人。另外一首歌谣讲的是他在比提尼亚时的旧八卦：

> 恺撒征服了高卢，但尼科美德四世征服了恺撒：
>
> 看呐，如今恺撒得胜了，他征服了高卢，
>
> 尼科美德四世没有得胜，不过他征服了恺撒。[4]

这是唯一一种会让恺撒恼怒的诽谤，不久之后他公开发誓，坚称这些传闻完全是胡言乱语。狄奥说，他的誓言只是让他显得可笑。[5]

在几次凯旋式之间的日子里，还举行了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大宴会，多达2.2万张餐桌上摆着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在最后一次宴会结束后的夜色中，恺撒在一支游行队伍的簇拥下回家，20头大象载着巨大的火炬为队伍照明。他还举办了戏剧演出，在其中一次演出中，恺撒坚持让著名的骑士阶层剧作家迪基姆斯·拉贝里乌斯亲自登台献艺。拉贝里乌斯心里很怨恨，因为登台演戏是不符合富裕公民身份的行为，他这样做会丧失骑士的体面，但他不得不服从。在舞台上，他读出了这样一句台词："令众人畏惧者，必畏惧众人。"观众们听到这话，纷纷将头转向恺撒。拉贝里乌斯感到很满意。演出后，拉贝里乌斯得到了5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赏金，还得到了一枚金戒指，以表明他的骑士身份已经恢复。除了戏剧演出，还有体育和竞技比赛。恺撒多年前承诺为尤利娅的葬礼举行竞技活动，如今得以真正举行。赛马场上举行了战车竞赛，战神广场上搭建了临时的比赛场地，有些角斗士比赛是在广场上举行的。但这些竞技规模极其宏大，因此有些角斗士比赛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斗兽比赛一连举行了五天，400头狮子被杀死，还有一些长颈鹿丧命，此前罗马城从来没有过长颈鹿。除了通常的一对对角斗士竞技之外，还有大规模交战，两军各有500名步兵、30名骑兵和20头战象。还有一种版本的故事说，有20头战象及其骑手互相单独打斗。此外，恺撒还在台伯河右岸挖掘水道，建造湖泊，进行了一场海战表演。恺撒要让所有这些庆祝活动比罗马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活动都更宏伟、更壮观。

城市挤满了前来观看庆祝活动的人群。很多人居住在所有能找得到的空地上搭建起来的帐篷里。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有些人，包括两名元老，在拥挤的人群中被踩踏而死。这些活动成本惊人，举行这些娱乐活动和游行本身就要花费巨款，此外恺撒还利用这些机会慷慨赏赐群众。在凯旋式结尾，恺撒给了他的每一名士兵5000迪纳厄斯，这比一名罗马军团士兵服满十六年兵役能得到的军饷还要多。每位百夫长得到1万迪纳厄斯，军事保民官和长官们（大多数属于骑士阶层）每人得到2万迪纳厄斯。他实际给出的赏金可能比他在内战期间向将士们许诺的还要多。他还慷慨大方地赏赐了平民百姓，尤其是罗马城的穷人。每位平民得到100迪纳厄斯，以及一些小麦和橄榄油。有些士兵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财富都是他们挣来的，因此不愿意与平民分享。毫无疑问，饮酒和节日气氛使得这种不满情绪愈发高涨，导致出现了一次暴乱。恺撒过去面对士兵哗变时不肯让步，如今更不愿意妥协。他命人将一名暴乱士兵带走处决。另外两人在仪式上被大祭司团和玛尔斯祭司斩首。这种仪式的地点是战神广场，我们对其具体含义不甚了解，但两个首级被带到广场，在雷吉亚附近示众。秩序恢复了，庆祝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恺撒始终是个擅长组织和安排表演的人，他不仅考虑了表演的节目，还考虑了观众们的观看体验。在好几场表演中，他命人搭建了丝绸遮阳篷，为观众提供阴凉。[6]

奖赏与安排

总的来讲，群众对恺撒的凯旋式、庆祝活动和竞技表演非常满意，尽管狄奥说一些人看到角斗士比赛中大规模流血的惨状，感到莫大的震惊。独裁官在观看这些比赛时还会阅读信函，并向书记员口述，这让群众不高兴，不过也说明他的工作极其繁忙。恺撒打了这场内战，不是为了改良共和国。不管西塞罗等人后来是怎么说的，没有证据表明恺撒的目的就是在自己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独揽大权。内战前夕他想要的是当执政官，无疑也打算在自己的十二个月任期内开展新的立法。然而，他

（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被迫打了一场内战，而胜利给他带来了比他之前想要的大得多的权力。在前46年，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随后在前45年和前44年又第四次、第五次担任执政官。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时还是独裁官，并拥有元老院授予的其他一些权利。他不是始终在罗马，因为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于前46年11月发生在西班牙，他直到次年夏天才返回意大利。这使他的立法和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尤其令人惊讶。恺撒勤于政事，孜孜不倦，虽然他的助手（如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肯定承担了制定法律的大量细致工作，但基本的理念似乎都是恺撒自己的。恺撒致力于立法的时间很短暂，所以一些项目从来没有真正开启，而更多项目在他去世时还没有完成。我们并不能确定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情，而要判断他的意图就更难了。他遇刺身亡后，他的支持者和暗杀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内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对他的长期目标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让这一切显得愈发费解的是，到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后来被称为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时，内战才结束。他被恺撒收养之后，正式名字就变成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这意味着，不管是恺撒还是他的养子通过的法律，都被称为《尤利乌斯法》；不管是恺撒还是奥古斯都建立的殖民地，都叫尤利乌斯殖民地。因此，如果某项法律只有名称保存至今，而不知道具体时间，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它究竟是恺撒颁布的，还是奥古斯都设立的。尤其让人糊涂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奥古斯都执行了恺撒的设计方案，但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想法和恺撒的想法迥然不同。如果要详细讨论每一项可能是恺撒采纳的措施，就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会让我们离题万里。所以，下面是一番概述，集中讨论一些被普遍认为是恺撒做出的举措。[7]

很显然，恺撒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关于他的总体目标究竟是什么，学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有些学者将他视为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看清了共和国面临的问题，知道共和国的体制再也不能应对已经

发生变化的形势，并且理解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他的计划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改变，还极大地改变了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包括罗马）与各行省的关系。恺撒在前48年写给梅特卢斯·西庇阿的一封信中称，他想要的仅仅是“让意大利安定，让各行省和平，让罗马的势力安全”。有些学者将这句话视为一种明确的施政纲领。而不认同此种观点的学者则会说，这仅仅是内战厮杀正酣时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在这些学者看来，恺撒不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而是一位非常保守的贵族，他在共和国体制内追寻荣耀与地位，最终获得了权力。在这样的传统雄心壮志的驱动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控制了罗马之后该做些什么。若以这种观点来考量，恺撒数不胜数的改革（处理了范围极广、五花八门的问题）恰恰说明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宽泛的计划。恺撒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修修补补，恰恰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让自己保持忙碌，误以为活跃就是一种成就。上述两种观点都太极端了，大多数学者采取了介于二者之间的较为合理的态度，但在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证据。[8]

恺撒接手的不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共和国。内战扰乱了整个罗马世界，但早在内战之前的很多年里，共和国的机构就已经难以应付动荡和凶暴的政治斗争。尊重传统固然重要（我们不必过于纠结恺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尊重传统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这在其他人眼中的重要性），但也必须尽快找到务实的新政府体制，进行有效的统治。另外，人事安排也始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人曾为他作战，因此需要奖励；有些人曾反对他，现在恺撒要么以慷慨和仁慈来争取他们，要么严酷地审判他们。前46年秋季，恺撒开始了他的殖民计划，为他的老兵们提供农场。他打算用公共土地来安顿他的老兵，或者没收那些已死或拒不悔改的庞培派的土地。即便如此，土地仍然不够，必须以恰当的价格来收购更多的土地。正如恺撒对哗变士兵所说的那样，他急于避免苏拉向其士兵分配土地时造成的动乱和艰难。起初，似乎只有那些服役期满的士兵才能退役并得到土地（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士兵在军中的比例是多

少），其他人只能继续服役到期满。土地分配主要是在意大利，但也有老兵被安顿在北非和外高卢，例如纳尔博的殖民地似乎得到了扩建。就像恺撒在纪念凯旋式时不仅向士兵，还向罗马人民赏赐金钱一样，他的土地分配计划也开始包括平民。他在各行省建立了一些殖民地，还筹建了更多的殖民地，预计将会迁移和安顿8万人。盖乌斯·格拉古曾计划在迦太基原址建立一个殖民地，如今这个计划被实施了；在科林斯原址（科林斯像迦太基一样，也被罗马人摧毁了，时间是前146年）也兴建了一个新的居民点。有些情况下，新居民点的选址是为了惩罚那些在内战中曾经反对他的社区，但即便如此，惩罚也不算特别严厉。整个殖民计划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土地测量员去往所有接受论证的地区，调查土地的真实产权情况，然后划分地界，将其分配给新人。在这项工作的每一个阶段，恺撒和他的幕僚似乎都愿意听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西塞罗成功地为伊庇鲁斯的布特罗图姆[9]社区争取到了豁免权（即不会向当地安置移民），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在那里拥有产业和利益。恺撒土地分配项目的目标是尽可能满足老兵和平民移居者的要求，但同时避免对殖民地所在的地区造成太大的负担，尤其是在当地人有影响力较大的朋友的情况下。

平民派政治家向公民们分配土地已经是悠久的传统，在格拉古兄弟很久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恺撒的土地法是他前59年立法工作的基石，现在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便以比当年大得多的规模继续这项事业。他奖赏了他的士兵，同时也将罗马人民中一个潜在的危险群体迁出了罗马城，给了他们谋生和养家的手段。在政治上，他获得了利益，让许多人欠了他的人情、对他感恩戴德，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富裕公民的数量。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恺撒和许多同时代人都感到，殖民计划利国利民，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在前59年，就连加图也认为，恺撒提出的土地法唯一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提出它的人。但这些工程的规模极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到恺撒去世时，他的计划只落实了一小部分。他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排除庞朴丁沼泽的水，并将其转化为良田，只存

在于理论阶段，没有实际进展。但是，这些计划的确说明恺撒打算进行更多的土地分配，也就是说他非常努力地改善更多穷苦公民的生活条件。另一项没有实际执行的计划是改变台伯河的河道，改善水上交通，并保护罗马城容易被水淹的部分。[10]

军官们，尤其是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们，也从土地分配中受益。恺撒的那些地位较高的追随者们得到了高官厚禄的奖励，导致传统的行政长官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前47年，他将裁判官的数量从八人增加到十人。次年秋季，在他从阿非利加返回和远征西班牙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举行大多数的选举。因此，当他于前45年10月从西班牙返回后，他立即在当年的余下时间选举了14名裁判官和40名财务官，有16名裁判官和另外40名财务官于前44年1月1日上任。与此同时，他辞去了前45年的执政官职务，这一年只有他一人担任执政官，没有同僚，就像庞培在前52年最初几个月那样。他的军团长费边和特雷博尼乌斯被选为这一年余下时间的补任执政官[11]。尽管元老院授予恺撒直接任命行政长官的权力，他还是仅仅做出推荐。他推荐的人选名单会在相应的选举会议上被朗读公布："独裁官恺撒致（部落名）。我推荐某某人担任某官职，请诸位投票表决。"他推荐的人总是能够当选，很有可能没有人敢于参加竞选，与恺撒青睐的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恺撒的这种做法保全了正当的程序，但他显然需要将高级行政长官的职位授予自己的众多追随者，这就产生了矛盾。费边·马克西穆斯去看一场戏时，传令官高呼执政官驾到，观众们却高声疾呼："他才不是执政官！"费边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一天早上去世了。恺撒得知此消息时正在主持一次选举次年财务官的部落会议。他改变了计划，让群众按照百人会议的模式聚集起来，选举了一位新的执政官。正午之后不久，他在高卢时的另一名军团长盖乌斯·卡尼尼乌斯·莱比鲁斯被选为执政官，因此这位新执政官的任期只有几个小时。几天后，西塞罗开玩笑说："卡尼尼乌斯担任执政官期间，没有人吃午饭。但在他任上没有发生任何坏事，因为他的尽忠职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他整个执政官任期上，他从来没有睡过觉。"据

说当时西塞罗敦促所有人冲上去，抢在卡尼尼乌斯任期结束前恭喜他。私下里，西塞罗觉得此事是莫大的悲剧，而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12]

恺撒挑选的执政官们在其任期内几乎都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即便他们有行动自由，而不是仅仅作为推动恺撒立法的工具，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有所作为。但他们获得了执政官的尊严和象征意义。恺撒甚至将执政官的地位授予十名从未担任过这个职务的前任裁判官，因为他需要奖赏许多追随者，时间却很有限。如此迅速地免职和指定新人并不违法，但是没有任何先例，而且极大地损害了这些官职的尊严。其他职位的戏剧性增加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职位的贬值，但从务实的角度看，这些做法也是有道理的。苏拉将裁判官的数量固定为八人，因为这已经足够为当时共和国控制的行省提供总督人选。此后，罗马通过征服和吞并大幅扩张，因此的确需要更多的行政长官来管理新的行省。当选财务官的人会自动获得元老身份，于是每年要增加至少四十名新元老。恺撒还获得了自行斟酌授予元老和贵族身份的权力。

甚至在内战造成动荡和损失之前，监察官的机制就已经无法正常运作，在接纳新元老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这往往是由于几位监察官之间的争吵。所以，元老院的人数急剧下降。恺撒任命了数百名新元老，弥补了元老院的损失，然后大幅增加了元老数量。苏拉当年将元老人数扩大了一倍，达到约600人；到恺撒去世时，已经有约800～900名元老。其中有些人是一度被逐出元老行列的人，或者那些因为支持马略而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大多数新元老来自地位稳固的骑士家族，包括意大利各地的很多贵族，但也包括一些前任百夫长。还有一些来自意大利之外的公民家族的人，包括一些来自内高卢（或许还有外高卢）的人。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蛮族”脱下了长裤，披上了托加袍。还有人在广场上乱涂乱画，鼓动大家不要告诉这些新元老去元老院议政厅的路怎么走。不过事实上这些刚成为元老的“外国人”不大可能不会讲流利的拉丁语，也不大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文化上与真正的罗马

贵族其实没有什么差别。[13]

恺撒的一些任命可能不太合适。前文已经讲到，恺撒曾说如果帮助他的是罪犯，他也会奖赏他们。被他任命为行省总督的一些人后来被以腐败和敲诈罪行起诉，并被定罪。其中之一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他在塔普苏斯战役之后被留下执掌阿非利加行省。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或许他真的是比较天真，而不是腐败。另外一名以残忍著称的忠实追随者想得到一个行省，但被恺撒拒绝。恺撒给了他一笔赏金。但总的来讲，恺撒接纳的新元老和元老院的旧成员没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罗马的许多最古老、最高贵家族的后裔同样常常表现出腐化、卑鄙、无能的罪行。对恺撒如此扩大元老院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控是，他这么做使元老院人数太多，无法在广场上进行正常的辩论。这是有道理的，但在恺撒余后的岁月里，要处理的政事极多，只有一小部分在元老院进行了辩论。事情往往是由恺撒及其谋士闭门决定的，然后公布出去；表面上假装是元老院发布的，甚至编造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西塞罗惊讶地发现，外省的一些统治者或社区写信给他，感谢他投票支持他们的请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肯定也没有参加过讨论这些事务的任何会议。要决断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处理。但有意思的是，恺撒确保他的决策被以正确的传统方式公布出去，尤其是发布给遥远的社区，那里的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决策其实是恺撒的一言堂。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是他在这些工作中的主要助手，两人在恺撒在世时都没有成为元老。尽管恺撒及其盟友处理政事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违反宪法的，但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也承认，恺撒等人的行政决策一般都是恰当且合理的。[14]

很多曾经的庞培派，包括西塞罗，得到了恺撒的宽恕，如今和恺撒的支持者一同坐在元老院里（至少是在元老院真正开会的时候）。起初西塞罗决心不参加任何辩论，集中精力于写作，而不是政治。塞维利娅

的儿子布鲁图斯之前也是庞培派，但他如今比较活跃，被恺撒派去管理内高卢，可能是以资深裁判官的身份，不过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裁判官。他的妹夫卡西乌斯大约在这个时期也接受了军团长的职位。其他的一些庞培派人士已经停止作战，但还没有正式向恺撒投降并接受裁决，因此不能擅自返回意大利。于是，他们流亡海外，等待亲戚朋友帮他们说情。据传闻，恺撒喜欢让曾经最为激烈地反对他的人等待，迟迟不对其做出裁决，好让这些人长时间如坐针毡，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其中之一是前51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是他开始了对恺撒地位的集中攻击，并且用鞭子抽打和驱赶诺乌姆·科姆的行政长官。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内战的爆发，不过他没有积极地参加内战。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肯直接写信向恺撒求饶。为马凯鲁斯求情的人包括恺撒的岳父皮索、马凯鲁斯的堂兄弟[15]（前50年的执政官，恺撒甥孙女的丈夫），以及其他一些参会的元老。恺撒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西塞罗打破了沉默，发表演讲，颂扬恺撒“以元老院的权威和共和国的尊严为重，摈弃个人恩怨和猜忌”的义举。不久之后，他发表了另一次演讲，这次是在广场而不是在元老院，敦促恺撒允许昆图斯·里加卢斯结束流亡、重返罗马。据普鲁塔克说，在西塞罗开始演讲之前，恺撒公开宣布，里加卢斯是他的敌人，不配得到宽恕。尽管他（恺撒）心意已决，但还是愿意听听西塞罗的话，因为西塞罗的精彩演讲会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最后，恺撒被西塞罗的演讲感动落泪，立刻赦免了里加卢斯。之前的庞培派逐渐返回了罗马，其中一些是非常显赫的人物，至少部分人得以重返政坛。但马凯鲁斯未能回国，他还没来得及享受恺撒的宽恕，就在一场家庭纠纷中被自己的一名家人杀害了。另外，越来越多在内战期间保持中立的人开始在恺撒的统治下出任官职，比如著名的法学家塞尔吉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他去希腊当了总督。西塞罗继续活跃地抛头露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很乐观，还建议恺撒努力恢复共和国的正常运作。[16]

大整顿

恺撒的殖民计划让罗马城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迁走了，但他也非常关心留下的那部分居民的生活，努力去改善和管理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仔细审查了向公民发放免费粮食的制度，认为此制度容易被滥用，而且经管不利。他下令对罗马城居民进行人口普查，逐条街道地统计人口，并利用地主提供的佃户人口信息。随后根据这次普查的结果，他主持重新计算了有资格领取免费粮食的人数。这样的人口数量从32万下降到了15万。新的数字被固定下来，并建立了新制度，一旦有人死亡，名单出现空缺，就由裁判官增添新的有资格领取免费粮食的人。那些被取消免费领取粮食资格的人可以在恺撒的建筑工程里找到一份工作，领取薪金。他的这些工程持续进行，规模宏大，以战神广场上的围场和新的广场建筑群为核心。除了奢华的表演和竞技之外，恺撒还找到了其他方法为罗马城造福。他很可能受到了在希腊化城市看到的东西的影响，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港。他向任何愿意到罗马工作的医生或教师授予公民权。他直接效仿亚历山大港的著名图书馆，命令在罗马建立一所类似的学术中心，并指派著名学者特伦提乌斯·瓦罗（曾经在西班牙的庞培派将领）负责搜集拉丁和希腊文学。恺撒的另一项工程是编纂罗马法律，但此工程可能当时并没有开始，到几个世纪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17]

恺撒影响最持久的工程之一是重新编纂历法。在这方面，他也受到了希腊化世界的影响。他委任亚历山大港天文学家索西琴尼主持新历法的计算工作。根据罗马现行的历法，一年有355天，最初是根据月相周期计算的，需要不断地修正。为了让官方历法能与自然季节一致，大祭司团（恺撒是其中最高级的祭司）要负责给每一年增添闰月。这种历法非常让人头痛，而且容易受到政治操纵，比如可以延长盟友的公职任期。西塞罗担任奇里乞亚总督的时候非常害怕有人会这么做，来推迟他离开行省、返回罗马的日子。到内战时期，历法已经比实际的季节早了大约三个月。恺撒新历法的逻辑性更强，他的目的是让历法不需要每年修正也能正常运行。前46年2月底的时候，恺撒已经为当年增添了一个长约三周的闰月。后来在11月和12月间又增添了两个闰月，于是这一年

最后一共有445天。这是为了让新一年（前45年）的1月1日从太阳周期的恰当时间开始。儒略历[18]的月份不等长，但加起来一共是365天。每四年添加一个闰日，而不是一整个闰月，加在2月23日之后。这种历法被东正教沿用至今，但在16世纪，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命人对其做了细微修改，成了所谓的格列高利历，也就是今天广泛使用的公历。恺撒的历法改革很实用，除去了混乱和政治操纵的可能性。它还为每年增加了10天，这10天都是可以执行公共事业（如元老院开会或召集公民大会）的日子。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有些人对新的历法抱有怨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颁布新历法的恺撒心怀不满。有一次，有人对西塞罗说，天琴星座应当在次日升起。西塞罗讥讽地说，星座的升起需要遵照官方命令。[19]

恺撒对规章制度很关心，它的很大一部分都属于罗马的传统。在过去，为了限制罗马精英阶层的奢靡浪费，罗马曾经颁布过许多禁止奢侈的法律。恺撒也通过了一部这样的法律，除了被特别指明的一些人和群体在特定日子之外，任何人不准坐轿子，不准穿紫色衣服，不准佩戴珍珠。许多来自异国的贵重食品被禁止了，恺撒还派人到广场周边检查商店出售的货物。甚至有故事说，士兵们闯进民宅，没收餐桌上的违禁食品。从长远来看，他的这项法律和之前的类似法律一样，影响甚微。他这么做的目的部分是政治上的，是为了防止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至少是潜在的扰乱局势的政客）通过奢侈的娱乐来展示自己的财富、笼络人心。他或许还希望城里的商人们将精力集中在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外国奢侈品上。但就连恺撒自己也不指望大家在他背后也能认真遵守这项法律。恺撒颁布这项法律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希望恢复传统的节俭品质（罗马人常常赞扬这种品质，只是很少有人真正去那么做）；不过如果他真的这么想，就有些讽刺了，因为恺撒本人就是有名的珍珠和艺术品收藏家。狄奥还告诉我们，恺撒奖励那些拥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以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受到他的禁奢令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买得起奢侈品的富人，他还禁止了罗马城的行会和同乡会之类的社团组

织。克洛狄乌斯那样的政客曾利用这些组织作为打手，为其实现政治目的服务。此项法律的唯一例外是合法的协会。罗马的犹太居民的会堂聚会得到了明确的豁免。20岁～40岁的罗马公民被禁止在国外连续停留超过三年，除非是作为军人或者执行其他公务。元老子弟们受到了格外关注，他们被禁止出国，除非是在一位总督的幕僚中服务或从军。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些法律的目的，不过对年轻贵族的限制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加入反政府武装集团，从而连累家人。恺撒的其他法律更为实用，比如清扫罗马的街道，以及维持城市的行政和基础设施正常运转。恺撒的措施带有平民派的意味，但他的改革都并不极端。他努力让社会的不同阶层都受益，并且显然竭力避免让某个群体获得过多利益以至于危害其他群体。[20]

恺撒关心的不仅仅是罗马城。他或许是记起了斯巴达克斯起义，立法规定意大利南部大庄园的劳动力必须至少三分之一是自由人，而非奴隶。有人认为恺撒还为意大利各城镇和自治市[21]的宪法制定了范例，但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大。他可能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其立法的很大一部分似乎的确要用于意大利和各行省。他在地中海周边作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调解纠纷，以及确认或修改涉及各行省社区和君主的法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场合中，征集资金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但他也热切地希望这些地区安定和平，哪怕仅仅是因为不满情绪可能导致这些地区造反，从而对他的政敌有利。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他曾经因起诉腐败的行省总督而闻名，后来他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还通过了规范这些行政长官行为的法律。当上独裁官之后，他对行省总督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是将资深执政官级别的总督任期定为不得超过两年，而资深裁判官级别的总督任期不得超过一年。狄奥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效仿他，但即便是批评者也认为这种措施是非常有道理的。[22]

西班牙战役，前46年秋～前45年春

恺撒对一个总督的不恰当任命，导致了内战的最后一场大战役爆发。昆图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曾作为财务官在西班牙服役。恺撒击败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之后，将卡西乌斯留在外西班牙行省担任总督。卡西乌斯贪得无厌，性格暴虐，导致行省居民和他自己的部队都非常憎恶他。这导致了叛乱和军队哗变，许多人公开宣称投奔庞培派。卡西乌斯遭到刺杀，但活了下来，后来决定逃跑。载着他和他的战利品的船不幸倾覆，他葬身于大海。在此之前，恺撒已经得知他的不端行为，并派人去接替他，但为时已晚。庞培的儿子格奈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很快抵达西班牙，争取当地人的支持，而西班牙与他们的父亲曾有过很多联系。塔普苏斯战役之后，拉比埃努斯和其他逃亡者也到西班牙与他们会合。恺撒起初觉得这是小菜一碟，他的军团长就能消灭庞培军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到前46年11月底，他判断自己的军团长掌控不了大局，于是亲自出征。如前文所述，这一年没有选举任何高级行政长官，于是他将罗马交给骑兵统帅李必达负责，由八名指定的高级军官辅佐他，但大多数日常工作是由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处理的。不到四周内（苏埃托尼乌斯说是二十四天，但其他几份史料说是二十七天）恺撒便抵达了位于外西班牙的战区。为了让自己保持忙碌状态，他不仅坐在马车上处理日常事务，还创作了一首题为《旅行》的诗。格奈乌斯·庞培没有他父亲的军事才华，但他是个坚忍不拔的人，现在拥有13个军团的大军，还有众多的辅助部队。恺撒率军前往西班牙之后，有人担心即便他取得了多次胜利，如今他仍然可能失败，因为他只调集了8个军团，其中只有2个有作战经验，即第五“云雀”军团和第十军团（已经有一些服役期满的老兵离队）。那些曾经为庞培效力而如今与恺撒和好的人也非常紧张，因为格奈乌斯是个暴躁易怒的人。前45年1月，卡西乌斯（布鲁图斯的妹夫和未来的反恺撒密谋者）写信给西塞罗，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 现在重新来谈谈关于共和国的事情，即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担心，宁愿留在仁慈的旧主人身边，也不愿意要一个残忍的新主人。你知道格奈乌斯多么蠢；你知道，他误以为残忍就是勇气，他还以为我们老是嘲讽他。我担心他会像个农夫一样，用剑来报偿我

们说的笑话。[23]

恺撒的军官们记述了此次战役，称之为《西班牙战争史》，但这是增补恺撒《战记》的著作中水平最差的一部。这些军事行动的很多细节都模糊不清，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就足够了。恺撒抵达西班牙后得知，敌军攻打乌利亚城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乌利亚是仍然忠于恺撒的地区的唯一一座重要城镇。为了减轻乌利亚的压力，他立即率军进攻行省首府科尔多瓦。防守这座城市的是塞克斯图斯·庞培，他的求援很快让兄长及其主力部队离开了乌利亚。恺撒的军队安顿下来，准备在冬季围攻科尔多瓦。格奈乌斯追踪和骚扰恺撒军队，但不肯正面交锋。条件非常艰苦，从这场战役一开始，双方都表现得极端凶残。恺撒认为科尔多瓦太牢固，难以攻克，而且留在原地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于是选择撤退，改为攻打较小的阿特瓜城。格奈乌斯追了上去，但仍然不肯正面对垒。恺撒军队的围攻取得了很大进展，很快就发现阿特瓜的许多居民希望投降。于是，驻守阿特瓜的庞培军队将所有被怀疑想投降的人及其亲眷全部带到城墙上，尽数屠杀。即便如此，格奈乌斯仍然无法保住阿特瓜，最后阿特瓜守军于前45年2月19日投降。行省的各社区开始纷纷向恺撒投降，庞培军队也不断有逃兵加入恺撒阵营。格奈乌斯的回应是处决那些可疑分子。将近2月底的时候，恺撒的士兵抓获了敌军的四名侦察兵，将其中三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是奴隶。第四个人是罗马公民，被斩首了。格奈乌斯撤退了，恺撒追了上去，逼近了乌尔索城（现代的奥苏纳）。敌军驻扎在大约6里外的蒙达。[24]

3月17日上午，格奈乌斯率军出营，在蒙达城外的山岭上排兵布阵。恺撒判断这就是决战的时机（他自战役开始以来一直渴望与敌军决战），于是将其军队部署在敌军前方的平原上。他看到庞培军队自信满怀的样子，认为他们会下来到平原上交战。但格奈乌斯让他的部队停留在山坡上。尽管不占据地利，但恺撒仍然决定进攻。庞培军队兵力可能多于恺撒，不过庞培军队的13个军团未必全都在场并且齐装满员，因为

他们在之前的作战中损失不小，而且还需要派遣部队到各地去驻防。恺撒的骑兵的确比敌军多得多，但地形对骑兵不利。恺撒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好运气、军事才干以及官兵的英勇上，毕竟这些将士在塔普苏斯曾经心急如焚地要求作战。像往常一样，第十军团在右翼，第五军团和第三军团（可能就是在高卢为他效力，后来被庞培接管的那个军团）在左翼，另外5个军团在中路。恺撒下令进攻，但敌人没有上来迎战，直到最后一刻才发动了反击。战斗非常激烈，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格奈乌斯占了上风。有一次，恺撒的一些部队开始动摇，他的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就像多年前在桑布尔河那样，恺撒立刻冲到危急地段，控制住了局势。据说他一直冲到离敌军战线只有十步远的地方。起初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躲避敌人的投射武器或用盾牌挡住它们，但随后离他最近的军官们冲了上去，最后士兵们也冲了上去。《西班牙战争史》中没有记载这个故事，它肯定随着口口相传而变得越来越精彩离奇，但能够体现出蒙达战役的激烈。据普鲁塔克记载，恺撒后来说他常常为了胜利而战斗，但在蒙达他是第一次为了自己的性命而拼搏。第十军团首先突破敌阵，在敌军左翼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其暴露，尽管第十军团的人数少于敌军。格奈乌斯命令拉比埃努斯率领1个军团去堵住这个缺口，但恺撒的骑兵已经在席卷庞培军队的右翼。庞培军队拼命应对这个危机时，全军迅速瓦解溃败。在此次战役中，恺撒损失了约1000人，超过了在法萨卢斯的伤亡数字，而且恺撒的总兵力应当不超过2.5万～3万人，可见战况之激烈。庞培军队的伤亡据说超过3.3万人，不过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恺撒的士兵在蒙达城外建立了恐怖的胜利纪念碑，在其顶端堆放砍下的首级。蒙达坚守了一段时间。拉比埃努斯战死沙场。格奈乌斯·庞培负了伤，但逃走了，不过几周后被抓获。他被斩首，首级被送给恺撒。塞克斯图斯带领一小队船只逃走了，但近期他不会对恺撒构成任何威胁。[25] 尽管一些庞培派军队继续作战，但内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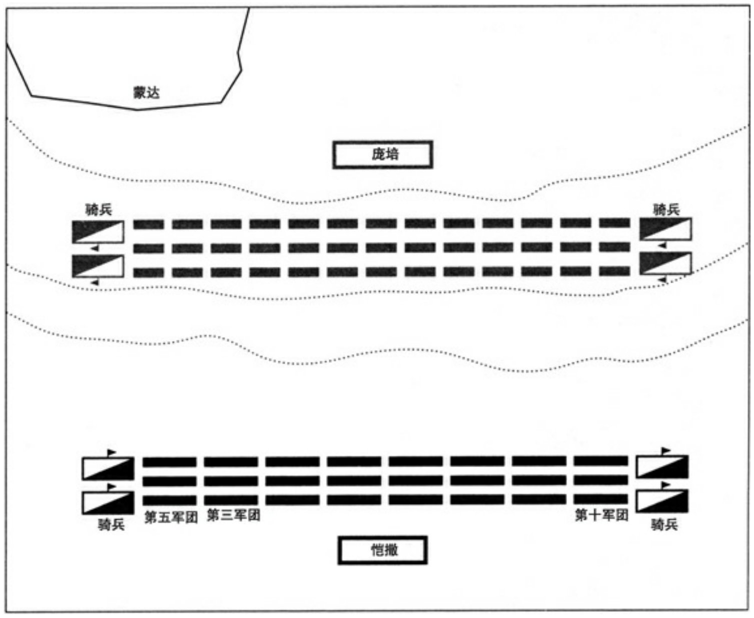


图15 蒙达战役

大约一个月后，捷报传到了罗马，元老院宣布举行五十天的感恩活动。恺撒被授予“解放者”的称号。当局将建造一座自由神庙。另外，他还被永久性地授予“凯旋将军”的称号。在过去，一般来讲，只有在打赢战争之后，士兵们用这个称号来赞颂他们的统帅。恺撒在西班牙待了一段时间，扫荡仍然忠于庞培派的最后一批要塞，并重新平定这个行省。他仍然抽出时间写了很多信。我们知道，他在4月底写信给西塞罗，哀悼他挚爱女儿图利娅的辞世。西塞罗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恺撒非常需要他的政治友谊。但恺撒这一次可能并非仅仅出于客套，因为他自己深切地知道失去女儿意味着什么。西塞罗对图利娅的爱远远超过对自己妻子或儿子的爱，他始终未能从这悲痛中释怀。在西班牙，恺撒忙于重新规划一些城镇，将其转化为殖民地，那里不仅有原先的居民，还有一些退伍军人和其他定居者。无论军人还是平民，无论外省居民还是罗马公民，都得到了他的奖赏。在返乡途中，他在外高卢停留了几周，做了一些行政工作，检查了在纳尔博和阿莱拉特（今阿尔勒）安顿老兵的工作进展。外高卢的高卢城镇被赋予拉丁公民权，这意味着他们的行政长官在任期满后会自动获得完全的罗马公民权。马克·安东尼在高卢与他

会面，两人显然和好如初。

恺撒直到夏末才返回意大利，然后似乎一直待在罗马城外，直到10月初才庆祝了另一次凯旋式。这一次，毫无疑问，他庆祝的显然是击败罗马敌人的胜利。他还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允许他的两名军团长昆图斯·佩蒂乌斯和费边（恺撒很快将任命这两人为当年余下时间的执政官）为西班牙战役的胜利而举行他们自己的凯旋式。这些举措都令元老院内的批评者不满。在恺撒自己的凯旋式上，十名保民官中只有庞提乌斯·阿奎拉一个人在恺撒经过时拒绝起立，这让恺撒很恼怒。阿奎拉曾经是庞培派，有一些产业被没收，但显然被允许继续从政。这情景令恺撒大怒，他嘲讽地喊道："来啊，保民官阿奎拉，从我手中夺回共和国啊！""恺撒不会让这件事就这么轻易过去。在随后几天内，当他向其他人许诺时，都会讥讽地补充一句：'当然，如果庞提乌斯·阿奎拉同意的话。'" [27]

恺撒现在拥有非同寻常的荣耀。他被任命为独裁官，任期十年，所有行政长官都正式地服从于他。除此之外，他还是执政官，每年想当多久执政官就可以当多久。很快，他正式获得了十年的执政官任期。据狄奥记载，恺撒还获得了平民保民官的权力和权益，不过其他史料没有提及这一点。此外，他还控制着所有罗马军队以及共和国的国库。阿谀奉承的元老院给了他数量极多的荣誉头衔，据狄奥说恺撒只接受了其中一小部分，但数量已经非常惊人了。在元老院或广场的正式会议上，他坐在两名执政官之间的特殊席位上。在竞技比赛的开幕式上，特别的马车上不仅载着诸位神祇的雕像，如今还载着恺撒的象牙雕像。卡比托利欧山上历代国王的雕像旁和奎里努斯神庙（奎里努斯是神话中创建罗马的罗慕路斯的另一个名字）内也都立起了恺撒像。西塞罗对这种情况感到很好笑，因为据传说，罗慕路斯被元老们撕成了碎片。西塞罗开玩笑称，他很高兴看到恺撒和奎里努斯在一起，而不是和萨卢斯（健康与安全之神）在一起。一年前当恺撒赦免马凯鲁斯和其他主要对手时，西塞

罗对恺撒颇有好感，十分乐观，但如今已经不是那么乐观了。恺撒显然拥有最高权力，而且没有让元老院恢复全部行动自由的打算。独裁官不在罗马的时候，大多数的关键决策都是由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那样的人私下里做出的。倒不是说这些决策不好，让西塞罗忧心忡忡的是这些决策的过程和真正做决策的人。在他这样一位元老，尤其是曾经跻身高位、惯于在元老院辩论中呼风唤雨的人看来，重大事务只能在元老院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元老院则应由最优秀、最显赫的元老来指导，这些元老主要是门阀贵族。西塞罗还始终希望，像他本人那样的少数有才华的人应当在元老院起到重要作用。这是传统，但恺撒的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元老院的这种理想。[28]

在危机悬而未决、内战仍有可能爆发的时候，很多元老愿意容忍恺撒的绝对权力。但这些危险消失之后，他们就渴望回到正常状态，恢复他们阶级的显赫地位。在恺撒经过内高卢返回意大利的途中，布鲁图斯去见了恺撒，感到恺撒“站到了好人一边”。“好人”这个词和其他一些词，比如“最优者”一样，都是指与说这话的人结盟、持有相似政见的人。西塞罗认为布鲁图斯的这个判断幼稚到了荒唐的地步。恺撒会见布鲁图斯的时候可能许诺让他当前44年的裁判官，并且等前41年他到了合法年龄之后就让他当执政官。这或许就是布鲁图斯热情赞颂恺撒的原因。布鲁图斯对自己的舅舅加图一直非常尊重，并且在舅舅选择自杀而不是像外甥一样接受恺撒宽恕之后，对加图就更敬佩了。布鲁图斯休了妻子（阿庇乌斯·克劳狄的女儿，克劳狄本人在马其顿战役初期寿终正寝了），改娶了加图的女儿波尔基娅。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表兄妹结婚并不稀奇。波尔基娅是毕布路斯的寡妇，所以和恺撒最顽固的死敌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前46年，布鲁图斯写了《加图传》，不吝赞美之词地歌颂了自己的舅舅。据西塞罗说，布鲁图斯这本书的资料研究非常马虎，并且夸大了加图在关于喀提林叛乱者的辩论中起到的作用，同时贬抑了西塞罗的作用，这让西塞罗很恼火。但是，在布鲁图斯的敦促下，西塞罗也写了一本《加图传》，集中描写加图的个人美德和坚定意志，

而不是他的政治生涯，因为西塞罗不想惹恺撒不高兴。这样写也会轻松一些，因为西塞罗在过去常常对加图在政治中的判断不敢苟同。后来有人给西塞罗看了恺撒的一封信，恺撒宣称自己通过研读西塞罗的书，提高了自己的文学素养。恺撒还说，读了布鲁图斯的《加图传》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比布鲁图斯强。这让西塞罗非常开心。[29]

加图是恺撒的仇敌之一，在加图自杀仅仅几个月之后，就有颂扬他为贵族品格之典范的书公开传播，并且得到普遍赞扬。其中一本的作者是西塞罗，被公认为“罗马第一演说家”的前任执政官；另一本的作者是布鲁图斯，他被普遍认为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苏拉当独裁官的时候，绝对没有人敢这样公开地赞扬他的敌人。但恺撒从一开始就宣称自己不会学习苏拉，并且如今也没有食言。歌颂加图的书出版后，恺撒读了这些书，但当时正忙着与格奈乌斯·庞培作战，因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只是命令希尔提乌斯搜集批判加图的资料。击败庞培军队之后，恺撒便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反加图传》。这部书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显然对加图进行了大肆攻击。据这本书记载，加图在火葬自己的同母异父兄弟之前，用精美服饰和贵金属装饰遗体，但火化之后就用筛子去筛骨灰，以回收熔化的黄金。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加图的生活方式的确非常怪异，给了恺撒很多加工的材料。加图最古怪的故事是，他决定与给他生了多个儿女的妻子离婚，然后让她嫁给他的朋友著名演说家霍尔腾西乌斯，好让他也能有自己的儿女。霍尔腾西乌斯非常富有，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于是加图再娶了自己的前妻，也就是霍尔腾西乌斯的寡妇，重新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并且把霍尔腾西乌斯的大量产业和金钱带到了自己家。这种行为说得轻一些也算是怪异，而在恺撒看来就是极度地玩世不恭。

在《反加图传》中，我们或许能看到恺撒的私人仇怨，但我们必须记住在罗马政界，人身攻击往往是言过其实的，往往还是非常低俗的。加图对恺撒恨之入骨，在两人的一些公开对抗中曾挫败恺撒，并且是推

动内战爆发的主要人物之一。恺撒在法萨卢斯曾说：“是他们想要这样的。”这话非常适合用来描述加图。在恺撒看来，就是加图顽固的敌意迫使他跨过卢比孔河，去打仗，去杀死那么多公民同胞，将罗马世界撕得四分五裂。从恺撒的立场看，确实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憎恶加图；即便不是憎恶加图这个人，也是憎恶（在恺撒看来）加图迫使他做出的事情。《反加图传》的攻击中或许有情感因素，但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是，恺撒仅仅满足于写一部书来回应。他没有和西塞罗或布鲁图斯断交，而是努力劝说有文化的罗马人，不要对加图顶礼膜拜。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尽管加图活跃于政坛时招致非议，但他死了之后，却成为坚毅美德和毫不动摇的意志力的理想典范，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30]

恺撒的政权并不冷酷残暴，尽管他有时对死了的加图以及活着的庞提乌斯·阿奎拉大发雷霆、百般嘲讽，但在蒙达战役之后，他的统治并没有变得更冷酷无情。然而不满情绪仍然很普遍。西塞罗起草了一份关于如何改革和复兴共和国的建议书，但非常谨慎地先请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过目，然后才送给恺撒。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提了许多修改意见，让西塞罗觉得自己无法将建议书完成了。他听到布鲁图斯乐观地认为恺撒将站到“好人”那一边的言论时，带着黑色幽默评论道，“除非恺撒自缢”，否则怎么可能和“好人”在一起呢。内战结束了，一些长期忽视的问题如今得到了解决，因此很多人的生活与之前相比有了改善。罗马如今享受到了十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和平与稳定。但战争留下的创伤仍然很深。有太多的人死去，尤其是元老院中那些显赫家族的成员，而一些活着的人则不得不努力应付他们在动荡岁月中做出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恺撒利用宽大仁慈和政治手腕来争取中立派和已经落败的对手，但说到底他的地位还是通过武力取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局势很像征服高卢之后对高卢的平定。恺撒必须说服他的公民同胞们，尤其是那些贵族精英人士，忍受他的主宰比反对他更好。这是恺撒面临的最终考验。[31]

[1] Cicero，*ad Fam.* 12.18.

[2] Velleius Paterculus，2.61.1.

[3] 关于恺撒的凯旋式，见Dio 43.19.1-21.4，Appian，*BC* 2.101-102，Plutarch，*Caesar* 55，Suetonius，*Caesar* 37，Pliny，*NH* 7.92，Cicero，*Philippics* 14.23；see also comments in M.Gelzer，*Caesar* （1968），pp.284-286，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3 （1923），pp.279-281，and S.Weinstock，*Divus Julius* （1971），pp.76-77。S.Weinstock认为车轴断裂的故事是关于恺撒坐车旅行前迷信咒语（Pliny，*NH* 28.21）的误传。

[4] Suetonius，*Caesar* 49.4.

[5] Suetonius，*Caesar* 51，Dio 43.20.2-4.

[6] 关于庆祝活动和竞技，见Dio 43.22.1-24.4，Appian，*BC* 2.102，Suetonius，*Caesar* 38.1，39.2，Plutarch，*Caesar* 55，Pliny，*NH* 8.21-22，181，Cicero，*ad Fam.* 12.18.2，Macrobius，*Saturnalia* 2.7.2-9，and also M.Gelzer，*Caesar* （1968），pp.285-287，Holmes（1923），pp.280-282。

[7] 关于在竞技比赛中的行为，见Suetonius，*Augustus* 45.1；Z.Yazetz，*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1983）包含了对恺撒立法的最有价值的讨论之一。

[8] Caesar，*BC* 3.57；关于对恺撒的不同诠释，见Yazetz （1983），pp.10-57。

[9] 即今天的布特林特，在阿尔巴尼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史前就已有人居住。

[10] Dio 43.50.3-4，Suetonius，*Caesar* 42.1，81，*Tiberius* 4.1，Plutarch，*Caesar* 57-58，Strabo，*Geog.* 8.6.23，17.3.15，Appian，*Punic History* 136，Cicero，*ad Fam.* 9.17.2，13.4，13.5，13.8；also Yazetz （1983），pp.137-149，E.Rawson，*CAH2IX*，pp.445-480，and Holmes（1923），pp.320-324.

[11] 如果一位执政官在其任期内死亡（此情况并非罕见，因为执政官常常处在战斗的前线）或被免职，会选出另外一位，在前任任期余下的时间里执政，被称为“补任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

[12] Suetonius，*Caesar* 41.2，76.2，80.3，Dio 43.46.2-4，Plutarch，*Caesar* 58，Pliny，*NH* 7.181，Cicero，*ad Fam.* 7.30.1-2，M.Gelzer，*Caesar* （1968），p.309，310-311，and Holmes（1923），pp.328-330.

[13] Cicero，*ad Fam.* 6.18.1，*Philippics* 11.5.12，13.13.27，Dio 43.47.3，Suetonius，*Caesar* 76.2-3，80.2；关于恺撒的元老们的出身的详细讨论，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39），pp.78-96。

[14] 关于撒路斯提乌斯，见Dio 43.9.2，47.4，Sallust，*Bell.Cat.* 3.4，cf.Dio 43.1.3；关于拒绝授予一名追随者行省总督职位，见Dio 43.47.5；关于此人的残忍，见Appian，*BC* 3.89。

[15] 即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88年～前40年，前50年执政官），他是屋大维娅的第一任丈夫。屋大维娅即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的姐姐，马克·安东尼的第四任妻子。

[16] Cicero，*pro Marcello* 3；cf.Titus Amplius Balbus，the ‘trumpet of the Civil War’ allowed back in November，Cicero，*ad Fam.* 6.12.3.

[17] Suetonius，*Caesar* 42.1，44.2.

[18] “儒略”是恺撒的名字尤利乌斯的旧译。

[19] Suetonius，*Caesar* 44.2，Pliny，*NH* 18.211，Plutarch，*Caesar* 59，Macrobius，*Saturnalia* 1.14.2-3，Holmes （1923），pp.285-287，Gelzer （1969），p.289，and Yazetz （1983），pp.111-114.

[20] 关于禁奢令，见Suetonius，*Caesar* 42.1，43.1-2，Cicero，*ad Att.* 12.35.36.1，13.6，7，*ad Fam.* 7.26，Dio 43.25.2，and Yazetz （1983），pp.154-156；关于行会和社团，见Suetonius，*Caesar* 42.3，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 14.215-216，and Yazetz （1983），pp.85-95。

[21] 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罗马因军事目的或者为了安置缺乏土地的公民，在意大利内外建立了一系列罗马公民殖民地。最初，因为这种殖民地完全是罗马的一部分而没有设立单独的自治机构。公元前 317年，昂提乌姆首先设立了自治机构，其他殖民地竞相仿效。由罗马公民殖民地发展而成的城市，是罗马国家的自治市（Municipium）。有的自治市居民享有完全的罗马公民权，有的则只有部分权利，最重要的是没有选举权。

[22] Provincial law，Dio 43.25.3，and Cicero，*Philippics* 1.8.9 for approval；herders，Suetonius，*Caesar* 42.1；关于自由市，见Yazetz （1983），pp.117-121。

[23] Quotation from Cicero，*ad Fam.* 15.19.4；关于昆图斯·卡西乌斯·在西班牙，见*Alexandrian War* 48-64，*Spanish War* 42，Appian，*BC* 2.43，103，Dio 43.29.1-31.2，and Holmes （1923），pp.293-295；旅行和作诗，见Suetonius 56.5，Strabo，*Geog* .3.4.9，and Holmes （1923），p.296。

[24] *Spanish War* 2-27；关于对战事的详细记述，见see Holmes （1923），pp.297-306。

[25] 塞克斯图斯·庞培后来控制了西西里岛，拥有了自己的强大陆海军，坚持抵抗。一直到前35年，他才被安东尼最终消灭。

[26] *Spanish War* 28-42，Appian，*BC* 2.103-105，Plutarch，*Caesar* 56，Dio 43.36.1-41.2，and Holmes （1923），pp.306-308.

[27] 关于荣耀，见Dio 43.42.3，44.1-3；关于安东尼与恺撒的会面，见Plutarch，*Antony* 11；关于西塞罗的女儿，见Cicero，*ad Att.* 13.20.1，and T.Mitchell，*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p.282；关于庞提乌斯·阿奎拉，见Suetonius，*Caesar* 78.2，see also R.Holmes，p.318。

[28] Dio 43.14.7，44.1-46.2，Cicero，*ad Att.* 12.47.3，45.3，*ad Fam.* 6.8.1，6.18.1，Suetonius，*Caesar* 76.1，and see Holmes （1923），pp.315-316，M.Gelzer，*Caesar* （1968），pp.307-308，Mitchell （1991），pp.282ff.

[29] Cicero，*ad Att.* 13.40.1.

[30] Cicero，*ad Att.* 12.21.1，13.40.1，46，51.1，*Orator* 10，35，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11.1-4，25.1-5，73.4，*Cicero* 39.2，*Caesar* 3.2，Suetonius，*Caesar* 56.5，and M.Gelzer，*Caesar* （1968），p.301-304，Holmes （1923），p.311，and D.Stockton，*Cicero* （1971），p.138.

[31] Cicero，*ad Att.* 12.40.2，51.2，13.2.1，27.1，28.2-3，40.1.

二十三 3月15日

恺撒给他的一些朋友的印象是，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因此对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没有做任何预防措施……也有人说，他曾宣称，更重要的是让共和国延续下去，而不是让他本人维持生命；因为他已经赢得足够多的荣耀和权力；但如果他发生不测，国家将不会有和平，会陷入一场更糟糕的内战。

——苏埃托尼乌斯，2世纪初 [1]

我活得已经足够久，也得到了足够多的荣耀。

——恺撒，前46年 [2]

前44年初，恺撒五十六岁了。多年的戎马生涯若对他的身体没有产生影响，那才叫奇怪。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的身体日渐衰弱。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表明他的癫痫病恶化了，而且他充沛的精力似乎也没有减弱。按照罗马的标准，他早已过了盛年，但他完全可以再活上十五年或二十年，甚至更久。恺撒没想到自己会死在前44年3月，而刺杀他的那些人显然也不认为恺撒会在近期寿终正寝。除了密谋者之外，所有人都觉得独裁官的死太突然、太意外。因此，要审视恺撒和他创建的政权，就必然是在审视不完整的、仍在发展变化的东西。后来奥古斯都执掌最高权力超过四十年，他创建的制度有足够的时间逐渐演化。说到底，我们不可能知道恺撒的打算是什么，他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传闻（往往是荒诞不经的传闻）讲到他的意图。他死后，内战的双方都竭尽全力地展开宣传攻势，因此平添了更多混乱，让我们更难判断恺撒的真正打算。尤其不幸的是，西塞罗在前44年头三个月的书信都没有公开发表，所以不曾为这个关键时期留下任何文字证据。

关于恺撒的长期目标，必然会存在一些疑问，但有一件事情是很清

楚的，那就是他打算离开罗马和意大利至少三年。密谋者之所以选择在那个时间下手，是因为他们知道独裁官几天后就将离开罗马城，去安排新的军事行动。这一次，恺撒的对手将是异族，因此打败他们而获得的荣耀将是不可置疑的。首先，他将讨伐布雷比斯塔国王统治下的达契亚人，完成他可能早在前58年就在谋划的巴尔干战争。他很可能计划在年底之前结束这场战争。随后，他将攻击帕提亚人，为克拉苏在卡莱的惨败报仇雪恨。前不久，帕提亚人又一次入侵了叙利亚，并且支持一位叛逃到他们那边的庞培派人士，此人意图再次掀起内战。按照恺撒的设想，此次帕提亚战争的规模将极其宏大，他下令集结了16个军团和1万名骑兵。他还计划在科林斯地峡开凿运河，此运河虽然也是为了促进贸易，但主要还是为了维持通往战区的补给线。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恺撒任命了一位希腊建筑师来主持此工程。但在恺撒死前，工程应当仍然处于理论阶段，后来就被放弃了。罗马人似乎普遍认为打败帕提亚是一件好事，比如在内战前夕就有人猜测，庞培或恺撒会被派去征讨帕提亚。据说，恺撒非常谨小慎微地计划作战，在真正发动进攻之前尽可能多地了解敌人及其作战方式。我们不知道，恺撒的目标是征服帕提亚，还是仅仅重创其力量，迫使帕提亚国王接受有利于罗马的和约。有荒诞的故事称，他计划返回时绕一个大圈子，绕过里海，穿过今天的俄罗斯南部，在返回高卢的沿途征服日耳曼各部落。但这种说法与有条不紊的战争准备工作相矛盾。那样的话显然也需要三年以上时间。在东方开展战争的想法对恺撒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效仿亚历山大大帝，但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恺撒此时已经沉迷于这样狂妄的梦想。显然，他的帕提亚战役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从恺撒过去的军事成就来看，只要他的精力、才干（更不要说他的好运气）没有完全抛弃他，他就能够打赢帕提亚战役。但帕提亚人是令人生畏的强大对手。六年后，马克·安东尼攻击帕提亚时，遭受了重创。奥古斯都选择外交手段，辅之以武力威胁，成功地在东方边疆维持了令人满意的和平。不过，他的成功（以及后来多位皇帝企图彻底战胜帕提亚却遭受失败的例

子）未必说明恺撒的计划就一定会失败。[3]

在凯旋式之后的几个月里，恺撒并非始终待在罗马，但不管他在哪里，一直都很忙碌。前45年12月，他视察了坎帕尼亚沿海地区，一大群幕僚人员（包括巴尔布斯）和卫队跟随着他，所以他身边一共有约2000人。在普泰奥利城[4]外，恺撒在西塞罗别墅附近的一座别墅停留了一晚。西塞罗后来详细记述了他在12月19日晚举办的宴会。有意思的是，西塞罗觉得有必要从一位邻居那里借一些卫兵（可能是角斗士），他或许是害怕驻扎在外面的士兵会抢劫他的别墅。第二天上午，恺撒一直待在这位邻居的别墅里，直到：

> 第七个钟点（即下午早些时候），没有接见任何人。我知道他在忙着和巴尔布斯一起查账。后来他在海边散步。第八个钟点之后，他沐浴更衣。然后他听了马穆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事情，不过可能是马穆拉违反了禁奢令），表情始终没有任何改变。他接受了按摩，擦干身子，用了晚膳。他服用了催吐剂[5]，所以大吃大喝，毫不担忧。这次宴会很奢华，侍奉得很好，不仅如此，“烹饪有方，调料精美，一切顺利”。

与此同时，他的追随者们，包括奴隶和释奴，也都受到了招待，其中最资深的人员还受到了高水准的款待。在主宴席上，“没人谈论国家大事，而是切磋文学。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他很开心，心情愉快”。尽管此次宴会很成功，西塞罗还是懊恼地宣称，恺撒不是那种你希望再次看到的客人；尽管西塞罗显然感到，既然恺撒已经到了附近，他就没有不尽地主之谊的道理。在恺撒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似乎一直都忙忙碌碌，但在餐桌上仍然是一位轻松愉快、魅力十足的伙伴。他希望做到平易近人，但并不总是有时间。前44年的某个时间，西塞罗去恺撒在罗马的宅邸见他，等了一段时间才被领到恺撒面前。经他后来回忆，恺撒当时说道：“连马尔库斯·西塞罗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时来见我，而是需要坐下来等待。我难道还能不怀疑世人多么憎恶我吗？西塞罗是那样性情随和的人，但我毫不怀疑，他一定恨我。”

恺撒有时会大发雷霆，但正如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身体状况在迅速恶化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的个性发生了极大改变。他公务缠身，尤其是因为正在筹备远征帕提亚，所以工作量更大，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匆匆忙忙。西塞罗和大多数其他元老仍然觉得恺撒这个人讨人喜欢，而且恺撒的行为一般很温和、大方。他们恨的不是恺撒这个人，而是他取得的地位，以及这对共和国意味着什么。在前45年底和前44年初，他的地位仍然尚未明确。与此同时，随着他的权力和地位发生变化，人们对他的态度也在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回到这样的问题：恺撒的长远打算究竟是什么？[6]

国王、神或恺撒？

毫无疑问，到前45年底，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实际上已经是一位君主，也就是说，他手中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罗马共和国内部的任何个人、群体和机构。他取得这样的地位是凭借内战的胜利，但他的具体权力却是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的。按照传统，独裁官的任期仅有六个月。苏拉在与恺撒类似的情况下执掌了比独裁官大得多的权力，而且没有任期限制，直到他自愿辞职退隐。恺撒认为苏拉这么做说明他在政治上是个文盲。恺撒此刻已经是任期十年之久的执政官和独裁官，这个任期大大超越了罗马宪法传统所允许的范围。前44年初，他又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另外，他还被任命为终身监察官，不过其实他已经在运用这项官职的权力了。他获得的许多头衔仅仅是象征意义的。他被尊称为“祖国之父”，不过他不是第一个获得此称号的人；西塞罗在破获喀提林阴谋后也被称为“祖国之父”。恺撒还被允许执行唯一一种比凯旋式的威望还要高的仪式，即奉献“最高战利品”。一般是在单挑中杀死敌军领袖的指挥官，才可以获得这项荣誉。没有证据表明他有时间举行这项仪式。另一项非同寻常的荣誉是允许他在剧场内和平民保民官们坐在一起。在其他的正式场合，他的席位在两位执政官之间，除非他自己就是执政官之一。但现在他的象牙座椅被换成了镶金座椅。他的生日成了公共节日，

其生日所在的那个月份被更名为“尤利乌斯月”。他也是第一个在世时肖像就被印在钱币上的罗马人。当时只是部分钱币上有他的头像，后来奥古斯都规定所有钱币上都必须有他的头像。所以在《福音书》里，耶稣才会问银币上是谁的头像，因为他知道所有钱币上都有皇帝的头像。[7]

恺撒获得这些荣誉，显然符合罗马人颂扬其他著名贵族成就的传统，比如大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和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马略、苏拉，以及最重要的庞培。但恺撒获得的每一项荣誉都更进一步，单单他一个人获得的特权的规模和数量就是史无前例的。竞技比赛开幕式上展示诸神雕像的游行队伍也展示恺撒的雕像，卡比托利欧山的各神庙内和神庙周边也摆放着更多的恺撒雕像，这都意味着他的地位已经超越了凡人。塔普苏斯战役的捷报送到罗马之后，有人竖立起一座恺撒雕像，他雄踞于一个球体之上，底座带有“致不可战胜之神”的铭文。他返回罗马后下令抹去了这句铭文。但在前45年末和前44年初，恺撒得到了更多荣誉，他给人留下的超出凡人的印象也越来越深。他宅邸的正面被增加了三角楣饰，即由石柱支撑的尖顶装饰，就像大神庙那样。新建了一个尤利乌斯祭司团，与主持古老牧神节[8]的祭司团有关联。随后又更进一步，元老院决定建造一座神庙以颂扬恺撒和他的宽宏大量，史料记载在此处不太明确。此种崇拜仪式将由一位新祭司负责，就像古老的朱庇特祭司一样。马克·安东尼被任命为第一位此种祭司。狄奥甚至说，当时开始有人将恺撒以朱庇特·尤利乌斯的名义顶礼膜拜，但没有其他证据表明人们已经把恺撒与罗马最重要的大神联系了起来。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在各行省的希腊化社区的荣誉称号和法令中，已经正式将他奉为神明了。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也有其他罗马统帅得到了大体上相同的荣耀。东方有着将统治者神化的悠久传统，也常将来到该地区的强大罗马人神化。只是在过去不曾有人将这种做法带到罗马。[9]

恺撒死后被宣布为尤利乌斯神，而他的养子也将自命为神子。但是

奥古斯都自己是在去世后才在罗马被神化，他的继承者们也遵循这一传统。这种程序事实上已经变得自动化了，以至于韦斯巴芗皇帝的临终遗言是一句带有黑色幽默的笑话：“可怜的我啊，快变成神啰。”只有狂妄自大的皇帝才会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宣布为神，因为后人知道这种程序，所以关于恺撒是否接受自己被神化的争议就更大了。罗马宗教很复杂，是一种多神教，拥有数量极多的男女神祇，有些神的地位远高于其他神，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半神和英雄。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都讲到凡人被升格为神，赫拉克勒斯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恺撒的家族以维纳斯后裔自居，其他贵族也声称自己的家系源自其他神祇。在现代人更为熟悉的一神教传统中，神与人泾渭分明。但在罗马人那里，神与人的区别不是那么明显。在恺撒去世仅几周之后，西塞罗提到了安东尼被任命为恺撒的祭司，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命已经公布了，不过安东尼不大可能实际上任。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反驳这样的观点：恺撒在世时至少已经被宣布为半神，或许已经被宣布为神。但是，对恺撒的崇拜似乎并不非常重要，如果当时真的有时间恰当地建立这种崇拜仪式的话。我们最好这样看：恺撒顶多是罗马众神中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新成员。狄奥认为此事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是点头哈腰的元老院在奉承独裁官。值得注意的是，狄奥随后还说，恺撒得到了被埋葬在罗马城内的权利。根据罗马的风俗习惯，死者应当被埋葬在罗马城的正式边界之外。此项法令据说被用金字刻在银板上，然后放置在卡比托利欧山的朱庇特神像脚下。狄奥说这显然是为了提醒独裁官，他只是个凡人。[10]

除了他的正式权力之外，恺撒还有许多独特之处。他的家族自称是阿尔巴朗格国王的后裔，阿尔巴朗格这座城市早已不存在，在罗马历史早期就被罗马人吞并了。在正式的场合中，恺撒开始穿戴据他说是阿尔巴朗格国王的服饰，尤其是红色皮革的长靴。他在节庆和正式会议上穿的凯旋将军专用的紫红色上衣和托加袍也具有君主的意味。他还戴上了一顶花环冠冕。据说由于他的头越来越秃，他特别喜欢这项荣誉。在前44年，花环冠冕似乎被换成了金冠。他的正式权力非常大，而他非正式

的控制力甚至更大，有时是明目张胆的。大约在前46年底，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她的弟弟兼丈夫托勒密十四世及他们的宫廷人员来到了罗马。他们住在台伯河远岸一座属于恺撒的宅邸里，在那里一直待到恺撒遇刺身亡。我们不知道是恺撒让他们来的，还是他们自己要来的。不过如果恺撒不愿意让他们来，他们就不大可能到意大利，并且待了那么久。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王位是她的罗马情人给的，她或许觉得在他身边而远离埃及会更安全，希望亚历山大港和其他地方的敌对势力能够渐渐习惯于她的统治。她或许也觉得只有从恺撒本人那里，她才能得到一些政治上的好处和让步。或许恺撒在阿非利加期间与尤诺娅王后的风流韵事传到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耳边，让她开始担心他对她的支持可能会动摇。从恺撒的角度看，很显然，在他筹划的帕提亚战争中，埃及及其丰盛的农产品会起到重要作用。恺撒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都极少忘记政治上的考虑，她在恺撒离开埃及不到一年之后就来到罗马，并且长期在罗马居留，这有力地说明恺撒也希望她待在他身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旧情复燃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他心中仍然占据极高的地位。在恺撒兴建的新广场上，母亲维纳斯神庙是核心建筑。恺撒命人制作了女王的黄金塑像，并将其安放在维纳斯女神像的旁边。据阿庇安说，在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一百五十多年后，女王的金像仍然在广场上矗立。恺撒和卡尔普尔尼娅仍然是夫妻。据普鲁塔克说，他们仍然同床共寝。要说她不知道他的诸多不忠行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她也一定知道住在河对岸的埃及女王就是他的情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罗马期间常常受到罗马显贵的拜访，这些人希望讨好她，从她那里得到礼物，为他们埃及门客的生意争取支持，或者希望她能在恺撒耳边为他们美言几句。西塞罗似乎很失望，抱怨说女王太傲慢，但重要的是，他也曾去求见女王。[11]

恺撒获得的诸多荣誉中至少有一项被明确规定可以传给儿孙。但他没有儿子，或者说没有合法的儿子。他的独生女已经去世了，而她腹中的胎儿，即便是个男孩，也没活几天就夭折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分娩

后，将她的儿子命名为恺撒里昂[12]，并显然得到了恺撒的许可。恺撒里昂的出生年份无法确定，但最可能是前46年底的某个时间。这个婴儿很可能随母亲一起来到了罗马，但在恺撒去世前撰写的史料中都不曾提及恺撒里昂。正因为此，有人说他不是独裁官的儿子，而仅仅是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弄来的一个孩子，目的是削弱屋大维作为恺撒继承人的显要地位。支持这一观点的一个论据是，恺撒虽然结过三次婚而且常常和其他女人私通，但他除了尤利娅之外不曾有过其他孩子，而尤利娅也是几十年前孕育的了。一个多世纪后至少有一位高卢贵族自称是恺撒的后裔，但这可能没有事实根据。但我们要记住，恺撒与庞培娅的婚姻是以离婚告终的，并且很可能是不幸福的；而在与卡尔普尔尼娅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恺撒都在海外作战。一般来讲，共和国行省总督们的夫人一般不会陪同他们去任职地，也不会去拜访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孩子也不足为奇。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也不可能凭空搬出一个之前无人知晓的孩子，然后说他是恺撒的儿子，还期望大家能够相信。所以这个男孩可能在前44年3月之前就已经在罗马了。他究竟是不是恺撒的孩子，我们没办法百分百确定，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女王私生活的更多细节。大部分谈及此事的古代史料似乎都认可恺撒里昂是独裁官的孩子，但这些史料都是在很久之后才撰写的。苏埃托尼乌斯提到在恺撒死后，他的长期副手和密友盖乌斯·奥庇乌斯写了一本书来反驳这种观点。[13]

总结来看，我们有理由推断，恺撒的确是恺撒里昂的父亲（或者至少他相信自己是恺撒里昂的父亲），但恺撒里昂是私生子，不是罗马公民，而且尚在襁褓中。独裁官在生命最后几个月拟定的遗嘱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及这个男孩。他将最重要的地位赋予了姐姐的外孙——十八岁的盖乌斯·屋大维。恺撒近些年来对屋大维产生了一些兴趣。恺撒很可能在这个少年身上看到了一些了不起的才华，后来这个少年将成为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的父亲也叫盖乌斯·屋大维，曾担任裁判官，但于前59年去世了。在恺撒女儿的葬礼上，年仅十二岁的屋大维发表了悼念演

说。前47年，恺撒让屋大维进入了大祭司团，接替了在法萨卢斯战死的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对年纪这么轻的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屋大维原本应当陪同恺撒讨伐西班牙，但由于身体欠佳，直到战斗结束才来到恺撒身边。恺撒在遗嘱中将屋大维立为主要继承人，并正式收他为养子。但如果夸大屋大维在恺撒遇刺前的重要性，就不太合适了。屋大维年纪还很小，是个“新人”的儿子，而且在政坛也人微言轻。马克·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作为恺撒宠臣的地位要重要得多。前45年，安东尼在高卢见了恺撒之后，便陪同独裁官继续余下的旅程，而屋大维与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一起乘坐另一辆马车。马克·安东尼将成为前44年恺撒的同僚执政官，但他与多拉贝拉仇隙极深，所以独裁官的计划（离开罗马时辞去执政官职务，让给多拉贝拉）恐怕难以实现。恺撒遗嘱中收养屋大维的条款似乎并不广为人知。假如独裁官突然死于正常原因，年轻的屋大维恐怕只能继承他的财产和地产。他并没有被明确地规定为恺撒权力和荣誉的继承者，而在政治上，其他一些人似乎与独裁官走得更近。从技术上讲，安东尼和多拉贝拉事实上都太年轻，远远没有到担任执政官的法定年龄，但他们在政界的地位都已经十分稳固。[14]

格拉古兄弟曾被怀疑觊觎君主地位，传闻说有位亚洲国王给提比略送去了一顶王冠。自罗马的末代国王被驱逐、共和国建立以来，罗马贵族对君主制恨之入骨，政坛常见的攻击就是指控对手企图自立为王。独裁官的权力事实上相当于君主的权力，而且恺撒还得到了其他一些权力，所以他事实上是以君主的身份统治罗马的。他的穿着打扮也像阿尔巴朗格的国王。在希腊化世界，统治者既是君主也是神祇，所以有人认为恺撒获得那些神圣的或半神圣的荣誉，是在往以希腊化君主为模板建立正式君主制的方向走。在前44年最初几个月，恺撒是否应当采用国王头衔的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1月26日，他在罗马城外的阿尔班山庆祝了传统的拉丁节日，元老院特别授权他举行小凯旋式，并在一支盛大游行队伍的陪伴下骑马返回罗马。在游行中，一些群众称他为国王（Rex）。Rex是拉丁语里的国王，但也是一个姓氏，即马尔基乌斯·雷

克斯。恺撒将这当作一个笑话，回答说他“不是Rex，而是恺撒”。几天前，两名保民官盖乌斯·厄比底乌斯·马鲁路斯和卢基乌斯·凯塞提乌斯·弗拉乌斯曾下令将广场上一座恺撒雕像头上的王冠除去。现在，这两人又下令逮捕最先称恺撒为国王的人。恺撒很恼怒，怀疑这两名保民官是在故意找茬，刻意让大家想起君主制，以便诋毁他的名誉。他向他们抗议，他们的回应是发布了公告，宣称恺撒阻挠保民官执行合法公务。恺撒召集了元老院，谴责了这两人，说他们置他于不义，强迫他要么容忍侮辱，要么违背自己的本性去做残酷的事情。有人建议将这两人处死，但恺撒不同意，而是在另一名保民官提出动议后，免去了这两人的官职。恺撒要求弗拉乌斯的父亲剥夺他的继承权，因为弗拉乌斯还有两个更有才干的兄弟。弗拉乌斯的父亲拒绝了恺撒的要求，独裁官也就作罢了。恺撒当年开始内战的时候打着捍卫保民官权力的旗号，但他又一次压倒了反对他的保民官，不过他的惩罚比苏拉的手段要温和得多。[15]

前44年2月15日，罗马人庆祝了牧神节，这是一种主要与生育有关的古老节日。作为仪式的一部分，牧神祭司们除了在腰间围着兽皮之外全身赤裸，跑过大街小巷，用山羊皮鞭子抽打路过的人。如果被鞭子打到，是非常幸运的，尤其对那些求子心切的妇女或希望顺利生产的孕妇来说。三十九岁的执政官安东尼是奔跑的牧神祭司的领头人，因为他是尤利乌斯祭司团之首。恺撒带着花冠，穿着凯旋将军的紫袍和阿尔班国王的长袖上衣与长靴，坐在镀金的椅子上观看。安东尼跑到他面前，献上一顶王冠，敦促他接受并登基为王。看到这景象，群众霎时间变得鸦雀无声。恺撒拒绝了安东尼的请求，群众欢呼起来。安东尼再次请求，独裁官再次拒绝，群众发出了更大的欢呼声。恺撒命令将王冠送到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因为罗马只有一位国王，即朱庇特。我们很难相信这场风波不是恺撒事先精心安排的，不过我们很难说安东尼在表演中有多少自主发挥。当时和后来的一些玩世不恭分子说，恺撒是想接受王冠的，如果围观群众表现得热情一些，他肯定就接受了。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恺撒的做法就太拙劣了。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之前得

到的那些荣誉都是先在元老院里提议。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恺撒希望大家赞颂他拒绝称王的义举，或许也想让两名保民官风波引起的流言蜚语彻底平息下去。他的想法未能实现，因为很快就有传言称，有人发现了神谕，只有一位国王才能打败帕提亚人。身为观鸟占卜师的西塞罗后来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根本没有这样的神谕。但很多人似乎的确相信这种说法，这也表明了当时人们的情绪。从这个故事又流传出了新的故事，声称元老院会有人提议，让恺撒成为除意大利之外所有地区的国王。恺撒已经拥有实际上的王权，即绝对的最高权力，当时没有证据表明他也想要国王的名号。事实上，即便是后来的绝大多数记述也没有说这个故事是真的，而仅仅说存在这样的传闻。他年轻时在比提尼亚目睹过希腊化的君主制，近期在远胜于比提尼亚的埃及王国也看过。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希望在罗马建立类似的君主制（或许是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鼓励之下）。他在元老院的地位仅仅是他个人的，目前他还没有真正的继承人来继承王权。[16]

密谋

最终有大约六十名元老参与了刺杀恺撒的阴谋。多年来一直有类似密谋的传闻，但都没有成事。在前44年之前，恺撒曾拥有一支由西班牙辅助部队组成的卫队。但是，在元老院向他宣誓效忠并提议组建一支由元老和骑士组成的新卫队之后，他就非常公开地解散了原先的卫队。在危机时期也曾有过类似的卫队，比如前63年西塞罗曾得到武装骑士的保护，但恺撒的新卫队始终没有被组建起来。密谋者们的动机五花八门，但其背后都是这样的观点：让单独一个人拥有恺撒这样的永久性权力与自由共和国的理念相抵触；国家应当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来领导，其任期必须是有限的，并得到元老院的指导；元老院的辩论必须是公开的，而且由最优秀的前任行政长官来主导。在恺撒统治下，很多决策都是独裁官和他的亲密谋士们私下里做出的，尽管这些决策往往是很好的，但这毕竟不是共和国运作的方式。根据传统，在危机时期可以暂时

搁置正常的政府机制，但只能是在短期之内，危险消除后就得恢复常规。苏拉的崛起比恺撒更为凶残，但苏拉最终辞去了独裁官职务。恺撒显然不打算效仿苏拉，而恺撒的终身独裁官身份也强调了他权力的永久性。共和国已经变了，让贵族们对恺撒不满的不是恺撒做的事情，而是他做事的方式。恺撒的确做了很大努力，至少是去维持传统政体的表面文章。行政长官都是按照恺撒推荐的人选来选出的，不是他直接任命的。元老院正常开会和辩论，恺撒获得的绝大多数荣誉都是首先在元老院提出的。另外，法庭仍然按照传统方式运转，恺撒赢得了严格执法的名望。有一次他取消了一名前任裁判官的婚姻，此人在某女被前夫休掉仅一天之后就与她结婚。现在的陪审团成员全部是元老和骑士，因为他禁止第三个群体（司库阶层）进入陪审团。苏拉曾规定，陪审团须有三分之一人员来自司库阶层。[17]

恺撒虽然一般很有风度和礼貌，但常常缺乏耐心，容易发怒。在他的最后十四年里，他一直是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身边没有一个人与他平起平坐。他常常需要亲力亲为，筹划军事行动，率军征战，管理他的行省。从前49年开始，他还要统治越来越广大、最终覆盖整个罗马疆域的地区。另外，他发现如果他不亲自在场监督，局面往往会变得糟糕。这么多年里，他很少休息，在他的最后几个月里更是没有时间休息。恺撒仍然非常忙碌，而且他早已习惯于发号施令，极可能对笨重愚钝、效率低下的政治常规颇为不满，尤其是很多政治常规已经变得非常空洞。前45年底或前44年初，元老院开会，投票决定授予他上文已经讲到的许多荣誉。他本人不在场，因为他觉得最好维持“元老院辩论仍然完全自由”的假象。会议结束后，全体元老在执政官安东尼（如果这事发生在前45年，就是费边和特雷博尼乌斯）的率领下离开会议厅，去向恺撒报告他们的决定。他们看到他坐在华贵的椅子上处理公务，要么是在演讲台附近，要么是在他建造的广场（部分完工）的维纳斯神庙外。元老们走来向他奉上新的荣誉时，恺撒并没有起身迎接他们。这给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因为他这样仿佛在蔑视执政官和元老阶层的尊严。从技术上

讲，他作为独裁官，比执政官的地位要高，所以完全可以坐着不动，但很多元老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据说他正要起身，却被巴尔布斯阻止了，因为巴尔布斯认为恺撒不应当向地位比他低的人表现出这样的礼节。另一份史料称，恺撒后来解释说，他当时感到自己的癫痫病即将发作，由于害怕当众出丑（癫痫发作常常让他头晕目眩、大便失禁），所以没有起身。但这一次他的病没有发作，我们知道他处理完公事之后就步行回家了，没有任何困难。他对元老们的回答是很温和的，他谢绝了元老们投票授予他的一些荣誉，只接受了一小部分。包括卡西乌斯在内的一些元老，之前曾在元老院发言或者投票反对授予恺撒这些新权力。但恺撒像往常一样，没有对这些人采取任何直接措施。然而在此刻或是随后的日子里，许多投票支持授予恺撒新荣誉的元老也开始怨恨他，觉得他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这件事情的意义被夸大了。有意思的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在牧神节庆祝活动上，当执政官安东尼请求恺撒称王的时候，恺撒也没有起身迎接他。[18]

恺撒的许多最亲密的盟友也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共和国事实上被他一个人控制了。即便许多在恺撒遇刺后仍然公开宣称对他绝对忠诚的人，也心怀不满。虽然普遍存在骚乱，但引人注目的是，绝大多数元老仍然照常办事，适应新的环境。所有人都对自己的门客负有义务，而很多好处或特权最终都取决于恺撒的喜怒，所以他们都去找独裁官（或者那些被认为有能力影响他的朋友）谋求好处。元老生活的这个方面一如既往，尽管元老们在政治上几乎没有自由。刺杀恺撒的阴谋最后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但参与者仍然只约占元老院人数的7%。密谋者大多是内战期间的恺撒派，有一些还曾身居高位。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在高卢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军团长，在内战期间指挥了对马西利亚的围城战。前45年，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特雷博尼乌斯得到了补任执政官职位的奖赏。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是塞姆普罗尼娅的儿子，据说曾深深牵连进喀提林阴谋，他在高卢也立过功。恺撒非常喜爱他，提名他为前42年的执政官。恺撒遗嘱的第二级受益人也包括布鲁图斯。塞尔维乌

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在高卢战争期间也是军团长，曾参选前49年的执政官，不幸落败。这可能是因为他与恺撒的关系，所以他似乎对恺撒有些怨恨。另一个心怀不满的人是卢基乌斯·米努基乌斯·巴希卢斯，恺撒拒绝给他一个行省总督的职位，或许是因为怀疑他品行不端（这种怀疑是很正确的）。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因为在内战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而获利丰厚，许多名气较小的密谋者也是这样。但显然有些人觉得自己得到的还不够多。所有这些密谋者现在都拿定主意，他们更愿意在没有恺撒的共和国里继续从政。有的人得出这个结论已有时日。差不多一年之前，特雷博尼乌斯就试探马克·安东尼，看他愿不愿意入伙。当时安东尼和恺撒的分歧似乎还很严重。尽管如此，安东尼拒绝了特雷博尼乌斯，对恺撒保持忠诚。但安东尼也没有告发特雷博尼乌斯，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这些阴谋分子不能成事，会自生自灭。[19]

尽管许多密谋者是恺撒曾经的长期支持者，但参与密谋的两个主要领导者都是之前的庞培派。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法萨卢斯向恺撒投降，而他对恺撒的影响也使恺撒接纳了卡西乌斯。前44年，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成为裁判官，其中布鲁图斯已经被内定为将来的执政官。据普鲁塔克说，卡西乌斯私下里很恼火，因为恺撒将威望更高的城市裁判官[20]职位给了布鲁图斯，而不是他自己。据说恺撒曾表示，卡西乌斯更有资格得到这个职位，但他很喜爱塞维利娅的儿子，所以偏袒后者。其他史料告诉我们，卡西乌斯对恺撒的怨恨来源更早，据说恺撒曾没收了卡西乌斯搜罗来的准备参加斗兽比赛的一些动物。在残暴的格奈乌斯·庞培不再构成威胁之后，卡西乌斯显然已经失去了对他所称的“仁慈的旧主人”的热情。卡西乌斯娶了布鲁图斯的三个妹妹之一——尤尼娅·特尔提娅，据说她与恺撒有过私情。这个故事可能是假的，而且所有史料都没有说吃醋是卡西乌斯憎恨恺撒的原因之一。在布鲁图斯方面，尽管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母亲与恺撒确有私情，但没有证据表明这对他的行动产生了任何影响。不过他的确是最晚加入密谋的人之一。有人散发匿名的小册子，还在墙上喷涂标语，问布鲁图斯是不是在睡

觉。罗马的末代国王就是被一个叫作布鲁图斯的人废黜并驱逐的，布鲁图斯家族自称是这个英雄人物的后代，不过许多罗马人怀疑这种说法是假的。布鲁图斯热爱哲学，尤其是斯多葛派哲学（强调严格的义务），他知道希腊化文学对杀死暴君的义士的赞美。家族的荣誉感也促使他采取行动，再加上他对舅舅加图越来越崇拜。布鲁图斯的妻子波尔基娅（加图的女儿）似乎是个性格强悍的女人（尽管有些神经质）。好几份史料称她刻意刺伤自己的大腿，以证明自己能够忍耐痛楚，因此有资格得到丈夫的信任并去参与密谋。如果说内疚没有对布鲁图斯产生任何影响，那就奇怪了。在布鲁图斯投降很久之后，加图仍然在奋战。舅舅在乌提卡撕扯自己伤口的时候，布鲁图斯已经在恺撒的领导下治理内高卢了。一切迹象表明，在恺撒统治下，布鲁图斯前程似锦。恺撒曾说：“不管布鲁图斯想要什么，都非得到不可。”布鲁图斯的性格的确有些偏执。一旦他决定加入密谋，他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就不可动摇了。舅舅和妻子的影响、为家族名誉奋斗的压力全都推动着他前进。但说到底，他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他觉得一个自由共和国里不应当有独揽大权之人。不管卡西乌斯有怎么样的私人动机，相同的信念也是最重要的。[21]

密谋者们宣扬自由，并且相信只有除掉了恺撒才能恢复自由。绝大多数人或许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整个共和国的福祉。他们相信恺撒死了之后，国家机构就能又一次正常运转起来，罗马能够得到元老院和自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的领导。为了表明这就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决定只杀死独裁官一人，绝不伤害其他人，包括恺撒的同僚执政官和亲密盟友安东尼。一些更务实的密谋者建议把安东尼等恺撒的亲信一同杀掉，但据说布鲁图斯说服了他们。在所有密谋者当中，布鲁图斯的名望最高，至少在罗马的精英阶层中如此。尽管这些人相信自己是在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而行动，但如果他们不渴望这样的壮举所能带来的名望和荣耀，那么他们就不是罗马贵族了。我们需要注意，如果行刺成功，密谋者们——尤其是那些显赫人物，如卡西乌斯、马尔库斯

·布鲁图斯、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特雷博尼乌斯和加尔巴——在政坛肯定会飞黄腾达。在恢复了昔日状态的共和国里，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最显赫的元老，把持国政，因为那些坚决忠于恺撒的人在他死后几乎不可能再在政界有所作为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参与密谋，就等于是放弃了恺撒一定会给他们的执政官职位，但他们自信一定能够通过选举获得他们渴望的官职。自由和复兴共和国意味着少数豪门贵族主导政治的旧状态会卷土重来，人们可以像过去一样贿赂选民、剥削行省居民。布鲁图斯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一生中的大部分举动似乎都配得上莎士比亚的颂词——“他们当中最高贵的罗马人”。但我们知道，有一次，克里特的一个社区愚蠢地从他那里按照四倍于合法水平的利率借了钱，他命令部下以一切手段榨取48%的利息。密谋者们信仰的那个共和国就是维护元老精英阶层特权的国家机器。社会上的其他人并不像密谋者设想的那样，对这个体制仍然充满信心。

刺杀

密谋者们决定尽快行动，因为他们知道恺撒计划于3月18日离开罗马，要好几年后才回来。密谋者们可能还觉得，恺撒因发落弗拉乌斯和马鲁路斯而受到的敌意，以及牧神节事件引起的争议，都对他们有利。西塞罗后来说，杀害恺撒的真凶其实是安东尼，因为他在牧神节那天引起了人们对王政的警惕。后来有谣言和荒诞故事称，恺撒打算迁都到亚历山大港或特洛伊。据说，保民官之一赫尔维乌斯·秦纳告诉他的朋友们，他打算提出一个议案，允许恺撒想娶多少妻子就娶多少，以便生一个儿子作为继承人。这个故事可能直到恺撒遇刺之后才流传开，因为秦纳在恺撒的葬礼之后被私刑处死了，没有办法否认。不管怎么说，就算人们不相信，生动有趣的流言还是能够传扬四海。密谋者们知道独裁官即将离开罗马，于是决定在3月15日动手，那一天恺撒将要参加元老院的一场会议。密谋者们认为在这样的场合恺撒会放松警惕，也比较容易接近他。独裁官肯定听到了一些关于阴谋的报告和传闻，但这些说法往

往很模糊，而且常常不仅涉及真正的密谋者，还涉及安东尼和多拉贝拉等人。恺撒对这些传闻置之不理，不过据说他曾表示，他更倾向于怀疑瘦削而生性严肃的卡西乌斯，而不是生活放荡的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据说在另一个场合，恺撒曾宣称布鲁图斯应当有足够的理智，不会急等着他死掉。[22]

恺撒是个理智的人，他判断罗马需要他，因为若是没有他，罗马将再次陷入内战。他是独裁官，实际上拥有君主大权，但他不是残酷的统治者，而且努力用他的权力为民造福。共和国享有和平，而且比之前几十年的状况都更好，尽管政务不是按照常规方法来处置的。恺撒曾宣称共和国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名字而已，在他看来，政治的非常规状态并不重要。不过或许他没有意识到，旧的理想对其他一些人仍然很重要。恺撒或许认为其统治带来的好处应当能让人们克服怀旧情绪。尽管他的亲密盟友们再三请求，恺撒还是一再拒绝重新组建卫队，也不打算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他回答说，他不愿意始终在恐惧中生活，也不愿意始终处于严密护卫之下。或许多年辛劳造成的疲惫，以及统治共和国及其行省的无休无止的劳作，让他无暇担忧。对他来讲，政治生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完全只需要恪尽职守地努力工作，因为所有曾经与他争霸的人（最重要的是克拉苏和庞培，也有卡图卢斯、加图，甚至还有毕布路斯和他那一代人）都已经不在了。毋庸置疑，他已经赢了，他是共和国的第一人，他的荣耀和成就超过了罗马历史上和现今的所有伟人。现在他唯一的有力竞争对手就是他自己。但恺撒始终非常重视责任，继续将自己的充沛精力全部投入到为罗马服务的工作中。筹备中的针对达契亚人和帕提亚人的战争必将为他赢得更多荣耀（并且是非常光彩的荣誉，因为敌人是外邦人）。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也大多都认识到这些战争是必不可少的，罗马应当驯服这些敌人。恺撒或许感到疲倦，或许感到自己的胜利有些空虚，或许他不畏惧死亡，但这并不是说他一心求死。如果他的新政权要成功，就不可能永久性地用恐惧来维持，而是需要让世人接受他的统治比其他可能的情况更好。他向世人表明，他不害

怕自己的阶层，既不怕盟友，也不怕先前的敌人。这展现了他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大权独揽让人讨厌，但他希望大家能够容忍他的专制。于是他寄希望于曾经帮助他赢得这么多胜利的好运气，相信自己的才干和公正的统治，相信其他人能够务实地接受他。他希望三年的征战和新的胜利能够让罗马的精英阶层习惯他的统治，或许还能提醒他们，恺撒比他的一些下属好得多。我们不知道，得胜归来后他会不会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开始指定一个继承人。据说他打算让屋大维在至少一年的战争期间担任他的骑兵统帅，但还有另外一个人被提名这个职位，所以他对自己的继承人肯定还没有最终决定。我们没办法确定这一点，他可能还没有制订出具体的计划。在前53年～前52年的冬季，恺撒对高卢贵族的态度做出了严重的误判。如今，他在罗马重蹈覆辙。[23]

史料中有很多预示罗马最有权势的人物即将丧命的征兆。其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是在3月14日夜间，卡尔普尔尼娅做了一个噩梦。据说，她梦见自家宅邸的三角楣饰坍塌或者梦见自己抱着恺撒的尸体。3月15日早上，她连续做了多次献祭，但征兆都不吉利。据说恺撒很吃惊，因为他的妻子一般是不迷信这些东西的，但最终卡尔普尔尼娅说服他留在家中。他派人通知元老院，他身体有恙，无法离家处理公务。他可能真的生了病。据说是安东尼把这个消息送往元老院，但他还没有出发，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就来了。重要的元老常在清晨接受朋友们的请安，这是很寻常的事情。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和恺撒在前一晚都在李必达府中用膳，饭后大家聊起了什么样的死法才是最好的。恺撒之前没怎么参加讨论，这时突然抬起头来说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死是最好的。第二天早上，布鲁图斯说服恺撒改变了主意。据普鲁塔克记载，布鲁图斯嘲讽了占卜者的警示，并诱骗恺撒说元老院将授予他在意大利之外称王的权力。这个桥段可能是后人虚构的。毕竟恺撒三天后就要离开罗马，他现在有很多理由去参加元老院会议。不管细节怎样，独裁官最终坐上了轿子，穿过广场，来到了元老院开会的地方，那是庞培剧院建筑群内的一座神庙。几个月前，恺撒下令恢复在公共场合摆放苏拉和庞培的纪念

碑，并因此赢得了赞赏。所以，在元老院辩论的时候，他前女婿的塑像应当立在一旁。他离开家之后，一名奴隶来到他家，声称为独裁官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消息。此人被允许留下等待恺撒回来。[24]

恺撒抵达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在此之前，密谋者们一直提心吊胆，害怕自己的阴谋已经暴露。除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之外，密谋者们已经早早聚集起来，借口是为卡西乌斯的儿子举行成年礼，他将公开披上成年托加。然后他们来到神庙，在外面等待恺撒。他们的匕首藏在元老们用来盛放长长的尖笔[25]的盒子里。庞培剧场内有一队属于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角斗士，全副武装，整装待发。他们有理由待在那里，因为他们即将参加近期在那里举行的一些竞技比赛。其中一人神秘兮兮地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问候，他们起初以为自己已经被出卖了。独裁官抵达后，他们看到这个人走到恺撒面前，和他说了一会儿话，这让他们愈发紧张。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他是在向恺撒请愿。在途中，希腊文教师阿特米多鲁斯给恺撒送上了一份卷轴。阿特米多鲁斯在布鲁图斯家待过一段时间，可能知道密谋的情况。独裁官没有读卷轴上的文字，可能是刻意没有读，也可能是没有机会读。从各方面史料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起了疑心。他看到一位曾经警告他要提防3月15日的占卜者，并快活地向他打招呼。他们的这段对话借助莎士比亚的演绎，已经家喻户晓。恺撒说：“3月15日已经到了。”“是啊，恺撒，但还没结束呢。”恺撒下了轿子，密谋者们上前问候。特雷博尼乌斯（或者按照普鲁塔克的版本，是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将安东尼拉到一边，和他一直说话，而恺撒和其他人走了进去。他们知道，恺撒的同僚执政官（安东尼）对恺撒忠心耿耿，而且非常健壮，并且一般会坐在独裁官旁边，能够援救他。恺撒走进大厅时，室内的元老起身迎接他。然后独裁官走到自己的黄金椅前，这个席位应当是在安东尼的贵人座椅[26]旁边，因为他是除了恺撒之外的唯一执政官。[27]

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密谋者们将独裁官团团围住。曾经在恺撒麾

下效力的卢基乌斯·提利乌斯·金博尔请求允许他的兄弟（一名热忱的庞培派分子）回国。其他人紧紧围住恺撒，恳求他批准金博尔的请求，触碰他，吻他的手。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卡斯卡·朗古斯走到恺撒座椅的后面。独裁官不肯听他们的恳求，冷静地驳斥他们的论据。突然间，金博尔抓住恺撒的托加袍，将它从他的肩上拉了下来。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卡斯卡抽出匕首，刺向恺撒。但他过于紧张，只擦伤了独裁官的肩膀或脖子。恺撒转过身，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混账卡斯卡，你在搞什么鬼？根据某些版本的记述，他抓住了卡斯卡的胳膊，想扭开他的匕首，但按照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恺撒用自己的笔做武器，刺向卡斯卡。普鲁塔克非常具体地说，卡斯卡用希腊语（而不是像恺撒那样用拉丁语）喊他的兄弟来帮忙。其他密谋者向恺撒劈砍和刺杀。有好几个人，包括布鲁图斯，在独裁官周围混乱的打斗中被其他密谋者误伤。只有两名元老努力去救恺撒，但他们无法突破人墙。独裁官一直和他们搏斗到最后，想杀出一条血路。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刺中了他的腹股沟部。据有些人说，恺撒看到塞维利娅的儿子时，停止了挣扎，说了最后一句话："也有你啊，我的孩子。"但遗憾的是，莎士比亚版本中的"你也有份，布鲁图斯"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它的真实性。然后独裁官用自己的托加袍遮住头，倒了下去，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他身上有二十三处伤。[28]

这攻击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以至于数百名元老目瞪口呆地看着，起初都没做出任何反应。刺杀结束后，密谋者们站在那里，个个衣衫凌乱，有些人负了伤，所有人都溅了血。布鲁图斯要求西塞罗（他事先对刺杀恺撒的密谋不知情）领导大家。布鲁图斯正在说话的时候，大厅内乱作一团，所有其他元老，包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全都拔腿就跑。这不是密谋者们希望看到的反应，但他们还在为自己的成功而洋洋自得。他们鱼贯而出，走到卡比托利欧山，用一根杆子挑着获释奴隶通常会戴的帽子，象征他们给国家带来了自由。安东尼暂时躲了起来，不久之后，恺撒的三名奴隶勇敢地走进大厅，抬起尸体，搬到轿子上，然后抬

回了恺撒的府邸。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罗马全城呆若木鸡，处于一种紧张的停战状态。西塞罗最终走到卡比托利欧山，向刺客们表示祝贺，但当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走下山，在广场的演讲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没有表示出任何热情。安东尼还活着，李必达也活着，而且李必达掌管着驻扎在城外的军队。在一段时间内，双方似乎想要和解。安东尼私下里会见了密谋者，然后第二天在元老院公开与他们会见。元老院通过了一项动议，确认恺撒的所有举措和任命为合法有效。太多的人，包括一些密谋者，都从中获益，因此不愿意将它们撤销。

在和解的气氛下，元老院投票决定为恺撒举行公开葬礼，将于3月18日在广场举行。安东尼命令一名传令官宣读了前不久元老院投票授予独裁官的所有荣誉，以及所有元老发出的保卫恺撒生命的誓言，然后发表了一次简短的演讲。这是强有力的罗马式演讲，莎士比亚的著名版本或许是现代人能够做出的最佳转述。安东尼还宣读了恺撒的遗嘱，其中包括将台伯河附近相当广阔的花园赠给罗马市民，以及给每一位公民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即75迪纳厄斯）的赠礼。恺撒死前穿的紫袍被撕裂了，还沾着血迹，后来被公开展示。据一些史料记载，人们还用蜡做了一尊恺撒像，展示他的伤口。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西塞罗后来轻蔑地说这些人不过是城市的乌合之众，但他这么说其实仅仅是按照常规贬低自己的对手。参加葬礼的群众包括了广泛的不同群体。一群行政长官和前任行政长官开始抬起装着遗体的棺木，因为按照计划，遗体要被抬到战神广场上他女儿的墓地旁，在那里火化。愤怒的群众阻止了他们。就像英雄克洛狄乌斯的遗体在元老院火化一样，群众要求将恺撒的遗体在城内火葬，就在广场的正中间。行政长官们和法庭使用的座椅和长凳被砸烂，用作火葬的柴火。群众的情绪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被雇来穿着恺撒及其先祖的凯旋盛装和官服的演员们将衣服扯下，撕成碎片，投入火中。恺撒的老兵们将自己的武器和甲胄丢入大火，女人们将自己最精美珍贵的首饰也丢了进去。偶尔有人对恺撒发出抗议，但这种抗议总是针对具体的某件事。恺撒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

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一小群精英阶层成员的利益，因此群众对他的爱戴从来没有真正动摇过。在前49年，意大利的绝大多数民众不曾拿起武器反抗恺撒。无论是那时还是如今，群众都不会像敌视恺撒的元老们那样，将他视为共和国的敌人。毕竟在不同人眼里，“共和国的敌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葬礼之后发生了暴乱，密谋者及其支持者的宅邸遭到了攻击。独裁官的忠实支持者赫尔维乌斯·秦纳被暴民杀害，他们误以为他就是那个叫作科尔内利乌斯·秦纳、经常批评恺撒的人。哀悼恺撒的不仅仅是罗马公民。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在葬礼上以及葬礼之后的多个夜晚，许多外国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习俗，哀悼了恺撒。尤其是居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为他痛哭流涕。[29]

恺撒遇刺几周之后，他的一名忠实追随者郁闷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天才的恺撒都找不到出路，那么谁能找到”？此人还预测当恺撒遇刺的消息传到高卢之后，高卢立刻就会爆发叛乱。这个预测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他的另一个判断（内战很快将再次爆发）是完全正确的。安东尼选择以武力对抗密谋者。恺撒在遗嘱中正式收养了屋大维，于是屋大维被更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这个仅仅十八岁的少年表现出了非凡的气质和自信，他将恺撒的老兵们招揽到自己麾下，崛起为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重要人物。起初他率军为元老院效力，去镇压安东尼。但他正确地判断在他成功之后，元老院一定会抛弃他。于是，他与安东尼和李必达联手，组成了后三头同盟。随后的战争无比凶残，一点没有恺撒的宽大仁慈，而是让人想起马略、秦纳和苏拉之间的斗争。三年内，几乎所有密谋者要么被打败，要么丧命，其中许多人是自杀的。迫害政敌的规模比苏拉时的规模更大，元老阶层和骑士阶层遭到了大清洗。后来，李必达被排挤到一边，作为一名默默无闻的流亡者度过残生。而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了争夺霸权而厮杀起来。在落败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自杀之时，屋大维年仅三十二岁。他成了罗马世界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罗马又一次变成了君主国，但这一次没有使用令人憎恶的“国王”头衔，而且这一次的变化将是永久性的。屋大维成了

奥古斯都，比他的养父更巧妙地掩饰了自己大权独揽的事实。这是他成功的部分原因。但他对敌人斩草除根的冷酷无情以及人民的疲惫不堪（他们已经忍受了十多年流血冲突）也让罗马的精英阶层认识到，最好是接受他的统治，而不是再次掀起内战。[30]

---

[1] Suetonius，*Caesar* 86.1-2.

[2] Cicero，*pro Marcello* 8，25.

[3] Dio 43.51.1-2，44.1.1，Appian，*BC* 2.110，3.77，Plutarch，*Caesar* 58，Velleius Paterculus 2.59.4，Suetonius，*Caesar* 44.3，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3（1923），pp.326-327.

[4] 今天的波佐利，意大利南部城市。

[5] 传说古罗马人有时为了留出胃口以品尝更多食品，常在吃饭中途为自己催吐。

[6] 关于这次拜访，见Cicero，*ad Att.* 13.52；关于到恺撒在罗马的宅邸拜访，见14.1；关于恺撒的个性发生了深刻变化（据说是由于受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影响）的观点，见J.Collins，‘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Historia* 4（1955），pp.445-465。

[7] Dio 43.44.1-45.2，44.3.1-6.4，Suetonius，*Caesar* 76.1；see also R.Carson，‘Caesar and the Monarchy’，*Greece and Rome* 4（1957），pp.46-53，E.Rawson，‘Caesar’s heritage：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5（1975），pp.148-159，S.Weinstock，*Divus Julius*（1971），esp.pp.200-206；关于《新约》中耶稣就征税问题的回答，即著名的“恺撒的物当归恺撒”见Matthew 22.17-21，Mark 12.14-17。

[8] 牧神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节日，起源可能在罗马建城之前，时间是2月13日至15日，是春季驱逐恶灵、净化城市的节庆，纪念牧神和抚育罗马创始人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母狼。

[9] Dio 43.14.6-7，44.6.1，5-6，Appian，*BC* 2.106，Weinstock（1971），pp.241-243，276-286，305-310.

[10] Dio 44.5.3-7.1，Cicero，*Philippics* 2.43.1；关于韦斯巴芗的临终遗言，见Suetonius，*Vespasian* 23；关于后来对皇帝的崇拜，见S.Price，*Rituals and Power*：*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1984）。

[11] Suetonius，*Caesar* 44.2，Dio 43.2，44.6.1-3，Cicero，*de Divinatione* 1.119，2.37；see also Weinstock（1971），pp.271-3；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到访，见Dio 43.27.3，Appian，*BC* 2.102；Suetonius，*Caesar* 52.1声称是恺撒传唤她到罗马的，但错误地认为她在恺撒

在世时就离开了；西塞罗的拜访，见*ad Att.* 15.2；see also M.Grant，*Cleopatra* （1972），pp.83-94，and E.Rice，*Cleopatra* （1999），pp.41-44。

[12] 意思是“小恺撒”。

[13] Suetonius，*Caesar* 52.2，Plutarch，*Caesar* 49；但Plutarch，*Antony* 52说男孩是在恺撒死后才出生的；for discussions see Grant （1972），pp.83-85。

[14] Suetonius，*Caesar* 83.1-2，*Augustus* 8.1-2，Appian，*BC* 2.143，Pliny，*NH* 35.21，Plutarch，*Antony* 11.

[15] Plutarch，*Caesar* 61，*Antony* 12，Suetonius，*Caesar* 79.1-2，Appian，*BC* 2.108，Dio 44.9.2-10.3，Cicero，*Philippics* 13.31，Velleius Paterculus 2.68.4-5，Valerius Maximus 5.7.2.

[16] Dio 44.11.1-3，Appian，*BC* 2.109，Plutarch，*Caesar* 61，Antony 12，Cicero，*Philippics* 2.84-87，*de Divinatione* 1.52，119，Suetonius，*Caesar* 79.2；see also Weinstock （1971），pp.318-341.

[17] 卫队，见Dio 44.7.4，Suetonius，*Caesar* 84.2，86.1-2，Appian，*BC* 2.107；关于司法和陪审团，见Suetonius，*Caesar* 41.2，53.1。

[18] Dio 44.8.1-4，Plutarch，*Caesar* 60，Suetonius，*Caesar* 78.1；see also the comments in Weinstock （1971），p.276，M.Gelzer，*Caesar* （1968），p.317，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3 （1923），pp.333-334.

[19] See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p.64，95，for Galba，and also Suetonius，*Galba* 3；关于恺撒遗嘱中提及迪基姆斯·布鲁图斯，见Suetonius，*Caesar* 83.2，and also Dio 44.14.3-4；关于巴希卢斯，见Dio 43.47.3，Appian，*BC* 3.98；关于特雷博尼乌斯和安东尼，见Plutarch，*Antony* 13。

[20] 城市裁判官与其他裁判官的区别在于，一般裁判官往往被外派，而城市裁判官留在罗马城，负责处理司法工作。

[21] Plutarch，*Brutus* 6-13，*Caesar* 62，Appian，*BC* 2.111-114，Dio 44.11.4-14.4，Suetonius，*Caesar* 80.1，3-4，Velleius Paterculus 2.58.1-4；see also Syme （1939），p.44-45，56-60.

[22] Suetonius，*Caesar* 52.2-3，Appian，*BC* 2.113，Plutarch，*Caesar* 62，*Brutus* 8，*Antony* 11.

[23] Dio 43.51.7.

[24] Plutarch，*Caesar* 63-65，Suetonius，*Caesar* 81.14，Dio 44.18.1-4，Appian，*BC* 2.115-

116，Velleius Paterculus 2.57.2-3.

[25] 这个时期罗马的笔一般是金属制成的，在蜡板上写字。

[26] 贵人座椅是古罗马最高级官员坐的一种软垫凳，一般用象牙制成，或镶嵌象牙。

[27] Plutarch，*Brutus* 14-15，*Caesar* 63，Suetonius，*Caesar* 80.4，Cicero，*de Divinatione* 2.9.23，Dio 44.16.1-19.1.

[28] Plutarch，*Caesar* 66，*Brutus* 17，Dio 44.19.1-5，Appian，*BC* 2.117，Suetonius，*Caesar* 82.1-3；Dio和Suetonius 都认为，恺撒对布鲁图斯的最后一句话是“也有你啊，我的儿子”（*kai sou teknon* ）；Suetonius认为，恺撒对卡斯卡的回答是：“什么，这么凶残！”（Ista quidem vis est）。

[29] Plutarch，*Caesar* 67-68，*Brutus* 18-21，*Antony* 14，Dio 44.20.1-53.7，Appian，*BC* 2.118-148，Suetonius，*Caesar* 82.4-85.

[30] 关于从盖乌斯·马提乌斯的引文，见Cicero，*ad Att.* 14.1；关于预言高卢将发生叛乱，见14.4。

后记

流血和破坏将要成为一时的风尚，恐怖的景象将要每天映入人们的眼帘。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第三幕，第一场

恺撒出生时，共和国已经问题重重，常常会突然爆发野蛮的政治暴力。在他的一生中，流血冲突越来越严重，他的遇刺身亡只是罗马史上一个特别动荡时期的事件之一。恺撒的死亡非常残酷和壮烈，而在他的故事里扮演主角的人们很少能够寿终正寝。女性角色们的命运要好得多，尽管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这方面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是个例外。恺撒还是个婴孩的时候，萨图尔尼努斯的追随者们惨遭屠杀；恺撒是个幼童时，爆发了同盟者战争；他长大成人的时候，内战肆虐。苏拉与敌手的斗争使罗马精英阶层损失惨重，这样可怕的损失自汉尼拔战争那段最黑暗日子以来还不曾有过。但这还不算完。李必达很快在意大利举兵起事，但不久就被镇压下去。塞多留则在西班牙残酷而高效地南征北战，多年后才被击败。后来，甚至在恺撒越过卢比孔河之前，就有喀提林、克洛狄乌斯、米罗等许多其他人物为了追逐自己的野心，不惜动用暴力。与此同时，与外国不断爆发战争，而斯巴达克斯起义最初惊人的成功令极度依赖奴隶劳动的罗马社会惊慌失措。但是，在罗马人内部斗争中死亡的元老和骑士要比在对外战争和镇压奴隶战争中牺牲的多得多。安东尼和屋大维首先消灭了刺杀恺撒的密谋者，然后他们互相厮杀，流血冲突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恺撒生活在一个残暴而危险的时代。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因为它也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恺撒本人的

《战记》，西塞罗的大量书信、演讲和哲学文章，以及撒路斯提乌斯的史书和卡图卢斯的诗歌，是拉丁文学中的瑰宝。这些著作再加上后世的一些史料，使这些岁月成为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我们熟知的时期。事实上，今天我们在审视共和国较早期历史时很难避免前1世纪的视角，尤其是很难绕开西塞罗的著作和思想。关于这些岁月的大量详细信息、日常的流言蜚语或者涉及选举和辩论的详细讨论（这些内容的很大一部分来自西塞罗的著述）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而稳定的社会。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前1世纪的罗马政治毫无稳定性可言。暴力并不随处可见，但它始终具有可能性，潜伏在表面之下。限制元老竞争的很多条件已经不能正常发挥效力。在大多数年头里，政治生活能够相对正常地运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召开会议，法庭审案并做出裁决，行政长官们处理公务，依法举行选举。有时陪审员会受贿，或者被用其他手段改变主意，或者选民遭到操控。但总的来讲，共和国的运作方式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暴乱、有组织冲突、谋杀和公开战争仍然是偶然发生的例外情况，间或打断上述的政治运转。共和国的体制具有很好的弹性，在每一次危机之后都能恢复到至少是表面上的正常状态。对格拉古兄弟之前的罗马人来讲，政坛的暴力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格拉古兄弟之后，这些事情就完全可能发生了。马略、秦纳和苏拉这样的人证明，可以通过武力夺取最高权力。而庞培的早期生涯表明，一位拥有军队的精明能干的指挥官能够以史无前例的方式硬挤到政治生活的最前沿。

恺撒这一代人和之前的元老有着本质上相同的野心，即追求高官厚禄、财富和荣耀，以提升自己和家族的地位。从前2世纪开始，帝国主义扩张的利润意味着罗马人永远可以搞到更多的钱。于是一掷千金地修建纪念碑、提供娱乐活动，其他沽名钓誉、收买人心的做法越来越多，令人震惊。到前1世纪，从政并取得成功的成本比以前高了许多。恺撒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了从政而债台高筑，寄希望于将来取得成功来偿还债务。如果他在任何一个阶段失败，就会被彻底地从政界扫地出门，永无出头之日。所以他在参选祭司长的那天才会对母亲说，他要么作为

胜利者回家，要么就根本不回家了。恺撒屡战屡胜，但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失败了就会失去一切。有些人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春风得意，但他们的竞争对手会在法庭或其他地方公开地将其打倒。前63年，西塞罗处决了前任执政官兰图鲁斯，此人已经被逐出元老院，不得不在政界从头开始。仅仅几年之后，演说家自己就被克洛狄乌斯强迫流亡，后来仅仅因为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才得以回国。政治生活的风险比之前大了许多，极少有人能够高枕无忧、不必担心任何攻击。失败者加入了亡命徒的队伍，令这样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为了恢复财富和前途，愿意加入任何人领导的事业。很多这样的人加入了喀提林阵营，最后丧了命。其他一些这样的人在前49年投奔恺撒，只要没有在内战中丧命，后来都发达起来。在这个残暴的时代，失败带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垮台，还有死亡。政治生活虽然有着许多新的危险，但是限制却少了许多。至少对一部分人而言，可以扭曲或者操纵管理官职任命的法则和常规，也可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职权极大、任期极长的行省总督职位。很多人为苏拉卖命，从而获得了财富和地位，这让世人看得清清楚楚，在内战中有可能大发横财。内战中恺撒的敌人们自命为传统共和国的捍卫者，但其中大多数人也曾从苏拉的胜利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

极高的风险和获得无限成功的可能性让恺撒这一代人既野心勃勃又担惊受怕。所有人都曾看到有人平步青云，有人一败涂地或者丢掉性命。绝大多数人不敢，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借助恐吓或公开的暴力来推动自己的政治进程。但是，任何人都不能确定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定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段。元老们很容易相信关于革命或暗杀阴谋的传闻。内战爆发后，连保持中立也不能确保安全了，对政敌的流放迫害就印证了这一点。一个人爬得越高，承担的风险就越大，一旦跌下来摔得就越惨，他也就越害怕自己显露出任何虚弱的迹象，让敌人乘虚而入、残酷攻击。显而易见的是，共和国晚期的很多著名人物都是野心勃勃的。但我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生活和争权夺利时所处的氛围是多么紧张。每一次成功都让人更难回头，唯一能够保障安全的手段就是获得更多的成功。

恺撒在史册中的形象是越过卢比孔河、让罗马世界陷入混乱的人，他狂赌了一把，要么赢得一切，要么失去一切。他实际上和对手及前1世纪的其他罗马显要人物没有多少区别。此次危机和其他历次危机中的关键人物也并不总是经过理性考虑而做出选择。他们都是某种形式的赌徒，所有人都害怕失败的后果，因此都不肯信任自己的私敌。军事独裁和迫害政敌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罗马，其他一些粗鲁的大屠杀和处决也让人们记忆犹新。罗马精英阶层的心态也不鼓励他们去谋求妥协。贵族子弟受到的教育是追求“美德”，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意志坚定，哪怕面临失败也绝不认输。在对外战争中，这种精神对共和国大有益处，令皮洛士和汉尼拔困惑不已；他们想不通罗马人显然已经被打败，为什么还不认输。而在内战时期，这种精神则使得冲突各方都极端地冷酷无情。斗争开始后，双方都知道他们要么得胜，要么死路一条。在对外战争中，罗马贵族在被打败后极少自杀，因为他们的使命是重整旗鼓、重建军力，以便打赢战争。在内战中，普通士兵一般能得到宽恕，但领导人不能，所以他们纷纷自尽，不管是出于绝望还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敌人。

恺撒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前49年，他害怕落入敌人手中，敌人也害怕他率军返回罗马。双方的恐惧可能都没有根据，但它仍然是真切无比的。战争爆发后，恺撒表现得宽宏大量，饶恕被打败的敌人，有时还允许他们继续从政。这是他精心筹划的政策，意在争取骑墙观望分子，同时避免让敌人顽抗到底。恺撒与对手之间的反差是极大的，恺撒和往昔的胜利者也非常不同。他打赢战争之后，允许被赦免的庞培派重返政界，有些人还得到了很好的待遇。恺撒认为这更有可能劝服这些人以及其他人接受他的独裁统治。不管恺撒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在类似情况下夺权成功的其他罗马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慷慨仁慈。同样，他一生中始终支持民众的事业，虽然他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支持，但他的确执行了一些为大众造福的举措。

恺撒决心攀登到最高峰。莎士比亚笔下的马克·安东尼在谈及恺撒

时说："野心家是不应当这样仁慈的。"事实上，很少有比恺撒更严酷、更坚决的野心家了。有的时候，他完全铁面无情，不过他在高卢战争中比内战期间更残酷。他似乎很少有什么道德顾虑，在下令实施暴行时非常冷血和务实。但他从来不会无谓地残忍，他的胜利对他自己有好处，一般对更多的人也有好处。说到底，恺撒是个性格非常多面、充满矛盾的人，他的一生亦是如此。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险象环生，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也越来越少。共和国体制非常依赖先例和常规，但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瓦解，而当局动辄用元老院终极议决来暂停法律的效力也损害了体制。政治游戏的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要恢复旧体制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恺撒的雄心壮志、才干、决心和他常夸耀的好运气帮助他攀登到最高位置，但也使他再也不能中途放弃或者妥协让步。如果他出生在一个不是那样困难重重的时代，他的名誉或许就不会那么争议重重。他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在对外战争中挽救罗马，赢得无可争议的胜利（不过如果那样的话，他的结局或许会和阿非利加努斯相同，即被迫退出政坛、自我流放、愤恨而灰心丧气地度过余生）。恺撒不管有怎样的错误，终究是个爱国者，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恺撒打了一场内战，赢得了胜利，成为独裁官，最后被密谋者刺死。不管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他的一生都充满了戏剧性。

"我永远是恺撒"——不同年代人眼中的恺撒

从古至今，作为军事统帅的恺撒始终受到景仰。他的《战记》在15世纪末再次受到世人瞩目，开始重新出版。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国家越来越有序，职业化军队也越来越复杂，军事思想家们常常从恺撒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对古希腊和古罗马兵法的认知在16～17世纪欧洲军事的理论和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直到不久前，《战记》和其他一些古书在西方国家的军官教育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拿破仑常说自己受到了恺撒的启发，甚至在圣赫勒拿岛流放时还对恺撒的历次战役做了研究和

批评。拿破仑对恺撒的效仿显然不限于军事方面，因为他在崛起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执政者和皇帝的过程中，始终刻意模仿恺撒那样的伟人。而法兰西共和国自一开始就从罗马共和国那里吸取了不少灵感。拿破仑帝国的很大一部分绘画和文学显然是罗马风格的，尤其是模仿了恺撒及其历代继承者。后来，拿破仑三世资助了恺撒征服高卢遗址的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对恺撒的仰慕与对高卢人的浪漫追思混合起来。法国儿童在学校里还被教导将铁器时代的高卢人视为“他们的祖先”。19世纪，这种联系被大大增强，因为法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是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就像恺撒笔下的高卢民族与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敌人对抗一样。

作为军事家，恺撒一直受到广泛的仰慕，也有人对他有所批评，持保留态度。但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恺撒，从一开始人们的态度就是非常复杂的。屋大维作为恺撒的继承人崛起，笼络了他的老兵和支持者，为遇害的独裁官复仇。恺撒被神化之后，屋大维自称为“神圣尤利乌斯之子”。他没有效仿养父的宽大仁慈。尽管他的军事才干比不上恺撒，但他是个极其有才华的政治家。内战结束后，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统治已经登峰造极，任何人都无法挑战，而他用和恺撒非常不同的方式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绝对权力。那时他神圣父亲的名头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很少出现在新政权的宣传中。虽然李维等作家拿不准应当如何看待恺撒及其作为，但他们一定没有歌颂恺撒。很多与恺撒同时代的人也不知道应该对恺撒是褒还是贬。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史书（已遗失）可能对恺撒并非完全没有批评。在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加图——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比恺撒更常得到赞颂，被理想化为共和国的高尚捍卫者。在尼禄的统治下，诗人卢坎创作了史诗《法萨利亚》，题材就是庞培和恺撒之间的斗争，其中恺撒肯定不是史诗的英雄，但他也不是毋庸置疑的反角，有时更像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不完全是凡人。1世纪中晚期，苏埃托尼乌斯开始创作罗马帝国最初十二位统治者的传记，从恺撒开始。在十二人当中，奥古斯都显然被

颂扬为最接近理想化君主的贤君。但在某些方面，苏埃托尼乌斯描写恺撒的那部分与其他部分差别很大。因为恺撒尽管是独裁官，却既不是皇帝，也不是他的养子所谓的“元首”。苏埃托尼乌斯的确批评了恺撒，但也详细记述了他的许多成就。从很多方面看，对恺撒态度的模棱两可是从罗马人开始的，他们敬仰他的伟大征服，但对其生活和政治生涯的其他部分痛心疾首，并且继续对他的一些对手持有尊重的态度。

这种不确定性延续下去，所以在千百年间人们描绘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恺撒。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中的恺撒。该剧虽然以恺撒为题，但核心人物实际上是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恺撒出场时间较短，在第三幕就被杀害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恺撒没有多少明显的伟大之处，他傲慢自负、自吹自擂且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但绝不是暴君。他的强大权力和崇高地位主要是通过其他人物的态度表现出来的，在他死前和死后都有所呈现。莎士比亚不是第一个以恺撒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剧作家，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很多人都创作了以恺撒生平的部分或全部故事为主题的戏剧或歌剧。恺撒遇刺可能是最吸引人的故事，因为它本身就极富戏剧性。其次是恺撒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私情，因为它充满了异国情调和艳情暗示。但萧伯纳的《恺撒与克利奥帕特拉》中完全没有艳情的意味。萧伯纳笔下的恺撒更温和，显然也更善良；他与女王（萧伯纳将她设定为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实际上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前48年已经是成熟女性）的关系也在本质上被设定为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在近期，恺撒的形象出现在了一些电影中，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或许是雷克斯·哈里森在《埃及艳后》（1963年）中的表演[1]。他饰演的恺撒更具有行动家的风风火火和威严领袖的冷静沉稳。此外，在哈里森娴熟和准确的演绎下，恺撒的机敏聪慧和演说家风范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恺撒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其饰演者伊丽莎白·泰勒看上去非常美丽，但在外貌上很可能和历史上的女王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关系或许更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激情。电视荧幕上也有人尝试演绎恺撒，比如杰里米·西斯托（Jeremy Sisto）主演的

电影《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 ，2002年）。这部电影对恺撒做了大体上正面的描绘，但要将他一生的故事压缩到两个半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实在太困难了。剧中根本没有提及克拉苏，而且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也非常模糊，苏拉当独裁官的时候加图竟然就已经在元老院了。但是，这部电影的确尝试对恺撒做更广泛的介绍，而不仅仅是埃及和3月15日的故事。

恺撒在一生中做了许多事情，而他生活的时代又是多事之秋，并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记载，所以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努力涵盖他整个生涯的作品都很少。近些年里，规模最大也最详细的版本是考琳·麦卡洛（Colleen McCullough）的“罗马的主人”（*Masters of Rome* ）系列。这是六部小说[2]，每部大约有700～800页。这个系列的小说非常详细、有趣，从马略和苏拉开始，一直讲到恺撒遇刺之后。作者的研究很到位，并且严格遵照史实。这个系列规模庞大，主人公们的私人生活又很有吸引力，所以史料的很多空白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虚构来填充。历史学家可以说我们对某事物不了解，小说家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康恩·伊古尔登（Conn Iggulden）的“皇帝”（*Emperor* ）系列小说的篇幅没有那么长，是以恺撒为主角的冒险故事。这些小说的节奏很快，强调惊险的情节，所以作者对史实的遵照不是很严格。麦卡洛和伊古尔登对恺撒的描写都很正面，尤其是伊古尔登，但也表现了他冷酷无情的一面。艾伦·马西（Allan Massie）的《恺撒》（*Caesar* ）是一部更严肃的小说，对恺撒也持批判态度。该书的主人公和叙述者是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莎士比亚版本，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描绘为一个自负的傻瓜，而不是高尚的英雄。恺撒是一位伟人，但他的玩世不恭和野心勃勃更为突出。史蒂文·塞勒（Steven Saylor）的《玫瑰下的罗马》（*Roma sub rosa* ）系列悬疑小说中也出现了恺撒，这些小说对他的塑造也不是很正面，不像是英雄，而是摧毁了共和国的自私之徒。这些故事中的共和国的确问题重重、摇摇欲坠，但这并不能开脱恺撒加快其灭亡的罪责。

对剧作家、编剧和小说家来说，历史真实只是一个方面，他们还要考虑如何把故事讲好。有些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尊重史实，但历史学家不应当过于批评小说中偏离史实的问题，毕竟有时史实本身也很难确定。不同的创作者塑造了不同的恺撒。但我们需要注意，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曾以差别极大的方式描绘他的性格、目标和重要性。在本书中，我努力审视现有的证据，努力复原他的一生。有些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并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的目标是在处理恺撒生平每一个时段时，都不假定随后的事件是必然发生的。他性格的某些方面，比如他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情感、信仰，尤其是他在最后岁月中的野心，仍然迷雾重重。我们可以做一些猜测，但不可能确凿地知道。每个人都必然会塑造自己版本的恺撒，要么仰慕他，要么谴责他，往往是二者皆有。恺撒离世已经两千多年了，他的故事仍然让人心醉神迷。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本书绝不会是论述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的最终著作。

---

[1] 对英国读者来说，Kenneth Williams在电影*Carry on Cleo*（1964年）中对恺撒的塑造和不朽名句“耻辱啊耻辱，他们统统给我了”，或许同样难忘，尽管不符合史实。同样，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对恺撒的了解其实来自Goscinny和Uderzo的*Asterix* 连环画。尽管在这些故事里，罗马人是主要的恶棍，而恺撒有些过于拘谨和傲慢，但总的来讲仍然是正面形象。

[2] 到2007年，“罗马的主人”系列包括七部小说，分别是：*The First Man in Rome*（《罗马第一人》，1990年），*The Grass Crown*（《桂冠》，1991年），*Fortune 's Favorites*（《命运的宠儿》，1993年），*Caesar 's Women*（《恺撒的女人们》，1996年），*Caesar*（《恺撒》，1997年），*The October Horse*（《十月马》，2002年），*Antony and Cleopatra*（《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2007年）。

大事年表

前753年　　传说中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

前509年　　罗马末代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被驱逐

前201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罗马战胜迦太基

前146年　　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迦太基灭亡

前133年　　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死亡

前123年～前122年　　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死亡

约前112年　　克拉苏出生

前106年　　庞培出生

前105年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在阿劳西奥歼灭一支罗马大军

前102年～前101年　　马略打败辛布里人和条顿人

约前100年　　尤利乌斯·恺撒出生

前91年～前88年　　　　同盟者战争，罗马的意大利盟邦的最后一次大起义。经过苦战，罗马打败了同盟者

前88年　　　　马略从苏拉手中夺走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指挥权。苏拉进军罗马

前86年　　　　马略去世

约前85年　　　　恺撒的父亲去世

前84年　　　　恺撒与科尔内利娅结婚

前82年～前79年　　　　苏拉担任独裁官

前81年　　　　苏拉命令恺撒与科尔内利娅离婚。恺撒拒绝服从，开始逃亡。他母亲的亲戚为他说情，恺撒获得了苏拉的赦免

前80年～前78年　　　　恺撒在亚细亚服兵役，在米蒂利尼荣获橡叶冠

前77年　　　　恺撒在罗马法庭从业，起诉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失败

前76年　　　　恺撒起诉盖乌斯·安东尼失败

前75年　　　　恺撒去罗德岛学习，途中被海盗俘虏，被赎回

前74年　　　　恺撒自行前往亚细亚，征募当地士兵，打退了米特里达梯六世国王麾下一名将领发动的入侵或袭掠

前73年　　　　恺撒返回罗马，进入大祭司团

前73年～前70年　　　　　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

前72年或前71年　　　　　恺撒当选为军事保民官，可能参加了镇压斯巴达克斯的行动

前69年　　　　　　　　　恺撒当选为财务官，在外西班牙效力。他的姑母尤利娅和妻子科尔内利娅去世，恺撒为她们举办公开葬礼

前67年　　　　　　　　　《加比尼乌斯法》颁布。庞培获得特别指挥权，负责清剿地中海的海盗。此役虽短暂但组织极其高效，很快得胜。恺撒支持《加比尼乌斯法》。大约在这个时期，他与庞培娅结婚

前66年　　　　　　　　　《马尼利乌斯法》颁布。庞培获得特别指挥权，负责战胜米特里达梯六世。恺撒支持《马尼利乌斯法》

前65年　　　　　　　　　恺撒与毕布路斯一同担任席位市政官，毕布路斯抱怨自己被恺撒抢了风头。恺撒举办了纪念自己父亲的角斗比赛

前64年　　　　　　　　　恺撒负责主持特别法庭之一。该法庭的任务是处理加图的调查（关于苏拉的支持者拖欠公款不还）

前63年　　　　　　　　　恺撒担任法官，审理对拉比里乌斯的起诉。喀提林阴谋。恺撒当选为祭司长

前62年　　　　　　　　　恺撒担任裁判官。他支持保民官梅特卢斯·尼波斯，在后者逃亡后短暂地离职。善良女神节的丑闻迫使他与庞培娅离婚

前61年～前60年　　　　　恺撒被委派管理外西班牙。他改革了当地的行政，并指挥了极具攻击性的惩戒行动。返回罗马后，为了参选执

政官，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凯旋式

前59年　　　　　　　　　　　恺撒担任执政官。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组成前三头同盟。恺撒的同僚执政官毕布路斯及其支持者（包括加图）刻意阻挠他，造成许多混乱。恺撒强行让自己的立法通过，但在将来很可能面临起诉。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尤利娅。恺撒娶了卡尔普尔尼娅

前58年　　　　　　　　　　　恺撒接管自己的行省，在比布拉克特打败迁徙中的赫尔维蒂人。然后他打败了日耳曼人的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

前57年　　　　　　　　　　　恺撒打败比利时各部落，赢得桑布尔河战役

前55年　　　　　　　　　　　恺撒首次在莱茵河上架桥，率军远征不列颠

前54年　　　　　　　　　　　第二次且规模较大的不列颠远征。尤利娅及其婴儿去世。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去世

前54年～前53年　　　　　　　高卢人针对恺撒的第一次大规模叛乱，导致科塔和萨比努斯兵败身死。恺撒第二次在莱茵河上架桥

前53年　　　　　　　　　　　克拉苏在卡莱被苏雷纳领导下的帕提亚军队击败并杀死

前52年　　　　　　　　　　　维钦托利领导下的高卢第二次大叛乱。恺撒猛攻阿瓦利库姆，在戈高维亚战败，但围攻了阿莱西亚，迫使高卢叛军投降。克洛狄乌斯在罗马城外被谋杀。庞培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奉命率军进城恢复秩序

前51年　　　　　　　　　　　恺撒在高卢打了一些战役，以围攻乌克

斯罗杜努姆告终

前51年～前50年　　　元老院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企图结束恺撒的任期

前49年～前45年　　　恺撒越过卢比孔河，内战爆发。他迅速占领意大利。随后他在西班牙击败庞培军队

前48年　　　恺撒短暂地担任独裁官，随后第二次就任执政官。他渡海来到希腊，在狄拉奇乌姆受挫，但在法萨卢斯击败庞培。庞培逃往埃及，被谋杀。恺撒追到埃及，干预那里的权力斗争，扶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登基

前48年～前47年　　　亚历山大港战争。恺撒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私情

前47年　　　恺撒在济莱速战速决，击败博斯普鲁斯国王法尔纳基斯二世

前46年　　　恺撒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但在这一年初率军远征阿非利加。恺撒在北非的鲁斯皮纳险些被拉比埃努斯打败，但最终在塔普苏斯击败了庞培派军队。加图自杀。恺撒被任命为独裁官，任期十年

前44年　　　恺撒在按计划出征讨伐达契亚人和帕提亚人的几天前被刺杀。恺撒被神化

前44年～前42年　　　恺撒的遇刺导致新一轮内战爆发。一方是刺杀恺撒的密谋者，另一方是恺撒的支持者（领导人是马克·安东尼，后来恺撒的甥孙和养子屋大维也加入进来）

前42年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两次腓立比战役中被打败

前31年　　　　　　　　亚克兴角海战中，屋大维打败安东尼。屋大维成为罗马帝国实际上的唯一统治者

前30年　　　　　　　　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自杀

术语解释

市政官（**Aedile**）： 市政官是负责主持罗马城日常生活某些方面（包括举办某些一年一度的节日庆典）的行政长官。市政官的地位一般在财务官与裁判官之间，市政官的数量比裁判官少，并且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需的阶段。

军团旗手（**Aquilifer**）： 执掌一个罗马军团的军旗（aquila）的旗手。军旗其实是一尊银质或镀金的雄鹰塑像，安放在一根木杖顶端。

威望（**Auctoritas**）： 一位罗马元老的声望和影响力。军事成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辅助部队（**Auxilia**）： 共和国晚期征募的非罗马公民的士兵，也叫支援部队。

床弩（**Ballista**）： 一种有两根臂、利用扭力的大型弩，可以发射弩箭或石块，精度相当高。床弩尺寸不一，绝大多数用于攻城。

善良女神节（**Bona Dea**）： 一年一度纪念“善良女神”的节日，只有妇女可以参加，并在一位当选的行政长官家中举行。前62年的善良女神节在恺撒家中举行，发生了丑闻。

铁甲骑兵（**Cataphract**）： 身披重甲的骑兵，其坐骑往往也配备护甲。铁甲骑兵是帕提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夫长（**Centurion**）： 罗马军队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的一个重

要的军官级别。最初的百夫长指挥一个80人的百人队。一个罗马军团中最资深的百夫长是首席百夫长，地位极高，任期只有一年。

百人队（**centuria**）： 罗马军队最基本的小单位，由1名百夫长指挥，一般有80名士兵。

大队（**cohors**）： 罗马军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包括6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有80名士兵，一共有480人。

百人会议（**Comitia Centuriata**）： 负责选举最高级行政长官（包括执政官和裁判官）的罗马公民大会。根据人口普查中登记的财产情况，全体公民被分为193个投票的百人团。富人尽管人数少，但对选举的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百人会议的结构据说是根据早期罗马军队的组织。

部落会议（**Comitia Tributa**）： 全体罗马人民（包括贵族和平民）的一种大会。根据血统出身，将全体公民分为35个投票的部落。部落会议有立法权，由一名执政官、裁判官或席位市政官主持。部落会议还可以选举一些官职，比如财务官和席位市政官。

兄弟（**Commilito**，复数为**commilitones**）： 这是一种亲切的称呼，罗马将军在向士兵讲话时（尤其在内战时期）这样称呼他们。

平民大会（**Concilium Plebis**）： 罗马平民的会议，负责立法或者选举某些行政长官，如平民保民官。贵族不可以参加平民大会。根据血统出身，将全体平民分为35个投票的部落。会议由平民保民官主持。

执政官（**Consul**）： 每年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选举产生的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他们负责指挥重要的作战行动。在他们任期结束之后，元老院有时会授予他们一些权力，此时他们被称为资深执政官（proconsul）。

元老院议政厅（**Curia**）： 元老院议政厅位于罗马城广场的北侧，据传说是由一位国王建造的。苏拉修复了议政厅，但它后来在克洛狄乌斯的葬礼时被烧毁。恺撒担任独裁官时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元老院议政厅。但即便在议政厅状态良好时，元老院有时也会在其他地方开会，进行一些特定的辩论。

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 罗马人从政的进阶制度。苏拉担任独裁官时重新颁布和强化了关于竞选行政长官的候选人的年龄和其他资格要求的法律。

独裁官（**Dictator**）： 在危机时期，可以任命一名独裁官，任期六个月，拥有最高的军事和民政大权。后来历次内战的胜利者，如苏拉和尤利乌斯·恺撒，都用这个头衔作为获得更长期化权力的基础。

骑士（**Equites**，单数为**Eques**）： 罗马的骑士是人口普查中拥有的财产达到最高标准的群体。从格拉古兄弟时期开始，骑士获得了更为正式的政治角色，比如在法庭上担任陪审员，但这种措施非常有争议。

法西斯束棒（**Fasces**，单数为**Fascis**）： 一束装饰性的木棒，长约5英尺，中间捆着一只斧头。法西斯束棒由执法吏扛在肩头，是一位行政长官权力与地位的最明显的象征。

朱庇特祭司（**Flamen Dialis**）： 大神朱庇特的祭司，历史悠久，担任此种祭司的人受到很多严格的限制。朱庇特祭司及其夫人（Flaminica）应当始终遵守宗教仪式的规定，因此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污染。恺撒年轻时曾被选为朱庇特祭司，但可能从来没有正式上任过。

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 罗马城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位于卡比托利欧山、帕拉丁山、奎利那雷山和威利亚山之间。公共集会常在广场上的演讲台（Rostra）周围或广场东端举行。平民大会和部落会议

通常也在广场举行，进行立法工作。

短剑（**Gladius**）： 拉丁文中的剑。短剑一般指的是西班牙短剑（gladius hispaniensis），一直到3世纪，它始终是罗马标准的武器。它用优质钢制成，可以劈砍，但主要用来刺杀。

军权（**Imperium**）： 行政长官和资深行政长官在其任期内的军事指挥权。

军团长（**Legatus**，复数为**Legati**）： 一名受上级委派指挥军队的军官，他本身并没有军权。军团长由行政长官选拔，而不是选举产生。

军团（**Legio**）： 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征兵。军团是罗马军队历史上的主要组成单位。在恺撒时代，一个军团的理论兵力约为4800～5000人。但在作战中，军团有效兵力往往比这少得多。

执法吏（**Lictor**）： 一位行政长官的正式侍从，携带法西斯束棒，象征行政长官主持正义、施加极刑和肉刑的权力。执政官由12名执法吏陪同，独裁官则通常有24名执法吏。

骑兵统帅（**Magister Equitum**）： 共和国独裁官的副手。根据传统，骑兵统帅负责指挥骑兵，因为独裁官被禁止骑马。

中队（**manipulus**）： 罗马军团曾经的基本战术单位，后来被大队（cohors）取代。1个中队包括2个百人队。在恺撒时代，中队在军队的行政和日常工作，或许还有训练中，似乎仍然起到一些作用。

指名者（**Nomenclator**）： 一种受过特别训练的奴隶，他的任务是向自己的主人提示走过来的其他公民的名字，以便主人能够以亲切的方式与来者打招呼。拉选票的政治家往往会带一名指名者在自己身边。

小凯旋式（**Ovatio**）**：** 一种等级较低的凯旋式。在小凯旋式中，将军骑马，而不是乘坐战车穿过城市。

标枪（**Pilum**，复数为**pila**）**：** 在罗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重型标枪都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标准装备。标枪的枪头狭窄，用来穿透敌人的盾牌；枪杆长而细，使枪头能够打击到盾牌后的敌人。

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 十五名大祭司（pontiff）之首。大祭司是罗马贵族垄断的三种主要神职人员团体之一。大祭司负责管理许多国家节庆和事件的时间安排。祭司长更像是大祭司团（College of Pontiffs）的主席，而不是领导人，但这个职位的威望极高。

裁判官（**Praetor**）**：** 裁判官是一年一度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在元老院指导下治理重要性较低的行省，并指挥罗马的规模较小的战争。

长官（**praefectus**）**：** 一名拥有骑士身份的军官，职责范围很广，包括指挥盟军或辅助部队。

财务官（**Quaestor**）**：** 财务官是一种行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可以作为执政官级别总督的副手，常担任从属性的军事指挥官。

演讲台（**Rostra**）**：** 广场上供演讲的高台，政治家可以在此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说。

选举围场（**Saepta**）**：** 战神广场上的选举区域，不同的人民大会在此举行选举。

蝎弩（**Scorpion**）**：** 罗马军队在野战和攻城战中使用的一种较轻的大型弩。蝎弩射程较大，精度很高，能够穿透任何形式的铠甲。

旗手（**Signifer**）： 扛着百人队的军旗（signum）的旗手。

奉献**“**最高战利品**”**（**Spolia opima**）： 一位凯旋将军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在卡比托利欧山的至善至伟朱庇特神庙奉献缴获敌人的盔甲兵器。获得此项荣誉的唯一办法是与敌军统帅单挑并将其杀死。这种荣誉很少有人获得。

苏布拉（**Subura**）： 苏布拉是维米那勒山和埃斯奎里努斯山之间的谷地，以狭窄街道和贫民区而臭名昭著。恺撒在成为祭司长之前就住在这里。

龟阵（**Testudo**）： 罗马军团士兵的一种著名阵型，士兵们将自己的长盾重叠起来，保护自己的前方、两侧和头顶。这种阵型一般在攻击敌人的防御工事时使用。

司库阶层（**Tribuni aerarii**）： 人口普查中登记的低于骑士阶层的群体。对这个群体我们了解较少。

军事保民官（**Tribunus militum**）： 每个罗马军团有6名军事保民官，他们要么是选举产生的，要么是被任命的。任何时间都有其中两人执掌指挥权。

平民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lebs**）： 每年选举产生10名平民保民官，拥有政治权力而没有军事职责，可以就任何问题立法。在共和国晚期，许多有野心的将军，比如马略和庞培，都借助保民官的帮助，为自己获取重要的职位。

凯旋式（**Triumph**）： 元老院授权的大型庆祝活动，以嘉奖得胜的将领。其形式为沿着圣道（罗马城举行庆典的主要道路）游行，展示得胜将领获得的战利品和战俘，高潮是在仪式中处决被俘的敌酋。得胜将领乘坐一辆战车，穿着与朱庇特神像类似的服装，一名奴隶将象征胜

利的花冠举至头顶上方。这名奴隶应当不断小声地提醒将军，他纵然这般荣耀，也不过是凡人而已。

方旗：一种方形旗帜，挂在旗杆上，用来标示将军的位置，也是一队士兵携带的旗帜。将军的方旗通常是红色的。

参考文献

著作

Adcock，F.，*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1940）.

Astin，A.，*Cato the Censor* （1978）.

Austin，N.，& Rankov，B.，*Exploratio*：*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telligence in the Roman World* （1995）.

Badian，E.，*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1968）.

Badian，E.，*Publicans and Sinners* （1972）.

Bishop，M.，& Coulston，J.，*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1993）.

Brunt，P.，*Social Conflicts in the Roman Republic* （1971a）.

Brunt，P.，*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1971b）.

Calwell，C.，*Small Wars* （1906）.

Connolly，P.，*Greece and Rome at War* （1981）.

Cornell，T.，*The Beginnings of Rome* （1995）.

Cunliffe，B.，*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

Davies，R.，*Service in the Roman Army*（1989）.

Delbrück，H.，*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ume 1：*Warfare in Antiquity*（trans. J. Renfroe）（1975）.

Derks，T.，*Gods*，*Temples and Ritual Practices*：*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and Values in Roman Gaul*（1998）.

Dyson，S.，*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1985）.

Epstein，D.，*Personal Enmity in Roman Politics 218-43 BC*（1978）.

Erdkamp，P.，*Hunger and Sword*：*Warfare and Food Supply in Roman Republican Wars 264-30 BC*（1998）.

Evans，R.，*Gains Marius*：*A Political Biography*（1994）.

Feugère，M.（ed.），（1997），*L'Équipment Militaire et L'Armement de la République*，*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

Fuller，Major General J.，*Julius Caesar*：*Man*，*Soldier and Tyrant*（1965）.

Gabba，E.，*The Roman Republic*，*the Army and the Allies*（trans. P. Cuff）（1976）.

Gelzer，M.，*Caesar*（trans. P. Needham）（1968）.

Goldsworthy，A.，*The Roman Army at War*，*100 BC-AD 200*（1996）.

Goldsworthy，A.，*In the Name of Rome*（2003）.

Goudineau，C.，*César et la Gaule*（1995）.

Grainge，G.，*The Roman Invasions of Britain*（2005）.

Grant，M.，*Cleopatra*（1972）.

Green，M.，*Dictionary of Celtic Myth and Legend*（1992）.

Greenhalgh，P.，*Pompey*：*The Roman Alexander*（1980）.

Grimal，P.，*Love in Ancient Rome*（trans.A.Train）（1986）.

Gruen，E.，*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

Gwynn，A.，*Roman Education*：*From Cicero to Quintilian*（1926）.

Hardy，E.，*The Catilinarian Conspiracy in its Context*：*A Re-study of the Evidence*（1924）.

Harmand，J.，*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ôtre ère*（1967a）.

Harmand，J.，*Une Campagne Césarienne*：*Alésia*（1967b）.

Harris，W.，*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327-70 BC*（1979）.

Holmes，T.Rice，*Ancient Britain and the Invasions of Julius Caesar*（1907）.

Holmes，T.Rice，*Caesar's Conquest of Gaul*（1911）.

Holmes，T.Rice，*The Roman Republic*，Volume 3（1923）.

Holmes，T.Rice，*The Roman Republic*，Volume 1（1928）.

Hopkins，K.，*Conquerors and Slaves*（1978）.

Keaveney，A.，*Sulla*：*The Last Republican*（1982）.

Keaveney，A.，*Lucullus*：*A Life*（1992）.

Keppie，L.，*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1984）.

Labisch，A.，*Frumentum Commeatusque. Die Nahrungsmittelversongung der Heere Caesars*（1975）.

Le Bohec，Y.，*The Imperial Roman Army*（1994）.

Le Gall，J.，*La Bataille D'Alésia*（2000）.

Lintott，A.，*Imperium Romanum*：*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1993）.

Lintott，A.，*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

Marrou，H.，*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1956）.

Maxfield，V.，*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1981）.

Meier，C.，*Caesar*（trans.D.McLintock）（1996）.

Millar，F.，*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1998）.

Mitchell，T.，*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1979）.

Mitchell，T.，*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1991）.

Morrison，J.，& Coates，J.，*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1996）.

Mouritsen，H.，*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2001）.

Parker，H.，*The Roman Legions*（1957）.

Porch，D.，*Wars of Empire*（2000）.

Price，S.，*Rituals and Power*：*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1984）.

Rawson，B.（ed.），*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1986）.

Rawson，B.（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1991）.

Rawson，B.，*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2003）.

Rice，E.，*Cleopatra*（1999）.

Rickman，G.，*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1979）.

Rosenstein，N.，*Imperatores Victi*（1993）.

Roth，J.，*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264 BC-AD 235*（1999）.

Roymans，N.，*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ingula* 12（1990）.

Saddington，D.，*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 （1982）.

Sailer，R.，*Personal Patronage in the Early Empire* （1982）.

Seager，R.，*Pompey the Great* （2002）.

Sherwin-White，A.，*The Roman Citizenship* （1973）.

Spaul，J.，*ALA 2* （1994）.

Stockton，D.，*Cicero* （1971）.

Stockton，D.，*The Gracchi* （1979）.

Syme，R.，*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

Taylor，L.Ross，*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

Taylor，L.Ross，*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

Todd，M.，*The Northern Barbarians* （1987）.

Todd，M.，*The Early Germans* （1992）.

Todd，M.，*Roman Britain* ，3rd edn.（1999）.

Treggiari，S.，*Roman Marriage*：*lusti Coniuges from the Time of Cicero to the Time of Ulpian* （1991）.

Tyrrell，W.，*A Leg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to Cicero’s Oratio Pro Rabirio Perduellionis* （1978）.

Walbank，F.，*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ume 1（1970）.

Walker，S.，& Higgs，P.（eds.），*Cleopatra of Egypt*：*From History to Myth* （2001）.

Walker，S.，& Ashton，S.（eds.），*Cleopatra Reassessed* （2003）.

Ward，A.，*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Watson，G.，*The Roman Soldier* （1969）.

Webster，G.，*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rev.edn.（1993）.

Weinstock，S.，*Divus Julius* （1971）.

Welch K.，& Powell，A.（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Wells，C.，*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

Wells，P.，*The Barbarians Speak*：*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Empire* （1999）.

Yavetz，Z.，*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1983）.

文章

Bradley，K.（1986），‘Wet-nursing at Rome：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in B.Rawson（ed.），*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pp.201-229.

Braund，D.（1996），‘River Frontiers in the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of the Roman World’，in Kennedy，D.（ed.），*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18*，pp.43—47.

Carson，R.（1957），‘Caesar and the Monarchy’，*Greece and Rome* 4，pp.46—53.

Collins，J.（1955），‘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Historia* 4，pp.445-465.

Cuff，P.（1958），‘The Terminal Date of Caesar’s Gallic Command’，*Historia* 7，pp.445-471.

Hansen，M.（1993），‘The Battle Exhortation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Fact or Fiction’，*Historia* 42，pp.161-180.

Lintott，A.（1990），‘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0，pp.1-16.

Rankov，B.（1996），‘The Second Punic War at Sea’ in Cornell，T.，Rankov，B.，& Sabin，P.（eds.），*The Second Punic War*：*A Reappraisal*，pp.49—57.

Rawson，E.（1975），‘Caesar’s Heritage：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5，pp.148-159.

Rawson，E.（1976），‘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in Finley，M.（ed.），*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pp.85-102.

Roymans，N.（1983），‘The North Belgic Tribes in the First Century BC’ in Brandt，R.，& Slofstra，J.（eds.），*Roman and Native in the Low Countries*，*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184*，pp.43-69.

Salmon，E.（1935），‘Catiline，Crassus，and Caesar’，*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6，pp.302-316.

Salway，B.（1994），‘What’s in a Name？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 — AD 700’，*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4，pp.124-145.

Stockton，D.（1975），*‘Quis iustius induit arma’*，*Historia* 24，pp.222-259.

Syme，R.（1938），‘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8，pp.424-440.

Taylor，L.Ross（1941），‘Caesar’s Early Career’，*Classical Philology* 36，pp.113-132.

Taylor，L.Ross（1957），‘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Greece and Rome* 4，pp.10—18.

Taylor，L.Ross（1968），‘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pp.173-193.

Tchernia，A.（1983），‘Italian Wine in Gau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in Garnsey，P.，Hopkins，K.，& Whittaker，C.

（eds.），*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pp.87—104.

Treggiari，S.（1991），‘Divorce Roman Style：How Easy and Frequent was it？’in B.Rawson（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pp.131-146.

Tyrrell，W.（1972）‘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Historia* 21，pp.424-440.

Yakobson，A.（1992），‘Petitio 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82，pp.32-52.

缩写词

Ampelius，*lib. mem* =Lucius Ampelius，*Liber memorialis* .

Appian，*BC* =Appian，*Civil Wars.*

Appian，*Bell. Hisp.* =Appian，*Spanish Wars* .

Broughton，*MRR* 2=Broughton，T.，& Patterson，M.，*The 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Volume 2 （1951）.

Caesar，*BC*= Caesar，*The Civil Wars.*

Caesar，*BG* =Caesar，*The Gallic Wars.*

CAH2 IX=Crook，J.，Lintott，A.，& E. Rawson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n，Volume IX：*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146-43 BC* （1994）.

Cicero，*ad Att.* =Cicero，*Letters to Atticus.*

Cicero，*ad Fam.* =Cicero，*Letters to his friends.*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Cicero，*Letters to his Brother Quintus* .

Cicero，*Cat.* =Cicero，*Catilinarian Orations.*

Cicero，*de Sen.* =Cicero，*de Senectute* .

Cicero，*Verr.* =Cicero，*Verrine Orations.*

CIL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omp. Nic. =Fragment of Nicolaus of Damascus，*History*.

devir. Ill. =the anonymous *de virisillustribus* .

Dio=Cassius Dio，*Roman History.*

Gellius，*NA* =AulusGellius，*Attic Nights.*

ILLRP =Degrassi，A. （ed.）（1963～1965），*Inscriptiones Latinae Liberae Rei Republicae.*

ILS =Dessau，H. （1892～1916），*In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ustin=Justinus，*Epitome.*

Livy，*Pers.* =Livy，*Periochae*

Pliny the Elder，*NH*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

Pliny the Younger，*Epistulae*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Quintilian=Quintilian，*Training in Oratory.*

Sallust，*Bell. Cat.* =Sallust，*The Catilinarian War.*

Serv.=Servius.

Strabo，*Geog.* =Strabo，*Geography*.

Valerius Maximus=Valerius Maximus，*Memorable Doings and Sayings.*

Velleius Paterculus=Velleius Paterculus，*Roman History* .

译名对照表

Acco 阿科

Achillas 阿基拉斯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dvocates 辩护律师

Aediles 市政官

Aedui tribe 埃杜依部落

Aeneas 埃涅阿斯

Afghan War，First （1838～1842年）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1838～1842年）

Afranius，Lucius 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前60年执政官）

Africa 阿非利加（罗马行省）

Agammemnon 阿伽门农

Agedincum 阿格丁库姆

Aggar 阿嘎尔

Ahenobarbus，Gnaeus Domitius 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122年执政官）

Ahenobarbus，Lucius Domitius 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54年执政官）

Aisne，River 埃纳河

Alba Longa 阿尔巴朗格

Alban Hills 阿尔班山

Albanians 阿尔巴尼亚人

Alesia 阿莱西亚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ria 亚历山大港

Pharos island 法罗斯岛

Allier，River 阿列河

Allobroges 阿洛布罗基人

Ambarri tribe 安巴里部落

Ambiorix 阿姆比奥雷克斯

Amiens（Samarobriva） 亚眠（萨马罗布里瓦）

Amorica（Brittany） 阿莫利卡（布列塔尼）

Ancona 安科纳

Antioch 安条克

Antipater（Father of Herod the Great） 安提帕特（大希律王的父亲）

Antium 安提乌姆

Antonius，Gaius 盖乌斯·安东尼（前63年执政官）

Antonius，Lucius 卢基乌斯·盖乌斯·安东尼（前41年执政官）

Antonius，Marcus （Mark Antony’s father） 马克·安东尼（马克·安东尼的父亲）

Antonius，Marcus （Mark Antony’s grandfather，cos.99） 马克·安东尼（马克·安东尼的祖父，前99年执政官）

Antony，Mark 马克·安东尼（前44年执政官）

Aous，River 奥斯河

Apollo （god） 阿波罗（神）

Apollodorus of Rhodes 罗德岛的阿波罗多洛斯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

Appian 阿庇安

Appian Way 阿庇乌斯大道

Apsus，River 阿普苏斯河

Apulia 阿普利亚

Aquae Sextiae 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

Aquila，Lucius Pontius 卢基乌斯·庞提乌斯·阿奎拉

Aquileia 阿奎莱亚

Aquitania 阿基坦

Aquitanians 阿基坦人

Arabia 阿拉伯半岛

Arausio，battle of（105 BC） 阿劳西奥战役（前105年）

Ardennes 阿登山区

Arelate （Arles） 阿莱拉特（阿尔勒）

Ariminum （Rimini） 阿里米努姆（里米尼）

Ariovistus，King 阿里奥维斯图斯国王

Armenia 亚美尼亚

Armenia，Tigranes，King of 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

Alps 阿尔卑斯山脉

Arretium （Arrezo） 阿雷提乌姆（阿雷佐）

Arsinoe （sister of Cleopatra） 阿尔西诺伊四世（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妹妹）

Artemidorus 阿特米多鲁斯

Arverni tribe 阿维尔尼部落

Ascalon 亚实基伦

Asculum 阿斯库路姆

Asia 亚细亚（罗马行省）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Aswan dam 阿斯旺大坝

Ategua 阿特瓜

Athens 雅典

Athens，Assembly of 雅典公民大会

Atia （mother of Octavian） 阿提娅（屋大维的母亲）

Atrebates tribe 阿特雷巴特部落

Atrius，Quintus 昆图斯·阿特里乌斯

Atticus，Titus Pomponius 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

Atuatuca 阿图阿图卡

Atuatuci tribe 阿杜亚都契部落

Auctoritas 威望

Aude，River 奥德河

Augustus，Emperor（Caesar’s adopted son） 奥古斯都，皇帝（恺撒的养子）

Aurelia （Caesar’s mother） 奥雷利娅（恺撒的母亲）

Aurelia Orestilla 奥雷利娅·奥利斯提拉

Aurelius，Gaius 盖乌斯·奥雷利乌斯

Autronius Paetus，Publius 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派图斯（当选为前65年执政官）

Auxinum 奥克希努姆

Avaricum （Bourges） 阿瓦利库姆（布尔日）

Avienus 阿维艾努斯

Baculus，Sextus Julius 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巴库鲁斯

Balbus，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

Balearic Islands 巴利阿里群岛

Bardyaei 巴蒂埃卫队（释奴团体）

Basilus，Lucius Minucius 卢基乌斯·米努基乌斯·巴希卢斯

Belgae 比利时人

Belgium 比利时

Bellienus，Lucius Annius 卢基乌斯·安尼乌斯·贝利艾努斯

Bellovaci tribe 贝洛瓦契部落

Berenice IV（older sister of Cleopatra） 贝勒尼基四世（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姐姐）

Besancon（Vesontio） 贝桑松（韦松蒂奥）

Bestia，Lucius Calpurnius 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

Bibracte（Mont Beuvray） 比布拉克特（比弗雷山）

Bibrax（Vieux-Laon？） 比布拉克斯（老拉昂？）

Bibulus，Marcus Calpurnius 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前59年执政官）

Bigbury Wood 比格伯里树林

Bithynia 比提尼亚

Bituriges tribe 比图里吉部落

Blücher，Marshal Gebhard von 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元帅

Bocchus II of Mauretania 毛里塔尼亚国王博库斯二世

Boduognatus 博铎纳图斯

Bogudes，King 包古达

Boii tribe 波伊部落

Boulogne 布洛涅

Bourges（Avaricum） 布尔日（阿瓦利库姆）

Brindisi（Brundisium） 布林迪西（布隆迪西乌姆）

Britain 不列颠

Britons 布立吞人

Brittany（Amorica） 布列塔尼（阿莫利卡）

Brutus Albinus，Decimus Junius 迪基姆斯·尤尼乌斯·阿尔比努斯·布鲁图斯

Brutus，Marcus Junius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Bugeaud，Marshal Thomas-Robert 托马-罗贝尔·比若元帅

Burebista，King of Dacia 达契亚国王布雷比斯塔

Buthrotum 布特罗图姆

Cabillonum 卡比隆努姆

Cadiz（Gades） 加的斯

Caelius Rufus，Marcus 马尔库斯·凯利乌斯·鲁弗斯

Caepio，Quintus Servilius 昆图斯·塞维利乌斯·凯皮欧

Caesar，Julius 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Gaius 盖乌斯·恺撒

Caesarion 恺撒里昂

Calenus，Quintus Fufius 昆图斯·弗费乌斯·卡雷努斯（前47年执政官）

Caleti tribe 卡雷提部落

Calpurnia（Caesar’s wife） 卡尔普尔尼娅（恺撒的妻子）

Calvinus，Gnaeus Domitius 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前47年、前40年执政官）

Campania 坎帕尼亚

Caninius Rebilus，Gaius 盖乌斯·卡尼尼乌斯·莱比鲁斯

Cannae，battle of（216 BC） 坎尼战役（前216年）

Canterbury 坎特伯雷

Canuleius，Marcus 马尔库斯·卡努雷乌斯

Cappadocia 卡帕多细亚

Capua 卡普阿

Carbo，Gnaeus Papirius 格奈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前120年执政官）

Carbo，Gnaeus Papirius 格奈乌斯·帕皮里乌斯·卡尔波（前85年、前84年、前82年执政官）

Carnutes tribe 卡尔尼特部落

Carrhae，battle of（53 BC） 卡莱战役（前53年）

Carthage 迦太基

Casca Longus，Publius Servilius 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卡斯卡·朗古斯

Caspian Sea 里海

Cassius Longinus，Gaius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

Cassius Longinus，Lucius 卢基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前107年执政官）

Cassius Longinus，Quintus 昆图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

Cassivellaunus 卡西维拉努斯

Casticus 卡斯提库斯

Catiline，Lucius Sergius 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

Cato，Gaius 盖乌斯·加图

Cato，Marcus Porcius（“the Elder”）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老加图）

Cato，Marcus Porcius（“the Younger”）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小加图）

Catullus，Gaius Valerius 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图卢斯（诗人）

Catulus，Quintus Lutatius 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前78年执政官）

Catuvolcus 卡图沃尔库斯

Cavarinus，King of the Senones 希诺奈人国王卡瓦里努斯

Celtiberian tribe 凯尔特伊比利亚部落

Celtic/Gallic tribes 凯尔特/高卢诸部落

Cenabum（Orleans） 凯纳布姆（奥尔良）

Censors 监察官

Centuria praerogativa 优先百人团

Centuries 百人团/百人队

Centurions 百夫长

Cethegus，Gaius Cornelius 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基泰古斯

Cethegus，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基泰古斯

Cevennes，Pass of the 塞文山脉隘口

Churchill，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Cicero，Marcus Tullius（cos.63，orator）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63年执政官，演说家）

Cicero，Quintus Tullius 昆图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licia 奇里乞亚

Cimber，Lucius Tillius 卢基乌斯·提利乌斯·金博尔

Cimbri tribe 辛布里部落

Cingetorix 秦格托利克斯

Cingulum 秦古鲁姆

Cinna，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

Cinna，Gaius Helvius 盖乌斯·赫尔维乌斯·秦纳

Cinna，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前87年～前84年执政官）

Cirta，Numidia 锡尔塔（努米底亚城镇）

Claudian family 克劳狄家族

Claudius Pulcher，Gaius 盖乌斯·克劳狄·普尔喀

Claudius Caecus，Appius（cos.307，296） 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前307年、前296年执政官）

Claudius Pulcher，Appius 阿庇乌斯·克劳狄·普尔喀（前54年执政官）

Claudius Pulcher，Publius 普布利乌斯·克劳狄·普尔喀（前249年执政官）

Cleopatra VI 克利奥帕特拉六世

Cleopatra VII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Clermont 克莱蒙

Clodia（sister of Clodius） 克洛狄娅（克洛狄乌斯的妹妹）

Clodius Pulcher，Publius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

Colchis，Lesser 小科尔基斯

Collegia 行会或社团

Comitia Centuriata 百人会议

Comitia Tributa 部落会议

Commius，King of the Atrebates 阿特雷巴特人国王科密乌斯

Concilium Plebis 平民大会

Concordia（deity） 和谐女神

Condrusi tribe 康德鲁西部落

Considius，Quintus（senator） 昆图斯·孔西迪乌斯（元老）

Considius，Publius 普布利乌斯·孔西迪乌斯

Consuls 执政官

Convictolitavis 孔维克多李塔维斯

Corcyra 克基拉

Córdoba 科尔多瓦

Corfinium 科尔菲涅乌姆

Corinth 科林斯

Corinth canal 科林斯运河

Coriolanus 科利奥兰纳斯

Cornelia（mother of the Gracchi） 科尔内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

Cornelia（Caesar’s wife） 科尔内利娅（恺撒的妻子）

Cornelia（Pompey’s wife） 科尔内利娅（庞培的妻子）

Correus 科雷乌斯

Corsica 科西嘉

Cossutia 科苏提娅

Cotta，Gaius Aurelius 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前75年执政官）

Cotta，Lucius Aurelius 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前65年执政官）

Cotta，Lucius Aurunculeius 卢基乌斯·奥隆库勒乌斯·科塔

Cotta，Marcus Aurelius 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前74年执政官）

Crassus，Marcus Licinius the Younger 小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

Crassus，Marcus Licinius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前70年、前55年执政官）

Crassus，Publius Licinius 普布利乌斯·李锡尼·克拉苏

Crastinus，Gaius 盖乌斯·克拉斯提努斯

Crete 克里特

Curio，Gaius Scribonius（the Younger） 小盖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库里奥

Curio，Gaius Scribonius（the Elder） 老盖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库里奥（前76年执政官）

Curius，Quintus 昆图斯·库里乌斯

Cybele（goddess） 库柏勒（女神）

Cyprus 塞浦路斯

Cyrenaica 昔兰尼加

Cytheris（Volumnia） 西塞莉丝（沃鲁姆尼娅）

Dacia 达契亚

Dardanus，Peace of 《达耳达诺斯和约》

Deal，Kent 迪尔（肯特郡）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Dignitas （dignity） 尊严

Dio 狄奥

Diviciacus 狄维契阿库斯

Divico 狄维克

Dolabella，Gnaeus Cornelius 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前81年执政官）

Dolabella，Publius Cornelius 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前44年执政官）

Dordogne 多尔多涅

Dover，Kent 多佛（肯特郡）

Drusus，Marcus Livius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

Dumnorix 杜诺列克斯

Durazzo（Dyrrachium） 杜拉佐（狄拉奇乌姆）

Durocortorum（Reims） 杜罗科托鲁姆（兰斯）

Ebro，River 埃布罗河

Eburones tribe 厄勃隆尼斯部落

Egus 艾古斯

Egypt 埃及

Elphinstone，Major general William 威廉·埃尔芬斯通少将

Enipeus，River 埃尼培乌斯河

Entremont 昂特勒蒙

Epirus 伊庇鲁斯

Equites 骑士

Etruria 伊特鲁里亚

Eunoe，Queen 尤诺娅王后

Fabia tribe 法比亚部落

Fabii clan 费边氏族

Fabius，Gaius 盖乌斯·费边（恺撒的军团长）

Fabius，Lucius（centurion） 卢基乌斯·费边（百夫长）

Fabius Maximus，Quintus 昆图斯·费边·马克西穆斯（前45年执政官）

Fanum（Fano） 法努姆（法诺）

Bona Dea 善良女神

Festival of Liberalia 自由神节

Festival of Lupercalia 牧神节

Fimbria，Gaius Flavius 盖乌斯·弗拉维乌斯·费穆布里亚

Flaccus，Lucius Valerius 卢基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前100年执政官）

Flaccus，Lucius Valerius 卢基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前86年执政官）

Flavius，Lucius 卢基乌斯·弗拉维乌斯

Flavus，Lucius Caesetius 卢基乌斯·凯塞提乌斯·弗拉乌斯

Flora 弗洛拉

Fortuna 幸运女神

Fregellae people 弗雷格莱人

Fulvia 富尔维娅（昆图斯·库里乌斯的情妇）

Fulvia 富尔维娅（先后是克洛狄乌斯、库里奥和马克·安东尼的妻子）

Gabinius，Aulus 奥卢斯·加比尼乌斯（前58年执政官）

Gaetulians 盖图里人

Galba，King of the Suessiones 苏埃西翁人国王加尔巴

Galba，Servius Sulpicius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恺撒的军团长）

Gallia Comata 自由高卢

Ganymede 该尼墨得斯

Garonne，River 加龙河

Gaul 高卢

Geminius 格米尼乌斯

Geneva 日内瓦

Gergovia 戈高维亚

Glaucia，Gaius Servilius 盖乌斯·塞维利乌斯·格劳基亚

Gnipho，Marcus Antonius 马克·安东尼·格尼弗

Gomphi 戈姆菲

Gorgobina 高戈比纳

Gracchi 格拉古兄弟

Gracchus，Gaius Sempronius 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Gracchus，Tiberius Sempronius 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Gregory XIII，Pope 格列高利十三世，教皇

Habra 哈布拉

Hadrumentum 哈德鲁门图姆

Hannibal 汉尼拔

Harrison，Rex 雷克斯·哈里森

Hat，*apex* 阿佩克斯帽（朱庇特祭司的帽子）

Helvetii tribe 赫尔维蒂部落

Helvii tribe 赫尔维部落

Hengistbury Head 亨吉斯特伯里角

Herculaneum 赫库兰尼姆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

Hiempsal，King of Numidia 努米底亚国王希耶姆普萨尔二世

Hirtius，Aulus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前43年执政官）

Hortensius Hortalus，Quintus 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鲁斯（前69年执政官）

Hostilius，Tullus 图卢斯·霍斯提里乌斯（罗马的第三代国王）

Hyrcanus II 赫卡努斯二世（犹太大祭司）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Iberians（Black Sea people） 伊比利亚人（黑海沿岸民族）

Iggulden，Conn 康恩·伊古尔登

Iguvium 伊古维乌姆

Ilerda（Lerida） 伊莱尔达（莱里达）

Illyricum 伊利里库姆

Indutiomarus 因杜提奥马鲁斯

Isauricus，Publius Servilius Vatia 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苏利库斯（前79年执政官）

Isauricus，Publius Servilius Vatia（cos.48，41） 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苏利库斯（前48年、前41年执政官）

Iulus，Son of Aeneas 尤卢斯，埃涅阿斯之子

Iuncus，Marcus 马尔库斯·荣库斯

Iuventus（deity of youth） 尤文塔斯（青春女神）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uba，King of Numidia 朱巴一世，努米底亚国王

Judaea 犹太（罗马行省）

Jugurtha，King of Numidia 朱古达，努米底亚国王

Julia（aunt） 尤利娅（恺撒的姑姑）

Julia（daughter） 尤利娅（恺撒的女儿）

Julia（sisters） 尤利娅（恺撒的姐妹）

Julii 尤利乌斯氏族

Julius Caesar（ancestor） 尤利乌斯·恺撒（先祖）

Julius Caesar，Gaius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sar，Lucius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157年执政官）

Julius Caesar，Lucius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90年执政官）

Julius Caesar，Lucius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64年执政官）

Julius Caesar，Lucius（Lucius Caesar the Younger） 小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Julius Caesar，Sextus（cos.91） 塞克斯图斯·尤利乌斯·恺撒（前91年执政官）

Julius Caesar Strabo，Gaius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斯特拉波

Julius Caesar，Gaius（Caesar’s father）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恺撒的父亲）

Julius Caesar，Gaius（Caesar’s grandfather）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恺撒的祖父）

Junia Tertia（daughter of Servilia，sister of Brutus） 尤尼娅·特尔提娅（塞维利娅的女儿，布鲁图斯的妹妹）

Jupiter（god） 朱庇特（神）

Jupiter Optimus Maximus 至善至伟朱庇特（神）

Jura Mountains 汝拉山脉

Kabul 喀布尔

Laberius，Decimus 迪基姆斯·拉贝里乌斯

Labienus，Titus 提图斯·拉比埃努斯

Lee，General Robert E. 罗伯特·E.李将军

legates 军团长

Lentuli，the 兰图鲁斯氏族

Lentulus Marcellinus，Gnaeus Cornelius 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马尔凯利努斯（前56年执政官）

Lentulus Crus，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克鲁斯

Lentulus Spinther，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斯宾特尔（前57年执政官）

Lentulus Sura，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素拉（前71年执政官）

Lepidus，Marcus Aemilius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78年执政官）

Lepidus，Marcus Aemilius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46年、前42年执政官）

Lepidus Livianus，Mamercus Aemilius 马梅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李维阿努斯（前77年执政官）

Leptis 莱普提斯

Libo，Lucius Scribonius 卢基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利博（前34年执政官）

Licinia（wife of cato the Elder） 李锡尼娅（老加图的妻子）

Licinia（Vestal Virgin） 李锡尼娅（维斯塔贞女）

Ligarius，Quintus 昆图斯·里加卢斯

Lilybaeum 利利俾

Lingones tribe 林贡斯部落

Liscus 李斯库斯

Lissus 利苏斯

Litaviccus 李塔维库斯

Livy 李维

Loire，River 卢瓦尔河

Luca 卢卡

Lucan（Marcus Annaeus Lucanus） 卢坎（马尔库斯·安奈乌斯·卢坎努斯）

Pharsalia 《法萨利亚》

Lucceius，Lucius 卢基乌斯·卢凯依乌斯

Lucterius 卢克特里乌斯

Lucullus，Lucius Licinius 卢基乌斯·李锡尼·卢库鲁斯（前74年执政官）

Lucullus，Marcus Licinius 马尔库斯·李锡尼·卢库鲁斯（前73年执政官）

Luscius，Lucius 卢基乌斯·鲁斯吉乌斯

Lusitania 卢西塔尼亚

Lutetia（Paris） 卢泰提亚（巴黎）

Macedonia 马其顿

Macnaghton，Sir William 威廉·麦克诺顿爵士

Magistrates 行政长官

Mamurra 马穆拉

Mancinus，Gaius Hostilius 盖乌斯·霍斯提里乌斯·曼基努斯（前137年执政官）

Mandubii tribe 曼杜比伊部落

Mandubracius 曼杜布拉库斯

Manilius，Gaius 盖乌斯·马尼利乌斯

Manlii，the 曼利乌斯氏族

Manlius，Gaius 盖乌斯·曼利乌斯

Marcelli 马凯鲁斯氏族

Marcellus，Gaius Claudius 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50年执政官）

Marcellus，Gaius Claudius 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49年执政官）

Marcellus，Marcus Claudius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51年执政官）

Marcia（Caesar’s grandmother） 马尔基娅（恺撒的祖母）

Marcii Reges 马尔基乌斯·雷克斯氏族

Marcius，Ancus（fourth king of Rome） 安库斯·马尔基乌斯（罗马第四代国王）

Marius，Gaius 盖乌斯·马略（前107年、前104年～前100年、前86年执政官）

Marius，Gaius，the Younger 小盖乌斯·马略（前82年执政官）

Marseilles 马赛

Marsi tribe 马尔西部落

Marullus，Gaius Epidius 盖乌斯·厄比底乌斯·马鲁路斯

Massie，Alan 艾伦·马西

Massilia 马西利亚

Master of Horse（*Magister Equitum* ） 骑兵统帅

Maubeuge 莫伯日

Mauretanians 毛里塔尼亚人

McCollough，Colleen 考琳·麦卡洛

Mediolanum（Milan） 梅迪奥拉努姆（米兰）

Memmius，Gaius 盖乌斯·迈密乌斯

Menapii tribe 门奈比部落

Merchants（*negotiatores* ） 商人

Merula，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梅卢拉（前87年执政官）

Metelli 梅特卢斯氏族

Metellus，Lucius Caecilius 卢基乌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

Metellus Celer，Quintus Caecilius 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凯列尔（前60年执政官）

Metellus Nepos，Quintus Caecilius（cos.57） 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尼波斯（前57年执政官）

Metellus Pius，Quintus Caecilius 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前80年执政官）

Meto，Valerius 瓦列里乌斯·梅托

Metrobius 梅特罗比乌斯

Mettius，Gaius 盖乌斯·梅提乌斯

Meuse，River 默兹河

Miletus 米利都

Milo，Titus Annius 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

Mithridates VI，King of Pontus 米特里达梯六世，本都国王

Mithridates of Pergamum 帕加马的米特里达梯

Molo，Apollonius 阿波罗尼奥斯·莫罗

Mont Auxois 奥索瓦山

Morini tribe 莫里尼部落

Mount Amanus 阿玛努斯山

Mucia（Pompey’s wife） 穆齐娅（庞培的妻子）

Munda，battle of（45 BC） 蒙达战役（前45年）

Murena，Lucius Licinius 卢基乌斯·李锡尼·穆里纳（前62年执政官）

Mytilene 米蒂利尼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Narbo（Narbonne） 纳尔博（纳博讷）

Nero，Emperor 尼禄，皇帝

Nero，Tiberius Claudius 提比略·克劳狄·尼禄

Nervii tribe 内尔维部落

Nicomedes，King of Bithynia 尼科美德四世，比提尼亚国王

Nile，Rive 尼罗河

Noricum 诺里库姆

Normandy 诺曼底

Noviodunum 新堡

Novum Comum 诺乌姆·科姆

Numantia/Numantines 努曼西亚/努曼西亚人

Numidia，Kingdom 努米底亚王国

Nysa 妮萨

Octavia（Caesar’s great niece） 屋大维娅（恺撒的甥孙女）

Octavian（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Caesar’s adopted son） 屋大维（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恺撒的养子）

Octavius，Gnaeus 格奈乌斯·屋大维（前87年执政官）

Octogesa 奥克托格萨

Ofella，Quintus Lucretius 昆图斯·卢克雷提乌斯·奥菲拉

Opimius 欧皮米乌斯

Oppius，Gaius 盖乌斯·奥庇乌斯

Orange，southern France 奥朗日，法国南部

Orgetorix 奥尔吉托利科斯

Oricum 奥利库姆

Ostia 奥斯提亚

Osuna（Urso） 奥苏纳（乌尔索）

Paeleste 派赖斯特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risii tribe 巴黎西部落

Parthia 帕提亚

Pas de Calais 加来海峡省

Pas de l’Ecluse 莱克吕斯隘口

Paterculus，Velleius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

Patton，General George 乔治·巴顿将军

Paullus，Lucius Aemilius Lepidus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保卢斯（前50年执政官）

Pedius，Quintus 昆图斯·佩蒂乌斯（前43年执政官）

Pelusium 佩卢西乌姆

Pergamum 帕加马

Persians 波斯人

Petra（hill） 佩特拉山

Petreius，Marcus 马尔库斯·佩特列乌斯

Petronius，Marcus（centurion） 马尔库斯·佩特罗尼乌斯（百夫长）

Phagites，Cornelius 科尔内利乌斯·法基特斯

Pharmacussa 法玛库萨

Pharnaces，King of Bosporus 法尔纳基斯二世，博斯普鲁斯国王

Pharsalus 法萨卢斯

Piacenza（Placentia） 皮亚琴察（普拉坎提亚）

Picenum 皮基努姆

pietas （piety） 虔敬

pila 标枪

Pisaurum 皮索鲁姆

Piso（Aquitanian aristocrat） 皮索（阿基坦贵族）

Piso，Gaius Calpurnius 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前67年执政官）

Piso，Calpurnius Lucius 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前58年执政官，恺撒的岳父）

Piso，Gnaeus Calpurnius 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

Piso，Marcus Pupius（cos.61） 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前61年执政官）

Plato：*Phaedo* 柏拉图《斐多篇》

Plautius（Plotius） 普劳提乌斯（普洛提乌斯）

Pliny the Elder（Gaius Plinius Secundus） 老普林尼（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River 波河

Pollio，Gaius Asinius 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前40年执政官）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

Pompeia（Caesar’s wife） 庞培娅（恺撒的妻子）

Pompeius Strabo，Gnaeus 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波（前89年执政官，庞培的父亲）

Pompeius，Gnaeus 格奈乌斯·庞培（庞培的儿子）

Pompeius，Quintus 昆图斯·庞培（前88年执政官）

Pompeius，Sextus 塞克斯图斯·庞培（庞培的儿子）

Pompeius Trogus 庞培·特洛古斯

Pompey（Pompeius），Gnaeus，‘the Great’（*Magnus* ）“伟大的”格奈乌斯·庞培

Pomptine marshes 庞朴丁沼泽

Pomptinus 彭普提努斯

Pontifex Maximus （seniorpriest） 祭司长

Pontiffs 大祭司

Pontus 本都

Popular Assemblies（*Concilium Plebis* or *Comitia Tributa* ） 平民大会或部落会议

Porcia（daughter of Cato，married to Bibulus and then Brutus） 波尔基娅（加图的女儿，先后嫁给毕布路斯和布鲁图斯）

Poseidonius 波希多尼

Pothinus 波提纽斯

Praecia（courtesan） 普雷基娅

Praeneste 普雷尼斯特

praetors 裁判官

Procillus，Gaius Valerius 盖乌斯·瓦列里乌斯·普罗基鲁斯

Ptolemaic 托勒密王朝

Ptolemy I 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I 托勒密二世

Ptolemy IX 托勒密九世

Ptolemy X 托勒密十世

Ptolemy XI 托勒密十一世

Ptolemy XII（‘Auletes’） 托勒密十二世（“奥勒忒斯”）

Ptolemy XIII 托勒密十三世

Ptolemy XIV 托勒密十四世

Punic War，First（264-241 BC） 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年～前241）

Punic War，Second（218-201 BC） 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年～前201）

Punic War，Third（149-146 BC）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年～前146）

Puteoli 普泰奥利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脉

Pyrrhus，King of Epirus 皮洛士，伊庇鲁斯国王

Quirinus 奎里努斯

Rabirius，Gaius 盖乌斯·拉比里乌斯

Ravenna 拉文纳

Remi tribe 雷米部落

Remus 雷穆斯

res publica 共和国

Rex，Quintus Marcius 昆图斯·马尔基乌斯·雷克斯

Rhine，River 莱茵河

Rhodes 罗德岛

Rhone，River 罗讷河

Ribemont-sur-Ancre 昂克尔河畔里布蒙

Rimini（Ariminum） 里米尼（阿里米努姆）

Rocquepertuse 罗克佩尔蒂斯

Romney Marshes，Kent 罗姆尼沼泽，肯特郡

Romulus 罗慕路斯

Roscius（famous actor） 罗斯基乌斯（著名演员）

Roscius，Lucius（Caesar’s legate） 卢基乌斯·罗斯基乌斯（恺撒的军团长）

Roucillus 路基鲁斯

Rubicon，River 卢比孔河

Rufio 鲁菲奥

Rullus，Publius Servilius 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卢路斯

Ruspina 鲁斯皮纳

Sabine women 萨宾女人

Sabinus，Quintus Titurius（Caesar’s legate） 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恺撒的军团长）

St Bernard Pass，Great 大圣伯纳德山口

St Helena 圣赫勒拿岛

Sallust（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撒路斯提乌斯（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

Samarobriva（Amiens） 萨马罗布里瓦（亚眠）

Sambre，battle of the 桑布尔河之战

Santones tribe 桑托内部落

Saône，River 索恩河

Sardinia 撒丁岛

Sarsura 萨尔苏拉

Saturninus，Lucius Appuleius 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

Saylor，Steven：*Roma sub rosa* 史蒂文·塞勒《玫瑰下的罗马》

Scaeva 斯凯瓦

Scaevola，Quintus Mucius 昆图斯·穆齐乌斯·斯喀埃沃拉（前95年执政官）

Scaurus，Marcus Aemilius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斯考卢斯（前115年执政官）

Scheldt，River 斯海尔德河

Scipio Africanus，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前205、前194年执政官）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阿非利加努斯（前147年、前134年执政官）

Scipio Nasica，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前138年执政官）

Scipio Nasica，Quintus 昆图斯·西庇阿·纳西卡

Scipio Salvito（or Salutio） 西庇阿·萨尔维托（或萨路提奥）

Segre（Sicoris），River 塞格雷河（西科里斯河）

Seleucid Empire 塞琉古帝国

Semiramis 塞弥拉弥斯

Sempronia（sister of the Gracchi） 塞姆普罗尼娅（格拉古兄弟的妹妹）

Sempronia（mother of Decimus Brutus） 塞姆普罗尼娅（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母亲）

Senones tribe 希诺奈部落

Sens 桑斯

Sequani tribe 塞广尼部落

Sertorius，Quintus 昆图斯·塞多留

Servilia（Caesar’s mistress，Brutus’ mother） 塞维利娅（恺撒的情妇，布鲁图斯的母亲）

Sestius，Publius 普布利乌斯·塞思提乌斯

Seubi tribe 苏维汇部落

Severus，Quintus Varius 昆图斯·瓦里乌斯·塞维鲁

Shakespeare，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haw，George Bernard 萧伯纳

Sicily 西西里

Silanus，Decimus Junius 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前62年执政官）

Silvia，Rhea 雷娅·西尔维亚

Sisto，Jeremy 杰里米·西斯托

Sittius，Publius 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

Social War（91-88 BC） 同盟者战争（前91年～前88年）

Soisson 苏瓦松

Sosigenes 索西琴尼

Spain 西班牙

Spain，Further（Hispanis Ulterior） 外西班牙

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

Stour，River（Kent） 斯陶尔河（肯特郡）

Sucro，Spain 苏克罗

Suessiones 苏埃西翁人

Suetonius 苏埃托尼乌斯

Sugambri tribe 苏刚布里部落

Sulla，Faustus 福斯图斯·苏拉

Sulla，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前88年、前80年执政官）

Sulla，Publius Cornelius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

Sulmo 苏尔莫

Sulpicius Rufus，Publius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

Sulpicius Rufus，Sergius 塞尔吉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前51年执政官）

Switzerland 瑞士

Syria 叙利亚

Tacitus，Publius Cornelius（historian）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塔西佗（历史学家）

Tarpeian Rock 塔尔皮娅悬崖

Tarquinius 塔奎尼乌斯

Tarsus 大数

Taylor，Elizabeth 伊丽莎白·泰勒

Teanum 忒阿努姆

Tencteri tribe 滕科特利部落

“tent-companions”（*contubernales* ） 帐篷伙伴

Tertulla 特尔图拉（克拉苏的妻子）

Teutones tribe 条顿部落

Thames，River 泰晤士河

Thanet，Isle of（Kent） 萨尼特岛（肯特郡）

Thapsus，battle of（46 BC） 塔普苏斯战役（前46年）

Theophanes of Mytilene 米蒂利尼的狄奥法内斯

Thermus，Marcus Minucius 马尔库斯·米努基乌斯·泰尔姆斯

Thermus，Quintus Minucius 昆图斯·米努基乌斯·泰尔姆斯

Thessaly 色萨利

Thrace 色雷斯

Tiber，River 台伯河

Tigranes，King of Armenia 提格兰，亚美尼亚国王

Tigurini tribe 提古里尼部落

toga candidus 纯白托加袍

toga praetexta 镶边托加

toga virilis 成年托加

Tolosates tribe 托洛萨特部落

Torquatus，Lucius Manlius 卢基乌斯·曼利乌斯·托夸图斯（前65年执政官）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Trebatius Testa，Gaius 盖乌斯·特雷巴提乌斯·泰斯塔

Trebonius，Gaius（cos.45） 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前45年执政官）

Treveri tribe 特雷维里部落

tribunes 保民官

Trinovantes tribe 特里诺文特部落

Tulingi，the 图林吉部落

Tullia（daughter of Cicero） 图利娅（西塞罗的女儿）

Ubii tribe 乌比部落

Ulia 乌利亚

Urso（Osuna） 乌尔索（奥苏纳）

Usipetes tribe 乌西皮特部落

Utica 乌提卡

Uxellodunum 乌克斯罗杜努姆

Uzitta 乌齐塔

Valerius Maximus 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

Varro，Marcus Terentius 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

Vatinius，Publius（cos.47） 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前47年执政官）

Vellaunodunum 维劳诺杜努姆

Veneti tribe 维尼蒂部落

Venus（goddess） 维纳斯（女神）

Vercassivellaunus 维卡西维尔劳努斯

Vercingetorix 维钦托利

Vergobret（Aedui magistrate） 大酋长（埃杜依部落的行政长官）

Vesontio（Besancon） 韦松蒂奥（贝桑松）

Vespasian，Emperor 韦斯巴芗，皇帝

Vestal Virgins 维斯塔贞女

Vettius，Lucius 卢基乌斯·威提乌斯

Vetus，Antistius 安梯斯提乌斯·维图斯

Via Domitia 多米提乌斯大道

Vienne 维埃纳

Vieux-Laon（Bibrax？） 老拉昂（比布拉克斯？）

Virgil 维吉尔

Viromandui tribe 维洛曼杜伊部落

Voltaire 伏尔泰

Volusenus，Gaius 盖乌斯·沃卢森努斯

Walmer（Kent） 沃尔默（肯特郡）

Wantsum Channel（Kent） 瓦恩特萨姆海峡（肯特郡）

Waterloo，battle of（1815） 滑铁卢战役（1815年）

Wellington，Duke of（Arthur Wellesley）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Zela 济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恺撒：巨人的一生/（英）戈兹沃西（Goldsworthy，A.）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ISBN 978-7-5097-7522-6

Ⅰ.①恺… Ⅱ.①戈…②陆… Ⅲ.①恺撒，G.J.（前100～前44）-传记 Ⅳ.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7685号

恺撒：巨人的一生

著者/〔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张金勇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5.125 插页：0.5 字数：551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522-6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1777号

定价/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戈兹沃西是年轻一代古典学家之一，他将学术研究与精彩叙述融于一体，让古代世界跃然于纸上。在他的杰作《恺撒：巨人的一生》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伟大罗马人的不同形象：男人、政治家、军人和情人。

——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

戈兹沃西是著名的军事史学家，他在本书中对混乱的罗马共和国晚期历史的梳理是非常权威和明晰的。他帮助我们了解到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和当时的罗马社会，尤其是那位超越时代的、令人着迷的人物本身的巍峨形象。

——《星期日独立报》

一部扣人心弦的尤利乌斯·恺撒传记，记述了他跌宕起伏的精彩一生。

——《金融时报》

戈兹沃西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史学家，他对高卢战争的记述堪称典范。

——《独立报》

非常精彩……戈兹沃西先生以娴熟的技巧和卓越的叙事能力，讲述了这个故事，运用了恺撒本人的著作及其他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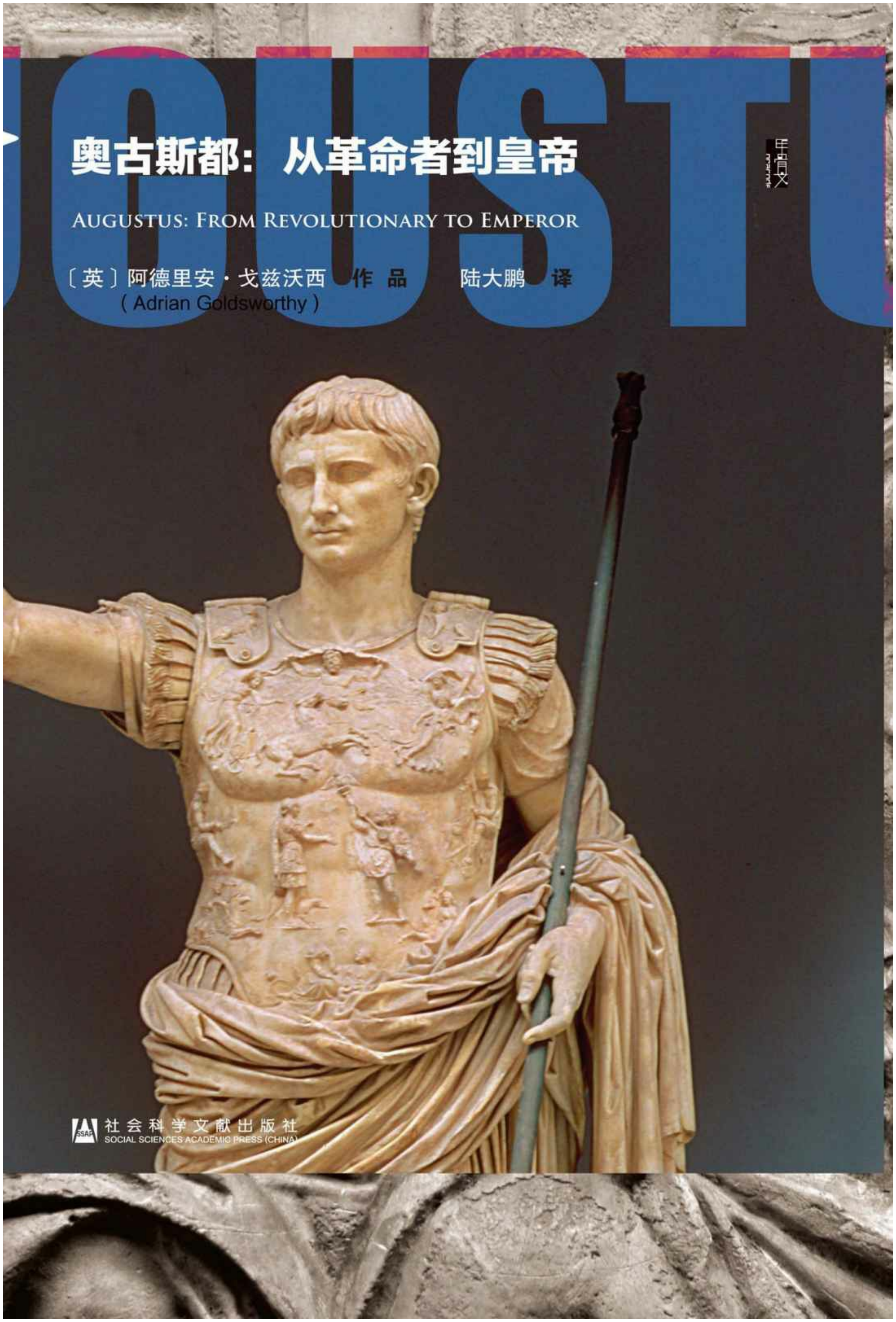
——《华尔街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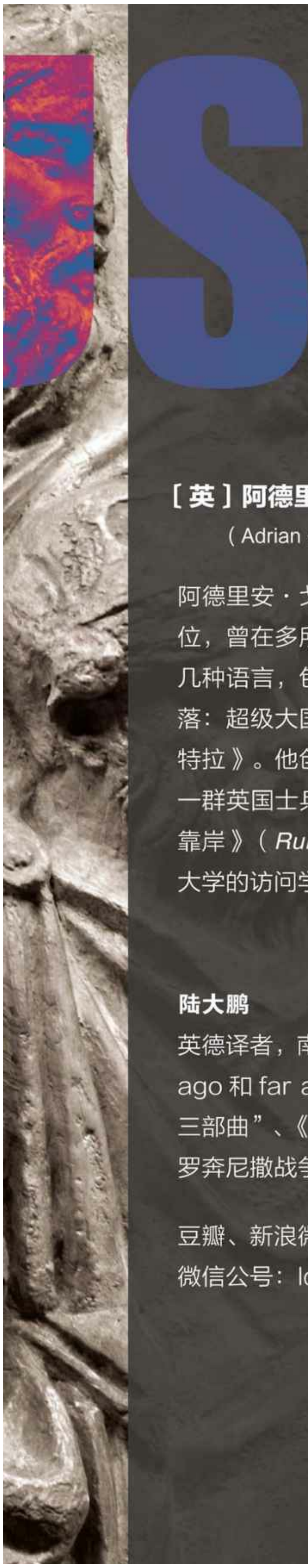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7522-6

9 787509 775226 >

定价：89.00元


AUGUSTUS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AUGUSTUS: FROM REVOLUTIONARY TO EMPEROR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作品 陆大鹏 译
（Adrian Goldsworthy）
甲骨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Adrian Goldsworthy）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在牛津大学获得古代史博士学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他著作颇丰，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恺撒：巨人的一生》《西方的没落：超级大国罗马的灭亡》和《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他创作了五部小说，讲述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群英国士兵的命运沉浮，其中最新一部是《驱敌靠岸》（*Run Them Ashore*）。他目前是纽卡斯尔大学的访问学者。

陆大鹏

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获誉

本书获得2014年美国出版商专业与学术卓越奖（PROSE）的传记与自传类荣誉奖。

令人肃然起敬……戈兹沃西先生……巧妙地运用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证据……这部传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圆满的。对某些传统的说法做了有益的纠正。

——布兰登·博伊尔，《华尔街日报》

戈兹沃西真正的专业是军事历史学，这赋予他的传记以力度和精彩：他对奥古斯都与军队关系的描述是大师级的。

——罗伯特·哈里斯，《伦敦周日时报》

戈兹沃西为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罗马皇帝写的这本精彩超群的传记非常细致，有很深厚的研究功底……戈兹沃西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才华横溢的作家……《奥古斯都》很可能成为这位真正伟大的罗马领袖的优秀传记之一……戈兹沃西提醒读者……人性是亘古不变的。奥古斯都拉拢罗马的“媒体”，就像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位政治家取悦福克斯新闻或CNN一样。我们的感觉是，奥古斯都能够很好地适应21世纪的政治，同时还能睿智地统治国家。

——盖里·安德森，《华盛顿时报》

恺撒·奥古斯都戏剧性的崛起和长期统治，是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重磅级传记《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的主题。本书扣人心弦地研究了古罗马的政治生活，它与我们的政治体制十分相似，非常有趣。但美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样能说明问题。

——尼克·罗密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戈兹沃西就像一位珠宝大师观察一块奇异冰冷的钻石一样，观察着罗马历史的核心——奥古斯都皇帝，并揭示了整个罗马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本书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文笔优雅，激发起读者对历史的热

爱。

——J.E.兰顿，著有《军人与鬼魂：古典时代战役的历史》和《怒歌：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就像戈兹沃西给尤利乌斯·恺撒写的传记一样，本书也是任何对古罗马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

——娜塔莉·海恩斯，《独立报》

对罗马最稳重也最神秘的皇帝之一所做的探索，令人着迷……这部精彩绝伦的书……令人手不释卷，可以轻松地浏览，去感受众多的人物与事件。

——詹妮弗·赛尔威，《每日邮报》

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众多著作中，奥古斯都这一人物形象有些模糊，虽然没有被忽视，但仍然很陌生。戈兹沃西的目标是把奥古斯都的生平从史海中挽救出来，刻画他的激情、残忍和意志力，正是这些东西塑造了他那常常令人忽视的个性……阿德里安·戈兹沃西这部优异的新传记把奥古斯都这位帝国建立者的故事讲得令人拍案叫绝。

——迈克尔·奥斯林，《国家评论》

戈兹沃西创作了一部文字优雅、论据充分的奥古斯都传记，坦率而毫无粉饰或隐瞒。他筛选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文献，将古代的证据与最顶尖的现代学术研究融合起来，创作出一部研究极其精细但可读性极强的罗马第一位皇帝的传记。本书探讨了领袖的本质、权力的运用和这两方面需要付出的代价。

——罗斯·玛丽·谢尔顿上校，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戈兹沃西娴熟地引导我们通过“现代学术”的湍流。他挑战了一些常被重复却从未得到质疑的说法……并且特别专业地介绍了罗马元老的权力斗争以及利用婚姻来巩固或破坏政治联盟的手段……《奥古斯都》是我们有可能读到的最值得信赖的奥古斯都传记。

——尼古拉斯·莎士比亚，《每日电讯报》

戈兹沃西（著有《恺撒：巨人的一生》等）对古罗马的理解显然已经深入骨髓，他的奥古斯都传记也是一部关于罗马及其发展的内容丰富的编年史……戈兹沃西质疑了为什么奥古斯都被许多历史学家遗忘，而没有被列入伟大领袖的名单（这个名单包括尤利乌斯·恺撒、亚

历山大、汉尼拔和哈德良）。他提供了许多理由，证明奥古斯都应当位于这个名单的最前列。

——《科克斯书评》

奥古斯都是古罗马最伟大的领袖……但有时也是个神秘的人。阿德里安·戈兹沃西的绝妙传记会改变这一切。《奥古斯都》揭示了主题人物的个性及其所处的时代，对他的缺点做了公正评判，对许多配角的描摹也非常精彩。传记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奥古斯都》是最优秀的传记，因为它激发读者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做比较，而没有把这些比较直接表现出来。本书值得被广泛阅读，并且以最好的方式彰显了普鲁塔克那句名言的真实性："除了歌颂罗马之外，历史还有什么？"

——泰德·劳伦斯，"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

历史学家和传记家戈兹沃西（著有《恺撒：巨人的一生》）在这部精彩的传记（它的许多主题在现代仍然引人深思）中展现了他对古罗马的丰富知识……强有力的叙述，关于罗马生活的许多趣味盎然的细节使本书更为丰富……戈兹沃西制造的整体效果是，读者见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整个生活距离我们现代人的体验并不远。古代的文化习俗常常让我们觉得陌生，但那些政治动机、阴谋、家庭关系和情感，在今天就像在公元纪年之初一样真实。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又写了一部大作。他的奥古斯都传记是关于奥古斯都如何取得成功的最中肯也最精妙的一本书……本书的有些部分读起来就像小说。或许，戈兹沃西在写了几本小说之后，已经懂得如何调动读者的注意力。他显然是今天最优秀的罗马历史学家。

——马丁·罗贝尔，PhDiva.com

奥古斯都去世2000周年的纪念日让我们对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和第一位皇帝重新产生了兴趣。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戈兹沃西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时间点，出版了一部新传记来讲述这个重要但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戈兹沃西客观给出了神秘而复杂的奥古斯都生平的已知事实。他娴熟地记述了奥古斯都崛起的事件，揭示了他是一位二流的军事指挥家、聪明的操纵者、自信的表演艺术家和圆熟的政治家。

——林赛·鲍威尔，UNRV网站

一部“权威性强，始终饶有趣味的新传记”。

——约翰·格雷，《新政治家》

戈兹沃西，畅销书《恺撒：巨人的一生》的作者……以动人心扉的活力，讲述了奥古斯都的军事胜利、惊心动魄的逃亡、外交成功和黑暗的家庭纠纷，把罗马帝国与东方各王国（如帕提亚）的紧张对峙描摹得活灵活现，同时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诗人，如维吉尔与贺拉斯的精彩介绍……戈兹沃西的洞见和引经据典始终非常精彩……《奥古斯都》是一部一流的通俗传记，由一位技艺娴熟的专家写成，可以与《恺撒：巨人的一生》媲美。

——史蒂夫·多纳休，《华盛顿邮报》

奥古斯都固然重要，但常常是躲在古典世界表面之后的谜。戈兹沃西的《奥古斯都》揭示了围绕在罗马第一位皇帝身边的所有戏剧与细节。本书洋溢着一种能量、学术和智慧，是一部值得细心品味的历史书。

——巴利·施特劳斯，著有《指挥大师：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和领导的天才》

这是一部能让学者感兴趣的传记，但也可以让任何对古代世界感兴趣的人轻松阅读。戈兹沃西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能力，能够让他的非常细致的历史著作吸引大众读者，这是罕见的才华。我推荐本书。

——理查德·魏格尔，《博林格林（肯塔基）每日新闻》

《奥古斯都》精彩地完结了以恺撒开始，以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结束的三部曲。这是用英语中讲述奥古斯都生涯与其诸多自相矛盾之处的最佳长篇作品。

——卡尔·格林斯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戈兹沃西的目标读者应当感激，他们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导游，为他们提供了高水平的地图、术语表和人物表，以及罗马元老在政坛攀升过程的概括……本书价值极高，可读性极强。

——S.J.V.迈洛克，诺丁汉大学

- 致谢
- 序章
- 第一部 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前63～前44年
    - 一 “祖国之父”
    - 二 “富裕且名誉良好的人”
    - 三 尤利乌斯和恺撒担任执政官
    - 四 出路
- 第二部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前44～前38年
    - 五 继承人
    - 六 赞颂
    - 七 奖赏和抛弃
    - 八 复仇和纷争
- 第三部 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前38～前27年
    - 九 神子们
    - 十 竞争对手
    - 十一 凯旋
- 第四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前27～前2年
    - 十二 恢复传统，继往开来
    - 十三 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
    - 十四 “最强大权力的头衔”
    - 十五 鹰旗
    - 十六 结尾和开端
    - 十七 家庭和同僚
    - 十八 奥古斯都的和平
- 第五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祖国之父，前2～公元14年
    - 十九 父亲
    - 二十 “哨兵岗位”
    - 二十一 为了共和国
    - 二十二 奥古斯都盛世
- 终章 “着急也要从容！”
- 附录一 元老晋升体系（荣耀之路）
- 附录二 耶稣的出生年代
- 术语解释
- 主要人物

- 谱系图
- 参考文献
- 缩写词
- 译名对照表

致谢

本书的许多想法是在漫长岁月里逐渐形成的。1988年，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我听了一门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的课程，非常精彩。授课的是我的导师Nicholas Purcell，是他最早向我介绍了Platner和Ashby的鸿篇巨制《古罗马地形学辞典》（*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1929）。在随后的年月里，Alan Bowman、Miriam Griffin、Fergus Millar、Barbara Levick、Andrew Lintott 和David Stockton等人的讲座、研讨课和课程帮助我熟悉了古典世界，尤其是奥古斯都及其所处的时代。这些学者的著作都列在本书末尾的“参考文献”部分。我还想向其他一些学者表示感谢，因为我参考了他们的著作和文章。

更具体地说，我要感谢那些帮助我写作这部传记的人们。Philip Matyszak是我在牛津大学期间结交的朋友，他关于罗马元老院内部运作的思想一直对我很有启发。他又一次从自己的写作中抽出时间，阅读了本书手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同样，Ian Hughes也阅读了本书的很大一部分，把对历史的理解与编辑的敏锐眼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意见。Kevin Powell阅读了全书，像往常一样注重细节，同时还能保持对宏观场景的把握。我的另外一位好友Dorothy King聆听了我的很多想法，总是带着极大的洞察力和机智做出评论，并为我提供了一些图片。我还要感谢母亲的校对技能，以及我的妻子，她阅读了一些章节。他们和我的其他亲友，在过去几年中不得不和奥古斯都一起生活，我非常感激他们的支持。

像往常一样，我必须感谢经纪人Georgina Capel，是她创造了机

会，让我有时间好好地写这本书，并且很感激她对本书一贯的热情。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们，英国的Alan Samson和美国的Christopher Rogers，以及他们的团队，是他们做出了这样漂亮的书。最后，由衷感谢David Breeze，是他绘制了本书中的谱系图。在M. Cooley主编的*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2003）一书图表的启发下，他不仅提出了制作不同时期多个版本家谱图表的建议，还花了很大力气帮我制作这些图表。这些图表有助于读者理解奥古斯都的亲戚和他们同时代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家庭关系。

序章

>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1]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2]
>
> ——《路加福音》，1世纪末

尽管幼年记忆已经模糊，但我一定是从这个圣诞节故事的简略段落中第一次听到奥古斯都的名字。和大多数听到或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一样，我当时应当没有多想，直到后来我越来越热爱历史，才对关于古罗马的一切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要研究罗马史，就绕不开奥古斯都及其遗产。他是罗马的第一位皇帝，他最终用蒙着面纱的君主制取代了延续近五百年的共和国，他创立的体制使得罗马帝国稳定发展了约两百五十年。在这期间，帝国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为幅员辽阔、繁荣昌盛。3世纪，罗马帝国面临着数十年的危机，在经历了宏大深刻的改革之后才生存下来。即便如此，一直到15世纪，在君士坦丁堡执政的罗马皇帝都自命为奥古斯都的权力与威望的合法继承者。

毋庸置疑，奥古斯都非常重要，同时，他的故事也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我在向学生传授关于奥古斯都的课程时，总是会停下来提醒他们，奥古斯都投身于极其凶残的罗马政治时，还不到十九岁，差不多比我的所有学生都年轻。在描述他的所作所为，他如何驾轻就熟又冷酷无情、毫无忌惮地周旋于内战（在这期间，人们的效忠关系错综复杂又瞬息万变）时，我们常常忘记，他当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是遇刺身亡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被后者立为主要继承人，并获得了“恺撒”的名字。这意味着，恺撒将他收为养子。在罗马，权力不是世袭的，但

在“恺撒”这个名字的支持下，他将死去的独裁官的亲信召集到自己麾下，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即继承养父的所有官职和地位。随后，尽管困难重重而且遭到经验远比他丰富的竞争对手的阻挠，他还是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马克·安东尼是他的最后一位竞争对手，于前30年被击败并殒命。经历数次内战的年轻而嗜血成性的军阀随后成功地将自己转型为受人爱戴的国家守护者，采用了“奥古斯都”这个带有宗教意味的名号，并最终被歌颂为“祖国之父”。他是一位海纳百川的人物，而不是制造纷争的恶徒；他执掌最高权力达四十四年之久，这对任何一位君主来说都是很长的时间；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他指定的继承人可以毋庸置疑地顺利继承皇位。

然而，尽管他的故事非常了不起，他对罗马帝国历史的影响也极其深远（这个帝国的历史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恺撒·奥古斯都却从大众的视野中渐渐远去。对大多数人来说，他只不过是圣诞节宗教仪式中或者学校上演的耶稣降生题材话剧中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很少有人会想到，7月（July）是以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名字命名的；但我怀疑更少有人会意识到，8月（August）是以奥古斯都（Augustus）命名的。尤利乌斯·恺撒闻名遐迩，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尼禄、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许还有哈德良，以及一些哲学家也很有名，但奥古斯都不是那么广为人知。原因之一是，莎士比亚从来没有以他为题材写过一部剧。或许因为奥古斯都活到了高龄，最后寿终正寝，他身上没有多少天然的悲剧性。在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中，奥古斯都以屋大维的名字出现；在《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中则被称为恺撒。但这两部剧中，他的角色都不是特别鲜明有趣，不如布鲁图斯和安东尼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甚至也比不上埃诺巴尔布斯[3]那样的小角色。在剧中，他主要是作为安东尼的陪衬，显得软弱，甚至怯懦，却能冷酷而娴熟地玩弄权术。与他相比，安东尼被塑造得有血有肉，英勇无畏，激情澎湃。古代史料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人的差异，其根源在于当时的宣传战。在现代人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中，奥古斯都与

安东尼的差别显得更加突出，例如1963年的著名史诗巨片《埃及艳后》中，罗迪·麦克道尔扮演的奥古斯都如冰山一般冷酷，并且带有一丝虐待狂的意味。[4]

电影中的奥古斯都精于算计、奸诈阴险、冷酷无情，所以观众倾向于同情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他们的死显得特别悲惨，因为这些故事说到底是以这一对鸳鸯为主角的。没有一部以奥古斯都为核心人物的戏剧、电影或小说能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在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小说《我，克劳狄》以及根据它改编的精彩的BBC版电视剧中（如今这部电视剧至少与小说一样有名），奥古斯都仅仅是一位比较重要的配角。格雷夫斯对奥古斯都的描写非常正面，他是一位淳朴、情绪化、偶尔露出凶相的老人，但被他那精于权谋而且残忍暴虐的妻子李维娅耍得团团转。这些故事扣人心弦、趣味横生，但总的来讲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奥古斯都何以如此重要，让我们很难把那个玩弄阴谋诡计的青年与常常被欺骗和愚弄的皇帝联系起来。

奥古斯都的生平远不止这些，而且更多的故事绝不是沉闷无聊的。有人认定他的成功是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要么是因为他的政治天才（这是比较老派的观点），要么是因为时势使得罗马必然出现君主制，或早或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奥古斯都的长寿让所有人吃惊，他的成功，尤其是早年的成功，也令人意外。在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赌徒，而不是小心算计的运筹帷幄者。奥古斯都冒了很多险，尤其是在内战期间，而这些风险并非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有时人们没有认识到，其实奥古斯都非常像尤利乌斯·恺撒，比如他摆脱自己造成的困境的本领。我们也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表明，他建立新政权的计划是在长时间内逐渐成熟的。事实上，这个过程包括了很多随机应变和试验，通过不断摸索尝试、吸取教训来建立新体制，偶然性起到的作用差不多和设计安排一样大。我们看到，他非常努力地去抑制自己的激情和火暴脾气，常常失败，所以他绝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权术家。真实的奥古斯都和

身怀六甲的有夫之妇李维娅有了私情。奥古斯都迫使她的丈夫与她离婚，然后在她分娩仅仅几天之后就与她结婚，并且还让她的前夫主持婚礼。我们或许觉得这更像安东尼做的事情，甚至更像尼禄（马克·安东尼与奥古斯都姐姐的外孙的外孙）[5] 的所作所为。

除了激情洋溢之外，他还颇有些残暴。奥古斯都、安东尼和他们的后三头同僚李必达都犯过大屠杀的罪行，比如在有名的“公敌宣告”期间（莎士比亚剧中的台词是“那么这些人都是应该死的；他们的名字上都做了记号了”），其他很多时候也犯过这样的罪行。这个时期的其他军阀并不比他们心慈手软，不过这也不能洗脱他们的残酷暴行。尽管后来的奥古斯都温和克制，但我们实在很难喜欢年轻的奥古斯都。现代大多数为他立传的传记家也颇感棘手，不知道如何将这个人迥然不同的两面联系起来。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他的故事分为两段。从他最初的崛起一直到亚克兴角大捷，很显然自成一体，充满了南征北战和阴谋诡计，涉及许多著名人物，如西塞罗、布鲁图斯、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然后，很多传记家会直接跳到他的晚年，讲述他选择继承人时遭遇所谓的阴谋。这两段截然不同的故事相当于莎士比亚和格雷夫斯挑选的主题。这绝非偶然。其他作家，尤其是学者，通常也将其叙述定格于前30年。对于奥古斯都的余生，则主要讨论更广泛的主题，例如“奥古斯都和元老院”“奥古斯都和各行省”，以及“奥古斯都与宗教”。[6]

尽管传记对广大读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或许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学术界对传记感兴趣的人并不多。我写了一部尤利乌斯·恺撒的传记，因为比较近期的关于他的书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要么缺乏细节，要么只讲了他生平的一部分。作家们要么关注他的政治生涯，要么描写他的戎马一生，但从来没有人两方面都写，这样的区别对待会让罗马人感到困惑。在写作恺撒传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有朝一日我要写一部同样规模的奥古斯都传记，因为还没有一部他理应享有的完整传记。关

于他生平的某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著作，一些非常优秀的简略概述，但没有一部非常详细地描写他整个生涯的书。从不同主题入手的策略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关于政府采用的政策、思想或图景的讨论会让读者眼花缭乱，看不到奥古斯都这个人。从年轻的奥古斯都一下子跳到晚年奥古斯都，很容易显得过于跳跃和缺乏连贯性，让读者无法真切地感受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和《恺撒：巨人的一生》一样，本书的目标是，将奥古斯都当作一位现代政治家来为他立传，提出我们会对现代政治家提出的相同问题（尽管史料不足，让我们很难得到圆满的答案），并努力理解真实的奥古斯都。[7]

皇帝变幻莫测的面目

但真实的奥古斯都极难准确描摹，不仅仅是因为他一生中非常仔细地重塑自己的形象。4世纪中叶，尤利安皇帝在当时的帝国体制中当了几年恺撒（副皇帝）之后，通过武力夺得了最高的奥古斯都头衔。他写了一部讽刺作品，幻想在一场宴会上，诸神欢迎已经被神化的皇帝们。奥古斯都也在那里，不过被描绘为一个奇怪的、不自然的形象，就像变色龙一样，不断变换颜色，以适应周边环境。只有在得到哲学的教诲之后，他才变成了一位优秀而睿智的统治者。[8]

奥古斯都很了解自己的公众形象，不过所有的罗马政治家都会大肆宣扬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功绩与成就，并抓住一切机会鼓吹。马克·安东尼至今仍然享有经验丰富且精明强干的军事家的美誉，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宣传得力，而不是他实际的军事经验与才干。与奥古斯都不同的是，安东尼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塑造和宣扬自己，也拥有比其他人多得多的资源。在古典世界的历史人物中，奥古斯都留存至今的肖像最多。尤其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人们甚至很难看透表象，去了解真实的奥古斯都。即便如此，我们也知道许多关于他家庭生活与习惯的故事，关于日常偶发事件的诸多轶事趣闻，甚至他讲过的笑话或者攻击他的笑话。在这些

方面，我们掌握的关于奥古斯都的材料比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材料多得多，也超过几乎任何一位罗马历史的主要人物。但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些貌似“真情流露”的时刻其实也是表演作秀的好机会，而且罗马的公共生活总是非常戏剧化的。罗马政治家是在公众视野内生活的，而奥古斯都特别希望别人觉得，他无论在私生活还是公事中都是楷模。关于他的信息很少有完全清楚明晰的。

或许我们应当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即如何称呼他，就连莎士比亚在不同剧作中都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他最初的名字为盖乌斯·屋大维。成为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之后，他用了恺撒的名字，改称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可以将“屋大维阿努斯”加在名字后面，以纪念他真实的、相当默默无闻的家庭背景，但他显然没有这么做。只有他的敌人才叫他屋大维阿努斯。随着时间流逝，他修改了自己的名字，取掉了“盖乌斯”，换成了非常偏离常规的“凯旋将军”（Imperator）。尤利乌斯·恺撒被神化之后，他又变成了“神圣尤利乌斯之子”。最后在前27年，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投票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他们肯定是精心准备了这个称号，知道这一定会让他龙颜大悦。

于是，他在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有着迥然不同的名字，而且这些名字还有不少形式和细节上的变化。现代学界的常规是，将前27年之前的他称为屋大维，此后称他为奥古斯都，而完全避免使用“恺撒”这一名字，以免和尤利乌斯·恺撒混淆。这种办法虽然清楚明了，却非常有误导性，会让人觉得在双手沾满污血的后三头同盟者和卓越的政治家与统治者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在罗马世界，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在较晚近的时期也是这样，比如“恺撒”作为统治者头衔一直延续到现代，如“kaiser”（德国皇帝）和“tsar”（俄国沙皇）都是“恺撒”这个名字的变体。马克·安东尼将年轻的奥古斯都称为“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正是因为这个少年被称为恺撒之后，才获得了一种重要性，而他以其他方式是不可能变得如此显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都

从来没有自称为屋大维。如果我们这么称呼他，而不是用“恺撒”，那么就较难理解那些年的事件。我们需要知道他在每个阶段如何自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会尽量用这种办法，并据此将本书分为若干部分。那位著名的独裁官将始终被称为“尤利乌斯·恺撒”，如果单独提到“恺撒”，那么指的就是奥古斯都。

棘手的不仅仅是他的名字。Imperator是个拉丁词，英语里的emperor（皇帝）就是从它演变来的，但在奥古斯都时期，Imperator并没有“皇帝”的意思。他自称为“元首”（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其他罗马人也是这么称呼他的。如果我们称他为皇帝，那么就等于给他的政权强加了一个不同的概念，这个概念出自我们的后见之明，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将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因此，在“序章”和“终章”之外，我不会称他为皇帝，尽管我有时会把他的后继者称为皇帝。类似地，我不会将他建立的政权称为“帝国”，因为罗马共和国也拥有海外的帝国基业，而将其称为“元首国”（principate），学者们熟悉这个术语，不过它在学术圈之外很少见。

另一个与拉丁语词源有关联的困难就是Republic（共和国），它源于拉丁文res publica，字面意思是“公共之物”或“国家”；罗马人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国家的，但它并没有今天的“共和国”的特殊体制含义。“共和国”这个词非常有用，不可能完全绕开，否则我们怎么称呼那个延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在前1世纪灭亡的政治体制呢？但我努力避免现代人的一种倾向，即将尤利乌斯·恺撒和三头同盟的对手称为“共和派”，因为这会让我们误以为这些人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而事实上，他们是许多立场和目标差别很大的不同群体。“共和派”这个词也会让很多群体显得具有合法性，而事实上他们没有，就像假如我们使用“屋大维”这个名字，就让马克·安东尼在死后赢得了一场胜利一样。不过追求准确性也是有限度的，比如我将July（7月）和August（8月）这些词用于它们被发明出来之前的时期，因为很少有读者会熟悉罗马历的Quinctilis（第

五月）和Sextilis（第六月）。

在本书中，我会努力做到独立和客观。这么说好像有点奇怪，毕竟我们探讨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冲突和争端，但历史会让人们感情用事，即便最冷静和最严肃的学者也不能免俗。尤利乌斯·恺撒常常引起阿谀奉承的赞颂和愤恨的憎恶，奥古斯都差不多也是这样。在整个19世纪及以后，他受到广泛赞颂，因为他治愈了一个破碎共和国的疾病，给了罗马人和平、稳定和繁荣，因此被认为是一位贤君。在帝王和帝国仍然主宰着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时候，这样的理解是很容易产生的。到了20世纪，世界风云变幻，旧制度消失殆尽，世人对奥古斯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罗纳尔德·赛姆爵士的《罗马革命》是这一时期关于奥古斯都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出版。这部作品的挑衅性很强，拒绝将奥古斯都的崛起视为一件好事，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正处于发展中的"族谱学"（研究贵族家族和关系的学问），将那个时代描绘为一位领袖的崛起，他的派系取代了旧的精英阶层。这一切的背后是赛姆所处时代的那些独裁者，尤其是墨索里尼，他自称"领袖"（这是刻意模仿奥古斯都的称号），并将他的支持者称为"法西斯党"。法西斯是一把斧头，被多根绑在一起的木棍围绕着，象征一位罗马行政长官[9] 的权力。今天，《罗马革命》的读者更容易联想到比之更恐怖的德国纳粹主义的崛起，或者斯大林的专制统治。[10]

现代世界对任何政治派别的独裁者都持怀疑的态度，也不是很愿意原谅奥古斯都杀人如麻式的崛起，尽管他最终实现了和平。但我们需要小心，不能对过去做简单化的描绘，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独裁者、所有的帝国或者所有的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奥古斯都杀了很多人，但他从来没有给世界带来希特勒或斯大林式的灾祸。我们应当始终根据时代背景来审视他的行为。他对自己的敌人毫不手软、大肆杀戮，但这样的他并不比当时的其他军阀更好或更坏。尤利乌斯·恺撒不像他那样冷酷，曾经宽恕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他一些人，但这些人

后来却将他刺死。奥古斯都、安东尼和李必达在公布他们要处死的敌人的名单时，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不像希特勒那样坏”肯定不算赞许，而说某人并不比他的竞争对手差，也好不了多少。但是，我们知晓一位成功领袖的缺陷，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他的对手的缺陷视而不见。赛姆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不会犯这个错误，尽管他对安东尼的评价特别慷慨大方，而在评论奥古斯都的支持者（尤其是来自门阀贵族圈子之外的大多数人）时特别严厉。他也知道，罗马精英阶层的家族关系特别复杂，亲戚关系并不一定与政治上的效忠关系相吻合，罗马人会为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考虑迅速改换阵营。虽然《罗马革命》是75年前问世的，但它是一部杰作，再加上赛姆的许多其他著作以及对其他人的影响，这部书仍然决定着对奥古斯都及其时代的讨论基调，尤其在英语世界的学术界。对奥古斯都的研究有过很多新思路，研究重点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讲，这些研究都是着眼于特定的主题或细节。然而，始终没有一部研究该时期的、拥有类似影响力的全面著作，所以我们对奥古斯都的时代（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研究它，后来又教这方面的课程）的理解，仍然受到20世纪中期这部皇皇巨著的影响。

在正式的教学中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架构上的安排，而这种安排往往会扭曲过去。关于共和国晚期的课程一般以尤利乌斯·恺撒结尾。通常认为，奥古斯都时代从亚克兴角战役开始。亚克兴角战役要么被单独处理，要么被混入对元首国的研究中，而前44～前31年的后三头同盟执政时期很少受到人们关注，这加剧了屋大维与奥古斯都之间的割裂。一种比较少见的思路是，将奥古斯都及其生涯视为共和国的延续。人们的注意力一般集中在这二者（共和国与奥古斯都体制）的明显差别。奥古斯都并不知道他正在创建的新体制会延续许多个世纪。因此这种研究思路会夸大从共和国到元首国的变化，毕竟在当时这种变化肯定没有那么显而易见。这也会鼓励现代人使用“共和国”和“共和主义”等术语，并描

绘出这样的图景：元老院的反对迫使奥古斯都将自己独裁的事实隐藏在共和国的表象之后。

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态度也会影响我们对他的继承人的理解。独裁官恺撒因为掌握了永久性的绝对权力而被谋杀。奥古斯都也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却能寿终正寝。因此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很显然，奥古斯都的行为方式一定与他的养父有着根本不同之处，尤利乌斯·恺撒赤裸裸地运用自己的权力，而奥古斯都则软化和隐藏自己的权力。这种推断使得现代学者不愿意称奥古斯都为恺撒。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很多学者追随赛姆进一步推断出，奥古斯都打败安东尼并成为国家主宰之后，就非常刻意地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尽管仍然与“神圣尤利乌斯”有着联系。

这种想法很方便趁手，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奥古斯都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命运如此不同。人们不断重复这种想法，但不幸的是，没有证据能够支撑它。首先，奥古斯都和恺撒的对比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5年和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所处的不同局势。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尤利乌斯·恺撒刚刚打赢了一场艰苦的内战，而他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在罗马停留的时间很少。不管尤利乌斯·恺撒多么精力充沛，他主宰国家的时期很短而且常常被打断，所以他能取得的成绩是有限的。而奥古斯都在打败安东尼的时候，已经作为后三头同盟者之一掌握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超过十年时间，并且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罗马和意大利，而他的两位同僚都不在罗马和意大利。从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开始讲述奥古斯都的故事，就忽略了这些漫长的岁月，在这期间，他通过武力和提拔亲信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古老的贵族世家逐渐凋零，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失败之后几乎无人敢步其后尘。有人认为，尤利乌斯·恺撒面对着一群死硬的元老院传统派的反对，未能安抚他们，所以奥古斯都一定也面对并且战胜了类似的反对派。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奥古斯都和尤利乌斯

·恺撒所处的局势实在是千差万别。很多现代学者钟爱的观点——奥古斯都受到元老院反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事实上，罗马贵族表现出的对共和国体制的忠诚还不如今天的学者。若是仔细观察一番，我们会发现，尤利乌斯·恺撒和恺撒·奥古斯都之间的差别其实没那么大。

为了讲述一个全新的关于奥古斯都的故事，我们有必要避开许多代人积累下来的学术辩论。本书不是关于那个时代的史册，而是一部传记。所以，尽管我们需要考虑更广泛的事件，但必须将注意力聚焦于奥古斯都本人。我们有必要知道，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他身处何方，如果有可能还要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意大利或各行省旅行。除了2世纪的哈德良，他的后继者当中很少有人这么做。我们还清楚地知道，他即便年迈之时也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他政治生涯的基础不仅仅是简单的改革和立法，还要关注细节和日常维护。而在对他的作为和成就的概览中，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些方面。当时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体制、社会、经济、罗马本身和更广阔的帝国的变化。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些变化产生的节奏，就能真正理解它们的重要性。

这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书，我原本也可以轻松地把篇幅翻一倍或两倍。我努力帮助读者一瞥奥古斯都对意大利和整个帝国的影响，以避免局限于观察罗马一些贵族世家的命运，但篇幅的限制使得我无法添加更多细节。本书一笔带过的许多主题，都可以写出长篇著作来。用几页纸来概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一件让人非常受挫的事情，没有机会探讨奥维德和其他一些诗人也令我遗憾。本书写作过程中让我最感愉快的事情之一，是有机会重读该时期的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是我结束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阅读。我尽了最大努力去帮助读者领略这些作品，同时保证不偏离奥古斯都这个中心人物，毕竟这是一部关于他的书。对奥古斯都及其时代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书注释部分和长长的参考文献清单，它们有助于了解关于这些主题的论述。

讲故事：奥古斯都生平的史料来源

罗马世界的大量文学作品、公文和私人信函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留存至今。在印刷机发明之前，所有文字都需要手抄，因此除了耗费人力、价格昂贵之外，也带有只增不减的讹误。很多书籍失传，就是因为没有人制作足够多的抄本。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新的世界里有能力读书写字的人变得更少，也没有充裕的财富来支持书籍抄写工作，于是更多的书籍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世纪，教会保存了一些古代文献，但很有选择性，而且教会选择保存的文献也由于火灾、事故或疏忽而损失了很大一部分。这意味着，古典世界的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在每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考虑文献资料的不完整性，以及时常出现的互相矛盾。

关于这些岁月的最完整叙述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写出来的。阿庇安在2世纪初写作，他的《内战史》一直写到塞克斯图斯·庞培于前36年战败。狄奥在3世纪初写作，他的史书涵盖了整个时期，非常详细，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部分只遗失了一点点。阿庇安和狄奥都是希腊人（不过狄奥也是一位罗马元老和高级行政长官），用希腊语写作，所以有时较难确定他们翻译成希腊语的拉丁文术语。两人写作的时候，元首国都已经稳固确立，皇帝的统治牢不可破，因此他们都倾向于将他们所处时代的立场投射到更早期的时代。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开始从政的时候，正是奥古斯都在位期间。他的简短叙述的优势在于，写作时间更接近事件本身，但他高唱提比略皇帝的赞歌，进而削弱了其叙述的可靠性。以上是我们今天掌握的最完整的史料，但并不涵盖所有方面，因此我们有时需要参考较晚近的作品，如弗罗鲁斯和奥罗修斯的作品，尤其是关于各行省和边疆的情况。有这些史料总比没有好，但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历史学家李维是奥古斯都的同时代人，他的相关著作一直写到前9年，可惜这些书卷都遗失了，只有晚近得多的一份非常简略的概述留存至今。

在前43年西塞罗被奥古斯都、安东尼和李必达下令处决之前，他的书信和演讲稿非常直接和详尽（尽管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地描述了时事。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书信集里还包括其他人写给他的信，以及这些绝望的时期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这些流言蜚语对人们行动的影响有时不亚于真相。遗憾的是，西塞罗的作品只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其他一些作品，包括这位演说家与奥古斯都的更多通信，虽然古代作家可以读到，可惜都没有保存到我们的时代。

奥古斯都的自传涵盖了一直到前25年的事件，但没有留存至今，尽管其中的一些信息被保存在他的同时代人“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撰写的简短传记中。不过我们今天能读到的《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是在奥古斯都晚年编纂的一部作品，在他死后被置于其陵墓之外，并在其他地方保存了抄本。这部作品主要列举了他的成就和荣誉，所以是一部得到他认可的关于他一生的官方记载。苏埃托尼乌斯在1世纪末和2世纪初撰写的传记更完整，也更有人情味。它显然采用了许多不同来源的史料，其中包括非常敌视奥古斯都的史料（很可能产生于前44～前30年的宣传战）。这部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特别有意思的是奥古斯都给家人（其中一些人出现在苏埃托尼乌斯为提比略和克劳狄写的传记中）的私人信件的摘选。但令人沮丧的是，苏埃托尼乌斯没有提供任何确定的日期或其他能够帮助我们确定事件时间顺序的提示。

其他一些史料提供了少量相关资料。例如普鲁塔克为布鲁图斯、西塞罗和马克·安东尼写的传记，以及他的其他作品，其创作时间与苏埃托尼乌斯和阿庇安差不多。塔西佗是普鲁塔克的同时代人，还是一位资深的罗马元老，但他的史书里没有讲到奥古斯都，只是间接传达了一些关于他的信息。老塞内卡和小塞内卡活跃于1世纪早些时候，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很久之后，5世纪初的作家马克罗比乌斯显然采纳了更早期的史料，编纂了上文提到的涉及奥古斯都的笑话集。对于所有这些作品，我们通常没有办法知道，作者是从何处得到资料的，所

以无法证实其可靠性。但最重要的地方或许是，关于奥古斯都本人的趣闻轶事如此之多，这让我们能了解到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以及他希望大家如何看待自己。[11]

铭文，无论是刻在石碑上的还是钱币上的，也能提供一些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明确信息，正如图像和雕塑能够有意识地传达信息。很多铭文的优势在于直截了当，尤其是其年代非常明确的时候，不仅能够反映当时短时间内的重要事件，也能够传达更宽泛的信息。对建筑物和其他遗址的发掘也能揭示时代风尚的变化，但由于阐释发掘出来的遗迹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我们很少能彻底地、完全地理解它们，阐释也绝少能够做到完全肯定。对于所有这些物质证据，背景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背景环境从来不会清楚明确到我们满意的程度。而且较早期的发掘工作往往不如晚近的发掘那样谨慎和精细。尤其是对于艺术品和建筑，我们很难做到客观，也难以做到不忽视也不过度解读微小的细节。罗马人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来考量图画和钱币上的铭文？但与文献资料不同的是，当下仍在开展的考古工作不断获得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新的物质证据，非常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他的世界的理解。

理解奥古斯都并不容易，对于任何类型的证据我们都要小心谨慎。我们也应当对史料的局限性保持坦诚开放的态度。有些东西，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的，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们只能猜测，但对于这些猜测的基础也必须坦率诚实。在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地方，我们绝不能假装确定。绝对真相是很难捕捉到的，或许根本不可能捕捉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尽最大努力去接近真相。关于奥古斯都，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在我们努力理解他和他的世界时，可以运用不同类型的证据。

---

[1] 这是中国大陆通用和合本圣经对恺撒·奥古斯都的译法（除特别标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Luke 2：1-3.

[3] 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中埃诺巴尔布斯的原型是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32年执政官），他曾和父亲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54年执政官）一起在庞培的领导下反对尤利乌斯·恺撒，后得到恺撒赦免。在恺撒死后的内战中，格奈乌斯先是反对后三头同盟，然后投靠安东尼。在奥古斯都与安东尼决战前夜，他又叛逃到奥古斯都那边，据说因羞耻而死。

[4] 近期的HBO迷你电视剧《罗马》（2006～2007年）把少年屋大维描绘得比较有同情心，但另一个演员接过这个角色，扮演成年屋大维之后，就显得精于算计。剧中还指出屋大维有虐待狂倾向。他与李维娅结婚时告诉她，他们做爱的时候，他会喜欢打她。

[5] 奥古斯都的姐姐是屋大维娅，她的女儿安东尼娅生了日尔曼尼库斯，日尔曼尼库斯的女儿是小阿格里皮娜，小阿格里皮娜的儿子就是尼禄皇帝。

[6] Shakespeare，Julius Caesar，4.1.1.

[7] 近期研究奥古斯都及其时代的篇幅较短的著作为：D.Shotter，*Augustus Caesar*（2nd edn，1991），W.Eck，*The Age of Augustus*（2003），K.Galinsky，*Augustus.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an Emperor*（2012），J.Richardson，*Augustan Rome 44 BC to AD 14 .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mpire*（2012）；通俗作品当中，R.Holland，*Augustus.Godfather of Europe*（2004）主要讲亚克兴角战役之前的故事，而A.Everitt，*Augustus*：*The Life of Rome's First Emperor*（2006）则讲述这个时期和后来的权力斗争。

[8] Julian，Caesars 309 B-C；简略讨论见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1996），p.373。

[9] 罗马共和国的行政长官（magistrates）经选举选出，可分成正规长官（Magistratus ordinarii）与特殊长官（Magistrarus extraordinarii）两类，执掌政治、军事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宗教权力。
正规长官按照级别从低到高包括：财务官（Quaestor）、市政官（Aedile）、裁判官（Praetor）、执政官（Consul）、监察官（Censor）等。正规长官每年由选举产生（监察官除外），任期一年。每个级别通常选出至少两位正规长官，以防一人权力过大。
特殊长官包括独裁官（Dictator）、骑兵统帅（Magister Equitum）等。
有元老身份的人可以通过所谓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字面意思为“荣耀之路”），在服完兵役后，依次参选和担任官职。不同的职位对候选人均有最低年龄的限制。官员在各职位间晋升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法律禁止连续担任同一职位。当然，这些规定并不总是得到遵守。
平民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lebs）在技术上严格地讲，不属于行政长官。

[10] 历史学家们对奥古斯都的态度，见Z.Yavetz，‘The *Res Gestae* and Augustus’ public image’，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1990），pp.1-36，尤见

pp.22-6，也见J.Edmondson（ed.）Augustus（2009），pp.14-26。

[11] 对一些主要史料的讨论，见F.Millar，*A Study of Cassius Dio* （1964），A.Wallace-Hadrill，*Suetonius* （2nd edn，1995），C.Pelling，*Plutarch and History* （2002），C.Smith & A.Powell（eds），*The Lost Memoirs of Augus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tobiography* （2009），R.Syme，Tacitus（2 Vols，1958），及R.Mellor，*Tacitus* （1993）。

第一部 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前63～前44年

他年幼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绰号“图里努斯”，要么是为了纪念他的祖先的来源地，要么是因为在他出生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屋大维在图里镇压逃亡奴隶，赢得了一场胜利……马克·安东尼在信中常称他为图里努斯，以此辱骂他。他的回答仅仅是，这不过是他的旧名而已；他很吃惊，安东尼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让他生气。

——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7.1

一 “祖国之父”

他出生的那一天，元老院正在商讨喀提林阴谋的问题。屋大维迟到了，因为他的妻子在分娩。正如后来人们常说的，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1]得知屋大维迟到的原因和孩子出生的时间后，宣称世界的主宰降生了。[2]

——苏埃托尼乌斯，2世纪初

前63年，罗马是已知世界的最大城市。它的人口至少有75万，到前1世纪末便会增加到100万。大多数人生活在肮脏、拥挤的街区或公寓楼（insulae，字面意思是“岛屿”）内，这些房屋很容易发生火灾，疾病在这里肆虐。这么多人聚居在一个地方，每天必然有许多婴儿出生，也有很多人死亡。因此，一名叫作阿提娅的妇女于9月23日黎明前分娩并不算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她为丈夫生下了一个儿子。

阿提娅比大多数母亲都幸运，因为她是贵族，她的丈夫盖乌斯·屋大维是一位元老，有足够的财富为她提供最优质的护理，并且在帕拉丁山东侧山麓拥有一座舒适的宅邸。她快临盆的时候，得到了女性亲属、家中女奴和女释奴[3]，以及一位有经验的产婆的照料。根据风俗习惯，男性不可以进入被选作产房的房间，只有在发生难产的时候才会传唤一位男性医生，不过如果真的发生难产，医生其实也做不了多少。阿提娅是有经验的母亲，她在几年前给丈夫生了一个女儿。

但丰富的经验、舒适的条件和优质的护理都不能保证阿提娅的生命安全。分娩对母子都很危险，在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当中有一些是死胎，还有一些将来会夭折。有不少母亲也会丧命。九年后，阿提娅的表妹尤利娅[4]因难产而死，她的孩子几天后也死去了，尽管她的丈夫[5]是当时罗马最富财力和权势的大人物。生儿育女的岁月或许是女人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

阿提娅的分娩很顺利，母子平安。产婆将男婴放在地上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畸形的迹象或其他问题。随后孩子被送到父亲面前。根据罗马的传统，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对全家人拥有生杀大权，尽管到这个时期已经很少有人如此严格地行使这样的权威。即便如此，也应当由盖乌斯·屋大维决定是否接纳新生儿进入自己的家庭。他很快接纳了男婴，将他展示给聚集起来和他一起等待的亲友，以及那些得知孩子降生之后立刻登门道喜的亲友。盖乌斯·屋大维已经有两个女儿了，长女是他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女儿也很有价值，因为联姻能够帮助他赢得和维持政治盟友。但只有儿子能够从政，获得与父亲相提并论的地位，甚至超过父亲的成就，从而给家族增添荣耀。

家中祭坛点起了火，人们向家庭保护神拉瑞斯和灶神皮纳特斯，以及其他受到特别尊崇的神祇献祭。客人离去之后，会执行相同的仪式。访客中肯定有阿提娅的三十七岁舅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元老，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前不久，他赢得了一场竞争特别激烈的选举，当选为罗马最高级和最有威望的神职人员——祭司长[6]。这个职位主要是政治上的，而且尤利乌斯·恺撒似乎并不特别虔诚信教。即便如此，和其他罗马人一样，他还是高度重视传统的宗教仪式。罗马贵族终其一生都被宗教仪式所环绕，孩子的平安降生对一个元老阶层的家庭及其亲属来说，总是一件喜事。[7]

除此之外，外界没有理由对此非常关注，因为盖乌斯·屋大维作为元老的地位很低。许多年后，在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成为奥古斯都之后，才开始流传一些关于他出生时的征兆，甚至公开预测他未来的丰功伟绩。苏埃托尼乌斯讲了一长串这方面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些根本就是荒诞无稽的。其中一个荒唐故事说，有人预言罗马的国王将要诞生，于是元老院颁布法令，将在指定时段出生的男孩全部处死。但有一些元老的妻子正在怀孕，于是他们以程序的技术角度阻止

了法令通过。共和国的立法工作根本就不是这样运作的，而且如果真的有如此严酷和有争议的措施，西塞罗只字未提就很奇怪了。这根本就是一个捏造的传奇。还有的荒唐故事肯定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和其他英雄的神话中汲取了灵感。伟人的父亲不可能是凡人，于是有人传说阿提娅在阿波罗神庙参加一次夜间仪式时在轿子上睡着了。一条蛇出现，从她身上游过，在她大腿上留下了一条蛇皮一样的印迹。她醒了，感到自己需要按照仪式要求清洁自己，就像她刚刚做过爱一样，因为只有身体洁净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祇的圣所。她没有办法洗去皮肤上的印迹，于是不再去公共浴室洗澡。九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8]

盖乌斯·屋大维不需要这种神秘体验也会感到开心。在罗马文化里，生日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中都会庆祝生日。根据罗马的阴历，一年有十个月，9月（September）是其中第七个，因为在古时一年是从3月（战神玛尔斯的月份）开始的，罗马军队一般从这个月开始出征作战。对罗马人来说，9月23日是10月“月首日”的九天前。罗马人的历法规则是，一个月有三个节日，分别是第一天（月首日）、第七天和第十三或第十五天（月中日）。月首日本身算一天，9月23日也算一天，所以它是10月“月首日”的九天前。

根据罗马人的计算，这一年是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之后的第690年。更贴近生活的算法是，这一年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和盖乌斯·安东尼[9]担任执政官的年度。两位执政官是罗马最高级的行政长官，平起平坐，任期一年。共和国体制刻意阻止任何一个人获得最高权力或永久性权力，所以任何人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之后都必须等待十年才能再次参选。每一年以当年掌权的两名执政官的名字命名，选举时票数第一的执政官的名字排在前面。执政官大多来自一小群豪门望族，如安东尼家族。西塞罗很不寻常，因为他是他们家族历史上第一个在罗马从政的人，而且几十年来不曾有一位“新人”[10]攀升到执政官的高度。盖乌斯·屋大维也是一位新人，他肯定希望能够复制西塞罗的成功。[11]

两名执政官的权力平等，但每个月里其中一人享有优先权力，两人轮流。因此9月23日这一天，在元老院主持会议的是西塞罗。据苏埃托尼乌斯所说，盖乌斯·屋大维因为儿子出世而迟到了，这为另一个关于“世界主宰”诞生的传说提供了背景，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谨慎。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是捏造的，尽管盖乌斯·屋大维参加元老院会议迟到并非不可能。当天会议上元老们讨论了关于他们的一员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阴谋起事的传言，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关于革命的流言口口相传，其中很多认为喀提林为幕后指使，因为他在这年夏季的选举中未能当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如果元老院真的讨论了这些事务，而目前又未采取任何行动，说明要过一段时间，此事才会发展到一个重大关头。[12]

与此同时，生活照常继续。9月30日夜间，盖乌斯·屋大维和阿提娅在家中整晚守夜。他们举行了仪式，高潮是献祭和次日（10月的月首日，即他们儿子出生后的第九天）举行的净化仪式。净化的目的是保护婴儿免受出生时可能进入其身躯的恶灵或其他超自然影响的侵害。婴儿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护身符，它通常是黄金制成的。护身符被系在脖子上，直到他正式成年。随后，由一名观鸟占卜师[13]观察飞鸟行迹，以预测孩子的未来。盖乌斯·屋大维和阿提娅可能被告知，征兆很吉利。[14]

直到这时，男婴才被正式命名，并根据程序注册到公民名单中。他与父亲同名，因此被称为盖乌斯之子盖乌斯·屋大维。许多家族的一代代男性成员往往使用同一个名字，不过在这些年里一些最有权势的贵族世家开始打破这种传统，使得他们与元老阶层的其他人拉开了更大的距离。氏族[15]名（第二个名字），此处是屋大维，当然是自动延续的，只有第一个名字（个人名）才可以选择。大多数显要的男子拥有完整的三个名字，所以阿提娅的舅舅叫作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尤利乌斯氏族枝繁叶茂，第三个名字（家族名）说明他属于这个氏族的恺撒分支。

三名制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即便是许多贵族家庭也没有第三个名字，有的是因为他们人丁不是很兴旺，有的则是因为他们自信名满天下，能被大家轻易识别。屋大维氏族目前还没有必要区分自己的若干支系。

罗马人不认为有必要准确地识别女性，因为她们不能投票，也不能参加竞选。阿提娅只有一个名字，即她父亲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的氏族名“阿提乌斯”的阴性形式。最重要的是她父亲的身份，以及与他家族的关系。罗马女性一生都只有这一个名字，结婚之后也不会改名。阿提娅的女儿叫屋大维娅，她的继女（即其丈夫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女儿）也叫屋大维娅。如果他们又生了其他女儿，一定还叫屋大维娅。有时候罗马家庭会给女儿们的名字加上序号，以便用于正式场合。[16]

婴儿需要大量的照顾料理，但阿提娅在这方面主要发挥了较远距离的监督作用。她忙于管理整个家庭，并扶持丈夫的政治生涯。有人主张母亲应当用母乳喂养孩子，但实际上这是很少见的，一般是让一名奴隶乳母来喂养孩子。这名乳母或另外一名奴隶将担任孩子的保姆。（有些哲学家主张母亲应当亲自哺乳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如果让奴隶来哺乳，孩子会从奶水中吸取到一些奴隶的品质。）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有多少，无疑由父母个人决定。有的父母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不过也有例外。我们知道，在前2世纪，老加图（他以拥有严峻、老派的美德并对其大肆宣扬而闻名）在自己的男婴洗澡时总会亲临现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公务。老加图的妻子是坚持母乳喂养孩子的妇女之一，有时甚至给家中奴隶的孩子喂奶。[17]

我们掌握的史料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屋大维的幼年时代，不过苏埃托尼乌斯的一个预示他将成为伟人的故事的戏剧性并不是很强，或许还具备一定的真实性。在这个故事里，屋大维已经能爬了。他被保姆放在最底层的一个房间睡觉，却在当晚失踪了，于是家人匆匆四处搜寻他。次日早上，人们发现他在最顶层的房间观察升起的太阳。[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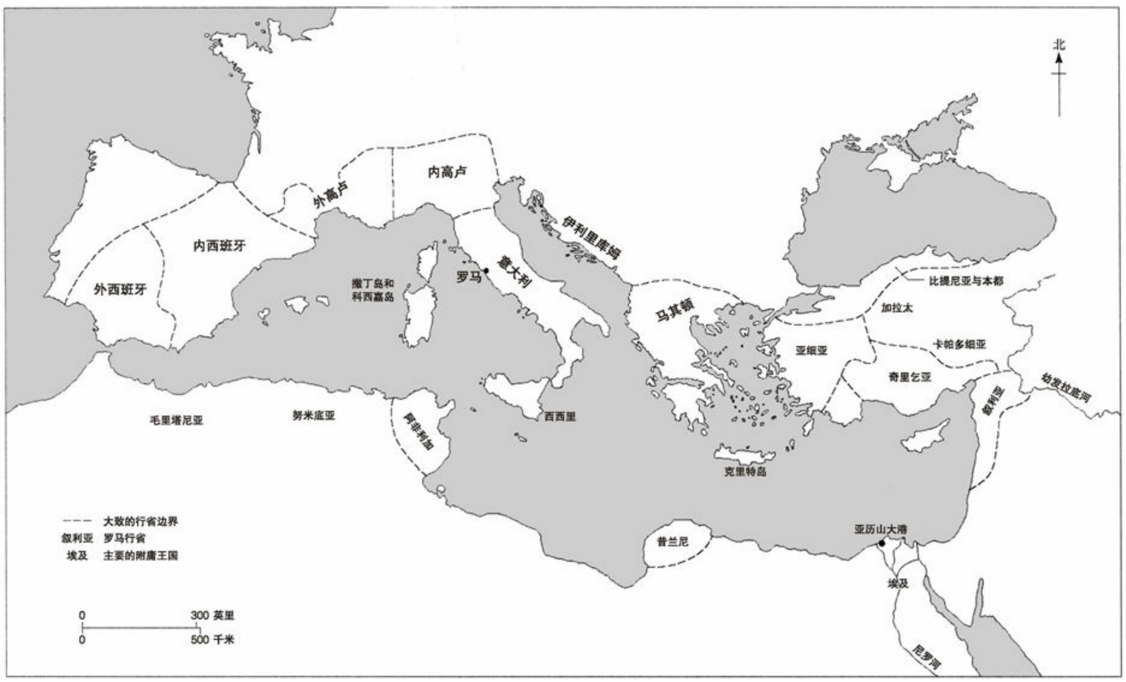
饱受困扰的世界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也是后来发生的。在前63年最后几个月，罗马的气氛非常紧张，孩子的父母遭遇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事情。罗马共和国自前2世纪中叶以来就主宰着地中海世界。迦太基已经灭亡，东方诸王国要么被罗马征服，要么羸弱不堪而依赖罗马的善意，因此不构成任何威胁。小亚细亚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与罗马对抗数十年之久，此刻已经被罗马最成功和最受民众爱戴的将领“伟大的庞培”彻底击败了。米特里达梯六世一生中长期服用解毒药，对毒药形成了免疫。这一年，他企图服毒自杀，但就是死不了，于是让一名卫兵将他杀死。庞培的军队支持犹太王族内战中的一派，围困耶路撒冷三个月，于10月将其攻克。似乎无人能抵挡罗马共和国的军事威力。[19]

罗马的实力远远超过所有邻国和潜在敌人，但征服和海外帝国带来的巨大收益动摇了罗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微妙平衡。贵族之间争夺崇高官职和地位的竞争历来非常激烈，但在过去受制于严格的传统和法律。如今，这个体制的很多支柱受到了威胁，因为元老们为了笼络人心不惜一掷千金；社会中也涌现了很多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困境感到绝望，因此不管是谁，只要能捍卫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拥护他。现在有些人得到了机会，攀升到过去无法想象的高峰，却引起了其他人的怨恨和抵制。

前133年，一位叫作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贵族当选为十位平民保民官之一。他提出了一项旨在扶助农村贫民的立法。他赢得了相当多的赞许，但被指控企图自立为王，于是被一群元老（领头的就是他的表兄）活活打死。前122年，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企图发动一场甚至更为激进的改革，最终连同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一起被杀害。这一次的厮杀显然是早有预谋的，双方都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政治竞争变得凶残起来，这样的景象在前100年又重演了。十年后，提议为所有与罗马

结盟的意大利人授予公民权的保民官[20]被谋杀，意大利各民族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起兵反抗罗马。在激烈斗争之后，罗马人打赢了这场战争[21]。他们之所以能够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终于勉强同意赋予意大利各社区想要的东西。于是，罗马公民的数量大大增加，政客们可以去培植更多的选民，这又一次改变了政治平衡。



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

没过多久，一位平民保民官引发的争端[22]愈演愈烈，导致前8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事件：一位罗马将军率领军队攻打罗马城。他的名字是苏拉，他与一位上了年纪、广受人民爱戴的英雄马略之间的竞争是此次冲突的根源。随后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暴行肆虐，并越来越猖獗和残酷，直到苏拉打赢了内战，自立为独裁官。独裁官原本是很少见的临时性紧急措施，他却将它变成了独占永久性权力的地位。几年后他辞官退隐，几个月后寿终正寝。共和国面临新的内战威胁，前78年的执政官之一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23]招兵买马，企图攫取政权。李必达被击败，他本人及其党羽都被处死，但苏拉的很多对手在西班牙坚

持作战，继续打了很多年。

前63年，内战的阴云仍然笼罩着共和国。每一位元老都曾经历苏拉和马略两派间的血腥厮杀，大多数元老在这期间都失去过近亲或朋友。尤利乌斯·恺撒的姑姑嫁给了马略，而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一任妻子是马略最亲密盟友之一[24]的女儿，或许仅仅是由于恺撒年轻，才躲过了得胜的苏拉党人的屠刀。即便如此，有一段时间，他也被迫逃亡，遭到追捕，直到他母亲在苏拉派那边的关系救了他的命。被苏拉处死的人的后裔被禁止从政，他们努力四处游说，希望恢复自己的权利。苏拉已经去世了，但所有的资深元老都是由他挑选，或者至少是经他默许的人选。新的内战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给罗马人带来混乱、危险和机遇。苏拉的许多支持者通过掠夺死去的敌人发了大财。而在当前体制下受挫的人则希望在一场新的革命中得到晋身的机会。

喀提林是苏拉党人之一，但他新近获得的财富还不足以维持其浮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野心，正是由于这种野心，他在向潜在支持者馈赠礼物时非常慷慨大方。苏拉将元老数量翻了一倍，并将裁判官（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行政长官）增加到八人，但每年仍然只有两名执政官，所以对最高荣誉的争夺变得愈发激烈了。前70年，数十名元老因为严重腐败和昏庸无能被剥夺元老资格。这次清洗发生得十分突然，在历史上也算相当罕见。这些人再次加入谋求官职的竞争中，其中有几个人拥有足够的金钱和野心，希望能够再次当选、恢复政治地位。

在政坛阶梯上攀登，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要想成为一名元老，首先要满足资格要求，即拥有足够数量的地产。为了在竞选中占据优势，政客们大肆举债，贷款金额越来越高。喀提林因此债台高筑，尤利乌斯·恺撒也是如此。竞选祭司长的职位时，尤利乌斯·恺撒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年纪较长、威望较高的政治家，双方都向参选的部落送去了大量贿金。尤利乌斯·恺撒知道，如果自己失败，就没有希望偿清债务。但他

狂赌了一把，寄希望于这次选举胜利能让债主相信，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将来会继续攀升并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盟友，最终还清债款。选举这一天早上，尤利乌斯·恺撒在离家之前告诉他的母亲，他要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来，要么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最后他当选了，他的债主目前还愿意继续支持他。[25]

喀提林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他也是贵族，他的家族属于罗马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在罗马，平民（如盖乌斯·屋大维和他的儿子）的数量远远多于贵族，几百年来很多平民跻身于精英阶层。好几个贵族家族的光辉已经黯淡，逐渐衰败，变得默默无闻。近几个世纪以来，喀提林和尤利乌斯·恺撒的祖先在选举中都没有取得多少成功。他们都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而且这两人都极富魅力和才华，并都拥有风流浪子的名声，这至少能让公众记得他们，哪怕仅仅是作为流言蜚语的主题。尤利乌斯·恺撒节节胜利，喀提林的政治前途却开始受阻。[26]

喀提林由于在担任阿非利加行省[27]总督期间的不端行为遭到了起诉，未能参加前65年和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在下一次竞选中，他越来越狂野不羁的言论疏远了太多有影响力的人，于是他被西塞罗组织的精彩攻势击败了。对血统古老的贵族来说，被一个“新人”打败是特别耻辱的事情。喀提林将西塞罗称为罗马的“常住外国人”。另外一位胜利者是盖乌斯·安东尼，他在前70年被逐出元老院，现在卷土重来，杀回政坛。尽管他在选举中曾与喀提林互相支持，但西塞罗承诺在安东尼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之后给他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位，于是将安东尼争取到中立的战线上。其实根据抽签，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位原本属于西塞罗，他主动把它让给了安东尼。马其顿是个富庶的地区，一位无所顾忌的总督可以轻松地搜刮到巨额金钱，恢复自己的财富。[28]

但喀提林又参加了前63年7月的选举（由执政官西塞罗主持）。这

一次参选各方都有严重的贿选行为，而且得到一大群打手的支持，所以西塞罗带着自己的追随者到达会场，并在托加袍下穿着胸甲，他“偶然”露出了胸甲，以显示自己的决心。这一次选举虽然有威吓，但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喀提林第二次被击败。[29]

喀提林以及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人陷入了绝望。如果一位元老为了还债卖掉自己的土地，那么很可能会赔一笔钱，因为市场很萧条；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卖了土地，就失去了获得元老身份的资格，再也没有政治前途。对某些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在政治上破产，要么掀起一场革命。在伊特鲁里亚[30]乡村，喀提林的追随者曼利乌斯（曾是苏拉军中的一名百夫长）从穷困和绝望的人中召集一支成分复杂的军队。苏拉的一些老兵在退伍时得到了土地，但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萧条或者他们自己的错误，不能维持生活，于是和曾经的马略党人，以及其他一些觉得只有革命才能挽救自己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将会高举马略的某个军团曾经使用（不是在内战中，而是马略在潮水般蛮族的攻击下挽救了意大利的伟大战争中使用）的一尊鹰旗，成群结队地开进。但形势还不明朗，人们不知道喀提林是否会发动公开叛乱，或者在何时发动。[31]

10月21日，元老院发布了终极议决，要求两位执政官采纳一切必需的措施保卫共和国。事实上这等于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但人们对这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可以中止法律效力产生了分歧。前122年，元老院曾用终极议决来镇压盖乌斯·格拉古，后来在前100年、前88年和前78年也用过这种手段。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其实是承认在遇到严重的内部动乱时，共和国的传统机制不足以解决问题。

喀提林还待在罗马，并继续参加元老院会议，即便在曼利乌斯于10月底公开叛乱之后也是如此。西塞罗对喀提林的公开谴责越来越凶猛，但密谋者暗杀西塞罗的企图失败了。最后，11月8日夜间，喀提林逃走，与曼利乌斯会合。他留在罗马城的盟友非常无能，他们笨拙地去接

触阿洛布罗基人（高卢的一个部落）的使者，希望能为叛军获得一支骑兵部队。这些高卢人却报告了罗马当局，密谋者被当场擒获。

四名参与密谋的元老被逮捕，其中最资深的是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现任裁判官，也是前70年被剥夺元老资格的人之一。他的妻子叫尤利娅，是尤利乌斯·恺撒的远房亲戚，她在此之前已经当过一次寡妇[32]。兰图鲁斯和另外三人被带到元老院受审，自称清白无辜，但能够证明他们有罪的证据越来越多，于是他们的决心瓦解，各自认罪。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如何处置他们。12月5日，在和谐女神庙举行的一次会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选择和谐女神庙为开会地点无疑是为了呼吁大家团结，但或许也是为了提醒人们政府在过去曾采取过的强硬措施，因为建造和谐女神庙的人就是镇压盖乌斯·格拉古的领导人[33]。

在随后的辩论中，许多发言者主张处决犯人。盖乌斯·屋大维作为元老的资历非常浅，大家不会征询他的意见，但尤利乌斯·恺撒已经当选下一年的裁判官，而且还是祭司长，所以西塞罗很快询问他的意见。有人说阿提娅的这位高调浮夸的舅舅参与了喀提林阴谋，但尤利乌斯·恺撒没有附和其他人的意见以证明自己对共和国的忠诚，而是大胆地反对处死犯人。他正确地指出，不经审判就处决犯人是违反宪法的，不过他自己的建议——将每一名犯人送往意大利的不同城镇羁押——也完全缺乏先例。罗马人没有那种长期羁押犯人的监狱，更不要说终身监禁了。

大家的共识开始动摇，一时间，似乎雄心勃勃的尤利乌斯·恺撒将要单枪匹马地改变元老院的意见，从而威名远播了。但这时，另一个前程远大的人——下届保民官小加图[34]——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演说，敦促立刻处死犯人。其他人附和了这一信念，严肃质疑了监禁犯人的做法是否务实可行。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多数人赞同处决犯人。我们不知道

盖乌斯·屋大维投了什么票，但他很可能随波逐流，而不是站在尤利乌斯·恺撒那边。元老院中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之一赞扬西塞罗为“祖国之父”。[35]

兰图鲁斯的裁判官职位已被褫夺，但享受了特殊待遇：由执政官西塞罗亲自押他上刑场。四名犯人被处决。随后，西塞罗简洁地宣布：“他们已经死了。”这句话在拉丁语里只有一个词，vixerunt。有传闻说，密谋者企图在罗马搞大屠杀和纵火以便制造混乱，现在公众看到危险解除，都松了一口气。共和国逃脱了最直接的威胁，尽管喀提林及其军队仍然逍遥法外。人们很难预测，他们为了保卫共和国而愿意暂时中止法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罗马仍然主宰着世界，但它的政治仍然竞争激烈、险象环生，暴力冲突和政局动荡的威胁始终没有远去。不过，虽然风险很大，但成功的奖赏也很大。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盖乌斯·屋大维决心在政坛努力奋斗。[36]

---

[1] 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菲古鲁斯（约前98～前45年），罗马共和国晚期大学者，前58年裁判官。在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的内战中，他支持后者。尤利乌斯·恺撒胜利后，尼基迪乌斯的好友西塞罗帮助他向恺撒说情，但尼基迪乌斯没有来得及获得赦免，便在流亡中死去了。

[2] Suetonius，*Augustus* 94.5.

[3] 在古罗马，被主人授予自由的奴隶可以成为公民，享有全部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原主人则成为他的恩主和保护者。释奴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能担任公职，不能担任国家祭司，不能成为元老。但后来释奴也能成为高官。释奴在获得自由后生的孩子生来自由，享有全部公民权。一些释奴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甚至成为巨富。

[4] 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儿。

[5] 庞培。

[6] 在此简单介绍一下古罗马的神职人员。古罗马没有专门的教会阶层和团体，普通公民可以扮演神职人员的角色，比如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可以在家中作为祭司主持宗教仪式。神职人员的身份往往被授予贵族和豪门世家成员，是一项很大的荣誉，但也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神职人员往往要自掏腰包来主持祭祀等宗教活动。
最重要的神职人员团体有四个：1.大祭司团（College of Pontiffs），包括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其他大祭司（Pontiff）、15名祭司（Flamen，分别侍奉一位神）、维斯塔贞女（Vestal Virgins）、祭典之王（Rex Sacrorum）；2.观鸟占卜师（augur）；3.十五人团（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主要负责保管《西卜林书》；4.司膳（Epulones），负责安排节庆活动和公共宴席等。

[7] 关于时间，见Suetonius，*Augustus* 5.1；关于局势的概述和生育的概况，见B.Rawson，*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passim，尤见pp.99-113，S.Dixon，*The Roman Mother* （1988），pp.106-8，237-40。另见论文集B.Rawson（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关于尤利乌斯·恺撒和他当选祭司长，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24-6，关于他没有宗教上的顾虑，见Suetonius，*Caesar* 59；关于奥古斯都出生时间的星相学问题和他后来采纳摩羯为自己的符号，见T.Barton，'Augustus and Capricorn：Astrological polyvalency and imperialrhetoric'，*JRS* 85（1995），pp.33-51。

[8] 关于一系列征兆，见Suetonius，*Augustus* 94.1-12，尤见94.3-4；Dio 45.1.2-3重述了关于蛇的故事，可能是直接以苏埃托尼乌斯为资料来源，或一种常见资料。

[9] 后来尤利乌斯·恺撒麾下大将和后三头同盟者之一马克·安东尼的叔叔。

[10] 成为自己家族史上首位元老或执政官的人被称为"新人"（novus homo）。

[11] 对执政官和其他高级行政长官的详细讨论，见A.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pp.94-120，尤见104-9。

[12] Suetonius，*Augustus* 94.5说著名的宗教专家和神秘学家普布利乌斯·尼基迪乌斯·菲古鲁斯做了这个预测。其他故事说是西塞罗和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可能同样是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可信。关于喀提林辩论的时间顺序，见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336-9，尤见337。

[13] 古罗马人的一个习俗是通过观察鸟类的飞行（是单飞还是成群、飞行方向、发出何种声音、何种鸟类等）来预言占卜。

[14] 见B.Rawson，*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pp.105-12。

[15] 氏族是许多血缘相近的家族组成的集团。

[16] 关于罗马人姓名，见B.Salway，'What's in a name？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AD 700'，*JRS* 84（1994），pp.124-45，尤见124-31。关于奥古斯都的名字和在这个时期的活动，详见R.Syme，'Imperator Caesar：A study in imperial nomenclature'，*Historia* 7（1958），pp.172-88 = *Roman Papers* Vol.1（1979），pp.181-96。

[17] Plutarch，*Cato the Elder* 20.3.对本话题的详细讨论，见K.Bradley，'Wet-nursing at

Rome.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in Rawson（1986），pp.201-29。

[18] Suetonius，*Augustus* 94.6.

[19] 关于米特里达梯六世，见P.Matyszak，*Mithridates the Great.Rome’s Indomitable Enemy*（2004），及A.Mayor，*The Poison King*（2010）。

[20]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他的改革令人回想起格拉古兄弟当年的改革，这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德鲁苏斯的父亲曾是盖乌斯·格拉古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德鲁苏斯和格拉古兄弟一样，也来自影响力极大的名门望族，所以他在立法时胆子比较大，但也使人们害怕他会过于野心勃勃。德鲁苏斯的改革，尤其是扩大公民群体的计划，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就在公民大会就扩大公民群体的立法投票之前，德鲁苏斯在自己家的门廊上向访客问候时，被人用皮匠的刀子刺死。凶手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楚。

[21] 所谓“同盟者战争”（前91～前88年）。

[22] 一位叫作苏尔皮基乌斯的保民官在公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指挥权从苏拉手中夺走，交给了马略。

[23] 是后三头同盟者之一李必达的父亲，父子同名。

[24]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他的女儿科尔内利娅是恺撒的第一任妻子。

[25] 对他母亲的话，见Suetonius，*Caesar* 13，也见Plutarch，*Caesar* 7，Dio 37.1-3，Velleius Paterculus 2.43.3；概况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p.124-7=（2007），pp.150-4。

[26] 恺撒的祖先，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p.31-4=（2007），pp.37-41；喀提林，见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1971），pp.73-8，96-8，100-07。

[27]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年）中，罗马彻底消灭了迦太基，在其领土上建立阿非利加行省，范围约在今日的突尼斯北部、阿尔及利亚东北部和利比亚西部地中海沿岸地区。这是罗马帝国西部最富庶的一个行省。今日非洲大陆的名称即是从该省的名称而来。

[28] T.Mitchell，*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1979），pp.149-76，222-5，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1971），pp.79-84.

[29] 可参见Sallust，*Bell.Cat* .26-7，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1971），pp.105-6，T.Mitchell，*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1979），pp.226-32，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Vol.1（1928），pp.259-72；‘residentalien’（*inquilinus civis urbis Romanam*）见Sallust，*Bell.Cat* .31.9；相关也可见Cicero’s *Pro Murena*，这是西塞罗为其中一位成功候选人辩护的演讲稿，此人被指控行贿。

[30] 伊特鲁里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拉齐奥和翁布里亚。前9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在这一地区兴起，出现许多城邦。前650年前后达到极盛，影响力超过意大利半岛上的各民族。罗马早期受到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极大影响，前509年之前有多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统治罗马。但伊特鲁里亚最终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完全被罗马同化。

[31] 关于鹰，见Sallust，*Bell.Cat* .59.3。

[32] 这个尤利娅在之前的一段婚姻中生的儿子就是马克·安东尼，当时只有十岁左右。

[33] 前121年执政官卢基乌斯·欧皮米乌斯，他镇压了企图发动改革的盖乌斯·格拉古，以“元老院终极议决”为借口，处死了格拉古的三千名支持者。从一开始，盖乌斯及其反对派就比十年前的提比略·格拉古更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地使用恐吓与威胁的手段。一次斗殴导致执政官欧皮米乌斯的一名仆役丧生，于是局势到了一个紧急关头。元老院通过了一道法令——学者们称其为“元老院终极议决”，即最后通牒法令，这个术语源自恺撒曾使用的说法，但在当时并没有这个名字——呼吁执政官以任何必需的手段保卫共和国。正常的法律被暂时搁置，斗争双方的党徒都拿起了武器。欧皮米乌斯在自己的武装力量之外，还调来了一群克里特雇佣兵弓箭手，这些雇佣兵之前在罗马城外等候，说明欧皮米乌斯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预谋的。盖乌斯及其支持者的人数不敌对方，他们占据了阿文廷山上的狄安娜神庙。但执政官拒绝与其谈判，率军杀入了神庙。格拉古在厮杀中丧生。欧皮米乌斯之前许诺，谁将格拉古的首级送来，就赏赐与首级同等重量的黄金。果然，格拉古的首级被送到了他面前。欧皮米乌斯后来因此受到起诉，但被无罪开释。最终他因受贿而被流放，死在国外。

[34] 老加图的曾孙，全名为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

[35] Cicero，*In Pisonem* 6.

[36] 喀提林阴谋，见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110-42，T.Mitchell，*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 （1979），pp.219-40；恺撒在此案中起到的作用，见M.Gelzer，*Caesar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1968），pp.50-52，C.Meier，*Caesar* （1996），pp.170-72及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15-42 =（2007），pp.144-72。

二 “富裕且名誉良好的人”

> 他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虽然不是贵族出身，却来自一个非常显赫的骑士家族，是个尊贵、正直、清白和非常富裕的人。[1]
>
>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约公元30年

我们对阿提娅的丈夫盖乌斯·屋大维了解不多。据史料记载，他相当富裕，不过史料并没有具体谈及与其他元老相比，他究竟有多么富裕。他在帕拉丁山被称为“牛头”的地区拥有一座宅邸，在诺拉（那不勒斯以东约20英里的一座城镇，苏拉将其转变为殖民地[2]，以安置他的老兵）还有另外一座宅子。他们家在伏尔西城镇韦莱特里及其周边地区（在罗马城外的阿尔班山以南）还拥有面积相当大的地产。伏尔西人曾经是罗马人的顽敌，在前4世纪被罗马征服和同化。[3]

盖乌斯·屋大维的财富是继承来的，对罗马人来说，这是最好的财富来源。屋大维氏族是韦莱特里当地的士绅，城镇里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就是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据说，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屋大维匆匆结束了向战神玛尔斯的献祭，以便率领城镇的武士打退邻近一个社区的攻击。那肯定发生在韦莱特里被罗马征服以前，人们用这个故事来解释当地向玛尔斯献祭风俗的特点。在较晚近的前205年（对这个时期已经有了较好的史料记载），盖乌斯·屋大维的祖父在对抗汉尼拔的战争中担任罗马军队的军事保民官。战争结束后，他没有寻求政治前途，说明他和很多人一样，在共和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时毅然参军，保家卫国。[4]

他的儿子，也就是盖乌斯·屋大维的父亲，在其漫长一生中满足于地区性政治，只在韦莱特里担任过官职。他们家原本就很富有，他通过精明的投资和银行业（放债收息，这种挣钱方式远远没有经营土地那么体面）积攒了更多财富。多年后，马克·安东尼嘲讽他是一个肮脏的兑换钱币者，其他人则声称盖乌斯·屋大维追随了父亲的行当，以便在罗

马选举时向各部落发放礼物和赤裸裸地行贿。在罗马政坛，人身攻击是家常便饭，所以对上述说法，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就连讲了很多关于奥古斯都的污秽故事的苏埃托尼乌斯，对这个说法也表示怀疑。[5]

盖乌斯·屋大维是一位地区性贵族和成功商人的儿子，不仅是罗马公民，还是骑士阶层的成员。骑士是罗马人口普查中地位最高的阶层。骑士身份的资格要求是，拥有价值超过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6]的财产。不过到前1世纪，这个数字也不算特别高了，骑士的财产往往超过这个标准。在早先的世纪里，罗马军队的成员是那些足够富裕、能自备武器甲胄的人。最富有的人买得起马匹，因此能够在骑兵部队中服役。虽然骑士的军事职能已经消失（罗马军团的士兵已经改为从最贫穷的公民中招募，由国家为其提供装备），但骑士的名头保存了下来。元老身份的取得不是根据财产多寡，而是在一个人当选为行政长官或被选拔到元老院之后获得。所有的元老都必须属于骑士阶层。一共有大约600名元老，骑士有数千人，而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罗马公民的数量约为90万。[7]

这些年里最富有的元老可能是伟大的庞培，他在东方的军事胜利中赢得的财富使他更加富裕。他在元老院的强有力竞争对手是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庞培曾在前70年与他一同担任执政官。克拉苏有时被称为“富人”。庞培和克拉苏都曾在苏拉麾下效力。苏拉的政敌被处决后，其财产被没收，庞培和克拉苏从中捞了不少油水。克拉苏也是一位精明而活跃的生意人。他拥有一大批奴隶工匠和建筑工，以及一些受过训练的消防员。罗马经常发生火灾，克拉苏的把戏之一就是以低廉价格收购即将受到大火威胁的房屋，然后派他的奴隶去拆除房屋以制造隔离带，从而灭火。过一段时间之后，克拉苏会在买下的地皮上重新建房然后出租。最终，罗马城的相当大一部分地产都到了他的名下。他的财产总值一度高达2亿塞斯特尔提乌斯，这足以让500人获得骑士身份。他曾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自费组建军队，就算不上富人。庞培在之前的内战

中就自掏腰包组建过3个军团，并为其提供军费。[8]

盖乌斯·屋大维不大可能和克拉苏或庞培属于一个层次，但他应当知道克拉苏是如何运用自己的金钱的。克拉苏敛财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利用他的财富达到政治目的，向很多元老提供无息贷款（或利息非常低）。据传言，元老院中的大部分人都欠克拉苏的钱。克拉苏被指控参与喀提林阴谋，但欠他钱的元老们害怕他突然要求还债，于是这事很快不了了之。他对五花八门的生意都感兴趣，与外省的包税人集团联系密切。包税人就是詹姆斯一世钦定本圣经中所谓的“税吏”，他们执行共和国所需的任务，如在各行省征税。这样的生意大多是在幕后操纵的，因为法律禁止元老参与这种生意，不过很多元老还是参与其中。克拉苏或许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除了金钱之外，他还拿人情做买卖。他是一位精明强干和成功的辩护律师，非常勤奋地代理其他人打官司，以便卖人情给他们。[9]

盖乌斯·屋大维有一个当银行家的父亲，肯定有一些显贵人士欠他的钱，或者因为之前的贷款而对他感恩戴德。所以，他很有可能继续做家族生意，因为这对他的仕途很有帮助。与很多元老不同的是，他的绝大部分财富没有被套牢在地产上，所以能随时拿出现金为自己赢得政治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财富，他才娶到了阿提娅作为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安卡里娅，我们不知道这段婚姻是如何结束的，是因为她去世了，还是因为他看到有机会获得更有利的姻亲而和她离婚。对罗马精英阶层来说，婚姻是重要的政治工具。[10]

尤利乌斯·恺撒自己也曾与一个富裕骑士的女儿订婚。[11] 后来他让自己的一个姐姐嫁给了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此人也是一名地区性贵族，其家庭背景与屋大维氏族很类似。阿提乌斯来自阿里奇亚（在阿尔班山，距罗马城较近），相当富有，他母亲那边与庞培有亲戚关系。他的父亲显然与元老世家的千金结了婚，这有助于阿提乌斯在罗

马的仕途。尤利乌斯·恺撒的另一个姐姐先后嫁给了两名这样的小士绅，他们都有着政治上的雄心，希望到罗马城从政。借助于这些联姻网络，尤利乌斯·恺撒得到了一些忠诚的盟友，他们非常乐意与这样一位血统古老的豪门贵族拉上关系，这很可能也为尤利乌斯·恺撒提供了金钱上的帮助，促进他的事业。[12]

前62年，盖乌斯·屋大维可能四十岁出头，感到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参加下一年八名裁判官的竞选了。在罗马，从政与年龄是紧密联系的，苏拉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曾以法律条文正式规定每一个官职的最低年龄要求。（关于从政或晋升体系，见附录一。）参选裁判官的人必须至少三十九岁。对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说，在规定下的最低年龄当选某职位（尤其是当上执政官）会被视为政治上很大的成就，非常值得骄傲。西塞罗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他的运气特别好，而且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我们没听说过盖乌斯·屋大维当过辩护律师，他的才华可能不在这个方面。[13]

他曾两次担任军事保民官，大约在前70年代的某个时间，所以至少在政治生涯开始的时候，他曾努力去赢得军事声誉，这一般能够吸引选民的支持。每年有24名军事保民官当选，这是旧时制度的遗存，因为在过去罗马军队只有4个军团，每个军团由6名军事保民官指挥。到前1世纪的时候，通常同时存在几十个军团，所以大多数军事保民官是由行省总督挑选和任命的。我们不知道盖乌斯·屋大维曾在何地服兵役，但他既然当过两次军事保民官，每次都要至少服役一年，说明他对这个岗位还是很有热情的。在共和国更早期的历史上，任何寻求从政的人都必须服至少十年兵役。到前1世纪，这个规矩已经松懈了很多，不过即便是毫无军人气概的西塞罗也在军中待过一段时间。为行省总督担任“帐篷伙伴”的年轻人其实就是下级参谋军官，跟随总督以积累经验。[14]

随后，盖乌斯·屋大维当选为罗马最低级的行政长官，即财务官，

这是从政的第一个正式步骤。自苏拉改革以来，当选为财务官的人自动获得元老身份。每年有20名财务官，前73年的财务官之一是盖乌斯·托拉尼乌斯，后来盖乌斯·屋大维与他交好，所以盖乌斯·屋大维很可能也是在前73年担任财务官的。财务官的主要职责在财务方面。有的在罗马工作，有的被派去辅佐行省总督，监管行省的财务。我们不知道盖乌斯·屋大维被分配到了什么样的任务。托拉尼乌斯则率军镇压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遭到惨败。[15]

前64年（不过这个时间也部分是猜测，虽然可能性比较大），盖乌斯·屋大维和托拉尼乌斯都担任平民市政官。每年有四名市政官，其中两人是平民市政官，两人是席位市政官。只有平民可以担任平民市政官，而平民和贵族均可担任席位市政官。市政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从组织公共节日（尤其是纪念丰收女神的刻瑞斯节和平民节庆活动），到管理罗马城内的交通和公共工程，不一而足。当市政官是吸引选民注意力的极好机会，尤其是在市政官自掏腰包来补充国家拨付的资金的情况下。节庆活动包括游行、宴饮和公共娱乐活动，如斗兽。在罗马历史的这个阶段，只有在葬礼时才能举办角斗士竞技。每年的市政官职位很少，所以它不是晋升体系中的必经级别。对托拉尼乌斯来说，当市政官有利于恢复他被奴隶起义军打败之后受损的地位。对盖乌斯·屋大维来说，这是赢得更多政治盟友并在选民面前露脸的机会。[16]

他的仕途没有阿提娅的舅舅那么顺利。自共和国早期以来，尤利乌斯·恺撒的家族已经远远偏离政治核心，但在他幼年时，家族的运气开始好转。家族的另外一支开始重新崛起，至少让人们再一次熟悉了恺撒这个姓氏。尤利乌斯·恺撒父亲的姐姐嫁给了深得民心的英雄马略。在如此显赫的姻亲的帮助下，尤利乌斯·恺撒的父亲轻松获得了裁判官职位，可惜后来猝死（一天早上，他在穿鞋时骤然倒下去世了），否则还能攀升更高。

尤利乌斯·恺撒本人在不到二十岁时就凭借英勇壮举获得了罗马最高荣誉——橡叶冠[17]。根据传统，这项荣誉只授予在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挽救另一位公民的勇士。或许就是由于这项功绩，或许还有一些贵族的支持，他得到了特别的许可，得以比正常的最低年龄早两年担任行政长官。尤利乌斯·恺撒在法庭上非常活跃，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高调浮夸，执行公务时恪尽职守，自己借钱来弥补国家资金的不足。他也是一位经历丰富多彩的英雄，曾与海盗和入侵的敌军交手，并且因为与许多有夫之妇私通而成为流言蜚语的主角。当时和其他很多时代一样，对政治家来说，臭名也比默默无闻要好得多。即便如此，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治生涯总的来讲还是很传统的。[18]

盖乌斯·屋大维的仕途晋升比较慢，也没有恺撒那么精彩，但也算是稳步提升。竞选官职的人会正式穿上一种特别的白色托加袍（toga candidata，意思是“纯白的托加袍”，英语中“候选人”candidate一词就是这么来的）。在竞选拉票时吸引大家的眼球是非常重要的。罗马没有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政党，竞选也并非是不同政策的竞争。选民非常坦然直率地根据候选人的品格和过去的行为来选择，而不是看重候选人表达的观点。如果候选人的品行不是很显眼，罗马人民就倾向于选择名门世家的成员，因为罗马人相信，美德和才干是可以遗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因此，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和祖父曾经建功立业（或至少没有丢人现眼），那么他也一定有类似的才华。家族先辈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网和人情恩泽对他也会有很大帮助。显贵家族紧抓一切机会去宣扬家族成员的功业。宅邸门廊会陈列象征家族往昔成就的纪念物。走进大门的人第一眼就会看到这家人祖先的半身雕像，它们展示着先辈曾经担任的官职的象征物。[19]

屋大维氏族不是很知名。即便如此，盖乌斯·屋大维的朋友、对他抱有良好祝愿的人和求他办事的人也得每天早上来向他请安。所有元老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每天的开端是那些欠他们钱或者人情的人、希望

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的人，以及与他们有联系或者希望与他们拉上关系的人，都会来向他们正式请安。黎明之前的几个小时里，也就是一天工作开始之时，竞选官职的候选人家里理应如此繁忙，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前64年，昆图斯·西塞罗写了一本关于竞选拉票的小册子，送给他哥哥，作为竞选执政官的建议。马尔库斯·西塞罗其实基本不需要这些建议，但这样的小册子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小册子里写道，不少选民会拜访多位候选人，多处押注。昆图斯建议，候选人在有客登门时要表现出喜出望外的样子，以恭维对方，使其成为自己的真诚支持者。[20]

对候选人来说，政治盟友自然是多多益善，拉票就是结交新朋友的机会。如昆图斯·西塞罗所说："……在竞选期间，你能与任何人结交而不失体面。在人生的其他阶段，交朋友就没有这么轻松了。在其他时间，你若是努力与人们缔结友谊，会被人觉得是刻意逢迎谄媚。但在拉票的时候，如果你不竭尽全力去结交很多这样的人，人们就会觉得你是个糟糕的候选人。"[21]

竞选对选民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卖个人情给候选人，支持他，让他对自己感恩戴德。表达自己对某位候选人的支持有非常显而易见的办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伴随他在广场[22]行走。对候选人来说，在公共场合陪伴自己的人越多越好，越显赫越好，以便让世人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友谊。罗马选民倾向于支持一个看上去就非常成功的人，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有希望获胜的一方，候选人的"粉丝团"会越来越壮大。

一位候选人在前呼后拥之下穿过城市中心时，他会遇到一些行人，所以会希望别人看到他和尽可能多的显赫人物为伍。候选人身旁会有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称为"指名者"。当有人走近时，指名者会向候选人小声提示来人的姓名，好让候选人以恰当的方式问候他们。若是过于明显地依赖这种辅助手段，会显得很粗俗，但小加图特立独行地公开表示自己不需要指名者的帮助，还企图禁止其他候选人使用指名者。在

外界压力之下，他放弃了这种企图，指名者仍然是一位政客的核心幕僚人员。[23]

有些重大事业，候选人若是支持它们，就能得到社会某些群体的好感。尤利乌斯·恺撒追随格拉古兄弟和其他改革家的脚步，始终赞同将国有土地分配给城市贫民和退伍军人的法案。他还在法庭和元老院积极捍卫行省居民的权益。罗马城的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元老院颁布终极议决之后，行政长官的行动是否仍然受到约束。前63年，尤利乌斯·恺撒参与了一场作秀审判，有人被指控在前100年（也就是三十七年前）的动乱期间处死犯人。这整个审判是为了表达政治立场，遵循的是非常古旧的程序，最后没有做出任何裁决就结束了。恺撒在此案中的目的不是为了否认杀死反叛共和国的公民的必要性，而是提出了质疑：这样的人在投降之后已经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是否仍然可以剥夺其接受正式审判的权利。在关于喀提林党徒的辩论中，大家争执的是同样的问题。这一年还没结束，西塞罗就因为处决喀提林党徒而遭到了攻击。[24]

盖乌斯·屋大维不大可能深入介入这些非常有争议的事情。前62年初的几个月里，喀提林的军队仍然逍遥法外，共和国受到一场长期内战的威胁。后来，喀提林的支持者逐渐作鸟兽散，这场叛乱没有成气候。没过多久，喀提林叛军被一支名义上由盖乌斯·安东尼统领、实际上由他一名经验更丰富的部下指挥的政府军包围了。叛军寡不敌众，注定要灭亡。即便如此，喀提林和数千名死硬分子仍然顽抗到底，宁愿战死也不愿意投降之后被处决。[25]

在前62年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公众最关注的事情可能是，伟大的庞培即将结束他在东方的军事行动，返回罗马。米特里达梯六世已经死亡，战争结束了，庞培忙了几个月以重组各行省和该地区的诸盟邦，随后率领他的军队踏上了归途。没有人说得准，他们回国之后会干什么。

有人担心，庞培会变成第二个苏拉。更多人不愿意看到一个拥有极大财富和威望的人继续主宰国家。庞培已经打破了罗马政界几乎所有的规则，他在内战期间征集了一支私人军队，后来又拒绝将其解散，于是元老们决定授予他合法权力，让他去镇压叛军，以防止他自己反叛共和国。前70年1月1日，他就任执政官并同时成为元老，此时仅三十六岁。在此之前，他不曾担任过任何选举产生的官职。内战期间，他热衷处死显赫的贵族，因而获得了“年轻的屠夫”的绰号。在更近期，有人控诉他偷走了其他人的荣耀，在别人指挥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时去摘桃子。[26]

像克拉苏和加图这样迥然不同的元老都对庞培的成功感到怨恨。但在绝大多数人眼里，庞培是罗马最伟大的英雄。尤利乌斯·恺撒非常积极地支持有利于庞培的提案，同时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前62年初，他与一位平民保民官结交，此人建议将庞培召回，以镇压喀提林叛军。此项提议受到了强烈反对，于是这名保民官逃走了，尤利乌斯·恺撒在一个短时期内被免去了裁判官职务，直到他公开承认错误。盖乌斯·屋大维极有可能远远避开了这些波折，同时确保自己发表合适的意见，以便和他的听众保持一致。[27]

聪明的候选人会竭尽全力去讨好尽可能多的人。他和他的朋友需要招待和歌颂许多个人与群体，如骑士阶层、包税人、较贫困的阶层、城内各种行会社团的成员，以及各种公民大会中的投票团体。最重要的是，候选人应当表现得慷慨大方和乐于助人，尤其是要帮助自己的支持者。如昆图斯·西塞罗所说：“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诺言……而是慷慨和讨喜的好处。他们也一定会求候选人帮忙。对于你做不到的事情，就优雅地婉拒，或者更好的办法是不要拒绝。前者是好人的选择，而优秀的候选人要选择后者。只要是办得到的事情，最好尽可能多地做出承诺。因为如果你拒绝帮助别人，一定会当场激起敌意，并且让更多人敌视你……如果你直截了当地拒绝，别人会很生气。而如果你许下诺言，即

便后来没有办法兑现，只要有合理的理由，别人反倒不会那么恼火。当然，你应当尽可能兑现诺言。”[28] 前1世纪和今天一样，竞选时的发誓许愿往往转瞬即逝，很难真正落实。古今的选民也一样倾向于乐观地相信政客的诺言，而忘记过去的教训。

盖乌斯·屋大维有很多钱可以款待选民，或者用礼物和放贷来维持现有的友谊，以及结交新朋友。他的家族之前的商业活动无疑也能给他拉来一些人脉，再加上尤利乌斯·恺撒这样的亲戚非常公开地支持他。人心是可以收买的，而大多数礼物或人情交易都不会违反旨在打击腐败的法律。贿选与赠礼的界限很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尤利乌斯·恺撒虽然一掷千金地拉拢选民，却从来没有被指控过行贿。这些事情可以用非常精细微妙的手段来处理，只有最明目张胆的行贿者才会被送上法庭。[29]



罗马城的中心，约前**63**年

每年有八个裁判官职位，所以每年的二十名财务官注定有十几个人无法晋升到更高一级。不过这样的胜率还是比竞选执政官要好得多。裁判官的选举时间在执政官选举之后，由同一种公民大会，即百人会议来选出。在百人会议中，罗马公民的三十五个部落[30] 根据财产情况和古时罗马军队的结构分为若干个“百人团”。因为武装的公民群体被禁止进

入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他们就在边界之外的战神广场聚集，在所谓的“羊圈”内投票。“羊圈”是一种围场，每个“羊圈”供一个选举单位使用。

富人的百人团总人数较少，有权先投票。选民依次走过木制过道（或称“桥梁”），将写着他们选择的候选人姓名首字母的木板放入一个篮子。每个百人团的多数意见即代表整个百人团的意见。候选人可能有机会在百人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的非正式集会上向在场选民发表演讲，然后在场外的一个平台上等候和观察。每个候选人都穿着光鲜的白色托加袍。第一个获得多数百人团支持（共193个百人团，若赢得97个百人团的支持即可算作多数）的候选人就算当选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候选人等。选举过程很繁琐，耗时很久，有时天黑了还没有选出八名裁判官，于是公民大会就要解散，在下一个可以执行公务的日子继续选举。[31]

在此次选举中，盖乌斯·屋大维是第一个获得多数票的。他的岳父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很快（可能是在下一年）也将获得裁判官职位，这或许能够说明，尤利乌斯·恺撒的影响力和名望对他亲戚的仕途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裁判官在一年任期内的主要职责是审理案件。七名裁判官负责主持苏拉建立的七个法庭，而另一名裁判官则享有威望很高、职权范围广泛的“城市裁判官”[32] 称号，其权威仅次于两名执政官。盖乌斯·屋大维得到的任务是监管一个法庭。[33]

案件审理一般在广场的高台上举行，如果案件很重要，或者很有意思，或者涉及丑闻，就会有很多群众来围观。主持法庭的裁判官端坐在他的席位上，周围有六名手执法西斯束棒的执法吏侍奉。执法吏这样的幕僚人员是职业吏员，不像裁判官是每年更换的。执法吏因为经验丰富，有时候能够对审判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主持法庭也是让群众熟悉自己的好机会，也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政治人脉。如果原告、被告、辩护律师和陪审员是元老、骑士或其他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就可以对他们以

礼相待、表示同情。罗马法律体制中没有国家对某人提起公诉的概念，指控总是由普通公民提出。起诉人通常是雄心勃勃、希望扬名立威的年轻人，而辩护律师一般是更为显赫的名人。罗马元老们认为，更体面的做法是支持一位受到指控的元老（即便他的罪行铁证如山），而不是寻求结束他的政治生命。因此，司法体系也是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很多审判都带有政治意义。对参与审判的人来说，所有审判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人情交易的途径。

前60年末，西塞罗高度赞扬了盖乌斯·屋大维作为裁判官的行为，建议弟弟昆图斯在担任亚细亚[34]总督时效仿盖乌斯·屋大维，因为：

> ……聆听时必须有礼貌，裁决案件时必须宽大为怀。为了圆满解决争端，必须仔细辨明真相。盖乌斯·屋大维近期就是凭借这样的举动，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在他的法庭上，执法吏第一次规规矩矩，没有胡乱生事，而参加庭审的另一名行政长官闭上了嘴巴，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言，想讲多久都可以。或许他这么做会让人觉得太温和，但事实上他的这种温和是为了平衡这样严酷的事件：某些“苏拉党人”被强迫归还他们用暴力和恫吓手段夺走的财物；那些当官时发布不公正法令的人在辞官并成为普通公民后也不得不承受在任官员的不公。他的这种严酷若不是包裹在许多温和善意的糖衣之下，或许就让人难以接受了。[35]

打击那些非常贪婪或凶残的前苏拉党人的做法特别受群众欢迎，尤利乌斯·恺撒和加图在不同时期都曾支持这种做法。盖乌斯·屋大维似乎是理想化的罗马法官，对少数人严苛，而对那些有资格得到善待和理解的人，尤其是那些出身高贵、人脉很广的人，一般会宽大为怀。当一位元老无法逃避有罪的判决时，他会被允许放弃自我辩护和公民权，带着自己的大部分财富逃离罗马城，在流亡中也能过得舒舒服服。这就是为什么西塞罗不愿意对喀提林阴谋分子进行正式审判，因为他们肯定会选择流亡，而不是被处决。[36]

按照元老阶层的标准，盖乌斯·屋大维在裁判官任上干得不错。随

着行省数量的增加，大多数裁判官在卸任后都会担任一段时间的行省总督。具体的职位由元老院挑选，然后用抽签方式分配到个人。盖乌斯·屋大维获得了富饶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马其顿行省，以及资深执政官的衔级。资深执政官和资深裁判官不是直接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元老院赋予军权[37]。在前往马其顿途中，盖乌斯·屋大维奉命去镇压图里地区（意大利南部的塔兰托附近）一群为非作歹的匪徒。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些匪徒部分是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的幸存者，部分是喀提林叛军的掉队士兵。盖乌斯·屋大维很快就驱散了这群匪徒。[38]

行省总督有很多捞油水的机会，大多数罗马人都把在海外服务和中饱私囊联系在一起。大约在这个时期，诗人卡图卢斯声称，他从比提尼亚[39]总督幕僚的官职卸任回国后，一位朋友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捞了多少？”一位臭名昭著的西西里岛总督曾发表如下妙论：当官要当三年才行，第一年捞到足够的钱偿还债务，第二年发大财，第三年攒够足够的钱去贿赂法官和陪审团，以保证自己返回罗马后若被以贪赃枉法罪名起诉（这样的起诉是避免不了的），能逃脱法律制裁。大多数行省总督不会这么明目张胆，但资深执政官在其行省内拥有最高军权和司法权，总会有很多人希望得到他的善意。行省总督只有维持自己开销的津贴和人数不多的幕僚，而没有薪金。[40]

盖乌斯·屋大维在行省总督任上的品行又一次赢得了其他元老的赞许。在他治下，马其顿行省内部安定，而边境上与培西人和其他色雷斯民族的冲突给了他获得军事荣誉的机会。他打赢了一场战役后，热情洋溢的士兵们赞誉他为凯旋将军。若希望从元老院那里获得凯旋式的荣耀，得到士兵们的如此赞誉是必需的步骤。法律规定，若要获得凯旋式资格，胜利的规模必须非常宏大，至少杀敌5000人，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真的去准确计算这个数字。一个人能否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往往取决于他在元老院的朋友的影响力。[41]

盖乌斯·屋大维的仕途一帆风顺，若能获得凯旋式的荣誉，必然有助于竞选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在政坛的进展也很顺风顺水，担任了前59年执政官。他外甥女的丈夫也大有希望很快步其后尘，登上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然而，在从马其顿返回罗马的途中，盖乌斯·屋大维病倒了，后来在位于诺拉的自家宅邸去世。[42]

---

[1] Velleius Paterculus 2.59.1-2（Loeb translation）.

[2] 古典时代的殖民地大多是与母邦（metropolis，英语中“大都市”一词即来源于此）领土不接壤的海外殖民城邦的形式。殖民城市与母邦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但与近代的殖民主义不同的是，这种联系并不以母邦直接控制殖民城市的形式存在。母邦与殖民地也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罗马的殖民地起初是在征服的外国领土上建立的居民点，或安置退伍军人的定居点，后来有的发展为地位很高的城市。

[3] Suetonius，*Augustus* 3，5，Velleius Paterculus 2.59.1-2，Dio 45.1.1，Tacitus，*Ann* .1.9；关于他的财富，见I.Shatzman，*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Collection Latomus* Vol.142（1975），p.387，包括692 and 693，概况见E.Rawson，‘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in M.I.Finley（ed.），*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1976），pp.85-102；帕拉丁山东北侧的考古发掘显示，这里有一座贵族宅邸，前2世纪和前1世纪有人居住，并曾翻新过，后来在尼禄的大火中被毁，可能就是屋大维曾拥有的房子，见J.Patterson，‘The City of Rome Revisited：From Mid-Republic to Mid-Empire’，*JRS* 100（2010），pp.210-32，尤见.p.223fn.112，还提及了意大利在该地区的近期考古发掘。

[4] Suetonius，*Augustus* 1.2.2.

[5] Suetonius，*Augustus* 2.3-3.1，Appian，*BC* 3.23；一位银行家的记账单上出现了C.Octavius的名字，这可能就是盖乌斯·屋大维的父亲。关于元老参与借贷，见I.Shatzman，*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Collection Latomus* Vol.142（1975），pp.75-9。

[6] 塞斯特尔提乌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一种小银币，在帝国时期是一种较大的铜币。

[7] Livy，*Pers* .98说前70～前69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90万人，但其他史料的数字比这多1万人，见E.Lo Cascio，‘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Beloch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JRS* 84（1994），pp.23-40。古代人口的总数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

[8] Plutarch，*Crassus* 2讲到，克拉苏说只有有能力组建一支军队的人才算富人；他的产业，见Pliny，*NH* 33.134，不过Plutarch，*Crassus* 2 的估计数字要略微低一些，见I.Shatzman，*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Collection Latomus* Vol.142（1975），pp.375-

8，庞培见pp.389-93。关于他们的职业生涯，见A.Ward，*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1977），P.Greenhalgh，*Pompey*：*The Roman Alexander*（1980）以及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2nd edn，2002）。

[9] 关于克拉苏如何花钱，见Plutarch，*Crassus* 2-3；关于欠他债的元老，见Sallust，*Bell.Cat*.48.5-6；关于包税人，见E.Badian，*Publicansand Sinners*（1972）。

[10] Suetonius，*Augustus* 4.1.

[11] 尤利乌斯·恺撒的这门婚姻是父母包办的，未婚妻是一个叫科苏提娅的女子，她的父亲属于骑士阶层，而非元老。她的家庭非常富裕，无疑会给恺撒带来一大笔嫁妆，这些钱肯定能帮助他踏上从政之路，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好处了。恺撒和科苏提娅可能已经结婚了，而不是仅仅处于订婚状态，因为苏埃托尼乌斯的措辞的意思是，两人离了婚，而普鲁塔克显然将科苏提娅算作恺撒的妻子之一。两人年纪尚小，因此不大可能已经正式结婚。不管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都算是一刀两断了。

[12]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112；与庞培的关系，见Suetonius，*Augustus* 4.1。

[13] 他的年龄是猜测的，但有一定根据：他于前73年和盖乌斯·托拉尼乌斯一同担任裁判官，他们也曾同年担任平民市政官，见*ILS* 47。但托拉尼乌斯曾被斯巴达克斯打败过（Sallust，*Hist*.3.46M，Florus 2.8.5），所以他的政治前程可能进展得比较慢，他和屋大维是在较晚阶段成为同僚的。证据见Broughton，*MRR 2*，p.110。

[14] 盖乌斯·屋大维的政治生涯，见*ILS* 47；该时期的军团数量，见P.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1971），pp.446-72，估计前80年的军团总数最低，为13个；前71～前70年最高，为39个。

[15] 关于裁判官，见A.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pp.133-7；关于时间，见注释9；关于托拉尼乌斯和斯巴达克斯，见Sallust，*Hist*.3.46M，Florus 2.8.5。

[16] A.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99），pp.129-33.

[17] 严格地讲，橡叶冠并非表彰军人英勇壮举的最高荣誉，比它更高的是禾草冠（corona graminea）。禾草冠只会颁授给直接挽救整个军团或全军的将军、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禾草冠是以在战场上采集的禾草、花卉、野草和各种谷物等植物编织而成的。不过，普通士兵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确实是橡叶冠。

[18] 近期出版的对恺撒早期生涯的精彩介绍，见E.Gruen，‘Caesar as a politician’，in M.Griffin（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2009），pp.23-36，也见L.Taylor，‘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Greece and Rome* 4（1957），pp.10-18，及M.Gelzer，*CaesarPolitician and Statesman*（1968），p.22，概况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

pp.82-151 =（2007），pp.61-183，和R.Billows，*Julius Caesar*：*The Colossus of Rome*（2009），pp.56-110，他强调恺撒始终站在民众事业一边。关于橡叶冠，见Gellius，*NA* 5.6.13-14，Pliny *NH* 16.12-13，讨论见V.Maxfield，*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1981），pp.70-74，119-20。

[19] 关于候选人和一般的选举过程，见L.Taylor，*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1949），尤见pp.50-75，和*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1966），尤见pp.78-106，A.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RS* 80（1990），pp.1-16，F.Millar，*The Crowd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1998），H.Mouritsen，*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2001），尤见pp.63-89，A.Yakobson，'*Petitio 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RS* 8（1992），pp.32-52。

[20] Q.Cicero，*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35。学界的共识是，昆图斯·西塞罗就是本书的作者。他的文学创作很多，虽然很少保存到今天。在高卢与尤利乌斯·恺撒一同征战时，他告诉兄长，他仅仅十六天内就写了四部悲剧。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3.5/6.8。

[21] Q.Cicero，*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25-6（Loeb translation）.

[22] 广场（Forum）是古罗马的城市中心，呈长方形，周围是罗马一些最古老与最重要的建筑。它是罗马公共生活的中心：不仅是凯旋式游行、选举、公共演讲、罪案审判、角斗士竞技的场所，也是商业中心。广场及周边有纪念伟人的雕像和纪念碑。

[23] 见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8.2；见Q.Cicero，*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41-2讲到候选人记住别人名字的重要性，即便需要提醒，也要表现得自然。

[24] 关于恺撒的立场，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p.119-45，尤见pp.121-4讲到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的审判。R.Billows，*Julius Caesar*：*The Colossus of Rome*（2009），pp.56-110强调恺撒始终支持民众事业是他成功的部分原因。

[25] Sallust，*Bell.Cat* .60.7-61.4.

[26] 庞培政治生涯的概述，见A.Goldsworthy，*In the Name of Rome*（2004），pp.152-80，具体内容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2nd edn，2002），pp.20-38；他的绰号，见Valerius Maximus 6.2.8。

[27] Suetonius，*Caesar* 15，Dio 37.43.1-4，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26.1-29.2.

[28] Q.Cicero，*Handbook on Electioneering* 45，47-8（Loeb translation）.

[29] R.Billows，*Julius Caesar*：*The Colossus of Rome*（2009），pp.104-5非常精彩地论证了这一点。

[30] 分为四个城市部落和三十一个乡村部落。

[31] 讨论见L.Ross Taylor，*Roman Voting Assemblies* （1966），pp.84-106。

[32] 城市裁判官与其他裁判官的区别是，一般裁判官往往被外派，而城市裁判官则留在罗马城，负责处理司法工作。

[33] Velleius Paterculus 2.59.2讲到在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一，with 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pp.118-19。

[34] 亚细亚行省在今天土耳其的西部沿海地区。今日“亚洲”的名称即从该省的名称而来。

[35]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1.21（Loeb translation）.

[36] Suetonius，*Caesar* 11，Dio 37.10.1-3，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17.4-5.

[37] 大多数资深的行政长官在任职一年后会被派遣出去，治理一个行省。执政官或裁判官掌握军政大权的时间可以延长，每次可以延长一年，那时他们就被称为资深执政官（proconsul）或资深裁判官（propraetor）。

[38] Suetonius，*Augustus* 3.1.

[39] 位于现代土耳其的北部海岸。

[40] Catullus 10；Cicero，*Verrines* 1.40.

[41] Suetonius，*Augustus* 3.2，94.5，Velleius Paterculus 2.59.2，*ILS* 47；关于杀敌5000的要求，见Valerius Maximus 2.8.1，讨论见J.Richardson，‘The triumph，the praetors and the Senate in the early second century BC’，*JRS* 65（1976），pp.50-63，尤见61-2。

[42] Tacitus *Ann* ，1.9，Cicero，*Philippics* 3.15与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p.143，fn.96。

三 尤利乌斯和恺撒担任执政官

> “如果他（恺撒）想当执政官，但还保留自己的军队，怎么办？”另外一人问道。庞培温和地答道：“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这些话让大家怀疑，庞培正在和恺撒争吵。
>
> ——凯利乌斯·鲁弗斯给西塞罗的信，前51年10月 [1]

父亲去世时，小屋大维年仅四岁。盖乌斯·屋大维的绝大部分家产都传给了他的独生子。家族财产的用途是支持子孙的政治事业。贵族的婚姻通常是为了获得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好处，离婚和再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尤利乌斯·恺撒很年轻时就订过婚，后来结过三次婚。庞培结过四次婚。阿提娅嫁给盖乌斯·屋大维时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氏，她自己的财产与丈夫的家产也是分开的。除了嫁妆之外，她名下的财产都由她父亲掌管。妻子是很少继承丈夫的财产的，一般来讲是孩子，尤其是儿子，成为父亲财产的主要继承人。

遗嘱会指定监护人来监管男孩的财产，直到他成年。监护人之一是盖乌斯·托拉尼乌斯，他曾与小屋大维的父亲一同担任市政官，或许也曾一起担任过财务官。为了保护遗产（理想情况当然是以财生财），需要对财产进行管理和投资。托拉尼乌斯后来被指控侵吞了盖乌斯·屋大维的很大一部分财产。当然这可能是管理或投资不善导致的，而不是刻意侵吞，不过屋大维长大成人之后可不会这么想，他会对托拉尼乌斯加以残酷的报复。[2]

阿提娅对她父亲来说是很重要的资产。她还很年轻，可能只有二十多岁，还能生养更多儿女，如果她不再嫁，就显得不正常了。罗马法律规定寡妇或离异女性必须等待十个月才能再嫁，这是为了明确她在后一段婚姻中所生孩子的血统。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结婚，以及和盖乌斯·屋大维结亲，得到了不少好处。但这并

不是说他不可以与其他贵族家系攀亲，以获得新的人脉。阿提娅再嫁了，她的新丈夫是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他后来当上了前56年执政官。菲利普斯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朋友，但他的家族是豪门世家，在政治上很成功，并且与阿提娅结婚能够带来一大笔金钱，这对双方都算是很好的亲事。菲利普斯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仕途的成年儿子，还有一个女儿，但如果他希望从新的婚姻中得到更多孩子，就要失望了。[3]

屋大维没有和母亲一起去她的新家，他（或许还有他的姐姐）搬去和阿提娅的父母一起生活。外祖父母承担了监督这对姐弟成长与早期教育的责任。过了一段时间，除了照料他们的保姆之外，外祖父母还雇用了一名教师。屋大维的主要仆人名叫斯法埃鲁斯。教师一般是一名希腊奴隶，他的部分任务就是向孩子传授希腊语和拉丁语。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能够熟练掌握这两种语言。除了读书写字和基本算术之外，孩子们还要学习罗马共和国的风俗与历史。正如西塞罗所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是通过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先人联系在一起，那还算是什么生命？"对于更宽泛的国家历史，人们往往主要宣扬自己家族祖先的事迹。阿提娅会确保屋大维继承尤利乌斯氏族，尤其是恺撒家族的伟大功业和古老血脉，无疑也会向孩子灌输盖乌斯·屋大维家族的历史，尽管它没有恺撒家族那样光辉灿烂，但也值得骄傲。多年后，屋大维仅简单地说屋大维家族是"一个古老而富裕的骑士家族"，并没有详细叙述。[4]

"三个头的怪兽"

前62年底，伟大的庞培率军返回了罗马。此前，他从公民大会那里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极大权力和丰富资源，他取得的胜利令先前罗马将军们的成就黯然失色。庞培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凭借经验和组织规划天才，先是扫荡了地中海的海盗，最后彻底击败了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并全面重组了近东格局。很多元老怀疑，这样一个惯于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人，现在能否满足于仅当一个普通元老。很多人担心

他会利用手中的军队主宰共和国，就像当年的苏拉一样。[5]

庞培不是苏拉，何况此时的局势与当年截然不同。苏拉结束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争回国后，发现他的罗马政敌已经举兵反对他，因此，他还要继续进行未结束的内战。前62年，庞培做了一个大气的姿态以安抚人们的恐惧。他刚刚抵达意大利就解散了军队。罗马的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人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又感到伟大的征服者现在处于脆弱的状态。庞培不再拥有官方权力，也不掌握军队，尽管他还在城市的正式边界之外保留着自己的军权，以等待庆祝他的凯旋式。他现在能够依赖的只有财富、本领和罗马人称为“威望”（auctoritas）的那种无形之物。英语里的authority（权威）一词不能准确地表达auctoritas的含义。“威望”既包含了地位，也包含一个人及其家族凭借其成就与人脉而理所应当享有的尊重。说得简单些，“威望”其实就是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6]

没有人会怀疑庞培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在财富或政治人脉上能够超过他，但他并不能独占这些东西，还有很多人也拥有突出的财富和人脉，虽然没有他那么强。庞培在整个青年时代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征北战。他对政界的日常运转、政治上的人情交易和运用，几乎没有任何经验。除此之外，他渴望得到群众的颂扬和其他元老发自内心的认可。在这些心愿得不到满足时，他很难摆正自己的心态。在实践层面上，庞培有三个目标：第一个也是最简单的目标是，获得庆祝凯旋式并在城市中心宣扬自己成就的权利；第二个目标是让他对东方各行省和王国的重组获得批准，让他的所有决策得到元老院的确认；最后的目标是通过一项法案，为他的退伍老兵分配土地，让他们在农场上安顿下来，以便将来供养自己和家人。

这对国家都是好事。庞培在东方所做的安排是很理智的，得到批准之后，其中很多条款的效力维持了几个世纪。军团士兵们英勇作战，取得了胜利，但共和国给他们的军饷少得可怜。现在军队不再需要他们，

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的确，庞培这么做会得到退伍军人的感激，以及他们未来的投票支持，让原本就有义务支持他的门客数量大大增加。这一代的罗马贵族认为，若是其他人获得了极大威望，就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还有很多人对庞培心怀不满，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亲戚就是被这位年轻的屠夫处死的。[7]

庞培奋斗一番之后才得到了自己的凯旋式。这是他的第三次凯旋式，场面极其宏伟壮丽，强调了他史无前例、规模庞大的功业。士兵们列队行进，队伍中有成群的俘虏和大量的花车。花车上载着战利品、记录历次征服的清单和展示作战场景的图画。庞培本人则乘坐一辆战车，身穿凯旋将军的紫袍，戴着月桂花环，脸涂成红色，模仿“至善至伟朱庇特”（罗马的主神）的古老赤陶塑像的颜色。这一天，凯旋将军扮演着神的角色。随后的岁月会非常清楚地表明，面对群起而攻之的政敌，影响力和财富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有局限的。作为普通公民，庞培没有政治权力，也不能传唤元老院开会或者向公民大会提交法案。在前61年和前60年，他支持自己的两名老部下当上了执政官。但这两人的政治才干非常有限，很快就被各自的同僚阻挠或边缘化了。

加图在挫败庞培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有其他很多门阀世家子弟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惯常的争斗，希望联手推翻伟大的英雄庞培。这些人喜欢自称为“好人”或“贵人”，他们口中标榜的自由和共和国仅仅代表着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宁愿让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不愿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凭借解决这些问题而获得莫大声望。这必然导致政界核心具有极大惰性。没有一项旨在向退伍军人（或其他贫困公民）授予土地的法案通过并成为法律，而庞培对东方的安排仍然留待元老院批准。各行省和同盟王国的统治者与各社区进退两难，不知道庞培给他们的权力能否维持下去。

克拉苏也参加了许多针对庞培的攻击，但很快就和庞培一样受到了

挫折。好几个重要的包税人公司为了获得在亚细亚和东方其他行省征税的权限，向元老院做了过高的承诺，导致现在无法承担自己的开支。他们希望减少上缴国库的金额。克拉苏或许在这桩生意中也有投资，而且肯定与主要的包税人联系紧密。尽管他有很多欠他人情的政治盟友，但此事在元老院提出之后，还是遭到了阻挠。[8]

若是仅仅从庞培、克拉苏及其对手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时期，就大错特错了。每年的各项选举仍然非常火热，常出现贿选和恫吓的情况，而法庭上也继续开展着受政治驱动的斗争。前61～前60年，尤利乌斯·恺撒担任外西班牙行省总督。在上任之前，一些债主要求他立刻偿清巨额债务，他险些未能启程。克拉苏干预了此事，帮他还了一些债务，并为剩余债务担保。外西班牙的一场叛乱给了这位新总督发动一场战争、获得荣誉与大批战利品的机会。尤利乌斯·恺撒返回罗马时，已经改善了他的财务状况，并获得了庆祝凯旋式的机会。

他决心乘胜追击，赢得前59年的执政官席位，也就是以法律许可的最低年龄当上执政官。为了参加选举，他必须亲自到罗马城内宣布自己要参选。他请求破例允许他不亲自到场也可获得参选资格。元老院开会讨论了此事，主持人征求加图的意见时，他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直到辩论时间耗尽，会议不得不在未投票的情况下结束。元老院不可以在天黑之后继续辩论，所以任何在白天不能决定的事情都必须放弃。这是加图惯用的伎俩，也是他较年轻时就成为元老院重要人物的原因之一。但这一次他的成功转瞬即逝。尤利乌斯·恺撒进了城，宣布了自己的候选人身份，尽管这意味着他必须解散军队、放弃凯旋式。[9]

加图对尤利乌斯·恺撒之所以咬牙切齿，部分原因是个人憎恶。另外，加图的同母异父姐姐塞维利娅与尤利乌斯·恺撒有着长期私情关系；加图自己的女婿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年龄比岳父大）也在竞选执政官。加图或许希望确保毕布路斯当选，并且让一个不

像恺撒那样高调浮夸的人成为毕布路斯的同僚。加图或许还希望尤利乌斯·恺撒此次竞选失败并彻底垮台，就像喀提林那样。如果他这么想，就严重误判了形势，所有候选人都一掷千金地拉拢人心。最后尤利乌斯·恺撒轻松以第一名当选，毕布路斯勉强当选，成为恺撒的同僚。[10]

这都是公开的局面。在幕后，尤利乌斯·恺撒与克拉苏和庞培缔结了盟约，说服他们相信，只有搁置敌意，一起合作，并借助恺撒的力量，他们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恺撒还想将西塞罗拉拢为类似的亲密盟友，但没能说服他。现代学者将罗马最富有的两个人和最雄心勃勃的新来者组成的联盟称为“前三头同盟”。当时这还只是秘密协定，前59年才渐渐为公众所知。[11]

1月，尤利乌斯·恺撒上任之后，便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土地法案。法案的措辞很温和，他的态度也是欢迎和解的。他宣布，只要是合理的批评，都可以接受，愿意修改任何条款。他已经颁布法令，要求将元老院辩论的内容公开发表，让公众了解元老们的立场。只有加图愿意让自己的顽固反对意见被记录在案。他很快开始故伎重施，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尤利乌斯·恺撒大发雷霆，命令执法吏带走加图。但加图很擅长将自己打扮为被暴君侵害的受害者。至少有一名元老和他一起离去，宣布自己宁愿和加图一起坐牢，也不愿意和恺撒待在一起。会议没有投票表决就结束了。[12]

加图、毕布路斯和他们的支持者抓住一切机会阻挠尤利乌斯·恺撒，不断滋生事端。他们的主要目标倒不是阻止他，而是迫使他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手段，以便让人们对他行为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公民大会通过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土地法案，于是庞培的老兵得到了农场。几个月后，又通过了第二项土地法案，对前一项加以补充，将更多公有土地分配给退伍军人和两万名至少有三个孩子的男性城市贫民。政府指派了二十名专员来监督土地分配工作，其中之一是阿提娅的父亲。庞培在东方

所做的安排也终于全部得到了批准。大约在同一时期，包税人如愿以偿，得到了退税，不过当局在这么帮助他们的同时也警告他们将来要好自为之。[13]

尤利乌斯·恺撒越来越依赖公共集会和公民大会来通过立法，于是庞培和克拉苏对他的支持渐渐公开化了。斗争双方都使用了众多打手和恫吓手段，但前三头同盟的支持者更多，组织得也更好。在一次关于土地法案的公共集会上，毕布路斯的执法吏携带的法西斯束棒被打得粉碎，他自己被泼了一篮粪便。此后，毕布路斯退隐回家，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他宣称自己在观测天象，寻找征兆，并且经常看到空中有闪电。如果一位主持公务的行政长官看到闪电（朱庇特发出的征兆），公务就要中止。但观测者必须亲自到集会或公民大会宣布凶兆，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待在家里。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足以让人们对这一年的立法产生不确定性。[14]

庞培从东方返回后，曾与加图接触，希望与他的一个外甥女结婚，但遭到了傲慢的拒绝。庞培随后娶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女儿尤利娅，这就公开证实了他与恺撒的盟友关系。尤利娅的父亲比庞培小六岁，虽然老夫少妻年龄差距很大，但这是一门成功的婚姻，年纪较大的庞培享受着年轻貌美的新娘的赞美与崇拜。世人皆知，克拉苏和庞培都是雄心勃勃的执政官的盟友，人们开始谈及所谓“三个头的怪兽”主宰了国家。也有人开玩笑说，这一年的执政官是“尤利乌斯和恺撒”，因为毕布路斯不肯抛头露面，也没有尝试颁布任何法律或者开展自己的工作。除了观测天象之外，他还忙于撰写恶言诽谤的小册子攻击同僚，并将这些文件张挂在广场，供大家阅读。其他人也对尤利乌斯·恺撒恶言攻击，称他为“所有女人的丈夫，所有男人的妻子”，因为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说他曾被年迈的比提尼亚国王引诱，充当他的男宠。[15]

这个旧闻又被重新提起。庞培、克拉苏和尤利乌斯·恺撒联合起来

足以让任何法案得以通过，尽管有时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不管批评他们的人如何渲染，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控制公共事务的所有方面。他们确保前58年的两名执政官成为他们的朋友，其中之一是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即尤利乌斯·恺撒的新岳父。但前三头同盟无法阻止更多的政敌占据其他行政长官职位，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选举。这一年年底，尤利乌斯·恺撒离开罗马城，去担任行省总督，任期五年，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去赢得荣誉和足够的金钱来还债和发大财。一位平民保民官在公民大会提出法案，将内高卢[16]和伊利里亚[17]行省交给了他。外高卢总督去世后，庞培建议元老院将这个行省也交给尤利乌斯·恺撒，于是后者通过元老院的法令获得了第三个行省。[18]

“是他们想要这样的”

除了正式的书本教育之外，元老的子弟还要通过观察长辈来学习。从七岁开始，男孩便要在父亲（或另一名男性亲属）处理事务时跟随左右，观察长辈如何接见每天登门拜访的门客并与其打招呼，跟着长辈走过广场，参加元老院会议。男孩不能进入元老院议政厅，但议政厅大门敞开，他们可以在室外旁听。他们还要在战神广场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锻炼身体，渐渐学会骑马、投掷标枪和用盾牌与剑格斗。因此，从很小的时候，年龄相仿的男孩们就待在一起，他们将来会成为争夺官职的对手，或者同僚。

我们不知道阿提娅的父亲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是在何时去世的。据我们所知，他担任过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前59年的土地分配专员。或许小屋大维就在外祖父阿提乌斯·巴尔布斯的最后几年中伴随在他身旁，学习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我们对此没有直接的证据。屋大维的舅公尤利乌斯·恺撒只是个遥远的存在，因为他在随后十年中将远离罗马城。在开始观察政治生活的大约同一时期，男孩们还开始接受一名语法教师（传授文学和语言）的教育。当时罗马大约有二十家学校，

经济条件足够好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去上学。非常富裕的家庭一般雇用一位家庭教师，不过通常会允许亲友或门客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一起上课。在受教育的某个阶段，屋大维开始缔结一些将会延续终生的友谊。[19]

罗马的青少年要学习阅读和背诵拉丁文与希腊文古典著作，以便对其加以评论和引用。孩子们还要死记硬背地学习一些东西，比如十二铜表法[20]，即罗马法律的古老根基。但最有助于男孩成长的，是对共和国运作与元老私人事务的观察学习。对女孩来说，则是观察母亲如何执掌家务。在前50年代，观察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对人很少有什么教诲作用。尤利乌斯·恺撒不再在罗马担任执政官，庞培和克拉苏又重新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但与尤利乌斯·恺撒担任高级行政长官时相比，他们对日常事务的控制力下降了许多。大多数其他元老的影响力比不上这两位伟人，但有些元老拥有足够的力量办成一些事情。与庞培、克拉苏或尤利乌斯·恺撒没有任何关系的政治竞争仍然在激烈地开展着。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是一位富有领袖魅力、活跃好动且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他成了这十年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姓氏原本是克劳狄·普尔喀，然而他很早就改用了较为平民化的拼法——克洛狄乌斯。但是他骨子里始终是个贵族，带着延续数百年的古老门阀贵族的那种高度自信。“普尔喀”这个家族名的意思是“美丽”，很能体现他们眼中的自己。克劳狄氏族以绝对自信和盛气凌人而闻名。在反对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有一位克劳狄·普尔喀率领了一支罗马舰队。在战前举行的占卜仪式上，如果圣鸡吃掉食料，就说明诸神支持罗马人，对迦太基舰队的进攻就会得胜。但圣鸡不配合，让他非常不耐烦。最后他抓起圣鸡的笼子，将它们从自己的旗舰上抛入大海，并喊道：“如果圣鸡不肯吃，那就喝吧！”罗马人随后发动了进攻，遭受了与迦太基的漫长战争史上最惨重的一次海战失败。几年后，克劳狄·普尔喀的妹妹坐轿子穿过拥挤的罗马街巷时，受到来往人群的阻碍，于是她大声说，希

望“她哥哥能把这些穷鬼多淹死一些”，别挡着她的路。她因此遭到了起诉。[21]

克洛狄乌斯比他的祖先更懂得民意，但在说话做事时同样肆无忌惮、毫无克制。作为贵族，他不能担任保民官，于是努力了好几次，想把自己的身份变为平民。克洛狄乌斯对西塞罗的极度憎恨是世人皆知的。前59年，当演说家公开批评前三头同盟时，克洛狄乌斯几乎马上就做出回应。几个小时后，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和观鸟占卜师庞培就主持了一场仪式，安排一位年纪比克洛狄乌斯还小的平民“收养”他为义子，于是将他的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整个仪式完全是象征意义的，颇有滑稽闹剧的意味，但在技术上是合法的。克洛狄乌斯在其他方面仍然是个彻头彻尾的贵族，拥有一大群门客和支持自己的政治盟友，于是轻松当选保民官。很多政治家都曾利用成群的打手来威吓，甚至攻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克洛狄乌斯将这种活动提升到了一个新层次，将传统的行会社团作为有组织帮会的基础。他的对手将他的支持者斥责为乌合之众，不过他的很多打手是商店业主和手工艺人，有不少是释奴（毕竟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释奴）。[22]

西塞罗很快遭到克洛狄乌斯的攻击，主要涉及他处死喀提林党人的事情。几个月后，西塞罗众叛亲离，不得不开始流亡。克洛狄乌斯不是尤利乌斯·恺撒、克拉苏或任何人的工具，他和这些人合作仅仅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很快，他就威胁要质疑前59年各项法案的合法性，他的打手还开始攻击庞培，于是共和国的这位大英雄在一段时间内都不敢走出家门。后来，一位叫作米罗的元老招募了支持者，其中很多是角斗士，与克洛狄乌斯的党徒争夺街道和公共场所。政治暴力愈演愈烈，贿选上升到更严重的层次。[23]

克拉苏与庞培的旧日嫌隙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在一段时间内前三头同盟似乎要瓦解了。前三头匆匆进行了一系列谈判，最后在内高卢的卢

卡（因为尤利乌斯·恺撒不能离开他的行省）商谈，终于消除了矛盾。庞培和克拉苏一同参加竞选，当选为前55年执政官，这是他们第二次成为同僚。两人都为自己一年任期结束之后的去向做好了安排，各自以资深执政官身份担任特别行省总督。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和伊利里亚行省的任期延长了五年。克拉苏卸去执政官职务后当上了叙利亚总督，从一开始就打算进攻帕提亚[24]，这是东方最后一个还没有被罗马控制的大国。庞培则得到了西班牙的两个行省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但始终没有去那里上任。他待在位于阿尔班山的自家别墅，也就是在罗马城的正式边界之外，所以他保留着军权。他派遣军团长（罗马总督的下属，凭借总督委派的军权，可以独立指挥）管理两个行省，若有需要，他随时都有军队可以动用。[25]

达成这一切的过程中，始终伴有暴力冲突，选举时的暴乱几乎司空见惯，有人为此丧命的情况越来越多。有一次，庞培回家时浑身溅上了别人的血，令他的妻子尤利娅受到惊吓，导致流产。前三头同盟仍然无法阻止常常敌视他们、思想独立的元老在将来获得高级官职。克拉苏离开罗马城去行省上任时，一名保民官不断骚扰他，严正呼吁神祇诅咒这位资深执政官以及他筹划的非正义战争。在大多数元老的脑子里，私人仇隙远比共和国福祉重要。[26]

这诅咒果然发生了效力，或者是克拉苏太粗心让他的远征酿成了灾难。前53年，他的军队被阻挡于卡莱[27]，在企图逃跑时被迅捷的帕提亚骑兵击溃，只有少量残兵败将逃出，大部分人阵亡或被俘。克拉苏与敌人谈判时被斩首。他的死亡严重削弱了庞培与尤利乌斯·恺撒之间的联盟。大约同一时间他们还遭遇了更大的打击，尤利娅因难产而死。她的父亲匆匆提议让庞培娶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庞培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很快，屋大维娅嫁给了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他是威望最高的平民豪门之一的成员，他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朋友，尤利乌斯·恺撒应当没有参与安排这门婚事。不过从政治角度来看，这门婚事对女孩的近

亲非常有利。阿提娅的丈夫菲利普斯是前56年的执政官，马凯鲁斯则将在前50年赢得这个官职。[28]

克洛狄乌斯和米罗继续争斗，其他领导人也在互相竞争，虽然斗得没有那么凶。政坛非常动荡，以至于前53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位执政官当选，直到夏季才完成了选举，有两个人当选。这年秋季的暴力冲突比以往更严重了，因为这一次米罗也是候选人，而他的不共戴天之敌克洛狄乌斯也在竞选裁判官。这一次又发生了暴乱，导致百人会议未能完成任务，新的一年又在没有执政官的情况下开始了。前52年1月，克洛狄乌斯和米罗凑巧在城外相遇。克洛狄乌斯在最初的打斗中负伤，被抬进一家酒馆。米罗派人闯入酒馆，把他的老对手杀掉了。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随后的葬礼上愤怒不已，掀起了一场戏剧性的抗议，克洛狄乌斯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表示赞赏。支持者将他的尸体抬进元老院厅堂，在那里将他火葬，结果把房子也烧掉了。罗马似乎正陷入无政府状态。罗马城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控制暴民，只有军队才能做到。问题是，谁拥有军权和威望来掌控局面？[29]

加图和贵人派成功阻止庞培被任命为独裁官。庞培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年晚些时候，他有了一位同僚，即昆图斯·科尔内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纳西卡，他的名字很长，说明他出身罗马最鼎盛的门阀贵族家庭，不过他本人没有多少才干。庞培还娶了这个西庇阿的女儿科尔内利娅，借此与贵族精英阶层缔结了新联盟。他通过武力恢复了秩序。米罗遭到审判，法庭被士兵和敌视他的人群团团围住。在不可避免的有罪裁决下来之前，米罗选择了流亡。他毫无疑问是有罪的，但这次审判很不公正，也无视正当程序。在类似的审判中，倒是有不少克洛狄乌斯党徒被定罪，他们逃往北方，投奔尤利乌斯·恺撒阵营，受到了欢迎。庞培的行省总督任期得到延长，这一年年底时，他恢复了原先不寻常的姿态，即待在罗马城近郊。有时元老院选择在城市边界之外的神庙开会，以便让庞培也能参加，而无须放弃他的

军权和军队。[30]

到前51年，尤利乌斯·恺撒已经在高卢做最后的扫荡。或许除了他自己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他竟然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他利用一个高卢部落的迁徙对外高卢和罗马盟邦构成的威胁，对高卢施加干预，并且逐步扩大活动范围，征服（罗马人的委婉用语是“平定”）了西至大西洋、东至莱茵河的所有土地。他的胜利非常辉煌宏伟，他每年发表一些作品（即著名的《高卢战记》）宣扬自己的成功。就连西塞罗也赞扬《高卢战记》是拉丁语言最崇高的表达之一。庞培在东方赢得胜利后得到了十天的公共感恩，以颂扬他的业绩，这是之前任何一位罗马将军得到天数的两倍。尤利乌斯·恺撒最初的成功则得到了十五天的公共感恩；后来他袭掠神秘岛屿不列颠之后，得到了二十天感恩；他镇压了高卢诸多部落大联盟的叛乱之后，又得到了二十天感恩。罗马人民有了一位新的军事英雄。[31]

尤利乌斯·恺撒希望从高卢返回罗马庆祝自己的凯旋式，然后立即当选前48年执政官，因为法律规定，任何人的两次执政官任期之间必须间隔十年，他已经符合这个条件。他不打算退隐成为普通公民，因为那样会很容易遭到起诉。他的好几个政敌已经公开表示要对他加以审判，就像审判米罗那样，让士兵包围法庭。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获准在本人不到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将参加竞选。与庞培前不久无视规则的行为相比，尤利乌斯·恺撒的要求只是个小小的让步。尤利乌斯·恺撒还希望在前49年年底之前仍然保留资深执政官的身份和军权。他提出，他有权这么做，因为公民大会授予他这样的指挥权。尽管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一次执政官任期之后罗马政坛发生了许多动荡，批评者们却大谈特谈他当执政官时的恫吓手段与暴力冲突，并预测他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将更加凶险。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尤利乌斯·恺撒现在的地位很脆弱，于是蜂拥而上，利用他的弱势，就像他们在前60年代末攻击庞培一样。

庞培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猜不透他究竟是怎样想的。西塞罗早已断定，“罗马的亚历山大”是个极难揣测的人。一些迹象渐渐出现了，他正在转而反对自己的前岳父。他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支持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就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的诗人卢坎[32]概括的那样：“恺撒不能接受别人的地位优于自己，庞培不能接受别人与自己平起平坐。”尤利乌斯·恺撒要想称心遂愿地返回罗马，就必须承认，自己需要庞培的帮助与支持。有人问庞培，如果尤利乌斯·恺撒拒绝服从元老院，他会怎么做。庞培自满地答道：“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这样的话鼓励了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敌。[33]

连续多位执政官加入了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攻击，要求立刻将他召回。首先发难的是屋大维娅丈夫的堂兄弟，也叫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34]。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于前50年担任执政官期间也非常敌视妻子的舅公。为了抵挡政敌的攻击，尤利乌斯·恺撒将他从高卢掠夺到的财富大量投入罗马城，以笼络支持者，尤其是拉拢保民官。前50年12月1日，一位保民官迫使元老院进行投票表决，要求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同时辞职。370名元老支持这一动议，只有22人反对。绝大多数元老不愿意看到一场新的内战，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尤利乌斯·恺撒和他的显赫地位。[35]

有传闻说，尤利乌斯·恺撒已经入侵了意大利。马凯鲁斯[36]努力劝说元老院采取行动，但元老们不愿意，并且保民官们否决了他的动议。他对这结果置之不理，和同僚一起，在朋友们的陪伴下，匆匆去阿尔班山的别墅找庞培，向这位资深执政官呈上一把剑，呼吁他用军队保卫共和国。庞培毫无顾虑地称愿意用武力反对自己的前岳父和朋友。后来发现尤利乌斯·恺撒入侵意大利的消息是假的，于是不了了之。前49年1月1日，又一位马凯鲁斯[37]当上了执政官，即前51年执政官[38]的弟弟。各方都提出了一些建议，但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信任，而且都把别人

愿意谈判视为软弱的表现。1月7日，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呼吁各位行政长官以及在城市周边的资深执政官（显然指的是庞培）尽一切努力确保共和国的安全。马克·安东尼和另一名保民官一直在为尤利乌斯·恺撒摇旗呐喊，却被警告他们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他们逃离了罗马城，去往北方。[39]

几天后，可能是1月10日，尤利乌斯·恺撒率领仅仅1个军团渡过了卢比孔河，越过了他的行省（他在那里仍然拥有合法的军权）与意大利的边界（他在意大利没有合法军权）。多次得到公共感恩的人现在成了叛国者，他必须胜利，否则就要步喀提林的后尘。他在开启内战的时候，究竟有没有说出老赌徒的口头禅“骰子已掷出”，我们并不清楚，但他冒的风险无疑是非常大的，他也的确坚信自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尤利乌斯·恺撒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尊严，愿意让共和国陷入内战。庞培、加图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其他对手也同样愿意发动一场战争，剥夺他的地位和尊严。[40]

---

[1] Caelius’ quote from Cicero，*ad Fam* .8.8.9.

[2] Suetonius，*Augustus* 8.1，27.1，Nicolaus of Damascus 2，Appian，*BC* 4.12.

[3] Nicolaus of Damascus 3，和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27-8，及‘Neglected children on the *Ara Paci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8（1984），pp.583-9，586 fn.17.

[4] 屋大维的教师，见Dio 58.33.1，讲到斯法埃鲁斯前40年去世后，奥古斯都为表达对他的感激，为他举行了公开葬礼；Cicero，*Orator* 120；关于童年生活，见B.Rawson（ed.），*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尤见pp.99-113；关于教育，见H.Mar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1956），pp.229-91，A.Gwynn，*Roman Education* （1926），尤见1-32；Cicero，*de re publica* 4.3；‘an old and wealthy equestrian family’，见Suetonius，*Augustus* 2.3。

[5] 讨论见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72-9，及T.Wiseman in *CAH2* IX，pp.358-67。

[6] 权威力量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证，见Valerius Maximus 3.7.8。

[7] 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79-82，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65-8；关于军饷，值得一提的是，尤利乌斯·恺撒把军饷翻了一倍，士兵们还不能算是富有。Suetonius，*Julius Caesar* 26，关于此时期的军队，见R.Smith，*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1958）。

[8] 见Cicero，*ad Att* .1.17.9，18.3，18.7，2.1.8，with E.Badian，*Publicans and Sinners* （1972），pp.101-4.

[9] 关于他担任西班牙总督和此后的归来，见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61-70，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48-59 =（2007），pp.179-95，Gruen，'Caesar as a politician'，in M.Griffin（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pp.23-36，尤见29-31；古代史料中讲到加图阻挠会议议程，见Appian，*BC* 2.8，Dio 37.54.1-2，Suetonius，*Julius Caesar* 18.2 和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31.2-3，*Caesar* 13.1。

[10]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4-5.

[11] Cicero，*ad Att* .2.3，3-4.

[12] 尤利乌斯·恺撒的执政官任期，见L.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1968），pp.173-93。Gruen，'Caesar as a politician'，in M.Griffin（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pp.31-5，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71-101，C.Meier（trans. D. McLintock），*Caesar* （1996），pp.204-23，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61-81 =（2007），pp.196-220，R.Billows，*Julius Caesar.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pp.111-29，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86-100；加图被捕，见Dio 38.2.1-3.3.Suetonius，*Julius Caesar* 20.4和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33.1-2 的版本略微不同，说加图是另一次被捕的，不是在辩论土地法的时候。

[13] Suetonius，*Augustus* 4.1讲到阿提乌斯·巴尔布斯是二十名土地委员会成员之一。

[14] 广场上的骚乱，见Dio 38.6.4-7.2，Appian，*BC* 2.11，Plutarch，*Catothe Younger* 32.2-6，Suetonius，*Julius Caesar* 20.1；关于毕布路斯企图阻止立法，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20.2，Dio 38.8.2，相关评论见L.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1968），pp.177-9。

[15] Suetonius，*Julius Caesar* 21，50.1-2，Plutarch，*Pompey* 47-48，*Caesar* 14及Dio 38.9.1；"所有女人的丈夫，所有男人的妻子"，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52.3。

[16] 内高卢也叫山南高卢，"山"指的是阿尔卑斯山。内高卢是意大利北部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前220年代被罗马征服，约前81～前42年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后来被并入意大利。内高卢以波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前49年，内高卢全体居民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17] 伊利里亚，或称伊利里库姆，是前167～公元10年罗马的一个行省，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大约包括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区。公元10年，伊利里亚行省被分割为达尔马提亚和潘诺尼亚行省，但伊利里库姆/伊利里亚作为地区名仍然被广泛使用着。该地区的人民以孔武有力著称，是罗马帝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地之一。多位皇帝，包括君士坦丁大帝，出生于伊利里库姆。

[18] L.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1968），pp.182-8讨论了授予尤利乌斯·恺撒指挥权的《瓦提尼乌斯法》。

[19] Nicolaus of Damascus 3；关于罗马教育的概况，见n.4。

[20]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而得名。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等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贵族的权力做了一些限制。

[21] Suetonius，*Tiberius* 2-3，Cicero，*de natura deorum* 2.7 讨论了克劳狄·普尔喀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的角色。关于克洛狄乌斯，见W.Tatum，*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1999）*passim*，关于“良善女神”节丑闻和他对西塞罗的敌意，见J.Balsdon，‘Fabula Clodiana’，*Historia* 15（1966），pp.65-73；关于他们家族在前1世纪的地位，见E.Gruen，*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pp.97-100。

[22] Dio 38.12.1-3，Cicero，*de domo* 41，*ad Att* .8.3，Suetonius，*Julius Caesar* 20.4，Plutarch，*Caesar* 14；也见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76-8，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91-9。

[23] 对这些年政治的精彩介绍，见J.Ramsay，‘The Proconsular Years：Politics at a Distance’，in Griffin（2009），pp.37-56，及Wiseman in *CAH2* IX，pp.366-81，385-408。

[24] 帕提亚帝国，中国古书称之为安息，是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统治波斯的王朝，与罗马长期对抗，后在内乱中被萨珊王朝取代。

[25] 关于卢卡“会议”及庞培、克拉苏与尤利乌斯·恺撒之间联盟的巩固，见Suetonius，*Caesar* 24.1，Appian，*BC* 2.17，Plutarch，*Pompey* 50，*Caesar* 21，*Crassus* 14；也见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120-24，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110-19，Meier（1996），pp.270-73及A.Ward，*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pp.262-88。

[26] 尤利娅流产，见Plutarch，*Pompey* 53；克拉苏离开罗马城，见Cicero，*ad Att* .4.13，Plutarch，*Crassus* 16。

[27] 在今天土耳其东南部，今称哈兰。

[28] Suetonius，*Julius Caesar* 27.1；关于卡莱战役和克拉苏之死，主要资料是Plutarch，*Crassus* 17-33，及Dio 40.12-30。

[29] 克洛狄乌斯和米罗，见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145-52，Meier（1996），pp.297-301及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126-35。

[30] 庞培作为唯一执政官，见Plutarch，*Pompey* 54，*Cato* 47，Dio 40.50.4，Appian，*BC* 2.23；关于庞培的地位和新婚姻，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6-40，关于科尔内利娅，见Plutarch，*Pompey* 55。

[31] 对这些战役的更详细记述，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184-356 =（2007），pp.222-431；关于恺撒《战记》，见论文集K.Welch & A.Powell（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32] 即马尔库斯·安奈乌斯·卢坎努斯（39～65年），他未完成的史诗《法萨利亚》描述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被誉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文史诗。

[33] Quotations from Lucan，*Pharsalia* 1.125-6（Oxford translation by S.Braund），及Cicero，*ad Fam* .8.8.9；内战前夕局势，见M.Gelzer（trans. P. Needham），*Caesar* （1968），pp.169-94，R.Seager，*Pompey the Great.A Political Biography* （2002），pp.138-51，Wiseman in *CAH2* IX，pp.414-23，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358-79 =（2007），pp.434-60。

[34] 史学界称他为大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以区别屋大维娅的丈夫小盖乌斯（前50年执政官）。

[35] Appian，*BC* 2.28，另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是Plutarch，*Pompey* 58，参见Dio 60.64.1-4.

[36] 前50年执政官小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37] 大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38]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39] Plutarch，*Pompey* 59，Caesar，*BG* 8.52.3，Dio 40.64.3-4，Appian，*BC* 2.31-2，Caesar，*BC* 1.1-5，Suetonius，*Julius Caesar* 29.2，Dio 41.1.1-3.4.

[40] Suetonius，*Caesar* 31-2，Plutarch，*Caesar* 32，Appian，*BC* 2.35.

四 出路

是他们想要这样的，即便在我的所有伟大功业之后，我，盖乌斯·恺撒，如果不是得到了我的军队的支持，也会灭亡。

——尤利乌斯·恺撒在法萨卢斯看到敌军死尸时说的话。当时在场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记载，前1世纪末 [1]

内战的细节无须赘述，因为当时屋大维只有十三岁，没有参与内战。尤利乌斯·恺撒迅速占领了意大利。庞培或许仍然希望他的旧盟友做出让步，或许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满意。几个月前，他自吹自擂道，他只消“跺跺脚，意大利的泥土中就能崛起一支支军团和骑兵”。然而，令他的盟友垂头丧气的是，他未经一战便放弃了罗马，撤退到布隆迪西乌姆 [2] 。一位元老玩世不恭地问他，现在是不是应当开始跺脚了。他率军渡过亚得里亚海，撤到希腊北部，动用了他在东方各行省和盟邦的所有人脉，组建了一支大军和舰队。庞培已经接近六十岁，但仍然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组织天分。庞培常说：“苏拉这么干过，我为什么不行？”他指的是，苏拉曾经从希腊杀回意大利，打赢了一场内战。但拿苏拉做榜样实在不好。庞培的一些盟友开始窃窃私语，说他们打仗仅仅是为了选择哪一位独裁者统治他们而已。其他人则公开批评庞培的每一个决定。庞培自己的政治生涯打破了宪法每一条规则，如今他却成了自由共和国的捍卫者，指挥着多年来作为他死敌的贵人派。这很有讽刺意味，由此产生的联盟也是不稳定的。 [3]

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敌和希望保持中立的大多数人都害怕他会是一个真正残暴野蛮的主子，像马略和苏拉一样屠杀反对派。但他表现得非常宽大为怀，只攻击那些抵抗他的人，并饶恕所有投降的人。前49年3月，他宣布：“让我们看看，用这种办法，我们能否赢得所有人的支持，获得永久性的胜利。其他人由于残暴，未能逃脱世人的仇恨，也未

能让他们的胜利延续千秋万代。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卢基乌斯·苏拉，但我不打算效仿他。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征服，我们通过怜悯和慷慨，逐渐壮大自己。”[4]

平定意大利之后，他又挥师西班牙，迅速战胜了庞培留在那里的军队，迫使他们投降。尤利乌斯·恺撒亲自到场指挥的时候都能取胜，但他的下属没有他那样的才干，其中好几个人吃了败仗。到前48年初，他集结了足够多的船只，将部分军队运往马其顿。庞培拥有数量和资源上的优势，仍然打算效仿苏拉。尤利乌斯·恺撒的兵力较少，却已身经百战，战斗力超强，而且对统帅赤胆忠心。他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就将兵力超过他的敌军封锁在狄拉奇乌姆[5]并迫使其屈服，但庞培突破了他的包围圈。恺撒军队撤退了，庞培军队紧随其后，显赫的元老们不断催促庞培迅速打赢战争，并且已经在为预期获得的战利品而争吵。前48年8月9日，在法萨卢斯，庞培发起挑战，尤利乌斯·恺撒非常高兴地应战了。庞培的作战计划很稳健，但不是很高明。他将全部赌注押在骑兵身上，因为他的骑兵兵力是恺撒的七倍。尤利乌斯·恺撒猜到了对方的意图，采取反制措施，随后他的老兵们将缺乏经验的庞培军队及其外国辅助部队杀得血流成河。[6]

罗马贵族只要保持勇气、拒绝承认永久性失败并重整旗鼓赢得下一次战役，那么就算吃了败仗也会得到原谅。庞培却彻底丧了胆，在战役结束前就逃走了，最后逃到了埃及。埃及的孩童国王托勒密十三世的谋臣下令杀死了庞培，希望借此讨得胜利者的欢心。庞培的死对尤利乌斯·恺撒来说本应是极大的便利，但当他追击赶到并看到自己前女婿的首级时，却表现出了对谋杀犯的厌恶和愤怒。恺撒的军队因为吸收了数万名庞培军队的俘虏而力量大增，他急需现金来发军饷，于是干预了埃及事务，很快卷入了埃及内战。年轻的国王与他的姐姐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争夺王位。规模不大的罗马军队很快遭到围攻，在一番苦战之后，援军才抵达，最终击败了敌人。尤利乌斯·恺撒在埃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很多人觉得他在那里待得太久了），和情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起在尼罗河上观光。与此同时，庞培军队重整旗鼓，加图的钢铁意志帮助他们在阿非利加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尤利乌斯·恺撒终于离开埃及，在亚细亚击溃了米特里达梯六世的儿子指挥的一支军队，于秋季短暂地返回意大利，然后渡海来到阿非利加。前46年4月6日，他在塔普苏斯打败了庞培军队。加图宁愿自杀也不投降接受敌人的怜悯。内战还没有结束。庞培的长子格奈乌斯在西班牙征募了一支军队，于是尤利乌斯·恺撒很快离开罗马，再次征战。前45年3月17日的蒙达战役是最后的决战，非常凶残和激烈，但最后高卢战争的老兵们赢得了胜利。[7]

混战中的世界

到内战时期，屋大维待在母亲身边，在继父菲利普斯家中生活。他的外祖母尤利娅于前51年去世，外祖父可能在之前的几年里辞世。在恺撒的女儿尤利娅的葬礼上，年仅十二岁的屋大维发表了悼念演说，并得到了赞扬。贵族的葬礼是非常公开化的事件，首先在广场举行一场仪式，然后在城外游行、火葬。葬礼上不仅可以颂扬死者，还可以展示所有先辈的功业。在最宏大的葬礼上，死者家族要雇用演员，让演员穿戴家族历史上曾经担任高位的所有先辈的官服，佩戴他们的葬礼面具，这是一种纪念往昔荣耀的可视化方式。一般会让年轻一代发表悼词，将他与曾经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暗示着他在将来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就。[8]

这是小屋大维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与著名的（目前也是非常有争议的）舅公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从其他方面看，他不过是诸多骑马出行、在公共场所锻炼、与同龄人会面和竞争的贵族少年之一。据说菲利普斯非常热心地监督继子的成长，屋大维很有可能在菲利普斯外出办事和参加公共集会与元老院会议时跟随他。菲利普斯和阿提娅每天询问屋大维的教师与辅导老师们，他做了什么，取得了怎样的进步。多年后，阿提娅被奉为罗马母亲的理想化典型：

> 在美好的往昔，所有人的儿子，只要是合法婚生的，都不是在雇佣乳娘的房间里长大，而是在母亲怀中和膝下成长。而母亲能够得到的最高颂扬就是，她持家有方，全身心奉献给孩子……在这样一位母亲面前，任何人胆敢口出恶言，或者胡作非为，都是极大的冒犯。她不仅要严格遵守宗教的要求、勤勤恳恳地照料年幼的儿女，还要管理他们的娱乐和游戏。我们得知，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和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就是以这种精神培养自己的儿子的，这几位母亲就是这样养育了她们君王一般尊贵的孩子。[9]

母亲应当是权威人物，可能会与孩子十分疏离，孩子们需要顺从家庭与国家的要求，赢得母亲的赞许。[10] 内战开始的时候，阿提娅和菲利普斯觉得罗马可能会很危险，于是将少年屋大维送到他继父的别墅之一。我们知道菲利普斯拥有至少两栋别墅，一座在普泰奥利[11]，一座在阿斯图拉附近（在海边，离罗马更近），但可能还有其他别墅。菲利普斯不肯明确地支持内战的任何一方。屋大维娅的丈夫马凯鲁斯也是这样，尽管他在几周前还向庞培送上宝剑。尤利乌斯·恺撒宣布，他将尊重这样的中立人士，只会攻击那些与他为敌的人。而自命为法律与共和国捍卫者的庞培派，却威胁要将任何不支持他们的人视为敌人。[12]

我们不知道长辈们在何时觉得屋大维可以安全返回罗马了。前47年底时他肯定在罗马。10月18日，他正式接受了成年礼。孩子在什么年龄接受成年礼，并无定规，一般是14～16岁。此时屋大维的16岁生日已经过去了几周。婴儿时戴在脖子上的护身符终于被取下，他第一次接受剃须修面，并将头发剪短。男孩可以留长长的、蓬乱的头发，但成年公民应当留较短的、整洁的发型。男孩穿的是镶紫边的托加长袍，只有男孩和行政长官可以穿这种长袍。屋大维现在换上了成年人穿的朴素托加，以显示自己的新地位。苏埃托尼乌斯讲了一个预示屋大维前程的故事，声称在脱下孩童托加袍的时候，他的上衣撕裂了，掉落到脚踝处。这象征着行政长官和元老院终有一日将屈服于他。和其他情况一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是不是后人捏造的。家中仪式结束之后，新的成年人还要在男性亲属及家族朋友的陪伴下，走过城市中心，

通过广场，登上卡比托利欧山[13]，在朱庇特神庙中献祭，为青春女神尤文塔斯[14]献上祭品。[15]

尤利乌斯·恺撒很可能亲自到场，见证甥孙生命中这个重要的时刻。他于9月底从东方回到意大利，但随后要组织去往阿非利加的远征，还要平定军团士兵的一场哗变（在他长期远离意大利期间，这些士兵开始焦躁不安）、举行选举，然后于10月中旬去往西西里岛。或许他太忙碌，没有参加屋大维的成年礼，但他对这个十六岁少年已经表现出了兴趣。法萨卢斯战役中，一位庞培派领导人死亡，于是大祭司团出现了一个空缺。尤利乌斯·恺撒正式推荐他的甥孙为候选人，选民果然按照他的意思，选举屋大维为大祭司。[16]

屋大维虽然已经正式成年，并且成为罗马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但仍然在菲利普斯家中生活，阿提娅依旧管制着儿子的生活和教育。大家觉得他是个少见的帅小伙。他的头发有一点卷曲，带有淡淡的金色，不过对头发颜色的类似描述很难评判，或许仅仅表示他的头发不是黑色，而是有一些褐色。他的牙齿小，牙缝比一般情况要大；他晚年时蛀牙很严重，但年轻时的牙齿肯定要好一些。他的面色不是非常明显的黧黑，也不是特别白皙。他的动作优雅，躯干和四肢比例恰到好处，所以看上去比实际情况要高。他的一名释奴后来声称，屋大维成年后的身高超过5英尺6英寸（按照较小的罗马计算方法，是5尺9寸），不过这个数字可能高估了。屋大维显然自认为矮小，所以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穿着厚底鞋，以便显得高大一些。[17]

尤利乌斯·恺撒非常魁梧，目光炯炯有神。屋大维在身高方面比不上舅公，但觉得自己的目光和他一样犀利。罗马贵族子弟在成长过程中，就养成了对自己家族重要性的极高观感。屋大维特别自信，据说很小的时候就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一群朋友。为他立传的“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后来声称，屋大维还引起了一些欲望旺盛的成熟妇人的注意。

为了隐藏自己的魅力，他在可能被外人看到的繁忙时间较少抛头露面，甚至仅在夜间去神庙。罗马贵族女性和她们的兄弟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但不能从政，被作为巩固或打破政治联盟的工具，被安排嫁人或离婚。因此，有许多百无聊赖的元老夫人，她们的丈夫要么不在罗马，要么虽然在罗马但对她们兴趣不大。克洛狄乌斯的几个姐姐因为不守妇道和生活放荡，常常成为流言蜚语的主角。其中之一就是诗人卡图卢斯笔下的“莱斯比娅”。卡图卢斯曾爱过她，被她离弃后就由爱生恨。尤利乌斯·恺撒的下属之一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母亲就是一位风流成性的妇人，一位元老用这样多彩的语言描绘她：

> 其中有塞姆普罗尼娅……出身高贵，非常美丽，就像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一样得到命运恩宠；她饱读希腊和拉丁文学，擅长演奏里拉琴，舞姿优美（体面的妇女不应有这样高超的舞艺），还拥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天赋，注定会生活得多姿多彩。但她却视自己的荣誉和贞洁如粪土。很难说她在金钱和贞操中更看轻哪一个。她性欲旺盛，经常追逐男人，而不是被男人追逐……她常常背弃诺言、拖欠债款和参与谋杀。她囊中羞涩，却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因此走上了一条疯狂的道路。即便如此，她仍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会写诗、打趣，能够端庄地、温柔地或者放荡地与人交谈；总的来讲，她有许多突出的天赋和魅力。[18]

据说年轻的屋大维抵御住了这些高贵的狐狸精的诱惑。但贵族少年与他们的姐妹不同，在性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由。罗马有很多妓院，也有众多高档次的交际花，男人们要绞尽脑汁、一掷千金地追求和包养她们。当时，马克·安东尼与一个叫作西塞莉丝的哑剧演员有私情。尤利乌斯·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安东尼担任他在意大利的代表，带着西塞莉丝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罗马是个奴隶制社会，人被当成财产。如果一名奴隶被主人看中，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去抵抗主人的肉欲。[19]

屋大维去西班牙参加了讨伐格奈乌斯·庞培的战役，但因为患病，到西班牙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即便如此，尤利乌斯·恺撒仍然欢迎他的到来，对他特别热情。返回罗马后，屋大维离开了菲利普斯家，在附近

的一套公寓住下。许多富人区拥有大型公寓楼，富家子弟在结婚和获得自己的宅邸之前常常租住这种公寓楼。十七岁的屋大维仍然将大量时间用于与母亲和继父相处，不过有时也设宴招待朋友。有些朋友后来声称，屋大维在一整年的时间里完全禁欲，因为他觉得这对他的健康，尤其是嗓子，有好处。希望从政的人至少应当拥有说得过去的演讲本领。不管屋大维禁欲的理由是什么，有意思的是，大家觉得禁欲整整一年是不同寻常的事情，不仅对年轻的罗马贵族来说不寻常，对屋大维来说算是一桩了不得的成就。[20]

独裁官

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9年只当了几天独裁官，以便主持执政官选举。他担任了前48年、前46年、前45年（这一年年初时他是唯一执政官，就像庞培在前52年那样）和前44年执政官。法萨卢斯大捷的消息传到罗马后，元老院又一次任命他为独裁官，并将他的任期增加到十二个月，这是正常时期独裁官任期的两倍（苏拉是个例外）。前46年，他被任命为任期十年的独裁官，不过每年要正式地延长任期。前44年年初的几周里，他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还获得了其他一些权力。他被任命为道德风纪长官，接管了传统上由监察官负责的工作（在最近几十年里，监察官很难发挥效力）。前45年，独裁官获得了提名随后三年的执政官和一半其他行政长官的权力，因为他计划向帕提亚人发动一次大规模远征，预计自己要离开罗马城三年时间。[21]

然而，尽管尤利乌斯·恺撒拥有极大权力，但他在罗马城待的时间非常短：除了前44年之外，他每一年都在南征北战，遇刺身亡之前还在打算出征作战。而在随后的岁月里，大量传闻和宣传也让我们很难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即便如此，独裁官仍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充沛精力，在罗马城的短时间内匆匆做了很多事情，开展了许多立法和改革工作。但我们常常很难判断，有哪些工作落实了，又有哪些仅仅是宣布了或处在计

划阶段。他肯定发动了一个向退伍军人和城市贫民分配土地的大规模项目，这是他在前59年担任执政官时的项目的延续。很多人被安置在意大利的农场上，这些土地往往是死去的庞培党羽被没收充公的产业，有的土地则是用战利品购买的。外省也建立了一些由公民组成的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殖民地位于迦太基和科林斯。

除执政官之外的行政长官的数量也增加了，所以现在每年有四十名财务官和二十名裁判官。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奖赏忠诚的追随者和近期才投奔他的前庞培派，但也有务实的理由。罗马的疆域不断扩张，需要更多行政长官来管理。尤利乌斯·恺撒还提名了更多元老，其中很多是来自意大利各城镇的地区性贵族，但也有一些人是来自西班牙和高卢各行省的公民。元老院成员人数超过了九百人，每年有新当选财务官的人进行补充，因为当选这个职位的人自动获得元老身份。[22]

庞培为罗马建造了第一座石制剧场，这是他用战利品建造的宏伟建筑群的一部分。尤利乌斯·恺撒运用从高卢获取的金钱，开始翻新战神广场上的投票场地。旧的投票围场将改用大理石铺地和筑墙，并搭建凉棚，为等待投票的公民提供荫凉。当上独裁官后，他继续这项工程，重建了元老院议政厅，并开始建造一座新广场，即尤利乌斯广场，其位置与主广场呈一定角度，其中包括一座献给他的神圣祖先维纳斯的神庙，以及更多用于公共事务和商贸活动的空间。建筑工程既为失业者提供了薪水不错的工作岗位，也能颂扬工程背后的人。罗马贵族很早就着手建造这样的纪念性工程，以宣扬自己的功业。尤利乌斯·恺撒仅仅是极大地扩大了工程的规模。[23]

新的法律管理着罗马城、意大利和各行省的生活与商贸，并对一些债台高筑的人提供援助。罗马的历法是根据月相周期计算的，一年有355天。大祭司团需要对某些年份增添闰月，才能让历法与自然季节挂钩。这种历法容易受到政治操纵，到前1世纪中叶已经严重脱离实际。

尤利乌斯·恺撒主持编纂的儒略历[24]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已经很接近，在16世纪得到了细微修改。它根据364天的太阳周期计算，每四年添加一个闰日。大祭司（包括年轻的屋大维）为前46年增添了3个闰月，于是这一年一共有446天。这样做是为了让新一年（前45年）的1月1日从太阳周期的恰当时间开始。为了歌颂尤利乌斯·恺撒，他出生的月份被更名为尤利乌斯月，即我们今天的7月（July）。[25]

这只是独裁官得到的大量荣誉和特权之一。结束阿非利加的战事回国后，尤利乌斯·恺撒举行了四次凯旋式，比庞培多一次，超过了共和国的所有其他英雄。四次凯旋式分别纪念在高卢、埃及、亚细亚和阿非利加的胜利，表面上都是战胜了外国敌人。即便如此，纪念阿非利加胜利的凯旋式上仍然有描绘庞培派领导人死亡的图画。前45年底，尤利乌斯·恺撒从西班牙返回后，公开举行了第五次凯旋式，这一次是明目张胆地庆祝在内战中战胜了罗马同胞。[26]

不过他宽大为怀的政策仍然维持了下来。虽然有些人很担心，但胜利之后的尤利乌斯·恺撒并没有露出凶残的一面，变成新的苏拉。他不准自己的支持者随意掳掠财物和杀人。他的忠诚亲信肯定得到了许多好处。尤利乌斯·恺撒曾说，哪怕是一个土匪，只要忠诚地为他效力，也会得到奖赏。他的亲信得到了元老地位、高官厚禄和行省总督职位。已死敌人的房地产被没收，但他并没有将其简单地发放给亲信。尤利乌斯·恺撒将这些房地产公开拍卖，并且坚持要求大家按照房地产在战前的市场价来全额购买，这让马克·安东尼等人大吃一惊。同样，那些希望废除现有债务的人（罗马政治中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呼声就是要求“新账本”，意思是销毁所有现存的账本，从头开始）也失望了，尤利乌斯·恺撒仅仅给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援助。[27]

屋大维也得到了一些奖赏。虽然阿非利加战役期间他实际上待在意大利，但仍然在纪念此次战役的凯旋式上得到了名义上的军事荣誉。古

老的罗马贵族在历史上已经渐渐凋零衰败，在近期的内战中更是损失惨重，于是尤利乌斯·恺撒扩大了贵族阶层。屋大维也因此获得了贵族身份。屋大维的一些亲戚朋友在内战中曾为庞培派效劳，他恳求舅公赦免这些人，独裁官同意了。屋大维得到了好几个荣誉职位，并且在公共场合得到了尤利乌斯·恺撒一定程度的关爱。除了屋大维这个甥孙之外，独裁官还有两个外甥，是他另外一个姐姐尤利娅（不是阿提娅的母亲）的儿子们。这个尤利娅在第一段婚姻中生的儿子昆图斯·佩蒂乌斯在高卢战争和内战期间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至于尤利娅在第二段婚姻中生的儿子卢基乌斯·皮纳里乌斯，我们对他不太了解，他可能才刚刚开始从政。后来有人说尤利乌斯·恺撒特别疼爱屋大维，我们很难判断这种说法是不是后人附会。前45年年底时屋大维才十八岁，太年轻，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引人注目。[28]

在这些年里春风得意的不仅仅是恺撒的忠实亲信。前44年1月1日就任裁判官的新人当中有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他们都曾为庞培效力，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后才向恺撒投降。布鲁图斯是塞维利娅的儿子，塞维利娅是加图的同母异父姐姐，也是尤利乌斯·恺撒的长期情人。布鲁图斯如今得到了威望极高的城市裁判官职位。尤利乌斯·恺撒可能已经内定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未来执政官的人选，只不过目前他们年龄还不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原先的庞培派都得到赦免，被允许结束流亡回国。前46年，尤利乌斯·恺撒允许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屋大维娅丈夫的堂兄弟，前51年担任执政官时对尤利乌斯·恺撒的攻击特别凶狠）回国，得到了西塞罗热情洋溢的赞扬。

3月15日

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统治远远谈不上严酷，他的改革很务实，一般来讲也符合国家更广泛的利益。但任何人都不应当拥有如此巨大的

权力，更不要说是永久性拥有了。苏拉比尤利乌斯·恺撒残暴得多，但苏拉掌权几年后就辞去独裁官职务，退隐回家了。因此，尤利乌斯·恺撒说苏拉“在政治上是个文盲”，并且不打算放弃对国家的主宰权。他已经五十六岁，虽然受到癫痫病的困扰，但完全可以再活上几十年。他正在筹划的帕提亚战争将给他带来体面的荣耀，因为他的敌人是外国人，他在大概三年之后回国时会获得更高的威望。[29]

尤利乌斯·恺撒实际上享有君主的权力。他获得的荣誉是曾经的伟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庞培）所得荣誉的延伸，但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先例。在所有公开场合，他坐在黄金的官方席位上，穿戴凯旋将军的托加袍和月桂花环，并被允许穿长靴和长袖上衣，据他说，这是他的上古祖先阿尔巴朗格（邻近罗马的一座城市，在罗马早期历史中是它的竞争对手）国王的装束。他的宅邸增加了三角楣饰，就像神庙那样。其他荣誉将尤利乌斯·恺撒的地位提升到与神祇非常接近的程度，不过很难确定他在世时是否已经被神化。我们可能对将活人奉为神明的做法感到震惊，但拥有多神教传统的罗马人不会很吃惊。传说中就有英雄通过功业被升格为神的故事，赞颂伟大成就为“如神一般”也是司空见惯的。[30]

有非常荒诞不经的故事在流传，称尤利乌斯·恺撒打算迁都到伊利昂，即特洛伊的地点。据传说，罗马人的祖先就是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摧毁后逃亡的特洛伊人。也有人说尤利乌斯·恺撒希望迁都到亚历山大港，或许打算与他的另一位情人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同统治和生活。前46～前44年，她两次访问了罗马，并且和她的随行人员一起居住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一座属于尤利乌斯·恺撒的别墅内。她生了一个男孩，可能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孩子。后来亚历山大港人给这个孩子取了个绰号，叫作恺撒里昂[31]。他是私生子，不是罗马公民，根据罗马法律不享有任何地位。何况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独裁官本人对这个孩子表现出了特别的关心，所以现代人的观念，即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对她的罗马情

人有着极大影响力，完全是想象。但这无法阻止更多的流言蜚语，据说有一位元老打算提一个议案，允许尤利乌斯·恺撒想娶多少妻子就娶多少，以便生孩子作为继承人。西塞罗不是独裁官的朋友，但即便他也不相信这个传闻。对于大多数传言，理智的观察者肯定都持怀疑态度，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这些故事能够流传，就印证了当时人们的恐惧和担忧。这些流言蜚语带有足够的可信成分，能被不断重复，反映了罗马精英阶层抑郁的情绪。[32]

很多传言都讲到，尤利乌斯·恺撒企图自立为王。一些群众欢呼他为国王（Rex）。Rex（雷克斯）也是一个贵族家系的姓氏。恺撒答道："我不是雷克斯，而是恺撒。"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有保民官将一座恺撒雕像头上的冠冕除去，他大发雷霆，声称他们剥夺了他拒绝这项荣誉的机会，是刻意让大家想起君主制，以诋毁他的名誉。最有名的一个事件发生在前44年2月15日的牧神节[33]，成群的祭司除了腰间围着山羊皮缠腰布之外全身赤裸，跑过大街小巷，用鞭子轻轻抽打路过的人。[34]独裁官在高台上主持节庆活动，祭司的领头人马克·安东尼在游行结束时跑到他面前，献上一顶王冠。尤利乌斯·恺撒拒绝了，群众欢呼起来。安东尼再次请求，独裁官再次拒绝。对此事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哑剧，意在一劳永逸地向群众表明，他并不想要国王的头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的目的没有达到。很快人们就说，这是一场测试，尤利乌斯·恺撒是想接受王冠的，如果围观群众表现得热情一些，他肯定就接受了。流传的另一个说法是，元老院将进行辩论，是否让恺撒成为除罗马城之外所有地区的国王。[35]

真相究竟如何，并不重要。元老们内心里知道，政局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不管尤利乌斯·恺撒是不是国王，不管他多么仁慈和高效，不管他如何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他都掌握着最高权力，实际上相当于王权。这意味着，共和国无法存在了。对罗马贵族来说，真正的共和国理应是这样的：元老阶层分享权力，指导着通过公开竞争选出的行政长

官，并且行政长官的人选定期更换，便于更多的人有机会当上高官、获得利益。这才是自由。就连一贯支持恺撒的人士也觉得，如今自由已经不复存在。

独裁官本人的态度也无助于缓和紧张的气氛。尤利乌斯·恺撒在罗马待的时间很短，要做的事情又太多，多年南征北战让他十分疲惫，而且惯于发号施令，对那些不如他精力充沛的人常常表现出不耐烦，所以他经常显得不够审慎。他辞去了前45年的执政官职位，让两个人接替他。12月31日这天，其中一名执政官突然去世，于是尤利乌斯·恺撒匆匆将原本正在进行立法工作的会议改为选举执政官的投票表决会议，将他的另一名亲信选为执政官，此人的任期只有当天余下的几个小时。西塞罗开玩笑说："卡尼尼乌斯担任执政官期间，没有人吃午饭。但在他任上没有发生任何坏事，因为他的尽忠职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在他整个执政官任期上，他从来没有睡过觉。"但私下里，西塞罗觉得此事是莫大的悲剧，足以让任何人流泪。在尤利乌斯·恺撒的恩泽佑护下当上裁判官和财务官的人们对他很感激，但同时也哀叹，他大大增加了这些职位的数量，它们贬值了。[36]

"共和国不过是个虚名，没有实质，没有形态。"据说独裁官曾有过这样的言论。如今，国家大事的决策都是由尤利乌斯·恺撒及其谋士闭门做出的，处理了内战的纷扰和之前多年行政混乱积压的大量事务和问题。尤利乌斯·恺撒的决定通常是很合理的，但问题不在这里。通常他假装自己的命令是元老院发布的，将其伪装成正当程序。西塞罗惊讶地发现，外省的一些社区写信给他，感谢他在元老院会议（其实根本没有这些会议，尤利乌斯·恺撒甚至编造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上投票支持他们的请愿，授予他们某些特权。马克·安东尼（与尤利乌斯·恺撒一同担任前44年执政官）带领一群元老向他奉上新的荣誉时，独裁官仍然继续处理公务，没有起身问候他们。从技术上讲，他作为独裁官，比执政官的地位更高，所以完全可以坐着不动，但很多元老感觉自己受到了

侮辱。尤利乌斯·恺撒在观看公共比赛时还按照自己的一贯做法，同时向多名书记员口述信件，始终忙于政务。这让群众不高兴，因为群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欣赏他所提供的奢华盛景。尤利乌斯·恺撒似乎始终行色匆匆，没有时间去讨好元老和群众。[37]

群众的不满很快就消退了，但许多贵族的怨恨还在。独裁官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据西塞罗后来回忆，尤利乌斯·恺撒哀伤地说："连马尔库斯·西塞罗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时来见我，而是需要坐下来等待。我难道还要去怀疑世人多么憎恶我吗？西塞罗是那样性情随和的人，但我毫不怀疑，他一定恨我。"他的另外一句话"我活得已经足够久了，也得到了足够多的荣耀"则表达出听天由命、身心俱疲的意味。他决心让罗马及其帝国基业高效运转，这决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他似乎期望别人能够认识到，他必须这么做。独裁官估计，如果他突然死亡或被杀，就会爆发新的内战，并且认为其他人也应当有足够的理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让他活下去才是有利于大局的做法。他决心表现出自信，或者是由于非常自满，于是解散了由西班牙武士组成的卫队。元老院投票决定为他组建一支由元老和骑士组成的新卫队，但始终没有落实。尤利乌斯·恺撒徒步或者乘轿穿过大街小巷，在公共场所处理政务，并参加元老院会议。他在罗马的时候，人们是很容易接近他的，但一旦他离开罗马远征帕提亚，就很难再接近他了。[38]

就是这个原因促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领导的一群元老采取行动。我们无须明确介绍尤利乌斯·恺撒在这几个月里的具体权力，更不用询问他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他的权力地位与共和国是无法共存的，要想恢复共和国，就必须除掉他。密谋者包括好几个恺撒派的主要人物，以及一些先前的庞培派。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曾担任前45年执政官，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的堂兄弟）曾在高卢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担任前45年裁判官，并被独裁官内定为他远征帕提亚期间的执政官之一（他的母亲就是上文提到的、

被撒路斯提乌斯[39]冷嘲热讽的塞姆普罗尼娅）。这些主谋分子在当前政权下其实混得不错，但仍然怨恨一个人独揽大权，不管他是谁。

这种政治上的动机是最重要的。公平地说，独裁官死了之后，这些密谋者会成为共和国的领导人，仕途发展至少会和以往一样顺利，或者好得多。这些人是罗马贵族，从小就被教育得雄心勃勃，至少有一些人受到了著名的希腊义士刺杀暴君故事的激励。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还是加图的外甥，却向尤利乌斯·恺撒投降，并在他手下飞黄腾达。他的舅舅宁愿用剑自杀，也不愿意接受胜利者的垂怜。这种自杀手段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加图用剑刺伤自己之后并没有死，他的儿子传来了医生，包扎了伤口。其他人离开后，加图便撕开缝好的伤口，掏出内脏，以这种非常痛苦和恐怖的方式死去了。他素来擅长将自己的对手描绘为残暴的压迫者，这种死法也是对敌人的控诉。内疚让布鲁图斯愈发崇拜自己死去的舅舅，不仅撰写了一部歌颂他的传记，还休了自己的妻子，以便与加图的女儿、毕布路斯的遗孀结婚。[40]

西塞罗也写了一部《加图传》，赞扬加图，但语调比较温和。尤利乌斯·恺撒写了一部言辞激烈的《反加图传》，作为对布鲁图斯和西塞罗著作的回应，这符合罗马的传统，用骇人听闻的恶言攻击加图，但仅此而已，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前45年初，卡西乌斯称尤利乌斯·恺撒为“仁慈的旧主人”，更愿意支持他，而不是凶神恶煞的格奈乌斯·庞培。不管尤利乌斯·恺撒多么“仁慈”，毕竟是他们的“主人”，这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密谋者没有用誓言来互相约束。秘密起誓被认为是非常阴险的事情，喀提林党人就曾经这么做过。在公开场合，所有元老都曾宣誓要保卫尤利乌斯·恺撒。[41]

3月15日，尤利乌斯·恺撒去参加一次元老院会议，地点是庞培剧场建筑群中的一座神庙。一队属于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角斗士待在附近，他们即将参加近期在那里举行的一些竞技比赛。独裁官身边没有保

镖。特雷博尼乌斯将马克·安东尼拉到一边，在室外一直和他说话。安东尼是恺撒的同僚执政官，会坐在他旁边。安东尼非常健壮和勇敢，很可能会拼命抵抗。在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的敦促下，密谋者决定只杀独裁官一人。

密谋者以有事相求为借口，将尤利乌斯·恺撒团团围住，其中一人突然从背后刺他。独裁官大吃一惊，然后愤怒起来，拔出自己长长的笔[42] 作为武器，将笔尖刺向对方。密谋者围着他，用刀子疯狂刺他。在混乱中，布鲁图斯大腿受伤，另外一人被同伙的刀子刺伤。尤利乌斯·恺撒倒了下去，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他身上有二十三处伤，不过后来据说只有其中一处是致命伤。他只剩下一点点力气，拉起自己的托加袍遮住面部，这是维护自己仪容的最后努力。[43]

独裁官已经死了，共和国得到自由了。布鲁图斯呼喊西塞罗的名字，其他密谋者高呼自由已经恢复。在一旁观看的元老，包括西塞罗，全都惊慌失措，拔腿就跑。他们害怕发生更普遍的暴力冲突。在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角斗士护卫下，密谋者来到卡比托利欧山。罗马城的民众被他们的举动惊得呆若木鸡，但他们或许已经意识到，群众的情绪表明他们并没有得到支持。大多数群众仍然对尤利乌斯·恺撒很忠诚，毕竟他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这是历代元老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的。密谋者幻想中的、万分渴望的那个共和国早就不能正常运作了。

几周后，一位叫作马提乌斯的元老（他是坚定的恺撒派，尽管他也不喜欢恺撒的独裁）在给西塞罗的信中忧郁地写道，假如尤利乌斯·恺撒“那样的天才都找不到出路，那么谁能做到”？[44]

---

[1] Quoted in Suetonius，*Caesar* 30.4.

[2] 今天的布林迪西，在意大利南部。

[3] 庞培关于跺脚的吹嘘，见Plutarch，*Pompey* 57，60；“苏拉这么干过”，见Cicero，*ad Att*

.9.10.3；对这些战役的叙述，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p.380-471（2007），pp.461-574。

[4] Cicero，*ad Att* .9.7C.

[5] 今天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

[6] 关于这些战役，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p.380-431 =（2007），pp.461-524。

[7] 关于罗马指挥官的行为，见N.Rosenstein，*Imperatores Victi*（1993），pp.114-51；对庞培之死和尤利乌斯·恺撒在埃及的详细叙述，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167-81。

[8] Suetonius，*Augustus* 8.1，Nicolaus of Damascus 3；关于葬礼，见Polybius 6.53.1-54.6的著名叙述。

[9] Tacitus，*Dialogues* 28.6（Loeb translation），p.307.

[10] Nicolaus of Damascus 3，Velleius Paterculus 2.59.3；对母亲和母亲角色的更广泛讨论，见S.Dixon，*The Roman Mother*（1988），pp.104-40，esp.129-35。

[11] 今天的波佐利，意大利南部城市。

[12] Nicolaus of Damascus 4；Cicero，*ad Att* .12.16，12.18，14.11提及菲利普斯的别墅；马凯鲁斯的中立，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62。

[13] 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是罗马城七座山丘中最高的一座，在广场附近，是重要的宗教与政治中心。美国国会大厦所在的“国会山”（Capitol Hill）就得名自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

[14] 尤文塔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青春女神，是大神朱庇特和天后朱诺所生的女儿，对应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赫拉的女儿赫柏。尤文塔斯拥有少女般的青春和活力，在奥林匹斯圣山的神宴上侍候诸神，专门给他们斟酒。她的双耳壶中盛有的长生不老酒拥有恢复青春美貌的神力。同时尤文塔斯还是青少年的守护神，所有罗马少年在即将成年之时都要前往神庙，祈求尤文塔斯的庇佑。

[15] Suetonius，*Augustus* 8.1，94.10，Dio 45.1.5-6，Nicolaus of Damascus 4；关于穿上成年托加袍的仪式，见B.Rawson，*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2003），pp.142-4，关于向青春女神尤文塔斯献祭，见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4.15.5。

[16] 当选祭司，见Nicolaus of Damascus 4，Cicero，*Philippics* 5.17.46，Velleius Paterculus 2.59.3。

[17] Suetonius，*Augustus* 79.1-2.

[18] Sallust，*Bell Cat* .25.

[19] 尤利乌斯·恺撒的相貌，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45.1，屋大维的眼睛，见Suetonius，*Augustus* 79.2。性道德与屋大维，见Nicolaus of Damascus 5，15；古罗马有大量关于性的文学作品，而且往往很有现代色彩，见P.Grimal（trans.A.Train），*Love in Ancient Rome*（1986）；安东尼与西塞莉丝，见Cicero，*ad Att* .10.10，*Philippics* 2.58，*ad Fam* .9.26.Serv.On E10；*de vir.Ill* .82.2，Plutarch，*Antony* 6，9。西塞罗在*Philippics* 2.58，69，77中表达了对她的憎恶；见P.Grimal（trans.A.Train），*Love in Ancient Rome*（1986），pp.222-37；关于莱斯比娅其实是克洛狄乌斯的姐妹之一，见Apuleius，*Apologia* .10。

[20] Suetonius，*Augustus* 8.1，Velleius Paterculus 2.59.3，Nicolaus of Damascus 10-13，15.

[21] 对尤利乌斯·恺撒担任独裁官时期的介绍，见J.Gardner，'The Dictator'，in M.Griffin（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2009），pp.57-71，细节详见M.Gelzer（trans.P.Needham），*Caesar*（1968），pp.272-333，C.Meier（trans.D.McLintock），*Caesar*（1996），pp.430-96。

[22] 见E.Rawson，'Civil War and dictatorship' in *CAH2* IX，pp.438-67，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61-96讲到了恺撒党人和他的新元老们。

[23] Cicero，*ad Att* .4.16.3，8，17.7，Suetonius，*Caesar* 26.2，Pliny，*NH* 36.103，with Rawson in *CAH2* IX，pp.453-4.

[24] "儒略"是恺撒的名字尤利乌斯的旧译。

[25] Suetonius，*Caesar* 44.2，Pliny，*NH* 18.211，Plutarch，*Caesar* 59，Macrobius，*Saturnalia* 1.14.2-3，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Vol.III（1923），pp.285-7，M.Gelzer（trans.P.Needham），*Caesar*（1968），p.289，及Z.Yavetz，*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1983），pp.111-14.

[26] 关于凯旋式，见Dio 43.19.1-21.4，42.3，44.1-3，Appian，*BC* 2.101-2，Plutarch，*Caesar* 55，Suetonius，*Caesar* 37，Pliny，*NH* 7.92，Cicero，*Philippics* 14.23；相关评论也见M.Gelzer，*Caesar*（1968），pp.284-6，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Vol.III（1923），pp.279-81，概况见S.Weinstock，*Divus Julius*（1971），尤见pp.76-7。

[27] 尤利乌斯·恺撒说，哪怕是一个土匪，只要忠诚地为他效力，他也会奖赏他，见Suetonius，*Augustu* s 72；关于他的负债和奖赏追随者，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183-90。

[28] Suetonius，*Augustus* 8.1，41.1，Nicolaus of Damascus 6-15，Dio 43.47.3，Tacitus，*Ann*

.11.25.2，注意R.Billows，*Julius Caesar*：*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pp.256-8 的评论，以及他对屋大维和外甥们的态度。

[29] Suetonius，*Julius Caesar* 77.

[30]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计划，对比E.Rawson，‘Caesar’s Heritage：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JRS* 65（1975），pp.148-59，R.Carson，‘Caesar and the monarchy’，*Greece & Rome* 4（1957），pp.46-53，和J.Collins，‘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Historia* 4（1957），pp.445-65。

[31] 意思是“小恺撒”。

[32] 关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真正重要性，见E.Gruen，‘Cleopatrain Rome.Fact and Fantasies’，in D.Braund & C.Gill（eds），*Myths*，*Historyand Culture in Republican Rome*：*Studies in honour of T.P.Wiseman* （2003），pp.257-74，更多概况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192-203；允许尤利乌斯·恺撒多娶妻的故事，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52.3。

[33] 牧神节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节日，起源可能在罗马建城之前，时间是每年2月13日至15日，是春季驱逐恶灵、净化城市的节庆，纪念牧神和抚育罗马创始人罗慕路斯与雷穆斯的母狼。

[34] 如果被鞭子打到，是非常幸运的，尤其对那些求子心切的妇女或希望顺利生产的孕妇来说。

[35] “不是雷克斯，而是恺撒”，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79.2；牧神节，见Dio 44.11.1-3，Appian，*BC* 2.109，Plutarch，*Caesar* 61，Antony 12，Cicero，*Philippics* 2.84-7，*de divinatione* 1.52，119，Suetonius，*Caesar* 79.2-3。J.North，‘Caesar at the Lupercalia，’ *JRS* 98（2008），pp.144-60有力地论证了，此事不是尤利乌斯·恺撒为了当国王而安排的；即便是他安排的，也是为了非常公开地拒绝；另见Weinstock（1971），pp.318-41。

[36] Suetonius，*Caesar* 41.2，76.2，80.3，Dio 43.46.2-4，Plutarch，*Caesar* 58，Pliny *NH* 7.181，Cicero，*ad Fam* .7.30.1-2，M.Gelzer，*Caesar* （1968），p.309，310-11，和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Vol.Ⅲ（1923），pp.328-30。

[37] Suetonius，*Caesar* 77；西塞罗莫名得到外省居民的感谢，见Cicero，*ad Fam* .9.15.4；竞技会上的表现，见Suetonius，*Augustus* 45.1。

[38] “我活得已经足够久”见Cicero，*pro Marcello* 8，25；‘he hates me’，Cicero，*ad Att* .14.1。

[39]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前86～约前35年），古罗马史学家、政治家和来自

外省平民家庭的“新人”。他终生反对门阀贵族势力，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主要作品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他在担任阿非利加总督期间强取豪夺，大发横财。

[40] 关于密谋者，见M.Gelzer，*Caesar* （1968），pp.323-9，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44-5，56-60，64，95，A.Lintott，‘The assassination’，in M.Griffin（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 （2009），pp.72-82，也见Suetonius，*Caesar* 83.2，Dio 43.47.3，44.11.4-14.4，Appian，*BC* 2.111-14，3.98，Plutarch，*Antony* 13，*Brutus* 6-13，*Caesar* 62，Suetonius，*Caesar* 80.1，3-4，Velleius Paterculus 2.58.1-4；关于Cato自杀见Dio 43.10.1-13.4，Appian，*BC* 2.98-9，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6.4，59.1-73.1。

[41] 引自西塞罗的话，见*ad Fam* .15.19.4；赞美加图的著作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反加图传》，见Cicero，*ad Att* .12.21.1，13.40.1，46，51.1，*Orator* 10，35，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11.1-4，25.1-5，73.4，*Cicero* 39.2，*Caesar* 3.2，Suetonius，*Caesar* 56.5，with M.Gelzer，*Caesar* （1968），pp.301-4，T.Rice Holmes，*The Roman Republic* Vol.Ⅲ（1923），p.311和D.Stockton，*Cicero* （1971），p.138；元老们宣誓保卫尤利乌斯·恺撒，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84.2；密谋者不受誓言约束，见Plutarch，*Brutus* 12，与喀提林党人不同，见Sallust，*Bell.Cat* .22.1-2。

[42] 这个时期罗马的笔一般是金属制的，在蜡板上写字。

[43] 刺杀，见Plutarch，*Caesar* 66，*Brutus* 17，*Antony* 13，Dio 44.19.1-5，Appian，*BC* 2.117，Suetonius，*Caesar* 82.1-3。

[44] 盖乌斯·马提乌斯的话，见Cicero，*ad Att* .14.1。

第二部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前44～前38年

后来，根据他舅公的遗嘱……他开始自称为盖乌斯·恺撒。

——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7.2

五 继承人

屋大维阿努斯……很有头脑，很有活力，他很可能对我们的英雄们（刺杀恺撒的密谋者）示好。但我们对他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呢，毕竟他是这个年纪，有这样的姓名，继承了这样的遗产，经历过这样的教育。我在阿斯图拉遇见了他的继父，他觉得绝对不能信任屋大维阿努斯。即便如此，我们必须注意他，至少要让他远离安东尼。

——西塞罗，前44年6月[1]

3月15日这天，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离罗马很远，因为前45年年底时独裁官送他去国外深造。贵族子弟常常为担任行省总督的亲戚或家族友人效力，作为他们的“帐篷伙伴”。他们与总督及其幕僚一起生活，观察总督的一举一动，就像他们在家时观察亲戚在广场的活动一样。尤利乌斯·恺撒打算带屋大维一起远征帕提亚，希望让他历练一番，积攒经验。于是这个年轻人被派往马其顿，那里有6个军团和相当规模的辅助部队[2]在为东方的战争做准备。尤利乌斯·恺撒为了给克拉苏报仇雪恨，正在集结大军，马其顿的部队只是其中一部分，但马其顿离意大利较近，很方便，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在希腊。在接受军事训练的同时，屋大维也不能忽略政治技能，因为军事和政治是公共生活的两大支柱。希腊的修辞学教师享有盛誉，年轻的罗马贵族常去希腊学习。[3]

四个月里，屋大维和一群朋友与侍从居住在马其顿西海岸的阿波罗尼亚[4]。这座城市的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在艾格纳提乌斯大道[5]沿线，这条宏伟的罗马大道是在前2世纪建造的，横亘希腊半岛，一直通到爱琴海畔。阿波罗尼亚曾经受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慷慨善待，因此很欢迎他的甥孙。冬季，屋大维接受了嗓音训练，练习演讲，观察军队的操练与锻炼，并参与其中。除了和罗马军团一起训练之外，他还与由非公民组成的骑兵队一起训练，因为年轻贵族常担任这种单位的指挥官。在针对帕提亚国王骑兵部队的战斗中，罗马的骑兵有可能起到关键作

用。[6]

消息穿过亚得里亚海需要时间，所以直到3月底，屋大维母亲的一封家书才送到他手中。这封信很可能是由家中的一名仆人或与他们家有某种联系的人送来的。阿提娅很可能是在3月15日当天写信的，因为她在信中只讲到了恺撒遇刺的基本事实。书信始终只是信息的一部分，信使常常要补充细节和解释，但这名信使并不知道更多情况。他在拿到信后立刻离开了罗马，并且十万火急地赶来，所以并不知道3月1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和阿提娅一样，他只能描述人们的震惊和惶惑，以及害怕发生更多暴力冲突，因为死去的独裁官的亲戚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屋大维的母亲敦促他立刻返回意大利，并尽量保持低调。

这个年轻人以罗马人的恰当方式接受了这个噩耗，在一次临时举行的会议（就是为行政长官和行省总督出谋划策的会议）上征求伙伴的建议。在场的人中我们知道名字的有昆图斯·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和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他们都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与屋大维维持着关系。这两人的背景与屋大维的父亲相仿，属于意大利城镇的当地士绅。萨尔维迪努斯的年纪可能大一些，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差不多同龄，可能从小时候就与屋大维一起接受教育。[7]

独裁官的死讯传开之后，驻扎在附近的各军团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前来拜访屋大维，表达自己的同情和对刺客的愤怒，并表示支持他。有人说，这些军人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指挥、进军罗马，这可能是后来的夸张说法。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善意。驻扎在马其顿的全部6个军团都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8年的法萨卢斯战役之后组建的，每一名军官的最初任命和后来的晋升都要感谢独裁官的批准。有些军官可能在此之前就在不同的军团为他效力。尤利乌斯·恺撒过去给他们的好处让他们感恩戴德，同时他们也热切期望在将来得到丰厚的赏赐。在东方的战争以利润丰厚而闻名，该地区的富庶国家里有大量战利品。世人皆知

尤利乌斯·恺撒是个幸运的将军，从来没有输掉一场战争，并且在分享战利品时特别慷慨大方。除了军人之外，阿波罗尼亚城的代表也前来吊唁，并保障屋大维的安全。[8]

罗马贵族理应征询他人的建议，但随后就要自行斟酌并做出决定。屋大维决定不再等待传来更多消息，而是立刻渡海前往意大利，安排了运载他一行人及其侍从的船只。他可能先在卡拉布里亚沿海的一个偏僻地点停靠，然后在大港口布隆迪西乌姆（今天的布林迪西）正式登陆。很快，他就了解到罗马当前的局势。[9]

在刺杀最初造成的震惊情绪消退之后，一些元老赞扬了密谋者，但广大群众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布鲁图斯等人的演讲无人响应，分配金钱也拉拢不到人。后来的历史学家阿庇安辛辣地讽刺道，密谋者竟然希望一群可以被金钱收买的选民响应他们捍卫自由的口号。密谋者没有采取行动，于是失去了主动权。3月17日，安东尼以执政官的身份召集元老院开会。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他人一些人感到不安全，不敢参加，留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在漫长的辩论之后，西塞罗提出的一项动议被绝大多数人通过，赦免了密谋者，但认可尤利乌斯·恺撒的所有决定与举措。这个妥协虽然不符逻辑，却是必需的。大多数行政长官都是独裁官任命的，如果他的决定无效，那么这些人（包括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安东尼）就不能合法地占据官职。同样，如果他的举措是不合法的，那么就没有一个行省总督是合法的，近期的全部法律也没有效力，分配给退伍军人和其他定居者的土地就不再是他们的财产。复苏的共和国极有可能立刻陷入混乱，因此只能等待新的选举，对每一项命令和法律进行重新裁决。

尤利乌斯·恺撒的岳父提出动议，为他举办了公开葬礼。葬礼地点在广场的中心位置，时间最可能是在3月20日，由安东尼主持并致悼词。他究竟说了多久，具体说了些什么，各方面史料众说纷纭，但对演

讲结果的记述是一致的。安东尼向群众展示了独裁官死前穿的袍子，它被刀子割裂了，还沾着血迹。人们用蜡做了一尊恺撒像，展示他的二十三处伤口。人们用剧场使用的那种吊车将蜡像吊起来，旋转着向群众展示。安东尼宣读了独裁官的遗嘱，包括将他在台伯河附近的广阔花园改为公园，以及给每一位公民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即75迪纳厄斯[10]）的赠礼，他过去也曾这样馈赠公民。遗嘱还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立为第二继承人，群众听到这里，表达了对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憎恶。愤怒的群众很快沸腾，开始攻击密谋者及其同情者的房屋。一位叫作秦纳的保民官（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密友）被暴民杀害，他们误以为他是那个也叫秦纳的密谋者。就像群众喜爱的另一位英雄克洛狄乌斯一样，尤利乌斯·恺撒的遗体也在广场上被火化。长凳和其他可燃物被堆起来形成火葬堆。对密谋者来说，罗马城已经不再安全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全都离开了罗马。[11]

尤利乌斯·恺撒的遗嘱还将盖乌斯·屋大维立为继承人，将独裁官庞大家产的四分之三都传给了他，不过有一个算是相当常见的条件，即要求遗产受赠人改用尤利乌斯·恺撒的姓氏。遗嘱是前45年9月15日独裁官从西班牙战役返回后拟定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屋大维或他的任何直系亲属知道遗嘱的内容。尤利乌斯·恺撒显然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比自己的两个外甥都更有才干。但我们必须记住，尤利乌斯·恺撒在立遗嘱时并不认为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西塞罗后来宣称，独裁官在东方战争中将一去不复返，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看法很普遍，或者很可能成为现实。而且也完全不能确定，屋大维一定比他的舅公活得更久，因为这个年轻人在前45年就患过重病，所以才没有及时赶到西班牙，何况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健壮。如果这个年轻人经受住了鞍马劳顿，躲过了帕提亚人的箭矢，并且持续表现出才华，那么尤利乌斯·恺撒也许会给他更多的公开认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不可能知道独裁官的长期计划是什么。[12]

罗马人非常重视收养关系，养子在各方面都与亲生儿子享有完全相同的权益，此外还拥有自己血亲家族的宝贵人脉。这种完全的收养必须在养父在世时进行，他死后就不能进行收养。正因如此，学术界出现了漫长而非常复杂的辩论，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遗嘱究竟给了屋大维何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争论没有抓住重点。屋大维是他舅公财产的主要继承人，还将改用他的姓氏。尤利乌斯·恺撒的权力、官职和荣誉都是授予他本人的，不是可以世袭的财产。但他是一位元老，恢复了自己家族的威望，并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接受了尤利乌斯·恺撒家产与姓氏的年轻人必然也会前程远大，有希望将家族的政治成就延续下去。他当然不一定很快就取得成功，但过一段时间到了合适的年龄之后，他就理应进入政界，为恺撒之名获得新的荣耀。

如果屋大维接受了遗产（因为继承财产不是强制性的，受赠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接受，我们知道有些人曾拒绝接受遗产），那么他不仅继承了舅公的姓氏，还继承了他的政治前途。虽然尤利乌斯·恺撒与屋大维之间并不是完全合法的收养关系，但主要继承人与儿子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了。有些技术上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亲生儿子或养子会继承父亲或养父对其释奴享有的权利；尤利乌斯·恺撒的释奴不仅数量极多，而且其中很多人非常富裕，这些释奴有义务支持他，奉他为新的恩主，为他投票，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资源供他使用。屋大维并没有被正式收养，所以可能觉得要主张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会比较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独裁官的全体或部分释奴不会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恩主。[13]

在布隆迪西乌姆，屋大维收到了菲利普斯的一封信，以及阿提娅的第二封信，这两人此时已经知道尤利乌斯·恺撒遗嘱的条件。他们也看到，虽然密谋者得到了赦免，并且仍然有很多元老支持他们，但群众非常憎恨密谋者。目前尤利乌斯·恺撒的亲属还没有遭到血洗或报复性攻击。但这不能说明，屋大维能够安全地以独裁官继承人的身份进入政

界。十八岁的少年太年轻，要等十几年才能参选官职、进入元老院，但恺撒的名字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或许还会招来敌意，他可能很难应付这种敌意，甚至很难生存下来。他的继父已经在考虑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参加前41年的执政官竞选（竞争对手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因此不愿意让屋大维过早从政。菲利普斯建议屋大维拒绝接受遗产，保留自己的姓氏。他的母亲有些犹豫，但同样谨慎。我们掌握的史料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它们都是后世撰写的，而且大多以奥古斯都自己的回忆录为基础。年轻的英雄拒绝被经验丰富的长辈的建议所羁绊，这样的形象在文学上早已形成传统，从阿喀琉斯到亚历山大大帝，皆是如此。根据阿庇安的说法，年轻的屋大维甚至向阿提娅引用了《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对母亲忒提斯说的话。[14]

这并不是说谨慎是不对的，至少这两封信都敦促屋大维不要鲁莽行事。不管他们的建议究竟是怎么样的，决定只能由他一人做出。他自己的雄心、自信和自尊一定是主要动机，否则此后发生的一切就让人无法理解了。或许从一开始，他就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所有竞争对手，不管他们的年纪比他大多少，经验又比他丰富多少。不过，在当时没有一位理智的观察者能够预测随后几年的局势走向，也无法预测他能够扮演的角色。[15]

如果说屋大维曾经犹豫要不要接受尤利乌斯·恺撒的遗产和姓氏，那么他的犹豫是很短暂的。十八岁时，他不再是盖乌斯·屋大维，而变成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根据传统，他应当在这个新名字后面加上“屋大维阿努斯”，以保留一点自己本名的痕迹。但他始终没有这么做，尽管他的敌人有时会称他为屋大维阿努斯，以强调他的真实家族背景是比较默默无闻的。“序章”已经讲到，本书不会遵照现代人的习惯称他为屋大维，而是称他为恺撒，因为这才是他自己使用的名字，我们掌握的史料也是这么称呼他的。这个名字的威力与随后发生的事件有着很大关系。[16]

罗马

年轻的恺撒及其随行人员从布隆迪西乌姆出发，前往罗马，在正常情况下这段路程需要走九天或更久。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称他为恺撒。可能早在这个阶段，他就派遣一名信使去亚细亚行省，控制尤利乌斯·恺撒为帕提亚远征准备的一些作战资金。一行人肯定一路快马加鞭，于4月初抵达罗马。西塞罗当时不在罗马城，他于4月10日写信询问屋大维抵达罗马的情况，是否有人争先恐后地迎接他，或者是否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但西塞罗显然不认为会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果然，恺撒此次到访罗马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安东尼让年轻的恺撒等了一段时间，才在帕拉丁山上的宅邸（原先是庞培的府邸）花园内接见他，场面非常冷淡。执政官安东尼的确非常忙碌，正在应付潮水般的请愿者，而且他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少年在政治上有什么价值，或者有什么重要意义。少年希望接管尤利乌斯·恺撒的全部家产，这对安东尼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尽可能多的资金来巩固自己的地位。4月12日，西塞罗漫不经心地表示，他之前询问的关于恺撒的情况并不重要。[17]

离开罗马后，十八岁的少年恺撒穿过坎帕尼亚[18]，前往那不勒斯。途中，他花了一些时间与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定居于此的军团老兵交谈。4月18日，他与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见了面。巴尔布斯是西班牙人，来自加的斯[19]，凭借为庞培效劳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后来加入尤利乌斯·恺撒的幕僚。他曾在西班牙和高卢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但后来更多地担任他的政治代理人，在罗马城为他服务，推动了很多幕后交易，并为他出谋划策。对少年恺撒来说，巴尔布斯是一个重要的人脉，应当与他结交，而且这样一个有影响且富裕的政客对他来讲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天晚些时候，巴尔布斯告诉西塞罗，少年恺撒决定接受遗产。[20]

几天后，西塞罗见到了年轻的恺撒，后者正待在他继父的别墅（位于那不勒斯湾沿岸的普泰奥利），西塞罗的乡间别墅就在附近。西塞罗写信给朋友阿提库斯称："屋大维和我们在一起，对我很尊敬，也很热情和友好。他的伙伴们称他为恺撒，但菲利普斯不这么叫他，我也不。"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密谋者受到的威胁，以及对执政官安东尼决策的轻蔑，关于恺撒的内容很少。目前，西塞罗并不觉得这个十八岁少年很重要。阿提娅与丈夫不同，已经将儿子称为恺撒。菲利普斯从来不会公开站队，但肯定不会积极反对继子的雄心壮志，或许在悄悄地帮助他。屋大维娅的丈夫马凯鲁斯可能也是这样，不过他目前与密谋者还保持着良好关系。除了自然的损耗之外，多年内战加上庞培与尤利乌斯·恺撒多次担任执政官时的动荡也使得高级元老损失惨重，所以此时只有十七名前任执政官在世，其中好几人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意愿去参与政治。能够指导共和国并控制门客-恩主关系网（就是这种网络维系着共和国）的资深政治家已经为数不多。尤利乌斯·恺撒的死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他曾史无前例地处于庞大的门客-恩主关系网的中心，没有人能够轻松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他的支持者都是单方与他维持着关系，绝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21]

此时马克·安东尼是执政官，尽管他只有四十岁，因此严格来讲并不符合任职资格。尤利乌斯·恺撒在即将离开罗马远征帕提亚的时候，曾任命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为补任执政官[22]，以接替自己的岗位。多拉贝拉只有三十多岁，这更是独裁官明目张胆地违反传统的例子。即便如此，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后，多拉贝拉身穿官服、在执法吏陪同下出现时，没有人敢出声反对。安东尼和多拉贝拉都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但好几个密谋者也曾是他的亲信。安东尼和多拉贝拉都以鲁莽和高调浮夸的行为而闻名。更重要的是，世人皆知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尽管尤利乌斯·恺撒早已内定了多拉贝拉，安东尼还是企图

阻止他当选，为此甚至操纵国家宗教，声称自己在选举时观察到了雷电，所以投票无效。在过去，行政长官之间的竞争和公开敌对阻止了任何一个人在共和国获得太多权力。[23]

马克·安东尼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形象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狂徒、头脑简单的军人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忠实副手。我们很难看透这幅讽刺画像，去理解真实的安东尼。他肯定将自己展示为非常尚武骁勇的形象，自称是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的半神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就像尤利乌斯·恺撒自称是女神维纳斯的后代一样。安东尼常常蓄着英雄式的浓密大胡子，而“非传统”的年轻贵族（其中很多人曾支持喀提林）的胡须通常是胡乱蔓生的。安东尼把上衣束得很高，以炫耀自己肌肉发达的大腿，并且即便在城内也佩带利剑，尽管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不妥当的。铭刻在钱币上的安东尼肖像显示，他的脖子粗壮，面部线条粗重，证实了人们对他的描绘，即一个孔武有力的壮汉，竭尽全力地展现自己咄咄逼人的男性气概。他的演讲风格强悍有力，属于富丽浮夸的亚洲风格，就是西塞罗讨厌的那种。[24]

安东尼家族是根基牢固的平民望族。安东尼的祖父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仕途辉煌，当过执政官和监察官。但在那个凶暴的年代，辉煌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在内战期间被马略下令处死。他儿子的名望没有那么高，说得好听些是个善良的傻瓜，说得难听些就是恶习难改的浪荡子。安东尼家族的名望很高，再加上或许大家觉得他是个无害的人，于是元老院在前73年指派安东尼的父亲去清剿海盗，不过没有给他六年后庞培得到的那样强大的资源。结果是不难预测的，安东尼的父亲一败涂地，没能回家就死去了。他的遗孀很快嫁给了兰图鲁斯（前63年被处决的喀提林党人之一），所以安东尼在二十出头时就已经失去了父亲和继父。因此他对共和国没有什么好感。[25]

安东尼是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内心里认为自己理应得到荣誉与

光辉，因此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尊重常规的行为准则。他的父亲留下了累累债务，家族的一些产业已经被抵押出去，所以安东尼拒绝继承这部分产业。他在青年时代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丝毫不知节制，终日酗酒作乐，追逐美女。虽然囊中羞涩，他仍然不愿意抑制自己浮夸奢侈的本性。安东尼很快也债台高筑，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不罕见。他开始从政的时间比一般情况晚得多，曾在叙利亚、犹太和埃及服役，后来到高卢投奔尤利乌斯·恺撒。他没有赶上参加高卢的大部分主要战役，但在高卢大叛乱（其高潮便是前52年夏季残酷的阿莱西亚攻防战）后期参加了作战。在内战中，安东尼追随尤利乌斯·恺撒，参加了意大利战役、马其顿战役的第二阶段，在马其顿战役中指挥恺撒军队的左翼。内战的其他战役，他就没有参加了。[26]

安东尼在军旅生涯中的表现其实并不算特别突出。他本人非常勇敢，但缺乏独立指挥的经验（不管指挥的部队规模有多大）。总的来讲，他比贵族通常待在军中的时间要少。但他将自己宣传为一位伟大的军人和统帅（赫拉克勒斯不仅凭借自己的无穷力量建功立业，也曾指挥军队），他的这种形象一直延续到今日。尤利乌斯·恺撒一般更愿意让安东尼扮演政治角色，前49年和法萨卢斯战役之后他都让安东尼管理意大利。但结果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安东尼人脉很广，而且他的家庭背景比尤利乌斯·恺撒的其他支持者要好得多，但他不是个非常精明世故的人。他带领盛大的车队巡游意大利各地，带着他的母亲和哑剧演员情妇，以及形形色色不适合出现在一位罗马行政长官随行队伍中的人。安东尼喜欢与戏子伶人打交道，这些人肯定和现代演员一样激情四射、热情奔放，但社会地位显然低于安东尼，不管他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元老是不应当和这些人待在一起的，其中很多人，包括他的情妇，都曾经是奴隶。但安东尼对这种规矩置之不理。有一次，他在广场上摆开席位，接受人们的请愿，但他显然还在遭受宿醉的折磨。政事处理到一半的时候，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呕吐起来。有人说他吐到了自己怀里，还有人说一位朋友掀起了自己的斗篷帮助他。有传闻说，他甚至试验用

狮子，而不是马，给他拉车。[27]

他就是这样愚蠢地炫耀通过内战获得的权力，但更糟糕的是，骚乱导致罗马城和乡间发生了暴力冲突，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包括多拉贝拉）在怂恿和四处活动，支持负债人的事业。尤利乌斯·恺撒最终回到罗马后，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公开任用安东尼，并对多拉贝拉加以严密监视，在作战时也带着他。在蒙达战役后期，独裁官传唤马克·安东尼到西班牙，有迹象表明他又开始宠信安东尼。安东尼和他一起乘坐马车，而年轻的屋大维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则乘坐第二辆马车跟在后面。到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选择安东尼为同僚执政官，多拉贝拉为接替自己的续任执政官，说明他已经恢复了对这两人的恩宠和信任。[28]

作为执政官，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大权在握。他们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并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但他们两人都是豪门世家子弟，有着自己的野心。要说他们只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爪牙，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实际上是在追寻自己的利益，而支持尤利乌斯·恺撒对他们有利。据说特雷博尼乌斯曾在密谋早期试探安东尼。“解放者”[29]们杀死了独裁官，以便恢复旧日的共和国，让贵族可以像过去那样竞争官职和发挥影响力。执政官肯定是这种新秩序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则表明，这种竞争进行的方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30]

安东尼等人与密谋者的停战始终是令人高度紧张的。安东尼和多拉贝拉都不愿意强有力地支持密谋者，或者提高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的地位，这对安东尼和多拉贝拉肯定没有好处。不管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对独裁官和刺杀案是怎么想的，如今密谋集团的领导人都是与他们争夺官职与威望的对手了。各方都着眼未来，因为在目前来讲，大赦和认可尤利乌斯·恺撒的举措是必要的，但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假以时日，密谋者和独裁官的举措都可能在元老院、公民大会或法庭遭到攻击。前49年的内战之所以爆发，就是因为庞培派威胁要为了尤利乌斯·

恺撒十年前做的事情而起诉他。在罗马的体制下，任何事情都不是板上钉钉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可能被定性为非法，所以永久性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上的攻击可以很容易结束一个人的仕途，但暴力却是非常真切的威胁。

混乱和即刻陷入冲突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两名执政官和密谋者都没有自己可以直接调遣的军队。独裁官的副手、骑兵统帅李必达在城郊有1个军团，并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后的日子里将一些士兵调至广场，但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去用武力为自己争得更长期的主宰地位，尤其是独裁官死去之后，从技术上讲他已经丧失军权了。安东尼安排李必达接替尤利乌斯·恺撒当上祭司长，随后这位前任骑兵统帅去了外高卢，接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得他暂时不必害怕任何敌人。[31]

尤利乌斯·恺撒的葬礼刚刚结束，一群热情的支持者就在他的火葬堆处建了一座祭坛。这群人的领导人叫阿玛提乌斯，他自称是马略的孙子，所以也就是独裁官的血亲。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并没有认这个亲戚，阿玛提乌斯寻求其他亲戚（包括年轻的屋大维）的支持，也没有成功。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对他没有好感，命令将阿玛提乌斯的追随者驱散，并拆除祭坛。4月底，安东尼离开了罗马，去寻求尤利乌斯·恺撒老兵的支持。在这期间，发生了更直接的对抗。多拉贝拉将阿玛提乌斯和他的许多支持者处死了，赢得了西塞罗的热情赞颂。但这表明，很多群众仍然在哀悼独裁者，并且对当局没有采取措施镇压凶手而感到怨恨。安东尼愿意利用群众的情绪，让密谋者惴惴不安，同时自己招募老兵，尤其是先前的百夫长。但他不希望群众的愤怒爆发，从而无法控制局面。目前他的地位很强大，而且他的两个兄弟分别是前44年的裁判官和保民官，但这种地位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安东尼和其他人一样，也在为未来做准备，需要保护自己，并且维持长期的实力。[32]

3月17日，元老院认可了尤利乌斯·恺撒生前做出的决定。其中有些

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但已经被很多人知晓，因此也得到了认可。执政官安东尼应当在确认尤利乌斯·恺撒的每一项决定之前，与一群资深元老组成会议商讨。这种做法是不实际的，他可能也不喜欢这么做。因为有太多决定等待确认，太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者排着队等待当局的处理。元老院怠惰多年，而且近期的内战又造成许多动荡，因此积压了太多政务，尤利乌斯·恺撒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全部处理完就死了。在务实的层面上，安东尼无疑感到有很多紧迫的事情需要做。这对他来讲也是天赐良机，可以向许多人施加恩惠，收买人心，有希望拉拢到更多的支持者。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安东尼控制了他的文件。现在他宣布了一些所谓的尤利乌斯·恺撒生前的决定（尽管人们对这些决定一无所知），并坚持要求元老院批准它们。其中有些似乎与独裁官生前实际做过的事情相矛盾。据西塞罗说，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克洛狄乌斯的遗孀）受到加拉太[33]国王狄奥塔鲁斯的贿赂，让安东尼确认狄奥塔鲁斯的统治权。后来演说家强烈谴责安东尼在这几个月里捏造的所谓尤利乌斯·恺撒的决定，所以我们很难准确知晓安东尼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不过就算西塞罗夸大其词，也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34]

安东尼正在为将来的成功聚集资金和人脉，也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长远来看，他最需要的是一支强大而忠诚的军队。特雷博尼乌斯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分别得到了叙利亚和内高卢行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最终得到了西西里岛和亚细亚的粮食供应管理权，这对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让他们这样级别的人去管理粮食，有些贬抑的意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兵权。安东尼和多拉贝拉合作，把叙利亚给了多拉贝拉，在这一年年末撤掉了特雷博尼乌斯，接管了计划中的帕提亚远征的权责。安东尼接管了马其顿和驻扎在那里的6个军团，不过他同意将其中1个交给同僚执政官。然后他决定让弟弟盖乌斯代替自己治理马其顿，他本人则取代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控制内高卢，这样就既可以方便地监视意大利，也可以得到“长发高卢”，即前不久被尤利乌斯·恺撒征服的地区。在马其顿的5个军团和辅助部队将被调到他的麾下，

他的弟弟则在马其顿征募新军队。尽管尤利乌斯·恺撒将行省总督任期限定为两年，安东尼还是让公民大会投票，把他在这个扩大后的行省的任期定为五年，就像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得到的特别指挥权一样。[35]

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时的局势很像前49年内战爆发前，各方互不信任，主要领导人都在准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遥远的距离之外观察，没有办法夺回主动权。布鲁图斯是城市裁判官，所以负责主持阿波罗节，即一年一度纪念太阳神阿波罗的节庆和竞技活动。布鲁图斯为这些活动出资，并敲定了活动流程和一些具体的演员，但觉得此时返回罗马太危险，所以没有亲自到场。马克·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代替布鲁图斯主持了竞技，所以群众应当感谢谁，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了。竞技活动很顺利，有些人愿意欢呼布鲁图斯的名字，但也可能有人举行了反对密谋者的游行。不久之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离开了意大利，去往地中海东部，后来也集结起了自己的军队。布鲁图斯可能并不很情愿这么做，但还是鼓励罗马人民的军团反抗安东尼，并非法夺取了军队的指挥权。西塞罗开始觉得，安东尼是对他们本身和对恢复真正共和国的最大威胁。西塞罗不断哀叹，密谋者原本应当把安东尼和独裁官一起杀掉。他以后见之明评论道："密谋者拥有男子汉的勇气，却只有婴孩的头脑。"[36]

西塞罗还没有用新名字称呼年轻的恺撒，而这个十八岁少年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和发表的言论让西塞罗担心，但他主要烦恼的还是安东尼。他知道多拉贝拉是个流氓，因为此人曾短暂地与自己非常疼爱的女儿图利娅结婚，后来离了婚却拒绝归还她的嫁妆。但多拉贝拉出发赴行省上任之后，就不再是主要问题了。安东尼是最大的威胁，因为他是共和国复兴的头号敌人。西塞罗渴望有办法削弱安东尼的权力，让密谋者返回罗马并发展壮大。[37]

---

[1] Cicero，*ad Att* .15.12.2.

[2] 罗马军队的辅助单位主要依赖外国士兵，他们被称为辅助部队。

[3] Suetonius，*Augustus* 9.2，Appian，*BC* 3.9，Velleius Paterculus 2.59.4，Dio 45.3.1，Nicolaus of Damascus 16讲到屋大维在阿波罗尼亚的时期；西塞罗和尤利乌斯·恺撒等许多罗马人曾去希腊化世界学习演讲术，见Cicero，*Brutus* 316，及Suetonius，*Caesar* 4.2，Plutarch，*Caesar* 2。

[4] 今天阿尔巴尼亚西部的费里附近。

[5] 古罗马人于前2世纪建造的大道，经过今天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全长约1120公里，得名自主持工程的马其顿总督格奈乌斯·艾格纳提乌斯。

[6] Appian，*BC* 3.9强调他在骑兵中的训练。

[7] 关于萨尔维迪努斯和阿格里帕，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29，fn.2-3。

[8]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遇刺的消息和人们的反应，见Nicolaus of Damascus 16，讨论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31，关于军团士兵对战利品的期待，见p.47。

[9] Nicolaus of Damascus 17-18，Appian，*BC* 3.10-11.

[10] 迪纳厄斯是古罗马从公元前211年，也就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开始铸造的小银币，起初币重4.5克，后来不断贬值，3世纪中期废止。

[11]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遇刺的后果和他的葬礼，见Rawson *CAH2* IX，pp.468-70，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97-105，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12-14，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04-14，T.Mitchell，*Cicero 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pp.289-91；Appian，*BC* 2.120-23，120谈及了贿赂群众同时却宣扬自由的讽刺意味。

[12] 关于遗嘱，见Suetonius，*Julius Caesar* 83.2，有价值的讨论，见R.Billows，*Julius Caesar*：*The Colossus of Rome* （2009），pp.256-8。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31 fn.71 提及了关于此话题的辩论；西塞罗后来说尤利乌斯·恺撒不会从东方归来，见Cicero，*ad Att* .15.2.3。

[13] 安东尼拒绝将尤利乌斯·恺撒的部分遗产给屋大维，见Cicero，*Philippics* 2.44；对释奴的权力，见Appian，*BC* 3.94。

[14] Nicolaus of Damascus 18，Appian，BC 3.11-13，Suetonius，Augustus 9.2；西塞罗谈菲利普斯的战役，见Cicero，*ad Fam* .12.2.2；阿庇安著作中说屋大维引用阿喀琉斯的话，见*BC* 3.13，citing *Iliad* 18.98：“那么我很快要死了；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伙伴死去。”

[15] 强调屋大维从一开始就雄心勃勃，见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2010），pp.23-4。

[16] 关于名字，见重要文章R.Syme，‘Imperator Caesar：A study in imperial nomenclature’，pp.172-88。

[17] Nicolaus of Damascus 18，Appian，*BC* 3.13-21，Cicero，*ad Att* .14.6.1和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31，fn.73；Cicero，*ad Att* .14.5.3 询问阿提库斯关于抵达罗马的事情。

[18] 在今天意大利的西南部。

[19] 加的斯是今天西班牙西南部的滨海城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著名的贸易海港和海军基地。

[20] Cicero，*ad Att* .14.10.3；巴尔布斯的背景和他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71-3。西塞罗曾在法庭为他辩护，辩护词见*pro Balbo*；西塞罗的证词，见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2008），尤见pp.339-73。

[21] 引文见Cicero，*ad Att* .14.11.2；马凯鲁斯与密谋者关系友好，见*ad Att* .15.12.2；关于两位前任执政官的态度，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114，128。Syme倾向于使用“恺撒派”和“庞培派”的说法，但并没有将它们描绘成泾渭分明或永久性的群体。

[22] 如果一位执政官在任期内死亡（此情况并非罕见，因为执政官常常处在战斗的前线）或被免职，就会选出另外一位，在前任任期余下的时间里执政，被称为“补任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

[23] 关于多拉贝拉，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69，fn.2，97，150-51；过去与安东尼的矛盾，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186-91。

[24] Plutarch，*Antony* 4讲到他模仿赫拉克勒斯，和张牙舞爪的浮夸军人形象；安东尼的概况，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assim*。

[25] 关于家族，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52-65。

[26] Cicero，*Philippics* 2.44讲到拒绝接受父亲的部分遗产；44-6 提及他的少年时代；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81-104。

[27] Cicero，*Philippics* 2.58，*ad Att* .10.10，13，*ad Fam* .9.26，Serv.On E10；*de vir.Ill* .82.2. 西塞罗对安东尼的憎恶直到*Philippics* 2.58，69，7才公开表达出来；另见Plutarch，*Antony* 6，9，Pliny，*NH* 8.55。

[28] Cicero，*Philippics* 2.64-9，72-4，78，Plutarch，*Antony* 10，Dio 45.28.1-4；

Plutarch，*Antony* 10 说安东尼和恺撒之间发生决裂。M.Gelzer（trans.P.Needham），*Caesar*（1968），pp.261-2倾向于认为这次决裂很严重，而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104表示怀疑；和尤利乌斯·恺撒乘坐同一辆车，见Plutarch，*Antony* 11。

[29] 这是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集团（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的自称。

[30] Plutarch，*Antony* 13.

[31] 见R.Weigel，*Lepidus.The Tarnished Triumvir*（1992），pp.44-51，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97-111；关于安东尼的态度，见深刻的讨论J.Ramsay，'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B.C.E.？'，*Classical Philology* 96.3（2001），pp.253-68，这篇文章虽然主要讲夏季的几个月，但很好地分析了他的态度。

[32] 阿玛提乌斯和献给尤利乌斯·恺撒的祭坛，见Appian，*BC* 3.2-3，36，Cicero，*ad Att* .14.15，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99；他企图得到年轻的屋大维的接受，见Nicolaus of Damascus 14。

[33] 加拉太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加拉太北面是比提尼亚和帕弗拉哥尼亚，东面是本都，南面是吕高尼和卡帕多细亚，西面是弗里吉亚。此时加拉太是罗马的一个附庸国。

[34] J.Ramsay，'The Senate，Mark Antony，and Caesar's Legislative Legacy'，*Classical Quarterly* 44（1994），pp.130-45 正确地没有全盘接受西塞罗的说法，而是精彩分析了好几种最有争议的措施及其背景。细节并不能改变核心的一点，即颁布这些法律和授权对安东尼特别有利，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独裁官的决策。

[35] Appian，*BC* 3.27，30，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115-16，及P.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1971），pp.477-83，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33-4.

[36] Cicero，*ad Att* .16.1，2.3，4.1，5.1，Appian，*BC* 3.24，Plutarch，*Brutus* 21.2-3；引文来自Cicero，*ad Att* .15.4。

[37] Cicero，*ad Att* .16.15.1写到他决定将多拉贝拉没有偿还嫁妆的事情公开。

六 赞颂

我十九岁的时候自行决定并自筹经费，组建了一支军队。共和国的自由受到某个派系的暴政压迫时，我借助这支军队，成功捍卫了共和国。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公元14年，于奥古斯都去世不久后发表 [1]

5月，年轻的恺撒回到了罗马。多年后有一个传说，他抵达罗马城的那天，光晕环绕着太阳，这又是一个预示他未来辉煌成就的征兆。安东尼的弟弟卢基乌斯此时是保民官，他允许这个少年在一次公共集会上讲话。西塞罗得知恺撒演讲的内容后不以为然，仍然认为他并不重要。这个十八岁少年希望自己作为尤利乌斯·恺撒养子的地位得到正式承认，并获得其全部遗产。或许他还没有开始公开攻击密谋者，而是主要强调他“父亲”的声望和荣誉。至少有一次，可能是在纪念丰收女神刻瑞斯的竞技活动中，他企图根据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的一道元老院法令，将独裁官的座椅和月桂花冠公开展示。这个花冠就是牧神节时元老们向尤利乌斯·恺撒献上但被拒绝的那一个，不过安东尼不允许进行这种展示。

恺撒提出其他要求，尤其是关于独裁官的家产时，安东尼也同样不肯帮忙，最后独裁官留下的现金很少或几乎完全没有传到恺撒手中。安东尼在方方面面都表现出他觉得新的恺撒是个麻烦。其他人也觉得新恺撒很脆弱。不过也有可能的确很难分清哪些东西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私人财产，哪些是被他控制的国家财产。有人在法庭上提起了一些诉讼，要求获得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财产，理由之一便是这些财产是他在内战期间非法攫取的。总的来讲，这些案件都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不利。[2]

少年开始借贷。马提乌斯和另一个叫作拉比里乌斯·波斯图穆斯的银行家（过去常与尤利乌斯·恺撒有联系）借钱给他。奥庇乌斯[3]和巴尔布斯可能也出资帮助他。为了积累现金，恺撒还变卖或抵押了属于自己和独裁官的一些财产。菲利普斯和阿提娅也伸出援手，而独裁官的外甥们（他们得到了独裁官遗产的剩余部分）也多多少少愿意地将这些遗产转交给主要继承人。我们不知道，尤利乌斯·恺撒为帕提亚远征准备的资金是何时抵达的。随这笔资金一同送抵罗马的，还有亚细亚行省一年的税收，但年轻的恺撒自称将这些钱和其他公款交给了国库，只保留了独裁官的私产。[4]

随后几个月内，少年恺撒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准备纪念尤利乌斯·恺撒在内战中的法萨卢斯大捷，以及他的神圣祖先“母亲维纳斯”的竞技活动。这也是元老院在独裁官在世时投票决定授予他的荣誉。这一次，没有人企图妨碍或阻拦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举行这些活动。恺撒决定在举行这些活动的同时举办葬礼竞技，以及角斗士竞技和斗兽表演、大型宴会与戏剧表演。这些活动大多会在广场上举行，一些主要公共建筑也会搭建临时场地。这些庆祝活动于7月20日至28日举行，盛大而奢华。为了达成独裁官在遗嘱中的心愿，即向每一位罗马公民赠送金钱，恺撒不得不借了更多钱。[5]

在竞技活动期间，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这种“长发”星被认为是可怕的凶兆，预示着迫在眉睫的灾难。恺撒或他的一位支持者给出了更好的阐释，声称这亮光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升往苍穹、加入诸神的班列。于是，在维纳斯神庙（位于尤利乌斯·恺撒广场建筑群的中心）的独裁官雕像头顶上添加了一颗星。这个故事流传开了，尤其是那些仍然爱戴尤利乌斯·恺撒的人热衷传播这个故事。从很多方面看，这个故事源于元老院在尤利乌斯·恺撒生前授予他的半神荣誉，以及为他建立的后来又被两名执政官下令拆毁的祭坛。这一次，当局没有企图阻止给予尤利乌斯·恺撒这样的荣誉。[6]

举行公共娱乐活动和纪念祖先都是屡试不爽和非常高效的笼络人心的手段，不过这一次活动的规模和尤利乌斯·恺撒成为神祇的说法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所获得的荣誉。担任平民保民官是另一种屡试不爽的得到群众爱戴的办法，这一年7月举行选举以填补被杀害的秦纳留下的空缺时，有人说年轻的恺撒即将竞选这个职位。由于尤利乌斯·恺撒在指定他为继承人之前已经将他的身份改为贵族，所以他是不能竞选平民保民官的。这个事件的准确细节今天已经没有办法还原了，有的历史学家说年轻的恺撒企图让一位朋友得到这个职位而不是自己去竞选，但是失败了。这场风波表明，与应对彗星凶兆时的高超手腕相比，恺撒这一次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不断说他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这可能太重复了，但我们必须牢记，恺撒毕竟还很年轻，缺乏经验。他之所以从政，就是因为极度自信，而这种自信很容易发展成自负和鲁莽。私下里，他坚信彗星预示着自己即将平步青云。年轻的恺撒非常公开地变卖家产和贷款，这有助于他举办竞技活动，并给死去的独裁官带来荣誉，同时也为自己赢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者。[7]

恺撒和安东尼的关系仍然很糟糕。安东尼的势力越来越强，到夏末，他从定居的老兵当中招募了一队强悍的保镖。其中很多人是先前的百夫长，因为百夫长在作战时要身先士卒、带头拼杀，所以往往是非常厉害的战士。如果安东尼打算建立新的军团，有经验的领导者也会特别有价值，因为他们有能力组织、训练和指挥新兵。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兵的政治意义。有些百夫长属于骑士阶层，但绝大多数百夫长属于百人会议中的最高阶级，所以他们不仅武力强大，他们的投票也很重要。或许是为了赢得这个群体的支持并能操纵法庭，安东尼引入了一项新法律，让这个阶层中的部分人或全体成员有资格担任陪审员，于是在元老和骑士这两个群体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不容小觑的陪审员团体。[8]

与执政官安东尼不同，恺撒没有官职，没有权力，虽然他的公开支持者目前能够为他提供资金，但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马提乌斯告诉西

塞罗，他帮助这个孩子，仅仅是因为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友谊。恺撒仅有的实实在在的资本就是金钱和他的姓氏。从很早期开始，他就运用这两项资本，去拉拢独裁官之前的军官和士兵。很快，他开始向愿意为他效力的人提供500迪纳厄斯的赏金（超过普通士兵两年的军饷），并承诺将来会给更多赏赐。他给百夫长或军事保民官的奖赏肯定更高。他可能还谈到要向密谋者复仇，尽管此时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讲到这些。人们开始接受他的金钱，并宣誓支持他，但目前他的支持者数量依然远远少于安东尼的人。所有这些老兵仍然对尤利乌斯·恺撒赤胆忠心，毕竟他们曾追随他南征北战。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前任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说服了安东尼，让他对独裁官的继承人友好一些。年轻的恺撒站在投票围场的隔间外，鼓励人们投票批准将内高卢交给安东尼而非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但后来恺撒和安东尼的关系又变糟糕了，安东尼声称他的保镖队伍中的一名老兵收了恺撒的贿赂，要谋杀他。有不少罗马政治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庞培，害怕刺杀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安东尼的这个指控背后很可能没有真凭实据。从务实角度看，干掉执政官对年轻的恺撒而言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他真的企图暗杀安东尼，就又一次说明他在这个阶段的思维还是比较幼稚的。[9]

8月1日，尤利乌斯·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大胆地在元老院批评安东尼。他的口吻是告诫性的，而不是尖刻的攻击。更重要的是，之前已经有消息传出来，很多人早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西塞罗正在去希腊的路上，公开理由是帮助他儿子的学业，但实际上是罗马渐渐走向暴力冲突的政治局势令他感到恐惧、绝望。所有密谋者和其他一些关键大人物，如李必达，都离开了意大利。多拉贝拉很快也将动身。没有一个拥有军权的人留在意大利，与安东尼争夺意大利本土的主宰权。很多人感到局势正在往内战的方向扭转，就像前49年之前的几年一样，而且人们对内战没有多大热情。皮索要求确认对密谋者的大赦，以便让密谋者回国，密谋者和安东尼这样的恺撒派都不会因此损失威望。执政官没有对此做出凶暴的回应。西塞罗感到有希望出现新的妥协，于是返

回了罗马。一个月后的9月2日，他发表了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反腓利比克之辩”的演说，其效仿的蓝本是前4世纪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警示雅典人提防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威胁的演说。此次演说虽然批评了安东尼近期的一些行为，但敦促他恢复在3月15日之后的日子里曾表现出的和解精神。[10]

作为执政官，安东尼有采取行动的权力，而其他人，哪怕是最资深的元老，也只能告诫和建议。他也有能耐将退伍老兵召回来支持他，这些老兵的数量此时可能多达6000人。驻扎马其顿的军队中已经有1个军团在布隆迪西乌姆港登陆，其他军团紧随其后，所以他很快将拥有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供他调遣。他听到别人的批评，暴跳如雷，但没有动用手头现有的军队，尽管西塞罗私下里写道，他确信安东尼一定在计划搞一场大屠杀。演说家又一次暂时避开罗马城和公共集会，开始撰写他的《第二次反腓利比克之辩》，这是一本言辞激烈凶狠的小册子，将安东尼的品性痛斥得体无完肤，并谴责了他近期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以演讲的形式发表。在一段时间内，局势有些沉寂，但各方都在备战。10月初，安东尼南下去往布隆迪西乌姆，接收新近抵达的部队。[11]

9月，恺撒庆祝了自己的十九岁生日，此时他在坎帕尼亚招募定居于此的独裁官的老兵。随后几周内，他的追随者增加到3000人，但非常缺乏武器装备。老兵对他们的老部队仍然抱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到年底，这些人被分配到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七、第八军团（当然是新建的）。和喀提林的军团很类似，这些单位的结构可能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确定了，等待更多新兵来填补空缺。恺撒还借此机会任命了多达120名百夫长和十几名军事保民官，确认了一些军官先前的衔级，并提拔了一批人，给予他们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薪水。在这个阶段，老兵云集到恺撒麾下，既是为了得到赏金，也是被恺撒这个名字所吸引，而这个少年的品质如何，大家还不清楚。尤利乌斯·恺撒曾引领这些官兵走向胜利，并慷慨大方地奖赏他们，使他们渐渐地效忠于他。他的继承人无法

立刻或在短时期内恢复这种纽带的全部吸引力，但老兵们愿意给这个少年和他的金钱一次机会。年轻的恺撒知道金钱和承诺未来赏赐的重要性，于是派人到布隆迪西乌姆收买安东尼的部队。[12]

与此同时，这个十九岁的少年率领他的老兵（这样一支军队的存在肯定是非法的），于11月初返回罗马。他将自己的武装支持者带进了城，这同样是违法的。他为此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星期，不断请求西塞罗（肯定还有其他显赫的元老）批准他这么做，理想情况是他抵达城市时，他们公开对他表示支持。恺撒奉承这位老政治家，敦促他“第二次拯救共和国”（第一次是在前63年镇压了喀提林）。西塞罗“不好意思拒绝，但又不敢同意。但他（恺撒）一直在积极活动，还会继续下去。他会带领一支强大的支持者队伍到罗马，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觉得他可以立刻召开元老院会议。谁会来？就算有人来，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谁敢惹安东尼？”但西塞罗承认，“各城镇热情地支持他（恺撒）”。[13]

恺撒向西塞罗保证，他会在合法的框架内通过元老院来行事，暂时不提自己未经元老院授权而非法组建的军队。但西塞罗一直对这个少年的新姓氏和他要求获得显要地位的做法感到不安，也开始担心年轻恺撒的意图，尤其是恺撒坚持要求确认独裁官的所有立法和荣誉。即便如此，西塞罗还是觉得这个少年“高度自信，但没有什么威望”，因此不足为虑。西塞罗的通信伙伴、狡猾的骑士阿提库斯没有从政，但和罗马的几乎每一位显贵都保持着非常友善的关系。他比西塞罗更审慎一些，写道：“虽然目前那孩子（恺撒）势力很强，遏制住了安东尼，但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他做出长远的评判。”恺撒的姓氏和金钱把很多潜在支持者，尤其是老兵，从安东尼那边吸引到了他那边。[14]

年轻的恺撒抵达罗马时，安东尼还在远方。一位非常积极活跃、已经开始公开攻击安东尼的保民官将年轻的恺撒带到广场，召开了一次公

共集会。他和恺撒站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的台阶上，俯视着一块常被当作集会与立法会议场所的开阔地。公开佩剑的老兵们围绕着自己的领袖，明目张胆地展示他们的非法武力。保民官先发言，又一次猛烈抨击安东尼，呼吁人民团结到尤利乌斯·恺撒继承人的麾下，反对执政官。年轻的恺撒随后发表了演讲，其文稿很快就流传开来。西塞罗很快也得到了一份抄本，对其内容肃然起敬。年轻的恺撒颂扬了尤利乌斯·恺撒及其功业，然后转身，指了指独裁官的一座雕像，表示自己希望“赢得父亲的荣光”。年轻的恺撒斥责安东尼阻挠他获得遗产以及在元老院的作威作福，这可能更合西塞罗的口味，但让很多老兵不满。他们忠于尤利乌斯·恺撒，看到杀害他的凶手仍然没有受到惩罚，非常愤怒。在老兵们看来，那些凶手才是恶徒，马克·安东尼不是。[15]

安东尼正在返回罗马的途中，身边有他自己的老兵护卫着。最初从马其顿调来的2个军团正从布隆迪西乌姆北上，若有需要可以很容易调遣。对恺撒的老兵来说，安东尼不是主要敌人，而且他的军队比恺撒的一小群武器装备不足的人马强得多。如果与安东尼发生武装冲突，恺撒必败无疑。一些老兵开始暂时抛弃他们的年轻领袖，溜回家中。广大群众并没有蜂拥前来支持恺撒，最重要的是，显赫的元老们也没有表现出热情。除了召开会议的保民官之外，没有一个元老参加会议。西塞罗根本不在罗马城，其他很多人也躲在自己的乡间别墅，暂避风头。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大失所望，于是也溜走了，带着自己剩余的支持者去伊特鲁里亚（那里有大量独裁官的老兵定居），进行新一轮的招兵买马。在那个地区也有其他人在招兵，独裁官生前的一些军官在为安东尼招募人马。

在这个阶段，年轻的恺撒在政坛斗争中仍然只是个小角色。在意大利除了安东尼之外，只有他拥有武装支持者，但人数太少，所以算不上一支真正的力量。他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受到公众的关注已经很了不起了。他在政治上走错了好几步，这不足为奇，毕竟奥古斯都的政治才能

并不是天生的，当时也并不存在一个团结一致的恺撒派，即便存在，力量也不强。到目前为止，他仅仅比几年前被处决的假马略重要一点点，与这个假马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拥有财富，而且与独裁官有着确凿无疑的联系。不过，他仍然可能会像假马略一样被轻松消灭。安东尼打算召集元老院开会，将这个孩子宣布为国民公敌。[16]

但随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彻底改变了局势，使得年轻的恺撒的重要性瞬间大大提升了。

军阀

第一个抵达布隆迪西乌姆的军团是玛尔斯军团（以战神玛尔斯的名字命名），随后是第四军团。他们在布隆迪西乌姆这座港口城市郊外扎营的时候，年轻恺撒的亲信来了，与很多随军人员（妓女等）和商贩（任何一支罗马军队都有这样一群人跟随着，等着挣大兵们的钱）交谈。他们在营地散发宣传册，窃窃地承诺给每一位士兵500迪纳厄斯的赏金（这个赏格如今已是世人皆知了）并在退伍时给每人5000迪纳厄斯（几乎相当于二十年的军饷）。给百夫长和军事保民官的赏金肯定比这多得多。[17]

这两个军团以及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其中一个已经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另一个很快也将从马其顿渡海赶来），全都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8年胜利之后组建的。至少有一些普通士兵可能曾在庞培麾下反对尤利乌斯·恺撒，这些士兵对尤利乌斯·恺撒有多少感情，是很难说的。但军官就不同了。尤利乌斯·恺撒在征战过程中一直将有作战经验的军团中的初级百夫长调到新建部队，并提拔他们。这几个军团的全部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都是尤利乌斯·恺撒任命和提拔起来的，对他忠心不二。其中一些人可能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这几个军团作为整体还没有打过仗，但兵力都接近满员，而且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训练，准备很充分。[18]

马克·安东尼在前来接管这几个军团的指挥权之前，与它们素无联系。对官兵来说，他是个陌生人。而且，与流传甚广的传说相反，他事实上并没有伟大的军事功业和胜利可以吹嘘，也没有许多在困难情况下控制军队的经验。这几个军团几个月前还在急切地盼望在帕提亚获得大量战利品，如今却发现要接受一个陌生人的指挥，而且处在内战边缘。与此同时，年轻恺撒的名字四处传扬，他还做出很慷慨的承诺。有些军官可能在他待在阿波罗尼亚时就认识他，或许这促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他的提议。

执政官是带着夫人富尔维娅一起来的。从一开始，安东尼对局势的处理就很糟糕，他显然以为士兵们会无条件服从他。军团士兵们桀骜不驯，难以控制。他提议给每人100迪纳厄斯（也就是他那竞争对手恺撒的报价的五分之一，仅相当于半年的军饷），遭到了士兵们的耻笑。执政官怒火中烧，企图用威吓的手段迫使士兵们听话，于是怒气冲冲地咆哮道："你们会学会服从命令的！"他要求军官们交出惹是生非的士兵的名单。一些士兵被逮捕并被处决了。有些百夫长也成了牺牲品。据西塞罗说，一些官兵被押到安东尼住的房子，在那里惨遭屠杀，鲜血溅到了富尔维娅身上。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非常可疑，而且也不重要。总之，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的官员离开布隆迪西乌姆，开始沿着海岸线北上前往内高卢时，是闷闷不乐的。[19]

玛尔斯军团打头阵，第一个公开宣布支持恺撒。第四军团（由安东尼的财务官亲自指挥）步其后尘，很快也倒向恺撒阵营。这两个军团都拒绝向安东尼妥协，不过安东尼迅速向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每人发放500迪纳厄斯，控制住了这两个军团，只有少数人当了逃兵，投奔了恺撒。安东尼终于意识到，他不能简单地用恐吓来迫使军团士兵们顺从，也不能指望陌生人会忠于自己。但他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军队。[20]

11月28日夜间，他召集元老院开会（在夜间开会其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元老院不能在天黑之后辩论），怒斥年轻的恺撒。次日，他在城外举行阅兵，要求元老们都来观看。所有到场的元老都被哄骗去和士兵们一起宣誓效忠安东尼。随后安东尼便离开了罗马，去往内高卢，在途中与他的两个军团以及第五“云雀”军团（由尤利乌斯·恺撒的老兵组成，最初是在外高卢组建的，后来其成员获得了公民身份）会合。第五“云雀”军团可能是由安东尼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招募到的6000名老兵组建的。西塞罗早在这年11月就将安东尼的保镖称为“云雀”。此外，安东尼还有相当多的辅助部队，包括摩尔人骑兵。罗马军队和任何时期的任何军队一样，很少能够长时间地维持完整的理论兵力，所以安东尼的军队加起来大约有1.5万人，全都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这是一支规模不大但战斗力很强的军队。[21]

恺撒还是个普通公民，虽然太年轻，既没有从政的资格，也不是元老院成员，但也正式组建了一支军队。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停留在阿尔巴福肯斯[22]，恺撒匆匆赶去与他们会合，并立刻兑现诺言，每人发放500迪纳厄斯的赏金。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举行了阅兵和操练，并开展了一次实战演习。这样的操练是罗马军事训练的标准内容，这两个军团最近几年都在为远征帕提亚做准备，所以无疑表现得特别优秀。一个世纪之后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有些夸张地说，罗马军队的“训练是不流血的战斗，战斗则是流血的训练”。一个军团的满员兵力包括10个大队，每个大队480人。罗马军团士兵全部是重步兵，以一排排的密集队形作战，防具包括头盔（一般是青铜的）、链甲和半圆柱形的长盾。在过去，盾牌通常是椭圆形的，不过我们更熟悉的矩形瓦状盾牌可能正在变得流行。士兵携带一种重型标枪，有效射程为10～15码，在与敌人交锋前投掷。士兵的主要武器是剑。在奥古斯都生活的时期，士兵普遍使用长度不到2英尺，既可以劈砍也可以刺杀的短剑，但剑刃长度达到3英尺的剑也很常见。剑刃较重，制作工艺水平很高，适合劈砍，刺杀时的杀伤力特别强，三角形的剑尖很适合穿刺敌人的护胸链甲。

[23]

来自马其顿的各军团兵力可能非常接近理论兵力。他们拥有全套装备，携带着行军作战所需的帐篷、奴隶、役畜、驮马所用的鞍具和运载物资的大车等。负责指挥的是经验丰富的军官，官兵都接受过长期训练，已经惯于密切协作，也拥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与认同感。玛尔斯军团可能也有数字番号，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这也表明士兵们对自己军团名号的自豪感。为了支援这些部队，恺撒还拥有重建的第七军团和第八军团。这两个军团的成员是从退伍军人定居的主要地区招募来的，大多是老兵，也可能包含一些年轻人。曾在尤利乌斯·恺撒麾下服役的士兵比来自马其顿的军团拥有更多的作战经验和胜利纪录。但目前他们缺乏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而重建的两个军团还在转型过程中。要让这些部队能够协同或单独作战，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自马其顿的军团已经准备就绪，就是他们让年轻恺撒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他们接受他的指挥，尽管他根本没有合法权力向他们发号施令或者发放军饷。

恺撒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马克·安东尼的军队旗鼓相当。前43年的两位执政官，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和盖乌斯·威比乌斯·潘萨，正在组建一支由4个新军团组成的部队。新兵很多（我们很难判断，这些新兵是志愿兵还是被强征入伍），但其中很少人（或者根本没有人）有军事经验。尤利乌斯·恺撒的许多老兵已经被年轻恺撒吸引走了，因此两位执政官任命的监督新军团组建和训练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不大可能是最有经验或最能干的。重新入伍的老兵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内就能组成新的拥有战斗力的军团。但要让白手起家的新部队与他们匹敌，还需要很长时间。在训练和经验方面，来自马其顿的军团比新军团领先了大约四年。执政官的4个新军团若是与安东尼的人马相遇，肯定会一败涂地。若要在战场上打败安东尼的老兵，元老院就需要其他部队。而在意大利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已经宣誓效忠恺撒。

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都是独裁官在生前挑选的，曾长期忠心耿

耿地为他效劳。这两人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可能都比担任执政官的正常年龄要大。西塞罗在公开场合热情洋溢地赞扬他们。私下里，他觉得这两位执政官精力欠缺、意志不坚定。而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曾与两名执政官一同在高卢战争期间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则说这两人是腐败的无用之徒。安东尼离开罗马之后，演说家又一次出现在罗马，敦促元老院采取措施，镇压安东尼。12月20日，他在由保民官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了“第三次反腓利比克之辩”。此时，两名执政官和其他多名行政长官都已经去往各自的行省。这年11月，年轻恺撒（西塞罗坚持称他为屋大维）的演讲曾让西塞罗惊恐失望。西塞罗在书信中常引用一句希腊格言：“要让这样一个人救我，还不如没有人救我！”现在，西塞罗却觉得，安东尼不是两害之中更严重的那个，而是唯一的恶徒。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已经写信表示拒绝让安东尼接管他的内高卢行省。在这种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西塞罗终于开始称呼年轻恺撒为恺撒，而不是屋大维或屋大维阿努斯。他主张，共和国应当接受这个拥有非法武装部队的十九岁少年的帮助。[24]

西塞罗的演讲和往常一样，精彩绝伦：

> 盖乌斯·恺撒是个年轻人，或者说简直是个孩子，但他拥有神圣的智慧和勇气。就在此刻，安东尼的疯狂到了最顶峰的时候，人们害怕他从布隆迪西乌姆返回后要大开杀戒。我们没有寻求援助，也没有想到寻求援助，甚至根本没有得到援救的希望，因为似乎已经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就在此刻，盖乌斯·恺撒集结了一支由不可战胜的老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并慷慨地挥霍了他继承的财产……以便拯救共和国……若他不曾出生于共和国，那么，如今由于安东尼的罪行，共和国将不复存在……[25]

年轻恺撒的士兵们也受到了赞扬：

> 对于玛尔斯军团，我们也不能吝啬赞美之词。还有谁比玛尔斯军团的将士更勇敢，更忠于共和国？他们认清了马克·安东尼是罗马人民的敌人，于是拒绝再和这个狂人结盟。他们看到，安东尼的目标是屠戮共和国的公民、将共和国彻底消灭，于是抛弃了他……[26]

安东尼是罗马的执政官，两个军团却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这肯定是哗变。他们投奔了一个没有任何合法军权的人的非法私人武装。这些行为都得到了元老院的原谅。安东尼不再是执政官，而被宣布为国民公敌，是新的喀提林，或者更糟糕，是新的斯巴达克斯，因此只要反对他，一切都可以被合理化。这就是西塞罗的立场，不过到目前为止，安东尼其实并没有做出什么伤天害理、应当受到如此谴责的事情来。其实，恺撒比安东尼违反了更多法律。[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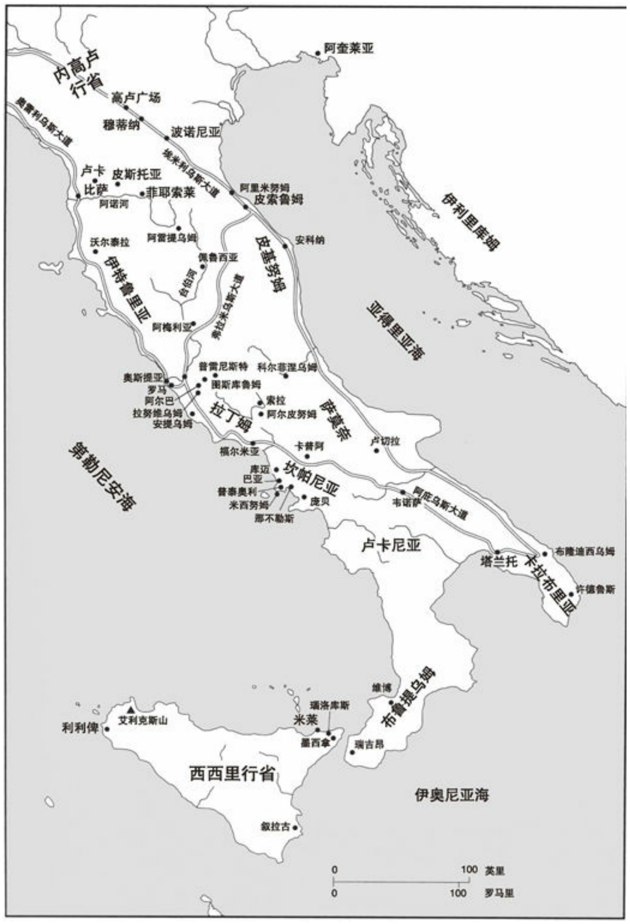
元老院的意见开始转为支持西塞罗，但转向的速度远远没有他所希望的那样快。恺撒和他的军队都是无法抵御的现实。两名执政官组建的4个新军团没有能力抵抗安东尼的部队，也没有办法抵挡恺撒的人马。元老院没有办法镇压恺撒，于是只能暂时接受他，甚至原谅他。苏拉当年运用二十三岁的庞培的私人军队就是一个先例。

安东尼则是另外一回事。他曾是执政官，他的官职与权力至少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甚至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权力一样正当合法，而且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内高卢交给他管辖，恺撒还曾到场鼓励公民支持这项法律。不过，这次投票表决的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有人说安东尼运用了恫吓手段，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次开会的时候当真下起了雷暴雨，而不仅仅是想象出来的凶兆。不管元老们是否喜欢或认可安东尼，他们目前还没有为此打一场内战的想法。安东尼在元老院也有盟友，而且他的母亲和妻子也竭尽全力地帮助他笼络人心。密谋者全都在国外，只留下一些同情他们的人，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全力帮助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元老院暂时还不肯宣布安东尼为国民公敌，而是派遣了三名资深元老作为代表，去与他商谈。其中一人就是菲利普斯，没有证据表明他不是真诚地希望达成妥协。[28]

即便如此，这次商谈还是徒劳无功。安东尼继续攻击恺撒，羞辱他真实的家庭，提醒大家，他并非真的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所谓

的”恺撒只不过是个外省的小鱼小虾，是外国奴隶的后代，不过是个娃娃，用自己的肉体换得年老的独裁官的宠幸。安东尼的这些话充满了贵族的傲慢，但在其他方面全是罗马政坛攻击詈骂的常见说辞，即便在当时也没有人完全当真。[29]

尽管安东尼发表某些言辞的背景已经被遗忘，但他的有些话被人们牢记下来。安东尼说，这个年轻的暴发户不过是个“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当然，恺撒除了名字之外，还要感谢自己“拥有一支军队”。西塞罗会强调这两方面（名字与军队），在他心里，安东尼是令人厌恶的，是不值得尊重的，因此是比尤利乌斯·恺撒坏得多的头号敌人。暴君（尤利乌斯·恺撒）死了之后，暴政却在继续，而且新的暴君（安东尼）并没有像尤利乌斯·恺撒那样历经百般辛劳，而是轻松获得了崇高地位。更重要的是，西塞罗自己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有过太多挫折和失意，而且他感到终于能够最后一次为罗马和他挚爱的共和国效劳，甚至挽救罗马和共和国了。从一开始，年轻的恺撒就对西塞罗表现出了极大尊重。这种尊重不需要是真诚的。西塞罗是一位显赫的资深政治家，雄心勃勃的新来者完全有理由去奉承他。他对年轻恺撒的好感也不一定完全是伪装的。政治友谊就像用来巩固政治联盟的婚姻一样，都是为了眼前利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友谊可能是短暂的。目前，恺撒和西塞罗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双方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西塞罗愿意利用这个孩子和他的军队，就像前49年加图及其盟友愿意利用庞培来反对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互惠互利并不需要互相之间的绝对信任，而且说到底恺撒毕竟只有十九岁，还缺乏政治经验。西塞罗认为，长远来看，恺撒肯定不会构成什么威胁。[30]



意大利

1月1日，希尔提乌斯与潘萨就任执政官，西塞罗再次展开对安东尼的猛烈抨击。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但没有具体提到安东尼。安东尼的舅舅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成功阻止了宣判安东尼为国民公敌的投票表决，终极议决的其他措辞也被淡化了。元老院宣布了紧急状态，但这还不是正式开战。当然，这也不会妨碍备战工作。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内高卢总督职位得到确认。更具戏剧性的是，恺撒被授予资深裁判官级别的军权，好让他合法地指挥自己已经拥有了一段时间的军队。他还被纳入元老院，获得财务官的衔级，这使他可以比正常的从政年龄资格早十年。要再等十年，他才有资格参选执政官。和他们的领袖一样，恺撒的士兵也得到了褒奖，国家同意向他们支付年轻恺撒拉拢他们时所承诺的退伍奖金。[31]

在仅仅几个月内，年轻恺撒组建了一支军队，短暂地占领了广场，未能赢得足够的支持，被迫撤退，随后又收买了两个军团的忠心，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迫使元老院要么与他武力对抗，要么认可他的地位。元老院选择接受他。没过多久，他就开始与安东尼作战，在此过程中竟然帮助了杀害他养父的凶手之一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他还曾于前45年与后者在西班牙同乘一辆马车。

---

[1] *Res Gestae* 1（Brunt & Moore’s translation）.

[2] Appian，*BC* 3.21-2，Suetonius，*Augustus* 10.1-2，95，Dio 45.3.4-7.2，Nicolaus of Damascus 28，另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14-17，116，fn.3 引用 T.Rice Holmes，*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1（1928），p.191认为此次刻瑞斯节的时间是5月底，而非通常的4月。

[3] 盖乌斯·奥庇乌斯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密友和亲信。尤利乌斯·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奥庇乌斯为他打理私人事务。奥庇乌斯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另一名亲信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一起对罗马施加了很大影响。奥庇乌斯撰写了关于尤利乌斯·恺撒征战阿非利加等地的史书，还写过一部尤利乌斯·恺撒传记。

[4] Nicolaus of Damascus 18谈及尤利乌斯·恺撒的战争储备金。关于他的财政支持者，见注释4。

[5] Appian，*BC* 3.23-4，28，Suetonius，*Augustus* 10.1，Dio 45.6.4，Cicero，*ad Att* .15.2.3，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131及J.Ramsay，‘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Classical Philology* 96.3（2001），pp.253-68，尤见253，fn.3谈及节庆的时长和它在此阶段的日期。这篇文章分析了前44年夏季事件的时间顺序，很有价值。

[6] Suetonius，*Julius Caesar* 88，Pliny，*NH* 2.93-4，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40-41，详细分析见J.Ramsay & A.Licht，*The Comet of 44 BC and Caesar’s Funeral Games* （1997），pp.135-53。

[7] 当选保民官，详见Appian，*BC* 3.31，称他支持了一位候选人，但群众“要求”他参选，被安东尼阻止，另见Plutarch，*Antony* 16，Dio 45.6.2，Suetonius10.2，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120及Z.Yavetz，*Plebs and Princeps* （1969），pp.73-5；彗星预示他未来的伟大，见Pliny，*NH* 2.93。

[8] 陪审团制度的改革，见J.Ramsay，‘Mark Antony’s Judiciary Reform and its revival under

the Triumvirs'，*JRS* 95（2005），pp.20-37，不过请注意，p.31讲4万或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作为部落会议"第一等级"的资格，被认为与骑士资格（八倍于这个数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不过4万或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与恺撒不久之后向士兵承诺的退伍奖金数字相比，仍然多出了差不多一倍。

[9] Cicero，*ad Fam* .11.28.6-7记载了马提乌斯给西塞罗的信。马提乌斯说自己资助年轻的恺撒，是因为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友谊；Appian，*BC* 3.28-30讲到和解与投票，32-42讲到他们的关系和后来所谓的阴谋，另见Cicero，*ad Att* .16.8.1-2，*ad Fam* .12.3，Dio 45.7-3-9.5，12.1-6，Plutarch，*Antony* 16。后来加入恺撒队伍的志愿者与士兵的身份，见J.Linderski，'Aphrodisias and the *Res Gestae*：The *Genera Militiae* and the Status of Octavian，' *JRS* 74（1984），pp.74-80提出，恺撒士兵发出的誓言都是紧急征兵工作的一部分，不是常规的军人誓言（sacramentum），而是coniuratio，并讨论了此种誓言对其身份的影响。

[10] 西塞罗在此时期的思考和行动，见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292-7，及J.Ramsay，'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Classical Philology* 96.3（2001），尤见pp.265-7。

[11]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41-2，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292-3，297-9，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 （2008），pp.375-82；Appian，*BC* 3.5讲到安东尼的6000名老兵；Cicero，*ad Fam* .12.2.1，3.1，Plutarch，*Cicero* 43讲到他的恐惧。

[12] Appian，*BC* 3.40；Cicero，*ad Att* .16.8，写于前44年11月4日，报告称恺撒拥有3000名老兵，并提到恺撒希望赢得马其顿各军团的支持。

[13] Cicero，*ad Att* .16.11.6.

[14] 对恺撒的担忧，Cicero，*ad Att* .16.14.1，阿提库斯的引文见16.15.3，参见Plutarch，*Cicero* 44-6，及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295-6。

[15] 引文见Cicero，*ad Att* .16.15.3，另见Appian，*BC* 3.41-2，Dio 45.12.3-6。

[16] Cicero，*Philippics* 3.20讲到，安东尼企图宣布恺撒为公敌。

[17] 不可避免的随军商贩队伍不是在前53年昆图斯·西塞罗的冬季营地外，见Caesar，*BG* 6.37。

[18] 尤利乌斯·恺撒将老部队的百夫长提拔到新军团的更高职位，见e.g.Caesar，*BG* 6.40。

[19] Appian，*BC* 3.31，40-44，Dio 45.12.1-13.5，Cicero，*Philippics* 3.4，6，38-9，4.5-6，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47-50；对玛尔斯军团及该军团一名百夫长墓碑的讨论，见L.Keppie，'A centurion of *legio*

Martia at Padova？’，*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2（1991），pp.115-21 = L.Keppie，*Legions and Veterans*：*Roman Army Papers 1971-2000* （2000），pp.68-74，及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19-21。

[20] Appian，*BC* 3.46，Dio 45.13.5，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26-7。

[21] 对恺撒的攻击，见Cicero，*Philippics* 3.20，Appian，*BC* 3.44-6，Dio 45.13.5；西塞罗早在这年11月就将安东尼的保镖称为“云雀”，见Cicero，*ad Att* .16.8，不过他可能仅仅是想把安东尼的追随者描绘为野蛮人，于是选择了这个名号。

[22] 意大利中部城镇。

[23] 约瑟夫斯的引文，见*BJ* 3.75；该时期军队概况，见H.Parker，*The Roman Legions* （1957），pp.47-71，尤见55-6，F.Adcock，*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 （1940），P.Brunt，*Italian Manpower*，*225 BC-AD 14* （1971），P.Connolly，*Greece and Rome at War* （1981），M.Feugère（ed.），*L'Équipment Militaireet L'Armement de la République*，*JRMES 8* （1997），E.Gabba（trans.P.J.Cuff），*The Roman Republic*，*the Army and the Allies* （1976），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Y.Le Bohec，*The Imperial Roman Army* （1994），J.Harmand，*L'armée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ôtre ère* （Paris，1967）；更宽泛的研究包括A.Goldsworthy，*The Complete Roman Army* （2004）和近期非常精彩的S.James，*Rome and the Sword . How Warriors and Weapons Shaped Roman History* （2011）。

[24] 西塞罗的引文见*ad Att* .16.5.3，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49，及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299-306；昆图斯对执政官的看法，见*ad Att* .16.27.2；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内高卢，见Cicero，*ad Fam* .11.6，6a.2。

[25] Cicero，*Philippics* 3.2（3，5）（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altered）.

[26] Cicero，*Philippics* 3.3（6）（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altered）.

[27]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49-51，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 （2008），pp.385-8.

[28]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62-70；the vote Appian *BC* 3.30.

[29] Suetonius，*Augustus* 2.3-3.1，4.2记载了其中一些辱骂，概况见K.Scott，‘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1933），pp.7-49。

[30] “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见Cicero，*Philippics* 13.24；恺撒吹捧和讨好西塞罗，见Plutarch，*Cicero* 45-6；西塞罗的策略，见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300-02，326-8。

[31] Appian，*BC* 3.48，50-51，Dio 46.29.2-6，Cicero，*ad Brutum* 1.12，*Philippics* 5.3-4，25，31，with Rawson in *CAH2* IX，pp.479-81。

七 奖赏和抛弃

> 恺撒说，他当然对你没有怨言，除了这一件事情：他认为你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赞扬这个年轻人，奖赏他，然后抛弃他。”他还说，他绝不会允许自己被抛弃。
>
>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给西塞罗的信，前43年5月24日 [1]

冬季的几个月里，各方进行谈判，但毫无建树。在冬季很难为军队提供给养，而两位执政官还忙着训练新兵和征集物资。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穆蒂纳 [2] 城驻扎，他的军团士兵靠屠宰役畜、制咸肉来度日。安东尼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军队团团围住，但没有逼得太紧，也没有尝试进攻。等待对安东尼有利，因为只要他等得足够久，守军就要忍耐饥饿，不得不投降。让对方在更激烈的战争中走出第一步，对安东尼也没有害处。各个阵营还不是很明朗，大家还不知道，那些坐拥重兵的总督们会如何反应。西塞罗敦促在西班牙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以及在高卢各行省的李必达和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派出各自的军队去支援迪基姆斯·布鲁图斯。这三人都向西塞罗保证自己的友好和对共和国的忠心，却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3]

在远方，另外一位布鲁图斯如今掌控着马其顿行省及其驻军。盖乌斯·安东尼奉兄长之命去控制马其顿，但未能赢得当地驻军的支持，他自己的部队反而投奔了布鲁图斯，他本人也成了俘虏。特雷博尼乌斯被多拉贝拉逮捕和处决，有人说多拉贝拉对其进行了毒刑拷打。特雷博尼乌斯是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凶手中第一个丢掉性命的。没过多久，军队又转而反对多拉贝拉。在随后几个月内，他很快被彻底打垮，最终自杀。卡西乌斯接过了叙利亚境内各军团的指挥权。密谋者获得了自己的军队，开始从各行省榨取钱财和其他资源。西塞罗开始努力劝说元老院将密谋者已经做的事情合法化，但密谋者的这些军队都没有办法去援救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恺撒及其士兵仍然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关键力量。[4]

新官上任的资深裁判官恺撒非常情愿地接受两位执政官的指挥，与他们保持着亲密关系。两位执政官都曾是铁杆的恺撒派。可能是在前44年年底，希尔提乌斯为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记》补充了第八卷。他也可能是《亚历山大港战争史》和《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这两部书续写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内战记》。对尤利乌斯·恺撒往昔胜利的赞颂无疑会赢得他的旧部的好感。[5]

3月，元老院控制下的军队开始调动。恺撒的几个军团是仅有的真正做好了战斗准备的部队。恺撒将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交给希尔提乌斯指挥，于是这位执政官动身前往内高卢。年轻的恺撒则率领第七军团随后跟进，他的第八军团此时可能还没到他身边。这些部队得到了一些骑兵和轻步兵的支持，可能还有一队战象，是叛逃安东尼的军团带来的。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各自还组建了一个大队的禁卫军，都是精心挑选的精锐老兵，用作司令部的卫队在战斗中也是令人生畏的力量。潘萨目前还留在罗马，匆忙地训练和准备4个新军团，并主持元老院会议。他参加了3月19日的一次会议，但次日便离开了罗马城，带领4个军团的新兵北上。[6]

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在安东尼战线附近建造了两座设防营地，但觉得自己力量还不足，必须等待其余部队抵达，才敢向穆蒂纳发起突破作战。他们点燃了烽火，向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发信号，但没有办法知道，后者是否知道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后来一名信使溜过了敌人前哨，游过一条河，潜入穆蒂纳城。被包围的穆蒂纳驻军和负责营救他们的解围部队之间的通信就只能依靠这些勇士和信鸽，所以通信很不稳定。一连几周，两军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马其顿的几个军团投奔恺撒时带过来的一些辅助骑兵现在决定重新回到安东尼的怀抱。安东尼可能还得

到了其他一些增援部队，因为他的兵力似乎增加到超过3个军团。在穆蒂纳城内，迪基姆斯·布鲁图斯部队的存粮濒临告罄，但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在得到增援之前，还没有办法救援迪基姆斯·布鲁图斯。[7]

到4月的第二周，潘萨及其部队快要抵达。他们是沿着埃米利乌斯大道[8]开赴穆蒂纳的。安东尼不能让几支敌军会师，于是决定趁着敌人还分成几股、比较脆弱的时候快速攻击。他派遣了一些小部队到希尔提乌斯和恺撒营地前，希望能够缠住他们。安东尼亲自率领2个来自马其顿的军团，即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以及很大一部分骑兵和轻步兵，匆匆南下，去伏击潘萨的新兵。希尔提乌斯察觉了安东尼的这一动向，或者是得到了情报，于是在4月13日至14日夜间，派遣玛尔斯军团以及他和恺撒的禁卫军大队与潘萨会合，并护送他的部队。希尔提乌斯的这个决定是一场赌博，因为如果这些部队走错了路，迎头撞上兵力更强的安东尼部队，就可能被全歼。不过他的这次冒险收到了成效，这些部队顺利与潘萨会合了。

4月14日晨，潘萨得到加强后的部队接近了小镇“高卢广场”（距穆蒂纳约7里[9]）。安东尼军队的大部分都隐藏在房舍内，或者道路两侧的沼泽与灌木林地，但有一些前哨被潘萨部队发现。玛尔斯军团的将士记起了自己的战友在布隆迪西乌姆被安东尼处决的事情，怒火中烧，突然发动了进攻。随后爆发了一场凶残的混战，由于地形复杂，可以分解为好几场小规模战斗。恺撒的禁卫军大队在大道上与安东尼的卫队交手，伤亡惊人地惨重。在后方，潘萨的新兵军团开始撤往他们连夜修建的行军营地，并竭尽全力地加固防御工事。

在一段时间内，玛尔斯军团坚守阵地，甚至将第三十五军团逐退了半里路，但安东尼的骑兵优势渐渐发挥出来，迫使玛尔斯军团后撤。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的顽强战斗，以及潘萨及其军官的指挥，使战线被勉强稳住，撤退没有变成溃散。尽管潘萨本人头部被投射武器击中，负了

重伤，但其部队的大部分士兵撤到了营地的防御工事处。安东尼军队攻打潘萨营地的低矮土墙，但未能突破。此时已是下午，安东尼认识到自己的士兵疲劳且饥饿。如果是尤利乌斯·恺撒处于安东尼的位置上，一定会在现场建造自己的设防营地，并将食物送过来，对敌人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但安东尼率军撤回了自己的原营地。

此时，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已经认识到，他们遭到的试探性攻击只是幌子。希尔提乌斯率领第四军团和第七军团的大部分士兵出动，让他的年轻同僚守卫营地。不知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希尔提乌斯的谋略高明，他成功攻击了正在撤退的安东尼军队。在月光下，安东尼军队仓促组成了战线，但他们胜利的喜悦渐渐变成了疲惫不堪，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没有办法应付第二场战斗。第二军团和第三十五军团被突破，伤亡惨重，各自都丢失了珍贵的鹰旗和其他一半军旗。大多数士兵都被打散了，有的退到了“高卢广场”，还有一些人躲藏在沼泽地内。安东尼的骑兵伤亡很少，成功逃脱，他在夜间派出巡逻队去搜寻和召回尽可能多的掉队士兵。[10]

除了这些残部之外，安东尼手中还有状态良好的第五“云雀”军团和其他部队，足以继续封锁穆蒂纳。而且他仍然拥有兵力和骑兵质量上的优势，所以在随后几天的小规模交锋中打得很不错。但他转入了守势，而希尔提乌斯和恺撒对他加强了压力，逼近了安东尼战线，向其发起挑战。安东尼拒绝出战。希尔提乌斯和恺撒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提升己方官兵的自信。这一周结束的时候，安东尼终于按捺不住，排兵布阵，出来应战。他吃了败仗。希尔提乌斯和恺撒乘胜追击，向安东尼的战线发动了全面进攻。在之前的战斗中，十九岁的恺撒起到的作用很小，安东尼后来声称恺撒逃离了战场，抛弃了作为将军身份标识的红斗篷。于是在这第二次交战中，恺撒刻意表现了自己的英雄气概。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有一次，在旗手负伤后，恺撒亲自举起军团的鹰旗。这是个很有名的姿态，意在激励将士奋力进攻，或者鼓舞正在动摇的士兵。攻打设

防阵地总是非常困难的，但兵力和自信能够发挥作用。希尔提乌斯冲进了安东尼的主营地，但在帐篷之间的混战中阵亡。到这一天结束时，安东尼军队丢失了好几个关键地点。安东尼放弃了对穆蒂纳的封锁，撤退了，寄希望于与为他带来生力部队的下属会合。[11]

对安东尼的追击战打得有气无力。希尔提乌斯死了，身负重伤的潘萨只能躺在营帐内，没等这个月过去就不治身亡。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是下一年的执政官（这也是尤利乌斯·恺撒生前的任命），所以地位比恺撒高；他自己的部队在忍饥挨饿地死守穆蒂纳几个月之后，状态非常糟糕。而且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囊中羞涩，很难为部队支付军饷和提供给养。在穆蒂纳围城战之前，守军屠宰了所有役畜，现在很难找到替代的牲口。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缺少有战斗力的骑兵，也没有辎重，所以无法作战。解围部队中最强的部分仍然忠于年轻的恺撒，何况老兵不会喜欢一个杀害尤利乌斯·恺撒的凶手。[12]

恺撒现在实际上掌握着他自己的和两位执政官的军队。后来有人指控恺撒下令杀害希尔提乌斯，甚至亲自动手杀了他，并且安排潘萨去送死，以便抢夺军队指挥权。据说潘萨的私人医生遭到逮捕和拷问，因为潘萨的伤情突然恶化了。这些故事的背后肯定有后见之明和仍然持续的内战宣传需求，这些说法不大可能是真的。罗马的军事指挥官要身先士卒，身处距离战斗最前沿不远处，而且要穿着鲜红色斗篷和精美甲胄，因此是非常显眼的目标，很容易遭到投射武器或者想要扬名的敌军勇士的攻击。在内战中，双方的服饰相似，难免造成混乱，指挥官遇到的威胁肯定更大。在第一次“高卢广场”战役中，玛尔斯军团的一名指挥官险些被潘萨的一些新兵杀死，这些新兵到最后一刻才认清对方是友军。[13]

两名执政官的死亡肯定是机缘巧合，而不是恺撒的阴谋使然，但这改变不了根本的事实：如今恺撒拥有七八个军团。

重返罗马

元老院先得知安东尼军队获胜（这或许指的是潘萨部队的战败）的传闻，随后才听到“高卢广场”的完整故事。两名执政官和恺撒都因此次胜利而受到褒奖，尽管恺撒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蒂纳解围的消息令西塞罗和其他一些害怕安东尼的人欢欣鼓舞。元老院宣布举行五十天的公共感恩活动，这远远超过了尤利乌斯·恺撒得到的荣誉。安东尼终于被宣判为国民公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对各自军队和行省的指挥被合法化。并非所有人都欢呼雀跃。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是西班牙一个行省的总督，也是老的恺撒派。他写信给西塞罗，哀叹如此多的意大利优秀子弟白白丧命。[14]

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尽了全力，但无法阻止安东尼逃跑。5月初，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抱怨道，他“没有办法向恺撒发号施令，也没有办法调遣恺撒的军队。这两件事情都很糟糕”。元老院下令将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交给迪基姆斯·布鲁图斯，但士兵们拒绝接受他。几周后，西塞罗不得不向布鲁图斯承认，没有办法强迫士兵们接受他。布鲁图斯可能得到了对一些新兵军团的勉强算是长期性的指挥权，于是他带着这些新兵和原先的残兵，出发追击安东尼。安东尼很快与普布利乌斯·温提迪乌斯·巴苏斯（尤利乌斯·恺撒旧时的参谋军官之一）新征募的3个军团生力部队会合了。随后，安东尼全军进入了外高卢。元老院敦促李必达和普兰库斯去攻击安东尼，但这两人麾下最优秀的军官和部队都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旧部。5月，安东尼的军队在李必达的主力部队附近扎营。两军的老战友互相亲热起来，大家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两军不愿意彼此厮杀。李必达的部队宣布支持安东尼，李必达很快也倒戈过去。他的一名有元老身份的下属自杀了，但只有这一例死亡。李必达和安东尼成了盟友，很快普兰库斯和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也加入进来。国民公敌的势力日益增长，远远超过以往。[15]

元老院投票决定授予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凯旋式的荣誉。恺撒得到了级别较低的小凯旋式。小凯旋式的将军骑在马背上，而不是乘战车，而且得到的威望也比凯旋式将军要低。元老院还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将各军团解散，并向退伍军人分配土地。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和恺撒都被排除在这个委员会之外。这意味着恺撒不仅要被夺走军队，而且没有机会通过赏赐将士来赢得支持。许多元老感到危机已经度过了，希望放松下来，也迟迟不能清楚认识安东尼元气恢复的程度。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不明智地决定，将曾经承诺赏赐给投诚军团的赏金减少一半。[16]

5月24日，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写信给西塞罗，报告称十九岁的恺撒重复了一句话："我们必须赞扬这个年轻人，奖赏他，然后抛弃他。"布鲁图斯的一名幕僚成员确信这句话最初是西塞罗说的。演说家没有否认自己说过这话，而这句话（laudanum aduluscentum，ornandum，tollendum，最后一个词既有"升高"，也有"抛弃"的意思）的节律也的确符合西塞罗的风格，所以应当确实是他说的。[17]

从一开始，元老院就把恺撒当作镇压安东尼的便利工具。对年轻的恺撒来说，接受元老院的命令就将他征募军队的行为合法化，并帮助他成为随后斗争中的一位重要参与者。现在，元老院正式批准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在增强的军事力量，甚至认可了塞克斯图斯·庞培（伟大的庞培的幼子，此前在西班牙和地中海岛屿掀起了叛乱）的地位。这些人都不大可能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友好。这些年早些时候，安东尼曾写信给希尔提乌斯和恺撒，警告他们，唯一能够从他们双方的冲突中渔利的，就是过去的庞培派。[18]

恺撒可不打算被抛弃，他在公开场合也这么说过。和大家一样，他希望长久地保全自己的地位。这个月初，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暗示，年轻的恺撒在觊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留下的空缺的执政官职位。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可能去找了西塞罗，暗示他俩可以联合起来。有传闻称，老

演说家已经得到了空缺的执政官职位之一。在马其顿的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听到了这种说法，他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元老院任用恺撒。6月，西塞罗写信给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向他保证，自己已经在元老院讲话，反对恺撒的亲戚们，那些人努力将恺撒推到最高职位。西塞罗指的应当是菲利普斯和马凯鲁斯。不过，尽管西塞罗劝说恺撒放弃如此疯狂的野心，但仍然继续高度赞扬这个年轻人。尤利乌斯·恺撒曾说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的信念常常会到偏执狂的地步。布鲁图斯没有被西塞罗说服，担心西塞罗太容易被吓倒，又太容易被年轻的恺撒奉承得飘飘然。在布鲁图斯眼里，恺撒只是一个未经合法选举的军阀，他的地位、名字和财富都是从尤利乌斯·恺撒那里继承来的，而布鲁图斯及其同志杀死了这位暴君。西塞罗则不断敦促“解放者”的领导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率领军队返回意大利。说到底，军力胜过理性。[19]

7月，恺撒的军队派来了一个代表团。代表团有四百人，大约是一个大队的规模，算不上一支军队，但包括许多百夫长和各级官兵代表。他们要求元老院给他们的统帅以执政官的职位，并要求发放承诺过的全额赏金。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代表团的发言人是一名叫作科尔内利乌斯的百夫长。他援引了主要来自遥远过去的前例，说明在国家需要人才的时候，可以将低于法定年龄的人任命为执政官。百夫长们是比较富裕的人，常常是来自意大利外省城镇的贵族。旧的观念——百夫长是从普通士兵提拔起来的军士长——是一个神话，但很遗憾的是，这种错误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即便如此，在元老们看来，百夫长的社会地位仍然远远低于他们自己，而且元老们很怨恨百夫长们陈词时的强硬语调。百夫长们的要求被愤怒地拒绝了。据说科尔内利乌斯掀开了自己的军服斗篷，露出了剑柄和剑鞘（普通士兵的剑佩带在身体右侧，而百夫长的剑在左侧）。他说：“如果你们做不到，它能做得到。”[20]

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可能只是个传说，但很快变成了现实。代表团返回内高卢，回到恺撒身边后，“要求”他率领军队进军罗马。他没有表现

出任何不情愿，立刻率军南下。又有一位恺撒率军跨过了卢比孔河，不过这一次这条小河对他的军权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的军权是个特例，并不与任何具体地区挂钩。他手中大约有8个军团。元老院只有1个军团，是潘萨组建的，而且潘萨觉得这个军团还不能胜任作战任务。一名信使被派往北非行省，召唤那里的3个军团回国保卫罗马城。

元老院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投票决定授予恺撒缺席参加竞选的权利（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9年要的就是这个），但恺撒已经不再愿意信任他们，于是继续进军。在他抵达罗马城之前，来自阿非利加的2个军团先到了。这些士兵的训练水平高于潘萨留下的新兵，但他们没有动力去对抗优势敌人，毕竟元老院只有3个军团，而恺撒有8个。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在一名或多名裁判官的指挥下，开始准备防御。元老院还做了一件更阴险的事情，派人去将阿提娅和屋大维娅作为人质，但没找到她们。她们很可能已经得到了警示，或者自己足够精明，认识到形势对她们很危险。

恺撒兵临城下，元老院的军队非常明智地倒戈到他那边。一名裁判官因羞耻或愤怒而自杀，但年轻的恺撒和他的卫队进城时，并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群众以及许多元老，都出来迎接他。西塞罗是最后一个来的，年轻的恺撒冷冰冰地提及了这一点。夜间传出了谣言，说玛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发生了哗变，反对恺撒。元老院在黎明前开了会（这又违反了传统），短暂地为此欢欣鼓舞，后来发现这是假的。

前43年8月19日，恺撒当选为执政官，此时他的年龄仅有19岁10个月26天。这么年轻的人担任公职，此前还没有先例。这个年轻人对自己在这方面的独一无二感到非常自豪。他的同僚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昆图斯·佩蒂乌斯。我们估计可能除了他俩之外没有别的候选人，但选举的所有正当程序都得到了遵守，罗马人民依法走过“羊圈”投票。他的当选很可能的确是由于得到群众的支持，不过他的军队就驻扎在战神广

场上，这肯定能帮助选民们想清楚应当选择谁。当选之后，恺撒履行了传统的献祭，据说有十二只秃鹫从他头顶上飞过。根据神话，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吉兆。

不久之后，罗马人民再一次聚集起来开会，这一次是为了投票确认尤利乌斯·恺撒收养行为在法律上的合法性。随后恺撒颁布了其他一些法律，其中一项推翻了前44年3月17日的大赦，宣布刺杀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是一桩罪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夺取各自行省行为的合法性被剥夺，他们和其他密谋者都被一个特别组成的正式法庭缺席判处有罪，庭审在一天内完成。陪审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并且受到严密监视，只有一名陪审员敢于投票主张密谋者无罪。因为密谋者肯定是杀死了独裁官，并且曾对此自我吹嘘过，所以只要尤利乌斯·恺撒被杀一事被认为是犯罪，那么他们肯定是有罪的。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此次庭审的时间过短，以及缺席审判这种显然不符合常规的做法。不过，这次审判比西塞罗前63年审判喀提林党人时更符合法律程序。另一项法律撤销了将安东尼和李必达宣布为国民公敌的法律。多拉贝拉的国民公敌身份也被撤销，恢复为合法的前任行政长官，不过他可能在得知消息前就死了。塞克斯图斯·庞培短暂享有的法律地位被剥夺，又一次被宣布为叛贼。一位裁判官被指控阴谋杀害年轻的恺撒，并被草草地罢免和判处死刑。判决可能是迅速而残酷的，但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孤例。

独裁官遗嘱里承诺给罗马人民的馈赠的剩余部分，终于由正式成为他养子和继承人的年轻恺撒支付了。恺撒从几乎已经空荡荡的国库拿钱，给了他的军团士兵每人2500迪纳厄斯，并承诺会支付剩余一半赏金。他新近得到的几个军团可能也获得了慷慨赏赐，因为说到底他的力量还是有赖于军队。他现在有11个军团，但安东尼和李必达有22个之多。不过安东尼和李必达的这些部队可能只是空架子，实际兵力是理论兵力的一半，甚至更少。一位军事统帅的威望更多取决于他所拥有军团的数量，而不是他实际指挥的士兵的确切总数，所以统帅们倾向于组建

很多军团，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有机会将忠诚的追随者提拔到高级衔级。[21]

恺撒及其军队很快重新北上，返回内高卢。安东尼和李必达在那里等待他。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追踪安东尼和李必达，但没有办法与兵力远超自己的敌人交战。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及其军队在迪基姆斯·布鲁图斯麾下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投奔了安东尼。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的部队成群结队地叛变，他带了一小群骑兵作为护卫，躲到了一位高卢酋长那里。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在尤利乌斯·恺撒帐下效力的时候认识了这位酋长，但在新形势下，旧的友谊也土崩瓦解了。或许是在安东尼的命令下，这位酋长杀死了迪基姆斯·布鲁图斯，将其首级送给安东尼，得到了安东尼的认可。

敌对双方的最优秀官兵都是曾为尤利乌斯·恺撒战斗的旧部，都热爱和缅怀他，也都仇恨杀害他的凶手。他们不愿意互相残杀，所以尽管恺撒的军队规模比李必达和安东尼的军队小得多（可能是后者的一半），但他仍然能够自信地接近对方。三位领袖都认识到，互相攻击会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争斗对各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尽管安东尼在前一年愿意与所谓的“解放者”和平共处，但这纯粹是出于双方的务实需求。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东方各行省军力的支持下，不大可能愿意妥协，也不可能对安东尼或李必达友好，更不会对年轻的恺撒友好。要相信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风险实在太大。当然，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及其盟友对安东尼等人也抱有同样程度的怀疑。[22]

安东尼、李必达和恺撒互相通信，也有使者通风报信，所以知道对方愿意妥协。10月底，他们在波诺尼亚（穆蒂纳以北不远处）附近会晤。两天时间里，三位主要领袖及其幕僚人员商谈了结盟的细节。每位领袖都带来了5个军团，三人在一个小岛上商谈的时候，负责警戒的士兵在一条河两岸互相监视着。随后达成的协议在罗马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也很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庞培、克拉苏和尤利乌斯·恺撒之间达成的是非正式合作协议，而新的联盟却在他们抵达罗马后很快得到法律认可。三人同意分享只有尤利乌斯·恺撒曾经享有的最高权力。他们将成为有权恢复国家秩序的三头同盟（字面意思是三个人组成的理事会）。得到如此强大的权力之后，恺撒同意放弃自己短暂担任的执政官，将这个职位让给温提迪乌斯。温提迪乌斯目前担任裁判官，正是他的增援使得安东尼战败之后得救。温提迪乌斯将在本年度余下的几周内担任执政官，虽然任期很短，却让他终身享有前任执政官的地位。

三位领袖合军一处，共同率领联军的很大一部分开赴罗马。意大利根本没有任何军队能够抵抗他们，他们进入罗马城时就像恺撒几个月前进城那样平安无事。11月27日，一位名叫提提乌斯的保民官召集了公民大会，大会批准了三头同盟的建立，并授予了他们五年的权力。大会可能还正式将他们已经占有的行省授予他们。李必达得到了外高卢和西班牙各行省，安东尼得到高卢的其余部分。恺撒得到了西西里岛、撒丁岛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岛屿，以及北非。恺撒的地盘可能是最弱小的，因为其领地的很大一部分很快将被塞克斯图斯·庞培占领。就像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伟大的庞培）所做的一样，三头同盟将通过军团长来控制各行省，他们没有义务亲自到行省去。其中的关键在于控制驻扎在各省的军队，而二十岁的恺撒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从长远看来，控制军队远远比控制广袤的各行省重要。[23]

三头同盟是明目张胆的军阀，各自拥有忠于他们本人而不忠于国家的私人军队。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以及塞克斯图斯·庞培也都是这样，他们全都一掷千金地赏赐麾下士兵，以巩固他们的忠诚。恺撒与其他军阀没什么不同，但他的崛起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军阀，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他这个年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在军中担任下级军官或开始在法庭担任辩护律师，但他成了拥有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权势的人之

一。

---

[1] Cicero，*ad Fam* .11.20（SB 401）（Loeb translation，modified）.

[2] 今称摩德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南岸。现在以"引擎之都"著称，因为有许多意大利著名的跑车制造商，如法拉利、兰博基尼、帕加尼及玛莎拉蒂将工厂设立于此，而且除兰博基尼之外，它们的总部也都设在摩德纳市内或附近。

[3] Appian，*BC* 3.27，49.及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50。

[4] Appian，*BC* 3.63，79，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71-2，183。

[5] Caesar，*BG* 8. *praef* .声称巴尔布斯敦促他写作，另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51，fn.133讲到第七和第八军团得到优待。

[6] Cicero，*ad Fam* .10.6.3，参见*Philippics* 13.7-9，见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 （2008），p.399。

[7] Appian，*BC* 3.50，65，Dio 46.35.1-37.3，包括恺撒骑兵部队的逃兵，Pliny *NH* 10.110讲到使用信鸽。

[8] 古罗马的一条大道，在意大利北部，从今天的里米尼通往皮亚琴察，前187年竣工，得名自主持工程并完成的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187年执政官）。

[9] 1罗马里=1618.5码或1.48公里，比现代的英里小一点。

[10] "高卢广场"的两次战斗，见Cicero，*ad Fam* .10.30包括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生动的目击记述，Appian，*BC* 66-70，Dio 46.37.1-7，及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51-5，及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15-18，及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25-7。阿庇安在戏剧性的描写中强调老兵军团静默的、机器一般的杀戮，但这可能只是文学夸张。我们应当记住，在场真正的老兵只有禁卫军。马其顿各军团普通士兵的作战经验很少。

[11] Appian，*BC* 3.71-2，Dio 46.38.1-7，Cicero，*ad Fam* .11.13.2，Suetonius，*Augustus* 10.4讲到恺撒的行为，如Velleius Paterculus 2.61.4强调他的勇敢和年轻；挑战，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143-5。

[12] Appian，*BC* 3.73-5，Plutarch，*Antony* 17-18；迪基姆斯·布鲁图斯缺少牲口，见Cicero，*ad Fam* .11.13.2。

[13] Cicero，*ad Brutum* 1.6.2 记述了当时的一个传闻称布鲁图斯表示怀疑，因为他认识潘萨的医生，Suetonius，*Augustus* 11记述了后世的故事，讲到恺撒害死了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参见Tacitus，*Ann* .1.10，此处暗示潘萨是被毒死的，希尔提乌斯则被自己的部下在恺撒的劝诱下杀害；在高卢广场险些被安东尼军队抓住随后又差一点被己方杀死的军官，见Cicero，*ad Fam* .10.30.3。

[14] Cicero，*ad Brutum* 1.3.4，*ad Fam* .10.21.4，11.19.1，11.21.2，Appian，*BC* 3.74，Dio 46.40.1及Rawson in *CAH2* IX，pp.483-5，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76-8及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318-23 概括了元老院的反应和穆蒂纳胜利之后的情况；波利奥的书信，见Cicero，*ad Fam* .10.33.1。

[15] Cicero，*ad Fam* .11.11.4 for quote，*ad Fam* .11.19.1讲到迪基姆斯没有得到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而感到失望；李必达军队的变节，见Plutarch，*Antony* 18，Appian，*BC* 3.80-84，Dio 46.38.6-7，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78-9，及P.Brunt，*Italian Manpower*，*225 BC-AD 14* （1971），pp.481-4。

[16] 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319-30.

[17] Cicero，*ad Fam* .11.20.

[18] Cicero，*Philippics* 13.22-5.

[19] Appian，*BC* 3.82，Cicero，*ad Brutum* 1.3.2，4.3-6，*Philippics* 14.15，Plutarch，*Cicero* 45，with 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 （1971），pp.325-8，A.Lintott，*Cicero as Evidence* （2008），pp.416-21；Cicero，*ad Brutum* 1.10.3（Loeb translation 18.3）讲到恺撒的亲戚们鼓励他竞选执政官。

[20] Appian，*BC* 3.88，Suetonius，*Augustus* 26.1，Dio 46.42.3-43.6；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185，fn.7，对这个故事的细节表示怀疑。

[21] Appian，*BC* 3.88-95，Dio 46.44.1-49.5，Velleius Paterculus 2.65.2，*Res Gestae* 1，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85-8；该时期的罗马军团，见P.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pp.481-4。

[22] J.Ramsay，‘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Classical Philology* 96.3（2001），pp.253-68提出，安东尼只关心增强自己的地位，从来没有真正致力于和密谋者永久性结盟。

[23] 三头同盟的建立，见Plutarch，*Antony* 19-21，Appian，*BC* 3.96-4.46.50.1-56.4，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188-91，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57-61，及Rawson in *CAH2* IX，pp.485-6，及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28-31。

八 复仇和纷争

> 马尔库斯·李必达、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恺撒，奉人民之命，管理和治理共和国。他们宣称，背信弃义的叛贼哀求饶命，而在得到宽恕后却成为恩主的敌人，密谋反对恩主，盖乌斯·恺撒因此被那些得到仁慈宽恕的人杀害……；我们也因此遭到侮辱，被宣布为国民公敌；现在……我们要先发制人，而不是被他们伤害……
>
> ——阿庇安记载的三头同盟镇压政敌的宣告，2世纪初 [1]

> 但有一件事情需要评论一下。对于那些被镇压的人，他们的妻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他们的释奴也是如此，他们的奴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忠诚，而他们的儿子们则忘恩负义。
>
>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 [2]

三头同盟的统治是从大屠杀开始的。恺撒、安东尼和李必达从波诺尼亚南下的过程中，派遣士兵先行出动，消灭了十几位显赫人物。他们没有给出任何事先警告，不过西塞罗和其他一些受害者猜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逃离了罗马城。在有四人被杀后，士兵们开始搜索其余人，一夜之间在罗马精英阶层中引发了极大恐慌，他们担心自己也处于危险中。执政官佩蒂乌斯（恺撒的同僚和表舅）派遣传令官到各地，要求大家保持冷静，等待天亮，那时就会公布通缉名单。佩蒂乌斯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身体不好。人们相信，此事的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几天后就去世了。三头同盟把他留下的执政官职位赏给了另外一名追随者，尽管任期只有本年度余下的几周时间。[3]

三头同盟抵达罗马后，恢复了苏拉曾经用过的公敌宣告手段，于是谋杀变得更公开和正式。广场上张贴了两张名单，据说其中一张名单专门用来通缉元老。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失去了法律保护，三头同盟的下属或者任何渴望领赏（赏格就是死者财产的一部分）的人都可以合法地杀死他们。杀人者可以呈上死者首级，以此为据领赏。首级随后被固定在

演讲台[4]上。死尸的其余部分则被丢弃在死亡现场，或者和城市的垃圾一起被投入台伯河。任何人，包括被镇压者的直系亲属，若胆敢帮助名单上的人，就可能遭到镇压。最初的名单上有数百人，在随后几个月内增加到超过两千人。镇压的程序非常正式，但掩盖不了事实：这是非法杀戮，规模远远超过了西塞罗不经审判处死喀提林党人的行为。这一次，没有一位保民官，事实上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发出抗议。安东尼属下的一名指挥官后来冷冷地评论道："要批评那些有能力镇压你的人，实在太难。"三头同盟指挥着意大利的全部军队，即便他们每人只带了1个军团和1个禁卫军大队到罗马城，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违抗他们的意志。[5]

新政权的合法性只是一层薄薄的虚饰。建立三头同盟的《提提乌斯法》在提交的当天就被草草通过，完全无视法律要求，即任何提案要等待至少三天才能成为法律。三头同盟声称，镇压行动是消灭国家与国家领袖之敌的必要手段。他们宣称，尤利乌斯·恺撒对人宽大仁慈，却被自己宽恕的人杀害了。他们可不打算重蹈覆辙，所以会毫无怜悯之心地杀死任何敌人，对敌人的亲戚和家人也一视同仁。恺撒、安东尼和李必达在制定死亡名单时，做了一些交易。这个场景后来被莎士比亚记录下来，令人毛骨悚然："那么这些人都是应该死的；他们的名字上都做了记号。"[6]安东尼允许两位同僚把他的舅舅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7]列在名单上，李必达也则放弃了自己的亲兄弟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这两位受害者都是前任执政官。年轻的恺撒没有多少显赫的亲戚可以牺牲，于是拿托拉尼乌斯来凑数，也就是曾经监护他但被指控侵吞他父亲遗产的人。[8]

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逃到了米利都[9]，在那里流亡，他很可能得到了李必达本人的预先警示。李必达也并没有认真去追捕自己的兄弟。安东尼的母亲尤利娅将自己的兄弟藏在家中。刽子手闯到门前时，她堵住了门。据普鲁塔克记载，尤利娅告诉刽子手们："你们想杀卢基乌斯·恺

撒，就先杀我吧，我是你们统帅的母亲！”后来她在广场上公开与自己的儿子攀谈，后者“不情愿”地赦免了自己的舅舅。没有人保护托拉尼乌斯，于是他死了。在随后大约一年时间里，有数百人丧生。[10]

西塞罗原本可以逃走。他登上了一艘开往东方的船，但由于天气恶劣，船被狂风吹回岸边，他似乎也没有精气神去逃亡了。在这期间，他的弟弟昆图斯和侄儿都被抓住并被杀死了。西塞罗的儿子正在雅典学习，很安全，很快就将作为布鲁图斯的军官参加反对三头同盟的战争。前43年12月7日，演说家听天由命，带着尊严迎接死亡。他是目前为止地位最显赫的受害者，也是唯一一位遇害的前任执政官。他的死亡向人们发出警示：即便是最显赫的人，若是得罪了三头同盟，也是死路一条。西塞罗虽然很成功，但仍然是个“新人”，他不像门阀贵族那样拥有许多代人传承下来的人脉关系，他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成了一个显而易见、非常脆弱的目标。在他卸去执政官职务之后，面对克洛狄乌斯和其他野心勃勃的政客攻击时，他显得势单力薄。[11]

后来有人说，年轻的恺撒记起了老政治家曾经对自己的提携，于是主张放他一马。恺撒或许真的替西塞罗求了情，甚至可能是真诚的，而不是在讨价还价。但不管真相是什么，他都没有坚持到底。安东尼命令将西塞罗的右手和首级一起送到罗马，后来将它们都钉在演讲台上，以便报复那只写下了《反腓利比克之辩》的手，以及那张曾经宣读这份演讲稿的嘴。在此之前，他和妻子富尔维娅用餐时，这些恐怖的战利品被送到他面前。据说安东尼抓住了西塞罗的首级，带着野蛮的喜悦放声大笑。随后，富尔维娅拿走了战利品，痛斥死者，甚至从自己头发上拔出发簪，去刺死者的舌头。两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恨西塞罗，或许富尔维娅更恨他，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克洛狄乌斯曾是西塞罗的死敌，而西塞罗甚至在法庭上为杀害克洛狄乌斯的凶手米罗辩护，尽管没有成功。在更近的时期，富尔维娅眼睁睁看着西塞罗说服元老院去反对身为合法执政官的安东尼，并将他宣布为国民公敌。当时富尔维娅居住在罗马，感

到自己的财产和人身都遭到了威胁，因为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觉得他们这样一个富户处于脆弱状态。[12]

史料中讲到，三头同盟全都为了这场大屠杀而欢呼雀跃。我们很难辨清事实真相，很难把真相与后来的宣传分离开，因为罗马的政治宣传中素来充满凶残而想象力丰富的攻击。在年轻的恺撒及其继承人统治的时代写下来的大多数故事都将他描绘为温和而不情愿的合作者，而将他的两位同僚描绘为野兽。但这不是留存至今的唯一版本。苏埃托尼乌斯声称，恺撒起初不情愿，但很快就热情而积极地追杀受害者。李必达和安东尼都是成熟的人，处于能够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年龄，即便那些嫉妒和痛恨他们统治的元老，也更加怨恨一个黄口小儿杀人越货的权力。大多数罗马人觉得，还只有二十岁的恺撒实在不应当树立这么多敌人。[13]

事实上，被镇压的不仅仅是三头同盟的敌人。安东尼、李必达和恺撒拥有大约40个军团的大军，而且士兵们惯于接受慷慨的赏赐，因此他们急需大笔现金，此外治理国家也需要开支。被镇压的很多人之所以出现在名单上，仅仅因为他们很有钱，而三头同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让他们活下去。受害者的家产被没收，宅邸和乡间庄园被拍卖，以便为新政权筹集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受害者是被杀了还是逃往国外，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财产总会被充公。恺撒和安东尼都被指控，仅仅为了夺得一些精美的科林斯青铜花瓶，就肆无忌惮地杀人。被安东尼下令处死的维雷斯是一位前行省总督，即便按照罗马的标准也算是特别地贪婪，他于前70年被西塞罗成功地控诉，此后流亡海外。他还有很多财产，其中的艺术收藏品特别珍贵，于是这位年老的罪犯因此丧命。三头同盟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都急需金钱。传说在镇压政敌期间，富尔维娅和安东尼曾接受贿赂，然后杀死或者赦免某些人。富尔维娅还曾往名单上增加人名，仅仅因为她觊觎那些人的财产。据说安东尼还曾赦免一个人，因为此人的妻子答应和安东尼上床。[14]

在镇压行动中有很多人丧生，不过大多数受害者还是逃走并生存下来，最终返回了意大利和罗马城。这些大清洗引发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如戏剧性地逃出、英雄保护受害者、亲友互相出卖、奴隶告发主人等。后来出现了汗牛充栋的书籍，讲述这些故事。据说有一个男孩在上学路上被杀害；还有一个男孩正在举行成人仪式，此时凶手匆匆将他的名字加在镇压名单上。不过总的来讲，儿童都是安全的，不会受到伤害，除非他们自己名下拥有巨额财产。虽然三头同盟威胁要处死那些庇护和窝藏被镇压者的人，但并没有认真执行。一名受害者的藏身之处被发现后，他的妻子哀求与丈夫一同赴死。士兵们拒绝了，行政长官（可能是三头同盟之一或他们的一名高级下属）也拒绝了，这时这名女子宣称自己犯有包庇窝藏丈夫的罪行。据说最后这名寡妇把自己活活饿死了。[15]

没有故事专门讲述妻子因为窝藏丈夫而被杀死，但有很多故事讲到父亲保护儿子，或儿子庇护父亲。有一个邪恶的故事写道，一名女子安排自己的丈夫遭到镇压，将他锁在家中，等待士兵赶来，然后在丈夫被处决仅仅几个小时后便与情夫结婚了。还有一名被镇压的男子立起石碑，镌刻了铭文来纪念爱妻。他提到，妻子帮助他藏身和逃跑，最后说服恺撒赦免了他。但赦免令很难执行，女子在努力劝说李必达执行赦免令、召回她的丈夫时，李必达却命令仆人殴打这名女子。[16]

还有一个故事说，恺撒对某个案子下令暂缓执行判决。在此案中，一名女子将丈夫藏在一个大箱子内，把箱子搬运到正在主持公共竞技的恺撒面前。她随后揭示了自己的计谋，群众被她的勇敢和忠贞感动。恺撒察觉到群众的情绪，于是赦免了他。即便是军阀，也不能完全无视民意。根据镇压法令，奴隶若告发自己的主人，便可获得自由。但在几个得到宣传的案例中，如果奴隶告发主人后过于嚣张，或继续攻击前主人的家庭，三头同盟便会将这些奴隶处死，或重新卖为奴隶，以便向人民保证，社会秩序并没有受到严重威胁。[17]

恺撒、安东尼或李必达在下令镇压政敌时都表现出了冷酷无情，他们难逃罪责。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角度看，这些谋杀非常成功地制造了恐怖气氛，但经济收益却令人失望，因为很少有人竞买被没收充公的财产。太多的潜在买家不敢出手，以免显露出自己很有钱，能够买得起新地产。还有人记起了那些曾经从苏拉镇压政敌活动中受益的人后来遭到的频繁攻击。急需更多金钱的三头同盟开始征收一批新税，根据富人的财产对其征税，这是非常不符合罗马传统的措施。他们宣布，将对1400名最富裕的女性公民的地产进行评估，以便征税。这是史无前例的做法。在前3世纪抵抗汉尼拔的绝望战争中，贵族女性曾自愿捐献珠宝和其他财物给共和国，但国家从来没有对她们征过税。在霍尔腾西娅（她的父亲[18]曾经是罗马第一演说家，不过这个地位后来被西塞罗夺走了）领导下，一大群妇女先去找了三头同盟的女性亲属，然后冲进广场，去找恺撒、安东尼和李必达当面对质。这一次，广大群众仍然赞赏这些女性所表现出的勇气，于是三头同盟觉得还是让步比较稳妥。只有400名女性被征税，而男性的纳税负担则被加重。各农场的一半出产将被征收，而意大利各社区不得不在冬季为士兵提供免费住宿地，这种服务原本是被强加给外省的。[19]

腓立比战役

前42年1月1日，李必达第二次就任执政官，这离他上一次担任执政官（同僚是尤利乌斯·恺撒）仅仅过去了四年。这一次他的同僚是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此人是穆蒂纳战役后加入安东尼军队的指挥官之一。两位执政官的第一个举措是宣誓已不在人世的尤利乌斯·恺撒的全部决定永久有效。安东尼和恺撒非常愿意参与这次宣誓，元老院的其他人不是那么情愿，但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尤利乌斯·恺撒被正式封为神，人们在广场上他被火葬的地点附近建造了一座供奉他的神庙。这座神庙的遗迹存留至今。他的继承人如今不仅仅是拥有恺撒之名，还是神的儿子，尽管年轻的恺撒没有立刻采用这个头衔。[20]

罗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家族关系。前43年年末，阿提娅去世了，她活得足够久，看到了儿子当上执政官。她得到了一场公开葬礼。此时她的儿子已经与一位年老贵族的女儿订婚，但三头同盟建立后，这段婚约便被解除了。安东尼和李必达都没有年龄合适的女儿，但军队明确表示渴望采取一些措施来巩固三头同盟，于是年轻的恺撒娶了富尔维娅在第一段婚姻中生的女儿。这个姑娘叫克劳狄娅，在她父亲[21]将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时，改了自己的姓氏，但克劳狄娅的名字没有被改为较为低俗的克洛狄娅。克劳狄娅的父母都来自重要的贵族世家，所以对恺撒来说也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她年纪还小，还要几年才到正常的结婚年龄。尽管他们结了婚，但没有过夫妻生活。两年后，他们离婚时，恺撒发誓她还是处子之身。[22]

目前，这段婚姻为安东尼和恺撒建立了非常传统的联系。就在几个月前，这两人还互相攻击辱骂，兵戎相见。现在，他们要一同率军东进，去对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集结起来的强大军队。李必达留在意大利，只有几个军团。虽然恺撒年轻而缺乏经验，但他显然必须随军去惩罚那些谋害他养父的人。这比在三头同盟之间瓜分各行省重要得多。安东尼和恺撒将会赢得荣耀，或者殒命沙场。如果他们赢了，李必达就只能间接地分享一点点威望和权力。如果他们输了，未能回国，那么曾参与清洗政敌的李必达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敌人。[23]

要想胜利，并不轻松。“解放者”已经获得和招募了超过20个军团。其中有些军团最初是尤利乌斯·恺撒组建的，但都不曾在他的指挥下打过很多仗，因此没有理由对他、他的继承人或马克·安东尼表现出善意。这些军队也不会特别忠心耿耿地捍卫元老精英阶层的利益。和三头同盟一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非常仔细和慷慨地为士兵提供经济上的刺激。地中海东部各行省别无选择，只能为此埋单，因而遭到苛捐杂税的压榨，除此之外，还必须提供粮草、物资和盟军士兵。有些人是自愿支持的，但没有人能够抵挡“解放者”大军的强大力量。罗德岛不愿意满

足卡西乌斯的要求，于是卡西乌斯率军入侵该岛。犹太地区的一些社区顽固地拒绝合作，于是卡西乌斯将那里的居民全部卖为奴隶。大约在同一时间，布鲁图斯攻打并洗劫了吕基亚[24]的桑瑟斯，导致当地居民大批自杀。这些恐怖手段让大多数社区都积极地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布鲁图斯用他获得的部分白银铸造了一批带有他头像的银币，银币另一面是更妥当的共和国自由之帽[25]。铸造带有自己头像的钱币的做法是尤利乌斯·恺撒开创的，现在三头同盟也效仿他。[26]

前42年夏末，“解放者”觉得自己足够强大，便开始集结兵力，然后从小亚细亚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马其顿。安东尼和恺撒派遣了8个军团渡过亚得里亚海，同时准备自己的主力部队，并集结运送如此多士兵所需的船只。8个军团的先遣部队兵力少于对方，谋略也占下风，沿着艾格纳提乌斯大道向西撤到安菲波利斯。“解放者”没有穷追不舍，但在腓立比城下占据了一个易守难攻的位置。这座城市由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于前4世纪建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安东尼和恺撒的主力部队直到9月才起航，在这个时间开始作战算是非常晚了，但行动之坚决果断可与尤利乌斯·恺撒在内战中的表现媲美。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安东尼和恺撒也缺少运输船，并且面对着强大的、决心阻止他们渡海的敌军舰队。安东尼在布隆迪西乌姆港准备远征的时候，袭击港口的敌军被他打退。在抵达亚得里亚海之前，恺撒与力量不断增强的塞克斯图斯·庞培打了几场无关大局的小规模海战。在最终起航的时候，他们只带去了部分军队，而且他们的运输船必须返回来运载增援部队。第二批部队渡海之后，“解放者”的战船就封锁了海路，并且封锁维持了一段时间。[27]

安东尼和恺撒的军队在阿波罗尼亚登陆。两年多前，恺撒（当时还叫盖乌斯·屋大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面对风云变幻的罗马政治。但熟悉的环境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在航行途中患了重病。我们不知道具

体是什么病，但他此时没有办法继续前进。安东尼率领他的军队继续开进，去援救在安菲波利斯的先遣部队。然后他继续推进，勇敢地在腓立比附近扎营，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对峙。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兵力至少比他多三分之一，但“解放者”过于谨慎，未能利用这个优势。在随后十天内，两军的前哨之间发生了一些小规模交锋，直到恺撒及其军队抵达与安东尼会师。年轻的恺撒快到二十一岁了，因为体弱不能骑马，所以不得不乘轿。[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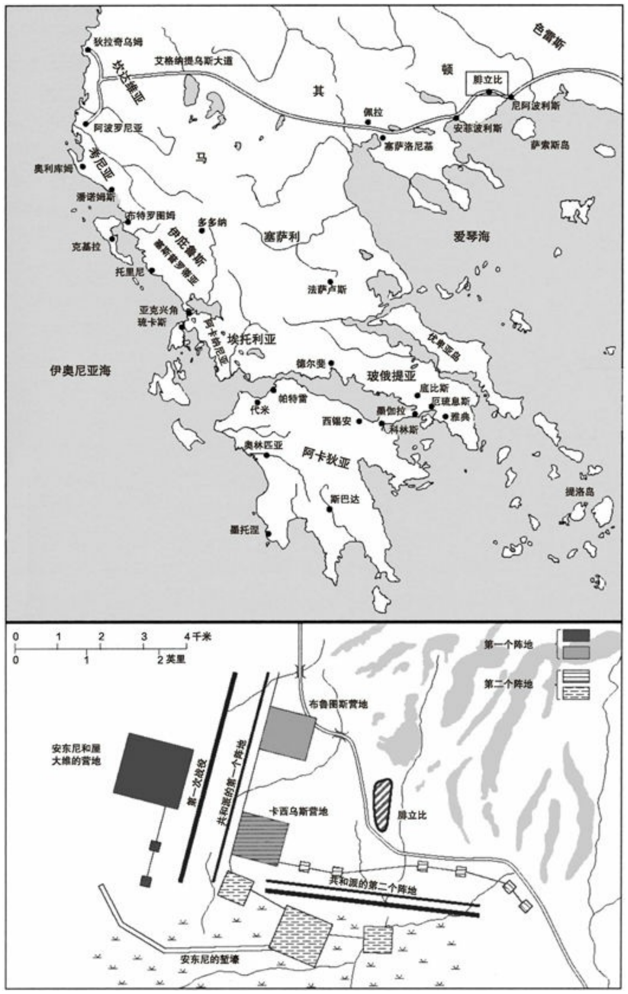
安东尼和恺撒手中有19个军团，这相当于前48年决定性的法萨卢斯战役时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兵力之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17个军团。“解放者”在骑兵方面有优势，据说出动了2万名骑兵，而安东尼和恺撒只有1.3万名骑兵。如果各军团的兵力接近理论数字，那么就有超过20万人参加了随后的战役，不过我们必须谨慎。很可能所有军团的兵力都远远少于理论数字，上述的骑兵兵力也是夸大的。用船运输马匹很困难，为这么多战马提供饲料也非常困难，何况还有数量相当的役畜以及这么多士兵，要在相当长的时间维持这么多人员和牲口的生存，难上加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已经聚集了大量粮草，并且可以从海路获取补给，他们的对手没有这些优势。但要说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能够在整个战役期间维持如此庞大军队的给养，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29]

即便各部队的兵力是其理论数字的三分之二或一半，仍然是非常庞大的。两军都有一些老兵，但绝大多数士兵和军官的作战经验都很少。统帅们也是如此。卡西乌斯于前53年在克拉苏麾下担任财务官，并率领一队残兵败将撤退到安全地带，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和布鲁图斯都曾在前48年的马其顿战役[30]中作战，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直到他们为了筹集军费而开展了一些小规模的惩罚性行动。这远远不足以让他们做好充分准备，去调遣史上投入战场的规模最大的罗马军队。安东尼的指挥经验比较丰富，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并没有大家一般认为的那么丰富。他的指挥水平远远比不上尤利乌斯·恺撒或

庞培，尽管后两位从来不曾指挥过这么多军团。在这场新内战中，双方的军队都庞大而笨拙，而且高级军官们都没有指挥如此宏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在两边，各支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独行动的，仅仅对给他们发饷的领袖忠诚。他们互相挨着，排兵布阵，但并没有整合起来接受统一指挥。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腓立比城外的高地上各有一座营地。布鲁图斯在右翼，他的侧翼在一线山峦上。卡西乌斯在左翼，在一大块沼泽地旁边。防御工事的战线将两座营地连接起来。他们有充足的水源，与海岸之间有着稳妥的补给线。他们的计划是等待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或者等待敌人的粮草耗尽。这种战略或许能成功，但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很不符合罗马的传统。恺撒的军队驻扎在布鲁图斯对面，安东尼的军队在卡西乌斯对面。在一段时间内，双方满足于小规模交锋。大多数日子里，两军都出营，摆开阵势，但双方都没有向前推进、迫使对方交战。这种形式的挑战在当时的战争中是很常见的。[31]

为了打破僵局，安东尼判断敌军阵地左侧的沼泽地是一个薄弱点，于是派遣士兵建造一条贯穿沼泽地的战线。他的士兵从己方营地出发，向外延伸战线。他的目标是建造一块从卡西乌斯身旁经过的阵地，最终威胁敌人的补给线。起初，高高的芦苇可以掩蔽施工，并且安东尼小心地每天在营地外排兵布阵、发出威胁，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最终卡西乌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派遣士兵修建自己的壕沟和壁垒，与安东尼的战线构成直角。他打算截断安东尼的战线，消灭施工人员，并切断所有前进得过远的敌人，以便慢慢将其吃掉。10月3日，安东尼的侦察兵发现了敌人的动向。像往常一样，两军都摆好作战阵形。这一次，“解放者”可能决定向前逼近一点点，甚至打算发动进攻，以便将敌人的注意力从修建工事上转移走。



希腊和马其顿，两次腓立比战役

安东尼正在自己战线的最右翼，他立刻带领手边的部队冲进沼泽地，去攻击卡西乌斯的新战线。在其他地方，两军混战起来。不管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这次进攻是不是事先筹划的，他们的幕僚很难协调这么多缺乏经验的军团。前进的命令没有同时抵达各单位，所以指挥官们自行决定，有的等待，有的则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前进。于是，他们热情洋溢却缺乏秩序地前进。在另外一边，情况甚至更加混乱。在一连许多天摆开阵势、面对敌人却没有作战之后，安东尼和恺撒的军队没有预料到敌人这次会真的发动全面进攻。布鲁图斯的右翼战线比恺撒的部队延伸得要长，这可能是偶然，而不是布鲁图斯有意为之。第四军团占据着最左端的荣誉位置，这个有经验的恺撒军团发现自己的正面和侧

翼都遭到冲击，很快就败退了。恐慌情绪迅速蔓延，恺撒的整个左翼崩溃了。布鲁图斯的部队兴高采烈，潮涌般猛冲追击敌人，突入敌营，随后很快分散开去掳掠敌营的财物，完全忘记要一鼓作气取得彻底胜利。

与此同时，安东尼的士兵借助梯子，爬上卡西乌斯的新壁垒，将其占领，然后在将军的敦促下继续前进。安东尼是第一批杀进卡西乌斯主营地的人之一。卡西乌斯的大多数军团都在前方作战，没有参与沼泽地里的战斗。但随着新壁垒失守的消息传开，卡西乌斯的各大队开始动摇和撤退。卡西乌斯自己陷入了绝望，军队在他周围土崩瓦解。他的眼睛近视，误以为布鲁图斯的一些骑兵是敌人，于是命令自己的贴身仆人帮助他自杀，他不愿被俘。（这个仆人之后就消失了，有些人怀疑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命令就杀死了主人。）布鲁图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士兵，以让他们去抵抗安东尼。这些士兵开始满载着战利品，返回营地。安东尼也卷入了冲击卡西乌斯营地的战斗，没有办法掌控全局，也未能利用布鲁图斯部队的混乱。恺撒则干脆不知所踪。[32]

这位年轻的将军在10月3日这一天的行为，导致他的余生始终笼罩在争议之中。毫无疑问，他没有像一位罗马贵族理应做的那样，身先士卒。这时他的病还很严重，没有办法积极地指挥，但他也没有任命一位下属来代替自己，这无疑是因为一位军阀必须亲自为亡父报仇，而不能借助他人之手。这种指挥真空，就是他的军队遭到布鲁图斯攻击后迅速陷入混乱和溃败的最重要原因。恺撒可能就在军中，坐着轿子待在战线后方。“解放者”的人马冲进他的主营地时，他肯定不在那里，尽管好几个人跑到布鲁图斯那里，吹嘘自己杀死了年轻的恺撒。恺撒自己的说法是，他的私人医生认为继续留在营帐中很危险，于是他的伙伴们听取了医生的警示，让仆人把他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被抬走的时间是在战斗打响之前还是战斗期间。他们把他抬离战场，躲在后方远处的沼泽地内。也许他们或他本人对战役已经绝望，抑或他仅仅是精疲力竭，无法行动，总之他在那里待了三天才返回营地。[33]

在第一次腓立比战役中，双方军队都很笨拙而且也不专业，再加上糟糕的指挥，最终打成了平手。恺撒的各军团伤亡最重，还丢失了一些军旗。更糟糕的是，一名信使送来了噩耗：最近一批从意大利输送援兵的船只在海上被敌军战船拦截并摧毁了。运输船被敌人烧毁，玛尔斯军团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另外一个军团的官兵，被烧死或溺死。布鲁图斯得知这消息时并不相信，但在确认自己的盟友和妹夫[34]死后，陷入了绝望。卡西乌斯死了，但他的军队和布鲁图斯的军队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布鲁图斯立刻给了卡西乌斯的士兵一笔丰厚的赏赐，拉拢他们继续为共和国和自由而战。安东尼则继续打造绕过敌军左翼的战线。卡西乌斯之前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上派驻了部队，但不知是因为错误，还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布鲁图斯将这支部队撤走了。安东尼和恺撒发现了敌人的这个错误，立刻派兵到那个地点，并迅速建造了一座强大的要塞。布鲁图斯的补给线现在受到了威胁。时间一天天、一周周地流逝，他的军队开始倍感挫折，急于与敌军对抗，做个了结。

10月23日，布鲁图斯不情愿地出战了。这一次两军的位置与之前的战场呈直角，这意味着布鲁图斯的部队不再拥有缓坡的地理优势。即便如此，战斗还是漫长而残酷的，不过安东尼和恺撒的军队稳步将对方打退，“就像工人推着一台沉重的机械”，敌军最终瓦解溃散。布鲁图斯聚拢了几个军团，有秩序地撤退了。然后，像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在加图等人榜样的感召下，他自杀了。[35]

恺撒的病情已经大有好转，所以在第二次战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胜利的主要功劳还是安东尼的。据说，俘虏中的一些贵族嘲讽年轻的恺撒，而欢呼安东尼为凯旋将军。那些得到宽恕的俘虏肯定倾向于加入安东尼那边，这又一次体现了人们更青睐一个年纪较长、地位更巩固并且拥有无可争议的贵族血统的人。安东尼对布鲁图斯的遗体以礼相待，因此得到了赞誉。不过据普鲁塔克说，恺撒对布鲁图斯的遗体给予同样的尊重。布鲁图斯的首级准备被送往罗马（我们不知道这是谁下的

命令），摆放到尤利乌斯·恺撒雕像的脚下，但运送首级的船只在海上倾覆，首级也失踪了。有人指控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残酷地对待战俘，据说有一次他让一对父子赌博决定谁先被斩首。[36]

安东尼获得了打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大部分荣耀，不过恺撒后来简单地宣称："我把那些杀害我父亲的人驱赶到流亡队伍中，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惩罚他们的罪行，后来他们对共和国开战，我两次在战场上击败他们。"[37]

主要的密谋者都战败和死亡了，恺撒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目前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了。军阀需要成功，战争已经打赢了。他和安东尼必须兑现给士兵的承诺，其中很多人服役期已满，有的是因为服役年限到了，有的是因为参军时订立了契约，规定战争结束后便退役。退伍军人得到的承诺是在意大利得到土地。三头同盟决定让恺撒回国监督这项工作。安东尼将留在地中海东部，确保各行省保持忠顺，并压榨它们的钱财，以便筹集三头同盟支付军饷和分配土地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主要的附庸王国和城市别无选择，只能满足他的要求，就像它们前不久被迫满足"解放者"的需求，以及几年前满足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的要求那样。国王和其他领袖知道，如果他们拒绝服从，罗马人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来取代他们。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仅仅是急于讨得安东尼欢心的一大批东方显贵之一。[38]

但恺撒在起航返回意大利之前，又病倒了。和上一次患病的情形一样，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也不知道这次是新的疾病，还是旧病复发。有一段时间，人们担心他会死掉，还有谣言说他已经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迟迟未能返回，罗马城变得越来越紧张。传闻称他在筹划一件比之前的大清洗更为凶残的事情。恺撒和安东尼在国外期间开始怀疑李必达，疑心他已经开始私下里与塞克斯图斯·庞培单独谈判。于是，恺撒和安东尼暂时瓜分了李必达的几个行省，不过他们似乎打算在将来

的某个时间把北非的两个行省交还给他。李必达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三头同盟的一员，但他的地位显然已经低于另外两人了。[39]

前41年，恺撒终于返回罗马，开始急迫而坚决地搜罗土地。在他们动身去马其顿作战之前，三头同盟就已经指定了意大利的十八座城市，计划没收其土地，分配给退伍军人。富人和有背景的人，尤其是元老和最富裕的骑士，若是发现涉及自己的地产，便发出抗议。疏远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总是很危险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地产都得到了豁免。这意味着遭到打击最大的是中等阶层，他们没有多少办法抗议，尽管其中很多人还是决定来罗马城尝试一番。在好几个案例中，被指定城市周围的土地还不够，于是附近社区的土地也被没收，尽管这些社区并没有被三头同盟指定。

士兵得到的承诺是，他们退役之后将得到农场。他们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冒险，去帮助统帅打仗，他们也知道，三头同盟之所以能够统治，就是依赖他们的力量。于是，士兵们傲慢而粗暴地坚持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尤其是，他们希望他们的亲戚，以及阵亡战友的父亲和儿子也得到保护，不至于被没收土地。与此同时，一些耕种自家土地已经几代的家庭丧失了土地，但他们并没有犯过罪，也不曾反对三头同盟。土地被没收时，原先的牲畜、工具、建筑和房屋，以及作为劳动力的奴隶，会被一并没收。人们畏惧但并不爱戴三头同盟，所以三头同盟如履薄冰，一方面要满足退伍军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能疏远太多其他人。同时，塞克斯图斯·庞培在骚扰通往意大利的海路，所以运到意大利的粮食比正常情况少了许多。于是粮食开始短缺。和通常情况一样，最容易受到饥馑威胁的是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已经开始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可能更糟糕了，因此倾向于支持任何变革。[40]

恺撒在意大利本土，所以很多群体都将他当作怨恨的焦点。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出现了。为了给迪基姆斯·布鲁图斯报仇，马尔库

斯·布鲁图斯杀死了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但到前41年，安东尼仅剩的弟弟卢基乌斯·安东尼当上了执政官。卢基乌斯拥有罗马贵族趾高气扬的自信，我们不应当将他仅仅视为其兄长的爪牙，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作为执政官，他开始支持那些被没收了土地的农民和意大利心怀不满的社区。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和恺撒的关系恶化了。随后发生的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即便在当时也很难查清，况且很快就陷入了宣传的泥沼。富尔维娅加入了卢基乌斯，竭尽所能地从安东尼的老兵当中帮他召集人马。但很少有老兵表现出热情，因为尽管他们喜爱自己的老长官，但不愿意站到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一边去反对政府，毕竟政府正在非常努力地把那些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安东尼的老兵，以及恺撒的老兵。站到卢基乌斯旗下的大多数士兵都是来自意大利北部和坎帕尼亚肥沃地区的新兵，这些地区受土地分配政策的打击最大。

前41年年末，卢基乌斯率领他的新军队向罗马城进发。李必达在城内，但他的兵力远远不敌卢基乌斯·安东尼，而且广大群众对三头同盟没有多少支持。罗马迅速陷落，李必达逃去投奔恺撒。但在恺撒率领一支庞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赶来时，卢基乌斯·安东尼已经撤退了，而且跑得比他之前来时更快。他向北进发，希望与意大利境内马克·安东尼属下的几名将军会合，他们有大约13个有作战经验的军团。恺撒的下属指挥官堵住了他的去路，将他封堵在佩鲁西亚（今天的佩鲁贾）。恺撒的军队在佩鲁西亚城周围挖掘了一道壕沟，建造了壁垒，并每隔一小段距离就建造一座塔楼，等待敌人因为饥饿而屈服。在冬季的几个月，卢基乌斯·安东尼坚守下来，等待安东尼的将军们带兵救援。援军到了很近的地方，有一次在离佩鲁西亚仅20里的地方扎营，但由于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得到马克·安东尼本人的指示，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或许也认识到，己方的士兵也不同情卢基乌斯叛党。没有一位将军选择与恺撒手下驻扎在那里观察他们的指挥官发生对抗，而恺撒的指挥官也小心地避免严重的冲突。[41]

考古学家在佩鲁西亚发现了一些铅制的弹丸，上面铸有文字，揭示了当时两军之间的宣传和粗俗辱骂。恺撒的部下嘲讽卢基乌斯·安东尼的秃头，或者表示希望他们的投射武器击中富尔维娅的landica（这是一个特别粗俗的俚语词，指的是阴蒂）。尽管安东尼的妻子并不在佩鲁西亚，但她显然受到特别的憎恨和讥讽。守军弹丸上的文字则自称瞄准恺撒的屁股，把他描述为堕落下流的同性恋者，供别人鸡奸。除了这些污言秽语攻击之外，守军还常袭击围城者的战线。有一次，恺撒在以军队统帅的身份举行献祭时，遭到突然袭击，险些丧命。不过守军袭击的结果一般没有如此惊险，有时一些守军能够突围逃走。[42]

卢基乌斯·安东尼的兄长属下的指挥官不能够或不愿意帮助卢基乌斯。他的粮草最终消耗殆尽，于前40年2月投降。佩鲁西亚遭到洗劫，被付之一炬，不过我们不确定火是胜利者还是当地居民放的。一些领头放火的平民可能被处决了，卢基乌斯·安东尼的一些元老级支持者可能也被处死。谣言和敌视恺撒的宣传很快将此事夸大为又一场恐怖大屠杀，说三百名显赫平民被献祭给尤利乌斯·恺撒的灵魂。这种捏造的故事肯定受到了《伊利亚特》的启发，阿喀琉斯在其战友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杀死了特洛伊战俘。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有人哀求饶命或者替人求情时，年轻的恺撒简练地回答“你必须死”或者“他必须死”。不过总的来讲，恺撒的报复还是有限的。叛军士兵得到了宽恕，其中很多人无疑被招募到恺撒军中。卢基乌斯·安东尼不仅没有受到伤害，还被派去治理西班牙的一个行省。[43] 富尔维娅已经逃到她丈夫身边了，安东尼的母亲也逃到了国外，先是跑到塞克斯图斯·庞培那边，后来他派人将她送到安东尼那里。[44]

安东尼没有干预这场所谓的“佩鲁西亚战争”，没有支持自己的弟弟和妻子，也没有约束他们。前40年春，他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带来了实力非常雄厚的舰队。没有人知道，新的内战是已经真正结束了，还是刚刚开始。

[1] Appian，*BC* 4.8（Loeb translation）.

[2] Velleius Paterculus 2.67.2（Loeb translation）.

[3] Appian，*BC* 4.6提到，有些史料说，三头同盟当即下令处死了十二人，也有史料说是十七人。

[4] 演讲台（Rostra）在罗马广场（Forum）上、元老院议政厅之外。Rostra的字面意思是战船船首的冲角，它装饰着迦太基战争期间俘虏的敌船的船首，由此得名。行政长官和其他大人物常常在演讲台向罗马人民的非正式集会发表演讲。

[5] 镇压政敌，概况见Appian，*BC* 4.6-31，Dio 47.1.1-15.4，Plutarch，*Cicero* 46，*Antony* 19，精彩的介绍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62-82，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190-94；对镇压政敌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和年轻恺撒角色的精彩介绍，见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2008），pp.55-62，68-9，他指出，人们容易忘记这些谋杀是多么残暴，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镇压政敌”这样的词；三头同盟中每一方带到罗马城的兵力，见Appian，*BC* 4.7；上文关于不要用文字反对三头同盟的引文，被认为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说的话，见Macrobius，*Satires* 2.11.1。

[6] 典出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第四幕第一场，是安东尼说的话。

[7]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是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远方堂兄，曾担任前64年执政官。他的父亲也叫卢基乌斯，是前90年执政官。他的儿子也叫卢基乌斯，内战中站在庞培一边，反对自己的父亲和堂叔。

[8] Appian，*BC* 4.8-11记载了镇压政敌公告的一个版本，可能是真实的。名单包含盖乌斯·托拉尼乌斯，见Suetonius，*Augustus* 27.1。

[9] 米利都为古希腊名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前6世纪为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发源地，即所谓“米利都学派”的家园。在希腊化时期和罗马统治下，米利都相当繁荣。

[10] Plutarch，*Antony* 19-20，Appian，*BC* 4.5-30，37，Dio 57.1.1-14.5，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190-96，及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62-82；Plutarch，*Antony* 20（Oxford translation，modified）for quote。

[11] 见Plutarch，*Cicero* 47-8，Appian，*BC* 4.19-20，及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78其他讨论和资料见D.Stockton，*Cicero.A Political Biography*（1971），pp.331-2，T.Mitchell，*Cicero.The Senior Statesman*（1991），pp.322-4，A.Everitt，*Cicero.A Turbulent Life*（2001），pp.304-10。

[12] Dio 47.8.3-4，Plutarch，*Cicero* 48-9，*Antony* 20，Appian，*BC* 4.19，也见Cornelius Nepos，*Atticus* 9.3-7，with 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45-6。

[13] Suetonius，*Augustus* 27.1-2强调他追逐受害者，对比Velleius Paterculus 2.66-7，认为安东尼和李必达才是罪魁，K.Scott，'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1933），pp.7-49，尤见19-21，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pp.63-8讲到史料对恺撒的态度以及对他的描述，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46-7。

[14] 科林斯花瓶，见Suetonius，*Augustus* 70.2，安东尼为抢夺维雷斯的艺术品而镇压他，见Pliny，*NH* 34.2.6，with K.Scott，'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1933），pp.20-21；安东尼和富尔维娅，见Appian，*BC* 4.40，Dio 47.7.4-5，8.5。

[15] Appian，*BC* 4.30讲到年轻的受害者，及4.23-4关于妻子的故事；女性的角色，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74-82。

[16] Appian，*BC* 4.23，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64-5，79；女子被李必达的侍从殴打的故事出自她丈夫为纪念她而竖立的纪念碑，今天通常称为Laudatio Turiae（不过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准确），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67-74的讨论和资料。

[17] Dio 47.7.4-5.

[18] 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鲁斯（前114～前50年），前69年执政官，著名演说家。

[19] Appian，*BC* 4.31-4，Dio 47.14.2-3，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84-8.

[20] Dio 47.18.3-19，with S.Weinstock，*Divus Julius* （1971），pp.386-98.

[21] 即前文讲到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喀，西塞罗的死敌，被米罗杀害。

[22] 阿提娅之死，见Suetonius，*Augustus* 61.2，Dio 47.17.6；与克劳狄娅的订婚和结婚，见Suetonius，*Augustus* 62.1，Velleius Paterculus 2.65.2，Plutarch，*Antony* 20；克劳狄娅离婚时还是处女，见Dio 48.5.3。

[23] 讨论见R.Weigel，*Lepidus.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pp.69-70，77-9。

[24] 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25] 自由之帽（Pileus）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自由人戴的一种尖顶帽，奴隶在获得自由时往往得到这样一顶帽子，以象征他们的自由人身份。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人误将自由之帽与来源于古代弗里吉亚（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地区）的一种帽子混淆，用弗里吉亚帽象征自由，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26] Dio 47.25.3，与Appian，*BC* 4.100-01；Appian，*BC* 5.17 详细讨论了士兵的态度，Cornelius Nepos，*Eumenes* 8.2将马其顿老兵与当时的罗马士兵相比，因为二者都贪婪且热衷于内战；布鲁图斯的钱币，见M.Crawford，*Roman Republican Coinage* （1974），pp.498-508。

[27] Appian，*BC* 4.101-8，Plutarch，*Brutus* 37-40。

[28] Appian，*BC* 4.106，108，Dio 47.37.2-3，Suetonius，*Augustus* 13.1.

[29] 数字见Appian，*BC* 4.88，108；讨论见P.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pp.485-8，基本上接受较高的估计，怀疑的立场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251-3；对比Appian，*BC* 4.137，他强调战役的规模，Dio 47.39.1 声称这些战役不是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另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13，未来的皇帝提比略觉得控制聚集在一个地方的10个军团太困难。

[30] 即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在马其顿的决战，后者大败。

[31] 挑战，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141-5。

[32] 关于第一次腓立比战役，见Appian，*BC* 4.109-14，Plutarch，*Brutus* 40-45，Dio 47.42.1-47.1，配有精美插图的叙述见S.Sheppard，*Philippi 42 BC.The Death of the Roman Republic* （2008）；损失辎重导致士气瓦解，见Caesar，*BG* 5.33，与*BG* 5.43记述的另一个军团的较好纪律对比。

[33] 屋大维行为的不同说法，见Plutarch，*Brutus* 41，*Antony* 22，Dio 47.41.3-4，46.2，Velleius Paterculus 2.70.1，Suetonius，*Augustus* 13.1，Pliny，*NH* 7.147，简要讨论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204-5，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95-6，Stark（1933），pp.21-2，和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p.106。

[34] 卡西乌斯娶了布鲁图斯的三个妹妹之一——尤尼娅·特尔提娅。

[35] Appian，*BC* 4.125-31，Plutarch，*Brutus* 49-52，*Antony* 22（这是暗示恺撒在第二次战役时仍然患病的唯一史料），Dio 47.48.1-49.4。

[36] Appian，*BC* 4.129-31，135，Suetonius，*Augustus* 13.1-2，Dio 47.49.2，Plutarch，*Brutus* 53.3，*Antony* 22，*Comparison of lives of Dion and Brutus* 5.1，with

Stark（1933），pp.22-3.

[37] *Res Gestae* 2（Loeb translation）.

[38] 安东尼在随后一年半行动的更多细节，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261-71，尤其强调他面对附庸国统治者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所做的选择。

[39] Appian，*BC* 5.3，12，Dio 48.1.2-3.6，with R.Weigel，*Lepidus.The Tarnished Triumvir*（1992），pp.79-80.

[40] 对没收土地的详细讨论，见L.Keppie，*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47-14 BC* （1983），*passim* and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108-51。

[41] 佩鲁西亚战争，见Appian，*BC* 5.12-51，Dio 48.5.1-14.6，Plutarch，*Antony* 30，Velleius Paterculus 2.74-6，讨论见E.Gabba，'The Perusine War and Triumviral Italy'，*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5（1971），pp.139-60，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207-12，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152-72，及C.Pelling in *CAH2* X，pp.14-17。

[42] 见J.Hallett，'Perusinae Glandes 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Augustus'，*AJAH* 2（1977），pp.151-71，另见T.Rihll，'Lead Slingshot（*glandes* ）'，*JRA* 22（2009），pp.149-69有力地指出，这些铅制弹丸可能是用非常轻型的手持武器发射的，而不是用投石器。这不会改变这些信息的重要性；恺撒险些丧命，见Suetonius，*Augustus* 14，声称这些袭击者是获释的角斗士，参见Appian，*BC* 5.33；逃离围城，后来导致悲剧，见Propertius，*Elegies* 1.21。

[43] 此后卢基乌斯·安东尼就从史册中销声匿迹了，我们不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

[44] 围城战结束，对战俘的处置见Appian，*BC* 5.46-9，Dio 48.14.3-6，Suetonius，*Augustus* 15，及Velleius Paterculus 2.74.4讲到，大火是一名居民点起来的，Stark（1933），pp.27-8；阿喀琉斯的献祭，见*Iliad* 23.21-2。

第三部 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前38～前27年

凯旋将军是赋予一名赢得胜利的将军的头衔，但在此之前从未被用作永久性的名字。在前42年尤利乌斯·恺撒被正式封神之后，他（恺撒）正式获得了“神之子”的称号，但后来才开始一直使用这个头衔。

九 神子们

啊，在怎样遥远的将来才能回到故乡，再看见茅草堆在我村舍的屋顶上，再来欣赏我的小小收成，自己的王国？种好了的土地将被粗鲁的士兵掳掠，异族人将占有我们的果实，这都是战争给我们的灾难，把自己的土地让给这些人！

——维吉尔，前1世纪30年代[1]

伟大世纪的运行又要重新开始，处女星已经回来，又回到萨图恩[2]的统治，从高高的天上新的一代已经降临，在他生时，黑铁时代就已经终停，整个世界又出现了黄金的新人。圣洁的露吉娜[3]……正当你为执政官，波利奥啊，伟大的岁月正在运行初度。

——维吉尔预言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始，前40年[4]

前41年的某个时候，随着富尔维娅与卢基乌斯·安东尼的关系恶化，恺撒得到启发，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岳母（马克·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的短诗："安东尼操了格拉菲拉，富尔维娅为了报复，想搞我！怎么办？我要操富尔维娅吗？如果马尼乌斯求我操他屁股，我应当这样做吗？我觉得不行，如果我还有一丁点儿理智的话。她说，要么操，要么打仗。呃，对我来说，我的鸡巴比我的生命更珍贵。让战斗开始吧！"[5]

一个多世纪之后，诗人马提亚尔引用了这些诗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知晓它们的存在。他还厚脸皮地说，既然罗马的第一位皇帝能写淫秽诗歌，那他也可以。恺撒这些诗句的拉丁文特别粗俗，与他的士兵在佩鲁西亚往铅制弹丸上刻的污言秽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格拉菲拉是罗马的附庸国卡帕多细亚统治者的出身高贵的情妇，三头同盟重组东方各行省时，格拉菲拉委身于安东尼，希望说服他，让她的儿子继承卡帕多细亚的王位。（当时安东尼把卡帕多细亚的权力给了其他人，但几年后又安排格拉菲拉的儿子成为国王，所以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安东

尼遇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之前几个月，他和格拉菲拉的风流韵事已经传到了罗马，成了新的流言主题。马尼乌斯是安东尼在意大利的一位重要代理人，后来被指责激化了政局，被认为是促发佩鲁西亚战争的主要责任人之一。[6]

即便按照罗马政客凶残地互相攻击的标准，这几句诗也是非常低俗的，作者是一个纵情于污言秽语的毛头小子，充满了任性顽固的自信。仅仅几年之间，恺撒便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人之一，如同他养父般的作为国家最高领袖的荣誉和地位似乎指日可待。平步青云说明他有着极大的、极其强烈的野心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也说明他的运气非常好。和几乎所有成功的政治家一样，恺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若不是尤利乌斯·恺撒被谋杀，年轻恺撒的政治生涯将会截然不同，晋升肯定要慢得多，不过说不定到最后会取得同样崇高的地位。借助西塞罗领导下的元老院的帮助，他得以攫取权力，并获得合法性。后来元老院领导人要“抛弃”他时，他又变成了安东尼和李必达的有价值盟友。他也曾失败过，比如第一次进入罗马，以及在第一次腓立比战役中的可耻表现。他也冒了很多风险。他完全有可能输掉战役，或者殒命沙场。他克服了两次非常严重的疾病，并直面愤怒的公民和由哗变老兵组成的暴民团体。有一次，他派遣一名百夫长去安抚哗变士兵，士兵们却将此人杀死，将尸体丢在恺撒一行人的必经之路上，以确保他看得见死尸。年轻恺撒在每一次危机中生存下来，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古代史料中记载的预兆往往是后人的捏造，但恺撒一定坚信自己的好运气，以及必将赢得天下的命运。[7]

在佩鲁西亚战争打响之前，他与克劳狄娅离婚了。有人说恺撒故意没有与妻子圆房，因为他知道这段婚姻以及它所代表的政治联盟不会维持多久。不过，没有圆房的原因可能仅仅是这个姑娘年纪太小，就算有了孩子，在政治上不利的婚姻也会终结。恺撒及其指挥官击败了卢基乌斯·安东尼，安东尼的将军们未能有效地支持卢基乌斯·安东尼，也是恺

撒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恺撒终归是赢了，并且在这次挫折之后变得更强。随后，好运气又一次站到他这边。在腓立比战役之后重新分配各行省时，内高卢变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高卢各行省的其余部分被分给了安东尼，安东尼通过自己的下属昆图斯·弗费乌斯·卡雷努斯来控制这些地区。前40年夏季，卡雷努斯病逝，留下一个年轻的儿子来掌管局面。恺撒的年纪可能只比小卡雷努斯大一点点。他匆匆赶到高卢，威逼小卡雷努斯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他。就在一夜之间，11个军团转了手。[8]

恺撒外出期间，安东尼返回了意大利。他现在拥有一大批战船，因为一度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效力的海军将领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加入了他。就在前不久，阿赫诺巴尔布斯还在袭掠意大利沿海地区。他与安东尼的联合舰队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时，当地驻军认出了阿赫诺巴尔布斯的战船，于是封闭了港口。安东尼认为这是恺撒在刻意开战，于是攻打了这座城市。驻军可能犯了个错误，不过在佩鲁西亚战争造成的激烈气氛中，双方无疑都高度紧张。恺撒从高卢返回，开始准备作战。他集结了军队，并又一次努力招募刚刚定居下来的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因为得到了土地而对恺撒感恩戴德，做出了良好的回应。直到消息传来，这一次他们的敌人是安东尼和他们的许多老战友，有些人转身回家了，而留下的人也是不情愿地跟随恺撒。[9]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此时安东尼处于强势地位。塞克斯图斯·庞培已经找到他，提议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恺撒。在佩鲁西亚战争之后，安东尼的母亲逃到了西西里岛，得到了塞克斯图斯的照顾。或许她真的是因为害怕才逃跑，但实际上她基本不会有任何危险，所以她的逃跑更有可能是为了公开表示对恺撒的敌意。恺撒肯定是这么想的。塞克斯图斯欢迎了这位逃亡的老妇人，派人送她去东方，去见她的儿子。安东尼对塞克斯图斯很感激，但目前还不是全心全意地打算与年轻的同僚开战。他这么谨慎，有着很好的理由。前41～前40年冬季，他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都城亚历山大港沉溺享乐。他离开时，克利奥帕特拉已经怀孕

了，后来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在这几个月里，帕提亚人入侵了叙利亚，以此支持提图斯·拉比埃努斯领导的罗马军队。拉比埃努斯是一名顽固的共和派分子，错过了腓立比战役。他的父亲是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时最优秀的军团长，但在内战中选择为庞培效力，前45年在蒙达战败后自杀。东方各行省多年来不得不为罗马内战的双方提供资源，如今国弊民穷，驻军很少，没有力量抵抗帕提亚人的进攻。帕提亚人只遇到了微弱抵抗，便轻松占领了叙利亚，然后派遣规模较小的部队去占领犹太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10]

安东尼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时，拥有一支舰队，但陆军兵力不多。他的一些下属在意大利和西方还有一些军团，但失去了卡雷努斯的军队之后，安东尼的军力远远小于恺撒。考虑到东方各行省的状况，再从那里征兵困难重重，在政治上也很不利，而且最快也要几个月。若与塞克斯图斯·庞培结盟，便能获得更多齐装满员的战船，但陆军士兵却很少。目前来看，不管长期力量平衡如何，军事优势肯定在恺撒那边。但这并不意味着恺撒必胜无疑，或者互相厮杀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真正有益。

最后，安东尼和恺撒没有得到选择的机会。双方在布隆迪西乌姆周边集结的时候，尤利乌斯·恺撒的老兵认出了自己的老战友，开始亲密交往。他们起初是开玩笑，后来变得严肃起来。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不愿意与先前的同袍作战。士兵们努力避免新的战争，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佩鲁西亚战争之前的紧张时期，士兵们迫使恺撒和卢基乌斯·安东尼在最后关头进行了谈判。不过那一次，在谈判开始之前，互相的猜疑和误会激起了一场武装冲突，结果没有谈成。这一次，士兵们更坚决，双方的领导人也真诚地希望达成妥协。[11]

他们没有亲自去谈判。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代表安东尼去谈判，而恺撒的代表是一名叫作盖乌斯·梅塞纳斯的年轻骑士，此人是恺撒的主要密友之一，可能与他年龄相仿，说不定就是某个与恺撒一同受教育的

青年。参加谈判的还有卢基乌斯·考基乌斯·涅尔瓦，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深受将士们信任，似乎被认为是个中立分子。没有人替李必达说话，不过他被任命为北非总督，拥有一支按照那些年的标准来说不算强大的军队。恺撒仍然控制着高卢，并得到了其他所有西方行省，往东一直到伊利里亚的斯科多拉[12]。安东尼则得到了恺撒领地以东的所有地区。阿赫诺巴尔布斯和其他一些人得到了赦免。安东尼告诉恺撒，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恺撒最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已经开始秘密地与自己谈判。鲁弗斯被逮捕并处决了。恺撒让元老院颁布了终极议决，以便给予处决鲁弗斯的行动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安东尼则处死了自己的代理人马尼乌斯，据说马尼乌斯曾伪造文书，煽动卢基乌斯和富尔维娅打着安东尼的旗号造反。[13]

偶然的机缘也帮了他们的忙。富尔维娅逃到希腊后，受到了丈夫冷冰冰的“欢迎”。她心力交瘁，再加上非常抑郁，很快患病死去了。这意味着，近期佩鲁西亚战争的主要罪责可以方便地推到她身上。由于富尔维娅受到了很多恶毒宣传的攻击，我们已经很难公正地判断她的真实品格和扮演的角色，但她肯定是那一代女性中在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她死后，安东尼又一次成了单身汉。巧合的是，屋大维娅的丈夫马凯鲁斯也在这一年死去了，于是恺撒的姐姐和他新近巩固了关系的盟友之间很快缔结了婚姻。由于罗马法律规定寡妇再嫁之前必须等待十个月，恺撒和安东尼装模作样地请求祭司允许安东尼与屋大维娅在这个期限之前结婚。祭司当然做出了令他们满意的决定。[14]

屋大维娅此时大约三十岁，已经和马凯鲁斯生了一个儿子。贵族女性在自己的婚姻上很少有自主权，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尽其所能地做一个忠诚的贤妻，而她和安东尼在一开始似乎的确很幸福。安东尼与恺撒重归于好的消息在意大利全境和罗马城受到了普遍欢迎，主要是因为这意味着不会再发生新的内战。三头同盟很愿意强化这种信息。屋大维娅的肖像和丈夫一起出现在钱币上。她是第一位出现在罗马货币上的女

性。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是这一年的执政官之一，诗人维吉尔在诗中预言，他当执政官的年份将标志着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开端，第一个吉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男童的诞生。虽然维吉尔没有说这个男孩是谁，但他指的显然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娅即将诞生的孩子。屋大维娅确实很快怀孕了，不过生的是个女孩，所以关于和平与普遍繁荣的预言显得有些为时过早了。[15]

在与安东尼和解之前，恺撒也再婚了。他的新娘是斯克利博尼娅，比他年长约十岁，已经结过不止一次婚，是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卢基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利博的妹妹。恺撒可能是希望增加与塞克斯图斯打交道的机会，不过斯克利博尼乌斯·利博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塞克斯图斯的主要盟友之一。这段新婚姻至少会让利博和塞克斯图斯这对翁婿之间的忠诚关系变得不是那么铁板一块。[16]

尼普顿之子

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势力太强，恺撒没有办法忽视他。到前42年时，塞克斯图斯已控制了西西里岛，后来又占领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的齐装满员的强大舰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恣意袭掠意大利沿海地区，扰乱贸易航线，造成了极大损害，以至于运往意大利，尤其是对罗马这座大都市来说非常重要的粮食供给都严重减少了。安东尼与恺撒在布隆迪西乌姆的和谈将塞克斯图斯排除在外，仅仅含糊地说将来再谈，所以塞克斯图斯在随后几个月内加强了袭扰行动。在正常时期，首都所需的很大一部分粮食是从西西里岛运来的。没了西西里岛的粮食，再加上从更远地方运送粮食的路线被截断，罗马城的粮价迅速飙升，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去寻找足够数量的粮食，以便执行尤利乌斯·恺撒向公民免费发放粮食的政策。一年多以来，罗马一直是愤愤不平的退伍军人、被剥夺了土地的意大利农民以及城市贫民（他们代表着前两个群体的存在和要求）时断时续的暴乱场所，如今变得更加动荡不安。[17]

塞克斯图斯·庞培不断施加压力。即便在年轻军阀横行的年代，他也算得上很年轻的一位了，可能只比恺撒年长三四岁。法萨卢斯战役时，他被认为太年轻，没有参战。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埃及被杀，然后看着自己的兄长征集了一支军队去对抗尤利乌斯·恺撒，最后却被打败和处死。塞克斯图斯留着一条性命，在西班牙发动了一场新的叛乱。家族的人脉和他自己的领袖魅力很快为他赢得了成功。他的部下掳掠或建造船只，在地中海西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发动袭击。前43年春季，西塞罗说服元老院，将塞克斯图斯夺得的权力合法化。仅仅因为他是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便被正式任命为“舰队及沿海地区长官”。同年年底的权力转移将他从一名合法任命的行政长官变成了不法之徒，因为《佩蒂乌斯法》[18]将他和密谋者一同定罪，尽管他并没有参与谋杀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阴谋。塞克斯图斯和“解放者”虽然都敌视三头同盟（卡西乌斯曾表示对格奈乌斯·庞培[19]非常不屑，因此对他的弟弟可能也有类似的看法），但互相之间并没有积极的合作。此外，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可能都不会喜欢一个自称继承其父亲权力的人。[20]

和恺撒一样，塞克斯图斯大肆宣扬对自己父亲的尊重，以此为由控制指挥权。虔敬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非常符合罗马人风尚的义务，它指的是对诸神、祖国，尤其是对父母的尊崇。恺撒为被谋杀的养父复仇，以此宣扬虔敬。卢基乌斯·安东尼以兄长的名义举兵反叛时，将虔敬这个词加在自己的名字和执政官头衔之后。塞克斯图斯·庞培自称皮乌斯（意思是“虔敬的”），还采用了父亲的绰号“伟大的”，于是他的名字在钱币上就是“伟大的皮乌斯”，这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名号。[21]

恺撒和塞克斯图斯·庞培有很多相似之处。钱币上描绘的塞克斯图斯·庞培蓄着胡须，这是哀悼亡父和亡兄的象征。钱币上的恺撒肖像也是这样。“解放者”死后，恺撒公开地剃去胡须，表示大仇已报。但在此之后的几年里，钱币上仍然刻有他蓄须的形象。不过，塞克斯图斯的父

亲是在战争中失败，作为流亡者被杀死，不像恺撒的养父那样，是在成功的巅峰被谋杀的。所以，塞克斯图斯的权力基础不可避免地远离意大利，主要来自他自己和家族的威望，而不是传统的国家机构。恺撒则成功地进入国家的心脏，来到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两人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其一定会让塞克斯图斯永远显得更高一筹。三头同盟开始镇压政敌的时候，塞克斯图斯庇护了所有受害者和逃离三头同盟统治的人。他的战船在意大利海岸线巡游，随时准备营救逃亡者，而对于那些被三头同盟悬赏缉拿的人，塞克斯图斯给出双倍的价钱，鼓励人们将这些受害者救到安全地带。由于他的努力，数百人的生命得以挽救。他这么做有政治上的加分，但即便如此，这种义举也与那些凶残年代的残酷暴行形成了鲜明对比。[22]

但塞克斯图斯也切断了意大利和罗马的粮食供应。他的这项战略是针对三头同盟的，但不可避免地给广大民众，尤其是最贫穷的人群带来了苦难。到前40年年底，安东尼和恺撒都在罗马，为了庆祝在马其顿的胜利而举行了小凯旋式。他们都不得人心，所以群众把粮食短缺怪罪到他们头上，因为大家觉得他们应当和塞克斯图斯谈判。和退伍军人一样，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和平；他们也效仿退伍军人，举行了越来越凶暴的抗议活动，迫使领导人缔造和平。前39年年初，恺撒在广场处理政务时，一群愤怒的暴民围了上来。有人动用了投射武器，他身边的一小群侍卫花了很大力气才保护住自己的领袖。

安东尼前来营救他。他带来了一群队形齐整的士兵，沿着圣道[23]赶来。起初一群人堵住了他的路，但没有做出任何敌对的举动，因为大家觉得安东尼对塞克斯图斯较为友好。但安东尼命令士兵强行开道，群众做出了愤怒的回应，用石头攻击士兵，将他们逐退。士兵们重新集结，并得到增援。然后他们从两个方向冲进广场，砍倒那些挡路的人。安东尼的部下杀出一条路来营救恺撒，将他带了出来。但一连几个钟头，群众控制着城市中心，后来才慢慢散去。[24]

安东尼和恺撒去找塞克斯图斯的母亲和其他人，并通过这些关系，在春季开始谈判。双方互不信任，所以第一次谈判是在那不勒斯湾海岸附近的巴亚举行的。在海上搭建了两个木制平台，双方领导人及其幕僚分别站在两个平台上。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当年夏季又在附近的米西努姆角继续商谈，这一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塞克斯图斯将获得指挥军队的合法权力。他被元老院接纳为成员，并获得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他已经实际控制了这些地区）以及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作为他的行省。安东尼已经拥有观鸟占卜师的身份，于是亲自监督了塞克斯图斯被这个祭司团接纳的仪式。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将在前33年的选举（由三头同盟控制）中当选为执政官。

《米西努姆条约》结束了意大利被封锁的局面，但塞克斯图斯得到的利益有限，因为实际上条约仅仅是认可了现状。他坚持要求三头同盟赦免所有被镇压的人和其他被迫流亡的人，并允许这些人返回意大利并收回他们被没收的财产的四分之一。只有谋杀尤利乌斯·恺撒的仍然在世的凶手和其他一小群人被排除在此次大赦之外。很可能是逃到西西里岛的许多贵族向塞克斯图斯施压，敦促他与三头同盟议和，以便让他们回家。有意思的是，恺撒的内兄斯克利博尼乌斯被内定为前34年的执政官。

塞克斯图斯要想返回罗马，就必须放弃自己对海军及其基地的指挥权，他当然不愿意这么做，就像恺撒和安东尼不会愿意解散自己的军队一样。只有通过武力，这些军阀才能维持自己的重要地位和长期的安全。安东尼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下了伟大的庞培的宅邸和地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帕拉丁山坡上时髦的卡里奈区[25]的豪宅。“卡里奈”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船的龙骨，塞克斯图斯在自己的旗舰上宴请恺撒和安东尼时开玩笑说，如今他唯一的家就是他的舰队的龙骨。在这次宴会上（之前，安东尼和恺撒在岸上款待了塞克斯图斯），据说塞克斯图斯麾下的一名海军将领声称，他只要切断缆绳，把客人干掉，就能让他的统帅成

为世界的主宰。塞克斯图斯不愿意干这样背信弃义的事情。他后来懊恼地说，如果这名将领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而是自作主张地行动就好了。[26]

情人们

在被镇压的人得以回国之后，塞克斯图斯留在了西西里岛，我们不能确定他有没有正式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安东尼和屋大维娅去了东方，在雅典度过了前39～前38年的冬天。安东尼热情洋溢地融入了希腊城市的生活。雅典人将这对夫妻称为“乐善好施的神祇”，将安东尼称为“新的狄俄倪索斯神”，并举办了一场仪式性的婚礼，让他与雅典城的保护女神雅典娜“结婚”。虽然得到了这样的荣耀，他还是向雅典人征收了一笔新税，作为“嫁妆”。不过，若不是雅典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安东尼夫妇，他向他们索要的税额还会更多。春天到来之后，安东尼正式脱去了希腊风格的便服，又一次换上了罗马统帅的服饰。他麾下的将领温提迪乌斯已经将帕提亚入侵者从罗马各行省逐出。在随后的几年里，安东尼的宏大使命将是狠狠惩罚帕提亚人，并最终为克拉苏报仇雪恨。[27]

恺撒留在意大利，开始建造船只的工程，以便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建立海军的唯一目的是镇压塞克斯图斯，但目前脆弱的和平还在维持。粮食供应又一次充足如前，流亡者也得以回国，因此罗马城的民众普遍来讲还是很高兴的。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就是这样一位流亡者，他曾担任前42年的裁判官，但在那一年结束时非常任性地拒绝离职。他是个朝三暮四的人，在内战中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前44年3月15日[28]后又积极地歌颂谋杀他的凶手。佩鲁西亚战争期间，他和卢基乌斯·安东尼为伍，并开始招募那些因为当局安置退伍军人而被剥夺土地的人。此次叛乱失败后，他遭到镇压，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逃往西西里岛，但似乎觉得塞克斯图斯·庞培对他的接待不是很慷慨，于是又逃往希腊。他似乎麻烦不断，有一次不得不逃离斯巴达，但一行人被困在一场森林火

灾中，后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29]

克劳狄·尼禄的妻子在方方面面都比她丈夫更值得注意。她的名字是李维娅，不过人们更熟悉她的绰号德鲁茜拉。她也有克劳狄氏族的血脉，来自这个贵族氏族的另一个显赫得多的支系。她的父亲被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最古老、最富贵的平民豪门之一的后代）收养，于是身世愈发显贵。李维乌斯·德鲁苏斯于前91年担任平民保民官，捍卫罗马的意大利盟邦的权利。后来他被谋杀，不久之后意大利盟邦就发动了叛乱，即“同盟者战争”。为了控制危机，共和国不得不向这些同盟者授予罗马公民权。很多人回想起李维乌斯·德鲁苏斯，对他还很爱戴。李维娅的父亲被后三头同盟宣告为公敌，于是与“解放者”并肩作战，在腓立比战役之后自杀。此时他的女儿已经结婚了，并在前42年11月为丈夫生了个儿子，给孩子取名为提比略·克劳狄·尼禄[30]。[31]

李维娅的丈夫起兵造反，她（此时大约十七岁）便来到他身边。她伴随丈夫经历了佩鲁西亚战争和流亡，躲过了追兵，风餐露宿。据说有两次，婴儿提比略的哭声险些让他们暴露。逃离斯巴达的时候，李维娅的头发和衣裙被烧着了。他们回到罗马之后，经济拮据。虽然《米西努姆条约》承诺允许他们收回被没收财产的四分之一，但和很多流亡者一样，他们实际上很难真正收回这么多。他们设法将提比略过继给一位热切希望与一个古老的贵族氏族拉上关系的富裕元老。在政治上，这个决定可能不是非常明智。没过多久，这位元老的兄弟就被怀疑阴谋反对恺撒。此人随即被逮捕，后来莫名其妙地死掉了。[32]

李维娅的身份非常高贵，无论是从血缘还是收养的关系来看，都是豪门贵族。而且她正值青春年少，非常美丽。她的头脑特别机敏（许多年后，她的曾孙卡利古拉称她为“穿裙子的尤利西斯”），这种聪明和机智无疑增强了她天生美貌的吸引力。前38年1月，她为丈夫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所以她在返回罗马时一定已经怀孕几个月了。即便如此，她还

是吸引了恺撒的目光，这甚至可能发生在他的二十四岁生日宴会上（可能在生日当天举行，也可能在生日前几天，以庆祝他大仇得报、剃掉胡须）。[33]

恺撒自愿禁欲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斯克利博尼娅怀孕了，在前39年年末生下了一个女儿（当然叫作尤利娅），但恺撒与她的婚姻在政治上已经不再非常有利，夫妻间似乎根本就不亲密。恺撒积极地追逐着其他女人。安东尼目前对恺撒的这些风流事还是很宽容的。后来恺撒的朋友们为他的风流辩解道，他之所以引诱元老们的妻子，是为了搞清楚她们的丈夫在想什么、做什么。安东尼后来散播了一个故事：在宴会上，恺撒将一位前任执政官的妻子当着她丈夫的面拖进卧室，她回到宴会厅时头发乱蓬蓬，脸红到耳朵根。李维娅·德鲁茜拉尽管大着肚子，还是很快成为恺撒最新的一位情人，但这不仅仅是逢场作戏或为了刺探政治情报。[34]

恺撒爱上了她的美貌和聪明，而李维娅可能也热情地投桃报李。她不大可能对自己丈夫到目前为止的政治生涯或前景感到满意。世人皆知，权力就是一种春药，年轻的恺撒令人瞠目结舌的晋升之路给了他极大的权力，让他踌躇满志、高度自信。她的贵族背景和人脉在政治上很有价值，但这都是长期的优势，在短期内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很难从这个角度来解释随后发生的怪诞丑闻。只有从以下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恺撒惯于称心遂愿，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这对情人铁了心要立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恺撒还只有二十四岁，而李维娅还不到二十岁。或许她害怕夜长梦多，情夫会朝三暮四。[35]

斯克利博尼娅刚生下女儿尤利娅，恺撒就把她休了。基本上，一位罗马丈夫只需要对妻子说“你的财产还归你！”，就算离婚了。恺撒的离婚理由包括一条，他“再也不能忍受她的怨妇性格”。我们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恺撒在无端侮辱她。克劳狄·尼禄非常给恺撒面子，乖乖地与

李维娅离了婚。前39年10月初，恺撒和李维娅订婚了。此事还需要向恺撒所在的大祭司团申请裁决。官方正式确认，李维娅身怀六甲，孩子的父亲是克劳狄·尼禄，这就明确了孩子的血缘关系。但这也不能阻止流言蜚语，有人说孩子是恺撒的，于是开玩笑道，一对夫妇仅仅三个月就生下了孩子，是多么幸运；但这个孩子肯定是克劳狄·尼禄和李维娅在希腊时怀上的，所以孩子不可能是恺撒的。目前李维娅以未婚妻的身份搬到了恺撒家。前38年1月14日，她在恺撒家中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为德鲁苏斯·克劳狄·尼禄。男婴被送到生身父亲身边，由父亲抚养长大。[36]

1月17日，也就是李维娅分娩仅仅三天之后，恺撒便和她结婚了。新娘的父亲已经去世，而她似乎没有多少亲近的男性亲属，只好让她的前夫在婚礼上陪伴她。婚礼仪式非常盛大，随后的宴会主题是奥林匹斯诸神，有六名男子和六名女子打扮成希腊诸神的模样，参加宴会。恺撒打扮成阿波罗。饮食极尽奢靡，这对年轻夫妇纵情享受自己的财富与权力。根据当时的风尚，贵族女性身边要有衣着非常“清凉”的奴隶男孩（这一次可能打扮成丘比特的样子）侍奉，小声地向她们发表尖刻的评论，对她们周围的人评头论足。这些幽默评论非常尖酸、做作，往往十分粗俗，老于世故的人会喜欢这种笑话。在宴会上，据说有个男孩指着斜躺在餐桌另一端的克劳狄·尼禄，对李维娅说：“夫人，您的丈夫在那边，您为什么在这边？”

多年后，有人批评恺撒抢走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这种事情只有暴君才做得出来。这些批评家为了在政治上攻击恺撒而夸大其词，因为克劳狄·尼禄其实是顺从恺撒意志的，不过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李维娅极有可能是个热情积极的参与者，她同意，甚至主动提出要与恺撒迅速结婚。当时罗马又开始缺少粮食，所以这次被称为“十二神祇盛宴”的奢华婚宴遭到了群众的普遍怨恨。人们说恺撒的确是阿波罗，不过是折磨人类的阿波罗，这是阿波罗比较令人讨厌的一个身份。当时有

一句流传很广的顺口溜：“恺撒假扮阿波罗，在诸神新颖的骄奢淫逸之间狂宴；所有神祇都把脸扭开，不去看人间；连朱庇特都逃离自己的黄金宝座。”[37]

凯旋将军

罗马又一次出现粮食匮乏，原因是三头同盟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之间发生了新的摩擦。意大利遭到了一些海盗的袭击，恺撒声称，被俘的海盗在刑讯之下供认他们是塞克斯图斯派来的。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庞培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控制他麾下所有人），恺撒都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就绪，可以打赢一场海战。庞培信赖的海军将领之一，一个叫作梅纳斯的释奴，倒戈到恺撒这边，带来了一些船只，这使得恺撒得以控制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在这些年的内战里，各方都非常重视数量，或者投入比对方更多的军团。罗马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去解决某个问题，就必然会取得成功。罗马的绝大多数军事统帅，包括尤利乌斯·恺撒，都还没有完全转变自己的思维，都还认为海战与陆战在根本上是差不多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也是如此。恺撒于前38年入侵西西里岛的计划从方方面面表明，他非常志得意满，完全没有尊重大海的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力量。[38]

在意大利西海岸，从墨西拿海峡一直到那不勒斯湾，都没有天然良港。再加上塞克斯图斯的部下能够从其基地（在各个岛屿上）出发，随意打击航程之内的任何港口，所以恺撒的准备工作必须在距离目标相当远的地方进行。根据计划，恺撒的两支舰队将在海上会合，然后互相协同，攻击西西里岛，但后来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行事，两支舰队各自为战。这些船只都是新建的，水手缺乏经验，指挥官同样是生手，只有梅纳斯一个人比较有经验。塞克斯图斯的舰队经验丰富，在与恺撒的一支舰队的交锋中占了上风，并将另一支恺撒舰队击溃。恶劣天气把残余的恺撒舰队也收拾掉了。此时刮起了特别凶悍的暴风，这对意大利西海岸

原本就不可捉摸的大海而言也算是非常严重的了。梅纳斯的船员知道如何应付，但其他大多数船长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的船只被风浪吹到岸边，撞得粉碎。次日，恺撒的船只剩下一小半，此次战役以惨败告终。罗马发生了暴乱，恺撒派梅塞纳斯去稳定那里的形势，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39]

塞克斯图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因为恶劣天气来得正是时候。后来他穿上一件海蓝色的斗篷，自称尼普顿[40]之子。据说恺撒在战前曾吹嘘自己即便没有尼普顿佑助也能打赢，并命令在罗马下一次的竞技会游行中不要展示海神的塑像。大多数罗马人认为，缺少粮食，以及这样一场没有必要、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战争都是三头同盟的错，不应该责怪海神。人们知道恺撒痴迷于掷骰子和赌博游戏，有些诙谐滑稽的人便编出了这样的顺口溜来描述当时的情况：“他在海战中两次失败，丢掉了自己的舰队，于是开始玩骰子，希望能赢一回！”[41]

恺撒曾请求安东尼在这一年初夏时到布隆迪西乌姆会谈，但恺撒自己却没有如约出现。安东尼等得不耐烦，便乘船返回了东方。在夏季的惨败之后，恺撒派梅塞纳斯去见安东尼，最终安排了一场新的会议。会议于前37年在塔兰托如期举行。安东尼带来了300艘战船，将其中120艘借给了自己的小舅子，这是新交易的一部分。恺撒则承诺借兵给安东尼，让他去远征帕提亚。据信，屋大维娅帮助促成了此次协议，说服自己的丈夫多给了10艘小船，而她的弟弟则为安东尼提供了1000名精锐的禁卫军士兵。三头同盟以更正式的方式再续盟约，因为前43年的法律赋予他们的五年任期已经结束了。这种政体上的虚幌子的细节究竟是什么，现代学者对其知之甚少，在当时可能也比较含糊，因为罗马史上不曾有过如此广泛权力的先例。安东尼与富尔维娅的儿子安提勒斯（此时十岁）同恺撒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尤利娅订了婚，以便敲定协议。这种婚约现在几乎已经是例行公事了。[42]

三头同盟计划对塞克斯图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整个前37年和前36年的上半年全部用来准备打仗。负责指挥的是阿格里帕，恺撒的老友和同龄人，前44年时曾与恺撒一同待在阿波罗尼亚，后来似乎一直为恺撒效力，并不断得到升迁。他没有参加讨伐塞克斯图斯的第一次战争，因为当时他在高卢，镇压了阿基坦尼亚的一次叛乱，并效仿尤利乌斯·恺撒在莱茵河上架桥，率军征讨日耳曼部落。终其一生，无论是作为将军、工程师还是行政官员，阿格里帕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精明强干。他对恺撒忠心耿耿，并且非常小心谨慎地保持谦逊。他凭借上述军事胜利，得到了一次凯旋式的荣誉，但他为了避免突出自己上级的失败，决定不举行凯旋式，而是集中精力去打造一支新的、更强大的舰队。在那不勒斯湾沿海的库迈背后，他挖掘了一条运河，通过一个较小的湖泊将阿维尔努斯湖与大海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港口和安全的基地，用来训练水手。

成群的桨手开始在岸上练习，坐在一层一层特制的长凳上，以模拟船舱内的场景。其中很多桨手都是曾经的奴隶，用参军换取自由。奴隶是很少被军队征募的，这是其中一个罕见的例子。好莱坞电影里，桨帆船的桨手都是奴隶，被铁链锁在船上。这是虚构的神话，因为罗马战船的船员都是自由人，是领军饷的水手和桨手。战船的船体尺寸很大，非常坚固，甲板被遮蔽起来，以保护桨手，很多战船配有一种新型的可折叠的塔楼，可以从塔楼上向敌船射箭或使用投射武器。还有一种秘密武器叫作“哈尔帕克斯”，这是一个尾端系着绳子的钩子，用弩炮射出去，深深嵌入敌船，将其咬死，然后将敌船控制住，以便己方士兵登上敌船。[43]

塞克斯图斯也没有闲着。双方各自集结了300多艘战船，每一位军阀都希望压倒对手。他们遇到的有些问题和前38年是一样的，因为恺撒的舰队分散在多个地点，不得不各自准备。7月初战役开始时，恺撒的三支舰队向西西里岛发动进攻，但很难协调配合。这一次尼普顿似乎仍

然对恺撒不爽。由于天气恶劣，阿格里帕损失了一些船只。在第一次尝试时，只有从北非出发的李必达在西西里岛成功登陆，但此后一些增援部队乘坐的船只都被敌军拦截和消灭了。

阿格里帕在米莱角外海打赢了一场战役。他的战船尺寸很大，防护很强，而敌军的战船虽然机动性强但比较小，很难击伤他的战船。不久之后，恺撒在陶罗梅尼乌姆（今天的陶尔米纳[44]）被塞克斯图斯击败，损失了大部分船只，不得不逃到岸上。有一段时间，他身边只有一名卫兵。在遇到友军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但在随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的士兵在西西里岛登陆，最后兵力达到约21个军团，此外还有一些辅助部队。庞培军队对其中一些部队进行了严重侵扰，但缺乏兵力和决心去歼灭其中任何一支。战局对庞培越来越不利，他的基地遭到攻打，被逐个占领。他别无选择，只能打一场大海战。

9月3日，在瑙洛库斯[45]外海，决战开始了。交战的时间和地点甚至有可能是双方事先约定的。阿格里帕在自己的旗舰上指挥，而恺撒在岸上观战。据说恺撒因为疲劳而睡着了，他的部下不得不将他唤醒，好让他发布进攻的命令。后来安东尼讥讽恺撒胆战心惊、呆若木鸡，甚至不敢看敌人，更不要说与其交战了。事实证明，恺撒不在现场也没什么要紧。阿格里帕的海战指挥技能在不断提高，他的战船尺寸比敌船大，船员也在近期获得了自信和经验，所以他的舰队击溃了敌军，将大部分逃窜的庞培派战船都摧毁了。恺撒向阿格里帕授予了一面特别的蓝色方旗，以及一项新设立的荣誉：海战金冠。它是一项形状像战船船首的金冠。[46]

恺撒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但与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是他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之一。对恺撒来说幸运的是，庞培始终缺少陆军部队以致不能将战火燃烧到意大利，因为他一直未能占领人口稠密的地区，以便组建更多军团。恺撒在这场冲突中冒了很大风险，在战局不利的时候损

失惨重。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个故事留存至今，讲到他本人逃脱险境，以及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得性命。这些故事的风格与那些讲述“公敌宣告”受害者逃亡的故事很相似，它们显然激发了罗马人的想象力。恺撒的这些故事可能都源于他自己的回忆录，风格和尤利乌斯·恺撒平心静气的《战记》很不一样，后者很少讲到自己的事迹。二者文体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尤利乌斯·恺撒是在非常谦逊地讲述自己的胜利。他的继承人自己蒙受了失败，胜利是由其下属赢得的，所以不得不描绘自己个人的英勇行为，来给自己贴金。到前36年，恺撒已经非常精明地承认，他需要依赖阿格里帕这样的人才去真正作战，但他很擅长将主要的功劳包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尽可能激动人心的笔触来描写自己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

[1] Virgil，*Eclogues* 1.67-72（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modified）.

[2] 萨图恩（Saturn）是古罗马的重要神祇，历史悠久，极其复杂。他是卡比托利欧山的第一位神，是主持万物生长和死亡、丰饶、财富、农业、周期性复苏、解放和时间的神。他的统治被认为是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罗马广场上的农神庙就是供奉他的。罗马最重要的节日农神节（Saturnalia）也是纪念他的。土星（Saturn）和星期六（Saturday）得名自他。罗马人认为他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宙斯的父亲）。

[3] 露吉娜是古罗马主持生育和分娩的女神。

[4] Virgil，*Eclogues* 4.4-12（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modified）.

[5] Martial，*Epigrams* 11.20.3-8，评论见K.Scott，‘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1933），pp.7-49，尤见24-6。

[6] Appian，*BC* 5.7，Dio 49.32.3讲到格拉菲拉，马尼乌斯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208-9，and Appian，*BC* 5.19。

[7] Appian，*BC* 5.13，5.15-17讲到士兵两次反对恺撒的哗变，第二次是由于百夫长Nonius被谋杀，见Dio 48.8.1-10.1；Suetonius，*Augustus* 104.12-106.2讲到他对自己的命运极度自信。

[8] Suetonius，*Augustus* 62.1，Dio 48.5.3讲到克劳狄娅。卡雷努斯见Dio 48.20.3，Appian，*BC* 5.51，54，59-61。

[9] Appian，*BC* 5.55，Velleius Paterculus 2.76.

[10] 安东尼的母亲尤利娅，见Appian，*BC* 5.52；拉比埃努斯的父亲，见R.Syme，‘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 *JRS* 28（1938），pp.113-25，及W.Tyrell，‘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Historia* 21（1972），pp.424-40；关于小拉比埃努斯，见Dio 48.24.4-25.1；关于帕提亚人的入侵，见Dio 48.26.5，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p.223，对战役及其背景的讨论，见D.Kennedy，‘Parthia and Rome：eastern perspectives’，in D.Kennedy（ed.），*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s* 18（1996），pp.67-90，尤见77-81，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185，225-8。

[11] Dio 48.12.1-5，Appian，*BC* 5.20-24.

[12] 今天阿尔巴尼亚西北部的斯库台。

[13] Appian，*BC* 5.56-66，Dio 48.28.1-30.2，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129，216-17，242，253-5，及Pelling in *CAH2* X，pp.17-20；梅塞纳斯，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129，341-2，359。

[14] 关于富尔维娅，我们的史料中有些疑问，见D.Delia，‘Fulvia Reconsidered’，in S.Pomperoy（ed.），*Women’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1991），pp.197-217，她的死亡，见Plutarch，*Antony* 30，Appian，*BC* 5.59，Dio 48.28.3-4；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的婚姻，见Plutarch，*Antony* 31，Appian，*BC* 5.64，Dio 48.28.3-31.3，Velleius Paterculus 2.78.1，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188-201，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217-20，E.Huzar，‘Mark Antony：Marriages vs.careers’，*The Classical Journal* 81（1985/6），pp.97-111，尤见103-11。

[15] Plutarch，*Antony* 57，概况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193-200 在这些年的背景下精彩地讨论了维吉尔的《第四牧歌》。关于这孩子的身份还有别的意见，有人说他是波利奥的儿子。在基督教时代，这种弥赛亚般的语调和前1世纪的成文年代有时被阐释为指的是耶稣。

[16] Appian，*BC* 5.53，Suetonius，*Augustus* 52.2，Dio 48.16.3，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213.

[17] 见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1980），pp.60-61，P.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1988），pp.202，206-8。

[18] 得名自颁布此法律的昆图斯·佩蒂乌斯，他是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

[19] 格奈乌斯·庞培（约前75～前45年），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庞培的哥哥。父亲死后，他坚持抵抗尤利乌斯·恺撒，在蒙达战役中战败被杀。卡西乌斯曾说，格奈乌斯·庞培是“一个残忍的新主人。你知道格奈乌斯多么蠢；你知道，他误以为残忍就是勇气，他还以为我

们老是嘲讽他。我担心他会像个农夫一样，用剑来报偿我们说的笑话”。

[20] 见K.Welch，‘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in A.Powell& K.Welch（eds），*Sextus Pompeius*（2002），pp.31-63；卡西乌斯对格奈乌斯·庞培的评价，见Cicero，*ad Fam* .15.19.4。

[21] A.Powell，“An island amid the flame”：The Strategy and Imagery of Sextus Pompeius，43-36 BC’，in A.Powell& K.Welch（eds），*Sextus Pompeius*（2002），pp.103-33.esp.105-9，118-29，and 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2008），pp.31-83；关于卢基乌斯·安东尼，见Dio 48.5.4。

[22] Appian，*BC* 4.25，36，85，5.143，Dio 47.12.1-13.1，Velleius Paterculus 2.72.5，77.2，with K.Welch，‘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in A.Powell& K.Welch（eds），*Sextus Pompeius*（2002），pp.45-6；恺撒正式理发剃须，见Dio 48.34.3，评论见M.Flory，‘*Abducta Neroni Uxor*：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pp.343-59，尤见344。

[23] 圣道（Via Sacra）是古罗马的主街道，从卡比托利欧山山顶，经过罗马广场的一些最重要的宗教遗迹（这里是最宽的一段），到达斗兽场。这条路是传统的凯旋式路线，开始于罗马郊区，经过罗马广场。

[24] Appian，*BC* 5.67-8，Dio 48.31.1-6.

[25] 卡里奈区应当在埃斯奎里努斯山上，不是在帕拉丁山。

[26] Appian，*BC* 5.69-74，Dio 48.36.1-38.3，Velleius Paterculus 2.77，Plutarch，*Antony* 32，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221-2，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205-7，与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2008），pp.190-91；尤其K.Welch，‘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in A.Powell& K.Welch（eds），*Sextus Pompeius*（2002），pp.51-4暗示，这些流亡者可能迫使塞克斯图斯接受了条约。

[27] Plutarch，*Antony* 33，Appian，*BC* 5.76，Dio 48.39.2，Seneca，*Suasoriae* 1.6，with M.Grant，*Cleopatra*（1972），pp.129-30；温提迪乌斯的军事行动，概况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286-8，援引了古代史料。

[28] 尤利乌斯·恺撒在这一天遇刺身亡。

[29] 见Dio 54.7.2，Suetonius，*Tiberius* 6.2-3，with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2002），pp.10-11，16-18.

[30] 后来的提比略皇帝。

[31]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3-10，15-16；她父亲的死，见Dio 48.44.1，Velleius Paterculus 2.71.2。

[32] Suetonius，*Tiberius* 6.1-3，*Augustus* 27.4.

[33] *Ulixes stolatus*， Suetonius *Caius* 23；概况见M.Flory，‘*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和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1-14。

[34] Suetonius，*Augustus* 53.1，69.1-2，后一种指控可能源自安东尼在罗马看到的事情；另见M.Flory，‘*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pp.352-3和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24-5 讨论了从宴会桌上抢走有夫之妇的故事可能指的是李维娅，不过克劳狄·尼禄只是前任裁判官，不是前任执政官。

[35] M.Flory，‘*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pp.345-6称：“他希望在李维娅的儿子出生之前与她结婚，说明他在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之前，能够从这门婚姻中得利。只有这一点才能解释他为什么明知自己匆匆与孕妇结婚会造成丑闻，还是这么做了。”但没有人能说明，他匆匆结婚究竟能得到什么政治利益。这种理论可能是由于Flory将恺撒视为精明算计、冷静沉着的政治阴谋家。如果把他匆匆结婚的行为视为早熟青年的轻率，倒是更有说服力。

[36]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1-26，M.Flory，‘*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p.348；关于离婚，概况见S.Treggiari，*Roman Marriage* （1991），pp.435-82及‘Divorce Roman Style：How easy and frequent was it？’ in B.Rawson（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pp.131-46；恺撒对斯克利博尼娅的评价，见Suetonius，*Augustus* 62.2；Suetonius，*Claudius* 1讲到，德鲁苏斯出生于恺撒和李维娅结婚三个月后，但这指的肯定是订婚，而不是实际的婚礼。

[37] Suetonius，*Augustus* 70.1-2（Loeb translation）；婚宴，概况见Suetonius，*Augustus* 70.1，Dio 48.43.4-44.5，with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24-7，他认为十二主神的宴会与订婚，而不是婚礼有关联；M.Flory，‘*Abducta Neroni Uxor*： 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更有说服力地论断这是婚礼宴会；奴隶男孩，见Dio 48.44.3，概况见W.Slater，‘*Pueri*，*Turba Minuta*’，in *BICS* 21（1974），pp.133-40。

[38] Dio 48.45.5-46.1，及Appian，*BC* 5.78-80，他将梅纳斯称为Menodorus。

[39] 此次战役，见Appian，*BC* 5.81-92，Dio 48.46.1-48.4，with J.Morrison& J.Coates，*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1996），pp.149-52，M.Pitassi，*The Navies of Rome* （2009），pp.186-91，W.Rogers，*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1937），pp.496-516，及R.Paget，'The Naval Battle of Cumae in 38 BC'，*Latomus* 29（1970），pp.363-9。

[40] 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大致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41] Suetonius，*Augustus* 16.2讲到尼普顿，70.2包含这诗句，另见Appian，*BC* 5.100，Dio 48.48.6-49.1，with A.Powell，"An island amid the flame"：The Strategy and Imagery of Sextus Pompeius，43-36 BC'，in A.Powell& K.Welch（eds），*Sextus Pompeius* （2002），pp.120-26，及（2008），pp.97-8。

[42] 屋大维在前38年未能与安东尼相见，见Appian，*BC* 4.78-80，前37年的会议，见Appian，*BC* 5.93-5，Plutarch，*Antony* 35，with Pelling in *CAH2* X，pp.24-7，及P.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p.502讲到屋大维承诺给安东尼的士兵数量；关于三头同盟第一个五年任期的结束，见F.Millar，'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JRS* 63（1973），pp.50-67，尤见.51，53，及Pelling in *CAH2* X，pp.67-8。

[43] 阿格里帕在高卢，见Dio 48.49.2-3，Appian，*BC* 5.92 讨论见J.M.Roddaz，*Marcus Agrippa* （1984），pp.70-72，及Pelling in *CAH2* X，p.25，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231。

[44] 西西里岛东部城镇。

[45] 西西里岛北部城镇。

[46] Appian，*BC* 5.96-122，Dio 49.1.1-16.2，Suetonius，*Augustus* 16.1-3，Velleius Paterculus 2.79.1-6，Livy，*Pers* .128-9；也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298-303，J.Morrison& J.Coates，*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1996），pp.154-7，M.Pitassi，*The Navies of Rome* （2009），pp.187-91，J.M.Roddaz，*Marcus Agrippa* （1984），pp.87-138，M.Reinhold，*Marcus Agrippa*：*A Biography* （1933），p.29讲到阿格里帕前37年被授予指挥权时还缺乏海战经验；阿格里帕的港口，见R.Paget，'The ancient ports of Cumae，' *JRS* 58（1968），pp.152-69，尤见161-9；关于海战金冠，见V.Maxfield，*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 （1981），pp.74-6。

十 竞争对手

无论是在海洋还是在陆地，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我都在全世界南征北战。胜利的时候，我总是饶恕那些恳求宽恕的人。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最后，他打破了与马克·安东尼的联盟，这联盟历来是可疑和不确定的，并且通过许多和解来艰难地维持。为了更好地揭露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堕落，已经丧失了一位罗马公民的体面，他下令打开并公布安东尼留在罗马的遗嘱。这份遗嘱指定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孩子为安东尼的继承人。

——苏埃托尼乌斯，2世纪初[2]

恺撒很快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个人勇气，不过这一次让一位盟友吃了亏。占领西西里岛之后，李必达多年以来第一次获取了一个重要地位。在腓立比战役之后，三头同盟中最年长的那一位遭到排挤，当然心有怨言，他现在期望恢复一些曾经的权力。李必达绕过了恺撒在岛上的将领，安排让一支最强大的庞培派军队向他投降并接受他指挥，此举将自己的军队扩充到超过20个军团。尽管其中很多军团的兵力远远少于理论数字，但这个总数也算非常惊人了。为了赢得这些新投诚的前庞培派士兵的支持，他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士兵一起洗劫墨西拿。他自己的士兵可能不是很愿意和不久前还是敌人的士兵一起分享战利品，但还是服从了命令。现在李必达感到自己很强大，决心将西西里岛纳入自己的阿非利加行省，并继续控制得到扩充后的军队。他在努力夺取西西里岛控制权的时候，与恺撒及其在当地的指挥官发生了一些愤怒的争吵。他将自己的军队调离恺撒的军队，单独扎营。在这些年里，军队是终极的权力基础，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一个拥有强大而忠诚军队的人。但忠诚往往是可以商谈、可以交易的。恺撒的部下很快开始在李必达的士兵当中活动，就像前43年在布隆迪西乌姆拉拢第四军团和玛尔斯军团那

样。

凯旋将军恺撒率领一支骑兵赶到了。他将这些骑兵留在李必达营地外，只带几名军官和卫兵，勇敢地进入营地。他这个举动有点像当年尤利乌斯·恺撒冷冰冰地直面哗变的第十军团，称呼他们为“公民们”，而不是通常的“兄弟们”，用这种手段击垮了他们的意志。但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缺乏前者的魅力，而且与他正在面对的士兵也没有旧交情。大部分士兵对他来讲都是陌生人，其中一些是前不久投诚的敌兵，不过肯定有一些军官是尤利乌斯·恺撒的旧部，这也许会有帮助。李必达及其亲信企图阻挡年轻的统帅。恺撒被推推搡搡，险些被一名士兵投掷的标枪击中，但没有受到伤害。如果李必达的军队下定决心的话，恺撒一行人肯定会遭到屠戮。

恺撒向士兵们讲话，敦促他们加入他这边。他亲自举起一尊军团鹰旗（就像他在穆蒂纳做的那样），开始走出营地，相信属于这个单位的士兵会跟随他。有些人跟了上去，其中一些是旗手，于是更多的人跟着他们走了。并不是所有士兵都瞬间投奔到恺撒那边。目前，大多数士兵还在犹豫不决。恺撒的更多士兵抵达营地外面，这可能促使营地内的很多士兵拿定了主意。更重要的是，李必达未能成功煽动士兵们的激情，让他们支持他。于是士兵们抛弃了他，起初是三三两两，最终全体都投奔了恺撒。被抛弃的指挥官卸去了自己的甲胄和军服斗篷，换上平民的托加袍，去向恺撒投降。

当年尤利乌斯·恺撒展现了宽大的胸怀，但后三头同盟公开选择了不同的路线。现在，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决定效仿自己“父亲”的仁慈，这既是务实的做法，也是值得的。李必达被剥夺了三头同盟成员的地位，失去了所有的权力。恺撒饶了他一条性命，他被送回意大利软禁起来，过上舒适的囚徒生活。恺撒究竟有没有权力这么做，在法律上是说不清的，不过在这些年里，这并不重要。李必达很多年后才去世，一

直保留着祭司长的身份。他得到了宽恕，因为他对恺撒不构成威胁。这种裁决本身就带着一些残酷，更糟糕的是，对罗马贵族来讲，承认其他人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就是莫大的耻辱。后来，恺撒有时会把李必达带到罗马，让他参加一些仪式或元老院会议。不过，恺撒对李必达的处置，与很多被镇压的政敌受到的待遇相比，还是非常仁慈的。李必达活了很久，寿终正寝。[3]

塞克斯图斯·庞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带着残余的几艘船和一些人马，驶向东方，选择与安东尼而不是恺撒打交道。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起初也受到了安东尼的欢迎，颇受鼓舞。他感到有机会逆转自己的命运，可以以更强势的地位与敌人谈判，于是开始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安东尼下属的一名将领迅速将塞克斯图斯击败，不久之后将他处决了。即便在当时，人们也不确定究竟是不是安东尼下令处死了塞克斯图斯。[4]

安东尼仍然自称三头同盟之一，尽管此时已经只剩下两个同盟者了。他有更大的难题需要烦恼，所以伟大的庞培的儿子的命运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前36年夏季，马克·安东尼终于发动了对帕提亚的大规模进攻，旨在恢复罗马的荣耀。由于克拉苏的战败和近期东部各行省遭到帕提亚入侵，罗马损失了不少颜面，急需弥补。恺撒没有兑现一年前向同僚做出的承诺，即借兵给他。即便如此，安东尼的军队也是极其雄壮的，拥有15到18个军团，并得到了辅助部队以及附庸国统治者提供的强大盟军的支持。后来，普鲁塔克兴高采烈地声称，远至印度的统治者听闻安东尼大军出征的消息，都为之战栗。[5]

但安东尼不是亚历山大大帝，帕提亚人也不像前4世纪的波斯人那样一触即溃。安东尼欺骗敌人的计划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却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他不耐烦地将行动迟缓的攻城器械和辎重留下，只给它们留了少量卫兵。机动性极强的帕提亚人猛扑过来，消灭了安东尼的攻城

器械和辎重部队，于是安东尼的主力部队被困在敌境深处，没有装备，粮草不足，而且冬天快到了。他的亚美尼亚盟军背信弃义，让局势更加恶化，但全部责任都在安东尼一个人身上。罗马人别无选择，只能撤退，在漫长的四个星期里持续遭到帕提亚人的无情追击和袭扰。安东尼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气，他的士兵也非常英勇，但在一个夜晚，罗马士兵们突然陷入恐慌。安东尼绝望了，想到了自杀。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他才没有自杀。事实上，敌军不久之后就放弃了追击，罗马军队最终撤到了安全地带。此次远征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军团士兵未能回国，随军人员和盟军的损失更重，骑兵战马和役畜的损失比率难免是最高的。幸存者在经历这番折磨之后，身体状况肯定不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对安东尼来说幸运的是，帕提亚人并不打算发动一场反攻。他自己在很多年里都不会再有足够的力量发动新的远征，说不定永远也不会有这个能力了。

若能在帕提亚取得一场辉煌胜利，安东尼将赢得超过在世或史上任何罗马领导人的军事荣耀，并获得大量战利品，使得他的财富超过恺撒或其他任何竞争对手。然而他一败涂地。很多现代学者低估了此次惨败的重要意义，反而觉得安东尼没有全军覆灭、丢掉性命，已经很了不起了。今天的我们当然知道，罗马人始终未能征服帕提亚人，也没有征服他们的波斯继承者，但当时的罗马人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也不会怀疑自己的最终胜利。对共和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击败外国敌人。安东尼将自己打扮为一位伟大的军人、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有时将自己描绘为狄俄倪索斯（他在东方既是酒神，也是胜利之神）。他很可能对自己的宣传信以为真了。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他的军事经验是有限的，高级指挥的经验更少，而他经历过的大多数战役都是内战。我们不应当对安东尼远征帕提亚的失败感到非常惊讶。对他自己而言，这次失败出乎意料，对他个人和他的政治前途更是一次毁灭性打击。[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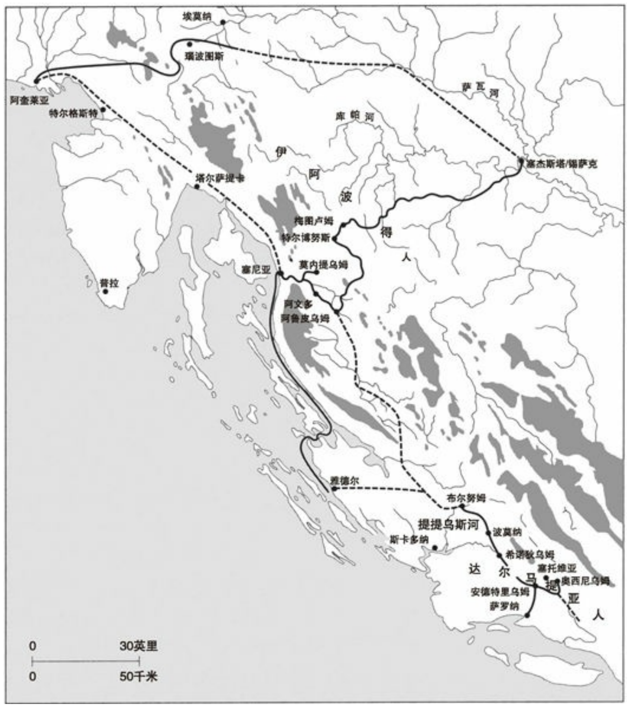
光荣与诺言

“凯旋将军恺撒”这种非常规的名号宣扬了他是一位成功的军事统帅，他还用宣传来不断强化这种形象。到此时，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干有限，并愿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阿格里帕这样有才华的下属。前36年年末，击败塞克斯图斯的胜利是毫不含糊的，与东方传来的稀里糊涂的报告形成了对比。安东尼非常努力地将自己的失败粉饰为成功，但一切都是徒劳。恺撒返回罗马，举行了一次小凯旋式以纪念在西西里岛的胜利。在过去，庆祝内战胜利是一种禁忌，不被允许，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不过，恺撒还是将塞克斯图斯描绘为海盗和逃亡奴隶的领导人，以便让民众觉得塞克斯图斯是活该吃败仗，这对国家是好事。恺撒曾将数千名奴隶解放，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在自己的舰队中服役。这个事实被忽略了。而战俘中的所有前奴隶都被返还给旧主人。战俘中有大约6000名前奴隶，因为短期内找不到主人，恺撒下令将他们处决，这可能是刻意地效仿前71年克拉苏将同样数量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元老院授予恺撒一项荣誉，允许他在广场竖立一座他本人的英雄式裸体雕像，雕像被置于石柱顶端，石柱上装饰着战船的船首。这座雕像的旁边是一座类似的纪念碑，它是为了颂扬罗马第一次伟大的海战胜利，地点也是米莱，不过时间是前260年，敌人是令人生畏的迦太基海军。[7]

将自己的胜利与历史上战胜危险的外国敌人的胜利相提并论，肯定是有好处的。更好的办法是亲自赢得新的胜利，于是在随后三年内，恺撒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伐伊利里库姆行省内外的各部族。尤利乌斯·恺撒生前曾计划在远征帕提亚之前在巴尔干打一场战役。在前40年代，尤利乌斯·恺撒的两位下属指挥官在该地区遭受了一些失败，损失了一些珍贵的军旗。罗马人在这些战事中的损失与在帕提亚人手下遭到的损失（帕提亚人先是从克拉苏，然后从安东尼那里夺得了一大批战利品）相比，是很少的，但伊利里亚能够给恺撒一个机会去为之前的失败复仇，并收复象征罗马荣誉的军旗。

前35年，恺撒在巴尔干北部作战，一直打到萨瓦河畔的塞杰斯塔（今天克罗地亚境内的锡萨克），然后在那里派驻了两个半军团过冬。他可能在考虑向多瑙河和达契亚[8]发动一次大规模远征。达契亚国王在近些年里被视为对罗马的真切威胁，而且很可能就是尤利乌斯·恺撒筹划的攻势的最终目标。即使恺撒现在开始考虑这个想法，也很快就放弃了，至少是暂时放弃了。前34年，他的军队在更南方的达尔马提亚，攻击了许多很小的部落和氏族。在这些战役结束时，恺撒在给元老院的报告中列举了不少于30个不同民族。该地区的地形非常复杂，在过去曾有不止一支罗马军队被敌人包围在高耸群山环绕的山谷中，进出山谷的通道全被敌人控制。恺撒的行动非常谨慎，在山谷两侧的山顶上都安排了侧翼掩护部队。在19世纪印度西北边境省，这种策略被称为“给高地加冕”。前1世纪罗马人这么做的目的与19世纪的英军是相同的。任何敌人若企图攻击山谷内的罗马主力部队，就会遭到两侧高处的罗马侧翼掩护部队的冲击。在该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两军对垒，但有很多突袭和伏击作战，以及攻打土著部落山顶要塞的围攻战。[9]

记述这些战役的史料中又有很多突出表现凯旋将军恺撒个人功绩的段落，这些史料肯定都是来源于他自己的回忆录。在梅图鲁斯（这是一个小地方，即便在罗马时代也不为人熟知，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具体地点）围攻战中，他起初在一座高塔上居高临下地观察主攻势。他的士兵建造了一座面向敌人城墙的坡道，但还没有到城墙那么高。坡道上有四座吊桥，可以伸到敌人城墙上，以便罗马人登上城墙。守军打得非常凶猛，先是第一座，然后是第二座，最后是第三座吊桥被推翻或者被攻击者的重量压垮，所以罗马军团士兵显然不太愿意登上最后一座吊桥。



前**35**～前**33**年，奥古斯都在伊利里库姆的军事行动

恺撒匆匆离开自己的观察塔，向士兵们呼喊，鼓舞他们前进。但没有效果，于是他决定身先士卒，从一名士兵手中夺走盾牌（尤利乌斯·恺撒在另一个危机时刻也曾这么做，这已经是一段佳话），冲上最后一座吊桥，身边只有阿格里帕和其他一些幕僚人员。军团士兵受到鼓舞，或是感到羞愧，于是潮水般跟了上去。人太多了，吊桥被压垮，落入坡道与城墙之间的深深凹陷处。有些士兵因为这次坠落而丧命，恺撒很幸运，仅仅右腿和双臂负伤。他很快回到观察塔顶端（可能得到了不少帮助），让全军都看到他还活着，还能继续指挥，将来还能继续奖赏士兵们。军团士兵们奉命建造新的吊桥，以便发动新的进攻。这种非常罗马式的执拗令敌人丧胆，于是梅图鲁斯很快投降了。[10]

一年后，在另一座默默无闻的要塞之外的战斗中，恺撒的膝盖因被石块击中而负伤（我们不知道这石块是敌人投掷的，还是用投石器射出来的），一连几天不能行走。这些作战的规模都相对较小，但战斗本身可能很激烈和困难。在另一次围攻战中，敌人在夜间发动突袭，罗马人

的一个大队陷入恐慌，抱头鼠窜。恺撒下令对这个大队实施十一抽杀，即每十名士兵中抽签选出一人，将其活活打死，然后另外九人要接受象征性的羞辱：在战役的余下时间里，他们只能吃大麦（一般是牲畜的饲料和给奴隶吃的食物）而不是小麦。比较不寻常的是，我们还得知，此次有两名百夫长被处决。因为一个大队里顶多有六名百夫长，所以此举意味着恺撒认为这两名百夫长应当负主要责任。前36年，在亚美尼亚，安东尼麾下的一个大队因为类似的恐慌逃窜而遭到十一抽杀。我们还知道，在这些年里，在西班牙作战的一位将军也对部队实施这样的惩罚。这是一种传统的惩罚，但它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已经很少见，被认为是一种几近过时的严酷行为。[11]

恺撒显然非常希望在世人眼中成为一位传统风格的伟大的罗马将军，就像他那被谋杀的养父一样。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领袖应当取得成功。尽管他的伊利里亚战役不如安东尼与帕提亚人的斗争那样重要，但他胜利了，而安东尼失败了。恺撒于前33年夏季返回罗马，带回了从落败和求饶的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以及之前战败时丢失的罗马军旗。这些战利品和军旗被存放在新建的屋大维娅门廊[12]。元老院很快授予他凯旋式的荣誉（他已经获得了两次小凯旋式），不过他决定等一段时间再举行凯旋式。当年尤利乌斯·恺撒面对两个选择，要么留在罗马城外等到自己的凯旋式结束，要么放弃这项荣誉而立刻进入城市参选执政官。从那个时候到如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完全来去自由，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13]

在伊利里亚战役期间，他曾多次返回罗马城，并于前33年1月1日第二次就任执政官。这距离他上一次担任执政官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年，但恺撒此时仍然只有二十九岁，所以这样的传统限制早就没有意义了。然而这一天还没结束，他就辞去了执政官职位，以便指定一位继任者。安东尼在前一年也是这样做的，并且根本没有离开自己的行省到罗马就任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对罗马的高级行政长官职位漫不经心，后三

头同盟更是远远超过了他，视这些职位如儿戏。现在每年的两位执政官都不会在任整整一年，而是很快辞职，指定补任执政官来接替自己。补任执政官也可能辞职，给其他人一个机会，所以前33年居然有多达六位补任执政官，不过这与前38年多达六十七位裁判官同时任职的事情相比，也不算什么了。每一位官员都因为曾经担任这些官职而获得永久性的显赫地位，在元老院会议中获得相应的优先权利。[14]

凯旋式的含金量也比以前下降了很多，元老院授予此项荣誉时越来越慷慨大方。在前30年代，有好几位高级将领（有的是恺撒的人，有的是安东尼的部下）获得凯旋式荣誉，仅仅在前34～前33年就有六人。很多获得此项荣誉的人建造或修缮了城内的大型纪念建筑，以永久性纪念自己的胜利。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在前39年举行了凯旋式，后来修复了监察官使用的自由大厅，为其增添了一座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一翼存放希腊文书籍，另一翼存放拉丁文书籍。这是罗马的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因为尤利乌斯·恺撒筹划的图书馆项目在他死后就被放弃了。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于前34年举行凯旋式，并开始建造罗马的第一座石制圆形剧场。在过去，剧场的座席都是临时性的，通常是倚靠着大型公共建筑搭建起来。同年，盖乌斯·索希乌斯庆祝了自己的凯旋式，他收复了耶路撒冷，帮助大希律王[15]在犹太复辟。他建造了一座阿波罗神庙，后来称为阿波罗·索希阿努斯神庙，今天在马凯鲁斯剧场旁还能看得到。[16]

对罗马人来说，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是非常值得庆祝的。如果说这些凯旋式以及相应的建筑工程是安东尼与恺撒两派支持者之间的竞争，那就错了。这些凯旋的将领个个都是骄傲的罗马人，而且即便在两位巨头瓜分了共和国及其各行省统治权的年代，他们也并不拥有自己固定的党派。事实上，安东尼的部下的成功就像恺撒亲信的凯旋一样，反衬了安东尼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觉得，如今的战争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不是罗马同胞。在罗马城中心的建造工程增加了城市的忙碌气

氛，甚至在这些生活福利设施竣工之前，就能让人们变得更乐观。这些工程也给很多人，不管是工匠还是普通劳工，带来了领薪水的工作机会，并给建材供应商带来了很好的生意。

恺撒把尤利乌斯·恺撒的很多恢宏的建筑工程继续开展下去，尤其是在广场重建元老院议政厅和新建维纳斯神庙，这两项是工程的核心项目。不管其他人主持的纪念建筑是多么壮观，在整体的雄伟和规模上都没有办法与他的工程媲美。前33年，阿格里帕担任市政官（这个职位常常被人忽视，因为三头同盟的支持者们得到了很多更高级的职位）。他曾在前37年担任执政官，因此让他这样一位前任执政官来当级别较低的市政官，是非同寻常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过去，仅仅三十岁出头的前任执政官更是无法想象。这个年轻人曾在高卢征战，将塞克斯图斯·庞培逐出大海，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和恺撒一起，在梅图鲁斯身先士卒地冲过危险的吊桥。现在，他开始监督罗马城的公共生活福利设施，像往常一样，以充沛的精力和精明强干的本领投入工作。[17]

他主持建造了一座新的高架渠，即尤利乌斯高架渠（和往常一样，苦劳是阿格里帕的，但功劳都被机敏地归于他的上司），并大规模翻新或维修了其他高架渠。这不仅仅是为了建造宏伟建筑：借助于700座新的蓄水池、500处泉眼和130座水塔，整个罗马都有流动水的良好供应。下水道得到检查、维修和改良。做一些虽然凡俗但必需的工作，也是能够吸引群众眼球的。多年以后，人们还记得这位了不起的市政官乘坐小舟，巡视大下水道（罗马城的主要下水道）的情景。除了这些务实的公共设施之外，阿格里帕还主持了罗马城每年59天的竞技娱乐活动，向群众分发奖品，并安排了170次免费开放公共浴室，以及组织理发师免费为公民服务。审美方面也没有被忽视。他建造的很多水泉都饰有雕像或石柱，公园里有非常宏大的艺术品展示。

对罗马城的所有人（不仅仅是富人）来说，生活都变得更舒适了。

在内战、公敌宣告、没收土地和殖民的许多混乱岁月之后，意大利的生活开始变得稳定一些。恺撒对上述的这些坏事负有责任，很多人因此痛恨他。但现在人们似乎不再恨他了，没有人愿意回到之前的动荡日子。很少有人爱戴他，但国内和平重新降临，人们为此感激他，并且越来越相信安宁的日子会继续下去。有些人或许感到，还有一件事情没有了结，因为没有人知道安东尼会何时返回罗马，以及以何种方式返回。

亚克兴角的阿波罗

现在该说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了。到目前为止她基本上没有露面，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尽管她名扬四海，作为一位浪漫人物具有极大魅力，是东方的象征，或者是一位在被男性主宰的世界里的独立女性，但实际上，地中海世界已经几乎被罗马主宰，所以她的权力很小，重要性很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罗马的许多附庸统治者之一，她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对抗竞争者，完全依赖罗马的撑腰。尤利乌斯·恺撒恢复了她的王位，推翻了她的弟弟和共治者托勒密十三世。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两次访问罗马，无疑是担心情人的朝三暮四会削弱对她的支持。有人认为，尤利乌斯·恺撒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培植为自己的长期情妇，并且在政治上受到她的引导。这完全是现代人捏造的神话。他们的孩子托勒密·恺撒里昂和母亲一起来到罗马，但他不是罗马公民，也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合法儿子，所以在罗马政治中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罗马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尽其所能地获得独裁官死后出现的新政权的认可。其他的附庸统治者或附庸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有的亲自到罗马，有的是通过代理人，其中有一个派系在寻求劝说罗马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交给她的妹妹阿尔西诺伊。西塞罗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这个段落经常被引用。但西塞罗的通信极多，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其中仅仅短暂露面，显然说明她根本就是个不重要的角色。女王返回自己的国家之后，立刻谋杀了自己的第二个弟弟托勒密十

四世（尤利乌斯·恺撒立他为她的共治君主），以恺撒里昂取而代之。一个男婴肯定比十几岁的弟弟更容易控制。[18]

前41～前40年秋冬，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安东尼成了情人。他离开时，她已经怀了孕，王位也得到巩固。他还非常善解人意地下令杀死了阿尔西诺伊，除掉了她最后一个（至少在她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有可能成为威胁之前）真正的成年竞争对手。三年半之后，这对情人才再次相见。安东尼娶了屋大维娅，和她生了两个女儿。前37～前36年冬季，安东尼把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带到了安条克，见到了他们的两个孩子，男孩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和女孩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分别是太阳神和月神的名字。安东尼在安排将埃及粮食和白银输送给自己军队作为给养和军饷时，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旧情复燃。他出发远征帕提亚时，女王又一次怀孕。在安东尼兵败返回之前，女王生了个男孩，取名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安东尼将自己的情人召唤到身边（在今天黎巴嫩沿海的一座小城市）安慰自己，此后就与她如胶似漆，很少长时间分离了。[19]

前35年，屋大维娅带着一队精锐禁卫军、一些骑兵和虽然凡俗但至关重要的役畜，来到雅典，以补充丈夫在战争中损失的资源。安东尼接收了这些部队和牲口，却没有去见她，而是写信让她返回罗马。在之前的岁月里，屋大维娅陪伴丈夫旅行时，从来没有去过比希腊更远的地方。罗马的行政长官去自己的行省赴任时一般不带妻子，更不要说战时了。但公开展示自己的王家情妇，也是很不正常的事情。恺撒很快将安东尼简单粗暴地打发一位体面尊贵的罗马妻子，与他可耻地公开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出双入对的行为对立起来。有些人怀疑，整个事情是恺撒一手炮制的，他故意鼓励姐姐去雅典，以损害安东尼的形象。两位巨头之间的关系肯定已经冷淡了下来，而且双方对此都不加掩饰。[20]

在这些年里，恺撒能够随时去罗马，而安东尼不能。屋大维娅继续扮演一位尽职尽责的贤妻角色，欢迎丈夫派来的人，尽力帮他们获得官

职和荣耀。但她要得到这些，就必须去找自己的弟弟。据说恺撒建议她与丈夫分手，但她拒绝了，而是继续替丈夫说话。恺撒出手帮助提携安东尼的人，至少能够获得这些人的部分感激，而且恺撒比安东尼处在更有利的位置（很简单，因为恺撒在意大利或附近），能够用慷慨大方来拉拢新的支持者。如今，对没收土地政策的受害者做出让步显得像是大慈大悲，其实仅仅是对之前的残酷恶行的稍许缓和。恺撒在伊利里亚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永久性打破了塞克斯图斯·庞培对意大利的封锁，解除了面临的威胁，促使罗马和意大利向正常的、稳定的方向发展。恺撒就在意大利本土，所以他获得的荣誉比身处远方的同僚多得多。前36年年底，恺撒的人身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他是一位平民保民官一样，不过他的此项特权是永久性的，而不仅仅是在任职的一年内有效。一年后，同样的荣誉被授予屋大维娅和李维娅，国家立起她们的雕像来歌颂她们，并且赋予她们无须监护人即可自行处置自己财政的合法权利[21]。恺撒的人身将享有特殊地位，他的直系亲属也是这样。[22]

前34年，安东尼又一次出征。他通过狡猾的手段俘虏了之前的盟友——亚美尼亚国王。这也算是胜利，但还远远不能弥补他进攻帕提亚的惨败。他返回亚历山大港，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游行。亚美尼亚国王身披黄金（据另一份史料，是白银）枷锁，和其他的王室俘虏一起行进，后面跟着一辆战车。安东尼坐在战车上，打扮成狄俄倪索斯。游行的最高潮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端坐在宝座上（宝座在一个装饰精美的平台的顶端）接见他。整个仪式很像罗马的凯旋式，不过是在一座外国城市上演的，不是在罗马，而且是给一位外国女王观赏，而不是给罗马公民。不管真相如何，恺撒及其盟友很高兴将此事描绘成这种样子，来破坏安东尼的形象。[23]

这一年晚些时候，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主持了另一场仪式，用托勒密王朝最喜爱的极其壮观奢华的方式来进行。所谓“亚历山大港的献土”确认了女王及其共治君主恺撒里昂的权力，并将东方各行省的

大片土地赏赐给安东尼与女王的三个孩子。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得到了帕提亚和米底[24]，这两个地区其实都不在安东尼或罗马的控制范围之内。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被赞颂为“众君主的女王，她的儿子们亦是君主”，这无疑是为了确认她的统治权，以及她对自己儿女的主宰权。孩子们中最大的已经是个少年了，很快就将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东方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也很难知道安东尼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因为真相很快就被一大堆充满敌意的宣传掩盖了。安东尼的最亲密盟友们扣押了安东尼自己对此事的报告，因为这非常有损他的形象。[25]

对安东尼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如果恺撒本人没有批评他，那么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对安东尼大肆口诛笔伐。他们说，安东尼是一位阴险的东方女王及其腐朽廷臣的奴隶。贺拉斯在若干年后的一首诗里捕捉到了这种批评情绪：

> 多么可耻！一个罗马人拜倒在一个女人裙下（你们这些后辈一定不肯相信），手里拿着木桩和兵器。尽管他是军人，却低三下四地伺候一大群干瘪的宦官，而阳光照射在军旗丛中腐化的蚊帐上！[26]

安东尼被描绘为酒鬼，或者甚至被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灌下魔药，被她拖来拖去，牢牢控制。他的行为举止已经不再像罗马人，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共和国的公仆。人们不断强调安东尼与恺撒的对比。恺撒取得了胜利，为国家福祉而劳作，受到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赞颂，并且和自己的罗马妻子一起生活。安东尼自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代，所以文学和艺术中再次开始炒作赫拉克勒斯的那段故事：这位半神被翁法勒[27]诱骗，穿上女人的裙子，坐下来纺线，而她拿起他的大棒，披上他的狮皮。[28]

攻击是双向的。安东尼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恺撒批评他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关系时采用的双重标准：“你为什么变了？是因为我在操女

王吗？她是我的妻子吗？（当然不是！）我是刚刚开始和她上床吗？难道不是已经持续了九年吗？你呢？你只上德鲁茜拉（李维娅）一个人吗？如果你在读这封信时没有在干特尔图拉、特连提拉、卢菲拉或萨尔维娅·提提西尼阿姆，或者她们所有人一起，我就祝贺你！干什么人，真的重要吗？”[29]

恺撒的风流是世人皆知的，但与很多罗马女人有露水情缘是一回事，被一个外国情妇套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希腊人，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非常复杂，既有仰慕（因为罗马人感到自己的文化没有希腊那么高级），也有对被征服民族的鄙夷。更糟糕的是，她是埃及的统治者，罗马人对埃及蛮族（他们有很多带着动物脑袋的神祇）有着很多历史悠久的刻板印象。恺撒及其盟友拥有许多材料可以利用。安东尼自己的行为举止也无助于维护他的形象。他发表的唯一著作为论他的酗酒，为自己的酗酒辩护，或许还暗示，他从来不会因为饮酒而丧失行动能力，并且在执行公务时从来不会酗酒。我们不知道这部书的细节，因为它已经遗失。他需要写一本书来自我辩护，足以说明他的酗酒是多么严重，公众形象是多么糟糕。[30]

安东尼的攻击比自我辩护更多。双方的辱骂都非常符合罗马政客互相攻击的传统，很少会考虑真相是什么。安东尼又开始炒作恺撒在腓立比战役中的糟糕表现，并大肆宣扬恺撒被塞克斯图斯·庞培击败以及怯懦惧敌的故事。安东尼绘声绘色地描述恺撒是一个恶毒的腐化堕落之徒，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尤利乌斯·恺撒，以获得独裁官的恩宠；后来，恺撒打算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尤利娅嫁给某个伊利里亚小部落的国王，甚至考虑自己娶这位国王的女儿。这个指控肯定比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私情更严重，至于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身为贵族的安东尼自然要表示对竞争对手真实（而非收养他的）家族背景的鄙视。到了这个比较晚的时期，恺撒里昂才开始起到一些重要作用。倒不是恺撒里昂自己有什么重要，而是因为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这

表明自封的凯旋将军恺撒、神之子，根本就不是尤利乌斯·恺撒的血亲。恺撒让奥庇乌斯（独裁官的旧部之一）写了一份小册子，“证明恺撒里昂根本不是独裁官的儿子”。安东尼回答说，他曾亲耳听到尤利乌斯·恺撒承认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31]

双方的唇枪舌剑演化为武装冲突，我们很容易觉得这完全是恺撒的错。他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很容易被看成事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事实上两位巨头都对权力非常贪婪，也都对最终的武力对抗没有什么顾虑。前33年夏季，安东尼的军队开始在幼发拉底河集结。他这么做也许是想再次进攻帕提亚，但即使他有过这种想法，也很快放弃了。他命令军队开始了超过1000英里的长征，开赴小亚细亚沿海。西方唯一的潜在敌人就是恺撒。[32]

前32年1月1日，安东尼的两位高级下属，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曾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海军将领）和盖乌斯·索希乌斯成为执政官。三头同盟的第二个五年期限可能在前一年年底到期，恺撒和安东尼失去了正式的权力，不过他们仍然掌控着军队和许多行省。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赞扬安东尼，间接地批评恺撒。索希乌斯随后发动了针对恺撒的人身攻击，并向元老院提交一项动议，谴责恺撒。在投票表决开始之前，一名保民官否决了此项动议。恺撒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有策略地避免参加这些会议，但在下一次会议召开时在军队的护送下到达会场，他的朋友们也陪伴在他身边，并且小心地显露出他们“隐藏”的匕首。不管他有没有合法的军权，他都冷静地坐在两名执政官之间的座椅上，以显示他才是实际上的主宰。阿赫诺巴尔布斯和索希乌斯明白这种暗示，于是离开罗马，去希腊与安东尼会和，沿途没有遭到骚扰。其他一些人也开始跟随他们离开了意大利。[33]

安东尼麾下也有人逃到恺撒那边。不久之后，前任执政官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抵达罗马，还带来了他的外甥马尔库斯·提提乌斯

（原定的下一年执政官，就是他下令处死塞克斯图斯·庞培）。普兰库斯曾多次变节，朝三暮四，名声很臭，但他的决定被认为是一个风向标。直到前不久，他还积极地参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狂欢。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曾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赌局，由普兰库斯主持，看谁能拿出最昂贵的菜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将价值连城的珍珠耳环丢在酒里，然后一口吞了下去。普兰库斯宣布她是获胜者。还有一个故事说，普兰库斯曾参加一场奥林匹斯诸神主题的宴会，他扮演海神格劳科斯的角色。这位前任执政官穿上了假的鱼尾，涂抹自己的皮肤，然后裸体跳舞。现在他背叛了安东尼。一位玩世不恭的元老说："安东尼一定做了很多事情，你才离开了他！"[34]

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知道安东尼的很多秘密，可以卖给恺撒，而且他这个人的存在也有价值。普兰库斯是安东尼遗嘱的见证人，所以知道其中一些条款对安东尼的形象很不利。这份遗嘱存放在罗马的灶神庙，尽管为首的维斯塔贞女[35]拒绝交出遗嘱，但恺撒还是把它强行拿走，并在广场的一次公共集会上当众宣读了遗嘱的摘要。遗嘱的内容，或者至少恺撒选择公布的那部分，令人激愤不已。安东尼在遗嘱中正式承认恺撒里昂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他在自己的遗嘱里提到这个，有些奇怪），并将自己的财产传给他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生的孩子。遗嘱里肯定有将自己部分财产传给他的合法的罗马儿女的条款，但被忽略了。更糟糕的是，他希望自己的遗体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一起葬在亚历山大港，即便他是在意大利去世的。[36]

我们掌握的古代史料都没有说这份遗嘱是伪造的，这肯定是正确的。这份遗嘱本来就令人尴尬，绝不能公之于众。恺撒固然没有伪造遗嘱，却非常仔细地扭曲和加深了它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恺撒自己的行为是刻意与安东尼形成鲜明对照的。他还只有三十岁，却已经开始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一座宏伟的陵寝。在过去，贵族建造纪念建筑是为了传扬自己家族的荣光，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恺撒的陵寝工程让过去的任何建筑

都黯然失色。它很快就被称为Mausoleum，得名自卡里亚[37]国王摩索拉斯（Mausolus）的著名陵墓，后者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恺撒陵寝的直径为300罗马尺[38]，墙高40尺，顶部有穹顶，穹顶的顶端有一座巨大的恺撒雕像，其尺寸显然是帝王风格的，又一次强调恺撒与其他人不同。更重要的是，陵寝在罗马，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的战神广场，这个地点很适合建陵寝。恺撒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人，与安东尼不同，绝不会想要被葬在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有传闻称，安东尼打算将首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之前有传闻，说尤利乌斯·恺撒也曾有这个计划）。还有一个故事说，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最喜欢的誓言是："就像我会在卡比托利欧山上主持公义一样。"这些故事互相矛盾，但这不重要，因为它们传达的信息是：安东尼服从她的命令，心里早已不顾及罗马的利益。[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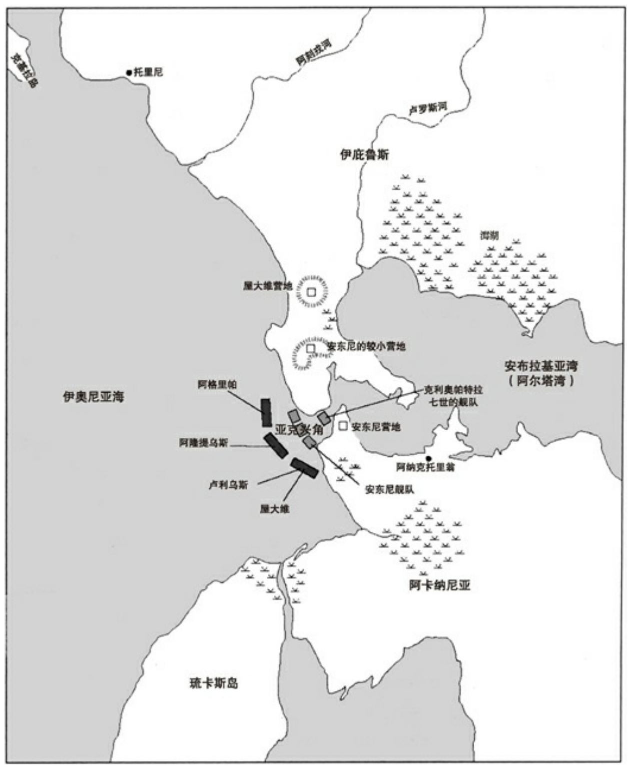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是罗马的敌人。这是恺撒宣传攻势的长期主题，因为人们更愿意假装自己在抵抗一个威胁罗马的外国敌人，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两位罗马军阀之间即将爆发新的内战。表面上，内战的爆发不是恺撒和安东尼的选择，而是保卫罗马的集结号。整个意大利宣誓在这场战争中服从恺撒的领导，这是一个精心导演出来的团结姿态。恺撒允许安东尼的退伍老兵拒绝宣誓效忠恺撒，但很少有人拒绝，根本没有人表现出愿意集合起来为安东尼作战的态度。一些元老，可能有数百人，逃去加入安东尼阵营，现代历史学家觉得能有数百人已经很了不起了。有些元老是对安东尼负有义务，或许也有人只是觉得他更可能获胜，或者这些元老处于绝望的处境，希望发生新的革命。当年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中所剩无几的幸存者也投奔了安东尼，因为他们不可能得到尤利乌斯·恺撒继承人的欢迎。恺撒吹嘘说，有七百多名元老宣誓接受他的指挥。即便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也仍然是元老阶层的大多数。一些人公开保持中立，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他说自己"会远离你们之间的争吵，并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40]。[41]

前32年夏季，恺撒领导着罗马共和国正式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宣战。在遥远的过去，被称为“国务祭司”的团体负责宣布战争与和平。古老的仪式被恢复，或者可能是发明出来的，但伪装成一种传统。恺撒作为一名国务祭司，在战神庙主持了祭祀。一支长矛被染上牺牲品的血。祭司念诵了敌人的恶行，然后将长矛投掷出去，插入一片象征着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埃及王国的土地。[42]

安东尼的陆海军已经在希腊西海岸集结了。此时的时节已经太晚，双方都不能发动进攻，但安东尼的计划似乎是按兵不动，在希腊迎击敌人。庞培在前48年，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前42年，都运用过这样的计划，但都失败了。苏拉是唯一一个以希腊为基地打赢内战的罗马统帅，但他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渡海去了意大利作战。安东尼依赖自己陆军与舰队的庞大兵力，相信敌人会犯错误并被击垮。和近期的其他战争一样，这场新的战争的规模也是极其宏大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安东尼那边，她的存在导致他的一些高级下属发生了摩擦。如果他渡海进攻意大利，一定非常不利于他的公众形象，这或许就是他不愿意渡海的另一个原因。但他按兵不动的结果就是，将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敌人。[43]

阿格里帕发动了进攻。他极可能是整个战役的规划者，而且在关键时刻指挥大军有条不紊地击败安东尼的肯定是他。他凭借一连串闪电般的攻击，袭掠和摧毁了安东尼的多个基地，威胁了他的补给线。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时，恺撒（这一年，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亲自率领主力部队渡海，在伊庇鲁斯登陆，占领了一座称为托伦涅（意思是“长柄勺”）的城镇。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开玩笑说，如果恺撒“坐在长柄勺上”（在俚语中，“长柄勺”指的是阳具），他们不必担心。但事实是，敌人已经渡过了亚得里亚海，而安东尼还没有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对抗敌人。恺撒逼近了安布拉基亚湾沿岸的亚克兴角，安东尼的主基地就在那里。很快，恺撒从海陆两面封锁了亚克兴角。从春末到整个夏季，安东尼的部下未能突破敌军的封锁，也未能引诱敌军在对安东尼有利的环境

下交战。在此期间，安东尼的营地环境卫生状况极差，疟疾和痢疾传播得很厉害，导致军队不断减员。恺撒的部队等待着，观察着敌人越来越羸弱。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恺撒军队赢得了许多小规模胜利，有一次差一点俘虏了安东尼本人。逃兵（包括普通士兵和辅助士兵，也有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这样的元老）偷偷从安东尼营地溜走，受到恺撒的欢迎。但恺撒这边没有人逃往安东尼营地。[44]



亚克兴角战役

前31年9月2日，安东尼的舰队出航，向敌人发起挑战。至少有部分船只配有桅杆和帆，其实在战斗中应当抛弃这些笨重的物件。战船在战斗中完全依靠划桨来机动，所以船上配有桅杆和帆说明安东尼显然在考虑带领部分或全部船只突围。或许他还希望打赢一场海战来扭转战局，但也为失败做好了准备。这对一位统帅来说，不是乐观的心态。两军舰队摆好阵形需要好几个钟头。随后，两军对峙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不愿意在太靠近岸边的地方作战。终于在安东尼的战船开始继续推进的时

候，阿格里帕命令他的战船往外海退一点距离，以便腾出更大空间。然后，他们尝试从侧翼包抄敌人。恺撒舰队的兵力可能更强一些，船长和水手的技能在针对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残酷战争之后肯定也有很大提高。两支舰队都拥有很多大型战船，战斗打响之后，大家发现很难用撞击战术来击沉或击伤这些大船。大部分战斗是用投射武器或用抓钩登船，然后近战。随着各艘战船运动起来捕捉优势地位，整齐的战线被打破，出现了一些缺口。

该地区的某个固定时间通常会刮起西北偏北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指挥的一队船只利用这个风向变化，突然升起船帆，从舰队主力背后驶出，径直奔向战线中央的一个大缺口。他们对正在交锋的战船置之不理，继续前进，而安东尼离开自己的旗舰，登上一艘轻型船只，追了上去。大约70到80艘船逃走了，载着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很大一部分财物，但这顶多相当于整个舰队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其他船只被留下来作战，其中一些继续非常顽强地拼杀。最终，幸存者闷闷不乐地撤回到港口。安东尼舰队损失了约5000人和一些船只。安东尼输掉了这场战争，尽管他和情妇带着很大一部分金钱逃走了。他的陆军指挥官普布利乌斯·卡尼迪乌斯企图率军离开，但官兵拒绝服从，而是与恺撒做了一笔很好的交易，向他投诚。舰队残部则与陆军一同投降。[45]

安东尼保住了性命，但不管有多少钱，都没有办法买新的陆海军来替代他受损的军队，也没有办法修补他受损的声誉。一位罗马贵族绝不能承认失败，也绝不能抛弃部下，自己和情妇一起逃命。恺撒手头有更紧迫的问题，所以不能直接去追击竞争对手。之前他让梅塞纳斯留下掌管意大利和罗马城。梅塞纳斯虽然只是个骑士，没有官职，也没有成为元老，但以精明的手段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现在有些服役期满的军团士兵向恺撒施加压力，要求立刻退役并得到恺撒曾向他们承诺的赏金与农场。曾为安东尼效力的士兵和恺撒自己的士兵一起，鼓噪着要求赏赐。监管大约40个军团的运动和部分士兵的退役，可不是一项简单的工

作。阿格里帕被派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恺撒本人在这一年年底前也去跟进。一方面，面对哗变或叛乱的威胁，他给出了慷慨的承诺。另一方面，他希望避免回到佩鲁西亚战争时期那种常常引发叛乱的动荡状态。在意大利不能通过没收来获取土地，这意味着他必须找到资金去收购土地。恺撒又一次去了东方，寻找充足的现金。[46]

现在很多曾支持安东尼的附庸统治者和社区都急于向恺撒表示忠心，他们热情地帮助他得到了资金。所有人都愿意用金钱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带着同样的想法与恺撒接触。虽然恺撒的宣传把她描绘为敌人，但她其实始终是罗马的忠实盟友，肯定会愿意为了他的利益而积极压榨自己的臣民，就像她曾为了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的利益而剥削民众那样。安东尼已经无药可救，不管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对他有怎样的感情。她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尽管她的家族和宫廷内斗不休、血雨腥风，并卷入了罗马持续发生的权力斗争中，但她还是安然无恙地活到了三十九岁。恺撒玩世不恭地鼓励她，而当他的军队开进埃及时，她可能还鼓动自己的部队向恺撒投诚。[47]

安东尼决定效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以及他那个年代的许多贵族，自行了断。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可能促成了他的死亡，但她的情夫自杀得很不利索，用太长的时间与她做最后一次精神上的团圆。女王还活了一个多星期，希望能够与恺撒达成协议。她躲在墓穴内，里面堆满了可以移动的财宝和易燃物，她可以威胁随时将其摧毁。恺撒的使者把她诱骗出来。我们不知道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当年访问罗马的时候，有没有和年轻的恺撒见过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他们唯一一次相遇就是这个时候。她向胜利者苦苦哀求。不同史料对这次谈话细节的记载是不同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竭尽全力去赢得他的怜悯和同情，穿得可怜兮兮但没有隐藏自己的美艳，并讲到她对尤利乌斯·恺撒的热爱，以及独裁官对她的挚爱。

但这都无济于事。在战前，恺撒的动员口号就是反对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所以现在不能留她了，也不能留她的孩子。恺撒需要她的财富来资助新的退伍军人安置计划。他也希望把她当成一件装饰性的战利品，在自己的凯旋式上展示。但很难说罗马平民看到一个女人在俘虏队伍中会做出什么反应。当初尤利乌斯·恺撒把十几岁的阿尔西诺伊放在自己埃及战役凯旋式的游行队伍里，群众对她表示同情。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或许他的确下令让她活下去，并且在发现她自杀后还唤来了医生和蛇毒专家。但死了的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几乎和活着时一样有价值，他可以在凯旋式游行里展示她的肖像，而不用担心群众会同情她。恺撒得到了她的财富，并将她的王国当作自己的私人产业，得到的收入也成为他个人的财产。[48]

恺撒里昂被他的教师出卖了。他的存在对恺撒来说很尴尬，于是恺撒里昂被处死了。安东尼的长子安提勒斯也被抓获并处死。恺撒里昂和安提勒斯都在仅仅几个月前经历了成人礼，所以算是成年人，这足以让他们必死无疑。安东尼的一些核心的罗马支持者自杀或被处死，但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政权更迭。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臣民将不得不缴纳沉重的赋税，但他们在她及其家族的统治下就一直是这样的苦命。祭司们赶来，表示如果罗马人允许他们在神庙上保留女王的肖像，就愿意给罗马人缴纳一笔钱。这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女王，而是不愿意因为拆除肖像而损坏神庙，他们也想积极地向新主人表示忠心。恺撒知道自己的希腊语水平不够，于是借助一名译员，向亚历山大港群众讲话。他的一生到目前为止都是不循常规的，也没有时间像西塞罗、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大多数贵族子弟那样练习演讲。[49]

前30年年末，恺撒三十三岁，已经成为罗马和整个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主人。

---

[1] *Res Gestae* 3（Loeb translation）.

[2] Suetonius，*Augustus* 17.1（Loeb translation）.

[3] 关于这个情节，见Velleius Paterculus 2.28.3-4，Appian，*BC* 5.123-6，Dio 49.11.1-12.4，讨论见R.Weigel，*Lepidus.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pp.88-92。

[4] Dio 49.17.1-18.7，50.1.4，Appian *BC* 5.127，133-44，Velleius Paterculus 2.79.5.

[5] Plutarch，*Antony* 37.

[6] 对此次战役的详细记述，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304-20；安东尼的损失，见Plutarch，*Antony* 49-51，Velleius Paterculus 2.82.3.Dio 49.31.1-3，with A.Sherwin-White，*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168 BC-AD 1* （1984），pp.320-21.Livy，*Pers* .130声称8000人行军穿过亚美尼亚时死于"风暴"，但没有给出伤亡总数字；安东尼险些自杀，见Plutarch，*Antony* 48；现代评论者倾向于对安东尼评价过高，例如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264，'it was a defeat，but not a rout or a disaster'. 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220-43更现实，并提到普鲁塔克认为此次远征的失败是安东尼一生的转折点。

[7] Appian，*BC* 5.130-31，*Res Gestae* 4 and 25声称3万名奴隶被归还给主人；屋大维舰队使用奴隶，见Suetonius，*Augustus* 16.1，Dio 47.17.4，48.49.1，49.1.5，最后一段暗示他们退役后得到了自由；恺撒得到的荣誉，见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40-42，及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40。

[8] 达契亚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和乌克兰的一小部分。达契亚人是色雷斯人的一支。前82～公元106年，此地存在一个一度非常强盛的达契亚王国，后被罗马征服。

[9] 这些战役的概况，见Appian，*Illyrian Wars* 16-29，Dio 49.34.2-38.1，43.8，with E.Gruen in *CAH2* X，pp.172-4，尤见M.Kos，*Appian and Illyricum* （2005），pp.393-471。

[10] Appian，*Illyrian Wars* 19-21，Suetonius，*Augustus* 20.

[11] Appian，*Illyrian Wars* 26，27，Suetonius，*Augustus* 20，24；安东尼对一个大队的十一抽杀，见Plutarch，*Antony* 39，Dio 49.26.1-27.1，with A.Sherwin-White，*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168 BC-AD 1* （1984），p.318。

[12] 以奥古斯都的姐姐小屋大维娅（安东尼的妻子）命名。

[13]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25-6.

[14] Dio 47.15.2-3，48.43.2，49.43.6-7，49.39.1，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257-67.

[15] 大希律王（约前74～前4年）是犹太国王，罗马的附庸。他以残暴著称，为了权位，曾下令杀害自己的家人与多位拉比。但他也是犹太历史上最著名的建设者，扩建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又称希律圣殿），修建了恺撒利亚的港口，建造了马萨达与希律宫的城墙。在《圣经·新约》中，他知道伯利恒有个君王诞生了，就派三智者先行，假意跟随朝拜。当三智者从另一方向离开后，他下令将伯利恒及其周围境内两岁及以下的所有婴儿杀死，而耶稣一家在其死后才回到拿撒勒。

[16]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252-3，326-31.

[17] Suetonius，*Augustus* 28.3，Pliny *NH* 36.121，讨论见N.Purcell in *CAH2* X，pp.782-9。

[18]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生涯，概况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M.Grant，*Cleopatra*（1972），J.Tyldesley，*Cleopatra.Last Queen of Egypt*（2009）；非常有洞察力的对她与尤利乌斯·恺撒关系的重新审视，见E.Gruen，‘Cleopatra in Rome.Fact and Fantasies’，in D.Braund & C.Gill（eds），*Myths*，*History and Culture in Republican Rome*：*Studies in honour of T.P.Wiseman*（2003），pp.257-74，她父亲与罗马的关系史，见M.Siani-Davies，‘Ptolemy XII Auletes and the Romans’，*Historia* 46（1997），pp.306-40；西塞罗提及她，见Cicero，*ad Att* .14.8，15.15，评论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234，可对照M.Grant，*Cleopatra*（1972），pp.95-7；阿尔西诺伊四世，见Strabo，*Geog* .14.6.6，with P.Green，*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1990），p.669，及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2010），pp.235-6；Ptolemy XIV之死，见Josephus，*AJ* 15.39，*Against Apion* 2.58，Porphyry，*Fragments of Greek Historians* 260。

[19] 阿尔西诺伊四世和另外一个潜在竞争者的死亡，见Josephus，*AJ* 15.89，Appian，*BC* 5.9，Dio 48.24.2；被 Lebanon传唤，见Plutarch，*Antony* 51，Dio 49.31.4。

[20] Plutarch，*Antony* 53-4，Appian，*BC* 5.95，138，Dio 49.33.3-4，with M.Grant，*Cleopatra*（1972），pp.150-53，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336，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265.

[21] 罗马女性一般需接受监护人（父亲、兄长、儿子或其他男性亲属等）的监督，财政由监护人控制。

[22] 屋大维继续在罗马代表安东尼处理事务，见Plutarch，*Antony* 54；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民官身份，见Dio 49.15.5-6，38.1，讨论见Pelling in *CAH2* X，pp.68-9，与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2002），pp.31-2；缓解没收土地造成的冲击，从而得到爱戴，见e.g.Virgil，*Eclogues* 1.40-47，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121-2。

[23] Plutarch，*Antony* 54，Dio 49.40.3-4，Velleius Paterculus 2.82.3-4，评论见M.Grant，*Cleopatra*（1972），pp.161-2，及Pelling in *CAH2* X，p.40。

[24] 米底是一个古国，在今天的伊朗西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一带，前7世纪到前6世纪一度很强盛。其居民为古伊朗民族。

[25] Plutarch，*Antony* 54，Dio 49.41.1-6，with Pelling in *CAH2* X，pp.40-41，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338-9，M.Grant，*Cleopatra*（1972），pp.162-75，J.Bingen，*Hellenistic Egypt*：*Monarchy*，*Society*，*Economy*，*Culture*（2007），pp.78-9，G.Hölbl，*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2001），pp.244-5；查禁安东尼自己的版本，见Dio 49.41.4。

[26] Horace，*Epodes* 9.11-16（Loeb translation）.

[27] 根据希腊神话，翁法勒是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一地区）女王。赫拉克勒斯因误伤人命，被迫作为奴隶侍奉翁法勒一年。翁法勒强迫赫拉克勒斯穿女人的衣服、做女人的活计。一年期满后，翁法勒与赫拉克勒斯结婚。

[28] Plutarch，*Comparison between Antony and Demetrius* 4，with M.Grant，*Cleopatra*（1972），p.188，及Pelling in *CAH2* X，p.43.关于Hercules and Omphale见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1988），pp.57-65，esp.58-60；魔药见Dio 49.34.1，Josephus，*AJ* 15.93。

[29] Suetonius，*Augustus* 69.2.

[30] 对宣传战的讨论，见K.Scott，'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1933），pp.7-49，esp.33-49，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335-49，Pelling in *CAH2* X，pp.40-48，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276-8。

[31] Suetonius，*Caesar* 52.2讲到盖乌斯·奥庇乌斯写了小册子，否认恺撒里昂是恺撒的儿子；安东尼指控恺撒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伊利里亚国王Cotiso，见Suetonius，*Augustus* 63.2。

[32] Plutarch，*Antony* 55-6，Dio 49.44.3，50.1.1-2.2.

[33] Dio 49.41.4，50.2.2-7，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2006），pp.252-3；三头同盟的结束见精彩的概括，Pelling in CAH2 X，pp.67-8。

[34] Velleius Paterculus 2.83.1-2，Pliny，*NH* 9.119-21，参见Horace，*Satires* 2.3.239-42，Valerius Maximus 9.1.2，Pliny，*NH* 9.122；Suetonius，*Caligula* 37.1，with B.Ullman，'Cleopatra's pearls'，*The Classical Journal* 52.5（Feb.1957），pp.193-201，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276-80，及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337-9；引文见Velleius Paterculus 2.83.3。

[35] 维斯塔贞女，或称护火贞女（Vestal Virgin），是古罗马炉灶和家庭女神维斯塔的女祭司。维斯塔贞女共六位，六岁至十岁开始侍奉，必须守贞、侍奉神祇至少三十年。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守护维斯塔神庙的炉灶，不让圣火浇熄。三十年期满退休后，她们会得到丰厚的退休金，可以结婚。与前维斯塔贞女结婚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且能获得不菲的嫁妆。

[36] Plutarch，*Antony* 58，Suetonius，*Augustus* 17.1，Dio 50.3.1-4.1，with J.Johnson，‘The authenticity and validity of Antony’s will’，*L’ Antiquit é Classique* 47（1978），pp.494-503.

[37] 今天土耳其西南部一地区。

[38] 1罗马尺合295.7毫米。

[39] 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72-7.

[40] 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后来退出政坛，著书立说，组织文学活动，扶助文学新人，安度晚年。

[41] Velleius Paterculus 2.86.3讲到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誓言，见*The Res Gestae of the Divine Augustus* 25.2-3，Suetonius，*Augustus* 17.2，讨论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57-68；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278，fn.3 声称300多名元老投奔了安东尼，Syme很有权威，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是事实，而非推测。

[42] Dio 50.4.1-6.1，Livy 1.32详细描述了屋大维恢复此种仪式之后的具体情况，另见J.Rich，*Declaring War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Period of Transmarine Expansion* （1976），pp.56-8，104-7。

[43] Dio 50.9.3，Plutarch，*Antony* 56，with 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259-60，及*CAH2* X，pp.52，55，M.Grant，*Cleopatra* （1972），pp.197-8，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294-5。

[44] 作战的概况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360-64；‘sit on aladle’，见Plutarch，*Antony* 62，with 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271-2；逃兵见Plutarch，*Antony 59* ，63，Velleius Paterculus 2.84.2，Dio 50.13.6，14.3，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72-3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296。

[45] 此次战役见Plutarch，*Antony* 64-6，68，Dio 50.14.4-35.6，with J.Carter，*The Battle of Actium*：*The Rise and Triumph of Augustus Caesar* （1970），pp.203-13，S.Sheppard，*Actium*：*Downfall of Antony and Cleopatra* . Osprey Campaign Series 211（2009），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74-5，380-82，M.Grant，*Cleopatra* （1972），pp.206-15，及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278-89，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364-9，D.Harrington，'The Battle ofActium-a study in historiography'，*Ancient World* 9.1-2（1984），pp.59-64，及C.Lange，'The Battle of Actium：A reconsideration'，*Classical Quarterly* 61.2（2011），pp.608-23，后者认为有些学者说此次战役不激烈，是错误的；安东尼军队的投降，见Plutarch，*Antony* 68，Dio 51.1.4-3.1，Velleius Paterculus 2.85.5-6，with 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34-6。

[46] Dio 51.3.1-4.8，Pelling in *CAH2* X，pp.61-2.

[47] Dio 51.6.4-8.7，Plutarch，*Antony* 72-3，with 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297-300；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协助恺撒入侵，见Dio 51.10.4-5，Plutarch，*Antony* 76；见M.Grant，*Cleopatra* （1972），pp.222-3怀疑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背叛安东尼，而认为她的投降是形势所迫。

[48] 概况见A.Goldsworthy，*Antony and Cleopatra* （2010），pp.376-87，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与恺撒的会面，见Dio 51.11.3，5-13，Plutarch，*Antony* 82-3，with 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313-16，Florus 2.21.9-10；她的死亡，见Strabo，*Geog* .17.1.10，Dio 51.13.4-14.6，Plutarch，*Antony* 84-6，with C.Pelling，*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pp.316-22，Velleius Paterculus 2.87.1；另见M.Grant，*Cleopatra* （1972），pp.224-8，J.Tyldesley，*Cleopatra.Last Queen of Egypt* （2009），pp.189-95，E.Rice，*Cleopatra* （1999），pp.86-91，P.Green，*Alexander to Actium* （1990），pp.679-82，及G.Hölbl（trans.T.Saavedra），*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2001），pp.248-9；阿尔西诺伊在尤利乌斯·恺撒的凯旋式，Dio 53.19.1-20.4，Appian，*BC* 2.101。

[49] Dio 51.15.5-6，Plutarch，*Antony* 81.狄奥说恺撒是用希腊语演讲的，但他可能忽视了恺撒借用一名本土演说家的可能性。

十一 凯旋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死让国家没了防备；塞克斯图斯·庞培在西西里岛被打垮；李必达被抛到一边；安东尼丢了性命。就连尤利乌斯一党也只剩下恺撒这么一个领袖。

——塔西佗，2世纪初 [1]

无论在海洋还是陆地，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我都在全世界南征北战。胜利的时候，我总是饶恕那些恳求宽恕的人……我两次庆祝小凯旋式，三次庆祝凯旋式，二十一次被称颂为凯旋将军。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 [2]

听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死讯之后，诗人贺拉斯歌唱道："现在，开始饮酒吧！现在，让我们用脱去了镣铐的脚，跺一跺大地！我的朋友们，是时候了，让我们为诸神摆开战神祭司也会满意的盛宴！"就在不久前，女王曾威胁意大利："完全失控的女人，胜利的甜酒让她酩酊大醉，她什么都想要。"好在她的胜利很短暂，她从亚克兴角熊熊燃烧的舰队逃走，"逃离意大利，而恺撒追击她……就像鹰追击一只温顺的鸽子，或一位敏捷的猎手追击一只兔子……"但女王"在刀剑面前没有表现出女性的畏惧……她意志坚韧，以冷静的面容凝视自己毁坏的宫殿，还有勇气拿起牙齿锋利的毒蛇，让自己的身体饮下它们的黑色毒液……她绝不愿意被夺走王权，被押走，去面对凯旋式上讥笑的人群：她可不是卑贱的女人"。[3]

曾经令人畏惧的敌人在失败和死亡之后，也比较容易得到仰慕了，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和尊严为恺撒的胜利增添了光辉。但真正重要的、给诗人带来如此喜悦的，不是她的自杀，而是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其他诗篇中，贺拉斯曾写到安东尼成为埃及女王的"奴婢"，贺拉斯和其他人也都知道这是一场新的内战。在亚克兴角，被抛

弃在燃烧战船上死去的大多数人都是罗马人。战争的公开敌人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诗人们和其他人一样，都一次又一次说到安东尼的“东方盟友”，但他们没有隐藏事实，即真正领导敌人的是安东尼。这是又一场内战，尽管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正如维吉尔在几年后清楚地写道：

> 在一边，奥古斯都·恺撒屹立在高耸的船首，领导意大利人去战斗，和元老院与人民、家庭与国家的神祇在一起……他父亲的星辰在他头顶上熠熠生光……在另一边，安东尼带着野蛮的强力……统领着埃及和东方的力量……跟着他的，是——哦，多么可耻！——他的埃及妻子……在当中，女王用他们本族的叉铃（埃及伊西斯[4]女神的崇拜仪式上使用的一种嘎嘎作响的神圣乐器）呼唤她的大军……形态各异的恐怖神祇和吠叫的阿努比斯挥动兵器，与尼普顿、维纳斯和密涅瓦厮杀。[5]

亚克兴角的胜利是意大利团结一心的美德与传统的胜利，得到了正义神祇的佑助，领导者则是神圣尤利乌斯的儿子。敌人是牛鬼蛇神的东方力量，以及他们奇形怪状的神祇。其中特别讲到豺首的阿努比斯（冥界之神），尽管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的希腊祖先对这些古老的崇拜仪式并不感兴趣。正义的一方赢得了一场压倒性的、必需的胜利，非常光荣，因为它带来了和平的希望。[6]

维吉尔、贺拉斯和其他诗人看够了只能导致人民被屠杀、土地与财产被偷窃的内战。在前29年发表的诗集《歌集》（不过写作时间是之前恺撒和安东尼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期）中，贺拉斯表达了对一场罗马人之间兄弟相残的新斗争的恐惧：“何方，在这邪恶的疯狂中，你要奔向何方？你为何拔出刚刚入鞘的剑？在陆地和海洋流的拉丁人的鲜血，难道还少吗？不是为了让罗马人烧毁充满嫉妒的迦太基的傲慢要塞，也不是为了让长久以来我们触手不及的布立吞人[7]身披枷锁地走下圣道，而是让帕提亚人的祈祷成真：这座城市将自己毁掉自己？”[8]

大约在同一时间，贺拉斯哀叹道：“又一代人被内战击垮，这座城市被自己的力量压垮！”无论是意大利敌人、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军还

是汉尼拔的迦太基军队，都不曾战胜罗马，但它“如今将被我们自己摧毁，我们这渎神的一代，血统被诅咒的一代”。虽然发出了这样严正的警告，诗人在结尾时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并呼唤所有意大利人加入这场战争。[9]

贺拉斯这样的人渴望和平，但并非为了和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对罗马人来说，真正的和平只能从胜利中来，最理想的状况是彻底的胜利，将来不必再与同一个敌人交战。尤利乌斯·恺撒喜悦地写道，他“平定”了他在高卢征服的各部落。战争应当以绝对胜利结束，由罗马人来决定和平条件，而不是用妥协和让步换取和平。同样的态度在罗马人的内战中也起到了作用，所以内战几乎没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尤其是无法长期解决。贺拉斯曾参加腓立比战役并逃跑，因此比较了解真实的战争。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服从自己发出的呼唤，参加亚克兴角战役。他说自己和恩主梅塞纳斯一起待在一艘战船上，但我们不确定梅塞纳斯有没有离开意大利海岸，所以我们很难知道贺拉斯是否真正加入了舰队，去满足他的愿望——用一场胜利来终结内战。[10]

诗人们反映了几乎是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愿望，即在漫长岁月的动荡与暴力之后，重返和平与稳定的状态。在这些冲突中，意识形态的作用甚微。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自称为自由而战，但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同时代的其他军阀没什么区别。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失败了，丢了性命。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最后一批密谋者作为安东尼的党羽死去，为一位巨头效力，去反对另一位。如此戏剧性的阵营转换在从上到下的所有阶层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在绝大多数人只希望能够活下去，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人们记得，年轻的恺撒在腓立比战役或佩鲁西亚战争之后，是多么冷酷无情地处死战俘。但真相是，得到宽恕的人比被处死的人多得多。后来有人说，他的很多最亲密朋友和盟友都曾追随安东尼而反对他，但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或之后倒戈。[11]

密谋者所谓的“自由”，即便对那些希望享有它的贵族们，也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帝国时期的元老，如历史学家塔西佗，将会复苏这种“自由”的观念，视其为一个浪漫的幻梦。但这些人对前几个世纪“自由”政治的怀旧也没有妨碍他们接受现实。至少塔西佗对“自由”共和国最后几十年的凶残暴力没有多少幻想。在前30年，没有什么人会对共和国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太多人由于选择了错误阵营，或者因为没有选择任何阵营，而丢掉性命。[12]

自同盟者战争和随后苏拉进军罗马以来，共和国深陷暴力与混乱之中。在世的人们对这些事件还记忆犹新，而在恺撒自己的一生中，暴力冲突变得愈发残忍和漫长。没有人记得政治不受暴力威胁或实际暴力影响的时期。我们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豪门贵族，他们的损失之大，令人震惊，但长期充实元老院的那些地位较低的家族同样损失惨重。如此之多的冲突和死亡摧毁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打乱了旧的友谊和联盟关系，甚至遏制了贵族本能的野心。元老和其他人一样，最渴望的是和平。

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安东尼的死讯。主持此次会议的是补任执政官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他是那位著名演说家的儿子，与父亲同名，曾在法萨卢斯的庞培军中反对尤利乌斯·恺撒；在腓立比战役中支持布鲁图斯，反对三头同盟；后来又加入了塞克斯图斯·庞培阵营。前39年，被镇压的人获得大赦，他才返回罗马，后来得到了恺撒的恩宠。前30年的两名执政官辞职时，他被任命为补任执政官。他只有三十五岁，但在这些年里，年龄资格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一年的另外一位执政官是同样年轻的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也就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盟友克拉苏（他于前53年在卡莱惨败）的孙子。就在前不久，这位小克拉苏还是安东尼的支持者，但后来成功地改投恺撒门下。他和小西塞罗后来都当上了行省总督，小克拉苏在马其顿总督任上打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战役。旧日豪门的名字又开始浮现，但要说一切恢复原样，还为时尚

早。恺撒在前30年第四次担任执政官，前29年第五次担任执政官。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西塞罗恰恰在这次会议上，听到了那个曾下令处死他父亲的人自杀的消息。当初，恺撒同意安东尼处死演说家西塞罗的决定，但大家一般认为安东尼是杀害西塞罗的幕后指使，而且肯定是他命令将演说家的首级和手割下来公开展示。亚克兴角大捷的喜讯促使元老院授予恺撒一次凯旋式，现在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死讯以及占领埃及的捷报推动他们授予恺撒又一次凯旋式。胜利者本人此时不在罗马，凯旋式只是他获得的大量荣誉中的一部分。安东尼战船的冲角被树立在广场的几个关键地点，作为战利品；还将建造一座拱顶，以纪念恺撒的胜利；此外还设立了几个新的节日。罗马的所有神职人员和维斯塔贞女的祈祷中都必须为恺撒祈福，即便是私人用餐时也要以他的名义奠酒。奠酒的命令肯定是不可能强制执行的，但仍然很快成为根深蒂固的习俗，这又一次说明人们是多么望眼欲穿地渴望和平，并希望恺撒能给人们带来和平。[13]

元老院还投票表决，授予胜利者新的权力，包括某些形式的司法权责。恺撒谢绝了授予他的一些荣誉。据说他最喜爱前29年1月11日举行的一次仪式。这次仪式与广场上的雅努斯·格米努斯神庙有关，这座神庙很小，形似拱顶。古老的门神雅努斯·格米努斯有两张脸，一张往前看，另一张向后看，被认为与事情的开端有关联，所以在每年的1月，人们常向他祷告。神庙的狭窄两端有青铜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就打开门。因为罗马人几乎总是在某地与某人交战，所以神庙的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

现在，元老院命令举行一场仪式，正式将神庙的青铜门关闭，以象征恺撒的胜利终于恢复了和平。元老们宣布，将举行一种叫作平安占卜的仪式，不过仪式的时间可能是前28年。此种仪式仅在和平时间举行，旨在从诸神那里寻求吉兆，表明此时适合为罗马人民的安全祈福。关门

仪式和平安占卜仪式，和向埃及宣战时的仪式一样，都很古老，或许根本就是当时的人捏造的，至少仪式的细节是当时发明出来的。但它们让大家觉得自己与遥远的过去，与罗马繁荣昌盛、胜利不曾被内战玷污的时代，有着关联。[14]

元老们和绝大多数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所以他们在命令举行上述仪式时，刻意忽略了高卢和西班牙尚未熄灭的战火。虽然元老院向恺撒授予的大量荣誉有很大的阿谀奉承成分，就像元老院当年向尤利乌斯·恺撒泼洒荣誉一样，但人们真诚地渴望稳定的生活。在前29年，一个人拥有绝对权力的概念已经不像差不多二十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击败庞培时那样让人震惊了。二十年前，许多贵族觉得尤利乌斯·恺撒的独裁是不堪忍受的。尤利乌斯·恺撒于前45年在西班牙取得最终胜利之后建立的和平很短命。前40年和前36年的充满和平期望的时期也转瞬即逝。如果对稳定的渴望比过去要强烈，那么人们也更清楚地知道，稳定仍然可能是短暂的。一切都取决于年轻的恺撒，取决于他打算做什么。目前他还留在东方，直到前29年夏末才返回意大利。元老们和其他人能够做的只有等待，并心怀希望。

胜利者

现在，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年轻的恺撒如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到目前为止，我们追踪了他的政治生涯，目睹了他的崛起。从一开始，他的雄心壮志就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政治才干以及相当程度的好运气（罗马人认为好运气对任何成功者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夸张地认为他具有完美的政治实用主义精神，或者假定他始终是他后来成为的那位伟大的、成功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很早就被确定下来，就大错特错了。恺撒犯过错误，但也表现出愿意吸取教训的精神。在研究古典世界时，我们总是更容易看到人物做了什么，而较难理解他的内心思考和性格。

我们可以瞥见在政治家外表之后隐藏的那个真实的人，最有意思的肯定是他与李维娅非常不体面的仓促结婚。这显露出了一个迅速崛起到崇高位置、手握极大权力的年轻人的急躁。但这段婚姻维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他的漫长生命落幕。在某个时间，最可能是前30年代，李维娅怀孕了。孩子胎死腹中，可能分娩也特别困难或有着不同寻常的危险。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对夫妇没有再生孩子。她很可能再也没有怀孕过。有传闻称，恺撒与其他女人有过很多婚外情，其中一些女人据说还是他的妻子选来送给他的，这也许说明他的全部或大部分肉体愉悦都是从其他女人那里寻得的。罗马元老往往会结好几次婚，如果妻子对他们不再有价值，就可能与其离婚。恺撒没有与李维娅离婚，但并没有政治上的因素迫使他与她保持夫妻关系。她的家庭背景很好，却没有强大到如果离婚就会对他不利的程度，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女人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婚姻生活维持了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持续着深深的爱意，以及互相尊重和依赖。恺撒并非仅仅看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我们在探究他的其他家庭成员时必须牢记这一点。[15]

他表现出了另一种类型的激情。在镇压政敌、腓立比战役与佩鲁西亚战争胜利的时期，他显然非常热衷于发布死刑命令。恺撒知道自己常常大发雷霆、做出严酷的裁决。他的教师之一——来自希腊的修辞学教师阿提诺多罗斯——给了他这样的建议：“发怒的时候，在说话之前，先背诵一遍字母表。”据说在恺撒大发脾气的时候，差不多只有梅塞纳斯一个人能够安抚他的情绪。狄奥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有一次梅塞纳斯来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主持朝政；梅塞纳斯看到恺撒正打算把一大批人判处死刑，于是努力在围观者中挤出一条路，走到恺撒身边。但梅塞纳斯挤不过去，于是在一块木板上写道：“刽子手，请站起来！”

他将木板扔到恺撒怀里，促使他立刻结束了工作，没有做出任何判决。狄奥告诉我们，恺撒对梅塞纳斯非常感激，因为梅塞纳斯坦率地指出，怒气会让他犯错误。这个故事发生在恺撒政治生涯的早期。在打败

了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安东尼之后，恺撒就更愿意效仿尤利乌斯·恺撒的仁慈，去宽恕敌人。这或许说明他在慢慢成熟，不过目前还没有人知道这种变化是不是永久性的。[16]

年轻的恺撒虽然迅速地在血雨腥风中崛起为最高统治者，但在很多方面，他还是他那个阶层的典型分子。有些学者喜欢把他视为外省士绅的情感与元老精英集团品位的混合体，但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猜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往往很难了解到元老院之外任何人的道德、精神和政治立场。很显然，恺撒有着罗马精英集团大部分人的那种文学兴趣，他自己也写诗（有时是非常淫荡的诗），并广泛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17]

在前30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恺撒定期与阿提库斯（西塞罗的同学和终生好友）通信。阿提库斯去世不久之后发表的一部传记声称，即便恺撒与阿提库斯两人都在罗马，如果恺撒不能亲自拜访阿提库斯，也几乎天天给他写信，“有时询问古代史的问题，有时向他请教诗歌中比较难懂的段落，有时开玩笑地尝试诱导他写更长的信”。这些话题在贵族的交流中都是常见的。阿提库斯没有从政，而且始终是个骑士，没有获得元老身份，但他非常富有，而且人脉比很多元老都更强大，他与当时政坛的几乎所有关键人物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就是由于逃避政治，他才在几十年的动荡中幸存下来。在前2世纪和前1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中，像他这样明哲保身、躲过血雨腥风的人并不多见。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曾定期给阿提库斯写信，布鲁图斯也是。他与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很亲近，在前44～前43年安东尼被谴责时，他还保护了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后来，三头同盟镇压政敌期间，心存感激的安东尼庇护了阿提库斯，也与他通信。阿提库斯地位巩固，受到广泛仰慕，与他结交无疑是一种微妙的地位象征，但这并不是说恺撒与他的友谊不真诚。阿格里帕娶了阿提库斯的女儿，这肯定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也表明了阿提库斯与恺撒的亲密关系。阿格里帕夫妇生了一个女

儿维普撒尼娅，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许配给了李维娅的长子提比略。[18]

阿提库斯写了好几部书，其中有一部赞颂了西塞罗前63年当执政官的事迹，但最有名的是他的《编年志》，这是一部编年史，主要是讲罗马历史。他对遥远的过去，体制、仪式与风俗的起源，以及古人的成就，都兴趣盎然。他和西塞罗常对自己同时代人的无知感到震惊，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祖先的政治生涯和官职都一头雾水。这个时期，爱好历史是很常见的，既是为了历史本身，也是为了逃避前1世纪的风云动荡。这些年里研究历史最勤奋的学者是博学之士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不过和阿提库斯的作品一样，瓦罗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保存到今天。直到前3世纪和前2世纪之交，罗马人才开始编纂史书，虽然对更早的时期也有一些文献记载，但这些资料往往非常混乱和残缺不全。所以，尤利乌斯·恺撒穿上阿尔巴朗格古代国王的长袖上衣和靴子时，没有人知道这种风格究竟有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19]

他的继承人似乎从幼年便对罗马的传统有着浓厚兴趣。对历史的兴趣能够帮助他赢得阿提库斯的友谊，以及其他很多志同道合的贵族的好感，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恺撒对历史的兴趣是不真诚的。在政治上，这非常有利，不过我们很难说得清，诸如复兴国务祭司长矛仪式这样的事情，是出于他的历史兴趣和真诚的热情，还是因为这些事情是很有价值的象征，他对这方面的兴趣使其更容易利用这些象征。阿提库斯建议了另外一种表现自己尊重传统的方式：修缮“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的神庙。年轻的军阀亲自去了这座倾颓半壁的建筑，视察了存放在那里的遗迹，其中有些据说有数百年历史。[20]

阿提库斯于前32年在罗马去世，没有活着看到内战的结束。他病得很重，决定绝食自杀，享年七十七岁。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在恺撒和安东尼之间做出选择，不过凭借他的年高德劭，以及处理类似事情的惯常本领，他一定能在内战中生存下来，并且仍然保留胜利者的好感，而不至

于失去幸存的失败者的友谊。阿格里帕在他临终前拜访了他，尽管他的葬礼很简朴，但所有的贵人都到场了。我们不知道恺撒有没有参加葬礼，这个时期他完全可能在罗马。[21]

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代表着恺撒性格中比较柔和的一面，不过这一面也可以转化为政治优势。但从这方面，我们无法推测他最终返回罗马后可能做些什么。目前，他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到前30年，恺撒指挥着大约60个军团，比尤利乌斯·恺撒在其权力巅峰时还要多。在近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为所欲为，所以元老院和所有人都赞颂他，并希冀和平。人们为他做的祈福和献祭很可能是真心实意的。他原本就体弱多病，假如他被疾病夺去生命，那么就有新的领袖登场并互相争斗以填补权力真空，结果必然是出现更多混乱。不管大家是否喜欢恺撒，所有人都知道未来取决于他，于是他们等待他回来揭示他的大政方针。

归来

人们等了很久。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自杀的整整一年之后，恺撒才返回意大利。之前他在埃及逗留了几个月，因为那里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他急需资金，亚克兴角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驻扎在意大利的一些军团的骚动更突出了金钱的重要性。恺撒打算向他自己的士兵，以及向他投诚的安东尼士兵分配之前承诺的农场，而不至于给意大利各社区带来很大困难。他尽可能地收购土地，即便是没收土地，也会给前主人一些补偿金或新的土地（通常在外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大量金钱。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希望逃脱或者与恺撒达成交易的时候，疯狂聚集了埃及王国的财富。现在这些财富都落入恺撒手中，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还需要从各社区压榨更多金钱。

埃及土地特别肥沃，农业产出丰盛，而且位于好几条贸易路线上，因此非常富庶。这一切早就令罗马人垂涎三尺，仅仅由于政客们彼此嫉

妒，不愿意让任何一个竞争对手从中获利，埃及才没有被吞并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恺撒至高无上的地位除去了这个障碍，于是埃及正式成为罗马海外帝国的一部分。3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将驻扎在埃及，不过自前58年以来几乎一直有罗马军队在埃及，所以这不算什么大变化。不过，设立一位罗马总督是新鲜事，恺撒离开之后，总督将代替他行使全部军政大权，接管托勒密王朝的行政体系。

首任总督是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他在攻击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伽卢斯颇有文墨，享有诗人的美名，并且与西塞罗和阿提库斯都很友好。他可能只有三十出头，不过在那个雄心青年叱咤风云的时代，这也不算稀罕。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是一名骑士，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被吸纳进元老院（此时元老院已经大大扩充）以奖励他的忠诚。后来接替他的所有埃及总督都是骑士，恺撒还正式禁止任何元老涉足埃及。我们很难说，是因为恺撒从一开始就打算只派骑士当埃及总督，还是因为伽卢斯的忠诚和才干比他的地位更重要。恺撒在埃及拥有相当多的私人地产，但要说埃及是唯一一个成为他私产的行省，就有些夸大其词了。在其他行省也有属于他的地产。[22]

后来，伽卢斯的部下被派去镇压底比斯（古老的上埃及王国[23]）的叛乱。叛乱的原因可能是埃及人对托勒密王朝还有一些残存的忠诚，或者怨恨新来的征服者，或者不满罗马人强征的赋税徭役，或者所有这些原因混合起来。叛乱很快被平定下去。但在开始这些军事行动之前，恺撒还派遣他的士兵去维修和改良灌溉系统，这些设施帮助人们控制一年一度的河水泛滥，以便尽可能地利用尼罗河的馈赠。托勒密王朝在其鼎盛时期曾花费很大力气去管理这些运河和排水沟，但后来王族因为争夺王位的内乱而耗尽了力量，于是灌溉系统被遗忘了。有现代学者说，在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下，埃及繁荣昌盛。这忽视了她统治期内漫长的混乱和动荡。显然很多水利工程要由恺撒的士兵来承担。他这么做的

目的不是无私的。恺撒希望新行省提供稳定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成为罗马的永久性财产。[24]

恺撒在埃及的时光并非纯粹用于工作。他参观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寝，并对此事大肆宣传。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和送葬队伍在前往家园马其顿的途中被托勒密一世拦截，并带到了埃及。遗体最终被停放在亚历山大港的一座宏伟陵墓内。棺材原先是黄金的，后来托勒密王朝的一位囊中羞涩的国王将黄金棺材熔化，换成了水晶。[25]

到目前为止，亚历山大是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的年代里最伟大的英雄。庞培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罗马的亚历山大，而据说青年时代的尤利乌斯·恺撒在看到这位伟大征服者的半身像时不禁潸然泪下，因为马其顿国王在同样的年龄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而他却还没有什么成就。亚历山大与恺撒的共同点——青春年少、难以抑制的充沛精力和奇迹般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很多恺撒雕像的头发也被做成马其顿国王那种风格，绝非巧合。他打算瞻仰伟大征服者的遗骸，将其带出陵墓，用鲜花装饰遗体，并为其戴上一顶金冠。他可能太激动了，以至于伸手触摸亚历山大遗体的面部时，不小心把鼻子的一部分撕了下来。[26]

恺撒触摸到了过去，虽然用力过猛，却让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精神。亚历山大曾在急躁之下挥剑砍断戈耳狄俄斯之结[27]。恺撒自己的豪华陵墓正在罗马城正式边界之外的战神广场施工。规模宏伟的陵墓，以及他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亚历山大联系起来，说明他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还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权力。恺撒在亚历山大港的时候还命令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安葬在她已经准备好的墓穴内。他的这个姿态很慷慨，但同时也是在提醒大家，安东尼是个忘记了爱国的罗马人，竟然想要和自己的外国情妇一起葬在国外。罗马元老院在向恺撒授予大量荣誉的同时，也拆毁了安东尼的雕像和纪念碑，甚至命令他们家族的人不准再用马克·安东尼这个名字。这倒不是为了将安东尼从历史中铲除，而

是为了确保他的可耻被永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28]

恺撒离开埃及之后，去了叙利亚。就像上一次短暂到访叙利亚一样，他发现自己必须确认地中海东部行政管理的安排。在那里和在罗马与意大利一样，当地统治者和社区都希望得到稳定安宁，毕竟他们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帕提亚入侵，还被迫为罗马的内战出钱出力。一些附庸统治者被替换，一些社区获得了一部分特权，一些社区失去了一部分特权。这句简单的概括掩盖了漫长而艰难的一轮又一轮请愿、代表团拜访和会议，以及恺撒拿定主意后宣布自己决定的过程。他的慷慨大方鼓励人们向他效忠。在过去，该地区的人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得不支持安东尼，还有他之前的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其他人。[29]

腓立比战役之后，安东尼写信给犹太祭司长和国王赫卡努斯二世，告诉他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没有合法权力，他们的残暴冒犯了诸神，而他们的失败给了他（安东尼）机会，“让我们的盟友也享有神赋予我们的和平；由于我们的胜利，亚细亚的身躯从一次重病中逐渐恢复了”。恺撒此时也在贯彻同样的安定精神。战争已经结束，正义的一方获胜了，那些曾为恺撒作战的社区将得到特别的奖赏。就像对历史上曾经的征服者一样，各社区也热忱地膜拜罗马领袖本人，以表达自己的忠诚。以弗所[30]和尼西亚[31]被允许建造供奉神圣尤利乌斯和罗马女神的神庙。罗马公民被命令只能崇拜这些神祇，但外省居民被允许将恺撒本人奉若神明。亚细亚行省的帕加马和比提尼亚行省的尼科米底亚建造了大型神龛。罗马公民和外省居民在是否奉皇帝为神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将会持续几个世纪。[32]

总的来讲，保持原样、尽可能少地改变现状、确认大多数附庸统治者的权力，是更简单也更务实的做法。这种做法很可能赢得急于被新政权接受的人的感激。长远来看，这些地区需要稳定，这样才能恢复元气，再一次为罗马人带来利益。在短期内，和在埃及一样，叙利亚的统

治者和各城市也都急于讨得恺撒的欢心，于是热情洋溢地向他奉上礼物，所以他原本就非常强势的财政地位变得更加稳固了。一年前恺撒还囊中羞涩、急缺资金，现在却享有数额巨大的盈余。他返回罗马之后，罗马的利率猛跌，据狄奥说从12%下降到了4%，因为他给罗马经济注入了大量现金。[33]

犹太的大希律王为赢得恺撒的永久支持做了很大努力，我们对此比较了解。他向恺撒求救，在恺撒入侵埃及之前被确认为犹太国王。在入侵埃及期间，大希律王又一次来到恺撒身边，为他带来军队需要的给养和资金。恺撒离开埃及前，大希律王又一次拜访恺撒，并奉上更多的礼物。之前安东尼把大希律王的一些土地夺走，送给了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恺撒如今将这些土地物归原主。女王的卫队（数百名高卢人）也是安东尼的礼物，如今也被恺撒赠给犹太国王。但大希律王仍然非常紧张，并且越来越偏执。他在第一次心惊胆战地拜见恺撒之前，将自己的妻子米利暗（赫卡努斯二世的外孙女，所以是真正的犹太王族血脉[34]，而大希律王是以东[35]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及其母亲送到一座要塞，让她们在那里等他回来。这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她们，但他留了命令，如果他未能赢得恺撒的欢心、未能返回，就将他的妻子杀死。他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非常憎恨他的妻子和岳母，这两派女人互相之间的恨意显而易见，不共戴天。他把母亲和妹妹送到了马萨达[36]的一座要塞。

大希律王成功返回了，但他的妻子得知他曾秘密命令处死自己的事情之后，非常恼怒。大希律王希望妻子这样思考：他对她无比挚爱，不能容忍其他男人占有他，所以在自己保不住性命的情况下要把她杀死。但她可不会这么想。几年前，她的兄弟“意外”溺死，大希律王被怀疑是凶手，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早就高度紧张了，很快就恶化。他指控某些人要毒死他，最终他的岳母也加入反对女婿的阴谋中，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女儿注定要被他害死。米利暗于前29年被处决。大约在前30年，大希律王还处死了她的祖父，即年迈的赫卡努斯二世。尽管赫卡努斯二世早

就被残害得肢体残缺，不能担任祭司或国王，大希律王还是觉得他对自己是个威胁。这位老人曾经作为俘虏被帕提亚人关押了一些年。大希律王指控他与帕提亚帝国私通，将他判处死刑。[37]

让恺撒长舒一口气的是，帕提亚人目前忙于内战，王室成员在争夺权力，因此，罗马的东方各行省没有被入侵的危险。贺拉斯等诗人鼓吹为在卡莱和安东尼的惨败中丧生的罗马人和珍贵的军旗复仇，但恺撒还不打算满足这样的要求。入侵帕提亚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大业。即使一切顺利，也要很多年才能胜利，而一旦遇到挫折，他的声誉就会就像安东尼那样受损。更重要的是，东方各行省有没有充分地恢复元气，能不能为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提供资金、给养和支持，都是值得怀疑的。而且恺撒不急于长时间远离罗马，去进行如此艰难的冒险。他允许帕提亚国王的一位被打败的兄弟居住在叙利亚。与此同时，他正式向帕提亚内战的胜利者——国王弗拉特斯四世——保证罗马的和平意图。弗拉特斯四世将自己众多儿子中的一个送到罗马当人质。恺撒这次外交上的成功被赞颂为伟大的胜利。[38]

东方各行省暂时得到了平定和安宁，恺撒也收到了埃及和其他行省与王国的大宗赋税，因此富得流油，于是在前29年夏季开始返回意大利，途中游览了希腊。在意大利，他受到了群众欣喜若狂的欢迎，他的慷慨大方也有助于赢得人们的好感。意大利各社区为他送上赠予胜利者的传统金冠，不过这种赠礼只是名义上的，惯常的做法是赠送价值相当的黄金。他原先的巨额债务早已偿清，开销也得到支付，还剩下一大笔盈余。于是恺撒宣布他不会接受金冠。元老院命令所有阶层的人和所有祭司，包括维斯塔贞女，都出城迎接他。他也拒绝了这种礼遇。他说，灶神庙的圣火不应当无人照管，于是维斯塔贞女留在城内。虽然政府并没有正式下令，但所有的主要宗教崇拜团体和许多个人都举行了公共献祭，感谢诸神保佑他安全归来。一大群人自发地等待着，为他欢呼。[39]

欢迎的人群并没有被挡在远处，也并非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接近恺撒。接近得胜军阀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的胳膊上站着一只渡鸦，他训练这只渡鸦喊道：“恺撒万岁，胜利的统帅！”恺撒大为赞许，心花怒放，于是花5000迪纳厄斯买了这只鸟。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原来他是刚才那个驯鸟师的生意伙伴，他自己没有得到赏金，非常不满。他说还有第二只会说话的鸟，于是很快带着另一只渡鸦来了。这只渡鸦非常不知趣地喊道：“安东尼万岁，胜利的统帅！”恺撒感觉很好玩，并没有生气，命令第一个人与他的伙伴分享5000迪纳厄斯。毫无疑问，假如是安东尼凯旋，也一定会有欢呼雀跃的人群迎接他。最让人高兴的是，内战终于结束了，人们有希望过上长久的和平生活。胜利者如此慷慨大方的消息促使一些人送来了一只受过训练、会说同样的话的喜鹊，恺撒也把它买下了。一个贫穷的鞋匠得到灵感，又弄来一只渡鸦，尝试训练它。他的努力失败了，不过这只鸟后来学会了他气急败坏的呼喊：“我的所有辛苦，所有钱，都白费了！”据说，从一大群急于吸引他注意力的群众当中，恺撒听到了这只鸟的嘶哑声音。他被逗乐了，于是用高于5000迪纳厄斯的价格买下了它。[40]

前29年8月13日，年轻的恺撒终于庆祝了他早在前34年凭借征讨伊利里亚人的战功而获得的凯旋式。次日他举行了第二次凯旋式，这一次是纪念亚克兴角大捷，展示了从敌船船首取下的冲角，以及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不寻常的武器、俘虏，还有载着描绘战争场景图画的游行花车。游行非常恢宏壮观，接连两天慷慨地展示了来自埃及的战利品。8月15日，举行了第三次凯旋式，这一次是为了庆祝征服埃及，无疑是最壮美的一次。托勒密王朝以奢靡著称，他们的典礼和游行非常复杂，神话般奢华，所有的东西都是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制成，镶嵌宝石，悬挂着来自远东的丝绸。现在，所有这些华美的物件全都被展示在罗马街头。最后一天凯旋式的战利品包括双胞胎亚历山大·赫利俄斯和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他们只有十多岁。他们母亲的肖像被做成假人展示，还出现在至少一幅图画中，描绘了她手里拿着毒蛇准备自尽的场景。三天

里，有另外七位国王或王子被押过市中心，包括加拉太统治者和安东尼的其他盟友。其中有些人被处决，但大多数都被饶恕了。[41]

恺撒本人似乎只参加了第三场凯旋式，而且直到那时才进城。他乘坐一辆战车走过圣道，身穿凯旋将军的紫红袍服，面孔被涂成红色。按照常规，拉车的是四匹骏马。最左侧的马上坐着李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克劳狄·尼禄，而右侧的马（根据罗马风俗，右侧比左侧的位置更尊贵）上坐着屋大维娅的儿子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两个男孩都大约十一岁。凯旋将军的儿子和亲属参加游行是很常见的，所以这个姿态并没有皇朝主宰天下的意思。跟随战车的不仅有参加了这些战役的元老（这是惯例），还包括恺撒的同僚执政官和当年的许多其他行政长官。更常见的做法是让这些人引领游行队伍，这或许是为了强调，胜利属于整个国家。[42]

恺撒返回罗马的时候，离他的三十四岁生日还有一个多月。这一年，他第五次担任执政官，并将于前28年1月1日第六次担任执政官，这一次的同僚是阿格里帕。元老院授予他们监察官的权力（不过没有给他们监察官的职位）。他们宣布，将执行自前70年以来第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他们更全面的计划是什么，还很难判断。目前，恺撒战胜了他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最近一场内战的胜利究竟能不能带来持久和平，大家拭目以待。[43]

---

[1] Tacitus，*Ann* .1.2（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modified）.

[2] *Res Gestae* 3，4（Loeb translation）.

[3] Horace，*Odes* 1.37（Loeb translation）.

[4] 伊西斯起初是埃及的女神，后来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受到广泛崇拜。她是理想的母亲和妻子，是自然与魔法之神，保护奴隶、罪人、手工艺人和被压迫者，也倾听富人、统治者、贵族和少女的祈祷。她常被认为是荷鲁斯（隼头人身，法老的守护神）的母亲。伊西斯的意思是“王座”，她的头饰就是王座。埃及法老被认为是她的孩子。在埃及神话中，她的丈夫和兄弟

奥西里斯被塞特杀害并肢解后，她收集散落在大地上的尸块，用魔法让奥西里斯复活。

[5] Virgil，*Aeneid* 8.678-99（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modified）.

[6] 对此次战役描述的讨论，以及此主题的大量文献，见C.Lange，*Res Publica Constituta.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pp.75-90，with 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70-72，375-83。

[7] 布立吞人是在铁器时代、罗马时代和之后一段时期生活在今天不列颠的一些凯尔特族群。5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定居不列颠后，布立吞人要么被同化吸收，成为后来的“英格兰人”的一部分，要么退居到威尔士、康沃尔、苏格兰等地，也有的迁徙到今天的法国布列塔尼。

[8] Horace，*Epodes* 7.1-10（Loeb translation）；民众希望战胜帕提亚人和在不列颠的征服，见J.Rich，‘Augustus，War and Peace’，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137-64，esp.143-6 = L.de Blois，P.Erdkamp，G.de Kleijn and S.Mols（eds），*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Impact of Empire*（*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2003），pp.329-57。

[9] Horace，*Epodes* 16，quotes taken from lines 1-9（Loeb translation）.

[10] Horace，*Epodes* 1讲到梅塞纳斯随恺撒舰队出航，诗人虽然身体虚弱，但也觉得自己必须一同前往，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62-3；贺拉斯在腓立比战役，见*Odes* 2.7，其中讲到他逃离战场，参见*Epistulae* 2.2.46-51。

[11] Suetonius，*Augustus* 51.1.另见Velleius Paterculus 2.86.1-3；对奥古斯都宽待旧敌的详尽讨论，见M.Dowling，*Clemency and Cruelty in the Roman World* （2006），pp.29-75。

[12] 例如Tacitus，*Ann* .1.1-2，4，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1-16.

[13] Dio 51.19.1-7，with C.Lange，*Res Publica Constituta.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pp.125-48 包括详细讨论，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182-3；渴望和平，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389-98。

[14] Dio 51.20.4-5，Suetonius，*Augustus* 22，*Res Gestae* 13，with C.Lange，*Res Publica Constituta.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pp.140-48及J.Crook in *CAH2* X，pp.74-5；Dio 51.19.7讲到司法权，他将其与雅典的雅典娜投票相比，

他有权在任何法庭投票。或许他被允许担任最高上诉法官，但细节不明确；关于平安占卜仪式，见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41，fn.92。

[15] Suetonius，*Augustus* 63.1讲到流产的孩子，概况见A.Barrett，*Livia .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28-34，118-22，及M.Dennison，*Empress of Rome.The Life of Livia* （2010），pp.89-96。

[16] Dio 55.7.2-3，with quote from Loeb translation；阿提诺多罗斯的故事，见Plutarch，*Moralia* 207C.7。

[17] Suetonius，*Augustus* 85.1-2.

[18] 引文见Nepos，*Atticus* 20（Loeb translation）。

[19] 关于阿尔巴朗格国王的服饰，见Dio 43.43.2，及S.Weinstock，*Divus Julius* （1971），p.324；关于此时期贵族对历史的兴趣，见E.Rawson，*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Roman Republic* （1985），pp.102-3，233-49。

[20] 见Nepos，*Atticus* 20，讨论见J.Rich，'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Chiron* 26（1996），pp.85-127，尤见113-16。

[21] Nepos，*Atticus* 22.3-4.

[22] Dio 51.16.3-17.8，with A.Bowman in *CAH2* X，pp.676-89，P.Brunt，'The administrators of Roman Egypt'，*JRS* 65（1975），pp.124-47及'Princeps and equites'，*JRS* 73（1983），pp.42-75，尤见62-3；关于Gallus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252-3，300。

[23] 在埃及南部。

[24] Dio 51.18.1，Suetonius，*Augustus* 18.2.

[25] G.Hölbl（trans.T.Saavedra），*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2001），pp.14-15.

[26] Suetonius，*Augustus* 18.1，Dio 51.16.5；关于肖像，包括他的肖像被做成类似亚历山大形象的时期，见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164-79，尤见167-8。

[27] 根据神话，弗里吉亚（小亚细亚一地区）没有国王，神谕说第一个赶着牛车进城的人将成为国王。农民戈耳狄俄斯赶着牛车进城，被推举为国王。为了感谢神祇，他将牛车献给神。他的儿子米达斯用一个非常复杂的结将牛车拴在神庙柱子上。传说能够解开这个结的人将会征服世界。亚历山大大帝到访时，尝试解开这个结，但失败了。他挥剑将其砍断，用这种办法把它"解开"了。

[28] Suetonius，*Augustus* 17.4，Plutarch，*Antony* 86，Dio 51.15.1讲到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

拉七世的下葬，Dio 51.19.3-5讲到安东尼及其形象公开受辱，C.Lange，*Res Publica Constituta.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pp.136-40；亚历山大与戈耳狄俄斯之结的故事，见Plutarch，*Alexander the Great* 18。

[29] Dio 51.18.1-3，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00-02，及F.Millar，*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 （1993），pp.27-34。

[30] 以弗所是一座古希腊城市，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前10世纪由希腊殖民者建立。前129年被罗马共和国控制。该城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公元268年被哥特人摧毁。《约翰福音》可能在此写下。5世纪基督教会的多次会议在以弗所召开。后来港口因泥沙淤塞而废弃，以弗所逐渐衰败。

[31] 尼西亚古城，今称伊兹尼克，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北部，因基督教的两次会议（公元325年和787年）和“尼西亚信经”（基督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议决）而闻名。1204年拜占庭帝国被西方十字军消灭后，拜占庭贵族以尼西亚为都城，建立尼西亚帝国，最后于1261年恢复为拜占庭帝国。

[32] Josephus，*AJ* 14.314-16，及14.301-12（quotes from Loeb translation）；亦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105-6；神庙与崇拜仪式，见Dio 51.20.6-8；皇帝崇拜，概况见S.Price，*Rituals and Power.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 （1985），及J.Scheid，‘To honour the Princeps and venerate the gods.Public cult，neighbourhoodcults，and imperial cult in Augustan Rome’，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275-99，尤见288-99。

[33] Suetonius，*Augustus* 41.1，Dio 51.21.5.

[34] 此处简要介绍一下犹太王国哈斯蒙王朝末期的历史。赫卡努斯二世与其弟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争权，后者得胜。赫卡努斯二世不甘心，在重臣安提帕特帮助下反抗。伟大的庞培率领罗马军队来到犹太，攻占耶路撒冷，废黜了阿里斯托布鲁斯二世，立赫卡努斯二世为傀儡（庞培恢复了他的大祭司位置，但没有恢复其王位），由安提帕特辅佐。
前47年，尤利乌斯·恺撒在亚历山大港作战期间，安提帕特率军支援他，因此得到恺撒的好感，在恺撒支持下成为犹太的实际统治者。安提帕特被谋杀后，他的儿子大希律王赢得罗马内战的胜利者奥古斯都的支持。

[35] 以东是一个古代地区，大致在今天以色列南部、死海以南。其居民为闪米特人，与犹太人血缘相近。

[36] 位于今天以色列的东部，死海之滨。

[37] Josephus，*AJ* 15.161-78，183-236，*BJ* 1.386-97，431-44，with E.Sc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p.301-3；Josephus，*BJ* 1.397讲到卫队。

[38] Dio 51.18.2-3，with A.Sherwin-White，*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168 BC-AD1*（1984），pp.324-41，及J.Rich，‘Augustus，War and Peace’，in J.Edmondson（ed.），*Augustus*（2009），pp.143-8。

[39] Dio 51.19.2-3，20.4 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p.39-41，拒绝桂冠，Dio 51.21.4。

[40] 渡鸦的故事，见Macrobius 2.4.29。

[41] Strabo，*Geog* .12.35讲到一名领袖及其儿子被处死。

[42] 凯旋式见Dio 51.21.4-9，Plutarch，*Antony* 86，*Res Gestae* 4讲到被俘的王族成员，with C.Lange，*Res Publica Constituta.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2009），pp.148-57，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41；马凯鲁斯和提比略坐在拉战车的马背上，见Suetonius，*Tiberius* 6.4。

[43] *Res Gestae* 8.

第四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前**27**～前**2**年

凭借这项功业，元老院授予我“奥古斯都”的称号。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第34节 [1]

---

[1] 名字的具体措辞有所变化，他可能仍然被称为恺撒或奥古斯都。有时是奥古斯都·恺撒，有时是恺撒·奥古斯都。——作者注

十二 恢复传统，继往开来

> 我扑灭内战的烈火之后，在我第六次和第七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全体人民同意将全部政权交给我。后来我将共和国交还给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由他们的意志来主宰共和国。
>
>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 共和国古老而传统的形式得到了恢复。
>
>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2世纪初[2]

前29年8月是普天同庆和一掷千金的时候。恺撒向每一位成年男性公民赠送了100迪纳厄斯（相当于400塞斯特尔提乌斯），后来还以他的外甥马凯鲁斯的名义，向男孩们馈赠了金钱。这些赠礼被宣布为公民得以分享的“战利品”。同时，被安置在意大利和海外各殖民地的约12万退伍军人也每人得到了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奖金。当年苏拉的老兵在得到农场之后就被遗忘了，后来很多人变卖了自己的农场，或者债台高筑，成为军事力量的来源，很容易被喀提林那样的人利用。恺撒安置的退伍军人更多，他决心不让这些人将来成为不安定因素。现役军人应当也得到了赏金，不过史料中没有提到这方面。阿格里帕等将领则凭借战功得到了奖赏。[3]

在纪念征服埃及的凯旋式不久之后，罗马城举行了典礼，为两座新纪念碑揭幕，分别纪念取得的胜利和恺撒家族的荣耀。前42年，三头同盟宣布在广场南端独裁官被火葬的地点附近建造一座供奉神圣尤利乌斯的神庙。这座神庙终于竣工，并于前29年8月18日正式开放。在文艺复兴时期这座神庙被拆除了，其建材也被挪为它用，因此，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神庙的一点点残迹，完全无法想象它原初的壮美。神庙旁有一座新的演讲台，即尤利乌斯演讲台，从那里可以越过广场眺望主演讲台。前29年，这两座演讲台都装饰着从安东尼战船取下的冲角。三次凯旋式展

示的许多战利品都被存放在神庙内。

主演讲台附近屹立着新的元老院议政厅，即尤利乌斯议政厅。尤利乌斯·恺撒启动了这项工程，将元老院议政厅迁到这个新地点，以便让议政厅将罗马广场与他自己筹建的尤利乌斯广场连接起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议政厅是3世纪末建造的，但利用了原先尤利乌斯议政厅的地基，规模和形状可能也与原先大体相似。尤利乌斯议政厅的前方原先有一座柱廊，高耸的屋顶（今天的议政厅高度为104英尺，尤利乌斯议政厅可能差不多高）上有一座带翼的胜利女神像，神像踩着一个球体。尤利乌斯议政厅内还有一座胜利女神像，是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城市塔兰托掳来的。罗马人于前3世纪初占领了塔兰托。这座胜利女神像周围环绕着一些来自埃及的精美战利品。有一座维纳斯（尤利乌斯家族的女祖先）雕像，由著名雕塑家阿佩莱斯[4]创作，被尤利乌斯·恺撒买下。[5]

除了正式的庆典和凯旋式之外，还举办了一些盛大的公共娱乐活动，以吸引城市居民。在一系列斗兽表演中，专业的猎人杀死了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凶猛野兽。罗马群众第一次见到犀牛和河马。为了愉悦群众，这些野兽被杀死了。为了纪念神圣尤利乌斯神庙的落成，举行了体育和其他竞赛。贵族男孩们骑马参加竞争激烈而往往很危险的“特洛伊”竞技，这种竞技的名字和所谓的起源让人们想起遥远的过去，以及尤利乌斯家族的起源。这些竞技包括赛马（有时一名骑手要同时驾驭两匹马）和赛车。还有好几场角斗士竞技，这种表演原先一般在葬礼上举行，但现在大家已经忘记了这种关系。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开放了他新近建成的石制圆形剧场（这是罗马城第一座此类剧场），并举行了一系列斗兽和角斗士表演。他是恺撒最信赖的下属之一，用在前34年阿非利加战役胜利的收益建造了这座剧场。这些表演很成功，以至于群众投票决定授予他每年提名一名裁判官的权利。

大约在同一时期，恺撒也举办了一些角斗士比赛，包括一场大规模战斗，双方都是战俘，据说一边是日耳曼的苏维汇人，一边是巴尔干的达契亚人。还有一些战斗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其中一名参赛者是元老昆图斯·维特里乌斯，他为了出风头，自愿参加角斗士比赛。并不是每一场角斗士比赛都要打到出人命为止。有些比赛用的是钝兵器，有些比赛是根据点数来评判输赢，就像现代的击剑比赛。虽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但大多数贵族都热衷于兵器和武艺，有时非常喜欢竞争。角斗士比赛持续很多天，即便恺撒生病了没法到场观看，比赛也继续进行。[6]

新的开始

前28年1月1日，恺撒开始了他的第六次执政官任期。他前两次担任执政官时，新年的第一天他都不在罗马城，不过这一次他在城里，因此能够执行传统的仪式。这预示着，这将是不同以往的一年。在三头同盟统治下，执政官得到任命，每年都会在任上辞职，由补任执政官接任。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恺撒和安东尼曾各自担任执政官仅一天。这种做法是为了给更多的人当执政官的机会，以便奖赏他们的追随者。但这就让执政官的含金量下降了。不过时代不同了。这一年，恺撒及其同僚阿格里帕将会一直担任执政官到12月31日，那时才正式离职，并发出古老的誓言，保证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尽其所能地为国家效力。

根据传统，一年有两名执政官，每个月里其中一人的权力优先，两人轮流。在三头同盟统治下，这种规矩被忽略了，至少在三头同盟之一担任执政官的年份里是这样。前28年，恺撒恢复了传统的做法，1月由他占据优先位置，2月则轮到阿格里帕。恺撒的侍从的变化就象征了优先权的轮换。1月，十二名执法吏走在恺撒前面，为他开道。每一名执法吏都携带完整的法西斯束棒。作为三头同盟之一，恺撒和他的两位同僚一直都有执法吏陪伴在身边。不过我们不确定，他们是像独裁官那样

拥有二十四名执法吏，还是像执政官那样拥有十二名。到2月，以及阿格里帕优先的每个月份，恺撒的执法吏就改为跟在他身后，并且携带的法西斯束棒也与完整的版本明显不同，不过具体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这种变化不仅表达了对同僚的尊重，也是对执政官职位的尊重。类似地，此前十年中大量分配裁判官职位的做法也被叫停了，这一年和随后的年份里只有八名或十名裁判官。[7]

元老院也得到了改革，变得更体面庄重。尤利乌斯·恺撒曾接纳了许多新元老，著名的例子是接受了来自高卢的罗马公民，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这些人脱掉了自己的高卢式裤子，换上了罗马的托加袍，并且找不到去元老院议政厅的路。他还吸纳了更多来自意大利各城镇的贵族人士，所以尽管前49～前45年内战造成了很大损失，但元老院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在独裁官遇刺造成的混乱以及三头同盟统治下，元老院迅速扩大，挤满了三头同盟的党羽，最后人数超过1000人。在这个时代，逃亡奴隶也能当上裁判官；贿赂能使人平步青云，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8]

恺撒和阿格里帕还拥有监察官的权力，于是开始了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自前71年以来，每五年选举一次的监察官未能执行其职责的核心部分——人口普查。恺撒和阿格里帕的人口普查结束后，一共登记了406.3万名公民及其财产和地位。这个数字是上一次人口普查结果的五倍。在普查过程中，两位执政官还削减了元老院人数。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除掉顽固的安东尼分子或其他异己。他们宣布，这样做的目的是恢复元老院曾经的威望。恺撒发表了一次演讲，请每一位元老来反省自己的名望、财产和祖先血统，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适合成为罗马威望最高的群体的一分子。随后几天内，大约50人主动退出了元老院，两位执政官还将另外140人除名。这些被开除出元老院的人都重返普通公民的生活，但被允许继续享有穿戴元老服饰的特权，以及可以在公共竞技和娱乐活动中坐在仅供元老使用的座椅上。被剥夺元老

身份的人当中有一个平民保民官，他同时还丧失了这个官职。

只有那些被正式逐出元老院的人的名字才被公布，这是对他们没有主动离开的一种轻微斥责。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在驱逐这些人的会议上，恺撒在托加袍下穿着胸甲，佩带利剑，就像西塞罗在前63年做的那样，并且身边围绕着十名身强力壮的朋友（都是元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当时没有发生麻烦，后来也没有。苏埃托尼乌斯的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不过我们必须要谨慎，因为之前几十年的高度紧张情绪到这时未必已经完全消散。这可能是因为恺撒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命运记忆犹新，所以明确表示，虽然他慷慨大方，但绝不打算重蹈养父的覆辙。不过在其他方面，作为一个团体的元老院和各位元老都得到了非常小心的尊重。前29年，恺撒利用自己的权力，向一些人授予了贵族身份。他希望，人数减少后的崭新的元老院（不过人数还是远远多于苏拉时期的600人，更多于苏拉独裁之前正常的300人）能恢复之前的大部分尊严，让显赫大族成员的美名能够在元老院出现。元老名册上的第一人，即首席元老[9]，是恺撒自己。首席元老的身份虽然不能带来正式权力，但拥有很大威望。[10]

前28年有三位元老庆祝了凯旋式，5月有一人庆祝了在西班牙的胜利，另一人于6月庆祝在高卢的胜利，还有一人于10月庆祝在阿非利加的胜利。三头同盟都非常慷慨大方地授予其支持者凯旋式的荣誉，哪怕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相比之下，阿格里帕赢得了真正的辉煌胜利却谢绝凯旋式，就更惊人了。不过，庆祝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总归是好事，而且这些人的凯旋式不可能与恺撒自己的庆祝胜利仪式相提并论。没有人能够获得可与他媲美的威望，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得到埃及的黄金，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连续三天举行三场凯旋式。在整个罗马历史上，除了恺撒，只有罗慕路斯和庞培曾赢得三次凯旋式。尤利乌斯·恺撒一共得到过四次凯旋式，但他的继承人还拥有两次小凯旋式，所以能够和养父平起平坐，甚至超过他。估计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些事情，因为

恺撒显然已经获得了与其祖先，包括神圣尤利乌斯比肩的威望。那个“一切都要感谢他的名字的兔崽子”如今已经赢得了最宏伟的胜利。至少在目前，恺撒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元老。[11]

在这些年里，他拥有执政官的衔级和威望。三头同盟已经正式解散，他已经多年没有使用“三头同盟之一”的头衔。不过，他在前43年获得的权力仍然继续有效（直到被正式解除），所以给他的地位增添了额外的法律依据。三头同盟的完整头衔是“恢复国家秩序”的三人理事会。在内战前，安东尼曾说自己要正式辞去这个职务，并要求恺撒也辞职，然后又说等他赢了之后会放弃自己的权力。若要让国家恢复稳定，就必须承诺永久和平。一个世纪之后的塔西佗说，在内战和三头同盟的年代，“没有法律，没有惯例”。换言之，基本的体制崩坍了，被专断的权力取代。[12]

前28年，恺撒将一名裁判官任命为城市裁判官，此人负责罗马城本身的一些具体事务，包括监督主要的法庭。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担任城市裁判官这个威望很高的职位了，也没有证据表明在三头同盟统治下传统的法庭能够正常运作。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和三头同盟的其他敌人都是在特别设立的法庭上受审的，这些特别法庭运作非常迅速，并且一定会给出令三头同盟满意的结果。根据传统，城市裁判官是抽签产生的，不过尤利乌斯·恺撒曾经自己选择和指定人选，比如他指定布鲁图斯（而不是卡西乌斯）为前44年的城市裁判官。恺撒任命城市裁判官的时候，可能这种指定合适人选的做法已经不再显得专横跋扈。前28年发行的一枚金币上铭刻着这样的口号：“他将罗马人民的法律和权益归还给他们。”这枚钱币的正面是恺撒的头像，戴着胜利者的花冠。在钱币背面，他坐在行政长官的座椅上，即执政官的象牙座椅。铭文上的“他”指的是谁，是显而易见的。[13]

除了重新设立法庭之外，恺撒还宣布恢复正常的选举。选举场地是

装潢华丽的新围场，由尤利乌斯·恺撒开始建造，由阿格里帕完成。罗马人民现在可以在装饰着大理石与艺术品的“羊圈”集合，他们等待的时候，有遮阳棚提供荫凉。由统治者直接任命行政长官的做法被终结了，不过可能直到前27年秋季才被叫停，但也可能是在前一年。狄奥告诉我们，在前28年，恺撒将国库的控制权交还给从前任裁判官当中挑选的两名官员。很多个人欠国家的债务被一笔勾销，但国库状态良好，因为亚克兴角大捷之后恺撒从埃及和东方各行省获得的大量财富被送入国库。各行省和盟邦王国的稳定意味着将来会有稳定的收入输送到罗马。[14]

在传统机构被恢复（虽然有时候形式被改变了）的同时，罗马城本身也得到了翻新美化。前30年代末集中的建筑活动持续下来，并得到大力推进。前28年，恺撒回应了元老院的一个请求，命令修复罗马城内的八十二座神庙。其中很多神庙都很小，而且绝大多数都符合简单的传统设计，而不是更宏伟的现代风格。在修复神庙的同时，恺撒还复兴了在每座神庙内举行的古老仪式。虔敬是罗马的一种传统美德，是罗马人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罗马人民缺乏对古老神祇的恰当尊重，体现在最近几代人的道德堕落。在混乱和暴力的几十年里，这种堕落是世人皆知的。罗马人很容易想到，时局动荡是因为人心不古，所以要复兴社会就必须改善人们的行为举止、重新确立与诸神的良好关系，正是这些神祇引领罗马走向辉煌。与此同时，埃及的伊西斯崇拜被驱逐出罗马城。宗教复兴的精神非常严格地遵守传统，由恺撒亲自领导。

在修缮神庙的同时，恺撒当局还在市中心与城外的战神广场继续开展宏伟的建筑工程。阿格里帕仍然非常忙碌。曾举行过凯旋式的元老们继续将他们的一些战利品用于纪念性建筑的建设工程。所有这些工程都为居住在罗马的数千人，甚至是数万人，提供了薪水不错的工作。前28年，恺撒还向有资格领取免费粮食的公民发放了四倍于常规数量的粮食。他尝试对粮食分配工作做一些安排，以避免与建筑工程冲突，但没有成功。这表明在那些年里，大型建筑工程提供就业机会是多么重要。

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国家提供的一些支持让民众相信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所以很少有人寻衅滋事。[15]

9月，史上第一届亚克兴竞技会召开了，持续了好几天，又一次让人们想起恺撒的胜利及其带来的和平。战神广场上搭建的临时木制平台上举行了体操表演。很多参赛者来自豪门世家，在形形色色的项目中角逐，以纪念恺撒的伟大胜利。至少有一天全部用于举行角斗士比赛，角斗士都是外国战俘。在此次节庆期间，恺撒又一次病倒了，没有观看剩余几天的比赛。阿格里帕代表他到场，并且像以往一样，让大家都明确知道，节庆活动的功绩属于他的主子，节庆的所有开销也是由恺撒承担的。[16]

一个月后的10月9日，帕拉丁山上的阿波罗神庙落成并向公众开放。早在前36年，恺撒新近购得的一座豪宅的一部分被闪电击中，于是他发誓要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罗神庙。与他主持修复的许多建筑不同，这座新神庙非常奢华，用熠熠生辉的白色大理石建成，饰有黄金，明显受到希腊风格的强力影响，但同时仍然很符合罗马传统。这座神庙是一个更大建筑群的一部分，建筑群还包括一座圣林和一座图书馆。人们认为，亚克兴角的胜利最应当感谢的神就是阿波罗。这座雄踞于帕拉丁山的阿波罗神庙在很远之外就能看见，从广场上也看得见。恺撒的府邸就在神庙旁边，他的府邸似乎已经将现有的多座贵族住宅连接起来。大约在这个时期，恺撒开始主持修建一条路，它从帕拉丁山的较远一侧连接其宅邸的主门，从屠牛广场[17]延伸过来，而不是从主广场，这意味着它要在沿途经过其他贵族的宅子。恺撒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得到诸神恩宠，其他元老不能和他竞争。他命令将自己的所有黄金塑像和其他纪念塑像全都熔化，铸造成宗教仪式用的三足鼎，献给阿波罗神庙。这种谦虚的姿态就是为了获得大家的赞赏，而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姿态，就和他当初欣然接受这些东西一样，表明了自己的无比强大。[18]

这些年里还建成了另一座恢宏的阿波罗神庙，不过是对旧神庙的改建。此项工程由盖乌斯·索希乌斯出资和监督，他于前34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于前32年在安东尼的庇护下成为执政官，并领导了对恺撒的攻击。但他主持建造的这座神庙还是被冠以他的名字，后来被称为阿波罗·索希阿努斯神庙，这是很不寻常的。这座神庙的檐壁融合了古典希腊雕塑的风格，但新的雕塑描绘了被击败的敌人的形象。这些敌人穿着长裤，更像西方人，而不像犹太人，可能是代表恺撒在巴尔干征服的一些伊利里亚蛮族。索希乌斯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得到了恺撒的宽恕，被允许完成这项建筑工程，并得到功劳。修复一座旧神庙和纪念罗马军队的胜利，都是很好的事情。索希乌斯费了很大力气才得到赦免，他的这项代价高昂的工程可能是在向新政权表忠心，不是在和恺撒竞争。安东尼和内战的其他所有军阀都出局之后，没有人能和恺撒竞争。[19]

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20]的故事。他在卸去执政官职务后去了马其顿当总督。前29年，与罗马敌对的部族向马其顿发动袭掠，他做出了积极回应，发动强有力的反攻，打得相当精彩。在第一场大规模战役中，他不仅击溃了巴斯塔奈部落的军队，还亲自在肉搏战中斩杀了他们的领袖——戴尔多国王。此次胜利之后，他扩大了行动规模，在这一年和随后一年里赢得了许多胜利。这些行动有点像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的最初干预，大胆甚至残酷无情地利用一切机会将战事升级，并迅速歼灭每一个新敌人。狄奥对这些军事行动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李维可能也留下了相关记述。但这些行动持续不超过两年，而且就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克拉苏的一切作为都可以被描述为符合罗马人民的更广泛利益。[21]

克拉苏可能在前28年年末或前27年年初返回罗马，并得到了凯旋式的荣誉。他肯定比在三头同盟统治下庆祝凯旋式的很多人都更配得上这项荣誉。据狄奥说，人们以克拉苏和恺撒的名义献祭，纪念他的成功，而恺撒凭借这些军事胜利获得了凯旋将军的头衔，克拉苏却没有。狄奥

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希腊出土的两座碑铭上记载了克拉苏的凯旋将军头衔，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些碑铭完工之后传来消息，克拉苏的凯旋将军头衔被取消了。我们也可以确定，恺撒并没有因为克拉苏的军事胜利而得到凯旋将军头衔。[22]

狄奥还告诉我们，假如克拉苏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动的（但事实上，他是资深执政官，而非当年在任的执政官），就能凭借亲自斩杀戴尔多的功绩在凯旋式之外赢得至高无上的荣誉：举行奉献“最高战利品”的仪式，把即将死去的敌人的盔甲兵器奉献给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神庙。历史上只有三位罗马统帅曾获得此项荣誉。第一位是前8世纪的罗慕路斯，第二位是前5世纪的科尔内利乌斯·考苏斯，最后一位是前222年的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23]。罗慕路斯赢得此项荣誉时是国王，马凯鲁斯则是执政官。考苏斯的地位不太清楚，根据李维的记载，考苏斯当时应当不是最高统帅，而是一位下属。但根据后人附会的版本，李维又说：“与我的前辈和我本人曾经说的相反，考苏斯杀死维爱人国王的时候，是执政官。”李维这番话的资料来源是恺撒本人，后者“修复了年久失修的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神庙之后走进神庙，命人将据说是考苏斯奉献的敌人亚麻布胸甲上的文字读给他听”。李维“觉得，是恺撒修复了这座神庙，若不相信他的证词，简直是亵渎神明”。虽然有这段文字，李维还是没有更改自己史书的措辞，在书里仍然说考苏斯是一位军事保民官，为一位独裁官效力。[24]

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恺撒这番证词的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因此这不仅仅是关于历史趣闻的证据，更表明了恺撒紧张兮兮地害怕与人竞争的心态。按照这种理解，克拉苏继承了他祖父的财富并拥有古老贵族世家的遗产与威望，像一位真正的罗马贵族那样行事，决心赢得威名，与所有同时代人（包括恺撒）一决高低。克拉苏是将近两个世纪里第一位亲手斩杀敌军统帅的罗马将军，他很自然地会要求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以增加其家族和本人的荣耀。恺撒害怕竞争者，嫉

妒其他人的光辉，尤其是事关奉献“最高战利品”或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这样的古老仪式。于是，恺撒授意元老院拒绝授予克拉苏这项额外的荣誉。拒绝的理由是他在一座坍塌神庙的古代胸甲上看到的文字，这个理由很可能是捏造的。恺撒简直不顾一切了，他非常害怕更多元老会集结到这样一位豪门子弟旗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复苏如此古老的荣誉，防止竞争对手因此崛起。克拉苏被允许举行凯旋式，但仅此而已，后来就在史书里沉默了，尽管他的血脉延续了下去。[25]

阴谋论总是很吸引人，而这个故事塑造了非常有意思的形象：恺撒在反对派元老的强大压力下，高度紧张地努力巩固和保护自己的地位。这种说法非常流行，已经被当作是真的，我在其他地方也曾信以为真。但只要仔细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狄奥没有说克拉苏要求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而遭到拒绝。其他史料也根本没有讲到这一点。克拉苏确实庆祝了凯旋式，这绝不是不起眼的荣誉。其他很多元老在结束官职任期、治理过行省和打赢一场战争之后，就在史册中无声无息了，所以克拉苏在之后的史料中失去踪迹也就不奇怪了。恺撒修复朱庇特神庙的决定源自阿提库斯的启发，而且是好几年之后的事情。我们没法判断他是何时公布自己查看胸甲的结果，但由于他一直对古罗马仪式兴趣浓厚，所以这可能与克拉苏完全无关。李维提及恺撒查看胸甲的事情，是为了尊崇恺撒。李维在史书中说考苏斯不是执政官，这并不能说明他对恺撒及其政权持批评态度。

克拉苏返回罗马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任何公开的争议。如果他真的要求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也就是说，如果几个世纪之后的狄奥的话是真的），那么狄奥著作和其他史料中一定会有克拉苏正式提出要求、元老院对此进行讨论和拒绝的相关记载。克拉苏曾为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安东尼效力，后来才投奔恺撒，这表明克拉苏在政治上还是很有本事的。就算他真的想索取“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他也会自己放弃，或者被人（或许是恺撒的亲信）私下里劝服而放弃。从另一个角

度看，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表明克拉苏在元老院有大群支持者。他或许受到自己军队的爱戴（他率领他们赢得了胜利），但这些官兵与其他对恺撒忠心不二的军队相比，数量是很少的，何况恺撒近几年一直在忙着赏赐士兵和退伍老兵。克拉苏即便有上位的野心，也没有希望和恺撒竞争，而且他目前已经赢得足够多的官职和荣耀，这些东西足以满足绝大多数贵族的期望。[26]

目前，恺撒的军事力量无比强大，大多数阶层的民众对他还比较满意。终于和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意大利不再到处挤满了被剥夺土地的农民、难以驾驭的退伍军人或债台高筑的公民，这些人曾经陷入绝望，会跟随任何承诺给他们更好未来的领袖。铁杆的安东尼或庞培分子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殆尽，几十年内战中的口号和忠诚已经被人渐渐淡忘。恺撒的地位至高无上，短期内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至于未来会怎样，还很难预测，如何建立一个能够保障稳定和他本人安全的新政权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狄奥著作的第五十二卷全部用来记载据说来自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的演讲。他们两人针锋相对，据说阿格里帕主张恢复接近原先共和国的体制，而梅塞纳斯则建议建立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具体的措辞都是狄奥的，反映了他所知晓的3世纪初的帝国，他的很多想法可能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更有关联。但他说恺撒认真考虑了这些问题，而苏埃托尼乌斯也说恺撒在这些年里曾考虑恢复共和国体制。恺撒会不会退出政坛，就像苏拉当年辞职退隐那样，就很难说了。就算他真的曾经这么斟酌，后来也肯定是放弃了。[27]

现代历史学家很容易想到尤利乌斯·恺撒的独裁，并认为他的继承人想到要避免这种独裁体制。古代史料没有这种说法。尤利乌斯·恺撒在蒙达战役结束、返回罗马不到一年后就死了，没有时间真正做些什么，所以应当不能为他的继承人提供什么可以吸取的教训。或许他的遇

刺身亡教会了恺撒要尊重元老院和其他机构，但恺撒在前28年的绝对权力和独裁官当年的权力都是毫不掩饰的，尽管他没有自立为独裁官。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元老院及其立场与前44年有很大不同。[28]

前28年，恺撒忙于将罗马社会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行政长官和各种机构的尊重并没有减少恺撒本人的权力。他可能在8月正式宣布内战结束。他还宣布，其三头同盟的两位同僚的所有非法举动，以及他本人作为三头同盟之一而得到的一些权力和额外的荣誉，将从这年年底开始失去效力。这表明“恢复共和国”的工作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危机大体上已经结束，所以不再需要三头同盟这样特殊的行政长官职位。这一切都是一个井井有条、积极主动的进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恺撒是被迫做出这些妥协的。这年年底，恺撒和阿格里帕卸去执政官职位并按照规矩宣誓，但恺撒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29]

奥古斯都

前27年1月1日，恺撒开始了他的第七次执政官任期，阿格里帕则是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我们不知道此前有没有举行正式选举。如果举行了选举，不管有没有其他候选人与他竞争，广受爱戴的恺撒都必胜无疑。1月13日，元老院召开会议，恺撒以执政官身份主持。聚集在此的元老当中只有少数人事先得到消息：此次会议不是普通的辩论，而是要公布一个重大的宣言。恺撒精心准备了演讲。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总是会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相当不重要的）宣言事先完整地写好，然后照本宣科，以确保自己的表达明确清晰，避免说出不应当说的话，或者错误地遗漏一些东西。[30]

狄奥记载了这次演讲的内容，但除了其中心主题之外，没有办法确定狄奥的版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恺撒实际上说的话。恺撒宣布自己要辞职，并将各行省、军队和法律的控制权归还元老院。在狄奥的版本

里，恺撒先宣布他即将要说的话会让大家震惊，因为他已经处于成功的巅峰（这成功也是他努力得来的），没有人能够强迫他放弃权力。大家只有考量他的高尚一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给“父亲”复仇并保卫国家，才会觉得他即将做出的举动并不意外，反而更加光荣。

> 除了我已经辞世的父亲，谁比我更宽宏大度？谁比我更接近神祇？诸神临鉴，我拥有这么多勇敢的士兵，既有罗马人也有盟军，他们对我绝对忠诚。我主宰着赫拉克勒斯双柱[31]之内的整片海洋，只有几个部落除外。我在每一块大陆都拥有城市和行省……你们全都安宁和平……最重要的是，都乐于服从我。虽然如此，我却自愿自觉地放弃如此伟大的统治权，放弃如此庞大的领地。[32]

他经常提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成就，以及他拒绝接受王冠、国王头衔，最后不幸遇害的往事。尤利乌斯·恺撒的继承人如今追随他的脚步，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或许能够赢得更大的光荣。恺撒已经做了需要做的事情，让共和国强大而稳定，所以现在可以把统治共和国的任务交给其他人，而不必担忧它的安全。

不管狄奥记载的恺撒演讲内容是否真实，他描写的元老们的反应是非常可信的。恺撒的亲信知道他要说什么，于是在恰当的时刻高声鼓掌。有些人怀疑这位三十六岁的执政官只是在演戏，并不打算放弃统治权。但他们不敢表露自己的怀疑，去指责年轻的军阀在撒谎。那些相信他真诚的人当中，有的欢迎他辞职的前景，但其他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害怕他辞职之后会引发新一轮内战，新的领导人会崛起并争夺主宰权。怀疑他的人和相信他的人都没有欢呼，前者是因为恐惧，后者是因为沮丧。很多人高呼着，哀求他改变主意、继续统治国家。恺撒主持着会议，因此由他决定谁发言。在一段时间内，他坚持要求大家允许他辞职并安宁地生活，这安宁是他奋斗得来的。但共和国最高级的议事会作为一个集体，以及元老们作为个人，都央求执政官继续担任国家元首。[33]

恺撒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狄奥认为这是一场作秀，恺撒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主宰地位，而仅仅希望大家公开表达对他的支持，表明自己是由于责任感和全民公决（几天后，公民大会确认了元老院的决定）而被迫担任国家公仆。这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元老院和人民热情洋溢地赞同恺撒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尽管大家事实上没有其他选择。[34]

我们不确定，恺撒未来角色的细节是在1月13日的会议上，还是在后来的日子里确定的。1月13日肯定向他授予了一项荣誉，即在他府邸门廊的大门上方展示橡叶环。橡叶冠——罗马奖励英勇行为的最高荣誉——被授予冒着生命危险挽救另一位公民的勇士。根据传统，得救的人会用橡树叶编织一顶冠冕，亲自送给他的救命恩人，以公开认可恩情，并象征自己对恩人的永久性义务。尤利乌斯·恺撒在青年时代服兵役早期曾获得此项荣誉。前27年，他的继承人获得的这项荣誉表明他拯救了全体公民，并再一次强调他的胜利利于全体公民的福祉。大约在这一时期，罗马城还铸造了一些钱币，上面有橡叶环图案，还有“拯救公民”的铭文。可以说，他有恩于所有公民。他府邸门廊上还加挂了胜利桂冠，作为永久性的装饰。[35]

1月14日，元老院没有开会，因为这一天是不吉利的日子，不可以执行公务。在日历中，不吉利的日子一般是军事失利或可怕事件之后的日期。将1月14日定为不吉利日子是比较近期的事情，是元老院在前30年确定的，因为这一天是马克·安东尼的生日。1月15日，元老院开了一次会，但很短暂，因为要庆祝一个宗教节日。1月16日，元老院才举行了一次完整的会议。我们无法确定元老院许多具体决策的确切时间，但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

在元老集体的“压力”下，恺撒同意接受某些行省的统辖权，理由是这些行省最需要抵御外敌或平定内乱。于是，他掌管了整个西班牙半岛

（罗马在那里的征服尚未完成）、整个高卢（罗马对那里的占领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部落威胁着高卢的稳定）和叙利亚（那里在历次内战中饱受骚扰，并且受到邻国帕提亚的威胁）。他还保留了对埃及的控制权，理由或许是它前不久才刚刚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元老院投票决定将上述各地区交给他管理，为期十年。不过他强调说，如果他能更早地将这些地区彻底平定下来，就会早一些把部分地区归还元老院。其余行省则由元老院监管。

恺撒控制的各行省包括罗马军队的大部分。马其顿驻扎着一些军团，克拉苏近期在那里的成功意味着它不属于脆弱的行省之一，因此不需要恺撒的直接监管。阿非利加也有几个军团。除此之外，元老院控制的行省没有多少军事力量。驻扎马其顿和阿非利加的士兵可能继续向恺撒宣誓效忠，几年后肯定还是这样。

新体制的一些细节是在这些日子里定下来的，也有一些细节是后来确定的。恺撒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所以他挑选部分军团长去掌管其庞大辖区的部分地区。这些军团长控制的地区范围，以及他们的决策权，都与过去的行省总督完全相同，但是只拥有上级委派的军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元老院行省的总督是资深执政官，从前任行政长官中选拔，拥有独立的军权。元老院行省的总督的服饰和标志都是平民化的（在这些早期岁月，马其顿和阿非利加的总督可能除外），而元首委派的军团长则佩带利剑，身披军服斗篷。元老院行省和帝国行省的总督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人们可以在这两个类型的职位之间转换。在埃及以外，恺撒选拔一些元老来担任他的军团长，为他统治各行省。这能保证元老院阶层的人有更多机遇。在自己家族的声望之外，人们还可以赢得新的荣誉，虽然军团长们得到的荣誉和头衔与资深执政官（他们拥有独立军权）略有不同，但毕竟也算荣誉。在新体制下，贵族互相竞争，超越他人以赢得名望的冲动仍然起着作用。[36]

恺撒超脱于竞争之外，因为他的地位至高无上，没有人与他平起平坐。军团长由他挑选，所以他控制着所有那些得到主要军事指挥岗位的人。马其顿和阿非利加的资深执政官级别的总督只具备有限的独立性。这两位总督很可能不被允许征募新兵，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得到自己指挥的军队的忠诚，也没有能力去抵抗控制其他所有军队的人（恺撒）。每一位元老的政治生涯的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能否讨得恺撒的欢心。

没有人会怀疑，恺撒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为期十年的特别指挥权很像之前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曾享有的指挥权。这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公众形象：一位人民公仆为了广大群众的福祉承担着重任。人民不大可能对此有任何顾虑。历史证明，特别指挥权能够更高效地处理问题，比将一位野心勃勃的行政长官换为下一位的传统模式更高效。一些元老可能也是这么想的，甚至那些没有机会参与体制的人也是这个看法。只要恺撒还控制着绝大部分军队，国家就无别路可走。狄奥玩世不恭地写道，恺撒“被说服”担任国家要职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包括让元老院发布一条法令，为他的禁卫军大队提高军饷。这种说法没有足够的证据，但禁卫军士兵的年薪可能是375迪纳厄斯，而普通军团士兵只有225迪纳厄斯。一共有9个禁卫军大队，所以总兵力比一个军团（10个大队）的名义兵力要弱一点，其中几个禁卫军大队定期驻扎在罗马城或城郊。这种做法与尤利乌斯·恺撒不同，后者于前44年初解散了自己的卫队。恺撒的最高统治地位的终极保障仍然是武装力量。[37]

1月13日，尤其是15日和16日元老院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恺撒歌功颂德，以及授予他新的个人荣誉。在这方面，大家能够真正独立地去决定歌颂礼赞的细节，不过整个辩论无疑仍然是恺撒主导的，因为他决定元老们发言的顺序，事先还给一些元老提过醒。很快大家就决定授予恺撒一个额外的名字，以象征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往昔，以及未来对国家的贡献。有人建议称他为“罗慕路斯”，永久性地将他与罗马的创立者联系起来，因为他复兴了罗马，相当于重建了罗马城。

罗慕路斯不仅是罗马城的创立者，还是罗马的第一位国王。根据一个传说，他最后没有死亡，而是升天成神。但罗慕路斯有些地方就不是那么值得歌颂了。罗马城的建立是从兄弟相残开始的，罗慕路斯用铁锹杀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对于经历了这么多内战的一代人来说，罗慕路斯的这些举动令人不安。根据另一个传说，罗马第一位国王的消失不是那么光彩，他是被一群元老活活撕成碎片的。过了一段时间，元老院不再打算将恺撒命名为罗慕路斯。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恺撒本人及其亲密谋士很喜欢罗慕路斯的名字，如果这是真的，他们一定在某个时候改变了主意。大家非常公开和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这能够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气氛。元老们热切希望向如此强大的人授予荣誉。不管大家是否喜欢他和他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怀疑他的至高无上性。[38]

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提出了一个建议。此人曾把自己的皮肤涂成蓝色并穿上鱼尾，为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跳舞，后来投奔恺撒，带来了关于安东尼遗嘱的消息。最终元老院对他的提议进行了投票表决。普兰库斯建议了“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元老们纷纷站到他身旁表示同意，这个提议以绝大多数票（或许是全票）通过。主持会议的执政官现在正式成为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此前没有一个罗马人有过这样的名字。我们今天已经熟悉了这个名字，所以容易忘记它在当时是非常新颖奇特的。“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与一种非常罗马式的传统——通过观鸟占卜寻求神的指导和认可——有着紧密联系。罗马最早也最受尊重的诗人恩纽斯[39]曾写道，罗马城是通过“威严的观鸟占卜”建立的。罗马人对他的这段诗句耳熟能详，就像今天我们对最有名的莎士比亚诗句如数家珍一样。

恺撒·奥古斯都（有时为了着重强调，也可称为奥古斯都·恺撒）独一无二。与他的十年指挥权不同，新名字是一项终身荣誉。人民很难想象，或许根本无法想象，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有一天会退隐，或者其他人的荣耀、威望和地位能够接近他。历史上的先例，如

庞培的特别指挥权和他从前54年起遥控指挥西班牙各行省的做法，都与恺撒·奥古斯都的地位相去甚远。过去曾有人赢得了辉煌的名字，如苏拉被称为“菲利克斯”（幸运的、有福的），庞培被称为“伟大的”，但从来没有人拥有“奥古斯都”这样光辉和神圣的名字。只有尤利乌斯·恺撒曾拥有可与他媲美的权力和地位。后世一般习惯将他的继承人称为奥古斯都，而非恺撒·奥古斯都，这就掩盖了两人相似的政治地位。

后来罗马人民又投票决定授予他一项新的荣誉，即在尤利乌斯议政厅陈设由黄金制成的“美德之盾”，以赞颂他的美德、公正、宽宏、敬神和爱国。《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将此荣誉与授予“奥古斯都”名号的决定相联系，但“美德之盾”的荣誉可能来得较晚，或许是在授予“奥古斯都”名号一周年时。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保存着“美德之盾”的一个复制品，带有明确的年份，即前26年，他第八次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这个复制品最初是各行省的陈设品之一，当时还有很多带有CLV（culpeus virtutis，美德之盾）字样的钱币。这让人回想起尤利乌斯·恺撒得到的类似赞扬，所以应当是有意为之。[40]

恺撒·奥古斯都在国内拥有个人化的、永久性的崇高地位，在过去只有他的养父能够与他相提并论。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他继续每年都担任执政官。恺撒将权力移交给元老院，然后元老院立即将权力交还给恺撒的作秀是非常重要的，比前44年牧神节传达的稀里糊涂的信息[41]更成功。我们不应当聚焦于恺撒·奥古斯都在自我形象展示和行为上与其养父的少许差别，而忽视了二者之间极大的、非常公开化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兑现了自己少年时的承诺，即赢得养父的荣誉和官职。尤利乌斯·恺撒曾不屑地说共和国“不过是个虚名，没有实质，没有形态”，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在何时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又是在何种语境下发表的。他的继承人更有策略，避开了已经被废止的独裁官头衔，但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区别仅仅是表面上的。恺撒是“神之子”，这个名号以及“恺撒”的名字始终在展示他与被害的尤利乌斯·恺撒

之间的关系。装饰罗马城的与他有关系的纪念性建筑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尤利乌斯·恺撒在世时歌颂他的建筑。[42]

两人的行为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4年曾计划离开罗马、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而恺撒·奥古斯都在获得前文所述的荣誉之后也打算离开罗马，到他在西方的行省待上几年。这年末尾，他到了高卢，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在何时离开罗马的。有人说他是刻意在克拉苏于7月举行凯旋式时回避，这种说法没有很充分的根据。克拉苏的凯旋式并非本年度的唯一一次，因为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在9月也庆祝了凯旋式。前28年的几次凯旋式举行时，恺撒都在罗马城。如果在克拉苏沿着圣道游行之前恺撒便离开了罗马，那是因为他想在本年度结束之前启动在各行省的工作。少年马凯鲁斯与提比略陪伴在他身边，担任军事保民官，第一次去汲取从军经验。青少年跟随亲属去外省，以这种方式学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较不寻常的是，李维娅可能陪伴丈夫一同前往。在他们婚姻生活的余下时间里，他经常外出，她也习惯于陪伴在他左右。过去，总督夫人一般会留在家中，所以屋大维娅陪同安东尼去雅典时，大家会感到惊讶。奥古斯都·恺撒也会无视这种旧传统。[43]

---

[1] *Res Gestae* 34（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modified）.

[2] Velleius Paterculus 2.89.3.

[3] Dio 51.21.3-4，*Res Gestae* 15.狄奥说阿格里帕得到了一面深蓝色旗帜的赏赐。我们不确定这是否就是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之后他得到的那面旗帜，还是新的荣誉，见Suetonius，*Augustus* 25.3；关于殖民，见P.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pp.332-44，及L.Keppie，*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 47-14 BC* （1983），尤见pp.58-86。

[4] 希腊艺术家，可能活跃于前330年代。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的肖像就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5] Dio 51.22.1-4，Crook in *CAH2* X，pp.75-6，及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79-82。

[6] Dio 51.22.4-9，*Res Gestae* 22讲到恺撒的竞技会；Dio 51.23.1讲到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和挑选裁判官的特别荣誉。

[7] Dio 53.1.1-2，with E.Stavely，‘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Historia* 12（1963），pp.458-84，尤见466-8，F.Millar，‘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JRS* 63（1973），pp.50-67，esp.62。

[8] Cicero，*ad Fam* .6.18.1，*Philippics* 11.5.12，13.13.27，Dio 43.47.3，Suetonius，*Caesar* 76.2-3，80.2；尤利乌斯·恺撒的新元老的来源，详尽讨论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78-96；尤利乌斯·恺撒死后的时期，见J.Osgood，*Caesar's Legacy.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pp.257-60，283-8；逃奴当上官，见Dio 48.34.5。

[9] 首席元老原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荣誉职衔，后来在屋大维所创建的元首制度中，该职衔即是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

[10] Dio 52.42.1-5，Suetonius，*Augustus* 35.1-2，*Res Gestae* 8.

[11] Caius Calvisius Sabinus战胜西班牙人的凯旋式在5月26日，Caius Carrinas战胜高卢人的凯旋式在7月6日，Lucius Autronius Paetus在阿非利加取得的胜利凯旋式在8月16日。

[12] Tacitus，*Ann* .3.28 ‘*non mos*，*non ius* ’；三头同盟恢复国家秩序的作用，概况见C.Lange，*Res Publica Constituta.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2009），*passim* 。

[13] Dio 53.2.3，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83-6，Crook in *CAH2* X，pp.76-7.J.Liebeschuetz，‘The settlement of 27BC’，in C.Deroux，*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008），pp.345-65.

[14] 选举见A.Jones，‘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1955），pp.9-21，esp.11；国库，见Dio 53.2.1，3。

[15] 建筑工程，见*Res Gestae* 20，Dio 53.2.4-6，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83-4，概况见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101-36.

[16] Dio 53.1.4-6.

[17] 屠牛广场在卡比托利欧山、帕拉丁山和阿文廷山之间靠近台伯河的地方，是罗马城的主要码头，也是贩卖牛肉的集市。

[18] Dio 53.1.3，with 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1988），pp.65-71，240-54，及T.Wiseman，‘*Conspicui Postes Tectaque Digna Deo*：the public image of aristocratic and imperial ho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in *L’Urbs.Espace urbain et histoire*（1987），pp.393-413，尤见399-407；对阿波罗神庙的近期研究，见S.Zink，‘Reconstructing the Palatine temple of Apollo：a case study in early Augustantemple design’，*JRA* 21（2008），pp.47-63。

[19] Purcell in *CAH2* X，pp.787-8，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1988），pp.66-71；Velleius Paterculus 2.86.2.

[20] 那个最有名的克拉苏（前三头同盟成员，巨富，曾镇压斯巴达克斯，死于远征帕提亚时）的孙子。

[21] Dio 51.23.2-27.3，Livy，*Per* .134.

[22] Dio 51.25.2，with J.Rich，‘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Chiron* 26（1996），pp.85-127，尤见95-7，概况见T.Barnes，‘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JRS* 64（1974），pp.21-6。

[23]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268～前208年），五次当选执政官，是高卢战争（前225年）和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年，对手是汉尼拔）的名将和英雄，曾与敌军领袖单挑并将其杀死，获得了罗马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征服了叙拉古城，发明家阿基米德就死于那场战役中。

[24] Livy 4.20.5-7（Loeb translation）；对“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详尽讨论，见H.Flower，‘The tradition of the spolia opima：M.Claudius Marcellus and Augustus’，*Classical Antiquity* 19（2000），pp.34-64。

[25] 关于家庭，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424，496-7。

[26] 克拉苏要求“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但被拒绝的理论，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308-9及‘Livy and Augustu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4（1959），pp.27-87，尤见43-7，Crook in *CAH2* X，p.80，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p.87-8，Millar（1973），p.62，J.Richardson，‘*Imperium Romanum*：Empire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JRS* 81（1991），pp.1-9，尤见8；笔者在此问题上遵照了非常有说服力的E.Badian，‘“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in W.Wirth，*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1982），pp.18-41，尤见24-7，及J.Rich，‘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Chiron* 26（1996）。

[27] Suetonius，*Augustus* 28.1；阿格里帕与梅塞纳斯的辩论，见Dio 52.1.2-41.2，with F.Millar，*A Study of Cassius Dio*（1964），pp.102-18。

[28] 一般人眼中他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对比，如P.Cart ledge，‘The second thoughts of Augustus on the res publica in 28/7 BC’，*Greece and Rome* 31（1984），pp.30-40，尤见34-5，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17-18，E.Salmon，‘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Historia* 5（1956），pp.456-78，尤见459-62，K.Galinsky，*Augustus.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an Emperor* （2012），pp.63，152-3.此种理论包含了审视独裁官最后岁月和密谋者动机的许多文献。

[29] 内战的结束，见Macrobius，*Saturnalia* 1.12.35，概况见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81-2。

[30] Suetonius，*Augustus* 84，Dio 53.2.7与11.1讲到朗读演讲稿，53.3.1-10.8是狄奥的版本。

[31] “赫拉克勒斯双柱”是直布罗陀海峡南北两岸的巨岩，北面一柱是位于英属直布罗陀境内的直布罗陀巨岩，南面一柱则在北非，但确切是哪座山峰没有定论。根据希腊神话，这两大巨岩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所立，为他捕捉巨人革律翁之行留下纪念。赫拉克勒斯双柱之内的海洋即地中海。

[32] Dio 53.8.1-2（Loeb translation）.

[33] Dio 53.11.1-4.

[34] Dio 53.11.5-12.1.

[35] *Res Gestae* 34，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86-8及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91-4.

[36] Dio 53.12.2-16.3，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89-95，J.Liebeschuetz，‘The settlement of 27BC’，in C.Deroux，*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008），pp.346-53，E.Salmon，‘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Historia* 5（1956），pp.459-67，Cartledge，P.，‘The second thoughts of Augustus on the res publica in 28/7 BC’，*Greece and Rome* 31（1984），pp.31-8，J.Ferrary，‘The powers of Augustus’，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90-136，尤见90-99，A.Jones，‘The imperium of Augustus’，*JRS* 41（1951），pp.112-19，尤见112-14，及G.Chilver，‘Augustus and the Roman constitution 1939-1950’，*Historia* 1（1950），pp.408-35是很有价值的文献，介绍了到当时学术界的争论，涉及恺撒为自己地位的辩护。行省和战争的一般作用见J.Rich，‘Augustus，War and Peace’，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137-64，esp.153-7；贵族竞争的继续，见W.Eck，‘Senatorial Self-Representation：Developments in the Augustan Period’，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129-67。

[37] Dio 53.11.5，with G.Watson，*The Roman Soldier* （1985），pp.97-8讲到禁卫军的军衔，指出狄奥说的“双倍军饷”一定是粗略数字；对军队的控制，概况见J.Campbell，*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Army 31 BC-AD 235* （1984），*passim* 。

[38] 注意Horace，*Epodes* 7.17-20包含当时人的看法，即罗马被罗慕路斯杀害兄弟雷穆斯的罪行诅咒了；罗慕路斯和他的死亡，见Livy 1.16.1-4。

[39] 昆图斯·恩纽斯（约前239～前169年），常被认为是罗马的第一位诗人。他的作品大多已经失传，但对拉丁文学影响极大。

[40] *Res Gestae* 34，Suetonius，*Augustus* 7，Dio 53.16.7，Velleius Paterculus 2.91，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92-5，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95-100，R.Syme，‘Livy and Augustus’，*Harvard Studie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64（1959），p.59，及‘Imperator Caesar，a study in nomenclature’，*Historia* 7（1958），pp.172-88；对盾牌上美德的含义，以及这些荣誉全部曾被授予尤利乌斯·恺撒的详尽讨论，见S.Weinstock，*Divus Julius* （1971），pp.228-59。

[41] 前44年2月15日，罗马人庆祝牧神节。

[42] Suetonius，*Julius Caesar* 77.

[43] Suetonius，*Augustus* 24.1讲到他不愿意允许行省总督的妻子陪伴他们去行省；李维娅，见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34-7。

十三 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

记住，罗马人，因为这些便是你的技艺，你必须用力量统治各民族，维护和平繁荣，饶恕被征服者，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

——维吉尔，前20年代[1]

恺撒·奥古斯都离开罗马之前，雅努斯神庙的大门被再次开启，这意味着官方正式宣布的和平结束了。接受西班牙、高卢、叙利亚和埃及为自己行省的那个人要出征了，他开始了在这些地区恢复（罗马统治下的）秩序和稳定的工作。这将是在遥远国度开展的针对外国敌人的战争，所以不会威胁罗马本土的安定，不会让罗马回到近些年的动荡和混乱状态。这是为恢复共和国健康所做的努力，群众情绪高涨，大家兴奋地谈及要征服不列颠。

尤利乌斯·恺撒曾两次在不列颠岛登陆，理由是保障高卢的安全，因为布立吞人曾向欧洲大陆派遣武士，支援那里的酋长。前54年，不列颠东南的主要部落向尤利乌斯·恺撒投降，并同意向罗马纳贡。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先是高卢爆发大规模叛乱，然后又是漫长的多次内战，所以我们不知道不列颠部落是否每年都按时纳贡。由于尤利乌斯·恺撒的活动，过去被高卢中间商控制的市场向罗马商人开放了，到前1世纪末，这些商人将在泰晤士河畔的伦蒂尼乌姆[2]建立永久定居点。很多罗马人显然想要得到更多，他们热切希望正式将这个仍然充满异国情调的岛屿变成一个永久性的行省。诗人们将布立吞人描绘为与帕提亚人类似的敌人，罗马将其彻底征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理有据的。几年后，贺拉斯宣称：

布立吞人和可怕的帕提亚人

被纳入帝国之后，

奥古斯都将被视为人间的神明。

有时罗马人还说，印度人也必将臣服于罗马的伟大领袖，正如他们曾屈服于亚历山大大帝。战胜危险而稀罕的外族，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是最伟大的国家公仆为祖国做出的极佳贡献。[3]

大约在这一时期，不列颠东南部诸部落间的权力斗争似乎为罗马人提供了干预的良机。后来，泰晤士河以北的两个部落，卡图维劳尼人和特里诺文特人，主宰了不列颠东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两个部落的国王垄断了罗马商人带来的奢侈品贸易。奥古斯都在位期间，被打败的不列颠统治者逃往罗马帝国，请求奥古斯都运用他的影响力和军队，帮助他们实现复辟，这种情形至少有两次。在整个罗马史上，外国人向元老院或皇帝求援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一般只有在对罗马领导人有利的时候，求救者才会得到援助。

恺撒·奥古斯都可能考虑了向不列颠发动远征。他在高卢的阿基坦尼亚沿海地区集结了一批运输船，说明他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或许这只是紧急预案，或者是为了配合外交手段。最后事情的解决令奥古斯都满意。我们对具体细节不清楚，既不知道问题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解决的。总的来说，奥古斯都应当不大可能热切希望进攻不列颠。尤利乌斯·恺撒的先例表明，远征不列颠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收益有限，风险却很大。在前55年和前54年，他都因为风暴而损失了很多船只，几乎被困在岛上，被迫在敌对部落的包围之下，在没有补给物资和支援的情况下过冬。也很难摸清，远征不列颠究竟是多么大的挑战。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有一队罗马战船绕过不列颠北端，确认它是一个岛屿，并对它的真正范围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没有受到更严重挑衅的情况下，奥古斯都放弃了远征不列颠，表现出了他避免与帕提亚交战（除非不可避免）时的谨慎。诗人们会继续鼓吹征服不列颠和帕提亚，但目前恺撒·奥古斯都考虑的是其他事情。[4]

他从罗马去了高卢，花了几个月时间主持巡回法庭，接受请愿，并开始人口普查。尤利乌斯·恺撒征服莱茵河以西、远至英吉利海峡与大西洋海岸的所有领土，仅仅是一代人以前的事情，这些行省的最终形态还没有明确。即便如此，奥古斯都在高卢停留的时间也很短，该年年末到了塔拉科（今天的塔拉戈纳），即内西班牙行省的首府，不久之后被更名为塔拉科嫩西斯。在那里，前26年1月1日，他开始了自己的第八次执政官任期，这次的同僚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后者此时在罗马。奥古斯都去西班牙的借口是，西班牙西北部少数仍然保持独立的社区发生了骚乱。但他很可能早就打算去西班牙，在那里开启他的战争。[5]

在前3世纪末罗马与汉尼拔和迦太基的漫长斗争中，罗马军队第一次涉足西班牙半岛。罗马共和国在意大利之外的第一个永久驻军地就是西班牙，那里也是罗马人边疆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地区。这是一个棘手的地区，虽然有不少总督赢得了凯旋式，但也有一些总督的征战得到的只有耻辱。在各个战例中，罗马人运用的手段很少是光明正大的。缺乏正当理由的侵略、背信弃义和血腥屠杀是边疆作战的家常便饭。伊比利亚半岛的很多居民都是意志坚定且本领高强的战士。罗马人积极将他们招募为盟军，很早就将著名的西班牙短剑定为自己的武器。但罗马人很团结，而当地的各民族一盘散沙，于是罗马的内西班牙和外西班牙行省逐渐扩张，直到囊括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被坎塔布里亚山脉保护的地区除外）。前1世纪的西班牙也不安宁。罗马人和土著居民之间仍然有一些战争，但更糟糕的是前70年代和前40年代的罗马内战，西班牙的土著也被卷入了共和国的兄弟相残。有时内战非常野蛮。考古学家在巴伦西亚发掘出了庞培与塞多留[6]战争期间被毒刑拷打和处决的人的骨骸，而尤利乌斯·恺撒的一名军官写道，他的部下在一堵胸墙上挂满了敌人的首级。[7]

虽然发生了这样恐怖的事件，塔拉戈纳等城市还是欣欣向荣。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有着城市定居的悠久传统，希腊和迦太基的殖民地与商

埠和土著社区混杂。伊比利亚人的定居点发展起来，由长官和议事会领导着行政机构，至少已经有文字使用情况，不过用的是迦太基或拉丁字母。第二次布匿战争末期，一些罗马军人在西班牙定居，后来有更多人前来，特别是在前1世纪。其他意大利人和罗马人来到西班牙寻找商机，尤其是开发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金银矿。大量西班牙人作为盟军为罗马军队效力，其中一些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前89年的一份铭文记载道，一群为伟大的庞培的父亲作战的西班牙骑兵（约三十人）获得了公民权。庞培本人则更加慷慨地帮助曾经支持他讨伐塞多留的西班牙社区领导人获取公民权。其中一位受益者是来自加的斯的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他后来成为尤利乌斯·恺撒最信赖的亲信之一，并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之后为他的继承人提供金钱、人脉和辅佐。巴尔布斯于前40年获得补任执政官职位，他是罗马第一位出身外国的执政官。

加的斯是一个特别繁荣的贸易中心，当地有能力航海的地主已经在为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市场生产商品。橄榄油成为此地的主要出口商品，发酵鱼露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加鲁姆鱼露”。几十年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8]记载道，仅仅在加的斯就有多达五百人不仅是罗马公民，而且成为骑士。在意大利，除了罗马城之外，很少有一座城市拥有这么多骑士。其中一些骑士，比如巴尔布斯和他的同名侄子（后获得执政官地位，被任命为阿非利加总督）去了罗马从政。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家乡切断了联系。尤其是小巴尔布斯花了很多钱在加的斯举办娱乐活动和建造纪念性建筑。由于当地贵族、行省总督或恺撒·奥古斯都的慷慨捐资，其他城市也拥有了剧场和竞技场，得以分享共和国的音乐戏剧文化，以及角斗士表演的血腥品位。这些活动非常受欢迎，显然表明西班牙当地人普遍希望成为罗马人，或至少体验一下帝国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在获得公民权之前便改用罗马式的名字，尤其在南方，穿托加袍已经蔚然成风。在这些年里，当地铸造的铜币上不

再使用伊比利亚语言的铭文，而是只用拉丁文。[9]

在远离地中海海岸的地区，很多社区抵抗罗马的时间要长得多，再加上它们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们（或至少是当地贵族）接受罗马帝国统治的速度要慢一些。西班牙中部被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主宰，这是个有着鲜明特色的多民族集团，说一种与高卢人和布立吞人的语言类似的凯尔特语。古人认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是伊比利亚人与高卢入侵者的混血后裔，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不大可能是真的。除了语言之外，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风俗和工艺品似乎与同时代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凯尔特”社会没有什么共同点。在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居住地以北分布着阿斯图里亚斯人和坎塔布里亚人，他们分成许多单独的群体，往往居住在特定的设防山顶居民点。很少有罗马军队能够深入这些土地，也不曾有任何罗马人能够长期停留。三头同盟统治下举行的多次西班牙战役凯旋式，就是为了庆祝在这一地区赢得的胜利。[10]

我们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一些仍然独立的民族在袭击邻近的、罗马行省内的、更为定居化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在古典世界的很多时期，袭击掳掠都是常见的事情。在迦太基人或罗马人抵达很久之前，西班牙半岛就有了大量武器，说明在这两个入侵民族到达之前，西班牙土著民族之间就战火连绵。不过，迦太基人和罗马人通过直接冲突或贪得无厌地索取雇佣兵与盟军，深刻地改变了土著战争的形态和激烈程度。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征服和更近期的历次罗马内战，则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广大地区内的所有社会，让崎岖不平的坎塔布里亚山区原本就非常艰难的生存斗争更加难以为继。这一切肯定让掳掠貌似脆弱的邻居显得更有吸引力。[11]



西部各行省，包括西班牙和高卢

奥古斯都可能从一开始就打算攻打西班牙西北部，以完成对西班牙的征服。这项任务有着清晰的界限，似乎在仅仅几年内便可完成；虽然地形崎岖，不大可能很轻松，但风险不像进攻布立吞人或帕提亚人那样大，不可能造成大灾难。这并非一场针对充满异国情调或著名敌人的战争，但这一点或许恰恰是额外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向人民展示，恺撒·奥古斯都为了国家利益，愿意去承担不是那么光鲜的使命，并兑现他的诺言，即恢复他指挥下的各行省的秩序与安全。春季，他离开塔拉戈纳，北上与正在集结的军队会合。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发动进攻，“平定”坎塔布里亚人。

“指挥官宁要稳妥，不要勇敢”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仍然是一位军阀，他对国家的主宰，说到底还是取决于他掌握的军事力量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大。按照现代的标

准，他始终是一位军事独裁者，尽管他一直避免使用罗马意义上的“独裁官”头衔。虽然在前27年年初他做了一番表演，主动交出权力，然后不情愿地接受元老院“强加”给他的权责，但只要他仍然垄断着军队，就没有人能够强迫他做任何事情。军队都是他自己的，元老院没有掌管这些军队的实权，也没有权力征召和解散这些部队或其他部队。虽然奥古斯都会就士兵服役的具体条件向元老院“申请”，但元老不可能有权做真正的辩论，也不可能拒绝他的申请。在过去，军队的很多管理工作，包括大多数军事保民官的晋升、所有百夫长的任命和晋升，都被委派给具体的总督。现在仍然是这样，但对军队的绝大部分来说，这位总督就是奥古斯都本人。雄心勃勃的军官若想要一个锦绣前程，就必须赢得他的好感。[12]

军队把奥古斯都推到了主宰地位，最终也只有军队有希望遏制他的权力，所以对他来说，军队既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潜在的威胁。他必须防止任何人效仿自己，或者马略、苏拉、庞培及其儿子们、尤利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和其他大小军阀（正是这些军阀使得前1世纪动荡不安）。对于士兵的忠诚，不能想当然。恺撒·奥古斯都经历过一些哗变，对此有很深的理解。他不仅仅需要限制授予元老们的军权（每位统帅的任期只有几年，控制的兵力很少），还需要让军团及其军官们保持心满意足和忠心耿耿。

在亚克兴角大捷和彻底击败安东尼之后，当时存在的大约60个军团全都处于奥古斯都的控制下。很大一部分官兵曾为多位统帅效力。大多数年纪足够大的人曾向尤利乌斯·恺撒宣誓效忠，这在他们和他的继承人之间构建了一种强有力的情感纽带。但这还不够，急于退役的士兵的哗变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军团肯定只有个骨架，大多数军团的兵力都远远少于理论数字。即便如此，军队的总兵力仍然超过罗马历史上任何时期，包括与迦太基殊死搏斗的时期。长时期维持这样庞大的军队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非常危险，因为要让这么多人保持心满意足，是非常

困难的。[13]

因此，奥古斯都及其谋臣必须决定他们想要维持的军队的规模和形态。他们需要判断，要维护他的地位、抵抗任何潜在的罗马竞争者，需要多少兵力；以及要维持帝国、保卫和扩张各行省，还需要多少兵力。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帝国在邻国眼中显得软弱，在边疆和各行省内遭到挫折，那么凯旋将军奥古斯都的声望和权威就会遭到严重损害。这样的损害还不足以打破他的权力，但可能引发人们的反对之声，于是竞争对手就有机会崭露头角。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奥古斯都决定维持一支由26或27个军团组成的军队。具体数字无法确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中两个拥有较多兵力的单位是在何时组建的。有一个时期总数还达到了28个军团。军团数量被砍掉了一半以上，亚克兴角大捷之后恢复退伍军人殖民地的举措缓解了裁军的困难。到前29年，有12万退伍军人被安置到各殖民地，这相当于24个齐装满员的军团。到了退役时间、不愿意继续服役的人离去之后，剩余的士兵足以构成26或27个差不多满员的军团。[14]

我们对共和国最后几十年中兵役的细节不是很了解，但至少部分士兵只服六年兵役，或者到战争结束时便退伍，所以那些有资格退伍的人不一定是年纪很大的人。有些人把从军视为职业，会延长服役期，这在军官当中是很常见的。在前1世纪的动荡岁月里，原本很小的陆军职业军官团体迅速扩大。这些人主要担任军事保民官、各级长官和百夫长，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和专业技能。其中部分人是骑士，或者通过获取战利品而成为骑士。对这部分人来说，军队是晋升的垫脚石；对其他人来说，从军是获得良好生活条件与体面职业的手段。

要忽略这些人是不明智的，而且我们不应当仅仅考虑元老们的需求（即获得军事声誉），因为社会的其他阶层同样热衷于从军。很多军官是出身于意大利各城镇的乡绅。还有一些人因为退伍军人的安置，获得

了与其军衔相匹配的相当多的土地，因此成为乡绅，有资格进入当地的行政机构和城镇议事会。不管这样的人是否愿意继续从军，他们和与他们类似的人都热切希望，自己或者儿子仍然有机会从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征兵出现困难，这或许并非偶然。

26个军团不仅意味着约13万士兵有了生计，还表明提供了156个军事保民官和1560个百夫长岗位。差不多1个军团的禁卫军（禁卫军每一级别的军饷都比同级别的普通军官要高）也增加了岗位数量，越来越正式的辅助单位也为非公民士兵提供了更多晋升机会。辅助单位一般分为步兵大队或兵力相当的骑兵队，通常由罗马公民指挥，不过有时由组成该单位的民族中的贵族指挥。起初的常见做法是将这样一个辅助单位交给一名前任资深百夫长指挥。有一段时间，奥古斯都做了试验，让两名元老阶层的青年联合指挥一个辅助骑兵单位，希望借此让青年元老们积累一些指挥和管理骑兵的经验，为将来在军团中担任更高级职位打好基础。不过后来他越来越多地选择一位骑兵长官或军事保民官来指挥辅助单位。这意味着，骑士阶层成员能够担任的公职数量有了极大增加。骑士们担任这些公职时需要向元首宣誓效忠，从他那里接受衔级、薪金，以及未来晋升的机会和利益。[15]

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常备军是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满足骑士这个重要群体晋升的愿望，以及让这些人和其他想要从军的人为此忙碌。前63年，曾在苏拉麾下担任百夫长的一个人为喀提林集结了一支军队。而在内战中，这样的人为各支军队贡献良多，使之成为高效的武装力量。3世纪初的狄奥从一位元老的刻薄视角写道，梅塞纳斯建议奥古斯都大规模招兵，是为了防止无业青年盲流化。更大的危险是，这些青年可能加入竞争对手组建的军队。[16]

在构建新军队的过程中，集体自豪感和当前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共和国早期，通常的做法是每年为各军团重新编号，以便让执政官总

是指挥第一至第四军团。这种制度在前1世纪瓦解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各军团对自己的身份抱有特别的自豪感，不管他们后来是为李必达、安东尼还是为年轻的恺撒效力。安东尼的军团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迅速投奔恺撒，但不肯放弃原先的番号、名称和传统。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新组建军队的番号就没有遵循逻辑。番号为第四、第五、第六和第十军团的单位各有两个，番号为第三军团的单位多达三个。有好几个军团，比如第五“云雀”军团，仍然保留自己的旧名称（尽管他们与安东尼联系紧密），或许是因为他们曾忠诚地为尤利乌斯·恺撒作战。该军团继续将大象作为自己的标志，纪念自己于前46年在塔普苏斯击败庞培军队战象的功绩。[17]

第五“云雀”军团是在为西班牙西北部的战役做准备的6个军团之一。其他单位分别是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六“胜利”军团，或许还有第九军团（在这些年里赢得了“西班牙”的称号），肯定还有第十“孪生子”军团。我们知道还有第八“孪生子”军团和第十四“孪生子”军团，不过这两个军团没有参加西班牙作战。这三个“孪生子”军团都是由之前的两个军团结合而成的。组成第十“孪生子”军团的旧军团之一曾为安东尼效力，自称起源于尤利乌斯·恺撒的第十军团；在一段时间内，该军团保留了“骑士”的称号，这个称号源于前58年，当时士兵们短暂地骑马作战，并开玩笑说，长官打算把他们全部升为骑士。将两个单位融合为一个新单位，可以维持两个单位的自豪感，肯定比解散现有军团要强。[18]

官兵都被允许保留自己的传统，但这支新组建的军队不会像内战时期的军队那样，受到统帅慷慨的娇纵。士兵的服役期被延长了，不久之后士兵们将必须服满传统的十六年，才有资格在退伍时得到土地。有的时候，士兵们要再多服四年兵役，在这期间被称为老兵，可以不必承担某些工作，但必须留在军中，受到军纪约束。在过去，常常为了巩固士兵的忠诚而定期赏赐战利品和奖金，今后不再定期发放，而只是偶尔为

之，并且只有奥古斯都本人或其亲属可以这么做。这种态度的变化反映在称呼的变化上。内战期间，年轻的恺撒常效仿他的养父，将官兵称为“弟兄们”。前30年之后，这种亲热的称呼消失了，他只是简单地称呼他们“士兵们”。他坚持要求所有总督和指挥官（包括他的亲属）都这样称呼士兵。在西班牙，他像在伊利里亚一样，对部队严加管束。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有的百夫长遭到象征性的羞辱，被命令站在他的营帐外，有时手里拿着一块用来修建壁垒的泥炭，或者没有系腰带，于是他们长长的军服上衣一直垂到脚踝，就像女人的裙子一样。[19]

最高级军官也受到严密的控制。恺撒年轻时常常冒极大的风险，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他有时受到生命危险，最突出的就是在对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中。如今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已经成熟了。坎塔布里亚战役时他已经三十八岁，所以他更倾向于谨小慎微。苏埃托尼乌斯写道：

> 他认为，对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来说，最不得体的就是草率和鲁莽。所以他最喜欢的一些口号包括：“着急也要从容！”“指挥官宁要稳妥，不要勇敢！”以及“只要做得好，慢一点也无妨！”
>
> 他曾说，无论是一场战役，还是整个战争，都不应当草率地开始，只有在成功的希望明显大于失败的代价时才能开启。他说，那些为了少许利益而冒巨大风险的人，就像用金钩钓鱼，如果钩子丢了，无论捕到多少鱼都不足以弥补。[20]

指挥军队的罗马贵族知道自己的军事指挥岗位是短期的，急于为自己和家族增添声望，并且在罗马几个世纪屡战屡胜的经验之后志得意满，认为自己必然胜利。所以本能促使他们做出勇敢的，甚至是鲁莽的行动。奥古斯都不希望他的军团长以及少数有权指挥军队的元老资深执政官，仅仅为了获得荣耀和战利品（就像庞培或尤利乌斯·恺撒以及更早的许多其他统帅那样），就寻求毫无必要的战争，或者去冒惨败的风险。尽管奥古斯都远离战场，但军事失利总会损害他的形象。他在行省的权责极大，再加上享有结束内战、为国家带来和平的威望，所以他更

是不能接受失败。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不能承受太多的挫折，不管是他本人遭受的挫折，还是部下的失败。[21]

而且，如果是他本人或者阿格里帕和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这样的亲信（这些亲信与他联系紧密，他可以分享他们的光荣）之外的其他人赢得了太多光辉胜利，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危险。上文已经讲到，我们不太相信，奥古斯都曾公开阻止克拉苏获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而且克拉苏和其他很多贵族一样被允许举行凯旋式。今后很少有人会得到机会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非他们是恺撒·奥古斯都的亲信。即便如此，风险还是有的。大约在前26年，奥古斯都留在埃及掌权的那个人失宠了。骑士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成功，镇压了上埃及的叛乱，然后多次击败了袭掠罗马埃及行省的南方王国[22]，并掳掠其土地。但他庆祝自己的胜利时过于高调。有一份宣扬他胜利的铭文保存至今。据狄奥记载，伽卢斯还让人在金字塔上铭刻他的丰功伟绩。狄奥还说，伽卢斯放纵地侃侃而谈，说奥古斯都的坏话。这更增添了危险，因为狄奥很了解伽卢斯。伽卢斯曾有过判断失误的时候，比如将一名修辞学教师吸纳为自己的亲信，而此人在当阿提库斯的女儿的家庭教师时勾引过这个女孩。这名教师是个释奴，做出这种事情是非常不端的行为，而且这个女孩后来嫁给了阿格里帕，所以奥古斯都看到此人受到伽卢斯的欢迎，尤为恼火。[23]

和许多故事一样，伽卢斯倒台的细节很难说清楚了。指控他的是一个叫作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的人，他此前是伽卢斯的同僚，所以很可能享有元首一定程度的宠信。但具体情况不太明朗，而且大家都知道拉尔古斯常常发起凶残而没有根据的控诉。狄奥告诉我们，有个人第一次见到拉尔古斯，问拉尔古斯认不认得他。拉尔古斯说不认识，于是这人刻意将此事记录在案，免得拉尔古斯将来对他发出莫须有的指控。狄奥还告诉我们，奥古斯都内层圈子的另一名亲信（和伽卢斯一样也是骑士）有一次遇到拉尔古斯时立刻用手捂住自己的口鼻，这说明在拉尔古

斯面前呼吸也不安全。[24]

恺撒·奥古斯都不再宠信伽卢斯，免去了他的官职。我们不知道具体罪名，但可能是根据处置行省总督腐败罪行的法律来罢免伽卢斯的，在此之前骑士不会受到这种法律的制裁。但无论是职责还是权力，伽卢斯都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总督。现在元老院看到他受到用以制裁担任行省总督的元老的法律的惩罚，或许感到一丝安慰。埃及是重要的财源和谷仓，受到奥古斯都本人的严密监督。奥古斯都不会放过伽卢斯及其属下在埃及贪赃枉法的行为。或许这位骑士就像过去许多元老阶层的总督一样太肆无忌惮了，不过这只是猜测。

伽卢斯失去了奥古斯都的友谊，元老院将此视为恺撒对伽卢斯直截了当的敌视，于是积极地将他定罪并流放。伽卢斯陷入绝望，于是自尽。据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为此流下了眼泪，抱怨道，“只有他（奥古斯都）不能克制自己对朋友的怒气”。有人认为元老院的行动是联合起来和奥古斯都作对，但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或许这件事情表明了某些元老拼命讨元首的欢心，于是去做他们认为元首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元老院对伽卢斯的攻击是为了表明，即便是奥古斯都任命的骑士总督也不是法外之身。如果是这样，那么元老院的做法应当得到了元首的批准，或者至少得到了他在罗马的代表（如阿格里帕、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和梅塞纳斯）的认可。[25]

自传的最后一卷

奥古斯都全军兵分三路，各自沿不同路线进入坎塔布里亚山区。他的目标似乎是占领主要隘口、征服土著居民的主要设防定居点。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其中一些地点发生了激烈战斗和严重破坏，还发现了罗马人在这些战役中建造的一些临时营地。遗憾的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将任何考古发现的地点与古代文献中相关短暂记录（几乎是非常混乱的）中提到的地名对应起来。奥古斯都的自传以这些战争的胜利结尾，但在现

存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这部自传的蛛丝马迹。这次军事行动也没有关于个人功业和遇险的故事流传下来，但他遇到的最大危险应当不是敌人造成的。这一年年底之前，他又患了重病，返回塔拉戈纳，在那里监督军事行动，直到行动于前25年结束。[26]

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打得相当坚决，有故事说被包围的武士宁愿自杀也不投降。现代人有一种强烈的、容易让人进入误区的本能，觉得任何时期西班牙发生的战争都是游击战。在这样崎岖多山的地区，伏击战肯定能发挥作用。根据史料记载，敌人曾企图伏击罗马军队，但一个盟友社区的人向罗马人告密，于是罗马人迅速支援了受到威胁的部队，击败了敌人。但有一些战斗的规模肯定很大，也有为数众多的攻城战。罗马军队损失相当大，因为并非每一次交战都是罗马人取胜，而且即便是攻打一座有围墙的小村庄，对攻击者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在某个时间，一支载着大量士兵的舰队从高卢的阿基坦尼亚起航，在西班牙北部海岸进行了一次或多次登陆，在敌人被主力部队缠住的时候发动了进攻。[27]

西班牙的作战与在伊利里亚山区的行动有相似之处，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两次战争分别有多少人参加。我们也不清楚，罗马人在一个战区吸取的经验教训有多少能被传达给其他部队。这些战役中建造的临时营地符合共和国时期军队的传统，善于利用地形地貌。虽然营地的内部结构肯定是井然有序的（早在前3世纪，希腊人就很仰慕罗马军营的组织有序），但还没有发展到几十年后那种标准的纸牌形状布局和相当标准化的内部结构。和服役条件一样，罗马军队的日常规程和操练模式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被设计引入的，而是奥古斯都在世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不断增添新的规则。[28]

与之前的军事行动一样，罗马军队在穿过谷地和隘道时总会尝试控制高地。他们建造了15英里长的围墙，将敌人的一座要塞团团围住，令

守军插翅难逃。这场战争严酷、有条不紊，不是很辉煌壮丽，但它给了官兵们赢得荣耀、获得晋升或得到其他奖赏的机会。第一和第二军团都获得了“奥古斯塔”的荣誉称号，至少第二军团还将奥古斯都的星座摩羯定为自己的符号之一。[29]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之后，罗马军队终于获得战争胜利。捷报传到罗马，要再一次关闭雅努斯神庙的大门。奥古斯都被赞颂为凯旋将军，元老院投票授予他一次凯旋式。他接受了荣誉称号，但谢绝举行凯旋式，并且后来再也没有庆祝过凯旋式。他这个姿态实际上是宣布他已经赢得了太多荣誉，不需要更多的个人荣耀，也不需要再一次在罗马市中心游行。像阿格里帕一样，他将继续为了国家福祉而不计酬劳地辛勤工作。至少奥古斯都没有得到传统荣誉的报酬。实际上宣布最终胜利的消息有些过早了，奥古斯都刚刚离开西班牙，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就又一次开始作战。随后是更多的战役，最终的高潮是前19年阿格里帕非常高效地（尽管残酷无情）打垮了敌人。即便如此，战事在起初也没有完全向有利于罗马人的方向发展。第一“奥古斯塔”军团由于某些失败而被剥夺了荣誉称号。它后来在日耳曼边境长期作战，赢得了“日耳曼”的称号。[30]

前25年1月1日，奥古斯都在塔拉戈纳第九次就任执政官。他可能一度离开塔拉戈纳，去亲自接受一些坎塔布里亚领袖的投降，但他的病情仍然严重，所以不大可能奔波劳顿。但这也不意味着他闲坐无事。我们知道外省有好几个使团去了罗马城，拜见元老院之后前往塔拉戈纳觐见奥古斯都。使团肯定不止几个。请愿者来自帝国各个角落，希望奥古斯都答应他们的请求。[31]

外省居民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机会见到奥古斯都本人。他的肖像则是另一回事，后来比任何其他神祇或凡人的肖像都更常见。罗马人铸造了一些纯金或纯银钱币，上面有他的头像或与他有紧密联系的符号。他的

名字被镌刻在纪念碑上，雕像被竖立在意大利和外省各地。这些雕像是理想化的奥古斯都，英俊、威严而魁梧。雕像表现的奥古斯都永远青春英武，或者更妙的是，永远是他年富力强的状态。没有一幅中年或老年奥古斯都的肖像。

这并不是说，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终有一死的凡人（何况他还经常抱病），对自己家族的未来漠不关心。马凯鲁斯和提比略在陪伴他去西班牙之前都已经穿上了成年人的托加袍，正式成为男子汉。西班牙战役让他们尝到了军事生涯的滋味，李维娅的儿子后来非常喜爱军旅生活。对年轻贵族来说，联姻是他们雄心壮志的一个重要部分。奥古斯都自己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尤利乌斯·恺撒对他的收养，所以他知道，与他的大家族建立任何联系都是大事。如果李维娅在他身边，那么夫妻俩一定详细讨论了这些事情。对于绝大多数家事，他们一定进行了讨论。提比略被安排与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撒尼娅订了婚，而马凯鲁斯得到更大的优待，与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尤利娅订了婚。马凯鲁斯和尤利娅是表兄妹。虽然罗马贵族互相通婚、关系紧密，但表兄妹结婚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这又一次证明，尽管恺撒·奥古斯都大肆宣扬传统，但他不会让自己受到旧规矩的约束。[32]

---

[1] Virgil，*Aeneid* 6.851-3：*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Romane*，*memento*（*Hae tibi erunt artes*）*pacisque imponere morem*，*parcere subiectis et debellare superbos* .

[2] 就是今天的伦敦。

[3] Horace，*Odes* 3.5.2-4（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modified）；战争在奥古斯都公众形象中的作用和攻击帕提亚人、布立吞人和印度人受到民众支持，见J.Rich，‘Augustus，War，and Peace’，in L.de Blois，P.Erdkamp，O.Hekster，G.de Kleijn & S.Mols（eds），*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Impact of Empire*（*Roman Empire*，*c.200 BC-AD 476*）（2003），pp.329-57 = J.Edmondson（ed.），*Augustus*（2009），pp.137-64，尤见143-8；关于不列颠，见Caesar，*BG* .4.20，讲到了不列颠人对高卢人所谓的援助，关于这些行动的概况，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p.278-92。

[4] 概况见M.Todd，*Roman Britain* （3rd edn，1999），pp.15-22，G.Webster，*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rev.edn，1993），pp.41-74，及J.Manley，*AD 43 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A Reassessment* （2002），pp.37-50；关于环绕不列颠的航行，见*Agricola* 38。

[5] Dio 53.22.5，Orosius 6.21.1-11，Florus 2.33.46-59.

[6] 昆图斯·塞多留（约前123～前72年），罗马政治家和整个罗马史上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他青年时代在马略麾下屡建奇功，在马略、秦纳和苏拉的内战中支持马略和秦纳。苏拉得势之后，塞多留率军在西班牙坚持抵抗，后被庞培打败，最后被自己的部下杀害。

[7] 巴伦西亚的恐怖遗迹，见A.Ribera i Lacomba & M.Calvo Galvez，‘La primera evidencia arqueológica de la destrucción de Valentia por Pompeyo’，*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8（1995），pp.19-40，及Caesar，*Spanish War* 32；对罗马边疆和西班牙各行省的研究，见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尤见pp.199-236，及J.Richardson，*The Romans in Spain* （1996），pp.41-126；西班牙短剑的起源，见F.Queseda Sanz，‘*Gladius hispaniensis* ：an 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Iberia’，*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1997），pp.251-70及*Armas de la Antigua Iberia de Tartessos a Numancia* （2010）详细研究了西班牙的装备与作战。

[8] 斯特拉波（前64或前63～公元23年），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生于现在土耳其的阿马西亚（当时属于罗马帝国），著有《地理学》十七卷。

[9] 巴尔布斯，见Cicero，*pro Balbo* ，J.Richardson，*The Romans in Spain* （1996），pp.103，106，117，119，126，引用Cicero，*ad Fam* .10.32.3，阿西尼乌斯·波利奥尖刻批评了年轻的巴尔布斯在加的斯的行为；关于出生在西班牙的公民从政，见M.Griffin，‘The Elder Seneca and Spain’，*JRS* 62（1972），pp.1-19；关于在加的斯的骑士的人数，见Strabo，*Geog* .3.5.3；关于行省的经济与人口，见J.Richardson，*The Romans in Spain* （1996），pp.149-78。

[10] 关于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以及关于“罗马化”和“文化适应”正在进行中的考古学辩论，见L.Curchin，*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Complexity*，*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 Provincial Hinterland* （2004），尤见pp.69-143。

[11] 罗马人对西班牙的看法往往是非常简单的，至少那些没去过西班牙的罗马人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见Strabo in J.Richardson，*The Romans in Spain* （1996），对过时和怪异的描述的讨论以及更新的信息见pp.150-68；另请注意，狄奥写道一名土匪投降，最终得到奥古斯都的赦免和奖赏。Dio 56.43.3。

[12] 关于皇帝和将军的概况，见J.Campbell，*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

[13] 奥古斯都的新军队，概况见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32-54，H.Parker，*The Roman Legions* （1957），pp.72-92，及R.Syme，‘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JRS* 23（1933），pp.14-33。关于第二十一军团和第二十二军团的创建时间，有些疑问。第二十二军团是由加拉太国王的以罗马方式训练的士兵组建，这些士兵被罗马军队接纳后都得到了公民权。这可能发生在前25年加拉太国王驾崩后。

[14] 前29年共安置了12万退伍军人，见*Res Gestae* 15。

[15] Suetonius，*Augustus* 38.2.

[16] Sallust，*Bell.Cat* .24.2，28.4，30.1，56.1-2，59.3讲到前百夫长曼利乌斯为喀提林组建了一支军队，参见59.6敌对一方的指挥官佩特列乌斯则曾服役三十年，先后担任军事保民官、长官、军团长或裁判官；Dio 52.27.4-5；前44年安东尼招募前任百夫长，见第六章；J.Campbell，*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pp.101-9讲到百夫长的作用，及R.Smith，*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 （1958），pp.59-69。

[17] 见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34-40，尤见142-3。

[18] 关于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最新的著作见A.Morillo Cerdán，'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in A.Morillo，N.Hanel & E.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2009），pp.239-51，240，R.Syme，'The Spanish Warof Augustu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5（1934），pp.293-317，298-301，及R.Jones，'The Roman Military Occupation of North-West Spain'，JRS 66（1976），pp.45-66，48-52；关于*Caesar's Legio X Equestris* ，见*BG* 1.42及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137。

[19] Suetonius，*Augustus* 24.2-25.1；关于"弟兄们"和对军人的待遇，见J.Campbell，*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pp.32-93。

[20] Suetonius，*Augustus* 25.4.

[21] 对罗马将领的讨论，见A.Goldsworthy，'"Instinctive genius"：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in K.Welch & A.Powell（eds），*Julius Caesar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pp.193-219；对失败的责任，见Suetonius，*Augustus* 23，高卢和日耳曼的军事失败被认为是他的责任，尽管他并没有直接指挥。

[22] 指的是努比亚王国。

[23] Dio 53.23.5-7，*ILS* 8995，1l.4 ff，及Crook in *CAH2* X，pp.80-81；勾引阿提库斯的女儿庞贝尼娅，见Suetonius，*Gram* .16。

[24] Dio 53.23.6，24.1-2，讨论见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p.174-5。

[25] Suetonius，*Augustus* 66.2，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09-10，他

将此事与之前克拉苏的事情联系起来，理由是伽卢斯“可能”早在前28年就被从埃及召回了。但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狄奥给出的较晚的年代。

[26] 关于前26～前25年的军事行动，见近期的讨论，A.Morillo Cerdán，‘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in A.Morillo，N.Hanel & E.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2009）提到考古证据。更大范围的背景，见Gruen in *CAH2* X，pp.163-6.R.Syme，‘The Spanish Warof Augustu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5（1934）及‘The conquest of North-West Spain’，*Roman Papers* .vol.2（1979），pp.825-54，及D.Magie，‘Augustus’ War in Spain（26-25 BC），*Classical Philology* 15（1920），pp.323-39 仍然是对文字史料的有价值讨论；Suetonius，*Augustus* 85.1讲到自传，with J.Rich，‘Cantabrian closure：Augustus’ Spanish War and the ending of his memoirs’，in C.Smith & A.Powell（eds），*The Lost Memoirs of Augus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tobiography* （2009），pp.145-72；Dio 53.25.6-7讨论了奥古斯都的疾患。

[27] Orosius 6.21.1-11，Florus 2.33.46-59.

[28] A.Morillo Cerdán，‘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in A.Morillo，N.Hanel & E.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2009），p.243.

[29] Florus 2.33.50.

[30] A.Morillo Cerdán，‘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in A.Morillo，N.Hanel & E.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2009），pp.243-4；关于军团，见Dio 54.11.5 with 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38，157。

[31] 例如Orosius 6.21.19-20，Strabo，*Geog* .12.8.18，with Crook in *CAH2* X，p.82及J.Richardson，*Augustan Rome 44 BC to AD 14.The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e* （2012），pp.93-4强调了在奥古斯都在西班牙期间，塔拉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罗马世界的中心。

[32] 对李维娅作用的讨论，见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27-9。

十四 “最强大权力的头衔”

> 罗马人民！不久前还冒着生命危险去追寻胜利桂冠的恺撒，如今像赫拉克勒斯一样，从西班牙海岸凯旋归国。让他的夫人，那位为了自己无可比拟的卓越夫君而欣喜的女士，以及我们敬爱领袖的姐姐，向正义的神祇做恰当的献祭……
>
> ——贺拉斯，前24年，描述恺撒·奥古斯都从西班牙归来 [1]

从西班牙回国的旅程耗时甚多。奥古斯都又一次病倒，可能是近些年来多次困扰他的那种疾病复发了。人满为患的罗马大都市被认为是一个不卫生的地方，所以他遵循贵族的习惯，在康复时远离罗马城。到前24年1月1日，他可能已经在意大利，但没有赶到罗马亲自开始自己的第十次执政官任期。但元老院仍然宣誓要服从他所有的正式举措，并批准了他的“请求”，即向每一位罗马公民发放4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礼金，他的每次凯旋式都会如此慷慨地赏赐公民。元老们投票授予元首更多荣誉，其中一些被他谢绝。 [2]

这一次奥古斯都的同僚执政官是盖乌斯·诺巴努斯·弗拉库斯，此人是腓立比战役中一位高级将领的儿子，还娶了小巴尔布斯的女儿。阿格里帕和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仍然在罗马，梅塞纳斯也在，所以罗马城有好几位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富得流油且有权有势的下属，足以保证一切令奥古斯都满意，尽管这几个人并没有正式官职。陶鲁斯家中豢养着一大群身强体健的日耳曼奴隶，不过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用这些力量去强迫他人的意志。尽管至少有几个大队的禁卫军之前陪同元首去了西班牙，城内肯定还留有一些禁卫军。所以，恺撒的支持者在罗马城有一些随时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 [3]

更重要的是，阿格里帕正忙于一系列宏伟的建筑工程，为人民提供了许多待遇不错的工作岗位，并持续地宣扬奥古斯都的光荣以及他的胜

利为人民带来的和平。前26年，战神广场上新的投票围场（更名为尤利乌斯围场，这是为了纪念尤利乌斯·恺撒，但更是为了纪念他的养子）竣工并正式开放，地面铺着大理石，装饰着许多精美的雕像和图画，围场的很大一部分都设有天蓬，投票者可以享受荫凉并欣赏艺术品。围场附近是公共浴场和一个操练场、一座奉献给尼普顿的会堂[4]（这是为了纪念在瑙洛库斯和亚克兴角取得的胜利），还有一座华丽的神庙，后来被称为万神殿，因为它里面供奉着所有主要神祇的雕像。阿格里帕起初打算在万神殿内陈设一座奥古斯都雕像，并将建筑命名为“奥古斯都神庙”，但元首认为这太容易让人觉得自己被神化，于是谢绝了。这个故事当然完全可能是奥古斯都刻意设计出来宣扬自己多么谦逊的。神圣尤利乌斯·恺撒的一座雕像被摆放在万神殿内，而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的肖像装饰着入口门廊，与诸神雕像保持一个安全的、充满敬意的距离。入口上方的三角楣饰很可能饰有橡叶冠雕塑，这又一次提醒大家，奥古斯都对公民同胞们做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

一个半世纪之后，哈德良皇帝在原址重建了万神殿，但改变了它的朝向，今天游客能看到的就是这座带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穹顶的宏伟建筑。阿格里帕的万神殿设计得更传统，不过规模仍然非常宏大。哈德良保留或翻新了原先的铭文，所以阿格里帕的名字被雕刻在建筑正面，这生动展示了罗马人翻新一座建筑，既增添原先建造者的光荣，也提高翻新者的荣耀。当然翻新工程对翻新者的益处更大，因为竣工时他仍然在世。阿格里帕在战神广场的工程为罗马人民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同时为他们提供了实用而豪华的生活便利设施，这延续了十年前他担任特别市政官时开创的事业。后来，浴场得到扩建。前19年建造的新高架渠——维尔戈水道——改善了浴场的供水。会堂为举行公共事务提供了更多空间，但和其他工程一样，建筑的功能与审美融为一体。会堂的装饰很多，其中有一幅描绘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阿尔戈英雄的著名图画。公开陈设著名的艺术品是非常鲜明的平民派作风，帕拉丁阿波罗神庙的公共图书馆也是这样，因为它们让广大群众能够享受到原本只有富人才能

享有的东西。但与之前的政治家不同的是，阿格里帕从来不会仅仅宣扬自己的成就，而总是尽可能增添奥古斯都的荣耀。他的建筑工程总是颂扬奥古斯都的胜利所带来的和平。[5]

奥古斯都持续获得新的胜利。雅努斯神庙大门在仅仅几年后又一次关闭，公开宣布元首带来了新的成功。在共和国多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的仪式仅仅执行过两次，但我们很难确定当时有多少人知晓这个事实，而且他们还不知道，宣布西班牙和平有些为时过早。其他行省传来的消息都很好，奥古斯都的将军们在南征北战。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都传来了捷报。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的生涯虽然以耻辱告终，但他的胜利无疑是货真价实的。接任他的艾利乌斯·伽卢斯也是一名骑士。到目前（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奥古斯都似乎已经决定对埃及施加特殊待遇，让一名骑士阶层的长官，而不是元老阶层的军团长，来统治埃及。[6]

奥古斯都向艾利乌斯·伽卢斯下达的指示是直白坦率且咄咄逼人的。艾利乌斯·伽卢斯向阿拉伯福地（阿拉伯半岛的西北角，那里的居民凭借香料、宝石和丝绸等奢侈品的中转贸易发了大财）[7] 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伊始，他的许多船只因在红海遭遇风暴而损毁，此后的进展也很不顺利。罗马军队很难适应沙漠条件，步履艰难，因为交战而损失的人很少，因为干渴、中暑和疾病而死亡的人却很多。艾利乌斯·伽卢斯选择了错误的路线，他后来责怪并处决了提出此建议的盟友。但我们很难说这位盟友是故意坑害罗马人，还是仅仅庸碌无能。罗马人占领了好几座要塞，但饮水耗尽，不得不放弃对最后一座要塞的围攻。艾利乌斯·伽卢斯及其将士虽然缺乏技巧，但表现出了顽强的意志，撤退时比进攻时更顺利。

此次入侵无疑是个失败，而且代价高昂，但战场离罗马非常遥远，而且规模不大，顶多只有两个军团的部分兵力以及一些辅助部队和盟军

参加。与尤利乌斯·恺撒的不列颠远征（建树甚微，但得到了罗马群众的疯狂赞颂）一样，阿拉伯半岛充满了异国情调，神秘莫测，是罗马军队不曾涉足的国度。奥古斯都宣布此次入侵取得了胜利，没有人过分关注真相。没有一位元老参加此次远征，艾利乌斯·伽卢斯的继任者普布利乌斯·佩特罗尼乌斯发动远征时，也没有元老随军行动。佩特罗尼乌斯率领埃及行省驻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沿着尼罗河南下，在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赢得了一些胜利。埃塞俄比亚人的一座主要城市被攻破，于是罗马人宣布对遥远的异邦民族取得了又一次胜利，这一次是真实的胜利。[8]

在海外的成功（尽管其中有些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成功）加强了国内的稳定。元首似乎在兑现他的诺言，即为他管辖的各行省带来秩序，不管他是亲自出马还是派遣部下行动。如果执政官之一长期不在罗马，对罗马的日常管理造成了困难，那么就要想办法来应对。事情并非始终顺利。前26年，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他的父亲是执政官，他本人则是前32年的补任执政官），以及一个曾支持“解放者，后来又支持安东尼的人”被任命为罗马城长官。尤利乌斯·恺撒恢复了这个古老的职位，选择几个人在他远离罗马期间负责罗马的行政管理。除此之外，这个职位只出现在共和国早期遥远而迷雾笼罩的年代。梅萨拉上任几天之后就辞职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职权”。有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解释是，他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被幕后的奥古斯都亲信弄得像一场骗局，于是辞职了。现代人还有一种解释是，他受到了其他不认可奥古斯都政权的贵族的压力，被迫辞职。但这两种解释完全是猜测。后来这个职位被再次启用，并交给了值得信赖的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9]

衰老、疾病和死亡

奥古斯都最终返回罗马的时候，已经快到年底了，他得以在新近修

缮完毕的道路上旅行。他本人曾为弗拉米乌斯大道[10]的修复工程出资，并鼓励其他元老，尤其是曾庆祝凯旋式的元老，去承担其他主要道路的工程。有一些元老效仿他的做法，但最后大部分工程还是恺撒·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承担的。这些工程将实用功能与强有力的视觉信息结合起来。路上的里程碑记载着修复道路的功臣的名字，而显眼的地点，如主要桥梁，则竖立着元首雕像。[11]

这些雕像非常优雅，表现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他的面庞没有任何衰老或压力的迹象，与近几十年来罗马十分常见的那种布满皱纹、下颌多肉的肖像形成了对比。但事实上恺撒·奥古斯都已经三十九岁了，受到重病困扰，以至于无法参加马凯鲁斯和尤利娅的婚礼。阿格里帕代表奥古斯都参加了这次婚礼。在很多场合都是阿格里帕代表奥古斯都出席的。没有人说得准，奥古斯都还能活多久，他本人也说不准。我们不知道他长期疾病缠身的原因，不过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患有肝病，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至少他的肝有一些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奥古斯都的疾病是假装的，为了吓唬广大群众，让他们觉得假如元首死了，内战就会再次爆发，于是大家会感激他的继续存在，并接受他的主宰。也有人说奥古斯都的疾病是心理或情绪上的侵扰导致的身体病痛，不过正如一位著名学者说的，“医生遇到自己无法诊断的疾病时，总喜欢说它是心理原因造成的”。[12]

对罗马贵族来说，培养下一代从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马凯鲁斯和提比略都在离开罗马城、陪同奥古斯都去西班牙之前接受了成人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亲属的幕僚中获取最初的军事和外省生活经验也是司空见惯的，只是他们获得军事保民官职衔时太年轻。不过，他们后来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一般情况。这两位青年在恺撒之前返回了罗马，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周里，他们为军团士兵主持了一系列竞技和娱乐活动，以庆祝战役的结束。后来，在前24年，元老院在奥古斯都的鼓励下，加快了晋升他们的速度。他们获得了元老身份，马凯鲁斯获得了前任裁判

官的衔级，并被允许在正常年龄的十年以前担任各级官职，包括执政官。提比略被允许比法律规定的年龄早五年担任官职。

秋季，两位十八岁少年第一次竞选官职。他们肯定得到了奥古斯都的公开支持，并且在拉票与投票的环节，奥古斯都很可能还亲自到场。和奥古斯都推荐的其他人选一样，此次竞选的结果没有任何疑问，马凯鲁斯当选为市政官，提比略成为财务官。虽然他们非常年轻，但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都来自非常古老和威望极高的贵族豪门。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比阿格里帕那样的人更容易被其他元老接受。

马凯鲁斯尤其得宠，得到了比提比略更高的官职，并且享有最大的荣誉：与元首的独生女结婚。但提比略得到的荣誉也是非常慷慨和不同寻常的，他的未婚妻维普撒尼娅是三次担任执政官的人的女儿，还是阿提库斯的外孙女。前23年，奥古斯都挑选李维娅的儿子为自己的财务官，并给了他一项特别的职责，即在他们前往罗马旅途的最后阶段组织粮食运输工作。提比略还奉命去调查很多乡村大庄园的奴隶营地，其中一些被怀疑非法囚禁无辜的旅行者，强迫其为庄园劳动。后来发现果然如此。这两项工作都很有意义，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给了提比略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做一些重要而得民心的公共事业。马凯鲁斯的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他作为市政官，负责主持竞技活动，在自己的舅舅和岳父，即元首本人的帮助下搞得有声有色、令人难忘。广场临时看台的上方搭起了凉棚，为观众遮阳，表演者中有一位拥有骑士身份的舞者和一位来自贵族世家的年轻女子。[13]

前23年，马凯鲁斯和提比略都是十九岁。恺撒·奥古斯都四十岁，第十一次担任执政官。与他一同当选的同僚原本应当是一个叫瓦罗·穆里纳的人，但后者于前24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去世了。接替穆里纳的是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此人曾在腓立比与奥古斯都敌对。皮索的家世很显赫，但自内战以来很少参与政事，据说曾拒绝别人鼓励他从

政。这一次他被说服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变主意，但这打破了近些年来的常规，即奥古斯都的同僚执政官全都是他的亲信。这或许是奥古斯都与皮索和解的姿态，或许是向大家保证，贵族世家的成员能够享有他们理应享有的崇高荣誉。[14]

这一年很不顺利，不过不是两位执政官的缘故，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合作，而是因为天灾。一场严重的疫病暴发，在意大利各地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且它在本年度和下一年度多次在罗马暴发。台伯河洪水泛滥，影响了罗马城地势较低的区域，引发了更多疫病。庄稼收成很糟糕，导致粮食匮乏。虽然提比略的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市场被严重扰乱，粮价飙升。为了赈济穷人，奥古斯都使用自己的资金，向在罗马城的25万公民发放了12份粮食或面粉（可能是一个月一份）。[15]

大家都觉得恺撒·奥古斯都已经时日无多。上半年某个时候，困扰他很久的肝病又发作了，病情非常严重。通常的治疗手段包括热敷，但这一次没能缓解他的痛苦。奥古斯都将高级行政长官、显赫元老和骑士阶层的代表召唤到自己病榻前，共商国是。谈话结束时，他将自己的图章戒指交给阿格里帕，但向自己的同僚执政官皮索汇报了当前军队和公共账目的状况。没有人提及马凯鲁斯。恺撒·奥古斯都非常刻意地没有指定继承人。要指定继承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权力和威望都属于他本人，而且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元首地位可以传给其他人。除此之外，马凯鲁斯年仅十九岁，正处于自己政治生涯的开端，即便奥古斯都本人也是在多年里逐渐获得其养父的地位的。如果恺撒·奥古斯都去世，那么阿格里帕是接管大部分军队的最佳人选，但他缺乏政治人脉，而且在过去愿意将大部分功劳都让给朋友，这些都是弱点。他不是恺撒家族的成员，根本就不是贵族，即便他控制了政权，也很可能需要用武力保住权力。

恺撒·奥古斯都顽强地生存着，不过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继续开

会，甚至不能做出重要决策。一位新医生被唤来照顾他，即释奴安东尼·穆萨，他和其他很多医生一样，可能来自希腊化世界。他摒弃了通常的疗法（热敷），改用冷敷和冷水浴。元首的身体逐渐好转，恢复了元气。不管是穆萨的疗法真正有效，还是奥古斯都自愈，他后来再也没有患过重病，也不再受到肝病的困扰。其他疾病，比如感冒，以及初春和9月（他生日前后）容易生病的情况，在大多数年份里都会发生，但看上去羸弱的奥古斯都还有三十五年的寿命。

穆萨凭借自己奇迹般的疗法，得到了痊愈的元首的丰厚赏赐。元老院举行了公共感恩活动，很快赐给这位医生额外的慷慨赏金，以及佩戴一枚金戒指的权利。元老院还让人制作了穆萨的雕像，将其摆放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雕像旁。穆萨和其他医生都被赋予永久免税的权利。消息传开之后，许多个人和社区举行了公共感恩活动，庆祝恺撒·奥古斯都恢复健康。[16]

至少在目前，国家安定得到了保障，即便那些不是非常喜欢元首的人也感到高兴。但人们对未来还是抱有担忧，有流言谈到马凯鲁斯为什么被忽略，这表明至少有部分人认为，奥古斯都如此厚待马凯鲁斯是准备让他接班。奥古斯都听到这些流言，很不高兴，因为这些说法对他原本非常正当、非常公开地交权给同僚执政官和老友的做法产生了消极影响。他身体恢复到足以参加元老院会议的程度后，便公开否认他在培养马凯鲁斯接班。作为证据，恺撒·奥古斯都带来了他所谓的遗嘱，并主动表示愿意宣读给元老们听，表明他的外甥除了正常的遗产之外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举动很有意思，让人联想到差不多十年前他公开安东尼遗嘱的事情。如果接受他的主动建议（即当众宣读遗嘱）就意味着大家不相信元首的话，需要看到证据，所以元老们迅速高呼，不肯让他宣读遗嘱。[17]

7月1日，奥古斯都离开罗马城，去往附近的阿尔班山，在那里辞去

了执政官职务。他处于罗马城的正式边界之外，可能事先没有走漏自己即将辞职的风声，避免了元老们“表忠心”或者广大群众迫使他收回成命的情况。他可能还宣布自己在近期内将不再担任执政官。执政官皮索迅速主持选举了一名补任执政官来接替奥古斯都。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候选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出现，而且奥古斯都可能已经鼓励卢基乌斯·塞思提乌斯参选。塞思提乌斯曾是布鲁图斯的财务官，为他效力，反对年轻的恺撒。尽管塞思提乌斯在腓立比战役之后投降并且得到赦免，但还是公开而热情地赞颂死去的“解放者”，家中存放着布鲁图斯的肖像，并定期哀悼他。奥古斯都选择这样一个肯定不是他亲信的人当执政官，得到了广泛的敬佩，尤其是贵族们的仰慕。和皮索一样，塞思提乌斯也被门阀贵族认为是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事实上，在随后十年中很多执政官都是贵族。这是奥古斯都恢复表面看起来正常的体制的又一个姿态。[18]

虽然奥古斯都不再担任执政官，但他掌管帝国所有关键军事行省的十年任期还没有过一半。他仍然享有极大的威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几乎垄断了武装力量，所以辞去执政官职务并没有削弱他的最高地位。但这种主宰地位如何以合法的方式表达出来，需要注意。他如今不再拥有执政官的军权，于是元老院迅速投票授予他永久性的资深执政官级别军权，授权他合法控制他的各行省以及各省驻军。一般来讲，当一位资深执政官离开自己的行省、跨越罗马的神圣边界进入罗马城之后，他的军事指挥权和司法权就正式失效了（除了他在凯旋式那天获得的特别授权之外）。而奥古斯都打算频繁地进出罗马城。为了避免每一次都要给他特别授权的麻烦，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宣布对他施加相应的豁免。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即便在罗马时也拥有永久性的资深执政官军权。而且他的军权被明确规定为优于任何其他资深执政官的军权。如果奥古斯都来到一个元老院行省，那么该省总督无权阻碍或推翻他的行动和决定。这种授权并没有将这些元老院行省交给他掌管，也不需要他

向总督们定期发出指示。和以往一样，他继续接收和答复这些地区的社区发出的请愿，他的决定也得到尊重。这既是因为他的威望极高，也是由于他拥有正式权力。

在过去，恺撒曾多次被授予平民保民官的部分权益和权力。前23年，这些权益和权力被恢复，或者范围得到扩大。他是贵族，根据法律是不能担任平民保民官的，尽管他在前44年的混乱中曾尝试竞选这个职位。自前36年起，他，以及屋大维娅和李维娅，都陆续获得了平民保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任何人胆敢以任何形式伤害他，都将被视为亵渎神明。现在他不再担任执政官，因此没有在城内处理政事的正式权力，于是他被授予保民官的权力，以便让他有权在城内处理政事。作为一名行政长官，保民官有权召集元老院或平民大会。奥古斯都还得到了以往任何保民官都不曾享有的一项权利，即在每一次元老院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19]

这些新权力的具体细节，以及为什么要授予他这些权力，目前仍然是非常有争议的学术讨论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回答，而且和几乎所有情况一样，我们对奥古斯都及其谋士的动机一无所知。这个计划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很难明确这些考虑是在他上一次患病之前还是之后进行的。执政官的职位很方便，也是传统的、显赫的权力的一种明显的表达方式。但在前23年，奥古斯都已经连续九年担任执政官，而且除了最初两年之外，他都任满一年任期。在前23年之前，他的同僚执政官主要是他的亲信。虽然这是一种合法公开地掌权与行事的有效方式，但意味着在这十年里，除了元首的亲信之外，任何人都不能攀登到元老政治生涯的巅峰。习惯性的辞职和任命补任执政官的做法令这个官职的尊严受损，表现了奥古斯都赤裸裸的主宰地位（因为他控制着这个体制），同时还要进行频繁的选举活动。[20]

狄奥说恺撒·奥古斯都希望给更多元老赢得最高行政长官职位的机

会，这可能是正确的。前23年之后，一连十年不再有补任执政官，而且后来即使出现了补任执政官，也是孤例。大多数担任执政官的人都出身贵族世家，但都很年轻，所以在内战（尤其是越来越遥远的腓立比战役）中都只是小角色。皮索和塞思提乌斯那样的人代表着旧的元老精英阶层，可能会公开支持“解放者”的事业，并希望恢复理想化的共和国（即由元老院指导，不受任何个人或派系的支配）。[21]

但他们也是二十多年来在三头同盟或恺撒·奥古斯都统治下生活过的人。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新政权，至少目前必须接受。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执政官的官方名录中，而且他们公开履行官职职责，这些都装饰了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恢复每年两名执政官的做法不仅是传统的，而且阻止了任何个人获得太多或永久性的影响力和权力，而这恰恰是执政官制度的初衷。不管执政官的威名多么显赫，他们都无法与恺撒·奥古斯都相提并论，后者十一次担任执政官，三次庆祝凯旋式，更多胜利的功劳也被正式归于他，而且他仍然掌控着所有重要的行省，并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继续起到积极作用。

尽管有人努力将这些年的事情解释为元老们联合起来与奥古斯都作对，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古斯都改变自己的正式地位是被人强迫的。很多元老肯定很高兴看到执政官职位的竞选可以在广泛的、恰当的候选人之中进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在随后几年里，百人会议的大多数选民持续在选票上写下恺撒·奥古斯都的名字，尽管他根本没有参选。这些选举实际上由当年的两名贵族执政官之一主持，并且竞争很激烈，据说存在普遍的贿选和一些暴力骚乱，就像之前几十年一样。奥古斯都总是谢绝再次当选，但很显然，许多人只在奥古斯都拥有公开权力以维持稳定、避免内战的时候，才感到放心。百人会议的投票由富人组成的百人团开始，往往也由他们决定结果，所以这并非一群粗鲁不羁的文盲贫民希望那个给他们娱乐活动和免费粮食的人继续掌权。[22]

对奥古斯都来说，让元老们相对满意是非常理智的做法，因为他需要借助这些人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工作。除了埃及之外，他的所有行省总督和指挥军队的下级军团长都是元老。这种体制需要不断有新的元老自愿为他效力，然后接受奖赏——荣耀、头衔和为自己与家族赢得声望的机会。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前23年，奥古斯都将裁判官的数量从传统的八人增加到十人，利用增加的两名裁判官来帮助管理国家财政。每年有两名新的执政官，再加上他自己的新权力，于是有了更多的高级行政官员，使他能够办成更多的事情。连续担任执政官对奥古斯都来说可能也很不方便，而且在他远离罗马时，给他的同僚带来了沉重负担。因此他做的这些改变是有充分理由的。[23]

更重要的问题是，恺撒·奥古斯都的权力在将来应当如何公开行使。他大病痊愈，说明他的未来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非常强调保民官权力，并在统治期间用他担任保民官的年数来确定年份。他的继承者延续了这种做法。塔西佗在2世纪初将保民官描述为“最强大权力的头衔”。但奥古斯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强调保民官权力的，而且用他担任保民官的年数来纪年的做法起初也只是图方便，因为再也不能用他担任执政官的次数来纪年了（自前30年起的很多年都是这么做的）。很多罗马人对平民保民官有着很深的感情，认为平民保民官是公民权益的捍卫者，所以这种联系对奥古斯都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罗马人不断尝试迫使元首当执政官，后来有一次甚至企图让他当独裁官，说明人们对奥古斯都当保民官这件事本身并不满足。[24]

这些年里，有迹象表明奥古斯都在努力掩饰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他放弃了之前的一项计划，即为他在帕拉丁山的宅邸建造宏伟的道路。通往他宅邸的道路将会从广场出发，从许多最豪华的贵族府邸门前经过，这些府邸的门廊上装饰着其主人或主人先祖的战利品和丰功伟绩的标志物。这样，元首就不是茕茕孑立，而是处于罗马城所有伟人的巅峰。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努力去掩饰自己远远超过其他人的荣耀和地

位。他的豪华宅邸胜过其他任何人的住宅，甚至胜过恢宏的阿波罗神庙；其他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居住在罗马如此多的古老而神圣的场所附近，比如罗慕路斯的小屋和牧神圣所（罗慕路斯和兄弟吮吸母狼乳汁之后被发现的地点）。这绝不是一位普通元老的住所，甚至不是一位元首（这个词原意是许多人的首领）的家宅。通往奥古斯都宅邸之路开始的地方——广场——立起了越来越多的纪念碑，以颂扬神之子、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25]

作为执政官，以及作为三头同盟成员，奥古斯都拥有正式的行政长官职位，以及相应的权力，唯一的约束就是紧急法律规定的他的两位同僚的权力，正是这项法律创建了三头同盟。前23年他辞去执政官职位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他只是偶尔担任正式的行政长官。除此之外，他的权力属于他个人，与任何官职都没有联系。而且这些权力是终身制的。奥古斯都拥有保民官权力和资深执政官级别的军权，以及其他一些权力，这些都是元老院和人民授予的。他的权力没有任期限制，也没有任何官职可以让他辞去。他的行省指挥岗位是有任期的，但在期满之前就被迅速延长五年或十年。恺撒·奥古斯都是共和国最伟大的公仆，因为他是恺撒·奥古斯都，并将始终如此。从很多方面来看，前23年之后，他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先前更加明显，而不是更加隐晦。这一般被称为“奥古斯都的第二次解决方案”。尽管他小心避免国王或独裁官这样的头衔，但他的主宰地位是一目了然的，并且所有迹象都表明他的权力将是终身制的，就像尤利乌斯·恺撒在前44年所享有的地位那样。

竞争与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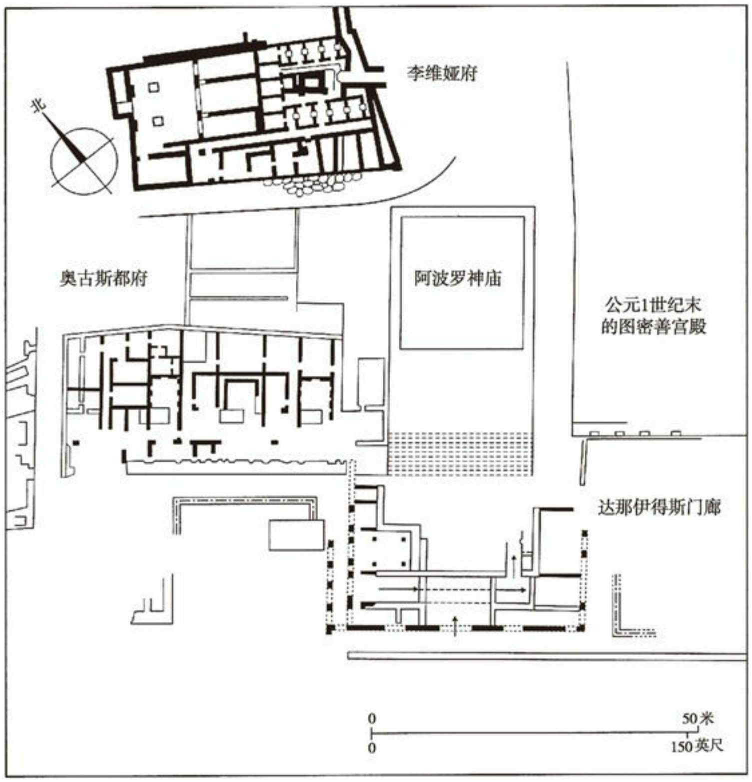
前23年下半年某个时间，阿格里帕离开了罗马，前往地中海东部。他获得了资深执政官级别军权的特别授予，可能为期五年。我们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被授予这个特殊指挥岗位，但他的职权范围显然包括叙利亚

这个帝国行省。但阿格里帕没有去叙利亚，而是在莱斯博斯岛（其名义上的长官是亚细亚总督）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从那里监管更广泛的地区。他可能作为奥古斯都的代表，接见了一些来自元老院行省和帝国行省的代表团，为元首分担了一些工作。帕提亚国王目前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居住在罗马帝国境内，这可能加剧了两国边境的紧张气氛。帕提亚人可能会发动一场入侵，就像前41～前40年做的那样。因此，让一位有能力协调对策的人掌管地中海东部的大局，会很有帮助。派遣阿格里帕去东方的做法本身就表明罗马人不是毫无戒备的，或许已经足以震慑帕提亚国王，令其不敢公开与罗马作对。[26]

当时流言四起，说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人们说，十九岁的马凯鲁斯和四十岁的阿格里帕之间存在竞争。据说阿格里帕非常嫉妒奥古斯都那年轻而未受考验的外甥所受到的特别恩宠；也有人说阿格里帕宽宏大量，刻意避开马凯鲁斯，以免妨碍后者。两人的关系很可能有些紧张。众所周知，阿格里帕脾气比较火爆，有时很难相处。他已经拥有一系列胜利和公共建筑工程，现在处于罗马传统中政治生涯的巅峰期。马凯鲁斯很年轻，可能已经被自己新近获得的崇高地位弄得心醉神迷。有迹象表明，他的判断和言论在有的时候很值得商榷。有权有势的人身边总会聚集一些门客和比较非正式的追随者，这些人希望与大人物结交，从而得利。马凯鲁斯的一些追随者可能觉得，打击任何有可能与自己的恩主平起平坐或甚至超过他的人的威望，是很好的主意。[27]

事情应当就是这样了，阿格里帕和马凯鲁斯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故事都是夸大其词，或者完全是捏造的。奥古斯都的本意很可能就是，在自己返回罗马之后，派遣阿格里帕到外省，确保他们两人当中随时都有一人在努力维护帝国的稳定，保障和收缴稳定的财政收入。十年前，地中海东部还遭到压榨，先是支持安东尼的战争努力，后来又为恺撒的得胜军队出资。即便帕提亚的威胁并不真实存在，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确保该地区复苏并处于罗马的有效控制之下。恺撒的疾病可能使他未能

早些返回罗马，直到他痊愈之后，才将自己最精明强干的下属派往东方，执行又一轮凡俗而缺少光辉的劳作。流言蜚语在继续传播，但极不可能影响任何重要决策。



奥古斯都在帕拉丁山上的府邸平面图

恺撒·奥古斯都的状态不错，虽然意大利和罗马出现了粮食匮乏、瘟疫和自然灾害，但他一直很健康。这年年底时，马凯鲁斯病倒了。有史料称，他的症状与奥古斯都前不久患病的情况相似，但当时瘟疫还在传播，所以他也完全可能是染上了瘟疫，不管这瘟疫究竟是什么。安东尼·穆萨被唤来医治马凯鲁斯，大家希望他能在马凯鲁斯身上创造奇迹，就像他当初在马凯鲁斯的舅舅身上创造奇迹一样。这一次穆萨失败了。马凯鲁斯死了，十六岁的尤利娅成了寡妇。这对少年表兄妹的婚姻很短暂，没有生下一男半女。[28]

后来有传闻称，马凯鲁斯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毒死的，凶手或幕

后元凶是李维娅。我们无法证明马凯鲁斯不是被谋杀的，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在瘟疫肆虐的时期，青少年早夭的现象屡见不鲜，名人也不可能免于瘟疫，而即便在安宁的年份，罗马年轻人也有可能病死。在挤着近100万人并且不断从世界各地吸收商品与人员的大城市，病菌有很多机会传播开来并导致人们死亡。马凯鲁斯应当是自然死亡的。当时他的死亡并不对任何潜在竞争者特别有利。元首的健康状况仍然非常好，他在这一年年初拒绝指定马凯鲁斯为继承人，而在外甥去世之后，他也不大可能公开地恩宠提比略或其他人。[29]

在公众层面上，马凯鲁斯受到了极其深切的哀悼。葬礼之后，马凯鲁斯的骨灰被存放在战神广场上的奥古斯都陵墓。这座陵墓还没有完工，马凯鲁斯是第一个在此安息的人。屋大维娅建造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以纪念她的儿子。奥古斯都也表达了哀思，将尤利乌斯·恺撒开始建造（或至少是筹划）的石制剧场（现已接近竣工）命名为“马凯鲁斯剧场”。普罗佩提乌斯[30]写了一首诗纪念马凯鲁斯，追溯了马凯鲁斯曾主持的节庆活动以及为群众提供荫凉的凉棚。几年后，维吉尔描写他的史诗主人公埃涅阿斯拜访阴间，看到了未来伟大罗马人的影像，他们还没有得到肉身，还没有降生到凡间。其中他看到了一个“英俊超俗”的青年，但面带忧伤，因为“死亡的黑影”笼罩着他。埃涅阿斯的向导解释说，这就是马凯鲁斯，并且：

> ……命运只允许人世短暂地一瞥他的身形，不允许他在凡间停留太久。哦，天上的诸神啊，若你们的这些馈赠延续很久，你们就会觉得罗马人过于强大！著名的战场上，怎样的抽泣声会飘向玛尔斯的伟大城市！父亲台伯河啊，你从新建的坟墓旁流过时，会目睹怎样的送葬队伍！再也没有一位特洛伊血统的青年，会让他的拉丁先祖如此充满期望。罗慕路斯的土地再也不会拥有这样优秀的男儿。呜呼哀哉，他的善良，他的骑士荣誉，他不可战胜的持剑的臂膊！在战斗中，无人能够面对他而毫发无损。他徒步冲向敌人，或者纵马奔驰，用马刺催动口泛白沫的骏马。[31]

自然灾害一直持续到前22年，但奥古斯都的身体一直很健康。两位

新的执政官拥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不过没有特别突出的个人才干。持续的粮食短缺促使人们呼吁元首直接掌管政权，就像伟大的庞培于前56年在类似危机中做的那样。恺撒·奥古斯都谢绝了任何额外的权力或头衔，但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粮食问题。有些人在故意囤积粮食，等待粮价升到最高点，于是他向这些囤积者施加了非正式的压力，将存粮投入市场，实现了短期的救济。在长远方面，他安排每年指定两名前任裁判官来监管向罗马城输送粮食的工作。[32]

奥古斯都办成了一些事情。如果他不施加干预的话，那么许多年来元老政府典型的惰性似乎要卷土重来了。很多人对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职务和拒绝接受其他行政长官职务仍然有顾虑。有人要求他就任监察官，或永久性接受监察官的权力。还有一次，一群意志坚定的群众包围了正在开会的元老院，堵住了议政厅大门，要求元老们立刻选举奥古斯都为独裁官，否则就把房子连同里面的人一起烧掉。或许就是在这一次，一大群人要么是夺得了真正的法西斯束棒，要么是制作了类似的束棒，带着二十四支束棒（象征独裁官）去找恺撒。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圣尤利乌斯之子发表了演讲，谢绝了这项荣誉，并以同样的方式应对他们持续的哀求。但群众非常坚决，促使他非常戏剧性地撕破了自己的衣服，以示无奈。多年后，他吹嘘自己曾两次谢绝独裁官职务。这个场景让人联想起尤利乌斯·恺撒在牧神节的表现。但奇怪的是，有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尤利乌斯·恺撒是在作秀，却相信奥古斯都是真诚的。类似地，关于要求奥古斯都接受官职的群众运动是不是奥古斯都安排的，历史学界很少有争论，大家一般都认为这些运动多多少少是群众自发的。这些事情进一步表明，恺撒·奥古斯都必须关注元老和骑士阶层之外的人群的意见。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精英阶层，还要让其他群体也心满意足，才能维持长期稳定。这个事件表明他仍然在为国效力并处置遇到的各种危机。他向群众保证，辞去执政官职位并不意味着他已经退隐，也不说明他今后只关注外省。他将运

用自己现有的权力，尽其所能。[33]

另外，选举产生了两名监察官，这也是佯装恢复传统的做法。其中之一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让他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监管道德风化，未免有些讽刺。另外一个人曾在前43年遭到政治清洗，但生存了下来。两名监察官的任职并不顺利。有一次两人在主持一场仪式时，所站的平台坍塌了。狄奥记载道，一般由监察官监管的大多数工作，其实都是由奥古斯都亲自安排的。在粮食匮乏的时期，一些公共节日被取消了，其他节日的规模也缩减了不少。节日活动的开销受到限制，负责主持节日的行政长官被禁止花费比其同僚更多的金钱。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正式批准，才可以举办角斗士竞技，并且一年顶多举办两次，每一次竞技不能超过120名角斗士。遵照监察官的传统，还采纳了其他一些措施，以遏制不端行为和奢靡之风。元老的儿孙（只要他们足够富裕，算得上骑士阶层）被禁止登台演戏，恺撒·奥古斯都在马凯鲁斯的娱乐活动期间曾允许这种现象发生。在其他人的提议下，一些措施可能被采纳为法律，但奥古斯都肯定是幕后的推动者。[34]

奥古斯都这样的绝对主宰地位肯定让很多人感到宽慰，但在前22年年初，在一些令人不快的事件中，他的权力和地位受到了质疑。首先是马尔库斯·普里穆斯受审，此人之前是元老院行省马其顿的总督，现在任期结束，返回了罗马。马其顿是少数仍然拥有驻军的元老院行省之一，普里穆斯利用这些军队开展战争，赢得荣耀和战利品，大发横财。现在他被起诉，罪名是损害了罗马人民的威严或声誉。苏拉和尤利乌斯·恺撒都曾确认已有的立法，禁止行省总督在没有元老院明确许可的情况下率军离开自己的行省。普里穆斯攻击的民族之一是欧德律赛人，这个部族在几年前刚被克拉苏打败过，后来向克拉苏投降，被授予盟友地位。如果克拉苏还在世，很有可能帮助欧德律赛人申冤，因为征服者往往会成为落败敌人的保护者。其他人可能也对此案感兴趣，推动了起诉进程。非公民的个人或社区不能在罗马法庭上提起诉讼，因此需要罗马

公民来代理他们。

为普里穆斯辩护的律师是一位被普遍认为是善人的元老，而且得到奥古斯都的宠信。他的名字是穆里纳，有的史料说他叫李锡尼·穆里纳，也有的说是瓦罗·穆里纳。他可能与被选举为前23年执政官，但在就职前不久或之后死亡的那个穆里纳有亲戚关系，然而我们不知道是多么亲近的关系。他的妹妹或同父异母妹妹是特伦提娅，即梅塞纳斯的妻子；他还有一个兄弟是盖乌斯·普罗库雷乌斯，是元首的亲信。没有证据表明穆里纳敌对奥古斯都，而作为主要的辩护律师（为被告辩护的人可能有很多），他关注的应当是让自己的客户无罪开释。读一读西塞罗的演讲稿，我们就会发现，罗马的辩护律师随时可以歪曲事实，眼睛都不眨一下。

普里穆斯毫无疑问攻击了欧德律赛人，而欧德律赛人是罗马人民的正式盟友。辩方的论点可能是，欧德律赛人背信弃义，图谋反对罗马，或者已经做出了敌对行为，因此理应受到惩罚。尤利乌斯·恺撒曾在一次停战期间攻击一些日耳曼部落，后来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但这一次普里穆斯更过分，声称自己得到了发动进攻的许可，甚至是直接指示。据狄奥记载，普里穆斯的证词前后不一致。普里穆斯有一次声称指示他进攻欧德律赛部落的人是奥古斯都，后来又说是马凯鲁斯。他可能是说，马凯鲁斯向他传达了奥古斯都的暗示或直接命令。[35]

在很多层面，这都令人震惊：一位近期才进入元老院的少年，竟然能够命令或者鼓励一位资深执政官去做某件事情。这让人想起三头同盟或君主制的旧日子，那时行政长官和总督都没有真正的独立性，统治者或其亲信可以强迫他们做事。这可不是恺撒·奥古斯都在前27年精心设计的形象，他在近期辞去执政官职位并谢绝独裁官职位，也不是为了让大家这么想。

马凯鲁斯已经死了，不能出庭作证。法庭没有传唤恺撒·奥古斯

都，因为没有人愿意用这种方式挑战他的权威。穆里纳和普里穆斯可能是希望借用元首的名字把这一潭水搅浑，帮助普里穆斯无罪开释。在过去，罗马法庭常常无法将铁证如山的罪人定罪，而这一次可能有一些陪审员对普里穆斯友好，或者愿意对他网开一面，以便换取他的友谊或好处。

虽然没人敢也没人想要奥古斯都出庭，但他还是来了。他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出庭作证。一位主持法庭的裁判官问他，是否曾像普里穆斯说的那样指示普里穆斯进攻欧德律赛部落，元首否认了这种说法。被告的辩护律师穆里纳还没有质询他，而穆里纳此时越来越绝望，因为恺撒·奥古斯都的到场和无法撼动的声望对他的客户施加了极大压力。他们肯定希望避免这种情况。恼怒与恐惧的混合很快让辩方律师采用了罗马庭审中常见的咄咄逼人、尖刻凶悍的语调。奥古斯都仍然不动声色，这令人恼火。穆里纳问他为什么到庭，是谁传唤他来的。元首精练地回答：“公共利益。”

虽然一些陪审员投票主张将普里穆斯无罪释放，但他还是被判有罪。这些陪审员可能是和被告有着种种联系，但也有人可能是因为奥古斯都干涉庭审而非常恼火，于是和他对着干。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元首说的是不是真相，究竟是完整的真相，还是很多现代政治家常用的那种避免直接撒谎而刻意设计出的误导众人的所谓真相。奥古斯都应当不大可能希望进攻欧德律赛人，更不会用如此拙劣的方式部署安排。但有传闻称，奥古斯都有时对马凯鲁斯的判断和举止不满，所以存在这样颇有吸引力的可能性：他的外甥可能不明智地对普里穆斯说了些什么。[36]

虽然很多人仰慕奥古斯都镇静自若而充满尊严的干预，但至少有一部分人怀疑他欺骗了大家。普里穆斯声称自己得到了命令，并且认为大家会相信他，这突出了元首主宰政局的事实，而不是元首精心维持的假象。不管案情究竟如何，这都损害了奥古斯都的形象。穆里纳肯定怒火

中烧，几个月后他被指认为企图刺杀奥古斯都的阴谋集团的成员之一。这是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小李必达[37]企图政变以来第一次出现关于阴谋的传闻。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是范尼乌斯·凯皮欧，据说是个声名狼藉的人，不过很难说他是否抱有“共和派”情感，他可能是另一个布鲁图斯，也完全可能是另一个喀提林。

我们不知道这些密谋者的目的，也不清楚其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份，不过大部分显然是元老或来自元老家族。他们或许希望杀死恺撒·奥古斯都，恢复传统的政府体制，就像“解放者”在前44年希望的那样。即便的确如此，他们也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等人一样，渴望刺杀暴君的光荣和未来的政治利益。另外，密谋者也可能是希望除掉“暴君”，然后以己方一员取而代之。密谋没有发展起来。尤利乌斯·恺撒当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恺撒·奥古斯都则维持着禁卫军和其他卫队，以及一个虽不引人注目但十分高效的间谍和告密者网络。他绝不打算重蹈自己舅公的覆辙。

密谋者们受到控诉，在审判开始之前或不久之后逃之夭夭。虽然他们缺席，但审判照常进行，提比略是控方的律师之一。控方一般是年轻人，这为贵族青年提供了在其政治生涯早期抛头露面的机会。被告一旦逃亡，就被认为是承认自己有罪。贵族享有一项特权，就是在被定罪不久前或不久后逃跑。过去很多罪人带着自己可以携带的财产逃亡，在一座盟邦城市过上舒适的退隐生活。这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公民权，政治生命也结束了，但能够逃脱死刑。

凯皮欧、穆里纳等人没有得到这种传统的宽大优待。政府派遣士兵（可能是禁卫军）将其绳之以法并处决。死者之一的父亲后来赞扬了一名努力保护他儿子的奴隶侍从，但公开处死了另一名出卖他儿子的奴隶。据说，穆里纳从梅塞纳斯的妻子那里提前得到了警告。因为有传闻称这个女人和奥古斯都有长期私情，所以我们不确定她是从丈夫还是从

元首那里得到了消息。有流言称，在一段时间内，奥古斯都和他的老友梅塞纳斯疏远了，但梅塞纳斯的影响力主要在幕后，所以很难判断这种说法是真是假。总的来讲，这应当只是个谣言，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仍然很亲密。

历史学家狄奥哀叹道，记述奥古斯都取得内战胜利之后的事情比记载之前的事情困难，因为太多的关键决定是私下里做出的，并没有史料记载，而公开的事情仅仅是空虚的仪式。一个世纪之后的图密善皇帝抱怨道，证明某项行刺阴谋真实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被杀掉。不管具体细节如何，前22年的阴谋应当不是凭空捏造的。有的学者认为这起阴谋和普里穆斯审判发生在前一年，是有人企图强迫奥古斯都辞去每年的执政官职务。这种理论没有说服力。凯皮欧和穆里纳的阴谋应当发生在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职务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元首的权力在很多方面愈发肆无忌惮，肯定也带有终身制的意味。权力属于他个人，而不再与任何任期固定的行政长官职位有联系。[38]

前44年，“解放者”惊讶地发现，公众对他们的行动毫无热情。前22年，更是找不到人民普遍敌视奥古斯都的迹象，不过敦促他当独裁官的压力可能让他的敌人害怕他很快会实施永久性统治。凯皮欧阴谋没有给人计划完备的感觉，或许本来就没戏。前63年，西塞罗不愿意允许喀提林密谋者活下去过流亡生活。奥古斯都的选择和西塞罗一样。各行省正处于安定下来的过程中，与之前几代人的印象相比，外省距离罗马已经不是那么遥远。历次内战中也出现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在罗马被定罪因而逃亡的人后来作为其他领导人的党羽重返罗马。奥古斯都不愿冒这个险，或许也希望向其他所有企图攻击他的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想提醒大家，他依旧是过去多次血腥镇压政敌、大批处决敌人的那个军阀，现在之所以不那么做了，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选择。恺撒·奥古斯都拥有远远超过国内其他任何人的强大权力，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权力。他公开强调合法性和传统的做法让其立场有所温和，但他没有尝试

去掩饰自己对权力的态度。

他继续为罗马人和外省居民提供和平稳定。有些贵族私下里讨厌这样的事实（即只有他才能维持和平），但仍然接受这样的现实。虽然一些贵族怨恨奥古斯都公开宣扬自己的胜利，随后又庆祝击败和处决密谋者的行为，但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怨恨他。恺撒·奥古斯都仍然深得民心，人们害怕他因为疾病或被刺杀死亡后，会天下大乱。目前政权稳固，尽管马凯鲁斯死了之后，奥古斯都需要在别处寻找长远的未来。

---

[1] Horace，*Odes* 3.14.1-8（Loeb translation）.

[2] Dio 53.28.1-3，*Res Gestae* 15.1，with Crook in *CAH2* X，pp.83-4.

[3]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372，引用*ILS* 7448-9讲到他的保镖。

[4] 会堂（Basilica）是古罗马的一种公共建筑形式，呈长方形，外侧有一圈柱廊，主入口在长边，短边有耳室。Basilica这个词源于希腊语，原意是“王者之厅”。在古罗马的城市，会堂一般是作为法庭或大商场的豪华建筑。基督教沿用了罗马会堂的建筑布局来建造教堂。随着历史的变迁，会堂这个词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今天在天主教中，有特殊地位的教堂被赋予Basilica的称号，中文的说法是“宗座圣殿”。

[5] Dio 53.23.1-4，with P.Zanker（trans.A 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139-43.

[6] Dio 53.26.1-5，27.1-2，评论见T.Barnes，‘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JRS* 64（1974），pp.21-6。

[7] 原文有误，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指的是阿拉伯半岛南部，今天的也门一带。

[8] 艾利乌斯·伽卢斯的阿拉伯远征，见Dio 53.29.3-8，Strabo，*Geog* .16.4.23-4，17.1.53-4，*Res Gestae* 26.5，with S.Sidebotham，‘Aelius Gallus and Arabia’，*Latomus* 45（1986），pp.590-602，及Gruen in *CAH2* X，pp.148-51。

[9] Tacitus，*Ann* .6.11 on Messalla Corvinus，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403及Crook in *CAH2* X，pp.81-2。

[10] 弗拉米乌斯大道是古罗马的一条大道，从罗马越过亚平宁山脉，通往里米尼，由盖乌斯·弗拉米乌斯（前187年执政官）主持建造。

[11] Dio 53.22.1-2.

[12] Dio 53.27.5-6，30.1，Suetonius，*Augustus* 81.1，with E.Badian，'"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in W.Wirth，*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pp.18-41，31包含这句引文。

[13] Dio 53.26.1-2，28.3-4，31.2-3，Suetonius，*Tiberius* 8-9.3，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19-24，R.Seager，*Tiberius* （2005），pp.12-13.

[14] *Res Gestae* 15.1；皮索不愿意从政，见Tacitus，*Ann* .2.43。

[15] 粮食，见*Res Gestae* 15.1。

[16] Suetonius，*Augustus* 59及81.1-2，Dio 53.30.1-3.

[17] Dio 53.31.1。

[18] 辞职与塞思提乌斯，见Dio 53.32.3-4，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335。

[19] Dio 53.32.5-6.

[20] 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辩论，见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100-16，A.Jones，'The imperiumof Augustus'，*JRS* 41（1951），pp.112-19，E.Stavely，'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Historia* 12（1963），pp.458-84，E.Salmon，'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Historia* 5（1956），pp.456-78，尤见464-73，J.Crook，'Some remarks on the Augustan Constitution'，*Classical Review* 3（1953），pp.10-12，W.Lacey，'Summi Fastigii Vocabulum：The story of a title'，*JRS* 69（1979），pp.28-34，H.Last，'Imperium Maius：A note'，*JRS* 37（1947），pp.157-64，J.Ferrary，'The powers of Augustus'，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90-136，尤见99-103，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35-8，及B.Levick，*Augustus.Image andSubstance* （2010），pp.84-7。

[21] Dio 53.32.3.

[22] 将前23年事件视为对集中有力的反对派的反应，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35-6，也认为是奥古斯都的盟友推动的，B.Levick，*Augustus.Image andSubstance* （2010），pp.80-86的分析更为平衡，但E.Badian，'"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in W.Wirth，*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pp.28-38 有力驳斥了上述论点，并提出主要原因其实是奥古斯都患病，从而精心安排；人民多次尝试选举奥古斯都为执政官，见Dio 54.6.1-2，10.1，及A.Jones，'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1955），pp.9-21，尤见13。

[23] Dio 53.32.2.

[24] Tacitus，*Ann* .3.56，with W.Lacey，‘Summi Fastigii Vocabulum：The story of a title’，*JRS* 69（1979）.

[25] T.Wiseman，‘*Conspicui Postes Tectaque Digna Deo*：the public image of aristocratic and imperial ho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in *L’Urbs.Espace urbain et histoire*（1987），pp.393-413，尤见401-12。

[26] Dio 53.32.1，对阿格里帕在这些年里的权力的讨论，见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p.117-31，尤见127-31。

[27] Dio 53.31.4-32.1，Velleius Paterculus 2.93.1-2，Josephus，*AJ* 15.350，Suetonius，*Augustus* 66.3.

[28] Dio 53.30.4，33.4，Velleius Paterculus 2.93.1.

[29] 狄奥提到，有人指控李维娅谋杀了马凯鲁斯，见53.33.4-5，及Tacitus，*Ann* .1.3讲到李维娅杀害了皇族的其他一些成员；贵族的死亡情况，详见W.Scheidel，‘Emperors，Aristocrats，and the Grim Reaper：Towards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oman Elite’，*Classical Quarterly* 49（1999），pp.254-81。

[30] 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约前50至前45～约前15年），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诗人，以《哀歌集》闻名于世。他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前文讲到的埃及总督）和维吉尔的好友，并通过他的恩主梅塞纳斯，与奥古斯都也有交情。

[31] Virgil，*Aeneid* 6.860-65，870-81（Loeb translation），Propertius 3.18.

[32] Dio 54.1.1-3；见G.Rickman，*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1980），pp.60-66，179-86。

[33] Dio 54.1.4-2.1，*Res Gestae* 5.

[34] Dio 54.2.1-3.1.

[35] 尤利乌斯·恺撒，见*BG* 4.11-16及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1.1-2讲到元老院对他的攻击。

[36] 对普里穆斯的审判，见Dio 54.3.2-4；对马凯鲁斯的低评价，见Dio 53.31.4。

[37] 小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30年）是后三头同盟者之一李必达的独生子。他曾与安东尼的长女订婚，但不知为何取消了婚约。他因阴谋反对奥古斯都而被处死。

[38] 此次密谋，见Dio 54.3.4-8，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333-4，

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p.80-83，及D.Stockton，‘Primus and Murena’，*Historia* 14（1965），pp.18-40强调此次审判和密谋是影响奥古斯都重组自己权力的主要因素，通常将这些事件的年代定为前24或前23年，而M.Swan，‘The consular fasti of 23 BC and the conspiracy of Varro Murena’，*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1（1967），pp.235-47及E.Badian，‘“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in W.Wirth，*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 （1982）明确说密谋者不是前23年的执政官，审判和密谋都发生在奥古斯都辞去执政官之后；Dio 53.19讲到此时期的所有决定都是秘密做出的，所以很难理解；Suetonius，*Domitian* 21评论了这些密谋；对皇帝们的反对，以及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联系，见R.MacMullen，*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Treason*，*Unrest and Alienation in the Empire* （1967），pp.1-45。

十五 鹰旗

我迫使帕提亚人归还三支罗马军队的战利品和军旗，并让他们恳求罗马人民的友谊。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弗拉特斯四世卑躬屈膝，接受了恺撒的帝国统治。

——贺拉斯，约前19年[2]

恺撒·奥古斯都在罗马城或其附近待了不到两年时间，随后又一次巡视各行省。在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将成为他的习惯，即访问罗马和较长时间地巡视各行省交替进行。相比之下，他不在罗马的时间更长，所以他创建的政权主要是在其远离首都期间发展的。很久之后，他的继承者才像他那样大范围旅行。哈德良是第一位在旅行历程上与他平分秋色的皇帝。奥古斯都一生访问了帝国几乎每一个行省。前22年，他先去了西西里岛，这是罗马最古老的海外行省，不是直属元首的帝国行省。西西里岛的元老总督应当没有多少机会或根本没有机会和他对抗，因为他的军权级别更高，足以确保总督不会尝试以任何方式妨碍他。

西西里岛是罗马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奥古斯都新近承担的赈济罗马饥荒的使命无疑是他访问该省的一个直接理由，不过他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后来，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会向到元老院行省上任的总督发放书面指示，就像他们向到帝国行省上任的军团长发出命令一样。他这时可能已经这么做了。穆里纳为普里穆斯辩护的一个焦点似乎是，普里穆斯收到了额外的非正式命令，并非没有收到任何指示。没有人质疑元老院行省的社区有无权利向奥古斯都申诉，或奥古斯都有无权力对此种请愿做出裁决，因为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行省总督的任期很快被标准化为一年，所以元首能够更轻松地、更前后一致地设立重要的先例，并处理

重大事务或对其他行省有影响的事情。恺撒·奥古斯都不管去往何处，都拥有军权和权威，处理当地行省总督无权处理的事情。行省总督则忙于在更地方性的层面上主持司法和决策。[3]

但这一次，奥古斯都还没有机会开始工作，就有人呼吁他返回罗马。在他远离罗马期间，百人会议选举他为下一年执政官的同僚（尽管他并没有参选），然后拒绝选举其他人。元首不肯动摇，也不肯回去恢复秩序。在《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中他自称曾两次拒绝担任独裁官，第二次拒绝可能就发生在此时。前21年1月1日，只有一位执政官就职，他召开公民大会选举一位同僚执政官时，争夺剩余岗位的两名竞争者炮制的混乱迫使会议中断。恺撒·奥古斯都仍然拒绝返回，而是将争吵不休的两名候选人传唤到西西里岛。两人被训诫一番，并被禁止参加下一轮选举。但后来选举时还是发生骚乱，直到最终有人当选，事情才算了结。[4]

前22～前21年冬季，奥古斯都留在西西里岛。这是自讨伐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战争以来，他第一次访问该岛。尤利乌斯·恺撒曾向西西里人授予拉丁公民权，但西西里人近期因为支持失败的一方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前36年，年轻的恺撒入侵西西里岛时洗劫了城市，没收了当地人的土地，处决了许多显赫公民，或许还取消了当地人的拉丁公民权。奥古斯都的好几位主要支持者，包括阿格里帕，获赠西西里岛上的大片庄园作为战利品。但从长远来看，惩罚旧敌人没有恢复西西里岛各社区的稳定与繁荣那么重要。尽管如今供养意大利和罗马的大部分粮食和其他作物来自埃及和北非，西西里岛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奥古斯都在岛上建立了六个新殖民地，包括叙拉古、卡提纳（今卡塔尼亚）和潘诺姆斯（今巴勒莫）。这六个殖民地都是原本就有的城市，融合了土著居民、退伍军人，或许还有一些平民定居者。其他几个社区获得了拉丁公民权，但并不是全岛都得到了此种待遇。元首下令在叙拉古和卡提纳展开大规模建筑工程，在其他城市可能也有，以便让这些城市看起来既宏伟又具有

罗马风格。当地的精英集团无疑也在效仿他，于是各城市建起了圆形剧场、拱门、会堂和神庙。[5]

沿海社区，尤其是北岸和东岸（与意大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社区，从迅速繁荣起来的贸易中获益最大。这些社区最初大多是希腊殖民地——叙拉古是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曾击败雅典人的入侵并和迦太基打成平手，先后成为罗马共和国的盟友、敌人和被打败的臣民。后来西西里岛几乎被视为意大利的一部分，一度成为仅有的两个元老无须皇帝批准便可访问的行省之一。变得更罗马化或意大利化，并不意味着西西里岛抛弃了希腊语言或文化。尽管一些较古老的建筑被取代，但现有的宗教崇拜和风俗习惯延续了下来。其他建筑则得到修缮和复原，和较新风格的建筑一同屹立。西西里岛仍然是大希腊[6]的一部分，所以奥古斯都在前21年选择从西西里岛出发，视察其他说希腊语的行省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是非常自然的事。[7]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

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前的几个月，奥古斯都曾访问希腊，后来腓立比战役时又去了希腊，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和之后也去过。那个时期他还去过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希腊地区对罗马始终很忠诚，因此三次卷入罗马内战，而且都是站在失败的一方[8]。亚克兴角战役十年之后，无人怀疑恺撒·奥古斯都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罗马精英阶层来说非常重要的、堂皇伪装的宪政，对外省居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他视为君主。“恺撒”的名字在帝国各地已经家喻户晓。“奥古斯都”在希腊语中被译为“赛巴斯托斯”，意思是“可敬的人”或“尊贵的人”，他的形象很快变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常见。当地的铸币厂发行了印有他头像或象征他统治的符号的钱币，一般还有他的名字和头衔。很快，几乎所有新的金银币都由罗马控制的铸币厂来生产，但各地的铜币仍然很流行。罗马并没有强制推行自己的度量衡，而是希腊各地主动采

用，因为这很方便，比如在交税和从事贸易时。在东方，迪纳厄斯银币被称为一个德拉克马，但其实这种银币和迪纳厄斯是同一种钱币，币值也相同。唯一的例外是埃及，那里沿用了与罗马略微不同的币制。[9]

几十年后，有人问耶稣，犹太人是否应当向罗马交税，耶稣让提问的人拿一个用于交税的银币过来，然后问道："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恺撒的。"耶稣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由于奥古斯都在其漫长一生中发行了大量钱币，所以耶稣手里的这个钱币上的肖像极可能是奥古斯都，而不是当时在位的提比略皇帝。更重要的是，福音书的作者讲了这个有名的故事，知道任何读者都会很熟悉这样一枚钱币，会知道钱币上应当有皇帝头像，会自动认可它是皇帝权力和至高无上地位的象征。[10]

虽然很多外省居民永远不会亲眼见到恺撒·奥古斯都，但通过他的名字或肖像，很多人对他非常熟悉。前26年年底在埃及的摩里斯湖附近写下的一份纸莎草纸的文书记载道，租借"一头红色母牛，名叫赛伊莉丝"，租期十个月。文书上的年份是"神之子恺撒统治的第五年"。埃及的传统是根据统治者在位的时间（或者有的时候是根据君主及其配偶的在位时间）来纪年，所以奥古斯都的统治时期是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结束开始计算。为了行政上的便利，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统治时间被多算了几天。于是，前30年，负责在俄克喜林库斯[11]的街道点燃油灯的人宣誓就职时，将这一年称为恺撒统治的第一年。前一年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统治的第二十二年，也是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她的儿子恺撒里昂共同统治的第七年。

上述安排租借母牛的文书是用希腊文写的，不过母牛的主人是一个叫庞培的人，他很可能是罗马公民。他的一名奴隶代他处理这笔交易。租借母牛的人叫帕普斯，他拼写某些希腊词语的方法充分表明他是个埃及本土人。一个罗马人（可能是一个大地主或中等地主）及其奴隶和一

个埃及本土人做了这笔交易，说明埃及行省的人口是非常混杂的。在埃及，罗马人不过是取代了希腊人和曾经统治这个国家的其他外族的一支新的占领力量而已。在这个真正古老的国度，点油灯、畜牧业和生活都像之前一个又一个世纪那样照常进行。整个交易只涉及一头母牛，不过租期很长，所以帕普斯可能打算给母牛配种，然后自己留下牛犊。他的租金是用粮食付的，并宣称，“我会将母牛以健康良好的状态返还，如果我不能返还，就赔偿187德拉克马银币”，并用他的财产作为抵押。[12

过了一段时间，用恺撒的名字纪年、他的肖像出现在公共纪念碑与钱币上，一定变得司空见惯，不再引起人的注意，就像今天大多数人不会花时间去注意货币上的符号与文字一样。让人们如此熟悉自己，算是成功的标志，但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之快，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东方各行省，绝大多数民众早就认识到，罗马的统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与持续更换行政长官相比，单独一位领袖成为罗马统治的代表，让东方人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罗马的统治，或许对个人和当地社区更有益。在《马太福音》中，质问耶稣的人很轻易地接受了货币、税赋与皇帝之间的联系。从技术上讲，其实并非如此。税金是付给罗马国家及其国库的，不是直接付给奥古斯都或其继承者的。但对外省居民来说，钱币上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国家元首，这种联系是自然而然的。由于元首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国家税收，所以从根本上讲，也可以说税金是付给元首的，尽管有专门的法律机制掩盖了这种隐蔽的真相。帝国的臣民很自然地将奥古斯都视为君主，根本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关心他在罗马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国王或独裁官等头衔的做法。

因为主宰他们的世界的力量是由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领导的，所以当地居民很自然地希望这位统治者会善待他们。一种常用的办法是在自己的社区公开尊崇奥古斯都。前27年之后不久，雅典的一位行政长官将卫城[13]上的一座新建筑奉献给奥古斯都。这似乎是一个石柱群，一共九根石柱，环绕着一座“由人民建造的”祭坛，献给罗马女神和恺撒·

奥古斯都。这种模式是奥古斯都于前29年批准的，允许外省居民向他做宗教崇拜的献祭，但必须同时向罗马的神祇献祭。大约在同一时期，米利都城的议事会在其议政厅庭院内建造了一座奉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在以弗所，一份涉及一些相当常规的公民活动的铭文提到，一名公民竖立了“赛巴斯托斯”雕像，并奉献了一座神龛，其结构应当与上述的类似。建造这种东西是对元首的尊崇。这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写信给奥古斯都，或者派人去觐见他，把自己做的事情汇报给他，同时借机提出一些要求。[14]

觐见元首是吸引他注意的最有效办法，如果运气好，还能得到积极的回应。前29年，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搭乘一艘商船旅行，船停在了渔村伊亚罗斯附近。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位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希腊小岛上。一个渔民上了船，说自己是整个村庄的使者，希望见到恺撒，请求他减少村子要交给罗马的税金，因为“他们吃尽苦头才凑齐100德拉克马，而政府要求他们缴纳150德拉克马”。这艘船把这名使者送到了科林斯，奥古斯都正在那里逗留，打算返回意大利庆祝他的三次凯旋式，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成功见到奥古斯都并减少他们的税务负担。斯特拉波提及这个故事，仅仅是为了印证这个岛屿和周边其他岛屿的贫困，否则我们根本不会知道此事。尽管埃及的德拉克马币值比希腊的低一些，但这个村的全体村民缴纳的全部税金还不及“一头红色母牛，名叫赛伊莉丝”的价值。对在一个贫困地区挣扎谋生的村民来说，这笔税金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显然觉得，将此事汇报给奥古斯都本人是办得到的，也是值得一试的。这让我们可以猜想，每年一定有数百名，甚至数千名请愿者求见元首或者像阿格里帕那样代表元首行事的大人物。[15]

毫无疑问，较大的、较重要的社区和较富裕的个人，比渔村的穷人更容易见到元首并得到良好待遇。但这并没有吓倒村民们，他们还是去求见元首了。有时，比较重要的社区会不太受欢迎。雅典曾热情支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并在前32～前31年欢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

世，所以必须特别努力地去讨好得胜的恺撒。和其他很多社区一样，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雅典也被要求为恺撒的战争努力提供金钱和资源。为了向奥古斯都表忠心，雅典人肯定迅速建造了歌颂他的纪念碑。

希腊名城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所有的罗马贵族都特别尊重它们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在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六世对抗罗马的战争中，雅典曾支持他。后来苏拉的军队攻占了雅典城，对其进行了恐怖洗劫。但由于雅典的历史，洗劫的结果并不算很糟糕，苏拉说，他“因为死人的缘故，可以饶恕活人”，这里“死人”指的是雅典人的著名祖先们。雅典继续繁荣发展，不过如今的雅典几乎只是一座历史博物馆，供到访的罗马贵族参观雕塑或纪念碑。和以往一样，奥古斯都及其亲信遵从传统，但气度更恢宏。阿格里帕很快开始在雅典城的老阿哥拉（市场）中央建造一座有屋顶的大剧场。它的装饰非常奢华，规模也恢宏得惊人。只有运用罗马技术以及罗马人研制的混凝土，才有可能建造如此之大却没有柱子支撑的屋顶。于是，在一座标志着罗马技术成就的伟大建筑里，人们可以上演传统的希腊音乐和戏剧。这座剧场还颂扬了元首及其亲信的光荣，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建筑上，他们的肖像在那里展出。后来雅典城还建造了一座新市场，这意味着普通的商业活动也会被恺撒的符号所环绕。[16]

除了仰慕希腊的过去（或至少是符合罗马人需求的版本的过去，能够让罗马人自称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之外，罗马人也理解和信任雅典城的机构，所以允许绝大多数日常事务和行政工作由本地人执行，这很自然也很方便。此种现象在奥古斯都时代比在共和国时期更为突出。很快，包税人失去了在从各行省收税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收税的职责被交给各城市和各地的其他社区，不再被罗马包税人把持。受益最大的是当地贵族，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财富去赢得自己社区内的官职，然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地行使职权。和在西西里岛一样，其他各行省也都出现了由当地人、奥古斯都及其亲信共同出资的建筑工程。

富人和贵族希望得到尊重，并在自己的社区内掌权。但也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即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财富为社区造福，为节庆活动出资，或者建造永久性纪念建筑。在较小的层面上，就是这种思想构成了罗马政治竞争的一部分。在罗马，这种现象越来越受到元首压倒一切的慷慨和威望的约束。在外省，富人花费巨款为民造福的行为对他不构成威胁，而是受到鼓励。在恺撒·奥古斯都治下，整个希腊世界的地区性精英热情洋溢地启动建筑工程，挥金如土。节庆和体育竞技得到复苏、扩展或引入，往往还会修复或建造剧场和其他供这些活动使用的场所。随着这些本质上属于希腊文化的传统活动再次蓬勃发展起来，演员、音乐家和运动员都得到了新的表演和获奖机会。

与这些活动一同涌现的还有外国元素，在风格和方法上与角斗士竞技的野蛮景观迥然不同。前2世纪，塞琉古王朝的一位国王在罗马当了一年人质之后回国，尝试将角斗士竞技之类的血腥运动引进自己的祖国。他的臣民对此感到憎恶。但一个半世纪之后，对角斗士的热情在整个希腊世界迅速蔓延。有人建造了圆形剧场，更多人则简单地利用自己的剧场和某些临时性竞技场举办这些恐怖的比赛。在所有形式的公共服务中，总会有争夺声望的竞争，有的是同一社区的个人之间的竞争，有的是相邻社区之间的竞争。在一座城市担任行政长官是一项荣誉，但代价高昂，有时是个沉重负担。奥古斯都鼓励大家在这些事情上花钱，并用这样的前景激励他们：不仅可以在当地获得威望，还能有更好的机会得到奥古斯都的宠信、获得罗马公民权，以及为帝国效力的政治前程。[17]

地区性精英阶层中最顶尖的是附庸国统治者，这些人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控制的土地要比罗马总督们多。这些人（有时会有女性）的权力取决于罗马的好感，但在自己国内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负责地区性行政管理。他们之间有时甚至会发生小规模战争，这是非常有风险的，尤其是如果开战之前没有得到帝国的许可的话。他们必须将自己的野心

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并且不能做任何有可能冒犯奥古斯都的事情。这些国家不算真正的独立王国，而被认为处于罗马人民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其实也就是奥古斯都）随时可以剥夺他们的地位。这些统治者大多拥有自己的小型军队，但没有一个人幻想可以对抗强大的罗马军队。

我们不确定这些附庸国统治者是否会定期向罗马纳贡。史料中常写到他们为罗马献上礼物，而且往往是非常奢华的礼物，比如用来纪念帝国胜利的金冠；他们也经常给罗马送来粮食、资源和士兵，以支援罗马的军事行动。大希律王派了500人参加艾利乌斯·伽卢斯在阿拉伯半岛的远征。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附庸国负有响应罗马号召、满足其要求的义务，但不会定期纳贡。但附庸国也完全可能每年向罗马提供金钱、服务或某种物资，尽管他们很有策略地将其称为礼物。非常粗略地讲，这些附庸国统治者相当于行省总督，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是终身制的（不过奥古斯都可以随时罢免他们），而且不会自动传给继承人。例如，大希律王被授予一项特权，可以自行挑选继任者，但我们不知道其他附庸统治者是否也能这么做。[18]

在这些年里的附庸统治者当中，史料对大希律王的生平记载最详细，揭示了他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和对罗马人的彻底依赖。他在世时多次访问罗马。当奥古斯都、阿格里帕、皇族的其他高级成员或代表访问东方时，大希律王总会寻求拜见他们并向他们表达尊崇的机会。前20年，他觐见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向这位犹太国王授予了新的领土，而大希律王大约在这一时间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送到罗马接受教育。附庸统治者们经常这么做。他们的孩子可以说是人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接受罗马式教育。这些王室子弟大部分时间都和奥古斯都的亲属一起度过，奥古斯都还有机会判断这些附庸统治者的性格和可靠程度。大希律王受到信任，被认为很可靠，但其他统治者不是这样。这一次他得到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从另一位附庸统治者那里夺来的。[19]

大希律王的王国腹地仍然是犹太、撒马利亚、加利利和他的家乡以东地区。在这些地区有撒马利亚人和很多非犹太人社区，奥古斯都新赐给他的领土也是混杂居住的。在他的犹太臣民面前，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国王总是小心地把自己的形象塑造为虔诚的犹太人。他很快就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宏大工程，并且很认真地把工程做好，使用上乘材料，在所有的圣洁之地都让祭司主持工作。除了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之外，大希律王可能是这个时代主持建筑工程最多的人了，他还出资修建了自己领土上和邻近各行省的纪念性建筑。有的工程是实用性质的，比如他建造了一座人工港（沿海没有天然港口），称为恺撒利亚港。此项工程需要大量罗马制造的防水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是用火山砂（维苏威火山周边地区的白榴火山灰）制成约45英尺×25英尺×13英尺的块状，然后沉入海底，形成防波堤。新的港口拥有规模很大的码头和仓储设施，很快吸引了大量贸易活动，帮助大希律王更轻松地获得奢侈品，并通过向商品和商贸活动征收赋税，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财政收入。[20]

“恺撒利亚”这个名字是奉承恺撒·奥古斯都比较露骨的手段之一。大希律王建造了不止一座被命名为“恺撒利亚”的城市，而他重建的撒马利亚都城被更名为赛巴斯托斯，并安置了大量非犹太人，其中很多殖民者是大希律王军队的退伍军人。赛巴斯托斯城是一个招募士兵的好地点，在犹太王国最终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之后，赛巴斯托斯的军人被纳入罗马军队，成为正规部队，由罗马总督指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处决耶稣的士兵就是赛巴斯托斯人。[21]

所有用恺撒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似乎都建有奉献给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神龛。这些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是非犹太人，虽然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这些城市还建有其他的异教神庙，并陈列着男女神祇的雕像，以及元首——往往还有他的家人和盟友（如阿格里帕）——的雕像。但是没有大希律王的肖像。在犹太人的城市，尤其是耶路撒冷，除了罗马钱币上的肖像之外，没有任何人的肖像。圣殿铸造自己的货币供献祭用，因

此圣殿庭院内才有兑换钱币的人[22]。圣殿的货币上没有任何侵犯宗教情感的符号。和大部分精英人士一样，大希律王说希腊语，对希腊文学和哲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仰慕希腊文化的很多方面，例如，他慷慨地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捐资。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座剧场及一座供赛马和赛车竞技的赛马场，可能还建了一座圆形剧场，不过有的历史学家相信这座圆形剧场其实就是赛马场，他的角斗士竞技就在那里举行。国内的许多非犹太人城市都举办竞技活动，而在耶路撒冷每隔四年举办一次大型的体育和戏剧节。他不强迫自己的犹太臣民参加这些竞技活动，而只给他们一点点压力，让他们观看。[23]

大希律王渴望不仅在自己的王国，而且在更广大的希腊和罗马世界都被视为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绝大多数高级谋臣和官员都是希腊人，他的军队也主要由非犹太人组成。奥古斯都把安东尼赠给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高卢卫队送给了大希律王，我们听说他的军中还有日耳曼人和色雷斯人。他的少数犹太人士兵要么是和他一样的以东人（不被犹太人认同为真正的犹太人），要么是逃离帕提亚的巴比伦犹太人，其土地和生计都依赖他的恩典。国王高度依赖这些外国人的帮助，并且绝对依附于罗马，这让他的犹太臣民非常憎恶。他的高级总督和将领一般是犹太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他的亲戚。不过，即便是他的亲戚，若是对他不忠，或者被怀疑对他不忠，也难逃一死。哈斯蒙王族的男性成员都已经死了，许多女性也已经不在人世。

只要大希律王拥有罗马的支持，就足够强大，没有人能够用武力推翻他。这些年里，一群年轻的犹太贵族尝试刺杀他，但这些密谋者虽然勇敢且信仰坚定，却没有什么真本事。大希律王的间谍揭露了这一阴谋，所有密谋者被传唤到国王面前，供认不讳。他们遭到毒刑拷打后被处死，他们的很多亲戚也被处死。大希律王在他的犹太臣民当中非常不得人心。非犹太人的态度比较难以判断，他们和撒马利亚人也无法联合起来反对他的统治。再加上他冷酷无情地用武力对付任何反抗，所以他

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从罗马人的角度看，大希律王是否得民心，根本不重要，只要他忠于罗马、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臣民就可以了。[24]

大希律王用奥古斯都的名字来命名一些城市，并在一些新建筑的装饰中歌颂他。赛马场（我们假设它就是圆形剧场，而不是单独的另一座建筑）上竖立了纪念奥古斯都历次胜利的纪念柱，并依次给出每次胜利的名称。这些纪念柱是按照传统的罗马风格设计的，由一根立柱和若干横梁构成，上面挂着盾牌，顶端是一顶头盔，这些装备被认为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群耶路撒冷人误以为纪念柱代表了人的粗糙图形，立刻骚乱起来。他们与领导人会见，通知大希律王，他们不喜欢看到角斗士与野兽或其他人搏斗到死的血腥景象，但最不能接受的是人像[25]。大希律王多次否认这是人像，但群众就是不信，最后大希律王不得不命人取下立柱上的战利品，以证明它们仅仅是木柱。此事以哄堂大笑结尾，而且犹太群众的愤怒始终不是针对为奥古斯都歌功颂德的行为，甚至也不是反对罗马文化，而仅仅因为它可能违背犹太律法。[26]

在后来的岁月里，犹太人对罗马统治的怨恨越来越强，在尼禄、图拉真和哈德良在位时掀起了大规模反叛。但目前犹太人怨恨的目标主要是大希律王。国王若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可能会施加非常野蛮的惩罚。他身边的亲信知道，他喜怒无常、难以揣摩，而且常常视人命为草芥。但在他的统治下，王国欣欣向荣，活跃的贸易和宏大建筑工程提供的实际好处与就业机会给国家带来了不少益处。有好几次，他减轻了臣民的纳税负担，当然我们不知道减税之后负担是不是仍然很沉重，也不知道社会各阶层是否都从新的繁荣中获得实利。农村贫民的生活可能是非常艰苦的。

即便如此，在前20年代末农业歉收、粮食短缺的年份，大希律王向接替艾利乌斯·伽卢斯的新任埃及总督（也是骑士身份）求援，并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金银饰品熔化铸成钱币，以此付账。历史学家约瑟夫斯

写道，埃及总督佩特罗尼乌斯是国王的朋友，于是允许大希律王购买大量埃及粮食，并帮助他安排船只运粮到犹太。奥古斯都肯定知道佩特罗尼乌斯的行动，或至少在事后对其予以认可。此事也能说明各附庸王国与正式的行省融合成一个帝国的程度。粮食被运到犹太之后，大希律王认真地将面粉和面包发放给最需要救济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希律王的慷慨举动（符合传统的犹太精神，即关爱穷人）赢得了臣民的一些好感。[27]

各行省、附庸国的城市和其他社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治的。在它们之上，罗马和奥古斯都具有更高的权威，能够解决困难、授予好处或者赈济灾民。当然，罗马和奥古斯都也掌握着无比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镇压任何臣属社区。在过去，罗马统帅曾向忠诚的外省居民授予罗马公民权，随着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那样的军阀崛起，这种事情越来越常见。奥古斯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不过由于所有被他或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授予公民权的人都会改用尤利乌斯的姓氏，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在何时获得公民权的。越来越多的辅助士兵在退伍时获得了罗马公民权，在他的继承者统治下，辅助士兵退役时会自动成为罗马公民。而授予公民权也是对外省权贵予以奖赏的一种常见手段。再加上殖民计划，本土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涌入外省，于是外省有了更多常住公民。在东方各行省，只有少数殖民地，如贝里图斯（今天的贝鲁特）长期保持了罗马特色，或长期使用拉丁语处理绝大多数公务。在其他地方，希腊语的地位根深蒂固，或者受到广泛仰慕。罗马人并没有施加压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不过地中海东部很多雄心勃勃的人会去学拉丁文。[28]

当外省社区的很多居民成为罗马公民时，奥古斯都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决定这些人是否仍然有义务在其家乡担任官职。他的决定是，这些人仍然有这样的义务，除非他对某些个人予以豁免。因此，一名外省居民可以成为罗马公民，如果足够富裕的话，或许还能担任军官

或者帝国官员，但返回自己家乡之后，仍然要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政治生活。罗马人始终努力栽培被征服地区的贵族，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更是大力推行此种措施。对所有外省居民来说，奥古斯都就是罗马权力的象征，他对外省居民请愿的答复带有非常个人化的语调，这些答复常常被做成碑铭，竖立在公共场所。他写信给以弗所，谈到以弗所派到他那里的使者，并说："接见他们之后，我发现他们都是善良的爱国志士。"后来他还承诺道："我会尽我所能，为你们效劳，并保留你们城市的特权。"负面回复很少被记载下来，除非是被另一个运气更好的社区记载下来。例如，阿佛洛狄西阿斯[29] 人民得意扬扬地竖立了一块碑铭，记录奥古斯都拒绝免除萨摩斯岛的税赋，而免去了阿佛洛狄西阿斯的税赋。但奥古斯都拒绝萨摩斯人的措辞还是非常亲切的："我对你们颇有好感，而且我的妻子在为你们说话，我很想让她高兴一下，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惯例。我对你们缴纳的贡金其实并不关心，但不愿意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随便授予免税的高级特权。"[30]

有些文件记录了元老院的正式法令，批准元首授予外省社区某些特权和好处，我们可以推断元首授予的所有主要特权和好处都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所以拥有至少表面上的宪政的合法性。但人们的印象是，总的来讲奥古斯都施行的仍然是高度独裁的统治，尽管至少在公开层面上，他的统治是在为臣民造福。使者觐见元首，是奥古斯都发表演讲和馈赠礼物的机会。他的很多演讲是用希腊语完成的，这增强了这种感觉：他是一位仁慈贤君，对外省文化非常同情。他毫不羞耻地提及李维娅替萨摩斯人说情这件事，这与共和国时期的风气相比是很大的变化，也等于公开承认，任何有能力影响奥古斯都的人都是值得结交攀附的。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有些社区曾经欢迎李维娅，她与当时的丈夫逃离意大利之后得到了一些社区的帮助。这些社区都得到了慷慨的优待。[31]

奥古斯都做某些巡视的时候，他的妻子很可能陪伴在他身边，或者始终陪同他巡视各地。前21年，他从西西里岛去了希腊，在萨摩斯岛过

冬，然后于前20年渡海前往亚细亚，巡视了这个行省和比提尼亚，随后去往叙利亚。在他巡视的各个地方当中，叙利亚其实是第一个分配给他、由他通过军团长统治的帝国行省。他在元老院行省的时候，当地的总督照常办公，主持司法并接受请愿。元首处理一些更重大、更敏感的问题，有很多使团和请愿的情况被记载下来并保存至今，让我们能够瞥见当时等待他斟酌和答复的潮水般的问题。有些使者真正见到奥古斯都时可能吃了一惊，他们看到的不是雕像上的完美青年，而是一个开始步入中年的人，而且他的皮肤非常敏感，常戴一顶宽檐软帽以遮挡阳光。[32]

现实的不完美从来都不会妨碍外交活动。一天又一天，一座又一座城市，公务在不断进行。使者们等待觐见的机会，然后发表自己的演讲（有的演讲很长），随后等待奥古斯都的回复，要么喜悦要么失望。有些社区遭到了打击。雅典丧失了一些土地，而斯巴达获得了更多土地的管辖权。亚细亚的库济库斯[33]爆发了一起严重骚乱，一些罗马人被鞭笞和处死。库济库斯因此遭到了严厉惩罚，失去了城市的地位，一些公民被卖为奴隶。这是非常极端的惩罚，遭受类似处罚的城市不多。[34]

旅行的时候，奥古斯都必须时刻跟踪罗马局势。前21年，罗马发生了更多骚乱。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有其他行省的人前来觐见和请愿，就像他住在塔拉戈纳期间有人到那里拜见他一样。在埃及，总督佩特罗尼乌斯面临着埃塞俄比亚人对埃及行省南部的袭掠，局势很严重。他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但在沙漠里很难维持军队的正常运作，不得不将大部分部队撤回。埃塞俄比亚女王康达吉[35]又一次派遣她的武士去袭击罗马人，发动了第二次战役，迫使罗马人反击。这一次，佩特罗尼乌斯的准备比较充分，向南打得更远。大英博物馆存放着一尊奥古斯都雕像的头部，是埃塞俄比亚人切割下来当作战利品运回家的。雕像的头部后来被埋在他们一座神庙的入口处，佩特罗尼乌斯的士兵前来复仇时摧毁了神庙建筑，但雕像头部一直埋在那里，直到被发掘出来。最后康达

吉寻求妥协，佩特罗尼乌斯让他们的使者去见奥古斯都。有意思的是，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抱怨道，他们“不知道恺撒是谁，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于是佩特罗尼乌斯“派人护送他们；他们去了萨摩斯岛，因为恺撒在那里……”[36]

前20年，阿格里帕被派回罗马，去处理那里持续的骚乱，但他很快就不得不动身去西班牙，镇压那里再次爆发的叛乱。次年，他打了一场艰苦的战役，终于粉碎了坎塔布里亚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的大规模抵抗。与此同时，百人会议的选民又一次将奥古斯都的名字写在选票上，拒绝选举超过一名执政官。前19年年初，新当选的执政官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还没有同僚。又举行了一次选举，但其中一名候选人马尔库斯·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掀起暴力活动，严重扰乱了选举。鲁弗斯几年前曾担任市政官，颇得民心。在发生洪灾和火灾的时期，鲁弗斯不仅出钱款待民众，还将自己的奴隶组成一个消防队，帮助民众保护房屋。虽然他还不到参选执政官的合法年龄，但自荐为候选人，并将自己的家奴和支持者组织起来，以武力威胁他人，就像过去克洛狄乌斯和米罗做的那样。他可能承诺自己当选后要开展激进的改革，或者他被认为威胁了国家安定，因为后来的史料说他阴谋反对奥古斯都本人。持有同样态度的人还将一些军事失败说成元首的过错，尽管他并不在战区。萨图尔尼努斯让元老院通过了终极议决（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终极议决），鲁弗斯及其部分支持者被逮捕并处决。留在罗马城或其附近的禁卫军，以及梅塞纳斯和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等人的积极支持或许对萨图尔尼努斯帮助很大。此事令人回想起凶残动荡的过去，并警示人们，这样的动乱仍然可能发生，尤其是在元首远离罗马的时候。但在很多方面，此事更证明了奥古斯都政权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传统机制处理了这个问题，而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是罗马史上众多野心勃勃、为达到目标不惜动用武力的最后一位元老（往往是保民官）。[37]

军旗的回归

由于奥古斯都身在远方，可能直到这些风波结束之后才得知情况。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派来了使者，要求将他的竞争对手梯里达底返还。梯里达底之前逃到奥古斯都那里寻求保护和支持，并且带来了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作为俘虏。梯里达底和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都得到了礼遇，因为罗马人觉得他们在未来可能会有用。但在前23年，弗拉特斯四世派来的代表团要求将这两人返还。帕提亚大使先去找了奥古斯都，而奥古斯都将大使和梯里达底带到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元老们没有对此事做出决定，而是立刻投票决定将此事交给元首裁断。最靠近帕提亚的叙利亚地区是奥古斯都辖区的一部分，所以元老们的决定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这揭示了罗马真正的主人是谁。[38]

奥古斯都将弗拉特斯四世的儿子送回了，但拒绝交出梯里达底，而且要求帕提亚国王返还他控制的罗马军旗和战俘。前20年，元首抵达叙利亚，近距离与帕提亚人继续谈判。奥古斯都还用展示武力的方式，支持自己的谈判。亚美尼亚爆发了一场叛乱，推翻并杀死了国王阿尔塔夏二世。亚美尼亚王国夹在帕提亚和罗马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文化上与帕提亚更亲近，不过总的来讲在军事上受到罗马的威胁更大。阿尔塔夏二世之前得到帕提亚人的支持，但现在亚美尼亚的大贵族提议将王位交给他的兄弟提格兰。提格兰也是一位在罗马避难的外国流亡王子。

奥古斯都同意了亚美尼亚大贵族的提议，并派遣二十一岁的提比略率领一支军队，护送提格兰回他的王国。对如此年轻的提比略来说，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指挥使命，近期的类似例子只有庞培和内战中的年轻恺撒。这次护送就像是一次游行，途中没有发生武装冲突，最后提格兰被立为新国王。和平地展示罗马力量的做法有着悠久传统，广受仰慕。提比略身边肯定有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军官辅佐。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年轻人也有了一次发号施令、统领大军的机会。[39]

此次亚美尼亚远征为罗马和帕提亚正在进行的谈判提供了一个背

景。奥古斯都此时并不比前29年更希望与帕提亚交战。战争的风险太大，而行动规模也令人生畏。一旦开战，他至少要离开罗马两三年，在那期间将难以继续处理所有的请愿和其他问题。弗拉特斯四世也不希望发生武装对抗。除了与罗马相邻的边境之外，他还有其他的边境要保护，并且还要面对更直接的威胁：王族内部的竞争对手和难以驾驭的贵族。近些年里，奥古斯都确保了叙利亚及其周边城市以及附庸国君主都对罗马保持忠诚，所以若是帕提亚人发动入侵，也很难在那里得到任何支持。

两国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和平手段，让双方下得了台，都能自称取得了胜利。罗马人可能承诺不支持梯里达底，不过他很可能被允许过着舒适的流亡生活。作为回报，弗拉特斯四世发誓维持和平，并返还了从克拉苏和安东尼那里，以及在前41～前40年从罗马行省缴获的罗马军旗。罗马战俘也得以回国，其中有些人是在卡莱战役被俘的，在帕提亚已经生活了三十年。

丧失的鹰旗和其他军旗的成功回归，是奥古斯都所有成就中被宣扬得最热烈的一次。例如，著名的“第一大门”[40] 奥古斯都雕像的胸甲上就有庆祝此次胜利的图像。此次胜利是通过外交而不是成功的战争赢得的，不过这并不重要。对罗马人而言，他们的优越性得到了认可，因为帕提亚国王承认了他们的力量，并满足了奥古斯都的要求。军旗被收回了，虽然相对于罗马人来说这些象征物的意义对帕提亚人小得多，但帕提亚人此刻也一定认识到了它们的象征性价值。就我们所知的情况而言，在这次协定中，弗拉特斯四世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对自己国内的人，他无疑会说这是两位平等君主之间的协定。罗马人不是这么看的，他们觉得，一个骄傲而危险的敌人由于畏惧罗马的力量而臣服了，并且没有损失任何罗马人的生命。

虽然贺拉斯宣称“为了祖国牺牲，是一件甜蜜而适宜的事情”（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如今我们熟悉这句话，可能是由于威尔弗雷德·欧文所说的“古老的谎言”[41]），但罗马人从来不会为了光荣而希冀一场己方损失惨重的胜利，他们的胜利纪念碑上也从来不会刻画己方的死者。[42]

当局很快就铸造了一批钱币，描绘军旗的回归，并刻有宣扬此事的铭文。元老院向奥古斯都授予了潮水般的新荣誉，其中很多被奥古斯都谢绝。但在他谢绝这些荣誉的消息传来之前，西班牙和其他一些行省已经铸造了一些刻有这些新荣誉字样的钱币。有些钱币上描绘卡比托利欧山耸立着一座新神庙，用来存放这些军旗。不过据我们所知，并没有新建这样一座神庙。虽然奥古斯都接受了对他此次胜利的正式感恩，但谢绝了返回罗马后举行小凯旋式（甚至是完整的凯旋式）的荣誉。不过还是出现了一些描绘凯旋式的钱币。其中一批钱币描绘元首乘着一辆由一对大象拉的战车，所以我们推测他也被授予了这种怪诞的荣誉。庞培曾企图在凯旋式时用大象给自己拉车，但没有成功，因为他发现游行路线上的一座拱门太窄，如此笨重的战车和大象过不去，于是不得不换成传统的马拉战车。尤利乌斯·恺撒在庆祝高卢战争胜利的凯旋式之后，在夜间攀登卡比托利欧山时用四十头大象载着火炬。很显然，如此浮夸高调的姿态，使用如此巨大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动物，仍然能够激发一些贵族的想象力。[43]

奥古斯都谢绝了几乎所有的新荣誉。但他对元老院向他授予这些荣誉的决定还是感到很高兴，并且谢绝之后，大家又会赞扬他的谦逊。同时，他也足够自信，相信自己的声望和威名已经足够大，不需要更多荣誉了。后来，回归的军旗被陈列在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中，这座神庙是他的新建筑群“奥古斯都广场”的一部分。他在腓立比战役之后就发誓要建造这座神庙，因为他成功向杀害养父的凶手复仇了。不过后来神庙很晚才动工，现在正好也可以纪念向帕提亚人的复仇。

元老院还投票决定授权他建造一座凯旋门。这是他第三次得到这样的荣誉，前两次分别是瑙洛库斯战役和亚克兴角战役之后。据我们所知，他只建造了一座凯旋门，坐落在罗马广场边缘神圣尤利乌斯神庙的旁边，是为了纪念亚克兴角战役。奥古斯都没有建造新的凯旋门，而是决定对亚克兴角凯旋门进行改造，在其顶端竖立了一座大于真人尺寸的元首雕像，乘着战车，胜利女神在他身后，而卑躬屈膝的帕提亚人向他交还罗马军旗。这样的图像告诉我们，虽然奥古斯都拒绝了很多荣誉，但他仍然是罗马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公仆。他的形象随处可见，他的名字、形象或符号出现在罗马市中心、意大利各城镇和外省各地的纪念碑上。[44]

前19年3月27日，小巴尔布斯庆祝了凯旋式，以纪念他在担任阿非利加总督期间取得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将很多战利品投资于建造一座新的石制剧场。奥古斯都的军团长不会得到凯旋式的荣誉，因为他们的胜利都属于他。但军团长会得到凯旋式的象征符号。大多数有元老身份的总督都没有机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仍然有权指挥军队的阿非利加总督和马其顿总督也没有多少机会。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意识到，巴尔布斯的凯旋式是最后一次旧式风格的凯旋式。奥古斯都本人此后再也没有庆祝过凯旋式，而在将来只有他的亲属才被允许得到这种荣誉。但即便对他们而言，凯旋式的机会也非常稀罕。战争将继续，罗马人不断取得胜利，但所有的胜利都主要归功于元首，而他对用传统方式纪念胜利根本不在乎。亚克兴角凯旋门上增添了过去所有凯旋式的清单，这或许能说明奥古斯都对凯旋式的态度。[45]

前20～前19年冬季，奥古斯都返回了萨摩斯岛。在这几个月里，不断有使团和请愿者来求见。其中有一个代表团是某位印度统治者派来的，送来了一些老虎作为礼物，还有一个不幸的男孩，他天生没有胳膊，但可以用脚抓住东西。两个多世纪之后的狄奥觉得这些礼物仍然值得一提。老虎可能被送到了罗马，展示给群众，可能为了给群众提供娱

乐活动而被宰杀了。罗马人的娱乐方式就是这么残酷。残疾男孩引起了大家的好奇，而不是同情。印度使者在奥古斯都的宫廷待了一段时间，跟着他去了雅典。狄奥还说，在雅典，一名印度使者跳进一个特别准备的火葬堆，自杀了。狄奥不知道这人自杀是因为年事已高，还是“为了给奥古斯都和雅典人上演一场好戏”。

对罗马人来说，印度仍然无比遥远和神秘。亚历山大大帝到过印度，但不曾有罗马军队抵达那里。即便如此，前来拜见奥古斯都的印度使团并不止一个，这说明一些印度领导人很认可罗马的财富、权力和威望。罗马人和外省居民对丝绸、香料和其他远东奢侈品的胃口非常大，而且需求不断增长，所以印度使者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与罗马这个市场建立联系。同时，这样的交流也让奥古斯都有机会吹嘘，罗马统治着差不多整个世界。这种想法让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激动不已，并且随着新的胜利不断来临，似乎越来越真实。罗马无须动武就收回了自己的军旗，恢复了自己的荣誉，但这不是扩张放缓的迹象。[46]

---

[1] Res Gestae 29.2（Loeb translation）.

[2] Horace，*Epodes* 1.12.27-8（Loeb translation）.

[3] 奥古斯都与书面指示，见F.Millar，‘State and Subject：the impact of monarchy’，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37-60，尤见46-8，书面指示的性质见D.Potter，‘Emperors，their borders and their neighbours：the scope of imperial *mandata* ’，in D.Kennedy（ed.），*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JRA Supplementary Series 18* （1996），pp.49-66。

[4] Dio 54.6.1-4，*Res Gestae* 5.

[5] Dio 54.7.1，Strabo，*Geog* .6.2.4-5，Pliny，*NH* 3.90，with R.Wilson in *CAH2* X，pp.437-9.

[6] 大希腊（Magna Graecia）是古时意大利南部沿海由希腊人殖民定居的地区。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向意大利南部殖民，建立了许多繁荣的城邦，罗马人称之为大希腊。建立在意大利的著名希腊城邦有那不勒斯、叙拉古等。大希腊对意大利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影响，希腊字母经由大希腊的传播和演化，最终形成拉丁字母。前3世纪的皮洛士战争之后，大希腊被罗马共和国

吞并。

[7] 关于元老无需正式批准便可去往西西里岛，见Tacitus，*Ann* .12.23.1及Dio 52.42.6。狄奥认为这是奥古斯都的决定，塔西佗和狄奥都声称，唯一类似的授权是关于元老去往纳博讷高卢的产业。

[8] 三次内战指的是尤利乌斯·恺撒与庞培的内战（前49～前45年）、后三头同盟与“解放者”（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内战（前44～前42年）、奥古斯都与安东尼的内战（前32～前30年）。在这三场内战中，希腊地区先后支持庞培、“解放者”和安东尼，三次都站在失败的一方。

[9] 见A.Wallace-Hadrill，‘Image and authority in the coinage of Augustus’，*JRS* 76（1986），pp.66-87。

[10] Matthew 22：20-21，评论见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1990），pp.44-5。

[11] 埃及城市，在今天的开罗西南偏南约160公里处，其周边地区是重要的考古发掘地，出土了大量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期的纸莎草纸，包括米南德的戏剧、《多马福音》残篇和欧几里得著作的残篇等。

[12] J.Rea，‘Lease of a Red Cow called Thayris’，*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68（1982），pp.277-82.

[13] 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卫城是城市中地势较高、易守难攻的部分，可能筑有军事要塞，做防御之用。

[14] *Inscriptiones Graecae* （1893-）II 2.3173，评论见J.Camp，*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2001），pp.187-8。

[15] Strabo，*Geog* .10.5.3.

[16] J.Camp，*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2001），pp.188-93，奥古斯都时代背景下，罗马人对希腊的态度，以及希腊人对罗马的态度，详见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1965），pp.42-61，尤见85-100，及A.Spawforth，*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 （2012），pp.59-86，尤见106-17关于雅典人的讨论。

[17] 概况见F.Millar，‘Empire and City，Augustus to Julian：Obligations，excuses and status’，*JRS* 73（1983），pp.76-96及P.Veyne，*Bread and Circuses* （1992），尤见A.Spawforth，*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2012）。

[18] 概况见B.Levick in *CAH2* X，pp.649-50；艾利乌斯·伽卢斯的部队，见Josephus，*AJ* 15.317；大希律王和他自行选择继承人的权利，见Josephus，*AJ* 15.343，16.129及Gruen in *CAH2* X，pp.155-7的评论。

[19] Dio 54.9.3，Josephus，*AJ* 15.343-8，360，*BJ* 1.398-400.

[20] 概况见D.Roller，*The Building Programme of Herod the Great*（1998），港口见C.Brandon，'Cement，concrete and settling barges at Sebastos：comparisons with other Roman harbour examp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Vitruvius'，in A.Raban & K.Houm（eds），*Caesarea Maritima.A Retrospective after Two Millennia*（1996），pp.25-40。

[21] 罗马军队里的赛巴斯托斯人，见M.Speidel，'The Roman army in Judaea under the Procurators'，in M.Speidel，*Roman Army Studies* Vol.2，Mavors（1992），pp.224-32。

[22] 《圣经·新约》中耶稣洁净圣殿的典故，见《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当时圣殿的祭司允许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子进行买卖；又因圣殿不收希腊和罗马的钱币，犹太人缴纳殿税或奉献须用指定的希伯来钱币，故有兑换银钱的人，为那些外来朝圣者提供方便。因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神圣之地因而被玷污；占用外邦人的院子，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祭司和商人勾结串通，祭司给予商人各种方便，而商人高价剥削，然后平分暴利。耶稣大力谴责这些利欲熏心的商业行为。

[23] 大希律王的统治，见E.Sc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p.287-329，尤见309-15，是绝妙的介绍；奥林匹克运动会见Josephus，*AJ* 16.149，*BJ* 1.427，他自己的节庆活动见15.268-71；刺杀见15.280-91；大希律王给希腊社区的馈赠，见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1965），pp.54-6，及A.Spawforth，*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2012），pp.84-6。

[24] Josephus，*AJ* 15.217，17.198，*BJ* 1.672，及E.Sc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315。

[25] 犹太教"摩西十诫"的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仿佛上天下地的形象，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26] Josephus，*AJ* 15.272-9.

[27] Josephus，*AJ* 15.305-16.

[28] R.MacMullen，*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2000），pp.1-29.

[29] 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得名自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

[30] L.Jalabert，R.Mouterde et al.，*Inscriptiones grecques et latines de la Syrie* （1929-）3.718 = R.Sherk，*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1969），no.58，doc.iii；J.Reynolds，*Aphrodisias and Rome* （1982），No.13.

[31] Dio 54.7.2.

[32] Dio 54.7.1-6；Suetonius，*Augustus* 82.1讲到他戴帽子，保护自己的皮肤。

[33] 库济库斯为古希腊名城，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北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前410年，在库济库斯，雅典军队在亚西比德的指挥下大败斯巴达舰队。

[34] Dio 54.7.2，6.

[35] 康达吉（Kandake或Candace）是古代尼罗河流域库施王国（在埃及以南）女王的头衔，普林尼和《新约》里讲到埃塞俄比亚的女王被称为康达吉。前21年时的康达吉是阿玛尼利纳斯（Amanirenas）。

[36] Dio 54.5.4-6，Strabo，*Geog* .17.1.54（Loeb translation）；Dio 54.6.1讲到罗马的骚动。

[37] 见Velleius Paterculus 2.91.3-4，Suetonius，*Augustus* 19.1，及Dio 53.24.4-6，他错误地将此事件的年代定为前26年，with Crook in *CAH2* X，p.89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71-2，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148-9。

[38] Dio 53.33.1-2.

[39] Dio 54.9.4-6，Velleius Paterculus 2.94.4，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25-7，R.Seager，*Tiberius* （2005），pp.13-14.

[40] 第一大门（prima porta）是罗马郊区的一个地点，距市中心12公里，在台伯河右岸，是几条重要道路的交会点，也是从北面进入罗马城的入口，因此具有重要意义。1863年在此发掘出了奥古斯都最著名的一尊雕像。

[41] 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年），英国军人与诗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他之前，战争诗歌常鼓吹爱国主义或所谓的战争荣耀，而他用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笔法描绘堑壕战、毒气战的凶残恐怖。他于1918年11月4日在法国阵亡，恰好一周之后，停战协定签署了。他的名诗Dulce et decorum est（……是一件甜蜜而适宜的事情）描写一战期间英军士兵遭到毒气攻击的惨状，谴责战争和鼓吹“为国捐躯”的“古老的谎言”。

[42] Dio 54.8.1-2，*Res Gestae* 29.2，Velleius Paterculus 2.91.1，Suetonius，*Augustus* 21.3，*Tiberius* 9.1，Ovid，*Fasti* 5.579-84，with D.Kennedy，‘Parthia and Rome：eastern

perspectives’，in Kennedy（1996），pp.67-90，尤见82-3，及B.Campbell，‘War and diplomacy：Rome and Parthia，31 BC-AD 235’，in J.Rich & G.Shipley（eds），*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1993），pp.213-40，esp.220-28；*dulce et decorum estpro patria mori*，Horace，*Odes* 3.2.13。

[43] 对这些荣誉及其背景的详尽讨论，见J.Rich，‘The Parthian honours’，*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6（1998），pp.71-128；大象和凯旋式，见Plutarch，*Pompey* 14.4，Pliny *NH* 8.4讲到庞培的凯旋式，Suetonius，*Julius Caesar* 37讲到用大象承载火炬。

[44] 凯旋门，见J.Rich，‘The Parthian honours’，*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6（1998），pp.97-115，各项荣誉的概况，见Gruenin *CAH2* X，pp.159-60，Levick（1996），pp.236-7。

[45] 见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p.138-40，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367及Crook in *CAH2* X，p.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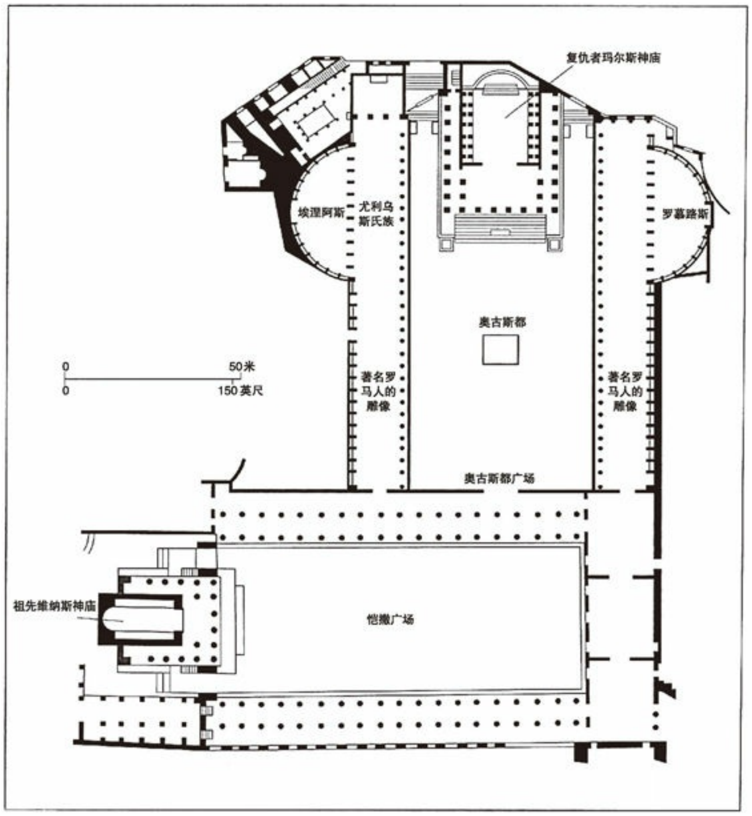
[46] Dio 54.9.8-10，*Res Gestae* 31-2，with Rich，‘Augustus，War，and Peace’，in L.deBlois，P.Erdkamp，O.Hekster，G.de Kleijn & S.Mols（eds），*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Impact of Empire*（*Roman Empire*，*c.200 BC-AD 476*），（2003），pp.329-57 = J.Edmondson（ed.），*Augustus*（2009），pp.137-64，尤见145-6。

十六 结尾和开端

从这高贵的血脉，特洛伊的恺撒将会出世，他会把他的帝国扩张到大洋边，他的荣耀将升至星辰……假以时日，不再焦虑的你们，将会欢迎满载东方战利品的他，去往天堂；人们在发誓时也会呼唤他的名字。然后，战争会停息，野蛮的年代变得温和……

——维吉尔，前20年代末 [1]

恺撒·奥古斯都可能在雅典逗留了几周，然后徐徐地返回意大利，在沿途所有重要社区停留，接见臣民。他继续工作，即便印度大使自杀这样恐怖的事情也只是个小插曲。他持续不断地接见请愿者和书写信件。诗人维吉尔来到雅典，他比请愿者更受到奥古斯都的欢迎。维吉尔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创作十二卷史诗《埃涅阿斯纪》，现在去希腊旅行，休息一番。他是梅塞纳斯的长期密友，通过梅塞纳斯认识了奥古斯都。人们普遍相信，是元首敦促维吉尔开始了创作史诗的伟大工程。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奥古斯都肯定对史诗的进展很感兴趣，有一次在西班牙写信询问写作情况。在离开罗马、前往东方之前，奥古斯都和一些家人参加了维吉尔亲自公开朗诵《埃涅阿斯纪》部分章节的聚会。哀悼前不久去世的马凯鲁斯的段落让他们非常感动，屋大维娅甚至因此晕倒。[2]



奥古斯都广场

维吉尔是个完美主义者，遣词造句呕心沥血，在创作《埃涅阿斯纪》时一天只能写出几行。他的朋友贺拉斯也是梅塞纳斯圈子的成员，创作时有时更慢。这样缓慢的苦吟不是装腔作势，也不是外行的表现，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严肃的艺术家，才华横溢。贺拉斯被大家仰慕，而维吉尔的诗歌已经被誉为可能是拉丁语言最美丽的表达。梅塞纳斯在选择诗人加入自己的朋友圈子时颇具慧眼。他的文艺伙伴可能都是骑士（贺拉斯就是骑士，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释奴），非常富裕，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非常清闲，能够专心于诗歌。虽然其中有些人在内战中丧失了一些土地，但他们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依赖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的恩宠，这两位的馈赠仅仅让这些文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而已。奥古斯都可能是在患病之后希望雇用贺拉斯，于是写信给梅塞纳斯：“在此之前，我能用自己的手写信给朋友们；如今，肩负着工作的重担，并且身体欠佳，我希望从你身边把我们的朋友贺拉斯请来。我要请他离开

你那寄生虫的餐桌，来到我这帝王的桌前，帮助我写信。”[3]

最后贺拉斯谢绝了这个提议，但他和奥古斯都仍然维持着友好关系。元首给老友梅塞纳斯写的这封信具有非正式而取笑逗乐的风格，他和诗人们的通信用的也是这种风格。对罗马精英阶层来说，文学是一种非常受尊重、非常时髦的闲暇活动，也是真正的文明人的标志。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时的幕僚是一群才华横溢的文人，而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一样，非常尊重诗人和作家。在社交场合与其他元老或重要人物交流时，文学是非常有用且比较中立、不带政治性的话题。在奥古斯都与阿提库斯的交往中，除了热爱传统之外，文学也是一个主要话题。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也都写作，奥古斯都还和贺拉斯等人一起嘲笑梅塞纳斯写诗的努力。奥古斯都常常自嘲，有一次放弃写作一部悲剧时开玩笑地说，他的主人公“摔倒在自己的海绵上”。[4]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梅塞纳斯文学圈子里的诗人们也都清楚奥古斯都主宰国家的现实，并且他的统治说到底还是建立在强大军事力量之上。但奥古斯都并没有强迫诗人们去写作，正如他没有强迫元老们去从政一样。有人认为这些诗人的作品仅仅是政治宣传，甚至提出他们作品的内容受到梅塞纳斯（以及奥古斯都）的严密监控。这些观点都大错特错。也有人努力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挖掘隐含的颠覆言论或对元首及其政权的批评。这样做是徒劳无功的。奥古斯都非常骄傲地只与最优秀的作家结交。这是自尊问题，但也是很好的政治手腕。亚历山大大帝受到了太多平庸诗人的夸张歌颂，因此声誉有些受损。

奥古斯都可以鼓励和诱导维吉尔、贺拉斯和普罗佩提乌斯这样的人去写某些主题的作品，他们自己也知道哪些主题会让元首开心。他们有时开玩笑说自己是被“强迫”写作的，但这种说法是常见的文学手段，代表着虚假的谦虚。西塞罗、阿提库斯及其同时代人常常玩同样的游戏，互相敦促去写某些特定主题的作品。奥古斯都曾写信给贺拉斯，温和地

批评他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讲到自己。奥古斯都用惯常的打趣口吻写道："你是担心如果大家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你的身后名会受损吗？"这些话的背后很难说存在什么真正的威胁。奥古斯都谈的是友谊（因为贺拉斯是皇室的亲信），而不是政治。尽管在罗马，友谊和政治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奥古斯都暗示的意思是，贺拉斯若是写一部以奥古斯都为主题的作品，将会给他们两人都带来荣誉。贺拉斯的回应是他的《书信集》第二卷的第一首诗，谈到了他这样的诗人主动为国效力，并包括那句著名的诗："被俘虏的希腊征服了凶悍的胜利者，将艺术带到了粗野的拉丁姆[5]。"[6]

诗人们受到的压力是很小的，而且他们的绝大多数主题都是自己喜欢的。差不多所有亲身经历过内战的人都会愿意歌颂恺撒的胜利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和平。复苏宗教仪式、恢复稳定和击败危险的外国敌人，这些无疑都是有利于全体罗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好事，诗人们如果不这么想，就非常奇怪了。他们作品的措辞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更没有直接审查。若要创作出佳作，维吉尔和贺拉斯等人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风格来写作。

结果是，一大批文学水平极高的不朽名著诞生了，随后许多世纪里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其中很多作品符合新政权的口味，但也有很多作品讲的是更普遍的人生经历。这样的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被严密控制的宣传，并且有利于促进恢复传统和安宁的气氛。奥古斯都与诗人们的交情为他的统治增添了不少光辉，因为文学是任何一位元老都可以拥有的非常正当的兴趣，而且这些诗歌显然非常优秀，所以，他不会被认为是暴君，诗人们也不会被认为是阿谀奉承之辈。普罗佩提乌斯拒绝接受"对抗帕提亚人和其他敌人的战争"这样的主题，而是去写爱情。他不是在攻击国家政策，而是在诗歌中运用机智和富有魅力的手法去愉悦读者，而不是劝读者放弃政治生活。奥古斯都的统治创造了一个鼓励文学和艺术繁荣发展的环境。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努力扬名立万，往往会

彻底改变现有的风格。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维吉尔和其他人表达的观点不是真诚的，尽管现代人有一种偏见，认为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必须是异见分子，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尤其是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位用武力夺取权力的领导人的统治之下。作为对比，我们可以考虑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很多伟大的音乐和艺术作品就是在专制君主统治时期，甚至在专制君主的直接赞助之下问世的。[7]

有一次，维吉尔谈到要写一部以奥古斯都为主人公的史诗，后来放弃了这个创意。《埃涅阿斯纪》的背景是遥远的过去，讲述的是埃涅阿斯的故事，他是特洛伊的英雄，在这座城市陷落之后逃走，带领一群流亡者来到了意大利。几个世纪之后，他的后代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埃涅阿斯的世界就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是最古老和最伟大的希腊史诗）的世界，维吉尔刻意要尝试在拉丁语中与荷马史诗的辉煌比肩。埃涅阿斯也被认为是尤利乌斯氏族的祖先，他们的姓氏尤利乌斯来自埃涅阿斯之子尤卢斯的名字。因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所以显贵的尤利乌斯氏族拥有神的血统。维吉尔为这部史诗投入了全部精力，就连他去希腊的旅行也只是暂时休息一下，然后继续修改史诗，提高创作水平。虽然维吉尔呕心沥血地苦吟，而且《埃涅阿斯纪》部分章节在公开朗诵之后受到了欢迎，但他还是对自己不满意。据说他曾在一次公开朗诵的过程中修改诗句。他不像喜爱锦衣玉食的贺拉斯那样热衷社交，而是大部分时间都隐居在自己的一个乡间庄园里，苦思冥想地修改诗作，一行一行地改善或摈弃。[8]

《埃涅阿斯纪》还没有完成，但不知是由于希腊没有如预期的那样激发他的灵感，还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陪伴奥古斯都，他和元首及其随行人员一同返回了意大利。在旅途中，他病倒了，起初是中暑，后来发高烧。维吉尔抵达了意大利，但于前19年9月21日在布隆迪西乌姆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他去世的日子离恺撒·奥古斯都的四十四岁生日只有两天。他在遗嘱中立元首和梅塞纳斯以及卢基乌斯·瓦里乌斯（也是

梅塞纳斯文人圈子的一员）为继承人。维吉尔生前对《埃涅阿斯纪》不满意，曾请求瓦里乌斯，假如他去世了，就烧掉手稿。瓦里乌斯拒绝了这个请求。维吉尔在临终的日子里恳求仆人将手稿拿到他身边，以便亲自把它们烧掉。奥古斯都确保无人服从这个命令。元首敦促瓦里乌斯和一位同僚整理了这部史诗，很快将其发表。[9]

维吉尔的意愿遭到了违背，但这为人类做出了极大贡献，挽救了罗马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埃涅阿斯纪》对奥古斯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因为这是一部恢宏优美的史诗，由一位著名诗人创作，讲述的是他的尤利乌斯祖先之一以及罗马人起源的激动人心的故事，赞颂了罗马人的过去与未来。因此奥古斯都的行动并非完全无私，不过如果史诗没有大体完成并且水平不高的话，他应当也不会希望将它公之于世。人们很快开始猜测，维吉尔生前打算做怎样的修改，今天的学者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埃涅阿斯纪》被世人普遍赞美为足以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的杰作。它很快成为罗马教育的标准教材。（一个世纪之后，在帝国的两端，分别在不列颠北部和犹太的两位百无聊赖的军队书记员在日常文书的背面胡乱写了这部史诗的一句，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些文书。）《埃涅阿斯纪》是拉丁文学中经常被引用的作品，但我们应当注意，历史上的引用大多引自《埃涅阿斯纪》前几卷。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埃涅阿斯纪》的很大一部分也被忽视，因为教师们往往集中注意力于为人熟知的少数选段。[10]

《埃涅阿斯纪》第一卷第一行是“我歌唱的是战争和一个人的故事”，诗人用第一人称，这就与荷马的传统分道扬镳了。《埃涅阿斯纪》的世界与荷马的世界交织起来，其中很多人物，最重要的是埃涅阿斯，都直接来自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的上半部分很像《奥德赛》，描写特洛伊流亡者在地中海漫游，有时会涉足奥德修斯曾经到过的地方。比如，他们遇到了当初奥德修斯及其伙伴逃离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11]时被留下的一个人，后来又看到被戳瞎的怪物怒气冲冲地跌跌

撞撞。在整个故事中，神祇会不断干预人的命运，朱诺复仇心切地追踪特洛伊人，而维纳斯则保护她的儿子。

虽然《埃涅阿斯纪》中有很多荷马的影子，也有很多指涉其他文学作品的典故，但在神话之外还是能看出一个更现代和更复杂的世界。埃涅阿斯有时会害怕、生气或一时糊涂，有时为了鼓舞部下会故作自信和热情，自己内心里其实是绝望的。荷马的英雄则完全是无比自信、极度自我为中心的，比如《伊利亚特》讲的是阿喀琉斯因为自己受到不公而大发雷霆，于是躲在营帐内生闷气，直到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促使他重返战场，大肆杀戮。与他个人的动机（他选择了短暂但光荣的生命，而不是默默无闻地活到高龄）相比，整个希腊军队的命运似乎无足轻重。在《奥德赛》里，英雄奥德修斯在旅途中失去了所有伙伴，却并不感到懊悔。他和仙女与女神缠绵嬉戏之后，回到家里屠杀了向他妻子求婚的人和所有曾经接纳求婚者的家仆。对这些英雄来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誉和成功，所以许多世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尤其是贵族，都将这两部史诗当作个人行为的指南。

埃涅阿斯则不同，他始终清楚自己更重要的使命。他是虔敬的埃涅阿斯，尊重神祇和家人，尤其是他从特洛伊废墟里救出来的父亲。他知道自己肩负着特洛伊种族的命运，他需要带领他们去意大利，后来的罗马就是由他们建立的，而罗马人将崛起到维吉尔时代的那种崇高地位，甚至还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他多次瞥见这样的未来，从中受到激励。除了公开的敌人之外，他还面临着诱惑，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和他的追随者受到了迦太基女王狄多的欢迎。朱诺和维纳斯联手让狄多爱上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和狄多在一起狩猎时遭遇风暴，躲在一个洞穴内，发生了肌肤之亲。但特洛伊人前途受到的威胁很短暂，因为埃涅阿斯很快就带领他的全体族人离开了，而不是在迦太基人当中定居。如果他们留下，迦太基就将成为地中海最强大的国家，而不是罗马。伤心欲绝的狄多自杀殉情，导致她的民族对埃涅阿斯的后代抱有刻骨铭心的仇

恨，这为前3世纪和前2世纪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真实冲突提供了一个古老的缘由。[12]

维吉尔的史诗融合了现有的传说（有时他从多个版本中挑选了一个）、荷马史诗和其他史诗，他自己也做了很多虚构。书中暗指他自己所处时代之处不胜枚举，但不会显得笨拙。诗中经常出现西西里岛，埃涅阿斯曾两次到访那里，这肯定反映了西西里岛在奥古斯都崛起过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绝望的狄多哀叹她的情人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小埃涅阿斯”以宽慰被抛弃的她，这肯定让维吉尔的同时代人联想到尤利乌斯·恺撒、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和恺撒里昂。史诗中的迦太基女王很容易与近期历史上的埃及女王联系起来，但这个联系不会显得太刻意。维吉尔非常同情狄多，她被诸神操纵，爱上埃涅阿斯，后来又被抛弃。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本人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也露过面，被写得很负面，但狄多更像是一位受害者而非恶人。只有诗人描写她的恐怖自杀时，她才被写得精神不稳定和危险，或许现代人会觉得狄多的性情变化得太突然，但维吉尔时代的人可能不会这么觉得。[13]

虔敬的埃涅阿斯先公后私，将民族的命运置于比个人情感更高的地位，因此抛弃了狄多。后来，他拜访冥界时遇到了她的鬼魂。这个场景主要刻画他的哀愁和愧疚，而不是她的情感。女王拒绝与他相认。埃涅阿斯每一次都做出了有利于未来的正确选择，但对他自己和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伤害。他们最终抵达意大利，受到当地一些国王的欢迎，却使得他们与邻国发生了战争，这在很多方面影射了维吉尔时代的历次内战。荷马史诗中详细描写了战争中的伤痛和死亡，战斗场面残酷而野蛮。维吉尔也遵循了这种传统。《埃涅阿斯纪》展现的很可能是一个比荷马史诗更冷酷的世界。一位盟邦国王被绊倒在地，跌落到祭坛上并被杀死，他的对手嘲讽地喊道：“他完蛋啦！（这是角斗士竞技场上观众常用的呼喊。）这是给大神的更好的祭品！”就在附近，另外一个人的胡须被点着，然后被打倒在地，惨遭屠杀。《埃涅阿斯纪》相比荷马史

诗，更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惨重代价，以及死者亲人的痛苦感受。[14]

尽管维吉尔把战斗描写得非常恐怖、令人哀伤，但他并没有谴责战争本身，更没有说战争是无谓的。埃涅阿斯在战斗中也是非常残酷无情的，他杀死了包括一个佩戴祭司符号的人在内的众多敌军，拼出了一条血路。在故事末尾，他遇见了鲁图利亚国王图尔努斯，后者已经杀死了很多特洛伊人及其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伊万德国王的儿子帕拉斯。图尔努斯被埃涅阿斯击伤，请求埃涅阿斯看在他可怜父亲的份上饶他一命，这让埃涅阿斯想起了自己挚爱的、现已去世的父亲安喀塞斯。胜利者一瞬间被感动了，有些犹豫。然后他注意到，图尔努斯系着一根从帕拉斯尸首上剥下的腰带，于是他的怜悯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怒”。埃涅阿斯高呼这是正义的惩罚，是为帕拉斯报仇雪恨，于是将剑深深刺入图尔努斯的胸膛，他的“肢体松懈下来，变冷了，随着一声叹息，他的灵魂愤怒地飞向阴间的黑影”。[15]

全诗就这样结束了。虽然维吉尔并没有完成对这部巨著的修改，但他未必打算以怜悯而非复仇结束故事的最后一幕。图尔努斯以武力反对埃涅阿斯，为给敌人造成的破坏而欢呼雀跃，对敌人没有一丝怜悯，在最后的决战中还破坏了停战协定。图尔努斯并没有被描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恶魔，维吉尔也很同情他，就像对狄多和其他角色一样。这样对人性的同情与理解，是伟大艺术家的标志，但维吉尔绝没有鼓励读者（尤其是前1世纪的罗马读者）将这些人物与埃涅阿斯相提并论，更没有暗示他们可能才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罗马人能够做到敬佩自己的敌人，并承认他们的征服战争常常给被征服人民带来极大苦难。但这些认识从来不会真正挑战罗马人内心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罗马的扩张是正义的。敌人就是敌人，必须打败他们后才能善待他们。诗歌和现实生活一样，只有罗马的胜利才能带来和平的喜悦。[16]

埃涅阿斯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奥古斯都本人的特点，例如，显而易

见的英雄主义，英明神武的武士形象。有人说维吉尔没有刻意颂扬元首，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把责任和虔敬看得比自己的享乐和利益更重要，忍受了极大的艰难困苦，奋斗了多年才赢得最终胜利，让广大群众享受到和平与繁荣。有的时候，为了更重要的福祉和罗马人的命运（当然对埃涅阿斯来说是罗马人祖先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做一些可怕的事情。目标如此高远，他们必须消灭所有阻碍他们的人，符合道义、激昂浓烈的狂怒替代了从容虔敬的态度。埃涅阿斯有时甚至会嘲讽即将被杀死的敌人，据说年轻的恺撒在腓立比战役之后和佩鲁西亚战争时期也曾这么做。[17]

史诗赞颂了恺撒·奥古斯都。工匠之神武尔坎为埃涅阿斯锻造的华丽盾牌的中心图案就是亚克兴角大捷时期的恺撒·奥古斯都。有时维吉尔会更模糊地说到一位恺撒。有一次，他讲到“特洛伊的恺撒……满载东方战利品”，我们很难判断他指的是奥古斯都还是尤利乌斯·恺撒。或许他是故意含糊其辞，对两位恺撒都有指涉，养父的丰功伟绩增强了养子的成绩和美德。类似地，当维吉尔写到加图在阴间裁判死人时，他指的既是著名的老加图，也指涉曾坚决反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小加图。维吉尔热衷赞颂历史上伟大的罗马人。在史诗里，喀提林死后遭到可怕的惩罚，除此之外史诗很少提及政治分野。在等待出世的罗马的未来英雄当中有两位“以同样雄武的阵势熠熠生辉”的豪杰，显然是指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他们“呜呼哀哉……将会造成战争与流血”，“新娘的父亲”会反对“她的丈夫”。诗中敦促他们保持克制，避免内战。这肯定是维吉尔对他们的批评，但这批评很温和，既是针对伟大的庞培，也是针对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并且敦促后者首先“饶恕敌人”，这显然是在认可和称赞他那著名的宽宏仁慈。[18]

《埃涅阿斯纪》洋溢着爱国主义，充满了歌颂往昔荣光的激动人心的段落，并预言在神圣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的统治下必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虽然诗中鲜血淋漓地刻画了战争和传统（维吉尔那一代人对这

些已耳熟能详），但对未来非常乐观，因为罗马的前途不可限量。和所有伟大的作品一样，《埃涅阿斯纪》也有很多层面，不同时代的人对其有丰富的阐释，这些阐释往往会让作者本人感到惊讶或沮丧。奥古斯都应当不会想到那些复杂的解读，他只是被优美的诗句所感动，并且因为自己出现在这样一部广受赞颂的史诗中，与它有着紧密关系而备感愉悦。

家族与权力

元首及其随行人员抵达罗马时，已是年末。在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掀起的骚乱之后，这一年仍然只有一位在职的执政官。直到这时，元老院才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奥古斯都，他选择了一名元老作为另一位执政官。这样做的具体程序不太清楚。狄奥暗示说，奥古斯都凭借自己的权威指定了一个人，没有举行正式选举。不过狄奥可能是在描述事情的本质，而不是实际的技术细节。被选定的那个人在内战期间曾忠心耿耿地为奥古斯都效力。做了这个安排之后，奥古斯都又一次谢绝了元老院全体集合并与群众一同正式欢迎他入城的荣誉。他发现一大群元老仍然打算去迎接他，于是借着夜色，悄悄溜进了城。不过他接受了元老院的另一项投票决定，即在卡佩纳门（他在沿着阿庇乌斯大道[19] 靠近罗马后，从这座城门进入罗马城）建造一座幸运返乡女神庙。每年的献祭于10月12日（新设立的奥古斯都节）在这座神庙举行。[20]

恺撒·奥古斯都外出期间，罗马城有些不安稳。只有在阿格里帕的直接监督下，才能暂时阻止百人会议每年选举奥古斯都为执政官的行为。可能就是在他返回罗马之后，开始考虑每年设立三个执政官职位，以便他自己能够担任这个职务，同时还能让另外两人有机会。这种想法太不符合常规，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超过两名执政官同时存在。据狄奥记载，奥古斯都被授予了永久性的执政官权力。但这是否符合史实，以及如果属实，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直是学者争论的

话题。学者的共识是，奥古斯都被授予了执政官职务的符号，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在城内行动时，有十二名执法吏护卫。在元老院会议上，他的行政长官席位在两位执政官之间。不管这些权力的细节如何，它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就像前23年他得到的那些权力一样，与任何官职都没有关系。在罗马，符号，尤其是官职的符号，有着重要意义，它加强了奥古斯都对国家的控制。[21]

狄奥所记载的奥古斯都在这个时期接受的其他一些新权力，可能实际上被他拒绝了，或者根本就是讹传。奥古斯都被任命为终身制“公共道德监管者”，这可能是他被临时授予监察官的权力，因为在下一年元首又开始清洗元老院，希望能减少元老人数，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近期选举时的一些骚乱有损元老院的体面）。没有人自愿退出元老院，于是奥古斯都选择了三十名元老，公开宣誓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人。这三十名元老随后做了同样的宣誓，每个人写下另外五名元老的名字，但不可以写自己或亲属的名字。每个五人小组中的一人被抽签决定为新元老名单上的一员。然后最初的三十名元老重复这个过程，每人再写五个名字。这种程序非常麻烦，而且容易受到幕后交易的操纵。安梯斯提乌斯·拉比奥举荐了李必达，这让奥古斯都很恼火，努力让拉比奥改变主意。拉比奥拒绝了，说他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既然元首允许李必达继续担任祭司长，那么拉比奥希望李必达成为元老就没有什么不对。奥古斯都只得作罢。他在三头同盟的老同僚一定是被抽中了，因为李必达成了元老院的一员。[22]

奥古斯都十分气恼，于是放弃了这种选举程序，改为由他自己挑选剩余的元老。有人发出了抗议，比如有个人被排除在元老院之外，而他的儿子却被选中，于是他用非常罗马化的方式抗议。他撕开自己的托加袍，脱掉上衣，露出了身上的伤疤，那是他为国负伤的光荣印迹。另一位元老请求辞去元老资格，让位于他的失去元老身份的父亲。和上一次清洗元老院一样，被开除的人被允许保留元老身份的衔级和威望，后

来，有些人通过当选行政长官而重新获得了元老身份。据说奥古斯都的目标仍然是将元老数量减到三百人，但最后被迫放弃，满足于六百人的规模。如果总人数再少一点，就很难填充所有必需的职位，在投票时也很难达到四百人的法定在场人数。

大约在这个时期，元首组建了一个更小和更便捷的议事会，后来被称为元首御前会议，其成员包括各个级别的行政长官的代表和十五名抽签选出的元老，任期六个月。这个议事会是一个很有用的试探更多元老意见的机构，也有助于在一项提议被呈送元老院讨论之前对其加以提炼。奥古斯都仍然非常尊重元老院，只要他在罗马，就会参加元老院的每一次会议，并鼓励元老们各抒己见。他虽然对拉比奥很生气，但没有采取措施惩罚他。元老院后来提议，让所有元老轮流睡在元首卧室外，拉比奥说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打呼噜太响。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奥古斯都在元老院的演讲会被“我不明白！”或“如果给我机会，一定发言反对你！”这样的呼喊声打断。后面这句话一定是那些没有被邀请参与讨论的人说的。有时怒气冲冲的元老之间的唇枪舌剑让奥古斯都非常烦恼和愤怒，会议尚未结束就拂袖而去，这让元老们高声疾呼，他们应有权对重大的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23]

在过去，元老也属于骑士阶层，必须满足拥有至少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财产的资格。如今，为了增加元老的尊严，奥古斯都正式将元老划分为单独一个阶层，并要求其成员拥有至少1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一些无法满足这个条件的人就失去了在元老院的席位。有一些人虽然财产不够，但元首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德行，于是赠送足够的金钱，以便让他们保留元老身份。同时，他颁布了一部新法律，处置选举中的贿赂和恐吓行为。

这样的立法在历史上很少奏效，但奥古斯都拥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能够更严格地执行这项法律。这些罪行虽然没有完全根除，但肯定

是大大减少了。随后十年中，很多名门望族的成员当上了执政官。这些大家族在历次内战中损失惨重，后继的年轻人没有亲身参加内战，如今愿意在被奥古斯都主宰的国家里从政。执政官的荣誉仍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比元老院的其他成员对奥古斯都更友好，也不能证明他们对他更敌视。狄奥说，大约在这个时期，有几个人因为图谋反对元首而被处死。但狄奥没有给出这些人的名字。[24]

前18年，李维娅的次子德鲁苏斯担任财务官。他只有十九岁，和兄长提比略一样被授予比正常年龄早五年担任裁判官和执政官的权利。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撒尼娅尚在襁褓中时就被许配给了提比略。提比略远征东方返回后，维普撒尼娅已经到了嫁人的年龄，于是他们终于结婚了。几年后，他的弟弟德鲁苏斯娶了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的女儿小安东尼娅。奥古斯都在东方期间，罗马还缔结了一门甚至更重要的婚事。前21年，阿格里帕被派回罗马，处置那里的骚乱，同时他还有更私人的事情要办理。他休掉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屋大维娅和马凯鲁斯的女儿，所以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然后娶了奥古斯都的女儿，寡居的尤利娅。新娘只有十八岁，新郎与她父亲（四十二岁）的年纪差不多，但老夫少妻在贵族婚姻中是很常见的。这门婚事说明阿格里帕深得奥古斯都的宠信。就这样，奥古斯都与他最信赖也最可靠的副手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有流言说，这门婚事是不得已而为之。据说梅塞纳斯告诉恺撒·奥古斯都，他把阿格里帕培植得太强大，现在必须把阿格里帕杀掉，或者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现实中，其实没有多少其他选择。奥古斯都对提比略的态度还不明确，但如果取消提比略和维普撒尼娅的婚约，一定会被认为是对她父亲的冷落。[25]

阿格里帕出身于内层元老圈子之外，凭借与恺撒·奥古斯都的关系得以平步青云，这让很多贵族非常嫉恨他。和其他新人一样，阿格里帕似乎格外宣扬自己的平凡出身，有意识地与广大群众交好，为他们修建福利设施，同时轻蔑地谢绝其他元老非常渴望的个人荣誉，比如凯旋

式。他非常热衷收藏艺术品，总是公开展出，而不是私藏。但与奥古斯都圈子的其他人和一般贵族不同的是，他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也不结交诗人和作家。阿格里帕精力充沛而高效，是一位成功的将军、行政管理者和建筑巨头，也是一位成功的丈夫，至少按照罗马的标准是这样的。前20年，他离开罗马前，尤利娅已经有孕在身，这一年晚些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盖乌斯。前19年，阿格里帕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在返回罗马后又一次谢绝了凯旋式的奖励。尤利娅很快又怀孕了，在前17年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卢基乌斯。[26]

作为元首的女婿，并且拥有如此多的伟大成就，阿格里帕的威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位元老。很快，他又得到了正式的权力。前18年，恺撒·奥古斯都还有一年就要到期的五年行省指挥权又被延长了五年。同时，阿格里帕也被授予一个为期五年的总督职位，不过可能不是与具体的某些行省有关联，并且后来才被确定为级别高于普通总督。他过去也一定拥有过类似的职权，不过在前20年代其地位的细节很难搞清楚。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于前18年被授予了为期五年的保民官权力。除了恺撒·奥古斯都之外，还不曾有人拥有过这样的权力。阿格里帕的保民官权力有时间限制，不像元首那样是终身制的，但仍然是一种个人化权利，这让阿格里帕在其他行政长官和显赫元老当中显得与众不同。总的来讲，他的新地位使他享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如果奥古斯都在随后几年内去世，那么阿格里帕一定有机会继承他的地位。[27]

一个皇朝正在形成。卢基乌斯出生后，奥古斯都收养了尤利娅和阿格里帕的两个儿子，于是人们更加觉得阿格里帕家族正在被培养为帝国的接班人。这种收养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购买，奥古斯都在一位裁判官面前，用一枚低价值的铜币（称为“阿斯”）在一台秤上敲了三下。于是，两个婴儿，元首的外孙也是元首最亲密盟友的儿子，就变成了盖乌斯·恺撒和卢基乌斯·恺撒。到这个阶段，应当不会有人觉得恺撒·奥古斯都会退隐，而且很多权力都属于他个人，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官职

可以辞掉。但在其行省指挥任期被延长五年时，他声称这足够平定这些地区了。也许有些人相信他。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任期被延长为十年，并没有因此发生骚动。一些罗马人可能仍然在怨恨一个人掌握如此大的永久性权力的事实，但即便是心怀不满的人也很少愿意冒重燃内战的风险，至少短期内不愿冒这个险。随着时间流逝，新的现实——奥古斯都除了没有君主的名号之外，其实已经是一位君主——变得越来越不引人注目。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一位新的军阀与奥古斯都分庭抗礼，异见分子不会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所以除了暗杀之外，没有任何除掉元首的办法。奥古斯都比尤利乌斯·恺撒更小心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任何行刺他的企图都是非常危险的，而前44年的事件向所有人证明，即便有可能刺杀独裁者，结果也很可能只是回到混乱和内战的状态。[28]

要谋杀恺撒·奥古斯都并非绝对不可能，而且我们也不能高估他采取的防备措施。他常参加元老院会议，出于这个原因或其他一些原因，他常常在罗马街头步行或者乘轿。在元老院会议上，他遇到每一位元老都会向其问候，常常还用亲热的方式与其道别。主持会议的时候，他会预先搞清楚每一位与会者的名字，以便直呼其名，请他们发表高见。他依赖于自己极佳的记忆力，而不用指名者。元首在罗马和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会接见请愿者，并且非常努力地表现出自己愿意倾听。有个人接近他时非常紧张，他责备这个人看上去仿佛“向大象奉上一枚钱币”。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希腊诗人常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宅邸的门廊外等候，可能是和其他一大群希望吸引奥古斯都注意的人在一起。这位诗人拿着一首他写的赞颂皇帝的诗，希望得到赏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奥古斯都对他置之不理。他喜欢和维吉尔与贺拉斯那样的才子交往，但不打算接受一位不成功作家的平庸颂歌，因此从来没有允许这位诗人接近自己。[29]

这个希腊人坚持不懈，最后奥古斯都决定要弄他一下。这一天，诗

人和往常一样在门外等候。这一次，元首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一张纸莎草纸，上面写着奥古斯都自己的几行诗。希腊人安之若素，大声朗诵了这首小诗，赞扬了它的文采，然后给了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几枚钱币作为赏金，道歉说钱不多，还用希腊语说：“我以奥古斯都的好运气起誓，如果我有更多钱，一定会给你更多。”元首被逗乐了，命令一名侍从给了这人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30]

这个故事以及其他很多轶闻清楚地表明，恺撒·奥古斯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大家是可以接近他的，不仅富人和显贵可以，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这也证明绝大多数罗马人满足于接受他的主宰地位，而不愿意接受其他选择。在这种环境下，奥古斯都更加公开地认可阿格里帕的地位，并收养他的两个儿子。这是稳定民心的举措，承诺了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显然这对奥古斯都本人很重要，所以他才收养了那两个男婴。在这个时期，罗马民族的未来，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未来，也成了他认真思考的问题。内战和政治迫害对元老阶层和很多骑士家族造成了巨大破坏。有些家族干脆已经灭亡，其他家族则有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在从政的最合适年龄之前或期间死亡。抚养孩子是很昂贵的事情，尤其是如果这些孩子想要从政的话。人们普遍相信，越来越多的男子要么选择单身，要么结婚却不生孩子。

奥古斯都决定采取行动。无疑地，他先和御前会议（即小议事会）探讨了此事，然后将其提交元老院。他的担忧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可以说是关系到道德的：他希望罗马的精英阶层尽自己的义务，不断提供年轻男子来从政。管一管此事对奥古斯都来说也是非常正当的，因为在过去监察官的部分职责就是监督公众的道德风化。他从东方返回后，元老院投票授权他通过一项《奥古斯都法》，但这个决定没有经过正常的元老院讨论、公民大会投票的程序。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接受这项权力，即使接受了，他也没有运用。他遵从正当程序，将自己的提案呈送元老院，请求批准，然后接受投票表决，使其成为《尤利乌斯婚姻法》。生

三个或更多孩子的父亲将得到一些福利，而适龄却不结婚或不生子的男子将受到处罚。他像往常一样非常关注元老阶层的尊严，因此禁止元老与女释奴结婚，但其他公民，包括骑士，则被允许与女释奴结婚，因为很多人相信公民当中男多女少。[31]

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引入了《尤利乌斯处置通奸法》，处罚通奸以及与自由女性的任何非婚性行为。据说是元老院最先感到急需处理这个问题的，元老们认为年轻一代过于放荡，导致很多人没有结婚生子。这项法律通过了，但据狄奥记载，有些人希望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奥古斯都却不愿意继续干预，因为他觉得新法律已经足够了。这种事情肯定是很难管的，参与通奸的人很可能仅仅显得可笑而已。而且奥古斯都自己也曾是个风流浪子，与很多有夫之妇发生过奸情，这肯定不利于法律的执行。在辩论中，有人讥讽说，奥古斯都非常有资格讨论这个话题。他遭到嘲讽，而且有人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加大干预力度，于是他建议他们都管好自己的老婆："你们应当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训斥和教导你们的妻子。我就是这样的。"元老的总人数虽然多达六百，但仍然只是小小的贵族群体（也包括元首及其家人）的一部分。很多元老认识李维娅，所有元老都知道她以贞洁闻名，所以奥古斯都的这种说法让大家很惊讶。好几个发言者敦促奥古斯都介绍一下他教导自己妻子的细节，他却只说得出自己对李维娅和尤利娅的仪态、服饰和礼节提过一些建议。[32]

元老们可以自由地取笑元首，让他窘迫，而不必害怕遭到报复。元首的不悦或许会影响某些人的升迁，但很多元老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官职、荣誉、行省指挥权，所以不会害怕。他们对元首的嘲讽是温和的，尤其与罗马政坛传统的极其污秽粗俗的语言相比，而且并没有直接批评奥古斯都本人。在很多方面，这样的对话有利于维护奥古斯都所希望的那种表象：他只不过是元老院中最显赫的一位成员而已。他提议的法律得以轻松通过，但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对新法律的抵制并

不是由于反对他本人。为了应付新法律，有些男子安排自己与婴儿订婚，于是就享有婚姻带来的福利，而在好些年内都不必真的结婚。奥古斯都的回应是对法律做了修改，规定订婚之后必须在两年内结婚，否则婚约无效。[33]

制定这些法律的努力造成了更多不方便的窘境，他负责监管公众道德风化的临时职责意味着他需要审理具体的案件。一名男子被指控娶了一个之前与他有过通奸行为的女子，这事情与奥古斯都不循常规地追求李维娅的故事十分相似。在这个案子里，控方对被告的品行还做了其他许多指控，显然非常仇恨被告。奥古斯都最后驳回了起诉，含糊地宣布，原告和被告双方应当捐弃前嫌。前17年年初，元首四十五岁，已经是个成熟男子，不会像青春年少时那样动辄暴跳如雷、时常说出蠢话来。他很好应对了元老们讥讽地询问或者打断他演讲的行为，即便陷入窘境时也以很好的风度脱身，不会有失体面。[34]

他的温和可亲软化了其独裁的冷酷现实，曾经的三头同盟之一的强硬面孔只是偶尔显露出来。有一次，奥古斯都与一名叫作维迪乌斯·波利奥的骑士一同用膳，此人以富裕、奢侈和残酷而闻名。波利奥也是奥古斯都的老友，可能是年轻的恺撒于前44年投身政治时支持他的富豪之一。和西塞罗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波利奥也拥有面积很大的装饰性鱼池，其中之一养着食肉的七鳃鳗，如果有奴隶惹恼了他，他就把奴隶丢进去喂鱼。席间，一名奴隶偶然打碎了一套昂贵的酒杯中的一只，主人立刻命令将此人扔进鱼池。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命他的侍从把这套酒杯的剩余几只拿过来，当着主人的面一只一只砸碎，直到波利奥释放那个奴隶。这个故事表明他并不赞成这位骑士的残酷行为。他这么做的动机肯定也在于此。他那绝对的自信令人不寒而栗，他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做，而主人没有任何办法。后来波利奥去世了，将他的奢华别墅之一遗赠给元首。奥古斯都将这座别墅拆毁，以消灭这恶人留下的痕迹，让维迪乌斯的名字陨灭。别墅已经是他的财产了，他可以随意处置，但他

鄙夷地消灭维迪乌斯遗迹的做法，不管是多么合情合理，也体现出了恺撒·奥古斯都绝对的主宰地位。[35]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反抗他。不管人们如何假装不是这个样子，大家其实都很清楚实际情况。人们可以批评他，但这些批评非常有限，这也证明了他受到的敬畏。在过去，罗马人对哪怕是国内最伟大的人，也会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人们还会在公共场所，包括元老院议政厅，留下匿名小册子，以抒发更为强烈的情感。恺撒·奥古斯都在元老院发表演讲，为自己辩护，驳斥这些匿名攻击，并宣布将来要对这些小册子的匿名作者追查到底，予以严惩。有时最凶残的攻击是针对其他元老的，与他或他的政权无关，反映了历史更悠久的仇隙。和其他任何时代一样，大多数人的时间、精力和利益只有一小部分被用于高端政治。这些年里，奥古斯都将演员皮拉得斯从流亡中召回。皮拉得斯和另外一位叫作巴绪卢的演员的追捧者之间激烈争斗，皮拉得斯羞辱了一名捣乱分子，诱导群众去辱骂这个人，后来导致皮拉得斯获罪而被放逐。巴绪卢是梅塞纳斯的宠儿，还曾是他的情人，得到这位大人物的保护。如今，皮拉得斯重返罗马，和巴绪卢都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奥古斯都为了过去的骚乱而责备皮拉得斯，他则向恺撒保证，最符合恺撒利益的事情就是，让群众把闲暇时间和热情全部用于剧场和追星（有些明星臭名昭著）。[36]

年份的周期

前17年，新生儿卢基乌斯及其兄长盖乌斯被恺撒·奥古斯都收养。他开始筹划长远的未来。虽然在几十年的纷争之后获得了和平，虽然他常鼓吹精神和肉体的复兴，虽然他对传统和往昔的光荣兴致勃勃，但他的政权始终着眼于未来，而非过去。恺撒·奥古斯都领导下的罗马人取得的成就将会延续下去，他率领他们走向未来，将会有更了不起的成绩。复兴传统是为了让罗马人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未来：让罗马人与数个

世纪以来引导他们城市进步的神祇融洽相处，让公民们像罗马人理应的那样行动和作为，但说到底并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在正确的路径上继续前进。

罗马人有好几种计时法。年是根据四季的自然变化计算的，并且与政坛有紧密联系。每一年执政官的名字被用来为这一年命名。每隔五年，监察官应当重新检视全体公民的人口、财政状况和衔级。此外还有一个更长的周期，称为世纪（saeculum），它比人的最长寿命还要长。庆祝世纪的例子在过去只发生过几次，对于它的长度大家也很惘然，不过大多数人觉得一个世纪应当是一百年。上一次庆祝世纪是在前146年，但一百年后的内战动乱使得无人关注，无人纪念新的周期。奥古斯都说，有人报告称，预示着尤利乌斯·恺撒升天成神的彗星也标志着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但这种时间计算法不是很方便，后来他的一位支持者，著名的法学家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经过一番努力，“发现”世纪周期其实是110年。如果从罗马建城开始计算，那么下一个世纪之交就是前17年。并非所有人都信服这种说法，比如后来的克劳狄皇帝就恢复了传统纪年法，以便在自己统治时期庆祝世纪之交，但对急于举行一场宏伟和适宜的活动的奥古斯都来说，大家相不相信并不很重要。[37]

奥古斯都花费了很大精力去筹备世纪节（ludi saeculares），现代英语将其译为Secular Games（字面意思为“世俗节庆”），这很有误导性，因为世纪节在方方面面都是宗教仪式。奥古斯都深度参与了节庆的每个阶段，阿格里帕也是如此。阿格里帕自获得保民官权力以来，发挥的作用更大。两人都是重要的古老祭司团——十五人团[38]——的成员，祭司团奉命监管这些仪式。十五人团的成员如今已经不止十五人，因为奥古斯都扩大了所有祭司团，并且他是所有祭司团的成员。十五人团的其他成员都是元老，节庆的筹备计划由他们审阅和批准。元老院规定具体细节应当被记载在大理石和青铜碑铭（由国库出资）上，竖立在现场。所有工作都是以传统和适宜的方式进行的，但在整个过程中，奥古斯都

和阿格里帕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远远超过祭司团的同僚和其他元老："执政官盖乌斯·西拉努斯报告称，在荒废多年之后，世纪节庆祝活动将在本年度举行，由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阿格里帕领导，他们均享有保民官权力……"

新近发布的关于婚姻的法律禁止未婚青年男女观看公开节庆活动，但这一次的节庆太重要（因为它的一个周期比人的寿命还长，所以这是他们见证此种节庆的唯一一次机会），于是姑且允许他们观看。

前17年5月31日，奥古斯都在台伯河畔的战神广场举行夜间献祭，世纪节就这样拉开帷幕。根据《西卜林书》规定的仪式，他向命运三女神（这一次用她们的希腊语名字摩伊赖称呼她们）献祭了九只母绵羊和九只母山羊。他为了罗马人民向命运三女神祈祷，将罗马人称为"奎里努斯[39]的子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身份，请求女神继续保佑他们在战争中旗开得胜，并保佑国家和军团士兵。祈祷文中还有比较古老的元素，即请求女神让"拉丁人驯顺"。罗马说拉丁语言的邻居自前4世纪起就已经被罗马牢牢控制，但罗马的仪式极度保守，所以常常见到上古留下的遗迹，甚至其中有些不断重复的语句如今已经无人理解。这一次的仪式应当不是沿袭古例，而是刻意模仿古风，炮制古色古香的气氛。这传统的表象之中还编织了当代的元素：在祷告中，奥古斯都两次请求女神降福给"罗马人民、奎里努斯的子孙、十五人团、我、我的家族和我的亲属"。

当夜还有一场仪式飨宴，参与者是精心挑选出来的110名已婚妇女，都已经当了母亲。宴会桌前还摆放着女神朱诺和狄安娜的神像。还有一场戏剧表演，观众按照传统的罗马方式站着观看，而不是按照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方式坐着观看。次日，即6月1日，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各自去了卡比托利欧山，杀死一头完美无瑕的献祭公牛，将其奉献给"至善至伟朱庇特"。6月2日，两人各自向朱诺献祭了一头母牛，也是

在卡比托利欧山举行。祭司团的其他成员在一旁侍奉，但只有他们两人执行献祭。除了向特定的神或女神祈祷之外，他们还重复了第一次祈祷，请求神祇压制拉丁人，并请求神祇保佑罗马人民、奎里努斯子孙的安宁和成功，以及保佑元首及其家族和亲属。6月1日夜间，他们向希腊的助产女神厄勒梯亚献了祭饼。6月2日夜间，奥古斯都在台伯河畔屠宰了一头怀孕的母猪，以纪念大地母亲。次日，他和阿格里帕在帕拉丁山向阿波罗和狄安娜奉献祭饼。

我们现代人对动物献祭非常陌生，所以研究古罗马的学者常常觉得这是想当然的事情，而忘记了动物献祭需要多么精心的准备。必须找到合适的动物，保持其健康，然后沉稳地牵到祭坛前，避免让它们惊慌失措。屠宰动物的工作一般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完成，因为必须做得干脆利落。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站在一旁背诵祷文，托加袍的一部分遮盖他们的头顶。有很多奥古斯都的画像，还有不少阿格里帕的画像，表现他们是这样遮盖头部的。元首显然希望展示自己的虔诚和祭司身份。如果献祭仪式出了差错，不管是准备工作、屠宰牺牲品还是祷文中哪怕极其细微的错误，都会让整个仪式失效，必须从头再来。

在献祭的同时，110名已婚妇女举行了神圣宴会，她们有时也参加公共祷告。仪式之后，还有为期七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戏剧表演，其中一些表演在临时的木制剧场举行，有的则在庞培剧场或尚未竣工的马凯鲁斯剧场举行。还有几天举行斗兽和赛车表演，以此结束差不多两周的华丽盛景。通过这些节庆活动，罗马过去和未来的伟大光辉与恺撒·奥古斯都及其盟友阿格里帕的领导，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6月3日，先是在帕拉丁山，后来在卡比托利欧山，由二十七名（三九二十七是神圣的数字组合）男童和二十七名女童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一首特别制作的诗歌。诗作者是贺拉斯，不过假如维吉尔还在世，也许也会被选中。这首《世纪之歌》保存至今。它呼吁得到献祭抚慰的诸神

以及其他神祇，保佑和保护罗马人，并提到了《埃涅阿斯纪》歌颂的特洛伊的历史。奥古斯都关心的很多东西都在诗中有所体现，比如“父老”（这是对元老的另一个称呼，根据传统，元老都是一家之主）关于男女永世同心的敕令和关于养育新一代孩子的法律。元首本人在诗中被赞颂为“安喀塞斯和维纳斯的光荣后嗣……愿他在战斗中旗开得胜，但击败敌人之后以怜悯待之”。这一年发行的一系列钱币上刻画了尤利乌斯·恺撒的形象，再一次突显了尤利乌斯家族的重要性。[40]

节庆活动的宗旨是表现正在进行的和已经稳固确立的复兴，以及更光辉未来的美好前景。罗马人将会繁衍生息，在下一个历史周期里新的一代代人将会更加强大，而恺撒·奥古斯都处于这一切的中心。他现在可以说自己有了儿子，因为正如他自己的政治生涯所表明的那样，养子和亲生儿子一样享有父亲遗留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养子和亲生儿子一样，抚养起来要付出很大代价。通过这种方式，奥古斯都努力做一个表率，去养育新一代罗马人，就像鼓励和强迫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去做的那样。他的继子和其他亲属的早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元首圈子的其他人没有做出表率。梅塞纳斯已经结婚，但没有孩子，而且似乎对男性情人更感兴趣。维吉尔似乎没有结过婚，而且有传闻说他只对小男孩有欲望。贺拉斯热衷追逐女性，但只和职业交际花及其他娼妓交往。据说他的卧室墙壁和天花板上挂满镜子，和这些女人做爱时，他就可以自我观赏。如果这是真的，它一定是一桩非常奢靡的爱好，因为镜子非常昂贵。奥古斯都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在给贺拉斯的书信中开玩笑地为他取了绰号“极其淫荡的小男人”和“完美的阴茎”。这几个人都没有认真从政，梅塞纳斯在幕后有影响力和权力，但没有担任过官职。[41]

恺撒·奥古斯都遵照非常典型的罗马习惯，更关心公众形象和实用价值，而不是仅仅为了改变行为习惯而改变。他需要贵族繁衍生息，这

样才能有新的一代；他需要贵族在公共场所表现出尊严并尊重神祇和一般传统。他关于婚姻的法律受到很多人的怨恨和无视，但总的来讲大多数人应当或多或少自愿地服从了。只要他们服从法律，并且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符合规矩，那么奥古斯都和其他人就不会很关心这些贵族的私生活。

---

[1] Virgil，*Aeneid* 1.286-94（Loeb translation）.

[2] Donatus，*Life of Virgil* 31-2，35.

[3] Suetonius，*Horace* （Loeb translation）.

[4] “摔倒在自己的海绵上”，见Suetonius，*Augustus* 85.2，*Horace passim*；讨论见P.White，*Promised Verse.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993），尤见pp.3-34，112-55，J.Griffin，‘Augustus and the poets：“Caesar qui cogereposset”，’ 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189-218，and 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225-79，上述著作介绍了以奥古斯都时代诗人为主题的大量文学。

[5] 拉丁姆是以罗马为中心的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拉齐奥大区。

[6] Suetonius，*Horace*；Horace，*Epistulae* 2.1.156-7；被强迫写作，如希尔提乌斯，见the preface to *BG* 8；讨论见P.White，*Promised Verse.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993），pp 112-42，及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 （2008），尤见pp.3-30。

[7] Propertius 3.5，9，12.

[8] Donatus，*Life of Virgil* 20-24，34，with 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246-53.

[9] Donatus，*Life of Virgil* 35-41.

[10] J.Ziolkowski & J.Putnam，*The Virgilian Tradition.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 （2008），pp.44-5.

[11] 波吕斐摩斯是希腊神话中独眼巨人之一，是波塞冬的儿子。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特洛伊十年鏖战之后，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家途中登陆独眼巨人聚居的西西里岛。他和十二名同伴被困在波吕斐摩斯的巢穴。波吕斐摩斯回洞后发现了奥德修斯等人，立刻用巨石封堵了洞口，并随后残暴地摔死和吞食了其中几人。奥德修斯悲痛万分之下想到了一个逃走的计

划，他把没有勾兑的烈性葡萄酒给波吕斐摩斯喝，并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没有人”。趁着巨人醉酒熟睡，奥德修斯带着剩下的人把巨人用作武器的橄榄树桩削尖磨锐，然后几人一起举着，插入了巨人的独眼。巨人大声痛呼，希望岛上其他的巨人来帮忙，但他呼喊的“没有人攻击我”只被当成了玩笑，因而没人前来。第二天，巨人和往常一样把他洞里圈养的巨羊放出洞外吃草，在洞口他一一摸索羊的脊背，防止奥德修斯等人骑羊逃走，但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还是藏在羊的肚子下面安全逃出。回到船上的奥德修斯大声嘲笑波吕斐摩斯“没有人没有伤害你，伤你的是奥德修斯”，这一傲慢举动为他招来后来的不幸。波吕斐摩斯向他的父亲波塞冬祈祷，要求报复奥德修斯。波塞冬唤起巨浪和大风，将奥德修斯的船吹离了回家的航线，后来遭遇了更多艰险。

[12] 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229-31，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 （2008），pp.11-12，151，153-5，159-61.

[13] Dido and a ‘little Aeneas’，Virgil，*Aeneid* 4.328-9，Cleopatra 8.685-714.

[14] Virgil，*Aeneid* 10.510-605，12.291-305介绍了战斗场景，引文见12.295，Dido’s spirit 6.450-76。

[15] Virgil，*Aeneid* 12.945-52.

[16] 关于罗马人对敌人态度的讨论，见G.Woolf，‘Roman Peace’，in J.Rich & G.Shipley（eds），*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1993），pp.171-94，尤见178-85。

[17] 埃涅阿斯杀死敌人时嘲笑他们，见Virgil *Aeneid* 10.510-605。

[18] Virgil，*Aeneid* 1.286-94如果指的是奥古斯都，暗示他被神化了；6.666-70，及A.Powell，*Virgil the Partisan* （2008），pp.42-3，133；尤利乌斯·恺撒和庞培，见6.828-35。

[19] 阿庇乌斯大道是古罗马时期一条把罗马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得名自兴建此工程的罗马监察官和演说家“盲人”阿庇乌斯·克劳狄·凯库斯（前340～前273年）。

[20] Dio 54.10.1-7；任命为执政官，见P.Brunt，‘The role of the Senate in the Augustan regime’，*Classical Quarterly* 34.2（1984），pp.423-44，尤见429-30。

[21] Suetonius，*Augustus* 37；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p.89-90，E.Salmon，‘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Historia* 5（1956），pp.456-78，尤见471-3，A.Jones，‘The *Imperium* of Augustus’，*JRS* 41（1951），pp.112-19，尤见117，关于象征的力量见E.Stavely，‘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Historia* 12（1963），pp.458-84。

[22] Dio 54.13.1-14.5，Suetonius，*Augustus* 54，with Crook in *CAH2* X，pp.91-3.

[23] Dio 54.15.1-8，Suetonius，*Augustus* 35，54，with R.Talbert，‘Augustus and the

Senate'，*Greece and Rome* 31（1984），pp.55-63，尤见61。

[24] Dio 54.15.1-4，16.1，17.3，Suetonius，*Augustus* 35，with A.Jones，'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 *JRS* 45（1955）.

[25] Dio 54.6.4-6，8.5，10.4，12.4-5.

[26] Dio 54.11.1-6涉及坎塔布里亚战役。

[27] Dio 54.12.4-5，with 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pp.117-31涉及阿格里帕的行省。

[28] Suetonius，*Augustus* 55.1涉及领养。

[29] Suetonius，*Augustus* 53.2-3讲到他的平易近人。

[30] Macrobius，*Saturnalia* 2.4.31.

[31] Dio 54.10.5-7，16.1-2，*Res Gestae* 6.2，with Crook in *CAH2* X，pp.92-3.

[32] Dio 54.16.3-5.

[33] Dio 54.16.7.

[34] Dio 54.16.6，概况见A.Wallace-Hadrill，'Civilis Principis：between citizenand king'，*JRS* 72（1982），pp.32-48。

[35] Dio 54.23，Pliny，*NH* 9.77，Seneca，*de ira* 3.40.2，*de clementia* 1.18.2，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410；关于Vedins见R.Syme，'Who was Vedius Pollio？'，*Roman Papers* Vol.2（1979），pp.518-29。

[36] Suetonius，*Augustus* 45.4，55，Dio 54.17.4-5.

[37] 世纪节，概况见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100-06，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152和Price in *CAH2* X，pp.834-7。

[38] 十五人团（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是古罗马主要负责保管《西卜林书》的祭司团。《西卜林书》是一部神谕集，用希腊文写成，据说是罗马末代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从一名西比尔女预言家手中购得。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重大危机时期，人们都会寻求这部神谕集的指导。

[39] 奎里努斯（Quirinus）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之一，在罗马城建立之时、古罗马早期曾具有重要意义。后地位衰微，仅为祭祀之用。后来被认为与罗马的建城者罗慕路斯的地位等同。

[40] Horace，*Carmen Saeculare* 17-20，50-52（Loeb translation）；记载世纪节的铭文的译文，见N.Lewis & M.Reinhold（eds），*Roman Civilization.Selected Readings* Vol.1：*The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Age* （3rd edn，1990），pp.612-16.引文来自上述译本，略有改动。

[41] Suetonius，*Horace* ，*Augustus* 86.2，Donatus，*Life of Virgil* 9，Dio 55.7.1-6，C.Williams，*Roman Homosexuality. 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1999），pp.157-9.

十七 家庭和同僚

奥古斯都·恺撒……因为长期待在首都，受到很多人的憎恶。

——狄奥，3世纪初 [1]

我没有向任何部落发动非正义战争，平定了阿尔卑斯山，从最接近亚得里亚海的地区，一直到托斯卡纳海。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 [2]

前17年年末或前16年年初，三个日耳曼部落，乌西皮特人、滕科特利人和苏刚布里人，突然围捕了他们领地内的一些罗马人（可能是商人），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对罗马人表现出敌意，但随后一大群武士集结起来，渡过莱茵河，向罗马的高卢行省发动了一次袭掠。军团长马尔库斯·劳里乌斯集结了一支军队来对付他们，就像尤利乌斯·恺撒、阿格里帕和其他罗马统帅过去差不多在同一地区做过的那样。但劳里乌斯没有他们那样的军事才干，这一次进展不顺利。在主力部队前方侦察的辅助骑兵遭到伏击，被打得落花流水。兴高采烈的日耳曼武士追逐这些逃窜的骑兵，把他们一直追赶到罗马主力部队那里。主力部队吃了一惊，陷入混乱。第五“云雀”军团乱了阵脚，丢失了宝贵的鹰旗。一段时间内，大部分罗马军队都在败退，后来才恢复了秩序，击退了敌人。

劳里乌斯及其军队虽然战败，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损失应当不是很大。苏埃托尼乌斯说此次挫败“并不严重，但影响很坏”，仍然将它列为奥古斯都军队在内战之后仅遭受的两次大败之一。劳里乌斯是奥古斯都的军团长，士兵也是奥古斯都的士兵，所以他们的失败完全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失败，就像他们过去的胜利也属于他一样。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之所以能够领导国家，是因为他的胜利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任何挫

折都会损害他的地位，而在大肆宣传从帕提亚和伊利里亚收回军旗的光荣之后，如今又损失了一面鹰旗，这实在令人尴尬。奥古斯都宣布他将御驾亲征高卢，并于春末离开了罗马。但他还没有抵达高卢，那里的战事就结束了。劳里乌斯集结了一支比先前更强大且准备更充分的军队，入侵了日耳曼部落的腹地，以报复他们之前的袭击。这消息促使日耳曼人派使者来求和，于是罗马人给了他们和平，但必须遵照罗马的条件。我们不知道那面鹰旗后来怎么样了，但没有大规模宣传它的回归，所以它的丢失可能是很短暂的，在第一次冲突中就被收回了。[3]

奥古斯都继续前往高卢，可能已经打算巡视西方各行省，这时传来了劳里乌斯失利的消息。阿格里帕也离开罗马，去往东方，他和岳父在随后三年多时间里都不会返回意大利。他们继续按照业已确定的惯例，在罗马待一段时间后就要花较长时间巡视各行省。据狄奥说，奥古斯都很高兴离开罗马城，用高卢传来的消息作为匆匆上路的借口。他前不久颁布的婚姻法仍然让一些元老和骑士恼火。元首愿意对违反该法的朋友和支持者网开一面或宽大处理。这能让人理解，也符合罗马人的习惯，却让那些受到更严厉处理的人更加怨恨。没有迹象表明存在联合一致反对奥古斯都的集团，但奥古斯都的平易近人和希望元老院进行自由公开辩论的主张却让他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他在罗马待得越久，那些对他抱有敌意的人就越容易试探他宽容的底线，而只要他希望维持其政权传统和符合法律的表象，他能做的就很少。[4]

李维娅可能陪奥古斯都去了高卢，不过狄奥记载了一段荒诞的传言，说奥古斯都之所以离开意大利，是为了避开公众耳目，继续与梅塞纳斯的妻子特伦提娅通奸。李维娅的儿子提比略很快与他们会合，奥古斯都的两个继子在随后几年里都将在公共事务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提比略在罗马逗留的原因之一是与德鲁苏斯一同主持纪念奎里努斯（对奎里努斯的崇拜历史悠久，如今奎里努斯被视为神化了的罗慕路斯）神庙落成的角斗士竞技。这兄弟俩奉命主持这些竞技可能不是偶然，因为新

神庙的檐壁上描绘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兄弟的图像，不是描绘他们之间的争斗，而是描绘在罗马城建立之前，兄弟俩作为观鸟占卜师，坐着寻求诸神的指导。这种兄弟和睦的景象，不管是亲兄弟之间还是全体罗马人之间的和睦，就是奥古斯都政权在当今和未来所主张的状态。[5]

提比略当选前16年的裁判官。近些年来，元老院名单上一直把他列为前任裁判官，如今他终于真正担任了这个职务。他时年二十五岁，被元老院的法令允许比正常年龄早五年竞选每一级别的行政长官。后来奥古斯都降低了所有重要职位的最低年龄要求，但我们不清楚这是何时发生的，也不知道这是一次性的大规模改革，还是一系列较小的变化。这个过程似乎在前20年代末之前完成，所以如今的人可以比过去更早地担任官职。年满三十岁即可担任裁判官，满三十三岁即可担任执政官。这项变革有助于豪门世家子弟担任执政官和其他行政长官，因为那些被内战和政治迫害摧残得枝叶飘零的家族的新一代成员已经成年了。[6]

前16年1月1日，两位新任执政官分别是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这两人都有着无可挑剔的贵族家世，提比略和德鲁苏斯也是这样。阿赫诺巴尔布斯也是奥古斯都的甥孙，因为他母亲是大安东尼娅[7]，即屋大维娅和马克·安东尼的女儿。西庇阿和奥古斯都的关系比较远，不过他是尤利娅的同母异父哥哥，因为他的母亲是斯克利博尼娅，即奥古斯都休掉的前妻。如此亲近的关系在罗马政坛司空见惯，未必能保证政治上一定是伙伴。后来西庇阿没有干满一年任期就被奥古斯都的一名老部下取代（补任执政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这说明应当不是由于什么坏的原因。[8]

在离开罗马之前，奥古斯都又一次恢复了城市长官的官职，这一次他将这个职位给了经验丰富的下属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前26年，奥古斯都曾尝试恢复这个古老的职位，但梅萨拉上任几天后就辞职了，于

是奥古斯都的尝试失败。但在十年后，城市长官的权力和职能应当已经被清楚界定了。罗马城组建了三个城市大队当作警察，交给城市长官指挥。提比略可能获得了威望很高的城市裁判官职位，如果是这样，他应当上任几个月后就陪同奥古斯都去了高卢。提比略不在期间，德鲁苏斯代理他的职务，尽管他还没有正式担任任何职务。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这样的人是奥古斯都的老战友，但权力越来越多地被交给元首的亲属。奥古斯都的女婿和同样拥有保民官权力的阿格里帕正身处东方。提比略和奥古斯都一同在高卢，很快将取代劳里乌斯成为那里的军团长，而德鲁苏斯被从罗马唤来，于前15年开始在外省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这兄弟俩，以及阿格里帕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养子）就是未来稳定的保障。即便元首去世，他的政权也不会立刻垮台，内战也不会爆发。[9]

殖民地、社区和道路

这是奥古斯都第四次到访高卢，这足以印证高卢的重要性。通过征服“长发高卢”，尤利乌斯·恺撒获得了足以与庞培匹敌的财富、威望和忠诚的军队。在随后的岁月里，高卢在历次内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尽管战火很少燃烧到该地区。新的高卢各行省在近期才被征服，而且容易遭到莱茵河东岸蛮族的袭击，所以通常需要相当多的驻军，而这些军队比其他任何罗马军队都更接近意大利。此外，高卢也是招募辅助士兵的重要地区，高卢骑兵特别有名。前43年，李必达控制着驻扎高卢的军队，所以他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奥古斯都在前40年控制了那里的军队，从根本上破坏了安东尼的根基。

内高卢如今已经是意大利的一部分，不再有驻军。尤利乌斯·恺撒的主要基地是外高卢（今天的普罗旺斯）。前29年，外高卢被纳入奥古斯都庞大的外省辖区。这一年，他承诺将把平定下来、不再受外敌威胁的行省交还元老院，外高卢就是第一个被用来证明其诚意的行省。可能

在前22年（不过我们无法确定），外高卢被交给元老院管辖，从此由一名总督治理。它被更名为纳博讷高卢（得名自其首府纳博讷），不再有驻军，不过有很多退伍军人定居在该省近几十年来建立的众多殖民地。这些人非常感激奥古斯都，所以他们不大可能支持他的竞争对手兴兵作乱。长远来看，纳博讷高卢是一个兵力资源丰富的地方，因为这些殖民者的后代会遵照家族传统，从军效力。[10]

纳博讷高卢已经非常罗马化了，几十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就发现当地的贵族是有价值的盟友。这些人会说流利的拉丁语，熟悉罗马文化，有时还懂希腊文化，并且很容易与他的罗马军官和幕僚打成一片。有些当地人已经享有罗马公民权，更多人将会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公民权的奖赏。目前高卢全境公民最常见的名字是尤利乌斯，尤其在纳博讷。这证明了尤利乌斯·恺撒和后来的奥古斯都对当地的慷慨优待。最受宠的当地贵族会成为骑士甚至元老。很多社区已经变为非常接近罗马风格的城市，建立退伍军人殖民地的工作更是加快了这种同化进程。许多城市的规划是围绕着秩序井然的街道，以广场为中心，广场上有处理公共事务的会堂，有足够的空间供商业活动之用，通常还有一座供奉罗马神祇的神庙。许多城市很快有了剧场和竞技场，有的是元首出资建造的，有的是当地富豪建造的。不到一个世纪之后的老普林尼说，纳博讷高卢差不多可以算作意大利的一部分。[11]

高卢的其余部分则不同，罗马的影响没有那么深。长发高卢发展为三个行省：西南部的阿基坦尼亚、北部和中部的卢格敦高卢和东北部的比利时。这大致相当于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战记》里所说的高卢分成的三部分，虽然不是完全对等。奥古斯都时代已经有“三个高卢”的说法，后来的高卢各行省可能已经被划定，不过似乎此时是一名军团长治理整个长发高卢。这肯定是个军事辖区，劳里乌斯前不久与日耳曼袭击者的不幸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也偶尔会出麻烦，那里的居民仍然不在罗马控制之下。阿基坦尼亚也会有问题。总的

来讲，奥古斯都说三个高卢是比较棘手的地区，需要他亲自处理，是有道理的。[12]

虽然高卢各部落在几十年之后才被罗马征服，但这些部落并没有大规模抵抗的迹象。阿基坦尼亚是唯一的例外，不过如今罗马已经彻底征服了西班牙北部，所以比利牛斯山脉以南不再有独立的人群去袭击或者援助阿基坦尼亚的高卢部落。在随后的年份里，阿基坦尼亚不会有大规模战事。但目前，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区和与日耳曼部落的漫长边界常遭到罗马帝国之外的敌人攻击。如果罗马人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并保护自己的臣民，那么有些高卢贵族或许会觉得，与罗马结盟不划算，他们或者他们的竞争对手就可能寻求日耳曼军事领袖的支持。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局势就是这个样子，他不觉得这是难题，而将其视为武装干预的良机。[13]

奥古斯都需要寻找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方面，阿尔卑斯山的问题比较容易处置，因为它差不多已经被罗马的行省包围了，不过这仍然不是轻松的任务。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山谷中的部族有比较松散的组织，包括很多互有区分的社区，其领袖只在很小的地区享有权威。艰苦的生活条件培养了坚忍不拔、凶悍勇猛的武士，他们擅长袭击定居谷地，从希望不受骚扰地安全通过山道的商人（有时甚至还有罗马军队）那里敲诈买路钱。近期有一些关于恐怖的野蛮暴行的报告，说明至少部分社区开始憎恨罗马人。袭击突然增多，据说他们会杀死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罗马男人，并杀害所有被他们的占卜师认为怀着男孩的孕妇。[14]

近些年来，奥古斯都多次下令在阿尔卑斯山区开展军事行动，如今他决心完成对该地区的征服，并将这个任务交给他的两个继子。德鲁苏斯于前15年春开始行动，从意大利率领几支部队进入因河流域。随后提比略从高卢的基地进军。这场战争的特色就是残酷的小规模冲突和攻打设防村庄。巧合的是，两兄弟于8月1日（奥古斯都在埃及取胜十五周

年）会师，联手取得了一场大规模胜利。到这一年年底，几乎整个阿尔卑斯山区都已经被罗马牢牢控制，少数顽抗的地区也很快被荡平。罗马对这些山区及其隘道的控制再也不会受到挑战。为了纪念此次胜利，并与庞培在比利牛斯山脉竖立的类似纪念碑相媲美，奥古斯都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脉[15]的拉蒂尔比耶建立了一座宏伟的胜利纪念碑，并列举了罗马人在这些战役中打败的四十五个部族。其中不少部族的名字在其他史料中不曾出现过，反映了该地区社会的松散状况；也有一些部族没有反抗罗马，而是选择接受其统治。在诺里库姆[16]可能没有发生多少战斗，但至少有部分赖提亚人[17]和温德利希人[18]顽强抵抗，尽管他们并没有希望战胜占有更多资源的罗马军队。贺拉斯写了两首诗，分别赞颂提比略和德鲁苏斯的胜利。奥古斯都宣称自己对这些部族的战争是师出有名，罗马人总是喜欢这么想。[19]

罗马控制了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这极大地改善了意大利与南面的伊利里库姆和北面的高卢之间的交通，使得罗马帝国成为一个更连贯的整体。从很多方面看，罗马人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控制阿尔卑斯山，似乎令人惊讶，但的确需要奥古斯都的自信和控制力，才能投入大量资源，开展一系列艰苦的战役。这些战斗往往非常残酷而枯燥，得到的战利品或奴隶却非常少。在过去，向阿尔卑斯山部族缴纳买路钱，才是更简单和更实惠的办法。就像征服西班牙北部山区的战事一样，恺撒·奥古斯都愿意从事艰难但有价值的工作，同样也热衷宣扬自己的成就。[20]

十多年前，阿格里帕开始在高卢建造一个庞大的道路系统，以保障高卢全境的交通便利，尤其是改善通往北面和东面的莱茵河，以及西面的阿基坦尼亚和西班牙的道路。两条主路在卢格敦（今天的里昂）交会，所以这座城市的街道网络是根据两条主路的走向来布局的。和所有罗马大道一样，这两条主路最初用于军事方面，为军队尤其是军队的补给队伍提供高质量、排水优良、一年四季均可用的道路。军队需要的粮

食、肉类和其他物资的数量十分庞大，就连按时向士兵发放的钱币（作为军饷）也是笨重且很占空间的货物。只要条件许可，这些物资会尽量走水路，因为那样更方便也更经济，所以新的道路系统是对交通繁忙的水道（如罗讷河与加龙河）的补充。供给军队的粮食和牲畜都是在行省内部征集的，但将这些物资运到需要的地方，还得细心准备并完成相当多的工作。在随后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军团被调到莱茵河前线，因此后勤需求大大增加了。除了运送必需品之外，随着平民和士兵对葡萄酒和精美餐具的要求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档次不一的奢侈品流动起来，被提供给沿途的市场，或者创建新市场。[21]

这都不是新鲜事。尤利乌斯·恺撒当年就发现，高卢全境的土著城镇里都有罗马商人居住或经商。考古发掘也证明了高卢人对来自地中海的商品的热情。前1世纪输入高卢的意大利葡萄酒的数量令人震惊：一位学者估计约4000万瓶葡萄酒取道罗讷河被送往高卢。道路也不完全是新开辟的，因为高卢人在一些路线上建有主要道路，在河上架桥，在沼泽地建造堤道。高卢的很多城镇都有工匠，有时数量还很多，并且工艺门类也很完备，能够生产各种产品，销往广大地区。很多部落，尤其是高卢中部的部落，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发展到相当发达的程度。[22]

尽管如此，罗马人作为占领军的到来，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征服的伤痛（往往还是非常恐怖的伤痛）外，也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原有道路虽然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够用，但在设计上远远不如罗马的适用于各种天气条件的由碎石铺设的大道，在规模上更是无法与罗马的道路网相提并论。在尤利乌斯·恺撒抵达高卢之前，贸易和商品流通的规模虽然很大，但主要是服务于精英阶层的奢侈品。受益者几乎全是贵族，对贸易的控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埃杜依部落的领地在罗讷河沿岸，他们的一些酋长通过控制葡萄酒贸易的税收，在部落内部获得了极大财富与主宰地位。在罗马人统治下，这种垄断被打破了，当地贵族只有通过成为罗马政府体制的一部分，才能获得区域性权力。种类繁多的商品从意

大利（后来还从其他行省送来）北上，被运往高卢，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为客户。当地人还适应了新形成的品味。在奥古斯都治下，高卢开始大规模种植葡萄树和酿制葡萄酒。而随着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大，高卢本地也开始建立陶器工坊。高卢南方早就普遍使用遵照罗马标准的钱币，如今这种风俗传播到了更广泛的地区，尤其是在有驻军、军团士兵会消费的地方。卢格敦建起了一座官方的罗马铸币厂，生产金银币，为士兵提供军饷，为官方工程提供资金。这些金银币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了，也促使经济很快变得更为货币化，同时也传播了恺撒·奥古斯都的形象和符号。

罗马的影响传播得很广，也很快，但这个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非常彻底，所以高卢仍然保留着一种独特个性，不同区域也有差别。三个高卢的罗马化程度远远低于纳博讷高卢。在大规模殖民的阶段，在纳博讷高卢之外，只建立了三个退伍军人殖民地，分别是卢格敦、新堡（今天的尼永）和劳里卡（今天瑞士境内的奥格斯特）。虽然城镇在很多地区的高卢社会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的功能和罗马人所期望的不一样。对罗马人来说，一座城市是一个政治实体，管辖它周边的土地，但每一座城市在本质上都独立于其邻居。在高卢，“部落”[23] 更重要，大多数部落包括几个城镇，它们都认为自己是更广泛实体的组成部分，而很多贵族可能居住在自己的农庄，而不是城镇内。[24]

奥古斯都可能遵循了现有的罗马惯例，无视高卢的这种结构，而是将每一个部落视为独立的城邦，将其中一个城镇指定为首府，即真正的部落中心，尽管它和别的社区和首府的规模差不多。有些中心的发展得到国家的扶持，但具体模式是多种风格的混合。许多城镇没有罗马城市那种整齐划一的网格状布局，不过差不多所有城市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广场。渐渐地，大多数中心城镇离开了前罗马时代常见的山顶，搬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理想情况下还要能够轻松地与道路网相通。地区政府逐渐采纳了罗马制度，尽管罗马制度其实和当地传统融合了起来。古老的

高卢名字，比如大酋长（一个部落的最高行政长官的头衔）仍然使用。虽然也用罗马的头衔，比如裁判官，但一般一个头衔只有一个人（这是高卢的传统），不像罗马那样，一个级别的行政长官可能有两人或更多。[25]

在三个高卢，罗马公民比在纳博讷高卢要少见。不过公民的数量在稳步增加。当地贵族受到鼓励，将自己的儿子送去接受罗马式教育，后来演讲术在高卢流行起来。同时，当地贵族有机会协助罗马人的行政管理，代表罗马人担任当地行政长官，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罗马军队中担任军官。奥古斯都时期辅助部队三分之一的兵员来自高卢。贵族的实力不再取决于他豢养了多少武士（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时代那样），但这些领导人的后代有机会为罗马作战从而获得荣誉。前1世纪末期，不少死者下葬时还遵循旧传统，即在死者身边放置一把剑或其他兵器，一起入土。有些事情的变化必然是非常缓慢的。我们掌握的史料中零星提及德鲁伊，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仍然很少。在前罗马时代的高卢，德鲁伊提供了一些跨民族的架构和仲裁力量。罗马征服高卢后，德鲁伊并没有当即消失。人祭之类的习俗被罗马当局禁止，泛滥成灾的猎头和部落混战（正是这些活动为人祭提供牺牲品）也被禁止。奥古斯都禁止罗马公民参与德鲁伊仪式，但没有禁止德鲁伊宗教本身。其他的高卢宗教崇拜换上了罗马式的名字和元素，越来越多地在石制神庙中进行，尽管这些神庙往往建在城镇之外原有的圣地之上。[26]

坚持传统并不意味着积极而刻意地排斥罗马风俗。高卢人的普遍倾向是渴望变成罗马人，至少富人是这么想的。事实上罗马人并没有努力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高卢，除非是在对行政管理有帮助的时候。比如，罗马人引入了罗马历法，将一年分成若干月份和日期，表明节日和交税的日期，取代了传统的德鲁伊监管的阴历。和所有的新制度一样，高卢人起初对罗马历法不是很理解，奥古斯都的一名财政官员就利用高卢人对新制度的不熟悉发了横财。此人名叫尤利乌斯·李基努斯，自己也是

高卢人，但曾被罗马人俘虏和奴役，可能是在尤利乌斯·恺撒的高卢战争期间。后来他成为尤利乌斯·恺撒的家奴，侍奉得非常勤勉，最终获得了自由。他对奥古斯都也很忠诚，被任命为行省财务长官，这种衔级的情况不太明晰，不过越来越多地与骑士地位有联系，并且是奉命辅佐帝国行省的总督，就像财务官辅佐过去的行省总督一样，任务是收税。

李基努斯对他的高卢同胞没有什么同情心。他到行省上任的时候可能已经很富裕，但在动身之前决心要抓住一切机会盘剥行省居民，大捞油水。在罗马的旧历法中一年只有十个月，December（12月）是最后一个月。尤利乌斯·恺撒改革历法的时候，将January（1月）定为第一个月，December仍然是最后一个月，因为这两个月包含在政治和宗教上非常重要的日期。李基努斯告诉行省居民，December这个词在拉丁语里很显然是“第十”的意思，所以December之后肯定还有第十一和第十二月。以此为据，他多收了两个月的税。

不管高卢人有没有听信他的解释，都别无选择，只能交钱，否则他们将面对帝国的怒火，最终肯定会被迫交钱。但很多人都非常怀疑李基努斯。前16年奥古斯都来到行省的时候，人们向他投诉李基努斯。起初，元首驳回了一些投诉，因为他不想承认是自己任命了这样一个贪赃枉法的狗官，所以仅仅温和地批评了他的行省财务长官。但铁证如山，而且当地很多重要的贵族明确地敌视李基努斯，于是奥古斯都受到了很大压力，不得不去处置李基努斯。不料李基努斯想出了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办法来逃避惩罚。他邀请奥古斯都去他府上，将自己搜刮到的所有钱财交给元首，宣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防止高卢太富裕以致反叛罗马。这是非常罕见的关于罗马人担心高卢发生叛乱的暗示，我们不能太当真。不过李基努斯似乎全身而退了，因为奥古斯都相信了他的借口。

除非奥古斯都亲自到外省，否则很难知道他的代表在那里做了些什么。这也是他大范围旅行的原因之一。官员一定程度的中饱私囊在他的

预料之中，他也能接受。他的目标是约束各行省政府的过分行为，因为它们的暴政往往促使行省居民掀起反叛（李基努斯说他阻止了这种反叛）。长途跋涉去觐见元首是耗时费力且代价高昂的事情，因为请愿者必须去罗马或者元首当时在的其他地方。元首亲自巡视各行省，让更多个人和社区有机会与他交谈。奥古斯都在高卢的时候，阿格里帕在叙利亚和东方的其他行省，同样是巡视各地、主持司法。巡视外省不仅是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机会，还能更明确地表达罗马政府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同时也让总督们（不管是元老院行省还是帝国行省的总督）在处理外省社区的问题时更难采取与元首截然不同的办法。

奥古斯都离开高卢，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去往西班牙。自前19年阿格里帕成功镇压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以来，伊比利亚半岛就很安定，只是偶尔发生零星的骚乱。伊比利亚半岛如今被划分为三个新行省，贝提卡在南部，占据了绝大部分繁荣的定居地区，罗马文化在那里与历史悠久的城市生活传统水乳交融。这个行省被交给元老院管辖时，大约与纳博讷高卢被交给元老院时在同一时间，这再一次证明奥古斯都在完成了平定某地区的使命之后愿意交出该地区的管辖权。另外两个行省仍然在他的控制下，由他的军团长治理。西部的卢西塔尼亚（比今天的葡萄牙大一点）已经基本上有人定居，不再有大规模驻军。内西班牙行省驻扎着3个军团。这个行省从今天的加利西亚延伸至西班牙中部，一直到地中海沿岸，近些年被征服的人群就居住在这个行省。曾经在该地区作战的其他军团已经离开西班牙，被调往其他地方，大多数是调往高卢或伊利里库姆。[27]

一些军团士兵留了下来。奥古斯都在坎塔布里亚战争期间或之后在这里建立了两个大型的退伍军人殖民地，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恺撒奥古斯塔（今天的萨拉戈萨），在内西班牙的埃布罗河畔；奥古斯塔埃梅里塔（今天的梅里达），在卢西塔尼亚的瓜地亚纳河畔。就像在高卢一样，逐渐扩展的新道路网与河流结合起来，为这些殖民地和其他主要城

市提供了良好便捷的交通。殖民地是对忠诚老兵的奖赏，同时也是罗马统治的堡垒，假如发生严重动乱（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些殖民地有潜在的军事价值。奥古斯塔埃梅里塔显然建造得非常宏伟，但它的城墙主要是为了耀武扬威，而不是为了防御。从瓜地亚纳河上长长的多拱桥可以进入奥古斯塔埃梅里塔。

殖民地也是罗马生活的样板，被规划和组织得非常有序，市中心有一个恢宏的广场，奥古斯塔埃梅里塔可能有两个广场。阿格里帕为这座城市建造了一座壮观的石制剧场，用他自己和奥古斯都的雕像以及记载他们两人享有保民官权力的年份的碑铭来装饰剧场。元首为殖民者建造了一座同样宏伟的竞技场，好让他们享受那些最符合罗马传统的娱乐。后来一代代人不断为城市增光添彩，美化环境，新建纪念碑，其中很多模仿了奥古斯都在罗马城的宏伟工程。西班牙和高卢还建立了其他一些殖民地，或者得到了新一批人口输入（退伍军人）。在西班牙各行省，城市生活大多欣欣向荣，主要是通过本地人的努力。大多数主要社区建起了一个罗马式广场，虽然设计风格与罗马城的广场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广场的规模不一，但无一例外都遵循了罗马建筑的最佳原则，运用一种基本的长度单位来确定所有数据，从柱子的直径和间隔距离到建筑和庭院的大小都是如此。长度单位本身五花八门，但背后的原理是一样的，能够赋予建筑一种几何上的整齐划一，这就是罗马设计的理想。和高卢一样，西班牙也出现了新的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革，当地或罗马地主开始为其他行省和意大利本土的消费者生产橄榄油、鱼露和葡萄酒。[28]

老战友和老对手

对奥古斯都政权来说，军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记住，虽然此时仅仅是亚克兴角战役之后的第二个十年，但这已经是前88年以来最长的没有内战的时段了。如果不算同盟者战争，那就是自前91年以来

最长的没有内战的时段。军团士兵服役期间，要对其加以约束并保持其忠诚；退役之后，要给他们分配土地，让他们满意，但又不能对生活在退伍军人定居地的原居民造成损害。大约在这个时期（狄奥说是前13年），奥古斯都为军队制定了新规矩，将军团士兵的服役期确定为十六年，而九个大队的禁卫军受到优待，只需服役十二年。军团的数量比较稳定，不会像内战期间突然猛增，所以比较容易预测每年退役的老兵的数量。[29]

与此同时，辅助部队变得更为固定化和永久化。有些部队仍然用其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如斯凯瓦部队，这是一个骑兵团，可能得名自尤利乌斯·恺撒麾下的一位著名百夫长。但辅助部队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字番号，并用兵员的招募地点来命名。高卢、色雷斯和西班牙部队都很常见。指挥这些辅助部队的是职业军官（通常是骑士，或者来自出了最多百夫长的阶层），他们由此获得了体面和有利可图的职业。外省贵族也可以担任军官，对他们来说，担任军官是获得公民权和成为帝国统治集团一分子的机会。元首会亲自授予这样的外省贵族公民权，让他们对元首感恩戴德。在军中待了一段时间（或长或短）之后，军官退役之后便可在自己家乡的社区担任要职，不管他们的家乡是殖民地还是意大利或外省的城镇。理想情况下，他们将仍然对奥古斯都忠心耿耿，满足于自己的命运，不大可能加入任何企图组建一支军队的竞争对手。恺撒的名字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家族将忠于尤利乌斯·恺撒及其继承人视为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是一种很私人化的关系。有一次，一名退伍军人（可能是前任军官或禁卫军士兵，因为这个故事显然发生在罗马）卷入了诉讼，于是去找奥古斯都，求他支持自己。元首向他表达了最好的祝愿，并为这名退伍军人找了一位辩护律师。但这还不够，于是此人掀起自己的上衣，向群众展示伤疤。“但是，恺撒，”退伍军人宣称，“你在亚克兴角遇险的时候，我可没有派人代替自己去打仗。我是为你作战的。”奥古斯都听

到这话，脸红了，于是亲自担任此人的辩护律师，“因为他害怕大家觉得他不仅傲慢，而且忘恩负义”。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虽然早已不将士兵称为“弟兄们”，但他还是希望士兵相信，他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曾在他的领导下出生入死。[30]

他对另一位老战友就不是那么关心了。李必达仍然是一位元老，尽管他只有在元首的命令下才会被带来开会。在这些会议上，奥古斯都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位前盟友的鄙夷。但李必达在前13年去世之前一直是祭司长。所以，罗马最高级的祭司已经沉寂了二十多年，虽然这让奥古斯都得以静悄悄地指导罗马的国家仪式，但依然有些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奥古斯都没有剥夺李必达的祭司长身份，让自己担任这个职务，这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不过后来奥古斯都曾吹嘘自己拒绝这么做的义举，“仅仅在李必达终于死了之后，他才接受这个职位。李必达当年是利用内乱夺取这个职位的”。[31]

前12年3月6日，奥古斯都正式就任祭司长。他说，“我的父亲”尤利乌斯·恺撒也曾担任祭司长。此后，只有皇帝才能担任这个职务，直到罗马帝国灭亡教皇采纳了这个头衔。这次就职典礼规模宏伟、威风凛凛、庄严肃穆，奥古斯都自己的描述明确表示，他认为祭司长头衔既是他的权利，也是他获得的遗产。根据传统，这位最高祭司应当居住在罗马广场边缘、灶神庙旁的正式府邸中，而这座府邸前不久遭火灾受损。奥古斯都将这座府邸赠给维斯塔贞女，自己仍然住在帕拉丁山上的府中，并将其宅邸的一部分作为神庙奉献出来，让它名义上成为公共财产，以便他能恰当地履行祭司职责。奥古斯都的府邸原本就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因为它毗邻帕拉丁阿波罗神庙和其他一些略微逊色的圣所。[32]

前13年夏季，奥古斯都返回了罗马。提比略早于他到达罗马并在这一年年初就任执政官，他的同僚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此人是阿格里帕的女婿。罗马又一次发生洪灾，台伯河水位上涨，淹没

了两岸，灾情严重，以至于巴尔布斯只能乘船去他新竣工的剧场，不过他还是热烈庆祝了剧场的正式落成。为了庆祝此事，提比略询问这位西班牙裔前任执政官应当如何欢迎元首的归来。巴尔布斯提议向奥古斯都授予新的荣誉，后来奥古斯都礼貌地谢绝了。这种模式如今已经成为常规。有人尝试正式欢迎他，但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又一次趁着夜色悄悄溜进了罗马城。次日早上，他接见了聚集在其宅邸外的群众，然后登上卡比托利欧山，从侍从的法西斯束棒上取下胜利者的桂冠，将其悬挂在至善至伟朱庇特的雕像上。这些胜利的象征物是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赢得的，归功于奥古斯都，如今被奉献给佑护罗马的大神。

这一天，恺撒·奥古斯都宣布，浴池（主要是阿格里帕建造的那一座）将免费开放，在浴池等待顾客的理发师也将免费为到场的公民同胞理发。晚些时候的元老院会议上，奥古斯都的嗓子哑了，无法演讲，于是一名财务官代他宣读。这是值得庆祝的节日，因为马凯鲁斯剧场也竣工了，并在盛大的典礼中向公众开放。奥古斯都七岁的外孙盖乌斯·恺撒参加了所谓“特洛伊竞技”——这是一种颇具戏剧性但有时会很危险的骑马训练和搏斗演习——让这孩子至少在名义上领导了一组贵族男孩。斗兽表演也是盛景的一部分，六百头野兽遭到屠戮。9月，举行了更多竞技和斗兽表演，以庆祝元首诞辰。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庆祝活动的安排和主持者是马克·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儿子尤卢斯。[33]

出现了一些尴尬的时刻。在另一场竞技会（组织者是执政官提比略，目的是庆祝奥古斯都返回罗马城）上，提比略允许盖乌斯坐在元首身旁的贵宾席上。可能就是在这一次，群众集体起身，向这男孩欢呼和问候。奥古斯都不高兴，训斥了他的继子和群众。虽然他在这些场合会接受人们对其成就的赞颂，但他觉得向一个没有任何成就、没有正式成年的小孩发出这样的赞颂，是非常不合适的。另外，他不允许任何人——不管是亲人、元老，还是群众——称他为“主人”。[34]

群众的反应表明很多人愿意赞颂所有和奥古斯都有关联的人，并且暗示着他们认为这个男孩有资格获得权力，因为他出身高贵，并且是奥古斯都的养子。但元首非常努力地否认“家天下”的存在，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君主制。他这么做部分是为了做给贵族看，并继续维持这样的幻象：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国里，不是由单独一个人统治的，尽管共和国的第一公民治国有方，而且有资格掌握政权。元老们不断授予他更广泛和前所未有的荣誉，这对奥古斯都显然很重要，说明很多元老现在已经不关心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那么珍视的自由了。总的来讲，他这么做的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自我认识。奥古斯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最高统治权，这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这并不是说他运用权力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非常努力地把权力用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元首认为自己理应赢得内战、获得统治地位并牢牢掌握统治地位，因为这对广大人民的福祉有利。他显然是这么看的。因此，他可能真的觉得自己仅仅是国家的第一行政长官，是公仆而非统治者。自我约束和实现理想的愿望比元老精英阶层的意见更能有效地节制他的行为。

现在他回到了罗马，就有可能受到不讨喜、不适宜的阿谀奉承，在公共辩论中也可能遭遇窘迫。在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科尔内利乌斯·希森纳的贵族因为妻子的行为而遭到批评（她可能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的女儿，但因为这些年里有好几个叫科尔内利乌斯·希森纳的人，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希森纳否认自己应当为妻子的行为负责，因为他是遵照奥古斯都的建议和支持才娶了她。元首看到自己卷入如此不体面的争吵，而且感到自己有可能说出将来会后悔的话，或者做出不妥的事情，于是站起身来，匆匆离开了议政厅。他等到自己冷静下来，才返回议政厅。[35]

虽然奥古斯都公开鼓励自由辩论，但他并不总是关心辩论的内容和基调。而且，不管他如何伪装，大家都不会忘记现实：他的威望压倒其他所有人，并且其他人要想得势，必须得到他的提携。前13年，奥古斯

都再一次努力去获得符合他心目中理想标准的新元老，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即豪门元老家族的一些后代不愿意从政，而满足于骑士身份。尤其是，想当保民官的人非常少。虽然保民官的主要权力被奥古斯都接管了，但保民官仍然有很多职责，与全体公民相关的一些小事，都可以向保民官上诉。为了填补保民官的岗位空缺，不得不从一些年纪不到四十岁的前任财务官当中抽签。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拥有足够多的财富、足够好的符合元老资格的骑士，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元老院，除非他们亲自向元首证明自己的身体有问题，无法履行元老院的职责。奥古斯都的面具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卓越公仆，但他不得不强迫其他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便是奥古斯都，也没有办法把世界完全改造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36]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虽然没有君主的名分，但其实是无冕之王。他想要的权力，元老院和人民都不会拒绝，即便他们不愿意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前13年，他的行省指挥任期被再次延长五年，而阿格里帕的保民官权力也被延长了五年，并第一次获得了高于其他所有人（奥古斯都本人可能除外）的资深执政官军权。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此时都是五十岁上下，阿格里帕的地位非常高，是自三头同盟以来地位最接近奥古斯都同僚的人。不管两人的军权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他们都不是平起平坐的。阿格里帕是他的女婿，这意味着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但尤利娅父亲的地位毕竟比阿格里帕高一些。更重要的是，阿格里帕不是恺撒家族成员，也缺少这个姓氏带来的威望，更不用说庞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了。阿格里帕的地位仅次于奥古斯都，但始终只能是二把手，奥古斯都也没有努力让阿格里帕与自己平起平坐。[37]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虽然人到中年，但仍然聪明强干、精力充沛，并对自己的老友忠心耿耿。他最喜欢的谚语是“和平让渺小的东西生长，纠纷让伟大的东西垮台”。前13年，他返回罗马，待了几个月之后又去处理巴尔干的军事问题。他离开罗马时，尤利娅第五

次怀孕了。夫妇俩除了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之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在巴尔干，展示一下武力就足以平息当地的骚乱，于是阿格里帕在前12年返回意大利，在抵达罗马前就病逝了。他的疾病不明，但这一年非同寻常地任命了三名补任执政官，说明这一年可能暴发了某种流行病。不久之后，尤利娅生了第三个男孩，被命名为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38]。[39]

阿格里帕去世的时候，奥古斯都并不在老友的身边。狄奥说奥古斯都当时在雅典主持泛雅典运动会[40]，但听说阿格里帕患病后立刻返回。阿格里帕的遗体被庄严肃穆地运回罗马，随后举行了公开葬礼，元首亲自致悼词。接着，这位亲人的骨灰被安放到奥古斯都为自己准备的宏伟陵寝中。[41]

---

[1] Dio 54.19.2（Loeb translation）.

[2] *Res Gestae* 26.

[3] Dio 54.20.4-6，Suetonius，*Augustus* 23.1；Strabo，*Geog* .7.1.4提到，苏刚布里人在其国王梅洛领导下的行动，是奥古斯都与日耳曼人战争的开端，但他指的可能是后来的一个事件。

[4] Dio 54.19.1-2.

[5] Dio 54.19.3；奎里努斯神庙，见Price in *CAH2* X，p.822。

[6]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369.

[7] 原文有误。前16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是大安东尼娅的丈夫，而不是儿子，所以他是奥古斯都的外甥女婿。卢基乌斯是尼禄皇帝的祖父。

[8] Crook in *CAH2* X，pp.94-5.

[9] Dio 54.19.6，Suetonius，*Tiberius* 12.2，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2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403-4.

[10] Dio 53.12.7，54.4.1；纳博讷高卢的发展概况，见C.Goudineau in *CAH2* X，pp.471-87，M.Christol，*Une Histoire Provinciale.La Gaule narbonnaiseav.J.-C.au IIIe siècle ap.J.-C* .（2010），尤见‘La municipalisation de la Gaule narbonnaise’，pp.105-28，及J.Drinkwater，*Roman Gaul.The Three Provinces*，*58 BC-AD 260* （1983），pp.20-21。

[11] 关于共和国最后几十年里的外高卢，见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pp.165-73；Pliny，*NH* .3.31。

[12] 讨论见J.Drinkwater，*Roman Gaul.The Three Provinces*，*58 BC-AD 260* （1983），pp.17-25，及Goudineau in *CAH2* X，pp.487-502。

[13] 尤利乌斯·恺撒的作战，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205-92 =（2007），pp.248-353。

[14] Dio 54.20.1-2，22.1-2，Florus 2.22，Strabo，*Geog* .4.6.7-8.

[15]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指阿尔卑斯山的西南部，是法国与意大利边界上的一段。

[16] 诺里库姆相当于今天奥地利大部分和斯洛文尼亚一小部分地区。

[17] 赖提亚人是古罗马人对当时阿尔卑斯山一带若干部族的称呼。他们居住在今天的瑞士中部、奥地利蒂罗尔地区和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地区。他们的语言可能与伊特鲁里亚语言有关联，也可能属于凯尔特语。

[18] 温德利希人是古罗马时期居住在今天瑞士东北部和德国南部一些地区的部族，可能是凯尔特人，前15年与其邻居赖提亚人一起被提比略领导的罗马军队征服。

[19] Dio 54.22.2-5，Velleius Paterculus 2.95.1-2，Strabo，*Geog* .4.6.9，*Res Gestae* 26，Horace，*Odes* 4.4和14，with Gruen in *CAH2* X，pp.169-71，C.Wells，*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972），pp.59-89，及G.Alföldy，*Noricum* （1974），pp.52-61.

[20] 见Wolff in *CAH2* X，pp.535-41。

[21] J.Drinkwater，*Roman Gaul.The Three Provinces*，*58 BC-AD 260* （1983），pp.12，21，119-40，C.Wells，*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972），pp.93-148.

[22] 葡萄酒贸易，见A.Tchernia，‘Italian wine in Gau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in P.Garnsey，K.Hopkins & C.Whittaker（eds），*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1983），pp.87-104；对高卢社会的精彩介绍，见N.Roymans，*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Cingula* 12（1990），尤见pp.17-47，及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尤见pp.38-58和80-105。

[23] 部落（civitas）这个词不是非常准确，有些学者会用“国家”来取代“部落”，但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法。

[24] R.MacMullen，*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pp.85-120，

P.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Empire* （1999），pp.49-78，B.Cunliffe，*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pp.48-9，86-7，96-7，132-4，S.Dyson，*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 （1985），pp.137-9，154，及C.Goudineau，*César et la Gaule* （1995），pp.141-3。

[25] J.Drinkwater，*Roman Gaul.The Three Provinces*，*58 BC-AD 260* （1983），pp.18-27，93-118，141-59.

[26] Caesar，*BG* 6.15讲到，贵族的地位取决于他们供养了多少武士；Pliny，*NH* 30.4.13讲到禁止公民参加德鲁伊崇拜仪式，概况见J.Drinkwater，*Roman Gaul.The Three Provinces*，*58 BC-AD 260* （1983），pp.38-9，44，179-81，206-7，及T.Derks，*Gods*，*Temples and Ritual Practices*：*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Ideas and Values in Roman Gaul* （1998），*passim* 。

[27] 概况见Alföldy in *CAH2* X，pp.449-63，J.Richardson，*The Romans in Spain* （1996），pp.41-126，及B.Lowe，*Roman Iberia.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2009），esp.pp.87-115；军队，见A.Morillo Cerdán，‘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in A.Moirillo，N.Hanel & E.NOTES 575 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de Gladius* 13 Vol.1（2009），pp.239-51，尤见244-7。

[28] 见W.Mierse，*Temples and Towns in Roman Iberia.The Social Dynamics of Sanctuary Design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BC to the Third Century AD* （1999），pp.54-127，B.Lowe，*Roman Iberia.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2009），pp.87-115，及R.MacMullen，*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pp.50-84；W.Trillmich（trans.C.Nader），*Colonia Augusta Emerita*，*Capital of Lusitania* 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427-67，及R.M.Durán Cabello，‘Edifi cios de espectáculo’，in X.Raventós（ed.），*Les capitales provinciales de Hispania 2.Merida*：*Colonia Augustua Emerita* （2004），pp.55-61。

[29] Dio 54.25.5-6，with K.Raafl aub，‘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ugustus’ military reforms’，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203-28.

[30] 关于斯凯瓦部队，见*CIL* 10.6011，评论见J.Spaul，*ALA2* （1994），pp.20-21，辅助部队的概况，见D.Saddingt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49 BC-AD 79*） （1982），pp.15-26，77-82，及P.Holder，*The Auxilia from Augustus to Trajan* （1980），pp.5-13；Macrobius，*Saturnalia* 2.4.25及（较简略）Dio 55.4.2讲到此次审判；与士兵和退伍军人的关系，见J.Campbell，*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 （1984），pp.32-59，243-81。

[31] Dio 54.15.4-7，27.2-3，*Res Gestae* 10（Loeb translation for quote），Suetonius，*Augustus* 16.4，31.1，Ovid，*Fasti* 3.415-28.

[32] *Res Gestae* 10， with Price in *CAH2* X， pp.825-7， 及S.Weinstock， *Divus Iulius*（1971）， pp.276-81。

[33] Dio 54.25.1-4，26.1-2.

[34] Dio 54.27.1， 及Suetonius， *Augustus* 56。

[35] Dio 54.27.4， with R.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 pp.377，379.

[36] Dio 54.26.3-9， 概况见R.Talbert，‘Augustus and the Senate’， *Greece and Rome* 31（1984）， pp.55-63讲到创造真正自由的辩论的难处。

[37] Dio 54.28.1.

[38] 波斯图穆斯是“遗腹子”的意思。

[39] 谚语“和平让渺小的东西生长，纠纷让伟大的东西垮台”（*nam concordia parvae res crescunt*， *discordia maximae dilabuntur* ）见Seneca， *Epistulae* 94.46（参见Sallust， *Bell.Jug* .10.6 with Syme， p.343， n.1）.

[40] 泛雅典运动会是前566年至前3世纪在雅典举行的盛会，包括宗教节日、体育竞技和文化活动等。

[41] Dio 54.28.2-29.8， Suetonius， *Augustus* 64.1， Velleius Paterculus 2.96， Tacitus， *Ann* .1.3.

十八 奥古斯都的和平

为了纪念我的归来，元老院投票决定奉献一座“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1]

我的歌将我引领到和平祭坛前……来啊，和平女神，你精致的秀发戴着阿提卡的花冠，让你温柔地停驻在整个世界。再也没有敌人，也没有凯旋式的机会。对我们的领袖，你将是比战争更伟大的荣耀。愿士兵仅仅为了遏制侵略者而战……！愿远近的世界都畏惧埃涅阿斯的子孙，如果有不畏惧罗马的国度，愿它热爱罗马！

——奥维德，1世纪最初十年[2]

阿格里帕将面积广大的花园和战神广场上的浴池建筑群赠给了罗马人民，还捐出了自己的一些庄园，以便为维护这些花园和建筑群提供资金。奥古斯都亲自宣布了他的遗愿，以确保这些遗愿会得到执行，并向所有男性公民（或至少是在罗马城的男性公民）赠送400塞斯特尔提乌斯，并说这是他的朋友的另一项遗愿。这种慷慨赠礼很符合阿格里帕近二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将自己新近获得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为人民建造生活福利设施，并在帝国全境的许多城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尤其是在罗马城。他的建筑活动的规模远远超过恺撒·奥古斯都之外所有的罗马贵族，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仍然在世的，并且既注重实用，也注重美观。当群众向元首抱怨葡萄酒太贵时，他答道，他的女婿已经为他们建造了一座高架渠，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饮用水。[3]

阿格里帕的勤奋和才干的最大受益者始终是奥古斯都。阿格里帕的遗嘱也是这样，将他最大一部分财产赠给了老友和岳父，包括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大量田产。狄奥写道，其中一座庄园囊括了几乎整个克森尼索[4]（在希腊）。于是，阿格里帕凭借内战期间和之后忠心耿耿的效力而赢得的巨大财富，如今回到了领袖的手中（阿格里帕曾追随这位领袖，

并与他一同崛起），最终可能落入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手中。政治和家庭的忠诚是很难分开的，这在罗马不算罕见。人们平步青云，靠的是新老朋友的支持、恩主提携和联姻。阿格里帕通过联姻收益良多，先是娶了庞贝尼娅（富甲天下且人脉极广的阿提库斯的女儿），然后娶了恺撒的外甥女马凯拉，最后娶了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后来奥古斯都收养了阿格里帕与尤利娅的两个儿子，于是阿格里帕与奥古斯都的关系更加亲近了。[5]

奥古斯都非常看重亲情。从很多角度看，这并不稀罕，因为罗马人的血亲、收养或姻亲关系往往会帮助他们晋升，但神圣尤利乌斯的儿子将他家庭的重要性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过去，权力和官职是不能分享的，因为二者都是有期限的，也需要竞争得来，并且受到选民影响。这些限制对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没有用，他可以将实际上是终身制的官职授予阿格里帕，最终给了他保民官权力和高级资深执政官军权。早在前36年，奥古斯都的妻子和姐姐就获得了保民官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并因此成为公众人物。而马凯鲁斯、提比略、德鲁苏斯和后来的盖乌斯与卢基乌斯都得到了特别优待，成年之后就迅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官职。虽然奥古斯都不赞成群众对幼年盖乌斯的歌颂，但他有意识地让大家感到，他的家族理应比罗马的其他任何人得到更多尊重和更重要的公众角色。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前13年7月4日，元老院下令建造这座祭坛，以纪念他满载成功地从外省返回。原先元老院打算在尤利乌斯议政厅内建造一座献给奥古斯都本人的祭坛，被他谢绝，于是改为奉献给和平的祭坛。祭坛的位置也改为战神广场，延续了他和阿格里帕将这个地区变为纪念他荣耀的巨大建筑群的做法。祭坛被安置在神圣土地之上，其设计参考了雅努斯神庙，两端各有一个入口，其内部的大理石被精心雕琢，做成传统神龛的木板的模样。外墙上也有工艺同样精湛的装饰，尤其是南北两面有表现宗教游行的檐壁。祭坛的具体

性质，或者说它代表的是一个具体事件还是融合了真实和虚构元素的某种想象的仪式，至今仍然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主题。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之一是，祭坛表现的是纪念奥古斯都前13年胜利的正式感恩活动（这是他荣获的五十五次公共感恩之一，五十五次感恩活动一共890天，让尤利乌斯·恺撒也黯然失色）。[6]

毋庸置疑的是，奥古斯都的家人在游行和檐壁的图案中都占据了核心位置。其他元老也有露面，比如戴着尖顶的独特帽子的祭司。祭司当中肯定有神圣尤利乌斯祭司，这个职位是前44年设立的，而其他祭司职位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远古。恺撒·奥古斯都走在祭司们的前面，他的前面是执法吏。元首的形象被刻画得比周围其他人高一点点。他本人其实不高，所以应当不会比周围的人都高，但他也没有被刻画得像波斯帝王或埃及法老那样耸立在人群之中。阿格里帕跟随着祭司们，也比其他人略微高一点，显得比较突出。他的托加袍一角遮盖着头部，可能表明他在祈祷或者在仪式中扮演某种角色，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说明他在雕塑竣工前就去世了。一个穿着短上衣的小男孩拉扯着他的托加袍，但转头仰望身后的李维娅。她轻轻拍着孩子的头，可能是为了抚慰他，让他安静下来。

这种非正式的姿态在雕塑场景的其他部分也很常见。提比略站在李维娅旁边，后面更远的地方是安东尼娅，她拉着一个孩子的手，并转头与她的丈夫德鲁苏斯说话。德鲁苏斯刚从高卢的军事指挥岗位回来，穿着鲜明的军装斗篷，另一个小男孩拉着他的斗篷，并抬起头看着一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女孩。我们很难判断奥古斯都和平祭坛雕塑中的人的身份。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被刻画得很清晰，但其他人都是程式化风格，这有助于让两位领导人显得更突出。其他人物仪态庄严，除了少数几个人都很年轻，虽然人物外貌不同，但很相似，区别只在细节。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肯定一下子就能辨认出这些人物，并了解这些相似面容的细微差别，但我们就很难分清了，尤其是那些名气较小的人物。雪上加霜

的是，这些雕塑从古典时代晚期一直到20世纪的墨索里尼时代被连续翻新修缮，有时被修改很多。人物当中可能包括马克·安东尼的儿子尤卢斯·安东尼，还有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们都娶了屋大维娅的女儿。群像中还有元首的其他亲属，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确定人物的身份。[7]

小孩是最难辨认的，所有小孩都是胖乎乎的面容，这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年幼，但这使得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身份。大多数小孩都像他们周围的成年男女一样穿着托加袍或裙子。拉着阿格里帕斗篷的男孩不一样，他只穿着一件短上衣，脖子上还戴着项圈（这种项圈最初是高卢风俗，很重，由金银或青铜制成）。有人因此猜测这孩子是个蛮族王子。当时有很多蛮族王子被作为人质送到罗马，在奥古斯都家中长大，奥古斯都希望他们将来会成为罗马的盟友。但我们知道，参加特洛伊竞技骑马训练的男孩也戴着项圈，所以这个孩子更可能是盖乌斯·恺撒。一个打扮与他相似但年龄小一点的男孩出现在雕塑的其他部分，可能是他的弟弟卢基乌斯。[8]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的用料考究，工艺水平极高。希腊艺术的影响清晰可辨，特别鲜明地（肯定是有意识地）模仿帕提农神庙的带状装饰。很多学者估计，高级雕刻师是希腊人，但这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有些概念的罗马风格很强，非常符合奥古斯都的理念，这远远不是简单的模仿。夫妻之间和成年人对小孩说话时轻松闲适的非正式仪态是前所未有的，游行队伍中有这么多女人和小孩也是史无前例的。在圣所的两翼——独立于游行队伍的雕塑——还有描绘罗马人的神圣佑护者罗马女神和大地母亲，以及罗马人在神话中的祖先埃涅阿斯、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图像。较小的细节图上还有准备献祭公牛的场景。以这种方式，罗马人的遥远过去，以及尤利乌斯氏族和元首的祖先都得到了纪念，并与当今（被奥古斯都及其家人主宰）紧密联系起来。维吉尔史诗中也有这样的主题，当时的许多艺术和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和平得到了颂扬，但这

是罗马人的胜利，是在军事胜利之后得来的，而且是奥古斯都的成功赢得的和平。几年后，诗人奥维德（他并非奥古斯都政权毫不含糊的宣传鼓动家）将会歌颂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并希冀和平，因为外族要么热爱罗马，要么畏惧它。这和平将是罗马雄霸天下、不受任何挑战的和平。[9]

奥古斯都的领导将保障这样美好的未来，他的许多亲人（奥古斯都和平祭坛雕像上有三代人）将会支持他。年纪最大、地位最高的家庭成员是奥古斯都和李维娅，以及阿格里帕，尽管他没有活到前9年年初这座祭坛竣工和对外开放之时。和往常的奥古斯都雕像一样，此处的他没有任何衰老的痕迹，成熟而威风凛凛，绝不像是五十出头的人。第二代人由李维娅的两个儿子引领着，他们都还只有二十多岁。最后是年幼且前程远大的第三代人，盖乌斯、卢基乌斯和其他孩子。可以上溯到埃涅阿斯的家系血脉如今枝繁叶茂，未来有了保障。奥古斯都此时不像过去那样常受重病困扰，但已经不再年轻，终有一死。现代学者总是努力寻找元首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有没有确定继承人。罗马人先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凯鲁斯身上，然后是其他人，这明确地证明当时的人们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及苏埃托尼乌斯、塔西佗和狄奥），奥古斯都死后，一连几百年，罗马将处于一位又一位皇帝的统治之下。

奥古斯都可能不是这么打算的，因为在马凯鲁斯死后，他总是寻找不止一位继承人，寻找多位支持者和未来的接班人。阿格里帕分享奥古斯都的权力，帮他承担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同龄人，但缺少威望，并且出身低微。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是贵族子弟，受到优待，在官场平步青云，并且分别娶了阿格里帕的女儿和奥古斯都的外甥女，但没有被奥古斯都收养。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则成为恺撒家族的成员，后来也很快得到提携。这五个人（成年之后）都分担了外省的行政管理，领兵作战，并监督罗马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们是同僚，但地位都低于元首，只是程度不同。[10]

没有一丝迹象表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曾被奥古斯都定为唯一继承人，而其他人则将站到一边，接受这个人的主宰。五个人并非平起平坐，但理论上应当团结一心，为天下人的福祉效劳。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奥古斯都最亲近的人的高死亡率是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超乎寻常（按照罗马世界的标准，人的死亡率本来就很高）。所以，他赋予这么多亲属（有的是收养的，有的是血亲或姻亲）崇高地位，可以理解为提前准备，以应对不可避免的损失。没有证据表明奥古斯都是这么想的。他在亲人的辅佐下领导国家，绝对信任这些人的忠诚。他似乎希望自己死后这种局面能够延续下去。虽然不会有单独一位元首，但会有多位领导人，他们共同承担艰苦的职责，级别最高的领导人死后也不会造成权力真空和内战。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非常罗马式的概念，不太像是君主制，而是一个非正式小圈子的统治，圈子成员拥有君主一般的权力。在奥古斯都治下，这种体制是有效的。后世恢复这种体制的努力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享有恺撒·奥古斯都那样极高的威望。他是神圣尤利乌斯的儿子，担任执政官，获得公共感恩和凯旋式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人。就连阿格里帕也无法赶上他的纪录，尽管大多数工作其实是阿格里帕做的，但功劳总算在奥古斯都头上，并进一步增加他的威望。其他任何一位皇帝的作为都比不上恺撒·奥古斯都（至少几个世纪之内是这样），甚至在位时间都没有他主宰罗马国家的时间那么长。身份和作为使得他有了这么多建树，统治了这么久，因为他家族内部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挑战他，而这个圈子之外的人没有挑战他的能力。

阿格里帕的去世对奥古斯都是一个打击，因为他鞍前马后，跟随奥古斯都三十多年，圆满完成了奥古斯都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但奥古斯都体制的优点在于，现在其他人可以接替阿格里帕了。最沉重的负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提比略和德鲁苏斯肩上，他们在随后几年都将南征北战，几乎没有任何停歇。提比略还被要求与妻子维普撒尼娅离婚。维普

撒尼娅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很快还将生下一个女儿。按照罗马贵族的标准，他们的婚姻很幸福，但罗马贵族常常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而离婚和再婚，所以他们的离婚并没有让人感到惊讶。奥古斯都的女儿虽然已经当了两次寡妇，而且生了五个孩子，但仍然只有二十七岁，如果不再嫁就非常奇怪了。一段时间里，奥古斯都考虑在骑士阶层为女儿找一个丈夫，要富裕而尊贵，但不像元老那样受到从政的诱惑。但这样的人当了元首的女婿之后一定会受到比以往多得多的注意，未必能与政治活动拉开距离。

尤利娅很希望嫁给提比略，从很多角度看，他也是显而易见的理想人选，因为如果奥古斯都从家族圈子之外选一个女婿，就会大幅提升女婿家的地位。奥古斯都已经不需要维持阿格里帕的忠诚，而德鲁苏斯娶了奥古斯都的外甥女，不能随便拆散，所以他命令提比略与维普撒尼娅离婚。后来维普撒尼娅再嫁了，寿命很长，为她的元老丈夫生了至少五个孩子，但她完全没有尤利乌斯家族的血统，所以这没关系。提比略和尤利娅订了婚，但遵照法律要求，十个多月后才结婚。这门婚事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提比略与奥古斯都及其养子的关系，后者将来会和提比略一起，辅佐元首治理帝国。[11]

征服

在这期间，提比略被派往巴尔干，因为那里又一次出了麻烦。阿格里帕的死讯应当是诱使当地发生骚乱的因素之一。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返回了高卢。在随后三年里，兄弟俩将在这些边疆地区积极作战。这显然是同一计划的不同部分，但有些现代学者的说法——奥古斯都努力在多瑙河，最终在易北河沿线建立利于防守的边界——没有什么说服力。在花费多年时间平定现有的行省、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和近期占领阿尔卑斯山之后，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决心在欧洲发起大规模征战。这是非常干净体面的荣耀，赢得的胜利将会兑现奥古斯都和平

祭坛赞颂的“通过力量获得和平”的誓言，并让他管辖出现军事问题的各行省的做法更加合理。这也是一个机会，让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扬名立威，积累更多的高层指挥经验。[12]

这些积极进取的对外扩张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近几年来，部队和给养被集中到莱茵河一线和巴尔干。这并不是说这些战争是罗马人在没有受到挑衅、毫无缘由的情况下悍然发动的。有一种说法是，罗马的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对之前所遭袭击的反应，现代人对这种说法的冷嘲热讽是大可不必的。外族袭击司空见惯，往往非常严重，但罗马人的反应比较难预测，有时是小规模报复，有时是大规模进攻，甚至是直接征服。现有资源的多寡、统帅行动的自由程度以及赢得荣耀的欲望，共同决定了罗马人反应的规模和类型。前58年，上述这些因素，再加上赫尔维蒂人迁徙带来的机遇，引发了尤利乌斯·恺撒征服高卢，而不是他之前觊觎的巴尔干。[13]

此时奥古斯都没有受到其他地区大规模战事的烦扰，而且享有史上任何一位罗马统帅都没有的行动自由，于是他决定在莱茵河和巴尔干为罗马开疆拓土。和其他罗马人一样，他并不是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看世界，而是将世界看作许多民族和国家组成的网络。他将要攻击这些民族和国家，“饶恕被征服者，在战争中击败骄傲者”。一些蛮族将被纳入罗马的行省，其他的则将被迫认可罗马的权力。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远离地中海的土地只有非常模糊的把握，肯定没有考虑到中欧及远方辽阔的草原。奥古斯都很可能相信自己能够征服整个欧洲，一直打到罗马人理念中环绕全部三个已知大洲的大洋，但这样的可能性要留待将来检验。目前他的愿景还是比较有限的。他要为罗马增添荣光，惩罚曾袭击各行省的蛮族，并阻止他们将来再侵犯罗马。

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将亲自领兵作战，而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在远方监督。他改变了近期的习惯（长时间巡视各行省），在随后几年里

只是短暂地视察接近战区的地方，将大本营设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奎莱亚（在意大利与伊利里库姆边界附近）或高卢的卢格敦。阿奎莱亚和卢格敦距离罗马都不算很远，他好几次返回罗马，通常是在作战季节结束之后。苏埃托尼乌斯抄录了奥古斯都亲笔写给继子提比略的一封信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3月20日至25日纪念女神密涅瓦的节庆活动的。从中我们可以知晓奥古斯都的旅程：

> 亲爱的提比略，我们的密涅瓦节过得很快活，因为我们整天玩乐，常常流连于赌桌。你弟弟大呼自己运气太差，但最后看来，成绩其实还不错。他开始输得很惨，但后来出人意料地逐渐赢回了很多钱。我输了2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但这是因为我和往常一样，在游戏时特别慷慨大方。如果我不是这样故意放人一马、礼让别人，我应当赢了整整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但我喜欢让着大家，因为慷慨会给我带来永恒的光荣。[14]

在保存至今的他给亲友的书信里，这种非正式的轻松笔调是很常见的，奥古斯都至少在表面上和两个继子相处融洽。德鲁苏斯的风度翩翩、和蔼可亲，很快就深得人心。提比略沉默寡言、性格复杂，人们更容易尊重他而不是喜爱他，但奥古斯都给他的信里常有亲热的表示，以及一种温和的、逗乐的口吻，并且经常出现讽刺性的语句，比如“永恒的光荣”。在另一封信里，奥古斯都描述了一次宴会，自嘲他和客人“像糟老头一样赌博”。奥古斯都的书信与西塞罗的书信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不断表示对收信人的亲昵，常常引用和开玩笑，或许还虚伪地表示对收信人的挚爱。即便如此，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元首和即将成为他女婿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15]

前12年，德鲁苏斯在三个高卢行省完成了一次正式的人口普查，这无疑有助于对各行省进行组织安排，记录财产状况和应交给罗马的税额，并确保各省为他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提供足够的给养。人口普查可能在前一年奥古斯都离开高卢各行省之前便开始了，元首曾在前27年亲自监督了高卢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可能也是为了建立比现行税

收制度（近期被李基努斯用来渔利）更公平的制度。除了《路加福音》，我们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奥古斯都在某个时间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帝国全境开展一次人口普查并据此征税。这样一道命令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有效说明了已经开展的工作，并且就像其他很多细节一样，没有被我们掌握的史料记载下来。另外，福音书作者也可能仅仅反映了一个外省居民的视角，对他们来说，罗马行政当局定期实施人口普查和征税，看上去就像是中央政府的单一决策。[16]

有时，人口普查会激起怨恨，甚至反叛，尤其是在近期刚刚平定的行省。少交税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在征税者是占领军的情况下。据李维记载，此次人口普查在高卢引发了一些麻烦。狄奥也有这样的暗示，但没有具体讲。如果真的发生了骚乱，规模可能不大。对个人和社区来说，将财产和权益情况登记在册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记录具有无可指摘的权威。大多数地区很快习惯了人口普查，而德鲁苏斯高效镇压了所有抵抗。[17]

除了组织高卢各行省的财政收入和维持秩序，还有大量工作是为即将开始的渡过莱茵河的战争做准备。为了安置集结起来准备参战的部队，罗马人建立了一系列大型军事基地。兵力数字很难确定，但可能至少集结了8个军团，并得到大量辅助部队和一些海军（拥有小型作战桨帆船和运输船）的支持。基地之一位于今天瓦尔河畔的奈梅亨[18]，考古发掘表明它是在前19～前16年建造的。这座基地面积约42公顷，用泥土、草皮和木材建成，可能足以容纳2个完整的军团和一些辅助单位。和这些年里军队建造的绝大多数要塞（不管在莱茵河畔或者河畔以东，还是在西班牙）一样，这座基地还不是公元1世纪和2世纪十分常见的罗马军事基地那种整齐划一的纸牌形布局。奥古斯都的军队利用良好的天然地理位置，常在高地建造要塞，壁垒大致依地势修建，呈六边形、七边形或八边形。它们的内部布局各不相同，正如不同类型的建筑有不同设计一样，但总的来讲相似之处远远多于不同点。由此可见，公元1世

纪和2世纪的罗马军事基地的模式化布局是从奥古斯都时期军事基地的布局方式发展而来的。奥古斯都为军队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在随后一百多年中持续有效，没有大的变化。[19]

我们习惯了后来的大型石制要塞，可能不太会注意奥古斯都时期军事营地的规模和组织。奈梅亨的驻军维持了不到十年，但在这期间，士兵们居住在根据标准设计方案建造的高质量、整齐的营房内，每个帐篷小组（八人）拥有两个房间。考古发现的一些营房比较小，被判定是辅助部队而非正规军团的营房，但即便是这些营房，也能为居住者提供相当程度的舒适条件，帮助他们度过欧洲北部的严冬。指挥部建筑、为担任军团长（负责指挥1个军团，不过在这样的营地里也可能是一名军团长指挥2个军团）的元老准备的房舍，以及为骑士和有元老身份的军事保民官准备的房子，就舒服多了。在这些战役期间建造的其他要塞也有类似的建筑类别。这些军事基地在规模和组织上很像在帝国边缘兴起的组织良好的地中海风格城市。

前13～前12年冬季，日耳曼武士再一次袭掠罗马的高卢各行省，但被德鲁苏斯击退。来年春季，他发动了针对莱茵河以东部落的第一次攻势。一些部队沿着莱茵河的一些支流流域走陆路，其他部队则登上宽敞的船只，绕过北海，在海岸登陆。有一次他严重误判了当地条件，落潮之后水面高度比他预计的要低，导致很多船只搁浅。尤利乌斯·恺撒在远征不列颠期间也曾低估海潮的力量和潮差。好在当地的新盟友弗里斯人前来保护，帮助了搁浅的罗马人。但总的来讲，德鲁苏斯的远征很成功。日耳曼部落的家园遭到攻击，村庄和农场被付之一炬，牲畜被驱赶、掳走，庄稼被毁坏，聚集起来抵抗的武士都被打败。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的塔西佗写道，一位蛮族领袖说了一个黑色笑话：罗马人“制造了一片废墟，然后说这就是和平”。看到抵抗罗马的代价如此惨重，好几个部落效仿弗里斯人，寻求与罗马结盟。提比略在潘诺尼亚[20]运用了类似的手段，取得了相似的成功。[21]

这一年年底，德鲁苏斯返回罗马，短暂停留。这证明，旧时对行省总督的种种限制，对元首的亲信完全无效。他当选裁判官，获得了威望很高的城市裁判官职位，但在罗马只待了很短时间就返回莱茵河前线，继续作战。前11年初春，二十七岁的德鲁苏斯又一次发动进攻，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从陆路推进。之前向罗马投降的一些部落如今可能打算再冒险抵抗。弗罗鲁斯讲的一个故事说，苏刚布里人、切鲁西人和苏维汇人抓住了二十名出现在他们领地的罗马百夫长，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事件可能就发生在前11年。这些百夫长出现在日耳曼领地，可能是作为外交活动的代表，更可能是在招募辅助士兵，因为盟邦有义务为罗马军队提供兵员。但罗马人常常利用各部落间的竞争和纠纷，分而治之，从中渔利。苏刚布里人集结了一支军队，攻击了邻近的卡蒂人，因为卡蒂人拒绝与其结盟反对罗马。苏刚布里武士忙着这事的同时，德鲁苏斯进行快速打击，蹂躏了他们的家园。[22]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莱茵河以东地区居住着很多各不相同、往往互相敌对的人群。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日耳曼人，但该地区的居民应当不大可能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从尤利乌斯·恺撒的描述看，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族群，尽管他也承认有些日耳曼人已经定居高卢，所以有些混淆。他做这样的区分是很有用的，这样他就能明确地说日耳曼人对高卢构成威胁，并在莱茵河一线停止征服战争。他和其他古代作家把日耳曼及其各民族描绘得非常负面，说他们比高卢居民更原始，也更凶悍。在他们眼中，日耳曼是沼泽丛生、丛林密布之地，很少有明显的道路，没有较大的城镇，没有神庙；那里的人民是半游牧的，养牲畜，在森林里狩猎，但不从事农耕。很多对蛮族的刻板印象（可以上溯到荷马《奥德赛》中对恐怖的独眼巨人的描绘）让罗马人更加觉得，日耳曼人完全没有开化，所以难以揣测、非常危险。

考古证据对上述理念发出了质疑，但也制造了新的难题。在尤利乌斯·恺撒抵达高卢之前，日耳曼中部的广阔地区与莱茵河以西地区很

像，都拥有大型山顶城镇；和高卢的城镇一样，也有手工业、贸易和社会组织的迹象。这些地区之间存在广泛联系，不管政治关系如何，文化上的相似是很突出的，都属于考古学家所说的拉登文化[23]。前1世纪上半叶，这些日耳曼中部的城镇全部被放弃，或者在规模和文明程度上急剧萎缩。有证据表明城镇遭到了凶残而血腥的摧毁，而考古证据中的武器也比以前更加常见。这些破坏不是罗马人造成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抵达这些地区，不过罗马帝国的影响像波浪一样扩散出去，可能是诱发这些破坏的因素之一，不管是贸易模式的变化，还是直接的军事行动。罗马人不大可能知道离他们帝国如此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他们在抵达这些地区看到荒凉破败的景象之后，便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当地的正常情况，当地人素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日耳曼城镇及其周围的社会可能是在尤利乌斯·恺撒抵达高卢之前崩坏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无从探究。掌握的证据可以被理解为内部动乱造成了破坏性的权力斗争，也可以被解读为新的侵略性很强的民族抵达这里，狠狠打击了原住民。从考古学角度很难追踪民族的迁徙，但史料中不断提到庞大人群去寻找新土地的故事至少部分反映了现实。我们很难依据考古证据来判断族群，因为这些族群的构成可能非常复杂，可能有近期形成的、存在时间很短的群体与较老的亲属群体混合在一起。基于晚期凯尔特和日耳曼语言，对保存至今的名字的语言学分析表明，当时的不同群体的确存在鲜明的差别，但我们还是不能准确判断具体人群的种族和文化身份。罗马人很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那些有名字的族群之间的关系，如苏刚布里人、切鲁西人、卡蒂人、考契人或苏维汇人，这些族群很可能随着领导人的兴衰而快速变化。

在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肯定有很多不稳定性和快速变化，所以罗马人觉得日耳曼人在不断迁徙是有道理的。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这种看法就未必正确了。城镇消失了，但在莱茵河以东的大多数地区，农场和大小村庄在很长时间（好几代人）内仍然有人居住。虽然

没有大的定居点，但总人口可能还是很多的。农业很普及，但主要是为了养活当地人口，剩余产品很少，只够支撑人们度过收成不好的年份。长远来看，这些部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很多人口定期迁徙。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部落群体定居在同一片土地上达数十年之久，而且有得到认可的领袖。罗马人可以努力去辨别这些部落，去了解他们目前的家园和酋长，至少在近期是可以做得到的。[24]

对日耳曼人，德鲁苏斯及其幕僚无疑有很多误解，也犯了很多错误，但他们对这些敌人的了解在不断加深。由于没有平坦的道路，罗马军队的人员和物资运输很困难。当地没有大型社区，这意味着很难找到大量囤积的粮食和草料。在高卢，尤利乌斯·恺撒常常率军前往一座城镇，要么要求当地人交出粮草，要么强行夺走。德鲁苏斯很难到数百个小型定居点搜索粮食，所以在日耳曼的罗马军队不得不自行携带几乎全部物资。若有需要，他们会在河上架桥，建造穿过沼泽地的堤道，这都需要时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德鲁苏斯及其部下沿着河流前进，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用驳船运送给养。陆地行进的困难也能解释罗马人为什么依赖绕过北海沿岸的航行。[25]

虽然有这些困难，但第二个作战季节很成功。在给养耗尽之前，罗马军队深入日耳曼土地，打到了比以往更远的地方。夏季快结束了，德鲁苏斯率军返回莱茵河。在这个阶段，若将军队留在敌境过冬，就很难为他们提供粮草，更无法支持他们作战。日耳曼酋长们豢养着成群的武士，他们除了打仗之外没有任何工作，不过这样的职业武士很少。一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队需要每一个有能力自备武器并愿意作战的自由民，所以这样一支军队要很长时间才能集结起来。这也意味着，一支罗马军队在撤退时比初期进攻时更有可能遇到顽强抵抗。这一次，之前袭击卡蒂人的武士也回来了，加入了其他队伍，去抵抗蹂躏他们土地的罗马人。罗马人的行军队伍很庞大，而且携带笨重的辎重，所以行军路线是可以预测的。武士们满腔怒火，也很自信，因为入侵者的撤退看上去

像紧张的逃跑。

德鲁苏斯的行军队伍遭到一连串伏击。罗马人稳步推进，不过即便击退了进攻的敌人，他们也没有办法追击并杀伤大量敌人，而且没有时间停下来整顿队形、认真对付难以捕捉的敌人。每一次成功，不管规模大小，对日耳曼武士来说都是鼓舞，也激励更多人加入他们。最后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伏击，罗马的行军队伍被围堵在一条狭窄的隘道内。罗马人被困住了，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但部落军队本质上的笨拙救了罗马人。日耳曼武士没有携带维持长时间作战的粮草，所以希望速战速决，赶紧回家。没有一个领袖能够掌控全军，很多酋长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力，而每一位武士都有权选择自己何时、如何作战。罗马人似乎已经是瓮中之鳖，于是日耳曼人没有静候罗马人饿死或被迫在不利条件下作战，而是成群结队地猛冲上去，希望歼灭罗马人，并掳掠其辎重。这种类型的近距离作战对罗马军团士兵有利，德鲁苏斯及其部下终于得到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罗马人在困境中奋起反击，重创了得意扬扬的日耳曼武士，后者的自负很快变成了惊慌失措的逃跑。德鲁苏斯及其部下在余下的路途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安然返回了莱茵河。[26]

此次战役，以及提比略在多瑙河附近的作战，都被宣布为胜利。奥古斯都被授予一次凯旋式，但他和往常一样谢绝了。他的两位继子被授予小凯旋式，但可以展示凯旋式的符号。秋季，兄弟俩返回了罗马，奥古斯都也回来了。为了纪念李维娅两个儿子的胜利，城内的每位男性公民都获赠400塞斯特尔提乌斯。奥古斯都的五十二岁生日期间举行了一系列斗兽表演。尤利娅和提比略也大约在这个时候结婚了。但并非全都是喜讯。屋大维娅突然去世了，于是又有一位亲人的骨灰被安放在奥古斯都陵寝。元首的姐姐得到了国葬的荣誉，由她的女婿德鲁苏斯致主悼词。[27]

虽然有亲人辞世，但奥古斯都是自信满怀的。元老院下令关闭雅努

斯神庙的大门，以表示罗马世界已经确立了和平。但消息传来，达契亚人越过多瑙河发动了一次袭击，于是关闭雅努斯神庙大门的仪式没有举行。前10年，战争继续。奥古斯都和李维娅陪德鲁苏斯一家去了高卢的卢格敦。这一年晚些时候，安东尼娅生了她和德鲁苏斯的第二个儿子，即未来的克劳狄皇帝。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年，卢格敦建成了一座非常奢华的圣所，包括一座献给罗马女神和奥古斯都的祭坛。高卢全境的部落领袖被传来参加仪式，从此之后每年都举行这种仪式。尤利乌斯·恺撒曾说高卢全体部落的习惯是每年定期开会，奥古斯都禁止了这种具有潜在颠覆性的集会，所以这种新的崇拜仪式可能是为了填补取消这种会议之后的空白。[28]

提比略这一年在巴尔干作战，至少还有一支军队支持他的行动，后者的指挥官也得到了凯旋式符号。德鲁苏斯在日耳曼作战，兄弟俩定期通信，他们也分别和奥古斯都及母亲通信。有一次，提比略拿一封信给元首看，德鲁苏斯在信中说要联合他们兄弟的军队，迫使奥古斯都“恢复自由”。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个故事是提比略憎恨自己弟弟的第一个迹象，但没有其他证据能表明兄弟之间存在敌意，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的关系很融洽。此事可能是偶然，或者是后人附会。现代学者倾向于假设德鲁苏斯希望元首退位并恢复共和国体制，还喜欢将这兄弟俩都描绘为具有非常传统的政治观念的贵族。但德鲁苏斯的措辞很含糊，意思可能仅仅是，他不喜欢一些在奥古斯都羽翼下得到高官厚禄的人，并希望用更优秀的人（包括他们兄弟俩）取而代之。德鲁苏斯肯定是雄心勃勃的。在其他地方，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德鲁苏斯渴望赢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甚至在战场上拼命追逐日耳曼人的国王，希望将其堵住，然后独自将其杀死。如果将此事与前29年克拉苏的事情联系起来，未免想象力太丰富了。这其实就是一位年轻贵族希望赢得最罕见也最崇高的荣誉之一的急切心情。[29]

前9年1月，德鲁苏斯成为执政官，此时他的二十九岁生日仅仅过去

了一周多一点。他寻求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可能就是在这一年。他以执政官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军权作战。也是在这一年，他率军进逼易北河。一个故事很快流传开来，说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比真人更高大的女人的幽灵，她警告他不要再继续前进，并说他的生命已经时日无多。此时作战季节已经快结束了，德鲁苏斯返回了位于莱茵河的基地，但这一次他在日耳曼留了一些驻军。在四次战役中，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土地遭到罗马人蹂躏，那里的大多数部族都接受了罗马的统治。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还不清楚，但他的成就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返回高卢过冬的途中，德鲁苏斯在骑马时出了事故，腿部受了重伤，未能治愈，结果这位年轻的将军于9月去世了。[30]

提比略很快来到弟弟身边，他的这趟旅途因神速而闻名。在他的安排下，德鲁苏斯的遗体做了防腐处理，然后隆重地运回罗马。最早抬棺木的是德鲁苏斯麾下的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随后罗马殖民地和城镇的显赫公民接过了这个职责。在旅途的很多阶段，提比略亲自走在送葬队伍中。人们对德鲁苏斯的哀悼是真诚的，反映了他深受人民爱戴。塞内卡[31]后来说，人们对这位闯劲十足的年轻英雄的纪念，仿佛是一场凯旋式。仪式的高潮是在罗马举行的公开葬礼。提比略在广场上神圣尤利乌斯神庙外的演讲台致了悼词。奥古斯都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的弗拉米尼乌斯广场向更多的人（可能比广场上的人更多）致了悼词。（奥古斯都此时还在为姐姐服丧，所以不能进入罗马城执行纪念他最近一次胜利的仪式。）按照传统，演员们戴着德鲁苏斯祖先的葬礼面具和象征物，以及尤利乌斯氏族祖先的面具和象征物，尽管奥古斯都并没有收养德鲁苏斯。最后遗体被火化，安放在奥古斯都陵寝。他与元首的关系显然胜过他的真实家族背景。[32]

奥古斯都陵寝附近就是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它于前9年1月30日正式落成。祭坛旁边有一座巨大的日晷，是一座从埃及运回的方尖碑，这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战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日晷演示了尤利乌

斯·恺撒历法的正常周期，每年有365.25天。方尖碑耸立在一座柱基之上，高度超过100英尺，每天正午会投下略微不同的影子，人们可以用碎石路面上的青铜线标出的网格来测量影子，用希腊字母来标注黄道十二宫图和阳历年。虽然日晷很宏伟，但可能是人们的计算错误，或者日晷的地基发生了移位，到1世纪中叶，普林尼发现日晷已经有三十年不能正确计算时间了。（方尖碑后来得到了大幅度翻修，如今矗立在另一个地点，即罗马的蒙特奇特利欧广场。）[33]

就连奥古斯都也无法掌控自然。五年前，他拥有三位积极进取且精明强干的亲属的辅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成年后也能够帮助他。如今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都已不在人世，只剩下提比略。在随后几年里，提比略将肩负重担。

---

[1] *Res Gestae* 12（Loeb translation）.

[2] Ovid，*Fasti* 1.709-18（Loeb translation）.

[3] Dio 54.29.4-5，Suetonius，*Augustus* 42.1.

[4] 克森尼索的字面意思是“半岛”，古代有多个地区被称为克森尼索。这里指的应当是色雷斯的克森尼索，即今天的加里波利半岛，属于土耳其，西面是爱琴海，东面是达达尼尔海峡。

[5] Dio 54.2.5.

[6] Dio 54.25.3，*Res Gestae* 4，12；和平祭坛，见D.Conlin，*The Artists of the Ara Paci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1997），M.Torelli，*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Roman Historical Reliefs* （1982），pp.27-61，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尤见pp.158-60，179-83，203-4，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141-55；关于雕刻描绘的是前13年正式感恩活动的理论，见R.Billows，‘The religious procession ofthe Ara Pacis Augustae：Augustus’ *supplicatio* in 13 BC’，*JRA* 6（1993），pp.80-92.M.Torelli，*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Roman Historical Reliefs* （1982），p.54认为这画面是幻想的，是“应当发生的聚会”，并非实际发生的。

[7] 修复工程，见D.Conlin，*The Artists of the Ara Paci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1997），pp.47-56。

[8] 对部分儿童身份的不同观点，见R.Syme，‘Neglected children on the Ara Paci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 aeology* 88（1984），pp.583-9，J.Pollini，‘Appuleii and Some Others on the Ara Paci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0（1986），pp.453-60，C.Rose，‘Princes and barbarians on the AraPaci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4（1990），pp.453-67。

[9] 帕提农神庙的带状装饰，见D.King，*The Elgin Marbles* （2006），尤见pp.137-8讲到它对和平祭坛的影响和奥古斯都对雅典的一般态度。

[10]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28-30.

[11] 提比略与维普撒尼娅离婚，娶尤利娅，见Dio 54.31.1-2，35.4，Suetonius，*Augustus* 63.2，*Tiberius* 7.2，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31，R.Seager，*Tiberius* （2005），pp.19-20。

[12] Dio 54.31.2-4.

[13] 讨论见Gruen in *CAH2* X，pp.178-81，C.Wells，*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pp.246-50，J.Rich，‘Augustus，War *and* Peace’，in L.de Blois，P.Erdkamp，O.Hekster，G.de Kleijn & S.Mols（eds），*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Impact of Empire*（*Roman Empire*，*c.200 BC-AD 476*） （2003），pp.329-57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137-64，尤见149-62，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 （2006），pp.205-14 =（2007），pp.248-57。

[14] Suetonius，*Augustus* 71.3（Loeb translation）；德鲁苏斯颇得民心，见Tacitus，*Ann* .2.41。

[15] Suetonius，*Augustus* 71.2 for the letter，更多概况见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38-44。

[16] Luke 2：1，with F.Millar，‘State and subject：the impact of monarchy’，in F.Millar&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37-60，尤见41-2。

[17] Livy，*Pers* .137-8，Dio 54.32.1.

[18] 奈梅亨在今天荷兰的东部。

[19] 关于奈梅亨，见P.Franzen，‘The Augustan legionary fortress at Nijmegen.Legionary and auxiliary soldiers’，in A.Morillo，N.Hanel & E.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1（2009），pp.1257-69，更多概况见C.Wells，*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pp.93-148，及C.Wells，‘What’s new along the Lippe：Recent work in North Germany’，*Britannia* 29（1998），pp.457-64。

[20] 潘诺尼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北面和东面以多瑙河为界，西面是诺里库姆和意大利北部，南面是达尔马提亚和默西亚。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匈牙利西部、奥地利东部、克罗地亚北部、塞尔维亚西北部、斯洛文尼亚北部、斯洛文尼亚西部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北部。

[21] Dio 54.32.1-3，Tacitus，*Agricola* 30.

[22] Dio 54.33.1-2，Florus 2.30.24；L.Powell，*Eager for Glory.The Untold Story of Drusus the Elder*，*Conqueror of Germany* （2011），尝试详细重建德鲁苏斯的历次战役，本年度事件见pp.81-92。

[23] 拉登文化（La Tène culture）是欧洲铁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得名自瑞士拉登的考古发掘地，1857年在那里发掘出了大量手工制品。拉登文化于约前450年至前1世纪（被罗马征服）在今天的比利时、法国东部、瑞士、奥地利、德国南部、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地繁荣。

[24] 概况见M.Todd，*The Early Germans* （2004），pp.17-47，P.Wells，*The Barbarians Speak.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Roman Europe* （1999），pp.3-93。

[25] 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见Caesar，*BG* 1.23。概况见J.Roth，*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264 BC-AD 235*）（1999），pp.117-55。

[26] Dio 54.33.2-4；对日耳曼军队及其局限的讨论，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42-53。

[27] Dio 54.33.5-54.4，35.4-5.

[28] Dio 54.32.1，36.2，Suetonius，*Claudius* 2.1，Livy，*Pers* .139，Caesar，*BG* 6.13讲到德鲁伊一年一度的会议，with D.Fishwick，*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Vol.3（2002），pp.9-20。

[29] Suetonius，*Tiberius* 50.1，*Claudius* 1.4，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34，R.Seager，*Tiberius* （2005），pp.21-2.

[30] Dio 54.36.3-55.1.5，Suetonius，*Claudius* 1.2-3，Livy，*Pers* .142，with C.Wells，*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1972），pp.163-211涉及征服。

[31] 此处指小塞内卡（约前4～65年），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政治家、戏剧家、幽默家。他是尼禄皇帝的教师和谋臣，后因被怀疑参与刺杀尼禄的阴谋而被迫自杀。他的父亲老塞内卡是著名修辞学家和作家。

[32] Dio 55.2.1-7，Valerius Maximus 5.5.3，Pliny，*NH* 7.84，Seneca，*ad Marciam* 3.2，with R.Seager，*Tiberius* （2005），p.22，and E.Champlin，‘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s’，*JRS*

101（2011），pp.73-99，esp.76-81.

[33] Pliny，*NH* 36.72-73.

第五部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祖国之父，前2～公元14年

我第十三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元老院、骑士阶层和全体罗马人民称呼我为祖国之父。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35

十九 父亲

奥古斯都对他的朋友们说，他有两个宠坏了的女儿，不得不忍受她们。一个是罗马共和国，一个是尤利娅。

——马克罗比乌斯，5世纪初 [1]

命运将你提升到崇高的荣誉地位，李维娅，肩负这重担吧……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请挺直脊梁，忘记你的忧伤，保持高昂斗志。当我们寻找美德的理想榜样时，最好你就是罗马人中的第一女性。

——佚名作者，可能写于1世纪初 [2]

李维娅因幼子辞世而哀恸万分。更让她痛苦的是，有传言说，是奥古斯都害死了德鲁苏斯。苏埃托尼乌斯认为这种传言非常荒唐，他肯定是正确的，但这个传言已经散播出去了。恺撒的夫人私下里寻求亚历山大港哲学家阿莱乌斯的建议，此人得到她丈夫的尊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意思的是，他的建议非常“现代”：他鼓励悲痛的母亲抓住一切机会谈论她的儿子，并在家中到处展示他的肖像。德鲁苏斯的遗孀安东尼娅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拒绝再嫁，带着孩子搬去和婆婆一起生活。德鲁苏斯与安东尼娅的两个儿子被授予“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以纪念他们父亲的胜利。元老院决定在城内为李维娅竖立一些雕像，并授予她“三子权” [3] 。她和奥古斯都的孩子流产了，不能算是一个孩子，所以她其实没有资格享有这个地位。 [4]

此项荣誉强化了李维娅作为理想的罗马妇人的公众形象。她的悲恸是真诚的，但被克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没有妨碍她继续履行公共和私人的职责。这与屋大维娅很不同，屋大维娅在儿子马凯鲁斯死后就不再抛头露面。后来，有人暗示或者直接指控李维娅玩弄阴谋诡计和谋杀，把李维娅的名声搞臭。所有的指控都涉及秘密的罪行，但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她在公共场合的举止素来是完美无瑕的。她的

美丽受到赞扬，对奥古斯都的忠贞也从未受到质疑，所有人都说她非常贞洁（罗马人说的“贞洁”指的是，妻子只和自己丈夫睡觉）。有一个故事甚至暗示她有一种调皮的幽默感：有一次她坐轿子经过一些被剥光衣服、等待处决的死刑犯，她说看到这些裸男，就跟看到裸体雕像差不多。李维娅被视为一位忠贞贤淑而顺从的妻子，据说顺从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甚至亲自挑选美女供丈夫享用。[5]

李维娅的肖像和奥古斯都类似，都表现得青春永驻、俊美秀逸，她的头发、服饰和仪态都洋溢着尊贵的优雅。她热爱时尚（很多人争相效仿她的穿着打扮），但着装始终在一位罗马贵妇的得体范围之内。她家中豢养着数量极多的奴隶、释奴和女仆，其中有很多化妆专家，无疑还有淘气的弄臣和侏儒，他们受过专门训练，专门娱乐主人，并常被赋予英雄的名字。李维娅很喜欢他们，罗马最矮的女侏儒就在她家中。李维娅朋友圈中的绝大多数贵妇应当都有这种爱好，但奥古斯都觉得侏儒和其他有严重畸形的人不吉利，所以不喜欢他们。前9年或前8年1月30日，李维娅庆祝了五十岁生日。她的身体似乎一直很健康，虽然痛失爱子，但她的自信和机智并没有减少一分一毫。[6]

前9年，提比略庆祝他的小凯旋式，举办了一次宴会招待元老们。同时，李维娅和尤利娅举办并主持了一次宴会，招待贵妇们。这种做法也是奥古斯都发明的，让女性在其家族举办的胜利庆祝活动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李维娅并没有正式的权力，但她和皇族的其他女性往往扮演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与过去的行政长官夫人完全不同。有一份史料甚至说李维娅是罗马女性的元首，将“元首”这个非常男性化的概念拓展到李维娅身上，暗示了她对罗马人的妻子女儿享有类似的领导权。[7]

奥古斯都的女儿和李维娅的儿子之间的婚姻起初很幸福。提比略离开罗马、奔赴巴尔干时，尤利娅陪他同去，并留在阿奎莱亚（位于意大利北部和伊利里库姆的边界）支持他。尤利娅又一次怀孕了，但这一次

不顺利，他们的儿子出生不久之后就夭折了。失望可能影响了夫妻关系，一年年过去，他们逐渐疏远。有传言说，尤利娅还是阿格里帕妻子的时候，就被提比略吸引。提比略相信了这话，对她产生了怨恨。他对维普撒尼娅还有一些爱；或者随着他和尤利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就越来越爱维普撒尼娅。提比略有一次在罗马偶然遇到自己的前妻，就跟着她。他双目含泪，脸上一副绝望的表情。亲戚们小心地安排，防止他们再次相遇。[8]

尤利娅和提比略的性格迥异，没有互补，反而渐渐起了更多的冲突。提比略的个性非常复杂，无疑还记得自己幼年时遭遇的恐惧和逃亡生活。他关于人的行为举止的观念非常严厉和传统，而且不善于社交。提比略父亲的家系虽然古老，但地位不高，他如今的高位完全是由于母亲嫁给了奥古斯都。与他不同，尤利娅生在恺撒家族，是三巨头之一的女儿，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她父亲就成了罗马世界唯一的主人。随着夫妻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她开始公开表示对丈夫家世背景的鄙视。即便如此，提比略和梅塞纳斯与阿格里帕一样，深受元首的宠信，得到了极大权势。尤利娅的儿子们也是这样。[9]

尤利娅顺从父亲的意志，在他的政治谋划中扮演指定的角色，帮助父亲先后巩固了马凯鲁斯、阿格里帕和提比略的忠诚，并为奥古斯都生了五个外孙和外孙女。如今，尤利娅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作为奥古斯都女儿的骄傲，也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奢侈享乐生活的酷爱。有人建议她效仿父亲朴素而节制的生活方式，她却答道：“他忘记了自己是恺撒，但我记得我是恺撒的女儿。”尤利娅和李维娅一样喜爱时髦，但比李维娅年轻约二十岁，更加高调奢华，也更风骚。有一次，她意识到父亲不欣赏她的仪表，尽管他什么也没说。次日，她穿了一套庄重得多的衣服，他显得很高兴。“这难道不是更合适奥古斯都女儿的风格？”他说。尤利娅回答：“今天我是为了父亲的眼睛打扮的，昨天是为了丈夫的眼睛。”奥古斯都的女儿非常机智，在行为举止上有主见，不愿意听

从其他人的指示。阿格里帕和提比略外出作战时，她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尤利娅虽然骄傲，但并没有令人讨厌的傲慢，所以她在罗马很受欢迎，既是因为大家喜欢她，也是因为喜爱她的父亲、前后三位丈夫和儿子们。[10]

离开的那个人

奥古斯都担心德鲁苏斯的死亡会导致日耳曼各部落再次侵犯罗马，于是在前8年派遣提比略接替他弟弟的岗位。元首在正式服丧期结束后进入罗马城，待了几个月，随后匆匆赶往高卢，督察军队在莱茵河以东的作战。虽然德鲁苏斯死了，但罗马军队还是展示出了强大力量和坚定决心，于是日耳曼各部落向罗马求和。全体日耳曼人的使者被传唤到卢格敦拜见奥古斯都，但苏刚布里人没有派使者来，于是他宣布不会和其他部落的使者打交道。最后，可能是在邻居们的压力之下，苏刚布里人派来了使者，但使者一到就被逮捕了。这违反了协议（不过罗马人违反外交协议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俘虏被分开送往不同社区，作为人质扣押起来。但很快所有俘虏都自杀了。目前他们的部落同胞还没有开战，但罗马人这次背信弃义令日耳曼人在将来愈发仇恨和不信任罗马人。[11]

我们不太了解这一年作战行动的细节，但可能以展示武力为主，实际作战不多。盖乌斯·恺撒第一次品尝到军旅生活的滋味。他只有十二岁，还没有正式成年，但参加了一些操练。作为军饷发放的一些钱币上也有他的形象。可能是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的辞世促使奥古斯都决定，让较年长的养子比正常年龄早一些接触军事。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年的行动成果不多，提比略却被授予了一次完整的凯旋式，这是十多年来奥古斯都之外的其他人第一次获得此项荣誉。元首则像往常一样，没有举行元老院授予他的凯旋式。秋季，提比略第二次当选执政官。[12]

虽然胜利的规模值得怀疑，但庆祝胜利的活动却非常宏大，在很多方面被视为近几年在日耳曼和巴尔干的艰苦战役的高潮。这些战役为罗马征服了许多土地，在多瑙河河畔的潘诺尼亚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设立了新行省。奥古斯都获得了征服者享有的另一项古老特权，正式扩大了罗马城的范围，不过很大一部分郊区仍然在罗马城范围之外，这种安排有时很有用。元首行使特别的执政官权力，命令执行一次人口普查，于前8年完成，登记了4233000名公民及其财产状况。奥古斯都的行省管辖任期已经有二十年了，如今再次被延长十年。尽管他已经将部分地区的管辖权交还给元老院，但在近些年里获得了伊利里库姆以及新征服土地的控制权。奥古斯都常常向元老们抱怨自己的负担太重，但他们和他本人依然毫不犹豫地扩大他的权限。和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元首也得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一个月份的殊荣。有些人希望把9月改成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生日在9月，但他选择了前面一个月，因为他在那个月首次成为执政官，并赢得了许多胜利。于是，罗马旧历法的第六个月变成了奥古斯都月（August）。[13]

欢庆之外也有悲伤，因为梅塞纳斯在这一年去世了。奥古斯都的两位老友都辞世了，参加过内战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已不在人世，而亚克兴角战役时期的毛头小伙儿现在也至少四十多岁了。元首五十五岁，仍然给自己增加了很沉重的工作负担。梅塞纳斯的活动大体上一直在幕后，他没有正式衔级或官职。他的影响力在近些年可能下降了，但他能为元首提供建议和意见，所以仍然很重要。他在世时很低调，死时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但他把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奥古斯都，包括罗马郊区一座规模相当大、非常奢华的别墅。不久之后，诗人贺拉斯也去世了，奥古斯都失去了“完美的阴茎”。贺拉斯既是奥古斯都快乐的通信伙伴，也愿意并能够用非常美丽的语言赞颂奥古斯都及其政权。较年轻的诗人就像较年轻的政治家一样在接管大局，但奥古斯都觉得这些年轻人有时不好驾驭，或者不符合他的世界观。[14]

最近几年里，他多次鼓励更多人从政，并提高元老院会议的出席率。根据罗马的传统，只要一位高级行政长官召集，元老院就要开会，所以会议可能很仓促。虽然仍需要一些紧急会议，但奥古斯都在前9年规定元老院每个月必须开两次会，日期必须避开法庭审判日和其他需要元老出席的事情。无故缺席的罚款数额被提高了，但由于违反的人太多，只能抽签选出一小部分人来接受惩罚。奥古斯都为任何做出元老院官方决议的正式投票规定了法定人数。如果出席人数不到法定人数，决议仍然会被记录在案，但地位较低。每年会公布元老名册，参加每一次会议的人名和人数也被记录下来。

奥古斯都启动了这些改革，将所有提案公布在议政厅内，给元老们充足的机会去研读，然后再进行讨论。这些改革可能带来了一些变化，他表现出愿意接受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有时政坛太自由散漫，让他很不高兴。前8年执政官选举出现了严重的贿选现象，所有候选人，包括胜利者，都被判有罪。因为差不多所有人都参与其中，所以最后没有处罚任何人。但奥古斯都经常要求在将来的选举中，候选人要缴纳押金，如果发现他们有腐败行为，就会没收押金。[15]

前8年末，提比略返回意大利，先留在罗马城外，等待举行他的凯旋式。所以，前7年1月1日他就任执政官的时候，元老院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开会，具体地点是马凯鲁斯剧场旁的屋大维娅门廊。奥古斯都此时在外省，所以他的光辉没有遮蔽女婿的辉煌时刻。提比略在第一次演讲中宣布将以他和德鲁苏斯的名义修复广场上的和谐女神庙。这座神庙的第一位修建者曾在前121年带头私刑处罚激进的保民官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前63年西塞罗在这里召集元老院会议，裁决喀提林党人的命运。在前7年或之前的某一年，提比略还承诺要修缮另一座神庙，即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也是以他和弟弟的名义。[16]

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合称“狄俄斯库里”，或称“天神的孪生子”，是

特洛伊的海伦的兄弟，以男子汉的美德和兄弟友爱著称。其中一人死后，另一人与其分享生命，于是兄弟俩轮流活着和死亡。狄俄斯库里在罗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过，据说曾于前494年抵达罗马，宣布雷吉鲁斯战役[17]的胜利。德鲁苏斯在世的时候，李维娅的两个儿子可能也曾以狄俄斯库里自命，后来提比略肯定宣传了这种观念。在过去，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常被罗马人民用作非正式集会上即兴演讲的地点，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见证了许多动荡和有争议的集会。很难说提比略是否刻意对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神庙做出评论，如果的确如此，更难说他的态度究竟是什么。不管是不是这样，他肯定为罗马市中心的修缮做出了贡献，将其建设得更加宏伟，同时把所有建筑都与奥古斯都及其家人联系起来。[18]

1月初，提比略庆祝了他的凯旋式，这是自前19年巴尔布斯的游行以来罗马城见证的第一次凯旋式。此后，他在卡比托利欧山上主持了一场宴会，招待元老们；而李维娅主持了另一场宴会，款待罗马的显赫贵妇。母子俩还主持了新建的李维娅门廊（在埃斯奎里努斯山上，奥古斯都主持建造，以妻子的名字命名）的落成仪式。李维娅门廊建在维迪乌斯·波利奥宅邸（后被拆毁）的原址，维迪乌斯就是那个用奴隶喂鱼的臭名昭著之人。拆掉这样一个不得民心之人的宅邸，并消除他的痕迹，无疑是受欢迎的举动。同样重要的是，李维娅门廊是一座宽敞的厅堂，为各种类型的公务活动（包括一些小型审判）提供了有屋顶遮盖的空间，是供广大群众使用的有价值的建筑，而不是过去那种炫耀私人财富的奢靡宅邸。李维娅门廊内设有一座献给和谐女神的祭坛或神龛，重申了国家与家庭和谐的主题。[19]

上述的几次庆祝活动中都没有提到尤利娅，这很可能不是偶然。她没有特别的理由在庆祝李维娅门廊（以她婆婆的名字命名）的仪式中起到突出作用，但没有参加庆祝提比略凯旋式的宴会，就有些奇怪，与几年前他举行小凯旋式时的情况大相径庭。夫妻之间的私人隔阂已经影响

了他们的公共角色。提比略离开罗马、返回日耳曼去指导前7年的作战时，他们两人应当都不会不高兴。奥古斯都返回罗马、盖乌斯·恺撒主持欢迎活动和选举计票大厅（这是阿格里帕重建的奢华的投票围场及其周边建筑群的一部分）落成仪式时，尤利娅无疑是愿意出席的。计票大厅是一个工程学上的巨大成就，带有罗马人建造的最大的无柱子支撑的屋顶。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它因火灾而坍塌，人们觉得太难重建屋顶，于是就让它保持露天状态。[20]

前7年也发生了一些火灾，一场大火严重损毁了广场的部分区域和邻近地区。人们认为这是有人蓄意纵火，而非事故。一群债台高筑、希望自己房子被毁后得到赔偿的人成为怀疑对象。尽管市中心发生了这场骚乱，但还是举办了纪念阿格里帕的葬礼竞技，由盖乌斯·恺撒和卢基乌斯·恺撒同奥古斯都一起主持。角斗士比赛包括成对武士的对决和大规模混战，场地是投票围场（可能是搭建了临时看台），既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让大家记得阿格里帕对公民同胞的贡献和慷慨。元首一行人中，除了奥古斯都之外，所有人都穿着黑色丧服。此事也是向公众进一步介绍他的两个养子的机会。[21]

这一年，罗马城的行政经历了大规模重组，部分原因是上述的火灾。根据传统，罗马被划分为许多小区。奥古斯都如今重新划定了265个小区的边界，它们又被分为14个大区。在每个小区，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监督十字路口神龛（供奉该地区的保护神）的崇拜仪式，这些行政长官如今得到了更大的权限，威望也提高了。在特殊场合，这些行政长官有一对执法吏陪同，并可以在自己的小区内穿官袍。这些行政长官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释奴，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也都是释奴。释奴阶层得到了担任正式官职、在本地享有权力和威望的机会。奥古斯都慷慨出资，将全市的十字路口神龛翻修得更精美，将自己的名字与保护各个社区的本土精灵和神祇联系起来。元首的形象不仅在城市的所有纪念性建筑中，还在迷宫般的小巷里，几乎无处不在。在将奥古斯

都和神祇一同供奉的祭坛前，自由人和释奴都定期献祭，有的是以个人身份，有的是以社区的集体身份。公元1年建造的一座祭坛带有这样的铭文："献给墨丘利[22]、永恒之神朱庇特、天后朱诺、密涅瓦、太阳神阿波罗、月神狄安娜、粮食之神、伊西斯和虔敬之神、神圣的命运女神，愿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他的力量、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力量以及各民族，吉祥如意……卢基乌斯的释奴，卢基乌斯·卢克雷提乌斯·泽图斯，遵从朱庇特之命，献上此祭坛。胜利属于人民！播种顺利，健康永福！"

奥古斯都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崇拜，但那些参与"奥古斯都"祭坛仪式的人代表他做了礼拜。除了传统的罗马男女神祇之外，还包括伊西斯，这表明罗马大多数居民的信仰，以及他们的种族身份发生了变化。国家不时企图镇压希腊化的埃及宗教崇拜，但未能阻止它的稳步传播，最后伊西斯终于被罗马当局接受，被纳入保护罗马城的传统的万神殿。[23]

前6年，提比略返回罗马，于6月获得了新荣誉。奥古斯都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获得保民官权力，这也被授予他的女婿，为期五年。提比略还获得了高级资深执政官地位（至少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只有阿格里帕曾以这种方式分享元首的崇高地位，如今奥古斯都显然在期望提比略履行与阿格里帕相同的职责，分担元首的大部分工作，并扮演帝国的救火队，东奔西跑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危机和问题。这一次，帕提亚的宫廷政变威胁了亚美尼亚的稳定和罗马在东方的利益。提比略在这一年11月就三十六岁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将领和行政管理者，他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外省。阿格里帕和德鲁苏斯不在了，奥古斯都的养子还是小孩，所以一切迹象都表明，从今往后，提比略几乎马不停蹄地在帝国全境奔波。得到崇高地位是要付出代价的。[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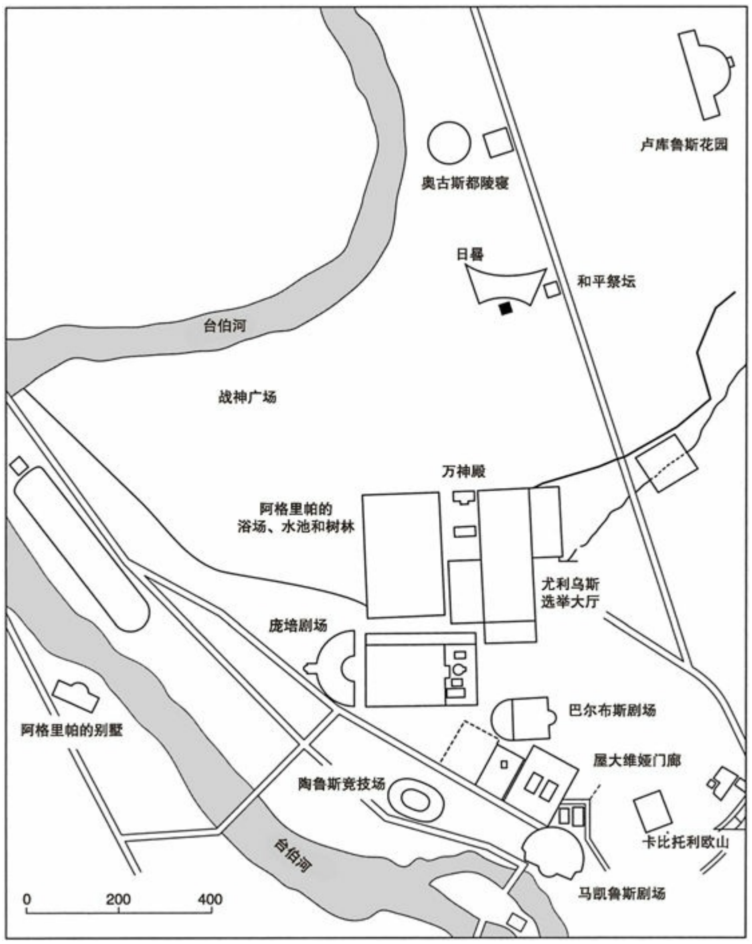
这一年晚些时候，罗马人民聚集在阿格里帕扩建的奢华选举围场内，召开百人会议，选举盖乌斯·恺撒为下一年的执政官之一。盖乌斯

不是候选人，而且还没有成年，因为他虽然已经年满十四岁，但还没有正式换上成年人的托加袍。选民将他的名字写在选票上，就像过去他们选择同样不是候选人的奥古斯都一样。元首的两个养子深得民心，十一岁的卢基乌斯前不久到剧院时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呼，当时并没有显赫的大人物和他一起出现。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群众选举盖乌斯是完全自发的。更可能的情况是，尤利娅的朋友，或者至少是那些向她和她的儿子们邀宠的人，在试探群众对此事的反应。

奥古斯都大为不悦，迅速采取行动来遏制群众的热情。此事又一次表明，他比其他罗马人更注重传统。虽然他已经将高级行政长官的最低年龄资格降低了十岁，并允许自己的家人以更小的年龄参选，但将一个孩子选为执政官，仅仅因为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肯定会让执政官的地位贬值。奥古斯都觉得必须对百人会议（被富裕公民把持）加以约束。后来在一次公共集会上，奥古斯都拒绝接受群众的投票。他公开祈祷，希望再也不会出现需要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担任执政官的国家危局，就像他在前43年那样。大约在这个时期，元首宣布，他本人而不是他的养子要参加竞选。他可能还承诺等盖乌斯成年后授予他一些荣誉。盖乌斯将成为一位大祭司，被允许参加元老院会议，并在公元1年他二十岁时担任执政官。奥古斯都可能希望盖乌斯到二十岁时给他一个公共角色，但群众推选盖乌斯为执政官的事情可能反映了他自己的亲人和一些群众要求提拔尤利娅的儿子们的压力。[25]

不久之后，提比略突然宣布要退出政坛，说他劳累多年，已经心力交瘁。他不愿意再监管东方各行省和边疆，希望过退隐生活，到罗得岛从事学术研究。起初大家并不以为他是认真的，奥古斯都不准他退隐，但他一直坚持。最后提比略以绝食抗议，一连四天滴水未进，直到元首妥协。奥古斯都公开谴责女婿逃避对国家的责任，最后很不情愿地批准了。提比略没有像一位罗马统帅那样威风凛凛地去外省，而是悄悄离开意大利，身边只有一些朋友。奥古斯都患病的消息让提比略犹豫了一段

时间。元首可能是真的病了，也可能是假装生病，希望李维娅的儿子回心转意。但没有更坏的消息传来，而且提比略觉得自己这样逗留，会让大家觉得他在等待岳父死去，于是终于起航了。他在途中停留，强迫帕罗斯城把一座灶神像卖给他。他宣布要将此神像陈设在和谐女神庙。[26]



战神广场

奥古斯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提比略的愤怒，因为是他把提比略扶持成自己的女婿和国内仅次于他自己的第二号人物，提比略却背叛了他。阿格里帕从来没有这样抛弃过他（不过在阿格里帕晚年，由于他和马凯鲁斯的竞争，阿格里帕曾尝试中断自己在东方的任职），但阿格里帕已经死了，德鲁苏斯也死了，提比略离开了他，而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还太年

轻，不能辅佐他。五十七岁时，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暂时失去了他多年来精心栽培的所有助手。奥古斯都很恼怒，也很困惑，他和其他人都不明白提比略为什么突然要退隐。史料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提比略嫉妒盖乌斯和卢基乌斯；或者提比略希望这两个孩子不会受到他的成功的威慑，能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后来有人说，他逃离罗马，是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和尤利娅一起生活。[27]

这些解释都没有道理。提比略完全可以多年巡视外省，这样就可以避开妻子，而不需要采取退隐的极端措施。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还太年轻，目前还不可能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提比略在临走之前向奥古斯都和李维娅展示了自己的遗嘱，两个孩子是他的主要继承人。现代学者经常将提比略的地位解读为实际上的摄政王，他要帮助奥古斯都领导国家，直到两个孩子足够成熟、能够接管局面。奥古斯都显然不是这么想的，并且继续筹划多人联合辅佐他、在他死后合作领导国家的计划。即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他的这种想法。如果尤利娅及其亲信希望她的两个儿子尽快上位，那么提比略可能感到自己的长期地位已不稳固了。但提比略已经差不多拥有了一切权力，奥古斯都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了。如果提比略是把辞职当成讨价还价的手段，那么说得好听些也是大错特错，而且会适得其反，让提比略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失去所有权责，尽管直到公元前1年他所享有的保民官权力和军权才到期。

有时候，表面上的事情往往包含很多真相。提比略说自己太累了，他在过去十年中的确有八年在南征北战，而且未来也不会有机会闲下来。这与传统的政治生涯迥然不同，过去的行政长官和外省职务都不会延续这么久，会有机会在家休息。奥古斯都、阿格里帕和他们选来帮助自己的人必须持续不断地工作，没有较长的休息时间。这种前景是令人生畏的：持续辛劳的一生，阿格里帕就是因为劳累过度而早逝。提比略虽然具有贵族的责任感，但他当了元首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远离罗马，隐居起来。奥古斯都抱怨自己的负担太重，但似乎愈战愈勇，喜欢与个

人和群众不断接触，而不感到特别劳累。提比略对工作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热情，而是带着一种严峻的责任感去劳作。弟弟的去世、不幸的婚姻、疲惫的身心，再加上辛劳不断的未来，以及最终要和他讨厌的妻子生的毛头小子分享权力，这些都让他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所以他的退隐可能和政治没有多大关系。提比略疲惫而腻烦，于是逃离了压力和责任，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需要继续工作。[28]

父亲、孩子和信任

奥古斯都只得一个人统领帝国。前5年，他第十二次担任执政官，他上一次担任执政官还是十八年前。盖乌斯第一次披上成年托加袍的那天，奥古斯都引领他与公众见面。不久之后，盖乌斯被授予史无前例的“青年元首”头衔，并被指定为骑士阶层的名誉领袖，这个概念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两个头衔都没有实际的权力或真正的职责，但肯定让盖乌斯更加受到公众关注。在等待养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恺撒·奥古斯都不得不依赖其他人来领军作战。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是前16年执政官，而且是大安东尼娅的丈夫，所以算是元首的亲属，他奉命指挥日耳曼的作战，打了一场大战役。接替他的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也开展了大规模行动，他是一位新人，前19年担任执政官。并非所有被选拔为军队统帅的人都是奥古斯都的亲戚，但都得到信赖，其中大多数人连续得到不同职务，有时还得到凯旋式荣誉的奖励。[29]

关于提比略退隐的这些年，史料语焉不详，很难重建细节。狄奥的叙述高度概括，从前5年一下子跳到了前2年。其他边疆可能有更多的军事行动，《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列出的一些没有旁证的胜利可能就发生在这些年。据我们所知，奥古斯都在这些年里很少旅行，似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巡视外省。元首没有一位高级助手，所以最好留在罗马，让代表团来见他。仍然不断有人向他请愿，只有在这个时期他才能亲自处理其中大部分事务。有时请愿的事由非常重大。前12年，亚细亚

社区遭遇一连串地震，地震又引发了火灾，灾情严重，于是当地人请求减免税赋。奥古斯都为亚细亚免税两年，然后自掏腰包，将相当于两年税收的金钱缴纳国库，以便让亚细亚有时间恢复元气。[30]

有的事情涉及范围较小，也更私人化。前6年，希腊的克尼多斯岛派遣一个使团去拜见元首。有两位使者都叫狄俄倪索斯，其中一人的父亲也叫狄俄倪索斯，另一人的父亲和祖父都叫狄俄倪索斯。他们前来控告一个叫阿纳克桑德利达斯之子欧布罗斯的人和他的妻子蒂菲拉谋杀了克律西波斯之子欧布罗斯。克尼多斯人在取名的时候显然没有什么想象力，但这件罪案颇不寻常。受害者的兄弟及其追随者曾连续三夜攻击被告夫妻俩的家宅。奥古斯都在给克尼多斯社区的信中写道："欧布罗斯和蒂菲拉夫妇，因为在自己家中无法得到安全，于是通过协商……或在家中设防抵抗攻击，命令他们的一名家奴，不是杀人（被这种事情激怒的人完全可能会杀人，他的愤怒也是正当的），而是向攻击者泼粪，迫使其后退。但家奴……将便壶和里面的东西一起抛了下去，把欧布罗斯砸死了……"

当地社区可能是在死者兄弟的影响下，认定欧布罗斯和蒂菲拉夫妇应当负责，而这对夫妇通过总督阿西尼乌斯·伽卢斯向奥古斯都上诉。伽卢斯命令按照罗马人的惯例，对夫妇俩的家奴进行审问，但那个抛下便壶的奴隶坚持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不过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奥古斯都继续写道："我将审讯笔录也发给你们。你们对这些奴隶过于严酷，对犯罪行为的错误方面吹毛求疵、穷追不舍，对那些罪有应得的人（因为他们连续多次在夜间暴力攻击他人的家宅，三次强行攻入）却不生气……所以被告才这么害怕把奴隶交给你们审讯。"

在此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即暴力攻击的受害者，也是当地审判不公的牺牲品）最终从元首那里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但这可能花了很长时间，并且经历了相当多的困难，花了不少钱。奥古斯都发布裁决、指示

克尼多斯“修改公共档案”以符合其意见的时候，被告欧布罗斯已经去世。[31]

个人、社区，甚至整个行省，都向恺撒·奥古斯都上诉，请求他的评判。君王亦是如此。大希律王有多达十位妻子和一大群儿女。其中两个最受宠的儿子被送往罗马抚养，在奥古斯都家中接受教育，但这两个儿子是被处决的米利暗生的，所以大希律王并不信任他们。多年后，大希律王将两个儿子召回身边。前13年，他把两个儿子带到意大利，来到元首面前，互相指控背信弃义。此事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在前7年，国王又一次指控两个儿子阴谋反对他。这一次他没有亲自去罗马，而是派了使者。奥古斯都命令在贝里图斯举行一次特别庭审，他的叙利亚总督和其他一些罗马人奉命审理此案。两个儿子被判有罪，很快被处决，尽管罗马人的主张是监禁。[32]

大希律王年事已高，身体很差，觉得周围所有人都是他的威胁，都要背叛他，因此对自己的亲属进行了一连串屠杀。奥古斯都冷淡地评论道，他“宁愿当大希律王的猪，也不愿当他的儿子”[33]。但犹太国王自始至终对罗马忠心耿耿。前4年，大希律王显然已经时日无多，一群人聚集起来，拆毁了他立在犹太教圣殿主门前的金鹰。犹太人仇恨这个金鹰，可能是由于它违反犹太教禁止偶像的律法，而不是因为它是罗马的象征。虽然群众行动得很迅速，但很快被逮捕并带到国王面前。他命令将拆毁金鹰的人活活烧死，那些鼓舞他们的人也被处决。大希律王虽然不得民心，但对王国的控制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不久之后他就死了。奥古斯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包括盖乌斯·恺撒）来决定如何安排犹太国的未来，最后将王国分割为三块，分给大希律王仍然在世的三个儿子。大约是大希律王在位的最后一年，耶稣诞生了。这对此后的历史显然有着重大意义，但不是奥古斯都的故事的一部分。（对证据的讨论，见附录二。）大希律王死后不到一年内，叙利亚总督两次率军进入犹太国，平定针对大希律王继承者及其罗马后台的暴力骚乱。[34]

亚克兴角战役已经过去很久了，自前30年以来，除了边陲的一些小规模战役之外，东方各行省几乎一直安享太平。人民接受了罗马的统治，罗马统治带来的和平与稳定也受到欢迎和珍视。早在前26～前25年，亚细亚一些社区组建的议事会（负责参加对罗马和奥古斯都的崇拜仪式）悬赏鼓励大家设计恰当的尊崇奥古斯都（就是他给人民带来了这个和平安定期）的方式。前9年，终于有人获奖。因为受奖者是一位罗马的资深执政官，所以他可能事先征求了元首的意见并得到了批准。从此，所有社区都改变了自己的历法，改为一年从9月23日（奥古斯都的生日）开始。这一天成了“恺撒月”的第一天。前4年，奥古斯都引入了一种新程序，能让外省社区更快捷地起诉贪赃枉法（非法杀人的罪行除外）的总督。奥古斯都的形象和名字在各行省无处不在，他做了很大的努力确保善政，不过新的体制可能对腐败的行政官员有利，因为审判他们的将是其他元老，而元老们的本能就是同情自己的同僚。[35]

前2年，六十岁的恺撒·奥古斯都第十三次担任执政官，卢基乌斯·恺撒的成年典礼因此得到了更多荣誉。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被任命为观鸟占卜师，并和哥哥一起成为青年元首。他也被允许参加元老院会议，还被内定为公元4年的执政官。前2年2月5日，元老院和人民投票决定授予奥古斯都“祖国之父”的称号。历史上多次有人获得这个称号，但到奥古斯都之前已经变得罕见了。西塞罗于前63年，以及尤利乌斯·恺撒在做独裁官时均获得过“祖国的家长”称号，不过这个称号不是很确定，有人相信他们当中的一人或两人的称号是“祖国之父”而不是“祖国的家长”。西塞罗的这项荣誉是非正式的，而尤利乌斯·恺撒的称号是元老院正式投票授予的。在罗马文化中，父亲，尤其是一家之主，受到极大尊重，但奥古斯都的头衔和西塞罗与尤利乌斯·恺撒的未必有很大差别，只是措辞略有不同，让奥古斯都更突出，并强调他是万民之父。一个代表广大群众的团体向奥古斯都授予这个称号时，他起初拒绝了。后来在剧院的一次演出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瓦列里乌斯·梅萨拉代表其他元老，再一次走到奥古斯都面前，宣布：“所有的祝福和神的恩宠都属于你和

你的家人，恺撒·奥古斯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请求诸神赐予共和国永久的好运，给我们的城市不朽的喜悦。元老院在全体罗马人民支持下，宣布你是祖国之父！”

奥古斯都感动得流下眼泪，答道：“我已经达成了自己最深切的心愿。诸位元老，我还能向不朽诸神祈祷什么呢？我只能接受你们所有人同意赋予的荣誉，直到我的生命结束。”[36]

元首先是百般谦逊地推辞、最后迫于群众压力接受的惯例已经根深蒂固了，双方肯定都理解自己要扮演什么角色。但事实仍然是，奥古斯都直到这一阶段才接受这个头衔。如果他想要的话，肯定早就接受了。一方面推辞、另一方面施压的惯例让双方都很舒服，但真正对奥古斯都的荣誉加以限制的是奥古斯都自己，而不是所谓的元老们的反抗。梅萨拉是前31年执政官，曾经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盟友，后来是安东尼的党徒，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转换阵营，后来获得了一个行省总督职位和一次凯旋式。他属于曾亲眼看到恐怖内战的那一代人，如今这个群体在不断减小。不管奥古斯都做过什么不堪的事情，他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稳定和内部和平，仅凭这一点，群众对他的赞颂肯定是真诚的。他的骄傲也是货真价实的。《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的最后一段就是讲他获得“祖国之父”的荣誉：“我第十三次担任执政官期间……元老院、骑士阶层和全体罗马人民称呼我为祖国之父，并下令将此头衔铭刻在我的宅邸门廊和元老院议政厅。”[37]

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奥古斯都已经从满腔怒火、为父报仇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统一天下的年迈政治家和罗马世界的“父亲”。两个养子和他一样广受爱戴，正在接受教育和培养，准备身居高位。他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孩子）却不是很愿意扮演父亲为她指定的角色。

提比略退隐罗得岛之后，尤利娅又茕茕孑立了。很可能在此之前夫妇已经分居多年，所以他的离去并不显得十分戏剧性。对尤利娅来说，

孤单也不是稀罕的事情，因为她和阿格里帕还是夫妻的时候，阿格里帕大部分时间也在外省。但尤利娅不喜欢寂寞。她非常活泼，喜爱艺术，尤其是诗歌，喜欢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美貌贵族青年待在一起。她深知自己地位显赫，所以她的圈子几乎全是出身豪门望族的青年贵族，他们的姓氏可以追溯到罗马的上古。他们都很年轻，没有参加过内战（对他们父母那一代人来说，内战肯定是改变他们生活的最重要体验），是在和平与繁荣的年代成长起来的。[38]

诗人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德乌斯·纳索）与尤利娅年龄和经历相仿，他的诗歌优美而充满激情，也有一种调皮捣蛋的意味，有时甚至显得轻浮。他没有早先一代诗人（他们经历过政治清洗、土地被没收的年代）阴暗的潜意识和严肃性，而有着一种无法压抑的喜悦感。大约前2年，他在创作三卷本《爱的艺术》，这部诗歌表面上是技术手册，讲述如何寻觅和赢得爱人。这部书主要讲的不是性爱，而是引诱，而且描述了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一些纪念性建筑，并重述了一些著名的神话故事，如伊卡洛斯[39]的故事，与此同时向男女读者提供建议。他多次向读者保证，自己并不是在颂扬通奸（他笔下的女性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情妇，其中很多是释奴），并没有威胁罗马正当的婚姻和繁衍后代（这些都是奥古斯都政权积极推动和鼓励的事情）。他的笔调从来不是刻板和说教式的，一直到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最后一行都是这样。在最后一行，他让听取其建议的人宣称：“纳索是我们的教师。”[40]

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有时会抱怨罗马精英阶层年轻一代的放荡不羁和漫不经心的奸情。这两位作家将真相与狂野的夸张搅和在了一起。到前1世纪，很多出身高贵的富裕女性不再满足于枯坐家中，静静等待丈夫从帝国的某个角落返回。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曾追逐有夫之妇，这样的风流浪子不止他们两人。和通常情况一样，谣言往往比真相夸张许多倍，但有些贵妇的确会养情夫，更多贵妇则享受着男性青年贵族的陪伴，并纵情享用美酒、盛宴、舞蹈和音乐。

尤利娅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显然非常喜爱奢靡的生活和男性的陪伴。在她与阿格里帕的婚姻中，据说奥古斯都曾怀疑她不贞，但后来看到她的所有孩子长得都很像阿格里帕，才放下心来。据说尤利娅曾逗趣地说，她“除非船上已经载满货物，否则不会允许乘客上船”。至少有一次，奥古斯都写信给一位元老，要求他不要去拜访他的女儿，但奥古斯都似乎让自己相信，尤利娅的行为举止虽然愚蠢，但并没有越轨。奥古斯都暗示尤利娅，她应当效仿她的继母（李维娅的朋友都是成熟稳重的女性，与尤利娅身边花天酒地的年轻人截然不同）。毫无疑问，尤利娅对此的反应非常冷淡，毕竟李维娅比她大二十岁左右。尤利娅向元首保证，她的朋友也会“和她一起变老”。前2年，尤利娅三十七岁了，已经生了六个孩子。人们往往会努力与衰老对抗，尤其是那些为自己的美貌而骄傲的人。有一次，尤利娅的奴隶帮她拔掉白发时，奥古斯都突然来了，后来问她是不是“宁愿秃头，也不愿意有白头发”。[41]

前2年发生了不得了的大事。元首发现了确凿的证据，尤利娅有一桩或更多婚外情。我们不知道奥古斯都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也无法判明事情真相。所有史料都不怀疑她有情夫。有些情夫被指名道姓，如诗人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一个阿庇乌斯·克劳狄、一个西庇阿、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克里斯皮努斯（前9年执政官），以及最有意思的是，尤卢斯·安东尼（马克·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儿子）也名列其中。此外还有一些没有名气的情人，但史料没有给出具体的姓名。被指名的情夫毋庸置疑都是豪门贵族，所有人都可能和尤利娅年龄相仿。

除了通奸之外，尤利娅还被指控有一些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恶行。据说她公开举行酩酊大醉的聚会，甚至在演讲台上狂欢取乐；她还在夜间集会，给广场上的马西亚斯（一个以音乐才能闻名的萨堤尔[42]，与酒神巴克科斯有关联）雕像戴上花环。更疯狂的故事说，尤利娅渴望新的刺激，公开向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我们本能地将这些故事视为无聊的流言蜚语。我们这么做很可能是正确的，不过历史上的确有人

做过一些相当愚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不过这些指控可能说明，尤利娅和她的圈子越来越放荡不羁了，他们可能确实在公共场所聚会。如果真的是这样，就让人想起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在亚历山大港的彻夜狂欢，这颇有讽刺意味。或许所有人都假定奥古斯都知道这些事情，并且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自己的女儿。[43]

很多情夫出身名门望族，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此事背后有政治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情夫其实是在阴谋夺权。普林尼声称当时有人企图刺杀奥古斯都。狄奥说尤卢斯是幕后黑手。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连暗示也没有，尤利娅也不大可能会图谋弑父。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她希望得到允许与提比略离婚，然后嫁给尤卢斯，让尤卢斯成为元首的新女婿之后有希望获得更多权力和职责，并与奥古斯都（将来还有年轻的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一起成为国家领导人。假如奥古斯都在接下来几年里去世，尤卢斯和尤利娅将能辅佐儿子们，与他们分享权力。前6年，盖乌斯被选举为执政官，这说明有人在推动尤利娅的两个儿子迅速攀升。她和其他人希望从中获利，是说得过去的。这或许就是她和情夫的计划，或许也有人在疯狂地大谈自由和企图恢复旧贵族世家的主宰地位（马西亚斯雕像和遮蔽它的无花果树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人民自由的象征）。[44]

可能确实存在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言，尤利娅或许真的想和尤卢斯结婚。但是，尽管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聪明的理论，但不大可能存在有组织的阴谋。奥古斯都肯定没有把这事情当成政治阴谋来处理。奥古斯都对女儿连续多次通奸罪行的公开谴责也极不可能是掩盖失败政变的烟雾，尤其是因为他曾颁布非常严厉（而且受到广泛怨恨）的关于婚姻和通奸的法律。元首让他的家人扮演非常公开化的角色，把他们当作罗马人恰当行为的榜样。对奥古斯都来说，尤利娅的通奸是比提比略退隐更严重的背叛。奥古斯都肯定有很深切的感受。他原本无须公开处理此事，却坚持让元老院来处置，让一名财务官宣读他的书信，因为他无法

亲自到场发表讲话。

尤卢斯·安东尼自杀了——可能因为他预见到自己会被判死刑，后世的史料含糊地说他是被杀的也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其他所有情夫都被流放。其中一人是在任的保民官，被允许结束任期之后遣送出国。尤卢斯·安东尼的年幼儿子也被放逐，后来在马西利亚[45]生活，死在那里。总的来讲，这些相对宽大的处理是驳斥政治阴谋论的最有利论据。在过去，奥古斯都处决阴谋反对他的人时很少会犹豫。大多数罗马人显然认为，对于通奸罪，这样的处罚过于严苛了。塔西佗后来说，元首仿佛在处置叛国罪。这种说法或许最接近真相。奥古斯都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女儿的不端行为是极大的个人耻辱，她的情夫们是故意羞辱他和他的家庭。这是对其威望的打击；或者，从很多方面看，甚至更严重，因为人民对他的印象并没有变坏，受损害的主要是他的自尊。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感到羞耻和愤怒，而不是畏惧。[46]

他不肯见尤利娅，将她放逐到小岛潘达特里亚[47]。她在岛上没有酒喝，没有任何奢侈品，也几乎见不到任何男人。到岛上处理公务的男人，不管是奴隶还是自由人，只有在奥古斯都仔细检视其外貌和人品之后，才被允许登岛。尤利娅的女释奴福柏自杀了，可能是因为卷入丑闻而感到羞耻，或者是畏罪。奥古斯都说“宁愿自己是福柏的父亲”。但尤利娅的母亲斯克利博尼娅陪伴她一同流亡。有人认为这是斯克利博尼娅在公开驳斥尤利娅通奸的指控，但完全可能是母亲仍然爱着自己的女儿，并愿意原谅她。而奥古斯都却不愿意宽恕女儿。[48]

整个事件让恺撒·奥古斯都十分震怒，他要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受到惩罚和公开羞辱。后来他的怒气平息了一点。尤利娅在岛上待了五年之后，被允许搬到大陆上瑞吉昂[49]附近的一座更舒适的别墅，但仍然不能接触奢侈品和男性。虽然罗马群众多次组织大型游行要求奥古斯都释放尤利娅，但都被他坚决拒绝。后来他说自己后悔当初的做法，若

是私下处理此事就好了。塞内卡说，奥古斯都抱怨道，假如阿格里帕和梅塞纳斯还活着，给他出主意，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至少他们会告诉他真相，阻止整个事件发生，或者至少阻止尤利娅的不端行为变得那么严重。但他的两位老友都已经不在了，较年轻的朋友也不在了，只留下奥古斯都日渐衰老和孤立。他的希望越来越集中在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身上。[50]

---

[1] Macrobius，*Saturnalia* 2.5.4.

[2] Anonymous，*Consolation to Livia* 349-56.这部著作据说是在德鲁苏斯死后有人写给李维娅的，但可能其实是几十年后克劳狄在位期间撰写的修辞学练习。对李维娅角色的讨论和关于此话题，见N.Purcell，‘Livia and the Womanhood of Rome’，*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6），pp.78-105.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165-94。

[3] 三子权（Jus trium liberorum）是奥古斯都为鼓励上层阶级生育而引入的一种特权，授予生了至少三个孩子的公民或至少四个孩子的释奴。享有三子权的男子可免除为公众提供福利的义务；享有三子权的女子可不再处于男性亲属的监护下，可自行处置财产和继承遗产。然而罗马上层阶级不愿意生养很多孩子，所以想尽办法利用法律的漏洞。

[4] Dio 55.2.3，5-7，Suetonius，*Claudius* 1.4-5，Seneca，*de consolatione ad Marciam* 4.3，with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44-5，108-9.

[5] Dio 58.2.4，Suetonius，*Augustus* 71.1，讨论见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22-6，Purcell（2009），pp.167-72。

[6] Suetonius，*Augustus* 83，Pliny，*NH* 7.75；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03-6，180-81，364，n.7提及记载李维娅家中仆役的许多铭文，人人都有非常具体的职责，如管理服装的人，见*CIL* 6.3985，4041，4251，摆放珍珠的人，见*CIL* 6.3981.

[7] Dio 55.2.4，with Purcell（2009），pp.165-8，177-80.

[8] Suetonius，*Tiberius* 7.2-3，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31-2，R.Seager，*Tiberius* （2005），p.20，及E.Fantham，*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pp.79-82.

[9] Tacitus，*Ann* .1.14.3，53.2，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37.

[10] Macrobius，*Saturnalia* 2.5.5，7.

[11] Dio 55.6.2-3，参见Caesar，*BG* .4.7-9谈及尤利乌斯·恺撒逮捕日耳曼部落的使者，Plutarch，*Cato the Younger* 51.1-2讲到对恺撒此种背信弃义行为的批评。

[12] Dio 55.6.4-5，with E.Fantham，*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pp.97-8.

[13] Dio 55.6.6-7，Suetonius，*Augustus* 31.2，Macrobius *Saturnalia* 1.12.35，*Res Gestae* 8，with M.Boatright，'The Pomerial extension of Augustus'，*Historia* 35（1986），pp.13-27.

[14] Dio 55.7.16，Suetonius，*Horace* ，称诗人卒于前8年11月27日，梅塞纳斯死后的第五十九天；关于梅塞纳斯的影响力，见G.Williams，'Did Maecenas "Fall from favour"？Augustan Literary Patronage'，in K.Raaflaub & M.Toher（eds），*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pp.258-75。

[15] Dio 54.30.2，55.3.1-4.2，5.3.

[16] Dio 55.8.1-2.

[17] 大约前493或前489年（年份无法确定），新生的罗马共和国击败了拉丁联盟（领导者为前不久被驱逐的罗马末代国王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此役是塔奎尼乌斯家族夺回罗马的最后一次尝试。

[18] 讨论见E.Champlin，'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s'，*JRS* 101（2011），pp.73-99。

[19] Dio 55.8.2，with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46-7，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36-7.

[20] Dio 55.8.3-4，Pliny，*NH* .16.20.

[21] Dio 55.8.5-6.

[22] 罗马神话中的墨丘利大致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是商业、雄辩（及诗歌）、信息（通信）、旅行、边界、运气、诡计和盗贼之神，也是引领死者灵魂去往冥界的使者。

[23] Dio 55.8.6-7，关于献词见*CIL* 6.50705 = *ILS* 3090 with Purcell in *CAH2* X，pp.800-02。

[24] Suetonius，*Tiberius* 9.3，11.3，Velleius Paterculus 2.99.1，Tacitus，*Ann* .56.3，Dio55.9.4，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35-6.

[25] Dio 55.9.1-5，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37-8，概况见'Julians and Claudians'，*Greece and Rome* 22（1975），pp.29-38。

[26] Dio 55.9.5-8，Suetonius，*Tiberius* 10.1-2，Velleius Paterculus 2.99.1-4.

[27] 讨论见Crook in *CAH2* X，pp.100-01，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37-40及*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p.182-3，R.Seager，*Tiberius* （2005），pp.23-7，E.Fantham，*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pp.83-4，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48-9，J.Corbett，'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Latomus* 33（1974），pp.87-97，尤见87-91，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391-2，413-14。

[28] Seneca the Younger，*On the shortness of Life* 4.2-5谈及奥古斯都抱怨自己政务的沉重负担。

[29] Dio 55.9.9，10a.2-3，with Gruen in *CAH2* X，pp.182-3，and E.Fantham，*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p.99.

[30] 亚洲的税务，见Dio 54.30.3。

[31] *EJ* 312 = *SIG3* 780（译有M.Cooley ［ed.］，*The Age of Augustus.Lactor 17* ［2003］，pp.197-8）。

[32] Josephus，*BJ* 1.538-51，概况见E.S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p.320-29，Goodmanin *CAH2* X，pp.741-2，及L.White，'Herod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Augustanrule'，in K.Galinsky（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2005），pp.361-87，尤见375-6见到大希律王的最后时光。

[33] 因为犹太人不能吃猪肉，所以猪是安全的。

[34] 奥古斯都的笑话，见Macrobius，*Saturnalia* 2.4.11；处决，见Josephus，*BJ* 1.648-53；对叙利亚驻军的干涉，见*BJ* 2.45-79。

[35] 见R.Sherk，*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1969），no.65讲到新历法，V.Ehrenberg & A.Jones，*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1975），311，v。

[36] Suetonius，*Augustus* 58.2，他自称准确记录了梅萨拉和奥古斯都的话，Crook in *CAH2* X，pp.101-2，及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 （2010），pp.91-2，204-5；对各种颂扬和对此项荣誉的庆祝，详见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193-7，详尽讨论这个术语及国父的概念，见T.Stevenson，'The ideal benefactor and the father analogy in Greek and Roman thought'，*CQ* 42（1992），pp.421-36，他认为西塞罗阖尤利乌斯·恺撒都被命名为祖国之父。M.Gelzer（trans.P.Needham），*Caesar*，*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1968），p.315，fn.2讲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情况。

[37] *Res Gestae* 35.

[38] Suetonius，*Tiberius* 7.3声称这对夫妻在失去孩子之后就不再同床共寝；尤利娅的生活方式，见E.Fantham，*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尤见pp.81-4。

[39]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工匠代达罗斯的儿子。代达罗斯用羽毛和蜡制成翅膀，和儿子一起飞行逃离克里特岛。伊卡洛斯不听父亲的劝告，飞得太高，蜡融化了，翅膀解体，导致他坠海而死。

[40] “纳索是我们的教师。”（*Naso magister erat* ），Ovid，*Ars Amatoria* 2.744，3.812，概况见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261-9主要讲《变形记》，但将奥维德置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大背景下。

[41] Macrobius，*Saturnalia* 2.6-7，9，Suetonius，*Augustus* 54.2.

[42] 萨堤尔是希腊神话里的一种生物，一般被视为潘（牧神）与狄俄倪索斯（酒神）的复合体。萨堤尔拥有人类的身体，同时亦有部分山羊的特征，例如山羊的尾巴、耳朵和阴茎。一般来说他们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随从。有时，萨堤尔被视作最低级的树林之神，跟随着潘或宁芙仙女在森林中游逛。萨堤尔的形象往往是淫荡好色的。

[43] Dio 55.9.11-16，Suetonius，*Augustus* 65.1，*Tiberius* 11.4，Velleius Paterculus 2.100.2-5，Seneca，*Brevitate Vitae* 4.6，*de Benefi ciis* 6.32，Pliny，*NH* 21.8-9，Tacitus，*Ann* .1.53，3.24.3，4.44；关于密谋者的身份及其关系，见A.Ferrill，‘Prosopography and the Last Years of Augustus’，*Historia* 20（1971），pp.718-31，尤见729，及‘Augustus and his daughter：a modern myth’，in C.Deroux（ed.），*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1980），pp.332-46，及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48-51。

[44] Pliny，*NH* 7.149 声称尤利娅密谋刺杀夫妻，及Dio 55.10.15 声称尤卢斯企图篡权；其他未指名的人也被处死。

[45] 现代的马赛。

[46] Tacitus，*Ann* .3.24，4.44，Dio 55.10.15.

[47] 潘达特里亚岛今天的名字是文托泰内，在意大利西海岸，长3公里，最大宽度约800米。此后罗马帝国皇室有多位成员被放逐到此地。

[48] Suetonius，*Augustus* 65.2讲到福柏；尤利娅的丑闻和被流放，见E.Fantham，*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pp.84-91，及E.Leon，‘Scribonia and her daughter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2（1951），pp.168-75，尤见173-4；Ferrill，A.，‘Augustus and his daughter：a modern myth’，in C. Deroux（ed.），*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1980）合情合理地质疑了现代学者关于政治阴谋的理论；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202-9提出，奥古斯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盖乌斯与卢基乌斯的合法性。

[49] 今天的雷焦卡拉布里亚，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隔海相望。

[50] Seneca，*de Benefi ciis* 6.32.

二十 “哨兵岗位”

> 玛尔斯来了，他降临的时候给出了战争的预兆。复仇者从天而降，欣赏他自己的荣耀和奥古斯都广场上他自己的恢宏神庙。战神非常庞大，神庙也是如此。玛尔斯必须这样居住在他儿子的城市……他看着……神庙立面上的奥古斯都之名；他读到恺撒之名时，神庙似乎变得更宏伟了。
>
> ——奥维德，公元前到公元后的世纪之交 [1]

尤利娅的丑闻并没有影响她的儿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何况可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利娅都没有亲自抚养他们了。两个少年已经正式成年，开始承担越来越公开化的职责。尽管对奥古斯都来说前2年是以愤怒和遭受背叛结束的，但这一年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庆祝和节日活动，他的两个养子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12日，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主持了复仇者玛尔斯神庙（奥古斯都的新广场的核心）落成仪式期间的庆祝活动。奥古斯都广场与尤利乌斯·恺撒广场（大体上也是奥古斯都主持建造的）呈直角，而后者与主要的罗马广场（奥古斯都对其加以改建）相连。于是，市中心公共空间的面积翻了一倍还多，提供了更多供行政管理、庭审、典礼和宗教仪式之用的可遮风挡雨的开阔空间。这些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奥古斯都广场的门廊在整个建筑群竣工之前很久就被开放使用了。奥古斯都的很多改革设立了新的官职和任务，或者恢复了长期被忽略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对该地区的结构翻新都可以理解为让国家再一次正常运转起来的切实迹象。[2]

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自掏腰包购买了他们的广场工程所需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几乎全都在私人手里。买下地皮之后，他们又拆除房屋、公寓、商店和仓库，以便清理出空间。并非所有的土地原主人都愿意出售，但没有人受到强迫，至少两位恺撒筹划的建筑群边缘土地的主人没有受强迫。奥古斯都年轻时，在腓立比战役之前曾宣誓要为复

仇的战神建一座神庙。这个誓言在四十年之后终于兑现了，耽搁这么久的部分原因无疑是等待所需的土地能够落实。但最后他没有买到自己想要的全部土地。由于一两位地主拒绝卖地，奥古斯都广场不是对称的，东北角的形状不规则。奥古斯都可能因此感到受挫，但他愿意接受现实，说明他尊重财产权，不愿意践踏别人的权利，哪怕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更不要说为了他的名望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广场的不完美恰恰比完美的对称图形更珍贵。[3]

在其他方面，奥古斯都不惜一掷千金。他的所有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工规模都非常宏伟，哪怕修缮古旧的神龛也是如此（这种修缮工作表面上简单，其实不然）。重建的罗马广场和规划得整齐划一的尤利乌斯广场都非常雄伟，用来彰显罗马权力的恢宏，并提醒大家牢记当前的伟大和复兴是在元首领导下得来的。奥古斯都广场胜过了这两座广场，而且只有两个入口，所以影响力更强。高墙挡住了广场外城市街道的全部景象，同时保护纪念碑免遭火灾。庭院地面用大理石铺就，做成五彩缤纷的图案。设计中糅合了现代理念和古典建筑风格，门廊上有女像柱，即被做成女性雕像的承重石柱，阿格里帕在万神殿也用了这种石柱。看到这些，受过教育的观察者会立刻想到厄瑞克忒翁神庙（前5世纪伯里克利在雅典卫城建造的神庙），追溯至处于文化和帝国霸业巅峰时期的雅典人。有的人也许想不到这个联系，但会看到成排的优雅而精美的雕像装饰着广场的周边。普林尼觉得奥古斯都广场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之一。它没有照抄过去的模板。奥古斯都广场上的女像柱是高浮雕，背部平坦，与墙壁齐平紧贴，而雅典的女像柱是完全立体的独立雕像，可以承载屋顶的重量。[4]

复仇者玛尔斯神庙的立面是白色的意大利大理石，入口处是宽阔的阶梯，主祭坛设在阶梯内。罗马的神庙是神祇拜访城市时的住所，而不是宗教崇拜的场所。几乎所有主要宗教崇拜的祭坛都在神庙之外，所有的动物献祭肯定都是在露天进行的。神庙前方是一排八根非常高的科林

斯风格石柱，神庙左侧和右侧也有相似的石柱，所有石柱都承载着高高的三角楣饰。这设计很像尤利乌斯·恺撒广场上的维纳斯神庙，但比它大一半。维纳斯和玛尔斯都是传统的罗马神祇，是共和国的强大支持者，而维纳斯被尤利乌斯氏族奉为祖先。这个氏族还自称是阿尔巴朗格国王的后代，雷娅·西尔维亚就来自这个王朝。她为战神玛尔斯生了双胞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尤利乌斯氏族没有说自己是这个家系的后嗣，但在近期，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曾宣称与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有联系，而罗慕路斯是战神的儿子。

庭院两侧的门廊陈设着令人追溯往昔的雕像。左侧有埃涅阿斯的雕像，他周围是阿尔巴朗格历代君王，以及尤利乌斯氏族最突出的成员（人数肯定不多，而且其中很多人肯定没有特别显赫的事迹，因为这个氏族发达的时期不多）。对面是罗慕路斯，周围是罗马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其中一些和对面的某些人一样，纯粹是为了充数。铭文记录了每个人的事迹，肯定得到了奥古斯都的批准，但可能不是他亲笔写的。除了罗马城建立之前的时代的人物之外，没有外国人，而且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其中有女性。尤利乌斯·恺撒不在其中，因为他已经是神，不能和这些凡人站在一起。他的雕像在神庙内，和其他神像在一起。[5]

雕像中的埃涅阿斯背着父亲安喀塞斯逃离特洛伊的废墟，一手牵着儿子尤卢斯。这个形象在当时的私人艺术和官方图像中都很常见。学术界有争论，这个尤卢斯究竟是不是尤利乌斯氏族的祖先和罗马的终极缔造者。我们无法确定，但这种说法至少是值得相信的。罗慕路斯的雕像刻画了他奉献“最高战利品”的场景。不足为奇的是，雕像群主要宣扬武德和曾庆祝凯旋式的人。

这是那些曾帮助罗马变得如此伟大的英雄豪杰的班列，并且政治倾向性不强，因为里面包括苏拉、马略和伟大的庞培。铭文强调的是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讲到内战时都很简略和中性。介绍马略的铭文写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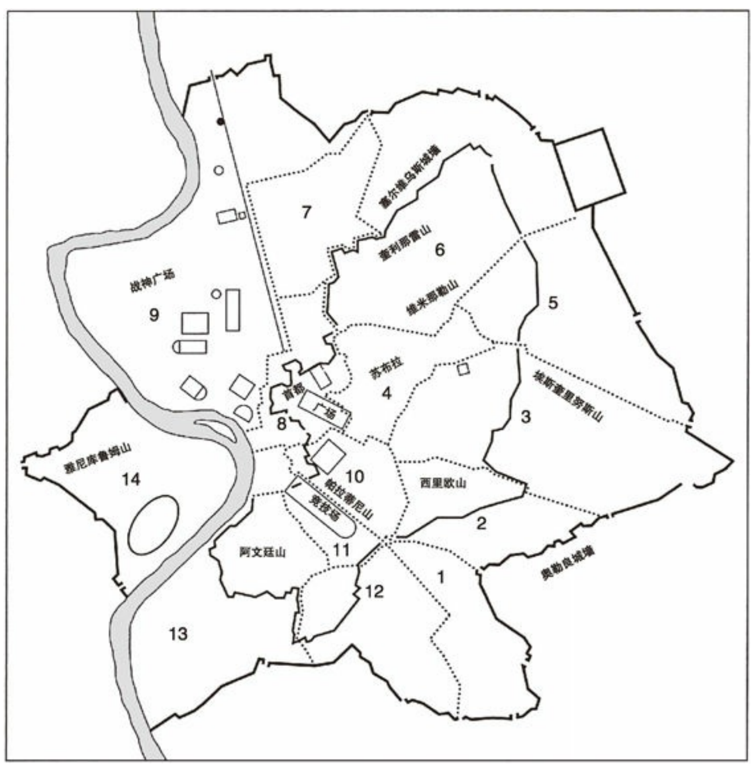
在努米底亚[6] 打败朱古达的战功、对抗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战争、连续多次担任执政官的业绩，并赞赏他在前100年镇压了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最后才中性地写道："七十岁时，由于内战，他被迫离开祖国，后来借助武力返回。他第七次担任了执政官。"[7]

奥古斯都宣称，"最杰出的人"的雕像被摆放在那里，是让人们根据这些英雄的业绩来衡量他本人，以及未来的元首们的成就。从建筑群的设计来看，他希望大家如何批判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在通往神庙的庭院正中央，耸立着孤零零的一座恺撒·奥古斯都青铜像，他像凯旋将军一样，乘着四匹马拉的战车。这是他的广场，他前不久获得的"祖国之父"头衔被刻在雕像的底座上。这是对罗马历史的纵览，将他置于中央位置，表明他与诸神和从建城开始一直到他自己时代的历代英雄好汉都有着紧密联系。奥古斯都认为自己与罗马的成功息息相关，他是这些伟人的优秀继承者，因为他领导国家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国强民富，河清海晏。他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既有神也有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是神之子，而其神祇父亲的雕像就在神庙内。[8]

奥古斯都广场颂扬了他的成就和罗马的光荣。庭审在广场的门廊举行，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也将在国家生活中发挥中心作用。从帕提亚人手中收复的鹰旗终于有了永久性的存放场所，而将来丢失又收复的罗马军旗也将被存放于此。元老院需要讨论宣战或授予凯旋式时，就会在这里开会。从这里，军队统帅们动身前往外省，最后返回这里；赢得凯旋式的将领的雕像将被竖立在这座广场上。奥古斯都还颁布了一条法令，将来贵族男孩举行成人礼的地点必须是这座神庙，以便提醒孩子们，成年意味着若情势需要，他们有义务参军打仗，为国效力。

盖乌斯和卢基乌斯被授予了某种形式的临时权力，以主持包括斗兽表演在内的庆祝活动。作为表演，在马克西穆斯广场杀死了260头狮子。过了一段时间，当局放水淹了弗拉米尼乌斯广场，也可能是将它的

一小部分暂时改为小湖，职业猎人在这里为观众表演，杀死了36条鳄鱼。这可能是为了纪念在埃及的胜利，但杀死这种稀罕的动物是一种常见的表演，就像印度使者献给奥古斯都的老虎很可能最后被杀死在罗马的竞技场一样。为了给群众提供娱乐，有时还会杀人。宏大的角斗士比赛又一次在选举围场上演了。这种比赛并不总是要杀人见血。奥古斯都的外孙，十岁的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在特洛伊竞技中骑马。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认为这种仪式很适合用来将年轻贵族介绍给公众。特洛伊竞技不是真的打斗，但有时也会出危险，有一次一位元老的儿子在竞技期间从马背摔下，导致终身瘸腿。元首赠给他一只金饰圈。可能在前2年，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孙子也在这种比赛中断了一条腿。波利奥在元老院坚定地批评这种比赛，说得合情合理，于是奥古斯都很快不再举行特洛伊竞技。[9]



罗马的十四个行政区域

过去和未来

此次节庆最让人长久怀念的一项赛事就是奥古斯都海战，比罗马举办过的任何娱乐活动都更宏大、更费钱。当局在台伯河西岸挖掘了一个1800罗马尺×1200罗马尺的人工湖，用特别为此建造的高架渠阿尔希提纳水道（20多英里长）引水。主题是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人在雅典人的领导下，击溃了入侵的波斯海军。虽然表演的规模没有真实战役那么大，但也非常可观了。奥古斯都后来吹嘘道，共有“30艘带冲角的战船，包括三列桨座战船[10]或双排桨座战船，还有很多较小的船只参加了表演。参战人数约3000，还不包括桨手”。我们不确定这场海战表演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拟真的。考虑到罗马人的品位，这场表演应当不会是完全不流血的，但也应当有相当多的舞台操控。两个多世纪之后的狄奥说，这场表演留下的一些架构仍然存在。而维莱伊乌斯说罗马群众的娱乐胃口被这些宏伟的比赛“满足到生厌”了。[11]

狄奥还告诉我们，希腊人赢得了此次战斗，这也许暗示其中有真枪实弹的厮杀。结果不是事先内定的，但希腊人获胜应当是大家都希望的结果。新广场的建筑效仿雅典卫城，并且重演了雅典最伟大的胜利，这说明奥古斯都显然非常希望与古典时期的光荣以及希腊文化的巅峰（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非常尊重希腊文化）扯上关系。在那个时期，雅典是民主制国家，领导人（如伯里克利）是选举产生的，而不是僭主或国王。奥古斯都或许刻意让大家想到这一点，表现他是这样一位民选领袖。不过我们不能在这个方向想得太远。有人说，奥古斯都早年的思维更像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业者时代的希腊化君主，所以才建造了华丽炫目的纪念性建筑，如阿波罗神庙；后来他更成熟了，便改为更节制的建筑风格，那样才符合自由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这种说法不能让人信服。[12]

古典希腊城邦与希腊化时代君主国之间泾渭分明的差别，其实大体上是现代学者发明的概念。喜爱希腊文化的罗马人并不觉得自己应当局限于前5世纪和前4世纪初“更优越的”风格和文学，而忽略后世的作品。

而且我们应当记住，奥古斯都广场和他早年的建筑一样恢宏壮观，同样歌颂了元首本人。不仅如此，奥古斯都广场还展出了两幅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像，还有好几座雕像，所以广场的宗旨显然是纪念过去的伟大胜利和胜利者，而不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扯上联系。[13]

同样的建筑和同样的符号可以与不同主题联系起来，惊心动魄的海战景象让人想起萨拉米斯海战，但也完全可能让人追溯亚克兴角海战。这两场海战都可以被描绘为文明战胜了野蛮，西方战胜了东方。奥古斯都近期的胜利完全有资格与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相提并论，正如“最杰出的人”为他的广场增添了恢宏气势一般。恺撒·奥古斯都吸纳了过去的荣光，接受了所有最好的东西。他利用马略、苏拉和庞培等人的形象，但剥去了他们与内战有关的负面元素，将他们视为先辈。他们增强了罗马的力量，把他的成就推向了巅峰。这就像维吉尔让理想化的加图担任冥界法官一样。奥古斯都公开表示仰慕小加图，赞扬任何愿意保全国家原状的人。死人没有办法决定新政权如何利用他们，而这样海纳百川的历史观强化了人们的印象，即朋党相争的内战已经过去了。即便是先前的敌人，以及其他一些不大可能赞成恺撒·奥古斯都及其终身制主宰地位的人，也被当作元首仰慕和宣传的榜样。[14]

对尤利乌斯·恺撒死敌的利用，并不意味着完全恢复他们的名誉。奥古斯都利用的庞培和加图的形象，其实是“消毒过后”的版本。这些人的缺陷和糟糕决定被人们记住，这只会更加衬托出元首的英明。奥古斯都赞扬庞培和加图的事迹和人格，并不是在暗地里批评尤利乌斯·恺撒。很多学者坚信不疑，奥古斯都有意识地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这种理论被不断重复，从来没有受到质疑，尽管它明显与证据不吻合。先称他为屋大维、后称为奥古斯都的习惯也鼓励了这种理论，却让我们忘记虽然他在前44年之后多次改名，但他始终被称为恺撒。的确，他在早年崛起的岁月比后来当权时期更常援引养父的名字，但这其实并没有学者们说的那样明显。他仍然被称为恺撒·奥古斯都，完成了独裁

官的很多建筑工程，并在新广场颂扬他的尤利乌斯祖先。更广泛的罗马历史及英雄，如埃涅阿斯和维纳斯、罗慕路斯和玛尔斯，被增添到这个家族当中，或与其拉上关系。私人家史与国家历史融合起来，就像纪念建筑糅合了私人和公共的光荣一样。诗人奥维德强调说，复仇者玛尔斯神庙既表现了为尤利乌斯·恺撒复仇诺言的兑现，也表现了成功向帕提亚复仇、收回军旗。在此处，和其他地方一样，奥古斯都将自己和亲人抬高到公共生活的中心，他个人的成就与广大人民的福祉融为一体。[15]

尤利乌斯·恺撒如今已经是神，不能简单地把他当作又一个罗马英雄，所以他的雕像在神庙内，而不是和尤利乌斯氏族其他成员在一起。没有迹象表明，罗马人会觉得这是有意识地把作为凡人的奥古斯都的一些比较值得商榷的行为与作为神的尤利乌斯·恺撒区分开来。从政初期的罗马贵族常大谈特谈自己的父亲和祖先，将他们的成就作为自身价值的证据。但地位巩固、获得高级行政长官职位之后，罗马贵族就很少谈及祖先了，因为到这个阶段，他自己的事迹变得更重要。一个人的祖先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不过如果他的成就与祖先比肩或甚至超越他们，肯定是件好事。罗马贵族死后举行公开葬礼时，会再一次强调整个家系，一代代人的肖像被展示出来，以证明儿孙们的大好前景。

内战之后，奥古斯都较少谈及尤利乌斯·恺撒，仅仅因为这么做是很自然的。任何罗马贵族家庭都会这么做，尽管可能不会像他那样突出。此时他自己的行动和胜利比养父的重要得多，所以得到广泛宣传。尤利乌斯·恺撒没有被遗忘，更没有被刻意压制，他的声望和荣耀继续加强着养子的威望，但没有必要再大肆宣传。恺撒·奥古斯都已经接管大局，远远超越了养父的光荣，但后者的纪念建筑仍然屹立，他的雕像繁多而引人注目，他的形象有时对养子仍然有用。说到底，毕竟是尤利乌斯·恺撒将尤利乌斯氏族从默默无闻提升到威震天下的地位，并让恺撒之名崛起于所有罗马贵族姓氏之上。

一个世纪之后的塔西佗说，在奥古斯都治下，历史写作衰败了，不是因为遭到了镇压和审查，而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罗马的传统是，撰写史书的人只能是那些参与历史构建的人，即参加辩论、制定法律和领兵作战的元老。只有这些人才有能力理解伟大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但在奥古斯都在位时，这些人如果想要在政坛有一番作为，就要依赖元首的善意。渐渐地，元老们要么不再写近期历史，要么只写溜须拍马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取悦奥古斯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愿意忘却自己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德鲁苏斯的次子克劳狄[16]宣布自己打算写一部内战史。李维娅和他的母亲安东尼娅悄悄地但坚决地劝他放弃这个念头。[17]

奥古斯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是李维写下的，这绝非偶然。李维是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贵族，毕生没有从政。他不必关心赢得官职，对政治和战争也没有直接的经验。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认为李维的作品有着强烈的偏狭守旧意味，但没有人怀疑李维的勤奋。他最终撰写了一部从罗马建城到德鲁苏斯去世的罗马史，共计142卷。我们不确定这部书是何时发表的，其中有些书卷可能在奥古斯都去世后才发表。李维写引言的时候，内战正酣，所以引言的语调非常抑郁，但随着局势好转，他的语调也发生了变化。李维不属于梅塞纳斯的文人圈子。尽管他与奥古斯都关系不错，但绝不是官方的宣传机器。然而他作品的立场与元首的很多观点相符，肯定与元首政权推行的罗马身份与文化吻合。李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也倾向于道德评判。在他看来，当罗马人道德水准高、尊重传统和神祇并奉行美德的时候，罗马就繁荣昌盛；而各阶级，尤其是领导人民的元老们腐化堕落时，罗马就蒙受失败、秩序紊乱并发生内战。[18]

李维《罗马史》的大部分，包括讲述最后一个半世纪的各卷，只有简略的概述流传下来，所以对于他如何描写具体个人，我们只能猜测。保存至今的几卷对某些事件的描写确实与奥古斯都广场上很多“最杰出

的人”的铭文有很大出入。有的是细节上的差别，如前168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19]打败珀尔修斯[20]国王的战争的确切天数。有的差别则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传说，对于某些个人，广场铭文的说法与其他史料有着显著差别。有一篇概述表明，李维严厉批评了马略的晚年和他前88年年末返回罗马大开杀戒的事情，而新广场的马略雕像铭文没有提及这些。[21]

李维写到科尔内利乌斯·考苏斯赢得奉献“最高战利品”的荣誉时，记述了奥古斯都对此事的解读，但也写了与之矛盾的其他说法。李维还讨论了尤卢斯究竟是埃涅阿斯与其特洛伊妻子生的儿子，还是后来与意大利妻子生的。李维对伟大庞培的评价可能也比较正面，因为塔西佗说奥古斯都温和地批评李维是一个不知悔改的庞培派分子。庞培也被列入“最杰出的人”，所以李维积极评价庞培并非在颠覆奥古斯都政权。更令人震惊的是，据说李维考虑到尤利乌斯·恺撒后来的所作所为，还曾质疑他的出生是一件好事。这个段落已经遗失，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其语调或结论，但保存至今的概述并不能说明李维非常敌视尤利乌斯·恺撒。[22]

相信恺撒·奥古斯都淡化其养父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李维的这段话能够支撑他们的观点，理由是李维一定相信不会激怒元首，才敢这么写。但是，除了悄悄向年轻的克劳狄施加压力让他写别的主题，以及奥古斯都晚年的几个例子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元首曾压制文学创作。有一次他写信给提比略，要求他“听到别人说我的坏话，不要太往心里去；我们能够阻止别人对我们采取不利的行动，就应当满意了”。官方的立场不断得到宣传，在大量文学作品、奥古斯都及其亲人的演讲、法令、奥古斯都自传，以及罗马和外省各地的纪念建筑上，都有官方宣传。不断的重复强化了官方宣传，而持续的成功和繁荣更是提供了有力支持。李维的主题——遵守恰当的罗马式美德，才能获得成功——也是对元首的强有力支持。[23]

奥古斯都没有积极地镇压异见人士，也没有隐藏过去。表达异见的人很少，而这少量异见也被支持他的潮水般的赞扬淹没了。尤利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开始了内战，奥古斯都在前44～前30年参加了对政敌的清洗迫害，并经常处决犯人和血腥镇压政敌，这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世的人对此记忆犹新，而且即便这些记忆黯淡了，那些年的文献记载和宣传都还在。隐藏历史，更不要说重写历史，是不实际的，奥古斯都可能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么做。他自己的版本很明确，将罪责扩展和转移到更多人身上。我们应当注意，李维愿意质疑尤利乌斯·恺撒做法的正确性，但并不意味着李维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尤利乌斯·恺撒，而认为其他人都是清白无辜的。李维哀叹西塞罗的死，但同时也说西塞罗在尽最大的努力搞死三头同盟，只不过没有三头同盟那么成功而已，并没有说西塞罗和三头同盟有任何本质区别。[24]

文学作品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很多时候适得其反。那些表面上开诚布公，偶尔赞扬元首曾经的对手（而且一定是已经死了的对手），或者对元首及其亲信加以温和的批评，反而是更好的宣传手段，有助于赞颂罗马和奥古斯都。这样的作品可能质量会更好，就像那个年代的诗歌一样，也有利于制造一种情感，即如今又有了一个自由和成功的共和国。作品的尺度是由作者和奥古斯都共同决定的，或者作者的作用更大。李维可能确实真诚地赞同奥古斯都的很多观点，社会上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如此，尤其是意大利各地的有产者和比较富裕的阶层。李维热情洋溢地记述战胜外国敌人的胜利和罗马权势的扩张，从亚克兴角战役到前9年的二十年给他提供了很多值得描写和歌颂的素材。

奥古斯都家族

前1年，十九岁的盖乌斯·恺撒获得了第一个指挥岗位，离开罗马，奔赴多瑙河。抵达那里的驻军营地之后不久，他的任务发生了变化。他

被授予东方各行省的军权，被派去应对罗马东部边境受到的威胁。亚美尼亚发生权力斗争，帕提亚人对其施加干预，并将其傀儡扶植到亚美尼亚王座上。和以往一样，战胜帕提亚人的期望令罗马公众为之心旌摇曳，给诗人们带来很多灵感。奥维德甚至将这种热情抒发到他的《爱的艺术》第一卷里：“看呐！恺撒在准备为已征服的世界增添最后一块土地。”帕提亚人将要为前53年屠戮克拉苏军队而付出代价。虽然奉命出征的统帅盖乌斯·恺撒年轻而缺乏经验，但罗马人必胜无疑。“为你复仇的人要到了。他虽然年轻，却统领有方；他虽然还是个少年，却没有任何少年能像他一样运筹帷幄……恺撒家族的成员，皆是少年英雄……父亲玛尔斯和父亲恺撒，保佑他，因为你们中的一个已经是神，另外一个即将成神。”诗人随后回到主题，想象自己一边观看盖乌斯·恺撒凯旋，一边泡妞。奥维德为这位女子描绘盖乌斯·恺撒的凯旋游行，有的内容是真实的，有的则是想象的，不过都是高度自信的。[25]

这个指挥岗位原本应当给提比略，但他还在罗得岛，而且已经过去了五年，他的保民官权力和军权都已经失效。尤利娅闹出丑闻之后，奥古斯都没有征询提比略的意见，而是直接代表他，给尤利娅发去了一封休书。随后他简单地通知提比略发生了什么事情。提比略写信请求对他的前妻宽大处理，但奥古斯都没有理睬他。提比略还不断请求允许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回国，也被拒绝了，于是他依然留在罗得岛听课和参加辩论。李维娅为他搞到了一个不明确的军团长身份，以便对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总的来讲，大家很尊重提比略，不过有一次辩论结束后一位哲学家跟着他回家，不仅与他争辩，还凶狠地辱骂他，于是提比略命令将此人逮捕了。提比略终其一生都是个不善交际、笨嘴拙舌的人，在罗得岛也发生了一些尴尬的事情，产生了一些误会。有一次他希望探望病人，不料他的侍从让当地行政长官把能找到的所有病人全都拉来，按照病情严重程度一字排开给他看。提比略大感窘迫，向病人们道歉，然后派人把他们送回家。[26]

因为他是元首的继子，而且直到不久前还是元首的女婿，所以大家不是很确定应当如何对待他。有迹象表明，很多权贵会来拜访他，大多数经过那里去自己行省的罗马官员也会来见他。盖乌斯·恺撒及其随行人员经过罗得岛附近时，提比略离开了罗得岛，去向恺撒的养子和东方统帅请安。敌视提比略的史料说，他匍匐在这个少年面前，这可能太夸张了。不过提比略的地位的确摇摇欲坠。整个东方社区都必须决定如何对待他，以及如何对待那些凭借与他的关系在各地享有显赫地位的人。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阴谋结党营私，或者准备等元首驾崩后夺权，提比略不再穿罗马将军的服饰，也不再练习骑马和武艺。据说他穿着希腊人的服饰，如果这是真的，就很像安东尼与屋大维娅新婚后在雅典过节那样。高卢的一座城市认为提比略已经失宠，于是摧毁了他的雕像。[27]

盖乌斯没有在罗得岛停留，但在穿过东方各行省时肯定受到了欢迎。毕竟他是奥古斯都的养子，有权处理请愿。希腊诗人们也像奥维德那样歌颂盖乌斯："宙斯之子，去幼发拉底河吧，东方的帕提亚人已经飞快地跑来向你投降。去吧，皇子。恺撒，你会看到他们因为恐惧而无力弯弓搭箭。按照你父亲的训令，统治吧。请你首先向升起的太阳证明，罗马以四周的海洋为边界。"[28]

雅典只是众多争相迎接和款待年轻皇子的城市之一。这些年的某个时期，雅典人将一整座阿瑞斯（希腊的战神，相当于罗马的玛尔斯）神庙搬走，一丝不苟地重建雅典的阿哥拉（市场）。虽然盖乌斯·恺撒受到万众瞩目，但他的养父小心地派遣了年纪较长、经验丰富的人去辅佐他，或者去负责做出许多关键的决定。盖乌斯·恺撒的幕僚很多，包括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前不久在日耳曼表现突出；还有马尔库斯·劳里乌斯，他的战绩不是很好，在前16年丢失了第五"云雀"军团的鹰旗；另一位前任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可能从一开始就陪伴着盖乌斯，随后多年里他一直在盖乌斯的幕僚中。[29]

奥古斯都留在罗马。现在他已经不愿意长时间巡视外省。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能感到自己在衰老，尤其是因为他的同龄人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公元2年生日这天，他给长子写了一封信：

> 9月23日
>
> 你好，我亲爱的盖乌斯，我最亲爱的小驴子。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总是想念你。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特别思念我的盖乌斯。不管你今天身在何方，我希望你庆祝我的六十四岁生日，祝我健康和幸福……我向诸神祈祷，不管我还有多少时间，都要安全和健康地在你身边度过，看着我们的国家如此繁荣，而你们俩都成为男子汉，准备继承我的哨兵岗位。[30]

在星相学上，六十三岁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年纪，所以奥古斯都开玩笑地表示，过了这个年纪让他长舒一口气。他谈到自己的“哨兵岗位”，说明在他眼里，自己是一个守护国家的监护者，他也希望自己的养子将来能够接过这个职责。虽然年事已高，他的工作还是很繁重，尤其是因为盖乌斯和卢基乌斯年纪还小，刚刚开始分担他的重任。

元首和两个养子非常亲近。遗憾的是，他公开发表的给盖乌斯的书信集只有这一封信流传了下来。他很可能也给卢基乌斯写过信。这封信的风格与他给其他亲人的信类似，语调轻松，常用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奥古斯都喜欢引用，与行省总督、部下和亲戚通信时常引经据典来描述良好行为的榜样。在两个养子的一生中，只要他们不在他身边，他总会写信给他们。他们在身边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成长关怀备至，教他们游泳和骑马。大约前10年，他挑选了语法教师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教导两个男孩。弗拉库斯原本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学校，但奥古斯都给了他年薪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于是他高兴地关闭了学校，来到帕拉丁山，被安顿在一座曾属于著名首席元老卡图卢斯并依然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宅邸内。[31]

奥古斯都买了帕拉丁山上的一些房屋，将其连接起来，作为自己的

府邸。奥古斯都府肯定有一个主门，门廊上雕刻着橡叶冠，但各座房屋和圣所（最重要的是阿波罗神庙，附有图书馆和灶神龛，雅典娜神像就存放在那里，这神像据说是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带来的）之间可能由一些狭窄街道和小巷连接起来。对这个地点的考古发掘没有明确的结论，很难将遗址和文字记载一一对应起来。今天称为“李维娅府”的房子（在那里发现了一根铅制水管，上面刻着她的名字）是她在奥古斯都驾崩后的住处，但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知道在这之前他们住在哪里。今天所说的奥古斯都府其实只是为了方便才这么叫，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它在整个建筑群中的具体功能。奥古斯都对原有建筑进行了调整和改良，至少在私人生活区似乎没有大幅度改变原有的贵族宅邸。[32]

元首自称生活朴素。苏埃托尼乌斯说，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里，奥古斯都“无论冬夏，住在同一间卧室内”，意思是奥古斯都在这么久的时间里只用一间卧室，不会因为天气寒冷或炎热而换地方。奥古斯都不习惯早起，如果需要一大早就到城市的另一个区域，他就会在前一夜住到附近的朋友家。其他史料告诉我们，夏天酷热，他夜间睡觉时会把房门敞开，甚至把床榻搬到一个庭院内，睡在一座装饰性喷泉旁边。奥古斯都每晚睡觉不会超过七个小时，睡在一张“低矮而装饰简单的床上”，但如果他中途醒了，就不愿意一个人继续躺下去，而坚持让别人陪伴他。不过在午饭之后他经常打盹，有时坐轿子也会打瞌睡。他的生活需求很少（精力充沛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睡眠时间更少），也很朴素，不像很多富裕元老和骑士那样骄奢淫逸，更不要说像马克·安东尼使用黄金尿壶那样穷奢极欲了。奥古斯都家中用的卧榻和桌子留存到一个世纪之后，苏埃托尼乌斯说这些家具整体上都很简朴。[33]

舒适而有节制，是奥古斯都生活作风的特点。不过我们不能从表面意思来理解，而要在前1世纪普遍奢靡（后来愈演愈烈，一直发展到卡利古拉和尼禄那样丧心病狂般的极度奢侈）的背景下来理解。奥古斯都的生活作风是他自己和很多元老都会感到恰当的。帕拉丁山上的奥古斯

都府邸，以及其他可能与元首及其家人有关系的地方的墙上都有装饰性绘画，往往非常复杂，符合最时髦的品位。他的乡间别墅（他常住在别墅，以躲避罗马的喧嚣）按照当时贵族的标准也不算奢侈，而且他只有三座别墅，而连只算一般富裕的西塞罗也有九座。奥古斯都没有仅供私人欣赏的昂贵艺术品和雕刻收藏品，这与某些富裕元老不同。和阿格里帕一样，奥古斯都的艺术品是用来公开展示、供广大群众欣赏的。不过他喜欢装饰性花园，收藏了各色珍奇。他在卡普里岛的别墅展示了他的“巨型骨骸”，即巨大动物和鱼类的骨骸（可能是恐龙之类的化石），以及据说曾被著名英雄使用过的古代兵器。[34]

奥古斯都的生活作风很符合一位元老领袖的身份，显然也是作为榜样告诉元老们应当如何表现。他强调的简朴是相对而言的。在家的时候，以及不需要接待客人或出席公共场合的时候，他一般穿的是李维娅、屋大维娅或其他女眷给他做的衣服（家中大量奴隶和女释奴肯定也帮助贵妇们做衣服）。对罗马精英阶层的妻子和女儿来说，织布是一项传统活动，不过到这个时代虽然更受人仰慕，但很少有人实践。我们很难知道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效仿元首的女眷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冬天，他在马甲和毛衣之上穿多达四件上衣，大腿和腿肚子上裹着暖腿套。长裤是蛮族的风俗，差不多三百年后罗马皇帝才开始穿长裤。夏季他穿得比较轻便，总是戴着一顶遮阳的宽檐帽，即便在帕拉丁山上府邸建筑群内也是这样。不过这是非正式的服饰。如果要出席正式场合，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会打扮得符合自己的身份。他家中总是备好合适的官服，如果他突然需要处理公务，便可以立即换上。[35]

奥古斯都的饮食也很有节制。与穿衣打扮一样，一方面是由于他饮食有节的天性，另一方面是身为罗马元老领袖，他要做出榜样。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他喜欢普通面包而非精致的高级面包，常吃湿润的奶酪、无花果和一条小鱼。在大多数日子里，他常常不等正式的用餐时间，想吃就快活地吃起这些东西，并且坐轿子或乘马车时也会吃东西。

他的书信中讲到他这样吃面包、枣子和葡萄。他还喜欢吃黄瓜、莴苣和苹果。他吃苹果一般是要蘸什么东西，或者苹果表面覆盖一层东西。他很少喝葡萄酒，一次不会超过一品脱[36]，如果喝多了就会用催吐的手段把过量的酒吐出来。他举办的宴会很丰盛，也经常举行正式宴会，但有时他在宴会上吃得很少，因为在宴会之前他已经吃过东西，或者打算宴会结束后再吃。据我们所知，他更喜欢客人的陪伴和交谈，掷骰子或者玩其他游戏，比如让大家竞买不知道是什么的奖品，或者不知道奖品的真实价值，将真正贵重的东西和非常普通的东西混在一起。他的花招之一是只给别人看一套画作的背面。在重要的宴会上，他喜欢发秘密奖品，有时是贵重的东西，有时是珍奇，比如古代钱币，有时是开玩笑的东西，比如海绵或铁制拨火棒。他会给这些东西取一语双关的名字，把它们赠给大家。[37]

奥古斯都常在家中招待客人，也经常接受邀请和其他人一起用餐，但和他一起吃饭的一定是贵族能够接受的有身份的人。他从来不会让释奴和自己同桌吃饭，但有时会邀请不是元老也不是骑士的自由人。苏埃托尼乌斯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曾经的侦察者（这个词最初指军队的侦察兵，但后来意思变成了情报人员，可能在奥古斯都时代已经有了这一层意思）受奥古斯都邀请，到他家中吃饭。奥古斯都曾在此人的别墅住过，所以为了表示感激而请他吃饭是个可以接受的理由。这也说明此人至少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元首非常仔细地按照每个人的身份和过去为他提供的服务来恰如其分地尊重他们，就像他非常耐心地接见请愿者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他有很强的幽默感，非常活泼，而且特别喜欢双关语和讽刺语（这也是非常符合罗马人性情的）。有一次，奥古斯都主持审案，一名辩护律师是一个驼背的元老，他不断请求元首："如果您发现有错，就把我理直了。"奥古斯都最后开玩笑说："我会纠正你，但我没有办法把你理直。"[38]

开玩笑往往是摆脱窘境（比如要拒绝某人时）的温和之法。笑话也

是很好的故事，能够迅速传播，让大家愈发觉得奥古斯都也是一个普通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暴君。一位商人给他送来一套用推罗[39]紫色染料染成的衣服。但元首对颜色的深度不太满意。商人保证说，如果他把衣服拿到光线下，就会好看一些。皇帝答道："什么？你的意思是，我要在阳台上转来转去，罗马人民才能看出我穿的衣服很好？"有段时间他拥有一个指名者，但此人记忆人脸和及时认出别人的本领不够，没办法帮助主人。有一天，他们即将走到广场，奴隶问有没有忘记什么需要的东西。奥古斯都说："你最好拿一些介绍信，因为你在那儿谁都不认识。"[40]

奥古斯都的笑话有时很尖刻，但按照当时的标准（罗马人喜欢嘲讽别人的身体缺陷），从来都不会显得恶毒。更重要的是，他虽然会挖苦人，但从来不会同时做出残酷或专横的行为，这与他在三头同盟的时候迥然不同，那时的他会下令处死别人，还会开玩笑说，他们将成为"食腐鸟的饲料"。奥古斯都在幽默时从来不会故意展示或者滥用自己的权力，就像他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不会这么做一样。他也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些故事的靶子，受人嘲笑。据说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个长得非常像自己的人。于是元首问这人，他的母亲是不是在罗马待过。那人说没有，不过他父亲经常到罗马。奥古斯都和其他人打交道时的温和与礼貌或许反映了他的真实性格（至少是他在这个阶段的性格），以及明智的政策。他慷慨与友善的举动很容易被口口相传。有一次，他听说一位地位不高的元老眼瞎了，打算自杀。恺撒·奥古斯都几乎不认识这人，但还是去到他床前，长谈一番，劝他改变主意。他的同情心和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人，都超越了正式职责，但非常有助于劝服人们接受（往往还是喜爱）他的统治。[41]

很多事情元首都是在公开场合完成的，所以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讲述他的小缺点和怪癖。他一般遵循尤利乌斯·恺撒的建议，即正式演讲和声明应当简单明了，并嘲讽梅塞纳斯和提比略，因为他们喜欢晦涩

和过于复杂的句子。奥古斯都自己会用一些粗俗的词，并且喜爱朴实无华的民间谚语，比如“就像烧芦笋一样快”或“他们会在希腊的月首日付钱”（因为希腊历法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日子，所以意思是他们不会付钱）。他尤其喜欢“着急也要从容！”这句口号，他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中都用过这句话。他的行为举动有一些独特之处，融合了一些很深的迷信思想。他害怕打雷和闪电，因为有一次在西班牙旅行途中，站在他身旁的一名举火炬的人被雷电击中身亡。所以他旅行时总是随身携带一块海豹皮作为吉祥物，保护自己。如果在家中遇到打雷，他会躲到地下室里。有的日期他不会出门，但如果开始旅行时下了小雨，他会很高兴，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吉兆。而如果奴隶把他的鞋摆错了方向，那就是凶兆。[42]

这都是小怪癖，不会惹人讨厌，处于能让人接受的贵族行为范围之内。类似地，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会显得过分，毕竟他的身体状况曾经很差。他研究出了自己的洗澡方式，没有像常规的罗马洗浴法（用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水）那么极端，但用金属工具刮掉涂在身上的油（当肥皂用）时太用力，在皮肤上留下了疤痕。他还是容易生重病，有时腿和手会患风湿病或软弱无力的毛病，尤其是右手，让他时常无法握笔。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他按照常规的贵族习俗，公开操练武艺，既徒步使用兵器，也骑马。从前29年开始，他改用投掷和接住一个球的锻炼方式，年岁大了之后就满足于骑马，然后是跑步，每次跑步结束时要跳一跳。这对上了年纪的元老来说，都是正常的运动。奥古斯都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举止风度、果断行动一样，塑造了一个正常的、受尊重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得过分的罗马贵族形象。锻炼和元首生活的很大部分内容一样，是公开进行的，他的家庭生活作风也是为了证明他拥有领导国家所必需的性格。在帕拉丁山上的建筑群内，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给了自己一个私人房间，他给这个房间取名为“工坊”或者“叙拉古”（西西里岛的最大城市）。他时常来到这个房间，其他人都不可以打搅他，他会躲在那里享受片刻的安宁，或者详细筹划立法或其他项目。他的另外一

个很方便的躲避处是一个释奴名下的一座别墅，就在城市正式边界之外。[43]

公元1年1月1日，盖乌斯·恺撒就任执政官。此时他还在遥远的罗马-帕提亚边境，所以就职典礼的职责落在了他的同僚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身上。保卢斯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尤利娅的丈夫。元首的习惯是在举荐自己的亲戚竞选官职时，向选民推荐他们，并说“如果他们有资格的话”。在顾问们的辅佐下，盖乌斯表现不错，而且帕提亚人也没有与罗马公开交战的胃口。奥古斯都的养子和帕提亚国王会面谈判，双方各自举行阅兵，请对方观看，然后在幼发拉底河两岸举办了奢华的宴会。和平得以确定，由罗马提名的人被安插到亚美尼亚王位上。[44]

公元2年，十九岁的卢基乌斯·恺撒离开罗马，去往西班牙，这是他的第一个行省总督职位。西班牙已经没有战争威胁，所以他可以在安全环境内积累经验。途中，他经过纳博讷高卢，在马西利亚稍事停留。毫无疑问，在旅途的每一站，当地人都会热烈欢迎他，还有长长的请愿者队伍等待着他。这位年轻的皇子在为履行公共职责做准备。不料命运横插一手，这个少年在马西利亚病逝了。奥古斯都伤心欲绝，但暂时还能感到宽慰，因为他的另一个养子不断取得成功。但东方出了麻烦。盖乌斯的幕僚受到丑闻的冲击，劳里乌斯被指控接受外国君主的贿赂，自杀了。罗马人在亚美尼亚也好景不长，一大群民众起兵反抗新国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是米底人而不是亚美尼亚人，受到当地贵族的怨恨。

公元3年，盖乌斯率军去镇压亚美尼亚的叛乱，但在攻打一座不知名的设防城镇时，他不明智地亲自去与敌军首领谈判，被奸诈地打伤。他的伤情很重，无法治愈。在秋季和冬季，他的伤势越来越重，行为也变得飘忽不定。有一次他写信给养父，请求允许他退隐，这和差不多十年前提比略做的事情一样有些奇怪，但对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而言更显得古怪。公元4年2月21日，盖乌斯·恺撒去世了。意大利和外省的许多

社区和元首一起公开哀悼他。两个早逝的青年得到了极大的荣誉，甚至超过了德鲁苏斯。又有两个骨灰瓮被安放到奥古斯都陵寝。六十七岁那年，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孤零零地守着自己的哨兵岗位。[45]

---

[1] Ovid，*Fasti* 5.550-54，567-8（Loeb translation）.

[2] 概况见Dio 55.10.6，Velleius Paterculus 2.100.2，Suetonius，*Augustus* 31.5，及Ovid，*Fasti* 5.545-98；年代，见C.Simpson，‘The date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of Mars Ultor’，*JRS* 67（1977），pp.91-4.还有一种说法是8月1日，也是有可能的，但5月12日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3] Suetonius，*Augustus* 56.2谈到，他不肯强迫地产所有者将其广场需要的地产卖出。

[4] Pliny，*NH* 36.11，102；关于厄瑞克忒翁神庙，见J.Camp，*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2001），pp.93-100；关于奥古斯都及其图像，见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81-2，113-14，193-215，S.Dyson，*Rome.A Living Portrait of an Ancient City* （2010），pp.128-31，及W.Lacey，*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1996），pp.193，197-202。

[5] 参见Dio 56.34.2-3讲到奥古斯都葬礼上有类似的展示和颂扬历史伟人的游行；“最杰出的人”（summi viri） 的说法出自后世的文献*Scriptores Historia Augusta*，*Alexander Severus* 28.6；讨论见T.Luce，‘Livy，Augustus，and the Forum Augustum’，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399-415，esp.403-6；铭文碎片，见*CIL* 1，pp.186-202 讨论了*elogia*， 部分译文见M.Cooley（ed.），*The Age of Augustus.Lactor 17* （2003），pp.238-9；奥古斯都参与撰写*elogia*， 见Pliny，*NH* 22.6.13；Cornelia见*CIL* 1.39。

[6] 努米底亚（前202～前46年）是古罗马时期的一个柏柏尔人王国，如今已经消亡。其领土大约包括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北以及突尼斯的一部分（皆位于北非）。当时以出产精锐骑兵闻名。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就是以努米底亚骑兵赢得早期多场战争的胜利，后来也因努米底亚骑兵投向罗马而战败。其后，努米底亚先后成为罗马的行省之一和附庸国。努米底亚领土西端与罗马帝国的另一行省毛里塔尼亚（即现今的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接壤，东端则与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迦太基故地，即现今的突尼斯）接壤，其领土北临地中海，南接撒哈拉沙漠。

[7] 对尤卢斯身份的疑问，见Livy 1.3；马略见T.Luce，‘Livy，Augustus，and the Forum Augustum’，in J.Edmondson（ed.），*Augustus* （2009），pp.406-7，英文译文见M.Cooley（ed.），*The Age of Augustus.Lactor 17* （2003），p.238，K25。

[8] Suetonius，*Augustus* 31.5，*Res Gestae* 35.

[9] Dio 55.10.6-8，Suetonius，*Augustus* 43.2.狄奥可能将纪念阿格里帕的基金会也算作节庆之一。

[10] 三列桨座战船是古代地中海的航海文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等）使用的一种桨帆船。战船每边有三排桨，一个人控制一支桨。此种战船在希波战争、雅典帝国兴亡中起到重要作用。

[11] *Res Gestae* 23，Velleius Paterculus 2.100.1，Dio 55.10.7.

[12] 见P.Zanker（trans.A.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 （1988），pp.105-6，奥古斯都时代所有主要神庙的辉煌；关于其风格偏离希腊化时代帝王风格的说法，见Purcell in *CAH2* X，pp.788-90，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是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197-213。

[13] Pliny，*NH* 34.48，35.93-4.

[14] Macrobius，*Saturnalia* 2.4.18.

[15] 奥古斯都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的理论所用的例子之一，见Z.Yavetz，‘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in K.Raaflaub & M.Toher（eds），*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pp.21-41，32，‘Gradually but consistently he distanced himself from the memory of Julius Caesar’；复仇者玛尔斯神庙，见Ovid，*Fasti* 570-83，及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208讲到奥古斯都广场的设计刻意让人想到尤利乌斯·恺撒。

[16] 后来的克劳狄皇帝。

[17] Tacitus，*Ann* .1.1，Suetonius，*Claudius* 41.2；概括见M.Toher，‘Augus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Roman Historiography’，in Raaflaub & Toher（1990），pp.139-54。

[18] 见R.Syme，‘Livy and Augustus’，*Harvard Studie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64（1959），pp.27-87，及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280-87。

[19]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马其顿尼库斯（约前229～前160年），两次担任执政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征服了马其顿，消灭了安提柯王朝。他的父亲也叫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于前216年在坎尼战役（被汉尼拔打败）中阵亡。他的儿子就是小西庇阿，被过继给大西庇阿的儿子。

[20] 珀尔修斯（约前212～前166年）是马其顿王国安提柯王朝的末代君主。安提柯王朝是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由他的帝国分裂出的几个政权之一，统治马其顿本土。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1～前168年）中，珀尔修斯被罗马击败并投降，安提柯王朝灭亡。到前146年，罗马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的本土势力，将马其顿变成一个罗马行省。珀尔修斯投降后学会了拉丁语，成了

熟练的金属工匠和公证人。

[21] 见T.Luce，‘Livy，Augustus，and the Forum Augustum’，in J.Edmondson（ed.），*Augustus*（2009），pp.406-15。

[22] Tacitus，*Ann*.4.34；Seneca，*Quaestiones Naturales* 5.18.4谈及李维质疑尤利乌斯·恺撒的降生是不是一件好事；R.Syme，‘Livy and Augustus’，*Harvard Studies of Classical Philology* 64（1959），p.58探讨和涉及了奥古斯都与尤利乌斯·恺撒拉开距离的理论。

[23] Suetonius，*Augustus* 51.3（Loeb translation for quote）.

[24] Seneca，*Suasoriae* 4.22.

[25] Dio 55.10.17-18，Ovid，*Ars Amatoria* 1.177-86，203-4 for the quotes（Loeb translation），更概括见177-229。

[26] 关于这些年里的提比略，见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1999），pp.39-42，44-6，R.Seager，*Tiberius*（2005），pp.23-9；奥古斯都代表提比略与尤利娅离婚，见Suetonius，*Tiberius* 11.4-5；拜访病人，见Suetonius，*Tiberius* 11.2；哲学家，见Suetonius，*Tiberius* 11.3。

[27] Dio 55.10.19，Velleius Paterculus 2.101.1，Suetonius，*Tiberius* 11.1，12.2，13.对提比略行为和会见地址的说法有所不同；对这些年的有趣讨论，见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East：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1990），pp.169-88。

[28] 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East：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1990），p.172.

[29] G.Bowersock，‘Augustus and the East：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1990），pp.172-3，讨论了军营内的辩论，（2001），pp.116-17；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425，428-9涉及盖乌斯及其谋士。

[30] Gellius，*NA* 15.7.3（Loeb translation，slightly emended）.

[31] Suetonius，*Augustus* 64.3，89.2，*de grammaticus et rhetoribus* 17.2.

[32] 关于奥古斯都在帕拉丁山上宅邸的非常有价值和有洞见的讨论，见P.Wiseman，‘The House of Augustus and the Lupercal’，*JRA* 22（2009），pp.527-45，尤见527-36。

[33] Suetonius，*Augustus* 72.1，73，78.1-2，Pliny，*NH* 33.49.

[34] Suetonius，*Augustus* 72.3谈到骨头，82.1谈到他睡觉时敞着门或者在室外睡觉；奥古斯都的生活概括，见Z.Yavetz，‘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in K.Raaflaub & M.Toher（eds），*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1990），pp.21-41，提示读者谨慎的段落R.Saller，‘Anecdot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Greece and Rome* 27（1980），pp.69-83；壁画，见J.Clarke，‘Augustan domestic interiors：propaganda or fashion？’ in K.Galinsky，*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 （2005），pp.264-78，及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 （1996），pp.179-97；见Vitruvius，*de architectura* 7.5.3-4讲到一位建筑师批评了帕拉丁山上出现的非常时髦的建筑。

[35] Suetonius，*Augustus* 73，82.1.

[36] 1品脱约合568毫升。

[37] Suetonius，*Augustus* 75-77.

[38] Suetonius，*Augustus* 74讲到，唯一曾应邀与他一同用膳的释奴是与塞克斯图斯·庞培作战期间变节的海军将领梅纳斯；笑话见Macrobius，*Saturnalia* 2.4.8。

[39] 推罗是腓尼基人建造的古城，在今天黎巴嫩南部，称苏尔，为海港城市。古时因产一种稀有而昂贵的紫色染料（用骨螺制成）而闻名。在古时很多文化中，紫色是王室专有的颜色。

[40] Macrobius，*Saturnalia* 2.4.14-15.

[41] Macrobius，*Saturnalia* 2.4.20，Suetonius，*Augustus* 53.3；关于幽默的有效性，见Z.Yavetz，‘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in K.Raaflaub & M.Toher（eds），*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1990），pp.36-38。

[42] Suetonius，*Augustus* 29.3，86.1-88，95，97.1-2，Gellius，*NA* 10 11.5，24.2.

[43] Suetonius，*Augustus* 72.2，80-83，with E.Gowers，‘Augustus and “Syracuse”’，*JRS* 100（2010），pp.69-87.

[44] Suetonius，*Augustus* 56.2讲到他向选民推荐自己的亲戚；盖乌斯在东方，见Dio 55.10.20，10a.4-5，Velleius Paterculus 2.101.1-3，with A.Sherwin-White，*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168 BC to AD 1* （1984），pp.325-41。

[45] Dio 55.10a.5-10，Velleius Paterculus 2.102.1-3，Suetonius，*Augustus* 65.1-2，Tacitus，*Ann* .1.3.

二十一 为了共和国

命运夺走了（恺撒的）伟大名字的希望，但已经为国家恢复了最强大的壁垒……恺撒·奥古斯都没有再耽搁一分一秒；因为他不需要努力去寻找一个人，而只需要挑选一个声名显赫的人。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 [1]

奥古斯都比较能够听天由命地接受亲人的死亡，而不能接受他们的不端行为。

——苏埃托尼乌斯，1世纪末 [2]

3月中下旬的某个时间，盖乌斯·恺撒的死讯传到了罗马。奥古斯都的悲恸是真诚的，但他在哀悼的时候已经开始谋划未来。三个月后，他的决定就被公布了。和以往一样，他求助于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不过很多学者所持的观点——奥古斯都痴迷于自己血统的延续——并没有说服力。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将“恺撒”这个姓氏的威望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并借助所有媒介不断宣传它。恺撒·奥古斯都让大家相信他是独一无二、高于其他任何人的，这种神话很早就开始扩展到他的亲人身上。任何接替他两个死去的养子的人，都必须成为一位恺撒，但也必须配得上这样的荣誉。现实中可供选择的人很少。 [3]

其中之一是尤利娅的最后一个儿子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但他只有十五岁，还没有正式披上成年托加袍。更现实的选择是德鲁苏斯的长子日耳曼尼库斯，他十八岁，已经表现出他父亲的魅力和赢得群众支持的本领，不过他是元首的外甥孙，亲缘关系更远一些。苏埃托尼乌斯说，奥古斯都认真地考虑过选择日耳曼尼库斯为自己的主要继承人，但后来放弃了，可能是因为他不确定自己能活到这个少年可以证明自己的年月，所以放不下心来。和往常一样，他似乎没有考虑提携外甥女和外甥孙女的丈夫们，也没有打算提拔外孙女婿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

斯。[4]

此外还有四十五岁的提比略，他两次担任执政官，曾是奥古斯都的女婿，曾和他分享保民官权力，很可能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将领。提比略多次写信请求回国，他在罗得岛待了八年之后，奥古斯都对前女婿的态度终于软化。他没有允许提比略回国，而是让盖乌斯·恺撒裁决此事。盖乌斯·恺撒起初拒绝，但最终同意了，这个变化据说是由于劳里乌斯的垮台。劳里乌斯长期憎恨提比略，提比略也恨他。这是公元2年的事情。卢基乌斯·恺撒的死讯传到罗马的时候，“流亡者”提比略回来了。他写了一封公开吊唁信给奥古斯都，信中充斥着悲恸和赞美之词。除了带自己的儿子德鲁苏斯去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举行成年礼之外，提比略非常小心地避免出席任何公开场合。他没有住在自己的豪宅（原属于庞培，后被安东尼占据），而是搬到了城市边缘的一座属于梅塞纳斯的别墅。[5]

奥古斯都故伎重演，不是寻找一个继承人，而是好几个。现代学者认为他是在为自己心仪的真正继承人准备几个摄政者或监管者，这种理论也是误导人的。奥古斯都不是这么想的，他显然希望亲密的家人能够以一个小组的形式合作并分享权力。这并不是说他的这个信念是现实的。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其几次皇朝安排中最复杂和最不符常规的一个。第一步，他要求提比略收养其侄子日耳曼尼库斯。然后，5月26日，奥古斯都收养了提比略和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收养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收养一个四十五岁的前任执政官，而且他自己已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养子日耳曼尼库斯和亲生儿子德鲁苏斯），就绝对没有先例了。所以，奥古斯都不仅有了两个儿子，还有了两个孙子。很快他又安排了婚姻，来巩固第二代人的纽带。日耳曼尼库斯要娶阿格里皮娜（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而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李维拉（似乎之前被确定要嫁给盖乌斯·恺撒）则嫁给了德鲁苏斯。提比略仍然单身，部分原因是他不愿再婚，很难为一个曾经与恺撒的独生女结

婚的男人找到合适的对象也是原因之一。

波斯图穆斯有点与众不同，不仅仅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不是李维娅儿孙的人。他比提比略年轻三十岁，年龄更接近提比略的儿子们（虽然比他们还要小），肯定与他们而不是与他的新哥哥更有共同点。而且奥古斯都也没有努力去快速提升波斯图穆斯的公共形象。一年之后，波斯图穆斯才接受了成人礼。在过去，奥古斯都会就任执政官，在成人礼上向群众介绍他的养子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他没有为波斯图穆斯这么做，不过奥古斯都已经多年没有担任执政官，所以这可能是他如此决定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波斯图穆斯没有像他两个死去的哥哥那样得到青年元首的头衔。奥古斯都也没有宣布授权他参加元老院会议并提前参选行政长官；同样，也没有为他安排与奥古斯都家族的其他显赫成员结婚。目前，从元首的外孙变成养子，仅仅给了波斯图穆斯“恺撒”之名，而没有其他任何直接好处。[6]

提比略如今的名字是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在元老院宣布收养提比略的决定时称：“我这么做，是为了共和国。”历史学家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认为，奥古斯都的这个宣言有损提比略的声望。很多人认为奥古斯都这话表明他听天由命的沮丧情绪或高度讥讽，但他不大可能公开表达这样的情感。前6年提比略退隐时，奥古斯都显然觉得自己遭到了女婿的背叛，这种愤怒可能始终没有完全消退。但提比略在罗得岛上的时候并没有惹是生非，而且自回国以来非常小心地避开政治，尽可能保持低调。随后几年里，奥古斯都给提比略的信和给其他亲人的信差不多，都是充满温情、建议、引用和逗乐的语调。不管奥古斯都私下里对提比略怎么看，至少在公开场合会对自己的新养子表示尊重、信任和喜爱。[7]

提比略显然从这种新局面中获得了好处，而且借助后见之明，我们知道他将会继承元首之位，统治国家二十三年，寿命比日耳曼尼库斯和

德鲁苏斯都长得多。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些后话，他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十年前就退出政坛而且没有希望恢复地位的人，变成了仅次于奥古斯都的国家领导人。李维娅的儿子是元首最高级的助手，无疑也是他的继承人当中最资深的一位，而这些继承人当中包括李维娅的两个孙子。很快有传闻散播开，说这一切都是她精心策划的，她甚至安排暗杀了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以便让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唯一的可行选择。这些传闻加上她下毒害人的旧闻，各种阴谋论愈演愈烈。这些都不大可能是真的，何况盖乌斯是在亚美尼亚与敌人谈判时负伤的，李维娅如何安排？所以阴谋论实在是异想天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但很少有学者对这些阴谋论有丝毫的相信。盖乌斯和卢基乌斯之死，以及之前其他人的死亡，更有可能是因为糟糕的运气。学者们更愿意说克劳狄家族和尤利乌斯家族（更具体地说是尤利娅的后代，甚至她母亲斯克利博尼娅的后代）之间存在权力斗争。这也不大可能是真的。[8]

公元4年，奥古斯都授予提比略保民官权力，为期十年。这可能发生在他收养提比略之前。前一年，奥古斯都的行省指挥权和军权被延长了十年。提比略曾经的崇高地位得到了恢复，又一次攀升到之前仅阿格里帕享有的地位。但这一次元首的高级副手是他的养子，而不是女婿。这个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提比略的新身份并非完全对他有利。公元4年，他从一个古老贵族世家的族长（而且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变成了另一个家族的初级成员，从养父手中接受最高权力。一瞬间，提比略的财产都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成为奥古斯都财产的一部分，听凭他处置。波斯图穆斯也是这样，所以阿格里帕庞大家产的剩余部分都转入了他的老友手中。根据罗马的法律和传统，父亲拥有很大权力。他可以断绝与养子的关系，但养子没有办法取消收养关系。被收养之后，养子的政治和财政独立性就丧失了；儿子公开反对父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肯定也是非常丢人的。[9]

提比略小心翼翼地表现出自己非常重视这个新地位，在养父奥古斯都在世时始终对他毕恭毕敬。李维娅和她的儿子（当然如今也是她丈夫的儿子）显然对新局面非常满意，很可能是他们曾在幕后推动奥古斯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获益最大的其实是奥古斯都，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是被操纵的。他如今有了一个中年儿子，一个少年儿子，还有两个孙子，在近期和远期都有了亲密助手，而且儿孙数量这么多，足以应付任何新的打击（如夺走了盖乌斯和卢基乌斯的噩运）。他又一次适应了新情况，从自己家族中选拔了一群亲密同僚。在前6年之前，提比略曾表示自己持续奔波劳顿，感到非常疲惫。但在公元4年年底之前，他出征日耳曼，随后十年一直在非常活跃地治国理政。他的长期退隐可能给了他新的工作激情，但奥古斯都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并自信一定会得到他的服从，就像当年驱使阿格里帕那样驱使提比略辛勤工作。[10]

新身份让提比略付出了艰辛努力，也剥夺了他的独立地位，但这样一位成熟而显赫的贵族心甘情愿地接受另外一人的收养（即便那是至高无上的元首），的确出人意料而且是史无前例的。这或许最能解释奥古斯都的话，即他“这么做，是为了共和国”。这样的事情，对于置身其中的双方的决定，都需要一番解释。虽然经验丰富的提比略对奥古斯都而言是最方便的选择，但他也完全可以继续将提比略排除在政坛之外，而且那样对国家安定也不会构成什么严重威胁。完全可能有人敦促奥古斯都选拔其他人。狄奥和塞内卡记述了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领导的一次未遂的阴谋，不过讲得都很糊涂，令人难以置信。这起阴谋东窗事发，奥古斯都原打算处决秦纳，却被李维娅劝阻了。李维娅显然非常有说服力，奥古斯都居然打算支持秦纳竞选，并确保他成为下一年的执政官之一。[11]

狄奥还说罗马有人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尤利娅。这让我们怀疑这些示威是有人操纵的，至少是受到了那些希望从尤利娅重获自由一事当中获益的人的鼓励。狄奥说这些示威发生在公元3年，但也有人说是公元4

年，还有人将这些示威看作更广泛的社会骚动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元首坚决拒绝释放尤利娅，宣布除非水火交融，否则他绝不原谅自己的女儿，于是群众将燃烧的火炬投入台伯河，说水火交融了。公元3年，尤利娅最终被允许返回意大利本土，在瑞吉昂附近度过余生，对她的监禁只是比以前放松了一点点。我们的史料不能说明她享有足够的自由，能够和那些要求释放她的人接触。同样，拒绝释放尤利娅并没有损害奥古斯都自己的声望。公元3年年初，他在帕拉丁山的府邸失火，损坏严重。许多社区和个人纷纷表示愿意出资帮他修缮府邸。奥古斯都从这些热心人那里只接受了象征性的一点钱，让他们参与重建工作，不过我们不知道其余的钱是被退回了，还是被用于公共工程。[12]

公元4年，奥古斯都被授予执政官权力，以便开展一次不完整的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没有包括贫困公民和居住在意大利之外的人，只是重新登记了那些自称拥有至少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财产的人。与此同时，他重新审核了元老花名册，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相信他这么做是为了除掉提比略或波斯图穆斯的潜在敌人。这很可能仅仅是之前努力的延续，目的是审查那些行为或身份可疑的人。有些人为了达到获得元老资格所要求的财产标准，可能要费一番力气。我们听说，十年后，演说家霍尔腾西乌斯的孙子养了四个儿子，但财产只有12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因此没有办法把财产分割以让四个儿子全部都成为元老。公元4年，元首向八十名元老赠送金钱，好让他们达到元老阶层的财产资格标准。有人说，从这时到奥古斯都去世，提比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执政官的人选。提比略很有可能在举荐人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古斯都也是如此，但他们推举的人选都不是令人特别意外，全都是那种即使不受他们推举也很可能当上执政官的人。[13]

这一年颁布了一项新法律，加强了近期其他一些立法，并详细规定了如何对待奴隶，尤其是如何授予其自由，最重要的是限制了遗嘱中能够解放的奴隶的数量，以及年轻的奴隶主能够解放的奴隶的数量，还具

体规定了释奴对其原主人的义务。奥古斯都对太多释奴增加了罗马公民的数量感到担忧，害怕罗马有太多人获得免费领取粮食的资格。但其他措施继续保护释奴，赋予他们公民权（尽管有一些限制），并奖励那些生育很多儿女的释奴（其他生养多的公民也会得到奖励）。释奴当中包括许多勤奋而非常成功的人，在罗马城的各个小区发挥重要作用，有时在其他地方的城镇能够成为当地显贵。奥古斯都认真地扶持这些人，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就像他对其他社会群体那样。从公元4年的立法和其他活动来看，这一年没有发生大幅度的权力转移或政府方向变换，而是“生意照常”。[14]

自汉尼拔以来的最大危险

这一年结束前，提比略领兵在莱茵河以东作战。冬季，他短暂地回到罗马（每年他都会这么做），随后返回前线，在次年春季指挥了一场新的军事行动，至少前进到易北河。此次行动针对的是一些已经处于罗马影响之下地区的领袖和部落，这说明他们在抵抗罗马，或者对罗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该地区的其他社区似乎已经接受，甚至欢迎罗马人的统治。考古发掘证明，在1世纪初的瓦尔德吉尔姆斯[15]至少有一座罗马风格的城镇被建立起来，距离征服日耳曼战争时期的罗马军事基地不远。有迹象表明，还存在与其类似的社区。对该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城市生活方式（它从根本上是属于罗马的）还没有什么吸引力，但这并不是说将来不会发生变化，毕竟其他行省被罗马征服之后就发生了变化。[16]

罗马人计划在公元6年开展一场规模更大的行动，希望扩张新领土，而不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征服。攻击目标是马科曼尼人的国王马罗博杜斯。马科曼尼这个部族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支系——苏维汇人。苏维汇人的习俗是把头发在头顶或两侧绾成髻，这就是有名的苏维汇发髻。马罗博杜斯聪明、有领袖魅力，而且无疑也是一位本领高强

的军事领袖，他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帝国，囊括很多族群以及他自己的部族。他控制着现代波西米亚的大部分，即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他至少在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待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作为人质。他回到家乡的初期可能得到了罗马人的支持。维莱伊乌斯说马罗博杜斯“血统是蛮族，智力却不是”，并说他统领着一支特别强大的王家军队，拥有很多常备军。维莱伊乌斯说这些士兵的训练几乎达到了罗马标准。这肯定是夸大其词了，不过马罗博杜斯的确是日耳曼各部落好几代人中出现的最强大领袖。他的领地与日耳曼、诺里库姆和潘诺尼亚这三个罗马行省接壤。尽管他接纳了从这些地区逃亡的人，但即便维莱伊乌斯也明确表示马罗博杜斯并没有对罗马人采取敌对行动。维莱伊乌斯只是说，马罗博杜斯的使者有时对罗马非常恭顺，有时却敢于“大言不惭，仿佛他们和罗马是平等的”。[17]

外国领导人的“傲慢”就足以让罗马人采取行动了，至少要展示一番罗马的力量。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互相畏惧和猜忌更使得局势恶化。马罗博杜斯加强自己的力量，以便自卫，被罗马人视为威胁。罗马人从驻扎在日耳曼的军队抽调部队，组成了一支强大力量，交给军团长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指挥，他是一位经验丰富而成熟稳重的前任执政官（前19年担任执政官），在前一年支持提比略的作战中凭战功荣获“凯旋式符号”的奖励。萨图尔尼努斯的部队将从北面攻击马罗博杜斯，而提比略会率领另一支大军（来自多瑙河沿线驻军）从南面进攻。公元6年秋季，攻势开始了。两支罗马军队穿越了居住在罗马各行省与马罗博杜斯王国之间的部落。没有发生交战，日耳曼国王没有积极的动作，而是退后，直到两支罗马军队几乎会师，距离日耳曼军队只有几天路程。就在马罗博杜斯将要被迫选择战斗或屈服的时候，消息传到罗马军中，罗马的巴尔干各行省爆发了严重的叛乱，于是形势大变。提比略向马罗博杜斯提出了恢复和平的条件。国王不想冒险与罗马人交战（除非他别无选择），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于是罗马军队调头撤退，去处置更紧急的叛乱。[18]

罗马人原先志得意满地以为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很平稳安定，但这两个行省的叛乱却迅速蔓延。就像很多叛乱一样，这里的新一代长大成人了，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被罗马人打败的滋味，于是自负地反叛罗马。据说当罗马人在伊利里库姆征召辅助部队以对付马罗博杜斯时，当地部族看到了自己的人数，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很强的力量。罗马统治者对行省居民的征发（不管是征召人力、牲畜、庄稼支持罗马军队，还是直截了当地要钱）往往给人民造成沉重负担，尤其是如果负责征发的官员笨拙或腐败，或二者兼而有之的话。一位叛乱领袖后来宣称："这事全怪你们罗马人，因为你们派来保护羊群的，不是牧羊犬或牧羊人，而是恶狼。"[19]

外省居民心中酝酿着不满，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强大，尤其是看到自己地区的罗马驻军的精锐部分被调去征服波西米亚，于是叛乱爆发了。各行省的罗马商人和其他平民最先遭到攻击。罗马的军事原则是尽可能快速地处理任何叛乱迹象，用能够快速集结的任何部队发起镇压。无动于衷会被视为软弱无能，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叛乱。但这样快速反击的风险在于，部队往往力量很弱，无法对付任何顽强的抵抗。若是罗马军队战败，不管失败是多么微不足道，都会鼓舞叛军，壮大其力量。我们不清楚这场叛乱的细节，但罗马人可能没有迅速镇压叛乱，可能还遇到了一些小挫折。至少有一次失败比较严重，维莱伊乌斯记载道，一支罗马军队的老兵们遭到屠杀。[20]

其他行省也出了麻烦。大约在这个时期，阿非利加（最后一个有驻军的元老院行省）边境发生了军事行动。亚细亚的伊苏利亚[21]也出了问题。也是这一年，负责管辖叙利亚的帝国总督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率领主力部队干涉了犹太地区。大希律王的儿子阿奇劳斯非常不得民心，被罗马人剥夺了王位，流放到高卢，舒适地安度余生。大希律王王国的很大一部分改由罗马人直接管辖，变成了一个罗马行省。不同寻常的是，这个行省的总督是一位骑士身份的长官，而非元

老身份的总督，这是埃及之后第二个由骑士掌管的行省，不过后来会有更多这样的行省。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奎里尼乌斯开始主持一次人口普查。这是犹太人第一次接受人口普查，直接向罗马人交税，而不是交给当地国王。很快爆发了一连串的暴力活动。罗马人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以暴制暴，而且迅速取得成效，就像前4年大希律王死后的情形一样。[22]

六十九岁那年，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同时在多条战线上遇到严重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似乎丧失了斗志。普林尼说奥古斯都陷入了绝望，一连四天不肯吃饭，并宣布自己打算死去。叛乱的伊利里库姆是距意大利最近的行省之一，那里的叛乱从一开始就规模浩大。奥古斯都对该地区有亲身体验，所以知道那里的武士多么凶悍，地形多么不利于罗马军队。起初他没有办法知道波西米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马罗博杜斯选择战斗而不是接受和平，那么就很难从那个战区抽调大量部队去镇压伊利里库姆的叛乱。而帝国其他地区的军队要么太遥远，无法迅速赶到伊利里库姆，要么已经在处理其他问题。在意大利，他只有9个大队的禁卫军、少量日耳曼卫队、城市大队和帝国舰队，这些兵力加起来也不能算作可用的野战军。[23]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奥古斯都还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军费重组，目标是设立长期性的、可持续的军费。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奥古斯都建立了军事国库，自掏腰包为其提供了1.7亿塞斯特尔提乌斯，并指定三名前任裁判官担任军事国库的管理者，任期三年。军事国库的资金被用来支付士兵的军饷，以及士兵退伍时的奖金（现在士兵退伍后一般不会得到土地，而是发放一笔奖金）。此时共有28个军团，为了延缓发放退役奖金从而削减开支，兵役期从十六年延长到了二十年，如果继续服五年兵役，则被称为老兵（伊利里库姆叛乱初期被屠杀的就是这种老兵）。即便如此，长远来看还是需要稳定的资金流。为了提供这笔资金，奥古斯都征收了5%的遗产税，任何非直系亲属的人

若要继承财产，都需要交纳遗产税。这是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对居住在意大利的公民征收直接税，从一开始就受到群众的普遍怨恨。[24]

面对迅速蔓延的叛乱，当务之急不再是谋求长期稳定性，而是迅速征召新的军队来镇压叛乱。奥古斯都在元老院宣布，除非迅速采取措施，否则叛军十天之内就能打到罗马。还有人将此次危机与罗马和迦太基的大战相提并论。数十年来当局第一次在罗马城征兵，但没有足够的志愿兵，于是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征兵，并接受那些往常因为身体状况或职业而不被接受的人。当局组建了新的大队，不过我们不确定这些大队将来要被军团吸纳，还是仍然作为独立单位。与此同时，政府要求富人交出一些奴隶。这些奴隶被赋予自由和公民权，然后编入特别大队，称为“罗马公民志愿大队”。这个番号以不同的服装和装备，将他们与在军团服役的生来就是自由人的公民区分开。[25]

富人被要求尽自己的义务，担任现有军队和新部队的指挥官。奥古斯都要求大家自愿报名，尤其是元老和骑士阶层的青年。多年来，他鼓励骑士阶层培养一种比以往更强的身份认同，任命盖乌斯·恺撒和卢基乌斯·恺撒为骑士阶层名义上的领袖，并恢复了一年一度的骑士（那些根据传统有资格作为骑兵服役的人）游行，并将骑士身份仅局限于那些年龄和身体状况适合服兵役的人。在这个危机时刻，骑士们不是作为骑兵服役，而是担任辅助单位的指挥官，并在军团中担任军事保民官。公元6年，一些骑士主动报名，其他人若是受到国家征召，也愿意参军。有少数人不愿意参军，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一位骑士父亲切掉了儿子们的大拇指，这样他们就不符合参军的身体资格。奥古斯都下令对此人进行审判、定罪，最后的处罚是将他卖为奴隶，并将其财产拍卖。此人属于一个包税人公司（这种公司仍然从政府承揽合同，征收一些税赋），他的同事们开价要买他，于是元首以象征性价格将他卖给他先前的一名释奴。于是犯人被送到一座乡间别墅当奴隶，但没有受到虐待。[26]

各阶层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为国效力，这只是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对罗马的所有居民来说，火灾仍然是严重的威胁，近期的几次火灾迫使奥古斯都组建了7个火警队，每个队负责城市的2个区域，作为消防队和夜间巡逻队。火警队的绝大多数人员都是释奴，因为罗马人口的很大组成部分是释奴，也说明当时各种人力都很缺乏。为了给火警队提供资金，政府以奴隶售价的2% [27] ，对奴隶贸易征税。此外还有粮食短缺的问题，原因可能是收成不好，或者将粮食运往罗马有困难。多余人口（包括角斗士和等待出售的奴隶）被禁止进入城市100英里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一些公共事务被暂时停止，元老被允许待在乡间、不来参加元老院会议；另外实施了豁免，以便元老院不足法定人数时的投票也算有效。 [28]

不足为奇的是，在这些令人忧心忡忡的时期，有人暗暗表达着不满。一些匿名小册子在流传，或多或少公开地暗示要闹革命。很难说攻击的对象是元首还是他身边的人；也许是其他行政长官和元老被人民责怪，不得民心。狄奥说，人民将骚动的大部分罪责归于一个叫鲁弗斯的人，此人自称普布利乌斯，而苏埃托尼乌斯说他姓普劳提乌斯。但大多数人相信此人身份低微，也不够聪明，所以不是真正的策划者。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些骚动与那些相信应当让李维娅的子孙下台、让尤利娅及其亲人上台的人有关系。狄奥认为，遗产税是人民不满的原因之一。但遗产税只会影响到那些拥有相当多财产的人，所以历史学家们怀疑尤利娅亲人的支持者进行了政治操纵，希望放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但这样的理论只是猜测而已。 [29]

粮食短缺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促使奥古斯都拒绝在他的生日当天举办公共宴会。他派遣几位前任执政官去改善粮食供给制度，同时自掏腰包为罗马城有资格接受免费粮食的人提供额外食物。渐渐地，粮食供应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更适合庆祝的时候到了。为了纪念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角斗士比赛得以举办，由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主持。克

劳狄身体虚弱，常常抽搐和口吃，显然不适合从政，因为从政就有军事义务。克劳狄的母亲说他是“自然未完成的怪胎”，喜欢骂别人“和我儿子克劳狄一样笨”。但在这个阶段，他被认为可以出席公共场合，尽管在观看角斗士比赛时他穿一件厚斗篷而不是通常的托加袍，可能是为了掩盖外貌。提比略在广场重建的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落成时，又纪念了德鲁苏斯。神庙中将提比略称为“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克劳狄阿努斯”，以赞颂他原先的家族背景和如今的恺撒之名。[30]

尤利娅的孩子们

我们对波斯图穆斯被收养之后几年的情况了解不多。公元5年，他成年了，举行了公开成年礼，但没有大肆宣扬。不过这也比克劳狄的成年礼要强。借着夜色，克劳狄被匆匆带进复仇者玛尔斯神庙，而后又被偷偷带出来。亲人们还没有拿定主意，要在多大程度上将克劳狄展示给公众。波斯图穆斯还年轻，所以他还没有扮演公共角色，也不奇怪。与克劳狄不同，波斯图穆斯健壮而活跃，但我们的史料都说大家对他的性格和智力有怀疑，含糊地暗示他性格凶暴、行为不端，但没有具体说如何不端。值得记住的是，他母亲出丑闻的时候，他还不到十岁，并且亲眼看到她被流放，他的两个哥哥都得到迅速提升，享有广泛赞誉，他自己却没有。或许他开始努力迫使大家更好地认可他。[31]

公元5年，奥古斯都改革了百人会议的投票制度，从最高阶层中组建了10个新百人团，并以盖乌斯和卢基乌斯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们。这10个百人团最先投票，其他百人团很可能会效仿他们，因为罗马选民喜爱站在胜利者一边。这次改革可能是偶然的，也是让国家机构更顺利运作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肯定有利于防止前6年的事件（选民们选盖乌斯·恺撒为执政官，尽管他根本不是候选人）重演。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可能觉得，波斯图穆斯是他们飞黄腾达的良机。这个少年可能说了一些不明智的话，或者有不妥的举动，渐渐失去了奥古斯都的信任。公元7

年，人们期待十七岁的波斯图穆斯会得到一个公共职位以及某些新建部队的指挥权，率军开赴潘诺尼亚作战。但这个职位被交给了日耳曼尼库斯。[32]

波斯图穆斯似乎是逐步垮台的。起初，他遭到训斥，被送往那不勒斯湾的苏伦图姆（今天的索伦托），他在那里终日钓鱼。随后奥古斯都正式断绝了与他的父子关系，他不再是一位恺撒，而变回了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他的生父留下的财产没有归还给他，因为奥古斯都把这笔钱的大部分投入了军事国库。波斯图穆斯为此大声抱怨，尤其是攻击李维娅，于是最终他被流放到科西嘉岛附近的小岛普拉纳西亚[33]，受到严密监视。古典世界已经散播着这种怀疑：提比略及其母亲急于除掉潜在的未来竞争对手。今天仍然有学者相信这种理论。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更可能的是波斯图穆斯自掘坟墓。奥古斯都在此事当中，和在其他很多事情中一样，可能受到了妻子的引导，但他亲眼看着这孩子长大，应当对他的天性有很好的把握。有人说奥古斯都家族愿意容忍克劳狄所谓的迟钝和羸弱，所以应当也会容忍波斯图穆斯的愚蠢或更糟的情况。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克劳狄不是恺撒的养子，也不被认为是他的继承人之一。[34]

波斯图穆斯是元首唯一的外孙，所以在公元4年没有办法轻易地忽略他，除非把他关在什么地方。奥古斯都可能已经怀疑这孩子品行有问题，但希望他改过自新，长成一个沉稳能干的男子汉。波斯图穆斯在被收养之后也没有得到公共角色，这主要是因为奥古斯都的谨慎，而不是提比略或他母亲对波斯图穆斯的嫉妒和猜忌。波斯图穆斯没有进步，于是奥古斯都摈弃了他。塔西佗后来说，波斯图穆斯并没有真正犯罪，很难说是不是他的某个举动促使奥古斯都放弃了他。政治竞争肯定发挥了作用，但史料的判断——他被流放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性格和人品——很可能是正确的。[35]

公元7年，日耳曼尼库斯率军前往潘诺尼亚，开始证明自己是一位优秀将领。他的角色仍然是比较次要的，其他部队也有自己独立的指挥官。历史学家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自豪地告诉我们，他就是指挥官之一，没有履行当年财务官的职责，而是领兵作战。提比略是最高统帅，他在前一年匆匆赶到了平叛前线。这是一场艰难的战役，附近各行省遭到邻国部族的攻击，于是一些原本肩负平叛任务的罗马部队被调走。这又一次证明，罗马人非常幸运，因为马罗博杜斯愿意讲和而不是利用罗马暂时的弱势趁火打劫。从此之后，马罗博杜斯成为罗马的坚定盟友，并因此获得了更巩固的地位。[36]

战斗规模宏大，常常非常残酷，因为很多叛军曾在罗马军中作为辅助士兵服役。他们懂拉丁语，知道罗马军团如何运作，而且他们比大多数部落武装都更加遵守纪律。有好几次，罗马远征军被遏制住，不得不撤退，或者在蒙受严重损失之后才取胜，好几支被包围的驻军在千钧一发之际得到救援。有一段时间，提比略统领着自内战以来最强大的罗马军队，包括10个军团、70个辅助大队、14个辅助骑兵单位、1万名老兵（这里老兵指的应当是重新入伍的退伍军人，而不仅仅是处于兵役末期的资深士兵），以及色雷斯国王和其他友邦提供的盟军。提比略的这支大军相当于整个罗马军队的三分之一以上，比尤利乌斯·恺撒指挥过的任何军队都更庞大。提比略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太大，无法有效地保障后勤，也难以控制，于是不久之后就将其分割成多支野战军。不过这还不包括所有被派去平叛的部队。讨伐潘诺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的罗马军队共计15个军团，还有数量差不多的辅助部队。因此，为了镇压一个行省的叛乱，相当于罗马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参加了艰苦的作战。[37]

这是自亚克兴角战役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比之前更加艰难。关于叛军进逼罗马的说辞是耸人听闻的，但这场战争确实与前30年以来的历次规模较小的战争迥然不同，其规模大得多，取胜也更艰难。在一段

时间内，或许只是非常短的时间，这场战争威胁到了奥古斯都的领导。奥古斯都政权素来宣称，罗马人民及其元首被诸神赋予持续的、不可阻挡的胜利，因为美德和虔诚使得他们有资格得到这种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不过重复了那么多遍的主题往往被宣传对象信以为真。罗马可能输掉一场战争、丢掉一个行省的前景令人震惊，意味着罗马人已经丧失了诸神的恩宠，不再有资格获得胜利。这足以解释为何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在战争开始时险些崩溃："他创造的一切，似乎都受到了威胁。即便在他恢复勇气之后，也有迹象表明他心里还是害怕，一个表现就是，他后来不耐烦地说，提比略赢得不够快。"[38]

公元7年，奥古斯都庆祝了七十岁生日。有很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已经非常衰老了，健康在走下坡路。次年，他开始减少自己的工作量。三位前任执政官被派去接待盟邦领导人和外省社区的大部分使团。这些使团仍然不断来到罗马，向元首请愿，或者仅仅来赞颂他。他参加元老院会议的次数大大减少了。虽然他还继续主持司法听证会，但部分会议在帕拉丁山上的家中举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选举的时候，他不再亲自参加并表示自己对得宠候选人的支持，而是简单写下他推荐的人的名字，展示给选民。但我们不应当夸大他的虚弱，况且他旧日的坚定还会不时表露出来。公元8年，也可能是在其他年份，他旅行到意大利-伊利里库姆边界上的阿里米努姆（今天的里米尼），以便接近战区。[39]

公元7年又出现粮食匮乏的情况，导致更多骚乱。次年的选举被暴乱打断，以至于无法进行，于是奥古斯都任命了所有行政长官。据我们所知，这些暴乱是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造成的，他们都与支持提比略及其家人或被抛弃的波斯图穆斯的派系没有关联。但在公元8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小尤利娅因通奸罪被公开谴责，和她母亲一样被流放到一个岛上。这一次只有一个情夫被指名道姓，就是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他得到通知，他已经失去了恺撒的友谊，必须"自愿"流亡。我们不了解小尤利娅的丈夫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的命运，不过

因为罪名是通奸，所以他应当还活着。保卢斯在公元1年担任执政官，但没有得到其他高级岗位，而且被苏埃托尼乌斯列入阴谋反对奥古斯都的密谋者之中。苏埃托尼乌斯没有指出保卢斯阴谋反对奥古斯都的时间，也没有记载他具体做了什么。因此如果小尤利娅出丑闻时他还没有被流放，那么他阴谋反对元首一定发生在她出事之后。小尤利娅在几个月后生了一个孩子，但奥古斯都不准抚养这孩子，而是把孩子弃于荒野。这显示了一家之主以及元首享有的生杀予夺大权。[40]

诗人奥维德卷入了此事，他没有受到正式指控或审判，而是被命令自行前往黑海之滨的托米城[41]，留在那里等候指示。托米位于帝国的边缘，也是希腊-罗马文化的边缘。他在那里写了许多诗，恳求宽恕回国。遗憾的是，它们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丑闻的更多细节。不过考虑到事件的敏感性质，这也不足为奇。奥维德被责怪做了某些不谨慎的事情，可能是看到了他不应当看到的事情，另外他的《爱的艺术》也被认为有伤风化（这部诗已经流传了至少十年，因此算不上新鲜事）。年迈的奥古斯都如今元气渐渐衰竭，更容易发怒，可能觉得这部诗欢快地赞扬婚外情，对年轻人的影响十分恶劣。不过，奥维德的另外一桩罪行可能更严重。[42]

总的来讲，整个事件仍然迷雾重重。学者们肯定觉得性丑闻背后有政治阴谋，尤其是因为保卢斯被指认为密谋者之一。具体是什么阴谋，众说纷纭。根据他当时是否还在罗马，有不同解释。不过学者们总是认为，此事对提比略及其亲人作为帝国接班人的地位发起了挑战。有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理论是，小尤利娅和西拉努斯企图结婚，甚至举行了一个仪式（奥维德可能目睹了这个仪式），以某种方式迫使元首提携自己外孙女的新丈夫。但这只是猜测，而且不管多么有吸引力，其他的解释也能覆盖我们知道的少得可怜的事实。如果真有阴谋，肯定没有什么结果，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筹划得很幼稚，执行得很差劲。小尤利娅可能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她开始搞婚外情或

危险的政治阴谋（或二者兼有）。奥古斯都晚年说两个尤利娅和波斯图穆斯是他的“三个疖子”或“三处溃疡”，所以他们的罪行可能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违背他的意愿，而不是野心勃勃的夺权阴谋。[43]

不管怎么样，结果都是一样的。李维娅的家系将会主宰皇位继承，这可能是秘密权力斗争的胜利，也可能是偶然为之的结果。公元9年，提比略返回罗马，凭借成功镇压巴尔干叛乱的战功荣获凯旋式，这是他理所应得的。他的工作做得虽然慢，但很彻底，据说在战争晚期对叛军恩威并施，以武力配合和解。至少有一次，一名叛军高级将领被宽恕，这在任何战争中都是罕见的事情，更不用说在叛乱中了。更有力的证据是，这些地区再也没有发生过叛乱，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将是罗马帝国一个稳定而欣欣向荣的部分。看样子危机结束了，胜利换来的和平可以继续统治天下了。就在这时，从日耳曼传来消息，那里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军事灾难。

---

[1] Velleius Paterculus 2.103.1-2.

[2] Suetonius，*Augustus* 65.2.

[3] Pisa（*ILS* 140）的一份铭文明确表示，到4月2日，那里的人已经得知盖乌斯的死讯，消息一定在此之前就传到了罗马城；对这一年的决策的讨论，见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p.443-56；关于恺撒的名字，以及恺撒家族与其住所的联系，见D.Wardle，‘Valerius Maximus on the Domus Augusta，Augustus，and Tiberius’，*Classical Quarterly* 50（2000），pp.479-93。

[4] Suetonius，*Caligula* 4.1；关于概况，见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47-52，R.Seager，*Tiberius* （2005），pp.29-32；关于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及其家族，见R.Syme，*The Augustan Aristocracy* （1986），pp.104-27。

[5] Suetonius，*Tiberius* 12.2-3，15.1，Velleius Paterculus 2.102，Tacitus，*Ann* .3.48.

[6] Dio 55.13.1a-2，Velleius Paterculus 2.103.1-104.1，Suetonius，*Tiberius* 15.2，相关讨论见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尤见.pp.444-8。

[7] 引文来自Velleius Paterculus 2.104.1；讨论见Crook in *CAH2* X，p.105，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49-50，R.Seager，*Tiberius* （2005），pp.29-32；奥古斯都给提比略的信，见Suetonius，*Tiberius* 21.2-6。

[8] 李维娅的参与，见Dio 55.10a.10，Pliny，*NH* 7.149，Tacitus，*Ann* .1.3，Suetonius，*Augustus* 65.1，with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52-9，241-2；关于两个家族之间更广泛的竞争，见B.Levick，'Julians and Claudians'，*Greece and Rome* 22（1975），pp.29-38。

[9] Dio 55.13.2.Suetonius，*Tiberius* 16.1声称此次授权仅为三年，但*Res Gestae* 6 Augustus表明授权更有可能是十年。

[10] Suetonius，*Tiberius* 15.2谈及提比略认真对待自己被收养。

[11] Dio 55.13.1，14.1-22.2，Seneca，*de clementia* 1.9.1-10，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54，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447，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131-3，Syme，R.，*The Augustan Aristocracy* （1986），p.266.

[12] Dio 55.12.4-5，Tacitus，*Ann* .1.53.

[13] Dio 55.13.4-7，概况见C.Nicolet，'Augustus，Government，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89-128；霍尔腾西乌斯·霍尔塔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在公元16年，见Tacitus，*Ann* .1.37-8，及C.Nicolet，'Augustus，Government，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95-6；关于选举，见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51-4。

[14] 有价值的介绍，见Treggiari in *CAH2* X，pp.893-7。

[15] 在今天德国西部黑森州的拉瑙县。

[16] Dio 55.13.1a，29.5-7，Velleius Paterculus 2.104.2-107.3；对拉瑙-瓦尔德吉尔姆斯的考古发掘的概述，见R.Wolters，*Die 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 （2008），pp.65-9。

[17] Velleius Paterculus 2.108.1-109.4；关于马科曼尼人和苏维汇人的概况，见Tacitus，*Germania* 38-41，Strabo，*Geog* .7.1.3。

[18] Velleius Paterculus 2.109.4-110.2，Dio 55.28.6；在据说由Maroboduus创作的辞藻华丽的演讲稿中，罗马人调动了12个军团去对付他，Tacitus，*Ann* .2.46。

[19] Dio 56.16.3（Loeb translation）.

[20] Dio 55.29.1-30.6，Velleius Paterculus 2.110.2-6；罗马军队对叛乱的应对，见

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79-95。

[21] 大约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的安塔利亚省。

[22] Dio 55.27.6-28.4，Josephus，*BJ* 2.111-118，*AJ* 17.314.

[23] Pliny，*NH* 7.149谈及他企图自杀。

[24] Dio 55.24.9-25.6，*Res Gestae* 17，with 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47-8.

[25] 见Suetonius，*Augustus* 25.2，Velleius Paterculus 2.110.6-111.2，with 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68-9，引用V.Ehrenberg & A.Jones，*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1975），p.368讲到征召公民。

[26] Suetonius，*Augustus* 24.1，概况见C.Nicolet，‘Augustus，Government，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in F.Millar & E.Segal（eds），*Caesar Augustus.Seven Aspects* （1990），pp.99-101。

[27] 也有说法是4%。

[28] 警备队，见Dio 55.26.4-5，with G.Watson，*The Roman Soldier* （1985），pp.19-20；关于其他问题，见Dio 55.26.1-27.3。

[29] Suetonius，*Augustus* 19.1，Dio 55.27.1-2，with 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p.450-52，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55-9，及T.Wiedermann，‘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Ovid’s *Tristia* 2’，*Classical Quarterly* 25（1975），pp.264-71，esp.265-8。

[30] Dio 55.26.2-3，27.3-5，Suetonius，*Claudius* 2.2.

[31] Dio 55.32.1-2，Suetonius，*Augustus* 51.1，65.1，*Claudius* 2.2，Velleius Paterculus 2.112.7，Tacitus，*Ann* .1.5-6，with 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p.446-52，及B.Levick，‘Abdication and Agrippa Postumus’，*Historia* 21（1972），pp.674-97，尤见690-93。

[32] Dio 55.32.1，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51-2，A.Jones，‘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JRS* 45（1955），pp.9-21，尤见13-17。

[33] 今称皮亚诺萨岛，在意大利本土与科西嘉岛之间。

[34] Dio 55.32.1，with B.Levick，‘Abdication and Agrippa Postumus’，*Historia* 21（1972），pp.690-97，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p.448-51，455-6，及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 （2002），pp.57-65。

[35] Tacitus，*Ann* .1.3.

[36] Velleius Paterculus 2.111.3-4；关于此次战争的概况，见Dio 55.29.1-32.4，34.4-7，56.11.1-17.1，Velleius Paterculus 2.110.1-116.5。

[37] Velleius 2.113.1-2，Suetonius，*Tiberius* 16.1，with 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35-7，116-25.

[38] Dio 55.31.1讲到，奥古斯都相信提比略作战不力，进展不够快，这与他此前敦促将领小心谨慎形成了对比，Suetonius，*Augustus* 25.4。

[39] Dio 55.33.5-34.3.

[40] Suetonius，*Augustus* 65.1，4，72.3，101.3，Tacitus，*Ann* .3.24，4.71，Pliny，*NH* 7.75，with R.Birch，‘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p.452-4，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432，468，与（1986），pp.115-27，188-99。

[41] 今天罗马尼亚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

[42] Ovid，*Tristiae* 2.207讲到“两起罪行，一首歌谣和一个错误”；讨论见R.Syme，*History in Ovid* （1978），pp.206-29。

[43] Suetonius，*Augustus* 65.4，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55-62，Crook in *CAH2* X，pp.108-9都对这个问题做了谨慎的讨论。

二十二 奥古斯都盛世

奥古斯都盛世笼罩着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边境，保护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免遭土匪劫掠。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 [1]

罗马人非常善于吸纳被征服的族群，并劝说他们（或至少是他们的领袖），支持罗马的统治并加入征服者一方对他们更有利。阿米尼乌斯就是这样一个光辉例证。他生于约前18～前15年，属于切鲁西部族（日耳曼人的一支，领地在莱茵河以东，靠近威悉河）的王族。除了他之外，部族里还有几个贵族拥有王族血统，但在日耳曼部落松散的社会与政治架构中，王权的地位并不高，所以出身王族未必能够主宰部落。阿米尼乌斯的父亲西吉莫尔仅仅是争夺部族权力的几个权贵之一。西吉莫尔可能参加过前1世纪末反抗罗马人的战争。即使是这样，他也很快向入侵者投降了。西吉莫尔也完全可能从一开始就认为，与罗马结盟能够帮助他战胜当地的竞争对手。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领袖都是这样，将罗马军队的强大力量视为可以帮助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威胁。

罗马人从切鲁西部族招募辅助士兵，年轻的阿米尼乌斯起初就是这样一个辅助单位的指挥官，与罗马人并肩作战。他的弟弟弗拉乌斯很快也追随他，加入罗马军队。兄弟俩可能都曾作为人质在罗马生活，居住在帕拉丁山上的奥古斯都府邸，和元首家族的孩子们一起接受教育。不过对此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兄弟俩肯定都会说非常流利的拉丁语，这样比较容易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奥古斯都更愿意将公民仅限于那些他认为有资格成为罗马人的人。阿米尼乌斯在罗马军中参加了很多军事行动，可能在日耳曼作战，也可能在镇压伊利里库姆大叛乱的队伍中。他被授予骑士身份，后来在公元7年返回家乡，成为切鲁西人的重要领袖之一。在新建的日耳曼行省，骑士身份所需的至少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是一大笔钱。阿米尼乌斯很富有，而且是久经考验的罗马盟友，常常是日耳曼行省总督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的座上客。[2]

瓦卢斯五十多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省总督，曾在阿非利加和叙利亚任职。他于前13年和提比略一起担任执政官，先娶了阿格里帕的一个女儿，后来娶了奥古斯都的甥孙女克劳狄娅·普尔科拉[3]。元首显然认为瓦卢斯是个忠诚可靠的部下。公元7年，瓦卢斯奉命统领日耳曼，管辖莱茵河边境和向易北河延伸的、正在发展的行省。他的任务是，在帝国的精力和资源集中于镇压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叛乱时，确保日耳曼地区的稳定。瓦卢斯手中有5个军团和大量辅助部队来支撑自己的权威，不过这些部队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可能已经被调往伊利里库姆。另外，征募新兵的困难意味着新兵不大可能被送往日耳曼。同时，无疑有很多雄心勃勃和精明强干的军官寻求到巴尔干的大战前线任职，以建功立业。瓦卢斯没有被派往前线，也没有被派往靠近叛乱地区的行省，说明奥古斯都认为他虽然能干但不是特别有才华，至少没有突出的军事才华。前4年，瓦卢斯担任叙利亚总督时，曾率军开进犹太，展示军力，平定了大希律王驾崩引发的骚乱，但此次行动很少有真正的战斗。据我们所知，瓦卢斯从来没有亲身参加过战斗。[4]

但日耳曼地区似乎一片安宁，原因之一是像阿米尼乌斯这样的当地贵族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到这时，阿米尼乌斯的父亲可能已经去世，但他的叔叔是瓦卢斯餐桌上的另一位常客，切鲁西人的贵族塞格斯特斯[5]也是如此。塞格斯特斯的幼子是新建的供奉罗马女神与奥古斯都的新崇拜仪式的祭司，祭拜地点在乌比部落的民政中心（即今天的科隆，由阿格里帕建造）。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公元5年，此后日耳曼基本上和平安定，只是偶尔有一些小规模的反对罗马的叛乱和零星的部落间冲突。在瓦卢斯统辖下，日耳曼酋长们开始采用向总督上诉而不是互相袭击的手段来解决争端。前不久建立的罗马平民定居点在扩大，它们的位置常常在旧军营或其附近。[6]

后来有人批评瓦卢斯简单地认为这个行省已经彻底安定，而不是处于被征服的过程中，还批评他藐视当地居民，认为日耳曼人“仅仅外形和说话像人类，虽然不会臣服于刀剑，却会屈服于法律”。但这些批评都是后见之明，不过这并不是说他的所有行动都是明智的或处理得很好。他开始向各部落定期收税，而在过去，各部落被罗马打败并臣服于罗马时，罗马人只会征收牛或粮食。他的税收可能很严苛，也可能不严苛，但毕竟是新鲜事，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被认为象征着日耳曼人不再是罗马的盟友，而是臣民。在罗马外省治理的漫长历史中，腐败是个司空见惯的问题，可能让日耳曼的局势变得更糟。维莱伊乌斯说瓦卢斯贪得无厌，在治理叙利亚期间，“上任前他是个穷人，叙利亚是个富裕省份；他离开时成了富人，叙利亚却变穷了”。[7]

日耳曼人对罗马的怨恨愈演愈烈，税收更是火上浇油。和在潘诺尼亚一样，最恨罗马的是那些从来没有与罗马军队交过手的较年轻武士。同时，看到罗马人从攻击马罗博杜斯的行动中撤退，在伊利里库姆花了很大力气却依然未能镇压叛乱，日耳曼人对罗马强大力量的畏惧也可能消失了。看来罗马人并非不可战胜，就连那些和罗马结盟而获益甚多的人也开始考虑，与罗马友好在将来是不是明智的政策。阿米尼乌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罗马骑士决定抛弃自己的罗马公民权，反抗罗马帝国。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时做出这个决定的，也不知道促使他反叛的动因又是什么。对自己和其他部落丧失独立而感到愤怒，是极可能的原因，同时他也不满意征服者对日耳曼人的待遇。虽然他已经是罗马公民，但可能觉得其他公民对他只是屈尊俯就。他的弟弟的名字弗拉乌斯是罗马人取的拉丁文名字，字面意思是“金发”，很难说这是侮辱还是亲昵的称呼，就像“红毛”“姜黄毛”“蓝蓝”这样的绰号。另外，我们也要考虑，或许阿米尼乌斯自己也有野心。他通过与罗马人结交，攀升到了很高的地位，成为自己部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或许觉得，现在继续效忠罗马也不会有晋升的希望了。近期事件表明，罗马不是不可战胜的。而率领自己部落和其他部落赢得自由的英雄必将获得极大的威望，得到更

大的、更永久性的权力，有希望成为马罗博杜斯那样强大的领袖。个人野心和对自由的渴望绝不是不能共存的，后来的事件肯定能说明阿米尼乌斯渴望统治的权力。[8]

但目前他还很谨慎，秘密而小心地筹划叛乱。公元9年春夏，瓦卢斯开始巡视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各地，带着3个军团，分别是第十七、十八和十九军团，另外还有6个辅助步兵大队以及3个骑兵单位。这是在展示罗马的武力，而不是出征，因为他不认为会遇到顽强抵抗。作为对各地骚乱的回应，瓦卢斯派遣小分队到许多自称感到受威胁、需要罗马保护的村庄和其他社区。他行进时接见各地的贵族，听取他们的请愿，并按照罗马总督的惯常方式仲裁他们长期而复杂的争端。到夏末，总督及其将士准备返回邻近莱茵河的冬季营地，这时传来消息，更东方的地区发生了叛乱。可能是阿米尼乌斯告诉他这个消息的。这起叛乱也是阿米尼乌斯暗地里安排的。瓦卢斯按照标准的罗马方式做出反应，就像他前4年在犹太做的那样，立刻率军去讨伐叛军。同样和在犹太一样，罗马军队刚刚出现，叛军的公开抵抗就瓦解了。[9]

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瓦卢斯于9月开始向西撤退。与原计划相比，他的返程比较晚，路程也更远。给养肯定已经不多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匆匆赶路，但没有理由觉得会遇到麻烦，所以这也不是严重的问题。他的部队可能有相当多的缺编，所以全军可能只有1万至1.5万作战人员。此外还有数千名奴隶，包括军队的奴隶（作为马夫、骡夫之类）和军官们的奴隶与自由侍从。瓦卢斯的军队在行军时不忘奢侈舒适，我们知道至少有一名军官带着一张镶嵌象牙的精美卧榻，所以军队受到大量运载行李的骡子和大车的拖累。军中还有一些平民，其中一些可能是为官兵提供物资的商贩，其他人则是旅客，在日耳曼部落待了一个季节之后乐于得到军队保护，还有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奥古斯都曾禁止在役士兵结婚，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禁令是前13年广泛军事改革的一部分，还是在公元6年或其他年份颁布的。禁令的原因可能是政府不愿意供养太

多的军人家属，或者向太多孤儿寡妇支付抚恤金，同时也是为了让军队能够随时行动，快速地从帝国的一端调动到另一端。有些士兵可能在禁令颁布之前结了婚，所以他们服役时有妻子。也有的士兵干脆无视这道禁令，结婚生子（尽管这是非法的），当局对这种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0]

在如此深入日耳曼的地方，没有宽阔而平整的罗马式大道。长达十多里的行军队伍沿着大车留下的蜿蜒老路，穿过树林、耕地、草地和沼泽。罗马人的路线是不难预测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必须始终走在道路上。阿米尼乌斯和其他部族领袖提供的本地向导帮助罗马人寻找道路，队伍缓缓行进，只有最基本的安保措施。瓦卢斯相信自己处于友邦领地，急于赶路，免得连绵秋雨将道路变成泥沼。他不认为自己会遇到威胁，所以也没有提高警惕；他相信，万一遇到麻烦，切鲁西人和其他部落提供的侦察兵会提前发出警告。塞格斯特斯突然告诉总督，阿米尼乌斯图谋造反，总督却无动于衷，肯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酋长在攻击另一个。阿米尼乌斯否认了塞格斯特斯的所有指控，毕竟他是罗马公民，是一名久经考验的骑士。大多数罗马人，就像大多数帝国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一样，都不愿意相信土著竟然拒绝接受与殖民者合作、享受他们“更优越”文化和统治的好处。[11]

过了一段时间，阿米尼乌斯离开了罗马人的行军队伍，说要去找更多的辅助部队、向导或其他帮助。但其实他是去与正在集结起来准备打击罗马人的日耳曼军队会合。随后一些天里，小股部族武装开始骚扰罗马队伍的一些部分，并在罗马人开始组织防御之前就撤退了。奥斯纳布吕克附近卡尔克里泽山的考古发掘显示，在大约20英里的距离，日耳曼人发动了一系列攻击，最后在卡尔克里泽山发动了决定性的大伏击。阿米尼乌斯显然做了精心准备。他选择的伏击地点是一个狭窄的通道，道路穿过草地，一侧是林木茂密的山丘，另一侧是沼泽地。在天然障碍物之外，日耳曼人还伐倒树木以拖慢罗马人的行军速度，挖掘了一道壕沟

以防止罗马人改走另一条道路逃避伏击，并在道路一侧山坡的树丛中建起500码长的壁垒。修建壁垒的材料部分是泥炭，部分是泥土，显然是受到罗马军队经常建造的野战工事的启发。[12]

阿米尼乌斯从为罗马服役的军旅生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无情高效地运用了自己的知识。他确保瓦卢斯一定会走这条道路，而且他的伏击准备工作一定花了好几天，甚至好几周。形势对罗马人非常不利。更糟糕的是，下起了暴雨，道路变成了烂泥潭，行军速度被拖慢，装备也难以操作。瓦卢斯对危机的处理很不好。他在早期就命令将大部分辎重焚毁，这很可能会传播紧张气氛。敌人迅猛攻击，蚕食着罗马军队，绝望情绪开始蔓延。他们抵达敌人精心准备的伏击场时，敌人的攻击更猛烈了。日耳曼人的壁垒有好几个出击点，武士们可以从那里冲出去进攻，然后撤回来躲避。壁垒虽然不超过五英尺高，但足以打断罗马人进攻的势头，而且给了在那里作战的日耳曼武士居高临下的优势。罗马人在狭窄的道路上被围堵得动弹不得，并且四面八方同时遭到攻击。罗马人努力组成协调一致的战线。[13]

一位特别优秀的将领仍然有机会恢复部队的秩序，向敌人发动集中攻击，从而脱险。瓦卢斯不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将领，很快就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他的一名部下自行率领骑兵冲了出去，后来在另一条道路上被包围和屠杀。瓦卢斯自己也负了伤（我们不知道伤得有多重），不久之后就和另一名高级军官一同自杀了。他的父亲是在腓立比战役之后自杀的。然而，在内战中失败而自尽的罗马贵族可以得到仰慕，但率军与外敌作战的指挥官自杀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指挥官都绝望了，那么士兵们还有什么斗志？一些人，包括几名高级军官，投降了，其他人逃走了，或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日耳曼人砍倒。一些士兵还在战斗，发动了绝望的进攻，希望突破壁垒，逃出包围。在战斗中，壁垒的一部分坍塌了。考古发掘让我们能瞥见最后殊死搏斗的一些场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头骡子的骨骸，它脖子上挂的铃铛塞满了不久前从地上拔起来的

草，以便减小声响，说明罗马人企图借着夜色掩护悄悄发动进攻。另一头骡子爬过壁垒，坠落到另外一边，摔断了脖子。[14]

突围的努力都失败了，瓦卢斯大军的士兵们一个个丧命。很多俘虏也被兴高采烈的日耳曼人作为祭品处死，以感谢诸神给了他们这场胜利。也有一些士兵被当作奴隶，多年后有些人逃回了罗马，或者被赎回，讲述了当年的恐怖故事。瓦卢斯被匆匆火葬，但没有烧完。他的遗骸被埋葬，但后来又被挖出来，遭到亵渎。三个军团的鹰旗，其他很多军旗，大量甲胄、武器和其他装备被掳走。胜利的纪念品被分发给各部落，或者被送给其他部落，以鼓舞他们加入叛乱。瓦卢斯的首级被送给马罗博杜斯，但马科曼尼人的国王选择与罗马维持和平，并且害怕阿米尼乌斯会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将这恐怖的礼物转送给罗马人。瓦卢斯的首级最终被送到罗马，被恰当地火化，并以礼下葬。[15]

在正式宣布伊利里库姆的胜利仅仅五天之后，日耳曼大灾祸的噩耗传到了罗马。至少假以时日便可以从巴尔干抽调部队到莱茵河前线。但在日耳曼的惨败比在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失败严重得多，可以与前53年卡莱战役的灾难，甚至汉尼拔施加给罗马的惨败相提并论。仅仅几天之内，3个军团被全歼，这相当于全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以上。在更多消息送抵之前，罗马人不知道在日耳曼的其他罗马军队是不是也已经被消灭了，成群结队的日耳曼武士是不是已经渡过日耳曼，正在洗劫高卢。此次失败本身已经很严重，对元首及其政权更是严峻挑战，因为他们一直自诩得到诸神恩宠，因此常胜不败。更糟糕的是，他的一支军队丢失了宝贵的鹰旗，给罗马的荣誉抹上了一个新的污点。何况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在过去常常夸耀自己收复丢失鹰旗的功绩，如今就更显尴尬。恐惧迅速在罗马蔓延。[16]

奥古斯都震惊了，这一次似乎更愤怒而不是绝望。狄奥说有好几部史料讲到元首备感受挫，撕坏了自己的衣服。他命令对罗马城的14个区

加强巡逻，谨防动乱，尤其是防止蛮族出身的奴隶趁机造反。这不大可能发生，但军队的出现强调了政府仍然掌控着局面，让紧张的人放下心来，让潜在的不安定分子不敢行动。元首担心他的日耳曼骑兵卫队对自己不利（奥古斯都年轻时的卫队是西班牙人，后来换成了日耳曼人）。这是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些日耳曼士兵还是被非常公开地调离罗马。一个更强有力的姿态是，奥古斯都宣誓，“如果共和国局势改善”，就举办特别的竞技会来感谢“至善至伟朱庇特”。这是一种荒废了一个多世纪的仪式，奥古斯都将其复苏。同时，他延长了各行省总督的任期，以保障稳定性，让有经验的人掌管帝国各地。他下令进行新的征兵，不足为奇的是，这次比公元6年更难招到新兵。于是他命令以抽签方式强行征兵，尽管这种方法不受欢迎。有些人仍然企图逃避兵役。为了以儆效尤，政府处死了一些逃兵役的人。与此同时，在役士兵的兵役期被延长，更多已经退伍的老兵被重新入伍。政府又一次收购奴隶，赋予其自由，并将其组成特别部队。[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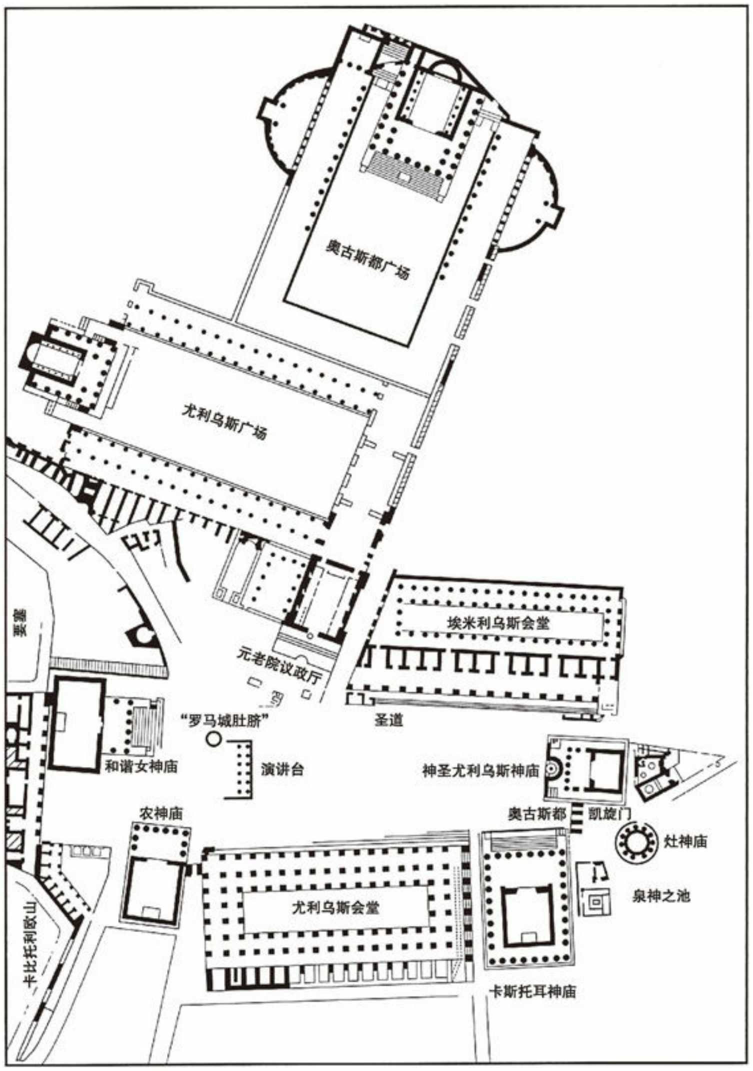
很快，提比略被派往莱茵河地区执掌大局。在这期间，奥古斯都一连好几个月拒绝剃须理发，就像他当初发誓为被害的尤利乌斯·恺撒复仇一样。这一次没有发行描绘他满脸胡须的钱币或图像。公众心目中的奥古斯都不是那个邋里邋遢、头发蓬乱的老人，而仍然是青春永驻、沉稳从容的元首。私下里，他暴跳如雷地痛斥瓦卢斯，有时在家里用头撞门，喊道：“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还我军团来！”已经死掉的将军被当成替罪羊，而最早的一批文献将阿米尼乌斯描述为叛徒。这两种说法都不算不公平，但都不是完整的故事。后来，元首每年都将此次灾难的日子当作哀悼日。他没有组建新的军团来取代损失掉的3个军团，这说明要补充现有单位的兵力，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即便多年后组建新军团时，也从来不用十七、十八和十九这三个番号。[18]

随后几个月里，日耳曼传来了稍微好一些的消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非正规军一样，阿米尼乌斯的部下在得胜之后就作鸟兽散，带着战利

品各自回家过冬。目前只有少量武士还在作战，其他一些被他们的成功激励并且也想得到荣耀和战利品的人也加入进来。瓦卢斯之前派到各地的小分队大多损失掉了，但一群日耳曼武士攻击位于阿里索[19]的罗马军事基地（可能就是哈尔滕发掘出来的地点）时被打退了。在英勇的防御战之后，阿里索守军带着大量平民借着夜色溜走，戏剧性地安全撤回莱茵河边境。河上的所有渡口都在罗马人手中，似乎并没有遭到猛烈攻击。瓦卢斯剩下的2个军团和一些辅助部队基本上完好，指挥官们在竭尽全力地组织连贯一致的防御。[20]

最后岁月

但此时，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行省失陷了。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发掘的所有罗马驻军营地和平民定居点都在这个时期被突然放弃了。在随后四个作战季节里，提比略要么在莱茵河上，要么向东开展惩罚性行动。后来日耳曼尼库斯也前来与他并肩作战。我们对这些战役知之甚少，但他们似乎逐渐从莱茵河的安全地带向东越打越远，烧毁村庄、摧毁庄稼、掳掠牲畜，杀死或俘虏他们抓到的所有人。罗马人把这种行动称为“焦土政策”，并且很擅长，但他们显然遇到了顽强抵抗。阿米尼乌斯是消灭了罗马军团的英雄，他的权势日渐增长，不仅领导着很多切鲁西人，还有其他部落的武士追随他。瓦卢斯的失败粉碎了罗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就像日本人在1941～1942年迅速征服香港、马来半岛和缅甸，在整个远东抹杀了大英帝国的威名一样。要从这样的奇耻大辱中恢复元气，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21]



公元**14**年，罗马市中心

在奥古斯都的余生，罗马人一直在日耳曼作战，他显然还希望收复这个失去的行省。罗马人在这期间取得的很多成就主要是象征意义的，没有实际价值。公元11年，提比略和日耳曼尼库斯合兵一处，发动了越过莱茵河的第一次大规模远征，但没有发生很多战斗。阿米尼乌斯和其他日耳曼领袖非常明智地避免与罗马人交锋，因为局势对罗马人有利，而罗马指挥官们也同样谨慎，没有长途追击日耳曼人。9月23日，他们在敌境庆祝了奥古斯都的生日，百夫长们组织了一系列赛马活动，随后大军撤过了莱茵河。虽然目前还没有报仇雪恨或收复军旗的希望，但罗马人自信的进军至少说明他们目前掌控着局势，以确保将来罗马人会取

得最终胜利。[22]

持续的战争给了提比略机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表现出很愿意为国家奔波劳碌的态度。每年冬天他都返回罗马，从公元9年到10年，在参加元老院会议和其他公共集会时，他通常坐在奥古斯都身旁，在两位执政官之间。元首写给提比略、后来被苏埃托尼乌斯引用的几封信，可能就出自这些年。苏埃托尼乌斯引用这些信，是为了证明奥古斯都对提比略的喜爱，如："我亲爱的提比略，我由衷地赞扬你的作战指挥。我相信，面对这么多困难，面对缺乏斗志的军队，没有人能够表现得比你更审慎。""我听说你因为作战而万分疲惫。假如我不同情你，愿诸神惩罚我！我求你一定要珍重身体。如果你病倒，那么你母亲和我都活不下去了，罗马人民也会陷入危险。""我身体怎么样并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和往常一样，奥古斯都的信里充满了引用和机智的希腊谚语，用来加强他的观点。[23]

公元10年1月，提比略以自己和弟弟德鲁苏斯的名义将广场上修缮完毕的和谐女神庙对外开放，用日耳曼战争（可能指的是之前的成功战役，而不是近期的战争）的收益支付修缮工程开销。他因为伊利里库姆平叛战争的胜利而得到的凯旋式被推迟到公元12年10月12日。在凯旋式上，他手中资深执政官军权的有效范围被扩展到整个帝国，而不仅仅是他已经在主持作战的西部各行省。奥古斯都也因为平叛的胜利而被赞颂为凯旋将军，但和往常一样，他谢绝了这荣誉。到晚年，他已经二十一次荣获凯旋将军的称号，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纪录。日耳曼尼库斯凭借镇压巴尔干叛乱的战功获得了凯旋式符号的荣誉，并成为公元12年执政官，此时他只有二十六岁。他跳过了裁判官这个级别，而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在公元11年担任财务官，也被内定会尽早担任执政官。[24]

日耳曼灾难的噩耗传到罗马之前，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的主要担忧

是，他鼓励婚姻和生育的法律会引发人民的怨恨。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他的立法值得被尊重，但不喜欢法律对未婚和无子女人士的处罚，而且法律限制人们从直系亲属之外的人那里继承财产。在过去，富裕而无子女的人很容易赢得朋友，因为很多人希望继承一份财产。现在这种事情比较难办了，如果没有亲属可以继承财产，那么金钱和地产都可能被收归国有。法律鼓励大家生育三个孩子以上，但养这么多孩子要花很多钱，尤其是要让所有孩子都成为骑士，就需要大笔财产，更不用说让孩子们都享有舒适的生活了。[25]

富人肯定最关心这些法律。在一些竞技会上，一群骑士非常坚决地要求撤销这些法律。奥古斯都为此召开了一次公共集会，展示了日耳曼尼库斯人丁兴旺的家庭，作为榜样，然后将到场的骑士分为两类：有孩子的（占大多数）和没有孩子的。在这次集会或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讲，可能是由其他人代他宣读演讲稿。一段时间里是每年被分配给他的财务官负责读他的稿子，日耳曼尼库斯在这些年里也承担过这个责任。在这次演讲中，奥古斯都重申了关于养育未来新一代的必要性，引用了前2世纪的一篇著名演讲（告诫当时的元老，一定要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大量内容。[26]

奥古斯都的唯一妥协是对婚姻法律做了一些修改，新版本在当年晚些时候由两名补任执政官推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人都是单身汉，没有孩子）。《帕皮乌斯与波派乌斯法》[27] 和旧版本婚姻法之间的具体差别是什么，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后世的法学家将这两部法律合并起来了。但很明显，精英阶层仍然觉得新法律很严苛。长远来看，婚姻法并不能阻止旧贵族世家的灭绝倾向，主要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太高，这不是国家能控制的事情。不过《帕皮乌斯与波派乌斯法》的确带来了一些收入，并强调了奥古斯都眼中的罗马人应当具备负责任和遵守道德的行为。在瓦卢斯及其军队灭亡之后，这种传统道德观或许显得尤其重要。[28]

这些年很艰难，更糟糕的是公元12年发生了严重的洪灾，扰乱了一个重要节日。恺撒·奥古斯都年事已高，人们感到一个没有他的世界即将到来。很多罗马人，尤其是贵族，长期以来热衷于占星，现在它变得更流行了。奥古斯都禁止大家私下里向预言家和占星家询问未来。即便一群人去请教预言家和占星家，也被禁止询问某人的生命何时终结。与此同时，元首公布了他自己出生的细节情况和当时的星相，让那些懂得占星的人帮他算命。一年前，他放松了禁止骑士作为角斗士参加竞技的法令，因为一些骑士无视这道法律，仍然出现在竞技场上。群众似乎喜欢观看富人以这种方式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冒险，就连奥古斯都也喜欢观看这种比赛。[29]

但元首并不总是这样胸襟开阔、慷慨大方和愿意对挑战法律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约在这个时期，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写的书被没收和公开焚烧了。他的祖父是尤利乌斯·恺撒在高卢的副手，但在前49年倒向庞培阵营。这位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喜欢在公开朗读自己的著作时宣布要省略下面一段，等他去世之后才能公开这个段落。他还恶毒攻击很多重要的公众人物，不过我们不确定他是诽谤他们，还是要让大家想起这些人过去的不明智之举。与公开攻击相比，他刻意省略著作片段又宣布死后公布的做法更是阴险。罗马人喜爱双关语，于是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疯狗”（Rabienus，与他的名字Labienus音近）。据我们所知，他没有攻击奥古斯都及其亲人，但可能赞扬过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的其他旧敌。拉比埃努斯为了抗议政府销毁他的著作，自杀了。[30]

同样尖酸刻薄的演说家卡西乌斯·塞维鲁吹嘘自己已经将被销毁的拉比埃努斯作品牢记于胸。他常在法庭坚决而咄咄逼人地起诉他人，并因此闻名，但他也喜欢按照历史悠久的罗马檄文的风格撰写侮辱名人的小册子。他应当没有攻击奥古斯都。但大约在公元12年，奥古斯都动用公元6年修改的关于“叛逆”罪（定义非常模糊，是一种侵犯罗马国家与人民“尊严”的罪行）的法律，起诉了卡西乌斯。这似乎是史上第一次用

这种罪名来起诉以文字和口头形式攻击他人的行为。卡西乌斯被判有罪，被流放到相对比较舒适的克里特岛。在提比略及其继承者统治下，“叛逆”罪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付那些被认为对皇帝不忠的人，这种审判变得司空见惯，审查也更普遍了。有了这样的后见之明，我们会觉得奥古斯都用“叛逆”罪来起诉人，是一个特别不祥的征兆，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如炮火一般凶狠的人身攻击和侮辱也表明，精英阶层内部持续存在敌意，而这些敌意与元首没有什么关系，或者关系甚微。对官职和荣耀的竞争也在继续。前11年，竞选裁判官的16名候选人票数相当，于是奥古斯都允许他们全体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后来恢复了正常的每年12名裁判官。[31]

政府采取了更多措施，减轻年迈奥古斯都的工作和纪念场合的负担。公元12年，日耳曼尼库斯宣读了元首的一份演讲稿。元首请求元老们在他抵达和离开广场时不要向他正式请安和道别。他还请求他们，当他在家的时候，减少拜访他的次数，并说自己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到元老们家中用餐，请他们见谅。次年，一直作为试探元老院意见的元首御前会议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成员不再由抽签产生并有六个月任期，而是变成终身制，全部成员由元首挑选。元首御前会议得到了更大的权威，于是它的决定可以算作整个元老院的法令。这样无疑有助于奥古斯都在舒适的家中处理更多政务。狄奥说他有时候会倚靠在卧榻上接见御前会议成员。[32]

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明显结果是，提比略及其儿子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这是为他们在元首去世后继承大权铺路。但要说奥古斯都在这个变动中仅仅是傀儡，就错了。他显然继续承担大量工作，做出重大决策，不过得到了谋臣和亲人的辅佐。他仍然是先前那位经验丰富、精明狡黠的政治家。公元13年，对5%遗产税（用来为军事国库提供资金）的怨言愈演愈烈。奥古斯都的对策是邀请元老们出谋划策，为军事国库提供安全稳定的财源。在任何时候，军费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此时日

耳曼战争还在继续。提比略不在罗马，日耳曼尼库斯和德鲁苏斯被奥古斯都要求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免得大家说这是他们祖父的意思。元老院讨论了此事，向元首呈送了一些书面建议。没有一条建议是切实可行的，都是大肆攻击现行制度，却没有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恺撒·奥古斯都随后宣布他支持征收财产税，并派人开始登记所有人的财产，准备征收新税。手足无措的元老院迅速表示，他们还是更愿意延续旧的遗产税，而不是面对新的不确定的未来。元首宣布自己也很高兴接受这么明智的决定。[33]

同样在公元13年，奥古斯都的行省指挥权和其他职权再一次被延长了十年时间。同时，提比略也终于得到相同的权力。近几年里，提比略的头像开始出现在钱币的背面，正面是奥古斯都头像。奥古斯都和提比略还被授予执政官权力，以监督一次人口普查。此次普查于公元14年5月结束，共493.7万名公民被登记在册，这比元首在前28年主持的第一次普查时多了将近90万人。对奥古斯都来说，这个增长清楚地表明他为罗马人民恢复了和平与繁荣。安东尼自杀已经过去四十三年了，恺撒·奥古斯都七十六岁。狄奥说有征兆表明即将发生一个变化。其中一个征兆是，在一次竞技会上，一个疯子跑到抬着神像和符号的游行队伍中，一屁股坐在尤利乌斯·恺撒的座席上。另一个征兆是，卡比托利欧山上一座奥古斯都雕像基座上“恺撒”（CAESAR）的字母C被闪电击中了，剩下的AESAR在伊特鲁里亚语中是“神”的意思。人们认为这意味着他即将成为神。苏埃托尼乌斯说，人口普查结束时照例举行的仪式上，一只鹰在奥古斯都头顶上绕着飞了好几圈，然后停在一座神庙的三角楣饰上，就在“阿格里帕”的第一个字母上方。元首原本打算宣读正式的誓言，要在随后五年中（直到下一次人口普查）保卫罗马人民的福祉，但他决定让提比略帮他读，说自己不会活到兑现誓言的时候了。[34]

最后的旅行

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元首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驶往撒丁岛外海的那个关押波斯图穆斯·阿格里帕的小岛。只有一个贵族陪伴着他，即前任执政官保卢斯·费边·马克西穆斯，他在这一年去世了。许多学者认为奥古斯都的这次旅行是后人虚构的故事，是为了让大家怀疑奥古斯都对继承安排的真实想法。但既然这个宣称他离开罗马很久的故事能够流传得这么广，说明它可能是真的。奥古斯都和他的外孙（曾是他的养子）可能有过泪流满面的重逢。但非常明确的是，此事对他的计划没有任何影响。元首在前一年立下遗嘱，并将其交给维斯塔贞女保管，并且没有想要修改遗嘱。提比略是他的主要继承人，得到三分之二的财产，剩余三分之一留给了李维娅。波斯图穆斯什么也得不到，遗嘱里只是说不准将波斯图穆斯和两个尤利娅安葬在奥古斯都陵寝。[35]

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由于人口普查工作，提比略留在意大利，只在夏末短暂视察了伊利里库姆，查看这个行省是否仍然稳定和安全。他无疑需要处理很多请愿和当地纠纷，但没有迹象表明当地的总体安定受到威胁。伊利里库姆离意大利不远，往返很方便，他可以在那里从事一些有价值和有威望的工作，并仍然可以返回罗马过冬。奥古斯都和李维娅陪提比略走了旅程的第一段，并打算一直走到贝内文托，部分原因是元首想观看那不勒斯即将举行的纪念他的竞技会。一行人向西南方前进到阿斯图拉港，然后乘船，这打破了他只在白天乘船的习惯，因为天气很好。夜间，恺撒·奥古斯都突患胃病，症状是腹泻。[36]

他的病情似乎不是特别严重，于是船继续沿着海岸向南航行，到了卡普里岛。他在那里拥有一座别墅，就是陈列着化石收藏品的那座别墅。他们接近主要港口普泰奥利时，遇到了一艘从亚历山大港开来的商船，船员和乘客像膜拜神祇一样向他问候。他们身穿白衣，头戴花环，焚香献礼。他们可能原本就在献祭，以纪念自己安全抵达目的地。他们热情洋溢地向恺撒·奥古斯都呼喊，声称“由于他，他们才能生存；由于他，他们才能航行；由于他，他们才能享受自由和繁荣”。元首很高

兴，给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发了40奥留斯金币（相当于1000迪纳厄斯或4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并指示他们这笔钱只能用来购买从亚历山大港来的商品。[37]

他在卡普里岛休息了四天，似乎已经恢复了健康。他心里充满了节日喜悦，喜爱聚会和开玩笑，于是向他的罗马伙伴发放了希腊服饰，向希腊朋友发放罗马服饰。然后他命令大家都换上这些衣服。作为游戏的一部分，罗马人要说希腊语，希腊人要说拉丁语。这些天里，他兴致勃勃地观看当地少年的操练，这是希腊人长期定居并影响当地习俗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少年要经历一些隐约有军事意味的体育训练，然后才被认可为正式的公民，可以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奥古斯都宴请他们，向人群抛掷奖品兑换券（奖品是水果和美食之类），鼓励大家开玩笑，甚至拿他开涮。一天，他和提比略的一名随行人员开了个玩笑。奥古斯都编了两行诗，然后假装它是某位名人创作的，他不过是引用而已，并要求这个人说出两行诗的作者。

奥古斯都虽然还时而受到腹泻折磨，但觉得身体已经恢复不少，能够渡海前往那不勒斯，观看纪念他的竞技会。随后，他和提比略一起旅行到贝内文托，在那里与提比略道别。恺撒·奥古斯都返程时走到位于诺拉的别墅，就又一次病倒了，比之前更严重。他父亲就是在这座乡间别墅去世的，或许这个巧合让他愈发坚信，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命令向提比略发出讯息，要他回来。提比略可能正沿着阿庇乌斯大道向布隆迪西乌姆的大港进发。提比略有没有在元首合眼前赶到他身边，史料众说纷纭，但苏埃托尼乌斯（他的记述最详细也最令人信服）说提比略赶到了。提比略和元首一起待了很长时间，讨论国家大事。但在提比略离开的时候，据说仆役们听到奥古斯都喃喃自语："哦，不幸的罗马人民，要被这样的嘴巴缓缓地嚼烂。"[38]

此次会面之后，元首没有再谈国家大事，不过夸耀说，在他之前，

罗马是泥土砖块建成的，而他把罗马变成了一座大理石城市。这既是指他缔造的和平与繁荣，也反映了他给城市带来了新的面貌。我们不知道他坚持了多少天。狄奥说他只吃自己在花园里种的一棵无花果树上的果实，还说有传闻称李维娅在一些无花果上涂抹了毒药，然后将它们交给奥古斯都，而她自己只吃干净的果实。这些故事，以及奥古斯都嘲讽提比略的话，可能都是多年后提比略极度不得人心时产生的，所以没有多大意义。按照古典世界的标准，奥古斯都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而且身体一直都不算很健壮，所以他的死亡极有可能是自然原因，不需要其他解释。可能元首无法进食，身体太虚弱，心脏就衰竭了。[39]

苏埃托尼乌斯详细描述了他的最后一天，即公元14年8月19日。我们不知道苏埃托尼乌斯的资料来源是什么，但他的叙述很有说服力。至少他的记述代表了大家的理念，一位贤君应当如何迎接死亡。恺撒·奥古斯都多次询问外面是否有骚动，显然是担心群众蜂拥而来哀悼他，或者引发动乱，从而威胁国家稳定和继承权的顺利交接。他关注自己的仪表，叫人拿来一面镜子，让一名奴隶帮他梳头，并帮他调整好自己下巴的位置（就像垂死的尤利乌斯·恺撒拉起自己的托加袍盖住头部）。他这样做好准备之后，让奴隶把他的一些朋友叫进来，问他们是否觉得，他在人生的哑剧或喜剧中表演得还不错。然后他改用希腊语，念了几行诗，可能是引用，也可能是他自己编的，是演员离开舞台时的谢幕词：“既然我表演得很好，请大家都鼓掌，用掌声送我离开舞台。”[40]

这个故事表明，奥古斯都显然期待大家的赞许和鼓掌。没有迹象表明奥古斯都在弥留之际有过疑虑，但狄奥说的可能是对的，他说奥古斯都看到了人生的讽刺，并承认即便是最成功的人也终有一死。随后奥古斯都让朋友们离去，但在他们走出门之前，问了近期从罗马赶来的人，李维拉（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的妻子，前不久生病了）的情况怎么样了[41]。[42]

奥古斯都身边只剩下李维娅和近侍。他有些焦躁，说自己要被四十个年轻人抬走了。苏埃托尼乌斯说元首的遗体后来被四十名禁卫军士兵抬走，但元首为自己的葬礼做了详细安排，所以他脑子里可能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他在第九个钟点[43]（从黎明算起，按照我们的计算，应当是下午晚些时候或者傍晚）去世，倒在李维娅的怀抱里，最后一次亲吻了她。他对她的临终遗言是："李维娅，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永别了。"

凯旋将军恺撒·奥古斯都、神圣尤利乌斯之子和"祖国之父"去世了。李维娅可能先秘不发丧，等继承的事情准备妥当，才宣布他的死讯。不过这种说法可能只是关于元首之死的阴谋论的一部分。[44]

根据阿格里帕、德鲁苏斯和其他死在远离罗马地方的皇室成员的葬礼安排，元首的遗体可能还经历了最后一次旅行。为了避开8月的酷热，送葬队伍在夜间出发，诺拉镇的议员们庄严地抬着棺木，踏上了前往罗马的道路。途中每一天都将遗体停放在经过的城镇的会堂（那里比较荫凉），各个城镇的领导人每夜轮流将棺木抬到下一个主要社区。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表示哀悼和敬仰。很少有人记得奥古斯都领导国家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一群显要的骑士在罗马以南不远处的博维莱（阿尔巴朗格的旧址）迎接了送葬队伍，将其送到城内，把棺木停放在帕拉丁山上奥古斯都府邸的前厅。[45]

元老院讨论了如何更好地尊崇他。元老院过去在这方面的建议都被奥古斯都认为太过分。奥古斯都的亲人决定了他没有考虑到的少量葬礼细节。他的葬礼按照贵族葬礼的惯例，从广场上的人群聚集开始。日期可能是9月8日，但我们没有证据。尽管奥古斯都的葬礼比尤利乌斯·恺撒的葬礼更有秩序，但人们来到广场向奥古斯都致敬时，无疑会联想起尤利乌斯·恺撒。按照规矩，演员们戴着奥古斯都祖先的葬礼面具，但也有人戴着罗马史上其他一些与奥古斯都家族无关的伟人的面具，其中

就有庞培。奥古斯都广场上“最杰出的人”大多（或全部）登场了，以纪念他们当中最伟大的罗马人的去世。恺撒·奥古斯都不仅仅是一位贵族，他还是罗马城的第二位缔造者，恢复罗马和平、繁荣和恰当的人神关系的大功臣。所以，即便在死后，他也和生前一样，与历史上的所有伟大业绩和英雄领袖有着紧密联系。

尤利乌斯·恺撒的形象没有被展出，因为他已经是神，不是凡人。但这并不是说他被忽略了，或者他的事迹被刻意遗忘。提比略登上神圣尤利乌斯神庙外面的演讲台，发表了第一份悼词。他身穿丧服（黑色上衣和托加袍）。他的儿子德鲁苏斯也穿着丧服，发表了第二份悼词，地点是“老”演讲台（它被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改造过）。周围的纪念碑和建筑上尽是奥古斯都的象征物。元老们也到场了。下一年的行政长官只穿上衣，没有披托加袍，将遗体抬到战神广场。沿途有更多的景象让大家想到元首的荣耀和建筑工程。奥古斯都的遗体被封闭在棺材内，此时已是夏末，而且他已经去世几周，遗体已经腐烂。棺材上方载着整洁而完美无瑕的奥古斯都蜡像，是凯旋将军的形象，侧卧在象牙和黄金制成的卧榻上。游行队伍中还有他的两座金像，一座是元老们从尤利乌斯议政厅（是奥古斯都修复了这座建筑）搬来的，另一座由一辆凯旋战车承载着。[46]

战神广场上已经准备好了火葬柴堆，棺材被放到柴堆上。然后，罗马的高级祭司们绕着柴堆行走。随后是一些被选出来的骑士，再往后是禁卫军战士，其中一些士兵将自己的功勋奖章扔到棺材上，就像尤利乌斯·恺撒的士兵在他的葬礼上做的一样。然后，禁卫军百夫长们将火炬丢到火葬柴堆上，这些木柴都是精心准备好的，柴堆很快就燃烧起来。这时，一只鹰被从广场建筑中放出，飞到空中，象征元首的灵魂飞向天堂，到他养父身边，成为神祇。一位前任裁判官后来公开发誓，说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奥古斯都飞向了天空。[47]

一连五天，年迈的李维娅留在火葬地点附近，或许待在临时的棚子内。一些家人和显要的骑士陪伴着他。五天后，这些人赤着脚，解开腰带（于是上衣垂落到脚腕处），收集了骨灰和一些残余骨骸，把它们放到一个骨灰瓮内。骨灰瓮被送到差不多五十年前奥古斯都为自己建造的宏伟陵墓内。

---

[1] Velleius Paterculus 2.127.3（Loeb translation）.

[2] 阿米尼乌斯及其早期生活，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18.1-3，Tacitus，*Ann* .2.9-10，88，with P.Wells，*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pp.105-10，及A.Murdoch，*Rome’s Greatest Defeat.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pp.75-97，尤见83-6；奥古斯都不愿意授予公民权，见Suetonius，*Augustus* 40.3。

[3] 奥古斯都的姐姐小屋大维娅的外孙女。

[4] 关于瓦卢斯，见P.Wells，*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pp.80-86，A.Murdoch，*Rome’s Greatest Defeat.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pp.49-74，及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 （1960），pp.401，424-5，434，437。

[5] 塞格斯特斯也是阿米尼乌斯的岳父，不过他非常不喜欢这个女婿。

[6] Tacitus，*Ann* .1.57-59，Velleius Paterculus 2.118.4.

[7]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2-4 包含引文，Dio 56.18.1-5。

[8] 概况见S.Dyson，‘Native Revolt Patterns in the Roman Empire’，*Aufstieg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3（1975），pp.38-175。

[9] 关于他的军队，见Velleius Paterculus 2.117.1；关于叛乱，见Dio 56.18.5-19.4。

[10] Dio 56.20.1-2，提到百夫长马尔库斯·凯利乌斯衣冠冢上的释奴；关于随军携带卧榻，见W.Schlüter，‘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in J.Creighton & R.Wilson，*Roman Germany.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2（1999），pp.125-59，尤见148-9；关于军人的婚姻，见B.Campbell，‘The marriage of soldiers under the Empire’，*JRS* 68（1978），pp.153-66。

[11] Velleius Paterculus 2.118.4，Dio 56.19.2-3，Tacitus，*Ann* .1.58.

[12] 关于考古发掘和对战役一系列不同的复原解读，见A.Rost，‘The Battle between Romans and Germans in Kalkriese：Interpret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an ancient battlefield’及

S.Wilbers-Rost，‘The site of the Varus Battle at Kalkriese.Recent Results fro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均载于A.Morillo，N.Hanel & E.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la frontera romana.Roman Frontier Studies.Anejos de Gladius* 13 Vol.3（2009），pp.1339-45，1347-52，W.Schlüter，‘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in J.Creighton & R.Wilson，*Roman Germany.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2（1999），pp.125-59，P.Wells，*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A.Murdoch，*Rome’s Greatest Defeat.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M.McNally，*Teutoburg Forest AD 9.The Destruction of Varus and his Legions* （2011）配有精美的插图，很容易读到的论文集J.Oorthuys（ed.），*The Varian Disaster*：*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Ancient Warfare* special issue（2009）也有很好的插图；主要的古代史料为Dio 56.19.1-22.2，Velleius Paterculus 2.119.1-5，Tacitus，*Ann* .1.61-2。本书的叙述以上述全部史料为基础，更详尽的讨论见引用的著作。

[13] 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一些士兵对损失辎重的反应，见*BG* 5.33，并对比5.44。

[14] 关于指挥官的恰当行为，见A.Goldsworthy，*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 （1996），pp.163-5。

[15] Tacitus，*Ann* .1.57-8，71，Velleius Paterculus 2.119.5.

[16] Velleius Paterculus 2.117.1.

[17] Dio 56.23.1-4，Suetonius，*Augustus* 23.1-2.

[18] Suetonius，*Augustus* 23.2；关于罗马军团，见L.Keppie，*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1984），pp.163-9。

[19] 应当在今天的德国境内，具体地点至今不详。

[20] Dio 56.22.2a-4，Velleius Paterculus 2.120.1-6，with P.Wells，*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pp.200-12，A.Murdoch，*Rome’s Greatest Defeat.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pp.121-8.

[21] 关于焦土政策，见J.Roth，*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264 BC-AD 235* （1999），pp.148-55，298-305。

[22] Dio 56.25.2-3.注585。

[23] Suetonius，*Tiberius* 21.5-6.

[24] Dio 56.17.1-3，25.1，Suetonius，*Tiberius* 17.2，*Res Gestae* 4，with 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 （1999），pp.61-4，与T.Barnes，‘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JRS* 64（1974），pp.21-6。

[25] 对这些法律的影响，讨论见A.Wallace-Hadrill，‘Family inheritance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in J.Edmondson（ed.），*Augustus*（2009），pp.250-74 =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7（1981），pp.58-80.

[26] Dio 56.1.2-10.3，Suetonius，*Augustus* 34.2，89.2.

[27] 得名自上述的两位补任执政官。

[28] Tacitus，*Ann* .3.25-8 强调了修改后的法律的严苛，S.Treggiari，*Roman Marriage*（1991），尤见pp.60-80；另见K.Galinsky，*Augustan Culture*（1996），pp.128-40讲到，这些担忧的更大背景是，人们害怕道德的堕落会导致瓦卢斯战败这样的灾难。法律有可能是在瓦卢斯战败的噩耗传来之后颁布的，但它的基本形式可能在此之前就拟定了。

[29] Dio 56.25.7-8，27.4，Suetonius，*Augustus* 43.3.

[30] 关于Labienus见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486，及B.Levick，*Augustus.Image and Substance*（2010），pp.190-91。

[31] Dio 56.25.4，27.1，Tacitus，*Ann* .1.72，with 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p.486-7.

[32] Dio 56.26.1-3，28.2-3.

[33] Dio 56.28.4-6；关于提比略在这些年的地位，见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1999），pp.61-7。

[34] Dio 56.29.1-6，Suetonius，*Augustus* 97.1-3，*Res Gestae* 8.

[35] Tacitus，*Ann* .1.5，Dio 56.30.1论及此次旅行；Suetonius，*Augustus* 101.1-3论及遗嘱，奥古斯都规定两个尤利娅不准入葬他的陵寝，可能也对波斯图穆斯做了类似的禁止；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1960），p.433不认可此事，而B.Levick，*Tiberiusthe Politician*（1999），pp.64-5很好地描述了此次旅行。

[36] Dio 56.29.2.目前对奥古斯都临终前的最详细叙述，见Suetonius，*Augustus* 97.3-100.1，提供了下文的绝大部分细节。有价值的讨论见D.Wardle，‘A perfect send-off：Suetonius and the dying art of Augustus（Suetonius Aug.99）’，*Mnemosyne* 60（2007），pp.443-63。

[37] Suetonius，*Augustus* 98.2包含这句引文。

[38] “嘴巴”的引文，见Suetonius，*Tiberius* 21.2；Dio 56.31.1称，他引用的大部分史料都说提比略是在奥古斯都去世后才抵达的。

[39] Dio 56.30.1-4，with A.Barrett，*Livia.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2002），pp.242-7.

[40] Suetonius，*Augustus* 99（Loeb translation）.

[41] 也有资料表明，奥古斯都临终前过问的是李维拉与德鲁苏斯的女儿尤利娅·李维娅（5～43年）的病情。

[42] Dio 56.30.4.

[43] 古罗马人将白天和黑夜各分为十二个钟点，每个钟点的时间不等长。关于其计算方法也有争议，一般认为是从黎明或黄昏开始计时。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午夜开始计算。

[44] 引文来自Suetonius，*Augustus* 99.1；Dio 31.1讲到李维娅在几天内秘不发丧。

[45] Suetonius，*Augustus* 100.2，Dio 56.31.2.

[46] 葬礼的主要信息来自Suetonius，*Augustus* 100.2-4，Dio 56.34.1-42.4；与苏埃托尼乌斯不同，狄奥的说法是，德鲁苏斯在神圣尤利乌斯神庙前的演讲台发表悼词，而提比略在旧的演讲台致悼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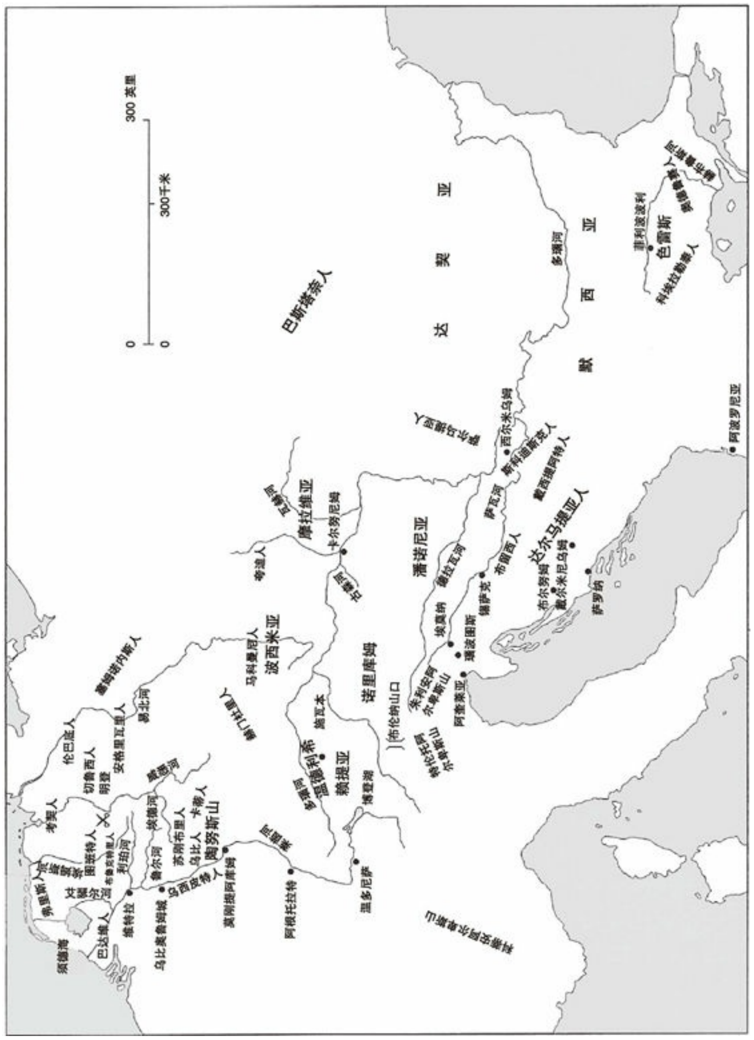
[47] Suetonius，*Augustus* 100.4，Dio 56.42.3.

终章“着急也要从容！”

> 的确，民主制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君主制……听起来就令人不快，对人民来说却是最务实的政府形式。因为找到一个优秀的人，比找到很多优秀的人要容易……因为君主制不属于缺乏美德的大多数人……如果曾经有过繁荣的民主制国家，它一定只维持了很短时间。
>
> ——狄奥，3世纪初 [1]

> 奥古斯都用赏金引诱军队，用免费口粮拉拢人民，用和平的舒适吸引整个世界，然后逐渐占有了元老院、行政长官和立法者的权力。没有人反对他，因为最勇敢的人都死在了战场上，或死于政治清洗。
>
> ——塔西佗，2世纪初 [2]

送葬队伍前往罗马期间，以及后来的葬礼期间，公共事务大体上都暂停了，元老们聚集起来聆听奥古斯都的遗嘱。提比略和李维娅被指定为他的主要继承人，不过按照罗马人的惯例，其他关系较远的亲戚也被列为第二顺序继承人，以免提比略和李维娅先离世。奥古斯都还将数额庞大的43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金钱赠给国家，并向所有公民和军人发放了赏金。禁卫军的普通士兵每人得到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准军事的城市大队和火警队成员每人得到500塞斯特尔提乌斯，而每位军团士兵和公元6年与9年被征募的释奴士兵得到了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军官得到的赏金肯定比士兵多很多。奥古斯都的慷慨清楚地表明，他承认自己的主宰地位说到底还是依赖于军队的绝对忠诚。奥古斯都十九岁成为军阀，此后始终是一位军阀。 [3]



莱茵河与多瑙河边疆

提比略已经拥有奥古斯都所有重要的权力，包括高级军权和保民官权力。奥古斯都去世后，提比略便自然而然地向禁卫军和在罗马的其他部队发号施令，并写信给各省驻军的指挥官。实际上，国家从同时拥有两位元首，又一次变成了只有一位。提比略并不是以奥古斯都的养子或继承人的身份继承了他的权力，他原本就拥有这些权力。但表面文章还是很重要的，正如奥古斯都在前27年1月“卸去”职权，在前23年7月辞去执政官职位，然后元老院说服他接过国家领导权一样，提比略也希望元老院来赋予他领导人的角色。提比略的性格与奥古斯都截然不同，这一次的表演没有过去那样圆滑，或许安排得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提比略的

笨拙仪态和过于复杂的演讲风格让很多人稀里糊涂，搞不清楚他的真实用意，但最后元老们“说服”他必须接过那受到万民缅怀的父亲的全部职责。

9月17日，元老院宣布奥古斯都是神，于是提比略的正式称号变成了提比略·尤利乌斯·恺撒·奥古斯都、神之子。奥古斯都的遗嘱里要求提比略也用“奥古斯都”的名字，但新元首拒绝让元老院投票确认此事。他宣称自己只是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和纪念他，才会用“奥古斯都”的名字。同样，他也拒绝自动继承“祖国之父”的头衔。就像他在元老院假装不愿意当元首一样，这样的谦虚并不能掩盖其想要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急切心情。在奥古斯都向他授予每一项权力的时候，他显然已经决定将来要承担元首的角色。[4]

除了提比略之外，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人选。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使得多瑙河沿线的一些军团发生了哗变，后来莱茵河畔的一些部队也哗变了。哗变的原因是闲得无聊、早已服满兵役的士兵迟迟不能退伍、严苛纪律造成的挫折感，以及新世界的不确定性（那个给他们军饷、他们宣誓效忠的人已经不在人世）。总的来讲，这些哗变士兵想要的仅仅是改善条件和其他短期特权。莱茵河驻军曾短暂地讨论推举他们的统帅日耳曼尼库斯为元首，取代提比略，但很快不了了之。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的养子，完全遵守罗马人的孝道，对养父忠心耿耿，而且人们不愿意回到内战。

奥古斯都几乎刚合眼，就有一位禁卫军百夫长动身前往关押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那个小岛。这名军官到了岛上之后，杀死了奥古斯都的外孙，尽管后者年轻健壮，拼命抵抗。百夫长及其部下返回罗马向提比略报告后，提比略坚决否认自己下达了处死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新元首是不是在说实话。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有的说他撒谎，有的说幕后元凶是李维娅。也有人说是奥古斯都下的命

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的最后一道命令让人想起他当年作为三头同盟之一时杀伐决断的残酷，这是他最后一次发出“记住，你必须死！”的指令。塔西佗对此表示怀疑，说奥古斯都在其他时候都不曾杀过自己的亲人。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的死显然对提比略最有利，因为这样他就少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这一年结束之前，他的前妻尤利娅也去世了。他曾下令降低她的生活水平，更加严苛地对待她，这显然缩短了她的生命。[5]

随后的岁月里，奥古斯都的亲人继续以极高的死亡率纷纷离世。公元19年，日耳曼尼库斯在东方行省去世。虽然有传闻说他是被满腹嫉妒的提比略或李维娅毒死的，但他可能也是噩运的牺牲品。德鲁苏斯于公元23年去世，他可能是被妻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克劳狄的姐姐，也是德鲁苏斯的堂妹）及其情夫（野心勃勃的禁卫军司令卢基乌斯·艾利乌斯·塞扬努斯）害死的。塞扬努斯的阴谋诡计帮助提比略打击了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和儿子们。阿格里皮娜（尤利娅唯一仍然在世的孩子）和她的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后来都遭到逮捕和流放，全都在流亡生活中死亡。李维娅比丈夫多活了十五年，不过她与儿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她于公元29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但提比略没有追授她很多荣誉。直到她的孙子克劳狄当皇帝之后，才封她为神。

在提比略统治的最初几周，他常说希望元老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辅佐他，但实际上他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他最早的决策之一就是将选举从公民大会改到元老院，于是选举围场就变成了纯粹的观赏性公园和公共娱乐场所。虽然奥古斯都一直能确保他青睐的人当选，但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被内定的职位仍然会带来真正的（有时甚至是腐败凶残的）竞争，而且选民有时会违背他的意愿。不过提比略的这个改革没有受到公开的反抗，元老们更愿意为了竞选而拉拢其他元老，而不是笼络一大群选民。这个改革似乎并没有影响行政长官的质量。[6]

与奥古斯都不同的是，提比略不喜欢巡视外省，后来渐渐地，他对日常接见元老和罗马的其他人也腻烦了。公元26年，他离开了罗马，次年隐居到卡普里岛，在余下的十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罗马。公元14年～16年，日耳曼尼库斯继续统领莱茵河前线，但后来被召回并派往东方。德鲁苏斯主要待在罗马，在日耳曼尼库斯死后，提比略没有尝试让德鲁苏斯巡视各行省。各行省由其总督负责，其中很多人的任期长得超乎寻常，但他们都没有被要求发动积极的对外战争。奥古斯都曾建议保持现有的疆界，虽然这只是为了从公元6年和9年的灾祸中恢复元气而做的短期停顿，提比略却把这当作他毕生的准则。与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相比，提比略在位时的军事行动比较少，公开庆祝胜利的活动也少得多，也没有利用战利品建造很多新的纪念性建筑。与奥古斯都在世时相比，提比略在罗马的建筑工程和娱乐上花的钱少得多了。[7]

对这些年的事件，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他们都将提比略描绘为睚眦必报、心狠手辣的小人，并暗示他有隐秘的变态行为，简而言之，他是个恶魔，比卡利古拉和尼禄之流只好一点点。现代学者普遍反对这种偏见，虽然他们有些过于正面地评价提比略，但他们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总的来讲，提比略在位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尤其是在外省。虽然没有许多积极的对外战争，但外交上一般都是成功的。阿米尼乌斯被日耳曼尼库斯击败，活了下来，罗马人后来不再攻击他的时候，他就转而攻击马罗博杜斯，而不是罗马人。马科曼尼人的国王被击败，逃到罗马帝国境内，以流亡者的身份生活。他自己的部落联盟瓦解了。大约在日耳曼尼库斯去世的时候，阿米尼乌斯被他自己的一些酋长谋杀，因为他们怨恨他的强势。他一度统一起来的各部族再次变成一盘散沙，而且互相敌对。在几十年之后，莱茵河或多瑙河边疆才会再次出现这样一位魅力十足的领袖。于是，罗马人无须费力，两大威胁就被解除了。

在二十三年里，帝国总体而言很安定，边疆和一些行省的问题都得

到了控制。在这些方面，提比略的决策似乎是理智的。他的大多数继承者都将效仿他，不像奥古斯都那样不断巡视帝国各地。和提比略一样，这些后世的皇帝也不会派遣自己家族的高级成员代替他们去巡视各地。对很多皇帝来说，这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信赖的亲戚。奥古斯都的多位元首共同执政的理念只是偶尔被复苏，成功的例子更少。这本身似乎并不重要，尽管这的确意味着，将来多人执政的前景会受限。虽然这与罗马的过去相比是一个深刻变革，但我们很难判断它对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好是坏。

更严重的是，提比略逐渐退出了公共生活。元老和帝国各地及外邦的使者必须赶到卡普里岛，等待拜见提比略。提比略甚至在统治早期，还身在罗马的时候，就越来越依赖塞扬努斯，而不信任其他任何人。部分原因是，塞扬努斯是个骑士，提比略不认为他会有太大野心。阿格里帕也有类似的背景，但在奥古斯都的帮助下成为元老并飞黄腾达，一直是一位优秀将领和行政管理者。塞扬努斯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还是很快从禁卫军司令崛起成为元首最重要的谋臣。提比略离开罗马之后，塞扬努斯有效控制了外界与他的接触。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们和其他很多显要人士被除掉，以儆效尤。提比略常用“叛逆”罪名来镇压他不喜欢的人。现在这项罪名的使用范围很广，执行非常严苛，对元首的哪怕最不明显的攻击也会遭到严惩。公元31年，提比略担任执政官（不过没有亲自到罗马），并将塞扬努斯扶植为自己的同僚执政官，后来授予他资深执政官的军权。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似乎在提携塞扬努斯到共治元首和继承人的位置。但最后他改了主意，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清洗。塞扬努斯被逮捕和处决。罗马的精英阶层还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提比略的统治在元老和高级骑士当中制造了恐怖气氛，令人回想起内战和政治清洗。在提比略的继承者们统治期间，这种恐怖气氛也始终没有完全消散。人们的情绪与奥古斯都时期完全不同，部分原因是奥古斯都在三头同盟时期制造了足够的恐怖气氛，以震慑所有反对派（最大

胆或最愚蠢的密谋者除外）。更重要的是，奥古斯都认真地去了解国内最显要的人士，与他们结交，带着尊重对待他们。提比略的不善交际和最终离开罗马城的举动，导致了一个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后世的元首们越来越难培植奥古斯都时期那种轻松的气氛。李维娅的儿子未必是史料描写的那种恶魔，但至少在上述方面，他是一位糟糕的元首。在他统治时期，君主制原形毕露，而环绕着他的宫廷和廷臣的形象也更加明显了。塞扬努斯之所以能够攀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元首的宠信，而不是他具有军人或行政长官的突出才干。[8]

屋大维、恺撒和奥古斯都

本书不涉及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也不会讲他们给元首国的性质带来的变化，因为这些本身就是非常宏大的题目。罗马人自己的判断是，奥古斯都比后来的几乎所有皇帝都强。很多年后，罗马人的一个习惯是，希望每一位皇帝“比图拉真更善良，比奥古斯都更幸运”（指的是奥古斯都的很多亲人早逝）。元老们除了对共和国的贵族领导抱有怀旧的喜爱（表现形式往往是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赞扬）之外，对元首国的现实并无怨恨，肯定也没有真正的抵抗。只有在卡利古拉被谋杀之后，元老院才短暂地商讨恢复共和国，但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决定选择谁当新元首。罗马人普遍承认元首国是有效的，对它本身的不满情绪很少。关键之处在于皇帝是不是好人或贤君（衡量标准是内政外交能否取得成功），是否对元老阶层抱有充分的尊重。所以，奥古斯都的政府体制没有受到挑战，奥古斯都本人成了优秀元首的典范。这明确证明了他的成功，比这更有效的证据应当不多了。[9]

在当时和现代一样，对奥古斯都本身很难做一个评判，因为他太复杂，无法给出一个简单的裁决。终其一生，他都受到雄心壮志的驱动。在某个时间（可能要到尤利乌斯·恺撒被谋杀之后，但我们不能确定），他决心要成为罗马第一人，此后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毫不犹豫地动用暴力，在后来的岁月里杀人如麻，令人噤若寒蝉，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随时改换阵营。所有的罗马贵族都是雄心勃勃的，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如此悍然摈弃传统的约束，也没有人如此公开地将自己的目标定为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不过，话说回来，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是尤利乌斯·恺撒（终身独裁官，满载荣誉，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罗马人）的继承人。年轻的奥古斯都所处的局势和他的行动一样，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至少他的动机植根于他所在社会阶层的传统。

奥古斯都的野心是明目张胆的、不受约束的。随着越来越接近最终胜利，他对敌人也变得更宽容了。他的宽大仁慈比尤利乌斯·恺撒更审慎，但仍然是真诚的。尤其在与安东尼的战争中，他只有在情势必需的情况下（当然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才会杀死对手；只要他觉得安全，就会宽恕敌人。早先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他对敌人铁面无情，或者只是偶尔开恩。奇怪的是，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宽恕所有敌人，而另一个人起初草菅人命，后来懂得克制自己，不再胡乱杀人，那么第二个人反而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感激。尤利乌斯·恺撒的对手们不知道如何理解他的仁慈。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奥古斯都大体上停止了杀戮其他罗马人，几个例外是在发生或真或假的阴谋之后。最终，他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他厉行自我克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别人强迫他停止杀戮的。从政治角度看，他的这种做法很明智，因为满怀自信、对皇帝有好感的精英阶层肯定更容易对付。但他的一些继承者更加残暴嗜血，但仍然能长期掌权。不管奥古斯都的行为是否务实，毕竟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应当为此仰慕奥古斯都，就像我们必须谴责他早年的凶残一样。

他在早年并没有深思熟虑的计划或愿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后来所创政权背后的思想在他年轻时已经清晰成形。早期他的行动全是为了最直接的目标：赢得权力、击败敌人。他可能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东

西。在早期岁月，他宣扬自己与尤利乌斯·恺撒的关系，歌颂后者的丰功伟绩，为他复仇，同时为自己赢得权力。后来，在前30年代，他开始更多关心人民的福祉，在罗马修缮和新建纪念性建筑与基础设施，并管理罗马城的粮食供应。这也是非常明智的政治举措，但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后他继续从事这方面工作，说明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短期的俘获人心。奥古斯都无情地追求权力，但得到权力之后，就表现出非常希望把事情处理好的姿态，不管是粮食和饮水供应、道路系统、各种行政长官职位，还是罗马、意大利与各行省的治理。他一掷千金地修复旧神庙和建造新神庙，是为了恢复人与神之间的恰当关系，因为诸神曾经让罗马伟大，将来还会如此。我们没办法知道他内心深处的秉性，也不知道他这种集中有力的政策背后的真实信念，但至少他希望别人看到他在做一些事情，他的这种冲动很可能是真诚的。同样，他努力改善罗马精英阶层的行为和道德，是因为罗马人普遍相信，他们的不端行为招致了共和国晚期的那些灾祸，只要他们遵从美德，国家未来就会变好。

奥古斯都无情地追逐权力，然后紧紧握着权力，尽管他在公共场合假装不是这样。这样的雄心肯定是任何一位成功的政治领袖的标志性特征，很多不是那么成功的领袖也是这样。但他运用这种权力，为大众福祉服务。他努力让共和国再一次正常运转起来，我们不能否认他成功了，因为他缔造的和平与稳定使得国家欣欣向荣。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在他的统治下，更多人的生活水平比之前几代人提高了。他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传统问题，尽管他的一些手段比较新颖。尤利乌斯·恺撒曾尝试处理其中一些问题，其他人也试过，但他们都没有机会像奥古斯都那样全面、彻底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确保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在为全民福祉而辛劳。但话又说回来，这种自我推销是所有罗马政治家都会做的。他赋予一些个人和社区好处，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所以个人利益往往和更广泛的益处融为一体。但事实仍然是，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确实统治得很好。

奥古斯都的地位是逐渐提升的。从前30年开始，他有效垄断了军队的控制权，用现代术语来说，他是一位军事独裁者，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独裁官”的头衔。他的法律地位的变化似乎不是循序渐进的。每一个变化都是精心策划出来的，并做了准备，然后才实施，并不断摸索、反复修改。同时，随着一年年过去，他的名字和形象深入到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奥古斯都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在过去，还不曾有人对罗马帝国这么大的地域施加如此大的影响。在获得突出地位的同时，他也不得不承担繁重的工作：不断有使团和请愿者从各行省和国外前来拜见他。他亲自接见其中很多使者，或者让一位亲密盟友或亲属接见他们，这样就能确保很多个人和社区对他的忠诚，尤其是那些得到好处的个人和社区。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和判断往往非常具有地域性的事情。

恺撒·奥古斯都是一位军事独裁者，控制了国家。即便他后来非常得民心，也不能掩盖上述事实。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前1世纪的罗马发生了极大混乱。若在更早期的时代，他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腓立比获胜，或者奥古斯都在与塞克斯图斯·庞培或安东尼交战时阵亡或者病死，历史将会怎样发展，做这样的猜想是没有意义的。对历史爱好者来说，这些假设是非常有趣的饭后话题，但依赖太多无法精确衡量的因素，所以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奥古斯都取得了胜利，并活到高龄。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如果他失败了或者早逝，如果他选择了迥然不同的统治风格，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我们也不能草率地把奥古斯都时代与我们自己的时代相比拟。当今很多西方民主国家核心的体制惰性有点像罗马共和国最后几十年的情况，那时元老院领导人忙于互相之间的争斗，没有直面那些所有人都承认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情况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西方社会，但两个时空之间的差别更多也更大：罗马共和国的状态更糟糕，因为它的政治变得非常凶暴。罗马共和国的命运是一个教训：任何体制，哪怕是长

期成功的体制，都不能逃脱腐朽和崩溃的威胁。但在坠入这样的深渊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崩溃的命运可能会成为现实，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是不可避免的；当今西方社会还远远没有到可能出现现代版尤利乌斯·恺撒或奥古斯都的时候，我们应当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都是才华横溢的人，但他们都曾下达导致成千上万人在内战中死亡的命令。除非我们愿意相信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否则就必须始终记住，他们虽有伟大成就，但同时也是双手沾满血污的屠夫。根据军阀和独裁者的标准，他们都非凡地高效和温和。有些比他们坏得多的独裁者，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许。

奥古斯都签字命令发动政治清洗，但也非常自制，谢绝了元老院投票决定授予他的很多过分的荣誉。他偷走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虽然对她忠贞不贰，但之前也有过很多偷情的经历。另外，他还宣传旧式的道德观和婚姻的益处。他放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外孙女和外孙，他也敦促其他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年轻时，他违反了法律和先例，组建了一支私人军队去对抗合法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后来自己制定法律，并同意接受这些法律的约束。总的来讲，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行为不断得到改善。

他的矛盾之处始终存在，正如这样简单的事实始终存在一样：他是一个军阀，通过杀戮同胞得到了统治地位；他能够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没有谁的军事力量能与他相提并论。被欢呼为“祖国之父”的成熟政治家和得到亚历山大港水手赞颂（因为他让他们和平地航行和生活）的年迈元首控制着军队，并让军队只对他一人忠诚。他一生中取得的其他成就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是一位成功的军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军事独裁者当中，恺撒·奥古斯都不算太坏，至少他确立主宰地位之后，施行了善政。不管他有多少矛盾之处，至少在上述方面，他的戏剧表演应当得到热烈鼓掌。

[1] Dio 44.2.1-3（Loeb translation）.

[2] Tacitus，*Ann* .1.2.

[3] Tacitus，*Ann* .1.8.

[4] 关于这个名字，见Levick，*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p.247，n.11 有资料和讨论。

[5] 关于提比略登基和他在位的早期，见Levick，*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pp.68-81，及R.Seager，*Tiberius* （2005），pp.40-59。

[6] Tacitus，*Ann* .1.15.

[7] Tacitus，*Ann* .1.11讲到奥古斯都的建议。

[8] 提比略在位期间情况，详见Levick，*Tiberius the Politician* （1999）及R.Seager，*Tiberius* （2005）。

[9] Eutropius，*Breviarium* 8.5；奥古斯都留下的制度注定失败的观点，见J.Drinkwater，‘The Principate-lifebelt，or millstone around the neck of Empire？’，载于O.Hekster，G.Kleijn & D.Slootjes（eds），*Crises and the Roman Empire* （2007），pp.67-74；卡利古拉遇刺之后的情况，见A.Barrett，*Caligula.The Corruption of Power* （1989），pp.172-6。

附录一 元老晋升体系（荣耀之路）

若要从政，需依次参选和担任一系列官职，履行军事和民政职责。奥古斯都修改了各个官职的职责及其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审视他出生和逝世时的晋升体系。

前**63**年的元老晋升体系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理论上,从政之前要服十年兵役。一般作为军事保民官,或者在担任行省总督的亲友的幕僚中效力。
30	财务官	20	在罗马和各行省负责财政管理。每一位行省总督配备一名财务官,作为其副手。财务官自动获得元老身份。
	平民保民官	10	只有平民才能获得这个官职,而且它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须经过的步骤。保民官的人身神圣不可侵犯,负责保护人民。他们可以否决任何行政长官的行动,可以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
36	市政官	4	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须经过的步骤。其中两个职位仅限平民担任。在罗马负责行政管理,包括主持某些一年一度的节庆,并监管粮食供应与公共档案。

前**63**年的元老晋升体系**-**续表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39	裁判官	8	在罗马负责司法和行政管理,主持所有主要法庭。一年任期结束之后一般被外派,以资深裁判官或资深执政官的衔级担任行省总督。
42	执政官	2	共和国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在一年任期内留在罗马,按照月份轮流享有优先权。大多数执政官会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一年任期结束之后一般被外派,以资深执政官的衔级担任重要行省的总督。
	监察官	每5年有2人	通常是前任执政官,威望极高,负责监督公民人口与财产普查,并审核元老名录。

苏拉修改了晋升体系，重新规定了参选每一级官职的最低年龄要求。除平民保民官之外的所有官职任期都从当年1月1日开始，12月31日结束。平民保民官在12月10日就职。

公元**14**年的元老晋升体系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接近20岁	二十人团成员	20	在罗马负责初级管理工作。
20出头	军事保民官	24	每个军团(驻扎在埃及的军团除外)有一名出身元老家庭的高级军事保民官。有一段时间,奥古斯都也让两名高级军事保民官联合指挥一个骑兵单位。

公元**14**年的元老晋升体系**-**续表**1**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25	财务官	20	财务官的财政工作被减少,仅限于在元老院行省负责财政工作。在罗马,财务官负责协助执政官组织元老院会议,也负责监管罗马的公共档案。
	市政官(平民必须担任市政官或平民保民官,贵族可以跳过这些步骤)	6	失去了管理节庆活动、粮食供应和公共档案的职能。继续执行其他行政职能。
	平民保民官	10	失去了否决权和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的权力。仍然有权接受公民的上诉,可以参与法律案件。
30	裁判官	12	负责主持主要法庭。现在也负责主持节庆和竞技会。
	军团长	约22	负责指挥各军团(驻扎在埃及的军团除外)。
	资深执政官	约10	元老院行省的总督。

公元**14**年的元老晋升体系**-**续表**2**

最低年龄要求(岁)	官职	数量(人)	职责
理论上,苏拉设置的42岁的年龄要求仍然有效。实际上常采用33岁的标准(我们不知道这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的豁免)。	执政官	2(选举产生的执政官在任上死亡或辞职时,会任命补任执政官来接替)	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有权向公民大会提交立法和主持元老院会议。实际上,执政官的地位低于奥古斯都和提比略,他们在元老院时会坐在两位执政官之间。
	帝国行省总督	约9	帝国行省(埃及除外)和犹太等小行省的总督。每个这样的行省驻扎一个或多个军团。

附录二 耶稣的出生年代

对于拿撒勒的耶稣的出生年代和具体情况，我们唯一的资料来源是福音书。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其他史料提及此事，后世的相关史料肯定受到了福音书的影响，或许完全取材于福音书。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记载于很多早期史料中。这不足为奇，因为希腊或罗马的文献没有理由去记述外省任何人的出生。就连著名罗马人的出生情况也很少被完整记载下来，往往非常含糊，甚至没有任何记录。我们不知道尤利乌斯·恺撒的确切出生日期。他可能出生于前100年，但由于苏埃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写的传记的开头部分都已经遗失，前100年也只是个很好的猜测，有些学者提出他出生在前102年。关于奥古斯都出生的故事是在很久之后被记录在案的，那时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位多么重要的人物。[1]

在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描述了耶稣的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书时间一般被认为是1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不过直接证据极少。我们有理由说它们的成书时间不可能比这更晚，但可能更早一些。《马可福音》的成书时间被认为早一些，可能比《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早十年，但没有描写耶稣的诞生。《约翰福音》被认为是四福音书中最晚的一部，也没有写到耶稣诞生。我们必须记住，福音书不是记载当时事件的史书，它的宗旨是传达神学信息。所以它们描述了耶稣生平事迹中在神学方面重要的内容，写到其他事件也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例如，福音书很少写到耶稣的童年，完全没有涉及他传福音之前的成年生活。历史学家或者传记家会渴望这一类的细节信息，以及尽可能多的背景资料，但福音书的重点不在于此。作为比较，我们

应当注意到，我们对罗马领导人在政治上变得重要之前的生平也知之甚少。我们要牢记，福音书作者在其主线之外插入的题外话可能不准确，所以我们不能以它们为基础得出严肃的理论。

《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明确写道，耶稣诞生在大希律王统治时期。《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具体写道，施洗约翰出生在大希律王在世时，所以耶稣也出生在同一时期。大希律王于前4年去世，所以耶稣可能出生在此前的一两年，大约是前6～前5年，或者是前4年年初。也有人提出，前7年的星相对琐罗亚斯德教占星家（《马太福音》中的东方博士指的很可能就是琐罗亚斯德教占星家）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耶稣可能出生于前7年。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格来判断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这几个年份都与“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担任犹太地区长官时期（公元26～36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说法相吻合。

《路加福音》第2章第1～2节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难题，这段著名的经文写道：“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前文已经讲到，没有其他文献提及奥古斯都下了一道单独的命令，对帝国各行省进行人口普查和征税。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奥古斯都从来没有发布过这样的命令，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能仅凭一个证据就认为这是真的。今天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自己国家税收制度的所有方面，所以路加未必懂得罗马帝国税收的管理机制。即便他懂，他也未必会非常小心准确地对其加以描述。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像政府的其他很多方面一样，帝国的税收制度得到了整顿。作为整顿工作的一部分，大多数行省，或许是所有行省，都接受了一次或多次人口普查，以评估当地人民的纳税义务。对很多地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普查，至少是罗马直接统治下的第一次。这些评估与罗马的传统人口普查有显著区别，后者仅涉及罗马公民及其财产。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就是钦定本圣经中说的居里扭）主持的人口普查被犹太人民怀恨在心，引发了一些反抗。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次普查于公元6年开始，当时大希律王的儿子阿奇劳斯被废黜，犹太成为罗马直接统辖的一个行省，由叙利亚总督奎里尼乌斯监管建立行省的过程。于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关于耶稣诞生日期的说法就有了直接矛盾，《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5节和第2章第1～2节也互相抵触。为了让这些段落互相协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复杂的理论，但这些理论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有人提出，在公元6年的约十年前，大希律王还在世的时候，曾有过一次人口普查，而奎里尼乌斯也在公元6年之前担任过一次叙利亚总督（没有文献证据）。这种理论依赖太多的猜测。大希律王死的时候，叙利亚总督是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瓦卢斯是在前6年接替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的，而后者是在前9年开始担任叙利亚总督的。这些时间点似乎是明确的，尽管这些年恰好处于提比略在罗得岛的时期，留下的资料不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一个人先后两次担任同一个职位不是不可能（后来这种事情就变得非常罕见了），但奎里尼乌斯不大可能在大希律王活着的时候当过叙利亚总督，除非只当了几个月，但那样的可能性太小。大希律王活着的时候，奎里尼乌斯可能在这个地区，或许担任过加拉太总督，后来他肯定在盖乌斯·恺撒的幕僚中，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人口普查。[2]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公元6年由奎里尼乌斯主持的人口普查是罗马人在犹太开展的第一次普查，被犹太人当作一件悲痛的事情铭记。在此之前，似乎不大可能有罗马人直接开展人口普查。我们知道，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在高卢开展过多次人口普查，比如前27年、前12年和公元14年的几次，但高卢是一个直接受罗马统辖的行省，不是一个附庸国。遗憾的是，我们对附庸国（尤其是犹太）的税收制度和它们与罗马的关系知之甚少。大希律王可以调节征税的数量，这说明他应当有一个评估人口和财产的制度，极有可能是根据某种形式的普查。普查

多久执行一次，又如何运作（比如是否要求人们在其家乡接受登记），我们都不知道。[3]

《路加福音》第2章第3～5节说，就是因为需要回到家乡接受普查登记，约瑟才和他的未婚妻一起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去往犹太的伯利恒，后来玛利亚在伯利恒生下了一个儿子。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简单地说，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而没有解释伯利恒是不是约瑟和玛利亚平时的居住地，也没有提到人口普查。我们不必将此视为与《路加福音》矛盾，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为他们描述的事件提供完整又详细的历史背景，而是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告诉读者。约瑟和玛利亚可能确实需要去伯利恒接受大希律王王国的官员举行的某种形式的普查，而这普查与税收有关联。当时的人们也完全可能认为，他们的税金说到底其实是交给恺撒·奥古斯都的，因为是他扶植大希律王当上国王，并为他撑腰，让他维持权力。不管罗马国家、元首和大希律王这样的附庸统治者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法律关系（研究此话题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但没有什么实际结果，因为缺乏证据），当时的人的确有可能这样想，尤其是在事件发生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4]

这全都是有可能的，但仍然只是猜测。很可能，在1世纪晚期，提到人口普查，大家就自动想起了奎里尼乌斯那次有名的普查。但我们较难相信公元6年的普查和之前的普查之间有什么直接联系，除非可以肯定公元6年的普查是建立在大希律王朝税收制度的基础上，而大希律王朝的税收制度是建立在哈斯蒙王朝的制度上。在罗马治下的埃及，罗马时期和托勒密王朝之间有着相当多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应当不是埃及独有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都相信耶稣出生在大希律王晚年，这让我们再一次估计耶稣诞生时间为约前6～前5年。约瑟可能在那个时间前往伯利恒以便接受人口普查的登记，并可能被迫（或自愿）把未婚妻一起带去。《马太福音》似乎说明他们在伯利恒待了一段

时间。东方博士的出现（应当是来自帝国之外，可能是帕提亚帝国的腹地）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很多商人会进行这样的旅行。同样，《马太福音》说约瑟一家从犹太逃往埃及，也是说得过去的。埃及，尤其是亚历山大港，有规模很大的犹太人社区。[5]

这些说法虽然可信，但我们还是拿不准。毕竟我们手头的资料只有两部福音书中的短暂叙述，也没有关于这些年的犹太以及它和罗马关系的更多信息，所以我们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些说法。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而避免教条的、不明智的做法。但这种主题不可避免地会比奥古斯都之类人物的生平细节更容易引起情绪化的反应，人们对圣经叙述的证据常常施加不同的标准。因此，人们常说，大希律王屠杀婴儿的故事（根据《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大希律王下令处死所有出生在伯利恒的男婴）是虚构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除了《马太福音》之外，没有其他史料提及此事。路加没有讲到这个故事，于公元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写作的约瑟夫斯也没有提及此事，尽管他在记述大希律王统治时一般都写得非常详细。约瑟夫斯记录了大希律王统治时期大量的血腥屠杀，国王的很多亲属和耶路撒冷贵族都成为他的牺牲品。所以，《马太福音》中屠杀婴儿的恶行是大希律王能做出来的，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受到了大希律王自身经历的启发：他处决了好几个被指控阴谋反对他的儿子。这些理论，就像其他一些强调伯利恒作为耶稣出生地的神学重要性的理论一样，值得考虑，但都没有真凭实据。同样，说某事是可能发生的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说它肯定发生过。和本书的其余部分一样，在此处也必须承认，我们掌握的证据有限；我们要提醒自己，奥古斯都生平以及一般来讲的古代史的很多方面，都是无法百分之百确定的。[6]

---

[1] 早期史料中关于耶稣被处决，见Tacitus，Ann.15.44，Josephus，*AJ* 18.63-4.20.200，有关讨论见E.Sc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p.430-41介绍了关于*testimonium Flavianum* 的大量文献，因为这些段落中的一

部分或许全部，是后人篡改添加的。关于尤利乌斯·恺撒的诞生，见A.Goldsworthy，*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p.30。

[2] Josephus，*BJ* 2.117-18，*AJ* 17.355，18.1，26，*ILS* 2683；讨论见E.Sc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p.258-9，注释*ILS* 918 记载了一位不知名的元老两次担任帝国行省总督，至少一次是在叙利亚。这也许就是奎里尼乌斯。令问题更加复杂的是，2世纪末3世纪初的基督教辩护者德尔图良将耶稣出生年份定为叙利亚总督Coponius举行的人口普查期间，见Tertullian，*Against Marcion* 4.19；Strabo，*Geog* .12.5.6，Tacitus，*Ann* .3.48 记载了奎里尼乌斯在奇里乞亚边境赢得的一场胜利，时间可能是约前4～前3年，可能是他担任加拉太和潘菲利亚总督期间。

[3] 见Goudineau in *CAH2* X，p.490涉及在高卢举行的人口普查。

[4] 非常有价值的讨论，见E.Schürer，G.Vermes & F.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1（1973），pp.399-427，更简洁的讨论见P.Richardson，*Herod.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1996），pp.295-8。

[5] 关于埃及，见A.Bowman in *CAH2* X，pp.679-86，689-93。

[6] 关于对大屠杀的质疑，见J.Richardson，*The Romans in Spain*（1996），pp.297-8。即便在A.Murdoch，*Rome’s Greatest Defeat.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2006），p.59这部与本话题似乎无关的书里，大屠杀也被视为事实。

术语解释

市政官（**Aedile**）： 市政官是负责主持罗马城日常生活某些方面（包括举办某些一年一度的节庆）的行政长官。市政官的地位一般在财务官与裁判官之间。市政官的数量比裁判官少，并且不是晋升体系中必需的阶段。

《埃涅阿斯纪》（***Aeneid***）： 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十二卷史诗，在他死后发表。它发表后当即被认可为拉丁文诗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并成为标准教材。它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在故国灭亡后的旅行，最后他和族人定居在意大利，其后裔建立了罗马城。

军事国库（**Aerarium militare**）： 公元6年，奥古斯都建立了军事国库，以便提供军费，尤其是支付军饷和退伍奖金。军事国库最早的资金大部分都是奥古斯都自掏腰包，但后来为了维持军事国库，征收了不得人心的遗产税。

军团旗手（**Aquilifer**）： 执掌一个罗马军团军旗（aquila）的旗手。军旗其实是一尊银质或镀金的雄鹰塑像，安放在一根木杖顶端。

骑兵团（**Ala**）： 骑兵团是辅助骑兵的单位，兵力大致相当于一个步兵大队。

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 这是奥古斯都时期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之一。元老院投票决定建造这座祭坛，以纪念奥古斯都于前13年返回罗马。祭坛于前9年落成。和平的主题纪念了内战的结束

和对外战争的胜利。

威望（**Auctoritas**）：一位罗马元老的声望和影响力。军事成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观鸟占卜师（**Augur**）：观鸟占卜师是罗马最重要的祭司团体之一，共十五人，终身制。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监督正确地观察和诠释神谕（定期占卜是罗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尤利乌斯·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增加了第十六名观鸟占卜师。

辅助部队（**Auxilia**）：共和国晚期招募的非罗马公民士兵，也叫支援部队。

床弩（**Ballista**）：一种有两根臂、利用扭力的大型弩，可以发射弩箭或石块，精准度相当高。床弩尺寸不一，绝大多数用于攻城。

纯白托加袍（**Candidatus**）：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会穿一种特别的白色托加袍，以此向其他公民宣布自己即将参选。英语中“候选人”一词candidate就来源于此。

铁甲骑兵（**Cataphract**）：身披重甲的骑兵，其坐骑往往也用护甲。铁甲骑兵是帕提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百夫长（**Centurion**）：罗马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军官级别。最初的百夫长指挥一个80人的百人队。一个罗马军团中最资深的百夫长是首席百夫长（primus pilus），地位极高，任期只有一年。

百人队（**centuria**）：罗马军队最基本的小单位，由一名百夫长指挥，一般有80名士兵。

大队（**cohors**）：罗马军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包括6个百人队，每

个百人队有80名士兵，一共有480人。

百人会议（**Comitia Centuriata**）**：** 负责选举最高级行政长官（包括执政官和裁判官）的罗马公民大会。根据人口普查中登记的财产情况，全体公民被分为193个投票百人团。富人尽管人数少，但对选举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百人会议的结构据说是效仿早期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

部落会议（**Comitia Tributa**）**：** 全体罗马人民（包括贵族和平民）的一种大会。根据血统出身，将全体公民分为35个投票部落。部落会议有立法权，由一名执政官、裁判官或席位市政官主持。部落会议还可以选举一些官职，比如财务官和席位市政官。

平民大会（**Concilium Plebis**）**：** 罗马平民的会议，负责立法或选举某些行政长官，如平民保民官。贵族不可以参加平民大会。根据血统出身，将全体平民分为35个投票部落。会议由平民保民官主持。

执政官（**Consul**）**：** 每年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选举产生的最高级行政长官，他们负责指挥重要的作战。任期结束之后，元老院有时会授予他们一些权力，此时他们被称为资深执政官（proconsul）。

元老院议政厅（**Curia**）和尤利乌斯议政厅（**Curia Julia**）**：** 元老院议政厅位于罗马城广场的北侧，据说是由一位国王建造的。苏拉修复了议政厅，但它后来在克洛狄乌斯的葬礼上被烧毁。恺撒担任独裁官时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元老院议政厅。但即便在议政厅状态良好时，元老院有时也在其他地方开会，进行一些特定的辩论。

晋升体系（**Cursus honorum**）**：** 罗马人从政的进阶制度。苏拉担任独裁官时重新颁布和加强了关于行政长官候选人的年龄和其他资格要求的法律。后来奥古斯都修改了这些法律。

独裁官（**Dictator**）： 在极端危机的时期，可以任命一名独裁官，任期六个月，拥有最高的军事和民政大权。后来历次内战的胜利者，如苏拉和尤利乌斯·恺撒，都用这个头衔作为更为长期化权力的基础。

青少年（**Ephebe**）： 希腊城市的少年要在国家指导下，在体育馆（gymnasium）接受训练，主要是为了增强体质，但往往也包括特定的军事训练。

骑士（**Equites**，单数为**Eques**）： 罗马的骑士是根据人口普查拥有达到最高标准的财产的群体。从格拉古兄弟时期开始，骑士获得了更为正式的政治角色，比如在法庭担任陪审员，这种措施非常有争议。直到奥古斯都时期，才将元老单独化为一个阶层。

法西斯束棒（**Fasces**，单数为**Fascis**）： 一束装饰性的木棒，长约5英尺，中间捆着一把斧头。法西斯束棒由执法吏扛在肩头，是一位行政长官权力与地位的最明显象征。

奥古斯都广场（**Forum Augustum**）： 奥古斯都建造的广场，复仇者玛尔斯神庙位于其中心。

尤利乌斯广场（**Forum Julium**），或称恺撒广场（**Forum Caesaris**）： 尤利乌斯·恺撒筹划和开始建造的广场，由奥古斯都完成。维纳斯神庙在其中心。

罗马广场（**Forum Romanum**）： 罗马城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位于卡比托利欧山、帕拉丁山、奎利那雷山和威利亚山之间。公共集会常在广场上的演讲台（Rostra）周围或广场东端举行。平民大会和部落会议通常也在广场举行，进行立法工作。

短剑（**Gladius**）： 拉丁文的剑。短剑一般指的是西班牙短剑（gladius hispaniensis），一直到3世纪，它始终是罗马的标准武器。它

用优质钢制成，可以劈砍，但主要用来刺杀。

哈斯蒙王朝（**Hasmonaean**）： 前2世纪，犹太人反叛塞琉古王朝，取得成功。犹太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由哈斯蒙王朝统治。安东尼和屋大维最终扶植大希律王，取代了古老的哈斯蒙王朝。

军权（**Imperium**）： 行政长官和资深行政长官在其任期内的军事指挥权。奥古斯都被授予高级资深执政官军权（maius imperium proconsulare），也就是比其他所有资深执政官更高的军权。后来阿格里帕和提比略也获得了这种权力。

军团长（**Legatus**，复数为**Legati**）： 一名受上级委派指挥军队的军官，他本身没有军权。军团长由行政长官选拔，而不是选举产生。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军团长被分为两个主要级别，即指挥一个军团的军团长（legatus legionis）和“奥古斯都军团长”（legatus Augusti，即管辖一个帝国行省的总督）。

军团（**Legio**）： 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征兵。军团是罗马军队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主要单位。在奥古斯都时代，一个军团的理论兵力约为4800～5000人（分为10个大队，每个大队480人）。但在作战中军团的有效兵力往往少得多，在内战中尤其如此。

执法吏（**Lictor**）： 一位行政长官的正式侍从，携带法西斯束棒，象征行政长官主持正义、施加极刑和肉刑的权力。执政官由12名执法吏陪同，独裁官通常则有24名执法吏。

骑兵统帅（**Magister Equitum**）： 共和国独裁官的副手。根据传统，骑兵统帅负责指挥骑兵，因为独裁官被禁止骑马。

奥古斯都陵寝（**Mausoleum**）： 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战役之前开始建造的宏伟陵墓，得名自卡里亚国王摩索拉斯（Mausolus）的著名陵

墓，这是古典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

奥古斯都海战（**Naumachia Augusti**）： 奥古斯都在前2年上演的海战表演，用以娱乐群众。动用了约30艘战船和数千名水手，在一个特别挖掘出来的湖泊上进行。

指名者（**Nomenclator**）： 一种受过特别训练的奴隶，他的任务是向自己的主人提示走过来的其他公民的名字，以便主人能够以亲切的方式与来人打招呼。拉选票的政治家往往会带一名指名者在自己身边。

凯旋式符号（**Ornamenta triumphalia**）： 奥古斯都设立了用凯旋式的“符号”而不是凯旋式本身奖励人的办法。前19年之后，除了他的亲属之外，无人获得完整的凯旋式荣誉，得胜的行省总督会得到“凯旋式符号”的奖励。

小凯旋式（**Ovatio**）： 一种等级较低的凯旋式。在小凯旋式中，将军骑马而不是乘坐战车穿过城市。

万神殿（**Pantheon**）： 阿格里帕建造的供奉诸神的神庙。虽然神庙的铭文上还有他的名字，但我们今天看到的万神殿其实是哈德良在2世纪重建的。

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 前2年，奥古斯都获得了这个头衔。

标枪（**Pilum**，复数为**pila**）： 在罗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重型标枪都是罗马军团士兵的标准装备。标枪的枪头狭窄，用来穿透敌人的盾牌，枪杆长而细，使得枪头能够打击到盾牌后的敌人。

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 十五名大祭司（pontiff）之首。大祭司是由罗马贵族垄断的三种主要神职人员团体之一。大祭司负责管理许多国家节庆和事件的时间安排。祭司长更像是大祭司团（College of

Pontiffs）的主席，而不是领导人，但这个职位的威望极高。

裁判官（**Praetor**）： 裁判官是一年一度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在元老院指导下治理重要性较低的行省，并指挥罗马规模较小的战争。

禁卫军大队（**Praetorian cohort**）： 这个时期的禁卫军是从各军团精心选拔出来的精锐士兵，装备非常华丽。每一位将军有权组建一个大队的禁卫军，但在内战期间，三头同盟分别控制着好几个禁卫军大队，都是从他们的下属那里接收来的。亚克兴角战役之后，奥古斯都组建了9个永久性的禁卫军大队，作为自己的卫队。在这个阶段，禁卫军在罗马没有永久性的兵营，任何时候都只有3个大队在城内。

长官（**praefectus**）： 一名拥有骑士身份的军官，职责范围很广，包括指挥盟军或辅助部队。

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s**）： 奥古斯都恢复的一个古旧官职，一般由一位前任执政官担任。城市长官负责罗马城的行政管理，并指挥3个城市大队。

元首国（**Principate**）： 现代学者为奥古斯都创立的政权取的名字，意思是一位元首（princeps）的统治。有时元首被称为皇帝，但这不是非常准确。

元首（**princeps**）： 元首是第一公民，也是元老院、人民和国家的领导人。奥古斯都更愿意用这个词来指他自己的地位。在过去，元老名录上的第一人是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由监察官选出，是元老院威望最高、最受尊重的成员。元首这个词本身并不意味着拥有此头衔的人拥有特定权力，而只是代表人们对他的景仰和尊重。

青年元首（**Princeps iuventutis**，复数为**principes iuventutis**）： 盖乌斯·恺撒得到了一个新设立的头衔“青年元首”，后来他的弟弟卢基乌

斯也被授予这个头衔。他们还成为骑士阶层象征意义上的领袖。

演讲台（**Rostra**）：罗马广场上供演讲的高台。尤利乌斯·恺撒计划对议政厅和周边地区重新规划，以便将罗马广场与他的新广场连接起来。奥古斯都对演讲台做了改造，在罗马广场的另一端建造了一座新的演讲台，靠近神圣尤利乌斯神庙。演讲台装饰着俘虏的敌船的冲角，由此得名。

财务官（**Quaestor**）：财务官是一种行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可以作为执政官级别总督的副手，常担任从属性的军事指挥官。

选举围场（**Saepta**）：战神广场上的选举区域，不同的人民大会在此举行选举。尤利乌斯·恺撒开始了改造选举围场的工程，后由阿格里帕完成。

蝎弩（**Scorpion**）：罗马军队在野战和攻城战中使用的一种较轻的大型弩。蝎弩射程较大，精准度很高，能够穿透任何形式的铠甲。

世纪节（**ludi saeculares**）：奥古斯都于前17年庆祝了这个节日。一个世纪据说比人的寿命要长。

元老院终极议决（**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元老院的终极法令，要求行政长官尽一切努力保卫国家。前63年元老院以此镇压喀提林，前49年反对尤利乌斯·恺撒，最后一次使用是前19年镇压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

旗手（**Signifer**）：扛着百人队军旗（signum）的旗手。

苏布拉（**Subura**）：苏布拉是维米那勒山和埃斯奎里努斯山之间的谷地，因狭窄街道和贫民区而臭名昭著。

塔兰同（**Talent**）： 塔兰同是希腊的一个重量和货币单位，规格差别相当大，从约57磅到83磅不等。史料中很少能明确说明它们使用这个单位时用的是哪一种标准。

龟阵（**Testudo**）： 罗马军团士兵的一种著名阵形，士兵们将自己的长盾重叠起来，保护自己的前方、两侧和头顶。这种阵形一般在攻击敌人防御工事时使用。

司库阶层（**Tribuni aerarii**）： 人口普查登记的低于骑士阶层的群体。对这个群体我们了解较少。

军事保民官（**Tribunus militum**）： 共和国的每个军团有6名军事保民官，他们要么是选举产生的，要么是被任命的。任何时间都由其中两人执掌指挥权。在奥古斯都时代，每个军团仍然有6名军事保民官，但其中一人是元老身份，将来会从政，地位最高。这名军事保民官被称为“宽带军事保民官”（tribunus laticlavius），得名自他胸甲一圈宽条纹。他是军团的二把手，仅次于军团长。另外五名“窄带军事保民官”（tribuni angusticlavii）的条纹较窄，是骑士身份，一般在此之前曾担任一个辅助大队的指挥官。

平民保民官（**Tribune of the plebs**）： 每年选举产生10名平民保民官，拥有政治权力而没有军事职责，可以就任何问题立法。在共和国晚期，许多有野心的将军，比如马略、庞培和尤利乌斯·恺撒，都借助保民官的帮助，为自己获取重要的职位。奥古斯都被授予了平民保民官一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和权力。

保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 平民保民官的权力，包括召集元老院开会和向公民大会提交法案的权力。奥古斯都被授予这种权力。后来阿格里帕和提比略也得到了保民官权力。

凯旋式（**Triumph**）：元老院授权的大型庆祝活动，以嘉奖得胜的将领。形式为沿着圣道（罗马城举行庆典的主要道路）游行，展示得胜将领获得的战利品和战俘，最后高潮是在仪式中处决被俘的敌酋。得胜将领乘坐一辆战车，打扮得如朱庇特神像一般，一名奴隶将象征胜利的花冠举在他头顶。这名奴隶应当不断小声提醒将军，他纵然获得这般荣耀，也不过是凡人而已。

三头同盟（**Triumvir**）：前43年，平民大会通过了一位保民官提出的《提提乌斯法》，任命安东尼、李必达和屋大维为“恢复国家秩序”的三人理事会（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三头同盟被授予独裁官的权力，起初任期被规定为五年。

城市大队（**Urban cohorts**）：奥古斯都为罗马城组建了3个城市大队，作为准军事的警察部队。他们的指挥官是城市长官（praefectus urbis）。奥古斯都时期可能还组建了第4个大队，以保卫高卢卢格敦的帝国铸币厂。提比略在位时，这个大队肯定已经在卢格敦了。

方旗（**vexillum**）：一种方形旗帜，挂在旗杆上，用来标示将军的位置，也是一队士兵携带的旗帜。将军的方旗通常是红色的。

火警队（**Vigiles**）：奥古斯都于公元6年组建了7个大队，作为消防队和罗马城的夜间巡警。每个大队负责当时罗马城14个区域中的2个。

主要人物

阿格里皮娜 （约前14～公元33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她嫁给了日耳曼尼库斯，生了五个孩子。日耳曼尼库斯于公元19年去世后，她受到提比略的猜疑。她和两个儿子在流亡期间死去。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 （约前63～前12年）：阿格里帕是奥古斯都交情最深的朋友和最忠诚、最能干的副手。奥古斯都得知尤利乌斯·恺撒遇刺的消息时，阿格里帕就在他身边。阿格里帕的高明本领在战胜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安东尼的胜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是一位非常高效的行政管理者和建筑工程主持者。前21年，他娶了丧夫的尤利娅，和她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不断晋升，成为元首的同僚。

阿提娅 （？～前43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尤利娅和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的女儿。她嫁给了盖乌斯·屋大维，生了奥古斯都。丧夫之后，她嫁给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奥古斯都第一次成为执政官（此时他仅有十九岁）之后不久，阿提娅去世了。

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 （约前106～前32年）：西塞罗的终身好友和通信伙伴。他始终是骑士身份，没有从政，但仍然与共和国的几乎所有显贵都保持友好关系。他也和奥古斯都通信。他的女儿嫁给了阿格里帕。阿提库斯意识到自己身患绝症，便自杀了。

奥古斯都 （前63～公元14年）：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后更名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和恺撒·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甥孙，在

内战中得胜，成为共和国的唯一主人。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约前85～前41年）：他的父亲在前78年和李必达的父亲一起被处决。他的母亲是塞维利娅，尤利乌斯·恺撒的长期情人。前49年内战爆发时，他被认为是元老院最有前途的青年之一。他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抗尤利乌斯·恺撒，但得到宽恕，并被任命为裁判官。但他仍然领导“解放者”（即刺杀尤利乌斯·恺撒的密谋者群体），后来在腓立比战败自杀。

盖乌斯·恺撒（前20～公元4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长子，于前17年被奥古斯都收养，得到极大恩宠。前1年，他得到主要的行省指挥职位，但在公元3年负了重伤，于次年年初去世。

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约前85～前41年）：前53年，他担任克拉苏的财务官，在帕提亚的惨败中幸存。他也与尤利乌斯·恺撒对抗，但在法萨卢斯战役后投降，并被尤利乌斯·恺撒任命为裁判官。他和李必达都娶了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妹妹。他和布鲁图斯一起领导“解放者”，但在第一次腓立比战役之后自杀。

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约前108/前106～前62年）：出身于历史悠久但后来比较衰败的贵族世家，喀提林绝望地追求高官职位，付出了高昂代价，最终企图发动政变，被西塞罗镇压。

小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前95～前46年）：加图是尤利乌斯·恺撒的不共戴天之敌，以严峻的美德闻名，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接受他的仁慈。塞维利娅是他的同母异父姐姐，她的儿子布鲁图斯后来娶了加图孀居的女儿。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约前106～前43年）：西塞罗是他那一代人中最成功的新人之一，是罗马最优秀的演说家。前63年，他担任

执政官，智胜喀提林，但后来因为自己行动的合法性问题遭到攻击。在内战中，他最终反对尤利乌斯·恺撒阵营，但后来得到宽恕。尤利乌斯·恺撒遇刺身亡之后，西塞罗鼓励“解放者”，然后企图利用奥古斯都来消灭安东尼。后三头同盟建立后，他成为政治清洗的第一批牺牲品之一。

克劳狄（前10～公元54年）：瘸腿且被怀疑头脑有问题，克劳狄被奥古斯都和李维娅阻拦在公共生活之外。直到克劳狄的侄子卡利古拉统治期间，他才担任官职。卡利古拉被谋杀后，克劳狄被禁卫军推举为元首。

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约前70/前69～前30年）：统治以埃及为中心的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终其一生都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她的不幸在于，她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罗马共和国被内战分裂的时期，最后她与落败的马克·安东尼联系过于紧密。她发现奥古斯都不会允许她或她的孩子保留权力，便自杀了。

“富人”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约前115～前53年）：克拉苏以富有而闻名，所以得到绰号“富人”。他在苏拉麾下崭露头角，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前59年，他和庞培、尤利乌斯·恺撒一起组成了前三头同盟，并在前55年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同僚是庞培）。他主动向帕提亚人发起进攻，在卡莱受挫。在随后的撤退中，他被杀死，他的军队大部分遭到屠杀。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前30年执政官，生卒不详）：富人克拉苏的孙子，在奥古斯都对抗安东尼时加入前者，后来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讨伐邻近的部族，赢得一连串胜利。他在前27年庆祝凯旋式，此后就从史册中消失，不过他的养子于前14年担任执政官。

德鲁苏斯（前38～前9年）：李维娅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提比略·克劳狄·尼禄的次子。他得到快速晋升，在阿尔卑斯山作战赢得军事荣耀，

然后在日耳曼作战，最远打到易北河。他娶了安东尼娅（屋大维娅和马克·安东尼的女儿），生了三个孩子，包括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德鲁苏斯于前9年因坠马负伤而死。

小德鲁苏斯 （前13～公元23年）：提比略和维普撒尼娅的儿子，李维娅的孙子。公元4年，提比略被奥古斯都收养，于是小德鲁苏斯成了奥古斯都的孙子。

富尔维娅 （？～前40年）：马克·安东尼的妻子，和他生了两个儿子，安提勒斯和尤卢斯。在与安东尼结婚前，她已经结过两次婚，两任丈夫都不幸惨死。马克·安东尼起初不情愿地支持卢基乌斯·安东尼失败的叛乱，后来与她断绝关系，据说她不久之后就死了。

日耳曼尼库斯 （前15～公元19年）：德鲁苏斯和安东尼娅的儿子，颇得民心。公元6年潘诺尼亚叛乱和公元9年日耳曼叛乱之后，他开始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指挥职务。他于公元19年去世，死状非常可疑。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 （前65～前8年）：一位成功释奴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在腓立比战役中为“解放者”而战。几年后他成为梅塞纳斯文人圈子的一员，认识了奥古斯都。奥古斯都赠给贺拉斯一座昂贵的庄园，让他能够专注于写作。奥古斯都还想聘请他为秘书，被他谢绝，不过两人仍然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尤利娅： 尤利乌斯·恺撒的姐姐、奥古斯都的外祖母。她嫁给了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和他生了一个女儿阿提娅。

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女儿 （前39～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独生女。奥古斯都利用她来巩固自己与主要支持者的联盟，将她先后嫁给马凯鲁斯、阿格里帕和提比略。她和阿格里帕生了五个孩子，但和提比略只有一个流产的孩子。她与提比略婚姻关系的恶化促使提比略退隐到罗

得岛。前2年，她因通奸罪受到谴责，被父亲流放。

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外孙女（约前19～公元28年）：尤利娅和阿格里帕的女儿，也被指控犯有通奸罪，于公元8年被流放。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100～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出身于前1世纪比较默默无闻的贵族家庭，政治生涯的早期总的来讲还是循规蹈矩的。前59年，他担任执政官，与庞培和克拉苏秘密结盟，即今天所谓的前三头同盟。在高卢征战十年屡战屡胜之后，他在内战中击败庞培，成为独裁官。他先前的支持者和被他宽恕的敌人组成密谋集团，将他刺杀。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约前86～前13/前12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执政官，在前78年企图发动政变。内战期间，李必达支持尤利乌斯·恺撒，逐渐得到提升，于前44年得到骑兵统帅的高位。因此他掌握了很多军队，在独裁官被刺杀后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但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士兵并不热情地支持他。他与马克·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组成后三头同盟，但后来他的权力逐渐萎缩，于前36年遭到镇压，余生几乎处于被软禁状态。

李维娅·德鲁茜拉（约前58～公元29年）：从前38年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她一直是奥古斯都的妻子。他们只有一个流产的孩子。但她在前一段婚姻中生的两个儿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在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都作为军事统帅赢得了荣誉。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和尼禄这四位皇帝都是李维娅的后代。奥古斯都在世时，她常在公共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奥古斯都重要的幕后谋士。

李维（提图斯·李维乌斯，约前59～公元17年，或前64～公元12年）：奥古斯都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创作了142卷罗马史，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道德教诲，从罗马建城一直讲到前9年德鲁苏斯去世。他的

著作只有一小部分保存至今，其余部分只有简略概述存世。奥古斯都开玩笑地批评他是庞培派，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维敌视新政权。在很多方面，他都歌颂了元首所珍视的那些美德。

卢基乌斯·安东尼（约前80？～前40/前39年）：马克·安东尼的两个弟弟之一，于前41年起兵反叛奥古斯都，在佩鲁西亚被击败。他得到赦免，被派往西班牙当总督，但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卢基乌斯·恺撒（前17～公元2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次子，被奥古斯都收养，和兄长盖乌斯一样得到极大恩宠。公元2年，他被派往西班牙，途中在马西利亚病逝。

盖乌斯·梅塞纳斯（约前63～前8年）：奥古斯都的长期挚友和支持者，一直是骑士，没有担任过官职。即便如此，有好几次他是罗马的实际领导者，在政坛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后三头同盟时代。后来他继续辅佐奥古斯都，并结交了许多作家，包括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

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42～前23年）：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和前任执政官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的儿子，得到元首的极大恩宠，后来突然去世。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生卒不详，前56年执政官，最后一次在史料中出现是前43年）：阿提娅的第二任丈夫，奥古斯都的继父，似乎在奥古斯都政治生涯初期帮助过他。

盖乌斯·马略（约前157～前87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姑父，是一位新人，后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罗马军事统帅，史无前例地连续五次担任执政官。但他与苏拉的竞争导致了内战，在夺取罗马几天后去世。

马克·安东尼（前86/前83～前30年）：一个非常成功的贵族世家成员，父亲去世时给他留下大量债务，他自己也很快债台高筑。在高卢战

争的最后几年里，他为尤利乌斯·恺撒效力，后来在内战中也支持他。安东尼于前44年担任执政官，因此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处于有权有势的地位。他和奥古斯都的关系开始时就很恶劣，但在互相冲突了一段时间之后联手，并与李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他们一同打败了“解放者”，但安东尼后来远征帕提亚失败，他的地位遭到了致命性的打击。而他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私情损害了他在罗马的形象。前31年，他在亚克兴角战败，于次年自杀。

屋大维娅（约前69～前11年）：奥古斯都的姐姐，先嫁给盖乌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后改嫁马克·安东尼，以便巩固弟弟与安东尼的联盟。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了一个儿子马凯鲁斯，在第二段婚姻中生了两个女儿，大安东尼娅和小安东尼娅。

盖乌斯·屋大维（？～前59年）：奥古斯都的父亲，出身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是家族里第一个到罗马从政的成员。他于前61年当选裁判官，并成功担任马其顿总督，但在回家途中死在位于诺拉的别墅。

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德乌斯·纳索，前43～公元17年）：属于比维吉尔和贺拉斯更年轻的一代人，所以没有参加过内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元首国的和平环境中创作的。他的风格远远不像老一代诗人那样尊重传统，他的《爱的艺术》尤其令奥古斯都不悦。公元8年，他卷入了小尤利娅的丑闻，被放逐到黑海。

伟大的格奈乌斯·庞培（前106～前48年）：庞培是他所在时代最著名的罗马将军，在苏拉麾下飞黄腾达。他辉煌的政治生涯打破了几乎所有规矩。前50年代，他担任西班牙各行省总督，却留在罗马城外，派遣他的军团长去治理行省。在内战中，他与尤利乌斯·恺撒对抗，于前48年在法萨卢斯战败，不久之后在埃及被谋杀。

塞克斯图斯·庞培·马格努斯·皮乌斯（约前67～前36年）：伟大的

庞培的幼子，在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前不久招兵买马，准备与他对抗，但后来才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占据了西西里岛，将其作为自己的基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得以封锁意大利并营救逃避政治清洗的流亡者。虽然赢得了一些海战，但他最终被奥古斯都及其支持者打败。

波斯图穆斯·阿格里帕（前12～公元14年）：阿格里帕和尤利娅最小的孩子，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在父亲死后才出生的。在他于公元4年被奥古斯都收养之前，公众很少注意到他。即便被收养之后，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官职，几年后被边缘化和流放。奥古斯都去世之后不久，他就被谋杀，但幕后指使者的身份不详。

斯克利博尼娅（公元16年之后去世）：奥古斯都的妻子，尤利娅的母亲，陪伴女儿一同流亡。

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生卒不详，前37年和前26年执政官）：奥古斯都最忠诚可靠的下属之一，地位可能仅次于阿格里帕。他于前16年担任城市长官，但不久之后就从史册中消失了，可能是去世了，

“幸运的”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前138～前78年）：出身于历史悠久但后来破落的贵族世家，苏拉于前88年率军进攻罗马，以武力夺权成功。随后他与马略的支持者和其他敌人打了一场内战，自立为独裁官，并发明了“公敌宣告”手段，以便将谋杀对手的行为合法化。

提比略（前42～公元37年）：李维娅和第一任丈夫提比略·克劳狄·尼禄的长子，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些重要官职和行省指挥职务。他最先娶了阿格里帕的女儿维普撒尼娅，后来与她离婚，以便与尤利娅结婚，但与尤利娅都非常不幸福。前6年，他自愿退隐到罗得岛，在随后十年里被排除在政坛之外。最后他被允许返回意大利，直到盖乌斯和

卢基乌斯·恺撒去世之后，才被奥古斯都收养。随后几年里，他得到了与元首平起平坐的权力，于公元14年顺利继承了元首的位置。

维普撒尼娅 （前36～公元20年）：阿格里帕和庞贝尼娅（阿提库斯的女儿）的女儿，嫁给了提比略。提比略与她离婚，以便与尤利娅结婚，但据说后来非常后悔。维普撒尼娅之后改嫁一位元老，生了几个孩子。

维吉尔 （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前70～前19年）：虽然维吉尔在后三头同盟组织的没收土地行动中损失了一些土地，但后来成为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的朋友，创作了符合新政权口味的作品。他的《埃涅阿斯纪》在其去世时尚未完成，他希望将稿子毁掉，但奥古斯都命人整理了稿件，公开发表，作品得到了极大赞颂。

谱系图

1.前三头同盟

2.后三头同盟，他们后代之间的联系

3.奥古斯都的亲戚们

4.前30年马克·安东尼死时，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亲戚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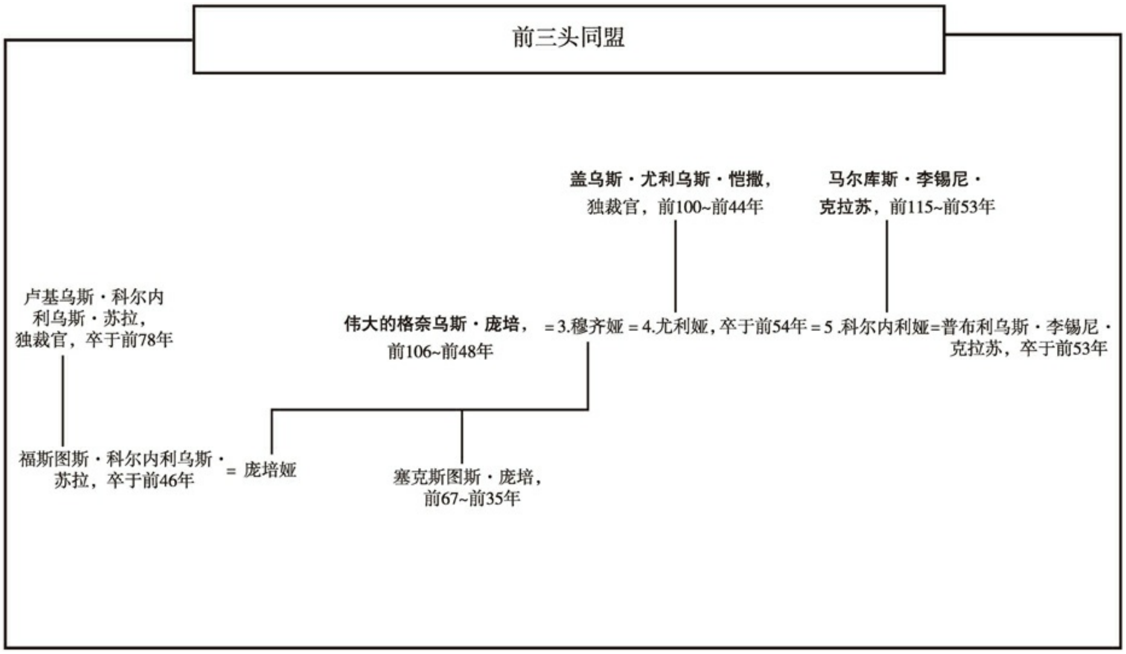
5.前19年，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亲戚和儿女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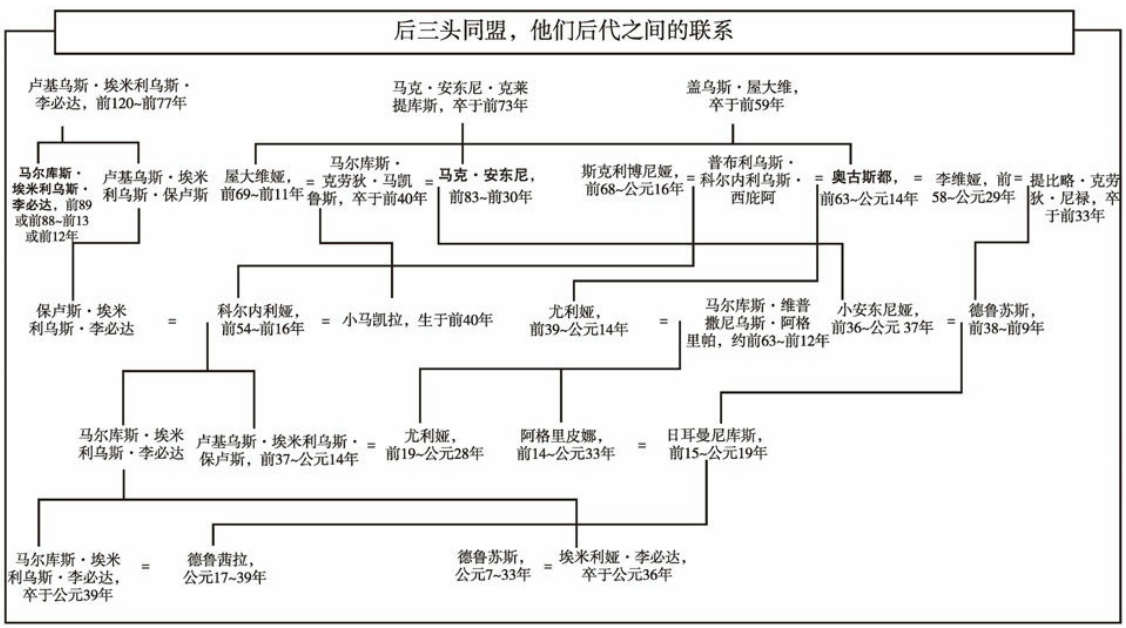
6.前10年，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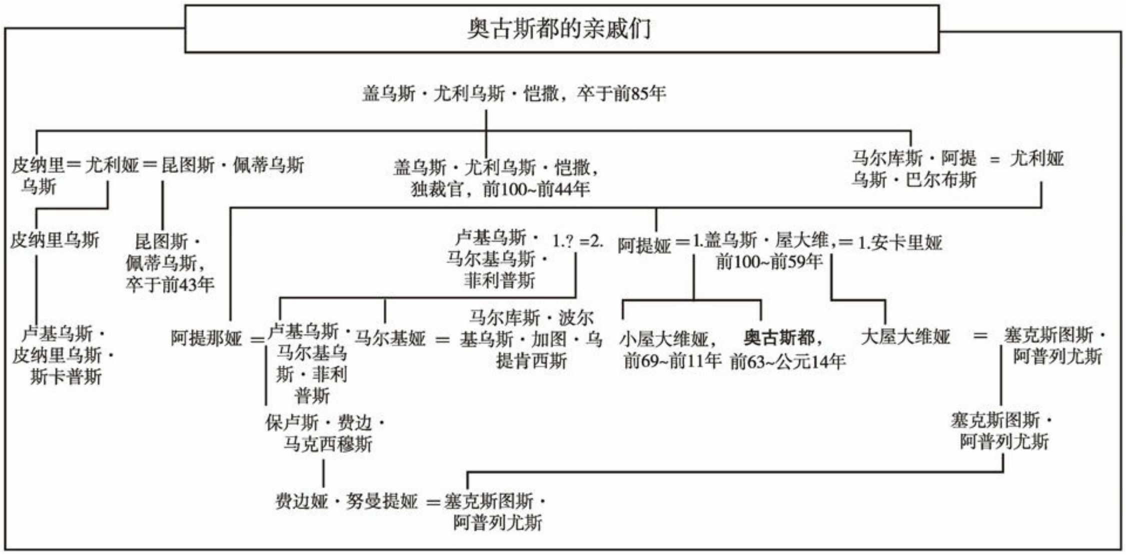
7.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他还在世的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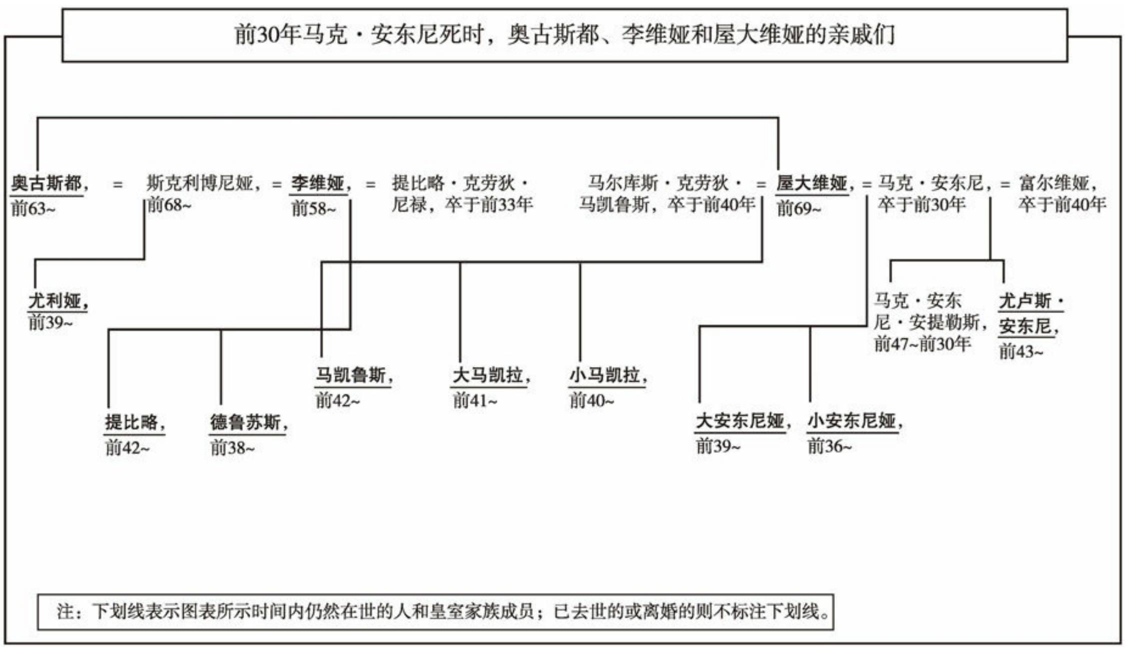
8.尤利乌斯-克劳狄皇朝简化版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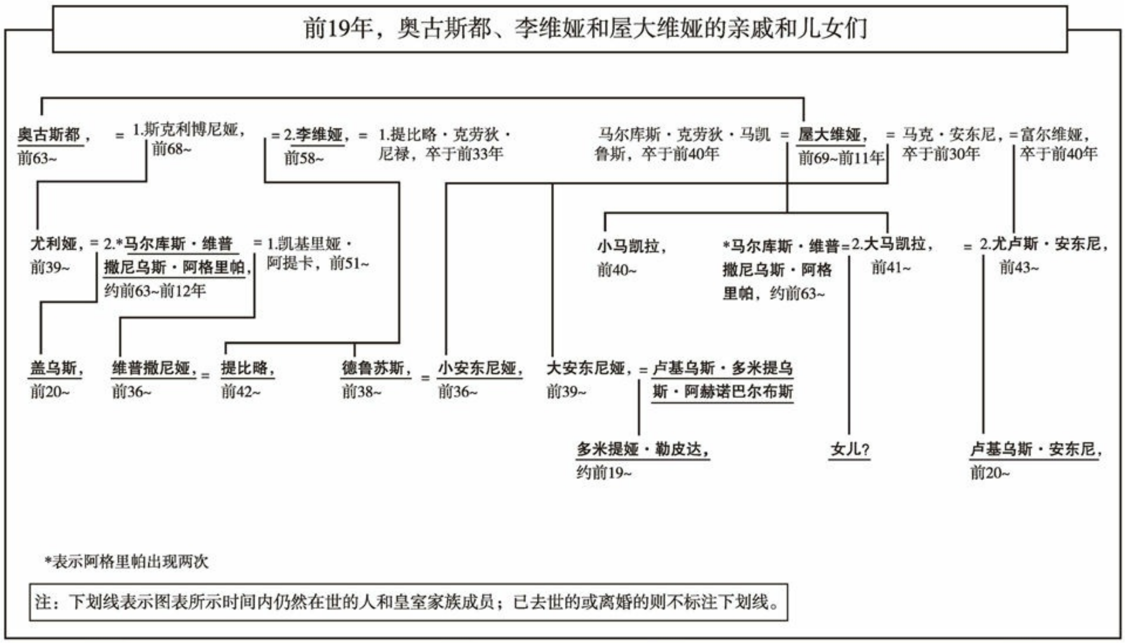
9.阿格里帕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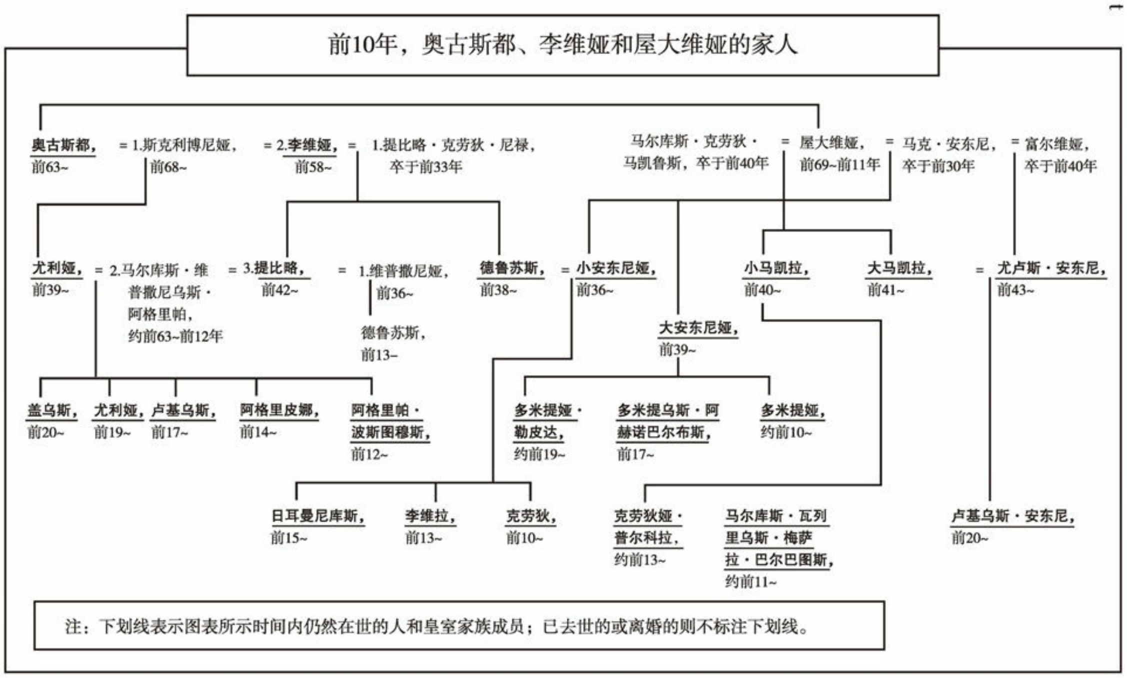

前三头同盟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独裁官，前100~前44年
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前115~前53年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独裁官，卒于前78年
伟大的格奈乌斯·庞培，前106~前48年
= 3.穆齐娅 = 4.尤利娅，卒于前54年 = 5 .科尔内利娅 = 普布利乌斯·李锡尼·克拉苏，卒于前53年
福斯图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卒于前46年 = 庞培娅
塞克斯图斯·庞培，前67~前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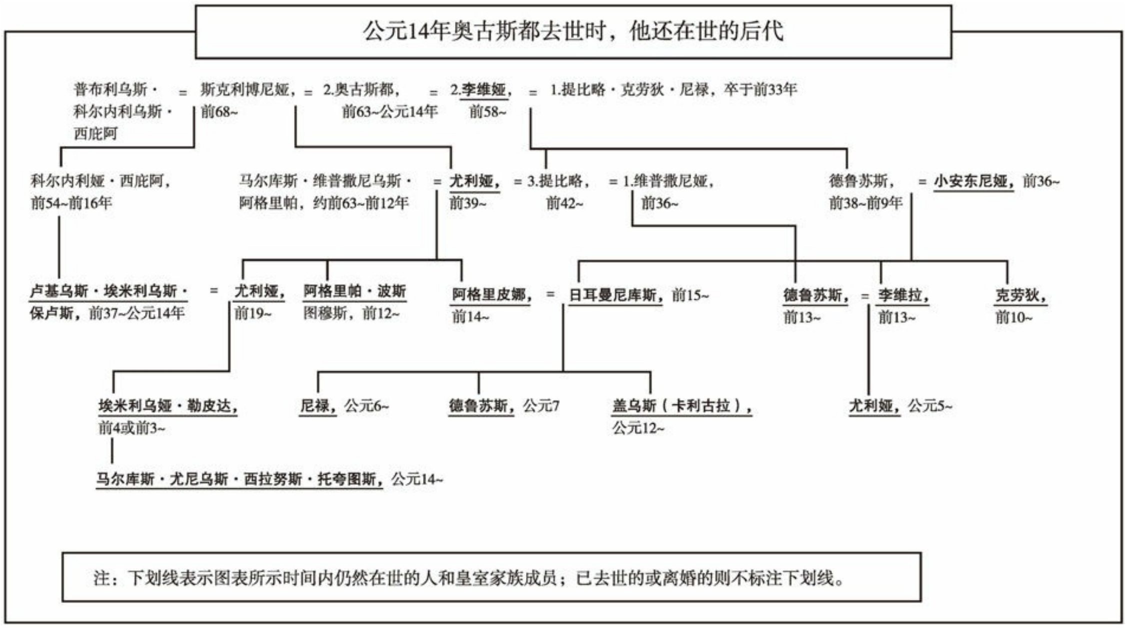

后三头同盟，他们后代之间的联系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120~前77年
马克·安东尼·克莱提库斯，卒于前73年
盖乌斯·屋大维，卒于前59年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前89或前88~前13或前12年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屋大维娅，前69~前11年 =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卒于前40年 = 马克·安东尼，前83~前30年
斯克利博尼娅，前68~公元16年 =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 = 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 = 李维娅，前58~公元29年 = 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3年
保卢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 = 科尔内利娅，前54~前16年 = 小马凯拉，生于前40年
尤利娅，前39~公元14年 =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
小安东尼娅，前36~公元 37年 = 德鲁苏斯，前38~前9年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前37~公元14年 = 尤利娅，前19~公元28年
阿格里皮娜，前14~公元33年 = 日耳曼尼库斯，前15~公元19年
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卒于公元39年 = 德鲁茜拉，公元17~39年
德鲁苏斯，公元7~33年 = 埃米利娅·李必达，卒于公元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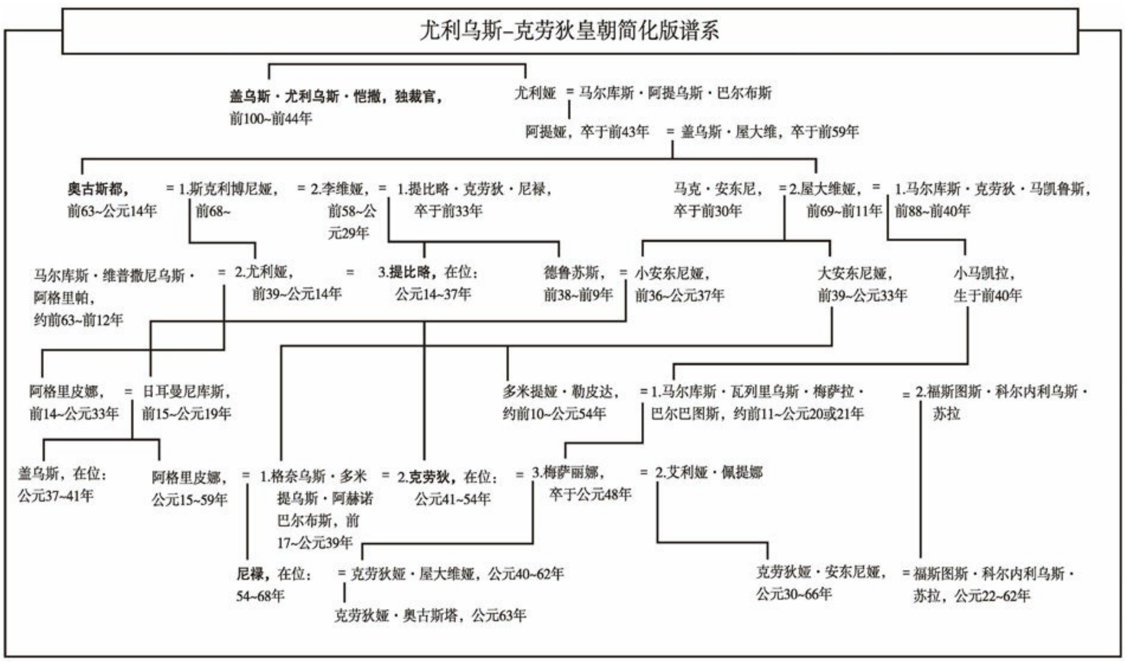

奥古斯都的亲戚们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卒于前85年
皮纳里乌斯＝尤利娅＝昆图斯·佩蒂乌斯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独裁官，前100~前44年
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 ＝ 尤利娅
皮纳里乌斯
昆图斯·佩蒂乌斯，卒于前43年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 1.? ＝2.
阿提娅＝1.盖乌斯·屋大维，＝1.安卡里娅
前100~前59年
卢基乌斯·皮纳里乌斯·斯卡普斯
阿提那娅＝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
马尔基娅 ＝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乌提肯西斯
小屋大维娅，前69~前11年
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
大屋大维娅 ＝ 塞克斯图斯·阿普列尤斯
保卢斯·费边·马克西穆斯
塞克斯图斯·阿普列尤斯
费边娅·努曼提娅＝塞克斯图斯·阿普列尤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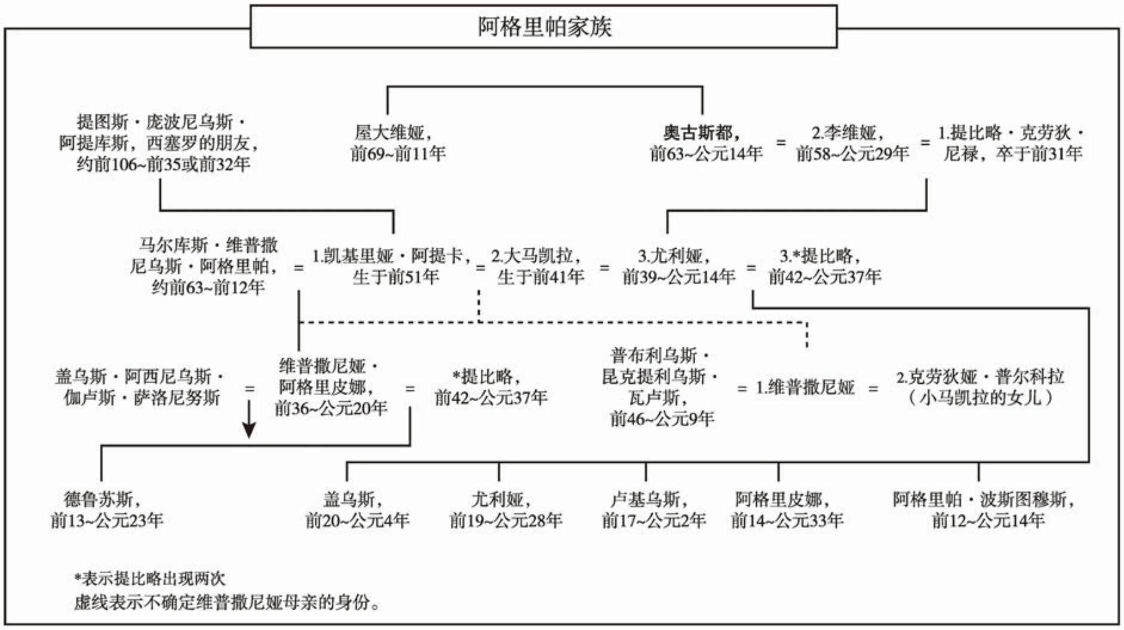

前30年马克·安东尼死时，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亲戚们
奥古斯都，前63~
＝ 斯克利博尼娅，前68~
＝ 李维娅，前58~
＝ 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3年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卒于前40年
＝ 屋大维娅，前69~
＝ 马克·安东尼，卒于前30年
＝ 富尔维娅，卒于前40年
尤利娅，前39~
马克·安东尼·安提勒斯，前47~前30年
尤卢斯·安东尼，前43~
马凯鲁斯，前42~
大马凯拉，前41~
小马凯拉，前40~
提比略，前42~
德鲁苏斯，前38~
大安东尼娅，前39~
小安东尼娅，前36~
注：下划线表示图表所示时间内仍然在世的人和皇室家族成员；已去世的或离婚的则不标注下划线。


前19年，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亲戚和儿女们
奥古斯都，前63~
= 1.斯克利博尼娅，前68~
= 2.李维娅，前58~
= 1.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3年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卒于前40年
= 屋大维娅，前69~前11年
= 马克·安东尼，卒于前30年
= 富尔维娅，卒于前40年
尤利娅，前39~
= 2.*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
= 1.凯基里娅·阿提卡，前51~
小马凯拉，前40~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
= 2.大马凯拉，前41~
= 2.尤卢斯·安东尼，前43~
盖乌斯，前20~
维普撒尼娅，前36~
= 提比略，前42~
德鲁苏斯，前38~
= 小安东尼娅，前36~
大安东尼娅，前39~
= 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多米提娅·勒皮达，约前19~
女儿？
卢基乌斯·安东尼，前20~
*表示阿格里帕出现两次
注：下划线表示图表所示时间内仍然在世的人和皇室家族成员；已去世的或离婚的则不标注下划线。


前10年，奥古斯都、李维娅和屋大维娅的家人
奥古斯都，前63~
= 1.斯克利博尼娅，前68~
= 2.李维娅，前58~
= 1.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3年
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卒于前40年
= 屋大维娅，前69~前11年
= 马克·安东尼，卒于前30年
= 富尔维娅，卒于前40年
尤利娅，前39~
= 2.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
= 3.提比略，前42~
= 1.维普撒尼娅，前36~
德鲁苏斯，前13~
德鲁苏斯，前38~
= 小安东尼娅，前36~
小马凯拉，前40~
大马凯拉，前41~
= 尤卢斯·安东尼，前43~
大安东尼娅，前39~
盖乌斯，前20~
尤利娅，前19~
卢基乌斯，前17~
阿格里皮娜，前14~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前12~
多米提娅·勒皮达，约前19~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17~
多米提娅，约前10~
日耳曼尼库斯，前15~
李维拉，前13~
克劳狄，前10~
克劳狄娅·普尔科拉，约前13~
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巴尔巴图斯，约前11~
卢基乌斯·安东尼，前20~
注：下划线表示图表所示时间内仍然在世的人和皇室家族成员；已去世的或离婚的则不标注下划线。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时，他还在世的后代
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
= 斯克利博尼娅，前68~
= 2.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
= 2.李维娅，前58~
= 1.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3年
科尔内利娅·西庇阿，前54~前16年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
= 尤利娅，前39~
= 3.提比略，前42~
= 1.维普撒尼娅，前36~
德鲁苏斯，前38~前9年
= 小安东尼娅，前36~
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前37~公元14年
= 尤利娅，前19~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前12~
阿格里皮娜，前14~
= 日耳曼尼库斯，前15~
德鲁苏斯，前13~
= 李维拉，前13~
克劳狄，前10~
埃米利乌娅·勒皮达，前4或前3~
尼禄，公元6~
德鲁苏斯，公元7
盖乌斯（卡利古拉），公元12~
尤利娅，公元5~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奇图斯，公元14~
注：下划线表示图表所示时间内仍然在世的人和皇室家族成员；已去世的或离婚的则不标注下划线。


尤利乌斯–克劳狄皇朝简化版谱系
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独裁官，前100~前44年
尤利娅 = 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
阿提娅，卒于前43年 = 盖乌斯·屋大维，卒于前59年
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
= 1.斯克利博尼娅，前68~
= 2.李维娅，前58~公元29年
= 1.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3年
马克·安东尼，卒于前30年
= 2.屋大维娅，前69~前11年
= 1.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前88~前40年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
= 2.尤利娅，前39~公元14年
= 3.提比略，在位：公元14~37年
德鲁苏斯，前38~前9年
= 小安东尼娅，前36~公元37年
大安东尼娅，前39~公元33年
小马凯拉，生于前40年
阿格里皮娜，前14~公元33年
= 日耳曼尼库斯，前15~公元19年
多米提娅·勒皮达，约前10~公元54年
= 1.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巴尔巴图斯，约前11~公元20或21年
= 2.福斯图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
盖乌斯，在位：公元37~41年
阿格里皮娜，公元15~59年
= 1.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17~公元39年
= 2.克劳狄，在位：公元41~54年
= 3.梅萨丽娜，卒于公元48年
= 2.艾利娅·佩提娜
尼禄，在位：54~68年
= 克劳狄娅·屋大维娅，公元40~62年
克劳狄娅·奥古斯塔，公元63年
克劳狄娅·安东尼娅，公元30~66年
= 福斯图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公元22~62年


阿格里帕家族
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西塞罗的朋友，约前106~前35或前32年
屋大维娅，前69~前11年
奥古斯都，前63~公元14年
2.李维娅，前58~公元29年
1.提比略·克劳狄·尼禄，卒于前31年
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约前63~前12年
1.凯基里娅·阿提卡，生于前51年
2.大马凯拉，生于前41年
3.尤利娅，前39~公元14年
3.*提比略，前42~公元37年
盖乌斯·阿西尼乌斯·伽卢斯·萨洛尼努斯
维普撒尼娅·阿格里皮娜，前36~公元20年
*提比略，前42~公元37年
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前46~公元9年
1.维普撒尼娅
2.克劳狄娅·普尔科拉（小马凯拉的女儿）
德鲁苏斯，前13~公元23年
盖乌斯，前20~公元4年
尤利娅，前19~公元28年
卢基乌斯，前17~公元2年
阿格里皮娜，前14~公元33年
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前12~公元14年
*表示提比略出现两次
虚线表示不确定维普撒尼娅母亲的身份。

参考文献

Adcock，F.，*The Roman Art of War under the Republic*（1940）

Alföldy，G.，*Noricum*（1974）

Badian，E.，*Publicans and Sinners*（1972）

Badian，E.，'"Crisis Theo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incipate'，in W. Wirth，*Romanitas and Christianitas*（1982），pp. 18-41

Balsdon，J.，'Fabula Clodiana'，*Historia* 15（1966），pp. 65-73

Barnes，T.，'The victories of Augustus'，*JRS* 64（1974），pp. 21-6

Barrett，A.，*Caligula. The Corruption of Power*（1989）

Barrett，A.，*Livia. First Lady of Imperial Rome*（2002）

Barton，T.，'Augustus and Capricorn：Astrological polyvalency and imperial rhetoric'，*JRS* 85（1995），pp. 33-51

Billows，R.，'The religious procession of the Ara Pacis Augustae：Augustus' *supplicatio* in 13 BC'，*JRA* 6（1993），pp. 80-92

Billows，R.，*Julius Caesar. The Colossus of Rome*（2009）

Bingen，J.，*Hellenistic Egypt*：*Monarchy*，*Society*，*Economy*，

Culture （2007）

Birch，R.，‘The Settlement of 26 June AD 4 and its Aftermath’，*Classical Quarterly* 31（1981），pp. 443-56

Boatright，M.，‘The Pomerial extension of Augustus’，*Historia* 35（1986），pp. 13-27

Bowersock，G.，*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1965）

Bowersock，G.，‘Augustus and the East：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in Millar & Segal（1990），pp. 169-88

Bradley，K.，‘Wet-nursing at Rome. A Study in Social Relations’，in Rawson（1986），pp. 201-29

Brandon，C.，‘Cement，concrete and settling barges at Sebastos：comparisons with other Roman harbour examples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Vitruvius’，in A. Raban & K. Houm（eds），*Caesarea Maritima. A Retrospective after Two Millennia* （1996），pp. 25-40

Brunt，P.，*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1971）

Brunt，P.，‘The administrators of Roman Egypt’，*JRS* 65（1975），pp. 124-47

Brunt，P.，‘Princeps and equites’，*JRS* 73（1983），pp. 42-75

Brunt，P.，‘The role of the Senate in the Augustan regime’，*Classical Quarterly* 34. 2（1984），pp. 423-44

Camp，J.，*The Archaeology of Athens* （2001）

Campbell，B.，‘The marriage of soldiers under the Empire’，*JRS* 68（1978），pp. 153-66

Campbell，B.，‘War and diplomacy：Rome and Parthia，31 BC-AD 235’，in Rich & Shipley（1993），pp. 213-40

Campbell，J.，*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31 BC-AD 235*（1984）

Carson，R.，‘Caesar and the monarchy’，*Greece & Rome* 4（1957），pp. 46-53

Carter，J.，*The Battle of Actium*：*The Rise and Triumph of Augustus Caesar* （1970）

Cartledge，P.，‘The second thoughts of Augustus on the res publica in 28/7 BC’，*Greece and Rome* 31（1984），pp. 30-40

Champlin，E.，‘Tiberius and the Heavenly Twins’，*JRS* 101（2011），pp. 73-99

Chilver，G.，‘Augustus and the Roman constitution 1939-1950’，*Historia* 1（1950），pp. 408-35

Christol，M.，*Une Histoire Provinciale. La Gaule narbonnaise av. J.-C. au III^e^ siècle ap. J.-C.* （2010）

Clarke，J.，‘Augustan domestic interiors：propaganda or fashion？’in Galinsky（2005），pp. 264-78

Collins，J.，‘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power’，*Historia* 4（1957），pp. 445-65

Conlin，D.，*The Artists of the Ara Paci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1997）

Connolly，P.，*Greece and Rome at War* （1981）

Cooley，M.（ed.），*The Age of Augustus. Lactor 17* （2003）

Corbett，J.，‘The Succession policy of Augustus’，*Latomus* 33（1974），pp. 87-97

Crawford，M.，*Roman Republican Coinage* （1974）

Crook，J.，‘Some remarks on the Augustan Constitution’，*Classical Review* 3（1953），pp. 10-12

Cunliffe，B.，*Greeks*，*Romans and Barbarians*：*Spheres of Interaction* （1988）

Curchin，L.，*The Romanization of Central Spain. Complexity*，*Diversity and Change in a Provincial Hinterland* （2004）

Delia，D.，‘Fulvia Reconsidered’，in S. Pomperoy（ed.），*Women’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1991），pp. 197-217

Dennison，M.，*Empress of Rome. The Life of Livia* （2010）

Derks，T.，*Gods*，*Temples and Ritual Practices*：*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ns Ideas and Values in Roman Gaul* （1998）

Dixon，S.，*The Roman Mother* （1988）

Dowling，M.，*Clemency and Cruelty in the Roman World* （2006）

Drinkwater，J.，*Roman Gaul. The Three Provinces*，*58 BC-AD 260*（1983）

Drinkwater，J.，‘The Principate - lifebelt，or millstone around the neck of Empire？’，in O. Hekster，G. Kleijn & D. Slootjes（eds），*Crises and the Roman Empire*（2007），pp. 67-74

Durán Cabello，R. M.，‘Edificios de espectáculo’，in X. Raventós（ed.），*Les capitales provinciales de Hispania 2. Merida*：*Colonia Augustua Emerita*（2004）

Dyson，S.，‘Native Revolt Patterns in the Roman Empire’，*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2. 3（1975），pp. 38-175

Dyson，S.，*The Creation of the Roman Frontier*（1985）

Dyson，S.，*Rome. A Living Portrait of an Ancient City*（2010）

Eck，W.，‘Senatorial Self-Representation：Developments in the Augustan Period’，in Millar & Segal（eds）（1990），pp. 129-67

Eck，W.，*The Age of Augustus*（2003）

Edmondson，J.（ed.），*Augustus*（2009）

Ehrenberg，V. & Jones，A.，*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2nd edn，1975）

Everitt，A.，*Cicero. A Turbulent Life*（2001）

Everitt，A.，*Augustus*：*The Life of Rome’s First Emperor*（2006）

Fantham，E.，*Julia Augusti*，*the Emperor’s Daughter* （2006）

Ferrary，J.，‘The powers of Augustus’，in Edmondson（2009），pp. 90-136

Ferrill，A.，‘Prosopography and the Last Years of Augustus’，*Historia* 20（1971），pp. 718-31

Ferrill，A.，‘Augustus and his daughter：a modern myth’，in C. Deroux（ed.），*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 2（1980），pp. 332-46

Feugère，M.（ed.），*L’Équipment Militaire et L’Armement de la République*，*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1997）

Finley，M. I.（ed.），*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1976）

Fishwick，D.，*The Imperial Cult in the Latin West*：*Studies in the Ruler Cult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Vol. 3（2002）

Flory，M.，‘*Abducta Neroni Uxor*：The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on the marriage of Octavian and Livia’，*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8（1988），pp. 343-59

Flower，H.，‘The tradition of the spolia opima：M. Claudius Marcellus and Augustus’，*Classical Antiquity* 19（2000），pp. 34-64

Franzen，P.，‘The Augustan legionary fortress at Nijmegen. Legionary and auxiliary soldiers’，in A. Morillo，N. Hanel & E. 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 1（2009），pp. 1257-69

Gabba，E.，‘The Perusine War and Triumviral Italy’，*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5（1971），pp. 139-60

Gabba，E.（trans. P. Cuff），*The Roman Republic*，*the Army and the Allies*（1976）

Galinsky，K.，*Augustan Culture*（1996）

Galinsky，K.（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ugustus*（2005）

Galinsky，K.，*Augustus.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an Emperor*（2012）

Gardner，J.，‘The Dictator’，in Griffin（2009），pp. 57-71

Garnsey，P.，*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1988）

Gelzer，M.（trans. P. Needham），*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1968）

Goldsworthy，A.，*The Roman Army at War 100 BC-AD 200*（1996）

Goldsworthy，A.，‘“Instinctive genius”：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in Welch & Powell（1998），pp. 193-219

Goldsworthy，A.，*In the Name of Rome*（2004）

Goldsworthy，A.，*The Complete Roman Army*（2004）

Goldsworthy，A.，*Caesar*：*The Life of a Colossus*（2006）

Goldsworthy，A.，*Antony and Cleopatra*（2010）

Goudineau，C.，*César et la Gaule*（1995）

Gowers，E.，‘Augustus and “Syracuse”’，*JRS* 100（2010），pp. 69-87

Grant，M.，*Cleopatra*（1972）

Green，P.，*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1990）

Greenhalgh，P.，*Pompey*：*The Roman Alexander*（1980）

Griffin，J.，‘Augustus and the poets：“Caesar qui cogere posset”’，in Millar & Segal（1990），pp. 189-218

Griffin，M.，‘The Elder Seneca and Spain’，*JRS* 62（1972），pp. 1-19

Griffin，M.（ed.），*A Companion to Julius Caesar*（2009）

Grimal，P.（trans. A. Train），*Love in Ancient Rome*（1986）

Gruen，E.，*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1974）

Gruen，E.，‘Cleopatra in Rome. Fact and Fantasies’，in D. Braund & C. Gill（eds），*Myths*，*History and Culture in Republican Rome*：*Studies in honour of T. P. Wiseman*（2003），pp. 257-74

Gruen，E.，‘Caesar as a politician’，in Griffin（2009），pp. 23-36

Gwynn，A.，*Roman Education*（1926）

Hallett，J.，‘Perusinae Glandes and the Changing Image of Augustus’，*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2（1977），pp. 151-71

Harmand，J.，*L’armée et le soldat à Rome de 107 à 50 avant nôtre ère*（Paris，1967）

Harrington，D.，‘The Battle of Actium - a study in historiography’，*Ancient World* 9. 1-2（1984），pp. 59-64

Hölbl，G.（trans. T. Saavedra），*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2001）

Holder，P.，*The Auxilia from Augustus to Trajan*（1980）

Holland，R.，*Augustus. Godfather of Europe*（2004）

Huzar，E.，‘Mark Antony：Marriages vs. careers’，*The Classical Journal* 81（1985/6），pp. 97-111

James，S.，*Rome and the Sword. How Warriors and Weapons Shaped Roman History*（2011）

Johnson，J.，‘The authenticity and validity of Antony’s will’，*L’Antiquité Classique* 47（1978），pp. 494-503

Jones，A.，‘The *Imperium* of Augustus’，*JRS* 41（1951），pp. 112-19

Jones，A.，‘The elections under Augustus’，*JRS* 45（1955），pp. 9-21

Jones，R.，‘The Roman Military Occupation of North-West

Spain’，*JRS* 66（1976），pp. 45-66

Kennedy，D.（ed.），*The Roman Army in the East.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s* 18（1996）

Kennedy，D.，‘Parthia and Rome：eastern perspectives’，in Kennedy（1996），pp. 67-90

Keppie，L.，*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Italy*：*47-14 BC*（1983）

Keppie，L.，*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1984）

Keppie，L.，‘A centurion of legio Martia at Padova？’，*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2（1991），pp. 115-21 = L. Keppie，*Legions and Veterans*：*Roman Army Papers 1971-2000*（2000），pp. 68-74

King，D.，*The Elgin Marbles*（2006）

Kos，M.，*Appian and Illyricum*（2005）

Lacey，W.，‘Summi Fastigii Vocabulum：The story of a title’，*JRS* 69（1979），pp. 28-34

Lacey，W.，*Augustus and the Principate. The Evolution of the System*（1996）

Lange，C.，*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2009）

Lange，C.，‘The Battle of Actium：A reconsideration’，*Classical*

Quarterly 61. 2（2011），pp. 608-23

Last，H.，‘Imperium Maius：A note’，*JRS* 37（1947），pp. 157-64

Le Bohec，Y.，*The Imperial Roman Army*（1994）

Leon，E.，‘Scribonia and her daughter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82（1951），pp. 168-75

Levick，B.，‘Abdication and Agrippa Postumus’，*Historia* 21（1972），pp. 674-97

Levick，B.，‘Julians and Claudians’，*Greece and Rome* 22（1975），pp. 29-38

Levick，B.，*Tiberius the Politician*（1999）

Levick，B.，*Augustus. Image and Substance*（2010）

Lewis，N. Reinhold，M.（eds），*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Vol. 1：*The Republic and the Augustan Age*（3rd edn，1990）

Liebeschuetz，J.，‘The settlement of 27 BC’，in C. Deroux，*Studies in Latin Literature and Roman History*（2008），pp. 345-65

Linderski，J.，‘Aphrodisias and the *Res Gestae*：The *Genera Militiae* and the Status of Octavian’，*JRS* 74（1984），pp. 74-80

Lintott，A.，‘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RS* 80（1990），pp. 1-16

Lintott，A.，*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

Lintott，A.，*Cicero as Evidence* （2008）

Lintott，A.，‘The assassination’，in Griffin（2009），pp. 72-82

Lo Cascio，E.，‘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Beloch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JRS* 84（1994），pp. 23-40

Lowe，B.，*Roman Iberia. 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 （2009）

Luce，T.，‘Livy，Augustus，and the Forum Augustum’，in Edmondson（2009），pp. 399-415

MacMullen，R.，*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 Treason*，*Unrest and Alienation in the Empire* （1967）

MacMullen，R.，*Romanization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2000）

McNally，M.，*Teutoburg Forest AD 9. The Destruction of Varus and his Legions* . Osprey Campaign Series 228（2011）

Magie，D.，‘Augustus’ War in Spain（26-25 BC）’，*Classical Philology* 15（1920），pp. 323-39

Manley，J.，*AD 43 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 A Reassessment* （2002）

Marrou，H.，*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 （1956）

Matyszak，P.，*Mithridates the Great. Rome’s Indomitable Enemy* （2004）

Maxfield，V.，*The Military Decorations of the Roman Army*（1981）

Mayor，A.，*The Poison King*（2010）

Meier，C.（trans. D. McLintock），*Caesar*（1996）

Mellor，R.，*Tacitus*（1993）

Mierse，W.，*Temples and Towns in Roman Iberia. The Social Dynamics of Sanctuary Designs from the Third Century BC to the Third Century AD*（1999）

Millar，F.，*A Study of Cassius Dio*（1964）

Millar，F.，'Triumvirate and Principate'，*JRS* 63（1973），pp. 50-67

Millar，F.，*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1977）

Millar，F.，'Empire and City，Augustus to Julian：Obligations，excuses and status'，*JRS* 73（1983），pp. 76-96

Millar，F. & Segal，E.（eds），*Caesar Augustus. Seven Aspects*（corrected paperback edn，1990）

Millar，F.，'State and Subject：the impact of monarchy'，in Millar & Segal（1990），pp. 37-60

Millar，F.，*The Roman Near East 31 BC-AD 337*（1993）

Millar，F.，*The Crowd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1998）

Mitchell，T.，*Cicero*：*The Ascending Years*（1979）

Mitchell，T.，*Cicero 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

Morillo Cerdán，A.，‘The Augustean Spanish Experience：The origin of the *limes* system？’，in A. Morillo，N. Hanel & E. 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 1（2009），pp. 239-51

Morrison，J. & Coates，J.，*Greek and Roman Oared Warships* （1996）

Mouritsen，H.，*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2001）

Murdoch，A.，*Rome’s Greatest Defeat. Massacre in the Teutoburg Forest* （2006）

Nicolet，C.，‘Augustus，Government，and the Propertied Classes’，in Millar & Segal（1990），pp. 89-128

North，J.，‘Caesar at the Lupercalia’，*JRS* 98（2008），pp. 144-60

Oorthuys，J.（ed.），*The Varian Disaster*：*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 Ancient Warfare* special issue（2009）

Osgood，J.，*Caesar’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2006）

Paget，R.，‘The ancient ports of Cumae’，*JRS* 58（1968），pp. 152-69

Paget，R.，‘The Naval Battle of Cumae in 38 BC’，*Latomus* 29（1970），pp. 363-9

Parker，H.，*The Roman Legions* （1957）

Patterson，J.，‘The City of Rome Revisited：From Mid-Republic to Mid-Empire’，*JRS* 100（2010），pp. 210-32

Pelling，C.，*Plutarch*：*Life of Antony* （1988）

Pelling，C.，*Plutarch and History* （2002）

Pitassi，M.，*The Navies of Rome* （2009）

Platner，S. & Ashby，T.，*A Top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Rome* （1929）

Pollini，J.，‘Appuleii and Some Others on the Ara Paci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0（1986），pp. 453-60

Potter，D.，‘Emperors，their borders and their neighbours：the scope of imperial *mandata* ’，in Kennedy（1996），pp. 49-66

Powell，A.，‘“An island amid the flame”：The Strategy and Imagery of Sextus Pompeius，43-36 BC’，in Powell & Welch（2002），pp. 103-33

Powell，A. & Welch，K.（eds），*Sextus Pompeius* （2002）

Powell，A.，*Virgil the Partisan*：*A Study in the Re-integration of Classics* （2008）

Powell，L.，*Eager for Glory. The Untold Story of Drusus the Elder*，*Conqueror of Germany* （2011）

Price，S.，*Rituals and Power. The Roman Imperial Cult in Asia Minor*（1985）

Purcell，N.，‘Livia and the Womanhood of Rome’，*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1986），pp. 78-105 = Edmondson（2009），pp. 165-94

Queseda Sanz，F.，‘*Gladius hispaniensis*：an archaeological view from Iberia’，*Journal of Roman Military Equipment Studies* 8（1997），pp. 251-70

Queseda Sanz，F.，*Armas de la Antigua Iberia de Tartessos a Numancia*（2010）

Raaflaub，K. & Toher，M.（eds），*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1990）

Raaflaub，K.，‘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ugustus’ military reforms’，in Edmondson（2009），pp. 203-28

Ramsay，J.，‘The Senate，Mark Antony，and Caesar’s Legislative Legacy’，*Classical Quarterly* 44（1994），pp. 130-45

Ramsay，J. & Licht，A.，*The Comet of 44 BC and Caesar’s Funeral Games*（1997）

Ramsay，J.，‘Did Mark Antony contemplate an alliance with his political enemies in July 44 B.C.E.？’，*Classical Philology* 96. 3（2001），pp. 253-68

Ramsay，J.，‘Mark Antony’s Judiciary Reform and its revival under

the Triumvirs’，*JRS* 95（2005），pp.20-37

Ramsay，J.，‘The Proconsular Years：Politics at a Distance’，in Griffin（2009），pp. 37-56

Rawson，B.（ed.），*The Family in Ancient Rome* （1986）

Rawson，B.（ed），*Marriage*，*Divorce and Children in Ancient Rome* （1991）

Rawson，B.，*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Roman Italy* （2003）

Rawson，E.，‘Caesar’s Heritage：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JRS* 65（1975），pp. 148-59

Rawson，E.，‘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in Finley（ed.）（1976），pp. 85-102

Rawson，E.，*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Roman Republic* （1985）

Rea，J.，‘Lease of a Red Cow called Thayris’，*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68（1982），pp. 277-82

Reinhold，M.，*Marcus Agrippa*：*A Biography* （1933）

Reynolds，J.，*Aphrodisias and Rome* （1982）

Ribera i Lacomba，A. & Calvo Galvez，M.，‘La primera evidencia arqueológica de la destrucción de Valentia por Pompeyo’，*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8（1995），pp.19-40

Rice，E.，*Cleopatra* （1999）

Rice Holmes，T.，*The Roman Republic* Vols 1-3（1923-8）

Rice Holmes，T.，*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1（1928）

Rich，J.，*Declaring War in the Roman Republic in the Period of Transmarine Expansion* （1976）

Rich，J. & Shipley，G.（eds），*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 （1993）

Rich，J.，'Augustus and the spolia opima'，*Chiron* 26（1996），pp. 85-127

Rich，J.，'The Parthian honours'，*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66（1998），pp.71-128

Rich，J.，'Augustus，War *and* Peace'，in Edmondson（2009），pp. 137-64=L. de Blois，P. Erdkamp，O. Hekster，G. de Kleijn S. Mols（eds），*The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of Roman Imperial Power*：*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Impact of Empire*（*Roman Empire c.200 BC-AD 476*）. Netherlands Institute in Rome，20-23 March 2002（2003），pp. 329-57

Rich，J.，'Cantabrian closure：Augustus' Spanish War and the ending of his memoirs'，in Smith & Powell（2009），pp. 145-72

Richardson，J.，'The triumph，the praetors and the Senate in the early second century BC'，*JRS* 65（1976），pp. 50-63

Richardson，J.，'*Imperium Romanum*：Empi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JRS* 81（1991），pp. 1-9

Richardson，J.，*The Romans in Spain* （1996）

Richardson，J.，*Augustan Rome 44 BC TO AD 14.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mpire* （2012）

Richardson，P.，*Herod. King of the Jews and Friend of the Romans* （1996）

Rickman，G.，*The Corn Supply of Ancient Rome* （1980）

Rihll，T.，‘Lead Slingshot（*glandes* ）’，*JRA* 22（2009），pp.149-69

Roddaz，J. M.，*Marcus Agrippa* （1984）

Rogers，W.，*Greek and Roman Naval Warfare* （1937）

Roller，D.，*The Building Programme of Herod the Great* （1998）

Rose，C.，‘Princes and barbarians on the Ara Paci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94（1990），pp. 453-67

Rosenstein，N.，*Imperatores Victi* （1993）

Rost，A.，‘The Battle between Romans and Germans in Kalkriese：Interpret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from an ancient battlefield’，in A. Morillo，N. Hanel & E. *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3（2009），pp. 1339-45

Roth，J.，*The Logistics of the Roman Army at War*（*264 BC-AD 235*）（1999）

Roymans，N.，*Tribal Societies in Northern Gaul*：*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Cingula* 12（1990）

Saddington，D.，*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Auxiliary Forces from Caesar to Vespasian*（*49 BC-AD 79*）（1982）

Sailer，R.，‘Anecdot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Greece and Rome* 27（1980），pp. 69-83

Salmon，E.，‘The Evolution of Augustus’ Principate’，*Historia* 5（1956），pp.456-78

Salway，B.，‘What’s in a name？A survey of Roman onomastic practice from 700 BC-AD 700’，*JRS* 84（1994），pp.124-45

Scheid，J.，‘To honour the Princeps and venerate the gods. Public cult，neighbourhood cults，and imperial cult in Augustan Rome’，in Edmondson（2009），pp. 275-99

Scheidel，W.，‘Emperors，Aristocrats，and the Grim Reaper：Towards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oman Elite’，*Classical Quarterly* 49（1999），pp. 254-81

Schlüter，W.，‘The 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t Kalkriese near Osnabrück’，in J. Creighton & R. Wilson，*Roman Germany. Studies in Cultur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Supplementary Series* 32（1999），pp. 125-59

Schürer，E.，Vermes，G. & Millar，F.，*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 1（1973）

Scott，K.，‘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44-30 BC’，*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1（1933），pp. 7-49

Seager，R.，*Pompey the Great. A Political Biography* （2nd edn，2002）

Seager，R.，*Tiberius* （2005）

Shatzman，I.，*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 Collection Latomus* Vol. 142（1975）

Sheppard，S.，*Philippi 42 BC. The Death of the Roman Republic* . Osprey Campaign Series 199（2008）

Sheppard，S.，*Actium*：*Downfall of Antony and Cleopatra* . Osprey Campaign Series 211（2009）

Sherk，R.，*Roman Documents from the Greek East* （1969）

Sherwin-White，A.，*Ro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st*，*168 BC-AD 1* （1984）

Siani-Davies，M.，‘Ptolemy XII Auletes and the Romans’，*Historia* 46（1997），pp. 306-40

Sidebotham，S.，‘Aelius Gallus and Arabia’ *Latomus* 45（1986），pp. 590-602

Simpson，C.，‘The date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of Mars Ultor’，*JRS* 67（1977），pp.91-4

Slater，W.，‘*Pueri*，*Turba Minuta* ’，i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21（1974），pp. 133-40

Smith，C. & Powell，A.（eds），*The Lost Memoirs of August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oman Autobiography*（2009）

Smith，R.，*Service in the Post-Marian Roman Army*（1958）

Spaul，J.，*ALA* [2]（1994）

Spawforth，A.，*Greece and the Augustan Cultural Revolution. Greek Culture in the Roman World*（2012）

Speidel，M.，‘The Roman army in Judaea under the Procurators’，in M. Speidel，*Roman Army Studies* Vol. 2，Mayors（1992），pp. 224-32

Stavely，E.，‘The “Fasces” and “Imperium Maius”’，*Historia* 12（1963），pp. 458-84

Stevenson，T.，‘The ideal benefactor and the father analogy in Greek and Roman thought’，*Classical Quarterly* 42（1992），pp. 421-36

Stockton，D.，‘Primus and Murena’，*Historia* 14（1965），pp. 18-40

Stockton，D.，*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1971）

Swan，M.，‘The consular fasti of 23 BC and the conspiracy of Varro Murena’，*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71（1967），pp. 235-47

Syme，R.，‘Notes on the legions under Augustus’，*JRS* 23（1933），pp. 14-33

Syme，R.，‘The Spanish War of Augustu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5（1934），pp. 293-317

Syme，R.，‘The Allegiance of Labienus’*JRS* 28（1938），pp. 113-25

Syme，R.，*Tacitus*（2 vols，1958）

Syme，R.，‘Imperator Caesar：A study in imperial nomenclature’，*Historia* 7（1958），pp. 172-88=*Roman Papers* Vol. 1（1979），pp. 181-96

Syme，R.，‘Livy and Augustu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4（1959），pp. 27-87

Syme，R.，*The Roman Revolution*（paperback edn，1960）

Syme，R.，*History in Ovid*（1978）

Syme，R.，‘The conquest of North-West Spain’，*Roman Papers* Vol. 2（1979），pp.825-54

Syme，R.，‘Neglected children on the *Ara Paci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8（1984），pp. 583-9

Syme，R.，*The Augustan Aristocracy*（1986）

Talbert，R.，‘Augustus and the Senate’，*Greece and Rome* 31（1984），pp. 55-63

Tatum，W.，*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1999）

Taylor，L. Ross，*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1949）

Taylor，L. Ross，‘The rise of Julius Caesar’，*Greece and Rome* 4（1957），pp. 10-18

Taylor，L. Ross，*Roman Voting Assemblies*：*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1966）

Taylor，L. Ross，‘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Historia* 17（1968），pp.173-93

Tchernia，A.，‘Italian wine in Gaul at the end of the Republic’，in P.Garnsey，K. Hopkins & C. Whittaker（eds），*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1983），pp. 87-104

Todd，M.，*Roman Britain*（3rd edn，1999）

Todd，M.，*The Early Germans*（2004）

Toher，M.，‘Augustus and the Evolution of Roman Historiography’，in Raaflaub & Toher（1990），pp. 139-54

Torelli，M.，*Typology and Structure of Roman Historical Reliefs*（1982）

Treggiari，S.，*Roman Marriage*（1991）

Treggiari，S.，‘Divorce Roman Style：How easy and frequent was it？’in Rawson（1991），pp. 131-46

Trillmich，W.（trans. C. Nader），*Colonia Augusta Emerita*，*Capital of Lusitania* in Edmondson（2009），pp.427-67

Tyldesley，J.，*Cleopatra. Last Queen of Egypt*（2009）

Tyrell，W.，‘Labienus’ departure from Caesar in January 49 BC’，*His-toria* 21（1972），pp. 424-40

Ullman，B.，‘Cleopatra’s pearls’，*The Classical Journal* 52. 5（Feb. 1957），pp. 193-201

Veyne，P.（trans. B. Pearce），*Bread and Circuses* （1992）

Wallace-Hadrill，A.，‘Civilis Principis：between citizen and king’，*JRS* 72（1982），pp. 32-48

Wallace-Hadrill，A.，‘Image and authority in the coinage of Augustus’，*JRS* 76（1986），pp. 66-87

Wallace-Hadrill，A.，*Suetonius* （2nd edn，1995）

Wallace-Hadrill，A.，‘Family inheritance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 in Edmondson（2009），pp. 250-74=*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27（1981），pp. 58-80

Ward，A.，*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Wardle，D.，‘Valerius Maximus on the Domus Augusta，Augustus，and Tiberius’，*Classical Quarterly* 50（2000），pp.479-93

Wardle，D.，‘A perfect send-off：Suetonius and the dying art of Augustus（Suetonius Aug. 99）’，*Mnemosyne* 60（2007），pp.443-63

Watson，G.，*The Roman Soldier* （1985）

Webster，G.，*The Roman Invasion of Britain* （rev. edn，1993）

Weigel，R.，*Lepidus. The Tarnished Triumvir* （1992）

Weinstock，S.，*Divus Julius* （1971）

Welch，K. & Powell，A.（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Welch，K.，‘Sextus Pompeius and the *Res Publica* in 42-39 BC’，in Powell & Welch（2002），pp. 31-63

Wells，C.，*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1972）

Wells，C.，‘What’s new along the Lippe：Recent work in North Germany’，*Britannia* 29（1998），pp. 457-64

Wells，P.，*The Barbarians Speak. How the Conquered Peoples Shaped the Roman Empire* （1999）

Wells，P.，*The Battle that Stopped Rome* （2003）

White，L.，‘Herod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Augustan rule’，in Galinsky（2005），pp. 361-87

White，P.，*Promised Verse. Poets in the Society of Augustan Rome* （1993）

Wiedermann，T.，‘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o Ovid’s *Tristia* 2’，*Classical Quarterly* 25（1975），pp. 264-71

Wilbers-Rost，S.，‘The site of the Varus Battle at Kalkriese. Recent Results fro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in A. Morillo，N. Hanel & E.

Martín，*Limes XX*：*Estudios sobre la frontera roma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Anejos de Gladius* 13 Vol. 3（2009），pp. 1347-52

Williams，C.，*Roman Homosexuality. Ideologies of Masculinit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1999）

Williams，G.，‘Did Maecenas “Fall from favour”？Augustan Literary Patronage’，in Raaflaub & Toher（1990），pp. 258-75

Wiseman，T.，‘*Conspicui Postes Tectaque Digna Deo*：the public image of aristocratic and imperial houses in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in *L’Urbs. Espace urbain et histoire* （1987），pp. 393-413

Wiseman，T.，‘The House of Augustus and the Lupercal’，*JRA* 22（2009），pp. 527-45

Wolters，R.，*Die Schlacht im Teutoburger Wald* （2008）

Woolf，G.，‘Roman Peace’，in Rich & Shipley（1993），pp. 171-94

Yakobson，A.，‘*Petitio et Largitio*：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RS* 8（1992），pp. 32-52

Yavetz，Z.，*Plebs and Princeps* （1969）

Yavetz，Z.，*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1983）

Yavetz，Z.，‘The *Res Gestae* and Augustus’ public image’，in Millar & Segal（1990），pp. 1-36

Yavetz，Z.，‘The personality of Augustus’，in Raaflaub &

Toher（1990），pp. 21-41，32

Zanker，P.（trans. A. Shapiro），*The Power of Images in the Age of Augustus*（1988）

Zink，S.，‘Reconstructing the Palatine temple of Apollo：a case study in early Augustan temple design’，*JRA* 21（2008），pp. 47-63

Ziolkowski，J. & Putnam，J.，*The Virgilian Tradition. The First Fifteen Hundred Years*（2008）

缩写词

Ampelius，*Lib. mem* =Lucius Ampellius，*Liber memorialis*

Appian，BC=Appian，*Civil Wars*

Appian，*Bell Hisp* .=Appian，*Spanish Wars*

Broughton，*MRR* 2=Broughton，T.，& Patterson，M.（1951），*The Magistrates of the Roman Republic* Vol. 2

Caesar，*BC* =Caesar，*The Civil Wars*

Caesar，*BG* =Caesar，*The Gallic Wars*

CAH^2 IX=Crook，J.，Lintott，A.，& Rawson，E.（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n Vol.IX：*The Last Age of the Roman Republic*，146-43 *BC* .

CAH ^{2} X=Bowman，A.，Champlin，E.，& Lintott，A.（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n Vol. X：*The Augustan Empire*，43 *BC* -*AD* 69.

Cicero，*ad Att* .=Cicero，*Letters to Atticus*

Cicero，*ad Fam* .=Cicero，*Letters to his Friends*

Cicero，*ad Quintum Fratrem* =Cicero，*Letters to his Brother Quintus*

Cicero，*Agr* .=Cicero，*Orationes de Lege Agraria*

Cicero，*Cat* .=Cicero，*Catilinarian Orations*

Cicero，*de reg* . *Alex F* .=Cicero，fragment from the *Oration Concerning the King of Alexandria*

Cicero，*Verrines* =Cicero，*Verrine Orations*

CIG =*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CIL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Comp . *Nic* .=Fragment of Nicolaus of Damascus，*History*

De vir. Ill =the anonymous *de viris illustribus*

Dio=Cassius Dio，Roman History

Galen，*Comm. In Hipp. Epid.* ，CMG=Kühn，C.，*Galenus Medicus*（1821-33），supplemented by Diels，H. *et alii* （1918-）

Gellius，NA=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

ILLRP =Degrassi，A.（ed.）（1963-5），*Inscriptiones Latinae Liberae Rei Republicae*

ILS =Dessau，H.（1892-1916），*In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Josephus，*AJ* =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

Josephus，*BJ* =Josephus，*The Jewish War*

JRA =*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Justin=Justinus，*Epitome*

Livy，*Pers* .=Livy，*Roman History. Periochae* .

OGIS =Dittenberger，W.，*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1903-5）.

Pliny the Elder，*NH*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

Pliny the Younger，*Epistulae* =Pliny the Younger，*Letters*

Quintilian=Quintilian，*Training in Oratory*

Sallust，*Bell Cat* .=Sallust，*The Catilinarian War*

Sallust，*Bell Jug* .=Sallust，*The Jugurthine War*

Sallust，*Hist* .=Sallust，*Histories*

SEG .=Roussel，P.，Tod，M.，Ziebarth，E. & Hondius，J.（eds），*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1923-）

Serv.=Servius

Strabo，*Geog* .=Strabo，*Geography*

Tacitus，*Ann* .=Tacitus，*Annals*

Valerius Maximus=Valerius Maximus，*Memorable Doings and*

Sayings

Velleius Paterculus=Velleius Paterculus，*Roman History*

译名对照表

Achilles阿喀琉斯

Actian Arch亚克兴凯旋门

Actian Games亚克兴竞技会

Actium，Battle of亚克兴角战役

Aedui tribe埃杜依部落

Aeneas埃涅阿斯

Aeneid《埃涅阿斯纪》

aerariummilitare军事国库

Agrippa，Marcus Vipsanius马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

Ahenobarbus，CnaeusDomitius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Ahenobarbus，Lucius Domitius（cos.16 BC）卢基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前16年执政官）

Alba Longa阿尔巴朗格

Alesia阿莱西亚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Helios亚历山大·赫利俄斯

Alexandria亚历山大港

Aliso（Haltern）阿里索（哈尔滕）

Allobroges阿洛布罗基人

Amatius（false Marius）阿玛提乌斯（假马略）

Amphipolis安菲波利斯

Antonia（the younger）小安东尼娅

Antonia（the elder）大安东尼娅

Antoninus，Iullus尤卢斯·安东尼

Antonius，Caius（brother of Mark Antony）盖乌斯·安东尼（马克·安东尼的弟弟）

Antonius，Caius（cos.63 BC）盖乌斯·安东尼（前63年执政官）

Antonius，Lucius卢基乌斯·安东尼

Antonius Creticus，Marcus马克·安东尼·克莱提库斯

Antyllus，Marcus Antonius马克·安东尼·安提勒斯

Aphrodisias阿佛洛狄西阿斯

Apollo阿波罗

Apollonia阿波罗尼亚

Appian阿庇安

Appian Way阿庇乌斯大道

Aqua Alsietina阿尔希提纳水道

Aqua Julia尤利乌斯高架渠

Aqua Virgo维尔戈水道

Aquileia阿奎莱亚

Aquitania阿基坦

Ara Pacis Augustae奥古斯都和平祭坛

Arabia Felix阿拉伯福地

Archelaus，King of Judaea阿奇劳斯，犹太国王

Ares（Mars）阿瑞斯（玛尔斯）

Areus（philosopher）阿莱乌斯（哲学家）

Argonauts阿尔戈英雄

Armenia亚美尼亚

Arminius阿米尼乌斯

Arsinoe阿尔西诺伊

Artaxias Ⅱ，King of Aremnia阿尔塔夏二世，亚美尼亚国王

Astura阿斯图拉

Asturians阿斯图里亚斯人

Athenodorus阿提诺多罗斯

Atia阿提娅

Augusta Emerita（Mérida）奥古斯塔·埃梅里塔（梅里达）

Baetica贝提卡

Baiae巴亚

Balbus，Lucius Cornelius 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

Balbus，Lucius Cornelius（the younger）小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

Balbus，Marcus Atius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

Bassus，Publius Ventidius普布利乌斯·温提迪乌斯·巴苏斯

Bastarnae巴斯塔奈人

Bathyllus（actor）巴绪卢（演员）

Belgica比利时

Beneventum贝内文托

Berytus（Beirut）贝里图斯（贝鲁特）

Bessi培西人

Bibulus，Marcus Calpurnius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

Bithynia 比提尼亚

Bononia波诺尼亚

Bovillae博维莱

Brundisium布隆迪西乌姆

Brutus，Decimus Junius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Brutus，Marcus Junius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Caepio，Fannius范尼乌斯·凯皮欧

Caesar，Caius盖乌斯·恺撒

Caesar，Lucius卢基乌斯·恺撒

Caesar，Lucius Julius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

Caesaraugusta（Zaragoza）恺撒奥古斯塔（萨拉戈萨）

Caesarea Maritima恺撒利亚港

Caesarion 恺撒里昂

Calenus，Quintus Fufius昆图斯·弗费乌斯·卡雷努斯

Caligula，Emperor卡利古拉，皇帝

Campus Martius战神广场

Candace，Queen of Ethiopia康达吉，埃塞俄比亚女王

Canidius，Publius普布利乌斯·卡尼迪乌斯

Cantabrians坎塔布里亚人

Cape Mylae米莱角

Capito，Caius Ateius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

Capreae（Capri）卡普里岛

Carinae卡里奈区

Carrhae，battle of（53 BC）卡莱战役（前53年）

Caryatids女像柱

Cassius Longinus，Gaius盖乌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

Catiline，Lucius Sergius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

Catina（Catania）卡提纳（卡塔尼亚）

Cato the Elder老加图

Cato the Younger小加图

Catullus，Caius Valerius Catullus，Gaius Valerius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图卢斯

Catulus，Quintus Lutatius（cos.78 BC）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

斯（前78年执政官）

Catuvellauni卡图维劳尼人

Celtiberians凯尔特伊比利亚人

Censors监察官

Ceres刻瑞斯

Chatti卡蒂人

Chauci考契人

Cherusci切鲁西人

Cicero，Marcus Tullius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cero，Marcus Tullius（the younger）小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cero，Quintus Tullius昆图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Cinna，Cnaeus Cornelius格奈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

Circus Flaminius弗拉米尼乌斯广场

Circus Maximus马克西穆斯广场

Claudia克劳狄娅

Claudia Pulchra克劳狄娅·普尔科拉

Claudius，Emperor克劳狄，皇帝

Cleopatra Selene克利奥帕特拉·塞勒涅

Cloaca Maxima大下水道

Clodius Pulcher，Publius普布利乌斯·克劳狄·普尔喀

Concordia，shrines to和谐女神圣所

consilium principis 元首御前会议

contubernales （‘tent-companions’）“帐篷伙伴”

Cornelia（Pompey’s wife）科尔内利娅（庞培的妻子）

Cornelia（mother of the Gracchi）科尔内利娅（格拉古兄弟的母亲）

corona civica 橡叶冠

corona navalis 海战金冠

Corsica科西嘉岛

Corvinus，Marcus Valerius Messalla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

Cossus，Cornelius科尔内利乌斯·考苏斯

Crassus，Marcus Licinius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

Crispinus，Titus Quinctius提图斯·昆克提乌斯·克里斯皮努斯

culpeus virtutis （‘shield ofvirtues’）美德之盾

Cumae库迈

Curia Julia（Senate House）尤利乌斯议政厅（元老院议政厅）

Cytheris（actress）西塞莉丝（演员）

Cyzicus库济库斯

Dacia达契亚

Dalmatians达尔马提亚人

Deiotarus，King of Galatia狄奥塔鲁斯，加拉太国王

Deldo，King of the Bastarnae巴斯塔奈人的国王戴尔多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Diana狄安娜

Dido，Queen of Carthage狄多，迦太基女王

Dio，Cassius卡西乌斯·狄奥

Dioscuri，cult of狄俄斯库里崇拜

Diribitorium计票大厅

Dolabella，Publius Cornelius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多拉贝拉

Domitian，Emperor图密善皇帝

Drusus德鲁苏斯

Drusus，Marcus Livius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

Dyrrachium狄拉奇乌姆

Ebro，River 埃布罗河

Ennius恩纽斯

Ephesus以弗所

Epirus伊庇鲁斯

Ethiopians埃塞俄比亚人

Euphrates，River幼发拉底河

fasces 法西斯束棒

Festival of Augustalia奥古斯都节

festival of Lupercalia 牧神节

fetiales 国务祭司

Flaccus，Caius Norbanus盖乌斯·诺巴努斯·弗拉库斯

Flaccus，Marcus Valerius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

Flamines 祭司

Flavus弗拉乌斯

Florus弗罗鲁斯

Forum Augustum奥古斯都广场

Forum Boarium屠牛广场

Forum Gallorum，Battle of高卢广场战役

Forum Julium尤利乌斯广场

Frisii弗里斯人

Fulvia富尔维娅

Gades（Cadiz）加的斯

Galatia加拉太

Galilee加利利

Gallus，Marcus Aelius马尔库斯·艾利乌斯·伽卢斯

Gallus，Caius Asinius（cos.8BC）盖乌斯·阿西尼乌斯·伽卢斯（前8年执政官）

Gallus，Caius Cornelius盖乌斯·科尔内利乌斯·伽卢斯

Gaul内高卢

Gallia Comata（‘Long-Haired Gaul’）长发高卢

Gallia Narbonensis纳博讷高卢

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

Glaukon（sea god）格劳科斯（海神）

Gospel of Luke《路加福音》

Gospel of Matthew《马太福音》

Gracchus，Gaius Sempronius盖乌斯·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Gracchus，Sempronius（poet）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诗人）

Gracchus，Tiberius Sempronius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Graves，Robert罗伯特·格雷夫斯

Gulf of Ambracia安布拉基亚湾

Gyaros，（Greek island renowned for its poverty）伊亚罗斯（以贫困出名的希腊小岛）

Hadrian，Emperor哈德良，皇帝

Hall of Liberty自由大厅

Hannibal汉尼拔

harpax 哈尔帕克斯

Helvetii tribe赫尔维蒂部落

Hercules赫拉克勒斯

Herod the Great，King of Judaea大希律王，犹太国王

Hirtius，Aulus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Homer荷马

Horace贺拉斯

Hortensia霍尔腾西娅

Hortensius，Marcus马尔库斯·霍尔腾西乌斯

House of Livia李维娅府

Hyrcanus Ⅱ，King of Judaea赫卡努斯二世，犹太国王

Idumaeans以东人

Iliad 《伊利亚特》

Ilithyia（goddess of childbirth）厄勒梯亚（助产女神）

Illyria伊利里亚

Illyricum伊利里库姆

insulae （tenement blocks）公寓楼

Isauria伊苏利亚

Isis伊西斯

Janus Geminus雅努斯·格米努斯

Jerusalem耶路撒冷

Jesus耶稣

John the Baptist施洗约翰

Josephus约瑟夫斯

Judaea犹太

Julia（daughter of Agrippaand Julia）尤利娅（阿格里帕和尤利娅的女儿）

Julia（daughter of Augustus）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女儿）

Julia（grandmother of Augustus）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外祖母）

Julia（mother of Antony）尤利娅（安东尼的母亲）

Julia（wife of Cornelius Lentulus）尤利娅（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的妻子）

Julian，Emperor尤利安，皇帝

Julius Caesar尤利乌斯·恺撒

Juno朱诺

Jupiter朱庇特

Jupiter Optimus Maximus至善至伟朱庇特

Kalkriese（near Osnabrück）卡尔克里泽山（奥斯纳布吕克附近）

Knidos克尼多斯岛

La Tène culture拉登文化

La Turbie拉蒂尔比耶

Labeo，Marcus Antistius马尔库斯·安梯斯提乌斯·拉比奥

Labienus，Titus提图斯·拉比埃努斯

Lake Avernus阿维尔努斯湖

Lake Moeris摩里斯湖

lares and *penates* 拉瑞斯和皮纳特斯

Largus，Valerius瓦列里乌斯·拉尔古斯

Latin拉丁文

Legio V Alaudae 第五“云雀”军团

Legio VI Victrix 第六“胜利”军团

Ninth Hispana 第九“西班牙”军团

Legio X Gemina 第十“孪生子”军团

Legio XIII Gemina 第十三“孪生子”军团

Legio XIV Gemina 第十四“孪生子”军团

Legio Martia 玛尔斯军团

Lentulus，Publius Cornelius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兰图鲁斯

Lepidus，Marcus Aemlius the triumvir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后三头同盟之一）

Lepidus，Marcus Aemilius（father of the triumvir）马尔库斯·埃米利

乌斯·李必达（后三头同盟之一李必达的父亲）

Lesbos莱斯博斯岛

lex Julia de adulteriis 《尤利乌斯处置通奸法》

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尤利乌斯婚姻法》

lex Papia Poppaea 《帕皮乌斯与波派乌斯法》

Libo，Lucius Scribonius卢基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利博

Licinus，Julius尤利乌斯·李基努斯

Livia（Drusilla）李维娅（德鲁茜拉）

Livilla李维拉

Livy，Titus提图斯·李维

Lollius，Marcus马尔库斯·劳里乌斯

Londinium伦蒂尼乌姆

Luca卢卡

Lucan卢坎

ludi Apollinares 阿波罗节

ludi Ceriales 刻瑞斯节

Lugdunum（Lyons）卢格敦（里昂）

lustratio （purification ceremony）净化仪式

Macrobius马克罗比乌斯

Maecenas，Caius盖乌斯·梅塞纳斯

maiestas law叛逆法

Manius马尼乌斯

Marcella马凯拉

Marcellus马凯鲁斯

Marcellus，Marcus Claudius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

Marcomanni马科曼尼人

Mariamme，Queen ofJudaea米利暗，犹太王后

Marius，Caius盖乌斯·马略

Mark Antony（Marcus Antonius）马克·安东尼

Mars玛尔斯

Marsyas马西亚斯

Martial马提亚尔

Masada马萨达

Massilia 马西利亚

Matius，Caius盖乌斯·马提乌斯

Mausoleum of Augustus奥古斯都陵墓

Mausolos，King摩索拉斯国王

Maximus，Paullus Fabius保卢斯·费边·马克西穆斯

Menas梅纳斯

Mercury墨丘利

Messalla Corvinus，Marcus Valerius马尔库斯·梅萨拉·考尔维努斯

Messana（Messina）墨西拿

Metulus梅图鲁斯

Miletus 米利都

Milo米罗

Minerva密涅瓦

Mithridates Ⅵ，King of Pontus米特里达梯六世，本都国王

Mount Vesuvius维苏威火山

Munda蒙达

Murena，Lucinius 李锡尼·穆里纳

Murena，Varro瓦罗·穆里纳

Musa，Antonius安东尼·穆萨

Mussolini，Benito贝尼托·墨索里尼

Mutina穆蒂纳

Mylae米莱

Naples那不勒斯

Narbo（Narbonne）纳尔博（纳博讷）

Naulochus瑙洛库斯

naumachia Augusti 奥古斯都海战

Neptune尼普顿

Nero，Emperor尼禄，皇帝

Nero，Tiberius Claudius提比略·克劳狄·尼禄

Nerva，Lucius Coccius卢基乌斯·考基乌斯·涅尔瓦

Nicaea尼西亚

Nicolaus of Damascus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斯

Nicomedia尼科米底亚

Nijmegen奈梅亨

Nola诺拉

Nomenclatores 指名者

Noricum 诺里库姆

Noviodunum（Nyons）新堡（尼永）

Numidia努米底亚

Octavia屋大维娅

Octavius，Caius（father ofAugustus）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父亲）

Odrysae欧德律赛人

Odyssey 《奥德赛》

Olympic Games奥林匹克运动会

Oppius奥庇乌斯

Orosius奥罗修斯

Ovid（Publius OvidiusNaso）奥维德（普布利乌斯·奥维德乌斯·纳索）

Ars Amatoria 《爱的艺术》

Oxyrhyncus俄克喜林库斯

Panathenaic Games泛雅典运动会

Pandateria（island）潘达特里亚（岛）

Pannonians潘诺尼亚人

Panormus（Palermo）潘诺姆斯（巴勒莫）

Pansa，Cauis Vibius盖乌斯·威比乌斯·潘萨

Pantheon万神殿

Paros帕罗斯

Parthia帕提亚

Paullus，Lucius Aemilius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

Pedius，Quintus昆图斯·佩蒂乌斯

Pergamum 帕加马

Persians波斯人

Perusine War佩鲁西亚战争

Petronius，Publius普布利乌斯·佩特罗尼乌斯

Pharsalus，Battle法萨卢斯战役

Philip Ⅱ，King of Macedon腓力二世，马其顿国王

Philippi，Battle of腓立比战役

Philippus，Lucius Marcius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普斯

Phoebe（freedwoman）福柏（女释奴）

Phraates Ⅳ，King of Parthia弗拉特斯四世，帕提亚国王

pietas （piety）虔敬

Pinarius，Lucius卢基乌斯·皮纳里乌斯

Piso，Lucius Calpurnius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

Planasia普拉纳西亚

Plancus，Lucius Munatius卢基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

Plebeian Games平民竞技会

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

Plutarch普鲁塔克

Pollio，Caius Asinius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

Pollio，Vedius维迪乌斯·波利奥

Pompeius，Cnaeus格奈乌斯·庞培

Pompeius，Sextus塞克斯图斯·庞培

Pompey the Great“伟大的”庞培

Pomponia庞贝尼娅

pontifexmaximus 祭司长

Porta Capena第一大门

Porticus of Livia李维娅门廊

Porticus of Octavia屋大维娅门廊

Postumus，Agrippa阿格里帕·波斯图穆斯

praefectusurbis 城市长官

praetors裁判官

Primus，Marcus马尔库斯·普里穆斯

princepsiuventutis 青年元首

Proculeius，Caius盖乌斯·普罗库雷乌斯

Propertius普罗佩提乌斯

Proscriptions政治清洗

Ptolemy XIII，King of Egypt托勒密十三世，埃及国王

Ptolemy XIV，King of Egypt托勒密十四世，埃及国王

Ptolemy Philadelphus托勒密·费拉德尔甫斯

Publicani 包税人

Puteoli普泰奥利

Pylades（actor）皮拉得斯（演员）

Quirinius，Publius Sulpicius（Cyrenius）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奎里尼乌斯（居里扭）

Res Gestae 《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

Rhaeti赖提亚人

Rhea Silvia雷娅·西尔维亚

Rhegium瑞吉昂

Rhodes罗得岛

Rhone罗讷河

Roma（goddess）罗马（女神）

Romulus and Remus罗慕路斯和雷穆斯

Rubicon，River卢比孔河

Rufus，Marcus Egnatius马尔库斯·伊格纳提乌斯·鲁弗斯

Rufus，Publius or Plautius普布利乌斯或普劳提乌斯·鲁弗斯

Saepta 选举围场

Saepta Julia尤利乌斯围场

Sallust（Gaius SallustiusCrispus）撒路斯提乌斯（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

Salvidienus Rufus，Quintus昆图斯·萨尔维迪努斯·鲁弗斯

Samaritans撒马利亚人

Samos萨摩斯岛

Sardinia撒丁岛

Saturninus，Caius Sentius盖乌斯·桑提乌斯·萨图尔尼努斯

Sava，River萨瓦河

Scipio Nasica，Quintus Cornelius Metellus Pius昆图斯·科尔内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纳西卡

Scodra斯科多拉

Scribonia斯克利博尼娅

Scribonius斯克利博尼乌斯

Sebasteni赛巴斯托斯人

Secular Games（*ludi saeculares* ）世纪节

Segesta（Sisak）塞杰斯塔（锡萨克）

Segestes塞格斯特斯

Segimer西吉莫尔

Sejanus，Lucius Aelius卢基乌斯·艾利乌斯·塞扬努斯

Sempronia塞姆普罗尼娅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 元老院终极议决

Servilia（mother of Brutus）塞维利娅（布鲁图斯的母亲）

Sestius，Lucius卢基乌斯·塞思提乌斯

Severus，Cassius卡西乌斯·塞维鲁

Shakespeare，William威廉·莎士比亚

Sicily西西里岛

Silanus，Caius盖乌斯·西拉努斯

Silanus，Decimus Junius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

Sisenna，Cornelius科尔内利乌斯·希森纳

Social War同盟者战争

Sosius，Caius盖乌斯·索希乌斯

Sparta斯巴达

Speculatores 侦察者

Sphaerus斯法埃鲁斯

spolia opima 最高战利品

Strabo斯特拉波

SUEBI苏维汇人

Suetonius苏埃托尼乌斯

Sulla，Lucius the dictator卢基乌斯·苏拉，独裁官

Surrentum（Sorrento）苏伦图姆（索伦托）

Sybilline Books《西卜林书》

Syme，Sir Ronald罗纳尔德·赛姆爵士

Syracuse叙拉古

Tacitus塔西佗

Tarentum（Taranto）塔兰托

Tarragona今天的塔拉戈纳

Tauromenium陶罗梅尼乌姆

Taurus，Titus Statilius提图斯·斯塔提里乌斯·陶鲁斯

Tellus大地母亲

Temple of Apollo Sosianus阿波罗·索希阿努斯神庙

Temple of Bellona战神庙

Temple of Castor andPollux卡斯托耳与波鲁克斯神庙

Temple of Concord和谐女神庙

Temple of Fortuna Redux幸运返乡女神庙

Temple of Janus Geminus阴阳面雅诺神庙

Temple of Jupiter雅努斯·格米努斯神庙

Temple of Jupiter Feretrius誓言守护者朱庇特神庙

Temple of Mars Ultor复仇者玛尔斯神庙

Temple of Palatine Apollo帕拉丁阿波罗神庙

Temple of Quirinus奎里努斯神庙

Temple of the Divine Julius神圣尤利乌斯神庙

Temple of Venus Genetrix祖先维纳斯神庙

Temple of Vesta灶神庙

Tencteri滕科特利人

Terentia特伦提娅

Thapsus塔普苏斯

Theatre of Marcellus马凯鲁斯剧场

Theatre of Pompey庞培剧场

Thetis忒提斯

Thurii图里

Tiber，River台伯河

Tiberius，Emperor提比略，皇帝

Tiridates梯里达底

Titius（tribune）提提乌斯（保民官）

Titius，Marcus马尔库斯·提提

Tomi托米

Toranius，Caius盖乌斯·托拉尼乌斯

Torone（‘ladle’）托伦涅（“长柄勺”）

Trajan，Emperor图拉真，皇帝

Treaty of Misenum《米西努姆条约》

Trebonius，Caius盖乌斯·特雷博尼乌斯

trianomina 三名法

Trinovantes特里诺文特人

Trojan Games特洛伊竞技会

Tullia图利娅

tumultus （state of emergency）紧急状态

Twelve Tables十二铜表法

Ubii tribe 乌比部落

Usipetes tribe乌西皮特部落

Valencia巴伦西亚

Valley of the Inn因河流域

Varius，Lucius卢基乌斯·瓦里乌斯

Varro，Marcus Terentius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

Varus，Publius Quinctilius普布利乌斯·昆克提利乌斯·瓦卢斯

Veii维爱

Velitrae韦莱特里

Velleius Paterculus，Caius格瓦斯·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

Ventidius Bassus，Publius普布利乌斯·温提迪乌斯·巴苏斯

Venus维纳斯

Vesta灶神

Vestal Virgins维斯塔贞女

Via Aemilia埃米利乌斯大道

Via Egnatia艾格纳提乌斯大道

Via Flaminia弗拉米乌斯大道

Via Sacra圣道

Victory（goddess）胜利女神

Vigiles 警备队

Vindelici温德利希人

Vinicius，Marcus马尔库斯·维尼基乌斯

Vipsania维普撒尼娅

Virgil维吉尔

Vitellius，Quintus昆图斯·维特里乌斯

Volsci伏尔西人

Vulcan武尔坎

Waal，River瓦尔河

Waldgirmes瓦尔德吉尔姆斯

Weser，River威悉河

Xanthus桑瑟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2017.1重印）

书名原文：Augustus：From Revolutionary to Emperor

ISBN 978-7-5097-9244-5

Ⅰ.①奥… Ⅱ.①阿…②陆… Ⅲ.①奥古斯都（前63-14）-传记 Ⅳ.①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140号

奥古斯都：从革命者到皇帝

著者/〔英〕阿德里安·戈兹沃西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周方茹 安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2.25 插页：0.5 字数：508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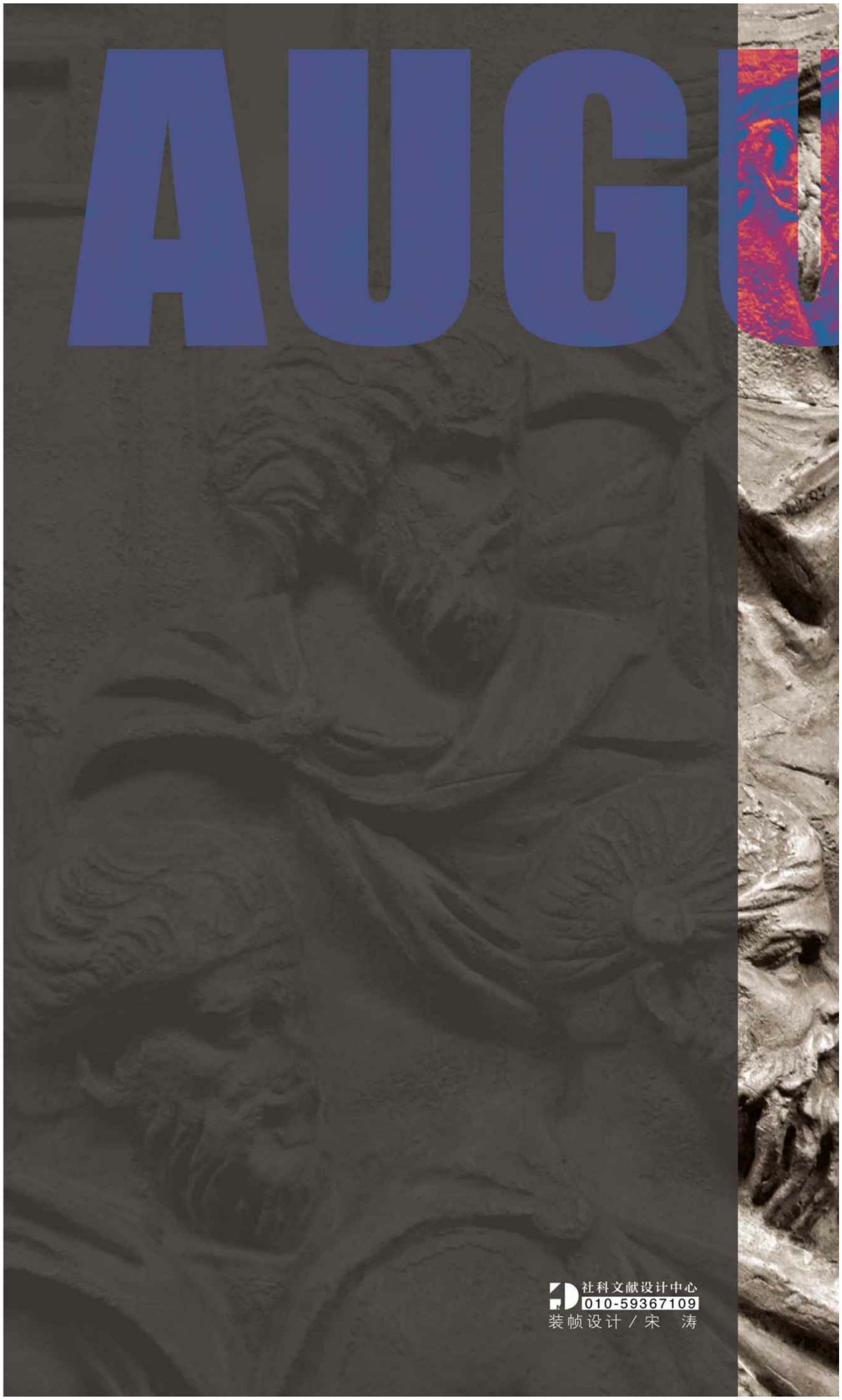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9244-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1770号

定价/8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UGU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本书获得 2014 年美国出版商专业与学术卓越奖（PROSE）传记与自传类荣誉奖。

精彩绝伦……《奥古斯都》是一部一流的通俗传记，由一位技艺娴熟的专家写成，可以与《恺撒：巨人的一生》媲美。

——《华盛顿邮报》

令人肃然起敬……巧妙地运用关于奥古斯都生平的其他证据……这部传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圆满的。对某些传统说法做了有益的纠正。

——《华尔街日报》

戈兹沃西真正的专业是军事历史学，这赋予他的传记以力度和精彩：他对奥古斯都与军队关系的描述是大师级的。

——《伦敦周日时报》

就像戈兹沃西给尤利乌斯·恺撒写的传记一样，本书也是任何对古罗马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

——《独立报》

历史学家和传记家戈兹沃西在这部精彩的传记中展现了他对古罗马的丰富知识……强有力的叙述将本书支撑起来，关于罗马生活的许多细节使本书更为丰富……戈兹沃西制造的整体效果是，让读者见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整个生活距离我们现代人的体验并不远。古代的文化习俗常常让我们觉得陌生，但那些政治动机、阴谋、家庭关系和情感，在今天就像在公元纪年之初一样真实。

——《出版人周刊》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9244-5

9 787509 792445 >

定价：88.00 元





甲骨文

〔英〕杰弗里·罗伯茨 / 著
（Geoffrey Roberts）

基于朱可夫本人未经删节的回忆录
及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
一部关于二战中“综合能力最优秀的
将领”的全景式传记
世界军事史协会 2013 年度杰出著作

李晓江 / 译



朱可夫

STALIN' S GENERAL
THE LIFE OF
GEORGY ZHUKOV

斯大林的将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杰弗里·罗伯茨（Geoffrey Roberts）

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爱尔兰科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和院长，著有《斯大林的战争》（*Stalin's Wars*）和《斯大林格勒的胜利》（*Victory at Stalingrad*）。

李晓江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爱书。教书、读书之余，亦以译书为乐。译有《斯大林的战争》《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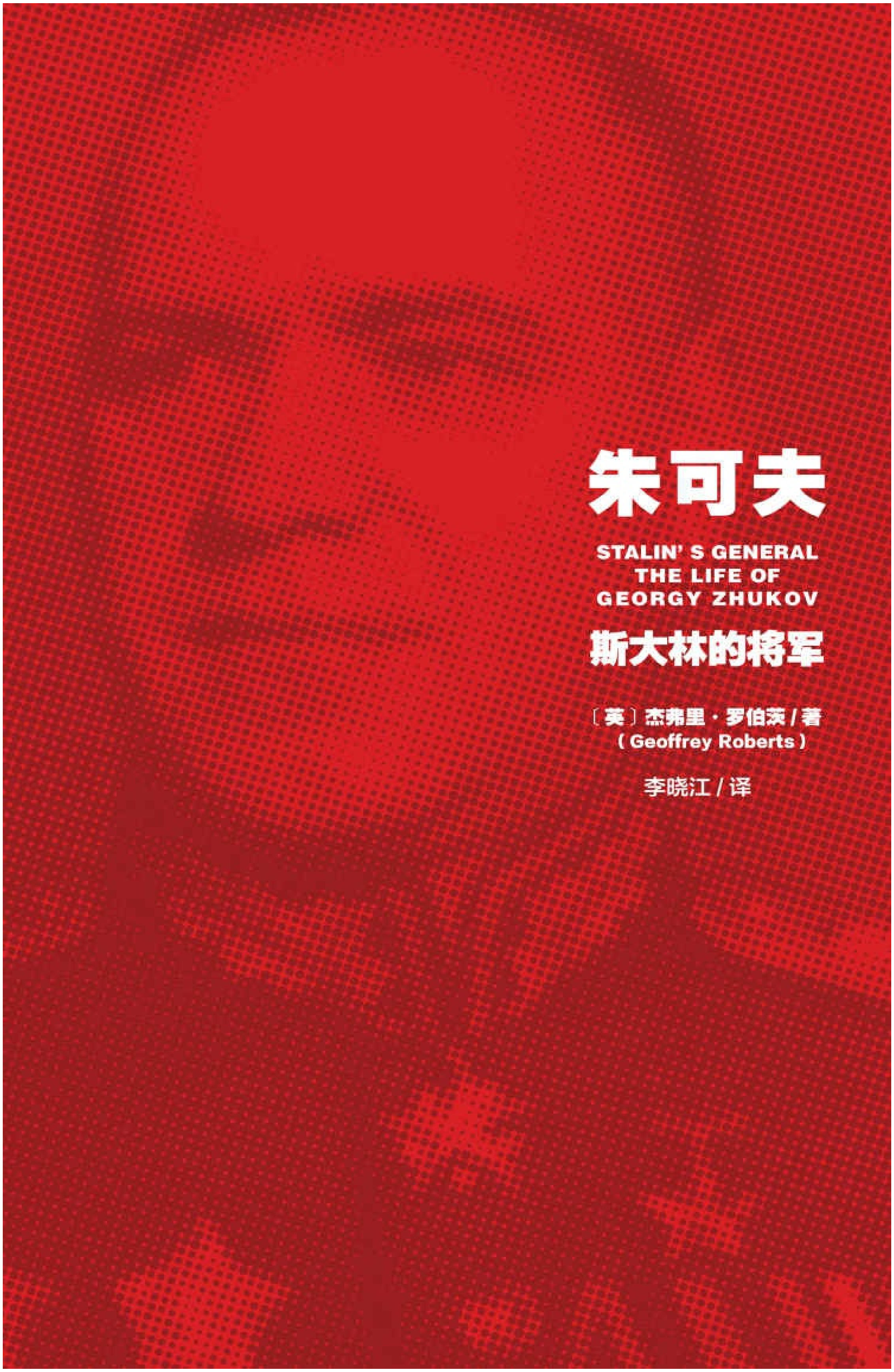


Stalin’s General：The Life of Georgy Zhukov

Copyright © 2012 by Geoffrey Robert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本中文版根据兰登书屋2012年版本译出。



朱可夫

STALIN' S GENERAL
THE LIFE OF
GEORGY ZHUKOV

斯大林的将军

〔英〕杰弗里·罗伯茨 / 著
（Geoffrey Roberts）

李晓江 / 译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



朱可夫（右）和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



苏联将军和指挥官合影

左起依次为科涅夫、托尔布欣、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朱可夫、戈沃罗夫、罗科索夫斯基、叶廖缅科、梅列茨科夫、巴格拉米杨



朱可夫在哈拉哈河
1939年



朱可夫在库尔斯克
1943年**7**月



朱可夫（左）在通往华沙的路上
1944年



朱可夫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协议
柏林，**1945**年**5**月**8**日



朱可夫和伯纳德·蒙哥马利陆军元帅（在朱可夫的左侧）
柏林，**1945**年**5**月



朱可夫在柏林
1945年**6**月**5**日



朱可夫向蒙哥马利授予“胜利勋章”
1945年**6**月**21**日



朱可夫在红场胜利阅兵仪式上接受敬礼
莫斯科，**1945**年**6**月**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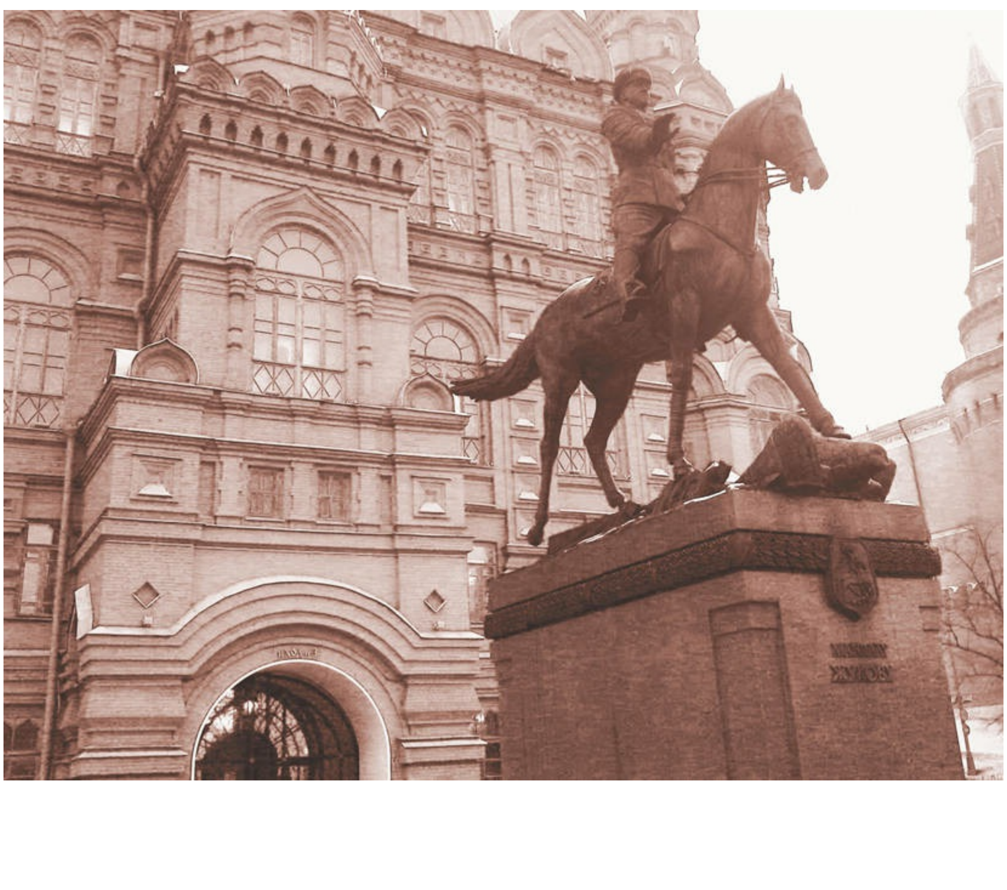
胜利阅兵仪式当天，朱可夫与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前



朱可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德里



朱可夫手里拿的是一副红军士兵将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顶端的油画
莫斯科，**1970**年



1995年在克里姆林宫旁竖立的朱可夫像



朱可夫参加为纪念对日胜利而举行的盟军阅兵仪式
柏林，**1945**年**9**月**7**日

中文版序

《斯大林的将军》中文版是我的第二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很高兴能够写这篇序言并对编辑董风云和译者李晓江表示谢意。

我的第一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书是《斯大林的战争》。[1] 通过对斯大林的战争领袖作用的研究，该书提出——虽说有点争议——苏联独裁者是个非常有力的最高统帅，他在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依靠自己的将军，尤其是副最高统帅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取得了苏联对纳粹德国的胜利。1941年，被斯大林派去拯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不让德国人占领它们的是朱可夫。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扭转了战争势头的是朱可夫。率领红军打到柏林的是朱可夫。接受德国无条件投降，又在一个月之后即1945年6月的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上接受致礼的还是朱可夫。骑着白色骏马出现在红场上的朱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符号意义的画面之一。如果说斯大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赢得胜利的组织者，那朱可夫就是这一胜利在军事方面的设计师。

虽然斯大林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朱可夫却是大多数人眼中的英雄。他的传记是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是如何在红军中一步步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它还讲到了他跌宕起伏的战后生涯，当时他曾先后逃过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清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企图把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抹去，但又都未能得逞。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朱可夫再次展示出铸就了他作为一

名伟大的将军的种种品质：意志坚定、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就如同战争期间一样，起初在对手手下吃了败仗的朱可夫又重新站了起来，赢得了争夺历史记忆的胜利。

对中国读者来说特别有趣的一点是，作为将军，朱可夫是1939年8月在哈拉哈河地区与日本关东军的作战中一战成名的。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1937年入侵中国其他地方开始的。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引发了与苏联的边境冲突，而最大、最重要的冲突就发生在哈拉哈河地区。朱可夫对日本人的决定性的胜利使后者相信，继续在亚洲大陆扩张并非明智之举。于是，日本转向东南亚，并走上与美国交战的道路。

1939年之后，朱可夫并未进一步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作用，但他参与策划和准备了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中国东北的进攻。苏联打败了盘踞在那里的日军，这对于迫使日本投降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朱可夫并不是所有人的英雄，即便在俄罗斯也是如此。他有时受到的指控是：他是个残忍的将军，只在乎赢得胜利。的确，朱可夫的部队伤亡率很高，可也并不比其他苏联将军的高。红军面对的敌人是野蛮的，他们必须打一场残酷的战争，而胜利并不是可以轻易到手的。朱可夫犯过许多代价很高的错误，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年，但他对战役的精心准备以及他充满活力和想象力的领导方式也拯救了许多生命。朱可夫是个严厉但有同情心的将军。他相信，要拯救自己士兵的生命，最严格的纪律和最艰苦的训练就是最好的办法。他把自己的回忆录献给苏联的普通士兵绝不是偶然的。

朱可夫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哪怕在战后受到斯大林的排挤和打击时也仍然对他忠心耿耿。但他保持着自己在思想上的独立性，并在与独裁者的交往中表现出在斯大林的将军中独一无二的个人勇气。斯大林

死后，朱可夫批评了苏联独裁者战前对红军的清洗导致许多忠诚而有才干的军官被处死和遭监禁。但朱可夫也同样坚决认为，斯大林是个杰出的最高统帅。1969年朱可夫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成了为斯大林恢复战争领袖名誉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朱可夫是个实干家，他的个性特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强硬而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的公共形象的影响。即便在私生活中，他也是寡言少语。但在他的心灵中也有较温柔的一面，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也变得更平和、更善于表达了。忽略朱可夫私人生活和内心生活的传记不会是完整的。在这本书中，你们将会遇到一个有缺点但非常有人情味的英雄：他经历了20世纪的一些最重大的事件，并对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杰弗里·罗伯茨

2015年3月

---

[1]〔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前言及致谢

如果说俄罗斯有卓越的英雄，那就是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那个打败了希特勒（Hitler）的人，那个从贫困中崛起并成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的农家子弟，那个个性鲜明、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闹翻过却大难不死的人。在兰登书屋的乔纳森·乔（Jonathan Jao）建议我写一本新的朱可夫传记的时候，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当初我在写《斯大林的战争》时，就想对朱可夫在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对其自我标榜的回忆录所引发的神话一探究竟。如果说过去有哪位苏联的将军是我特别喜爱的，那是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他是朱可夫的竞争对手，领导风格截然不同。对于这项新的写作计划，我原定的题目是“朱可夫：一部批判性的传记”，目的是想给出一幅瑕瑜互见的完整画面，在紧紧抓住他那些激动人心的军事成败和过山车般的政治经历的同时，也揭示出围绕其生活和事业的诸多神话。但随着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赞同朱可夫的观点。对于他，我既有赞同又有批评，所以，我希望本书能被看作对他的一个公正的再评价，它在充分尊重朱可夫个人及其成就的同时，也克服了朱可夫崇拜中的夸大之词。

这不是关于朱可夫的第一部英文传记，我得感谢艾伯特·阿克塞尔（Albert Axell）、威廉·斯帕尔（William J.Spahr）——尤其是奥托·普雷斯顿·钱尼（Otto Preston Chaney）的开拓性努力。他们的工作的主要局限在于，过于信赖朱可夫的回忆录。那些回忆录作为原始资料是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在现在的这部传记中，我利用了俄罗斯档案中的大量新材料，包括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朱可夫个人档案。许

多俄罗斯学者的工作也让我获益良多，这其中特别是V.A.阿法纳西耶夫（V.A.Afanas’ev）、V.丹尼斯（V.Daines）、A.伊萨耶夫（A.Isaev）和V.克拉斯诺夫（V.Krasnov）。他们对朱可夫在二战中的作用都做过非常有价值的传记性研究。不过，我写的传记是全景式的，它对朱可夫的早期生活及战后的政治生涯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在莫斯科，我的研究得到了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科学研究所的朋友们的大力帮助，尤其是奥利格·勒热舍夫斯基（Oleg Rzheshevsky）、米哈伊尔·米亚赫科夫（Mikhail Myagkov）和谢尔盖·利斯季科夫（Sergey Listikov）。勒热舍夫斯基教授特意安排了我与朱可夫长女叶拉（Era）的见面和采访。尼基塔·马克西莫夫（Nikita Maximov）和亚历山大·波兹杰耶夫（Alexander Pozdeev）两位先生陪我一同兴致勃勃地去了朱可夫的家乡——那里现在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并参观了朱可夫博物馆。鲍里斯·索科洛夫（Boris Sokolov）对朱可夫抱有敌意的看法我并不认同，但他大度地提醒我，要关注伊琳娜·马斯蒂基纳（Irina Mastykina）对朱可夫的家庭及私生活的研究。

承其好意，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读了本书的初稿，他在指出其中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那些错误中最为好笑的就是我以为朱可夫当初爱上的是一位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而不是女中学生。[1] 埃文自己对苏德战争的研究，就像克里斯·贝拉米（Chris Bellamy）、大卫·格兰茨（David Glantz）、乔纳森·豪斯（Jonathan House）及已故的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的著述一样，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关朱可夫战前在红军中服役的情况，给了我较多启发的是玛丽·哈贝克（Mary Habeck）、马克·冯·哈根（Mark von Hagen）、西蒙·内夫（Shimon Naveh）、罗杰·里斯（Roger Reese）和大卫·斯通（David Stone）的著作。

我要感谢约翰·拜尔勒大使[2] 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讲述他父

亲约瑟夫于1945年邂逅朱可夫的故事，从而为我重构这一事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

为我对朱可夫的研究提供了展示机会的有“世界军事史协会”、“爱尔兰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会”、伦敦的“俄罗斯与苏联研究合作协会”、梅努斯大学（Maynooth University）“军史与战略研究中心”以及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政治与国际研究系。

如果没有我就职的爱尔兰科克大学提供的资金支持和专职研究机会（research leave），我就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在莫斯科进行研究和写作。

本书有幸得到两位非常出色的编辑的帮助：一位是我的妻子西莉亚·韦斯顿（Celia Weston），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另一位是乔纳森·乔，他为如何写作通俗的学术性传记给了我大师般的指导。我还有幸得到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洛尼（Andrew Lownie）的服务。他也鼓励我接受挑战，为更广泛的读者写作。

最后要感谢的是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的《如何写传记》。只是在重读了那本书之后——当时我已完成了有关朱可夫的写作——我才意识到我从中汲取了多少宝贵的教益。不过，本书存在的任何不足都完全在于我自己，而不能归咎于他或这篇前言中提到的任何人。

---

[1] 俄文的“女中学生”（gimnazistka）与英文的“体操运动员”（gymnast）拼写很相似。——译者注

[2] John Beyrle（1954～），美国外交官，苏联与东欧事务专家，曾任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2005.7～2008.4）和驻俄罗斯大使（2008.7～2012.1）。其父约瑟夫·拜尔勒（Joseph R.Beyrle，1923～2004）二战时作为伞兵在美军101空降师服役，诺曼底战役中被德军俘虏。1945年1月从纳粹战俘营逃脱后加入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同年2月在受伤住院期间得到朱可夫的探望，并在伤愈后被护送至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约瑟夫战后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译者注

- 前言及致谢
- 朱可夫生平和事业年表
- 1 荣耀易逝：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浮沉
- 2 青春传奇：从农家子弟到共产主义战士，1896～1921
- 3 军人生活：一名红军指挥员所受的教育，1922～1938
- 4 一将成名：哈拉哈河，1939
- 5 在基辅：演习与备战，1940
- 6 灾难的制造者？朱可夫与1941年6月22日
- 7 斯大林的将军：拯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1941
- 8 胜利的设计师？斯大林格勒，1942
- 9 西进！从库尔斯克到华沙，1943～1944
- 10 红色风暴：征服德国，1945
- 11 外放：贬黜与平反，1946～1954
- 12 国防部部长：凯旋与模仿剧，1955～1957
- 13 最后一战：争夺历史，1958～1974
- 14 常胜元帅
- 参考文献
- 索引

朱可夫生平和事业年表

1896年

12月1日：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于俄罗斯卡卢加省斯特列尔科夫卡村

1903年

开始读小学

1908年

到莫斯科当毛皮匠学徒

1914年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

8月：应征加入沙皇军队并被分派到骑兵部队

1916年

10月：在行动中负伤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

1917年

3月：彼得格勒兵变之后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

11月：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并夺得政权

1918年

10月1日：参加红军

1919年

3月：成为共产党预备党员

10月：在俄国内战的行动中负伤

1920年

与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结婚

3月：参加在梁赞举办的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班

5月：成为共产党正式党员

10月：晋升为排长，接着又升为连长

1921年

朱可夫的父亲去世

3月：因勇敢而被授予勋章

1922年

6月：被任命为第38骑兵团连长

1923年

3月：晋升为第40骑兵团副团长

7月：被任命为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团长

1924年

10月：进入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

1928年

女儿叶拉出生

1929年

女儿马加丽塔出生

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

5月：晋升为第7萨马拉师第2骑兵旅旅长

1931年

2月：被任命为骑兵监察部助理

9月：日本入侵满洲

1933年

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3月：被任命为第4（伏罗希洛夫）骑兵师师长

1935年

被授予“列宁勋章”

1937年

女儿埃拉出生

5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遭到逮捕和处决，对军队的清洗开始

7月：日本入侵中国

7月：被任命为驻扎在白俄罗斯的第3骑兵军军长

1938年

3月：调任第6哥萨克军军长

6月：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

1939年

5月：调往中蒙边境

6月：被任命为驻哈拉哈河地区的第57特别军军长

7月：第57军被改编为第1集团军群，由朱可夫指挥

8月20日：对哈拉哈河地区的日军发起攻击

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

8月30日：因哈拉哈河大捷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

9月17日：苏军入侵波兰东部

12月：苏军入侵芬兰

1940年

3月：苏芬和约签订

5月：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5月：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恢复将军军衔

6月2日：第一次面见斯大林

6月5日：晋升为大将

6月22日：法国投降

6月28日：率领苏军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有关“巴巴罗萨行动”的指令

12月25日：做题为“当代进攻战的特点”的报告

1941年

1月：参加总参谋部军演

1月14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2月：在苏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5月15日：起草苏联对德国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

6月30日：明斯克陷落

7月10日：成立大本营，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司令部

7月29日：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

8月8日：斯大林成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8月：领导叶利尼亚反攻

9月：基辅陷落，列宁格勒被围

9月11日：被任命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

10月11日：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

12月5日：莫斯科反攻开始

1942年

1月：发动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6月：德军向巴库和斯大林格勒方向发动南方攻势

7月：第二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7月17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

7月28日：斯大林发布227号命令——“一步也不后退！”

8月26日：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

11月：第三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火星行动”）

11月19日：“天王星行动”——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1943年

1月：负责监督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的行动

1月18日：晋升为苏联元帅

2月：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最终投降

7月：库尔斯克战役

11月：解放基辅

1944年

朱可夫的母亲去世

6月：“巴格拉季昂行动”；盟军在法国登陆

8月：华沙起义

9月：负责监督苏军入侵保加利亚的行动

11月12日：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

1945年

1月：发动“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占领华沙

2月18日：大本营要求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停止向柏林推进

4月16日：向柏林发动进攻

4月25日：苏美军队会师易北河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

5月：红军攻占柏林，朱可夫接受德国投降

5月30日：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占领军司令

6月24日：朱可夫领导红场的胜利阅兵

7～8月：参加波茨坦会议

1946年

2月：当选最高苏维埃代表

3月22日：被任命为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

6月：被解除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职务并被调往敖德萨

1947年

2月：被取消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

1948年

1月：因从德国攫取战利品而受到严厉的批评

2月：调任乌拉尔军区司令

1950年

再次当选最高苏维埃代表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遇见加琳娜·谢苗诺娃

1952年

10月：出席苏共十九大，并当选中央委员

1953年

3月：返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3月：斯大林去世

6月：逮捕贝利亚

1954年

朱可夫的姐姐玛丽亚去世

9月：负责监督在托茨科耶进行的核试验和演习

1955年

2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5月：签订《华沙条约》

7月：出席日内瓦峰会并与艾森豪威尔会谈

1956年

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当选中央主席团成员

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

11月：负责监督苏联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

1957年

1～2月：访问印度和缅甸

6月：带头维护赫鲁晓夫，反对所谓的反党集团企图发动的政变

6月：女儿玛丽亚出生

10月：中央委员会以朱可夫疏远军队与党的关系为由，解除其职务

1958年

2月：中央主席团要求他从武装力量中退休

1959年

在苏共二十一大上遭到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抨击

1961年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遭到赫鲁晓夫的抨击

1964年

10月：赫鲁晓夫下台

1965年

与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离婚

1966年

与加琳娜·谢苗诺娃结婚

11月：被第5次授予“列宁勋章”

1967年

12月：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去世

1968年

1月：中风

1969年

4月：朱可夫回忆录第一版出版

1971年

9月：赫鲁晓夫去世

1973年

11月：加琳娜·谢苗诺娃去世

1974年

6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去世

7月：朱可夫回忆录修订版出版

1 荣耀易逝[1]：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浮沉

在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的一生中，所有胜利的时刻都无法与1945年6月他在红场胜利阅兵仪式上接受致礼的那天相比：朱可夫，骑着名为“茨皮基”（Tspeki）的白色阿拉伯骏马，伴着多达1400人的乐队演奏的格林卡（Glinka）的《光荣》（属于祖国俄罗斯），从斯帕斯基大门进入广场——克里姆林宫在他的右侧，正前方是圣巴希尔大教堂著名的洋葱形圆顶。等待着他的是由若干混成团组成的、代表苏联武装力量各兵种的一个个方阵。在广场中央，朱可夫与K.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会合。后者向接受检阅的部队发出立正的口令，然后陪同朱可夫策马走向每个混成团并向他们致敬。

致礼完毕，朱可夫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一同站在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并发表讲话，庆祝红军对纳粹德国的胜利。此时的天空乌云密布，并下起了细雨，而且越下越大。朱可夫曾想把自己被淋湿的帽子摘下来擦一擦帽檐，但看到斯大林并没有这样做，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骑兵出身的朱可夫对阅兵仪式中的致礼环节还是非常期待的，但发表讲话就不同了，那可是世界上无数的人都会看到和听到的。想到这，他就有点儿紧张。他尽自己所能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还在女儿叶拉和埃拉（Ella）面前进行了试讲。她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禁不住使劲地鼓掌。发表讲话是经过精心安排的，稿子的边上都有提示，告诉朱可夫在讲的时候要抑扬顿挫，以及什么时候语调要庄严。

朱可夫表现得比较紧张，不过很威严。他的讲话磕磕巴巴，但很有力，最后还用这样一句话掀起了高潮：“光荣属于我们英明的领袖和统帅——苏联元帅、伟大的斯大林！”此时，礼炮齐鸣，乐队奏响了苏联国歌。

讲话之后，朱可夫站在斯大林身旁检阅了部队。在这中间，阅兵队伍还停了一会儿：200面缴获的纳粹旗帜在鼓声中被堆靠在克里姆林宫的墙边，就像1812年库图佐夫（Kutuzov）元帅的手下打败拿破仑之后把法兰西旗帜扔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的脚下一样。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最后还进行了盛大的焰火表演。[2]

对于斯大林让朱可夫来领导这次阅兵，没有人说三道四。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而且被普遍认为是苏联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主要设计师——那场胜利不仅使苏联，也使欧洲避免了纳粹的奴役。阅兵式新闻片在世界各地放映，这进一步加强了朱可夫作为二战中最伟大的苏军将领的地位。

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苏俄的时候，是朱可夫领导了红军的第一次成功的反攻，迫使德国国防军后撤，从而向全世界证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不是战无不胜的。1941年9月，当列宁格勒遭到德军的围攻时，被斯大林派去解救那座危城的还是朱可夫。一个月后，为了指挥保卫苏联首都的战斗，朱可夫又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朱可夫不仅遏制住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的势头，还在1941年12月发动反攻，从这座城市赶走了德国国防军，从而粉碎了希特勒要用闪电战一举击败红军并征服苏俄的妄想。

六个月后，希特勒企图对红军再次施以重击。这次的攻势是在南方，目标是占领苏联的巴库油田。在德军向南推进的势头正劲的时候，朱可夫发挥了核心作用，策划了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那是一场包围战，把30万德军士兵困在了那座城市。继这场辉煌的

胜利之后，他又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坦克大战中大获成功，消灭了德军仅存的装甲后备力量。1943年11月，朱可夫和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驱车进入被收复的乌克兰首府——基辅，受到了成群结队的人们的热烈欢迎。1944年6月，朱可夫负责协调从德军手中解放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巴格拉季昂行动”使红军兵临华沙，并于1945年1月占领了波兰首都。“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由此拉开序幕，朱可夫的军队在这次攻势中横扫波兰，进入东普鲁士，并将柏林置于打击的范围之内。1945年4月，朱可夫指挥苏军向柏林发起总攻。夺取德国首都的惨烈战斗让苏军付出了8万条生命的代价，但到4月底，阿道夫·希特勒自杀了，苏联旗帜飘扬在帝国国会大厦的废墟之上。1945年5月9日，正是朱可夫正式接受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在1945年6月检阅了红军陆海空部队之后，作为苏联的顶级战士，朱可夫的战后生涯似乎注定会同样辉煌。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所有地面部队的总司令。可是，三个月的时间都还没到，斯大林就解除了他的职务，并把他贬为敖德萨军区司令。

朱可夫之所以被解除职务，表面上是因为他对斯大林不忠、不敬，并把苏联人所谓的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过多地归功于他自己。但实际上，朱可夫忠于斯大林，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有谁该得到“斯大林的将军”这一称号的话，那就是朱可夫。的确，在自我吹嘘方面，朱可夫不甘人后——至少私下里是这样——可那是全世界高级将领的通病，其中也包括他在苏军统帅部的支持斯大林解除其总司令职务的许多同僚。事实上，让斯大林真正感到不满的是朱可夫独立的个性以及他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真话的习惯。这种品质在战时对独裁者是很有用的，但在和平时期就不怎么值得称道了。因为此时的斯大林感到，除了自己，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像朱可夫一样，斯大林也可能有虚荣心。他对自己的副手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结束时受到的关注感到嫉妒，

尽管在树立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望方面，他本人也曾经推波助澜。斯大林如此对待朱可夫，也是向其他将领传递一个信号：既然他们中最有名的、与斯大林关系最紧密的朱可夫都会遭遇这样的命运，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人，要是不老老实实，也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据朱可夫的女儿叶拉说，哪怕是在家里，朱可夫也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是，被贬到敖德萨这件事却令他十分痛苦。[3] 后来，他曾对苏联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说："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4]

然而，朱可夫的麻烦才刚刚开始。1947年2月，他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惶恐不安的朱可夫恳求斯大林，想私下里当面向独裁者为自己辩白。不过，斯大林未予理睬，于是，反朱可夫的运动继续进行。1947年6月，朱可夫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他在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5] 于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了军功章。不久，鲁斯拉诺娃和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V.V.Krukov）将军就被逮捕并关押起来。"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后来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6]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越发不妙：对朱可夫在驻德期间攫取的战利品的调查开始了。根据苏共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朱可夫个人囤积了大量的战利品，其中包括70件黄金珠宝、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而且还有——想必是用行家的眼光看的——320件皮草（他年轻时做过毛皮匠）。朱可夫申辩说，这些东西要么是礼物，要么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但委员会查明，他的说法是想推脱责任的不实之

词。委员会的结论是：虽说还不至于开除他的党籍，但他要把自己的非法所得上交国家。1948年1月，朱可夫被降为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的乌拉尔军区司令。[7]

对朱可夫的进一步惩罚是，就当他这个人没有存在过一样。书面的卫国战争史中没有他，描写1945年胜利阅兵的绘画中也没有他。在1948年的一部讲述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中，几乎没有看到朱可夫的面孔。在1949年的一幅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但是，早在1949年10月就有了朱可夫要复出的迹象。当月的《真理报》刊登了F.I.托尔布欣（F.I.Tolbukhin）元帅的讣告，朱可夫也在签名者之列。[8] 1950年，朱可夫和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一起，再次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年，在官方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出现了关于朱可夫的词条，虽然不长，但内容却是正面的，强调了他在战争期间对于实现斯大林军事计划的重要作用。[9] 1952年10月，朱可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苏共十九大，并恢复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即试用）委员资格。不可思议的是，朱可夫当时竟然以为斯大林准备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10]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独裁者的国葬仪式上，朱可夫是军方仪仗队伍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员。[11] 在后斯大林时代，任命朱可夫为国防部副部长，是新的苏联政府最早宣布的决定之一。随着1955年2月朱可夫被继斯大林之后担任苏共领导人的赫鲁晓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对他的平反工作也继续迅速展开。1955年7月，朱可夫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英、法、美、苏大国峰会。这也是战后的首次峰会。他在那里遇到了战争刚结束时曾在柏林共事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并与之进行了会谈。让当时的《时代》杂志感到好奇的是："两位老兵的友谊能否成为美苏紧张关系真正缓和的基础？"[12]

作为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在苏联成了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其地位仅次于赫鲁晓夫。1957年6月，在反对以前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首的强硬派企图剥夺赫鲁晓夫领导权的斗争中，朱可夫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幸的是，对朱可夫而言，他在与莫洛托夫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使自己成了赫鲁晓夫眼中的政治威胁。1957年10月，朱可夫受到指控，说他阴谋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在那些指控朱可夫最力的人当中，有许多都是战争期间曾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军和元帅。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8年3月在六十一岁这个还相对年轻的年龄时退役了。

就像在斯大林时代被外放一样，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剩余的时光里，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历史书籍中除名。例如，苏共在从1960年开始出版的大部头、多卷本卫国战争史中，在极力夸大赫鲁晓夫的作用的同时，对朱可夫几乎只字不提。[13] 朱可夫失势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他与外界隔离开来。1963年，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瑞安（Cornelius Ryan）在为他的那本研究柏林战役的书而访问苏联的时候，唯一被禁止见到的苏联元帅就是朱可夫。[14]

让朱可夫聊以自慰的是，他可以写自己的回忆录。他的作家角色的榜样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读过后者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的二战史——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出版并限制发行的俄文译本。丘吉尔写那部书时的座右铭是，历史会证明他是对的——因为他将会书写历史！朱可夫似乎也抱有类似的想法，他不仅要用回忆录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用它来回击和反驳赫鲁晓夫那帮人对他的批评，尽管那意味着会为了对自己有利而影响到历史记录的准确性。

只要赫鲁晓夫还在继续统治苏联，朱可夫的回忆录就不可能出版。当他的女儿埃拉问他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的时候，朱可夫说自己是为书桌的抽屉写的。不过，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了，为恢复朱可夫作

为重要军事人物的名誉的工作也开始了。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媒体又开始发表朱可夫的文章了，包括他对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柏林等战役的记述。

朱可夫的第二次平反重新激起了西方对他的兴趣，这种兴趣曾在他当初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时有所消退。1969年，美国记者和历史学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在一本名为《朱可夫元帅的最伟大战役》的书中发表了朱可夫文章的未经授权的译文。索尔兹伯里在引言中对朱可夫有一段很有名的描述，说他是“20世纪大规模作战的大师”。[15] 多数评论家对此都表示认同。在英国，苏联红军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权威约翰·埃里克森曾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20世纪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伟大的军人，是苏联的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稍稍数一下就可以发现，他是个从未输过一场战役的将军……长期以来都是德意志将军掌握了发言权，吹嘘他们自己的技艺……现在轮到朱可夫元帅了——他出现得是晚了些，但可以一锤定音。”[16]

1969年4月出版的那版朱可夫回忆录很漂亮，有彩色的地图和许多照片，其中有些是来自朱可夫的个人档案。[17] 苏联公众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期待。最初印刷的30万部很快便销售一空，接着又卖出了几百万部，还包括几十万部的各种译本。这部回忆录很快就成为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最有影响力的个人记述，而且现在依然如此。

在争夺卫国战争的历史记忆的战斗中，朱可夫取得了胜利，但他没能活着品尝到胜利的滋味。他死于1974年自己的回忆录修订版发行的时候。[18] 朱可夫在1968年有过一次严重的中风，而且再也没能痊愈。他的第二任妻子加琳娜（Galina）罹患癌症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加重了他的病情。当四十七岁的加琳娜于1973年11月去世的时候，朱可夫自己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1974年6月，七十七岁的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与世长辞。

朱可夫的葬礼是自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最为盛大的葬礼。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莫斯科中央陆军剧院（Central House of the Soviet Army）瞻仰朱可夫的遗体。在6月21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体中的时候，扶柩者中为首的是苏共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主要的发言者是国防部部长A.A.格列奇科（A.A.Grechko）元帅。[19]

在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朱可夫不但被视为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也被视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有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在西方，朱可夫的声望只是稍稍地逊色一些。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把朱可夫视为英雄。即便在俄罗斯，他也有自己的批评者。有人认为他是个自负而残暴的人，军事上的名声是吹出来的。曾是苏联情报官员的维克托·苏沃洛夫（Viktor Suvorov）的历史书籍在俄罗斯非常畅销。据他说，“国家的所有高级军队领导人都反对朱可夫。这些将军和元帅们知道，朱可夫虚荣心很强。他们知道，他这人既讨厌，又乏味。他们知道他粗俗，是个篡位者。他们知道，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野心家。他们知道，他把挡在自己路上的所有人都踩在脚下。他们知道，他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20]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朱可夫在性格上当然是有缺陷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的确有许多可供那些与之共事的将军们谈论的负面的东西，但苏沃洛夫突出的只是负面的东西。苏沃洛夫的指责对朱可夫在俄罗斯的声望几乎没有影响。即便有，这种持续的争议也只是增加了朱可夫作为一个取得了史诗般成就但同时又有着深刻的性格缺陷的人的魅力。

对朱可夫的一种最为常见的批评是：他不爱惜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他不在乎为了胜利所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对于这样的批评，朱可夫坚决予以否认。他指出，坐在扶手椅中的批评者说这个那个战役可以用小得多的生命的代价赢下来，这种话事后说起来很轻松。不错，他是

喜欢进攻，但在战争期间，他也学到了撤退的好处。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朱可夫当时也在尽力保存他的力量，保护他的士兵。他的战役准备总是一丝不苟，而且只要斯大林允许，他就会集中足够多的资源。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朱可夫的部队的伤亡率绝不比其他苏联将领的高，包括人们认为比较宽厚的罗科索夫斯基。认为朱可夫这人漠视手下士兵的生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有时对自己的部下残酷无情，但那不是他生性残忍，而是指挥风格的问题。而且在受挫或不满意的时候，朱可夫的怒火大多是指向高级指挥官，所以后来有些人才对他如此不满。

在朱可夫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时，俄罗斯的档案还未开放，能够查阅到的独立的文献资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要写他的传记，只能是给他获得官方批准的回忆录做注解，那样一来，对他的生平的记述就会出现偏颇。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新版朱可夫回忆录的面世——书中增加了在20世纪60年代被苏联审查人员剔除的大量材料——情况开始好转。[21] 1991年苏联政权终结之后，有无数与朱可夫职业生涯相关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档案文献都公开了。最近，这些材料又得到了补充，朱可夫的一些私人文件在档案馆中也可以直接查阅了。[22] 现在，可以在文献证据的基础上叙说他的生平了。

朱可夫的一生远不只是一张他打过的那些战役的年表。他的故事是与他为之服务的苏联政权的成败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朱可夫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他对纳粹分子的胜利虽说对人类的帮助很大，但也让一个就其本身而言是高度集权的高压体制得以强化并获得了合法性。朱可夫不仅是军人，也是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认为苏联采取的镇压措施对于自己所信奉的共产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即便他活着看到苏联的终结，他也未必会觉得有必要抛弃自己的信仰，或为自己在拯救斯大林政权方面所扮演过的角色而道歉。相反，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会说自己不但是个共产主义者，还

是个爱国者，而苏维埃政权——尽管它有种种缺陷——是他唯一可以为其服务的、代表自己国家利益的政权。

朱可夫既不是完美无瑕的传奇英雄，也非诋毁者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恶棍。毫无疑问，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一个有着极高的军事才能的人，一个具备了为打赢野蛮的战争所必须具备的性格力量的人。但是，他也犯过许多错误，无数的人因为这些错误而付出了血的代价。朱可夫是个有着性格缺陷的、充满矛盾的人，所以，对于他的生活和事业，我们不可能轻易地做出裁决。但除了他的那些重大的胜利和败绩之外，使朱可夫成为一个令人如此着迷的主题的，也正是那些缺陷和矛盾。

---

[1] 原文为拉丁文“sic transit gloria”。这句话带有宗教色彩，意在感叹尘世的荣耀短暂而易逝。——译者注

[2] 我对胜利阅兵的描述主要依据苏联方面有关的新闻片——《1945年的胜利阅兵》（*Parad Pobedy 1945* ）。朱可夫讲话的打字稿是在2010年4月莫斯科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的展览中展出的。关于朱可夫讲话的预演情况来自他的女儿叶拉，作者于2010年4月在莫斯科对她进行了采访。

[3] 作者对叶拉·朱可娃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4]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Moscow：APN，1989），p.330.

[5] Lidiya Ruslanova（1900～1973），俄罗斯伟大的民歌演唱家，二战中曾辗转东部战场为苏军官兵演唱以鼓舞士气。二战后一度被捕并被投入劳改营，直到斯大林死后才被释放。——译者注

[6] A.Mirkina，*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24.

[7]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s.9-10.

[8] “F.I.Tolbukhin，” *Pravda* ，October 19，1949.

[9] *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 ，2nd ed.（Moscow：Ogiz，1952），pp.222-223.

[10]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vol.2（Moscow：APN，1988），p.70.

[11] “U Groba Velikogo Vozhdya，” *Krasnaya Zvezda*， March 9，1953.

[12] *Time*， May 9，1955.

[13] *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 6 vols.（Moscow：Voenizdat，1960-1965）.

[14] C.Ryan，*The Last Battle*（London：NEL，1968），p.169.

[15] E.Salisbury ed.，*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London：Sphere，1971；最初由Harper & Row出版社在1969出版），p.4。

[16] 埃里克森的评论可见于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朱可夫卷宗，里面有国外媒体对他的评论的剪报。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yi Arkhiv（后面用RGVA表示），F.41107，Op.1，D.85.

[17]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Moscow：APN，1969）.英译本名为《朱可夫元帅回忆录》（*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London：Jonathan Cape，1971）。

[18]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2 vols.（Moscow：APN，1974）.这一版的英文本是两卷本的《G.朱可夫：回忆与反思》（*G.Zhukov*，*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

[19] “V Poslednii Put'：Pokhorony 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G.K.Zhukova，” *Pravda*， June 22，1974.

[20] V.Suvorov，*Ten' Pobedy*（Donetsk：Harvest，2003），pp.17，26.

[21]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3 vols.，10th and 11th eds.（Moscow：APN，1990-1992）.这两版对原先被剔除的材料都用斜体标出。据奥托·普林斯顿·钱尼的计算，第十版相对于以前各版增加了125页的内容，而第十一版又增加了35页。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527.

[22] 朱可夫的个人卷宗可见于RGVA。有大约190个卷宗，其中包括与其回忆录有关的手稿和材料、演讲稿、文章、通信和个人的纪念物品（F.41107，Ops.1-2）。该档案馆还藏有与哈拉哈河战役有关的朱可夫系列卷宗（F.32113，Op.1）。

2 青春传奇：从农家子弟到共产主义战士，1896～1921

关于格奥尔吉·朱可夫的童年和青年，现有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乞丐变富翁的童话。故事是这样的：1896年，朱可夫出生于俄国农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十二岁时被送到莫斯科当毛皮匠学徒，1915年应征加入沙皇军队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过伤，并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勋章。1917年的俄国革命使年轻的格奥尔吉卷入了政治。他先后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在俄国内战中站在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一方。在被选中参加军官培训之后，朱可夫在红军中逐级晋升，成为苏联元帅和二战中最著名的苏军将领。

故事基本属实。朱可夫出身寒微却跃居社会的顶层，这是理解他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体制的信仰终生不渝的关键。朱可夫从成年起便为之服务的是一个野蛮、高压、专制的政权，而且不时地采取恐怖手段。它在经济上并不特别有效，尽管它可以在紧急情况（例如战争）下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这一体制始终未能践行其平等主义理想，统治它的是一个很少——如果说有过的话——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政党。但是与旧的沙皇政权相比，它给朱可夫这样的人提供了此前从未有过而且也无法想象的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升迁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特权、社会地位以及强烈的身份意识：自己是精英中的一分子，负有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责任。这并不是说朱可夫之所以忠于苏维埃体制，仅仅是因为这样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对于他以及其他许多成功地成为新的苏维埃精英成员的人来说，在其理想与升迁所带来的好处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在迈向更好的世界的过程中，两者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朱可夫早年生活的故事，问题在于，它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朱可夫本人。如果用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童年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但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像该神话所暗示的那样，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考虑到他的出生地以及家庭的亲戚关系，他还是个相对来说得到优待的（privileged）农民。

童年和青年时期

朱可夫的故事要从1896年12月1日一个名为斯特列尔科夫卡（Strelkovka）的村子开始说起，它属于莫斯科西南约80英里的卡卢加省（Kaluga Province）。[1] 他的父亲康斯坦丁（Konstantin）是个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Ustin’ya）是做农活的。“朱可夫”这个姓源于俄语中表示“甲虫”的“Zhuk”。在俄罗斯俚语中，它还可以指有点儿捣蛋的人。朱可夫的父母都是二婚，两人以前的配偶都死于肺结核。[2]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的父母结婚时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分别是五十岁和三十五岁。不过，据他的小女儿玛丽亚（Maria）说，教堂的记录（写回忆录时朱可夫没看到）表明，康斯坦丁和乌斯金妮娅在1892年结婚时，一个是四十一岁，一个是二十六岁。[3] 不过，考虑到俄罗斯农民艰辛的生活对于人的外貌的影响，在朱可夫的记忆或想象中，自己的父母要比实际的年龄显老也不足为奇。

格奥尔吉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名叫玛丽亚。在他五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又生了个男孩阿列克谢（Alexei），但这个孩子只活了不到一年。“我和姐姐，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都很难过，经常去看他的坟墓。”[4] 三个孩子都受洗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徒。“我的父亲从出生、教养和观点来说，和他的士兵一样，”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声称，“都是东正教徒。他们和他一起在战斗前祈祷：‘上帝与我们同在！’”[5] 二战期间，有传闻说朱可夫在自己的小车里有一尊圣像。可是当朱可夫战时的司机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说这是

胡扯。“他是个党员……要是车里有圣像，我是会知道的。”[6] 虽然他的女儿相信他是个东正教徒，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宗教信仰在朱可夫的生活中起过任何作用。

朱可夫出生于其中的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上帝国，从华沙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北冰洋到里海和黑海，绵延数千英里，横跨10个时区。在它的境内，生活着100多个民族和族群，尽管人口中占多数的是和朱可夫一样的俄罗斯人。1900年，俄罗斯的人口约有1.4亿，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朱可夫在卡卢加省的出生地位于所谓的“中央工业区”，它包括莫斯科及其周边省份。与俄罗斯南部及乌克兰大草原的肥沃的“黑土地”不同，“中央工业区”的地貌以湖泊、河流和成片的森林为主，很适合朱可夫喜爱的渔猎活动，但不太适合农业。它的主要的农作物是亚麻和蔬菜，而不是谷物。在“中央工业区”中承担农活的主要是像朱可夫的母亲那样的妇女。男人们则从事农业以外的活计和手艺，所以他们经常到莫斯科揽活。在那里，他们发现到处都是和他们一样的来自乡下的人。

20世纪初的俄罗斯，随着小学教育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的生活正经历着一场文化革命。村庄不论大小，大多建起了学校。朱可夫就是受益者之一，他接受了三年完整的小学教育，而多数农民都会选择两年。这表明，他的父母或许是贫穷的，但对于自己儿子的期待还是较高的。把教育当作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这是朱可夫一生秉持的态度，而且他还把这样的态度传给了自己的家人。

朱可夫的父亲康斯坦丁虽说有一门手艺，可从来没有多少活可干，因此，格奥尔吉年幼时一直饱受贫困的煎熬。这种贫困是俄罗斯农民共同的命运，就连那些生活在相对富裕的“中央工业区”的农民也不能幸免。

格奥尔吉长得像他的母亲，而且他也继承了她那强壮的体格——据说她能背着一袋200磅重的粮食走一段路。[7] 但是从感情上来说，他似乎与自己的父亲更亲近，尽管康斯坦丁要经常外出，到莫斯科找活干——这也许正是原因所在。“我爱父亲，他也很宠我。不过，偶尔他也会因为我犯的错误而惩罚我，用他的皮带抽我并要我道歉。我比较犟，不管他抽得有多狠，也会咬紧牙关，从不求饶。有一天，他又这样抽我，我就从家里跑掉了，在邻居家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8] 在当学徒的时候以及在加入军队之后，朱可夫也经常受到体罚，但他并未因此而怀恨在心。在多年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说：“艰难的生活是人生最好的学校。”[9]

格奥尔吉于1903年七岁时开始上学并成功完成了三年的小学课程。为了庆祝他的成功，母亲给了他一件新衬衫，父亲给他做了一双新靴子。不久，家里人便做出决定，让朱可夫到莫斯科跟着他的舅舅米哈伊尔（Mikhail）当毛皮匠学徒。

莫斯科离斯特列尔科夫卡坐火车只要四个小时（现在是一个小时多一点），但对小格奥尔吉来说，那可是个大不一样的陌生世界。1908年夏天，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熙熙攘攘的人群、高大气派的建筑（村里的房子没有超过两层的）以及疯狂的生活节奏，让他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不过，莫斯科到处都是像他那样的人：受过教育的农村小伙子，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毛皮匠、裁缝、木匠、皮匠之类的手艺。

他舅舅的门店在市中心，离红场不远。朱可夫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其中有一小时的午饭时间。工作很辛苦，还要时不时地挨师傅（和女工头）的打，但格奥尔吉不仅熬过来了，还挤出时间来上夜校继续自己的教育。朱可夫在后来的生活中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朱可夫不属于那种才智出众的将军，宁可说，他属于苏联人所谓的实干型，也就是注重实际行动的人；但在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他是个好学

生，而且还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据他的女儿埃拉说，读书在朱可夫的家中总是处于中心位置。到这位元帅去世的时候，他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已经积攒了20000册图书。可惜的是，在他去世之后政府收回了别墅，大部分藏书都变成了纸浆，最后只有几百册被博物馆收藏了。[10]

与格奥尔吉一道自学的是他的表兄弟、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他们一起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及科普读物，还有一个科目是德语。为了帮着做生意，亚历山大被自己的父亲送到莱比锡学习德语。在定期返回莫斯科家中的时候，他就抽空教他的表兄弟这门语言[11]，而朱可夫将会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把它派上大的用场。

1914年，朱可夫学徒期满。此时的他作为一个手艺不错的毛皮匠有了不错的收入，手下还有3个小徒工。从他与自己那些毛皮匠同事在当时一起拍的一幅照片来看，这是一群衣着体面而又温文尔雅的富足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张朱可夫与亚历山大一起拍的照片也表明，这个年轻人已经超越了他卑微的出身，成功适应了城市的新环境。要不是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朱可夫无疑会继续做他的毛皮匠，并最终经营起他自己的作坊。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很坦率，说自己年轻时缺乏政治热情，并说这在他的同事中很普遍。他将其归因于手工业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工业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截然不同的。与此同时，他又声称自己已经受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而正在俄国传播的各种革命思想的影响，并暗示说，自己逐渐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思想。可是，除了朱可夫自己的证言之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萌发。他当初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时很可能并不像他后来说的那样坚决。他的确成了一个忠贞的共产主义者，但那是由于机缘而非有意的安排，是由于军事和政治事态发展的偶然性而非社会主义思想的启示。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由此而开始了

自己的军事生涯。

沙皇的士兵

1914年的“七月危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6月底在萨拉热窝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之后（一同遇害的还有大公的妻子苏菲），奥匈帝国针对塞尔维亚进行了战争动员。当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时候，俄国也开始动员，以支持其巴尔干盟友和斯拉夫兄弟国家。为了回应俄国的战争动员，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德国于8月1日对俄宣战，并在两天后向与俄国结盟的法国发动了进攻。随着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理由是德国侵犯了中立国比利时——大战的主角纷纷登场。随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卷入了战争：土耳其（1914年）和保加利亚（1915年）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方，日本（1914年）、意大利（1915年）和美国（1917年）加入英、法、俄一方。

从俄国人的立场来看，他们卷入的是一场保卫国家、反对德国和奥匈帝国侵略者的战争。由于战争的爆发，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动员，就和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的情形相似。受到爱国热情鼓舞的朱可夫也想从军，但在与来自老家村子的另一个毛皮匠商议之后，他决定等到征召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时候再说。不过，亚历山大却决定从军，并试图说服格奥尔吉也那么做。

1915年夏天朱可夫应征入伍的时候，他同舅舅米哈伊尔进行了商量。米哈伊尔告诉他，他可以以生病为由推迟一年。当朱可夫说他身体很好、完全可以到前线服役时，他的舅舅问他，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傻瓜。“我告诉他，”朱可夫回忆说，“我有义务保卫祖国。”[12]

1915年8月，朱可夫在卡卢加省报到入伍，并被分配到第5预备骑兵

团。在那里，他“因为（对骑兵）抱有许多浪漫的想法……而对当兵感到非常开心”。[13] 9月，朱可夫和他的团一起被派往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省，加入第10骑兵师。正是在那儿，他接受了骑兵训练。他的第一匹马是一匹名为“恰谢奇娜娅”（Chashechnaya）的深灰色烈马，他一天要给它刷洗三次。

到1916年时，朱可夫已完成了自己的骑兵训练，接着又被选中接受进一步的培训，预备将来成为军士。在此期间，成年后的朱可夫第一次与上司发生了冲突。那是一个特别野蛮的军士，绰号“四指半”，因为他右手的食指缺了半截。“四指半”找朱可夫的茬，还对他施压，要他不当骑兵而去做文书。尽管朱可夫期待着能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就在考试的前两周，由于对“四指半”的不忠和不服从，他被宣布除名。当时，他以为自己的骑兵生涯就此完结了，但在一位一同受训的士兵将此事报告给指挥官以后，他摆脱了这样的厄运。那位指挥官决定让朱可夫完成训练。

在回忆录中说到自己参加的军士培训时，朱可夫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在骑术、武器的使用和操练方法方面，这种培训的确不错；另一方面，“教给军士的不是合乎人道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他的期待就是要把士兵变成听话的机器。维持纪律靠的是严厉。虽然条例并未规定可以采取体罚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实际上却司空见惯”。[14]

1916年8月，朱可夫被派往摩尔多瓦境内的德涅斯特河（River Dnestr）沿岸承担战斗任务，当时那里属于沙俄的一个省。朱可夫还没到前线就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他所在的部队遭到了一架侦察机的轰炸，结果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到前线后不久，朱可夫就因为抓到一名德国军官而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苏联记者于1945年在柏林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采访中，朱可夫回忆说自己当时对情报工作十分着迷，而且因为懂得一点德语，就专门抓俘虏。

[15] 在1916年10月又一次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时候，朱可夫的两位同伴被地雷炸成了重伤，他本人也被爆炸的气浪从马背上掀了下来。严重震伤的朱可夫被转移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住院治疗。这次负伤让朱可夫得到了他的第二枚“圣乔治十字勋章”。1916年年底，他被派回自己原来的部队——第5预备骑兵团。就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当初我离开时还是个年轻的士兵，现在带着军士的杠杠、实战经验和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回来了。”[16]

革命与内战

朱可夫原来的部队驻扎在哈尔科夫东南约80英里的巴拉克利亚（Balakleya）附近的拉格利（Lageri）。在那里，朱可夫和他的伙伴们很快便卷入了1917年的革命进程——它从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专制王朝的垮台开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达到了高潮。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发生总罢工和士兵哗变之后于1917年3月的逊位加快了这一进程。（彼得格勒的前身是圣彼得堡，1991年苏联解体后它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在苏联时代，它被更名为列宁格勒。）

沙皇下台的背后，是民众风起云涌的不满和抗议浪潮。对俄国而言，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它连遭败绩，丢失了领土，伤亡惨重。事实证明，沙皇政府没有能力组织好国家的战争努力。武器弹药匮乏，部队的许多基本需要——食物、被服和医疗救助——都是由民间组织提供的。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而大印钞票，使通货膨胀日趋严重，而货币贬值和农民惜售又导致城市的粮食短缺。城市居民的反应是举行罢工和政治示威活动。1915年11月，沙皇尼古拉接管了武装力量的指挥权，结果让自己成了俄国的军事失败和战时的种种弊端的罪魁祸首。雪上加霜的是，中产阶级不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并坚持呼吁实现俄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

当1917年3月彼得格勒纺织女工的罢工和示威发展成全市范围的抗议活动时，问题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部队接到了恢复秩序的命令，许多示威者被枪杀。但在后来，该市卫戍部队的士兵发生哗变并加入抗议者一边。有人劝说对自己的首都失去控制的尼古拉，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引退。他曾想传位于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但遭到后者的拒绝。罗曼诺夫专制王朝就此终结。

由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家们组成的临时政府取代了沙皇政府。临时政府的目标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紧急改革，并做好制宪会议选举的筹备工作，而制宪会议将就国家的新宪法达成一致。不过，事态的发展让这些计划落了空。因为此时的政权是一种“二元政权”，权力和权威由临时政府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分享。苏维埃作为普选产生的委员会，在地方层面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它们比临时政府更加激进，这就为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集团的鼓动和宣传，即要求在俄国建立一个不但是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权，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土地归农民，面包给工人，并让俄国退出战争。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士兵和工人当中。不到六个月，他们就成为俄国最强大、最有组织的政党。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策划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新的社会主义政府，它将代表各个苏维埃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这些很快从彼得格勒波及全国各地的剧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军队的政治化。临时政府的首批法令之一就是，准备发布命令，批准成立士兵委员会和水兵委员会，以便选出他们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朱可夫当选为自己所在的骑兵连的委员会主席和团苏维埃代表。他后来声称，当时自己在团里支持布尔什维克派，但他的当选很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作为优秀军士的地位和威望，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倾向。朱可夫还提到了团苏

维埃是怎样被反苏维埃分子接管的。结果，这个团的一些部队与乌克兰的反革命民族主义分子站在了一边。他自己的部队被解散了，士兵们被遣散回家，而他有几周一直在东躲西藏，以逃避替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效力的军官们的追捕。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要一直等到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之后才来到莫斯科。

1917年年底，朱可夫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打算——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休息一下再加入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1月建立的红军。但不巧的是，他得了斑疹伤寒，所以他又过了半年才加入军队。不过，现在看来，朱可夫当时的做法很可能是和多数被遣散的前沙皇军队的士兵一样：回家静观其变。

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俄国退出了战争。不过，和平的代价是很高的，布尔什维克被迫将大片的土地割让给德国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因此发动了武装暴动，反对列宁政府，而这在俄国还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他们是不愿意去做的。为了应对刚刚开始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开始组建武装力量，以便保卫自己用革命的手段夺取的政权。职业军队取代了曾经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革命的民兵组织。军官选举被取消，传统的指挥结构又确立了，同时还开始发给适当的薪饷。最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开始征召前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和军士。1918年9月初，布尔什维克发布命令，要求朱可夫那个年龄段的人于月底前报到入伍。[17]

朱可夫虽然是住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心脏地带，但实际上，他也可以像许多俄国农民一样，不去理睬征兵令。他之所以应征，多半是出于职业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选择，因为这给了他继续自己的军事生涯的机会。就像许多在红军中服役的第一代军人一样，朱可夫的政治信念是其从军的结果而非原因。

1918年10月1日，朱可夫加入红军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第4团。[18] 布

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是首批应征入伍的，朱可夫所在的部队也有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干部。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可夫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并于1919年3月成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新名称）的预备党员，那是不奇怪的。预备党员有一段预备期，在此期间，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朱可夫要到1920年5月才能成为正式党员。[19]

1919年5月，朱可夫所在的师被派往乌拉尔地区南部，参加布尔什维克与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的作战。后者是前沙皇军队的指挥官，此时已夺取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权，并一心想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6月，朱可夫经历了自他成为红军战士以来的第一次战斗——与大约800名哥萨克骑兵的激战。9月，他又参加了一次战斗，这次是在俄国南方的察里津（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格勒）。在10月底的一次白刃战中，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了。在萨拉托夫（Saratov）野战医院治疗的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名为玛丽亚·沃尔霍娃（Maria Volkhova）的年轻女学生。他俩有一个月的时间形影不离，但在玛丽亚回到其位于波尔塔瓦（Poltava）的家乡而朱可夫也被送回斯特列尔科夫卡的家中继续康复的时候，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的分离，三年后，这段关系又恢复了，尽管朱可夫此时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之后不久，玛丽亚为朱可夫生下了一个私生女——马加丽塔（Margarita）。[20]

红军指挥员

1920年1月，朱可夫返回了部队。但是，由于尚未痊愈（他再次得了斑疹伤寒，这种病在当时很常见），他被分配到第3预备骑兵师。三个月后，朱可夫迎来了其红军生涯的新的转折点：他被派去参加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地点是在莫斯科东南约100英里处的梁赞（Ryazan）。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实际上是用来训练下级军官的，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取消了军官衔，而且要等到二战的时候才恢复，所以在红军中就

用“指挥员”[21] 这个统称来区分级别的高低。

关于朱可夫在梁赞的情况，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文件，可以让我们对他在这段时期的活动有个大致的了解。[22]

朱可夫是由他所在师的党组织推荐参加培训的。他在1920年3月15日报到，并被安排参加预备课程的学习——那是要让受训学员接受基本的教育。俄语、数学、地理、卫生保健、军队管理、政治教育、军事条例，所有这些科目他都拿到了良好或优秀，于是很快就结业并开始学习专门的骑兵战术课程，而且尽管他曾在沙皇军队中干过，但最后竟然能帮着训练其他学员了。

在梁赞，朱可夫在自己所在的党小组中非常积极，甚至一度成为它的书记。但似乎是因为发生了一场与该小组主席斯塔文科夫（Stavenkov）有关的争论——他被指控在执勤时打瞌睡——朱可夫辞去了这一职务。在党小组开会讨论此事的时候，朱可夫竭力为斯塔文科夫辩护，说他是个不错的党务工作者，也是个不错的指挥员。朱可夫反对拟议中的把斯塔文科夫从培训班除名的做法，并认为倒是那个指控他的人应该被踢出党小组，并开除出党。除一人弃权外，朱可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

朱可夫还是培训学校卫生状况三人监督小组的成员和负责检查新学员资格的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一点来看，朱可夫的能力在当时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朱可夫在学校的表现还难称楷模。1920年7月底，他因违反纪律而被停了几天课。确切的原因到现在都还不清楚。

1920年8月，朱可夫在梁赞的培训结束了。他和其他120名学员被编入莫斯科第2步兵旅。该旅是个混成部队，有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8月底，该旅被派往北高加索的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参加与弗兰格尔男爵（Baron Wrangel）武装的作战，后者是以克里米亚为根

据地的反布尔什维克武装的首领。在参加了几次战斗之后，朱可夫被调往第14骑兵独立旅第1骑兵团，该团的任务是肃清新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Novozherelievskaya）附近弗兰格尔武装的残部。

到1920年10月时，朱可夫已晋升为排长。在该旅被派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暴动时，他又晋升为连长。那次暴动发展成了所谓的“坦波夫叛乱”（Tambov Revolt），领导者是曾经担任过地方民兵组织指挥官的A.S.安东诺夫（A.S.Antonov）。与安东诺夫武装的交锋，是朱可夫在俄国内战中经历过的最激烈的战斗。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之后，朱可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军奖章——“红旗勋章”。据嘉奖令说，朱可夫的连队“在1921年3月5日……顶住了敌军1500～2000名骑兵七个小时的猛攻，而后发动反击，经过六次白刃战，终于打垮了匪徒”。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一次白刃战中，一名安东诺夫匪徒用他的枪管被截短了的步枪向我射击，把我的马给打死了。马倒下时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动弹不得，要不是指导员诺切夫卡（Nochevka）来救我，接下来我就会被砍死。他手起刀落，杀死了那个匪徒，并抓住他的马的缰绳，扶我骑了上去。”[23]

到1921年夏天，坦波夫叛乱被镇压了下去，但朱可夫的部队要一直追剿安东诺夫残部到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朱可夫的伙伴中就有他年轻的妻子。据他的女儿叶拉说，朱可夫是在调到沃罗涅日时遇到她妈妈、乡村教师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Alexandra Dievna，出生于1900年）的。按照叶拉的说法，如果他们是在1920年结的婚，那它一定是一场旋风式的罗曼史，因为朱可夫是10月才到那儿的。“那些日子很难，”叶拉说，

> 为了追剿（安东诺夫）匪帮，这支小分队不停地调动。妈妈是小分队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指挥员的视线。有一次因为在准备业余文艺演出时出了点差错，他差点把她关禁闭。但居无定所的军队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幸福。我记得，他俩都喜欢回忆那段岁月：妈妈如何在轻型马车中颠簸数小时，她怎样把短的

> 军上衣改成内裤和把红军的白粗布衬衫改成内衣，她怎样把绳子变成“凉鞋”。[24]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切都轻描淡写。但那时除了讲述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之外，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个人的。一旦他加入红军，他的回忆就成了其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的历史记录。比如说，就连他父亲于1921年去世这件事，他都没想到要提一下。

献身于他认为作为一名苏维埃战士所应承担的社会主义神圣义务，这当然是朱可夫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但远远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哪怕是在压抑、刻板的苏维埃体制中，公民也是有个性和除公共生活之外的私人生活的。朱可夫也不例外。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辉煌背后，是驱使着他不断向前和从容面对失败的个人抱负以及强悍的性格。若是说我们从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故事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个人品质和性格特点，那就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但是，这些故事中的相当多的内容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艰难困苦面前的泰然自若；坚持学习和自我提高；作战勇敢；以及勇于承担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

从童年到成年，从乡村到城市，经历战争与革命，加入红军和共产党——从年轻的格奥尔吉的这些故事中，可以得到的典型的教益是：时事的混乱与动荡，为那些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而他们也抓住了机会。这种模式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还会不断地重复。

---

[1] 除非另作说明，本章有关朱可夫生平的信息都来自朱可夫回忆录的前三章。G.Zhukov，*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vol.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后文简称为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在本书中，从头至尾参考的都是1974年版朱可夫回忆录俄文修订本的1985年英译本。需要注意的是，朱可夫是在12月2日庆祝自己的生日的，而这也是许多苏联参考书中记载的日期。这是因为在朱可夫出生的时候，俄罗斯还在使用儒略历，而儒略历当时要比其他国家使用的公历晚12天。这两种历法之间的差距到20世纪时增加到13天。1918年，布尔什维克采用公历，而那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修改他们的生日。许多人像朱可夫一样，加了13天，而不是本来应该加的12

天。

[2]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ya，2005），p.9.

[3] M.Zhukova，*Marshal Zhukov—Moi Otets*（Moscow：Izdanie Sretenskogo Monastyriya，2005），p.25.还有一种说法给出的朱可夫的母亲嫁给康斯坦丁时的年龄是二十九岁。

[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9.

[5] Zhukova，M. *Marshal Zhukov—Moi Otets.* Moscow：Sretenskogo Monastyriya，2005，p.34.

[6] A.N.Buchin，*170000 Kilometrov s G.Zhukovym*（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4），pp.29-30.

[7] 参见他女儿叶拉的回忆录《父亲》，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30。

[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24.

[9] 转引自A.Axell，*Marshal Zhukov*：*The Man Who Beat Hitler*（London：Pearson，2003），p.2。

[10] E.Zhukova，“Interesy Ottsa，”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pp.47-48.对保存下来的朱可夫的藏书以及他对它们的注释的分析，可见于V.S.Astrakhanskii，“Biblioteka G.K.Zhukova，”*Arkhivno-Informatsionnyi Bulleten*’，no.13，1996。

[11]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a Moskvy，2005），pp.21-22.

[12]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11th ed.，vol.1（Moscow：APN，1992），p.64（此后略写为Zhukov，G..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10th and 11th eds.，3 vols.Moscow：APN，1992）。本书从头至尾都是以朱可夫回忆录俄文第十一版为参考。这是朱可夫回忆录最完整的版本。在苏联时代，这段对话被删掉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即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战争并试图推翻沙皇政府，而朱可夫的这番话表明，他此时的政治观点是爱国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后来朱可夫在生前一直坚持认为，他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打了四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内战、1939年在中蒙边境与日本的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

[1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43.

[1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49.

[15] RGVA，F.41107，Op.1，D.86，L.5.

[1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52.

[17] M.von Hagen，*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Socialist State*，*1917-193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39.

[18] Daines，V. *Zhukov*. 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28.

[19] 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p.18-19.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1919年3月1日他入党的时候，并不存在入党预备期。这种说法不准确，年份搞错了。

[20] B.V.Sokolov，*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Moscow：Ast，2003），p.44.

[21] “指挥员”这个词与苏联的某些历史时期相关，而且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英文中，它与更职业化的说法“指挥官”（commander）是同一个词，所以在本书中会视具体的情况而作不同的翻译。——译者注

[22] 这些文件可见于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24-31。

[2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85-87.

[24] E.Zhukova，“Otets，”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p.30.

3 军人生活：一名红军指挥员所受的教育，1922～1938

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红军大部也随即复员。到20年代中期，红军兵力已从500万缩减到50万左右。在留在部队的那些人当中，也包括朱可夫。对于自己为什么决定要继续服役，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做出解释，但他特意提到了1921年2月苏共要求所有党员留在军队的指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指示，但它们对于阻止党员的大批退伍几乎不起作用。朱可夫之所以留在军队，是因为军队适合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留下来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考虑到自己的意向和能力，才选择了献身军队工作”。[1]

内战结束时，朱可夫虽然还只是个低级指挥官，但他完全有条件在红军中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前程。他做过沙皇军队的军士，又是红军的低级指挥官，而且因为作战勇敢，两支军队都给他颁发过勋章。相对来说，他还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参加过红军骑兵指挥员的培训。特别是，朱可夫是党员，这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中可是事业进步的最重要的资格。

20世纪20～30年代，朱可夫在红军中的崛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个稳步前进的过程。他在1922年起步时是个连长，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升到了团级和旅级指挥职务。他的第一个高级指挥职务是在1931年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接着便是师级和军级指挥职务。1938年，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具体负责训练。直到1939年5月朱可夫被派往远东调查苏蒙军队在与日军的边境冲突中失利的情况时，他的名字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共产党的军队

朱可夫在其中干出一番事业的那个组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高压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关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现在的典型描述是：它是某种形式的“军事社会主义”，是1917年革命的产物，同样也是俄国内战的产物。[2]

内战期间有无数的人被杀死或饿死。为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学会了冷酷无情；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使用无论何种程度的暴力去保卫自己的政权。政治动员的方式由说服变成了强制。布尔什维克党（它在1918年更名为共产党）的管理变得越来越等级分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1919～1920年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差点就失败了，当时它们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据点遭到反革命白军的团团围困。白军在军事上得到了英、法、日、美这些外国政府的援助，因为它们害怕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传染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内战是一场生死搏斗，它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布尔什维克希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终会帮自己一把，但当这种帮助并未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至少暂时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内战是赢了，但布尔什维克仍然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进攻有可能与国内的颠覆活动联手并构成致命的威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整个间隙期，苏维埃政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半战争动员的状态。在这种紧张气氛下，红军被视为对保卫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盾与剑。

红军——其正式名称是“工农红军”——也被视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是遵守纪律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典范，它将把全体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应征入伍的人来说，在红军中服役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而且也会

把人变得冷酷无情的经历。对于朱可夫那样的职业军官，这种经历的意义就比较积极了。他们受人尊敬，津贴和待遇比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要好很多。现政权给予红军的崇高地位也强化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的忠诚感。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实施快速现代化计划，红军对现政权变得越发重要了。快速现代化计划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1928年，苏联人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五年计划的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工业产量，并把国家从以农民为主的社会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工业产量增加了850%。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要低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当时的工业化规模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建造了成千上万个工厂，修筑了许多新的水坝、运河、公路和铁路，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由于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工业化的努力大多集中于国防工业。这就像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1931年2月的一次有名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就被它们彻底打败”。[3]

其次是苏联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上主张农业部门要由国家控制，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它们才开始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加入集体农庄。到1937年时，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90%。但是，来自农民的阻力相当大，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于集体化浪潮所导致的危机，共产党政权采取的办法是大规模的处决、逮捕和驱逐，结果造成了数百万农民的死亡。特别是1932～1933年，集体化过程中的野蛮行为再加上天灾，在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和乌克兰引发了严重的饥荒。高压政治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苏共以及国家安全机构，但红军也有份，尽管现在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朱可夫当时也直接参与了集体化运动。

在朱可夫决定继续服役的时候，红军的地位还远远没有后来那么高。在内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复员工作不仅破坏了红军的正常运转，也削弱了它的士气。党内还有人主张，要废除常备军，依靠带有业余性质的自卫队——这也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的想法。对此，红军的各位领导人表示，因为国内外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必须保留专门的常备军。

党内争论的结果是，在两种立场之间采取折中的办法：除了一些地方师之外——这些地方师主要由每年服役数月的兼职军人组成——建立一支50万人左右的正规部队。正规部队集中在边境地区，而地方师通常驻扎在比较安全的内地。但即便是所谓的正规部队，入伍者大多也只服役两年时间。红军中由职业军人构成的核心依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地方师则几乎是清一色的步兵。在红军的11个骑兵师和8个骑兵旅中，地方师只有1个。骑兵部队在人员配备、物资供应和技术效率方面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备战水平，这就使朱可夫成了内战后经过整编的红军中的精英。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之所以会涌现出那么多骑兵出身的高级军官，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内战后红军改革的关键人物是它的总参谋长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V.Frunze），他同时还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部长）。伏龙芝改组了红军的指挥结构，取消了内战中形成的军政双重领导制——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委员对指挥决定拥有否决权。1924年，伏龙芝开始采取一长制，从而取消了政治委员在军事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

朱可夫当时是在伏龙芝手下的莫斯科第1骑兵师服役。他在谈起内战后伏龙芝在重建红军方面的功绩时，就像苏联的许多军事回忆录的作者一样，满怀爱戴与敬佩。1925年10月，由于胃部手术失败，伏龙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在新红军中确立的职业精神却保留了下来。伏龙

芝信奉铁的纪律和高强度的训练，以及对军官除了要进行政治教育之外还要进行职业教育，这些都在日后被朱可夫融入了自己的指挥风格之中。

伏龙芝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热情，不过，在军事事务尤其是战略思想上，他也并不保守，而是有着创新思维。在他的帮助下，经过整编的红军对军事战略、战术及技术进行了热烈的辩论。由于红军对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来说极为重要，所以在独立思考日益受到压制，就连最温和的有关党的路线的讨论都被绝对禁止的苏维埃体制下，它还能被允许保持一种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活跃的氛围。

之所以会出现正统性与创造性兼而有之的这种奇怪局面，原因之一是，它符合约瑟夫·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斯大林在1922年成了苏共的总书记，并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绝对主宰。1924年列宁去世的时候，作为继承人的斯大林开始显露峥嵘，并通过一连串的党内斗争，击败了自己的政治对手，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在成为党及党所统治的国家的领导者的道路上，一直顺风顺水。斯大林的领导风格有个特点：为了实现规定的目标，他一贯主张创新，只要这些新的东西不去质疑党的权力或他自己的独裁地位就行。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愈演愈烈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信徒——尽管比较温和——朱可夫在这种规定好的、有时还具有建设性的框架中工作，是没有任何困难的。[4]

团长

1922年6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第38骑兵团中的连长，这意味着他要负责大约100个士兵。1923年3月，他被提升为第7萨玛拉骑兵师第40团副团长。7月，他被临时、接着又正式任命为该师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团长。朱可夫在二十六岁时的级别就相当于西方军队的陆军中校了。此后七年他一直都是团长。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这一时期对他的军

事教育影响是最大的：

> 指挥一个团一直被视为掌握战争艺术最重要的阶段。团是基本的作战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所有地面部队的配合……团长必须对自己的部队，以及作战中通常配属该团的支援部队非常熟悉。他必须正确选择主要的作战方向，并相应地集中自己的主要兵力……一个团长，如能熟练掌握管理一个团的方法，并能使之始终处于战斗准备状态，那么，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在各级指挥岗位上，都会是优秀的军事领导者。[5]

当朱可夫接管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的时候，该团的情况相当糟糕：缺乏战斗准备，军官们不清楚在和平时期如何开展自己的工作。[6] 朱可夫很快就使局面有了改观。1923年，在上级的工作检查中，他的成绩得到了肯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热爱且熟悉骑兵工作。能使自己很快适应环境。具有很强的纪律性。短期内将他的团提升到最高水平。任命他为团长是完全正确的。"[7]

从朱可夫任团长时的命令和报告来看，他成功的关键是，对于和训练、纪律及政治指导有关的细节一丝不苟。[8] 据20世纪20年代曾在他手下服役的A.L.克罗尼克（A.L.Kronik）说，朱可夫是个率直而严格的指挥员，在个人交往中不苟言笑，尤其是和他的部下，他从来不喜欢和自己的手下搞得太熟。朱可夫的态度，克罗尼克特别指出，"表达了他对自己之于下属的责任的理解，他认为自己不但是他们的指挥员，还是他们的导师"。[9]

1924年10月，师长决定派朱可夫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培训的目的是让高级指挥员在军事和政治技能方面接受全面的教育，好让他们在返回部队后再反过来教给自己的下属。"课程安排得满满的，"朱可夫回忆说，"除了上课之外，课余时间我们还得进行大量的研究。"[10]

在朱可夫的同学当中，有两位未来的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

索夫斯基和伊万·巴格拉米扬（Ivan K.Bagramyan）。他们两个注定要在朱可夫的生活和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罗科索夫斯基出生于1896年，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是在华沙附近长大的，所以他的俄语带有波兰口音。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加入了沙皇军队，在骑兵部队中表现优异，到1917年时已晋升为低级指挥官。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罗科索夫斯基加入了作为红军前身的赤卫队。在俄国内战期间，罗科索夫斯基负过两次伤，获得了两枚“红旗勋章”。到内战结束的时候，他作为优秀的骑兵指挥员已是大名鼎鼎。他的个性及领导风格与朱可夫的恰好相反。作为指挥官，朱可夫武断、毫不妥协〔就像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将军一样〕；罗科索夫斯基则文质彬彬，比较谦和（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喜欢用哄而不是强迫的方式，让自己的士兵做到最好。二战期间，他俩由于个性不同，发生过几次激烈的冲突。

伊万·巴格拉米扬是亚美尼亚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也是红军中能成为元帅的为数很少的非斯拉夫人。他生于1897年，一战时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后来又成为在俄国革命和内战的乱世中兴起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军官。巴格拉米扬于1920年加入红军，但直到1939年才成为共产党员。像罗科索夫斯基一样，他也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被安排在总参军事学院教学。1940年，他时来运转，走上了作战指挥岗位，并获得了高级军衔。当时他和朱可夫一起在基辅特别军区服役。

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骑兵学校的那个班是这样说的：“我们年轻，充满朝气，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一个紧密的团队。我们学习的劲头都很大，尤其是朱可夫，他完全沉浸在征服军事科学的奥秘之中。每当我们顺便去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总是趴在铺在地上的地图上仔细研究。那时候对他来说，责任高于一切。”[11] 巴格拉米扬

对朱可夫更是赞美有加：“（他）在我们这批学员中是最有天赋的。那时候他表现出的，不仅是超群的意志力，还有特别具有原创性的思维。在骑兵战术方面，朱可夫不止一次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他的决定产生的争议总是最大，但他通常都能用有力的逻辑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2] 回忆肯定会受到事后看法的影响，尽管如此，朱可夫当时是个专心致志的学员和年轻有为的指挥官，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培训课程包括各种马上的竞赛项目：跳越、赛马、障碍赛、竞速赛、马刀和长矛的使用。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都参加过这些竞赛。1925年夏天，学习转入野外战术训练，参加培训的学员最后要强行军，抵达沃尔霍夫河并带着自己的马一起游过去。“与马一道泅渡很不容易，”朱可夫回忆说，“单是着装游泳还不够，还得控制住游泳的马。”[13]

培训结束后，朱可夫和其他两位同事决定骑马返回自己部队的驻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而963千米也将是集体骑乘的世界纪录。这段路程只花了七天时间，而且朱可夫的马还瘸了，所以他只好不时地下马牵着它走。他们在到达明斯克的时候，受到了成群结队的人们的热烈欢迎，统帅部也进行了表彰，并准予短期休假以示鼓励。朱可夫回到斯特列尔科夫卡看望了他的母亲和姐姐（此时他父亲已经去世）。在返回部队的时候，他得知自己所在的团将与另一个团合并，并由他指挥这个新扩编的团——梅列克斯—普加切夫斯克第39骑兵团，它由原来的41团和42团组成。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该团的政治委员。朱可夫同时担任梅列克斯—普加切夫斯克团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这在第7萨玛拉师尚属首例，但与伏龙芝改革是一致的。这说明，无论是从军事能力还是从对党的忠诚来说，上级对他都是信任的。[14]

除了要搞好军事与政治的平衡之外，朱可夫还要处理好他个人的感

情纠葛。当第7萨玛拉师于1923年秋天到明斯克换防的时候，朱可夫与1919年年底时他在萨拉托夫养伤期间结识的那位年轻的女学生玛丽亚·沃尔霍娃再续前缘。在此期间，他还维系着与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的婚姻，并在1928年生下了他的大女儿叶拉。六个月后，也就是在1929年6月，玛丽亚生下了朱可夫的第二个女儿——马加丽塔。据马加丽塔说，朱可夫对她十分宠爱，亲自为她办理了出生登记。她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那红润的双颊和蓝色的眼睛，让他想起了一种花。不过，马加丽塔是由继父养大的。20世纪30年代，朱可夫与她和她的母亲失去了联系，直到二战中她的继父在行动中牺牲了，他们才又恢复了联系。[15]

1929年年底，朱可夫被送到莫斯科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高级指挥员的深造。朱可夫再次遇到了一群非常优秀的、注定会在卫国战争中身居要职的同学，包括在列宁格勒被围时指挥苏军的L.A.戈沃罗夫（L.A.Govorov）元帅和苏军著名坦克指挥官F.I.托尔布欣（F.I.Tolbukhin）元帅。这次培训是为了培养师及师以上的指挥员，重点主要放在当代条件下战役实施的理论与实践。1930年春天时的朱可夫结业报告，对这位三十三岁的指挥员的能力做了敏锐的评估：对多兵种联合战术的了解完全符合要求，参加军事演习和小组作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对野战勤务条例的熟悉程度符合要求；军事行动的战术决定明确而果断，值得称道；如继续进步，将有能力指导团、师两级作战的战术准备工作。朱可夫唯一学得不好的科目是参谋工作，它得到的评语是“勉强”符合要求。报告的结论是：“从气质和性格特点来看，他显然是一个前线指挥员（不太适合参谋工作）。”[16]

大纵深战役理论

红军和其他军队一样，也很注意吸收一战的经验和教训，注意评估现代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尤其是坦克和飞机对于未来战争的影响。红军

还需要吸收俄国内战的经验，因为那次冲突和以静态的阵地战为主的一战很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在数百英里的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红军的领导层认为，未来战争将会是机械化的战争，是坦克、大炮、飞机、摩托化步兵和空降部队的联合作战，以快速突入敌方领土和防线的纵深地带。

到1930年年初，红军制定并采取了“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的双重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由各兵种组成的连续的攻击波将突入敌方的整个防御纵深，然后利用该突破口，从背后包围敌军。战争将包括一连串这样的军事行动，并运用苏联人所谓的“作战艺术”，即对“联合兵种”（即武装力量的不同分支）的精细管理，开展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该理论与大约同一时期德国人提出的闪电战概念很相似，后者是利用密集的坦克纵队在狭窄锋面上取得突破，然后从背后包围敌军。不过，苏联人还不像德国人那样以坦克为核心，而是强调多兵种的联合作战；除了独立作战之外，坦克还可以在联合作战中发挥支援作用。与德国人相比，他们考虑得比较多的是坦克在作战中与炮兵、步兵、骑兵还有空军的协同性和同步性。

按照这一新的理论，红军在1932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军：它有两个编队，每个编队都有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并有步兵、炮兵和空军小分队的支援。万一发生战争，机械化部队将成为陆军的核心打击力量。到1936年时，苏军已经拥有4个机械化军、6个机械化独立旅和4个坦克独立团。但是，在实施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方面，一些实际的困难很快就暴露出来。在大纵深战役中，怎样为参加攻击的坦克补充燃料和给养？行动缓慢的步兵和炮兵如何跟上行动迅速的机械化部队？中央指挥部（在野外通信还不是很先进的时代）怎样为在敌方腹地行动的部队提供指导？至少是理论上的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是：让坦克放慢速度，好让它们的补给能够跟得上；用摩托化来加快步兵和炮兵的行动速度；对各联合兵种进行更加严格而集中的控制与协调。[17]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期，红军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方面的关键人物是伏龙芝的继任者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Tukhachevsky），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总参谋长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副国防人民委员。[18] 朱可夫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是在1921年镇压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时候。他对图哈切夫斯基非常钦佩："他通晓军事科学的各个方面。他作为一个聪明而博学的职业军人，对于战术战略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对于不同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因而能够创造性地处理各种问题。……图哈切夫斯基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家，是红军优秀军人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19]

由于相对来说级别较低，而且对理论或参谋工作没有多大兴趣，朱可夫在确立红军的军事思想方面看不出起到了什么作用，但他确实领会了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的精神和方法。事实证明，这对他后来作为一名将军的实践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后来特别强调1936年的《野战勤务临时条例》的影响。按照它所制定的原则，红军是作为一支以进攻为主的军队来解决战役和作战问题的；它将调动多个兵种，联合攻击敌方的纵深：

> 使用坦克、大炮、航空兵以及搭乘坦克的步兵发动大规模突袭，作为现代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使得向敌方阵地的整个纵深同时发起进攻成为可能，目的是分割和彻底包围并歼灭敌人。[20]

不过，到这些条例颁布的时候，红军内部对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理论的批评已越来越多。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对红军作战思想的改进与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和由保守派、君主主义者及法西斯分子结成的同盟，发动了武装叛乱，反对由选举产生的共和派政府。2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参加了西班牙内战，而且苏联也是共和派政府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提供了大量的坦克。西班牙内战的两个主要的教训似乎是：首先，坦克经不住大炮和反坦克武器的打击，所以，要是正面交锋，坦克部队

会损失惨重；其次，如果没有步兵的紧密支援，坦克难以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使苏联的军事思想更加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重要性（它反对坦克独立作战）和坦克对步兵的支援作用。1939年11月，苏联决定解散机械化军并将坦克编成较小的作战单位分散到整个武装力量之中，原因之一就是西班牙内战的经验。

冉冉升起的明星

1930年春天，当朱可夫结束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培训时，他还是个不知名的中级骑兵指挥官，只不过正处在上升期。1930年5月17日，未来的元帅和国防人民委员、当时的骑兵军军长S.K.铁木辛哥（S.K.Timoshenko）写道，在之前的七年，朱可夫把自己团的士气和备战工作都提升到最高水平。[21] 朱可夫在当月得到晋升，指挥第7萨玛拉师第2骑兵旅，其中包括第40团和他以前所在的39团。此时，第7师师长是朱可夫的老同学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被任命为旅长想必和他也有关系。从罗科索夫斯基1930年11月给这位新旅长写的鉴定中就可以看出朱可夫此时的个性和业务能力：

> 坚定，果断。有主动精神并知道怎样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一贯严格要求。在个人交往中有点冷漠，不够婉转。明显有点固执。非常自负。在军事问题上准备得很充分。拥有大量的实际指挥经验。热爱军队工作并总是追求完美。可以看出，他的能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有威信。这一年，他的旅在操练和步枪的战斗训练方面，以及整个旅的战术和作战方面，都收到重大的成效。熟悉并关心动员工作。对节约使用武器装备以及马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而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政治方面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他安排在这一岗位上是完全正确的。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他可以成为师长或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员。不能安排他从事参谋和教学工作——他讨厌那样的工作。[22]

此后不久，即1931年2月，朱可夫又得到晋升，这次是骑兵监察部助理。[23] 骑兵监察部的总部设在莫斯科，朱可夫在那里的工作是负责军事训练。他还被选为自己所在的党支部的书记。监察部的工作与亚历

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xander M.Vasilevsky）所在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作训部有密切的联系。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和他发展起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当时华西列夫斯基是总参谋长，朱可夫是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

华西列夫斯基出生于1895年。因为他的父亲是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所以预定要成为神职人员。1914年，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他在神学院的学习。华西列夫斯基与红军精英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样，他出身于步兵而不是骑兵。一战期间，他在西南战线作战并升为上尉。加入红军以后，他在内战结束时成了副团长。由于受过教育，华西列夫斯基倾向于被安排去从事教学、训练和参谋工作。但由于其“资产阶级”背景，他直到1931年才成为预备党员，1938年才转为正式党员。

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朱可夫的“军事才能一年比一年突出。我记得在他指挥骑兵师和骑兵军以及成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他的能力在自己的同志中间，得到了一致好评”。[24]

1931年10月，朱可夫在监察部的上司、俄国内战时期第1骑兵集团军的传奇司令谢苗·布琼尼（Semyon Budenny），在给朱可夫的鉴定中得出的结论，与罗科索夫斯基的结论非常相似。朱可夫是“一个有着强大的意志力的同志，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下属要求非常严格……没有必要那么严厉和粗暴”。不过，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是个全面的好同志，布琼尼最后说，能指挥一个师，甚至主管一个骑兵学校。[25]

朱可夫在指挥中往往过于严厉，他在多年之后终于承认了这个错误。“过去有人说我对部属要求太严，但我当时认为，这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指挥员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承认自己有时候要求太严了，对自己下属的过错不够冷静和宽容……对于他们的工作或行为，我见不得任何的懈怠。他们有些人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我呢，当时对人性的弱点或许不够宽容。”[26]

朱可夫在骑兵监察部的工作涉及安排野战部队和参谋机构的演习、组织军演、召开作训军官的会议、交流情况和经验。他还参与制定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红军骑兵勤务条例》，当时正在把机械化部队以及炮兵和坦克部队并入骑兵部队。[27]

在骑兵监察部工作了两年之后，1933年3月，朱可夫被安排去指挥驻扎在白俄罗斯斯卢茨克（Slutsk）的第4（伏罗希洛夫）骑兵师。朱可夫在第4师（在它从第3骑兵军划归第6哥萨克军之后于1936年更名为第4顿河哥萨克师）干了四年。在此期间，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师成为红军中最优秀的集体”。他麾下有第19、20、21、23骑兵团，以及第4骑炮团和第4机械化团。据朱可夫说，该师在他接手时的情况很差，因为在它从列宁格勒调到白俄罗斯之后，前十八个月的时间一直忙于给自己修建营房和马厩。“结果，一个训练有素的师变成了一群不称职的劳动力。更糟糕的是，建材短缺和多雨天气等不利因素，使得冬季的防寒工作没能够及时做好，影响了士气和斗志。纪律松弛了，马匹生病的比例也增加了。”[28] 朱可夫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反复的训练和演习，同时狠抓纪律。到1935年的时候，朱可夫已经扭转了该师的局面，他和自己的部队因此都获得了“列宁勋章”。该师驻地在白俄罗斯军区，这就意味着它参加了红军为准备机械化战争和贯彻大纵深战役及大纵深作战思想而举行的所有重大的演习。因此，朱可夫对于自己的第4机械化团及其坦克的表现十分关注。

曾任第4骑兵师参谋长的L.F.米努克（L.F.Minuk）回忆说，朱可夫是个精力充沛、有组织有纪律的指挥员，他对细节一丝不苟，对自己和下属同样要求严格。米努克完全认可朱可夫的指挥风格，因为它效果很好，而且就应该那样，因为第4师驻扎在边境地区，一旦发生战争，遇到敌人的进攻，它就会首当其冲。“如果一个指挥员在我面前都控制不住自己，犹豫不决，那在战斗中我们还能指望他什么？”这话朱可夫曾多次对米努克说过。但朱可夫不单是批评自己的指挥员，米努克说，他

还纠正他们的错误，并照顾他们个人的需要——例如，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和健康问题。工作之外，米努克回忆说，对朱可夫来说不存在官阶和等级，他可以变得很随和："在他的身上，我从来没有发现任何自负、傲慢或自大，但是在与下属的工作关系和非工作关系之间，是有明显的界限的。"[29]

对朱可夫的回忆往往要么是赞美，要么是指责，而在这里，米努克站在哪边，是显而易见的。但米努克的回忆与这样一幅正在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一致的：一个强硬但很受人尊敬的指挥官，他能让人既爱又怕。最重要的是，这个人满怀成功的愿望。

朱可夫的回忆录很少提及自己的个人生活，写的几乎全都是他的军队生涯。我们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私生活的了解，是来自其长女叶拉的回忆。显然，朱可夫在家中就和他在工作中一样讲究秩序，他不喜欢迟到或不守信用。无论是虚伪还是不诚实，他在家中都不会容忍。在叶拉的记忆中，她的父亲总是在读书和研究。这样的说法得到了她的妹妹——1937年出生于斯卢茨克的埃拉的证实。她说，书籍在朱可夫的家中总是占据着中心位置。叶拉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她们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她对朱可夫忠贞不渝，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助手。例如，结婚头几年，她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语水平。亚历山德拉为人随和，交朋友——包括与朱可夫那些同事们的妻子——比较容易。朱可夫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家人，就像她们也深爱着他一样，这一点叶拉和埃拉都深信不疑。[30] 即便考虑到由于子女之爱而难免会有的一些夸大的地方，朱可夫在红军中的事业有成显然也离不开他家人的支持。两位女儿对他的回忆还表明，朱可夫就像许多军人一样——实际上，男人一般都这样——也把自己的情感能量留着用在工作中。

1937年7月，朱可夫又升了一级，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第3骑兵军军长。接着，在1938年3月，他被调往第6哥萨克军——他对这个安排

非常高兴，因为他先前领导的骑兵第4师就在这个军。作为军长，朱可夫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骑兵用于机械化军队的战斗中以及在作战和战略上的问题。他还通宵达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调说，“尤其是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31] 1938年6月，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专门负责骑兵部队和坦克旅的训练工作。

朱可夫在20世纪30年代升迁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那是因为形势出现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新变化：一是苏联武装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扩军的幅度非常大；二是斯大林在1937～1938年对红军的大清洗。

从1932年到1939年，苏联的国防开支从占预算的10%增长到25%。20世纪30年代初，红军的数量增加到将近100万；到30年代末，编制人数达到400多万。红军的扩编基本上是通过把地方的预备役师转为正规师和把服役时间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来实现的。从1932年到1937年，国防预算的绝对增长量是340%；然后在1937年至1940年又翻了一番。到1939年的时候，苏联每年生产的飞机有10000多架，坦克近3000辆，火炮17000多门，机枪114000多挺。此外，军官的薪水和待遇也有了大幅改善。1939年时，朱可夫的军长年薪是2000卢布，这相当于1934年军长年薪的三倍。[32]

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的起因，要追溯到1927年的战争恐慌。当时的苏联人相信，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策划联手发动进攻。苏联人在检查自己的防御工事时，发现它们不堪一击。那次检查恰逢苏联开始实施自己的第一个工业化五年计划，该计划有望使红军获得加强其军事实力所需的技术资源。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这加重了人们对于苏联国防状况的担忧。苏联人在中国有许多利益，特别是边境安全，而且他们担心，日本人的进攻可能会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地区冲突，从而把自己卷进去。另外，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上台，而纳粹政

治主张的核心就是反共反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要在俄罗斯谋求日耳曼民族的“生存空间”。为了应对这些严峻的威胁，苏联人在这个十年余下的时间里，试图建立一个由反对日本尤其是反对德国威胁的各国组成的国际同盟。但是，要保卫自身的安全，重整军备之后的红军才是苏联人的根本依靠。

武装力量的发展为朱可夫这样的有才能的职业军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业机遇。在红军中服役的地位也提高了，这尤其是对于高级指挥官来说。1935年9月，红军基层和中层又开始采取正式的军衔——中尉、上尉、大尉、少校和上校。不过，那时还没有将军衔，旅、军一级指挥官的名称依旧是按照他们的职务来定的。虽然红军中没有将军，但元帅倒是有的。1935年11月，这一头衔被授予K.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图哈切夫斯基、总参谋长布琼尼、A.I.叶戈罗夫（A.I.Yegorov）和远东集团军司令V.K.布柳赫尔（V.K.Blukher）。

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对红军的大清洗是影响朱可夫职业生涯的第二点新变化。这并不是第一次对红军的清洗，20世纪的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就已经搞过几次了，当时清洗的对象是前沙皇军队的军官和那些同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人——后者是斯大林的主要竞争对手，从1929年开始流亡国外。不过，在1937年的清洗中，苏军统帅部第一次被卷了进去。1937年5月开始的清洗惊心动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另外7名高级军官遭到逮捕，罪名是叛国和勾结纳粹德国、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6月，所有被告都受到秘密审判、被判有罪并执行枪决。判决书公布在苏联媒体上。审判后不到十天，又有另外980名军官被捕。在大清洗中，从武装力量中开除的军官有34000多名，这其中也包括罗科索夫斯基，他于1937年8月遭到逮捕和监禁。最后虽然有大约11500名军官恢复了名誉（罗科索夫斯基也在其中），但大多数人不是

被枪毙了就是死在了牢里。死者中包括3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16名将官、15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和71名中尉。不过，军官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政治委员，他们中有数千人死于清洗。作为武装力量中政治正确的维护者，在军官们的政治忠诚受到怀疑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成为替罪羊。而且，政治委员也是许多职业军官憎恶的对象，所以有些人乘机告发他们。

没有人真正知道清洗的确切起因，但是，斯大林似乎是真的以为红军中有人对他构成了威胁，尽管现在并没有发现一点点不忠或图谋不轨的证据。二战之后，斯大林对军队进行清洗时的所有受害者都得到了平反，其中有许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朱可夫主管国防部的时候。[33]

武装力量并不是斯大林发泄其愤怒与偏执的唯一对象。在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y Kirov）被暗杀之后，许多党员遭到逮捕，他们被怀疑参与了杀害苏联领导人的阴谋。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前领导人纷纷受到政治公审，对他们的指控是：特务、破坏分子和阴谋反对斯大林。受到缺席审判的首席被告是托洛茨基。1940年，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的特工人员暗杀。接下来就是以斯大林的安全首脑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的名字命名的所谓“叶若夫时代”——疯狂追查莫须有的“内部敌人”，导致大批党政官员被捕和被处决。这一连串的事件，就是人们所说的“大恐怖”。在这段时期，政治高压和官方许可的暴力活动搞得人心惶惶，数百万人被捕，数十万人被处死，而且基本上都是在1937～1938年。在这种背景下，对军队的清洗相对来说还算是克制的；与其他苏联人民的遭遇相比，除了对统帅部的打击之外，这算是比较轻的。[34]

这些事件对朱可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在其于苏联时代出版的回忆录中，朱可夫强调说，1937年“那年的没有事实依据的逮捕，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律。杰出的军队领导人遭到逮捕，这自然影响到我们武装力

量的发展和备战”。[35] 在其死后出版的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他对斯大林的清洗谈得比较多。其中，他指名道姓地提到了自己直接知道的一些非常有名的受害者，提到自己因为与他们有联系而遭到怀疑。他还讲述了他怎样为手下的一名在党的会议上遭到攻击的师长出面说话，并取得了成功。在朱可夫对大清洗的叙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说他怎样在第6骑兵军的党委会议上受到指控，罪名是态度严厉、粗暴，并与“人民的敌人”有着可疑的良好关系。朱可夫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扭转了会议的势头，因而逃脱了被审查和可能遭受的被开除党籍的命运——要是那样，接下来就要被逮捕了。[36]

据叶拉和埃拉说，她们的父亲当时预计到随时会遭到逮捕，所以就准备了一只包袱，以防万一。在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朱可夫告诉苏联作家兼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 在我的一生中，1937～1938年的那段时间最难熬。有关我的那些必然是灾难性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显然，它们已经很充分了，某个地方有人带着装有这些文件的公文包正在匆匆奔走。总之，事情是这样的：早晚我会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然后，在这所有的一切之后，突然来了电话，要把我调到哈拉哈河！……我高高兴兴地去了那里。[37]

问题在于，朱可夫对事情经过的说法现在还得不到文献证据的支持，而且只有一位幸存的见证人，那就是他自己。朱可夫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差点儿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现在看来似乎是有意为之，这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省得别人说他是大清洗的受益者，尽管他被提升为第3军和此后第6军的军长恰好是因为他的前任们遭到了清洗。另外，如果朱可夫的行为实际上就像他在自己的后苏联时代版本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毫无疑问，他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只有那些规规矩矩、不招惹任何是非的人——应该说这在武装力量中是绝大多数——才能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并不是说清洗没有给朱可夫带来烦恼，或者没让他感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惶恐。但现在很难回避这样的结论，即当

时朱可夫与大多数苏联公民一样，不想招惹麻烦，所以就把自己的怀疑憋在心里，并这样来安慰自己：斯大林一定清楚他自己在干什么。[38]

朱可夫声称他只是因为在1939年5月被派往哈拉哈河才逃过一劫，这种说法同样也有问题。要是对他的忠诚有怀疑，苏联领导层为什么还要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呢？再说了，朱可夫被派往哈拉哈河，不是去打仗，而是去调查在中蒙边界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期间当地军事领导工作的失败之处的。实际上，他是被派往远东搞清洗的。苏维埃体制的严厉性和压制性又一次帮了朱可夫的忙。

---

[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75.

[2] 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红军进行的研究有：J.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 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M.von Hagen，*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Socialist State*，*1917-1930*（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R.R.Reese，*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R.R.Reese，*Red Command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Army Officer Corps*，*1918-1991*（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5）；S.W.Stoecker，*Forging Stalin’s Army*：*Marshal Tukhachevsky an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Boulder，Colo.：Westview，1998）；W.J.Spahr，*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Stress*（Novato，Calif.：Presidio，1997）；L.Samuelson，*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1925-1941*（London：Palgrave，2000）；D.R.Stone，*Hammer and Rifle*：*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26-1933*（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0）。

[3] J.Stalin，*Leninism*（London：Allen & Unwin，1942），p.366.

[4] 2010年4月，我在莫斯科采访朱可夫的女儿叶拉时，她说，在朱可夫的家中，对斯大林既不崇拜，也不贬低。

[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 p.97.

[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 p.98.

[7]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 （Moscow：Svyatigor，2006），p.22.

[8] 这些文件有许多可见于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5），p.44ff。

[9] A.L.Kronik，“Molodost’ Marshala，” in I.G.Aleksandrov ed.，*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Moscow：APN，1988），p.66.

[10]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07.

[11]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84；关于罗科索夫斯基：R.Woff，“Rokossovsky，”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2001）.

[12] I.K.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 （Moscow：Voenizdat，1988），p.7；关于巴格拉米扬：G.Jukes，“Bagramyan，” in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

[1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08.

[1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09-113.

[15]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 （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这本书中提到的马斯蒂基纳对朱可夫女儿等人的采访，最初发表于1996年6月7日、1996年8月23日、1996年8月30日和1996年10月4日的《共青团真理报》。

[16] 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 p.33.

[17]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状况：M.R.Habeck，*Storm of Steel*：*The Development of Armou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19-1939*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S.Naveh，*In Pursuit of Military Excellence*：*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Theory* （London：Frank Cass，1997）；H.Fast Scott and W.F.Scott，eds.，*The Soviet Art of War* （Boulder，Colo.：West-view，1982）；以及S.J.Main，“The Red Army and the Future War in Europe，1925-1940，” in S.Pons and A.Romano，eds.，*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41-1945* （Milan：Feltrinelli，2000）。

[18]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S.Naveh，“Tukhachevsky，” in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

[1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37-139.

[20] Erickson，J. *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 ，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p.800.

[21] 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 ，p.22.

[22]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 （Moscow：Glavarkhiva Moskvy，2005），pp.48-49.

[23] 在20世纪80年代有报道说，罗科索夫斯基在与两位苏联记者的私下交谈中曾经表示，朱可夫当时是明升暗降，被免去了旅长职务，因为他的下属反映他过于严厉和粗暴（N.G.Pavlenko，“Razmyshleniya o Sud’be Polkovodts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10，1988，p.17）.罗科索夫斯基的这次谈话据说是在1966年夏天，当时的朱可夫在赫鲁晓夫时代被孤立后还没有完全平反。他们两人的关系也还处于低潮，因为朱可夫认为罗科索夫斯基与赫鲁晓夫合伙贬低他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

[24] 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p.485-486.关于华西列夫斯基：Jukes，“Vasilevsky，” in 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

[25]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74-76.

[2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19.

[2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36-139.

[2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41，162.

[29] L.F.Minuk，“Komandir Divizii，”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vol.1（Moscow：APN，1998），pp.100-115。

[30] 他的两位女儿的回忆除了可见于前面所参考的资料之外，还可参见下面这则对她们的采访。“Papa Chetverok ne Lyubil.Dnevnik Smotrel Pridirchivo，” *Izvestiya* ，December 1，2006.感谢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教授为我提供了文章的副本。

[3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p.171-174.

[32] M.Fainsod，*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479.

[33] 关于斯大林战前对红军的清洗，参见R.R.Reese，“The Impact of the Great Purge on the

Red Army，” *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 vol.19， nos.1-3， 1992， 以及R.R.Reese，“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urges，” in J.A.Getty and R.T.Manning，eds.，*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O.F.Suvenirov，*Tragediya RKKA*，*1937-1938*（Moscow：Terra，1998）；P.P.Wieczorkiewicz，*Lancuch Smierci*：*Czystka w Armii Czerwonej*，*1937-1939*（Warsaw：RYTM，2001）；以及A.A.Pechenkii，*Voennaya Elita SSSR v 1935-1939gg*：*Repressii i Obnovlenie*（Moscow，2003）。

[34] 有关“大恐怖”的文献非常多。一部出色的文献汇编是J.Arch Getty and O.V.Naumov，eds.，*The Road to Terror*：*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1932-1939*（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3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71.

[36] Zhukov *Vospominaniya*， vol.1， chap.6各处。

[37] 转引自O.P.Chaney，*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54-55。

[38] 20世纪90年代初有证据表明，朱可夫本人至少也指控过一名大清洗的受害者。然而，后来人们才发现，在这份所谓的控告材料上出现的“G.朱可夫”是另一个叫朱可夫的人。参见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34-235。

4 一将成名：哈拉哈河，1939

1939年5月，由于苏日军队在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发生了一连串的流血冲突，朱可夫被派往远东，领导一个督查小组调查与日军作战的第57特别军军长N.V.费克连科（N.V.Feklenko）“工作不能让人满意”的原因。国防人民委员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在5月24日的命令中对朱可夫的任务做了详细的交代：“调查第57军军长及其参谋人员在作战训练方面的工作，以及该军军长为了使部队做好行动准备，采取了哪些措施支持自己的部下；核实第57军人员的数量及构成、该军武器给养的状况及保障情况。如发现作战训练方面存在不足，立即与该军军长一道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1]

朱可夫之所以被委以重任，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骑兵监察部工作过，以及他在作战训练方面的鼎鼎大名。在被调往远东的前一年，他作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具体负责的就是骑兵部队和坦克旅的训练；而总参谋部的看法则是，在与日本人即将进行的作战中，装甲力量及快速移动会在哈拉哈河地区平坦的开阔地带发挥重要作用。

5月24日，朱可夫给自己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写信说：

爱妻：

> 今天我和人民委员在一起。我想，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我要执行一项长期的任务。人民委员说大约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
> 首先我要请求你不要抹泪，要坚忍、坦然地面对这次痛苦的离别。想想看，亲爱的，非常困难的工作就摆在我面前，而我，作为一名党员和红军指挥员，必须以身作则，迎难而上。你是了解我的，我

不喜欢对工作马马虎虎，但我又放心不下你和我们的孩子。我请你为我创造这种安宁。拜托你，尽你最大的力量……至于我，你可以百分之百地放心。

你的眼泪让我很伤心。但我理解，这对你来说也很难。

深情地吻你，吻我亲爱的女儿们。

你的若尔日（Zhorzh）[2]

苏日对抗

哈拉哈河地区冲突的根源在于俄日之间在中国的长期竞争。[3]出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后期就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使得日本从中国皇帝的手中夺走了对朝鲜的控制权。中国还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不过，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这两个国家同样担心日本在中国的渗透，因为它们在那里也拥有广泛的利益——俄国向日本人施压，要他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随后，俄国人进入辽东半岛，并从中国人那里租借了亚瑟港（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从而使他们拥有了终年不冻的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了打通与亚瑟港的陆上交通，他们开始修筑后来所谓的“中东铁路”[4]。这条线路贯穿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并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及“跨西伯利亚大铁路”连在一起。他们还开始蚕食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利益。这一切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他们试图通过谈判与俄国人达成交易，用俄国在满洲的霸权来换取其对日本人在朝鲜的控制权的承认。谈判失败后，日本人于1904年2月偷袭了驻扎在亚瑟港的俄国舰队。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连连败北，包括丢掉了亚瑟港。双方伤亡数万人。俄国的军事失败是促成1905年革命的原因之一。当时爆发了一连串的罢工、抗议和暴力骚乱，目的是逼迫沙皇尼古拉二世改革其独裁政权。1905年9月，内外交困的沙皇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耻辱的《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条

约，俄国人被迫撤出满洲，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地位，并将俄国自1875年起占领的萨哈林岛南半部分的控制权归还给日本人。此外，日本人还获得了中东铁路南段的控制权。

俄日之间接下来的冲突发生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1918年夏天，7万日军以美、英、法军队为后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并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的反对势力联合起来。此次武装干涉的背景是，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与德国签订和约，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与西方国家联合组成远征军，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它们给前俄国盟友所提供的战争物资的安全，实质上是为了更广泛地干预俄国内战，推翻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在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之后，1920年4月，西方国家的军队撤出了西伯利亚，但想在西伯利亚建立永久基地的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又在那里赖了两年，只是由于苏联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才最终撤走。

但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前者于1910年被日本人吞并，后者则有关东军保护着日本人控制的中东铁路南段及其周围地区。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借口部分铁路线路遭到蓄意破坏——据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异见分子所为——入侵并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2月，日本人在满洲成立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

苏联人对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他们担心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觊觎西伯利亚。1932年12月，日本人拒绝签订苏联人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这让苏联人的担心变得越发强烈。莫斯科采取的对策是，不断加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力。

对莫斯科而言，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伪满洲国境内的中东铁路北段。它们是由苏联人控制的，但此时却在日本人的地盘上。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在1935年3月把铁路卖给了日本人。但在当时，苏联和伪满洲国之间的边境领土争端是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一连

串边境冲突把苏联和日本的军队都卷了进去。1936年11月，日本与纳粹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进一步加剧了苏日之间的紧张状况。该协定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国际”——它是布尔什维克于1919年为挑动世界革命而成立的——实际上矛头对准的却是苏联。它还含有一个秘密协议：如日本和德国当中的任何一方卷入与苏联的战争，另一方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该协定使斯大林更加相信，日本的特务和破坏分子已经渗透进西伯利亚，于是，他便大肆逮捕居住在该地区的土生土长的朝鲜人和日本人。

1937年7月，日本入侵中国华北，并很快占领了北平和上海。在中日战争期间——它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冲突的开始——苏联成了中国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为中国提供了904架飞机、82辆坦克、602辆拖拉机、1516辆汽车、1140挺重机枪、9720挺轻机枪、50000支步枪、1.8亿发子弹、31600枚炸弹和200万发炮弹。在华的苏联军事顾问有数百名，其中包括许多飞行员。[5]

苏日关系中特别棘手的是蒙古与伪满的边界问题。1924年作为苏联的附庸国而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曾是中国的外蒙古。在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蒙古与伪满政府之间的边界争端开始增多。由于争端逐渐升级，莫斯科在1936年3月签订了苏蒙互助条约，意在表明其维护蒙古和反对日本蚕食的坚定立场。

在1939年的哈拉哈河战役之前，最严重的事件是1938年苏联远东军与日本关东军在朝鲜、满洲及与苏联接壤的哈桑湖（Lake Khasan）地区发生的师级强度的冲突。经过一番激战，日本人后退了，没有挑起进一步的对抗，而是接受了苏联划分的边界。如果态度强硬，日本人就会退让，这一点苏联领导层并不是没有注意到。

总的来看，尽管是苏联人取得了胜利，但红军在哈桑湖战役[6]中的

表现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经过调查之后，远东集团军在1938年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独立的集团军群。苏联人还决定成立第57特别军，专门部署在蒙古。

哈拉哈河冲突与伪满和蒙古的边界的划分有关：边界是像日本人说的沿哈拉哈河，还是像蒙古人说的在这条河以东的地方？争端牵涉到的是一片数平方英里的荒无人烟的地区的归属问题，所以，这一争端对于苏日双方来说，其实都不太重要。但由于苏日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积怨已久，争端的意义就被放大了：要紧的是苏日之间在远东的权力关系和两国之间万一发生更全面的军事冲突谁有可能占得上风的问题。

远赴蒙古

在5月24日接到伏罗希洛夫的命令后不久，朱可夫就抵达了位于塔木察格—布拉克（Tamtsak-Bulak）的第57军司令部。5月30日，他和他的督查小组向伏罗希洛夫呈交了报告，认为5月28日和29日在哈拉哈河以东地区与日军的战斗“格外混乱”，结果苏军有71人阵亡、80人负伤、33人失踪。朱可夫在报告中说，作战之所以组织混乱，是由于战术不当、战役管理计划不周密和未能料敌在先。[7] 6月3日，朱可夫在给伏罗希洛夫的报告中写道，在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当中，称职的只有参谋长库谢夫（Kushchev）。至于费克连科，“无论是作为布尔什维克还是作为个人，都很好，绝对忠于党的事业，而且他也很尽力。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做事缺乏条理，目标不够明确。要对费克连科做出更全面的评估，只能等到对他有进一步的了解之后”。[8] 当时在蒙古的还有空军副司令Y.V.斯穆什克维奇（Y.V.Smushkevich），他被派到哈拉哈河是为了支援对日空战。从在白俄罗斯军区那时候起，他对朱可夫就非常了解。6月8日，斯穆什克维奇向伏罗希洛夫报告称：“我最后的结论是，军指挥部和费克连科本人都不称职……毫无疑问，军指挥部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工作，或者说准备得很糟糕……朱可夫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在

我看来，最好是让他暂时代理军长。”伏罗希洛夫当天给斯穆什克维奇答复说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并告诉他会撤换费克连科。[9] 1939年6月12日，朱可夫被任命为第57军军长。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魄力和决心投入到自己的新的指挥工作之中。他一上来就采取措施，打算主要依靠特工渗透、空中侦察和对在押人员的审讯，建立起一套情报系统。没有这样的情报系统，朱可夫在6月16日给伏罗希洛夫的电报中说，“我们对敌人就没有全面而清晰的了解”。朱可夫的另一个举措是改进训练，尤其是整顿57军的纪律，为与日军即将开始的战斗做好准备。7月，战火重燃。当时的日军试图赶走哈拉哈河东岸阵地上的苏军并在河西岸建立起自己的桥头堡。红军在激战中遭受了重大伤亡。从5月16日至7月25日，57军的伤亡超过了5000人，且大多数伤亡发生在7月的战斗中。所以，毫不奇怪，朱可夫在纪律方面变得越发地强硬。按照命令，指挥员和政委本人要为自己部队的战斗表现负责。要是他们未能执行命令，就会受到军法审判和严厉处罚。7月13日，朱可夫下达命令，枪毙两名怯战的士兵。在分发给57军全体指战员的这项命令的最后说：“保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苦大众，使他们免遭卑鄙的入侵者的蹂躏，这项崇高的荣誉已经落到我们这些有着一亿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的子孙身上……我要你们拿出自己的勇气、男子汉的气概、胆量、勇敢和英雄主义精神。让卑鄙的懦夫和叛徒去死吧！”[10]

七月战斗的中途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它对朱可夫个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副国防人民委员G.I.库利克（G.I.Kulik）来到哈拉哈河督战。7月13日，他命令朱可夫把河东的苏军大部撤到河的西岸。在执行纪律方面一向毫不含糊的朱可夫立即行动起来，但当莫斯科的总参谋部看到他的战况报告并发觉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命令他停止后撤。在7月14日与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Boris Shaposhnikov）的通话中，朱可夫解释说，他是在按照库利克的命令行动，但既然要他停止后撤，那他就会停止后撤。伏罗希洛夫当天也发电报给朱可夫，严令不准后

撤。在此期间，库利克向莫斯科求援，要求支持他的决定，但伏罗希洛夫未予理睬，而是命令他不要插手57军的事务。[11]

此事透露出莫斯科做出的一项重要的组织决定。至当时为止，第57军在形式上一直隶属于G.M.什捷尔恩（G.M. Shtern）指挥的方面军群。1939年7月5日成立的这个方面军群统辖所有部署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联军队。7月19日，57军被编入第1集团军群，并可以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不受什捷尔恩方面军群的节制。之所以做出这一特别安排，目的是要保证：除了莫斯科总参谋部的直接指令之外，朱可夫的行动不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干预。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看来是想在即将打响的战役中，避免再次发生像库利克那样的事情。指挥结构在7月31日定了下来，这一天，朱可夫正式从师级指挥员提升为军级指挥员——这相当于西方军队中的将军。

制订战役计划

什捷尔恩的方面军群继续参与了哈拉哈河战役的计划与准备工作。7月27日，什捷尔恩给朱可夫下达指示，要他在7月31日之前拿出歼灭日军并将其逐出蒙古领土的计划。虽然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并没有把制订1939年8月的进攻计划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但他确实让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是这一计划制订工作中的核心。这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前线指挥官，莫斯科也给了他行动的自主权。但是，8月10日将计划草案交给莫斯科的是什捷尔恩，而且是什捷尔恩的参谋长M.A.波格丹诺夫（M.A.Bogdanov）制订了对战役进行周密部署的计划。[12] 朱可夫也许是该战役计划的执行者，但不是它唯一的设计者。

在红军为八月攻势所做的准备中，最重要的是增加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截至进攻前夕，第1集团军群下辖第57师和第82步兵师及第36摩托化步兵师、第6和第8蒙古骑兵师、第7和第8机械化旅和第5机枪

旅、第6和第11坦克旅。朱可夫麾下总共有35个步兵营和20个骑兵连。在向日军进攻时，他能够调集57000人、500多门大炮、近9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500架飞机。与他对阵的日军有25个营又17个连，共计75000人，大炮和飞机的数量与苏军相当，但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要比朱可夫的少很多。[13]

要集中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并做好供应和备战工作，后勤保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一地区荒无人烟，路况很差，最近的铁路卸货点也远在400英里之外。据朱可夫说，在卸货点和军营间往返一趟需要五天时间，所以苏联人不得不动用大约5000辆卡车，把18000吨炮兵弹药、6500吨航空兵弹药、15000吨燃料和各种润滑油、7500吨固体燃料、4000吨食品和4000吨其他物资运进来。[14]

为了不让日本人察觉到自己的进攻意图和准备工作，苏联人非常注意做好他们称之为“欺骗”（*maskirovka* ）的保密工作。物资和军队的调动都是隐蔽的，用于进攻的突击部队一直到最后时刻才展开。无线电通信还发出假情报，好像红军正在掘壕固守，而不是准备进攻。一本名为《苏军战士防御须知》的小册子被分发给部队，而且还故意把消息泄露给日本人。训练是秘密进行的，与计划草案有关的文件也只发给最高级的指挥人员。行动指令和作战命令只用一名打字员打印。[15] 为了迷惑日本人，朱可夫还不断对敌军阵地发动局部进攻。“伪装”方面的这些花招收到了效果。关东军没有料到苏军正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以当朱可夫开始进攻的时候，完全是出其不意，这是此次行动很快便取得惊人战果的主要原因。

8月17日，朱可夫向第1集团军群下达了关于哈拉哈河攻势的总命令。[16] 进攻将于8月20日开始；命令说，其目标是要包围并摧毁位于哈拉哈河以东蒙古境内的日军。朱可夫为此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三个集群。作为朱可夫右翼的南部集群将发起主要打击，渡过哈拉哈河向诺门罕

（Nomonhan）前进，目标是包围海拉斯台音河（Khailastyn-Gol，哈拉哈河的支流）以北的日军。在那里，它将与朱可夫的中央及北部集群会合，歼灭被围日军。北部集群的任务是进攻弗伊高地（Fui Heights）的日军北翼，支援中央集群和南部集群对海拉斯台音河以北的敌军发起的强攻。朱可夫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大部分集中在北部集群和南部集群。主要由步兵组成的中央集群，将对海拉斯台音河北、南两岸的敌军阵地发起正面突击。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还将与南部集群的部分兵力会合，实施另一项包围行动。朱可夫的司令部设在中部的哈马尔达巴（Hamar Daba），一支强大的机动预备队就部署在他的身后，准备用来扩大北部和南部集群的战果（见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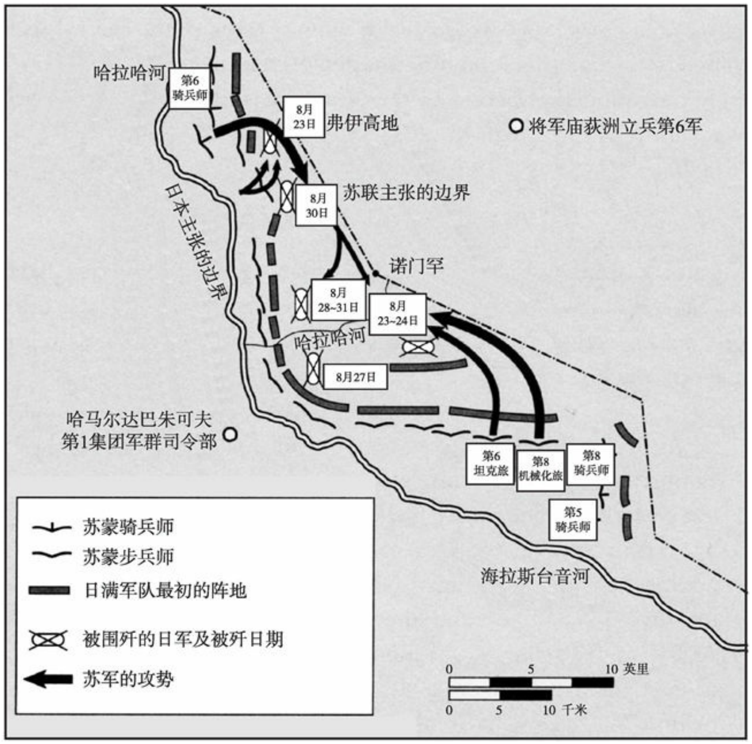
哈拉哈河大捷

8月20日星期天凌晨，进攻开始了。据朱可夫说，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日军的许多高级军官没有料到苏军会发起进攻，星期天时他们还在休假。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 早晨6点15分，我方炮兵对敌人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猛烈开火。我方有些炮群则向我航空兵的轰炸目标发射烟幕弹。在哈拉哈河地区，正在进入战斗位置的飞机轰鸣声越来越响，震耳欲聋。150多架轰炸机和大约100架战斗机出现在空中……8点45分，各种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开始向敌方目标开火……同时，我方飞机也袭击了战线后面的目标……9点整，当我航空兵猛烈扫射敌军并轰炸其炮兵阵地时，空中升起了红色信号弹，宣布进攻开始。攻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17]

行动基本上是照计划进行的。苏军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迅速占领了日军的步兵和炮兵阵地。苏联空军出动几百架次，倾泻了86吨炸弹。苏联炮兵猛轰日军阵地，造成敌军的大量伤亡。8月24日，战事一度陷入胶着。当时，日军发动了反击，企图突破苏军在海拉斯台音河北岸布置的包围圈。但是，朱可夫投入了他的部分预备队，包括第6坦克旅，顶住了日军的反扑。经过三天的激战，日军反击的势头逐渐减弱。8月27

日，朱可夫向第1集团军群发布命令，宣布哈拉哈河地区蒙古境内的日军已被围歼。[18] 不过，战斗尚未结束，小股被分割包围并负隅顽抗的日军要在8月28～31日才能被肃清。



地图**1** 哈拉哈河战役，**1939**年**8**月**20**～**31**日

苏联政府早在8月30日就开始庆祝哈拉哈河大捷了。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红星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宣布，授予朱可夫、什捷尔恩等31位此次战役的参与者“苏联英雄”称号（这是苏联的最高荣誉）。不过，在获奖和受表彰人员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什捷尔恩而不是朱可夫：

> 杰出的指挥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才华横溢的学生、哈桑湖战役的领导者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什捷尔恩，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军事使命。作为我党最著名的军事人才之一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是勇敢的布尔什维克和军队指挥员的楷模。苏联英雄、军级指挥员G.K.朱可夫的名字完全有理由得到人们的爱戴和钦佩。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一个有着不屈的意志和无穷的勇气的人，他把自己的部队牢牢地团结在一起，完成了政府所赋予的军事使命。[19]

有人根据这项嘉奖令推测，什捷尔恩与哈拉哈河大捷的关系也许要比后人相信的要大。其实，这当中的原因可能很简单，那就是在他们两人当中，什捷尔恩的级别更高（也更有名），而且起草政府公报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总参谋部允许朱可夫便宜行事。

实际上，在八月攻势的准备过程中，什捷尔恩的确是起到了核心作用，但主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还是朱可夫。战役期间他可以自行决策，如果考虑到这场攻势的进展和实现其作战目标的速度，这一点并不奇怪。朱可夫后来声称，在进攻开始后的第三天，什捷尔恩来找他，建议暂停两到三天，以便在继续包围日军之前调整部署并补充物资。朱可夫说他当时对什捷尔恩说得很直接：如果他是在提建议，那是一回事，但如果是在下命令，那自己就会越过什捷尔恩向莫斯科求助。不用说，什捷尔恩做出了让步，于是，朱可夫便继续发动进攻。[20] 这种事也许真的有过，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说明，朱可夫与什捷尔恩的关系总体上比较紧张，而这种紧张又是由总参谋部在指挥上的不同寻常的安排所导致的。朱可夫是什捷尔恩的下级，而如果上级被排除在重大的指挥决策之外，那后者难免会产生不满。在1940年12月的统帅部会议上讨论哈拉哈河之战对于当代战争的教训时，两人的紧张关系将再次表现出来。[21]

由于战役在8月28日已临近尾声，朱可夫开始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这封信是他在9月1日完成的：

我的爱妻！

> 给你献上问候和我所有深情的吻。我收到了你的许多来信和电报，但请原谅，因为战事繁忙，我无法回复。从8月20日开始，我一直在连续作战。现在，歼灭日本武士的任务就要完成了。歼灭（敌）军损失了100多门大炮和大批各种类型的机器装备……
>
> 我要告诉你，战斗自始至终都很激烈。作为指挥员，我当然得工作，不能睡觉。那不算什么，只要有个好的结果。你记得我曾经从莫

> 斯科给你写信说，必须以优异的表现来完成党的任务。我不知道这次冲突会如何发展。但愿它很快结束，那样，我们就可以团聚了。今天我让通信员把这封信送给你。我想这会结束的。
>
> 今天我看到报道，说我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显然，你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政府、党和伏罗希洛夫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我要加倍努力，尽到我对祖国的责任。
>
> 深情地吻你。
>
> 直到我们很快重逢。
>
> 若尔日 [22]

由于不清楚自己的妻子收到信没有，9月中旬朱可夫又给她写了信：

> 我还活着，活得很好。想必你从塔斯社的报道中听说了中蒙边界上的这场战役。现在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那么急着离开斯摩棱斯克了。你从塔斯社的报道中想必还了解到，无论是在陆上还是空中，日本武士都已被歼灭……行动期间我感觉很好。总之，就像在内战中一样。[23]

呆板、中规中矩、几乎不流露真实感情，朱可夫与其第一任妻子的通信都是这样的。考虑到朱可夫写信时的背景和状况，这一点并不奇怪。对像朱可夫这样的级别很高的苏联公民来说，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是政治忠诚，而不是个人感情，而且他们可能也想到，自己的私信会受到安全机构的检查。但是，他们的通信并不缺乏个人的内容，并可以在规定的框架内表露自己的偏好。就朱可夫而言，很显然，他喜欢上战场，这一点将会成为他与家人战时通信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朱可夫的坎尼之战 [24]

对于朱可夫在哈拉哈河取得的胜利，人们几乎是交口称赞，说它是战术上的神来之笔，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典范，证明了现代的机械化部

队的力量与速度。在阿尔文·库克斯（Alvin D.Coox）对该战役所做的很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关于苏军的夏季攻势这一章，标题是“坎尼之战重现：朱可夫的杰作，1939年8月”。[25] 另一位美国军事史学家威廉·斯帕尔的看法也一样：“在汉尼拔歼灭特雷恩蒂乌斯·瓦罗的罗马军队差不多2000年之后，朱可夫在蒙古草原的74千米宽、20千米纵深的战场上打了一场坎尼战役，一场成功的合围。”[26] 这实在是过誉了，因为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胜利被认为是史上最辉煌的战绩之一，是全世界将军们此后都渴望仿效的利用钳形运动实施包围的典范，尽管布匿战争最终的赢家是罗马而不是迦太基。

哈拉哈河之战也被认为是朱可夫作为作战指挥官走向成熟的关键时刻。例如，按照美国传记作家奥托·普林斯顿·钱尼（Otto Preston Chaney）的说法，

> 这场战役显示出朱可夫的指挥风格：亲自勘察、抢得先机、大胆进攻、创新、地面和空中力量的巧妙配合，而且如果形势需要，能够接受大量伤亡……事实证明，他能够在强大的压力下保持镇静，同时具备把握全局的能力……事实表明，他作为指挥官，在要求部下执行自己的命令方面说一不二，但在他确信会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也能够采取灵活的策略缓和自己的严厉态度。这种能力反映在他的集中优势兵力、他的大胆而成功的合围计划、他的积极而灵活地减少被包围敌军的数量上，以及他对诸兵种协同和对各种现代武器特别是各种进攻手段的正确结合上，结果使苏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27]

这都是些实话，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可夫远非哈拉哈河大捷唯一的制造者。哈拉哈河大捷是他以及他的参谋人员、什捷尔恩的方面军群以及莫斯科的总参谋部共同努力的结果。他在指挥上所展示出来的特点令人称道，但那些特点无疑是所有优秀将领都孜孜以求的。此外，如果面对的是处于劣势的敌人，总是更容易有好的表现，尤其是在你打赢的时候。朱可夫真正的考验还未到来：在1941年夏天被德国人打得大败时保持镇静，而那个对手可要远远强于装备落后的老式的关东军。

哈拉哈河之战对于朱可夫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更为重要。他表现优异并因取得红军自内战以来的首次大胜而受到赞誉。在苏联人的眼中，这场胜利让他们一雪前耻，报了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一箭之仇。朱可夫的自信心有了极大提升。从那以后，在他那些同辈的将领当中，有和他差不多的，但没有超过他的。

从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对自己初次见到朱可夫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哈拉哈河之战已经使朱可夫好像变了一个人。西蒙诺夫是在战役结束后不久来到哈拉哈河的。他与一群苏联记者一起到朱可夫的地下掩体去采访他。朱可夫坐在角落里，在一张小桌子的后面。“他一定是刚洗过澡，”西蒙诺夫回忆说，“双颊红红的，冒着汗，没穿衬衣，黄色的外衣掖在他的法兰绒长裤里。个头不高，宽阔的胸膛把他的外衣绷得紧紧的，这让他显得非常敦实。”在一位情报官拿着报告进来的时候，朱可夫愤怒地瞪着这位军官说：“6个师？胡说八道。我们在那儿查明的只有2个师。其余的都是胡说。”他转向记者们说：“他们就是这样子做事的。”当那位军官问他是否可以离开时，朱可夫告诉他：“走吧。告诉他们不要在那儿瞎编了。如果有空白的地方，就诚实些，让它们空着好了，不要为了安慰我，就用不存在的日军师来代替它们。”那位军官走后，朱可夫又说了一遍：“他们就是这样子做事的。这些情报官。”[28]很难想象朱可夫早先会在一群记者面前表现得如此坦率而自信。

西蒙诺夫在十年后写了一部关于哈拉哈河之战的小说《战友们》，主人公是苏军的一位无名的“指挥员”。西蒙诺夫一直说这是个虚构的人物，但人们都看得出来，他所描写的那位严厉、精力十足而又雷厉风行的指挥员就是朱可夫。[29]

朱可夫逐渐增强的自信心在1939年11月给沙波什尼科夫的有关哈拉哈河之战的长篇报告中也有所反映。报告开头对费克连科的“犯罪”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没能为与日本人的作战做好充分准备；在报告

中，费克连科后来被描写成“人民的敌人”。报告用大量的篇幅说明了坦克在打败关东军的过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朱可夫也指出了坦克的一些不足。他认为，要是缺少情报，战场的通信状况又不好，就难以给坦克的行动指引方向。有几次，坦克就是因为缺少步兵的支援而让日军给跑掉了。情报工作的不足导致未能调集预备队扎紧对日军的包围圈。朱可夫对空军也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他指出，各部队没有为集群作战做好准备，不同类型的飞机的行动没有配合，对敌人的空中战术也缺乏研究。尽管如此，朱可夫的总体结论还是非常肯定的：“在8月20日至31日的哈拉哈河战役中，工农红军的部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部队实施了当代最为复杂的军事行动并成功赢得了胜利。这场胜利，在我们看来，所有的指挥员都应该好好地加以研究。”[30]

哈拉哈河之败对日本人产生的政治影响是，认为日本应该采取“南进战略”的人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种战略认为，最好是建议日本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而不是与苏联人在西伯利亚苦战。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的签订，以及苏德同盟在欧洲的迅速形成，在粉碎了德日联手对苏开战的梦想的同时，也使日本政策中的这一倾向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朱可夫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但日本之所以最后走上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的道路，实际上也和他有关。当苏德协定破裂，德国人在1941年夏天果真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时候，日本人又开始考虑“北进战略”，即彻底征服中国并进攻苏联，但那个时候，日本已在远东陷入与美国人的权力争斗而无法脱身，而且它的“南进战略”也已走得太远。

战役结束后，朱可夫就赶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Ulan Bator）与家人团聚，他的第1集团军群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他一直都在那儿。之所以会出乎意料地在蒙古逗留这么长的时间，原因之一就是苏日停战谈判拖拖拉拉地谈了几个月。在1939年9月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什捷尔恩和朱可夫接着就与日本人谈判边界问题的细节，双方直到1940年6月才达成一致。

从朱可夫的角度来看，他在乌兰巴托的逗留有利有弊。一方面，欧洲已沦为战场。为了反对希特勒对波兰的入侵，英法在9月3日对德宣战。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苏联人一直在与英法谈判，商讨建立针对德国的三国同盟。但斯大林认为，英法之所以要拉他入伙，是为了替它们当炮灰。他在外交上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置身于战争之外。该条约还包含一项秘密协议，把波兰及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划分为苏联与德国的势力范围。红军按照条约于9月17日加入了德国人对波兰的进攻，夺回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那些地方都是在1919～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输给波兰人的。对于苏联的入侵，波兰人几乎没有抵抗，但此次入侵却是红军自内战以来的最大的军事行动。接着，由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屈服于斯大林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联的影响力扩张到了波罗的海地区。

另一方面，待在蒙古意味着1939～1940年冬季红军在芬兰进行的战役与朱可夫没有关系。红军在那次冲突中损失惨重，伤亡了20万人，其中阵亡近5万人。1940年3月，所谓的“冬季战争”最后以苏芬和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促使双方媾和的原因是，英法有可能对这场冲突进行干涉，那样一来就会把德国人拖进苏芬冲突并很可能使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卷入战火。

“冬季战争”的教训苏联人还没怎么消化，希特勒就发动了闪电战，于1940年5月入侵西欧。在不到六周的时间内，法国就投降了，只剩下英国在孤军奋战。但朱可夫此时已回到西线，并准备在为即将到来的苏德战争而进行的备战工作中，成为关键性的人物。

---

[1] 伏罗希洛夫命令的大部分内容可见于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98。命令的原文连同克拉斯诺夫援引的其他许多文件，都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有关哈拉哈河战役的展览中展出过（2010年4月，莫斯科）。

[2] 这封信的复印件见于E.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p.52-53。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在6月2日见到了伏罗希洛夫，于6月5日抵达蒙古。他还暗示，他被派到哈拉哈河，目的是接管指挥权而不只是检查工作。但是，文件记录显示的情况正好相反。参见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77-178。

[3] 参见E.O.Clubb，“Armed Conflict in the Chinese Borderlands，1917-1950，” in R.L.Garthoff ed.，*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New York：Praeger，1966）；J.Colvin，*Nomonhan*（London：Quartet，1999）；G.Lenson，*The Damned Inheritanc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1924-1935*（Tallahassee，Fla.：Diplomatic Press，1974）。

[4] Chinese Eastern Railway，指1898～1903年沙俄为强化其在远东的利益，依据1896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在中国东北修筑的以哈尔滨为枢纽的“T”字形铁路线，其东西向的干线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分别与俄境内的赤塔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相连，从而贯通了沙俄的西伯利亚铁路。日俄战争战败后，沙俄将中东铁路南向支线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日本。“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当时的苏联政府单方面将中东铁路其余部分的路权卖给了日本人。中东铁路的名称在历史上几经变化。建筑之初曾称“东清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中国长春铁路”，在这之间又曾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为“中东铁路”“中东路”。——译者注

[5] J.Haslam，*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1941*（London：Macmillan Press，1992），pp.93-94.

[6] 即“张鼓峰事件”。——译者注

[7]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00-101.

[8]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01-102.

[9]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95.

[10]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12-114. 在克拉斯诺夫的书的这部分内容中，收录了朱可夫这段时期下达的一些命令的原文。（我所见到的）原件可见于RGVA，F.32113，Op.1，Dd.3，5。

[11] 朱可夫与沙波什尼科夫以及伏罗希洛夫与库利克之间的通话，还有伏罗希洛夫给库利克的不要干涉的命令，这些内容都转引自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118-120。

[12] 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p.114-116.

[13]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 （Moscow：Svyatigor，2006），p.83；J.Erickson，*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p.533.

[1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85-186.

[1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186-188.

[16] 该命令的原文可见于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pp.233-234。

[1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92.

[18]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137.

[19] 转引自B.V.Sokolov，*Georgy Zhukov* （Moscow：Ast，2003），p.143。

[20]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Moscow：APN，1989），pp.319-320.

[21] 关于什捷尔恩与朱可夫之间的不和，更多的证据材料可见于彼得·格里戈连科（Petro G.Grigorenko）中将的回忆录。格里戈连科，20世纪60～70年代苏联的异见人士，被当局在精神病院关押了七年，理由是如果他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他一定是疯了。在被迫移居美国十年之后，格里戈连科于1987年去世。1939年6月，格里戈连科是刚从红军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并被派往远东的学员之一。他在驻扎在那里的什捷尔恩方面军群中服役。格里戈连科对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朱可夫的描写有很多贬抑之词，说在6月的战斗中，朱可夫为了应对日军的连续进攻，就在不同的作战区域来回调动部队，结果前线到处都是临时的小分队，一片混乱。格里戈连科认为，朱可夫之所以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是因为他没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过，接受的军事教育不够。他还报告说，只是在什捷尔恩介入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必须得说，这种说法很可能是不实的。朱可夫没在总参军事学院接受过教育，但他参加过其他许多培训班，而且是经验丰富的高级军官，不会犯这种重大错误。事实上，格里戈连科的回忆录对朱可夫有很深的偏见。与对朱可夫的态度相反，什捷尔恩反倒显得差不多是个圣徒般的人物，并被认为是哈拉哈河大捷的功臣。格里戈连科对待什捷尔恩和朱可夫的不同态度，部分原因可能与这两人随后的命运有关。朱可夫变成了苏联最著名的军人，而什捷尔恩在1941年10月遭到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清洗并被处死。参见P.G.Grigorenko，*Memoirs* （New York：Norton，1982），pp.105-129。

[22] 这封信的复印件见于E.Zhukova，“Interesy Ottsa，” pp.53-54。

[23] V.Daines，*Zhukov* （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p.126-127.

[24] 坎尼（Cannae）是古代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地区的一个村庄，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在这里以少胜多，取得了对罗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译者注

[25] A.D.Coox，*Nomonhan*：*Japan Against Russia*，*1939*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72.坎尼战役发生在公元前216年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26] W.J.Spahr，*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Stress* （Novato，Calif.：Presidio，1997），p.213.

[27] O.P.Chaney，*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68，72，74.

[28] Simonov，K.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 Moscow：APN，1989，pp.309-310.另一位在场的记者是D.I.奥尔滕贝格（D.I.Ortenberg）。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是《红星报》的编辑。在他有关哈拉哈河战役和朱可夫的回忆中，表达了与西蒙诺夫类似的印象。参见他的"Nezabyvaemoe，" in S.S.Smirnov et al.，eds.，*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 （Moscow：Politizdat，1988）。

[29] K.Simonov，*Tovarishchi po Oruzhiu* （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1961）.小说初版于1952年。

[30] "O Kampanii 1939g v Raione r.Khalkhin-Gol，" RGVA，F.32113，Op.1，D.2.在报告上署名的还有政治委员M.S.尼基谢夫（M.S.Nikishe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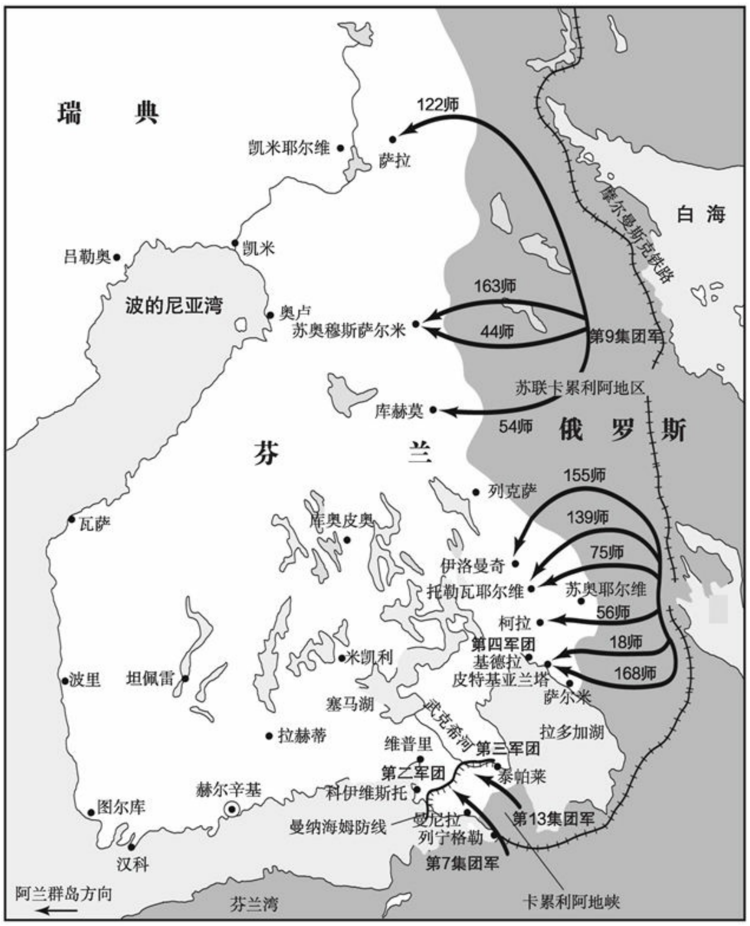
5 在基辅：演习与备战，1940

1940年5月从远东召回朱可夫，是苏芬战争惨败后苏联为了对红军进行彻底整顿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在红军于1939年12月进攻芬兰的时候，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期待的是一场轻松的胜利。苏联人甚至还抱有幻想，以为芬兰的工人阶级会发动起义，把红军当作社会主义救星来欢迎。但芬兰人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因此而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钦佩。苏联人在政治上承受的许多负面的后果之一，就是因为侵略而被逐出国际联盟，而这样的羞辱就连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也不曾有过，因为它们都是自己主动退出该组织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一直都是最为倡导集体安全的国家，主张国际联盟要用行动来反对侵略，现在它自己恰恰是因为这一罪名而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在军事战线上，苏芬战争主要有两个阶段（见地图2）。1939年12月，红军出动5个集团军约120万人，在15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的支援下，沿宽大锋面对芬兰人的防线发起进攻，主攻方向是卡累利阿地峡的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这条以芬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字命名的防线，是一道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狭长防线，纵贯整个地峡。攻打曼纳海姆防线的主要突击力量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K.A.梅列茨科夫（K.A.Meretskov）率领的第7集团军。苏军的目标是突破曼纳海姆防线，占领维普里（Viipuri），然后向西朝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方向推进。部分是由于天气恶劣，但主要是因为红军实力不济，进攻起初未能得手。随后，苏联人调整部署，增派兵力，于1940年1月在基辅特别军区

司令铁木辛哥的指挥下——他因为战事僵持太久而被调到北方——再次发动进攻。铁木辛哥的进攻成功了。到1940年3月，红军已处于收拾残敌并向赫尔辛基进发的态势。但斯大林因为担心英法的干涉而决定与芬兰人谈判，并在1940年3月12日与其签订了和约。依照和约规定，芬兰人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做出让步，把自己的边界从列宁格勒往后移，但他们在政治上依然保持独立，因而也保有了自己的自由，可以在1941年6月德国入侵行动开始的时候，选择与德国人一起进攻俄国。



地图2 苏芬战争，**1939～1940**

苏联人在苏芬战争结束后对这场冲突进行了检讨，想要弄清楚自己的伤亡为什么那么大（20万人，其中有5万人阵亡），为什么就连制服芬兰这样的小国也那么困难。在1940年4月的统帅部特别会议上，斯大

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说红军仍抱着俄国内战时的经验教训不放，没能让自己的思维现代化，特别是在火炮、坦克、飞机以及火箭在当代战争中的作用的问题上。[1]

为了进一步总结芬兰战争的经验教训，会议之后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了苏联武装力量的一系列改革。5月，政府恢复了将军军衔，并在6月将数百名经历过战斗洗礼的军官晋升为将军。大约在同时，斯大林给数千名被清洗和贬黜的军官恢复了职务，其中包括20世纪20年代就与朱可夫当过同学的K.K.罗科索夫斯基上校，后者在1937年遭到逮捕和关押。1940年5月16日，红军修改了训练条例，以便更加切实地做好备战工作；7月，强化了武装力量纪律处分条例；8月，在战术层面上恢复了在战前清洗中被取消的一长制，这样一来，野战军官在指挥决策上便无须和政治委员的意见保持一致。另外，为了改进武装力量的宣传工作并招募更多的官兵加入共产党，红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红军改革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1940年5～6月，德国的闪电战在入侵西欧的行动中战果惊人。希特勒的装甲师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推翻了先前做出的取消机械化军的决定，并于1940年7月下令成立9个机械化军，每个军有1000多辆坦克，并有摩托化步兵、信号部队和工程部队的支援。大约在同时，斯大林还做出决定，生产多种型号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它们将成为苏联武装力量在卫国战争中的主战装备，其中就包括著名的T-34坦克。

改革的关键人物是铁木辛哥，他在1940年5月取代了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成为国防人员委员。实际上，人们也常常把这些改革称为“铁木辛哥改革”。另一项变动是改组总军事委员会，它是负责红军的总体组织、运作和动员的机构。斯大林退出该委员会，并由铁木辛哥接替伏罗希洛夫的主席位置。[2]

战争期间，BBC开过一个有名的玩笑，说铁木辛哥有爱尔兰血统，他的真名是蒂姆·奥辛哥（Tim O’shenko）。[3] 但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实际上是于1895年出生在敖德萨地区。他和朱可夫同龄，而且也出身于农民家庭，一战期间也在沙皇骑兵部队服役。1917年革命之后，他加入红军和共产党，并在内战中迅速晋升为师长。铁木辛哥属于所谓的“骑兵帮”——内战期间和斯大林并肩战斗过并参加了察里津（后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一群高级军官。伏罗希洛夫也属于这个小集团。[4]

内战以后，铁木辛哥成了第3骑兵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是他手下的师长，而格奥尔吉·朱可夫又是后者手下的团长。铁木辛哥在1930年把朱可夫提拔为旅长。从1933年至1935年，两人又开始一起共事。当时，铁木辛哥是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而朱可夫是师长。铁木辛哥接着又成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1939年就是由该军区为首入侵波兰东部的。铁木辛哥领导那次行动的方式和他收拾红军在芬兰的乱局一样，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铁木辛哥的女儿嫁给了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这可能对他的前程也有帮助。因此，当斯大林由于他的老伙计伏罗希洛夫在“冬季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能而终于对其失去耐心的时候，铁木辛哥就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国防人民委员一职。

由于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的位置就出现了空缺。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大获成功——相比之下，他的许多同侪在芬兰战争中都表现平平——让他顺利接替了铁木辛哥在基辅的职务，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与德国的战争中，该地区注定要成为前线。朱可夫与铁木辛哥的私人关系无疑也促成了此事。

1940年5月，朱可夫被从蒙古召回；6月2日，他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的习惯是晚睡晚起，朱可夫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已是夜里11点。[5] 见面持续了半个小时。据朱可夫说，主要是讨论了哈拉哈河战

役。斯大林想了解朱可夫对日本军队的看法以及他在蒙古碰到的困难。在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他谈到了对斯大林的第一印象："斯大林的外表，他的轻柔的嗓音，他的判断之深刻与正确，他对军事问题的了解，他在听取我汇报时专注的神情，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后苏联时代的回忆录中，后面还有一句："要是他对每个人都这样，那人们为什么全都把他说得那么可怕？"[6]

6月5日，《真理报》公布了朱可夫晋升为大将的消息——那是仅次于元帅的最高级别的军衔——并且特别提到了他在哈拉哈河战役中对坦克的使用成效显著。一同获得晋升的还有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同事G.M.什捷尔恩，但他只被晋升为上将。[7] 这是《真理报》公布的首批晋升为将军的人员名单，罗科索夫斯基在6月10被晋升为少将。

在基辅特别军区

当朱可夫在1940年5月到乌克兰接管基辅特别军区的时候，他似乎是做好了应对长期挑战的准备。作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军区管辖的范围包括统一后的整个乌克兰，要守卫的国境线长达500英里。它是苏联西部边境的三个特别军区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总部设在明斯克的西部特别军区和总部设在里加（Riga）的波罗的海特别军区。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对保卫苏联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们可以在无须另外动员预备队的情况下，独立承担战略层面的军事行动。万一发生战争，如果要对敌方领土实施反入侵，每个特别军区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那段时间红军一直在整编和扩军，所以现在很难弄清楚，在朱可夫于1940年中期接管基辅军区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兵力。但可以肯定，他所指挥的力量包括多个集团军和作战师，编制有几十万人，另外还有许多坦克、飞机和大炮。[8]

朱可夫很乐意被派往乌克兰。用他的话说就是，"让我负责国内最

大的军区，我感到十分光荣……基辅特别军区是个一流的军区……指挥各集团军、编队和参谋机构的是一批年轻有为的军官和将军。”[9]

实际上，基辅的情况根本不像朱可夫回忆的那样乐观。红军此时特有的那些问题也在困扰着基辅军区：士气低落、训练落后、纪律松弛、开小差的多、装备和设备有缺陷、住房短缺，尤其是优秀军官太少。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之后，该军区管辖的范围扩大到西乌克兰，再加上它的一些最优秀的作战师和部队被调走参加对芬战争，情况变得更乱了。[10] 正因为存在诸如此类的困难，苏联才会给基辅派来一位素以通过无情的纪律和严格的训练打造部队而著称的指挥官。

朱可夫到达基辅后面临的另一项紧迫的任务是，为进攻罗马尼亚领土做好准备。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现属当代的摩尔多瓦（Moldova）〕，一个从1918年起一直由罗马尼亚人占领的有争议的地区。斯大林还要求罗马尼亚人割让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该地区居住有乌克兰人，但苏联人此前从未对其提出过主权要求。斯大林估计不会因为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而与罗马尼亚爆发战争，但为了以防万一，朱可夫还是奉命成立了“南方方面军”，由来自他的军区的第5和第12集团军以及来自邻近的敖德萨军区的第三个集团军组成。在答复苏联的最后通牒之前，罗马尼亚人曾征求柏林的意见。德国人对苏联的行动感到不快，但希特勒在1939年8月签订苏德协定时就已将比萨拉比亚让给了斯大林。罗马尼亚人得到的建议是，照苏联人的要求去办，于是，他们在6月28日就这样做了。同一天，朱可夫的部队越过边境。两天后，新吞并的领土就处在红军的控制之下。[11]

朱可夫对自己的部队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过程中的表现感到不满。7月17日，朱可夫发布命令，列举了种种不足，包括缺乏战斗准备、对部队的组织和控制不当、情报工作不力、纪律败坏、对待当地

居民的行为恶劣。随后，按照其特有的行事风格，朱可夫又发布了若干详细的指示，对部队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整顿，以便达到要求，完不成任务的指挥官要受到惩罚。他还把这种威胁付诸行动，解除了几个师长的职务，并将其中的一个送上了军事法庭，原因是他对自己的师失去了控制，让手下士兵在比萨拉比亚胡乱杀人。[12]

罗科索夫斯基也是朱可夫手下的指挥官之一，他被安排在基辅军区继续指挥第5骑兵军，那是他在被清洗前指挥的部队。但由于第5骑兵军还在从别处来乌克兰的路上，罗科索夫斯基就被临时安排到受朱可夫直接指挥的岗位上："我当时被安排到一个由将军们组成的团队，直接与军区司令一起工作。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部队上。朱可夫将军分派的任务极为有趣，所以我能看得出我们部队的长处和不足。"[13]

基辅军区有个名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Mikhail Kalashnikov）的年轻的坦克驾驶员也在朱可夫手下服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们立马就感受到G.K.朱可夫的意志和干劲。"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正在努力改进苏联坦克的性能。他发明了一个可记录坦克发动机运行状况的装置，这让他引起了朱可夫的注意。卡拉什尼科夫对该装置的演示打动了朱可夫，于是他决定把他送到基辅的坦克技术学校学习，然后又送到莫斯科，那里正在对类似的装置进行测试。这是卡拉什尼科夫事业的开端，他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武器设计师，最有名的就是发明了AK-47自动步枪。正如朱可夫的一位传记作者强调的，"朱可夫营造的注重革新的氛围，为这位未来的设计师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4]

朱可夫在基辅时还结识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后者当时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两人的人生道路有过多次相交，而这是其中的首次。赫鲁晓夫当时对朱可夫的评价很高，并在回忆时说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的位置非常令人满意"。[15]

苏联的战争计划

对朱可夫来说，1940年夏天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让自己的军区齐心协力，参与到苏联的总的战争计划的修订之中。从1928年至1941年，苏联共计制订过七个这样的元计划（meta-plan），确定了红军的大的战略框架，即红军如何对敌发动反击的总体构想。每个计划都设定了假想敌，评估了敌军的规模及可能采取的部署，并预测了敌军可能的入侵线路。二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计划是于1938年3月在时任总参谋长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准备的。作为前沙皇军官，沙波什尼科夫是红军的理论权威，他的《军队大脑》一书对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运作做了详细的研究，1935年苏军正式成立总参谋部时就是仿照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部。[16]

沙波什尼科夫的1938年战争计划，认为苏联的主要敌人，在欧洲是德国及其盟友，在远东则是日本。虽然苏联武装力量必须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但德国才是首要威胁，西线才是主战场。德国人，沙波什尼科夫说，企图入侵苏联的线路要么是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向明斯克、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向，要么是在普里亚季沼泽以南，目标是向基辅推进并占领乌克兰。至于到底会采取哪条线路，要取决于欧洲的政治形势及德国与其东欧盟友（波兰也可能加入其中）确切的反苏阵容。为了反击以德国为首的入侵，该文件接着详细介绍了苏军作战计划的两种变化。如德国人从北线发动进攻，红军将就地反击，而在南线采取守势；如德国人在南线发动进攻，红军也就地反击，而在北线采取守势。两个方案的目的都是与敌军主力交战并歼灭之。[17]

接下来一版的战争计划是在1940年夏天准备的，当时的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1940年版的计划虽说总体上与1938年的差不多，但它预测德国人会在北线发动进攻，从东普鲁士（在纳粹占领波兰后，它此时已和德国本土连为一体）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西白俄罗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此时都已并入苏联）发起攻击。因此，该计划认为，红军主力应集中在北线。[18]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A.M.华西列夫斯基也参与了计划的

制订工作。在卫国战争中，他将成为与朱可夫关系最紧密的同事。

1940年8月，沙波什尼科夫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版战争计划是之前由他的参谋人员准备的。接替沙波什尼科夫的是基里尔·梅列茨科夫，他在对芬兰的损失惨重的首轮进攻中曾担任过指挥官。在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之后，新计划草案于9月18日完成。“九月计划”仍然认为德国人最有可能从北线发动进攻，但也不排除他们有可能会把主力集中在南线。因此，它重申，有必要对苏联的战略反应准备两套不同的方案。如果德国人在南线集中，红军就也在那里集结，并向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的卢布林和克拉科夫方向发动反击，继而向德国南部布雷斯劳方向攻击，目标是切断希特勒与其巴尔干盟友及该地区重要的经济资源之间的联系。如果德国人在北线动手，那红军就进攻东普鲁士。[19]

九月计划曾被提交给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讨论。10月初，在征求过意见之后，苏联人对九月计划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修改：把红军的主要攻击力量集中在南线，任务是向卢布林、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推进。在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交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对于这一改动的原因并未做出说明。[20] 这其中可能有几种情况。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给出的解释是，斯大林认为希特勒首先考虑的是夺取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经济与矿产资源，包括高加索的石油。但现在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把红军主力集中在南线主要是斯大林的决定，尽管这样做肯定得到了他的支持。另一种可能是，在制订1940年战争计划期间，苏联领导层的心思正放在巴尔干的局势上，包括希特勒在8月做出的保证罗马尼亚在失去比萨拉比亚之后的未来安全的决定。按照这种看法，把主力集中在南线的决定，有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而非战略的考虑。[21] 另一个有趣的建议来自马特维·扎哈罗夫（Matvei Zakharov）元帅对战前苏军总参谋部的研究：个人偏好和官僚主义因素有可能起到了决定作用。如果把资源集中在南线，受益的主要是基辅军区。梅列茨科夫和

铁木辛哥两人以前都做过基辅军区的司令。总参谋部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高级军官，有许多也曾在基辅军区服役，其中包括很有才干的N.F.瓦图京（N.F.Vatutin）将军。他在1940年7月调到莫斯科之前，曾经是朱可夫的参谋长。[22] 可以肯定，在朱可夫的领导下，基辅军区非常支持德国人会在西南集结的判断，而且还到处游说，以期得到更多的兵力来应对这一情况。[23]

更有甚者认为，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当初之所以选择把主力集中在南线，是因为红军正在计划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与到处都是河流、湖泊、沼泽和森林的东普鲁士相比，波兰南部的平原是一条更为容易的进攻线路。但是，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苏联人估计战争爆发时德军会把主力集中在南线。随后数月，这种估计主导了苏联人对于和德国行将发生的大战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也得到了大量情报的支持，它们都显示德国国防军沿苏德边境增加的兵力主要集中在南线。这种错误的估计说明，德国人的情报战起到了作用，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即在北线集中并向列宁格勒方向和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线发动进攻。

苏联人把兵力集中在南线的决定是致命的。当1941年6月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时候，苏联军队及其装甲力量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南方向。不过，应该说明的是，希特勒起初的确是想让德军集中力量从南线进攻的，但他的将军们让他改变了主意。即便是这样，莫斯科也只是在1941年夏天德国人已经攻入苏联境内的时候，才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1940年12月的指挥工作会议

1940年9月底，朱可夫应邀要在即将召开的高级指挥员会议上做题为“当代进攻战的特点”的报告，并且要在11月1日之前向铁木辛哥提交报告的草案。“由于我的题目很大，会议的层次又很高，”朱可夫回忆说，“为了写这份报告，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花很多小

时。军区作战部部长伊万·巴格拉米扬给了我宝贵的帮助。”[24] 和朱可夫不同，未来的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过。据巴格拉米扬说，朱可夫曾建议他请军区司令部的其他人帮忙。朱可夫得到了巴格拉米扬等人的帮助，这让他的某些批评者得出了一个不公正的结论，说报告之所以质量很高，应该是巴格拉米扬等人的功劳。但是，巴格拉米扬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朱可夫不仅拥有杰出的军事天赋，而且才智过人，有着铁一般的意志。”说朱可夫才智过人，表现之一便是他对巴格拉米扬这样的有才干的军官，能够识人用人，所以巴格拉米扬非但不会因此而心怀怨恨，依旧对他忠心耿耿。[25]

之所以选择朱可夫来做这个特别的报告，是因为他是哈拉哈河之战的胜利者，同时又是军区司令，而该军区将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在苏联对德国的进攻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朱可夫的主要任务是，对德军在西欧的进攻行动的经验进行评估。在这方面，他的参谋长M.A.普尔卡耶夫（M.A.Purkaev）将军帮了大忙。普尔卡耶夫能讲流利的德语和法语，而且刚从苏联驻柏林武官的任上卸任回国。朱可夫还可以查阅苏联军事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德国军事行动的报告和文章，包括翻译过来的国外作者的评论。[26]

这次为期一周的会议是1940年1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270名高级军官，包括各军区和集团军的司令和参谋长、各军事学院院长、武装力量各兵种总监，以及众多的军长和师长。与会军官中有24人参加过一战，43人参加过俄国内战，5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0人参加过苏芬战争，4人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铁木辛哥致开幕词，简要地介绍了会议议程。接着是梅列茨科夫，他讲了总参在备战中有关作战和指挥的训练情况。第三个是朱可夫，之后是空军的P.V.雷恰戈夫（P.V.Rychagov）将军有关争夺制空权的报告。莫斯科军区首脑I.V.秋列涅夫（I.V.Tulenev）讲的是现代防御战的特点，西部军区司令D.G.巴

甫洛夫（D.G.Pavlov）将军讲了机械化军队在进攻行动中的使用。最后，步兵总监A.K.斯米尔诺夫（A.K.Smirnov）将军做了有关步兵在攻防中的作用的报告。每个报告过后，与会者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共有74人发言。会议结束时铁木辛哥进行了总结。[27]

朱可夫做报告的那天是圣诞节。他的主题是当代战争给进攻战带来的教训。他的主要结论是，当代军队拥有飞机、坦克、高度机动的火炮和摩托化步兵等各种力量，这使它们能够发动迅猛的进攻。在当代进攻战的战例中，他介绍得最详细的是哈拉哈河战役。朱可夫说，这次行动经过精心准备，它的特点是坦克、火炮、步兵、航空兵紧密协同。另一个例子是德国人入侵西欧的行动。其特点是：在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坦克和机械化军团实施大胆而坚决的前插，并由同样的部队利用各自的突破口扩大战果。德国人占领波兰用了18天，占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用了20天，占领法国中部和南部用了18天，这些都证明了一点，即当代进攻战的特点是迅猛和一鼓作气。朱可夫认为，德军的胜利，是沿宽大锋面在几个不同的方向实施战略行动的结果。据此，朱可夫提出，战略进攻应在250～300英里宽的锋面展开，目标是切入敌方纵深50～100英里。这样的行动需要85～100个步兵师，4～5个机械化军，2～3个骑兵军以及30～35个航空兵师。朱可夫设想，在这样的行动中，突破敌人防御的方式与哈拉哈河战役中相似，只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强大的机动力量在两翼发动进攻，将敌军主力钉在中间，而由此撕开的缺口和形成的包围圈则交给强大的预备队去扩大战果。要想成功，这样的行动在开始阶段就要歼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敌军，而且每天都要保持向前推进10～15千米。“火炮、坦克、摩托化军队、航空兵等当代作战手段的发展，”朱可夫最后说，“正在为进攻战打下宽广的基础，从而使远距离、高速度的进攻战成为可能。”[28]

在讨论朱可夫的报告时，有六个人发表了意见。他们谈的基本都是技术性问题：大规模进攻行动所需的兵力、这些兵力何时及怎样展开、

这类行动的时机选择和各个阶段，以及推进的速度。争议最多的是列宁格勒军区第1机械化军军长P.L.罗曼年科（P.L.Romanenko）将军提出的意见。他说朱可夫的观点还是1932年至1934年间的思维，没有适当考虑德军在西欧军事行动的经验。那些行动表明，有必要组建大规模的“突击集团军”，每个突击集团军要有4～5个机械化军、3～4个航空兵军、1～2个空降兵师，以及9～12个炮兵团。在进攻行动中，这些突击集团军不只是用在扩大战果阶段，也要用在突防阶段。什捷尔恩将军的评论最为详细，这也许是因为朱可夫触怒了他，因为朱可夫在发言中顺便提到，在哈拉哈河行动的第一阶段（什捷尔恩当时是总指挥），第57特别军的备战工作做得不好。什捷尔恩说，除了目前的战争外，也应考虑到一战的经验。而这两次冲突都表明，进攻行动的准备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在哈拉哈河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谈到与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分歧时，什捷尔恩提出的最尖锐的意见，也许是突防时坦克投入的时机问题。朱可夫认为应该展开得相对早一点，而什捷尔恩则认为要等到发动强攻的步兵和炮兵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特别是在遇到呈纵深梯次配置的坚固防御时才展开。在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采纳了什捷尔恩的看法，一般都要等到多功能的野战集团军取得必要的突破之后，才将独立的坦克编队投入战斗。但在这次会议上，朱可夫对什捷尔恩的看法未置可否。在对讨论情况的简短总结中，他认为对于自己的报告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29]

与朱可夫的报告类似，巴甫洛夫将军的报告也是关于机械化部队在装甲战中的使用问题。巴甫洛夫和朱可夫一样，指挥的也是一个对于苏联对德进攻战计划的实施来说至关重要的军区（西部军区）。作为30年代末红军装甲部队指导委员会的首脑，巴甫洛夫在苏联坦克理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芬兰战争期间，对于把坦克部队在陆军中广泛分散使用的效果，巴甫洛夫产生了怀疑，德国装甲师在西欧的成功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怀疑。巴甫洛夫的报告体现了一种新的思路：把坦克部队作为独立的兵种，在进攻战中大量地集中使用。巴甫洛夫自始至终都强调

自己的观点与朱可夫观点的兼容性，并重申了朱可夫的这样一个看法，即坦克可用来最大限度地穿透敌军的防御（50～100英里），摧毁敌军的预备队并取得战略行动的胜利。[30]

铁木辛哥在总结讲话中力挺朱可夫和巴甫洛夫报告中偏好进攻的主张，包括他们对现代进攻手段的速度和威力的评估。会议也考虑了防御问题。铁木辛哥的总结讲话有整整一大段都是讲这个问题的。他坚决认为，并不存在有人说的“当代防御战的危机”。有人认为，波兰和法国的速败证明，在火力强大且高度机动的当代进攻力量面前，防守是没有用的。铁木辛哥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在当代条件下的有效防御是可能的，但这种防御必须要有纵深，要分成若干区域和梯次。但铁木辛哥也明确表示，“防守不是打败敌人的决定性手段，只有进攻才能达到这一最终的目的。只是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发动进攻，或者是有助于创造进攻的必备条件时，才会采取防守的策略”。[31]

斯大林没有出席此次大会，但在1941年1月2日，与会者当中包括铁木辛哥、梅列茨科夫、朱可夫及巴甫洛夫在内的高级军官，都集中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召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向独裁者汇报大会的情况。[32] 据朱可夫说，让人意外的是，会议是由斯大林召集的，而且他当时还埋怨说，自己熬了个通宵，给铁木辛哥修改会议的总结讲话，但自己还没来得及把改过的发言稿给他，国防人民委员就已经讲完了。铁木辛哥说自己是把大会时间表和讲话稿一起给他的。斯大林怨气未消，说不能指望他什么都看。[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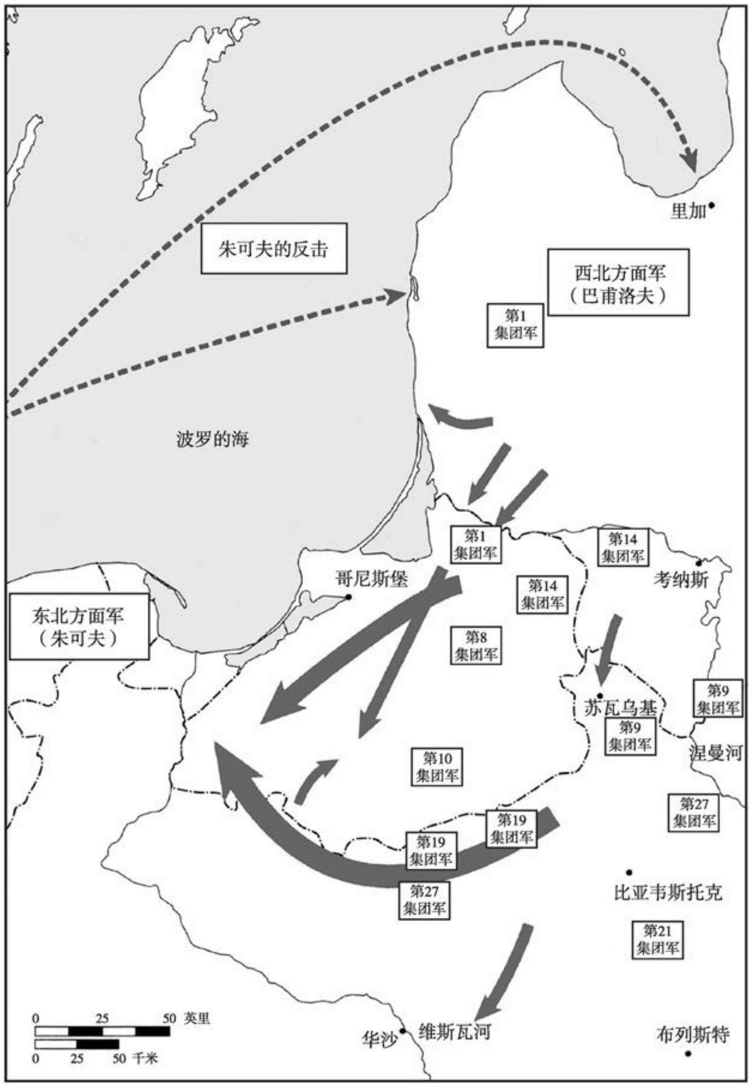
军演

同一天，总参谋部开始了两场军演中的第一场。在这些图上作业中，参与双方都拨给了一定的兵力和资源，而对于他们采取的措施和反措施，则由一个独立的评委会进行评估。评委会为首的是铁木辛哥、梅列茨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和苏联军方其他有名的人物。制订军演方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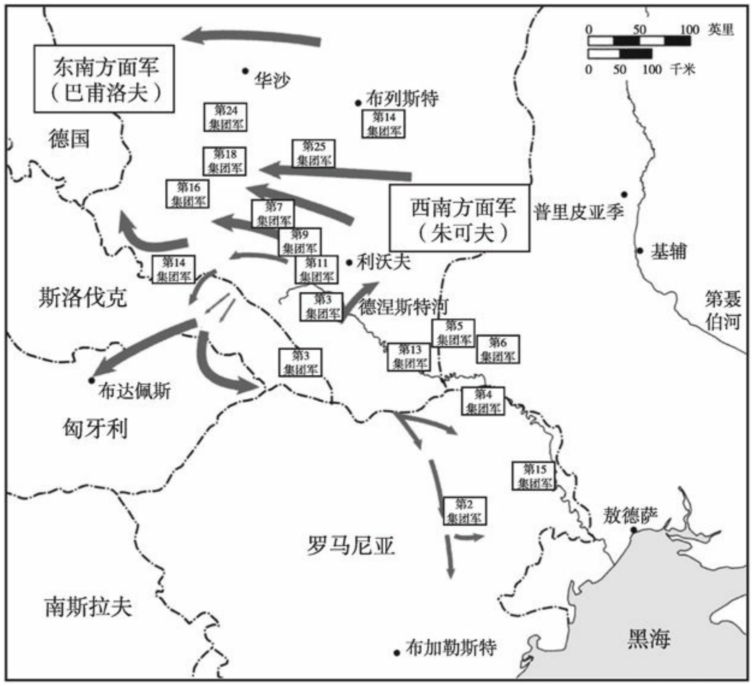
是总参作战部部长N.F.瓦图京将军领导的小组。演习的目的是，就当代攻防行动的计划与实施，给高级指挥官们一个至少是纸上谈兵的机会。

1941年1月2～6日的第一场演习的大致情节是，敌军从东普鲁士入侵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朱可夫领导的团队扮作西方（即德国）的部队，而巴甫洛夫指挥的则是东方（即苏联）的部队。巴甫洛夫先是设法限制敌方在边境地区的渗透，然后向自己的左翼发动猛烈的反攻，打算从背后包抄朱可夫的军队。朱可夫的应对是，把巴甫洛夫的军队困在自己的筑垒地域，同时却在自己的左翼向里加方向发动反攻（见地图3）。1月8～11日的第二场演习的重点是西南战场，它设想的是苏联入侵波兰的德占区并进攻德国的盟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这次演习中，朱可夫和巴甫洛夫互换了角色。朱可夫再次成功地实施了合围行动，攻入波兰德占区的腹地并歼灭了敌军大量的作战师（见地图4）。两次演习一次都没有进行到底，但朱可夫两次都明显占了上风。当然，对于巴甫洛夫，朱可夫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在哈拉哈河实施过大规模行动，有实战经验。

演习及其结果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发人深省。首先是这样一个假设，即德国人会率先采取敌对行动，而苏联人则在边境地区经过大约两周的持续战斗之后转入反攻。其次是两次演习都证实了在西南地段发动反入侵战略行动的优点，因而让“十月计划”把苏军集中在该地区的决定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最后是预计战争爆发时红军可能遭受的人员损失是每月12万人，但事实证明，这一数字被大大低估了。[34]



地图**3** 第一场军演，**1941**年**1**月**2**～**6**日



地图**4** 第二场军演，**1941**年**1**月**8**～**11**日

朱可夫显然只记得第一场演习。他回忆道：

> 利用有关敌人的实际资料和兵力情况，我展开行动的线路……刚好就是德军日后展开行动的线路。主要的打击就发生在日后发生的地方。编组的方式和日后在战争中的差不多。边界的轮廓、地形和形势，这一切使我做出的决策就和日后德国人做出的一样。[35]

想必是朱可夫在大会和演习中的表现打动了斯大林，所以他才会不顾朱可夫缺乏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经验，让他取代梅列茨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铁木辛哥的提携以及他本人熟悉白俄罗斯和基辅这两个军区的情况，对他的任命也起到了作用。同样重要的还有，朱可夫信奉在苏联的战争计划中体现的崇尚进攻的思想。苏联人想对德国打一场进攻战，而在斯大林的眼中，朱可夫就是那个可以谋划红军进攻的人。[36]

1941年1月14日，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了朱可夫和梅列茨科夫，并宣布了这一决定。据梅列茨科夫说，苏联独裁者说："铁木辛哥同志请求委任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这对梅列茨科夫来说是可以接

受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份差事他本来就不想干，他是在1940年夏天沙波什尼科夫病倒时被安排接替他的工作的。当时斯大林就告诉他，在找到更为合适的人选之前，暂且这样安排。[37] 如此看来，斯大林认为朱可夫就是他要找的人。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朱可夫对斯大林也心存敬畏，而且一直到苏联独裁者去世时为止都是如此。即便在朱可夫自己的名声和荣耀如日中天的1945年，在他与斯大林的关系中也是后者居于支配地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个人关系中的不平衡并没有妨碍在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创造性的而且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在把红军引向军事史上的最伟大的胜利之前，先使红军走到了完败的边缘。

---

[1] 关于斯大林的讲话，参见O.A.Rzheshevsky and O.Vekhvilyainen（eds.），*Zimnyaya Voina，1939-1940*（Moscow：Nauka，1999），pp.272-282。英文译文可见于A.O.Chubaryan and H.Shukman，eds.，*Stalin and the Soviet-Finnish War，1939～1940*（London：Frank Cass，2002）。

[2] “*Zimnyaya Voina*”：*Rabota nad Oshibkami，Aprel’-Mai 1940g*.（Moscow：Letnii Sad，2004），doc.82；*Glavnyi Voennyi Sovet RKKA，1938-1941*：*Dokumenty i Materialy*（Moscow：Rosspen，2004），p.5.对铁木辛哥改革所做的完美的概述，见于W.J.Spahr，*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Duress*（Novato，Calif.：Presidio，1997），chap.10。1940年7月24日，朱可夫成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

[3] J.Colvin，*Nomonhan*（London：Quartet，1999），p.13.

[4] 参见V.Anfilov，“Timoshenko，”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铁木辛哥没有出版过回忆录。

[5] *Na Priyome u Stalina*（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300.朱可夫第二天再次去见斯大林的时候，时间长了许多，但这次是和另外一些高级军官一起去的（p.301）。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把见到斯大林的日期以及自己被调到基辅的日期，错记成1940年5月初。

[6] Zhukov，*Vospominaniya*，vol.1，p.287.

[7] “O Prisvoenii Voinskikh Zvanii Vyeshemu Nachal’stvuushemu Sostavu Krasnoiarmii，” *Pravda*，June 5，1940.

[8] 详情参见R.S.Irinarkhov，*Kievskii Osobyi*（Minsk：Harvest，2006），以及M.Mel’tukhov，*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Moscow：Veche，2000）。

[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227-228.

[10] R.R.Reese，*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p.175-185.里斯的叙述依据的是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中有关基辅军区的记录。

[11] 苏联的进攻基本上是和平的，没出什么事情，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个小插曲：为了防止罗马尼亚人违背协议，从被占领地区转移禁止转移的设备和物资，他曾命令两个空降旅在两个坦克旅的支援下，夺取普鲁特（Prut）河上几座桥梁的控制权。第二天，斯大林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罗马尼亚大使提出抗议，说苏联坦克登上了普鲁特河岸。斯大林想知道那是怎么做到的。当朱可夫解释说只是把空降部队空投到那里而坦克则是独自从陆路设法到达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哈哈大笑。苏联书报审查人员看来把这种幽默感都毁掉了，他们把这整段的内容都从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删掉了。共产党控制的罗马尼亚在二战后成了苏联的盟友，但对于许多罗马尼亚人来说，失去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依然是他们心中的痛。直到朱可夫回忆录的第十版在1990年出版的时候，这段让人不快的内容才又重新出现。Zhukov，*Vospominaniya*，vol.1，pp.289-291.

[12] 指示的原文可见于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5），pp.150-154。另见Reese，R.R. *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p.184。

[13]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5.

[14] O.P 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81-82.摘自卡拉什尼科夫回忆录中的一段内容，可见于*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p.97-99。

[15]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144.

[16] 参见O.Rzheshevsky “Shaposhnikov，” in Shukman，H.（ed.）. *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1997。

[17] *1941 God*，vol.2（Moscow：Demokratiya，1998），pp.557-571.

[18] *1941 God*，vol.1，doc.95.

[19] *1941 God*，doc.117.

[20] *1941 God*，doc.134.

[21] G.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1-124.

[22] M.V.Zakharov，*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 （Moscow：Ast，1989），pp.220-224.

[23] *1941 God* ，vol.1，doc.224.

[2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121.

[25] I.Kh.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 （Moscow：Voenizdat，1977），pp.7-9.

[26]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 （Moscow：Svyatigor，2006），pp.110-113.

[27] 会议议程的记录可见于"Nakanune Voiny：Materialy Soveshchaniya Vyschego Rukovodyashchego Sostava RKKA 23-31 Dekabrya 1940g，"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vol.12（1）（Moscow：Terra，1993）。

[28] G.Zhukov，"Kharakter Sovremnnoi Nastupatel'noi Operatsii，" in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pp.129-151.

[29] G.Zhukov，"Kharakter Sovremnnoi Nastupatel'noi Operatsii，" in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pp.152-172.

[30] D.G.Pavlov，"Ispol'zovanie Mekhanizirovannykh Soedinenii v Sovremennoi Nasupatel'noi Operatsi i Vvod Mekhanizirovannogo Korpusa v Proryv，" in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pp.252-300.关于巴甫洛夫在苏联坦克理论发展中的作用，参见M.R.Habeck，*Storm of Steel*：*The Development of Armou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19-1939*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assim。

[31] "Zakluchitel'naya Rech'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ouza SSR Geroya i 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S.K.Timoshenko na Voennom Soveshchanii 31 Dekabrya 1940g，"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 naya Voina*，*1941-1945* ，vol.12（1）（Moscow：Terra，1993），pp.338-372.

[32] *Na Priyome u Stalina* ，p.322.

[33] 对这个小插曲的最完整的描述，可见于未经删节的朱可夫回忆录：Zhukov，*Vospominaniya* ，vol.1，pp.291-292.由此看来，铁木辛哥的讲话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武装力量内部发行之前，已经吸收了斯大林的修改意见。参见*1941 God* ，vol.1，p.498，no.2.铁木辛哥1941年讲话的复印件可见于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34] 关于这两场军演，参见Zakharov，M.V. *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 . Moscow：Ast，2005，pp.239-250；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pp.127-129；P.N.Bobylev，“K Kakoi Voine Gotovilsya General'nyishtab RKKA v 1941 godu，”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no.5，1995；及B.Fugate and L.Dvoretsky，*Thunder on the Dnepr*：*Zhukov-Stalin and the Defeat of Hitler's Blitzkrieg* （Novato，Calif.：Presidio，1997），chap.1。富盖特和德沃列茨基对这两场军演的论述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说：在苏联人应对德国入侵的计划中，要故意牺牲掉巴甫洛夫的西部军区，目的是先把德国国防军引入俄国腹地，然后再发动反攻，而这样的反攻最终是于1941年12月在莫斯科开始的。为此，富盖特和德沃列茨基还设想，在1941年2月，还有过第三场演习，没让巴甫洛夫参加，而上述情节就是在第三场演习中发生的。这个猜测很有趣，但现在并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支持。它把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想得太有先见之明了。

[35]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89。

[36] E.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pp.826-827.

[37] K.Meretskov，*Serving the Peopl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1），pp.122-127；*Na Priyome u Stalina* ，p.322.

6 灾难的制造者？朱可夫与1941年6月22日

1941年夏天，红军连遭败绩，而且其失利之惨重，是史上其他军队所未曾有过的。从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俄国开始，红军几周之内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了数百万，而且几个月之后就败退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到1941年秋天，希特勒企图用闪电战一举征服俄国的计划眼看就要得逞了，苏联作为独立国家的存续已命悬一线。

当6月22日的灾难降临到红军和苏联人民头上的时候，朱可夫是总参谋长，而且主要负责意料之中的对德战争的计划与备战工作，这也是他传记中最重要的内容。1941年7月底，斯大林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去负责预备队方面军，并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对德军发动反攻。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他之所以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不是因为他不称职，而是因为他提出的把苏军撤出基辅的建议触怒了斯大林。[1] 1941年9月德军包围乌克兰首府的时候，红军损失了50万人，他此时这样说是想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干系。实际上，派他到预备队方面军并不是斯大林对他的惩罚，甚至也不是降级，而是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朱可夫对这项任务十分期待，而且执行得也非常成功。他在1941年8～9月发起的叶利尼亚攻势，实际上是苏德战争初期的一个转折点。它是红军对德国国防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它把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延误了几周的时间，而这几周非常关键。

总参谋长

朱可夫是在1941年1月14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但上任是在2月1日。除了总参谋长一职，他还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并在3月15日被安排

另外再负责军队的通信、燃料供给、防空及总参军事学院的管理。[2] 他作为总参谋长新确立起来的地位还反映在，他于1941年2月的苏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即可以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没有投票权）。中央委员会照理说是苏共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实际上，它是受斯大林和政治局支配的。朱可夫的当选，虽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非常重要，但作为党员，这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不过，作为党和军队团结一致的象征，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成为苏联精英中的一分子的朱可夫，在格拉诺夫斯基街（Granovsky Street）的一幢专门的大楼里得到了一套公寓。那是一条安静的小巷子，就在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道路边上。他的邻居中有布琼尼元帅和铁木辛哥元帅，而前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也住在隔壁的楼里。朱可夫一家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时间，即便战后朱可夫被外放，他们的住处也没有被收走。

成为总参谋长之后，朱可夫头几个月一直都在深入了解总参谋部的各项工作。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他必须尽快掌握它的运作，这一点随着战争进入了倒计时而显得格外紧迫，因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希特勒正准备发动进攻。

1939年8月“苏德协定”签订之后，苏德合作一度呈现出要变为永久伙伴的样子。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广泛协作。苏联成了德国战争经济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国。反过来，德国人也向苏联人提供机器、工业产品和武器装备。德国占领波兰之后，斯大林支持希特勒发出的和平倡议，而在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苏联人在政治上也得到了那位元首的支持。德国潜艇获准在摩尔曼斯克北部的苏联领土上建立基地。宣传方面，双方也不再相互攻击，这一点与20世纪30年代大不一样，那时的苏联人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纳粹德国发起反法西斯圣战，而纳粹则把共产党人（以及犹太人）视为自己主要的敌人。

1940年夏天，随着德国打败法国，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斯大林原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会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即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西欧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但他此时却发现，自己碰到的是一个不仅统治了欧洲大陆，还扬言要征服不列颠的拍档。虽然斯大林准备与希特勒结盟，可他并不相信希特勒。1940年7月，来自德国的威胁加剧，为此，苏联人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通过比萨拉比亚行动向罗马尼亚境内扩张，时任基辅军区司令的朱可夫参与了那次行动。斯大林还试图与德国及其法西斯盟国——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意大利进行谈判，就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但希特勒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而且还把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要求苏联停止对罗马尼亚领土的进一步蚕食。

斯大林采取的这些举措本来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与德国人谈判，以签订新的苏德条约，但希特勒却认为苏联人的举动是攻击性的，这使他开始重新考虑在东方谋求“生存空间”，向俄境内扩张并使其殖民化。

1940年11月，苏德关系的危机已到了严重的关头，当时斯大林派自己的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由于苏联人拒绝了希特勒的提议，不愿在德意日轴心集团中充当低级伙伴，谈判失败了。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之后，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巴巴罗萨”是入侵俄国的代号。[3]

从1940年中期开始，来自军方、政界和外交领域等各种渠道的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报告就如同涓涓细流一般不断地流向莫斯科。1941年年初，在德国人为入侵而开始积极准备的时候，情报就更多了，涓涓细流最终变成了潮水。传到斯大林那里的情报，朱可夫并不全都了解，但他照例可以收到苏军情报部门这个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所提供的情报。[4]

按照俄文首字母的缩写通常被称为“格鲁乌”（GRU，情报总局）的苏军情报机构，隶属于总参谋部。1941年时，格鲁乌的负责人是副总参谋长F.I.戈利科夫（F.I.Golikov）将军。通过格鲁乌的活动搜集到的情报，并不全都送给朱可夫，但他收到的情报的确是最为关键的，而戈利科夫有关敌军沿苏联边境集结的情报简报对于苏联的战争计划和备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3月10日，戈利科夫向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呈交了一份有关德国武装力量兵力情况的报告。据苏联人在1940年9月的估计，德军有228个师，其中包括15～17个坦克师和8～10个摩托化师。六个月后，德军有263个师，包括20个坦克师和20个摩托化师。同一时期，西欧的德军也在向东欧大量（10%）调动，现在德军兵力的47%都集中在了东欧。对苏联人而言尤其重要的是，东欧德军的部署进行了调整，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东南方向（即乌克兰对面）。

3月20日，戈利科夫提交了一份情报简报，它里面的那些情报都指出，德军将于1941年春天进攻苏联。戈利科夫强调，这些情报大多是来源于英美。他的结论是：“对苏军事行动最有可能是在打败英国之后或在英德缔结体面的和约之后开始。有关对苏战争在今年春天不可避免的那些传言和文件证据，应该是英国甚至德国情报部门散布的假情报。”戈利科夫的这份报告受到了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人的诟病，认为这位情报首脑的观点是为了迎合斯大林。不过，戈利科夫随后的报告又较为客观地提供了德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沿苏联边境集结的情报。4月4日，他报告说，德国军队正在不断地由西向东调动，包括又调来了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4月16日，他又报告说，在东普鲁士和波兰的德占区，德军有78个师。他还特意指出，有报告说德国国防军军官的家属们撤离了华沙地区。戈利科夫在4月26日的报告中说，现在在苏联边境附近的德军有95～100个师。到5月5日时，这一估计又增加到103～107个，而到5月15日则增加到114～119个，其中有23～24个师针对的是波

罗的海特别军区，30个师针对的是西部特别军区，33～36个师针对的是基辅特别军区。5月31日，戈利科夫报告说，苏联边境附近的德军有120～122个师。他强调，在参加1941年4月入侵希腊和南斯拉夫行动的部队腾出手之后，德军右翼（与乌克兰相对）的兵力明显加强了。同时，戈利科夫也指出，德国人（在包括北非和地中海在内的各个战场上）仍然部署了122～126个师对付英国人，所以，他们还在考虑入侵英国。[5]

奇怪的是，苏联人并没有把这些新的不祥的预兆看作迫在眉睫的威胁。对于这件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事情，现在的解释是：苏联人起初夸大了德军的总兵力。他们估计，截止到1941年春天，其数量已达到300个师，而实际上当时只有不到200个师。从这个角度看，苏联人估计与自己对阵的有120个师，既不算多，也不像是马上就要入侵的样子。[6]

德国在集结兵力，苏联人的反应则是继续加紧备战。在朱可夫最初签发的文件中，有一份1941年的动员计划。这份时间为1941年2月中旬的计划，要把红军的兵力从400万人出头扩充到800万人以上。在计划增加的300个师当中，有60个坦克师和30个摩托化师，它们将组成30个机械化军，每个机械化军有3个师。绝大部分红军（650万人）都将部署在苏联西部的各个军区。该动员计划将征召近500万预备役人员，其中包括60万名军官和88.5万名军士。苏联人当时打算到什么时候完成动员，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在1941年年底之前。这样，到6月德军发动进攻的时候，红军虽说有300多个师，包括198个步兵师、61个坦克师、31个摩托化师和13个骑兵师，但许多师都不满员，军事人员总数缺编100万人。部署在西部各个军区的兵力不到3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西南，那里有97个师，包括27个坦克师。[7]

从1940年夏天开始，总参谋部就在制订1941年的动员计划，所以，它和刚上任的朱可夫没有多大的关系。在经过修订的1941年3月8日的苏联战争计划（“三月计划”）中，朱可夫可能有较多的发言权，但它对现

存的日期为1940年10月的计划（“十月计划”）改动并不大。三月计划估计，德军有260个师，其中有大约110个师的部署是针对苏联的。不过，它认为德国人要等到对英国的战事结束之后，才能调动200个师的兵力，并在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70个师的支援下对付苏联。为了应对由这支力量发动的进攻，苏联人计划在其西部各个军区部署至少250个师。关键在于，三月计划与十月计划一样，虽然没有排除德军会在北方从东普鲁士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都以为主攻方向会在南方。苏联计划采取的对策是，从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并突入波兰的南部。[8]

苏联人似乎在1941年5月中旬还准备了另一个版本的战争计划（“五月计划”）。不过，这份文件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地位如何，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份日期为5月15日的有争议的文件，是由时任作战部副部长A.M.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手写并由其顶头上司瓦图京修改的。该计划的标题是“在与德国及其盟国开战的情况下，对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若干考虑”，并附有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签名——这就是人们常说但并不准确的所谓的“朱可夫计划”。五月计划与1940年的十月计划以及1941年的三月计划大体是一样的：抵挡住德军的进攻，然后在行动的主战场发起反击，目标是摧毁敌军的主力，并把战火烧到敌方的境内（见地图5）。但是，五月计划中有一个现在引发了很多争议的新内容——建议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 鉴于德国目前使其军队——包括后方——保持动员状态，它有可能先于我们完成部署并发动突然进攻。



地图**5** 苏联对德进攻计划，**1941**年**5**月

为防止这种情况（并摧毁德军），我认为有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德军的指挥机构，有必要在部署上抢在敌人的前面，并趁德军还在部署、尚未组织起战线或尚未使军队的各个部门协同一致的时候，就对其发起进攻。红军首要的战略目标是，摧毁部署在德布林（Demblin）以南的德军主力……西南方面军的主要打击方向是克拉科夫和卡托维茨（Katowitze），以切断德国与其南方盟国之间的联系。西方方面军的左翼沿塞德莱茨（Sedletz）和德布林方向发起支援进攻，目标是牵制华沙的敌军并帮助西南方面军摧毁卢布林的敌军编队。对芬兰、东普鲁士、匈牙利及罗马尼亚要进行积极防御，并做好在有利条件下进攻罗马尼亚的准备。

文件最后请求斯大林允许进行“及时”而“秘密”的动员，并集中统帅部的各个预备集团军。[9]

红军崇尚进攻的军事思想和准备一旦进入敌对状况就对德国打进攻战，这让有些历史学家误以为斯大林打算在1941年夏天对希特勒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根据这种看法，关于1941年6月22日还有一个未曾讲述的故事：红军之所以会被打得措手不及，不是因为德军的入侵来得突然，而是因为红军本身当时正在忙于准备进攻。1941年的五月计划是否能作为证据来支持红军准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一假说呢？问题在于，这份文件虽然是准备交给斯大林的，但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交给了斯大林。20世纪90年代，五月计划的存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后便有传闻说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曾经与斯大林谈过这个计划，但这都是些事后的说法。从这些相当可疑的事后说法中又衍生出这样一则最常听到的故事：华西列夫斯基通过修改1941年的三月计划而重新制订的五月计划，与斯大林1941年5月5日对红军各参谋学院2000名毕业学员发表的秘密讲话有关。斯大林每次公开或半公开的讲话都被广为传播，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但这一次却没有公布讲话的原文，只是在第二天的《真理报》上有一篇简短的报道，标题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意外》：

>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讲话中着重提到了红军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深刻变化。他还基于现代战争的经验强调说，红军的组织结构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而且基本上都进行了重新装备。斯大林同志对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军官们表示欢迎，并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成功。[10]

毫不奇怪，关于斯大林对他的毕业学员可能还讲了哪些别的内容，当时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其中之一就是说，斯大林发出警告，与德国必有一战；而另一种说法是，他赞成进攻战，以扩大社会主义体系的范围。苏联人透露给德国人的说法是，斯大林谈到了与希特勒的新的妥协方案。与传闻相比，真相往往平淡无奇。从1995年公开的斯大林讲话的

原文来看，他讲话的主题就像《真理报》报道的那样，是红军的改革、整顿和重新装备。但讲话也涉及与改革及红军实力有关的许多细节，而这些都属于大战之前不能公开的信息。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场招待会。斯大林在招待会上像往常一样数次提议干杯。他的祝酒词有些被记了下来。据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日记的记载，斯大林的“心情很好”，并且说“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同时也是备战的政策。没有进攻就没有防守。军队必须养成崇尚进攻的精神。我们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另一个在场的人的记录则是，斯大林说：“好的防守意味着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据官方的记录，斯大林还说：

> 和平政策是好事。我们直到现在……采取的都是一种（基于）防御的路线……但是现在，当我们的军队经过重建，装备了大量的现代战争装备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就必然要从防御转向进攻。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行动必须要有攻击性。军事思想也必须从防御转向进攻。我们必须要用崇尚进攻的精神来改造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宣传、我们的鼓动、我们的报刊。红军是一支现代的军队，而现代的军队是崇尚进攻的军队。[11]

人们的推测是，在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和祝酒词之后，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决定下令制订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在这一点上，五月计划的故事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当时否决了计划草案，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说他同意了，而且还下令准备在1941年夏末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弄清楚，斯大林有没有看过五月计划或者他对该计划有什么看法，但是，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当时的想法，因为如果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是不会制订出这样的草案的。但是，就像历史学家埃文·莫兹利提出的，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当时在想的，很可能并不是立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是让红军“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到了德国人要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此之前，对德国人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12] 至于那个时

刻到底是什么时候，五月计划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格鲁乌的情报报告指出，德国人并不会马上发动进攻。同时，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关心的是加紧苏联的动员计划，而华西列夫斯基的文件也许是想——并且也许是用来——说服斯大林加快动员的步伐。不管怎么样，五月计划并没有带来任何具体的后果。红军在继续按部就班地加强军事力量，但对于统帅部的各个预备集团军来说，无论在哪个阶段都没有进行过秘密动员，说要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采取的动员措施如下：

·从1941年2月开始，在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西部特别军区组建3个方面军（集团军群）司令部（西北、西和西南）。

·3月8日，决定征召90万预备役人员。

·5月13日，命令各军区将28个师和9个军的司令部及4个集团军（第16、19、21和22集团军）司令部从内地移往边境。

·5月20日，要求边境各军区制订详细的国境守卫计划。

·5月27日，命令边境各军区修建野战指挥所。

·截止到6月初，以大规模训练演习的名义征召了近80万的预备役人员。

·6月，有38500人被派驻边境各军区的筑垒地域。

·6月12～15日，命令各军区将部队向边境方向移动。

·6月19日，命令将各军区司令部移往新指挥所，同时对各个目标进行伪装并疏散飞机。[13]

这些措施确实相当全面，但就像埃文·莫兹利还指出的，仍然远远不足以发动五月计划草案中设想的先发制人的打击。[14]

朱可夫这段时间经常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去见他。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记载，从1941年的2月1日至6月21日，朱可夫总共见了斯大林26次。其中除了有一次之外，他都是和铁木辛哥一起去的。最长的

一次见面（有3个多小时）是在5月24日，当时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以及军队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瓦图京和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都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有人提出，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要在1941年夏天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那次会议更有可能是讨论当前的动员措施。况且斯大林在之后的十天当中，并没有见过朱可夫、铁木辛哥或他的任何将领，这不像是做出了重大决策要与德国开战的样子。[15]

归根结底，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想要或打算在1941年夏天与希特勒开战（至于他是不是考虑过到1942年苏联备战工作完成的时候有这种可能性，那是另外一回事）。相反，他想尽可能地推迟开战——实际上，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军事分析家都把这个时间想得太长了。直到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仍然相信战争可以再延后数月，相信即使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苏联的防线也可以守住，并且有时间组织反攻。

战争倒计时

对于德国人的进攻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虽然苏联人可能还心存侥幸，但在1941年6月，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进攻也许会来得比他们想象的要快。从西部边境的各个军区都传来德军准备入侵的详细情报。尤其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有报告说，罗马尼亚和芬兰也在进行战争动员。[16] 同时，在政治战线上，德国人对苏联人想在两国之间重启谈判的暗示不屑一顾——这些暗示所采取的方式是，由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在6月13日发表声明，驳斥苏德即将开战的谣言。塔斯社说，苏联在遵守苏德互不侵犯的条约，德国也是如此，相反的传闻都是谎言，是挑拨离间。声明否认德国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暗示，即使那样，也是可以协商的。在所剩无几的太平日子里，苏联人向德国人摆出了若干安抚的姿态，但柏林不为所动。[17] 6月15日，格鲁乌的最新情报简报证

实，德国已把大量的军队调往东方，现在，沿苏联边境部署的德国国防军有120～122个师，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南方向。[18]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和铁木辛哥对不断迫近的战争危险做出了反应，并在6月14日面见斯大林，敦促他向边境地区的所有部队发出警报，并允许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部署更多的兵力——这些措施将加强防御掩护，对在战争来临时保护苏联的全面动员是必不可少的。但斯大林却表示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带有挑衅的意味，而且，驻守在边境地区的力量无论如何已经足够强大了。“我们离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朱可夫回忆说，“我想走一会儿。我的心情很郁闷。在克里姆林宫旁边的亚历山德罗夫花园，孩子们正在无忧无虑地嬉戏。我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对于这些孩子，对于他们的未来，对于整个国家，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19] 很感人的故事，只是是否有过这样的见面还未可知。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是在6月11日见他的，6月18日又见了一次，但在此期间没有。目前没有任何同时期的文献材料——这与事后回忆所说的相反——可以证明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比斯大林更清楚德国威胁的紧迫性，至少在入侵即将开始之前是这样的。6月19日，朱可夫命令西部边境地区的各个方面军将司令部移往前方的指挥所，但截止日期是6月23日，也就是德军实际上已经发动进攻的第二天。

历史学家们对于该问题的讨论，都把焦点集中在诸如斯大林对于情报的误读，或者是他过于相信希特勒在打败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之类的问题之上。这些考虑都是合理的，但斯大林之所以对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种种警报充耳不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以为即便自己失算，遭到希特勒的突然袭击，那也没多大关系。[20]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总参谋部都没有料到，德国人会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就在进攻中投入巨大的军事力量。正如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的，苏联人预计敌对行动开始时会在边境地区先进行几天规模相对较小的战斗。在此期间，双方将对其主力

进行动员，然后投入战斗。和斯大林一样，朱可夫与苏军总参谋部认为己方在边境地区采取的防御措施，完全可以挺过开战之初的那段时间，从而为红军其他部队完成动员并转入计划中的反攻赢得时间。

6月21日晚，朱可夫在基辅军区的老参谋长普尔卡耶夫打电话给他，说一名德军逃兵主动提供情报，警告说德军正在开往出发地域，并于次日发动进攻。[21] 现在看来，单是这件事还不可能引起多大的担忧，随后采取的那些措施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实际上，催促采取行动的很可能正是斯大林本人。他是唯一掌握各方面情报的人——不仅仅是格鲁乌提供的情报，还有其他情报机构以及政界和外交人员的报告。对于斯大林来说，很显然，进攻确有可能，尽管他或许还心存侥幸。从晚上8点50分开始，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与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议。[22] 会议结果就是向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西部军区以及基辅军区等下达命令，警告说德军有可能在6月22日或23日发动突袭。命令要求各军区避免采取任何带有挑衅意味的行动，但要使自己的部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这道命令在6月22日零点过后不久便下达给各个军区。

“巴巴罗萨行动”

将近拂晓时分，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开始了。德军152个师在北方14个芬兰师和南方14个罗马尼亚师的掩护下，在1000英里的战线上发起猛攻。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军队、西班牙的“蓝色师”、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小分队以及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国招募的志愿部队，也陆续加入了这支350万人的入侵大军。

入侵的军队分为三个集群：北方集团军群由东普鲁士发起进攻，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向列宁格勒推进；中央集团军群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前进；南方集团军群则向乌克兰及其首府基辅方向前进。与苏联预料的相反，德军的主攻方向集中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

沿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方向。德军入侵行动的代号是“巴巴罗萨”，这是为了纪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绰号“红胡子”）。他为了使基督教圣地摆脱穆斯林的控制，曾经领导过12世纪的一次十字军东征（见地图6）。

在1940年12月18日的命令中，希特勒已经明确了此次入侵的战略目标：

> 德国国防军必须做好准备，一举击败苏俄……装甲先头部队要通过大胆、迅速的穿插，摧毁驻守在俄国西部的（红）军大部，要防止还有战斗力的人员撤退到辽阔的俄国内地……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致沿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防御俄国的屏障。

德国人打算采取的战术与他们在波兰和法国使用的几乎一模一样。先由强大的装甲师组成的密集纵队突破敌方的防线并从背后包抄苏联军队，随后由步兵师摧毁被包围的敌军并守住已经夺取的领土。

另外，德国人计划在俄国发动的是毁灭战、灭绝战（Vernichtungskrieg）。要摧毁的不仅是红军，还有苏联的整个共产主义政权。按照纳粹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苏联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是受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的共产主义政权。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把俄国的各个斯拉夫民族说成是低等种族（Untermenschen）。与对待犹太人不一样，纳粹为斯拉夫人安排的命运不是灭绝或驱逐，而是奴役。



地图6 **“**巴巴罗萨行动**”**，**1941**年**6**～**12**月

希特勒要对俄国发动的战争，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战争。“对俄国的战争，”他在1941年告诉自己的将军们，“是不能有骑士风度的；这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种族的斗争，因此，必须要以前所未有的无情与残酷来进行这场斗争。”随后他又发布命令，让德国士兵在俄国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受到惩罚；他还命令他们对所有共产党员一律就地枪决。犹太人大屠杀的起因就包含在这些命令之中——这种大屠杀是从1941～1942年德国人处死100万苏联犹太人开始的。德国人野蛮对待苏

联战俘的起因也在于这些命令。苏联战俘在被囚禁期间，由于条件恶劣、饥饿、疾病和虐待而死亡的达到了300万人。

随着德军入侵的详细情况慢慢地传到莫斯科，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在清晨5点45分返回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们待了将近三个小时，并在早晨7点15分下达了二号命令，要求部队歼灭那些越过边境的敌军，但自己不得擅自越过边境。空军接到的命令是，攻击空中和地面的敌军，并向德国境内60～100英里的纵深发动进攻，但不得擅自飞越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上空。当晚9点15分，又发布了三号命令，说德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西北方向立陶宛国境线附近的苏瓦乌基（Suvalki）突出部和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的扎莫斯季耶（Zamost’e）。在这些地区，虽然“敌军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在国境线的其他地段……敌人的进攻已被击退，而且损失惨重”。为此，命令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进攻苏瓦乌基的敌军，并在6月24日之前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地区。为发动此次反击，命令还要求西方方面军投入2个机械化军的兵力对苏瓦乌基德军的侧翼和后方进行有力的回击。在南方，命令要求西南方面军进攻、包围并歼灭扎莫斯季耶地区的敌军，然后向苏联边界以西100千米的卢布林前进，并在6月24日之前占领该地区。这次行动计划动用5个机械化军，并集中方面军所有的空中力量。[23] 除了在南方发动反攻的胃口没有那么大，以及要求立即而不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动员之后再发动反攻之外，三号命令与一月军演及三月和五月战争计划中设想的情形非常相似。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一心想撇清自己与三号命令的干系。按照他对事态发展的说法，6月22日下午1点，斯大林打电话给他，命令他作为统帅部的代表立即前往基辅的西南方面军。“我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基辅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正在那里等我。”在自己到达西南方面军之后，朱可夫说，瓦图京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有关三号命令的情况以及斯大林要求也署上他的名字。朱可夫声称，要是让他来处理，他会等

到形势变得较为明朗之后再下令发动反击。[24] 这里的问题在于，斯大林办公室的日志表明，从下午2点到4点，朱可夫一直在和军方其他高级军官一起开会。此次会议有可能不仅讨论了前线的形势，还讨论了如何实施谋划已久的反攻。另外，根据巴格拉米扬的回忆录，朱可夫是在西南方面军接到三号命令之后才到达那里的。[25]

朱可夫之所以想撇清自己与三号命令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道命令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可是，考虑到他本人对进攻的偏好，没有理由认为他当时对于该命令中所体现的行动方针不是完全赞同的。实际上，在这种紧要关头，若不是为了专门监督落实三号命令所要求的大反攻，很难理解为什么要把他这位总参谋长派到乌克兰。总参谋部一直认为乌克兰会成为主战场，而苏军的主力也部署在那里。有可能正是朱可夫自己主动要求把他派到他以前指挥过的西南方面军，以协助执行他本人参与制订的计划。结果，朱可夫只在西南停留了很短的时间。6月26日下午，他又回到莫斯科，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26]

朱可夫在乌克兰期间，西南方面军尝试发动的反攻错误百出，虽说反攻确实在短期内迟滞了德军向乌克兰腹地的推进——迟滞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德军对乌克兰的进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猛烈，而且西南方面军是苏联西部国境线上最强大的力量，有4个集团军、8个机械化军、7个步兵军，以及1个空降兵军。西方方面军的情况完全不同，巴甫洛夫面对的是德军最强大的力量。朱可夫后来对巴甫洛夫有很多批评，特别是批评这位西方方面军司令对于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自己的部队失去了控制。但是，巴甫洛夫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执行总参谋部的三号命令。他把自己第二梯队的部队深入到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突出部——那里已到了波兰中部——结果使自己的部队陷入了德军大规模的两翼合围。德军在明斯克以东不远的地方合上双钳，落入包围圈的红军有30个师，最后有40万人被俘。当明斯克于6月底陷落的时候，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红军的第二大主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见地图7）。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把朱可夫紧急召回莫斯科。据朱可夫说，6月29日，斯大林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两次都因为西方战略方向的形势而大发雷霆”。[27] 此事的另一位目击者是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朱可夫说不出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时，斯大林对他发火了：“总参谋部是干什么的？要是开战头几天总参谋长就惊慌失措，不和自己的部队保持联络，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指挥任何人，那他是干什么的？”据米高扬说，朱可夫“一下子哭了，跑进了别的房间。莫洛托夫赶紧跟在他后面……过了有5到10分钟，莫洛托夫和朱可夫一起回来了，后者看上去已经平静下来，可眼里仍然含着泪水”。[28] 米高扬的故事不太可信，因为这无疑是赫鲁晓夫那帮人为了指责朱可夫而编造的，是要诋毁他个人的名声，不过，它确实也抓住了一点，那就是在战争初期损失惨重的时候，斯大林和自己的统帅部的紧张关系。



地图7 边境地区的战斗，**1941**年**6**月**22**日～**7**月**9**日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在德国人发动进攻后，斯大林惊慌失措，沮丧不已，直到在自己政治局同事的催促下才恢复过来。但是据朱可夫说："斯大林这个人意志坚强，绝不是懦夫。只有一次我看到他有点消沉。那是在1941年6月22日的黎明，当时他以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希望破灭了。1941年6月22日之后，斯大林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坚定而沉着地掌管着这个国家……"[29]

7月1日，斯大林解除了巴甫洛夫的职务，并由铁木辛哥接任西方方

面军司令。[30] 不久，巴甫洛夫就和他的参谋长、通信主任及西方方面军其他高级军官一起被捕了。在7月16日宣布逮捕的决议中，斯大林说自己要给任何违反纪律的高级军官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31] 巴甫洛夫被捕时起初受到的指控是卷入反苏阴谋，但在7月22日军事法庭将他和其他一些人判处死刑的时候，罪名是怯战、制造恐慌、玩忽职守和擅自撤退。[32] 实际上，巴甫洛夫不过是1941年6月22日的替罪羊，是包括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在内的苏联军政领导层所犯的灾难性错误的替罪羊。

前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也被捕了，因为巴甫洛夫在严刑拷打之下，把他供成了反苏阴谋的同谋。不过，梅列茨科夫虽然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刑审讯，但还是被无罪释放了，并在9月作为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列宁格勒地区，直到1945年才离开那里。[33] 红军空军的一些高级军官也成了斯大林震怒之下的牺牲品——他们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应该为1941年6月22日德国空军对苏联机场的毁灭性打击负责。这其中就包括朱可夫从哈拉哈河战役开始的老对头什捷尔恩将军。德军入侵的时候，他刚好负责苏联的对空防御。1941年10月，什捷尔恩和其他人一样，未经审判就被枪毙了。

此次对军队的清洗，是苏联独裁者在红军防线崩溃和红军被迫败退到俄国内地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若干措施之一。[34] 6月30日，斯大林发布命令，成立国防委员会（俄文首字母缩写为GKO）。由斯大林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成了某种形式的战时内阁，负责指导和掌控苏联所有方面的战争努力。

7月10日，于6月23日成立的由铁木辛哥任主席的总司令部大本营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由斯大林任主席。同一天，红军的五个“方面军”（北方、西北方、西方、西南方和南方）被置于三个战略“方向”的领导之下，每个战略方向都有多个方面军。指挥这三个战略方向

的是斯大林骑兵小集团的成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被派去指挥西北战略方向，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方战略方向，布琼尼元帅指挥西南战略方向。7月19日，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8月8日，他成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随着斯大林就任最高统帅，苏联整个战争努力的组织和方向也就被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见图1）。

斯大林认为，红军在最初阶段的败退，部分原因在于纪律松弛，特别是指挥人员。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俄国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办法一样：在政治上加强对武装力量的控制。7月16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政治宣传局被改组为红军总政治局（俄文缩写为GPU）。同时，在武装力量中重新采用军事委员制。这意味着会再次任命政工军官，他将有权否决指挥方面的决定并在各级武装力量中担任副指挥官的角色。7月20日，斯大林和总政治局新任局长列夫·梅赫利斯（Lev Mekhlis）将军向所有政治委员发布命令，强调他们的特殊职责是要维护武装力量的纪律，严厉处置怯战分子、逃兵和制造恐慌者。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一个隶属于内务部的特别机构，负责与红军中的间谍分子以及叛徒做斗争，并有权当场处死逃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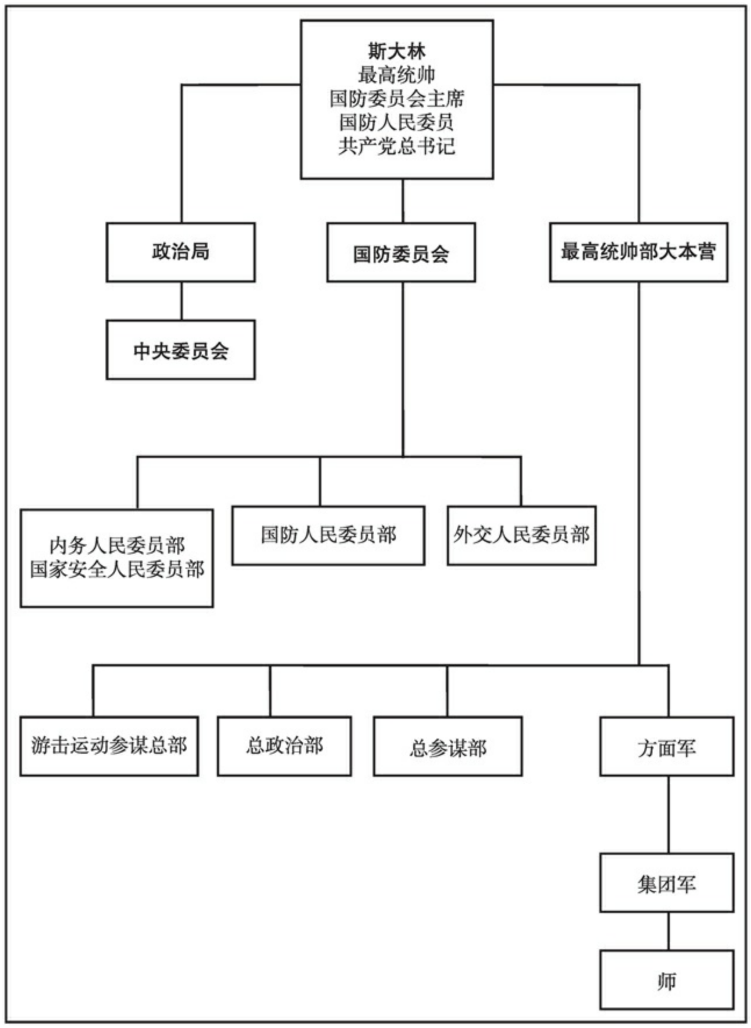


图**1**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政决策结构示意

8月16日，斯大林发布第270号命令。这道由朱可夫等人签署并传达给所有武装部队成员的命令，要求处死怯战和临阵脱逃者，战斗中畏缩不前的指挥官要被立即撤职，被包围的部队要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最严厉的是，斯大林还宣布，从今以后，对怯战分子、逃兵和叛徒的家属有可能也要逮捕。几天后，斯大林下令，对在行动中失踪的高级指挥官和政治委员的姓名，连同其近亲的姓名，都要有一个名单。首批名单要在9月8日之前交给总参谋部，此后是在每月的1日和15日。9月12日，斯大林命令前线指挥官成立“督战队”，阻止红军士兵向后逃跑，并清除煽动恐慌或临阵脱逃的人。

由于铁木辛哥要负责西方战略方向，总参谋部此时便以朱可夫的名义通过大本营给武装力量下达命令。许多人都认为那些命令不切实际，因为朱可夫在命令中要求的反突击得不偿失，要求的进攻无法执行，要求的前进也很快变成了退却。[35] 与此同时，战场的形势却不断恶化。到7月中旬时，德军已沿宽大锋面突入苏联境内200～400英里。

从朱可夫与前线指挥官的通话记录来看，[36] 同时，用更直接的方式，从总参谋部吸取战争教训的种种努力来看，很显然，他在不断加剧的灾难面前并没有惊慌失措。7月15日，朱可夫给各方面军下达了关于“吸取战争经验”的大本营命令。该命令从到当时为止的战争经验出发，得出了五点结论。第一，机械化军过于庞大和笨拙，应当解散并代之以由集团军层面指挥的独立坦克师。第二，事实证明，由多个师组成的集团军难以掌控，应将其缩编为不超过5～6个师的较小的野战集团军。第三，如果缺少自己的坦克部队，步兵师就很难击退敌人的坦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一些小规模的坦克部队分散到各个步兵师。第四，骑兵的重要性过去被低估了——这一点想必让朱可夫的骑兵们觉得很中听。在战线漫长、敌军后方绵延数百英里的情况下，骑兵的长途奔袭可以在进攻敌人补给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五，事实证明，空军的军的编制过于庞大，效率低下，最好是将其改编为飞行团，每个团配有大约30架飞机。[37]

对于苏联在军事战略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错误与后果，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试图采取强调进攻的军事思想的种种后果，朱可夫难辞其咎，但他很好地履行了总参谋长的职责，特别是在1941年6月22日灾难发生的时候他能够保持镇定。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在7月底的时候解除他的职务呢？按照朱可夫的说法，他之所以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在是否撤出基辅的问题上与斯大林有分歧。与斯大林的那次导致他被解除职务的见面，据称是在7月29日。在朱可夫建议把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并放弃基辅的时候，斯大林勃然大怒。“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朱

可夫说，他当时忍不住了，就回敬道：“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我在这里就没什么可干的了。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据说斯大林的回答是：“要是你这么说，我们没有你也行。”朱可夫被撵走了，但半小时后又被叫了回来。斯大林告诉他，现在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他的职务。斯大林问他想被安排到哪儿，朱可夫回答说他愿意干任何工作，哪怕是指挥一个师。斯大林叫他不要那么激动，然后就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准备在叶利尼亚地区发动攻势。[38]

朱可夫用这种自我标榜的小花絮强化了人们对他的印象：他是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指挥官，哪怕斯大林不想听的他也会说。朱可夫也常对斯大林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就这件事而言，是不是真的呢？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中的未发表的朱可夫回忆录，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 斯大林：你认为谁能组织反攻，消灭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
>
> 朱可夫：派我去消灭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敌人，同时任命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长。
>
> 斯大林：你是不是想撂担子？
>
> 朱可夫：不，我不是想撂担子，我是想做自己更熟悉的工作，让自己对国家更有用。[39]

考虑到朱可夫一心想要投入直接的战斗，上述说法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在已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中对于此事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7月29日他和斯大林没有见过面，至少从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来看是没有的。7月20日朱可夫见过斯大林，8月5日又见过一次，但在此期间没有。[40] 再说，朱可夫是在日期为7月30日、由他和斯大林签发的大本营命令中被宣布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的，而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是到8月10日才正式宣布的。[41] 因此，朱可夫离开总参谋部看来是有

条不紊的，而且是经过协商同意的。

朱可夫的公开的说法是想把基辅那场灾难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到8月初的时候，德国的南方集团军群已经逼近基辅，于是，要不要把苏联军队撤出乌克兰首府就成了问题。朱可夫说，即使是在他不再做总参谋长之后，他还在继续努力劝说斯大林下令撤退，但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自己反对那样做，而且给大本营的建议也是如此。8月18日，斯大林和大本营发布命令：绝不放弃基辅。[42] 但到了8月底，红军被迫撤到了第聂伯河防线，这样一来，基辅就暴露在一个长而脆弱的突出部的顶端。就在此时，希特勒把德国著名的坦克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将军和他的第2装甲集团军从中央集团军群调到南方，在背后夹击西南方面军，这就使基辅及其周围的苏军有被包围的危险。朱可夫就形势的变化向斯大林发出了警报，[43] 但独裁者自以为由A.I.叶廖缅科将军指挥的一个新的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可以对付这一威胁。然而，叶廖缅科没能抵挡住古德里安，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9月7日请求允许将部分部队撤退到第聂伯河，以保护自己的右翼，阻止古德里安的推进。9月9日，斯大林同意部分后撤，但他在第二天与西南方面军司令M.P.基尔波诺斯（M.P.Kirponos）将军通话时对后者说：“我们认为你关于撤退的建议……是危险的……不要想着怎么撤退，要想着怎么抵抗，而且只有抵抗。”[44] 9月13日，基尔波诺斯的参谋长图皮科夫（Tupikov）少将向沙波什尼科夫报告说，大溃败已经为期不远了。盛怒之下，斯大林亲自口授了回信：“图皮科夫少将……给总参谋部发来的电报惊慌失措。相反，形势要求各级指挥员的头脑要格外清醒，要保持冷静。任何人都不应该惊慌失措……前线的所有部队都必须明白，要义无反顾地顽强战斗。”[45]

尽管有斯大林的劝勉，但灾难还是很快就降临了。9月17日，大本营终于下达了从基辅撤退到第聂伯河东岸的命令，[46] 但为时已晚，德军已在基辅东面合上双钳，包围了苏军的4个集团军，总共43个师。西

南方面军在基辅战役中损失75万人，其中阵亡、被俘或失踪的有60多万。阵亡者当中包括基尔波诺斯和图皮科夫。基尔波诺斯的作战处长巴格拉米扬是幸存者之一，他设法冲出了包围圈。

朱可夫在7月底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吗？未必。实际上，在7月28日，即据说他因为力主撤出基辅而被斯大林解除职务的前一天，朱可夫和斯大林共同签署了命令，禁止第63步兵军撤到第聂伯河东岸。[47]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要忘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对基辅溃败尤其是地方领导层的负面作用喋喋不休，是有一种算旧账的意思。基辅的政治首脑当时是赫鲁晓夫，他在1957年朱可夫开始写作回忆录之前不久解除了他的国防部部长职务。朱可夫的另一个目标是没能拯救西南方面军的叶廖缅科。他在朱可夫被解除职务的时候，是赫鲁晓夫诋毁朱可夫军事成就的左膀右臂。朱可夫想为自己辩护，揭露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等人的面目，这让他对战时其他事件的描述也被扭曲了。

叶利尼亚攻势

基辅溃败正在发生的时候，朱可夫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叶利尼亚成功组织了一次攻势。这是1941年夏天红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采取的一连串军事行动之一，目的是堵住德军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虽然斯摩棱斯克本身已经在7月中旬落入德军之手，但其周围地区的激战还在继续。红军在斯摩棱斯克打的并不是防御战，它的策略是进攻，是不计其数的回击、反击和像叶利尼亚那样的反攻。德军被挡在斯摩棱斯克达两个月之久。不过，红军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阵亡或失踪的有50万人，另有25万人受伤。

朱可夫从7月底开始指挥的预备队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约50个师，其中大部分是步兵师，但也有一些坦克部队以及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它被部署在铁木辛哥的西方方面军身后约60英里的从勒热夫到维亚济马的宽大锋面上，任务是拔掉德军在杰斯纳河（River Desna）东岸的坚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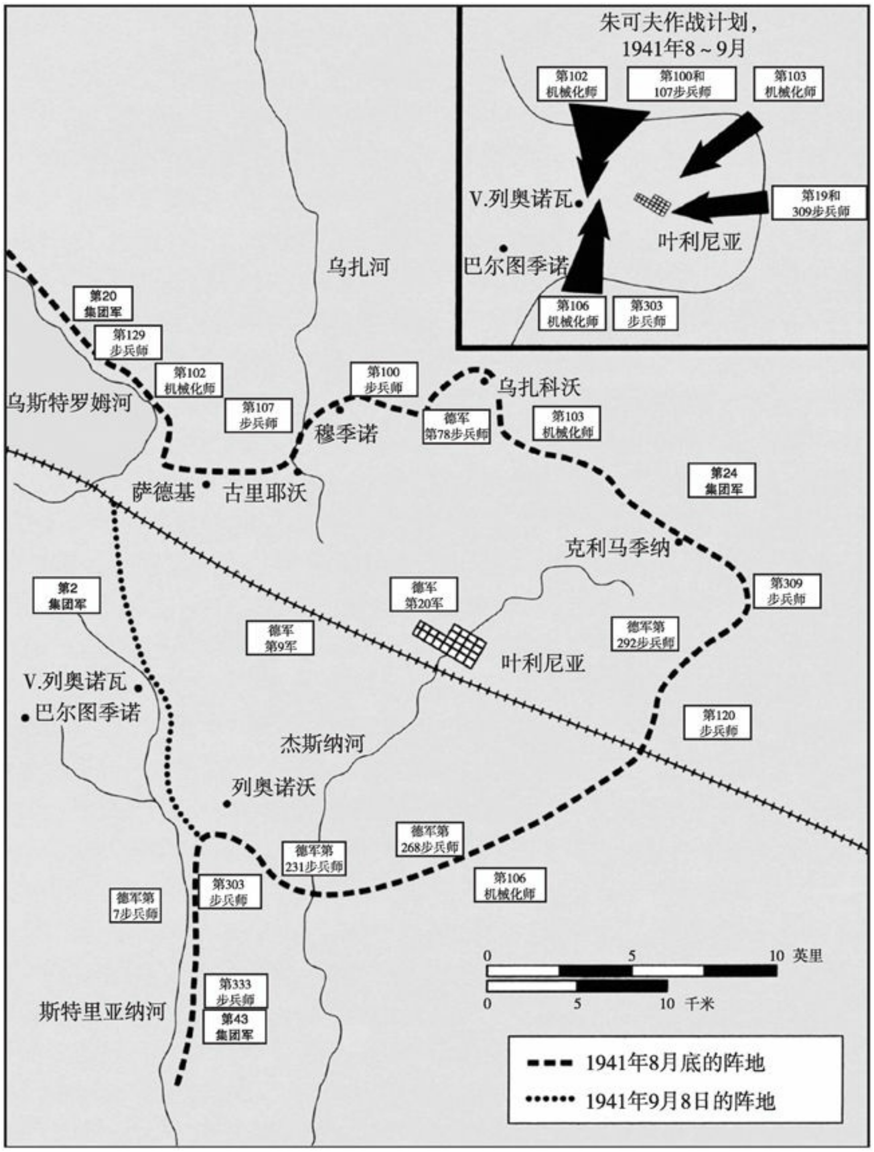
桥头堡。在1939年的哈拉哈河战役中，朱可夫的进攻都是经过周密准备的，但在1941年，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的第24集团军不得不在8月中旬提前发动进攻。[48] 8月21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此次进攻并没有能够包围并歼灭敌军。他还特意说，在这10天的战斗中，他走遍了该集团军的各个师，它们的表现大多都很好，但此次战役要是继续打下去，造成的伤亡会削弱参战部队的战斗力。朱可夫请求允许暂停3～4天，以便在再次发动攻势之前对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并对形势加以研究。在此期间，他们将对德军进行不间断的炮击和轰炸。如有可能，朱可夫想在下次进攻中动用自己预备队中的第303步兵师。[49] 8月30日，在预备队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的支援下，攻势重新开始。截至9月6日，叶利尼亚地区已被收复，而德军则被迫后撤（见地图8）。

苏联人高调宣扬了叶利尼亚攻势的胜利，而且还前所未有地邀请一群西方记者去参观战场，其中包括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沃思（Alexander Werth）和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亨利·卡西迪（Henry C.Cassidy）。后者写道：

> 这里遭受破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在西欧战后见到的情形。在那里，当巴黎沦陷之后，我发现战火在大部分地方都是轻轻掠过，只是这儿的村子里有几个弹孔，那儿的路口坏了而已。而在叶利尼亚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在两个巨人之间的可怕的、毁灭性的殊死搏斗中被毁掉了。[50]

行动结束后，沙波什尼科夫对预备队方面军的这次攻势提出了批评：

> 第24和43集团军最近的攻势完全没有收到积极的效果，只造成了人员和装备的过多损失。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各集团军在进攻上没有形成必要的集群；企图沿全线发动进攻；为步兵和坦克进攻提供的空中和地面的炮火准备明显不足，也不够有力，而且组织非常混乱。从今以后，对于没有得到必需的预备队支援的步兵和坦克进攻，有必要停止而且不容许进行缺乏组织的、准备得不充分的地面和空中的炮火支援。[51]



地图**8** 叶利尼亚攻势，**1941**年**8**～**9**月

朱可夫对于此次行动的看法截然不同。在9月8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他强调了自己麾下各师的优异表现。他指出，敌人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在4.5万人至4.7万人之间，而苏军的损失约为1.7万人。最主要的是叶利尼亚胜利带来的心理影响："此次行动提振了我们所有部队的士气，他们相信能够取得胜利。现在，部队有信心去迎战敌人，有信心面对敌人的炮火，然后迅速进行反击。"[52] 对于朱可夫的看法，斯大林看来是赞成的。9月18日，他发布命令，将朱可夫的第100、第127、第153

和第161师命名为苏军首批“近卫”师。这些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自己的部队，将得到更好的报偿和更好的补给。在战争过程中，有许多师获得了这样的称号，后来还出现了“近卫”集团军。

朱可夫指挥的叶利尼亚行动使他作为野战指挥官的声名大振，也给了斯大林信心，在军事上把他当作自己信赖的“麻烦终结者”。虽然作为总参谋长，朱可夫显然是不成功的，但他在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中挺身而出，使自己的地位和声望都提高了。他并没有因为红军在最初阶段的失利而受到同时代人的责备，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比较奇怪，但在当时却毫无异议。同时代的观察家对于德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并不特别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成功对一支已经征服了波兰、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久经考验的军队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对于1941年6月22日的灾难确实有过批评性的讨论，但批评基本上都是针对斯大林个人的责任：对德军即将入侵的种种警告置之不理；阻拦军队为应对即将遭受的攻击而进行的动员。当时已结束外放并返回莫斯科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和部长的朱可夫，在对斯大林的批评中并没有突出赫鲁晓夫分子所强调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着重谈了苏联独裁者战前对军队的清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在1957年他与赫鲁晓夫失和之后，批评斯大林的范围扩大了，把朱可夫也牵连了进去，因为他未能预料到德军的“突然”进攻并做好适当的准备。

对于这样的批评，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朱可夫才被允许做出回应。在朱可夫于1969年首次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担任总参谋长不长时间内的工作做了有力的辩护。他提出，红军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到德军进攻时为止也进行了大量的动员。朱可夫也承认当时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对德军主攻方向的误判。苏军统帅部，尤其是斯大林，认为德军要夺取乌克兰富饶的土地、原材料和工业资源，而不是像

后来证明的那样，要夺取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斯大林还严重误判了德军进攻的时机。朱可夫说，斯大林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怀疑有关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是英美奸细的诡计。斯大林还担心，苏联过早的动员有可能会加快与希特勒爆发冲突的速度。鉴于1914年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月危机”，他对朱可夫说过，“动员意味着战争”。

斯大林的谨慎使他不愿意让总参谋部进行彻底的动员并使红军进入完全战备状态。朱可夫表示，红军未能进行充分的动员，是德军的进攻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不愿像赫鲁晓夫分子那样，把斯大林作为灾难的替罪羊，所以他指出，统帅部本应做出更大的努力，去让“头”相信德军进攻的危险迫在眉睫。

总参谋部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反攻而不是防御上，那是因为红军具有根深蒂固的崇尚进攻的精神特质和军事思想——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大纵深战役观念提出来的时候，它就已成为僵化的教条。就像朱可夫回忆录中的一段在苏联时代版本中被删掉的话所说的，“我们当时没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战争开始时会那么不济，刚刚交战就遭受那么严重的失利，以至于不得不向我国的内地撤退”。在另一段未经删节的话中，朱可夫强调说：“总的来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军事理论科学没有考虑到战略防御中的诸多深刻的问题，而是错误地认为它没那么重要。”[53]

在斯大林的将领当中，和自己的领袖一样对红军的防御能力抱有幻想的，朱可夫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在此事过后以及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想撇清自己与这一重大误判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关系的，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在承认自己也有责任方面，朱可夫比大多数人都要诚实。他认为这种错误在红军的历史和文化中有其深刻的根源，这一看法非常有见地。

朱可夫对自己和统帅部缺点的最为坦率的披露，在其各个版本的回

忆录中，甚至在其与苏联作家兼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等人较为私密的谈话中，都是看不到的。他在那些场合都是小心翼翼地不让赫鲁晓夫那帮批评者抓住自己的小辫子。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源是俄罗斯军史档案中他的个人卷宗里的那些没有发表的文字。就像朱可夫在一份手稿中强调的，“苏联战前的军事科学认为，只有进攻才能摧毁敌人，而在保护进攻部队努力实现指定目标方面，防御起到的是纯粹辅助性的作用”。结果，红军忽视了防御训练，尤其是在行动和战略层面，因而对于自己在1941～1942年被迫进行的防御战没有做好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朱可夫说，它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没有吸取二战头几年的教训，也加剧了该错误的严重性。德军在波兰、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取得的胜利表明：在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支持下，集中装甲力量突然发动进攻，可以“快速冲垮敌军的防线，切断敌军的退路并包围其主力”。当然，总参谋部也研究过德军的战术，但朱可夫承认，直到德国国防军的装甲部队像古代的攻城槌一样砸穿苏军的防线时，他们才明白这种战术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认为，在边境地区是无法挡住德军的入侵的。防御做得好一点，可以减少苏军的伤亡并增加德军的损失，但德军的突然进攻之所以能够在一开始就取得成功，主要还是由于德国国防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优势。“很显然，”朱可夫写道，“我们的部队无法招架住敌人在战争头几天的有力的打击，我们没有能力对抗那么有力的打击，战略主动权在战争头几天掌握在敌人手中。”

朱可夫对苏联军队最高领导层也不太满意。他认为他的前任——总参谋长基里尔·梅列茨科夫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但谨小慎微，做事较为被动，而国防人民委员谢苗·铁木辛哥在大战略和举国备战问题上“有点业余”。至于自己，他说：“坦率地讲，我当时对于总参谋长这个角色并没有做好准备（在斯大林任命我的时候，我也这样对他讲过）。虽然我努力工作，但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抓住国防工作的要领，没有抓住与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强大而经验丰富的敌人开战、武装力量在行动和战略层面备战的要领。”[54]

朱可夫还尖刻地嘲讽了那些试图根据后见之明批评斯大林所采取的措施和决策的历史学家以及回忆录作者："人们常常责备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误判……在结果已知的情况下，回过头来对各种意见进行详细的解释，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但在特定的历史关头，没有什么比在各种力量的较量中，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与事实中，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更难的了。"[55]

朱可夫为斯大林的辩护容易掩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大战在即，为什么会让一个被认为是不适合参谋工作的人去负责总参谋部呢？答案既简单又发人深思：在德军入侵的时候，苏联人计划的应对措施是对敌方领土实行战略性的反入侵，而朱可夫作为哈拉哈河之战的胜利者和进攻战的坚定的鼓吹者，在斯大林眼里正是指挥这类行动的合适人选。当红军在1941年6月底最初的反攻中失利时，斯大林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但是，朱可夫在叶利尼亚取得的成功又让独裁者恢复了对他的信任。

叶利尼亚的胜利为朱可夫带来的奖赏是再次被委以重任。斯大林在那次战役中一再催促他到莫斯科商讨对策，但朱可夫推托说，他要留在靠近自己部队的地方。到9月11日朱可夫见到斯大林的时候，苏联独裁者急切地要求他去指挥一个全然不同的战场——遭到德军围困而且危在旦夕的列宁格勒。斯大林需要一个意志坚定而又能干的人去鼓舞士气，并加强苏联第二大城市的防御，而朱可夫恰好合乎这项工作的要求。

---

[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379-380.

[2]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3（1），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1937-1941*，Iunya 1941g（Moscow：Terra，1994），doc.108.

[3] 关于1939～1941年的苏德关系，参见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2。

[4] 苏联军方可查阅的情报报告都收集在*Voennaya Razvedka Informiruet*：*Dokumenty Razvedypravleniya Krasnoi Armii*，*1939-1941* （Moscow：Demokratiya，2008）。

[5] *Voennaya Razvedka Informiruet*：*Dokumenty Razvedypravleniya Krasnoi Armii*，*1939-1941* （Moscow：Demokratiya，2008），docs.7.13，7.22，7.33，7.38，7.47，7.57，7.65，7.82.

[6] E.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London：Hodder Arnold，2005），pp.33-34.

[7] *1941 God* ，vol.1，docs.273-274，vol.2，doc.549；D.M.Glantz，*Stumbling Colossus*：*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pp.100-101；E.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M.Mel’tukhov，*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 （Moscow：Veche，2000），pp.347-348.

[8] *1941 God* ，vol.1，doc.315.注意：已公布的三月计划的内容并不完整。

[9] *1941 God* ，vol.2，doc.473.

[10]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132.

[11] 参见J.Forster and E.Mawdsley，“Hitler and Stalin in Perspective：Secret Speeches on the Eve of Barbarossa，” *War in History* ，vol.11，no.1，2006。

[12] Mawdsley，E. “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p.838.

[13] *1941 God* ，vol.2，docs.481-483；L.Rotundo，“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24，1989，p.283.

[14] Mawdsley，E. “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December 2003.

[15] *Na Priyome u Stalina* （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p.334-335.

[16] *Voennaya Razvedka* ，docs.7.90，7.91，7.95，7.97，7.98，7.104.

[17] G.Gorodetsky，*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87-293.

[18] *Voennaya Razvedka* ，doc.7.107.

[1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276.

[20] 关于斯大林与1941年6月22日，参见Gorodetsky，*Grand Delusion*， 以及Roberts，G. *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2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277.

[22] 关于6月21～22日朱可夫和铁木辛哥与斯大林几次见面的时间，参见*Na Priyome u Stalina*， pp.337-338。

[23] 这三道命令的译文可见于D.M.Glantz，*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Stroud，U.K.：Tem-pus，2001），pp.242-243。

[24]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284-285.

[25] I.K.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Moscow：Voenizdat，1988），p.65.

[26] *Na Priyome u Stalina*， p.339.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6月26日深夜，他回到莫斯科后直接去了斯大林的办公室（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305）。据斯大林会客日志的记载，下午4点至5点的时候他在那里，9点至10点的时候又去了那里。

[2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309.斯大林的会客日志证实他当天不在自己的办公室。

[28] A.Mikoyan，*Tak Bylo*（Moscow：Vargrius，1999），p.390.

[29] *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London：Jonathan Cape，1971），p.268.

[30]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Moscow：Terra，1996），doc.41.

[31] *1941 God*， vol.2，doc.635.

[32]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vol.2，book 1（Moscow：Rus'，2000），docs.379，436，437，438.

[33] G.Jukes，"Meretskov，"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1997）.

[34] 参见*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docs.293，306，384，413，424，490，550。

[35] 这些命令有许多可见于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

[36]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s.115，117.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复述了其他一些通话的内容。

[37]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01.

[3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379-380.

[39] RGVA，F.41107，Op.1，D.54，L.57.

[40] *Na Priyome u Stalina*， pp.343-345.

[41] *Russkii Arkhiv*， vol.13（2）， 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22 Iunya 1941g-1942g，doc.36.

[42]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68.

[43]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0，p.361.

[44]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255。

[45] 转引自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10。

[46]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280.

[47]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30.

[4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383.

[49]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doc.15，pp.365-366.

[50] H.C.Cassidy，*Moscow Datelin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3），p.123.至于沃思对此次参观的描述，可参见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p.188-195。

[51] 转引自Glantz，D.M. *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 Stroud，U.K.：Tempus，2001，pp.90-91。

[52] 转引自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210-212。

[53] Zhukov，*Vospominaniya*， vol.1，pp.304-305.

[54] RGVA，F.41107，Op.1，D.17，Ll.1-50.这份50页的打印稿，标题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初阶段”，是准备用来作为回忆录的一章的。此处的引文摘自该文件的第38～41页。该卷宗有许多这样的文件，包括几个手写的片断。

[55] RGVA，F.41107，p.265.

7 斯大林的将军：拯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1941

斯大林与朱可夫的关系，有着和苏联独裁者与其所有高级将领的关系同样的基础：他们的忠诚与称职以及他对他们的信任。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对上级始终忠心耿耿、恭恭敬敬，尽管对自己的同侪或下属并不总是如此。对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也强化了朱可夫对斯大林权威的尊敬，虽说他在这方面并不过分，但也像所有人一样，是持赞同态度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的人格力量。他支配着所有可以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人，朱可夫也不例外。

除了职业上的联系之外，斯大林和朱可夫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两人的父亲都做过鞋匠而且都有体罚自己儿子的习惯。两人的母亲都曾努力让自己的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两个对于自己的孩子也都是充满温情的（就斯大林而言，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如对自己的女儿）。对朱可夫和斯大林来说，俄国内战是一段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残酷的经历，尽管前者当时是个小兵，而后者是高级政治委员。斯大林在才智上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他和朱可夫一样，主要是把自己看作讲究实际的实干家。两人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时都很执着，而且为了实现那些目标，必要时都一样地铁石心肠。斯大林和朱可夫在政治上的共同点不仅在于他们都投身于共产主义，而且在于他们都怀有深刻的爱国之情，致力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样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和种群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在他们看来，苏联是所有这些民族和种群的保护者。正是这种“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把作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和作为俄罗斯人的朱可夫团结在了一起。至于希特勒和纳粹，斯大林和朱可夫不仅将其视为外国的入侵者，而且还

视为企图灭绝数百万苏联公民（尤其是犹太人）并奴役其余的人的入侵者。

朱可夫是在1941年1月成为总参谋长的时候开始发展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的，但只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这种关系才完全成型。战争向斯大林表明：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朱可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不会在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他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有能力也有决心挺身而出，迎接挑战。

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一章是谈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运作的，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在那里面表露得非常明显。那一章是朱可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自己的回忆录进行修订时添加的，而他写那一章内容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维护苏军最高统帅部战时领导班子的声誉，特别是他自己作为副最高统帅的作用。不过，他还想驳斥针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所谓“秘密报告”开始的。朱可夫做得非常成功；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个出色的最高统帅。他的描述因此成了一份关键性的文本，为独裁者恢复了成功的战争领袖的名誉。

战争期间，朱可夫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见过他一百二十多次。考虑到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这个见面的次数是非常多的。[1] 另外，在莫斯科附近斯大林的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他们也见过多次。如果不能亲自去见斯大林，朱可夫就会和他通话或给他发电报，有时候天天都会这样。所以，毫不奇怪，朱可夫在战争期间逐渐对斯大林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前我和他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过，所以起初他要是在场，我就有点局促不安……在我们交往的最初那段时间，斯大林很少对我说什么。我感到他在非常留心地观察我，对我还没形成确定的看法……可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变得更加自信和大胆。我还注意到，斯大林开始更加重视这些想法了。”

朱可夫去见斯大林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夜里。独裁者习惯于晚起，而他一般也都要工作到凌晨。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不仅对斯大林本人，就是对他的下属来说，也是很辛苦的。这位苏联领导人要求总参谋部每天汇报两到三次，而且要是不和自己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商量，特别是总参谋长并且从1942年8月起成为他的新任副最高统帅的朱可夫，他从不做出军事行动的重要决策。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斯大林总是抽着烟斗或俄国香烟，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地停下来查看一下形势图。朱可夫回忆说："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有条不紊、沉着镇定，允许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喜欢专心听取别人的汇报，但他们必须要说到点子上……他这人话不多，也不喜欢话多的人……战争期间，我体会到斯大林不是那种反对别人提出尖锐的问题或者反对人们和他争论的人。如果有人有相反的说法，那他是撒谎。"朱可夫对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有很高的评价：

> 可以说，斯大林谙熟方面军和方面军群军事行动组织的基本原则，对这些行动的指导很在行。可以肯定，他通晓主要的战略原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尤为突出……斯大林把这种能力归因于自己天赋的才智，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经验，自己的直觉和广博的知识。他能发现战略形势中最重要的环节，并抓住这个最重要的环节，组织对敌行动，并因此而确保进攻行动的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个非常出色的最高统帅。

对于斯大林，朱可夫最欣赏的是他通常都不拘礼节，不装腔作势。独裁者很少大声地笑，但他很幽默，喜欢说笑话。不过，斯大林也会固执、冲动、遮遮掩掩，而且有时候很容易生气。"在发火的时候，他就不再客观了，而是说变就变，脸色越发苍白，目光阴沉锐利。能够经得住斯大林的怒火和抵挡住他的训斥的勇敢的人不多。"尽管这样，朱可夫感到的是迷醉而不是害怕。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着了他的魔：

> 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他用自己朴素的方式赢得了人心。他的无拘无束的说话方式，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他的天生善于分析的思维，他的见多识广和非凡的记忆力，就连那些老手和有名望的

人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也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2]

在后苏联时代的各种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以及在现已公开的其他材料中，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要比在官方出版的回忆录中多一些，但朱可夫对作为伟大军事领袖的斯大林持肯定的态度却是一贯的。[3]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看法如何，现在很难知道，因为独裁者很少流露他内心的想法。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自己的许多将领都很喜欢。他钦佩他们的职业素养，愿意向他们学习，尽管他本人也自命为伟大的将军。最合理的猜测是，斯大林对朱可夫要比对他小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敬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惯于逢迎谄媚。同样，对于朱可夫这种显得太有主见的人，哪怕他们的忠诚毫无问题，斯大林也不太放心。这种态度或许在战后两人失和时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处置中有充分的反映：由于不敬而将其放逐，而一旦朱可夫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便又很快恢复名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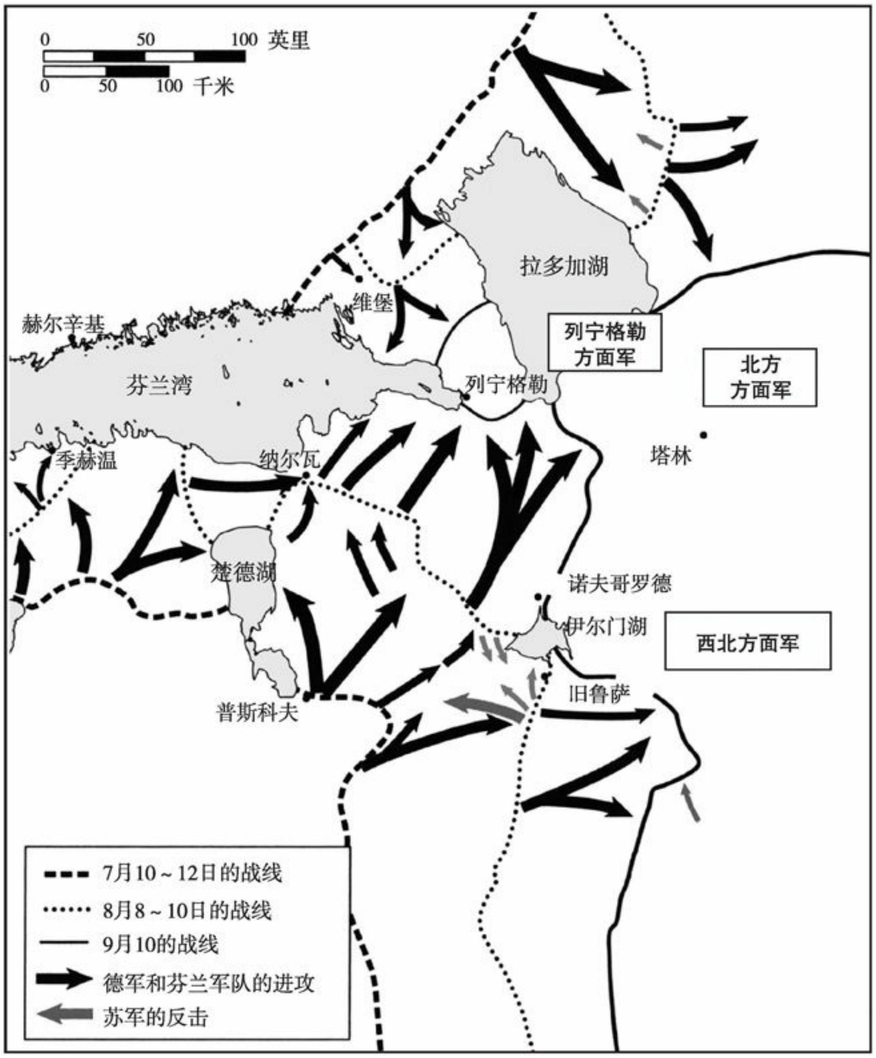
保卫列宁格勒

在叶利尼亚取得了胜利之后，朱可夫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保卫列宁格勒。德军在入侵苏联时的主要目标起初并不是打到莫斯科，而是占领列宁格勒。只有在北方集团军群夺取列宁格勒之后，德军才会集中力量攻打莫斯科。一开始，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德军轻松突破了立陶宛边境的苏军防线，不到三周就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了300英里，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大部分领土。但是，随着红军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德军前进的脚步也慢了下来，结果到1941年9月初才进抵列宁格勒郊区。就在此时，希特勒改变了主意，把莫斯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决定不再一鼓作气拿下列宁格勒，而是把它包围起来，消耗其防御力量，迫使里面的人由于饥饿而投降。德国人相信，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落到他们手中。1941年9月22日，希特勒发布了有关列宁格勒的命令：“元首决定从地球上抹掉彼得堡这座城市。我不想在苏俄失败之后

还让这座庞大的定居点继续存在……我们建议严密封锁这座城市并用各种口径的火炮和持续的空中轰炸把它从地球上抹掉。”（见地图9）

对苏联人而言，列宁格勒受到的威胁要比他们在乌克兰同时发生的溃败更加危险。要是列宁格勒失守，德军从北面向莫斯科的侧翼发动进攻的通道就会打开。失去苏联的第二大城市，这个国家就失去了国防生产的中枢。再说，如果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摇篮落入纳粹之手，那种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

大本营对自己的西北方面军的表现感到不满。7月10日，当时还是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对该方面军的指挥班子提出了警告，说：“你们没有惩罚不执行命令并擅自撤出防御阵地的指挥员。你们对待胆小鬼的这种放任自由的态度是不可辩解的……立即到前方的部队去，对那些胆小鬼和罪犯要当场处置。”[4] 同一天，大本营成立了由多个方面军组成的“西北战略方向”，取代了原西北方面军。隶属于这个新的战略方向的也包括北方方面军，它所面对的是列宁格勒以北的芬兰军队，芬兰为了收复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也加入了德军在1941年6月发起的进攻。[5] 指挥这个新的战略方向的是前国防人民委员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大本营给他的命令是在诺夫哥罗德东南的伊尔门湖附近的索利奇（Sol’tsy）、旧鲁萨（Staraya Russa）和德诺（Dno）这些地区发动反击。伏罗希洛夫在7月中旬和8月初的两次反击延缓了德军的推进速度，但没能挡住它，这让大本营对他的指挥逐渐感到不满。8月29日，西北战略方向与M.M.波波夫（M.M.Popov）将军指挥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合并，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新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任他的参谋长。但是，斯大林仍不满意，自6月22日以来的节节败退所带来的压力开始对他产生影响。当天，他给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当时正带着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委员会在列宁格勒检查防务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



地图**9** 德军向列宁格勒的推进，**1941**年**6**～**9**月

> 我担心列宁格勒会由于愚蠢的疯狂而被丢掉，担心列宁格勒的部队有被俘虏的危险。波波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干什么？他们也不向我们报告一下，针对这种危险，他们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显然是在忙着寻找撤退的路线。他们哪来那么大的消极性和完全是农民式的听天由命？什么人哪——我搞不懂……你认为在这个关键地段，是不是有人在故意为德国人打开通道？波波夫这人怎么样？……我说这些是因为我非常焦急，我不明白列宁格勒指挥部为什么没有动静。[6]

9月9日，德军攻陷了位于列宁格勒东北的拉多加湖岸边的什利谢利堡（Shlisselburg），从而切断了这座城市最后的陆路联系。这促使斯大林采取行动，让自己信赖的朱可夫去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据朱可夫

说，9月9日，他被紧急召回莫斯科，而且在当晚他来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并没有被带到斯大林的办公室，而是被引进了独裁者的私人住所。在讨论了列宁格勒的形势之后，朱可夫得到的命令是：飞往这座城市，接手指挥工作。“路上要小心，”斯大林告诉他，“你要飞越前线或者是由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斯大林还让朱可夫给伏罗希洛夫带去手令——上面写着：“把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往莫斯科”——并说关于他的任命，会在他到达列宁格勒之后再发布命令。“我意识到，”朱可夫写道，“这样说是担心我们在飞行的途中有可能遭遇不测。”朱可夫还和斯大林讨论了基辅岌岌可危的形势，建议由铁木辛哥担任西南方面军的新司令，而由科涅夫将军接管他在西方方面军的指挥工作。斯大林“立即给沙波什尼科夫（他接替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打电话，要他召回铁木辛哥元帅并把命令传达给科涅夫”。[7] 朱可夫于次日飞往列宁格勒，结果在途中差不多就像斯大林担心的那样遇到了危险：他的飞机在到达拉多加湖的时候，遭到两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追击，不得不紧急下降，贴着水面飞行。[8]

朱可夫在飞往列宁格勒途中的情况，有可能就像他回忆的那样扣人心弦，但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似乎是精彩有余，准确不够。根据官方的记录，朱可夫是在9月11日见到斯大林的，是在独裁者的办公室而不是他的住所。会议从傍晚5点10分开始，持续了四个小时。参加会议的有沙波什尼科夫，还有铁木辛哥。[9] 会议中间——晚上的7点10分——有关指挥人员变动的命令发给了列宁格勒，这是宣布这类决定时的规范。几分钟后，关于科涅夫和铁木辛哥任命的命令也下达了。[10]

与朱可夫一同飞往列宁格勒的是I.I.费久宁斯基（I.I.Fedyuninskii）将军、M.S.霍津（M.S.Khozin）将军和P.I.科科列夫（P.I.Kokorev）将军。据费久宁斯基说，飞机是在9月13日早晨起飞飞往列宁格勒的，有13架战斗机护航。费久宁斯基没提到遇到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追击的事情，但他的回忆录是在赫鲁晓夫时代出版的，当时朱可夫已经失势，所以对于

这位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新指挥官，他的话不是那么中听。实际上，朱可夫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他茫无头绪，也不了解情况，甚至不知道在他们到达列宁格勒之后给费久宁斯基安排什么工作。另一部赫鲁晓夫时代的回忆录中的说法还要负面一些，那是由当时担任列宁格勒红军工兵首脑的B.V.贝切夫斯基（B.V.Bychevskii）将军写的。贝切夫斯基把朱可夫描写成一个严厉的军人，专横跋扈，到处发号施令，却没有什么效果。[11]

朱可夫表现得比较粗暴，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因为他在接手新的指挥职务时喜欢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立威。至于他是否像费久宁斯基和贝切夫斯基说的那样无能，则是另一回事。在朱可夫到达列宁格勒的时候，形势又开始恶化。德军在9月9日收紧对这座城市的包围圈之后，此时正在寻找它的防御弱点。朱可夫做出的回应是下令反击。他在9月15日的总的行动命令是：

1.用大炮和迫击炮的炮火及空袭压制敌人，不允许防线被突破。

2.在9月18日之前组建5个步兵旅和2个步兵师，并将其部署成四道防线，加强列宁格勒的近距离防御。

3.用第8集团军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4.让第8集团军的行动与第54集团军保持协调，后者的目标是解放姆加（Mga）和什利谢利堡地区。[12]

两天后的9月17日，为了守住列宁格勒南面的防区，朱可夫和他的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如果没有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书面命令就擅自放弃指定防线的所有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士兵，都将被立即枪毙。对于朱可夫发出的威胁，无论是它的精神实质还是措辞，斯大林都完全支持。9月21日，他给朱可夫及其军事委员会发了电报，并命令他们将电报内容传达给当地的指挥员：

据说德国恶棍在向列宁格勒前进时已经向我们的部队派出……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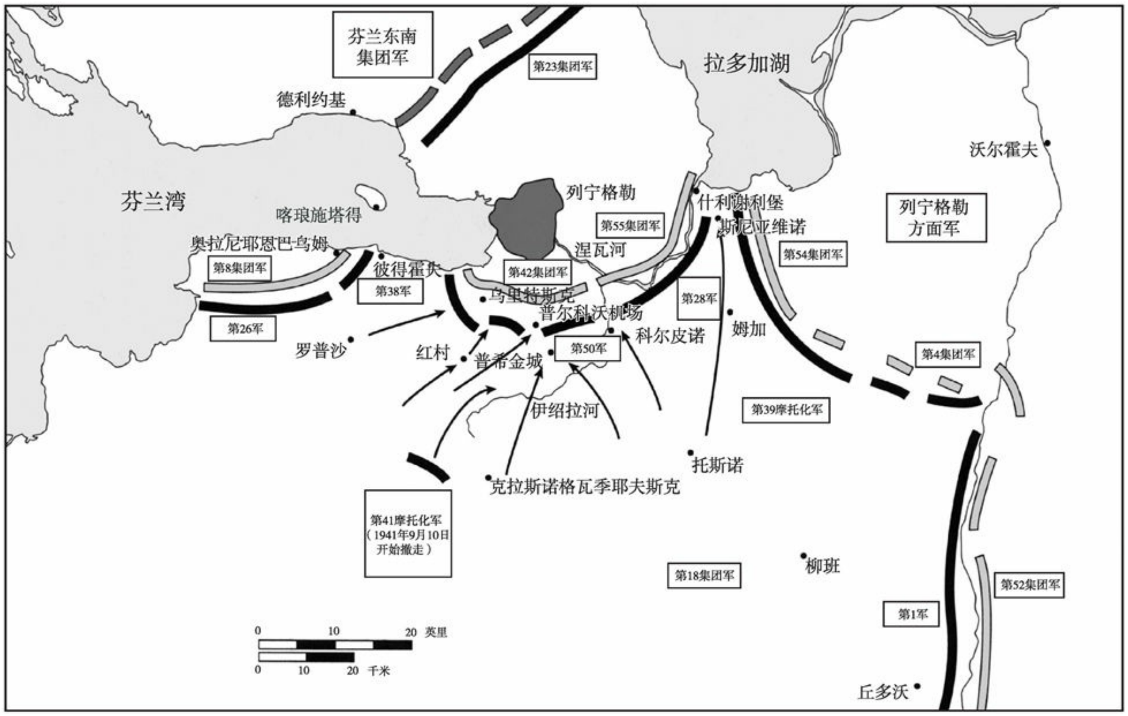
人、妇女和儿童……请求布尔什维克放弃列宁格勒并恢复和平。

据说在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认为不能用武器之类的去对付那些人。我认为，如果在布尔什维克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必须消灭他们……因为他们对德国法西斯害怕了。

我的回答是，不要感情用事，对敌人及其帮凶，不管是有病的还是健康的，要迎头痛击。战争是无情的，那些软弱和动摇的人……会遭到失败。

要用各种方式打击德国人及其帮凶，不管这些帮凶是些什么人，要去蹂躏敌人；至于这些敌人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那无关紧要。[13]

在朱可夫接管列宁格勒的指挥重任时，他麾下的部队有45万人，分属第8、第23、第42和第55集团军。与他对阵的德军数量相当，只是德军有2个坦克师而朱可夫没有，而且德国空军还占据了绝对的空中优势。另外，有14个芬兰师正从北面向列宁格勒和苏联的卡累利阿地带发动进攻。不过，主要的战斗是围绕南面通往列宁格勒的各个入口而展开的，德军在那里占据的阵地离这座城市的边缘只有几英里远。战斗在9月一直时起时落，但到了那个月的月底，苏联人稳住了自己的防线，德军进攻的势头也逐渐减弱了（见地图10）。



地图**10** 列宁格勒保卫战，**1941**年**9**月

朱可夫在激战中抽空给女儿叶拉和埃拉写了信：

> 从前线向你们问候。像你们希望的那样，我正在列宁格勒与德国人战斗。德国人正冒着很大的伤亡，企图夺取列宁格勒，但我想，我们会守住它，并把德国人一直赶到柏林。
>
> 你们那里怎样？我非常想见到你们，但恐怕只有等到打败德国人的时候，我才能来到你们身边，或是你们来到我的身边。常写信给我。因为战事不断，我没有时间。
>
> 吻你们。[14]

对于朱可夫在列宁格勒的表现，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大卫·格兰茨的看法，“朱可夫的钢铁意志……制造了‘涅瓦河上的奇迹’”。约翰·埃里克森用一种差不多的语气写道：“朱可夫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控制住了这个最严重的危机，在恢复了他来之前已极度涣散的纪律的同时，还组织起了有效的防御并重振了士气。”朱可夫在列宁格勒有没有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埃文·莫兹利则不太确定。就在朱

可夫到达列宁格勒之前，希特勒已经开始从北方集团军群调兵，支援对莫斯科即将发起的进攻。莫兹利认为，要是德国人再加把劲，调集北方集团军群的所有装甲力量，全力发动进攻，很可能就可以拿下列宁格勒。而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别沙诺夫（Vladimir Beshanov）指出，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是要解除封锁的，这个任务他远远没有完成。[15]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朱可夫的声望在提高。哈拉哈河战役、叶利尼亚战役以及现在的列宁格勒战役，或许并不像朱可夫传奇让人联想到的那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相对成功的。朱可夫正在证明自己是斯大林的福将（lucky general）：他到哪里，哪里就胜利，或至少不会失败，这使得朱可夫的战绩与红军在其他地方的溃败形成了强烈的对照。9月中旬，基辅陷落，德军开始向克里米亚和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前进，那里是通往高加索和巴库油田的门户。10月初，德军重新开始向莫斯科进军，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包围了大批苏军，结果，红军又损失了50万人。再次到了危急关头的斯大林决定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10月5日，斯大林打电话给人在列宁格勒的朱可夫，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段对话：

> 斯大林： 我就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能不能乘飞机来莫斯科。预备队方面军在尤赫诺夫（Ukhnov）地区左翼的形势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为了采取必要的措施，大本营需要你的建议。也许可以让霍津接替你的工作？
>
> 朱可夫： 我请求允许我在明天早晨的黎明时分出发。
>
> 斯大林： 很好。我们等着你明天来到莫斯科。[16]

当朱可夫离开列宁格勒的时候，对这座城市的严峻考验才刚刚开始。列宁格勒还要被德国和芬兰军队继续围困漫长的三年时间。在此期间，饿死的平民有64万，另外还有40万在强制疏散的过程中死亡或失踪，许多都是在1941～1942年的冬季掉进了冰冷的拉多加湖。100多万

苏军士兵在列宁格勒地区的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德军多次试图突破这座城市的防御并瓦解守军的抵抗意志，但再也没有像1941年9月那样距离成功如此之近。1941年11～12月，红军在列宁格勒东面的季赫温（Tikhvin）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攻，确保了莫斯科西北方向的安全，粉碎了德军的合围企图。在此之后，列宁格勒便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只是有大量的敌军被它牵制在那里无法脱身（1941年时占德国国防军总数的1/3）。[17]

拯救莫斯科

被召回莫斯科的朱可夫迎来了自己的时刻。迫在眉睫的苏联首都保卫战，要么使他名声大噪，要么使他名声扫地。更重要的是，它将决定“巴巴罗萨行动”的成败，因为希特勒想通过闪电入侵征服俄国，避免在东线陷入消耗战，因为那样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至当时为止，希特勒的计划一直进展得很顺利，只是红军让德国国防军在推进过程中受到的打击比预想的要大。单是1941年夏天，德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他们在1940年征服法国时的两倍。但是，苏联人付出的代价更大。红军虽然拥有庞大的兵源，有数百万服过一两年兵役的退伍军人，但对这支预备队的动员、训练和重新装备也要花费时间。除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之外，红军的装备也损失殆尽。俄国的欧洲部分大部都已被德军占领，这让苏联人失去了他们相当多的工业资源。在德军推进的过程中，苏联人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幕奇迹：拆除了几百座工厂并将其与几十万工人一起运往东方。但是，要把这些搬迁的工厂安顿下来并生产出急需的坦克、飞机和枪炮弹药，还要假以时日。英国、美国等苏联的西方盟友的确是开始提供援助了，但大规模的援助还要等到1942年。苏联人现在要对付的是“台风行动”，这次进攻莫斯科的德军有70个师，包括100万人、1700辆坦克、14000门大炮和近1000架飞机。如果希特勒能够占领苏联的首都，那就等于敲响了斯大林政权的丧钟。苏联人在丢掉

自己首都之后，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要说红军还能从这样的毁灭性失败中重整旗鼓，那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希特勒的盟国日本当初若是决定进攻苏联的远东地区而不是在1941年12月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的话。

朱可夫并没有立即被安排去负责莫斯科的防务。先是在10月6日，大本营任命朱可夫作为它在预备队方面军的代表——朱可夫在叶利尼亚战役中指挥过这个方面军——并且严令：对于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使用，他所做出的任何命令，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然后是在10月8日，朱可夫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接替布琼尼元帅。最后是在10月10日，斯大林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成一个新的西方方面军，由朱可夫指挥。原西方方面军司令科涅夫成为朱可夫的副手。不过，科涅夫在几天后就被调去负责新组建的加里宁方面军，它是由从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中抽出的几个集团军组成的，任务是保护朱可夫北面的侧翼。[18]

为什么要任命朱可夫去指挥新的西方方面军？对于其确切的原因，一直是众说纷纭，神秘难解，但又非常让人受到启发。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莫斯科战役的书中，科涅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朱可夫之所以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是由于他的推荐。而在同一本书中，朱可夫则坚称，他是在与斯大林通话后被任命为新的西方方面军司令的，而那次通话是他从列宁格勒回来之后与斯大林的多次通话之一。在关于那次通话的回忆中，朱可夫写道，斯大林问他是否反对让科涅夫做他的副手。[19] 这个故事还有一种说法，那是朱可夫在1964～1965年对记者兼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讲的：斯大林在通话时说，由于西方方面军接连失利，他想把科涅夫送上军事法庭。只是在朱可夫的劝说下，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朱可夫说，科涅夫是个诚实的人，不该得到巴甫洛夫那样的结果——后者是西方方面军的倒霉的首任指挥官，他在1941年7月被处死了。[20]

虽然科涅夫的说法现在有文献记录的支持，[21] 但朱可夫说他得到斯大林的信任也是实情。朱可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被委以重任是必然的，因为斯大林把他从列宁格勒召回，并不只是要让他指挥预备队方面军。

在20世纪60年代这两位退休的将军之间发生的这场小小的冲突背后，有一段长长的历史，牵扯到他们在事业上的竞争和私人间的嫌隙。战争期间，在名望和战绩方面，科涅夫逐渐成为朱可夫的主要竞争对手，这种竞争在他们于1945年争相攻取柏林的过程中达到了白热化。当朱可夫在战后遭到斯大林的贬黜时，科涅夫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1957年，在朱可夫被赫鲁晓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时候，在他的公开批评者当中，科涅夫是最卖力的。他甚至还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贬低朱可夫的战绩。因此，朱可夫非常反感说自己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要感谢科涅夫，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实际上，对于科涅夫作为指挥官在战争中的表现，朱可夫的回忆录中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讽刺与挖苦。

科涅夫与朱可夫的个人冲突，根源在于他们的性格及领导风格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像朱可夫一样，科涅夫也是个精力充沛、要求严格的指挥官，对笨蛋可不会耐着性子，而是常常大发雷霆。他对于战役的准备工作也同样毫不含糊，对于行动的实施则要严格按照要求。和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出身于炮兵部队，他事业的起步是在内战时期担任红军的政治委员。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才转到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指挥岗位。然后，他差不多和朱可夫一样逐级上升，但直到莫斯科战役的时候两人才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在一起共事。[22]

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的基本任务是阻止德军向莫斯科推进。他的困难在于兵力不足。10月初的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之围比夏天的明斯克和基辅之围还要惨烈。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

方面军总共损失了64个步兵师，11个坦克旅和50个炮兵团。[23] 结果，朱可夫只剩下90万人保卫苏联首都了。甚至在朱可夫到来之前，大本营已下令退守莫扎伊斯克防线（Mozhaisk Line）。这道长150英里的防线在莫斯科西面大约75英里的地方，北至加里宁涅茨，南至图拉，筑有一系列的防御阵地。但这道防线并没能坚持多久。到10月中旬时，德军已突破了它的两翼，占领了加里宁涅茨，并进逼图拉，在那里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周的大战。10月18日，莫扎伊斯克被放弃，通往莫斯科的门户大开，苏联首都一片恐慌，出现了骚乱和趁乱打劫，人们纷纷准备逃离这座城市。当局正准备撤离的流言（他们的确是在准备撤离）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气氛。10月17日，莫斯科地区共产党领导人A.A.谢尔巴科夫（A.A.Shcherbakov）发表广播讲话，安定了人心——他向市民们保证，斯大林同志还在首都。使形势进一步稳定下来的是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公布的决议，它宣布由于莫斯科遭到敌人的围攻而实行宵禁，同时由朱可夫担任保卫莫斯科的方面军司令。[24] 次日，斯大林打电话给红军的《红星报》编辑大卫·奥滕贝格（David Ortenberg），要他刊登朱可夫的照片，同时把照片传给《真理报》，好让他们也刊登。10月21日，朱可夫的照片出现在《红星报》上，这是该报首次刊登方面军司令的照片。同一天，《真理报》也登出了这幅照片。奥滕贝格声称，朱可夫后来对他说，登出他的照片是为了让他承担骂名，如果这座城市落到德国人手里的话。比较厚道的解释是，斯大林要求刊登他的照片，是为了鼓舞人民对于保卫莫斯科的信心。[25]

对于这次的严重危机，朱可夫的处置方式和他在列宁格勒的时候一样：严厉的纪律；不准投降也不准后撤；无论何时何地，一有可能便发起反击。朱可夫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发布的第一则通告就是在10月13日宣布：逃离战场、丢弃自己的武器或擅自撤退的“胆小鬼和制造恐慌者”，将被就地枪决。通告的最后说：“一步也不准后退！为了祖国，前进！”[26] 这个威胁不仅适用于普通士兵，也适用于高级军官。11月3日，朱可夫宣布，第133步兵师师长A.G.格拉西莫夫（A.G.Gerasimov）

上校和师政委G.F.沙巴罗夫（G.F.Shabalov）因擅自下令撤退而被枪毙。[27]

据说，朱可夫在莫斯科战役期间读了《战争与和平》，也许正是托尔斯泰的那部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的不朽的小说带来了诉诸爱国主义情感的灵感。“在保卫莫斯科母亲的时候，你们现在所在的那些地方，那些田野和森林，染有我们先辈神圣的鲜血，他们因为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而被载入史册，”朱可夫在11月1日对他的部队说，“我们是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儿子。我们是由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的党养育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它的领导下建设我们的生活。在此危急关头，为了竖起一座钢铁城墙，保卫祖国，保卫它的神圣的首都莫斯科，我们不会吝惜自己的力量，也不会吝惜自己的生命。为了荣誉和自由，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神圣的莫斯科！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彻底消灭敌人！”[28]

话尽管说得慷慨激昂，可朱可夫还是不得不撤到了新的防御阵地——一开始是从紧邻莫斯科西北的克林（Klin）经伊斯特拉（Istra）至该城西南的谢尔普霍夫（Serpukhov）一线。但是，朱可夫采取的不断反击的策略和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撤退的政策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所以到10月底，德军的攻势便逐渐减弱了。再加上俄罗斯人称之为“拉斯普季查”（Rasputitsa，意为“烂路季节”）的秋季的来临，泥泞的道路让德军的行动越来越困难。德国人决定暂缓进攻并调整部署，这就给了朱可夫调集援兵的时间。从11月1日至15日，西方方面军又补充了10万人，300辆坦克和2000门大炮。[29]

德军暂缓进攻也给苏联领导层提供了政治机会。11月1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到大本营并问他，11月7日那天，继续举行纪念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周年庆祝活动是否安全。[30] 朱可夫向他保证肯定是安全的，但考虑到有可能遭到德军的空袭，党的拥护者的周年庆祝大会

要在地下，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举行。斯大林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且在次日对参加红场阅兵并奔赴莫斯科城外战场的士兵们也发表了讲话。形势严峻，斯大林告诉他们，但苏维埃政权过去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 记得在1918年，当时我们庆祝了十月革命一周年。我们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地方……落到了外国干涉军的手中。乌克兰、高加索、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都暂时失去了。我们没有盟友，没有红军……食物和武器匮乏……有14个国家在向我们进攻。但我们没有泄气，没有灰心。我们在战火中铸就了红军并把我们的家园变成了军营。伟大的列宁精神使我们充满力量……结果怎样呢？我们把干涉军打得落荒而逃，收复了失地并取得了胜利。

斯大林最后再次谈到了爱国主义，回顾了俄国人过去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

> 一项伟大的解放使命现在要由你们去完成。一定要配得上这项使命……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他打败了瑞典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y Donskoy，他打败了鞑靼人）、库兹马·米宁（Kurma Minin）和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Dimitry Pozharsky）（他们把波兰人赶出了莫斯科）、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o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俄国将军，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的男子汉形象，在这场战争中激励着你们。愿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成为你们的指路明星。[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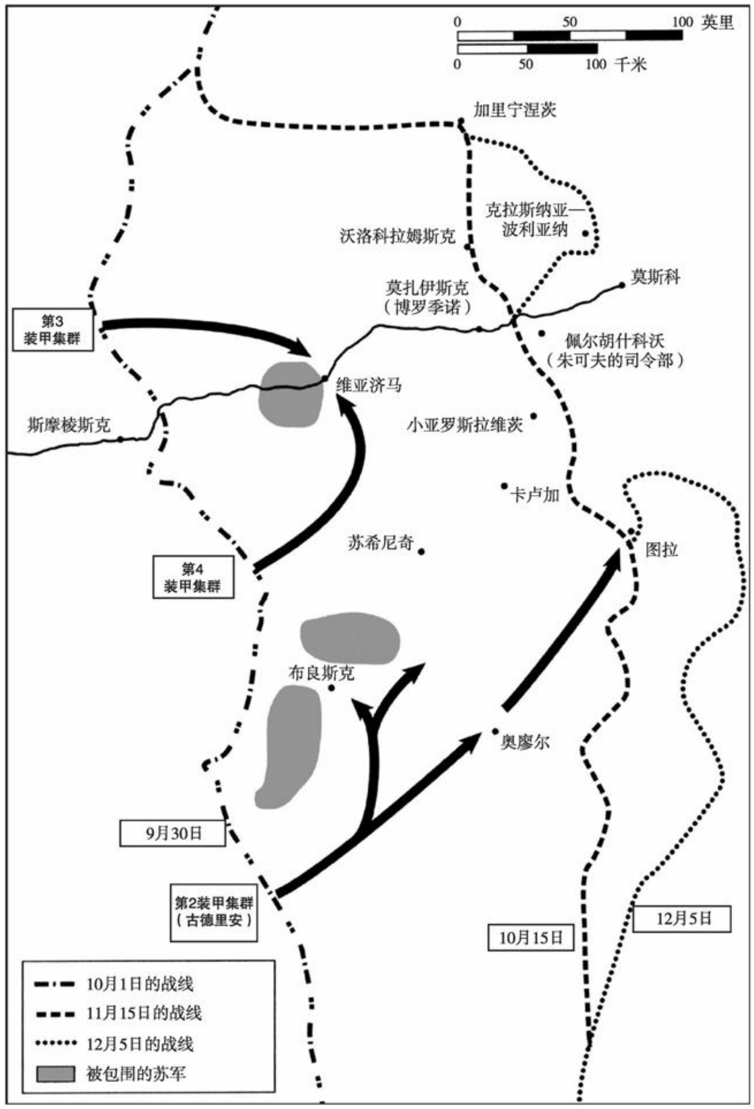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在拯救莫斯科过程中的作用不吝赞美之辞，特别是他在战役期间自始至终都留在城里，并为组织莫斯科的防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他的严格要求，斯大林做到了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32] 与此同时，朱可夫也竭力想摆脱与战役期间斯大林的几次错误决定的关系。但从朱可夫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命令、通告和谈话记录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基本上毫无异议地、心甘情愿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而且他希望自己的下属也同样如此。尤其是，正是朱可夫恪守纪律的态度，而不是他自诩的耿直或不顺从，使他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睐。朱可夫注重等级关系和纪律的指挥风格，从他

在1941年10月26日给罗科索夫斯基的回信中可见一斑——当时作为第16集团军司令的罗科索夫斯基，正在伊斯特拉地区与德军交战，他抱怨说自己的德国对手优势太大。朱可夫告诉他：

> 你在无端地浪费时间。我们一再地从你那里得到报告，说敌人的兵力多得惊人，而你的集团军的兵力微不足道。这不是一个指挥员该做的事情。你有什么，敌人有什么，这一点我们清楚，政府也清楚。你不要从担心的东西出发，它是靠不住的，要从自己的任务和掌握的实际兵力出发。政府以及它的指挥机构的命令必须执行，没有任何借口。[33]

11月中旬，泥泞的道路开始结冰，于是德军重新发起了攻势，并在两翼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莫斯科正西方向的关键阵地上，红军的防御并未松动。首都之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1月底，当时大本营派出预备队堵住了朱可夫防线的缺口。面对敌人的生力军，再加上气候越来越恶劣，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在距离该市市中心只剩下几英里的时候失败了（见地图11）。

在11月的战事中，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再次发生了冲突。后者想把部队撤到伊斯特拉河，朱可夫没有同意，但罗科索夫斯基越级向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提出请求。沙波什尼科夫同意了，并给了必要的书面许可。当朱可夫发现后，他发电报给罗科索夫斯基：“我是方面军司令！我取消撤到伊斯特拉库区的命令，并命令你们守住已经占领的防线，一步也不准后退。”[34] “这就是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抱怨说，“从这道命令中你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朱可夫。他个人的自我时常凌驾于全体的利益之上……有些上级……以为，只有他们可以有效地处理问题，只有他们想要取得胜利。对其他所有人都必须通过训斥和恫吓才能使他们听从上级的意愿。我们的方面军司令也属于这种人。”[35]



地图**11** 莫斯科保卫战，**1941**年**10**～**12**月

据罗科索夫斯基说，在莫斯科战役期间，这种事发生过多次，这只是其中的一次，它反映了自己与朱可夫在指挥风格上的差异。罗科索夫斯基回忆说，朱可夫“什么都不缺——才能、精力和自信”，而且是“一个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赋有成为一名伟大的军事领导人的所有品质的人”。但是，罗科索夫斯基写道：“对于指挥员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意志，以及指挥员在这样做的时候应该采取的方式，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坚持最高标准的要求，这对于任何军事领导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必需的。但对他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要把铁的意志和灵活性、对

下属的尊重以及能够信赖他们的才智及主动精神结合起来。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我们的方面军司令并不总是这样的。发脾气的时候，他还可能不够公正。”

有趣的是，罗科索夫斯基把他和朱可夫关系中的这些磕磕碰碰，与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支持和鼓励做了对比。有一次，罗科索夫斯基以为是朱可夫又打电话来训人了，拿起电话后却惊喜地听到斯大林那“沉静、平和的声音”。最高统帅的关心让他感动不已：“那慈父般的语调令人振奋，给人增添了自信。”[36] 和朱可夫很相似，罗科索夫斯基在斯大林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以及自己指挥风格的镜像。

莫斯科反攻

就在朱可夫打响了莫斯科保卫战的同时，大本营也在策划和准备反攻。早在10月5日的时候，斯大林就决定成立由10个集团军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这些集团军有一部分已经投入战斗，以阻止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但其主力还在按兵不动，准备用来反攻。据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说，反攻计划的制订工作是在11月初开始的，但由于德军再次发动进攻而一度中断，直到该月月底才又继续进行。[37] 朱可夫说自己在制订反攻计划中起到了核心作用，[38] 这种说法似乎是夸大了，因为他作为方面军司令，公务繁重。莫斯科战役期间，朱可夫只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见过他一次（11月8日）。[39] 11月30日，朱可夫向大本营呈交了他的方面军的反攻计划。该计划要求朱可夫的右翼在莫斯科北面沿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Solnechnogorsk）和伊斯特拉方向，朱可夫的左翼在图拉南面沿乌兹洛瓦亚（Uzlovaya）和博罗季茨克（Boroditsk）方向发动进攻。为了不让德军调动兵力，朱可夫还建议，直接在莫斯科的正面发动强有力的进攻。对于朱可夫的建议，斯大林简单地写道：“同意。J.斯大林。”[40]

朱可夫反攻的目的是，摧毁企图从南北两翼合围莫斯科的德军。在

中央地区的目标只限于牵制德军。同时，如果形势有利，也不排除在中央地区取得更大进展的可能性，包括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分割开来，并在莫扎伊斯克和维亚济马一线打通通往斯摩棱斯克的道路。

12月5日，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率先发起了莫斯科反攻；接着，朱可夫在第二天也发动了进攻，然后是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红军的有生力量包括38.8 万人、56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550辆坦克。与之对阵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有24万人，5350门火炮和600辆坦克。[41] 起初的进展很慢，所以朱可夫在12月9日给他的各个集团军司令下达指示，提醒他们战役的目的是“尽快打败侧翼的敌军，最后迅速前插……摧毁位于我们西方方面军正面的所有敌军”。朱可夫批评说，然而有些部队还在攻击德军的后卫部队，没有迅速合围，这就让敌人占了便宜，给了他们撤到“新的阵地并调整部署、组织抵抗”的机会。朱可夫指出，正确的方式是拖住那些后卫部队，然后从侧翼包抄，而不是从正面强攻那些已经构筑了防御工事的阵地。[42]

12月12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说，西方方面军给德军造成了3万人的伤亡，并解放了400个村镇。[43] 在那些被解放的地区中，就包括朱可夫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虽然德军已经把村子烧了，他母亲的房子也未能幸免，但她和朱可夫的姐姐一家已经被疏散了。不过，朱可夫的母亲没能活过这次战争，她在1944年自然死亡。

12月13日，苏联报刊报道了朱可夫在扭转莫斯科地区局势方面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同时还配发了他的大幅照片。在有关此次战役的苏联新闻片中，朱可夫也成了中心人物。西方媒体开始关注起了朱可夫。1942年1月，他的照片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的头版，所附的说明是“俄国中央战线杰出的总指挥官格里戈里（原文如此！）·朱可夫将军”。1942年6月，《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字后面，最常提到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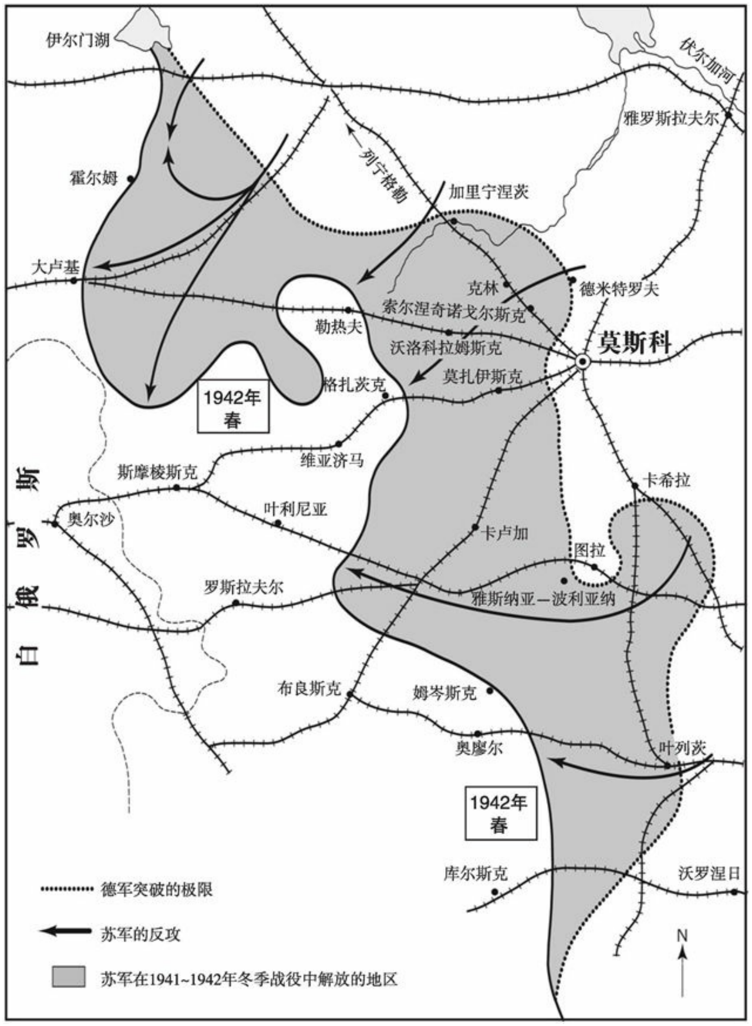
朱可夫。朱可夫不但在组织俄国莫斯科反攻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也许完全是他，在危急关头拯救了列宁格勒。今天有人说，就在战前不久，当消息灵通的德国武官被问到谁是俄国最伟大的将军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朱可夫’。”[44]

到12月底时，红军已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了100～150英里（见地图12）。

战争期间的朱可夫神话就是从朱可夫指挥的莫斯科战役开始的。此后，人们便开始认为，只要有朱可夫指挥，胜利就有了保障。事实上并非如此。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朱可夫还会遇到许多挫折。但是，对这个神话信以为真，激起了红军各级官兵，尤其是底层官兵对他的信心。对他们来说，他是个传奇，是俄国军事史上的巨人，是从拿破仑手中拯救祖国的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在当代的化身。红军战士大多是农民或者有农民的遗风，朱可夫是他们的自己人，尽管他冷酷无情的名声在外，但还是被视为会取得成功并率领部队走向胜利的人。

“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12月反攻的成功使得发动胃口更大的攻势有了可能。大本营从12月中旬开始便着手制订计划，要包围并摧毁很大一部分中央集团军群的敌军。大体上说，苏军的目标是要推进到勒热夫和维亚济马一线，摧毁在此以东的所有德军。这项任务被交给了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并由科涅夫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负责支援。俄国人起初是希望把莫斯科反攻的计划范围扩得再大一些，好把这第二个目标也包括进去，但事实证明这样做行不通，因为德军此时已经按照希特勒的不准撤退的命令筑壕固守。大本营的对策是，调整部署并发动人们所说的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地图**12** 朱可夫的莫斯科反攻，**1941**年**12**月

按照1942年1月7日大本营给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指示，“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的目标是包围尤赫诺夫—维亚济马—格扎特斯克（Gzhatsk）[45]—勒热夫地区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了此次行动，大本营从预备队中调集了大约50个师的兵力。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共有14个集团军、3个骑兵军和相当数量的空中支援力量，总计68.8万人、109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474辆坦克。与之对阵的德国国防军有62.5万人、1.1万门大炮和354辆坦克。行动从1月8日开始，由加里宁方面军向勒热夫方向发起进攻。两天后，西方方面军也加入战团，向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方向猛攻，而朱可夫的第1、第16和第20集团军则继

续向格扎特斯克方向进攻。为协调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行动，大本营在1月底成立了“西方战略方向”（原来的已在1941年被取消）。朱可夫被任命为这一方向的司令，全面负责“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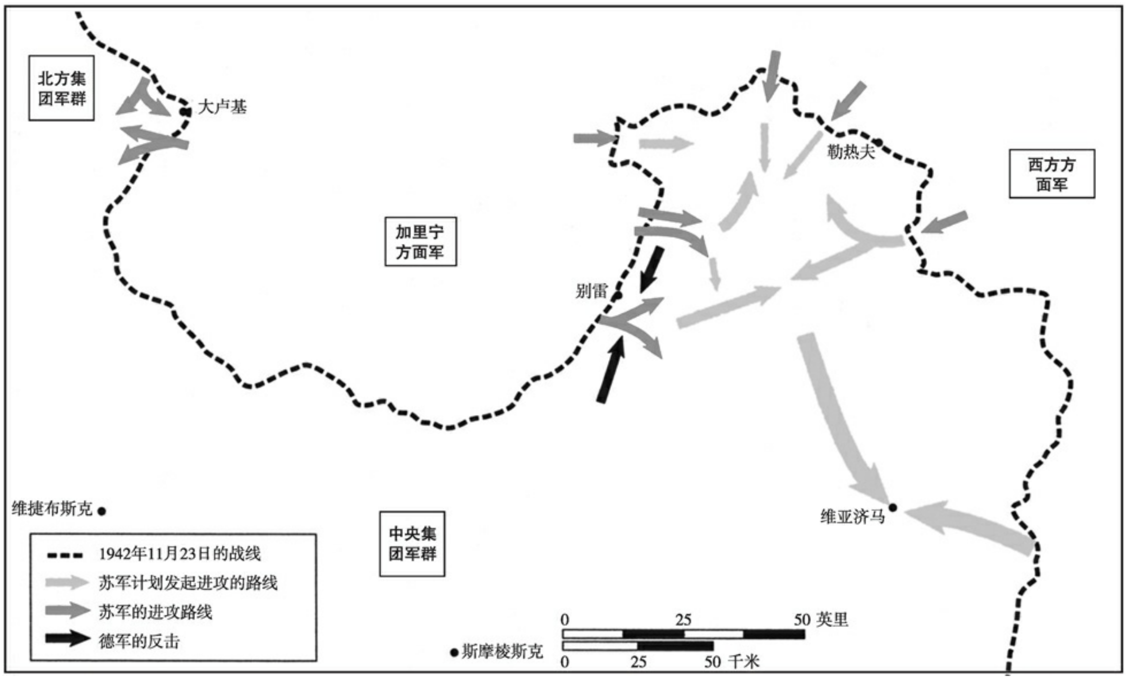
尽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它持续了三个多月。斯大林相信，由于德国国防军未能夺取莫斯科，这意味着“巴巴罗萨行动”很快可以被逆转，并把德国人赶出俄国。1942年1月10日，斯大林向自己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下面这条总的指示：

> 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国人以喘息之机，要不停地把他们向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季来临之前就用光自己的预备队。到那时，我们将会有大批预备队的生力军，而德国人却没有了预备队。这将确保在1942年彻底打败纳粹的军队。[46]

基于对形势的这一看法，红军在苏德战线全线发起进攻，但结果要么是收效甚微，要么是无功而返。到4月20日“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被叫停的时候，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伤亡已经超过75万人。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7月底，这两个方面军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这次攻势一直持续到9月底，而且又付出了将近20万人伤亡的代价，却再一次地无功而返。11～12月，苏联人再次试图有所突破，发动了代号为“火星”的行动。“火星行动”的目标被限定为摧毁勒热夫—瑟切夫卡（Sychevka）地区的德国第9集团军，不过，大本营也考虑过对中央集团军群实施更大规模的包围行动。可“火星行动”失败了，伤亡35万人，其中死亡10万人[47]（见地图13）。

在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期间，M.G.叶夫列莫夫（M.G.Efremov）领导的第33集团军得到的任务是占领维亚济马，担任支援的是P.A.别洛夫（P.A.Belov）将军的第1骑兵军和来自加里宁方面军的第11骑兵军。不幸的是，夺取维亚济马的尝试失败了，叶夫列莫夫的编队陷入德军的包围。别洛夫的骑兵部队等设法突围了出去，而包括叶夫列莫夫本人在内的叶夫列莫夫主力却全军覆没。朱可夫在自己的回

忆录中对此事花了很多笔墨。他对叶夫列莫夫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的来说，他的结论更多的是自我批评：“现在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1942年的事态发展，可以说，我们当时错误地判断了维亚济马一带的形势。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却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事实证明，敌人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顽强。”[48]



地图**13** “火星行动”——第三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1942**年**11**～**12**月

在俄罗斯，人们对于损失第33集团军一直争议很大。有历史学家认为，朱可夫操之过急，想要拿下维亚济马，而在行动失败时又没有给予叶夫列莫夫足够的支援。不过，从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看，朱可夫为此次行动的成功和解救第33集团军，显然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的失败就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是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他的兵力还不足以打败德国人”。[49]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中，朱可夫受到了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批评，说西方方面军未能援救被德军包围的三个师。这张日期为1942年8月17日的便条指出，当德国人被围的时

候，国防军会全力救援。“大本营认为，解救被围的部队对于西方方面军指挥部来说是个荣誉问题。”[50]

大本营执着地在勒热夫—维亚济马一带展开行动，这表明，在最高统帅部看来，在苏德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场是莫斯科—斯摩棱斯克—华沙—柏林这条中轴线，苏联要想取胜，就必须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在1944年之前，红军还没有能力攻击这个目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红军可以动用的兵力有限，其他许多战场也需要人手。另外，苏军面对的是一个顽强的、已逐渐站稳脚跟的对手，而且那些森林茂密的地区也有利于防守。

俄罗斯有句格言：成功有许多父亲，失败却是孤儿。“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是朱可夫在1942年的大事。即便是在当年8月他离开西方方面军成为斯大林的副最高统帅之后，他对这些行动仍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却宁可大谈自己在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不朽胜利中的作用，而不怎么说起“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表明他自己与那些失利无关。朱可夫表示，第一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的失利是因为没有拨给他足够的兵力。[51] 然而有关记录显示，当时拨给朱可夫的兵力是很多的，超过了其他各个方面军。

哈尔科夫惨败

对朱可夫有关大本营在1942年春天的战略决策的描述，人们一定也会有很大的疑问。朱可夫写道，冬季攻势的失利使斯大林和总参谋部认为，红军不应再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而应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态势，等到德军进攻时再进行回击。与此同时，斯大林不顾沙波什尼科夫的反对，认为有必要采取少量的进攻行动。朱可夫同意沙波什尼科夫的意见，认为要继续以防御为主，但他也想在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要是再给我一两个集团军，我们就可以和I.S.科涅夫将军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联合起来，不但打败勒热夫地区的，还有整

个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的德军，从而大大地改善整个西方战略方向的作战形势。可惜，这个大好机会被最高统帅部错过了。”[52]

按照朱可夫的说法，这个机会之所以被错过，是因为斯大林经不住铁木辛哥和西南方面军的游说，要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这次行动是在5月12日开始的，目标是收复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但是，苏军非但没能夺回哈尔科夫，参加行动的3个集团军还被德军包围并消灭殆尽。等到5月28日战役结束的时候，苏军损失了将近28万人——其中有17万人死亡、失踪或被俘——同时还有650辆坦克和近5000门大炮。

乌克兰当时的共产党首脑是还兼任西南方面军政治委员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把哈尔科夫惨败归咎于斯大林，声称自己和铁木辛哥曾请示过斯大林，趁苏军还没有被德军合围，允许取消此次行动。[53] 赫鲁晓夫对事态发展所做的自我辩白，被正式写进了20世纪60年代初官方版的卫国战争史中，当时他仍是苏联领导人。

对于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朱可夫断然予以否认，并认为哈尔科夫惨败的责任在西南方面军的领导层——他们先是在自己能力的问题上误导斯大林，后来又没把战役的实情告诉斯大林。朱可夫对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的批评得到了K.S.莫斯卡连科（K.S.Moskalenko）元帅的支持，后者是参与那次行动的集团军司令之一。按照他的看法，西南方面军低估了德军的抵抗能力，同时又夸大了己方军队的实力。[54] 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的看法表示赞同，但也表示，赫鲁晓夫说的曾试图说服斯大林取消行动的说法确有其事。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大本营本来是可以为西南方面军提供更多的帮助的。[55] 关于这一点，时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的巴格拉米扬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他觉得问题主要在于大本营为此次行动提供的资源不够。[56]

在6月26日给西南方面军的信中，斯大林对此次行动的失利做出了裁决：宣布解除巴格拉米扬参谋长的职务，因为他未能给大本营提供清晰而准确的情报——这“不仅使哈尔科夫行动功亏一篑，还把18到20个师送给了敌人”。[57] 斯大林认为这次的“大灾难”比得上沙皇军队在一战中最大的败绩。他还指出，犯错的不仅是巴格拉米扬，还有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如果我们把这次大灾难的实情全都告诉国人……那我担心他们对你们的处置会是非常严厉的。”[58] 不过，斯大林对待这帮罪人还是比较宽大的。巴格拉米扬虽然遭到降级，但他后来又东山再起，成为卫国战争中苏军最重要的指挥官之一。1942年7月，铁木辛哥被调到列宁格勒担任西北方面军司令，但这很难说是惩罚或贬黜。赫鲁晓夫依旧是乌克兰的负责人，而且在战后被斯大林调到莫斯科并培养成自己的一个接班人。

斯大林对西南方面军领导层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哈尔科夫惨败是统帅部的集体责任，包括作为最高统帅的他本人。在这方面，西南方面军在1942年3～5月提交给大本营的那些建议和报告很能说明问题。[59] 那些文件表明，西南方面军在建议采取行动的时候，对成功充满了信心，而且雄心很大，不仅要收复哈尔科夫，还想进抵把乌克兰一分为二并在首府基辅穿城而过的第聂伯河。即便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当德军要比原来设想的强大许多、取得的战果要远远低于行动的预期这些都很明了的时候，西南方面军向莫斯科提交的有关行动进展的报告仍然是乐观的。

制订出雄心勃勃的计划并表现出诸如此类的乐观态度的，并不是只有西南方面军。1942年春天，大本营收到前线指挥官的大量建议，要求发动进攻并增加兵力。[60] 这些建议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反映出斯大林和大本营的这样一种乐观的心态：要是在1942年春夏红军再发动一次攻势，那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德军就会被赶出苏联。哈尔科夫战役只是斯大林和大本营在1942年春天批准的若干雄心勃勃的进攻行动之一。因

此，可以说，是大本营崇尚进攻的战略取向，而非斯大林或西南方面军在行动中所犯的这个或那个错误，才是哈尔科夫惨败的根本原因。回忆录中的互相指责以及对朱可夫关于大本营在1942年春天决定继续采取守势的说法的普遍的信以为真，都往往使人看不到哈尔科夫惨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是在朱可夫回忆录之后出版的）更是增加了朱可夫的有关说法的可信度。按照它的说法，大本营的政策是：

> 在采取战略防御的同时，在几个地段发动局部的进攻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将会巩固冬季战役的成果，改善我方部队的作战态势，有利于我们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并打乱纳粹在1942年夏季发动新的攻势的计划。我们当时的设想是，这一切将为红军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夏季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条战线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行动。[61]

如果说这听上去像是隆隆作响的进攻行动的安排，而不是战略防御，那是因为在总参谋部1942年春天的计划文件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想法。按照那些文件的构想，除了要采取华西列夫斯基提到的那些局部行动之外，后面还会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并在1942年年底推进到苏联的西部边界，到那时，红军就会采取守势。[62] 在1942年5月1日斯大林的“节日命令”中，对这一战略构想有公开的表述。该命令将目前的战争阶段定义为“从希特勒匪徒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而且它还号召红军“把1942年变成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从希特勒恶棍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一年！”[63]

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斯大林表现得过于乐观。就像哈尔科夫之战所表明的，德国人离完蛋还早着呢。实际上，对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的最大考验尚未到来。希特勒正在策划再来一次“巴巴罗萨行动”——这次是在俄国南方——而且斯大林要再次依靠朱可夫来挽救危局。

---

[1] *Na Priyome u Stalina* （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p.614-615.

[2] 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总体看法见于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chap.11。在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一章令他的出版商们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想把朱可夫打扮成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所以他们就加了一个编注，说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描述合乎“时代精神”（Zhukov，*Vospominaniya*， vol.2，p.73）。

[3] 例如，参见“Korotko o Staline，” Pravda，January 20，1989。

[4]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vol.16（1），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Moscow：Terra，1996）， doc.82.

[5]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vol.16（1），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Moscow：Terra，1996）， doc.83.

[6] 转引自Lomagin，N. *Neizvestnaya Blokada*， 2 vols. Moscow：Olma-Press，2002，vol.1（Moscow：OlmaPress，2002）， p.63。

[7]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1，pp.398-401.档案中对该故事有另一种说法。朱可夫给出的他和斯大林见面的日期是9月7日，并说斯大林问他接下来想去哪里。他建议说列宁格勒或西南地区。当斯大林决定派他到列宁格勒时，他建议由铁木辛哥指挥西南方面军。RGVA，F.41107，Op.1，D.54，L.58.

[8] Zhukov，*Reminiscences*， vol.1，pp.417-418.

[9] *Na Priyome u Stalina*， p.349.

[10]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s.252，253.

[11] 费久宁斯基和贝切夫斯基回忆录中的有关内容可见于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

[12] 转引自D.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 p.76。

[13] 转引自D.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 pp.81-82。

[14] 转引自Ella 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I.G.Aleksandrov ed.，*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Moscow：APN，1988）， pp.54-55。

[15] Glantz，D.M. *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p.83；J.Erickson，“Zhukov，” in M.Carver ed.，*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rnsley，U.K.：Pen & Sword，2005）， p.250；E.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London：Hodder Arnold，

2005），pp.84-85；V.Beshanov，*Leningradskaya Oborona*（Minsk：Kharvest，2006），pp.124-125.

[16]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339.

[17] 关于列宁格勒之围，参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无与伦比的《900天》（New York：Harper & Row，1969）。

[18]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Sbornik Dokumentov*（Moscow：Mosgorarkhiv，1994），docs.3，5，7，17.

[19] I.S.Konev，“Osen’u 1941 goda，” and G.K.Zhukov，“Vospominaniya Komanduushchego Frontom，” in *Bitva za Moskvu*，3rd ed.（Moscow：Moskovskii Rabochii，1975），pp.55-56，68-69.该书初版于1968年。在科涅夫的文章发表之前，编辑给朱可夫发了一篇征求意见的样稿。朱可夫反应激烈。他写信给编辑说，科涅夫的稿子谎话连篇，其中涉及他本人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一事，如果它就这样发表，他就撤回自己给这本书的文稿（RGVA，F.41107，Op.1，D.77，L.8）。最后，科涅夫的文章发表时基本上原封未动，同时发表的还有朱可夫自己的文章。

[20]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Moscow：APN，1989），p.364.

[21] 参见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Moscow：Olma-Press，2000），pp.237-241。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件事采取了折中的说法：“10月9日，在一次与最高统帅的例行谈话中形成了一个决定，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成西方方面军。我们大家，包括科涅夫在内……都同意斯大林的建议，任命朱可夫为合并后的方面军司令。”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15.

[22] 关于科涅夫，参见 O.Rzheshevsky，“Konev，”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以及J.Erickson，“Konev，” in Carver ed.，*The War Lords*。科涅夫回忆录的英文版名为《胜利的年代》（*Year of Victor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他的更完整的俄文版回忆录是I.S.Konev，*Zapiski Komanduushchego Frontom*（Moscow：Voenizdat，1981）。

[23] Mawdsley，E. *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London：Hodder Arnold，2005，p.95.

[24]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doc.23.关于莫斯科的恐慌情绪，参见R.Braithwaite，*Moscow 1941*（New York：Knopf，2006），chap.12；A.Nagorski，*The Greatest Battle*（London：Aurum，2007），chap.7；以及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 Books，1965），pp.224-233.

[25]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

1993），p.72.奥滕贝格回忆的说法可见于S.S.Smirnov et al.，eds.，*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 （Moscow：Politizdat，1988）。

[26]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 ， doc.12.

[27]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66.

[28] 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doc.32.

[2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1.

[30]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1.

[31] J.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Hutchinson，1943-1944），pp.21-23.

[3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66.

[33]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 ， doc.37.

[34]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78.

[35] 转引自O.P.Chaney，*Zhukov* ，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179。这段话在出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中被删掉了。

[36] O.P.Chaney，*Zhukov* ，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85-86.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莫斯科战役期间的斯大林有类似的评论："斯大林可能会非常急躁而粗暴；但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期，（他）对自己下级的关心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18.

[37]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21.

[3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4-46.

[39] *Na Priyome u Stalina* ， p.355.

[40]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 ， doc.62.

[41] D.Glantz，*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 （Stroud，U.K.：Tempus，2001），p.188.

[42] 转引自E.Mawdsley，*December 1942*：*Twelve Days That Began a World War*（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19-220。

[43] *Bitva za Moskvu*：*Moskovskaya Operatsiya Zapadnogo Fronta*，*16 Noyabrya 1941g.-31 Yanvarya 1942g*.（Moscow：Tranzitkniga，2006），p.240.这是苏军总参谋部自己对莫斯科反攻的研究。战争期间撰写并秘密传阅的这类研究报告有很多，目的是汲取并传播重大军事行动的经验。这些研究报告非常宝贵，它们从苏方的视角对历次战役的过程做了清晰的描述，而且还提到了从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献。

[44] A.Werth，*The Year of Stalingrad*（London：Hamish Hamilton，1946），p.99.

[45] 1968年后按照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名字更名为“加加林市”。——译者注

[46] 转引自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52。

[47] 我对1942年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的历次行动的概述，是基于S.Gerasimova，*Rzhev 42*：*Pozitsionnaya Boinya*（Moscow：Yauza-Eksmo，2007）。该书附有若干地图及大本营的相关命令。格拉西莫娃的伤亡数字受到了M.A.加利耶夫（M.A.Gareev）将军的质疑：“O Nashikh Poteryakh podo Rzhevom i Vyaz’mo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3，2002。

[48]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62.在20世纪60年代《军史杂志》的编辑对朱可夫的采访中（没有发表），朱可夫对叶夫列莫夫提出的批评要比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多，但他承认自己对于此次失败负有责任，而且还指出，他自己远不只是在这一次行动中犯了错误（*Kommunist*，no.14，1988，p.96）。

[49] 参见V.Mel’nikov，*Ikh Poslal na Smert’ Zhukov*？*Gibel’ Armii Generala Efremova*（Moscow：Eksmo，2009）；另见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304-31；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84-87；以及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197-200。

[50] 该文件的复印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5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52-55.

[5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86.

[53]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p.536-537.

[54] K.S.Moskalenko，*Na Ugo-Zapadnom Napravlenii*，2nd.ed.，vol.1（Moscow：Nauka，

1975），pp.168-213.

[55]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p.163-164.

[56] I.K.Bagramyan，*Tak Shli My k Pobede* （Moscow：Voenizdat，1998），pp.305-353.

[57] 这些文件可见于D.M.Glantz，*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格兰茨在这部非常有价值的书中还对此次战役以及苏方有关此次惨败的讨论做了详细的描述。

[58] Glantz，D.M. *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pp.224-225.

[59] Glantz，D.M. *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pp.224-225.

[60] 参见M.N.Ramanichev，“Nevidannoe Ispytanie，” in G.N.Sevast’yanov ed.，*Voina i Obshchestvo*，*1941-1945*，vol.1（Moscow：Nauka，2004），p.88。

[61]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157.

[62] 参见P.P.Chevela，“Novye Ispytania，” in V.A.Zolotarev and G.N.Sevast’v yanov，eds.，*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Moscow：Nauka，1998-1999），pp.325-327。另见Ramanichev，“Nevidannoe Ispytaniye”。

[63] 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pp.32，34.

8 胜利的设计师？斯大林格勒，1942

与1941年相比，希特勒在1942年的战略选择比较有限。他本来更希望多路出击，再来一次“巴巴罗萨”那样的战略进攻，但他的实力不允许。德国国防军已经遭到红军的重创。截至1942年3月，德国军队已有110万人阵亡、受伤、失踪或被俘，约占其东线兵力的35%。满员的师没几个，而且德军的机动性也遭到严重的削弱，因为他们已经损失了4万辆卡车、4万辆摩托车和近3万辆小汽车，更别说还有数千辆坦克了。德国国防军是一支现代军队，而且是最新式的军队，即便如此，它的运输也只能依靠马匹等役畜，而这些役畜的损失也已达到18万匹（头），却只补充了2万匹（头）。[1]

希特勒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在某个单独的战线上发动进攻，而他的选择落在了苏联南方。高加索山脉的南面是巴库油田，苏联燃料中有近90%都来自那里。如果德国人能够夺取那些油田，苏联的战争机器很快就会瘫痪。在通往巴库的途中，德国人还可以顺便占领乌克兰、俄罗斯南部和外高加索的农业区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希特勒并不一定指望在1942年就打赢战争，但他希望能使德国熬过东线漫长的消耗战。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在日本于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希特勒为了支持他的这个盟友而对美宣战之后，美国已正式参战。显然，美国人很快就会利用其巨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支持他们的俄国盟友。

1942年4月5日的第41号元首令明确了德军夏季作战的目标：

> 要集中所有可以动用的军队参加南方的这次重大行动，目标是在顿河前方摧毁敌军，夺取高加索的油田并越过高加索山脉。[2]

苏联人已经得到情报，说1942年夏天德国人会在南方发动进攻，但这个消息还不确定，而且对斯大林和大本营来说，盘踞在距莫斯科不到100英里处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70个师，仍然是心腹之患。斯大林没有排除德军会在南方有大动作的可能，但他认为这主要还是为了协助从侧翼向莫斯科发动的进攻。所以，莫斯科的防御是重中之重，而大本营的预备队也被布置在合适的位置。

认为希特勒的目标是夺取莫斯科，这种看法在1942年从头到尾都占据了上风。斯大林在1942年11月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当时正是德军在南方的推进最为迅猛的时候——否认德军的夏季攻势主要是为了石油，他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从东面迂回包围莫斯科，从前后夹击苏联的首都。[3]

在主要的战役开始之前，德国人先攻占了克里米亚。他们虽然在1941年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全境，但由于红军为了缓解被困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中的守军的压力而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1942年年初，德军失去了对刻赤半岛的控制。5月8日，德国第11集团军发起了夺回刻赤半岛的战役。他们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击溃了苏联的3个集团军，共计21个师，并俘虏了17万人。

在红军被赶出刻赤半岛之后，德军就可以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最后的强攻了。从6月2日开始，德军动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在长达一个月的围攻中，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2.3万架次，向这座城市空投了2万吨炸弹。德国人还从列宁格勒前线调来了他们最重型的大炮，可以发射1吨、1.5吨甚至7吨的炮弹。7月初，遭到步兵和两栖攻击的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但城中守军的殊死抵抗令人肃然起敬。这种殊死抵抗就像即将在斯大林格勒开始的大搏斗的预演。

“蓝色行动”

德军在南方的推进——代号“蓝色行动”——是从1942年6月28日开始的。计划占领顿涅茨盆地（顿巴斯）和顿河以西的所有领土，包围并摧毁这些地区的苏军并沿顿河建立自己的防线。在将红军装进口袋之后，德军便跨过罗斯托夫南面的顿河，向库班、高加索和巴库前进。占领斯大林格勒并非首要目标，但需要把这座城市置于其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从而切断从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上至俄罗斯北部的石油运输线。在从顿河大湾到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西岸，德军还要筑起一座防御性的陆桥（land bridge），以进一步掩护自己向南方的推进。

实施此次行动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包括第6和第17集团军、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主要在克里米亚活动的第11集团军。负责提供支援的是数量庞大的轴心国军队，包括匈牙利的第2集团军、意大利的第8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3和第4集团军。总数近200万人，89个师，其中有9个装甲师。

“蓝色行动”进展迅速。到7月底的时候，德军已占领了顿巴斯全境以及顿河地区的大部分领土，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山脉也已进入视线的范围。8月底，德军打到了伏尔加河，包围了斯大林格勒。在更远的南方，他们来到高加索山脉的脚下，占领了迈科普（Maikop）油田，并对车臣的格罗兹尼油田形成了威胁。1942年8月21日，德国人的旗帜插上了高加索最高的厄尔布鲁士峰（Elbruz）（见地图14）。

德军在7～8月俘虏了62.5万名苏军，缴获或击毁了7000辆坦克、6000门大炮和400多架飞机。德军的伤亡也很高，仅在8月就有约20万人。红军也损失惨重，但没有1941年夏天的那么大。不过，德军推进的相对容易使希特勒误以为胜利已唾手可得。

按照原先的设想，“蓝色行动”是一次统一的行动，要通过协同作战分阶段实现其各项目标。首先是控制顿河和伏尔加河，继而主要向高加

索以南推进。然而，南方集团军群在7月9日分成了两支独立的部队：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负责由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各轴心国集团军组成的B集团军群。他的任务是，从库尔斯克和哈尔科夫沿沃罗涅日方向向东攻击，然后折向东南，向顿河大湾推进。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Wilhelm List）率领的A集团军群下辖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任务是占领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然后向巴库前进。7月13日，冯·博克由于在作战上意见不合而被希特勒解除职务，由陆军元帅冯·魏克斯（von Weichs）男爵接替他的位置。同一天，第4装甲集团军奉命从B集团军群调入A集团军群，参加南方战役。



地图**14** 德军在南方的推进，**1942**年夏天

7月23日，希特勒发布第45号令。它说：“在一场持续三周多的战役中，我为东部战场南翼列出的各个目标大部分都已实现。”在克里米亚的第11集团军的支援下，A集团军群现在的任务是摧毁罗斯托夫以南的

敌人，然后“占领黑海的整个东海岸”并推进到巴库。在此期间，B集团军群要“向斯大林格勒挺进并击溃集结在那里的敌军，占领这座城市，截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陆上交通”。[4] 换句话说，希特勒决定同时追求两个战略目标——占领巴库和夺取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在南方攻势中分头出击，这样的决定是致命的。德国国防军无力实现这么大的目标，这就使苏联人有机会巩固自己的防御并准备发动还击。

斯大林针对“蓝色行动”采取的对策受到了这样的看法的影响，即他仍然相信莫斯科是德军在1942年的主要目标。而德军最初对沃罗涅日的攻击力度之大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因为沃罗涅日更靠近莫斯科而不是斯大林格勒。7月7日，沃罗涅日失陷，但红军连续几周在周围地区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从大本营决定成立沃罗涅日方面军并任命总参谋部最有才干的军官之一——尼古拉·瓦图京将军担任指挥官来看，就可以看出大本营对于这些行动的重视。[5]

再往南，由于铁木辛哥的西南方面军在1942年5月的哈尔科夫惨败后尚未恢复元气，采取进攻行动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当7月初德军的进攻使南方的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铁木辛哥的防线崩溃了，大本营不得不下令向顿河地区撤退。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这一点已不可否认，于是，大本营在7月12日下令成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的原西南方面军再加上第62、第63、第64这三个预备队集团军构成。铁木辛哥手下现在有38个师、50多万兵力，其中包括1000辆坦克和近750架飞机。不过，铁木辛哥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并没有待多长时间。7月22日，V.N.戈尔多夫（V.N.Gordov）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在8月初，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又被一分为二，分成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8月9日，A.I.叶廖缅科将军被任命为这两个方面军的总指挥。[6]

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官方历史中，1942年7月17日被认为是斯大林格勒战役“200天战火”开始的日子。[7] 这一天，德国第6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与第62、第64集团军在奇尔河（River Chir）交上了火。没过几天，大批德军就越过南面的顿河，并迅速向高加索地区和斯大林格勒推进。7月底，罗斯托夫失守。这一事件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罗斯托夫是通往高加索的门户，它的陷落意味着德军现在可以畅通无阻地占领库班这个在顿河与高加索山脉之间的最富裕的农业区。罗斯托夫的失守在心理上的影响也相当大。罗斯托夫最初在1941年11月就被德军占领了，但几天之后又被红军收复了，而且苏联人还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因为这是他们收复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现在，罗斯托夫又落到了敌人手中。

“一步也不后退！”

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发布了他那著名的227号命令，即“一步也不后退！”的命令。命令开门见山，指出了苏联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

> 敌人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并正在突入苏联的腹地，侵占新的地区，破坏和毁灭我们的城镇和村庄，强奸、抢劫和杀害苏联人民。在沃罗涅日地区，在顿河，在南方通往北高加索的门户，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德国占领军正在扑向斯大林格勒，扑向伏尔加河，企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库班和北高加索，以及它们的石油和粮食资源。

但是，斯大林说，红军没能尽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 南方方面军的部队惊慌失措，没有经过认真的抵抗，也没有得到莫斯科的命令，就放弃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从而令他们的旗帜蒙羞。我国人民对红军……正在失去信心……并咒骂他们，因为他们任由我们的人民遭受德国压迫者的凌辱，而自己却逃向东方。

在指出到当时为止的损失程度的同时，斯大林还强调，“继续后退意味着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的毁灭。我们每放弃一点点领土都会极大地

增强敌人的力量而严重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斯大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停止后退，而且他使用了与朱可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用过的相同的口号——“一步也不后退！”

> 一步也不后退！现在这必须成为我们首要的战斗口号。为了守住每一块阵地，每一米的苏联领土，为了尽最大的努力去牢牢守住每一小块苏联的土地，必须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8]

227号命令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铁的纪律、严厉的惩罚及不得擅自撤退，这些都是斯大林（和朱可夫）自开战以来一直强调的。但是，其紧迫的语气反映出斯大林由于当年夏天接二连三的失利和损失而感到的焦虑。

就像在莫斯科战役中一样，光靠用惩罚来威胁还不行，还得靠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吁。呼吁人们——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去尽爱国主义的义务，这在开战以来已经成为苏联政治动员的要领，但在亚历山大·沃思所说的“黑色的1942年夏天”，当大溃败的一幕有可能重演的时候，这种呼吁显得尤为突出。[9] 对于大部分苏联公民来说，德军在南方的迅猛推进犹如晴天霹雳，而由此引起的幻灭感又加剧了那年夏天强烈的危机气氛。苏联的宣传很快改变了策略，转而开始强调形势的严峻性。7月19日的《红星报》社论认为，（当前）南方的局势就如同1941年的莫斯科战役和列宁格勒战役。[10]

呼吁为祖国而献身所针对的最重要的目标人群是苏联的军官团。7月30日，斯大林新设了专门给军官们颁发的勋章：“库图佐夫勋章”“涅夫斯基勋章”“苏沃洛夫勋章”。苏联报刊也开始大量刊登文章，宣传军官们在维持纪律方面的特殊作用以及他们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对于胜利的重要性。当年晚些时候，军官们都配发了带有肩章和金色镶边（那要专门从英国进口）的新制服。1942年10月9日，当斯大林格勒鏖战正酣的时候，一道政令取消了政委制度，从而结束了那种政治委员有权否

决指挥决定的做法。[11] 苏联在1941年夏天德军入侵之后，为了强化武装力量的纪律与忠诚，曾一度恢复过政治委员的权力。一年之后，斯大林想要传递一个不同的信息：他相信红军不用政治委员的干预也能去尽自己对祖国的义务。

斯大林预感到一场大决战即将在斯大林格勒开始，这在他与8月飞到莫斯科商讨军政局势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交谈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他们于8月12日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大林告诉丘吉尔：

> 情况不妙，德国人正在拼命想打到巴库和斯大林格勒。他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同时调集那么多的部队和坦克，还有那么多的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部队。他觉得他们肯定已经调走了部署在欧洲的所有军队。在莫斯科，阵地是牢固的，但他无法预先保证俄国人有能力抵挡住德国人的进攻。

当丘吉尔问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在沃罗涅日或北方发动新的攻势时，斯大林回答说："我不知道。但考虑到战线的长度，用20个师来建立一支打击力量是很有可能的，那样一来就会威胁到莫斯科或其他地方。"讨论接着就转到"第二战场"问题。苏联人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在要求自己的英美盟友进攻法国北部，以吸引一部分东线德军。几周之前，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先后到伦敦和华盛顿与丘吉尔及罗斯福总统商讨此事，最后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就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紧迫的任务已经达成充分的理解"。但英国人也警告说，只有在他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开辟"第二战场"，而现在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这件事不可能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登陆船只用来实施这样的行动。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消息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非常愤怒，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该那样害怕德国人"。他对丘吉尔谈到的英美在当年秋季联合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非常高兴，但他在次日给英国首相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苏联夏季和秋季军事行动计划的制订都是以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为基础的。

8月15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再度举行会谈，最后还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住所举行了私人晚宴。斯大林在晚宴上向丘吉尔简单介绍了苏德战场的情况。斯大林说，德国人正在兵分两路发动进攻，一路朝高加索方向，一路朝沃罗涅日和斯大林格勒方向：

> 前线已经被突破，敌人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扩大战果……他们指望突破到斯大林格勒，但他们没能到达伏尔加河。（他）认为他们到不了。在沃罗涅日，他们想要突破到叶列茨（Elets）和梁赞（Riazan），以便转向莫斯科战场。他们在那里也失败了……在勒热夫，俄国人已经使防线的形势有所好转，勒热夫很快就要收复。然后俄国人就向南推进，把斯摩棱斯克分割开来。在沃罗涅日，德国人已经被赶过顿河。在斯大林格勒的北面……俄国人有庞大的预备队。他希望不久之后沿两个方向发动进攻：（a）朝罗斯托夫方向，（b）朝更南的方向……目标是截断北高加索的敌军……他最后说，在东线，希特勒没有实力在一个以上的地段同时发动进攻。[12]

这番话表明，斯大林尽管对形势很担心，但他相信自己应付得了这个新的危机。斯大林对外国人总是显得那么自信，而且它往往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但是，由于红军对逼近斯大林格勒的敌军发动的反击失利，这种信心想必已经动摇了。8月23日，德军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用大规模的空袭拉开了进攻的序幕，结果造成至少2.5万名平民的死亡。8月25日，城市当局开始实行军事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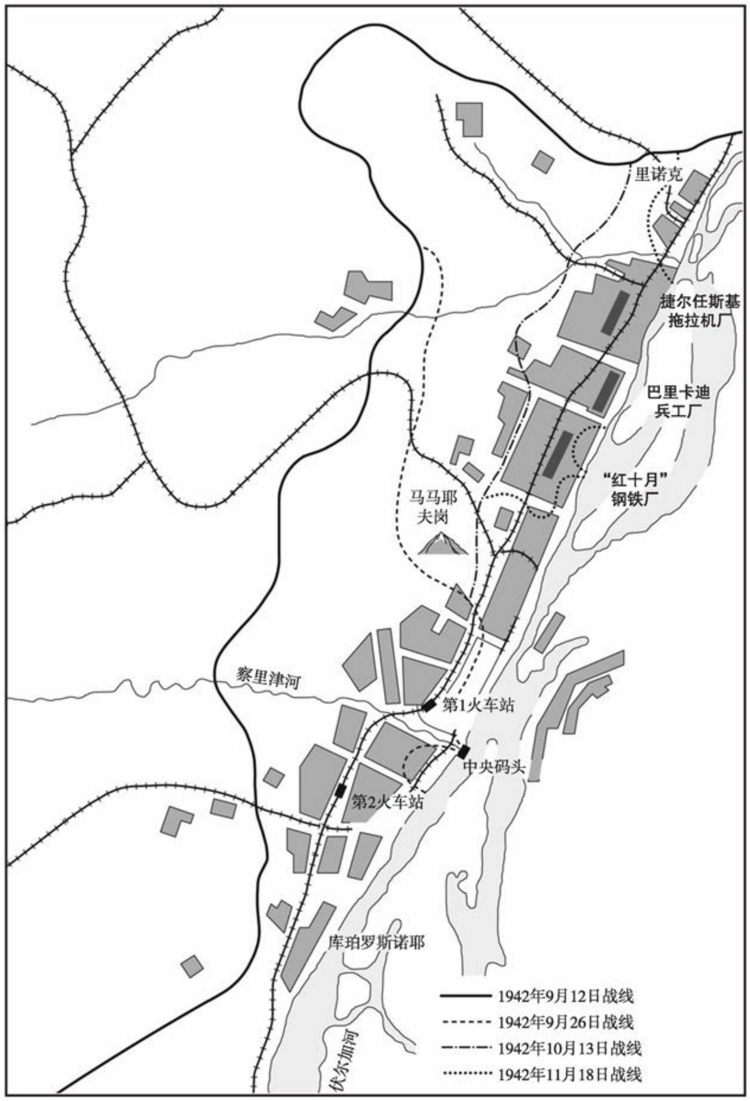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情况下，8月26日，斯大林决定从西方方面军召回朱可夫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一职由科涅夫接任）。就像之前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一样，斯大林格勒也需要被拯救，而斯大林想让某个人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果断、无情且带着坚定的信念来打这场战役。但是，对于朱可夫的任命，并不是要不顾一切地拯救斯大林格勒那么简单。斯大林释放出的信号是，作为其主要的幕僚和干将，他对朱可夫是极为信任的。就像约翰·埃里克森说的，朱可夫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副手，意味着他“从被派往受到威胁的战场去的‘客串救火队员’，一下子成了苏联军事机器的首席工程师”。[13]

朱可夫的任命还象征着在共产党政权与战争中发展起来的红军之间，包括斯大林与其将领之间，比较平等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朱可夫在8月27日还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从现在起，管理苏联战争努力的许多最重要的决定，除了斯大林的名字之外，也将附上朱可夫的名字。

德国人要想拿下斯大林格勒，就必须先占领伏尔加河西岸，那样一来，红军就无法得到来自东岸的增援和补给。在这场搏斗中，捉对厮杀的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将军指挥的德国第6集团军和瓦西里·崔可夫（Vasily Chuikov）将军指挥的苏联第62集团军。崔可夫在性格上与朱可夫一样，都属于那种为了胜利愿意做出任何牺牲的人。[14] 市内的战斗漫长而激烈，它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德国国防军占领了这座城市90%的地方，但就是没有办法把崔可夫的部队从伏尔加河西岸的一块16英里的狭长地带赶出去。只要第62集团军还守着这个桥头堡，德国人就不能说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容易遭到苏军的反击，从而动摇其在斯大林格勒及整个顿河和伏尔加河地区的态势。崔可夫的部队在战斗中的伤亡率达到75%，但他们的抵抗意志并没有被击垮。虽然全世界都觉得市中心著名的巷战很了不起，但第63和第64集团军为保护斯大林格勒的侧翼而进行的战斗，对于此次战役的结果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德国人无法向这座城市投入更多的兵力。同样关键的还有德国空军与红军空军之间争夺制空权的战斗以及伏尔加河东岸苏联炮兵倾泻在德军阵地上的弹雨[15] （见地图15）。

斯大林并没有把朱可夫立即派往斯大林格勒。6月接替有病在身的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已经作为大本营协调员到了那里。不过，朱可夫在8月底乘飞机来到了戈尔多夫将军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部，而且在整个9月基本上都待在这一地区。[16] 作为大本营的代表，他的任务是监督并协调戈尔多夫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叶廖

缅科的东南方面军在保卫这座城市中的行动，还有就是要把有关情况直接反馈给斯大林，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地图**15** 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9**～**11**月

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的这段时间和斯大林之间的通信联系，属于这座城市的保卫战中错综复杂的历史细节，但从那些联系的语气就可以明显看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两人之间的关系。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汇报非常信任。他尊重他的判断，愿意接受他的建议。斯大林经常会说：“你有什么计划？”“你怎么看……？”“请报告吧。”例如，9月16日，斯大林给

朱可夫发了封电报，问他为了加强这座城市的防御，是否“考虑过派两个步兵师进入斯大林格勒的可行性”。就在同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还告诉朱可夫，他对其实施此次战役的计划没有任何异议。[17] 斯大林对于自己的将领一般是不会表现得如此尊重的，这一点从他在10月5日与叶廖缅科的通话中就可以看出：

> 我认为你们没有看到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军队所面临的危险。敌人占领了市中心并向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推进，这是想要……包围并俘虏第62集团军，然后再去包围并俘虏城南的第64集团军。如果敌人能够占领斯大林格勒城北、城中和城南的伏尔加河上的渡口，他们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把敌人从伏尔加河河边赶走，占领敌人已经从你们那里夺去的街道和建筑。为此就必须把斯大林格勒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都变成堡垒。可惜你们没有尽力这样去做，而是继续把一个又一个的街区让给了敌人。这说明你们的表现很糟糕。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你们的兵力比敌人的多，但敌人还硬是一点一点地把你们赶了出来。我对你们在斯大林格勒的表现感到不满，并要求你们采取一切措施守住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不能给敌人，必须解放斯大林格勒被敌人占领的每一个地方。[18]

“天王星行动”

从大本营的角度来看，守住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阵地固然重要——哪怕只是为了心理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要设法击退德国人的整个南方攻势。大本营想出的办法就是“天王星行动”，即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反攻，包围并歼灭了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行动。

据朱可夫说，该计划主要是由他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人制订的。9月12日，朱可夫飞回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汇报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汇报过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就走到一旁，开始小声讨论需要找到“其他办法”来解决他们在斯大林格勒面临的困难。斯大林听到了，就问他们在谈什么。斯大林的插话让朱可夫很是惊讶。“我没想到斯大林的耳朵这么灵。”结果，斯大林让他们两人拿出一个新的计划。

>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总参谋部仔细研究。我们集

中考虑了有没有可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以免把我们已经处于准备状态和半准备状态的预备队浪费在一些孤立的行动上……在讨论了所有可能的选择之后，我们决定向斯大林提出如下的行动计划：首先是继续通过积极防御来疲惫敌人；其次是准备发动反攻，狠狠打击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敌人，以迅速扭转我国南方的战略形势，使之变得对我方有利。

当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当晚回到斯大林办公室的时候，独裁者对他们的建议表示怀疑，但愿意进一步考虑。在此期间，发动大规模反攻的想法是保密的。朱可夫在当天夜里就回到了斯大林格勒，但9月底又被召到莫斯科，对自己和华西列夫斯基的计划草案进行详细的讨论。这个时候，斯大林批准了他们的计划。[19]

就像朱可夫的许多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不能得到斯大林会客日志的证实，因为根据它的记载，从8月31日至9月26日，斯大林根本没有见过朱可夫。斯大林这段时间确实见过华西列夫斯基，但不是在9月9日至21日。朱可夫所说的9月12日和13日的见面有可能日志里没有记载，或者是在别的地方发生的，或者是朱可夫把日期搞错了。但这个证据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一切都是朱可夫想象或虚构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原因并不难找到。“天王星行动”的起因在战后引发过相当多的争议。1946年，当朱可夫遭到贬黜时，对他的指控之一就是他欺世盗名，把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功劳据为己有。1957年，在朱可夫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时候，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又提出了同样的指控。在朱可夫被解除职务之后，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他曾经是斯大林格勒的总政治委员）声称他们才是这个反攻计划的制订者，而朱可夫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前，一直被剥夺了对他们的说法发表意见的权利。实际上，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对于事情经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完全有理由感到不平。该计划产生的确切时间和方式也许不像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绘声绘色地说的那样，但毫无疑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推动者。

据同一时期苏军总参谋部有关此次战役的记述，反攻计划的制订是在9月的下半个月开始的。然后，10月4日，朱可夫召开了由各个方面军司令参加的会议，并在会上介绍了计划的大体内容。[20] 根据其他的文献证据，我们得知，会后有三个参加了此次反攻的方面军，即顿河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向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的实施建议。还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两人在此次反攻的准备工作中也发挥了广泛的作用。[21]

与“天王星行动”有关的另一个争议是，它与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同时发动的攻势即“火星行动”的关系。按照朱可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火星行动”是牵制性的，是为了保证在发动“天王星行动”的时候，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部队不会被调到南方。[22] 朱可夫把“火星行动”说成是牵制性的，这种税法已被大部分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所接受，但是在《朱可夫最大的败绩：1942年红军在“火星行动”中的惨败》这本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格兰茨却表示，“火星行动”是朱可夫策划的一次独立的行动，该行动即使不比“天王星行动”更为重要，那也同等重要。就像格兰茨指出的，朱可夫为准备“火星行动”而耗费的时间要多过“天王星行动”，而在这两个行动开始的时候，朱可夫是负责协调参与“火星行动”的两个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而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天王星行动”。每个行动的参战兵力基本上差不多。按照格兰茨提供的数据，在“火星行动”中投入的兵力相当于36.5个师，而用于“天王星行动”的有34.5个师。苏军为了对付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而调集的总兵力达到189万人，拥有24682门大炮和迫击炮、337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170架飞机，而用来对付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有110.3万人、15501门大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463架飞机。

格兰茨提出的理由很充分，特别是在把“火星行动”放在1942年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发动的一连串行动的背景中来看的时候。三次行动的规模都差不多，都是为了给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以沉重的打击。没有任

何理由认为“火星行动”有什么不同。当11月25日紧接着“天王星行动”也开始发起“火星行动”的时候，这两个行动在苏联报刊上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意义。报刊的新闻标题特意强调，正在进行的是一次两路出击的攻势。这样的标题直到“火星行动”显然无法取得“天王星行动”那样的进展时才消失不见。[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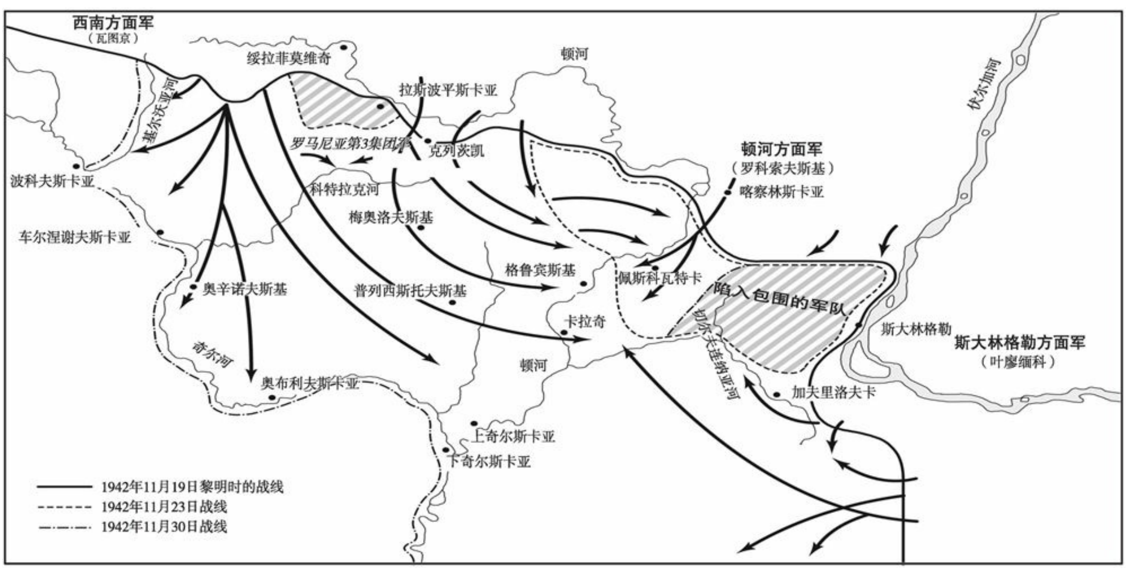
很明显，“火星行动”远不只是一次牵制性的行动，但它是不是格兰茨所渲染的“最大的败绩”，也是有问题的。它更像是朱可夫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最新遭遇的挫败。而且，前两次“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与“火星行动”一样都损失惨重。尽管这样，“火星行动”的积极成果也不应被低估。在“天王星行动”给德军的南方战役造成重创的同时，它也让德军在中央地带穷于应付。“火星行动”虽然没能把德军赶出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但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损失，并促使德军在1943年主动后撤。

1942年11月19日开始的“天王星行动”，是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联合发动的攻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组建于9月28日，当时是把叶廖缅科的东南方面军更名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而罗科索夫斯基则指挥更名为顿河方面军的老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邻近顿河方面军的西南方面军成立于10月31日，由瓦图京指挥。行动的基本构想是，由这三个方面军进行合围，各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西面的卡拉奇（Kalach）会合。

反攻行动是从3500门大炮和迫击炮的猛烈炮击开始的。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担任主攻的是西南方面军，而在南面则是叶廖缅科的第51和第57集团军。为双管齐下的打击提供支援的是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按照计划，瓦图京的部队向东南的卡拉奇方向推进，而叶廖缅科的部队则向西北朝同一目标前进。与此同时，沿奇尔河和基尔沃亚河（Krivaya River）会建立一道外围防线。对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

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顿河大湾处敌军的雄心勃勃的两翼合围计划就是这样设想的（见地图16）。

反攻的准备工作保密性非常好，苏军采取的许多欺骗手段和散布假情报的措施都起了作用。[24] 前线地区的平民都被转移了，主要的突击力量直到最后时刻才进入出发地域。“天王星行动”在完全出其不意的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些措施功不可没。11月23日，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保卢斯军队的合围完成了。大本营原本估计能困住10万人左右的敌军，结果却多出了三倍。“天王星行动”是红军第一个成功实施的大合围。在此次行动中被击溃的还有德国轴心国盟友的军队——他们的任务本来是保护保卢斯的侧翼。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希特勒的轴心同盟瓦解的开始。轴心同盟中第一个倒戈的国家是意大利，它在1943年7月废黜了墨索里尼。一年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也相继倒戈。



地图**16** “天王星行动”，**1942**年**11**月

对于陷入重围的保卢斯军队，希特勒采取的对策是，企图依靠空运来维持第6集团军的补给，而那样一来，德国空军每天需要运送300吨的物资，但它并没有足够的飞机来完成这项任务。飞机紧缺的一个原因

是，英美军队刚刚入侵北非，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的非洲军团的撤退也需要运输工具。德国人想要突破到斯大林格勒，但被挡在距离这座城市还有25～30英里的地方。不过，营救行动也打乱了苏联的“土星行动”计划。这是“天王星行动”的雄心勃勃的后续计划，目标是收复罗斯托夫并切断高加索地区的A集团军群的退路。在中央地带，与之对应的则是“木星行动”——如果“火星行动”取得成功就包围中央集团军群的宏大计划。由于“火星行动”失败了，“木星行动”也就被搁置起来。“土星行动”取得了成功，但由于时机已被延误，到1943年2月苏军收复罗斯托夫的时候，A集团军群基本上都已经逃脱了（见地图17）。

当苏联人意识到自己在斯大林格勒逮到一条大鱼的时候，他们便准备采取大规模的行动收紧包围圈。1943年1月10日，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苏军的7个集团军发起进攻。到当月的月底，这场一边倒的战斗结束了，投降的德军只有9万人，其中包括保卢斯，他是在斯大林格勒被苏军俘虏的24位德国将领之一。

这里得说一下大本营1942年秋季战略构想的宏大与大胆。它的目标不单是要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以及斯大林格勒地区实施相当规模的合围行动，而且还要采取规模更大的合围，同时包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就像“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这种行星命名法令人联想到的那样，这一战略构想无比巨大。斯大林、朱可夫以及华西列夫斯基不仅打算在1942年秋季扭转战局，而且还要赢得整个战争。这样的雄心壮志大大超出了红军当时的能力，但其战略视野之宽广却预示着1943～1944年的大规模攻势。而正是通过那些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攻势，德国国防军才被赶出苏联，并一路败退到柏林。



地图17 "火星""木星""土星"及"天王星"诸行动

由于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德国人及其轴心国盟友损失了50个师，伤亡150万人。到1943年年初，德国国防军又被赶回到他们在1942年6月"蓝色行动"开始的地方。红军的损失更大，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伤亡达到250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大本营再次尝试了一次全面的冬季攻势，并在1943年1月收复了沃罗涅日，2月收复了哈尔科夫，但当德军发动反击的时候，红军无力守住后者。此时，随着春季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苏军沿战线的各个行动都逐渐停止了。

重返列宁格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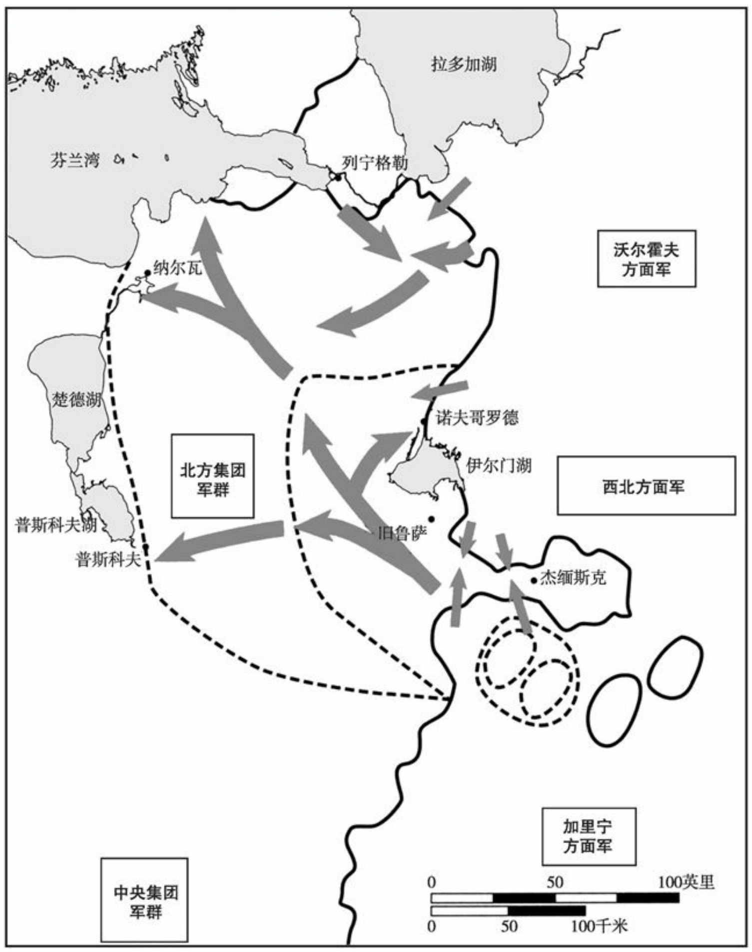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朱可夫正在别的地方忙碌着。1943年1月，他再次回到列宁格勒，负责监督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执行的一项行动，意在打破德军对这座城市的封锁。“火花行动”是从1月12日开始的，到18日的时候，它已打通与列宁格勒的公路及铁路联系。通往列宁格勒的陆桥只有几英里宽，而且不断遭到德军的炮击，所以，正如大卫·格兰茨所说，封锁只是出现了裂缝，还没有被打破。[25] 但就在同一天，朱可夫被晋升为苏联元帅——两个月前，斯大林将同样的军衔授给了他自己。作为政府喉舌，《消息报》发表了题为《红军领导者的本领》的社论，并把朱可夫的名字放在新晋元帅和将军名单中的首位，称赞他是“才华横溢的勇敢的领导者”，实施了斯大林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打退德国人的计划。1月28日，朱可夫因为“成功发动了斯大林格勒反攻”而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26]

1月底，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开始制订“北极星行动”计划。这是个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对列宁格勒地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进行合围的宏伟计划。计划的基本构想是，由铁木辛哥的西北方面军向普斯科夫（Pskov）和纳尔瓦（Narva）推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负责支援。此次行动的关键是M.S.霍津将军指挥的由1个坦克集团军和1个野战集团军组成的特别集群，其任务是合上对伊尔门湖和旧鲁萨地区北方集团军群包围圈的内圈（见地图18）。

在给这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指令中，朱可夫的名字出现在了斯大林名字的后面。这些指令是最高统帅和他的副手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会商之后才下达的。[27] 朱可夫在行动开始时为了监督计划的执行而返回了西北战区。朱可夫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和他在“火星行动”和“天王星行动”中的作用几乎一样重要，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却只是一笔带过。这可能是因为，像“火星行动”一样，“北极星

行动”也不成功，而朱可夫对于自己遭遇的失利是不喜欢多说的。这很可惜，因为这次行动是他此时作为斯大林的副手行使权力和权威的例证。

朱可夫的表现更像是一个负责多个方面军的指挥官，而不是大本营的协调员。对于朱可夫提出的建议和推荐的实施此次攻势的人选，斯大林是言听计从，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朱可夫有多么信任。但更重要的也许是，朱可夫的指挥明显变得越来越灵活，在遇到新情况时更愿意审时度势，改变策略。



地图**18** 朱可夫的“北极星行动”计划

“北极星行动”要想取得成功，关键是铲除杰缅斯克（Demyansk）突

出部的德国第16集团军。这项任务被交给了第1突击集团军，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包围并歼灭该突出部的德军。第1突击集团军未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在2月中旬发动“北极星行动”的时候，德军已经开始从杰缅斯克撤到洛瓦季河（Lovat River）沿岸更易防守的阵地上。针对这一新的形势，朱可夫在2月28日发电报给斯大林，建议把“北极星行动”的目标限定在夺取旧鲁萨，以便为后续的春季攻势做好准备。[28] 斯大林表示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朱可夫努力想夺取旧鲁萨，但没有成功。红军在“北极星行动”中损失了大约25万人，其中阵亡5万人。

3月中旬，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并把他派往沃罗涅日方面军，搞清楚在德军重新夺回哈尔科夫之后那里的形势。正是从这个有利的位置，朱可夫在1943年4月8日给斯大林做了详细的汇报，对于德军的下一步动作以及苏军的应对措施给出了自己的评估意见。朱可夫认为，德军没有预备队再在南方发动攻势了，甚至也无力在宽大锋面上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会进攻某段狭窄的、自己已把军队集中在那里的战线，而且从那里发动攻势会有助于他们实现最终夺取莫斯科的目标。所以，朱可夫估计，德军会向库尔斯克方向进攻，它位于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防守的突出部的中心。这次进攻，德军会倚重自己的坦克师，而且可能投入多达2500辆坦克对付库尔斯克的苏军。为了反制这一威胁，朱可夫建议加强对坦克的防御，并从大本营预备队调来尽可能多的飞机，以粉碎敌人的坦克进攻。朱可夫最后说，他认为没有必要率先发起进攻：“最好是等到我军在防御中消耗敌人并摧毁了敌人的坦克以后，再……全力进攻并消灭敌军主力。”[29]

这是对苏德战争中下一场大战的非常精彩的而且充满了先见之明的分析。1941年，在莫斯科，德国的战争机器在顽强的防守和坚决的反攻面前戛然而止。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苏联人用一次漂亮的合围扭转了战局。这两次战役都是德军率先发动进攻，最后红军又通过反攻一下子反败为胜的。同样的一幕又要在库尔斯克上演了。在莫斯科和斯大林

格勒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朱可夫，注定又要在库尔斯克大放光彩。他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他作为高级指挥官的不断提高的指挥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尽管遭遇了“火星行动”和“北极星行动”等失利，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一直没有动摇。当朱可夫在1942年12月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时，“斯大林的爱将”这个标题是再合适不过了。

---

[1] B.Wegner，“The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1942-1943，” in H.Boog et al.，eds.，*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Oxford，U.K.：Clarendon Press，2001）.

[2] H.R.Trevor-Roper，*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64），p.117.

[3] J.Stalin，*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London：Hutchinson，1943-1944），p.38.

[4] Trevor-Roper，H.R. *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 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64，pp.129-130.

[5] 从苏军总参谋部每天的简报中摘录的大量内容可见于*Stalingradskaya Bitva*，2 vols.（Moscow：Olma-Press，2002）。这其中除了有大本营的指示、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报告等其他许多文件之外，还有许多摘自苏联报刊的文章。

[6] *Stalingrad，1942-1943：Stalingradskaya Bitva v Dokumentakh*（Moscow：Biblioteka，1995），docs.109-110，120.

[7] *Khronika Ognenykh Dnei，17 Iulya 1942，2 Fevralya 1943*，Volgograd，2002.这个日期最初是在1943年苏军总参谋部撰写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参见 L.Rotundo ed.，*Battle for Stalingrad：The 1943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London：Pergamon-Brassey's，1989），pp.12-13。

[8] 第227号命令的完整的英文译文可见于G.Roberts，*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London：Pearson/Longman，2002）中的附录。

[9]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London：Pan，1965），part 4.

[10] “Na Uge，” *Krasnaya Zvezda*，July 19，1942.

[11] “Ob Ustanovlenii Polnogo Edinonachaliya i Uprazdnenii Instituta Voennykh Komissarov v Krasnoi Armii，” *Krasnaya Zvezda*，October 10，1942.

[12] 关于1942年8月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参见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4-143。

[13] J.Erickson，“Zhukov，” in M.Carver ed.，*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Barnsley，U.K.：Pen & Sword，2005），pp.251-252.

[14] 关于崔可夫，参见 R.Woff，“Chuikov，”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

[15] 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参见Roberts，G. *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 London：Pearson/Longman，2002；A.Beevor，*Stalingrad*（London：Penguin，1999）；W.Craig，*Enemy at the Gates*（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73）；M.Jones，*Stalingrad*：*How the Red Army Triumphed*（Barnsley，U.K.：Pen & Sword，2007）；D.M.Glantz & J.M.House，*Armageddon at Stalingrad*（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9）；以及J.S.A.Hayward，*Stopped at Stalingrad*：*The Luftwaffe and Hitler’s Defeat in the East*，*1942-1943*（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16]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是在8月27日到斯大林格勒去的，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和其他文献显示，8月31日之前他一直在莫斯科。

[17] *G.K.Zhukov v Stalingradskom Bitve*：*Sbornik Dokumentov*（Moscow：Biblioteka，1996），pp.66-67.

[18] *Stalingrad*，*1942-1943*， doc.220.

[1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93-99.

[20] Rotundo，L.（ed.）. *Battle for Stalingrad*：*The 1943 General Staff Study*. London：Pergamon-Brassey’s，1989，p.415.

[21] 参见*Stalingrad*， 1942-1943，docs.221，225，227，228，229，231，258。

[2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129.

[23] 从1942年11月29日起在《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上发表的文章、社论和声明。

[24] D.M.Glantz，*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Frank Cass，1989），chap.5.

[25] D.M.Glantz，*After Stalingrad*：*The Red Army’s Winter Offensive*，*1942-1943*（Solihull，

U.K.：Helion，2009），p.391.

[26]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237.

[27] *Na Priyome u Stalina*（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pp.396-398.

[28] Glantz，D.M. *After Stalingrad*：*The Red Army's Winter Offensive*，*1942-1943*. Solihull，U.K.：Helion，2009，p.426.这是格兰茨在他的书中逐字翻译并引用的诸多文件之一。我对"北极星行动"以及朱可夫在这次行动中的作用的论述，几乎全是以格兰茨的这本书为基础的。

[2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150-152.

9 西进！从库尔斯克到华沙，1943～1944

战争几乎没有给朱可夫留下任何家庭生活的时间。1941年8月，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和两个女儿叶拉和埃拉被疏散到莫斯科东南500英里外的古比雪夫（Kuibyshev）——那年夏天，许多政府官员的家人都去了那里。在古比雪夫，她们和朱可夫的母亲还有他的姐姐玛丽亚会合了，因为她们也不得不逃离自己的老家斯特列尔科夫卡，德国人在1941年秋天占领了那里。

朱可夫的家人直到1943年才返回莫斯科。在此期间，一家人只团聚过一次，那是1942年1月在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佩尔胡什科沃（原文为Perkhushkin）庆祝新年的时候。埃拉回忆说，家里人是在夜里乘飞机去的。“在父亲住的小屋里有一棵冷杉树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许多糖果——或者在我看来是那样，实际上并没有很多，只是在过了古比雪夫那种日子之后看上去很多，因为我们在那里从来没有见过糖果。但最重要的还是有了节日的气氛。那种幸福，还有父亲表现出来的高兴劲儿，都是因为取得了（莫斯科反攻的）伟大胜利。”[1]

在她们返回此时已经安全了的莫斯科之后，家里人会通过电话与朱可夫通话，而且可以在他回首都的时候看到他，但这种机会在1943～1944年并不太多，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前线。虽然朱可夫不在家，但“我们并没有觉得和父亲分开，或者和他的重要的工作分开，”叶拉回忆说。[2]

据叶拉说，她的父亲在战争期间不常给家里写信，即使写，也是很短。但保留下来的少量信件还是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男人的内心，尽管

他作为指挥官做出的决定和下达的命令会给无数人带来死亡。

1943年1月8日，朱可夫写信给亚历山德拉：

爱妻！

我本来想顺道花三四十分钟去看你的，但是很遗憾，你当时在剧院。当然，你会怪我，说我没有事先告诉你。不过后来我耽误了换乘列车。怎么办呢？责任我们要平摊了。

你现在怎么样？我很好。身体不错，除了该死的风湿病。它很烦人。也许可以用盐浴或暖和的日光浴来治它。

好了，先写到这。

你的若尔日 [3]

抱怨自己的身体似乎成了朱可夫和他妻子通信中的主题。在1943年10月5日给她的信中，他写道：

向你还有叶拉和埃拉致以热情的问候。我给你们送了一些葵花籽。不要做别的，把它们吃了。我把那件暖和的大衣送回去了，它太笨重了……最好是有件暖和的毛衣。这里的情况还不错。我们现在就在第聂伯河河畔。在这里，德国人想守住，但显然不会成功。像通常一样，我和部队一起行动……我生性就喜欢上战场，和我的部队在一起，在部队里我觉得如鱼得水。

我的身体不错，但听力不好。要让人再给我治治耳朵，但这件事现在还不好办。有时候我的头和脚有点疼。好了，我想对你说的就这些。我希望你和孩子们都身体健康。

1943年10月23日，他以一种类似的语气写道：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为此我要再给你两个热吻。我收到了装有内衣的包裹。看到自己穿着睡衣的样子，我忍不住捧腹大笑。前线的情况很顺利。有些部队的确遇到了些小挫折，但在这样的推进之后，那也许是免不了的。我本来希望尽快结束基辅的工作，然后返回莫斯科，但遗憾的是有事耽搁了。

> 我的身体像过去一样时好时坏。现在我脚疼的毛病又犯了。我想到莫斯科去治一治。我的听力还跟以前一样，还是会有耳鸣。可能是年纪大了，毛病都来了。
>
> 如果一切顺利，我想大概在八天后，我就会回到莫斯科——如果（斯大林）允许的话。差不多吧。你说我不写信。你看到了我写得有多潦草。再次亲吻你和孩子们。

也许是对可能会读到自己邮件的安全官员有所顾忌，朱可夫在信中也会表现得比较刻板和拘谨。1944年2月10日，他写信给亚历山德拉：

> 谢谢你的来信、卷心菜、浆果还有其他的一切。事情整个说来进展很顺利。各部队的计划都完成得很好。很清楚，希特勒正走向彻底的失败，而我国正在走向无条件的胜利和俄罗斯各兵种的胜利。总的来说，前方正在履行它的使命，现在的事情就取决于后方了。为了确保前方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后方有许多工作要做。只要大家吸取教训并保持高昂的士气，俄国人的胜利是肯定的。
>
> 深情地吻你。

这封信的署名是“你的G.朱可夫”，而不是更熟悉的昵称“若尔日”。[4]

战争期间，朱可夫恢复了与他和玛丽亚·沃尔霍娃所生的女儿马加丽塔的联系。在马加丽塔的继父于斯大林格勒阵亡而她的继父与前妻所生的兄弟又在行动中失踪（他后因受伤而死亡）之后，玛丽亚请求朱可夫的帮助。于是就有了他和自己女儿的情真意切的通信。在马加丽塔因瘦弱和疲惫而得了重病的时候，朱可夫派自己的“道格拉斯DC-3”飞机把她送到军方办的儿童疗养院，并在六个月后又用飞机把她送回了家。[5]

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都跟朱可夫在一起的，是他的个人后援团队的成员——副官、司机、厨师、警卫和医护人员。[6] 卫士长尼古拉·别多夫（Nikolai Bedov）记得，朱可夫当时承受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莫斯科战役期间，有时候连续几夜得不到休息，只能靠浓咖啡提神。别多夫回忆说，在去前线的路上，朱可夫经常碰到轰炸，而且在莫斯科战役后，

他成了德国人暗杀的对象，到各地去的时候只好用化名。别多夫强调，朱可夫从来没有消沉过，哪怕是在1941～1942年最艰难的、连连失利的日子：“形势越是严重越是危险，朱可夫就越是镇静越是劲头十足。”别多夫承认朱可夫对下属可能是粗暴了点，但他觉得战时出现这种事情有可原。在被问及朱可夫最欣赏的品质是什么的时候，别多夫回答说：“勇气、果断、真诚，最主要的是在评估复杂条件时要准确无误。”[7]

朱可夫的另一个助手是司机亚历山大·布钦（Alexander Buchin）。布钦算过，他在战争期间和朱可夫一起行驶了大约17万千米。他还以此为书名出版了回忆录。在布钦的回忆录中提到的一位同事是莫斯科战役期间加入这个团队的医务助手利达·扎哈罗娃（Lida Zakharova）。布钦回忆说，很难找到比她更好、更善良的人了。腼腆、害羞的利达受不了朱可夫的粗鲁和大嗓门，有时还为此掉眼泪，但她没有抱怨，而是继续留了下来。[8]

在自己的回忆录出版后，布钦对朱可夫与利达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说明，说朱可夫被她的羞怯吸引住了，和她有过一段恋情。布钦声称，他们两人形影不离，而且还公开显示爱意。战后，当朱可夫被斯大林外放的时候，利达也随他一道去了敖德萨军区，后来在他调到乌拉尔军区时又去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只是在他爱上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也就是最后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和他的第四个女儿玛丽亚的母亲的加琳娜·谢苗诺娃医生的时候，朱可夫和利达的关系才结束。利达随后嫁了人并搬到了莫斯科。在那里，朱可夫帮她找了一处公寓。据叶拉说，她母亲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知道此事，但是忍住了——因为朱可夫比较稳重，“她知道父亲这个人是多么有趣，知道女人是怎样追他的”。[9]

利达·扎哈罗娃的名字还出现在曾经做过朱可夫副官的A.S.谢莫奇金（A.S.Semochkin）的证词中，那是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安全机构想抹黑朱可夫。谢莫奇金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说朱可夫因为与利达

的私情而袒护她。1948年1月，朱可夫写信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指控做了答复。对于利达，朱可夫坚持说不存在袒护；在工作方面，他和她的关系光明磊落。他承认自己和她有恋情，但坚决否认自己在公开场合与她调情。[10]

战争期间，红军高级军官在军中有临时妻子的现象并不少见。朱可夫对此肯定也心知肚明，而且原则上并不反对。1945年2月，朱可夫批评他的一位将军在情妇身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但这种批评是基于实际的而非道德的理由：

> 我听说……卡图科夫（Katukov）同志（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一点也不管事，他不是在指挥他的集团军，他是在和某个女人在家中闲坐，而那个与他在一起的女人正在妨碍他的工作。卡图科夫……显然从来不去看自己的部队。他没有组织自己的集团军和各个军的行动，所以这个集团军最近是不成功的。我要求……立即把那个女人从卡图科夫身边送走。要是不送走，我就下令让Smersh（苏军反情报机构）把她带走。卡图科夫要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是（他）不做出必要的了断，就由其他指挥员来接替他的位置。[11]

布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列举了朱可夫其他的一两件风流韵事，把他描写成有点儿喜欢和女人泡在一起的男人。考虑到朱可夫的地位、长相和强悍的个性，女人会觉得他有吸引力，这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朱可夫的私生活中，重要的女人（除了他母亲和几个女儿之外）只有四个：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玛丽亚·沃尔霍娃、利达·扎哈罗娃和加琳娜·谢苗诺娃。朱可夫对年轻漂亮的女人显然也是很注意的。朱可夫跟她们的关系的模式还表明，他偏爱不喜欢出风头而且能有帮助的女人。她们可以信赖，不会干涉他的工作。实际上，无论是这四个女人还是他的四个女儿，都没有说过他的坏话，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她们对他的挚爱。朱可夫也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她们，但他总是把军事生涯和为苏维埃国家服务放在首位。

库尔斯克

在给亚历山德拉的信中，朱可夫提到的听力问题可能是由于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近距离遭到迫击炮炮击的缘故。[12] 库尔斯克战役是继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德战争中的第三次大决战。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朱可夫的贡献有三个方面。首先，他帮助确立了苏军战役计划背后的战略思想框架。其次，他负责监督参加库尔斯克行动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备战工作。最后，在战役进行期间，他作为大本营协调员，负责协调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行动。

1943年4月，由于下雨和冬季的冰雪融化，道路泥泞难行，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大本营面临的问题是，当夏季来临，当不再下雨、路面变硬的时候，当可以恢复进攻的时候，要做什么。正如上文提到的，4月8日，朱可夫写信给斯大林，建议采取战略防御态势，目的是抵挡住德军的下一波进攻，然后再发动全面反攻。[13]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S.M.什捷缅科（S.M.Shtemenko）回忆说，当斯大林接到朱可夫的报告时，他对各个方面军司令有关德军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大家都同意朱可夫的判断，即德军将在库尔斯克地区发动进攻。[14] 库尔斯克位于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防线结合处的突出部中心。德军如能吃掉库尔斯克突出部，就可以把自己的防线缩短150～200英里，从而腾出20个师来用于进攻。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急需一场这样的胜利来鼓舞士气。

1943年4月中旬，斯大林、朱可夫及华西列夫斯基之间连续进行会商并达成一致：在德军发动进攻之前，红军按兵不动。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而且还加了着重号：“因此，早在4月中旬，最高统帅部就做出初步决定，故意采取守势。”[15] 他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赫鲁晓夫时代，朱可夫发现，在赫鲁晓夫分子写的有关库尔斯克战役的历史中，自己被排除在外，而时任沃罗涅日方面军政治委员的赫鲁晓夫却被说成苏军的战略设计师。

另一个参加了四月会商的是总参作战部部长、不久就被任命为华西列夫斯基副手的A.I.安东诺夫（A.I.Antonov）将军。像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一样，安东诺夫也是个沉稳而理智的将军，朱可夫对他非常欣赏："安东诺夫是个无比能干的将军，一个文化程度很高而且充满魅力的男人。听他讲总参谋部的战略战术思想总是令我非常愉快......在整理材料方面，安东诺夫有着惊人的天赋。" [16] 那也是斯大林欣赏的品质，而且在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派往前线因而经常长时间不在的时候，安东诺夫就是实际上的总参谋长——他是在1945年2月华西列夫斯基去指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时才得到正式任命的。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安东诺夫，这些人将成为红军的战略大脑，在1943～1944年指挥红军从库尔斯克到基辅、从维亚济马到斯摩棱斯克以及从明斯克到华沙，一路西进。

四月会商之后，朱可夫被派往北高加索执行任务，陪同他的是什捷缅科，因为后者在加入总参谋部之前曾在该地区服役。什捷缅科记得，朱可夫有在每天傍晚拉手风琴的习惯——那是他在战争期间学会的——拉的一般都是战时那种感情深沉的名曲。"这位音乐家的技艺不精，"什捷缅科写道，"但他靠投入自己音乐中的感情弥补了这一点。"朱可夫在遇到炮击时的沉着冷静也让什捷缅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朱可夫他们遇到了空袭，他没有在路边等待危险过去，而是坚持要求继续赶路。还有一次，敌军回击的炮火已经打到观察所周围了，朱可夫还在继续观察炮兵的弹幕攻击。 [17]

朱可夫的任务是负责监督把德国第17集团军赶出连接克里米亚和新罗西斯克（Novorossiisk）附近的北高加索沿岸地区的塔曼半岛的军事行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迫使德国人撤出了外高加索，但他们还保留了塔曼半岛的据点，这使他们既可以保护自己在克里米亚的阵地，又可以从背后威胁苏联人。朱可夫的任务完成得不是很成功。德国人仍然盘踞在塔曼半岛，这需要在那年晚些时候采取第二次较大的行动来把他们最

终赶走。什捷缅科返回莫斯科时担心斯大林会因为行动失败而怪罪他和朱可夫，但这种事没有发生，至少没有针对朱可夫。实际上，在他返回苏联首都的当天，也就是5月12日，斯大林颁布法令说，除他本人之外，只有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有权向各方面军司令下达命令。这项法令是针对武装力量各兵种负责人的——炮兵、空军、骑兵、机械化部队、工程兵等——目的是防止他们干预各方面军事务。[18]

朱可夫接下来的工作是，监督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攻防两端的备战情况。苏军的计划很简单：构建纵深防御，抵挡住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然后转入反攻。[19] 为此，苏联人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及其背后构筑了几道环形防线，纵深达200～250英里。每个防御阵地都有纵横交错的壕沟和混凝土地堡，而且因为估计到德国人会在进攻中投入大量的装甲力量，苏联人还特意修筑了反坦克据点。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可以动用的力量共有大约130万人、19794门大炮和迫击炮、348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外，归他们指挥的还有拥有2650架飞机的空军第17集团军和有50万人、1500辆坦克的草原方面军（由朱可夫的竞争对手科涅夫指挥）——它们都被用作战略预备队，任务是应对敌军的突破和为苏军的反击提供支援。

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准备过程中，苏联人为了暗中加强自身的防御和调集准备反击的力量，在“欺骗”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指挥所的地点是保密的，部队的运输和调动只在夜间进行。无线电通信也做了巧妙的处理以蒙骗敌人。机场、防御工事和部队集中的区域都进行了伪装，而且还制造了一些假模型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所以，尽管德国人的情报机构侦察到苏军的大部分准备工作，但并没有搞清楚红军防线的整个纵深和强度，更重要的是，没有搞清楚红军的反击能力。[20]

苏联游击队首次在红军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德军备战的情报，并多次利用小规模的进攻和破坏行

动——许多都是针对国防军的运输网络——来扰乱德军的备战。当苏军开始反攻的时候，游击队又通过攻击德军的指挥和控制系统来提供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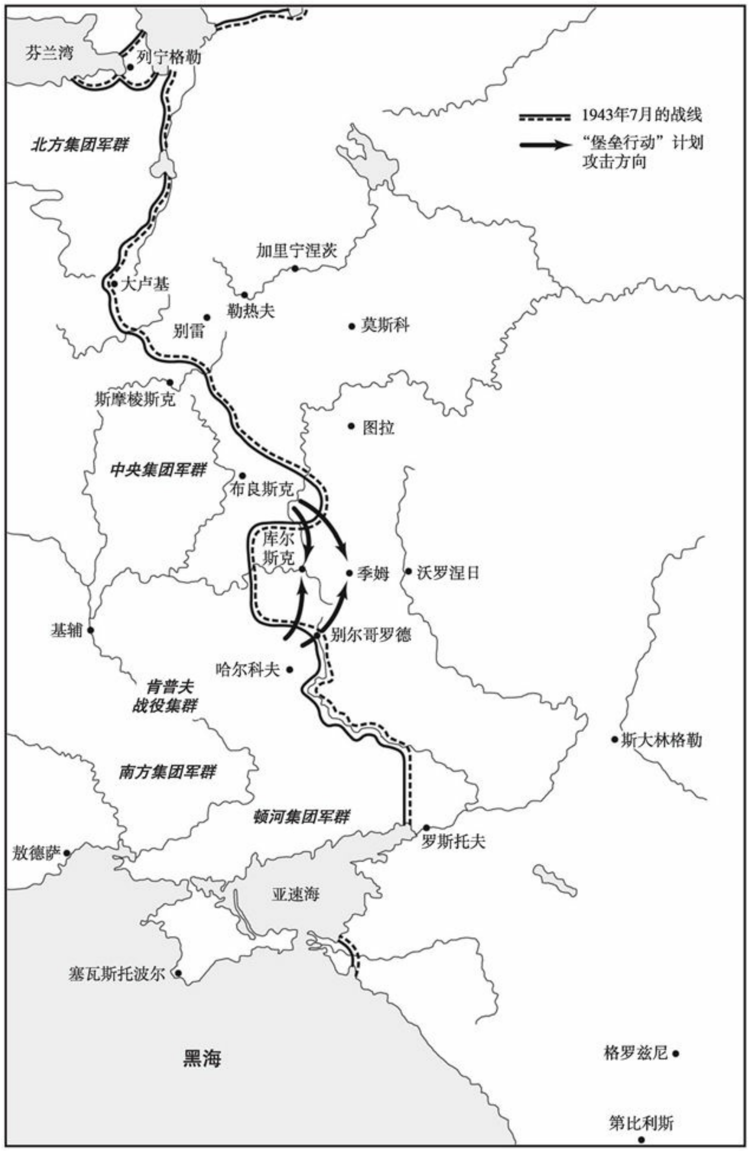
在备战过程中，朱可夫的角色是监督并向斯大林汇报进展情况。他还利用自己作为大本营代表和副最高统帅的权威就地处置问题。指挥中央方面军的是罗科索夫斯基，他回忆说："备战阶段，朱可夫在中央方面军待了很长时间，我们共同决定防御和反攻的组织、实施中的原则问题。多亏了他，我们向莫斯科提出的许多请求都得到了满足。"[21] 在苏军加强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实力的这段时间，朱可夫的另一位观察者是他的司机布钦。他说："朱可夫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来回奔忙，检查工事修筑及（防御用的）障碍物加固和设置方面的细节。"[22]

对于德国国防军的意图和进攻的准备情况，苏联人掌握了充分的情报，包括他们自己在英国的间谍提供的情报——那些间谍搞到了和被破译的德国高阶密码有关的"厄尔特拉"情报[23]。[24] 只是他们不知道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在5～6月导致了一连串关于德军即将进攻的假警报。[25]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有些指挥官想先发制人，而不是等德国国防军先动手。支持这样做的就有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图京。"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据称他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敌人不打算行动，而很快就到秋季了，那时我们所有的计划就都泡汤了。不要再等了，我们要先动手。我们有足够多的兵力。"[26] 不过，斯大林和统帅部沉住了气，继续等待。

7月2日，从大本营传来最终的警报警告各个方面军：预计德军会在7月3～6日的某个时候发动进攻。"堡垒行动"——德军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行动代号——在7月4日夜里至7月5日凌晨开始了。德军的计划是，由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对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实行两翼

合围。希特勒投入战斗的有18个步兵师、3个摩托化师和7个装甲师，其中包括大量新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它们的火力超过了苏联人的任何坦克（见地图19）。朱可夫此时奉命协调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在预计会成为主战场的区域）的行动，而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沃罗涅日方面军。当“堡垒行动”开始的时候，朱可夫正和罗科索夫斯基一起在中央方面军的司令部。朱可夫对红军航空兵和炮兵向正在发起进攻的德军倾泻的准备已久的猛烈炮火做了生动的描述：

> 重炮的轰击声，炸弹和M-31火箭弹的爆炸声，“喀秋莎”的炸裂声，还有持续不断的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汇成一片，就像是从地狱传来的“交响乐”旋律。敌军离我们司令部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千米。我们能够听到和感觉到那种疾风骤雨般的炮火，禁不住想到敌人的出发地域突然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时的可怕情形。措手不及的敌军官兵也许会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地上，或者一看到可以藏身的洞穴、沟壕或不管什么缝隙，就扑进去胡乱躲避炸弹、炮弹和地雷的可怕的爆炸。[27]



地图**19 “**堡垒行动**”**，**1943**年**7**月

德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大部分苏军防线还是守住了。7月11～12日，此次战役的高潮在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到来了。当时，P.A.罗特米斯特罗夫（P.A.Rotmistrov）将军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与德军的两个装甲军展开了厮杀。参战的坦克有1000多辆，双方各损失了几百辆。苏军损失的坦克比德军多，不过他们消耗得起，而希特勒却不得不取消了此次进攻。

普罗霍罗夫卡战斗之后不久，朱可夫来到罗特米斯特罗夫的指挥所并视察了战场。据后者说，朱可夫几次停车察看最近发生的坦克战的现场：

> 那种景象很可怕，到处散落着被击毁或烧毁的坦克，被撞坏的大炮、装甲运兵车和卡车，成堆的大炮轮子和一截截履带。焦黑的泥土上寸草不留。田野、灌木和尸体在经过毁灭性的交火之后，还在冒着烟。朱可夫盯着那些坦克的残骸和弹坑看了很久……元帅摇了摇头——这种景象让他肃然起敬——摘下自己的帽子，这显然是在向我们英勇的坦克手致敬。[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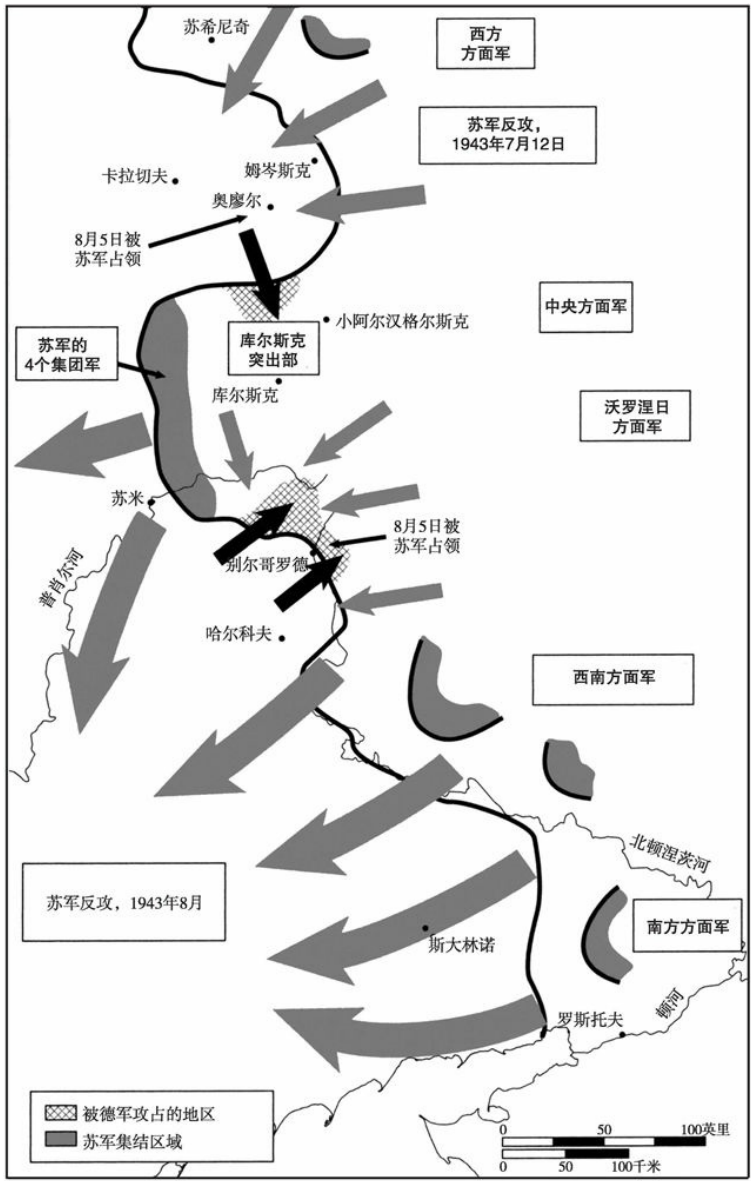
为了夺回苏德战争的主动权，希特勒孤注一掷，发动了库尔斯克战役。而在此之后，面对苏联人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意志采取的没完没了的消耗战，德军已毫无胜算。尽管红军通往柏林的道路还很漫长且艰难，但这段路程会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走完，这一点已毋庸置疑。

在库尔斯克抵挡住德军的进攻之后，接着就轮到苏联人转守为攻了。苏联人计划采取两个行动：一是“库图佐夫行动”，由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进攻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二是“鲁缅采夫行动”，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进攻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南方集团军群（见地图20）。“库图佐夫行动”从7月12日开始，到8月5日时红军已经收复了奥廖尔，但德军的许多部队此前已设法撤出了包围圈。朱可夫声称，如果再多调集一些兵力，就可以把德军全部包围在奥廖尔，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当前的重点是打退而不是围歼德军。

朱可夫并没有直接参与“库图佐夫行动”，因为他已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所在地，监督“鲁缅采夫行动”。斯大林本来是想在7月23日开始行动的，但朱可夫说服了他，认为需要暂缓一下，以便做好准备，所以“鲁缅采夫行动”直到8月5日才开始。[29] 同日，红军攻占了别尔哥罗德，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鸣礼炮120响，庆祝它的收复和奥

廖尔的解放。这是在红军向柏林推进过程中斯大林下令进行的300次祝捷鸣炮中的第一次。[30] 不过，此次行动接下来的进展就没那么顺利了，哈尔科夫直到8月23日才被收复。与此同时，为了收复斯摩棱斯克，红军发动了第三波行动，即“苏沃洛夫行动”。当9月行动结束的时候，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向前推进了150～200英里。

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在哈尔科夫解放后不久便去察看了这座城市。他发现了一些残酷的数据。在德军1941年10月第一次占领哈尔科夫时，它的人口是70万。到他们离开时，它的人口只剩下不到一半：12万人被赶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工；8万人死于饥饿、寒冷和贫困；3万人被枪杀；还有许多人逃到了乡村。[31]



地图20 苏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1943年7～8月

乌克兰战役

“库图佐夫行动”“鲁缅采夫行动”和“苏沃洛夫行动”，用18～19世纪俄罗斯三位伟大统帅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些行动，属于夏季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沿宽大锋面迫使德军后退。在南方，苏军的目标是推进到第聂伯河，那是败退中的南方集团军群的第二道天然屏障。到初秋的时候，红军抵达并渡过了第聂伯河。于是，此次攻势便发展成解放乌克兰

全境的总攻。正如埃文·莫兹利所说的，第二次乌克兰战役（第一次是在1941年夏天）“影响的范围非常广。它也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从1943年8月到1944年4月……一共打了八个多月。而且它取得了大胜，国防军起初退到了第聂伯河的奥斯特沃尔（Ostwall），后来又远远地退到喀尔巴阡山脉和与波兰的1938年的边界”。[32] 参与行动的苏军不少于5个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1943年10月，上述前4个方面军被分别更名为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而中央方面军则更名为白俄罗斯方面军。朱可夫作为核心人物全程参与了乌克兰战役的各个阶段：开始是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后来又被任命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见地图21）。

乌克兰战役并不是没有遇到麻烦和挫折，而且在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也有些不愉快的时候。由于战争的势头已经决定性地转到了苏联一方，红军可以动用的兵力与德军相比也拥有巨大的优势，因此，斯大林对其指挥官取胜的要求也变得苛刻起来。一个总的分歧是，朱可夫主张，就像在斯大林格勒那样，战役要以有选择地围歼密集的敌军集团为基础。但斯大林对此感到怀疑，认为合围容易受敌军反击或突围的影响，这已经发生过多次了。而且从政治上考虑，斯大林更愿意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那样可以尽快地解放尽可能多的苏联领土。既然斯大林已经打定了主意，朱可夫知道，再跟独裁者争辩也是白费时间。[33]



地图21 乌克兰战役，**1943～1944**

1943年8月26日，中央方面军、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发动了统称为“切尔尼格夫—波尔塔瓦行动”（Chernigov-Poltava operation）的一连串攻势，目的是向基辅和第聂伯河方向推进。到9月中旬时，红军已沿宽大锋面逼近第聂伯河。此时，联合进攻进入了新的阶段：为了包围并收复乌克兰首府，苏军试图夺取并守住第聂伯河西岸基辅南北两侧相当数量的桥头堡。这三个方面军的所有部队都过了河，但主要的桥头堡还是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在基辅南面大布克林（Velikii Bukrin）地区建立的。该桥头堡得到了两个空降旅的支援，他们在德军防线的背后实施了一次大胆的空降行动。9月28日，当时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行动的朱可夫，奉命担任大本营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的协调员。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调整这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范围，把夺取基辅的任务交给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朱可夫也主要是待在那里——而不是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此举激怒了罗科索夫斯基，他打电话给斯大林表示不满。苏联独裁者生硬地回答说，那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主意。[34]

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政治委员，他为什么要让瓦图京的部队获得从基辅赶走德国人的荣誉，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朱可夫也想分享公众的关注，这也不难想象。在乌克兰战役期间，朱可夫和赫鲁晓夫的工作联系十分紧密，而且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不过，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这段时期的时候，除了带有贬义地说在你找到赫鲁晓夫的地方总能有好吃好喝之外，对那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是只字未提。[35]

斯大林给朱可夫的任务是在10月7日之前拿下基辅，[36] 但事实证明，这座桥太遥远了。伞兵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阵地，而在德军的顽强抵抗面前要扩大布克林桥头堡也很困难。10月24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乌克兰第1（沃罗涅日）方面军一直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是那里的地形易守难攻。敌人的防线很厚实，而且意志顽强，朱可夫告诉斯大林说。朱可夫想得到允许，以暂时停止进攻，他还请求补充武器弹药并再拨给该方面军一个野战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斯大林对朱可夫的解释感到不满，所以就委婉地批评说："大本营想要指出，进攻布克林桥头堡的失利是因为未能考虑到当地的条件，这些条件对进攻不利，特别是对于坦克集团军来说。武器弹药不足的说法缺乏依据，因为草原方面军并没有更多的弹药却……设法完成了任务。"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同意再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增派兵力，以便能够尽快地拿下基辅。[37]

新的时间表是在11月7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之前收复乌克兰首府。按照大本营的指示，进攻的重点由布克林转移到基辅北面第聂伯河西岸的另一处桥头堡柳捷日（Liutezh）。11月3日的进攻一开始就是苏德战场上到当时为止所见过的最为猛烈的炮火齐射，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再加上50台"喀秋莎"火箭炮发射车——相当于每英里480门炮——占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整个炮兵兵力的三分之一。[38] 不到三天，红军便攻克了基辅。朱可夫和瓦图京发电报给斯大林说："我们带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向您报告，您所规定的解放乌克兰首府——我们美丽的基辅

城的任务，已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完成了。基辅城内的纳粹侵略者已被彻底肃清。”[39]

像哈尔科夫一样，基辅也已是一片荒芜：6000座大楼和1000座工厂遭到洗劫或严重破坏；20万平民死亡，另有10万人被驱逐。[40] 就在基辅城外，一个叫作娘子谷（Babi Yar）的地方，成了二战中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的现场之一。有3万名犹太人在那里被党卫军枪杀了，为的是给1941年9月红军从乌克兰首府撤走时为阻滞敌军而安放在城内的定时炸弹炸死的德国人复仇。

收复基辅后，苏军在乌克兰继续发动攻势。到1943年年底的时候，红军已经巩固了他们在第聂伯河西岸的阵地，并迫使德军后退了50～80英里。

12月，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参加统帅部高级会议。斯大林也刚刚结束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德黑兰峰会并返回。在那次峰会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向斯大林承诺——在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承诺了——西方盟军将在1944年夏天进攻法国北部。同时达成一致的还有，苏联与西方盟友的战略行动要相互配合。斯大林承诺，为了支持盟军进攻法国的行动，大约在同一时期会在苏德战场发动一次较大的攻势。

出席莫斯科最高指挥工作会议的有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以及总参谋部的军官和苏联政治领导层的成员。会议的目的是评估战略形势，并就下一步一系列大规模行动的计划达成一致。总参谋部在会上介绍了到当时为止战争方面的统计数据。截至1943年年底，所有被德国人占领的苏联领土已有一半获得解放。自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德国人已损失56个师，另有162个师受到重创。尽管国防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行动，但它依然拥有积极防御的实力：德国及其盟友仍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军队，有54500门大炮和迫击炮、5400辆坦克和突击炮，以及3000多架飞机。苏联武装力量的累计损失尽管很大，

要远远超过德军，但它在人员、火炮和飞机的数量上分别要多出30%、70%和230%（而且它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盟国物资援助的大幅增加）。

朱可夫在莫斯科期间曾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私人住所与独裁者共进晚餐。在这样的场合，有一次，朱可夫又提起用合围的方式进行作战的话题——这与沿宽大锋面向前推进的主张相反。斯大林指出，现在红军更强大了，也更有经验了，所以他比较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行动。此次会议决定，沿着从北方的列宁格勒到南方的克里米亚的宽大锋面，发动一次冬季攻势，而且重点放在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的行动上，目的是解放第聂伯河以西的整个乌克兰。[41]

12月中旬，朱可夫返回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在这个月的月底，为了进一步击退基辅周围的德军，瓦图京的部队发动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行动”（Zhitomir-Berdichev operation）。一个月后，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展开了一次联合行动，以消灭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Korsun-Shevchenkovskii）地区德军的突出部。负责监督这两次行动的朱可夫后来声称，用两个方面军对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突出部的德军实施钳形包围，那是他的主意。[42] 合围行动成功了，但事实证明，收紧包围圈的过程比较艰难，因为德军拒绝投降。斯大林对于战事的拖延感到不快，并在12月12日对朱可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虽然我亲自下了指示，但你并没有好好计划一下如何用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去歼灭德军在科尔松的集团……我让你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但从你今天的报告来看，尽管你说的话比较尖锐，但你似乎并不太了解情况。[43]

几个小时之后，斯大林又给朱可夫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已经决定由科涅夫负责消灭敌人在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的集团，他的新任务是掩护科涅夫的行动，以防止德军从外围突破。[44]

科涅夫花了一周时间收紧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包围圈并歼灭被包围的德军。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鸣放礼炮向乌克兰第2方面军致敬。“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一个字也没提到，”朱可夫后来抱怨说，“我觉得这是最高统帅的一个错误。胜利围歼敌军的集团，要同时取决于内外两线各方面军的行动，这是不可否认的；在这方面，瓦图京和科涅夫这两个方面军的出色的行动是同样成功的。”[45]

瓦图京是一名忠于职守并受人欢迎的军官。朱可夫很欣赏他，而且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意为瓦图京的名誉做了辩护。1944年2月29日，他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瓦图京在遭到反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伏击时中弹了。朱可夫于次日奉命接替他的职务，成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瓦图京被送往基辅的医院抢救，而且斯大林还用飞机派来了红军的首席外科医生，但两周之后，他还是因为伤重不治身亡。

乌克兰第1方面军成了自莫斯科战役以来，首支由朱可夫直接指挥作战的部队。他的任务是，继续在西乌克兰发动攻势，进抵德涅斯特河，切断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进入罗马尼亚的退路。3月26日，《红星报》发表社论，称赞朱可夫最近的功绩：“在过去这段时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下，对德军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显著的胜利……苏联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苏联士兵的坚定决心又一次挫败了德国人的计划……这些胜利既是我们勇气的胜利，又是我们能力的胜利……伦敦的无线电正在广播：乌克兰地区的事态发展对纳粹德国来说是一场大灾难。”[46] 德涅斯特地区的战斗又持续了几周，但朱可夫已经把注意力逐渐放在策划红军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行动上，那就是“巴格拉季昂行动”。

“巴格拉季昂行动”

“巴格拉季昂行动”的目标是，包围并摧毁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支完好的主力——中央集团军群，并将德国人赶出白俄罗斯。就像卫

国战争期间红军所有取得辉煌胜利的行动一样，谁是这项计划的制订者，也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据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说，该计划是1944年4～5月总参谋部在各有关方面军司令的协助下起草的。而且，在什捷缅科看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前身是中央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的贡献特别重要。[47] 但是据朱可夫讲，对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中央集团军群实施合围的基本构想，是4月22日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会议上由他提出的。[48] 然而，从斯大林的会客日志来看，1944年3～4月这段时间，朱可夫根本没有见过斯大林。如果有过这样的会议，那一定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其他地方。现在所知道的，是斯大林在5月15日下过一道命令，说鉴于有可能会让朱可夫“领导几个方面军的行动”，现免去他“临时”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工作。[49] 接替他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是科涅夫。现在还知道的是，在5月25日、26日和27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什捷缅科等高级军官与斯大林一起开了三次长会。[50] 想必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做出了有关“巴格拉季昂行动”的最终决定。几天后，也就是5月31日，参战的各个方面军接到指令，要求他们起草实施“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详细作战计划。在这些指令上署名的，除了斯大林之外，还有朱可夫。这再一次证明，在独裁者的各位将军和元帅当中，朱可夫的地位是很高的。而且它还表明，在提出“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基本作战构想方面，朱可夫也许就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发挥了重要作用。[51]

用拿破仑战争中一位格鲁吉亚英雄的名字来命名的“巴格拉季昂行动”，是一次由四个方面军联合发动的进攻，参战的是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及乌克兰第1方面军。按照计划，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巴拉诺维奇（Baronovichi）、布列斯特和华沙方向，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向明斯克方向，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向立陶宛首府维尔纽斯方向推进。承担支援任务的是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方面军及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行动将由列宁格勒方面军率先开始，在6月初向芬兰境内推进，继而在当月晚些时候在白俄罗斯发动突袭，然后由乌克兰第1方面

军向利沃夫方向推进，阻止来自南方战区的敌人的调动（见地图22）。这四个主力方面军共有240万人、5200辆坦克、36000门火炮、5300架作战飞机。苏军在人数上对德军占有2比1的优势，坦克是6倍，飞机和火炮是4倍。

苏军的“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与在法国开辟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是紧密协同的。4月初，苏联人得知了进攻发起的大致日期；4月18日，斯大林发电报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说：“按照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红军将在同一时间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以最大限度地支援英美军队的行动。”在1944年6月6日登陆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发电报给丘吉尔和罗斯福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向他们通报，按照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苏军很快将发动夏季攻势，进攻的目标是东线“某个至关重要的地段”。[52]

朱可夫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扮演的角色是大本营在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协调员。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一样，在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担任协调员。与朱可夫并肩作战的是什捷缅科，他具体负责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朱可夫大部分时间都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而且因为他战前在白俄罗斯服役过六年，他对于作战地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像在库尔斯克战役开始前一样，朱可夫花了大量的时间四处检查备战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于备战的细致认真的程度做了详细描述。士兵们在火力打击的战术和进攻技能方面还进行了强化训练，并特别注意步兵、坦克、炮兵、航空兵的协同作战。前线司令部、指挥所及观察所都建立起来了，而且还制定了它们随攻势的进展向前移动的程序。侦察部队对于自己获得的情报进行了核实，并对提供给前线部队的战术地图和行动地图做了改进。像以往一样，后勤保障方面也做了巨大努力，以便使必需的食品、燃料和武器弹药的补给能够做到井井有条。6月中旬，苏联人再次检查了行动细节，并进行了一系列集团军级的推演作业。军、师一

级的指挥官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也参加了此次推演，朱可夫说：“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些即将率部打垮敌主力集团的军官……他们的责任重大，因为击败中央集团军群意味着要把敌人彻底赶出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53]



地图22 **“**巴格拉季昂行动**”**计划，**1944**年**6**月

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对这个地区太熟悉了，再加上作战间隙有这样的机会，朱可夫又开始打猎了——那是他过去最喜爱的活动。朱可夫打猎很是投入，而且战争期间还常带着自己的军官和政委们一起外出打猎。当被问及为什么坚持让自己的军官们，即便他们不是猎手，和自己一起去打猎的时候，他解释说，这是要显示信心，显示他所控制的后方是安全的、有保障的。[54]

在准备“巴格拉季昂行动”期间，朱可夫视察的部队之一是P.I.巴托夫（P.I.Batov）将军的第65集团军，它隶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巴托夫在自己196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描绘了一幅不招人喜欢的朱可夫形象：一个笨拙而霸道的人。他回忆说，朱可夫想要爬上树上的观察所，

但没有成功。他爬到一半时失足摔了下来。朱可夫“大发雷霆”，命令解除该军军长职务并把该师师长送到惩戒连。[55] 不过，巴托夫回忆录出版的时候，正赶上赫鲁晓夫时代抹黑朱可夫运动的高潮，所以他有关朱可夫的性格和行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那段时间批判朱可夫时编造的东西。

朱可夫的确有可能很粗暴，这在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中并不少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那种过于自信的领导风格。在战争的重压之下，肯定会有很多高级军官对他感到不快。还有，朱可夫的显赫地位，特别是他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会招致人们的嫉妒。斯大林的许多将领，如科涅夫，都是一样的自负，所以他在战后就乘机清算自己与朱可夫的私人恩怨。不过，对朱可夫的怨恨并不是普遍的。每当有一个巴托夫和科涅夫，就会有一个巴格拉米扬或华西列夫斯基愿意站出来为朱可夫辩护。就连科涅夫在憎恶朱可夫的同时也很欣赏朱可夫的军事才能，而朱可夫对科涅夫的态度也同样如此。

“巴格拉季昂行动”是从游击队对德军发起的攻击波开始的。白俄罗斯是苏联游击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截止到1944年夏天，那里有多达14万的游击队员，他们组成了大约200个小分队，在德国国防军防线的背后活动。6月19～20日，游击队袭击了德军的交通系统、参谋指挥机构以及机场。游击队还为6月21～22日的大规模轰炸充当前沿观察员。主要的地面进攻是在6月23日开始的，而且极为成功。红军在500英里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突破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并迅速在明斯克会合。7月3日，苏军收复了白俄罗斯首府。朱可夫在不久之后察看了这座城市：

> 白俄罗斯首府几乎认不出来了。七年前我在那里指挥过一个团，熟悉那里的每一条街道以及所有的大楼、桥梁、公园、体育场和剧院。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废墟；曾经伫立着整栋公寓大楼的地方，只剩下断壁残垣。明斯克居民的情况十分凄惨，他们精疲力竭、面黄肌瘦，许多人都噙着泪水。[56]

1941年6月红军在明斯克的惨败现在被反转了，10万名德军被困在该市的东部。在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指挥官、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的投降曾经是新闻片中象征苏军胜利的标志性镜头。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1944年7月，57000名德军战俘在他们的将军们的带领下，在莫斯科游街示众。

继明斯克之后，7月13日，维尔纽斯也被收复了。7月中旬，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开始了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加入他的行动的是朱可夫，后者被大本营任命为此次行动的协调员。7月27日，红军攻陷利沃夫。两天之后，朱可夫再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在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同一天，斯大林颁布命令：今后，朱可夫不仅负责协调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还负责这几个方面军的作战决策。关于华西列夫斯基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及波罗的海第1、第2方面军，也颁布了完全一样的命令。[57] 斯大林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何种动机，或者说这样做实际上有什么区别，现在还不清楚，但这项命令提升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地位与威信，他们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首席麻烦终结者。

从6月22日至7月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损失了25个师，30多万人，而且在随后的几周里又损失了10万人。到7月底时，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然而，摧毁中央集团军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参加“巴格拉季昂行动”的四个主力方面军在解放白俄罗斯的战役中伤亡了75万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军取得了巨大胜利。到此次行动结束的时候，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都回到了苏联人手中，芬兰也快撑不住了，红军已突入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腹地；而在南方，他们正在向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挺进。约翰·埃里克森甚至认为，“在苏军粉碎中央集团军群的时候，他们取得了自己在东线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对于东线的德军来说，这是一场大得难以置信的惨败，比斯大林格勒的还要大”。[58]

华沙起义

“巴格拉季昂行动”的主要目标是解放白俄罗斯，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瓦解和红军的快速推进使得苏军打到了东普鲁士的边境并进入波兰中部和南部。到7月底时，红军已从多个方向逼近波兰首都华沙。红军向西突进之迅猛，把在白俄罗斯解放后未来进攻的方向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7月1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占领东普鲁士，或至少切断其与德国本土的联系。[59] 朱可夫的建议在7月底他与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及什捷缅科之间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60] 最终做出的决定是：东普鲁士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即便这样，还是要继续采取行动，以便为以后的突击打下基础，但苏军将把主要的努力用于攻占华沙。7月27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接到命令，进攻位于维斯瓦河东岸的华沙郊区普拉加（Praga），并在河西岸波兰首都的南北两侧建立桥头堡。这些任务要在8月5～8日完成。[61] 即将开始的攻占华沙的荣誉交给了由苏联组建的波兰第1集团军。这支部队成立于1943年7月，其成员是从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后被驱逐到苏联的波兰公民中招募的。它的领导层是亲共的，许多军官也都是俄国人。到1944年7月时，它的总兵力约2万人，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本人也有波兰血统，他两种语言都会说，只是在说俄语时带有波兰口音。二战结束后，他成了由共产党掌权的波兰的国防部部长。

面对德国人在华沙地区的坚固的防御工事，苏联人的计划很快陷入困境。德国国防军是受了重创，可并没有丧失战斗力，而且德国人还从东线的其他地段和西欧调来了若干个师，迅速重建了中央集团军群。华沙是柏林的屏障，是德军必须守住的战略要冲。德军要把自己的防御阵地稳定下来，它的有利因素就是苏军攻势的后劲不足。苏军士兵非常疲惫；红军的补给线现在拉长了几百英里；红军空军因为要转场到更靠近前线的机场而暂时停止了行动，结果让德国空军在某种程度上又重新掌

握了主动权。苏军有能力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一些小规模的桥头堡，但是守不住，因而在它的第2坦克集团军受到德军6个师——其中有5个装甲师——的重创之后，被迫撤出了普拉加。波兰第1集团军想在维斯瓦河西岸建立桥头堡的行动也失败了，而且伤亡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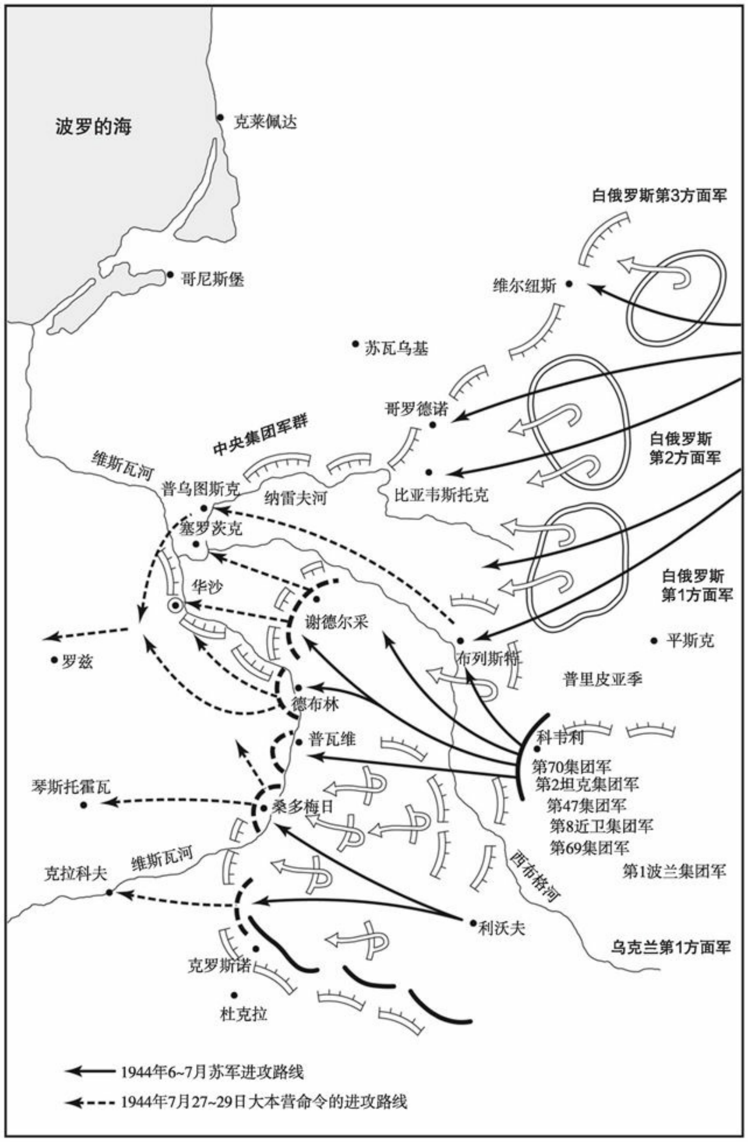
8月8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向大本营提交了新的攻占华沙的计划，试图在华沙北面普乌图斯克—塞罗茨克（Pultusk-Serock）地区的维斯瓦河西岸建立坚固的桥头堡，同时巩固华沙南面现有的桥头堡。在这一步成功之后，波兰第1集团军就沿维斯瓦河西岸向北推进并占领华沙。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估计行动可以在8月25日开始。[62] 结果，这个计划又被推迟了。大本营在8月29日向各个方面军下达指令，要他们转入防御。不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不在该指令的范围之内。他们接到的命令是，继续努力在普乌图斯克—塞罗茨克地区建立桥头堡。[63]

9月中旬，罗科索夫斯基开始向普拉加重新发动进攻，并再次努力为维斯瓦河西岸的波兰第1集团军建立桥头堡。虽然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他坚持要为河对岸的波兰第1集团军获得一块阵地的努力却失败了。到10月初时，苏军对华沙的进攻逐渐停了下来。而它在维斯瓦河西岸的桥头堡哪怕是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也是岌岌可危的。11月12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接到转入防御的命令，[64] 而红军在华沙地区的进攻行动要到1945年1月才会重新开始。

军事事态的发展进程表明，苏军在当时确实是想拿下华沙，而且他们预计这用不了多长时间。首次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再次进行了尝试。只是在“巴格拉季昂行动”结束后，大本营才把攻占华沙的目标暂时搁在一边[65] （见地图23）。然而，有人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红军故意停止他们在维斯瓦河的攻势，好让德军有时间镇压华沙民众的起义。从8月1日开始的起义，是由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游击队武装——波兰家乡

军（Polish Home Army）策划的。和苏联人一样，波兰民族主义游击队员也估计红军很快就会占领华沙。他们想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华沙并在红军到来之前掌握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权。

斯大林对于这次起义无疑是抱有敌意的，因为起义带有反共反苏的动机，既针对希特勒，也针对他自己。但是，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把家乡军当成了威胁。他相信在红军夺取华沙之后，自己完全能够对付那些反苏的波兰人。他的方面军司令们也都有这样的自信。“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即使有能力也不会拿下华沙？”在1944年8月底的一次非正式采访中，罗科索夫斯基对记者亚历山大·沃思反问道，“那种认为我们不管怎么说都害怕家乡军的说法，完全是荒谬透顶。”[66]



地图**23** 苏军向华沙的推进，**1944**年夏天

有人也怀疑斯大林之所以拒绝对反叛者施以援手，是因为他乐于看到德国人镇压他们。起初他是想提供援助的，尽管他认为此次起义在军事上判断失当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当西方媒体开始报道说，家乡军的行动是为了配合红军，后者之前鼓动他们起义，现在又拒绝帮助起义者，这个时候，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英美与斯大林接洽，请苏联人为它们自己给起义者空投补给的飞机提供着陆和加油的方便时，他拒绝了。8月16日，他写信给丘吉尔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

> 现在，在对华沙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华沙行动是一场鲁莽而可怕的赌博，它使华沙居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苏军的各个指挥部事先得到有关华沙行动的消息，如果波兰人跟它们保持联系，事情不至于这样。事情发展到现在的这种地步，苏军的指挥部决定，它们必须与华沙的这次冒险脱离关系。

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起呼吁斯大林给华沙空投补给，哪怕是为了平息一下世界舆论也好。8月22日，斯大林答复说：

> 少数追逐权力的罪犯在华沙发动了这场冒险活动，这一点迟早会真相大白……从军事角度来看，形势……对红军和波兰人极为不利。虽然如此，苏联军队……还是在尽其所能击退希特勒匪帮的出击，并采取别的办法，准备在华沙附近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会不遗余力地打垮华沙的敌人并为波兰人解放华沙。这是给予和纳粹做斗争的波兰人最好的、实际上也是最有效的帮助。[67]

但到了9月，当苏联人对华沙的进攻受到延误的时候，他们开始担心此事对于公共关系产生的影响。9月9日，外交人民委员部向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调查是谁发动华沙起义的以及为什么没有跟苏联统帅部协调好。备忘录还宣布，在给起义者空投物资的问题上，苏联人现在将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合作。9月中旬，苏联人开始加快他们给华沙空投补给的步伐，与此同时，苏军也开始重新发起进攻，力图拿下这座城市。苏军给起义者空投的物资包括：156门迫击炮、505门反坦克炮、2667支冲锋枪和步枪、300万发子弹、42000颗手榴弹、500公斤药品和113吨食品——这实际上与英国人空投的物资大体相当。[68]

到10月初起义失败的时候，家乡军已有2万人死亡，另有好几千人受伤，而在交火中死亡的平民也有15万～20万人。为了掩盖这整个可怕的事件，德国人把华沙市中心夷为了平地，并将幸存的居民赶进了集中营。战后，在谁应当为这起大灾难负责的问题上，人们进行了旷日持久且常常充满敌意的争论。是不是家乡军，它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发动起义？是不是斯大林，他没有让红军继续进攻？是不是英国人和美

国人，他们未能全力支援起义者，或者，怂恿人们去做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情？[69]

由于存在这种争论，罗科索夫斯基和什捷缅科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用了整章的篇幅证明：为了夺取华沙和帮助起义者，红军已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朱可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也差不多，但在细节上对事情的经过着墨不多。[70] 事实上，朱可夫认为，进攻德国本土在战略上更重要，而与之相比，夺取华沙是次要的。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向东普鲁士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建议，这让他非常失望。他认为这是错失良机，没有利用“巴格拉季昂行动”大胜之后德军混乱和薄弱的有利条件。他认为这样的判断失误会使红军在1945年年初进攻德国本土时付出高昂的代价。[71]

他事后回顾对华沙起义缺乏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8月底接受了新的任务。斯大林已决定向保加利亚宣战。后者虽未与苏联开战，但它想方设法为纳粹德国提供帮助。承担进攻保加利亚本土任务的是乌克兰第3方面军，朱可夫则被派去监督此次行动。指挥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是托尔布欣元帅，他是朱可夫以前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同学。9月4日，朱可夫和托尔布欣向大本营提交了进攻计划，并于次日获得斯大林的批准。该计划需要3个集团军（27个步兵师）和2个机械化军来发动进攻。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几天后，乌克兰第3方面军开始进攻保加利亚本土。那不太像是战争。大部分人，包括保加利亚军队，都把红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9月9日，共产党人在索菲亚发动政变，推翻了原来的亲德政府。保加利亚新政府随即对德宣战。[72]

到9月中旬时，朱可夫回到波兰，协调白俄罗斯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但直到10月底的时候他才被正式免去在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职务。[73] 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在1944年9～10月的这段时间，独裁者根本没有见过朱可夫。不过，11月2日，他们确实见过面，并在此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74]，最后做出一个奇怪的决定：11月12日，朱可夫被

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75] 此时，制订红军下一步战略行动即进攻德国本土的计划已经开始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在中央地带从华沙向柏林推进。在朱可夫的北翼，是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而在南翼则是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对于把自己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调到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感到不快，尽管斯大林向他保证说，他的任务并非是不重要的。“如果你和科涅夫不能前进，”斯大林告诉他，“朱可夫也不能。”[76]

朱可夫觉得罗科索夫斯基因为被调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指挥岗位而迁怒于他，所以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看来，在（罗科索夫斯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这次谈话之后，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和我就没有了我们曾经有过多年的那种温暖而友好的关系。他似乎认为……我是要去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他要那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77]

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朱可夫在这件事上说的话。做决策的是斯大林，因为他已经决定，要把率领苏军横扫德国的荣耀归于他的副最高统帅。

---

[1] Ella Zhukova，“Interesy Ottsa，”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55.

[2] Era Zhukova，“Otets，”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43.

[3] Era Zhukova，“Otets，”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98），p.56.

[4] 1943年10月和1944年2月的书信引自V.Daines，*Zhukov*：*Rozhdennyi Pobezhdat*’（Moscow：Yauza/Eksmo，2008），pp.384-385，406-407。

[5]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p.86-87.朱可夫给马加丽塔的信件的影印件可见于*Georgy Zhukov*：*Al’bom*（Moscow：Poligrafresursy，1995）。马加丽塔提到的道格拉斯飞机是由苏联人获准制造的美国飞机。战争期间这种名为“里苏诺夫Li-2”的飞机转为军用并装备了武器。

[6] 在准备自己回忆录的第二版时，朱可夫花了几页的篇幅对自己的后援团队的各位成员表示感谢。由于某种原因，这部分致谢的内容并没有发表（RGVA，F.41107，Op.1，D.52，Ll.72-76）.

[7] 别多夫的回忆可见于他的“Ryadom s Marshalom” 以及V.Peskov，“Govoryat Sputniki Zhukova，” 两者都见于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

[8] A.N.Buchin，*170000 Kilometrov s G.Zhukovym* （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4），p.42.该回忆录由N.N.雅科夫列夫的系列采访组成，后者于1992年出版了关于朱可夫的首部严肃的俄文传记。

[9] B.V.Sokolov，*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 （Moscow：Ast，2003），pp.433-442；“Zheny i Docheri Marshala Zhukova，” *Komsomol’skaya Pravda* ，June 7，1996，August 22，1996，September 30，1996.感谢鲍里斯·索科洛夫让我参考马斯蒂基纳的这些采访，它们都重印于她的 *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 。

[10]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p.593.

[11] R.R.Reese，*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1），pp.300-301.

[12]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133.

[1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150-152.

[14] S.M.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 ，vol.1（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p.152-153.这些文件还可见于“Podgotovka k Kurskoi Bitv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6，1983。

[1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160.朱可夫把商讨的日期记成4月11～12日，但斯大林的会客日志表明，与斯大林一起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是在4月16～18日。参见 *Na Priyome u Stalina* ，pp.403-404。

[1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11，159.关于安东诺夫，可参见理查德·沃夫（Richard Woff）的文章，见于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1997）。罗科索夫斯基也很钦佩安东诺夫，说他是“作战艺术大师”，但他认为其对斯大林过于顺从。

[17] 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 ，vol.1，p.90；vol.2（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473.

[18] 这项命令的复印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19] 关于苏军的计划及准备情况，参见D.M.Glantz and J.M.House，*The Battle of Kursk*（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

[20] D.M.Glantz，*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Frank Cass，1989），pp.146-182.

[21]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202.2002年出版的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增订版补充了一些材料，批评了大本营向各方面军派遣朱可夫这样的代表的做法，认为他们成了方面军指挥官与斯大林及总参谋部之间不必要的障碍（K.Rokossovsky，*Soldatskii Dolg*［Moscow：Olma-Press，2002］，pp.265-66）。这样的怨言在方面军指挥官中看来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当然希望可以和莫斯科的统帅部直接联系。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这些担任大本营代表的人，辩称这种体制乃是指挥之链中的必要环节。这似乎也是斯大林和总参谋部的观点，因为战争期间的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大本营代表在战场上的权威。

[22] 转引自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358。

[23] "厄尔特拉"是英文Ultra的音译。二战期间，英国军情机构把设在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政府密码学校通过截获并破译用高阶密码加密的轴心国通信而得到的情报叫作"Ultra"。这些情报的重要性被认为是超过了英国信息安全分类的最高级别，所以便将其命名为"Ultra"，意为"极端机密"。——译者注

[24] 参见T.P.Mulligan，"Spies，Ciphers and 'Zitadelle'：Intelligence and the Battle of Kursk，19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2，1987；以及V.Korovin，*Sovetskaya Razvedka i Kontrrazvedka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Rus'，2003），pp.113-122。

[25] 参见"Podgotovka k Kurskoi Bitv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6，1983。

[26] A.M.Vasilevsky，*A Lifelong Cause*（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p.272.

[27]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182.关于在普罗霍罗夫卡进行的战斗，可进一步参见V.Zamulin，*Demolishing the Myth*：*The Tank Battle at Prokhorovka*（Solihull，U.K.：Helion，2011）。

[28] *Main Front*：*Soviet Leaders Look Back on World War II*（London：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1987），p.118.

[2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85，vol.2，pp.194，208.

[30]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619.

[31]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p.551-552.

[32] E.Mawdsley，*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London：Hodder Arnold，2005），pp.274-275.

[3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p.213.

[34] Rokossovsky，*A Soldier's Life* ，p.211.

[35] Zhukov，*Reminiscences* ，vol.2，p.233.

[36] 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408.

[37] 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p.409-412.

[38] J.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141.

[3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21.

[40] A.Read and D.Fisher，*The Fall of Berlin* （London：Pimlico，2002），p.153.

[41] 关于这次会议的唯一信息来源是朱可夫（Zhukov：*Reminiscences* ，vol.2，p.225-231.华西列夫斯基也提到过它（*A Lifelong Cause* ，pp.307-309），但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之前已经读过朱可夫的回忆录。在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召开过这样的会议，但考虑到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多，它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朱可夫说这次会议是在12月中旬，但有关他在此次战争中的行踪的详细年表显示，它想必是在这个月的月初召开的。参见S.I.Isaev，“Vekhi Frontoogo Put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10，1991。这是一份相当有用的文件，但在文献证据出现空白的地方，作者就接受了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

[42] Zhukov，*Reminiscences* ，vol.2，p.238.

[43] 文件的复印件可见于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417。

[44]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引用了第二封，但没有引用第一封电报的内容，他把此事说成是斯大林不是责备他，而是责备瓦图京。参见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47-249。

[45]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50.

[46] 转引自V.Daines，*Zhukov*（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pp.421-422。

[47] 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1，chap.11.

[4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57ff.

[49] 命令的复印件可见于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

[50] *Na Priyome u Stalina*，pp.433-434.据什捷缅科说（vol.1，p.238），在与斯大林一起召开这些会议之前，5月22日和23日预先做了一些讨论，参加者有总参谋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司令。

[51]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16（4），*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1944-1945*（Moscow：Terra，1993），docs.113-116.另见D.M.Glantz and H.S.Orenstein，*Belorussia 1944*：*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London：Frank Cass，2001），pp.14-28.

[52]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lee*，*Roosevelt and Truman*，*1941-1945*（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8），doc.260，p.215；doc.274，p.224.

[5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73-274.

[54]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pp.324-325.

[55] 巴托夫回忆录的摘要可见于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p.417-420.巴托夫的书在20世纪70年代再版时，有关朱可夫的这些诽谤性的内容都被删掉了。参见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149。

[5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279.

[57] Stavka VGK 1944-1945，docs.162-163，p.120.

[58] Erickson，J. *The Road to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228.

[59]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286-287.

[60] 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2，pp.71-81；*Na Priyome u Stalina*，p.438.

[61]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7，p.201.

[62]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29，pp.218-219.这一文件的译文可见于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2，pp.93-94.

[63]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55，p.245.

[64] *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Moscow：Terra，1994），doc.100，p.310.

[65] 关于"巴格拉季昂行动"及夺取华沙失利的情况，参见A.Tucker-Jones，*Stalin's Revenge：Operation Bagration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Army Group Centre*（Barnsley，U.K.：Pen & Sword，2009）。

[66] Werth，A. *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786.

[67] *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Churchill，Atlee，Roosevelt and Truman*，doc.321，p.254；docs.322-323，pp.254-255.

[68] Shtemenko，S.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vol.2，pp.102-104；以及A.Chmielarz，"Warsaw Fought Alone：Reflections on Aid to and the Fall of the 1944 Uprising，" *The Polish Review*，vol.39，no.4，1994，p.421。

[69] 对斯大林的作用的详细探讨可见于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70]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p.301-303.

[71]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310.

[72] Zhukov，*Reminiscences*，vol.2，pp.296-300；*Liberation Mission of the Soviet Armed Forc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5），pp.172-182.

[73] Stavka VGK 1944-1945，doc.234，p.162.

[74] *Na Priyome u Stalina*，p.443.

[75] Stavka VGK 1944-1945，doc.248，p.170.

[76] Rokossovsky，*A Soldier’s Life* ， p.267.

[77] Zhukov，*Vospominaniya* ， vol.3，p.175.这些话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回忆录中被删掉了。

10 红色风暴：征服德国，1945

莫斯科战役之后，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朱可夫在1945年4月攻克柏林时的作用。攻进市中心的就是他的部队，而且他们在4月30日还在那里上演了著名的一幕：把苏联旗帜插在已沦为废墟的德国国会大厦的顶上。希特勒此时已经身亡——当天下午，他在自己的地下掩体中自杀了。两天后，柏林的德国守军投降；5月9日，朱可夫荣幸地代表斯大林接受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胜利来之不易。在强攻柏林的过程中，红军伤亡30万人，其中阵亡近8万人。

1944年秋天，斯大林和大本营开始谋划进攻德国本土，并打算通过一次不超过45天的军事行动，在1945年2月底拿下柏林。随后进行短暂的休整，到夏天再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目的是彻底摧毁纳粹政权。换句话说，苏联人以为战事还会按照前三年的模式：冬季攻势—春季暂停—夏季攻势。应当指出，苏联人并不认为拿下柏林就等于战争结束。他们满以为德国人会继续打上几个月，包括在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巴伐利亚堡垒——那里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人们普遍认为纳粹会在那里做困兽之斗。由于军政方面种种偶然的原因，特别是斯大林决心让红军抢在英美军队之前拿下德国首都，结果，柏林之战成了苏德战争的最后一场大战。作为斯大林的副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拯救者、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的胜利者、波兰和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解放者，朱可夫照例被指定要在征服德国和占领柏林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人料到苏德战争会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并由此而巩固了朱可夫作为一名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的名声。

1944年11月初，朱可夫参加了几次长会，与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以及什捷缅科一道，商讨冬季行动。[1] 由此产生的主要构想是，红军于1945年年初发动一次由多个方面军参加的战略行动，从维斯瓦河进抵奥德河，然后继续向柏林推进。在所谓的“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中，参战的两个主力方面军将是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朱可夫和科涅夫共有163个师，总数220万人，3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64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4800架飞机。双方相比，科涅夫和朱可夫的兵力为德军的5.5倍，火炮为7.8倍，坦克为5.7倍，飞机为17.6倍。[2] 另外，在侧翼负责支援的分别是北面的白俄罗斯第2、第3方面军，以及南面的乌克兰第2、第3、第4方面军。

朱可夫的任务是占领华沙，并向波兹南推进，然后夺取柏林。科涅夫则向布雷斯劳和重要的工业区西里西亚前进——斯大林之所以急于占领西里西亚，除了战略上的考虑之外，也有经济上的考虑。[3] 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任务是从波兰北部向但泽方向推进。负责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是I.D.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D.Chernyakhovsky），他是卫国战争时期方面军司令中唯一的一名犹太人。他的任务是摧毁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军，占领哥尼斯堡，并与罗科索夫斯基合兵一处，一起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向前推进。不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1945年2月阵亡了，接替他的是当时一直担任波罗的海第1、第2方面军协调员的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起初并未在进攻德国本土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受到斯大林的冷落，而是因为斯大林打算让他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去指挥对满洲日军的进攻行动。虽然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仍然保持中立，但斯大林已经做出保证，会在打败德国之后，很快就加入对日战争。苏联人可以得到的回报是，收回他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和在中国的军事基地。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是一次由多个方面军参加的联合攻势，不

过，斯大林决定由他亲自来协调此次行动，而不是依靠大本营派到战场的协调员——那是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通常扮演的角色。按照朱可夫的猜测，斯大林之所以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想直接率领红军开进柏林，就像1814年俄军占领巴黎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样。事实上，在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后来祝贺斯大林攻克柏林的时候，独裁者就对他说过“亚历山大到过巴黎”。不管怎么说，战争到了这个阶段，斯大林作为军事领袖是极为自信的，而且他身边还有非常能干、很快将接替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的安东诺夫将军以及同样能干的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将军相助。

战争中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什捷缅科一表人才，后来还蓄了一副很惹眼的八字胡。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从内部人的角度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书——《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4]战后，什捷缅科先后担任过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长，但在与赫鲁晓夫失和之后，就被贬到外省。1955年朱可夫任国防部部长的时候，他让什捷缅科回来担任副总参谋长。但当朱可夫1957年被解除职务的时候，什捷缅科再次被降为地方军区的司令。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和什捷缅科在20世纪60年代有关卫国战争历史记忆的争夺战中又一次结为同盟，尽管两人的回忆不尽相同。[5]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

原定于1月8～10日开始的“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被坏天气给耽误了。于是，斯大林把1月20日定为行动发起的时间，但后来又提前了，原因是德军在1944年12月发动的阿登攻势（被称为“突出部之战”）取得了成功，丘吉尔向他求援，要减轻西线的压力。科涅夫于1月12日，也就是在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开始行动的次日发起了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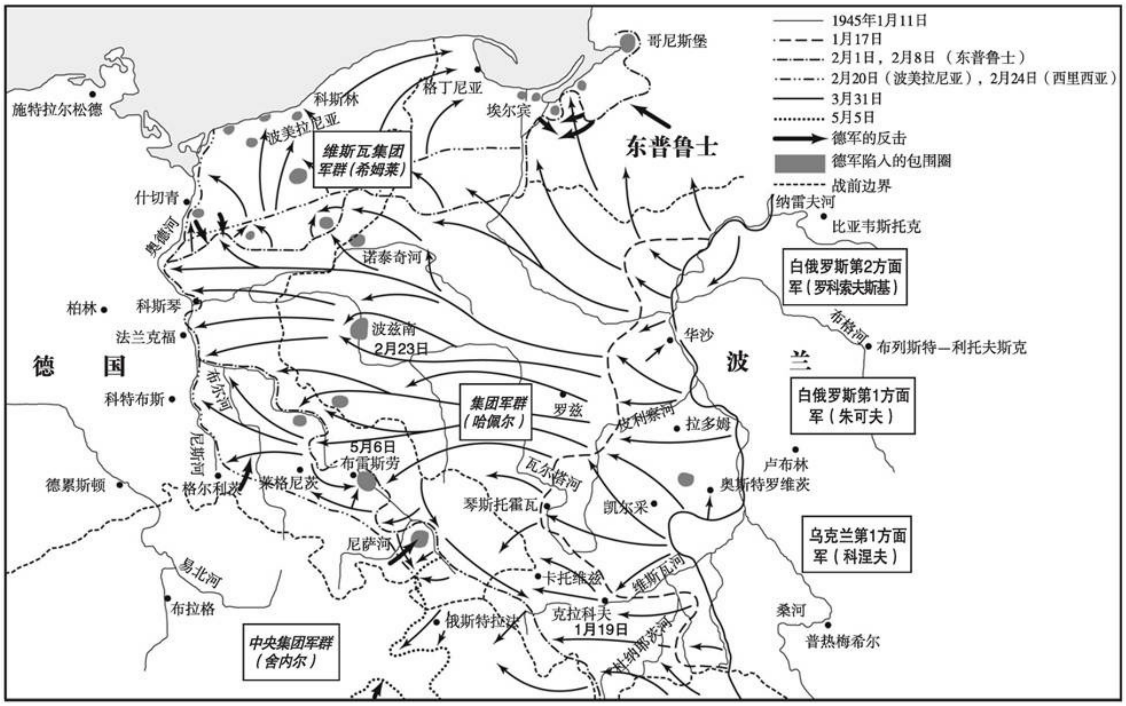
朱可夫的第一个目标是拿下华沙，为此，他利用维斯瓦河西岸现有

的桥头堡从南面进攻这座城市的侧翼。亲共的波兰第1集团军的任务是率先攻进华沙，而它在1945年1月17日做到了这一点。朱可夫回忆说：

> 在听从华沙来的人讲述纳粹在占领期间，特别是在撤离之前的暴行时，人们会觉得很难理解敌人的心理和品性。波兰官兵对这座城市遭到的严重破坏尤其难以接受。我看到那些久经沙场的波兰军人流泪了，并发誓说要向凶残的敌人复仇。作为苏联军人，我们也感到痛恨，决心要为敌人犯下的暴行狠狠地惩罚他们。[6]

接下来，朱可夫就要向华沙西面120英里处的波兹南推进，那儿距离战前的波德边界不远。按照要求，苏军要在2月初之前到达波兹南，结果却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尽管采用的方式是绕行而不是强攻这座重兵布防的城市。苏军推进速度如此惊人的原因之一，是朱可夫直到此次攻势已经开始两三天之后，才把自己的各个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而此时敌军的防线已被撕破，这就保存了那些坦克集团军的实力，可用来沿纵深方向扩大战果。[7] 速度是“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的典型特征。在行动的头二十天，苏军每天的推进速度是15～20英里，而有些坦克部队的速度还要快上两倍[8] （见地图24）。

1月26日，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苏军应在月底前推进到奥德河，继而在2月初沿宽大锋面强渡该河，然后从南北两翼包围柏林。[9] 实际上，这是个对德国首都进行合围的计划。斯大林批准了，于是，1月27日，朱可夫通知自己的部队，“要是我们能够夺取奥德河西岸，攻占柏林的行动就有了充分的保证”。[10] 2月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果真抵达并渡过了奥德河，而且还在河西岸的科斯琴（Kustrin）地区建立了桥头堡。不过，德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朱可夫不得不调整部署，准备——就像他说的——“在2月15或16日一举拿下柏林”。[11] 2月10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提交了自己攻占柏林的计划，这项行动当时计划在2月19～20日开始。[12] 但在2月18日的晚上，朱可夫接到大本营的命令，停止对柏林的进攻。[13]



地图24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1945**年**1**～**2**月

大本营的决定是对朱可夫北翼的形势做出的反应。尽管科涅夫在南翼的推进和朱可夫一样是势如破竹，但罗科索夫斯基向奥德河北段的推进却落在了后面。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在东普鲁士陷入困境，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右翼奉命驰援。调整部署引发了连锁反应，罗科索夫斯基左翼的推进速度慢了下来，从而与中央地带快速推进的朱可夫的各个集团军之间出现了缺口。这就使朱可夫向柏林方向的大规模突击容易受到盘踞在波美拉尼亚（德国北部省份，毗邻东普鲁士）的强大的德国国防军的反击。考虑到这一威胁，大本营命令朱可夫将他的右翼折向北，避开柏林，进攻波美拉尼亚的敌军阵地。另一个导致局面复杂化的因素是，科涅夫在南翼的推进速度也放慢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1月底之前就抵达并渡过了奥德河，而且科涅夫还制订了宏大的计划，要继续向前，一路推进到易北河，并于2月底从南翼向柏林发起攻击。该项任务的第一阶段，即从奥德河推进到尼斯河，到2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完成，但在连续作战40天并推进了300～400英里之后，科涅夫的部队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14]

这一连串的事件在20世纪60年代引发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当时，瓦西里·崔可夫元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朱可夫本来是可以在1945年2月直捣柏林的，那样就会早点儿结束战争。崔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之围中曾担任62集团军司令。那次战役之后，62集团军更名为第8近卫集团军，并在参加朱可夫对柏林的大规模突击中仍由崔可夫指挥。[15]

崔可夫的理由是，朱可夫有足够的兵力在1945年2月直捣柏林，波美拉尼亚集团的威胁被夸大了。朱可夫是想要继续向柏林推进的，崔可夫说，但斯大林不允许，并坚持要求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北进入波美拉尼亚。崔可夫在文章中声称，自己在2月4日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斯大林和朱可夫的通话，苏联独裁者在电话中命令停止进攻柏林。崔可夫最后说：

> 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作为第一副最高统帅，作为对战况了解最清楚的人，朱可夫元帅为什么不想办法说服斯大林，必须向柏林而不是波美拉尼亚发动进攻。更让人不解的是，并不是只有朱可夫一个人这样想，他十分清楚官兵们的心情。那他当时为什么还要一声不吭，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呢？[16]

崔可夫并不是第一个认为红军本来可以在1945年2月拿下柏林的人。1945年2月19日，《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容不迫的朱可夫》的报道。它说：

> 上周，朱可夫元帅不得不拿出他全部的意志力，因为诱惑实在太大了。自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柏林——这个他一直在战斗和计划着想要得到的大奖，几乎已进入他大炮的射程……再来一次猛攻，朱可夫就可以打到柏林……但朱可夫停了下来，以加强其对局势的控制。也许危险并不大，但要是想对柏林来个迅速一击，某种程度的危险仍然是存在的。对于德国人十分清楚的事情，朱可夫也十分清楚：一座一片狼藉的废墟城市变成了堡垒，进攻部队有遭到侧翼夹击而被困在里面的危险。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对德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时代》杂志差不多说出了朱可夫的心思，1946年4月他在柏林的

一次红军会议上的讲话证实了这一点。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讨论“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的教训。有人表示，那次行动本来是能够以在1945年2月攻克柏林为结束的。朱可夫回应说：

> 当然，当时柏林的防御并不强。在奥德河西岸，敌人只有个别的连、营和坦克部队，沿奥德河并没有真正设防。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所以，要是派坦克集团军……直取柏林，那是可行的，而它们也许能到达柏林。当然，问题在于它们能否拿下它，这很难说。但我们必须经得住诱惑，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指挥员哪怕是胜利在望了，也不能失去冷静。你们难道以为崔可夫同志不想直扑柏林，或朱可夫不想拿下柏林？到柏林去是可以的，把机动力量派去进攻柏林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敌人可以轻易地切断退路，那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从北面进攻的敌人很容易突破我们的步兵，抵达奥德河渡口，从而使我军陷入困境。我再强调一遍，必须稳住，要经得住诱惑，不要冒险。指挥员在做决定的时候，永远不应失去他的常识感。[17]

对于崔可夫后来提出的批评，朱可夫的回应显得相当激动，但如果考虑到他从前的部下针对他个人说的那些带刺儿的话，这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朱可夫强调说波美拉尼亚集团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他否认崔可夫提出的当时凭现有的兵力足以隔离威胁并向柏林推进的说法。朱可夫还否认2月4日那天和斯大林通过电话，说自己那天在别的地方。对于崔可夫说的战争中的冒险是必要的的观点，朱可夫反驳说：“历史经验表明，险是要冒的，但不能过于冒险。”[18]

朱可夫和崔可夫争论的关键在于，他们对波美拉尼亚德军威胁大小的看法不一致。实际上，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右翼以及朱可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左翼，在波美拉尼亚与德军交战了近两个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威胁的严重性。在这些行动中，红军摧毁了敌军20多个师，但自身也有5万人阵亡、17万人负伤，损失的坦克、飞机和火炮总数超过3000。[19]

1966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当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朱可夫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这当中也

包括卫国战争时期的许多高级军官。崔可夫出席了会议（朱可夫没有），并为自己的立场做了辩护，但在朱可夫的支持者当中，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跟他的关系都不好，他们都对他所说的如果“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继续下去德国人的防线就会瓦解的观点提出了质疑。[20] 虽然朱可夫后来为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做了辩护，但他当时对波美拉尼亚行动似乎并不热心。当波美拉尼亚行动久拖未决，大本营命令朱可夫把自己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调给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时候，他告诉罗科索夫斯基：“我警告你，这个集团军必须照你接收的样子完好无损地还过来。”[21]

1945年2月底，红军向柏林的推进停了下来。在此期间，朱可夫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成为二战中最有名的小兵之一。约瑟夫·拜尔勒中士被认为是二战中唯一的一名既在美军中又在苏军中服役过的美国军人。拜尔勒是一名伞兵，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就在法国被德军俘虏了。1945年1月，他逃出位于德国东部的战俘营，并在逃向苏军战线的路上碰到了红军的一支坦克部队。拜尔勒擅长使用炸药，他说服坦克部队的指挥官，允许他和他们并肩作战。一个月后，他因为在战斗中负伤而被送到了当时叫作兰茨贝格（Landsberg）（现属波兰）的苏军医院。一天，医院病房里一阵喧闹，原来是朱可夫到这里探望伤员来了。朱可夫饶有兴趣地听人介绍了这位受伤的美国大兵的情况，并通过翻译和拜尔勒进行了交谈。后者告诉他，自己的证件丢了，这意味着自己很难再回家了。第二天，拜尔勒得到了一份经朱可夫批准的文件，使他得以转道莫斯科回到美国。

1994年，在纪念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的活动中，拜尔勒中士的故事在全世界引起了关注。当时在白宫还举行了仪式，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分别向他颁发了纪念章。2004年，拜尔勒去世。四年后，他的儿子约翰被任命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2011年4月，在莫斯科的一次采访中，拜尔勒大使表示，就他而

言，他认为“朱可夫帮助挽救了他父亲的生活”。[22]

朱可夫与科涅夫的竞赛

朱可夫还在盯着柏林。1945年3月底，他向总参谋部递交了再次向德国首都发起进攻的计划。该计划有两手变招：一是扩大奥德河河西岸科斯琴地区现有的桥头堡；二是在科斯琴北面和施韦特（Schwedt）南面建立新的桥头堡，同时加强奥德河河畔法兰克福的小桥头堡的力量。[23] 朱可夫赶到莫斯科与总参谋部商量他的作战计划，但事实证明，计划很快将赶不上变化。

3月31日，斯大林接到西方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来信，信中详细通报了英美的战略计划。艾森豪威尔告诉斯大林，自己眼下的目标是要摧毁鲁尔工业区的德国守军，然后向爱尔福特、德累斯顿和莱比锡进发，并与该地区的苏军会合。西方军队也有可能把雷根斯堡—林茨（Regensburg-Linz）方向作为次要的推进线路，目的是挫败德国人企图在南方负隅顽抗的计划。最后，艾森豪威尔还向斯大林询问了苏军的计划。[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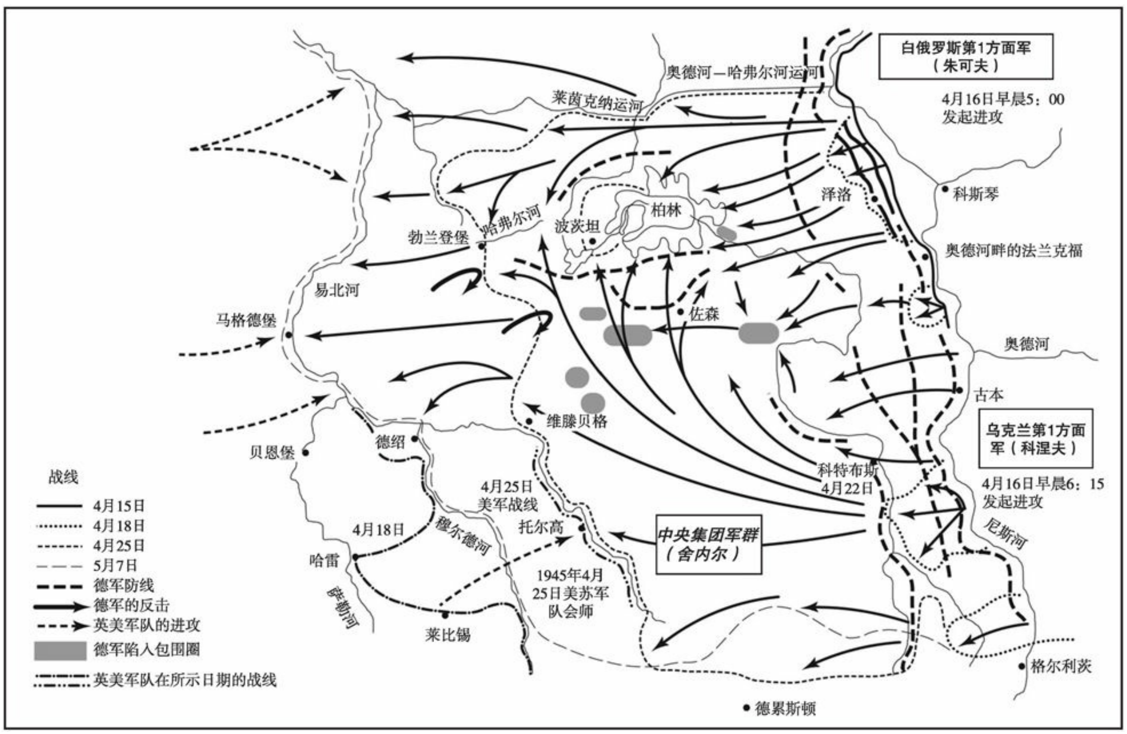
艾森豪威尔的来信是由美国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在当天晚上带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交给他的。在哈里曼离开之后，斯大林叫来了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召开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议。[25] 可以想见，斯大林他们讨论了艾森豪威尔信中的内容。第二天，斯大林在给艾森豪威尔的回信中说，西方与苏军的战略计划是一致的。他赞成让苏军与西方军队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会合，并说自己的统帅部表示，会把该方向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斯大林说，德国首都“已经失去了它先前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只投入次要兵力进攻柏林”。苏军的主要攻势，斯大林告诉艾森豪威尔，会在5月的下半个月开始。[26]

斯大林的回信后来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人提出，在苏联对柏林的意图问题上，斯大林是有意误导艾森豪威尔。不过，斯大林当时说的有可能是真话，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至于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变化，这可以从科涅夫的回忆录中找到线索。4月2日，科涅夫同朱可夫、安东诺夫以及什捷缅科一起，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据科涅夫说，什捷缅科给大家念了一份显然是苏联情报人员发来的电报，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正准备采取行动，抢在红军之前夺取柏林。然后，斯大林转向科涅夫和朱可夫，问他们："那好，谁会拿下柏林呢，是我们还是盟军？""是我们会拿下柏林，"科涅夫答道，"而且我们会赶在盟军之前拿下它。"[27]

第二天，安东诺夫、科涅夫、什捷缅科和朱可夫又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短会。[28] 同一天，斯大林签署了给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指令，要他们尽快攻占柏林。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发起占领柏林的攻势，并在行动开始后的12～15天内进抵易北河（苏联已与西方达成一致，以这条河作为双方在德国的军事分界线）。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击溃柏林南面的德军，并在10～12天内推进到德累斯顿，然后考虑进攻莱比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以柏林东南约50英里的吕本（Lübben）为界，并从4月15日起开始生效——这表明，从4月16日开始，苏军将兵分两路发起进攻。

这一计划意味着朱可夫将直接朝着德国首都的方向发起进攻并从北面包围这座城市，而科涅夫的部队则从南面包围它。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负责支援，它将在4月20日朝柏林方向发动进攻，以保护朱可夫的右翼不会受到北面德军的反击[29]（见地图25）。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这反映了斯大林要抢在自己的西方盟友之前拿下柏林的决心。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他对成功是有把握的，哪怕要以许多苏军官兵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要不然，这些人是有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

什捷缅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示，斯大林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划了分界线，那是要制造一场竞赛，看朱可夫和科涅夫谁先打到柏林。据什捷缅科说，原来的分界线还要往南，但斯大林把它改了，因为科涅夫抗议说，应当让他有机会在距离柏林更近的地方展开自己的部队。后来，据说斯大林曾对什捷缅科和总参谋部说："谁先到柏林，就让谁夺取它。"[30] 也许什捷缅科的故事有点儿太戏剧化了，但是，斯大林让朱可夫和科涅夫展开竞赛，是为了保证尽快拿下柏林，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



地图**25 "**柏林行动**"**，**1945**年**4**月

据科涅夫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界线的变动，是斯大林而不是他的主意。科涅夫说："这条分界线在吕本，是不是带有让两个方面军竞赛的意思呢？我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31] 然而，朱可夫断然否定了什捷缅科的故事，并坚持认为夺取柏林的任务只交给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科

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起辅助作用。[32]

虽然柏林在之前的五年已经遭受重创，但仍然是很难对付的。从1940年到1945年，皇家空军向柏林投掷了6万多吨炸弹，杀死了20万人，摧毁了市中心75%的建筑。许多市民无家可归。柏林战前的人口将近450万。到1945年年初，人口还有300万多一点，其中包括12万名儿童和大约200万名妇女。这座城市还一下子涌进了许多东部的难民和在东线作战的党卫军中的外国志愿兵残余，以及几十万名被德国人强征的、在战争工厂中劳动的奴隶劳工。

柏林城市的防御纵深有30英里，分成三个防区。机枪掩体、地堡、据点、隐蔽的战壕系统、反坦克沟、火炮、坦克和反坦克炮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前沿区域雷区密布，而且为了迟滞苏军的推进速度，德军还放水淹没了许多地方。巨大的防空塔楼（flak tower）[33] 既可以容纳柏林的对空防御力量，也可以用于即将开始的地面战斗。守卫这座城市及其各个入口的100万名德军，有1500辆坦克、突击炮以及近万门迫击炮和大炮的支援。德军的计划是边打边撤，如有可能，就不让苏军突破到柏林或其周围地区。由于德军两年多来一直处于守势，所以到194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谙熟边打边撤的战法。

实际上，德国守军是一群胡乱拼凑起来的部队，缺兵少将，补给匮乏，而且里面有相当多的征召来与苏联人决一死战的少年和老人。即便如此，德国人还是给红军造成了大量伤亡。而且按比例来说，伤亡要超过开战初期灾难性的那几个月以来的任何一次战役。[34]

就连最狂热的纳粹分子心中也很清楚，惨败是唯一的结局。既然如此，德国人为什么还要负隅顽抗？简单来说，那是因为相对于战败而言，他们更害怕苏联人的报复。当红军还在德国东部向前推进的时候，纳粹宣传人员就向人们大肆宣扬苏联人针对军人和平民的暴行。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有些却是事实，而且还得到德国东部难民的证

实。德国人还希望，如果他们继续抵抗，就有可能出现某种转机。例如，西方盟军抢先到达柏林，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失和，或者希特勒大肆吹嘘的秘密的超级武器会变成现实从而扭转战局。

尽管时间有限，朱可夫还是尽其所能，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克服困难，夺取这座红军曾经遇到过的最大而且防守也是最严密的城市。他集中了77个师的兵力，拥有坦克和自行火炮3155辆、大炮和迫击炮14628门、火箭炮1531门，在奥德河上修筑了40个渡口和25座桥。朱可夫的工程人员制造了市中心模型，并按照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规模，做好了巷战的准备。在大举进攻的前夕，苏军还组织侦察部队去摸清敌人的火力并试探德军防线的弱点。

朱可夫在作战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如何从科斯琴的桥头堡突破敌军的防线。这样做必须要先夺取泽洛高地（Seelow Heights），一个100～200英尺高、带有陡坡的沙质高地。德军重兵布防的这处高地，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春季解冻，那里有许多沼泽，有些地方还浸泡在水里。朱可夫决定由他的野战集团军从正面突击，继而由两个坦克集团军从突破口扩大战果，然后从南北两翼包围柏林。为了出其不意，朱可夫决定在夜间发起进攻，并首先进行短促而密集的炮击。进攻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3点开始，共向敌军阵地倾泻了100多万发炮弹。凌晨3点半，朱可夫打开140架探照灯，把战场照得如同点燃了1000亿支蜡烛一般。“那场面真是惊人，”朱可夫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这辈子以前从来没见过。”尽管场面很大，但朱可夫的将军中有人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并不太确定。他们后来指出，探照灯不仅亮得让德军，也让苏军睁不开眼睛。事后引发争议的还有朱可夫的一个决定：在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就把他的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当时他这样做是为了支援自己在泽洛高地陷入苦战的野战集团军，但科斯琴桥头堡是个狭小而拥挤的地域，坦克堵在路上，更加妨碍了步兵的前进。朱可夫花了将近三天的时间才拿下这个高地。

第8近卫集团军的阿纳托利·米里什科（Anatoly Mereshko）大尉回想起了朱可夫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挫败感："朱可夫怒气冲冲，说话急促，口气强硬，每一句话都带着威胁。我被命令去找第29步兵军的军长，告诉他要在下午3点之前组织对泽洛高地的猛攻，否则他就要被降级并失去'苏联英雄'的称号。第47和第82近卫师的师长受到了进一步威胁。命令被及时传达了下去，但收到命令的人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的侦察部队刚刚发现，德军的主阵地在泽洛高地的背面，没有被我方密集炮火压制住。" [35]

当朱可夫被阻挡在科斯琴桥头堡的时候，科涅夫却已在长驱直入。据科涅夫说，他在4月17日晚与斯大林有过一次谈话，结果大本营下令让他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突入柏林。 [36] 这使朱可夫更加急于突破泽洛高地。4月18日，他命令手下的指挥官亲自到前线察看，看看到底是什么在阻挡部队的推进。"没有能力执行任务"或"缺乏决心"的军官，会被立即解除职务。 [37] 这是朱可夫的一贯作风。

朱可夫的部队终于突破了德军的防线。4月20日，他的炮兵已处在可以直接向柏林开火的位置。但是，与科涅夫的看谁第一个冲进这座城市的竞赛还在继续。当晚，两人都向自己坦克部队的指挥官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在第二天突入柏林郊区。朱可夫的命令明确指出，这项任务一旦完成，消息不仅会传给斯大林，还会传给新闻界。正如约翰·埃里克森所说的："这道命令说得很明白。朱可夫想要率先进入柏林，那样，不但是斯大林，全世界的媒体都会知道这件事。" [38] 结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同时突入了柏林郊区。

已沦为废墟的国会大厦是柏林市中心的一座宏伟的大型建筑。1933年2月，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它曾被烧得只剩下了空架子。纵火者据说是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纳粹分子以此为借口在全国实行高压体制，第一步就是确立

希特勒的独裁地位。由于这起所谓的罪行而与卢贝一同受审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他后来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和斯大林的亲信。面对国际社会的抗议浪潮，只有卢贝被判有罪，而季米特洛夫则被驱逐出境，去了苏联。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正如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克里斯·贝拉米所说的，国会大厦“具备成为一种圣像般的胜利象征的所有特征”。[39]

4月23日，斯大林颁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在即将打响的柏林市内的战斗中，科涅夫和朱可夫这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它刚好在市中心的南面距国会大厦约150码的地方把柏林一分为二。科涅夫和朱可夫为了攻占柏林的荣誉而展开的竞赛，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科涅夫会分享攻占希特勒首都的荣耀，但当朱可夫的部队直取国会大厦的时候，胜利的桂冠将戴到后者的头上。[40]

接下来的一周，科涅夫和朱可夫的部队就像1942年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一样，逐条街道、逐栋建筑地向市中心方向前进。苏军常常直接向建筑物开炮，把它连同里面的守军一起毁掉。苏联红军完成了由皇家空军开始的拆除柏林的工作。此次战役的高潮出现在4月30日夺取国会大厦的过程中。那天傍晚，朱可夫的第3突击集团军的两名士兵把苏联旗帜插到了大厦的顶端。后来，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Yevgeni Chaldei）用另外两名士兵再现了这一场景，目的是像两个月前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的山顶扶住星条旗一样，拍出一幅红军攻占柏林的圣像般的照片。但是，与美军在硫磺岛伤亡25000人相比，苏军在柏林战役中的损失达到了数十万。这样的代价是很高的，但红军中的其他人也有着斯大林、朱可夫及科涅夫那样的决心，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以让科涅夫得到些许安慰的是，4月25日与美军会师的是他的部队，地点是在柏林西南70英里处的托尔高（Torgau）的易北河上。为了配合新闻片的拍摄，这一令人高兴的一幕也重演了一次，而且还在莫斯

科大鸣礼炮，以示庆祝。

5月1日，斯大林向全世界宣布了攻克柏林的消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的支援下……已完全掌握了作为德意志帝国主义中心和德意志侵略战争温床的德国首都柏林的控制权。"次日，柏林守军的残部放下了武器。到战役结束的时候，苏军在柏林行动中的伤亡超过了35万人，而德国人也损失了50万人，另有50万人成了苏军的俘虏。在德国的伤亡人员中，死亡的平民有12.5万人，其中，仅在1945年4月就有4000人自杀。

为了控制住柏林的局势，朱可夫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核实希特勒自杀的情况。朱可夫和斯大林一样，对纳粹独裁者的自杀感到怀疑，担心他有可能与其副手马丁·鲍尔曼（Martin Bormann）一起逃走。朱可夫到帝国总理府去搜寻希特勒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被烧毁的尸体——后者是纳粹宣传部部长，他也自杀了。朱可夫什么也没找到，但人们告诉他，在希特勒的地下掩体中发现了戈培尔的六个孩子的尸体，他（她）们是被自己的父母毒死的。"坦率地说，"朱可夫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勇气下去看那些孩子。"[41] 只是在经过苏联法医小组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朱可夫和斯大林才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希特勒确已自杀的事实。[42]

在国会大厦入口处的柱子上红军官兵草草留下的无数文字中，朱可夫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可夫的国会大厦和帝国总理府之行被拍成了电影，新闻片中的镜头巩固了他作为苏军顶级将领的声望。几天后，电影镜头捕捉到了更有名的时刻。5月7日，德国武装力量在法国的兰斯（Reims）签署了投降书。但是，因为苏军只有一位相对来说级别较低的军官在场，斯大林坚持认为这份协议只是临时的，应该由朱可夫在柏林签署正式的投降协议。5月8日，在柏林东部卡尔勒斯霍尔斯特（Karlshorst）的一栋市郊别墅举行了受降仪式。美国代表是美国战略空

军司令卡尔·施帕茨（Carl Spaatz）将军，英国代表是阿瑟·特德（Arthur Tedder）空军元帅，法国代表是它的陆军总司令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代表德国签字的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文件的实际签字时间是在5月9日的午夜刚过，因此在俄国，“胜利日”的周年纪念活动也是在这一天。受降仪式过后，朱可夫向在场的所有人表示祝贺。然后，他回忆说：“大厅里一下子变得异常喧闹。大家都在相互祝贺、握手。许多人的眼里都涌出了喜悦的泪水。我也被我的同志们围了起来。”接着又举行了招待会，直到黎明时分才在歌舞中结束：“苏联将军跳起舞来谁也比不了。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也禁不住跳起了‘俄罗斯舞’。”[43]

5月19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他在那里得知斯大林已决定任命他为苏联驻德占领军司令和“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CC）苏联代表。战争期间已经做出决定，把战后的德国分成美、英、法、苏占领区。柏林也被分成了几个占领区，尽管它位于苏军控制的德国东部的腹地（见地图26）。“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总部设在柏林，任务是协调同盟国的占领工作，监督共同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为德国在彻底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之后最终再重新统一做好准备。

朱可夫在莫斯科期间与安东诺夫、什捷缅科及其他高级军官一起，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召开的一系列会议。6月底的时候又进一步召开了多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苏军即将对满洲发动的进攻。

当1941年12月日本在珍珠港向美国发动进攻的时候，苏联是保持中立的，但斯大林承诺，会尽快加入远东战争。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告诉罗斯福总统，红军会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向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进攻。结果，那意味着是在1945年8月。

进攻是在8月8日开始的。指挥此次行动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几天之内，日本关东军就被击败了，而且伤亡惨重，其中，阵亡8万人。在红

军发动进攻的同时，美国人也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正是这两件互相关联的事件所造成的双重打击，使日本人在8月14日提前投降了。

朱可夫没有参加在中国东北的战役，但红军的惊人战果以及1939年8月他在那里大获全胜的哈拉哈河地区成为红军发起进攻的阵地之一，想必会让他也有某种满足感。[44]

5月30日，朱可夫奉命担任他在德国的新职务。6月9日，他在德国首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回答了苏联及外国记者的口头或书面提问。他谈了很多跟柏林战役有关的情况，特别是苏军在强攻时所做的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及进攻开始的当天夜里为了出其不意而大胆进行的炮击。在被问及柏林战役与莫斯科战役的区别时，朱可夫指出，在莫斯科，苏军在成功守住城市的同时还发动了大反攻。在被问及哈拉哈河战役以及德军与日军的区别时，朱可夫巧妙地回答说，德国人已经不再是敌人了，但他认为他们在技术上要优于他在1939年交手过的日本人。朱可夫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对斯大林大唱赞歌。[45]



地图26 同盟国在柏林的各占领区

在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那些人当中，就有《星期日泰晤士报》战时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沃思。“跟朱可夫在一起，人们会感受到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的存在，”沃思回忆说，“但他的态度淳朴，非常友善。”沃思还注意到，朱可夫在称颂斯大林在军事上的领导作用的同时，自我评价也很高，而且“把谦虚和几乎是孩子气的吹嘘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有一种想把红军赢得的实际上所有的重大胜利都归功于自己的倾向”。[46]

胜利阅兵

考虑到朱可夫在打赢苏德战争这场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冲突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他的自负也是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决定让他担任红场胜利阅兵的检阅首长，想必也进一步增加了朱可夫的自大心理。

6月中旬，朱可夫返回莫斯科，接受颁发给他的第三枚“苏联英雄”奖章。大约在6月18日或19日，斯大林把他召到自己的别墅，并问他

是否还记得怎样骑马。[47] 当朱可夫做了肯定的回答时，斯大林告诉他，由他来担任检阅首长，罗科索夫斯基任阅兵指挥。朱可夫推让说该由最高统帅本人担任检阅首长，但斯大林说自己太老了，不能再检阅部队了。[48] 第二天，朱可夫去了正在进行阅兵训练的莫斯科中央机场。在那里，他遇到了斯大林的儿子、空军军官瓦西里（Vasily）。后者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本来是想亲自担任检阅首长的，但练习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那匹马也就是朱可夫要骑的马。这个故事出现在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必须要说的是，酗酒、违反纪律、和自己父亲相处得不好的瓦西里，并不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再说，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斯大林学过骑马。[49]

朱可夫在阅兵仪式上骑的是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骏马，名为"茨皮基"，是20世纪30年代起朱可夫在骑兵部队中的老上级布琼尼元帅推荐的。阅兵仪式在6月24日举行。上午10点，当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朱可夫和他的护卫骑马进入红场。等待他们的是由一个个混成团组成的方阵，代表苏联武装力量的各方面军和各兵种。在每个方阵的前面，是朱可夫战时曾与之并肩战斗的许多将军和元帅，其中包括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梅列茨科夫、托尔布欣、巴格拉米扬以及叶廖缅科。胜利阅兵对朱可夫来说是最辉煌的时刻，但光荣也属于苏联统帅部的其他所有成员，特别是他们的总司令斯大林。苏联独裁者在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观看了阅兵仪式，并接受了200面缴获的纳粹旗帜，它们由阅兵部队堆靠在克里姆林宫的墙边。

阅兵仪式结束后，克里姆林宫为2500名将军和军官举行了宴会。斯大林在宴会上的祝酒词可能出乎苏联武装力量的这些精英的意料。他端起酒杯为之干杯的，不是自己的将军，而是无数的"小民"，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的那些小齿轮，他和他的元帅们正是靠他们打赢了战争。四天后，斯大林晋升为"大元帅"，即最高级别的将军。由此给朱可夫和统帅部传递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可以尽情享受胜利的荣耀，但斯大

林仍然是他们的头。

由于莫斯科的胜利阅兵非常成功，苏联人决定在柏林也搞一次类似的仪式。这一次是在9月7日，而且还是由朱可夫担任检阅首长。朱可夫给在场的同样以性格暴躁出名的美军高级将领乔治·巴顿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他穿着那种喜剧中的军礼服，上面挂满了奖章，”他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中写道，“他五短身材，相当肥胖，长着猿猴一般的翘下巴，但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可惜，曾经当过骑兵的巴顿没有看到莫斯科胜利阅兵仪式上的朱可夫骑在马上检阅部队的风采。否则，他对朱可夫的印象或许会好一点。[50]

朱可夫的另一项任务是主办由斯大林、丘吉尔及哈里·杜鲁门参加的波茨坦峰会。杜鲁门是美国的新总统，他接替了1945年4月在任期内去世的罗斯福。英、美、苏战时结成的“伟大的同盟”继续合作并建立和平繁荣的战后秩序的希望，在1945年夏天时还是很大的。会议地点在西席林霍夫宫（Cecilienhof Palace），那是大柏林区所剩无几的完好建筑之一。1945年7月16日，斯大林乘专列抵达柏林。跟丘吉尔和杜鲁门不一样，他对视察这座城市的废墟没有兴趣，而且还命令朱可夫不要为他搞欢迎仪式。但据朱可夫的回忆，斯大林的情绪很好——这对他来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就要在希特勒德国以前的首都与二战中另外两个获胜的大国的领导人举行峰会了。

朱可夫并不是参加峰会的代表，斯大林的主要军事顾问是新任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军事讨论主要与苏军对满洲日军即将发动的进攻有关，而那次行动朱可夫也没有参加。但朱可夫在这次峰会上确实也参加了几次会议。在一次会议之后，杜鲁门告诉斯大林，美国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并说打算用它来轰炸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的斯大林显得无动于衷，但他后来跟朱可夫和莫洛托夫谈了此事，并下令加快苏联原子弹的研发。在朱可夫回忆录中记载的另一件事是发生在一次招待会上，当时他

跟丘吉尔谈了很长时间有关历次战役的情况。在祝酒开始的时候，丘吉尔出人意料地给朱可夫祝酒。朱可夫在答谢时把丘吉尔误称为“同志”，但他很机敏地采取了补救措施：提议为同盟国的“战友们”干杯。[51] 不过在第二天，斯大林还是拿朱可夫新“同志”的事取笑了他。[52]

政治上，波茨坦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的未来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有：对德国实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而且必须赔偿战争损失（主要是向苏联）；要在适当的时候统一同盟国的各个占领区，并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来掌管一个和平而民主的国家。不管怎样，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在1947～1948年“伟大的同盟”破裂、冷战开始的时候，苏联和西方的各个占领区就成了从政治、经济上瓜分德国的基础。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

作为苏联驻德军政府的负责人，朱可夫所掌管的很快就成了一部庞大的占领机器。尽管从纸面上来说，在苏联占领区的范围内，他可以行使完全的民事和军事控制权，但实际上，他的权力相比于他那些西方占领区的同行而言，是比较有限的。外交部和共产党管理着苏联占领区的政治事务，负责战争赔偿的苏联官员也可以自行其是，拆走占领区内的工业设施并将其运回苏联。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的数百万名苏联战俘和奴隶劳工的大规模遣返工作，则由苏联安全警察控制。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朱可夫的控制权也是间接的，其执行需要依靠五位州一级的督军（military governor）。[53]

作为“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朱可夫在占领政权中拥有很高的、实实在在的地位。朱可夫与“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西方代表的首次会晤是在1945年6月5日，当时他们在柏林拜访了他，为的是共同签署一项公告，宣布由各占领国在德国充当最高管理机构。[54] 西方代表想让“同盟国管制委员会”立即运转起来，但朱可夫坚持要求英美军队先撤出苏联占领区。该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就各同盟国在德国的

分界线问题本已达成的协议，在军事行动过程中没有得到遵守。苏联人想放手行使权力，所以就要求英美部队撤出自己的占领区。朱可夫的拖延让“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急于有所作为的美国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感到不满。当美国人想要离开苏联人为自己的客人安排的宴会时，朱可夫快活地大声说道：“我要把你们抓起来，好让你们留下！”但艾森豪威尔第一轮祝酒过后便走了。[55] 除此之外，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相处得都很好，而且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实际上，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就把“统帅级荣誉军团勋章”授给了朱可夫。几天之后，当朱可夫到艾森豪威尔位于法兰克福的司令部回访时，他也投桃报李，给自己的东道主颁发了苏联的“胜利勋章”。

1945年8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儿子约翰）在朱可夫的陪同下访问了莫斯科，这让两人有了长谈的机会。他们对柏林战役谈了很多。艾森豪威尔在谈话中不承认先前曾有过抢在苏军之前夺取德国首都的打算，并把造成相反印象的责任推给丘吉尔。[56] 在这次的莫斯科之行中，艾森豪威尔注意到，“朱可夫显然很受斯大林器重……两人彼此间的交谈亲密而融洽”。[57]

两人一同出席的活动之一就是8月12日在红场举行的体育文化大游行。艾森豪威尔站在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检阅了游行队伍。他的左边是斯大林，右边是朱可夫。斯大林对艾森豪威尔的印象很好，称他是个“非常伟大的人”，不像大多数军人那样“粗俗”。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John Deane）在把这句话报告给艾森豪威尔的时候对他说：“你在这里显然赢得了信任。”[58]

斯大林之所以邀请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是受杜鲁门先前邀请朱可夫访问美国的影响。在8月2日转达邀请的时候，美国大使哈里曼特意表达了总统对朱可夫的敬佩和美国人民对他以及红军的热情。[59] 苏联人在9月17日答复邀请时建议，朱可夫在10月初访问美国。[60] 但朱可夫并

未成行，美国人只好在1946年4月再次发出邀请，可此时朱可夫已被从柏林召回莫斯科担任新的职务——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所以他不得不以工作为由谢绝了这份再次发来的邀请。[61] 朱可夫未能访问美国的真正原因，有可能是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在1946年年初时开始严重恶化。例如，这一年的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致俄国人的）有名的“铁幕演说”，指责苏联和共产党人对一些中欧、东欧国家的接管，并将西方的影响排除在该地区之外。苏联人有能力设置这样一道铁幕，因为红军占领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在二战中都站在德国一边参战——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较低程度上的波兰，共产党的力量都非常强大。从苏联人的角度看，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并再次发动战争，自己对东欧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演讲做了愤怒的回击，指责这位英国前首相（他在1945年7月下了台）是战争贩子和反共成瘾的人，在苏俄内战期间就曾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圣战的一个主要的组织者。

1945～1946年，朱可夫在被占领的德国只工作了几个月，苏联与西方的战后关系在当时还相对比较和谐。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朱可夫的评价很高。他不认同朱可夫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尊重他的政治立场：“朱可夫元帅是真诚的，这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自己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服膺，看来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由外界强加于他的。”至于朱可夫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艾森豪威尔写道，他“具有比我们时代其他任何人都要丰富的指挥大型战役的经验……显然，他是位杰出的军人”。[62]

在二十年之后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中——那也是冷战爆发的二十年之后——艾森豪威尔被描写成一个正派的人，但也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集团的代表，他在战后没有能够尽到自己的力量，避免“伟大的同盟”破裂。不过，在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就显得公允了许多。“我喜欢他的质朴、不拘礼节和幽默

感，”朱可夫道出了自己对艾森豪威尔的第一印象，“在我看来，他理解苏联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63]

1945年年底，艾森豪威尔被召回美国，朱可夫与他在柏林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1月7日。当艾森豪威尔问自己是否可以向华盛顿报告，说“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是在一种友好的氛围下按照各方的共识运作而且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分歧时，朱可夫欣然表示同意。[64]

红军与强奸

波茨坦会议之后，朱可夫在一次讲话中向驻德苏联军政府的主要官员简要阐述了政策上重点考虑的问题：苏联要从德国索取战争赔偿；要从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清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要支持德国的反纳粹政党；要把赢得德国人民的尊重作为苏德关系未来发展的基础。为了实现这后一个目标，必须抛弃前嫌，可这一点在苏联占领军中有些人还是弄不明白，朱可夫说，因为他们还在干着直接针对当地居民的非法勾当，还有抢劫和暴力行为。战争期间这种事也有过，但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当时人们还在躲避战火，而现在，“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人们开始忘却这场战争的时候，再到德国人那里去翻他们的口袋，这就让人无法容忍了”。遗憾的是，由于苏联占领军中“犯罪分子”的存在，这种事还在发生，结果就破坏了为了与德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而做出的努力：

> 在（占领）开始的那段时间，当德国人看到我们不会向他们开枪而且还给他们面包的时候，他们对这一点很想不通。（纳粹的）宣传说我们会消灭、屠杀、抢劫德国人，会向他们开枪。我们的行为证明了这种宣传是虚假的。德国人明白了这一点，因而十分感激。现在德国人的要求更高了。每一次的非法行径，每一次的残忍行为，每一次的目无法纪，都会对彼此的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我认为这件事并不难办，所以我亲自要求苏联军政府的每一位官员，要求每一位军人和我们机构的每一位成员，这种事必须停止。如果有必要采取极端措施，如果我们不得不枪毙人，那我们就那样做；我们免不了要枪毙一些犯罪分子。[65]

朱可夫提到的是他不想公开讨论的问题。当红军进入德国的时候，恐怖统治就降临到平民的头上。纳粹的宣传虽说夸大其词，但抢劫、枪杀尤其是强奸现象普遍存在。虽然朱可夫矢口否认，可这些行为并不限于极少数的犯罪分子，而且在苏联占领德国期间，违法乱纪的现象仍然存在。

朱可夫和统帅部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苏军部队的失控负责呢？可以肯定，苏军官兵在攻入德国的时候，心里都很明确：绝不心慈手软。在向柏林进军的途中，红军被不断地灌输反德的仇恨宣传。例如，在“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朱可夫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发布命令：“谋杀者的国度就要倒霉了。我们要为所遭遇到的一切报仇雪恨。”红军官兵为自己复仇是几乎不需要或根本不需要动员的。他们目睹了德国人凶残的、造成无数苏联公民死亡的占领政策。他们在横扫波兰时解放的一座座纳粹灭绝营——奥斯维辛、贝乌热茨（Belzec）、海乌姆诺（Chelmno）、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让他们对德国人更加憎恨。被关押在那里的幸存者当中，除了有作为纳粹大屠杀主要受害者的犹太人，还有苏联战俘。战争期间，德国人俘虏了600万名苏军官兵，其中有半数都在关押期间因为饥饿、疾病、无人照看和野蛮虐待而死亡。在这样的背景下，暴力的报复行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这种暴力和混乱的规模大得令人作呕，特别是对德国妇女的大规模强暴。对遭到苏军强暴的德国妇女人数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而真实的数字恐怕是介于这两者之间。许多强暴行为都是在红军攻克柏林之后在大柏林区发生的。[66] 另一个遭殃的城市是维也纳，那里的强暴行为可能达到7万～10万起。对于奥地利人，官方并没有煽动对他们的仇恨，因为他们的国家被认为是受害国，1938年遭到纳粹的吞并。不过，与德军在俄国战场特别是在乌克兰并肩作战的有许多奥地利人，而“解放”奥地利的正是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那里面有许多乌克兰人。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占领期间，对德国平民犯下暴行的同盟国军队并非只有红军。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军人也都有强暴和抢掠行为，只是其规模要比苏联人的小得多。当有关红军劣迹的报道出现在西方报刊上的时候，苏联宣传人员也反唇相讥，提到西方盟军的“违纪现象”。[67]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对于红军官兵的犯罪行为，朱可夫当时采取了纵容或容忍的态度。实际上，他还采取措施禁止此类现象——不但是口头上，而且还付诸行动。1945年6月30日，他发布命令，特别提到对“个别穿着红军制服的人”的抢劫和强暴行为的投诉，并指示自己的官兵非因公务不得外出。为了切断苏联军人与德国妇女的联系，他下令：任何被看到进出私人住宅的苏联军人都会被逮捕。朱可夫还威胁说要惩罚那些对自己手下管束不力的军官。此外，苏联人公开声称，红军是遵守纪律的模范，除了一小撮犯罪分子之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种声明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占领期间强暴行为才会一直存在。朱可夫对强暴的态度，也有一点点的轻薄和迁就。“士兵们，在你们偷看德国姑娘裙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据称朱可夫说过，“不要忘了祖国为什么要把你们派到这里。”[68] 对于准备让自己的官兵在女人问题上有多大的自由空间，斯大林更是直言不讳。“想象一下，”他在1945年4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说，“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打到贝尔格莱德，离开自己遭到蹂躏的故土有几千公里，跨过了自己同志和最亲爱的人的尸体。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反应？在有过如此可怕的经历之后，他与女人寻寻开心有那么糟糕吗？”[69] 斯大林关于“寻开心”的这番话，只会使人对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到趁火打劫，朱可夫自己也不干净。他在德国期间囤积了大量战利品，包括70件黄金首饰、740件银器、50幅小地毯、60幅画、3700米丝绸和320件皮草。朱可夫后来声称这些都是他买的或是别人送的礼物，但这些东西跟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他——无论是在当时还是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诩的红军在攻入和占领德国期间是遵守纪律的楷模的说法不相称。

1946年2月举行了最高苏维埃即苏联议会的选举。朱可夫是某个特别选区的候选人——成立这些特别选区，是为了方便驻扎在德国或其他地方的武装力量中的选民参加选举。按照苏联通行的做法，只有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才被允许竞选公职，所以朱可夫的当选是预先定好的。但是在胜利刚刚过去的喜悦气氛中，人们对他成为候选人似乎有一种由衷的热情——对斯大林等其他苏联领导人也是如此。《真理报》还刊登了一篇报道，以颂扬的口吻记述了一次朱可夫在其中发表了讲话的选举大会。[70]

选举过后不久，朱可夫就被召回莫斯科，担任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1946年3月22日对他的任命是军方高层的若干任命之一。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成为总参谋长，战争期间担任过朱可夫政治委员的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成了斯大林在武装力量部（这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新名称）的副手。[71] 然而，返回莫斯科还不到三个月，朱可夫就被解除职务并外放到省级军区的指挥岗位。事态发展出现如此的转折已是很不寻常，但事实证明，朱可夫战后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

---

[1] *Na Priyome u Stalina* ， p.443.

[2] 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467.

[3] 斯大林对科涅夫说西里西亚是“金子”，要他小心，不要对该地区的工业资源造成太大的损坏。I.Konev，*Year of Victor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p.5，67-68.

[4] S.M.Shtemenko，*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 ，2 vol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1986）.俄文第一卷初版于1968年，第二卷是1973年。

[5] 关于什捷缅科的战时生涯，参见G.Jukes，“Shtemenko，” in H.Shukman ed.，*Stalin’s*

Generals（London：Phoenix，2001）。

[6]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19.

[7]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297.钱尼指出，在1966年朱可夫七十岁生日那天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时候，嘉奖令中特意提到他在“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中对装甲力量的使用。

[8]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战后被苏军总参谋部视为闪电进攻的典范，参见对俄罗斯总参谋长的采访，*Krasnaya Zvezda*， May 7，2005。

[9]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vol.16（4）：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4-45 gg（Moscow：Terra，1993），doc.40，pp.326-28.

[10] 转引自P.T.Kunitskii，“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9，2006。

[1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28.

[12] “Marshal G.K.Zhukov：Nastuplenie na Berlin Mogu Nachat 19-20.2.45，”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2，1995.

[13] 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9，2006.

[14] Konev，I. *Year of Victor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p.5ff.

[15] 关于崔可夫，参见R.Woff，“Chuikov，” in Shukman，H.（ed.）. *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1997.另可参见崔可夫的英文版回忆录：*The Beginning of the Road*（London：MacGibbon & Kee，1963）。

[16] 崔可夫文章的译文可见于，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p.500-505。

[17] 转引自M.I.Golovin，“Uroki Dvukh Operats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1，1988，p.25。有关此次会议的资料来源于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9，2006。

[18] G.Zhukov，“Na Berlinskom Napravlen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6，1965.这篇文章的译文可见于H.E.Salisbury ed.，*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London：Sphere，1971）。在一封给《军史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崔可夫对朱可夫的文章做了回应，重申了自己

的观点，即本来是可以在1945年2月拿下柏林的。杂志编辑N.G.帕夫连科把信给了朱可夫并征求意见。朱可夫建议不要发表，因为，他说，崔可夫的说法“得不到对当时形势的科学分析的支持”。1965年8月，帕夫连科代表编辑部写信给崔可夫，退回了那封信。他指出，在大本营的全力支持下，朱可夫在2月中旬之前一直在考虑攻取柏林：“无论是大本营还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2月20日之前一直想着进攻柏林。”RGVA F.41107，Op.1，D.71，LL.54-74.

[19] V.A.Zolotarev and G.N.Sevast’yanov eds.，*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vol.3（Moscow：Nauka，1999），p.251.

[20] 参见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9，2006，pp.5-6。

[21] K.Rokossovsky，*A Soldier’s Duty*（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305.

[22] 感谢拜尔勒大使接受我的采访，并为我提供了有关他父亲的情况。约瑟夫·拜尔勒的故事可见于http：//www.506infantry.org/stories/beyrle_his.htm.另见托马斯·泰勒（Thomas H.Taylor）对拜尔勒事迹的记述：*Behind Hitler’s Lines*（New York：Ballantine，2004）。

[23] F.D.Vorob’ev et al.，*Poslednii Shturm*（Berlinskaya Operatsiya 1945g）（Moscow：Voenizdat，1970），pp.44-45.参见J.Erickson，“Poslednii Shturm：The Soviet Drive to Berlin，1945，” in G.Bennett，*The End of the War in Europe* 1945（London：HMSO，1996），p.21。

[24] 转引自C.Ryan，*The Last Battle*（London：NEL，1968），p.142。

[25] *Na Priyome u Stalina*，p.450.

[26] 斯大林这封信的复印件可见于O.A.Rzheshevskii，“Poslednii Shturm：Zhukov ili Konev，” *Mir Istorii*，http：//gpw.tellur.ru。

[27] Konev，I. *Year of Victory*.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79.科涅夫说这次会议是在4月1日，但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它是在2日召开的。*Na Priyome u Stalina*，p.450.无论是朱可夫还是什捷缅科，在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事，尽管后者确实说到，在大本营，人们普遍认为盟军想抢在红军之前夺取柏林。

[28] *Na Priyome u Stalina*，p.450.

[29] O.A.Rzheshevsky，“Vzyat’ Berlin！Novye Dokumenty，”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no.4，1995.

[30] Bialer，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500.

[31] I.S.Konev，*Zapiski Komanduushchego Frontom*（Moscow：Voenizdat，1981），p.404.

[32] Zhukov，*Vospominaniya*， vol.3，pp.225-226.在苏联时代各个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这段话被删掉了。

[33] 德国人从1940年起为了对付盟军空军的轰炸，陆续在柏林等地建造了几座巨大的防空塔楼，它们虽然数量极少，但容量大、墙体厚、火力猛，在柏林战役中成为德军对付红军的重要据点。——译者注

[34] 关于柏林战役，参见 A.Beevor，*Berlin*：*The Downfall 1945* （London：Penguin，2002）； A.Read and D.Fisher，*The Fall of Berlin* （London：Pimlico，2002）；，C. *The Last Battle.* London：NEL，1968；and T.Le Tissier，*Marshal Zhukov at the Oder* （Stroud，U.K.：Sutton，2008）。

[35] 转引自M.Jones，*Total War*：*From Stalingrad to Berlin* （London：John Murray，2011），pp.280-281。

[36] Konev，I. *Year of Victory* .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pp.105-108.

[37] J.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p.571-572.

[38] J.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578.

[39] C.Bellamy，*Absolute War*：*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Macmillan，2007），p.664.

[40] C.Bellamy，*Absolute War*：*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Macmillan，2007），p.586.命令的复印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4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395.

[42] 参见L.Bezymenksi，*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 （London：Michael Joseph，1968）。

[43]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401.

[44] 1945年5～6月朱可夫在斯大林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情况可见于*Na Priyome u Stalina*，pp.454-457.关于斯大林与远东战争，可参见T.Hasegawa，*Racing the Enemy*：*Stalin*，*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以及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79-295.据说进攻并占领北海道——日本本土在北方的岛屿——也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但朱可夫不同意，认为它“过于冒险”。参见J.Haslam，*Russia's Cold War*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60.

[45] “Press-Konferentsiya u Marshala G.Zhukova，” *Pravda*， June 10，1945.陪同朱可夫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是副外交人民委员A.Y.维辛斯基（A.Y.Vyshinsky）。

[46] A.Werth，*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pp.889-893.

[47] 朱可夫所说的日期大体上是对的。6月19日，他参加了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的军事会议，讨论了苏联加入远东战争的问题，并计划在8月开始向驻满洲的日军发动进攻。*Na Priyome u Stalina*， p.457.

[48]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23-424.

[49]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192-193.

[50] 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194.巴顿在1945年12月死于车祸。

[51] 俄语“战友”中的第一个词与“同志”相同。——译者注

[52]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42，449-451.

[53] 研究苏联在德国的占领体制的两部经典之作是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1945-1950*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以及N.M.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54] B.R.von Oppen，*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1945-1954*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p.29-35.

[55] R.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 （New York：Doubleday，1964），pp.258-259.

[56] Zhukov，*Vospominaniya*， vol.3，pp.317，350-351.

[57]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47。

[58] Eisenhower Papers，Pre-Presidential Principal File，Box 110，File on Joseph Stalin，Deane to Eisenhower，August 28，1945，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Abilene，Kansas.

[59]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 （Moscow：Materik，2004），doc.346.

[60]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 （Moscow：Materik，2004），doc.8.

[61]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1939-1945* （Moscow：Materik，2004），docs.104，107.

[62]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185-186.

[63] G.Zhukov，*Vos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vol.3（Moscow：APN，1992），p.35.

[64] G.P.Kynin and J.Laufer，eds.，*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941-1949*，vol.2（Moscow：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2000），doc.54.

[65] "Stenogramma Vystupleniya Glavnonachal'stvuushchego SVAG—Glavnoko-manduushchego GSOVG G.K.Zhukova，" *Sovetskaya Voennaya Administ-ratsiya v Germanii*，*1945-1949* （Moscow：Rosspen，2005），pp.90-100.

[66] 参见Naimark，N.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2。

[67]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doc.42.

[68] Naimark，N.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7.

[69] 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264.

[70] "Marshal G.K.Zhukov u Svoikh Izbiratelei，" *Pravda*，January 28，1946.

[71]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doc.1.

11 外放：贬黜与平反，1946～1954

朱可夫在1946年4月从柏林返回莫斯科时，并未想到自己的命运就要急转直下。在他检阅红场的五一游行时，这位卫国战争的英雄，作为斯大林军事上的得力助手，看上去似乎会长期据有显赫的位置。但仅仅过了一个月，朱可夫就不得不在最高军事委员会（Higher Military Council）面前接受讯问，罪名是以自我为中心和不尊重自己的同僚。

会议是在6月1日召开的，由斯大林主持，与会者有苏共高级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尼古拉·布尔加宁、格奥尔吉·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还有一大群将军和元帅，包括谢苗·布琼尼、菲利普·戈利科夫（Filipp Golikov）、列昂尼德·戈沃罗夫（Leonid Govorov）、伊万·科涅夫、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帕维尔·雷巴尔科（Pavel Rybalko）、谢尔盖·什捷缅科、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ky）、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以及尼古拉·沃罗诺夫（Nikolai Voronov）。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后来都声称在会上为朱可夫做了辩护，而朱可夫本人也回忆说，军队领导人大多支持他。[1] 不过，很难想象，他们反对斯大林不只是在做做样子。我们并没有关于此次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的速记记录，但当时的情形多半是这样的：在宣读了起诉书之后，有人发言表示支持相关的指控，接着就是朱可夫认错。那些在场的人，可能会说些关于朱可夫的忠诚和战绩之类的话，但也仅此而已。任何较为激烈的抗议都会为他们自己招致与朱可夫同样的命运。可以肯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解除朱可夫地面部队总司令职务并将其调任某个军区司令的决定——这一决议是由6月3日的部长会议执行的。次日，朱可夫便把指挥权移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科涅夫。[2]

诺维科夫的指控

朱可夫的失势还要从1946年3月A.A.诺维科夫（A.A.Novikov）元帅被解除苏联空军司令的职务说起。诺维科夫是所谓的“飞行员事件”（Aviators Affair）的牺牲品，那是以在战争期间制造的战斗机质量低劣为名而对苏联飞机工业的清洗。朱可夫是负责调查此案的委员会成员，尽管他对此似乎并不积极。

4月，诺维科夫被捕，并受到苏联安全人员的审讯。4月30日，国家安全部（MGB）头头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给斯大林送去了诺维科夫的口供，指责朱可夫是个“极端迷恋权力的自大狂，他喜欢荣誉，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而且希望别人尊重他、顺从他”。接着，诺维科夫又讲了朱可夫在战争中是怎样只看到自己的重要性而抹杀别人的贡献的。对朱可夫最具杀伤力的是，诺维科夫详细描述了他所谓的朱可夫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不敬。[3]

斯大林去世后，诺维科夫被释放并得到平反。这时候，他声称自己对朱可夫的指责是屈打成招。这很可能是实话。但是，诺维科夫之所以想要指控朱可夫，也有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朱可夫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对于整倒自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怎样，斯大林对诺维科夫的话是宁可信其有的。6月9日，他向军方高层发布命令，重申了有关指控并宣布将朱可夫调往克里米亚的敖德萨军区。据称，朱可夫的错误是，在他与统帅部的关系中有“不当和有害的行为”。作为一个有着过分的个人野心的人，该命令说，朱可夫把卫国战争中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胜利都冒称为自己的功劳，而且还在自己身边拉帮结伙，对政府说三道四。在朱可夫想归功于自己的那些胜利中，就包括柏林战役。但是，该命令说，如果没有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部队的支持，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柏林拿下。该命令强调，朱可夫认识到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已经使他不能再继续担任地面部队总司令一职。[4]

斯大林为什么要利用诺维科夫的指控来解除自己刚刚才任命的朱可夫的职务？一种可能是，关于朱可夫，斯大林有他自己的信息渠道，而这些渠道证实了诺维科夫所说的某些内容。苏联军政领导人受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包括对他们的公寓和别墅进行窃听，这在当时司空见惯。[5] 虽然很难相信朱可夫会贬低斯大林——哪怕是在私底下——但他言过其实，把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自己，这一点却不难想象。相对于自吹自擂这种过错而言，降职对朱可夫来说似乎有点儿小题大做，毕竟这种毛病在将军们中间是很常见的。但斯大林在战后的心态比较脆弱。独裁者此时已年近七十，战争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影响。对于自己核心圈子中的成员，哪怕是察觉到他们有小小的越轨行为，他都会大发雷霆，动辄便加以训斥。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命运落到了许多人的头上，朱可夫只是其中之一。例如，1949年，斯大林解除了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部长职务，原因是他拒绝投票赞成开除自己妻子的党籍（她是犹太人，被指控为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有联系）。[6] 斯大林还决定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防止把它在战争中的表现捧得太高。斯大林把朱可夫降职外放，就是要向红军表明他仍然是头，同时也警告其他将领，他不会容忍任何不忠的迹象。[7]

20世纪60年代，当朱可夫被问及自己降职一事的时候，他认为那是因为嫉妒，但与其说是斯大林嫉妒，不如说是独裁者身边的人嫉妒，尤其是贝利亚。[8] 朱可夫还有一个说法：斯大林之所以会反对他，都是因为布尔加宁作祟。布尔加宁是斯大林在国防部的政治副手，事实上还在1947年接替斯大林担任了武装力量部部长。在后苏联时代版本的朱可夫回忆录中，有一段是描写他如何与布尔加宁发生冲突的：那是1946年他刚刚回到莫斯科不久，是为了指挥系统（chain of command）以及军队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布尔加宁想让指挥系统通过自己与斯大林联系，而朱可夫想直接与那位苏联领导人联系。对朱可夫来说，不幸的是，当此次冲突被报告给斯大林的时候，独裁者却站在布尔加宁一边。在另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朱可夫描述了他与布尔加宁因为对被列入预

备役名单的退伍军人的指挥问题而发生的冲突。[9]

6月中旬，朱可夫动身前往敖德萨。他决定以平常心对待此事。“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持自我，”他告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认输，以为我在军区司令的位置上一天也待不下去。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当然，名声就是这么回事。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有时会伤到你自己。经过这次打击，我竭力保持曾经的我。从中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救赎。”[10] 这种平常心的一个外在表现是，8月，朱可夫战后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家人度了假，去的是隔着黑海与敖德萨相望的苏联度假胜地索契。跟他一起度假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元帅。[11] 但朱可夫的麻烦远远没有到头。8月23日，布尔加宁向斯大林报告，有一趟火车，装了7个车皮、85个纸箱的德国制造的家具，在苏波边境被海关拦下。这些家具本来是要送给在敖德萨的朱可夫的。这趟车被放行了，但敖德萨的海关官员接到指示，对这些货物不能有任何特殊照顾。[12]

1947年2月，朱可夫被取消苏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即没有投票权）的资格，理由是他有反党情绪。2月21日，朱可夫写信给斯大林：

> 我被取消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资格，这深深地伤害了我。我不是个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把我调离地面部队司令的岗位我也毫无怨言。九个月来，我作为军区司令一直在勤奋工作，即便我的调动是基于诽谤性的供词。我想对您说，我会纠正我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九个月来，我一次也没有受过批评，说这个军区搞得不好。我认为自己现在干得很好，但看来又有人在说我的坏话。我请您，斯大林同志，听我把话说完，我会向您证明，那帮诽谤我的小人在欺骗您。

2月27日，朱可夫又写信给斯大林，承认自己在战争期间犯过错误，包括把胜利的功劳太多地归于自己，而没有充分承认最高统帅的作用。但是，他依然坚决表示，诺维科夫说他敌视政府的指控是诽谤：“斯大林同志，您知道，我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执行您的指示，而不会顾及我自己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危急的形势下也毫不犹豫。”

按照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朱可夫的申诉是非常有尊严的。处在朱可夫那种情况下而又不遗余力地讨好斯大林的人并不少见，他们通常都会歌颂这位伟大领袖的天才。这两封信都是由布尔加宁转交给斯大林的，但独裁者没有回复，也没有再见朱可夫。[13] 相反，反朱可夫的运动还在继续。1947年6月，他因为在歌唱家利季娅·安德烈耶夫娜·鲁斯拉诺娃1945年8月访问柏林时给她颁发过军功章而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在她演出之后，朱可夫用手风琴为她伴奏。“作为元帅，他弹得不错。”这位歌唱家后来回忆说。）受到严厉批评的还有一位跟了朱可夫很长时间的政工军官K.F.捷列金（K.F.Telegin）将军，因为是他签署的嘉奖令。朱可夫受到的处罚是训诫，捷列金则被开除军籍，并从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1948年，捷列金、鲁斯拉诺娃以及她的丈夫V.V.克留科夫将军，因为与朱可夫有联系而遭到逮捕和关押。[14] “1947年的时候，我成天提心吊胆，害怕被逮捕，”朱可夫回忆说，“我还准备了一只袋子，把我的内衣放在里面。”[15]

接下来事情越发不妙：朱可夫在德国负责苏联占领区期间搞到的战利品现在受到了调查。1948年1月，斯大林批准对朱可夫在莫斯科的公寓和乡间别墅进行秘密搜查。1月10日，负责国家安全的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自己的手下找到了大量黄金、珠宝首饰、银器、丝绸、昂贵的书籍、皮草及外国家具。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道，在那座别墅里四处转一转，就不太搞得清楚它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德国。[16]

赃物中有朱可夫收藏的20件手工制造的打猎用的武器，其中包括知名的英国Holland & Holland公司制造的猎枪。

随着一些曾经与朱可夫一起在德国服役的军官的被捕，他所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些被捕的军官中有A.S.谢莫奇金上校，他在1940～1946年担任过朱可夫的副官。谢莫奇金的口供被送给朱可夫征求意见。1948年1月12日，朱可夫给主持调查其战利品问题的A.A.日丹诺夫

（A.A.Zhdanov，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主管）写了回信，为自己辩解说那些东西是他用自己的钱买的，或者是别人给他的礼物。他还否认了谢莫奇金的指控，即他从官方基金中额外收了钱用于购物。他还指出，自己别墅中的家具是由国家安全部提供的！不过他也表示懊悔，为自己和家人买了那么多东西。他说其中有些应该交给国家。最后，朱可夫恳求保留自己的党籍，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做个好党员。[17]

朱可夫的恳求和解释并没能打动日丹诺夫的委员会——它说那都是些不诚恳的托词。1月20日，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做出裁决：朱可夫可以保留他的党籍，但所有私自占有的财物都要上缴国家。决议还包括，把他降为一个不太重要的军区司令。于是，1948年2月4日，朱可夫被调到总部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军区。[18]

对于自己受到的进一步惩罚，朱可夫没有怪罪斯大林，而是怪罪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实际上，他还认为是苏联独裁者保护了他，没让他被捕。[19] 斯大林去世后，阿巴库莫夫受到审判并因为滥用权力而被处死，成了斯大林时代晚期多次清洗（包括对朱可夫的清洗）的一只合适的替罪羊。但是，阿巴库莫夫只有在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或许还是他的指使的情况下，才能对朱可夫那种地位的人动手。该对朱可夫受清洗负责的正是苏联独裁者本人，而且决定惩罚力度大小的也是他。惩罚本身，即剥夺物质上的好处并外放，相对来说并不算严厉。最大的侮辱也许在于，在修撰卫国战争的历史时，朱可夫没有被写进去。描写胜利阅兵的绘画也把他从画面中删掉了。1948年的一部关于莫斯科战役的纪录片，朱可夫的名字几乎没有被提到。1948年8月雷巴尔科将军去世的时候，《真理报》的讣告中列出了苏联所有元帅的名字，唯独没有朱可夫。[20] 在1949年的一张描写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一起策划斯大林格勒大反攻的招贴画中，也看不到朱可夫的身影。

那些在“朱可夫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人，其中许多人的遭遇都要坏得

多。鲁斯拉诺娃、捷列金、谢莫奇金等人被关了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伏尔加军区的戈尔多夫将军（他曾在1942年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他的参谋长雷巴利琴科（Rybalchenko）将军。他们在交谈时对斯大林对待朱可夫的方式表示不满，结果被国家安全部录了下来，两人都被逮捕并枪毙了。[21]

“朱可夫事件”的所有受害者都在斯大林去世后得到了平反，包括已不在人世的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朱可夫还亲自活动，以求获得对克留科夫的宽大处理。[22] 朱可夫本人的平反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这可能是得益于华西列夫斯基于1949年取代布尔加宁成为武装力量部部长。1948年，朱可夫的女儿叶拉嫁给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儿子尤里（Yuri），这种姻亲关系巩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联系。1949年10月，《真理报》刊登了F.I.托尔布欣元帅去世的讣告，朱可夫也在署名者之列。[23] 1950年，朱可夫作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代表，和其他许多高级军官一起，再次当选为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年，他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华沙，并在那里遇到了时任波兰国防部部长的罗科索夫斯基。朱可夫在自己的华沙之行期间还就波苏关系发表了演讲，而且演讲的内容还发表在《真理报》上。1952年，官方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增添了有关朱可夫的条目，尽管不长，但是褒扬性的，强调了他在战争期间为实施斯大林的军事计划而发挥的重要作用。[24]

1952年10月，朱可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苏共十九大——这是战争结束后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并恢复了中央候补委员资格。作家兼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大会上碰到朱可夫，发现他虽然对自己再次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有点儿意外，但精神状态很好。对于西蒙诺夫有关哈拉哈河战役的小说的出版，朱可夫似乎也很满意。那部小说并没有直接提到朱可夫的名字，但对那位虚构的负责此次行动的指挥官的描述充满了溢美之词。[25]

西蒙诺夫在1952年的大会上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第一次见到朱可夫是1939年在哈拉哈河，结果他写了一系列传记性的人物素描，巩固了朱可夫作为苏联历史上一位充满人情味的英雄人物的声望。西蒙诺夫作为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和战地记者，其名声几乎可以比肩朱可夫。1942年2月，《真理报》发表了他的诗作《等着我吧》。这是一首悲伤的挽歌，俘获了整整一代苏联人的情感，而且在当今俄罗斯仍然非常流行：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等待。

等到那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等待……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一次次死里逃生。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的人，

说我幸运；

他们不会理解：

在濒临死亡的时候，

是你，用你的等待，

拯救了我……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态度趋于软化的另外一个迹象

是这位独裁者下达的指示：埃玛努伊尔·卡扎克维奇（Emmanuil Kazakevich）关于“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的小说，要提到朱可夫的名字，而不是说一位无名的“方面军司令”。“朱可夫有他的缺点，我们也已为此批评过他，”据称斯大林说，“但朱可夫在柏林的工作干得很好，至少可以说不赖。”[26] 令人诧异的是，朱可夫相信，要是斯大林活的时间再长一点，他就会为自己彻底平反，甚至任命自己为国防部部长。[27]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除了政治生活之外，朱可夫的个人生活也很复杂。在朱可夫于1946年被派往敖德萨时，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是和他一起去的（他们的两个女儿留在莫斯科，放假时可以去探望），但他的战时情人利达·扎哈罗娃也去了，尽管他把这两个女人分开了。利达也跟着朱可夫去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当朱可夫遇到另一个令他坠入爱河的女人时，她返回了莫斯科。[28]

1950年夏天，朱可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因心脏病而住院治疗（他的心脏病已经发作过一次）。主治医生是加琳娜·谢苗诺娃。朱可夫很快就迷上了这个年轻的女人。“她特别吸引我的，”朱可夫回忆说，“是她的漂亮而热情的大眼睛，她的优美的身材，还有她腼腆而端庄的神情。我越是看到她就越是喜欢她……1951至1952年，加琳娜和我变得越来越亲密。那个时候，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生活。”[29] 1953年年初，加琳娜到莫斯科参加业务培训。在那里，她很快就与朱可夫会合了，因为后者在斯大林于3月去世之后又被召回苏联首都。即将卷入其中的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丝毫没有减弱朱可夫对加琳娜的热情。从1953年8月他给加琳娜写的一封信中——当时她在疗养院度假而他正准备参加一场模拟核攻击的军事演习——可以大致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 你感觉那大海、南国的太阳和高山怎么样？我想在那儿代替它们，为的是可以靠近你，我亲爱的加琳娜。在你离开莫斯科之后，我非常想念你。每天我都想起过去的那些日子，想起你的紧张不安，想起我们的谈话……

你的治疗开始了没有？我们过去多次达成一致的饮食起居的规则你现在还在遵守吗？不要忘了，亲爱的，你必须保持健康，要休息。必须要睡好，睡的时间要长；要尽量吃点东西，而且要尽量长时间地、不停地吃，但不要迟于晚上10点。不要忘了，亲爱的，你已经答应我，你要至少增加5公斤的体重。

明天上午11点我就会到达布拉格。看来我会在那里耽搁几个小时，然后去卡尔斯巴德（Karlsbad）。我不知道到了那儿会怎样，但我现在的心情很郁闷……

我希望亲爱的你一切都好。我很想紧紧地拥抱你，但你不在这儿。随信送上我的吻。你的G. [30]

这在20世纪50年代朱可夫不在莫斯科的时候写给加琳娜的那些信中很有代表性。很显然，朱可夫已经把他的罗曼蒂克的忠诚转移到加琳娜身上，尽管他要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与她同居。 [31] 事实上，只是在1957年加琳娜与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出生之后，亚历山德拉才发觉了这一私情。

朱可夫战后还与自己的私生女马加丽塔恢复了联系，后者曾到敖德萨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看望过他。1948年，马加丽塔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法律。叶拉也在那里，而且是同一个系（她后来成了国际法方面的专家）。20世纪50年代初，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姊妹的生活道路偶然相交了。遗憾的是，当亚历山德拉发觉之后，她坚决要求叶拉中断与马加丽塔的交往，而且还要求朱可夫，作为忠贞的标志，对他们的婚姻重新登记，因为他们原来的证书已在20世纪20年代遗失了。 [32]

这些事情成了朱可夫个人生活中一连串纠葛的开始。这一连串的纠葛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和亚历山德拉最终离婚了。

斯大林去世和逮捕贝利亚

朱可夫的回忆录就写到他1946年4月从柏林返回莫斯科为止。不

过，回忆录还有一个没有发表的结尾，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从斯大林去世到1957年被赫鲁晓夫解除职务那段时间的经历。[33] 按照这部分未发表的回忆录的说法，1953年3月4日，朱可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到急电，要他打电话给布尔加宁，后者让他第二天飞往莫斯科。在他到达之后，布尔加宁连忙把他带去参加苏共领导人高级会议，他在那里获悉斯大林的病情很严重——实际上，独裁者在当天晚些时候就去世了。在此次会议上，人们就若干人事变动达成了一致，其中任命布尔加宁为战争部部长，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现任部长）任他的副手。其他的任命包括：格奥尔吉·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再次担任他从1939年至1949年一直担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由此释放的信号是，除了奄奄一息的斯大林之外，他就是苏共最重要的领导人了。朱可夫对自己的新职务颇感意外，因为谁都知道他与布尔加宁不和。后来，朱可夫听说，布尔加宁曾反对他的任命，但苏共领导层的其他人未予理睬。在开始新的工作之前，朱可夫与布尔加宁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并且告诉他："你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快，让我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但如果你真的想在友好的基础上一起工作，那就让我们忘记过去的那些烦恼。"[34]

在3月9日独裁者的国葬仪式上，朱可夫在军方的仪仗队伍中十分引人瞩目，虽说在红场的群众集会上代表武装力量发表讲话的是华西列夫斯基。[35] "尽管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对我不好，"朱可夫回忆说，"我当时还是真的感到惋惜……在斯大林的葬礼之后，苏联人民发自内心地哀悼他的去世，并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党的身上。"[36]

朱可夫的副部长任命在3月15日得到了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在同一次会议上，战争部被更名为国防部，并与海军部合并。朱可夫迅速得到进一步平反的迹象是，《真理报》在1953年5月发表了一篇由他撰写的庆祝苏联对纳粹德国胜利八周年的文章。文章突出了两方面的主题：一是继续歌颂斯大林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以及这位"伟大领袖"的军事天

才，二是苏联奉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朱可夫在后斯大林时代的首个出彩的好机会，是他在逮捕安全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3年6月26日早晨，布尔加宁打电话给朱可夫，要他赶到克里姆林宫。他在那里见到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以及苏共的其他领导人。马林科夫告诉在场的人说，贝利亚正在策划阴谋，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必须逮捕他。在赫鲁晓夫插话说有没有什么疑问时，朱可夫回答说："能有什么疑问？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在赫鲁晓夫指出贝利亚很强壮而且可能有武器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在抓人方面我不是内行，以前也没干过这事，但是我不会犹豫的。"于是，朱可夫和另外几个被叫到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军官被告知：等他们听到马林科夫发出事先约定好的信号时，就进入党的各位领导人与贝利亚一起开会的房间。两个小时后，当信号传来的时候，朱可夫进去了。他快步走向贝利亚，告诉他被捕了并扭住他的双臂。接着，朱可夫等人就把贝利亚推出房间，送走关了起来。[37]

贝利亚被判犯有从事恐怖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罪，然后被处以死刑并执行枪决。后来的某个时候，当有人问起朱可夫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逮捕贝利亚。"[38]

用高级军官来对付贝利亚，这是后斯大林时代打造的共产党政权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象征。在斯大林去世后，武装力量的地位提高了，甚至被美化了，特别是在卫国战争的胜利方面。军队在其职业范围内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在政治决策上也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尽管党的领导集体仍然牢牢掌控着一切。在斯大林当政的时候，内务安全部队曾经是高压统治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更多地依靠军队作为国家的最后保障。选择让朱可夫领头逮捕贝利亚并非偶然。作为战争英雄，他的威望很高；有他的支持，党的领导层不但有把握获得武装力量的拥护，还可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朱可夫将适时地体现出党和军队之间更加合

理的权力平衡以及军方在政治上的行动主义——后者从20世纪20～30年代以后在苏联就见不到了，当时负责武装力量的是朱可夫心目中的英雄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

尽管朱可夫在逮捕贝利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1955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之前，他并没有走上苏联政治事务的中心舞台。在此期间，布尔加宁总是设法在政治上排挤他。朱可夫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所承担的职责，也使他得不到公众的关注，而且还远离莫斯科。

核试验

朱可夫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监督发展苏联武装力量核战争的能力。[39] 1949年8月，苏联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20世纪50年代，它又继续进行一连串试验，包括1953年8月试爆了第一颗氢弹。就在同一时期，美国人的核武库越来越庞大，连同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在内，原子弹就有1000多枚，从而让苏联人感受到了威胁。由于苏联人当时只有50枚核弹，这就意味着除了核力量之外，苏联人在防御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常规力量了。

1953年秋天，苏联人在西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军区举行了一场演习。苏军在演习中模拟遭到战术核武器的攻击。该军区负责人是科涅夫，他在做过一段时间的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1946～1950年）和陆军总监（1950～1951年）之后，在1951年被调到那里工作。朱可夫协助了演习的准备与实施。当时还决定进行一次实弹演习，在部队附近引爆核弹，并观察爆炸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试验是1954年9月在乌拉尔山区南部托茨科耶（Totskoe）进行的，朱可夫从4月开始就在负责它的准备工作。

在按照计划引爆核弹之前，当地居民已被疏散，或者被告知如何保护自己免遭放射性尘埃的伤害。部队也进行了训练，配备了防护服，并隐蔽在专门修筑的掩体中。朱可夫常去视察试验区。有一次，他在观看

坦克穿过假想中的污染区发动进攻的时候，发现坦克开得太慢，就让它们停下，把坦克指挥官召集起来，问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进军柏林的战斗。在得知有人参加过的时候，他要他们按照那时的做法发动一次真正的坦克进攻。朱可夫还担心各种各样的防护措施会扰乱军心。“你们用的那些安全措施让人感到太紧张了，”据说他对参加演习的指挥官们说，“现在你们必须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

核弹实弹演习是在9月14日开始的，当时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空中引爆了一颗中等大小的原子弹。部队就隐蔽在距爆心投影点只有3～4英里远的掩体之中，朱可夫、布尔加宁和统帅部的成员则在大约10英里之外的地方观察爆炸的情况。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将朱可夫等人的帽子都刮掉了。

按照当时的判断，那次演习总的来说非常成功。演习中的教训也得到了总结，并被吸收进了在1955年开始采用的新的野战条例。该条例假设，各个城市不仅遭到战略轰炸，还受到战术核武器的攻击。大约在同一时期，由于朱可夫的极力主张，核武器的研制也被从负责核弹制造的工业部转交给军方和国防部。[40]

作为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在军政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虽说重要，但还是从属性的。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朱可夫当时对苏联政府的防务政策产生过任何真正的影响。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公众人物，他也不太突出。如果不是苏联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在苏联统治集团中不上不下的朱可夫很可能就会这样湮没无闻，终老一生。1955年1月，政治上的风云变幻把他推到了前台，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这实际上使他在后斯大林时期尖锐的继承权之争中成了左右胜负的人。

---

[1] G.Zhukov，“Korotke o Staline，” *Pravda* ，January 20，1989.

[2]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2 and n.2，p.640.

[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2 and n.2，pp.586-591.

[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one，doc.2 and n.2，doc.3.

[5] 参见P.Sudoplatov，*Special Tasks*：*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A Soviet Spymaster* （London：Warner，1994），pp.313-314，328。

[6] 参见G.Roberts，*Molotov*：*Stalin's Cold Warrior* （Washington，D.C.：Potomac，2012），pp.17-18。

[7] 参见 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11。

[8]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vol.2（Moscow：APN，1988），p.70.

[9] Zhukov，*Vospominaniya* ，vol.3，p.364；Zhukov，“Korotke o Staline.”

[10]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Moscow：APN，1989），p.330.钱尼修订版的《朱可夫传》使这段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参见O.P.Chaney，*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66），pp.373-374。

[11] S.P.Markov，“Poslevoennye Gody，”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vol.1（Moscow：APN，1988），p.21.

[12] 参见V.Krasnov，*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p.463。

[1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art one，docs.6，8，n.11，p.643.根据斯大林的会客日志，他与朱可夫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4月29日。与某些记载相反，朱可夫并没有出席1947年取消其候补委员资格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1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art one，doc.9，以及n.13，p.643；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06-207。

[15] A.Mirkina，*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24.

[16] 参见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

pp.467-470。

[17]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p.591-593.

[1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art one，doc.10.

[19] Zhukov，"Korotke o Staline."

[20] "Pavel Semenovich Rybalko，" *Pravda*， August 28，1948.

[21]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p.641-642.

[22] *Reabilitatsiya*：*Kak Eto Bylo*， vol.1（Moscow：Materik，2000）， docs.26-27.

[23] "F.I.Tolbukhin，" *Pravda*， October 19，1949.

[24] *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 2nd ed.（Moscow：Ogiz，1952）， pp.222-223.

[25]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209.

[26] Chaney，O.P. *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80.

[27]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vol.2，p.70.

[28]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 pp.78-79.

[29]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 pp.491.这段引文出自朱可夫女儿手中的他的"日记"，但这个日记显得像是事后而不是当时写的，写的时间现在还不清楚。

[30]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 pp.493-494.

[31]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 pp.495-503.

[32] Mastykina，I. *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 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assim.

[33] "Posle Smerti Stalina，"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p.620-639.该文件的原件可见于RGVA，F.41107，Op.2，D.1。它是一份既没有署名和日期也没有校订过的打印稿。就像它的编辑们所说的，它不像是朱可夫本人写的，倒像是其他人根据与朱可夫的谈话写

的。编辑们认为该文件的日期大概是在1963～1964年。

[34] “Posle Smerti Stalina，” p.621.

[35] “U Groba Velikogo Vozhdya，” *Krasnaya Zvezda*， March 9， 1953.

[36] “Posle Smerti Stalina，” p.622.

[37] “Posle Smerti Stalina，”，pp.623-624.据赫鲁晓夫说，朱可夫进入房间并对贝利亚喊道，“举起手来！”当贝利亚伸手去拿自己的公文包时，赫鲁晓夫担心里面有枪，就抓住了他的胳膊。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 （London：Sphere，1971），pp.303-304.

[38] Chaney，O.P. *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388.

[39] 参见D.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25ff.关于托茨科耶试验或演习的一些文献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40] 20世纪80年代，有些参加过此次演习的军人声称，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佳就是因为受到核辐射的影响。还有报道说，托茨科耶地区的癌症发病率要高于正常水平。这些说法让朱可夫的批评者找到了更多的攻击他的理由。例如，维克托·苏沃洛夫（Victor Suvorov）很不恰当地把朱可夫在托茨科耶的试验与二战期间纳粹在集中营囚禁者身上进行的医学试验相提并论。在有关苏联原子弹工程的研究方面，西方最主要的专家大卫·霍洛韦的看法比较公允。他指出，美国人也进行过类似的试验。“当时，为了保护部队和村民是采取了措施的，这一点很明显；但同样明显的是，统帅部认为部队在核战场上面临的情况将会是残酷的，所以就想在演习中创造这种条件。”Holloway，D. *Stalin and the Bomb.*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28.

12 国防部部长：凯旋与模仿剧，1955～1957

1955年1月，格奥尔吉·马林科夫被免去苏联总理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尼古拉·布尔加宁，这样一来，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出现了空缺。朱可夫成了这一位置显而易见的候选人。地位、威望、必不可少的干劲与决心，这些他都有。当此事在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新名称）[1] 会议上提出来的时候，朱可夫谦虚地说应该由之前担任过战争部部长的华西列夫斯基接任。但是，华西列夫斯基坚持说，朱可夫更有经验，是武装力量中杰出的人物。[2]

马林科夫和朱可夫两人的一下一上，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苏共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崛起。虽然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有一些政策上的分歧，但导致马林科夫被免的，主要是个人恩怨。自从1953年3月接替斯大林担任苏共领导人以来，赫鲁晓夫就变得越来越专横。跟赫鲁晓夫闹翻的，并不是只有马林科夫一个人，还有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在1956年被赫鲁晓夫解除职务，接着就轮到朱可夫本人了，时间是1957年10月。

赫鲁晓夫这人十分强势，爱出风头，且反复无常。他谁都不放在眼里（除了斯大林，当然，那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也不喜欢与人分享公众的关注。

就像苏联领导层中的许多人一样，赫鲁晓夫也出身于农民家庭。他在1918年二十四岁时加入布尔什维克。苏俄内战期间，他在红军中担任政治委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靠自己的努力进入苏共权力阶层，并在1934年成为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1937年，斯大林任命他为乌克兰共

产党书记。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遭人诟病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在1940年3～4月“卡廷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所谓“卡廷大屠杀”，是指苏联当局处死了2万名波兰战俘，他们被认为是共产主义体制的死敌。建议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把那些战俘的家人驱逐到哈萨克斯坦达十年之久的（行动到1940年4月中旬时已经完成），正是赫鲁晓夫，还有斯大林的安全首脑、后来名声扫地的拉夫连季·贝利亚。[3]

当乌克兰在1941年遭到德军入侵并被占领的时候，赫鲁晓夫又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先是1942～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后来又在乌克兰担任政治委员。战后，斯大林把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让他再次担任首都的共产党负责人。这就让他处于一个最有利的位置，在1953年3月独裁者去世时继任党的领导人。后斯大林时代的领导体制是所谓的集体领导制，有几年它也确实如此。但是，赫鲁晓夫对党这个作为苏维埃国家中的关键的控制，使他成为与其地位相同的那些人中的领唱者，掌握了重要的人事与政策的决定权。

赫鲁晓夫确立自己领导地位的手段之一就是推动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而这就需要与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政策和做法决裂。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结束大镇压，并从古拉格——苏联的劳改营——释放数百万名政治犯。与此同时，苏联的文化政策也开始解冻。作家、音乐家等艺术家被允许在艺术表达上有更多的自由；国家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上也越来越开放。共产党党内的氛围也变得比较宽松了，尽管议论领导的是非仍然是不被允许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斯大林时代而言，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威权主义。镇压还是有的，但在一定范围内，不同政见还是允许存在的；公开反对现行体制的，更有可能被监禁，而不是被枪毙。[4]

赫鲁晓夫第一次遇到朱可夫是在1940年，当时后者在负责基辅特别军区。在斯大林格勒和1943～1944年乌克兰战役中两人并肩工作的时

候，他们的生活轨迹再次相交。赫鲁晓夫在自己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朱可夫有很高的评价：

> 他是个能干的组织者和坚强的领导者。他会在战争中展示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们后来的道路不同，但我对作为指挥员的他还是非常敬重的。他没有正确领会自己作为国防部部长的角色，我们不得不对他采取措施……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作为军人的他仍然非常看重……战后，当他在斯大林那里失宠的时候，我也没有隐瞒自己对他的钦佩。[5]

赫鲁晓夫在朱可夫身上想必也看到了斯大林看到的东西：强悍但值得信赖的、忠心耿耿的个性。对于朱可夫对自己的忠诚，赫鲁晓夫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不是斯大林，而朱可夫又希望随着自己的升迁能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朱可夫也不可能抵御得了诱惑，不去夸耀自己的战绩，而这对于心虚的赫鲁晓夫的刺激，要更甚于对斯大林。无论是战时一起共事还是后来担任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对赫鲁晓夫都不曾有过不友好的表现，但在后来，他却几乎毫不掩饰对后者的鄙视。实际上，他后来认为，1957年赫鲁晓夫对他的背叛要比1946年斯大林的那次更为严重。[6] 与赫鲁晓夫不同，斯大林没有剥夺朱可夫继续其军事生涯的权利，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歪曲朱可夫的战绩，或者愚蠢地夸大自己在一些具体战役中的作用。而对朱可夫来说，军人的荣誉和自尊是最重要的。

国防部部长

1955年2月7日，朱可夫被正式任命为国防部部长。当天，他接受了一群美国记者的长时间采访。[7]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莫斯科战役比斯大林格勒战役更为重要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扭转战争的势头是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结果。虽然他指导过斯大林格勒行动的准备工作，但实施此次行动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当被问及希特勒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时，朱可夫说，在战略层面，德国独裁者低估了苏联的实力，而在战术层面，希特勒低估了武装力量

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另外，相对于空军而言，他还低估了炮兵的作用："空军是个娇贵的兵种。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天气和其他许多因素。"当话题转到原子武器的时候，朱可夫断然否定它们会凭借自身的威慑力而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 核武器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使用它们的可能性，而且有些疯子也许会不顾一切地使用它们。我们有责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禁止这些武器……应当记住，原子武器是双刃剑。无论是攻击方还是被攻击方，原子战争对它们都一样危险。

朱可夫还强调，"不可能只靠原子弹就打赢战争"。针对此次采访中人们十分关心的美苏关系问题，朱可夫详细阐述了苏方的态度：苏联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苏联只想要和平的关系。朱可夫对美国在苏联周围设立军事基地的做法表示不满，呼吁结束军备竞赛。他在最后回忆了自己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一起在驻德"同盟国管制委员会"工作时曾经有过的良好关系，并强烈主张恢复友好交往。虽然他的回应是老生常谈，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首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充分显示了他的自信和对发布会的掌控力。

朱可夫就任国防部部长时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但首先是正在进行中的裁军计划。[8] 二战结束时，红军有1100万人，但在战后降到了300万人。然而，1947～1948年冷战的爆发，使红军的数量到20世纪50年代初时又增加到540万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红军削减了60万人；1955年8月，赫鲁晓夫宣布再次削减差不多的数量。1956年5月，又有120万名军人复员。

在朱可夫1955年2月到1957年10月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武装力量削减了大约200万人。裁军有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许多原因。朱可夫似乎认识到：在核武器时代，由于原子弹的威慑作用，只需要很少的常规力量，特别是苏联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研发可以确保远程打击的火箭技术。（1957年，苏联人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轨道卫星"斯普特尼

克”号。）“跟你在穿制服的当中发现的许多笨蛋不同，”赫鲁晓夫回忆说，“朱可夫理解我们削减军费的必要性。”[9]

与削减军队的数量相联系的，是苏联人在军控和核裁军方面的倡议。1955年5月10日，苏联呼吁联合国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军控机构，负责监督大幅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的计划，并发起以最终禁止核武器为目标的进程。[10] 要是完全落实这些倡议，苏联军队的数量就会减少到150万人，这对于苏联那么大的国家来说显得太少了。朱可夫是这些倡议的坚定的拥护者，而且在应对西方对苏联裁军计划的反对意见方面显得比赫鲁晓夫更为灵活。例如，美国人要求，为了核实苏联执行裁军协议的情况，应该允许他们的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飞行。朱可夫准备对这一要求做出让步，条件是美国也要允许苏联对它进行空中监督。有人认为，朱可夫这样做完全是一种策略——他希望得到比美国人能够得到的更多的情报。这种理解低估了朱可夫赋予核裁军的重要意义，低估了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准备付出的努力的程度。当朱可夫警告说核战争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时，那可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他亲眼见过那种巨大的破坏力。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与苏联为控制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而付出的努力有点儿背道而驰的是，莫斯科决定成立华沙条约组织。这是苏联人针对西德的重新武装以及西德政府在1955年5月加入北约所做出的回应。这一结果在几年前就露出了端倪，当时苏联人还为此发动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签订一个保护所有欧洲国家的泛欧洲集体安全条约，使西德没有必要重新武装——因为西德那样做就是要对付想象中的苏联对西欧的威胁。尽管苏联人对欧洲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野心——就长远而言，他们希望共产主义传遍整个欧洲大陆——但在军事上，他们没有任何图谋，实际上还认为自己受到北约和美国的威胁。

在倡导欧洲集体安全的运动失败之后，苏联人决定成立华沙条约组

织，而它起初与其说是类似于北约那样的军事组织，不如说是对所有国家开放的、非侵略性的集体安全组织。[11] 1955年5月，苏联人与其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友在华沙签署了一个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而起草条约各项条款的，正是朱可夫和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朱可夫之所以会参与条约的起草工作，是因为苏共主席团做出的决定：成立一个由各签约国组成的联合军事指挥机构，就和在北约保护伞下存在的那个相类似。1955年4月，朱可夫和莫洛托夫向苏联领导层建议，成立华约的军事组织，它含有85个师，其中苏联出32个师。[12] 但是，华约要发展成北约那样的羽翼丰满的军事同盟还要假以时日。

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裂在不断加深，尽管如此，1955年7月在日内瓦还是举行了自1945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首次大国峰会。参加此次峰会的是法、英、美、苏领导人。率领苏联代表团的是以总理身份参会的布尔加宁，一同前往的还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朱可夫。赫鲁晓夫后来声称，之所以特意让朱可夫加入代表团，是考虑到他之前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关系。但是，由于峰会的主题与欧洲的安全问题有关，也有可能不管怎样他都是会参加的。

日内瓦之行是赫鲁晓夫首次来到共产主义集团以外的地方，所以他急切地想在世界舞台上产生点儿影响。但事与愿违，媒体都在翘首期盼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的重逢。1955年5月，朱可夫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而它的说明文字则充满了溢美之词。按照《时代》杂志的说法："朱可夫是苏联最近于大众英雄的人物；赢得胜利的红军是苏联唯一受人尊敬的公共组织……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乱局中，朱可夫和红军让苏联政权有了一种可以让人放心的、稳定的外观。"文章的读者还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朱可夫凭一己之力，运筹帷幄，使苏联战胜了德国。文章中提到的传说之一，是说他有一次为了证明用唾沫可以上光，亲自为自己的一名士兵擦过靴子。还有一个是说，朱可夫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的家人，在最后关头得救了，没有被德国人活活烧死在家中。至

于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该杂志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两位老兵的友谊能够成为美苏紧张关系真正缓和的基础吗？"[13]

在日内瓦峰会的几周之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碰到过朱可夫。波伦向华盛顿报告说，朱可夫特别谈到了改善苏美关系的必要性，并表示希望在四国峰会上苏联能够与美国等国举行双边会谈。朱可夫强烈主张裁军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波伦：

> 他说军备竞赛是毫无意义的、危险的，原子武器的发展使任何新的战争都会造成难以置信的破坏。他说他对原子武器的效果做了专门的研究；在他5月8日战争结束纪念日这一天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本来有几段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做了生动的描述。但"编辑们"觉得那样有可能"吓着"人民，所以删掉比较明智。

后来，布尔加宁和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也加入了波伦与朱可夫的谈话。布尔加宁打趣说，有人讲朱可夫是"亲美派"。当波伦回应说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人所皆知，这表明军人之间的友谊要比外交官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为牢固时，"米高扬和朱可夫两人都看着布尔加宁哈哈大笑"。[14] 波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朱可夫的时候，说他"看上去就像军人——敦实、壮硕，像俄罗斯橡树，微微红润的面色，清澈的蓝眼睛。尽管笑容可掬，却非常矜持，尤其是对外国人……他传递了一种对美国容忍甚至尊重的态度，因此，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情意在我看来是真挚的"。[15]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

在日内瓦，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有过两次正式交谈，担任记录的分别是艾森豪威尔的翻译波伦和朱可夫的翻译、外交部官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16] 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道，朱可夫在峰会上表现非常得体，也很有手腕；他在承认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主

导地位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峰会的各项活动。朱可夫给人的印象根本就不像是那个传说中的严厉的指挥官："看来他能够适应不同的场合。"[17]

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的首次交谈是7月20日在总统别墅的午餐期间进行的。朱可夫回忆了美苏战时的良好关系以及自己与艾森豪威尔为"同盟国管制委员会"所做的共同努力，并特意指出希特勒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企图分裂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但没有得逞。可惜，战后的"各种黑暗势力"在破坏这种同盟方面得逞了，它们把苏联说成是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正在策划进攻他国。朱可夫以军人的名誉保证，事实并非如此。他还说，自己到日内瓦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会会总统，为改善苏美关系助一臂之力。当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冷战的发展是苏联侵略行径的结果时，不想卷入争论的朱可夫说，双方都犯了一些错误，所以最好是向前看而不是老想着过去。

在政治方面，朱可夫主要谈了裁军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推动两大冷战集团之间的和解。当艾森豪威尔提出为了确保军控及裁军协议的遵守而要建立一种监督体制的时候，朱可夫没有反对。两人还讨论了中国问题，朱可夫竭力劝说艾森豪威尔承认共产党中国并允许它加入联合国。至于德国，朱可夫重申了苏联的方针，即两个德国可以在为欧洲所有国家提供保护的泛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背景下重新统一。

撇开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的分歧不谈，两人之间的这次交谈的基调是轻松的、希望和解的。在接下来7月23日的会晤中，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再次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尽管谈的主要是峰会在程序上的争执：首先要讨论和解决的是哪个议题，是德国的统一还是欧洲的集体安全。美国人想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而苏联人则说，统一问题应该放到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之后，这样可以让他们放心，一个统一起来的德国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当艾森豪威尔请朱可夫帮忙解决这一争议时，后者回

答说，在峰会结束之前，应当继续努力以便达成妥协。在这次会晤的最后，朱可夫表示，希望能去美国看看总统的孙子孙女，而艾森豪威尔也能来莫斯科看看他的孩子。

虽然自己和朱可夫的关系不错，但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

> 在我们战时的交往中，他曾经是个独立而自信的男人。虽然他显而易见信奉共产主义学说，但要是碰到运作上的难题，总会乐呵呵地跟我见面，一起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在日内瓦——那已是若干年之后了——他显得闷闷不乐，忧心忡忡……他说话像是在背书，背那些灌输给他的、直到他能背得一字不差的东西。他没有了生气，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我的老朋友是在执行他上级的命令。除了悲伤之外，从这次私下的聊天中，我一无所获。[18]

据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说，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朱可夫也很失望。他还说总统“默不作声，说出来的也只是些老生常谈。看得出，朱可夫有点儿沮丧。在我们回去的路上，他表示苏联必须要‘提高警惕’”。[19]

任何“在此之后必是因此之故”式的追忆，都无法从两人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交谈记录中得到证实。实际上，两人都已进入政坛，所以对对方不再是自己十年前在柏林认识的那个老兵都很失望。就像朱可夫在离开总统下榻的别墅时对特罗扬诺夫斯基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跟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是同一个人”。[20]

几年后，特罗扬诺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一个电影院里碰到朱可夫，当时放映的是大卫·利恩（David Lean）战俘题材的经典之作——《桂河大桥》。亚力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主演的英国军官为了保持自己手下的士气，就跟日本人合作建造大桥。当特罗扬诺夫斯基问朱可夫对影片的看法时，后者回答道，它“对我来说太消极了。我宁可看《纳瓦隆大炮》那种片子，有激烈的战斗场面。我是个军人，做的事跟你们的不一样”。[21] 事实上，朱可夫在1955年对于自己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新角

色扮演得很好。因为在战后失势过，他也变得沉稳、谦和了些，这些品质在他再度被放逐的时候对他帮助不小。

日内瓦峰会产生的唯一实际的结果是，就进一步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达成了一致。第一项议程将是德国问题与欧洲安全，这样就避开了困扰着峰会的程序性争执。当1955年10月外长们聚头的时候，会议起初很顺利，所有人都同意有必要在欧洲建立共同安全体系。但是，西方在泛欧洲安全问题上开出的价码是德国的重新统一，而那就意味着共产党会失去对东德的控制。莫洛托夫想沿着这些路线继续谈判但被赫鲁晓夫给否定了，后者采取了一条更为强硬的路线。结果，外长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德国问题上的小冲突，属于两人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为了与共产党执政的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而开始的持续争斗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想要结束从1948年开始在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元帅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上的分裂状态。在把铁托逐出共产主义阵营的运动中，作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莫洛托夫曾经冲在了最前面，他不愿意收回或放弃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对那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做出的严厉批评。朱可夫也卷入了这场争端。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十周年的当天，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战争期间铁托在游击运动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并表示希望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在1955年5月1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表示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他说："红军是托洛茨基创建的，但我们并不以他为荣。"他还说朱可夫的文章是"反列宁主义的"，但后来又收回了这句话，说他是一时头脑发热说的。[22] 最后，莫洛托夫输了，与铁托的共产党人的交往又恢复了。在7月的苏共中央会议上，莫洛托夫因为其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严厉的批评。朱可夫出席了会议但没有发言，因而避免了直接卷入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层两大巨头之间的争斗。[23]

苏共二十大

到1955年年底时，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间斗争的焦点已转移到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的筹备工作上。赫鲁晓夫打算在大会上对斯大林提出广泛的批评，莫洛托夫不同意，理由是不能只看到独裁者的过错，也要承认他的功劳。他还指出，不久前，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大家都还把斯大林捧上了天。莫洛托夫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支持，特别是心怀不满的马林科夫和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后者也曾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主席团中的大多数人听命于赫鲁晓夫，所以他的“秘密报告”——按照后来的说法——还是照原计划进行了。

1956年2月25日，在一次只允许大会代表参加的秘密的闭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谴责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著名讲话。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执政时期恐怖统治的讲话震惊了全场。恐怖统治最为酷烈的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有大批的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镇压。受害者当中也包括苏联军官团的成员。赫鲁晓夫报告说，自1954年以来，有7500多名在大清洗中遭到迫害的军人得到平反——许多都是在死后。赫鲁晓夫还指责了斯大林对于战争的领导。国家当时没有为战争做好适当的准备，斯大林对有关德国人即将发动战争的种种警报置若罔闻。赫鲁晓夫声称，战争爆发的时候，斯大林的精神崩溃了，只是在苏联领导层中的其他人的请求下才又回来工作。斯大林恢复镇定之后，继续对军事事务横加干预。只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苏联才得救了，没有遭受比红军在战争初期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灾难。赫鲁晓夫还特意把自己说成是朱可夫的挚友，并说自己在后者受到斯大林的攻击时替他说过话。战后，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企图夸大他自己在赢得胜利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就竭力贬低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自己的将领们的作用。“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最后说，“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我们英勇的军队，它的那些杰出的领导者和英勇的士兵，整个苏维埃国家，

才是卫国战争胜利的保证（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24]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正式刊发，但它在苏联各地的党委会议上都宣读了，结果引发很多困惑和争论。

在赫鲁晓夫戏剧性地插了这么一手的前一周，朱可夫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就军事事务做了一次较为平淡的报告。这对于朱可夫个人而言是个重大的时刻，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党代会上讲话，而且这也是个机会，可以全面阐明苏联在新的核时代的国防政策。朱可夫告诉代表们，未来的战争会与过去的战争大不一样。它的特点是广泛使用飞机和火箭来投放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不但是指原子弹，还有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这种新的战争形式要求把资源转移到空中力量和防空方面。同时，常规的陆海空力量仍然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它们可以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朱可夫也没有忽视人的因素：“军事装备，哪怕是最有效的军事装备，不可能自动决定一场战役或一次行动，也不可能自动获得胜利。在未来的战争中，决定武装斗争结局的将会是那些彻底掌控了自己的军事装备的人，他们相信战争的正当性，他们在内心深处忠于自己的政府，并时刻准备着保卫自己的人民。”[25] 朱可夫结束讲话的方式就跟他在开始时一样——呼吁武装力量永远忠于苏维埃祖国。

在这次大会上，朱可夫当选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即没有投票权），这让他进入了苏联政治决策的最高层。朱可夫立即和赫鲁晓夫结盟并批判斯大林。他在大会过后不久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讲的是个人崇拜对军事事务的影响。发言稿本来是打算在1956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派上用场的，但由于某种原因，朱可夫没用得上它，这可能是因为苏共领导层已经决定把对斯大林的谴责缓一缓。

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朱可夫为中央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对斯大林的批评有：战前对红军的清洗，对1941年6月22日的溃败负有的责任，以及战争头几年的指挥失

误。但是，朱可夫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批评，包括1941年7月对巴甫洛夫将军及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成员的不公正的处决。朱可夫还将此事与从总体上维护红军的荣誉、否认斯大林说它战争期间动辄后退的指控联系起来。朱可夫提到了红军在战争头几年蒙受的巨大伤亡，认为红军“可敬而英勇地尽到了自己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军事义务”。他还提到战后对待幸存的苏联战俘的方式问题。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被俘并不是自己的错。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在战后受到压制，而且现在仍然受到党政机关的不公正对待。“对于那些当过战俘的人，必须停止道德上的非难，必须撤销对他们的非法的处罚并消除对他们的保留态度。”[26]

强烈要求减少战俘的痛苦，这一呼声已经发出去有一段时间了。1955年9月，政府批准对那些被认为是自愿被俘的前战俘实行大赦。1956年4月成立了一个由朱可夫领导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前战俘的情况，包括是否允许他们重新入党。朱可夫的委员会在6月提交了报告，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结束对前战俘的歧视：对被俘那段时间要有报偿，要给他们及其家人发放津贴，要轰轰烈烈地宣传和表扬战俘们为战时的斗争所做的英勇贡献。1956年9月，政府颁布命令，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一年前颁布的大赦令。[27]

对朱可夫而言，巴甫洛夫和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问题比较棘手。对他们被处决一事提出批评并恢复其作为爱国者和共产党员的荣誉，这没有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年当中，已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平反。在导致朱可夫被解除职务的1946年的“飞行员事件”中受到牵连的人，早在1953年6月就平反了。1941年10月被处死的红军空军指挥官的平反，是在1954年7月。1937年以阴谋反对斯大林的莫须有罪名被枪毙的图哈切夫斯基等将军和元帅，也在1957年1月平反了。巴甫洛夫的情况的困难在于，1941年6月降临到西方方面军头上的灾难是无可否认的。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办法是，由总参谋部对西方方面军领导层指挥失误的情况进行调查。1956年11月结束的总参谋部的调查结论是：巴甫洛夫缺乏统

帅经验，在能力上达不到战时决策的要求，但并非怯战或有意让自己的部队束手就擒。[28] 这样的裁决正合朱可夫的心意，因为它在部分免除巴甫洛夫责任的同时，也使公众注意的焦点仍然集中在他的过错上，而不是集中在下达了不切实际的反攻命令并导致西方方面军毁灭的总参谋部的过错上。1957年7月，苏共为巴甫洛夫等人正式平反。

匈牙利，1956

进入主席团以后，朱可夫积极参与高层的军政决策，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在这次危机之前，先发生了波兰危机，而此次危机实际上正是由波兰危机激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消息传到波兰国内的时候，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期待：可以对共产党在二战后推行的威权主义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得到民众拥护的持不同政见者增多了，有改革倾向的共产党人也在加强鼓动，以图改组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1956年6月，在波兹南骚乱期间，数百名示威者被波兰安全部队枪杀，这让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为了应对危机，波共恢复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的领导职务。他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担任波共领导人，后因民族主义倾向太明显而遭到清洗。在哥穆尔卡提出的改革建议中，有一条是解除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部长职务，这一点让莫斯科特别警觉，因为后者被视为波兰继续与苏联结盟的保证。随着抗议和街头示威活动的升级，10月19日，赫鲁晓夫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在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科涅夫及朱可夫的陪同下，乘飞机突然飞抵华沙，目的是逼迫哥穆尔卡保留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坚持要求波兰政治改革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大。为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苏联人还以武力相要挟。哥穆尔卡拒绝屈服，然而，他设法让苏联代表团相信：共产党在波兰的统治地位以及波兰与苏联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同盟关系都不会受到威胁。[29] 但是，苏联人没能救得了罗科索夫斯基，他被解除了国防部部长职务并于1956年11月返回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已然酿成，而且它也是受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影响。10月23日，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群试图冲击布达佩斯最重要的广播电台，匈牙利安全部队向他们开了火，从而引发了整座城市的武装暴动。匈牙利共产党政府请求苏军出手相助，镇压叛乱。当晚，朱可夫向主席团报告，布达佩斯有10万人举行示威活动并烧毁了广播电台。会议一致认为应该出动军队，恢复秩序。朱可夫表示同意："这跟波兰不同。必须动用部队……宣布戒严，并开始实行宵禁。"[30]

自战争结束以来，匈牙利境内一直驻有苏联军队。即使是在1947年与匈牙利签订了和约之后，他们也还在那里，表面上是要保护奥地利东部的苏军补给线，因为奥地利跟德国一样，战后也被分成了几个军事占领区。1955年5月，根据《奥地利国家条约》，苏联与西方结束了对奥地利的占领。此时，《华沙条约》已经签订，这让苏联又有了借口，以继续在匈牙利驻军。那些之前驻扎在奥地利的部队现在被改编成一个特别军。据布达佩斯的苏军指挥官E.I.马拉申科（E.I.Malashenko）上校说，成立特别军是朱可夫的主意，这是受其1939年经验的启发，当时他在哈拉哈河就指挥过一个类似的集团。[31]

匈牙利危机爆发的时候，苏联人在匈牙利境内或靠近匈牙利的地方有5个师的驻军。10月24日，他们动员了大约3万人和1000辆坦克，占据了布达佩斯的战略要地，并关闭了奥匈边境。这一行动的应急预案是在1956年7月制订的，所以苏联人相对来说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自己的战术目标。[32] 然而，苏联人的武力干涉进一步激怒了武装暴动的参与者，于是，与波兰的情况相似，苏联撤军也成了达成政治妥协的条件之一。当苏共主席团在10月26日就此事进行讨论的时候，朱可夫反对撤军，并称之为"投降"。他力主投入更多的部队并继续采取"坚定的立场"。[33]

在共产党改革派纳吉·伊姆雷（Imre Nagy）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之后，布达佩斯的形势稳定了下来。纳吉就如同匈牙利的哥穆尔卡，他让能使反叛者和苏联人双方都满意的政治妥协似乎有了可能。在10月28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朱可夫在发言中赞成有限撤军，认为有必要支持纳吉政府。[34] 同一天还达成了停火协议，苏联军队开始撤到布达佩斯城外的兵营。第二天，朱可夫在答记者问时说："在匈牙利，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个我们对它抱有信心的政府已经成立了。"[35] 在10月30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人们仍然抱着和解的态度，并一致同意就苏联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单是匈牙利——逐步形成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发表声明。朱可夫说，声明要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并"呼吁结束流血事件"。[36] 但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莫斯科的态度又强硬起来，朱可夫奉命制订计划，准备进一步实行武力干涉。

苏联人变卦是因为形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而且彼此不相干的新变化。首先，有迹象表明，纳吉正准备让匈牙利退出华约，并宣布该国中立（他在11月1日时这样做了）。其次，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10月29日向埃及发动进攻，目的是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埃及是苏联的盟友，而且正如赫鲁晓夫于10月31日告诉主席团的那样："要是我们丢下匈牙利不管，那就助长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会看出我们的软弱并继续进攻……先是埃及，接着就是匈牙利。"[37] 在接下来11月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是否要再次进行武力干涉的问题。朱可夫仍然坚信，决定性的行动是必要的："清除所有的腐败分子。解除反革命武装。一切都必须恢复秩序。"[38]

苏联在1956年11月4日的武装干涉是决定性的，同时也是伤亡惨重的。此次行动的代号为"旋风"，由科涅夫指挥，并从邻近的喀尔巴阡军区、罗马尼亚及敖德萨军区抽调了兵力，以增援匈牙利境内的部队。为了镇压布达佩斯及其他城市的叛乱，苏军总共有17个师参加了这次由坦克、步兵和空军发动的联合行动。在布达佩斯的战斗尤为激烈，那里的

反叛者使用路障、轻武器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瓶”进行还击。苏军的伤亡达到2000多人，其中有近700人死亡。平民和反叛者的伤亡达到25000人（死亡5000人）。另有20万匈牙利人不顾苏联人对边境的封锁，设法逃到了奥地利。

朱可夫定时向主席团提供布达佩斯行动的进展报告。[39] 没过几天，秩序就恢复了，一个由苏联人支持的、以卡达尔·亚诺什（Janos Kadar）为首的新政府上台了。暴动过后，数千名匈牙利人被捕，数百人被处死，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纳吉·伊姆雷。对于残酷镇压匈牙利民众的起义，朱可夫没有显出自己有任何的怀疑。对他和所有苏联领导人来说，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的不单单是在匈牙利。他们担心民众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多米诺效应会破坏整个东欧集团的稳定，从而威胁到苏德之间的缓冲区——那可是苏联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住的缓冲区。

由于在匈牙利危机中朱可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在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了。在1956年12月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得到了自己的第四枚“列宁勋章”，他的照片登上了苏联报纸的头版，而且还配有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生日贺词。[40]

1957年1～2月，继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1955年11～12月的访问之后，朱可夫也高调出访印度和缅甸，目的是加强苏联与这两个新近独立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此次访问非常成功，朱可夫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看到他在印度骑在大象身上的照片，人们可能会觉得好奇：他当时是不是想到了汉尼拔及其在坎尼对罗马人取得的著名胜利，因为它常常被拿来与哈拉哈河之战相比。当朱可夫回国的时候，苏联人发行了一部彩色新闻片，名为《苏联元帅G.K.朱可夫对印度和缅甸的友好访问》。[41] 朱可夫在印度期间还于1957年2月5日在军事参谋学院发表了演讲，谈到了核战争：

> 万一在不同的大国同盟之间爆发战争，会不会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呢？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在把这些武器引入武装力量方面已经走得太远，它们对组织、战术和军事战略思想都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我们认为，只要在各国的武库中拥有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它们对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就不容小觑。在我们战后对武装力量的建设中，我们的出发点是，要想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只能依靠由所有武器和兵种组成的联合力量，以及在战争中对它们的协同使用。[42]

1957年3月，朱可夫访问东柏林并与东德政府签订了防务协议。当时，他对驻东德的苏军高级指挥官也发表了讲话。驻德苏军的任务是，在北约发动进攻的时候，迟滞西方军队的推进，为第二梯队华约军队的前移赢得时间。但朱可夫讲得很清楚，他不一定要等到北约先动手。一旦形势明朗，北约准备发动进攻，那苏联人就会先发制人，在两天内打到英吉利海峡。换句话说，苏联人打算先发制人，而且这种策略他们在1941年夏天等待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也曾考虑过，但未能实施。关于这次讲话，苏联人故意编造并散布的说法是，朱可夫说，苏联的策略是反攻而不是先发制人，而且一旦爆发战争，会使用核武器而不是常规武器。[43] 苏联人这样做，既是想诱使北约对苏联的意图做出误判，也是想以核武器的迎头痛击相威胁，使西方不敢发动进攻。

1957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有200多名苏联陆海空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先发制人的主张再次被提了出来。朱可夫在自己的发言中集中谈了战争的起始阶段，并检讨了武装力量在1941年6月准备不足的教训。他特别谈到了研究敌方计划和意图的重要性：

> 我们的敌人的基本设想是，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在对指挥控制系统发动突袭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的兵力和手段。因此，有必要把国家的防空，尤其是雷达和反导防空，提升到一个高的水平并始终保持这个水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武装力量都必须做好从陆上、空中和海上发动进攻的准备，要打消敌人发动扰乱性打击的企图。有人说——例如巴格拉米扬——我们的战略构想必须以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突然打击为中心，以便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对这件事，我们不能公开谈论。

这番话是不是向与会者暗示，对于构想中的先发制人的战略，他们不要议论？或者它是在警告，这样的议论只会刺激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很难说，朱可夫很有可能这两种想法都有。[44] 朱可夫在向苏共领导层汇报此次会议的情况时，主要讲了对战争最初阶段的讨论，没提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的问题。会议很成功，他说，但它也暴露出军事思想仍然未能赶上当代军事技术发展的问题。[45]

朱可夫拯救赫鲁晓夫

波匈危机期间，随着其他成员开始主张其独立的权利，赫鲁晓夫对主席团的统治力开始下降。这种向更加注重集体领导的工作作风回归的主要受益者是莫洛托夫。他在1956年6月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外交部部长职务，但仍然是主席团成员，并在1956年11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部部长，负责确保政令的实施。他利用这个新的岗位，在国内外一系列议题上挑战赫鲁晓夫的权威。莫洛托夫得到了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的支持，三人构成了主席团内部不断壮大的反赫鲁晓夫势力的核心。在这些纷争中，朱可夫始终是赫鲁晓夫的坚定的支持者。就像他后来回忆的："从个人来讲，我当时觉得赫鲁晓夫的路线要比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更正确。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死抱着旧的教条，不想按照时代的精神做出改变。"[46]

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之后，他与莫洛托夫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当时他许诺，苏联会在短短的几年内，让肉类、黄油和牛奶的产量超过美国。赫鲁晓夫在未经协商的情况下就宣布这个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这样的决策风格显示出一种企图侵夺主席团权力和权利的危险。总而言之，由于出现了一位新的发号施令的人，后斯大林时代的集体领导制正在被颠覆。在主席团成员中，大多数人，包括布尔加宁和曾短暂接替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Dmitry Shepilov，他在1957年2月又被葛罗米柯取代），都不希望看到

这种情况。在主席团大多数正式成员（有投票权）的支持下，莫洛托夫集团企图对赫鲁晓夫发动政变。

6月18日，阴谋者们把赫鲁晓夫骗去开会。本来说是部长会议的，突然变成了主席团临时会议。不过，赫鲁晓夫也不是没有支持者，他设法回避了让他立即辞去党的领导人职务的要求。朱可夫和米高扬是他最有力的后盾。实际上，在会议之前，朱可夫就拒绝了马林科夫让他参与这起阴谋的企图。据朱可夫说，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不知所措、垂头丧气，只是由于他的支持才扭转了局面。“格奥尔吉，你挽救了局势，”朱可夫回忆说赫鲁晓夫这样对他讲，“只有你可以做到。我永远不会忘记。”[47] 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安排中央委员们乘军用运输机飞抵莫斯科，并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经过连续三天的主席团会议，被其对手称为“反党集团”的莫洛托夫集团，被迫同意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问题。[48]

在苏共二十大上选举产生的200位左右的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支持赫鲁晓夫。在6月22～29日的全会上，所谓的反党集团的成员发现自己成了人数极少的少数派，而朱可夫则是向莫洛托夫及其同谋发难的急先锋。全会上首先发言的是赫鲁晓夫手下主管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而第二个就是朱可夫。他揪住反党集团对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应当负有责任的问题，对其进行猛烈抨击。朱可夫向全会揭露说，从1937年2月27日至1938年11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亲自批准处决了38679名政治犯。仅在1938年11月12日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批准处死了3167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那些人的名单，”朱可夫说。在披露了有关处决的更多细节之后，朱可夫最后说：“我认为有必要在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并要求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就他们滥用权力一事做出解释。”尽管有朱可夫的介入，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并没有成为讨论的主题，主要是因为它牵扯到太多有关赫鲁晓夫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朱可夫在全会上没有再发言，但他确实多次与赫鲁晓夫一唱一和，打断反党集团成员的讲话并质问他们。“谈谈对罪行和杀人的责任，”他要求卡冈诺维奇，“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让朱可夫特别高兴的似乎是布尔加宁的窘况，因为后者曾在主席团会议上支持反党集团而此刻却在为自己的行为百般辩解。在布尔加宁发言的过程中，朱可夫开始质问他并对他说，如果想做个诚实的人，就不要“歪曲事实”。在宣读全会文字记录稿的时候，朱可夫显出了一副得意的样子。[49]

全会的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撤销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政府职务，并将其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莫洛托夫随后被流放，出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而马林科夫则被派到哈萨克斯坦管理电厂，卡冈诺维奇也成了乌拉尔地区一家钾碱厂的管理人员。布尔加宁在受到严厉批评之后逃过一劫，但赫鲁晓夫很快就取代了他的总理职务。毫无疑问，此次全会赫鲁晓夫大获全胜，但朱可夫才是这次演出中的真正的明星。他得到的奖赏是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

在与反党集团斗争的同时，朱可夫个人生活中的另一出戏也开演了。年过六旬的朱可夫再次做了父亲。6月19日，加琳娜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玛丽亚。朱可夫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加琳娜，对新生儿嘘长问短，并答应尽快去看她们，只是他卷入了一场“残酷的战斗”，有四天没怎么睡了。但加琳娜写信给朱可夫说，玛丽亚得了黄疸病，精神萎靡，自己和医生们都担心她不能活下来。忧心如焚的朱可夫在6月26日写信给加琳娜：“从你的来信得知我们女儿的健康状况之后，我彻夜未眠。怎么会这样呢？我非常担心她……我要你坚强起来，不要向命运低头……软弱在斗争中永远不会赢得胜利。”[50] 幸运的是，玛丽亚康复并活了下来。

全会过后，批判反党集团运动的范围扩大了。报刊上刊登了经过删节的关于反党集团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决议。苏共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声讨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7月2日，朱可夫向国防部党组成员发表讲话，与会者有安东诺夫、巴格拉米扬、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梅列茨科夫、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其他元帅和将军。朱可夫重复了他在全会上说过的内容，强调反党集团在斯大林时代历次大镇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次他特别提到了布尔加宁在事件中“不光彩的”角色。据朱可夫说，这起阴谋的一部分，是要把克格勃的控制权交给布尔加宁。布尔加宁本来在主席团会议上是附和这起阴谋的，但在全会上当他看到风向不对的时候，就转而反对反党集团了。[51]

7月中旬，朱可夫在列宁格勒参加海军节庆祝活动的时候，再次谴责了阴谋分子。7月15日，他发表了一次被广为报道的讲话，批评反党集团反对赫鲁晓夫做出的要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的承诺，批评反党集团抵制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分权化。但是，朱可夫对反党集团的批判，主要还是针对他们反对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52] 在列宁格勒之行中，陪同朱可夫的是“朱可夫夫人”——这表明，尽管和加琳娜事已至此，但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婚姻还没有结束。

赫鲁晓夫分子的攻击

1957年10月，朱可夫在一大群高级军官的陪同下访问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想要复制自己之前访问印度和缅甸时的轰动与成功。他们没有乘飞机，而是别具一格，乘着苏联的现代化巡洋舰“古比雪夫号”于10月5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前往贝尔格莱德。这是朱可夫的第一次海上之旅，而且他似乎很享受这次航行，尽管他此时与海军的关系并不太好。除了不同军种之间多年来存在的竞争之外，还因为赫鲁晓夫与主管海军的N.G.库兹涅佐夫（N.G.Kuznetsov）海军元帅最近为了大型水面舰队的建设计划问题发生了冲突。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的选择，主张优先发展以潜艇为基础的舰队。库兹涅佐夫因为1955年10月塞瓦斯托波尔的军舰发生爆炸并导致数百名水兵丧生而被解除职务。

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古比雪夫号”碰到了美国第六舰队的几艘军舰（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两艘护卫舰和几艘驱逐舰）。按照惯例，美国舰只的乘员在甲板上列队并用信号向苏联国防部部长致意。朱可夫并不感到高兴，而是抗议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在这儿？他们的舰船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水域？”此次航行中比较愉快的氛围，还给了朱可夫参加船上的音乐会并演奏手风琴的机会。[53]

10月8日，“古比雪夫号”抵达南斯拉夫的扎达尔（Zadar）港，朱可夫一行在那里按照惯例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参观、会议、仪式和演讲。对朱可夫而言，最有意义的就是与铁托的“邂逅”。他是在这个南斯拉夫人的克罗地亚家乡见到他的，他们还在那里一起去打山羊。“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狩猎，”朱可夫回忆说，“我打到了四只山羊，铁托只打到了一只。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意。”[54] 10月16日，朱可夫向莫斯科呈交了自己与铁托谈话的报告，并特别提到南斯拉夫想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舞台上一起行动。10月17日，朱可夫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Tirana），在那里进行了类似的参观，并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首脑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举行了会谈。[55]

但让朱可夫不高兴的是，国内媒体对他的出访只做了有限的报道。10月12日，他写信给赫鲁晓夫，抱怨《真理报》对于自己的出访只有简短的报道，没有发表自己以及南斯拉夫同志讲话的全文。这在南斯拉夫领导层那里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如果中央认为发表我的讲话不太合适，朱可夫在电报中说，那它或许该宣布我已经离开了南斯拉夫。主席团在10月14日回电中说，现在在国外访问的苏联代表团有两个，一个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去了中国，一个是“军事”代表团，去了南斯拉夫。假如对朱可夫的出访宣扬太多，那无论是对世界舆论还是对中国人，或许都不太好接受。朱可夫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10月16日，他再次写信给赫鲁晓夫，给他上了上政治课：“我们是大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和工人

运动的物质、精神基础，我们不该——譬如为了中国而得罪小国。”[56]

可能正是这些气头上的话，促使赫鲁晓夫最终做出了决定——特别是先前跟朱可夫已经有过一次政策上的分歧。那是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朱可夫主张在空中侦察问题上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此来保证各项协议的遵守。美国人赞成的“开放天空”最初是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峰会上提出的，它意味着苏联要向美国的间谍飞机开放自己的领空，以换取进入美国领空的权利。苏联人一开始同意有限开放，但在1957年8月有关“开放天空”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协议出笼的时候，虽然朱可夫赞成，但赫鲁晓夫却表示反对了。“我不完全同意朱可夫同志的观点，”他对主席团说，“敌人的潜力更大。谁的潜力更大，谁就会对情报更感兴趣。他们并不了解我们所有的东西。敌人不会接受的，这一点我同意朱可夫的看法。但要是它接受了怎么办呢？那就糟了。”[57]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苏联还是坚持目前的立场，即有限制地开放天空。不过，在朱可夫被解除职务之后，赫鲁晓夫就连有限开放天空的提议也撤销了，而且还让苏联退出联合国的裁军谈判。

朱可夫第二次失势的这出戏从他还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就开场了。10月17日，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A.S.热尔托夫（A.S.Zheltov）在主席团会议上向他发难。热尔托夫在会上说，武装力量中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忽视。朱可夫说过，他要让军事委员会（即武装力量中的政治机构）从属于军事指挥员。据热尔托夫说，朱可夫把“政工人员”说成是“红胡子”，如果给他们刀子，就会杀了所有的指挥员。热尔托夫指责说，朱可夫对他抱有敌意，如果没有得到批准，就不让自己下部队。“为什么？就因为我据说反对过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因为我看不惯他的自命不凡。”热尔托夫的指控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授意，他是不敢这样批评朱可夫的。参加主席团会议的有科涅夫及地面部队总司令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元帅。他们为军队政治工作的状况（虽然不是为朱可夫本人）做了辩解，但他们对

热尔托夫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对加强武装力量中党的工作问题进行检查。两天后，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报告，并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它特别规定，军事委员会要负责武装力量的所有重大决策。同时还决定，召开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武装力量中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

10月22和23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两次这样的会议上都发表了讲话。他并没怎么指名道姓地批评朱可夫，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朱可夫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赫鲁晓夫的指责有一条跟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纪录片有关。该片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说成是1942年11月反攻的主要设计师，而这项功劳本来是应该归于他自己和叶廖缅科的。两天后，文化部部长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详细描述了朱可夫对影片编辑工作的干涉，认为影片内容“宣扬了对朱可夫同志的个人崇拜”。[58]

在23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讲得比较露骨一点。他向自己的听众指出，他已经解除了什捷缅科将军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因为他和朱可夫未经党的领导批准，就成立了一个学校，专门训练从事军事破坏活动的特工人员。赫鲁晓夫提醒在场的人，什捷缅科先前就曾因和贝利亚有联系而被解除了副总参谋长职务，并调去担任西伯利亚军区的参谋长。但朱可夫在成了国防部部长之后，又让什捷缅科回到莫斯科负责军事情报机构。[59] 赫鲁晓夫想说的是，在什捷缅科的任用问题上，在擅自批准成立特工学校的问题上，朱可夫的判断力很差劲。

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身在阿尔巴尼亚的朱可夫可能听到也可能没有听到风声。他在10月26日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得了感冒，当天晚些时候参加主席团会议时状态不太好。不过，他还是为自己的立场做了有力的辩护，否认自己想把武装力量和党分裂开来，并要求成立委员会来调查那些指控。他承认存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但否认自己对荣誉有什么个人企图。在讨论中，赫鲁晓夫提到朱可夫心甘情愿接受美国人的“开放

天空”政策，并建议解除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这一决定被一致通过，同时一致通过的还有由马利诺夫斯基接替他的职务的决定。[60]

主席团会议后，朱可夫打电话给赫鲁晓夫，问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在很快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一切就都会明白的。朱可夫答道："我想我们之前的友好关系让我有权利直接问你，你为什么对我变得不友好了。"赫鲁晓夫回答说："不要那么激动，我们还是会给你安排工作的。"[61]

1957年10月28和29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解除朱可夫职务并对其进行谴责的决定。苏斯洛夫再次成为赫鲁晓夫的首席打手，但他也得到了许多将军和元帅的支持——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些人要向党的领袖表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与朱可夫的宿怨。对朱可夫的指控包括：企图让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太自以为是，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苏斯洛夫在批评朱可夫的时候还加油添醋，说朱可夫有揽权的倾向。苏斯洛夫的指控得到了热尔托夫的支持。接着，朱可夫得到了答辩的机会。自然，他重申了自己对于党的忠诚，表示自己没有任何削弱党在军队中的权威的想法，相反，利用军事指挥员——他们大多既是军官又是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加强党在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正是他的政策。朱可夫在发言时受到了赫鲁晓夫的质问，就像他自己在六月全会上对待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成员一样。

朱可夫的同僚也提出了一大堆指控。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在发言中声称，朱可夫没有经过商量，就把总参谋部的一份说苏联永远不会发动战争的文件，改成有可能率先发动进攻。铁木辛哥元帅重复了苏斯洛夫有关朱可夫贪恋权力的看法，并说他总以为自己一贯正确。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一样，声称在1946年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指责时为他说过话，但他现在要批评朱可夫的个人崇拜。曾经和赫鲁晓夫一起在斯大林格勒共过事的叶廖缅科喋喋不休，说朱可夫不诚实，把组织斯大林格勒

大反攻的功劳据为己有。另一位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将领崔可夫指责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被对朱可夫的个人崇拜取代了。罗科索夫斯基着重说了朱可夫的粗暴和不尊重自己的同事，并拿自己在莫斯科战役期间与朱可夫发生过争执为例。朱可夫不“只是在战争期间表现粗鲁”，罗科索夫斯基说，“他的指挥方式实在令人反感；我们听到的除了不停地咒骂和扬言要枪毙人之外，什么也没有。”马利诺夫斯基也特别指出了朱可夫的粗鲁，说自己从来没听他讲话不带脏字的。华西列夫斯基因病缺席了此次全会。他要是去了，会不会和别人一样指责朱可夫，这很难说。估计他肯定会那样做，他们两人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朱可夫第二次平反前一直比较淡。

全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朱可夫再次发言，感谢中央委员们的批评，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在一点上，他的立场又非常坚定。有人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交代自己的错误时改变主意了，1946年的时候他就拒绝承认自己的领导方式有错。朱可夫的机敏之处在于，虽然他接受了现在对自己的那些批评，但他没有，而且也不会去承认自己在1946年就错了。

全会上最后发言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典型的长篇大论式的讲话中，他把对朱可夫的指责的范围扩大到他的战绩，特别是与1941年的基辅失守、1942年的哈尔科夫惨败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的战绩。赫鲁晓夫还指责朱可夫不懂得现代的军事技术。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了主席团的决定，解除朱可夫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取消其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资格。[62] 党籍算是保住了，但几周之内他就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

全会过后，在武装力量和苏共内部，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公共领域，都开展了批判朱可夫的运动。在10月31日的莫斯科党员会议上，莫斯卡连科元帅指责朱可夫“虚荣、以自我为中心、极端傲慢和自我陶醉”，而

马利诺夫斯基则猛烈抨击他的“固执己见、专制独裁、野心勃勃、自命不凡”。也许最不厚道的要属他的老朋友巴格拉米扬的批评了，据说他说朱可夫“就是个病人，骨子里就自我膨胀”。[63]

10月27日的《真理报》最后一版，在全会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向世人公布了马利诺夫斯基接替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消息。[64] 11月3日，苏联报刊刊登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论改善我国陆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问题》——并披露说朱可夫之所以被解除职务，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政策削弱了武装力量中的党的工作。决议批评了对朱可夫的个人崇拜以及这种个人崇拜对卫国战争“真实历史”的歪曲。决议还提到朱可夫在对外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大概是影射在与美国的裁军谈判问题上他和赫鲁晓夫有过争执。《真理报》当天还发表了科涅夫的长文，批评朱可夫的战绩。科涅夫表示，德国人在1941年6月发动进攻的时候，朱可夫是总参谋长，理应对随后发生的溃败负责。科涅夫还批评朱可夫不该把斯大林格勒大反攻和强攻柏林之类的行动的功劳无端地据为己有。据科涅夫说，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斯大林、大本营和朱可夫的功劳，不如说是（像他自己那样的）各个方面军指挥官的功劳。而且，科涅夫指出，虽然朱可夫喜欢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朱可夫的目的不是批评个人崇拜本身，而是要加强对他自己的崇拜。[65] 几个月之后，朱可夫在街上碰巧遇到了科涅夫。朱可夫不想跟他说什么，但科涅夫主动请他搭自己的车，说他并没有忘记他们以前的友情。朱可夫拒绝了，他提醒科涅夫不要忘记自己在全会上的表现，那会儿他可一点都不像个朋友。[66]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部长之后，虽然对他逐渐产生了个人崇拜，但那并非其有意为之。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人们每每会把朱可夫的解职解读为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制度性冲突，解读为是他个人想要维护武装力量的独立性。实际上，这件事既简单又复杂。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事后，朱可夫都坚决否认自己想要削弱党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后来

说过："对我个人而言，党的话永远都是法律。"[67] 而且他还特意称赞了政治委员的作用，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朱可夫本人是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这一点永远都不该忘记。但是，他对党应该如何去控制和影响武装力量，确实有自己的想法。从20世纪20年代的伏龙芝改革开始，朱可夫就一直坚定地拥护一长制，也就是由一个人来指挥。朱可夫跟伏龙芝一样，认为军事决策应该由指挥官独自掌控，政治委员的作用是做好武装力量内部的宣传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控制的，是指挥官本人要成为或者就应该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朱可夫还强烈主张，政治委员要既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又是优秀的军人。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部长期间，为了强化一长制同时又提高武装力量中政治工作的效果，曾经有过许多举措和指示。例如，在1957年4月下达的关于党在武装力量中的组织工作的指示中，有一条是禁止利用党的会议去批评指挥官下达的命令，但其余的谈的都是加强党员在军队中的地位，同时还谈到职业军官的政治表现。[68] 关于武装力量中的党的工作，朱可夫采取的许多政策都是在他就任国防部部长之前就有的。当朱可夫在1956年5月发布命令，要求通过强化一长制来改善军队的纪律状况时，他就是在要求落实1951年斯大林时代的一项政策。[69] 指控朱可夫企图削弱党在武装力量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有力的政治借口，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但其实这样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

朱可夫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决定把他搞掉，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因为朱可夫在思想上的独立性以及他拒绝迎合日益严重的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赫鲁晓夫也担心朱可夫会像艾森豪威尔一样，想在政治上更进一步。但是，朱可夫说："我从来没有觊觎过国家权力——我是个军人，军队就是我的事业。"[70]

朱可夫后来说他知道赫鲁晓夫要对他动手，但现在并没有发现任何同时期的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所有的迹象都表明，1957年时困扰

着朱可夫的，是与1946年斯大林清洗他时同样的问题：政治上的天真再加上傲慢自大的个性。

朱可夫失势的消息传到西方后，西方社会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一时是议论纷纷。其中差不多属于当时分析得最准确的，是中情局的一份日期为1959年6月的简报。它的结论是："朱可夫被解职的原因似乎是他按照自己的看法忠于职守，政治上不够圆滑老练，真心实意地坚持行使一名主席团正式成员和苏联部长在理论上拥有的权力。"[71]

最有先见之明的是印度驻莫斯科大使K.P.S.梅农（K.P.S.Menon）于1957年11月5日写在日记中的一段话：

> 斯大林去世后，在俄罗斯的天空中，没有哪颗星星比朱可夫更亮。现在想要遮住他光亮的那些企图，只能说是可鄙的。苏共也许能让朱可夫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但无法从人们的心头抹掉对他的记忆……最终，真理将取得胜利，克利娥[72]会把朱可夫安排到与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以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那样的宠儿比肩的位置……而俄罗斯人民会永远怀着一颗爱戴之心感念他。[73]

---

[1] 下文中，"中央主席团"统一简称为"主席团"。——译者注

[2]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vol.1（Moscow：Rosspen，2004），p.40.

[3] 参见G.Roberts，"Stalin and the Katyn Massacre，" in G.Roberts ed.，*Stalin*：*His Times and Ours*（Dublin：IAREES，2005）。

[4] 关于赫鲁晓夫，参见W.Taubman：*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

[5]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London：Sphere，1971），p.144.

[6] 作者对叶拉·朱可娃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7] "Marshal G.K.Zhukov Interviewed by William Randolph Hearst，Jr.，J.Kingsbury Smith，and Frank Conniff，February 7，1955，" *New Times*，no.8，1955.采访内容发表于2月13日的《真理报》。

[8] 参见M.Evangelista，“*Why Keep Such an Army？*”：*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9，December 1997。

[9]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London：André Deutsch，1974），p.15.

[10] “Proposal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on the Reduction of Armaments，Prohibition of Atomic Weapons，and Elimination of the Threat of Another War，” *New Times*，no.20，pp.2-6.

[11] 参见G.Roberts，*A Chance for Peace？The Soviet Campaign to End the Cold War，1953-1955*，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57，December 2008。

[12] “Protokol：O Sozdanii O’bedenennu Komandovaniya Vooruzhennyi Sila Gosudarst-uchastnik Dogovora o Druzhbe，Sotrudnichestve i Vzaimoi Pomoshi，”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F.6，Op.14，Pap/4，D.54，Ll.68-74.

[13] “Russia’s Marshal Zhukov，” *Time*，May 9，1955.

[14] 波伦1955年6月10日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报告，见于Eisenhower Papers，Anne Whitman Files，International Series，Box 49，USSR 1953-1955，File 1，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Abilene，Kansas。

[15] 转引自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00。

[16] 波伦的这两次会谈的记录可见于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Dulles Papers，General Correspondence and Memoranda Series，Box no.3，File：Strictly Confidential U-Z（2）。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记录：*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two，docs.11-12。存档的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记录的复印件可见于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F.5，Op.30，D.116。这两套记录在大的细节上没有不同。会后比对记录是苏联及西方译员通行的做法。我在这里的叙述结合了两者的内容。

[17] O.Troyanovsky，*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Moscow：Vargrius，1997），p.191.

[18]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02。

[19] A.Gromyko，*Memories*（London：Hutchinson，1989），pp.166-167.

[20] Troyanovsky，O. *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 Moscow：Vargrius，1997，pp.193-194.

[21] Troyanovsky，O. *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 Moscow：Vargrius，1997，pp.193-194.

[22]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 vol.1，pp.41-42；A.Fursenko and T.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 （New York：Norton，2006），pp.28-29.

[23] 关于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参见G.Roberts，*Molotov*：*Stalin’s Cold Warrior*（Washington，D.C.：Potomac，2012）。

[24]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 p.539.

[2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124.

[26]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148.

[27]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p.126-133；*Reabilitatsiya*：*Kak Eto Bylo*， vol.2（Moscow：Materik，2003），doc.8，part 1，doc.14，part 3.

[28] 这份文件，连同其他一些相关的文件，可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29]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1956 goda* （Moscow：Rosspen，1998），doc.83.在冷战国际史项目的网站中，可以查到这其中许多文件的英译本。

[30]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1956 goda* （Moscow：Rosspen，1998），doc.82.

[31] E.I.Malashenko，“Osobyi Korpus v Ogne Budapesht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 l，nos.10-12，1993，no.1，1994.这是马拉申科对1956年事件的回忆。

[32] 参见同上及*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art two，doc.39。

[33]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 doc.100.

[34]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 doc.105.

[35]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13。

[36]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 doc.115.

[37]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 doc.125.

[38]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 doc.132.

[39]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 docs.159，160，166，179，180，184，188，192.这些文件存档的复印件可见于Fund 89：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on Trial，Op.45，Dd.26-40。

[40]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art two，doc.44.

[41] 关于朱可夫的印度和缅甸之行，参见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417-419；以及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28-230。

[42] 转引自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Moscow：Svyatigor，2006），p.250。

[43] 参见S.A.Christensen and F.P.Jensen，“Superpower Under Pressure：The Secret Speech of Minister of Defence Zhukov in East Berlin，March 1957，” http：//www.php.isn.ethz.ch/collections/coll_zhukov/zhukov.cfm。朱可夫讲话的两个版本之间的联系也可见于该网站（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44] “Iz Vystupleniya Marshala Zhukova na Nauchnoi Konferentsii Mai 1957g.，”感谢S.A.克里斯滕森（S.A.Christensen）博士给我提供了此次讲话的复印件，其来源是捷克军事档案馆。

[4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two，doc.49.

[46] “Posle Smerti Stalina，” in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625.

[47] “Posle Smerti Stalina，” in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p.628-630.

[48] Taubman，W. *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pp.314-320.

[49] *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1957*：*Stenogramma Iun’skogo 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Mezhdunarodnyi Fond*（Moscow：Demokratiya，1998），pp.38-39，41，67.

[50]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p.498.

[51] “Vystuplenie：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G.K.Zhukova na Sobranii Partiinogo Aktiva Ministerstva Oborony i Moskovsogo Garnizona 2 Iulya 1957g.，” 复印件见于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52] “Anti-Party Bloc Fought Exposé of Stalin Cult—Zhukov，”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ol.9，no.25，1957.

[53]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p.236-237；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p.77；*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pp.373-375.

[54]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3.

[5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four，docs.15，18，19.

[56]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four，docs.12-14.

[57]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vol.1，p.264.另见Fursenko and Naftali，*Khrushchev’s Cold War*，p.153。

[5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four，docs.1-6，10，15.

[59]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217.

[60]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docs.15-16.

[61]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5.

[62]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5，doc.19.

[63] 这段引文出自赫鲁晓夫的传记作者美国人威廉·陶布曼，他说：“跟这样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朱可夫根本就不需要敌人。”Taubman，W. *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pp.362-363.

[64]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45.

[65] I.S.Konev，“Sila Sovetskoi Armii i Flota—v Rukovodstve Partii，v Nerazryvnoi Svyazi s Narodom，” *Pravda*，November 3，1957.

[66]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9.

[67]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2（Moscow：APN，1988），p.71.

[6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p.605-611.

[69]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art two，doc.29.在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将其逐出党的领导集体的十月全会上，让他受到指责最多的就是这份文件。可进一步参见T.J.Colton，“The Zhukov Affair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vol.29，April 1977。

[70] “Posle Smerti Stalina，” p.632；*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2，p.70.

[71] CIA Staff Study，“Party-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USSR and the Fall of Marshal Zhukov，8 June 1959，” p.42，http：//www.foia.cia.gov.感谢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让我查阅这方面的资料。

[72] Clio，希腊神话中主管历史的女神。——译者注

[73]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

p.464。

13 最后一战：争夺历史，1958～1974

回家倒头大睡，这就是朱可夫熬过十月全会打击的方式。“我决心不做牺牲品，”他告诉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不消沉，不垮掉，不丧失自己的生活意志……我回到家中，吃了安眠药，睡了几个小时，起来，吃点东西，又吃安眠药倒头大睡，起来，再吃安眠药倒头大睡。就这样过了15天……睡梦中，折磨我的一切又历历在目……我据理力争，伤心难过——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梦中。然后，15天后，我钓鱼去了。”[1]

朱可夫私生活中不得消停的纠葛也加剧了他的痛苦。在被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之后，他和加琳娜的私情也被他妻子发现了。从加琳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亚历山德拉就对她有所耳闻，但她不知道加琳娜已经搬到了莫斯科。对于加琳娜女儿玛丽亚的事情，亚历山德拉也不知道。事实上，只是在四年之后当朱可夫想要得到自己的合法妻子的同意以收养玛丽亚的时候，她才了解到这件事。对于自己私生活中的危机，朱可夫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他在格拉诺夫斯克街的寓所换成两处小一点的房子，一处给亚历山德拉，一处给女儿埃拉，而他自己则搬到了乡间别墅，与加琳娜及玛丽亚住到一起。直到朱可夫夫妇于1965年离婚之前，无论是叶拉还是埃拉，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事实上已经分开。在真的发现此事之后，她们都站到自己母亲一边，一年多没和朱可夫说话。[2] 后来，朱可夫在1966年与加琳娜结了婚。

退休

赫鲁晓夫在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时答应过给他另行安排工作，但这个承诺没有兑现。1958年2月，主席团要求朱可夫从武装力量

退休，尽管按照苏联的标准来看，条件还算不错。他得到了一大笔退休金，还有专用的小汽车及优厚的医疗和安全保障。他可以保留自己的公寓和别墅。要是想穿，他也可以穿军服。[3]

不太受欢迎的是克格勃的监视。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得知，幽居在家的朱可夫动辄批评赫鲁晓夫的统治，而且不仅是在自己的家中。1959年9月，克格勃向赫鲁晓夫报告，在V.V.克留科夫将军（歌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的丈夫）的葬礼上，朱可夫在与其他送葬者交谈时，批评党的军人退休金政策，并说政治军官的权势越来越大，是在削弱武装力量。

1963年5月，克格勃报告说，朱可夫说接替自己担任国防部部长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是“马屁精”。他批评说，苏联在空间计划上投入太多，在来访的外国要人身上花钱也大手大脚，这些放在斯大林时代是不会有的。朱可夫还对官方从1960年开始出版的由赫鲁晓夫分子编写的多卷本《伟大的卫国战争史》冷嘲热讽。[4] 该书声称西方盟国对苏联的战时援助意义不大，但在朱可夫看来，美国援助的物资让苏联增加了自己的装备储备，并转而生产坦克之类的必需品。这名克格勃官员在报告的最后特别提到，朱可夫及其家人很快就要去度假了，届时就有机会弄清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了什么。

这份克格勃特别报告触及了一些敏感的话题。1963年6月，主席团决定委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等人向朱可夫提出警告：他如果再说三道四，就要被开除党籍并遭逮捕。但是，当勃列日涅夫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去看朱可夫的时候，那位元帅并没有悔意。他告诉勃列日涅夫，自己无法接受1957年十月全会的决议，因为没有给他申诉的机会。尤其让他愤怒的是决议中提到的冒险主义罪名：“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个冒险主义者了？说我是个冒险主义者是指什么事情？我入党43年，参加过四次战争，为祖国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却莫名其妙地说我干了冒险主义

的事情？证据呢？这种证据根本就没有。”朱可夫否认自己在和他人谈话时批评过党，并要求与指控者当面对质。另外，朱可夫也保证自己会永远忠于党，并让勃列日涅夫放心：对于自己正在写的回忆录，没有什么可担心的。[5]

被剔出书面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末，朱可夫开始撰写回忆录，当时针对他的运动接连不断，想要诋毁他的历史声誉和人品。首先发难的是科涅夫，他在全会后的1957年11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从多个方面严厉批评了朱可夫的战时表现。1958年，苏联最重要的军事历史学家E.A.鲍尔京（E.A.Boltin）将军的权威文章，批评朱可夫在1941年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没有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作为总参谋长的种种不足，成了官方的卫国战争史第2卷中的主要内容，就连在1941年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也受到了牵连。但是，更具杀伤力的还是马利诺夫斯基在1959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指控。他说朱可夫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觊觎最高权力。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又重提这项指控。[6] 对其名誉的这些非常公开的攻击，为军事回忆录的作者批评朱可夫的战时表现铺平了道路。他们一般都把他描写成一个既不了解复杂的军事事务又对同僚骄横跋扈的人。[7] 1964年2月，朱可夫写信给赫鲁晓夫，抗议回忆录的作者和历史学家不但把他描写成波拿巴主义者，而且还是冒险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对党有关武装力量的批评心怀不满的人。[8]

许多历史出版物对朱可夫在战争中的作用只字不提，这对他而言，就和前面的那些指责一样，是令人气愤的。在1958年的一本研究列宁格勒之围的书中，凡是提到他在1941年9月对保卫这座城市起到关键作用的地方，都被删掉了。在1960年的一本研究东波美拉尼亚行动的书中，朱可夫的名字甚至连提都没提，而由他担任指挥官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

军是参加那次行动以便为即将开始的强攻柏林清除威胁的主力之一。《伟大的卫国战争史》第1卷承认朱可夫指挥了哈拉哈河战役，但认为红军打败日军并非他的功劳。1962年，前总参谋长、朱可夫任国防部部长时曾经做过他的副手的V.D.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出版了那本最权威的苏联军事战略教科书。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索科洛夫斯基曾以许多不同的身份与朱可夫共过事，但他在论述苏联在二战时期的战略思想的发展时，根本就没有提到自己以前的上司。当然，朱可夫不是个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但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指挥才干，确实为苏联的作战方式的改进做出了很大贡献。索科洛夫斯基也没有提到朱可夫在1955～1957年担任国防部部长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观点，而这段时期是苏联人从传统的战争观念向核时代战争观念过渡的关键阶段。1964年，索科洛夫斯基编了一本关于莫斯科战役的书。他在那次战役中曾是朱可夫的参谋长，对朱可夫在战争转折关头所起的核心作用十分清楚，但他却无视这一事实，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朱可夫。1965年，罗科索夫斯基主编了一本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权威教科书，书中对朱可夫在局势发展中的作用的承认仅限于说他在战役期间担任过斯大林的大本营代表。[9] 此时的朱可夫想必有威灵顿公爵老年时有过的那种感慨：每当读到某些历史学家对滑铁卢战役的描述时，他就开始疑惑，不知道自己是否参加过那场战役！[10]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在极力为自己的战时表现辩护的同时，明显不太愿意谈论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就毫不奇怪了——因为他不想给批评者提供攻击自己的口实。

当朱可夫开始撰写回忆录的时候，这样做是出于信念。因为只要赫鲁晓夫还在台上，回忆录就没有发表的机会。当埃拉问他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的时候，他对她说自己是“为桌子”、“为历史”而写的。[11] 然而，1964年10月，对赫鲁晓夫内外政策极度失望并受够了他的专横的领导作风的主席团，把他赶下了台。像朱可夫一样，赫鲁晓夫也隐退到自

己的乡间别墅中写回忆录去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并引起了轰动；它们所披露的内容，多年来一直支配着西方对于苏联历史的看法。在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赫鲁晓夫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了1957年解除朱可夫职务的经过。他再次重申，在他看来，朱可夫有波拿巴主义倾向，所以才必须解除他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同时，赫鲁晓夫也谨慎地向朱可夫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敬意："我尊重朱可夫的才干和判断力。我们在一起谈正事的时间很多，在一起打鸭子的时间也很多……作为军人，朱可夫特别敏锐而灵活。"[12]

平反

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并没有立即得到平反，但也没拖多长时间。1965年3月，朱可夫写信给苏共领导层，说自己是赫鲁晓夫独裁倾向的受害者并要求平反。[13] 这封信似乎没有得到答复，但一个月之后，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在广播中谈到了朱可夫的老对头科涅夫对他的某些评价。科涅夫说，朱可夫有他的缺点，但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理应参加即将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5月8日，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关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主旨讲话。朱可夫应邀出席了会议。当他进入会议大厅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欢迎。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提到朱可夫（和斯大林）名字的时候，掌声更加热烈。第二天，朱可夫和许多元帅一起，再次站到了列宁陵墓上方的主席台上，检阅参加胜利阅兵的军队。阅兵仪式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人们向正在就座的朱可夫鼓掌欢迎。后来，朱可夫参观了莫斯科的作家俱乐部，并在那里做了即席讲话。讲话所显示出的理智与谦逊，给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4] 赫鲁晓夫分子这些年来对朱可夫的攻击，并没怎么影响到朱可夫的声望。他过去是，而且将来依然是那位伟大的、从希特勒带来的灾难性失败中挽救了苏联并率领这个国家取得了一场伟大胜利的将军。

1966年11月，朱可夫和包括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以及崔可夫在内的其他“常胜元帅”一起，参加了纪念莫斯科战役胜利二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当元帅们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观众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就在掌声逐渐平息的时候，一个代表高喊：“光荣属于朱可夫元帅！”全场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种过分的赞美让主持大会的苏共代表颇为不快。[15] 同月，在朱可夫即将迎来自己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得到了自己的第5枚“列宁勋章”，而他一生所获得的军功章和奖章，包括英国、法国、美国、波兰、蒙古、意大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埃及和中国颁发的，一共有将近70枚。[16]

1965年6月，苏联军史领域最重要的杂志——《军史杂志》发表了朱可夫的文章，回应了崔可夫有关他未能在1945年2月占领柏林的批评。这是个信号，即允许朱可夫再次发表自己的文字。从那以后直至去世，写文章、接受采访和出席现场，这些要求让他应接不暇。[17] 朱可夫在公开场合说的和写的，主要和战争有关，但他对当代出现的新情况也非常关注。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警告说不能让越南战争酿成新的世界大战，而且还批评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苏联的指责（这是在中苏分裂时期），警告说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有可能建立友好关系。[18]

在朱可夫发表的比较值得关注的文字中，有他1968年关于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1970年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几篇长文。[19] 朱可夫还为拍摄这些战役的纪录片接受过采访。朱可夫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电影剧本做了大量的修改。他建议制片人不要使用俚语，因为那样可能对年轻人的教育有害。[20] 朱可夫在为拍摄莫斯科战役纪录片接受采访的时候，西蒙诺夫也在场。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朱可夫不顾前一天摔倒所带来的疼痛而表现出来的专注和对细节的记忆。[21] 在这两部纪录片中，朱可夫的表现都有点儿生硬，但自信而威严。1969年8月，他在接受格鲁吉亚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他们的同乡斯大林，“在与德国及其

盟友的斗争中，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他显示出杰出的实施战略行动的能力，以及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意志。[22]

不过，朱可夫并没有把时间都花在公共活动或回忆录的撰写上。他要照顾自己的女儿玛丽亚，而此时作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加琳娜——她是个医生和传染病专家——则在莫斯科医院工作。他还修复了与叶拉和埃拉的关系。他常常和加琳娜一起去剧院，包括莫斯科大剧院，但他更喜欢看歌剧而不是芭蕾舞剧。他还要侍弄花草，到当地的树林采蘑菇。他的乡间别墅里有放映室，一家人在一起看过很多电影。他读了很多书，不单是关于军事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还有俄罗斯的文学经典。此外，他还一如既往地出去打猎和钓鱼。[23]

回忆录

1965年7月，俄罗斯新闻出版社（APN）的编辑安娜·米尔基娜（Anna Mirkina）与朱可夫接洽有关回忆录的写作事宜。据米尔基娜说，事情的起因是，法国的一家出版社要出版苏联军事与政治方面的系列回忆录。朱可夫与新闻出版社曾经打过交道。1965年年初，出版社委托他撰写有关德国投降方面的文章。1965年3月，新闻出版社把文章的副本给了苏共领导层，并要求允许发表。文章一直没有发表，但回忆录后来吸收了它里面的内容。[24]

朱可夫邀请米尔基娜到自己在莫斯科西面的昆采沃（Kuntsevo）别墅见他。朱可夫的别墅（那是斯大林在1942年给他的）绝非那种乡间的小别墅，而是相当气派的两层大宅。米尔基娜记得，门厅的墙上装饰着莫斯科战役期间拍摄的朱可夫及其参谋人员的照片。从门厅进去是一间布置得井井有条的宽大的餐厅。餐厅中央是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椭圆形大餐桌。桌子上方有水晶做的漂亮的枝形吊灯。靠一侧的墙壁摆放着一张沉重的橡木餐柜，角落里有一座声音悦耳的时钟。钟旁有一张小桌，上面摆了朱可夫的半身塑像和T-34坦克模型。餐厅通向阳台，那上面有

一张小圆桌和两把休闲椅。

随意穿着家居服的朱可夫，领着米尔基娜来到自己的书房。书房很大，但相当舒适，采光也很好。书房里有一张蒙着旧的绿色皮革的大写字台，朱可夫背窗而坐，那样光线比较好。房间里摆满了朱可夫用来写回忆录的书籍，墙上还挂了一幅他母亲的照片。[25]

当米尔基娜答应朱可夫，说新闻出版社是一家正规的出版社，它支持他说出有关战争的真相时，朱可夫便愉快地同意了把回忆录交给他们出版。出版合同是在1965年8月签的，它让朱可夫干劲十足，要完成写作。到1966年秋天，他给出版社交了1430页的打印稿。[26] 稿子并不是朱可夫本人打印的，他也不喜欢口授。他用的是普通手写的方式，因为——他告诉米尔基娜——那样可以方便他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手稿内容是由加琳娜的母亲克拉夫季娅·叶夫根尼娅（Klavdiya Evgeniya）打印的。[27]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可夫已获准查阅位于莫斯科郊外波多雷斯克（Podolsk）的国防部档案馆资料。他在那里研究了大约1500份文件。[28] 从档案中引用的许多材料让他的回忆录具有一种独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苏联解体前的那段时间，他的回忆录成了历史学家们重要的资料来源和苏联档案向学术研究开放的起点。

朱可夫写回忆录并不是闭门造车，他经常与统帅部及战争期间共过事的同志们商量、交谈和通信。这其中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罗科索夫斯基。他还与《军史杂志》的编辑以及向他约稿或征求意见的众多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代表们交谈过。这些交流也不都是建设性的。例如，1965年4月，朱可夫写信给罗科索夫斯基，指正在他自己看来后者在接受《文学报》有关战争的采访时所犯的错误。朱可夫尤其在意的是，罗科索夫斯基没有质疑赫鲁晓夫时代冒出来的种种战争神话，特别是那些夸大赫鲁晓夫在战争进程中的作用的神话。[29]

朱可夫在这段时间中最亲密的朋友是A.N.安季片科（A.N.Antipenko）将军。后者在朱可夫1945年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时做过他的军需官，而且战后也和他一同在德国共过事。安季片科回忆说，1957年十月全会之后不久，他在保健中心遇到了朱可夫。在他们拥抱的时候，朱可夫问他为什么不害怕。当安季片科回答说有什么好害怕的时候，朱可夫说，在来保健中心的路上，他碰到了与自己相识的其他两位将军，他们不想跟他照面，就故意走到街的对面。安季片科说，既然他战争期间和朱可夫共过事，他为什么要那样？打那以后，两人就经常在一起，打猎、钓鱼、看演出、讨论朱可夫的回忆录。[30] 赫鲁晓夫下台后，安季片科积极奔走，呼吁为朱可夫平反。他对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说，那样做在国内外会深得人心。1969年朱可夫的回忆录出版后，安季片科给苏共最重要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写信，强烈要求撤销1957年十月全会的决定。[31] 这封信没有公开，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曾经考虑过采取这样激进的举措。要推翻1957年十月全会的结论，难就难在它除了会使当初支持赫鲁晓夫的其他中央委员（包括那时带头批判而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依然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判断力，也会使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判断力受到质疑。它还可能牵扯到对在1957年六月全会上被开除党籍的莫洛托夫与马林科夫及卡冈诺维奇的反党集团的处理问题。他们也在游说，要求给他们在政治上平反。

朱可夫退休期间与安季片科的亲密关系是一件稀罕的事。朱可夫在成年后有过许多追随者、崇拜者、战友、喝酒打猎的同伴以及工作上的搭档，但亲密的男性朋友很少。除了安季片科，可以说只有巴格拉米扬与朱可夫的友谊深厚而持久了。朱可夫与华西列夫斯基的关系有段时间很近，但在赫鲁晓夫时代他被贬之后就不行了，此后两人的关系一直没有完全修复。叶拉与华西列夫斯基的儿子尤里的离婚，某种程度上肯定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了。

写完回忆录之后，朱可夫面临的问题是，要与苏联审查人员就回忆录的内容进行协商。在苏联，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过某种程序，由官方进行审查和删改，而事实证明，这对于朱可夫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67年12月，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朱可夫当面请求勃列日涅夫加快速度。1968年2月，他又再次催促此事。但直到1968年4月，由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Grechko）元帅领导的小组才拿出了关于回忆录的报告。该小组的评价总的来说是肯定的，但也批评朱可夫有夸大他自己作用的倾向，而对党的集体贡献，尤其是党的领导层的贡献，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报告特别提到了朱可夫对战争即将打响之前的那段时间的描述，认为他低估了党的战备工作的意义。具体来说，例如，朱可夫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对红军的清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格列奇科的结论是，回忆录要出版，但必须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更正。[32]

回忆录接着就交给了由历史学家G.A.德波林（G.A.Deborin）负责的编辑小组。德波林小组与朱可夫及V.G.科莫洛夫（V.G.Komolov）——新闻出版社请来协调作者与编辑关系的记者——对需要修改的地方进行了处理。据科莫洛夫说，修改的过程很艰难，朱可夫对许多要求做出的改动都很不满。[33] 尽管如此，这项工作的进展还是很快的。到1968年夏天时，核准出版的文本已经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34] 不过，书中公布的数百幅照片也必须得到审查人员的核准。

由于看不到未经删节的朱可夫原稿，现在对审查中所做的改动很难有一个全面的判断，但可以肯定，有几百页的内容以及整段整段的话都被删去了，或者做了大的改动。增加的内容也很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添加了这样一段话——朱可夫在那里说：1943年4月到北高加索去的时候，他本想能够征询一下政治委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上校的意见，但可惜没有遇到这位未来的苏联领导人。“明眼人会看出来的。”朱可夫的女儿玛丽亚记得他这样说过——意思是，元帅是不会和上校商量事情的。据玛丽亚说，是她母亲说服了朱可夫：“没有人会相

信这些话是他写的，而如果他不妥协，书就根本出不来。”[35]

这部得到官方批准的回忆录终于在1969年4月出版了。尽管原计划要印50万册，但由于纸张短缺，只能印10万册，接着又采取了一种可以节约纸张的版式印了20万册。[36] 这些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到最后，这部回忆录又印刷和售出了几百万册，不仅是在苏联，而且在世界各地，并被译成了各种文字。苏联公众热情高涨，朱可夫收到了无数的读者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进行指正的，也有为将来的再版提建议的。[37] 官方的反应比较平淡，至少最初是这样的；1969年4月，苏共中央发布命令，对朱可夫的回忆录不准做任何评论、解释或摘引。[38] 不过在7月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发表了华西列夫斯基的长篇评论。它以一种非常肯定而且巧妙的方式，没有宣扬朱可夫的个人功绩，而是突出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对共产党及苏维埃国家的忠诚。文章的标题是《献给苏联士兵》——这和朱可夫回忆录的标题是一样的。1969年11月的《军史杂志》也发表了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文章。[39]

胜利和悲剧

尽管回忆录的出版对朱可夫来说是一场胜利，但他个人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艰难了。1967年12月，加琳娜接受了一次手术，并被诊断出患了癌症，医生估计还能再活五年。同月，亚历山德拉死于中风。生病的朱可夫无法出席葬礼，但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锁了一整天。[40]

似乎这些还不够，1968年1月，朱可夫自己在莫斯科城外的阿尔汉格尔斯科耶（Arkhangel’skoe）疗养院疗养时也得了严重的中风，导致身体左侧偏瘫。他有一个月的时间丧失了行动能力，而且在恢复之后，说话仍然含糊不清，走路必须靠人扶着。1968年12月，朱可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问能不能把自己用了十五年的“吉尔”牌车子换成比较舒适的“海鸥”。他对勃列日涅夫解释说，自己要经常到诊所治疗，“海鸥”车的质量比较好，可以让他“坐在里面觉得软和些”。[41] 勃列日涅夫对朱

可夫的请求是怎么处理的，现在不得而知。

加琳娜有病在身，朱可夫又行动不便，这让加琳娜在不同地方治疗的时候，夫妇二人不得不长时间地分开。他在1973年7月的信中对她说："我日夜想念你。"1973年11月，加琳娜病情恶化，并于11月13日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在她去世前，朱可夫已无力去医院探望了。加琳娜被葬在莫斯科有名的新圣女公墓（Novodevichy），那里长眠着苏联时代的许多最杰出的人物，包括1971年去世的赫鲁晓夫。朱可夫拄着拐杖，在巴格拉米扬的搀扶下参加了葬礼。"这样的打击，我是挨不过去了，"他告诉玛丽亚。[42]

但他还是挨了过来，事实上还完成了他的回忆录第二版的修订工作，有些地方做了更正，并在评论和读者反馈的基础上增添了若干新的章节：列宁格勒之围、叶利尼亚战役以及大本营和苏联统帅部的运作方式。为了帮助朱可夫写大本营那章，出版社还抽调了历史学家叶夫根尼·茨维塔耶夫（Evgeny Tsvetaev），他曾经帮助写过什捷缅科将军的回忆录。第二版的准备工作是从1973年开始的，但由于朱可夫的身体不好而进展缓慢，因为遵照医嘱，他一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茨维塔耶夫要朱可夫详细描述大本营的运作方式，但朱可夫坚持说自己是在写回忆录，不是科学小册子。结果就采取了折中的方式，那一章既带有回忆的成分，又描写了大本营的总体运作。即便如此，对于想弄清战争期间苏联统帅部运作方式的历史学家来说，它注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本。[43]

尽管朱可夫和加琳娜的身体都不好，但他对于采访和约稿还是一如既往地有求必应。例如，1972年2月，塔斯社请他写篇文章，要在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那天发表在国家的青年报上。"保卫国家和在苏联军队服役，"朱可夫告诉青年读者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和光荣而高尚的责任，是一件令人感到荣耀和骄傲的事情。"1972年12月，朱可夫在一本由一群战争老兵撰写的书的序言中写道："岁月流逝，许多战争老兵都

已离我们而去，而其他的也在渐渐老去。但老兵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青春热情还在，他们还依然在不懈地努力。”[44]

这是对朱可夫本人的恰如其分的写照，他与疾病和衰老的抗争已经快到尽头了。加琳娜去世后，朱可夫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回忆录第二版的出版。1974年6月18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医院与世长辞。仅仅几周之后，经他修订的回忆录就出版了。

朱可夫的葬礼是自斯大林去世以来苏维埃国家的最大的事情。出席葬礼的有他的四个女儿，叶拉、埃拉、马加丽塔和玛丽亚。这也是人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她们在一起。

讣告刊登在6月20日的《真理报》上。在苏联高级军政领导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讣告的内容如下：

> 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和卫国战争的著名的英雄，已离我们而去……在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党总是把他派到最困难的地方。作为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他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他负责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的作战协调工作，并在库尔斯克为粉碎希特勒的军队和在解放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的最后阶段，G.K.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其他方面军一起，把敌人消灭在他们自己的巢穴。在党委托给他的所有岗位上，G.K.朱可夫都展示出不屈的意志、勇气和组织才能……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的儿子、勇敢的战士和杰出的指挥员——将永远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45]

华西列夫斯基的悼词也于次日发表在《真理报》上。他特别称赞了朱可夫的指挥艺术，他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拥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的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在理解复杂的战略形势并对不断发展的事态做出正确的分析方面，能力超群……在制

订行动计划时，他总是采取创造性的、原创性的方式。”[46]

当朱可夫的遗体被安放在莫斯科中央陆军剧院接受公众的瞻仰时，成千上万的市民排队表达他们的敬意。在6月21日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体中的时候，为首的扶柩人是勃列日涅夫。在随后举行的追悼会上，主要的发言者是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47]

一首名为《朱可夫之死》（1974）的诗，作者为苏联流亡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表达了对朱可夫的显然是矛盾的感情：

他让多少士兵

血洒异国他乡！

他可曾感到惋惜？

裹着平民床单的他

临终之际

是否还记得他们？

缄默无语。

当他在地下与他们相遇

他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是我开战的。”[48]

朱可夫崇拜的兴起

朱可夫死后的名声比他晚年的时候还要大——事情常常如此——他的葬礼就是对他的崇拜的开始。他的地位被抬高到二战中最伟大的苏军将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崇拜还在勃列日涅夫的掌控之中，但在官

修的历史中，在无数的战争纪录片中，甚至在专为儿童和青年编写的有关其功绩的书籍中，对朱可夫都是大书特书。[49] 为了表示纪念，他出生的村子被更名为“朱可夫村”。1980年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了两本回忆朱可夫的文集。[50] 撰稿人包括叶拉和埃拉，她们都把朱可夫描写成一往情深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和顾家的男人，他竭尽全力克服其军队工作给自己的个人生活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姐妹俩还出版了她们的父亲写给她们以及她们母亲的书信。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虽然朱可夫的职业角色是个作风强硬的指挥官，但他私底下也可以是一个细心、体贴、温柔的人。

同样热情支持自己父亲的还有玛丽亚。朱可夫去世的时候，他的私人文件都留给了她。许多文件都被党的官员拿走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了，但在剩下的当中，有他的回忆录的原稿。被苏共审查人员删去的材料大部分只具有学术价值，但也含有朱可夫对战前苏联武装力量受到的清洗的大量议论，包括说他自己也差点儿成为斯大林的牺牲品。从原稿来看，朱可夫对斯大林的批评比1969年官方批准出版的和1974年经过修订的回忆录还要严厉。1990年在玛丽亚的支持下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第十版，吸收了大量的原先被删掉的材料。两年后出版的第十一版增添的内容更多。[51] 这个新版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朱可夫和斯大林的距离。

对朱可夫在20世纪80年代的形象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的新情况，是1987年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去世后发表的《为G.K.朱可夫的传记而准备的笔记》——那位著名的苏联作家已于1979年去世了。笔记的主要内容是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60年代中期他与朱可夫的多次见面和谈话的情况。西蒙诺夫对朱可夫的记述，重点是把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而非将军——特别是，他在情感上是如何对待自己在战后所遭

受的痛苦的。该书在总体上把朱可夫人性化了，从而改变了赫鲁晓夫分子把他涂抹成的自私自利的残暴形象。在西蒙诺夫的笔下，朱可夫既刚强又脆弱，既自信也善于自我反省，既固执己见也会根据经验灵活变通。[52]

关于朱可夫，20世纪80年代后期另外还发表了N.G.帕夫连科（N.G.Pavlenko）中将的题为“对一位指挥官命运的反思”的有影响力的系列文章，此时苏联正处于戈尔巴乔夫时代，公开透明，对苏联的历史也更加开放。前《军史杂志》编辑帕夫连科，曾经为朱可夫在1965年能够再次发表自己的作品出过力。帕夫连科和西蒙诺夫一样，主要强调了苏共在战后对朱可夫的不公正待遇。这不仅是指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他遭到的贬黜，还包括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他没有完全得到平反。关于不公正待遇，帕夫连科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上，虽然朱可夫已被选为代表，但因为害怕他在大会上的人气盖过勃列日涅夫而没让他参加。[53]

1991年苏联解体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需要新的英雄，以取代已经名声扫地的共产党政权所树立的那些偶像，而朱可夫就是最好的人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被成功地重新塑造为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人物。相比于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体制的忠诚而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职业素养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他是卫国战争的英雄，而那场战争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眼中，依然是神圣的。而且从民族来说，他也的的确确是俄罗斯的英雄。正如他的女儿叶拉所言，朱可夫“本质上完完全全是俄罗斯的。他热爱俄罗斯的一切：土地和人民，音乐和艺术，风俗和饮食”。[54] 朱可夫的明确的俄罗斯身份，对于用民族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后苏联时代的政权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新俄罗斯，朱可夫注定要成为名人，而这件事的最初迹象是，发行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币。接着是在1994年5月，时任俄罗斯总统鲍里

斯·叶利钦颁布了两条与朱可夫有关的命令。第一条是要求赶在1995年5月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为朱可夫建造一座纪念物。第二条是创设两种新的军功章——“朱可夫奖章”和“朱可夫勋章”。由雕塑家V.M.克雷科夫（V.M.Klykov）和建筑设计师U.格里戈里耶夫（U.Grigoriev）制作的纪念朱可夫的大型塑像，描绘了他在1945年胜利阅兵仪式上的马上雄姿。塑像赶在胜利纪念日之前完成了，并及时安放在红场的主入口处。它现在仍然是那里吸引着俄罗斯和外国游客的最重要的景观。1996年，在朱可夫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的当天，朱可夫村扩大并升级为镇，而且还建了一座朱可夫纪念馆。1999年，叶利钦政府发布总统委员会报告，撤销赫鲁晓夫1957年的对朱可夫的所有指控，同时还决定公布195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会议记录——在那次会议上，朱可夫曾经与指控自己的赫鲁晓夫分子有过正面交锋。[55]

官方的这些积极的姿态，与专门的展览、纪念章、庆祝大会、报刊上的歌颂文章、向他致敬的电视纪录片、献给他的诗作和歌曲，以及出版与他熟识的人所写的更加生动的回忆录相比，只是确认朱可夫俄罗斯民族英雄地位的热潮中的一部分。1992年，由俄罗斯人撰写的为数众多的朱可夫传记中的第一部出版了，[56]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以及在进入21世纪以后，关于他以及他的丰功伟业的书籍，差不多每年都至少要出版几本。这些文献大多把朱可夫说成是“常胜元帅”。宣扬其错误和缺点的不同的声音同样也可以听到。对那些批评者来说，朱可夫不是个英雄，而是个恶棍，是斯大林和苏维埃国家的忠实而冷酷的仆人，他所代表的事业——共产主义——以及过去的那段历史，是俄罗斯要谴责而不是歌颂的。[57]

关于朱可夫，也有许多虚构的描述，包括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1995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当时他刚刚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返回俄罗斯不久。在小说中，索尔仁尼琴想象朱可夫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对于如何描写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很是作

难。在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朱可夫曾经是处在斯大林的直接控制之下的，但他在战争期间自信心的增加以及他们之间比较平等的关系，导致苏联独裁者在1946年将其外放。但是，朱可夫并没有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斯大林。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的内容，动摇但并未完全破坏他对苏联独裁者的信赖。

索尔仁尼琴的故事是以朱可夫的各种回忆录为基础的。在他对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的描写中，有很多真实的成分。后者热爱军队生活，他的冷酷无情的指挥风格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基于对军事事务必要性的判断。索尔仁尼琴猜测，朱可夫在1956年曾经考虑过是否要采取行动反对苏共。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设想，而且对于朱可夫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索尔仁尼琴的敏锐描述也让人难以相信他曾经动摇过对党的信心。[58]

暮年的朱可夫完成过一份现如今在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常见的名人问卷调查。他的答案由他的女儿玛丽亚保存：

问：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可夫：感觉尽到了责任。

问：在人的身上，你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

朱可夫：正直。

问：对男人来说呢？

朱可夫：勇气和胆量。

问：对女人来说呢？

朱可夫：忠诚和温柔。

问： 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朱可夫： 天蓝色。

问： 特别喜欢的作家？

朱可夫： 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

问： 俄罗斯最有天赋的指挥官？

朱可夫： 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不能把他们分开。

问： 特别喜欢的作曲家？

朱可夫： 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

问： 什么是你不会原谅的？

朱可夫： 背叛！

问： 你嫉妒你的朋友吗？

朱可夫： 是的！我总是嫉妒布琼尼（元帅）。他是个手风琴大师。[59]

---

[1] K.Simonov，*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Moscow：APN，1989），p.391.钱尼的书引起了我对这段话的注意。参见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464-465。

[2] I.Mastykina，*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pp.56-57；作者对叶拉·朱可夫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part five，docs.37-38；RGVA，F.41107，Op.1，D.73，Ll.1-2.签署关于他的退休待遇的政府命令的，是他的老对头尼古拉·布尔加宁，这也是后者在赫鲁晓夫于1958年3月解除其总理职务之前做的最后的事情之一。

[4] P.N.Pospelov ed.，*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6 vols.（Moscow：Voenizdat，1960-1965）.

[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five，docs.39-41，and pp.611-614.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去的是另一位主席团成员Z.T.谢尔杜克（Z.T.Serduk）。

[6] 参见T.J.Colton，"The Zhukov Affair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vol.29，April 1977；P.M.Cocks，"The Purge of Marshal Zhukov，" *Slavic Review*，vol.22，no.3，1963；以及M.Gallagher，"Trends in the Soviet Historiograph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J.Keep ed.，*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 （New York：Praeger，1964）。

[7] 参见巴托夫、别洛夫、比留佐夫、贝切夫斯基、崔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等人的回忆录的摘要。S.Bialer，*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II*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

[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part five，doc.42.

[9] D.V.Pavlov，*Leningrad v Blokade* （Moscow：Voenizdat，1958）；A.S.Zav'yalov and T.E.Kalyanin，*Vostochno —Pomeranskaya Operatsiya* （Moscow：Voenizdat，1960）*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vol.1，pp.240，244；V.D.Sokolovsky ed.，*Voennaya Strategiya* （Moscow：Voenizdat，1962）；Bialer，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p.25；K.K.Rokossovsky ed.，*Velikaya Pobeda na Volge* （Moscow：Voenizdat，1965）.

[10] 这是布赖恩·邦德（Brian Bond）在其对朱可夫元帅的最伟大的战役的评论中提出的观点。参见*The Listener*，July 31，1969.复印件见于朱可夫的个人卷宗：RGVA，F.41107，Op.1，D.85。

[11] A.Mirkina，*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10.

[12]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 （London：André Deutsch，1974），pp.13-14.

[13]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six，doc.6.

[14] O.P.Chaney，*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p.468-470.

[15] G.A.Kumanev，*Ryadom so Stalinym*（Moscow：Byliia，1999），pp.144-148.这本书中还收录了朱可夫在这次大会上讲话的原文（第160～172页）。

[16]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Moscow：Glavarkhiv，2005），p.544.

[17] 这方面的许多资料都可见于RGVA，F.41107，Op.1，D.54。

[18] "Neskol'ko Voprosov iz Sovremennogo Polozheniya，" RGVA，F.41107，Op.1，D.78.Ll.80-82.

[19] *Bitva za Moskvu*（Moscow：Moskovskii Rabochii，1968）；*Stalingradskaya Epopeya*（Moscow：Nauka，1968）；*Kurskaya Bitva*（Moscow：Nauk，1970）.

[20] RGVA，F.41107，Op.1，D.76，Ll.2，31-128.

[21]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75.

[22] RGVA，F.41107，Op.1，D.79，Ll.49-50.

[23]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47；*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pp.503-507.这是摘自玛丽亚的回忆录。

[2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six，doc.5.

[25]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Moscow：Vniigmi-Mtsd，2000，passim.在朱可夫博物馆中复制了朱可夫的书房，包括他原来用过的写字台等家具。博物馆的那张台子上蒙的是红色毛毡，而不是米尔基娜记得的绿色皮革，但也许朱可夫用过它。

[26] 米尔基娜说手稿是1966年3月交的，但朱可夫在自己的信中说是在秋天。

[27] G.Zhukov，"Korotke o Staline，" *Pravda*，January 20，1989.

[28] A.Samsonov，"Looking Truth in the Eye，" *Moscow News*，no.18，1987.

[29]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7.

[30] N.A.Antipenko，"My Znali Druga Druga 25 let，" in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vol.1（Moscow：APN，1988），p.324.

[31]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s.3，4，9，18，19；RGVA，F.41107，Op.1，D.119.

[32]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part 6，docs.12，13，15.

[33]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 Moscow：Vniigmi-Mtsd，2000，pp.53-55.

[34]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 ，part 6，docs.16-17.

[35] 转引自Chaney，O.P. *Zhukov* ，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p.476 以及W.J.Spahr，*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262。

[36] RGVA，F.41107，Op.1，D.54，L.75.

[37] 其中有些例子可见于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 Moscow：Vniigmi-Mtsd，2000，pp.103-126。

[38] Spahr，W.J.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p.262.

[39] A.Vasilevsky，"Sovetskomu Soldatu Posvyashchaetsya，" *Kommunist* ，July 1969；A.Beloborodov，"Polkovodets o Voennykh Sobytiyakh i Ludyakh，"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11，1969.

[40] 作者对叶拉·朱可娃的采访，莫斯科，2010年4月。

[41] RGVA，F.41106，Op.1，D.172.

[42]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 ，pp.508-515.这部分内容是玛丽亚回忆录的摘要，其中有朱可夫和加琳娜在他们最后几年中的通信。

[43] E.Tsvetaev，"Poslednii Podvig G.K.Zhukova，" in S.S.Smirnov et al.，*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 （Moscow：Politizdat，1988）.

[44] RGVA F.41107，Op.1，D.54，L.184；D.73，L.113.

[45] "Marshal Sovetskogo Souza Georgii Konstantinovich Zhukov，" *Pravda* ，June 20，1974.

[46] A.Vasilevsky，"Pamyati Slavnogo Polkovodtsa，" *Pravda* ，June 21，1974.

[47] "V Poslednii Put'：Pokhorony Marshala Sovetskogo Souza G.K.Zhukova，" *Pravda* ，June 22，1974.

[48] 由杰弗里·罗伯茨翻译。

[49] S.Alekseev，*Rasskazy o Marshale Zhukove* （Moscow：Malysh，1977）.这本书引起我的注意还要感谢V.A.阿法纳西耶夫的杰作中附有注释的参考书目。参见

V.A.Afanas’ev，*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ysstva G.K.Zhukova* （Moscow：Svyatigor，2006）。

[50]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2 vols.（Moscow：APN，1988）；*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 （Moscow：Politizdat，1989）.

[51] G.K.Zhukov，*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3 vols.，10th and 11th eds.（Moscow：APN，1990-1992）.

[52] 西蒙诺夫的笔记见于*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s.6，7，9，10，12，1987。另见Simonov，K.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 Moscow：APN，1989。

[53] N.G.Pavlenko，“Razmyshleniya o Sud’be Polkovodts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s.10-12，1988.

[54] *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vol.1，p.35.

[55]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pp.583-84.

[56] N.Yakovlev，*Zhukov* （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2）.雅科夫列夫早先曾经为年轻人写过一本简短的朱可夫传记：*Stranitsy Zhizni Marshala G.K.Zhukova* （Moscow：Detskaya Literatura，1985）。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名叙利亚人1991年用俄文出版的朱可夫传记：M.Tlas，*Marshal G.K.Zhukov*：*Polkovodets*，*Strateg* （Moscow：Leksika，1991）。

[57] 例如，参见 A.N.Mertsalov and L.A.Mertsalova，*Inoi Zhukov*，*Moscow* 1996；A.N.Mertsalov，“G.K.Zhukov v Publikatsiyakh za period s 1996 do 2001gg，”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 ，nos.5 and 6，2001；B.V.Sokolov，*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 （Moscow：Ast，2003）；以及V.M Safir，“Novye Mify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Data Izgotov-leniya—2006 god，”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 ，nos.9 and 10，2007。

[58] A.Solzhenitsyn，“Times of Crisis，” in *Apricot Jam and Other Stories* （Edinburgh，U.K.：Canongate Books，2011）.

[59]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 i Sud’be Polkovodtsa* ，pp.490-491.

14 常胜元帅

就在1974年6月朱可夫去世前不久，他完成了自己回忆录第二版的工作。写一篇新的结束语是他作为作者的最后的任务。第一版在结尾部分对共产党、光荣的社会主义制度、优秀的苏联人民和对纳粹的伟大胜利，照例歌颂了一番。第二版尽管也重复了这些虔诚的言辞，但已疾病缠身、快到生命尽头的朱可夫做了更多的反省："在我的一生中，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欢乐、痛苦和不幸。对我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为我的祖国服务，为我的人民服务。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为了尽到我的责任，我已经竭尽全力。"

一心想把爱国主义火炬传给年青一代的朱可夫，呼吁他们要珍惜打过仗的那些人做出的巨大牺牲，要善待仍然在世的老兵，尤其是要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人来继承。他们要从我们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一点很重要。"

朱可夫最后回顾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特意提到俄国革命对他这个年轻人的决定性的影响。它改变了他的前途，让他"有机会去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活泼有趣、充满各种激动人心的经历和重要行动的生活"。[1]

朱可夫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对自己一生的工作，对自己为党和祖国的优异的服务是满意的。苏联人民也几乎全都是满意的。对他们而言，朱可夫是爱国英雄，他在危难纷乱之际，在唯有对事业有绝对的、毫不动摇的献身精神可以拯救苏联的时刻，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今的俄罗斯人依然认为朱可夫是个英雄，虽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像

他那样毫不动摇地信奉共产主义。

朱可夫为什么还享有这么高的声望，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打赢1941～1945年卫国战争的那些声名显赫、才华横溢的苏联将领中，没有谁现在的光芒还能盖过朱可夫。对于从希特勒手中拯救俄罗斯和苏联的那些重大的转折关头和战役，唯有朱可夫是一个不漏全都参与的。在一场让苏联付出了2500万人死亡的代价，耗费了全国1/3的财富并毁掉了数万座村庄、城镇和城市的战争中，朱可夫是而且永远是“常胜元帅”。在某些方面，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但要是被并入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帝国从而处于受奴役的地位，那就更糟了。

战争期间朱可夫经历过许多挫败，而他麾下的部队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伤亡也很惊人。但是，只要赢得战争，就可以让所有针对具体战役或行动的批评，或者是有关不同行动路线和不同指挥决定的种种带有假设性质的议论，全都偃旗息鼓。在俄罗斯，朱可夫作为一名伟大的将军的威名，还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管他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有过什么样的失败，他还是赢得了最伟大同时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胜利。

俄罗斯军人对朱可夫的看法也和民众一样。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M.A.加列耶夫（M.A.Gareev）将军——他本人也是参加过莫斯科战役的老兵——在其2004年对卫国战争的苏军高级将领的研究中认为，朱可夫作为指挥官具有如下品质：无穷的创造力，大战在即时的深思熟虑和灵活性，对每次行动的周密计划和准备，以及在追求自己目标时的勇敢与坚定。加列耶夫的结论是：在俄罗斯军事史上，作为伟大的指挥官，只有18世纪沙皇的将领和战略家、从未有过败绩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可与朱可夫相提并论。[2]

然而，朱可夫是个伟大的指挥官，却不是传说中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在战略理论或军事思想方面，他并未做出任何具有深远影响的贡

献。至于说如何进行现代战争，他也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洞见。在哈拉哈河，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在1944～1945年通往柏林的道路上——他的战场表现的确非常敏锐，但他的才能在于调度，而不是作战的创新或想象力。同样，虽然朱可夫的强硬同时也往往粗暴的领导风格在全面战争的危难时刻有它的用处，但它的转移价值（transfer value）却值得怀疑。要让人们全力以赴，如果用严厉的纪律处分相威胁，并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其他许多苏军将领的领导风格都大不相同，但也一样是成功的。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科索夫斯基——在他看来，对部队既要强调纪律，又要进行鼓励。

朱可夫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非同寻常的求胜意志。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展示出了强烈的追求成功的决心，以及努力完成任务的强大干劲。对他周围的人来说，朱可夫的执拗也带来这样一种自信，即哪怕是最困难的局面，也能转危为安。这一点在1941年夏天形势严峻的那几个月表现得最为突出，后来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当德国和轴心国军队显得势不可当的时候也是如此。朱可夫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也不会让自己因为有可能失败而畏首畏尾。他的决策总是干脆利落，毫不含糊。

在遇到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朱可夫那种出了名的泰然自若与其说源自个人的勇气——虽然他并不缺少勇敢——不如说源自最大程度的自我约束。朱可夫对官兵们的要求——自控与服从——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相似的。作为一名作战指挥官，朱可夫在大本营内部的核心指挥班子中，会尽力争取做出他所赞成的决定，争取他用来执行自己命令所需的兵力和资源。可是决定一旦做出，命令一旦下达，哪怕并不是一切都如其所愿，朱可夫也会执行命令，而且希望其他所有人也都如此。

意志力、自我约束、坚决、处变不惊，朱可夫性格上的这些特点，得到了才智上的一些重要品质的补充：思维清晰、目标明确，再加上愿意从经验中汲取教训。所有伟大的将领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即透过

自己所处的复杂的战略形势和战场上的混乱局面，弄清楚什么才是关键性的部署、决定和目标，以便采取适当而有效的行动。此外，既要坚持追求己方的作战目标，必要时又要灵活选择实现该目标的途径，这一点同样重要。

在战争的头几年，这种必备的能力在朱可夫那里发挥得并不稳定。例如，在1941年夏天他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未能放弃进攻战计划并转而采取战略防御态势——如果那样，或许就可以更好地遏制德军的闪电入侵了。又例如，1942年他在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想把德国中央集团军群从其位于莫斯科前方的阵地上赶走，最后却以“火星行动”的失败而收场。但是，朱可夫在战争的进程中逐渐懂得，有时候为了更有效地脱离接触，为了用暂停或终止行动来取得长远的胜利，后撤也是必要的。

关于朱可夫的将才，还要说的就是他的战略眼光。他在战争期间一次又一次的行动，起初都胃口极大。1941年6月德军入侵时，他想对敌方领土发动战略性的反入侵，为的是一举扭转局面，就像他在1941年1月的图上作业中所做的那样。同年12月莫斯科反攻的目标，不仅是要从苏联首都赶走德军，还要发动一场倒转过来的“巴巴罗萨行动”，把他们彻底赶出俄国。1942年11月，苏军把德国第6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这被视为对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实施更大合围行动的开始。1943年1月的“北极星行动”的目标，除了要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还要包围北方集团军群。这些宏大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在此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为1944～1945年的解放白俄罗斯和波兰，并使朱可夫进逼柏林的“巴格拉季昂行动”和“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奠定了基础。

朱可夫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想入非非或别出心裁。斯大林和大本营也都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它们与苏联在社会改造中好大喜功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朱可夫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便是在

这种传统中形成的。虽然它可以允许有创造性，但其强调纪律和服从的威权主义的等级制色彩非常强烈。朱可夫更多的是靠干劲和魄力而不是想象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与整个苏维埃体制中主流的精神特质是一致的。所以，朱可夫有那么大的成就，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他是苏联的将军。他要是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作为一名苏联的将军，朱可夫指挥着一支特别的军队，一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他们只受过有限的教育和差不多的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穿着制服的农民，有许多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经历过强制集体化所带来的痛苦。虽然有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是真心地坚定地拥护的，但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对这一事业是不了解、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在苏德战争惊心动魄的恶战中，很难想象除了依靠严厉的纪律和惩罚，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可以把这样一支军队团结起来，而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严厉无情的。战争期间在苏联人自己的部队中，被处死者达到了惊人的158000人。还有数万人被送进了所谓的惩戒营，让他们有机会为自己的罪行和不端赎罪，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能够在这种死亡率高达50%的炮灰部队中活下来的话。现在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朱可夫对自己批准采取的那些严厉措施曾经懊悔甚至犹豫过。

应该记住，朱可夫是在斯大林这位非常得力的最高统帅的手下服役的众多才华横溢的苏军将领之一。就其对战争转折关头的所有重大战役都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言，如果说朱可夫是二战中最伟大的将军，那也不仅仅是靠他个人的努力。他是苏军统帅部的一员，而苏军统帅部作为一个集体，表现非常出色。可以说，与将领们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功绩相比，斯大林对他们的管理同样重要。斯大林凭借其领导艺术和权威地位，把一个个强悍且时常发生冲突的人物捏合到一块，激发出他们个人和集体的最优秀的才能，唤起他们的忠诚感，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争取胜利。在这一群体中，就个人而言，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大的依靠。

朱可夫一次次毫不犹豫地——尽管并不总是没有异议——为苏联独裁者带来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从不挑战独裁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有追求胜利之外的非分之想。他，其实就是“斯大林的将军”。[3]

这位苏联的传奇人物与二战中其他伟大的指挥官相比又如何呢？而且，比什么呢？简单统计胜利的次数，并不能说明单个战役打得有多么艰难。人物的个性不代表作战的技艺。在同侪中拥有的人气或招惹的是非，无法成为衡量才能和水平的标准。至于朱可夫，比较起来就更难了，因为就像艾森豪威尔说的，这位苏联将军“作为负责指挥重大战役的领导者，他的经验要超过我们时代的其他任何人”。

也许最恰当的做法是把他与苏军的高级指挥官们相比，尤其是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但这些将军谁也没有扮演过像朱可夫扮演的那么多不同的角色，因为他分别做过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大本营协调员和副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干过不同的工作，但主要还是作为大本营代表，而且他是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担任方面军的指挥工作的。朱可夫、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在成功之外也都有过失败，所以很难去评判他们作为方面军司令彼此功绩的大小。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在战后颇有怨言，说自己方面军的行动受到了总参谋部和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这些大本营代表的干预，说自己作为现场指挥官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无论是科涅夫还是罗科索夫斯基，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挑战，即从中央来协调并指导牵扯到多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所以，要是让他们来做，他们的表现能有多好，以及这样的经历是否会改变他们的指挥风格或者改变他们的胜率，那还是个未知数。

在性格及领导风格方面，朱可夫与科涅夫非常相似。作为下辖多个集团军的方面军指挥官，他们都以一种冷酷的决心驱使着自己的部队前进，而且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只要有必要，就不惜任何代价。两人都属于进攻型，喜欢主动出击，但也都知道何时该叫停进攻并调整部署。罗

科索夫斯基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加巧妙而聪明，至少是在涉及自己最直接的同事和下属的时候。正如罗科索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指出的，斯大林在必要时也很善于采取审慎而耐心的方式，尽管苏联独裁者也可以发脾气，可以使用威胁和侮辱性的语言——这些都属于朱可夫和科涅夫领导方式中的典型做法。

如果与苏联之外的将领相比，他们的许多特点，不管好坏，朱可夫的身上都有。[4] 朱可夫最喜爱的美军将领是艾森豪威尔，这个人和他自己一样，能够有效地管理负责数百万名士兵的庞大而复杂的组织。而两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忠实而有才干、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副手。不过，朱可夫缺乏艾森豪威尔的外交技巧。虽然两人在战后都成功地进入政坛，但事实证明，朱可夫在政治上还比较稚嫩。

巴顿将军由于掌掴两名生病的士兵而出了名——因为他以为他们是在装病。[5] 而现在有报告说，朱可夫偶尔也会打骂自己的部下。他的这种做法是在沙皇军队中养成的，因为这种事情在沙皇军队中司空见惯。巧合的是，巴顿和朱可夫都始终如一地坚持训练，以此来强化战场纪律。两人都崇尚进攻并告诉自己的士兵，要想消灭敌人，就要和他们搏斗。巴顿同朱可夫一样，在战争期间成了传奇人物，深受广大公众及自己士兵的爱戴。这两位指挥官最喜欢做的就是与自己的部队一起行动，而且要尽可能地靠近前线。

另一位深受官兵爱戴和信赖的将领是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朱可夫和蒙哥马利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喜欢对行动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为了保证胜利，两人都会动用大量的资源，集中压倒性优势的兵力。不太走运的是，两人在得到其他高级指挥官的爱戴的同时，也招致自己同侪的嫉妒和敌意。

朱可夫对于德军将领不屑一顾，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的亲纳粹

的政治观点，但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将领激怒了他，因为他们在回忆录中声称：他们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希特勒在战略上的失误、俄国的恶劣天气以及红军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这种数量优势使苏联人承受伤亡的能力大大超过了德国国防军。在朱可夫看来，他们谁都不愿承认，苏军高超的指挥艺术才是他们输掉战争的首要原因。

战争期间，唯一差不多与朱可夫一样有着巨大人气的德军将领是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但隆美尔是个战场上的战术家，而不是个战略家或大规模行动的组织者。在隆美尔最终输掉的北非战役中，他麾下只有少量的兵力。事先精心策划的战役也许并非朱可夫的最强项，但他在哈拉哈河地区和1941年8月叶利尼亚攻势中作战的实施情况，肯定可以比得上隆美尔在北非的成就。还有，隆美尔幸亏没到俄国前线作战，那里可是让许多德军将领折戟沉沙、丢掉自己性命和名声的地方。

能够活下来讲述东线战场的战斗故事的两位德军将领是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和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朱可夫的回忆录中。实际上，他是引用他们书中的内容来佐证自己对历次战役的叙述的真实性。但是，朱可夫在自己的写作中除了一带而过地提到冯·曼施坦因“有胆识”之外，根本没想去评价他们两人的战绩。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古德里安的部队和朱可夫的部队在莫斯科战役中有过正面交锋。古德里安把自己在苏联首都门口的失败归咎于糟糕的天气，但是正如朱可夫喜欢指出的，寒冷的天气对于苏德双方的士兵来说，都是一样的。当德国第6集团军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负责救援的德军指挥官是冯·曼施坦因。尽管那次行动失败了，但后来在掩护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以南的德军撤退时——他们在希特勒夺取苏联巴库油田的行动中失败了——曼施坦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曼施坦因像朱可夫一样，证明了自己不仅长于进攻，而且精于防守。

将朱可夫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进行比较也许是最有趣的。和朱可夫一样，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也被敌人的凶猛攻势打了个措手不及，结果在1941～1942年与日军在菲律宾的作战中连遭败绩，损失惨重。但麦克阿瑟后来又卷土重来，发起了一连串漂亮的两栖作战，夺回了那些岛屿，还有婆罗洲和新几内亚。如果日本人没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及在苏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之后于1945年8月投降认输，麦克阿瑟就会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先锋，从而遇到朱可夫在战争中多次遇到的那种规模的军事考验。与朱可夫一样，麦克阿瑟也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更甚于相信别人，而且也都不愿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朱可夫不像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那样过分，因为后者声称，自己在军事生涯中没有犯过任何重大的错误。

在对这些可与之相比的将领有了大致的了解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朱可夫在军事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但他是二战中综合能力最优秀的将领。他既拥有战斗的勇气，又拥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决心和组织能力。虽然他不能得到自己所有同侪的真心实意的尊重，但他自己的士兵对他不仅仅是畏惧，还有爱戴和信任。遭遇挫败时他就隐忍以待，取得胜利时他就兴高采烈。他有着似乎是无穷的精力和不管困难多大都要取得成功的意志。

战后，这些品质在朱可夫那里再次派上了用场，当时他先后受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人身和政治攻击。两次他都没有灰心，而是决心在失意后东山再起。朱可夫在战后的沉浮，几乎和他在战时的表现一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朱可夫从失败和逆境中胜利归来。

构成朱可夫生活和事业大起大落的背景的，是现已不复存在的苏维埃体制。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拥护这一体制；不管这一体制有什么样的缺陷，它都是他服务与忠诚的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

是由于1991年苏联政权的垮台，人们才有可能剥离种种神话和政治上的歪曲，着手研究并揭示出朱可夫作为一名将军和一个男子汉的真正形象。

后苏联时代的朱可夫传奇还在继续发酵。但是，新的证据材料的出现让我们有可能从经常是平淡无奇的现实中廓清诱人的神话，真正抓住一个从农民的贫苦生活中崛起并成长为伟大的将军和英雄人物的男人身上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这个英雄不仅仅属于俄罗斯人民，还属于所有珍惜他为战胜纳粹德国而做出的无可比拟的贡献的人。

---

[1] Zhukov，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vol.2，pp.474-481.另见*The Memoirs of Marshal Zhukov* （London：Jonathan Cape，1971），pp.690-692。

[2] M.A.Gareev，*Polkovodtsy Pobedy i Ikh Voennoe Nasledie* （Moscow：Isan，2004），pp.125-137.

[3] 关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参见G.Roberts，*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4] 一部为了进行比较而编辑的优秀文集是M.Carver ed.，*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rnsley，U.K.：Pen & Sword，2005）。文集收录了约翰·埃里克森所写的关于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几篇文章。

[5] 在1943年夏天的西西里登陆作战中，巴顿指挥的美国第7集团军损失很大。8月3日，巴顿在战地医院视察时发现，有一位住院士兵身上没有任何外伤。他问这名士兵得了什么病，回答是“烦躁不安”。巴顿听了勃然大怒，以为这位实际上患有战斗疲劳症的士兵是贪生怕死、逃避战斗，于是就又打又骂，把他拖出了帐篷。8月10日，在另一所战地医院，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而且这次巴顿还拔出手枪，扬言要亲手毙掉那名“胆小鬼”。这两起掌掴士兵的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结果，巴顿不但向当事人道了歉，他的职业生涯还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参考文献

档案

Arkhiv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AVPRF—Foreign Policy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isenhower Papers，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Abilene，Kansas

Fond 89：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on Trial（Hoover Institution Microfilm Collection）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RGANI—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Recent History）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Sotsial’no-Politicheskoi Istorii（RGASPI—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al-Political History）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Voennyi Arkhiv（RGVA—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

Volkogonov Papers，Library of Congress，Manuscript Division

报纸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Izvestiya

Komsomol’skaya Pravda

Krasnaya Zvezda （Red Star）

Pravda

公开文件

1941 god ，2 vols. Moscow：Demokratiya，1998.

Georgy Zhukov：*Stenogramma Oktyabr’skogo*（*1957g.*）*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Moscow：Democratiya，2001.

G.K.Zhukov v Bitve pod Moskvoi：*Sbornik Dokumentov* . Moscow：Mosgorarkhiv，1994.

G.K.Zhukov v Stalingradskom Bitve：*Sbornik Dokumentov*. Moscow：Biblioteka，1996.

Glavnyi Voennyi Sovet RKKA，*1938-1941*：*Dokumenty i Materialy* . Moscow：Rosspen，2004.

“Kievskaya Nastupatel’naya Operatsiya v Dokumentakh.”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11，1983.

KPSS o Vooruzhennykh Silakh Sovetskogo Souza：*Dokumenty*，*1917-1968*. Moscow：Voenizdat，1969.

Kurskaya Bitva ，2 vols. Moscow：Olma-Press，2003.

“Marshal G.K.Zhukov：Nastuplenie na Berlin Mogu Nachat 19-

20.2.45.”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2，1995.

Marshal Zhukov：*Moskva v Zhizni i Sud’be Polkovodtsa* . Moscow：Glavarkhiv，2005.

Molotov，*Malenkov*，*Kaganovich*，*1957*：*Stenogramma Iun’skogo Plenuma TsK KPSS i Drugie Dokumenty* . Moscow：Mezhdunarodnyi Fond‘Demokratiya，’1998.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 ，vol.2. Moscow：Rus’，2000.

“Pobeda na Kurskoi Dug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7，1983.

“Podgotovka k Kurskoi Bitve.”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6，1983.

Prezidium TsK KPSS，*1954-1964* ，vols.1 and 2. Moscow：Rosspen，2004，2006.

Reabilitatsiya：*Kak Eto Bylo* ，2 vols. Moscow：Materik，2000，2003.

Reabilitatsiya：*Politicheskie Protsessy*，*30-50-Kh godov* . Moscow：Politizdatel，1991.

Russkii Arkhiv：*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 Moscow：Terra，1993-2000.

Vol.12（1）Nakanune Voiny：Materialy Soveshchaniya Vysshego Rukovodyashchego Sostava RKKA，23-31 Dekabrya 1940g

Vol.13（1）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1937-41，Iunya 1941g

Vol.13（2）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22 Iunya 1941g-1942g

Vol.13（3）Prikazy Narodnogo Komissara Oborony SSSR，1943-1945gg

Vol.14（1）SSSR i Pol’sha，1941-1945：k Istorii Voennogo Souza

Vol.14（2）Krasnaya Armiya v Stranakh Tsentral’noi，Severnoi Evropy i na Balkanakh：Dokumenty i Materialy，1944-1945

Vol.16（1）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

Vol.16（2）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2 god

Vol.16（3）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3 god

Vol.16（4）Stavka VGK：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4-1945gg

Vol.23（1）General’nyi Shtab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1 god

Vol.23（2）General’nyi Shtab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2 god

Vol.23（3）General’nyi Shtab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3 god

Vol.23（4）General’nyi Shtab v Gody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Dokumenty i Materialy 1944-45gg

Sovetskaya Voennaya Administratsiya v Germanii，1945-1949，3 vols.Moscow：*Rosspen*，2004-2006.

Sovetskii Souz i Vengerskii Krizis，*1956 goda.* Moscow：Rosspen，1998.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941-1949*，vol.2. Moscow：*Mezhdunarodnye* Otnosheniya，2000.

Stalingrad，*1942-1943*：*Stalingradskaya Bitva v Dokumentakh. Moscow*： Biblioteka，1995.

Stalingradskaya Bitva，2 vols. Moscow：Olma-Press，2002.

Voennaya Razvedka Informiruet：*Dokumenty Razvedypravleniya Krasnoi Armii*，1939-1941. Moscow：Demokratiya，2008.

von Oppen，B.R.（ed.）. *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1945-1954.*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Zimnyaya Voina”*：*Rabota nad Oshibkami*，*Aprel’-Mai 1940g.* Moscow：Letnii Sad，2004.

参考著作

Georgy Zhukov：*Al’bom.* Moscow：Poligrafresursy，1995.

Isaev，S.I. “Vekhi Frontovogo Put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10，1991.

Marshal Sovetskogo Souza G.K.Zhukov：*Kronika Zhizni*. Moscow：Russkaya Kniga，1998.

Na Priyome u Stalina：*Tetradi*（*Zhurnaly*）*Zapisei Lits*，*Prinyatykh I.V.Stalinym*（*1924-1953*）. Moscow：Novyi Khronograf，2008.

Platanov，S.P.（ed.）. *Vtoraya Mirovaya Voina*，*1939-1945*：*Al'bom Skhem*. Moscow：Voenizdat，1958.

Rzheshevsky，O.A.（ed.）. *Kto Byl Kto v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e*，*1941-1945* . Moscow：Respublika，2000.

Taylor，B. *Barbarossa to Berlin*：*A Chronology of the Campaign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to 1945* ，2 vols. Staplehurst，U.K.：Spellmount，2003-2004.

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gg*：*Kampanii i Strategicheskie Operatsii v Tsifrakh* ，2 vols. Moscow：MVD Rossii/Glavarkhiv Goroda Moskvy，2010.

回忆录

Aleksandrov，I.G.（ed.），*Marshal Zhukov*：*Polkovodets i Chelovek* ，2 vols. Moscow：APN，1988.

Antipenko，N. “Ot Visly do Oder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3，1965.

Bagramyan，I.K. *Tak Shli My k Pobede* . Moscow：Voenizdat，1988.

Bialer，S. *Stalin and His Generals*：*Soviet Military Memoirs of World War* Ⅱ. London：Souvenir Press，1970.

Buchin，A.N. *170000 Kilometrov s G.Zhukovym.* 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4.

Cassidy，H.C. *Moscow Datelin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3.

Chuikov，V.I. *Konets Tret'ego Reikha.* Moscow：Rossiya，1973.

——. *Ot Stalingrada do Berlina* . Moscow：Voenizdat，1980.

"G.K.Zhukov：Iz Neopublikovannykh Vospominanii." *Kommunist* ，no.14，1988.

Griogorenko，P.G. *Memoirs.* New York：Norton，1982.

Gromyko，A. *Memories* . London：Hutchinson，1989.

Khrushchev，Nikita. *Khrushchev Remembers* . London：Sphere，1971.

——. *Khrushchev Remembers*：*The Last Testament* . London：André Deutsch，1974.

Konev，I. *Year of Victory* .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9.

——. *Zapiski Komanduushchego Frontom* . Moscow：Voenizdat，1981.

Kuznetsov，N.G. *Kursom k Pobede* . Moscow：Golos，2000.

——. *Nakanune* . Moscow：Voenizdat，1969.

Main Front：*Soviet Leaders Look Back on World War* Ⅱ . London：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1987.

Malashenko，E.I. “Osobyi Korpus v Ogne Budapesht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s.10-12，1993，no.1，1994.

Mastykina，I. *Zheny i Deti Georgiya Zhukova* . Moscow：Komsomol’skya Pravda，1996. Interviews with Zhukov’s daughters and oth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msomol’skaya Pravda* ，June 7，1996，August 22，1996，September 30，1996，and October 3，1996.

Meretskov，K.A. *Na Sluzhbe Narodu* . Moscow：Politizdat，1968.

——. *Serving the People* .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1.

Mikoyan，A. *Tak Bylo* . Moscow：Vargrius，1999.

Mirkina，A. *Vtoraya Pobeda Marshala Zhukova* . Moscow：Vniigmi-Mtsd，2000.

Moskalenko，K.S. *Na Ugo-Zapadnom Napravlenii* ，2nd.ed.，2 vols. Moscow：Nauka，1975.

Naimark，N.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apa Chetverok ne Lyubil. Dnevnik Smotrel Pridirchivo.” *Izvestiya* ，December 1，2006（Interview with Era and Ella Zhukova）.

Rokossovsky，K. *Soldatskii Dolg* . Moscow：Olma-Press，2002.

——. *A Soldier’s Duty* .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

Samsonov，A.M.（ed.），9 *Maya 1945 goda.* Moscow：Nauka，

1970.

——.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 Moscow：Nauka，1998.

Shtemenko，S. “Kak Planirovalas’Poslednyaya Kampaniya po Razgromu Gitlerovskoi German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5，1965.

——. *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at War*，*1941-1945* ，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1986.

Simonov，K.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 Moscow：APN，1989.

Smirnov，S.S.，et al.（eds.）. *Marshal Zhukov*：*Kakim My Ego Pomnim*. Moscow：Politizdat，1988.

Sudoplatov，P. *Special Tasks*：*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 —A Soviet Spymaster* . London：Warner，1994.

Troyanovsky，O. *Cherez Gody i Rasstoyaniya*. Moscow：Vargrius，1997.

Vasilevsky，A.M. *A Lifelong Caus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1.

Yeremenko，A.I. *Stalingrad*. Moscow：Voenizdat，1961.

——. *V Nachale Voiny* . Moscow：Ast，2006.

Zakharov，M.V. *General’nyi Shtab v Predvoennye Gody* . Moscow：Ast，2005.

Zhukov，G. “Korotke o Staline.” *Pravda*，January 20，1989.

——.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2 vols.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85.

——.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10th and 11th eds.，3 vols.Moscow：APN，1992.

Zhukova，M. *Marshal Zhukov—Moi Otets.* Moscow：Sretenskogo Monastyriya，2005.

二手研究

Abaturov，V. *1941*：*Na Zapanom Napravlenii.* Moscow：Yauza-Eksmo，2007.

Afanas’ev，V.A. *Stanovlenie Polkovodcheskogo Iskusstva G.K.Zhukova.* Moscow：Svyatigor，2006.

Andy，J.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Military：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Khrushchev Era，1953-1964.” U.K.：University of Birmingham，Ph.D.thesis，2011.

Antonov，V.S. “Tri Epizoda iz Memuarov Znamenitogo Polkovodtsa.” *Voprosy Istorii*，no.3，2003.

Astrakhanskii，V.S. “Biblioteka G.K.Zhukova，” *Arkhivno-Informatsionnyi Bulleten*’，no.13，1996.

Axell，A. *Marshal Zhukov*：*The Man Who Beat Hitler.* London：Pearson，2003.

Beevor，A. *Berlin*：*The Downfall 1945*. London：Penguin，2002.

——. *Stalingrad*. London：Penguin，1999.

Bellamy，C. *Absolute War*：*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Macmillan，2007.

Beshanov，V. *God 1942—"Uchebnyi* ." Minsk：Kharvest，2002.

——. *Leningradskaya Oborona*. Minsk：Kharvest，2006.

Bezymenski，L. *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 London：Michael Joseph，1968.

Bitva pod Kurskom. Moscow：Khranitel'，2006.

Bitva za Berlin. Moscow：Ast，2007.

Bitva za Dnepr，*1943g*. Moscow：Khranitel'，2007.

Bitva za Moskvu. Moscow：Moskovskii Pabochii，1968.

Bitva za Moskvu：*Moskovskaya Operatsiya Zapadnogo Fronta*，*16 Noyabrya 1941g.-31 Yanvarya 1942g*. Moscow：Tranzitkniga，2006.

Bobylev，P.N. "K Kakoi Voine Gotovilsya General'nyishtab RKKA v 1941 godu？"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no.5，1995.

Boog，H.，et al.（eds.）.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6. Oxford，U.K.：Clarendon Press，2001.

Braithwaite，R. *Moscow 1941*. New York：Knopf，2006.

Bykov，K. *Khar’kovskii “Kotel” 1942*. Moscow：Yauza-Eksmo，2007.

Carver，M.（ed.）. *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rnsley，U.K.：Pen & Sword，2005.

Chaney，O.P. *Zhukov*，rev.ed.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

Chmielarz，A. “Warsaw Fought Alone：Reflections on Aid to and the Fall of the 1944 Uprising.” *The Polish Review*，vol.39，no.4，1994.

Christensen，S.A.，and F.P.Jensen. “Superpower Under Pressure：The Secret Speech of Minister of Defence Zhukov in East Berlin，March *1957*. www.php.isn.ethz.ch/collections/coll_zhukov.

Chubaryan，A.O.，and H.Shukman（eds.）. *Stalin and the Soviet-Finnish War*，*1939-1940*. London：Frank Cass，2002.

Cocks，P.M. “The Purge of Marshal Zhukov.” *Slavic Review*，vol.22，no.3，1963.

Colton，T.J. “The Zhukov Affair Reconsidered.” *Soviet Studies*，vol.29，April 1977.

Colvin，J. *Nomonhan*. London：Quartet，1999.

——. *Zhukov*：*The Conqueror of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

Coox，A.D. *Nomonhan*：*Japan Against Russia*，*1939*.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Craig，W. *Enemy at the Gates*. 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73.

Daines，V. *Zhukov*. Moscow：Molodaya Gvardia，2005.

——. *Zhukov*：*Rozhdennyi Pobezhdat’*. Moscow：Yauza-Eksmo，2008.

Erickson，J. “Poslednii Shturm：The Soviet Drive to Berlin，1945.” In G.Bennett（ed.），*The End of the War in Europe 1945*. London：HMSO，1996.

——. *The Road to Berlin*.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

——. *The Road to Stalingrad*. New York：Harper & Row，1975.

——. *The Soviet High Command*：*A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y*，*1918-1941*，3rd ed.London：Frank Cass，2001.

——. “Zhukov，” in M.Carver（ed.）. *The War Lords*：*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arnsley，U.K.：Pen & Sword，2005.

Evangelista，M. “*Why Keep Such an Army*？”：*Khrushchev’s Troop Reduction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9，December 1997.

Fainsod，M.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Forster，J. and E.Mawdsley. “Hitler and Stalin in Perspective：Secret Speeches on the Eve of Barbarossa.” *War in History*，vol.11，no.1，2006.

Fugate，B.，and L.Dvoretsky. *Thunder on the Dnepr*：*Zhukov-Stalin and the Defeat of Hitler’s Blitzkrieg*. Novato，Calif.：Presidio，2001.

Fursenko，A.，and T.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New York：Norton，2006.

Gallagher，M.P. *The Soviet History of World War* Ⅱ：*Myths*，*Memories*，*Realities*. New York：Praeger，1963.

——. “Trends in the Soviet Historiograph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J.Keep（ed.），*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 New York：Praeger，1964.

Gareev，M.A. *Polkovodtsy Pobedy i Ikh Voennoe Nasledie*. Moscow：Isan，2004.

Garthoff，R.L.（e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New York：Praeger，1966.

Gerasimova，S. *Rzhev 42*：*Pozitsionnaya Boinya*. Moscow：Yauza-Eksmo，2007.

Getty，J.A.，and R.T.Manning（eds.）. *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Getty，J.Arch，and O.V.Naumov（eds.）. *The Road to Terror*：*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1932-1939*.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Glantz，D.M. *After Stalingrad*：*The Red Army’s Winter Offensive*，*1942-1943*. Solihull，U.K.：Helion，2009.

——. *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1941*. Stroud，U.K.：Tempus，2001.

——. *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

——. *Colossus Reborn*：*The Red Army at War*，*1941-1943.*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5.

——. *Kharkov 1942*：*Anatomy of a Military Disaster Through Soviet Eyes.* Shepperton，U.K.：Ian Allan，1998.

——.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Frank Cass，1989.

——. *Stumbling Colossus*：*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 *Zhukov's Greatest Defeat*：*The Red Army's Epic Disaster in Operation Mars*，*1942.* Shepperton，U.K.：Ian Allan，2000.

Glantz，D.M.，and J.M.House. *Armageddon at Stalingrad.*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9.

——. *The Battle of Kursk.*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

——. *To the Gates of Stalingrad*：*Soviet-German Combat Operations*，*April-August 1942.*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9.

Glantz，D.M.，and H.S.Orenstein. *Belorussia 1944*：*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 London：Frank Cass，2001.

Golovin，M.I. “Uroki Dvukh Operatsii.”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no.1，1988.

Gorodetsky，G. *Grand Delusion*：*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Habeck，M.R. *Storm of Steel*：*The Development of Armour Doctrine in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1919-1939*.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Haslam，J.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1933-1941*. London：Macmillan，1992.

Hayward，J.S.A. *Stopped at Stalingrad*：*The Luftwaffe and Hitler’s Defeat in the East*，*1942-1943*.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Holloway，D. *Stalin and the Bomb*.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Irinarkhov，R.S. *Kievskii Osobyi*. Minsk：Harvest，2006.

Isaev，A. *Berlin 45-go*. Moscow：Yauza-Eksmo，2007.

——. *Georgy Zhukov*. Moscow：Yauza-Eksmo，2006.

——. *Mify i Pravda o Marshale Zhukove*. Moscow：Yauza-Eksmo，2010.

——. *Nastuplenie Marshala Shaposhnikova*. Moscow：Yauza-

Eksmo，2005.

——. *Stalingrad.* Moscow：Yauza-Eksmo，2005.

Jones，M. *Stalingrad*：*How the Red Army Triumphed.* Barnsley，U.K.：Pen & Sword，2007.

——. *Total War*：*From Stalingrad to Berlin.* London：John Murray，2011.

Karpov，V. *Marshal Zhukov*. Moscow：Veche，1994.

Krasnov，V. *Zhukov*：*Marshal Velikoi Imperii.* Moscow：Olma-Press，2000.

Kulikov，V.G. *Tri Marshala Pobedy*. Moscow：RAN，1999.

Kumanev，G.A. *Ryadom so Stalinym.* Moscow：Byliia，1999.

——. *Stalingradskaya Bitva*. Moscow：Bimpa，2007.

Kunitskii，P.T. “Padenie Berlina：Kogda Ona Moglo Sostoyat’sy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9，2006.

Lenson，G. *The Damned Inheritance*：*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nchurian Crisis.* Tallahassee，Fla.：Diplomatic Press，1974.

Le Tissier，T. *Marshal Zhukov at the Oder*. Stroud，U.K.：Sutton，2008.

Lomagin，N. *Neizvestnaya Blokada* ，2 vols. Moscow：Olma-Press，2002.

Mal’kov，V. “Pochemu Marshal Zhukov ne Letal v SSha？” *Sputnik*，no.5，1994.

Mawdsley，E. “Crossing the Rubicon：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December 2003.

——. *December 1941*：*Twelve Days That Began a World War.*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 *Thunder in the East*：*The Nazi-Soviet War*，*1941-1945.* London：Hodder Arnold，2005.

Mel’nikov，V. *Ikh Poslal na Smert’Zhukov*？*Gibel’Armii Generala Efremova.* Moscow：Eksmo，2009.

Mel’tukhov，M. *Upushchennyi Shans Stalina.* Moscow：Veche，2000.

Mertsalov，A.N. “G.K.Zhukov v Publikatsiyakh za period s 1996 do 2001gg.”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nos.5 and 6，2001.

——，and L.A.Mertsalova. *Inoi Zhukov.* Moscow，1996.

Mulligan，T.P. “Spies，Ciphers and‘Zitadelle’：Intelligence and the Battle of Kursk，19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2，1987.

Murphy，R.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New York：Doubleday，1964.

Nagorski，A. *The Greatest Battle.* London：Aurum，2007.

Naumov，V.P. “‘Delo’Marshala G.K.Zhukova，1957g.”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1，2001.

Naveh，S. *In Pursuit of Military Excellence*：*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Theory*. London：Frank Cass，1997.

Nettl，J.P. *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1945-1950*.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Operatsiya “Bagration.” Moscow：Olma-Press，2004.

Pavlenko，N.G. “Razmyshleniya o Sud’be Polkovodsta.” *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nos.10-12，1988.

Pavlov，D.V. *Leningrad v Blokade*. Moscow：Voenizdat，1958.

Pons，S.，and A.Romano（eds.）.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1941-1945*. Milan：Feltrinelli，2000.

Pospelov，P.N.（ed.）. *Istoriya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iny Sovetskogo Souza* ，6 vols.Moscow：Voenizdat，1960-1965.

Read，A.，and D.Fisher. *The Fall of Berlin*. London：Pimlico，2002.

Reese，R.R. *Red Command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Army Officer Corps*，*1918-1991*.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5.

——. *Stalin’s Reluctant Soldie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d Army*，*1925-1941*.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

——. *Why Stalin’s Soldiers Fought*.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1.

Roberts，G. *A Chance for Peace？ The Soviet Campaign to End the Cold War，1953-195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57，December 2008.

——. *Molotov：Stalin's Cold Warrior.* Washington，D.C.：Potomac，2012.

——. *Stalin：His Time and Ours.* Dublin：IAREES，2005.

——. *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 *Victory at Stalingrad：The Battle That Changed History.* London：Pearson/Longman，2002.

Rokossovsky，K.K.（ed.）. *Velikaya Pobeda na Volge.* Moscow：Voenizdat，1965.

Rotundo，L. "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4，1989.

Rotundo，L.（ed.）. *Battle for Stalingrad：The 1943 General Staff Study.* London：Pergamon-Brassey's，1989.

Runov，V.A. *Zhukov protiv Gal'dera.* Moscow：Yauza-Eksmo，2010.

Ryan，C. *The Last Battle.* London：NEL，1968.

Rzheshevsky，O.A. "Poslednii Shturm：Zhukov ili Konev." *Mir Istorii*，http：//gpw.tellur.ru.

——. “Vzyat’Berlin！Novye Dokumenty.”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4，1995.

Safir，V.M. “Novye Mify o Velikoi Otechestvennoi.” *Voenno-Istoricheskii Arkhiv* ，nos.9 and 10，2007.

Salisbury，H. *The 900 Days*：*The Siege of Leningrad.* New York：Harper & Row，1969.

Salisbury，H.（ed.）.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 London：Sphere，1971.

Samuelson，L.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1925-1941.* London：Palgrave，2000.

Scott，H.Fast，and W.F.Scott（eds.）. *The Soviet Art of War.* Boulder，Colo.：Westview，1982.

Shukman，H.（ed.）. *Stalin’s Generals.* London：Phoenix，1997.

Simonov，K. *Tovarishchi po Oruzhiu.* Moscow：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Khudozhestvennoi Literatury，1961.

Sokolov，B.V. *Georgy Zhukov*：*Triumf i Padeniya.* Moscow：Ast，2003.

Sokolovsky，V.D.（ed.）. *Voennaya Strategiya.* Moscow：Voenizdat，1962.

Spahr，W.J. *Stalin’s Lieutenants*：*A Study of Command Under Stress.* Novato，Calif.：Presidio，1997.

——. *Zhukov*：*The Rise and Fall of a Great Captain.* Novato，Calif.：Presidio，1993.

Stalingradskaya Epopeya. Moscow：Nauka，1968.

Stoecker，S.W. *Forging Stalin’s Army*：*Marshal Tukhachevsky and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Boulder，Colo.：Westview，1998.

Stone，D.R. *Hammer and Rifle*：*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1926-1933.*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0.

Stone，D.R.（ed.）. *The Soviet Union at War.* Barnsley，U.K.：Pen & Sword，2011.

Suvorov，V. *Beru Svoi Slova Obratno.* Donetsk：Harvest，2005.

——. *The Chief Culprit*：*Stalin’s Grand Design to Start World War* Ⅱ.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8.

——. *Icebreaker*：*Who Starte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Hamish Hamilton，1990.

——. *Ten’Pobedy.* Donetsk：Harvest，2003.

Sverdlov，F.D. *Oshibki G.K.Zhukova*（*god 1942*）. Moscow：Monolit，2002.

Taubman，W. *Khrushchev*：*The Man and His Era.* London：Simon & Schuster，2003.

Taylor，T.H. *Behind Hitler’s Lines.* New York：Ballantine，2004.

Tlas，Marshal M.G. *K.Zhukov*：*Polkovodets*，*Strateg*. Moscow：Leksika，1991.

Trevor-Roper，H.R. *Hitler's War Directives*，*1939-1945*. 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64.

Tucker-Jones，A. *Stalin's Revenge*：*Operation Bagration and the Annihilation of Army Group Centre*. Barnsley，U.K.：Pen & Sword，2009.

Ustinov，D.F.（ed.）. *Istoriya Vtoroi Mirovoi Voiny*，*1939-1945*，12 vols. Moscow：Voenizdat，1973-1978.

von Hagen，M.，*Soldiers in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The Red Army and the Soviet Socialist State*，*1917-1930*.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Vorob'ev，F.D.，et al. *Poslednii Shturm*（*Berlinskaya Operatsiya 1945g*）. Moscow：Voenizdat，1970.

Vorotnikov，M.F. *G.K.Zhukov na Khalkhin-Gole*. Omsk：OKI，1989.

Weeks，A.L. *Stalin's Other War*：*Soviet Grand Strategy*，*1939-1941*.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2.

Werth，A. *Russia at War*，*1941-1945*. London：Pan，1965.

——. *The Year of Stalingrad*. London：Hamish Hamilton，1946.

Yakovlev，N. *Zhukov*. Moscow：Molodaya Gvardiya，1992.

Yarushina，L.V. *Tri Marshala Pobedy*. Moscow：RAN，1999.

Zamulin，V. *Demolishing the Myth*：*The Tank Battle at Prokhorovka.* Solihull，U.K.：Helion，2011.

Zav’yalov，A.S.，and T.E.Kalyanin. *Vostochno—Pomeranskaya Operatsiya.* Moscow：Voenizdat，1960.

Zhuk，U.A. *Neizvestnye Stranitsy Bitvy za Moskvu.* Moscow：Khranitel’，2005.

Zolotarev，V.A.，and G.N.Sevast’yanov（eds.）. *Velikaya Otechestvennaya Voina*，*1941-1945.* 4 vols.Moscow：Nauka，1998-1999.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阿巴库莫夫，维克托（Abakumov，Viktor） 245，249，250

非洲军团（Afrika Korps） 171

农业集体化（agriculture，collectivization of） 29～30

AK-47 自动步枪 74

阿尔巴尼亚（Albania） 281，282

亚历山大一世，俄国沙皇（Alexander I，Tsar of Russia） 4，251

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CC） 231，236～237，261，265

反共（anticommunism） 44

安季片科，A.N.（Antipenko，A.N.） 298～299

反苏（anti-Sovietism） 44

安东诺夫，A.I.（Antonov，A.I.） 185～186，197，200，205，214，215，223，231，235，280

安东诺夫，A.S.（Antonov，A.S.） 25

俄罗斯新闻出版社（APN） 296，297，299

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Armenia，nationalist movement in） 34

军备控制（arms control） 262～263

军备竞赛（arms race） 261，264

A集团军群（德军） 157，173

B集团军群（德军） 157～158

中央集团军群（德军） 101，113，143，144，145～147，148，155，169，170，173，188，199～205，312

消灭 206

重建 206

北方集团军群（德军） 101，125，133，175，312

南方集团军群（德军） 101，112～113，156～160，170，173，188，193，199

逮捕 30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 115

原子武器 231，235，236，256，257，261，262，264，270，276

奥斯维辛（Auschwitz） 241

澳大利亚（Australia） 197

奥地利（Austria） 241，273

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 18

奥地利国家条约（Austrian State Treaty）273

“飞行员事件”（Aviators Affair）245，271

娘子谷（Babi yar）196～197

细菌武器 270

巴格拉米扬，伊万·K.（Bagramyan，Ivan K.） 33，34，77，78，104，151，152，203，234，280，298，299，301

“巴格拉季昂行动”（Bagration，Operation） 5，199～205，201，207，211，313

巴库（Baku） 5，133，154，157，159，317

巴尔干半岛各国（Balkans） 76

波罗的海方面军（Baltic Front） 200

波罗的海特别军区（Baltic Special Military District） 91

“巴巴罗萨行动”（Barbarossa，Operation） 89，90，100～114，102，106，134，147，153，154，316

巴拉诺维奇（Baronovichi） 200

巴托夫，P.I.（Batov，P.I.） 203

英国广播公司（BBC） 70

别多夫，尼古拉（Bedov，Nikolai） 182

比利时（Belgium） 18，79

别尔哥罗德（Belgorod） 191

贝尔格莱德（Belgrade） 205

贝拉米，克里斯（Bellamy，Chris） 229

白俄罗斯（Belorussia） 5，41，75，199～205

白俄罗斯方面军（Belorussian Front） 193

白俄罗斯特别军区（Belorussian Military District） 28，41～43，48，53，71，85

别洛夫，P.A.（Belov，P.A.） 148

贝乌热茨（Belzec） 241

贝利亚，拉夫连季（Beria，Lavrenty） 244，246，250，255，259，284

柏林（Berlin） 8，9，206，218，237，287

轰炸 224，229

防御 226

苏军最终对柏林发起的强攻 5，136，213，214，222～233，

225，246

各占领区 231，232

人口 224，226

别沙诺夫，弗拉基米尔（Beshanov，Vladimir） 133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73，76

拜尔勒，约翰（Beyrle，John） 222

拜尔勒，约瑟夫·R.（Beyrle，Joseph R.） 221，222

闪电战（Blitzkrieg） 37，66，70，79，87

“督战队”（“blocking detachments”） 110

“蓝色行动”（Blue，Operation） 156～160，173

西班牙“蓝色师”（Blue Division，Spanish） 101

布柳赫尔，V.K.（Blukher，V.K.） 44，45

波格丹诺夫，M.A.（Bogdanov，M.A.） 55

波伦，查尔斯（Bohlen，Charles） 264，265

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 20，21，24，28，29，33，46，50，108，258，259

强制集体化 29，30

更名 28

　农民暴动 25

鲍尔京，E.A.（Boltin，E.A.） 292

鲍尔曼，马丁（Bormann，Martin） 230

婆罗洲（Borneo） 317

《军队大脑》（沙波什尼科夫） 74，75

突防进攻（breakthrough attacks） 80

布雷斯劳（Breslau） 76，214

布列斯特（Brest） 200

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 22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Brezhnev，Leonid） 10，291，292，294，298～304

布良斯克（Briansk） 133，137

布良斯克方面军（Briansk Front） 188

布罗茨基，约瑟夫（Brodsky，Joseph） 303，304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205

布钦，亚历山大（Buchin，Alexander） 182，184，188

布达佩斯（Budapest） 205，273～275

布琼尼，谢苗（Budenny，Semyon） 40，44，88，108，135，

234，244

布尔加宁，尼古拉（Bulganin，Nikolai） 242～244，246～248，250，255～258，265，275，279～281

保加利亚（Bulgaria） 18，171，211，238

“突出部之战”（Bulge，Battle of the） 216

缅甸（Burma） 275，276，281

贝切夫斯基，B.V.（Bychevskii，B.V.） 129，130

加拿大（Canada） 197

坎尼（Cannae） 62，276

《资本论》（马克思） 43

喀尔巴阡军区（Carpathian Mountain District） 256，275

卡西迪，亨利·C.（Cassidy，Henry C.） 115

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 76，154，156

骑兵监察部（Cavalry Inspectorate） 40，41，48

书刊影视审查官（censors） 299，300

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7，88，247，251，279，280，282，300

中央方面军（Central Front） 184～199

中心工业区（Central Industrial Region） 15，16

哈尔杰伊，叶夫根尼（Chaldei，Yevgeni） 229

钱尼，奥托·普林斯顿（Chaney，Otto Preston） 62

“当代进攻战的特点”（朱可夫） 77，78

恰谢奇娜娅（Chashechnaya）（马的名字） 19

车臣（Chechnya） 157

海乌姆诺（Chelmno） 241

化学武器（chemical weapons） 270

“切尔尼格夫—波尔塔瓦行动”（Chernigov-Poltava operation） 195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D.（Chernyakhovsky，I.D.） 214～216

中国（China） 49，266，282，295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需物资 51，52

中东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 50，51

奇尔河（Chir River） 171

崔可夫，瓦西里（Chuikov，Vasily） 164，165，219～221，286

丘吉尔，温斯顿（Churchill，Winston） 8，162～164，197，202，209，235～237

“铁幕演说” 238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289

“堡垒行动”（Citadel，Operation） 188～190

克林顿，比尔（Clinton，Bill） 222

冷战（Cold War） 261～263，266

集体安全体系（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s） 266，268

多兵种联合作战（combined arms operations） 37～39，61，62

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 51，96，229

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27，31，40，70，236，242，259

预备党员 23

与集体化 30

苏共十八大 88

党内清洗 46

苏共二十大 123

《战友》（西蒙诺夫） 64

“在与德国及其盟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对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若干考虑” 92，93

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 21

库克斯，阿尔文·D.（Coox，Alvin D.） 62

哥萨克（Cossacks） 23

因怯战而处决 54

怯战分子（cowards） 110，126，138

克里米亚（Crimea） 25，133，156，157，186

克罗地亚（Croatia） 101

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 238

但泽（Danzig） 214

诺曼底登陆日（D-Day） 202

迪恩，约翰（Deane，John） 237

德波林，G.A.（Deborin，G.A.） 299

国防人民委员部（Defense Commissariat） 105，108

　作训处 40

杰缅斯克突出部（Demyansk salient） 177

驱逐 30

逃兵 110

杰斯纳河（Desna River） 113，115

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 259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吉（Dimitrov，Georgy） 96，229

45号令 157

裁军 266

第聂伯河（Dnepr River） 152，193，195，196

德涅斯特河（Dnestr River） 19，199

顿涅茨盆地（Donets Basin） 156

顿河方面军（Don Front） 170，171

顿河（Don River） 156，157，159

顿斯科伊，德米特里（Donskoy，Dimitry） 139

德累斯顿（Dresden） 222，223

东普鲁士（East Prussia） 205，210，214，218

教育 15

叶夫列莫夫，M.G.（Efremov，M.G.） 148

埃及（Egypt） 274

第8近卫集团军 219

艾森豪威尔，德怀特（Eisenhower，Dwight） 8，33，222，223，236～239，261，263～268，283，289，314，315

艾森豪威尔，约翰（Eisenhower，John） 237

易北河（Elbe River） 223，229

埃尔勃鲁斯峰（Elbruz，Mount） 157

第11集团军（德军） 155，156

第11骑兵军 148

包围战 197，198

爱尔福特（Erfurt） 222，223

埃里克森，约翰（Erickson，John） 9，133，164，205，228

爱沙尼亚（Estonia） 65

　苏联占领爱沙尼亚 89

叶夫根尼娅，克拉夫季娅（Evgeniya，Klavdiya） 297

处决 30，279，313

灭绝营 240，241

饥荒 30

远东集团军 52

费久宁斯基，I.I.（Feduninskii，I.I.） 129

费克连科，N.V.（Feklenko，N.V.） 48，64

第5骑兵军 73，74

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 189

第5预备骑兵团 19

第57特别军 48，52～54，80

芬兰（Finland） 65，69，71，72，75，92，98，103，126，171，200，205

另见 苏芬战争

第1集团军群 55，59，65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 200，202，203，205～207，211，212，214，218，219，221，223，224，240，293

第1骑兵集团军 40

第1骑兵军 148

第1骑兵团 25

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 221

第1机械化军 80

莫斯科第1骑兵师 23，31

波兰第1集团军 206，207

第1突击集团军 177

乌克兰第1方面军 196，198～200，204，211，214，218，223，

224，230，241

食物短缺 20

外交部（Foreign Ministry） 236

“四指半”（军士） 19

第4（伏罗希洛夫）骑兵师 41～43

第4顿河哥萨克师 41

第4机械化团 42

乌克兰第4方面军 214

第14骑兵独立旅 25

第43集团军 115

法国（France） 7，18，28，49，65，66，79，81，89，134，162，197，202，263，274

弗朗哥，弗朗西斯科（Franco，Francisco） 38

奥德河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on-Oder） 222

弗朗茨·费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Archduke） 18

腓特烈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Frederick I，Holy Roman Emperor） 101

《苏联元帅G.K.朱可夫对印度和缅甸的友好访问》 276

方面军群（Front Group） 54，55，62

伏龙芝，米哈伊尔·V.（Frunze，Mikhail V.） 30，31，35，37，256

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 35，36，39，211

第41号元首令 155

弗伊高地（Fui Heights） 57

加列耶夫，M.A.（Gareev，M.A.） 310，311

总参谋部 76，90，100，120，153，165，185，197，200，215，222，242，272，285，314

反攻的重点 119，121

采取的防御性战略 150

“1941年动员计划” 91，92

给斯大林的汇报 124

军演 82～86，104

朱可夫任总参谋长 87，88～98，110，111，118，120，121，123，124

总参军事学院（General Staff Academy） 34，88

日内瓦大国峰会 7，8，263～268，283

格拉西莫夫，A.G.（Gerasimov，A.G.） 138

德国（Germany） 37，44，45，49，64，65，67

同盟国在德国的各占领区 232，236

德军各师 231

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51

可能对德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77

入侵前的准备 90～92，98～100

重新统一 266，268

入侵俄国 4，87，89，90，100～114，125

苏德合作 88，89

苏联攻入德国本土 211，213～243

苏德和约（1918） 50

苏联军演中的德国 85

苏联战争计划中的德国 75，76

德国的战略目标 101

德军的夏季作战 156～160，158

德国的毁灭战计划 101，103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 18，22

东德（Germany，East） 268，276

西德（Germany，West） 263

国防委员会（GKO） 108，110，137

格兰茨，大卫（Glantz，David） 133，169，170，175

公开透明（Glasnost） 305

戈培尔，约瑟夫（Goebbels，Joseph） 230

戈利科夫，菲利普·I.（Golikov，Filipp I.） 244

情报报告 90，91

哥穆尔卡，瓦迪斯瓦夫（Gomulka，Wladyslaw） 272，273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Gorbachev，Mikhail） 305

戈尔多夫，V.N.（Gordov，V.N.） 159，165，250

戈沃罗夫，L.A.（Govorov，L.A.） 36，244

英国（Great Britain） 7，18，28，65，66，89，92，100，135，162，171，197，263，274

与华沙起义 209，210

伟大的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

参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7，251

大恐怖（Great Terror） 45～47，269

格列奇科，A.A.（Grechko，A.A.） 10，299，303

格里戈里耶夫，U.（Grigoriev，U.） 306

葛罗米柯，安德烈（Gromyko，Andrei） 267，278

格罗兹尼（Grozny） 157

格鲁乌（总参军情总局）（GRU） 90，91，97，99

古德里安，海因茨（Guderian，Heinz） 113，316

古拉格 259

哈马尔达巴（Hamar Daba） 57

汉尼拔（Hannibal） 62，275，276

哈里曼，埃夫里尔（Harriman，Averell） 215，223

氢弹 256

赫尔辛基（Helsinki） 69

高级骑兵学校 33～35

最高军事委员会（Higher Military Council） 244，245

广岛（Hiroshima） 231，317

《伟大的卫国战争史》 291，293

希特勒，阿道夫（Hitler，Adolf） 4～5，18，44，65，66，70，73，76，77，87，113，123，126，153，154，159，189，228，265

第45号令 157

与入侵俄国 100，101，103

与斯大林 89

自杀 213，230

夏季攻势中多路出击 159

宣战 155

荷兰（Holland） 79

Holland & Holland公司 249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103，241

霍查，恩维尔（Hoxha，Enver） 282

匈牙利（Hungary） 92，101，171，238，272～277

苏联在匈牙利的驻军 273

印度（India） 275，276，281

工业化 29，44

通货膨胀 20

政治委员制度 162

以色列（Israel） 274

伊斯特拉（Istra） 138，143

伊斯特拉河（Istra River） 141

意大利（Italy） 18，67，89，101，171

硫磺岛（Iwo Jima） 229

日本（Japan） 18，28，48，67，135，155，215，231，233，235，317

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51

入侵中国 51，52

入侵满洲 44

北进战略 65

拒绝苏联主动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 51

与俄国的竞争 49～52

南进战略 64，65

偷袭俄国舰队 50

犹太人（Jews） 196，197，241

德国处决犹太人 103，123

1914年“7月危机” 18，118

“木星行动”（Jupiter，Operation） 173，174

卡达尔·亚诺什（Janos Kadar） 275

卡冈诺维奇，拉扎（Kaganovich，Lazar） 269，272，278～280，298

卡拉什尼科夫，米哈伊尔（Kalashnikov，Mikhail） 74

加里宁涅茨（Kalinin） 137

加里宁方面军（Kalinin Front） 135，143，145，147，148，150，169

卡卢加省（Kaluga Province） 14，15，19

卡图科夫同志（Katukov，Comrade） 183，184

卡廷大屠杀（Katyn Massacre） 259

卡扎克维奇，埃玛努伊尔（Kazakevich，Emmanuil） 252

凯特尔，威廉（Keitel，Wilhelm） 230，231

刻赤半岛（Kerch Peninsula） 155，156

克格勃（KGB） 281，291

海拉斯台音河（Khailastyn-Gol River） 56，57，59

哈拉哈河（Khalkhin-Gol） 47，48～66，71，78～80，85，115，

121，133，233，273，276，293

哈尔科夫（Kharkov） 19，150～153，159，173，177，191，193，196，286

哈桑湖（Khasan，Lake） 52，59

霍津，M.S.（Khozin，M.S.） 129，175

赫鲁晓夫，尼基塔（Khrushchev，Nikita） 5，7，9，74，104，114，168，169，185，195，215，254，255，258～260，268，272，275，277～282，292，293，298，317

试图发动的反赫鲁晓夫政变 278，279

对朱可夫的批判 284，285

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 289

与日内瓦峰会 263～265

与哈尔科夫惨败 151，152

回忆录 294

与莫洛托夫的争斗 268，269

反对赫鲁晓夫 277，278

二十大“秘密报告” 123，151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269，270，272，273

对斯大林的批评 123，151

与苏伊士运河危机 274

削减军队 262

对朱可夫的批评 118

解除朱可夫的职务 8，136，285，288，289，291

基辅（Kiev） 5，75，87，101，104，129，137，152，195，196，286

惨败 196，197

撤离 111～114

陷落 133

基辅特别军区（Kiev Special Military District） 34，69，71，85，91，260

存在的问题 72，73

与苏联的战争计划 76，77

朱可夫在基辅军区 72～74

基洛夫，谢尔盖（Kirov，Sergey） 45，46

基尔波诺斯，M.P.（Kirponos，M.P.） 113

克林（Klin） 138

克雷科夫，V.M.（Klykov，V.M.） 306

科科列夫，P.I.（Kokorev，P.I.） 129

高尔察克，亚历山大（Kolchak，Alexander） 23

《共产主义者》（Kommunist） 298，300

科莫洛夫，V.G.（Komolov，V.G.） 299

科涅夫，I.S.（Konev，I.S.） 129，135，136，143，145，150，164，187，198～200，204，211，234，241，244，246，256，272，280，283，285～287，292，294，315

与进攻德国本土 214

回忆录 223

争先向柏林进军 222～233

与“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 216，218，221

与“旋风行动” 275

作为朱可夫的竞争对手 136，137

哥尼斯堡（Königsberg） 214

朝鲜（Korea） 49～51

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突出部（Korsun-Shevchenkovskii salient） 198，199

克拉科夫（Krakow） 76

《红星报》（Krasnaya Zvezda） 59，137，161，199

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 25

基尔沃亚河（Krivaya River） 171

克罗尼克，A.L.（Kronik，A.L.） 33

克留科夫，V.V.（Krukov，V.V.） 6，248，250，291

库班（Kuban） 160

“古比雪夫号”巡洋舰（Kuibyshev） 281

库利克，G.I.（Kulik，G.I.） 54，55

库尔斯克（Kursk） 5，9，177，178，184～193，261

　苏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 191～193

库谢夫（Kushchev）（参谋长） 53

科斯琴（Kustrin） 218，222，227，228

库图佐夫，米哈伊尔（Kutuzov，Mikhail） 4，140，145

“库图佐夫行动”（Kutuzov，Operation） 191，193

库兹涅佐夫，N.G.（Kuznetsov，N.G.） 281

关东军（Kwantung Army） 51，52，56，63，64，231

拉多加湖（Ladoga，Lake） 128，129，134

拉脱维亚（Latvia） 65，75

苏联对拉脱维亚的占领 89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67

“生存空间”（Lebensraum） 44，89

莱比锡（Leipzig） 222，223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Lenin，Vladimir Ilyich） 20，22，31，43

列宁格勒（Leningrad） 4，20，21，36，75，87，101，118，164，293

列宁格勒战役 125～134

伤亡 134

兵力 131

德军向列宁格勒的推进 127

列宁格勒方面军（Leningrad Front） 128，175，200

列宁格勒军区（Leningrad Military District） 69，80

辽东半岛（Liaodong Peninsula） 49

李斯特，威廉（List，Wilhelm） 157

《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 298

立陶宛（Lithuania） 65，75，200

苏联对立陶宛的占领 89

《伦敦新闻画报》（London Illustrated News） 144

洛瓦季河（Lovat River） 177

卢贝，马里努斯·范·德（Lubbe，Marinus van der） 228，229

吕本（Lübben） 223～224

卢布林（Lublin） 76，104

纳粹德国空军（Luftwaffe） 131，156，165，206

柳捷日（Lutezh） 196

利沃夫（Lvov） 200

“利沃夫—桑多梅日行动”（Lvov-Sandomierz operation） 204

麦克阿瑟，道格拉斯（MacArthur，Douglas） 317

迈科普油田（Maikop oilfield） 157

总军事委员会（Main Military Council） 70

马拉申科，E.I.（Malashenko，E.I.） 273

马林科夫，格奥尔吉（Malenkov，Georgy） 244，254，255，258，269，278，280，298

马利诺夫斯基，罗季翁（Malinovsky，Rodion） 283，286，287，291，292

满洲国（Manchukuo） 51，52

满洲（Manchuria） 44，49～52，215，231，232，235，317

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 Line） 67，69

“火星行动”（Mars，Operation） 147～149，169，173，174，177，312

《朱可夫元帅的最伟大的战役》 9

“常胜元帅” 295，310

马克思，卡尔（Marx，Karl） 43

“欺骗”（maskirovka） 56，171，187

大屠杀 196，197

莫兹利，埃文（Mawdsley，Evan） 96，98，133，193

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Mayakovsky metro station） 139

五一游行 244

朱可夫与西方媒体 144，145

《我的奋斗》（希特勒） 44

梅赫利斯，列夫（Mekhlis，Lev） 110

梅农，K.P.S.（Menon，K.P.S.） 289

米里什科，阿纳托利（Mereshko，Anatoly） 227，228

梅列茨科夫，基里尔·A.（Meretskov，Kiril A.） 69，75，76，78，81，82，85，86，120，234，280

被逮捕 107

米哈伊尔大公（Michael，Grand Duke） 20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Mikoyan，Anastas） 105，107，265，272，278

《军事战略》（索科洛夫斯基） 293

米宁，库兹马（Minin，Kurma） 139，140

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245，249

明斯克（Minsk） 35，75，101，105，137，200，204

米努克，L.F.（Minuk，L.F.） 42

米尔基娜，安娜（Mirkina，Anna） 296，297

战地临时妻子（mobile field wife） 183，184

摩尔多瓦（Moldova） 19，73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Molotov，Vyacheslav） 8，89，107，128，162，163，235，244，246，254，255，258，263，268，269，272，278～280，298

与希特勒的谈判 89

蒙古（Mongolia） 52，65

蒙哥马利，伯纳德（Montgomery，Bernard） 316

莫斯科（Moscow） 4，7，9，16，75，77，87，101，118，125，155，159，233

莫斯科保卫战 134～153，161，164，178，260，261，296

兵力 144，147

德军的推进 126，133

“勒热夫—维亚济马行动” 145～150，312

朱可夫的反攻 143～146

朱可夫的通告 138

莫斯科国立大学 253

莫斯科作家俱乐部 295

莫斯卡连科，K.S.（Moskalenko，K.S.） 151，287

莫扎伊斯克防线（Mozhaisk Line） 137

“1941年动员计划”（Mobilizatsionnyi Plan 1941） 91，92

墨索里尼，贝尼托（Mussolini，Benito） 89，171

长崎（Nagasaki） 231，317

伊姆雷，纳吉（Nagy，Imre） 274，275

拿破仑一世，法国皇帝（Napoleon I，Emperor of France） 4，145

纳尔瓦（Narva） 175

北约（NATO） 263，276，277

纳粹种族主义 103，123

苏德条约（1939） 64，65，73，88，89，99

涅夫斯基，亚历山大（Nevsky，Alexander） 139

新几内亚（New Guinea） 317

尼古拉二世，沙皇（Nicholas II，Tsar） 20，21，50

内部人民委员部（NKVD） 110

盟军进攻北非 163，171，316

北布科维纳（North Bukovina） 73

北方方面军（Northern Front） 126

西北战略方向（Northwestern Direction） 108，126，128

西南方面军（Northwestern Front） 126，175

“为G.K.朱可夫传记而准备的笔记”（西蒙诺夫） 305

诺维科夫，A.A.（Novikov，A.A.） 245～247

俄罗斯新闻出版社（Novosti press agency） 296

奥德河（Oder River） 214，218

敖德萨军区（Odessa Military District） 5，6，73，183，245，247

石油 76，156

油田 5，133，154，157，317

一长制 31，69，70，288

“朱可夫之死”（布罗茨基） 303，304

“开放天空” 283，285

作战艺术 37，293

第270号命令 110

“红旗勋章” 25，33

奥廖尔突出部 191

奥滕贝格，大卫（Ortenberg，David） 137，138

外蒙古（Outer Mongolia） 52

德军装甲师 70，81

游击队员 187，203，204

苏共全国代表大会：

第十九次 251

第二十次 268～272，279

第二十一次 292

第二十二次 292

第二十四次 305

爱国主义（patriotism） 161

巴顿，乔治·S.（Patton，George S.） 33，235，315

保卢斯，弗里德里希（Paulus，Friedrich） 164，171，173，204

帕夫连科，N.G.（Pavlenko，N.G.） 305

巴甫洛夫，D.G.（Pavlov，D.G.） 78，79，81，98，105，136，270～272

军演 82～86

偷袭珍珠港 64，135，155，231

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 30

北平（Peking） 51

惩戒营（penal battalions） 313

外交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Foreign Affairs） 210

佩尔胡什金（Perkhushkin） 179

彼得格勒（Petrograd）

参见 列宁格勒

菲律宾（Philippines） 317

飞机 36

波兰（Poland） 65，72，75～77，79，81，89，92，205～212，238，272～274

波兰境内的灭绝营 240，241

波兰游击队 207

苏联进攻波兰 71

“北极星行动”（Polar Star，Operation） 175～177，312

波兰家乡军（Polish Home Army，AK） 207，209，210

政治局（Politburo） 88，249

政委（political commissars） 31，45，70，162，259，288

波美拉尼亚（Pomerania） 218，219，221，293

波波夫，M.M.（Popov，M.M.） 128

亚瑟港（旅顺） 49，50

朴茨茅斯条约 50

波茨坦会议 235，236，239，263

波扎尔斯基，德米特里（Pozharsky，Dimitry） 139，140

波兹南（Poznan） 214，216

布拉格（Praga） 206，207

《真理报》（Pravda） 7，71，72，95，136，137，242，250，251，254，268，282，287，292，302，303

苏共中央主席团（Presidium） 258，270，273，274，277～280，291

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yat Marshes） 75，101

德国对待战俘的方式 103

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 189

宣传（propaganda） 70，161，288

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21

普鲁士（Prussia） 76

普斯科夫（Pskov） 175

布匿战争（Punic Wars） 62

普尔卡耶夫，M.A.（Purkaev，M.A.） 78，100

英国皇家空军（RAF） 224，229

“烂路季节”（Rasputitsa） 138，139，184

红军空军（Red Air Force） 53，107，108，165，206，245，271

红军（Red Army） 4，13，36，101，147

取消军衔 24

盟军向红军提供的物资 197

装甲部队指导委员 81

红军的暴行 239～243

在莫斯科战役中 134～153

与乌克兰战役 193～199

扩军 91，92，97，98

职业军官 29，161，162

伤亡 87

柏林战役中的伤亡 230

红军中的骑兵帮 70

与集体化 30

在红军中允许存在的创造性 31

大纵深战役和大纵深作战理论 36～39，42，119

防御能力不足 119，120

防御战略 150

初期的失利 87

创建 22

未进行充分的动员 118，119

芬兰战役 65，66

恢复将军军衔 69

与德军的夏季攻势 156～160

对红军的美化 255，256

总政治局（GPU） 108，110

统帅部 119

西班牙内战的影响 38，39

红军中的军事委员制 110

与进攻德国本土 213～243

在刻赤半岛 155，156

在哈拉哈河 55～66

在库尔斯克 184～193

哈桑湖战役 52，53

列宁格勒保卫战 126

机械化军 37，39，62，70，81，92，111

战地临时妻子 183，184

20世纪30年代的扩军 43，44

偏好进攻的作战思想 93～95，111，119，121

作战思想 38，39

与“巴格拉季昂行动” 199～205

与“巴巴罗萨行动” 154

与第270号命令 110

党对军队的控制 288

“北极星行动”的损失 177

政委 31，45，110

对红军的政治控制 108，110

内战后的复员 27，30

内战后的重组 30，31

职业军人构成的核心力量 30

预计的损失 85

恢复军衔制 44

改革 69，70，96

步兵师 111

规模 92，

南方攻势 5

斯大林担任红军的最高统帅 108，110

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损失 173

斯大林对红军的清洗 43，45～47，107，108，269，304

与战略进攻 79，80

架构 30，108～110

补给线 206

坦克师 111

地方师 30，43

入伍人员在红军中的待遇 29

削减部队人数 261，262

战争计划 74～77，90，92，93，104

华沙攻势 205～212

与战争恐慌 29

与“冬季战争” 67～69

叶利尼亚攻势 114～121

另见 历次战役

红军骑兵指挥员培训班 24，27

赤卫队（Red Guards） 33

《对一位指挥官命运的反思》（帕夫连科） 305

雷根斯堡—林茨（Regensburg-Linz） 222

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 213，228～230

战争赔偿 236，239

预备队方面军（Reserve Front） 87，112，115，117，135

罗科索夫斯基，康斯坦丁·K.（Rokossovsky，Konstantin K.） 3，11，33，34，45，69，70，72～74，140，141，143，170，171，173，195，200，206，207，211，212，234，244，246，247，251，272，273，280，286，293，298，311，315

对朱可夫的评价 39，40

与进攻德国本土 214，224

在库尔斯克 187，188

与“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 216，218，221

与华沙起义 207～210

罗曼年科，P.L.（Romanenko，P.L.） 80

罗马尼亚（Romania） 73，76，89，92，98，103，171，199，238

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 20，21

隆美尔，埃尔温（Rommel，Erwin） 171，316

罗斯福，富兰克林·D.（Roosevelt，Franklin D.） 162，197，202，209，231

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 133，157，160，173

罗特米斯特罗夫，P.A.（Rotmistrov，P.A.） 189

鲁尔区（Ruhr） 222

“鲁缅采夫行动”（Rumiantsev，Operation） 191，193

鲁斯拉诺娃，利季娅·安德烈耶夫娜（Ruslanova，Lidiya Andreevna） 6，248，250，291

沙俄（Russia，Tsarist） 15

农民的生活 1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俄国 18

俄罗斯军事科学院（Russian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310

俄国内战（Russian Civil War） 13，21～25，27，28，33，34，36，40，50，69，78，108，122，259

俄罗斯军事历史档案馆（Russian Military History Archive） 119

俄罗斯东正教（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4，15

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13，20～21，34，50，309

1904～1905年的俄日战争 50，63，215

1919～1920年的俄波战争 65

瑞安，科尼利厄斯（Ryan，Cornelius） 8

雷巴利琴科将军（Rybalchenko，General） 250

雷巴尔科，帕维尔（Rybalko，Pavel） 244，250

雷恰戈夫，P.V.（Rychagov，P.V.） 78

勒热夫（Rzhev） 145～150

训练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人员的学校（saboteurs school） 284

圣乔治十字勋章（St.George Cross） 19

圣彼得堡

参见 列宁格勒

萨哈林岛（Sakhalin island） 50

突出部，得以确定的（salient，defined） 185

索尔兹伯里，哈里森·E.（Salisbury，Harrison E.） 9

“土星行动”（Saturn，Operation） 171，173，174

施韦特（Schwedt） 222

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 155，156

　德军强攻 156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200，202，211，214，221，224

第2骑兵旅 39

莫斯科第2步兵旅 24，25

德国第2装甲集团军 113

第2坦克集团军 206

乌克兰第2方面军 198，199，214

“第二战场”（Second Front） 162，163，202

泽洛高地（Seelow Heights） 227，228

谢莫奇金，A.S.（Semochkin，A.S.） 183，249，250

塞尔维亚（Serbia） 18

谢尔普霍夫（Serpukhov） 138

《红军骑兵勤务条例》 41

第7集团军 67，69

第7萨玛拉骑兵师 32，35，39

第17集团军（德国） 186，187

沙巴罗夫，G.F.（Shabalov，G.F.） 138

上海（Shanghai） 51

沙波什尼科夫，鲍里斯（Shaposhnikov，Boris） 54，55，64，74，75，82，86，112，113，117，129，141，150，165，185

谢尔巴科夫，A.A.（Shcherbakov，A.A.） 137

谢皮洛夫，德米特里（Shepilov，Dmitry） 278

什利谢利堡（Shlisselburg） 128，130

突击集团军 80

公审（show trials） 46

什捷缅科，S.M.（Shtemenko，S.M.） 185，186，200，202，205，210，214，215，223，224，231，244，284

什捷尔恩，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Shtern，Grigory Mikhailovich） 55，59，60，62，65，71，80，108

西伯利亚（Siberia） 50，51，64

西伯利亚军区（Siberian Military District） 284

西里西亚（Silesia） 214

西蒙诺夫，康斯坦丁（Simonov，Konstantin） 6，46，47，63，119，136，247，251，289，295，296，305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 49

1937年的中日战争 51，52

第6集团军（德国） 164，171，312，316，317

哥萨克第6军 41，43，47

美国第6舰队 281，282

第6坦克旅 59

第62集团军 164，165，219

第63步兵军 114

第65集团军 203

斯拉夫人（Slavs） 103

斯洛伐克（Slovakia） 101

斯卢茨克（Slutsk） 41

斯麦尔什（Smersh） 183，184

斯米尔诺夫，A.K.（Smirnov，A.K.） 79

斯摩棱斯克（Smolensk） 101，143，191

被德军占领 114
斯穆什克维奇，Y.V.（Smushkevich，Y.V.） 53
索比堡（Sobibor） 241
索契（Sochi） 247
索菲亚（Sofia） 211
索科洛夫，谢尔盖（Sokolov，Sergey） 244，285
索科洛夫斯基，V.D.（Sokolovsky，V.D.） 293
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Solzhenitsyn，Aleksandr） 307
东南方面军（Southeastern Front） 165，169，170
西南战略方向（Southwestern Direction） 108
西南方面军（Southwestern Front） 104，105，113，114，151，152，159，170，171，193～199
苏联建军节（Soviet Army Day） 302
苏芬战争（Soviet-Finnish War） 65～69，71，78，81，89，126
《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什捷缅科） 215
苏军“近卫”师 117
苏军统帅部（Soviet High Command） 45，148，152
苏联军事情报机构

参见 格鲁乌

苏联（Soviet Union） 28，29

同盟国的物资援助 291

向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 51，52

暴行 226

残忍体制 13，14

解体 305

集体化 29，30，313

国防预算 43，44

裁军计划 262，263

五年计划 29，44

与德国的合作 88，89

与德国的和约（1918） 50

入侵波兰 71

与日本的竞争 49～52

动员计划 97

现代化 29

　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93～97

　特别军区 72

　对待做过俘虏的苏联人的方式 271

　军演 82～86

　战争计划 74～77，85，90，92，93

　战争恐慌 28，29，44

　朱可夫对苏联的忠诚 13，14

　另见 红军

施帕茨，卡尔（Spaatz，Carl） 230

空间计划 291

斯帕尔，威廉·J.（Spahr，William J.） 62

西班牙（Spain） 101

西班牙内战 39，78

特别军区 72

　另见 特别地区

“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Sputnik） 262

间谍飞机 262

党卫军（SS） 196

斯大林，约瑟夫（Stalin，Joseph） 3～5，7，8，11，29，31，32，51，65，76，85～87，104，110，115，117，139，140，204，205，211，234，235，296，313，314

发怒 125

任命朱可夫为占领军司令 231

与莫斯科战役 147

与斯大林格勒战役 165

与乌克兰战役 193，195，198

对中央委员会的控制 88

与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238

与丘吉尔会晤 162～164

个人崇拜 32，122，281

去世 7，250，254

向保加利亚宣战 211

采取防御性的战略 150

努力避免战争 98

关于艾森豪威尔 237

对朱可夫的信赖 177，178

总参谋部的汇报 124

成立国防委员会 108

与希特勒 89

交给他的有关德国进攻的情报 90，91

与进攻德国本土 213，214

与哈尔科夫惨败 151，152

与赫鲁晓夫 259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 123，269，270

与基辅撤退 111～114

与库尔斯克战役 185，186，188

与列宁格勒保卫战 128，130，131

与机械化军 70

与“巴格拉季昂行动” 200

与“巴巴罗萨行动” 155

与“天王星行动” 167，168

发布227号命令 160，161

节日命令（1942年5月1日） 153

斯大林的爱国主义 123

与逮捕巴甫洛夫 107

承诺对日开战 215，231

在波茨坦会议上 235，236

与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95～97

宣布就任大元帅 235

与进军柏林的竞赛 222～224，229，230

关于收复基辅 196

关于红军的暴行 242

对红军的清洗 43，45～47，107，108，118，304

与罗科索夫斯基 141，143

发表秘密讲话 95，96

对朱可夫的态度趋于缓和 252

作为最高统帅 108，110，135

与德黑兰峰会 197，202

与铁木辛哥 71

与铁托 268

与“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 215，216，218，219

与战争计划 77，81，82，90，100

与华沙起义 207，209

与“冬季战争” 67，69

作息规律 124

对朱可夫的打击 5～7，244～250，289

对朱可夫的训斥 148

解除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 111，112

与朱可夫一起参加的会议 98，99，103，105，107，112

朱可夫的称赞 120，121，124，125，140

与朱可夫的关系 122，125，136

与朱可夫的相似之处 122，123

斯大林，瓦西里（Stalin，Vasily） 71，234

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 5，9，23，70，150，156～158，204，219，286

斯大林格勒战役 159～174，166，185，186，260，261，287，293，316，317

“天王星行动” 167～174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Stalingrad Front） 159，165，170

旧鲁萨（Staraya Russa） 177

斯塔文科夫（Stavenkov） 24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Stavka，Supreme Command） 108，113，123，126，128，135，147，155，159，165，171，173，184，185，195，206，213，214

与莫斯科战役 137，141，143，145，147，148

推迟向柏林的推进 218～220

与哈尔科夫惨败 150～153

草原方面军（Steppe Front） 187，191，193～199

斯特列尔科夫卡村（Strelkovka） 14，16，144，179，222

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 275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伦敦） 9，115，144，233

苏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 Command，Soviet） 124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HQ），参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 7，242，251

苏斯洛夫，米哈伊尔（Suslov，Mikhail） 279，285，298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Suvorov，Alexander） 140，145，310，311

“苏沃洛夫行动”（Suvorov，Operation） 191，193

苏沃洛夫，维克托（Suvorov，Viktor） 10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 7，183，249

T-34 坦克 70

塔曼半岛（Taman Peninsula） 186

坦波夫叛乱（Tambov Revolt） 25，37

坦克 36～38，70，74，80，81，188，291

　缺点 64

坦克技术学校 74

塔斯社（TASS） 61，99，294，302

塔西尼，让·德·拉特尔·德（Tassigny，Jean de Lattre de） 230

军事技术 36

特德，阿瑟（Tedder，Arthur） 230

德黑兰峰会（Tehran summit） 197，202

捷列金，K.F.（Telegin，K.F.） 248，250

1936年《野战勤务临时条例》 38

第10骑兵师 19

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200，202，214，218

第3骑兵军 41，43，47，70

第3预备骑兵师 23，24

第3突击集团军 229

乌克兰第3方面军 211，214

第33集团军 148

第38骑兵团 32

第39布祖鲁克骑兵团 32，35

第303步兵师 115

季赫温（Tikhvin） 134

《时代》杂志（Time） 8，178，219，220，264

铁木辛哥，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Timoshenko，Semyon Konstantinovich） 39，69，70，71，74，76～79，81，82，88，90，98，99，103，120，159，175，285，292

与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95～97

任西南方面军指挥官 129，144，151，152

任西方方面军指挥官 107，108，110，115

地拉那（Tirana） 282

铁托元帅（Tito，Marshal） 268，282

托尔布欣，F.I.（Tolbukhin，F.I.） 7，35，211，234，250

“火炬行动”（Torch，Operation） 163

托尔高（Torgau） 229

托茨科耶（Totskoe） 256，257

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 154，186

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 50

特雷布林卡（Treblinka） 241

托洛茨基，列夫（Trotsky，Leon） 45，46，268

特罗扬诺夫斯基，奥列格（Troyanovsky，Oleg） 265，267

杜鲁门，哈里（Truman，Harry） 235，238

察里津（Tsaritsyn）

参见 斯大林格勒

茨皮基（Tspeki）（马） 3，234

茨维塔耶夫，叶夫根尼（Tsvetaev，Evgeny） 301，302

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N.（Tukhachevsky，Mikhail N.） 37，38，44，45，256，271

图拉（Tula） 137

秋列涅夫，I.V.（Tulenev，I.V.） 78

图皮科夫少将（Tupikov，Major-General） 113

土耳其（Turkey） 18

“台风行动”（Typhoon，Operation） 135

乌克兰（Ukraine） 5，19，22，30，65，72～76，92，101，105，118，126，151，152，154，256，259

乌克兰战役 193～199，205

饥荒 30

乌克兰共产党 259

乌兰巴托（Ulan Bator） 65

被破译的“厄尔特拉”情报（Ultra decryptions） 188

联合国（United Nations） 262，266

美国（United States） 7，18，28，135，154～156，162，171，197，231，261，263，283

希特勒对美宣战 155

核武库 256

与华沙起义 209，210

乌拉尔军区（Urals Military District） 7，249

“天王星行动”（Uranus，Operation） 167～174

城市化（urbanization） 29

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M.（Vasilevsky，Alexander M.） 40，75，92，95，96，143，148，151，153，165，167～169，185，197，200，203，205，231，234，242，244，261，280，298～300，303

与进攻德国本土 214，215

与库尔斯克战役 185，186，188

与朱可夫的平反 250

华西列夫斯基，尤里（Vasilevsky，Yuri） 250，299

瓦图京，N.F.（Vatutin，N.F.） 76，77，82，92，98，104，159，171，188，195，198，199

“灭绝战”（Vernichtunskrieg） 101，103

维亚济马（Viazma） 133，137，145～150

维也纳（Vienna） 241

越南战争（Vietnam War） 295

维普里（Viipuri） 69

维尔纽斯（Vilnius） 200

“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Vistula-Oder operation） 5，214～222，240，252，313

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 214

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 50

《军史杂志》（Voenno-Istoricheskii Zhurnal） 300，305

伏尔加河（Volga River） 156，157，159

沃尔霍娃，玛丽亚（Volkhova，Maria） 23，35，181，182，184

沃尔霍夫方面军（Volkhov Front） 175

沃尔霍夫河（Volkhov River） 34

冯·博克，费多尔（von Bock，Fedor） 157

冯·曼施坦因，埃里希（von Manstein，Erich） 316，317

冯·魏克斯男爵（Von Weichs，Baron） 157

沃罗涅日方面军（Voronezh Front） 159，177，184～199

沃罗涅日省（Voronezh Province） 25，159，162，163，173

沃罗诺夫，尼古拉（Voronov，Nikolai） 244

伏罗希洛夫，克莱门特（Voroshilov，Kliment） 44，48，53，55，59，70，71，88，108，126，128，129

《等着我吧》（西蒙诺夫） 251

《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138

华沙（Warsaw） 5，200，214

苏军向华沙的推进 208

起义 205～212

华沙条约（Warsaw Pact） 263，273，274，276

滑铁卢（Waterloo） 293

德国国防军（Wehrmacht） 4，120，134，147，148，159，197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的伤亡 154

伤亡情况 134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损失 173

与华沙起义 206

另见 具体的战役和战斗

威灵顿公爵（Wellington，Duke of） 293

沃思，亚历山大（Werth，Alexander） 115，144，145，161，191，193，207～209，233

西方战略方向（Western Direction） 108，110，147

西方方面军（Western Front） 105，107，115，129，144，147，148，164，169，188，271，272

部队的补充 139

朱可夫任指挥官 135～138，145

西部特别军区（Western Special Military District） 91

《苏军战士防御须知》 56

“旋风行动”（Whirlwind） 275

白俄罗斯人（White Russians） 28

“冬季战争”（Winter War）

参见 苏芬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 13，17～20，36，40，78，118

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 4，5，15，51

“第二战场” 162，163，202

另见 具体的战役和战斗

弗兰格尔男爵（Wrangel，Baron） 25

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 231

叶戈罗夫，A.I.（Yegorov，A.I.） 44，45

叶利尼亚攻势（Yel’nya offensive） 87，88，112，114～121，133，316

叶利钦，鲍里斯（Yeltsin，Boris） 222，306

叶廖缅科，A.I.（Yeremenko，A.I.） 113，114，159，165，167，170，171，234，284，285

叶若夫，尼古拉（Yezhov，Nikolai） 46

“叶若夫时代”（Yezhovshchina） 46

南斯拉夫（Yugoslavia） 238，268，281，282

尤赫诺夫（Yukhnov） 147

扎达尔（Zadar） 282

扎哈罗夫，马特维（Zakharov，Matvei） 76

扎哈罗娃，利达（Zakharova，Lida） 182～184，252

日丹诺夫，A.A.（Zhdanov，A.A.） 249

热尔托夫，A.S.（Zheltov，A.S.） 283～285

“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行动”（Zhitomir-Berdichev operation） 198

朱可夫，阿列克谢（Zhukov，Alexei） 14

朱可夫，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Zhukov，Georgy Konstantinovich） 4，5，21，22

演奏手风琴 186，248

适应能力 177，312

风流韵事 184

所谓的反党情绪 247，248

学徒生涯 16，17

成为暗杀的目标 182

与莫斯科战役，

参见 莫斯科战役

大本营推迟向柏林的推进 218～220

在炮火中沉着镇静 186

在骑兵监察部 40，41，48

骑术 34

任总参谋长 85

童年和青年时期 14～18

指挥风格 10，11，33，42，141，143，286，311

上级的检查 32，33

加入共产党 23

加入红军 22，23

对入侵德军的反攻 104，105

朱可夫的批评者 10，11

对斯大林的批评 270，271

个人崇拜 285～288，304～308

乡间别墅 297

讣告 302，303

去世 9，302

与1940年12月的指挥工作会议 77～82

论红军的防御能力 119，120

降级和流放 6，168，169

任国防部副部长 7，254，255，257

任副最高统帅 164

纪律严明的人 41，54

早年的贫困生活 15，16

接受的教育 15～17

与艾森豪威尔 236～239，265～268

信仰 14，15

家庭生活 179～181

姓 14

小说中对他的刻画 307

第一次见到斯大林 71

性格缺陷 10，12

葬礼 10

任总参谋长 87～98，110，111，118，120，121，123

学德语 17，19

格拉诺夫斯基街的公寓 88

健康状况 180，181，301，302

听力障碍 184

在高级骑兵学校 33～35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讯问 244，245

与1956年匈牙利人的起义 272～277

打猎 203，282

印度与缅甸之行 275，276，28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职业生涯 27～47

在哈拉哈河 47～66，78

关于哈尔科夫惨败 151，153

赫鲁晓夫时代对他的抨击 8，9，185，203，215，281～289

在赫鲁晓夫时代受到贬黜 8，9，136

与基辅撤退 111～114

在库尔斯克 184～193

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 125～134

与利达的关系 182，183

与折损第33集团军 148

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17，18

对苏联的忠诚 13，14

对斯大林的忠诚 5，6，11，13，14

奖章 19，25，59，175，204，295

回忆录 8，9，11，17，26，32，42，46，47，71，87，99，104，112，118，119，123，125，136，148，195，202，212，239，247，253，291，293，294，296～301，309

纪念碑 306

任国防部部长 7，8，260～265，293

神话 145

军士对朱可夫的训练 19

在北高加索的任务 186

诺维科夫的指控 245～247

在被占领的德国 233，236～239

与“巴格拉季昂行动” 199～205

与“火星行动” 169，170

与“北极星行动” 175～177

与“天王星行动” 167～174

爱国主义 123

个人抱负 26

哈拉哈河战役对其个人的重大意义 63，64

个人的支持团队 182，183

战后生涯 5

战后被降级 136

战后对他的诋毁 183，244～250

建议对北约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276，277

与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95～97

私生活 42，43，280，289～291，301

晋升为元帅 175

进军柏林的竞赛 222～233

从远东召回 67，71

成为红军指挥官 23～47

任团指挥官 32

平反 7～9，250，251，294～296

声望 10，12，133，310，311

退休 8，291，292

返回列宁格勒 175～178

罗科索夫斯基对朱可夫的评价 39，40

自负 233，234

参谋工作 36

在斯大林格勒 164～174

发动斯大林格勒反攻 5

对斯大林的赞扬 120，121，124，125，140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打击 5～7，244～250，289

成为斯大林的爱将 133

与斯大林的见面 98，99，103，105，107，112

受到斯大林的训斥 148

与斯大林对红军的清洗 45～47

与斯大林的关系 86，122～125，136，165，166，177，203

与斯大林的相似之处 122，123

遭遇的不幸 301

在最高指挥工作会议上 197，198

与铁木辛哥 70，71

关于军队的高层领导 120

杜鲁门的邀请 238

在苏共二十大上 270

感染斑疹伤寒 22，23

成为“受冷落的人” 7

参加胜利阅兵 3，4，7，233～235

在胜利阅兵仪式上的讲话 3，4，7

在“维斯瓦河—奥德河行动”中 216～222

粗暴 286

战利品 6，7，242，249

军演 82～86，104

与战争计划 74～77，90，92，93，104

关于华沙起义 210，211

任西方方面军指挥官 135～138，1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8～20

负伤 20

被剔出书面的历史 292～294

叶利尼亚攻势 87，88，114～121，133

朱可夫，康斯坦丁（Zhukov，Konstantin） 14～16

朱可夫，乌斯金妮娅（Zhukov，Ustin’ya） 14，16，144，179

朱可娃，亚历山德拉·季耶夫娜（Zhukova，Alexandra Dievna） 25，26，35，43，48，179～181，183，184，252，253，289，290，301

朱可娃，埃拉（Zhukova，Ella） 4，9，17，42，43，46，131，179，289，290，294，299，302，304

朱可娃，叶拉（Zhukova，Era） 4，6，25，26，42，43，46，131，179，180，183，250，289，290，302，304，305

朱可娃，加琳娜（Zhukova，Galina） 9，183，184，252，253，

280，289，291，301

朱可娃，马加丽塔（Zhukova，Margarita） 3，23，181，182，253，302

朱可娃，玛丽亚（Zhukova，Maria）（女儿） 14，16，183，253，280，300，302，304

朱可娃，玛丽亚（姐姐） 14，179

“朱可夫计划” 92，93

《朱可夫最大的败绩：1942年红军在“火星行动”中的惨败》（格兰茨） 169，1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英）罗伯茨（Roberts，G.）著；李晓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2017.6重印）

ISBN 978-7-5097-7167-9

Ⅰ.①朱… Ⅱ.①罗…②李… Ⅲ.①朱可夫（1896～1974）-生平事迹 Ⅳ.①K835.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793号

朱可夫

——斯大林的将军

著者/〔英〕杰弗里·罗伯茨

译者/李晓江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9.75 插页：1.25 字数：334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3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1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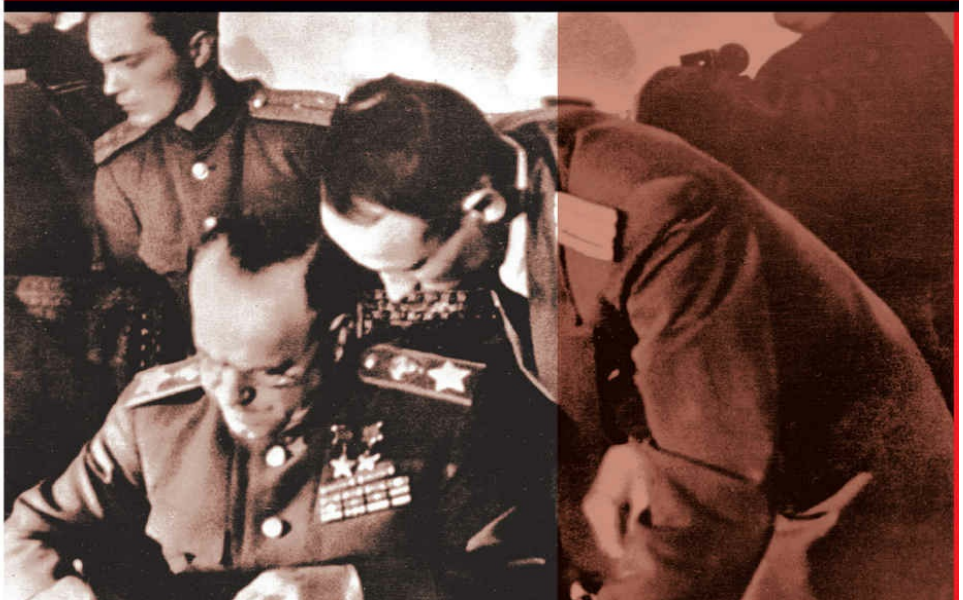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9291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基于朱可夫本人未经删节的回忆录及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
一部关于二战中“综合能力最优秀的将领”的全景式传记
世界军事史协会2013年度杰出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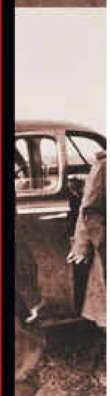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我们终于有了一部完整的朱可夫传记。杰弗里·罗伯茨的叙述详细、公允而生动，其内容不仅涉及 1941 ~ 1945 年朱可夫作为前线指挥官、作为与斯大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军事幕僚所发挥的作用，还包括战前在红军中对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经历、他的家庭纠葛、他在冷战的军事谋划中的地位，以及他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时政治上受到的冷遇。书中有大量的新材料，包括来自朱可夫亲属的第一手的深入了解。这里可以看到一位农家子弟和二战中最伟大的将领的富有立体感的形象。这是一本很精彩的书，详实且易懂，是对苏德战争或苏联历史感兴趣的人的重要读物。

——埃文·莫兹利（Evan Mawdsley）
《1941 年 12 月》和《东线惊雷》作者













出版社官方微信

甲骨文官方微博

甲骨文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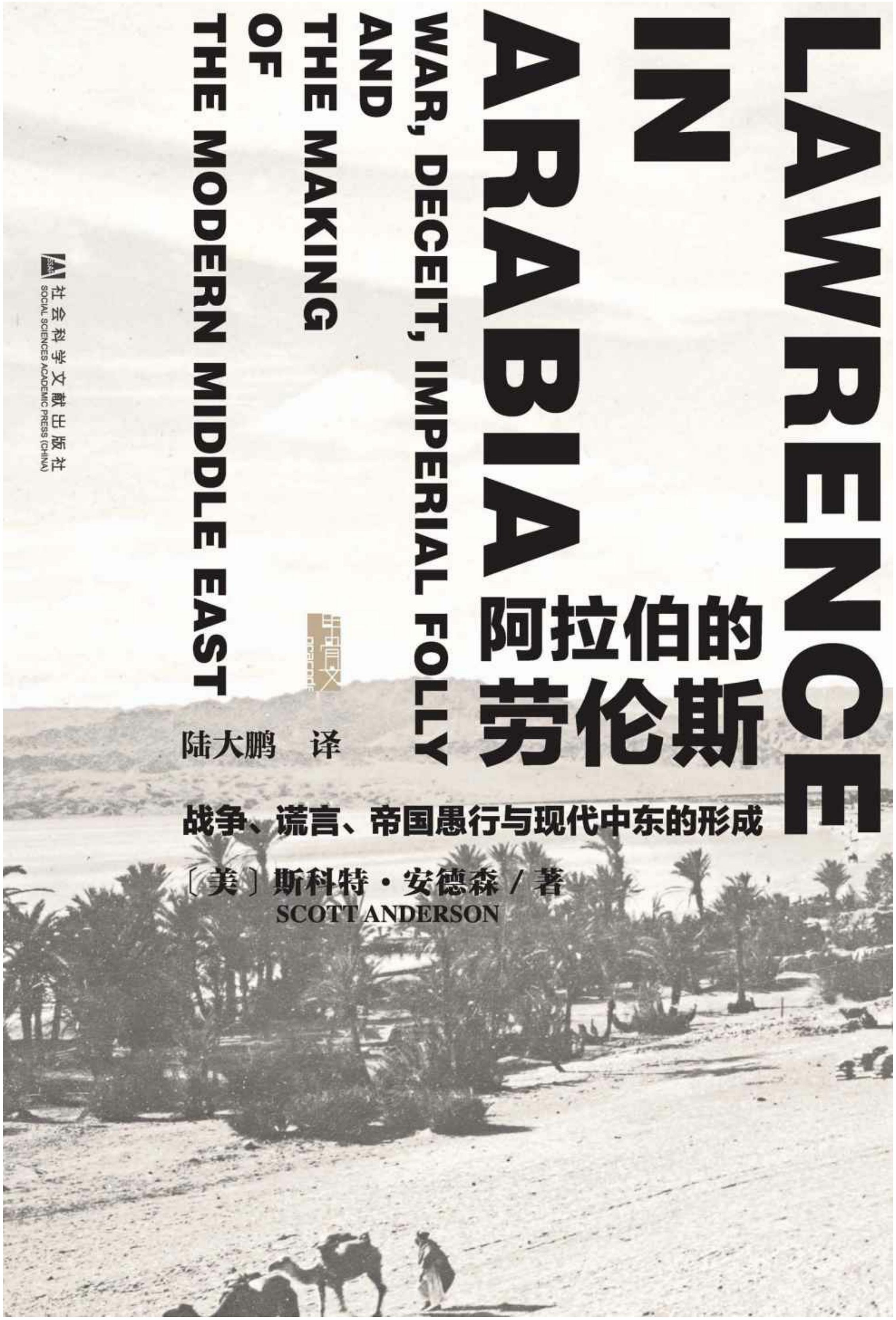
www.ssap.com.cn

ISBN 978-7-5097-7167-9

9 787509 771679

ISBN 978-7-5097-7167-9

定价：69.00 元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阿拉伯的劳伦斯

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美〕斯科特·安德森 / 著

SCOTT ANDERSON

陆大鹏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斯科特·安德森

资深战地记者，曾在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北爱尔兰、车臣、苏丹、波斯尼亚、萨尔瓦多和许多其他战乱国家或地区报道。他常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文章，也为《名利场》《时尚先生》《哈珀斯杂志》《户外》撰写文章。他的著作包括小说《月光酒店》《检伤分类》，非虚构作品《试图拯救世界的人》《4点钟的谋杀》，以及他与自己的兄弟乔恩·李·安德森合著的《战区》和《联盟之内》。

陆大鹏，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英德语口笔译者，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读书不求甚解，全凭乐趣。代表译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哈比人》（合译）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虞候 Hans。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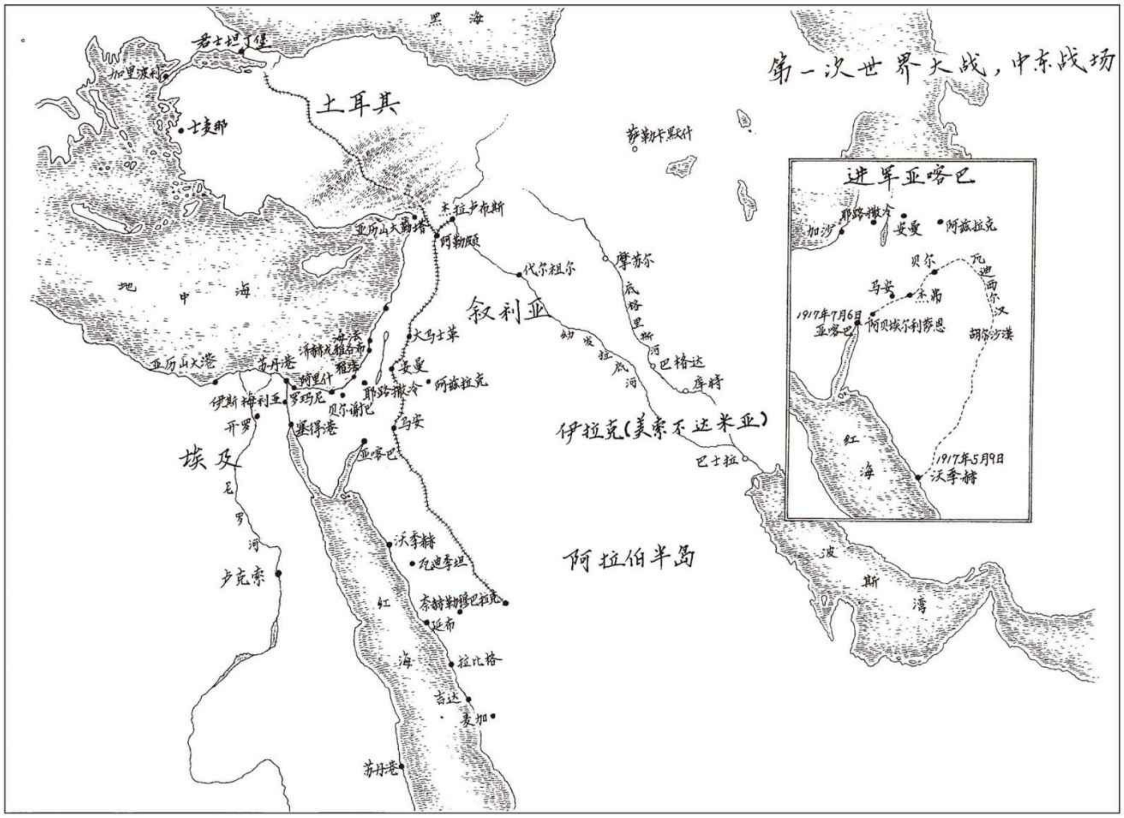
阿拉伯的劳伦斯

陆大鹏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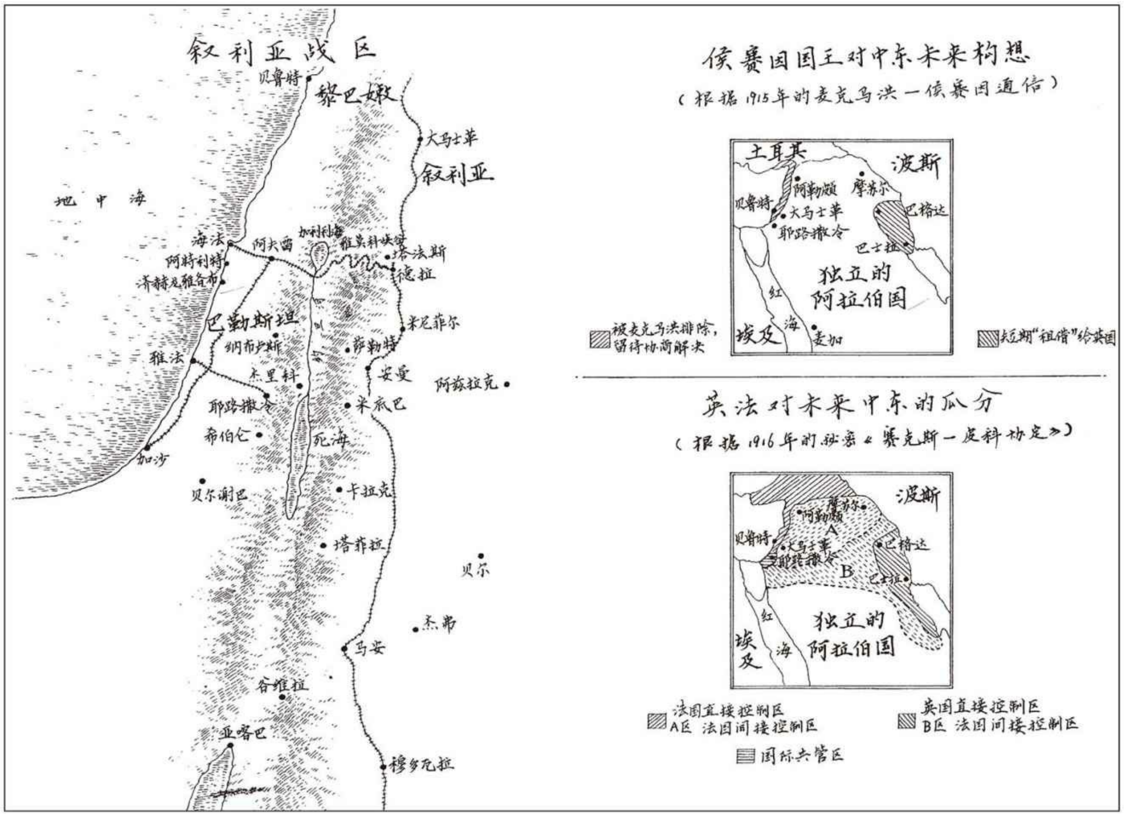
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美〕斯科特·安德森 / 著
SCOTT ANDE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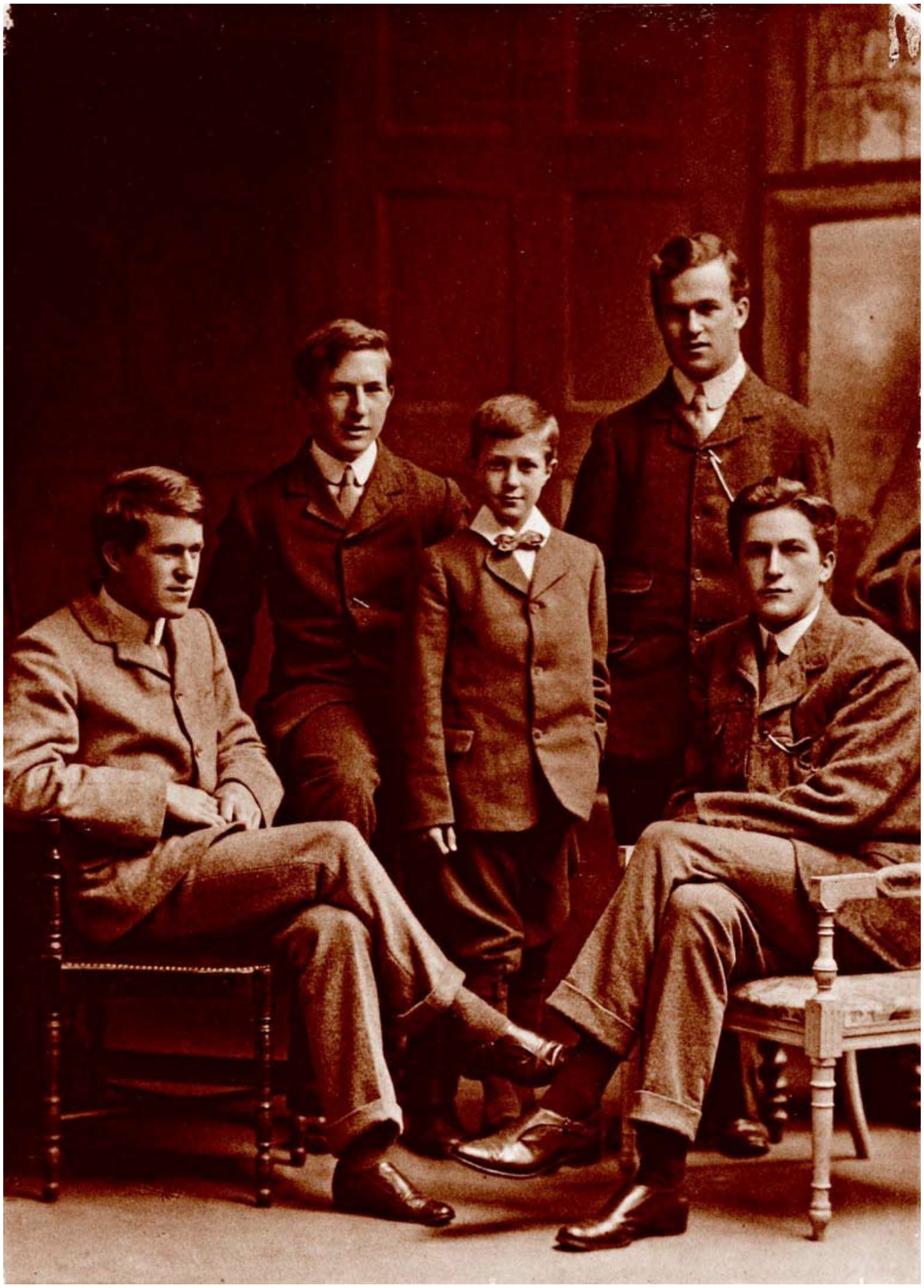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战场
黑海
君士坦丁堡
加里波利
士麦那
土耳其
萨勒卡默什
亚历山大勒塔
阿勒颇
代尔祖尔
摩苏尔
底格里斯河
巴格达
库特
幼发拉底河
叙利亚
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
巴士拉
地中海
亚历山大港
苏丹港
海法
济赫龙雅各布
雅法
阿里什
罗玛尼
贝尔谢巴
耶路撒冷
阿兹拉克
大马士革
安曼
伊斯梅利亚
开罗
塞得港
马安
亚喀巴
埃及
尼罗河
卢克索
沃季赫
延布
拉比格
吉达
麦加
苏丹港
红海
阿拉伯半岛
波斯湾
进军亚喀巴
加沙
耶路撒冷
安曼
阿兹拉克
贝尔
马安
1917年7月6日
亚喀巴
瓦迪西尔汉
1917年5月9日
沃季赫
红海



叙利亚战区
贝鲁特
黎巴嫩
大马士革
叙利亚
地中海
海法
阿夫雷
加利利海
雅莫科峡谷
塔法斯
阿特利特
德拉
济赫龙雅各布
巴勒斯坦
米尼菲尔
纳布卢斯
萨勒特
雅法
安曼
杰里科
阿兹拉克
耶路撒冷
米底巴
希伯仑
死海
加沙
贝尔谢巴
卡拉克
塔菲拉
贝尔
杰弗
马安
谷维拉
亚喀巴
穆多瓦拉
侯赛因国王对中东未来构想
（根据1915年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
土耳其
波斯
阿勒颇
摩苏尔
贝鲁特
大马士革
巴格达
耶路撒冷
巴士拉
独立的
阿拉伯国
红
海
埃及
麦加
被麦克马洪排除，留待协商解决
短期“租借”给英国
英法对未来中东的瓜分
（根据1916年的秘密《赛克斯—皮科协定》）
波斯
摩苏尔
阿勒颇
A
贝鲁特
大马士革
巴格达
耶路撒冷
B
巴士拉
红
海
独立的
阿拉伯国
埃及
法国直接控制区
A区 法国间接控制区
英国直接控制区
B区 法国间接控制区
国际共管区



T.E.劳伦斯（左一）与他的四个兄弟（从左向右：弗兰克、阿诺尔德、罗伯特和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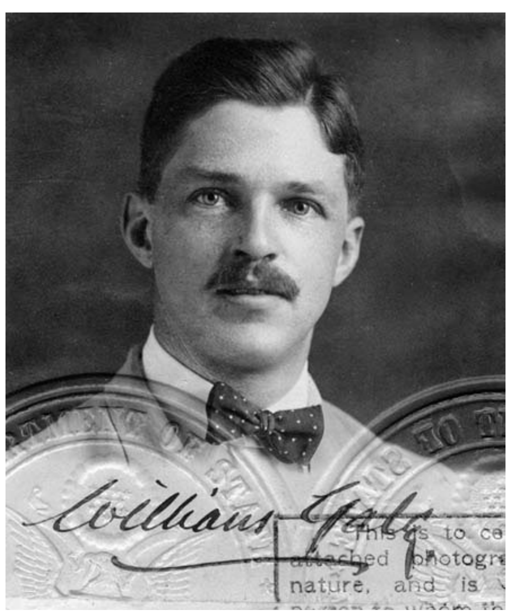
T.E.劳伦斯于**1915**年在开罗开展**“**文牍战争**”**的同时，弗兰克和威尔都在西线阵亡。

Bodleian ref：**MS. Photog. c.122**，**fol.3**

破落贵族威廉·耶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中东的唯一一名情报人员，



学者、间谍和臭名昭著的风流浪子：库尔特·普吕弗在开罗，**1906**年
©Trina Prüf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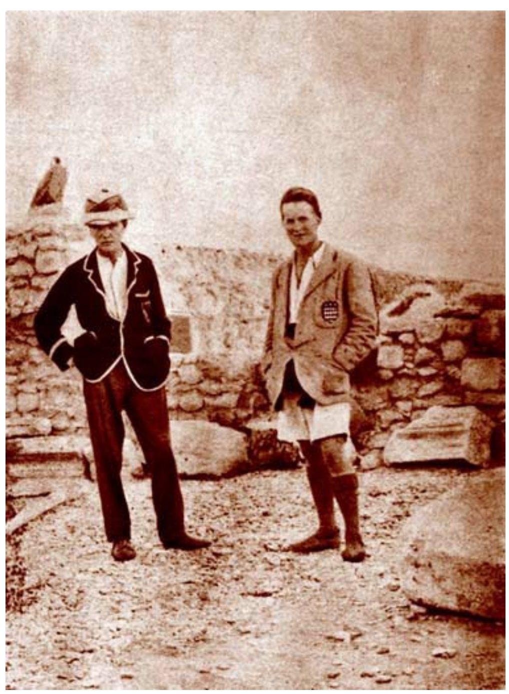


破落贵族威廉·耶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中东的唯一一名情报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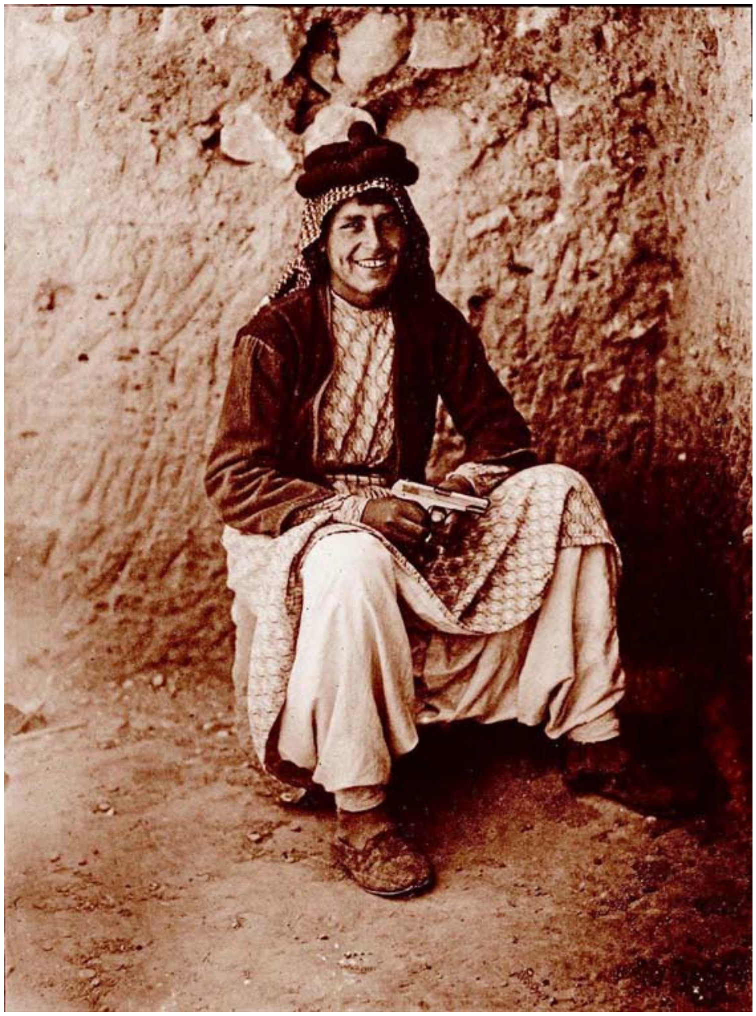
同时仍然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秘密雇员。
©Milne 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Library



魁梧的壮汉：亚伦·亚伦森，卓越的科学家，热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东最成功的间谍网的领导人。**All rights are reserved to the Beit Aaronsohn Museum NILI**



英国人在国外：**1912**年，**T.E.**劳伦斯（右）和伦纳德·伍莱在卡尔基米什考古发掘现场。劳伦斯后来回忆说，在卡尔基米什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达霍姆，劳伦斯在卡尔基米什的年轻助理。劳伦斯将《智慧的七柱》献给了他。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MS 50584，f.115-116



斯图尔特·纽科姆在神秘的寻漠探险活动中是劳伦斯的上级，后来把他带到了战时开罗，从事情报工作。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威廉·耶鲁家的万贯家财灰飞烟灭之后，他加入标准石油公司，前往奥斯曼帝国执行一项寻找石油的秘密行动。
©Milne 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Library



花花公子在圣地：为了保密，耶鲁和他在标准石油公司的伙伴（左二：**J.C.**希尔；右二：鲁道夫·麦戈文）装扮成游览圣经时代遗迹的富裕的花花公子**”**，但这番伪装的效果很有限。

©Milne 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Library**



德皇威廉二世，德意志的恺撒。他的整整一代臣民，包括库尔特·普吕弗，都被威廉二世的好战要求——德国应当享有“太阳下的崇高地位”——所振奋鼓舞。



“德皇的间谍”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也是库尔特·普吕弗的导师。奥本海默在沉溺于考古学、女奴和赛马的同时，梦想着通过伊斯兰圣战在中东点燃一场大火。



1915年**2**月，普吕弗在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前夕。尽管他在私人日记中预感到大祸临头，但还是敦促攻势展开。
©Trina Prüfer



基钦纳勋爵于**1914**年**8**月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其他人估计战争会很快结束，轻松得胜，但他却预言，这场战争会耗尽英国的人力，**“**只剩最后**100**万人**”**。
©UIG History/Science &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雷金纳德温盖特，埃及军总司令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显然，他始终没有看

穿劳伦斯的欺骗计谋。**Hulton Arbive/Getty Image**



外交界的讨厌鬼和典型的业余政治家马克·赛克斯。**“**想象力丰富，鼓吹着不能令人信服的世界走向**……**满脑子是偏见、直觉和伪科学。**”**劳伦斯鄙夷地如此描述赛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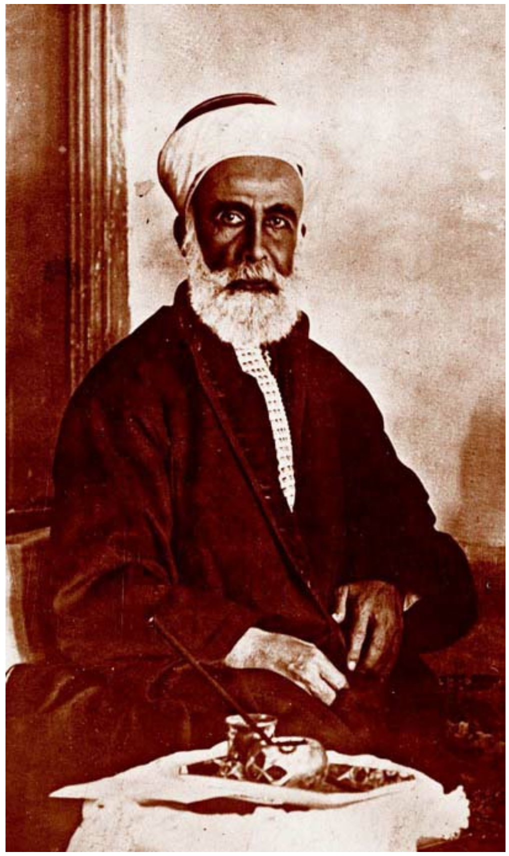
艾哈迈德·杰马勒帕夏（穿白衣者），叙利亚的奥斯曼总督。战争期间，威廉·耶鲁、库尔特·普吕弗和亚伦·亚伦森都曾与反复无常的杰马勒直接打过交道。



“土耳其军队中最英俊的人**”**，奥斯曼帝国的陆军部长恩维尔帕夏，他曾与库尔特·普吕弗共谋摧毁苏伊士运河。
©DIZ München GmbH，Süddeutsche Zeitung Photo/Alamy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Library of Congress**



汉志国王侯赛因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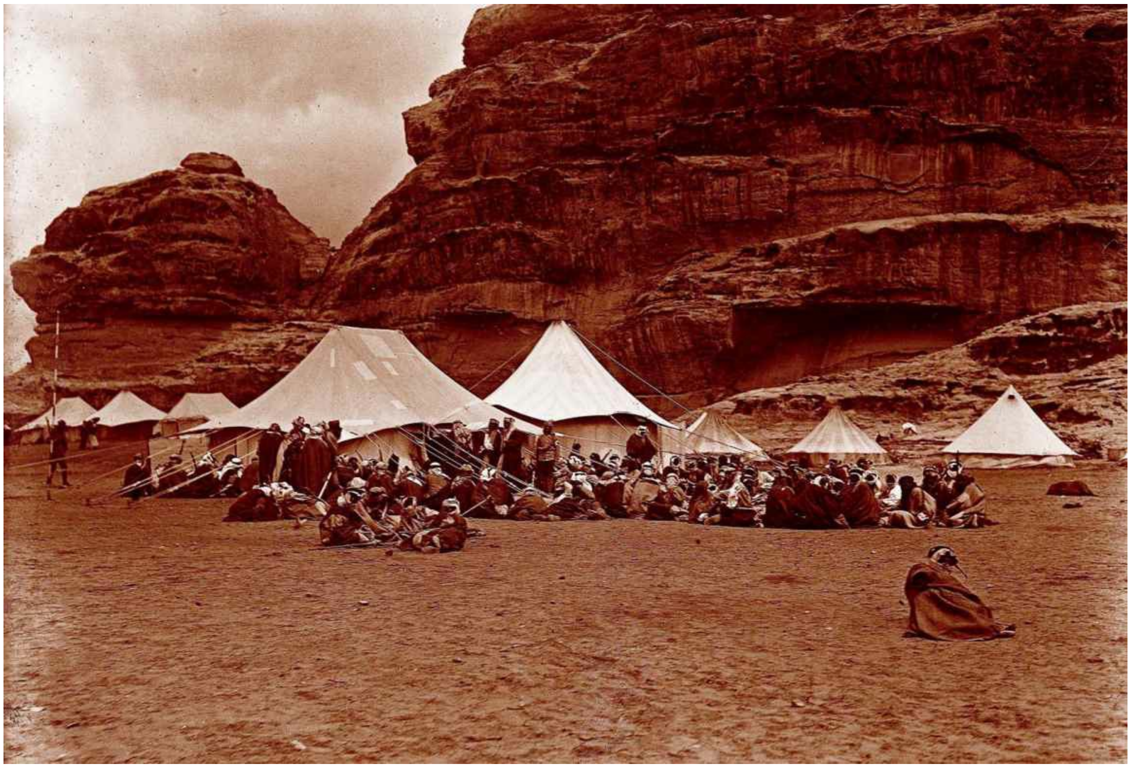


罗纳德·斯托尔斯，侯赛因与英国的秘密协商的联络人，是他把**T.E.**劳伦斯领进了阿拉伯起义。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武装的先知**”**，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侯赛因国王的第三子，**T.E.**劳伦斯在阿拉伯起义期间的主要盟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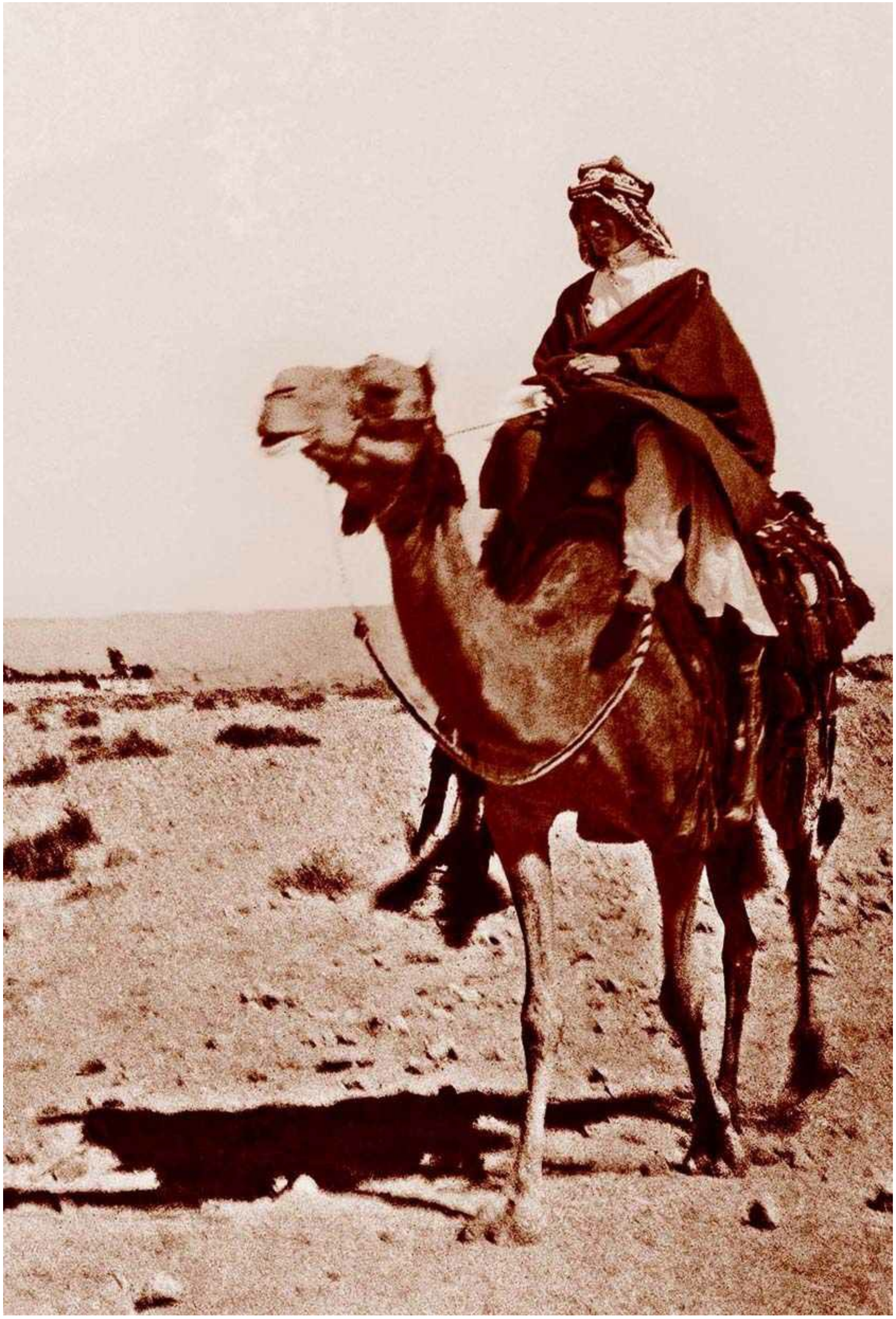
无休无止地谈话，慢悠悠地用餐：**1917**年，费萨尔的流动作战指挥部的一次部落会议。在所有英国军官当中，只有劳伦斯一个人认识到，英国人必须适应阿拉伯的作战方式。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劳伦斯敏锐地理解了部落政治运作的方式。在阿拉伯半岛，他是唯一一个被接纳到费萨尔内层圈子的英国军官。费萨尔（右三）和他的部落副手们，最右方蹲着的是劳伦斯。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劳伦斯的马拉松一般的骑乘骆驼的长途跋涉体现了他极强的耐力，甚至让最吃苦耐劳的贝都因伙伴也瞠目结舌。

©Imperial War Museum（Q60212）



吉尔伯特·克莱顿，英国在埃及的主要情报主管，劳伦斯的上级。到**1917**年秋季，克莱顿非常关心劳伦斯承担的风险，因此打算将他撤离前线，**“**但时间还没到，因为现在需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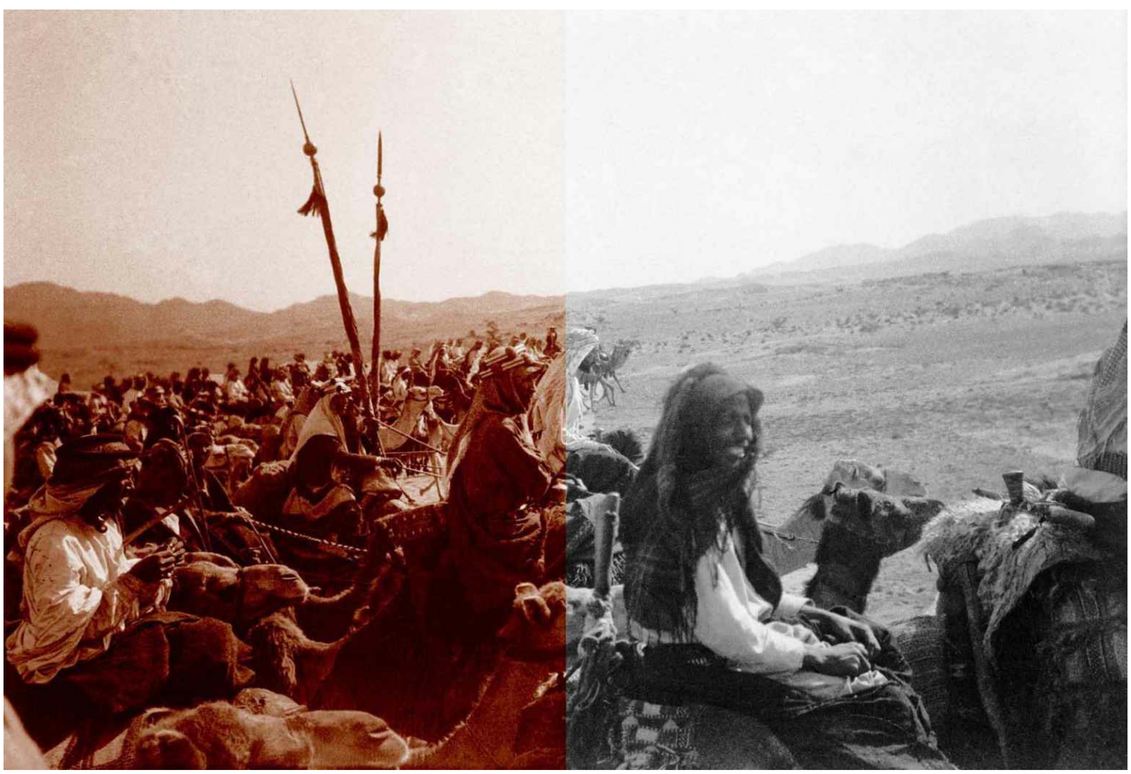


最原始的战争。劳伦斯关于何时何地攻击土耳其人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何处有水源和饲料。

©www.rogerstudy.co.uk. March 1917. Photo by Captain Thomas Hender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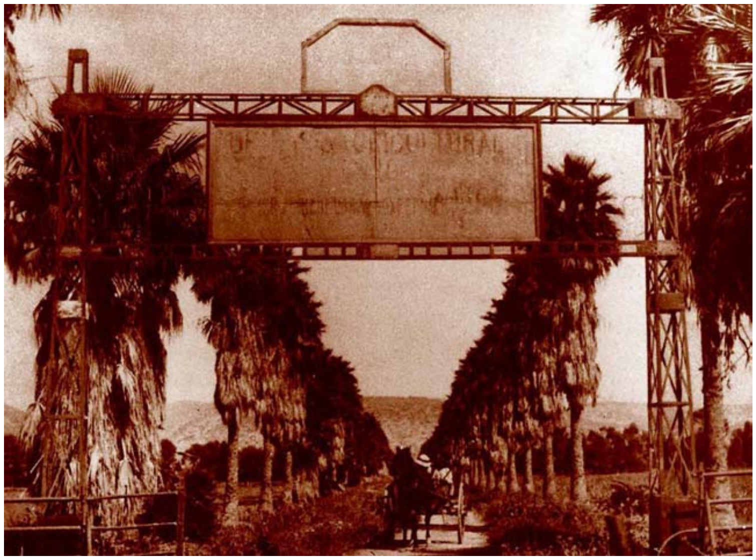


1916年，巴勒斯坦南部，一队奥斯曼路驼骑兵。在劳伦斯和其他人主张的游击战术最终被采纳之前，土耳其军队尽管装备落后且兵力单薄，但仍然屡次大败英军。



中世纪一般的盛景：费萨尔（中央穿白袍者）率领部落军队出征，进攻沃季

赫。
©Imperial War Museum（Q58863）



阿特利特，亚伦森的犹太农业研究站的入口，这是他的**NILI**间谍网的指挥部。**All rights are reserved to the Beit Aaronsohn Museum NI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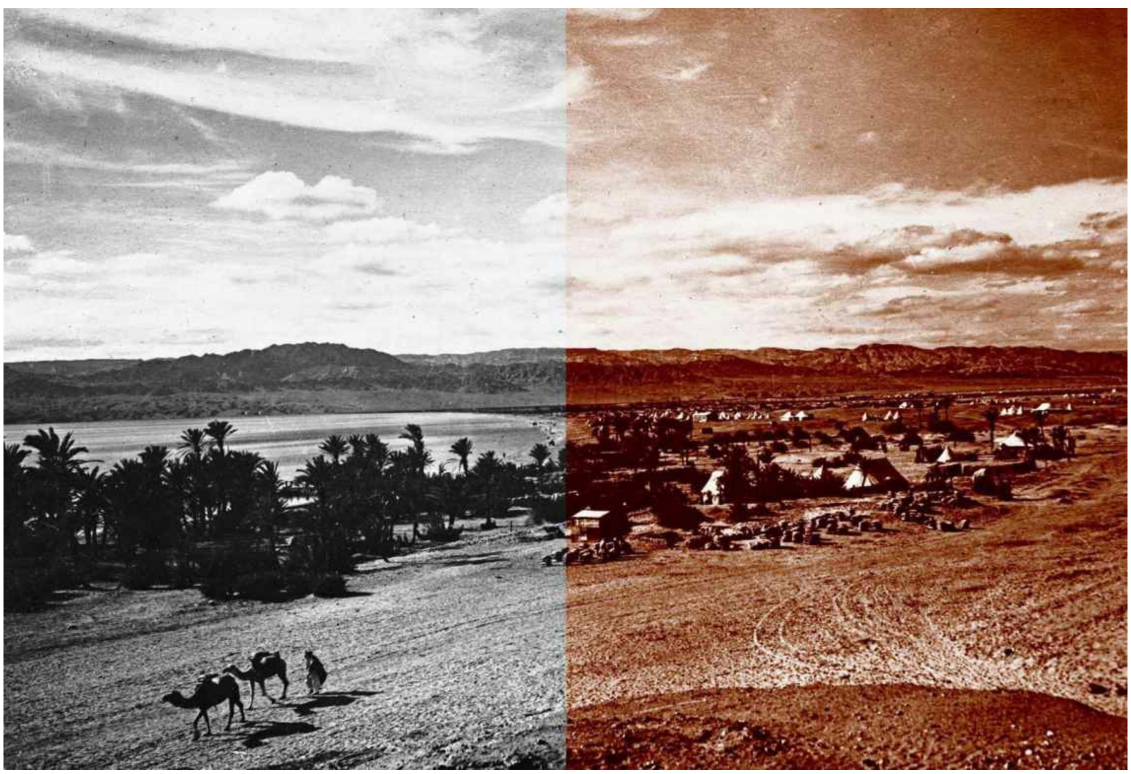


亚伦森的妹妹，**27**岁的萨拉，面对日益险恶的环境，她将巴勒斯坦的**NILI**间谍网领导得风生水起。**All rights are reserved to the Beit Aaronsohn Museum NILI**



作为德国的特务头子，库尔特·普吕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之一，但他始终没有发现，阿特利特有一个犹太间谍网在运作。

©Trina Prüfer



英法希望阻止他们的阿拉伯盟友控制亚喀巴。劳伦斯将英法政府蒙在鼓里，设计出了抢先一步抵达亚喀巴的大胆计划。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1917年**7**月**6**日。阿拉伯起义军在劳伦斯的领导下，占领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镇亚喀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勇敢的军事功业之一。

©Imperial War Museum（Q59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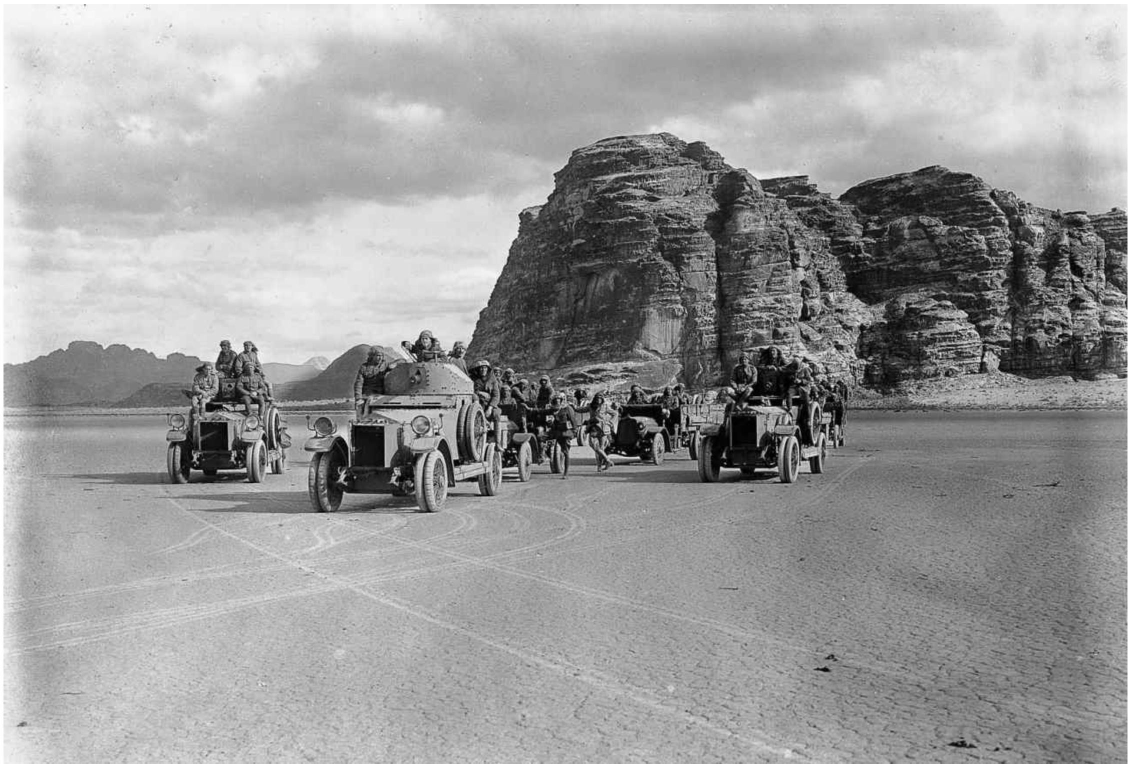


奥达·阿布·塔伊，传奇武士，劳伦斯攻克亚喀巴行动中的主要盟友。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英军和阿拉伯起义军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汉志铁路，土耳其军队的生命线。根据劳伦斯自己的记录，他在战争期间一共摧毁了**79**座桥梁。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战局的扭转。英军在沙漠作战中引入劳斯莱斯装甲车之后，土耳其军队没有还手之力。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1918年，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前排乘客座上）和其他阿拉伯领袖乘车在沙漠中行进。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我们将哈奇开斯机枪对准俘虏群，把他们全解决掉了。**”**随着战争继续，劳伦斯变成了一位越来越冷酷无情的战斗指挥官。

©Marist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Lowell Thomas Papers



1918年**6**月**4**日，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和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翌年，在劳伦斯的撮合下，两人在巴黎和会携起手来，要求建立一个阿拉伯一犹太人的联合国家。这项努力最终被英法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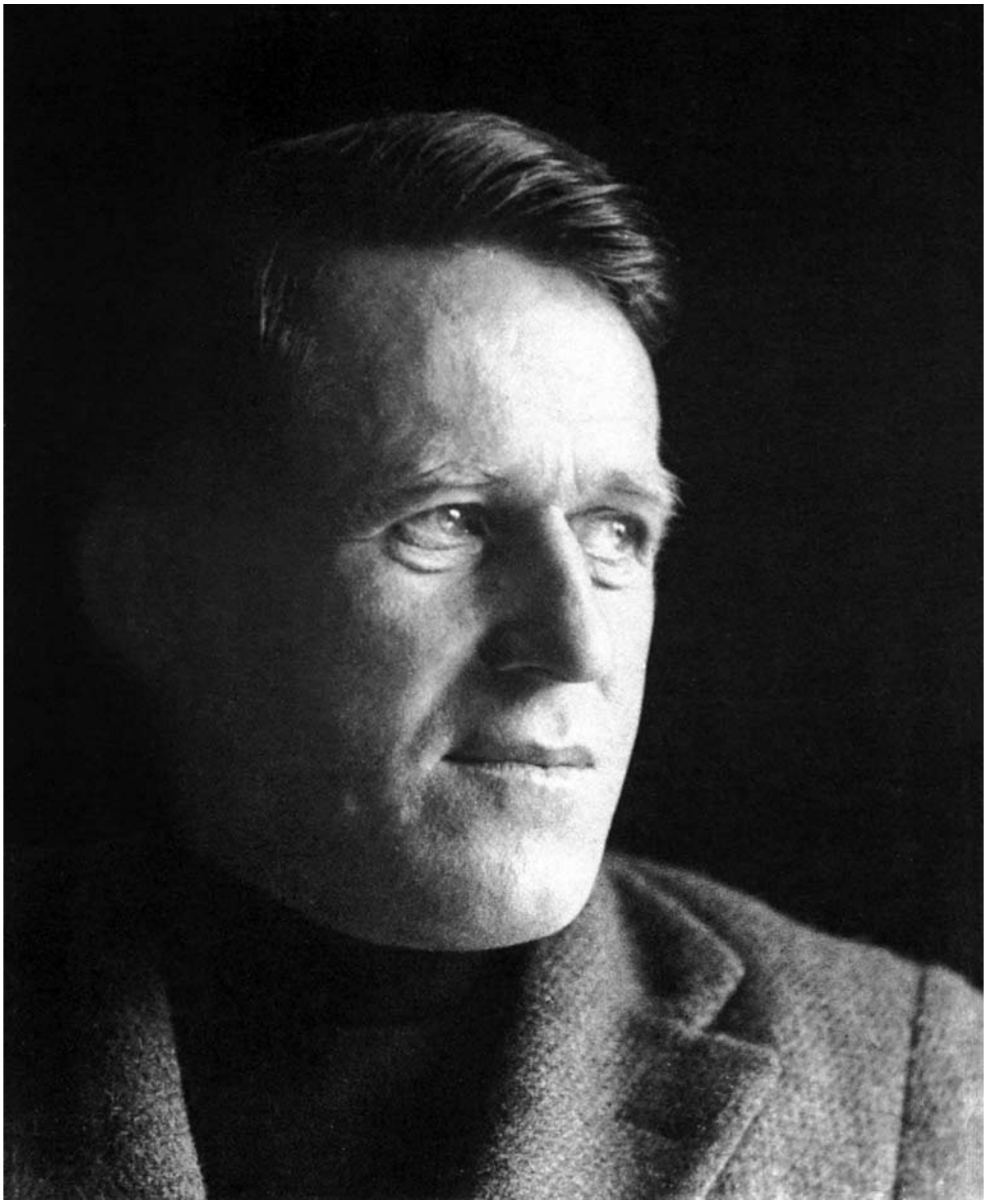


巴黎和会的**“**四巨头**”**。从左到右：大卫·劳合·乔治（英国）、维托里奥·奥兰多（意大利）、乔治·克列孟梭（法国）和伍德罗·威尔逊（美国）。在威尔逊抵达巴黎之前，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签订了一个秘密协定，瓜分了中东。



背叛被揭露。**1918**年**10**月**3**日，劳伦斯在大马士革的维多利亚饭店阳台上。艾伦比和费萨尔的重大会议刚刚结束。次日，劳伦斯离开了叙利亚，再也没有回来过。

©Imperial War Museum（Q113044）



“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之后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劳伦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一周之后，他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丧生。这是劳伦斯的最后几幅正式肖像照片之一，摄于**1934**年**12**月。**Bodleianref**：**MS. Photor. c.126**，**fol.75r**

本书所获奖项和赞誉

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历史类第一名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关注好书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年度最佳图书

《西雅图时报》年度最佳图书

《圣路易斯邮报》年度最佳图书

《芝加哥论坛报》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年度最佳图书

2014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传记类入围奖

如果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是战争面貌的描绘者，那斯科特·安德森就是劳伦斯面貌的再塑者。安德森将劳伦斯与漫游在阿拉伯战区的其他冒险家和间谍并置，精彩地再现了现代中东的形成过程。这本书的研究角度新颖独特，文字也同样异彩纷呈，令我完全置身其中，仿佛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主题的书籍一般，这当真是一种深刻的、扣人心弦的阅读体验。

——塞巴斯蒂安·容格，《纽约时报》畅销书《战争》与《完美风暴》的作者

这本书在完美展现劳伦斯这一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同时，对不知名的德国和美国特工（他们几乎和劳伦斯一样古怪）的描绘同样令人满意，这些丰富立体而又颇具启发性的形象描摹，着实让人惊叹不已。这些人对我们所知世界的塑造施加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能够阅读到他们的故事，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安德森既是一位文笔优美的作家，也是一位顽强执着的研究者，更曾目睹过与自己在档案中发掘出的行径类似的匪夷所思而又毫无顾忌的恐怖事件。正因为此，即使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残暴行为，他也能呈现得相当有说服力。相信这本壮阔的史诗，能让热爱20世纪大历史的人享受到涅槃般的极乐。

——汤姆·赖斯，普利策奖得主，《黑伯爵》和《东方学家》的作者

《阿拉伯的劳伦斯》实在是一本令人惊叹的杰作，它敏锐而又准确地捕捉了20世纪初处于分娩阵痛之中的中东宏伟壮阔的历史，将那时的蛮勇及超现实感描绘得淋漓尽致。安德森运用最高水平的戏剧叙述手法，为劳伦斯这一在战争和政治中均永垂青史的伟大人物创作出不可磨灭的肖像。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仿佛出自格雷厄姆·格林小说的人物，共同演绎出这部极其生动并意义深远的历史，真正不可多得。

——道格·斯坦顿，《纽约时报》畅销书《身处险境》和《骑兵》的作者

不得不承认，《阿拉伯的劳伦斯》确实是通过严谨研究和考证的成果，通篇不仅充满强有力的洞见，更遍布熠熠生辉的细节，波澜壮阔的故事背景下贯穿着无穷无尽的智慧、人性以及勇气，我在阅读的时候真切体会到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一气呵成、引人入胜是对这本

书最好的概括，从第一个词开始就让人不忍释手，我将会长久地珍爱这本书。

——康迪斯·米勒德，《纽约时报》畅销书《共和国的命运》和《疑虑之河》的作者

历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够在冒险、密谋，甚至神秘莫测方面与T.E.劳伦斯相提并论。斯科特·安德森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记者，他借助自己对阿拉伯世界的熟悉，通过孜孜不倦的求证，为我们精心重建了劳伦斯的影子国度。安德森用激情洋溢的笔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带领读者共同领略伟大人物劳伦斯如何在一群恶棍和特工的陪衬下，巧妙布局，运筹帷幄，为现代中东这个烂摊子打下基础。这是一部详尽而深刻的历史，铺陈在浩瀚异常的画布之上，拂去故事卷轴的尘埃，扑面而来的便是立于中心的那位神奇诡谲、充满魅力、有深刻缺陷却又令人回味无穷的伟大人物。

——汉普顿·塞兹，《纽约时报》畅销书《地狱恶犬的追踪》的作者

作者前言

在战争中，语言往往就是一种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便是如此。例如，协约国既使用“奥斯曼帝国”，也使用“土耳其”这个词。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协约国越来越偏好“土耳其”这个说法，这无疑是在力图让世人相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战前和战争初期，协约国的文件中常常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称为奥斯曼叙利亚地区下辖的省份，但英国和法国开始谋划在战后攫取这些地区的时候，就渐渐不用这种说法了。一个更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主要战争盟友——德国，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名称（“君士坦丁堡”是这座城市属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名字，拜占庭于1453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消灭），尽管本地人将这座城市称为“伊斯坦布尔”。

很多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爱的标签——“土耳其”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尔”——表明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这种视角的最恶劣形式被用来为欧洲的（帝国主义的）历史观造势。

这给专门研究西方在该战区的角色的历史学家们（包括我本人）制造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研究当然都是基于西方的文献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在清楚明晰和政治敏感二者之间择一；我感到，如果我一直使用“伊斯坦布尔”这种说法，而几乎所有参考文献都说“君士坦丁堡”的话，就会给很多读者造成困惑，因此我选择了“君士坦丁堡”。

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语言上的差别在当时并不像一些当代中东历史学家认定的那样泾渭分明。甚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时的领导层也常常使用“君士坦丁堡”这个说法，对“奥斯曼”和“土耳其”这两种说法也会混用（见第一章，杰马勒帕夏的碑铭）。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久，只会造成更复杂的问题。正如奥斯曼历史学家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之路》中承认的那样，“在1914年，要说什么‘奥斯曼政府’或‘奥斯曼内阁’，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因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明确地批驳了‘奥斯曼主义’，打定主意要建设一个为土耳其人所有、为土耳其人服务的政府……”

总而言之，我和本书的主要人物一样，倾向于多多少少地将“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混用，主要是考虑在具体的语境中哪个词更合适；而为了清楚明晰起见，我只用“君士坦丁堡”。

另一个和语言有关的问题是，阿拉伯语名字的音译方法五花八门。为了保持前后一致，我采纳的是参考文献中最常见的拼写方式，并在所有引文中对其进行标准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采纳的音译是根据埃及阿拉伯方言的发音。例如，穆罕默德·法鲁基的姓氏[1]“法鲁基”在当时的不同文件中有诸如Faruqi、Farogi、Farookee、Faroukhi等不同拼法，我则始终使用Faroki。最显著的例子是，T. E.劳伦斯的主要阿拉伯盟友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被劳伦斯称为Feisal，但其他绝大多数人，包括历史学家，都把他的名字拼写为Faisal。为了避免混乱，我全部使用Faisal这个拼法。

另外，英语的标点使用方法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劳伦斯在写作时使用的标点尤其独树一帜，有人也许会说是违背常理。有的引文中的标点可能会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于是我全部改用现代标点。我只改了标点，引文中除了使用方括号或省略号的地方之外，对原文没有任何增删。

最后，在劳伦斯在世时，一共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智慧的七柱》。第一版是1922年的手印版，只有八册，被称为“牛津版”；第二版是个修订版，1926年出版，约两百册。今天最容易读到的就是第二版。劳伦斯本人明确指出，牛津版只是个草稿，所以我的引文几乎全部出自1926年版。在少数引用牛津版的引文中，尾注里特别标示了“牛津版”。

---

[1] 严格来讲，阿拉伯人并没有姓。阿拉伯人的名字一般分成若干节，顺序一般是本人名、父名、祖父名，随后是家族、部落、出生地、职业等。作者说穆罕默德·法鲁基这个名字里“法鲁基”是姓，或许是受到西方人将姓放在名字后面的影响（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所加）。

- 序章
- 第一部
  - 第1章 花花公子在圣地
  - 第2章 非同寻常的人
  - 第3章 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
  - 第4章 到最后100万人
  - 第5章 可鄙的乱局
  - 第6章 保守秘密的人
  - 第7章 背信弃义
- 第二部
  - 第8章 短兵相接
  - 第9章 意图拥立君主的人
  - 第10章 进军沃季赫
  - 第11章 欺骗的迷雾
  - 第12章 大胆的计划
  - 第13章 亚喀巴
- 第三部
  - 第14章 狂傲
  - 第15章 奔向火焰
  - 第16章 风暴聚集
  - 第17章 孤独的追寻
  - 第18章 大马士革
- 尾声 巴黎
- 致谢
- 注释
- 参考文献
- 索引

序章

1918年10月30日早上，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1]接到了白金汉宫的传唤。英国国王传旨要接见他。

这一天，伦敦的气氛是一派喜气洋洋。在过去的4年零3个月里，在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中，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山穷水尽。这场战争夺去了三大洲约1600万人的生命。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战争结束得如此迅速，在几周前还是无法想象的。就在这一天，英国的三个主要敌人之一——奥斯曼帝国接受了和谈条件，而剩下的两个敌人——德国和奥匈帝国——很快也将举手投降。劳伦斯上校在这场战争中的贡献主要是在中东战场，他自己也对事态的神速发展颇感意外。就在10月初，他还在前线协助占领大马士革的行动。大马士革的陷落预示了奥斯曼军队的瓦解。回到英国还不到3周，他就已经和负责确定中东战后边界的英国高级政治家和将军们磋商起来。就在前不久，确定中东未来版图的事情似乎还是异想天开，但现在必须尽快上马了。劳伦斯的印象显然是，乔治五世国王这天上午传唤他，就是为了讨论这些正在会商中的问题。

但并非如此。这位30岁的上校进宫之后被领进了一个舞厅。不久之后，英国国王和王后在六名显贵和一群锦衣华服的廷臣簇拥之下，大驾光临。国王的宝座前放置着一张配有软垫的凳子，而在国王的右侧，宫务大臣端着一个天鹅绒垫子，上面摆放着许多勋章。引见之后，乔治五世微笑着对客人说："我有一些礼物要给你。"[2]

劳伦斯精通英国历史，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王座前的凳子

是授爵凳，他将要跪在上面，国王则将施行有数百年历史的复杂仪式——授予饰带和垫子上的勋章，用剑拍击肩膀，并吟诵誓言。他将成为一位大英帝国骑士。

这一刻，T.E.劳伦斯已经憧憬了许多年。在少年时代[3]，他就醉心于中世纪历史和亚瑟王宫廷的传说。他曾写道，他最大的雄心，就是在30岁时受封为骑士。在这个早上，他少年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还有一些细节，给他增加了更多的荣誉。在过去的四年中，乔治五世已经向他的军人们授予了太多的嘉奖和勋章，现在就连骑士爵位授予也是大批进行。在1918年秋季，像劳伦斯这样由国王亲自封赏的仪式是闻所未闻的。玛丽王后也亲临现场，这同样是非同寻常的。她一般会避开这种仪式，但T. E.劳伦斯战时的英雄事迹让她激动不已，于是为他破了个例。

但是劳伦斯没有跪下。就在仪式开始的时候，他悄声告诉国王，他拒绝接受爵位。

人们手忙脚乱起来，十分尴尬。在英格兰王政的900年历史中，拒绝骑士爵位的事情实在是罕见，因此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最后，窘迫地拿着勋章的乔治五世把它们放回了宫务大臣的垫子上。在火冒三丈的玛丽王后的凶狠目光下，劳伦斯上校转过身，拂袖而去。

今天，他已经辞世70多年，为他扬名立威的那些英雄事迹也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号是“阿拉伯的劳伦斯”——仍然是20世纪最神秘莫测和充满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个年轻、羞涩的牛津学者率领一支阿拉伯军队冲锋陷阵，改变了历史。

对他的历史评价之所以争议繁多，原因之一在于他涉足的地域不同寻常。劳伦斯是促使现代中东诞生的一些最关键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

者。而关于中东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论断也会被抽丝剥茧地解剖、分析和争论不休。在关于该地区无数裂痕的根源的无休止的争论中，各方按照政治的需要，对劳伦斯或不吝溢美之词，或嘲弄羞辱，或奉为至圣，或妖魔化，或者甚至将他贬抑为历史的一个小小脚注。

劳伦斯还是个性格独特的人。他是个特别喜好独处的孤僻之人，似乎一定要为难那些希望了解他的人。他究竟是个天生的领袖，还是江湖骗子？他是个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勇士，还是道德上的懦夫、战场上的胆小鬼？在所有传记家挥毫泼墨之前，劳伦斯自己已经将这些互相矛盾的特质——还有很多其他特质——加到了自己身上。另外，他还很顽皮，在讲故事的时候喜欢嘲讽那些相信和坚持要求知道“真相”的人。白金汉宫发生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后来的岁月中，劳伦斯对在宫廷舞厅内发生的事情做了多次描述[4]，每一次都和其他的记述有细微差别，与目击者的回忆的差别甚至更大。劳伦斯似乎走在大多数人前面，接受了现代历史观：历史是可塑的，人们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相，什么就是真相。

这些矛盾之处往往促使研究劳伦斯的作家们陷入吹毛求疵、晦涩难懂的争吵，有的人试图败坏他的名誉，有的人力图捍卫他的令名。他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49小时内穿越了某个沙漠，还是少说了一天多的时间？他在某战役中真的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或者其实某英国军官或某阿拉伯酋长的功绩更大？还有一些论战者非要搞清楚，他究竟是为怎样的意识形态目标服务。这真是够无聊的。劳伦斯是犹太民族的伟大捍卫者，还是疯疯癫癫的反犹主义者？他是为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奋斗的开明、进步人士，还是私底下的帝国主义者？劳伦斯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作品，而且他一生中的观点前后变化极大，所以人们对他的几乎所有赞誉和指控都能从他自己的作品中找到支持的证据，也能找到反驳的理由。

这些争论除了枯燥无味之外，主要的罪过在于，它们模糊了劳伦斯的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谜题：他是怎么做到的？不曾接受过一天军事训练、极度羞涩的牛津大学考古学家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了统领一支外国革命军的野战指挥官？又是如何变成政治战略大师，睿智地预言了中东未来的很多灾难？

答案很简单，简单到或许会让大家失望：劳伦斯之所以能够成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是因为没有人关注他所在的战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事十分宏大惨烈，而中东只是个次要战区。而在中东战场，劳伦斯参加的阿拉伯起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插曲的插曲”[5]。从消耗的生命、金钱和物资，以及帝王将相们的重大会议花费的数千个小时来看，欧洲各帝国运筹帷幄的统帅们对比利时的未来地位，比对贫困而遥远的中东要关心得多。因此，在英国军方高层看来，如果一个基本上是自行决断的年轻的陆军军官能够把乖僻而难以驾驭的阿拉伯诸部落团结起来去骚扰土耳其人，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不久之后，阿拉伯起义和中东对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意义就变得极其重大。但在当时，不会有人考虑到甚至想象到这种可能性。

但故事还不止这么多。因为，不只是英国的战略家对中东局势不重视，其他的主要参战国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国家同样只是将从更重要的战区拼凑出来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中东，把情报搜集、煽动叛乱和缔结盟约的任务委派给了像劳伦斯一样缺乏军事经验或者半路参军的外行。

和劳伦斯一样，他的对手们也往往是毛头小伙，不曾接受过自己的任务所要求的训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行动，受到的上级监管很少。和他们更出名的英国同行一样，他们也利用了自己非常规的极大行动自由，将自己的很多个性特征——聪慧、勇敢、欺骗的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既缔造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其中有一位20多岁的美国名门望族之后（但家道已经中落），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的唯一一位美国一线情报军官。尽管当时他还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雇员，但将会给美国的战后中东政策带来极大影响。有一位年轻的德国古典学家，以阿拉伯长袍为伪装，寻求煽动一场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伊斯兰圣战。他的“以革命为战争手段”的理念被一直承袭到纳粹时期。还有一位犹太科学家，打着为奥斯曼政府效力的幌子，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奥斯曼间谍网，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这些人在今天已经几乎默默无闻，但和他们的英国同行有一个共同点。和劳伦斯一样，他们不是在中东地图上运筹帷幄的高级将领，也不是划定战后各国版图的高龄政治家。但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可能更为意义深远：是他们在前线的实践，使得将帅们构想的作战计划得以水到渠成，是他们使得政治家们设计的战后政策和边界成为可能。历史始终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历史的舞台上有几百万演员。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四个人的复杂的秘密游戏，以及他们隐藏在内心的忠诚和私人仇隙，缔造了现代中东，也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但在这四个人的小小星系中，T. E.劳伦斯和他的故事稳稳占据中心地位，这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现代中东大体上是英国人创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中东的主要战争努力是由英国人承担的，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又主要是英国人缔造了和平。在战时，对中东垂涎三尺的英国领导人们就给中东取了“大战利品”这个绰号，这预示了英国人将给中东带来怎样的和平。作为英国在这个战区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代理人，劳伦斯自然与即将到来的一切——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次，正如白金汉宫发生的事情能够证明的，在中东的经历让劳伦

斯这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有些方面，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胜利者不得不承担的道德包袱是战败者永远不会理解的。作为一位重大历史事件的建筑师，劳伦斯将会被自己在英国掠夺“大战利品”期间所目睹的事件，以及自己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长期地困扰和折磨。

---

[1] 劳伦斯此时的正式军衔应当是中校，但在几周前，为了帮助他尽快返回英国，军方暂时赋予他上校的身份。因此，从1918年10月起，官方公文中常称他为“劳伦斯上校”。

[2]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notes on interview of July 29，1933，p. 2；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 Folder 1，File 1.

[3] Lawrence，*Seven Pillars*， p. 562.

[4] Lord Stamfordham，King’s Private Secretary，to Lawrence（Shaw），January 1 and 17，1928：A.W.Lawrence，*Letters to T.E. Lawrence*， pp. 184-86. See also Graves，*Lawrence and the Arabs*， pp. 392-93，and Churchill in A. W. Lawrence，*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1937），193-94.

[5] Lawrence，*Seven Pillars*， p.274.

第一部

第1章 花花公子在圣地

> 在我看来，最近发生的新危机是个福气。我相信，土耳其人最终的责任在于，要么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民族生存，要么光辉灿烂地退出历史舞台。
>
>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叙利亚总督杰马勒帕夏对局势的评论[1]

沙暴在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温和的大气扰动，在这个季节属于司空见惯的现象。1914年1月初，一连几天，干燥酷热的微风从撒哈拉沙漠吹来，拂过在冬季变凉的地中海东部海面。到1月9日上午，热风与海面上冷空气的汇聚产生了强劲的西南风，在巴勒斯坦南部登陆之后，风力越来越强，抵达贝尔谢巴（寻漠[2]边缘的一个小村庄，离海岸约25英里）时，坎辛风（沙暴）已经一触即发。

对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在沙漠中遭遇坎辛风是相当恐怖的事情。尽管它与强雷暴雨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风暴发生前大气压都会下降，还有抖风的前奏），但在沙暴中，瓢泼而下的是沙粒，而不是雨水，所以能见度会迅速降低到几英尺，而且沙子会猛烈扫射人的身体，很快就在口鼻处覆盖厚厚的一层，并在衣服的所有缝隙积累起来，给人一种窒息感。在这种激烈感觉的冲击下，人的大脑很容易紧抓住最糟糕的主意——继续前进，或挣扎着走出沙暴。按照这种冲动行事的人往往会迷失方向、丢掉性命。

但那个下午在贝尔谢巴等待的三个年轻英国人可不是缺乏经验的人。他们在这个村庄——这是一个偏僻的前哨，或许有800个居民，是过往骆驼商队的饮水处——多等了一天，等待一支由两个美国人带领的探险队的到来。黄昏时分，美国人仍然踪迹全无，而先前还毫无威胁地出现在西方的暗褐色微风，已经变成一根数英里高的沙柱，咄咄逼人地向村庄逼近。天黑后不久，坎辛风轰然而至。

沙暴肆虐了一整夜。在三个英国人待的小屋，沙粒像暴雨一样狠狠敲击窗板，四下飞溅。虽然他们拼命努力把屋子密闭起来，但室内所有东西很快都被一层精细的沙漠细沙覆盖了。黎明时，风力有所减弱，徐徐升起的太阳出现在东方苍穹中，像是一个暗银色的球。[3]

下午早些时候，坎辛风终于平息，贝尔谢巴的居民们从屋子和帐篷里走出来，四处活动起来。这时，英国人得知了关于美国人的一些消息。原来美国人在前一夜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沙暴，在村庄以东几英里处安营扎寨下来。三个英国人给他们的骆驼配上鞍具，去寻找美国人的营地。

荒凉枯寂的环境中，美国人营地的富足显得颇为怪异。除了几辆用来运载为探险队的牲口准备的青贮饲料的马拉大车之外，还有几辆车专门用来运载探险队较大的“野外家具”。坎辛风已经平息，土著勤杂工们正在忙着收拾营地，准备开拔[4]。率领探险队的两个年轻美国人居住的两个非常高档和宽敞的钟形帐篷——无疑是从伦敦或纽约的高档探险装备店买来的——也被拆解了。这两个人都是20多岁，身穿西部户外衬衫，头戴圆顶硬礼帽，分别叫作威廉·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他们向英国访客们解释说，他们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行程是圣地大旅行的一部分，事先也没料到会遭遇恐怖的沙暴。

但这两个美国人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尽管他们都衣冠楚楚，旅行时的生活方式也很时髦，但这两个人——麦戈文身材矮小而沉默寡言，耶

鲁身躯粗壮、相貌粗犷，有如拳击手——却不像是自然而然的旅行伙伴，或者是那种愿意到圣经中的名胜地点朝圣的游客。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有些奇怪。在叙利亚这个偏僻的角落遇到其他外国人，本应是件新奇有趣的事情，往往会让双方一下子就亲密起来，但耶鲁和麦戈文却没有示好的意思。恰恰相反，英国人的到来让这两个美国人颇有些紧张不安，甚至不悦。但沙漠中的好客礼节迫使耶鲁——他显然是两人中的领导者——邀请客人们到食堂帐篷坐下，并派遣一名帮佣去沏茶。

但如果说英国人感到美国人形迹古怪的话，威廉·耶鲁对他的英国客人们有着一模一样的印象。年纪最大的英国人——耶鲁估计他是领头的——大概三十五六岁，黑发，面部清瘦如鹰隼，穿着一件饱经风霜的英国陆军制服。他的伙伴们都穿着便服，比他年轻不少，其中一个人大约二十五六岁，第三个人看上去简直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最让耶鲁困惑的是，两个年纪较大的英国人很少说话，而那个“孩子”却像个喜鹊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独占话头。他非常瘦削，面部线条很重，让耶鲁几乎感到讨厌，但他的眼睛非常吸引人，是浅蓝色的，目光炯炯有神。

这个最年轻的访客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为一个叫作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英国机构工作，对这一地区的圣经时代遗址进行考古研究。然后他口若悬河地给美国人讲起自己在近东的冒险经历，他讲起来喋喋不休而又引人入胜，耶鲁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些故事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盘问：

> 他滔滔不绝的话里夹杂着一连串问题——都是貌似天真无害的问题——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有什么打算。他推测，我们是有钱的游客，要潇潇洒洒地游览西奈和巴勒斯坦。直到客人们离去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个貌似乳臭未干、活力四射的小伙子把我们都榨干了。

威廉·耶鲁后来才知道，他邂逅的这个人就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很快就以“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称号扬名四海。耶鲁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劳伦斯假装对美国人的圣地旅行感兴趣，只是为了耍弄他

们，他早就知道，他们的故事只是幌子。

事实上，威廉·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来到巴勒斯坦的秘密任务是寻找石油。遵照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的命令，他们在此前的3个月扮作有闲阶级的少爷——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花花公子——加入了圣地旅游团。他们打着这个幌子，悄悄从旅游团溜走，沿着死海发掘，并在朱迪亚[5]山麓地带进行地质勘探。

但如果花花公子的招牌故事在他们早期的漫游中还说得通，因为至少朱迪亚有古代遗址，死海在《圣经》里是个重要地点——他们转向孤独凄凉的贝尔谢巴之后，就显得很可疑了。耶鲁和麦戈文的最终目标是贝尔谢巴东南方约20英里处沙漠中的一座荒凉的岩石山丘——克恩纳布。考虑到这个目的地，花花公子的幌子就显得很可笑了。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的招牌故事可信度越来越低，美国人才没有在前一夜进入贝尔谢巴。石油勘探家们接近村庄的时候得知，村内有三个英国人。他们一心要逃避与英国人的会面和有可能遭遇的尴尬问题，于是决定在沙漠中扎营，次日拂晓时溜进贝尔谢巴，快速地收集继续旅行所需的给养，然后在被发现之前就溜之大吉。缓缓移动的坎辛风显然让他们的计划泡汤了，耶鲁在早上等待沙暴平息的时候就很担心，在贝尔谢巴的英国人得知他们的沙漠营地并前来拜访只是时间问题。果然，三个英国人骑着骆驼出现的时候，他的担忧成了事实。

但耶鲁当时有所不知的是，他的伪装隐蔽全都是徒劳，而英国人貌似即兴而来的拜访其实是早有准备。两天前，劳伦斯和他在考古探险队的同事们就收到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电报，得知有美国石油勘探家在这一地区活动[6]。劳伦斯等人被派到贝尔谢巴，就是为了拦截耶鲁和麦戈文，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

如果说让一个考古勘探队来承担这样的任务有些奇怪的话，是因为

这背后另有缘由。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帐篷内另一个穿便服的人，是一位很有地位的考古学家——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确是在寻找圣经时代遗址，但这个项目只是英国军方主持的一个更为敏感和复杂的秘密行动的幌子而已。奥斯曼政府官员肯定知道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在寻漠的勘察活动，毕竟是他们批准了这些活动，但他们不知道，此刻有五个英国军事勘察组打着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旗号，正散布在沙漠里，悄无声息地绘制奥斯曼帝国西南边疆的地图。负责指挥此次秘密行动的就是拜访美国人营地的那个穿军服的人，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斯图尔特·弗朗西斯·纽科姆上尉。

所以，在贝尔谢巴村外发生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虚张声势的游戏，英国人在努力搜寻对方伪装背后的真相，同时维持着自己的伪装。

在这个1月中旬，怀揣秘密在圣地漫游的年轻外国人还不止劳伦斯和耶鲁两个。在贝尔谢巴以北60英里处的耶路撒冷城，一个名叫库尔特·普吕弗的33岁的德国学者也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普吕弗相貌平平，看上去颇为乏味无趣。但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德国人只有五英尺九英寸高，肩膀很窄、坡度很大，有点发褐色的金发很稀薄，瘦削的脸庞十分普通，没有任何显著特征，是那种很容易消失在人群中的大众脸。普吕弗不仅貌不惊人，声音也很低调。他说话时永远是用轻轻细柔的低语，就好像他一辈子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但其实是因为他幼年的一次喉部手术失败，损伤了他的声带。这个年轻的德国学者身材不高，声音又很轻柔，很多人会以为他是个娘娘腔。如果他们知道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关于埃及的皮影戏的渊博研究，说不定更要嘲笑他。1914年1月中旬，普吕弗在耶路撒冷等待一位朋友——一位有一定声望的巴伐利亚风景画家的到来，计划和他一道乘坐豪华三角帆船，去尼罗河上游观光。

但就像聚集在贝尔谢巴村外帐篷内的人一样，库尔特·普吕弗博士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前几年里，他一直担任德国驻开罗大使馆的东方文化秘书。这个职位与他的相貌和仪态都很相配。东方文化秘书远离高级外交官的决策筹划，负责不引人注目地密切关注当地的社会和政治暗流，保持低调，并向国内报告。在这个岗位上，普吕弗在开罗的生活就是无止境的社交活动，接连不断地与埃及最知名的记者、商人和政治家们会见、饮茶、欢宴。

他的社交圈也包括一些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德国在和英国竞争，力图争夺在该地区的影响，所以普吕弗也暗中结交了形形色色的希望将英国人赶出家园的埃及异见分子：民族主义者、保王党人、宗教狂热分子。这位精通阿拉伯语[7]和其他六七种语言的德国东方文化秘书在1911年乔装打扮为贝都因人，奔走于埃及和叙利亚各地，在各部落间煽动反英情绪。次年，他尝试招募埃及圣战者去支援在利比亚的阿拉伯兄弟，以抵抗侵略利比亚的意大利军队。

在这些努力中，库尔特·普吕弗最终违反了自己的位置所要求的首要铁律：保持低调。在埃及的英国秘密警察注意到了他的颠覆煽动活动，悄悄地编纂了篇幅很长的关于这位东方文化秘书的档案，并等待时机来使用这份档案。他们最终采取措施之后，普吕弗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强忍了一番屈辱之后，他于1913年末辞去了德国外交部门的工作。随后，他于次年1月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的朋友——艺术家理夏德·冯·贝洛从德国抵达之后，他们两人就将前往埃及，搭乘豪华游轮，向尼罗河上游进发。他的计划是，这次旅行将持续约5个月，在冯·贝洛绘画的时候，普吕弗就打算为德国的杂志撰写游记文章，同时更新德国著名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的条目。他似乎要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轨道上去，把自己在国际政治的混乱竞技场的冒险抛诸脑后。但或许，并非如此。

也许他的间谍活动只是暂告一段落而已，因为库尔特·普吕弗在即将开始的航行过程中，将会沿着英属埃及的生命线前进，将会有机会直接观察它的防御工事和港口设施，并悄悄地了解埃及民情。被揭露、遭羞辱的前任东方文化秘书在1914年1月似乎是航向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但他心中至少有一个信念，给了他前进的方向：是英国人毁坏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他要报仇雪耻。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还有一个令人咂舌的本事可资利用。库尔特·普吕弗尽管外表天真无邪，其实魅力无穷，在风月场手段高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风流浪子。他虽然对自己的妻子——一个比他年长13岁的性格强悍的美国女人——颇有感情，但在开罗仍然接二连三地包养了很多情妇。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勾搭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她是个俄国犹太移民，名叫明娜·魏茨曼，但亲戚朋友都叫她范妮。一年多之后，作为德国在战时叙利亚的反谍报主管，普吕弗将会设想出招募犹太移民渗透进英占埃及、为德意志祖国刺探情报的主意来。普吕弗派到敌境的第一批间谍中就有他的情人范妮·魏茨曼。

在这个1月份，就在耶路撒冷以北70英里处，还有一个人即将开始双重生活。他的名字叫亚伦·亚伦森。亚伦森是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时年38岁，在中东已经享有杰出农学家的声望，为他奠定声誉的成就是于1906年发现了小麦的基因祖先。1909年，在美国犹太慈善家的资助下，他在阿特利特村外建立了犹太农业实验站。在过去的5年中，他一直在不知疲倦地试验五花八门的树木，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干旱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恢复成曾经的翠绿花园。

他的宏图大略有着政治成分。亚伦森是个坚定不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1911年就提出了一项计划，希望将巴勒斯坦的一片广阔土地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重建为犹太人的家园。当然，早在他之前，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有过这个设想，然而是对该地区的植物、土壤条

件和含水层了如指掌的亚伦森第一个提出，如何脚踏实地地实现这一梦想，如何让沙漠化为绿洲，借此让流散的犹太民族重返故土。

不久之后，亚伦森将会发现让这个梦想离现实更进一步的机遇，并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他将打着为当地政府作农业顾问的幌子，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一个庞大的间谍网，为奥斯曼帝国的敌人——英国人提供一些最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后来，这位农学家又在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工作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复国的奋斗中，他的主要盟友是哈伊姆·魏茨曼，未来的第一任以色列总统，也就是库尔特·普吕弗的情人、间谍范妮·魏茨曼的兄长。

东方的诱惑：不管是为了征服，还是探索或剥削，西方已经对东方垂涎1000年之久。在中世纪的300年间，一波一波的基督教十字军纷至沓来，来到近东。在更近的历史时期，18世纪90年代有一位所向披靡的法国将军怀揣着法老的幻想来到埃及，他的名字是拿破仑·波拿巴；19世纪30年代，欧洲最伟大的一批考古学家来到埃及；19世纪70年代，成群的西方石油大亨、石油钻井投机分子和招摇撞骗的流氓涌向里海岸边。而在20世纪初，四个年轻的冒险家由于种种类似的原因，齐聚到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威廉·耶鲁、库尔特·普吕弗和亚伦·亚伦森。

当时，这些人旅行的地方还是奥斯曼帝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之一——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从现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山区的偏僻角落发源，到17世纪初其疆域已经足以与巅峰时期的罗马帝国媲美：北至维也纳城下，南到阿拉伯半岛最南端，从地中海西部的海岸一直到现代伊拉克的巴士拉港。

但那只是曾经的辉煌。到20世纪20年代，奥斯曼帝国已经缓慢但不可避免地持续衰微许久。它被称为“欧洲的病夫”，早在19世纪50年代它的丧钟就已经开始敲响了，在随后的岁月中，有多达五个欧洲大国轮番

攫取了大片奥斯曼领土。奥斯曼人苟延残喘这么久都没有彻底灭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这些互相竞争的欧洲大国之间周旋的本领高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但在1914年，好运气到头了。奥斯曼人对风雨欲来的灾难性战争判断失误——而且是大错特错，不仅自掘了坟墓，还释放出了极其强大的分裂的力量。一个世纪之后，世界还在处置这个大分裂造成的后果。

---

[1] Djemal Pasha，quoted in Aksakal，*The Ottoman Road to War*，p.19.

[2] 《圣经·旧约》中一般称为“寻的旷野”，一般认为在今天的约旦境内。

[3]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1，p.10；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7，Folder 7.

[4] 耶鲁对自己与T.E.劳伦斯的初次会面作过多个不同的且有细微矛盾的记述，他的回忆录*It Takes So Long*中就有。其中最详细的版本，也是此处大部分信息的来源，载于他的文章“T.E. Lawrence：Scholar，Soldier，Statesman，Diplomat”（未标注写作时间，应当是劳伦斯于1935年去世后不久）；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6，Folder 1。

[5] 朱迪亚是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南部和约旦西南部。

[6] Yale，*The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Yale*，p.7；Columbia University，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1973.

[7] McKale，*War by Revolution*，p.22，n. 18.

第2章 非同寻常的人 [1]

> 你在明年冬天的发掘项目如果还有空缺，能不能安排一个叫作T.劳伦斯的牛津毕业生？他曾在卡尔基米什和我一起工作。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我相信你一定会认可和喜欢他……我补充一句，他对饮食和生活条件没有任何要求。
>
> ——1911年，戴维·霍格思写给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的信 [2]

“我想，是该给你写封信的时候了，”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在1906年8月20日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尽管这封信的文风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因为我写的所有信函都同样地不谈个人的情况。我努力去描绘的建筑物将会长存于世，比我们更长久，所以它们理应在我的信中占据更大篇幅。”

劳伦斯言出必行，在这封信的余下部分里没有谈及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甚至没有说到自己两天前是如何过18岁生日的。他极其详细地描述了他刚刚参观过的一座14世纪城堡在结构上的独特之处。

劳伦斯利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的暑假，在法国西北部骑自行车游览。就在不久之前，得益于设计革新和大批量生产，欧洲公众才开始大量购买和使用自行车。在英国，中产阶级骑自行车游览欧洲乡间一时成为时尚。但劳伦斯的旅行规模完全不同：行程近1000英里的长途跋涉，参观了诺曼底地区的几乎每一座城堡和大教堂。

劳伦斯写给在牛津的家人的信件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地方的描述。他常常在信的开头简短地表达对母亲健康的关心，但他的绝大部分信件的主要特征是彻底的冷静超然，就像这封给父亲的信的口吻一样，仿佛是在作学术演讲。

在某些方面，这种情感上的克制对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英国中产阶

级家庭成员来说并不罕见。劳伦斯所在的家庭中男性居多，有五个男孩，没有女孩，所以他们家或许格外地冷淡自制。但是英国中产阶级特别推崇自我克制和低调保守，孩子们被要求做到勤奋努力、尊敬长辈，而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万般宠爱，而是严肃审慎的宗教教诲和良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世界观简单朴素而安逸自得。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萌生激进的政治观念，而英国中产阶级仍然固守着一种更重视血统和口音而非挣得的财富的社会等级观念，这是一种严格地规定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种姓制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比50年前更加严格。这种阶级分化虽然死气沉沉，但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他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怎样的提升。人们尽可能地通过“虔诚的美德”——谦逊、自立、勤奋和节俭来获得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

当时人们最为坚信不疑的信条或许就是，大英帝国矗立于现代文明的巅峰，帝国的特别义务是通过贸易、圣经、枪炮，或者这三者的结合，去启蒙和教化世界上较为不幸的文化和种族。这种观念渗透到了英国社会的所有阶层，但在中产阶级特别兴盛，因为帝国的主要管理者——中层军官和殖民行政官员——就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无疑这也促使这个阶层的家庭中出现了一种情感上的疏离；从孩子降生起，父母就不得不告诫自己要坚强，因为他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将来可能会漂洋过海，前往帝国的一个遥远的前哨，或许几十年都不会再见面，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法重逢。

所以，在20世纪初长大成人的那一代英国中产阶级成员有着一种冷淡超然的特质，也就不奇怪了。劳伦斯的一个兄弟在多年后回忆他们的孩提岁月时曾不带一丝一毫讽刺地写道：“我们的童年非常幸福，我们几个人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4]

但至少在一个方面，住在牛津波尔斯特德路的劳伦斯一家有些不同寻常的地方，让这个家庭的严肃气氛愈加突出。托马斯和萨拉·劳伦斯

伉俪隐匿着一个令人咂舌的秘密：他们其实是一对逃亡者。不仅邻居们，就连他们的大多数孩子都对此一无所知。这个秘密的关键源自他们的姓氏：他们根本不姓劳伦斯。

托马斯·劳伦斯的真名是托马斯·罗伯特·泰伊·查普曼，曾经是英国—爱尔兰贵族地主阶层的重要成员。从伊顿公学毕业之后，这位未来的从男爵返回了爱尔兰，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韦斯特米斯郡的家族庄园过起了闲适愉快的绅士地主的生活。他娶了另一个富有的英国—爱尔兰家族的千金，不久就有了四个女儿。

但查普曼的镀金生活开始瓦解，因为他和自己幼女的家庭教师——一个叫萨拉·琼纳的24岁苏格兰女人有了私情。1888年初，查普曼的妻子发现丈夫的不忠时，萨拉已经和托马斯生了一个儿子，将他藏匿在都柏林一套租来的公寓房内，还怀上了第二个孩子。查普曼的妻子拒绝离婚，于是这位贵族不得不在两个家庭之间做出选择。

在维多利亚时代严厉而保守的法律和道德桎梏的束缚下，这个决定将会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如果他选择留在萨拉身边，托马斯·查普曼不仅会被剥夺绝大部分遗产，他的四个女儿将来也会因为家族丑闻的耻辱而很难嫁人。他和萨拉的孩子将更加命途多舛。作为私生子，他们会被很多高档学校和高级职业拒之门外，而如果他们是查普曼的合法后代的话，良好的教育和堂皇的职业原本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对托马斯来说，最稳妥的办法当然是把萨拉送回她的苏格兰老家，为她和孩子们支付赡养费。在当时，女佣和主人“惹了麻烦”之后，这种安排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查普曼选择和萨拉在一起。

托马斯把家产让给了自己的弟弟，然后和萨拉一道，于1888年中离开爱尔兰，来到威尔士北部一个叫特雷马多格的小村庄，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这一对飘零鸳鸯使用了萨拉母亲的娘家姓——劳伦斯[5]。这一年8月，萨拉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给他取名为托马斯·爱德

华。

但劳伦斯和萨拉在威尔士也没法心平气和地过日子。他们依靠查普曼家族提供的一笔不算丰厚的年金为生，但一直害怕会遇见过去的熟人，于是劳伦斯夫妇开始偷偷摸摸地颠沛流离：他们很快又离开了特雷马多格，搬到苏格兰北部的一个更偏僻的村庄，然后迁往马恩岛，随后在法国一个小镇住了几年，然后在英格兰南海岸的一个僻静的狩猎小屋住了两年。这些地点原本就与世隔绝，在每一地，劳伦斯夫妇都租住在村庄外围，或者是有高高石墙环绕的房屋，托马斯与几乎所有先前的朋友断了联系，而萨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脱离家的安全和庇护。

“你们可以想象，你们的母亲和我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头，”托马斯·劳伦斯在去世前遗留下的一封信中向儿子们吐露了心迹，“我们一直担心会被认出来，然后我们的忧伤历史被大肆宣扬。”[6]

考虑到劳伦斯夫妇持续不断的担惊受怕，1896年他们迁往牛津的决定一定是经历了一番痛苦折磨之后才作出的。他们第一次不仅要住在一个大城镇的中心，而且由于托马斯的贵族和教育背景，在这种地方是极有可能遇到老熟人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儿子们——现在有了四个儿子，第五个还在母亲腹中——在牛津会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甚至最终能够进入牛津大学，于是劳伦斯夫妇决定赌一把。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的代价是，他们的家庭更加内敛了，孩子们的生活圈子与同学相比非常狭窄，但个中缘由是孩子们当时远远无法理解的。但是什么都瞒不了托马斯·爱德华。搬到牛津之后，八岁的托马斯·爱德华住进了他童年时代的第六个家。在波尔斯特德路居住的第一年的某个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家庭的部分秘密。但他把事情都埋在自己心底，从来没有去质问父母，也没有把秘密透露给兄弟们[7]。

在牛津公立男子学校，劳伦斯是一个特别聪慧但又文静的学生，不喜欢团队体育活动，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和自己的兄弟或少数几个密友

待在一起。他嗜书如命，甚至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了很多书，但同时又热衷于骑自行车和搞恶作剧。但他还有另外一面。到青春期早期，这个被家人和朋友称为内德的孩子就开始不断地测试自己耐力的极限，要么是看骑自行车最远能走多远，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要么是看不吃饭、不睡觉或不喝水能够坚持多久。这不是男孩子检验自己的一般项目，而是时间相当久的痛苦折磨[8]。内德凭借钢铁般的意志，能够一直坚持到崩溃为止。他的这种习惯非常引人注目，甚至他四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八年级）时的校长亨利·霍尔也注意到了。“他和同龄的男孩子不一样”，霍尔在回忆劳伦斯时写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就颇有些斯多噶派的作风，对愉悦和痛苦都不在意。”[9]

这部分是由于劳伦斯的家庭环境越来越严苛。随着劳伦斯兄弟渐渐长大，萨拉作为家里的纪律管理者，一方面越来越笃信宗教，另一方面又越来越经常体罚孩子。这可不是一般的打屁股，而是用皮带或枝条长时间地鞭笞[10]。根据劳伦斯兄弟的回忆，最常被她鞭笞的是内德。这在母子之间造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关系。内德坚持在被鞭笞时绝不哭泣，绝不求饶——他似乎为自己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感到高兴——这往往让体罚更加严酷，有好几次连通常是妻管严的托马斯·劳伦斯也干预进来，让萨拉住手。

大约15岁的时候，内德的发育突然停止了。他的所有兄弟最后都比他高大，他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矮小——按照不同的说法，他的身高是5英尺3英寸或5英尺5英寸——这让原本就很害羞的他愈加羞怯。大约同一时期，他开始对中世纪骑士的故事和考古学着迷。他开始骑自行车在英格兰乡间长途漫游，寻访教堂，拓下纪念铜牌上的铭文。他和当时最好的朋友一道，搜寻了牛津的各个建筑工地，寻找古物，还真找到了不少。这些古物，大多是16、17世纪的玻璃和陶器碎片，这些古物很快让内德来到了牛津中部的阿什莫林博物馆。

阿什莫林博物馆是英国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重点收藏东西方文化交汇产生的文物，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劳伦斯的人生。这个少年把自己在建筑工地发现的古物送到博物馆，得到管理员们的鼓励，于是就经常在放学后到博物馆来，并在周末帮助干零活。对劳伦斯来说，阿什莫林博物馆是通向牛津之外广阔世界的窗口，馆内收藏的文物让他经常读到的地方和文明都变得有血有肉。1906年夏天，他独自一人骑车游历诺曼底，参观城堡和教堂，这既佐证了他对历史的痴迷，也证明了他已经很突出的独立自主精神。

劳伦斯在中学成绩优秀，于1907年秋季被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主修历史学。他一直对军事史和中世纪有着浓厚的兴趣，计划撰写一篇关于中世纪城堡和防御工事的论文。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计划在1908年暑假进行一次足以令他先前在诺曼底的远足黯然失色的旅行，那将是一场行程2400英里、纵览法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类似建筑的自行车长途跋涉。在这次旅行中，他要么住在廉价公寓，要么在野外露营，从一座古堡或城堞前往下一座，常常每天要行进超过100英里。在每一座城堡前，他都要拍照、绘图，写下极其详细透彻的笔记，然后重新跨上自行车，继续前进。

起初，他写给波尔斯特德路的信和过去旅行中写下的同样冷淡，甚至乏味。但后来变了样。1908年8月2日，劳伦斯抵达艾格莫尔特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地中海。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描摹了这一天的经历，文采飞扬、激情四射。

“我今天在海里游泳，”他写道，“大海，全世界最伟大的海；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感受……我感到，我终于来到了通往南方的路途，整个光辉灿烂的东方——希腊、迦太基、埃及、叙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西西里、克里特——全都在那里，触手可及……噢，我一定要去那里——走得更远——再次远行！来到海滨，几乎让我欣喜若狂；如果明天能去

希腊，我一定毫不犹豫。”[11]

他简直像是在描述一次宗教意义上的心灵顿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

这年秋天，他重返牛津校园后，开始酝酿一个新的也更为雄心勃勃的旅行计划，这个计划将把他带到在艾格莫尔特畅想过的最遥远的地方。最早听到他的新计划的人当中有一位叫作戴维·霍格思的先生。

霍格思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曾长期在近东工作和旅行，最近才开始担任阿什莫林博物馆馆长。霍格思肯定早已从管理员们那里听到过T.E.劳伦斯的名字——这个羞怯的牛津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在博物馆活动，对考古工作兴趣盎然——但1909年1月的一个下午，身材矮小的劳伦斯走进霍格思的办公室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在游览法国诸多城堡之后，劳伦斯已经把自己在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的设想作了极大的扩展。简单地说，单单研究欧洲中世纪的防御工事已经没有什么新意，而军事建筑研究领域的一个长久的谜团是，中世纪城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或者东方：是基督教十字军在入侵圣地的时候从他们的穆斯林敌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还是穆斯林从十字军那里照抄了军事建筑的样式？劳伦斯向霍格思解释说，他建议对近东叙利亚地区的十字军城堡作一番研究，而且，按照典型的劳伦斯风格，不仅仅是参观一些有名的城堡，而是研究几乎所有城堡。劳伦斯计划在下一个暑假里进行这次长途旅行，而且是单枪匹马。

霍格思已经因为劳伦斯的矮小——他已经20岁，但看上去足像是15岁——吃了一惊，现在听了他的计划，更是瞠目结舌。劳伦斯提议的远征意味着要穿越沙漠和崎岖山岭，跋涉上千英里，这些地区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道路早已破败不堪。另外，夏季绝对是在叙利亚旅行的最糟糕时节，因为内陆的气温常常飙升到华氏120度[12]。霍格思的一部在他去

世后出版的作品中描述了这次谈话。他以巧妙的外交手段提出这些异议时，遇到的却是钢铁般的决心。

“我非去不可。”劳伦斯说。

“那么，你有钱吗？”霍格思问道。“你会需要一名向导，还需要仆人搬运你的帐篷和行李。”

“我打算徒步旅行。”

这计划越来越荒唐了。“欧洲人在叙利亚不能徒步旅行，”霍格思解释道，“那样既不安全，也不舒适。”

“嗯，我可以的。”劳伦斯说。[13]

这个小伙子唐突的决心让霍格思十分震惊，他请求劳伦斯至少征询一位真正专家的意见。这位专家是查尔斯·蒙塔古·道蒂，一位曾经涉足劳伦斯提议的大部分地区的探险家，他的著作《阿拉伯沙漠游记》在当时被认为是一本权威游记。劳伦斯联系到道蒂之后，后者甚至比霍格思更反对劳伦斯的计划。

“在7月和8月，不论白天黑夜都炽热难当，”他在给劳伦斯的信中写道，“甚至在大马士革的海拔（超过2000英尺）也是如此。这是一片肮脏的土地，欧洲人很难找到舒适的生活条件。我认为，熟悉这一地区的人会告诉你，在白天长时间徒步行进是办不到的事情。当地人只知道自己的悲惨生活，对任何在他们国家漫游的欧洲人都抱有敌意，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隐蔽的敌意。”[14]

为了防止自己说得还不够清楚，道蒂又继续写道，“你要走的路途太遥远。除了从欧洲带来的一点点力量，没有任何能量支撑你走下去。缺乏食物、休息和睡眠很快就能让你的身体垮掉。”

这样的建议或许会让大部分人打退堂鼓，但劳伦斯岿然不动。对于一个习惯于测试自己忍耐力极限的年轻人来说，道蒂的信读起来像是在发出挑战。

他的外貌和身份的确很相符。公牛般粗壮的肩膀、布满老茧的双手、泰迪·罗斯福 [15] 式的八字胡——威廉·耶鲁，1908年夏季受雇在库莱布拉水道 [16] 工作的新任水准测量工程师，很容易就混入了潮水般涌向中美洲的数万名工人之中。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加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建筑工程——开掘巴拿马运河。

他的同事中很少有人猜得到，威廉·耶鲁其实没有任何工程学背景；他能得到测量工程师的职位和相应的高薪，是由于一位有着强大人际关系网的大学朋友的鼎力相助。更少会有人猜得到，这个21岁的年轻人——根据各方面的说法，他是个不知疲倦、从不抱怨的好工人——其实是在对自己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行动。他是美国最为富甲天下、美名远播的豪门望族之一的后代，而直到不久前，他还过着按照当时的极端标准也算是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威廉·耶鲁是美国典型的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富翁的暗黑反面，他是生来就口含银匙、享有极大特权的天之骄子。但是，在一眨眼的工夫里，他的这一切丢了个一干二净。

新英格兰的耶鲁家族于17世纪中叶来到美洲，是个地地道道的扬基望族，在250年间，通过航运、制造业和开发新大陆的所有财富，发财致富，资本越来越雄厚。耶鲁家族恪守长老会精神，同样相信慈善事业和教育；1701年，伊莱休·耶鲁，也就是威廉的曾曾叔祖，在纽黑文创办了以他们家族姓氏命名的耶鲁大学。

威廉生于1887年，似乎注定要子承父业、沿袭家族传统。他是实业家和华尔街投机商威廉·亨利·耶鲁的第三子，从小在斯派腾戴维尔 [17]（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西南端的峭壁）上的一座四英亩的大庄园长大。斯派腾戴维尔居高临下地俯视的曼哈顿和哈得孙河，素来是纽约的富豪

阶层偏好的住地，足以逃避城市的喧嚣和烟尘，而耶鲁庄园是斯派腾戴维尔上最奢华宏伟的豪宅之一。在童年早期，威廉和他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在自家豪宅内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在曼哈顿最有名的舞蹈学校——多兹沃思学校学习跳舞和礼仪，在位于纽约州北布莱克河谷的带有森林的巨大家族地产上消暑。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威廉中学时期在非常有名的劳伦斯维尔中学就读，就在普林斯顿城外。

但从幼年时起，耶鲁家的男孩子就比纽约其他的豪门少爷们眼界更开阔。这要感谢他们的父亲。除了是泰迪·罗斯福的铁杆支持者之外——耶鲁家族是典型的进步的共和党人——威廉·亨利·耶鲁还很赞同罗斯福关于理想的美国人，以及“过度文明”（即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危险的观念。根据这种世界观，真正的男人应当是个粗犷有力的个人主义者，身体强健，学识渊博，既能够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或者在大草原上射杀大型野兽，也同样能够挥洒自如地在沙龙内与女士们交谈。为了把他的儿子们培养成这样的男子汉，威廉·亨利经常带他们去美国的荒野长期旅行，并保证让他们掌握狩猎、钓鱼、设陷阱的本领，同时还能够在斯派腾戴维尔的花园聚会上做到彬彬有礼。

“罗斯福式的男子汉”的理想似乎特别在他的第三子（与他同名）身上扎下了根。1902年，在劳伦斯维尔中学的暑假期间，14岁的威廉和父亲一起前往古巴，去游览这个新近从西班牙手中“解放”出来的岛屿的风光，并参观耶鲁家族最近购得的铜矿。中学毕业后，威廉没有直接去耶鲁大学就读——耶鲁家族的男孩子选择哪一所大学，自然是不消说的——而是等了一年时间，有一段时间是陪伴一位富有的朋友及其家人搭乘他们家的私人火车，游览美国西部。

但和T.E.劳伦斯一样，当威廉·耶鲁思考自己的前程时，想到家庭已经为自己安排了传统的人生旅途，不禁感到一丝恐惧。“我看到其他年轻人过上的循规蹈矩的生活既无趣又毫无意义，”他后来写道，“想到一

天天、一年年又翻来覆去地做相同的事情，简直让我发疯。其他人能够一直居住在自己长大的城市，和自己从小就认识的姑娘结婚，住在自己家庭拥有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去他们父亲的公司上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完全无法理解。”

但很快就有人替他解决了这个难题。1907年10月，华尔街的恐慌导致全国性的银行挤兑，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几天之内就缩水近一半。很大程度上靠举债经营的威廉·亨利·耶鲁损失惨重，万贯家财几乎被一扫而空。威廉在耶鲁大学一年级那年圣诞节回家后，父亲告诉他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消息：这个19岁的大学生从现在开始必须勤工俭学，基本上要自力更生了。

威廉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很复杂的：对自己荣华富贵生活的骤然告终，自然是感到无比震惊；但同时也有一种解脱感。现在，追寻自己梦想中的冒险生活的机会来了。这年夏天，他从大学告假，乘船前往巴拿马。

在中美洲的6个月改变了他的人生。耶鲁的伙伴不再是名门望族的继承人和社交名流，而是一群鱼龙混杂、放荡不羁的来自各国的冒险家和流浪的建筑工人，这些粗野的汉子教会了这位破落贵族如何干活，如何痛饮。根据耶鲁自己的记述，完全是由于他母亲清教徒式的训诫，他才抵挡住了巴拿马城的纳瓦霍酒吧娼妓们的诱惑，保住了清白之身。

如果说巴拿马为他打开了人生的大门，但要继续走下去还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返回纽黑文读完大学之后，威廉·耶鲁发现自己身处窘境。“我的世界一落千丈。要想结婚和过上我自幼期待的那种生活，似乎完全无望。究竟如何挣钱，我一点概念没有……现在该做什么呢？我当时身无分文、债台高筑，对世界一无所知，而且内心里对世界非常恐惧。”

他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海外勤务学校”的招生启事。

1909年9月，穿越叙利亚北部阿勒颇以西炽热如火的平原的旅客，或许会看到这样一幅令人困惑的景象：一个瘦如竹竿的年轻英国人，肩膀上挂着帆布背包，拖着沉重的脚步前行，后面跟着一队土耳其骑兵。

几天前，T.E.劳伦斯抵达了偏僻的山区城镇塞赫云，准备在那里悄悄地研究又一座十字军城堡。当地的奥斯曼行省总督对这个年轻的旅行者颇感惊奇，坚持要以伺候达官贵人的礼节来招待劳伦斯。劳伦斯被邀请到总督府，受到盛情款待。劳伦斯踏上前往阿勒颇的五天旅途时，总督还派了骑兵保护他。

“一个徒步的人却得到一队轻骑兵的小心护卫，这的确很有趣，”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描绘了这个小插曲，“当然了，所有人都认为，我要步行真是疯了，平均每隔半小时，我的保镖们就要请我上马；他们无法理解我对任何四条腿东西的偏见。”[18]

那年夏天，劳伦斯在叙利亚的徒步旅行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段旅程从海滨城市贝鲁特开始，向南穿过黎巴嫩的群山，前往巴勒斯坦北部，历时3周。返回贝鲁特，休息几天之后，他又开始了更复杂也更艰苦的北上的跋涉。

这段冒险改变了他的一生。不论走到哪里，当地人都以万分惊愕和极度的慷慨大方欢迎他。在一个又一个村庄，村民们争先恐后地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或者在家里过夜，尽管当地人一贫如洗，但很少会有人收他的钱。“对于漫游者来说，这是个美好的国度，”他在8月中旬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因为在这里，热情好客绝不是一句空话。”[19]

他的家信中洋溢着先前不曾有过的幸福感。在8月底写给母亲的一

封信中，他的口吻就像是想象自己的人生被旅行彻底改变的现代大学生一样："我很难再变回英国人了。"[20]

但与现代大学生不同的是，劳伦斯后来的确很难融入英国社会。

返回牛津后，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劳伦斯在波尔斯特德路家中花园里父亲为他修建的舒适小屋内艰苦地写论文。他的论文标题很准确，但不算吸引人：《12世纪前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

牛津大学历史系审读论文的教授们对他的原创研究评价很高——当时和现在一样，大部分论文其实多少都是其他人论文的摘要——于是向劳伦斯授予一等优秀奖，这是大学里最高等的评级，那一年历史系只有10人获得这项荣誉。这项荣誉让他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他新发现的目标——的热情高涨起来，大学还为他安排了一笔奖学金，好让他读研究生。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在牛津建筑工地的考古发现，劳伦斯早就对陶器有着特别的兴趣，于是他在研究生期间转向了陶器研究领域。研究"11～16世纪的中世纪铅釉陶器"听起来固然没有在叙利亚漫游那么激动人心，但这是他为自己构想的学术生涯的第一步。

但这个构想不会实现了。1910年秋天，为了研究陶器而来到法国仅仅几天之后，劳伦斯得知，戴维·霍格思即将前往叙利亚北部，去主持大英博物馆在卡尔基米什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的启动工作。劳伦斯立刻放弃了在法国的计划，匆匆赶回牛津，试图劝说霍格思把他也带上。

他是个瘦小、病弱的孩子，生在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家。库尔特·普吕弗是柏林一位教师的独生子，在青春期之前，就患了一连串的病，包括结核病、肾病和白喉。白喉治疗的失败导致他的嗓音变得纤细轻柔。

他的父母——卡尔和阿格尼丝·普吕弗不是很喜欢这个病快快的孩

子。父亲经常批评库尔特的所谓懒惰，而母亲对他很少有疼爱的表现，甚至根本不关心他。情感上的隔绝还不止这些。按照普吕弗的传记作者唐纳德·麦克凯尔的说法，库尔特在童年时代没有任何朋友，成长过程中唯一的情感牵挂就是比他年长好几岁的姐姐。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库尔特·普吕弗因为自己的嗓音在学校操场上无疑遭到过许多嘲弄，他长大成人之后最喜欢骂别人是同性恋，他会把整个民族怒斥为同性恋，甚至给自己已经结婚的儿子也打上这个标签[21]。

与他的家庭生活精神上的贫乏形成对比的是，普吕弗生活在德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时代[22]。1871年，也就是普吕弗出生的10年前，奥托·冯·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大获全胜，打破了几百年来德国诸侯林立的旧模式，打造出了现代的德意志国家。

在国家控制的社团主义结构下，德国迅速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发展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地铁路、运河和公路的庞大网络四通八达。一系列保护工人权益的立法，以及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体制，让地球上曾经阶级划分最为森严的社会告别了旧秩序。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更使得旧的等级社会被进一步打破。大学教育一度是精英阶层的专利，现在中产阶级也能上大学了，到世纪之交，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半来自中产阶级。

德国在国外的形象和权威也发生了同样戏剧性的变化。德国曾经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互相争斗的封建领地的混合体，欧洲的各个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撺掇这些领地鹬蚌相争，从中得利。现在，德国突然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德国已经迟到了，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仍然在非洲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德国甚至以光辉雄壮的姿态，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岛——差不多是地球上离德国最远的一个点——插上了自己的旗帜。

如果说是俾斯麦一手创立了现代德意志国家，那另一个人则真正把

德国推上了国际舞台，并在此过程中点燃了库尔特·普吕弗这样的年轻德国人的激情。1888年，29岁的威廉二世（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登上了德皇的宝座。年轻的皇帝喜爱军服和好战的言辞，对欧洲其他王室非常怨恨。他决心要让他的国家不仅成为地区性强国，更要成为世界霸权。常有乱伦现象的欧洲王室圈子一直将威廉二世视为情感冲动但还可以控制得住的急性子，只要德国的真正统治权还掌握在沉稳的俾斯麦首相手中，其他欧洲国家就不是很担心。但当威廉二世于1890年迫使俾斯麦辞职，自己执掌独裁权力时，大家都担忧起来。没了铁血首相稳重的引导，身处阿谀奉承之徒和普鲁士军事精英的簇拥之下，威廉二世让他自己，以及他的国家，醉心于一种毒性很烈的民族主义神话，这种神话的根源既有一种被迫害的冤屈感，也有优越感：在历史上，由于其他国家的阴谋诡计，德国被剥夺了理应享有的“太阳下的崇高地位”，现在要洗净这个巨大的耻辱，哪怕动武也在所不惜。

对于库尔特·普吕弗这样在这个历史性关头成长起来的男孩，几乎可以说是新的德国造就了他。1896年他进入中学时，德国引入了一种新的全国性教学大纲，与欧洲的古典教育模式分道扬镳，改为强调灌输民族主义自豪感和国家及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个来自柏林的生性孤僻、体弱多病的孩子成了这种观念的狂热信徒。库尔特断然摒弃了父亲的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还反叛父母狭隘的小资产阶级视野，尤其是他们希望他子承父业，做一名教师。这个德国的“新人”——尽管父亲对他评价不高，但他其实聪慧过人、意志顽强——为自己设想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他要去东方。

他憧憬东方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政治潮流。19世纪末互相争斗、不择手段的欧洲列强越来越倾向于将外交视为一种零和博弈——自己的两个竞争者之间如果达成了任何协议，都被认为是自己的直接损失，或者是对自己的威胁——但在威廉二世的疑心极重、偏执妄想的德国，这种倾向特别明显。纵观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友好的

迹象越来越清晰——这三国的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德国的快速军事化感到恐惧——于是，“包围”在柏林越来越成了一个流行词。为了躲避竞争对手——一边是法国和英国，另一边是俄国——的包围，腹背受敌的德国需要在远方寻找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空间。希望最大的就是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治下的东方。1898年，德皇以盛大的排场巡游了奥斯曼世界，所到之处都受到最高规格的欢迎和款待。于是，向东方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流行。对爱国的年轻德国人来说，近东一下子变成了值得向往的边疆。

但更吸引库尔特·普吕弗的是东方的异国情调。在19世纪的不同时期，在近东的考古发现令欧洲公众兴趣盎然，在德国尤其如此。从19世纪40年代卡尔·累普济乌斯对埃及金字塔的探索，到70年代海因里希·施利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的发掘，德国考古学家一直身处东方探索的最前沿，很多最伟大的发现都要归功于德国人。19世纪90年代，德国科学家们在上埃及的卢克索地区发掘墓葬，而阿道夫·埃尔曼在柏林大学成功解读了法老时代的象形文字，公众对东方的新一波兴趣引来了所谓的埃及学的黄金时代。这种狂热紧紧地攫住了年轻的普吕弗的心灵，就像后来宇航时代的开端让又一代人如痴似狂一样。早在孩提时代，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来自近东的冒险和发现的故事，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去那里。

如果库尔特·普吕弗不是拥有一种特殊天赋的话，那么这也永远只能是孩童的梦幻而已。他的发音有困难，但奇异的是，他是个语言天才，在几个月内就能把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学到接近流畅的程度。他在中学时就掌握了法语和英语，但这个年轻人的目标更为远大。

部分是为了安抚对他抱有传统期望的父母，20岁的普吕弗于1901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同时，他参加了东方语言的研讨班，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这是比较难学的两种语言。两年后，

他完全放弃了法律学业，借口干燥的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前往意大利南部，学习意大利语。[23]

但意大利毕竟不是东方，于是普吕弗在1903年夏季出航前往开罗。在随后的3年中，他又在东方作了两次长期旅行，一边读东方学的博士学位，一边给德国的文化杂志写游记来贴补生计。

或许恰恰是由于平民出身的刺激，普吕弗选择的研究领域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埃及的一种完全供劳动阶级娱乐的皮影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描绘了自己在开罗的瓦斯阿贫民窟的一家咖啡馆观看这种皮影戏的经历：

> 这家咖啡馆主楼层的边座和长凳上挤满了人，绝大多数是社会最底层的分子。在这里，赶驴人、脚夫和推着手推车叫卖的小贩摩肩接踵地坐着，安静地抽着大麻烟斗。上流社会的成员不敢涉足瓦斯阿贫民窟，生怕玷污自己的名誉。[24]

在开罗的外国侨民当然也不会来到瓦斯阿贫民窟，所以这位年轻的德国学者几乎是能够瞥见埃及日常生活的唯一一个欧洲人。在瓦斯阿这样的地方，普吕弗还熟练掌握了阿拉伯口语，这种口语与上流社会讲的阿拉伯语差别很大，将来对他会有很大助益。

到1906年初，普吕弗站在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拿到了埃尔朗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原本很容易在德国找到一个大学教师的工作——那样的地位比当小学教师的父亲要高得多，这也可以算作对父亲的一个小小的胜利——但他一心想回到东方。很快连续发生了两件好事，让他吉星高照，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

那年冬天，他结识了弗朗西丝·埃塞尔·平卡姆[25]，一个在柏林学习音乐的美国女人。平卡姆已经38岁，来自马萨诸塞州林恩的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维斯理学院，在遇见比她小13岁的殷勤有礼的东方学者时，

按照当时的标准，已经算是老姑娘了。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尽管平卡姆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在当年4月结了婚。普吕弗说服了新娘，夫妇俩应当迁往埃及，他在那里可以继续研究，或许还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身在林恩的平卡姆的父母对这个想法肯定无比惊恐，但他们的女婿很快就得到了冒险和晋身的良机。

普吕弗先前在开罗的时候，常与德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结交，这些外交官对普吕弗熟练掌握古典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口语的本领非常赞赏。1907年初，大使馆的译员即将退休，于是大使馆询问普吕弗，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普吕弗当即满口答应。当年2月，普吕弗成为德国驻埃及外交使团的最新成员。

但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德国大使馆等待着这位其貌不扬的26岁学者。他将遇到一位导师，是曾经涉足中东的最有个性，但在英国人眼中也是最危险的人之一。

卡尔基米什遗址位于俯瞰幼发拉底河一个河湾的峭壁之上，恰好在现代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上。它周围是延绵起伏的平原，逐渐化为绿草茵茵的山麓丘陵，而西北方的远处巍然屹立着阿玛努斯山脉的群峰。这座俯瞰幼发拉底河重要渡口的峭壁在至少5000年前就有人居住，在公元前约11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达到兴盛的顶峰。当时，卡尔基米什是赫梯文明（以北面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为中心）的一座主要城市，埃及历代法老和《旧约》的作者们都熟知这座城市。《圣经》中多次提及这座城市，包括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与埃及法老尼科二世的一场战役。T.E.劳伦斯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小角落感受到了一种极强的归属感，他一生中对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劳伦斯以甜言蜜语说服了戴维·霍格思，加入了他的考古探险队，于1911年2月抵达卡尔基米什。作为探险队的初级助理，他的职责包括：在发掘进行时对现场进行拍照和绘图，以及对各种发掘物做记录。

但他的工作范围很快就扩大了。长期在发掘现场的只有两个西方人，要监管大约两百名当地工人（霍格思虽然是整个项目的领导人，但只是间或亲临现场），因此劳伦斯很快就扮演起了建筑工头的角色。在这个岗位上，他发现自己具有天然的领导才华，这不仅让别人，就连他自己也大吃一惊。

当然了，这部分是由于他是个欧洲人，地位比当地人高。在一种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下，欧洲列强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派为借口，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们手里强取豪夺，让苏丹们做出了越来越丧权辱国的妥协。到20世纪初，欧洲公民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这个国家对外国人来说真是太美好了，言语无法形容，”劳伦斯在1921年夏季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外国人在这里就像是封建制下的男爵一样。”[26]

但让劳伦斯成为领导者的不仅仅是他作为欧洲人的身份。他似乎瞬间就对东方产生了喜爱之情，与这种喜爱相伴的还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对东方文化的欣赏。此时他的阿拉伯语已经很流利，在卡尔基米什更是一刻不停地努力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语。他学习语言的方法是仔细询问工人，拜访他们的家庭，并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全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通过了解他们的民间传说故事、他们对政治的看法，以及确定复杂的民族结构（它决定了地区性的效忠关系），劳伦斯渐渐摸清了叙利亚北部这个小角落及其人民的情况，他很可能比当时其他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更熟悉这个地区。

当然了，关注最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卡尔基米什发掘现场的工人们都来自附近的杰拉布卢斯镇，他们此前和西方人打交道时无疑总是泛泛之交和卑躬屈膝。他们肯定从未见过一个西方人肯花时间去了解他们的孩子、亲戚和祖先的名字，或者乐意接受邀请、光临他们的寒舍，或者对他们的仪式和风俗表现出真正的尊重。

劳伦斯还有一个地方给当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一般认为，欧洲人都是软弱或者娇气的，但劳伦斯截然相反，他可以在炎炎赤日下一连苦干好几个钟头，中途没有任何休息；他可以徒步或者骑马行进几天而毫无怨言，或者像一个当地人一样，泰然自若、听天由命地硬撑痢疾和疟疾带来的痛苦。对杰拉布卢斯的阿拉伯人来说，劳伦斯坚忍不拔、毅力顽强、生活朴素，不像个欧洲人，倒更像他们自己。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他们以强烈而持久的忠诚回报劳伦斯，因为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劳伦斯在叙利亚待得越久、受当地人接受的程度越高，他的思维和行为就越来越不像英国人。

在更深的层面上，他在叙利亚的时光让他开始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他先前的关于西方“启蒙和教化落后民族”的观点。他与一个来自杰拉布卢斯、叫达霍姆的年轻人的密切关系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达霍姆当时只有13岁，在卡尔基米什发掘现场负责赶驴子。这个聪明而特别英俊的少年很快被劳伦斯提升为私人助理，两人密不可分，导致有人窃窃私语，说他们可能是一对情人。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劳伦斯在达霍姆身上看到了阿拉伯民族本质上的高贵（这种新观念有些过度浪漫化了），仰慕他们的苦行禁欲，认为那是一种脱离了西方式放纵的“朴素的福音”[27]。

1911年，在从杰拉布卢斯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介绍了达霍姆，称其为“一个有趣的人”[28]，说自己希望帮助达霍姆。在这封信中，他表现出了与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矛盾的观点：“好在这一地区还没有受到外国影响。如果你们看过法国影响造成的破坏，还有美国影响的恶劣后果——尽管没有法国人那么糟糕，你们就会希望，这样的影响永远不要扩张。半欧洲化的阿拉伯人的恶俗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不曾受过欧洲影响的阿拉伯人要比他们强一千倍。外国人来这里是为了教诲当地人，但其实他们最好是向当地人学习。”

这不是考古学家一般会思考的问题。就连对自己的弟子非常钟爱的戴维·霍格思也从来没有确信，劳伦斯拥有学者的心灵或气质。劳伦斯很少有伦纳德·伍莱（他于1912年成为卡尔基米什的主管科学家）那样的人的极其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的精神。劳伦斯的主要兴趣在于这片土地，以及他周围的人们；他的激情就在于此。

这种激情给了劳伦斯一种独特视角，让他观察到了20世纪初的意义更为重大的历史潮流[29]：奥斯曼帝国的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目击这一历史大潮的大多数西方人都住在中东的城市。劳伦斯是少数目睹这一潮流在乡村的发展的西方人之一，而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子民都生活在乡村。

奥斯曼帝国的丧钟早就被敲响了。奥斯曼帝国延续了近五个世纪，主要是因为它允许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在很大程度上自治，只要缴纳赋税，并向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效忠即可。19世纪，由于民族主义的崛起和通信与贸易的快速进步，这种体制开始分崩离析。世界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欧洲的工业国力量猛增，而本质上是靠温和地忽视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存活的帝国已经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了。到19世纪50年代，奥斯曼帝国已经成了“欧洲的病夫”。崛起中的西方列强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它的彻底崩溃。

尽管西方竞争者一直在蚕食帝国的边疆，奥斯曼人通过灵巧的结盟政策，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躲过了灭亡的命运。19世纪70年代，沙皇俄国在巴尔干大败一支奥斯曼军队，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赢得了独立。1881年，法国攫取了突尼斯。次年，英国以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为借口，夺走了埃及。

现实非常残酷，貌似能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最后的复兴希望的事件，却反倒加速了它的瓦解。1908年，一群年轻军官打着“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旗号——后来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

旨在改良国家的政变，强迫残暴的苏丹恢复他30年前撤销的议会宪法。这个成功让青年土耳其党大受鼓舞，于是迅速发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要把帝国变成20世纪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包括解放妇女和给予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完全的公民权。

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军官们大多来自帝国的欧洲部分，熟谙欧洲自由主义，他们期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不料却遭到了当头一棒。奥匈帝国利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乱局，迅速吞并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包括英国政府，则对青年土耳其党满腹狐疑，甚至嘲讽他们是“地下犹太人”[30]，视他们的政变为国际犹太人的某种险恶的旨在攫取帝国政权的阴谋。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守势力对进步人士的恶毒反扑使得新的议会政府很快陷入了内讧和瘫痪。

到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开始巩固自己的权力，努力通过三项事业来把四分五裂的帝国联合起来：现代化、保卫伊斯兰，以及呼唤帝国重新加入泛突厥世界（或称图兰主义）。这听起来都很不错，只是它们是互相矛盾的。

青年土耳其党的很多社会改革的进步性或许受到了世俗主义者和帝国的犹太人与基督徒少数派的支持，但同时却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穆斯林。另外，他们的言辞越来越具有极端的图兰主义色彩，鼓舞了土耳其裔群众，却疏远了人口占多数的非土耳其裔民族，比如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至于打起伊斯兰卫道士的旗号，这显然能够赢得土耳其、库尔德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支持，其他人（包括人口相当多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虽然努力争取多语言、多民族的社会的每个人群，但却给了每个群体忌惮和仇恨的理由。

劳伦斯这样对自己身边的政治和社会潮流越来越熟悉的年轻人很快就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奥斯曼帝国正在一点点地分崩离析。在他在

杰拉布卢斯期间，这个分崩离析的过程加快了，此前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断断续续的蚕食如今变成了鲸吞的狂潮。

1907年初，德国开始以大帝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而库尔特·普吕弗开始担任驻开罗大使馆的译员。

在纸面上，译员的职责仅仅是翻译，在大使参加外交会议时予以协助，以及翻译大使馆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件。现实中，一个雄心勃勃的译员完全有可能获得很大的权力。当时和现在一样，大使们常常是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庸碌之辈，任职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由于宫廷内的关系而得到闲差，更擅长跳舞，而不是谈判。而译员则代表了一种长期性和延续性——很多人任职长达数十年，通过翻译工作，几乎对大使馆每一个部门的大事小情都了如指掌。另外，由于他们生存在大使馆的外交和领事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灰色地带，他们可以私下里从事一些路数不正的活动，比如会见政府的敌人，如果这种事情由他们的上级来做，就会引发抗议。20世纪初的几乎所有互相竞争的欧洲强国都把自己在海外的使馆当作搜集情报、施加影响和挑拨离间的绝佳工具，但德国人在这方面自成一体。与威廉二世好斗的外交政策相一致，德国外交官们常常做出非君子的逾矩行为，比如窃取政府和工业机密、操控间谍网，往往被人赃俱获地抓个正着，这让自诩高尚正直的英国和法国同行们七窍生烟。大使馆的译员就往往处在许多这样的丑闻的中心。

埃及就是德国强硬外交手段的最重要实践场所之一，柏林希望在这里讨好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领导层，同时又打击英国竞争者的霸权。埃及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尽管这种统治是有名无实的）已经有近400年，然而在1882年，英国以保卫埃及的统治集团、反对一个图谋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为幌子，入侵了埃及，将这个国家占为己有。英国人并不就此满足，而是得陇望蜀。1906年5月，也就是普吕弗抵达德国大使馆的9个月之前，英国人利用西奈（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面积广大的半

岛）的一起鸡毛蒜皮的外交争端，从奥斯曼人手中攫取了西奈半岛。这个事件让埃及人对英国的统治愈加不满，君士坦丁堡对曾经的盟友[31]也是咬牙切齿。在开罗活动的德国人感到，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挑拨离间，让它们保持这种相互的敌意，对德国来说是极其有利的。

但或许，普吕弗在埃及首都要利用的最大资产是他在大使馆的直接上级——一位叫作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的传奇人物。

奥本海默比他的译员年长21岁，喜好交际，衣着时髦，蓄着八字胡，讲究吃喝、热爱生活，是个擅长风月的情场老手，热衷于赛马，在柏林的联盟俱乐部（德国政治和经济界精英的高档会所）是个颇有地位的人。奥本海默于1883年进入德国外交界。他很快前往叙利亚，在随后的60年中对近东一往情深并与它难舍难分。他是个业余的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曾自掏腰包（他出身于银行业世家）在乡间组织考古探险。考古对奥本海默只是个业余爱好，但给他带来了很大成功。1899年，他在叙利亚北部的哈拉夫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失落的人类定居点之一（据说，就是由于这项发现，万宝龙公司用他的名字为一个钢笔品牌命名，在该公司的“艺术赞助者”系列中，除了奥本海默，还有查理曼、哥白尼和亚历山大大帝这样杰出人物的名字）。这位探险家最终于1896年在开罗设立了半永久性的基地，他本人也得到了德国大使馆领事部门的一个专员职位（尽管这个职位的具体职责并不明确）。[32]

奥本海默伯爵（其实除了他的名片上印着伯爵头衔之外，没人确切知道他的贵族谱系）有好几个颇有争议的特点，让他和在埃及首都的外交同僚们迥然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他喜欢“入乡随俗”。这方面最明显的体现是，他喜欢穿着阿拉伯长袍四处游荡，住在城里一个本地人居多的区域，而且在风月场上也偏好当地人。根据肖恩·麦克米金的《柏林—巴格达快车》，“每年秋季，奥本海默从柏林回来之后，他的仆人领班苏莱曼就会给他找一个新的女奴（他把这些女奴称为他的临时小妾），

这个女奴就会成为他的后宫的女主人，有两名女仆侍候，直到次年”。[33]

但伯爵是个热情洋溢的天主教徒，除了热衷于考古、赛马和女奴之外，他还有个构想让德国在近东的竞争对手们感到特别讨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想要煽动伊斯兰圣战的熊熊大火，让该地区的政治格局来个大洗牌。

他在开罗的领事部门上任后不久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在奥本海默看来，德国的主要欧洲竞争对手——英国、法国和俄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它们各自势力范围内的穆斯林群众，这些人因受到基督教殖民列强的控制而满腹怨恨。奥本海默提出，德国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尝试在伊斯兰世界搞殖民运动的欧洲大国，因此有一个特别好的机遇来利用这个局面，尤其是如果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话。奥本海默在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连串报告中称，假如发生全欧洲范围的战争，而德国能够说服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当局发动一场针对占领了他们故土的基督教殖民者的圣战，那么英国治下的埃及，或者法属突尼斯和俄属高加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德皇威廉二世对这个提议兴趣盎然。德皇在收到奥本海默的一些“以革命为战争手段”的论文之后，很快成了圣战设想的坚定支持者。[34] 威廉二世作了关照，将奥本海默（“我的令人生畏的间谍”）提升为驻开罗大使馆的法律总顾问，尽管这个官衔颇有些讽刺意味。

在万众期待的全欧大战到来之前，德国人在英属埃及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奥本海默花费了大量时间——以及不少私人财产——来争取来自各行各业的反对英国统治的埃及精英：部族谢赫[35]、城市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人物。奥本海默的泛伊斯兰圣战思想研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在1907年，他又得到了另一个门徒——他的新下属库尔特·普吕弗。普吕弗已经腻烦了学术论文和古埃

及皮影戏，现在在充满领袖魅力的长官的指导下，他感到，在阿拉伯世界闹个天翻地覆的机遇已经降临了。

普吕弗的阿拉伯语（尤其是发音）比奥本海默强得多，因此很快就成为德国大使馆和埃及首都形形色色的不满分子之间的关键联络人。普吕弗特别小心谨慎地结交埃及的赫迪夫（大致相当于总督）阿拔斯·希里米，他是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封疆大吏。英国人剥夺了希里米的所有权力，但仍然把他捧在宝座上，当作傀儡。希里米显然对这种安排心怀不满，普吕弗就竭尽全力地去煽动他的怨恨。两个德国宣传鼓动家的工作对象可不是仅限于开罗的不满分子。1909年初，普吕弗和奥本海默身着贝都因人的服饰，在埃及和叙利亚腹地大范围活动，努力在部落人群中推动泛伊斯兰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这两项事业[36]。

但是能让万宝龙钢笔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人是不会走寻常路的。1910年底，冯·奥本海默伯爵令人意外地宣布：他要辞去大使馆的法务顾问工作，重拾自己挚爱的考古事业。伯爵决定，现在是时候去发掘他在叙利亚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哈拉夫遗址了，毕竟该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被搁置了十多年之久。

开罗的英国当局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长舒了一口气——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借口把奥本海默驱逐出境——但是只要快速地看一眼地图，就让人心生狐疑，因为哈拉夫遗址恰好就在筹划中的巴格达铁路沿线。奥斯曼政府承担了这项工程，旨在将君士坦丁堡与帝国最东端、据说富含石油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直接地连接起来。1905年，奥斯曼人不顾英法两国的竭力反对，将该工程及随之而来的慷慨的优惠权益交给了德国。

即便“德皇的间谍”已经改行考古去了，在埃及的英国人还是不能放松警惕。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虽然走了，却在开罗留下了一位非常忠于职守且精明强干的弟子。

卡尔基米什发掘工作的指挥部设在离遗址约半英里的一座小院子内，先前是杰拉布卢斯村外围的一家欧甘草公司的库房。T.E.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接待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小群西方游客。他们在此地待了三年，其间不断地为原先的建筑添加新房间和仓储棚子，直到杰拉布卢斯“工作站”成了一个舒适而宽敞的家。劳伦斯渐渐将这个家视为圣殿。1912年夏季，在叙利亚海岸旅行仅仅几天之后，他就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似乎已经离开杰拉布卢斯数月之久，渴望它的安宁静谧。”[37]

但是，在近东，随着奥斯曼帝国加速走向土崩瓦解，安宁静谧已经和现实格格不入了。1911年，意大利人入侵了利比亚，引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最终的结局是奥斯曼人战败。与此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人所剩无几的欧洲领地几乎丢失殆尽，在随后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君士坦丁堡几乎失守。前线的噩耗引发了层叠效应。到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第二次政变，彻底地夺取了政权，此时在帝国残余部分的全境，小规模的叛乱和分裂运动如燎原之火般四处蔓延，就连地区性的酋长和氏族领袖都感到，最终摆脱奥斯曼桎梏的时机到了。

曾经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叙利亚北部也受到了动荡时局的影响。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或者库尔德人，而土耳其人主要局限于奥斯曼权力机构在当地的代表、市长、警察和税务官。这种民族构成让劳伦斯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热爱高贵的阿拉伯人；对气势汹汹的库尔德人保持谨慎的尊重；而对残忍的土耳其人恨之入骨。1912年，当地的库尔德部落威胁要发动起义，而一度畏缩的阿拉伯人在杰拉布卢斯街头越来越公开地违抗和挑战他们的土耳其统治者。劳伦斯看到这些，感到相当满意。在劳伦斯看来，奥斯曼人对当地人的奴役主要是基于恐惧、腐败和笨拙无能的官僚机器对群众心灵的压榨。现在，奥斯曼人的统治在迅速地瓦解，很难相信他们能够恢复自己的地位。这

种前景让他欢欣鼓舞。

但在叙利亚北部能够感觉到的还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动荡。欧洲列强还在大搞阴谋诡计，每个国家都在各处加紧活动，寻找打击竞争对手的机会。尤其是，臭名昭著的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伯爵的大驾光临清楚地表明，该地区业已成为欧洲列强日渐扩展的棋盘的一部分。奥本海默打着返回叙利亚的哈拉夫遗址（在卡尔基米什以东约100英里处）开展发掘的幌子，在1912年7月的一个下午拜访了杰拉布卢斯工作站。

“他面目可憎，”劳伦斯在给年纪最小的弟弟的信中写道，“我对他没有客气——但他却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说，除了他自己的发现之外，卡尔基米什遗址是他见过的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的发现。”[38]

没过多久，劳伦斯和伍莱就开始听到关于伯爵在哈拉夫遗址的可疑勾当的传言，据说有成车成车的财宝被非法地运走，送往柏林。他们还注意到，巴格达铁路的施工多年来一直是懒洋洋的——在奥斯曼世界，工程进展慢得可以与地质变化的速度相比——但在奥本海默驾到之后，施工突然间加快了。工程进展神速，到1912年末，德国工程师及其先遣工作队已经着手处理铁路线在技术上最复杂的一段，即水流湍急的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栈桥。巧合的是，这座桥梁的地址就在杰拉布卢斯村附近。

在整个1913年和1914年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德两国工人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偏僻角落打着交道，时而友好，时而争吵。在杰拉布卢斯的德国铁路工人帮助英国考古学家把发掘现场挖出来的石头搬走，用于铁路路基的修筑。而德国人常常与当地工人发生摩擦，于是就请英国人——尤其是阿拉伯语非常流利的劳伦斯——帮助调解。德国人与当地工人的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优秀的工人常常跳槽到劳伦斯和伍莱那边，因为后者给出的工资更高，对当地人也更尊重。

不久之后，这两群人就成了战争中的死对头，而另外一条铁路——从大马士革南下70英里到达麦地那城的汉志铁路则将成为这场战争的中东战场上最关键的交通线。劳伦斯通过观察杰拉布卢斯的铁路工地学到的知识无疑会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因为几年之后，他就将会以破坏汉志铁路作为消遣。

1913年9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26岁的威廉·耶鲁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基弗油田干活。他是拉套管三人小组——拉套管就是拆解和堆放钻探用的套管，这差不多是油田上最苦的活计了——的成员。这时，一名信使策马奔来。几分钟后，基弗油田的副工头把耶鲁叫过去，交给他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电文非常简洁："即刻到纽约报到。"

耶鲁于19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没有拿定主意从事什么职业，这时偶然看到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海外勤务学校"的招生启事，于是心血来潮就报了名。

"海外勤务学校"位于纽约百老汇大街26号的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包括四个月的高强度课程和研讨班，旨在向学员传授石油工业的方方面面，并向他们灌输"标准人"的理想。但这理想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很难说了，因为到1912年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是国际商贸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企业，它的名字就是欲壑难填、为非作歹的资本家的同义词。[39]

通过大股东约翰·D.洛克菲勒设计的凶狠策略，标准石油公司在之前的40年中已经彻底地主宰了美国石油工业，到20世纪初就控制了全国石油生产的近90%。在这几十年中，它还运营着一个由大量幌子企业和空壳公司构成的复杂网络，让所有力图打破垄断的法律工作者的努力都化为泡影。最后，在1911年，也就是耶鲁求职的前一年，美国最高法庭宣布标准石油公司为非法的垄断组织，命令将它拆分为34个独立公司。

法庭的拆分法令究竟有没有真正终结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还很难说，但的确迫使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更加专业化，有的专攻国内的地区性市场，有的专注于国际出口。在国际业务方面最活跃的是的新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人们常用它的首字母缩写Socony来称呼它——也就是34个从先前的标准公司拆分出来的企业中规模第二大的公司。

在标准公司的其他子企业转向国内的时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却放眼全球，看到了很多急速发展的市场急需石油。为了协调和标准化在全球各地的营销手段，公司特地开设了海外勤务学校。激情澎湃的学员威廉·耶鲁说，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比他在预科中学和大学中见识过的都“远为有效，效率也高得多”。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领导层显然也很赏识威廉·耶鲁。课程结业后，耶鲁被留在公司，派到美国的石油生产一线去实地学习，为海外工作做准备。1912年的整个秋季，耶鲁穿梭于标准石油公司在中西部的各个油田，唯一任务是将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写成周度报告，发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但无休止地参观油田很快就让精力充沛、闲不下来的耶鲁感到单调乏味。1913年初，他写信给纽约的上级，请求得到一份一线工作，理由是，如果要学习石油生意的话，最好的途径是实际操作，而不是仅仅观察。这封信无疑让百老汇大街26号的老板们对他好感倍增。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竟然主动要求作为一名劳工去一线干活，这就是标准石油公司最想要的那种员工。耶鲁很快被派到俄克拉荷马州西部新建的库欣油田，成了一名普通劳工。

在一段时间内，他非常喜爱重体力劳动。耶鲁一连几周都生活在鸟不拉屎的荒郊野岭，辗转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多个油田，清扫钻探场地、铺设管道、搬运机器、搭建井架。他就这么干了几个月之后，收到了纽约的电报。

离开基弗油田三天之后，耶鲁走进了曼哈顿下城百老汇大街26号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的大厅。他被带到13楼，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威廉·比米斯的办公室套间。耶鲁看到，已经有另外两个人在套间内等候，手里捧着帽子，恭恭敬敬地坐着，一言不发，而过分殷勤的比米斯向来回奔走的下属连珠炮似地发出一连串指示。

“听着他向秘书口述命令，说到向上海运送煤油、关于送到印度某座城市修路用的沥青的合同，以及和希腊政府签订的向驻比雷埃夫斯的希腊海军提供燃油的合同，我如同在九霄云中。”耶鲁记述道。[40]

比米斯最终转向等待着的三个人，告诉他们，总部挑选了他们三人去执行一项特殊的海外任务；两天后，他们将在纽约港登上“皇帝”号轮船，前往法国加莱。随后他们将走陆路横穿整个欧洲，前往君士坦丁堡，然后在那里等待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办事处经理的进一步指示。最后，比米斯向三人强调，他们即将执行的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他们不可以将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告诉任何人，也不可以泄露自己标准石油公司雇员的身份。他们将伪装成到圣地观光旅游的腰缠万贯的“花花公子”，他们的豪华的旅行方式让这种幌子颇具可信度：“皇帝”号是跨越大西洋航线上最新也是最豪华的客轮，而他们还将搭乘传说中的东方快车前往君士坦丁堡，一路上都是头等舱。

但对耶鲁的两个同伴来说，乔装花花公子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三人小组的组长J.C.希尔是个来自宾夕法尼亚炼钢厂的工头，生性粗犷不羁。鲁道夫·麦戈文将近30岁，是个地质学家，性格阴沉，不善交际。即便这两人能够装腔作势，让人相信他们是富家阔少——这很值得怀疑——他们也不像是会去圣经时代遗址朝圣的香客。他们装扮花花公子的明智策略就是尽可能避免和头等舱的其他乘客打交道。

威廉·耶鲁没有这样的困难。这次旅行对他来讲就像是回到了昔日的富裕生活。在“皇帝”号头等舱的乘客中有很多年轻人，都是美国工业

巨头和大地主的子弟，起航去游览欧洲，因为这是他们教育的一部分。这种比较平和的冒险在几年前还是耶鲁自己理应享受到的。

耶鲁会记得，他的这次旅行有个特别之处。“皇帝”号是汉堡—美国航线的新旗舰，每到晚餐时间，船上的德国官员就会起立祝酒，庆祝“那一天”。耶鲁对德语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以为这个姿态是以一种古雅的方式欢送即将过去的那一天；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理解，这其实是一种暗语，德国人是在轻狂地期待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不到一年之后战争就爆发了。

1913年9月15日，也就是威廉·耶鲁在基弗油田收到命令他去纽约报到的电报的同一天，T.E.劳伦斯在阿勒颇（卡尔基米什以西60英里处）的火车站等待他的兄弟威尔。

劳伦斯在自己的四个兄弟当中，最亲近的就是比他只小两岁的三弟威尔。得知弟弟要离开英国去印度教书后，他就请求威尔在途中于叙利亚稍事停留。

虽然和威尔关系亲密，但他的这次拜访还是让劳伦斯颇有些焦虑，因为他自己一直被视为家中的浪荡子。他很容易想象，弟弟可能会被他身处环境的简陋吓一大跳，把这情况报告给在牛津的父母。劳伦斯其实不必担心。两人在杰拉布卢斯待了大约10天之后，威尔要返回阿勒颇，劳伦斯在当地的火车站给他送行。威尔在给父母的信中描绘了这个离别时刻：

>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内德过的是野蛮人的生活。火车开出车站，我看到他的最后一眼时，他穿着白色法兰绒内衣、短袜、红色拖鞋和一件白色的运动夹克，正在以贵族的姿态和比雷吉克总督侃侃而谈。[41]

杰拉布卢斯一别，竟成了兄弟俩的永诀。

---

[1] 关于T.E.劳伦斯童年和早期岁月的许多细节来自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具权威性的两本书：John Mack的*A Prince of Our Disorder* 和Jeremy Wilson的*Lawrence of Arabia* 。威廉·耶鲁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It Takes So Long* 中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关于库尔特·普吕弗的早期生活，Donald McKale的*Curt Prüfer* 一书几乎肯定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他的材料来自对普吕弗的儿子奥拉夫的采访。奥拉夫现已去世。

[2] Hogarth to Petrie，July 10，1911，as ci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85.

[3]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3.

[4] Robert Lawrence quoted in A. W. Lawrence，*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1954 edition），p.31.

[5] 劳伦斯家族姓氏的起源其实复杂得多。T.E.劳伦斯在1919年从他母亲那里得知，她自己也是非婚生子。她的出生证上的名字是萨拉·琼纳，到十几岁的时候才改用据推测是她父亲的那个人的姓氏劳伦斯。这种对姓氏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或许也能解释，T.E.劳伦斯自己后来为什么能毫无顾虑地使用假名，把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换成了约翰·休姆·罗斯，后来又改称托马斯·爱德华·肖。

[6] Thomas（Chapman）Lawrence（undated）；Bodleian MS Eng C 6740.

[7] Lawrence to Charlotte Shaw，April 14，1927，cited by 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 ，p.26.

[8] E. F. Hall in A. W. Lawrence，*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1954 edition），pp.44-45.

[9] H. R. Hall，as quoted in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25.

[10] 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 ，p.33.

[11]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p.65-66.

[12] 约49摄氏度。

[13] Hogarth to Robert Graves，as quoted in Graves，*Lawrence and the Arabs* ，p.18.

[14] Doughty to Lawrence，February 3，1909，in A. W. Lawrence，*Letters to T.E. Lawrence* ，p.37.

[15] 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第26任总统。

[16] 库莱布拉水道是巴拿马运河的一部分。

[17] 为荷兰语，意为“魔鬼喷水”。

[18]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106.

[19]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103.

[20]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105.

[21] McKale，*Curt Prüfer*，pp.5；152；193-94 n. 5；233 n. 28.

[22] 关于一战前德国和威廉二世时代的历史，我主要参考了Fischer的*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Macdonogh的*The Last Kaiser*；Cecil的*Wilhelm II*，vols. 1 and 2。

[23] Prüfer，*Personalbogen*，October 24，1944；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20，Roll 2539，FrameE309975.

[24] 引自奥拉夫·普吕弗在未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父亲》中的译文，由Trina Prüfer授权使用。

[25] 关于普吕弗与弗朗西丝·普吕弗（娘家姓平卡姆）的关系，见：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165，Entry 67，Box 379，File PF25794，Attachment 8。

[26]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218.

[27] 劳伦斯对理查兹的话，1918年7月15日，引自Garnett的*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239。

[28]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p.173-74.

[29]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崛起，我主要参考了Aksakal的*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Kent的*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Shaw的*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s. 1 and 2。

[30] Lowther to Hardinge，May 29，1910，as cited by 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pp.183-84.

[31] 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0～1856.2）中，英国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它们共同的敌人是俄国。

[32] Cecil，*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p.102.

[33] McMeekin，*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p.25.

[34] McMeekin，*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p.22.

[35] 谢赫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常见尊称，意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

[36] McKale，*War by Revolution*， p.22.

[37]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17.

[38]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25.

[39] 关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及其分割，见：Chernow，Titan，and Yergin，*The Prize*。

[40] 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1，p.1.

[41]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447.

第3章 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的灵魂的渴求总是越来越少。

——T.E.劳伦斯，《智慧的七柱》[1]

有一个笑话说，怎样给一只豹子戴上项圈？答案是：小心翼翼地戴上。但在1913年秋季，T.E.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难题。不久前，阿勒颇的一名政府官员送给他们一只幼豹。他们发现，只要把它用链子拴在杰拉布卢斯工作站的院子里，它就是一条非常有效的看家狗。但问题在于，豹子长得非常快，很快它就能挣断它被送来时戴着的脆弱项圈了。

考古学家们的第一个主意是用一个板条箱罩住豹子，然后透过板条箱的空隙给它戴项圈，但是据劳伦斯说，豹子“脾气不是太好”，所以这只能让它更加狂躁。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们把箱子的一个开口稍微扩大了一些，然后不停地往里面塞粗麻布口袋，直到把豹子塞的严严实实、动弹不得。

“然后我们拿掉箱子的盖子，给它戴好项圈，然后把它放了出来，”劳伦斯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有朝一日它能成为一张非常美丽的地毯。”[2]

在1913年秋天的发掘季节（这是劳伦斯的第五个发掘季节），除了学会如何给豹子戴上新项圈之外，他们还有了一项重大发现——遗址的主神庙。这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一生只能有一次的伟大发现，让劳伦斯感到，他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或许还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家园。杰拉布卢斯工作站宽敞的主起居室现在非常舒适惬意，墙上挂着艺术品，地上铺着地毯和兽皮，配备了一个藏有七种语言书籍的图书馆，以及一个巨大的壁炉，炉子里持续不断地烧着橄榄木。那年秋天，他在给牛津

的一位挚友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我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他写道，“还有这里的人们——有五六个人，整个生活方式让我非常满意……卡尔基米什的发掘还要四五年才能完成，在那之后，我或许会去追寻一件又一件美好的事情。”[3]

但令人心碎的是，大英博物馆提供的经费——经费总是非常紧张的，按照季度或者年份有条件地发放——已经耗尽。除非突然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资金来源，否则下一个发掘季节，即1914年春季，就只能是发掘的最后阶段了。劳伦斯和伍莱为此忧心忡忡，在那个季节的发现带来的喜悦也被这晦暗的前景冲淡了，他们越来越感到绝望。他们得到批准，将该季节的工作延长了一个月，随后准备休假，这时突然有一个良机从天而降。

大英博物馆的一位官员解释说，英国皇家工兵的一个特遣队即将在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支持下，在巴勒斯坦最南部的所谓寻漠开展一次考古研究；不知劳伦斯和伍莱有无兴趣，在他们即将开始的假期中加入这次探险？

劳伦斯和伍莱有两个选择，要么在英国安闲舒适地度过两个月的假期，要么在世界上最荒无人烟的角落之一艰苦跋涉。但探索的诱惑太大，所以两人都当即不假思索地选择加入冒险。

1913年10月初的一个深夜，威廉·耶鲁躺在安纳托利亚山区的一座帐篷内，仍然为自己的人生在如此之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惊奇。就在3周前，他还在俄克拉荷马州一处油田拉套管，住在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工棚内；而此刻，他正在世界上最具粗犷美的地区之一旅行，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曾经亲眼见过这个地方。

他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那么长时间，常常猜测标准石油公司究竟会把

他派到什么地方，但他几乎从未想到过近东。这更让他心中多了一分敬畏。他走进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的那天，还以为自己要被派到中国去当销售代表。

耶鲁的这个错误估计也是可以理解的。1913年，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石油产品出口，而中国是它最大的市场。相比而言，公司向奥斯曼帝国的出口（主要是煤油，用于该国羽翼初生的工业设施）是微不足道的。标准石油公司的煤油是美国向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出口产品，而第一大产品是胜家牌缝纫机。向奥斯曼帝国的煤油出口额甚至不如缝纫机，足见生意的微薄。

但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威廉·比米斯在那天向来到他办公室的三人解释说，他们去近东的任务不是寻找新客户，而是去搜寻和开发新的油源。

做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计算就知道了。到1913年底，全球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需求增长极其迅猛，很快就要超过供应量。仅在美国，内燃机车的数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增长到了原先的20倍——从1905年的约7.5万辆增加到了1913年的超过150万辆，而美国最老的一些油田已经开始枯竭。

同时，石油还逐渐成为一项关键的军事资产。1912年，也就是耶鲁应召前往纽约的前一年，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做出了一项令全球报界轰动的重大决定：整个皇家海军将弃用煤炭，全部改为使用燃油动力。全世界最强舰队的现代化计划自然也让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的海军，争先恐后地效仿。

于是，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纷纷到各处寻找和勘探新油田。近东是特别有希望的一个地区。19世纪70年代，在里海之滨的巴库发现了储量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田，1908年又在波斯湾有了另一项重大发现。这

些油田很快被欧洲大财团控制，寻找和霸占新油田的竞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悄悄地从一个由三名驻在耶路撒冷的商人组成的财团（该财团在奥斯曼帝国三个不同地区拥有极大的勘探优惠权益）手中获得了六个月的购买权。耶鲁、麦戈文和希尔被派到当地，就是为了开展前期的勘探工作。他们的行动要如此机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为了避免引起潜在竞争者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久地让标准石油公司躲在幕后。标准石油公司虽然前不久被拆分，但是近东和世界上很多地区仍然对标准石油的品牌非常不信任，以至于诽谤竞争对手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说它是标准石油的幌子。

尽管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行事诡秘，但它绝非先前的标准石油公司那样运行平稳、贪婪卑鄙的商业机器。它派去勘探奥斯曼帝国特许区的队伍的人员组成就能说明这一点。头领J.C.希尔来自匹茨堡的钢铁行业，对石油工业毫无经验。鲁道夫·麦戈文是个科班出身的地质学家，但从未去过油田。威廉·耶鲁虽然懂得油田操作业务，但对勘探一无所知。[4]

J.C.希尔的勘探方法非常不同寻常，可以说是宿命论的。10月初，一行三人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动身前往第一个特许区，那是安纳托利亚中部、黑海以南不远处的一片广阔的山地。三个美国人在一小队当地向导的陪同下，骑着马在高原上徘徊了几周，每次麦戈文发现一个他认为值得仔细查看的遥远地点时，希尔总是予以否决。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得知30小时后将有一艘船开回君士坦丁堡，而下一班船是至少两周以后；他们心急火燎地赶去，终于在开船的几分钟前上了船。

1913年11月，他们抵达第二个勘探区域——巴勒斯坦的死海山谷之后，步子就放慢了许多。该地区实质上是东非大裂谷的延伸部分，从地

质上讲，含油的可能性比安纳托利亚大得多。一连几周，三人沿着死海西岸，在页岩碎石地带和周边的石灰岩峭壁上择路而行。他们多次发现石油或许就在眼前的颇具诱惑力的线索——水面上漂浮的块状纯沥青；地表的石灰岩富含石油，发出汽油的臭气——但没有证据能确凿地证明，地下存在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储油层。

但是也很难做出确实的结论，因为希尔使用他在安纳托利亚磨炼出来的勘探方法，很快就开始大刀阔斧地否决麦戈文建议进一步观察的每一个地点。在耶鲁看来，他们有的时候简直不是在寻找石油，而是在躲避它。

1月初，希尔宣称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命令收拾行装，准备返回耶路撒冷。事情到了一个严重关头。耶鲁对三个月的挫折忍无可忍，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直言不讳地批判希尔，两人大吵特吵起来。

不知是这次争吵起到了效果，还是仅仅是巧合，就在第二天，三人进入朱迪亚山麓地带、准备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尔突然勒住马，凝视着南面约30英里处的一座多石山丘。这是个奇异的地质构造，是平坦沙漠中突兀地矗立的一座非常规的山丘。借助望远镜可以看到，山脚下有成滩的某种闪闪发光的东西。

J.C.希尔指向克恩纳布山，说道："我们在那儿能找得到石油。"[5]

此后的事情进展极快。希尔带领他的褴褛的队伍匆匆赶回耶路撒冷，立即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发电报，报告了自己的"发现"。总部的回复电报命令他找到巴勒斯坦特许土地的两名主要所有人——耶路撒冷的商人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和苏莱曼·纳西夫，并尽快亲自把他们带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开罗的办公室。希尔不在期间，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的任务是继续前往克恩纳布，确定这个地点的储油量究竟有多大。

耶鲁和麦戈文匆匆雇用了向导和勤杂工，于1月6日前后离开耶路撒冷，几天后在贝尔谢巴村外遇见了T.E.劳伦斯和他的伙伴们。在这次屈辱的会面之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探险队继续南下，最终抵达了荒凉的克恩纳布群峰。他们在那里的发现将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1913年3月15日，亚伦·亚伦森应邀参加了华盛顿的一家高端俱乐部的午餐会。宴会的贵宾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亚伦森的东道主——美国犹太人的两位杰出领袖朱利安·麦克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把亚伦森的座位安排在前总统旁边，这或许是出于尊重，但也许是故意恶作剧。亚伦森和罗斯福（他的密友们仍然称他为“上校”）都以口若悬河著称，同桌的其他人或许认为，看看谁更能说，会比较好玩。让麦克和法兰克福特目瞪口呆的是，罗斯福总统几乎一句话都插不进去，而只是全神贯注地听亚伦森侃侃而谈。亚伦森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取得了一项独特的成就；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从今往后，我将名扬天下，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让上校闭嘴101分钟的人。”[6]

亚伦·亚伦森具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力量，这一点和前总统很相似。亚伦森身材魁梧，有些肥胖，既聪明又傲慢，既激情洋溢又斗志高昂，似乎坚信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有意思的人。时年37岁的亚伦森的确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到1913年夏季，他已经成为一项新近在某些犹太人圈子内盛行的事业——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雄辩的演说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呼唤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返回祖先的国度——大以色列，在此前的20年中赢得了一些支持者，但是常常遇到质疑，甚至敌意。亚伦森的强大影响力在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观点并非以政治或者宗教的抽象概念为基础，而是基于脚踏实地的，甚至是平淡无奇的事情——农业。亚伦森时年37岁，在巴勒斯坦度过了31年，已经成为中东成就最高的农学家之一。此刻他正在对作物、树木和土壤做五花八门的实验，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巴

勒斯坦地区恢复古时的翠绿和富饶。抛却犹太复国主义的高尚原则不谈，他常常指出，犹太人重返以色列的首要先决条件是，他们必须要有饭吃。亚伦森知道怎么给他们饭吃。

他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也不是一帆风顺。亚伦森是一个犹太粮食商人的长子，于1876年出生在罗马尼亚中部的一个小镇。他两岁的时候，俄土战争爆发，导致罗马尼亚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对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大量犹太人来说，原先在穆斯林的独裁统治下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但在基督教民主统治下，生活却变得不堪忍受了。犹太人无法获得公民权，因此也就无法进入绝大多数学校及从事大部分职业，于是开始大规模地逃离罗马尼亚。1882年，亚伦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也加入了逃亡的大潮。犹太人移民最向往的目的地是美国，但亚伦森一家却和另外约250名罗马尼亚犹太人一起，起航前往奥斯曼叙利亚的巴勒斯坦地区。[7]

这群移民在港城海法附近的一个土地贫瘠的多石山坡上安顿下来。他们给这里取名为撒马林。他们很快发现，《出埃及记》里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撒马林的定居者在罗马尼亚的时候大多是小商人，少数会种地的人也很快被干燥的气候和糟糕的土壤击败了。不到一年，移民们就一贫如洗，不得不将神圣的《托拉》经卷典当出去。

拯救他们的是富可敌国的法国犹太金融家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罗思柴尔德是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事业的早期支持和资助者之一，已经在该地区建立或者挽救了不少犹太人定居点。1884年，他挽救了撒马林，将其更名为济赫龙雅各布（意思是“雅各布的纪念”），以纪念他已经辞世的父亲。但居民们很快发现，要领取罗思柴尔德的赞助，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在同意提供资金支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本人为该定居点的唯一领主，其领土之上的万物皆由他主宰”，他

这么说可不是开玩笑的。济赫龙雅各布的居民们种植什么作物，穿什么衣服，甚至谁有资格结婚，都必须经过罗思柴尔德的批准。他的代理人住在当地，确保这些规则得到执行。

但对年轻而聪明绝顶的亚伦·亚伦森来说，这种封建体制也有好处。1893年，他16岁的时候，被罗思柴尔德的代理人选中，送到法国学习，一切费用由罗思柴尔德承担。随后的两年中，他就在巴黎郊外的格里纽学院（欧洲最有威望的农学院之一）学习农学和植物学。他返回巴勒斯坦之后，就不会在济赫龙雅各布继续当罗思柴尔德的农奴，而是被派到男爵的另一个领地去担任农业“教员”。但他没干多久。不到一年之后，虽然只有19岁但已经非常执拗而急性子的亚伦森与男爵及其代理人一刀两断，自谋生路去了。

他给居住在外地的大地主做农业顾问，同时开始一丝不苟地研究和记录巴勒斯坦的植物和地质情况。在这项工作上，他极强的好奇心和不知疲倦的充沛精力很快就成了传奇。亚伦森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六七种语言，并开始在欧洲的农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欧洲农学界的小圈子里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的这个在巴勒斯坦的同行，而亚伦森的文章极多，而且涉猎范围广泛——各种渊博的研究论文，从芝麻油的提炼到丝绸生产——让人不禁猜测，亚伦森或许是一群科学家的集体化名。

1906年，他取得了一项真正的大突破——他在黑门山的山坡上发现了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灭绝的野生双粒小麦，即现代栽培小麦的祖先。在全世界的人口仍然有80%是农民的时代，这项发现让这个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年轻犹太科学家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赢得了全球同行的认可。3年后，他应美国农业部的邀请，在美国西部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在美国，他被当成明星来追捧，许多大学要聘他作教授，他的讲座万众期待，听众挤满讲堂。亚伦森在美国一共待了将近8个月，其间也

受到了现代犹太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些最重要领袖的影响。

虽然数千年来重返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信仰的基石[8]——近两千年来，犹太教的赎罪日和逾越节仪式都是以“明年在耶路撒冷”的吟诵告终——但把它转变为现代政治思想的是一位叫作特奥多尔·赫茨尔的匈牙利作家。在欧洲，即便是最“开明”的国家也存在体制化的反犹主义，而沙皇俄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周期性地爆发屠杀犹太人的惨案。面对残酷的现实，赫茨尔在他于1896年出版的《犹太国家》一书中指出，只有在古老的以色列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全世界的犹太人才能真正得到安全和自由。第二年，赫茨尔在瑞士主持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首届会议，这个事件令全世界的犹太人激动万分。

但它也招致了激烈的反弹。在欧洲和美国，很多犹太领袖——或许是大部分犹太领袖，都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工具，会让犹太人与他们的出生地所在国疏离，还会给长久以来一直指控犹太人对自己所在国家不忠的人以口实。有些人甚至怀疑，犹太复国主义是反犹主义者的阴谋。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看来，“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重返以色列，而是融入社会，全心全意地参与到所在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由于民主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广泛传播，这个目标终于触手可及了。

“归化派”似乎有一个特别有力的务实的论据。到20世纪初，已经有大约6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圣地，其中绝大多数人要么是一贫如洗，要么是依赖国外同胞的资助。有鉴于此，流散在全球的犹太人大约有1000万之众，巴勒斯坦的荒漠能养活多少人呢？

为了驳斥这个观点，亚伦·亚伦森——他不仅是一位农学家，更是一位业余的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提出了自己的犀利问题。是什么养活了罗马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因为考古发掘和史料都能证明，巴

勒斯坦尽管在1909年的人口仅有约70万，但在古代却有着多得多的人口。曾经养育那些古文明的水源或者土壤也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在时间长河中被人们遗忘了，正在等待人们去重新发现，去开发利用。亚伦森还可以援引一个颇具说服力的现代例证。他在美国西部旅行期间曾经特别研究过加利福尼亚，那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巴勒斯坦很类似。从内华达山脉引水灌溉之后，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已经成为美国的粮仓，吸引了新一批定居者。亚伦森提出，在巴勒斯坦也可以做成这样的事业，而他对那个地区的了解无可匹敌，因此他就是主持这项事业的不二人选。

看到亚伦森如此乐观，更不用说狂妄自大，越来越多的富裕美国犹太人对他的这种恢复生机的以色列的设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于1909年秋季离开美国之前，由这些商人和慈善家组成的财团筹措了约2万美金，让他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农业实验站，由他负责领导。亚伦森发誓说，这个实验站将成为整个中东最优秀的科研中心。

亚伦森为他的新事业选择的地点是济赫龙雅各布以北约8英里处的一座俯瞰地中海的峭壁，这个地方叫作阿特利特。在随后的几年内，他设置了实验用的苗床和果园，建造了许多温室和实验室。他还授意在1英里之外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俯瞰大海的大型两层楼房，用来安置研究站的图书馆以及长期工作人员的宿舍。由于很少有当地人的教育程度达到要求，这些长期工作人员大多是亚伦森的家人——他的全部五个兄弟姐妹都曾在不同时期在阿特利特工作。他们负责监管研究站的日常工作，包括监督从附近阿拉伯村庄雇来的工人。亚伦森的传记作者罗纳德·弗洛伦斯写道："没过多久，研究站试验田的小麦、大麦和燕麦每德南（约1000平方米）的产量就超过了土壤条件好得多的老资格农场的产量。"[9]

亚伦森为犹太复国主义招兵买马的工作干得越来越多，但他似乎很

少花时间去思考，这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着实有些奇怪。他确信自己可以让更多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但是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政府又将采取何种形式，都仍然很模糊。

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就很模糊。“社会派”和虔诚派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并不高：让愿意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能够如愿，增加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但不能打乱当地现有的政治框架。甚至很多捐款资助亚伦森的研究站的商人都自命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者，认为自己的参与是非政治性的，就好比帮助重建一座犹太会堂。

就连拥护“犹太国家”思想的人也没能就国家的具体形态达成一致。1901年，特奥多尔·赫茨尔会晤了奥斯曼苏丹，希望能够购买巴勒斯坦。这次会晤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于是后来的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都主张一种渐变的方法，即让犹太金融家逐渐把巴勒斯坦的土地买下来，用于移民安置——同时与君士坦丁堡谈判，可以贿赂奥斯曼人，或者帮助他们偿还一部分外债，因为奥斯曼人已经债台高筑——以确保奥斯曼人接受和保护新移民。但考虑到目前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口是犹太人口的10倍，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是否能够大幅度地改变人口构成，以便让犹太人成为多数派进而获得政权，是很值得怀疑的。但亚伦森于1913年返回美国时，出现了一个更有希望的新前景。奥斯曼帝国四面受敌，突然间它的彻底崩溃似乎指日可待了。如果奥斯曼帝国灭亡，而某个欧洲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许就可以在他们的保护下建国。在亚伦森看来，最有可能支持犹太人的是英国，这对犹太人来说也是最好的结局。[10]

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近东是个传奇人物，但是毁誉参半。他时年35岁，是布尔战争[11]的老兵，此时已经为英国政府勘察了埃及和苏丹的广大地区，并绘制了地图。他享有不知疲倦的探险家的美誉，人们说他工作起来抵得上10个普通人。但这就是部分问题所在。他严于律己，对

待别人就像对自己一样高标准严要求，所以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和他一起工作的阿拉伯人会说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如同烈火，既烧敌人，也烧朋友”[12]。

1月8日早上，纽科姆离开位于寻漠的营地，前往贝尔谢巴（这段路程骑骆驼要走一天）时，心情非常糟糕。这也不奇怪。他去那里是为了面见最近在叙利亚北部发掘的两位著名考古学家，因为这两人被安排到了他的麾下。虽然他完全理解考古学家的重要性——他们可以作为政治幌子，为他的五个军事绘图组的秘密工作打掩护，但是此次他们注定要在条件极其艰苦的地区快速行动，他可没有时间去照顾两个牛津科学家。此前他已经派人赶着10只骆驼去加沙迎接他们的船，以运载他们的装备——考古学家总是携带很多装备——但是估计10只骆驼还不够，于是他亲自带领更多骆驼走出沙漠，去迎接他们。

在贝尔谢巴等待他的是一番惊喜。“我原以为这两个考古学家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是遇见的却是C.L.伍莱和T.E.劳伦斯，他们两人看上去像是24岁和18岁……我先前写给他们的安排迎接他们的信是太拘于礼节了。后来我们就不再用那种过分的客气口吻了。”[13]

劳伦斯和伍莱并不需要小型骆驼队来运载他们的装备，因为他们和劳伦斯的年轻助手达霍姆在加沙下船的时候，全部行李都已经捆扎整齐，由一只小驴子驮着。他们还买了一些野营和照相所需的物资，但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显然懂得，在他们即将进入的严酷地带，务必轻装上阵。

当晚，纽科姆向两位从叙利亚来的客人解释了他们将执行的任务，以及此次探险的秘密目标。劳伦斯其实已经大体上猜到了行动的秘密目标。“显然我们俩只是转移别人注意力的幌子，”在前往巴勒斯坦途中，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给一项政治任务涂抹上一点考古学的色彩。”[14]

这项政治任务的源头是，英国自己招惹了一个麻烦。英国是欧洲列强中最依赖海权的国家，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极力推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建造，因为这样就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军事和商业捷径，将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进而更好地维系幅员辽阔、分布广泛的大英帝国。苏伊士运河是如此重要，英国为了彻底将它占为己有，甚至不惜牺牲与奥斯曼帝国长期的良好关系，于1882年以平定当地骚乱为借口，出兵入侵了埃及。英国人借此占领了苏伊士运河西岸，即埃及事实上的边界，但是已经与英国反目成仇的奥斯曼人仍然在运河东岸的西奈半岛虎视眈眈。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1906年，英国利用一起鸡毛蒜皮的外交争端，将西奈半岛也收入囊中。最终的结果是喜忧参半。英国人现在控制了他们的运河，以及西奈半岛120英里宽的缓冲地带（它将埃及与叙利亚西南部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地区分隔开来）。但是，奥斯曼人现在成了他们的不共戴天之敌。

或许这在1882年和1906年还只是很小的代价，但是到1914年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欧洲各国正跌跌撞撞地奔向一场整个大陆范围的战争，英国人突然为自己和土耳其之间糟糕的关系担忧起来，尤其是当看到了一些不祥的迹象：君士坦丁堡和英国的死敌——德国越走越近。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果真爆发，那么苏伊士运河将是从印度和澳大利亚向欧洲调兵遣将的关键通道。当然，如果土耳其与德国结盟，在战争中无疑会为了同样的理由进攻运河。英国的麻烦还不算完。如果敌人成功地跨过运河，进入埃及，很有可能会促使鄙视英国人的当地人发动反英起义，把原本可以用于欧洲战事的英国士兵牵制在埃及。

在考虑这种可能性时，英国人总算认识到了西奈缓冲地带的弊端，但是已经太晚了。其实这种弊端是缓冲地带的概念本身内在的：你如何知道，缓冲地带的另一侧是什么？英国人很清楚西奈半岛的东北端是什么——人口稠密、长期有农业种植的巴勒斯坦海岸地区，但他们对从该海岸向东南方向一直到100英里外的亚喀巴湾的沙漠边疆几乎一无所

知。那里有道路吗？有足以维持一支入侵军队的水井吗？

最急于了解这些情况的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英国代理人和总领事——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到1914年，基钦纳勋爵已经是英国当世的一位威名赫赫的战争英雄。他曾在1898年的马赫迪战争[15]中粉碎了当地人的起义，后来在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率领英军取胜。但巧合的是，基钦纳年轻的时候也曾是一名地理勘察员，最重要的成就是绘制了巴勒斯坦的地图。基钦纳和其他地理勘察员对巴勒斯坦的一个角落略去不提，那就是荒无人烟的寻漠——基本上就是现代以色列的南半部分，呈三角形——因为那次勘察的资助者认为，那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毫无意义，所以不必将其包括在地图中。但如今，位于西奈缓冲地带另一侧的正是这个没有被纳入地图的三角形地带。

两个帝国之间关系很僵，基钦纳却在1913年向奥斯曼人提议，让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对寻漠进行勘察，可见他的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君士坦丁堡当然是旋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巧合的是，寻漠在圣经的《出埃及记》中也有重要作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在沙漠漫游了40年，最后经过的就是寻漠地区。这就能方便地从神学和历史学角度解释，为什么一个基督教国家希望对该地区进行探索。英国人将先前的提议改头换面，改为在享有盛誉的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领导下对圣经时代遗址的考古勘察，再次向君士坦丁堡提出。这个计谋奏效了。正是这条计策把劳伦斯和伍莱带到了贝尔谢巴，从而给纽科姆的军事绘图组提供了需要的掩护。[16]

纽科姆原先对和两名考古学家一同行动还颇有顾虑，但这顾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尤其对劳伦斯感到意气相投，因为后者对享乐完全不感兴趣，而且忍耐力惊人，几乎到了受虐狂的程度。

他还发现了劳伦斯性格中一个奇特的怪癖：劳伦斯一般非常害羞，但是如果有人要糊弄他或者阻挠他，他就会变得坚决而大胆。一个早期

的例子就是，他1月中旬在贝尔谢巴残酷地用言语折磨可怜的美国石油勘探家。大多数羞怯的人在遇到对抗性的激烈场面时，都会更加缩手缩脚，劳伦斯却恰恰相反。在和美国人会面的时候，年轻的考古学家玩起了一场猫鼠游戏，自己扮演猫，把对方玩弄了一番。这表明劳伦斯深明处事决胜之道，这种本领在打退试图阻挠他们的奥斯曼小官时会非常有用。纽科姆确信，奥斯曼官方一定会对他们处处掣肘。

但事实上，对劳伦斯和伍莱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奥斯曼人，而是寻漠本身。他们一般是脱离军事勘察组，单独行动，尽管纽科姆常常会对他们过于冒险的行动予以控制。劳伦斯和伍莱骑着骆驼，带领一小队勤杂工，在荒凉枯寂的地区坚持不懈地东奔西走，几乎把大家累垮。至少当地人适应这里的气候，而从气候较温和的叙利亚北部来到此地的劳伦斯和伍莱在这片饱受毒日炙烤的土地上吃尽了苦头。

如果他们找到了自己希望找到的东西，吃这些苦头也就值得了。但事与愿违。除了拜占庭时代或更晚期的少数遗址外，他们在整个地区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建筑遗迹，更不用说《出埃及记》时代的定居点了。

但是寻漠计划原本就有一个内在的荒谬之处，如果奥斯曼人多花点时间思考，也能推断出来。这个地区完全不适宜人类生存，甚至吃苦耐劳的贝都因游牧民族在夏天也要离开此地，在沙漠里漫游了40年、急于最终找到好地方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这个人间地狱停留许久？劳伦斯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以调皮的口吻说到了这一点："巴勒斯坦基金会当然是希望找到能证明犹太人出埃及的遗址，据说摩西率领犹太人曾经过此地。当然了，离开埃及已经40年的民族在他们晚期的宿营地不大可能留下多少踪迹。"[17]

1913年11月12日上午，库尔特·普吕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在一个短暂时期内，他一直追寻的作为学者、作为新德国的光辉榜样的威望和地位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一切又都灰飞烟灭了。事实上，情况比

这还要糟糕。普吕弗努力去争取埃及统治集团内一个威望极高的职位，他的英国敌人不仅剥夺了他的全部机会，还在其间彻底断绝了他的职业前景。这天上午，普吕弗坐在德国大使馆的办公桌前，写了一封呈交给外交部的简练的辞职信。在此前的七年中，外交部一直是他的家。几天后，这位已经离职的前使馆官员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待他的艺术家朋友理夏德·冯·贝洛，打算和他一起在尼罗河上作长期旅行。

欧洲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比较奇异的特点是，互相竞争的欧洲列强往往使用一种与竞争对手瓜分战利品的复杂体制。这既是为了让自己的殖民利益获得认可，也是为了减少对手在当地煽动骚乱的可能性。

从学术界威望的角度来讲，在开罗授予外国人的职位中最令人垂涎三尺的就是赫迪夫图书馆馆长了。自1906年的双边协议签订之后，这个职位被保留给德国人。1911年底，现任的德国籍馆长即将退休，于是德国大使馆推荐库尔特·普吕弗博士来接替他。

赫迪夫图书馆馆长的头衔听起来纯洁无害，但其实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职位。在奥斯曼时代，赫迪夫是帝国委任的埃及国家元首。英国人在1882年入侵埃及时为了维持他们此举是为了维护奥斯曼统治的假象，把赫迪夫留了下来，作为他们的傀儡。从1892年起，担任赫迪夫的是阿拔斯·希里米。这位赫迪夫原本就不喜欢英国人的统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基钦纳勋爵于1911年上任之后，他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作为英国在埃及的新代理人，基钦纳很快就烦透了希里米（基钦纳称他为“这个邪恶的小赫迪夫”），开始剥夺他原本就完全是礼仪性的职责。作为回应，希里米越来越多地利用他的“图书馆”的办公室来秘密地接触一群宗教和民族主义异见人士。

当然，英国人的眼中钉就是德国人的香饽饽。德国人通过控制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得到了一个绝佳的掩护，来结交埃及反英人士，并与他们保持联系。即将退休的德国馆长就是这么做的。在1911年，英国人估

计，已经从德国大使馆译员晋升为东方文化秘书的库尔特·普吕弗博士肯定也会继承这个传统。

普吕弗接过了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衣钵，继续进行泛伊斯兰主义的煽动破坏工作，这早就让埃及的英国当局对他咬牙切齿了。最让开罗当局惊恐的是，普吕弗长期以来一直与大量埃及反英人士，以及满腹怨恨的赫迪夫本人保持着密切联系。[18] 埃及秘密警察曾多次追踪到这位好博士和英属埃及的一些最死硬、最危险的敌人进行秘密会晤。

所以，把这样一个人放到赫迪夫图书馆，就好比是把纵火犯放到了烟花爆竹厂。德国人提议让普吕弗担任馆长之后没多久，英国人就通过外交途径告知他们，普吕弗“不是合适的人选”[19] 。德国人作了很大的努力去争取。德国驻开罗大使直接找到基钦纳，力挺普吕弗的提名。到1911年10月底，德国驻英国大使保罗·梅特涅伯爵为此事一直找到了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但德国人越是坚持要普吕弗当馆长，英国人的疑心就越重。1912年初，基钦纳通知德国大使馆，这个问题交由埃及政府的教育部处理，而教育部再次驳回了普吕弗的提名。这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因为所谓的埃及政府完全唯英国人马首是瞻，但这事总算是了结了。对普吕弗来说，这是职业上的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仅因为未能当上馆长而在公众眼中颜面尽失，而且英国政府已经熟知他的小动作，因此他在德国驻开罗大使馆已经不可能有晋升的空间了。

但这都还只是小问题。德国社会的精英结构虽然在其他领域得到了改革，但在外交部的外交领域还固守传统。1912年和1812年一样，德国外交领域是贵族的天下，由伯爵、亲王和其他贵族们把持。一个圈外人几乎不可能被接纳进这个高级小圈子，普吕弗的导师冯·奥本海默伯爵漫长而徒劳无益的努力就是一个绝佳例证。

奥本海默虽然受过极好的教育，并且才华横溢，但在德国外交部门的眼中，他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有犹太血统。所以，他虽然在20多年的时间中一直努力从威望较低的领事部门调入外交部门，始终未能如愿。他离成功最近的时候是1898年，当时很多德国贵族（他在柏林联盟俱乐部的朋友）写了连篇累牍的信函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奥本海默的不幸在于，他这次提出申请的时候，恰好有另一个犹太人也在申请。在德国外交界的历史上，只有过一个犹太外交官，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的成员。现在突然间又多出两个犹太外交官的前景让大家不寒而栗。

“我坚信不疑，”外交部一名高官就此事写道，“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更多的犹太人会通过他打开的缺口，蜂拥而至……如果我们接纳了一个人，下面就不好拒绝其他人了。”[20] 于是，奥本海默和另外那个犹太人的申请都被驳回了。

在纸面上，库尔特·普吕弗这样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的平民，而且博士学位是从一个中等大学获得的，他升到外交部高层的机会几乎和奥本海默一样渺茫，但他的东方文化秘书的任命带来了一线希望。在领事部门的这个职位上，偶尔会有晋升到外交部门的机遇。显然，如果普吕弗当上图书馆馆长的话，提升的机会就会增加很多。虽然努力过，但是最终失败，现在他晋升的机会是零。

1912年全年和1913年大部分时间，普吕弗仍然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他感到无法摆脱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埃及秘密警察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现在他作为东方文化秘书的冒险活动也大大减少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或许还有彻底换一条新路的想法，让他最终递交辞呈，去迎接理夏德·冯·贝洛。

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关于普吕弗未能就任图书馆馆长的争议，清楚地表明了20世纪第二个10年早期的一个特别险恶的特点。基钦纳勋爵——统治着英国最重要的附庸国之一的1200万人口的无冕之王——居然

不得不亲自参与到这场争端中，已经令人难以置信了；事情怎么会发展到需要英国外交大臣及其最亲密顾问亲自过问呢？这些人难道真的百无聊赖到为德国驻开罗使馆的一名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命这样一桩小事撰写长篇备忘录和为之激烈辩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到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永远在争权夺利的欧洲列强都在不停地制造危机，希望借此占到对手的一点小便宜；一种独特的“战争迷雾”正在升起，这迷雾由成千上万的鸡毛蒜皮的怠慢、争议和误解组成。不仅英国外交大臣，各国的外交部长，甚至是首相、总理、总统和国王们的时间都被用来处理这种貌似无足轻重的小事，而且往往为了比库尔特·普吕弗的事情更不重要的无稽之事而争吵不休。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抱怨和轻微冒犯的嘈杂中，如何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真正的危机降临时，如何识别它？

亚喀巴湾是红海的一条100多英里长的狭窄水道，一边是阿拉伯半岛崎岖的沙漠群山，另一边是西奈半岛的类似山峦。亚喀巴湾的最北端是一座属于约旦的小镇，叫作亚喀巴镇。

在1914年，亚喀巴不过是个小渔村，1000多居民住在散布于海岸的粗陋棚屋内。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和他的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看来，比他们已经绘图的约4000平方英里土地更值得关注。

奥斯曼人如果要从他们治下的巴勒斯坦出征，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域的话，最合理的路线当然是穿越西奈半岛的最北端，即靠近地中海的地方。这是一条已经被人类使用了数千年的古道，沿途水资源虽然不多，但也被利用了数千年之久。敌人似乎不大可能取道远在内陆、条件恶劣的寻漠，纽科姆的部下渐渐确定了这一点。到1914年2月初，他们已经勘察了边境地区内陆的大部分，虽然发现了贝都因人留下的少量踪迹和

水井，但没有发现任何可资较大规模入侵部队利用的自然资源。

但是位于西奈—巴勒斯坦分界线最南端的亚喀巴却是一个未知因素。土耳其人可以通过亚喀巴湾在红海的出口，用船运兵到亚喀巴村，然后取陆路西进。10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土耳其人在秘密修建一条铁路支线，将亚喀巴和阿拉伯内陆连接起来，以补充已经建成的山区铁路线。抛却这些传闻不谈，英国人已经知道，亚喀巴北面的库维拉山区至少有两条“道路”发源，当地的贝都因人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些道路奔袭西奈半岛。综上所述，在英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缓冲地带更引人注目的北端时，土耳其人有可能会从缓冲地带的最南端发动穿越西奈半岛的攻势。

正因为此，斯图尔特·纽科姆认为进入亚喀巴是他的整个寻漠任务的关键所在。1914年2月中旬，他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进入亚喀巴，以及让谁与他一同前往。

历史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时刻集合而成的故事，这些时刻要么是偶然邂逅，要么是无意中做出的决定，或者完全是巧合，在当时并不起眼，但却以某种方式和其他的小时刻混合在一起，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正如谚语所说，蝴蝶的振翅也会导致暴风雨。纽科姆上尉选择一名同伴前往亚喀巴的决定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理论上，他可以从麾下的五个勘察组任意抽调一名工兵。工兵们的专业技能会很有用，但是他估计自己在亚喀巴会遭到冷遇，而两名英国军官大摇大摆进村的景象更会让村民反感。或者他可以带上伦纳德·伍莱，后者陈腐的学究气能够让人相信，他们正在进行的完全是一次科学调查。但是他选择了劳伦斯。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确喜欢与劳伦斯相处，另一个原因是，自探险早期以来，劳伦斯多次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但锋芒毕露的特殊本领，这种本领在亚喀巴或许会派上用场。

纽科姆、劳伦斯和达霍姆于2月中旬来到了亚喀巴，正如纽科姆的预料，迎接他们的是一番白眼。当地的市长声称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当即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绘图、照相或考古工作。但纽科姆也预料到，这些束手束脚的限制会让劳伦斯发挥出更大的积极主动性。“我尽可能多地拍照，”劳伦斯在给朋友爱德华·利兹的信中写道，“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做考古调查。”[21]

让劳伦斯特别感兴趣的是——这种浓厚兴趣或许部分是由于可以公然藐视市长的禁令——离亚喀巴海岸几百码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堡垒的遗迹。他秘密地让一名船夫载他上岛，船夫却当即被警察逮捕了。劳伦斯不为所动，和达霍姆一起制作了一个简易充气筏，划着筏子上了岛。

去的时候很轻松，回来却不容易。劳伦斯和达霍姆在返程中既逆风又逆流，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上岸，在岸上等候多时的当地警察旋即将他们逮捕。火冒三丈的市长命令武装士兵将两人押解离开亚喀巴。但对负责押送劳伦斯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不过给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挑战而已。

“我得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我脱离他们的视线，”一周后，在亚喀巴以北50英里的一座城镇，他给家人写了一封信，“于是我徒步行进，在崎岖山岭和干河床跋涉，把他们都累坏了。我在这里已经扎营两天了，他们还在从四面八方陆续追上来。”[22]

这次强行军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奖励是，劳伦斯无意中发现了贝都因人袭扰西奈半岛时使用的两条“大路”的交叉口。

这些发现后来对劳伦斯帮助极大。3年多一点之后，他将利用此次在亚喀巴的历险中了解到的知识，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征服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村庄，这次战役至今仍被认为是现代最大胆的军事成就之一。

1月初，威廉·耶鲁和鲁道夫·麦戈文在耶路撒冷与J.C.希尔道别之后，就向克恩纳布山进发。[23] 在贝尔谢巴与劳伦斯的屈辱会面发生几天之后，他们抵达了克恩纳布，当即就发现一条基本的化学法则派上了用场：能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掺有水的石油。只要浓度适当，很多矿物质都可以发光，包括铁。希尔在30英里外用望远镜观察到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就是富含铁尾矿的死水。

耶鲁和麦戈文不禁垂头丧气，但是已经费尽周折，既来之则安之，于是他们花了几天时间采集岩石样本，并在地上钻孔。他们判断，克恩纳布的确有石油——麦戈文对此相当肯定——但储量不大可能达到符合商业利益的规模。两人随后返回了耶路撒冷，将这个泼冷水的消息报告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

但奇怪的是，百老汇大街26号似乎并不像他们那样大失所望，这让耶鲁和麦戈文感到匪夷所思。总部命令两人在耶路撒冷潜伏下来，保持低调，他们就这么低调地等到了3月中旬，随后被派去三个特许区中的最后一个——君士坦丁堡以西的色雷斯山区，去做更多的徒劳无功的勘探。待在奥斯曼帝国穷乡僻壤的耶鲁有所不知，他在克恩纳布的“发现”已经引发了一场复杂的外交拔河战，涉及四大洲的众多大使、高官和六七个国际公司。

劳伦斯在贝尔谢巴村外对耶鲁的盘问使得英国政府得以准确判定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感兴趣的具体地点，政府内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皇家海军正在改用燃油，石油的来源已经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控制新油田不仅仅是经济事务，更是政治事务。随后英国当局施展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花招和计谋，希望破坏美国人的克恩纳布交易，并安排一家英国公司来获取这些开采特许权。他们依赖的情报来源是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所有人之一——苏莱曼·纳西夫。纳西夫娴熟地将英美双方玩弄于股掌之间，谋取私利。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卷入了竞争的狂潮，

不仅对自己的一线地质学家麦戈文的判断置若罔闻，而且最终花了比预计高得多的价钱去买克恩纳布的开发特许权。[24]

耶鲁和麦戈文直到4月底从色雷斯返回君士坦丁堡时，才了解到这些情况。他们在那里遇见了老上级J.C.希尔。希尔告诉他们，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刚刚购买了克恩纳布25年的开发特许权，现在要在该地区大力开展勘探活动，因此需要修筑道路，在沙漠中建立劳工营地，运送卡车、钻井设备和重型机械到一线。另外，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派遣他们三人到埃及，在那里监督全部所需物资的采购，并协调物资的运输交付。他们三人都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总部认为这无关紧要。到1914年春末，耶鲁、麦戈文和希尔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亚历山大港办事处研究着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大堆采购手册。

但在这项新工作中，三人可以遵照一条强有力的指导原则：他们是标准公司的人。威廉·耶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意味着必须负起责任来，果断地决策。他们花了几天时间翻看这些采购手册，也没有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就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克恩纳布的新项目订购了价值25万美金（相当于今天的3000万美金）的钻井设备。这些设备的供应商分布在美国各地，设备在巴勒斯坦全部到位就需要几个月时间，实际的钻井工作计划于11月1日开始，但在此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步是从希伯伦修建一条公路，穿越朱迪亚丘陵地带，然后穿过大约20英里人迹全无的沙漠，到达克恩纳布。修路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得至关重要。耶鲁负责主持修路工程，他找到了巴勒斯坦最好的修路公司来执行这个任务。即便如此，还是出了幺蛾子。修路的测量员在沿途房屋上用白色油漆在房屋墙壁上刷十字，作为标记，虔诚的穆斯林居民们认为这是要强迫他们改宗基督教，于是在希伯伦险些爆发骚乱。还有一次，持枪的贝都因人袭击了丘陵地带的一个建筑队，最终被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自己的民兵武装打退。

但是耶鲁心知肚明，最大的障碍是在公路的两端。所有的钻井设备都需要从美国由海路运到地中海的雅法港，但是雅法没有足以卸载这些重型机械的起重机。在公路的另一端还有许多琐碎的小细节需要处理。沙漠自然是严重缺水的，虽然麦戈文在克恩纳布地区发现了一些小井，但这些水根本不够居住在那里的20名工人使用，更不用说钻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冷却水了。但和整个工程的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对缺水的问题也不以为然。如果他们根本都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就更不会去努力解决问题了。

随着工程一天天继续下去，耶鲁越来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写道："主管（J.C.希尔）办事毫无章法，不可避免地要酿成大祸，我私下里非常害怕糟糕的结局。"

3月初，劳伦斯结束了寻漠的冒险，返回叙利亚，发现戴维·霍格思给他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是天大的喜讯。卡尔基米什项目的主要赞助者——一位英国慈善家——对前一季的发现颇为满意，最终拨出一笔数额相当大的款项，让发掘工作长期开展下去，至少还有两年，或许会一直进行到遗址的研究穷尽为止。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劳伦斯决定在返回英国度假期间快速地把呈送给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寻漠报告写完，然后尽快返回卡尔基米什，好让下一季的工作尽早开始。

劳伦斯返回英国的计划是，先绕道去巴格达，然后沿底格里斯河而下到印度洋，因为他认为这条较长的海路能让他在途中有时间撰写寻漠报告。但是6月初发掘季节落下帷幕的时候，斯图尔特·纽科姆的一封信让他改了主意。

纽科姆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工作已经完成，在5月份返回英国途中拜访了卡尔基米什。当然了，卡尔基米什并不是什么通衢大道的必经之地，纽科姆此次绕道的真正目的是继续从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刺探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在巴格达铁路上的工程进展情况，尤其是他们在托罗斯

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的隧道工程。纽科姆此行倒是很顺利，但是一路上受到严密监视，所以无法细致地研究隧道工程。纽科姆在6月的那封信中询问劳伦斯和伍莱，他们在返回英国途中可否走同样的路线，沿途尽可能地收集情报。两位考古学家对军事情报人员的新角色颇为热衷，满口答应。

这次旅行又是一次充满偶然的跋涉，但最终的结果和劳伦斯到亚喀巴的旅行大不相同。在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他发现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至关重要、或许是性命攸关的薄弱之处。在后来的战争中，虽然他竭尽全力，但还是未能对这个弱点加以利用。

1914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劳伦斯坐在牛津市波尔斯特德路2号花园小屋内，给一位叫作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25]的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大部分篇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5月份在杰拉布卢斯的德国铁路工程师和他们的工人们之间发生的一场混乱的斗殴[26]。但这封信的最有趣之处在于，它刻意省略了一些东西。在劳伦斯写这封信的这一天——6月29日，星期一，英国几乎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报道了前一天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塞尔维亚革命者暗杀的消息。

萨拉热窝传来的消息似乎对库尔特·普吕弗和威廉·耶鲁同样毫无影响。普吕弗和理夏德·冯·贝洛在尼罗河上的长途旅行已经结束，到1914年6月底，普吕弗生活在慕尼黑，靠教授东方语言为生，收入不高。他的日记没有提到斐迪南大公在巴尔干遇刺的新闻。至于威廉·耶鲁，他在希伯伦以南的公路上埋头苦干，几周后才听到这个消息。

他们都对此事有些麻木不仁，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众对欧洲列强无休无止的虚张声势、耀武扬威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每隔几个月就会爆发“危机”，没过多久又平息下去，这次新的危机似乎也不足为奇。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具有决定性，因为那些主战派让它具有决定性。一根

燃烧非常缓慢的导火索被点燃了，要花一个多月才会烧完，但是到1914年8月初导火索燃尽的时候，就将激发一场全欧洲范围的大战，最终把所有人都拖进了深渊。

6月29日，劳伦斯在给弗莱克的信中写道，他打算在英国再待上两三周，“然后东进”前往卡尔基米什。但是劳伦斯的考古生涯已经结束了。

---

[1] Lawrence，*Seven Pillars* ，p.277.

[2]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75.

[3] Lawrence to V. Richards，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p.160-61.

[4] Yale，*It Takes So Long* ，undated early drafts，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8.

[5] J. C. Hill：*Yale*，*The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Yale* ，p.6，Columbia University，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1973.

[6] As cited by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 ，p.91.

[7] 关于亚伦森的童年和早期生涯，我主要援引Florence的*Lawrence and Aaronsohn* 和 Engle的*The Nili Spies* 。

[8]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历史，我主要援引Laqueur的*A History of Zionism* ，O’Brien的*The Siege* 和Sachar的*A History of Israel* 。

[9]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 n，pp.90-91.

[10] Aaronsohn to Mack，“Aaron’s Confession，” October 9，1916，p.8，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1] 布尔战争是英国与两个布尔人（即在南部非洲的荷兰殖民者）共和国——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之间的两场战争，分别发生在1880～1881年和1899～1902年。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争夺德兰士瓦的黄金。英军兵力远胜于布尔人，但是起初接连惨败，后来英军采取焦土政策，以残酷的镇压迫使布尔人投降。英国就此确立了在南非的统治。

[12] Lawrence，*Seven Pillars* ，p.239.

[13] A. W. Lawrence，*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1937 edition），p.105.

[14]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80.

[15] 马赫迪战争是19世纪晚期的一场殖民战争，最初在马赫迪苏丹与埃及之间进行。后来，英国加入埃及一方，与苏丹作战。曾参与这场战争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自己的著作《河上战争》中生动地描写了这场战争。

[16] 关于寻漠探险幕后的军事和政治动机，最详细的记述见Moscrop的*Measuring Jerusalem* ，chapter 8。

[17]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82.

[18] 埃及政府发给部长会议主席的秘密报告，1911年11月11日。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1114，File 44628。

[19] 关于普吕弗担任赫迪夫图书馆馆长争端的英国政府通信和报告见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1114，File 44628。

[20] Cecil，*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 ，p.102.

[21] Lawrence to Leeds，February 28，1914，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65.

[22]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287.

[23] 威廉·耶鲁对于克恩纳布石油勘探的记述主要参考了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2。

[24] 英国政府关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石油开采区的通信见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124。另见埃德尔曼给国务院的报告，1914年4月10日；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Roll 67，document 867.6363/4。

[25] 詹姆斯·埃尔罗伊·弗莱克（1884～191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

[26] Lawrence to Flecker，“Monday ［June 1914］，” 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71。劳伦斯没有写明写这封信的日期是6月的哪一个星期一，但根据他在6月1日从卡尔基米什写给家人的信（他在这封信中讲到自己即将回家，称“大约25日能到家”）可以推断，应当是6月29日。

第4章 到最后100万人

先生，我荣幸地向您汇报，此地的局势日益恶化。

——1914年11月9日，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斯坦利·霍利斯，写给国务卿。[1]

1914年8月7日下午，新官上任的英国陆军大臣霍拉肖·赫伯特·基钦纳勋爵应招去参加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与会的还有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和其他大臣。

基钦纳被选为陆军大臣几乎是个偶然。他作为英国在埃及的代理人，返回英国作了一次短暂停留，正要登船离去，这时传来消息，战争爆发了。阿斯奎思认为，任命英国最赫赫有名的战争英雄来领导作战，或许能够鼓舞民众的斗志，于是跳过了许多候选人，直接将这个职位给了基钦纳。

在当时，其实首相根本不需要考虑鼓舞斗志。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群众为战争欣喜若狂，很多人聚集在广场上，为宣战的消息欢呼雀跃。大多数人都预测，这将是一场非常短暂的战争。在欧洲大陆的各个村庄和城市，急于摆脱农场和工厂的单调苦差的预备役士兵们无不害怕自己应征上前线之前，这场大冒险就会结束。英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英国是少数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欧洲国家之一。但在宣战几天之后，英国政府就开始考虑暂缓征兵，认为志愿参军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战争的需要。

但在1914年的夏天，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过去的40年中，武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武器的老观念都已经过时了。这都是些不起眼的简单东西——机枪、长射程炮弹、带刺铁丝网——但就是因为这个疏忽，欧洲将闯入一场与大多数人的预期大相径

庭的杀戮。

欧洲列强对这些警告的迹象视而不见，一个原因是，此前这些新式武器几乎完全是用来对付没有这些新式武器的人的，特别是那些试图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非欧洲人。在这些情况下，新式武器使得欧洲人可以对落后民族实施一边倒的大屠杀（这样实力悬殊的较量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来还不曾有过），因此是欧洲各个殖民帝国能够在19世纪下半叶在亚非迅速扩张的最重要原因。

颇具荒诞意味的是，在能够理解战争的新面孔及其可能造成的问题的少数人当中，就有那个多次执行过这种一边倒大屠杀（或许他执行屠杀的次数比当时任何人都多）的人：基钦纳勋爵。1898年，在苏丹的恩图曼战役中，基钦纳用马克沁重机枪对付挥舞长矛冲锋的骑兵；仅仅一个上午的时间，英军就消灭了1万名敌人，己方仅有47名士兵阵亡。但如果敌人也有马克沁重机枪，会发生什么情况？基钦纳心知肚明。在8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有些大臣认为战争只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周。新任陆军大臣却预测说，战争会持续几年。他告诉同僚们：“到我国只剩最后100万人时，战争才会结束。”[2]

这种话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听，更不会有人去注意了。似乎是坚信自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大战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格兰高地步兵携带风笛、穿着褶裥短裙，法国胸甲骑兵和奥地利长枪骑兵穿好铜制胸甲、戴上配有鸵鸟羽毛的头盔，在军号和战鼓的伴奏下，欢欣鼓舞地开赴战场，却完全不曾意识到，他们的欧洲即将化为一个屠场，在随后的四年中，将有约1000万军人和约600万平民被驱赶着奔向死亡[3]。

只有黑暗时代和成吉思汗的蹂躏才可以与这场战争的灾难性相提并论。相比而言，在前一个世纪，大英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了五大洲，卷入了全球范围内约40场冲突——主要是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但也有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这样的大战——一共损失了约4万名军

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将损失这个数字的20多倍。在1870～1871年灾难性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在战场上伤亡约27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三周，法国的损失人数就达到了这么多。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处于服兵役年龄的男性人口将会损失13%，塞尔维亚的总人口将损失15%，而仅仅在1913～1915年的这两年之内，法国男性的预期年龄将从50岁锐减到27岁[4]。这场血腥大屠杀的领导者将会对这些统计数字变得麻木不仁，以至于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在1916年发动索姆河攻势时——战役当天有5.8万协约国士兵伤亡，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会认为这些伤亡数字“不算严重”[5]。

这一切对欧洲人集体意识的影响将会极其深远。最初的狂喜会让位于震惊，震惊变成了恐惧，然后随着残杀漫无止境地一天天持续下去，人们最终会陷入麻木的绝望。

但在这过程中，欧洲公众开始质疑关于他们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他们意识到，剥去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巧言令色的辞藻，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一场大型的家族世仇，欧洲的帝王们——其中很多人都是血亲——终于有了机会，在他们的忠顺臣民的成堆尸体之上，清算他们的宿怨和私人仇隙。欧洲的君主制养成了一种衰败过时的军事精英文化，贵族、老迈的战争英雄和宫廷佞臣们在战场上庸碌无能，对为他们流血牺牲的人们冷酷无情，各国都是如此。看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不可思议的愚蠢，居然能有人最终战胜，已经是个天大的奇迹。

最终，欧洲公众回想起自己在1914年8月欢庆战争爆发的喜悦，看到的简直是另一个时代，是一群稀里糊涂、轻易上当的原始人跳的一场死亡之舞。这样造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在这场保卫和扩张帝国、蚕食其他帝国的大规模混战中，欧洲的6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4个将彻底灭亡，而另外两个——英国和法国——将会大伤元气，永远无法完全恢

复。填补缺口的是两种互相争斗不休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考虑到先前的帝国的恶名昭彰，美国自始至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帝国主义国家。

但在1914年8月，这还都只是未来。目前，欧洲人正为多年的装腔作势终于结束、战争的“那个日子”终于降临而长舒一口气，满心喜悦。

牛津的劳伦斯一家也不能免俗。宣战几天之后，最热衷军事的四弟弗兰克·劳伦斯就获得了第3格洛斯特营的中尉军衔。身在印度的威尔·劳伦斯当即准备回国参军。而大哥鲍勃加入了皇家陆军医疗部队。到月底，待在家里的就只有14岁的阿诺德和26岁的内德了。

T.E.劳伦斯待在家里也并非自己的意愿。尽管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在8月的狂潮中参战，但伦敦方面估计它很快就会参战，而且很可能是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那边。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前不久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绘图探险活动就会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基钦纳亲自下令，让两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暂时不要考虑参军，先一心一意地将报告完成。[6] 于是，在8月，当他的同龄人纷纷前往新兵训练营时，劳伦斯却在波尔斯特德路的小屋和阿什莫林博物馆之间来回穿梭，勤奋工作，对《寻漠》报告作最后的润色。

如果说劳伦斯知晓报告的重要性的话，他的倦怠让他越来越感到一种绝望。9月初，他和伍莱联系了他们在巴勒斯坦探险中的上级斯图尔特·纽科姆——此时他已经是军事情报部门的高官——请求纽科姆帮助他们在那里安排职位。纽科姆建议他们耐心等待。他解释说，如果土耳其与德国结盟并参战，英国军方就会急需他们这两位近东专家的本领；而如果他们现在急于参军的话，到时候反而不好安排他们。

劳伦斯对这个建议很不满意。尤其让他郁闷的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内，关于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预言似乎要兑现了，只不过是敌人要赢

了。

德国挑起了这场冲突，它的战略的基础是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鲁莽的计划。德国人的计划是，在东线只作微弱防御，面对俄军的进逼可以退让，而同时在西线向英法军队发起排山倒海的猛攻，在英法能够充分动员之前就将其一举打垮。西线战事结束后，再转身对付俄国人。

9月初，德国人的进展似乎比他们最疯狂的梦想还要顺利。[7] 在西线，德军横扫中立国比利时，然后转向南方，将英法军队打得七零八落。德军很快兵临马恩河畔，离巴黎只有30英里。令人意外的是，东线德军并没有按原计划实施防御阻滞战术，而是向兵力远胜于自己的俄军发动了进攻。德军迅速消灭了一支笨拙的俄军部队，正要将另一支也一举摧毁。“回家过圣诞节”对德军来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保守的口号，对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的士兵来说，却令人肝肠寸断。

但在9月的第二周，战争的狂潮突然发生逆转。在后来被称为“马恩河奇迹”的交锋中，英法军队阻挡住了德军的攻势，开始在法国乡间缓慢地将德军击退。德国首相曾满怀自信地预测，这场战争将是一场“短暂、令人神清气爽的雷暴雨”[8]，但这个预测落空了。在六周血战之后，已经有50万人死亡，出现了僵局。

劳伦斯待在绿树成荫的牛津，钻研一份比例尺为0.5英寸∶1英里的地图，而这地图描绘的是离最近的战场有上千英里的空旷沙漠。他一定感到非常痛苦。他肯定还考虑到，法国战事的逆转意味着，他的这种炼狱般的痛苦还将继续下去；德国人所向披靡的时候，土耳其人都没有参战，现在德国人在撤退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参战呢？

9月18日，他在给一位正在黎巴嫩的朋友的信中讽刺地写道：“我正在写一部关于摩西和他的漫游的学术著作。我非常害怕，土耳其人并不

打算参战。”[9]

如果说劳伦斯没有理解战前最后关头的不祥征兆，在巴勒斯坦南部监督标准石油公司的公路工程的威廉·耶鲁则完全错过了所有的迹象。[10] 他当初是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油田一线收到了预示着他即将被派往近东的电报，而近一年之后，在巴勒斯坦沙漠，又是一封电报告诉他，战争爆发了。

修路工程当即被叫停，耶鲁于8月匆匆赶回耶路撒冷。此时的耶路撒冷充满了喧嚣和骚动。居住在这里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不少，大多数家庭都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在他们之前，处于服兵役年龄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已经响应各自政府的总动员命令，回国入伍了。而英国直到1916年初才发布征兵令。

“我们到火车站给他们送行，”耶鲁回忆道，“他们就像去参加足球赛的年轻大学生一样，叫嚷着，欢呼着，歌唱着。去雅法的火车从调车场开出时，一节车厢内的德国人热情澎湃地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而另一节车厢里的法国人同样欢快地唱起了《马赛曲》。昔日的朋友各奔东西，去参加他们的大冒险。”

与周围的喧嚣狂乱形成对比的是，这个美国石油勘探家突然发现自己无所事事起来。美国没有介入战争，所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命令耶鲁留在巴勒斯坦，至少可以让他照看即将运送到一线的钻井设备，再慢慢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就连这个看守的任务也变得毫无意义了。标准石油公司的大量卡车在雅法码头刚刚卸下船，就被奥斯曼政府援引一项紧急状态法令，全部征用了。[11] 不久之后，英国海军拦截了运载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大部分管道和钻井机械的运输船，将其全部转移到位于埃及的一个扣押场地。

耶路撒冷的外国侨民已经所剩无几，耶鲁度过这个夏末的消遣是打

网球和玩卡纳斯塔纸牌游戏，以及和其他外国人长时间地、面红耳赤地讨论世界局势将如何发展。讨论的一个焦点是，试图通过区域政治的表象，去伪存真地发现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是否会参战的线索。耶鲁是个惯于行动的青年，这种不得已为之的无所事事让他越来越焦躁，急于找些事情来做。

但“许愿要小心，免得事与愿违”这句老话很快就应验了。耶鲁受命去管教十几名不守规矩的美国石油工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德克萨斯或俄克拉荷马，预定到克恩纳布钻井现场去工作，但乘坐的船（也就是钻井设备所在的那艘船）被英国人转移到了埃及。这些石油工人无所事事，腰包里又有大把钞票，于是在开罗寻欢作乐、胡作非为，在这个放荡不羁的城市也算是骇人听闻，于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当地的办事处向总部发了电报，敦促将这些工人送回美国。但是百老汇大街26号决定把这些人派到耶鲁那里去，或许是希望让他们在圣地待一段时间，能够重新找回基督徒的美德。

但总部的希望落空了。脚踏耶稣土地的机会却让这些石油工人更加公然地放肆。看到这个情况，再加上办事处的现金储备急剧缩减——欧洲的战争令国际汇款业务暂时停止——于是耶鲁和他的上级决定，一箭双雕地解决两个问题的办法是，扣留这些工人的工资不发，而给他们发放每周五美元的津贴。工人们对这个安排怨声载道，于是在发放津贴的日子，耶鲁一手发钱，另一手要紧握一把填满实弹的六发左轮手枪。

但他这个麻烦的管理工作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这些石油工人与耶路撒冷名誉最败坏的居民们有着持续不断的联系，因此消息特别灵通，总是能最先听到在城里传播的各色流言蜚语。随着战争在欧洲日益扩大，这些传言越来越黑暗。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时期，五彩斑斓的奥斯曼世界——包括数不胜数的各种宗教派别、部落和民族群体——很容易分崩离析，各个群体为了自我保护而更加内敛，而各种古老的宿怨、狐

疑和嫉妒会在暴力活动中迸发出来。分崩离析的危险最大的地方自然是帝国最“混杂”的角落——耶路撒冷城。在这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全都摩肩接踵，所以耶路撒冷是近东最具国际性的都市。

到8月底，从乡村（穆斯林们正在组建民团武装）传来了耸人听闻的消息：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遭到了袭击。虽然这些传闻大多是假的，但却让气氛越来越紧张。在耶路撒冷老城区，商人们越来越确信君士坦丁堡很快就会参战，于是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但尚不清楚的是，奥斯曼帝国将会加入哪一边，于是在希望与英法俄结盟的人和希望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边的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9月8日，对耶鲁和其他仍然留在城内的外国人来说，局势变得咄咄逼人。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利用欧洲的混乱局面，宣布不再承认先前四个世纪中被西方列强逼迫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外国人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耶鲁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举措的效果。先前阿谀谄媚的当地官员现在变得傲慢而严苛。在耶路撒冷的狭窄人行道上，当地人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西方“洋大人”走近时就自动跳到街上让路了。有一次，耶鲁和一群其他外国人在橄榄山[12]观光时，有一群小男孩向他们投掷石块。在耶鲁看来，耶路撒冷越来越像是一堆一点就着的易燃物。

对巴勒斯坦的其他一些人来说，不平等条约被撕毁造成的后果远不止被石块砸这么简单。处境特别危险的是在此前30年中抵达该地区的数万名犹太移民。

大部分移民是分两批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一批是19世纪80年代从中欧和东南欧来的移民，亚伦森一家就属于这一批。第二波“上升”（即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向圣地的回归）是20世纪初逃离沙皇政府的政治迫害和国家发动的虐犹活动的俄国犹太人。尽管这些移民在文化上差别很

大，第一批人大多笃信宗教、思想保守，而第二批移民中有很多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在先前的不平等条约下，很多人仍然保有出生地的公民身份。

在历史上，这种安排对犹太移民和西方列强都有好处。犹太人可以向故国寻求保护，而这些外国政府可以打着保护自己侨民的旗号干预奥斯曼内政。这种诡异的体制造就了许多悖论，其中最诡诞滑稽的就是，沙皇俄国一边大声疾呼地要保卫自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公民的权益和福祉，而同时在国内却系统性地迫害这个宗教少数派。不平等条约被废除后，这一切都宣告结束。另外，假如土耳其最终真的参战，至少一部分犹太人前途堪忧；成千上万的第一波犹太移民还拿着奥匈帝国的护照，而成千上万的第二波移民则拿着俄国护照，于是其中的一群最终会被奥斯曼帝国视为"敌国公民"。正如全欧洲范围内无数无辜的人已经遭遇的那样，这场博彩中的输家将会被驱逐出境或者面临牢狱之灾。

在这个问题上，济赫龙雅各布的大部分居民，包括亚伦森一家，实际上从另一个悖论中获益。这些罗马尼亚犹太人在独立的罗马尼亚无法获得公民权，所以才来到巴勒斯坦。因此，他们仍然是罗马尼亚独立前的宗主国的公民，而这个宗主国恰恰就是奥斯曼帝国。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人不同，亚伦·亚伦森和济赫龙的其他居民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待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事件，甚至还会有些幸灾乐祸。

但他们的这种想法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就在次日，即9月9日，君士坦丁堡宣布对武装力量进行总动员。总动员的理由很奇怪，是为了"维持奥斯曼帝国的中立"[13]。18～35岁的男性公民被要求报名入伍。更糟糕的是，此次征兵令的对象是几乎全部公民——过去犹太人和某些基督教派别是可以免服兵役的——而奥斯曼政府更是废除了富人可以缴纳某种特别税而免服兵役的古老制度。

深谙奥斯曼政府行事之道的亚伦·亚伦森明白，废除免服兵役制度

的条款并不是玩真的，而是意味着，现在要免服兵役的话，就要向更多官员行更多的贿赂。但是总动员让这位农学家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感到忧心忡忡。欧洲最近的事件表明，征兵必然意味着参战；在战争的机器和官僚系统启动起来、群众的狂热被煽动起来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让一切平静下来了。自欧洲战事爆发以来，亚伦森从他在奥斯曼军方和政界的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君士坦丁堡将如何决策的大量互相矛盾的传闻，而从欧洲局势的宏大图景中找到的线索也不能澄清晦暗的前景。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亚伦森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居民一样，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理智或许能战胜狂热，战争或许还能避免。

有意思的是，他忧心的倒不是土耳其会加入哪一边，而是战争本身。这部分是由于，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的欧洲战争中，不管谁输谁赢，总会有犹太人受苦受难；但另一方面，亚伦森的忧愁也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一个特点。在战时，帝国的军事和民政机关会突然间毫无忌惮地开始大规模征用——“劫掠”或许是更恰当的词——他们认为战争需要的物资。虽然这种征用活动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村庄都会有影响，但是更现代化、更富裕的地方受到的冲击肯定更大，比如济赫龙雅各布和阿特利特这样的地方。1914年9月中旬，亚伦森一家和他们在济赫龙的邻居们开始藏匿他们的财物，准备面对征用官员的到来和他们的毁灭性劫掠。[14] 1914年9月4日下午，库尔特·普吕弗在位于君士坦丁堡的日耳曼尼亚酒店房间内会见了一个叫作罗伯特·莫尔斯的德国人。莫尔斯魁梧粗壮、头发金黄，将近40岁，前不久还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当警察。当天下午两人的谈话主题是，如何通过炸弹袭击、暗杀和伊斯兰起义来推翻英国在埃及的统治。两人甚至探讨了炸毁苏伊士运河。

他们的会晤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非同寻常的。就在一个月前，普吕弗还在慕尼黑教授东方语言，惨淡谋生；现在他却成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情报行动的关键成员，对此次行动知情的人不超过36个，因为行动的最终目标是把仍然处于中立状态的奥斯曼帝国拖入战

争。整个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普吕弗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一无所知。这个奇怪的局面要归功于普吕弗的老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以及史上最奇特的外交协议之一。

在1914年的漫长夏季，随着战争乌云在欧洲上空越来越咄咄逼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掌控着帝国的军人集团）的30多名成员中的大多数都希望避开即将降临的欧战的烈火风暴。但有一个小派别极力主张与协约国结盟，而由时年32岁的陆军部长恩维尔帕夏领导的另一个派别则试图加入到德国和奥匈帝国那一边。在8月2日下午，也就是德国对俄国宣战、战争正式爆发的几个小时之前，他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互助防御条约。他的时间选择糟糕透顶。

但问题是，恩维尔帕夏在和德国人谈判的时候，并没有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僚商议。签约的时候，只有恩维尔的三四个最亲密的伙伴知晓此事。[15]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战争的最初几周，恩维尔仍然向土耳其政府的其他人隐瞒条约的存在。年轻的陆军部长告诉心急如焚的德国盟友们，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打好基础，随后才能把这个意外之事告诉其他部长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能发生什么突如其来的事件让全国人民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抛弃目前占上风的中立态度，就再好不过了。

恩维尔找德国人算是找对了，因为中立国比利时在不久前就以血的代价学到，德国人最擅长突如其来的事情了。为了帮助不敢抛头露面的土耳其盟友，德皇威廉二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请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出山，让他的泛伊斯兰起义理论施展威风。如果能在英国控制的诸多穆斯林地区——尤其是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手中偷走的埃及——煽动伊斯兰起义，那么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和群众都一定会大声疾呼地要求参战。

德国人的最终目标是把土耳其拉下水，但在这年秋天，德国最高统

帅部内有些人认为，让土耳其再保持中立一段时间，对德国有好处。只要奥斯曼帝国还是中立国，就可以将其作为德国煽动破坏活动的理想跳板，德国人可以借助这匹特洛伊木马，向周边的英国殖民地发动进攻，而蒙受的风险极小。奥斯曼帝国的中立还是一个绝佳的盾牌，德国可以在其掩护之下，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军事行动——进攻苏伊士运河——做好铺垫工作。8月中旬，德皇签署了一道秘密指令，命令组建东方情报局。[16] 该情报局将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将其作为德国在近东的破坏活动的指挥中心。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将担任情报局的局长。奥本海默上任后不久就向他的弟子库尔特·普吕弗提供了一个职位。

普吕弗自然是非常值得老师信赖的。普吕弗于9月3日晚在日耳曼尼亚酒店入住后立刻着手工作。第二天早上，他会见了恩维尔帕夏的得力干将之一——一位名叫奥马尔·法齐·贝伊的青年土耳其党参谋军官，和他一起筹划了一系列打击英属埃及的计划：雇佣贝都因部族武装袭击苏伊士运河沿线孤立的英军驻地；派遣游击队员（所谓的“克米塔基”）潜入敌境，煽动伊斯兰起义；暗杀重要目标、制造不区分军人和平民的爆炸袭击，掀起一场恐怖浪潮。普吕弗虽然对法齐·贝伊及其伙伴提出的一些比较别出心裁的计划——比如将一艘满载水泥的运输船在苏伊士运河最窄处凿沉——表示怀疑，但对他们的热情和创造性思维则高度认可。[17]

除了和法齐·贝伊或者谢赫·沙维什（一个埃及煽动家，英国人对他又恨又怕）筹划阴谋之外，普吕弗还和已经抵达土耳其首都的其他四五名东方情报局特工共图大业。德国大使馆也有三四名官员参加了这些会议。在会上，大家提出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埃及、俄国统治下的中亚、阿富汗，甚至远至印度——搞破坏和颠覆的雄心勃勃的计划[18] 。

9月7日的一次会议结束后，普吕弗被带去面见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个人——陆军部长恩维尔帕夏。恩维尔身材不高，身穿奢华的军礼

服，玉树临风——《纽约时报》称其为“土耳其军队中最英俊的人”[19]——黑眼睛的目光炯炯有神，戏剧性的小胡子按照普鲁士风俗，两端向上翘，还涂了蜡。他的普鲁士胡子可不是偶然。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他曾是奥斯曼帝国驻德国的军事联络官，很快就学会了德国军事精英的做派和风尚，自诩比普鲁士人更加普鲁士。库尔特·普吕弗并不擅长精神分析，但是他当晚在日记中草草写下的描绘恩维尔的寥寥数语（恩维尔时年32岁，比普吕弗小四个月）却非常深刻地体现出了这个即将单人独骑就毁灭了奥斯曼帝国的人的特点：“铁石心肠。面无表情、面貌带有女性美。衣冠楚楚、精心打扮，到了矫揉造作的地步。令人震惊地强硬。‘我们可以比英国人更残忍。’这个人想要些东西，但这东西就是不来。”[20]

但普吕弗在君士坦丁堡最初几天内参加的会议和听到的计划中，最让他着迷的还是被开除的亚历山大港警察罗伯特·莫尔斯面临的特殊局面。战争开始的时候莫尔斯碰巧不在埃及，因为他是德国公民，所以被英国当局不由分说地解雇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交战各方还颇有些绅士风度，因此英国人允许莫尔斯返回亚历山大港去接被困在那里的家人。在普吕弗看来，莫尔斯是发动颠覆行动的理想渠道。莫尔斯在埃及是个享有特权的洋大人，所以比当地人更容易私藏违禁品——普吕弗打算让他藏匿的是制作炸弹的材料——并将其私自带入埃及。为了让这个丢了饭碗的警察认识到任务的重大意义，普吕弗安排莫尔斯在起航前往亚历山大港（他将在行李中夹带雷管）的前一天去拜会了恩维尔帕夏。土耳其陆军部长热情地向莫尔斯表示了感谢。[21]

英国人虽然很快就怀疑恩维尔和德国高层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但对具体情况仍然一无所知。但当普吕弗和奥本海默的其他特工开始在君士坦丁堡露面之后，英国人更加担忧了。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在9月15日发给伦敦的电报中写道：“即便土耳其不加入战争，德国人在这里也是花样百出，说不定就会做出对苏伊士运河不利的事情，要么是从叙

利亚海岸派出所谓中立国船只来攻击，要么是通过陆地上的特工人员。”[22]

但与此同时，奥斯曼政府官员在不断向英国大使发誓许愿。马利特从苏丹和首相及大小官员那里听到的说法都是，土耳其没有军国主义意图，只希望置身于欧洲战争之外。这些高官中肯定有人是在装模作样，但也有人是真心实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恩维尔在8月2日与德国签订的协议很多高官仍然被蒙在鼓里。

10月5日，马利特带着自己的疑问直接去找了恩维尔。恩维尔在很多方面都天赋异禀，其中一项本事就是撒起谎来脸不变色心不跳。他不仅否认奥斯曼军队在巴勒斯坦的调动有任何不良企图，并且（据马利特说）还“对个别德国人有可能会针对运河或其他地方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说法嗤之以鼻”。[23]

但土耳其陆军部长的谎言很快就要被揭穿了。在马利特会见恩维尔的几天前，罗伯特·莫尔斯在亚历山大港被捕，他携带的爆破雷管也被查获。根据埃及的军法，他有可能会被处以死刑，于是他为了保命，将自己所知的德国与土耳其联合攻击埃及的计划向英国审讯官和盘托出，还招供了他出发前觐见恩维尔帕夏、得到他祝福的事情。在说到自己和奥马尔·法齐·贝伊与库尔特·普吕弗的关系时，莫尔斯尤其健谈。最能证明普吕弗罪责的是，被人赃俱获的莫尔斯满口承认，他行李里携带的雷管是用来配合正在埃及制作的炸弹来使用的。英国人问莫尔斯是如何知道的，他答道：“因为有一次我看到谢赫·沙维什和普吕弗博士一起，在普吕弗的日耳曼尼亚酒店房间里。他们在用阿拉伯语抄写制作炸弹的配方……包括操作指南、所需化学物质的清单，右下角还有炸弹的草图。”[24]

开罗的英国人在莫尔斯事件中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或许是希望君士坦丁堡政权中的温和派能够约束住热衷冒险的恩维尔，阻止土耳

其参战。匆匆组成的军事法庭判处莫尔斯无期徒刑，而公开记录中都隐去了他会见土耳其陆军部长的情节。对于曾经生活在埃及的普吕弗，开罗当局就没有那么仁慈了。由于他在莫尔斯事件中扮演的中心角色，英国人很快就悬赏要库尔特·普吕弗的人头。[25]

伦敦中部近卫军骑兵大道和白厅拐角处的老陆军部大楼是一座巍峨雄壮的新巴洛克式建筑，一共五层，以白色波特兰石建成，每个角上矗立着一座30英尺高的穹顶。大楼内部颇有高雅的绅士俱乐部风尚，配有大理石楼梯、大型水晶吊灯和铺设马赛克的走廊。整座楼有近1000个房间，在比较高级的房间内，墙壁镶着橡木，还预留出放置大理石壁炉的空间。1914年夏天，这座大厦就是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部所在地，英国的高级将领们就在这里运筹帷幄。T.E.劳伦斯在完成寻漠报告后，于10月中旬被派到这座大厦，到总参谋部地理科担任文职地图绘制师。

到此时，“地理科”这个说法已经不恰当了，因为在劳伦斯就职一周之内，科里的最后一名军职地图绘制师就被派到了法国前线，办公室里只剩下劳伦斯和他的直接上司两个人。劳伦斯很快就开始干起了六七个人的工作：组织协调各战区的地图、根据前线报告增补地图的细节、向高级指挥官报告地图的突出特征。

也许有人会想，劳伦斯这样的年轻人——他刚刚过了26岁生日——突然置身于全国军事指挥的神经中枢，每天与陆海军将领会谈，一定会心花怒放。但劳伦斯可不是这样的人。恰恰相反，劳伦斯似乎对自己的新环境充满偏见，对这里的人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他对军界的鄙夷，部分是由于军事文化和英国公学体制（他本人就是这个体制的产物）非常相似：向上级点头哈腰；森严的等级制——在学校里的表现是高年级学生和班长佩戴的特别领结，在军队里的表现则是衣袖上条纹和星的数量；地位高的人能享受特权，地位低的人就一无所有。到陆军部之后不久，劳伦斯向一个朋友开玩笑说，金碧辉煌的楼

梯似乎仅供陆军元帅们和杂役女佣使用。[26]

他对权威的轻蔑或许还因为这些权威人士的整体水平不高。大多数现役军官都在法国前线，所以总参谋部里现在挤满了预备役人员或者已经退役的人。劳伦斯虽然没有什么军队的经验，但他也能看得出，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稀里糊涂。和很多其他机构一样，人们往往用趾高气扬的自负来掩饰自己的无能。陆军部里到处是新晋升的上校和将军们，永远是昂首阔步地在走廊里匆匆行走，手里拿着备忘录，或者召开紧急参谋会议，或者派遣一个童子军传令兵去地理科索要10分钟前就应当提供的某战场的最新地图。

这种浮夸气氛的一个副产品是，它直接导致劳伦斯获得了军职，这个事情是他后来最喜欢说起的逸闻趣事之一。

到总参谋部后不久，他被带去拜见威风凛凛的亨利·罗林森将军。罗林森即将离开伦敦，去指挥在比利时的英军部队，劳伦斯的任务是向他报告刚刚更新的比利时野战地图的情况。但是，据劳伦斯说，罗林森一看到他穿着便服，就大发雷霆地吼道："找个军官来跟我说！"[27] 地理科现在只有两个人，于是劳伦斯被匆匆送到陆海军百货商店，领一套少尉的军服；同时，任命他为军官的委任状也在迅速起草。但这套军服也不会让劳伦斯对军方肃然起敬。在后来的岁月里，劳伦斯一直对军事规章置若罔闻，常常军容不整、邋里邋遢，而且总是一副悠闲的姿态，几乎到了倨傲的程度，令他的上级们一次又一次抓狂。

劳伦斯虽然已经非常偶然地成了军人，但他在陆军部的工作并没有让他更接近战场。因为他的身高不符合英国陆军的最低标准，所以只有需要他的特殊才华的地方才会让他有机会上战场，而唯一有希望的情况就是土耳其参战。

但这希望实在太渺茫了。战争已经陷入僵局——西线的双方都在疯

狂地修建战壕工事——谁还会要走进这个烂泥潭呢？劳伦斯在10月19日给英国驻阿勒颇领事的夫人威妮弗蕾德·丰塔纳的信中哀叹道："看样子，土耳其打定主意要躺着不动、跟全世界和平相处了。我很遗憾，因为我想把他们赶出叙利亚，而现在他们的残暴统治愈加稳定持久了。"[28]

但就在两周后，他的担忧烟消云散了。11月2日，恩维尔帕夏的派系最终得胜，土耳其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阵营，加入了战争。

对劳伦斯来说，好消息接踵而至。土耳其宣战之后，斯图尔特·纽科姆被调离法国战场，受命到开罗领导一个新的军事情报单位。开罗预定将是英国在近东战场的指挥部。纽科姆的单位很小，只有少数几个对该地区非常熟悉的人。他当即就向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发出了邀请。

12月初，劳伦斯在给威妮弗蕾德·丰塔纳的信中写道："我要去开罗了。"此时他的心情显然好了许多。"一切都好，除了土耳其人那边。"[29]

这是一片被搜刮得一干二净的土地。虽然亚伦·亚伦森对奥斯曼帝国参战后征用物资队伍的肆虐早有预料，但他们的残酷剥削比他预想的最糟糕情况还要恶劣。在叙利亚全境，政府以战时紧急情况的名义将农作物、农业车辆和役畜扣押运走，倒霉的农民只得到了草草写下的收据，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收据就是一纸空文。正如亚伦森担忧的，这种洗劫在犹太人定居点特别猖獗。据传记作者罗纳德·弗洛伦斯的记载，在济赫龙雅各布，"亚伦·亚伦森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士兵颇有章法地将衣服（包括女人的内衣和婴儿服装）、大车、马车、水牛、农具、工具、枪支、医疗器械（包括产科器械）、显微镜和用来保护农田的栅栏柱和带刺铁丝网抢了个一干二净。"[30] 最终，济赫龙的灌溉水管也被抢走，农田和果园因缺水而干枯败坏。只是由于当地奥斯曼官员的果断干预且安排了武装警卫，亚伦森在阿特利特的农业研究站才没有遭到同样

的噩运。

如果这些横征暴敛是为了战争努力而作的不可避免的牺牲，并且的确为战事做出了贡献的话，亚伦森还能认命；但是政府这是在把叙利亚的五脏六腑掏个干净，替敌人摧毁叙利亚。在他随后几个月的旅行中，他看到成堆成堆没收来的小麦在政府粮仓的院子里腐烂，纳布卢斯城有3000袋食糖被毫无遮挡地堆放着，在冬雨中融化，“令街头顽童喜不自胜”[31]。亚伦森后来记述称，工程师们为了修复贝尔谢巴的一座桥梁，要求提供24桶水泥。过度热心的征用队搜刮来了400桶，但是“还没派上用场就被雨水毁掉，于是那座桥至今没有修复”[32]。

犹太人定居点在这些征用过程中的损失极其惨重，这或许是由于它们的物资更多，质量也更好，君士坦丁堡政权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土耳其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阵营并参战几天之后，哈里发——逊尼派穆斯林世界的最高宗教权威——就发出了一道宗教命令，宣布这是一场圣战[33]；为了保卫信仰，所有穆斯林都有神圣的义务去参加圣战，反对伊斯兰的敌人——外国基督徒。这个号召失去了一些感召力，因为奥斯曼人的两个盟国就是基督教帝国。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确是被煽动起来了。在整个帝国的大小城镇，年轻的穆斯林男子纷纷走上街头或去征兵站，宣告自己为了伊斯兰的事业奋斗和牺牲的决心。当然，这道宗教命令同时也让帝国的基督徒和犹太臣民大为惊恐，叙利亚总督不得不匆匆发布一道解释性说明，称此次圣战只针对外国敌人[34]。

这个解释让很多基督徒（基督徒占到帝国总人口的近30%）松了一口气，但犹太人却没办法放下心来。他们仍然提心吊胆，一方面肯定是由于他们的人口很少——在战时，人口少往往就意味着脆弱无助——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颇具争议。

犹太移民的有些难题也是他们自找的。济赫龙雅各布的移民和大多

数“第一波”犹太人定居点的人们一样，通过采纳巴勒斯坦古老的佃农体制——即雇佣阿拉伯人中的无地农民或佃农来从事体力劳动——渐渐发达致富。而第二波移民中的很多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俄国犹太人移民则谴责这种做法，认为它带有剥削性和封建性；他们宣称，为了创造“新的犹太人”，所有的劳动都必须由犹太人承担。对不幸的阿拉伯农民来说，这两种做法都让他们头疼。第一种做法让种植园体制延续下去，而正是这种体制让他们一代代人始终一贫如洗、没有权益；而第二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他们好，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按照亚伦·亚伦森的讽刺说法，“把他们从生存手段中解放出来”[35]。

让两个民族间的摩擦更严重的是，在很多阿拉伯穆斯林眼中，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甚至对那些生活并没有受到大量犹太移民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其实有些人的生活还因为犹太人的移入得到了改善——来说，犹太人过得也比他们好；更不用说，不平等条约赋予犹太人一些特权，让他们对犹太人愈发怨恨。从第一波犹太移民开始，就发生了当地村民袭击犹太人定居点，或者独自外出的犹太移民被杀害的零星事件。

但犹太移民并没有逆来顺受地接受这种局面。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受到阿拉伯人袭扰最严重的几个犹太人定居点组建了多个准军事组织，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甸人”和“本·乔拉”[36]，他们还开始向其他定居点有偿提供武装保护。这种现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明眼人一看即知。没过多久，“基甸人”和“本·乔拉”开始对他们认为敌视犹太人或者曾经袭击犹太人的阿拉伯村庄发动惩罚性的袭击，这又使得阿拉伯人发动报复攻击。

总的来讲，到1914年秋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感到自己四面受敌。考虑到圣战的宗教命令、洗劫式的物资征用以及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假如局势进一步恶化，当地的奥斯曼官员——其中很多人平时就对犹太人不友好——究竟能帮犹太人多少。

在济赫龙雅各布，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解答，而答案完全不能让人宽慰。亚伦·亚伦森的弟弟亚历克斯在9月应征入伍，两个月后，他最终想方设法地以身体原因脱离军队，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圣战号召发出后，亚历克斯所在新兵单位的所有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被收缴武器，分配到劳工营。11月，政府发布了一道新命令，要求将私人的武器全部上缴；负责收缴武器的小分队对犹太人定居点的搜查要比对邻近的阿拉伯人的搜查仔细得多。济赫龙雅各布居民说自己没有任何武器——他们已经事先将武器埋在了附近的田地里——土耳其指挥官抓了四个人——包括倒霉的亚历克斯·亚伦森，把他们拖到纳布卢斯，毒刑拷打，一直到他们承认有武器。据说，这个土耳其指挥官威胁说要对济赫龙的年轻女人们不利，村民们才最终交出了武器，亚历克斯和其他三人才被释放。[37]

对巴勒斯坦的很多犹太移民来说，他们自以为已经安全逃离的欧洲的虐犹活动似乎又要开始了。[38] 尤其是在12月初，治理巴勒斯坦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杰马勒帕夏宣布，“敌国”公民必须入籍，否则将被驱逐出境。受到最直接影响的自然是俄国犹太人这个少数派，几天之内就有约800名俄国犹太人在雅法被捕，等候驱逐。这座城市的码头很快挤满了其他犹太人，他们都想尽快登上任何愿意带他们走的船只，前往任何可能接纳他们的安全港湾。

济赫龙雅各布的一些居民也加入了这股难民潮，但亚伦森一家不在其中。虽然一家之长——60岁的埃弗拉伊姆还在，但决定家中大事的其实是他的长子亚伦·亚伦森。亚伦森认为，这无需考虑，因为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家。而且，他的科研工作的基地就在这里，维系着他生命的梦想就在这里。他在1月中旬给一位美国赞助人的信中写道：“我始终被人监视，好心的朋友们强烈建议我一有机会就尽快出国。但我不打算逃跑，现在还不打算。”但亚伦森对国家的信心被严重动摇了。“我很久以来一直坚决支持土耳其政府，现在为在过去三周的所见所闻深感遗憾和

羞愧。”[39]

1914年12月15日上午，一艘法国汽船在从马赛出航六天后，接近了埃及北部低矮且雾气蒙蒙的海平线。T.E.劳伦斯就是这艘船的乘客之一，他是到英国驻埃及远征军在开罗的军事情报单位的新岗位就职的。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直接上司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

1914年的开罗人口不到100万，拥有宽广的林荫大道和风光旖旎的公园，尼罗河畔有着雅致的散步休闲场所。当时，吉萨的大金字塔离市区有约10英里，从市中心的几乎任何高层建筑的房顶都看得见金字塔的岩石尖顶。

抛却秀逸的风光不谈，让1914年的开罗如此令人心醉的是它作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十字路口的地位，以及它的可以上溯数千年的一层层厚重的历史。老城区仍然是一座由小巷和袖珍商铺组成的迷宫，后街里隐藏着古老的宫殿和清真寺。虽然在此地已经统治30年之久的英国人在有些地方建造了西式建筑，但埃及首都仍然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像所有真正宏伟壮丽的城市一样，高深莫测，难以一探究竟。

就是这种神秘气息让三年前首次到访开罗的劳伦斯心醉神迷。这座城市虽然自1911年以来在外观上没有多少变化，但在其他方面，1914年的开罗几乎旧貌换新颜。自欧洲战争爆发以来，它业已成为一个中转站，数十万殖民地军队从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纷至沓来，途经苏伊士运河，开赴西欧战场。就像在几乎任何一场战争中的任何一个军队休整落脚点一样，这些军人很快就把开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红灯区，在这里只要有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

这种局面令保守的开罗人无比愤慨，情况在土耳其参战后变得更糟糕了。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几乎已成定局——叙利亚总督杰马勒帕夏在11月底公开起誓要这么做——数十万英国和殖民地军队被留在埃

及，以应对这个威胁。开罗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市中心街道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神气活现的军官和列队前进的步兵。开罗人对他们的英国主人从来没有过好印象，现在更是怒火中烧、满腹憎恶。

这支部队急速膨胀，为了给负责管理它的军官们提供办公场所和住宿地，英国人很快征用了城里的几乎所有比较高档的酒店。其中就有萨沃伊饭店，它坐落在尼罗河东岸，兼收并蓄地吸收了英国爱德华七世时代和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斯图尔特·纽科姆的新军事情报单位人员在抵达开罗后，在萨沃伊饭店较高的一层占据了三个大房间，作为办公室，同时在邻近的大陆大酒店住宿。

起初，这个单位只有五个人，看上去更像是牛津或剑桥大学学术论文同业审核小组成员，而不是精通情报和反谍报的黑暗艺术的大师。除了劳伦斯和伍莱这两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考古学家外，还有两个年轻的贵族，乔治·劳埃德和奥布里·赫伯特，都拥有头衔，并且是上议院的议员。抵达开罗后不久，劳伦斯在给老友爱德华·利兹（他在阿什莫林博物馆工作）的信中描述了每个人的不同职能："伍莱负责人事，监听多种语言的电话通话，并将有用或可疑人员记录在案。有个叫乔治·劳埃德的人，是个什么议员，其他方面倒还不坏，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奥布里·赫伯特是个古怪的家伙，负责土耳其政治。他们在有空的时候就寻找土耳其军队的动向，这可是需要放大镜的活计。"至于他自己的职责，劳伦斯写道："我负责刷洗瓶子、处理办公室杂役、削铅笔和擦洗钢笔。"[40]

劳伦斯的工作当然远不止这些。因为他曾短暂地在伦敦陆军部的地理科工作，所以被指派负责管理单位的地图室。因为土耳其人对苏伊士运河的进攻指日可待，劳伦斯需要从清晨一直苦干到深夜。

劳伦斯虽然终于接近了战场，但他让上级抓狂的天赋还在。他刚到没几周，就有几名高级军官开始抱怨萨沃伊饭店地图室里那个瘦削小伙

子的厚颜无礼和邋遢外表。但劳伦斯让人恼火的本领不仅限于他的外表和言语。他还是个技艺娴熟的作家。作为情报单位中众人皆知的“叙利亚通”，他在1915年初开始撰写一份描述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幅员辽阔地区的地形地貌、文化和民族构成的长篇报告。当时和现在一样，这种背景报告里往往塞满了迟疑不决的、满是修饰语的措辞，但劳伦斯在他的《叙利亚：原材料》一文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对叙利亚各大城市和民族的看法，语言有时非常幽默和傲慢。他对耶路撒冷的猛烈抨击非常典型：“耶路撒冷是个肮脏的城镇，所有闪米特宗教都称它为圣地……在这座城市，过去的联合势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根本没有当今；它的市民绝大多数都是毫无个性的酒店仆役，依靠过往的游客过活。”[41]

这第一句话仅用了二十几个词就将世界上最享有盛誉的城市之一和三种主要宗教贬得一无是处，而且冒犯了所有读到此文的英国外交官和将领的基督教感情，无疑让劳伦斯非常自豪。

1914年11月中旬，威廉·耶鲁搭乘一艘挤满难民的运输船从贝鲁特前往亚历山大港。他在描述船上难民的情绪时，丝毫不吝惜夸大的言辞。他刚刚逃离了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战时的压抑气氛，就此写道：“对船上每个人来说，埃及都是绝对安全的避难所，没有任何值得害怕的东西。但我绝没有想到，另一种恐怖很快将吞没法老的国度。”[42]

但耶鲁说的恐怖不是指四处抢劫的士兵或者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武装民团，而是从埃及过境的成千上万澳大利亚士兵。他们在从家乡到此的拥挤的运输船上憋屈了几周，现在上岸之后立刻把古老的开罗变成了酩酊大醉、喧闹嘈杂的妓院。耶鲁虽然曾经目睹狂暴的美国劳工在耶路撒冷的胡作非为，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是个清教徒式的扬基人，所以被开罗街头持续不断的闹剧惊得瞠目结舌：打架斗殴、对过往的女人动手动脚、士兵烂醉如泥地躺在臭水沟里。在他看来，这种粗野下流的行为只

会让英国人在当地人眼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因为埃及人和近东的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将英国人视为一个冷静的优等种族。1914年的这些热血沸腾、淫荡好色、纪律涣散的澳大利亚人……让埃及人大开眼界。”

耶鲁在耶路撒冷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缓慢走向战争的全过程。11月3日，土耳其宣战的消息不胫而走，成群的穆斯林男子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城区聚集，城外村庄的人也不断蜂拥进城。当晚，耶鲁和其他西方侨民在大新酒店的上层阳台上观看着看不到尽头的年轻人的队伍涌过老城区的雅法门，前往阿克萨清真寺——耶路撒冷城内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一边走，一边捶打自己的胸膛，歌唱着自己为信仰牺牲的决心。

“这景象让我们毛骨悚然，”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的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感到，让这些人热血沸腾的那种宗教狂热，就是大约800年前驱使他们的祖先走过同一条街道、与我们的十字军祖先作战的那种狂热。”

这也让耶鲁和他的上司A.G.达纳拿定主意，撤退的时间到了。三天后，他们在雅法港成功登上了一艘满载难民的运输船。他们又换乘其他超载的船只，颇费了些周折，终于在11月17日抵达了埃及，目睹了狂欢的澳大利亚人造成的新的恐怖局面。

一位警觉的英国情报军官注意到了他们的到来。在亚历山大港码头，耶鲁被带到一个办公室，向英国人报告他最近在巴勒斯坦的见闻。让问话的英国人惊喜的是，这个美国石油专家在逃离叙利亚的途中观察非常仔细，能够说出巴勒斯坦南部一些城镇的土耳其兵力情况。他还证实，该地区到处都是德国军官，德国人似乎在和运载战争物资的卡车队伍以及成营的行军的土耳其士兵一道，大举南下。[43]

耶鲁不得不在开罗等待他在百老汇大街26号的老板们做出决定，究竟如何安排散布在中东各地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雇员。从标准公司的克

恩纳布项目的角度看，奥斯曼帝国参战让局面愈发恶化。英法两国的海军对新敌人的海岸线——奥斯曼帝国的海岸线包括整个地中海东部，从巴勒斯坦一直到欧洲的东南角——实施了封锁，所以在短期内肯定没有办法对特许区进行开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应该先从中东撤退，把员工都带回国，还是让他们先留在原地，等待近期出现什么无法预见的新情况。

12月底的一天，耶鲁还在等待上级的回复，这时有人敲响了他在民族酒店的房间的门。他起初没有认出这个访客——这是个身穿英国陆军制服的年轻人，这样的人此刻在开罗比比皆是——但他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似乎让他回忆起了什么。

“你好呀，耶鲁，”客人开心地歪着嘴笑了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英国情报部门的劳伦斯。我们去年1月份的时候在贝尔谢巴见过。”

耶鲁记起来了，无疑也记起了这个骄傲自大的年轻考古学家是如何拆穿他的“花花公子”幌子来取乐的。

很快局势就很明显了，这次会面仍然是某种形式的讯问。在战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向巴勒斯坦调兵遣将，显然是在准备进攻苏伊士运河，现在这个调兵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劳伦斯几天前刚刚抵达埃及，他翻看了一下入境外国人登记表，看到了耶鲁的名字。他想把标准石油公司在希伯伦以南修建的那条公路的情况摸个清楚：它的具体路线、它的构成和排水系统，以及土耳其人是否可以用它向南运送重武器。

“他把我掌握的信息全部掏空之后，”耶鲁回忆道，“就开始谈论巴勒斯坦局势。我很快发现，虽然我刚从那儿来，但这个军官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此时我才开始了解，英国情报部门是多么高效，年轻的劳伦斯是多么精明强干。”[44]

当晚，劳伦斯把从耶鲁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告，准备呈送给军事情报部门的上级。他的这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很不爽。希伯伦—贝尔谢巴公路还没有完工，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完成了最困难的一段路，就是穿过朱迪亚山区到沙漠边缘的下坡路。威廉·耶鲁或许是吸取了在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学经验，把路修得坡度非常平缓，以利于载重卡车通行，事实上这条路的坡度极小，路基很容易改建为铁路。此前，英国的高级将领一直认为，土耳其—德国军队从巴勒斯坦南部向苏伊士运河前进主要是依靠地中海沿岸的已经修好的道路。标准石油公司和威廉·耶鲁的希伯伦公路无意中帮助土耳其人把他们的作战正面扩展了约30英里。[45]

1914年11月21日上午，也就是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到三周之后，艾哈迈德·杰马勒帕夏——此时统治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之一——离开君士坦丁堡，就任第4集团军总司令兼叙利亚总督。他的真正权力比这两个头衔的范围要大得多：他实际上是安纳托利亚以南、美索不达米亚以西全部奥斯曼疆土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的辖区相当于帝国目前在大陆的版图的一半以上。他的头等要务与他的权威相称：率领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直捣英属埃及。

在随后的三年内，杰马勒帕夏将完完全全地主宰叙利亚的生活，他的行为是后来发生的大部分事件的动因。由于他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双重身份，他会和三个不同的人持续接触，并在不同时期令其为己所用：亚伦·亚伦森、库尔特·普吕弗和威廉·耶鲁。

从某些方面看，身材矮小强健的杰马勒似乎不是这个封疆大吏职位的理想人选。他于1872年出生于一个奥斯曼下级军官家庭，自然而然地子承父业、进入军队发展，逐渐得到晋升，但表现并不突出，直到于20世纪初加入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改革派密谋集团。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成功夺权的1913年政变之前，艾哈迈德·杰马勒一直默默无闻，政变后

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军事总督。不到一年之后，在新近崛起的所谓“三位帕夏”联合执政的局面中，这位42岁的军官成了统治帝国的神秘莫测的委员会的三位公开代表人之一。

杰马勒得以平步青云的一个原因无疑是他的个人魅力。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亨利·摩根索回忆称：“他握你的手时力道极大，就像是用老虎钳夹了你一下；他用那双滴溜溜转、目光深邃的眼睛看你的时候，那种个人魅力是令人景仰的。”这并不是说摩根索对杰马勒有好感，因为他在杰马勒的魅力里看到的是一种恶毒的力量。摩根索的过激的、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眼睛漆黑，目光穿透力极强，非常敏锐，极快地、极其灵敏地从一个目标投向另一个，用闪电般的短暂一瞥似乎就能看到所有东西，代表着极端的狡猾、无情和自私。他喜欢咧嘴大笑，露出所有的白牙，他的笑容也令人不快，如同野兽一般。”[46]

另一个在战时和杰马勒打交道很多的美国人对他作了更细致的描述。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的院长霍华德·布里斯回忆说，在战时的贝鲁特，有一天下午，总督举行了茶话会，那是一个社交场合，甚至邀请了敌国侨民。杰马勒“非常快活、温雅惬意、津津有味，手放在口袋里走来走去，或者懒洋洋地斜靠在一张大椅子的扶手上，倚靠在椅子的另一个扶手上的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欧洲女士。”[47] 布里斯注意到，总督非常爱孩子，而且公开地向妻子表示亲昵——“这在东方人中是很少见的”。布里斯看到的杰马勒一方面极度虚荣，另一方面又心地善良，“他的性格里富含互相矛盾的元素：残忍和宽大，坚定不移和反复无常，理想主义和纵欲享乐，自私自利和爱国主义”。

杰马勒的性格上有很多矛盾之处，他的政治观点也非常复杂。他代表了青年土耳其运动核心深处的内在矛盾：夹在东西方之间、现代性和传统之间，既对欧洲列强非常敬佩和仰慕，又对它们非常怨恨和憎恶。

杰马勒是个虔诚的穆斯林，鼓吹泛伊斯兰主义的圣战信条，但同时又是一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大力主张赋予帝国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完全的公民权利。他是个热衷于欧洲音乐和文学的审美家，特别喜欢在君士坦丁堡外国人光顾的沙龙里练习法语，但同时又告诫同胞们要清洗掉西方的腐化影响。他梦想着，土耳其和伊斯兰能够有一场复兴，让奥斯曼帝国焕发青春，恢复古时的光荣伟大，但内心深处又是个唯技术论者，一心要通过修建公路、铁路和学校来让他的国家进入现代化。

“他的雄心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叙利亚，能够向欧洲人展示，让他们艳羡不已，”布里斯写道，“如果说他是个人主义的爱国者，就不太公平。他非常虚荣。他希望改革土耳其，但他最想要的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是主要的改革家。”[48]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杰马勒将会依赖他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险恶潮流中崛起过程中习得的技能：能够在一眨眼的工夫从文雅变为凶残，既擅长伸出橄榄枝，也擅长暗箭伤人。那些生活在他的南方领地之内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杰马勒帕夏在拉拢潜在敌人时会非常殷勤客气和关怀备至，但如果阿谀谄媚、油水丰厚的闲职和甜美诺言都不奏效的话，他也会很自然地动用放逐和处决的老办法。

他乘坐的火车从君士坦丁堡的海德尔帕夏车站开出后，改革叙利亚的挑战很快就显得特别突出。杰马勒面临的最初困难是，首先要抵达叙利亚。漫长旅途的最初一段还很顺利，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两天旅程很愉快，但是火车抵达小镇穆斯塔法贝伊（位于亚历山大勒塔湾北端）时，就遇到了麻烦。在那里，当地官员窘迫地向杰马勒报告，前面的通往亚历山大勒塔城（今伊斯肯德伦）的铁路有多处在不久前被雨水冲毁了。于是帕夏改乘汽车，但是在通往亚历山大勒塔的“高速公路”上没走多远，就陷入泥潭，烂泥一直淹没到汽车的挡泥板。杰马勒随后骑马行进四个小时，终于抵达海滨城镇德尔特约尔。杰马勒一行在那里找到了

一辆仅能容纳两人的袖珍有轨车。某些乐观主义者相信这辆车足够轻，应该可以顺利通过已经损坏的海岸铁路线。最终，帕夏和他的参谋长乘坐这辆有轨车抵达了10英里外的亚历山大勒塔。

“这次乘坐有轨车在打滑的轨道上的旅行，我将终生难忘。”杰马勒写道，“我们多次遇到生命危险，因为我们在瓢泼大雨中沿着海岸线行进，而海岸线受到敌舰的监视……铁轨的有些地段悬空15～20米，有些地段则被水淹没，我们就这样开到了亚历山大勒塔”。[49]

等待帕夏的是更多的坏消息。亚历山大勒塔和叙利亚北部的内陆之间的唯一一条交通线——通往阿勒颇的公路已经无法通行，不过“无法通行”这种说法实在是太保守了。修路工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但仅仅是将所有加拱石清理掉，就没有下文了。那些石头现在就被高高地堆放在公路两侧，按照杰马勒的说法，使公路“成了一条绝妙的运河”。他在回忆录中惊呼道：“我的军队就要依赖这条路和帝国本土保持联系！”[50]

12月6日，杰马勒在跋涉两周多之后终于抵达位于大马士革的司令部，此时他已经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苏伊士运河攻势必须推迟，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补给线和基础设施的最基本问题。但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已经在大马士革等待他的一位年轻的德国情报军官。此人被委派担任杰马勒与德国高层之间的联络官，他就是库尔特·普吕弗少校。

在普吕弗看来，苏伊士运河攻势刻不容缓。他在了解到杰马勒的踌躇之后，写信给马克斯·奥本海默称，叙利亚人对圣战的支持原本就不温不火，如果攻势推迟的话，“我们精心炮制出来的圣战热情无疑会烟消云散，旧时的无动于衷（如果不是敌意的话），就会卷土重来”。另外，推迟攻势还会“令素来胆小如鼠的埃及人彻底灰心丧气”。[51]

普吕弗坚决反对推迟攻势的态度很奇怪，因为他给奥本海默的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解释，向运河的进攻为什么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认为“现有手段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但普吕弗催促尽早进攻或许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目睹了把土耳其拖入战争的漫长努力，而且他从发往大马士革的情报也一定能了解到，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层中仍然有人在百般努力，希望退出与德国的联盟，向协约国求和。一旦向苏伊士运河发起进攻，主和派就无路可走了。那样的话，土耳其和德国就将成为绑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只能同生共死。

不久之后，杰马勒收到了君士坦丁堡发来的一份简短的电报：苏伊士运河攻势务必即刻展开。

---

[1] Hollis to Lansing，November 9，1914；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Roll 6，Decimal 867.00/713.

[2] Magnus，*Kitchener*，pp.283-84.

[3] Stevenson，1914-1918，p.54.

[4] Keegan，*The First World War*，p.7；J. Vallin，“La Mortalité pargénération en France depuis 1899［Mortality by Generation in France Since 1899］，” Travaux et Documents，Cahier no. 63（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5] Haig，diary entry of July 2，1916，as cited in Gilbert，*The Somme*，p.93.

[6]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in Graves and Hart，*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 s，Pt. 2，p.90.

[7]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in Graves and Hart，*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 s，Pt. 2，p.90.

[8] As quoted in Fischer，*War of Illusion* s，p.542.

[9] Lawrence to Rieder，September 18，1914，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185.

[10] 威廉·耶鲁对自己在1914年底在耶路撒冷的生活的记述主要来自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2。

[11] 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448，Volume 14.

[12] 橄榄山是耶路撒冷东部的一座山，得名于满山的油橄榄树。在山脚有客西马尼园，根据传说，那里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住处。圣经上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橄榄山。《撒迦利亚书》说到，橄榄山将是末日耶和华降临的地点。因此，犹太人总是希望埋葬在橄榄山，从圣经时代直到今天，橄榄山一直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墓地。山上估计有15万个墓穴，其中包括撒迦利亚、押沙龙和从15世纪到20世纪的许多犹太教拉比的墓地。

[13] Beaumont to Gray，August 3，1913，File 35857，No. 605；and Tewfik Pasha to Grey，August 4，1914，File 35844，No. 598，in Gooch & Temperly，*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Vol. XI.

[14] 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John Dye在领事馆日志中对叙利亚战前的紧张局势作了极好的、相当客观公正的描述，见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350，Volume 101。Alex Aaronsohn的*With the Turks in Palestine* 较有偏见。

[15] 土耳其和德国双方都竭力隐瞒两国的秘密盟约。1914年7月29日，即与恩维尔帕夏的秘密协定还在谈判的时候，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团长利曼·冯·桑德斯将军向上级请求，一旦发生战争，就返回德国。德皇威廉二世读到桑德斯的电报时，在电文边缘批示道："他必须留在那里，煽动针对英国的战争和起义。他难道还不知道即将签署的盟约？根据这项盟约，他将担任总司令！"

[16] Oppenheim to Bethmann-Hollweg，August 18，1914；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143，Frames 16-21，Der Weltkrieg no. 11，Band 1.

[17] Prüfer，*Diary*，September 8，1914；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8] Oppenheim to Bethmann-Hollweg，August 18，1914；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143，Frames 16-21，Der Weltkrieg no. 11，Band 1.

[19] *New York Times*，April 20，1915.

[20] Prüfer，*Diary*，September 7，1914；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21] Interrogation of Robert Mors，October 10，1914，pp.4-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1972，File 66271.

[22] Mallet to Grey，September 15，1914；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1970，f. 8.

[23] Mallet to Grey，October 6，1914；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1970，f. 93.

[24] Interrogation of Robert Mors，October 10，1914，p.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1972，File 66271.

[25] McKale，*Curt Prüfer* ，p.31.

[26] Lawrence to “Friend，” 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88.

[27]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August 1，1933，in Graves and Hart，*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 ，Pt. 2，p.141.

[28] Lawrence to Fontana，October 19，1914，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87.

[29] Lawrence to Fontana，December 4，1914，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89.

[30]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 ，p.119.

[31] Aaronsohn，*Pres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inPalestine* ，p.6，early 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4，f. 328.

[32] Aaronsohn（anonymous），“Syria：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rab Bulletin no. 33（December 4，1916）：505.

[33] Kayali，*Arabs and Young Turks* ，pp.187-88.

[34]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204.

[35] Aaronsohn（anonymous），“The Jewish Colonies，” Arab Bulletin，no. 64（September 27，1917）：391.

[36] 得名自公元1世纪时的犹太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西蒙·本·乔拉。

[37] Alex Aaronsohn，“Saifna Ahmar，Ya Sultan！” The Atlantic Monthly，July 1916，Vol. 118.

[38]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杰马勒帕夏在1914～1915年下令将犹太人从巴勒斯坦驱逐出去，这是旨在消灭犹太人社区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大卫·弗洛姆金。他在《终结所有和平的和约》（*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第210～211页写道，杰马勒“对犹太人定居者施加暴力。在一位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奥斯曼官员贝哈艾丁的影响下，杰马勒采取措施去摧毁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并命令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出境，也就是说，巴勒斯坦

的绝大多数犹太人”。事实上，杰马勒在1914年12月的驱逐命令明确只针对敌国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其他参战国也都采取了这项政策——而且很快又改为，英国和法国籍犹太人不在受驱逐之列。另外，在巴勒斯坦的那些被划入驱逐范围的“敌国”犹太人，主要是俄国籍犹太人，如果愿意加入奥斯曼国籍，就可以留下。也只有奥斯曼帝国会给出这样宽厚的条件。由于这种相对比较宽大的处理和它造成的许多漏洞，居住在战前巴勒斯坦的约8.5万犹太人中只有少数离开，或者被驱逐，绝不是弗洛姆金估计的“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犹太人”。

[39] Aaronsohn to Rosenwald，January 21，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58，Volume 378，Decimal 800.

[40] Brown，*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69.

[41] Lawrence，“Syria：The Raw Material，” written early 1915，*Arab Bulletin* no. 44（March 12，1917）.

[42]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3，p.1.

[43] Military Censor，Statement of W. M. Yale，November 17，1914；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7/688.

[44] Yale，*T.E. Lawrence*：*Scholar*，*Soldier*，*Statesman*，*Diplomat*（undated but 1935）；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6，Folder 1.

[45] Lawrence（unsigned and undated），handwritten notes on interview of William Yale；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89.

[46] Morgenthau，*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p.120.

[47] Bliss，“Djemal Pasha：A Portrai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vol. 86（New York：Leonard Scott，July-December 1919），p.1151.

[48] Bliss，“Djemal Pasha：A Portrai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vol. 86（New York：Leonard Scott，July-December 1919），p.1153.

[49]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pp.141-42.

[50]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p.143.

[51] Prüfer to Oppenheim，December 31，1914；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21128，Der Weltkrieg no. 11g，Band 6.

第5章 可鄙的乱局

在叙利亚方面，我们的敌人不是土耳其，而是法国。

——1915年2月，T.E.劳伦斯写给家人的信 [1]

在萨沃伊饭店安顿就绪之后，劳伦斯占据了办公室里最大的一面墙，挂上了一幅巨大的奥斯曼世界的分地区地图。在闲暇时刻，他就倚靠着对面的墙，久久地凝视着地图，纵览帝国的广阔。

1915年1月，他在等待土耳其军队进攻苏伊士运河，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原因之一在于，他对这场战事的结局几乎没有疑问。土耳其人要想抵达运河，必须先穿过贫瘠荒凉的西奈半岛的150英里路程。根据他对这一广大地区的了解——尤其是水资源的匮乏，劳伦斯坚信不疑，敌人的进攻部队规模肯定很小——绝不会像英国军方的某些危言耸听的人提出的那样，能够达到10万之众，所以很容易打退。 [2]

他焦躁的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在考虑近东战争的下一个篇章，也就是打退土耳其人的进攻之后会怎么样。到那时，英军应当转守为攻。劳伦斯盯着萨沃伊饭店墙壁上的地图，寻找能够给奥斯曼帝国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目标。

他早已经认识到了这幅地图的一个真正怪异的地方：奥斯曼帝国虽然幅员辽阔，而且政治凝聚力不强，但是从地理的角度看，它得到了极好的保护。

奥斯曼世界的政治和精神核心当然是古城君士坦丁堡，以及它东面的群山连绵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即土耳其人祖先的故国。这种分布不可避免地让英国的战争筹划者们构想出了一个诱人的计划，即将敌人“斩首”：如果能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其所在地区，帝国的其他部分无疑会迅

速土崩瓦解。

但是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任何路线上都有着极大的障碍。土耳其的两个欧洲邻国——希腊和保加利亚都还保持中立，所以从西面没有多少空间能够从陆路逼近君士坦丁堡。理论上，英国的盟友俄国可以从安纳托利亚东端发动进攻，但是俄军已经在东线战场被德军大放血，所以可能在那个山区没走多远，人力和补给线就要出问题。至于南方路线，如果是从陆路进攻，就必须艰难地穿过安纳托利亚腹地，在当地一定会受到顽强抵抗，而且山区交通不便；如果从海路，舰队就必须穿过宽仅3英里的达达尼尔海峡，一路遭到两岸的土耳其堡垒的攻击。总而言之，要直接进攻君士坦丁堡绝非易事。

但是如果要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下手，前景更加惨淡。英属印度军队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就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油田，但是从那里出发，要穿过河流沼泽和沙漠，跋涉700英里才能接近安纳托利亚边境。同样，如果从埃及出发，就要先穿过荒无人烟的西奈半岛，然后在巴勒斯坦南部的狭窄咽喉要道与云集于此的土耳其大军短兵相接。

但是，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奥斯曼帝国的天然屏障中的确有一个特别薄弱的点。那就是叙利亚西北部的亚历山大勒塔湾，地中海东部漫长的南北向海岸线在这里与曲折得多的安纳托利亚海岸线连为一体。亚历山大勒塔不仅拥有地中海东部最好的天然深水港——这是两栖作战的一个关键要素——而且它东面的地域相对比较平坦，地面部队可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以向内陆推进。

但这些都是军事上的考虑，在劳伦斯抵达之前，早已有一些在埃及的英国高级军官认识到了这一点。劳伦斯的与众不同在于，他通过自己对该地区的知识——杰拉布卢斯就在亚历山大勒塔以东仅100英里处——和对奥斯曼社会的第一手了解，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意义。

任何一个大帝国在兴兵作战时都面临着一个隐藏的巨大危险，那就是它的国境之内往往有很多群体不愿意和战争扯上任何关系。仗打得越久，破坏越大，这些群体就越满腹怨恨，也就越容易受到敌人的诺言和宣传的影响。欧洲的互相争斗的各大帝国在战争持续下去时都要纠结这个内在的危险，但欧洲人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虽然有时会很严重，但和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面对的问题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很简单，奥斯曼帝国是个多语言多民族的成分极其复杂的帝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取悦某个群体的行动都必然会疏离另一个群体。11月政府号召圣战就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号召在短期内激起了穆斯林青年的热情，但让帝国的非穆斯林臣民惶恐不安。与此同时，很多保守的阿拉伯穆斯林已经对青年土耳其党对土耳其人的偏向感到不满，所以对政府的圣战号召无动于衷，认为这是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政权在虚伪地打宗教牌。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大马赛克，它也具有鲜明的特点，各种不同的“色彩”在帝国版图的不同区域占主导地位，或者影响力比较小。如果我们拉开一点距离来看这个马赛克，就会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有一个点，多种不同色彩在那里汇流，形成了民族和宗教的爆炸中心：亚历山大勒塔。

劳伦斯已经确信不已，由于路途遥远，而且能获得的资源相对缺乏，对土耳其的常规作战是不可能奏效的。英国需要采纳一种非常规的战略：利用敌国社会内部的分裂，与不满分子联手。亚历山大勒塔盆地是一道分界线，它的北面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世界，南面则是广阔的阿拉伯世界。依据劳伦斯在杰拉布卢斯的多年经验，叙利亚北部的阿拉伯人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宰者非常仇恨。亚历山大勒塔同时位于亚美尼亚腹地的边缘，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多次遭到他们的土耳其邻居的屠戮，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亚美尼亚人更有反叛君士坦丁堡的理由。劳伦斯认为，英军如果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除了在军事上有益处之外，还肯定

会星火燎原地激起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发动起义、反抗土耳其人，这些起义自然会有助于英军的努力。

劳伦斯还掌握了一些第一手信息，让这个主意显得更加诱人。将安纳托利亚与它南面的地区连接起来的主要公路途经亚历山大勒塔盆地，劳伦斯在那里待过，深知这条公路的路况非常糟糕。另外，连接君士坦丁堡与帝国的阿拉伯领地的汉志铁路也经过亚历山大勒塔盆地，更准确地说，这条铁路只是部分地连接君士坦丁堡与阿拉伯地区，因为劳伦斯在六个月前受斯图尔特·纽科姆之托曾旅行途经这一地区，他知道汉志铁路在亚历山大勒塔以北的托罗斯山脉和阿玛努斯山脉中的两个关键路段远远没有完工。这意味着，如果英军控制了亚历山大勒塔盆地，土耳其人无法快速做出反应，而盆地以南的所有地区因为被切断了补给和援兵，都很可能会迅速陷落。那么，英军只需在亚历山大勒塔维持少量兵力——劳伦斯估计两三千人足矣——就可以不仅将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还迫使它无法在战争中利用它的三分之一人口和超过一半的陆地疆土。

并非只有劳伦斯一个人认识到了亚历山大勒塔极大的薄弱性。土耳其人对此也有深刻认识，正因为此，他们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屈辱的插曲中卑躬屈节。

1914年12月20日，一艘孤零零的英国战舰“多丽丝”号驶到亚历山大勒塔外海，胆大包天地玩了一个虚张声势的游戏。它向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发布了一条最后通牒：释放被羁押在城内的所有外国战俘，并交出全部弹药和火车车皮，否则城市就将遭到炮击。土耳其人没有火炮来对抗这样的攻击，于是在绝望之下威胁说，每当有一名土耳其公民在炮击中身亡，他们就将杀死一名英军战俘。这个威胁公然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在外交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很快收回了这个威胁。双方达成了一个奇异的妥协：土耳

其人答应摧毁停在亚历山大勒塔火车站的两个火车头，英国人则不炮击城市。但是土耳其人很快就万般尴尬地承认，他们没有炸药，也没有懂得爆破技术的人员来实施爆破，于是“多丽丝”号在12月22日派出一名爆破专家上岸，在土耳其人保护下将火车头炸毁。英国政府对“多丽丝”号事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土耳其人的死亡威胁，而劳伦斯却从此事看出，土耳其人对亚历山大勒塔可能遭到的威胁非常恐慌。[3]

劳伦斯虽然只是个负责校勘地图的少尉，但他是军事情报单位的一员，因此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能够将他的想法传播到英国战争筹划的最高层。英军高层之前也讨论过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设想，但在劳伦斯抵达开罗后不久，这个计划就被加紧提上日程，这绝非偶然。1915年1月5日的一份军事备忘录提到了这个主题，鉴于此份备忘录语法上的怪异特点，几乎可以肯定它是劳伦斯写的：“两个很好的情报来源告诉我们，在叙利亚负责指挥的德国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军在叙利亚北部登陆。他们自己说，一旦我军在该处登陆，他们的阿拉伯部队就会普遍地叛变。德国人的这种恐惧无疑是很有根据的。我军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直接后果将是，泛阿拉伯军事联盟将发动普遍的阿拉伯起义。”[4]

这种游说产生了效果。1915年1月15日，也就是劳伦斯抵达开罗仅一个月之后，他给自己在牛津的恩师戴维·霍格思写了封信。因为这封信会受到军方的审查，所以他刻意使用了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我们的某项工作进展顺利。我们一致努力，花了一个月时间把‘他们’从我们认为的错误路线上扭转过来——我们看样子已经完全胜利了，今天已经得到了我们目前想要的所有东西，所以现在感到无聊透顶。”[5]

他提到的“他们”是开罗和伦敦的英军高层，而“某项工作”则是指在亚历山大勒塔的两栖登陆。在劳伦斯看来，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静候土耳其军队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势，安全解决这个问题。

将士们士气高昂，就连杰马勒帕夏也在一个短暂时期感到，战事或

许会很顺利。“大家全都坚信不疑，一定能够跨过运河，”他回忆道，“我们应当在运河西岸掘壕据守，埃及的爱国者一定会奋起反抗，从英国人的背后攻击他们。”[6]

奥斯曼第4集团军将士在1915年1月底士气如此高涨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穿越西奈半岛时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坚忍不拔，这是一个光辉的典范，证明土耳其人的顽强再加上德国人的组织能力能够取得怎样了不起的成就。穿越这120英里的行动已经筹划了好几个月，在后勤安排上付出了几乎是超人的努力。工兵单位在德国军官的监管下，在大部队前面出动，在沙漠里分散开，为大部队寻找水井、建造雨水蓄水池，并设置弹药堆放点。庞大的牛群拖运着渡过苏伊士运河所需的浮桥的部件和部队的重炮，军方还从远至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地方调来了大约1.2万头骆驼，来运输补给物资。1月初，1.3万土耳其军队兵分三路穿过沙漠，尽管行军途中条件极其艰苦——每人每天的口粮定量仅有半磅饼干和少量橄榄，但到月底还是在运河以东仅几英里处安营扎寨下来，做好了进攻准备。在埃及的英国人肯定知道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英军的侦察机曾拍摄到土军某些部队，甚至偶尔还向其开火——但并不清楚敌人的兵力有多少，也不知道敌人将从100多英里长的运河沿岸的哪个地点发起进攻。就是这一点让杰马勒的部队士气高涨。

“当时，我每天夜里都和官兵讨论即将到来的胜利，”他写道，“那将是多么光荣的胜利啊。我希望这神圣的火苗在全军心中熊熊燃烧……如果有什么无法预见的幸运让此役一举成功，我们自然会将它视为伊斯兰和奥斯曼帝国得到最终解放的好兆头。”[7]

库尔特·普吕弗少校就没有这么乐观了。他和其他一小群德国下级军官一道，忍受了此次沙漠行军的艰难险阻。他把成功穿越沙漠完全归功于杰马勒的主要德国军事顾问——一个叫作弗里德里希·克莱斯·冯·克莱森施泰因的中校，他的名字颇为有趣——的细致入微的筹划。但筹划

也不是万能的，虽然普吕弗不是职业军人——他和T.E.劳伦斯一样，虽然获得军官的职衔，但不曾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他能够认识到，现代战争的新面貌几乎肯定意味着，即将展开的攻势会出岔子。尤其是，在航空侦察的时代（当时航空侦察还处于萌芽期），英国人对敌人的兵力和意图的了解肯定比土耳其人想象的细致得多。

普吕弗自己对运河做了一次侦察，证实了这些想法。土耳其军队的进攻计划是，两翼分别在运河的南北两端发动牵制性佯攻，而主力部队——约6500人——在运河的中点附近、大苦湖以北不远处发动猛攻。1月25日上午，普吕弗来到已经潜伏在运河岸边的一个侦察组那里，发现湖里只有两艘英国挖泥船和几艘较小的船只。但三天之后，湖里就有好几艘运输船和两艘巡洋舰；1月30日，就有多达20艘船。在此期间，一架英国作战飞机向土军的指挥部营地投掷了两枚炸弹，普吕弗险些丧命。

“我承认，炸弹的重击、猛烈的爆炸和滚滚黑烟让我颇为惊恐，”他在日记中写道，“但我尽可能掩饰自己的恐惧。营地里，所有人都乱糟糟地跑来跑去。”[8]

在普吕弗看来，这都预示着大祸临头。“湖里敌人的巡洋舰控制着局面，”他在1月30日侦察回来之后写道，“我们还没接近运河就会被全部消灭。”[9] 在生死未卜的战役前夜，他吃下了战前的最后一餐：芦笋和法式烤面包。

1915年2月3日清晨，进攻终于开始。土耳其工兵利用一场短暂的沙尘暴的掩蔽，在河边搭建起了10座浮桥，步兵则在后面等待过河。但在一个关键时刻，英军的一台探照灯发现了敌人的活动；在步枪火力和炮火组成的弹幕中，七座浮桥很快被摧毁。这对奥斯曼第4集团军来说或许其实是件好事，因为它减小了屠杀的伤亡。有大约600名土耳其士兵在退路被切断之前冲到了对岸，全部被杀死或者被迫投降。[10]

普吕弗受命带领一长队拖运沙袋的大车上前，这的确是个堂吉诃德式的任务。计划是要用这些沙袋堵塞运河，形成一座通往对岸的桥梁。但是，他这一整天都在英军炮弹四处开花的混乱局面中从一个地点爬向另一个。

到天黑时，杰马勒和他的高级德国顾问们认定局势已经无望，于是开始穿越西奈沙漠撤退。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英军并没有追击这支败军，所以它的撤退井然有序、纪律严明，就像来时一样。

库尔特·普吕弗虽然在战役前夜就没抱什么希望，但运河上的挫折还是让他垂头丧气。他在战斗中有一只手臂被弹片击中，负了轻伤。他待在西奈半岛东缘的一个叫作哈菲尔安德沙的绿洲小镇养伤，同时向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和德国驻土耳其大使汉斯·冯·旺根海姆发送报告。他直言不讳，甚至是挖苦嘲讽地指出，这次战役未能让埃及人揭竿而起。

“虽然我们百般煽动，”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写道，“虽然我们发放了数千份圣战小册子，但没有一个人向我军投诚……埃及人在绝望中都非常怯懦，对自己的祖国没有真正的爱。”[11]

但他的失望显然有着更深刻的根源。自从与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组队以来，这位先前的东方学者就狂热地支持泛伊斯兰圣战思想，以打击德国的敌人。不仅是这场战斗，整个西奈战役都证明了这种想法的荒谬。从一开始，进攻部队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随着时间流逝，摩擦越来越严重。很多阿拉伯单位一听枪响就逃之夭夭，或者根本没有展开作战，还有些单位叛变投敌。普吕弗对贝都因游牧战士——其中很多人是他亲自招募来的，作为侦察兵——特别鄙夷，这些人在决定性的日子也作鸟兽散了。事实上，这些内斗不休的士兵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讨厌德国顾问。甚至很多土耳其军官也对德国人在整个战役中给出的指令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

普吕弗从哈菲尔安德沙告诉他的老导师：“圣战是一场悲喜剧。”[12]

杰马勒帕夏对此役的评估倒是比较乐观。这次攻势虽然没能像他预期的那样让埃及人发动起义，但迫使英军在埃及保留更多军队，所以其他战场能够动用的兵力就减少了。另外，由于他及时叫停战斗，部队主力尚存。与此同时，杰马勒和普吕弗各自穿过西奈半岛撤退的途中，无疑都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忧虑不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英军的报复性进攻很快就要降临了。问题是，英军会进攻什么地方。从他们最近穿过叙利亚的艰难旅途的经验来看，两人都知道，最有可能的地点是亚历山大勒塔盆地。

让他们担心的不只是破败的铁路和这个咽喉要冲的形似运河的糟糕公路。全国都在搜寻可靠的一线部队，所以土耳其人被迫将保卫亚历山大勒塔地区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几乎完全由叙利亚阿拉伯人组成的二流的师。阿拉伯人在最好的时候都对土耳其主子心怀不满，而当前可不是奥斯曼世界的最好时候，这些阿拉伯部队很可能一看到协约国军队登陆就土崩瓦解，或者甚至改弦易张。

杰马勒帕夏对亚历山大勒塔的焦虑已经让他做出了一个鲁莽的决定。他急于掩饰这座城市可悲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去年12月英军战舰“多丽丝”号在岸边苦苦相逼的时候，发出了处死英军战俘的威胁。在苏伊士运河攻势失败之后，叙利亚总督确信不疑，英国人会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土耳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这一次不会有谈判，也不会有办法阻止他们了。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情：一支军队占尽了优势，似乎必胜无疑，却出人意料地与胜利失之交臂、最终落败。这种现象一般有三个原因：狂妄自大，即对己方的军事或文化优势盲目自信，没有认真对待敌人；政治干扰；或者井蛙之见，即战争筹划者和将帅们的一种奇怪的倾向，认为只要投入更多兵力和火力，战术的缺陷就能得

到修正。1915年初，英国军方同时犯下了这三个错误，最终走向了一场规模极大的惨败。

2月3日，土耳其军队向苏伊士运河的进攻被轻松打退。劳伦斯和开罗情报单位的其他成员都以为，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计划应该会马上实施了。但是，伦敦的战略家们已经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奥斯曼海岸线的另一个地点：君士坦丁堡以南的达达尼尔海峡。[13]

达达尼尔海峡是地球上一个构造比较奇特的地点，是一条狭长的、类似峡湾的水道，东岸是土耳其的亚洲大陆，西岸则是群山延绵的加里波利半岛。海峡长30英里，在群山之间蜿蜒前行，北端与马尔马拉海相连，马尔马拉海的远端就是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海峡的南端入口注入地中海，一直被视为君士坦丁堡的门户，自古以来，所有曾控制这一地区的文明都在这里经营防御工事。1915年初在海峡上方的诸多奥斯曼堡垒是在拜占庭堡垒的废墟之上建起来的，而这些拜占庭堡垒则是建在希腊和罗马堡垒的遗址之上。

自土耳其参战以来，“闯过关口”就一直是英国高层很感兴趣的想法，最热衷于这个计划的就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再三向英国内阁指出——他讲话的风格常常让人腻烦——毫无防御的君士坦丁堡就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现在有很好的机会快速地将土耳其敌人斩首，让其退出战争。突破达达尼尔海峡的另一个理由是，俄国在北方受到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很大压力，因此向西方协约国求援。俄国的北方港口要么仍然冰冻三尺，要么处于德国U艇的监视之下，所以丘吉尔主张，唯一的海上救援线路就在南方。

伦敦方面对在达达尼尔海峡采取海军行动渐渐达成了共识，那些在开罗主张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人处于下风；他们从上级那里得到的说法是，皇家海军将集中力量在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如果要支援亚历山大勒塔登陆，兵力就过于分散了。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即便是陆军部

最悲观的评估也认为占领亚历山大勒塔需要约2万人——这比劳伦斯设想的两三千人多得多，但与在西线蹲在战壕里盯着无人地带的兵力相比就微不足道了。[14] 真正的问题是英军体制上的目光短浅。因为此刻达达尼尔海峡已经被定为近东的头等要务，在亚历山大勒塔的任何行动都会被视为牵制性攻击，而墨守19世纪的军事成规——集中全部可用兵力于一点——的英国高级将帅们认为，任何牵制性攻击都只是浪费兵力而已。

此外，英国高层极端地目空一切。它固执地认为，土耳其是个三流国家，土耳其士兵营养不良、训练乏力、武器装备很糟糕，而且喜欢造反。仅在过去的五年中，土耳其就接二连三地被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击败。最近，土耳其军队又在苏伊士运河吃了败仗，在土耳其东部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中惨遭俄军屠戮。1914年11月，一位英国军官向上级报告称："总体而言，土耳其军队只是一支民兵队伍，训练不足，士兵都是些虽然吃苦耐劳但是愚钝的农民，像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一样，遇到意外情况容易惊慌失措。"[15] 这种乌合之众面对大英帝国的威力，能有什么机会呢？因此，既然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将敌人斩首，为什么还要在亚历山大勒塔掐敌人的脚后跟呢？

但决定事态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与军事战略或者狂妄自大无关，而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自开战以来，法国人就提出了对叙利亚的权利主张，战争结束后就要将这个战利品收入囊中。尽管亚历山大勒塔飞地的位置在一般认为的大叙利亚的边境之外，但英国人鼓吹的"一旦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叙利亚人肯定会揭竿而起"的说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是劳伦斯发给伦敦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说法——让法国人非常焦躁。简单地说，如果协约国要进军叙利亚地区，法国人希望从一开始就参加行动，以便掌控那里的局势。这倒也能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在于，法国人因为在西线兵力吃紧，抽不出部队来攻打亚历山大勒塔，所以它要求自己的盟友也不要碰这整个地区，包括亚历山大勒

塔。

劳伦斯认为，毁掉亚历山大勒塔计划的不是英国陆军部的短视，而是法国人的阻挠。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暂且不谈。2月初，关于法国人立场的消息传到了萨沃伊饭店的情报单位，大家无不瞠目结舌。劳伦斯在给父母的短信中恼怒地写道：“在叙利亚方面，我们的敌人不是土耳其，而是法国。”[16]

但从最初的情况来看，劳伦斯的愤慨可能不合时宜，而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场很成功。2月19日，英国和法国的小型联合舰队抵达海峡南端入口，开始以远程火炮恣意轰击那里的土耳其要塞。土耳其人能组织起来的还击炮火少得可怜，他们的大部分外围堡垒很快化为齑粉，英国舰队指挥官自信满怀地预测称，他们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在海峡北上，同时摧毁剩余的土耳其工事，两周之内就可以抵达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的市民们显然很同意他的看法。协约国舰队驶离海峡，以便为最后猛攻补充弹药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也就是指日可待、板上钉钉的事情。[17] 土耳其的黄金储备被匆匆转移到内陆的一个安全地点，很多政府高官已经在悄悄地安排逃跑的计划。

T.E.劳伦斯并不认同君士坦丁堡陷落指日可待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还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在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正儿八经地展开之前，或许还能压倒法国人。于是他利用2月19日炮击之后的间歇，继续推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计划，但是收效甚微。英国军方高层对他的论点充耳不闻，于是他最终去找戴维·霍格思，因为他知道霍格思在英国政坛人脉很广。

劳伦斯和他的恩师霍格思一直保持着一种轻松愉快、学院式的关系，但他3月18日给霍格思的信却是截然不同的口吻：苦苦恳求，甚至是强硬地要求。他先是概括了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关键意义——“您知道的，它是整个地方的关键所在”——并警告了让该城落入其他任何一

个国家手中的危险后果，然后几乎是向霍格思发号施令，让他去排除这个计划面对的各种障碍：“您能不能找什么人告诉温斯顿（丘吉尔），那里的海岸上有石油泉眼（很多工程师对此持赞成意见，但是土耳其人一直拒绝将其作为特许区承包给外国公司），北面10英里处的德尔特约尔附近有储量巨大的铁矿，还有煤矿……如果可能的话，您再去找外交部。向他们指出，在《巴格达公约》里，法国把亚历山大勒塔让给了德国人，还同意，它不属于叙利亚。您要发誓赌咒说亚历山大勒塔不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您知道那里是说土耳其语的……用一万兵力占领亚历山大勒塔，我们的地位就固若金汤了。”[18]

不管霍格思有没有能耐去执行劳伦斯的这些指示，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在劳伦斯发出这封信的那一天，即3月18日，协约国舰队返回了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继续炮击。这一次，战局的发展出乎意料。

在最初的三个小时内，协约国舰队就像2月时那样轻松地对岸防工事狂轰滥炸。但当第一线的舰船受命后撤，以便为第二线舰船腾出位置时，麻烦开始了。2月时，土耳其人注意到了协约国舰队的一个怪癖，即掉转航行时几乎总是转向右舷。他们估计这个习惯会持续下去，于是前不久在协约国舰队右转必经之路的一个小海湾内布设了水雷。果不其然，下午2时，协约国舰队的第一线舰船径直闯进了雷场。三艘战舰迅速沉没，还有三艘遭到重创。[19]

虽然“任务蠕变”[20]的说法，及其带有的各种负面含义，在1915年还未诞生，但用来描述这个例子非常贴切。英军高层在分析3月18日的雷场惨败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即仅用海军是不可能扫清达达尼尔海峡的。他们却不曾认识到，整个行动都应当放弃，而另谋他策。恰恰相反，协约国决定加大赌注，不仅从海上攻击海峡，还要发动地面攻势。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才意识到，这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命运攸关的决定之一，最终导致中东战事速战速决的希望彻底破灭，因此

也间接地拖长了欧洲战事。与此同时，原本已经在考虑放弃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政权得到了一个喘息之机，而协约国再次暂停战事，去拼凑地面部队。

1915年隆冬，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终于做出了安排威廉·耶鲁去向的决定。他受命离开开罗——这个现代版的所多玛和蛾摩拉让生性保守的扬基人非常憎恶——返回君士坦丁堡。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或许比其他任何一家国际企业都更精明狡黠，它已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正在展开的悲剧做了研究，决定插手其中，借以渔利。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内，公司就已经想出一个计划，要把自己的油船登记为中立国船籍，然后向欧战的两大阵营同时供应石油。这个计划已经被揭穿，但耶鲁发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又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新办法，通过中立国保加利亚向土耳其秘密输送石油。但这和标准公司下一个计划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正是为了这个新计划，公司才派耶鲁返回土耳其。

百老汇大街26号的老板们认识到，只要全欧洲范围的大战一直打下去——同样关键的是，美国必须置身事外——他们就差不多是奥斯曼帝国的庞大疆域内的石油市场的唯一玩家。他们的英国、法国和俄国竞争对手们在战争结束前都出局了，他们现在有了一个黄金机遇来独吞近东的石油特许区，而且他们是唯一一家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大型石油公司，所以他们能够以贱价大肆收购。他们的计划的基础是，土耳其急需石油，如果要有希望在军事上与西方列强竞争的话，就非要有这种关键商品不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通过保加利亚输给土耳其的石油与它的需求相比还是杯水车薪。为了解决供不应求的问题，标准公司还有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巴勒斯坦。

从19世纪初开始就有很多地质学研究表明，巴勒斯坦中部可能是世界上尚未开采的最大油田之一的所在地。[21] 威廉·耶鲁在1913～1914年

参加的勘探组只勘探了该地区的极小部分，大约4.5万英亩，受到各特许区边界的限制。标准公司希望大规模扩张自己在巴勒斯坦的领地，现在找到了促成此事的办法。

在耶鲁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君士坦丁堡的官员已经通知奥斯曼政府，在慎重斟酌之后，他们遗憾地得出了结论，他们在克恩纳布的七个特许区面积太小，没有开采价值。[22] 当然，这个结论颇有些蹊跷，因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刚刚做了极大努力来开发这些特许区，但对急缺石油的奥斯曼政权来说，更紧迫的问题当然是，标准公司还需要多少英亩？回答是：再来50万英亩，具体来讲，差不多是从死海到地中海的整个朱迪亚中部地区，覆盖了今天的以色列国版图的约1/10。[23]

但是这一切有个关键的细节，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一直隐瞒着土耳其人。公司不打算在战争结束前钻井采油，更不要说进行精炼了。[24] 它的唯一目的是利用战争造就的这个“黄金时刻”来牢牢控制住这50万英亩土地，留待将来开发；如果向恰当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施加了恰当的压力，不管哪一方最终在战争中获胜都不要紧，标准公司都能大捞一笔。

威廉·耶鲁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旗下对巴勒斯坦最熟悉的雇员，他将是占据这片土地的先头尖兵。但当务之急是修改土耳其的采矿法律。现行的法律过于陈旧和复杂，对标准公司企图实施的大规模吞并土地行动是不小的障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的办事处开始为土耳其议会编纂一套全面的新采矿法的建议——他们已经收买了土耳其参议院的秘书，所以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25] 。耶鲁也是编纂委员会的一员。于是乎，年仅27岁的耶鲁，不到18个月之前还在俄克拉荷马州油田干杂活的耶鲁，居然扮演了重写一个大帝国的商业法律的关键角色。

耶路撒冷的德国招待所是一座雄伟的建筑，由黄色石料和板岩建

成，坐落在橄榄山的山脊上。今天，它周围的青松翠柏已经让它的威严线条柔和了不少，但在20世纪初它刚落成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建造了这座招待所，并规定了其规格），它的光秃秃的地面和山脊之上居高临下的位置让人不禁想起一座巴伐利亚城堡。

招待所是为了接待德国朝圣者和访问圣地的神职人员而建造的，它有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中世纪修道院的风尚，各层之间由粗犷的石制阶梯连接，敞开式的内部走廊俯瞰着有回廊环绕的花园。底层有一座石制大教堂，融合了彩色玻璃窗和摩尔式的拱门，令人想起科尔多瓦的大教堂。这座招待所非常恢宏庄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杰马勒帕夏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1915年2月，苏伊士运河战役失败之后，他和他的德国联络官库尔特·普吕弗就返回了这里。

在耶路撒冷，总督很快就以在行政工作中暴躁易怒而闻名。1915年初，他到招待所办公的第一天，他的新任私人秘书——一个叫作法里赫·勒夫克的21岁的预备役军官——就体验到了他的火气。勒夫克被带进杰马勒的内室，看到三名军官向总督呈上高高一摞文件，总督匆匆地签字，军官们又把文件收走。自始至终，杰马勒看都没看那20多个站在房间一角战战兢兢、面色惨白的人一眼。杰马勒终于把文件都签完了，转向那群人——他们是巴勒斯坦的纳布卢斯镇的长老——问他们是否知罪。纳布卢斯的长老们显然没意识到这是个反问句，开始辩称自己是无辜的，恳求开恩。

“住嘴！”杰马勒大发雷霆，“你们知道自己该当何罪吗？死罪！死罪！”他给了对方一点时间来吸收这个信息，然后用平静一些的口吻说道：“但奥斯曼国家格外开恩，你们应当感谢真主！目前我就只把你们和家人放逐到安纳托利亚。”[26]

那些人感恩戴德、点头哈腰一番之后被推推搡搡地带了出去，杰马勒转向勒夫克，耸耸肩说道：“我能怎么办？这儿就得这么办才成。”

这个小插曲是杰马勒帕夏管理风格的典型例证，“反复无常”这个词仿佛就是为了他而造出来的。他永远在狂怒的严酷和温和的宽宏大量之间摇摆不定（往往是在同一番谈话中），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始终无法揣测他下一步可能做出怎样的反应。贝鲁特的叙利亚新教学院的院长霍华德·布里斯回忆说，有一次有个英国人去求杰马勒办事。总督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对方的所有要求，这时碰巧一名副官递过来一个封口的信封。杰马勒读了读内容，心满意足地微笑起来。

“我现在可以答应你的全部请求了，”他宣称，“我刚收到了保加利亚国王授予的勋章，在这种时候我总是会批准第一批请求。”[27]

他这种行事风格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事情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请愿的人们知道杰马勒的大多数严酷命令都可能会被收回成命，或者他答应的好处也有可能很快被撤销，所以都选择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去找他，或者持续不断地恳求他，以增加心愿得遂的概率。

但我们要为叙利亚总督辩护一下：让他暴躁的事情的确是太多了。到1915年3月，他遭遇了一连串危机，最乐观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会感到自己饱受欺凌。他经历的第一场危机发生在3月22日，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蝗灾。

西班牙驻耶路撒冷领事，一个叫作安东尼奥·德·拉·谢尔瓦·德·巴约巴尔伯爵的帅气时髦的小伙子，这天早上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发现天空突然戏剧性地黑了起来，就好像发生了日食一样。“我从阳台上往外张望，看到巨大的乌云完全遮蔽了阳光。”乌云渐渐下降，巴约巴尔才看清，那是几百万只蝗虫。“地面、阳台、屋顶、整座城市，然后是乡村，一切都被这些可悲的小虫子遮蔽了。”[28]

不到一个钟头，蝗群向东面的杰里科推进，但在随后几天内，整个巴勒斯坦中部地区各处都传来了蝗灾的报告。据报告称，几个小时之

内，整片果园和天地化为不毛之地，农畜和短时间内无人照管的婴儿的眼睛被蝗虫盯瞎。[29]

圣地在古时也曾有过蝗灾，但近现代不曾发生过这样严重的灾情。而且蝗灾发生的时机也特别糟糕。战争已经造成了极大压力——数万名叙利亚农民应征入伍，农畜和机械也被肆意征用——蝗灾更是雪上加霜，注定要让原本已经困难重重的播种季节更加糟糕，导致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和粮价飙升。巴约巴尔领事注意到，蝗群在耶路撒冷着陆的几个钟头之内，城里市场的小麦价格已经激增。

杰马勒帕夏的确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改革家，他没有按照奥斯曼国家惯常的做法，组建一个委员会或者任命某个谄媚之徒来救灾，而是立即招来了叙利亚最有名的农学家——39岁的犹太移民亚伦·亚伦森。

这两个极其倔强执拗的人在3月27日会了面，按照杰马勒的偏好，双方是用法语交流的。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亚伦森概括了可以抵御蝗灾的现代技术，还利用这个机会直率地批评了军队的横征暴敛——由于这种大规模征用，在蝗灾发生之前该地区就已经濒临毁灭。根据亚伦森后来的记述，总督最终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打断了亚伦森的长篇大论：“如果我现在把你绞死，怎么办？”

亚伦森的反驳非常机智，既指出自己身躯肥胖，也暗示自己在国外人脉很广：“阁下，我身体的重量会让绞刑架轰然坍塌，那巨响在美国也能听得见。”[30]

杰马勒显然很喜欢这个回答。会议结束前，他已经任命亚伦森为一个新的抗蝗灾项目的总监，并赋予他几乎是独裁的权力来执行任务。总督传话出去，如果哪个下级官员胆敢妨碍亚伦森的工作，就必须向总督本人负责。[31]

蝗灾的问题可以交给一位专家来处置，但杰马勒在这年3月的其他麻烦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得到情报，帝国的“阿拉伯问题”或许比君士坦丁堡的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他们在叙利亚可能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土耳其于1914年11月参战不久之后，土耳其反谍报单位的一些军官进入了已经关闭的法国驻贝鲁特领事馆，发现了墙壁上隐藏着一个保险箱，里面藏有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法国领事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反对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阿拉伯领袖眉来眼去。这些阿拉伯人不单单是反对政府，他们向法国领事提出的一些建议——叙利亚独立、法国在黎巴嫩建立保护国——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谋反。

惩罚满腹牢骚的纳布卢斯长老还是小菜一碟；对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领事馆密谋者采取行动就棘手得多了。很多密谋者在阿拉伯世界闻名遐迩，如果将他们处决或者放逐，就可能会激发土耳其希望避免的阿拉伯起义。另外，还可能会让更广大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包括被占领的埃及和法属北非——产生惊恐情绪，而君士坦丁堡此时正在努力煽动这些地区的人民加入到泛伊斯兰圣战中。因此，杰马勒别无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他将在贝鲁特收缴来的文件藏在自己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内，努力通过佯装一切正常和使用奥斯曼帝国的惯用招数——赏赐闲职和荣誉地位——来把这些不满分子拴牢。这种策略最终也许能把密谋者拉到他这边来，或者揭示阴谋圈子的范围，但就在协约国入侵叙利亚的可能性激增的时候还让这些叛徒逍遥法外，非常让人头疼。

但在叙利亚，每个问题都会带来另一层面的新问题。贝鲁特的异见分子几乎全都是所谓的进步人士，即受到欧洲的民族主义和自决自立思想熏陶的阿拉伯城市自由主义者。而在3月底，杰马勒还有另外一个敌人——阿拉伯保守派，这些人被青年土耳其党的现代化改革（在他们看

来是世俗化）激怒了。这个保守派危机很快就凸显出来，一个轻言细语的31岁男子来到了总督门前。他的名字是谢赫费萨尔·伊本·侯赛因。

费萨尔是埃米尔[32]侯赛因的第三子。侯赛因是阿拉伯半岛西部辽阔的汉志地区的贝都因诸部落的领袖，共有四子。更重要的是，费萨尔的父亲是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穆斯林圣地的谢里夫（宗教领袖），也是自10世纪以来一直守卫伊斯兰圣地的哈希姆家族[33]最新的一位当家人。

青年土耳其党和埃米尔侯赛因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后来也没有任何改观。侯赛因极端保守，思维方式几乎是中世纪式的，对君士坦丁堡发出的一连串自由主义的敕令越来越看不顺眼。青年土耳其党解放妇女、推进少数派权益、削弱宗教领袖的民政权力，这些举措都让侯赛因不爽。甚至青年土耳其党打击奴隶制（当时奴隶制在汉志还很常见）的努力也让侯赛因反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埃米尔侯赛因的怨恨的最显著焦点是政府将汉志铁路从麦地那延伸到麦加的计划。侯赛因并不认为铁路的扩建是进步的标志、是帮助穆斯林朝觐者更方便快捷地前往圣城的便利，而把它看作是君士坦丁堡借以强化对该地区，尤其是对他本人的控制的特洛伊木马。于是，君士坦丁堡任命的汉志民政总督和这位埃米尔及其儿子们之间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冲突。[34]

自土耳其参战以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侯赛因是伊斯兰世界最德高望重的宗教人物之一，他对政府在11月发出的圣战号召置若罔闻，所有人都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冷淡态度，这也被认为是圣战不温不火的主要原因之一。团结一致、共同为战争努力的号召也没能让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和麦地那现任总督抛却宿怨、握手言和。这两人的长期仇恨有时已经接近公开的武装对抗。另外，杰马勒要求埃米尔提供志愿兵去参加苏伊士运河攻势，也没有得到有力的回应。奥斯曼政府原本以为侯赛因能派出数千名贝都因战士，但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

拉只带了一小队人马去叙利亚参战。

虽然侯赛因父子如此放肆，但必须要格外小心地对待他们，比处置贝鲁特的不满分子要更讲策略。虽然从军事角度看，汉志没有叙利亚那样的重要性——汉志位于帝国的边陲，只有少数小城市，城市被广阔的沙漠环绕——但哈希姆家族的埃米尔能够为君士坦丁堡的事业赋予或者拒绝赋予宗教祝福，所以他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于是，双方僵持了下来。显然，青年土耳其党希望要么让侯赛因乖乖听话，要么除掉他，但是以过于粗暴的方式对他动手就等于是向保守派挑衅，后果不堪设想。侯赛因也必须知道，青年土耳其党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太过分，必然会招致大兵压境。

僵局在最近被打破了，产生了危险的后果。1月，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声称发现了麦地那总督推翻侯赛因、以更俯首帖耳的宗教人物取而代之的阴谋。费萨尔前往叙利亚就是为了上门兴师问罪。埃米尔侯赛因派他走出阿拉伯沙漠，去直面君士坦丁堡政权，既是为了表达对这个阴谋的愤慨，也是为了要求将这名行省总督撤职。

但费萨尔的到来对杰马勒帕夏来说几乎可以算是个好消息，因为在惹是生非的侯赛因家族里最有可能通情达理的就是费萨尔了。和兄长一样，费萨尔也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内廷里长大和接受教育的，但这种文明的影响似乎对侯赛因的谦逊稳健的第三子影响最大。费萨尔的性格中有种谨小慎微，甚至是怯懦，或许施以好言好语和魅力，便可以对其加以利用。被拖进杰马勒办公室的倒霉的纳布卢斯长老们或许不会同意，但杰马勒的确很有说服人的魅力。总督打算在费萨尔及其随从进城时用迎接显贵的全套豪华礼节来迎接他。

耶路撒冷市中心的德国军事指挥部离德国招待所只有不到一英里远。在那里，库尔特·普吕弗也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到来颇感兴趣。但是，对于如何将侯赛因家族拉到土耳其—德国阵营来，他主张动用严

厉的手段。早在1914年10月，杰马勒帕夏还没有抵达叙利亚的时候，普吕弗已经派遣了他自己的间谍去汉志摸清埃米尔侯赛因究竟效忠于哪一方。他在11月初向马克斯·冯·奥本海默发送了自己的结论：麦加的埃米尔实质上已经被英属埃及收买，因此“彻头彻尾地忠于英国人”[35]。

侯赛因除了在政治和宗教上明显与青年土耳其党存在分歧外，他的问题还涉及地理方面。汉志是奥斯曼帝国最孤立和贫困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几乎完全依赖于每年的“哈只”，即穆斯林信众前往麦加朝觐。朝觐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印度或者埃及。干旱的汉志的粮食主要依赖进口，这些粮食大多来自红海对岸的埃及或英属苏丹，是政府补贴的宗教捐献。英国海军是红海无可争议的主宰，要切断朝觐路线和汉志的粮食供应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那样的话，汉志就会彻底灭亡。侯赛因把悬在自己头上的利剑的情况告知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奥斯曼政权提出的要求面前必须小心行事。

但在库尔特·普吕弗看来，这不过是令人愤慨的虚张声势。他认为，简单地说，英国绝对不会让伊斯兰圣地挨饿，更不会入侵圣地，因为那样必然招致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如果那样，德国就走运了。与此同时，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侯赛因不敢公然投靠英国人，因为那样的话，穆斯林世界的怒火就要针对他了。麦加的诡计多端的老埃米尔在玩弄双方，告诉英国人自己与君士坦丁堡不和，稳住英国人，并保住自己的粮食供应和朝觐路线；同时又告诉君士坦丁堡，受到了英国人的威胁，借此钓住君士坦丁堡。[36]

但问题在于，土耳其人不愿意公开挑战侯赛因。普吕弗和其他德国情报人员抵达该地区后，土耳其人就明令禁止他们以任何方式干预汉志事务。杰马勒甚至打算在费萨尔来访期间尽可能阻止德国顾问们与年轻的谢赫接触。叙利亚总督无疑要用青年土耳其党在过去六年中对付侯赛因家族所用的手段——百般殷勤、阿谀谄媚，再加上笑里藏刀的威胁，

尽管这些手段收效甚微。

最让普吕弗抓狂的是，侯赛因是让泛伊斯兰圣战开花结果的关键之一。没有这位哈希姆领袖的祝福，圣战的宗教命令就只是青年土耳其党政权在自说自话；有了他的祝福，烈火就可能在整个中东，乃至更远方熊熊燃起。

普吕弗在11月写给奥本海默的报告中做了结论，埃米尔侯赛因“好在全无力量，在我们掌心之内”。现在的挑战是，让其他所有人——杰马勒、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以及侯赛因自己——相信事实的确如此。

劳伦斯在开罗情报单位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中，几乎没有去追踪阿拉伯半岛的局势，或者甚至根本就对此一无所知。考虑到他几乎是如痴似狂地将全部精力聚焦在叙利亚，这也可以理解。他结识英国驻埃及的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斯托尔斯蓄着铅笔一般的小胡子，喜欢穿白色亚麻布西装，在大部分英国人都穿军服的战时开罗显得风流倜傥。他是个剑桥大学毕业的审美家，对歌剧、文艺复兴艺术和古典文学有着百科全书般的渊博知识。他年轻时就来到埃及，在英国当局中担任过多个职务，1909年被任命为东方文化秘书，当时他只有28岁。

他天生就很适合这个职位。除了在官方接待会和节庆活动（在开罗的英国人非常热衷于这些活动）中如鱼得水、玉树临风之外，斯托尔斯还是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得力干将，在幕后监视着埃及数不胜数的政治阴谋。1911年，基钦纳勋爵就任总领事，斯托尔斯也飞黄腾达起来。基钦纳很快就将斯托尔斯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副手——这位东方文化秘书在阻止库尔特·普吕弗被任命为赫迪夫图书馆馆长的行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14年8月就任陆军大臣之后仍然对斯托尔斯信赖有加。基钦

纳打算在战后仍然返回在埃及的岗位，因此将斯托尔斯留在开罗，充当他的耳目。

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在基钦纳麾下，罗纳德·斯托尔斯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密谋的关键渠道。这个密谋只有开罗、伦敦和麦加的极少数人知道。他掌握了或许是中东最危险的秘密。斯托尔斯视T.E.劳伦斯为挚友，把这个秘密吐露给他，帮助这个年轻的情报军官踏上了那条将为他赢得名望和荣耀的道路。

至少在最初，两人的友谊建立在非常普通的事情之上：他们都酷爱古典文学。颇有些迂腐的斯托尔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到劳伦斯时说："我们在文学上仅有的分歧是，他在荷马和但丁中更喜欢前者，而对我偏好忒奥克里托斯[37]而非阿里斯托芬不能苟同。"[38]

在1915年冬天的某个时候，他们的讨论转向了当前局势，具体说来，就是斯托尔斯正在为基钦纳勋爵执行的秘密任务。

故事是在一年前的1914年2月发端的。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的次子——32岁的阿卜杜拉·伊本·侯赛因来到了开罗。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埃米尔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幻想破灭了，但阿卜杜拉把事情推到了一个新境界；他得到一个机会短暂地拜会了基钦纳，试图摸一摸底细，如果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话，英国将会作何反应。

基钦纳费了不少周折来回避这个问题。毕竟当时英国和土耳其还没有开战，英国是万万不可鼓励后者的臣民造反的。两个月后，阿卜杜拉再次到访开罗，希望再见一次基钦纳，基钦纳就让他的东方文化秘书来接待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在与基钦纳谈话时还努力说得迂回一些，在会见斯托尔斯时就直截了当了。"他直言不讳地问我，英国是否愿意赠送大谢里夫

（侯赛因）12挺，或者是6挺机枪，”斯托尔斯回忆道，“我问他，要这些机枪做什么用，他（就像所有重整军备的人一样）回答，自卫用。我又追问他，他才补充说，自卫指的是抵御土耳其人的攻击。我不需要上级的特别指示也能够告诉他，我们绝不会向友邦的敌人提供武器。”[39]

但与阿卜杜拉的第二次会议是在1914年4月，到9月时，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已经是陆军大臣的基钦纳静观土耳其的动向，于是想起了先前与侯赛因之子的谈话，感到阿拉伯半岛或许有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等待他。他没有通过英国军方高官或埃及的民政当局行事，而是向自己在开罗的老办公室发去了一份加密电报：“让斯托尔斯精心挑选一名可靠的秘密信使，去询问谢里夫阿卜杜拉，假如德国迫使土耳其参战反对英国，他和他的父亲以及汉志的阿拉伯民众是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40]

就在土耳其宣战的时候，侯赛因的答复来了，诱惑力极大。侯赛因表明，他会努力保持中立，但同时又暗示，如果英国提供足够的外部支援，并且保证不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他也许会率领他的“追随者们”发动起义。[41]

这个前景让基钦纳大为振奋，于是很快发出了第二条信息，大幅度地追加了赌注。基钦纳写道，如果阿拉伯人加入到英国的阵营，而不是仅仅保持中立的话，“英国会保障谢里夫政权的独立和各项权益与特权不受任何外国侵略，尤其是不受奥斯曼人侵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捍卫以土耳其人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并与之友善相处；从今往后，我们将与高贵的阿拉伯人为友”。[42]

但侯赛因似乎有些含糊其辞。这位埃米尔在12月写给斯托尔斯的下一封信中重申自己计划“避免任何对英国不利的行为”，但表示，与土耳其的公开决裂必须等到未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机。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了。在侯赛因发出这条信息之后的几个月内，麦加方面毫无音讯。

对劳伦斯来说，与侯赛因的秘密通信的细节有如神的启示。自到开罗以来，他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研究在叙利亚发动阿拉伯起义的可能性，这样的起义几乎肯定要依赖所谓的进步人士：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腐败不满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渴望得到平等权利的少数派、对军方的土耳其沙文主义满腹怨言的阿拉伯官兵。他对阿拉伯保守派几乎一无所知。

但从政治的角度，劳伦斯很快就理解了汉志的巨大潜力。英国与侯赛因结盟，就不会有人说英国煽动起义是为了吞并中东；埃米尔侯赛因是圣城的守护者，绝大多数穆斯林都不会认为他会与侵吞土地的异教徒联手。恰恰相反，从汉志发起、由侯赛因领导的起义将会得到宗教界的认可，轻松地破解土耳其人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鼓吹的“伊斯兰对抗十字军”的宣传。

但是侯赛因已经很久没有任何音讯了，要判断局势究竟如何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他似乎的确兑现了恪守中立的诺言，因为他没有响应奥斯曼政府的圣战号召。但另一方面，他最近派了他的第三子费萨尔去叙利亚面见杰马勒帕夏，然后还要去君士坦丁堡会见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费萨尔被普遍认为是侯赛因的儿子们当中最温和与理智的一个，因此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侯赛因正在努力与君士坦丁堡修好，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美好前景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从英国人的手心溜走了。

但对劳伦斯来说，很快就有比揣测汉志政治更紧迫的事情了。到1915年4月初，英属埃及的全部注意力都转向了即将展开的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陆攻势。

在4月的最初几周，一支庞大的舰队集结在埃及北部海岸沿线，而在海滨的帐篷城市里，数万名士兵正忙着拖运补给物资和训练作战技能。他们是新近组建的地中海远征军的成员，很快就要启程，直捣土耳其敌人的要害。虽然等待的时光百无聊赖，但官兵摩拳擦掌、斗志昂扬。

T.E.劳伦斯却有一种不祥预感。自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开始以来，他就感到惴惴不安，现在他和开罗情报单位的其他成员被派到部队集结地向指挥官们报告对岸的情况时，就更加心惊肉跳。劳伦斯在4月20日给戴维·霍格思的信中写道："地中海远征军的准备极不充分，既不知道目的地何在，也不知道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更不知道要做些什么。"[43] 最让劳伦斯瞠目结舌的是，地中海远征军司令部来到埃及时，手中居然只有两份陈旧过时的1/4英寸：1英里的达达尼尔海峡地图。[44]

但英国战争筹划者们的愚蠢行为才刚刚开始。他们决定，地中海远征军的主要登陆场将是加里波利半岛，即达达尼尔海峡西岸的山岭崎岖的狭窄地带。加里波利半岛的宽度很少超过六七英里，向北延伸大约50英里才最终变宽，与欧洲大陆相连。在选择具体登陆地点时，加里波利半岛全线有多个地点可供选择，地面部队在登上山脊之后就可以下坡到达半岛的东海岸，这个距离在有些地方不到3英里，这样就能将奥斯曼军队一分为二，将山脚下的敌人困住。当然，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完全避开半岛，在半岛北端的萨罗斯湾登陆。在这个开阔的海湾登陆之后，不仅能够让所有驻扎在加里波利的土耳其军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还可以一马平川地直捣仅仅100英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最近被土耳其政府任命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司令官的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斯最大的担忧也就在此。为了防止英军在萨罗斯湾登陆，他把自己的司令部和全军的三分之一都部署在那里。

桑德斯完全没有想到，英军会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最南端登陆，因为这违背了军事逻辑的最基本原则，甚至有悖常识。在那里登陆的部队不仅暴露在居高临下的守军火力之下，而且还会遭到附近堡垒中剩余的土耳其远程火炮的狂轰滥炸。即便英军能够爬上高峰、占领堡垒，土耳其守军还可以缓慢地向北且战且退，不断挖掘新的战壕，照搬在西线战场让各国军队瘫痪的静止堑壕战。在奥斯曼帝国3000英里的地中海海岸线上，实在很难找到一个更糟糕的登陆地点。但地中海远征军选择的偏偏

就是这里。

除了傲慢轻敌之外（这对军队来说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条条框框），造成这个荒谬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的顽固不化。因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最初被设计为一场海战，在任务扩大之后，军方仍然以原先目标——扫清海峡——的狭隘视角来审视它的成功与否。筹划者们非常盲目，无视其他可能最终达成同样目标的方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加里波利战役的英军战略家们倒不是说拒绝了其他的登陆场，而是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其他选择。[45]

4月底，地中海远征军的士兵们在埃及海岸开始登上运兵船，跨越地中海东部，开赴加里波利。劳伦斯回顾了自己前几个月的徒劳努力，不仅是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还有他和开罗情报单位设计的其他计划全都被搁置，不禁在给霍格思的信中发泄出了怒火：

“阿拉伯的事情已经彻底完蛋。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鄙的乱局。我们在那里原本有个绝佳机会。这让人气得发狂。”信的结尾颇有些凄凉：“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请继续推动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在我看来，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46]

劳伦斯写信的这一天，即4月26日，他还不知道乱局将会一败涂地。就在前一天，地中海远征军在加里波利登陆了。

4月25日早上约6时15分[47]，“克莱德河”号（一艘来自利物浦的改装过的运煤船）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赫勒斯角的一处略有弧度的小海滩（代号为五号海滩）靠岸。甲板下的船舱里挤着约2000名英国士兵。在平静海面上与“克莱德河”号一起靠岸的还有五六艘小艇，每艘都拖曳着好几艘敞开式独桅帆船，满载士兵，一直挤到船舷上缘。离海岸约100码时，帆船的船长们切断拖曳缆绳，向船员们分发船桨，让他们划船上陆。海岸上万籁俱寂。正如英军希望的那样，在赫勒斯角的登陆让土耳

其人措手不及。

好在土耳其人没有预料到英军会在这个地点登陆，因为在五号海滩登陆的英军部队的准备工作极为草率——让士兵乘坐无武装、无动力的木船登上敌人的海滩还不算最糟糕的主意——如果遇到抵抗，麻烦就会很大。在亚历山大港的船坞，工人们为“克莱德河”号涂装了迷彩，但是时间不够；所以，那天早上这艘运煤船接近五号海滩的时候，船身上柔和的战列舰灰色被大块的黄褐色底漆衬托出来，如果处在光照之下会非常显眼。而且还有一个小问题，“克莱德河”号根本无法接近海滩。英军的计划是让它在近海搁浅，然后调用几艘渔船到这个缺口，连接起来，作为从“克莱德河”号到岸边的临时浮桥。登陆士兵需要从“克莱德河”号船首切割出的四个小门走出，通过两块跳板，登上渔船，走过渔船，然后才能最终抵达海滩。很难想象，英军在攻打石器时代太平洋岛屿的登陆行动中会如此草率，更不用说对手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了，但英国军方高层对土耳其人就是如此轻蔑。

帆船接近海滩时，平静的海湾上唯一能听得见的声音是船只引擎的噪声和划桨声，还有士兵们的谈话和笑声，他们因为登陆很顺利而舒了一口气，说话声或许太大了一点。前锋船只离海岸只有几码的时候，隐藏在海岸沿线战略性制高点的土耳其机枪突然开火。

敞开式独桅帆船里的人们没有任何逃生机会。这些船只接二连三地被打成碎片，或者倾覆，身上背满沉重装备的士兵们在激浪中溺亡，或者被缠在水面之下的带刺铁丝网上，被子弹击毙。极少数活着登上海滩的人也大多很快被机枪的扫射打倒在地。

从“克莱德河”号出来的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从有防护的钢制船体中走出，尝试将临时浮桥连接起来，但几乎当即就被机枪打倒，或者淹死在浪涛中。浮桥最终还是勉强搭好了，但走上跳板的士兵成了机枪的绝佳靶子；从船里走出的第一个连队的200人

中只有11人抵达海滩。跳板上的最早一批死者其实是窒息而死，被他们身后越来越多的死伤者压在底下，悲惨地丧命。成功上陆的人也只能躲在一座六英尺高的沙石陡坡朝向陆地的一角，这还不足以防御机枪子弹。到下午晚些时候，水里已经死尸枕藉，现场的一位英国船长描述说：“岸边的海水已经成了血红色，几百码外都能看得见。”[48]

到战役第一天夜幕降临时，加里波利的先头登陆部队已经死伤近4000人，比劳伦斯估算的用来控制亚历山大勒塔的总兵力还多得多。冯·桑德斯将军对敌人的愚蠢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在第二天仍然坚信半岛南端的登陆只是个幌子，真正的主力部队将从其他地方登陆。当地的一名奥斯曼师长——穆斯塔法·凯末尔中校自行决定不断派兵去攻击蜷缩在小小滩头阵地的敌人，希望将敌人赶下海去。

英军在赫勒斯角登陆的第一日的目标是占领内陆四英里处的一座小村庄，然后进攻它北面不远处的土耳其堡垒。在随后的7个月中，英军始终未能抵达那个村庄，但仍然不断尝试，付出了伤亡近25万人的惨重代价。至于那位奥斯曼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很快将名扬全世界。1922年，他拯救了重建的土耳其共和国，赢得了那个更为世人熟知的美名——凯末尔·阿塔图尔克[49]。

加里波利战役中，双方死伤总数达到约50万人，但这场战役的牺牲品还不止这些死在战壕两侧的军人。英军登陆的那天，也就是4月25日，君士坦丁堡政权命令逮捕了约200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商界领袖，指控他们是潜在的叛变通敌分子。一场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少数派的血雨腥风的“大清洗”就此拉开序幕，最终导致100万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50]在随后的三年中死亡，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种族灭绝。

要过一段时间之后，劳伦斯和中东战场的其他英国军官才认识到，加里波利战役还有另一个牺牲品：一场星火燎原的大规模阿拉伯起义，

原本可以从汉志一直席卷到叙利亚北部、传播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起义的机会断送了。直到一年多之后，劳伦斯面对面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轻言细语的第三子费萨尔交谈，得知费萨尔在1915年春季北上之旅还有一个秘密使命的时候，他才了解到这个付诸东流的机遇的具体细节。

1915年1月，几乎在得知麦地那总督企图推翻他的阴谋的同时，埃米尔侯赛因在麦加接待了一个名叫法齐·贝克尔的叙利亚人。贝克尔是埃米尔的一个效劳时间很久、深受信赖的随从，他此次拜访时告诉侯赛因，自己同时还是青年阿拉伯党的高级成员。青年阿拉伯党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秘密社团，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大马士革，在整个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组织。青年阿拉伯党的领导层得知侯赛因在秘密地与英国人通信，于是派遣贝克尔到麦加，向他提出一个建议：青年阿拉伯党在叙利亚、埃米尔的部队在汉志联合发动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起义，由英国提供支持，侯赛因担任精神领袖。[51]

谨小慎微的侯赛因没有给出确定的答复，而是派遣费萨尔北上，执行双重任务：摸清侯赛因家族在君士坦丁堡当前的地位如何，同时也判断一下与青年阿拉伯党结盟的真正前景如何。

费萨尔于3月底来到大马士革，礼貌地谢绝了杰马勒帕夏让他住在总督府的邀请，解释说自己已经接受了一个大马士革望族——贝克尔家族的邀请。他在贝克尔家的高墙之内与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们进行了长时间会谈。他原本只打算在大马士革短暂停留，就是因为这些微妙的会谈，才待了三周之久。

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年轻的谢赫游刃有余地与另一个阵营过招。在与青年土耳其党三巨头的另外两人——恩维尔和塔拉特，以及刚刚抵达的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会谈时，费萨尔再三表示，他的家族对奥斯曼事业忠贞不贰，甚至与恩维尔签订了一份似乎终于解决了君士坦丁堡与他父亲之间很多问题的协议。5月中旬，感恩戴德的奥斯曼政府为他安

排了一场盛大的送别仪式，他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了返回叙利亚的火车。

但他驶入的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加里波利登陆几周之后，已经有数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逐出家园，流放远方。费萨尔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饥肠辘辘的妇女儿童——非常可疑的是，很少看到男人——在刺刀的威逼下，蹒跚地走向老天才知道的什么地方。在提议的阿拉伯起义的问题上，更严峻的消息在大马士革等待着他。费萨尔从他的青年阿拉伯党盟友那里得知，该地区的很多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部队——密谋者打算在起义中依靠这些部队——已经被调往加里波利的屠场，换成了忠于政府的土耳其部队。

尽管局势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或者说恰恰是由于这种变化，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们给了费萨尔一份文件，敦促他将文件带给他的父亲，然后再送到埃及的英国人手中。这份文件就是后来所谓的《大马士革草约》，包括了一系列条件，如果能得到满足，并且得到英国人支持的话，青年阿拉伯党或许仍然能够发动起义。费萨尔启程返回麦加的时候，《草约》的唯一一份文本就藏在他最信赖的保镖的靴子内。

3月份，在准备迎接费萨尔访问叙利亚的时候，杰马勒帕夏认为，要想驾驭桀骜不驯的侯赛因，埃米尔的第三子就是最后的希望。事实上，叙利亚总督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尽管判断的出发点是错误的。6月，侯赛因家族在他们的夏宫召开了秘密会议，阿卜杜拉和阿里劝说父亲立即发动针对君士坦丁堡的起义，而最近目睹了加里波利战役恶果——亚美尼亚人成群地倒毙在安纳托利亚的公路边、叙利亚北部的阿拉伯部队被分散——的费萨尔主张谨慎行事。

T.E.劳伦斯要到将来才会知晓这一切。在加里波利登陆之后的日子里，他在开罗的萨沃伊饭店读着前线发来的一连串噩耗的战报。这时他还对《大马士革草约》和英国在叙利亚和汉志的潜在盟友一无所知，不

过这倒也不是坏事。青年阿拉伯党密谋者和侯赛因告诉开罗方面，让他们起义的必需前提条件是，英军必须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一切都取决于这个条件。

---

[1]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303.

[2]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Note，” January 3，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80，f. 137.

[3] 关于“多丽丝”号亚历山大勒塔事件的细节，见1914年12月22日至1915年1月14日间，美国驻阿勒颇领事J. B. Jackson给美国国务卿兰辛的一系列报告。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81，Box 12，Decimal 820。

[4] Untitled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report advocating landing at Alexandretta，January 5，1915；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 Papers，File 694/3/7，p.3.

[5] Lawrence to Hogarth，January 15，1915，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191.

[6]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154.

[7]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p.154-55.

[8] Prüfer，*Diary*， January 26，1915；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9] Prüfer，*Diary*， January 30，1915.

[10] Erickson，*Ordered to Die*， p.71.

[11] Prüfer to von Wangenheim and Oppenheim，February 9，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3，Frame 862.

[12] Prüfer to Oppenheim，February 9，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3，Frame 868.

[13] 英国政府内部关于亚历山大勒塔—达达尼尔海峡的辩论的详细情况，见Gottlieb，*Studies in Secret Diplomacy*， pp.77-87。

[14] M.O.2 report，“Expedition to Alexandretta，” January 11，1915，p.2；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06/1570.

[15] p.p.Graves，“Report on Turkish Military Preparations and Political Intrigues Having an Attack on Egypt as Their Object，” November 10，1914；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1970，f. 187.

[16] Lawrence to parents，February 20，1915，in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303.

[17] Gottlieb，*Studies in Secret Diplomacy*，p.109.

[18] Lawrence to Hogarth，March 18，1915，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p.193-94.

[19] Hickey，*Gallipoli*，p.72.

[20] 任务蠕变是指任务原先的目标有限，但在执行过程中，或许是受到起初的成功的鼓励，任务规模和目标扩大，往往以惨败收场。这个词于1993年美国干预索马里内战时首次使用，后来延伸到商业领域。

[21] Manuel，*Realities of American-Palestine Relations*，p.267. Also，“Mines and Quarries of Palestine in 1921 by the Geological Adviser，”；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Roll 87，document 867N.63/1.

[22] Cole，director of Socony，to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Polk，September 18，1919；William Yal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威廉·耶鲁收藏品，新罕布什尔大学）Box 2.

[23] Cole，director of Socony，to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Polk，May 5，1919；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Central Decimal File，1920-1929，document 467.11st 25/31.

[24]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4，p.3，and pp.24-25.

[25]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3，p.12，and chapter 4，p.3.

[26] Lewis，“An Ottoman Officer in Palestine，1914-1918，” in Kushner，*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p.404.

[27] Bliss，“Djemal Pasha：A Portrai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vol. 86（New York：Leonard Scott，July-December 1919），p.1156.

[28] Ballobar，*Jerusalem in World War I*，p.55.

[29] 亚伦森说，他曾亲眼看见“阿拉伯婴儿被母亲放在树荫下，脸都被成群来袭的蝗虫吃掉

了，哭喊声才被听见”。这个说法或许是夸张了。见Alex Aaronsohn，*With the Turks in Palestine*，p.51.

[30] As quoted by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p.129；Engle，*The Nili Spies*，p.45.

[31] Engle，*The Nili Spies*，p.60.

[32] 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其最初本意有军事统帅的意思，最早用于哈里发派驻在外的军事统帅及各地总督，亦有作为最高级贵族称号。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内乱，各地总督与哈里发之关系越发疏离，最后不少地方的埃米尔与哈里发之间的从属关系仅仅是象征性的，埃米尔遂在此权力交替中取得一地之军政大权，并成为当地的君主。

[33] 哈希姆家族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繁衍而成的家族名称，近代曾统治过汉志王国、伊拉克，至今仍统治着约旦。其始祖是定居于麦加的古莱什部落哈希姆（约464年—？）。哈希姆的原名是阿穆尔，“哈希姆”的意思是“掰开面饼的人”，这个称号的来源是某一年麦加旱灾时哈希姆拿出自己的食物赈济灾民。哈希姆的曾孙即为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将其女儿法蒂玛许配给侄子阿里，法蒂玛生有两子，哈桑和侯赛因，侯赛因的后人发展成为现代的哈希姆家族。哈希姆家族世代居住于麦加，获得了谢里夫的称号，身为“圣裔”的他们多年都在伊斯兰世界备受尊重。

[34] 关于侯赛因与青年土耳其党关系史的细节，见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pp.125-58；Baker，*King Husain and the Kingdom of Hejaz*，pp.12-45；Kayali，*Arabs and Young Turks*，pp.144-73.

[35] Prüfer to Oppenheim，November 3，1914；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3，Frame 213.

[36] Prüfer to Metternich，January 22，1916；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0，Roll 457，Türkei 65，Band 38.

[37] 忒奥克里托斯（约前310～前250），古希腊著名诗人和学者，西方田园诗派的创始人。

[38] Storrs，*Memoirs*，p.202.

[39] Storrs，*Memoirs*，p.135.

[40] Kitchener to Consul-General，Cairo，September 24，1914；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460.

[41]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p.132.

[42] Draft of letter from Kitchener to Sherif Abdalla，November 1914；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460.

[43] Lawrence to Hogarth，April 20，1915，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96.

[44] Lawrence to Hogarth，April 20，1915，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97.

[45] Guinn在*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 ，p.70中指出："这行动现在发展成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其政策的急剧变化——从主要是海军行动变为完全的陆地作战——是在很短时间内在现场决定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46] Lawrence to Hogarth，April 26，1915，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98.

[47] 关于1915年4月25日加里波利登陆作战的最初阶段，已经有许多著作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是Alan Moorehead和Peter Hart的著作，书名都叫作*Gallipoli* 。从军事科学的角度，最权威的作品或许是Robin Prior的*Gallipoli*：*The End of the Myth* 。

[48] Weldon，*Hard Lying* ，pp.68-69.

[49] "阿塔图尔克"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

[50]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以后，亚述人由于没有全民改信伊斯兰教而成为受压迫的对象。在近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末期，居住在其疆域内的亚述人由于信奉基督教，同亚美尼亚人一样，也遭到了屠杀，许多亚述人被迫离开故土，开始流亡。小亚细亚地区（现在的土耳其）的亚述人数量锐减。亚述人由于迫害和战乱，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大离散。目前，全世界约有300多万亚述人。

[51] 关于费萨尔1915年的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之旅，详见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pp.26-31；Tauber，*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pp.57-67。

第6章 保守秘密的人

你知道，人几乎全都是大笑着死去，因为他们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来之前最好把它忘掉。

——1916年，T.E.劳伦斯写给母亲的信 [1]

1915年4月，地中海远征军出征之后，劳伦斯在萨沃伊饭店地图室的工作轻松了一些，他接受了一个新任务：编辑一份情报概要，即来自整个地区各处的报告的概略，将在英国军方高层流通。他以自己特有的冷嘲热讽向一位在英国的朋友描述了这项工作：

> 我们编辑一份绝对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的日报，宗旨是为了教诲28位将军。他们发明新的将军的时候，报纸的发行量就会自动增加。这份报纸是我唯一的乐趣。写稿的人可以假想自己和战俘交谈，捏造土耳其人视角的说法，我作为主编就把这些假信息掺和进去。每周还要给“母亲”（伦敦的陆军部）写封信，在信里可以更大范围地逗弄打趣。[2]

就是这种轻浮无礼的态度——劳伦斯在通信和个人表现上都肆无忌惮地炫耀这种态度——让他的上级非常恼火。但他对军人规章制度的蔑视突出了这样一个深层次的事实：劳伦斯在根本上不是个军人，而且越来越没有军人气质。

在战区的区区四个月时间里，他亲眼看到英国迅速战胜土耳其的最佳希望因为政治和体制的惰性而被束之高阁；军方的“大思想家”们想出的却是加里波利这个昏着。在这位牛津学者看来，在军事文化的世界里，守旧褊狭、追名逐利的野心家们追寻的是骑士爵位和勋章，下级不愿意质疑权威，于是无数人就将因此丧命。

而且，由于他是开罗军事情报单位的成员，他能够得知持续不断的谎言和宣传背后的真相。每天他都看到第一手的战地报告从各个战区飞

进萨沃伊饭店，这些报告讲述的是一个庸碌无能和麻木不仁的故事：士兵们被命令以整齐队形穿过开阔地，向敌人的机枪巢开进；在反复争夺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山头的战斗中有数百人死亡。当然除了劳伦斯之外还有一小群下级军官也能接触到这些信息——将军的副官和各战区类似的军事情报单位的军官——但这些人大多希冀在体制内飞黄腾达，是这台庞大、愚钝的绞肉机里心甘情愿的齿轮，尽管没人敢承认，这是台绞肉机。

德国军事代表团在耶路撒冷的驻地是俄国朝圣者招待所，就在被称为“俄国区”的老城区的北面，枝繁叶茂，风光旖旎。1915年冬末，库尔特·普吕弗就常在那里，钻研着情报电文，筹划着下一步行动。

苏伊士运河攻势失败之后，他对圣战大失所望。现在与前线拉开了一点距离之后，他的沮丧情绪缓和了一些。他认识到，土耳其军队最远只打到运河边，所以圣战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检验。他还很清楚，虽然有了这第一次挫折，但决不能对英属埃及不管不问，因为它只要存在，就始终是德国-土耳其联盟在中东的首要威胁。所以必须要展开一次新的攻势[3]，这一次要有更强大的火力，要动用德国大炮和飞机，还要有更好的军事情报。情报可以告诉他们，运河另一侧的英军在筹划些什么，他们的部队又部署在哪里。

问题是，普吕弗自己的在埃及的庞大情报网也成了苏伊士运河攻势的牺牲品。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他还能够利用埃及的联络人编纂一份关于敌军战备的全面报告；在1914年11月的一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报告中，他提及英军防御工事时用的是将来时，也就是说敌人的工事还处在建设或筹备阶段。但在苏伊士运河战役前夕，他的情报网失灵了。普吕弗在2月末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称，他在运河的“令人悲愤的实践经验”[4]表明，他匆匆招募来填充间谍队伍的大部分贝都因人和埃及人都是废物，“面对出手阔绰大方的英国特工的诱惑，倾向于抛弃荣誉和爱国主

义”。德国人当然也可以效仿英国人，在埃及用金钱收买新的细作，但是普吕弗指出，那样的话，德国就会完全依赖于这些完全为金钱工作的间谍传递来的无法证实的情报，因而无法真正控制这些人。在考虑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时，这位情报机构想到了一个非常狡黠的主意：犹太间谍。

这个主意的来源或许是普吕弗当时的伴侣。她叫明娜·魏茨曼，芳龄二十五六，是个来自白俄罗斯莫托利镇的活力四射、美艳动人的犹太移民。魏茨曼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早年就接受了社会主义，在柏林学医时抓住机会逃脱了令她憎恶的沙皇政权。1913年，她移民到巴勒斯坦，成了叙利亚少数几个女医生之一。1914年初，在耶路撒冷，她结识了刚刚从德国大使馆辞职的库尔特·普吕弗。[5]

尽管他们的关系的细节不为人所知，但零星的证据表明，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一段不一般的情缘。德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一个传言，据说在1月份普吕弗启程参加苏伊士运河攻势的前夜，明娜·魏茨曼是在普吕弗在耶路撒冷的酒店房间内过夜的，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一定能毁掉任何一位良家女性的清誉。有迹象表明，对永远在寻芳猎艳的普吕弗来说，魏茨曼也远远不只是又一个征服猎物。他在战时的日记中几次提到“我亲爱的范妮”（这是魏茨曼的绰号）[6]，显露出了爱意，而在少数几次提到自己的美国妻子弗朗西丝·平卡姆时，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温存，而是干瘪地称她为“弗”。

但如果说，他和明娜·魏茨曼的关系是真爱，库尔特·普吕弗更愿意利用这份真爱去达到更高尚的目标。

土耳其参战时，叙利亚的巴勒斯坦地区有数万名俄国犹太人，他们像明娜·魏茨曼一样仍然保有俄国公民身份。君士坦丁堡很快就给了这些“敌国侨民”两个选择：要么加入奥斯曼国籍，要么被驱逐出境或在国内放逐。于是数千名移民放弃了自己的俄国护照，加入奥斯曼国籍，还

有很多人挤上了雅法港的拥挤船只，寻找新的家园。1915年3月，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逃亡还在继续，中立国美国的战舰也和商船一道运送这些难民，大多数难民最终流落到了英属埃及。普吕弗在发给杰马勒帕夏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建议中写道，在埃及建立成功的间谍网需要“能够进入埃及而不引起怀疑并且机智灵敏和沉着冷静的人。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中能找到一些符合条件的人”。[7]

普吕弗认为，犹太人组成的间谍网会很可靠，因为俄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对反犹的沙皇政权恨之入骨。他估计，按照“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的逻辑，巴勒斯坦或许有很多犹太人非常愿意打击沙皇俄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英属埃及。最妙的是，这些间谍持有俄国护照，因此可以轻松地混上前往埃及的难民船，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在战时能把情报人员送入敌国境内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把他们或者他们的情报弄出来还是个问题。普吕弗的计划在这方面特别聪明。1915年3月，意大利还是中立国（它在这年5月加入了协约国），意大利各港口和埃及之间有着定期的海运交通。普吕弗的间谍们不会与土耳其联络或者返回土耳其，而是前往意大利，将情报交给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然后，他们可以从陆路前往土耳其；或者，如果身份还没有暴露的话，返回埃及，再来一轮情报搜集工作。

普吕弗对这个话题颇为得意，继续做出规定，间谍应当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全是男人，另一个全是女人。两个小组“应当努力窃取或伪造相关的（英国）文件。他们还应当努力结交有可能提供这些信息的人”。为了避免理解错误，普吕弗把这个“结交”解释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女特工应当年轻且有姿色，应努力与有影响力的人发生关系。这些人在亲密的软弱时刻可能会吐露对我们有用的信息。”[8]

他的建议得到了奥本海默和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旺根海姆的大力支持，于是普吕弗在4月初开始招兵买马。没过多久，他就招募到了两

个正要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埃及的犹太移民，伊萨克·科恩和摩西·罗思柴尔德。罗思柴尔德与牧羊人饭店——开罗的英国高层人士最钟爱的住宿地和饮酒作乐场所——的一个德国间谍巢穴建立了联系[9]，而科恩则“游览”了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国岸防设施。

普吕弗这个特务头子显然是对自己的新事业非常投入，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对皇帝的忠诚压倒了对明娜·魏茨曼的感情。1915年5月初，魏茨曼渡海抵达埃及，成为普吕弗间谍网的最新成员。她或许是自愿的，不需要多少劝说；她既是犹太人，也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对沙俄抱着刻骨铭心的仇恨，现在冒险和复仇的机会来了。

魏茨曼在她的新行当里起初干得不错，她在医院的工作和女医生的新奇感帮助她顺利打入开罗英国人社交圈的上层。但她的好运气没能维持多久。她打着陪伴一名身负重伤的法国士兵回国的幌子，来到了意大利，但在罗马与德国大使接头时被人盯上了。她的面具被揭穿，随后被抓回埃及，去面对残酷的命运：至少会被关进英国战俘营，很可能会被处决。但是魏茨曼的楚楚动人和英国人老派的骑士风度给了她一个好得多的结局。据一个那年8月曾与明娜打过交道并且听过她的故事的瑞士女人说，“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人们对她非常喜爱和尊重，所以相信了她坚定不移的自我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沙俄驻开罗领事也为明娜的清白无辜担保，并安排她安全返回俄国。在返回两年前逃走的祖国的途中，在罗马尼亚的一家饭店里，魏茨曼绝望地向这个瑞士女人求助。

“她向我吐露了全部真情，”希拉·施泰因巴赫—舒向一位德国官员解释道，“并心急火燎地恳求我通知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她已经被驱逐，尤其是一定要告诉普吕弗先生。”[10]

明娜·魏茨曼得到了特别宽大的处理，她不仅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最终还重返巴勒斯坦，成为耶路撒冷的哈大沙[11]医院的第一位女医

生。她的好运气的一个原因是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哥哥是哈伊姆·魏茨曼，一位著名的化学家，于1904年移民到英国，在1915年的时候已经在与英国军火工业紧密合作，以提高英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哈伊姆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总统，而明娜的侄子埃泽尔后来成为第七任总统。这种家庭背景也说明了历史书里为什么都删去了明娜的踪迹[12]，甚至魏茨曼家族的记忆中也剔除了她（哈伊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妹妹）；“以色列的第一家庭”居然有一位成员不仅当过德国间谍，而且她的特务头子情人后来还成为一位纳粹高级外交官，这是个尴尬的故事，最好不要公之于众。

但在库尔特·普吕弗得知明娜·魏茨曼的命运之前，他的羽翼初生的埃及间谍网就已经大部分失灵了，因为意大利于5月加入了协约国，于是德国大使馆的情报传递渠道被切断了。但是普吕弗大胆的积极主动精神受到了德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高度好评。驻巴勒斯坦德军的指挥官克莱斯·冯·克莱森施泰因中校在发给柏林的报告中说：“库尔特·普吕弗作为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是不可或缺的。”[13] 1915年5月9日，T.E.劳伦斯的弟弟——22岁的弗兰克正在西线的阿拉斯地段的一处前进战壕内做修理工作，为一次进攻做准备，这时德军炮弹的三枚弹片击中了他。弗兰克的指挥官在给劳伦斯的父母的吊唁信中说，他们的儿子当场死亡，没有蒙受痛苦。军人常常会在这个问题上说谎，所以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这个噩耗让萨拉·劳伦斯痛不欲生。根据大多数说法，弗兰克是她最宠爱的一个孩子，[14] 他自2月份前往法国参战以来给她写了许多封东拉西扯的长信，满是对军旅生活缺憾和前线日常生活的描述。

T.E.劳伦斯于5月中旬从父母的电报中得知了弗兰克的死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等到收到父亲的信，了解到更多情况之后才回信。直到6月4日，他才终于在一张电报纸上草草写了一封短信给父母：

> 我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没有回信，是因为在等待更多细节。今天我

收到了父亲的两封信，读之颇感慰藉，我希望我死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我唯一有所感触的是，肯定没有必要为他哀悼吧？我看不到任何如此行事的理由。无论如何，能为国捐躯已是无上光荣。您和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比他死亡的痛苦还要大，但我认为，在此时，我们有义务隐藏任何会让他人难过的感情，如果做出悲痛欲绝的姿态肯定会影响他人。

所以请你们勇敢地直面世界。我们不能全都上战场，但我们都能勇敢坚强，这和上战场是一样的。内德。[15]

这封信除了惊人的不近人情之外，最有趣的地方或许是，劳伦斯援引了他长久以来一直嘲讽的幼稚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萨拉·劳伦斯都没有心情去遵从儿子的这个冷冰冰的建议。不久之后，她又写了一封信给内德，显然是严厉地责备他在母亲伤心难过的时候没有安慰她（之所以说“显然”，是因为这封信已经佚失）。如果萨拉·劳伦斯希望这能让自己的次子心软，就要大失所望了：

可怜的亲爱的母亲，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信，让我非常难过。我们兄弟几个长大了一些之后，你就永远没办法理解我们了。你难道没有感到，我们无须用语言表达，也一直爱着你？我不得不这样写信，感到自己是个可鄙的虫豸。如果你知道，人若是对事情深刻地思考，就宁愿死也不愿说出来。你知道，人几乎全都是大笑着死去，因为他们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来之前最好把它忘掉。

把哀恸搁在一边，在世人勉强勇敢些，不要再为弗兰克痛哭流涕了吧。在我国处于如此恐怖的压力之下的时节，我们的责任就是小心谨慎，以免感情脆弱的人受到影响；你知道，我们一家向来是很坚强的，如果他们看到你因伤心而垮掉，就都会为自己在前线的亲人担惊受怕。[16]

劳伦斯给父母的下一封信是在大约一周之后。他没有提到弗兰克——事实上，在后来的通信中，他很少直接提到弗兰克的名字——而是在这封短信的大部分篇幅里描述了开罗当时的天气。

1915年6月初，杰马勒帕夏的心情大为好转。他有充分的理由去高

兴。4月25日，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之后，他们就不大可能在叙利亚某地再来一次登陆了。更妙的是，双方都向加里波利的狭窄地带投入更多兵力和物资，让叙利亚总督有了一个借口，可以将他的辖区内比较棘手的部队调走。君士坦丁堡发出要求增援的紧急命令后，杰马勒立刻把他在叙利亚北部的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部队送往加里波利，而以新近在安纳托利亚内陆征募的土耳其部队代替，这些土耳其部队里虽然都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蛋子，但至少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可能发生兵变的阿拉伯部队被调走之后，法国领事馆的密谋者和其他隐藏起来的有分离主义倾向的阿拉伯叛徒们的计划就不是那么危险了。

关于汉志的惹是生非的侯赛因家族，也有好消息传来。杰马勒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极尽奢华地盛宴款待费萨尔之后，向君士坦丁堡发送了消息，让首都方面在这个年轻人抵达之后继续进行魅力攻势。君士坦丁堡遵从了他的这个指令。5月初，冒犯了侯赛因家族的麦地那民政总督被调离，费萨尔和恩维尔帕夏得以缔结协约，表示青年土耳其党和讨厌的侯赛因之间已经尽弃前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肯定是这么想的，他在君士坦丁堡与费萨尔长谈了两次；费萨尔于5月底返回叙利亚时，杰马勒也相信双方的关系已经改善。在德国招待所，面对杰马勒的高级军事幕僚，侯赛因的儿子发表了感情洋溢的讲话[17]，表达了他对帝国和泛伊斯兰圣战事业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甚至蝗灾的灾情也有所改善。蝗灾肯定会严重影响秋季的收成，但是通过犹太科学家亚伦·亚伦森精力充沛的努力和他的现代化掘壕防治技术，似乎已经避免了全面灾难。

但就在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一个新的危机吞没了帝国，或者说，一个旧危机再次爆发了。

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一直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们视为基督教侵略者——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不共戴天之敌俄国——潜在的第五纵

队，所以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经常遭到他们的土耳其和库尔德穆斯林邻居的屠杀。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导致至少5万名亚美尼亚人在几天之内丧命。[18]

奥斯曼政权在1914年11月发出的反对“基督教敌人”的圣战号召更是对这种历史遗留的敌意进一步煽风点火。亚美尼亚人除了种族和语言与土耳其人不同，光是人口众多这一点就足以被视为威胁，面对有可能星火燎原的新一轮反亚美尼亚怒潮，他们显得特别脆弱。这星星之火就是俄军向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攻势，亚美尼亚人成了解释土耳其军队战场失利的绝佳替罪羊。于是，舞台搭好了：在君士坦丁堡政权的言辞中，在它的很多土耳其和库尔德臣民的想象中，安纳托利亚的约200万亚美尼亚人就是国境内的敌人。

4月24日，也就是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的前夜，内政部长塔拉特下令逮捕君士坦丁堡的数百名亚美尼亚公民领袖，同时命令有较多亚美尼亚人口的各省总督立即镇压所有的亚美尼亚“革命和政治组织”[19]，并逮捕其领导人。这道命令暗示亚美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存在，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内地很多政府官员眼中，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是敌人。在塔拉特的命令发布几天之内，数万名普通亚美尼亚百姓被从家中拖走，赶往具体地点不明的“安置地带”，或者当场惨遭屠杀。

土耳其的边界并非铁板一块，而且整个帝国境内有很多西方的教会学校，所以关于安纳托利亚全境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以及被强制迁往农村的亚美尼亚人在路边尸骨枕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君士坦丁堡。这些恐怖故事越来越多，于是协约国的外交部长们于5月24日发表联合声明，发誓要迫使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土耳其犯下的针对人类和文明的新罪行”负责。[20]

君士坦丁堡的反应桀骜不驯。在协约国的声明发表三天之后，土耳其内阁通过了《转移安置临时法》。这部法律没有具体讲到亚美尼亚

人，而是规定，军队现在“为形势所逼，有权以最严厉的手段粉碎”群众中的任何抵抗或者侵犯迹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军队有权“根据军事需求，或对任何叛变行为做出反应，将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或是单个，或是集体，进行转移和再安置”[21]。至于这些潮水般的大量流放犯要被送往何处，塔拉特和恩维尔已经选好了地点：从安纳托利亚全境将大多数犯人集合起来，送往叙利亚北部的不毛之地。这个疯狂计划等同于将大量人口连根拔起，抛弃到原本已经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地方，最后导致了丑恶的结果：根据最准确的估算，约80万名亚美尼亚流放犯在途中饿死、被枪杀或者遭殴打致死。[22]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杰马勒帕夏对驱逐亚美尼亚人的态度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迥然不同。[23]6月，死亡行军的第一批幸存者开始慢慢进入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这是一个中转站，他们将从此地前往最终的目的地——东面约100英里处的代尔祖尔“安置地带”。视察阿勒颇的杰马勒帕夏被自己看到的景象震惊了。他重申了3月发布的让他的军队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命令[24]，并向君士坦丁堡游说，希望在关键地区——安纳托利亚——勒令军队服从这道命令。君士坦丁堡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

杰马勒从君士坦丁堡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允许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留在阿勒颇，而不是继续他们的死亡行军。尽管叙利亚的饥荒和粮食短缺越来越严重，他还是命令增加政府向难民援助口粮的幅度。他的一连串新命令足以证明他对秩序和法规的热爱：他命令军队对供应难民的粮食进行管理和维持，征用汽车和马匹来运送难民，甚至向每位难民发放金钱。但叙利亚总督每天签署的一大摞文件含蓄地说明，他的政权的确拥有执行这些计划的财力和手段，尽管所有的证据——从杰马勒办公室城外一直延伸到他的辖区的最边远角落都能看到这些证据——都表明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似乎他想象自己统辖的是和平时期的瑞士的一个州，而不是一个遭受战争、饥饿和疾病蹂躏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的贫

困而四分五裂的地区。面对亚美尼亚危机，就像面对他遇到的很多其他问题一样，杰马勒的回应是恐吓、威胁、恳求，这些手段都不奏效的时候，他就选择视而不见。9月，他发布了一道新命令，禁止拍摄亚美尼亚人的照片。[25] 在巴勒斯坦的卡特拉村，亚伦·亚伦森遇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阿拉伯老人走到他面前说："我们很感激你。"这位农学家当晚在日记里写道："阿拉伯人在20年前还不会这样和犹太人说话。我干的工作的确很艰苦，但是能迫使当地人向犹太人表示感激——哪怕他们口是心非——能让他们认识到，在这样的大灾害里，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没有任何希望，再辛苦也值得了。"[26]

1915年春季，作为杰马勒抗蝗灾项目的领导人，亚伦森在巴勒斯坦灾区各地旅行，举行公开讲座，在田间开展研讨会，来探讨抗灾的最佳手段。在他的敦促下，杰马勒帕夏下令，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必须搜集到6罗特尔（约40磅）的蝗虫卵，否则就要课以高额罚金。

即便是亚伦森这样不知疲倦的人，面对如此浩大的任务有时也会感到绝望。虽然做了百般努力，但蝗群仍然在扩张——至少有一个蝗群的规模得到了可靠的测量，宽1英里、长7英里——造成的破坏规模也越来越大。朱迪亚低地地区在这个季节本应是一片葱翠，现在却变成了褐色：一连好多英里的果园的果实和树叶全被啃食殆尽，田地没有一点绿色，看上去像是在作冬季休耕。

不论在何处，危机往往能揭露出社会的不平等和缺陷，巴勒斯坦的蝗灾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尽管杰马勒赋予亚伦森极大的权力，但他在努力推动各地官员和军官抗灾时，遇到的反应一般在冷漠和公然对抗之间。在雅法，他不得不以羞辱的手段强迫当地总督来听他的公开讲座，但总督却故意在他讲了一半的时候离开礼堂。卡特拉的老人虽然心存感激，但阿拉伯村庄更普遍的反应是听天由命。在他们看来，蝗虫是"真主的大军"，要抵抗蝗虫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是亵渎神明的。官僚们对

犹太殖民者的怨恨总是昭然若揭，现在更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奥斯曼税官们一丝不苟地对没有缴纳足额蝗虫卵的犹太村庄进行罚款，而对阿拉伯村庄的同样的缺额甚至是无动于衷，却不管不顾。亚伦森记述了一个特别令人愤慨的案例：佩塔提克瓦的犹太人居民点的所有耕地用的马匹都被军队征用了，政府却因为马匹的主人不耕地、违反了抗蝗灾法律而对他们罚款。[27] 他一次又一次威胁要辞去抗灾总监的职务，但杰马勒不断向他做出保证，问题和不平等会得到处置，和谐和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亚伦森的不满情绪至少有一部分植根于很深的私人层面，这种变化发生在他在巴勒斯坦各地旅行期间。他第一次开始质疑，奥斯曼帝国究竟能不能生存下去，或者更准确地说，犹太社区在奥斯曼帝国奴役下能不能生存下去。这不仅仅是他目睹的小小的骚扰和腐败的问题。在他访问的几乎每一个犹太定居点，都有战战兢兢的居民告诉他，他们与阿拉伯邻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地官员挥舞着武器公然发出威胁。

这些警告的迹象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4月，亚伦森派他的弟弟亚历克斯去黎巴嫩，既是为了查看蝗灾有没有蔓延到那里，也是为了看看他们最小的妹妹莉芙卡境况如何。在土耳其军队搜查济赫龙村私藏武器的紧张日子里，莉芙卡被送到了贝鲁特避难。根据不平等条约，人口以基督徒为主的黎巴嫩一直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受君士坦丁堡的干预较小，已经成了叙利亚境内一块自豪、繁荣而亲法国的飞地。亚历克斯报告说，黎巴嫩虽然躲过了蝗灾，但是仍然一派凄凉，土耳其士兵无处不在，甚至平素很高傲的贝鲁特人也心惊胆寒，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6月初，传来了最让人惊恐的可怕传闻，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遭到了屠杀。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亚伦森的沉思得出了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结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须与奥斯曼帝国一刀两断；要和它决裂，犹太人就必须积极活动，促进它的灭亡。

农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受到了他在阿特利特的助手押沙龙·法因贝格的鼓动。26岁的法因贝格是个能量强大的煽动家，是亚伦森的妹妹莉芙卡的未婚夫。在他的家乡哈代拉村（济赫龙以南仅10英里处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法因贝格组建了“基甸人”（保护犹太人定居点，并向他们的阿拉伯敌人发动报复性袭击的准军事组织）的一个当地分支。这种活动很符合法因贝格的政治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角逐，阿拉伯人当然是野蛮人。“我一辈子都在他们当中生活，”他写道，“很难让我改变自己的观点——再也没有比阿拉伯人更怯懦、虚伪和背信弃义的种族了。”[28]

如果说还有一个“种族”让法因贝格更憎恨，那就是土耳其人。自打来到阿特利特，他就一直向亚伦·亚伦森宣传武装起义的福音，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揭竿而起、摆脱土耳其的桎梏。

比法因贝格年长14岁的亚伦森对助手的慷慨陈词付之一笑，认为这是青年人的血气方刚，但在前一年的1月份，法因贝格和哈代拉的另外12位居民被政府以替英国人刺探情报的子虚乌有的罪名逮捕，这对亚伦森来说是个转折点。法因贝格成功出逃，径直来找亚伦森。

为了争取释放哈代拉的村民们，农学家考虑使用他之前用过多次的手段——利用他在奥斯曼政府的关系网，在必要的时候用金钱打通关节——但这一次法因贝格不肯这么做。“我们最凶残的敌人是土耳其人，”他对亚伦森说道，“现在土耳其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我们难道可以作壁上观、无动于衷吗？土耳其人怀疑我们是有道理的。他们在为我们准备末日的浩劫。只要不是兔子那样的胆小鬼，任何人都会很自豪地替英国人刺探情报，帮助他们到来，打倒土耳其人。”[29]

显然，法因贝格虽然一连好多周和亚伦森一起抗蝗灾，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软化。到6月，农学家反而被他说服了。

至于如何打击土耳其人——这就意味着帮助英国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抗蝗灾的工作中，亚伦森和他的多名助手走遍了巴勒斯坦各地，他的桌子上现在摆着一大摞关于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条件和资源的报告。现有资源的清单自然也包括军营、补给站和储油设施的规模和地点，这些信息对大规模的民事救灾工作都是关键信息，但对敌人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更具体的是，这些报告和亚伦森自己的旅行都证实，驻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军队聚集在少数几个城镇，整个海岸线除了一些当地宪兵和乡村民兵的乌合之众外，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英国人显然不知道这个情况，否则肯定早就冲上岸来了。亚伦森能够为他们提供的最关键情报就是巴勒斯坦海岸的具体情况，可以精确到英军在每一英里会遇到怎样的抵抗，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会遇到怎样的抵抗。

至于将一个间谍网正在巴勒斯坦摩拳擦掌地等待为英国人效劳的消息告诉他们，更是容易。在贝鲁特和海法，美国军舰正在持续地将希望离开奥斯曼帝国的“中立国公民”撤走，而这两座港口城市都有着兴旺发达的伪造证件黑市。虽然在巴勒斯坦要办任何事情都不容易，但要把一名信使塞上一艘开往埃及的难民船，只需要一点金钱和运气。

在亚伦森看来，信使的人选也是很显然的。他的弟弟亚历克斯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两次得罪了奥斯曼当局，现在又和当地一名官员横眉冷对，因此处境非常危险。另外，亚历克斯在纽约待过三年，英语讲得非常地道。于是，1915年7月中旬，亚历克斯·亚伦森在贝鲁特港登上了“得梅因”号。莉芙卡·亚伦森也扮作他的“妻子”，一同前往。经过这艘美国军舰的第一个中途停靠港——希腊的罗得岛之后，两人继续奔赴埃及，亚历克斯将直奔英军在开罗的情报办公室。

南下的旅途非常愉快[30]：乘坐一等火车行驶两周，窗外尽是旖旎风光，不时在秀美的安纳托利亚城镇稍事停留。最妙的是，威廉·耶鲁在旅途中结识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夏·优素福，他是土耳其议会的议

员，也是大马士革最富裕的贵族之一。帕夏将耶鲁视作临时“养子”，对他盛情款待。事实上，整个旅途中仅有的不愉快就是埃斯基谢希尔[31]饭店内的臭虫和塔尔索[32]的铁路侧线旁濒临饿死的亚美尼亚难民的景象。“看到这些可怜人，真是悲惨，”耶鲁淡淡地回忆道，“他们被逐出家园，被迫奔赴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大悲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如果这位美国石油勘探家对自己和自己的公司扮演的角色——与制造这个悲剧的政权合作——感到良心不安，他也埋藏在心底。威廉·耶鲁有一个微妙的任务要执行。

在叙利亚首府停留几天之后，他满心不情愿地与帕夏辞别，继续前往耶路撒冷。他在那里的头等要务是安排与杰马勒帕夏的会晤。他很快就收到了前往橄榄山上的德国招待所的传唤，这种匆忙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很稀罕。

耶鲁在指定的日子乘马车沿着陡峭的石子路上山，感到越来越紧张。“我练习着从君士坦丁堡到此的途中学到的额手礼和致敬语，”他写道，“却不知道对杰马勒这样的大人物用这些礼节是否合适。”

耶鲁的焦虑不仅是因为拜会高官权贵的紧张。他来耶路撒冷是为了替标准石油公司争取巴勒斯坦50万英亩土地的特许开发权。他很清楚，任务的成败取决于同叙利亚总督的会面。他完全不知道，会谈会不会顺利。

耶鲁的马车穿过德国招待所的铸铁大门，在这座宏伟建筑的入口前停下。身穿号衣的哨兵们走上前来扶他下车。这位美国石油勘探家带着他的文件和地图，被带进装饰豪华的大厅，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石制走廊，来到杰马勒内室外面的候见室。

耶鲁在那里等候召见的时候，与总督的一位年轻副官攀谈了起来。他是一位海军副官，会说英语。耶鲁很欢迎这个排解焦虑情绪的机会，

和他谈得非常投入，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进出房间的那些人，包括那个最终从一扇侧门走出的身材矮小、身着军服、蓄着短短的黑胡须的人。直到此人轻快地走到接待前台的桌前，跳到桌子一角上坐下，并目光炯炯地盯着耶鲁，他才意识到，这就是杰马勒帕夏。

“耶鲁先生，”他用优雅的法语说道，“把你的地图和文件都拿出来，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杰马勒的平易近人让耶鲁的紧张情绪迅速烟消云散，但也让他突然感到后悔。在动身之前，他觉得第一次与总督会面就把标准公司的全部要求——巴勒斯坦的50万英亩土地——一股脑儿提出来，似乎有些过于鲁莽了，所以他这次来德国招待所只带了一半地图。他快速地将这些地图铺在接待前台上，指出了朱迪亚中部的一个广阔地区。杰马勒看了看地图，但不耐烦地不停点头，显然是对大量细节不感兴趣。过了一小会儿，他站直身子，生硬地点点头。“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可以马上就发布命令。”

耶鲁后来说，就是在这个瞬间，他才认识到，他和叙利亚总督之间在交流上有着多么大的鸿沟。如果巴勒斯坦有石油，杰马勒帕夏自然是希望尽快找到油田，尽快开采，好让他的运输卡车能够开动，他的军队能够作战。但标准公司完全没有这样的打算。耶鲁到巴勒斯坦的任务仅仅是抢购开发特许权，为标准公司在战后抢占这个地区。

“现在我回想当年，”耶鲁在大约20年后说，“很后悔没有告诉他真相。”

但他没有吐露真情。在杰马勒帕夏的支持下，耶鲁很快办妥了需要的官方文件，组织了一场实地考察。他有土耳其士兵和地方官员的撑腰，确保部落谢赫们的服服帖帖，很快就搞定了巴勒斯坦中部大约25万英亩土地。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上级们为此欣喜若

狂，土耳其领导层显然也很开心。首先，标准公司从保加利亚偷运石油，帮助他们绕过英国的海上封锁，现在又更进一步——或者说土耳其人是这么想的——帮助他们开发自己的石油资源。7月底，奥斯曼政权决定向他们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的朋友们表示感激，感激的方式就是全世界各个帝国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授予勋章。

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或许不敢在这个时节接受奥斯曼政权的勋章。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侨民社区听到了数不胜数的关于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消息，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新闻说又有一个村庄的居民惨遭屠戮、数百人或数千人在被驱逐的途中饿死或者被打死。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这些人能做到今天的位置，靠的可不是以德服人，或者迎合时髦的人道主义事业。7月28日，公司驻君士坦丁堡的三名高管——威廉·比米斯、奥斯卡·贡克尔和卢西恩·I.托马斯被带进多尔玛巴赫切宫，觐见苏丹。在授勋仪式上，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官员们凭借“许多人道主义服务”[33]被授予奥斯曼勋章，这是奥斯曼帝国授予民间人士的最高荣誉之一。

1915年7月中旬，T.E.劳伦斯坐下来回复他最亲密的兄弟威尔前不久发来的一封信。这时，威尔正在朴次茅斯的剑桥兵营受训，为担任皇家飞行军团的航空观察员做准备。

劳伦斯不喜欢表达亲密感情，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所以要他回应威尔信中的主旨内容——他们的弟弟弗兰克在5月阵亡——一定是特别困难。“弗兰克的死，正如你所说，令人震惊，因为它完全出乎意料，”他写道，“但我认为，不必为此过于哀恸，因为这毕竟是很好的一条路途。我想，这场战争的宏大让人改换了视角，我自己已经很难看到细节。”

在信的末尾，劳伦斯的口吻变得柔和了一些，甚至是哀伤。“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何时能结束，和平何时能到来？我只能在《希腊诗集》[34]、埃雷迪亚[35]、莫里斯[36]中寻求慰藉。你呢？”[37]

1915年7月，战争还没有走完四分之一；前面还有三年多的屠杀和毁灭。但劳伦斯在这场冲突中的戏剧性角色的种子已经播下。这些种子源自两个貌似并无联系的事件：一封奇怪的信被偷偷带出麦加，送到开罗；一个神秘的24岁男子穿越了满目疮痍、弹坑遍地的加里波利无人地带。

到1915年仲夏时节，加里波利的狭小空间已经尸骨如山。在有些地方，双方的战壕线间隔只有不到30码，为了收回尸体，双方开始进行非正式的停火。一般是由一线指挥官作安排，在某个特定时间，双方的墓葬人员就进入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开展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

8月20日，一名奥斯曼中尉爬出他所在的前进战壕，举着白旗开始穿过无人地带，他显然是要来安排临时停火。但这名年轻军官抵达英军战线之后，向惊愕的英国人宣布，自己是来投降的。

按照标准操作流程，此人被五花大绑，蒙上眼睛，押过地中海远征军的战壕，送到团部。如果仍然遵循标准操作流程，他会在那里接受一名情报军官的审讯，然后送到中央临时战俘羁押地，最后被送到塞浦路斯的某个战俘营。但对这个战俘却没有遵循标准流程。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法鲁基[38]。虽然他其貌不扬——年仅24岁，而且非常瘦削——但他讲出的故事却不同寻常，连续多名英国军官感到有必要报告上级。

他说自己是一个叫作觉醒社的秘密军事社团的成员。该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像他一样的阿拉伯军官，几个月来一直在徒劳无功地等待合适的时机发动起义，来对抗土耳其人。到这年夏天，关于奥斯曼帝国内部存在神秘的第五纵队网络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但是法鲁基的特别之处是，他提供了觉醒社其他密谋者的名单，大部分人都是高级军官，还完整地说出了他们指挥哪些单位、目前部署在何处等细节。

兹事体大，加里波利战役的总司令伊安·汉密尔顿将军在8月25日亲

自向陆军大臣基钦纳发送了报告。[39] 伦敦方面感到最好让开罗的情报单位来判定法鲁基中尉的故事是真是假，于是命令把法鲁基送上一艘开往埃及的战舰。

这位年轻军官于9月10日被送到萨沃伊饭店。至少在最初，英国驻开罗军事情报单位的指挥官吉尔伯特·克莱顿和他的下属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置他。法鲁基说，英军在1915年春季没有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浪费了一个天赐良机。听到这话，英国军官们一下子被勾起了兴趣。

据法鲁基说，当时驻防亚历山大勒塔的主要是阿拉伯部队，很多指挥官是觉醒社的忠实成员，而且这些部队为了迎接英军的登陆，还仔细地破坏了城市的防御工事。但是事与愿违，英军没有攻打亚历山大勒塔，而是发动了灾难性的加里波利战役，于是他们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加里波利战役开始之后，杰马勒帕夏迅速把亚历山大勒塔的阿拉伯部队调往前线[40]；法鲁基解释说，就这样，很多觉醒社密谋者战死在加里波利的山坡上，杀死他们的正是他们希望投靠的“敌人”。

到目前为止，法鲁基的故事的大部分都很容易证实。觉醒社的创始人阿卜杜勒·阿齐兹·马斯里当时正在开罗流亡，他担保了法鲁基的诚实。至于亚历山大勒塔曾由急于起义的阿拉伯部队驻防的说法，劳伦斯从奥斯曼战俘口供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在主张从亚历山大勒塔登陆时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但法鲁基的故事还不止这么多。还有很多。

他说，自己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担任觉醒社与大马士革的秘密社团——青年阿拉伯党——之间的联络人。通过这个关系，觉醒社了解到，青年阿拉伯党和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在秘密协商，要联合发动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在这过程中，觉醒社还了解到，埃米尔侯赛因和开罗的英国人也在秘密通信。因此，阿拉伯的两个秘密社团——民间人士组成的青年阿拉伯党和军人组成的觉醒社——如果得到英国人的武装和支持，

就可以同埃米尔侯赛因联手，发动起义抵抗土耳其人。

但这样的合作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要求英国承认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国家将囊括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东至伊拉克，西至叙利亚，南到阿拉伯半岛最南端。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具体疆界可以再作有限的商谈，这些志在起义的人士认可英国对亚丁的殖民主张以及在伊拉克南部的商业利益，但是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是，无论如何不允许法国在任何地方插足。法鲁基解释说，如果英国人同意这些条件，奥斯曼世界的心脏就会爆发一场革命。

说到这里，年轻的中尉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法鲁基显然是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埃米尔侯赛因和罗纳德·斯托尔斯之间的通信，但开罗军事情报单位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青年阿拉伯党。至于法鲁基说他的小组能够代表叙利亚境内庞大的反奥斯曼密谋集团，谙熟叙利亚政治环境的劳伦斯或许是判断这个故事真伪的最佳人选，但他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获取的情报都不能证明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就算真的存在这样的网络，任何对阿拉伯社会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感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与麦加的极端保守的埃米尔侯赛因联手的说法有些太荒谬了。

但是，就在法鲁基在加里波利变节的几周之前，侯赛因终于打破了8个月的沉默，向罗纳德·斯托尔斯发出了新的信息。这封信中，侯赛因先前的模棱两可和温和节制都无影无踪了。现在他是以“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名义发言，对英国人的要求也从不干涉汉志内政扩大到了承认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独立。

斯托尔斯感到侯赛因的要求太异想天开了——他尖刻地评论说，侯赛因“没有权力，没有希望，也没有力量去希冀这么多”[41]。他和新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决定，最好的回应就是置之不理。在法鲁基被送到埃及前不久，麦克马洪给侯赛因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只

字不提侯赛因的要求。

但在9月份法鲁基登场之后，英国人发现，他的说法和侯赛因在7月份的信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双方提的条件和领土要求几乎完全吻合。这样看来，侯赛因的“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模糊说法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位贝都因部落的埃米尔并非口出狂言，而是暗指他与青年阿拉伯党和觉醒社密谋者的秘密合作关系。在开罗的英国官员突然感到，他们可能严重低估了侯赛因，他不只是有能耐在奥斯曼帝国的偏僻边陲发动一场起义。麦加的这个神秘莫测的老人或许是整个中东战区的关键所在。

但还不止这些。侯赛因在上一封信中还以他一贯的隐晦设置了一个期限，他说英国人从接到信起有30天时间考虑，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的条件。如果30天没有回复，阿拉伯人“完全保留自由决断的权力”[42]。斯托尔斯和麦克马洪在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隐蔽的威胁，但穆罕默德·法鲁基告诉他们，这个最后通牒是由于杰马勒帕夏向侯赛因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如果阿拉伯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土耳其—德国的战争努力，战后将赋予阿拉伯人完全的独立。

英国人此刻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抉择：要么与侯赛因及其伙伴达成协议，从奥斯曼帝国内部发力，使其瘫痪；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侯赛因和阿拉伯人与君士坦丁堡修好，这无疑会令针对协约国的圣战号召威力猛增，很有可能会星火燎原地激起英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人民起义。在伦敦和开罗的英国外交官们将情况全部报告给阿斯奎思首相及其内阁，同时匆匆向麦加的埃米尔发去了一封比以往恭敬得多的信。史上最具争议的秘密通信之一，即所谓“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就这样开始了，它造成的结果会将英国政府及其未来在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T.E.劳伦斯陷入一张充满误解、互相矛盾的诺言与背信弃义的复杂罗网。

在短期内，穆罕默德·法鲁基的情报使得劳伦斯得以重返他自九个月前抵达开罗以来就一直追寻的目标：筹划英军在亚历山大勒塔的登陆

作战。

在晴朗的日子，从阿特利特海岬，亚伦·亚伦森和押沙龙·法因贝格可以清楚地看到游弋在巴勒斯坦海岸线上实施封锁的英国和法国战舰。他们估计，最终从这样一艘战舰上，他们将收到亚历克斯从开罗发来的信，或许亚历克斯本人会一并前来。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信心渐渐开始动摇。

近一个月毫无亚历克斯的音信，于是亚伦森和法因贝格决定调用一个风险很大的备用方案。如果再等一阵子还没有消息，法因贝格就会搭乘海岸的一艘小型渔船，径直去找一艘英法的军舰，努力说服对方让自己登舰。但到8月中旬，却传来了消息，封锁加紧了，协约国战舰现在有权摧毁任何可疑船只，试图接近战舰的陌生船只当然也很可疑，所以这个备用方案现在已经不是风险很大，而是自杀。然后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8月底，他们得知（后来知道这个消息有误），运送难民的航运即将终止，“得梅因”号会在8月30日最后一次停靠海法港。密谋者们相信，美国战舰出现在海平线上的时候，就是他们与英国人取得联系的最后机会。

法因贝格心急火燎地要尽快登船，亚伦森坚决不同意。但法因贝格乔装打扮并携带伪造的俄国护照，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登上了“得梅因”号。一周后，他来到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码头。[43]

法因贝格在埃及只认识一个人，但事实证明这是个很好的关系。他的朋友是一个老家在海法的信基督教的阿拉伯青年，目前在塞得港的英国海军情报指挥部当信差。法因贝格在塞得港找到了这位老友，他很快就安排法因贝格与该单位的一名情报军官会面。这位军官不是别人，正是T.E.劳伦斯在卡尔基米什和寻漠探险的老搭档——伦纳德·伍莱。

法因贝格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亚历克斯·亚伦森确实已经

与埃及的英国情报部门取得了联系。在多次碰壁之后，亚历克斯终于在8月18日获准面见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军官——T.E.劳伦斯在寻漠探险中的另一位搭档，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但这次会谈也不顺利。纽科姆从一开始就对亚历克斯·亚伦森持谨慎态度，当这个一本正经的26岁青年开始详细介绍在巴勒斯坦随时准备为英国人效劳的犹太间谍网时，他更加警惕了。就在两个月前，库尔特·普吕弗的女弟子明娜·魏茨曼的间谍身份被拆穿，在埃及的英国情报人员都提高了警惕，因为他们知道，德国人在招募从巴勒斯坦来的犹太难民作为情报渠道。或许最让纽科姆怀疑的是，亚历克斯·亚伦森似乎一心只想为英国人效力，不求任何实质性的回报。作为一名资深情报军官，纽科姆常常遇到很多自称是间谍的人，这些人向他提供“珍贵情报”，要他给钱给枪，或者帮助解决法律问题。要说亚历克斯·亚伦森完全是心地善良、慷慨无私地要提供这个所谓的情报宝库，实在匪夷所思。于是纽科姆犯下了他情报生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不仅拒绝了亚伦森的建议，还命令他出境。当然，亚历克斯没有办法把这情况告诉正在巴勒斯坦焦急等待的兄长。9月3日，也就是押沙龙·法因贝格抵达亚历山大港的三天之前，亚历克斯和他的妹妹莉芙卡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船，离开了这同一个港口。

但法因贝格在伦纳德·伍莱那里的运气要好得多。伍莱对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完全信任，设计了一个方案：安排一艘英国间谍船定期经过阿特利特的研究站。密谋者如果有情报，就向间谍船发出事先约定的暗号，然后间谍船借助夜色掩护派出小船或者游泳者上岸接收情报。

要建立这个暗号系统并测试方案的可行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法因贝格搭乘这样一艘间谍船偷偷返回巴勒斯坦。与伍莱安排妥当之后，法因贝格就等待合适的时机——风平浪静的无月黑夜，踏上归途。

在这个夏末，有一个人对纽科姆和伍莱与巴勒斯坦来的志愿间谍的交往一无所知，那就是他们先前在寻漠探险中的搭档T.E.劳伦斯。这部

分是由于英国驻埃及的情报机构各部门相对独立，部分是因为劳伦斯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英军在亚历山大勒塔的登陆。到10月中旬，这个计划的最后细节似乎已经安排妥当，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尽量说得隐晦些，以便通过军方的审查：

“今年冬天在黎凡特[44]会很忙，”他写道，“总的来讲，我对事情还是很满意的。他们反对我们那么长时间，现在我们的政府变得更通情达理了，我想，这里的最后方案虽然会花很长时间，但应当会非常顺利。这要感谢过去的失败。”[45]

对劳伦斯来说，法鲁基的故事里最让他痛苦的是对1915年初亚历山大勒塔局势的描述，法鲁基指出，英军如果在当时攻打亚历山大勒塔，几乎可以长驱直入。当然，觉醒社成员控制的部队早已被调走，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在1915年秋季，劳伦斯和其他主张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人还有几个强有力的论点来支持这个计划。

保加利亚在战争的第一年坐山观虎斗，但在1915年9月底终于加入德奥阵营。这意味着，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现在有了一条不间断的公路和铁路线，部队和武器可以迅速而轻松地调动。同时，英军高层终于接受了加里波利战役的惨败，开始悄悄地制定撤退计划。这两个事件的后果是，英属埃及有可能遭到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新一轮打击。为了阻挠这样的攻势，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盆地不仅能扰乱敌人的主要补给线，甚至可以将其完全切断，如果还能引发阿拉伯人在当地起义，土耳其人就将不得不面对一连串新问题。

还有一个理由能够支持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这要感谢杰马勒帕夏反复无常的个性。杰马勒私下里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帕夏们的政策，允许安纳托利亚大屠杀的至少8万名亚美尼亚幸存者在叙利亚避难，并将很多亚美尼亚男子编入劳动营。这些难民和劳动营集中在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其中大约8000人在穿过阿玛努斯山和托罗斯山脉的铁路隧道工地

上干活。就算这些亚美尼亚人对至少暂时救了他们性命的帕夏心存感激，在英军到来时也一定会把他们视为解放者，奔向他们的阵营。况且这还有助于公共关系——劳伦斯对战争的这个方面一直非常敏感。英国将不计其数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从奴役或死亡魔爪下解放出来，将会是很好的宣传材料。

在劳伦斯和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其他成员的努力争取下，到10月底，埃及的两位最重要的大员——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和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约翰·麦克斯韦少将都对卷土重来的亚历山大勒塔计划产生了兴趣。更妙的是，他们两位将与到访的基钦纳勋爵举行一场峰会，来确定地中海东部战局的未来走向。一切进展得顺风顺水，劳伦斯相信，军界愚蠢的壁垒貌似坚不可摧，但也要土崩瓦解了。

“这个周末，事情要更进一步了，”劳伦斯在11月4日，也就是基钦纳峰会的前夕，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忙过！这是个好兆头，大家很满意。”[46]

基钦纳、麦克马洪和麦克斯韦的峰会于11月10日和11日在爱琴海穆兹罗斯岛外海的一艘船上召开。陆军大臣起初有些不情愿，但后来也同意了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并迅速向首相发了电报，敦促他尽快批准此方案。

但伦敦方面对这个计划并非全盘支持。西线已经血流成河，英军高层要找到新的兵员投入这台绞肉机已经很艰难，要抽调物资和兵力——修订版的亚历山大勒塔计划需要多达10万人——实在很难。而且，在加里波利折戟沉沙之后，在奥斯曼战线发动新的登陆作战的想法就不受欢迎了。基钦纳所在的舰船和伦敦各部之间通过电报展开了一番辩论。

基钦纳船上的一名法国联络官决定了局势的走向，他向巴黎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英国人的筹划情况。[47]

法国政府原以为自己在1915年冬天就彻底粉碎了亚历山大勒塔计划，现在感到必须直言不讳了。11月13日，法国驻伦敦武官向大英帝国总参谋部长官和英国陆军总司令威廉·罗伯逊将军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先是重申了法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然后声明："对于已经确认将会成为未来法属叙利亚一部分的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公众都不会置若罔闻。他们还要求法国政府，在此地区开展的任何军事行动都需要事先在各协约国间协调妥当，而且，即便采取了这样的军事行动，大部分任务也应当交给法国军队和指挥这些军队的将领。"[48]

抛却隐晦的外交辞令不谈，这封信实质上是重复了法国先前的对亚历山大勒塔登陆计划的反对意见：法国计划在战后主宰叙利亚，所以在该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应当由法国军队担当前锋，而现在法国腾不出兵力来执行这样的行动，所以干脆根本就不要在叙利亚搞任何军事行动。但这一次最让人震惊的是，法国人居然会把如此卑劣的论点付诸笔端。英国历史学家巴塞尔·利德尔·哈特对法国的这封信评论道："在生死斗争之际，这肯定是向盟友递交的最令人惊愕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断然否决了切断共同敌人的生命线、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线的最佳机会。"利德尔·哈特认为，英军总参谋部同意了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就成了"犯罪的同谋"[49]，他说的"犯罪"是指，在埃及的英军现在别无办法，只能等待敌人再一次进攻苏伊士运河，随后向土耳其战线最固若金汤的点——巴勒斯坦南部的狭窄战线——发动自己的攻势，这种方法最终将给英军带来伤亡5万人的惨重代价。

令劳伦斯和他在开罗的情报机构的同袍们无比震惊的是，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再次被粉碎，后来再也没有被认真提起过。

1915年2月，这个计划第一次被撤销时，劳伦斯曾悲愤地向家人说，法国才是英国在叙利亚的真正敌人。1915年11月，计划第二次瓦解之后，他心中产生了对法国的憎恶，他将会对法国在该地区的所有行动

都抱有深刻的不信任。

萨拉·劳伦斯在儿子弗兰克阵亡之后，曾责备次子“内德”的一个让她非常难过的错误：内德在1914年底动身前往埃及之前没有去弗兰克的新兵训练营看望他。T.E.劳伦斯对母亲批评的回应的逻辑非常实事求是，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我没有去向弗兰克道别，”他解释道，“因为他不愿意让我去看他，我知道我再见到他的机会很少了，那样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道别。”[50]

1915年3月，劳伦斯得知，他的弟弟威尔乘坐的船从印度返回英国，要途经苏伊士运河。他的反应与对弗兰克阵亡的反应大不相同。自威尔在1913年拜访卡尔基米什以来，劳伦斯还没有见过他，于是暂且搁置了在萨沃伊饭店的工作，骑上他的胜利牌摩托车，狂奔80英里前往弟弟的船停靠的苏伊士港。

但就在他抵达那里之前，运河沿线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威尔的船延误了。兄弟俩没能见面，只能在岸上和船上之间短暂地通了一次电话。当晚，劳伦斯再次跨上摩托车，返回开罗工作。

威尔志愿担任皇家飞行军团的航空观察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兵种之一。1915年10月23日，威尔乘坐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他殒命长空，遗体踪迹全无。他享年只有26岁，在前线待了还不到一星期。

仅仅五个月内就有两个弟弟阵亡，这让劳伦斯在感情上愈加内敛。在随后几个月内，他的家信越来越少，写的也越来越简短。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很快就不再提及弗兰克，而当时除了一个隐晦的暗指，甚至根本没有承认威尔的死亡。在12月的一封家信中，他写道：

> 我今天早上写了这么寥寥几笔，因为我很吃惊地发现，今天已经是圣诞节了。恐怕你们在今天不会开心了。但你们还有鲍勃和阿尼，

很多人还不如你们幸运。振作精神，希冀未来。这里一切照常，只是昨天下了场瓢泼大雨，最近比较凉快。[51]

---

[1]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304.

[2] Lawrence to Bell，April 18，1915，in Brown，*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71.

[3] Prüfer to von Wangenheim，February 9，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3，Frame 862.

[4] Prüfer to（illegible），February 24，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4，Frame 390.

[5] 关于普吕弗与明娜·魏茨曼的早期关系，见McKale，*Curt Prüfer*，p.42。

[6] See Prüfer，*Diary*，October 26，1914；January 27，1915；May 5 and June 25，1916；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7] Prüfer to Djemal Pasha，March 1，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4，Frames 271-73；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31，Der Weltkrieg no. 11g，Band 9.

[8] Prüfer to Djemal Pasha，March 1，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4，Frames 271-73；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31，Der Weltkrieg no. 11g，Band 9.

[9] Cohn，"Report，" July 16，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4，Frame 697.

[10] Steinbach to Ziemke，August 3，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4，Frame 779.

[11] 哈大沙是美国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工作为医疗、教育等。

[12] McKale，*Curt Prüfer*，p.203 n. 18.

[13] Von Wangenheim to Bethmann-Hollweg，in cover letter，March 3，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3，Frame 862.

[14] See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and His Brothers*， pp.653-720.

[15] Lawrence to family，June 4，1915；Bodleian MS Eng C 6740.

[16] Lawrence to Sarah Lawrence，undated；Bodleian MS Eng C 6740.

[17] Dawn，*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p.30；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213.

[18] Lewy，*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p.28。在所谓哈米德大屠杀中丧生的亚美尼亚人的数量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争论主题，最低的估计数字来自土耳其政府，为1.3万人；一些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估计有30万人。或许Lewy给出的数字，5万～8万人，最为可靠。

[19] As cited by Lewy，*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p.151.

[2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elegram to US Embassy，Constantinople，May 29，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Roll 43，document 867.4016/67.

[21] As cited by Lewy，*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p.153.

[22] 关于1915～1916年亚美尼亚大屠杀悲剧的最权威历史著作是Lewy的*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23]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Vanakh Dadrian在*The Key Elements in the Turkish Denial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p.54中称："在这方面，必须承认，不论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第4集团军总司令杰马勒，还是土耳其东部的第3集团军总司令Vehib Pasha，尽管与土耳其青年党联系紧密，但都拒绝执行该党领导层制定的秘密种族清洗的计划，而是尽其所能地抵抗和阻止随后发生的屠杀。"

[24] As cited by Lewy，*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p.197. See also Metternich to Bethmann-Hollweg，December 9，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9，Roll 463，Band 40.

[25] Lewy，*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p.192.

[26] Aaronsohn，*Diary*， April 1，1915，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27] Aaronsohn，*Diary*， April 27，1915.

[28] Quoted in Gorni，*Zionism and the Arabs*， p.56.

[29] Quoted in Engle，*The Nili Spies*， p.47.

[30] 威廉·耶鲁对其1915年前往耶路撒冷旅途及其与杰马勒帕夏的会晤的记述见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4。

[31] 今土耳其西北部城市。

[32] 今土耳其南部城市，是罗马帝国时期基利家省的首府、使徒保罗的出生地。和合本圣经译作“大数”。

[33] *New York Times*， July 29，1915.

[34] 10世纪开始流传的一部诗集，包括古典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文诗歌，历史上被不同时期的多位学者增补和修改，对西方文学影响极大。

[35] 应该是指若泽—玛利亚·德·埃雷迪亚（1842～1905），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成员。

[36]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世界知名的家具、壁纸花样和布料花纹的设计者兼画家。他同时是一位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起者之一。

[37] Lawrence to Will Lawrence，July 7，1915；Bodleian MS Eng C 6740.

[38] 穆罕默德·法鲁基在1915～1916年英国近东政策的塑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他是这一时期的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据信，他于1922年在伊拉克的一次部落战争中被杀，因此围绕他的许多问题或许永远不会得到解答了。
大卫·弗洛姆金在1989年的著作*A Peace to End All Peace*中对法鲁基又作了一番集中的研究。弗洛姆金多次提到法鲁基的“骗局”，以及他的行动对世界局势造成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麦克马洪信件，还有更重要的，与法国、俄国和后来的意大利的谈判——最终产生了《赛克斯—皮科—萨佐诺夫协定》，以及后来的协约国的秘密协定，都是穆罕默德·法鲁基的骗局造成的结果”。
这种说法或许夸大了法鲁基的影响，而且弗洛姆金从未具体说清，他所谓的骗局究竟指的是什么。他的指控似乎围绕着两点：法鲁基向英国人和埃米尔·侯赛因夸大了自己在觉醒社中的地位，以便为自己挣得中间人的角色；关于觉醒社和青年阿拉伯党在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起义的能力，他也撒了谎。弗洛姆金认为，实质上，法鲁基向英国人许下了他不可能兑现的诺言。
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法鲁基是一个热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殖民势力非常疑忌，上述行为完全就算不上是“骗局”。法鲁基几乎肯定夸大了叙利亚起义密谋者的实力，以便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更多让步，但在战争年代，这恰恰说明他是个优秀的谈判者，而不能说他是骗子。
但这远远不只是标签或语义的问题。在弗洛姆金看来，由于法鲁基的骗局，侯赛因通过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与英国人达成的协议，是用谎言买来的（p.186）。他说（p.219）：“英国的阿拉伯局相信，阿拉伯起义会在整个穆斯林和阿拉伯语世界得到广泛支持。最重要的是，它相信，起义会得到（英国人认为的）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事实上，侯赛因所希冀的那种阿拉伯起义从未发生。奥斯曼军队中的阿拉伯单位没有一个投诚到侯赛因这边

来。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人物没有一个投靠到他和协约国那边。法鲁基许诺，会有一个强大的秘密军事组织投靠到侯赛因那边，但这个组织始终没有露面。”

弗洛姆金观点的问题在于，到1916年6月阿拉伯起义爆发的时候，英国人或侯赛因都已经不相信这种事情。在此4个月之前，侯赛因通知麦克马洪，由于“当地土耳其政府的暴政”，“密谋者能够仰仗的人所剩无几”，叙利亚方面发动起义的希望大大缩减了。弗洛姆金不仅没有提到侯赛因的这个著名的警告，而且也没有注意到，英国人也已经完全考虑了这个情况。埃及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人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916年4月22日的备忘录中（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4，f. 92-3）写道：“谢里夫（侯赛因）承认，革命事业不能指望叙利亚。”有鉴于这个情况，克莱顿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高级专员（麦克马洪）坚信，目前必须建议谢里夫，保障铁路和将土耳其人扫荡出汉志的任务必须由他独立完成。”

简而言之，英国当局绝没有被蒙在鼓里，而是早就认清了阿拉伯起义的有限规模，知道自己如果支持阿拉伯起义，将会得到什么东西，以及得不到什么东西。事实上，英国人还敦促对起义的规模加以控制。

[39] Hamilton to Kitchener，August 25，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490.

[40] 除了伊安·汉密尔顿在8月25日的报告，克莱顿还在1915年10月11日给麦克马洪的报告这个详细记述了法鲁基的证词。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486，f. 223-28；Faroki’s own statement，entitled “‘A’ Statement of Sherif El Ferugi”；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486，f. 229-38；and in “Notes on Captain X，” and “Statement of Captain X，” September 12，1915，Intelligence Department，War Office，Cairo；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2。

[41] Storrs，“Memorandum，” August 19，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486，f. 150.

[42] Cited in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pp.414-15.

[43]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p.172.

[44] 黎凡特（Levant）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明确。它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45]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310.

[46]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p.223.

[47]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p.224.

[48] Panouse to Robertson，November 13，1915；reprinted in 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33/747，p.811.

[49] Liddell Hart，*Colonel Lawrence*：*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p.38.

[50] Lawrence to Sarah Lawrence，undated；Bodleian MS Eng C 6740.

[51]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p.310-11.

第7章 背信弃义

本人窃以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猎人在还没有打死熊之前就已经在盘算如何分熊皮了。我个人还看不到战争结束的迹象，所以我认为目前讨论如何瓜分土耳其帝国主要是个学术问题。

——1916年1月7日，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指挥官，乔治·麦克多纳将军 [1]

1915年11月16日，T.E.劳伦斯给一位老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管理员爱德华·利兹写了封短信。劳伦斯的兄弟威尔战死还不到三周，劳伦斯现在心情非常忧郁。他先是为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写信表示歉意，然后告诉利兹，这部分是由于他的工作繁忙，“部分是由于我的两个弟弟连续阵亡。当然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噩耗传来时并不非常让我震惊，但我还是害怕回到牛津，害怕回去时看到的境况。而且他们年纪都比我小，我仍然平安地生活在开罗，他们却已经马革裹尸，这有点不对劲”。 [2]

如果说战争在本质上就令人困惑苦恼，劳伦斯在这个11月感到特别迷茫痛苦，也是情有可原。抵达开罗之后的11个月内，他大部分时间都困守萨沃伊饭店的办公室，离夺去了他两个弟弟生命的西线屠场有万里之遥。更让他迷惘的是，他的最大精力不是用来打击敌人，而是被浪费在与英国军队官僚及其最亲密盟友法国的狭隘利益做斗争的“公文战争”上。

在萨沃伊办公室墙壁上的奥斯曼帝国地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些斗争的徒劳无益。1915年11月，这个战区的战事已经持续一年，有数十万人命丧黄泉，但地图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加里波利，地中海远征军仍然苦苦困守浸透鲜血的滩头阵地，但就连这些在土耳其土地上的小小立足点也很快要消失了。最具讽刺意味

的是，协约国军队从加里波利的撤退是整个战役唯一一个执行有力的阶段。在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人的苦难在继续，毫无缓和的迹象；叙利亚的阿拉伯分离主义者也惨遭杰马勒帕夏的秘密警察的屠戮。本可以帮助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分离主义者的亚历山大勒塔登陆计划似乎已经被彻底废弃，虽然开罗方面无人理解其原因（几周之后，伦敦的陆军部才终于告知埃及方面，法国政府公开地扼杀了这个计划）。土耳其军队已经在西奈半岛远方的巴勒斯坦掘壕据守下来，据说英军即将对其展开常规的正面攻势。即便这次攻势能够成功——加里波利的惨痛教训让人很难相信它能够成功——英军随后也将不得不缓慢而艰难地北上，向土耳其内陆前进。地图上唯一的亮点是伊拉克。在那里，一支英属印度军队在过去的七个月中沿着底格里斯河步步紧逼，到11月中旬已经兵临巴格达城下。就算能够攻克这座奥斯曼帝国的边陲城市，也很难对千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产生实质性影响。

劳伦斯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半岛，他相信，只有非常规战争才能打败土耳其人，而非常规战争很有可能要在阿拉伯半岛展开。就在几天前，他的这份希望大大增强了。在穆罕默德·法鲁基带来情报之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匆匆给埃米尔侯赛因写了一封新的信，同意了对方提出的独立阿拉伯国家的几乎全部领土要求，条件是，阿拉伯人要与英国结盟，发动起义。11月5日，开罗收到了侯赛因的同样令人愉快的答复。还有几个小细节需要商榷，但双方就针对土耳其的阿拉伯起义达成了共识。[3]

劳伦斯当然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恰恰相反，在1915年秋季，厮杀中的欧洲列强产生了一个执拗反常的观念，这表明中东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纷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要理解这种观念，我们必须看清战争的整体局势。在西线，英法军队和德军之间400英里长的无人地带在一年中几乎没有移动一寸。东线

虽然不是这样静止不动，但产生了另一种僵局。俄国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在西北战线被德军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在西南战线对倒霉的奥匈帝国军队大打出手，才出了一口气。不料德军赶来援助奥匈帝国，于是俄军又遭遇了惨败。这就形成了一种致命的局面——俄国打败奥匈帝国取得的成功被德国打败俄国抵消——并一直持续到1917年。但要说愚蠢盲目、徒劳无功，排第一的还要数意大利东北部新开的南线战场。意大利在1915年11月才姗姗来迟地与协约国结盟，加入战争。意大利已经向居高临下地据守一座崎岖山谷的奥匈帝国军队发动了四次进攻，虽然意大利军队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每一次都被杀得血流成河。在整个战争期间，为争夺伊松佐河谷就爆发了12场战役，导致意大利军队伤亡约60万人。

当然，僵局是一柄双刃剑，协约国没有进展，同盟国也没有什么好消息。

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却没有任何进展，各参战国或许应当考虑议和，或者想办法跳出这个烂摊子了。但是，它们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自古以来，战争中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往往得出的是可怕的答案：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挥霍了这么多财富，怎么可以承认这一切都白费了呢？承认自己错了是不可能的，现状又是维持不下去的，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大投入、让冲突升级。于是，在1915年底，欧洲各参战国已经不满足于当初开战要达到的目的——这些目的往往是非常鸡毛蒜皮的——而是更进一步。可接受的和平条件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这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在帝国霸业中占竞争对手一点小便宜，而是将其彻底打残，让对手永远没有能力开展一场如此毁天灭地而又毫无意义的战争。

但打败了敌人还只是赢了一半；战争要真正说得过去，就必须有物

质利益进账。根据现代欧洲的习惯，战争的赢家会向输家索取战争赔款，占领个把有争议的省份等。但相对于这场战争的惨重代价而言，这些利益都太不值一提了。如果要让这所有的血腥残杀都没有白费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帝国的新的黄金时代，赢家要比以往富裕得多、辉煌得多。于是，这种思想就将这个恶性循环推向了必然的、凶恶的结果。想一想最终的胜利者将得到哪些好处，失败者又将失去多少东西，现在还怎么可能罢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投入——更多士兵、更多金钱、更多损失——等到最终胜利的时候，就将得到更多领土、更多财富和更多权力来补偿这一切。

同盟国也有自己的一份心愿单，写明了胜利之后要得到什么东西，而这份心愿单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宏大；而对英法俄这三个协约国而言，只有一个地方能够给它们规模足够大的补偿：奥斯曼帝国的四分五裂、五彩斑斓的土地。到了1915年秋季，伦敦白厅走廊里的人们已经将奥斯曼帝国简单地称为“大战利品”。

对三个协约国来说，中东战争的目的已经完全是为了满足它们长久以来的帝国主义野心——用文雅的说法叫作“愿景”。俄国历代沙皇垂涎君士坦丁堡已经至少两百年之久。法国自16世纪以来就享有奥斯曼帝国叙利亚境内天主教徒的保护者的特殊地位；如果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叙利亚地区理当归属法国。英国则一直醉心于保卫通往印度——大英帝国“王冠上的珠宝”——的陆路通道免受帝国主义竞争者的侵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和法国是它最忌惮和防范的对象。另外还有宗教的因素。1915年的时候，三个协约国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国家。时隔600年，很多人依然对基督教圣地在穆斯林手中而耿耿于怀。瓜分奥斯曼帝国之时，基督徒们终于能重演十字军东征并达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了。

自相矛盾的是，将这些古老的欲求推入现实领域的恰恰是英国与埃米尔侯赛因的秘密会商。其他协约国渐渐知道了这些协商，阿拉伯起义

的前景也更加触手可及，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是胃口大开，更是垂涎三尺。

到11月末，法国已得知英国与侯赛因的交易。法国急于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匆匆地编纂出自己对该地区的野心勃勃的心愿单。俄国很快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面对主要盟友的贪得无厌——它们今天或许是盟友，明天可能又变成对手，英国突然感到自己的胃口也好了起来，而不管前不久才向侯赛因许下的诺言。最终，意大利，甚至中立国希腊，也要来分一杯羹。这很快就让中东的军事谋略屈从于政治考虑，决策权从前线军官手中转移到了聚集在会客厅的外交官和政客手中。如果说外交官们的主要特点是笨拙无能，至少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随着政客们的崛起，以及各个阵营争先恐后地争权夺利，一切都将被背信弃义和拜占庭宫廷式的钩心斗角所笼罩。

巧合的是，在这个阴谋的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个人于1915年11月17日抵达了开罗，也就是劳伦斯向爱德华·利兹抱怨自己平静生活的第二天。这个人的名字是马克·赛克斯，更正式的全名是第六代斯莱德米尔从男爵塔顿·本韦努托·马克·赛克斯爵士。

历史上很少有比他更不像坏人的坏人了。赛克斯时年35岁，英俊潇洒，尽管略微有些松弛无力。他是帝国时代晚期英国贵族的那个非同一般的小阶层——“业余政治家”的杰出代表。“业余”这个词在现代带有贬义，但其实源自拉丁语，最初的意思是“为了对……的爱”，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那些富裕且往往拥有贵族头衔的青年，他们出身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不需要为了晋身而拼命奋斗——这些人如果要正儿八经地工作的话，就太有失体统了——所以他们可以自由涉猎广泛的领域，在所有领域都如鱼得水。赛克斯是约克郡一位贵族的独子，自小在3万英亩的家族庄园长大，就像其他很多“业余政治家”一样，致力于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要像10个“普通人”加起来那么丰富多彩。他在剑桥大学

接受教育，游历了奥斯曼帝国很多地方，著有四本书，参加过布尔战争，曾担任爱尔兰总督的议会秘书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荣誉领事——这还仅仅是他25岁之前的亮点。在随后的10年中，在他于1915年抵达开罗之前，他娶妻生子，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尚在腹中——成了一位颇有名望的优秀的讽刺漫画家，发明了一种早期版的投影仪，而且自1912年以来一直担任赫尔中央区的保守党议员。

赛克斯出现在开罗是由于最近的职业变动。前一年春天，基钦纳勋爵任命他为德·邦森委员会[4]的顾问。这个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跨部门的理事会，旨在向英国内阁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指导性意见。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赛克斯很快成为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并于1915年7月对该地区进行了一次长期考察，打算回国后将自己的考察结果报告给内阁。

劳伦斯第一次见到赛克斯是在这年8月，当时赛克斯正在考察途中于开罗短暂停留。和大多数人一样，劳伦斯对这位魅力十足、风度翩翩的议员颇有好感。他和开罗情报部门的同僚们终于找到了一位似乎理解他们的非常规战争理念的英国政府高官，所以很满意。赛克斯于11月返回埃及后，劳伦斯和同僚们对他的好感更是极大增强。[5]在前两个月中，赛克斯与英属印度的官员们进行了会谈，这些人坚决反对英属埃及当局的“代理人战争”计划（即鼓动阿拉伯人去反抗奥斯曼帝国）。赛克斯返回后毫不隐讳地表示，自己支持埃及当局的做法。

马克·赛克斯虽然成就非凡，却带有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普遍的典型特征——狂妄自大，认为全世界的麻烦问题其实都有办法利索地解决，解决这许多问题的答案就掌握在英国手中；英国人有一项特别的负担——虽然是天赋的，但仍然很累人——开化和教育其他民族，让他们知道英国人的优越。赛克斯在这方面的特殊本领是果断大胆、简明扼要、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文风。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

甲乙丙丁的清清楚楚的条目，给人造成一种几乎是数学般简明的错觉。虽然PowerPoint幻灯演示要到近100年后才被发明出来，他在当时已经是这种演示的大师。

举个例子——在随后几年内，这样的例子会有很多——他于8月在开罗短暂停留时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声称对中东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了记录和研究。赛克斯先是把这些知识分子分为“守旧派”和“现代派”，然后又分别作了细分。例如，“守旧派”的第一类是正统派（“头脑僵硬顽固、难以驾驭、充满偏见和狂热”），而“现代派”的第一类（水平最高的级别）是“出身名门望族、完全吸收了西方教育的人”，但不可以将第一类“现代派”与第二类“现代派”混淆，因为后者是“贫穷、能力低下的人或罪犯，接受了程度较低的欧洲教育，由于境况或天性或者二者合一，比第一类更倾向于走阴险可怖的渠道”。赛克斯还不满足于分类，而是继续将他的公式应用于中东的各地区，为他的英国读者们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关于英国在每个地区地位的指南。坦率地说，埃及这样的地方可不妙：“守旧派”的第一、二、三类对英国人的态度分别是彻底敌视、善意冷漠和温和支持；而“现代派”的第一、二类对英国人的态度则分别是明文反对和毫不妥协的仇恨。[6]

这固然不是第一次有愚蠢的种族主义言论被付诸笔端，但是这种语言组织得力、表达又自信大胆的胡言乱语居然被视为智慧，足以说明英国领导层的自鸣得意，当然也印证了他们在对抗一场遍及全球的冲突时几面受敌的境地。赛克斯回到伦敦后，在德·邦森委员会面前作了一番气势磅礴的表演，英国政府竟然就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棘手——从历史角度看，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使命全盘交给了这个35岁的业余政治家：将英国与其盟友在中东的互相矛盾的领土主张分门别类、一一理顺。

英国领导人到一切都太晚的时候才发现了赛克斯个性的另一个特

点，如果他们早一点发现的话，或许就不会将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他了。马克·赛克斯活动起来总是兴冲冲又十分狂热，而且兴趣和涉猎范围极广，所以记性极差，甚至连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也记不住。他常常会被刚刚与之交谈过的人的话触动，或者他那多产的大脑里会蹦出一个新念头，因此总是与自己先前（往往仅仅是几天前）大力鼓吹过的观点或政策矛盾。

赛克斯于11月暂居埃及时，劳伦斯开始注意到他的这个缺陷。这位年轻的议员总会漫不经心地无视与他当前持有的观点矛盾的棘手证据，而在自己改弦易张之后却会抓住这个证据来支持自己。他这种做法让人颇感不安。劳伦斯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赛克斯“想象力丰富，鼓吹着不能令人信服的世界走向……满脑子是偏见、直觉和伪科学。他的观念都是外在的，他也没有耐心去测试自己的建筑材料，就急于选择自己的建筑风格。他会选取真相的一个方面，将其与具体情况割离，令其充气膨胀，对其扭曲和改造。”[7]

但赛克斯的性格还有另一面，对他即将扮演的关键角色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他的行事似乎有些鬼鬼祟祟和阴险狡诈。不知是为了证明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聪明的人，还是为了取乐而故意骗人，这位年轻的业余外交家将扭曲事实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以及保留或操纵关键信息来玩弄各方演化成了一种艺术形式。这给马克·赛克斯在历史上赢得了一个特殊地位：在这位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约克郡年轻贵族之外，很难找到一个既没有真正的恶意，手中也没有操控一个国家或军队的权力，却能给20世纪造成更严重损害的人。他留下的烂摊子，将会由一小群同胞，包括T.E.劳伦斯，非常努力地去补救。

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贱人只有赛克斯一个。在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方面，这位业余外交家此时在中东还有很多技艺娴熟的竞争对手。

在赛克斯在开罗耀武扬威的同时，一个身披长袍的神秘人物正在叙

利亚西部一些城镇的集市和茶馆内东奔西走。他三十五六的年纪，说起话来特别轻声细气，从衣服的质地和他的古典阿拉伯语用词来看，一定是个家境富裕、很有文化的人。他面色苍白、眼睛碧蓝，大多数遇到他的人或许都以为这个旅行者是切尔卡西亚人[8]，这个山地民族发源于黑海地区，很多人的面貌几乎像北欧人。库尔特·普吕弗或许没有去纠正别人的这个错觉。他是在杰马勒帕夏授意下执行这些秘密任务的。他的目标是弄清楚叙利亚人民真正忠于何方。

到这年秋天，总督和他的德国顾问们都越来越深刻地感到，有必要对叙利亚民意做一个公正无偏见的评估。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的灾难性攻势有了渐渐平息的迹象，于是协约国在叙利亚海岸某处登陆的威胁再次浮现了。如果协约国在黎巴嫩登陆，那里的基督徒和德鲁兹[9]宗教少数派会作何种反应？聚居在黎巴嫩南面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会如何？在安纳托利亚，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活动烈度不减，叙利亚的很多犹太人都害怕自己是下一个目标。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是什么态度？杰马勒帕夏已经对法国领事馆文件中揭露的阿拉伯密谋者采取了措施，而且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一直令人惴惴不安，但是其他地区广大的阿拉伯群众的态度如何呢？

一连5周，普吕弗假借各种身份和装扮，在叙利亚各处漫游。途中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犹太殖民者、阿拉伯商店主、基督徒地主、西方化的贵族、贝都因人的谢赫和阿拉伯农民交谈。1915年12月初，这个德国间谍觉得自己已经为叙利亚地区把好了脉，可以将发现的结果向杰马勒和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汇报了。

简单地讲，他认为，对奥斯曼政府最为不满的是基督徒。他相信，几乎所有基督徒都私下里支持协约国。但普吕弗认为这些基督徒的威胁很小，既是由于叙利亚基督徒人数很少，也是因为他们虽有“叛逆的本领”，但“生性怯懦，无力实现自己的梦想”[10]。

据他判断，威胁更大的是犹太人，尤其是其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普吕弗写道，“虽然犹太复国主义官方声称自己的意愿仅仅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显然是撒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的犹太国家，协约国的胜利显然比同盟国胜利更有利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但普吕弗认为也不值得为犹太人紧张，原因和基督徒是一样的：“犹太人天性胆小和消极被动，除非敌军已经入境，绝不敢发动颠覆行动。”

这位德国间谍在阿拉伯人身上看到的东西非常令人振奋，阿拉伯人也是这三个族群中人口最多的。普吕弗认为，部分是由于杰马勒对有分离主义嫌疑的阿拉伯领袖采取的“公正而严厉”的措施，阿拉伯独立运动已经大大削弱了。“在中产阶级，几乎找不到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他写道，“构成人口主要部分的小地主、商人和工人似乎是支持政府及其事业的。”普吕弗以他一贯的尖刻口吻分析说，即便某处爆发了阿拉伯起义，也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群众是轻佻无聊的”。

但在给出这种乐观评估的同时，普吕弗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如果英国人真的在叙利亚登陆，群众隐藏于胸的对协约国的支持就会浮出水面。在那种局面下，入侵者一定可以找到愿意与他们合作的当地人。普吕弗为杰马勒提供了一份“不可靠分子”的长名单，主要是有名望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党的全部领导人”。一旦协约国军队登陆，就要立即将这些人流放。

这最后一条建议让德国大使馆大惊失色。就在这年8月，杰马勒利用从贝鲁特的法国领事馆查获的文件，在贝鲁特的一个主要广场上处决了11位著名的阿拉伯领袖。这种事情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愤怒的浪涛，德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一名情报军官向叙利亚总督的死亡名单提供更多的名字。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将普吕弗的报告发送给柏林的外交部的同时表示，自己向普吕弗发出了如下的警告：“稍不慎重，群众

就会指控是我们造成了诸如流放的严刑峻法。将来向杰马勒提出类似建议时，请务必谨慎、克制。”[11]

这番告诫可能来得太晚了。拿到了普吕弗报告的叙利亚总督似乎得出了结论，他解决问题的灵活手段——没有明显规律地以胡萝卜和大棒轮番出击——是智胜越来越多的敌人的最佳策略。12月18日，他命令对法国领事馆文件涉及的人进行一番更大规模的搜捕，这张大网最终抓住了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大约60名阿拉伯知识分子。

这些逮捕或许让杰马勒的心情好了许多，因为另一个越来越可疑的人——亚伦·亚伦森在1月拜访他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时，杰马勒显得非常宽宏大量。

间谍船始终没有来。

1915年11月8日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一线月光，押沙龙·法因贝格终于搭乘一艘英国间谍船返回了阿特利特的海岸。他立刻将好消息告诉了欣喜若狂的亚伦·亚伦森：他已经和英国人取得了联系，英国人正在急切地等待他们能够传递的任何情报，并且已经做了相应的安排。

间谍船计划于两周后返回，于是两人立即开始进行长距离的侦察，来更新自己的信息。亚伦森北上，法因贝格南下。他们打着为农业研究站做科学调查的旗号，偷偷地记录土耳其军队的新营地、补给站和战壕工事的位置，跟踪火车和部队的运动，在笔记本上以蝇头小字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任何有可能对英国人有用的信息。

但当他们返回阿特利特，在预定接头的当晚等待时，间谍船却没有露面，第二天、第三天的夜晚依然无影无踪。亚伦森和法因贝格一直等到12月初，越来越困惑不解和心急火燎。显然出了什么差错，但他们等

得越久，他们的夜间活动就越容易被土耳其民兵的夜间巡逻队发现。但如果他们放松每晚的守夜，就有可能与英国间谍船失之交臂，英国人或许就会认为这些密谋者变了卦，或者已经被捕，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

性格急躁的法因贝格对间谍船已经绝望，于是到12月8日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新计划：他要混过云集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土耳其大军阵线，穿越西奈半岛的无人地带，抵达另一端的英军战线，与其重新建立联系。如果遭到土耳其巡逻队拦截，他就自称是在为抗蝗灾做实地考察工作。这种借口还是比较可信的。就在几天前，又有一大群蝗虫出现在朱迪亚地区，这是自春天以来的第一群蝗虫；亚伦森判断，这个蝗群是从埃及通过西奈半岛陆桥来的。这个计划还是非常冒险，但亚伦森自己也急于同英国人取得联系，于是同意了；法因贝格于当晚出发南下。

不久之后，又有了一件新的让人着急上火的事情。在君士坦丁堡，亚伦森的妹妹萨拉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想办法摆脱不幸福的婚姻，回到巴勒斯坦的家人身边。11月中旬，她的丈夫长期出差，她又得知一名犹太救济官员很快将离开君士坦丁堡、对犹太人定居点进行视察，于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她恳求这名官员带她一起去，于是在11月26日，25岁的萨拉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火车，开始了漫长的返乡之旅。

关于安纳托利亚乡间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的恐怖传闻已经广为流传了好几个月，但糟糕的通信和严格的审查使得奥斯曼政权得以很好地遮掩了暴行的严重程度。但旅行经过屠杀场的人就可以目睹这些惨景了。12月16日，萨拉·亚伦森在巴勒斯坦与哥哥团聚，此时她已经被沿途的所见所闻深深震撼。农学家后来记述道："她看到铁路两侧堆着成百上千亚美尼亚男女老少的尸体。有时能看见土耳其妇女翻检死尸，寻找值钱的东西；有时能看到野狗在吞食死人。那里有数百具惨白的骨骸。"萨拉说，她经历的最恐怖的一个插曲是，她的火车开到一个偏僻火车站的时候，数千名饥肠辘辘的亚美尼亚人包围着火车。在疯狂踩踏

中，十几人倒在车轮下，火车售票员看了哈哈大笑。萨拉看了这可怕场面当场晕倒，苏醒后却有两名土耳其军官训斥她不爱国。[12]

亚伦·亚伦森在旅行时也早就听说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恐怖传闻，但一直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叙利亚永久转动的造谣机器的成果。自己的妹妹亲口证实，并且得知屠杀仍在进行中，这让一切都显得极其丑恶和真实。这也让农学家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个可怖的问题：下面轮到谁了？如果青年土耳其党能够对境内的200万亚美尼亚人大开杀戒，要消灭区区8万犹太人岂不是易如反掌？

然后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在西奈半岛，押沙龙·法因贝格被土耳其军队的巡逻队拦住。他的抗蝗灾考察的幌子没有奏效。他们怀疑他是奸细，于是将他押回了贝尔谢巴。1月初，他被转移到耶路撒冷的监狱候审；如果法庭判处他犯有叛国罪——这是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指控——法因贝格无疑很快就会上绞刑架。

为了营救同志，亚伦·亚伦森于1月12日下午来到了杰马勒帕夏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农学家觉得，哀求开恩或者自称无罪或许无济于事，于是仍然动用辜负了法因贝格的那个托词：蝗虫。他告诉杰马勒，为了治理新的灾害，他要重新担任抗蝗灾项目总监（八个月前，出于对政府干预的愤怒，他辞去了这个职务）。但亚伦森有一个条件：他必须要他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助手，一个叫作押沙龙·法因贝格的年轻人为他服务，而此人前不久在西奈由于误会被捕了。[13]

按照杰马勒的命令，法因贝格很快从耶路撒冷的监狱被释放了。这两个一心要当间谍的人肯定不会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与英国人建立联系的漫长而徒劳的努力仍然毫无进展。

没人能掌握全局。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和通信的困难，英国政府的不同部门都与不同的战时盟友——或者是他们希望能够转变为盟友的人

——谈判，直到一切都太晚的时候才意识到，如此达成的协议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这倒不是由于刻意欺骗，而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内部沟通不畅的例子。

对于1915年和1916年间英国就中东问题与多方达成的秘密协议造成的混乱，历史学家大多是上面这样的看法。还有少数历史学家认为，其实当初根本不存在什么混乱。这些五花八门的协议中遍布精心选择的修饰语和条件语，都是为了让炮制协议的人洗脱背信弃义的罪名。已经有很多著作（足以摆满一个大书橱，压得它咯吱呻吟）致力于消除这些狡诈的辞令，揭露现象背后的本质。

事实上，第一种观点完全是凭空捏造，而第二种观点则过于强调人性恶，就好像为了减轻撒谎的罪过，诺言就不是诺言了似的。英国内部沟通不畅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是由于政府高层的一小群人做了很大努力去确保沟通不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设置了迷宫般错综复杂的信息防火墙——说得直白些，就是故意欺骗——来确保英国的战时盟友，甚至英国自己的很多高级外交官和军事指挥官都对关键信息毫不知情。

颇为讽刺的是，大英帝国的“王冠宝石”——英属印度就是最早受到这种待遇的实体之一。

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演化为一个独特的殖民主义恒星系，各个主要的行星相对于“恒星”——英国——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印度尤其是这样，在西姆拉的英国当局（通常就被称为西姆拉，尽管西姆拉只是英属印度当局的夏季首府）有着自己的内政方针，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如果说英属印度和伦敦的关系有些疏远，它和英属埃及的关系就是彻底的冷若冰霜，尤其是它得知开罗与埃米尔侯赛因在1915的谈判之

后。自1858年建立英属印度政权以来，阿拉伯半岛就被视为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的管理者们不愿意接受埃及这个姗姗来迟者的干预或是意见。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群，多达约8000万人，就在印度，这个数字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穆斯林人口的四倍。西姆拉的官员们向伦敦指出，鼓励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地区发动起义，并许诺给当地人自治或独立，同时却在穆斯林世界的另一个地区冷酷无情地镇压为了同样目的而发动的起义——英属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1915年秋季，开罗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谈判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西姆拉在伦敦发动了一场激烈反击，对秘密谈判极尽攻击之能事，攻击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到了10月底，也就是伦敦和开罗的官员努力起草对侯赛因的极高要求的回应时，基钦纳勋爵决定不准印度参加讨论。直到答应了侯赛因大部分要求的回复已经发送出去之后，开罗当局才将这个令人震惊的新进展通知印度总督[14]，并给出了一个苍白无力的借口：时间太仓促，没有来得及请教他。

印度被排除在了谈判之外，埃米尔侯赛因就做了一笔非常有利的买卖，或者说他是这么认为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在10月24日的关键信函中宣称，除部分调整之外，“英国准备接受和支持麦加的谢里夫要求的边界之内所有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独立”。两人在随后的信件中就这些提议的调整讨价还价——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英国要求在伊拉克的产油区巴格达和巴士拉保有“特别行政安排”，并将叙利亚的西北角从协议中排除出去。但埃米尔侯赛因有理由相信，英国人许诺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几乎囊括整个阿拉伯半岛，东至波斯边境，北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腹地，西至地中海和埃及边境。

但侯赛因可能没有注意到，麦克马洪在信中插入了一个不显眼的条件从句：这些诺言仅在“英国可以自由决断，而不危害其盟友法国的利

益时”生效。换句话说，如果法国人对协议的某些方面有意见，他们就有可能否决英国人对协议的认可。[15]

英国人当然知道，法国人极有可能对协议有意见。[16] 1915年夏天，法国驻英国大使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一清二楚地阐明了法国对近东的领土要求，其中就包括整个大叙利亚，也就是英国人向侯赛因许诺的土地。

如何绕过这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呢？英国人决定，根本不要告诉法国人，自己和侯赛因签下这个协议再说。11月底，法国外交官被邀请到伦敦来商讨法国对近东的愿景。法国人重申了自己的领土主张，他们希望得到几乎整个近东：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内地、美索不达米亚。英国官员虚伪地对法国人的要求表示惊诧。[17] 于是，史上最诡异——时隔几十年看来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外交协议之一——《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舞台就搭好了。

1916年1月初的几天会议上，两名中层外交官——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巧合的是，他就是曾经的法国驻贝鲁特领事，就是他和阿拉伯异见分子秘密通信，而这些文件后来被杰马勒帕夏的秘密警察破获——炮制出一份未来中东的地图，这地图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设想大相径庭。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刺激了英国的胃口，于是真正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将大体上仅限于阿拉伯半岛的荒漠，而法国直接控制大叙利亚，英国占领整个伊拉克。另外，内陆的两大块区域，即侯赛因的汉志王国以北和内陆的全部地区，将受到英法两国的间接控制，有半独立性，但英法两国享有“优先贸易权”。在这两个所谓的A区和B区飞地，谈判者的玩世不恭最为暴露；赛克斯和皮科都不相信阿拉伯人真有自治的本事，于是他们大可以空口白舌地许诺这两个飞地的独立，而深知它们肯定会成为英法两国的附庸国。两位外交官在闲暇之余甚至为巴勒斯坦安排了一个新的未来。巴勒斯坦不会成为未来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

——由于麦克马洪在他向侯赛因提议的修订中不曾提及巴勒斯坦，所以它理应属于阿拉伯国家——而将由法国、英国和俄国共同管理。[18]

当时，皮科不可能知道他的领土要求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要求抵触程度有多大，因为他的英国同僚根本没有告诉他。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1916年1月初的关键日子里，也就是中东的未来版图被决定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既知道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全部细节，也知道即将成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他应当能理解，阿拉伯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该地区的目标已经水火不容。这个人就是马克·赛克斯。

如果赛克斯真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却没有说出来。现在他和皮科的协定意味着必须建造起新的防火墙，不仅要瞒住埃米尔侯赛因，还要欺骗在埃及的那些知晓与侯赛因的协定且作风老派、恪守信誉的英国官员。正如英属印度在1915年秋季被排挤出去一样，在1916年春季，协约国在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之时，英属埃及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开罗当局不断询问英法协定的进展情况，赛克斯和伦敦的其他官员只告诉他们，谈判正在进行，在作出最终决定前一定会征询埃及的意见。结果，直到1916年5月，开罗方面才有人看到《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复本，此时它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英法俄三国内阁均已核准此项秘密协定。T.E.劳伦斯回忆说，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军官们最终读到协定文本时，无不大惊失色、深恶痛绝，有作呕之感。[19]

但对1916年冬天的劳伦斯来说，这一切都还是未来。在萨沃伊饭店的办公桌后，他继续“刷洗瓶子”、绘制地图和进行“文牍战争”。

在文书来往方面，他的工作颇有些荒诞色彩。至少在过去，他在文牍战争中的敌人是阴险奸诈的法国人；现在的对手却是英属印度的同胞们，这些人持续不断地耍出阴谋诡计。西姆拉方面显然认为，在埃米尔侯赛因正儿八经发动起义之前还有希望将英国与他的协议撕毁，于是在

伦敦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警告说侯赛因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以及一旦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受鼓励建立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灾难（如果西姆拉方面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忧虑了，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在劳伦斯看来，这场持续不断的扯皮的奇怪之处是，在1916年冬季，印度在自己的疆界之内的烦恼已经够多了。

至少在秋季，西姆拉还有资格说是自己，而不是英属埃及，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印度远征军在战争初期轻松地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油田，在此基础上，远征军的司令官在1915年4月派遣了一支2万人的部队，沿着底格里斯河挺进。查尔斯·汤森将军不屑与当地的阿拉伯部落结盟，更不要说侈谈什么自治或者独立了。他率军遵循着英国军队的光荣传统——奋力拼杀、一往直前——连战连胜，到10月已经兵临巴格达城下。这样看来，西姆拉主张的正面猛攻的战略比开罗鼓吹的奇异而具有煽动性的争取阿拉伯民心的策略要更有吸引力。

但局势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汤森的部队没能胜利攻入巴格达，而是在11月底在市郊遭到顽强抵抗，陷入僵局，损失惨重。汤森的补给线拉得太长，短期内又无法得到援兵，于是沿着底格里斯河后撤了100英里，来到河畔小镇库特。到1916年2月，驻扎在库特的英属印度军队据说遭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围攻——英属印度不肯说得更具体些——而一支援军正在沿底格里斯河前进，去援救汤森。

尽管如此，西姆拉仍然继续窃窃私语地反对开罗及其对侯赛因的支持。侯赛因领导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对英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会有怎样的影响？伦敦方面对此产生了忧虑，而印度方面更是对这种忧虑煽风点火。1月末，劳伦斯写了一份长篇报告《麦加的政治》，试图缓和伦敦的担忧。劳伦斯或许是量体裁衣，专拣英国领导人想听的说。他指出，独立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太荒谬了，因为“如果处置得当，阿拉伯人仍然会处于一种政治的马赛克当中，各个小国之间互相嫉妒，

不可能团结一致”。[20]

2月，印度似乎要尝试一下相反的策略：贬低侯赛因。他们在《中东情报公报》——一份仅供高级将领和民政高官阅读的高度机密的情报摘要——中插入了一篇与一个叫作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人的访谈。此人是阿拉伯半岛东北角的一位贝都因酋长，他说侯赛因“从根本上是个无足轻重和反复无常的人”，并明确表示，他自己和其他大多数阿拉伯部落酋长都绝不会听从侯赛因的领导。伊本·沙特说，即便侯赛因冒险自封为哈里发（伊斯兰世界最高的政教合一领袖），“他在众位酋长间的地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他们绝对不会比现在更顺从他的控制”。[21]

对劳伦斯来说，这篇访谈标志着开罗与西姆拉之间竞争的新的，而且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升级。因为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不是一个希望保住自治权的普通的贝都因不满分子，而是侯赛因在整个阿拉伯半岛最强悍的竞争对手。伊本·沙特在过去的15年中笃信一种叫作瓦哈比派的极其严格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教派，率领他的沙漠战士们凭借一种宗教狂热攻打了一个又一个不服管教的阿拉伯部落。瓦哈比派的纪律是非常传奇的；这时，伊本·沙特的势力范围已经从利雅德的一连串沙漠村庄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广大区域。他也是英属印度在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双方的盟友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前。

在劳伦斯看来，西姆拉利用《中东情报公报》来支持一个与英国价值观南辕北辙的人，已经非常糟糕；但西姆拉的这个花招还突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如果它不是这么险象环生的话，几乎是荒唐可笑的：在争夺阿拉伯政策上风的斗争中，英国政府的两个分支居然分别支持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这不像是成功的阿拉伯起义的催化剂，倒像是内战的导火索——当然，或许西姆拉的真正目标一直都是挑动阿拉伯人内讧。

劳伦斯写了篇文章，反驳伊本·沙特的访谈（劳伦斯的这篇文章同样也被分发给英国政府高层），指出伊本·沙特和他的瓦哈比派尽管摆出伊斯兰改革者的姿态，但“带有清教徒的所有狭隘偏见”[22]，远远不能算是伊斯兰教的代表。正如他在《麦加的政治》中已经警告的那样，瓦哈比教派是些思想还留在中世纪的边缘分子，“如果该教派取得优势，麦加和大马士革的宽容温和的伊斯兰教就会被内志的狂热所取代……而且这狂热将因成功而愈发强烈和膨胀”。[23]

正如劳伦斯的其他许多预测一样，他关于伊本·沙特和瓦哈比派的警告最终也被证明是正确的。1923年，伊本·沙特将征服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为了纪念他的氏族，还将它命名为沙特阿拉伯。在随后的90年中，枝繁叶茂且奢侈放荡的沙特王室将会用金钱收买那些帮助他们夺得王权的瓦哈比派，资助他们的活动，条件是他们的圣战活动必须在国外开展。这种局面的最著名产物就是一个叫作奥萨马·本·拉登的人。

但在当时，由于更为紧迫的局势发展，劳伦斯反对英属印度的口水战被暂时搁置了。这年3月，他被选中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它与英国人的荣誉观念格格不入，因此历史书里大多对其真实性质缄口不提。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英属印度制造的一个灾难——一系列事件在1916年3月8日清晨达到了丑陋的结局——这项任务才非执行不可。

这天早上约6时30分，芬顿·艾尔默中将（未来的第13代多纳迪亚从男爵）得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他的部队向伊拉克中部城镇杜杰拉前进的夜行军过程中，第36印度步兵旅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24]该旅部分单位没有停在事先指定的位置等待敌人黎明的炮击结束，而是继续穿过荒芜的杜杰拉平原，径直闯入了土耳其人的前线。更具体地说，他们径直闯入了通往“要塞”的道路。要塞是一座40英尺高的土制堡垒，居高临下地俯瞰周边的平地，是土耳其军队防御工事的一个据点。

看上去迷途的英印军队要惨遭屠杀了，但事情没有往那个方向发

展。那天早上出现在艾尔默司令部的传令兵报告称，要塞或是被遗弃了，或是只有极少数士兵把守；第36印度步兵旅已经来到了要塞门前，唾手可得。

在艾尔默驰援被围困在库特的汤森将军的漫长而血腥的战役中，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此时他离库特已经只有8英里。要塞传来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之后，现在他不仅有机会在杜杰拉战役尚未打响之前就赢得胜利，而且可以救赎此前两个月的一连串严重失误。

到1916年3月，欧洲各国军队已经发展出了攻打掘壕据守敌人的一种机械的做法：对敌军前沿阵地进行持续炮击，按照预定攻势的规模不同，炮击可能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然后步兵冲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这种战术在每一步都问题重重。这种炮击大多只能造成很轻的伤亡，因为守军可以简单地撤到靠后的战壕内，或者，在西线的更为复杂的战壕体系中，守军可以撤入固若金汤的地堡，来等待炮击结束。而且，这种炮火准备等于是向守军发出了警告，告诉他们攻势即将开始，以及将会从何处开始。

炮击停止后，进攻方的步兵就爬出前沿的集结战壕，开始跨越无人地带。但不幸的是，炮击结束等于是通知守军，地面攻势即将开始，于是守军就可以快速返回自己的前沿战壕，在进攻方接近的时候将其扫倒在地。到1916年初，已经有几十万人这样死在欧洲各地的战壕工事中。

虽然这种战术在欧洲各种地形条件下都不成功，艾尔默中将显然找不到任何办法在伊拉克中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改进战术。艾尔默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汤森将军在攻打巴格达的战事中使用这种灾难性的战术，才陷入败局，需要他来救援。自艾尔默两个月前率领约两万名英国和印度官兵驰援库特以来，他已经三次在开阔地上向掘壕据守的土耳其人发动正面进攻。每一次，英印军队都最终获得了胜利，尽管是依仗兵力优势——他们的兵力是土耳其人的至少两倍——而且损失极大；

在最初两周里，援军已经伤亡约1万人，差不多是全军的一半。

但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高级将领们显然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很快又给艾尔默增兵约1.5万人，让他发动第二次攻势。到3月初，这支已经得到补充的军队推进到了杜杰拉的土耳其防线前，这是援军和库特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艾尔默从之前的战斗中至少是学到了一点教训，决定在夜间逼近杜杰拉的土耳其军队的炮火射程的边缘，拂晓时进行一次快速的炮击，然后向控制一马平川的平原的要塞猛冲。就在破晓前不久，他的火炮正在被静悄悄地装上前车、拖运到指定阵地准备炮击的时候，他得知，第36印度步兵旅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但芬顿·艾尔默显然不喜欢意料之外的事情，哪怕是惊喜他也不喜欢。他与麾下的高级指挥官们匆匆会商一番后决定，现在就占领土耳其要塞离已经设定的作战计划偏差太远，无法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他命令第36印度步兵旅撤离要塞，返回英军主战线；等到炮火准备结束之后，部队再重新穿越平原，再一次占领要塞。

英军炮击终于开始的时候——不是预定的黎明时分，而是早上8点——出其不意的良机已经丧失，土耳其军队匆匆从河对岸派兵进入了杜杰拉要塞。又过了一个小时，英军的正面攻击才展开。很快，又有4000名大英帝国将士倒毙在无人地带，没有一个人能够抵达要塞。

杜杰拉战役是英军援救被围困在库特的同袍的最后机会。在此前两个月内，为了援救1.2万人的部队，援军已经损失了1.4万人，[25] 而且这还不算完。芬顿·艾尔默在杜杰拉战役三天之后被解职，送到后方基地工作。可能政府高层也发现了，艾尔默在伊拉克的表现时好时坏，他还企图遮掩杜杰拉要塞惨败的不端行为——他的官方作战报告中不曾提及第36印度步兵旅的报告——他的骑士爵位授予一直被推迟到1922年。[26]

在杜杰拉惨败之后，在库特的汤森部队的局势愈发恶化——报告显示，守军的口粮到4月中旬就会告罄，于是基钦纳勋爵开始筹划一个绝望的计划。1916年3月22日，“皇家乔治”号客轮溜出了苏伊士港的锚位，南下进入红海，开始了绕过阿拉伯半岛、前往伊拉克南部的14天旅程。T.E.劳伦斯就在这艘船上。他携带着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给英属印度在伊拉克的政治主官珀西·考克斯爵士的介绍信。

“亲爱的考克斯，”信中写道，“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劳伦斯上尉。他今天奉陆军部的命令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在阿拉伯事务上提供服务。他是我们这里情报部门最精明强干的成员之一，对阿拉伯问题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我坚信，你一定会感到，此人可堪大用。我们这里失去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都感到非常遗憾。”

> 我希望你那边一切顺利。我们心急火燎地等待汤森得到救援的捷报，但是很久都没有得到任何音讯。[27]

劳伦斯的任务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则是高度机密。有鉴于库特的危机，基钦纳和他在埃及情报部门的朋友们希望，在伊拉克的英属印度指挥官们能够最终认清形势，尝试与当地的阿拉伯部落合作，毕竟这些人一开始就应当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基钦纳的计划是派遣一群从土耳其军队变节、转而为英军效力的伊拉克籍阿拉伯军官，让他们与伊拉克当地的部族领袖结盟，并策反奥斯曼军队里心怀不满的阿拉伯单位。

但要用这种策略挽救汤森肯定是来不及了，所以劳伦斯才有第二个秘密的使命。按照基钦纳本人的命令，劳伦斯要努力向围攻库特的土耳其指挥官行贿，要他放汤森的部队一条生路，价码是价值100万英镑的黄金。

这种可耻的做法在英国军事史上几乎是前无古人，如果劳伦斯对这

个可耻的任务不满，也并没有吐露于言表。而且他在前不久又两次领略了军方的浮夸和虚伪。

一年半以前，他神奇般地从平民一下子变成了少尉，仅仅是因为到访总参谋部的将军要求找一个军官来向他做报告。现在，劳伦斯的上级又火速将他晋升为上尉，从他出海的第一天生效，或许是为了避免伊拉克的高级将领被迫与区区一个少尉商谈的尴尬局面。

就在他登上“皇家乔治”号的四天之前，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困惑的事情。3月18日，法国驻开罗的小型军事代表团暂时应召回国，于是遵照欧洲列强悠久的军事传统，双方借这个机会慷慨地大肆互赠勋章、互相吹捧。即将启程的法国代表团不可思议地选择了一直努力挫败法国在该地区野心的劳伦斯，授予他荣誉团勋章，这是法国最高级的军事荣誉之一。他们一错再错，在次年又授予他战功十字勋章（加挂棕榈叶）。

劳伦斯在战争生涯中获得过一些勋章和勋带，但他生性鄙视这些东西，要么随手一扔，要么根本懒得去领取。但他对战功十字勋章破了例；据他的兄弟说，他在战后曾将这枚勋章系在一位朋友的狗的脖子上，牵着它在牛津招摇过市，以此为乐。[28]

4月5日，“皇家乔治”号悄悄驶入沉闷、低矮的港口城市巴士拉。皇家海军的一艘快艇前去迎接船上最重要的客人——新晋的T.E.劳伦斯上尉。

劳伦斯在巴士拉很快发现，他到伊拉克的公开使命——劝说英属印度指挥官们与当地部落联手——已经不战自败。在他还在海上的时候，在伊拉克的印度远征军新任总司令珀西·莱克将军在发往伦敦的一系列电报中称这个计划“不可行、不方便”[29]。

但劳伦斯在巴士拉的最初几天与领导层会商时发现，让他的政治使

命注定完蛋的是另一个更为阴险的因素：种族主义和英国人在军事上的优越感的危险融合。尽管前不久在加里波利遭遇了惨败（或者恰恰是由于这次惨败），很多英国高级指挥官就是不肯接受他们可能会又一次输给奥斯曼军队的“乌合之众”。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并非仅限于英属印度那些目光狭隘的将军们，而是普遍现象，甚至在伦敦的英军最高统帅威廉·罗伯逊将军那里也不能免俗。艾尔默的援军被击败之后，围攻库特的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哈利勒帕夏向汤森提出了慷慨大方的劝降条件，罗伯逊得知此事后说：“据我所知，土耳其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我认为，哈利勒贝伊的提议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军只要坚决努力，必然取得胜利。”[30]

英军高层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军事和文化上的劣等民族，在他们的这种扭曲的世界观里，条件体面的劝降只能说明敌人的虚弱，而两次援救的惨败表明第三次一定能成功。

4月15日，劳伦斯被送往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前线指挥部，此时第三次援救行动已经展开。在杜杰拉的大败之后，指挥部来了一次大洗牌。乔治·戈林奇少将接替了艾尔默。但不幸的是，军事策略依然照旧。戈林奇和他的前任一样，热衷于正面进攻掘壕据守的敌人，几乎是完全复制了艾尔默第一次救援的记录——伤亡1万人，没有取得突破——而且花的时间也几乎和艾尔默一样，都是两周左右。

这最后一次失败让劳伦斯在“蛇蛉”号（英军指挥部所在的船，停在库特下游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尴尬停留宣告结束。船上的军官们得知了他的秘密使命——尝试花钱赎回库特守军，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躲着这个来自埃及的年轻上尉。此时，援军在九场战斗中一共损失了约2.3万人，始终未能接近库特，而被围困在库特的守军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负责此役的将军们终于承认，基钦纳的计划几乎是剩下的唯一选择。

虽然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最后关头，还有时间耍一场闹剧。汤森将

军和希望援救他的将军们都不愿意跟这个可耻的事情扯上关系，在4月的最后日子里，汤森和莱克将军通过电报来回拉锯，拼命争吵，都敦促对方去与敌人谈判。最后，做最后努力去挽救库特的濒临死亡的官兵们的是三位下级军官——爱德华·比奇上校、奥布里·赫伯特上尉和T.E.劳伦斯上尉。

这场景酷似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31]：风流倜傥、帅得过分的年轻贵族，必不可少的一群卖弄风骚却秉性贞洁的女士，冷血的大恶人，甚至还有纯真无邪、稀里糊涂的异乡客，在历经周折坎坷之后，他们将为故事提供带有道德教诲的结局。战时耶路撒冷的小型外国侨民团体与剧中人不同的是，如果站错了队伍，就将付出监禁、流放，甚至处决的代价。当然，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客厅窗外不是风光宜人的英国乡村，也不是时髦的伦敦大街，而是一座死神肆虐的城市，大街小巷躺满了饿死或者患伤寒而死的人，广场上常常立有挂着死尸的绞刑架。

对威廉·耶鲁来说，这种生活非常诡异，观察别人就好像在看金鱼缸里的鱼一样。他没有多少正经工作可做，于是几乎每天下午都同一群身份五花八门的牌友——一位希腊医生、一位亚美尼亚医生、一位退役了的土耳其上校，还有耶路撒冷城的希腊主教——打桥牌，晚上则在多位中年外国侨民女士的沙龙里与更多人聚会，消磨时光。在这些晚会上，大家主要是跳舞和玩室内游戏，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的活力。留在耶路撒冷的外国人当中很少有单身女性——对任何一位单身女子的注意力很快会被理解为结婚的兴趣——于是单身汉们公然与参加晚会的太太们调情逗乐，争风吃醋，往往是在这些女士的丈夫们的视线之内，甚至是在他们的默许之下。这种行为是相当纯洁无邪的。

耶鲁成了亚历克西·弗雷夫人——一位美艳的中年法国妇人，在耶路撒冷城的沙龙社交界地位极高——的宠儿，这时才发现战时的耶路撒冷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纯洁无邪的。耶鲁的受宠让他的一个竞争者——

一位中年阿拉伯基督徒，是叙利亚的土耳其烟草专卖局的老板——非常恼火，于是他有一天把耶鲁拉到一边，提了一个建议。“要不然这样，我们两个分一下耶路撒冷的女士们，”这位商人说道，“我就要弗雷夫人，其他的全归你。”

耶鲁起初以为这是个玩笑，但后来去烟草专卖局购买每月配额的香烟时，那里的职员却告诉他，他们得到了命令，不准卖烟给他。他这才感到，对方是认真的。这很成问题，因为在战时的耶路撒冷的确只有在专卖局才买得到烟草制品。不久之后，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告诉耶鲁，他的情场对手正在搞阴谋，要整他。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敌手是个爱吃醋、无所顾忌的人，为了除掉竞争对手，会无所不用其极。”耶鲁回忆道，“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与土耳其官员和当局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我感到自己在玩一个危险游戏。我决定让弗雷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告诉她，让这位先生滚蛋，否则就和她玩完。”

弗雷夫人解释说，专卖局的这个人地位很高，得罪不起，于是我们的美国石油勘探家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弗雷家的沙龙。耶鲁的男仆，一个叫作穆斯塔法·哈尔普特里的头发灰白的库尔德老人，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老爷，”他给耶鲁出谋划策，“我知道这个猪猡每天晚上去哪里，你只消一句话，我就把他解决掉。”哈尔普特里解释说，专卖局的这个人每天午夜都会从某个女人的家里走出来。“那条街很偏僻。你只要下命令，我今晚就把他做了。”

耶鲁拒绝了这个建议。不久之后，他的朋友们就安排他与亚历克西·弗雷和好。这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城里施行了军法管制，条令非常多，仇人很容易找到几乎无穷无尽的机会来报仇。弗雷家的晚会违反了宵禁，于是在下一次晚会的时候，警察查抄了她家，逮捕了一半客人，据说警方得到了吃醋的烟草专卖局老板的线报。

这个插曲让耶鲁感受到，他现在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游戏。这场游戏的最高仲裁者当然是杰马勒帕夏。他只要一句话就能把几乎任何人投入监狱，或者不经审讯就放逐到叙利亚荒原的某个鸟不拉屎的小村子。不过他反复无常，很可能很快又把犯人释放或者召回。

耶路撒冷的外国侨民要与杰马勒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在关系不好时减轻受到的处罚，往往要仰仗两个人。第一个是英俊时髦的中立国西班牙领事安东尼奥·德·拉·谢尔瓦·德·巴约巴尔伯爵。他接管了几乎所有欧洲参战国的领事工作，消息灵通、神通广大。威廉·耶鲁和德·巴约巴尔伯爵的关系比较棘手：如果局势恶化的话，伯爵是个很好的盟友；但是在游猎耶路撒冷所剩无几的单身美女的竞争中，他又是最可怕的对手。

为了日常的安全保卫，耶鲁更有可能去找耶路撒冷社会的另一栋梁：一个叫作伊斯梅尔·哈克·贝伊·侯塞尼的风度翩翩的中年贵族，他是在1914年春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出售克恩纳布开采特许权的三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耶鲁于战前在巴勒斯坦长期居留时与伊斯梅尔·贝伊结下了交情。1915年，耶鲁回到巴勒斯坦后，两人又友善起来，到1916年春季，伊斯梅尔·贝伊已经是耶鲁在中东最亲密的挚友。而且，侯塞尼家族是整个南叙利亚最有钱有势和受人尊敬的家族之一，而伊斯梅尔·贝伊是家族里特别重要的一位成员。

外国侨民群体虽然有保护者，却也有危险的敌人。其中最令人生畏的是一个定期悄无声息地出入城市的年轻德国军官，叫作库尔特·普吕弗。巴约巴尔伯爵对普吕弗描述道，“尽管他外表无害，其实是德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而且“天赋异禀”[32]。普吕弗的轻声细语已经很诡异，但真正让他显得非常危险的是，他是唯一一个得到杰马勒帕夏不假思索的信任的德国人。如果得罪了库尔特·普吕弗，那么即便有巴约巴尔伯爵或伊斯梅尔·哈克·贝伊的力挺也无济于事。甚至杰马勒帕夏本人求情也没用。一天下午，耶鲁正在一对和他关系不错的外国侨民夫妇家

中做客，这时普吕弗和两名警察破门而入。这对夫妇自称是瑞士人，但她们其实是法国人，这在侨民圈子里是公开的秘密，杰马勒帕夏也知道。而普吕弗显然是刚刚知道这个情况。他要求将这对夫妇流放，杰马勒虽然不情愿，也只能签署放逐令。

1916年冬天，威廉·耶鲁对普吕弗的权威非常忌惮，因为他发现，他自己、这个德国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巴约巴尔，在争夺同一个女人——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姿色动人的美国犹太姑娘的芳心。这个姑娘担心自己的美国追求者会被逮捕，于是向耶鲁吐露，普吕弗经常向她盘问关于他和他的活动的情况。“显然，我受到了怀疑。”

在战时的叙利亚生存下去不仅需要一种精妙的自私精神，还需要铁石心肠。耶鲁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一连几个月，每天他在耶路撒冷城里活动时都要踏过死尸和濒死的人。每周他都听说有失宠的人“被消失”，其中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绞死。为了在这样的地方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他也越来越冷酷无情，最终甚至会攻击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让他后来感到非常尴尬的是，这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威廉·耶鲁背叛友情，是为了石油。

在1915年春季第一次觐见杰马勒帕夏之前，耶鲁决定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申购分两批呈交，因为他担心，一口气就狮子大张口地索要50万英亩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但问题是，他早就得到了第一批25万英亩的开发特许权，而没有开工，到1916年春季就没有勇气索要第二批25万英亩了。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改变局面，但突破口在哪里却是个大问题，尤其是杰马勒显然已经开始领悟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玩什么把戏了。1916年初，标准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购买大马士革周边几大块土地的特许权，甚至请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塞缪尔·埃德尔曼当他们的排头兵。但到3月，埃德尔曼与“该地区的最高层”——显然

是指杰马勒——商谈之后，却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发回了坏消息。“杰马勒说，他前不久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矿业部长告诉他，标准石油公司不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排除竞争。只要他们还对你们抱有此种怀疑，就无法获得新的特许权。”[33]

但在碰壁之后没多久，耶鲁应招前往杰马勒在德国招待所的司令部。有一个好机会自己送上门来。总督解释说，最近有前线军官向他报告，南部沙漠里一座山脚下有大片石油聚集成池塘状。杰马勒指出，既然这些石油已经漂浮在地表，立刻对其进行开采和精炼应当易如反掌。他请求耶鲁帮他一个忙，亲自去现场——贝尔谢巴以南的一座小山脉，叫作克恩纳布——勘察一番。

耶鲁当即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发现”其实就是J.C.希尔两年前从朱迪亚地区一座山坡上看到的地方，他和鲁道夫·麦戈文已经确定，那里只有铁尾矿而已。但现在不需要把这一点告诉杰马勒帕夏。标准公司的这位代理人说，他很愿意去勘察克恩纳布现场，但请总督帮忙再给他批一些土地。他要离开德国招待所的时候，帕夏同意再给他巴勒斯坦的25万英亩。

但耶鲁在为下一次购买特许权的远行做准备的时候，突然和他最好的朋友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发生了冲突。在前一年夏季，耶鲁第一次大规模购买特许权的时候曾恳求伊斯梅尔·贝伊一同前往，并向他含糊地许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会报偿他的服务；虽然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在这些特许区没有利益，但还是同意了。当然，这次合作对两个人来说都远远不只是为了友谊。耶鲁的其他随行人员都是些腐化堕落的军人和政府官员，有了伊斯梅尔·贝伊这样有文化的人做伴，会愉快很多；而且耶鲁也仰仗他结交甚广的朋友解决顽固地主或趁机敲诈的地方官可能造成的困难。从伊斯梅尔·贝伊的角度看，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显然要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在巴勒斯坦大搞开发，当然要尽可能地参与其中，分一杯

羹。

但在1916年晚春，耶鲁来找伊斯梅尔·贝伊帮忙去买地时，他却退缩了。在阿拉伯人的经商之道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伊斯梅尔·贝伊已经看够了美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知道耶鲁给他报偿的发誓赌咒一钱不值；他需要的是书面合同。面对这样的要求，耶鲁解释说，他仅仅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名收购代理人，没有权力签署这样的保证书，但伊斯梅尔·贝伊“如果想知道我的个人意见的话，他最好信任公司”。

这对伊斯梅尔·贝伊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书面保证，他不能帮助他。

这让耶鲁陷入了一个困境。他和伊斯梅尔·贝伊相识已经两年半，认识了他的全部七个孩子，而且经常在他的耶路撒冷宅邸用餐。像所有的真心朋友一样，两人也互相吐露了一些秘密：耶鲁告诉对方，他战前在耶路撒冷遇见了一个英国护士，希望有一天能娶她为妻；伊斯梅尔·贝伊则说出了自己对奥斯曼政府的鄙夷，尤其是对杰马勒帕夏的怨恨。让耶鲁的困难愈发棘手的是，侯塞尼家族在巴勒斯坦如日中天。伊斯梅尔·贝伊的亲戚遍布政府高层，所以如果得罪了他，就不仅仅是两个朋友分道扬镳那么简单了；如果伊斯梅尔·贝伊要和耶鲁作对，那么先前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敞开的所有大门就会被砰的一声紧闭了。

耶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看着他，说道：‘好吧，伊斯梅尔·贝伊，虽然我非常不愿意这么做，但如果你不同意和我合作的话，我就马上去找杰马勒帕夏，告诉他，你在跟我对着干，你是亲英分子，是站在英国人利益那一边的。’”[34]

这是威廉·耶鲁个性的一个戏剧性转变。1911年时，他为一位富裕的波士顿实业家工作。耶鲁的父亲已经破产，正处于绝望中，于是恳求儿子为自己引见这位实业家。耶鲁感到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安排这样的会

见是不道德的，于是拒绝了父亲。仅仅5年之后，耶鲁就为了一桩生意用死亡来威胁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不是死个痛快，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并且妻子儿女都会被流放、陷入赤贫。

但他的招数奏效了。“我一边等待他的回应，一边焦急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耶鲁回忆道，“他非常突然地答道：‘我会帮助你。我会信任公司。’后来，只要我还是公司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他就一直非常忠实地与我合作。”

哈利勒帕夏的司令部是一座圆形帐篷，离库特的前线有约4英里。三名英国军官被蒙上眼睛，心急如焚地通过无人地带，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终于被带进了这座帐篷。

哈利勒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强健，褐色眼睛目光炯炯，蓄着土耳其军官——其实是所有土耳其男人——都喜爱的八字胡。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荒凉，他却仍然保持着在君士坦丁堡的沙龙里培养出来的风流倜傥的气概。奥布里·赫伯特在战前曾担任驻奥斯曼首都的荣誉领事，和哈利勒相当熟识，于是以几句风趣话打破沉默。“我上一次见到阁下是在哪里？”赫伯特用法语问道。

哈利勒的记忆力显然很好。“是在英国大使馆的舞会上。”[35] 他也用法语答道。从这开始，对话严肃了起来。

这一天是4月29日，三名英国军官清晨就出发，爬过英军战壕前沿的壁垒，打着白旗走进无人地带。他们前方是600码的草地，野草有齐腰高，远处就是土耳其军队战壕的泥土护堤。他们走到大约两军战线之间的中点，停下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待土耳其方面发出回应。天气越来越热，他们周围满地都是腐烂的死尸，吞食腐尸的成群绿头苍蝇不断骚扰着他们。最后，三人被带到土耳其战线，蒙上眼睛，扶到马背上，被带去哈利勒的司令部。劳伦斯几天前坠马负伤，膝盖伤得很重，没办

法骑马；他被扶下马，仍然蒙着眼，由一名土耳其士兵牵着，跌跌撞撞地走了4英里，来到哈利勒的帐篷。

三人在早上踏入无人地带的时候，都深知自己的任务是非常可耻的。这次贿赂尝试丢人现眼，爱德华·比奇始终没有公开揭露任务的真实目的，劳伦斯只是极其隐晦地一笔带过，而奥布里·赫伯特甚至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也无法下笔。在前一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他们仅有的筹码是“汤森的火炮、交换土耳其战俘，还有另外一件东西”[36]。这样说已经非常含糊了，但最终仍然被认为太暴露；赫伯特的日记在战后出版时，这句话被删掉了。

但三位军官在哈利勒帕夏的帐篷里很快了解到，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其实还没有这么多。他们早上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汤森越来越精神错乱，突然同意无条件投降。然后他遵循军事常规，摧毁了自己剩余的火炮。这让一心想拿到这些火炮的哈利勒帕夏火冒三丈，所以比奇、赫伯特和劳伦斯的本钱就只剩下了黄金。

为了挽回一点颜面，英国军官们声称这些黄金是为库特的平民百姓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说，在五个月的围城战中，无辜的百姓蒙受的苦难和被困的英国士兵一样严重，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哈利勒帕夏一眼看穿了这套说辞，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

英国谈判者在要求交出伤员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库特守军已经投降，于是土耳其指挥官提议让英军轮船载着粮食过来，将伤情最重的伤员接走。土耳其人的让步令军衔最高的谈判者比奇上校有了些勇气，决定试一试他的最后一张牌：用英军自进入伊拉克以来俘虏的奥斯曼军人交换库特幸存的身体状况良好的英国战俘。

哈利勒带着狡黠的表情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用英国士兵一对一地交换土耳其士兵，印度士兵和阿拉伯士兵则单独交换。英国军官们不太

明白这个建议的用意如何，赫伯特指出，土耳其军队里的很多阿拉伯士兵打得非常英勇，哈利勒应该很高兴把他们换回去，这位土耳其指挥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哈利勒拿起被英军俘虏的战俘名单，指出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名字。“或许我们10个土耳其人中有1个是孬种或者胆小鬼，”他说，“但100个阿拉伯人中只有1个勇士……你们如果愿意，可以把他们送过来，但我已经判了他们死刑。我打算把他们绞死。”[37]

英国军官们认识到自己被耍了，于是抛下了这个话题。过了一会儿，哈利勒帕夏装腔作势地打了个哈欠，宣布自己累了，还有其他很多事务要处理。于是救回库特守军的最后希望也付诸东流了。劳伦斯、赫伯特和比奇被带离哈利勒的司令部，送到前线，但这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土耳其人邀请他们在一座营地过夜。劳伦斯在日记中尖刻地说：“他们以土耳其方式给了我们一顿极其丰盛的晚餐。”[38]

次日早上，三人被带到河边。在阳光下，他们看到一具又一具死尸被底格里斯河湍急的水流卷走。这些死人都是奥斯曼士兵，因霍乱、伤寒或战伤而死，他们的指挥官非常冷漠无情，将尸体丢入河中，而不是埋葬。

就在这一天，汤森率全军投降。他的部队和企图为他解围而惨遭屠戮的援军大多是印度人。英国指挥官们对他们抱有种族主义的歧视，将他们视为不值得怜惜的消耗品；而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中将遭受更严酷的待遇。大部分印度战俘被送到巴格达铁路上当奴隶劳工，在库特被俘的1万名印度士兵和随军人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战争结束。[39]

汤森将军的命运比较好。他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小岛的美丽别墅中度过了战争的剩余岁月。他可以使用一艘土耳其海军游艇，还经常到奥斯曼宫廷参加外交招待会。他的三只心爱的约克郡㹴狗也和他一起去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库特守军濒临饿死，这三只宠物狗却过得相当好。1916年10月，英国国王授予汤森骑士勋位，一些土

耳其政府官员向他发去了祝贺信。这说明，即便是在战时，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间仍然存在着同僚般的关系。[40]

4月初的一个早上，一名骑马的信使来到大马士革郊外的贝克尔农庄，传唤费萨尔·侯赛因去杰马勒帕夏在城里的官邸。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费萨尔在三个月前应杰马勒的要求返回了叙利亚首府，与总督有很多交道要打。但在这天上午，费萨尔抵达杰马勒官邸时，却发现这里的气氛非常诡异地冷淡和拘谨。

上了咖啡、宾主寒暄一番之后，杰马勒将一张纸推过桌面。这是恩维尔帕夏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报，讲到了统帅恩维尔刚刚从费萨尔的父亲（在麦加）那里收到的信。这封信比最后通牒更强硬：侯赛因发出警告，如果青年土耳其党希望继续与他为友，就必须承认他是汉志的世袭君主，并立即终止在黎巴嫩对60名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的审判。

这让费萨尔陷入了一个非常微妙和危险的境地。1月份他返回大马士革之后很快发现，自他上次到访以来，在叙利亚发动阿拉伯起义的成功概率已经大大缩减。由于杰马勒的清洗，起义的很多政治领袖已经被放逐或藏匿起来，而意图起事的军人在加里波利十死九伤。费萨尔已经向父亲报告了局势的变化，但从这份狂暴的电文来看，侯赛因还没有理解局势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根据杰马勒的记述，费萨尔对他说：“大人，您不知道我是多么难过。这份电文肯定是什么极大的误解造成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父亲没有任何恶意。”[41]

费萨尔把“误解”解释为他父亲对土耳其语的不精通。显然是某个书记员把他父亲的阿拉伯文书信翻译错了，搞成了与他父亲本意大相径庭的东西。这天早上，在杰马勒官邸，费萨尔提议向他父亲发电报，解释他的意思被误解了，无疑能让他父亲立刻收回这封令人气愤的信。

杰马勒帕夏虽然对侯赛因及其儿子们的阴谋诡计已经腻烦透顶，但很喜欢看费萨尔局促不安的样子。他向年轻的谢赫下了逐客令，自己给埃米尔侯赛因写了封信。他先解释为什么不能释放大马士革的被告——“政府如果宽恕叛国者，会被指控为软弱无力”——然后指出，现在是战时，国家的生死存亡悬而未决，实在不是侯赛因争取世袭头衔的好时机。这番好言相劝之后，他露出了獠牙：“我还想请您注意，假如政府仅仅是为了让您在我们当前的困难时期归顺，就答应您的要求，当战争胜利结束之时，谁能阻止政府对您施以严厉惩罚呢？”[42]

埃米尔侯赛因的土耳其语再差，也能理解这些言辞中的威胁。杰马勒为了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得斩钉截铁，很快把注意力转向黎巴嫩的作秀审判的被告们。尽管费萨尔不断求他开恩，他还是在5月5日签署了21名被判有罪的犯人的死刑令。次日清晨，死囚被押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广场，当众绞死。

这些处决和另外一个事件一起，终于让青年土耳其党和阿拉伯半岛的哈希姆统治者之间漫长而艰难的合作宣告结束。几周之前，杰马勒帕夏派遣了约3500名精兵到麦地那。他向侯赛因保证，这些部队是去也门（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但侯赛因并没有相信，而是怀疑这些部队是冲着他来的。在5月6日的处决之后，侯赛因认定，徘徊逡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于是命令费萨尔离开大马士革。

在费萨尔准备动身的同一时间，杰马勒帕夏接待了另一个有事相求的人——亚伦·亚伦森。在这位农学家再次担任灭蝗项目领导人的四个月中，他在出差经过大马士革的时候，经常到总督府来。他很高兴地报告杰马勒，第二批蝗虫没有产卵，所以在未来不会构成威胁；到3月底，蝗虫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当然他没有告诉叙利亚总督，他利用科学实地考察的掩护，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了一个犹太间谍网。

组建这个间谍网对亚伦森来说是件非常微妙和危险的工作。犹太人

中有一派积极支持同盟国，另一派秘密地支持协约国，而绝大多数人只想置身事外。但几乎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招致更多奥斯曼敌意的行为。甚至那些私下里祈祷英国人早些来的人也只愿意在英军登陆之后帮忙，现在要做任何事情对大家都太危险了。亚伦森和法因贝格非常小心翼翼地试探朋友和熟人，才招募了10几名志同道合、愿意现在就为英国刺探情报的人士。

但这还只是理论。在冬天，他们在阿特利特海岸多次看到英国间谍船，而且英国人甚至向岸上发送了信号，但由于一连串的噩运，双方始终未能建立联系。对亚伦·亚伦森来说，这个困境让他发疯。他们三次试图与英国人取得联系，三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法因贝格险些丧命。1916年初春，他想出了一个新主意。

他在旅行途中得知，土耳其军队急缺润滑油。其实，他很难不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没有润滑的车轴发出的刺耳尖叫已经成了巴勒斯坦持续不断的背景音乐。有一天，农学家在阅读一本科学期刊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说一些欧洲科学家已经设计出了将芝麻籽油转化为润滑油的方法。奥斯曼帝国的芝麻籽是极为丰富的，于是亚伦森在5月的一天来到杰马勒的大马士革官邸，提议让自己去德国学习这种提炼方法，以支持土耳其的战争努力。

此时，在奥斯曼帝国作任何旅行都需要许可证，而杰马勒帕夏正是少数有权批准亚伦森提议的这种旅行的人之一。总督当然是满腹狐疑。他并不真正信任亚伦森——其实他不信任所有的犹太人——而且前不久还出了亚伦森的助手在西奈半岛游荡被抓获的奇怪事情。让这样一个人脱离自己的掌心，哪怕是去盟国，也是风险很大的事情。

但是，杰马勒的军队奇缺润滑油，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似乎并不急着满足他的需求，尽管他已经在叙利亚给了他们面积惊人的特许开发区。总督以他一贯的唐突态度很快批准了亚伦森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许可

证；到了那里之后，科学家需要扫清更多的官僚障碍，才能前往柏林。但是亚伦森当然不打算留在柏林。他希望溜过德国边境，进入某个中立国，在那里与英国情报部门取得联系；至于具体如何找到英国情报部门，他还没想好。

5月11日，劳伦斯登上一艘英国运兵船，从伊拉克返回开罗。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有两个兄弟在这场似乎无穷无尽的战争中丢掉了性命。到1916年中，英国战争努力的山穷水尽已经在各条战线暴露无遗，而在东翼的表现特别明显。仅仅13个月内，英国就在“欧洲病夫”手下连吃败仗，损失了约35万人。三年前，巴尔干民兵和武装农民的乌合之众就能连续打败奥斯曼军队，而英国却被奥斯曼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这还不算完，他最近的经历在个人和历史的层面都在极大程度上揭露了英国的没落：挽救1.2万名濒临饿死、丢盔卸甲的士兵的徒劳努力，被迫参加向敌人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的行动，因为把士兵们投入绝境的将军们不愿去做这么有损尊严的事情。

劳伦斯从伊拉克回来之后，有了两个长期萦绕心头的想法。第一是英印军队狂妄自大、稀里糊涂地闯入伊拉克，不吃败仗才怪：“他们完全靠蛮力冲进巴士拉。在伊拉克的敌人几乎全是阿拉伯人，他们处于难堪的困境，即必须站在土耳其世俗主义压迫者的阵营，去对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解放者的英国人，而英国人却不肯扮演解放者的角色。”[43] 英印军队的指挥官们本来就有极强的优越感，轻松拿下巴士拉之后更是自我膨胀，不屑与当地人合作，甚至根本不愿意去建立一条防守得住的补给线，而是鲁莽地指挥部队沿底格里斯河而上，走向灭亡。劳伦斯后来说：“英国将军常常愚蠢地将自己在无知中得到的东西丢弃。”或许就是因为想到了英军在伊拉克的惨败。[44]

在更为哲学的层面上，劳伦斯从库特得到了对帝国主义事业的越来越深的憎恶。他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们为了这些东西付

出了太多的荣誉和无辜的生命。我和100名德文郡义勇兵一起沿底格里斯河而上。他们年轻、整洁而欢快，充满了快乐和逗女人儿童开心的本领。从他们身上，我深深感到，作为他们的亲人，作为英国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就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投入烈火，投入最惨烈的死亡，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是为了强占美索不达米亚的谷物、大米和石油……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臣属省份的价值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死了的英国人。”[45]

但劳伦斯决心不让一切都白费。在返回埃及的14天旅程中，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一份长篇报告，描述了自己在伊拉克耳闻目睹的一切，对英印军队的码头停靠和仓储系统、高级将领的庸碌无能、战略的愚钝不堪，统统毫不客气地狠批了一番。但他的这番努力仍然是徒劳。开罗军事情报机构的高级军官们读了劳伦斯怒火冲天的报告，并得知这份报告将要呈送给驻埃及英军的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认定这份报告太直言不讳，不能拿去刺激将军的神经；在报告被送给默里前不久，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劳伦斯的最直白的段落剪掉了，于是让库特的惨痛教训也付诸东流。这些审查者做得非常彻底，据信劳伦斯的伊拉克报告原本只有一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46]

1916年春季，英国在中东已经与多方缔结了多个互相矛盾和抵触的协约。谁要是想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倒是能方便地找到几个有力论据。

或许最显而易见的论据就是，古人云，在情场与战场大可以不择手段。到1916年5月，全欧洲范围内已经有数百万青年死亡，未来还将有更多人丧命；如果两面三刀和无法信守的虚假诺言能够推动战争早日结束，谁能反对呢？

还有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就是究竟如何定义“独立”。这个词在今天的含义一目了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1916年却并非如此。对于帝国

主义时代晚期的很多屈尊俯就的欧洲人来说，独立并不是说让土著民族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一种家长制：一轮新的“白人的负担”，即对土著民族进行教化，当然还有剥削，一直到他们在未来某个无法确定的时间对现代文明有了足够的理解，能够自立为止。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英国的大部分高级政治家这么想，欧洲所有国家的政治家恐怕都是这么想的——来说，“独立”与“委任统治”、“控制区”或“宗主权”之间的距离并不像其他人眼中那样是一道鸿沟。

还有一个简单而玩世不恭的论点：这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互相矛盾的诺言没什么要紧，因为这一切说不定只是学术讨论。即使是最乐观的帝国主义者也必须承认，英法两国目前虽然还没有输掉战争，但肯定不像是要赢的样子，现在就坐地分赃，实在有些荒唐。至于埃米尔侯赛因，他早在战前就叫嚷着要起义反对君士坦丁堡，但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阿拉伯起义果真发生，协约国果真赢得战争（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太小了），对付侯赛因的问题就只是小菜一碟了。走一步算一步再说。

按照一般流传的说法，在1916年6月5日早上，埃米尔侯赛因爬上了他在麦加的宫殿的一座塔楼，用一支旧火枪向城内土耳其要塞的方向开了一枪。这是起义的信号。[47] 到这一天落日时，汉志全境的侯赛因支持者已经向一些土耳其据点发动了袭击。

命中注定的是，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促成起义的那个人却永远不会得知起义爆发了。当天下午5点前不久，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战列巡洋舰“汉普郡”号驶出了苏格兰北部的港口，运送陆军大臣霍拉肖·基钦纳前往俄国。不到3个小时之后，“汉普郡”号在公海触了德国水雷，很快沉没。船员和乘客几乎全部遇难，基钦纳也葬身大海。

就在两周前，劳伦斯在伊拉克的任务失败，回到萨沃伊饭店继续伏案工作。他的未来似乎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不同：文书大战，绘制地图，

撰写永远不会受到重视、永远不会付诸实施的战略和报告。但是，麦加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很快就将得到他梦想中的那种战争，他本人也将一举成名，进而演化为一个传奇。

---

[1] Macdonogh to Nicolson，January 7，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6.

[2] Lawrence to Leeds，November 16，1915，in Brown，*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p.78-79.

[3] 埃米尔·侯赛因和英国政府在所谓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究竟达成了什么协定，一直是中东历史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们撰写了汗牛充栋的书籍，都从这些简短的信函中挤捏出适合自己的观点或政治偏见的阐释来。
在很多人看来，主要的出发点在于，这些信函在语法结构上非常笨拙——埃米尔·侯赛因的措辞古旧而华丽，亨利·麦克马洪的信则非常小心地营造出晦涩难懂的文风——因此从中可以得出天差地别的阐释，而英国人并没有故意要欺骗对方。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赛亚·弗里德曼、伊利·柯杜里和大卫·弗洛姆金，专注于麦克马洪小心插入的修饰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英国人实际上没有向侯赛因做出任何承诺。按照这种说法，既然没有向阿拉伯人做出承诺，英国随后当然可以自由地与欧洲盟友签订关于中东的条约，即所谓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但无论是从常识，还是根据当时的证据，这种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没有偏见的观察者，只要看看该地区的地图，再花上几分钟时间去读麦克马洪和侯赛因的全部来往信函，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埃米尔·侯赛因相信自己得到了怎样的承诺。另外，当时英国政府的行为也很清楚地表明，它相信自己已经对侯赛因许下了诺言，并且这些诺言遭到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破坏。证据就是，在将近两年时间里，英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向侯赛因隐瞒《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如果不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了协定，无疑还会继续隐瞒下去。

[4] 以委员会主席莫里斯·德·邦森爵士得名。有趣的是，邦森的父亲曾是普鲁士驻英国大使。

[5] Sykes to Cox，undated but late November 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2.

[6] Sykes to General E. C. Callwell，Director of Military Operations，War Office，August 2，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3，f. 367-71.

[7]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8.

[8] 切尔卡西亚人是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在19世纪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战争期间被驱逐到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各地。西方文学艺术中有不少以貌美的切尔卡西亚人为主题的作品。

[9] 德鲁兹派是近东的一个伊斯兰教独立教派，属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教义受到诺斯替主义等的影响，被伊斯兰正统教派视为异端。

[10] Prüfer to Djemal Pasha，December 5，1915；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38，Der Weltkrieg no. 11g，Band 16.

[11] Metternich to Bethmann-Hollweg，December 23，1915；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38，Der Weltkrieg no. 11g，Band 16.

[12] Aaronsohn，“Addendum to ‘Report of an inhabitant of Athlit，Mount Carmel，Syria，’” undated but November 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83.

[13] Engle，*The Nili Spies*，pp.62-64；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p.205。Engle、Florence和亚伦森的其他传记作者将情况描写得更严重，说法因贝格在贝尔谢巴遭到刑讯，在耶路撒冷面临被即刻处决的危险。但亚伦森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似乎与上述观点矛盾，因为亚伦森是收到了法因贝格于12月29日从贝尔谢巴发出的电报，才得知他被捕了。而且，亚伦森随后几天的日记中完全没有解救法因贝格的紧迫感，而且他得知消息后过了两周才去找杰马勒帕夏求情。

[14] Chamberlain to Hardinge，October 22，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486，f. 254.

[15] 从麦克马洪与外交部的通信（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486，f. 204-8）看来，麦克马洪10月24日给侯赛因的信中这个关于法国的条件从句是由英国政府高层精心炮制出来的。

[16] Tanenbaum，*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p.8.

[17] “Results of second meeting of Committee to discuss Arab question and Syria，” November 23，1915；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2，f. 156-60.

[18] Sykes and Picot joint memorandum，“Arab Question，” January 5，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67。在围绕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所有争议当中，或许最貌似有理而其实不然的观点就是，英国人已经明确说明，独立阿拉伯国家将不会包括巴勒斯坦，而侯赛因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种观点的主要鼓吹者是以赛亚·弗里德曼，他的著作*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和*Palestine：A Twice-Promised Land*？经常被人引用；弗洛姆金在*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中也响应了他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麦克马洪于1915年10月24日给侯赛因的信中的一个“修饰条件”。他写道：“大

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区域以西的叙利亚地区，不能说完全是阿拉伯人地区，因此应当从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范围中排除出去。” 弗里德曼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指出，10月24日之后侯赛因有许多机会可以对排除巴勒斯坦的做法提出异议，但一直没有提出。他在*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p.90）中写道：“收到麦克马洪的10月24日来信之后，侯赛因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和贝鲁特与阿勒颇两省‘是阿拉伯人地区，因此应当由穆斯林政府来治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将巴勒斯坦放在这个范畴之内。1916年1月1日，他提醒高级专员说，在战后，他将向‘贝鲁特及其沿海地区’提出主张，但没有提及耶路撒冷地区。” 弗里德曼从侯赛因的这些省略得出结论，侯赛因在与麦克马洪对话时显然是默认放弃了巴勒斯坦。
这种观点的首要破绽是，巴勒斯坦的任何部分都不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区域以西”。这个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今天叙利亚的海岸地区。我说“大致”，是因为麦克马洪的“地区”究竟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巴勒斯坦/以色列在遥远的南方。更大的问题是，在与侯赛因通信的全过程中，麦克马洪非常仔细地列出了他将会寻求“修正”的地区，而从来没有提到过巴勒斯坦。至于侯赛因自己为什么始终没有向麦克马洪提出巴勒斯坦的问题，弗里德曼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似乎坚决要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既然巴勒斯坦不在麦克马洪描述的排除范围之内，而且麦克马洪在他要“修正”的地区中从未提及巴勒斯坦，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19]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notes from interview，undated；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Folder 1，File 1.

[20] Lawrence，“The Politics of Mecca，” forwarded by McMahon to Grey，February 7，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71，f. 151-56.

[21] As quoted in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249.

[22] As quoted in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249.

[23] Lawrence，“The Politics of Mecca，” p.1；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71，f. 152.

[24] Millar，*Death of an Army*， pp.204-5.

[25] 关于库特驻军的兵力，不同的历史资料的说法差别相当大，从9000到12000不等。这个差别的原因是，有的统计算入了所谓随军人员的数量，真正的军人的数量接近较低的估计。但这些随军人员和军人一样命运悲惨，所以应当将他们计算在内。

[26] 关于杜杰拉战役的细节和艾尔默的行动，见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68，f. 75-127。

[27] McMahon to Cox，March 20，1916，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259.

[28] A.W.Lawrence，*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1937 edition），p.301.

[29] Lake to Secretary of State（India）， March 30，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68，f. 36.

[30] Robertson to Lake， March 16，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69，no. 197.

[31] 威廉·耶鲁关于他在战时耶路撒冷的生活的记述主要来自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s 4 and 5.

[32] Ballobar，*Jerusalem in World War I*， p.75.

[33] Edelman to Socony，Constantinople，March 29，1916；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 84，Entry 350，Volume 30，Decimal 300— general.

[34] 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5，pp.7-8.

[35] Herbert，*Mons*，*Kut and Anzac*， p.232.

[36] Herbert diary，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p.272。日记出版时（Herbert：*Mons*，*Kut and Anzac*， p.228），这句话被改为："我们和土耳其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交换的筹码，几乎只有交换俘虏。"

[37] Herbert，*Mons*，*Kut and Anzac*， p.234.

[38]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324.

[39] 战后的英国政府非常一丝不苟地计算了在库特被俘的英军士兵的死亡人数——据Crowley 的说法（*Kut* 1916，p.253），2592名战俘中有1755人死亡，但对印度士兵就没有这么认真了，甚至在将幸存的战俘送回国时也稀里糊涂。据Millar（*Death of an Army*， p.284）的说法，迟至1924年，还有先前在库特被俘的印度士兵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到家的。

[40] Nash，*Chitral Charlie*， pp.274-79.

[41]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216.

[42] Djemal Pasha，*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pp.216-17.

[43]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9.

[44] Lawrence，*Seven Pillars*， p.386.

[45] Lawrence，*Seven Pillars*， p.25.

[46] 这份报告的原件保存在德伦大学的温盖特文件中。

[47] Baker，*King Husain and the Kingdom of Hejaz* ，pp.98-99. Baker的说法，起义的发起日是6月10日。

第二部

第8章 短兵相接

汉志战争的双方是德尔维希[1]和正规军——而我们站在德尔维希那边。

——T.E.劳伦斯，1916年11月3日[2]

为了排解在红海南下的炎热而漫长旅途中的无聊时光，“喇嘛”号的军官们在1916年10月15日下午组织了一场手枪射击比赛。这是他们从苏伊士港起航后的第二天。海上风平浪静，于是他们在这艘改装商船的一根栏杆上摆放了一些瓶子，然后在较远的另一根栏杆处轮流开枪，尝试把这些瓶子打碎。

“喇嘛”号上最重要的乘客，驻埃及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并不喜欢这场射击比赛。午饭后他有些懒散，原打算睡个午觉，但在这枪声中实在无法入眠，尤其是当军官们开始试射一支缴获的土耳其黑火药步枪的时候。“枪声简直像一门18磅大炮的炮声，”斯托尔斯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算返程时不乘这艘船，而是随便拦住任何一艘北上的船只。”[3]

射击比赛成绩最突出的人当中就有斯托尔斯的旅伴T.E.劳伦斯。他在卡尔基米什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打靶，已经成了神射手。除了劳伦斯喜好玩枪之外，斯托尔斯还是挺高兴能和他一起旅行的。东方文化秘书在前两次在红海南下前往吉达[4]的旅途中，已经因为缺少有趣的旅伴而抓

狂。[5] 在这次旅途中，“超级大脑”劳伦斯已经为他细致地讲解了波雷费密码，这是一种聪明灵巧的密码系统，建立起来容易，破解却极难。而且，就像他们在开罗的老习惯一样，两人的其他时间主要用来讨论古典文学和艺术。

和斯托尔斯前两次去吉达一样，10月的这番旅行也是为了阿拉伯起义，现在起义已经有四个多月时间了。东方文化秘书在起义前英国政府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艰难谈判中扮演了主要交流渠道的作用，现在已经短兵相接，他自然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但到1916年10月，阿拉伯起义很快接近了一个危机时刻，它还能坚持多久是罗纳德·斯托尔斯和其他人忧心忡忡的问题。

外界得知起义爆发的方式恰恰说明了它的组织乏力、草率鲁莽。斯托尔斯6月份第一次前往阿拉伯半岛的时候得知了此事。

麦加偷偷传出的密文显示，已经延误许久的起义终于被定为于6月16日开始，于是斯托尔斯在6月1日从苏丹动身，渡海前往吉达，准备去见埃米尔的次子阿卜杜拉。起义展开之后，阿卜杜拉将担任起义军的主要指挥官。但是阿卜杜拉踪迹全无。斯托尔斯派遣一名信使前往麦加，要求阿卜杜拉尽快到海岸来相见，随后四天内就乘坐一艘英国战舰在阿拉伯海岸线上游弋，寻找土耳其或阿拉伯军事行动的迹象。各个沉闷的港口小镇显得愈发催人入睡了。

6月5日，信使终于带着阿卜杜拉的信从麦加回来了。“致最高贵和可敬的斯托尔斯先生，”信中写道，“非常遗憾，因为有急事在身，我无法亲自前来与您会面，所以我的弟弟会给您送来所有消息。”[6] 这个弟弟是20岁的扎伊德，侯赛因四个儿子中最年轻的一个。斯托尔斯被要求前往萨米玛（吉达以南的一个海岸小村），扎伊德将在次日早上到达那里。斯托尔斯对这变故非常恼火，但有件奇特的事情让他的怒火平息下来：信使说，起义时间从6月16日提前到了6月10日。东方文化秘书早就

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会严格遵守时间表，但是他很难想起时间被提前的先例。

但在次日早上，他见到扎伊德的时候，对方似乎并无紧迫感，尽管修订过的起义发动时间已经是区区四天之后了。这个神秘莫测的年轻人领着斯托尔斯走进他搭在海滩上的帐篷，和他聊天打趣了很长时间，一名仆人则在旁边准备咖啡。上了咖啡之后，扎伊德交给斯托尔斯一封他父亲的“写得非常糟糕”的信，详细描述了他的起义计划，并且索要价值7万英镑的黄金来资助起义军。斯托尔斯追问侯赛因的儿子，他们具体打算如何打败敌人，却发现，战术考虑还在最原始的阶段。“我们会勒令土耳其人投降，”扎伊德答道，“如果他们不肯，将打死他们。”

东方文化秘书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焦躁。几个月来英国人一直在向侯赛因输送黄金和枪支，斯托尔斯听对方的宏图大略——不曾有过任何付诸现实的尝试——也听了差不多这么久。他和其他英国联络人已经多次告诉侯赛因，在起义爆发之前不会再提供任何资金。斯托尔斯在萨米玛海滩上重申了这个决定，这时扎伊德终于吐露了一点有趣的新闻：“我很高兴地向您宣布，起义已经于昨天在麦地那开始了。”

斯托尔斯立刻把扎伊德和他的主要副手带到等待着的战舰上，在后舰桥上匆匆为他们准备了早餐，然后他和陪同他从开罗前来的两名军事情报官员向年轻的谢赫追问细节。斯托尔斯向开罗汇报了这个消息，快速地写了一封给侯赛因和阿卜杜拉的祝贺信，然后搜罗了手头所有能够鼓舞起义军领袖的东西：战舰保险箱内价值1万英镑的黄金；给侯赛因家族的两个吸烟大王费萨尔和阿卜杜拉的五箱香烟；并许诺在一周之内送来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船员们在红海的市场买了一只小沙漠羚羊当作战舰的吉祥物。此刻这只小羚羊就走来走去，时而用角顶一顶客人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时而吃着散落在甲板上的香烟，给这个重大时刻增添了一分家庭气息。[7]

汉志地区的战线要过一段时间才明晰起来。侯赛因的起义军在最初几天借助突然袭击，很快制服了麦加的少量土耳其部队，并在英国海军舰炮的支援下占领了重要港口吉达。在塔伊夫（侯赛因的“夏季首都”，位于麦加以南的群山中），阿卜杜拉的战士们占领了城镇，而将约300名土耳其驻军隔离在防守严密的堡垒内。但在汉志的最大城市麦地那，局势不容乐观。在那里，起义军得知在麦加的同志迅速得胜，大受鼓舞，迎头撞上了规模更大、防守更巩固的土耳其军队，惨遭机枪和炮火屠杀。起义已经一个月了，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僵局，侯赛因的部队牢牢控制着麦加和吉达，以及南部几座较小的海滨城镇，而土耳其人同样稳固地占据着铁路终端城市麦地那（在麦加以北150英里处）和红海北段的滨海城镇。

从政治角度看，开罗和伦敦都对阿拉伯起义的消息欢呼雀跃。在加里波利和库特的惨败之后，中东总算有了点好消息。最关键的是，侯赛因既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所的监管人，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受尊重的领袖之一，他与君士坦丁堡的决裂让英国人放了心——土耳其人和德国人要搞的泛伊斯兰圣战基本上是完蛋了。

但从军事角度，英国的反应要模棱两可得多。显然，如果阿拉伯起义军能够成功地将大批土耳其军队牵制在阿拉伯半岛，就有助于英军右翼向巴勒斯坦发动攻势，开罗方面正在筹划这样的攻势。但另一方面，汉志的起义并没有激发更广泛的阿拉伯起义——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就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侯赛因的部队面对土耳其军队的反攻会非常脆弱，而且起义军目前为止的表现时好时坏，不大可能抵挡得住。如果那样的话，英国在埃及的远征军的部队和物资就要被送去援助起义军，而此时这支远征军的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死死地控制住每一点资源，为他的巴勒斯坦攻势做准备。[8]

但如果出兵援助起义军，风险会更大，可能会将英国军方高层最有

政治眼光的人士所赞扬的阿拉伯起义变成他们最恐怖的噩梦。这是因为，根据《古兰经》的教诲，不仅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绝对不允许非伊斯兰教的“异教徒”军人涉足，而且整个汉志也是如此，只不过禁止的程度低一些。罗纳德·斯托尔斯在6月份首次前往阿拉伯半岛时就体会到了这个禁令，当时扎伊德拒绝让与斯托尔斯一同前来的两名军事情报官员一起上岸，而只允许东方文化秘书独自前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侯赛因利用经文中的含糊之处制造了一点自由空间，允许极少数英国后勤军官在海滨城镇拉比格执行补给任务，但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在海岸活动。如果允许他们进入内陆，更不要说邀请成建制的英国基督徒士兵前来，就会正中土耳其宣传家的下怀，所有参与的人都会难逃厄运：侯赛因不仅会被奥斯曼帝国视为乱臣贼子，还会被整个伊斯兰世界看作叛徒；而英国的帝国主义的、十字军式的意图会暴露在义愤填膺的伊斯兰世界眼前。

有鉴于这个窘境，英国努力在边缘活动，通过拉比格向汉志起义军输送武器和黄金，同时尽量寻找穆斯林部队——主要是埃及人，还有少数投诚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来训练起义军，并形成一个小型的地面军事存在。但这肯定远远不够，随着1916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起义军的组织混乱越来越暴露无遗，土耳其军队发动反攻的形势也越来越紧迫。在开罗和伦敦，希望更大规模介入的人和敦促小心行事的人之间的辩论也越来越紧张。埃米尔侯赛因自己对局势也没有什么帮助。一直到秋季，他自己一个人就在进行同样的辩论[9]，根据前线形势的最新变化，时而拒绝让非穆斯林部队参战，时而恳求立刻派出所有可动部队支援他；他往往会转到中间立场，即请求开罗让非穆斯林部队随时待命，等待干预的时机。

但到10月份，如此优柔寡断的时间已经没有了。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得到了铁路送来的援兵，比起义开始时还要强大，而且最近重创了侯赛因的第三子费萨尔率领的一支起义军进攻部队。费萨尔的战士们撤进

了山里。有很清楚的迹象表明，土耳其人打算从麦地那出征，将起义军拦腰斩断，同时夺回麦加。为了应对这个危机，同时也是由于他的儿子们在各条战线不断告急，侯赛因终于同意在汉志部署英国军队。

罗纳德·斯托尔斯第三次到吉达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作为对侯赛因求援的回应，尽管默里将军在开罗大发牢骚，伦敦的英国战争委员会还是同意派遣一个旅的英军到汉志——齐装满员兵力是约5000人——以及一队飞机。对东方文化秘书来说，传递佳音的机会，再加上与T.E.劳伦斯一起旅行的愉快，至少是部分地弥补了他对这些乏味旅行，以及吉达镇本身越来越深的反感。

劳伦斯对几个月来阿拉伯起义在英国军方高层中引发的激烈辩论非常了解。他这么熟知内情，既是因为他是开罗情报机构的成员——他从伊拉克返回后不到两周，起义就爆发了，也是由于他和斯托尔斯私交甚笃。但他的专业领域是叙利亚事务，所以一直处在这些筹划之外。事实上，他在10月份同斯托尔斯一起登上“喇嘛”号之前，他对汉志事务的贡献非常平淡无奇：邮票。

在阿拉伯起义的最初日子里，土耳其对其完全报以沉默，斯托尔斯想到了发行“汉志共和国”邮票的主意，这能够有效地向全世界宣示，汉志已经与奥斯曼帝国一刀两断，而且这个手段成本低廉。他请埃米尔侯赛因提供一个合适的、符合伊斯兰风格的设计，但侯赛因交出的草图却酷似一座英国灯塔，效果非常诡异。于是，斯托尔斯找他的最精通阿拉伯文化的朋友劳伦斯帮忙，两人在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悠闲地逛了一个下午，寻找合适的主题。斯托尔斯记述道，“很快我就发现，劳伦斯原本就懂得，或者当即学会了一整套邮票设计制作和三色印刷工艺，”[10]于是东方文化秘书指派他的朋友来负责邮票的制作。

设计邮票那段时间恰好也是劳伦斯特别艰难的一段时光。自抵达开罗以来，他和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萨沃伊饭店的小小政治情报单位的其

他怪人们在编制上隶属于常驻埃及的军队，劳伦斯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因为否则他就会隶属于默里将军的埃及远征军（这支“常备军”的任务是进攻土耳其人）这台笨重而等级森严的机器。但在这年夏天，由于一次机构重组——英国在开罗的当局在战时搞过六七次机构重组，每次都造成了极大混乱——劳伦斯被调到了埃及远征军下属的一个情报单位。更糟糕的是，这次调动让劳伦斯受到一位他非常蔑视的指挥官的领导，而且他还得离开开罗，前往苏伊士运河上死气沉沉的港口城镇伊斯梅利亚。劳伦斯立刻申请调回“唐突鬼”（萨沃伊饭店的情报单位很清楚自己在军事官僚机构中的声誉，于是给自己挑了这个名字），但当即遭到拒绝。劳伦斯写道：“在一些友善的暗示下，我理解到，这是为了让我远离阿拉伯事务。”

但劳伦斯非常足智多谋，他将自己比较突出的一个性格特点善加利用：特别能烦人。他写道，在和伊斯梅利亚的新同事相处时，“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他们灌输，他们在情报工作（这根本不难！）上是多么无知和效率低下，并且摆出酸腐文人的姿态进一步招惹他们，好为人师地纠正他们的报告中的萧伯纳式的分裂不定式和同义反复。”[11]

这一招奏效了。1916年9月末，劳伦斯得知罗纳德·斯托尔斯即将前往吉达，于是请了10天假。对他咬牙切齿的上级们爽快地准了假。于是，劳伦斯以罗纳德·斯托尔斯的随行人员的身份，而并不具有官方身份，第一次起航前往阿拉伯半岛。[12]

10月16日黎明后不久，“喇嘛”号驶入了吉达港的宽阔海湾，驶向远处海岸上有防护的码头。在晨光中，劳伦斯只能看到这座城镇房屋间的光与影，而城镇的远方是“绵延不绝、平坦无垠、炫目的沙漠”。轮船接近锚地时，他感受到了大多数从海上接近阿拉伯半岛的人必然会经历的震撼，清凉的海风猛然撞上了陆地上吹来的热风。劳伦斯写道，在这一瞬间，“阿拉伯半岛的炽热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打得我们张口结舌”。[13]

这是一次尴尬的会谈，英国人以其特有的礼貌掩盖了双方的分歧。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在上午九点多下了“喇嘛”号，穿越吉达的狭窄街道，很快来到了英国领事馆所在的优雅的三层小楼，在那里受到了常驻此地的英国官员西里尔·威尔逊中校的迎接。威尔逊将客人们带到凉爽而有百叶窗遮蔽因而非常宜人的会客室——这时还不到10点，但吉达刷着石灰的房屋已经放射出刺眼的热光——并命令佣人准备点心饮料。

威尔逊身材颀长，蓄着大胡子，是个职业军官，以前曾在英属苏丹政府任职。罗纳德·斯托尔斯与威尔逊是老交情，但对他的看法却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改观。他觉得威尔逊沉闷无聊又暴躁易怒，有点歇斯底里——他曾这样描述威尔逊：“顶多就是个省级行政人员的料，更高的职位就不行了”[14]——所以完全不能胜任他自7月以来担任的要职——英国驻埃米尔侯赛因的汉志“政府”的代表。事实上，斯托尔斯在开罗没有极力反对威尔逊担任这个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他非常害怕，如果威尔逊被撤职，他自己或许会被派到吉达接替他。[15]

而威尔逊对东方文化秘书的这些拜访似乎颇为怨恨，尤其是埃米尔侯赛因及其使节对斯托尔斯毕恭毕敬，而他威尔逊却要在一线承担英国政策的所有苦差，极具挫败感，还无人感激。

威尔逊和劳伦斯之间也有些过节。几个月前，这位中校在开罗看到劳伦斯穿着军服却头戴阿拉伯头饰，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但我们的情报军官将威尔逊批评他军容不整的训诫当成了耳旁风，因为他来到领事馆门前时军服湿透、邋里邋遢。

但是，会客室里的人都是英国人，所以他们不会将这种摩擦表达出来，甚至根本不予承认。斯托尔斯和威尔逊佯作同僚的亲切，讨论着汉志局势和当天的日程安排。根据阿拉伯习俗，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去拜见谢赫阿卜杜拉——他驻扎在城外4英里处——当晚再在领事馆进行更正式的会晤。两位高官把劳伦斯丢下自由活动，在将近中午的时候骑马前

往阿卜杜拉的营地。

但三人在下午早些时候在领事馆再次聚首时，听到的却是不愉快的消息。开罗发来的电报宣称，战争委员会在考虑再三之后，决定召回原定在近期派往拉比格的一个旅的英军部队和飞机队伍。雪上加霜的是，战争委员会还命令，斯托尔斯在“喇嘛”号上携带的原定付给阿卜杜拉的价值1万英镑的黄金暂时不得动用。斯托尔斯和威尔逊上午拜访阿卜杜拉的时候，受到了阿拉伯式的盛情款待，现在他们都很害怕谢赫当晚对领事馆的访问。

五点多一点的时候，阿卜杜拉在衣着华丽的宫廷扈从和奴隶的簇拥下来到了领事馆。劳伦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生性特别快活的人——或许由于阿卜杜拉前不久在塔伊夫城打了场胜仗，该城长期抵抗的土耳其驻军终于投降，所以他格外高兴——有点奢侈纵欲的样子。这位谢赫虽然还不到35岁，面庞已经颇为肥胖，带有纵情享乐的印迹。他的快活没有维持多久。这次会议没有通常的那种长时间的寒暄打趣，阿卜杜拉和他的主要副手们刚在领事馆会客室坐定，威尔逊就开始大声朗读开罗来的电报，斯托尔斯将其翻译为阿拉伯语。阿卜杜拉仔细听着，面容坚忍，难以揣测。

读完之后，阿卜杜拉开始为自己申辩，斯托尔斯则解释说，自己在军事问题上没有任何权力，希望借此阻止谈话往那个方向发展。其实就是斯托尔斯在1914年写下了给侯赛因的秘密提议，所以他这么说实在太假了。室内的英国人第一次体验到了阿卜杜拉的脾气。“抱歉，”他打断了斯托尔斯的话，“就是你的信，你的信息让我们的这件事情开端的，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甚至在开始之前就知道。”

斯托尔斯和他的两位同胞受到这番责备，哑口无言了。他们的客人则滔滔不绝地描述汉志当前严重的局势，以及英国人对造成这种严重局面应当负主要责任。“他对双方谈判的历史作了相当准确的总结，”斯托

尔斯在日记中懊悔地写道，“多次引用了英王陛下政府的诺言，即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帮助阿拉伯人。”

谈话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阿卜杜拉列举了他当前的所有困难，斯托尔斯和威尔逊则许诺，他们虽然能力有限，但一定会竭尽所能，让政府高层收回最新的决定。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谢赫不得不去做他显然希望避免的事情：打电话给他父亲，汇报最新的进展。领事馆的电话被送来，拨通了埃米尔侯赛因的私人专线“麦加一号”。

让斯托尔斯意外的是，埃米尔似乎对这件失望之事颇为冷静和从容，再次声明了自己对英国伙伴的绝对信任，以及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的信心。阿卜杜拉当晚离开领事馆的时候，决定次日早上再来会晤。而他的英国东道主们，就像斯托尔斯说的那样，“对他无比景仰，对自己则十分鄙夷”。[16]

T.E.劳伦斯在这场漫长而紧张的会议中说话很少，或许一句话也没说。部分原因是很明显的：他在这里并没有官方的身份；在这种关系微妙的会议上，如果他未经邀请就唐突地发表意见，就违反了外交常规，是非常令人震惊的行为。与此同时，这种置身事外的疏离感让劳伦斯得以对阿卜杜拉进行密切研究，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装模作样，对他进行观察和批评”。[17]

埃米尔侯赛因是阿拉伯起义无可争议的精神领袖，阿卜杜拉则是无可争议的前线统帅。这一点对参与汉志事务的英国军官和外交官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讨论。阿卜杜拉是侯赛因最信任的儿子。1914年，侯赛因派遣他到开罗试探英国人对他的分离主义计划的态度；阿卜杜拉指挥了攻克塔伊夫的战役，还代表整个家族与英国顾问们谈判。

劳伦斯虽然是第一次见到阿卜杜拉，却已经产生了疑虑。虽然会谈

的气氛非常严肃，他却感到阿卜杜拉有种“持续的欢快”，虽然有着精明政治家的风度，但却不一定表里如一，而且野心极大。还不止这些。劳伦斯对此前4个月从汉志传出的情报作了仔细研读，希望找到起义在振奋人心的开端之后却陷入惨淡僵局的原因。他的结论是，起义的核心缺少真正的领袖，“不是智识，不是判断力，不是政治智慧，而是能够点燃沙漠的激情火焰”。起义需要的是一位先知。在领事馆的这次会议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阿卜杜拉太审慎，太冷静，太幽默，不可能成为先知，尤其是那种历史上在革命中取胜的武装先知”。

劳伦斯如果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的高级同僚们，肯定会得到这样嗤之以鼻的回答：谁会关心你的想法？但劳伦斯没有吐露这些思绪。早在10月16日，他抵达阿拉伯半岛还不到半天的时候，就已经在为阿拉伯起义设计一个新航向，而且他自己要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他对这个角色的设定如下（从不同角度看，他这番话要么是深刻的自信不疑，要么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极度傲慢）：“为起义寻找尚不为人知的主宰灵魂，并测量他将起义推进到我为之设想的目标的能力。”要达到这些目的，劳伦斯需要秘密行事，不动声色、悄无声息地寻找机会来促成他自己的计划。在和阿卜杜拉的会议上，劳伦斯找到了他的第一个机会，在次日早上他就会尝试利用这个机会。

但1916年10月16日这漫长的一天还没有结束。在它告终之前，劳伦斯还将会遇到另一个对汉志影响极大的人物，此人将会从反面进一步推动劳伦斯为自己设定的使命的清晰成形。在法国驻吉达代表团驻地的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爱德华·布雷蒙上校举起他的香槟酒杯，向他的英国客人们祝酒。“我刚听说，”他宣称，“我的男性亲属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战争中死伤的一位，也负了重伤。我有责任，也很荣幸地向协约国祝酒，并且告诉大家，我和英国人打交道是多么愉快。”

10月16日晚的这个动人时刻给罗纳德·斯托尔斯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的话语中没有法国式的夸耀自负，这是很惊人的。于是我举杯祝他的表弟早日康复，祝法国代表团的事业蒸蒸日上。”[18]

47岁的布雷蒙颇有些心宽体胖，是法国帝国主义战士的典范，对祖国的伟大和祖国的“文明教化使命”——将法国文明和文化传播给世界上的落后民族——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他的军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法国的北非属地服役，先是阿尔及利亚，然后是摩洛哥，对镇压叛乱部落很有经验，被公认为非常规作战的专家。他虽然没有平步青云，但也是稳步上升：摩洛哥港警察总长、法国驻摩洛哥军事代表团副团长、拉巴特城行政长官。[1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布雷蒙被召回法国，匆匆送上前线。在战争恐怖的第一个月里，和很多法国军官一样，布雷蒙在前线的日子只有几天时间。在比利时前线率军作战时，他胸部中弹。康复之后，他被任命为第64步兵团团长。随后两年时间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袍和男性亲属接二连三地在西线的残杀中倒下。1916年夏天，阿拉伯起义爆发后，他得到了脱离西线杀场的机会。法国国防部决定向阿拉伯地区派遣一个小型的军事代表团，认为布雷蒙——“土著战争的专家、法属北非的老将”[20]——是领导这个代表团的最佳人选。

其实，布雷蒙上校是绝佳人选的原因远远不止是他在穆斯林世界的丰富经验。和中东战场的很多其他行动一样，法国驻汉志代表团也有一个秘密使命，而这个使命需要狡猾奸诈和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好在爱德华·布雷蒙就是这样一个人。

鼓励阿拉伯人发动起义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英国人在操作，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有着狼子野心的法国领导层得知此事后大为惶恐。以成文形式规定法国对中东的权利主张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签署之后，法国人的担忧缓和了一些，但阿拉伯起义爆发后法国人又高度紧张起来。且不谈协约国之间信誓旦旦的盟友关系，法国人根本就不信任他们的英国

盟友能够信守关于中东的诺言；汉志起义释放出了一支革命力量，将来英国人就是想控制住它，恐怕也无能为力。法国人提议向该地区派遣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以保护自己将来对中东的权利主张，并监视当地局势的发展。英国人礼貌但是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这让法国人更是惊恐万分。伦敦的解释是，汉志局势瞬息万变、非常微妙，如果在此刻派遣另一支外国军队，只会让事情更复杂棘手。

于是法国人改用特洛伊木马的策略。1916年8月在布雷蒙上校指挥下从马赛港起航的200人的军事单位的官方称呼是“法国驻埃及军事代表团”。虽然这些法国军人打算在埃及做些什么是个很大的疑问，但英国人还是不好将最亲密盟友的这样一个代表团拒之门外。布雷蒙上校对自己使命的解释是：促进法国领地——主要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朝觐者前往麦加的哈只。英国的陆海军已经在为成千上万寻求前往麦加朝觐的埃及和印度穆斯林提供保护，所以也不好反对布雷蒙的幌子。

法国人计划的最后一步非常大胆，即便是英国人，虽然不太情愿，也得表示赞赏。9月中旬，布雷蒙陪同一批摩洛哥朝觐者来到吉达，在那里登陆之后挑选并租赁了一座足够气派的房子[21]，宣布法国军事代表团抵达了汉志。他旋即向法国外交部发了电报，敦促建立常驻侯赛因政府的外交使团。外交部批准这项建议后，法国在阿拉伯半岛就有了正式的军事和外交存在，而且从技术上将与英国等量齐观，伦敦也只得接受这个既成事实。毕竟巴黎方面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是两个伟大盟国在平等基础上携手勾画本地区未来的良机，能够加强两国永久的友谊。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在10月中旬抵达吉达后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布雷蒙的狡黠还远远不止是建立驻汉志代表团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体现在代表团的目标上。正如他于10月16日在法国领事馆的宴会上所说的那样，他在汉志的公开使命是表达法国对阿拉伯起义的支持，

并摸清法国能够如何支援起义。但他的秘密任务却是努力遏制起义的规模，避免起义和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理想蔓延到法国垂涎的那些阿拉伯地区。布雷蒙在具体的操作上有个方便利索的计划，虽然这计划极其玩世不恭。

当晚，他向英国客人们解释说，最重要的是不能允许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只要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还撑得住，只要阿拉伯人将资源和鲜血集中投入到攻打麦地那的战役中，就能将起义安全地遏制在汉志境内。他警告说，一旦麦地那陷落，阿拉伯人自然会将注意力转向北方，从土耳其铁蹄下解放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同胞，这将会不可避免地抵触英法在各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22]

这想法有些冷血，但却是一条简单而聪明的战略：虽然帮助外国起义取得成功向来是件困难的事情，但让它失败却简单得多。

但在法国领事馆的宴会上，布雷蒙上校的设想却是建立在至少两个极大的误解之上的。首先是，他认为英法两国有必要共谋来支援阿拉伯起义，暗地里却对其进行破坏。如果布雷蒙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法国将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对阿拉伯起义的未来发展一定会乐观得多。但在法国只有极少数政府高官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而受命保卫法国在中东利益的中层军事和外交官员并不知悉这个秘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被派遣到阿拉伯半岛担任法国利益的一线守护者的布雷蒙也被蒙在鼓里。[23]

布雷蒙的第二个误解是，当晚他向英国客人吐露心迹的时候，他以为这些英国人都是他的朋友，或至少是志同道合的帝国主义者。但这些人不是他的朋友，坐在餐桌旁很少开口说话的那个年轻的英国上尉对他尤其没有好感。布雷蒙很快就会发现，T.E.劳伦斯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另外，现在是劳伦斯占上风。在法国领事馆，布雷蒙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而劳伦斯却缄口不言。

次日上午10点左右，阿卜杜拉骑着一匹白色母马，在一大群奴隶引领之下，来到了英国领事馆的庭院。他比昨天严肃得多，在会客室坐定之后就解释了一番。他刚收到了弟弟费萨尔的电报。费萨尔此时在拉比格以北的山区营地，前一天下午有两架土耳其飞机轰炸了他的营地；轰炸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让贝都因部落族人惊恐万状，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这种机器。这条消息非常有针对性，因为恰恰就在土耳其飞机来的这天，英国人取消了向阿拉伯半岛派遣飞机的计划。

劳伦斯的回应是，不必为了土耳其的这番炫耀武力而惊慌失措。“土耳其飞机的寿命很少超过四五天。”[24] 他轻松地解释道。

或许就在这一刻，阿卜杜拉才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劳伦斯，因为劳伦斯在前一天只是个背景人物。当他们谈到在中东的各支土耳其军队的部署位置时，他就更加密切地注意劳伦斯了。罗纳德·斯托尔斯回忆说：“我们说到叙利亚、切尔卡西亚、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名时，劳伦斯当即就说出土耳其的哪些部队部署在哪些地方，最后阿卜杜拉惊愕地转向我说：‘这个人无所不知，难道是神吗？’”

斯托尔斯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朋友在这天上午的惊人表现归结于幸运的巧合，因为劳伦斯在开罗的地图室有过很多辛勤劳动。或许的确如此，或许劳伦斯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管怎么样，结果是相同的，劳伦斯有了推动自己计划的平台。

他向阿卜杜拉解释说，英国方面援助阿拉伯起义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缺乏可靠的把握。目前需要一名客观的观察者，既能直接向英军高层进言并受到重视，也能对局势——拉比格港的补给渠道的问题和北方山区费萨尔部队的后勤需求——做一个综合的报告。由于时间紧迫，劳伦斯毛遂自荐去承担这一使命。

这是个无伤大雅的建议，阿卜杜拉当即表示同意，并提议在劳伦斯

抵达拉比格之后，立即安排费萨尔从山区南下与他会面。劳伦斯礼貌地表示了反对。他需要亲自深入内陆评估局势，所以必须是他去找费萨尔，而不是让费萨尔来找他。当时对非穆斯林在内陆旅行还有限制，所以他这个要求是很大胆的。即便是两次见过费萨尔、深得埃米尔侯赛因尊重的西里尔·威尔逊也只被允许在港口城镇停留，等待费萨尔驾临。

斯托尔斯也为劳伦斯摇旗呐喊，阿卜杜拉渐渐被争取了过来——当前阿拉伯人的紧张局势显然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在更难对付的侯赛因手中。正如阿卜杜拉预想的那样，在打电话到麦加向他父亲提出这个建议时，他的态度模棱两可，于是斯托尔斯接过了电话听筒。

“斯托尔斯口若悬河地说起阿拉伯语的样子令人叹为观止，”劳伦斯回忆道，“也能教导所有在世的英国人，如何对付满腹狐疑或不情愿的东方人。要想抵抗他超过几分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次他也称心如愿了。”

但他们赢得的只是有限的胜利。侯赛因只是同意让劳伦斯前往拉比格与他的长子阿里见面；如果阿里“认为合适”，才会安排劳伦斯继续去见费萨尔。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阿里以谨小慎微闻名，对谨慎的人来说，默认的回答就是“不行”。斯托尔斯和劳伦斯决心等阿卜杜拉当晚到英国领事馆用餐时再努力推动此事。

在晚宴上，斯托尔斯和劳伦斯敦促阿卜杜拉向阿里和费萨尔各写一封正式的介绍信，认为这样能够大大增加劳伦斯获许进入内陆的几率。据劳伦斯说，阿卜杜拉起初不愿意这么做，但在电话上得到父亲批准后，终于写信“指示阿里尽快为我准备坐骑，并安排可靠的人送我去费萨尔的营地”。

10月19日清晨，“喇嘛”号抵达拉比格港。劳伦斯站在码头上向调头

返回埃及的“喇嘛”号挥手道别，这景象将永远镌刻在罗纳德·斯托尔斯心中。劳伦斯的阿拉伯冒险拉开了帷幕。

劳伦斯对阿里的预感完全正确。侯赛因的长子接过阿卜杜拉转达他父亲允许这位年轻的英国陆军上尉进入内陆的信时，一时间张口结舌。但和侯赛因的其他儿子一样，阿里对父亲也是绝对忠诚，于是只得同意，开始为劳伦斯的旅途做准备。

小小的拉比格港坐落在一片广阔沙漠的边缘，默默无闻，看上去毫不引人注目，更不要说是争夺阿拉伯半岛的战争的关键所在了。但是拉比格位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中间，是连接这两座圣城的“朝觐之路”——其实只是由石堆界碑标注出来的骆驼道——的一个关键中转站，也就是说，任何企图南下收复麦加的土耳其军队都必然经过这里。拉比格也是英国从埃及运来的给养和武器的运输中转站，这些物资将会被分发给在内陆作战的起义军，但往往就在半途中销声匿迹了。

拉比格不是个宜人的所在，但劳伦斯在那里待了两天半，有机会见到埃米尔侯赛因的另外两个儿子，并对他们做了一番性格分析，就像在吉达对阿卜杜拉的研究一样。

巧合的是，侯赛因的幼子扎伊德前不久也来到了拉比格，帮助阿里解决补给线的问题。扎伊德和侯赛因的另外三个儿子并非一母所出，时年20岁，英俊潇洒，继承了他的土耳其母亲的白皙面貌和柔和的面部线条。他虽然很聪明，但年纪太轻，而且外貌不似阿拉伯人，即便有领导才能也不大可能成为起义军领袖，况且他也没有这种才华。“他喜欢骑马闲逛和搞恶作剧，”劳伦斯写道，“幽默风趣，或许比他的兄长们更性格平稳，因为他没有那么冲动。他很害羞。”[25]

劳伦斯第一次见到阿里时的气氛虽然很紧张，但很快对他有了好感。“他的风度高贵而令人倾慕，但非常直截了当，”他写道，“在我看

来，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绅士，兢兢业业。”但侯赛因的长子有种忧伤、疲惫的神情，皮肤灰黄，“嘴角下垂，悲哀”[26]，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37岁）老得多。劳伦斯感到阿里没什么明显的雄心壮志，容易受到身边更有活力的人的影响，这绝不是天然领袖的特征。但劳伦斯在阿里和阿卜杜拉之间仍然更喜欢前者，并说，“如果费萨尔也算不得先知的话，那么让阿里领导起义，也会很好”[27]。或许如此，但那也只是将就凑合，所以劳伦斯对会见费萨尔充满了期待。

他在10月21日夜间出发去见费萨尔。阿里对劳伦斯的旅程高度关注，因为长达100英里的跋涉中途要经过由敌视起义军的部落控制的地区，所以对劳伦斯的动身和目的地严格保密，甚至不告诉最亲信的心腹家奴。他挑选了两名最受信任的副手来担任劳伦斯的向导。这两名向导是父子，按照贝都因人无须言明的法律，他们为了保护客人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阿里还指示三人绕开沿途的所有居民点，尽可能在夜间行进，还让劳伦斯在军服之上戴着阿拉伯头饰，以在月光下尽可能显得像是阿拉伯人。

虽然有着潜在危险，劳伦斯出发不久之后注意力就转移到了更平庸的事情上来。在萨沃伊饭店坐办公室两年之后再次开始骑骆驼是非常痛苦的。骆驼的脊柱非常突出和狭窄，就在皮肤表层之下，所以骑骆驼和骑马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更像是坐在不停摇晃的金属杆上。对没有经验的新骑手来说，哪怕是最好的贝都因鞍具——其实也只是铺着毯子的木头和皮革框架——也只能稍稍减轻骑乘的疼痛。新骑手很少能不间歇地忍耐超过两三个小时，但劳伦斯在此次旅途中没有这样的奢侈；他要一口气骑乘大约30个小时，其间只能短暂地休息两次。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他曾经表现出的超强耐力——骑自行车漫游法国、在叙利亚的1200英里长途跋涉——以及见到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尚未谋面的最后一个的希望，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设想的战争的“先知”。

虽然身体非常痛苦——或者正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劳伦斯在骑行过程中在军用的小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途经地区的地形地貌。他涉足的土地只有少数异邦人曾经目睹，它深深浸淫于一种数千年中改变甚少的沙漠文化中，与他熟悉的叙利亚的共同点很少，因此非常让人晕头转向。在叙利亚，他曾养成了一种业余爱好，就是研究部族和部落的复杂结构，以及决定着它们相互关系的复杂规则，但在阿拉伯半岛，一切规则都有着更丰富的层次，也更为严格。

“在阿拉伯半岛，每一座山峰，每一座谷地都有着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写道，“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土地，主人会迅速地捍卫自己家族或部族的权利。甚至水井和树木都各有其主，主人允许大家各取所需、自由地砍树枝当柴火或者饮水，但是谁要是试图将水井和树木占为己有，就会立刻遭到阻止……沙漠的居民维持着一种疯狂的共产主义，大自然和各种元素供所有的友好人士自由使用，满足其需求，仅此而已。”[28]

在叙利亚，越轨逾矩的代价往往是驱逐，或者是赔偿一只羊；在干枯严酷的阿拉伯半岛，犯罪的惩罚是死亡。

劳伦斯虽然还只是个业余的人类学家，但已经在从军人的视角观察汉志的地形地貌：哪里能找得到水源，军队走哪条路线最为有利。就这样，他偶然发现了英国军队的紧急预案的一个严重漏洞。

在准备拉比格的防御——也就是麦加的防御时，起义军的英国军事顾问们根据道路和水源的位置推测出了土耳其人最有可能采纳的路径，并相应地建造了警戒哨所。但在前往费萨尔营地的途中，劳伦斯发现了两条英军的任何地图上都不曾出现的季节性水道，进攻的土耳其军队可以利用这些水道，从意想不到的方向进攻拉比格，或者完全绕过这个港口城镇，直接攻打麦加。英国顾问到拉比格已经3个月了，怎么依旧对这些水道一无所知？当地的阿拉伯人肯定知道这些水道的存在，为什么

没有发出警告？很简单，因为英国人被限制在海岸线上，对周边环境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想不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而既然没有这样的问题，阿拉伯人自然也不知道英国人在担心哪些东西，也想不到主动提供这些信息。在劳伦斯看来，这一方面突出了让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联合起来并肩作战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侯赛因禁止非信徒深入内陆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管派遣多少英国军队，只要他们被隔离在海岸上，就好比是被蒙上了双目，无法探测危险。[29]

10月23日下午早些时候，劳伦斯一行绕过了一座高高的峭壁，抵达了翠绿的撒弗拉山谷，前不久在麦地那城外损兵折将的费萨尔起义军就集结在这里。他们溯流而上，劳伦斯开始看到山麓村庄间散布着武装人员的小营地，这些营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最后几乎覆盖了每一寸土地。

最后他们来到有约100户人家的哈姆拉村，在一座低矮长屋前停下。一名配有长剑的奴隶在那里站岗。劳伦斯下了骆驼，被带进内庭，看到一名男子站在远处的门口。“他身材颀长，有如石柱，”他写道，“非常瘦削，身穿白色丝质长袍，褐色头巾配有光彩夺目的绯红色和金黄色细绳。他的眼皮耷拉着；与他身体的奇特、沉静的警惕相比，他的黑胡须和没有血色的面庞就像是一副面具。”

这人就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劳伦斯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感到，这就是我来阿拉伯半岛寻觅的那个人，那个将给阿拉伯起义带来全副荣光的人。”

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但两人最初的会面并不愉快。劳伦斯被领进屋，室内除了费萨尔还有十几名参加起义的部落酋长。屋里光线很暗，地上铺着地毯。费萨尔和他的兄弟们一样，有着宫廷式的优雅。他感谢劳伦斯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见他。这番开场白之后，他开始严肃地讨论自己最近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

在侯赛因的几个儿子当中，费萨尔和他的追随者自起义爆发以来承担了最多的战斗，但是收到的补给和资助却最少。他向客人解释说，前不久，他的部队在麦地那郊外的比尔阿巴斯几乎到了一场大胜利的边缘。但是他们没有火炮来对抗土耳其人的炮火，部队被击溃和打散了。部队的残部——很多人脱离起义军，各自回家了——现在和他扎营在哈姆拉的安全地带，坐等土耳其人的下一步棋。情况就是这样。费萨尔指出，他的人马如果能得到适当的补给和武装，就大有可为，但如果当前的局面继续下去，每一盎司的物资都要向英国人苦苦索要，而且大部分物资根本就送不到前线，那么起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土耳其人从麦地那的要塞出动已经迫在眉睫，到那时费萨尔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困守山区，要么且战且退地撤往麦加。第一个选择意味着渐渐灭亡，第二个选择则将带来迅速的土崩瓦解，因为就像比尔阿巴斯战败之后那样，他的很多追随者会拒绝逃到离自己部落地区那么远的地方，而是自行回家。

劳伦斯一边听，一边仔细地揣摩费萨尔，寻找能够昭示他性格的线索，以及他得以主宰挤在室内这些人的奥妙所在。“他情绪多变，”劳伦斯写道，“有时神采飞扬、斗志高昂，有时却灰心丧气，而此刻是疲惫万分。他虽然只有31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俊秀的黑眼睛有些斜，布满血丝，凹陷的两腮有很多皱纹，显得思绪万千……他身材高大、优雅而遒劲有力，步态极美，头部和肩膀极具王者之风。他当然深知自己的威仪，在公共场合主要是靠手势动作来发号施令。”

或许正是因为费萨尔非常疲惫，他比他的兄弟们都更为坦率地讲到了阿拉伯人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不信任，这不信任表现在侯赛因与斯托尔斯和麦克马洪长达两年的艰难谈判，以及将英国顾问限制在海岸上的做法。费萨尔问道，既然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英国人从来不会因为善心而帮助别人，那么这一次想从汉志得到什么？

就像其他很多英国军官对侯赛因家族的其他成员做的那样，劳伦斯在哈姆拉的这座光线黯淡的屋子里耐心地向费萨尔保证，英国在汉志绝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费萨尔指出，英国在吞并苏丹之前也是这么发誓赌咒的，所以这个保证没有多少价值。

他们的谈话荆棘丛生，持续到晚餐。第二天早上6点半，费萨尔来到劳伦斯的帐篷，又开始谈话。在这些商谈中，劳伦斯感到侯赛因的第三子“蛮不讲理”，但他说话时的激情洋溢和言辞背后的铁一般的决心深深吸引了劳伦斯。这种激情在阿卜杜拉和阿里身上都是找不到的，劳伦斯越来越相信，费萨尔就是他寻觅的领袖。

当天，劳伦斯在起义军营地转悠了几个小时，和遇见的人聊天，更加坚定了对费萨尔的信心。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起义军包含了五花八门的许多部落。在桀骜不驯的阿拉伯半岛，很少有人能够把他所在的小地区的诸多部落和氏族联合起来，但在撒弗拉绿洲却聚集着来自汉志西部几乎所有部落群体的大约6000人，离自己的家园有足足两周旅途之遥。更了不起的是，这支部队仅仅在一周前还被土耳其人击溃过，但仍然士气高涨，对最终胜利的信心仍然毫不动摇。将他们团结起来，鼓舞了这种信心的人就是费萨尔。

劳伦斯在撒弗拉绿洲待了仅仅24小时多一点之后，于当晚来到费萨尔的指挥部，向他辞行。两人的道别比先前的谈话要友好一些，费萨尔感谢劳伦斯前来，而劳伦斯表达了模糊的希望：或许他的旅程能够有些益处。随后，他骑上一匹新骆驼，在14名武士护卫下，前往距离最近的由起义军控制的红海港口延布，在那里登上一艘英国船只返回埃及。他急于回到埃及，因为他现在已经坚信不疑，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就是他要找的先知。“比我们希望的好得多，”他写道，“我们的步履艰难的事业甚至不配有这么好的希望。我这次旅行的目标已经达到。”

[1] 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德尔维希可以集体生活，也可以在俗；云游四方的德尔维希叫作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运动已持续至今。

[2] T.E. Lawrence，“Military Notes，” November 3，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63.

[3] 除非特别说明，斯托尔斯关于1916年10月吉达之旅的所有记述和引文都来自他的“日记摘选”（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 22-38）或他的部分出版的私人日记Storrs，*Memoirs*，pp.186-95。

[4] 红海的主要港口，今属沙特阿拉伯，也是该国的外交都城。它的名字（意思是“女祖先”或“祖母”）取自当地的夏娃墓。1928年夏娃墓被沙特政府摧毁。吉达一直是穆斯林朝觐者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入口。以前属于土耳其，1916年被迫割让给英国。1925年被穆斯林领袖伊本·沙特占据，1927年被并入沙特阿拉伯。

[5] Barr，*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pp.9-10.

[6] 除非特别说明，斯托尔斯关于1916年6月阿拉伯半岛之旅的所有记述和引文都来自他写给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的无标题报告，写于1916年6月10日（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73）或他的部分出版的私人日记Storrs，*Memoirs*，pp.169-76。

[7] Storrs，*Memoirs*，p.176.

[8] 默里反对支援阿拉伯起义已经有很长时间，他在1916年9月12日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的英军高级会议上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4，f. 338-47）。

[9] Wilson to Arab Bureau，October 10，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8-9. Also Clayton to Wingate，October 12，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12-14.

[10] Storrs，*Memoirs*，p.203.

[11] Lawrence，*Seven Pillars*，p.63.

[12] 从技术角度，劳伦斯前往吉达的确没有官方的身份，但吉尔伯特·克莱顿在幕后操作，让他陪同斯托尔斯前往，好让他们能够对阿拉伯半岛的“形势有一个很好的把握”（Clayton to Wingate，October 9，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 Papers，W/141/3/35）。克莱顿这是为了努力将劳伦斯调回阿拉伯局。

[13] 劳伦斯关于他1916年10月阿拉伯半岛之旅的大部分记述都来自Lawrence，*Seven Pillars*，book 1，chapters 8-16，pp.65-108。

[14] Storrs Papers，Pembroke College，Cambridge，as cited by Barr，*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p.65.

[15] Storrs Papers，Pembroke College，Cambridge，as cited by Barr，*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p.65.

[16] Storrs，*Memoirs*，p.189.

[17] Lawrence，*Seven Pillars*，p.67.

[18] Storrs，*Memoirs*，p.190.

[19] Porte，Lt. Col. Remi，“General édouard Brémond（1868-1948），” Cahiers du CESAT（bulletin of the College of Higher Learning of the Army of France），issue 15（March 2009）.

[20] Lawrence，*Seven Pillars*，p.111.

[21] 关于布雷蒙在埃及和汉志的使命，详见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299-306，and 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79，File 152849。

[22] Lawrence memorandum for Clayton，November 17，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 Papers，694/4/42）. Also Brémond to Defrance，October 16，1917，as ci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p.309.

[23] 布雷蒙是从霞飞元帅1916年11月27日的电报中得知这个情况的，见Brémond，*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p.97。

[24] Storrs，*Memoirs*，p.204.

[25] Lawrence，*The Sherifs*，October 27，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40.

[26] Lawrence，*Seven Pillars*，p.76.

[27] Lawrence，*Seven Pillars*，p.77.

[28] Lawrence，*Seven Pillars*，p.83.

[29] 劳伦斯在同时期的报告中拐弯抹角地讲到了这些先前不为英军所知的水源，见“Feisal’s Operations，” October 30，1916，and “Military Notes，” November 3，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47-8，and f. 63。

第9章 意图拥立君主的人

费萨尔脾气火爆，骄傲而缺乏耐心，有时蛮横不讲理，很容易突然间离题万里。比他的兄弟们更具有个人魅力和精力，但不如他们审慎。显然非常聪明，或许并非过分一丝不苟……如果他被教养的方式不对，或许会成为一个兵营军官。深受民众爱戴，雄心勃勃；满脑子梦想，也有实现梦想的本领。

——1916年10月30日，T.E.劳伦斯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评价 [1]

由于劳伦斯的执拗和好运，他到汉志的旅行收获颇丰。在仅仅十天之内，他见到了埃米尔侯赛因的全部四个儿子，还有协约国在吉达的主要使节。他亲眼看到了英军在拉比格为起义军建立一条补给线的努力，还成为第一个深入内陆观察战场的外国人。1916年10月26日上午，他骑着骆驼来到延布，一心想赶紧回到开罗，将自己的发现汇报上去。

但在这个尘土漫天的小小的港口城镇，他的好运气突然用光了。按照计划，一艘英国战舰将在延布停靠，但在预定的日子，却没有战舰的影子。劳伦斯别无办法，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一直等了五天。他在可以俯瞰窄小的码头区的一座朴素的三层楼房里（费萨尔在当地的联络官的家）住了下来，着手将此次旅程的印象付诸笔端。他身边只有一支蓝色水笔和一些废纸。在5天之内，他用自己惯常的潦草笔迹写下了大约1.7万字。

关于T.E.劳伦斯的诸多互相抵触的传奇就是在延布的这座房屋内诞生的。在他的崇拜者看来，劳伦斯不仅对阿拉伯半岛的一线局势有着极其敏锐的把握，而且能够以精彩的文笔将其表达出来；他即将成为一个叱咤风云、如鱼得水的英雄；有时候，天才要努力一辈子才能遇到让自己大放异彩的良机，劳伦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在诋毁他的人看来，随后发生的事情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出于偶然机遇，在随

后三周内发生的无数对劳伦斯极其有利的小事件——奇异的巧合、信息送递的时间凑巧或者不凑巧、将军和政治家们阴险狡诈的操纵——都是不可能预知的。这些人认为，如果对所有这些因素重新洗牌，绝不会以同样的顺序再发生一次。

劳伦斯在这年10月的经历似乎能够支持后一种版本的传奇。在延布，他是个28岁的陆军上尉，不曾接受过一天的军事训练；当时，英国军方和政界的最高领导层在研讨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他的确是第一个亲眼看到一线起义军的英国军官，但他只看了26个小时，而且看到的也只是战士们在一座山谷营地中懒洋洋地转来转去，这算不得权威性分析的基础。他的大部分观察结论也不算独树一帜；在他之前到达汉志的少数几个英国军官几乎全都注意到了阿拉伯“军队”的七零八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纪律，以及对敌人火炮和飞机的可悲的畏惧。

但是，劳伦斯的评判当然不仅仅是基于他在费萨尔营地的短暂停留，而且还源自在卡尔基米什接受阿拉伯文化熏陶的多年。从那里，他深刻地理解了氏族和部落联盟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结构在战场上表现如何，以及能够找到一个在相当长时间内将诸多部落联合起来为远期目标而奋斗的领袖是多么不同寻常。另外，劳伦斯自少年时代就痴迷于一种非常特别的学术——中世纪军事史，后来在牛津又专门研究这个领域，而阿拉伯半岛在20世纪初的战争与14世纪欧洲的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些相似之处包含方方面面，从部队如何招兵买马，到领导结构——把欧洲中世纪的领主、乡绅和王公换成阿拉伯的谢赫和埃米尔，再到部队在战场上如何运作，不一而足。1916年的汉志和1356年的法国一样，行进中的军队完全依赖于对其最基本需求的满足——水、役畜和粮草，这些因素决定着军队要前进到何方，与何人作战，以及何时作战。在当时，劳伦斯的中世纪军事战略知识很少有人能够企及，所以他当即就发现，阿拉伯战场的很多特征他都非常熟悉。他肯定要比那些深受拿破仑战争或甚至当时的西线战略熏陶的职业军官要更懂得阿拉伯战场。

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学术基础的劳伦斯很快认识到，要想把阿拉伯起义军部队转化为常规的欧洲式军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不是这样的军队，也永远不可能是。他在延布写下的报告中指出，唯一的办法是，英国人必须接受阿拉伯人打仗的方式，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期望。

这个观点倒还算不得特别有争议或者新颖独特，因为毕竟最保守顽固的军官也懂得，必须根据自己手头现有的人员和物资来调整战略战术，但劳伦斯在汉志的短暂停留期间得出了两个更为新颖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阿拉伯起义在早期的胜利之后，连吃败仗，境况凄凉，因此伦敦和开罗方面越来越达成了共识，必须向汉志派遣一支足够强大的英军来支持起义军。英国官员们一般认为需要一个旅的兵力，也就是约3000～4000人。10月，埃米尔侯赛因仍然对这个主意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向穆斯林圣地引入这样一支“异教徒”军队，会影响他在目前与他结盟的部落中的地位。劳伦斯从自己的旅行，尤其是从自己在费萨尔营地观察到的谨小慎微中得出结论，侯赛因的担忧是非常有道理的。他写道，虽然一小群欧洲顾问和教官在海岸上活动会受到“热烈欢迎”，但是更大规模的部队很可能会受到怨恨，正中土耳其人关于基督教十字军的宣传的下怀。劳伦斯主张英军在汉志的驻军应该尽可能少，这与英国军方大部分人——包括在汉志待的时间最久的两位英国军官西里尔·威尔逊中校及其副手阿尔弗雷德·帕克——的观点相左。[2]

劳伦斯的另外一个主张更容易引起争议：起义的真正“先知”是轻言细语、严峻朴素的费萨尔。早在战前，英国军官们就一直认为，喜好交际、活力四射的阿卜杜拉是他们在汉志的主要盟友，因为他是反复无常的侯赛因最为信任的儿子。自起义爆发以来，英国军界的看法也没有什么改变。英国军官们总是去找阿卜杜拉，希望能探听到老侯赛因的算盘，以便为作战的下一步做准备。在劳伦斯之前，只有威尔逊和帕克这

两名英国军官见过费萨尔，对他也没什么印象。威尔逊在私人层面上很喜欢费萨尔，但却认为埃米尔的第三子“不能承受战斗的喧嚣”[3]——就是说他是个懦夫。他把自己的这个判断传达给了英国领导层。在推举费萨尔为起义的真正领袖这个问题上，劳伦斯是少数派，而且这个少数派只有他一个人。

在这两点上——英国在汉志尽量少驻军、推举费萨尔为领袖，劳伦斯面临的挑战都是不可逾越的，他最终是如何胜出的呢？是由于不可否认的天才，或者纯粹是走了狗屎运？

无论是褒劳伦斯还是贬劳伦斯的人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早在延布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件虽然不引人注目但是威力强大的武器。他处于开罗军事情报机构的内层圈子，因此极其熟悉有权对阿拉伯半岛事务做出决策的英国军队和政界的统治集团。“结构”这个词实在是太美化它了。它实际上是个官僚泥沼，由叠床架屋的诸多部门、争权夺利的不同图谋和个人组成的迷宫。劳伦斯在萨沃伊饭店可以读到所有信息，哪怕是保密级别最高的文件。所以他知道这个泥沼中的所有主要角色，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更重要的东西——他们的政敌是谁。他在延布的五天期间除了写报告之外，还找时间研究了一下摆在他面前的这个令人头晕眼花的极度复杂的政治棋局，并钻研出一个策略来利用互相争斗的各派别，让自己的主张得到采纳。

在这番努力当中，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帮了他的大忙：当时的通信手段。在某些地方，通信已经比几十年前有了质的飞跃，但在有些地方却仍然很原始。在1916年，利用油印机可以将一份重要文件复制成百上千份；已经有了百年历史的复写纸也可资利用。有了无线电报，从伦敦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一份信息只需几分钟，而在阿拉伯半岛这样的地方传递同样的信息却需要派遣一名徒步或者骑马的信使。劳伦斯非常擅长利用通信的进步和缺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违反规定，向自己的

盟友快速发送信息，而在收到不合自己想法的命令时，就说“信号传输故障”（这是他最喜欢用的借口），先斩后奏。再加上一种无情的特质，T.E.劳伦斯成了特别擅长与官僚体制做斗争的典范，甚至最阴险狡诈的宫廷阴谋家或是追求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也会艳羡他的本领。

在随后的三周内，形形色色的英国官员都会利用劳伦斯作为先头尖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心腹鹰犬——去努力达成自己的意图，而压制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位28岁的上尉在这个角色上娴熟地玩弄各方势力，对法国在该地区的狼子野心施以沉重打击，严重挫伤了一位极其位高权重的英国大员的势力，并推动了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政策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在这过程中，他还将改变阿拉伯起义的进程，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但他叱咤风云的开端却不顺利。10月31日，皇家海军“苏瓦”号在一位叫作威廉·“生姜”·博伊尔（他被称为“生姜”是因为他有一头红发）的职业海军军官指挥下停靠在延布，终于将被迫在此停留数日的劳伦斯接走。

“我听说，有位劳伦斯上尉在海岸上，”博伊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原以为他是一名被派遣到那里的军官，但登船向我走来的却是个邋里邋遢、毫无军人仪表、两手插在口袋里、没有敬军礼的矮子，我有些吃惊。”[4] 秉性严肃、不苟言笑的博伊尔注意到劳伦斯一侧的肩章上有三颗表示上尉军衔的星，另一侧却一个也没有，于是不肯搭理这位乘客，而是让自己属下的一名中尉去接待他；中尉狠狠地训斥劳伦斯不懂礼貌，这让船长颇为满意。

劳伦斯在自己的回忆中承认没有给“生姜”·博伊尔留下好的第一印象，但认为问题出在遗传上。他说：“红头发的人很少有耐心。”[5]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爱德华·布雷蒙都没有注意到10月16日参加

法国领事馆宴会的那个沉默寡言的英国陆军上尉。劳伦斯的确也不引人注目。法国上校在那天晚上的主要客人是他在吉达的英国同僚西里尔·威尔逊，以及到访的埃及东方文化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后者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人，在餐桌上也是谈笑风生、幽默风趣。而劳伦斯上尉身材矮小，又长着一张娃娃脸，穿着不合身的军服，很容易被当作扮演士兵的毛孩子。11月初，劳伦斯再次来到法国领事馆宴会厅的时候，布雷蒙就有充分的理由要对他重新评估了。在这次宴会上，三周前还丝毫不引人注目的年轻军官口若悬河，甚至完全抢占了话头，而他说的话更是让布雷蒙张口结舌。

“苏瓦”号在10月31日驶入延布海湾的时候，劳伦斯估计自己很快就要返回开罗。但是西里尔·威尔逊在汉志的副手阿尔弗雷德·帕克上校也登上了“苏瓦”号，要亲耳听听劳伦斯在费萨尔营地的所见所闻。帕克对劳伦斯的洞察力颇为赞赏，于是建议他先去喀土穆面见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后者是参与阿拉伯事务的最重要的英国官员之一。于是，“苏瓦”号带着劳伦斯调头行驶200英里，返回了吉达，那里有一艘船已经准备好，要带他渡过狭窄的红海，前往苏丹。这艘船是“欧吕阿鲁斯”号，红海舰队的旗舰，由舰队司令罗斯林·威姆斯将军亲自指挥，这足以说明英国高层对劳伦斯的使命突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布雷蒙上校听到这些风声，非常想知道这位年轻的陆军上尉在费萨尔营地究竟看到了什么，或许还更想知道，他打算向雷金纳德·温盖特报告些什么。于是他邀请劳伦斯和威姆斯到吉达赴宴。在这次宴会上，布雷蒙很快发现，劳伦斯上尉的几乎所有观点都与他在阿拉伯半岛的目标相抵触。

自9月初在吉达搭台唱戏以来，布雷蒙一直鼓吹让协约国在汉志大幅度增兵。他的部分理由显然植根于对侯赛因起义军战斗力的极低评价。他多次提议让他指挥下的200名法国技术顾问（目前无所事事地待

在埃及）立刻前往拉比格，将阿拉伯人转变为一支像模像样的作战部队。当然，一旦土耳其军队进攻拉比格，这么小的队伍无力抵抗，所以布雷蒙还建议从埃及派遣兵力足够强大的英国部队——至少一个旅，或两个——来控制这个地区，提供保护。如果这位法国上校得逞，西方国家在汉志的军事存在就从屈指可数的少数人——他自己、威尔逊、帕克和散布在海岸线上的英国后勤军官——扩张到3000～10000人。

他没有明说的是，这个建议与法国的秘密意图——或者说至少是布雷蒙上校自己的秘密意图——多么相符。一线有了较大规模的协约国部队，就很容易对事态发展进行监视和控制，并阻止阿拉伯起义蔓延到叙利亚。更妙的是，英国要投入数千兵力，而法国只有200人，投资极少，却能在中东形成实际的军事存在，名正言顺地成为英国在该地区的平等伙伴。

英国驻开罗的埃及远征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虽然没有看透布雷蒙的隐秘动机，但对这个想法已经是冷若冰霜。他的任务是向西奈半岛对面的巴勒斯坦南部发动攻势，而他的兵员经常被寻找新炮灰的西线指挥官们抽调到法国去对付德国人，所以默里坚决反对从他麾下再调离任何部队，去参与阿拉伯半岛的“无关紧要的杂耍”。

布雷蒙在与雷金纳德·温盖特接触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对法国人来说，苏丹总督是个绝佳的代言人，他坚信阿拉伯起义非常重要，但同时也斩钉截铁地相信光靠起义军是永远不能成事的。除了布雷蒙的建议之外，温盖特派往阿拉伯半岛的两名政治官员——威尔逊和帕克也相信，如果没有外国部队尽快支援，起义军的崩溃指日可待，所以温盖特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了。当然了，温盖特支持派兵也是空口白舌，因为他没有军队可以派遣。要派兵的话只能从埃及的默里麾下抽调。按照布雷蒙的盘算，温盖特已经是他的盟友了，现在只需要等待阿拉伯起义军的下一次挫折，就可以联手绕过默里，直接请求伦敦派兵。

布雷蒙不需要等很久。就在劳伦斯困守延布的那几天，出现了一个对布雷蒙有利的机遇。10月底，有消息传来，一大股土耳其军队正在逼近拉比格。这消息让驻扎在这座关键港口城镇以北山脚的阿拉伯部队大为恐慌，争先恐后地奔向海滩。温盖特和布雷蒙感到机会来了，于是迅速行动起来。温盖特向伦敦发了电报，敦促英法军队做好在拉比格登陆的准备。[6] 布雷蒙紧随其后，向英国外交部发送了一份声明，称自己完全准备好将闲置的士兵和火炮派往拉比格，但“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护卫，就有可能落入敌手，因此这是非常不谨慎的”。至于这位法国上校要求的“护卫”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温盖特为他的政府提供了具体数字：至少六个营，即约6000英军士兵。[7]

面对如此紧迫的请求，若不是默里将军坚决反对的话（那6000士兵只可能从他那里调出），英国战争委员会差一点就批准了温盖特的建议。11月2日，战争委员会驳回了从埃及调兵的请求，但建议布雷蒙和温盖特在他们属下尽可能搜罗兵力，尽快送到拉比格去，这就让一心要让战事升级的两人回到了原点。

伦敦的决定让布雷蒙颇感失望，但在同一天传来的一点新消息让他振作了起来。阿尔弗雷德·帕克在拉比格报告称，并没有土耳其军队在逼近拉比格，也从来不曾有过；整个危机都是由于错误的传闻。帕克尖刻地指出，这个令人尴尬的事件“证明，一旦受到威胁，拉比格的队伍一分钟也抵挡不了……我认为最佳解决方案就是让英国政府（战争委员会）收回成命，向拉比格派遣一个旅”。[8]

这对布雷蒙来说宛如天籁，他自信满怀，认为很快就会有游说战争委员会的新机遇；毕竟，一个谣言就让起义军抱头鼠窜，如果土耳其人真的打过来该怎么办？

然而，就在这个关头，T.E.劳伦斯再次出现在吉达。

在法国领事馆的宴会上，劳伦斯解释说，从他在拉比格与阿里的交谈以及在哈姆拉与费萨尔的会晤来看，他坚信不疑，协约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应该保持在最小规模；侯赛因的起义军很乐意从基督教“异教徒”顾问手中接受武器和军事训练，不管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但任何更进一步的行为肯定会让他们害怕欧洲人会接管阿拉伯半岛，导致起义从内部瓦解。

理智的人完全可以不同意这种分析——布雷蒙就是坚决反对——但真正让他目瞪口呆的是劳伦斯的第二个观点，即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协约国根本没有必要派遣军队。他认为，阿拉伯战士主要是一支防御性力量，他们已经掌控了麦地那与海岸之间的狭窄峡谷和隘道，阵地固若金汤，不必害怕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只要阿拉伯人控制着那些高地——当地的地形完全不利于土耳其人的炮兵和飞机优势的发挥，所以很难想出将阿拉伯人从那里驱逐出去的办法——拉比格就非常安全。

布雷蒙是个彬彬有礼的东道主，当然不会指出，劳伦斯对一线起义军观察了仅有一天时间，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他肯定问了，如何解释起义军前不久在拉比格以北的丢盔卸甲、鸡飞狗跳。如果阿拉伯人仅仅听到一个传闻就急于抛弃自己的阵地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并不认为自己的阵地像劳伦斯说的那样固若金汤。或许就是为了回答这样的质询，劳伦斯提出了又一个论点：在拉比格东逃西窜的是阿里的人，而不是费萨尔的部下；而费萨尔才是起义的真正领袖。

劳伦斯的这个观点最让布雷蒙目瞪口呆。上校还没有见过费萨尔，但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东西能够表明侯赛因的第三子是一个天生领袖或者杀伐决断的指挥官；布雷蒙在不久之后给巴黎的报告中写道：“费萨尔说话很多，但全是废话。他行动很少，从不做实事。”[9]

而且从法国人的角度看，推举费萨尔为领袖的想法也是令人惊恐的。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他比他的两个兄长都更不信任欧洲盟友。而

且他还和叙利亚的旨在推动阿拉伯独立的密谋者过从甚密；杰马勒帕夏已经抓捕了很多这样的密谋者，但他们的网络中的有些部分肯定仍然存在。法国急于避免让阿拉伯起义扩展到叙利亚，因此费萨尔的崛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头痛的。

如果不是由于一些细节，布雷蒙或许会将劳伦斯仅仅当作一个特别令人讨厌的宴会客人而不予理睬，将他的大胆推断看作一个狂妄自大的天真汉的臆想。首先，劳伦斯的举止不同寻常。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带着坚定不移、不容置辩的自信，这种自信在军事规程方面简直到了放肆无礼的地步。不管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的资历多么老，军衔多么高，这个蓝眼睛、目光冰冷的陆军上尉都不肯让步。而且他对威姆斯将军也产生了特别的影响。不管威姆斯之前对调兵到阿拉伯半岛的观点如何，现在显然已经深受劳伦斯的影响，想法与他极其相似；事实上，威姆斯正打算陪同劳伦斯一起去喀土穆，联手向温盖特游说。爱德华·布雷蒙当然非常害怕这两个人见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他最亲密的英国盟友的温盖特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次宴会之后，布雷蒙上校以贬抑的口吻称，劳伦斯已经成了费萨尔的“封臣”。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他会对劳伦斯有更深的了解，那时就会发现自己一直都搞错了，这个毫不装腔作势的英军上尉推举费萨尔其实有个自私，甚至阴险的动机。如果英军有一个旅在阿拉伯半岛登陆，肯定会建立起一个恰当的军事指挥机构，像劳伦斯上尉这样长期坐办公室、缺乏军事经验的人就没有什么戏可以唱了。如果没有外来干预，侯赛因的儿子们就要执掌大权。像费萨尔这样温软而踌躇不定的人，劳伦斯可以让他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使自己成为阿拉伯半岛幕后拥立君主的人。

10月22日，也就是劳伦斯动身前往费萨尔的山间营地的那天，苏格兰北部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故事的开端是，斯堪的纳维亚—美

国航线的一艘客轮“奥斯卡二世”号停靠在奥克尼群岛柯克沃尔镇的加煤站。

虽然“奥斯卡二世”号是在两个中立国之间航行——从丹麦出发前往纽约，但奥克尼群岛对英国军方来说是个极其敏感的地区，因为他们在战时的主要海军基地就在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英国警方始终在高度警惕，提防间谍或破坏分子，于是一队英国警察登上了这艘船籍为瑞典的客轮，进行例行的护照和行李检查。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是个身材粗壮的41岁的奥斯曼公民，前不久从德国进入了中立国丹麦。

在甲板上，警察们当着其他乘客的面将此人扣押，同时对他的舱室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后来当着张口结舌的乘客们的面告诉“奥斯卡二世”号的船长，此人的舱室“装满了德国的东西”[10]。此人被押上一艘警用快艇，当晚被监禁在柯克沃尔一家旅馆，次日被押往苏格兰本土。他后来被解往伦敦，到10月25日已经在接受巴塞尔·汤普森的讯问。汤普森是苏格兰场刑事调查部的长官，同时负责战时在英国境内对颠覆破坏分子和间谍的追踪。

“奥斯卡二世”号抵达纽约之后，公众才知道亚伦·亚伦森被英国人逮捕了。这很快在某些圈子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以及亚伦森战前在美国长期访问时熟识他的农学家们。这两个群体的人都不肯相信，这位犹太农学家居然是同盟国的间谍，而他在柯克沃尔被捕大约就是因为这样的罪名。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在战争爆发时，很多犹太移民逃往中立国或者英国治下的埃及，而他却选择留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而且他穿越战火纷飞的中欧前往丹麦的旅程也极其可疑。很显然，如果没有土耳其和德国政府高官的批准，他是不可能做这样的旅行的。

“奥斯卡二世”号上至少有一位乘客坚信亚伦森是无辜的。这是一位

名叫奥尔加·伯恩哈特的德国犹太社会名流，在从哥本哈根出发的旅途中与这位农学家结为好友。她打算抵达美国后将他的困境公之于众。但她的努力事与愿违。[11] 她向《纽约晚报》爆料后，这家报纸却刊登了文章，将亚伦森描绘为危险的土耳其间谍。于是，美国科学界或犹太人团体争取释放亚伦森的努力都泡汤了。

但亚伦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是因为，他在柯克沃尔的被捕是一个复杂的幌子。他的确是个间谍，或者至少他非常想成为一名间谍，不过是效忠英国的间谍。他被从“奥斯卡二世”号上押走的场景颇具戏剧性——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监禁，几乎是公开宣布在他的行李里查获了什么东西——都是为了迷惑德国和土耳其的反谍报人员，以保护他在巴勒斯坦的间谍网。如果静悄悄地将亚伦森带走，就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了。他需要让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知道”，他的目的地是美国，而英国人在“奥斯卡二世”号的甲板上抓获这名“危险的土耳其间谍”完全是出于偶然。所以，《纽约晚报》为他描绘的间谍肖像反而给他加了分。当晚在柯克沃尔的旅馆房间内，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游戏开始了。”[12]

这是一场马拉松一般漫长的游戏。亚伦森拿着杰马勒帕夏发放的旅行许可离开巴勒斯坦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情了。首先，为了打通关节获得前往维也纳的证件，他在君士坦丁堡耽搁了一个月时间。从奥地利首都到柏林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要想办法进入中立国丹麦又花了一个月时间。9月中旬，农学家终于越境来到丹麦，不料又有更多障碍：首先要与英国反谍报人员取得联系，然后还要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是真的。[13]

在丹麦的英国特工人员或许并不完全相信亚伦森的话，但在犹豫一番后决定，就让苏格兰场来判断真伪好了。10月中旬，他们安排亚伦森登上了“奥斯卡二世”号，于19日从哥本哈根港起程，同时又安排三天后在柯克沃尔将他逮捕。于是，花了一年多时间拼命要和英国人接头的志

愿间谍终于称心如愿。

在等待“奥斯卡二世”号起航的时候，亚伦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踏上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无论下面发生什么，之前作为巴勒斯坦普通科学家的生活都一去不复返了。在哥本哈根，他用暗语写了好几封信，希望能通过中间人将这些信送给在阿特利特的同志们。在信中，为了蒙蔽德国和土耳其反谍报人员，他用欢乐的笔触写到即将前往纽约的喜悦心情，同时用一些特别的措辞和短语暗示自己的真正目的地是英国。

他还给朱利安·麦克法官（资助阿特利特研究站的美国恩主之一）写了一封长信，吐露了自己踏上这条危险路途的原因。这封信一半是忏悔——后来亚伦森就是这样描述这封信的——一半是宣言，他痛心疾首地叙述了这两年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促使他背弃了曾经接纳他的国家。“如果我离开奥斯曼帝国，公开为英国效劳，”他写道，“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我的品行、我的地位会受到损害。但我做得更糟糕。我站在原先的地方，我组织整个运动，我与情报局（不敢直呼其名的人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发生了联系。我不喜欢矫揉造作的言辞。说得清楚些，我成了间谍。”

亚伦森希望这封信能被拿给赞助研究站的其他美国犹太人恩主看，其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定会被信的内容震惊。这或许能够解释，科学家在解释自己和同志们的奋斗目标时为什么摆出了一副演讲的腔调，甚至有些戏剧化：“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肮脏的金钱……我们也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复仇；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为犹太人的事业尽绵薄之力……我们认为，各尽其力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还很愚蠢，仍然相信公理、正义以及我们为之效力的事业。”[14]

这固然很好，但高尚的言辞无法让巴塞尔·汤普森完全满意。作为

苏格兰场刑事调查部的长官，汤普森到1916年底的时候已经讯问了数百名志愿当间谍的人，还审讯了更多后来被证明是德国卧底的人。在10月25日被送进他办公室的这个人的履历和近期旅行经历都很难让人信服。

但亚伦·亚伦森说得越多，汤普森就越相信他是真心要为英国效力——尽管是出于他自己的动机——并且的确有刺探情报的技能和聪明敏锐。亚伦森不仅对土耳其战争机器的细节观察得极其细致入微——这些信息现在可能有些过时了，但亚伦森说他有一个间谍网能够持续地更新情报——而且对该地区的方方面面有着百科全书一般广博的知识。对汤普森警探来说，决定性的时刻是他们说到英军目前缓慢穿越西奈半岛为进攻巴勒斯坦做准备的时候。

英军在这片干旱的荒原前进得慢如龟爬，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从遥远的埃及运输淡水。这意味着必须铺设水管，而铺设水管就需要建造一条铁路。但根据亚伦森的说法，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沙漠里就有水，”他说，“你们只需要钻井就是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汤普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的提问。

亚伦森耸耸肩：“石头就是证据。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1世纪的犹太—罗马历史学家）也说了。他写道，他从恺撒利亚[15]出发南下走了一整天，沿途到处是翠绿的花园……既然有花园，肯定就有水。现在水在哪里呢？”

“你能做些什么？”汤普森问道。

“如果我现在和英军在一起，就可以告诉工兵们在哪里钻井。我可以保证，他们不需要从开罗运送一滴水，就能为全军提供足够的水。”[16]

汤普森对亚伦森有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决定送他去英国军队的中枢首脑，即白厅街上的帝国总参谋部。在那里，一名叫作沃尔特·格里本的年轻少校受命对农学家继续询问，这是决定如何处置他的第一步。10月28日，也就是抵达伦敦后的第三天，亚伦森给在纽约的弟弟亚历山大和妹妹莉芙卡写了封信。除了对终于抵达英国表示宽慰——“这几天夜里，我睡得非常安宁，没有受到噩梦搅扰”——之外，他还承认自己心中有一丝遗憾：

> 在这里，我很幸运，人们急切地听我说话，他们的头脑也很开明。我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的英国朋友早一些得知情况，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我早一点抵达，或许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让我们的国家少受一些苦难，为我们的朋友们也能多尽一分力。[17]

亚伦森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对局势一无所知。前一天，在沃尔特·格里本又一次来讯问他的时候，一个和蔼可亲、微胖的三十五六岁的男子走进了办公室，短暂地旁听了一会儿。在格里本讯问的间歇，这个人询问亚伦森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以及在为数众多的犹太政治思潮中他究竟支持哪一种。这个人听得非常仔细，临走前给了亚伦森一张名片，请他在三天后的上午9点30分到名片上的地址去。亚伦森满口答应。名片上的地址是百老汇门30号，也就是赫尔中央区议员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伦敦的宅邸。1916年11月15日，吉尔伯特·克莱顿准将面临着一个和上下级关系一样历史悠久的难题：如何破坏上级的计划，而不至于暴露自己？在这一天，让克莱顿的难题愈发困难的是，为了设计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他必须尽快与自己的一名下属——T.E.劳伦斯上尉谈谈。但不幸的是，他联系不上劳伦斯，因为他正在喀土穆与开罗之间上千英里的沙漠和尼罗河沿岸城镇中的某个地点。

他的问题是，雷金纳德·温盖特又一次鼓吹在阿拉伯半岛实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这一次还说劳伦斯和谢赫费萨尔都支持这么做。在劳伦斯露面之前，克莱顿没有办法知道劳伦斯向温盖特说了什么，因此也没有

办法轻松地挫败温盖特的计划。

但不管吉尔伯特·克莱顿选择如何行事，他都有个显著的内在优势。这是因为，在战时的埃及，英国人建立了各部门和机构职责互相重叠的官僚迷宫，所以没人说得清克莱顿的职责范围具体有多大。这种不确定性在过去的许多危机中帮了这个蓄着铅笔般小胡子、毫不招摇的特工头子大忙，这一次又将助他一臂之力。

在战争之初，克莱顿是英国驻开罗的情报主官，因此是劳伦斯和其他于1914年底在萨沃伊饭店设立办公室的“唐突鬼”的总上司。而克莱顿的直接上司是英国在埃及的主要民政长官——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简单地说，这些人的最终上级是伦敦的外交部。

但埃及成为英国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由陆军部领导）的主要集结地之后，这个一目了然的指挥链条就变得稀里糊涂、充满争议。在常驻埃及的行政当局和外来的埃及远征军的将领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那些听命于陆军部的军事情报单位——开罗一下子挤满了这种单位——没有理由容忍与他们竞争的、听命于外交部的情报机构。1916年初，克莱顿的“唐突鬼”得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职权范围，并得到体制化，组建了阿拉伯局，这时双方的摩擦更加严重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埃及远征军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一直在努力从麦克马洪手中争夺克莱顿的阿拉伯局的控制权，但徒劳无功，最后只得满足于一个类似监管的职能。

但在开罗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其实有三个玩家，好不热闹！另外一方就是1000英里之外的喀土穆。苏丹总督雷金纳德·温盖特同时还是埃及军的总司令，埃及军和默里的埃及远征军是两码事。我们可以猜到，这三个人——麦克马洪、默里和温盖特互相都看不顺眼，而让他们的阴谋诡计更加错综复杂的是伦敦和英属印度的各种机构的明争暗斗，他们各自在埃及首府有着自己的利益、盟友和敌手。另外还有由当地人组成的

正式的埃及政府，虽然它没有任何实权，但许多英国官员还是时常感到有必要假装征询它的意见，以维持“埃及居民的意愿很重要”的假象。

在这乱七八糟的糊涂账里，有一个名字却令人惊异地不断浮现：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916年秋季，这位特工头子同时还担任阿拉伯局的局长（听命于麦克马洪）、“埃及军总司令驻开罗代表”（听命于温盖特）和埃及远征军（默里）与英属埃及的民政当局（麦克马洪）之间的主要联络官。在闲暇时光，他还领导着一个境内的间谍网，对当地异己分子领导人和土著埃及政府代表进行监视，这两群监视对象往往是同一群人，所以任务简化了不少。劳伦斯后来描述道：“要看清他的真正影响力并不容易。他就像是水，或者弥漫的油，悄无声息、坚持不懈地渗透一切。没办法说清楚克莱顿在哪里，或者不在哪里，以及究竟多少东西属于他。”[18]

虽然在这年11月，吉尔伯特·克莱顿在考虑破坏温盖特的计划，但在私人层面上，他和温盖特最亲密，这也是个悖论。温盖特时年五十五六岁，整洁矫健，蓄着修饰优雅的白胡须。他在东非是个传奇，曾经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马赫迪战争中与基钦纳并肩作战，在随后的17年中则统治着英属苏丹。在其中的五年里，克莱顿在喀土穆担任温盖特的私人秘书，对他政治上的精明敏锐印象极深。在1916年夏季，温盖特是该地区最早理解阿拉伯起义重要性的英国领导人之一，并不知疲倦地在伦敦推动这项事业。

但反复出现的症结所在是，温盖特关于阿拉伯半岛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他派往那里的两个苏丹通——西里尔·威尔逊和阿尔弗雷德·帕克，以及爱德华·布雷蒙上校。这三人喋喋不休地向温盖特灌输起义军的无能，滔滔不绝地鼓吹大规模出兵的必要性。阿拉伯局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种做法，克莱顿在10月安排T.E.劳伦斯去汉志实地考察，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获取一个新视角。正如克莱顿预料的，劳伦斯在考察之后更加坚

信增兵只能坏事，所以克莱顿批准劳伦斯绕道去喀土穆，直接向温盖特汇报。

起初，这种策略似乎奏效了。劳伦斯于11月7日抵达喀土穆，也就是温盖特首次要求军事干预的请求被战争委员会否决的几天之后，劳伦斯向温盖特说的话似乎让这位总司令宽慰了不少。劳伦斯对阿拉伯半岛的了如指掌以及对费萨尔部队防御能力的叙述显然给温盖特留下了很深印象，于是他在当天发电报给克莱顿，概括提出了一个规模大大缩减的计划：敦促布雷蒙将他的技术顾问尽快派往汉志（但不派遣数千名英军作为护卫），并给费萨尔的人“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飞机、火炮、机枪），帮助他们继续在山区进行防御作战”。[19]

克莱顿以为事情就这样定了，不料又出了新娄子。次日，即11月8日，法国政府敦促英国战争委员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并强调，虽然布雷蒙急于将顾问派到拉比格，“他们无法提供英国步兵能够形成的那种野战力量。让这些法国单位自行前往拉比格意味着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让他们冒牺牲的风险，将原定送给谢里夫的机枪大炮拱手交给土耳其人”。[20]

不久之后，温盖特发来了电报，表示又一次支持布雷蒙/法国政府的观点，尽管他受到了劳伦斯的影响。劳伦斯坚持认为，费萨尔或许有能力独立阻挡住土耳其军队向拉比格的进攻，所以温盖特建议让英军的一个旅随时待命，但只在“最后关头”才登陆。他还表示，唯一一位曾经亲临前线的英国军官——劳伦斯上尉也支持这个决定。[21]

在开罗读到这份电报的克莱顿感到不可思议。劳伦斯从军的时间已经够长，肯定知道随时待命的部队肯定会部署出去，这将会让他曾经警告的情况——阿拉伯起义从内部分崩离析——成为现实。劳伦斯怎么会同意这么做呢？这个问题一时间还得不到回答。劳伦斯于11月11日离开喀土穆，在抵达开罗之前与他无法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战争委员会在

法国人的强大压力之下，已经在考虑下一步棋。

11月16日，劳伦斯终于在阿拉伯局的办公室坐下的时候，克莱顿对他究竟说了什么，没有任何记录留存至今，两人在各自后来的著作中也不曾详细提及这次会议。根据坊间轶闻，劳伦斯要么坚持说温盖特误解了他的意思，要么承认自己确实同意温盖特的计划，但以为是在回应一种完全是假设的情况。

如果劳伦斯的确对他与温盖特的会面语焉不详，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11月6日，即他抵达喀土穆的前一天，传来消息称，亨利·麦克马洪将被解除埃及高级专员的职务，由雷金纳德·温盖特接替。这个消息让身处喀土穆的劳伦斯陷入难堪的窘境。与他会谈的人不仅是英国统治集团中地位最高的支持增兵者，而且他还即将成为自己的总上司。所以，劳伦斯很可能是在喀土穆当着温盖特的面同意他的计划，而希望自己回到环境更为友好的开罗之后能够出力破坏这个计划。

他现在就在大力破坏温盖特的计划。11月16日，劳伦斯与克莱顿会谈结束后回到办公室，写了一份新的关于汉志局势的备忘录，措辞非常直率，毫不迂回曲折，绝对不可能被误解。他于次日将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它虽然只有短短4页，但史上恐怕没有一份对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战争努力影响更为深远的文件。

在这份备忘录中，劳伦斯列举了能够支持往阿拉伯半岛大量增兵的几乎所有论据，然后一一予以驳斥，而且是以子之矛击子之盾。他指出，假如土耳其人突破了费萨尔在山区的防线，阿拉伯人的确守不住拉比格，但温盖特建议的在某处随时待命的协约国部队同样办不到。这是因为，土耳其人杀出山区之后，到拉比格就只有四天路程。在短短四天之内，哪怕是在埃及已经整装待发的部队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并部署完毕。

那么问题就是，是否可以在费萨尔的部队仍然坚守山区的时候就立刻派兵，但关键在于阿拉伯人内心深处对西方的不信任。“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独立，他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劳伦斯写道，“他们对我们提供的帮助感激涕零，但是担心我们在事后会向他们提出要求。我们已经将太多的伊斯兰国家占为己有，他们并不相信我们干预阿拉伯事务是出于无私的目的，而且他们非常害怕英国会占领汉志。不管有没有谢里夫的许可，只要有一支足够强大、可以在拉比格建立阵地的英国军队在那里登陆，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说‘英国人背叛了我们！’然后作鸟兽散，各自回到自己的帐篷。”[22]

当然，其他反对增兵的人一直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劳伦斯对该地区有着第一手的观察，所以能够给这种论据赋予全新的力量。他在前往费萨尔营地的跋涉途中发现，在拉比格以北的山中还有其他此前不为人知的水源。如果协约国大幅增兵，山区的阿拉伯人的抵抗必然土崩瓦解，一旦他们瓦解，土耳其人就可以利用这些水源，完全绕过拉比格，直取麦加，丝毫不受阻拦。在那种情况下，这座港口城镇就彻底丧失了关键的战略地位，变得无关紧要。

但劳伦斯还没说完。他看透了增兵计划的幕后推动者是布雷蒙上校和他的法国上级——不管英国战争委员会在最新一轮争吵中作出何种决定，他们都很可能会继续推动这个计划——于是着手驳斥他们的借口，即需要英军保护他们在拉比格的技术单位。他指出，即便土耳其人真的突破了山区防线，进逼拉比格，协约国还有四天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皇家海军还有足够的时间撤走200名法国军事顾问，但或许没有时间疏散数千名英军及其珍贵的战争物资。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借口的如此之大的漏洞此前竟然没有人发现。

劳伦斯指出，法国人的计划从来就不打算保卫拉比格，而是通过从内部消解阿拉伯起义，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图谋：“他们

说：‘最重要的是，决不能让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如果有协约国军队在拉比格登陆，就能保证这一点。部落武装会四散回家，我们就成了谢里夫在麦加的唯一倚靠。战争结束后我们把麦地那给他，作为酬劳。’这当然是一条确定的政策，有利于他们的更大计划。”但劳伦斯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英法军队成为拉比格尘土漫天的海滩上无法慰藉的纪念碑”。[23]

这是对英国最亲密盟友的严重指控，令人震惊，尤其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布雷蒙上校在吉达告诉劳伦斯的话的推断，而且是高度曲解之上的。但于对法国盟友越来越怨恨和疑忌的英国军方领导层而言，这或许并不令人吃惊。在西线，遭受重创、精疲力竭的法军正在努力重组力量，所以主要战斗是由英军承担的，英军的损失也更大。在过去的5个月中，为了给遭受沉重打击的法国凡尔登驻军减轻压力，英国的道格拉斯·黑格将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挥他的军队猛攻索姆河沿岸的德军阵地，却徒劳无益；索姆河战役中，英军伤亡40万人，恰好是法军的两倍。在中东战场，法国人多次阻挠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而且对英军即将展开的巴勒斯坦攻势一直摇摆不定——这是因为他们害怕英军得胜后会冲进法国人打算在战后占为己有的地区。知晓这些内情的英国指挥官们都愿意接受任何指控法国人背信弃义的说法。当然，劳伦斯的指控也肯定会受到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部分的欢迎，因为他们也急于将法国势力完全赶出中东。

劳伦斯的备忘录的效果是把向阿拉伯半岛派兵的问题从军事背景下抽出，放到了政治背景下。也就是说，英国统治集团中支持增兵的人可能是无意间中了法国人的巧妙圈套，这个圈套旨在破坏阿拉伯起义，同时通过把英军分散至阿拉伯半岛，搞垮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到1916年秋季，最能损害一位英国军官名誉的指控就是愚蠢地被法国人玩弄和利用，劳伦斯对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指控不管如何拐弯抹角，实质就是这样的。

但如何处置这样一份爆炸性的文件？这就是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1月17日面对的新难题。劳伦斯是阿拉伯局的工作人员，克莱顿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将文件发送给阿拉伯局的上级亨利·麦克马洪。但这是多此一举，因为麦克马洪即将卸去高级专员的职务，他拿到文件后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什么效果。克莱顿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将文件送给雷金纳德·温盖特，希望总司令能最终认识到自己增兵计划的谬误，改变主意。但是劳伦斯对温盖特让部队随时待命的计划冷嘲热讽，肯定会让温盖特火冒三丈。

但在政治斗争中，有时死敌能够被转变为暂时的盟友。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自抵达开罗以来，一直尽其所能地控制吉尔伯特·克莱顿和他的阿拉伯局，或者阉割其权力。默里曾想把阿拉伯局纳入自己麾下，失败之后火冒三丈，甚至命令自己的情报单位不与克莱顿的单位合作。[24] 但在11月17日，克莱顿最感兴趣的是，默里坚定不移地反对向阿拉伯半岛派兵。9月份，在一次跨部门的会议上，默里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你说，你只是想要这个或者那个，是没有用的。”他向温盖特的副手西里尔·威尔逊咆哮道，“从战争的经验，以及最近几场战役的经验来看，事情一旦开始，一定会发展扩大。你开始只要一个旅，然后这个旅又需要火炮，然后又要飞机和骆驼。然后又说部队必须转移到10英里之外的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必须守住。于是战役就越搞越大。”[25]

克莱顿想到了这事，突然感到，阿奇博尔德·默里或许知道如何处理劳伦斯的备忘录。

对埃及远征军总司令来说，这四页备忘录一定是有如神赐。它不仅简明扼要地驳斥了军事干预派的所有论点，而且还阴险地暗示，这一切都是法国人的阴谋。他命令立即把备忘录的作者带来见他。

众所周知，阿奇博尔德·默里是个容易紧张的人。在战争初期的一个关键时刻，他由于压力过大而晕倒，这件事情在英军高层引发了惊愕的窃窃私语，或许还导致他于1915年被从陆军总参谋长——英国军事等级结构中的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上贬黜下来。他被调到埃及后，紧张的毛病似乎并无好转。劳伦斯应默里的传唤前去他的司令部时，被默里的副手林登·贝尔将军拦住了。劳伦斯记述道："我走进去的时候，贝尔跳了起来，向前一纵身，抓住我的肩膀，小声说：'你不要吓到他，别忘了我说的话！'这让我大吃一惊。"贝尔指示说，劳伦斯的任务是给默里"吃一颗定心丸，但不能让他过于乐观，因为往哪个方向偏差太多都不好"。[26]

劳伦斯最终在默里面前坐下时，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个微妙的把握。虽然传闻说默里非常神经质，但很显然，在官僚斗争上，他非常稳健老辣。劳伦斯离开他的办公室不久，他就给温盖特发了一份电报："我刚见了劳伦斯，他是拜访费萨尔之后回来的。他强烈反对向阿拉伯半岛派遣白人军队。据我所知，你和费萨尔都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冒昧地提个建议，供你斟酌：立即知会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27]

这种请求温盖特"斟酌"的说法或许只是修辞上的礼貌，因为默里在15分钟前就把劳伦斯的备忘录发给了罗伯逊。至于温盖特同意劳伦斯观点的说法，温盖特是无法评判的，因为默里根本就没有把备忘录副本发给他。

在伦敦，劳伦斯的报告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快就在外交部和陆军部的高层传播开来。正如此类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同意这份报告的人对其作者的身份做了一番夸饰美化，以提高他的观点的权威性。11月19日，本来就不同意出兵干预阿拉伯半岛的罗伯逊将军将这份备忘录发给内阁，并称其作者"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知识极其渊博"[28]。

对不熟悉阿拉伯政策的复杂和微妙之处的内阁成员来说，这份备忘

录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就是它的反法态度。有趣的是，马克·赛克斯极力抵制这种效果。他向外交部抱怨道："劳伦斯上尉关于法国人对阿拉伯人态度的声明，以及他对法国更大政策计划的说法，一定是由于劳伦斯上尉对法国人的误解，或者法国军官对其政府意图的误解，因为它与巴黎方面的所思所言南辕北辙。"[29]

但他的声音非常孤独，完全抵挡不住反对增兵、敌视法国的那一派，后者现在把劳伦斯当作自己的一线专家，大加夸耀。亨利·麦克马洪也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向外交部常务次官查尔斯·哈丁发了一份电报。麦克马洪指出，他一直担心协约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干预会影响阿拉伯人的士气，而劳伦斯，"我知道他是个目光如炬的观察者，也证实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还告诉我——你无疑已经从总司令（温盖特）那里知道了，法国人也持同样观点，正因为此，他们才极力夸大目前局势的危险性，并鼓吹在拉比格采取行动。布雷蒙上校甚至向劳伦斯吐露心迹，称法国人的目标是借此破坏阿拉伯人的努力……在我们对谢里夫提供援助的问题上，如果法国人现在或者将来提出什么建议，我们一定要记住布雷蒙的话"。[30]

在风起云涌之中，甚至开罗的那些素来瞧不起劳伦斯和阿拉伯人的常规参谋军官们也对他肃然起敬。"他们开始对我彬彬有礼，"他写道，"说我富有洞察力，文风辛辣有力，个性鲜明。"[31]

面对如此凶残的攻击，战争委员会悄无声息地再次将增兵拉比格的计划束之高阁，但在此之前还发生了一件相当搞笑的事情。直到11月21日，也就是劳伦斯的备忘录抵达伦敦4天之后，雷金纳德·温盖特才终于看到大家都说他完全同意的这份分析材料。他发出一份怒火冲天的电报，质问为什么把他蒙在鼓里，战争委员会温和地批评了一下默里没有首先征询温盖特的意见，并说"此事显然协调沟通不力"[32]。

默里不肯低头。"我向来特别注意将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汇报给总司

令（温盖特），”他向伦敦回复道，“据我所知，我和他在工作时联系特别紧密。这个问题上诸位可以信赖我。至于劳伦斯的报告。劳伦斯是在总司令那里待了几天之后才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我自然认为，总司令已经完全知晓劳伦斯带来的消息。劳伦斯就是这么告诉我的。”[33]

亚伦·亚伦森有个癖好：不断记录自己在一天内的运动量——骑自行车多长时间，步行多少英里——并在日记中付诸笔端。这或许是源自他那虽然漫长但只是间歇取得一些成功的减肥努力，但他在伦敦期间漫长的步行却有另外一个目的：转移注意力，暂时忘却英国政府那令人抓狂的惰性。1916年11月11日，他步行了大约12英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持续地考虑局势，真会发疯。决策是多么迟缓！我离开柏林很快就要满两个月了，还没有做出任何重要举措，去寻找阿特利特的人们。”[34]

这位科学家已经尽其所能。在伦敦居留的近3周内，他已经为东道主撰写了两份长篇报告，一份记述叙利亚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惨状，另一份讲的是巴勒斯坦境内局势。第二份报告长达46页，或许是自开战以来英国对奥斯曼帝国任一角落的最全面了解。除了概述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亚伦森还详细介绍了它面临的卫生和医疗危机、公路和铁路的条件，并细致入微地列举了防守叙利亚海岸的每一支土耳其驻军的位置和规模。他甚至还写到了目前在贝鲁特有多少宪兵执行警戒，以及他们携带何种武器。

但亚伦森仍然被从一个办公室送到另一个，从一个衙门推到另一个，不断地被要求将自己的故事从头开始，再讲一遍。但是没有任何方面在努力送他回战区，更不必说努力与他在巴勒斯坦的间谍网取得联系了。

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固然是官僚机构的愚笨无能，但另一方面，英国官员们都不相信天上居然会掉这么大的馅饼。那时和当今一样，情报

人员惯于从五花八门的各种来源那里获取许多信息碎片，然后努力将这些碎片拼凑成完整的图景；一下子就拿到全部信息是非常不寻常，甚至可疑的。另外，当时的英国政府和欧洲的大多数政府一样，反犹主义倾向非常强烈，认为在一个犹太人证明自己有价值之前，他是不值得信任的。这种思维在情报工作中制造了一个很难逃脱的悖论。战争贸易情报部门的一名情报军官对亚伦森关于巴勒斯坦的报告写了一份11页的分析，承认在所有可以查证的地方，亚伦森提供的信息都“非常正确”，但同时又指出，提供情报的人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罗马尼亚犹太人”。这种描述显然支持了这位特工的结论：“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来我国目的何在，但他在英国或许像在土耳其一样注意观察，回到土耳其之后会向他们提供关于英国的情报。”[35]

当然，亚伦森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随着在伦敦的耽搁一天天延续下去，这位科学家越来越感到不安：问题或许出在他于10月30日在百老汇门30号的谈话上。

亚伦森应马克·赛克斯之邀，于这天上午9点半准时来到他在伦敦城的宅邸。两人来到装潢雅致的书房，很快又来了第三个人。他是杰拉尔德·费茨莫里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前任译员，现在是赛克斯在英国统治集团中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三人谈了90分钟，亚伦森对这次会议记述得非常粗略——“我们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但他起初以为这次谈得很好。几周后，他在伦敦的居留已经将近一个月大关，于是他又猜测起来。“我对他们或许太推心置腹了，”他在11月24日写道，“他们认为我是在下圈套。或者他们的注意力被转移开了，或者充耳不闻。或者，他们认为我太幼稚了。”[36]

事实上，亚伦森的担忧与事实相差甚远。马克·赛克斯尽管言行谨慎，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他是一批人数虽少但影响力很大的已经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飞地的英国政治家之一。他还相信，亚

伦·亚伦森或许能够在实现这个理念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赛克斯的部分动机是宗教。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帮助古老的以色列民族重返圣地是弥补近两千年来他们所受的冤屈的一种方式。亚美尼亚人遭屠杀后，他的这种观点更加坚定和强烈。在赛克斯看来，持续不断的暴行已经证明，绝不能信任奥斯曼帝国会保护其宗教少数派。他主张在战后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巴勒斯坦圣地，弥补十字军东征的失败。

但也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赛克斯在这个问题上还看到了潜在的巨大政治利益。犹太人在整个西方世界是一支虽然影响力强大但是派系众多的力量，目前为止大部分人要么保持中立，要么支持同盟国。主要原因是，协约国包含了臭名昭著的反犹势力——沙皇俄国；甚至很多英国犹太人也不愿意支持包括令人鄙视的彼得格勒政权在内的协约国。赛克斯相信，如果协约国大力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就可以把国际犹太人拉到它的阵营里来。进而，如果得到了虽然人数少但势力极其强大的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或许能最终把美国拉入战争。

早已有一位比马克·赛克斯位高权重得多的英国政治家在推动这种想法。1915年3月，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向内阁建议，在战后将巴勒斯坦变为英国的保护国，并积极鼓励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最终建立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飞地。[37] 内阁迅速而静悄悄地驳回了这个建议，因为这种行动影响过于深远，潜在的后果难以预料，但这种想法仍然维持了下来。马克·赛克斯受命与乔治—皮科敲定战后中东格局的框架时，又把这个想法提上了日程。

他很快就遇到了一个潜在障碍。亨利·麦克马洪在和埃米尔侯赛因通信的时候特别地列举了所有不会纳入阿拉伯主权范围或者留待以后再议的地区，其中没有提及巴勒斯坦，更不要说对其提出权利主张了。因此，如果对这些通信作严格解读，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巴勒斯坦将是独

立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这对马克·赛克斯来说并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他和乔治—皮科在瓜分中东的时候，早已无视了向侯赛因许下的大部分其他诺言。再加上巴勒斯坦又有什么要紧？《赛克斯—皮科协定》草案规定，巴勒斯坦将是英法俄共管的“国际行政区”。

但即便是这种安排，也不可能创建出赛克斯设想的英国保护下的犹太国家，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和谐的局面。1916年3月，他在给英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的电报中说：“阿拉伯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为了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取得主导权，一定会联手血战到底。”[38] 同时，犹太人强烈反对在巴勒斯坦实施国际共管，而法国和俄国一定不会同意让英国独吞巴勒斯坦。赛克斯告诉布坎南，为了打破这个僵局，他和乔治—皮科交换了一个新主意。

赛克斯的“解决方案”的一个特点是，他有种伪科学的观念，认为极其复杂的事物或许能导向极其简单的事物，似乎世界是一台机器，只要各个组成部件都调试妥当，就能稳稳当当地永远运转下去。他对巴勒斯坦的新主意也是这样的。援引赫伯特·塞缪尔一年前向内阁提出的建议案，他提议让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治理下的保护国；让埃米尔侯赛因指定他的一个儿子担任独立的巴勒斯坦的苏丹；英法两国联合担任这个苏丹国的担保人；同时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特许公司”买下巴勒斯坦的土地，以安置犹太移民。“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这让我深感遗憾，”赛克斯向布坎南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按照我的设想，法国人能够在巴勒斯坦拥有一个地位，俄国的意愿得到了满足，阿拉伯人有了一位君主，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了宪法地位和英国的保护，据我所知，他们要的就是这些。”[39]

但赛克斯不能高兴太早，因为他的简明清爽的方案忽略了一些尴尬的现实。首先，塞缪尔在前一年的建议当即就被内阁驳回了。其次，赛克斯没有向任何一位上级征询意见，就把这个计划宣示出来，而且是讲

给了决定中东未来版图的法国主要谈判人。赛克斯的电报被送到布坎南桌上的第二天，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就得知了此事，写了一份极其严厉的驳斥文件，命令赛克斯“忘记塞缪尔的内阁备忘录曾经提及英国保护国的事情……我当时就告诉塞缪尔先生，建立英国保护国是绝对不可能的，M.赛克斯爵士在没搞清楚这一点之前绝不应当提到这个话题”[40]。

这盆冷水或许让赛克斯谨言慎行了不少，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仍然热情高涨，新颖想法层出不穷。在1916年春夏，他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摩西·加斯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让这个话题始终保持活跃。但遇到亚伦·亚伦森之后，他的激情才再次完全振奋起来。赛克斯的传记作者罗杰·阿德尔森说：“如果说加斯特拉比在几个月前为赛克斯提供了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的装饰音，那么亚伦森就是真正在巴勒斯坦吹奏小号。赛克斯很喜欢这声音。”[41]

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以赛亚·弗里德曼说得更具体：“从马克·赛克斯爵士与亚伦森后来的高度互信的亲密关系来看，赛克斯对亚伦森的印象极深。”弗里德曼引用了其他后来深受亚伦森观点影响的英国战时官员的言论，称“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亚伦森对赛克斯信仰犹太复国主义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42]

随着在伦敦停留时间越来越久，亚伦森虽然产生了一些疑虑，但他的日记中写到在百老汇门的会晤的部分还是暗示，两人的联盟已经开始成形。“费茨莫里斯主张保持巴勒斯坦的‘既成事实’，”他这样写道，指的是犹太人家园，“但协约国还没有达成共识……赛克斯希望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英国的观点，‘但仍需努力’。”[43]

亚伦森要在开罗为这项努力做贡献。11月24日，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担心自己给赛克斯留下了坏印象的那一天，他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乘船返回埃及。在那里，他将和英国军事情报部门联手，努力让沉睡已久的

间谍网重新活跃起来。亚伦森还将在埃及与马克·赛克斯再度相逢。他们将携手设计出一个计划，让英国政府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的政策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劳伦斯在11月17日的备忘录虽然引发了一场风暴，但他在汉志的短暂停留结束后，军方还没有派他回去的计划。恰恰相反，吉尔伯特·克莱顿打算利用他的优秀文笔和娴熟的阿拉伯语，让他在开罗从事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领导阿拉伯局羽翼初生的宣传部。劳伦斯得以逃脱这平庸无聊的命运，是由于他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位恩公的帮助：雷金纳德·温盖特。

温盖特得知自己将接替麦克马洪在开罗的工作（也就是直接负责汉志的行动）不久之后，就请求扩充在阿拉伯半岛服务的顾问和情报军官；最要紧的是派遣一位联络军官到拉比格以北山区与费萨尔保持联系。大家都同意，领导这个英国军事代表团的首要人选就是劳伦斯在阿拉伯局名义上的上级斯图尔特·纽科姆。但纽科姆目前在欧洲执行任务，要到12月才能回来，于是温盖特要求另择人选，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刚刚在喀土穆拜访他的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上尉。11月12日，劳伦斯离开苏丹首都的第二天，温盖特就给在开罗的克莱顿发电报，建议让劳伦斯返回延布，在纽科姆回来之前代他主持工作。克莱顿已经打算让劳伦斯领导宣传部，极力反对，但是温盖特主意已定。

“在纽科姆返回之前，”他在11月14日重申，“我希望劳伦斯尽早前往延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绝对需要像他这样对阿拉伯人了如指掌的军官在费萨尔身边。”[44] 然后他向克莱顿保证，这只是临时措施，等纽科姆回来之后，就让劳伦斯返回开罗。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克莱顿只得让步。

当然，这都是劳伦斯写下那份煽动性备忘录、直接攻击温盖特对阿拉伯半岛的计划之前的事情。温盖特读到那份备忘录的时候，他对劳伦

斯的慷慨赞誉，以及他坚持要让劳伦斯返回延布的说法，已经成了被记录在案的事实。即便温盖特想惩罚这个年轻上尉的鲁莽，现在也没有体面的手段了。

但在官僚内斗中取胜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压倒别人。真正的本事是能够遮掩自己的行迹，装出一副清白无辜、人畜无害的模样。克莱顿和劳伦斯在这方面本领高强。11月还没结束，布雷蒙上校就将收到法国陆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元帅的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霞飞转弯抹角地提到了法英两国的某个“协议”——《赛克斯—皮科协定》——然后训斥布雷蒙胆敢说法国希望阻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英国人和谢里夫已知的心态可能导致他们相信我们要背信食言，这对我们在黎凡特计划的发展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你要克制好自己的态度，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理解。”[45]

但克莱顿给雷金纳德·温盖特下的圈套更是厉害。11月23日，劳伦斯备忘录引发的风暴还在肆虐，克莱顿向喀土穆的温盖特发了一份“私人”电报，建议把这个争议的责任全都推到默里身上。克莱顿或许是作了一番算计，认为总司令和埃及远征军指挥官之间的仇隙意味着具体细节永远不会被搞清楚，于是走的更远，甚至暗示是默里强迫劳伦斯写下了那份冒犯温盖特的报告。[46]

温盖特显然是有些天真。“我毫不怀疑，劳伦斯做了这一切，完全是出于诚恳的善意，”他在收到克莱顿电报的当天在给西里尔·威尔逊的信中写道，“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幻想家和门外汉的军人，却自视过高，对纯粹的军事问题把握不准，还自以为很精当。”他下面的话明显是暗指默里：“在整个事情当中，我最烦恼的倒不是某些人缺乏坦诚直率的精神——这些人应当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才对，而是在我承受巨大压力工作时，此事浪费了我不少宝贵时间。”[47]

要么是温盖特始终没发觉，自己被克莱顿和劳伦斯耍了，要么他是

个极其宽宏大量的人。八个月之后，他极力主张授予劳伦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等级的军事勋章，以嘉奖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

对这位后来居上的陆军上尉，并非所有人都像温盖特那样宽宏大量。西里尔·威尔逊就对他有着很深的敌意。在劳伦斯停留阿拉伯半岛期间，威尔逊对他观察最密切；在劳伦斯返回阿拉伯半岛后，威尔逊又担任他的直接上司。威尔逊极力反对让劳伦斯返回阿拉伯半岛，哪怕只是临时性的。在这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之后，威尔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劳伦斯需要教训一顿，”他对阿拉伯局的主管说道，“而且是狠狠教训一顿。那样他才能进步。目前，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狂妄自大、乳臭未干的兔崽子，虽然对叙利亚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确实丰富，但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切问题上的唯一权威，就好像在工程、驾驶国王陛下的舰船和其他方面他全都是专家。他把我遇见的所有人，从海军将领到红海上级别最低的军人，全都惹毛了。”[48]

关于这年11月事件所有被付诸笔端的谎言中，最厚颜无耻的要算劳伦斯对自己的描述了。那是在11月底的一天，他被传唤到克莱顿的办公室，得知自己被派回阿拉伯半岛，到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身边担任临时联络官。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极力推辞，说自己不适合这个职位。”[49]

---

[1] Lawrence，*The Sherifs*， October 27，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41.

[2] Wilson，*Notes on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Hedjaz*， September 11，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4，f. 329.

[3] Minutes of Conference held at Commander-in-Chief’s Residence，Ismailia，September 12，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4，f. 333.

[4] Boyle，*My Naval Life*， p.99.

[5]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43.

[6]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November 2，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03.

[7] Arabian Report no. 16（November 2，1916）；British Cabinet Records（英国内阁档案）17/177，p.2. Also，Wilson to Arab Bureau，November 1，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3，f. 49A.

[8] Parker to Arab Bureau，November 2，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03，f. 17b.

[9] Brémond report，January 2，1917，as quoted by Tanenbaum，*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p.19.

[10] Aaronsohn，*Diary*，October 25，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1] Katz，*The Aaronsohn Saga*，p.6.

[12] Aaronsohn，*Diary*，October 25，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3] Engle，*The Nili Spies*，p.77.

[14] Aaronsohn “confession” to Julius Mack，October 9，1916，pp.12-13；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5] 地中海东岸的古城，现属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和海法之间。犹太国的大希律王在位期间，大力建设此城，并改其名为恺撒利亚，意为“罗马皇帝之城”，以向罗马示好。

[16] Thomson，*My Experiences at Scotland Yard*，pp.225-26，and The Scene Changes，pp.387-88.

[17] Aaronsohn to Alex and Rivka Aaronsohn，October 28，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8] Lawrence，*Seven Pillars*，p.57.

[19] Wingate to Clayton，November 7，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3，f. 79A.

[20] French Embassy（London）to Foreign Office，November 8，1916，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p.325.

[21] Wingate to Robertson，November 12，1916，as repeated by Wingate to Murray，

November 18，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27，f. 10A，p.4.

[22] Lawrence，*Report*，November 17，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06/1511，f. 34-36.

[23] Lawrence，*Report*，November 17，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06/1511，f. 34-36.

[24] Parker to Wingate，July 6，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 Papers，W/138/3/69.

[25] Minutes of Conference held at Commander-in-Chief's Residence，Ismailia，September 12，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4，f. 333.

[26] Lawrence，*Seven Pillars*，p.112.

[27] Murray to Wingate，November 17，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27，f. 7A.

[28] Robertson，*The Occupation of El Arish*，November 19，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06/1511，f. 34.

[29] Sykes，*Appreciation of Arabian Report*，No. XVIII，November 20，1916；British Cabinet Records（英国内阁档案） 17/177.

[30] Cited by Wilson，*Lawrence*，pp.327-28.

[31] Lawrence，*Seven Pillars*，p.112.

[32] Robertson to Murray，November 22，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4，f. 75A.

[33] Murray to Robertson，November 23，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4，f. 76A.

[34] Aaronsohn，*Diary*，November 11，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35] W.T.I.D.，Report of Inhabitant of Athlit，November 2，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83.

[36] Aaronsohn，*Diary*，November 24，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37] Schneer，*The Balfour Declaration* ，pp.135-45.

[38] Sykes to Buchanan，March 14，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67，File 938.

[39] Sykes to Buchanan，March 14，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67，File 938.

[40] Edward Grey notes on Sykes’s cable to Buchanan，March 15，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67，File 938.

[41] Adelson，Mark Sykes，p.213.

[42] Friedman，*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p.122.

[43] Aaronsohn，*Diary* ，October 30，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4] Wingate to Clayton，November 11，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04，f. 18A.

[45] Joffre to Brémond，November 27，1916，as cited byBrémond，*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97.

[46] Clayton to Wingate，November 23，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Wingate Papers，143/6/44.

[47] Wingate to Wilson，November 23，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Wingate Papers，143/6/54.

[48] Wilson to Clayton，November 22，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Clayton Papers，470/5/7.

[49]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14.

第10章 进军沃季赫

这里的情况非常有趣，我想我可能不会回去了。

——1916年12月27日，T.E.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写给开罗总部的信[1]

从山顶俯瞰，夜幕笼罩下的奈赫勒穆巴拉克山谷呈现出一幅惊人的景象。劳伦斯后来记述称，从枣椰树庄园的枝叶缝隙中可以瞥见“熊熊大火，滚滚浓烟”，[2] 而山谷中回响着数千匹受惊的骆驼的哀鸣、枪声，以及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的呼喊声。

这一天，也就是1916年12月2日的晚上早些时候，劳伦斯在四名部落护卫的陪伴下从延布港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费萨尔的营地，位于内陆约45英里处的海伊夫侯赛因山区飞地。他们骑着强健的骆驼，稳步前进，预计天亮时就能抵达。但是，他们走了仅仅五个小时，离海岸的路程只有25英里，就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看到了这令人疑惑的景象。劳伦斯的护卫中没人知道，下方山谷内这么一大群武装人员是何许人也。

一行人下了骆驼，从山脊静悄悄地向下走，一直来到山谷边缘的一座被遗弃的房屋处。领头的护卫将他们的骆驼关进畜栏，将他们护送的英国客人藏在房屋内，然后往自己的卡宾枪里装填了弹夹，独自徒步前去查看究竟。他很快带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些人就是费萨尔的部队。一行人重新上了骆驼，向山谷中央走去，眼前看到的景象让劳伦斯越来越大惑不解。“地上点起了数百堆荆棘木的篝火，许多阿拉伯人围坐在火边煮咖啡或者吃饭，或者裹着斗篷像死人一样熟睡，在混乱的骆驼群中显得非常拥挤。”[3]

他们在营地中央找到了费萨尔，他坐在自己的帐篷前，身边有几名助手和一名文书。在几名奴隶手持的灯笼照亮下，他时而口述命令，时而聆听别人朗读的战场报告，显得沉着冷静。过了一会儿，他才命令部

下退去，向英国客人解释局势。局势不妙，其实已经濒临灾难。

劳伦斯在10月首次到访期间，费萨尔向他概述了一个北上作战的复杂计划，旨在给敌人制造新麻烦，消除土耳其军队对拉比格和麦加的威胁。这个计划需要费萨尔与他的三个兄弟的部队紧密配合。在阿卜杜拉骚扰麦地那周边的土耳其军队的同时，费萨尔将率其部队主力向西北前进，通过山区前往海伊夫侯赛因，最后进攻土耳其军队控制下的沃季赫港（延布以北约200英里处）。与此同时，扎伊德将负责保护通往延布的道路，而阿里会将他的部队从拉比格带出，守卫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上的一个关键路口。

劳伦斯认为这个计划过于复杂，因为它需要四个兄弟高度协调，而这在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广袤土地上是几乎不可能的。他在当时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报告中表达了自己的疑虑，但并没有说服费萨尔；11月中旬，费萨尔实施了这个计划。[4]

短期之内，计划进展还不错，费萨尔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带到了北方的海伊夫侯赛因。但在他的背后，20岁的扎伊德不可思议地忽视了一条通往延布的山区通道，完全没有把守。土耳其的一支骑兵巡逻队发现了这条通道。扎伊德的部队突然发现土耳其人堵在了自己逃往海岸的道路上，当即溃不成军、作鸟兽散。但这还只是惨败的开端。费萨尔的部队得知扎伊德的溃败之后，害怕自己很快也会被困在山区，于是也惊慌失措，从海伊夫侯赛因混乱地败退下来。费萨尔和他的副手们最终在奈赫勒穆巴拉克遏制住了这场逃窜，但他当晚向劳伦斯透露，就是这样恐怕也支撑不下去；土耳其人此刻已经在东面和南面步步紧逼，他的全军——或者说全军的残部——一直败退到延布港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劳伦斯在随后的48小时内几乎一点也没睡，不断与费萨尔会商，或者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战士们中间来回奔走，努力更好地判断危机的严重程度。然后，他狂奔回延布，发布警报。12月5日早上，他终于坐下

来向克莱顿发送紧急信息时，已经精疲力竭、灰心丧气。“整个周六夜间我都在赶路，整个周日夜间警报大作、四处奔波，然后昨夜又赶了一夜的路，所以我在这三天夜间的睡眠时间一共只有三个小时，而且我非常悲观绝望。不管怎么说，情况很糟糕。”[5]

劳伦斯深知，阿拉伯人在山区的溃败远远不止是个军事上的挫折。费萨尔花了几个月时间，费了大量心血才将北部诸部落争取到自己麾下，现在这努力都很快付诸东流了。劳伦斯在给克莱顿的报告中列举了那些已经抛弃费萨尔或者随时准备逃走的部落，并发出警告，这些部落的变节不仅将使得土耳其军队攻打麦加的道路洞开，还将导致阿拉伯起义本身的崩溃。劳伦斯写道，当下的关键问题是，费萨尔是“一个部落领袖，而不是多个部落的领袖”，已经造成的损害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修复。这个情况和劳伦斯研究过的中世纪十字军也很相似；由许多各不相同、大体上自行其是的群体组成的联盟是极端脆弱的，哪怕是小小的挫折也会导致整个联盟的分崩离析。

而且这对劳伦斯个人来说也是个惨败。在10月的报告中，他坦然承认，很难把阿拉伯战士组织成一支传统的作战部队——他估计只要一个连的土耳其士兵，在开阔地上掘壕据守就能打败所有起义军——但非常雄辩和极富说服力地强调了阿拉伯起义军作为防御性力量的厉害之处。[6]“他们的真正领域是游击战……他们积极主动，对地理环境了如指掌，而且机动性很强，所以在山地的战斗力不俗。”[7]不仅仅是战斗力强；劳伦斯估计，起义军在山地开展防御战应当是固若金汤。“根据我对比尔阿巴斯和比尔伊本哈撒尼之间山地的观察，”他写道，“除非山区部落背信弃义，土耳其人绝不可能冒险强行通过。”山区是“狙击手的天堂，”他坚信，只需要一两百人就能守住土耳其军队朝向海岸前进的任何通道。

这种信念是劳伦斯坚决反对向阿拉伯半岛派遣协约国军队的主要理

由之一，甚至在出现不利于他的证据之后，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11月初，有谣言称土耳其军队大举进攻，阿里的部队仓皇逃离了拉比格以北山地，劳伦斯向爱德华·布雷蒙坚持说，如果是费萨尔指挥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现在的事实证明，他完全错了。

或许是由于自己误判形势而感到尴尬，或许是即便精疲力竭依然保持着官场斗争的警惕性，劳伦斯在向克莱顿发送悲观的电报之前，又补充了一段。他的电报如果被刊登在《阿拉伯公报》上，所有那些支持他的反增兵观点的英国领导人都会读到，所以他匆匆写道："不要将上述任何情况刊登在《阿拉伯公报》或其他地方；这样不公平，因为我非常疲惫。"[8]

作为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回应，英国海军舰船开始在延布外海大量集结；如果局势真的到了最糟糕的那一步——费萨尔的人马被围困在这座城镇，这些舰船至少可以对周边的开阔平原进行炮击，阻滞土耳其军队的前进。费萨尔猜得没错，在12月9日上午，他的残缺不全的部队的前锋开始败退到延布，带来了他们又一次被土耳其军队打败、从奈赫勒穆巴拉克溃散的消息。最后一批掉队士兵抵达后，劳伦斯在仅仅两个月前看到的费萨尔麾下的约5000名战士就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踪迹全无的3000人中有少数阵亡，绝大多数人逃之夭夭，各自回家。

气氛非常沮丧，甚至劳伦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坚定信念是不是错了。他在12月11日又写信给克莱顿，声称"费萨尔现在改了主意，希望英军在拉比格部署兵力。我已经将这个情报发电报给你，我现在也看到他的论点很有力。如果扎伊德不是那么马虎，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他愤愤地补充了一句："阿拉伯人离开了他们的山地之后就一无是处。"[9]

当天，劳伦斯向西里尔·威尔逊描绘的情况更加惨淡。他写道，费萨尔现在认为，如果英军不向拉比格派兵，整个起义就将在三周内瓦

解。[10]

1916年5月31日早上，令耶路撒冷的许多居民困惑不解的是，一架德国飞机出现在耶路撒冷上空，在有城墙环绕的老城区以西不远处作了一系列半径很小的绕圈动作。最后，一个小小的重物被空投下来，落在法斯特酒店（德国军官们最喜欢的酒店）门前的街道上。仔细一看，这个包裹里有打包起来的德国国旗，还附有库尔特·普吕弗写的信。他在信中说，他将在当晚回到城里，让他的厨师为他准备"一顿美餐"[11]。普吕弗在当间谍头子的时候恐怕绝不会做出这种耀武扬威的夸张行为，但是这种举动与他的新战友——德国航空军团的观察员、机枪手和王牌飞行员们的五彩缤纷的行为举止颇为契合。

1916年初春，土耳其和德国为了准备联合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新的攻势，调来了一个新的德国飞行中队，驻扎在西奈半岛东端的贝尔谢巴。普吕弗厌倦了在叙利亚的宣传和监视工作，殷切希望在即将展开的攻势中大显身手，于是请求调往第300野战航空中队担任航空观察员。[12]

这个请求颇有些令人费解，因为普吕弗在参加了第一次苏伊士运河攻势之后就一直对再试一次的意义表示怀疑。早在1915年8月，在给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详细报告中，他就指出，杰马勒在2月份的凌乱攻势几乎就是一次"武装侦察"，如果攻势要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成功机会，绝不能学杰马勒的样，而是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修建公路和铁路的人员、精锐的土耳其军队，加上德国的飞机、军官和大炮。他也指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当然意味着，要维持一支大军在穿越西奈半岛沙漠时的给养、粮草和饮水的后勤困难将大幅增加。同时，大规模的行动也无法取得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英国人的战争机器十分强大，"他写道，"必须开展一场大围攻，用大炮轰破他们的防御，才能进入埃及，然后还得建立一条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通往埃及的补给线。"[13]

普吕弗还指出，就算这一切工作都大功告成了，占领苏伊士运河可

能最终也没有多大意义。毕竟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所以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就是有了运河，一时半会儿也派不上用场。虽然切断这条航海捷径能够迫使前往欧洲参战的英国海外军队走绕过非洲好望角的远路，借此打乱其兵力补充，但两三周的延误也不会造成多大麻烦。在这位德国特工看来，第二次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计划似乎突出地证明了一句老话：战争能消灭一切，唯独不能消灭馊主意。

但是有一个因素对他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第300战斗机中队，空战的“大明星”。与堑壕战的血肉横飞的丑恶现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空战这种最新的战争形式自诞生伊始就笼罩在浪漫主义的光环下，各国的王牌飞行员们被追捧为新闻片上的英雄和日场电影中的偶像。普吕弗向来不是个豪气冲天的硬汉，显然非常喜欢和贝尔谢巴的这些“超人”待在一起。他在第300战斗机中队度过的几个月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以无忧无虑地纵情狂饮到深夜，或者得到通知后立刻飞往耶路撒冷或雅法参加外交招待会或者社交舞会。他几乎是个追星族[14]；普吕弗在战时的日记写得不多，而且通常很粗略，但非常详细地记下了第300战斗机中队几乎每一位飞行员的名字，以留存后世。这个轻声细气的前学者在法斯特酒店门前空投短信传膳，显然是在模仿他那些光彩夺目的新战友们的恶作剧，并且无疑对自己空投的精度非常自豪。

但在这番嬉闹过后没多久，就传来了汉志爆发阿拉伯起义的消息。普吕弗显然是忘记了自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阿拉伯人都是些胆小怕事的懦夫，永远没有造反的胆量——而是自鸣得意地在日记中写道：“我早就向他们警告过，要注意谢里夫（即侯赛因）。”[15] 但随着起义的扩大，阿拉伯半岛的土耳其驻军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围攻，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导师马克斯·冯·奥本海默，以及这位宣传主管为了预防这一天的到来而作的巨大努力。“对土耳其人来说，阿拉伯半岛的形势很糟糕，”他在7月初写道，“可怜的奥本海默！”[16]

但随着苏伊士运河新攻势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普吕弗很快把注意力转移到与自己更直接相关的事情上。1916年8月4日，土耳其前锋部队向苏伊士运河以东约25英里处的罗玛尼（英军铁路的终端）发动进攻时，他作为航空观察员，俯瞰了战场。从这个有利位置，他向敌人投掷了一些炸弹——在空战的早期阶段，这些炸弹其实就是大型手榴弹——但在随后两天内，他也从空中观察到了土耳其—德国军队惨败的严重程度。

土耳其—德国军队原计划对英军实施侧翼包抄，不料自己在开阔地被铁壁合围起来。到8月5日下午，奥斯曼军队已经全线败退，伤亡约6000人，即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不是由于气温高达120华氏度[17]，英军精疲力竭、无力追击，奥斯曼军队的伤亡肯定会更多。

在罗玛尼的惨败永远终结了土耳其—德国“解放”埃及的梦想。它也宣告普吕弗在第300战斗机中队的田园牧歌般的四个月结束了，因为他不得不承认一个自己非常努力去无视的事实：他病得很重。一段时期以来，他的日记中已经简略地提到了这一点——“我身体不适，”[18]他在5月中旬写道——但现在他已经两颊凹陷，体重下降到100磅多一点，甚至笔迹也显露出严重的病情；他原先果断、急促的笔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颤抖、几乎看不清的潦草字迹。他被诊断患有霍乱和肺结核，于是休了病假，在10月初被送回德国。在柏林一家医院疗养几周后，他开始在威廉街的后备总参谋部地图部门工作。[19]

于是，库尔特·普吕弗的战争经历与他的一位对手——英国陆军上尉T.E.劳伦斯形成了一个反向的对称。在战争的最初两年，劳伦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开罗的阿拉伯局的地图室里坐办公室，而库尔特·普吕弗几乎无所不在：发动针对英属埃及的破坏和间谍活动、参加两次主要攻势、在叙利亚全境揭露奥斯曼帝国和德国的潜在敌人。到了1916年底，劳伦斯已经在一线大显神通，而普吕弗却在柏林一间地图室内消磨时

光。

而且这种生活非常平庸无聊。1917年1月，普吕弗在德国的病假被延长，却不得不为了自己的面包供应与柏林当地的食品配给供应办公室争斗。他在发给君士坦丁堡的前同事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的电报中抱怨说，由于他的病假延长没有书面的确认，面包委员会拒绝向他发放所需的配给卡，所以他恳求他们尽快帮忙解决这个问题。[20] 这和空投订餐命令的潇洒生活差的实在太远了。

更糟糕的是，库尔特·普吕弗的战争生涯很可能就要在处理这些平淡无聊事务的过程中度过了。这位东方学家天生体弱多病，在1914年能够进入德国军队，完全是由于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帮助。而现在他的健康显然是每况愈下。但来自科隆的自称为伯爵的冯·奥本海默又一次出手相助，帮助他的弟子普吕弗逃脱了在柏林的半是养病、半是工作的无聊生活。

按照普吕弗的传记作者唐纳德·麦克凯尔的说法，奥本海默到目前为止都没能在中东发动一场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德国有利的泛伊斯兰圣战，于是将自己的雄心壮志扩展到了经济领域。[21] 他设想在同盟国取胜之后，建立一个庞大的德国经济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主宰整个中东地区的贸易和资源开发。按照伯爵的计划，这种主宰的工具将是德国政府与德国私营工业财团之间的独特合作关系，双方将紧密协作，争取私人和国家的利益。奥本海默深信文字的力量，当然他的这种信念或许太夸张了。他写了一些极富诱惑力的小册子和计划书去鼓动德国商人们，告诉他们，在遥远的奥斯曼帝国有着金山银山，很快就是他们的了。

奥本海默向潜在投资者们解释说，他的年轻弟子库尔特·普吕弗很快将在君士坦丁堡担任一个职务。这个职务是他为东方设想的公私共生关系的绝妙例证。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德国情报局的新领导，普吕弗还将作为投资者们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对付土耳其官僚机构的种种障碍。

德国工业家们很难找到比他更好的朋友了；他不仅非常熟悉该地区和青年土耳其党的统治集团，还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头脑精明，懂得用创新思维来解决问题。

就像他关于反殖民的伊斯兰圣战的想法一样，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经济计划有些过于领先时代了，预示着后来的所谓国家社团主义。最先成功利用这种经济模式的是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10年之后，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墨索里尼的后辈阿道夫·希特勒。但在1917年，对库尔特·普吕弗来说，这只意味着，他终于能够重返一线了。2月底，他向地图室的同事们道别，又一次动身前往中东。

12月12日，T.E.劳伦斯上尉从停泊在吉达港的“苏瓦”号登陆。看到这情景，爱德华·布雷蒙上校一定非常开心，因为他得到了复仇。虽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几周前遭到法国陆军部训斥的主要幕后“黑手”就是劳伦斯，但现在肯定是把劳伦斯视为一个讨厌的捣蛋鬼，是英国一线军官中破坏增兵阿拉伯半岛计划的头号元凶。但现在，站在法国上校面前的劳伦斯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没了冲天傲气和极端自信。劳伦斯刚从延布赶来，他在那里目睹了费萨尔部队在步步紧逼的土耳其人面前溃不成军的惨状。这个讨厌的小个子上尉关于勇敢的阿拉伯战士的浪漫概念似乎荡然无存了。

布雷蒙或许是相信他和劳伦斯总算达成了共识，或许无法抵制往伤口上撒盐的诱惑，他在吉达码头告诉劳伦斯，他正要去喀土穆拜会雷金纳德·温盖特。有鉴于阿拉伯海岸上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他打算再一次敦促向拉比格派遣英法军队。

劳伦斯知道，温盖特一定会听布雷蒙的话。果然，在12月14日，温盖特向外交部和在开罗的默里将军又发送了秘密电报，敦促尽快派遣一个旅。“要援助阿拉伯人和挽救谢里夫的运动，别无他法，”温盖特写

道，“谢里夫撤销了请求我们派遣欧洲部队的申请，但现在对局势高度紧张。布雷蒙上校认为，只要向他施加一点压力，他就会再次发出请求。”[22] 温盖特指出，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直接问题是，“我们是否要在谢里夫和他的阿拉伯人还不同意我们增兵的情况下，做最后一次努力去挽救他们”。

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危机其实已经过去了。12月11日，劳伦斯搭乘“苏瓦”号离开延布的几个小时之后，一支相当强大的土耳其部队接近了延布，但是看到英国舰船停在港内，探照灯光将周边乡村照得犹如白昼，于是逡巡不前。显然不仅是阿拉伯人对炮火怕得要死，土耳其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很快撤离了延布；几天后的航空侦察表明，这支部队撤入了山区，或许要返回麦地那。虽然这个情况并不一定说明土耳其军队对海岸城镇的威胁已经结束，但确实制造出了喘息的空间，这对喀土穆的两位主张增兵的人士不是好消息。在随后几周内，温盖特和布雷蒙还会找到几个机会来敦促干预，但土耳其军队撤离延布的时候，他们的最后一个好机会就付诸东流了。

危机解除了几天之后，多少有些沮丧的劳伦斯回到了延布，努力和费萨尔商讨下一步如何是好。伦敦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他们的计划帮助很大。就在几周之前，赫伯特·阿斯奎思的联合政府倒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卫·劳合·乔治为首的新联合政府。新首相决心打破自战争爆发以来就在伦敦占主导地位的“西线派”观念，即认为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最终胜利。到1916年底，“西线派”观念已经导致约40万英国士兵死亡，还看不到任何突破的迹象。劳合·乔治则希望奉行“东线”政策，柿子拣软的捏，攻击敌人战争机器最薄弱的环节，来个“釜底抽薪”。至少与西线战场似乎坚不可摧的壁垒相比，在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比较薄弱。

劳伦斯返回延布之后不久，这种新政策焦点就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在汉志的英方人员大量增加——不是温盖特和布雷蒙希冀的数千正规军，而是一大群教官和顾问，旨在将纪律涣散的阿拉伯起义军锻造成一支拿得出手的作战部队。这些规模大大扩展的活动中最有趣的部分发生在延布，也就是起义军控制下最北方的港口，它目前相对安全，不必担心土耳其人的袭击。汉志铁路——土耳其人通往麦地那驻军的生命线——离海岸只有90英里，英国人希望将延布作为集结地，向铁路发动集中的破袭作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调来了一个有趣的人物——赫伯特·加兰德。加兰德是个苏格兰人，身材高大，长手长脚，在战前是个化学家，在开罗的训练场捣鼓一番之后自学成才，成了爆破专家。在加兰德到来之前，阿拉伯人也对汉志铁路搞过几次破坏，但只是简单地用铁镐铁铲将铁轨挖开，这是非常容易修理的。加兰德现在开始向他们传授将炸药安置在铁轨下方某个位置，将其彻底摧毁的艺术。在1917年1月初延布重建时期的沉闷日子里，加兰德少校最专心致志的学生之一就是T.E.劳伦斯。

但是，劳伦斯虽然和加兰德以及其他在这座港口城镇搭台唱戏的英国顾问打了很多交道，但他和这些同胞们有些不同。有一个差别是很明显的：他的服装。

12月初，劳伦斯拜访奈赫勒穆巴拉克的起义军营地时，费萨尔建议他脱掉英国军服，换上阿拉伯服装；那样他就可以随意在营地出入和拜访费萨尔，而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劳伦斯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穿上了一般只有高级谢赫才能穿的白色长袍和金色饰带。在沿着海岸南下前往吉达的短暂旅途中，他换下了这套装束，但回到延布之后立刻又换了回去。

但他和其他英国军官的差别不仅仅是装束。劳伦斯对自己的费萨尔联络官的身份非常在意，大部分时间都避开海边的英国帐篷营地，而是待在散布在内陆几英里处的阿拉伯营地。在那里，他开始让自己习惯于

费萨尔治“军”的散漫方式，而绝大多数其他英国军官都无法容忍这种涣散。[23]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一位伊玛目[24]唤醒大家，然后是悠闲的早餐，费萨尔与高级幕僚和各部落领袖们边吃边谈。然后，在上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营地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来找费萨尔请愿或者鸣冤；劳伦斯很快发现，这些觐见很少和战争直接相关。开放的觐见活动要一直持续到午餐。午餐往往要花两个小时，更多的助手和部落领袖会和费萨尔共进午餐。随后费萨尔可能要花几个小时向书记口述信息。完了之后是更多的闲聊，一直到晚餐，晚餐比午餐更慢悠悠。这之后，费萨尔会做更多的口述，与长老们谈话，听取各个侦察队的汇报。这个过程非常悠闲从容，没有预定方针，可能会持续到午夜之后，甚至一直到伊玛目的黎明呼唤，表示这一切又要再来一遍。

T.E.劳伦斯的急躁和严于律己人所共知，这一切对他来说一定是不堪忍受。他对饮食毫不介意，往往是站着吃饭，不到五分钟就完事。而且他非常讨厌身体接触，甚至尽可能避免与他人握手，如果这样不至于冒犯对方的话。而在阿拉伯营地里，人们随时随地都能轻易地表达好感，持续不断地拥抱和亲吻脸颊，随意拉手，这肯定更是让他痛苦万分。

但他也认识到，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战争与和平的方式。费萨尔不仅仅是个战时领袖，还是一位贝都因酋长，那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漫长闲聊是一种黏合剂，能让他那难以驾驭的联盟维持下去。在这种文化中，费萨尔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将军（至少不能向他自己部落以外的人发号施令），而是一个努力促成共识的人，必须要哄骗、建议和倾听。阿拉伯人当然不会为了迎合英国顾问而改变这一切。劳伦斯理解到，他和他的同胞们如果想要赢得信任、行事有效，就必须适应这种文化。这是个不言而喻的简单道理，但他的很多同僚深信英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优越

性，不肯接受。

让劳伦斯坚定决心去努力适应阿拉伯文化的，恰恰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本人。即便是在起义最黑暗的日子里，当劳伦斯拜访阿拉伯人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临时避难所的时候，也被费萨尔毫不动摇的雄心壮志所震撼，劳伦斯自己的悲观失望也因此被驱散了不少。他在12月15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报告中写道：“昨夜，派遣了一个营到比尔萨义德，前往接近土耳其营地的一个前进阵地。部队出发前，我听了费萨尔向营长的讲话。他说得不多，没有华丽辞藻，但是恰到好处，说完之后大家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涌上来亲吻他的头饰绳子。扎伊德的撤退对他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因为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山区苦口婆心地劝说各个部落，将他们联合起来，又把每一个部落安排到合适的地区。现在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但他在公开场合把这一切都当作一个玩笑，拿大家逃跑的窘状打趣，像挖苦小伙子一样讥讽他们，但绝没有伤害到他们的感情，而是让他们感到，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切都会好的。他的表现非常了不起，因为我私下里知道，他非常难过。”[25]

在延布，费萨尔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12月20日，已经确定，土耳其人撤回了麦地那方向。他恳求兄长阿里率领他的大约7000人离开拉比格北上，而费萨尔则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山区。他希望借助一个钳形攻势抓住撤退的土耳其人。但遗憾的是，阿里的军事指挥才华并不比弟弟扎伊德高明。几天之内，他的部队也是因为听到前方有土耳其军队的谣言而惊恐万状、溃退回拉比格，大失所望的费萨尔别无选择，只得率领自己的人马返回延布。

在大多数其他英国军官看来，这个事件是阿拉伯军队无能的又一例证。至少有两次，他们仅仅听说有土耳其军队，就不战而退。劳伦斯却不这么想。费萨尔的部队前不久在山区经历了溃败，现在对费萨尔来说最审慎的做法当然是留在延布的英军舰炮保护范围之内重组部队；但他

却一看到有机会就努力转入攻势。这表明了费萨尔有一种他的兄弟严重欠缺的决心。

另外，拉比格和延布至少目前是安全了，费萨尔又想率军北上攻打港口城镇沃季赫。如果起义军能够控制沃季赫，从埃及来的英国补给线就能缩短200英里，而且那里的地形也更适合向汉志铁路发动更频繁的袭击。费萨尔和劳伦斯长谈了一番，将费萨尔早先的计划作了精简，新计划对他的兄弟们（已经被证明不靠谱）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但筹划这次进攻对劳伦斯来说一定是既苦又甜。他深知，自己在阿拉伯半岛已经时日无多。斯图尔特·纽科姆虽然在欧洲因为一系列事而耽搁，但是很快就会回来担任费萨尔的常任联络官，而劳伦斯则将重返阿拉伯局的文牍工作。

自回到汉志以来，他就通过一系列静悄悄的颠覆活动，竭力去阻止这种命运的到来。他的颠覆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他的临时上级——西里尔·威尔逊中校。劳伦斯深知威尔逊强烈反对让他在阿拉伯半岛任职（尽管只是临时性的），所以直接与开罗的更高上级联系，而绕过常驻吉达的代表威尔逊。从12月5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第一封电报起，劳伦斯就开始耍这个把戏了。劳伦斯写道："我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具体向谁负责，汇报的方式又如何，都没有确定。我或许应当通过威尔逊中校，但是今夜有一批邮件要发往埃及，于是我就直接发给您了。"[26]

事实上，上级早就向劳伦斯明确过，威尔逊是他在一线的长官，所以他这是在假装糊涂。但这就立下了一个可以延循的先例。后来威尔逊要把他任命为地位较低的延布补给军官，借此煞住他的威风，劳伦斯又一次使用了这种策略。劳伦斯在给克莱顿的信中抗议了这个任命——"我认为，我主要是个情报军官，或者费萨尔身边的联络官"[27]——同时还解释说，自己将最新的报告直接发往开罗，而不是先汇报给威尔逊，是因为"这些情报必须尽快送递你处，否则就失效了。如果先

发给吉达，就会浪费一周或10天时间。”但实际上，劳伦斯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在一艘前往吉达的船上。如果别人知道这一点的话，这番辩解就没说服力了。

12月一天天过去，他的“犯上作乱”越来越公开化。劳伦斯绝不会哀求上级重新考虑、收回成命；他认为，他在阿拉伯半岛继续工作下去已经是个定论。“如果我要在这儿待下去，”12月底，他又一次绕过威尔逊，给克莱顿的副手写信，“我就需要许多东西。关于纽科姆，有什么消息吗？这里的情况非常有趣，我想我可能不会回去了。我要把自己的英国习惯改掉，和费萨尔一起走一走。”然后劳伦斯把自己的打算一一说明，就好像政府已经批准让他留下一样。“这里有人来接替我的时候，我就出发。瓦迪阿伊斯是汉志北部的未知疆域，我想去看一看。卢德赫瓦山背后的任何东西都值得一看。”[28]

与其说奥斯曼政府百无一用，倒不如说它错觉太深。到1916年底，在叙利亚全境已经有约50万人因饥馑和疾病而死亡，新一年的前景也愈发惨淡。在军事方面，土耳其军队再一次被从苏伊士运河击退，麦地那守军已经是汉志境内最后几个仍然在坚持抵抗阿拉伯起义军的据点之一，而英军又开始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推进。但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的总督府，杰马勒帕夏仍然在研读新的运河和铁路的蓝图，仍然参加新学校和医院的落成剪彩仪式。尽管他周围是排山倒海的毁灭和破坏，他却更加执拗地坚守自己开明改革家的形象。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叙利亚总督与在君士坦丁堡掌权的精英集团越来越疏离。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后，在奥斯曼首都，对杰马勒的批评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批评他的人有的是指责他太严酷——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他处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行动激发了起义——但也有人批评他过于宽大。对这后一项指控，杰马勒的油嘴滑舌没有帮他的忙；德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尤利乌斯·罗伊特韦德—哈尔德

格质问他，为什么会在起义爆发前夕允许费萨尔·伊本·侯赛因返回阿拉伯半岛。他的回答是，他这么做是为了检验费萨尔究竟效忠何方。罗伊特韦德—哈尔德格在记述此次会晤的报告中尖刻地指出："当前局势似乎不太适合这种检验。"[29]

还有一件让君士坦丁堡方面恼火的事情：杰马勒总是对欧洲人客客气气，尤其是对法国人很友善，允许很多"敌国侨民"留在叙利亚，而不对其加以约束。他对欧洲亲善的唯一例外是他的政府与其结成军事同盟的那个国家。杰马勒讨厌一切和德国及其文化有关的东西，向任何人数落起德国的缺陷时都是滔滔不绝。[30]

随着战争延续下去，在叙利亚的法国人越来越稀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库尔特·普吕弗这样的德国特工的高水平的搜索——于是总督大人将他的好感转移到另一个外国人群体——美国人身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美国的保守派穆斯林定居在耶路撒冷，杰马勒经常去拜访他们，也受到他们的欢迎。[31] 有保存至今的照片显示美国孩子在杰马勒膝头爬来爬去，他显然非常开心。叙利亚新教学院（后来的贝鲁特美国大学）的院长霍华德·布里斯对杰马勒的大力支持感激涕零——在黎巴嫩饥荒最严重时，杰马勒向学院提供了有补贴的粮食。于是在1917年1月，布里斯邀请杰马勒到学院毕业典礼上讲话。[32]

当时，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塞缪尔·埃德尔曼与杰马勒也有着一番奇怪的交往。故事是从1月20日埃德尔曼应召去大马士革总督府开始的。随着叙利亚的条件越来越糟糕，大约500名美国公民急于离开。几个月来，埃德尔曼一直在努力安排他们安全撤离，但奥斯曼当局一直予以阻挠。伍德罗·威尔逊最近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对埃德尔曼的努力也不是好消息。尽管威尔逊的竞选口号"他保护我们避免战争"帮助他连任成功，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威尔逊打算领导美国参战，并且是加入协约国阵营。在美国随时加入敌人阵营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堡当然不愿

意让数百名对叙利亚局势有着第一手了解的美国人出境了。1月20日，在与埃德尔曼的会议上，杰马勒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不知如何是好的领事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发电报称，杰马勒表示愿意允许这500名美国人离境，条件是他们必须发誓“在战争结束前绝不讨论奥斯曼事务”[33]。美国外交官们当然是很快就同意了这些明显不可能执行的条件，开始安排美国公民撤离叙利亚。

但杰马勒并非对所有美国人的请求都满口答应。标准石油公司在叙利亚的代表威廉·耶鲁有一次就没有称心遂愿。

尽管耶路撒冷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位美国石油勘探家却如鱼得水，非常擅长适应环境。[34]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投机倒把的人一旦被抓住会被处以绞刑，耶鲁就在这种条件下搞起来一种复杂的黑市交易，在巴勒斯坦各城镇买入卖出黄金和临时纸币。除去开支，他能挣得足足10%的利润。有一次，耶路撒冷总督拒绝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开发特许权续约，耶鲁就对他大加敲诈，威胁说要向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告发他，并且还要告诉总督夫人，他在外面包养情人。

耶鲁向杰马勒帕夏提出特殊请求的起因是，1916年秋季，耶路撒冷电报局的一名深受耶鲁信任——或者说已经被耶鲁收买的审查员找到了耶鲁和他的商业伙伴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位审查员说，杰马勒刚刚收到了一封检举伊斯梅尔·贝伊的匿名信，说伊斯梅尔·贝伊是一个与阿拉伯起义领袖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有关联的团体的成员。另外，匿名信还说“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在为这个团体提供资金”，显然指的是耶鲁。

如果杰马勒对这样的指控信以为真，两人就肯定要被判死刑，于是他们匆匆赶到杰马勒在德国招待所的办公室，要求看看这封信。让他们无比震惊的是，这封信的笔迹是萨利姆·阿尤布的，也就是参与克恩纳布石油开采交易的另外两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伊斯梅尔·贝伊和我对

此人的卑劣无耻行径义愤填膺，”耶鲁回忆道，“于是我们要求将他及其全家流放。”

在他的回忆录中，耶鲁承认自己与阿尤布及其家人“非常亲密友好”，而且他当然知道，如果遭到流放，阿尤布的妻儿将会遇到怎样的命运：最好的情况是赤贫如洗，最坏的情况是因疾病或饥饿而缓慢死亡。耶鲁似乎也忘记了，在前一年，他用非常类似的指控威胁过伊斯梅尔·贝伊。不管怎么说，杰马勒拒绝完全满足苦恼的石油勘探家的请求；他同意将萨利姆·阿尤布放逐，但允许阿尤布家的其他人留在耶路撒冷。20年之后，耶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高兴，杰马勒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残忍。”

向沃季赫的进军从延布东北方的一个绿洲村庄开始，其形式对劳伦斯来说非常具有异国风情。在他看来，这景象既壮美又野蛮，似乎他幼年如饥似渴地阅读的中世纪历史全都突然间成了现实。“费萨尔打头阵，身穿白袍，”他写道，“沙拉夫酋长在他右侧，戴着红色头巾，穿着散沫花染色的上衣和斗篷；我自己在费萨尔左侧，穿着红白两色的衣服。我们的后面是三面紫色丝织大旗，带有金色尖钉；再往后是三名演奏进行曲的鼓手；然后是蹦来跳去、狂野不羁的1200名骑骆驼的卫兵，队形非常紧密，人们的衣服五颜六色，骆驼也配有各种装饰，几乎和骑手们一样华丽——并且他们全体扯着嗓子高唱一首歌颂费萨尔及其家人的战歌！这看上去像是骆驼的河流，因为整个干谷中都是我们的队伍，一直挤到干谷的两岸，队伍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35]

但劳伦斯没有多少时间欣赏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盛景了。尽管他在前一个月想尽办法，这天清晨还是有一封电报抵达延布，宣布斯图尔特·纽科姆终于从埃及赶来了；劳伦斯接到的指示是在延布等待纽科姆到任，随后他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任务就算结束了。所以，劳伦斯陪伴宏大的队伍北上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就只能向费萨尔道别，返回海岸。

但在延布并没有发生权力交接的事情。纽科姆在开罗临行前又被耽搁了一番，于是上级决定让他和劳伦斯在起义军控制下的一个叫作恩列治的小港会合，这是在通往沃季赫的海岸的半途，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待北上的费萨尔军队。于是，劳伦斯在1月14日登上“苏瓦”号，没过多久就来到恩列治，与费萨尔再度聚首。起义军在这里短暂停留以补充给养，劳伦斯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前六周中的冒险是多么美好，失去又是多么可惜。“我希望我不需要返回埃及”，他在1月16日在恩列治给家人的信中忧愁地写道，“不管怎么说，我曾经有过一个机会。”[36]

但是仍然没有纽科姆的音信传来。17日，起义军决定于次日早上继续进军，劳伦斯私下里希望，或许他的上级这一次仍然不能及时赶到，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陪同费萨尔开赴沃季赫。当晚，纽科姆依然踪迹全无，劳伦斯的梦想似乎成真了。他在恩列治给纽科姆留了封短信——“就差一天就见到你了，真可惜！”[37]——然后狂奔到沙漠里去找费萨尔。

事实上，根本没有差一天那么多。那天早上，阿拉伯军队拔营出兵，劳伦斯快活地陪伴在费萨尔身边，就在这时，两名骑手纵马从恩列治疾驰而来。其中一人就是纽科姆，他终于抵达，要就任英国驻汉志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按照指示，劳伦斯现在应当立即返回恩列治，登船返回开罗。但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这一刻却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这次权力交接实在是太仓促了，他在继续前往沃季赫的长途跋涉中无疑能够和费萨尔及其主要副手熟悉起来，但如果他在前六周的代理能够留下来为他引见，就会容易得多。纽科姆向劳伦斯作这番提议时，劳伦斯没有反对。

在伦敦漫长等待的无聊日子里，亚伦·亚伦森将他的目光聚焦到了开罗，他希望英国人的惰性在那里或许能够最终被克服[38]。然而事与愿违。“每天我要诅咒决定与他们合作的那个时刻100次，”他在1917年1

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找到了他们，却要看着这种令人绝望的庸碌无能，还不如当初就和土耳其人死耗着，保持我们对协约国的幻想。如果德国佬最终被这些傻瓜打败，肯定有理由质疑上帝和天理。”

亚伦森于12月中旬抵达塞得港，原打算立刻拿着介绍信去开罗见阿拉伯局的领导人吉尔伯特·克莱顿。但是迎接他所在的航船的英国官员却更重视他的可疑的法律身份——他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于是将他扣押在亚历山大港。不久之后，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派来了一名年轻的上尉威廉·埃德蒙兹，称自己将担任亚伦森的联络官。

农学家起初对埃德蒙兹评价极高——“不仅非常聪明，而且十分精明”[39]，但他后来发现，这位特工的职能主要是以事情进展良好的假象安抚他，而不是帮他联络任何实权人物，于是他对埃德蒙兹的好感迅速消失了。亚伦森在前往伦敦和后来奔赴埃及途中的花销约为1500英镑，他询问能否报销这笔钱，得到的回答很能说明他在英国人的整个计划中的地位究竟如何。埃德蒙兹听到这个数字当场脸色煞白；英国官僚已经因为吝啬而臭名远扬了，他就这么小气地指出，没有恰当的收据无法报销任何款项，并建议向亚伦森发放每天1英镑的津贴，这点钱都不够亚伦森在亚历山大港的酒店房钱。自尊心极强的科学家当即回绝了。

他当晚在日记中发泄了自己的怒火：“目前为止，我遇到的净是不信任、沉默、小家子气和吝啬。我必须努力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以便另想办法与阿布萨取得联系，”——“阿布萨”指的是押沙龙·法因贝格，即他留在阿特利特的副手——“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干下去。我自己是受够了。我绝不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工作。”[40]

让亚伦森最为恼火的是，在过去的8个月中，他没有听到英国人对巴勒斯坦有什么打算。他到埃及的目的就是最终将英国人和他在阿特利特的间谍网联系起来，但他却不得不为了报销收据之类的鸡毛蒜皮，以及会见下级官员而浪费时间。

科学家还不理解的是，英国人还并不完全信任他。伦敦的情报分析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亚伦森提供的信息非常准确，这可能恰恰说明他是个土耳其间谍，而开罗的情报人员也在试图解决这种疑虑带来的难题：如果亚伦森的间谍网真的存在，如何与之取得联系，同时又阻止他与土耳其反谍报人员取得联系——如果他真的是土耳其间谍的话？亚伦森不断要求与押沙龙·法因贝格在1915年曾联系过的那位情报军官——伦纳德·伍莱见面，这无意中让英国人对他更加怀疑。英国人一直没有告诉亚伦森，伍莱乘坐的船只于夏季在亚历山大勒塔湾遭到鱼雷攻击，他本人被土耳其人俘虏。亚伦森在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下不断提起伍莱的名字，更是让人愈发怀疑。

圣诞节前不久，英国人认为自己想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难题的聪明办法。埃德蒙兹告诉亚伦森，终于将要派出一艘间谍船与阿特利特方面取得联系；亚伦森要不要捎带一封私人信件？农学家当场识破了这个花招，大发雷霆，这种暴脾气是他的特色招牌了。他告诉埃德蒙兹，除非让他本人登上那艘船，否则他就立刻和英国人断绝关系；如果让英国人派去什么“糊涂鬼”，把他的人都害死，还不如现在就彻底拉倒。

面对这个最后通牒，双方达成了妥协：亚伦森可以随船一同前往，但不可以上岸。将会派遣信使乘坐汽艇在夜色掩护下登陆，带去他的指示，以及他的一些私人物品，以便能够让他的同志确信这些指示的确来自他本人。等待足够的时间让双方联系完毕之后，汽艇会返回岸边接回信使。但时间非常紧迫，因为间谍船显然必须在日出之前溜之大吉。

到此时，亚伦森命途多舛的冒险已经持续了17个月。就像这场冒险的几乎每一个阶段一样，这一次也不顺利。间谍船是一艘改装过的小型拖网渔船，叫作“海鸥”号。亚伦森坐在间谍船上，在圣诞夜溜出塞得港，于次日下午抵达了阿特利特海岸。亚伦森看到研究站二楼阳台上有人在挥舞一块黑布，但是船上没人携带高质量的望远镜，所以无法确

定。“海鸥”号为了等待夜幕降临再去与陆上的人联系，先开往外海，不料一头撞上一场强风暴，这种现象在这个时节的地中海东部是很典型的。于是，直到将近凌晨2点，海面才相对平静下来，间谍船才得以重返阿特利特，释放出汽艇。艇上有两名信使，其中一人携带着亚伦森给同志们的指示，另一人带着他的带有花押字的小刀和特殊的放大镜。汽艇刚刚消失在黑暗中，风暴又猛刮起来。

不到一个小时的光景，汽艇带回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由于海浪太高，汽艇无法靠岸，信使不得不游过最后一小段距离。天色很快就要亮了——他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北面有堆篝火，可能是土耳其海岸巡逻队留下的——没有时间回去接信使了。他们只能靠自己了。“海鸥”号加大马力，再一次开往外海。对亚伦森来说，这是又一次令人抓狂的经历。他终于再一次看到了阿特利特，却没有办法明确地知道，究竟有没有成功地与同志取得联系。

1月初，他终于获准离开亚历山大港、前往开罗，心情这才好了一些。他在大陆酒店住下，挨个去拜见阿拉伯局的不同官员，最后终于找到了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其中的头号听众又是一位贵族业余政治家和议员，名叫威廉·奥姆斯比—戈尔，时年31岁，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新近来到开罗。奥姆斯比—戈尔虽然还没有到马克·赛克斯那种在多个领域成就非凡的水平，但同样也涉猎极广，他的兴趣之一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且让他的这项事业有着特殊意义的是，他在前不久皈依了犹太教。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和赛克斯将成为英国统治集团中提倡建立犹太人家园的两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而他们推动这项事业的一个主要工具就是亚伦·亚伦森。

奥姆斯比—戈尔目前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去鼓舞已经垂头丧气的农学家。在他的敦促下，又一艘间谍船于1月中旬被派往阿特利特；但遗憾的是，这一次间谍船又遭遇了恶劣天气，还没有接近巴勒斯坦海岸就

被迫返回。奥姆斯比—戈尔还为亚伦森引见了阿拉伯局的另外两名成员——菲利普·格雷夫斯和温德姆·迪兹少校，他们和奥姆斯比—戈尔议员的意见一致：启动科学家的情报网能够带来极大的收益。这些同情者将亚伦森写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的报告的一部分塞入了《阿拉伯公报》，包括一个非常明确到位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大的心愿是“在一个友好的大国保护下实行自治”[41]——这是非英国人的文章被收录到这本情报汇编中的极少数例子之一。但是，农学家在日记中想象温德姆·迪兹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42]，却不知道他仅仅是个中层分析员，这说明亚伦森离开罗的权力核心还很遥远。

亚伦森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缓慢，但步伐坚定。但他深知，“缓慢”是他的劲敌。1月25日，这个问题凸显了出来。当天下午，他返回大陆酒店的房间时，发现他曾经的联络官埃德蒙兹上尉正在楼梯处闲荡。他注意到，这位年轻军官“态度很神秘”。

“我就是来找你的，”埃德蒙兹说道，“你必须马上去塞得港。你的一个部下穿过沙漠来了。”这真是让亚伦森目瞪口呆，但和往常一样，埃德蒙兹除了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夫·利申斯基之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他负伤了吗？”亚伦森在奔赴塞得港之前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为什么让我去找他，而不是把他送来我这里？非常不幸的是，这些人真是神秘莫测，没有丝毫益处！”

他在塞得港发现，他的忧虑是非常正确的——利申斯基的确负了伤——但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个。12月中旬，利申斯基和押沙龙·法因贝格估计再也听不到亚伦森的音信了，再加上巴勒斯坦的局势愈发恶化，于是决定再次尝试从陆路前往埃及。命运非常残酷，就在他们从阿特利特出发几天之后，“海鸥”号的信使就带着亚伦森的指示登陆了。两人在西奈的无人地带痛苦地跋涉许久之后，几乎已经抵达英军阵线，却被一

群贝都因劫掠者发现。在随后的枪战中，利申斯基负了轻伤，得以逃脱，但法因贝格背部中弹，可能已经死了。

这个噩耗让亚伦森伤心欲绝；法因贝格不仅是他在阿特利特的副手，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勇士阿布萨被丑恶、贪婪的贝都因人杀害了，”他在日记中哀叹道，“他死时落入了那些他最鄙视的人手中。”[43]

但亚伦森没有时间去哀恸，因为他立刻认识到，法因贝格的死亡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土耳其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查明了死者身份，一定会将阿特利特挖地三尺，将他的同志一网打尽。亚伦森匆匆赶回开罗，心急火燎地寻找他在阿拉伯局新结交的朋友们，找到了温德姆·迪兹。

积聚了近两年的挫败感如滔滔洪水般发泄出来。他涕泪横流地责怪英国战争机器的无能和玩世不恭害死了法因贝格，并警告说，如果土耳其人破获了他的间谍网——这种可能性目前是极大的——法因贝格的遇害仅仅是更多死亡的前奏而已。“我说的时候满腹激情和忧伤，”亚伦森在日记中记述道，“迪兹友善地听着我的话……他向我保证，将来不再会有羞辱和不信任，一切都会好起来。”

迪兹说话算话，当即就准备了一艘间谍船，再去一次阿特利特。这一次，亚伦森清清楚楚地看到研究站阳台上有人在发信号，于是间谍船派出一艘汽艇，将他的信息送上岸。但诡异的是，上一次的不幸重演了，就在这时又刮起了风暴，汽艇无法靠岸，只能由一名信使泅水登陆。紧张地等了一个小时之后，这位信使带着阿特利特的两个人再次出现在海滩上，但这时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这名信使无法游到汽艇上，也被留在了岸上。

很快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英军派遣了一个贝都因追踪专家，按照利申斯基对遇袭情况的描述，到西奈半岛寻找押沙龙·法因贝格。他无

功而返。“这么说，我们的勇敢骑士已经牺牲了！”[44] 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我甚至都不敢向自己承认，自己抱着一种疯狂的希望，希望他还活着。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完成他为之奉献出生命的事业。”

但这个想法也无法慰藉亚伦·亚伦森。押沙龙·法因贝格已经死亡，他的兄弟亚历克斯又在美国，领导间谍网的全副重担和危险就落在了科学家完全信任的唯一一个留在巴勒斯坦的人的肩膀上：他的27岁的妹妹萨拉。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以恢宏的笔调描绘了于1月18日从恩列治开拔前往沃季赫的阿拉伯军队。在延布以北的溃败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之后，费萨尔此刻领导着大约1万名战士，他们来自六七个不同部落和数量更多的氏族。劳伦斯引用了贝达维部落的一位年轻谢赫——阿布德·卡里姆的话来强调这个时刻的重大意义。阿布德·卡里姆凝视着海洋一般的帐篷营地：

> 他（卡里姆）叫我出来看，并挥舞着胳膊，半是忧伤地说：“我们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一个民族。”他也颇感骄傲，因为向沃季赫的进军是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努力。在当代人记忆所及的历史之内，这是整个部落的男子第一次全体出动，携带着运输工具、武器和足够200英里路程使用的粮草，离开自己的区域，进入别人的领地，而并不是为了劫掠或者复仇。[45]

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如此豪情壮志却遭遇了令人丧气的结局。一周之后，费萨尔的部队走出了沃季赫以南的沙丘，却发现这座港口城镇已经是一座冒着黑烟的瓦砾堆。这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来说是非常尴尬的景象，对他幕僚中那个已经成为他最铁杆支持者的英国人来说也极其窘迫。

根据他们在恩列治与英国高级军官研究出来的时间表，费萨尔的人马应当在整整两天就抵达沃季赫才对。按照计划，费萨尔抵达之后，将

会发动一次海路联合行动，费萨尔的部队从陆地一侧逼近，同时停留在外海的英国小舰队会把从延布运来的大约550名阿拉伯战士送上岸。

但在1月23日预定进攻发起时间之前，英国舰队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却找不到费萨尔部队的踪影。当夜，英国舰队的指挥官罗斯林·威姆斯将军决定，哪怕仅仅为了“卫生原因”[46]，他也要让他船上的阿拉伯战士登陆。1月24日早晨，在短暂的炮击之后，船上的阿拉伯战士在两名英国军官的指挥下在沃季赫登陆。

随后发生的战斗非常杂乱，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乎一整天，有大约20名阿拉伯战士阵亡。土耳其驻军只有200人，几乎处于一对三的兵力劣势，而且士气很低落，但阿拉伯人的进攻还是非常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阿拉伯人有个习惯，经常打断攻势，停下来去抢劫新占领的房屋。指挥地面作战的英国军官之一诺曼·布雷上尉被起义军的这种行为惊得张口结舌，在作战报告中指出，他们的大肆洗劫的结果是，城镇“从屋顶到地板被抢得一干二净”[47]。次日，费萨尔和劳伦斯抵达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

劳伦斯非常努力地粉饰太平，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好几个缺乏说服力的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迟到。劳伦斯的英国战友们对阿拉伯人提出批判时，他总是会条件反射地表示反对，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前一年12月11日，土耳其军队进逼延布郊区的时候，一名英国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报告了城内费萨尔部队张皇失措的情况。他的叙述与劳伦斯的版本迥然不同。“晚上10点，传令兵被派到大街上呼喊消息，守军应声出动，”劳伦斯写道，“大家都泰然自若地出门，各自前往在城镇各处的岗位，没有噪声，也没有胡乱开枪。”[48]

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差别如此之大，最简单的解释是，这名飞行员当时就在延布，而劳伦斯不在。当天早些时候，他就乘船离开了延布，他在报告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种看法的差异也体现在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描述上。上述的那名英国飞行员在12月的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很容易被吓倒，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土耳其人的进军，尽管他在军队面前掩饰了自己的恐惧”。[49] 另一名英国军官查尔斯·维克里少校在沃季赫观察了费萨尔的部队之后尖酸地评价道：“我们不知道其他的谢里夫领袖对训练部队有多少兴趣，但谢里夫费萨尔肯定是完全不管的。”[50] 最让英国军官们震惊的是，在12月的黑暗日子里，土耳其军队随时可能发动进攻的时候，费萨尔竟然住在停泊在延布港内的一艘英国军舰上，任凭他的部下在岸上自生自灭。

这一切当然都与劳伦斯的分析大相径庭。按照他的说法，甚至在奈赫勒穆巴拉克的惨淡日子里，费萨尔也是“光辉灿烂”的。从这也能看出一点值得注意的东西：劳伦斯在一线只待了3个月，却不仅成为费萨尔和阿拉伯人的主要支持者，还是他们最坚决的辩护者。

丝毫不奇怪，费萨尔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劳伦斯现在要返回开罗，而且在从恩列治的旅途中或许受够了纽科姆的精明强悍，所以认识到他和纽科姆的关系不会像和劳伦斯那样融洽，于是在抵达沃季赫的当天给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发了一封秘密电报。正如威尔逊向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转达的那样，费萨尔“坚决要求，不要让劳伦斯返回开罗，因为他的帮助甚大”[51] 。

面对费萨尔的直接请求，克莱顿无法拒绝。几天之后，将劳伦斯在汉志的职务长期化的文书就准备完毕了。劳伦斯终于自由了：他逃脱了萨沃伊饭店的案牍劳形，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阿拉伯半岛的战争。

---

[1] Lawrence to K. C. Cornwallis，December 12，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882/6，f. 25A.

[2]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18.

[3]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18.

[4] Lawrence，*Faisal's Operations*， October 30，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43.

[5] Lawrence to Clayton，December 5，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6.

[6] Lawrence，*Military Notes*：*Possibilities*， November 3，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57.

[7] Lawrence，*Faisal's Operations*， October 30，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5，f. 44.

[8] Lawrence to Clayton，December 5，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8.

[9] Lawrence to Clayton，undated but December 11，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6，f. 123.

[10] Wilson to Clayton，December 12，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4，f. 206A.

[11] Ballobar，*Jerusalem in World War I*， p.98.

[12] Metternich to German Foreign Ministry，May 2，1916；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5，Frame 384.

[13] Prüfer，Vertraulich，August 6，1915；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4，Frames 790-97.

[14] Prüfer，*Diary*， May 8 and 14，1916；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15] Prüfer，*Diary*， June 9，1916.

[16] Prüfer，*Diary*， July 8，1916.

[17] 约合48.9摄氏度。

[18] Prüfer，*Diary*， May 13，1916.

[19] Nadolny to German Embassy/Constantinople，October 27，1916；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42，Der Weltkrieg no. 11g adh.，Band 1.

[20] Prüfer to Central Office of German Foreign Ministry，January 22，1917；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42，Der Weltkrieg no. 11g adh.，Band 1.

[21] McKale，*Curt Prüfer*，pp.50-51.

[22]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 and Murray，December 14，1916；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04，f. 211A.

[23] 劳伦斯最初在1916年10月30日的报告“Feisal’s Operations”；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 42-51中描述了费萨尔军营的散漫。这篇报告是他在*Seven Pillars*，book 1，chapters 14 and 15，and book 2，chapter 19中描述的基础。

[24]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25] Lawrence to Clayton，December 5，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6，f. 7.

[26] Lawrence to Clayton，December 5，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6，f. 6.

[27] Lawrence to Clayton，December 11，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6，f.122.

[28] Lawrence to K. C. Cornwallis，December 27，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5，f. 25A.

[29] Loytved-Hardegg to unknown addressee，May 6，1916；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9，Roll 457.

[30] 1915年7月，一位名叫罗胡斯·施密特的少校抱怨称，一方面，在叙利亚的帝国殖民部官员穿德国制服，让杰马勒大发雷霆；另一方面，他却“对被扣押的英法平民表现出极大善意，并下令赋予他们很大的自由”。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eel 139，Frame 79。

[31] Vester，*Our Jerusalem*， pp.243-54.

[32] Bliss to Edelman，March 11，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306，Volume 34.

[33] Edelman to Elkus，January 20，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306，Volume 34.

[34] 威廉·耶鲁对自己在战时耶路撒冷生活的大部分描述都来自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s 5 and 6。

[35] Lawrence to Wilson，January 8，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127-28.

[36]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 p.333.

[37] Brown，*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102.

[38] 亚伦森关于他在战时开罗早期岁月的描述主要引自他在1916年12月至1917年1月的日记；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39] Aaronsohn，*Diary*， December 14，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0] Aaronsohn，*Diary*， December 16，1916；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1] "Jewish Colonies in Palestine，" Arab Bulletin（January 19，1917）：p.35.

[42] Aaronsohn，*Diary*， January 24，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3] Aaronsohn，*Diary*， January 26，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4] Aaronsohn，*Diary*， January 30，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5]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52.

[46] Wemys's report to Secretary of the Admiralty，January 30，1917；Admiralty Records（海军部档案） 137/548，f. 114-15.

[47] Bray，*Arab Bulletin* no. 41（February 6，1917）：p.68.

[48] Lawrence to Wilson，December 19，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6，f. 49.

[49] J. C. Watson，report，January 11，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5，p.4.

[50] Vickery，Memorandum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in Arabia，February 2，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152.

[51] Wilson to Arab Bureau，Cairo，January 25，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736.

第11章 欺骗的迷雾

一个人或许能明白无误地毁掉自己，但毁掉阿拉伯人的纯真无邪和理性主义却需要我来帮忙，实在可憎。我们需要打赢这场战争，而他们的灵感是最佳的工具。这项努力本身就应当是它自己的报偿——被欺骗的人或许还能得到这报偿——但我们，这些当主子的，却在虚假的合约中向他们许下了不能兑现的诺言，这是在拿生命讨价还价。

——T.E.劳伦斯，《智慧的七柱》[1]

占领沃季赫之后，连续几个月来困扰着阿拉伯起义军的挫折和尴尬终于成了历史。劳伦斯竭尽全力让大家尽快遗忘曾经的耻辱。

1917年1月底攻克沃季赫之后，他短暂地返回了开罗，为在阿拉伯半岛的长期工作做准备。在埃及首府，他干着许多令人疲惫的工作。除了赶写被搁置许久的报告和增补《汉志手册》（阿拉伯局编纂的一本入门书，用来帮助被派往汉志的英国军官熟悉当地的情况）之外，劳伦斯还在英国军方领导层的办公室之间来往奔波，向他们作关于红海对岸局势的第一手报告。对所有人，他都把局势描绘得非常乐观——他甚至为费萨尔进军沃季赫的迟到编造出了貌似有理的借口——并坚持说，阿拉伯半岛西部的诸部落激发出了一种新的坚毅和斗志[2]。他的评估与在沃季赫的其他英国军官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在这种分歧中，命运总是有办法选择胜利者。

“奇怪的是，现在支持阿拉伯人的圈子扩大了，”劳伦斯调皮地回忆道，“在军队里，我们展现出成绩之后，支持我们的人就增多了。林登·贝尔将军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还发誓赌咒说，阿拉伯人的疯狂就是取胜的手段。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震惊地发现，与阿拉伯人作战的土耳其军队比与他交手的要多，开始记起来，自己一直就是支持阿拉伯起义的。”[3]

或许最开心的要数劳伦斯的上级吉尔伯特·克莱顿将军。当然了，费萨尔坚持要让劳伦斯留下来长期担任他的联络官，这需要在官僚体制中动一番手脚——克莱顿必须确保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和新到任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斯图尔特·纽科姆不会因此感到自己的权责范围受到了侵犯——但与取得的成就相比，这些都是小事：在此前两年英国与阿拉伯关系中突出的互不信任之后，尽管将领和高级外交官们付出了很大努力，疑虑仍然存在，但现在主要的阿拉伯前线指挥官将一名下级英国军官视为不可或缺的顾问。

劳伦斯在开罗非常忙碌，显然没有注意到在1917年2月1日拜访阿拉伯局办公室的一位客人。就在几天之前，亚伦·亚伦森得知自己在间谍网的最重要伙伴押沙龙·法因贝格在西奈沙漠丧生，现在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对他抱着一种悔悟的尊敬态度。这天上午他来到萨沃伊饭店，帮助一名英国军官撰写关于巴勒斯坦政治局势的档案。劳伦斯对这次简短的会谈没有留下记录，但亚伦森却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晚将此事写在了日记中。“在阿拉伯局有一个年轻的少尉（劳伦斯），”他写道，“是个考古学家，对巴勒斯坦问题了如指掌——但非常自负。”[4]

劳伦斯忘记自己与亚伦森的首次会面——他们会再度聚首，而且会产生远为重大的影响——原因之一或许是，两天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从根本上改变他在中东的任务。这一切从2月3日早上，他的不共戴天之仇敌爱德华·布雷蒙上校拜访萨沃伊饭店开始。狡黠精明和足智多谋是非常适合军官的品质。如果仅仅从这两个品质评判，爱德华·布雷蒙不应当仅仅是法国军队的一名上校，而应当是一位元帅。

布雷蒙在阿拉伯半岛的时期已经多次表现出，如果他达到目的的一条路径被堵死了，他会立刻动手寻找另一条。如果他的最初目标无法企及，或者已经多余，他就会重新定位，寻找新目标。让他的这种灵敏愈发显得了不起的是，作为法国对阿拉伯半岛政策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

排头兵，爱德华·布雷蒙在同时处理两个大体上互相抵触的计划：在当地的作战方面保证法国享有与盟友英国平等的地位；同时还要从内部尽可能遏制这种战争努力。

他花了很长时间努力促成协约国向拉比格派遣军队，最终无功而返，但这只是他的各项努力中最公开的一项。与此同时，他还在敦促埃米尔·侯赛因在吉达建立一个法国—奥斯曼银行，以非常优惠的利率向汉志政府贷款。审查布雷蒙的银行提议的英国军官很快发现，这是个经济陷阱——侯赛因政权没有还款能力，很快就会受制于法国债权人——于是将这个计划扼杀在萌芽状态[5]。布雷蒙上校还持续不断地游说，要求为阿拉伯起义军各支队伍配备法国军事顾问；他在阿卜杜拉和阿里那里取得了一些成功——六七名法国专家在12月被派往他们的营地——但在费萨尔那里却吃了闭门羹，因为费萨尔对法国人的意图非常警惕。

阿拉伯起义军进攻沃季赫的时候，布雷蒙找到一个捣蛋的新机遇。起义军将这座红海港口从土耳其人手中夺下之后，阿拉伯半岛战事的整个焦点就向北移动了约200英里。于是土耳其军队对吉达和麦加的威胁就被解除了，协约国也就没有理由向拉比格派兵，但是出现了一个更有诱惑力的目标：土耳其人在红海岸边的最后一个主要前哨阵地——小港亚喀巴。

从地图上，任何人都能看出亚喀巴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100英里长的长条形水域构成了西奈半岛在东南方的边界，而亚喀巴就在这片水域的末端，既是进攻巴勒斯坦南部人口中心（就在北方100英里处）的理想集结阵地，也是袭击麦地那的土耳其守军的生命线汉志铁路（就在东方60英里处）的绝妙出发点。事实上，在1916年夏季，布雷蒙抵达开罗不久之后，他就向英国军方的同僚提议进攻亚喀巴。英国人很欢迎这个设想，但当时阿拉伯起义还在遥远的南方挣扎，所以要实施这个计划为时尚早。[6]

到了1917年1月底，计划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阿拉伯人控制了北至沃季赫的红海海岸，而且默里将军为了巴勒斯坦攻势而缓慢穿越西奈半岛的进军也快要完成了。亚喀巴就在这两支军队之间的缺口处。协约国占领亚喀巴之后，默里的右翼就能得到保障，土耳其军队无法从那个方向发动反攻，而且能让阿拉伯起义军更接近在埃及的英军补给基地。

当然，这个计划还能最终让布雷蒙埋藏在心底的目标圆满实现：将阿拉伯起义限制在汉志境内。亚喀巴远离麦加和麦地那这两座圣城，侯赛因国王（他在10月已经自立为王）自然无力反对英法在亚喀巴派驻大军。有了这样一支大军之后，协约国就能支配处于弱势地位的阿拉伯伙伴，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阿拉伯人的行动。假如那时阿拉伯人胆敢抗议，英法就可以切断他们所依赖的协约国武器和金钱供应。最妙的是，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可以打着帮助起义军的幌子，借口将他们的前进基地移动到更有利于袭击铁路的地方。

1月中旬，甚至在攻克沃季赫之前，布雷蒙就开始与在巴黎的上级探讨这个想法，受到了热情支持。巴黎方面将在伦敦在部级层面敦促此事，而在开罗的法国联络官和在吉达的布雷蒙则将在当地的英国领导人那里游说这个方案。布雷蒙知道他应当去找谁。除了向在汉志的英国军官们兜售这个计划之外，他还去找了他在开罗统治集团中最可靠的盟友——新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温盖特很喜欢这个计划，当即去找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讨论。[7]

按照英国人惯常的彬彬有礼和低调克制的标准，默里的回应算是极其凶狠。“您的信中说到了布雷蒙的提议，作为回复，”他在1月22日给温盖特的信中写道，“我的意见是，从纯粹军事的角度看，先前反对向拉比格派兵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在亚喀巴登陆，而且反对的力度更强。”默里然后又一次列举了对任务蠕变的担忧，随后驳斥了温盖特的

观点，即控制亚喀巴有利于协约国袭击内陆的汉志铁路。“亚喀巴周边的地形极其崎岖不平”，将军解释道，从那里深入内陆非常困难，只有某种罕见品种的骆驼能够穿越那种地形。“综上所述，”默里写道，“法国人关于在亚喀巴登陆的建议，从军事角度看，益处甚少，坏处极多，我只能说，实在是欠考虑。我坚决反对。”[8]

阿奇博尔德·默里除了暴躁易怒之外，他的领导风格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毫无必要地保留信息，不与他人共享。他在写信给温盖特的时候深知，从亚喀巴东进的主要障碍并非简单的“极其崎岖不平”的地形，而是该地区几乎完全无法通行。几个月前，他派遣阿拉伯局的一名下级军官对亚喀巴地区的航空侦察照片作了分析。这名军官在其报告中指出，亚喀巴港坐落在一连串崎岖的巍峨群山脚下，这个山系向内陆深入30英里，高度一直在攀升，随后延伸到同样难以通行的内陆沙漠，高度才有所降低，汉志铁路就在那里。通过这道岩石壁垒的唯一途径是一条叫作瓦迪伊特姆的狭窄峡谷，土耳其人在峡谷沿线建造了一个碉堡和战壕的网络，任何军队如果有勇无谋地试图强行通过，都会暴露在持续不断的伏击和狙击火力之下。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占领亚喀巴——这是比较简单的——而是怎么离开它的海滩向内陆挺进。如果在这里一着不慎，加里波利的惨败就会重演，至于惨败的程度，要取决于协约国指挥官们是不是执拗地要让自己最初的错误翻倍。[9]

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默里没有把这关键信息与温盖特分享，显然也没有通知越来越多的支持在亚喀巴登陆的英国军官们。在这个信息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默里对布雷蒙提议的鄙夷回复就被理解为默里的怯懦和坏脾气的又一例证。布雷蒙上校从雷金纳德·温盖特那里得知默里的回答之后，肯定就是这么想的。

“你们可以秘密地通知布雷蒙，”温盖特在1月24日给在吉达的部下发了这份电报，“我们已经对他在亚喀巴登陆的提议予以充分考虑，但

考虑到我军目前在西奈半岛及其他地方的军事任务，暂时必须放弃他的提议。我们完全理解该计划的益处，但成功地从亚喀巴袭击铁路所需的兵力和运输工具实在抽调不出。”[10]

爱德华·布雷蒙在此之前就已经把温盖特玩得团团转，在他看来，温盖特的这番话听起来不像是坚决的拒绝，而是羞答答的“或许可以”。几天后，法国上校在吉达港登上一艘海军护卫舰，前往沃季赫，直接去找那个或许能够压倒默里意愿的人：费萨尔·伊本·侯赛因。

两人在1月30日下午会面，由阿拉伯语讲得更流利的斯图尔特·纽科姆担任翻译。布雷蒙告诉费萨尔，他即将前往埃及检阅自己在苏伊士港的部下，然后要去开罗。到了那里之后，他打算游说英军高层，让他们派遣一个旅去占领亚喀巴，另外还有两个法属塞内加尔营（目前正在红海南部海口的法国控制下的吉布提港闲坐）可以增援。

尽管费萨尔也关注到了亚喀巴，但他拒绝支持布雷蒙的计划；纽科姆报告称，“费萨尔后来告诉我，他希望英国军队能帮助他，但不要法国人的帮助，也不愿意和法国人打交道。”[11] 在沃季赫会见费萨尔之后，布雷蒙立刻前往苏伊士港，然后转往开罗，在那里找到了一位最出人意料的聆听者。“布雷蒙为占领沃季赫的事情向我表示祝贺，”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他说这个事情让他更加坚信我的军事才华，并鼓励他在扩大我们的战果的努力中期待我的帮助。”[12] “扩大战果”指的当然是上校的计划——协约国军队在亚喀巴登陆。

布雷蒙究竟是中了什么邪，竟然把自己的计划吐露给了劳伦斯？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认为亚喀巴计划对各方都有好处，即便是难以驾驭的劳伦斯或许也会支持它。但这个解释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到这时，布雷蒙应该已经清楚地知道，劳伦斯对他本人和法国在中东的任何企图都抱着极大的不信任，只要是法国人提出的，不管具体内容是什么，劳伦斯一定会反对。的确，根据劳伦斯自己的记述，他在布雷蒙的亚喀巴计划

中当即听到了先前的拉比格计划中隐藏动机的回音，即让协约国在事实上控制阿拉伯起义，不让它蔓延到叙利亚。[13]

但布雷蒙肯定不知道的是，这天上午在萨沃伊饭店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或许是对亚喀巴地区最为了解的少数几个在世的欧洲人之一。劳伦斯不仅在1914年的寻漠探险中就穿越过这个地区，而且奉默里将军之命分析亚喀巴航空地图并得出极其悲观结论的那个军官就是他。布雷蒙或许认为亚喀巴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个绝妙的死胡同，但根据劳伦斯的判断，任何被派遣到那里的英法军队也不会有什么出路。

劳伦斯努力向布雷蒙解释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个法国人却非常乐天。他还透露，他在开罗游说完毕之后，还打算返回沃季赫，继续敦促费萨尔采取行动。

上校这天上午来找劳伦斯的真正动机或许就在这里。在拉比格事件中，这个小个子牛津暴发户是布雷蒙的英国对手当中最雄辩的一位，而且对布雷蒙来说不幸的是，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现在这个法国人打算在开罗的英军高层中点燃支持亚喀巴行动的火焰，他当然不希望劳伦斯在开罗浇灭他辛辛苦苦点起来的火。他透露自己很快要返回沃季赫再去找费萨尔，或许是希望劳伦斯会当即赶往阿拉伯半岛，远离真正决策的地点。

如果布雷蒙的目标真的是这个，那么他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我还没有警告费萨尔，布雷蒙是个骗子，”劳伦斯记述道，“纽科姆在沃季赫，友善地希望能推动战事……我想我最好尽快赶到那里，提醒我们这边，警惕亚喀巴计划。”[14]

与布雷蒙会谈的几个小时之后，劳伦斯就离开开罗，奔赴苏伊士港，在那里登上了第一艘开往沃季赫的航船。

这是一个很小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表明了战争造成的变化。1915年6月，威廉·耶鲁第一次乘坐马车登上橄榄山拜会杰马勒帕夏时，拉车的马匹走上陡峭的卵石路时相当轻松。现在是1917年2月，同样的旅程却迟缓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忍饥挨饿两年的马匹佩戴着马具，憔悴不堪，似乎随时都会倒毙在地。“我们好像永远走不到德国招待所了。”[15] 耶鲁回忆道。但这位石油勘探家坚持了下去，因为他非见叙利亚总督一面不可。

到1917年冬季，耶鲁感到自己在耶路撒冷受到了极大的压力，部分原因是他的国籍。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战争中，几乎所有参战国在最初都勉强对美国保持尊敬的态度，因为美国调停议和的努力抵消了它令人讨厌的中立姿态，但这种尊敬态度越来越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憎恶。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绝望，不知道美国政府究竟何时才能认识到，它自己的福祉要求它必须站在“民主国家”一边，对抗“独裁政权”。而同盟国方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愤慨，因为尽管伍德罗·威尔逊侈谈美国是中立的仲裁者，但实际上明显倾向于协约国。让各方都越来越恼火的是，美国打着保护“自由贸易”神圣信条的幌子，继续同时向战争双方提供资助和与其做买卖，在欧洲流血的同时大发横财。

但到了1917年初，伍德罗·威尔逊已经成功连任，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现状很快就会被打破，美国即将加入协约国阵营。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仍然居留在同盟国的美国人将会受到一些不愉快的待遇，或许前景最危险的就是威廉·耶鲁。这位石油商人的贸易手段非常简单粗暴——贿赂、威胁和敲诈，所以他在巴勒斯坦期间树敌很多。他的商业竞争对手和吃过亏的地方官都会很高兴看到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受保护的美国“中立者”被划归“敌国侨民”拖到监禁营去。

尽管这年冬天危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强烈的责任感却让耶鲁没有请求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批准他离开耶路撒冷。他和颇受

信任的保镖穆斯塔法·哈尔普特里制定了应急计划，打算一旦美国参战就逃往英属埃及，尽管他们都知道这种冒险的成功率几乎是零。

2月1日，德国宣布重新开展无限制潜艇战，打击为其欧洲敌人提供补给的所有商船，这一招不可避免地将把美国船只当作目标，似乎是刻意要挑逗美国宣战。这并没有即刻成为现实，但在几天之后，威尔逊采取了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的过渡措施，耶鲁收到了他一直在心急火燎等待的电报：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命令他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奥斯曼首都。他长舒了一口气，迅速将办公室的文件和私人物品打包——一共是11件大小行李——为北上的漫长火车旅程做准备。

就在这时，耶鲁发现自己被一个谜题困住了。和战时叙利亚其他所有人一样，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必须有一份旅行许可文件。但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的许可文件需要杰马勒帕夏本人的亲自批准，而杰马勒现在很少离开大马士革。在痛苦煎熬的几天之内，耶鲁绞尽脑汁要想出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最后终于得到消息，杰马勒即将来耶路撒冷进行一次短期的考察。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才在2月的这个上午急匆匆地登上橄榄山。在德国招待所的主门厅等待机会拉住叙利亚总督的时候，威廉·耶鲁感到自己标志性的自信抛弃了自己。“美国处于和德国的战争边缘，”他回忆道，“而我对杰马勒帕夏来说百无一用。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曾经被指控为阿拉伯革命集团的成员。我肯定不能指望杰马勒帕夏给我好脸色。”

或许另一个让耶鲁忧心忡忡的因素是，他在耶路撒冷期间代表他的雇主取得的成绩实在太少。尽管标准石油公司从杰马勒帕夏那里得到了朱迪亚地区的面积广阔的开采特许区，却未能为土耳其军事机器生产出一滴巴勒斯坦石油。

耶鲁在招待所门厅等待的时候，杰马勒终于从一个遥远的门口露面了，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德国和土耳其高级军官。他快速走过走廊，向耶鲁奔来。但石油商人呆若木鸡，在总督快步走过的时候甚至没有试着去吸引他的注意力。耶鲁被自己的怯懦震惊了，呆呆地盯着远去的人群，直到有人喊他："耶鲁先生，你在这里做什么？"

耶鲁转过身，看到问话的人是扎基贝伊，耶路撒冷的前任军事总督。扎基贝伊是个彬彬有礼、有很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战争初期曾经努力保护耶路撒冷的外国人团体不受君士坦丁堡政权的更为严酷的敕令以及城内德国情报机构的迫害。据说，他曾在政府搜查令发出之前向希腊正教会的牧首发出警告，让他把教堂的贵重物品藏好。由于他的这些温和行动，扎基贝伊最终被德国人解职，但他一直是杰马勒帕夏亲信圈子中地位很高的人物。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同样重要的是，扎基贝伊还是威廉·耶鲁所在的两周聚会一次的桥牌俱乐部的一位高级成员。前任总督听了美国人的困境之后，从一份政府文件撕下最后一页，在背面匆匆写了一份旅行许可，然后跑过走廊去找杰马勒。他很快带着签了字的旅行许可回来了。

"马儿疲惫地走下橄榄山的时候，"耶鲁写道，"我愉快地哼起了小曲。在两年的海外生活中，我看到战争的越来越多的苦难困扰着我身边的人，现在我手里终于拿到了能让我踏上回家路的文件。"

当然，他回家之后的命运如何，还是个问题。如果美国真的参战，标准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业务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闭。这么空闲下来之后，耶鲁几乎一定会被美国陆军征召。在考虑这一切的不确定性时，这位石油商人显然决定，不管他欠了杰马勒帕夏多少人情——因为杰马勒准许他逃离巴勒斯坦，这些人情最好是限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火车旅途非常漫长，时走时停，万分痛苦，足足持续了近3周。途中，耶鲁非常仔细地记录了他从车窗观察到的一切：

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调动、铁路建筑工程的状态、军营和弹药仓储的地点。取决于未来的具体情况，这些信息或许会对某些人非常有价值，或许对威廉·耶鲁自己非常有价值。

2月6日，劳伦斯抵达沃季赫，急匆匆地与费萨尔会谈一番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毫无必要的。这位阿拉伯领袖的确决心进攻亚喀巴，但同样决心不让法国人参与此事；一周以前费萨尔与布雷蒙上校的会谈让他对法国人的不信任愈发加深了。

同时，劳伦斯或许私下里对布雷蒙提出亚喀巴问题还挺感激，因为这让他认识到，关于这座城镇的命运，不可避免会有一场大争斗。事实上，这场争斗已经打响了，法国上校的招数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现在，沃季赫是阿拉伯起义的前进基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部落代表团来面见费萨尔，签署参加革命事业的协议。其中大多数部落都来自东方和北方的沙漠和山区，也就是占领沃季赫之后的革命前沿。这些新兵自然希望在自己的后院一显身手。这就意味着沿着红海海岸北上，进军亚喀巴。同时，费萨尔的阿拉伯军事顾问们——主要是被俘或者投诚的叙利亚军官——也给了他很大压力，敦促他将斗争向北推进，到他们的家乡。要北上的最短也是最便捷的路途要穿过亚喀巴。

大声吵闹的还有目前在汉志的那些英国军官，为首的就是军事代表团的团长斯图尔特·纽科姆。在英国一线军官看来，占领亚喀巴之后即可大大缩短到埃及的交通和补给线，而且能控制阿拉伯半岛的整个北部海岸地区。甚至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在1月份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将原定用于拉比格的那个旅派往亚喀巴[16]。面对这些异口同声的倡议，劳伦斯肯定能认识到，他以该城镇的地理障碍为由的反对意见最终会被压倒。如果库特、加里波利以及西线战场的十几场战役的例子能够说明问题的话，亚喀巴登陆的不切实际恰恰是吸引英军高层的一个诱惑。

阿拉伯人也很难接受劳伦斯的反对意见。和所有革命运动一样，在幕后推动阿拉伯起义的是激情，而只有勇敢无畏才能促发这种激情，恳求小心谨慎和克制是与其格格不入的。另外，如果不进攻亚喀巴，那么阿拉伯人进入叙利亚的唯一可行路径就是沿着汉志铁路的内陆道路，只要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还在他们背后，这就是个险象环生的选择。如果沿着汉志铁路北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得不依赖通往海岸的漫长而艰险的补给线；阿拉伯人越向北推进，这条补给线就越长、越艰难，尽管这个考虑或许只是在理论的层面，而不是在实际的层面。按照目前阿拉伯人在内陆作战的速度，或许这一代战士永远不能抵达大马士革，他们的孙子辈才有希望。

因此，劳伦斯固然可以努力劝说费萨尔不要进军亚喀巴，甚至可以解释说，他认为爱德华·布雷蒙在亚喀巴为费萨尔设下了陷阱，但是劳伦斯的进谏只能暂时刹住费萨尔的劲头。然而由于劳伦斯占据着英国情报机构的一个独特位置——他既知晓在开罗进行的最高级的战略和政治筹划的内容，也身处这些计划执行的第一线——所以他察觉到了其他一些东西。

在1917年，欧洲列强仍然固守着帝国主义思维，即某个国家对某地区的权利主张与夺取该地区时花费的生命和财富有着直接联系，而这种合法性由在该地区插旗宣示主权而确立。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虽然没有多少兵力能用于中东战场，却在1915年破坏了英国人在亚历山大勒塔湾登陆的计划，现在又对默里即将展开的巴勒斯坦攻势感到不安，而且希望将在该地区的每一名法国士兵都投入攻打亚喀巴的战斗。他们相信，只有他们亲身处于现场，才能保证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张得到尊重。

倒不是只有法国人这么想，英国人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感染。在讨论进攻亚喀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包括费萨尔）设想的都基本上是沃季赫行动的重演：阿拉伯部队搭乘英国船只实施两栖登陆，在英国海军

舰炮大力支持下攻击土耳其驻军，夺取城镇后再输入英国的给养和物资。但是，与沃季赫不同的是，亚喀巴对英国人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离伊斯兰“圣地”区域很远（英国人在麦加周边蹑手蹑脚）。在花费了英国人的鲜血和财富来占领亚喀巴之后，英国军方筹划者受到了不可抵御的诱惑：将亚喀巴占为己有，同时将阿拉伯人贬低到一个从属的次要角色上去。到那时，英国人就扼住了阿拉伯人的咽喉。协约国的两个主要盟友——英法就将在中东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部队。如果要在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意愿之间做出选择，开罗——或者伦敦——的英国领导人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最有可能发生的结局是，阿拉伯人被困在亚喀巴；英法要么是公开地，要么是策略地阻止阿拉伯人继续北上。

于是，简单地说，对费萨尔而言，爱德华·布雷蒙还只是个小麻烦。拉比格的小插曲已经证明，劳伦斯可以灵巧地耍弄布雷蒙，因为他可以在英法利益相抵触的时候打出反法牌，但是当英法利益一致的时候，游戏就迥然不同了。费萨尔深知法国人的奸诈阴险，但他对英国人的奸诈阴险了解多少？

为什么单单劳伦斯能够看到这一切，其他人却不能？他为什么对自己的政府的忠诚信用表示怀疑？答案很简单：《赛克斯—皮科协定》。只要这份协定还在，英国人就注定会背叛阿拉伯人的事业，而尊重法国盟友的利益；英国人在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许下的诺言注定会被抛弃。事实上，由于这项协定的存在，英国政府自己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将阿拉伯人困在亚喀巴；通过阻止阿拉伯人积极参与解放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行动，英国人就可以良心比较安稳地背信食言。但是，要将这一切都解释给费萨尔——敦促他远离亚喀巴的陷阱，改选内陆道路前往叙利亚；不要信任法国人，但也不能信任英国人——劳伦斯只有一个潜在工具可用：仍然是《赛克斯—皮科协定》。

在1917年的英国军队，正如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战时军队一样，将秘密协定泄露给第三方的行为是严重的叛国，犯下这桩罪行的人如果不被枪决的话，也肯定会坐穿牢底。但就在2月初的一天，在沃季赫，劳伦斯把费萨尔拉到一边，向他告知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及其主要的重点。[17]

劳伦斯显然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因为他随后花了很大努力去毁灭证据。在他自己的著作，以及多位传记作者询问他的时候，他总是语焉不详，不肯说清楚自己是在何时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自己对其具体细节知晓多少，并暗示说自己当时不可能告诉费萨尔很多东西。事实上，《赛克斯—皮科协定》并不复杂，只有3页纸。到1916年1月，协定文本在开罗的情报机构中传播开，至少这时劳伦斯应该已经对它非常熟悉了。

类似地，在《智慧的七柱》中，他故意窜改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说他在开罗会见布雷蒙之后匆匆返回沃季赫是为了向费萨尔警告法国人的计划——“布雷蒙最后阴险地说，无论如何，他要去沃季赫把亚喀巴计划告诉费萨尔。”[18] 劳伦斯却故意没说，布雷蒙在4天前就已经把计划告诉费萨尔了。据推测，劳伦斯这么做的目的是，假如他在这个关口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的事情在将来东窗事发，他就可以辩解说，他这么做是为了破坏奸诈的法国人的努力。在战后英国的读者和官员们看来，这种反法情绪是远远更让人愉快的解释，他的行为也就不算是叛国，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敬仰的行为。

这种说法是劳伦斯的传记作者们——至少那些推崇他的人——非常愿意接受的。但如果这么做，他们就忽略了T.E.劳伦斯一生最重要也最有趣的谜题之一。他在阿拉伯半岛待了还不到4个月，怎么会如此认同阿拉伯事业，甚至愿意背叛自己祖国的秘密来辅佐这项事业，事实上是将自己忠诚的对象从祖国转移到了一个他几乎还不熟悉的民族？

部分原因肯定是植根于一种特别的英国人的荣誉感。在1917年，英国统治阶级或许比欧洲其他参战国在更大程度上仍然坚守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观念。在少数知道自己政府在中东的秘密政策——英国政府鼓励阿拉伯人为了一纸空文的诺言去卖命，而这个诺言注定不会兑现——的英国外交官和军人当中，很多人认为这项政策是极其可耻的，冒犯了英国的尊严。劳伦斯身处阿拉伯人抛头颅洒热血的第一线，所以很可能感触更深，但对可耻政策感到义愤填膺的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源于他童年时代幻想的复苏。劳伦斯写道："我在牛津市立学校的时候曾梦想，在我有生之年，尽快建成时代不可阻挡地带给我们的那个新亚洲。"[19] 在阿拉伯半岛，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为自己幼时阅读的书籍中的游侠骑士，去解放一个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于是他有了一种极其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远远超越任何目光短浅的民族主义，或者对一个日益显得无用和落伍的帝国的忠诚。

不管劳伦斯的动机究竟如何——他当时或许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些动机——他向费萨尔吐露秘密造成的影响是即刻发生、充满戏剧性的。阿拉伯领袖现在理解了，英国人尽管许下了诺言，但不会爽快地将叙利亚交给他；如果阿拉伯人想要叙利亚，就必须自己为之战斗。在劳伦斯返回沃季赫的几天之后，其他英国军官大惑不解地注意到，费萨尔突然间对亚喀巴行动的想法冷淡了；他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将他的起义扩展到更北方，进入叙利亚腹地。

2月18日，爱德华·布雷蒙再次造访沃季赫时，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消息。在劳伦斯列席的会议上，费萨尔告诉法国上校，他现在坚决反对在亚喀巴登陆，而决定加强在内陆的作战。他又一次拒绝了布雷蒙提供法国顾问的建议，解释说他不需要顾问；还为自己越来越扩大的军事计划给出了一个淘气的解释。他表示，如果他能有法国大炮来"还击法国人

向土耳其人提供的那些大炮”[20]，他很乐意集中力量攻打麦地那。劳伦斯快活地记述道，布雷蒙遭到侧翼包抄，别无选择，只得“以良好秩序撤出战斗”。[21]

在随后几周内，驻扎在沃季赫的英国军官们不断努力遏制费萨尔突然间变得雄心勃勃的计划，敦促他集中注意力处理眼前的事务，但徒劳无功。其中一名军官——皮尔斯·乔伊斯少校在4月1日写道：“我仍然认为，谢里夫·费萨尔的全部注意力指向北方……我努力让费萨尔专注于地区性事务和军事行动，但他不知从何处有了非常远大的设想。”[22]

费萨尔的这些雄心壮志究竟从何而来，英国高级军官们困惑不解。他们当然想不到劳伦斯上尉。西里尔·威尔逊在吉达的副手在3月初发给开罗的一份报告中对劳伦斯大为赞颂，说他是“无价之宝”[23]。

对杰马勒帕夏来说，可供选择的决策越来越少。自年初以来，各种迹象越来越明显，英国人很快就要发动期待已久的针对巴勒斯坦南部的攻势。到2月份，土耳其军队不断后撤，一直撤到了加沙城外，英军依然步步紧逼；德国侦察机发现了海洋一般的帐篷营地和补给站沿着英国人建造的新铁路一线铺开。这条铁路通往40英里外的阿里什。虽然对英军兵力的估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它远远超过受命抵挡它的约2万名土耳其守军。

杰马勒没有任何办法来缩小兵力差距，因为在整个帝国境内，奥斯曼军队都被拖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在欧洲的两条战线上苦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准备迎战俄军，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又在第二支英印军队的进逼下节节败退。即便能从其他战线抽调部队到巴勒斯坦——事实是办不到——也不可能及时赶到巴勒斯坦前线，抵挡英军的进攻。别无选择的杰马勒不情愿地将目光投向驻守阿拉伯城市麦地那的1万名土耳其士兵。

放弃麦地那是个极其痛苦的想法，所以总督才将它一直推迟到了最后关头。麦地那不仅是汉志铁路的最南端，而且土耳其军队一直牢牢控制着这座城市，组织凌乱、缺乏火炮的阿拉伯起义军只能在市郊零星地搞一点狙击，而无法对城市真正构成威胁。所以，麦地那是阻止埃米尔侯赛因将其起义扩展到北方的一座堡垒。放弃麦地那——伊斯兰的第二大圣城，还将给起义军及其英国主子拱手奉上一份巨大的心理胜利，即整个伊斯兰世界眼中的宗教主导地位。

另外，驻守麦地那的土耳其军队是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而且指挥它的还是帝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法赫里帕夏。如果这支军队到了巴勒斯坦前线，就可能扭转战局。于是，在恩维尔帕夏和德国驻君士坦丁堡总司令部的敦促下，杰马勒在2月末发布命令，放弃麦地那，其驻军开始了沿着汉志铁路北上、前往叙利亚的漫长旅途，并被匆匆赶入加沙的战壕。

这道命令当即引发了一个叫作伊本·阿里·海德尔的人的激烈反应。在前一年夏季侯赛因发动起义之后，君士坦丁堡挑选了海德尔作为麦加新的“合法”的穆夫提[24]，并将他派往南方，担任最高宗教权威。当然海德尔最南只能走到麦地那，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对立教廷”，和麦加的侯赛因政权分庭抗礼。尽管绝大多数汉志阿拉伯人都不支持海德尔，但他自称是伊斯兰最神圣的圣地的真正守护者，这就足以让国际穆斯林团体考虑再三，这削弱了侯赛因的号召力。如果放弃麦地那，这样的效果就没有了。“这消息让我毛骨悚然，”海德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匆忙向杰马勒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告诉他，放弃圣墓的想法是极其可耻的，如果有必要的话，要保卫圣墓到最后一兵一卒。”[25]

穆夫提显然对杰马勒了如指掌，因为杰马勒在发布撤出麦地那的命令的仅仅几天之后就突然间收回了这道命令。土耳其军队将继续驻守麦地那，而在巴勒斯坦处于兵力劣势的部队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抵抗英军的

进攻。

但是土耳其人关于麦地那未来的很快得到决断的短暂辩论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是历史的一个奇怪的小褶皱。这是因为，英国军方的密码专家截获并破译了杰马勒帕夏命令麦地那守军撤退的电报，但没有截获后来撤销命令的电报。于是，在随后几个月内，阿拉伯起义军及其英国顾问将努力去应对一个并不会发生的事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T.E.劳伦斯终于对阿拉伯起义及究竟如何作战有了一番伟大的顿悟。

3月8日上午，劳伦斯按照指示在沃季赫码头等待，这时一艘埃及巡逻船“努尔·巴尔”号驶入了港口。他从这艘船上的一名英国陆军信使手中领取了两份非常不同寻常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杰马勒帕夏命令放弃麦地那的电文抄本。杰马勒的指示是，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应当尽快携带所有火炮和其他作战物资沿着汉志铁路北上，在麦地那以北500英里处的叙利亚城市马安建立一条新防线，然后从那里尽可能抽调部队增援巴勒斯坦南部加沙的防御阵地。

第二份文件是吉尔伯特·克莱顿从开罗发出的指令。默里将军的巴勒斯坦攻势几周之后就要开始，所以必须阻止加沙的土耳其守军得到任何增援，也就是说，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麦地那守军北上。阿拉伯起义军应当在英国顾问的技术支持下，大规模扩展对汉志铁路的袭击，尽可能对其加以破坏，若有必要，还应对撤退中的土耳其部队实施拦截。克莱顿按照他一贯的谨慎，指示不要将扩大战事的原因告诉费萨尔或其他阿拉伯指挥官。[26]

这道命令让劳伦斯陷入了一个新的窘境。一方面，集中攻击铁路很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即敦促费萨尔集中力量于内陆作战，而避开具有诱惑力的亚喀巴陷阱。但另一方面，阿拉伯起义从一开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占领麦地那，而对起义军来说，奥斯曼军队的撤退几乎像奥斯曼人

投降一样，是个巨大的心理胜利。现在阿拉伯人却被要求不仅要放弃自己为之奋斗很长时间的战利品，还要去作战以阻止奥斯曼军队撤退。

这当然就是克莱顿要求保守秘密的动机，但它提出了至少两个麻烦的道德问题。如果英国人说服阿拉伯人占据麦地那和马安之间的一段铁路作为阻滞力量，却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知道，自己恰好处在转移中的麦地那守军的必经之路上。轻装的阿拉伯部落战士在开阔的沙漠中对抗土耳其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后果不堪设想。同时，英国人要求阿拉伯人在汉志战斗——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伤亡——完全是为了减轻加沙的英军的压力，减少其伤亡。当然这是军事盟友的义务所在，但劳伦斯认为，英国人有责任将原因告诉他们的阿拉伯盟友。

劳伦斯在几周前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就已经是犯下了叛国罪，所以现在要违反克莱顿的命令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虽然有克莱顿将军的命令，”他在当晚写信给西里尔·威尔逊，“我还是把局势的一些情况告诉了费萨尔。我义不容辞，别无选择。”[27] 他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费萨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像以往一样，凭着荣誉感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当即表示会竭尽全力”。[28]

目前最直接的任务是将新命令传达给阿卜杜拉——他正率军云集在瓦迪阿伊斯的汉志铁路附近，决定战局的将是他的部队——但考虑到侯赛因次子的一贯懒散，劳伦斯坚信，必须由一名英国军官亲自去传达这条事关重大的消息，并监督任务的执行。斯图尔特·纽科姆和其他几名熟悉汉志内陆的英国军官要么是在外执行侦察任务，要么是在搞爆破，所以只剩下他自己。在当晚给西里尔·威尔逊的同一封匆匆写就的信中，劳伦斯解释说，由于时间仓促，他的计划是非常临时变通的：

> 我认为，土耳其军队撤退方案的弱点在于运输饮水和粮草的火车。如果我们能严重破坏铁路，让他们无法修复，或者摧毁他们的火车头，那么他们的部队就会停滞不前……要是能阻滞他们10天就好

> 了。恐怕形势非常危险，一触即发。如果能找得到瞬发引信，我会携带一些加兰德地雷。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会把地雷布设在尽可能接近麦地那的地方：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打算自己去。[29]

3月10日夜间，在夜色掩护下，劳伦斯在仅仅14名战士保护下出发，踏上了前往阿卜杜拉营地的长达5天的艰难旅程。

这段旅程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劳伦斯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痢疾，到次日中午背上又长了疖子。一行人在阿拉伯半岛西部较为荒凉的地区艰难行进时，他只能勉强待在骆驼鞍子上。到3月12日，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有两次因为痢疾发作而晕倒，“爬坡比较困难的部分消耗了我太多体力”[30]。

劳伦斯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小小队伍中越来越激化的摩擦，因为这些人来自先前互相敌对的不同部落。旅途开始时还只是善意的打趣，后来却渐渐演化成互相辱骂和隐晦的威胁，紧张情绪一触即发。当晚，冲突爆发了。

队伍在一座叫作瓦迪季坦的山间扎营过夜，精疲力竭的劳伦斯当即在岩石之间躺倒休息。峡谷间的一声枪响打断了他的睡眠。劳伦斯被一名卫兵叫醒，被带去现场。队伍的一名成员，一个叫萨利姆的来自阿格伊尔部落的男子，倒毙在地，太阳穴被子弹击穿。子弹入口处周围的皮肤被烧焦了，这说明凶手是在近处开枪的，也就是说，凶手就是队伍的另一名成员。一个叫哈米德的摩洛哥人很快引起了怀疑。在下午举行的临时法庭上，哈米德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萨利姆的阿格伊尔部落兄弟们要求血债血还。

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劳伦斯曾着迷而仰慕地观察费萨尔调解部落间的十几起宿怨，各种争端包括征粮权利，以及延续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族间血仇。在整个战争期间，费萨尔将一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会在争吵双方之间清点收益和损失的情况，”劳伦斯后来回忆道，“费萨尔从

中斡旋和调解，经常会自掏腰包补足差价，或者用自己的金钱促进双方尽快和解。在两年时间里，费萨尔每天都要这样辛勤工作，将组成阿拉伯社会的无数小碎片拼接起来，按照自然秩序组合成形，他经过的地区的所有血仇都被处理妥当，没有留下任何一起。”[31]

这种调解体制能够奏效，是因为各方都信任调解人的公正公平，但这种体制也有残酷的一面：必要的时候，调解人必须亲自主持公道。

在瓦迪季坦，劳伦斯慢慢意识到了，他面前的恐怖景象意味着什么。如果阿格伊尔部落的人坚持要处死哈米德，就非这么做不可；这就是沙漠的法律。如果让萨利姆在阿格伊尔部落的亲属来处决哈米德，虽然能保证前往阿卜杜拉营地旅途中的短期和平，但是一旦消息传到更大范围的起义军中，必然会在阿格伊尔部落（一个非常重要、人口众多的部落）和参加起义的许多摩洛哥人之间引发血仇。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人士来执行哈米德的死刑，而这个夜晚在瓦迪季坦，只有一个人是“无亲无故的外邦人”。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让哈米德走进山嘴的一条狭窄隘谷，那里非常潮湿，长满野草。前不久下的雨在峭壁上留下的水一滴一滴地敲打着隘谷的黄沙地面……我站在隘谷入口处，给了他几分钟时间，他坐在地上哭个不停。然后我让他站起来，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

但第一发子弹没能将他击毙。哈米德尖叫着、挥舞着手脚倒在地上，鲜血喷涌出来，弄湿了他的衣服。劳伦斯又开了一枪，但是手抖得厉害，只打中了哈米德的手腕。“他继续呼喊，声音没有那么大了，躺在地上，两脚朝着我。我俯身向前，开了最后一枪，打中了他颌下的脖子。他的尸体微微颤抖。”[32]

这是劳伦斯第一次杀人。他跌跌撞撞地走回岩石之间自己的铺盖，倒头就睡。天亮时，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其他人不得不把他抬上鞍具，才能继续行进。

亚伦·亚伦森终于成功了。或者说，他非常容易受到客气的言辞和充满敬意的听众的影响，因此自以为成功了。

到1917年3月中旬，在开罗的官僚机构的荒野中漫游了太久的亚伦森终于被英国情报机构认定为他们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大量情报开始从敌占巴勒斯坦通过他传送到埃及。农学家非常满意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英国军官——他们曾经对他不屑一顾，或许是因为他脾气火爆，或许是由于他是个外来者，或许仅仅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或许是三个原因兼而有之——现在来找他征询意见，邀请他共进晚餐。

这个突破是从2月中旬开始的，当时他登上了间谍船“马纳杰姆”号，又去了一次阿特利特。这一次，天公作美，他们找到了亚伦森的一名同志，一个叫利奥瓦·施内尔松的人。最妙的是，间谍组织已经知晓前几次被留在岸上的英国信使与他们取得联系的情况，所以施内尔松这一次用防水背包带来了许多最新的情报。

“我们立刻离开了，”农学家在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很开心。”

于是，和阿特利特间谍网的联系终于稳固地确立了，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乘坐英国沿海船只的信使持续收到了许多关于巴勒斯坦局势的情报。英国人对情报的丰富颇感惊异，同时也为在一年半以前没能抓住第一次机会而懊悔不已。犹太间谍网逐渐扩大到了约25人，分布在巴勒斯坦全境，其中很多人在当地政府中担任要职。阿特利特间谍网报告的信息五花八门，从土耳其军事补给站的位置，到每天经过铁路枢纽阿夫雷的运兵火车车皮的数量，不一而足。在清点火车车皮的工作中，他们得到了一位有事业心的人士的帮助，此人在火车站旁开了一个餐饮摊子。犹太密谋者们给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代号NILI，这是《撒母耳记上》中一个段落“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Nezah Israel Lo Ieshaker）的希伯来文缩写。这个名字对英国人来说太奇怪了，所以他们在官方文件中一直简单地称亚伦森的间谍网为“A组织”。

[33]

考虑到默里在巴勒斯坦的攻势迫在眉睫，亚伦森为英国人提供的对该地区的详细分析特别有价值。威廉·奥姆斯比—戈尔在2月撰写的一份长19页的关于巴勒斯坦经济的文件大量引用了农学家先前的报告；雷金纳德·温盖特对这份报告非常欣赏，将一份副本发给了伦敦的新任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34] 亚伦森还应邀对《南叙利亚军事手册》——这是一本入门介绍，英国军官们在进军加沙以北的叙利亚地区时将携带这本手册——进行增补和修正。这本手册在3月中旬开始流通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了它的信息的广泛程度，以及来源。亚伦森在3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军队的一位熟人“祝贺我为《手册》做的贡献，还说司令部里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本手册。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威廉·埃德蒙兹（亚伦森的联络官）今天告诉我，各处都有人表示，大家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

当然了，亚伦森在这一切工作中也在追寻自己的目标。他的部分目标是世人皆知的——他从来没有隐瞒过，他加入英国阵营的最重要原因是关心巴勒斯坦犹太定居者的未来——但还有一部分就比较隐晦了。例如，在《南叙利亚军事手册》中，亚伦森对巴勒斯坦的几乎所有犹太定居点以及它们周边的阿拉伯村庄都做了详细描述。他对每个社区的领导人都做了简短的性格描述，并利用这个机会算了一笔账。他总是将盟友描述为“聪明”和“值得信赖”，而对敌人大加贬抑。于是，亚伦森在阿特利特的头号阿拉伯死敌被描述为“敲诈成性的寄生虫”和“狂热的穆斯林”[35]，而提比里亚的一名曾经与亚伦森结下梁子的犹太银行家则被痛斥为“具有东方标准的诚实”。他这么做的效果是，先发制人地将英国人引导到支持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盟友的道路上，同时将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的重要性大大夸张，尽管他们实际上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或许最关键的是，亚伦森描绘了一幅极其美好的景象，声称默里将军在加沙取得突破之后、进军巴勒斯坦腹地之时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全世界犹

太人对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很容易猜测的，”他在2月写道，“在英国旗帜下的巴勒斯坦将会持续不断地吸引犹太人的理性主义、犹太人的智慧、犹太人的资金和犹太人的群众。”[36]

农学家当然知道，他说的这些很少是真实的。在国际犹太人当中，犹太复国主义依然是一个产生分裂的问题，而巴勒斯坦的绝大多数犹太人要么继续忠于奥斯曼政权，要么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没关系，因为亚伦森的听众是英国军队和政界领导人，而且很少有一个筹划战争的司令部会抵制自己的士兵被当作解放者和英雄、受到热烈欢迎的故事。

亚伦森春风得意，地位一日千里，在3月26日终于得到了自他抵达埃及以来就一直渴望的奖励：面见吉尔伯特·克莱顿将军。这次会谈非常顺利，一周后两人又长谈了一次。其间，默里将军终于发动了他的巴勒斯坦攻势，最初的报告表明，英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大败土耳其人，”亚伦森在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4月3日，克莱顿将农学家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征询他的意见：在下一阶段的战役中，英军如何能善加利用自己的优势。

亚伦·亚伦森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从来不会羞怯，这一天在吉尔伯特·克莱顿面前当然也是侃侃而谈。他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南面或西面攻克耶路撒冷，因此建议英军继续沿着海岸平原北上，然后从北面杀个回马枪，进攻圣城。当然，和其他纸上谈兵的人不同，亚伦森能够利用自己对该地区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它的道路、地形和水源——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克莱顿将军兴趣盎然地听了我的意见。道别时，他邀请我再来看他，一旦有了这样好的建议，随时来找他。我走的时候，看到他在看着地图，梦想着。”在同一天的日记中，科学家显得欢欣鼓舞。“我成功地说服了正确的一方，兜圈子是没有用的，巴勒斯坦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水果。摇晃一下，它就会落到我们手里。”[37]

但这个“我们”究竟包括哪些人，还不清楚：协约国？英国？还是只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

3月28日，日落时分，劳伦斯和他的起义军战士的前锋登上了一座陡峭的岩壁，向远处眺望[38]。在下方的平坦谷地中，或许有3英里远的地方，是阿巴纳阿姆，汉志铁路的一个主要车站和储水站。在渐渐黯淡的黄昏光线中，劳伦斯观察着土耳其驻军——大约400人——进行晚间的操练。

据报告称，土耳其驻军因为位置非常孤立，特意经常在夜间在车站周边巡逻。这对劳伦斯不是个好消息；他的前锋只有30人，而且从瓦迪阿伊斯到此已经跋涉了3天之久，急需休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天黑之后，他派了几个人偷偷溜到接近车站的地方，向它的方向胡乱开了几枪。劳伦斯记述道：“敌人以为这是大规模袭击的前奏，在战壕里戒备了一整夜，而我们则舒服地呼呼大睡。”

劳伦斯或许比同伴们更需要睡眠，因为折磨他数周之久的痢疾和高烧还没有消退。为了他计划的对阿巴纳阿姆的进攻，他还需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体力。

在瓦迪季坦的恐怖经历之后，他强迫自己继续前进，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在3月15日上午抵达了位于瓦迪阿伊斯的阿卜杜拉营地。他和阿卜杜拉短暂地谈了一会儿，向后者解释了立即袭击铁路的必要性，随后告辞去休息。但在随后的10天内，他躺在帐篷内，饱受疟疾的摧残。

在这漫长的日子里，让劳伦斯更加痛苦的是，他知道在自己无力行动期间，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阿卜杜拉以懒散闻名，劳伦斯推断，如果要对铁路发动坚决果断的袭击，必须由他本人来领导。这个推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在体力略微恢复、能够走出帐篷的不多的几个时间段，劳伦斯发现阿卜杜拉的营地的气氛依然非

常轻浮和放松，就像以往一样，完全没有正在进行军事动员的迹象。

另外，瓦迪阿伊斯的人们并不特别欢迎劳伦斯。阿卜杜拉的亲信圈子里有一种几乎公开的对这位到访英国军官的不信任，甚至是敌意，而埃米尔本人对这种情绪听之任之。劳伦斯过去对阿卜杜拉还有些好感，但现在却变成了鄙夷和嫌恶。“他的漫不经心、吸引人的专横恣意，现在看来是伪装成心血来潮的软弱的暴虐，”他写道，“他的友好其实是反复无常，他的好脾气其实是追欢逐乐……在对他加深了解之后，甚至他的单纯也显得虚假，而天生的宗教偏见压倒了他头脑的敏锐，因为对他来讲，偏见比新思想更舒服。”

3月25日，劳伦斯的病情终于大体好转，有足够的体力活动。他走进了阿卜杜拉的帐篷，宣布自己要亲自指挥袭击铁路的行动。这个宣言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阿卜杜拉“优雅地批准所有不直接需要他自己费力气的事情”[39]。劳伦斯在瓦迪阿伊斯找了一些他认为真正有作战能力的谢赫，很快组成了一支来自不同部落的突击队，大约800人，去袭击孤立的阿巴纳阿姆火车站。次日早上，他带领小小的前锋队伍，亲自去勘察地形，制定作战计划。

3月29日一整天，劳伦斯和他的先头小组进入了火车站周围山地的进攻阵地，同时密切观察着土耳其士兵们的常规工作：排队点名、传唤用餐、毫无计划的操练，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有一个陷阱在等待他们。在劳伦斯看来，最妙的是，这天早上有一列火车开进了阿巴纳阿姆车站，停了下来；摧毁一列土耳其火车将是此次行动的一个很大额外奖励，他热切地希望火车在突击队主力抵达前不要开走。

主力部队在当晚渐渐抵达，但让劳伦斯沮丧的是，来的不是他被许诺的800名战士，而只有300人左右。这迫使他重新考虑，在次日早上能够取得怎样的成果。

劳伦斯准备了一整夜时间。他派遣小群战士潜伏在火车站周围的高地上；战斗打响之后，土耳其人将陷入一张火网。一个爆破组被派去阿巴纳阿姆火车站以北的铁路上布雷，而他亲自在火车站以南布雷，这是他第一次将赫伯特·加兰德的布雷课程付诸实践。他的唯一一挺机枪也安排在这里，在一条掩蔽的沟渠内，离铁轨仅有400码。麦地那在阿巴纳阿姆以南40英里处，所以劳伦斯估计，麦地那的土耳其守军如果要撤退，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有援军前来，肯定也要经过这里。三人的机枪组能够将这片开阔地化为屠场。劳伦斯的准备工作非常详尽和耗时，以至于黎明前不久进攻开始前，他已经累得睡着，后才被人叫醒观察战况。

进攻开始得很顺利。阿拉伯人的两门山炮被藏在山坡上的岩缝处，居高临下俯瞰着火车站，开起火来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效果。很快，火车站的两座石制房屋就被直接命中，储水的水罐也被打穿，停在侧线上的一列火车中弹起火。同时，跌跌撞撞地奔向战壕的土耳其人发现战壕也无法保护他们；子弹从三面飞来，他们腹背受敌。

在混乱中，前一天开进阿巴纳阿姆的那列火车隆隆开动，企图向南逃跑。劳伦斯满意地看到，火车触发了他布设的地雷，黄沙和钢铁碎片飞舞开，但随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他等待藏在沟渠内的机枪开火，但等了许久也没有任何动静。土耳其火车技工们安全地下了车，慢慢将火车头损坏的前轮抬回到铁轨上，然后开着火车跌跌撞撞地驶向麦地那。

不久之后，劳伦斯命令停止进攻。土耳其人的援军肯定很快就能赶到，而在下方的最初混战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们现在得到了战壕和黑烟的掩护。燃烧的火车车皮发出的浓浓黑烟裹住了整个车站。劳伦斯推断，除了撤退之外，唯一选择就是向土耳其战壕发动正面进攻，这种做法在阿巴纳阿姆可能像在成千上万的其他战场一样，会造成严重伤亡而徒劳无益。

从伤亡对比的角度看——军人通常从这个角度评判战事的成败——这次战斗是一场大胜。阿拉伯人只有1名战士负伤，却打死打伤约70名土耳其士兵，俘虏30人，并且无疑扰乱了随后几天内汉志铁路的交通。但在劳伦斯看来，这是一场空洞的胜利，因为他知道原本可以取得更好的战果。如果沟渠内的机枪按照原计划开火的话，损坏的火车就会被打成碎片，而不是顺利逃脱。劳伦斯很快查明，机枪组的成员在火车站周围的战斗打响后就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要么是因为想去观战，要么是因为感到自己离起义军主力太远，位置过于暴露。另外，如果他得到了在瓦迪阿伊斯许诺的800名战士，而不是真正到场的300人，兵力就会大大超过阿巴纳阿姆守军，就能将其全歼。劳伦斯没能获得自己想要的胜利，只能说“我们没有完全失败”。

让他更加失望的是，经验告诉他，阿拉伯起义将会如何进展。劳伦斯在敦促费萨尔集中攻击内陆并借此进军叙利亚的时候，曾模糊地谈到，这样做可以将铁路沿线的孤立的土耳其守军消灭。但从阿巴纳阿姆的例子来看，真的会那么容易吗？阿拉伯人在阿巴纳阿姆掌握了制高点，有完全出其不意的效果，而且对手只是区区400名二线哨所守军，却不能有力地组织起来将其打败，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对抗叙利亚南部较大铁路城镇的数千名守军，更不要说他们背后的麦地那的1万名精锐一线部队了。

但另外，阿巴纳阿姆的战斗证明了对劳伦斯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因为它能够支持在他脑子里开始成形的一个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想法。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瓦迪阿伊斯躺在帐篷里养病的漫长日子里有了这些想法的。

问题核心是，面对土耳其军队，阿拉伯起义军究竟能做些什么。自起义爆发以来被派往汉志的几乎所有英国顾问都对阿拉伯人的战斗力非常鄙夷。的确，劳伦斯也多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他自己也说过，掘壕

据守的一个连土耳其士兵就能将整个起义军打得抱头鼠窜。

劳伦斯开始认识到，这种观点的问题不仅是它拿欧洲的战争标准来衡量阿拉伯人——这些标准完全不适用于阿拉伯的地形，还有那些顾问们盲目地忽略了地形能够带来的巨大优势。换句话说，就是空间：大约14万平方英里的开阔地。

“土耳其人怎么能守得住这么大的空间呢？”劳伦斯问道，“如果我们像一支常规军队那样旌旗招展地去进攻的话，他们无疑会建设一条战壕线。但假如我们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观念，一种无形之物，无懈可击，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像气体一样四处飘荡呢？……大多数战争都是接触战，双方努力互相接触，避免战术上的奇袭。我们的战争应当是一场脱离接触的战争。我们要用广袤无垠的未知沙漠的沉默威胁来遏制敌人，在我们真正进攻之前不要暴露自己。”

当时的观念陈腐老朽的英国军方或许对这种观念很陌生，但它并不真正新鲜，而是有史以来战争中较弱的一方惯常使用的经典战略。毕竟，如果你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径直向敌人猛冲只能确保你早一点进坟墓或者坐到投降谈判桌前。独特之处在于，劳伦斯将其应用于阿拉伯战争。

自他抵达阿拉伯半岛以来，阿拉伯起义军和英国顾问的最高目标就是占领麦地那，那样的话就能让阿拉伯半岛摆脱长达4个世纪的土耳其统治，战场也就能北移。当前阻止土耳其人撤出麦地那的战斗让这个问题复杂了一些，但最终目标没有变。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来说，看到奥斯曼旗帜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圣城落下，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并将打开通往其他胜利的道路。劳伦斯现在却主张，不要去占领麦地那，既不用武力去攻打，也不要求它投降：“土耳其人在那里危害不到我们。如果将他们投入埃及的战俘营，我们还得提供粮食和警卫。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多地留在麦地那，以及所有的偏远地区。”[40]

根据劳伦斯的新想法，后续的正确战略是让土耳其人几乎无限期地留在麦地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应当像英国人希望的那样，将汉志铁路彻底摧毁，而是让土耳其人的补给线勉强维持，足以让麦地那守军支撑下去。这支守军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无力撤退或者发动进攻，于是就会变成俘虏，甚至比俘虏更妙，因为供养他们的负担仍然是在土耳其军队的肩膀上。

这种想法并不仅适用于麦地那。劳伦斯预计，如此剥夺麦地那守军战斗力之后，阿拉伯人可以将起义扩展到叙利亚，在那里继续执行这种战略：将有驻军的较大城镇让给土耳其人，而在乡间游击，自行选择目标，袭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不断扰乱敌人的补给线，直到土耳其人的存在被限制为阿拉伯解放海洋中的若干武装小岛。

这种让阿拉伯部队“像气体一样四处飘荡”的想法产生之后，劳伦斯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地图上那个让他烦恼了两个多月的地点：亚喀巴。

对阿拉伯人来讲，亚喀巴的麻烦之处在于，如果他们作为英法的副手进入该城，那里就会变成他们的陷阱，但如果他们希望继续进军叙利亚，这座港口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从土耳其人手中夺下亚喀巴和汉志铁路之间的山地，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南部作战时的补给线就能缩短到60英里，而不是从沃季赫出发的300英里。但如何才能肃清那些山地，同时还能不受制于英法呢？

在之前考虑这个难题时，劳伦斯选择的是显而易见的常规方案，并指出，阿拉伯部队沿着铁路线北上，沿途扫荡土耳其人控制的城镇时，驻扎在亚喀巴的土耳其驻军最终就会被切断；然后可以从内陆一侧派遣一支阿拉伯队伍越过山岭将其占领。但现在有了“像气体一样四处飘荡”的想法之后，他开始形成了一个远为大胆的计划。并不一定要等占领土耳其人在内陆的驻军城镇之后，也不要等阿拉伯人开始大规模北上

之后才去占领亚喀巴。劳伦斯相信，一小群机动性强的阿拉伯战士或许可以不被察觉地溜到马安（通往亚喀巴的公路在内陆的末端）附近，在那里发起一系列貌似毫无规律的牵制性攻击。土耳其人遭到这些袭击之后会高度警惕起来，在自己的防御阵地中高度戒备，而无法预知下一次进攻会从何方而来[41]。阿拉伯部队就可以抢在土耳其军事领导层反应过来之前迅速越过山岭，从内陆一侧进攻亚喀巴。

4月初，劳伦斯带着这些想法——尽管还在萌芽状态，肯定还没有考虑好如何解决后勤的难题——结束了袭击铁路的行动，返回阿卜杜拉的营地。在那里，费萨尔的一封哀伤的信件在等待他。

“听说你病了，我非常难过，”费萨尔用蹩脚的法语写道，“我希望你已经好转，并尽快、尽早回到我们身边。有鉴于问题的紧迫性和事情发展的快节奏，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他在信件结尾用抱怨的语调写道：“你并没有许诺要在那里待很久。所以我希望你见信后尽快回来。”[42]

于是，劳伦斯尽快返回了沃季赫。

---

[1] Lawrence，*Seven Pillars*（Oxford），chapter 51.

[2] Lawrence，“Faisal’s Order of March，” Arab Bulletin no. 41（February 6，1917）：66.

[3] Lawrence，*Seven Pillars*，p.167.

[4] Aaronsohn，*Diary*，February 1，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5] Lloyd to Wingate，November 24，1916；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8.

[6] Minutes of Conference held at Commander-in-Chief’s Office，September 5，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 Papers，694/4/8-11.

[7] Pearson to Clayton，undated；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27，f. 108A.

[8] Murray to Wingate，January 22，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27，f. 113A.

[9] Ci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 p.294 n. 47.

[10] Wingate to Pearson，January 24，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27，f. 114A.

[11] Newcombe to Wilson，February 4，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9.

[12] Lawrence，*Seven Pillars* ， p.167.

[13] Lawrence，*Seven Pillars* ， p.168.

[14] Lawrence，*Seven Pillars* （Oxford）， chapter 30.

[15] 耶鲁对1917年2月与杰马勒帕夏的会晤及随后离开巴勒斯坦的描述引自Yale，*It Takes So Long* ， chapter 6。

[16] Clayton “Appreciation” of Aqaba landing，January 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 Papers，694/5/17-21.

[17] Jeremy Wilson在得到劳伦斯本人授权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中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劳伦斯或许是在1917年2月返回沃季赫后几天之内向费萨尔告知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威尔逊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的研究非常细致，但他却总结说，劳伦斯这么做的动机是“一劳永逸地解决法国人的问题”，这很奇怪。
拉比格事件证明，法国在中东的军事提议能否成为现实，完全取决于他们在该地区最强大的盟友——英国是否支持。另外，1917年2月初劳伦斯返回沃季赫的时候，费萨尔早就对布雷蒙上校非常不信任了。因此，很难说劳伦斯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是出于对法国阴谋或影响的担忧。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劳伦斯之所以泄密，是为了阻止唯一一支真正有能力背叛阿拉伯人的力量：英国。
但是，后续的多位劳伦斯传记作者都接受了这种解释，即劳伦斯泄密是出于反法。威尔逊甚至更进一步地认为，劳伦斯泄密的动机是“长久来看，这样最符合英国的利益”。或许的确符合劳伦斯眼中的英国利益，但绝不是当时英国政府眼中的利益。

[18] Lawrence，*Seven Pillars* ， p.168.

[19] Lawrence，*Seven Pillars* ， p.661.

[20] Lawrence，*Diary* ， February 18，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180.

[21]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69.

[22] Joyce to Wilson，April 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227.

[23] Pearson to Clayton，March 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194.

[24]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的权威，负责就个人或法官的询问提出意见。穆夫提通常必须精通《古兰经》、圣训、经注以及判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的法学权威，总管律法和教义方面的所有事务。随着伊斯兰国家现代法律的发展，穆夫提的作用日益减小。如今，穆夫提的职权仅限于遗产继承、结婚、离婚等民事案件。

[25] Stitt，*A Prince of Arabia*，pp.177-78.

[26]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379.

[27] Lawrence to Wilson，as ci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380.

[28] Lawrence，*Seven Pillars*，p.177.

[29] Lawrence to Wilson，as ci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p.380.

[30] Lawrence，*Seven Pillars*，p.180.

[31] Lawrence，*Seven Pillars*，p.176.

[32] Lawrence，*Seven Pillars*，pp.181-82.

[33] 1 Samuel 15：29，as translated in 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Archives.

[34] Wingate to Balfour，February 7，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49，File41442.

[35] Personalities of South Syria：North Palestine，May 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1.

[36] Aaronsohn，*Pres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Palestine*， pp.20-21；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4，f. 342-43.

[37] Aaronsohn，*Diary*， April 3，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38] T.E.劳伦斯关于他前往阿卜杜拉营地、袭击阿巴纳阿姆的记述和对游击战的思考，见

Lawrence，*Seven Pillars*，book 3，chapters 32-36，pp.183-215.

[39] Lawrence，*Seven Pillars*，p.216.

[40] Lawrence，*Seven Pillars*，p.225.

[41] 没有证据能够确定劳伦斯是在什么时间想出了从陆地进攻亚喀巴的计划，大多数传记作者都认为是在1917年2月初，并且他在当时将这个主意告诉费萨尔，是为了劝说他不要采纳布雷蒙等人敦促的从海路进攻亚喀巴的计划。仔细思考之后，会发现这种结论并不可信。劳伦斯攻打亚喀巴的想法与此前任何人的构想都截然不同，如果成功，将会极大地改变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格局，因此他想出了这个主意之后，一定会把将它付诸实施作为头等要务。如果他在2月想出了这个计划，很难想象他会离开费萨尔营地达37天之久（前往瓦迪阿伊斯的阿卜杜拉营地和返回）。类似地，如果费萨尔在2月得知了这样一个陆路进攻的计划，又怎么会对劳伦斯的建议置若罔闻，继续支持（在3月初和4月初）在英国支持下从海岸进攻亚喀巴的计划呢？劳伦斯在2月或许向费萨尔进言了占领亚喀巴，从而保障阿拉伯人北上的最佳方案的模糊想法，但直到4月中旬，两人在沃季赫重逢之后，陆路进攻的计划才真正成形。

[42] Faisal to Lawrence，undated but notated “about the end of March，”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18A.

第12章 大胆的计划

> 各级官兵都认为，这是一场辉煌胜利，如果当天早些时候进展正常，原本就能稳操胜券。
>
> ——1917年3月28日，查尔斯·多贝尔中将对英军在加沙战败的评价[1]

在黎明前的黯淡光线中，劳伦斯看到了沃季赫郊外破破烂烂的房屋，于是命令他的小小的骆驼队伍停下。他自四天前离开阿卜杜拉营地以来就没有洗过澡。他希望换掉污秽、积满灰尘的长袍，体体面面地去见费萨尔。

这一天是1917年4月14日。劳伦斯离开沃季赫只有一个多月，但他返回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35天的时间里，在全球和中东舞台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他或许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理解。

3月中旬，也就是他出发前往阿卜杜拉营地的几天之后，俄罗斯延续300年的罗曼诺夫皇朝突然崩溃。工人要求结束战争，发动了令全国瘫痪的罢工，而近似哗变的军队拒绝对这些工人进行镇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取代沙皇的临时政府承诺让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但乱局越来越严重，其他欧洲国家都很怀疑，彼得格勒信守这个承诺还能有多久。事实上，尽管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俄国新政府毁灭的种子已经通过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颠覆行动之一播下了。4月1日，德国秘密警察悄无声息地集合了一群俄国左派流亡者——他们既反对沙皇，也反对温和的新政府——并安排他们回国。这些踏上归途的异见分子中有一个叫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后来以“列宁”的名字闻名天下。

俄国的局势虽然对英法领导层来说令人非常不安，但却在另一个方面带来了益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拒绝让美国参加协约国阵营的一个

关键原因是，他对倒行逆施的沙皇政权非常憎恶。在美国总统看来，有了彼得格勒的温和派新政府之后，俄国突然间成了“荣誉的联盟的合适伙伴”[2]。再加上德国再度在大西洋开展潜艇战，以及德国引诱墨西哥进攻美国的可耻阴谋被揭露，威尔逊有了政治上的掩护，最终在4月初对德宣战。要将美国和平时期规模极小的军队扩充成一支主要的作战力量，并将它运过大西洋，涉及极大的后勤问题，所以美国“大兵”们在西线战场发挥重大作用还需要很长时间——大多数战争筹划者们估计需要至少一年——但随着战争继续而越来越接近破产的法国和英国听到美国参战的消息都长舒了一口气。

中东也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3月26日，也就是劳伦斯出发去袭击阿巴纳阿姆火车站驻军的那天，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终于向加沙的土耳其防御阵地发动了进攻。战斗持续到第二天，非常混乱，断断续续，英军有好几次已经到了决定性胜利的边缘，每一次却都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优势，最后在土耳其援军接近时不得不停止进攻。战役的结果与亚伦·亚伦森在日记中记录的“大胜”和默里的一线指挥官在最初的公报中描述的“辉煌胜利”大相径庭。英军虽然占据至少三对一的兵力优势，却伤亡超过4000人，而土耳其军队伤亡不到2000人，而且控制了战场。战役结束后，土耳其人向英军战线抛撒传单，对其大加讥讽：“在公报上，你们是胜利者；但在加沙，我们是胜利者。”[3]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4月14日劳伦斯返回沃季赫时，默里将军在巴勒斯坦南部重整旗鼓，准备再试一次。

但在劳伦斯的叙述中，这一天对他来讲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而难忘：他第一次见到了奥达·阿布·塔伊。

自第一次到汉志以来，劳伦斯已经久闻奥达·阿布·塔伊的传奇式功业。他是西北部强悍的霍威塔部落的领袖。费萨尔早就在努力把这位酋长拉拢到起义军的阵营中来，派去许多使者奉上信件、礼物和承诺，并

招待了奥达的许多副手。起义军占领沃季赫之后，已经抵达霍威塔部落领地的外围，于是奥达终于亲自到海边来会见费萨尔。当天，在费萨尔和劳伦斯的重逢聚会上，奥达应邀前来。

劳伦斯往往能够在第一次见到某人时对其做出极其深刻和细致的描述，当然他的第一印象未必准确。很少有人比奥达·阿布·塔伊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他现在肯定将近50岁了（他自己只承认是40岁），”劳伦斯在一份战时快件中写道，“而且他的黑胡须已经夹有银丝，但他仍然高大强健，腰杆笔直，身材颀长，精瘦而结实，像比他年轻得多的人一样活跃。他的面庞满是皱纹，显得狂野不羁，是纯正的贝都因人的面容：宽阔而较低的前额，高高的尖利的鹰钩鼻，褐绿色的眼睛有些丹凤眼的样子，大大的嘴巴。”

奥达除了外貌引人注目之外，还极具领袖魅力，而且作为沙漠战士而威名赫赫。“他结过28次婚，负伤13次，在战斗中曾目睹自己所有的部落成员受伤，以及大多数亲属战死。他只说到了自1900年以来杀人的数量，现在的杀人总数是75名阿拉伯人，杀死的土耳其人则从不计数。在他领导下，霍威塔部落成了阿拉伯半岛西部最精锐的作战力量……在他眼中，人生是一部传奇，所有的事件都意义重大，所有的人物都是英雄。他的脑袋里装满了昔日袭击的故事和战争史诗，讲起来滔滔不绝。”[4]

劳伦斯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对奥达·阿布·塔伊兴趣盎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仍然非常推崇费萨尔，因为他是阿拉伯起义的政治主导，能够争取到各个桀骜不驯的氏族和部落，将他们团结到起义大旗下，但他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埃米尔侯赛因的第三子不是个天生的战士。恰恰相反，费萨尔似乎不喜欢暴力，而且尽可能避免亲自参与暴力活动。西里尔·威尔逊曾讥讽说他是个“不能承受战斗的喧嚣”的人。

在最近加强袭击汉志铁路的行动中，费萨尔的这个弱点暴露得非常明显。为了激励阿拉伯战士们奋勇拼杀，劳伦斯和其他英国军官一道，敦促费萨尔撤离沃季赫，前往起义军在瓦迪阿伊斯的主要集结地。费萨尔回绝了这些恳求，有时说缺少骆驼，有时又说他需要待在海岸，以便亲自接见前来投靠起义军的诸多部落代表团。这种态度让一些英国军官私下里得出结论，他有些怯懦。这种评估既不公正，也不正确，因为费萨尔在杰马勒帕夏和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周旋了几个月，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但这种勇气与奥达·阿布·塔伊这样的对厮杀的渴望不是一回事。

在劳伦斯眼中，费萨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优柔寡断。或许作为一名调解人和耐心的聆听者，就需要这样的品质，但是这位埃米尔——费萨尔在父亲于10月份自封为国王之后就获得了埃米尔的头衔——却有些耳根子软，原本已经拿定主意，听了别人的敦促和意见之后就会改主意。劳伦斯后来评论说："费萨尔尽管自己的判断更高明，却容易被人左右。"[5]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2月，劳伦斯向费萨尔吐露秘密，为什么参加协约国对亚喀巴的攻势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个潜在的陷阱，而对他本人的风险极大。得到这一信息之后，费萨尔不准大家再谈立即进攻这座港口的事情。劳伦斯在3月初离开了沃季赫一个短暂时期，回来时却发现费萨尔又一次被部落盟友说服，打算立刻发动进攻。劳伦斯又花了不少工夫，才把费萨尔扭转回来。

事实上，劳伦斯在瓦迪阿伊斯的时候收到的费萨尔恳求他立刻返回的信，或许就是因为费萨尔又要来个180°大转弯。3月底有传闻抵达沃季赫，称法国人即将在叙利亚海岸发动一次两栖登陆——也有人说他们已经登陆了，于是费萨尔感到，法国人可能凭借既成事实抢走叙利亚。4月1日，爱德华·布雷蒙来访，并再次敦促费萨尔让法国"联络官"常驻

在沃季赫的阿拉伯部队。这让费萨尔更加担忧。费萨尔又一次拒绝了布雷蒙，但他感到有必要尽快取道亚喀巴进军叙利亚。于是，劳伦斯这一天在沃季赫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这种传言是错误的，并让费萨尔冷静下来。埃米尔的软耳根除了让人厌倦之外，还非常危险；劳伦斯现在可以重新说服他，但下一次有主张进攻亚喀巴的酋长或者阴险的布雷蒙上校到访，又该怎么办？

当然有个明显的回答：立刻执行劳伦斯在脑子里已经酝酿的大胆的内陆进攻计划，尽快前往亚喀巴，控制了这座港口就能控制更远的北方。而且，这一天聚集在沃季赫的阿拉伯酋长当中就有一位勇敢无畏、坚忍不拔的战士，或许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奥达·阿布·塔伊。

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端，而且与费萨尔的反复无常有直接关联。3月初，费萨尔又一次热衷于进攻亚喀巴的时候，一名在沃季赫的英国军官将这情况报告给了吉尔伯特·克莱顿。克莱顿的回复是一道高度机密的命令，只有劳伦斯和另外两名在阿拉伯半岛的英国军官可以阅读。劳伦斯动身前往阿卜杜拉营地的时候，这道命令还没有抵达。但他在4月14日返回时，它已经在等他了。

“费萨尔进军亚喀巴对我们目前来说不是好事。”克莱顿如此写道。他声称主要原因是担心费萨尔会分心，不能集中力量袭击汉志铁路，但在信件的末尾暗示了他如此论断的真实原因。“在当前局势下，有一支阿拉伯部队出现在亚喀巴未必是好事，因为那会让很多部落骚动起来，现在最好让这些部落保持安静，直到时机更成熟。”[6]

劳伦斯与吉尔伯特·克莱顿这位战略大师关系甚笃，而且从开罗的情报机构也搜集到了许多信息，所以他很快就领悟了克莱顿将军的潜台词。劳伦斯在2月向费萨尔发出的警告是完全正确的——英国人想要将亚喀巴据为己有——但他们不仅是要将阿拉伯人困住，而且根本不希望阿拉伯人出现在亚喀巴（事实上，克莱顿很快就在给雷金纳德·温盖特

的一封信中将这一点说得一清二楚："一旦让阿拉伯部队占领亚喀巴，他们之后就很可能将其占为己有；在战后，亚喀巴有可能对埃及的防御计划至关重要。因此，英国必须在战后牢牢控制亚喀巴。"[7] ）

在4月14日，劳伦斯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否认克莱顿在3月8日发出的指令的真实意图——过了5周，这道命令已经过时；它仅仅指出什么事情是"好事"，而并非明确的命令——但他一定非常清楚英国军方措辞特有的拐弯抹角，知道现在继续执行自己的亚喀巴计划就是公然抗命不遵。但是，劳伦斯在两个月前还向费萨尔泄露了一项绝密外交协议的细节，而只有英国政府上层的少数人才知悉此项协议。

4月14日这个重大日子的某个时刻，或许就是劳伦斯、费萨尔和奥达三人单独在费萨尔帐篷中时，劳伦斯将自己的亚喀巴计划告诉了另外两人。奥达毫不犹豫、热情洋溢地表示支持，看来劳伦斯从一开始就没有看错这位酋长。"过了片刻，我知道了，"他写道，"此人如此强悍和直率，我们一定能够达成目标。他就像一位游侠骑士一样来到我们身边，对我们在沃季赫的耽搁非常不耐烦，一心只想着在自己的土地为阿拉伯民族的自由做一份贡献。如果他的实际表现能有他的热情的一半，我们就一定能繁荣昌盛。"[8]

1917年4月18日，也就是劳伦斯返回沃季赫4天之后，一艘法国驱逐舰溜出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向东南方航行，进入地中海。坐在这艘船上的就是那两位中层政府官员，他们在一年前秘密地瓜分了中东，将其划分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并在此过程中让自己的名字永载史册：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他们的目的地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他们的使命是为该地区风云变幻的军事局势带来政治秩序。

或者说，至少在几个月前他们的此次行程最早被提起的时候，局势似乎是那样的。尽管自开战以来几乎各条战线都陷入悲惨的僵局，但英法政府仍然都还习惯性地在远远没有取胜之前就开始争夺战利品。1917

年初，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蓄势待发要进攻巴勒斯坦的时候，两国政府的口角不可避免地转向了中东。

法国坚决要保护自己对叙利亚的帝国主义主张，于是发动了两面夹攻。首先是拼命搜刮在该地区的为数极少的法国部队，将其配属给默里的军队。法国人打着协约国之间团结互助的幌子提出这个要求时，英国人以作战计划已经接近完成、无法配属这些单位为由拒绝了。法国人火冒三丈，指控英国人要背叛盟友。英国一线指挥官不得不让步，但非常不高兴。“当然，我们没办法拒绝这些法国部队加入我们，”默里的副手林登·贝尔将军在3月中旬向阿拉伯局的一名成员透露道，“但你能想象得到，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碍手碍脚。”[9]

在外交阵线上，巴黎坚持要求让一名法国政治官员伴随默里的部队进军巴勒斯坦，这当然也很讨厌，但伦敦同样感到难以拒绝。1月，法国宣布，这名官员将是乔治—皮科，英国突然感到自己也需要派一名自己的政治官员来陪伴乔治—皮科。最佳人选当然就是皮科的谈判老搭档马克·赛克斯。

但这项新使命让赫尔的议员颇感为难。在与皮科讨论英法在中东的势力范围的界线时，赛克斯从来没有告诉这个法国人——或任何其他法国人，这条界线可能与英国已经向侯赛因国王许下的诺言相抵触。这种抵触最严重的地方是在叙利亚。英国人把叙利亚卖了两次，在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承认它的独立，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又承认法国对其拥有主宰权。

只要皮科还在法国，侯赛因的起义军还在汉志，而且土耳其人还统治着叙利亚，就没什么直接问题，但现在阿奇博尔德·默里即将攻入巴勒斯坦，赛克斯和皮科按计划将跟随他的部队，于是这些微妙的问题就突显了出来。马克·赛克斯在即将踏上埃及之旅时，感到自己面临着许多不愉快。

但他突然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解决办法。他可以不带乔治—皮科去见侯赛因国王，而是带他去见一群叙利亚流亡者，这些人是不知道英国人对阿拉伯人许下的诺言的。这些不明就里的叙利亚人或许会对英法愿意赏给他们的有限自治感激涕零，而这种感激态度或许也会让法国人心慈手软一些。2月22日，赛克斯写信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请他帮忙在开罗组织一个叙利亚流亡者代表团，好让他和皮科与这些人讨论其家园的未来地位。

假如这个代表团需要有一名来自汉志的代表，赛克斯建议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生性温和，并且不愿意骑马或者过多运动的人”[10]。赛克斯真是精力充沛，在这封信中还附了他为起义军设计的旗帜的许多草图（有意思的是，马克·赛克斯的真正才华或许在旗帜设计上。侯赛因国王后来选择了赛克斯的一份设计，作为自己的旗帜）。

温盖特对赛克斯玩世不恭的请求大感震惊，向外交部发了一份电报指出，英国是向侯赛因国王做出的承诺，所以肯定要由侯赛因来选择哪些人去见赛克斯和皮科。赛克斯很快驳斥了这种想法，向温盖特表示，“并不需要让侯赛因国王产生这种印象，即需要从头开始讨论叙利亚的未来。”赛克斯暗示说，高级专员这是在多此一举。“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些有地位的人，能够代表阿拉伯民族党，代表叙利亚穆斯林的观点，签署宣言，并批准当地的一些安排”。[11]

但马克·赛克斯和皮科正在准备前往埃及的时候，消息传来，默里于3月26日在加沙城下兵败。赛克斯一定是松了一口气。默里的下一次尝试一定能成功——面对英军的强大威力，土耳其荒唐的狗屎运不可能维持多久——但赛克斯就有了喘息之机来对付在开罗等待他的错综复杂的雷场。

这片雷场还不仅限于叙利亚问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马克·赛克斯一直在静悄悄地制定一个新计划，如果一切顺利，就能轻松地智胜他

的旅行伙伴弗朗索瓦·乔治—皮科。

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原始条款，巴勒斯坦将被从叙利亚分割出来，成为“国际共管区”，由协约国的三个主要国家——英、法、俄共同管理。但在一同推敲协定文本的几个月中，赛克斯抓住机遇，耍了个心眼。通过迎合巴勒斯坦的不同群体——尤其是对法国高度不信任，而对沙皇俄国恨之入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英国或许可以宣称三国共管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而将巴勒斯坦作为英国单独管理的保护国。在1916年春季，赛克斯第一次将这种想法上报给外交部时，遭到了严厉批评——外交大臣格雷让他将这种想法从自己脑子里“剔干净”[12]，但是一年之后，这个想法又在赛克斯高度活跃多产的脑子里浮现出来。

一个原因是，外交大臣格雷已经是过去时，在1916年12月他和阿斯奎思政府的其他人一起下台了。阿斯奎思政权主张集中力量于西线，所以对任何有可能激怒始终非常敏感的法国人的外交策略都十分谨慎，而大卫·劳合·乔治和他的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的新政府倾向于“东线”，就不那么照顾法国人的感受了。他们急于在战争中取得突破，不管是在哪里，只要能有进展就可以，所以对东线的作战非常重视，如果在那里取得成功意味着要惹恼法国人，也只算是小小的代价而已。

新政府还有一项变化对赛克斯非常有利。阿斯奎思政府受到的一个主要指责是缺少明确而恒定的战略方向。作为回应，劳合·乔治组建了所谓的战时内阁，只有五名高级政治家作为成员，拥有极大权力，可以主持英国战争努力的几乎方方面面。新政府对新颖的解决方案胃口很足，一个表现就是将马克·赛克斯提升为战时内阁的助理秘书，负责主持中东事务。

赛克斯在10月和11月与亚伦·亚伦森的谈话同样非常关键。在这些谈话之后，赛克斯受到了激励，感到利用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在巴勒斯坦的亲英工具大有可为，于是在1916年初冬静悄悄地和英国的犹太复国主

义领袖们作了一系列会谈。这些会谈的高潮发生在1917年2月7日，赛克斯在伦敦的一座宅邸与一批地位极高的英国“犹太绅士”们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晤[13]。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赛克斯一开场就说，他是在外交部和战时内阁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此次会议的，所以他们的会谈必须严格保密。8位与会者中有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勋爵、前任内政大臣赫伯特·塞缪尔，以及一位即将在赛克斯的巴勒斯坦计划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的人物，未来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哈伊姆·魏茨曼。

魏茨曼时年43岁，是来自沙皇俄国的移民，精力充沛，蓄有山羊胡子，曾经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化学讲师，在之前的10年中成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雄辩而有说服力的活动家之一。他在国际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是一位重要人物，并且决心要将演讲化为行动。1908年，他协助组建了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打算要将巴勒斯坦的耕地全部买下，供犹太人定居。但魏茨曼最吸引英国官员注意的地方是他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在会见赛克斯的不久之前，他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工艺，可以人工合成丙酮，而丙酮是炸药的关键成分。他将这项发明奉献给英国军火工业，赢得了英国政府的无比感激。他的贡献肯定消除了他身为明娜·魏茨曼（库尔特·普吕弗曾经的情人，于1915年因替德国人在埃及刺探情报而被捕）的兄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尽管偶然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曼彻斯特大学教书期间，魏茨曼还赢得了当地议员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同情。这位议员就是阿瑟·贝尔福，新任的英国外交大臣。

在2月7日的会议上，英国犹太人领袖们强调指出了马克·赛克斯非常希望听到的东西：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尤其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绝对不会接受三国共管巴勒斯坦。所有人都要求由英国单独控制该地区，或者按照其中一位与会者说的那样，建立“英国国王治下的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14]。作为回应，赛克斯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要将犹太复国主义观点呈报给战时内阁。他同时建议与会的大人

物们开始游说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甚至“愿意提供陆军部的电报设施，帮助他们秘密地与巴黎、彼得格勒、罗马和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取得联系”[15]。

与此同时，来自赫尔的政治家还是不能忘却自己的无忧无虑的乐观和撒谎骗人的表达。在2月7日的会议上，赛克斯表示，他认为阿拉伯人不会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增加——这个论断很有意思，因为即便是到了这么晚的时刻，阿拉伯人仍然不知道，协约国在对巴勒斯坦垂涎三尺（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此刻，劳伦斯正在把《赛克斯—皮科协定》泄露给费萨尔）。赛克斯询问犹太人对三国共管意见如何时，罗思柴尔德勋爵起了疑心，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对法国人在该地区许下了什么诺言。赛克斯的回答令人震惊：“法国人在巴勒斯坦没有特殊地位，也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16]马克·赛克斯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干了很多歪曲事实的事情，他制造的半真不假的谎言和互相矛盾的计划越来越多，他很快就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在2月7日的会议上，他又制造了上述的两个谎言，第一个或许是想当然，第二个则是彻头彻尾的撒谎。

同时，他非常聪明地认识到，万事万物都不是静止的，一旦发生什么新事件，或者一线的境况发生变化，一切就可能被再次打乱，他的一些难题就不攻自破了，并且还会得到新的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赛克斯在4月份乘船前往埃及的时候，将与一个懂得大胆行动的人重逢：亚伦·亚伦森。

来自阿特利特的农学家与静悄悄地在伦敦和赛克斯密谋的那些人是完全两个类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些人头脑清醒而审慎，手段也很绅士，而亚伦森急躁鲁莽，缺乏耐心，而且因为真正在巴勒斯坦实践过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而坚强冷酷。与伦敦的同行相比，他对巴勒斯坦的未来也有着更为广阔的设想：不仅是英国保护下的扩张了的犹太居民

点，而且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国家，从地中海海岸延伸到约旦河以东，直至大马士革城下。亚伦·亚伦森是个激进分子，但马克·赛克斯深知，往往是激进分子才能推动变革。

在4月中旬，一位敌人给他和亚伦森奉上了一份厚礼。那就是杰马勒帕夏。

让史上所有致力于防守的军事指挥官们恼火的是，平民似乎有个习惯，就是待在家里不动，一直待到入侵的敌军兵临城下。然而一旦箭矢或者子弹或者导弹开始乱飞的时候，平民却开始拖家带口、携带着锅碗瓢盆，慌不择路地逃难。毫不奇怪，这种匆匆忙忙的大逃亡最常见的结果是，通往战场的所有道路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往往造成道路彻底瘫痪，守军很难将援军调上前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军队往往会预先将平民赶出可能成为战区的地方，如果有必要，就用刺刀将平民驱逐出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两年半中，在西线战场，由于战线僵持不动，极少发生强制疏散平民的事情。但在东方，尤其是奥斯曼战线，这种事情却是司空见惯。

奥斯曼人很容易就运用起了这种政策，而且也不仅仅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几个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的历代苏丹都深知自己在军事上的相对劣势和帝国的多民族特性，因此多次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实施焦土政策，将某地区的居民全部连根拔起、彻底疏散，以防止他们私下里或者公开地与入侵者合作。如果时间允许，还要将入侵者必经之路上的牲畜、农业设备和存粮，以及所有可能为敌人所用的物资全部运走，运不走的东西就烧毁、砸毁或者下毒。

青年土耳其党在其他领域都是改革派，他们在1908年上台后没有理由去采纳这种旧传统；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事态发展太快，他们来不及这么做。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几乎所有参战的军队都将整群的平民强制驱逐，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是为了执

行一个世纪后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政策。这场大规模的悲剧——数十万土耳其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被永久性地逐出祖先的家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却为1915年春季的一场更为残暴和致命的惨剧，即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立下了一个先例。虽然有着这场前不久发生的可怕事件，而且杰马勒帕夏本人还努力去缓和亚美尼亚人的处境，但在1917年初，他自己的叙利亚领地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驱逐政策。

起初还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地方。2月底，英国侵略军重兵云集在加沙城下，显然蓄势待发，于是他命令将该城的约8000名平民疏散。叙利亚总督有理由为了自己的选择祝贺自己；3月底，英军发动进攻的时候，加沙以北和以东的道路畅通无阻，土耳其人得以迅速派来援军，取得胜利。

这场战役之后，杰马勒和他的德国指挥官们研究了更大范围的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地图；英军肯定会再试一次，而且肯定不会从同一地域再度进攻。在推测敌人下一次进攻可能在何处的时候，杰马勒的注意力集中在加沙以北约40英里处的海岸城镇雅法。

整个3月，杰马勒的司令部听到了许多传闻，称英军或许会绕过加沙的土耳其防线，而在它北面实施两栖登陆。雅法的海滩很平坦，风浪也小，是个几近完美的登陆场，而且这个城镇的人口成分很复杂，4万居民中约有8000名犹太人和4000名基督徒，这些人在奥斯曼统治下越来越心怀不满。英军于3月26日对加沙的正面进攻失败，让杰马勒松了一口气，但他的担忧很快又回来了，于是在3月28日，他命令疏散雅法的平民。起初他只给了该城居民不到一周的时间准备疏散，但在犹太人领袖的抗议下——因为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之一逾越节快要到了——他大发慈悲，将期限放宽了8天。[17]

尽管奥斯曼政府在这种时候惯于报喜不报忧——他们喋喋不休地宣

传，正在安排额外的火车将难民送往安全地带，正在准备舒适宜人的临时住宿地以保障难民的福祉——这种疏散总是非常混乱和凄惨的。歹毒之人有了机会去洗劫已经撤离的邻居的房屋，或者在沿途伏击精疲力竭、拖家带口的旅行者。再加上奥斯曼各级政府猖獗的腐败，这种疏散也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有关系或者有钱去贿赂官员的人就可以留下，或者只搬到城镇郊区，而其他人则被像牲口一样驱赶到几天甚至几周路程之外。在雅法这样"人口混杂"的城镇，各种坏事最有可能发生，始终潜伏在奥斯曼社会表面之下的种族和宗教敌意有机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但在最初，没有什么迹象能够表明雅法的疏散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或许它会像战争的许多被人遗忘的小注脚一样，不过是早已习惯了吃苦受罪的老百姓被迫承受的新一轮苦难而已。但杰马勒帕夏在发布敕令的时候，无意间却启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最重大的假情报散播行动之一。这一系列事件的第一个环节发生在4月17日夜间，一个27岁的女子在他人帮助下登上了徘徊在巴勒斯坦海岸的一艘英国间谍船。

这是一场动人的重逢。亚伦·亚伦森已经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妹妹萨拉了，她搭乘"马纳杰姆"号从阿特利特来到了塞得港，脸色苍白而憔悴，但是并无大碍。亚伦森匆匆将她带到了自己在开罗市中心大陆酒店的房间，招来了一名医生。医生对她的诊断结果是贫血，开了补铁的药片。虽然妹妹非常疲惫，亚伦森还是忙不迭地向她询问巴勒斯坦的消息。

萨拉·亚伦森是个个性独立、泼辣果敢的女人。她在济赫龙雅各布长大，少女时代就坚持要骑马，还要和男人们一起在周边山脚地带打猎，这让村里较为保守的村民们大为震惊。和她的兄弟们一样，萨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旅行过很多地方——她曾漫游中欧各地——有着一种精明世故，很难让人想象她居然是在巴勒斯坦穷苦的犹太人定居点长大的。在她的妹妹莉芙卡与押沙龙·法因贝格订婚之后，萨拉不得不屈服

于传统，很快结了婚，因为如果姐姐在妹妹后面结婚，被认为是不成体统的[18]。但她仍然非常摩登，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在君士坦丁堡的不幸婚姻。

在20世纪初，或许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萨拉·亚伦森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高智商和天生的领导才华。这些品质让有些人颇为怨恨，但却让其他人醉心不已。多年来，美丽的亚伦森妹妹吸引了一大群热火朝天的追求者，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毫不羞怯地利用男人们对她的爱慕，去为了更崇高的事业奋斗。押沙龙·法因贝格于1917年1月在西奈沙漠遇害后，萨拉成了巴勒斯坦的NILI间谍网的领导人。在她努力下，间谍网扩大到了二十几人，其中有好几个人都是她的爱慕者。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萨拉·亚伦森似乎对自己被迫扮演的危险角色非常称职合适，从成绩来看，做得比NILI组织的两名创始人——她的情绪容易激动的哥哥和轻率鲁莽的法因贝格——都要好。奥斯曼官员虽然对巴勒斯坦的西化的犹太人抱有戒心，但基本上不会怀疑女人。她就利用这一点，在乡间作了多次长距离的侦察。如果被拦住，她就可以借口说这是清白无辜的“女士的郊游”。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之后，她就把阿特利特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对来自巴勒斯坦各地的情报进行分拣整理，确保在间谍船下一次靠岸之前能够准备完毕。她的坚忍不拔的一个明证就是，她向NILI组织的其他人隐瞒了押沙龙·法因贝格的死亡[19]。她和法因贝格曾有过一段纯真的爱情。为了维持组织的士气，她严守着哥哥在开罗制造的假故事，即法因贝格去了欧洲，去接受协约国飞行员的训练。

1917年4月中旬，萨拉·亚伦森来到埃及，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她告诉兄长，杰马勒帕夏在3周前下令疏散雅法的平民。这道命令对雅法的所有居民都适用，但丝毫不奇怪的是，犹太人的负担最沉重；交通工具奇缺，于是他们不得不将大部分财产留下，同时还要忍受一直

满腹怨恨的穆斯林邻居的欺凌和抢劫。据萨拉说，至少有两个犹太人在雅法郊外遭到私刑毒打。[20]

这消息让亚伦·亚伦森非常担忧。他知道亚美尼亚人遭遇的悲惨命运，雅法的疏散似乎表明，犹太人会遭到类似的命运。他立刻去找在英国情报机构的熟人，向他们发出警告，巴勒斯坦南部可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但这个时机对他来讲糟糕透顶。就在萨拉·亚伦森抵达开罗的这一天，阿奇博尔德·默里指挥他的部队又一次攻打加沙的土耳其阵地。让杰马勒帕夏大跌眼镜的是，默里选择了与上一次一模一样的进攻路线，只是这一次的策略是更加蠢笨的人海战术。与第一次加沙战役相比，英军唯一的进步就是动用了坦克和毒气，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改变战局。英军虽然占据兵力的绝对优势，仍然吃了败仗，伤亡6000人，明眼人都看得出英军的一败涂地。

亚伦·亚伦森不禁目瞪口呆。3月12日，在默里的第一次攻势之前，英军高层听取了亚伦森根据自己对巴勒斯坦南部地形的知识提出的建议。英军原计划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加沙以南的一个叫作瓦迪加扎勒的地区，那是一片平坦地域，有若干蜿蜒曲折的溪流穿过，然后地势增高，是一大片仙人掌栅栏围成的畜栏，几乎无法通行。农学家对这个计划颇感惊恐。“我说，这种地形对我方非常不利，”亚伦森在当时写道，“会给土耳其狙击手很多机会。那里的干谷很多，难以通行。”[21] 尽管亚伦森如此告诫，英军在两次进攻中仍然像飞蛾扑火一般直奔瓦迪加扎勒的溪流和仙人掌栅栏而去。

对亚伦森来说更直接的问题是，目前英属开罗当局都沉浸在最近加沙兵败的郁闷气氛中，他很难找到任何人去注意雅法犹太人的命运。在随后一周内，科学家绝望地去找了他能想得到的所有英国官员，但徒劳无功。但他的运气突然间好转了。4月27日，他终于获准面见马克·赛克

斯。

赛克斯和皮科在五天前抵达开罗，随后一直在忙着会见赛克斯事先挑选好的代表该地区阿拉伯人利益的所谓叙利亚流亡者“代表团”。由于加沙传来的噩耗，这些会谈的紧迫性消解了不少，但在几天的谈判之后，赛克斯自信已经弥合了法国对叙利亚的企图和英国对叙利亚独立的承诺之间的巨大鸿沟。对他帮助极大的是，三名叙利亚代表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鸿沟的存在。

“主要的困难是，”赛克斯在给伦敦的军事情报机构主管的电报中写道，“如何在不给代表任何地图看，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了地理上的详细协定的情况下，对其循循善诱，引导他们索要我们愿意给他们的东西。”[22]

“叙利亚问题”至少是暂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于是赛克斯有时间处理其他事情了。他的一项优先事务就是会见亚伦·亚伦森，后者几天来一直在恳求赛克斯的随从，要与他见面。赛克斯和亚伦森的重逢发生在4月27日，地点是萨沃伊饭店的一个会议室。

“终于见到了！”亚伦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立刻开始谈敏感的话题。他告诉我，因为我是个犹太爱国者，他可以向我透露一些高度机密的事情，其中有些连外交部都不知道。”

赛克斯将自己于2月7日在伦敦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会晤的情况告诉了他，并阐述了他最近构想的关于中东和平的一个新计划，这个计划将会把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幸存的亚美尼亚人联合起来。赛克斯自信满怀地解释说，有了这样的联盟，就能让阿拉伯人服服帖帖，让他们知道，没有犹太人和英国人的支持，他们谋求独立的努力必然失败；同时还能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与法国人分庭抗礼。与此同时，这种协约还能将贪婪的意大利人完全排挤出去，将俄国人边缘化，建立一个保护埃

及和印度的亲英的缓冲国，同时还能假模假样地敷衍英国最新的盟友美国的反殖民主义要求。这个在方格纸上炮制出来的计划非常复杂，极为荒诞。仇恨阿拉伯人的亚伦森的反应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最可能的情况是，他只是尊重地默默聆听着；毕竟他自己也有急事要和马克·赛克斯商谈。

其他英国官员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加沙的败局，无心关注雅法犹太人的困境，战时内阁的新任助理秘书却不是这样。赛克斯当即认识到了亚伦森的消息带来的潜在的宣传价值，可以促使那些依然置身事外的国际犹太人加入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英国的阵营来。他立刻派遣亚伦森撰写一份关于雅法局势的备忘录，第二天早上再来找他。[23]

5个月前在记录亚美尼亚人的困境时，亚伦森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向杰马勒帕夏表达了敬意，指出这位叙利亚总督虽然有着人格缺陷，执政也乏力，但坚决果断地努力阻止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并减轻幸存者蒙受的苦难[24]。农学家还多次利用了杰马勒反复无常和怪异的殷勤性格，在押沙龙·法因贝格因间谍罪被捕后，他亲自去向杰马勒求情，救出了法因贝格；并且他还通过杰马勒缓和了一系列对犹太定居者有危害的法令。但在4月27日下午，亚伦森坐下来为马克·赛克斯撰写备忘录时，认识到这是推动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一个黄金机遇。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他必须做点不太实事求是的事情。亚伦森造谣抹黑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杰马勒帕夏。

次日早上9点15分，亚伦森再次拜见马克·赛克斯，向他递交了关于雅法的备忘录。赛克斯很快向外交部发了一份绝密电报，让他们找到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哈伊姆·魏茨曼，向他转达下面的消息："亚伦·亚伦森让我通知你，特拉维夫（雅法城内的犹太人区）遭到洗劫。1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整个居民点面临毁灭威胁。杰马勒（帕夏）公开宣称将用对付亚美尼亚人的手段对付犹太人。请在知会

犹太人中心时不要提及亚伦·亚伦森的名字或者信息来源。”[25]

最先注意到这个消息的是英国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报纸《犹太记事报》。5月4日，该报以“噩耗传来——恐怖暴行——大屠杀的威胁”的标题发表了这样的文章：“本报从绝对可靠的信息来源得知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悲惨境遇的噩耗，深感悲伤和严重关注……雅法美丽的花园郊区特拉维夫惨遭洗劫，沦为废墟，而巴勒斯坦的其他犹太人居民点很可能也遭到了同样恣意破坏的噩运。”[26]

《犹太记事报》提及了亚伦森捏造的叙利亚总督公开声明，继续写道，“但更严重的威胁仍然存在。因为土耳其总督杰马勒帕夏已经宣布了当局的意图，将要残酷无情地将巴勒斯坦的犹太居民一扫而净，他公开宣称将用对付亚美尼亚人的手段来对付犹太人。如果这个残暴而卑劣的威胁被付诸实施，不仅意味着成千上万犹太人……将被冷酷地屠戮，而且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的整个事业就彻底失败了。”

随后几天内，来自巴勒斯坦的噩耗回荡在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犹太人社区，他们万分痛苦地呼吁各自的政府采取措施[27]。但在英国外交部看来，究竟能采取什么措施，一点都不明确。在《犹太记事报》的文章刊登的当天，一位高级外交官评论说：“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要采取任何措施都是行不通的。”[28]

但至少有一位英国官员在雅法的故事上看到了一个将事态引导到截然不同的新层次的机遇，不仅仅是要主导国际犹太人的意见，而且要向自己的政府施压。这个人就是保守党议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他在开罗的阿拉伯局任职期间曾对亚伦·亚伦森有过很深的印象。1917年5月的时候，奥姆斯比—戈尔已经回到了伦敦，和马克·赛克斯一起负责战时内阁的中东事务。赛克斯在4月30日离开开罗，到阿拉伯半岛出了一趟短差，其间不方便接受信息。5月9日，他返回埃及后，发现有一封奥姆斯比—戈尔的电报在等待他。

“我认为，我们应当利用巴勒斯坦的虐犹事件，大作宣传，”奥姆斯比—戈尔写道，“我们这里的人会热情洋溢地欢迎任何关于暴行的耸人听闻的故事，亚伦·亚伦森可以给犹太报纸发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29]

亚伦森没有反对意见。他和赛克斯在5月11日又长谈了一次。据科学家的说法，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讨论了美国犹太人的问题，以及我们可以在那里做的宣传，以便为巴勒斯坦前线招兵买马。马克爵士表示，我可以向他发送电报或者信件，由他来转发。”

赛克斯或许知道自己喜欢夸大其词已经名声在外，所以很有远见地请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在亚伦森新的扩充版信件上签字，然后才对外公布。“在逾越节期间，”温盖特发往伦敦的电报写道，“雅法的全部犹太人被逐往北方。在土耳其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下，暴徒对犹太人的住宅和财产大肆洗劫，并抢劫逃难的犹太人。反抗的犹太人遭到洗劫，被绞死。成千上万人在道路上无助地游荡，饿殍遍野。”现在故事有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发展，被驱逐的对象扩大到了人口多得多的耶路撒冷犹太人。“大群年轻的耶路撒冷犹太人被向北方驱逐，目的地不明。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区随时可能被强制疏散。”[30]

这份电报有温盖特的签名，流通对象并未局限于外交部领导层，还送到了国王、首相和整个战时内阁的办公桌上。同时，亚伦森给了赛克斯一份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名单（约50人），要立刻通知这些人。雅法的故事如同病毒一般迅速传播。“被遣散的雅法犹太人遭受暴行！杰马勒帕夏因此受责难！”[31] 《纽约时报》刊出了这样的大标题，而前不久才加入战争的美国政府也加入了谴责君士坦丁堡政权最新一轮暴行的国际大合唱。这轮合唱最响亮的地方是英国。

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对这一轮凶残的谴责的反应较为迟缓，也是可以原谅的；毕竟，雅法是在4月初疏散的，而此时已经是5月中旬了。杰马勒帕夏起初根本不屑对这些指控予以回应，最后断然否认了这

些控告，指出，雅法的所有居民都被疏散了，不只是犹太人，而疏散过程对受到影响的人来说自然是不愉快的，但完成得井井有条、平静安定[32]。事实上，在疏散过程中，总督甚至特别对雅法犹太人予以其他人没有的特别照顾。至于耶路撒冷犹太人遭到“遣散”的说法，叙利亚总督反驳道，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任何疏散行动。君士坦丁堡和柏林政权都对他的声明表示支持，甚至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领导人，包括耶路撒冷的主要拉比也表示支持[33]。

但他们的努力太少，来得也太晚了。在国际公众的脑子里，雅法的“虐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是同盟国继“比利时大屠杀”和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之后犯下的又一起暴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在英国政府的盟友也认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个绝佳的工具。在深受犹太人仇恨的沙皇倒台以及美国参战不久之后就来了雅法的故事，它促进了国际犹太人舆论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使得他们越来越坚信，他们的未来在协约国那边。

这个事件更为直接的后果是，它迎合了犹太复国主义激进派的观点，即现在已经不可能与土耳其达成谅解或者妥协了。6月初，在雅法的故事仍然在激荡的时候，亚伦·亚伦森给美国犹太人团体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发了电报。这些人对全心全意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仍然保持谨慎，有些人仍然认为土耳其的统治最有利于未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地位。这封电报的收信人包括现任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及后来成为大法官的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了让亚伦森的信息更有权威性，马克·赛克斯安排让这封电报由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转发。费城的迈尔·苏兹贝格法官收到的电文很有代表性：[34]

“根据可靠情报，土耳其当局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亚伦森写道，“现在我们迫切需要摈弃先前对土耳其人的宽容态度……土耳其人已经犯下了那些罪行，犹太人的态度和美国的公众舆论

必须要有彻底变化。快速地将犹太人从土耳其魔爪下解救出来的唯一高效方法是在战场上以及所有地方对其大力攻击……我们必须构建一条统一战线，集中犹太人的影响力，将巴勒斯坦从土耳其手中夺走。”[35]

还是在6月，雅法的故事出现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版本。作为对协约国呼吁的回应，西班牙、瑞典和梵蒂冈（在这场战争中都是中立国）派遣特使去实地考察。西班牙和梵蒂冈特使都迅速得出结论，关于犹太人遭到屠杀和迫害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而瑞典特使则更进一步。他写道："雅法的犹太人社区的命运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当地的穆斯林更好，肯定不会比他们糟糕。"[36] 不久之后，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报告称，关于雅法犹太人遭遇暴行的说法"是大大夸张的"[37]。就连亚伦·亚伦森最终也被迫承认，在雅法城遭到所谓"私刑"的两个犹太人实际上是因为抢劫而被逮捕的，而且并没有被绞死[38]。

当然，这都没关系。在战争中，真相是人们被引导着去相信的东西，而杰马勒帕夏向他的敌人们拱手奉上了一个将会改变中东历史的"真相"。关于1917年雅法事件的谎言——后来研究这段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它是真的，不断予以重复——将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在穆斯林统治下永无安全可言，要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国家"这种观点最原初的神话。

4月21日，英国海军的一艘巡逻艇停靠在沃季赫港，带来了一批令T.E.劳伦斯大感兴趣的货物：11名土耳其战俘。在前一天早上之前，这些人还属于亚喀巴的土耳其守军。

英军得到消息称，德军正在亚喀巴附近布雷，于是派遣了三艘巡逻艇在4月20日黎明前逼近这个港口。一小队士兵登上海滩，将驻防的小群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在随后发生的短暂交火中，2名土耳其士兵死亡，11人被俘，其他人——大约五六十人则逃入山中。其中6名战俘是被强征入伍的叙利亚人，表示希望加入费萨尔·伊本·侯赛因的起义军，

于是一艘英军巡逻艇将他们送到了沃季赫，供讯问之用。

当天，劳伦斯逐个审讯了这几个叙利亚人。他得知，亚喀巴守军的人数有波动，但很少超过100人。考虑到他正在酝酿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情报是，在亚喀巴和马安之间长达60英里的瓦迪伊特姆路径沿途多个碉堡内驻扎的土耳其士兵总数只有200人[39]。这意味着，劳伦斯的计划成功概率很大。如果他能够在这条路径的东端集结一支阿拉伯部队，并闪电般翻山越岭，就能迅速扫荡自己面前的土耳其驻军，几乎不受阻挡地直逼亚喀巴。

但劳伦斯看到了这个机遇，并不意味着英国军方的其他人也这么看。吉尔伯特·克莱顿在3月8日发出的不允许阿拉伯人进攻亚喀巴的指令仍然有效。他命令集中注意力袭击汉志铁路，以阻断土耳其驻军撤离麦地那的道路（过了几周之后，英国人才意识到，土耳其人并没有离开麦地那的打算），因此不允许从事其他冒险。

当然，防止自己的主意被否决的最佳办法就是不要明确地将其表达出来。劳伦斯没有带着自己的建议直接去找克莱顿，而是与当时驻扎在沃季赫的另外两名英国军官攀谈起来，泛泛地讲到了自己在瓦迪阿伊斯养病期间产生的对游击战的洞见。他后来说，自己特别阐述了企图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走麦地那的愚蠢，以及将阿拉伯人组织成一支汉志铁路上的阻滞部队的不可行。他建议尽可能地扩张战线，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这意味着应当向北方派遣“一支机动性强、装备精良的小分队，成功地打击土耳其战线上若干分散的据点”[40]。

劳伦斯在沃季赫的两位听众都是职业军人，他们或许感到兴趣盎然，但这只不过是从当前的任务分散精力而已。但劳伦斯要的就是这样的反应。“大家都忙忙碌碌，没有给我具体的权力去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记述道，“我得到的只是他们的聆听，以及承认我的反击计划或许是有用的牵制。”[41]

我们很难想象劳伦斯的同袍会给他“具体的权力”去实施他的计划，因为从他们的前线报告来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牵制攻击的目标是亚喀巴。劳伦斯在与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会商时甚至更加隐晦和狡黠。4月26日，劳伦斯通知威尔逊，奥达·阿布·塔伊很快将率领一支袭扰小分队前往马安，他（劳伦斯）在考虑随同奥达前往，以保证他们的行动与英国当前的军事目标（袭扰铁路）相一致。威尔逊表示同意，并在5月1日报告克莱顿称，“奥达将北上，可能由劳伦斯陪同，首要目标是扰乱马安附近的铁路”。他没有说他们的次要目标可能是什么[42]。

在满是自我辩护的《智慧的七柱》一书中，劳伦斯对自己的自行其是给出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解释：“从袭击铁路的计划中分散出来的力量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在当时的情况下，少我一个人也无关紧要，况且我非常反对这个计划，就算我在那里，也只会三心二意。于是我决定不管有无命令，都去走自己的路。”[43]

换句话说，他认为尝试摧毁铁路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对所有人都更好的办法是绕过它去找点别的事情做。难怪他的很多上级非常讨厌这个牛津学者。

但在这表象之下，劳伦斯在对自己筹划的行动进行甚至更为堂而皇之的心理上的合理化。他认为，信守对阿拉伯人的诺言将会有利于英国的长期利益，这不仅是个荣誉问题，还能将欧洲其他强国——今天或许是盟友，但明天肯定就变成竞争对手了——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压缩到最小。这场斗争的关键的第一步就是允许阿拉伯人将他们的革命扩展到叙利亚，将这片土地从法国觊觎下夺走。在劳伦斯看来，核心的问题是英国还没有理解究竟怎样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解释。

在动身前往亚喀巴之前，劳伦斯将在沃季赫迎来又一次命运攸关的会议。5月7日，一艘英国驱逐舰在港口短暂停留。马克·赛克斯就在这

艘军舰上。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15年，当时赛克斯到埃及搞实地考察。尽管两人性格迥异——赛克斯喜好交际、风度翩翩，而劳伦斯沉默寡言、极其羞怯，但据说他们相处甚欢。但这友谊没有维持多久。1916年春季，开罗军事情报机关的人们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之后，劳伦斯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对这位外交官迅速产生了恶感。而且，在随后几年内，赛克斯仍然热衷于发出连珠炮一般的愚蠢的备忘录，提出该地区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这些建议往往与他自己在几周前甚至几天前的主张截然相反——这更是无助于改善他在劳伦斯眼中的形象。在劳伦斯看来，赛克斯是爱德华七世时代一个讨厌特色的典型代表，即牛虻一样令人厌恶的贵族老爷，仅仅凭借自己的高贵出身和洋洋自得的踌躇满志，不管发出多么荒唐的意见，都能赢得听众。

但在5月7日的会议上，劳伦斯发现了马克·赛克斯的另一个特点。因为找不到更礼貌的词，只能直截了当地说，马克·赛克斯还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

事实上，两人之所以要在这一天在沃季赫会面，就是因为赛克斯在最近一轮的招摇撞骗中露出了马脚。这位外交官刚刚觐见侯赛因国王回来，他本希望避免与国王会面，但在吉达的常驻代表西里尔·威尔逊上校强迫他一定要去。

威尔逊虽然性格倔强执拗，而且一本正经，自以为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地挥舞着手杖，但他逐渐成了英国中东政策的良心。1916年底，在关于是否派遣一个旅英军前往汉志的漫长辩论中，威尔逊起初是增兵派的一员猛将，还被自己的上级雷金纳德·温盖特派去迫使侯赛因国王接受增兵。但与侯赛因多次会晤之后，这位常驻代表渐渐认识到，麦加的这位老人或许比最近才抵达一线的协约国顾问们更了解自己的臣民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的政治。最后，温盖特又一次命令他的部下去说服侯赛

因，此前一直被认为对温盖特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的威尔逊却断然拒绝，并且努力促使增兵的计划被搁置。

在得知赛克斯的花招——避免觐见侯赛因，而是在开罗与所谓的叙利亚人代表团装模作样地谈判——之后，威尔逊义愤填膺。3月底，威尔逊向克莱顿发送了一份语调沉痛的长篇电文，列举了如此欺骗行为必然带来的问题，以及对侯赛因诚实守信的好处。“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去赢得大英帝国境内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激，这样的机会或许永远不会再有了。”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对那个老人诚实一些吧。我坚信，这样最终对我们会有好处。”[44]

这次呼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吉达的这位善良的上校看来很有本事，自己也懂得幕后的操纵。他下一次觐见侯赛因的时候，敦促国王正式要求与马克·赛克斯会面。威尔逊将侯赛因的要求转发给雷金纳德·温盖特——他虽然主张向阿拉伯半岛增兵，但却是个信守英国公平守信传统的绅士——于是赛克斯就没有办法拒绝国王的邀请了[45]。4月30日，赛克斯和皮科与叙利亚人“代表团”在开罗的会议结束后，赛克斯在苏伊士港登上了一艘英国驱逐舰，前往吉达。

尽管赛克斯绝对自信，但这次旅行一定也是压力很大。在开罗花言巧语地迷惑一群事先选好的、对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一无所知的官员是一回事；要欺骗通信的其中一方，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在当时，赛克斯还有别的牌可以打。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控制信息的流动。他在开罗的时候就安排在皮科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叙利亚人第一次会面，于是他现在要求与侯赛因单独见面。于是，假如将来就此次会谈的内容发生了争端，在极受尊重的英国特使和久以健忘和心血来潮的错误理解闻名的反复无常的沙漠酋长之间，人们会相信谁？

如果马克·赛克斯没有决定在途中在沃季赫停留、与费萨尔会谈的话，他的计划或许会奏效，至少是在短期内奏效，不过他也只能管得了

短期了。5月2日，赛克斯到访的时候，劳伦斯正巧在执行一次短途的侦察任务，但两天后他返回沃季赫后便从费萨尔那里得知了全部情况。这时赛克斯已经在前往吉达觐见侯赛因国王的途中。

从赛克斯5月5日晚发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报告看，赛克斯的这次穿梭外交非常顺利："5月2日，我在沃季赫会见了谢里夫费萨尔，向他解释了关于阿拉伯联盟的英法协定的原则；争论一番之后，他接受了这些原则，看上去很满意。"这次成功预示着一场更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在当晚，赛克斯拜见了侯赛因国王。"根据我得到的指示，我解释了关于阿拉伯联盟或国家的（英法）协定……我向国王强调了法国—阿拉伯友谊的重要性，至少让他承认，这对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的发展很关键，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他。"[46]

如果我们细读赛克斯5月5日的报告，就会感到不安，因为两次会谈有着奇怪的相似——赛克斯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英法对该地区的意图，然后是阿拉伯人的争论，然后是阿拉伯人最终接受。真正玩世不恭的人或许会得出结论，赛克斯重点强调其间双方的争吵，其实已经在准备为自己辩护，防止将来与费萨尔和侯赛因就当时究竟谈到了哪些事情又同意了哪些事情出现争端。但目前来看，这次行程是外交上的大胜利，是解决英法与其阿拉伯盟友之间棘手难题的关键的第一步。

"请通知皮科先生，"赛克斯在5月5日给温盖特电报末尾写道，"与费萨尔和国王的会谈令我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的立场与我们最近一次与三名叙利亚代表在开罗达成的共识完全一致。"

但马克·赛克斯蒙在鼓里的是，他与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会谈的时候，后者由于T.E.劳伦斯的泄密，已经知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赛克斯在5月2日非常含糊和泛泛地讨论了这份协定，却不知道对方已经对协定大体掌握。但是，不论是由于固守阿拉伯人的谈判传统——除非绝对必须，绝不亮出自己的牌——还是为了保护劳伦斯，免得

他泄密的事情被英国人发现，费萨尔在当时深藏不露，没有与英国外交官正面对抗。

赛克斯在5月7日再次来访的时候，费萨尔也仍然不能与他公开对抗。赛克斯告诉费萨尔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是缩水版，而费萨尔对协定的真实框架非常了解，这是他和劳伦斯两人之间的一个危险的重大秘密。如果吐露出来，只会招来灾难：费萨尔会受到英国恩主的疏远，甚至抛弃；劳伦斯会被立刻调走，或许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但另一方面，劳伦斯是通过合法途径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内容的，这意味着，他可以自行直面赛克斯，揭露他向费萨尔撒的谎（或许赛克斯向侯赛因也撒了谎）。一切迹象表明，劳伦斯挑起了与赛克斯的对抗。两人后来都没有记述在沃季赫的会见，但似乎是大吵了一番。从那天起，劳伦斯对赛克斯充满了敌意。而赛克斯则抓住一切机会，尽其所能地对劳伦斯大加诋毁和排挤。

在更为私人的层面上，在沃季赫与赛克斯的会谈似乎既让劳伦斯十分困扰，又让他松了一口气。他不信任自己国家的荣誉感；他的做法——向费萨尔泄露英国人背叛阿拉伯事业的秘密计划——被证明是合理的。他过去或许还因为自己泄密而感到良心不安，现在看到马克·赛克斯的阴险计划，心里就彻底坦荡荡了。

同时，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同胞是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相比而言，爱德华·布雷蒙还是好对付的，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追求法国的霸权，所以他的各种计划都是可以预测的。而马克·赛克斯是个经常心血来潮的人，满嘴跑火车地随意发誓许诺，并不感到自己有责任信守诺言，有时甚至根本记不住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他凭借欺骗的天赋能够掌控局面，而且他身居高位，能够操控从吉达到伦敦的所有权力杠杆，所以到最后恐怕英国的荣誉和正义理想也无济于事，一切都会为了方便而被牺牲掉。那么阿拉伯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去改变一线的局

面，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将阴谋者的计划打乱。

两天后，劳伦斯带着这些想法，踏上了进军亚喀巴的漫长而险象环生的道路。伴随他的“军队”只有不到45名阿拉伯战士，却要完成第一次世界大中最大胆也最著名的军事功业之一。

---

[1] Dobell，as cited by Keogh，*Suez to Aleppo*，p.102.

[2] Wilson，*War Message to Congress*，April 2，1917.

[3] Moore，*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p.67.

[4] Lawrence，“The Howeitat and their Chiefs，” Arab Bulletin no. 57（July 24，1917）：309-10.

[5]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October 31，1933；Graves and Hart，*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Pt. 2，pp.188-89.

[6] Clayton directive of March 8，1917，with copies to Wingate，C. Wilson，and Lawrence；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686/6，f. 46.

[7] Clayton to Wingate，May 29，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388.

[8] Lawrence，*Seven Pillars*，p.222.

[9] Lyndon Bell to Lloyd，March 17，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3.

[10] Sykes to Wingate，February 22，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f. 58.

[11] Foreign Office to Wingate，March 14，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 Papers，145/3/38.

[12] Grey to Buchanan，ambassador to Russia，March 16，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2767，Registry 49669.

[13] Adelson，*Mark Sykes*，p.220.

[14] As quoted by Friedman，*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p.130.

[15] Adelson，*Mark Sykes*，pp.220-21.

[16] As quoted by Friedman，*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p.131.

[17] Hardegg to Glazebrook，April 2，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448，Volume 3.

[18] 关于萨拉·亚伦森一生的最佳英文资料是Engle，*The Nili Spies*。

[19]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p.287.

[20] Aaronsohn，*Diary*，April 19，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21] Aaronsohn，*Diary*，March 12，1917.

[22] Sykes to War Office，April 3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3，f. 191-93.

[23] 亚伦森在1917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去见温德姆·迪兹，告诉他，马克（·赛克斯）爵士想让我通过迪兹，把宣布雅法犹太人遭驱逐消息的电报发出去。"

[24] Aaronsohn，"Addendum to 'Report of an inhabitant of Athlit，'" undated but November 1916；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83.

[25] Sykes to Graham，April 28，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5.

[26] *Jewish Chronicle*（London），May 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5.

[27] See 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5，File 87895.

[28] Oliphant，minutes to "Jews in Palestine，" May 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5，File 87895.

[29] Ormsby-Gore to Sykes，May 8，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7，p.4.

[30]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May 1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5.

[31] *New York Times*，June 3，1917.

[32] 关于雅法驱逐事件，一份非常有趣的文件是德国驻耶路撒冷领事海因里希·布罗德于

1917年4月5日写给新任德国大使Richard von Kuhlmann的报告。布罗德担心土耳其政府的行动会疏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于是向杰马勒帕夏告知了他的担忧。在他们的会议上，杰马勒澄清说，雅法犹太人中的农业人口可以留下，而被疏散的那些人如果愿意，可以去耶路撒冷，而被疏散的“奥斯曼人”不准去耶路撒冷。Brode to Kuhlmann，April 5，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20，Roll 4333，Türkei 195，Band 12，Frames K178502-8.

[33] Turkish Legation to the Netherlands，May 2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5. Also，Alvarado to Hardinge，June 8，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5.

[34] Deedes to Egypt High Commissioner’s Office，Cairo，June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805.

[35] Aaronsohn to Sulzberger，June 2，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805.

[36]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Sweden，August 25，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 58，Volume 399.

[37] Townley to Balfour，August 1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5.

[38] Aaronsohn，“The Evacuation Menace，” undated but late July 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805.

[39] Lawrence to Wilson，Intelligence Memo，undated but circa April 2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686/6，f. 88.

[40] Lawrence，*Seven Pillars*，p.224.

[41] Lawrence，*Seven Pillars*，p.225.

[42] Wilson to Clayton，“Note on the Proposed Military Plan of Operations of the Arab Armies，” May 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6，f. 351.

[43] Lawrence，*Seven Pillars*，p.226.

[44] Wilson to Clayton，March 2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2，f. 199-201.

[45]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April 27，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1d.

[46] Sykes to Wingate，May 5，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1d.

第13章 亚喀巴

永远不要怀疑英国的诺言。它睿智而值得信赖。不必害怕。

——1917年5月，侯赛因国王写给儿子费萨尔的信 [1]

谢里夫陛下（侯赛因国王）显然有着东方君主常见的人格缺陷和对系统工作的无知……指导东方君主或政府走应该走的路并非易事——我为此大伤脑筋，付出了不少代价，所以深知这一点——我对你非常同情。工作有时肯定令人心碎。

——1917年7月20日，雷金纳德·温盖特给西里尔·威尔逊的信 [2]

在这个时刻，就像两个月前在瓦迪季坦那样，领袖的可怕负担又落在了劳伦斯肩上。当时，领导人的职责要求他处死一个人。现在，他又必须去营救一个人，但在这过程中很可能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3]

这是5月24日上午大约9点钟，他的队伍在胡尔沙漠的第五天。“胡尔”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恐怖”，这是阿拉伯半岛北部的一片荒无人迹、淡水匮乏的广阔沙漠，没有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生命迹象。劳伦斯自离开沃季赫以来就一直非常害怕通往叙利亚之路的这一段路程。现实比想象更可怕。进入胡尔沙漠几个小时之后，45人的队伍就遭遇了迎面而来的狂风的抽打。据劳伦斯估计，风力相当于“六七级，非常干燥，我们的干枯的嘴唇全部裂开，面部皮肤都皲裂了”。狂风和它掀起的炽热的、令人盲目的沙暴在随后四天内几乎一刻不停。

为了在这种可怕环境下坚持下去，人们的思想往往会退缩到一种封闭状态，全副精力都用于努力熬下去。劳伦斯的队伍在胡尔沙漠就是这样，以至于在5月24日上午，没有人发现他们身边有一匹骆驼没了骑手。他们或许认为，这是一匹一般在队伍末尾的背负辎重的骆驼，或者骑手换到了另外一匹骆驼上，就在长长队伍的某处。最有可能的情况

是，在他们近似冬眠的状态下，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去注意。劳伦斯最后对这匹神秘的骆驼进行调查时发现，它是卡西姆的坐骑。

卡西姆是个“牙齿尖利、面色发黄的不法之徒”，来自叙利亚城市马安。劳伦斯带上他，是希望他能够联系到自己家乡的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是，队伍的大部分人是霍威塔和阿格伊尔部落的人，卡西姆是个外来者，在沙漠的残酷法则里，他没有任何朋友，在危机中就像被判死刑的哈米德在瓦迪季坦一样无助。劳伦斯记述道，卡西姆的身份使得“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

胡尔沙漠的巨大压力或许已经影响了劳伦斯的理智，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有勇无谋的决定，不仅要独自回去寻找卡西姆，而且不告诉其他人他要这么做。走了没多远，他就发现，队伍的踪迹全都消失了，骆驼的脚印被怒号的狂风掀起的沙子扫清，队伍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黑暗中。为了找到卡西姆并返回队伍，劳伦斯只能依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日记本中记录的罗盘读数，并相信自己没有搞错。

他们出发已经15天了。根据贝都因人的传统，一些部落酋长，包括费萨尔，陪伴他们从沃季赫出发，走了最初的几英里，以示辞别，随后约45名旅行者就进入了东北方的黑暗。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汉志将得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音讯。

他们轻装上阵。除了一些步枪和2万枚沙弗林金币[4]之外——用来发给他们希望争取到自己这边的叙利亚部落领袖——每个人在自己的鞍囊中携带了约45磅面粉。在抵达他们的最初集结地——叙利亚边境上的瓦迪西尔汉洼地，估计要3周路程——之前，他们的主食就是面粉和水。

劳伦斯虽然又患上了热病、长了疖子，但后来将旅途的最初几天描绘得非常诗情画意，是一次伟大冒险的开端。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他

在阿拉伯半岛期间最有趣的轶事之一。他得到了两名勤务兵，在《智慧的七柱》中他们被称为达乌德和法拉杰（他们的真实名字是阿里和奥斯曼）。

这是闲散无事的一天，身上长了疖子的劳伦斯非常疲惫，躺在一面岩石峭壁的阴影中休息，这时一个少年跑来求他帮助。这个叫作达乌德的少年是从附近的阿格伊尔部落营地逃出来的，他说，他的朋友法拉杰因为不小心烧毁了一顶帐篷，将要遭到营地指挥官的毒打。他说，如果劳伦斯发句话，或许能将法拉杰救下。过了一会儿，劳伦斯和经过他身边的阿格伊尔营地指挥官萨阿德谈了此事，后者毫不动摇。萨阿德解释说，这两个孩子老是惹是生非，必须要好好教训一顿。但为了给劳伦斯面子，萨阿德提出了一个所罗门一般睿智的方案：达乌德可以替自己的朋友挨一半殴打，这样就能将他的惩罚减轻一半。“达乌德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劳伦斯写道，“吻了我和萨阿德的手，跑向山谷。”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强烈地暗示说，法拉杰和达乌德是同性恋关系，将他们的关系描绘为“东方的男孩与男孩之间的深情厚谊，由于女性被隔离在深闺，这种感情是不可避免的”。劳伦斯这么写让人不禁猜测，他自己或许也是同性恋者，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在某些圈子里，劳伦斯的性取向仍然是个激烈辩论的话题。这种猜测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他对法拉杰和达乌德的描述。他们在次日早上来到他的营地，“弯着腰，眼睛里带着痛苦，嘴唇上却挂着扭曲的笑容”，恳求他收下他们作仆人。

“这是急性子达乌德和他的情人法拉杰，一个俊美、体格柔和、貌似女孩的少年，面庞光滑而清纯无辜，眼波如水。”劳伦斯起初要拒绝他们，解释说自己不需要仆人，但最后同意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如此年轻和干净”。从那天起，达乌德和法拉杰淘气的恶作剧将给劳伦斯的旅途带来许多轻松的快乐。

但在旅途的最初日子里，队伍已经面临了一个恼人的问题。他们几乎所有的骆驼，包括运载辎重和供骑乘的骆驼，都患上了正在沃季赫肆虐的疥癣，没有最基本的软膏来控制病情——沙漠中常用黄油来医治疥癣——很多骆驼很快就瘸了，或者发了疯。这种疫病或许就是两匹辎重骆驼死亡的原因，它们在爬过一条特别狭窄的隘道时，立足不稳，跌下了下方的深渊。在他们接近胡尔沙漠边缘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糟糕的预兆。

劳伦斯写道："在费萨尔的所有骑乘骆驼中，没有一匹是健康的。在我们的小小队伍中，所有骆驼都一天天虚弱下去。纳西尔（奥达的主要副手）非常担忧，害怕在我们即将开始的强行军中会有很多骆驼垮掉，把骑手困在沙漠里。"

劳伦斯在随身携带的袖珍日记本上记录了穿越胡尔沙漠道路的艰难痛苦。他以往在旅途中写下的记录一般篇幅很长，但在胡尔沙漠却只写了几个短小的片段，而且越来越前言不搭后语，几乎杂乱无章。后来，在第五天，卡西姆失踪了。

劳伦斯决定返回寻找掉队的卡西姆时肯定知道，他很可能已经死了；任何人如果在这个时节被困在胡尔沙漠而没有任何遮蔽或者饮水，就只能存活几个钟头。他肯定也知道，如果自己读罗盘时有一丁点儿错误，自己也很快会丢掉性命。但他仍然坚持要去，最后非常幸运。骑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看到远方有一个小黑点，走近之后发现那是精神错乱的卡西姆在跌跌撞撞地行进。劳伦斯把他拉上自己的骆驼，调头去追赶其他人。

在大卫·利恩的史诗电影中，营救卡西姆的行动被拍摄为十分钟的永垂不朽的情节，最后高潮是劳伦斯终于和伙伴们会合，他们松了一口气，嘶哑地欢呼起来，劳伦斯的高尚行为奠定了他作为真正的"沙漠之子"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卡西姆在停下大小便的时候没有

把自己的骆驼拴好，按照残酷的沙漠法则，他这是自取灭亡。劳伦斯不但没有得到赞扬，还因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窝囊废而受到一些伙伴的批评。另外，队伍的指挥官把达乌德和法拉杰又揍了一顿，惩罚他们胆敢让劳伦斯独自返回。

1917年5月26日，也就是劳伦斯营救卡西姆的两天之后，英国国王和他的战时内阁收到了一些振奋人心的喜讯。雷金纳德·温盖特从开罗发来了一份绝密电报，报告了马克·赛克斯最近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的胜利。

在赛克斯前不久的独自觐见之后，他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又一同到吉达拜见了侯赛因国王，希望能够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就叙利亚未来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双方的意愿是截然相反的，阿拉伯人坚持要求叙利亚在战后成为独立的大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而法国人同样坚持要求它接受法国的统治，所以大家并不指望这次会谈能够有什么成果。第一天的会谈证明大家这么想是很有道理的。5月19日，在紧张的三小时对抗之后，皮科和侯赛因离去时甚至比之前更加固执己见。[5]

因此，第二天早上侯赛因命令译员向欧洲特使们大声诵读一份大胆建议时，大家都颇感震惊：国王愿意接受法国人在“穆斯林—叙利亚沿海地区”——可能是指叙利亚的沿海和黎巴嫩部分——扮演英国人将在伊拉克的巴格达省扮演的角色。由于最近一支得胜的英国军队占领了巴格达，而且《赛克斯—皮科协定》条文规定英国将无限期地控制这个省份，侯赛因将巴格达和黎巴嫩等同起来就意味着，阿拉伯人一下子将法国人希望在黎巴嫩得到的东西拱手奉上了。赛克斯在给温盖特的报告中极其低调地描述道：“皮科先生非常满意，关系融洽了起来。”[6]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英国许下的众多互相矛盾的条约和诺言造成了非常棘手的难题，而赛克斯出人意料地在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走

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但熟悉赛克斯的惯用手段的人就会对这个突破持保留态度。他以往在讨论任何话题时都非常冗长啰唆，但对吉达会议——目前为止协约国和侯赛因国王之间最重要的外交会谈——的报告却只有短短四页，而对侯赛因令人震惊的关于黎巴嫩的让步只是一笔带过。另外，赛克斯和皮科都没有敦促侯赛因将自己的提议付诸书面，也没有获取国王的译员大声朗读的提议书的副本。甚至那些热切希望如此解决问题的法国外交部高官也很快开始感到，在吉达缔结的协议实在是太轻松、太容易了[7]。

5月27日，斯图尔特·纽科姆抵达开罗，走进吉尔伯特·克莱顿的办公室，表达了这些担忧。他和西里尔·威尔逊都参加了吉达会议的至少部分议程，并各自记述了事情经过。纽科姆还带来了侯赛因的译员（也就是当众宣布提议的那个人）福阿德·库塔布的书面记述。纽科姆、威尔逊和库塔布三人的说法在细节上有差异，但三人都表示，是马克·赛克斯，而不是侯赛因，最先提出了将黎巴嫩与巴格达等同的说法。最让人担忧的是，国王对这种说法的理解与协约国特使的理解迥然不同。

对这个问题最熟悉的是西里尔·威尔逊。“尽管赛克斯和皮科对这个美好结局非常满意，”他写道，“而且是谢里夫自己提出了（将黎巴嫩与巴格达等同的）建议，我自己却高兴不起来。我感到，谢里夫非常礼貌客气，而且对我绝对忠诚、对英国完全信赖，他有可能是在口头上答应，而如果他知道我们是如何理解伊拉克局势的，就绝不会同意。”[8]

威尔逊给克莱顿的信长达12页，而且充满忧虑、有颇多重复之处。在信中，他详细讲了自己如何再三敦促赛克斯澄清侯赛因提议的确切意思，却被置若罔闻。据威尔逊说，在整个会议中，赛克斯都大大咧咧地拒绝细谈。

纽科姆的抗议不像威尔逊那样富含感情，但是在很多方面更为惊

人。他在汉志的经历很困难，他对阿拉伯起义军作为一支真正的战斗力量没有多少信心，但吉达的事件让他忧心忡忡。最让他担忧的是他与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的一次谈话，在英法特使到访时费萨尔也在吉达。据纽科姆说，侯赛因之所以提出这个惊人的建议，因为“侯赛因非常坚决地向费萨尔表示，他之所以非常乐意这么做，是因为代表着英国政府的马克·赛克斯爵士让他这么做，而且马克·赛克斯爵士告诉他，他什么都不用管，让赛克斯来处理就好了。侯赛因很高兴这么做，因为他对英国政府绝对信任”[9]。

从纽科姆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角度来看，赛克斯的这种保证，再加上侯赛因显然对他自己同意的条件的理解有限，这意味着英国政府现在有了道义上的责任，一定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到底。“否则我们就是在欺骗谢里夫和他的人民，在玩一场非常阴险的游戏，被配属给谢里夫军队的英国军官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我知道，有好几名军官已经在担心我们会辜负他们。”

威尔逊和纽科姆虽然都感到不安，但要么是太圆滑礼貌，不肯直接去找赛克斯说明情况，要么是太天真，没能把整个问题串起来考虑。事实上，吉达发生的事情不是潜在的误会，而是马克·赛克斯要出的非常复杂而聪明的奸计。

赛克斯3周前第一次访问阿拉伯半岛时就奠定了这套奸计的基石。赛克斯对那次旅行的报告同样非常简略，声称自己已经向侯赛因和费萨尔全面、彻底地解释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他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费萨尔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但英国特使深信，英国官员们肯定会相信他的话——他是现任国会议员，而且还是从男爵，而不会去相信一个反复无常、性格怪僻的阿拉伯部落酋长和他的武士儿子。当然，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赛克斯说自己在这次旅途中对阿拉伯人开诚布公，这完全是在撒谎，而英国官员们有可能会相信这个人

的话。那就是T.E.劳伦斯，但对赛克斯来说幸运的是，劳伦斯目前不在现场，因为他已经起程北上，在赛克斯与皮科一道返回吉达的关键旅程期间，劳伦斯与外界的联络完全中断了。

看来，赛克斯想出这个巧妙的欺骗手段来，灵感来源似乎恰恰是把皮科与侯赛因在5月19日第一次会议搞得一团糟的那个问题：皮科坚持要求，法国在叙利亚海岸地区应当享有英国将会在巴格达享有的地位。当时赛克斯对皮科的这个要求颇感恼火，因为他想把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分隔开，所以他在这次会议结束时非常沮丧。但回到“诺斯布鲁克”号（两位特使搭乘这艘英国战舰来到吉达，他们也住在舰上）之后，赛克斯突然想到了解决自己难题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

侯赛因反对将黎巴嫩的地位与巴格达等同，是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法国人染指任何地方，而不是因为他知道巴格达将会被英国永久控制。除非赛克斯把《赛克斯—皮科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告诉侯赛因，他是绝对不可能知道巴格达的未来地位的。赛克斯当然不会告诉他了[10]。

侯赛因上一次听到英国对巴格达的打算还是在1915年底，他和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达成非常模糊的共识。在两人的来往信函中，麦克马洪表示，由于英国在伊拉克有经济利益，巴士拉和巴格达这两个省在未来的阿拉伯国家内将需要“特别的行政安排”，暗示着英国在某种程度上的控制[11]。侯赛因的回答是，可以在“短期内”由英国控制这两个省，条件是“在占领期间，英国向阿拉伯王国支付一笔适当的赔偿金”[12]。赛克斯从这里推测，侯赛因仍然相信，英国在伊拉克的地位将是短期的租借，但这两个省最终肯定会被包括在独立的大阿拉伯国家之内。事实上，侯赛因多次神秘地向最亲信的人（包括费萨尔和福阿德·库塔布）表示，他“口袋里装着”英国人对伊拉克未来的白纸黑字的保证书，尽管他拒绝将麦克马洪的信给他们看。

这就给赛克斯带来了非常诱人的机会。由于侯赛因不知道《赛克斯

—皮科协定》的存在，而皮科不知道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存在，赛克斯就有可能制造一份协定，让双方都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最妙的是，由于双方都认为自己骗到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去过分较真细节，免得夜长梦多。就在5月19日这一天的下午，赛克斯从“诺斯布鲁克”号发了一封紧急讯息到岸上，要求福阿德·库塔布来见他。

在这次会议上，赛克斯敦促福阿德，要将侯赛因在次日的建议限定为两点。第一点不过是个善意的姿态，是让侯赛因宣布不会支持一群近期将到国际上游说、呼吁阿拉伯独立的叙利亚流亡者。第二点当然是重要得多的，就是让侯赛因接受将黎巴嫩的地位与巴格达等同的方案。库塔布大惑不解，赛克斯则发誓赌咒，不断重复地让这位顾问将一切都交给他处理好了。

即便如此，侯赛因仍然对接受这个计划十分谨慎。据库塔布说，侯赛因最后终于同意，因为“他知道马克·赛克斯爵士在政治问题上能够比他本人更好地为阿拉伯人的利益而斗争，并且知道马克·赛克斯爵士代表着英国政府的权威，一言既出，驷马难追”[13]。并且，侯赛因还又一次告诉库塔布，他有“一封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信，答应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我知道这样是可以的，因为英国政府一定会信守诺言”。

第二天上午，福阿德按照指示宣读了侯赛因的宣言。当天下午，“诺斯布鲁克”号驶出吉达港的时候，乔治—皮科相信法国已经得到了黎巴嫩，而侯赛因国王相信自己已经诱使法国接受了叙利亚全境未来的独立。

威尔逊和纽科姆虽然没有理解赛克斯的骗局，但已经对他漫不经心的作风大感震惊，所以在给克莱顿的信中要求彻底澄清事实。威尔逊敦促克莱顿迫使赛克斯将他认为的在吉达达成的协议写成书面形式，并将英方的真正意图准确无误地告诉侯赛因。“如果我们不能支持谢里夫到底，”威尔逊写道，“如果我们让他大失所望，而他对我们是如此信任，

那么令人‘艳羡’的吉达朝觐官员的职位就要空缺了，因为我肯定是不能再待下去了。”[14]

但阿拉伯人对政治伎俩也不是一无所知。费萨尔私下里已经知道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这要感谢劳伦斯），所以他得知父亲同意的条件之后自然是无比震惊，很快就开始努力翻盘。5月28日，他向叙利亚人民发布了公开宣言，呼吁他们拿起武器，为阿拉伯独立而斗争，同时大力赞扬英国援助此项事业的努力。“毫无疑问，”费萨尔写道，“英国如此努力，唯一的目标就是看到世界上有一个独立的阿拉伯政府，由阿拉伯人建立和管理，其疆界保持完整，不受更改。”法国人也得到了类似的对待。费萨尔先是感谢了法国在过去在叙利亚的贡献，然后说：“我们非常感激法国与其盟友一道，承认了我们的独立。”[15]

赛克斯在吉达打的哑谜没有带来谅解和一致，却愈发加深了阿拉伯人和协约国在中东的意图之间的鸿沟，这个分裂很快就将带来极端丑恶而影响深远的后果。其间，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重拾他们最熟悉的策略：清静无为，静观其变，寄希望于一切都会好起来。人们发现费萨尔的宣言与几天前达成的协议差异非常明显，于是去问赛克斯，这是怎么回事。他大大咧咧地说，这只是阿拉伯人的宣传手段，受众只是阿拉伯人。克莱顿最后终于有机会向赛克斯转达了威尔逊和纽科姆的抱怨，但赛克斯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免责条款。“我认为这并不重要，”他如此评论侯赛因明显的不明真相，“因为我认为局面会变得太重大，他会掌控不了，最终他要么乖乖听话，要么出局。”[16]

有一个人不肯把事情就此放过，那就是固执的西里尔·威尔逊。他向开罗发送了自己的怨言之后整整一个月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在1917年6月底写信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副手斯图尔特·赛姆斯中校，敦促他要求赛克斯将在吉达达成的协议写成“较短的实事求是的材料”。威尔逊尖锐地指出：“据我所知，马克·赛克斯爵士声称他已经将事实明确地解释给

了谢里夫，现在让他写一份材料，一定不会有什么坏处吧。”[17]

但这种档案文书已经在中东制造了很多问题，赛姆斯感到没有必要再制造新的麻烦。“整个问题目前处于瞬息万变的状态，”他回答威尔逊说，“而且完全取决于战事的进展。因此我们无法将任何事情非常明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只能让各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直到局势明朗一些。我知道这是个困难的处境，但别无他法。”[18]

具有悲剧意义的是，在吉达会议之后，最坚决捍卫英国荣誉的人恰恰是被他们坑害最苦的那个人：侯赛因国王。费萨尔得知在“诺斯布鲁克”号上提出的建议之后，与父亲激烈争吵起来，最后侯赛因严厉地斥责他道：“这些话是父亲说给儿子听的：永远不要怀疑英国的诺言。它睿智而值得信赖。不必害怕。”

据说这是个避难所，但劳伦斯却不这么看。在他眼里，这是个充满折磨和疫病的地方，是应当尽快逃离的噩梦之地。

200英里长的瓦迪西尔汉呈西北—东南走向，横亘阿拉伯半岛与叙利亚（在今天的约旦）的边界，是地质上形成的低洼，曾经是条水量丰富的水道，有几亿年历史，但如今只是一条狭窄的旱谷。1917年，奥达·阿布·塔伊安排他的霍威塔部落族人在此地与他和劳伦斯从沃季赫带来的小股部队会合。

按照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述，瓦迪西尔汉有许多水井，植被相对比较葱茏，在他们穿越胡尔沙漠之后应当是有如天堂。但至少有两个问题让这个地方难以忍受。首先是这里有许多毒蛇，包括角蝰、鼓腹巨蝰和眼镜蛇，似乎无处不在——藏在岩石下，挂在灌木丛中，蜷曲在水边。劳伦斯非常怕蛇，很难找到片刻的安宁。他的恐惧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在抵达瓦迪西尔汉几天之内，从沃季赫来的人当中就有三人被蛇咬而中毒死亡，还有四人命悬一线。当地人的“疗法”也不能让人

放心，因为治疗就是用蛇皮膏药将伤口包扎起来，然后在伤者面前诵读《古兰经》，直到他死去。

第二个令人无法忍受的问题是宴会。瓦迪西尔汉是努里·沙拉昂的领地的下游地区，他是叙利亚南部最强大的部落酋长之一。奥达抵达此地之后立刻前去拜访沙拉昂，请求他允许起义军在当地停留。于是，聚集于此的霍威塔氏族夜夜笙歌，用米饭和羊肉盛情款待劳伦斯等贵客。曾经享受过贝都因人的热情好客的西方人都会作证，他们的热情有时到了让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劳伦斯很快就有了这种感觉。每个夜晚，不同的贫困家庭争先恐后地招待从沃季赫来的旅行者。劳伦斯对这些宴会作了详细描述，这些宴会起初还很有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俗情调，但渐渐变得怪异荒诞，尤其是他回忆道，有因饥饿而腹部浮肿的孩子聚集在宴会桌边缘，焦急地等待冲上来吃公共餐盘里剩饭的机会。

“这个地方比我们穿越的开阔沙漠更加令人绝望和悲伤，”劳伦斯写道，“黄沙或燧石，或是裸露岩石构成的荒漠有时令人心潮澎湃，在某些光影下还有一种没有生气的寂寥的怪诞之美；但在这个毒蛇满地的瓦迪西尔汉，有种阴森恐怖、活跃的邪恶的东西。”

但劳伦斯受到的折磨绝不仅仅是毒蛇和被迫吃太多羊肉。在这些等待的平静日子里，越来越多的部落前来与起义军使节商讨结盟之事，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扮演的欺骗的角色。

而且这种欺骗是在好几个层面上的。他们从沃季赫出发的那天，劳伦斯的大多数同伴都只知道此次旅行的官方目的：鼓动叙利亚部落，为费萨尔的北上打前站。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行动的具体目标，即占领亚喀巴。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有劳伦斯一个人知道完整的计划，甚至奥达和费萨尔也没有掌握全局。

抛去奥达的浪漫的美名，他实际上是个沙漠强盗，因此主要兴趣在

于抢劫。由于在亚喀巴没有什么油水可榨，劳伦斯在一开始很可能对奥达含糊其辞，寄希望于在行程的某个阶段能够说服奥达：与更为唾手可得的战利品相比，占领亚喀巴更符合他的长期利益。至于费萨尔，在劳伦斯离开沃季赫之后，他又一次劝说他的英国顾问们尽早进军亚喀巴[19]。或许这是费萨尔的计谋，是为了进一步掩饰劳伦斯的真正目标，免得让他的同事们知道；但这位阿拉伯领袖这么做或许是由于劳伦斯没有告诉他，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当然，这都仅仅是战术层面上的欺骗，是由于战争的紧急情况而不得已为之，但这意味着领导的最终职责和负担——更不必说可能的失败，及其给劳伦斯身边的人招来的大灾难——将完全落在劳伦斯一个人的肩上。

让他的负担更加沉重的是，在未来要做更大范围的欺骗：协约国打算背叛阿拉伯人。似乎是在从沃季赫出发前会见马克·赛克斯的时候，劳伦斯才完全理解协约国的两面三刀。在他北上的旅途中，这显然让他有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劳伦斯当然更不可能将这个秘密吐露给同行的旅伴们，而且看到部落代表们潮水般涌向瓦迪西尔汉、加入阿拉伯独立斗争时，他的内疚难以承受。

“他们把我看作英国政府的自由代理人，”他写道，“要求我对英国政府的书面诺言予以认可和支持。所以我不得不加入英国政府的密谋，尽可能地去安抚阿拉伯人，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会得到报偿。”这个角色让劳伦斯感到“持久的、痛苦的羞愧难当”，“因为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赢得了战争，这些诺言就只是废纸，如果我是阿拉伯人的诚实的顾问，就应当劝他们各自回家，不要为这种事情拿自己的性命冒险”[20]。

但劳伦斯当然不能这么做。他的选择是让自己远离令他羞愧的场景。“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在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打算北上，罢手拉倒。”[21]

“罢手拉倒”这个短语很有意思，因为劳伦斯现在的想法是北上进入土耳其人控制下的叙利亚，这样的旅途将险象环生，几乎是自杀。在《智慧的七柱》中，他努力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解释，说他是想去北方“了解民意，调查情况，为确定计划打基础。我对叙利亚的一般知识相当不错，对有些地方非常熟悉，但我感到，再看它一眼，能让我从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学到的战略地理知识更加精确适用”。

他此次冒险中隐藏着一线微薄的希望，即如果能在叙利亚内地煽动阿拉伯起义，或许还能挫败法国的帝国主义企图。但与这个希望相对应的是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叙利亚人发动起义后，不得不为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奋斗和死亡。

从劳伦斯在笔记本边角上写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讯息可以看出他对局势的悲痛。“克莱顿，我已决定独自去大马士革，希望能在途中死掉。拜托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让事情停止。我们欺骗了他们，让他们为我们流血牺牲。我无法忍受。”[22] 劳伦斯估计，如果他在行动中死去，这个笔记本一定会最终被送到英国人手中，于是将它留在瓦迪西尔汉，只带了两名向导，起程北上。

这或许是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为勇敢大胆的业绩，他在敌境之内迂回400英里，抵达了黎巴嫩边境和大马士革郊区。这项业绩为他赢得了英国最高级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提名，但也将是劳伦斯一生中最神秘、被记录最少的一个插曲。他是有意为之。他对此次长途游历只写了一份报告，发给开罗的上级，只有4页。《智慧的七柱》长达650页，而且散布着极其详尽的、研究默默无闻的沙漠盆地中植物与地质特征的专题论文，却只用了几个段落来描写劳伦斯的此次北方之旅，并且加以嘲讽：“动机低下，成绩匮乏。”[23]

关于他的这次旅行，我们知道的是，劳伦斯多次秘密会见了阿拉伯起义的潜在盟友——部落领袖和城市中的民族主义者，但每一次对方都

是犹豫不决。这是游击战的经典难题：费萨尔的起义军要北上进入叙利亚就需要当地人的支持，但当地人没有起义军的援助和武装支持是不敢揭竿而起的。面对这个难题，以及如果不能妥善予以解决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劳伦斯愈发真切地感到了英国政府和他自己对阿拉伯人的欺骗造成的负担。

从政治和个人的角度上看，劳伦斯在此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在旅程末期，在阿兹拉克（叙利亚东南部的一个沙漠绿洲）逗留，面见埃米尔努里·沙拉昂。奥达·阿布·塔伊花了好几周时间请求沙拉昂允许霍威塔族人在瓦迪西尔汉集结，这也印证了沙拉昂在该地区的崇高地位。甚至在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前，侯赛因国王就派遣了许多使节去拜见沙拉昂，希望将他和他实力强大的卢阿拉部落争取到起义军这边来。但埃米尔沙拉昂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大打擦边球，暗示说自己或许很快就会加入起义，但又退回到奥斯曼政府那边。但让沙拉昂如此重要的不仅仅是他的权威；按照劳伦斯的描述，这位酋长简直就是死亡的化身：

> 年事已高、面色铁青、憔悴不堪，带着一种灰暗的忧伤和悔恨，脸上唯一的表情就是苦痛的笑容。在他的粗糙睫毛的上方是破败不堪、呈褶子状下垂的眼皮。在头顶的阳光下，两束红光闪耀着射入他的眼窝，令两个眼窝仿佛火坑，这个人就在缓缓燃烧。[24]

或许这些夸张的描述源于努里·沙拉昂的另外一些特点。这位卢阿拉部落酋长虽然深居沙漠，与世隔绝，但似乎对近两年来英国向侯赛因和汉志的其他阿拉伯领袖许下的诺言心知肚明。沙拉昂为了考验劳伦斯，取出了这些互相矛盾的文件的副本，摆在这位客人面前，问他应当相信哪一份。“我知道，能不能把他争取过来，取决于我的回答。”劳伦斯记述道，“阿拉伯运动的未来则取决于他。”[25]

劳伦斯建议沙拉昂信任英国的诺言中最新的一个。沙漠酋长似乎对这个回答表示满意，但这给劳伦斯负疚的内心增加了新的负担。

会见沙拉昂之后，劳伦斯返回瓦迪西尔汉，与等待在那里的伙伴们会合，并下了铁的决心，一定要迫使英国政府信守对阿拉伯人的诺言。他的计划是亲自带领阿拉伯人进入扩大了的叙利亚战场，征服这片土地，这样阿拉伯人就能对自己打下的土地提出权利主张，破坏法国的帝国主义图谋。“换言之，”劳伦斯写道，“我看到没有其他领导人有这样的意志和权力，于是自作主张，要在这些战役中活下来，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土耳其人，还要在会议室里打败我的祖国和它的盟国。”[26]

他承认，自己的想法“是非常狂妄自负的”。

这一年6月，在叙利亚活动的西方情报人员不仅仅是劳伦斯一个人。事实上，在他北上的勇敢冒险途中，他有一次离自己的宿敌库尔特·普吕弗只有3英里之遥。

普吕弗于3月从德国返回中东后，就一直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报局总部俯身案牍，很少离开这相对舒适的环境。马克斯·冯·奥本海默设想的让德国政府与工业界通力合作的宏伟计划已经基本上宣告泡汤，因为德国商人都不愿意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贫困和四分五裂的地方投资。普吕弗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安排出版一批新的亲德宣传小册子，但柏林却以印刷成本和顽固的土耳其政府审查者制造的障碍这类琐事来困扰他。

5月中旬，他决定打破这种沉闷无聊的日常工作，去视察他和奥本海默前一年在叙利亚各地建立的德国宣传中心和图书馆。就是这些实地考察让普吕弗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人员，他能够从中获得第一手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往往与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报喜不报忧的公报和电文互相矛盾。尽管如此，这次出行还是令他大吃一惊。

正如战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到1917年春季，外界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事务的了解比帝国的居民更清楚。外界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在这年4月美国与土耳其断交后撤离岗位的美国领事馆官

员们。这些官员在瑞士、华盛顿和伦敦报告称，奥斯曼帝国境内已有数十万平民因疾病或饥馑而死亡，大片领土处于近乎公开的叛乱中，军队的逃兵率达到25%、30%，甚至40%[27]。这些新近离开奥斯曼帝国的美国官员中较为敏锐的人还指出，土耳其和德国部队之间存在摩擦，双方互相敌视，有时发生暴力事件；广大平民百姓对战争漠不关心，最热切的希望就是让战争赶紧结束，日子能好过一点[28]。

当然，普吕弗在君士坦丁堡也看到了一些苗头。他读到的报告或许对实情轻描淡写，但也讲到粮食短缺、疫病肆虐，而且土耳其军民都斗志涣散。但普吕弗于5月21日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通往内陆的列车时，却完全想不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哀鸿遍野。从普吕弗的角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本人在旅途中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曾经有过的专门为他准备的舒适车厢和招待他的官方宴会都是过去时了。尽管他是在中东最重要的德国官员之一，却只能搭乘人满为患、破破烂烂的火车，而且火车经常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就被转到侧线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他就只能住在脏乱不堪、满是跳蚤的小客栈里。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他用铅笔草草地写下了零星日记，几乎全都是一连串怨言[29]。

让普吕弗更加痛苦的是，他的间歇性牙痛越来越严重，最后整个颚部都发炎了，这是他四周的破败惨景的一个突出例子。一位牙医的推测诊断是，他患上了坏血病，这种疾病是简单的维生素C缺乏引起的，当时在叙利亚非常猖獗。直到两年前，叙利亚还是世界上种植柑橘最多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长期缺失煤炭，大多数果树都被砍下，当作火车头的燃料。

库尔特·普吕弗虽然目睹了这一切，却就是不肯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他在给柏林的高级外交官的报告中称，他和马克斯·奥本海默共同的泛伊斯兰圣战梦想之所以未能鼓舞穆斯林群众，主要原因是沟通不

畅。“集中描写敌人暴行的歇斯底里的宣传完全是浪费时间，”他写道，“土耳其帝国的各民族并不傻，他们知道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30]

普吕弗尽管提出了一些批评，但他的洞见中却有一种自我欺骗的元素。所以他看不到，他旅行经过的土地的裂缝已经在他周围绽裂了。他经常写道，叙利亚阿拉伯人怯懦无能，不敢反抗土耳其人，他在此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也没让他改变观点。6月3日，普吕弗在大马士革的时候，T.E.劳伦斯就在仅仅3英里外的一个村庄内，与一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密谈如何将阿拉伯起义扩展到叙利亚首府。普吕弗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更加不屑，说他们温顺驯良、易于驾驭。6月12日，这位德国特工主管逗留在巴勒斯坦的扎马林村，这里离济赫龙雅各布的犹太人定居点——NILI间谍网的中枢——只有1英里远。

萨拉·亚伦森在4月中旬前往开罗的旅行原计划只会短暂停留，与兄长见面，一同商讨如何在未来几个月内协调NILI间谍网的活动。“马纳杰姆”号下一次出航的时候，萨拉将和她的主要副手约瑟夫·利申斯基一起乘船溜回阿特利特，继续开展情报工作。但发生了一系列倒霉的事情——两次航行被取消，萨拉患疟疾住院两周——于是她和利申斯基能不能回得去就成了问题。5月底，两人又回到了在埃及的出发点。

这些耽搁让亚伦·亚伦森颇为沮丧——他原本没打算让约瑟夫·利申斯基离开阿特利特，现在他和萨拉都不在，间谍网肯定要瓦解了——但亚伦森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他是个不合群的人，所以很喜欢有妹妹在开罗陪伴自己，并且在与英国官僚体制的斗争中越来越依赖妹妹稳健明智的意见。他现在决定，让她返回阿特利特就太残酷了。“我看没有必要，”他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因为最宝贵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要说服意志如钢铁一般的萨拉·亚伦森留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开口提起时，她当即做出了坚定不移的反应：不管怎么样，她一

定要回巴勒斯坦。农学家换了一种策略。萨拉在开罗期间，熟识了许多和哥哥打交道的英国军官，他们对这个在巴勒斯坦执行危险任务的女人非常仰慕。但同时也有一些秉信老派骑士信条的军官向亚伦·亚伦森暗示，让一个女人去面对男人才能承担的危险，有点不成体统。最坚持表达这种观点的就是亚伦森之前的联络人威廉·埃德蒙兹，于是亚伦森安排让这位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的上尉一天晚上在他和萨拉单独坐在大陆酒店休闲室时提起此事。

“夫人，”埃德蒙兹语气僵硬地对萨拉说，“司令部授权我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您为我们做的一切。他们敦促您不要返回巴勒斯坦。埃及为您敞开了大门。您乐意在这里待多久都可以。您到目前为止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已经足够了。”[31]

萨拉·亚伦森感谢了上尉的好意，但立刻就看穿了哥哥的计谋。她转向哥哥说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话，就帮助我回去。如果你不帮忙，我自己也能想办法回去。”

6月15日，间谍船“马纳杰姆”号再次起航。这一次它顺利抵达阿特利特，萨拉·亚伦森和约瑟夫·利申斯基上了岸。亚伦·亚伦森得知此事之后，心情非常复杂，既舒了一口气，又感到懊悔。后来的事实证明，懊悔是对的，因为他再也不会见到自己的妹妹或者利申斯基了。奥达和劳伦斯骑着迅捷的竞速骆驼，在大部队前头去查看贝尔的水井。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在前三周内在瓦迪西尔汉艰苦地集结起来的作战部队：约500名部落战士，大多来自霍威塔部落，准备好了要狠揍土耳其主子一顿。两天前，也就是6月18日，全体人员离开瓦迪西尔汉的时候，无不斗志昂扬。

正因为此，奥达和劳伦斯在贝尔的发现令人垂头丧气。这座绿洲的全部三座水井都在前不久被土耳其人炸毁，只剩下瓦砾堆和仍然冒烟的废木料。幸运的是，一段距离之外的第四座水井安然无恙，因为土耳其

人在这里安放的炸药没有爆炸，所以起义军有足够的水给人畜饮用。但这也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土耳其人在追踪他们。

虽然这么说和人的直觉相悖，但沙漠其实是很难隐藏自己踪迹的地方。旅行者固守沿着水源路径行进的观念，穿越沙漠很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走，很少有岔路可供选择，而且其他人也在不断运动。到6月的第三周，叙利亚东南部的很多部落已经听说起义军在瓦迪西尔汉集结，土耳其人一定也得到了风声。土耳其人炸毁了瓦迪西尔汉以西的第一个主要水源——贝尔的水井，就是为了在敌人起程之前切断其去路。

虽然土耳其人的阴谋没有得逞，起义军和他们的牲畜有足够的水在贝尔生存下去，但这让他们对下一段路程产生了极大的忧虑。贝尔以西70英里处就是十字路口城镇马安，汉志铁路在此经过，令它成为整个地区的战略枢纽。劳伦斯的计划是在有重兵把守的马安以南绕过，继续西进奔赴亚喀巴，但这个计划依赖在杰弗（马安东南方25英里处的一系列沙漠水井）找到水。问题是，马安的土耳其人猜到起义军的目的地是亚喀巴之后——在这个阶段，“最不懂军事的老百姓也能看得出这一点”——就可以在起义军抵达杰弗很久以前就将它的水井摧毁。

因此关键在于设计出一个幌子来，迷惑住土耳其人，让他们无法判断起义军的当前位置和他们的目的地。于是起义军从贝尔派出使节到各个地区性部落，散播起义军还在瓦迪西尔汉编组的消息；肯定至少有一个部落会将这个“情报”转达给土耳其人，向其邀宠。同时，还派出小队战士到各地区进行骚扰袭击。

劳伦斯在前一次北上的时候就为这个幌子打下了一些基础。6月初，他率领一小队当地招募的战士，炸毁了大马士革以北汉志铁路的一座小桥。这次袭击离起义军上一次行动的地点有数百英里之遥，因此土耳其当局大惊失色，一段时期内甚至坚信当地即将爆发叛乱。而在从贝尔出发的大规模伪装欺敌中，劳伦斯亲自指挥了最雄心勃勃的一次行

动。6月21日，他和大约100名战士离开了绿洲，前往北方150英里处的铁路终端城镇安曼。

这次行动非常特殊，常常需要动用劳伦斯劝说诱导的本事。很多次，他不得不遏制住求战若渴的阿拉伯同伴们，劝说他们不要与敌人对垒，提醒他们，他们要做的仅仅是展示武力，这只是个虚张声势的游戏而已，摧毁一座铁路涵洞的效果和炸毁一列火车是一样的。阿拉伯部落战士们可不希望打仗是这个样子，但他们人数很少，而且依赖机动性，所以劳伦斯下定决心，一定要避免漫长的交火和任何妨碍他们尽快返回贝尔的事情。但速战速决的要求也有个讨厌的副作用，简单地说，劳伦斯的队伍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处置战俘。

在3个月前准备伏击阿巴纳阿姆的土耳其驻军的时候，劳伦斯和他的伙伴们无意中被一个游荡的牧羊小孩发现了。起义军担心如果将小孩释放，他会去报告土耳其人，而小孩因为离开羊群而越发焦躁，于是起义军最后采纳了一个滑稽的办法：在战斗打响前，他们将小孩捆在树上，逃走的时候将他释放。在安曼周边的打了就跑的袭扰战中，起义军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

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旅行的切尔卡西亚商人。他们没办法将他作为俘虏带走，又不愿意将他释放——因为大多数切尔卡西亚人都支持土耳其政府——于是很多战士主张将他尽快了断。最后的妥协是，他们将此人剥去衣服，并用匕首割裂了他的脚底。“这种做法虽然古怪，”劳伦斯温和地记述道，“但似乎有效，而且比死亡要仁慈。他脚上有伤，就只能用膝盖和手爬到铁路处，这要花一个小时时间；他赤身露体，在天黑之前就只能躲在岩石阴影里。”这个切尔卡西亚人的最终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在6月的炎炎赤日下将一个一丝不挂、身体残缺的人遗弃在叙利亚沙漠中，究竟算不算仁慈，的确值得商榷。

袭击队伍返回贝尔后，劳伦斯有理由感到自信。由于他们的欺敌工

作，土耳其人刚刚派遣了一支400人的骑兵队伍去追踪瓦迪西尔汉的并不存在的起义军部队。在此前一周内，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南部全境发动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而且没有任何可以辨识的规律可言。此时，土耳其人一定以为下一次袭击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注意力就分散了，无暇去关注对起义军来说仍然还很遥远的目标——亚喀巴。于是，起义军自信满怀地前往杰弗的水井。

土耳其人果然也对杰弗的水井实施了爆破，但效果只比在贝尔强一点点。其中一口井只是部分坍塌，花了一天时间就修复了。修理水井的时候，劳伦斯收到了最为重大的消息。

几天前，他们派出一支快速队伍去鼓动居住在马安西南方山麓丘陵和亚喀巴方向的部落。他们一起袭击了富维拉的土耳其堡垒，这座堡垒占据了横跨马安—亚喀巴道路上的一个制高点。起初，阿拉伯人的进攻没有什么进展，掘壕据守的土耳其士兵很快就将部落战士驱散，但富维拉的土耳其人随后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袭击。他们攻击了附近的一个霍威塔部落居民点，割断了发现的所有居民的喉咙，包括一个老人和十几名妇女儿童。阿拉伯战士们狂怒不已，再次攻击富维拉堡垒，将其占领，屠杀了全部土耳其士兵。于是，通往亚喀巴道路上的一个主要的土耳其据点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翻山越岭的道路基本上敞开了。在杰弗的起义军紧急出动，奔向富维拉。

但他们没能高兴多久。7月1日下午，他们绕过马安以南地带时得到消息，当天上午有约550名土耳其士兵离开了马安，开往富维拉。这支队伍目前就在他们前方的道路某处。

这让劳伦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阿拉伯人的机动性更强，有可能抢在土耳其援军的前头，继续奔赴亚喀巴，但这样就会让一支相当规模的土耳其部队处于自己的后方——事实上，劳伦斯之前坚持反对在亚喀巴实施两栖登陆，就是因为害怕出现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他现在只

有一个选择：找到土耳其援军，将其歼灭。

从威廉·耶鲁搭乘“皇帝”号从纽约港起航，已经过去了将近4年。当时他的假身份是前往圣地观光的花花公子。现在，1917年6月中旬，他回到了纽约，这座城市沉浸在爱国主义狂热之中。在曼哈顿，房屋上悬挂着巨大的美国国旗，窗户装饰着红白蓝三色旗帜，威尔逊总统领导美国参战的两个月之后，狂热的兴奋依然在空中弥漫。[32]

人们的兴奋持续了这么久，一个原因是，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战争的丑恶一面——尤其是阵亡将士的尸体和伤残士兵——才会扰乱节庆气氛。自1914年以来，威尔逊一直刻意将美国陆军维持在接近和平时期微不足道规模的水平，这是挫败主张干预欧战者的迂回手段。毕竟，美国军队只有区区12万人多一点，仅相当于欧洲大国军队的1/20，所以美国能够对战争努力做出多大贡献呢？大多数人的估计是，美国陆军——目前的计划是要扩充到超过100万人——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欧洲战场。

事态进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公众除了挥舞国旗之外，对参军入伍、作战牺牲并没有多少热情。威尔逊以前的想法是，只需要他的华丽辞藻就能鼓动潮水般的志愿者报名参军，但他的大多数同胞似乎对他态度的转变大惑不解——他以前吹嘘说“美国的自豪不容许它参战”，现在却告诫说“民主需要一个安全的世界”。到1917年5月中旬，主动参军的青年仅有不到10万人，于是美国政府自内战以来第一次实施了义务兵役制。所以，耶鲁在6月抵达纽约后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包括到当地的征兵办公室登记。

这位石油商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多少幻想，因为他时年29岁，单身，没有妻儿老人要抚养，非常符合兵役标准。这让威廉·耶鲁非常恐惧。部分原因是，与大多数同胞不同，他已经目睹了现代战争的丑恶一面——不是法国战壕中的血腥厮杀，而是同样恐怖的叙利亚境内大批平

民因饥荒和疫病而惨死的景象。在穿越南欧的漫长而缓慢的归途中，他还观察到了战争苦难的更为微妙的方面：维也纳街头排队买面包的队伍排了好几个街区，还有在火车站月台上等待开往前线的火车的法国士兵脸上的极度绝望。他无疑也准确地知道，应征入伍之后自己会被送往何方。他处于服兵役年龄的上层（1917年5月时兵役年龄上限为30岁，仅仅3个月后就提高到了45岁），再加上他的大学学历和贵族背景，几乎肯定会被送到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到了那里之后，考虑到他的从商背景和技术才能，他几乎一定会被分配到军需部门的补给和后勤领域。由于美国只是对德宣战，意味着几乎全部官兵都会被送往西线，于是耶鲁的战争“生涯”很可能会在法国乡村的某个远离前线的补给站处理文书。

雄心勃勃的石油商人可不愿这样碌碌无为。他非常轻率地相信，由于自己刚刚在奥斯曼帝国待了4年时间，他或许能够轻松地在政府或军队中谋得一个更有意义的职位。他在耶鲁家族在纽约州北的休养别墅待了仅仅一个周末，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从1913年开始就没见过他们）短暂团聚，然后就返回纽约城去，活动起来。

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他拜访了所有大学同学和商界熟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一个“东方通”在战争年代美国的整体计划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他去百老汇大街26号拜访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心想虽然公司在中东的业务在战争期间要暂停，但像他这样对公司忠心耿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辛勤工作的员工应该能得到一个新的海外职位。但是，在遇见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时，生性好斗的耶鲁却严厉批评公司停发在中东的当地员工薪水的新做法，指出公司的些许薪金对被困在战区的人来说却是救命稻草。于是请求公司帮忙的计划也泡汤了。耶鲁被命令离开办公室之后才得知，刚才这位董事就是发布停薪命令的人。

他对在纽约找到职位已经不抱希望，于是转往华盛顿，心想在权力的核心一定有人能够赏识他的才华。耶鲁将自己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

所见所闻写成了一份详细报告，作为敲门砖。他写道：“3年的战争已经将巴勒斯坦摧残到了极其凄惨的地步，村庄由于征兵而十室九空，遭到疟疾、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病的折磨。由于伤寒肆虐，人口可能下降了超过25%。”他报告称，黎巴嫩的情况更糟糕。根据他的一位在土耳其军队的熟人说，那里至少有3万平民饿死，未经证实的传闻则称饿死人数已经超过10万。[33]

报告的潜在读者或许更感兴趣的是，耶鲁对军事问题非常关注。耶鲁显然把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堡的漫长铁路之旅利用得很好，记录了沿途的一些关键的桥梁和路堤，如果这些地方遭到轰炸，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输送补给或援兵的交通线就瘫痪了。他还精确地记录了沿途一系列重要的德国军事设施的地点，包括阿玛努斯山中的一座无线电中继站，它旁边有一座瑞士木屋风格的德国兵营，所以非常显眼。“我还看到德国飞机和医疗单位向南转进。一个德国飞行单位的指挥官，是个上尉，告诉我说，他的单位拥有23架飞机，要转往贝尔谢巴。”他甚至能够报告称，有150至200辆德国运输卡车正在“通过一条连接耶路撒冷、希伯伦和贝尔谢巴的新的军事公路”，向巴勒斯坦南部的土耳其军队运送给养。但他非常有策略地没有在报告中提及，这条公路就是他自己受标准石油公司之命在1914年主持修建的。

最近几周内，协约国领导人开始从新近撤离奥斯曼帝国的美国领事馆官员那里搜集到了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情况，但这些情报根本不能与威廉·耶鲁的报告相提并论。虽然他的信息是三个月前的，但仍然是自开战以来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最详细也是最可靠的分析。6月27日，耶鲁大步走进白宫隔壁的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大楼（现在的老行政办公大楼），将自己的报告送到了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本人的办公室。三天后，他又给兰辛写了一封信。

耶鲁指出，“巴勒斯坦的处置很可能是任何战后和平会议的一大主

题”，向国务卿进言称，“如果美国要在如此复杂和重大的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作用，美国领导人就需要听到对该国及其人民有着第一手知识，而且客观公正的人士的报告。我愿意辞去目前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职位，为美国政府效力，不管是外交、情报领域，还是巴勒斯坦的援助工作。”[34]

耶鲁在国外待了4年，或许对新的威尔逊主义的复杂程度（某些人会认为威尔逊主义非常虚伪）完全不明就里。美国总统的确非常希望将他的“长久和平”概念强加于战火纷飞的世界——这也是他参战的价码——但美国政策的核心还是孤立主义的，所以美国政府希望尽可能少地卷入任何长期的外国事务。于是，耶鲁设想自己掌握的王牌，就是他的专业知识能够帮助美国在中东“发挥作用”，恰恰是威尔逊政府竭力要避免的。所以，他向兰辛的提议得到的回复只有意味深长的沉默。困惑不解的石油商人托了一位耶鲁大学老熟人的关系，将报告送给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主管，却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万般绝望的耶鲁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牌。在穿越欧洲的旅途中，他结识了英国驻瑞士使馆武官，询问了加入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可能性。这位武官的答复并不令人振奋，但耶鲁对中东的广博知识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于是他建议，耶鲁回国后如果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去找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塞西尔·斯普林—赖斯。于是耶鲁拿着武官的介绍信在7月9日早上登门拜访。

在威廉·耶鲁的一生中，幸运往往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但幸运在7月9日的出现却格外出人意料。拜访英国大使馆的时候，耶鲁其实不抱希望，估计使馆工作人员会告诉自己，大使不在，或者在开会。在之前的一个月里，许多远远没有大使那么事务繁忙或者位高权重的人都是这样敷衍耶鲁的。但是他当即被带到了斯普林—赖斯的办公室。

“你为什么会姓耶鲁？”大使一上来就惊愕地问道，“我的第一位太

太也姓耶鲁，是威尔士的耶鲁家族的最后一批成员之一！”

这算不得战斗，倒更像是屠杀。7月2日黎明，阿拉伯战士们在富维拉的道路周围的山地中巡弋，小心地寻找前来救援的一个营土耳其士兵。他们在富维拉以南不远处一条叫作阿巴利桑的山地隘道中找到了敌人，他们沿着一条小溪宿营，还在呼呼大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土耳其指挥官居然没有在周围的山岭上布置岗哨，于是阿拉伯人得以悄无声息地在怪石嶙峋的岩石中分散开来，将酣睡的敌人团团围住。他们摆好阵势之后就开始狙击被困在下方的敌人。

这一天酷热难当，是劳伦斯记忆中阿拉伯半岛最热的一天，酷热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战斗非常零乱。阿拉伯人虽然居高临下，占据压倒性优势，但是每次伏在岩石上没开几枪就必须站起来。如果待的时间太长，他们薄薄的长袍就无法抵御炽热，皮肤会被烫伤，甚至会大片地剥落。零乱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下方的土耳其人躲在小溪边的石缝中寻求掩蔽，而上方的阿拉伯人则从一个高处跳到另一个，寻找一枪毙敌的机会。

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的一句轻率无礼的评论终于改变了战斗的节奏。他无法忍受酷热，躲到了一条狭窄峡谷的阴影中，这里还有一条涓涓细流。奥达·阿布·塔伊在这里找到了他。

“嘿，你看霍威塔部落怎么样？”奥达想起了劳伦斯过去对自己族人的嘲讽，于是打趣道，“还是只会吹牛，不会干活吗？”

劳伦斯也打趣道，霍威塔部落的人“开枪很多，命中很少”。

这句话似乎让酋长勃然大怒。他将头巾丢到地上，跑上山，呼喊着命令族人脱离战斗，到山下等待的马匹处集合。劳伦斯害怕自己激怒了奥达，导致霍威塔部落放弃战斗，于是赶紧爬上山坡去弥补自己的过

失。他看到奥达独自一人站着，虎视眈眈地看着下方的敌人。“要是想看看老头子干的活，去牵你的骆驼。”奥达说道。

劳伦斯匆匆跑下山，来到骑骆驼的阿拉伯主力部队等待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等待冲进阿巴利桑，已经等了一整天），骑上自己的宝贝骆驼纳阿玛，爬到了附近的山岭上。他正好看到奥达和他的50名霍威塔骑兵从邻近的一条山脊全速冲进谷地。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回忆道：“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两三名霍威塔族人中弹倒地，但余下的人风驰电掣地急速猛冲，原先躲在岩壁下打算天黑后杀出血路、逃往马安的土耳其步兵开始动摇，最后在骑兵冲击下溃败了。”

350名乘骆驼的战士也受命迅速跟进。土耳其步兵腹背受敌，筋疲力尽，从两面受到乘骑敌人的冲杀，很快就土崩瓦解。突然间，他们就溃不成军，作鸟兽散，各自逃命，但在这一天的阿巴利桑，死亡对他们来说来得更快。

从劳伦斯的记述来看，战斗的大部分他都没有亲眼看到。由于纳阿玛速度很快，而且他处于骆驼骑兵冲锋的前沿，所以很快就冲到了战友们前方较远处。劳伦斯用手枪打了几枪，但纳阿玛中弹倒毙，把他重重地摔到了岩石当中。他最终清醒过来的时候，战斗已经快结束了。让他恼火的是，他发现，纳阿玛不是被土耳其人杀死的；它的致命伤是脑后近距离中弹，所以是劳伦斯自己无意中将它击毙了。

阿巴利桑的残杀是一场恶毒的一面倒的大屠杀。只有两名阿拉伯战士在进攻中阵亡，少数几人负伤；被困在谷地中的550名土耳其士兵中只有约100人逃往马安方向，有160人被俘，剩下的300人要么被打死，要么已经奄奄一息。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暗示，有些土耳其士兵不是战死的，而是成了一心要为几天前被杀的霍威塔平民复仇的阿拉伯

人的牺牲品。

劳伦斯的领导能力又一次受到了挑战。他从一名俘虏的口供中得知，马安的守军非常薄弱，而且现在援军又在阿巴利桑被消灭，马安一定更加脆弱。这个消息在阿拉伯战士们当中传开后，大家呼喊叫嚷着要迅速返回，袭击这座铁路城镇；马安是大发横财的黄金机遇，而凄凉的港口小镇亚喀巴什么也没有。

这是个绝对关键的时刻，劳伦斯感到最近两个月来一直萦绕心头的目标就要与他失之交臂了。即便阿拉伯战士能够拿下马安，也只是个暂时的胜利；土耳其人会大举增援，那样的话，目前是几乎畅通无阻的通往亚喀巴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封闭了。更糟糕的是，他和奥达以及其他部落酋长们辛辛苦苦拼凑起来的部队肯定就烟消云散了。到7月2日，他们“没有火炮，最近的基地是沃季赫，没有通信手段，甚至没有钱，因为我们的黄金都用完了，于是我们自己发行货币，许诺在‘攻克亚喀巴之后’补偿大家的日常开支”[35]。现在，占领亚喀巴的行动关系到他们的生存。

在奥达帮助下，劳伦斯最后终于劝说战士们不要被极具诱惑力的马安吸引过去。他们决定当晚就出发，开赴亚喀巴，这既是为了让战士们与马安的诱惑之间的距离拉大，也是由于害怕土耳其人或敌对部落的袭击。但当晚出发的决定带来了一个新的棘手问题：如何处置敌人的伤员？他们决定，让那些能够行走的轻伤员和其他俘虏一起，在一个后卫小分队的监视下，跟在大部队后面，往亚喀巴的方向行进。至于20多名伤势过重、无法行走的土耳其人，则被留在一条小溪旁，这样他们至少不会渴死。

阿拉伯战士们开始收拾行装，为即将开始的夜行军做准备的时候，劳伦斯独自走下山谷，来到白天的残杀场所。他希望能从土耳其人的死尸上得到足够的大衣或毯子，让留在溪边的垂死者在临终前能够尽可能

舒适一点。但他发现，已经有人发现了战场，剥去了死尸的衣服。这个场景和劳伦斯的反应造就了他的自传中最诡异的段落之一：

> 死人看上去非常美丽。月光温柔地播撒，将他们软化为新象牙般的颜色。土耳其人身体上没穿衣服的部分非常白皙，比阿拉伯人白得多，而且这些士兵非常年轻。在他们周围，艾蒿摇曳着，缀满露珠，月光的末端在露珠上如同浪花一般闪闪发光。死尸被抛在地面上，令人心生悲悯，堆成低低的小堆。如果身体舒展开来，他们一定能终于舒适起来了。于是我把他们全都摆放整齐，一个一个地摆好。我自己也很疲惫，渴望成为这些宁静的人的一员，而不是回到山谷高处那群没有片刻安宁、吵闹、苦痛的暴徒当中去，那些人还在为战利品而争吵不休，吹嘘自己的速度和吃苦耐劳的本事。

劳伦斯最后离开死者，回到战士们那里，继续向亚喀巴前进，现在目标就在山的另一边，只有40英里了。

在劳伦斯率军袭击亚喀巴的两个月期间，英国—阿拉伯在汉志的军事行动依然按着时断时续的旧节奏继续下去。在5月和6月，英国爆破组通常在小股阿拉伯战士护卫下，定期深入内陆，破坏汉志铁路。他们的报告记录了偶尔的成功——炸毁一座桥梁或者摧毁一列火车——但经常抱怨阿拉伯盟友的不可靠和纪律涣散[36]。英军高层仍然打算鼓动起义军最终去麦地那西北方的伍拉地区实施阻滞作战，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土耳其人没有离开麦地那的意思，于是这个行动的紧迫感就渐渐消失了。现在享有“阿拉伯军总司令”头衔的费萨尔则将注意力投向进军叙利亚的计划。那些知晓费萨尔的雄心勃勃蓝图的英国军官们对此热情不高，毕竟费萨尔在4个月内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沃季赫。“要详细研究谢里夫·费萨尔的计划较为困难，”其中一位军官在5月底报告称，“因为他的计划自始至终都丝毫不考虑时间、空间、补给安排或敌人的部署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等常规的限制条件。”[37]

在开罗的吉尔伯特·克莱顿审读了一线发来的报告之后，向伦敦的军事情报总管发送了一份关于汉志形势的周度报告。在5月和6月，这些

备忘录通常带有一句前言：自上次报告以来局势变化甚少。如果汉志形势到6月底都静止不动——克莱顿更喜欢用的词是“令人满意”，他在叙利亚的间谍却报告称，那里的起义军活动大大增多。7月5日，克莱顿写报告的时候，叙利亚南部各地都传来了这样的报告：霍威塔部落在马安附近有“积极的敌对行动”；富维拉的土耳其驻军遭到攻击；舒贝克附近有一支放牧骆驼的土耳其队伍遭到袭击；比尔谢迪亚之外铁路线遭到破坏。[38]

“劳伦斯上尉在一段时间以前动身前往马安或杰贝勒德鲁兹地区，目前下落不明，”克莱顿在同一份报告中写道，“但最近在沃季赫听到了阿拉伯人的传言称，他和他指挥的小分队炸毁了马安以南的一座大型铁桥。马安地区的这些活动或许是劳伦斯上尉抵达该地区周边后造成的。”

吉尔伯特·克莱顿只说对了一部分。他不可能知道，他在当天汇报的叙利亚南部发生的几乎所有袭击都是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实施的，而在前一个月中叙利亚全境发生的许多其他袭击（其中有些深入敌境超过300英里）也都是他们的杰作。在7月5日，他还不可能知道，劳伦斯并不在马安附近，而是在马安西南方60英里处，与亚喀巴的土耳其驻军商讨后者的投降事宜。

在阿巴利桑大屠杀之后，劳伦斯和阿拉伯战士们快速冲向海边。他们登上山顶，然后下坡通过瓦迪伊特姆，开赴亚喀巴。沿途战士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空荡荡的土耳其碉堡和战壕防线，这最终证明了劳伦斯的与众人意见相左的计划的聪明。“敌人从没有想到，我们会从内陆发动攻击，”他写道，“他们所有的大型防御工事中，没有一条战壕，没有一座哨所是面向内陆的。”[39]

大卫·利恩的电影将亚喀巴的陷落描绘得非常有戏剧性，但事实没有那么扣人心弦。僵持两天之后，双方都急缺粮食，土耳其指挥官终于

接受了无望的现实，几乎未发一枪就在7月6日将这座港口拱手奉上。白旗升起之后，起义军骑着骆驼冲进了亚喀巴，冲进海水里，欢庆自己大胆计划的成功。

但对劳伦斯来说，漫长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也不算稳操胜券。亚喀巴现在拥挤着将近1200人，包括约600名阿拉伯战士和数量相当的土耳其战俘，但粮食奇缺。他还知道，叙利亚内陆的土耳其人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翻山越岭来收复亚喀巴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很可能用不了多久。如果让起义军部队占据山地的哨所碉堡，或许能延缓敌人的进军，但劳伦斯过去的惨痛经验告诉他，依赖阿拉伯部落战士去防守阵地，哪怕是固若金汤的阵地，都是不靠谱的。攻克了亚喀巴固然重要，但现在必须尽快将消息送到英军那里，让他们快速送来补给和援兵。

次日，劳伦斯在仅仅8名战士护卫下，动身前往埃及方向，希望能够在一切都太晚之前穿越亚喀巴和苏伊士运河的英军防线之间的150英里沙漠。

---

[1] As related by Wilson to Clayton，May 2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6，f. 113.

[2] Wingate to Wilson，July 2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35.

[3] 劳伦斯对他前往和占领亚喀巴的记述见*Seven Pillars*， book 4，chapters 39-44，pp.227-312。

[4] 当时1枚沙弗林金币的面值是1英镑。

[5] Sykes to Wingate，May 23，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1b，p.3；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in 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4，f. 329.

[6] Sykes to Wingate，May 23，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1b，p.5；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 in 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4，f. 330.

[7] Tanenbaum，*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pp.17-18.

[8] Wilson to Clayton，May 25，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p.5.

[9] Newcombe，“Note” on Sykes-Picot meeting with King Hussein，May 20，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9.

[10] 尽管赛克斯矢口否认，但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在1917年5月他与侯赛因国王的会议上，他没有向国王透露《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件。一直到1918年，西里尔·威尔逊和其他与侯赛因会晤的英国军官都报告称，国王对《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阿拉伯“国家”的分割并不知情，而仍然认为，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规定的远为慷慨大方的框架依然有效。仅从此处的例子看，假如侯赛因事先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巴格达省的处理方案，他绝对不会同意将巴格达与黎巴嫩等同起来。Tanenbaum指出（*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p.17）：“一位起义领袖居然请外来势力来吞并自己为之奋斗和希望统治的领土，是说不通的。”

[11] McMahon to Hussein，October 24，1915，as cited by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p.420.

[12] Report by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Foreign Office，“Memorandum on British Commitments to King Husein［sic］，” December 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3，p.7，f. 225.

[13] “Note by Sheikh Fuad El Khatib taken down by Lt Col Newcombe，” undated but May 1917，p.3；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f.133.

[14] Wilson to Clayton，May 2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f. 111.

[15] Faisal Hussein，“To All Our Brethren— The Syrian Arabs，” trans. May 28，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 Papers，145/7/89.

[16] Clayton to Sykes，July 30，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 Papers，693/12/30.

[17] Wilson to Symes，June 2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f. 127。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侯赛因国王和费萨尔，而不是马克·赛克斯，隐瞒了他们在1917年5月会议的实质。在*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一书中，以赛亚·弗里德曼完全接受赛克斯的说法，称（p.206）在他们5月初那次初步会议上，“赛克斯解释了英法协定的情况，让费萨尔放下心来，打消了疑虑……5月5日与侯赛因的会晤进展同样顺利”。在弗里德曼看来，赛克斯的唯一错误就是没有把他和皮科后来与侯赛因的会议作一个私人的记录。“由于这个失误，”弗里德曼写道，“赛克斯在一年后付出了代价，那时，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侯赛因假装对英法协定一无所

知，自称是从杰马勒帕夏的大马士革讲话中第一次得知协定的情况……”
不仅侯赛因的抗议，而且赛克斯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能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917年5月12日，也就是首次与侯赛因会晤的仅一周之后，赛克斯参加了在温盖特的开罗办公室举行的一次高级别战略会议。这次会议上，赛克斯详细描述了近3周前他和皮科与在开罗的所谓叙利亚“代表”达成的协议，却对几天前与侯赛因达成的、重要得多的协议只字不提。原因之一或许是，西里尔·威尔逊上校也参加了5月12日的会议，而他是英国在侯赛因身边的正式联络官，能够驳斥赛克斯的谎言。
至于赛克斯和皮科与侯赛因的后续会议，如果赛克斯对这些会议的描述是真实的话，斯图尔特·纽科姆和西里尔·威尔逊这两位职业军官就没有理由如此强烈地驳斥他了，毕竟那样他们二人在汉志的任务会轻松许多。

[18] Symes to Wilson，June 26，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f. 129-30.

[19] Wilson to Clayton，May 20，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 Papers，145/7/36.

[20] Lawrence，*Seven Pillars* ，pp.25-26.

[21] Lawrence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p.410 n. 40.

[22] Lawrence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p.410 n. 41.

[23] Lawrence，*Seven Pillars* （Oxford），Chapter 51.

[24]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46.

[25] Lawrence，*Seven Pillars* （Oxford），Chapter 51.

[26] Lawrence，*Seven Pillars* ，p.26.

[27] 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塞缪尔·埃德尔曼在1917年7月6日在伦敦的报告中称，被调往叙利亚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士兵的逃兵率是25%，其他忠诚度更低的部队的逃兵率肯定更高。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0。

[28] See 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0，File 47710.

[29] Prüfer，*Diary* ，May 21-July 18，1917；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30] Prüfer to Mittwoch，April 12，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 T149，Roll 365，Frame 399.

[31] Engle，*The Nili Spies*， p.129.

[32] 关于威廉·耶鲁于1917年返回美国的记述见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7。

[33] Yale，“Palestine-Syria Situation，” to U.S. State Department，June 27，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763.72/13450.

[34] Yale to Secretary of State Lansing，June 30，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48.

[35] Lawrence，*Seven Pillars*， p.306. For an account of the battle at Aba el Lissan，see also Lawrence，“The Occupation of Akaba，” undated；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63-68.

[36] See field reports of Herbert Garland，May 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686/6.

[37] Dawnay，“Notes on Faisal’s Proposed Advance Northward，” May 29，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06，f. 43A.

[38] Clayton to Director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London），July 5，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1.

[39] Lawrence，*Seven Pillars*， p.310.

第三部

第14章 狂傲

> 不要尝试亲手去做太多的事。让阿拉伯人自己去做，哪怕只做得马马虎虎，也比你自己去做得完美要好。这是他们的战争，你是来帮助他们的，不是来替他们打赢战争的。另外，在阿拉伯半岛非常奇怪的条件下，你的实践工作或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
> ——1917年8月，T.E.劳伦斯给英国军官的《二十七条建议》[1]

1917年7月10日早上，吉尔伯特·克莱顿在做一件比较沉闷的工作，即为伦敦的军事情报总管撰写阿拉伯战区的每周报告。在最近几个月里，他已经写了许多这样的报告，每次的变化非常小。像以往一样，他在备忘录前写道，“自我上次报告以来，汉志未发生重大事件”[2]，然后快速地列举了那些尚未执行的作战计划、本可以更大的小胜利以及浪费掉的机遇。

报告写完，被送出去交付电报室不久之后，一个身穿肮脏阿拉伯长袍的小个子走进了克莱顿的办公室。注意力被分散的将军以为此人是个前来阿谀邀宠的当地人，或是有进取心的行乞男孩，正要将他赶出去，却发现这个人脸上有着熟悉的歪嘴笑容和目光炯炯的浅蓝色眼睛。他是T.E.劳伦斯。

克莱顿让这位憔悴不堪的下属坐下，然后急切地询问，自劳伦斯两个月前进入阿拉伯内陆，从世人视线中消失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将军为自己的每周局势报告快速地添加了一句兴奋的话：“写

完上文，正要付邮时，劳伦斯上尉到了。他深入敌境，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旅程。”随后是对攻克亚喀巴，以及劳伦斯在叙利亚各地搜集情报工作的简要概述。“我还未能与劳伦斯讨论他的旅程，因为他刚刚抵达，而且在最近30天内骑骆驼跋涉了1300英里，已经精疲力竭……但我认为，你们会对上述的概况感兴趣。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胜利，需要极大的勇气、智谋和耐力，甚至在英雄辈出的今天，也算得上惊人的壮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劳伦斯前往开罗途中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通过英军战线[3]。他和一小队卫兵从亚喀巴仅仅花了49个小时就抵达了苏伊士运河东岸，却发现那里的英军哨所空无一人（他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地爆发了霍乱）。他找到了一台可用的野战电话，多次打电话要求河对岸的陆军渡船办公室派遣一艘船来接他，但每一次都被挂断了电话。最后他打通了一位在沃季赫见过他的后勤军官的电话，终于等来了一艘汽艇。

此时自劳伦斯从沃季赫出发恰好是两个月。到了安全地带，他终于支撑不住，仅剩一点点力气，拖着脚步来到了西奈饭店的苏伊士港军官招待所。他写道：“饭店服务员起初对我的外表和衣服非常敌视，终于克服了这种恶感，为我准备了热水澡、冷饮（六瓶）、晚餐和我梦寐以求的床铺。”

他不得不忍受的折磨持续到了第二天。在乘火车前往开罗的途中，光着脚，还穿着破破烂烂的阿拉伯长袍的劳伦斯不断被宪兵拦下盘问。在伊斯梅利亚的火车站月台，他的运气才有所好转。一位在穿越红海的军舰上见过他的英国海军高级军官认出了他。这是一次幸运的邂逅；开罗的军队高层很快得知了亚喀巴的新进展，当天下午，第一批补给和援兵就被匆匆送往起义军控制下的港口。

在伊斯梅利亚的月台，劳伦斯还得知了自己不在期间发生的一个重

大事件。在第二次加沙战役失败之后，阿奇博尔德·默里被免去了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的职务。接替他的是一位名叫埃德蒙·艾伦比的骑兵将军，不到两周前来到开罗上任。起初，这个消息让劳伦斯非常气馁。他本人、克莱顿和阿拉伯局的其他所有人花了几个月时间，费了很大工夫才部分地将焦躁易怒的默里争取到支持阿拉伯起义的阵营来。现在他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劳伦斯设想一定还要花几个月时间来教育埃德蒙·艾伦比。

但抵达开罗之后，劳伦斯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他的英雄业绩已经在英国军方高层传播开了，令大家心潮澎湃。在加沙战败、汉志僵局和欧洲不断传来的噩耗（协约国在西线的又一次攻势惨遭失败、法国军队发生哗变、俄国政府正在垮台）之后，终于来了点真正的好消息，而且是英国人的勇敢无畏的绝佳例证。除了攻克亚喀巴的方式本身非常神奇之外，占领了这座港口就意味着阿拉伯战争的前线突然间向北方猛跳了250英里，进军叙利亚的任务也一下子简单了许多。

但奇怪的是，让英国同胞们最为振奋、为劳伦斯赢得最多赞誉的却是他的一项比较次要的功业，即在叙利亚腹地的漫长而艰辛的旅途。部分原因肯定是它给人一种非常浪漫的印象，这在英国军事传统中有很多先例：单枪匹马的冒险家（其实劳伦斯不是单身一人，而是有两名侦察兵陪伴）乔装打扮深入敌境，敌人对他悬赏缉拿；他秘密地会见潜在的密谋者，每一步行动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背叛，遭到毒刑拷打，丢掉性命。雷金纳德·温盖特建议向劳伦斯授予英国最高等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一定主要是出于上述理由。温盖特指出，让劳伦斯的功绩“愈显英勇无畏”[4]的是，土耳其人悬赏相当于5000英镑的金钱来缉拿他，而且他的行动是在“利欲熏心的人群”中执行的。

如前文所述，劳伦斯对这次长途跋涉的重要性大加贬抑。事实上，他对此次行动的仅有的描述就是抵达开罗之后撰写的措辞含糊的4页报

告。但他始终是个策略家，因此显然认识到，官方对他的叙利亚冒险的认可和赞誉是一件强大的工具，可以帮助他继续推动自己的目标。在被引见给埃及远征军新任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之后，他灵巧地使用了这个工具。

1917年，英国军队中存在着复杂的礼节规范。所以，很难想象会有比7月12日在开罗司令部举行的会议更不像话的了。埃德蒙·艾伦比因脾气火爆而得到了“血腥公牛”的绰号，他身材魁梧雄壮，体格貌似拳击手，只略有衰老迹象，即便在不穿将军礼服的时候也是威风凛凛。坐在他对面的是幽灵一般的T.E.劳伦斯上尉，在健康的时候体重或许有135磅，但由于沙漠征途的艰苦，现在体重下降到了不到100磅[5]。他身穿白色阿拉伯长袍，头戴头巾，据他自己说，当时还没有穿鞋（这不大可能是真的）；劳伦斯说他的军服在远离开罗的长时期中被蛾子咬坏了，还没有时间找一套新军服来换。

劳伦斯肯定知道艾伦比的战争生涯，也知道他经历过一些盛衰沉浮。1914年8月，在蒙斯战役中，英军败退，艾伦比命令他的骑兵团坚守阵地，抵抗一支兵力远远超过己方的德军部队，以掩护遭到围困的英军主力部队有秩序地撤退。碰巧的是，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时任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阿奇博尔德·默里在一个中央指挥所督导英军的撤退，由于压力过大而昏倒。但在最近，艾伦比的将星黯淡了不少。在阿拉斯战役中，他行动迟缓，未能抓住机会利用德军战线上的缺口长驱直入，遭到了批评。在这场战役中，英军只前进了2英里，却损失15万人，因此他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和默里一样，艾伦比是被贬黜到埃及来的，然而这种贬黜让默里小心谨慎到了举棋不定的程度，但劳伦斯感到，艾伦比或许会有非常不同的反应。当天下午，在将军的办公室内，他描绘了一幅雄心勃勃的美丽图景，阐述了阿拉伯起义军现在有可能取得的成就。他解释说，

只要能够快速加强亚喀巴，将其作为主要集结地，阿拉伯人就能终于将战火烧到叙利亚腹地，而且还不是小打小闹。按照劳伦斯的说法，现在终于有机会在整个叙利亚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劳伦斯对自己在叙利亚刺探情报活动的报告过于简略，于是画了一张小地图，作为补充材料，向将军解释自己的计划。这份地图描绘了多达七支潜在的阿拉伯部队在叙利亚全境各地袭击土耳其人，最西一直到黎巴嫩海岸，最北到大马士革以北100英里处的霍姆斯和哈马。他在地图附文中谨慎地表示“战局完全按照计划发展的机会是非常小的”[6]，但劳伦斯的蓝图中哪怕只有一部分成为现实，部署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的土耳其军队主力也会被困住手脚，不能前进，甚至不能轻易撤退。

但有个问题。劳伦斯告诉艾伦比，这场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要想成功，就需要英军同时在巴勒斯坦南部取得突破。一旦英军取得突破，两支军队就可以一前一后地协力北上，阿拉伯非正规军切断汉志铁路，袭扰叙利亚东部各个驻军城镇中的土耳其部队，同时英军在内陆一侧的侧翼得到阿拉伯人的保护，可以进军西海岸。根据劳伦斯的计划，甚至速战速决地拿下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还有一个小问题。将在这支阿拉伯攻击部队中担任主力的战士是叙利亚东部的贝都因人，他们的传统是每年秋季要向更东方跋涉，为骆驼寻找更好的草料，所以就会离开战区。劳伦斯解释说，如果要利用这些关键的战士，行动不能迟于9月中旬发起，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时间。[7]

劳伦斯对自己的这个夸张的设想究竟相信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就算他因为最近在亚喀巴的胜利而春风得意，他也始终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不会设想一直困扰着阿拉伯起义的惰怠和部落间的争吵会一下子烟消云散。他对英国军方也有足够的了解，必然知道它一向动作迟缓。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提出这个宏伟计划，是为了将英军新任总司令——

他对该地区事态发展的缓慢还一无所知，而且在阿拉斯的挫折之后急于恢复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拉到自己这边，去支持自己设想的阿拉伯—英国联合解放叙利亚的计划。当然，由于劳伦斯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所以艾伦比必须尽快决定，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

但就算他这是在虚张声势，又有谁能抓得住他的破绽？T.E.劳伦斯现在是开罗的名人，管理阿拉伯部落的魔法师，还是唯一一位亲自与阿拉伯人在叙利亚境内的潜在第五纵队有过接触的英国军官。就算他知道这些潜在的合作者不可能在两个月内准备好起义，但别人是不知道的。他私下里知道，英军肯定会耽搁延误，搞乱时间表，所以阿拉伯人远远没有准备好这个秘密就不会昭然天下，同时他已经缔结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和互相依赖的关系。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几乎承认了自己的把戏："艾伦比判断不出，我有多少成分是真诚的，又有多少成分是在夸大其词。问题在于，我把他蒙在鼓里，于是我让他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劳伦斯的表演大获全胜。会议结束时，将军抬起下巴，宣布："好，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

艾伦比在劳伦斯面前还保持低调，但对上级——包括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将军，英国战争努力的总体协调人——就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洋溢。他在7月19日向罗伯逊发电报称："鄙人愚见，劳伦斯上尉建议的阿拉伯人的合作能够带来极大好处，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从中得益……如果执行顺利，这样一次运动，再加上我军在巴勒斯坦的攻势，或许能够导致土耳其军队在汉志和叙利亚的垮台，并造成在政治和军事上极其深远的影响。"艾伦比对这个计划极其重视，甚至转达了劳伦斯的担忧，即如果耽搁下去，东部贝都因人就会去寻找秋季牧场，因而脱离战斗。"因此，我需要做好准备，以我手中目前可动的兵力在9月中旬

发起行动。”[8]

罗伯逊是个坚定不移地主张在西线决胜的人，因此不愿意在东线大操大办，但就连他也很快被说服了。在7月，开罗和伦敦之间电文来往不断，罗伯逊最后许诺立即给艾伦比增兵5万，用于即将开始的巴勒斯坦攻势。这是阿拉伯起义的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点。仅仅在两个月前，起义军还被阿奇博尔德·默里视为敲边鼓的讨厌鬼；现在他们却能左右英军在巴勒斯坦下一次攻势的时间表。

但阿拉伯人和英国人之间新近加强的联盟也意味着政治战场上发生了变化，艾伦比将军或许认识不到这个变化，或者对它不感兴趣，但T.E.劳伦斯却肯定是心知肚明、兴趣盎然。前不久，英军高层还在考虑如何将阿拉伯起义军在叙利亚的角色控制到最小，以便满足法国盟友的利益要求。现在，英国军方采纳了艾伦比的计划——实际上是劳伦斯的计划，完全无视法国人的意见，最终使得《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整个框架能否执行下去都有了疑问。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目前，对劳伦斯丰功伟绩的赞颂仍然从各个方向蜂拥而来。尽管他不符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要求（要求之一是，受勋者的英雄业绩必须有另外一个英国人目睹，作为证人），但他很快被晋升为少校，并被提名为巴斯三等骑士，这是下级军官有资格获得的骑士爵位中最高的一级。

这位新晋名人在8月初被要求写下自己与阿拉伯人合作的心得体会，帮助那些被派往汉志的英国军官，与他们分享在这个领域成功的秘诀，毕竟其他很多人在这个领域都遭遇了令人心碎的绝望。他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二十七条建议》。他的某些建议是常识，但有一些在他的学生们看来一定非常新奇。“在汉志长大的奴隶是最好的仆人，”他建议道，“但有法律规定英国公民不能蓄奴，所以只能去借奴隶。无论如何，在乡间活动时最好带上一两名阿格伊尔族人。他们是阿拉伯半岛最

高效的信使，而且非常懂得骆驼。”[9]

劳伦斯给他的读者们最重要的建议是：抛去自己的英国习惯，完全地沉浸到当地环境中去，要熟悉“当地的家庭、氏族和部落、朋友和敌人、水井、山丘和道路”。

在1917年狭隘保守的英国军事文化中，《二十七条建议》有着启示录一般的强大力量，甚至到今天仍然有着深远影响。2006年，美国在伊拉克开展军事行动，美军总司令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就命令他的高级军官们阅读《二十七条建议》，以学习去赢得伊拉克民心。美国军官们似乎忽略了劳伦斯的开篇告诫，即他的建议仅适用于贝都因人——占伊拉克总人口的约2%，而与阿拉伯城镇居民打交道“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

亚伦·亚伦森和伊恩·史密斯上尉的关系一直算不得亲密。史密斯是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与以塞得港为基地的间谍船之间的联络官。从他第一次见到亚伦森起，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间谍网的鄙视。从这个不吉利的开端起，史密斯——农学家说他“始终是个白痴”——想尽办法，以或大或小的手段来羞辱亚伦森及其盟友，似乎英国人给犹太间谍们帮了一个天大的忙，而不是刚好反过来。

虽然过去忍受了不少侮辱，但亚伦森还是没想到会发生7月1日的事情。亚伦森抱怨了史密斯对一名阿拉伯局军官的不公待遇，史密斯显然恼羞成怒，刻薄地告诉NILI组织的领导人，他在巴勒斯坦的间谍“一文不值。让其他人干，会好得多”[10]。

让这个插曲特别令人愤怒的是，就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大大增加了NILI组织的工作量，而且远远不止情报搜集工作。在5月的“雅法遭洗劫”故事传播开之后，国际上有人募集捐款，以援助犹太受害者。如何将这些款项送给巴勒斯坦境内需要帮助的人呢？英国当局中有人想到了

显而易见的答案：NILI组织。那么，既然NILI组织的间谍可以在巴勒斯坦各地分发救援款，为什么不能顺带传播宣传材料呢？他们在闲暇时间搞一些破坏袭击活动又如何呢？6月初，英国当局计划将炸药偷运到阿特利特，让NILI小组炸毁约旦谷地中一座关键的铁路桥。为了这个目的，亚伦森在埃及的主要副手利奥瓦·施内尔松正在开罗郊区的一个英国陆军试验场接受爆破训练。

亚伦森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国人向他的组织提出的这些新要求，认为这是得到英国人支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让伊恩·史密斯的侮辱实在无法忍受。在与史密斯争吵的第二天，他告诉自己在阿拉伯局的朋友，由于东地中海特别情报局目前在巴勒斯坦有其他更好的工作人员，“我已经没有权力让我的人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工作”[11]。因此，他决定解散NILI组织。

但亚伦森在这个夏季感到自己遭到了冷遇，还有其他原因。核心问题是，他一直未能澄清，自己在开罗的地位究竟是什么，他的组织在更大的计划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4月和5月，亚伦森会见了马克·赛克斯，得知这位英国政治家正在伦敦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两位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和纳胡姆·索科洛夫紧密合作。事实上，赛克斯在开罗期间曾敦促魏茨曼到埃及来亲自领导那里的犹太复国运动，但是魏茨曼未能成行，于是任命亚伦森为魏茨曼在当地的“代表”[12]。亚伦森并不认同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较为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但出于对赛克斯的尊重，他接受了这个安排，然而后来一直没有听到魏茨曼或索科洛夫的消息。他的地位仍然含糊暧昧，他自己从犹太复国主义联盟获取指示的努力又徒劳无功，于是在他与史密斯撕破脸皮的前一天，他请求吉尔伯特·克莱顿去找马克·赛克斯谈谈这事。但这一次仍然没有结果[13]。

被蒙在鼓里的亚伦森并不知道，他所珍爱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其实

在伦敦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展，主要是归功于哈伊姆·魏茨曼的不懈努力，尽管魏茨曼没有与亚伦森联络。

推动英国政府公开宣布支持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努力在最近经历了很大的革新。在过去，魏茨曼曾强调，这样的宣言能够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产生很大影响，让这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士敦促美国政府结束中立状态、站在协约国一边干预欧战；显然，自美国参战之后，这种论点就失去了很多效力。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的另一个论点是，这样的宣言能够促使俄国犹太人团结在主张继续参战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政府周围；但现在俄国国内局势越来越混乱，克伦斯基的问题远远超过犹太人的支持能否产生很大影响这一问题。但在6月初，魏茨曼找到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论点，这要感谢同盟国。

6月12日，魏茨曼向英国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罗伯特·塞西尔解释说，近几个月以来，他听到了一些传言说，德国政府在试图拉拢德国犹太人团体的领导人，让他们作为中间人来进行和谈。魏茨曼早就断定这只是谣言而已，但最近这些传闻有了很大说服力。他告诉塞西尔，德国犹太领导人事实上在积极地考虑去做这个工作，条件是德皇政权要满足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要求。最近，德国报纸上突然多了一大批支持犹太人家园的文章，说明德国政府显然是在斟酌这个问题。[14]

如果这些传闻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那么局势就是很清楚的——如果英国人不尽快打起犹太人家园这张牌，德国人肯定会。罗伯特·塞西尔的反应很快。他会见魏茨曼的第二天就向上级查尔斯·哈丁勋爵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毫无疑问，德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塞西尔写道，“已经下达命令，要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中欧各帝国政策中的一个主要政治因素。”他估计，这种政策政变的目的是影响国际犹太人的意见，“利用它来帮助德国反对协约国的宣传”。[15]

塞西尔解释说，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他最近的访客提出了一条大有助益的建议。“魏茨曼博士强烈敦促，国王陛下政府应当公开表达对犹太复国主义主张的同情和支持，并公开承认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主张的合乎公义，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好事。”

6月，英国外交部不断听到可能出现一个德国支持下的犹太国家的警钟，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高官赞同魏茨曼的建议。

亚伦·亚伦森不知道这些情况，那些匆匆努力消除史密斯上尉在7月1日言论的恶劣影响的阿拉伯局官员们也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只是在努力挽救英国在巴勒斯坦最重要的间谍网。

为了再次向亚伦森表达敬意，英国当局很快邀请他去见埃及远征军的新任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他们的会面是在7月17日，也就是艾伦比与T.E.劳伦斯会谈的五天之后。在闲适的会谈中，亚伦森为将军介绍了关于巴勒斯坦的五花八门的话题，从农业条件到土耳其驻军的战斗力，甚至描绘了杰马勒帕夏（“擅长阴谋诡计，非常狡猾”）[16] 和德国指挥官的性格特征。“总司令兴致盎然地听着，”亚伦森记述道，“提了一些很聪明而且非常到位的问题。我对他印象极好。”

在与艾伦比会谈后喜悦的气氛中，亚伦森或许感到自己终于受到了开罗英国当局的重视。但话又说回来，在之前的7个月里，他也时常有这样的感觉。问题在于，英国人永远在保持所有选项的畅通，不愿意给任何人一个正面或负面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所以根本不存在“受重视”这样的事情。英国人避免真心实意的拥抱，而仅仅是谨慎地拍拍对方的后背表示友好。伦敦关于公开宣言支持犹太人家园的密谋，以及英国政府内部对这个宣言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普遍焦虑都让亚伦森的困境愈发复杂。因此，英国人的目标是让亚伦森开心，但不给他确定的回答，既要鼓励他努力，又要对他们的最终奖赏保持谨慎，维持着这样的微妙平衡。

幸运的是，英国人有一位干这种事情的行家里手——雷金纳德·温盖特。温盖特在得知政府对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最近的尝试性提议之后，在7月23日给一位高级外交官的信中写道："我的理解是，事情绝没有板上钉钉，你希望我让亚伦森满意，但又不能跟他把话说死。已经办好了。"[17]

7月16日，英国运兵船"达弗林"号接到命令，在苏伊士港待命，以便送一位重要官员沿红海海岸南下，前往吉达。次日早上，28岁的T.E.劳伦斯悠闲地走上跳板，船员们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这位贵客。就在8个月前，劳伦斯走上了延布港的另一艘海军军舰的跳板，却因为衣衫不整和态度傲慢而遭到严厉训斥。

他将在吉达执行的使命也能说明，在攻克亚喀巴之后，他的地位已经一日千里。劳伦斯在与艾伦比和克莱顿这两位将军讨论时，强调了（或许是夸大了）叙利亚人对费萨尔·伊本·侯赛因长久以来的极大尊重[18]。他解释说，叙利亚人将费萨尔视为阿拉伯人的最高军事长官，因此只有在他旗帜下才会发动起义。就像这年7月劳伦斯在开罗的大多数其他言论一样，他的上级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他的这个论断，于是它简单地成为推测（争夺叙利亚的战役打响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一部分。

劳伦斯看到了扩大战果、更进一步的机遇：全面协调阿拉伯—英国在叙利亚的联合攻势，而且并非巧合地，将阿拉伯人事业的命运与英国军队的命运牢牢捆在一起——何不将费萨尔和他的部队直接配属到艾伦比司令部的麾下？劳伦斯的这个主意在开罗很快得到批准，但他还必须越过一个潜在障碍：侯赛因国王。汉志国王素来以暴躁易怒闻名，而且非常小心地控制着起义运动的领导权，他很可能会当场拒绝这个建议。但他也许会听从费萨尔最信赖的英国顾问和"亚喀巴的英雄"的意见。很快，劳伦斯就登上了"达弗林"号，去会见侯赛因。

但前往吉达的使命只是这位年轻上尉对英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新的极大影响力的最显而易见的标志。在幕后，劳伦斯已经打好了基础，要对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军事存在进行大规模重组，并且是按照他的意愿来重组。他在《智慧的七柱》里相当厚脸皮地解释说，他是这样向吉尔伯特·克莱顿论证的：“我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行动，占领了亚喀巴。如果他感到我挣得了自行决断的权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有能力做到。”[19]

克莱顿与劳伦斯一起在开罗的一周里，同意了这位下属的大多数建议。汉志的战争实质上已经结束，尽管土耳其人还控制着麦地那，却丧失了全部进攻能力，于是在伍拉封锁汉志铁路的漫长而无益的行动终于可以结束了。出于同样的理由，起义军在沃季赫的主要基地也可以关闭了，当地的阿拉伯部队和英国后勤军官都可以转移到亚喀巴。劳伦斯扮演起了将军的角色，对将留在汉志的阿拉伯部队的部署作了规划，还制定了一份将要保留、重新部署或者调走的英国陆军人员的名单。劳伦斯还大胆地要求将亚喀巴的总体指挥权交给他，遭到了克莱顿的拒绝，后者指出，让一名下级军官对上级指手画脚不是英国军队的做法。他们一起决定，让西里尔·威尔逊的一位副手皮尔斯·乔伊斯少校担任亚喀巴的指挥官，此人生性随和、没有野心，不大可能妨碍到劳伦斯。

但劳伦斯在吉达与威尔逊上校的重逢最能彰显劳伦斯地位的变化。8个月前劳伦斯首次造访阿拉伯半岛之后，威尔逊恼火地对克莱顿说，这个傲慢的下级军官“需要教训一顿，而且是狠狠教训一顿”，并且曾试图阻止劳伦斯重返阿拉伯半岛，哪怕只是暂时的。但到了1917年7月，上校却将劳伦斯（他正在被晋升为少校的过程中）视为盟友，或许还是在汉志执行任务的最重要的英国一线军官。

就在劳伦斯抵达吉达之前，威尔逊收到了克莱顿的一份备忘录，概述了他正在考虑的对该地区人事的大规模洗牌，并且很有针对性地指

出，他这些想法是“咨询了劳伦斯上尉的意见”后形成的。这个细节让这份备忘录的一个特点显得非常突出：它完全没有提到斯图尔特·纽科姆，他仍然是英国驻汉志军事代表团的正式团长。

劳伦斯在中东能得到这样的地位，最应当感谢的人就是斯图尔特·纽科姆。但在劳伦斯冷静而不带感情色彩的想法中，战争就是战争，不管他对自己的恩师多么感激，也不能影响作战。纽科姆在汉志的任职颇有争议，他始终不能适应阿拉伯人神秘的作战方式，在很多报告中痛苦地抱怨了他们的纪律涣散和不可靠。劳伦斯抵达吉达后向西里尔·威尔逊解释道，上级已经决定，将纽科姆撤出前线，送到后方工作，实际上就是被贬黜了[20]。威尔逊虽然吃惊不小，但表示了默许[21]。

当晚，劳伦斯和威尔逊觐见了侯赛因国王。这是劳伦斯第一次拜见国王，感到国王魅力十足、风度翩翩。或许是因为侯赛因很快同意将费萨尔及其部队交给艾伦比直接指挥，劳伦斯才对他有了这么好的印象。

第二天却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侯赛因传唤劳伦斯到他位于吉达的宫殿，单独会谈。国王直截了当地（这不太像他的性格）提出了一个让他非常痴迷的话题：他在5月与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的会晤。

尽管当时的会议上究竟同意了哪些东西，又没有同意哪些东西，在英国政府的某些部门仍然存在争议，但由于其他事件的快速发展和紧迫感，这次会议的意义已经大大缩水。像西里尔·威尔逊这样持有异见的目击者以礼貌的口吻、隐晦的言辞暗示说“可能存在误解”，这肯定也促使这次会议的效果消散不少。劳伦斯不会使用这种礼貌的口吻。威尔逊用很多页纸拐弯抹角地说明的问题，劳伦斯只用了不到1页纸。他在第二次面见侯赛因之后在电文中告诉克莱顿：“主要问题是，他（侯赛因）完全拒绝允许法国人吞并贝鲁特和黎巴嫩……他非常高兴能够诱骗皮科先生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将满足于享有与英国在伊拉克相同的地

位……最后，谢里夫指出，与赛克斯和皮科的会谈非常简短，不正式，缺少书面文件，而且这次会议对局势造成的唯一变化就是，法国人放弃了对叙利亚任何部分吞并、永久性占领或者控制主权的想法。”[22]

不知道是由于这份报告非常简短，还是因为它的作者新近美名远播，几天之内，这份报告就被送到了英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办公桌上。它立刻重新激起了关于英国在中东许下的互相矛盾诺言的大网以及马克·赛克斯在编织这张错综复杂大网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辩论。

但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还在吉达的时候，开罗传来消息称，据可靠情报，劳伦斯在亚喀巴战役中的主要伙伴奥达·阿布·塔伊正在秘密地与土耳其人商谈，要改换阵营[23]。劳伦斯当场的反应是为奥达辩护，说或许这是奥达的计谋，要引诱土耳其人懈怠下来。但劳伦斯内心里显然不是那么有把握。几个小时后，他就登上了前往亚喀巴的船，去与奥达当面对质。

劳伦斯骑着一匹快捷的骆驼深入内陆，在谷维拉村外的一座帐篷内找到了霍威塔部落酋长和他的两位主要副手，情报显示，这两人也是潜在的叛徒。一连好几个小时，劳伦斯不动声色，像朋友重逢一样与他们欢聚，但后来邀请奥达和另外一名密谋者与他一起散步。他们单独在一起之后，他就拿自己听说的情况质问对方。“他们急于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他们的秘密行动的，”劳伦斯记述道，“以及我还知道多少东西。我们站在一座打滑的岩架上。”[24]

的确，在这座岩架上，劳伦斯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但他凭借自己甚至在这种雷场般的环境下仍然能与阿拉伯人妥善交谈的卓越本领，进行了一番复杂的表演——同情、恭维和嘲讽融为一体——首先让他们放下戒心，然后将他们争取回到起义军阵营来。回到亚喀巴之后，劳伦斯向开罗发电报称，奥达的事情“纯属误会”，现在一切都“绝对令人满意”[25]。劳伦斯后来承认，自己经常在向开罗报告关于阿拉伯起义

及其领导人的情况时扭曲事实，但说这都是为了大家的好处。“英属埃及自己勤俭节约，维持我们的生命，不适合让它知道的真相就不必说出来了，我们必须让它满怀信心，让我们自己始终是个传奇。观众们需要书上的那种英雄。”[26]

劳伦斯就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很好地迎合了观众，满足他们的需求。

威廉·耶鲁的威尔士祖先的问题搞清楚之后，他就开始和英国驻美国大使谈起正事。

耶鲁很可能对塞西尔·斯普林—赖斯能帮他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不抱多少希望。毕竟英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专门针对中东的庞大的情报机构。但威廉·耶鲁非常精明地知道，他有一样东西，是其他人很少能够提供的：在石油界的关系。在此前的四年中，他勘察了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寻找潜在的油田。通过公司的备忘录，他还知道他的公司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哪些地方在寻找石油开采特许区，或者已经获得许可。在战后的世界里，占领这些地区的国家会不会承认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开采权，鬼才知道。如果占领这些地区的国家已经公开宣布未来的石油勘探和开采事关国家安全——英国就已经如此宣布——那么它完全可能对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权利主张置之不理，而安排自己的一家国有财团来开采石油。如果那样的话，假如有一位曾经看过现存地图和地质勘探报告的人，就能节省许多时间，省去诸多麻烦。

斯普林—赖斯大使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对这位年轻的访客非常感兴趣，于是要求耶鲁留下一份他写的关于叙利亚局势的报告。耶鲁第二天就送来了报告，还附加了一份两页的补充文件，记录了德国在耶路撒冷所有主要军事设施的位置，并在地图上准确标注了这些地点[27]。

耶鲁的叙利亚报告没有引起美国官员的兴趣，但英国人的反应截然

不同。大使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向外交大臣贝尔福发送了一份副本，很快就得到了伦敦方面的答复。秘密电文指示，如果威廉·耶鲁能够从美国陆军部获得免于入伍的许可，斯普林—赖斯应向这位29岁的石油商人提供英国陆军中尉的军衔，“随后安排到埃及担任情报军官。他的信息肯定非常有价值。请采取必需措施，以电文报告结果”[28]。

现在美国和英国是战时盟友，所以从陆军部获得免于入伍的许可应当只是个手续问题。但结果却证明，在威廉·耶鲁身上，这不仅仅是个手续问题。这是因为，他的叙利亚报告在国务院搁置了超过一个月没人读之后，终于被送到了一个对其内容非常感兴趣的人桌上。这个人叫作利兰·哈里森，是国务卿特别助理。

哈里森时年34岁，有与耶鲁相似的北方富豪背景。他在伊顿公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随后加入美国外交部门，在一些最重要的美国海外使团中担任了一系列职务。1915年，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将他带到华盛顿，于是他的飞黄腾达就确定无疑了，因为他很快就赢得了兰辛最信赖的得力干将的美誉。

兰辛和哈里森都是铁杆的亲英派，因此对伍德罗·威尔逊毫不动摇地坚持美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颇为不满。兰辛对哈里森高度信任的另一个原因无疑是这位副手高度的谨小慎微。国务院的一位职员曾说利兰·哈里森是“我知道的最神秘莫测、口风紧实的人……他简直是个斯芬克斯，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我不得不努力支棱着耳朵去听”[29]。

在美国参战之前，兰辛是威尔逊政府内部一个影子政府的领导人，这是个秘密集团，在悄无声息地努力让美国参加到协约国那边，干预欧战。在这个密谋中，哈里森的谨慎发挥了很大作用。兰辛在1916年组建了一个叫作秘密情报局的组织，这也表明了他的集团的秘密程度。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希望能够找到德国背信弃义的证据，那样就能使干预欧战的理由不可阻挡，于是他们对居住在美国境内、来自同盟国的外交官

和商人进行监视。这种活动显然违反了威尔逊的公开誓言（即要严守中立），如果东窗事发，必然还会激怒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门。但其他部门对此一无所知。兰辛组建秘密情报局的资金来自国务院可自行支配的款项，所以能让它运作下去，而国会，甚至威尔逊内阁的大多数其他成员都未对其予以批准，甚至根本不知情。兰辛将利兰·哈里森从国务院的拉丁美洲部门调来，让这位年轻的弟子主管这个“法律界限之外”的新机构，负责主持“秘密信息的收集和检查” [30] 。

虽然在美国参战之后，国务院内部的这种密谋没有必要了，但它为哈里森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先例。他读到威廉·耶鲁的叙利亚报告之后，感到美国需要在中东有一个自己的情报机构。但问题在于，这种事情超越了现存的国内情报局的职权范围，而且美国与土耳其并非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也不是军队情报部门能管的事情。解决方案就是把耶鲁拉进秘密情报局；于是，8月初的一天，耶鲁被传唤到了国务院。

在这次会谈中，哈里森提出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提议：耶鲁将重返中东，担任国务院的“特工”。他的年薪是2000美金，外加报销开支，任务是观察和汇报美国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兰·哈里森）可能感兴趣的一切信息。耶鲁将以开罗为基地，每周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向华盛顿发送报告，这些报告随后被送到哈里森那里。耶鲁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8月14日，由国务卿兰辛签字批准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驻中东特工。

前往奥尔德溪与家人短暂团聚后，耶鲁于8月29日在纽约港登上“纽约”号，开始了又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途。在前往开罗途中，他将在伦敦和巴黎逗留，探探直接参与中东事务的那些英法官员的口风。哈里森发给美国驻伦敦大使的电文称：“耶鲁将向我们汇报近东局势，若有必要，还可以去进行实地调查。英国当局知道他，而且对他印象不错，还曾向他提供军职。请尽你所能，帮助他与相关机构取得联系。” [31]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已经很难完全理解美国于1917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多么乡土气和褊狭的国家。它的常备军是德国军队的1/20，甚至还不如欧洲的一些小国，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葡萄牙。1917年，国务院在华盛顿的整个总部只占据了一栋六层楼房（在白宫隔壁）的一翼，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指挥机构也在这栋楼里办公。

除了这些例子之外，以下这一点或许更值得注意：在战争的余下岁月里，美国在中东的全部情报工作——包括分析军事战略和地区性政治策略、会见未来的国家元首、搜集不利于敌国和友邦政府的秘密——将由一个年仅29岁的青年完成，而且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外交或情报工作的训练。威廉·耶鲁自己还能想出自己的其他一些缺陷："我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我不懂历史哲学，不会阐释解读，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根本性特征和功能了解甚少。"[32]

但这一切都并没有让他感到过分的焦虑不安。这是敢干肯干的美国精神的例证，威廉·耶鲁具有在他的同胞当中很普遍的信念，即无知和缺乏经验或许其实是个长处，因为它们可能会激发出"原创性和大无畏"。如果的确如此，他很可能会成为中东的一支重要力量。

亚伦·亚伦森和T.E.劳伦斯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2月1日。这次会面给双方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有亚伦森在日记中一笔带过地说，他发现劳伦斯上尉知识丰富但非常狂妄自大。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是在这一年的8月12日，两人都将长久不忘。在此期间，两人都成了开罗的重要人物，劳伦斯因他在阿拉伯半岛的功业而闻名，亚伦森则通过他的NILI间谍网为英国的战争努力做了很大贡献。当然，两人都因为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中东未来的观点而闻名。他们在阿拉伯局的谈话很快就演变成互相的敌视。

亚伦森在几周前写了一份颇具宣传鼓动性的文件，劳伦斯或许从中预知了谈话将会以何种基调进行。到1917年8月，英国官方支持在巴勒

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已经一步步快要变成现实，即便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较为激进的领导人也开始使用宽慰人心的和解的言辞：他们强调，无论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框架如何，犹太人将与阿拉伯和基督徒邻居和平共处，因为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土耳其人的压迫。

但亚伦·亚伦森却不肯说这样的安抚人心的话。在他的立场宣言中（这份文件后来被《阿拉伯公报》节选刊载），农学家大声怒斥“肮脏、迷信和无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公开承认犹太定居者有时用武力将阿拉伯农民赶走，并声称如果按照他的意思办，将来还要这么干。有人指控说，犹太人不与阿拉伯邻居交往，亚伦森回答道：“的确如此……我们为此很高兴。从民族、文化、教育、技术和仅仅是卫生的角度看，我们必须严格坚持与阿拉伯人隔绝的政策；否则整个犹太人复兴运动就会失败。”作为警钟长鸣的例子，他指出，罗什皮纳犹太居民点主张融入当地社会，所以教育上有很多缺陷，这都是由于“和未受教育的阿拉伯农民持续接触而对犹太青年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蚀后果”[33]。

最让主流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他们的英国支持者尴尬的是他对阿拉伯起义的评论。为了争取英国官方对犹太人家园的支持，以及预估到阿拉伯人对这个计划肯定会反对，从马克·赛克斯往下的英国官员都在努力诱导犹太复国主义者，让他们表示支持阿拉伯事业。哈伊姆·魏茨曼在伦敦领导了这轮大合唱，但在开罗，亚伦森却不肯参加进来。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阿拉伯起义没有兴趣，更没有信心，”他写道，“犹太人还无法揭竿而起、武装反抗土耳其人，而且就算有能力，也不愿意加入阿拉伯人。据我们所知，阿拉伯人利欲熏心，他们当中能够抵御贿赂诱惑的人还没有出生……为了帮助打败土耳其人，犹太人非常愿意加入英国军队，但能否信任阿拉伯人，还有很大疑问。”

自命为阿拉伯起义的西方捍卫者的T.E.劳伦斯听了这些话当然不会开心，但在两人的会谈中，亚伦森却几乎是刻意地继续向他挑衅。他解

释说，巴勒斯坦的最终未来并非一个英国保护国——作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在保护国内得到保护——而是一个事实上的犹太国家。实施的手段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会买下加沙和海法之间的所有土地，将阿拉伯农民赶走。劳伦斯的回应同样直截了当。他告诉农学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有两个选择：要么与多数派阿拉伯人共存，要么等着被割喉咙。

“这次会谈没有任何友好的气氛，”亚伦森在日记中非常轻描淡写地记述道，“劳伦斯年纪轻轻就取得了太大的成功，这对他没有好处。他自视过高。他对我高谈阔论，向我教导我们定居点的情况，以及人民的精神、阿拉伯人的感情，还有我们融入他们是件多么好的事情，诸如此类。听他讲话的时候，我简直可以想象自己在听一个普鲁士科学派反犹主义者的讲座，不过是用英语讲的……他公开反对我们。他肯定有传教士的血统。”[34]

但这么想的不仅仅是劳伦斯。当时还有很多人让亚伦·亚伦森感到恼火。虽然有许多英国军官的调解斡旋，他和亚历山大港反复国主义犹太人委员会的激烈争吵还是持续了三个月，并且继续暴风骤雨般地持续下去；而且在伦敦的哈伊姆·魏茨曼领导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仍然对他置之不理。亚伦森对伦敦方面对自己的不够尊重怒火中烧，在与劳伦斯会谈的几天之后给魏茨曼写了两封长信，抱怨自己受到的冷遇，并再一次威胁要解散NILI组织。他向雷金纳德·温盖特重复这个威胁时，后者向外交部发送了又一份忧心忡忡的电文。

“如果亚伦森先生马上得到他要求的支持，或许有助事态发展，”温盖特在8月20日给外交大臣贝尔福的信中写道，“军事当局非常重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组织，这是另一个不能疏离他的理由，你或许会看重这个理由。他有能力毁掉这个组织，而且在当前的情绪下，很有可能真的会这么做，除非我们向他的观点做一些妥协。他与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

者的分歧究竟是由于原则的问题，还是由于感情受到伤害，我无法判断。”[35]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亚伦森在开罗街头骑自行车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新主意：如果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肯向他澄清问题，他就自己去英国，迫使他们摊牌。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英国联络人时，他们都马上表示赞同，无疑是很高兴让NILI组织离很可能会摧毁它的这位创始人远一点。9月13日，亚伦森离开埃及，前往马赛。

科学家执迷于四面树敌的争吵，并且醉心于得到承认，却似乎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秘密间谍网的领导人，如此张扬的风险是非常大的。他似乎也忘记了那个旨在保护他在巴勒斯坦的家人和同志们的幌子：奥斯曼当局仍然以为，他是在前往美国途中被英国人逮捕的，现在应当在英国俘虏营里坐穿牢底。而现在开罗、伦敦和巴黎间传播的大量官方报告中却出现了他的名字。更糟糕的是，由于他和开罗的英国官员们的交往，以及他与亚历山大港犹太人委员会的持续口角，埃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NILI组织的存在。就算这些人都不会故意去伤害间谍网，但走漏风声到柏林或者君士坦丁堡也只是时间问题。

亚伦·亚伦森的家人也在保密工作上帮了倒忙。他的弟弟亚历克斯在纽约流亡期间曾为《大西洋月刊》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讲到自己逃离土耳其的经历；到1917年8月，这篇文章已经被扩充为一本书《与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现在开罗的书店都能买得到。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阿特利特在搞某种情报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萨拉·亚伦森非常招人耳目的旅行也能让人猜到，参与其中的是谁。7月，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人的一个代表团拜访了萨拉，要求她立刻停止她的“活动”[36]。这项最后通牒遭到了她的愤怒拒绝。

但责任最大的应当是负责管理间谍网的那些英国官员，他们是职业情报人员，本应做得更好才对。他们的漫不经心简直到了犯罪的地步

[37] 。正是他们想出了利用NILI组织来传播英国宣传材料、分发救援款的主意。亚伦森最终否决了传播宣传材料的建议，但同意了第二项要求。于是，7月中旬，第一批救援款以沙弗林金币的形式被送到阿特利特，NILI组织不再仅仅是输出情报，还输入违禁的黄金，因此被破获的风险加倍了。最让人惊异的是，英国人多次违反了管理间谍网的最基本准则，即一个单元不能与另一个有接触。以塞得港为基地的间谍船曾经有许多艘，但数量不断缩减，到1917年8月就只剩一艘“马纳杰姆”号来承担所有任务。这意味着，“马纳杰姆”号在一次旅程中可能搭载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多个不同情报网的人员，因此一旦有一名间谍被捕或者叛变，就有可能把其他所有人都暴露出来。

说到底，这一切都是由于英国人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一直困扰他们的那种人格缺陷，亚伦森家族也有这个缺陷：狂傲、轻敌。正如1914年以来不断发生的那样，他们很快就有理由后悔了。9月13日，也就是亚伦森起航前往欧洲的当天，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当局捕获了第一名NILI间谍。

这是劳伦斯最讨厌的那种商店职员一般的沉闷工作。到8月底，将亚喀巴从一个昏昏欲睡的渔港转变为阿拉伯起义前进基地的工作进展良好，每天都有一连串英国船只卸下成山的补给物资。这些船只还送来了成千上万的战士——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新兵、从费萨尔在沃季赫的老基地来的阿拉伯战士——另外周边山区还有新的部落战士潮水般涌来。劳伦斯在8月17日从开罗返回沃季赫之后，就一直在忙于处理后勤工作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混乱局面，并努力在这地方建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来。但这些琐事或许能够帮助他暂时忘记当前更重大的问题，因为6周前攻克亚喀巴带来的胜利冲昏头脑和大大加快的计划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不足为奇，艾伦比将军在9月中旬发动巴勒斯坦攻势的雄心勃勃的

计划由于部队重整装备的一系列耽搁而不得不推迟。开罗的军方高层现在的说法是，进攻日期不迟于10月底。从劳伦斯的角度看，这样也好，因为阿拉伯人的准备工作也非常糟糕。

与此同时，亚喀巴的胜利吸引了一大群邀功请赏的人，个个都认为自己应当分一杯羹。亚喀巴离开罗很近，于是一大批令人厌恶的顾问纷至沓来，人人都提出一系列可疑的建议，试图证明自己的价值。8月底，一位新到的情报军官对阿拉伯部队的不专业大感震惊，敦促开罗立即派遣帝国骆驼骑兵部队（一支精锐的英国骑兵部队）到前线。劳伦斯不得不抽出时间来破坏这个计划。“如果一名帝国骆驼骑兵与一个阿拉伯人发生口角，”他在8月27日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或者与贝都因女人发生什么纠葛，就会造成普遍的敌意。”他非常有策略地对这名情报军官的其他建议表示认同，最后以轻蔑口吻写道：“我认为，任何关于阿拉伯局势的报告都不值得您一看，除非报告的作者自己去观察民族起义和军事行动之间的区别。”[38]

巧合的是，克莱顿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也在考虑自己去做一个小小的实地考察。9月1日，他离开开罗，抵达了亚喀巴。这是他第一次亲临这条耗费了他一年多心血的前线。

与往常一样，将军的到访似乎还有秘密的计划。一个多月前，他从伦敦的马克·赛克斯那里收到了一封信。在劳伦斯前不久在开罗期间——在8月的第二周，两人每天都在阿拉伯局打交道，但克莱顿感到没有必要将这封信与下属分享。但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这次他把信带到了亚喀巴。

这年夏天，赛克斯结束在中东的停留，返回伦敦时，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协约国领导人震惊和沮丧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说法“民主需要一个安全的世界”并非仅仅是伪善的言辞；美国干预欧战的条件是，被压迫的民族应当有民族自决的权力，政府间错

综复杂的秘密协定也要被废除——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时代开始落幕。英法两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两国在三年的战争中已经损失约500万人，甚至在两国首都的先前贪得无厌的政客们也开始努力学习“非吞并”和“自治”这些陌生词语。

在转这个180°大弯时，很少有人比马克·赛克斯更灵巧熟练。在令人咂舌的极短时间内，这位政客已经把自己重新打造成开明豁达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家、民族自决的捍卫者。赛克斯现在的观点是，英法在中东的最佳选择是彻底摈弃所有的帝国主义权利主张，因为，正如他在7月22日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信中说的那样，“殖民主义是疯狂之事”[39]。在他的设想里，取代殖民主义的将是一种政治上的社交礼仪精修学校，由西方列强管理；中东的无知蒙昧民族可以在这里学习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然后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些话居然出自现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协议的始作俑者之一，很多人或许会感到不和谐，但赛克斯有个好用的解决办法。他在7月中旬建议战时内阁今后不再使用“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说法，而改用“英国—法国—阿拉伯协定”[40]。

赛克斯就这么摇身一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外交部领导层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即英国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吃了亏，于是缺乏监管、自行其是地炮制此项协定的赛克斯自然受到了责怪[41]。战时内阁成员乔治·寇松评论道：“赛克斯似乎是这样想的，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怀疑的办法就是认可对方说的话，被问起的时候就放弃我们自己的主张。”赛克斯和皮科在5月与侯赛因国王缔结的所谓协议一直都有争议，再加上他是雅法遭洗劫故事传播的主要推动者，而很多人现在认为这个故事是个幕后阴谋，目的就是推动政府完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阵营。这一切都让赛克斯受到的信任大大缩水。7月初，外交部政务次官阿瑟·尼克尔森决定为战时内阁查明，政府在过去两年里在中东究竟做出了多少承诺，这些承诺与对侯赛因国王许下的诺言又是否会互相矛盾。于是一个关键时刻出现了。尼克尔森就差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赛克斯

是个骗人精了："较难确定外交部的文件是否代表真正发生的全部事实。"尼克尔森敦促"继续调查此事之前，应请马克·赛克斯爵士发表意见，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权威地判断，对我们对侯赛因的承诺的逃避或者修改会在多大程度上遭到阿拉伯人的怨恨"。[42]

面对这样的批评，赛克斯暴躁地为自己辩护。奇怪的是，他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归咎于一位英国下级军官：T.E.劳伦斯上尉。在7月20日写给外交大臣贝尔福的秘书的信中，赛克斯顾影自怜地将自己在中东事务中的两年辛勤劳作描绘为得不到感激的自我牺牲。"目前为止，工作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您知道，我必须要与许多困难做斗争：英法两国过去的偏见、因循守旧头脑的互相怀疑和感情脆弱、布雷蒙的反英政策，以及劳伦斯的反法态度。"[43]

但赛克斯对劳伦斯的集中攻击或许也不是那么奇怪。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赛克斯在中东编织的互相矛盾、半真半假的谎言，但其中大多数人——像吉尔伯特·克莱顿和雷金纳德·温盖特那样的人，都是体制的忠仆，不会与赛克斯彻底撕破脸皮。如果事态爆发，他们不会向别人吐露自己的抱怨，而是寻找办法来渡过难关。而劳伦斯不是那样忠于体制的人，他如果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地羞辱赛克斯，而在他在亚喀巴的胜利之后，他这样做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而且，劳伦斯现在有能力对赛克斯花了两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外交框架造成严重破坏。赛克斯的外交框架固然不完美，但能够保护英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而让各方都不至于空手而归。现在，劳伦斯与艾伦比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而且他一直决心要将叙利亚从法国手中夺走，于是这个小小的上尉突然间从麻烦角色变成了严重的威胁。赛克斯在7月22日给克莱顿的信显然就是为了用阿谀奉承和稍微掩饰的屈尊俯就来消除这个威胁。克莱顿把这封信带到了亚喀巴，拿给劳伦斯看。

"劳伦斯的行动居功至伟，我希望他能获得骑士爵位，"赛克斯是在

说攻克亚喀巴的事情，“告诉他，现在他已经是个伟人了，必须得有伟人的样子，眼界要开阔。阿拉伯人再接受协约国十年的教导，就能成为一个国家。如果现在就给他们独立，意味着他们会被波斯人控制、蒙受贫困和混乱。让他考虑考虑这一点，想一想他为之奋斗的人民。”[44]

劳伦斯知道赛克斯过去的阴谋诡计，再加上前不久还在开罗与亚伦森大吵了一番，所以他实在无法忍受这封信居高临下的口吻。或许这还触及了他的自尊心；劳伦斯就算还不是“伟人”，也肯定是个独立自主的人，绝不愿意被马克·赛克斯颐指气使。他给赛克斯写了一封长达7页纸的信，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装是诚恳地请求赛克斯赐教，其实是有条不紊地对他的每一个计划做了审视，揭穿了它们的严重缺陷：“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许了什么愿？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我在开罗见到了亚伦森，他当即说，犹太人希望获得从加沙到海法的整个巴勒斯坦的土地，然后在里面搞自治。他们是要以公道的价格买下这些土地，还是要低价强买，将当地人驱逐出境？……犹太人打算把阿拉伯农民全部赶走，还是将他们转变为按天付酬的劳工阶层？”[45]

然后他转向了法国人“援助”阿拉伯人开发叙利亚的事情，赛克斯在吉达曾尝试向侯赛因兜售这个谎言。“阿拉伯人有能力在没有法国人援助的情况下将起义扩展至叙利亚全境，因此不愿意付出了代价却只是为了将来被居高临下地通知情况……假以时日，加上我们的持续帮助，谢里夫一定会成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要过分夸大我们向他提供的骡子和弹药的价值；运筹帷幄和实际行动都是靠他自己）占据我们分配给由外国人担任顾问的‘独立叙利亚’的土地，也能够守住这个成果，而不需要外国人强加的顾问。他不仅会占据这些土地，还会占据那些《赛克斯—皮科协定》没有分配给阿拉伯国家的土地。他对这些土地的权利主张是非常强有力的，因为他可以领导当地人来征服它们，英法两大强国能怎么办？”

在信的末尾，劳伦斯改用了比较缓和的口吻，承认“我们或许不得不出卖小伙伴，来报答大朋友”的政治现实，但指出，与赛克斯永远的喜讯相反，“我们现在处境艰难。请告诉我，依照您的高见，我们如何找到出路？”

这封信或许是对赛克斯在中东活动的最严厉抨击，但这位政客永远不会读到它。9月7日，克莱顿已经结束在亚喀巴的访问并返回开罗，劳伦斯将这封信发给克莱顿的办公室，请他继续转发至伦敦。但克莱顿读了信之后，决定扣押不发。他在一封短信中向劳伦斯记述道，他不希望给赛克斯任何“或许能够刺激他活动起来”的东西，尤其是越来越受到批评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渐渐被人遗忘了。“它事实上已经死了，”克莱顿写道，“如果我们安静地等待，它很快就会彻底被遗忘。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计划，现在几乎已经是没有生命的纪念碑。”[46]

吉尔伯特·克莱顿的这个判断大错特错，但劳伦斯没有办法和他争执。克莱顿的信发出的时候，劳伦斯已经起程前往内陆，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新一轮攻势。他常常不能及时收到克莱顿的信已经是家常便饭。

9月7日，威廉·耶鲁住进了伦敦的萨沃伊饭店，发现前厅里满是“浓妆艳抹的女士”走来走去，感到有些不对劲。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哀伤地写道，这家曾经历史悠久的一度非常高档的饭店如今“完全成了幽会的场所”[47]。

但新教徒一般拘谨的耶鲁没有多少时间来考虑周边环境的下流，因为他在伦敦会非常忙碌。利兰·哈里森给美国大使的电报非常有用，新任特工很快和参与中东事务的许多英国高官取得了联系。在这些会见中，耶鲁受宠若惊地发现，自己的叙利亚报告被赞誉为源自敌境这个关键角落的最入木三分的文件，在英国政界和军界最高领导层传播，并且得到研读。许多情报单位都派人来听取他的报告，他很高兴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细节。

但很快，耶鲁就不再努力去了解中东局势的更多情况——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在开罗才最有可能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东局势的一个特殊方面：英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团体眉来眼去。

英国报纸上流传着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有一位不知姓名的犹太化学家向政府提供了关于生产炸药的“某些秘密”。这让耶鲁非常感兴趣。耶鲁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据说，有人问这位犹太化学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报偿时，他说他自己没有什么意愿，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希望协约国在和平会议上能够特别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问题。”报纸上说，英国政府已经秘密地答应了科学家的这个请求。[48]

耶鲁虽然还不知道这位化学家的名字——当然就是哈伊姆·魏茨曼，但让他感到有趣的是，英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公开否认或者压制这种传闻，这说明它很有可能是真的。在伦敦的随后一周内，新任美国特工向许多官员打探消息，询问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策，得到的回答却互相矛盾。

耶鲁的结论是，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英国犹太人对希望得到怎样的安排并没有一致意见。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有些人主张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有些人仅仅要求增加移民能够得到保障；而一些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领导人则强烈谴责复国主义运动，认为它是将犹太人边缘化的一个危险的新工具，反犹主义者会利用它来质疑犹太人对其出生国的忠诚。耶鲁努力理清这个争端，在他看来，英国政府显然在考虑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有关的某种建议，但具体是什么建议，尚不明确。

两周之后，耶鲁感到自己在伦敦的情报搜集工作已经完成，急于前往开罗。但他首先要去巴黎，因为他很想与一位最近非常有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交谈，此人前不久才从开罗来到法国。他就是亚伦·亚伦森。这是关于阿拉伯半岛之战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这是一场“干净

的”战争，阿拉伯战士们在忍受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终于揭竿而起，为自由而战；这些战士勇敢地从沙丘上冲杀而下，袭击倒霉的残酷压迫者。

与攻击T.E.劳伦斯的那些人的指控相反，他在这个神话的制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其实非常小。它其实主要源于战后颓唐心碎的公众的一种需求：在如此丑恶的战争中，寻找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光辉伟大。西线没有多少材料可资利用，那里有成千上万人灰飞烟灭、被炮火炸成齑粉，或者被永远埋葬在烂泥下。作为对比，阿拉伯半岛却到处是身披长袍的武士、冲锋的骆驼、招展的旌旗，在不光彩的残杀中却是一场华丽的中世纪盛典。在另一场甚至更加恐怖的世界大战中，这种浪漫形象和人们对它的需求都减弱了，但1962年大卫·利恩的电影为新一代人复苏了这种浪漫情怀。

劳伦斯对战争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尽管他公开支持阿拉伯人的事业，但对真相的忠实迫使他努力去记录事实。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确指出，很多阿拉伯人参加战斗固然是出于摆脱土耳其人的真诚愿望，但英国黄金和丰富战利品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这种愿望。在战场上，起义军的敌人不仅有土耳其人，还有其他阿拉伯人：没有分享到英国黄金的部落战士，或者那些被土耳其人收买的人；与起义军的部落有宿怨血仇的氏族；或者独立寻找战利品的雇佣兵。

而且这个战场与公众的想象也相差甚远。在人们的想象中，阿拉伯和叙利亚沙漠就是如诗如画的绵延沙丘，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沙漠都是荒凉悲凄的碎石戈壁和光秃秃的石头山，在很多方面类似于美国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一些不是那么美丽的角落。在穿越这些地区时，劳伦斯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是羊肉、骆驼肉，运气好的话有面包吃，运气不好就只能吃生面粉。他们喝的水来自含盐的泉水，或者长满水藻的池塘，或者被土耳其人用腐烂的动物死尸污染的水

井。要避开正午炽热的阳光，躲到阴凉处就不得不面对全世界沙漠都有的那种奇怪而残酷的现象：大群狠狠叮人的黑苍蝇。

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双方的重伤员都往往会被丢下等死，幸运的人会被一枪击毙，以避免痛苦。如果胜利者愿意将俘虏带走的话，胜利者吃完之后，俘虏才能去吃残羹剩饭，因此往往大批地饥渴而死。而且与西线的界限分明的死亡地带相反，阿拉伯战场中的战斗人员和平民互相混杂，无辜的人往往会突然陷入子弹和刀刃的血雨腥风。

9月19日下午早些时候，十节车皮的列车从南面绕过了路弯。劳伦斯等待列车的第二节机车开上短桥，然后引爆了50磅的葛里炸药。黑烟当即腾空而起，蹿到100英尺高，然后向两边扩散，至少也有100英尺远。爆炸声和金属断裂的噼啪声平息之后是一个短暂的诡异的平静瞬间。然后残杀开始了。

除了他打算沿途招募的阿拉伯战士之外，劳伦斯还从亚喀巴带来了两名西方军官——一个是英国人，绰号是“斯托克斯”，因为他携带着一门斯托克斯迫击炮；另外一个人是澳大利亚人，绰号是“刘易斯”，因为他负责两挺刘易斯机枪。他们在战斗打响前将武器安置在离桥梁仅300码的一处崎岖的岩架上，准备就绪。黑烟散去之后，起义军发现，只有火车头和最前面一节车厢从坍塌的桥上坠入涵洞，剩下的七节车厢都一动不动地停在铁轨上。成排的土耳其士兵坐在这些车厢顶上，他们被刘易斯机枪扫倒在地，“像成捆的棉花一样被扫倒”。[49]

一些土耳其人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跑向桥下涵洞的相对安全处。斯托克斯向他们发射的第一发迫击炮弹偏离目标较远。他调整了迫击炮的升降螺杆，第二发炮弹恰好落在了敌人当中。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写道，突然爆发的残杀令幸存者方寸大乱，“恐慌地奔向铁路线东北方200码处的崎岖地带。在他们逃跑过程中，刘易斯机枪打死了很多人，只剩下大约20人”。[50]

土耳其人的抵抗迅速瓦解，阿拉伯战士们——只有100多人——猛冲上去开始抢夺战利品。劳伦斯急于查看火车头受到的破坏程度，从他的掩蔽处跑下来，加入人群。

跑到火车前，他发现车上除了运载士兵，有几节车厢搭乘的是平民。其中有些人是返回大马士革的土耳其军官家属，但其他人就是普通的难民。“一边站着30或40个歇斯底里的妇女，”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解开头巾、撕扯自己的衣服和头发，神志不清地哭喊着。阿拉伯人对她们置之不理，继续捣毁她们的家居物品，抢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女人看到劳伦斯，恳求他开恩。她们的丈夫们也上来求情，“紧紧抱住我的脚，因为害怕当场死亡而痛苦万分。土耳其人如此颓唐凄惨，真是丑恶的景象。我用光脚尽可能踢开他们，终于摆脱了。”[51]

在前去查看火车头的路上，劳伦斯还检查了翻入山沟的那节车厢。他发现这是一节医疗车厢，伤病员原先都躺在担架上，但现在车厢翻了个底朝天，所有人堆在一起，血肉模糊。“其中还活着的一个人精神错乱地喊着‘斑疹伤寒！’。于是我用楔子把门卡死，把他们留在了那里。”

车上还有一群奥地利军事顾问，他们“平静地用土耳其语向我投降”。劳伦斯对他们的帮助只是稍微多一点。劳伦斯打算完成爆破工作，于是让几名阿拉伯战士看押他们。片刻之后，由于某种争吵，奥地利人大多被打死，“只剩下两三人”。

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估计，在穆多瓦拉以南的这次战斗中，有约70个土耳其人死亡，代价是一名阿拉伯战士。他哀叹说，在一片混乱中，他匆匆去破坏第一节火车头，但是担心它或许还能修复。“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彻底爆破。”[52] 他在报告中没有提及有平民死亡，但在战斗最初的几分钟内，弹雨射进了没有装甲的列车，平民死亡数字一定相当高。另外，有90名土耳其士兵被俘，但最终被押解到亚喀巴的只有68人，他

也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对大多数经历战斗的人来说，它都会引发互相矛盾的感情的斗争：对战斗的残酷感到恐惧，但又感到极大的刺激。由于军队中的吹牛皮和比拼勇气，军人或许比平民更难调和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军人也更有可能向平民坦白直率地表达自己的复杂感情——如果坦白直率还有可能的话。

劳伦斯从穆多瓦拉返回亚喀巴之后，给一位军中同袍沃尔特·斯特林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兴致勃勃地详细描述了这次袭击火车的战斗，提及了斯托克斯迫击炮一下子打死12个土耳其人的“美妙的射击”，以及他分得的战利品是“一张特别美丽的红色俾路支祈祷跪毯”。他继续写道：“但愿我已经把其中乐趣都描绘出来了。唯一的遗憾是，鼓舞阿拉伯人要花很大力气，以及战斗期间不得不疯狂奔跑。这是最外行的、水牛比尔[53]式的袭击，只有贝都因人能把这种事干好。”[54]

前一天，也就是9月24日，劳伦斯写信给在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老友爱德华·利兹，口吻却迥然不同：“我希望噩梦结束之后，我能够醒来，重新活过来。杀人，杀土耳其人，真是太可怕了。我最后冲进去，看到他们全都血肉横飞地躺在地上，很多人还活着，我知道自己已经干过这种事情几百次，如果可以的话，还要再干几百次。”[55]

劳伦斯现在已经开始感到难以对付精神上的创伤，以后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

[1] Lawrence，*Twenty-Seven Articles*， August 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93-97.

[2] Clayton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London），July 1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18-23.

[3] 劳伦斯对自己返回开罗和与艾伦比初次见面的描述来自*Seven Pillars*， book 5，chapters

55 and 56，pp.317-22。

[4] Wingate to Robertson，July 14，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374/41077.

[5]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422.

[6] Lawrence to Clayton，July 1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6，f. 249.

[7] Allenby to Robertson，July 16，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34，f. 4A.

[8] Allenby to Robertson，July 19，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34，f.10A.

[9] Lawrence，*Twenty-Seven Articles*， August 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93-97.

[10] Aaronsohn，*Diary*， July 1，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1] Aaronsohn，*Diary*， July 2，1917.

[12] Sykes to Graham，May 5，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1a.

[13] Clayton to Sykes，June 22，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8，f. 156.

[14] Cecil to Hardinge，June 13，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8，f. 145.

[15] Cecil to Hardinge，June 13，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8，f. 146-48.

[16] Aaronsohn，*Diary*， July 17，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7] Wingate to Graham，July 23，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83，f. 55.

[18] 克莱顿在开罗与劳伦斯会谈之后给赛克斯写信称："费萨尔的名字似乎有魔力……劳伦斯经过的叙利亚各地区几乎全都接受他。"Clayton，July 22，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6，f. 145.

[19] Lawrence，*Seven Pillars*，p.323.

[20] Wilson to Clayton，July 29，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48.

[21] 纽科姆很快厌倦了后方工作，被调回开罗。在1917年11月初埃及远征军的攻势中，他在巴勒斯坦南部被土耳其军队俘虏。

[22] Lawrence，"Report on meeting King Hussein，" July 3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4，f. 372-73.

[23] Macindoe for Clayton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July 28，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41/668，p.5.

[24] Lawrence，*Seven Pillars*，p.326.

[25] Wilson to Arab Bureau（Cairo），August 6，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34，f. 25A.

[26] Lawrence，*Seven Pillars*，p.327.

[27] Yale，"Palestine-Syrian Situation，" with addendum，July 1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0.

[28] Foreign Office to Spring-Rice，July 25，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7.

[29] Yardley，*American Black Chamber*，p.172.

[30] Department of State，"History of the Bureau of Diplomatic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1. 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76705.pdf.

[31] Harrison to Gunther（American embassy，London），August 30，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Box 1047.

[32]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8，pp.10-11.

[33] Aaronsohn，"The Jewish Colonies，" Arab Bulletin no. 64（September 27，1917）：389-91.

[34] Aaronsohn，*Diary*，August 12，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35] Wingate to Balfour，August 2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53，f. 384.

[36] Engle，*The Nili Spies*， pp.152-54.

[37] 间谍船“马纳杰姆”号的船长Lewen Weldon的回忆录*Hard Lying* 充分见证了英国政府对其情报人员漫不经心的态度。Weldon在第195页写道：“我们的‘特工’的事情总的来讲是运气好得惊人。我记得被捕的人数不到7个。其中6人被绞死，1人被斩首。”

[38] Lawrence to Clayton，August 27，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88-92.

[39] Sykes to Clayton，July 22，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69.

[40] Sykes memorandum，“On Mr. Nicholson’s ［sic］ Note Regarding Our Commitments，” July 18，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66.

[41] Curzon to Hardinge，August 23，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44，f. 299.

[42] Nicolson précis for Balfour，July 1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44，f. 286-93.

[43] Sykes to Drummond，July 20，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68.

[44] Sykes to Clayton，July 22，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69.

[45] Lawrence to Sykes，September 7，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Papers，693/11/3-8.

[46] Clayton to Lawrence，September 20，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Clayton Papers，693/11/9-12.

[47] Yale，*Diary*， September 8，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2.

[48] Yale，*Diary*， September 12，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2.

[49] Lawrence，*Seven Pillars*， p.367.

[50] Lawrence to Clayton，September 23，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4，f.71.

[51] Lawrence，*Seven Pillars*，p.369.

[52] Lawrence to Clayton，September 23，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4，f.71.

[53] 水牛比尔，即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1846—1917），美国军人、野牛猎人、边疆拓荒者和马戏表演者。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有“白人西部经验的万花筒”之称，他组织的牛仔主题的表演也非常有名。据说他曾在18个月内猎杀4280头野牛（民间称为水牛），因此得到“水牛比尔”的绰号。

[54] Lawrence to Stirling，September 25，1917；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Folder 6，File 7.

[55] Lawrence to Leeds，September 24，1917，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238.

第15章 奔向火焰

> 我只希望，也只相信，劳伦斯能够安全回来。他此刻正在那边打仗。如果他能成功，肯定能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如果不能，唉，我都不敢去想！
>
> ——1917年11月11日，戴维·霍格思给妻子的信 [1]

以前他们在巴勒斯坦见过好几次。那时，亚伦·亚伦森是一位著名科学家，是农学界的先驱；而威廉·耶鲁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地区代表。现在是1917年9月，两人的履历表都已经增添了很多内容。亚伦森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位领导人，而耶鲁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特工。但耶鲁并不知道，或者至少目前还不知道，亚伦·亚伦森还是中东最大的间谍网之一的总指挥。亚伦森并不知道，威廉·耶鲁除去含糊的头衔之外，实质上也是个间谍。所以，两人于9月25日在巴黎的会面有着一种特别小心谨慎的性质。

亚伦森于四天前抵达法国首都，努力要搞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前往伦敦。为了这个目的，他先去拜访了自己的老恩主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男爵。亚伦森知道，罗思柴尔德男爵在犹太人与英法政府的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幕后角色。但亚伦森大失所望。

“我向他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兴趣盎然地听着，”亚伦森在一封信中告诉自己的弟弟亚历克斯，“并且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回答了。但他不许我涉及某些话题，自己也不愿意谈这些话题，所以我没办法从他那里打听到任何我想知道的信息……他和我们一样感到，如果英国统治着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能成就大业，但目前一切都还说不准，所以他不能多说。” [2]

马克·赛克斯也到了巴黎，亚伦森和他的谈话比较顺利一些。两人

在9月23日作了一番长谈，次日上午又谈了一次。“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亚伦森告诉弟弟，“并且告诉我，我们有许多敌人。大多数对手都是我们的同胞，这对我们的组织很危险。”

显然，赛克斯到巴黎找亚伦森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扮演和事佬。英国战时内阁又一次开始就是否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问题进行辩论，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意见一致。这意味着必须消除亚伦森和哈伊姆·魏茨曼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之间的持续摩擦。赛克斯解释说，亚伦森在9月中旬给魏茨曼的气势汹汹的信就像“魏茨曼的眼中钉”。

坦率地说，亚伦森才不管这么多呢。他对弟弟傲慢地表示：“马克·赛克斯恳求我与他们言归于好，要我答应不要和他们吵架。他说，我应当听魏茨曼和索科洛夫的话。我告诉他，我去伦敦不是为了吵架，而是教导他们错在哪儿，教他们如何好好做事。如果他们肯接受，万事大吉；如果他们不肯，那我就自行其是。”

威廉·耶鲁在伦敦的调查中或许已经了解到了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痕，但这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之间，以及英国领导层内部不同阵营之间的更公开化的斗争相比，很可能只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耶鲁在巴黎找亚伦森谈话是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他就要失望了。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最终会报告给在华盛顿的利兰·哈里森：亚伦森“目前并不希望看到犹太人自治，或者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说这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危害极大。他希望英国、美国或者国际共管当局来控制巴勒斯坦”[3]。耶鲁还报告称，亚伦森在伦敦处理完自己的事务之后，还要继续前往美国，拜访那些有影响的美国犹太人，来推动自己的主张。让这一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耶鲁在伦敦的时候见过亚伦森的一个亲密盟友，一个叫作杰克·莫塞里的商人。莫塞里虽然赞扬了亚伦森的敏锐洞见，却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政府，并以

希伯来语为其官方语言。耶鲁在巴黎的几次会谈之后前往开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无疑比以前更加糊涂了。

但他还有一项别的使命。亚伦森不知是忘记了耶鲁是个特工，还是因为他特别容易轻信别人，将一封给弟弟亚历克斯的信托付给了这个美国人，让他送到开罗。这封信除了最基本的保密措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之外，没有加密。就在这封非常不谨慎的信里，亚伦森详细记录了他与埃德蒙·德·罗思柴尔德和马克·赛克斯的会谈，并概括了他对伦敦的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谈判当前状况知晓的全部情况。

但这位间谍首领写的还不止这么多。除了一一指名道姓地列举“我们在开罗的英国军队当局里的朋友”，并要求将情况通报他们之外，亚伦森还指示弟弟对即将抵达埃及的法国政客乔治—皮科进行监视。他写道：“帕斯卡尔（亚伦森在开罗的主要助手）会告诉你如何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亚伦森甚至向弟弟提了关于如何对付威廉·耶鲁的建议：“尽可能和他打成一片，对他仔细观察，因为你能从他那里得到你需要的信息，尤其是埃及发生的事件。”[4]

这一切对耶鲁和他代表的机构都有极大价值。美国政府已经得知英国在考虑犹太人家园问题，但从威尔逊总统往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英国人的辩论已经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肯定也不知道马克·赛克斯在幕后扮演的角色。亚伦·亚伦森将这样一份文件交给威廉·耶鲁，着实是马大哈。但亚伦森非常幸运。作为情报人员，耶鲁确实打算将信拆开，翻译出来，然后才发给亚历克斯·亚伦森。但他毕竟是间谍游戏的新手，显然不知道这种事情往往是有高度时效性的。他将亚伦森的信翻译出来并发往国务院的时候，已经是12月中旬了。到那时，他揣在怀里将近三个月的大多数爆炸性信息都已经过时了。

在1917年的中东，飞机还是个稀罕事物。所以在10月12日被派去亚喀巴接劳伦斯少校的那架飞机印证了他的使命的重大意义。在阿里什等

待他的那些人的身份也能说明他的任务的重要性：艾伦比将军、克莱顿将军，以及劳伦斯在牛津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他现在是阿拉伯局名义上的局长。劳伦斯的飞行耗时90分钟——在1917年，飞机的巡航速度只有每小时100英里多一点——他刚下飞机，就得知了自己被招来的原因。

艾伦比对土耳其防线的攻势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10月28日，也就是两周多一点之后。他的攻势将与阿奇博尔德·默里的两次失败的努力大不相同。为了迷惑土耳其人，英军将先对加沙进行三天的炮火准备——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面攻击的经典前奏——随后进攻加沙以东30英里处防御薄弱得多的贝尔谢巴。占领贝尔谢巴及其关键性的水井之后，英军将向北方和西方推进，切断巴勒斯坦内陆到加沙的补给线。如果一切顺利，在加沙掘壕据守的土耳其军队要么会惨遭合围，要么会主动撤退以避免被围。劳伦斯的问题是，阿拉伯起义军如何能协助此次大战役。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贝尔谢巴计划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的简单。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一位将军的首要战术考虑就是水源，默里缺乏想象力的正面进攻加沙的战术主要就是为了尽快获得土耳其战线后方的水源。但这个需求也使得默里的努力成了孤注一掷——决不能在沙漠战场上闲荡，寄希望于战果逐渐增加——所以他失败了。作为对比，艾伦比的部队在占领贝尔谢巴的水井之后就能有条不紊地逼近加沙；他的作战计划规定，攻势将持续至少一周。这个计划的缺陷是——也就是它的简单造成的后果——英军的步步为营也给了土耳其人重整旗鼓的时间。艾伦比的希冀显然更大，但成功的攻势或许仅仅意味着能够在巴勒斯坦西南部取得一个立足点，仅此而已；不要求直冲海岸，或者直捣耶路撒冷。

所以，很难确定阿拉伯人在这场战役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

果要求他们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土耳其补给线，那么他们的进攻目标就应当是叙利亚中部的铁路枢纽城镇德拉。从德拉有一条铁路支线从汉志铁路分叉出来，向西延伸，构成了土耳其人进出战区的主要生命线。另外，劳伦斯从自己6月份在叙利亚各地的侦察中得知，德拉地区有成千上万的部落族人愿意参加起义。但另一方面，如果英军仅仅在巴勒斯坦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位于德拉西南方120英里处），而部落族人在德拉大规模起事的话，这些部落族人就会惨遭土耳其人屠戮。

而集结在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也爱莫能助。坦率地说——尽管劳伦斯在阿里什对这个问题很可能并没有向上级坦率——亚喀巴的局势非常糟糕。两个多月以来，聚集在那里的阿拉伯部队一直在等待英军进攻巴勒斯坦南部的消息，一旦攻势发动，他们将深入叙利亚腹地。这个漫长等待造成了越来越恶化的后勤噩梦。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港口百无聊赖，需要从埃及运来越来越多的补给物资来为其提供装备和口粮，还需要越来越多的英国黄金为其发饷，这又吸引来了更多的新兵。局势非常糟糕，到10月初，亚喀巴周围山地的草已经被骆驼和马吃得一干二净，于是需要动用运输船从埃及运送草料。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爆发了霍乱，不得不实施隔离检疫，于是整个补给系统几乎瘫痪。

或许害处更大的是，这种停滞状态对亚喀巴的士气造成了极大打击，起义军战士当中开始弥漫一种低沉的情绪。情绪最阴郁的要算费萨尔本人。北上的计划耽搁得越来越久，他确信为阿拉伯事业夺取叙利亚的机遇已经付之东流，因此陷入了一种越来越深的抑郁。在他比较愤慨的时候，甚至指控英国人故意造成了这种停滞局面，以便将叙利亚交给法国人[5]。饱受困扰的乔伊斯少校承担了费萨尔的大部分抱怨，劳伦斯也不得不常常在会见埃米尔时对他好言安抚一番。为了让大家感到正在取得进展，或许还是为了暂时逃离这个凄凉城镇，劳伦斯继续越过山岭袭击敌人——指示他前往阿里什的命令传来时，他刚刚从一次袭击火车的战斗返回——但这些袭击与他三个月前在开罗阐述的宏大设想相比都

显得苍白无力。

但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许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劳伦斯感到，让阿拉伯人为即将展开的攻势做出某种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在阿里什构思出了一个新计划。

除了攻击德拉之外，还有一个地方能够切断通往巴勒斯坦的铁路支线。那是在德拉以西15英里处，铁路线在通过崎岖的雅莫科峡谷时要通过几座高架桥。如果能摧毁其中一座桥梁，效果是一样的。这样的行动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按照“传统”的袭击火车的战术来进行，由一支高度机动的小分队执行，打了就跑。

但与传统袭击火车的战术的相似点仅此而已。雅莫科峡谷离亚喀巴有200多英里远，而且是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从亚喀巴出发的部队将通过一个陌生的环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土耳其巡逻队和与土耳其结盟的当地部落的牺牲品。如果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这些危险只会翻倍。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只能依靠自己，英军或其他起义军都与他们相隔太远，爱莫能助。

考虑到这些问题，劳伦斯对计划作了修改：他亲自去执行这个任务。就像他在攻克亚喀巴时做的那样，他将带领一支精挑细选的小分队，但愿能够足智多谋和低调，避免被敌人发现，然后沿途招募需要的更多兵员。行动结束后，在当地招募的人就可以各自返回自己的村庄，而劳伦斯一行人可以分散开来，寻找避难所[6]。

在阿里什听到这个计划的那些人都认为，劳伦斯的想法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自杀任务。而且对这些人来说，劳伦斯并非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士兵，而是一个朋友、弟子和令他们仰慕的青年。但是战争形势实在太紧迫了。

到1917年10月中旬，协约国的战争努力在各处都是千疮百孔。在前一个夏季，法国军队爆发了许多哗变，整个团的士兵拒绝进入战壕的屠杀场；这场危机已经克服了，但法国军队仍然颓唐不已、精神委顿。在东线，德军又一次粉碎了俄军的攻势，这是垂死挣扎的克伦斯基政权的最后一次绝望狂赌；在这个10月底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将夺取政权，与德国媾和。在南线，意大利军队进攻伊松佐河谷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攻势都被奥地利军队挫败，并且即将在科巴里德战役中惨败。自7月31日以来，英军在西线的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冷酷无情、惨无人道的名声一直在增长，因为他继续坚持甚至比之前在索姆河更加徒劳无益的攻势。到11月初，帕森达勒战役终于被叫停，此时已有7万名英军士兵丧命在泥泞的田野中，相当于每前进2英寸的距离就要死一个人。

在这大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小小地推动一下战争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又有多少价值？哪怕是吉尔伯特·克莱顿在一年前描述的“几乎不可或缺的”[7]一个人。如果劳伦斯太勇敢，或者愚蠢，或者稀里糊涂地要试一试雅莫科峡谷，司令部里没有人会努力劝说他不要冒险。艾伦比将军得知此事后，下令在11月5、6或7日夜间执行此计划。

根据民间传说，毁灭他们的是一只鸽子。

自战争初期以来，英军就在西线用信鸽传递消息。1917年夏季，开罗方面有人想到，不妨用信鸽来维持与巴勒斯坦的NILI组织的联络。在纸面上，这个想法有很多优点。有了信鸽，就不用从埃及派出间谍船，这些间谍船的航行险象环生，而且经常遇到麻烦——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遇猛烈风暴；而且还可以消除间谍与其联络人之间面对面接头造成的安全风险。用信鸽的话，关键的情报还能更快地送递英军战线。由于要将线人的情报先送到阿特利特，然后等待间谍船，所以开罗收到NILI组织的情报时，往往已经晚了五六周。

但信鸽令人大失所望。在7月的一次试验中，放飞的六只信鸽中只

有一只飞过了100英里的路程，抵达西奈的英军指挥部。但在8月30日，萨拉·亚伦森在绝望中还是放飞了信鸽。到此时，“马纳杰姆”号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在阿特利特靠岸了（亚伦森并不知道，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拒绝给从间谍船游泳上岸的人员加薪到每月30英镑）[8]。她急于和英国人重新建立联系，于是将加密信息放入小金属盒内，将盒子缚在几只信鸽的腿上，然后将它们放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在四天后又放飞了两只鸽子。

萨拉·亚伦森对信鸽一直不是很有信心。9月4日，她到海边游泳的时候，她的疑虑被证实了。附近水箱上站着她前一天放飞的一只信鸽，暴露秘密的金属盒还捆在它的腿上。很快就传来了消息，雅法的一名土耳其指挥官截获了一只携带信息的信鸽，尽管土耳其当局显然还无法破译密码或者确定信鸽的来源，但他们确信巴勒斯坦沿海某地有一个间谍网在运作[9]。

9月中旬又传来消息，纳曼·贝尔坎德在西奈被捕。贝尔坎德是NILI组织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主要情报人员，他在试图前往英军战线途中被抓获。土耳其人怀疑他是间谍，先是在贝尔谢巴对他毒刑拷打，然后将他押往大马士革，进行更详细的审讯。贝尔坎德被捕之后，萨拉·亚伦森和NILI组织的其他人员担心，他们的组织被破获，土耳其人来抓他们只是时间问题。济赫龙雅各布的其他居民早就对城镇和邻近的阿特利特发生的事情起了疑心，所以他们也非常担忧。9月18日，济赫龙雅各布的治理委员会传唤萨拉·亚伦森来开会，质问了她的“不洁净”的工作。

据说，他们是这样告诉她的：“今天我们不想再听你的解释了，你只要回答一个字，要正确的答案：你要承诺停止这种逾越了一切界限的事情……如果你想干间谍工作，就离开犹太人的领土和疆域，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吧。”[10]

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马纳杰姆”号终于在9月22日返回

了。英国当局得知陆地上的情况之后，立刻安排一艘停泊在塞浦路斯的英国商船（足够运载愿意离开的所有居民）前往巴勒斯坦。9月25日夜间，这艘船出现在了济赫龙雅各布海岸。

但在此之前，萨拉·亚伦森和她的同志们似乎恢复了决心。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坚信贝尔坎德不会出卖他们——毕竟他被捕已经将近两周，土耳其人还没来逮捕他们——但更是担心NILI组织总部的人突然消失之后，其他地方的间谍会怎么办。于是只有两个人，一位母亲和她的幼子，登上了救援船。萨拉的助手们建议她也登船撤走，她坚定不移地答道："我要最后一个，而不是第一个离开。"[11] 她打算等待"马纳杰姆"号下一次到达（计划是10月12日），在此之前她要判断一下局势。

但NILI组织的间谍们似乎还没考虑到，土耳其当局如此懈怠，有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解释。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德国盟友都对5月份协约国利用雅法犹太人遭"清洗"的假新闻大搞宣传取得的成功震惊不已。德国人也知道，英国政府在考虑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借此争取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支持；事实上，德国人自己也正在焦急地想办法来吸引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以，尽管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都在流传巴勒斯坦犹太人间谍网的消息——因为纳曼·贝尔坎德招供了——但德国人严厉地警告他们的土耳其盟友，不到万无一失，不能打草惊蛇[12]。德国人在1917年秋季建议说，把一群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抓起来毒刑拷打没什么问题，但对巴勒斯坦犹太人要小心处置。

9月底，土耳其人获得了最后一条关键线索。这不是由于迷途的信鸽暴露了犹太间谍网，也不是因为纳曼·贝尔坎德的招供，而是由于英国情报人员自己的错误。据驻叙利亚的一位土耳其情报主管在战后说，破获NILI组织的缘由是在巴勒斯坦海岸抓获了两名阿拉伯间谍。严刑拷打之下，这两人招供说，他们是从一艘英国间谍船上登陆的，并且航行

途中船上还有犹太间谍。这些犹太间谍比他们先下船，是在阿特利特的农业研究站附近登陆的[13]。

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萨拉·亚伦森和她的主要副手约瑟夫·利申斯基最近搬到了离阿特利特9英里远的济赫龙雅各布。10月2日夜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土耳其士兵包围了这个定居点。士兵和秘密警察已经把阿特利特翻了个底朝天，根据一份包含十几人的名单，在次日早上开始抓人。最早一批被捕的人当中就有萨拉·亚伦森和她的父亲埃弗拉伊姆以及弟弟兹维。土耳其人最希望逮捕的“幕后首恶”约瑟夫·利申斯基却迅速脱身；1917年的土耳其人颇有大男子主义，显然从未想到，真正的“首恶”其实是个女人。

为了避免招致德国人的怒火，土耳其人对犹太人的处置特别小心谨慎。但恰恰是这种小心谨慎现在转变成了变态，把他们在济赫龙雅各布的行动变成了一场慢镜头的恐怖节目。在“讯问”的第一天，士兵们毒打了萨拉·亚伦森的父亲和兄弟，命令他们招供利申斯基的下落，但没有碰她本人。次日上午，形势急剧恶化。埃弗拉伊姆·亚伦森和兹维·亚伦森以及其他一些犯人被带到中央广场，多次遭到鞭笞。土耳其人希望能借此迫使仍然藏匿在逃的人自首。土耳其人对萨拉在前一天冷若冰霜的顽强反抗恼羞成怒，对她进行了特别残忍的折磨。她被捆在自家（位于济赫龙的主要街道）的门柱上，被鞭笞和用棍棒殴打。但她仍然不肯招供，据说甚至还嘲讽给她上刑的人，直到失去知觉。

土耳其人通缉名单上仍然在逃的人听到自己亲属遭受折磨的惨叫声，不堪忍受，一个个自首了。或者他们是被出卖的，因为随着恐怖气氛蔓延开，济赫龙雅各布的人们陷入了一场集体的癫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对那些长期以来反对NILI组织活动的人，现在是时候向土耳其人表忠心并且清算旧账了。土耳其人抓捕更多的人并对其毒刑拷打的时候，四个歇斯底里的泼妇在大街上奔来跑去，在每一个新的受害者遭到

土耳其人鞭笞的时候欢呼雀跃，甚至自己上去殴打被逮捕的人，放声大骂。”[14]

利申斯基依然踪迹全无，土耳其当局决定更进一步。土耳其指挥官把定居点的治理委员会传唤来，威胁说，如果不交出利申斯基，就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为了加强威胁的力度，他还宣布，次日上午要将所有被收监的人——一共大约70人——押往拿撒勒的警察总局，作进一步的“讯问”。另外还要将济赫龙的17名随机挑选的长老一起押走，如果利申斯基投降，就将他们释放，如果没有投降，长老们就要一起受苦。到下午，济赫龙的居民们在挖地三尺地搜寻利申斯基，而治理委员会则悬赏缉拿他[15]。

第二天，即10月5日，星期五，苦难终于迎来了悲惨的结局。犯人们被装上车押往拿撒勒的时候，浑身血污、遍体鳞伤的萨拉·亚伦森要求换件干净衣服再上路。她被带到自己家中，被允许独自一人走进浴室。她在那里匆匆写下了给尚未被捕的NILI组织成员的最后一封信。然后她取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早就藏在小壁橱内的左轮手枪，饮弹自尽。

但萨拉·亚伦森遭受的折磨还没有了断。子弹严重击伤了她的口腔，切断了她的脊髓，但没有击中脑部。一连四天，她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只有德国天主教修女照顾她，最后终于在10月9日早上死去。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她在当天被安葬在济赫龙公墓，寿衣就是从家中取来的蚊帐。她享年只有27岁[16]。

10月12日夜间，也就是萨拉辞世三天之后，“马纳杰姆”号按照原计划出现在了阿特利特海岸。亚历克斯·亚伦森就在船上。他从纽约返回中东，在亚伦在欧洲期间主管NILI组织的开罗办公室。他带来了兄长发来的消息。

10月1日，亚伦·亚伦森从巴黎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

哈伊姆·魏茨曼，与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取得了至少是暂时的和解。促成和解的主要因素是，魏茨曼认可了NILI组织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一封电报中对其大加赞赏，这份电报将会被分发给NILI组织的成员们。他写道："我们在尽最大努力，确保巴勒斯坦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犹太人家园。你们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前景光明。望诸君坚定勇敢，静候以色列的救赎。"[17]

亚历克斯·亚伦森携带着这份电报在当晚抵达阿特利特，但那里没有人迎接他。

劳伦斯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他陷入了一种安静的沮丧。他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在10月中旬在阿里什司令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状态不佳，"霍格思后来在给阿拉伯局的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说起他曾经信心满怀的阿拉伯未来，相当绝望。"[18]

其他人，包括劳伦斯自己，更早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我在这场游戏里撑不了多久了，"9月，在袭击穆多瓦拉的火车之后，他向好友爱德华·利兹吐露心声，"我神经衰弱，精气神也消耗殆尽。这两样东西，对人来讲都是多多益善。"[19]

在阿里什的会议之后，他这种新萌发的感情上的脆弱越来越严重。乔治·劳埃德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能够目睹劳伦斯的这种情绪变化。劳埃德也是一位来到中东的贵族"业余政治家"，相貌英俊，毕业于剑桥大学，拥有从男爵头衔，还是个保守党议员，于1914年底被招募到斯图尔特·纽科姆在开罗的军事情报单位。劳埃德很快就受不了纽科姆严厉的领导风格，于是调走了，但在此之前，他与这个小办公室的一位比他年轻9岁的同事结下了友谊，那就是T.E.劳伦斯。

和战时的很多其他英国贵族一样，劳埃德也经常改换工作和岗位，流动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在前线司令部待过，也在议会委员会做

过办公室工作——但至少他的某些任务会让他定期来到中东。他有银行的背景，所以在1916年秋季在阿拉伯起义爆发之后被调来研究侯赛因国王政权的财政状况。他关于汉志经济——汉志其实根本没有经济可言——的综合报告中包含了对爱德华·布雷蒙的计划（建立一个奥斯曼—法国银行）的批驳，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计划被废止[20]。

但到了1917年秋季，劳埃德受困于后方基地，忙于文书工作，一心想重返前线。9月底，他写信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列举了他认为自己或许能有所贡献的地区。尤其是他记起了自己在开罗军事情报办公室的那位已经成了传奇的老同事。“我想，由于我和劳伦斯的私人关系，我对他会很有帮助。”劳埃德写道，“他工作过于劳累，一定也是高度紧张。我确实认为，如果他要留在一线继续担任要职，一定需要志趣相投的其他白人的真正伙伴关系和慰藉。我绝不可能尝试取得领导地位。我甚至根本没有所需的资质。但劳伦斯以他的奇怪方式，对我非常喜爱，如果他在作‘惊险表演’的时候喜欢有我陪着他，我相信，我或许能够帮助他坚持下去。”[21]

权且不说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这个要求也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位贵族和议会现任议员居然甘当陪衬，去扮演桑丘·潘沙，来辅佐劳伦斯这个堂吉诃德。克莱顿同意了这个建议，安排立刻将劳埃德调到他那里。10月15日，劳伦斯从阿里什返回的时候，劳埃德已经在亚喀巴等他了。

一连几天，在劳伦斯为前往雅莫科的长途跋涉做准备的同时，两位朋友互相叙旧、交换消息。据劳埃德的观察，劳伦斯的计划有着非常突出的临时拼凑的色彩。除了数量极少的阿拉伯战士作为骨干外，劳伦斯的随行人员还包括一个印度陆军的机枪组和一个名叫伍德的英国中尉军官。伍德是个爆破专家，之前在西线头部中弹，现在还处于康复阶段。劳伦斯打算在北上的漫长旅途中绕开人口稠密地区，从叙利亚东部的氏

族中招募新兵，并集合阿布德·卡德尔（一位阿尔及利亚流亡者，自阿拉伯起义爆发以来就一直是起义军一分子）的追随者，而他的族人就居住在雅莫科地区。攻击结束之后，招募来的当地人就各自回家，而从亚喀巴来的人则分散转移，避免必然到来的土耳其追兵的搜捕。另外，还安排劳埃德陪伴劳伦斯完成至少最初几天，也是比较安全的几天的路程。

10月20日，劳埃德向克莱顿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劳伦斯的这些计划，以及他自己对亚喀巴形势的第一印象。在一段标为“私人”的附笔中，他的活泼口吻突然发生了变化：“劳伦斯身体相当健康，但因为自己面前任务的巨大风险和重大意义而深感忧郁。昨夜他向我敞开了心扉，告诉我，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还有很多地方要去发掘，还有很多民族要去援助，如果现在就丢掉性命就太可怕了。因为他感到自己必死无疑，因为他感到，他或许能够完成雅莫科的任务，但几乎没有机会能够逃出生天。我努力鼓舞他，但他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22]

在那个年代，两个男人之间很少会交换如此情真意切的信息，更不用说是在一封军事电报中了。乔治·劳埃德这么写，或许是希望克莱顿能够取消此次行动。如果他真是这么打算的，很快就受到了当头一棒。克莱顿在答复中承认自己对劳伦斯也“非常担忧”，但说，考虑到劳伦斯任务的重大，他的心情这么沉重也不足为奇。“他有一颗雄狮的心，但即便如此，压力也太大了。”克莱顿承认道，“他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会尽快把他撤下来，不要继续让他冒险，但时间还没到，因为现在需要他。”[23]

青年土耳其党政权竭尽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全力，以盛大华丽的仪式热烈欢迎了埃及的前任赫迪夫——阿拔斯·希里米二世。10月底的一天下午，这位名义上统治埃及的奥斯曼君主的火车驶入君士坦丁堡的

西尔凯吉车站时，迎接他的除了招展的彩旗彩带和荣誉卫兵之外，还有一大群达官贵人。恭候的人群中包括希里米的老友和共谋者库尔特·普吕弗博士。德国间谍大师和觊觎埃及王位者重拾他们的旧交情，又一次涉足了一场阴谋。

土耳其人投靠同盟国阵营、加入战争之后，英国人废黜了希里米——基钦纳将他称为“邪恶的小赫迪夫”，这个说法令人难忘。希里米从此开始浪迹天涯的流亡生活，最终来到了瑞士。但希里米是个天生的阴谋家，而且他在瑞士有的是时间。在随后的三年中，他不知疲倦地与战争的双方谈判，希望能够在战后夺回自己的王位。他可真是广撒网，双方都知道他在和另一方协商。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从来对希里米没有过什么好感，他在瑞士的拙劣手段更是火上浇油；他们鄙夷地拒绝了他的每一个提议。

但到了1916年，德国人对阿拔斯·希里米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不知是出于支持老朋友的江湖义气——或者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误以为希里米在埃及并非孤家寡人，而是有人支持，德国人坚定地相信，等打赢战争之后，被废黜的赫迪夫就是他们在埃及的代理人。德国人不断鼓励希里米和君士坦丁堡政权握手言和，这番努力终于在这年10月开花结果，希里米驾临土耳其首都。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普吕弗和前任赫迪夫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一同设计了埃及的未来：希里米将在德国朋友的帮助下重登王位，恢复先前的荣光。两人关系极其密切，而且柏林方面高度重视他们在埃及的未来代理人，很快普吕弗就几乎变成了希里米的专职指导者。他们的联盟在下一年中发展到了荒诞的地步，两个人构建着空中楼阁的梦幻，而真实世界就在他们周围燃起熊熊大火、轰然崩塌。

10月24日，他们出发了。乔治·劳埃德很快就理解了是什么让劳伦斯对深入沙漠腹地的旅行心醉神迷：这是一种进入超凡脱俗世界的感

觉，时间仿佛静止了。“往隘道去的风景极其壮美，”劳埃德当晚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两侧都是400英尺高的犬牙交错的玄武岩和花岗岩，月光照耀在我们面庞上。”[24] 他写道，陪伴他们的那位阿拉伯谢赫“带着两三名比亚沙奴隶，骑行在我们前头，就像是现代的萨拉丁出征迎敌”。

北上的旅途在最初几天很轻松。两个朋友在瓦迪鲁姆群山的盛景中行进时，探讨着中东战略，幻想着战后在阿拉伯半岛来一番大旅行。“我们打算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豢养一批奴隶，”劳埃德记述道，“还要有一匹骆驼专门用来运书，我们还要去朱夫和博瑞达，整天讨论沙漠政治。”劳伦斯轻松自如，甚至谈了一点自己的家庭和在牛津的成长经历，以及他在卡尔基米什的欢乐时光。劳埃德早已习惯了劳伦斯的沉默寡言，看到他“侃侃而谈”，不禁吃了一惊。

但令人不安的元素已经在旅途中出现。阿尔及利亚流亡者阿布德·卡德尔许诺要带劳伦斯去找他在雅莫科地区的族人，但在途中不断与其他人发生冲突。另一个麻烦人物是英国爆破专家伍德中尉。他在出发后的第一个夜晚在黑暗中迷了路，后来就一直闷闷不乐、满腹怨气，很少与两位英国同胞谈话，只是抱怨旅途的艰辛。这让劳埃德愈发担忧，因为由于从埃及来的补给线又一次瘫痪，劳伦斯在目标地域将不得不做一些风险极大的随机应变，而且一旦出事，就需要伍德来接替他。[25]

在阿里什的时候，劳伦斯向克莱顿索要1000码的新研发出来的轻型双股电缆，用来将葛里炸药同电雷管连接起来。有了这么长的电缆，爆破组就能远远地引爆雅莫科大桥，以及预备一些材料来进行第二次破坏。但被送到亚喀巴的只有500码的旧式单股电缆。因为需要将电缆叠成双股，所以劳伦斯离起爆地点的距离最多就只有250码。而且他很有可能在安置炸药的时候遭到敌人射击。劳伦斯希望能够偷偷将炸药安放在大桥的下主梁上，而不引起桥上土耳其哨兵的注意，但他还是设计了一个备用方案，即让其他人在周边山地上开枪，转移土耳其人的注意

力。如果劳伦斯在这过程中死亡——这绝非不可能——就必须由伍德接替他完成任务。

但这样假设的前提是，他们能够招募到足够多的人马。因为劳伦斯已经发现，人们对加入他的队伍非常不热情。劳埃德后来在给克莱顿的信中说，“只要能拦截火车，让阿拉伯人对它大加抢劫，就能暂时赢得他们的忠诚”，而这恰恰是劳伦斯以往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他们眼中，他是劳伦斯，伟大的劫掠者，超级突袭者，真正的、唯一的一种战争的真正的领袖。他也从来没有忘记，他能够统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给他们带来战利品。”[26] 劳伦斯为雅莫科行动招兵买马的时候，一旦解释说自己的目标不是火车，而是大桥时，对方的兴趣就迅速烟消云散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英国军官当中，劳伦斯已经赢得了真正的“印第安人侦察兵”的美誉，被认为拥有一种在沙漠中来去自如、如鱼得水的神奇本领。乔治·劳埃德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有两次，他们在夜间行进时迷失了方向。在第二次迷路时，劳伦斯坚持要朝着猎户座的方向走，认为这样就能回到正途，不料接近了土耳其军队的一座营地。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劳埃德在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他成功的概率比乍看上去要高得多。”

但事实上，劳伦斯顺利完成此次任务的希望甚至比劳埃德设想的还要渺茫。离开亚喀巴不久之前，有人向劳伦斯发出警告，称阿布德·卡德尔是个叛徒，已经被土耳其人收买了。劳伦斯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劳埃德。这或许是因为，发出警告的人是劳伦斯在汉志的老对手——爱德华·布雷蒙。

事实上，这位法国上校在最近几个月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他对阿拉伯起义的态度。这或许是由于他终于得知《赛克斯—皮科协定》将会确保法国得到叙利亚，或许是因为他认识到，不能阻止的事

情就需要去支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1917年秋季，帝国主义者布雷蒙已经遏制了自己在该地区阻挠英国政策的一贯作风，转而积极地向阿拉伯人输送法国武器和经济援助。劳伦斯当然知道老对手的这个变化，但或许是由于仍然相信法国人都是奸佞之徒，或许是决心无视越来越多的危险迹象，不管怎样都一定要继续前进，他选择对布雷蒙关于阿布德·卡德尔的警告充耳不闻[27]。但如果说布雷蒙的警告有错，错在他不知道这个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是近期被收买的。早在1914年11月，库尔特·普吕弗就见过阿布德·卡德尔，坚信他对德国—土耳其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28]。

如此之多的凶险征兆接踵而至，劳伦斯却置之不理，这表明了他听天由命的无奈心态，似乎他知道在这次行动中，他自己的生命无足轻重。劳埃德在与他一同行进的途中看到了他这种心态的迹象。有一次，劳伦斯阐述道，因为阿拉伯人从来不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情，因此无须遵守它；他们占领了叙利亚之后，或许能缔造自己的命运。劳伦斯透露说，他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就是为了这项事业，或者，就像劳埃德手写的对这次非同寻常谈话的记录那样，“劳伦斯不是在为英王陛下的政府工作，而是在为谢里夫（侯赛因）工作”[29]。

离开亚喀巴四天之后，10月28日晚，两位朋友坐下来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很快接近了真正危险的地域、不能回头的地点，而劳埃德对劳伦斯的“惊险表演”的担忧越来越深。劳埃德之前多次提议留下来陪伴劳伦斯，这次又再次提出。劳伦斯向他表示感谢，但是解释说，“他感到，让不是爆破专家的人员加入，只会给他自己带来风险”。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让劳埃德返回的更有利的理由，这是一个植根于自己必死无疑信念的愿望。“他希望我返回英国，”劳埃德在日记中写道，“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可能会被白厅毁掉，他认为我能挽救他的事业。”[30]

次日下午，两位朋友挥手言别，劳埃德调头返回亚喀巴，劳伦斯继续向雅莫科进发。1917年10月底，威廉·耶鲁终于抵达开罗，与将担任他的联络人的美国外交官取得了联系。这个外交官名叫查尔斯·克纳本斯修，是个无精打采、倦怠懒散的年轻人，拥有“美国外交部代办”的模糊头衔。考虑到英国情报网络在开罗无孔不入，两人很快得出结论，耶鲁应当多多少少公开地去找英国当局。“否则，”克纳本斯修向国务院报告道，“他们的间谍肯定会发现他的独立活动，这会引起对我方不利的猜疑。”[31] 于是，两个美国人请求尽早觐见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第二天，他们的愿望就实现了。耶鲁和克纳本斯修穿上自己最好的夏季西服，前往温盖特的官邸，那是尼罗河畔的一座红色砂岩豪宅。

对雷金纳德·温盖特来说，让又一个美国国务院官员在开罗四处游荡，既是好事，也有不利之处。一方面，由于美国已经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英国官员有义务与美国人建立互信和团结友好的关系，哪怕是在中东这样的美国根本不打算出兵的地区。另外，高级专员向美国人示好也有自己的隐蔽动机。他考虑到英国在该地区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政治泥沼——与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秘密协定，还要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誓许愿——温盖特越来越相信，美国或许能够帮助英国从这个泥沼中全身而退。就在耶鲁抵达开罗几天之前，温盖特向颇为惊恐的克纳本斯修表示，或许巴勒斯坦地区需要再一次重新洗牌，或许在战后不应当由阿拉伯人或法国人或多国或犹太复国主义者来控制中东，甚至不应当由英国控制，或许美国人愿意涉足此地、一试身手[32]。温盖特可以依靠克纳本斯修将这些试探的话以积极的色彩传达给美国国务院——克纳本斯修的太太是英国人，他本人非常亲英——但耶鲁或许也是个有益的附会的声音。

另一方面，如果一定要和一个新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打交道，温盖特和在开罗的所有知道威廉·耶鲁背景的人无疑都希望，最好这个人不要

是耶鲁。部分原因是，各个级别的英国官员都对耶鲁的老东家——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非常憎恶。在战争初期，英国人多次拦截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船企图绕过英国的海上封锁线、向德国人输送石油。外交上的呼吁也没有多少帮助，最终英国人扣押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船只，才真正打击了这种行为。但也只是打击了一点而已。就在这年夏天，也就是美国正式对德宣战的时候，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西的代表还向德国人销售石油，被抓了个现行。此人在为自己辩护时，居然温和地解释说，生意就是生意，如果他不向敌人卖石油，他的竞争对手肯定会的[33]。威廉·耶鲁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冷血的利欲熏心的公司文化，这让英国人很难对他有信心。

耶鲁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具体服务就更不能让人放心了。在开罗的英国人深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前任代表刚刚在敌境腹地作为受保护的中立国公民生活了两年，即使伦敦对耶鲁根据自己亲身经历传来的情报表示感激，作战一线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开罗的英军高层不能忘记，敌占巴勒斯坦最好的一条公路（耶路撒冷——贝尔谢巴公路，它是土耳其军队通往加沙前线的补给生命线，而英军两次在那里惨败）的大部分都是由标准石油公司在1914年修建的，而且威廉·耶鲁就是这项工程的主管。

因此，在温盖特与耶鲁的第一次温和友善的会晤之后不久，耶鲁又回来了，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这让温盖特左右为难。这位美国国务院特工不知从哪里得知了《阿拉伯公报》的存在，这是阿拉伯局从中东各地搜集的原始和绝密情报的每周汇编。《阿拉伯公报》高度敏感，发放范围仅限于大英帝国政界和军界的不到30名最高级官员，以及协约国政府的仅仅3名代表。威廉·耶鲁现在也要看《阿拉伯公报》。

温盖特斟酌再三，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是附加了一个典型英国式的条件。耶鲁可以自己阅读《阿拉伯公报》，但必须以荣誉起誓，在发给

国务院的报告中绝不直接引用它的内容。

毋庸置疑，这样的安排如果是针对欧洲高雅的军官阶层成员，一定是很好的，但从事后之明来看，高级专员对威廉·耶鲁背景的偏见或许应当更多一些才对。他刚刚把英国在中东最具时效性的秘密拱手交给人类历史上最掠夺成性的企业之一的前雇员，而威廉·耶鲁倒并不打算引用《阿拉伯公报》，而是要全套照搬。

耶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用循环逻辑的妙招为自己辩护：“英国人给我的信息不是给我个人的，因为我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名特工。如果我要执行政府雇用我去执行的任务，我就必须将自己获得的信息传达给国务院……其他国家政府的官员一定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们强加的条件是没有效力的。因此，在我判断有这样做的必要时，就毫不犹豫地引用《阿拉伯公报》中的信息。”[34]

耶鲁承认自己的逻辑可能有个漏洞——毕竟，外国官员要“理解”他的情况，必须先知晓他的情况才行——但耶鲁对此也有个顺手的借口：如果说他的美国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变了质，这肯定是由于“我和欧洲及东方的官员一起生活、与其打交道已经有四年之久”。

但这个年轻的美国特工身上还有一些东西是雷金纳德·温盖特没有理解的。威廉·耶鲁并不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前雇员。他实际上是从公司“休假”的，所以还能继续领到战前薪水的一半。如果开罗的英国官员开始对他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关系起了疑心，也不大可能发现真相，因为耶鲁已经安排好，让他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工资支票寄给他的母亲，存在纽约。[35] 在随后几个月内，当耶鲁浏览《阿拉伯公报》和其他所有到他手边的英国机密情报时，还会仔细地寻找提及石油的文字。1917年10月31日，亚伦·亚伦森和哈伊姆·魏茨曼在白厅的英国内阁会议室的前厅等候着。他们是应马克·赛克斯邀请前来的，有幸最先听取英国领导层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最新的决策结果。

等了许久，内殿的大门终于打开，春风满面的马克·赛克斯走了出来。“魏茨曼博士，”他宣布，“生了个男孩。”[36]

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随后被带进内阁会议室，去面见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和政府的其他一些高官。他们刚刚批准了一份已经酝酿了6个月的关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未来地位的声明文本。这过程的艰险曲折，以及许多英国高官对该问题仍然抱有的深深的保留意见，体现在声明发布的奇特方式上：外交大臣贝尔福将笔迹潦草、似乎是即兴写出的仅仅三句话交给了英国金融家沃尔特·罗思柴尔德。

最重要的一个从句是：“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竭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37]

这份手写的简短讯息很快就将以《贝尔福宣言》的名字闻名于世，从中将产生一个巨大争议，困扰世界一直到今天。但对亚伦·亚伦森来说，这是实现他的重建以色列国家的梦想的第一步，为了这项事业，他和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同胞已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但亚伦森还不知道这些牺牲将会多么沉重。在白厅的这个欢庆日子里，他和巴勒斯坦之外的其他人都还不知道，3周前在济赫龙雅各布发生了多么丑恶的事情。

11月初，对吉尔伯特·克莱顿、戴维·霍格思和其他一些在埃及的英国军官来说，有一个烦人的问题开始侵入他们沸腾般激动不已的大脑：劳伦斯在哪里？艾伦比将军的攻势就像钟表一样严格按照计划顺利展开。英国骑兵将贝尔谢巴周围的土耳其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在10月31日上午冲进了这座沙漠城镇，随后继续推进。到11月7日，加沙的土耳其驻军的增援路线被切断，面临很快被合围的危险，于是他们放弃了战壕工事，匆匆沿海岸北撤20英里。由于天气恶劣，英军未能乘胜追击，但现在他们已经突破了巴勒斯坦的第一道也是最强大的一道防线。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次胜利的余晖也开始黯淡，那些在阿里什与劳伦斯一起进行战略筹划的人越来越为雅莫科持续的沉默感到不安。11月12日，克莱顿向已经返回亚喀巴的乔治·劳埃德吐露心声：“我心急如焚地等待劳伦斯的消息。”[38]

当天，劳伦斯和他的队伍正在雅莫科以东约80英里处，希望能在这次事事不顺的行动中取得至少是一点点成绩。与劳埃德分别几天之后，劳伦斯抵达了沙漠堡垒村庄阿兹拉克，但发现他希望招募的塞拉欣族人不愿意加入他。主要原因是他们非常不信任阿布德·卡德尔，也怀疑他是叛徒。在劳伦斯激情洋溢的讲话的感召下，部落族人们终于加入了行动，但在前往雅莫科的途中，阿布德·卡德尔突然销声匿迹，最后一次有人看见他时，他正奔向一个土耳其人控制的城镇。但劳伦斯仍然不愿回头。

尽管挫折接二连三，他还是仅差一点就成功了。11月7日夜间，劳伦斯和他的爆破组抵达了西哈布山处的铁路桥，就在一名土耳其哨兵的鼻子底下拖运葛里炸药走下峡谷，这时突然有人的步枪掉落到岩石上。六七名土耳其卫兵被声响惊动，冲出哨所，开始向四面八方疯狂地胡乱射击。负责搬运葛里炸药的搬运工得知这种炸药被子弹击中就会起爆之后，当即将炸药丢进溪涧，逃往安全地带。劳伦斯别无选择，只得也跟了上去。

战争中的人最为迷信，即便是最坚信纯粹理性的人现在也该决定，雅莫科袭击小组应当立刻停手，能活这么久已经是福气了，赶紧逃命才是要务。但劳伦斯似乎中了魔，一心要从这次行动中取得至少是一星半点儿的成功。他决定再伏击一次火车。

但要这么做，承担的风险就更大了。他的队伍粮食奇缺，于是他命令部分成员离开。其中包括印度机枪手们，这意味着，即便袭击火车能够成功，袭击者也没有重武器的保护。另外，由于在雅莫科大桥丢失了

大量电缆，现在炸火车的人起爆的时候离起爆点就只有50码远。承担这个任务的人将是劳伦斯。

他选择的袭击地点是安曼以南汉志铁路主干线在米尼菲尔村外的一段偏僻的铁轨。劳伦斯蹲伏在一座小灌木丛后，隐藏好自己的起爆器，但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铁轨。他起初试图炸毁一列长长的运兵火车。对他自己以及藏在附近冲沟中的60名部下来说非常幸运的是，电缆失灵了——一旦起爆，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土耳其士兵一定会将他们尽数屠戮——在万分痛苦的几分钟内，劳伦斯不得不忍受着缓缓经过的列车上土耳其士兵困惑的凝视，有时还强作笑颜地向他们挥手示好[39]。

次日，劳伦斯成功袭击了另一列较小的运兵火车，在这次袭击中他的生存概率也不高。他的位置离起爆点太近，爆炸的冲击波将他掀翻飞出好远——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被摧毁的火车头的很大一部分直接砸在了起爆器装置上，而片刻之前这起爆器还在他的两膝之间。劳伦斯精神恍惚地挣扎着站起身来，看到自己的衬衫成了碎布片，血从左臂滴下来。烟尘散尽后，他看到自己面前是“一个人的上半身，被严重烫伤，冒着烟”，下半身被炸飞了50码远。

“我感到逃跑的时候到了，”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但我行动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右脚剧痛无比，于是我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头还因为爆炸的冲击而昏昏沉沉。走起来之后，昏沉的感觉就开始消退，我蹒跚地向高处山谷走去，阿拉伯人正从那里向拥挤的车厢射击。”

劳伦斯跌跌撞撞地走向安全处时，火车上的土耳其士兵向他瞄准射击——但打得不准；据他自己说，至少有五发子弹擦伤了他，“其中有些擦得很深，很不舒服”。他走的时候还处于恍惚状态，于是唱起一首古老歌曲来鼓励自己继续前进：“哦，但愿那不曾发生过。”

在10个月前攻打沃季赫的时候，曾有一名英国军官不肯等待被围困的土耳其驻军投降，而是带领一支突击队登陆，导致约20名阿拉伯人死亡。劳伦斯对他作了严厉批评。他对那次战斗评论道：“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的行动，或者射击，或者伤亡，不仅仅是浪费，而是罪孽……我们的起义军不是像士兵那样的材料，而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信任我们的领导。我们不是来指挥他们的，而是应他们邀请来的。我们的战士都是志愿兵——普通人、当地人、亲属——所以每个人的死亡都会给起义军中的很多人带来悲痛。”[40]

在米尼菲尔，劳伦斯以区区60人的兵力，敢于挑战约400人的土耳其部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一些部下甚至没有武器，只能向瘫痪的火车投掷石块。很快就有约20名起义军战士被击倒在地，包括被派到铁轨处营救劳伦斯的7人。劳伦斯对英国军官在沃季赫行为的批评与他自己在米尼菲尔的所作所为之间有着莫大矛盾，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在过了残酷的10个月之后，他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了。

“次日，”他如此记载米尼菲尔战斗的后续，“我们来到阿兹拉克，受到热烈欢迎。我们还——上帝宽恕我们吧——吹嘘自己打了胜仗。”

---

[1]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455.

[2] Aaronsohn to Alex Aaronsohn，October 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11.

[3] Yale，*Diary*， September 25，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2.

[4] Aaronsohn to Alex Aaronsohn，October 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11.

[5] Clayton to Joyce，October 2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175；Joyce memo，undated；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8/634. See also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p.447-48.

[6] Lawrence，*Seven Pillars*， pp.387-89.

[7] Clayton to Wingate，November 13，1916；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Papers，143/2/190.

[8]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 pp.298-99.

[9] Sheffy，*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p.162；Engle，*The Nili Spies*， pp.167-68.

[10]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 p.303.

[11] Engle，*The Nili Spies*， pp.186-87.

[12] 甚至在NILI间谍网被破获之后，德国人仍然继续警告土耳其人，要慎重对待犹太人。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向塔拉特帕夏建议“不要将任何一起单一的犹太人间谍案扩大为对犹太人的全面迫害”。Bernstorff to Foreign Ministry for Warburg，October 26，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20，Roll 4334，Frame K179639。

[13] See Sheffy，*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p.162 nn.77 and 78.

[14]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 p.326.

[15] Engle，*The Nili Spies*， p.202。约瑟夫·利申斯基在土耳其当局和犹太民兵的追捕下，终于在10月20日用光了好运气，在耶路撒冷城外被捕。他和纳曼·贝尔坎德一起被判处叛国罪，在1917年12月两人在大马士革被公开处以绞刑。

[16] 关于土耳其人搜查济赫龙雅各布、抓捕NILI组织成员的时间长度，以及萨拉·亚伦森开枪自杀后活了多久，已出版的资料的说法有很大差别。后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萨拉开枪后被传唤来的医生作证称，她企图自杀是在10月5日，而照顾萨拉的两位德国修女说她死于10月9日。

[17] Engle，*The Nili Spies*， p.191.

[18] Hogarth to Ormsby-Gore，October 26，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4，f. 388.

[19] Lawrence to Leeds，September 24，1917，in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238.

[20] See various George Lloyd reports on Hejaz economy and political situation，Autumn 1916，in 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8.

[21] Lloyd to Clayton，September 30，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

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3.

[22] Lloyd to Clayton，October 20，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3.

[23] Clayton to Lloyd，October 25，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0.

[24] Lloyd，“Diary of Journey with T.E.L. to El Jaffer，” October 24，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1.

[25] Lawrence，*Seven Pillars*，pp.421-23.

[26] Lloyd to Clayton，November 5，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0.

[27] Liddell Hart，*Colonel Lawrence*，pp.193-94.

[28] Prüfer to Oppenheim，November 3，1914；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7，Roll 23，Frame 213.

[29] Lloyd，notes from travels，undated but late October 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0。Jeremy Wilson在他的授权版劳伦斯传记里将乔治·劳埃德手写记录中的一个关键点抄错了，将“HMG”（英王陛下的政府）写成了“盟国”。于是，他的引文错误地变成了“劳伦斯不是在为盟国工作，而是在为谢里夫工作”。显然，这个错误扭曲了劳埃德的本意和劳伦斯据说曾有过的表达，但后来的很多劳伦斯传记作者都重复了这个错误，他们想尽可能将劳伦斯的不服从上级解释为他是在反对盟国（也就是法国），而不是反对英国政府。

[30] Lloyd，“Diary of Journey with T.E.L. to El Jaffer，” October 28，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1.

[31] Knabenshue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23，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Box 1047，111.70Y1/3.

[32] Knabenshue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November 4，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Box 6，Frame 0827.

[33] Hoover（U.S. Consul，Säo Paulo，Brazil）to U.S.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21，1917；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M367，Roll 217，document 763.72112.5321.

[34]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8，pp.18-19.

[35] Yale，*It Takes So Long* ，margin note，chapter 7，p.21.

[36] Weizmann，*Trial and Error* ，p.208.

[37] As reproduced on frontispiece by Stein，*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38] Clayton to Lloyd，November 12，1917；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9/10.

[39] 劳伦斯关于米尼菲尔火车袭击行动的记述见*Seven Pillars* ，book 6，chapters 77 and 78，pp.425-34。

[40] Lawrence，*Seven Pillars* ，p.163.

第16章 风暴聚集

> 关于阁下近日向罗思柴尔德勋爵发出的关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宣言，我们满怀敬意地恳请阁下注意，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关键组成部分——恰似心脏是身体的关键所在——不能作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分离。

——1917年11月14日，埃及的叙利亚委员会给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的信[1]

> 英国当局给叙利亚委员会的答复是：……给贝尔福先生的电报目前不能发送给他们，但英国当局很高兴地看到，在埃及的叙利亚人表达了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意见。

——1917年12月17日，威廉·耶鲁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2]

从约旦首都安曼出发向东行进，没有什么养眼的风景。走了几英里之后，安曼的崎岖多山的轮廓就消失了，眼前是一片延绵起伏的沙砾和粗沙的平原。因此，当人们来到深入凄凉沙漠50英里的阿兹拉克要塞的巍峨石墙前时，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惊异，居然会有这样的所在。在这个辽阔而了无生趣的地域，如此雄壮的要塞、它的3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墙各角上甚至更高的瞭望塔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

答案当然是水。在古时，这个绿洲是周边近5000平方英里土地的唯一生计来源。罗马人最早注意到了阿兹拉克的战略意义，于2世纪在绿洲旁建造了一座小堡垒。1000年后，萨拉丁的阿尤布帝国建造了屹立至今的巨大石制要塞。甚至在今天，要塞依然俯瞰着与它同名的城镇，但在1917年11月，劳伦斯和他的一小队人马在米尼菲尔袭击火车之后逃到阿兹拉克时，这个居民点只有几座石头小屋，要塞在他们面前一定是如同幽灵般拔地而起。

6月的时候，劳伦斯曾在阿兹拉克觐见过卢阿拉部落的埃米尔——

努里·沙拉昂。当时他就注意到，这是个绝妙的藏身之地。除了有水和避难处之外，要塞还居高临下，俯视周围所有方向的沙漠地带。劳伦斯在米尼菲尔的袭击之前就把印度机枪组派到了那里，所以他和其他人在11月12日抵达要塞时，机枪已经被安置在了要塞的瞭望塔上，令这个地方几乎固若金汤。这个绿洲非常理想，于是劳伦斯很快决定，将它作为阿拉伯起义向叙利亚腹地进军的前进基地。抵达阿兹拉克一天之内，他就派遣一名信使踏上前往亚喀巴的200英里旅途，请费萨尔开始将他的军队前锋派往北方。

在阿兹拉克安营扎寨还有一个更狡黠的目的。这个居民点是努里·沙拉昂领地的西北边界。尽管费萨尔不断恳求他加入起义阵营，而且劳伦斯自己也在6月求他加入，但沙拉昂仍然骑墙不定，有时悄悄地支援阿拉伯起义军，有时公开与土耳其人做交易。阿兹拉克恰好在卢阿拉腹地和土耳其人控制的叙利亚贸易城镇之间，起义军在这里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他犹豫不决，不肯表明立场，只是因为他在叙利亚有很多财产，”劳伦斯对沙拉昂评论道，“以及他的族人一旦失去了天然的市场，会受到损害。现在，我们住在他的一个主要领地之内，会让他耻于投敌。”[3]

在阿兹拉克，劳伦斯的小小队伍很快就不再是一群战士，而变成了临时的建筑队，开始修葺整理要塞，好让即将起程前往此地的更大的部队居住得舒适些。他们修补了坍塌的城墙和坍陷的屋顶，甚至修整了庭院里前一阵子被当作羊圈的小清真寺。起义军抵达的消息传开之后，他们的劳动不时被部落代表团的拜访打断，随后自然是要大摆筵席、欢庆一番。劳伦斯在南塔中修复的警卫室安顿下来，逃脱了这些喧嚣，得到了宜人的休憩。

《智慧的七柱》虽然细节极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被细节淹没了——但劳伦斯在书中对阿兹拉克的描述有些非同寻常之处。整整5页的

篇幅中包含了整部回忆录的一些最情真意切的段落，他恋恋不舍地描摹了他在那里的美好时光、他的追随者与访客之间欢乐的同志情谊，还抒情地描述了要塞高墙之外号叫不止但从未被看见过的神秘的豺狼。冬雨开始降下的时候，要塞变成了一座漏水、冷湿的监狱，唯一的慰藉就是裹着羊皮取暖，但在他笔下，这些苦痛却有着鲜明的浪漫色彩。“我们躲在那里，彻骨冰冷，一动不动，从黑暗的白天到黑暗，我们的头脑似乎悬空在这些厚重的大墙之内，刺透力很强的雾气流入每一个射击孔，如同白色三角旌旗。过去与未来从我们上方流过，仿佛没有漩涡的河流。我们做着梦，进入这个地方的灵魂；围城战与飨宴、袭击、谋杀、夜间的情歌。”[4]

让这一切更加不寻常的是，劳伦斯在11月在阿兹拉克只待了6天时间，或许只有3天。或许，这个地方在他的脑中产生了田园诗般的浪漫色彩，是由于他刚刚经受的磨难。在上一个月内，自从构想出袭击雅莫科大桥的计划以来，劳伦斯就一直生活在一个阴影之下：他知道自己命悬一线，可能时日无多。在阿兹拉克，那个阴影突然间销声匿迹了。

或许他的浪漫心绪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抵达阿兹拉克仅仅3天之后，劳伦斯在3个人陪伴下又一次进入沙漠。他们的目的地是重要的铁路枢纽城镇德拉，在西北方70英里处。在那里，劳伦斯将会经历他在整个战争生涯中最恐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也是最让他的许多传记作者们激烈争论的一场磨难。11月16日下午，也就是亚伦·亚伦森动身离开伦敦的前夕，他发现自己被骗了——或者说，他肯定是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这时，他终于收到了哈伊姆·魏茨曼关于他在美国任务的指示。两人在近日对任务作了极其详尽的讨论，亚伦森几乎不需要读这封信。但他还是读了。

魏茨曼对他的指示基本上就是：闭嘴。他写道：“执行这些复杂的任务需要你避免公开讲话和接受记者采访。为了防止你在压力之下做这

些事情，我们按照你的意愿，正式要求你谨言慎行，仅限于业已规定的任务。”为了避免误解，魏茨曼还命令亚伦森“除了通过布兰代斯先生（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中介之外，不得有任何直接行动，不论是通过演讲还是信函”[5]。

亚伦森读信之后怒火中烧，尤其是因为魏茨曼竟然说，钳制他的言论是他自己的意愿。“这老头不是傻瓜，”他在当夜的日记中恼火地写道，“但我也不是那么天真……每天都能看到魏茨曼的虚伪的新证据。”[6]

自6周前抵达伦敦以来，亚伦森和这位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两人的关系很复杂，植根于互相的尊重和不信任，他们有时把酒言欢，有时却大吵特吵。在魏茨曼伤人自尊的指示信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原因也很简单：几天之内，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最戏剧性和意义深远的一些事件。

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贝尔福宣言》，但与此同时还传来捷报，英军在巴勒斯坦进展神速。艾伦比的部队在贝尔谢巴取得突破之后，继续北进，将组织凌乱的土耳其军队驱散。尽管亚伦森还不知道，但就在11月16日这天，英军前锋部队不受阻挡地开进了海滨城市雅法（离他们的出发点有50英里），而其他单位则逼近了耶路撒冷城下的山麓丘陵。让流散全球的犹太人重返祖先家园的梦想原本是那么遥远，甚至只是个理论，但现在却以飞速接近事实。

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事件令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欣喜若狂。全世界的犹太人飞地都向英国外交部发来潮水般的对《贝尔福宣言》的感谢信。这种洋溢的感激之情似乎当即就证实了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在英国政府内部的盟友几个月来一直在宣扬的观点，即如果协约国宣布支持犹太人家园并努力促成其实现，就能赢得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支持。

但这种反应并不是普遍现象，而且其他地方的火热支持令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不动声色愈发显得刺眼。到11月中旬，很少有美国报纸提及《贝尔福宣言》——《纽约时报》仅用了三个非常短的段落来报道此事——而许多著名的美国犹太人领导人还没有公开发表意见。最惹人注意的是威尔逊政府的沉默，这让魏茨曼和英国政府特别烦恼，因为他们曾专门为了赢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而重写了宣言的文本，因而导致宣言的发表被推迟。

9月，英国人将宣言的建议稿第一次明确地交给美国人时，伍德罗·威尔逊最亲信的顾问爱德华·豪斯上校曾告诉英国人，总统顶多只会含糊地对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表示“同情”，而且总统“绝对不会做任何真正的承诺” [7] 。英国人随后将宣言最初的激烈言辞冲淡，终于让威尔逊完全支持宣言，但威尔逊仍然有一个主要条件；白宫在10月中旬通知伦敦方面，总统“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在公开宣言时不要提及他的支持，因为他已经做好安排，让美国犹太人请求他支持，然后他才会公开表示支持” [8] 。

但是威尔逊的沉默让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事犹豫不决，这就使得总统得以继续保持沉默。亚伦·亚伦森被派往美国，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因为他是许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知己故交。

几天前，英国外交部的一次高级别会议敲定了他的任务的目标。魏茨曼和马克·赛克斯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亚伦森的使命的确是雄心勃勃。作为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间的正式联络人，亚伦森的任务是“协助我们的美国组织了解中东的诸多政治与军事事态发展的实际意义”，以及推动“激发犹太复国主义热情、鼓动支持协约国的宣传”，另外，为了推进赛克斯的异想天开的主意（在中东建立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的联合），还要努力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力量与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力量的团结与联盟”。此外，亚伦

森还将担任魏茨曼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领导人——美国最高法庭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之间的正式联络人。[9]

尽管任务艰巨，亚伦森还是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任务，并已经通知自己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伙伴们，他马上要来了。这就使得魏茨曼在11月16日的指示信对他而言更具侮辱性。

但这么多年来，想让亚伦·亚伦森闭嘴的人很多，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他很快就将魏茨曼的掣肘视为一种挑战，于是在次日就在伦敦的尤斯顿车站登上开往利物浦的火车，在那里登上了驶往纽约的“圣保罗”号。

但我们必须要替魏茨曼辩护一下，他努力封住亚伦森的口，并非仅仅是要压制他。魏茨曼知道，亚伦森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结交甚广，但在之前的6周内他和亚伦森接触很多，已经开始为他焦躁冲动的个性感到担忧。考虑到亚伦森到美国其实还有个秘密任务，这就更让人担心了。

考虑到在不久的将来英国将会完全控制巴勒斯坦，以及为了安抚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群众对《贝尔福宣言》表达的忧虑，赛克斯和魏茨曼决定，尽快向该地区派遣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以评估形势。赛克斯尤其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够包括美国代表，因为他希望这样世人就会以为威尔逊总统对《贝尔福宣言》以及英国未来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作了默许。但他面对着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美国仅仅是对德宣战，威尔逊还明确表示，他绝不愿意卷入任何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事务；因此他的政府是否会批准让美国犹太人参加这个委员会是非常存疑的。于是，亚伦森的美国之旅就有了一个秘密任务：让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向威尔逊政府施加压力，不仅要公开支持《贝尔福宣言》，还要改弦易辙、向土耳其宣战。

但亚伦森抵达美国时，听到了一些令他魂飞魄散的消息。12月1日，在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驻纽约办事处，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他最年幼的弟弟萨姆（他刚刚抵达开罗）的电报。在NILI间谍网被土耳其人摧毁整整两个月后，亚伦森终于得知了这个噩耗。弟弟的电报还讲到了他们的姐妹萨拉、父亲埃弗拉伊姆的死，以及纳曼·贝尔坎德被处决[10]。

“牺牲圆满了，”亚伦森在当夜的日记中写道，“我素来知道，最悲惨的不幸还没有到来，但害怕它是一回事，知道所有希望均已破灭却是另一回事。可怜的父亲，可怜的萨拉……她的死最凄惨。”[11]

这些噩耗让他对魏茨曼和其他那些在欧洲企图遏制他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愈加怨恨。在两年时间里，亚伦森和他的亲朋好友们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很多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而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人只是开开会、写写小册子而已。12月2日的事情让亚伦森更加准确地把握到了这种反差。就在亚伦森收到阿特利特传来的噩耗的第二天，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一些成员在伦敦的阿尔伯特大厅把酒言欢，庆祝《贝尔福宣言》公开一个月。

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位作家，能够更加精细缜密甚至是充满爱意地描写自己遭到的毒刑拷打。[12]

按照劳伦斯的记述，拷打于11月20日上午开始。3天前，他带领3名护卫离开了阿兹拉克，前去勘察铁路枢纽城镇德拉周边的乡村。现在，他想亲自查看德拉的铁轨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模大样、明目张胆地去看。于是这天早上，劳伦斯和其中一名护卫骑到城北7英里处一段偏僻铁路线上，下了骆驼，然后身披阿拉伯长袍，徒步沿着铁路走进德拉。

一切顺利，但是在经过土耳其军队的一个营地时，这两人引起了一名警觉的军士的注意。军官抓住了劳伦斯，宣布“贝伊（长官）要见

你”，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允许劳伦斯的伙伴继续前进。

当天余下时间里，劳伦斯被关押在一间警卫室内，等待觐见贝伊。土耳其人怀疑他是个土耳其军队的逃兵。他解释说，自己是个切尔卡西亚人（高加索北部的一个山地民族，免于服兵役，并且以肤色白皙、眼珠颜色较浅闻名）。晚上，卫兵把他带去贝伊的房间。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称此人为“纳希”，但他的真名是哈基姆·毛希丁，是德拉当地的总督。

哈基姆命令卫兵退下，将劳伦斯拖到床上，原来是要对他加以性侵。他挣脱开来，总督就叫来卫兵。卫兵将劳伦斯按在床上，开始剥去他的衣服。哈基姆开始动手动脚，直到劳伦斯用膝盖猛击他的腹股沟部。

劳伦斯赤身露体，被卫兵按在床上。暴跳如雷的哈基姆向他扑了过去，既带着热情又夹杂着狂怒，亲吻他，往他身上吐唾沫，咬他的脖子，直到出血，最后捏起他胸前的皮肤，用刺刀穿刺他。根据劳伦斯的说法，贝伊然后命令卫兵“把我带出去，好好教导我”。

随后是一场恐怖的毒刑拷打。劳伦斯被拖进附近的一个房间，按倒在一条长凳上，两名卫兵“跪在我的脚腕上，压着我的膝盖内侧，另外两人扭曲我的手腕，直到它们咯吱作响，然后将我的手腕和脖子狠狠砸向木凳”。卫兵拿来了一条短鞭，四名卫兵轮流鞭笞劳伦斯的后背和臀部，足足打了几十下，如果不是几百下的话。“最后我完全垮掉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满意了，”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回忆道，“我不知道怎么的已经离开了长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我舒服地蜷伏在那里，晕头晕脑，喘着粗气，但迷迷糊糊地有点舒服的感觉。”

但他的折磨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开始出现了幻觉。负责刑讯的军官凶狠地猛踢他的肋骨，命令他站起来，他却只是漫不经心地抬头向那人

微笑。见劳伦斯如此放肆，军官“扬起胳膊，将整个一条鞭子抽向我的腹股沟。我痛得蜷缩起来，喊叫着，或者说，努力去喊叫，却是徒劳无益，张大嘴巴，浑身战栗，却发不出声来。其中一名卫兵快活地咯咯傻笑。一个声音喊道：‘可耻！你把他打死了！’随后又是一记鞭子。一声呼啸，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劳伦斯最后又被拖回到哈基姆的住处，但“他匆匆拒绝了我，因为我遍体鳞伤、浑身血污，不能上他的床”。劳伦斯的苦难终于结束，他被拖到庭院中，丢到一座棚子处，一名亚美尼亚“包扎员（即男护士）”被叫来为他清创和包扎。然后拷打他的人就这么离开了。

他们会这样离去，只是一系列非同寻常——有些人会说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一，这些事件最终将劳伦斯从他最严酷的折磨中解救了出来。按照他自己的记述，拂晓将至，他攒起全身力气爬起来，探查一下凄凉的周围环境。在附近的一个空房间内，他发现门上挂着“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他穿上衣服，爬出窗户，跳到外面空荡荡的大街上。他跌跌撞撞地走过刚刚醒来的城镇，直到将它抛在脑后。恰好有个骑骆驼的商人经过，他甜言蜜语地哄着商人，让他带上自己。劳伦斯坐着骆驼最后来到外围村庄，在那里做好了与阿兹拉克的伙伴会合的安排。他在那里找到了他们。伙伴们先前为他的被俘心急如焚，现在则为他的成功逃生惊异不已。

“我给他们讲了一个贿赂和计谋的欢乐故事，”劳伦斯记述道，“他们许诺不会把这故事说出去，大声嘲笑土耳其人的幼稚。”当天下午，大家骑马踏上了返回阿兹拉克的70英里路程。

以上就是劳伦斯对这个恐怖之日记述的概括，这只是概括，因为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用了长达5页的篇幅详细描写自己在德拉遭受的毒刑拷打，跃然纸上，令人毛骨悚然。但如此令人胆寒的细节堆积得如此之多，却给故事遮上了一层迷雾，让人无法看清事情的真相。劳伦

斯说“另外两人扭曲我的手腕，直到它们咯吱作响”，是说自己的手腕被拧断了吗？他是否遭到了强暴？有好几条委婉的线索似乎说明他遭到了性侵，但也有线索似乎表明并非如此。更令人困惑的是，对他遭受的毒打的详细描写似乎带有一种隐隐的淫秽、窥阴癖的色彩。例如，在写到自己的皮肤被刺刀穿透的时候，劳伦斯是这样描述的：“鲜血颤抖着从我身侧流下，滴到我的大腿前面。哈基姆看上去很满意，用指尖将血抹到我肚子上。”后来，在鞭笞之后，敌人狠踢他的肋骨，他又说这是“一种甜美的温暖，或许带有性的意味，在我体内膨胀起来”。

有鉴于这些精确而极富说服力的细节，劳伦斯的许多传记作家——事实上是大部分人——都做出结论，德拉的事件不可能是像他描述的那样，甚至或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简单地说，如果劳伦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在德拉遭受了如此残忍的毒打，又怎么可能轻易逃脱？就算他那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是真的，刚刚手腕还被扭曲得“咯吱作响”的人又怎么能爬出窗户？鞭笞会严重地扰乱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很多受害者在被鞭打30下的几个小时之后都站不稳；劳伦斯被鞭打的数目更多，他怎么能徒步穿过一座敌人控制下的城镇而不被察觉，旋即骑马奔驰70英里？

考虑到劳伦斯随后的行动，他的说法就更让人无法信服了。返回阿兹拉克两天之后，他又动身奔赴亚喀巴。这是骑骆驼要走4天的艰难路程。到了那里之后，他没有向自己的英国战友们提及在德拉遭受的折磨。多年之后，他的几名战友在接受询问时回忆称，劳伦斯回来之后似乎心事重重，其中甚至有人说他“面色苍白，显然心烦意乱”[13]，但没有人说看到他身上有割伤或瘀伤，或者他看上去身体状况不好。事实上，在德拉事件不到3周之后，戴维·霍格思见到了自己的弟子，随后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劳伦斯看上去“比我上次见他时身体更健康”[14]。

让《智慧的七柱》中对德拉事件的描述更加令人生疑的是，19个月

后，劳伦斯又讲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那是在1919年6月写给军中好友沃尔特·斯特林上校的信中。劳伦斯在列举阿尔及利亚叛徒阿布德·卡德尔的变节罪行时讲到了这件事情。劳伦斯向斯特林解释说，这个阿尔及利亚人不仅破坏了他的雅莫科大桥行动，而且德拉的总督哈基姆·毛希丁之所以能认出他（劳伦斯），“就是因为阿布德·卡德尔对我的描述（我是从哈基姆说的话，以及看押我的卫兵那里得知卡德尔的叛变行为的）。哈基姆是个色欲强烈的鸡奸者，对我有了好感。于是他把我关押到夜间，想占有我。我不肯就范，经历了一些困难之后才脱身。哈基姆把我送去医院。我的伤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于是在黎明前逃走了。他对这件事情搞得一团糟感到非常羞耻，所以封锁了所有消息，没有上报我被俘虏又逃脱的事情。我回到了阿兹拉克，对阿布德·卡德尔非常恼火。”[15]

与《智慧的七柱》的版本相比，这个故事的说服力既更强，也更弱。没有了书中描述的哥特小说一般的残酷折磨，“伤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的劳伦斯或许有足够的体力逃生。但另一方面，如果哈基姆真的认出了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土耳其政府对劳伦斯的脑袋悬赏2万土耳其镑——而居然让他待在一个棚子里过夜，没有安排警卫，实在太荒唐。俘虏劳伦斯的士兵们在虐待他的时候谈话的主要话题居然是阿布德·卡德尔揭露他的真实身份，这也让人难以相信。

但不管怎么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德拉确实是发生了某些事情。许多熟识劳伦斯的人会证明，大约从那一时期开始，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更加孤傲冷漠。不久之后，他开始组织一个私人卫队，大约有五六十名精锐战士，几乎无时无刻不陪伴在他身边。

后来劳伦斯又对德拉事件作了第三次描述，表明他在那里的经历与之前公之于众的版本大不相同，在某些方面更加严酷。这是在1924年给夏洛特·萧（作家萧伯纳的妻子）的一封信中。

劳伦斯在战后与萧夫妇结为至交，夏洛特·萧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忏悔牧师的角色，或者按照劳伦斯自己的说法，“不管怎样，这个孤独的女人都能让我感到自在心安”。或许是在回答夏洛特·萧的一个问题时，他写道：“关于那一夜，我不应该告诉你，因为正派人是不会说这种事情的。我本想在书中实话实说，与自己的自尊搏斗了几天。自尊不愿，也没有弃我而去。因为害怕被伤害，或者是为了从令我发狂的剧痛中获得5分钟的喘息，我放弃了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时带来的唯一财产：身体的纯洁。这是件不可原谅的事情，是不可恢复的状态，就是这件事让我发誓弃绝体面的生活……你或许说，我这是病态，但想想那种侵害，以及我这么多年为它冥思苦想的烈度。”[16]

这段话虽然带有他标志性的隐晦，但暗示德拉发生了与他之前描述完全不同的事情：劳伦斯为了避免遭到毒打，或者至少是为了让毒打停下来，向侵犯者的放肆妥协了。如果的确如此，就能解释他为什么能够逃脱——因为他身体受到的殴打很少——他为什么会给阿兹拉克的伙伴们讲一个“欢乐故事”并让他们发誓保守秘密，他为什么没有向亚喀巴的英国战友提及此事，以及他为什么之后始终隐瞒真相。

但如果他躲过了最严重的身体折磨，代价却是一连串复杂的心理问题。任何强奸或者刑讯的受害者都可以证明，伤痛中最难以释怀的部分或许不是疼痛或者甚至对此事的恐惧，而是一种深切的（尽管是不应当的）羞耻感。劳伦斯显然既遭到了强暴，又遭到毒打。这种折磨对大部分人都是致命打击，但对劳伦斯而言，尤其深深伤害了他自我形象的内核。自孩提时代以来，他内心一直抱有斯多葛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有能力承受任何折磨或者艰辛，但现在，在他最绝望和脆弱的时刻，这个信念抛弃了他。除此之外，如果劳伦斯是受到严重压抑的同性恋者的理论值得相信的话，这种苦难很可能造成了一种性层面的自我憎恶。或许从此以后他会一直问自己，他举手投降是因为害怕痛苦或者死亡，还是因为私底下被这种行为吸引？所以，经受了如此创伤的人会

希望用恐怖的暴力来装点自己对它的记忆，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暴力能够洗脱负罪感，因为面对如此凶残的暴力，人的意志和抵抗都无济于事。

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促使我们相信，劳伦斯在德拉经受了对他伤害极大的事情，而且此事更接近他给夏洛特·萧的描述，而与告诉沃尔特·斯特林的情况或《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相差较远。10个月后，他将重返那座叙利亚铁路城镇，并在那里做出他在战争期间最残暴的事情，带有极强的复仇色彩。

1917年12月4日晚上，贝鲁特的名流贵人欢聚一堂，为杰马勒帕夏举办了一个宴会。“我每次来到贝鲁特的时候，”杰马勒如此开始了他的演讲，“我都观察到，这里的居民忠心不二。这让我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爱意。我借此机会感谢他们对我的好意。”[17]

叙利亚总督的这个策略非常大胆，因为他与贝鲁特其实一直争吵不休。贝鲁特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摇篮，所以杰马勒以不忠诚的罪名放逐了数百名贝鲁特市民，而周边的黎巴嫩地区在肆虐战时叙利亚的饥馑中损失格外严重，很多人相信那是政府有意为之。另外，土耳其当局从关闭的法国领事馆中窃取到一些文件，揭穿了25名所谓的反土耳其密谋分子。杰马勒命令将这些人分两批绞死在城市的大炮广场。到1917年12月他的宴会举行时，大炮广场已经被贝鲁特居民们称为“烈士广场”，这个名字一致沿用至今。

聚集在那里的名流们也不会因为杰马勒的慷慨言辞与他争执，因为当晚是个饯行宴。在三个风云激荡的年头之后，这位来自莱斯博斯岛的喜怒无常的军人即将离开在叙利亚的岗位，尽管官方的说法是，他只是暂时离开，但宴会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杰马勒自己，都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

恩维尔帕夏最近实施了一番重组，在叙利亚的奥斯曼军队的领导权被交给了一位新的德国指挥官——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作为对杰马勒的安慰，恩维尔任命他为叙利亚与西阿拉伯总司令。这个头衔听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军权。“是某种二流的总司令，”杰马勒的私人秘书法里赫·勒夫克写道，“大炮、机枪、步枪和剑全都由那个德国人掌管，而杰马勒帕夏得到的只是那个神气活现的头衔，可以附在签名上……就像是我们过去向空旷沙漠里的贝都因部落谢赫们授予的‘帕夏’荣誉头衔一样。”[18]

如果恩维尔帕夏这么做就是为了刺伤杰马勒的荣誉感，这个目标达成了。杰马勒辞去了各种职务，宣布自己打算返回君士坦丁堡。他将自己的倒台归咎于恩维尔，在贝鲁特的演讲中作了一番小小的报复。他谈到了城内大炮广场的处决，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仍然让他的许多听众耿耿于怀。“诚然，一个时期以前，我绞死了一些阿拉伯人，”他说道，“但那不是我要做的，而是由于恩维尔帕夏的坚持。”[19]

杰马勒的任职经历与他本人的个性一样自相矛盾。他在公众面前发出的征服埃及的誓言导致了西奈半岛的惨败，但他的军队在加沙城下两次成功地抵挡住了英军，他是有功劳的。他主持了叙利亚全境的许多雄心勃勃的现代化工程——铺设和拓宽城市街道，电气化，建造新的公园、清真寺和市政建筑——与此同时，他的数十万臣民，或许多达100万人，因饥馑和疫病而死去。他曾努力缓解亚美尼亚人遭受的困难，但同时却得到了迫害犹太人的恶名。他对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强硬政策压倒了他们的起义热情——在他在任期间，叙利亚没有一个省份发生较大规模的起义，但他对汉志的埃米尔侯赛因的温和态度却导致了严重后果。

他离开叙利亚的时机很好。法尔肯海因努力将一支精锐的土耳其部队——耶尔德勒姆集团军群带往南方，先发制人地对云集在西奈半岛的

英军实施打击，却被艾伦比打了个落花流水。英军在10月底突破了土耳其防线。在随后的一个月内，耶尔德勒姆集团军群的单位分散在叙利亚各地，英军占领了巴勒斯坦南部的广大地区，现在已经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这一切失败的罪责完全不会落到杰马勒头上。

但杰马勒或者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战争努力都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多次走到土崩瓦解的边缘，但都安然渡过难关。这一次，恰恰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带来了扭转战局的机会。

11月7日，就在土耳其军队放弃加沙的当天，弗拉基米尔·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俄罗斯政府[20]。次日早上，布尔什维克党发布了《和平法令》，宣布打算立刻退出战争。在整个前线，俄国军队进入了单方面的停火。就这样，土耳其200年来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突然间消失了，撕咬土耳其战线的三支敌军中的一支就这样沉默了。

随后传来了更加非同寻常的消息。布尔什维克党在搜查被推翻的旧政府的文件时发现了当时仍然是秘密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副本。这份文件极有说服力地佐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指控，即过去三年中地球上发生的血腥屠杀都是为了帝国主义的扩张，于是他们在11月中旬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公之于众。当然，这份文件也佐证了杰马勒帕夏长期以来的指控——英法大言不惭地声称支持阿拉伯独立，其实只是个阴险的诡计，目的是将阿拉伯土地纳入自己的殖民帝国。于是他利用贝鲁特演讲的机会，向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重申了这一点。

“《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英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使用的工具。他们需要工具和傻瓜为他们火中取栗，于是教唆某些阿拉伯人造反，向他们许下虚假的诺言，用空中楼阁蒙蔽他们。”杰马勒说道。他告诉听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为侯赛因国王何以背弃自己的穆

斯林兄弟而大惑不解；现在真相大白了。“最终，不幸的谢里夫侯赛因落入了英国人为他挖下的陷阱，被他们的溜须拍马缠住，对伊斯兰的团结和威严犯下了罪行。”[21]

杰马勒指出，既然西方帝国主义阴谋已经被揭穿，还有时间将其打倒。侯赛因国王可以弃绝不洁的联盟，悔过自新。各地的阿拉伯人现在看清了奸险敌人的真面目，可以团结一心，打败他们。“我要去君士坦丁堡，但我很快就会回来。”杰马勒在演讲末尾发誓道，“我恳求本市的名流显贵们对虚假谣言置之不理，在战争剩余不多的日子里耐心守候，让我们达成目标。”[22]

次日，他的贝鲁特演讲，包括对《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揭露，被刊登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各地报纸的头版。

杰马勒的努力不仅限于演说。在贝鲁特演讲之前，他给费萨尔·伊本·侯赛因和起义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写了信，并安排一位亲信的使节将信送到亚喀巴。在给费萨尔的信中，杰马勒相当宽宏大量地承认，如果阿拉伯起义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阿拉伯政府，保障“伊斯兰的尊严和光辉”，那么阿拉伯起义就算是情有可原。“但是，正如协约国政府现在公开和正式宣布的，巴勒斯坦将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国家，叙利亚完全被法国控制，伊拉克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英国属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还能有什么样的独立？这样的政府还怎么能独立而有尊严地塑造伊斯兰的命运？或许，你在最初还没有预见到这些结果，但我希望英军征服巴勒斯坦的景象能为你揭露赤裸裸的真相。”这封信不仅仅是要责备费萨尔。“如果你承认这个真理，”杰马勒最后写道，“我们很容易对阿拉伯起义施行全面大赦，并重开协商，为了伊斯兰的利益解决问题。”[23]

杰马勒在选择发信的对象时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他和费萨尔曾在大马士革一起待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在侯赛因的四个儿子中，费萨尔既

是最虔诚的，也是思想最新潮的。杰马勒的措辞也是精心设计的，不断重复两个字眼："伊斯兰"和"独立"。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让费萨尔产生疑虑，那么他算是大获成功。

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在准备访问耶路撒冷时，安排人在这座城市的古老城墙上开掘出一个特殊的入口。德国皇帝骑着一匹黑色骏马，身穿戴满勋章的军服，从这座城门进入了老城区（全世界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地），活似一位现代的十字军征服者。

这个做法给德国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公共影响，于是英国人在1917年12月胜利进入耶路撒冷时，努力做得低调一些。严格遵守马克·赛克斯（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政治上的舞台经理）在千里之外发来的建议，英军的决定是让艾伦比将军徒步从城市的一座传统城门进入，并且不展示英国旗帜。赛克斯指出，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协约国获得了宣传上的一个极大胜利，任何带有英国或基督教获胜而洋洋自得意味的东西都肯定会破坏大局。

T.E.劳伦斯碰巧也参加了12月11日上午进入老城区的历史性游行。在德拉的悲惨经历之后，他返回了亚喀巴，随后被传唤到位于巴勒斯坦南部的艾伦比野战司令部。他在前往那里的途中以为自己一定会因为雅莫科行动的失败而受到斥责或甚至是贬黜，但艾伦比对他的一连串战斗胜利相当满意。12月9日，他还在总司令部的时候，消息传来，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撤离耶路撒冷。他借了一套军服和适当的军官肩章"星星"，换下了破破烂烂的阿拉伯长袍，扮作克莱顿将军的参谋军官，加入了入城游行队伍。尽管劳伦斯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所剩不多，但还是被这一天的重大意义所震撼；600多年来，第一次有一支欧洲军队返回了西方宗教的摇篮，中东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来说，"他后来写道，"这是战争的巅峰时刻。"[24]

劳伦斯无疑还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感到深深震撼。在11月末，他一瘸

一拐地返回亚喀巴，疾病缠身，而且因为在德拉遭受的虐待而十分羸弱的时候，他才得知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得知《贝尔福宣言》的存在，以及导致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俄国革命。在离他更近的地方，他还错过了宿敌爱德华·布雷蒙的最终失宠。

自当年春季以来，英国一些高官就在打算要搞垮布雷蒙。事实上，对布雷蒙的憎恶是劳伦斯和马克·赛克斯少数共同点之一。“我坚信不疑，法国军事代表团越早离开汉志就越好，”赛克斯在5月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法国军官们无一例外，都是反阿拉伯的，只能造成争吵和阴谋。”赛克斯认为，法国人的这种敌对基调是由法国军事代表团的领导人定下的，源自“布雷蒙上校遵循的刻意乖张、刚愎自用的态度和政策”。[2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恰恰是赛克斯对布雷蒙的批判让这位法国上校得以继续留下很长一段时间。巴黎方面得知英国人对布雷蒙的憎恶感之后，为了避免显得自己对盟友俯首帖耳，答复称，非常凑巧，他们已经在考虑缩减布雷蒙的吉达代表团的规模[26]。显然是为了制造一个给法国人台阶下的“体面的时间间隔”，好让大家相信裁减代表团的主意是法国人自己想出来的，于是在随后6个月内什么都没做。英国官员们在这场哑谜中也扮演自己的角色，利用这段时间研究要给讨厌的布雷蒙颁发一个什么荣誉头衔。最后决定是“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于是雷金纳德·温盖特利用给布雷蒙授勋的机会，向他表达“热烈的祝贺和赞扬，感谢法国代表团在您指挥下在汉志所做的价值极高的工作”[27]。

爱德华·布雷蒙虽然获得了英国最高级的军事荣誉之一，但说到底他仍然是个法国人。被撤职的上校起航返回法国的时候——为了给他留面子，官方的说法是他要度6周的假期——温盖特向外交部的一位高官

发了一封电报。“布雷蒙之前的事迹你是知道的，”他写道，“我想，他这次回国的主要目标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是探查巴黎公众对皮科和赛克斯的协约国政策的意见。应当向赛克斯发出警告。”[28]

布雷蒙的退场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在中东的活动就告终了。恰恰相反。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取胜之后，原先只是理论上的瓜分中东战利品的计划现在变得触手可及了。游戏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因此政治阴谋将会比以往更加活跃。

12月11日，耶路撒冷入城式结束之后，英国司令部高级人员来到一座宴会厅用午餐。劳伦斯在这里窥见了即将扩展的政治阴云。作为常驻艾伦比司令部的法国政治官员，乔治-皮科在入城式中享有贵宾地位，他显然认为，这说明他和马克·赛克斯在两年前制定的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共管的计划依然有效。在宴会厅，皮科对艾伦比宣布：“亲爱的将军，明天我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城里建立民事政府。”

按照劳伦斯的说法，这句话让宴会厅陷入了难堪的沉默。“我们湿漉漉的嘴里含着色拉、蛋黄酱鸡肉和鹅肝三明治，停止了咀嚼，我们目瞪口呆地转向艾伦比。就连他在那一瞬间似乎也不知所措。”[29] 但只是一瞬间而已。艾伦比转向法国政治官员，解释道，由于耶路撒冷位于英国军事区，城内唯一的领导者应当是军队总司令，也就是他本人。

翻天覆地的战局让法国人对英国施加了新的压力，但这只是英国人面对的政治麻烦的一小部分而已。耶路撒冷入城式之后，劳伦斯又去了开罗，目睹了那些政治问题。他看到的开罗是一座陷入狂怒的城市。

马克·赛克斯原先认为，犹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不会让阿拉伯人不悦，但现在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尽可能封锁消息，不让阿拉伯世界得知《贝尔福宣言》的情况。他的努力以惨败告终，《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在11月传到了埃及群众当中，沮丧很快变成了愤怒。英国当局努

力去安抚这些抗议者，但杰马勒帕夏的贝鲁特讲话又揭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具体条文。电光火石之间，英国人努力将阿拉伯世界拉拢到自己这边的长期努力遭到了惨痛的双重打击，其后果可能会使得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胜利变得毫无意义。

劳伦斯在开罗静观局势，预感到黑暗的日子即将降临。如果一向唯唯诺诺、受到严厉管制的埃及群众都被《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科协定》激怒到几乎要揭竿而起，那么聚集在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和他们在叙利亚各地的潜在盟友会怎么想？劳伦斯私下里感到一丝安慰，因为他很有远见，早在9个月前就将《赛克斯—皮科协定》告知费萨尔；如果费萨尔是现在才知道的话，再加上《贝尔福宣言》恰好也在这时被披露，他恐怕很难再信任劳伦斯或任何一个英国人了。但这些消息一定会让在亚喀巴围绕在费萨尔身边的人火冒三丈。不管他们对费萨尔或者阿拉伯独立事业多么忠心耿耿，这些人的脑子里一直有个想法，即起义的哈希姆领导人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被英国和法国主子愚弄了。当然了，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这样说的，现在杰马勒帕夏在贝鲁特的讲话给了这种指控更强的说服力。

在开罗，劳伦斯很快得知了费萨尔所处的困境，以及杰马勒向他提议的脱身之路。

11月底，费萨尔收到杰马勒的和平提议信之后，将其副本发送给了父亲。12月中旬，侯赛因又将信转发给了在吉达的西里尔·威尔逊。侯赛因这么做或许是为了表示，即便到了此时，他仍然信任英国人；或许他这也是个警告，即如果英国人敢骗他，他还是有其他路可走的。当然了，他或许是认为，英国人肯定很快就能自己发现这件事，因为杰马勒在他的贝鲁特讲话中提及了对阿拉伯起义军的和平建议。

不管侯赛因的动机如何，他交出杰马勒的信的举动让英属开罗大为警醒。几天前，克莱顿就向赛克斯警告说，现在《赛克斯—皮科协定》

和《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已经在阿拉伯世界传开了，土耳其人向起义军提出媾和建议只是时间问题[30]。杰马勒的信表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好在费萨尔和侯赛因都没有对这个提议做出回应，他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即告知英国当局。但谁知道土耳其人下一次发出提议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劳伦斯的看法则与此大不相同。事实上，他认为，杰马勒帕夏的信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带来了一个独特机遇。

正如在10月份劳伦斯向乔治·劳埃德吐露的那样，他认为自己不是在为英国效力，而是为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工作。在开罗的英国军方和政界高层，人尽皆知，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英国使节一直在瑞士与土耳其使节会谈，商讨议和事宜。既然英国可以毫无道德顾虑地与敌人秘密谈判，那么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可以？恰恰相反，阿拉伯人可以打一打土耳其这张牌，或许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特定的条件，随后也许能够从英法方面得到一些具体的让步。如果牌玩得好，或许不管谁赢得战争，阿拉伯人都能得到独立。

劳伦斯当然不会把这些想法明说给他在开罗的上级们。他只是告诉他们，符合英国利益的做法或许是，搞清楚土耳其人愿意给阿拉伯人开出怎样的条件，这样英国人就可以先发制人地做出反应。这个说法虽然没有说服力，却得到了雷金纳德·温盖特的支持。“我建议侯赛因国王不向土耳其人做任何正式回复，”温盖特在给战时内阁的电报中写道，“但劳伦斯少校会询问费萨尔，是否可以请费萨尔与杰马勒交换口头消息，以摸清土耳其的新政策。”[31]

战时内阁迅速行动起来，驳回这个建议，但他们的动作还不够快[32]。就在温盖特发出电报的当天，即圣诞节前一天，劳伦斯已经离开开罗。到战时内阁插手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亚喀巴，在费萨尔身边了。就像他之前在其他关键时刻做的那样，劳伦斯利用收到命令的延误

作为借口，自行其是。他鼓励费萨尔与土耳其敌人对话。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费萨尔和劳伦斯与叙利亚南部战线的土耳其总司令建立和维持了这样的对话[33]。

在《智慧的七柱》中，劳伦斯费了很多心思来努力为这些通敌行为辩解，声称土耳其政权已经分裂为两个阵营，即杰马勒帕夏那样的伊斯兰教徒和叙利亚南部战线总司令那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费萨尔或许可以在两个阵营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对其矛盾加以利用。劳伦斯写道："借助精心选择的措辞，我们可以将阿拉伯起义归咎于杰马勒的教徒派，或许军国主义派会和他们闹翻。"[34]他的理论是，最终这种闹翻会对阿拉伯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赢得独立，后者可以解放自己的手脚，集中力量保卫自己在安纳托利亚的家园。

劳伦斯或许是认识到自己论点的缺乏说服力，后来努力将自己与此事拉远距离。在1922年的所谓"牛津版"《智慧的七柱》中，还是"费萨尔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向杰马勒发回了有目的性的回复"；而在1926年版《智慧的七柱》中，就变成了费萨尔自行决定与敌人谈判。[35]

三年后，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更为简单，但也更为老掉牙的解释，为自己与费萨尔的行为辩护。不是别人，恰恰是威廉·耶鲁在1929年向他问起了战时那些与敌人联络的事情，他的回答是："在爱情、战争和联盟中，大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是公平的！噗！"[36]

亚伦·亚伦森在美国期间公然违抗哈伊姆·魏茨曼让他三缄其口的命令，但这对亚伦森来说显然还不够。他还要让魏茨曼知道自己在违抗他[37]。于是他在1917年12月13日给魏茨曼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他记述道，除了在华盛顿与官员的一系列会晤之外，他还在波士顿的城市俱乐部作了演讲，"该市的犹太人社会名流都应邀参加"。随后，他又在辛辛那提的希伯来联盟学院作了演讲，这所学院非常保守，坚定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正是魏茨曼希望绕开的那种反对派

堡垒，但据亚伦森说，他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努力做到言简意赅，我讲了不到四十分钟，听众的敌意全都消失了。”

英军于12月9日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无疑增加了亚伦森在美国受到欢迎的热烈程度。自开战以来，很少有什么事件更能让美国人（既包括犹太人，也有基督徒）群情激昂，很快就引发了全国范围关于圣地未来安排的热烈讨论。犹太人社区内的辩论最为激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初不肯接受《贝尔福宣言》的犹豫不决很快烟消云散。

但亚伦森的魅力攻势对路易斯·布兰代斯却没有多少效力，而哈伊姆·魏茨曼及其英国支持者们认为布兰代斯是争取美国支持的关键人物。亚伦森在华盛顿与这位最高法庭大法官进行了多次友好会晤，但布兰代斯对让美国代表团参加即将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设想没有多少信心。布兰代斯指出，这会让世人以为，美国官方在支持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计划。当然，英国人的目标就是这个。

1月中旬，魏茨曼在给布兰代斯的信中昭示了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和更敏感的目标——敦促美国对土耳其宣战。“这再明白不过了，”魏茨曼写道，“美国—英国—犹太人的利益与普鲁士—土耳其的利益相敌对，这完全是巧合……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必须成为美国参战的一个目标，就像（德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和独立的波兰一样。”[38]

布兰代斯显然是听够了。早在1917年4月，魏茨曼就请求布兰代斯游说伍德罗·威尔逊，让后者支持犹太人家园计划，而最高法庭大法官在自己的伦理观允许范围之内，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魏茨曼不仅要求他游说总统去急剧扩大美国的战争努力，还将《贝尔福宣言》提到的“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称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布兰代斯最后给魏茨曼写了一封简练的电报，称美国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现在是不可能的”[39]。于是，世界上两位最重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间出现了

隔阂，并且永远不能真正弥合。在山脊上，劳伦斯从骆驼背上直起身子，观察下方山谷中笼罩在阴影下的塔菲拉镇。这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地方，并且他很快将发现，这里的情况与他在之前16个月中在阿拉伯战区的经历截然不同。

这是1918年1月20日早晨。5天前，由贝都因战士和500人的阿拉伯军团（之前在亚喀巴训练）组成的混合部队冲进了塔菲拉（位于叙利亚南部的一座山谷中），将这座城镇的小股土耳其驻军驱逐了出去。塔菲拉以北就是阿拉伯人的新目标：较大的定居点卡拉克和米底巴。劳伦斯亲临前线是为了支持攻打这些城镇的行动，随后将推进到死海北岸。如果一切顺利，阿拉伯起义军将在那里，在古城杰里科附近，与艾伦比将军的部队（目前在耶路撒冷）最终会师。

但历史上的游击战士们都会发现，对敌人实施打了就跑的打击是一回事，攻打人口稠密的城镇并防守下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现代的游击和反游击专家指出，这个过程需要“争取人心”，但赤裸裸的真相是，这里没有人心可以去争取。事实上，任何被卷入游击战区域的平民的核心问题是：活下去。为了生存，他们会投靠能够保障他们生存的任何一方，直到这一方做不到这一点，那时平民就会转投另一方。在这场极其原始的斗争中，对民族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的呼吁几乎是毫无用处的；获得平民“忠诚”的办法就是为其提供保护，或者对其实施恐怖震慑，或者二者结合。

在塔菲拉的大街上，劳伦斯遇到了能够证明“争取人心”理念之荒谬的绝佳例证。城镇居民被从土耳其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时并没有欢呼雀跃地庆祝，对统一阿拉伯国家的概念也不感兴趣；塔菲拉的商人、小农和牧人却认为自己是被夹在了虎狼之间进退两难。他们对四处袭扰的贝都因战士既恐惧又仇恨，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骑骆驼的土匪。他们对纪律严明的阿拉伯军团不是那么害怕，但非常自然地认为，这样一支大部

队可能会吃光他们所剩不多的粮食，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很快将食物藏了起来。在这一切的背后，所有人都很害怕，如果土耳其人夺回了这座山谷，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不会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群众对于最安全的选择产生了严重分歧。

“这里的局面非常奇怪，”劳伦斯在1月22日向吉尔伯特·克莱顿报告道，“当地人分裂成两个不共戴天的派别，害怕对方，同时还害怕我们。每天夜间街上都有枪声，普遍高度紧张。我们在采取措施，安排警察等，那样会让大家的神经放松一点，我还希望能够有足够多的给养让我们维持下去。”[40]

但事与愿违，村民们大肆囤积和私藏粮食，已经导致山谷内食物短缺，粮价猛涨。这又让群众愈发怨恨，战士们则越来越愤怒。“抱歉，我不能向你报告此处给养的具体数目，”劳伦斯在1月22日的报告结尾写道，“但我自抵达这里以来，一直忙于搞清楚，哪些人是支持我们的，他们又在哪里。意见分歧、当地人的宿仇旧怨和派系利益非常混乱疯狂（整个地区盼望现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已经盼望了多年），一时间还搞不清楚。”

但局势很快会严重恶化。在写信给克莱顿的次日，劳伦斯得知，一支规模较大的土耳其部队正在逼近，旨在收复塔菲拉。

劳伦斯抵达塔菲拉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和开罗的逗留到返回阿拉伯半岛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评估了阿拉伯起义的局势，在亚喀巴与费萨尔会谈，为随后的战事做准备。返回前线后不久，他乘坐被引进阿拉伯前线的英国新式武器——劳斯莱斯装甲车，参加了对汉志铁路的一次袭击。两辆装甲车对目标——土耳其前哨只造成了很小的杀伤，但所有人都立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新武器从根本上改变了沙漠战争的面貌。现在，英军凭借数量极少的兵员和物资投入，就可以

彻底控制铁路，几乎是任意袭击孤立的土耳其驻军和扰乱铁路线。占据如此优势之后，英国军方领导层终于接受了劳伦斯近一年以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很好的理由去推动攻打麦地那；最好让那数千名被困的奥斯曼士兵留在那里。

他在个人层面也在做准备工作。在德拉的痛苦折磨之后，劳伦斯开始组织他的私人军队，或者说是保镖队伍。“我开始把我的队伍扩充为一支军队，”他写道，“到处搜罗无法无天之徒，这些家伙的鲁莽让他们无论到了哪儿都惹是生非。”[41] 他招募这些“无法无天之徒”的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非常聪明的。这些人在自己的部落里是捣蛋鬼，或者根本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此最终只会对劳伦斯一个人效忠，正因为此，他将营地里的两个小坏蛋——法拉杰和达霍姆纳入了自己的队伍。但这支卫队将会为自己的忠诚付出沉重代价。按照劳伦斯的估计，其中近60人在战争结束前牺牲。

1月10日，劳伦斯率领着这支扩大了的扈从队伍，加入了正在进行中的塔菲拉战役。艾伦比将军在耶路撒冷的司令部人员告诉他，在巴勒斯坦的英军需要休整和补充装备，要到2月中旬才能发动下一次进攻。有鉴于这种耽搁，劳伦斯和战争筹划者们为阿拉伯起义军在此期间设定了一个相当简单的计划。起义军将绕开叙利亚内陆的一连串主要的人口密集中心（它们仍然在土耳其控制下，而且离巴勒斯坦的英军部队太远），转而扫荡中间地域，即死海以东不远处的摩押高原山区，然后与耶路撒冷附近的英军会合。占领塔菲拉是此次战役的第一个目标，随后将兵锋直指较大的城镇卡拉克和米底巴，但现在土耳其人正在进军塔菲拉，于是一切突然间都悬而未决了。

如果按照过去的战术，阿拉伯人现在就已经卷起铺盖撤退了。但劳伦斯对游击战术足够精通，知道现在战争的规则突然间发生了变化。卡拉克和米底巴的居民就像塔菲拉市民一样，正在骑墙观望，等待着投靠

到胜利者一边。这意味着，三个城镇的命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放弃了塔菲拉，卡拉克或米底巴也就不会有什么指望了。于是，起义军别无选择，只能固守塔菲拉。

守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1月24日下午，从卡拉克前来的约1000名土耳其士兵的前锋从塔菲拉镇以北几英里处的海萨河谷进入了塔菲拉谷地。他们很快将兵力薄弱的起义军警戒线一直打退到城郊。对起义军来说幸运的是，土耳其人还没来得及乘胜追击，天就黑了；在夜色掩护下，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匆匆将他的部队一直撤到谷地的最南端。“大家都以为我们是在逃跑，”劳伦斯向克莱顿报告称，“我想我们确实是在逃跑。”[42]

破晓之前，劳伦斯冒险进入城镇，目睹了阿拉伯军团的撤退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所有人都在心惊胆战地大呼小叫，瓶瓶罐罐被从房子里搬运到大街上，街上挤满了人。骑马的阿拉伯人奔来跑去，疯狂地向空中开枪，土耳其步枪的枪口焰勾勒出了塔菲拉山谷远方的悬崖。”

劳伦斯发现一小队警戒部队仍然坚守着城北的一座峭壁，于是立刻派人回去找军团指挥官，要求增派援兵和机枪，然后亲自冲向那座峭壁。天亮之后，那里的小股部队——大约30名阿拉伯战士和相同数量的塔菲拉居民——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处境。

“土耳其人在穿过隘道，沿着平原的东部边界上的山脊推进，”劳伦斯记述道，“将大约15挺机枪的火力集中在我们正在防守的、位置相当暴露的小山丘的正面和侧面。他们同时还在修正榴霰弹的导火索，此前他们的榴霰弹掠过山顶、呼啸着飞过平原，现在开始将小山的侧面和顶端打得泥土横飞。我们的人缺少弹药，丢失这个阵地看样子只是时间问题。”

但在峭壁上的防守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放弃这个阵地的时

候，阿拉伯部队主力已经携带机枪和山炮赶了上来，在峭壁背后1.5英里处的平行山脊上建立了一条新防线。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那种虽然微不足道，却往往能决定战局的事情。在撤往安全处的奔跑过程中，劳伦斯还沉着冷静地数了自己的步数，发现已经被放弃的峭壁——即将被土耳其人占领——与阿拉伯人的新防线之间的距离是大约3100步。土耳其主力部队刚刚占领峭壁、部署好自己的重武器，就被阿拉伯人山炮发出的火雨淹没了。

土耳其人被牵制在中央，于是劳伦斯动用他的军事史知识，实施了一场经典的钳形攻势，派遣小队战士分别从两侧以较大弧线绕到毫无察觉的敌人背后。下午3点过后不久，陷阱挖好了。峭壁上的土耳其人的位置完全暴露，阿拉伯人的机枪手从两翼向其倾下弹雨。土耳其军队的机枪手和山炮手都被消灭，于是发生动摇，开始凌乱地逃往海萨河谷峡谷的安全处。但那里也不是安全的避难所。土耳其人溃不成军，在整个晚上和深夜，不断遭到阿拉伯骑兵和贝都因人的袭扰，甚至还有希望复仇或者发笔横财的山地村民的攻击。开进塔菲拉的土耳其士兵有1000人。劳伦斯估计他们的损失是死伤约500人，200人被俘，但这个估计可能还是太保守了。他后来听说，逃回卡拉克的不到50人，其他人都在峡谷中被一个一个击毙了。阿拉伯人只有约25人死亡，可能有75人负伤。[43]

塔菲拉的大胜是一场经典的拿破仑式的战役，不久之后为劳伦斯赢得了卓越服务勋章。但他自己却将此次行动描述为“恶毒的行为”，是毫无意义地炫耀自己高人一筹。“我们原本可以拒绝正面交锋、灵活调动我们的中路来取胜，就像我们之前干过20次的那样。”但是，由于按照常规战术和敌人交战，阿拉伯人的伤亡达到了全军的1/6，使得短期内几乎完全无法继续进军米底巴或卡拉克。他写道：“这一晚，没有剩下什么荣光，只有遍体鳞伤的肉体的恐怖，那是我们自己人，被从我们身边抬过，抬去他们的家。”

但在塔菲拉，劳伦斯表现出了一个新的、令人不安的个性特征：对敌人的仇恨，对他们愚蠢地攻击自己而狂怒不已。尽管他哀叹开进塔菲拉的“1000个可怜的土耳其人”的命运，但却没有了他曾经的那种同情心。事实上，劳伦斯在听说战斗打赢很久之后起义军战士仍然在峡谷内屠杀土耳其人时，显得无动于衷。“我原本应为敌人哀哭，”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但在战斗的愤怒和辛劳之后，我的头脑已经太疲惫，懒得再走到那个可怕的地方，花一整夜的工夫去挽救他们。”

在6个月前的阿巴利桑战役中，同样是阿拉伯人一边倒的胜利，战斗结束后劳伦斯命令部下将负了致命伤的敌人留在一条小溪边，这样他们临死前至少能有水喝。而在塔菲拉，当夜刮起了猛烈的暴风雪，甚至那些轻伤的土耳其人也被留在室外，无人照管。天亮时，所有土耳其伤员都死了。“这是无法辩护的，就像整个战争理论一样，但我们没有为此受到特别的指责。我们在暴风雪里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营救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法则是，不能为了杀死更多土耳其人而损失阿拉伯人的生命，那么我们更不会为了营救土耳其人而损失阿拉伯人。”

---

[1] Syrian Committee of Egypt，November 14，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3，Folder 8.

[2] Yale to Harrison，December 17，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11.

[3] Lawrence，*Seven Pillars*，p.435.

[4] Lawrence，*Seven Pillars*，p.439.

[5] Weizmann to Aaronsohn，November 16，1917，reproduced in Friedman，*Zionist Commission*，pp.19-20.

[6] Aaronsohn，*Diary*，November 16，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7] House to Drummond，September 1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83，f. 107.

[8] Wiseman to Drummond，October 16，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83，f. 106.

[9] Weizmann to Aaronsohn，November 16，1917，reproduced in Friedman，*Zionist Commission*，pp.19-20.

[10] Verrier，ed.，*Agents of Empire*，p.295。这份电报中关于萨拉·亚伦森命运的部分是准确的，但其他方面有错误。年迈的埃弗拉伊姆·亚伦森被关押在大马士革，得以幸存，后来被释放，而贝尔坎德直到12月14日才被处决。

[11] Aaronsohn，*Diary*，December 1，1917；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2] 劳伦斯关于他在德拉遭受毒打的记述见*Seven Pillars*，book 6，chapter 80，pp.441-47。

[13] Mack，*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233.

[14] As quoted by James，*The Golden Warrior*，p.214 n. 17.

[15] Lawrence to Stirling，June 29，1919；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copy）Folder 6，File 7.

[16] As quoted by Brown，*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pp.261-62.

[17] Agent 92C，"Syrian Politics，" December 9，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06/1420.

[18] Lewis，"An Ottoman Officer，" in Kushner，*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p.413.

[19] Agent 92C，"Syrian Politics，" December 9，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06/1420.

[20] 当时俄国仍然使用儒略历，而不是格列高利历，这个日期在俄国是10月25日，因此才有"十月革命"的说法。

[21] As quoted in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p.255.

[22] Agent 92C，"Syrian Politics，" December 9，1917；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06/1420.

[23] Ahmed Djemal Pasha to Faisal（undated），translated and sent from Wingate to Balfour，December 25，1917；PRO-PRO 30/30/10 f. 67.

[24] Lawrence，*Seven Pillars*，p.453.

[25] Sykes to Graham，May 5，1917；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41d.

[26] Foreign Office to Wingate，May 29，1917；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Wingate Papers，145/7/114-15.

[27] Wilson to Brémond，September 21，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1.

[28] Wingate to Graham，December 10，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1.

[29] Lawrence，*Seven Pillars*，p.455.

[30] Clayton to Sykes，November 28，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54，f. 393.

[31] Wingate to War Cabinet，December 24，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062.

[32] Minutes to “Turkish Intrigues in Arabia，” December 26，19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062，File 243033.

[33] 当时在叙利亚有两位土耳其领导人都叫作杰马勒帕夏，这给史学家带来了极大混乱。他们分别是叙利亚总督艾哈迈德·杰马勒帕夏（有时被称为“大杰马勒”）和穆罕默德·杰马勒帕夏（有时被称为“小杰马勒”）。更容易造成混淆的是，穆罕默德·杰马勒是在1918年初接任土耳其第4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开始使用“杰马勒帕夏”这个尊称的，他的前任就是刚刚离职的艾哈迈德·杰马勒。T.E.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使用“杰马勒帕夏”的说法，常常却不指明是艾哈迈德还是穆罕默德，这造成了更多的困扰。
于是，很多关于这个时期的史书将二人混为一谈，说在1918年夏季的时候，费萨尔还在和艾哈迈德·杰马勒进行秘密通信。事实上，土耳其给费萨尔的和谈建议的确是艾哈迈德·杰马勒最先于1917年11月发起的，但在12月，艾哈迈德就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因此费萨尔随后的通信对象一直是穆罕默德·杰马勒。
另外，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和他对同时代的传记作者的声明中说，费萨尔还和穆斯塔法·凯末尔（未来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进行了秘密谈判。这也许是真的，但我未能发现文献证据。

[34] Lawrence，*Seven Pillars*（Oxford），chapter 115.

[35] Lawrence，*Seven Pillars*（Oxford），chapter 115，and Lawrence，*Seven Pillars*（1926），p.554.

[36] Lawrence to Yale，October 22，1929；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1，Folder 4。奇怪的是，劳伦斯告诉耶鲁，他本人在费萨尔与穆罕默德·杰马勒帕夏的通信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而是在费萨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得知并阅读了这些通信的。劳伦斯对别人说的话，以及他自己的《智慧的七柱》的说法，都与此矛盾。

[37] “It must be abundantly”：Weizmann to Brandeis，January 14，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94，f. 423.

[38] British government White Paper，“Notes on Zionism，” Part 2. Communications of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II，January-March 1918；April 19，1918，p.11；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4171，f. 99.

[39] British government White Paper，“Notes on Zionism，” Part 2. Communications of the Zionist Organization II，January-March 1918；April 19，1918，p.11；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4171，f. 99.

[40] Lawrence to Clayton，January 2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251-53.

[41] Lawrence，*Seven Pillars*，p.462.

[42] Lawrence to Clayton，January 26，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254-58.

[43] Lawrence，*Seven Pillars*，p.482.

第17章 孤独的追寻

它或许是个骗局，或许是场闹剧，但没人能说我在其中演得不好。

——T.E.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扮演的角色的评论[1]

坚持不懈和对冒险的渴望让出身贵族的威廉·耶鲁走得很远。1908年，这些个性特征将他带到了巴拿马运河区喧嚣沸腾的丛林，不久之后他又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油田和奥斯曼帝国的穷乡僻壤。1917年秋季，他又带着“美国国务院特工”的含糊头衔抵达了开罗——协约国在中东战争努力的核心所在。他的使命使他陷入了一个新的丛林、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争夺未来中东权力的迷宫。

“这些利益集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耶鲁写道，“造成了一个由阴谋诡计和政策组成的乱局，几乎无法厘清。在这些政策和阴谋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的那些利益相关者：资本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让这些复杂问题愈发复杂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和犹太人的意愿……努力去理解和报道这些最为复杂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引人入胜和有趣的任务。”[2]

耶鲁是个聪明人，认识到自己对这个任务的准备极不充分——他是美国在整个地区的唯一一名一线情报人员——于是扫荡了开罗的所有英语书店，恶补中东历史。他结交了一系列埃及和外国移民社区的领导人，并常常拜访萨沃伊饭店的阿拉伯局办公室，与那里的情报军官们攀谈。遵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间谍们的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他勤奋地花了大量时间去逛外交官和高级军官们最喜爱的酒吧。在1917年的开罗，最受这些人青睐的地方是尼罗河中杰济拉岛上赛马俱乐部的那些陈设宜人的酒吧间。

耶鲁很快发现，他的任务中广交天下豪杰的那个方面其实轻松容易。这是因为开罗的政治漩涡中的几乎所有人都非常愿意向这位美国官员吐露心迹，因为美国是协约国军事同盟中最新的成员，如果伍德罗·威尔逊心愿得偿的话，还将是影响力最大的成员。但有一个显著的例外。“法国人没有来联系我，”耶鲁回忆道，“法国官员的一本正经和排外令我憎恶，而我由于一种特别的内在的腼腆，没有去主动结交他们。”

他在开罗的工作虽然需要他坚忍不拔的精神，但至少在起初却没有什么冒险可言。艾伦比将军于12月占领耶路撒冷之后，耶鲁请求英国当局批准他参观巴勒斯坦前线，当局拒绝了他，理由是，只有符合资格的军事联络官才可以前往。耶鲁最终推断，真正的原因是，英国人担心，如果允许美国人参观前线，他们将会不得不同样允许那些更加爱管闲事的盟友——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就一直在要求参观前线——而此时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光是为了跟法国人纠缠，就已经够忙活的了。

令耶鲁在该地区愈发沮丧的是，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避免冲突的做法，英国官员们在情势所需时就很容易妥协，但在不是那么紧急时就非常优雅地“无为而治”。耶路撒冷陷落不久之后，耶鲁得知英国人囚禁了该城前任奥斯曼军事总督扎基贝伊。扎基贝伊在1917年曾经帮助耶鲁逃离巴勒斯坦。耶鲁尝到了英国人做事的风格。耶鲁怒气冲冲地跑进英国相关官员的办公室，告诉他们，扎基贝伊对耶路撒冷的外国侨民社区做过多少好事。他还指出，扎基贝伊是美国前任驻巴勒斯坦领事奥蒂斯·格莱兹布鲁克的密友，而格莱兹布鲁克又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好友。“我告诉他们，如果不立即将扎基贝伊假释，我就把这事闹到华盛顿，请总统来裁决。”

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大多数国家的官员都会恭顺地妥协或者大发雷霆，但英国人做得非常巧妙。几天后，英国人将释放扎基贝伊的文

件交给耶鲁，并“友好地请求”他亲自去扎基贝伊被关押的监狱呈送文件，好让两位朋友在监狱大门前感情洋溢地重逢。“当英国人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耶鲁颇有些恼火地说，“他们就会慷慨大方地去做，让人感觉真的欠了他们很大的人情。”

30岁的耶鲁滞留在埃及首都，集中精力去理解各方面争夺该地区霸主地位的斗争。其中一项矛盾的历史已经很悠久——对大叙利亚未来控制权的错综复杂的权利主张——但现在由于《贝尔福宣言》，又出现了关于巴勒斯坦的同样激烈的争吵。

让这些争斗以及耶鲁对它们的认真思考带有虚幻色彩的是，到1917年底，协约国的战争前景到了前所未有的惨淡地步。在俄国西部城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德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谈判者正在敲定俄国正式退出战争的最后细节，已经有数十万德军从东线转往西线。协约国的指挥官们紧张地注视着德军在法国的兵力集结，深知德军在筹划一次排山倒海的春季攻势，旨在抢在姗姗来迟的美军大规模参战之前，向英法的残兵败将发出致命一击。俄国的垮台甚至让土耳其人也壮起胆来。陆军部长恩维尔计划不仅要收复先前被沙皇军队占领的土耳其东北部地区，还要乘胜追击，杀进19世纪就被俄国占领的高加索突厥地区。考虑到这一切，在开罗为了将来的战利品而作的持续争吵实在显得操之过急。

但耶鲁还是恪尽职守地努力执行自己的任务。在他发给国务院的利兰·哈里森的每一份“周一报告”中，他都对中东乱局的又一个方面进行澄清，他的资料来源是前一周与他交谈的官员、宗教人物的观点，以及《阿拉伯公报》的相关背景信息。但我们可以预料得到，这些混杂着五花八门、互相矛盾观点的卷帙浩繁的报告并不能厘清事实，而是让中东局势更加难以理解——至少从利兰·哈里森那意味深长的沉默来看是这样。

这位特工孜孜不倦地探寻真相，却迟迟未能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其他人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12月末，在克莱顿将军和在开罗的一群叙利亚流亡者领袖会晤之后，耶鲁终于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叙利亚人越来越担忧，《贝尔福宣言》意味着将会有一个犹太国家被强加于巴勒斯坦。克莱顿斩钉截铁地坚称，并非如此，《贝尔福宣言》中关于“民族家园”的措辞只是说犹太人将被允许移民至巴勒斯坦，在那里和其他民族一道，平等地共享该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未来。在埃及的级别最高的英国官员之一的这番保证大大地安抚了叙利亚代表团。“由于克莱顿将军对他们的表示，”耶鲁向国务院报告称，“叙利亚人在考虑是否要暂时放弃对犹太人的敌对态度，甚至讨论了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的可行性。”[3]

但在这次会议之后，耶鲁和克莱顿在阿拉伯局的主要副手谈了话，此人坦然承认，他和将军都不清楚“民族家园”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努力解开中东谜团的时候，威廉·耶鲁就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或许他对中东最准确的评估就是他的第一印象，而“知识”只会让他更加糊涂。11月，在他给哈里森的第三份周一报告中，他写道：“真相似乎是，唐宁街并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给它的代理人以明确的计划来操作。”[4] 于是，这些代理人就“对五花八门的利益方都表示多多少少的同情”，或者告诉所有人他们希望听到的东西。

但最后，这位努力挣扎的情报人员偶然发现了似乎能解开大部分谜团的东西。1918年2月底，在阅读《阿拉伯公报》的一份过刊时，耶鲁发现了一篇题为《叙利亚：原材料》的文章。

这篇文章仅有8页，文笔洗练，观点明确，有条不紊地描述了令该国四分五裂的无数裂缝，这些裂缝不仅包括部落间、民族间和宗教间的矛盾，甚至还包括城镇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想当然的如

意算盘（这是世界各地官僚公文作者的一个危险倾向），其作者以直率的笔调描绘了任何企图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叙利亚的外来者必将面临的诸多问题。考虑到当时开罗发生的激烈争吵，耶鲁特别感兴趣的是，该文作者“以寥寥数笔指出了巴勒斯坦南部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极大仇恨。穆斯林和基督徒都憎恶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最近的事态更是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这些来到巴勒斯坦、企图将其占为己有的犹太人的天生仇恨”[5]。

让这篇文章更显重要的是，它刊登在《阿拉伯公报》的1917年3月那一期，也就是《贝尔福宣言》公布的整整8个月之前，而且根据它的序言，它的实际写作时间是在那两年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吸引了威廉·耶鲁的注意力。他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在1914年1月在贝尔谢巴戏弄他的那个人，后来又在战争爆发时在开罗听取了他的报告：英军少校T.E.劳伦斯。

耶鲁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早已向国务院汇报了T.E.劳伦斯及其业绩。1917年11月，在撰写关于阿拉伯起义历史的报告时，耶鲁就大量引用了当时在开罗流传的故事：“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和贝都因人一起，组织了针对汉志铁路的袭击，努力将贝都因人争取到谢里夫和英国人这边来。”[6] 1918年2月，在偶然读到劳伦斯的旧报告之后，这位美国情报人员向雷金纳德·温盖特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请求：抄录该文章的全文，转发给美国国务院。他还决心下一次途经开罗的时候去拜会劳伦斯。

就在威廉·耶鲁向国务院发送劳伦斯的关于叙利亚的旧报告的同一周，劳伦斯正在努力离开叙利亚战区。原因是他犯了一个代价沉重的判断错误，责任全在他自己——或者他有一半心思是这么希望的。

错误的种子是在一个月前播下的。在攻打塔菲拉的战役前夕，劳伦斯请求吉尔伯特·克莱顿紧急提供价值3万英镑（相当于现代的约600万

英镑）的黄金，供集结在摩押高原的阿拉伯部队使用，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费萨尔的弟弟扎伊德。劳伦斯警告说，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扎伊德的追随者很快就会作鸟兽散[7]；而有了这些人马，起义军就可以北上攻打山地要塞卡拉克和米底巴，然后向南扫荡，在约旦河谷与英军前锋会师。只要发动坚决的一击，起义军就能最终与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顾问和补给提供者建立直接的陆路联系，而艾伦比将军部队的东翼也能得到保护，免受土耳其军队的攻击。

由于摩押高原战役意义重大，而且劳伦斯在财务方面享有一丝不苟的美誉——他很少会夸大自己的需求，于是克莱顿匆匆在埃及凑齐了黄金，火速送往亚喀巴。在击退土耳其军队对塔菲拉的攻击之后，劳伦斯亲自南下到起义军位于谷维拉（亚喀巴东北约35英里处）的新前进基地，迎接运送黄金的队伍。他急于尽快赶回塔菲拉前线，于是和两名卫兵一道，尽可能多地运载了黄金（约价值6000英镑），骑着快速骆驼，在行进迟缓的运输队伍前头起程了。

他们迎面撞上了一场冬季暴风雪，于是塔菲拉和谷维拉之间原本只需一天半时间的轻松路程变成了耗时3天的痛苦跋涉。劳伦斯万分焦躁，走了两天之后就丢下携带全部黄金因而行动迟缓的两名卫兵，独自快速前进。这是个几乎致命的大错，他和骆驼陷入了一个齐腰深的雪堆，徒手挖了几个小时才脱身。当然了，骑乘良种骆驼的劳伦斯都遇到了这么大困难，后面的人就更艰难了，于是他和运输黄金的队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2月11日，劳伦斯终于抵达塔菲拉。他恼火地发现，在他外出期间，扎伊德没有为北上攻势做任何准备工作。劳伦斯在次日给克莱顿的信中写道，侯赛因的幼子“踌躇不前，白白丢弃了机遇……这些阿拉伯人真是不堪大用”[8]。

劳伦斯对阿拉伯人的批评如此严厉，随后的行为却几乎是不可理

解。他急于对起义军即将经过的地区实施侦察，决定亲自对北部乡间进行一次长途侦察，尽管运送黄金的队伍还在谷维拉——塔菲拉道路上艰难跋涉。另外，他还决定让在塔菲拉的另外唯一一名西方军官——一个名叫亚历克·柯克布赖德的年轻的英军中尉一同前去。临行时，他让21岁的扎伊德负责照管即将运抵的黄金，并指示他“从中支取所需数额，以支付当前的开支费用，直到我回来”[9]。

一连6天时间，劳伦斯和柯克布赖德在北方和西方的乡间侦察，最远抵达了杰里科以北的约旦河谷的东坡。2月18日，他们返回塔菲拉时，劳伦斯兴致很高。黄金业已送抵，扫荡摩押高原、在死海与英军会师的计划似乎轻而易举，他估计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但当他向扎伊德概述这个想法时，却发现这个年轻人脸上有种奇怪的不安。

“但那需要很多钱。”扎伊德最后插言道。

“不会的，”劳伦斯答道，“我们手中现有的资金足够了，还花不了那么多。”

这时，侯赛因国王的幼子才窘迫地承认，自己已经把钱花完了。

劳伦斯起初以为扎伊德在开玩笑，但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在之前几天，运送黄金的队伍渐渐从谷维拉抵达塔菲拉，扎伊德的副手和部落盟友们（他们的军饷都被拖欠着）就一拥而上，将其瓜分。更糟糕的是，大多数黄金都被分配给了那些由于部落的原因不会参加北上作战的单位，而劳伦斯仰仗作为先锋的那些单位却没有分到好处。“我大为惊骇，”他记述道，“因为这意味着我的计划和希望全都泡汤了，我们对艾伦比信守诺言的努力也彻底白费了。”

而且他并不真正相信扎伊德的话。劳伦斯很快得知，运送黄金的最后一批人马在前一天刚刚抵达塔菲拉，根本没有时间去清点黄金，更不

要说分发出去了。劳伦斯怒火中烧地拂袖而去，冲到自己的帐篷。“一整夜我都在思考如何是好，”他写道，“但毫无办法，于是天亮之后，我只能传话给扎伊德，如果他不把钱还回来，我就走人。”

但扎伊德能拿得出手的只有匆匆拼凑出来的黄金去向的“估计的”账目。劳伦斯说话算话，在当天下午就备好骆驼，在仅仅4名卫兵护卫下，出发前往艾伦比将军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司令部，那是在西方100英里处。他决心到了那里之后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恳求艾伦比在别处给我找一个较小的角色去扮演”。

如果他表现出这是个人荣誉问题，劳伦斯内心里显然还有另一种冲动。在扎伊德的无能（或者不诚实）上，这位年轻的英军少校突然发现了一个解放自己的机遇，去摆脱重重地压着他的领导的负担。

他也不是最近才感到这种重负的压力。5个月前，劳伦斯就向自己的好友爱德华·利兹吐露心迹，称自己的神经快要崩溃，“在这场游戏中撑不了多久了”，而这还是在他的近似自杀的雅莫科行动、在德拉的恐怖折磨以及塔菲拉的丑恶屠杀之前的感觉。在黄金丢失事件的前夕，他的越来越严重的心力交瘁甚至表现在了他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最新一封信中。“我越来越不喜欢冒险，”他在2月12日给这位上司的信中写道，“目前，在面对各位谢里夫和诸部落时，我处于一个特殊地位，迟早会支撑不住。我尽最大努力躲在背景中，但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打倒我。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无限期地引导一个民族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我的成功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了。”[10]

他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除此之外还有他的职责的辛劳和危险。“一年半以来，我一直马不停蹄，每个月骑骆驼就要跋涉1000英里，再加上还要乘坐疯狂的飞机，神经紧绷地飞行许多钟头，或者搭乘大马力汽车越野狂奔。在我最近的五次行动中，我负过伤，我的身体非常害怕更多痛苦，因此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才能亲临火线。”

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种折磨会在近期结束；事实上恰恰相反。劳伦斯离开牛津参战时，他的弟弟阿诺尔德还只是个14岁的中学生。在最近几个月里，劳伦斯一直在为弟弟出谋划策，告诉他，如果在即将开始的服役生涯中想被分配到中东战场，需要哪些技能——熟悉阿拉伯语、驾驶多种车辆的本领[11]。

除了这些许多军人在战时都会感受到的重负之外，还有带着谎言生活而造成的心理压力，“我脑子里不得不一直装着那令人作呕的骗局：假装领导着另一个种族的民族起义，每天穿着异国服饰去装腔作势，用外语宣讲鼓吹”，这都是为了兑现一个劳伦斯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注定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在这方面，塔菲拉的屠杀抹去了他心中异想天开的“最后光泽”。“让我良心愈发不安的是那20个阿拉伯人和700个土耳其人在海萨河谷的毫无缘由、毫无意义的死。我的意志已经溃散，我害怕孑然一身。”[12]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2月22日，劳伦斯抵达位于拉姆拉的艾伦比司令部之后，发现他不仅不可能得到解脱，而且上级已经为他设计好了新任务。事实上，劳伦斯对这个新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将近一周时间里，有一架飞机多次飞过塔菲拉谷地，投下命令他即刻前往司令部的传单（但后来发现，这位飞行员将传单都抛撒到了另一座谷地）。

在劳伦斯最近一次身处前线期间，世界舞台上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大事件。协约国军方高层在西线准备抵御德军即将展开的大攻势，同时在地图上绝望地搜寻，看全球战场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地方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或许能够分散德军正在法国集结的庞大兵力。2月中旬，艾伦比将军得到命令，这个任务被交给他了。他的使命是尽快对叙利亚腹地发动全面攻势，最终目标是占领大马士革。阿拉伯起义军在此次攻势中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因此司令部心急如焚地要与他们驻阿拉伯起义军的首席联络官劳伦斯少校会晤。

但后来风险变得更大了。在布列斯特—立夫斯克城，德国和谈代表向俄国人提出的条件极其严酷苛刻，导致由列昂·托洛茨基率领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愤然离去。谈判的中断或许恰恰是柏林方面希望看到的，因为在2月18日，也就是劳伦斯抵达拉姆拉的4天之前，德军开始排山倒海地攻入俄国西部，所向披靡，一日千里。俄军兵败如山倒，于是在2月25日，俄国领导人迅速接受了德国人的新条件，而这新条件比一周前被俄国人拒绝的更为严苛。对在西线高度紧张地观察事态的协约国指挥官们来说，这意味着德国现在可以将甚至更多的兵员和武器运往法国，即将展开的德军攻势的最后一个小障碍也被铲除了。

劳伦斯知道，在这种局势下，上级绝对不可能为了荣誉问题就批准他离开岗位，那实在是太荒唐可笑了。于是他根本没有向艾伦比提出自己要辞职的事情。“我无路可逃，”他记述道，“我必须又一次在东方披上欺骗的外衣。我非常鄙视首鼠两端的行为，于是迅速披上这外衣，将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13]

在短暂逗留耶路撒冷、拜会自己的老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耶路撒冷城的新任军事总督）之后，劳伦斯继续奔赴开罗。3月8日，他在那里向家中写了一封短信。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告诉在牛津的家人，自己打算在近期利用自1914年以来积累的假期，回家一趟。回家的希望现在比过去更遥远了。“我要返回前线，至少要到6月，”他写道，“我很期待回前线。”他继续轻描淡写地讲述了自己最近得到的提升和军事表彰，这是由于他在塔菲拉战役中的领导角色，而那场屠杀已经开始困扰他的心灵。“他们给了我一枚卓越服务勋章。这些好东西没有被送给需要它的人，多么遗憾！现在我显然是个中校了。”[14]

在开罗短暂停留期间，劳伦斯同意会见了一位急于与他交谈的年轻的美国情报军官。“劳伦斯少校的意见值得深思熟虑，”威廉·耶鲁在3月

11日给利兰·哈里森的信中写道，“因为他对阿拉伯人非常熟悉，而且他做的工作极其重要……他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贝都因人一起旅行、生活和工作，他对阿拉伯部落的情感的了解或许是任何其他西方人都无法企及的。他对当前阿拉伯人事务的真实状态的了解应当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正确。”[15]

这是耶鲁与劳伦斯的第三次聚首。在1914年秋季，两人上一次见面时，英国的这位新任情报军官向耶鲁打听了巴勒斯坦南部土耳其军队运动和补给线的情况。现在轮到威廉·耶鲁发出连珠炮一般的一连串问题，询问叙利亚局势，而劳伦斯则是回答者。

耶鲁早已习惯了英国官员的委婉隐晦，因此劳伦斯的直言不讳让他颇为吃惊。借助劳伦斯提供的信息，这位美国特工后来向国务院报告称：“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很快将发动一次期望很高的攻势。”更加非同寻常的是，劳伦斯为耶鲁几乎完全精确地描述了阿拉伯起义军在即将展开的攻势中的军事目标，甚至指出了他希望让阿拉伯人和艾伦比的部队在叙利亚内陆会师的具体地点。

谈话转向政治方面之后，劳伦斯仍然是开诚布公。耶鲁报告称：“劳伦斯指出，阿拉伯人对英法的诺言没有信心。他们相信，只有他们通过自己的武力夺得的领土才将属于他们自己。”根据劳伦斯的判断，由于《贝尔福宣言》，阿拉伯人对其西方盟友内在的不信任达到了新的深度。“他认为《贝尔福宣言》是危险的政策，并说西方政府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埃及和巴勒斯坦从事的活动是非常愚蠢和鲁莽的。”劳伦斯警告称，如果英国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很快就将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垮台，或者至少是以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式结束。他凭借自己对该地区的丰富经验，驳斥了马克·赛克斯这样的人的乐观设想，以及他构建的空中楼阁，即犹太国家逐渐形成，而阿拉伯人虽然不情愿，但也只能接受。劳伦斯极富预见性地表

示："如果的确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只能是通过武力来建立，并且要在充满敌意的人群当中通过武力维持下去。"

一名英国军官如此公开地批判自己政府的政策，这在1918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何况还是对一名外国情报人员说出这样的话，但这反映了劳伦斯已经变得多么强大有力：他是英国与一线阿拉伯起义军之间关键的联系纽带，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而代之，因此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正如两人在贝尔谢巴的第一次会面一样，劳伦斯这次在与耶鲁谈话时同样有着隐秘的计划，而他用这种令人宽心的直率掩盖了自己的隐秘计划。他希望潜移默化地引导耶鲁，并通过他去引导美国国务院，去采纳他认可的政策。

劳伦斯现在非常敏锐地认识到，阿拉伯起义军的自由活动空间非常狭窄，他们将自己的努力与英国人的事业直接联系在一起，于是阿拉伯起义和侯赛因的哈希姆王朝的命运就完全臣服于比他们强大得多的盟友的恣意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历来都是如此——《赛克斯—皮科协定》就清楚显示了阿拉伯人在更高层面上的弱势地位——但在1918年初发生的却是影响更为重大的事件。

劳伦斯在与耶鲁会谈的几天之前去了一趟亚喀巴，在那里看到的景象就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局势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个一度昏昏欲睡的港口小村旧貌换新颜，几乎让人认不出来，港口挤满船只，狭窄的海滩上崛起了一座巨大的帐篷城市，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补给和作战物资。英军此前在此只有少数军官，现在则有数百名英国军人在此管理后勤、训练起义军新兵、照管在此扎营的数千名战士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亚喀巴现在甚至有常驻于此的空军部队，那是皇家飞行军团的一队飞机，定期起飞去轰炸汉志铁路和土耳其军队在内陆的军事设施。

他到访亚喀巴的方式也说明了局势的变化。劳伦斯受命将艾伦比的即将展开的叙利亚攻势计划通知费萨尔，他前往亚喀巴没有乘坐红海上

的行动迟缓的运输船，而是搭乘司令部专门为此征用的一架皇家飞行军团的双翼机。在与费萨尔谈话的时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王子的帐篷里慢悠悠、懒洋洋地一边喝茶一边讨论战术或政治；事实上，他们这次的会见不是商讨起义军在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能做些什么，而是劳伦斯颁布指示，告诉他们将要做些什么。在亚喀巴待了24小时多一点之后，劳伦斯重新登上征用来的那架飞机，飞回了开罗。

这体现了权力的一个矛盾之处，即阿拉伯起义在其英国监管者眼中的重要性增强之后，阿拉伯人的自主权反而减少了。在劳伦斯看来，终极的危险在于，英国人正在牵着阿拉伯盟友的鼻子，走上一条很可能会让阿拉伯人毁灭的道路。

从一开始，侯赛因的设想——一个在英国支持下的泛阿拉伯起义，由他本人担任领袖——的基础就很不稳固，受到阿拉伯保守派和进步人士的双重质疑。在侯赛因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竞争对手和宗教极端主义瓦哈比运动领导人伊本·沙特看来，侯赛因国王与英国人的联盟使他成为基督教西方的傀儡（当然，沙特自己也从英国人那里拿钱）。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更为国际化的阿拉伯人感到自己与从汉志杀出的“原始”的贝都因人没有什么共同点。这些都是未来在战后要解决的问题，但随着《贝尔福宣言》的公布，这个未来一下子降临到了侯赛因面前。

阿拉伯群众对《贝尔福宣言》的反应非常激烈和愤怒，这让英国人大为震惊，于是向他们的主要阿拉伯盟友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他支持该宣言。侯赛因不冷不热地服从了，但这并没有让阿拉伯人平静下来，而是增强了阿拉伯群众对侯赛因的敌对。1月初，劳伦斯的老导师戴维·霍格思（担任阿拉伯局的“代理局长”，尽管这个头衔只是荣誉性质，真正的权力在他人手中）拜访了侯赛因，希望能够最终澄清战后阿拉伯国家的边界。但是国王只想和他谈谈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派对自己越来越严重的威胁[16]。同时，埃及和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采纳了

伊本·沙特的说法，讥讽侯赛因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妥协是向西方溜须拍马。侯赛因在2月初写给雷金纳德·温盖特的一封令人警醒的信体现了英国计划造成的严重后果。据温盖特说："侯赛因提到，如果政治上破产，紧急情况下就要自杀……措辞很含糊，但麦加的谢里夫似乎因为协约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宣言而感到担忧。"[17]

就在这个关头，劳伦斯落入了一个圈套。在1月底，他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阿拉伯公报》的一个限制级别更高的版本上（只有极少数官员能够读到），在其中吹嘘费萨尔在叙利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说在叙利亚敌对费萨尔的人是受了法国或德国宣传蒙蔽的傻瓜。这篇文章很显然是致力于增强费萨尔在叙利亚的权利主张，但也让那些努力解决《贝尔福宣言》给阿拉伯世界带来的问题的英国官员感到，或许他们应当去找费萨尔而不是侯赛因寻求帮助[18]。当然了，讨好费萨尔必须要通过劳伦斯。2月初，劳伦斯的文章刊出几天之后，吉尔伯特·克莱顿告诉马克·赛克斯："我已经敦促劳伦斯向费萨尔解释与犹太人达成谅解的必要性。"[19]

劳伦斯坚决反对与犹太人妥协，而恰恰是他被英国当局派去向费萨尔兜售这项政策，他本人也看到了世事的讽刺意味，所以他只是半心半意地答应这么做。"至于犹太人，"他从塔菲拉给克莱顿回信道，"我下一次见到费萨尔的时候会和他谈，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应当是同情的，至少在战争期间是这样。"但劳伦斯能达成怎样的效果，也是有局限的；正如他向克莱顿说的那样，如果英国当局希望费萨尔公开发表宣言表示支持《贝尔福宣言》，"那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20]

不管劳伦斯多么反对这项政策，他毕竟是个秉信"现实政治"的务实者，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贝尔福宣言》已经是既成事实，阿拉伯起义军不可能因为它而与英国决裂，因此现在的主要目标应当是限制它造成的损害，或者在别处利用它得利。这个"别处"的一个绝

佳选择显然就是大叙利亚。劳伦斯设想，如果阿拉伯起义军向《贝尔福宣言》妥协，英国或许会感激涕零，转而帮助起义军与法国对抗，支持起义军对叙利亚其他地区的权利主张。但问题是，劳伦斯对自己的政府已经信心全无，知道自己的设想实在是风险极大的赌博。

那么还有什么牌可以打？最极端，也是最危险的当然是和土耳其人谈判。2月初，费萨尔又收到了土耳其第4集团军新任总司令穆罕默德·杰马勒将军秘密发出的和谈试探信。这封信比之前杰马勒帕夏的信要具体得多，条件也更为有利，于是费萨尔做了同样具体但颇为谨慎的回复。他公开拒绝了土耳其人的提议，但是没有把和谈大门关死，而是留下了一条缝[21]：如果土耳其人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南部撤军，双方或许还有的谈。这听起来是个决定能否谈得拢的最后通牒，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到1918年2月，青年土耳其党已经在集中军事力量去收复那些被战败的俄国人放弃的突厥地区，或许很乐意放弃贫困而棘手的阿拉伯地区。

但在做出和土耳其人交易这样的极端举动之前，还有一支潜在的力量或许能支援阿拉伯事业——美国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劳伦斯拨冗在开罗与威廉·耶鲁会谈的原因。

自1917年4月领导美国参战以来，威尔逊总统一再强调，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为了民主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的圣战还意味着，被压迫的各民族和世界各地的“小民族”都将得到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欧洲协约国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美国总统不是说说而已，的确是真诚地信守这个古怪的想法。1918年1月，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宣言发表后，欧洲列强的疑虑全都烟消云散。

在整个20世纪的所有文件中，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或许最能吸引全球瞩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无休无止的杀戮破坏当中，美国总统概述了一个半是乌托邦的设想。他设想了世界在未来的运

作方式：主宰世界数千年的帝国主义架构将被一扫而净，所有民族都将享有民族自决；在这个世界里，争端将在“国际联盟”通过耐心的协商解决，或许能将战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份文件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具有革命性，它的冲击波传遍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柏林和维也纳的饱受战争摧残的公民们和他们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兄弟一样，认为这或许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令它更富有吸引力的是，威尔逊以简单和毫不含糊的语言设定了实现这个过程的路线图，即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这份宣言的第十二点涉及对奥斯曼帝国的处置。美国总统宣称，这个帝国的土耳其部分将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目前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其他民族应当享有毋庸置疑的生存的安全，以及绝对的、不受骚扰的自治发展”。对劳伦斯和其他大多数公正客观的读者而言，这与《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被强加于中东的《贝尔福宣言》有着本质不同。

在与威廉·耶鲁谈话时，劳伦斯强调了所有阿拉伯人，不管其背景和身份，对美国的极大敬仰。事实上，劳伦斯极大地突出强调了这一点，耶鲁在给利兰·哈里森的报告中对这次谈话要点的概括是：“所有证据都表明，阿拉伯人对英法的信誉非常不信任；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阿拉伯人对美国的完全信任。”[22]

无聊的阿谀奉承从来都不是劳伦斯的长处，他向美国特工发出这样的信息显然不是为了讨好美国人。正如耶鲁写道：“他宣称，在将来，假如事情不像预期的那样好，假如阿拉伯人遭到英国背弃的危险迫在眉睫，那么如果美国能发表一份关于阿拉伯人及其国家的未来的宣言，就将是一张对抗土耳其—德国宣传的‘王牌’，他感到这样的宣言对阿拉伯人将产生极大影响。”

耶鲁或许是被劳伦斯在其他问题上的开诚布公迷惑了，似乎是相信

了劳伦斯这席话的表面意思，或者至少没有去深究其中奥妙。如果他仔细考虑一下，就会认识到，美国如果发出这样的宣言，对“土耳其—德国宣传”是没有多少效力的——毕竟美国只是对德宣战，所以它的动机自然会受到怀疑，而主要是针对美国的盟友——英法对中东的贪欲。实质上，劳伦斯是在试图利用一个外国政府来反对自己政府的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不像与土耳其谈判那样是叛国行为。

这样看来，劳伦斯在开罗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威廉·耶鲁会谈，是非常值得的。在随后几个月内，耶鲁会越来越强烈地敦促美国政府在中东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反对那些企图奴役阿拉伯人的人。在耶鲁和劳伦斯会谈的同一周，在3月14日晚上，“堪培拉”号停泊在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的码头，十几个人聚集在这艘船的会客室内。其中9人是一个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组织的成员，而另外两人是英国政府的联络员，或者“看护者”，任务是协助这群人的工作，并对其加以监视。这次会议是战前的战略动员会，因为在次日早上，“堪培拉”号（一艘改装过的澳大利亚轮船）将驶往埃及，那里是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中东的历史性使命的起点。

在他们面前解释任务的是英国保守党议员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他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支持者，现在和马克·赛克斯一起在英国战时内阁的近东委员会任职。在《贝尔福宣言》公布之后的四个月里，阿拉伯人对它的反对越来越强烈。奥姆斯比-戈尔解释道，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首要目标是向阿拉伯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社区领袖保证，他们不必害怕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园”。

随后，前往埃及的代表团的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他为该任务设定的“一个首要原则”，即“在战争结束前，阿拉伯人在军事上是英国政府的一项资产。但在战后，他们却可能是包袱”[23]。换句话说，要与敌对者正面对抗，现在还不是时候。目标应当是安抚对

手，保持冷静，韬光养晦，等待未来的时机。

毋庸赘言，亚伦·亚伦森对他们的任务的设想可不是这样的，但他不是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伦敦的时候，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坚决反对让他参加委员会，所以他现在的正式身份仅仅是委员会附属的“农业专家”，而且是在路易斯·布兰代斯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坚持之下才被允许待在委员会。

他的NILI间谍网的情况公开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和国际犹太人当中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人指控这位间谍领导人的行为威胁到了巴勒斯坦定居点的生存。更让人担忧的是，“堪培拉”号的乘客们的外交使命极其微妙，需要小心谨慎，而这位科学家却以喜好争吵闻名。

在努力安抚阿拉伯人（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接管他们的土地）的同时，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是将巴勒斯坦山头林立的犹太人团体联合到犹太复国主义大旗下。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的办法是说服他们，《贝尔福宣言》之后巴勒斯坦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他们要告诉阿拉伯人的话的反面。除此之外，还有在该地区的英国军官和政治官员要对付。即便那些对《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的英国官员也倾向于将它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意外情况，是英国的一个新承诺，要与已经对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做出的承诺竞争一番。

在“堪培拉”号的会客室内，魏茨曼大手一挥，泛泛地讲了如何执行这个复杂的计划。显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果给英国官员制造麻烦，就会丧失他们的支持，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安抚阿拉伯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哈伊姆·魏茨曼在这个语境下说的“委员会”指的是他自己——将公开而持续地发表宣言，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无意于战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也不打算将巴勒斯坦的土地全部收购。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当局最近发布的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只是在寻求机会帮助那些希望重返祖先家园的犹

太人完成心愿，与该地区的其他宗教团体或民族携手参加政治和经济发展。

至少公开的信息是这样。魏茨曼继续解释道，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积极地鼓励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储备资金，一旦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被解除，就立刻开始买地。他们绝不会放弃最终的目标——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但现在就大张旗鼓地公开宣扬是没有好处的[24]。

至少在起初，这场极其复杂的把戏收到了极佳的效果。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在亚历山大港受到了当地犹太人社区的欣喜若狂的欢迎——数百名犹太儿童站在码头沿线，歌唱希伯来歌曲《希望》——随后在开罗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魏茨曼向英国官员和在埃及的叙利亚流亡者社区再三强调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善良意图。吉尔伯特·克莱顿在阿拉伯局的副手金凯德·康沃利斯在4月20日报告称，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告诉一个被称为叙利亚委员会的阿拉伯人代表团，“他希望看到巴勒斯坦被一个像英国一样的稳定的政府治理，犹太政府将对他的计划造成致命打击，他的意愿就是为犹太人在圣地提供一个家园，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一起，与其他居民享有平等权利。”[25]另外，魏茨曼还向他的阿拉伯听众保证，穆斯林圣地的地位绝不会受到侵犯；他带着极大的同情谈到了阿拉伯人针对土耳其人的起义，甚至还暗示说，是他劝说英国人发布暂缓巴勒斯坦土地交易的命令的。“有些人还是疑忌重重，”康沃利斯在报告结尾写道，“但由于上述的情况，得到了缓和。如果委员会继续保持这种同阿拉伯人和解的态度，对方的疑心无疑会逐渐消失。”

熟知犹太人这场魅力攻势的内情的人当中包括美国国务院特工威廉·耶鲁。魏茨曼在开罗多次会见的一位叙利亚委员会领导人就是耶鲁的老熟人苏莱曼·贝伊·纳西夫，他就是1914年向标准石油公司出售石油开采特许权的三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耶鲁抵达开罗之后与纳西夫保持了

紧密联系，从这位流亡商人那里得到了他与魏茨曼会谈的详细信息。“总的来讲，”耶鲁向国务院报告称，“这些会议很成功。叙利亚领导者们得到的印象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打算将一个犹太政府强加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的条件是阿拉伯人可以接受的。”[26]

但如果叙利亚人相信了，耶鲁却很怀疑。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很快就能前往巴勒斯坦，旅途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而纳西夫和他在叙利亚委员会的同僚们却不被允许去巴勒斯坦，这很奇怪。耶鲁与该委员会的唯一一位美国代表路易斯·迈尔谈了之后，就更感到蹊跷了。

迈尔或许并不完全理解国务院特工的具体职责，或许他就是因为能和一位美国同胞聊天而兴奋，他在和威廉·耶鲁谈话的时候非常推心置腹。耶鲁回忆道：“迈尔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魏茨曼目前否认任何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否认在将来会对他有任何约束力。事实上，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在英国或美国保护下的犹太国家。”

耶鲁继续刨根问底，发现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已经非常成熟了。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内部已经在为建国之后如何处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而展开了辩论，一方认为“廉价的阿拉伯劳动力”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成长和成功”至关重要[27]，另一方预见到，将来必须将非犹太人驱逐出境。迈尔认为，最终局势将会取决于人口，“就像美国南方的白人绝不会屈服于黑人的统治一样，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少数派也绝不会听任多数派阿拉伯人的主宰”[28]。

在这位美国特工看来，该委员会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个政治上的波将金村。委员会向外界展示的人畜无害的假面具第一次出现小裂缝时，耶鲁颇有些幸灾乐祸。我们可以猜到，这个小裂缝是亚伦·亚伦森一手造成的。

在开罗，亚伦森日复一日地三缄其口，忍耐着委员会的无休无止的会议和演讲。讲起话来啰唆冗长、泼辣好斗的犹太代表和阿拉伯代表一样让他深感挫折。与犹太宗教界名人的一次漫长会议中，魏茨曼被迫耐心地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反对宗教，这差点让亚伦森按捺不住。亚伦森在日记中怒骂道："这又是一次对牛弹琴。"[29]

不幸的是，农学家恰恰在最糟糕的时机——与苏莱曼·纳西夫的叙利亚委员会会谈的时候大发雷霆。其中一名阿拉伯人指出，犹太定居者喜欢抱团，只跟自己人做生意，因此给阿拉伯人造成了损失。亚伦森怒火中烧，站起来指控说这是弥天大谎。魏茨曼迅速来安抚局面，说这种令人遗憾的事情在过去可能发生过，但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将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亚伦森的公开发作给会议投下了一道阴影。耶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挖苦道："但愿委员会在将来与阿拉伯人打的所有交道中，魏茨曼博士都能把亚伦森先生控制在幕后。"[30]

魏茨曼显然也是这么想的。几天后与叙利亚委员会的又一次会议中，亚伦森未能出席。

4月2日早上，劳伦斯和一小群卫兵从谷维拉出发，奔赴叙利亚内陆。这是一个多月来劳伦斯第一次骑骆驼，这次旅行很快让他兴致高昂起来。"沙漠景色的抽象净化了我，"他写道，"以它充溢的伟大涤荡了我的心灵。它的伟大不是来源于向它的空旷增添思想，而是来自思想的空无。地球生命的脆弱反映了天空的力量，如此巨大，如此美丽，如此强大有力。"[31]

抛却乡间的美景不谈，这次长途跋涉的缘由是，叙利亚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特点，这让艾伦比将军进军大马士革的计划出了问题。英军在巴勒斯坦中部全线维持着一条强大而井井有条的战线，从雅法以北的地中海海岸一直延伸到约旦河，长约30英里，但约旦河以东的全部地域仍在土耳其军队手中。这意味着，英军向北进攻大马士革时前进得越

远，他们的东翼就会越拉越长，也就越来越容易遭到土耳其人的反击。如果占领了摩押高原，这个危险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但由于扎伊德破坏了攻占摩押高原的努力，英军高层设计出了一个新计划，为朝向大马士革的主攻扫清障碍。

在2月底的司令部会议中（劳伦斯也参加了这些会议），英军高层决定，驻扎在亚喀巴的3000人的阿拉伯部队将进攻至关重要的铁路枢纽马安（位于阿拉伯人在谷维拉的前进基地东北30英里处）。为了掩饰这次进攻并阻止土耳其军队向马安增兵，英军一支骑兵部队将同时冲过马安以北约120英里处的死海北端，摧毁安曼附近汉志铁路的若干关键路段。一旦阿拉伯人占领马安，它南面的所有土耳其军队，包括仍然据守麦地那的部队，将被彻底切断。阿拉伯军队和英国辅助部队随后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北方，迅速扫清安曼以南铁路沿线的所有小型土耳其据点。如果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英军及其阿拉伯盟军将建立一条东西走向、横亘几乎整个大叙利亚的连续战线，这样就可以开始向大马士革推进。

劳伦斯在这场席卷敌境的作战中的角色很有限，但也只有他能够胜任。在其他英国顾问监管主要的战斗——袭击马安的同时，他将率领一小队起义军北上100英里，到达一座被称为阿塔提尔的山谷。在那里，他将与其他部落武装会合，对安曼周边的土耳其军队实施“骚扰”，配合英军骑兵部队从西面发动的进攻。他的任务初定于4月初开始，于是他提前几天从谷维拉出发，以便尽早准备。

4月6日，他的队伍抵达了阿塔提尔谷。在劳伦斯笔下，这座谷地在初春的旖旎中宛如伊甸园，山峦和溪岸长满了茂密的克拉莎草和野花。“万物都在生长，”他写道，“这景象一天天更饱满和明媚，直到沙漠变得仿佛繁茂的水草地。嬉戏的风儿交叉着，跌跌撞撞地飞来，它们的宽广、短暂的劲风从草丛中汹涌而出，在一瞬间将草丛化作明暗不一的锦缎，如同被滚压过的新庄稼。”

劳伦斯的高昂兴致和对身边美景的关注似乎不像是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人的举动，另一个细节就更不协调了。在动身前往阿塔提尔之前，他得知，他留在阿兹拉克要塞的两名战士在寒冬中被冻死了。其中一人是达乌德，就是6个月前劳伦斯选来做他私人仆役的两个营地顽童之一。送来这噩耗的就是过去与达乌德形影不离的伙伴法拉杰。

“他们自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永远欢天喜地，一起工作，一起睡眠，以完美挚爱的坦诚和诚实分享每一星星点点的利益。法拉杰前来报告他的伙伴已死时，我看到他面色黧黑、面容僵硬、眼色铅灰，衰老了许多。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从那天起到他的服务结束，他再也没有给过我们一个笑容……其他人向他奉献自己，以此慰藉他，但他却焦躁不安地游荡，面色灰暗，一言不发，非常孤寂。”尽管悲痛欲绝，或者正是因为伤心难过，法拉杰加入了劳伦斯北上的旅途。

在阿塔提尔，劳伦斯得到了英军的消息，但这不是他所期望的好消息。根据司令部制定的计划，这支约1.2万人的骑步兵混成部队将从约旦河谷北上，占领安曼以西约10英里处的萨勒特镇。一支袭击队伍将从那里出发，摧毁安曼城外汉志铁路上最关键的地点——两座高架桥和一条隧道。但显然走漏了风声，英军进攻部队在萨勒特遇到了掘壕据守的德军和土耳其部队。原本设想的轻松远足变成了长达两天的血腥战斗。英军终于占领了萨勒特，袭击部队前往安曼附近的铁路，但敌人也已经在那里严阵以待，迫使英军撤退，没有达成任何主要目标。噩耗纷至沓来：英军损失了近2000人之后，被逐出了萨勒特，正在土耳其人的紧追不舍下败退，撤过了约旦河[32]。

“当时认为，土耳其人有可能会夺回耶路撒冷，”劳伦斯如此描述在阿塔提尔收到的越来越凶险的报告，“我熟知同胞们的英勇，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局势显然非常糟糕。”但比军事失败更严重的是，它可能

会对阿拉伯人造成心理上的影响。“艾伦比的计划看上去还算谦逊适度，我们（英军）在阿拉伯人面前如此溃败，真是可悲可叹。他们从来不相信我们真的能够成就我曾预言的那些伟业。”萨勒特的大败之后，阿拉伯人的这些疑虑一定又加深了。

在安曼周边无事可做了，于是劳伦斯带领15名卫兵南下，加入正在进行中的袭击马安的战斗，但此次战役命途多舛，厄运还没有结束。次日，在法莱弗拉村外的沙漠中，他们看到一支由8人组成的土耳其步兵巡逻队在倒霉地沿着铁路线行进。在北方的行动徒劳无功之后，劳伦斯的部下恳求他批准去攻击这群兵力占弱势而且位置暴露的敌人。“我感觉这太无关紧要了，”他回忆道，“但他们气恼起来，我就同意了。”

土耳其人快速逃往一个铁路涵洞寻求掩蔽，劳伦斯将部下派往敌人两翼，形成包抄之势。他突然发现年轻的营地仆役法拉杰独自一人骑着骆驼径直向敌人冲去，但已经太晚了。劳伦斯看到，法拉杰在铁路涵洞旁猛然勒住骆驼；一声枪响，法拉杰倒了下去。“他的骆驼独自站在桥边，安然无恙，”劳伦斯写道，“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故意在开阔地里骑到他们旁边，然后又停在那里不动。但看上去的确是这样。”

劳伦斯和其他人赶到涵洞处时，发现一名土耳其士兵死亡，法拉杰身体侧面中弹，伤势极其严重。法拉杰的伙伴们努力帮他止血，但是无济于事，于是想把他抬到骆驼背上，尽管这个年轻人自己恳求大家将他留下，让他一个人死去。但这时传来警报，一支约50人的土耳其巡逻队正沿着铁路赶来，于是事情不决定也得决定了。

劳伦斯和他的卫兵们知道土耳其人会对俘虏做出多么残忍暴虐的事情来，因此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会杀死伤势太重、无法行动的战友。仁慈地结束法拉杰生命的任务落在了劳伦斯肩上。“我在他身旁蹲下，将我的手枪放在他脑袋旁的地面上，好让他看不到我的动作，但他一定是猜到了，因为他睁开眼睛，用粗糙、皮肤剥落的手紧紧攥住我，这是

那些内志少年的小小的手。我等了片刻，他说道：‘达乌德会生你的气的。’往昔的笑容怪异地回到这灰白的萎缩的面孔上。我答道：‘代我向他问好。’他以正式的礼节答道：‘真主会给你安宁。’最后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劳伦斯开枪打死法拉杰之后，重新爬上骆驼，带领部下逃走了，这时土耳其人的第一梭子弹开始向他们射来。

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场战争的残酷无情和劳伦斯越来越深的冷漠。当夜，一行人在离法莱弗拉几英里的地方宿营的时候，人们为了争夺法拉杰的优秀骆驼吵了起来。劳伦斯拔出手枪，一枪打在这匹骆驼头上，结束了这场争吵。当夜的晚餐上，他们吃的是米饭和这匹骆驼的肉。“吃完之后，我们就睡了。”劳伦斯写道。

到1918年4月中旬，杰马勒帕夏或许对未来非常乐观。尽管几个月前就有传闻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告终，但他在处于幕后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层中仍然举足轻重，和以往一样受人尊重和畏惧。战场上也传来了鼓舞人心的喜讯。3月21日，德军在法国发动了大规模攻势，迅速突破了协约国军队，进展迅速，这是西线所有军队自开战以来攻城略地进展最大的一次。德军攻势的第一波——代号“米夏埃尔行动”，仅仅因为进攻中的德军部队超越了己方的补给线范围，才不得不停住脚步。到4月13日，第二次攻势“乔治特行动”已经逼近了法国海岸和那里的重要港口。突然间，德军抢在正在奔赴前线的美军救援之前将英法打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当前，德国在西线战争春风得意，土耳其在东线的表现也不错。土耳其军队先是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东北省份，然后在2月初利用俄国战败在高加索造成的权力真空，杀进了亚美尼亚。到4月中旬，这些部队已经在准备行动的下一阶段，即进军里海之滨，以及巴库的神话般富饶的油田。就像杰马勒帕夏一样，奥斯曼帝国也变成了一个怪异的、不断

异变的有机体，在一个地方丧失了影响力和权威，却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补偿。

另外，有人认为，与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结下梁子，对土耳其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贝尔福宣言》将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到了英国那边，却激怒了阿拉伯世界。于是杰马勒和土耳其的其他领导人得以向叙利亚的一些幻想破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领导人，甚至头号叛贼——汉志的侯赛因国王，发出招安的呼吁。到4月中旬，有迹象表明，这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和平建议开始收到成效。杰马勒从他在叙利亚的中间人那里得知，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最近开始回应土耳其的橄榄枝，提出了他自己的条件。双方的鸿沟还很深，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游戏的一个教训就是，任何事情都不是恒定不变的，昨天丢失的东西明天也许就能收回。最重要的是，谁最后得胜。而到1918年4月，同盟国无疑稳操胜券。

这年春天也在君士坦丁堡的库尔特·普吕弗无疑也是这么想的。奇怪的是，德国形势的好转使得他得以重返自己参与的第一桩大密谋，那件事情原本早就胎死腹中，现在却骤然焕发了生机。

在过去的6个月中，埃及被废黜的赫迪夫阿拔斯·希里米二世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皇宫酒店高楼层的一个套房里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与一个特殊阶层的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都能找到这种贵族，这些小王子、侯爵和印度土邦主们被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们暂时搁置，留待未来某个有用的时机。在这期间，招待这位前任赫迪夫、让他感到自己重要的任务主要由库尔特·普吕弗承担。与他作为德国情报局主管的冷静职责相比，与希里米及其三教九流的扈从们打交道往往像是在照顾婴儿。据普吕弗的传记作家唐纳德·麦克凯尔称：“阿拔斯·希里米的顾问们争吵不休，互相指控是‘英国间谍’。普吕弗对这些顾问进行监视，并帮助前任赫迪夫处理好他与儿

子、三位前妻和一位法国情妇之间的关系。”[33]

显然，这位德国情报头子将阿拔斯·希里米看作试探民意的有用工具。希里米认为，与费萨尔·侯赛因的秘密谈判是毫无意义的；君士坦丁堡统治集团绝不会满足费萨尔提出的要求，而费萨尔肯定对此心知肚明。前任赫迪夫主张，更好的办法是让他成为埃及统治者，然后与侯赛因和费萨尔达成友好关系。希里米无疑还匆匆补充说，同时还会与土耳其和德国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34]。

在1917年秋季，这还只是一堆空话，但到了1918年初，曾经显得荒诞可笑，甚至是空中楼阁的想法却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到这时，关于埃及发生骚乱的第一批可靠报告已经传到了外界：一向安宁驯顺的埃及民众被英国人极其严酷的军法统治以及《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科协定》大大激怒。然后当然还有俄国的最终垮台、德国和土耳其在战场上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以及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的阿拉伯起义军有可能正在寻求脱离与虚伪的英国人的联盟的越来越多的迹象。由于上述的这些考虑，在这年4月，阿拔斯·希里米二世或许能通过某种方式登上埃及王位的想法并不显得荒诞离奇——如果那真的发生了，库尔特·普吕弗在佩拉皇宫酒店的耐心工作或许能为德国挣得一份绝妙的红利。

希里米显然也感到自己的价值正在提升，于是在4月他重新提出了一个让他觊觎已久的目标[35]。当初他向马克斯·冯·奥本海默提过此事，但一直被拒绝。希里米告诉库尔特·普吕弗，在决定任何事情之前，他需要面见德皇。普吕弗颇有些不知所措，表示会试试看。

5月15日下午，劳伦斯与艾伦比将军一起喝茶的时候，两人的情绪都很低落。

在前往阿塔提尔的跋涉被证明是徒劳无益之后，劳伦斯匆匆南下，参加阿拉伯人对铁路枢纽城镇马安的进攻。4月13日，他抵达那里时，

行动已经开始。

作战计划是，进攻部队将首先袭击马安外围的哨所，希望能将土耳其驻军主力从火车站周围的巩固阵地中诱骗出来。行动起初很顺利，土耳其军队的外围哨所一个个落入起义军手中。但在4月17日，阿拉伯部队的伊拉克指挥官厌倦了漫长的等待，推翻了他的英国顾问们的建议，命令向火车站发动正面进攻。马安的这次进攻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千场其他战役一样徒劳。劳伦斯写道："除了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人被从火车站驱赶出来，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地上到处躺着身穿卡其军服的死尸。"[36]

劳伦斯在马安地区还待了几天，协助其他英国军官破坏马安以南的铁路，但那次正面进攻的失败已经决定了战役的命运。英国军方公报大肆吹嘘了对马安以南汉志铁路的破坏——约60英里长的铁轨被摧毁，麦地那的土耳其驻军现在彻底被切断了——但与行动的目标相比，这个成就不值一提[37]。

但在5月2日，劳伦斯抵达位于拉姆拉的艾伦比司令部时，等待他的是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在过去的6周中，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只是非常勉强地抵挡住了德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迎战德军的第三次攻势，艾伦比得到命令，转入防御，并将他麾下数万名精锐的一线士兵调往法国。这意味着，英军不再会向大马士革进攻，前一个月的所有损失——英军骑兵部队向萨勒特进攻的失败、马安的灾难性的正面进攻、法拉杰在沙漠中惨死——全都付之东流了。更糟糕的是，就在劳伦斯抵达拉姆拉之前，前不久被逐出萨勒特的那位英军骑兵指挥官决定再试一次；又损失了1500人之后，到5月2日，英军的这一次新败局的最后一批残兵败将才从前线上撤下。

因此，到劳伦斯于5月15日第二次来到司令部并与艾伦比将军一起喝茶的时候，他们两人都不得不承认，突破叙利亚前线的希望非常渺

茫，事实上比先前愈发渺茫，因为在劳伦斯上一次到司令部之后，艾伦比的部队又有不少兵力被调往西线。总的来讲，埃及远征军将有约6万人被调往法国参战，这相当于它全部一线兵力的一半。伦敦方面许诺要从伊拉克和印度调兵补充埃及远征军，但这意味着在未来许多个月之内，叙利亚前线都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但在这次喝茶的时候，艾伦比在描述他的部队正经历的大规模重组时，偶然提到了帝国骆驼骑兵部队。这是一支精锐部队，在西奈半岛安坐无事已经有6个月之久。艾伦比现在打算摈弃它的骆驼，将其改编为传统的骑马的骑兵部队。

从叙利亚战役的一开始，困扰阿拉伯起义军的最大的后勤问题就是缺少运输和骑乘用的骆驼。随着行动规模的扩大，这个问题愈发恶化。由于骆驼的匮乏，补给线总是被拉长到濒临崩溃，常常因为没有坐骑而将计划的行动缩小，或者干脆取消。另外，劳伦斯和英国军官常常外出收购骆驼，已经将该地区的资源几乎耗尽，所剩不多的优质骆驼的价格也高到了敲诈勒索的程度。现在，帝国骆驼骑兵部队被解散之后，整个中东地区的大约2000头最优秀的骑乘骆驼突然间空闲了出来[38]。

艾伦比解散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打算让劳伦斯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的骆驼？"

艾伦比笑道："问问军需总长。"

军需总长已经答应将这批骆驼交给即将开抵前线的一个印度师，作为运输工具。军需总长不肯答应劳伦斯的呼吁，但艾伦比被劳伦斯的观点说服了：让这些优势骆驼仅作运输之用，实在是暴殄天物。当天晚餐时，总司令问劳伦斯打算如何使用这些骆驼。

劳伦斯当然已经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另外，他还看到，英军骑兵向

萨勒特第二次进攻的失败其实是塞翁失马。由于英军的这次败仗，土耳其人一定确信不疑，英军在将来的进攻一定还是针对这同一个地点——毕竟，连续多次猛攻敌人最巩固的地点已经成了英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项传统——于是相应地部署自己的部队。土耳其人的兵力集中在萨勒特—安曼地区，劳伦斯就可以利用新获得的骆驼，从阿兹拉克的沙漠藏身之地出发，从敌人背后向分布广泛的一大批目标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整个下叙利亚最关键的目标：铁路终端城镇德拉，即在巴勒斯坦对抗英军的土耳其军队的主要生命线。在司令部的餐桌上，劳伦斯给艾伦比的回答是："我要用这些骆驼把1000人送进德拉，日子随您挑。"

劳伦斯解释说，1000兵力虽然不足以长期防守德拉，但有足够的时间摧毁雅莫科的至关重要的铁路桥，将巴勒斯坦境内的土耳其军队彻底切断，断绝其补给和援兵。听到这话，艾伦比转向军需总长，假装悲伤地说："军需总长，你输了。"

艾伦比许诺将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骆驼交给劳伦斯，于是他火速赶回了费萨尔的指挥部。这消息令聚集在那里的部族武装酋长们欣喜若狂，因为2000头纯血统骆驼的"礼物"意味着，阿拉伯人终于可以大规模地将起义扩展到北方。局限于狙击、打了就跑的突袭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有了足够多的骑兵，他们可以进攻并守住人口密集的城镇了。

这还意味着，阿拉伯人或许能借此摆脱英国人的束缚，这是劳伦斯的想法的一个关键方面。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骆驼交付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随后还要让这些骆驼适应叙利亚的较粗劣的草料，但在两三个月内，阿拉伯起义军就不需要依赖英军（目前在巴勒斯坦陷入僵局）的行动了。起义军可以独自进军叙利亚腹地，有了这种独立性，就有机会将叙利亚占为己有。劳伦斯写道："这是帝王的馈赠，赠予我们不受限制的机动性。阿拉伯人现在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去打赢这场战争了。"[39]

自抵达开罗以来，亚伦·亚伦森便陷入了忧伤抑郁的情绪。部分原因是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内部遭到边缘化，其他人以非常不客气的方式将他排挤到核心之外；但时隔7个月之后重返中东，也让他对自己的NILI组织遭遇的悲剧更加感同身受。在开罗，他与两个弟弟亚历克斯和萨姆团聚，并从他们那里得知了妹妹的悲惨结局的更多细节。最让农学家火冒三丈的是，萨拉和NILI组织的其他成员实际上是被犹太同胞们出卖的，济赫龙雅各布委员会甚至悬赏缉拿NILI组织的在逃成员约瑟夫·利申斯基。1918年春季，济赫龙还处于土耳其的大后方，但亚伦森已经在考虑重返故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要向所有懦夫和恶棍复仇，那么就只有六七个人配得上我和他握手。"[40]

但比愤怒更严重的是，对萨拉及牺牲的挚友押沙龙·法因贝格的回忆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不时侵入他的思绪。例如，有一次，他看到威廉·奥姆斯比-戈尔打电话到耶路撒冷，不禁大吃一惊。"从开罗打电话到耶路撒冷！"他在日记中惊呼，"如果萨拉和阿布萨活到现在看到这个，就好了！"

4月初，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离开埃及，前往巴勒斯坦，亚伦森受到的折磨就更厉害了。他们搭乘的夜间火车经过加沙时，亚伦森独自一人站在车窗旁，凝视着飞驰而过的乡间夜景。他始终是个农学家，记录了农田的糟糕状况："冬季谷物很少，质量也很差"。同时又说，在他离开巴勒斯坦的两年中，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他写道，"我们是乘火车旅行，而且是和英国人在一起！阿布萨，阿布萨，你在哪里呀？萨拉，你又在哪里？"[41]

但亚伦森在巴勒斯坦愈发遭到排挤和冷遇。在欢迎到访的委员会的宴会上，一群当地的犹太长老拒绝和他坐在一起，因为他的间谍活动"将犹太定居点置于危险境地"。在与犹太代表团的其他会议中，有人严厉指责亚伦森在战争初期发放国际救援款时的高压手段。在雅法的特

拉维夫犹太人飞地（在杰马勒帕夏的疏散命令之后，亚伦森宣传了这个社区陷入的困境）的欢迎仪式上，才终于有人向他表示感谢。当马加比协会（犹太人的一个民间组织）的几百名青少年成员以歌声欢迎到访的委员会成员时，哈伊姆·魏茨曼向亚伦森探过身去。“嗯，亚伦，”魏茨曼说道，“这一切，都有你的极大贡献，而且你付出了很大代价。”[42]

但这个时刻是个异常现象。因为魏茨曼在巴勒斯坦的使命非常敏感，不容许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而亚伦森绝不是个驯顺怯懦的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将亚伦森拉到一边，敦促他与一个定居点代表团握手言和，这位科学家傲慢地说：“和他们握手意味着和我憎恶鄙视的人建立关系。如果我的态度不够谨慎，那也罢。”[43]

亚伦森甚至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争吵不休，于是魏茨曼渐渐地将农学家愈发向边缘排挤。有的时候，就连大家站的位置都能体现这一点。在委员会在巴勒斯坦期间的合影中，亚伦森通常站在一侧，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出现在合影中。到4月底，他已经与委员会分道扬镳，自己去做自己的一项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委员会的巴勒斯坦之旅的最触手可及的成果就是亚伦森的贡献，因为到5月底，亚伦森已经完成了巴勒斯坦南部农业发展的一份重要蓝图[44]。在他转交给阿拉伯局的温德姆·迪兹的文件和地图中，包含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尽快对大约25万英亩的荒地和“皇室土地”（被土耳其政府控制）进行耕种，以缓解持续不减的战时粮食短缺问题。根据亚伦森的计划，这项工程将由英国军方控制，由犹太定居者提供劳动力，由犹太复国主义银行提供资金。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承诺提供至少50万英镑。计划实施之后，粮食将被提供给贫困人口，阿拉伯人也能从巴勒斯坦增长的犹太人口中得益，而良好生活的前景也会吸引更多犹太人到巴勒斯坦。

当然，军管结束之后（或许需要四五年时间），这25万英亩的土地

所有权将被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吉尔伯特·克莱顿向外交部表达了对亚伦森计划的支持，并指出：“对一个群体的小小善意，很容易借助给其他群体的类似特权来平衡，因此在正常的管理过程中，可以取得循序渐进的进展，而不至于造成摩擦和不满。”[45]

尽管亚伦森的土地开发计划贡献颇大，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仍然是被排挤的对象，而委员会的英国赞助人自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5月底，艾伦比将军在耶路撒冷举办盛宴，为即将离开的委员会饯行，唯一没有受到邀请的委员会成员就是亚伦·亚伦森。

为了绕开自己不认可的命令，劳伦斯常常动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一个老把戏：消息在传递过程中丢失，或者没有及时送抵。然而，英国当局努力迫使阿拉伯起义领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解的时候，劳伦斯没法使用这个计谋；在这个领域，劳伦斯只能在边缘上搞一些迟滞或阻碍动作。1918年2月，吉尔伯特·克莱顿命令劳伦斯敦促费萨尔与犹太人和解，劳伦斯的回答是，他希望在近期安排费萨尔访问耶路撒冷，“那里的所有犹太人都会待之以礼。这或许就能达到你的所有目的，而不需要做出公开承诺，因为那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46]

一个小小的陆军少校居然放肆地告诉一位准将，后者的目的是什么，而他在帮助上级达成目的时有哪些局限，这在1918年和在今天一样不可接受，但克莱顿显然是平静地接受了劳伦斯的答复；他肯定是认为，劳伦斯对他的命令固然只是部分服从，也比完全置之不理要好，因为英国军方找不到第二个人拥有劳伦斯对费萨尔的那种影响力。

5月，克莱顿又提起此事时，劳伦斯改换了策略。有鉴于哈伊姆·魏茨曼及其委员会一直受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抵触和反对，魏茨曼建议让他与费萨尔会晤。在巴勒斯坦的英国领导层满心欢喜地支持这个想法，于是克莱顿在5月22日向身在亚喀巴的劳伦斯发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你建议如何安排？”将军问道，“我认为开会时你应当在场……请

尽快告知你对上述各点的意见。”[47]

劳伦斯肯定收到了这份电报，因为他在第二天还在亚喀巴，但没有他回复的记录。5月24日，魏茨曼建议的旅行时间表业已确定——他将在5天后乘船前往亚喀巴，于是克莱顿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这一次是从艾伦比的指挥部发给亚喀巴基地总指挥的。“会议将在阿拉伯人的指挥部进行，他们将乘车前往那里。若方便，请将此电文转发谢里夫费萨尔和劳伦斯。劳伦斯应出席会议。请速速回复。”[48]

劳伦斯这一次肯定是得到了通知，但他仍然装聋作哑。5月27日，魏茨曼即将抵达亚喀巴的时候，他又一次动身北上实施侦察，在魏茨曼抵达并离去之前与基地非常“方便”地断了联系。

在他外出期间，费萨尔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议于6月4日下午召开了。这是一次气氛融洽友好的会晤，魏茨曼夸张地戴上了阿拉伯头巾以示好。费萨尔避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表示最终的权威属于他的父亲（目前在麦加），而且叙利亚大局未定，现在就谈这么具体的问题为时过早。但魏茨曼对这次会议仍然非常满意，英国官员们也是如此。克莱顿收到关于此次会议的详细报告之后向外交部汇报称：“我认为，此次会议极大地促进了魏茨曼与费萨尔两人之间的互相同情和理解。双方都开诚布公，这样的直接会晤一定会带来良好后果。”[49]

劳伦斯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判断。他在6月8日，也就是费萨尔—魏茨曼会议的4天之后结束了侦察行动，返回亚喀巴。在他看来，英国人强加的和谐只能助长费萨尔以及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对手的声势。

但他没有什么办法。英国人不会从《贝尔福宣言》退缩。美国人执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或许能对英国施加压力，但那要等到和平会议时，美国目前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等于零。至于阿拉伯人独立作战的计划，帝国骆驼骑兵部队的坐骑还没有送抵，就算是交付了，还需要时

间——劳伦斯估计需要至少两个月，这些骆驼才能充分适应叙利亚的环境，有能力参加大规模行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与土耳其人修好。巧合的是，就在魏茨曼在亚喀巴亮相的两天之前，费萨尔收到了穆罕默德·杰马勒将军的又一封密信。

事实上，费萨尔与土耳其将领的秘密通信并没有瞒得过英国高官。早在3月底，一名间谍就向雷金纳德·温盖特呈交了费萨尔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一封信（其中概述了他的谈判条件）的副本。“很难说对这番通信应该重视到什么程度，”温盖特向外交部报告称，“直接向埃米尔费萨尔询问他的动机是不妥的……但这证实了我的疑虑，即谢里夫领袖们由于总体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协约国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策的怀疑，开始试探土耳其官员关于阿拉伯国家未来地位的意见。”[50]

得知这个消息的外交部官员们并没有表现出虚伪的假道学，的确是很了不起。他们指出，毕竟英国正在通过非官方渠道在瑞士与六七名土耳其使节谈判，所以如果要指责别人通敌，不太妥当。在马克·赛克斯的最初建议下，他们着手以君子的方式解除这些威胁：向费萨尔授予一枚勋章。在随后几个月内，一群英国高官就在琢磨，什么样的表彰足够让阿拉伯起义领袖肃然起敬，充分地保障他的忠诚[51]。

奇怪的是，费萨尔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竟然是吉尔伯特·克莱顿。他匆匆告诉外交部，针对费萨尔的背叛指控完全是出于误会，费萨尔向穆罕默德·杰马勒提出的建议事实上是旨在实现战后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间的和解。尽管如此，克莱顿建议道，伦敦方面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竭尽全力巩固阿拉伯人与英国的联盟”[52]。“竭尽全力”包括承认费萨尔在约旦河以东所有地区的权威，并迫使法国人“发布正式的声明”，宣布放弃对大叙利亚的权利主张。如果我们知道克莱顿对费萨尔的慷慨大度评价的来源，或许他的言论就不显得奇怪了。克莱顿在给外交部的信中称，这种解释——或许还有那一系列建议——是由T.E.劳伦

斯少校提供的。

在费萨尔与土耳其将领之间的秘密谈判中，劳伦斯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史学界始终没有搞清楚；就像他向费萨尔泄露《赛克斯—皮科协定》内容的时间一样，劳伦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深知自己面临着非常微妙的法律问题，所以向他早期的传记作者们提供了非常含糊和自相矛盾的解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这些谈判中看到了针对英国政府的一件潜在的强大武器，它提醒了英国人，假如他们背弃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还有别的路可走。“目前，”穆罕默德·杰马勒在6月2日的信是这样开始的，“奥斯曼政府，伊斯兰的最强大的代表，已经战胜了穆罕默德宗教的头号敌人。我深信不疑，我邀请先知的最优秀和高尚的后裔（费萨尔）参与到保卫伊斯兰的事业中，是对先知的尊崇，因为只有保障土耳其军队的胜利，所有真正的信士才能过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将军在信的末尾提议在4天之后与费萨尔会面，“我相信在此次会议中，我们一定能够满足所有阿拉伯人的心愿”[53]。

费萨尔没有接受面谈的建议，但是回了信。在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中，他再一次提出了让安曼以南所有土耳其军队撤走的条件，并建议，未来叙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可以参照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那种松散的邦联制。这还有些含糊，但费萨尔的其他条件就是斩钉截铁了：土耳其军队中所有阿拉伯士兵将脱离出来，加入阿拉伯军队，并且“如果阿拉伯和土耳其军队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阿拉伯军队将由自己的司令官指挥”[54]。这已经不是在谈和解了，肯定也不是在谈战后的情况，而是在说阿拉伯与土耳其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协约国。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费萨尔从亚喀巴向穆罕默德·杰马勒发出这个提议的时间至迟是6月10日。在此前的两天内，T.E.劳伦斯来到亚喀巴，与他聚首。直到6月10日，劳伦斯才在亚喀巴港登上“阿瑞图萨”号，前往开罗与英国军方高层作进一步协商[55]。

战略大师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环境，毫不感情用事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不管劳伦斯有没有帮助费萨尔写给穆罕默德·杰马勒的那封信，几天之后，他就去会见了他在亚喀巴回避的那个人：哈伊姆·魏茨曼。

从各方面的记述来看，这次会谈非常友好融洽。魏茨曼当然已经知道，他与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达成谅解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英国中层军官。所谓英雄之间惺惺相惜，劳伦斯对这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本领也非常钦佩：他敏捷地安然通过巴勒斯坦的政治雷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方面相当成功地安抚了阿拉伯人的担忧，同时又以另一套说辞激起了犹太人的斗志。这两位战略大师很快就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丝毫不奇怪。

这种共识植根于互相的依赖。要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犹太人显然需要英国打赢战争，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支持阿拉伯起义。在和费萨尔会谈的时候，魏茨曼就提出动员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而在拉姆拉与劳伦斯磋商的时候，魏茨曼说的更具体：这种支持可以包括向阿拉伯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以反抗土耳其人。劳伦斯则看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后的叙利亚或许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在6月16日撰写的关于同魏茨曼会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费萨尔占领大叙利亚之后，地主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基督徒和外国势力就会转而敌对他……如果，在巴勒斯坦身处英国控制之下而地位稳固的英美犹太人选择在这个时机向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伸出援手……谢里夫费萨尔将不得不接受这种支援。”[56] 有了犹太人的帮助，费萨尔就可以“处理掉”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妙的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法国人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费萨尔在对付法国人时将拥有一个天然盟军。

但那都是未来的事情。在当下，劳伦斯给外交部的建议是，阿拉伯

人不应当寻求，更不能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援助；也不能给魏茨曼机会去达成他心急火燎的心愿：觐见侯赛因国王。

劳伦斯对犹太复国主义问题态度的转变让他的上级非常高兴，尽管这种转变的程度有限。不知是出于天真还是深思熟虑的想当然，在该地区过去3个月中与哈伊姆·魏茨曼打过交道的大多数英国官员都买了他的账，相信了他那令人宽慰的设想：犹太社区在巴勒斯坦与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共同生活，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和谐之中。但劳伦斯和魏茨曼一样都是老谋深算的人，几乎当场即看破了后者的诡计。他在6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魏茨曼博士希望，50年之后犹太人将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而当前的目标则是犹太人在英国幌子之下控制巴勒斯坦。"

劳伦斯唯一的错误在于犹太人的时间表。仅仅30年之后，英国的幌子就被拆除，以色列国正式建立，哈伊姆·魏茨曼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统。

威廉·耶鲁在开罗待的时间越长，就越为了两件事情感到挫败和恼火。首先，他的政府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中东的事态。从1917年10月底开始，每个星期一他都要向国务院的利兰·哈里森发送长篇报告，除了少数简短电文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甚至他在请求指导时——他的报告是不是让读者觉得无聊？国务卿是否希望他调查另一个方面？——对方也是沉默不语。

耶鲁的第二个挫折是在更个人的层面上，他无法得到英国当局的批准去参观前线。3月初，T.E.劳伦斯与他会面时邀请他去拜访亚喀巴的阿拉伯起义军基地，但耶鲁的申请在英国官僚机器中有如石沉大海。犹太复国委员会准备首次前往巴勒斯坦作实地考察时，耶鲁请求一同前往，却被吉尔伯特·克莱顿告知，这个计划"可能有困难"[57]。耶鲁甚至提出，自己能够以美国红十字会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但遗憾的是，这个非政府组织不愿意为一名美国特工打掩护。雷金纳德·温盖

特耐心地向美国大使馆解释，耶鲁要去巴勒斯坦，唯一的办法是将他划归为军事联络官，并在艾伦比将军的司令部获取相应的资格[58]。但耶鲁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所以温盖特这么说其实是以非常有策略的方式将他留在开罗。

于是，耶鲁将精力集中在或许是他面前更重要的任务上：让威尔逊政府认识到，中东地区是多么意义重大。说得轻巧，做起来难，因为尽管威尔逊发布了基调高昂的十四点宣言，耶鲁却发现："我国政府并没有一项政策。它表面上是在为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战，却不曾意识到，历史不是在和谈桌上决定的，而是由议和过程之前的交战期间的行动所决定……在国际事务中，'解围天神'不是等待戏剧性危机时刻才出手的人，而是始终采取决定事态发展的行动的人。威尔逊总统和他的谋士们似乎从未理解这个简单的真理。"[59]

这个局面中的辛辣讽刺，同时也是耶鲁挫折感的来源：到了1918年春，中东事务的各方都在大声呼吁，要求美国人参与其中、决定事态发展。早在1917年10月，雷金纳德·温盖特就向一位美国外交官提议，在战后由美国接管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这种想法在英国外交部的呼声越来越高。劳伦斯在与耶鲁会谈时再三强调阿拉伯人对美国的万般景仰，显然私下里是希望推动美国参与中东事务，只是劳伦斯的目的与温盖特大不相同。哈伊姆·魏茨曼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毫不隐晦，如果没有英国的委任统治，美国来统治的话他们也会开心。甚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更有帝国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们也越来越希望美国全面参与该地区事务，因为如果他们得不到新的土地，最好的结局自然是让他们的欧洲"朋友们"也得不到。

但在耶鲁看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阿拉伯人激昂的亲美情绪。这种态度无疑是被威尔逊的十四点宣言中的承诺点燃的，但也是深思熟虑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毕竟各种权利主张都在等待在战后席卷中东。耶鲁

的老朋友苏莱曼·贝伊·纳西夫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纳西夫是个温和的阿拉伯基督徒，他虽然向叙利亚膨胀的犹太人口表示妥协，但仍然高度怀疑英国人的图谋，对侯赛因国王的泛阿拉伯国家保持警惕，同时坚决反对法国人的野心。纳西夫向耶鲁解释说，最好的办法，或许也是摆脱这一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美国人——他们没有帝国主义野心、满怀理性主义，同时又离中东非常遥远，不会让人讨厌——参与中东事务。

耶鲁举双手赞成这种想法，但却很难在威尔逊政府内找到合适的渠道来推动它的实现。有一次，他甚至试图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来诱导政府，向哈里森指出："众所周知，美国的某些石油利益集团最近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购买了巴勒斯坦的大量地产。"[60] 这是一位特工将自己之前活动公之于众的一个罕见例子。

在向国务院吹嘘美国在该地区享有的极高地位几个月之后，在4月底，耶鲁终于决定采取行动。那是在他见到一个叫作法里斯·尼米尔的人之后。尼米尔是在开罗的叙利亚流亡者社区的一位领导人，也是影响力极大的埃及报纸《穆克特姆报》的总编。耶鲁向利兰·哈里森解释道，自美国参战以来，尼米尔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叙利亚流亡者就将美国视为他们家园的潜在救星。"这些人开始在埃及的叙利亚人当中静悄悄地传播由美国在叙利亚建立保护国的想法，并努力尽可能地保守秘密，不让英国人或法国人得到风声。这个主意对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有吸引力……美国的这些热情支持者声称，叙利亚人的所有派系和集团在接受美国援助的问题上不仅会团结一致，如果能办成的话，还会欣喜若狂。"[61]

在等待哈里森对这封信回复的时候，耶鲁从华盛顿收到了在另一个问题上让他高兴的好消息。上级已经决定派遣第二名特工前往中东，此人抵达埃及后，耶鲁将被派往巴勒斯坦。即将在开罗接替他的人叫作威

廉·布鲁斯特，耶鲁对这个名字很熟悉。在耶鲁担任标准石油公司驻耶路撒冷代表的时候，布鲁斯特是该公司在阿勒颇的代表。于是，美国政府在将自己在中东的情报网规模翻倍的时候，确保其人员仍然来自标准石油公司。

布鲁斯特在途中的时候，上级匆忙将耶鲁任命为所谓“国民军”的上尉。英国当局或许不想在几个月的阻挠之后显得无礼，于是没有去探寻这个奇怪的“国民军”究竟是什么东西——前往欧洲的美国军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远征军——而是向这位美国特工获得军职表示了祝贺。

“开罗的裁缝刚开始为我做军服，”耶鲁记述道，“我就开始做当军人的准备。我受过的军事训练很少（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对军事问题和礼节也一无所知。一连好多天，我穿着自己的新军服在开罗的小巷走来走去，练习向经过的英国兵敬礼。他们开始向我回礼，而脸上没有傻笑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上路子了。”

这位新任上尉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迎接他其实相当害怕的一件事情：正式拜见艾伦比将军。7月中旬，耶鲁和美国驻埃及新任领事汉普逊·加里抓住了艾伦比短暂回国之前的机会，来到他位于亚历山大港的办公室。“我们走进艾伦比的书房时，”耶鲁回忆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向将军敬礼。我也不知道是应当立正，还是坐下。我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艾伦比将军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就好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似的。”

高潮时刻到了，艾伦比突然转向耶鲁，用他那训练出来的洪亮嗓音说道：“哦，耶鲁上尉，你在我的司令部有何贵干？”

“我将继续开展我的政治工作，艾伦比将军。”他答道。

答错了。“耶鲁上尉，”将军大吼道，“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向我的司

令部派遣一名屠夫，那是他们的权力，但你要记住，你在我的属下，就是一名军人！”美国客人遭到这番训斥，很快打了退堂鼓，耶鲁确信“艾伦比已经将我，标准石油的前员工，分类为那种从事贸易的低等生物”。

次日，耶鲁登上一列开往巴勒斯坦的运兵火车，奔赴他的新驻地：比尔萨利姆（雅法以东约10英里处）的英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军队已经为他预留了一顶小帐篷、一张写字桌、一个帆布脸盆和洗澡水。等待他的还有1918年欧洲军官阶层的独有特征：勤务兵，或者说是私人男仆。英国军官们最喜欢的勤务兵是专门受训从事这种工作的印度士兵，但或许是为了报复耶鲁对艾伦比的放肆回答，分配给他的勤务兵是个头发灰白的苏格兰老头。

虽然新环境非常有乡土气息，但耶鲁肯定很乐意离开开罗和那个越来越显得徒劳的岗位。在动身奔赴前线前不久，他终于收到了国务院对他在整整两个月前发送的关于法里斯·尼米尔及其亲美派叙利亚密谋小组的信息的回复。他的这份报告虽然没有资格得到即刻回复，但显然被认为足够重要，被送上了国务卿本人的办公桌。兰辛在7月9日的电报中写道：“关于你的28号报告，继续保持美国对叙利亚的不做任何承诺的态度。”[62]

这消息令劳伦斯大吃一惊，但也欣喜若狂。6月18日，他和艾伦·道内中校（阿拉伯半岛北部行动的新任总体协调人）前往司令部，去概述阿拉伯人独立进军叙利亚的计划。他们在那里见到了艾伦比的主要副手之一威廉·巴托罗缪将军。巴托罗缪听了他们的报告几分钟，然后微笑着摇了摇头；他告诉两位客人，他们到拉姆拉晚了三天。

道内和劳伦斯很快得知，在此前的一个月内，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一支军队比计划提前完成了作战准备。在最近几周内，英国和印度大量部队从伊拉克和南亚次大陆持续抵达中东，

取代了那些艾伦比被迫割爱、调往欧洲的部队的位置。英军做了极大努力，将新抵达的部队送入前线，并迅速将其与埃及远征军的其他部分整合起来。这些工作非常成功，在6月15日的司令部高级会议上，结论是，部队在9月就“有能力”向叙利亚腹地发动“全面的持续进攻”[63]。

对劳伦斯而言，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不必冒险孤军奋战、向叙利亚发动进攻了。艾伦比的时间表与劳伦斯和道内为阿拉伯人设计的时间表相同，于是起义军只需要紧密配合埃及远征军的行动即可。当然了，在中东，时间表往往会被推翻，因此劳伦斯在7月11日再次造访司令部时得知，埃及远征军的攻势日期已经确定为9月19日，不禁大为宽慰。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得让阿拉伯人配合英军行动的前景愈发显得有吸引力。5月初，7名叙利亚流亡者领导人（他们自称代表了叙利亚社会大众）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英法以明确而毫不含糊的言辞告诉他们，英法对他们国家的未来究竟是如何设想的。伦敦和巴黎方面努力尽可能长久地对这所谓的“叙利亚七人公开信”置之不理，但这一次国际关注不允许他们这么做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责任最终被交给了最应当对这个长期争议负责的两个人：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吞吞吐吐许久之后，赛克斯和皮科终于在6月中旬答复了7名叙利亚人：在“阿拉伯人在当前战争中通过独立行动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英法将“承认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的完整主权独立，并支持他们为自由所做的斗争”[64]。

对劳伦斯来说，他和阿拉伯起义军很久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求的东西——英国对阿拉伯人独立诺言的再次确认——终于到来了。但这些措辞再一次证实了劳伦斯一直怀疑的、潜伏在表面之下的附加条件：只有在阿拉伯人自己解放的地区，他们的独立才会得到保证。有鉴于此，起义军有必要加入即将展开的英军攻势。在7月11日在司令部的会议之后，劳伦斯火速返回开罗，然后前往亚喀巴，开始筹划阿拉伯人耽搁许久的

北上作战。

他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最终切断费萨尔与土耳其将军穆罕默德·杰马勒之间长期的危险通信。7月底，劳伦斯将费萨尔于6月10日发给杰马勒的和谈建议的一个副本交给了戴维·霍格思。劳伦斯对自己如何得到这样一份爆炸性文件的解释是，他是从费萨尔的书记员那里偷来的。这个故事非常荒唐，但显然有着足够的《天方夜谭》式的风味，在他的上级那里还说得过去[65]。

奇怪的是，在伦敦，关于费萨尔通敌行为的最新揭露的最直接效果竟然是，它重新启动了几个月前就开始但被暂时搁置的辩论，即对费萨尔应当授予什么样的高级荣誉。这个插曲揭示了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中，就在大英帝国风雨飘摇、命悬一线的黑暗时刻，帝国的十几名最位高权重的官员居然百忙之中多次拨冗，探讨应当向一位33岁的沙漠王子授予什么勋章。他们全都忽略了最了解这位王子的英国人T.E.劳伦斯的意见：费萨尔对勋章不怎么感兴趣[66]。

1918年8月7日早上，劳伦斯和他的60名卫兵聚集在亚喀巴海岸上。在之前的几周内，他马不停蹄地忙于战备工作，但在阿拉伯人做好准备在9月向叙利亚腹地发起进攻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对劳伦斯来说，后方基地的烦琐工作——组织补给运输队、在地图上安排人员和武器的运输——已经结束了。这一天，他和他的人马将出发进入内陆，要到大战役打响并尘埃落定之后才会回来。

对劳伦斯而言，这趟旅途在他个人的较深层面也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将开始掩埋困扰了他近一年的一件憾事。1917年10月，艾伦比将军的部队首次攻入巴勒斯坦的前夜，将军曾问劳伦斯，阿拉伯起义军对战役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当时劳伦斯担心起义军惨遭屠戮，于是让阿拉伯人尽可能少地参与其中，而是提议了命途多舛的雅莫科大桥行动。如果当

时他没有犹豫不决——他自己无情地将其描绘为“勇气匮乏”——局势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当初阿拉伯人就大举出动，过去一年的令人垂头丧气的僵局或许就能避免，战争或许已经结束；当然，德拉的苦痛、塔菲拉的悲剧以及达乌德和法拉杰的死或许也能够避免。

现在，救赎这一切的时刻到了。这天早上在亚喀巴，他告诉他的那些衣着鲜亮的卫兵们，要准备好去赢得胜利，并向其中的叙利亚人许诺，他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于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海风飕飕的海滩上集合，阳光播洒在波浪上，闪闪发光，与我的那些衣衫光彩夺目的部下交相辉映。”[67]

西线德军总司令部位于比利时度假小镇斯帕，是一个由美丽宜人的城堡和庄严豪华的宾馆组成的网络。1918年7月31日上午，就在这里，库尔特·普吕弗和阿拔斯·希里米二世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去拜见德皇威廉二世。普吕弗在日记中写道，威廉二世对埃及被废黜的赫迪夫“印象极佳”，对他从英国人手中重新征服自己家园的宏伟蓝图也大加赞赏。觐见结束时，德皇转向普吕弗，说道：“我要求你，下一次要在自由的埃及觐见我。”[68]

如果德皇的情绪因这次会晤而颇为高昂，他的两位客人的反应则更加默然。德皇在战争期间衰老了许多，现在看上去心力交瘁，头脑甚至有些轻微的糊涂。在熟悉军事生活的堂皇外表和繁文缛节的普吕弗看来，德皇显然已经没有能力掌控多少东西，尽管他佩戴着富丽堂皇的勋章，仪态依然威风凛凛，但其实他现在几乎和阿拔斯·希里米一样，是个傀儡。

这是两人在7月23日从君士坦丁堡起程时都没有料到的。土耳其政府派出了一个包括内政部长塔拉特在内的代表团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这证明了土耳其政府对他们此行的极高期望。但随后是横亘同盟国腹地的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一路上映入眼帘的尽是破败和衰落的景象。对两

人来说，这个国家及其民众已经彻底精疲力竭，局势比几个月前糟糕许多，这与德国总司令部不断发出的乐观宣言和接近最终胜利的言论非常不符。

如果之前还没有的话，他们抵达斯帕的时候肯定已经了解到这些宣言的虚假。7月17日，德军自3月以来在西线实施的五次攻势（统称为"皇帝战役"）的最后一次被叫停。德军损失超过70万人，其残部开始撤往兴登堡防线。这是贯穿法国北部全境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防御工事，德军早在1917年就开始修建这些工事。德国不仅无法赢得"最终胜利"，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无法结束战争；在兴登堡防线之后，德国或许可以长期坚守，让这场战争不分胜负地拖下去。

在战线的另一侧，将帅和战争筹划者们对战局的评估无疑就是这样的。尽管美军终于开始如潮水般抵达法国，最乐观的协约国战略家还是估计，要到1919年才能取得突破，而最保守的军事家则预测，战争还会拖很久；有些人甚至分析认为，战争会打到20年代中期。

但正如协约国的智者们提出的其他每一项评估一样，这些估计也被证明是大错特错。在全球死亡约1600万人之后，大幕快要落下了，其速度之快，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场大崩溃将从全球战争最偏僻、似乎最不重要的角落发端：叙利亚。

---

[1] Lawrence，*Seven Pillars*，p.503.

[2] 威廉·耶鲁关于自己在1917至1918年间在开罗的情报工作的记述见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8。

[3] Yale to Harrison，December 24，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12.

[4] Yale to Harrison，November 12，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6.

[5] Yale to Harrison，February 25，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19.

[6] Yale to Harrison，November 4，1917；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5.

[7] Lawrence to Clayton，January 2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251-52.

[8] Lawrence to Clayton，February 1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267.

[9] 劳伦斯对他在塔菲拉与扎伊德的对抗，以及他随后行动的描述见*Seven Pillars*，book 7，chapter 90，pp.499-502.

[10] Lawrence to Clayton，February 1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f. 268.

[11]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341.

[12] Lawrence，*Seven Pillars*，p.502.

[13] Lawrence，*Seven Pillars*，p.503.

[14] Lawrence，*The Home Letters*，p.348.

[15] Yale to Harrison，March 11，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21.

[16] David Hogarth，"Report on Mission to Jeddah，" January 15，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3 f. 35-40.

[17]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February 19，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80，f. 473.

[18] Lawrence，"Syrian Cross Currents，" *Arab Bulletin Supplementary Papers*，February 1，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4.

[19] Clayton to Sykes，February 4，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98.

[20] Lawrence to Clayton，February 1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7.

[21]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April 8，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403，f. 372.

[22] Yale to Harrison，March 11，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21.

[23] British government White Paper，“Notes on Zionism，” Part 3. *The Zionist Commission in Palestine*；February 6，1919，pp.16-17；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4171，f. 102.

[24] British government White Paper，“Notes on Zionism，” Part 3. *The Zionist Commission in Palestine*；February 6，1919，pp.14-21；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4171，f. 100-104.

[25] Cornwallis to Symes，April 20，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882/14，f. 358-59.

[26] Yale to Harrison，April 8，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25.

[27] Yale to Harrison，March 25，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23.

[28] Yale to Harrison，June 10，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34.

[29] Aaronsohn，*Diary*，April 1，1918；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30] Yale to Harrison，April 8，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25.

[31] 劳伦斯对阿塔提尔之旅，以及“达乌德”和“法拉杰”（阿里和奥斯曼）之死的描述，见*Seven Pillars*，book 8，chapters 112-113，pp.507-17。

[32] Wavell，*The Palestine Campaigns*，pp.173-84.

[33] McKale，*Curt Prüfer*， p.54.

[34] Bernstorff to von Hertling，July 19，1918；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2348，Türkei 47，Band 7.

[35] Oppenheim to Jagow，February 23，1915；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 21129，Der Weltkrieg no. 11g，Band 7.

[36] Lawrence，*Seven Pillars*，p.520.

[37] Dawnay to EEF Headquarters，May 1，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 277-86.

[38] Lawrence，*Seven Pillars*，pp.526-27.

[39] Lawrence，*Seven Pillars*，p.527.

[40] Aaronsohn，*Diary*，March 21，1918；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41] Aaronsohn，*Diary*，April 4，1918.

[42] Aaronsohn，*Diary*，April 6，1918.

[43] Aaronsohn，*Diary*，April 20，1918.

[44] Clayton to British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June 16，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803，pp.5-7.

[45] Clayton to British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pp.4-5.

[46] Lawrence to Clayton，February 1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7，f. 268.

[47] Clayton to Lawrence，May 2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688.

[48]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Commandant Akaba，May 24，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95/4370，App A.

[49] Clayton to Foreign Office，June 1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141/688.

[50] Wingate to Foreign Office，March 23，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 359.

[51] 外交部内部关于授予费萨尔·侯赛因何种勋章的漫长讨论，见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ile 53608。

[52] Clayton to Foreign Office，April 2，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03，f. 364-66.

[53] Mehmet Djemal to Faisal（translator unknown），June 2，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

军部档案） 158/634，f. 137.

[54] Hogarth，memorandum attached to “The Arab Question，” August 9，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81，f. 113.

[55] Lawrence，*Seven Pillars*， Appendix II.

[56] Lawrence，“Note，” June 16，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688.

[57] Yale to Harrison，March 25，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23.

[58] Gary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May 30，1918；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Box 1047，111.70Y.

[59] 威廉·耶鲁关于他在1918年春季在开罗的情报搜集工作的记述见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8。

[60] Yale to Harrison，July 1，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35.

[61] Yale to Harrison，April 29，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2，Folder 28，pp.10-11.

[62] U.S. Secretary of State Lansing to Yale，July 9，1918；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Box 1047，111.70Y.

[63]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34.

[64] Foreign Office to Wingate，June 11，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81，f. 35-36。事实上，这是劳伦斯愤世嫉俗的看法出错的极少例子之一。后来的巴黎和会揭露出，马克·赛克斯对“叙利亚七人”公开信的回复措辞非常巧妙，承诺“阿拉伯人在当前战争中通过独立行动从土耳其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将得到独立的诺言的意思是，只有他在写时被解放的土地才算数。通过这个变戏法般的诡计，大叙利亚的大部分都被排除在外了。

[65] Hogarth，memorandum attached to “The Arab Question，” August 9，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81，f. 113。要么费萨尔向奥斯曼政府的建议并未就此结束，要么德国人没有得知费萨尔与奥斯曼政府已经停止谈判，直到1918年9月初，德国高级外交官和军官仍然谈及与费萨尔讲和的紧迫性。

[66] Clayton to Foreign Office，May 3，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403，f. 384.

[67] Lawrence，*Seven Pillars*，p.544.

[68] Prüfer，*Diary*，July 31，1918；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第18章 大马士革

我们命令“不要俘虏”，士兵们服从了这道命令。

——1918年10月，T.E.劳伦斯关于塔法斯事件的正式报告。[1]

1918年9月12日。世界大战进入了第50个月份。这一天，在审视各条战线的时候，协约国的军方和政界领袖们陷入沉思，越来越确信敌人已经濒临崩溃，但他们又回忆起，在过去他们曾多次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在西线，德军撤出了在春季攻势中占领的最后一片土地，在兴登堡防线后方重整旗鼓。协约国军队将于月底对这道人类历史上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进行第一次试探性攻击，将由法国和美国军队联合在默兹河附近发动。在南线，在血战3年、损失超过150万人而徒劳无功之后，意大利将军们终于吸取了教训，开始制定小规模计划，去对抗坚守皮亚韦河远岸已经近一年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巴尔干，法国、塞尔维亚、希腊和英国联军正在准备攻击马其顿境内的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几百万人惨死的记忆依然清晰，所以协约国将这些计划中的进攻只看作是试水之举，意图仅仅是在冬季降临之前取得些许进展，随后要等待次年春天，或许还要等更久。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最近提议，暂停所有针对德国的全面进攻计划，一直等到1920年，那时美国陆军就能全面登陆法国，协约国的兵力能够真正压倒德国[2]。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协约国方面抱有谨慎的乐观，而同盟国的人们则静悄悄地揣着一份惶恐。所有人都相信，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终于一步步走向结局了，尽管这个结局的具体细节和时间表还和以往一样遥遥无期。

9月12日这一天，亚伦·亚伦森正在一艘驶往纽约的客轮上，这艘船是5天前从南安普敦起航的。8月，他从中东返回英国，在随后几周内在

巴黎和伦敦之间来往穿梭，努力为他在巴勒斯坦买地的计划争取支持，但受到很多挫折。由于他与哈伊姆·魏茨曼和英国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贯的争吵，他的这些努力变得非常复杂。魏茨曼和马克·赛克斯找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既能暂时甩掉这个讨厌的农学家，又能让他发挥热量：让他再去一次美国，拉拢美国犹太人团体。他们为亚伦森安排好了一系列的会议和演说，他的船开进纽约港之后，足够他忙上几个月的。

库尔特·普吕弗在这个夏天的经历逐渐从怪异变成了超现实。在7月底安排阿拔斯·希里米觐见德皇之后，随后几周内，他忙着陪伴这个觊觎埃及王位的人在德国乡间四处巡游，参加官方会晤和欢迎赫迪夫的宴会，还要安排他在诸侯王公和伯爵夫人们的乡间庄园逗留。8月中旬，在山区度假城镇加尔米施—帕滕基兴，两人幸会了德皇的妹妹维多利亚·冯·绍姆堡-利佩公主和她的三教九流的扈从们，于是一起度过了相当放荡堕落的10天欢乐时光，尽管前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晦暗。

“我和公主、蒙特格拉斯伯爵夫人，还有赛琳娜·冯·施罗特海姆越来越亲近，”普吕弗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蒙特格拉斯和冯·施罗特海姆是德皇御妹随从中的两位交际花），“晚上饮酒作乐、跳舞、调情、举办狂热的室内聚会，诸如此类。”[3]

但这并非仅仅是客厅的寻欢作乐。阿拔斯·希里米是世界上最不知疲倦的阴谋家之一，随着同盟国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普吕弗这个德国间谍头子却越来越焦灼而热诚地投入这个埃及人的宏伟蓝图中去。这个蓝图包括将希里米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卜杜勒·穆奈姆从瑞士引诱出来。前任赫迪夫解释说，他的儿子是个脆弱而喜怒无常的年轻人，带有虐待狂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现在正和英国人眉来眼去——但如果普吕弗能将阿卜杜勒·穆奈姆诱骗到德国，他的父亲就能安排他迎娶新任奥斯曼苏丹的女儿，这样就能巩固希里米自己对埃及统治权的

主张。普吕弗感到这是个绝妙的、意义重大的想法，必须要与外交部最高层沟通。从这就可以看出，普吕弗已经多么脱离实际[4]。

如果说这位德国间谍头子终日生活在空中楼阁中，在虚空幻境里陪伴他的还有很多人。外交部高层官员不仅敦促普吕弗继续执行诱拐阿卜杜勒·穆奈姆的计划，还请求他在另一件事情上出手相助。德国高层得知，在6月的时候，费萨尔·侯赛因向土耳其将军穆罕默德·杰马勒写了一封寻求和解的信，于是想到了一个与阿拉伯起义军媾和的主意，以此作为解决中东难题的最后方案，这个方案也许会将他们在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的挚友包括在内，也许不会。外交部要求普吕弗寻找合适的中间人，向费萨尔传递德国自己的秘密和平建议。阿拔斯·希里米热心地提供了一些联系人的名单，普吕弗将这个名单报了上去。

威廉·耶鲁在这年夏末的经历没有那么丰富多彩，而是令他垂头丧气。到9月12日，他已经在英军总司令部（位于耶路撒冷城下山麓地带的比尔萨利姆）枯坐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这位国务院特工（此时他的新身份是美国驻埃及远征军的军事代表）从英军司令部那里没有打听到一星半点关于艾伦比的新攻势的消息，尽管传闻满天飞。这可不是因为耶鲁不够努力。耶鲁参加了许多情报汇报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英国官员们似乎在私下里互相竞争，看谁透露的实质性信息更少；他还忍受了一系列甚至更加干瘪无趣的高级幕僚晚餐会。他不断请求参观英军前线，但总是被各种理由挡回来。最后，负责关照外国代表的英国军官霍奇森上尉终于对此做了部分解释。“我要告诉你，耶鲁，”霍奇森透露道，“上级命令我，对你说的越少越好，因为你曾经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人。”[5]

但英国人无意中给了耶鲁一个机会。他们对外国军事代表都不甚尊重，对耶鲁尤其讨厌，因此将他和另一群令人嫌恶的随军人员——常驻军队的记者——一起隔离在比尔萨利姆的一个角落里。这些三教九流的

英国和澳大利亚记者的行动自由比外国军事代表们大得多，因此耶鲁从他们那里至少能够得知英军在筹划什么东西，到9月12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大戏”很快就要开演了。他不知道新攻势的具体时间，更不知道地点，但司令部里弥漫着一种紧迫感，而记者们说在外出时看到了部队调动、物资转运，这些都无可争辩地表明，艾伦比的攻势已经箭在弦上。

除了对耶鲁的标准石油公司背景的顾虑之外，英军司令部其实有很好的理由要保守秘密，因为他们在巴勒斯坦运筹帷幄的计划包含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谋。最近几周内，一系列英军单位被从巴勒斯坦海岸平原调往耶路撒冷周边，他们的新的帐篷营地遍布朱迪亚的山坡。由于这次重新部署，艾伦比将他的前进指挥部迁往耶路撒冷。同时，英军向安曼地区的各部落派遣了收购人员，任务是在9月底之前收购到足够一支大军的马匹和骆驼食用的大批草料。对正在观察的土耳其人看来，结论是毋庸置疑的：英军攻势即将展开，目标仍然是英军曾在那里失败两次的萨勒特—安曼地区。但事实上，那些新搭建的帐篷城市是空无一人的，艾伦比迁往耶路撒冷只是个戏法，而收购草料也是障眼法。英军的计划实际上是攻击战线的另一端，沿着巴勒斯坦海岸席卷北上，然后转入内陆，以便从三面包围土耳其军队。

这还只是计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将在约旦河的另一侧上演。近一段时期以来，一支由阿拉伯部族武装、阿拉伯北方军士兵、英法顾问和专门的炮兵与装甲车单位组成的数千人的混成部队一直在越过叙利亚沙漠，在阿兹拉克古要塞集结。如果土耳其人发现了这个动向——规模如此之大的部队当然不可能无限期地隐声匿迹——就会更加确信，协约国的攻势将在阿兹拉克以西仅50英里处的安曼发起。但事实上，集结在阿兹拉克的部队的真正目标是西北方70英里处的关键铁路枢纽德拉。另外，这支部队还将担当整个攻势的至关重要的排头兵，目标是在艾伦比发动总攻之前切断汉志铁路及其深入巴勒斯坦的支线，以便从背后使土

耳其军队彻底瘫痪。到9月12日，这支部队的最后一些单位也抵达了阿兹拉克，在那里遇到了负责协调整个行动的两名英军中校：皮尔斯·乔伊斯和T.E.劳伦斯。

到当日为止，劳伦斯已经在阿兹拉克待了近一周，对连续抵达的各单位作了评估：来自十几个阿拉伯部落的战士、英法运输和炮兵专业人员、一队印度骑兵，甚至还有一小队廓尔喀兵（非常有名的尼泊尔士兵，以其标志性的弯刀闻名遐迩）。9月12日上午，阿拉伯起义的高级领导人抵达了阿兹拉克，其中最重要的是费萨尔·侯赛因，还有努里·沙拉昂和奥达·阿布·塔伊，以及劳伦斯在过去两年中帮助争取到阿拉伯独立事业中的其他一些部落酋长。于是部队最终集结完毕。进攻部队的前锋将于次日上午开始部署，计划是在当天下午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劳伦斯和乔伊斯将在会上详细阐述各个目标。

但恰恰是在这个关头，在劳伦斯吃尽苦头促成的战役的前夕，他却突然间陷入了令他瘫软无力的抑郁中。侯赛因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抵达不久之后，劳伦斯溜出了阿兹拉克，前往约80英里之外的一个叫作艾因阿萨德的偏僻山涧。他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我在柽柳丛里的旧巢穴中躺了一整天，风儿在挤满灰尘的翠绿枝杈上吹拂出的声音与在英国树木上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它告诉我，我对这些阿拉伯人真是烦透了。"[6]

其实，近一段时期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劳伦斯可能濒临这样的精神崩溃。7月中旬，在得知艾伦比攻势发起的确定时间之后，他本应欣喜若狂才对，却向密友维维安·理查兹写了一封忧郁的信。"我被如此凶暴地连根拔起，投入到一件我无力胜任的工作中，万事万物都显得虚幻，"他告诉理查兹，"我丢弃了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仅仅作为一个机遇的窃贼来生活，发现机会的时候就伸手攫取……这是一种外国舞台，我成日成夜地穿着奇装异服、说着奇怪的语言，在这里

表演。代价是，如果角色演得不好，就要为失败负责。”[7]

随后他描述了自己对阿拉伯人的仰慕，尽管他现在已经认识到，他从根本上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永远是个异乡客。他写到了自己脑海中常常萦绕的词语——和平、沉默、休息——“如同黑暗中一扇亮着的窗户”，但又质疑，一扇亮着的窗户究竟有什么用。正如劳伦斯在吐露真情实感时常常做的那样，他在信的末尾对自己写的东西大加贬抑，称这是一封“白痴的信”，其源于他自相矛盾的个性。“我仍然一直得不到满足。我讨厌前线，也讨厌后方，我不喜欢责任，也不服从命令。总的来讲现在一点用都没有。漫长的寂静，如同清洗，然后是冥思和对未来道路的抉择，那才是应当期待的东西。”

如果他给理查兹的信提及了他心力交瘁的状态，这更是由于他因为“欺骗”自己的阿拉伯战友两年之久并“从中渔利”而抱有负罪感。这种歉疚越来越重。8月初，在筹划阿兹拉克行动的时候，劳伦斯又一次见到了强大的卢阿拉部落的酋长努里·沙拉昂。他曾向这位酋长建议相信英国向阿拉伯人许下的最新一次诺言，希望能够将他争取到谢里夫的阵营。在8月的会见中，沙拉昂终于全面承诺参与起义，但此后《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科协定》被公之于众，沙拉昂一定知道这个拉拢他的英国人不够坦诚。从劳伦斯的回忆录和他告诉自己最早的传记作家的言论来看，欺骗沙拉昂这件事情对他的良心压力最大，尽管具体原因还不清楚[8]。

就在动身前往阿兹拉克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劳伦斯对自己为阿拉伯人而奋斗的“圣战”的目的产生了怀疑。8月底，阿拉伯军队主力正在准备离开亚喀巴地区北上的时候，侯赛因国王与费萨尔发生了相当公开的激烈争吵，几乎是在指控儿子不忠诚。在将近一周时间内，父子两人用措辞激烈的电报互相争吵，在此期间，起义军的行动止步不前，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整个叙利亚攻势能否实施都成了疑问。劳伦斯最终

促成了两人的和解——他截获了侯赛因的一封电文，将怒气冲天的后半部分删去，只将听起来抱有歉意的前半部分发给了费萨尔。但是，恰恰是他为之奋斗的那个人几乎将他的全部计划破坏掉，这让劳伦斯感到了挥之不去的痛苦[9]。

但在艾因阿萨德的这一天，令劳伦斯痛苦万分的还有另一件事，是近期发生的对他个人的沉重打击。从各方面证据来看，在劳伦斯在阿兹拉克期间，他得知了自己在卡尔基米什时的年轻伙伴达霍姆的死讯。达霍姆显然是前一段时间肆虐叙利亚北部的斑疹伤寒大爆发的受害者。在很深的程度上——这种程度之深，劳伦斯自己或许都没有完全理解——他已经在自己脑海中将这场战争幻化为达霍姆的形象。就是为了这个叙利亚少年和他的未来，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现在达霍姆死了，激励劳伦斯奋斗的许多东西也就随风飘去了。尽管他从来没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献词中的神秘的“S.A.”的真实身份——达霍姆的真名是萨利姆·阿里，但该书卷首诗的最初几节强有力地佐证了劳伦斯得知达霍姆死讯的时间和此事对他的影响：

我爱你，因此我将这些如潮的人流拉进我的手中

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

去为你赢来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会为我而闪耀

当我们来的时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见你在等待

当你微笑时，悲戚地嫉妒时，他（死神）追上了我

并把你拉走

带入他无言的寂静之中。

虽然悲痛不已，但劳伦斯已经为阿拉伯独立事业出力甚多，对阿拉伯人也提出了太多要求，在漫长战役的高潮时又怎能抽身呢？他对自己在9月12日的情绪描述道："时至今日，我对自己被安排到了错误的位置所抱有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再过一周、两周或三周，我决心一定要卸任。我的神经已经崩溃，如果还能隐瞒那么久，我就太幸运了。"[10] 于是，他离开了在艾因阿萨德的"巢穴"，返回阿兹拉克。几个小时之后，集结在阿兹拉克的战士们就将对敌人发起第一轮打击。

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天，美国驻伦敦军事情报办事处收到了一份绝密报告，称英军方面的阿拉伯起义军的士气正在瓦解。9月12日的这份报告称："情报显示，在亚喀巴地区与埃米尔费萨尔在一起的叙利亚人非常不满，争执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起义军的战斗力太差。"尽管有英军的支援，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表现出缺乏组织和实施作战的能力……阿拉伯人的整个局势非常糟糕。"[11]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在中东的主要通信员——军事代表威廉·耶鲁。从这份报告开始，他建立了美国情报界的一个传统：对中东局势进行根本上的错误解读。在随后95年中，耶鲁在美国情报界的后继者们将恪守这一传统。

大家轻松愉快。在战争中，全部优势都在己方，而风险大部分都在敌方，这种现象并非罕见。9月14日上午，劳伦斯离开了阿兹拉克，随后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乘坐一辆劳斯莱斯装甲车，在德拉周边的沙漠中风驰电掣，炸毁桥梁、摧毁铁轨，躲闪敌人效力极差的空袭，偶尔与倒霉的土耳其徒步巡逻兵交锋。

他的行动如此轻而易举，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艾伦比司令部计谋的成功。土耳其军队重兵云集在安曼周边，准备迎战英军，阿兹拉克的突击部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可以自由地达成目标：切断德拉南北两个方向的汉志铁路，以及向巴勒斯坦延伸的至关重要的西向支线。最终目标

当然是在艾伦比的总攻于9月19日开始前完成上述任务。

但劳伦斯追上突击队的主力时却得知，由于运气不佳，袭击德拉以南铁路线的行动失败了。现在他已经对沙漠中机械化作战的效力坚信不疑，于是决定亲自试一次。他只带了两辆装甲车和两辆“补给车”，即大型轿车。9月16日上午，他找到了自己的攻击目标，那是一座防备薄弱的桥梁，周边荒无人烟，桥梁是“一座不错的小型建筑，80英尺长，15英尺高”[12]。让劳伦斯特别骄傲的一点是，他和战友们在安放炸药时使用的是一种新技术，能够让桥梁“结构完全损毁”但主体仍然不倒。土耳其的维修人员将不得不耗时费力地先将桥梁残骸拆除，然后才能开始重建工作。

这项任务完成后，劳伦斯重新加入阿拉伯部队主力，于次日上午一同袭击德拉以北的铁路。1000多人的部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很快就控制了近10英里长的铁路线，好让爆破组放置炸药。此次行动让劳伦斯摆脱了在阿兹拉克一直困扰他的忧郁情绪。司令部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将德拉隔离，“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运气居然这么好，我们向艾伦比的承诺这么简单、这么快就兑现了”。

目标只剩下了通往巴勒斯坦的铁路支线。就在9月17日这天下午，一支阿拉伯部队袭击了德拉以西几英里处的一座火车站；他们很快就洗劫了车站，将不能搬走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但劳伦斯的计划更宏伟。他率领一小队人马西进，希望能够摧毁前一年令他遗恨的雅莫科峡谷大桥。但这一次他仍然不能成功，因为他遇上了从巴勒斯坦赶来的整整一火车的德国和土耳其军队。

但是，劳伦斯于次日返回并与起义军主力会合时，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成绩”感到心满意足：土耳其军队通往巴勒斯坦的主要电报线被切断了，全部三段铁路都被摧毁，维修需要几天至几周的时间。他还有更多的破坏工作要做——9月18日这天下午，他还炸毁了另一座桥

梁，这是他的战绩中第79座桥。但阿兹拉克的前锋部队已经完成了司令部命令他们在艾伦比攻势之前执行的所有任务，而此时离攻势发动已经只有几个小时。

按照预先的安排，一架皇家飞行军团的飞机将于9月21日上午降落到阿兹拉克，带来关于巴勒斯坦攻势进展情况的报告。劳伦斯急于知道消息，在此前一天就赶回了那座沙漠要塞。他自6天前从阿兹拉克出发以来就几乎没有合过眼，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濒临崩溃，在营地的野战医院找到一张空床，倒头就睡。

9月18日，耶鲁走进指定的食堂用餐时，发现了第一条线索：记者们都不在了。他走到停车场时又发现了第二条线索：所有的车辆也都走了。一名英国下级军官勇敢地解释说，汽车都被派到了前线各处，为即将开始的攻势做准备。显然，耶鲁和仅剩的另外一名外国代表——一个叫德·桑布伊的意大利少校——没有任何车辆可用。

“我非常恼火和困惑，”耶鲁写道，“一名军事代表应当做什么？我应当要求为我提供上前线的车辆，还是应当接受他们的这种蹩脚的解释？桑布伊为什么不应当做些什么？他是个科班出身的军官，1915年就参战了。我对自己，还有对英国人非常恼怒，就这样上床睡觉了。”[13]

他的这一觉被打断了。9月19日凌晨4时45分，耶鲁被“似乎震撼了整个世界的可怕巨响”吵醒了。在巴勒斯坦的整条前线，英军的近500门大炮同时开始轰击土耳其战线。

耶鲁起床穿好衣服的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一位将军的办公室，宣布自己马上去吃早餐，如果吃完的时候还没有一辆汽车在等他的话，他就向华盛顿发电报，说英国人把他监禁了。他的意大利同行对这种蛮勇大感震惊，但不久之后两人从食堂走出来的时候，有辆福特T型汽车在等他们，驾驶员曾经是伦敦的一名出租车司

机。

这天上午，他们被送到一座俯瞰沙仑平原的悬崖上，据说从那里可以观察战场的一个部分。两位外国代表发现一群英国军官已经在一座十字军时代古堡遗址安顿下来，于是加入他们，用望远镜观察着北方2～3英里处的战局。这是耶鲁第一次观察战斗，没怎么引起他的兴趣。“炮弹不时从我们背后的高地射出，频率并不高，而我们前方是步枪的枪火，断断续续的机枪嗒嗒声，不时有散兵线在前进，在石灰石山岭的空寂灰白色背景下，几乎看不清士兵的身形。这远远没有我孩提时代在范科特兰公园看的战争表演那么激动人心。对我们而言，这一天既漫长又乏味。似乎没有人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肯定不知道英军还是土耳其军队占了上风。”

这位初尝战争滋味的美国代表并不知道，他正在体验的其实是传统战场的本质所在：在排山倒海的混乱中，即便是高级野战指挥官通常对战局进展也只有非常模糊的把握，而且往往只能了解自己所在位置周边的情况。但足智多谋的耶鲁想到了一个办法。当晚回到司令部之后，他利用自己的外国代表身份，获准进入主电报室。在那里他发现了来自战场各个角落的成堆的电报。将这些电文与地图联系起来，他就能对战役总体局势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原先是只有艾伦比和他最高级的参谋才享有的。次日，耶鲁来到了前线的另一个地段，向一位英军准将介绍了各处的战事进展情况。前一天了解到的知识派上了用场。

“这让我在军队里感到不是那么窘迫了，”他回忆道，“我第一次来到职业军人的队伍里感到的那种自信严重受挫的感觉也开始消失了。”

在攻势的最初两天，耶鲁享受到了从远距离舒适地观察战场的特权，在他眼里，士兵们如同一群群疾跑的蚂蚁。这种情况在9月21日宣告结束，他和伙伴们乘坐T型汽车爬上一条通往纳布卢斯镇（在撒马利亚山麓地带）的山路。前一天，一个逃跑的土耳其单位从同一条道路撤

往纳布卢斯，在那里遭到大群英国飞机的轰炸和机枪扫射。

“土耳其人毫无还手之力，”耶鲁记述道，“没有地方可以掩蔽，也没有办法投降。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道路上一连好几英里，两边都是浮肿的死尸，在赤日炎炎之下膨胀到了爆裂的地步。”

有一个景象让耶鲁永生难忘，那是公路的一个地点，有一座古罗马的高架渠穿过了一座山谷。在这里，曾有数十名土耳其士兵紧贴在高架渠的石墙上，以躲避扫射的英军战机，但飞机绕到他们背后，从另一个方向攻击，于是他们全都丢了性命。在整个一条高架渠沿线，死尸整整齐齐地排成一路纵队，“在世人眼中，”耶鲁回忆道，“如同一排翻倒的锡兵。”

传来了惊人的消息。9月21日，皇家飞行军团的一架飞机在阿兹拉克降落，飞行员告诉大家，英军沿着巴勒斯坦海岸长驱直入，秋风扫落叶一般粉碎了挡路的土耳其军队的微弱抵抗。几周前，司令部的期望是进抵耶路撒冷以北40英里处的纳布卢斯城。现在，仅仅几天之内，英军前锋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纳布卢斯，数千名敌军士兵缴枪投降。艾伦比将军发给在阿兹拉克的费萨尔的信中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遭受了难以恢复的惨败，”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应当联手，将敌人彻底歼灭。”[14]

艾伦·道内给乔伊斯中校的信讲得更详细。前一天晚上，英军骑兵已经从沿着海岸北上的行动转为向内陆推进，合围在巴勒斯坦的敌军部队指日可待。“整个土耳其军队已经落入陷阱，”道内欢呼雀跃道，“除了通过雅莫科峡谷向约旦河以东逃跑之外，所有退路都被封死。如果阿拉伯人能够切断这最后一条逃生之路，而且是及时切断，那么敌人一兵一卒、一门大炮、一辆马车都插翅难逃！多么了不起的胜利！”[15]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明白无误地说：“我们的战争的面貌发

生了变化。”

当然，战局进展如此之快，原先为阿兹拉克部队设计的作战计划已经过时。当天下午，劳伦斯登上那架皇家飞行军团的飞机，返回巴勒斯坦，与艾伦比将军的幕僚紧急磋商。

劳伦斯在司令部得知，新的目标不是击败土耳其军队，而是将其全歼。艾伦比在给费萨尔的信中也提及了这一点。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英军左翼继续北上的同时，另外三支部队将渡过约旦河东进，以便扫荡汉志铁路沿线的各个叙利亚城镇，最终逼近大马士革。关键仍然是德拉。从巴勒斯坦逃跑的所有土耳其单位以及那些仍然在它南面的单位有可能会在德拉集结，或许能够重整旗鼓，负隅顽抗。司令部敦促劳伦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阿拉伯人必须彻底切断德拉以南的铁路线，而绝不可以冲向大马士革[16]。

艾伦·道内写给在阿兹拉克的乔伊斯的信中已经强调了这后一点。乔伊斯临时外出，劳伦斯拆读了这封信。“你和劳伦斯应当动用全部约束力，”道内向乔伊斯下令，“防止费萨尔在北方做出任何鲁莽行动……局势完全在我们手中，任我们控制，所以费萨尔只要信任我们并耐心等待，就不必担心对他不利的事情。让他千万不要在未与艾伦比将军协商的情况下北上，那将是致命错误。”

英国人的这番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近两年来，劳伦斯一直向费萨尔进言，阿拉伯人要对大马士革发出主张的唯一稳妥办法是抢先抵达那里；前不久马克·赛克斯向“叙利亚七人”回复的公开信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因此，对费萨尔来说，放弃德拉行动而进军大马士革是个不可抵挡的诱惑。劳伦斯在司令部短暂停留期间，艾伦比的高级参谋们一再向他强调，阿拉伯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忠诚的话，将得到很好的报偿，甚至暗示，将会允许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一个政府[17]。

得到这些保证并拿到给阿拉伯人的新命令之后，劳伦斯于次日飞回了阿兹拉克。随后两天内，大群阿拉伯战士以及英军的装甲车单位袭击了德拉以南的汉志铁路，将其严重损毁，在可预见的短期内无法修复。但撤退中的土耳其军队可能重整旗鼓在德拉顽抗的担忧现在看来是多余的；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他们的士兵被战局发展的神速惊得呆若木鸡，脑子里只有逃命一件事情。土耳其军队瓦解的速度如此之快，到9月25日，劳伦斯就得以向司令部报告称，德拉以南的所有内陆城镇中或许已经只有4000名土耳其士兵，其余大部分人已经通过德拉，继续逃往大马士革[18]。

但考虑到战役目标已经扩大为全歼土耳其军队，劳伦斯看到了一个机遇：如果德拉不会成为土耳其军队的集结地，那么可以将它化为杀戮场。在9月25日的报告中，他在描述敌人部队企图逃往大马士革的时候，简练地评论道："我要阻止他们。"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26日派遣一群阿拉伯战士前往德拉西北方12英里处的一个叫作谢赫萨阿德的小山村。在那里，起义军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德拉和通往大马士革道路上的情况，还能观察从巴勒斯坦通过雅莫科峡谷撤退的土耳其部队的动向。

劳伦斯很快就有理由为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庆幸。当天下午，侦察兵发现一小群德国和土耳其士兵从雅莫科道路走来，"绝望但逍遥，轻松自在地行军，认为自己离战场还有50英里远"[19]。阿拉伯人匆匆布下了一个陷阱，将这群掉以轻心的敌人迅速消灭。劳伦斯写道："谢赫萨阿德很快就报答了我们，报答得很好。"

这还只是小试牛刀。次日上午，英军从雅莫科北上，德拉及其周边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准备放弃这里的阵地。劳伦斯得到情报：约4000名敌军将从德拉出发，在通往大马士革的主路上撤退，而另外2000人将从附近的一个城镇撤退。这支2000人的队伍选择了陆路的一条捷径，将通过

谢赫萨阿德以南6英里处的塔法斯村。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冷冷地写道："2000人更像是我们能吃得下的。"

9月23日下午，一支印度骑兵部队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地中海城市海法。威廉·耶鲁于当晚抵达海法，在当地一户人家住下，然后决定在城市空荡荡的老城区散散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几乎所有参战国军队中都有配备长枪的骑兵。到1918年，在机枪和作战飞机的时代，几乎所有这样的骑兵都抛弃了长枪这种过时武器，但印度军队还没有。当天下午，印度枪骑兵在海法老城区的狭窄街道上大显神通，追杀胆战心惊、抱头鼠窜的土耳其士兵，将其一一刺死。耶鲁不管走到哪里，看到地上都是死尸。

"在死寂的冷清的街道上，"他回忆道，"在明亮的月光下，土耳其士兵的尸体非常奇怪地显得极不协调，因为东方月夜的安宁祥和笼罩着城市的这个部分。"

但是，普通人很快就会对战争的恐怖无动于衷，威廉·耶鲁也不例外。次日是他来到战场的仅仅第6天，他和德·桑布伊少校开车在巴勒斯坦海岸公路上奔驰，经过了一队队被押往战俘营的土耳其战俘。在队伍的末尾是几十名精疲力竭或者病重而无力行进的俘虏。这些人就被丢弃在后面，在炙热阳光下等死，他们的战友、俘虏他们的印度兵，以及耶鲁和他的伙伴，都熟视无睹。"这不是我们能管的事情，我们还有一天的路要走，"他写道，"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我们太没心没肺、冷酷无情。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停下来，带上一两个人。"

在塔法斯外围不远处的高高草丛中，他们遇见了第一批幸存者。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村民们喃喃低语地告诉他们，土耳其士兵在一个小时前进入塔法斯之后就开始疯狂肆虐。劳伦斯和阿拉伯部队的前锋继续前进，很快发现了敌人暴行的证据。草地上四处散布着尸体，"用死尸的

那种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大地”。

突然间，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跳进他们的视野，她的脖子上有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浸透了她的罩衫。“那孩子走了几步，”劳伦斯回忆道，“然后停住脚步，以令人震惊的力量向我们高声哭喊起来：‘老爷，别打我！’除了这哭声，周遭一片沉寂。”片刻之后，女孩跌倒在地，很可能是死了[20]。

但与塔法斯街头的惨状相比，这还不算什么。到处是死尸，很多尸体残缺不全，姑娘和妇女们显然是惨遭先奸后杀。让劳伦斯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裸身的孕妇俯卧在一堵矮墙上，身体被锯齿刺刀刺穿，非常恐怖。她周围有约二十具尸体，“死法不同，但都是非常猥亵”。

非常巧合的是，在前两周陪同劳伦斯，并且现在与他一同骑行的人当中就有塔法斯的头人塔拉勒·哈雷丁。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记述道，塔拉勒看到自己村庄遭到蹂躏的惨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哭喊，用头巾围住自己的头，用马刺狠狠地催动坐骑，在马鞍上摇晃着，全速冲进正在撤退中的土耳其队伍。他和他的母马都被机枪打死，倒在敌人的枪尖下”。

与奥达·阿布·塔伊（他在这天上午也来到了塔法斯）协商之后，劳伦斯向他的副手们下令，不接受任何俘虏，或者按照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更雄辩的说法：“你们当中谁能带来最多的土耳其死尸，就是最优秀的。”

9月27日这个漫长日子余下的时间里发生的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单方面屠杀。进攻的阿拉伯人很快将逃跑中的土耳其队伍切割成三个孤立部分，然后开始逐个击破。任何负伤倒下或者企图投降的土耳其或德国士兵都被迅速砍死。很快，沿途村民也加入了追击，他们急于报复4年来压迫他们的土耳其人，或许同样热切地希望抢劫死人身上的财物。甚至

从屠杀的标准来看，这也显得格外凶残。“我们陷入了一种疯狂，”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记述道，“这疯狂来源于塔法斯遭遇的恐怖蹂躏，或者关于它的故事，于是我们杀了又杀，甚至猛击死人和牲口的头部，似乎他们的死亡和汹涌鲜血能够缓解我们脑子里的痛苦。”

屠杀越来越残忍。阿拉伯部队的一个预备队伍由于偶然，没有接到“不留俘虏”的命令，日落之前，劳伦斯折回来的时候，这个单位已经活捉了约250名土耳其和德国士兵。根据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述，劳伦斯“并非不愿意”放这群俘虏一条生路，但他被带到一名垂死的阿拉伯战士面前，此人被德国刺刀残忍地钉在地上，“就像收藏的昆虫标本”。劳伦斯在此事过后不久写下的正式报告中称，“然后我们将哈奇开斯机枪对准俘虏群，把他们全解决掉了，他们什么也没说”[21]。

屠杀持续了一整夜，又延续到次日。惊恐万状、精疲力竭的土耳其人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群，最后完全无力抵抗，少数幸运的人被俘虏，更多人被草率地当场杀死。两天后，最后一批掉队士兵抵达大马士革郊外，此时于9月27日从德拉地区出发的约6000名土耳其和德国士兵已经只剩下不到2000人。

劳伦斯没有参加进一步的屠杀。当夜，他返回了设在谢赫萨阿德的指挥部，在次日黎明前往他的伤心之地：德拉。根据他在《智慧的七柱》中的记述，这次他在德拉的见闻非常平淡，尤其与塔法斯的恐怖事件相比就更不值一提。一支阿拉伯部队于前一天下午冲进了德拉，搜捕了留在那里的少数几名土耳其士兵之后，就开始大肆劫掠。劳伦斯迅速阻止了混乱局面，在遭到破坏的火车站及其工棚处安排了武装警卫，并帮助任命市长和指定警察。事实上，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当天在德拉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阻挠乔治·巴罗将军（他刚率军从雅莫科峡谷抵达）好斗的野心。

在《智慧的七柱》中，巴罗被描摹为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劳伦斯

从德拉出来到西面的道路上迎接他时，巴罗就开始受到各种打击。巴罗将军打算在城内外四处安置警戒，以平定这个城镇的秩序，劳伦斯“温和地解释说”，秩序已经恢复了，因为指定了一位阿拉伯市长。巴罗随后坚持要让他的人马占领德拉火车站，劳伦斯同意了，但是非常傲慢地要求英军不得干预火车站的运作，因为阿拉伯人已经清理了铁路线，正在为一列火车的出发做准备。劳伦斯写道：“巴罗来的时候把阿拉伯人看作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我冷静地向他暗示，他是我的客人。他虽然对此颇为震惊，但别无选择，只有乖乖地听我的话。”劳伦斯记述道，如此这般把巴罗将军驯服之后，“很快我们就相处融洽了”。

但乔治·巴罗对这一天德拉形势的回忆不是这样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整个地方脏得不可名状，零乱地散布着还在冒烟的灰烬和抢劫后丢弃的腌臜东西。土耳其人的死者或垂死之人躺在火车站周围，或者倚着墙坐着。还活着的人盯着我们，哀求我们开恩，因为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不可能得到任何怜悯。”[22]

但这与巴罗的士兵进入一列被困在德拉车站的土耳其医护列车之后看到的景象相比，就不值一提了。他相当夸张地将这景象描述为“其野蛮残忍，远远超过过去120年里各国冲突中的任何已知暴行”。据巴罗说，“阿拉伯士兵走进了列车，剥掉呻吟的土耳其伤病员的衣服，也不管他们的血淋淋伤口和断裂肢体，并割断受害者的喉咙……任何一个普通的文明人都无法忍受这样的惨景。”巴罗说，他愤怒地命令劳伦斯将这些阿拉伯人从列车上带走，劳伦斯却拒绝了他，并解释说，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战争观念”。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观念，”巴罗反驳道，“如果你不把他们弄走，我来。”据说劳伦斯在这关头抽身离去，告诉将军，他不会对即将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巴罗召集了他的士兵，将救护火车上的阿拉伯人都赶了出去，阻止了他们的屠杀。

将塔法斯和德拉的事件结合起来考量，我们发现很难了解到“劳伦斯神话”的全部真相，甚至无法确定这个神话的哪些方面最为可信。对于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对塔法斯事件的描述，不轻信的读者或许会感到，有些场景实在太戏剧化了，难以令人信服，比如塔拉勒冲锋时被敌人击毙前发出的惊人的惨叫、被刺刀钉在地上的阿拉伯战士临死前向折磨他的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发去的控诉的目光等，尤其是这些场景都没有出现在劳伦斯的正式报告中。另外，令人不安的是，劳伦斯大量描述恐怖细节，其笔触带有性的意味，接近战争色情作品，令人想起他描述一年前在德拉遭受折磨的情节。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在战后，曾与劳伦斯一同参加1918年9月攻势的多名英国军人坚持，劳伦斯从未发布过“不留俘虏”的命令，更不要说命令处决战俘了，尽管劳伦斯在回忆录和正式报告中都这么说得一清二楚[23]。

德拉医护列车的故事从相反的角度突出了我们了解真相的困难。劳伦斯开诚布公地将自己在塔法斯的行动描绘得跃然纸上、震撼人心，但在《智慧的七柱》和正式报告中都丝毫不曾提及救护列车的事件。我们很难想象，乔治·巴罗这样一位“正派”的职业军官会捏造这样一个故事。如果这个事件真的发生过，而劳伦斯避而不谈，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不愿意破坏阿拉伯起义军的光辉形象，但《智慧的七柱》的很多段落，以及他的战时报告，都毫不隐讳地描述了阿拉伯起义军不光彩的一面。如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劳伦斯的确是刻意要隐瞒这个事件，那么为什么要在《智慧的七柱》中大力贬低最有能力宣传此事的巴罗？难道不应当保持低调、避免激怒巴罗吗？当然了，对于这一切，还有一个更简单但更令人不安的解释：在9月最后几天的恣意杀戮中，劳伦斯感到救护火车的事情实在不值一提。

劳伦斯留在德拉，以便与费萨尔会面。费萨尔在第二天从阿兹拉克赶到了德拉。到此时，由于土耳其军队的全线崩溃，艾伦比不准阿拉伯人进军大马士革的禁令已经被解除。事实上，他还命令埃及远征军的所

有单位不得擅自进入叙利亚首府，以便将首先攻入该城的荣誉留给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劳伦斯和费萨尔讨论了在大马士革组建临时政府的计划。9月30日清晨，劳伦斯和最近有时担任他司机的沃尔特·斯特林少校乘坐那辆被他们命名为“蓝雾”的劳斯莱斯轿车，起程北上。途中，放眼望去，到处是人畜的尸体，其中有些是在土耳其军队仓皇逃窜过程中死亡的。当晚，他们已经抵达一座俯瞰大马士革城的山脊，那里挤满了阿拉伯军队和埃及远征军的单位，都在等待天亮之后进城。

在这个等待的夜晚，斯特林注意到，劳伦斯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在这位下级军官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已经处在攻入大马士革的前夜，”斯特林写道，“将为劳伦斯的全部努力赢得成功的最后一步已经近在眼前。”最后他问自己的同伴，为什么如此沮丧。“自从我们占领德拉以来，”劳伦斯答道，“结局就已无法逃避。现在，热情和兴趣都没了。”[24]

当夜，在大马士革城外的同一座山脊上，威廉·耶鲁和意大利军事代表也在那里宿营。他们躺在自己的T型汽车旁，裹着毯子，努力休息几个钟头。午夜过后不久，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他们惊醒。在北方，巨大的烟雾和火焰从大马士革上方升起，周边几英里的乡村都被这强光照得亮如白昼。“全能的上帝啊，”耶鲁说道，“土耳其人把大马士革炸掉了。”当夜，在这第一次大爆炸后还发生了许多较小的爆炸，火焰和爆炸的炮弹如同间歇泉一般从夜空中划过。

黎明时分，耶鲁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大马士革依然屹立。土耳其和德国军队在前一夜只是在撤离城市之前摧毁了自己的弹药和燃料库。

非常凑巧的是，耶鲁和德·桑布伊这一夜扎营的地方就在那群在攻势前离开司令部、将他们抛在脑后的那群记者旁边。这天上午，重新团聚的朋友们讨论了一番，现在进入大马士革是不是太危险。耶鲁在讨论

中途离开去找水泡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记者们又一次抛弃了他们。“记者能去的地方，”他告诉德·桑布伊，“军事代表自然也能去。”他们跳上T型汽车，向市区开去。

他们进入的是一场喧闹的欢庆活动。在街道上，大马士革市民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阿拉伯战士们骑着战马或骆驼，向天鸣枪，妇女们从阳台上向他们抛撒玫瑰花瓣。两位军事代表越接近市中心，场面就越狂热。“简直是群魔乱舞，”耶鲁回忆道，“我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将近3年时间，终日惴惴不安，对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所以我能感受到阿拉伯人的那种狂喜，另外，更让我心醉神迷的是，我是解放大军的一员……人们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做客，为我端来葡萄酒和甜食。这是疯狂热烈的一天，这样的日子，一个人哪怕一生中只会遇到一次也算是非常幸运了。”

这一天，劳伦斯也体验到了大马士革的疯狂，只是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和斯特林开着“蓝雾”，在记者和外国军事代表们出发很久以前就动身前往大马士革，但被一名印度陆军警卫扣押了好几个小时。这名警卫对他们的阿拉伯头巾产生了狐疑。这个耽搁险些导致灾难性后果，因为劳伦斯最终抵达大马士革市政厅（阿拉伯起义领导人的集结点）的时候，他发现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中。

这天上午，费萨尔的副手们在市政厅着手组建临时政府，却来了两个人，声称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组建了政府。另外，这两个不速之客还坚持，自己是侯赛因国王在大马士革的合法代表。劳伦斯对这两人很熟悉，他们分别是曾经在雅莫科差点把他害死的阿尔及利亚叛徒阿布德·卡德尔和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萨义德。几分钟后，这兄弟俩及其追随者离开了市政厅，但他们如果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希望自己没有离开。在他们离开的时候，劳伦斯当即撤销了他们的权力主张，任命了另一个人——舒克里·帕夏·阿尤比为大马士革的临时军事总督。

劳伦斯这么做的时机堪称绝妙，因为就在几分钟之后，埃及远征军沙漠骑兵军的澳大利亚司令官亨利·肖韦尔将军就来到了市政厅。作为第一位进入大马士革的埃及远征军高级指挥官，他从艾伦比那里接到的指示是，寻找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请他暂时继续管理城市。在市政厅，肖韦尔遇到了劳伦斯。劳伦斯迅速带他去见舒克里帕夏。“我以为这就是土耳其人任命的总督，”肖韦尔后来向艾伦比报告称，“于是我通过劳伦斯中校向他发布指示，让他继续市政管理工作，并告诉他，他需要多少警卫和警察，我都可以为他提供。”肖韦尔还请求劳伦斯“协助这些工作，因为我目前没有政治军官可供调用”，于是劳伦斯的计谋圆满成功。[25]

这意味着，通过如此聪明的一步棋，劳伦斯在埃及远征军军事当局眼中确立了自己选择的阿拉伯“政府”的合法性。另外，在至关重要的随后几天之内，他就是大马士革实际上的统治者，可以随意抽调埃及远征军部队，还能通过军事总督的“职位”领导阿拉伯人。

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消除阿布德·卡德尔和穆罕默德·萨义德构成的持续威胁。他将两兄弟传唤到市政厅，告诉他们，他们的政府已经被废除，并任命了一些忠于费萨尔的人到实权岗位上。劳伦斯与两兄弟之间的对抗非常紧张，差点动了刀子。劳伦斯叙述道：“随后，穆罕默德·萨义德和阿布德·卡德尔拂袖而去，发誓要对我这个基督徒报仇雪恨。”不久之后，劳伦斯派遣了埃及远征军的部队去平息市区几个地方出现的抢劫骚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市内秩序恢复了一些，忠于费萨尔的分子控制了局面，劳伦斯这才赶到肖韦尔的办公室，承认两人先前会面时可能发生了误会，舒克里帕夏其实不是土耳其人任命的大马士革总督，而是劳伦斯本人不久之前任命的。劳伦斯表面上这是在澄清事实，其实也是在向肖韦尔发出挑战。大马士革的局面还很紧张，将军要么接受当前的安

排，要么自己想个主意，但那样就要冒风险。亨利·肖韦尔已经很不喜欢劳伦斯，但显然更不喜欢城市暴动的情景。当晚，劳伦斯得以向艾伦比司令部发了自己的电报，宣布“肖韦尔同意让我继续执行市政管理，等待进一步指示”[26]。

随后两天，他就统治着这座城市，有时宽宏大量，有时严厉苛刻。尽管市区某些地方还有抢劫现象，他还是派遣市政工作人员去修复城市的电力和供水系统。将垃圾清扫干净，组建了一个消防队，向穷人发放口粮，同时对市中心的一些新的骚乱——可能是阿布德·卡德尔和他的兄弟争夺权力的又一次努力的结果——进行了严厉镇压。“我们派出了阿拉伯部队，”劳伦斯在正式报告中冷静地写道，“在中央广场安置了哈奇开斯机枪，花了3个小时，打死打伤约20人，恢复了秩序。”[27]

T.E.劳伦斯和威廉·耶鲁两人的角色非常不同，所以他们在大马士革的这些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只邂逅了一次。劳伦斯公务繁重，所以对这次会面没有任何印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耶鲁去找他，投诉一些美国公民开的商店遭到抢劫的事情。但他们在大马士革都经历的同一件事情，将他们联系了起来。那是一个恐怖得不可言喻的地方，将给两人带来长期的心理伤痛。那个地方叫作“土耳其医院”。

10月2日，威廉·耶鲁在大马士革一家酒店的大堂内，这时一名澳大利亚军官走上前来，问他有没有看过“土耳其医院”。他对这个地方不熟悉，问了路之后才知道这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于是他和德·桑布伊少校很快动身了。

这实际上是土耳其军队的一座兵营，正面有一个很大的操练场。耶鲁回忆道，走过大门口的两名澳大利亚哨兵之后，“我们穿过了空无一人的操练场，爬上台阶，进入了一座停尸房”。

土耳其人将这座兵营改建成了临时的军医院，但在9月29日的大撤

退中将它抛弃，留下了约800名伤病员。在随后3天内，阿拉伯人洗劫了医院，对这些伤病员大肆攻击，将医院的食品和药品洗劫一空，在搜寻隐匿的财物时甚至将很多病人推到地板上。驻扎在附近的澳大利亚部队除了在医院大门设置岗哨之外，对绝望和垂死的伤病员们无动于衷，甚至没有给他们送水喝。

“满地都是屎尿，泥泞不堪，”耶鲁记述道，“到处是小小的肮脏的医院病床，躺着几百人。死人、伤员和病人紧挨着躺着自己的污秽之中，地上也有死人，还有从床上翻落到地上的人，在痛苦地挣扎着……大多数人沉默地忍受着这一切；有些人在呻吟，其他人可怜兮兮地向我们哭喊，他们悲戚戚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在我们走过的时候紧随着我们。”

更令人心惊胆寒的是，在主楼层上方的一个小凹室内，耶鲁和德·桑布伊发现3名护士、勤杂工正坐在桌前，一言不发地喝咖啡。“我的印象是，他们被吓破了胆，满心都是绝望，面对这恐怖而难以置信的局面，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他们坐在地狱里喝咖啡，这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两位军事代表看够了，于是逃离了兵营楼房，去寻找能管事的人，尽管在这一天，究竟谁掌握着大马士革的权力还很难说。

当天下午，T.E.劳伦斯也得知了土耳其医院的事情，也去了那里。他看到的景象和耶鲁差不多，但在他更为才华横溢的笔下，阴森恐怖的细节被描绘得更鲜明形象：老鼠在死尸上咬出了一条“湿漉漉的红色走廊”，许多死尸“已经肿胀到了生前尺寸的两倍或三倍，肥胖的脑袋张着黑漆漆的嘴巴，无声地笑着……有些死尸上，较柔软的部分已经坍塌。有几具尸体爆裂了，已经腐烂成液体”[28]。

劳伦斯走进房间更深处，在死尸和垂死者之间择路前行，“拉起我的白色衬衣，免得我的光脚踩在一摊摊的秽物上，突然间我听见一声叹息”。他转过身，看见一个还活着的人在盯着他，喃喃低语：“发发慈

悲，发发慈悲。”很快，其他人也这么哀鸣起来，然后有些人举起手来哀求他，如同一道“褐色的波浪”，“轻微的颤动，如同枯萎的落叶，”随后手又垂了下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力气说话，”劳伦斯回忆道，“但他们全体都喃喃低语起来，好像是接到了命令，让我感到好笑。”

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当即行动起来，处理这个可怕局面。他在楼上一个房间内发现了一群土耳其医生无所事事地坐着，于是命令他们去病房。附近的澳大利亚部队拒绝帮助他，于是他命令阿拉伯部队送来食物和水，然后强迫一群土耳其战俘挖了一个集体墓，以便安葬死者。但甚至是在这里，劳伦斯也抵制不住诱惑，一定要描写恐怖的细节。“壕沟对他们来讲太小了，”他对埋葬死者的情景描述道，“但死尸已经严重腐烂，半是液体，所以每一具尸体被抛下去的时候，就像果冻一样，在自己重量的作用下，从尸堆滑了下去”。

为了解决土耳其医院的悲剧性问题，耶鲁最终找到了新近抵达的吉尔伯特·克莱顿。耶鲁在开罗就和他打过许多交道，对这位准将非常憎恶，认为他冷酷无情。10月2日夜间与克莱顿的会面仍然没有改变耶鲁的这种看法。耶鲁感情洋溢地恳求处理此事，克莱顿听完之后冷静地说：“耶鲁，你不是个军人。”看到耶鲁眼睛里聚集的怒火，他随后补充道：“你不必生气；我也不是军人。”

土耳其医院的事件对劳伦斯和耶鲁的影响都非常大，在战后两人的一次对话中（1929年的通信），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个。耶鲁起初的信已经遗失了，但他肯定是向劳伦斯询问了此事的更多细节，因为劳伦斯的手写的回信的三分之一篇幅（约400字）都在解释自己在医院的行动。这个插曲在两人的回忆录中都占据了显著位置，从中可以瞥见他们迥然不同的个性。

对威廉·耶鲁而言，或许就是出于对土耳其医院事件的愧疚，他写下了自己手稿中最为真挚和悲痛的段落。“在整个战争时期，我最深切

悔恨和羞愧难当的事情就是，我没有睿智而冷静地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缓解那800人的极大痛苦。愿他们的诅咒降到我头上。”但自责向来不是耶鲁的长处。两个句子之后，他就开始将罪责归于另一方。“这件恐怖暴行的罪魁祸首是欧洲帝国主义，这是它罪恶滔天中的又一劣迹。”

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的描述比耶鲁的叙述更情真意切，也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根据劳伦斯的记述，他在次日返回医院，发现那里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但遇到了一个暴跳如雷的澳大利亚少校。劳伦斯还穿着阿拉伯长袍，懒得说明自己其实是个中校，甚至在这个军衔较低的军官询问谁负责这个仍然相当恐怖的地方的时候，也没有揭示自己的身份。劳伦斯说是自己负责这里，澳大利亚少校吐了口唾沫，骂道：“操蛋的畜生！”扇了劳伦斯一个耳光，然后怒气冲冲地冲了出去。

这个段落居然出现在全书660页的《智慧的七柱》的倒数第2页——而且这本书的副标题还叫作“一场胜利”，着实奇怪，但这个场景的有些地方听起来不够真实。和塔法斯事件的一些细节一样，这个情节也未免有些太干脆利落、太像舞台剧了。但不管这个情节是真实还是虚构的，这个少校的耳光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它让劳伦斯“羞耻之心更甚于愤怒，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他是正确的；任何推动弱者发动起义、战胜自己主子的人，事后在价值观上必已受到严重污染，而觉得周遭没有什么是洁净的”。

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始终感到被自己在战时的所见和所为污染了，在他努力“感到洁净”的斗争中，常常自我克制和对自己实行暴力——这种暴力比那个少校的耳光严重得多——来补偿自己的罪孽。

会议于10月3日下午在大马士革最高档的维多利亚饭店二楼的会客室内举行。与会者只有8人：英国方面是艾伦比将军和肖韦尔将军及他们的两位参谋长；阿拉伯方面是费萨尔·伊本·侯赛因、他的幕僚长努里·萨义德和麦地那的谢里夫纳西尔；T.E.劳伦斯是中间人和翻译。尽管这

次会议意义极其深远——中东的未来历史和悲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启动的——但没有留下官方的记录。

艾伦比将军在几个小时以前才抵达叙利亚首府。他素来都不是个耐心的人，这一天的情绪特别恶劣。他的攻势还在进行中——他的前锋部队正在无情地追击向北逃窜的土耳其军队，却不得不从军务中拨冗处理大马士革的越来越棘手的政治问题。费萨尔从德拉乘坐3点钟的火车到大马士革，但由于安排了骑马入城式，所以到维多利亚饭店会晚一些。艾伦比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他妈的入城式！"并命人立刻将费萨尔带到饭店[29]。

将军或许没有完全知晓，或者军务繁忙而没有去搭理这件事情，但他的巴勒斯坦攻势最初令人惊喜万分的成功促使法国政府疯狂地又一次提出了《赛克斯—皮科协定》规定的对叙利亚的权利主张。9月23日，英国政府大体上向他们的要求妥协了。结果就是，两天后，艾伦比从外交部收到了一系列愚蠢到几乎毫无道理地步的指示。9月25日的指示先是声明"在叙利亚问题上，英国政府坚守自己业已宣示的政策，即若它进入任何欧洲国家的利益范围，该国应当是法国"，然后提醒艾伦比，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你会注意到，英法两国联合支持在A地区建立的任何阿拉伯国家的主权独立"（A地区指的是叙利亚）。基于这两个貌似互相矛盾的方面，外交部向艾伦比提出的建议自然也是稀里糊涂的，"如果艾伦比将军进入大马士革，最好的办法是，尊重1916年的英法协定，借助一名法国联络官的渠道，通过一个阿拉伯政府来工作"[30]。

伦敦方面显然是认为这些指示还不够稀里糊涂，在10月1日又发来了更加莫名其妙的命令。艾伦比得知，由于"（为将自己的土地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战斗的）阿拉伯人的参战国地位"已经得到协约国的承认，"阿拉伯人解放的地区应当被视为盟国领土，享有友好阿拉伯

人的独立国家（或邦联）的地位”。这突然间清楚明晰起来，但是随后又有一条奇怪的附加条件，“如果在叙利亚的阿拉伯当局要求得到欧洲官员的协助或建议，根据英法协定，应当派遣法国官员”。实质上，英国政府这是要援引《赛克斯—皮科协定》，同时废除和支持与阿拉伯人的条约，意图举棋不定，每句话都不同[31]。

在维多利亚饭店第一次听到这番胡言乱语的时候，劳伦斯无疑感到非常警惕。他一直以为，《赛克斯—皮科协定》已经是一纸空文，很长时间以前就被废除了；现在突然又提起它，着实是不祥之兆。但在积极的方面，艾伦比得到的指示清楚无误地认可了阿拉伯人对叙利亚独立的主张，而费萨尔毫无寻求欧洲人协助或建议的打算——正因为此，他才要组建临时政府，这肯定意味着，关于法国联络官的条件并无实际意义。

但局势发生了恶化，或者说，发生了一系列恶化。据肖韦尔将军记述，艾伦比宣称，费萨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选择，法国将成为保护叙利亚的“宗主国”。另外，尽管费萨尔作为他父亲的代表“将拥有叙利亚的管辖权”——不过是“在法国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下”，但他的管辖权不包括巴勒斯坦或黎巴嫩，“仅限于叙利亚内地”。“内地”是关键字眼，因为费萨尔还得知，黎巴嫩的边界已经被定为从巴勒斯坦到亚历山大勒塔湾的整个地中海海岸，于是叙利亚变成了一个内陆国。艾伦比告诉费萨尔，最终的结果就是，将立刻派遣一名法国联络官给费萨尔，“这名联络官目前将与劳伦斯一同工作，劳伦斯应对其尽力协助”[32]。

费萨尔和劳伦斯都呆若木鸡。肖韦尔记述称，费萨尔言辞激烈地声称，“从艾伦比派给他的顾问”（即劳伦斯）那里，他得知，作为割让巴勒斯坦的条件，“阿拉伯人将拥有整个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在内”。另外，他断然拒绝接受法国联络官，“或以任何方式接受法国的指导”。

面对这个紧张的僵局，艾伦比转向劳伦斯：“但是，你难道没有告

诉他，法国将拥有叙利亚的保护权？”据肖韦尔说，劳伦斯的回答是：“没有，长官。我对此一无所知。”

“但你肯定知道，费萨尔不会得到黎巴嫩？”艾伦比坚称。

“不，长官，”劳伦斯答道，“我不知道。”

艾伦比希望解除当前的危机，于是说这都这是临时措施，一切都会在筹划中的战后大型和会上得到解决，但费萨尔不肯接受。他深知，这种局面下的临时措施往往会变成永久性措施。于是英国总司令只有用自己的军衔来压制对方了。艾伦比提醒费萨尔，从技术角度，他和他的阿拉伯北方军都是他的属下；因此，起义军领袖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颓唐沮丧的费萨尔·侯赛因离开了维多利亚饭店，却受到了一大群支持者的欢迎，这着实有些讽刺。劳伦斯没有和他一起出来，而是留在饭店会客室，向艾伦比将军提出了一个请求。

大坝崩塌，洪水汹涌。在10月剩下的日子里，埃及远征军和他们的阿拉伯盟军继续北上，追击土耳其军队残部，迅速粉碎敌人的所有后卫阻滞行动。直到10月底，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即未来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才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腹地边缘建立起一道新防线。但到那时，整个叙利亚都已失陷，君士坦丁堡政权正在求和。10月31日，穆兹罗斯停火协定生效。大约在同时，失势的三巨头——杰马勒、恩维尔和塔拉特悄悄登上一艘德国鱼雷艇，渡过黑海，逃之夭夭。

但崩坍的不仅仅是土耳其的大坝。同盟国各自的军事行动大体上是独立的，却在同一时间土崩瓦解，这着实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连锁反应。保加利亚在9月底举手投降，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在仅仅6天之内相继垮台。德国撑的时间最长，但也只比盟友们多撑了一周。他们大肆夸耀

的兴登堡防线有六七处被突破，德军士兵大规模投降。11月11日清晨，德国谈判代表在法国一处森林的火车车厢内与协约国代表签订了停火协议，协议将于当天上午11时生效。这场最无意义的战争的结局也非常丑恶。西线德军的一些单位继续战斗，一直打到上午11点。于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上午，有约4000名士兵阵亡。

库尔特·普吕弗在9月底到了瑞士，从那里静观了这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尽管大厦将倾、大局崩坏，这个德国特务头子还是继续执行诱骗阿拔斯·希里米的任性儿子回到同盟国怀抱的计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仍然认为，这是建立德国—土耳其—埃及联盟的关键所在，而这个联盟或许还能在中东称王称霸。阿卜杜勒·穆奈姆或许真的是个精神状态不稳定的虐待狂，但他还是有足够的智商，在1918年10月，认清这个德国人的计划荒唐可笑。10月末，两手空空的普吕弗返回德国，正好目睹了他挚爱的祖国的最后崩溃。

一段时期以来，亚伦·亚伦森也在千里之外——遥远的美国——观察着这个多事之秋的局势。但在10月中旬，同盟国垮台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他在纽约匆匆登上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亚伦森知道，一旦土耳其和德国投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会转向正在巴黎筹备的国际和平会议。他决心在会议上出头露面，敦促西方兑现在《贝尔福宣言》中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出的承诺。

与普吕弗和亚伦森相比，威廉·耶鲁是战争高潮的直接的目击证人。10月间，他跟随乘胜追击的英军北上。德国停火的消息传来时，他已经身处阿勒颇。随后，他返回了开罗，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他不愿意回家，但在埃及又无事可做，于是努力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为自己谋个差事。“我狂热地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他记述道，“希望能说服某人，把我派去巴黎。我的报告越来越糟糕。”[33]

报告质量的下降显然起了作用，因为在12月末，耶鲁收到了一份电

报，命令他前往法国首都。他到了那里之后要向美国和谈委员会报到，担任他们的“阿拉伯事务专家”。耶鲁写道：“这个头衔令我受宠若惊。”这是他比较少见的谦虚的时刻。

在过去几年里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中，在战争结束时离一线最遥远的竟然是T.E.劳伦斯。10月3日下午，在大马士革维多利亚饭店二楼的会客室，他确保了这一点。

费萨尔与艾伦比开完会离开房间之后，劳伦斯就转向将军，向他告假。艾伦比起初显然以为这只是请几天假而已——这很容易安排，也是劳伦斯应得的——但劳伦斯解释道，他想离开战区，返回英国。艾伦比开始时断然拒绝了；叙利亚战事正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阿拉伯人信赖的英国军官，而他们最信赖的莫过于劳伦斯中校。

据亨利·肖韦尔的记述，劳伦斯这时告诉艾伦比“他不愿意和一名法国联络官一起工作，而且他早就该休假了，最好现在就走，回英国去”[34]。不知是出于对劳伦斯抗命不遵的恼火，还是出于尊重他的荣誉感——肖韦尔和劳伦斯对此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艾伦比最终心软了。他对劳伦斯说：“好吧，我想你最好回国。”

从1916年末开始，劳伦斯就在打一场反对自己政府的秘密战争，现在他输了。但很快就一目了然的是，他打算在战场之外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在和平时期巴黎的会议厅继续斗争。他离开大马士革的理由是自己过于疲惫，但也是为了准备进行阿拉伯独立斗争的下一回合。

次日下午，劳伦斯被送出了大马士革。两年前，他将夺取这座城市作为战斗口号来激励阿拉伯战士，现在他离开了这座城市。大马士革东北方150英里处就是杰拉布卢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劳伦斯再也不会涉足大马士革或杰拉布卢斯。

[1]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4th. Army，” October 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882/7，f. 360.

[2] Gilbert，*First World War*， p.452.

[3] Prüfer，*Diary*， August 30，1918；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4] Prüfer to AA，September 3，1918；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 T137，Roll 138，Frames 329-30.

[5] 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8，p.30.

[6]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86.

[7]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244.

[8] 和在《智慧的七柱》中一样，劳伦斯在和罗伯特·格雷夫斯与巴塞尔·利德尔·哈特谈到自己1918年8月与努里·沙拉昂的会议时，特别小心谨慎。格雷夫斯催问他的时候，劳伦斯答道："我在当时的痛苦，有一个特别的、非常可怕的原因（不曾公之于众）。"（Graves and Liddell Hart，*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 Pt. 1，p.103）类似地，利德尔·哈特问他，他向沙拉昂许下的诺言究竟是什么，劳伦斯答道："我不想说出来。"（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 Folder 1，File 1）

[9]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79.

[10] Lawrence，*Seven Pillars*， p.586.

[11] Yale to U.S. Director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September 12，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Box 2，Folder 39.

[12] 劳伦斯关于1918年9月叙利亚攻势的记述见*Seven Pillars*， book 10，chapters 107-12，pp.581-660。

[13] 威廉·耶鲁关于1918年9月英军叙利亚攻势的回忆见Yale，*It Takes So Long*， chapter 9。

[14]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549.

[15] 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549.

[16] Bartholomew to Joyce，September 21，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157/738.

[17]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555.

[18] Lawrence to Dawnay，September 25，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7/738.

[19] Lawrence，*Seven Pillars*，pp.628-29.

[20]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4th. Army，” October 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882/7，f. 360.

[21]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4th. Army，” October 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882/7，f. 360.

[22] Barrow，*The Fire of Life*，pp.209-12.

[23] Mack的*A Prince of Our Disorder*，pp.234-40对塔法斯事件作了有趣的探讨，劳伦斯的一些战友试图捍卫他的名誉，尽管他自己竭力自贬。

[24] Stirling，*Safety Last*，pp.93-94.

[25]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p.563.

[26] Lawrence to General Headquarters，October 1，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157/738.

[27] Lawrence，“The Destruction of the 4th. Army，” October 1918；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882/7，f. 364.

[28] Lawrence，*Seven Pillars*，p.656.

[29] Chauvel，“Notes，” as cited by Hill，*Chauvel of the Light Horse*，p.184.

[30] CIGS to Allenby，September 25，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83，f. 489-92.

[31] War Office to General Headquarters，Egypt，October 1，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383，f. 498-99.

[32] Chauvel，“Notes，” as cited by Hill，*Chauvel of the Light Horse*，p.184.

[33]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10，p.3.

[34] Chauvel，“Notes，” as cited by Hill，*Chauvel of the Light Horse*，p.185.

尾声 巴黎

让劳伦斯滚蛋吧。他是个恶棍，被我杀了。

——1924年10月6日，T.E.肖（T.E.劳伦斯的化名）给H.C.阿姆斯特朗的信[1]

T.E.劳伦斯曾为之奋斗、为之运筹帷幄，甚至为之背叛自己祖国的一切，在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的5分钟会谈中，全都灰飞烟灭。1918年12月1日上午，大卫·劳合·乔治将到访的乔治·克列孟梭拉到一边，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英国在中东的愿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作为默许的交换（尽管劳合·乔治会一直否认这一点），法国将有权自由处置叙利亚。自英法两国垂涎三尺地觊觎中东以来，争夺战利品的竞争就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场竞争越来越紧迫。因此英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大战终于落幕，巴黎和会即将召开，英法两国务必要口径一致，联手对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和被压迫人民自决权的高尚言论。面对迫在眉睫的美国人的威胁，克列孟梭迅速同意了劳合·乔治的建议。

实质上，两个帝国主义战胜国不仅确认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本结构，还大大超越了它，给了自己更多，而给阿拉伯人的更少。但按照欧洲秘密协定的悠久传统，要过一段时间，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亲信圈子之外的人才会知晓这个非同寻常的协定。此时T.E.劳伦斯肯定是对此一无所知。

随后在巴黎上演了长达一年的明争暗斗。起初，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即伍德罗·威尔逊夸耀的“世界新秩序”，似乎大有希望，但后来又

蜕化为幕后协议、报复性条约和恣意专横的边界规定。关于巴黎和会以及和会期间列强及民族主义者的极其复杂的活动，已经有大量专著，汗牛充栋，其中最重要的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决定性的《巴黎1919》。但就中东而言，奸险的阴谋诡计最终几乎是毫无意义的。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大抢劫”马上就要开始了。

劳伦斯上天入地，竭尽全力去推动阿拉伯事业。在巴黎和会期间，他担任费萨尔的顾问，不断提出将阿拉伯人为之艰苦奋斗的土地交给他们的计划，同时向英国高级政治家游说，并撰写为阿拉伯人辩护的激情洋溢的社论。但对英国政府来讲，劳伦斯已经没有用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劳伦斯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同时——洛厄尔·托马斯的“与艾伦比在巴勒斯坦，与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讲座的英国听众达到约100万人，包括国王和王后——政府官员们却在备忘录里称劳伦斯为“有害影响”[2]，“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与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麻烦的根源”[3]。最后，他被剥夺了参加和会的资格，被禁止在会议中协助费萨尔。劳伦斯在和平时期输掉了。

但劳伦斯的外交努力至少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方面，值得强调。劳伦斯和费萨尔早就知道，阿拉伯人丧失了对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部分的控制区，于是寻找了一个盟友来保证他们对叙利亚剩余部分的民族主义主张。他们找到的盟友是哈伊姆·魏茨曼。到1918年底，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美两国政府中都有很强大的支持者，但令英美政府非常紧张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目标仍然保持敌意，而且越来越仇视。所以，能不能让谢里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计划，以此交换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独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国家的支持？这年12月，劳伦斯、费萨尔和魏茨曼拟定了这样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的细节，在巴黎和会前夕发布了联合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费萨尔和魏茨曼宣布了他们在巴黎合作的意愿，并

承认对方的权利主张。《费萨尔—魏茨曼协定》的九个条款中最有争议的肯定是第四条："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和促进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4] 对这份协定，费萨尔——更有可能是劳伦斯——添加了一个关键的条件。这份协定仅在叙利亚取得独立的情况下有效；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完全无效。

但劳伦斯和费萨尔在绝望地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和谈搭档的时候，却忽略了几个重要细节。《费萨尔—魏茨曼协定》虽然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巴勒斯坦的管理情况，却没有明确指出，巴勒斯坦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另外，在与魏茨曼达成协议的时候，费萨尔公然违背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原则，这让他在援引同一条原则来处理叙利亚其他地区时，显得很没有底气，有些人甚至会说他是伪善。最麻烦的是，哈伊姆·魏茨曼前不久公开了他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设想。他在11月中旬宣布："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这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将被置于有利于犹太人人口增长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条件下，于是按照民主原则，将来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犹太联邦。"[5]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费萨尔给了更保守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竞争者一个用来反对他的有力武器。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竞争对手——伊本·沙特和他的宗教极端主义瓦哈比派追随者就将动用这个武器，造成极大破坏。

威廉·耶鲁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将巴黎和会称为"20世纪悲剧的序言"。耶鲁担任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的中东事务专家，和劳伦斯一样，尽了很大努力促成该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他有时和劳伦斯联手，但他们的努力在每一步都被挫败了。

耶鲁认为，美国政府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他看来，巴黎的大事件完美地折射了伍德罗·威尔逊奇特的理想主义和傲慢自负的混合。美国总统喜爱整洁的有条不紊的清单——他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又提

出了“四大原则”和“四项目标”，最后是“五点问题”——这暗示了他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无数棘手难题解决起来都很简单，只消将它们分解，然后用近似数学的方法就能轻松搞定。威尔逊最心爱的，也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民族自决”这一点，尤其漏洞百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固然美妙，但在20世纪初欧洲和中东的成分极其复杂的文化中，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主义都起到非常大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作用，那么谁的权利主张能够压倒别人？伦敦和巴黎方面多次警告威尔逊不要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总统听得进去。

在威廉·耶鲁看来，这一切都是美国在巴黎和会扮演的角色背后的巨大矛盾的表征。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的宏伟蓝图建立在莫大的无知之上。耶鲁抵达巴黎见到自己的新上司威廉·韦斯特曼和美国代表团中东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的第一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诚然，中东不是美国关心的头号问题，因为美国毕竟不曾向土耳其开战，但耶鲁错愕地发现，韦斯特曼（威斯康星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召集的小组成员竟然都对中东非常无知。小组包括一名拉丁美洲专家、一名美国印第安人历史学家、一名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学者和两名波斯语言学教授[6]。

耶鲁领到了一本长达107页的资料汇编，涉及叙利亚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这是指导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主要资料。看到这本资料，耶鲁更清楚地看清了局势。对于这份《关于叙利亚人意愿的报告》，耶鲁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读[7]，因为其中涉及1914年以来事件的绝大多数引文的来源都是一个人：国务院驻开罗特工威廉·耶鲁。

有好几次，耶鲁看到了捍卫阿拉伯民族自决事业的机遇，但都由于美国人的无动于衷而与其失之交臂。在1919年2月中旬与费萨尔的一次会议上，这位阿拉伯领袖直截了当地建议由美国在叙利亚建立委任统治，表示自己更喜欢（据说是）公平中立的美国人，而绝不要法国人。听到这话，耶鲁大吃一惊。但到此时，耶鲁已经对美国驻巴黎和会代表

团心知肚明，知道抛却高尚的原则不谈，威尔逊政府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更有兴趣，而不愿意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美国人的话就不容易看到。美国虽然在短期内深度参与国际事务，但现在已经有重新回到隔离主义状态的迹象，威尔逊和反对他的共和党（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争吵愈演愈烈。对于那些在巴黎渴望美国人来领导局面的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拖得越久，美国人就越不可能有能力，或者甚至是有兴趣去干预。很快，耶鲁和美国代表团中东小组的其他人就万分沮丧地感到，局势在渐渐脱离他们的手心。“我们为了边界线而拼命争斗，就好像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它。”耶鲁回忆道。“我们大张声势、大做文章，因为威尔逊和爱德华·豪斯（威尔逊的主要顾问）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干什么。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只是纸面文章，徒劳无益。”[8]

随着和会的继续，耶鲁的任务越来越显得荒诞。1919年春末，他被委派到美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金-克兰委员会，遵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去调查前奥斯曼世界居民的意愿。按照耶鲁的满腹狐疑的说法，这等于是“对3000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作一个全民公决”。顺理成章地，在周游两个月，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开了几十次会之后，委员会在每个地方听到的信息都是毫不含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独立，或者由美国人来统治他们。有鉴于此，委员会提出的一整套建议将美国置于解决中东难题的最前沿。但这种解决方案与英法秘密约定的截然不同，也绝非威尔逊政府愿意承担的责任。至少在这方面，威尔逊政府反应迅捷。金-克兰委员会的报告被迅速锁进保险箱，在随后三年内外界对它一无所知。

1919年秋季，耶鲁离开金-克兰委员会，返回欧洲，做了挽救叙利亚局势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争取到了劳伦斯的支持，构建了所谓“耶鲁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一些英国高官的支持，因此在一个短暂时期内，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最后摊牌或许能够避免。但耶鲁的行

动是他自行其是，因此美国高官得知此事后，就把他的计划枪毙了。1919年11月1日，在最终解决方案出台前暂驻叙利亚的英国军队开始撤退。同一天，法国军队开入了叙利亚。几天后，耶鲁义愤填膺地从美国和谈代表团辞职，乘船返回纽约。

T.E.劳伦斯大约在同一时期彻底灰心丧气了。他的母亲后来告诉一位传记作者，她的儿子在这年秋天陷入了“极端的抑郁和神经崩溃”，他在回家期间“有时在早餐和午餐之间会在同一个地方枯坐整个上午，一动不动，脸上表情纹丝不动”[9]。

T.E.劳伦斯的故事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的问题，即他失败的时候，整个世界损失了什么。如果在1918年，阿拉伯人能够成立很多人为之拼死奋斗并坚信得到承诺的大阿拉伯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战后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能够和费萨尔·侯赛因这样的人——他曾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和古老纽带”[10]——达成协议，今天的中东将会多么不同？如果美国人在当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又会怎样？

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居然曾经有一个时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高声疾呼地呼吁美国干预他们的国家。如果美国把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机遇，历史将如何发展？或许不是某些人设想的黄金时代。劳伦斯本人常常谈到，真正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始终是海市蜃楼，因为阿拉伯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差别迥异，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或许，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奥斯曼人治下的旧体制那样），这样派系林立、难以驾驭的大国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技术和通信的进步几乎一定会让这些差别甚大的文化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同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关系，因为在《贝尔福宣言》发布很久以前，阿拉伯人就开始敌视人口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并且对费萨尔的温和态度置之不理。事实上，战后的一位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解

的阿拉伯领导人——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就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刺杀了。至于假设美国军队进占中东，他们或许会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但这欢迎肯定是短暂的，因为这些军队一定会被卷入他们几乎完全不理解的当地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即便美国能够避免这些麻烦，肯定也会丧失“公平中立者”的美好形象，因为它自己也在逐渐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的这些难题造成的架空的历史轨迹未必会比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真实发生的历史——战争、宗教冲突、残暴的独裁统治，不仅困扰中东，更令全世界颤抖——更凄惨。这段悲伤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从巴黎和会代表们收拾行装、宣布自己使命圆满完成的那一刻开始的。

1919年秋季，费萨尔在失去了劳伦斯的帮助之后，绝望之中，不得不接受法国人向他抛来的些许好处。但当费萨尔返回大马士革之时，却发现自己被谴责为向欧洲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的叛徒。费萨尔利用民众的愤怒，在1920年3月撕毁了与法国人的协定，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自立为叙利亚国王。4月，在圣雷莫会议上，英法两国正式签订了瓜分中东的条约——英国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控制叙利亚其他地区。这两件事联合起来，使得费萨尔与法国人发生了极大矛盾。冲突在7月爆发了。在大马士革郊外的一场短暂而一边倒的战斗之后，法军将费萨尔驱逐出去，迫使他流亡境外。到1920年末，法国人终于控制了他们的大叙利亚的绝大部分（除去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但群众怒火中烧。法国人还有一个外部威胁：在外约旦的沙漠里，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正在集结他的追随者，意在进军大马士革。

但法国人在1920年底遇到的问题与英国人面对的困境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升级为流血冲突。在阿拉伯半岛，伊本·沙特又一次企图驱逐侯赛因国王。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前一年，劳伦斯曾预

言，“如果我们不改邪归正，”该地区到1920年3月就会爆发全面的反英起义。但他预测得早了两个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5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之时，已经有约1000名英国人和9000名当地人丧生。劳伦斯在1929年给威廉·耶鲁的信中记述道，英法在巴黎和会期间重拾本已名誉扫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炮制出了更糟糕的东西。中东几乎当即就遍地烽火、危机重重，这印证了新局面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劳合·乔治在1920年12月寻求了一个被英国统治阶级摈弃的人的帮助：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就任殖民地大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招募另一个最近被排挤的人——前陆军中校T.E.劳伦斯来辅佐他。

至少在起初，劳伦斯没有兴趣重新投入这场混战。他忙于撰写回忆录，无疑还因为前一年劳合·乔治政府的冷眼而感到刺痛，于是告诉丘吉尔，自己没有时间，而且已经不管政治了。直到新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中，将给劳伦斯几乎是完全自由的权力，帮助英国政府重新塑造中东棋盘上属于英国的那一部分，他这才答应出山。因此，开罗会议只是走个过场，因为（按照劳伦斯告诉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劳伦斯和丘吉尔事先“不仅确定了会议将审议哪些问题，还确定了将会达成何种决议”[11]。

伊拉克将被巩固成为一个受国际承认的阿拉伯王国，由费萨尔担任国王。在阿拉伯半岛，英国人支持侯赛因对汉志的统治权，但同时也支持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内陆的权威。开罗会议最新颖的主意无疑是让阿卜杜拉停止攻击叙利亚的法国人的计划。会议结束后，劳伦斯前往阿卜杜拉在安曼的基地，劝说这位凶暴的阿拉伯领袖先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外约旦地区组建一个政府。令劳伦斯大吃一惊的是——或许阿卜杜拉自己也吃惊不小，侯赛因四个儿子中最懒惰的一个竟然成为一位贤君。不久之后，外约旦正式脱离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

伯王国，就是今天的约旦，由阿卜杜拉担任国王。1921年秋季，劳伦斯返回英国，他在殖民地部的一年工作接近告终，此时他确实已经意料之外地成为在中东划定疆界、指定君王的决策者。

这一切工作虽然给先前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中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却无助于改善北方和南方的局势。在这些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命运悬而不决、兵火肆虐、生灵涂炭。

在安纳托利亚，前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拒绝接受协约国规定的对土耳其的肢解。在4年时间里，他率领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军队，与所有那些企图对土耳其腹地分一杯羹的人对抗，最后在1923年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法国在1921年秋季插手了这场列强对土耳其群起而攻之的战争，当时凯末尔（不久之后将以阿塔图尔克的名字威震天下）将注意力转向了占领奇里乞亚地区的法国军队。在奇里乞亚的法军很快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指挥官——倒霉的爱德华·布雷蒙领导下快速撤入叙利亚境内。

与此同时，从高加索一直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爆发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俄国的红军和白军及青年土耳其党的残余势力争夺霸权，以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极快速度结盟又撕毁盟约。恩维尔和杰马勒帕夏是这场混战中的两位主要斗士。1921年冬，杰马勒帕夏居然来到了喀布尔，成为阿富汗国王的军事顾问，这并不比该地区发生的其他事情更匪夷所思。

在遥远的南方，侯赛因国王的末日到了。英国人对他反复无常的统治和拒不接受中东的政治现实的态度——在1921年，劳伦斯花了令人发疯的两个月时间，在吉达苦口婆心地劝说侯赛因接受开罗会议的决议——早已厌烦透顶，因此在1924年底，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战士最终逼近麦加的时候，侯赛因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侯赛因被匆匆送到海岸，然后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先是被送到塞浦路斯流亡，最后来到了

约旦的新首都安曼，与儿子阿卜杜拉团聚。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曾梦想建立一个从麦加一直延伸到巴格达的泛阿拉伯国家，最后在1931年去世，享年76岁。

从那以后，西方人在中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在他们曾为之拼死奋斗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面临着一个泥沼。先是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导致了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游击队又以武力反抗英国军队，因为他们视英国占领军为建立以色列国的最后障碍。1946年，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法国被迫放弃心爱的大叙利亚，但在此之前从叙利亚领土分割出了一个新国家：黎巴嫩。三年之内，叙利亚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就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而法国人在黎巴嫩强行安置的极其复杂的统治结构促使这个国家走向内战。1952年，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落下帷幕。英国人安插的傀儡国王被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和他的民族主义自由军官运动推翻。6年后，在伊拉克，与纳赛尔志同道合的一些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建立的亲西方君主政权。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不光彩地落下帷幕，中东格局与殖民列强在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烂摊子很相似，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由于石油的存在，中东业已成为地球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角落，西方就是想远离这个自己造成的乱局，也办不到。对于中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4场战争；黎巴嫩的10年内战；也门的20年内战；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少数民族遭屠杀；40年间，政府赞助的恐怖主义横行；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震动；美国的4次大规模军事干预和许多小规模干预；对于阿拉伯民族而言，直到前不久，从突尼斯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不间断的残暴或盗贼当政的独裁统治之下，导致绝大多数人口一贫如洗，毫无权益可言。

这一切的责任固然不能全部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的可怕决策，但在那时播下了一颗毒性特别强的种子。从那以后，阿拉伯社

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位。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是狂热地培植，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代表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潜在的划时代的时刻。自1918年以来，“阿拉伯的街头大众”第一次在自己的未来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公民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因素已经被传播开，或许永远不会再被封锁起来。真正的民主和自决是能够持久的，在中东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受到压抑的地区，或许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短期混乱，但阿拉伯世界或许终于能踏上一个世纪前劳伦斯和其他几个梦想家为它设想的那条道路。

马克·赛克斯的名字已经变成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执行的灾难性的中东政策的同义词，但他本人没能活到目睹这些政策造成的后果。在英国外交部眼里，赛克斯很快就从不可或缺的问题解决专家变成了替罪羊，因为他是令人憎恶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缔造者之一。1918年10月底，他开始了在中东的一次长途旅行。他虽然地位一落千丈，却依然狂妄自大。他在向外交部上报自己的这次旅行时，称自己的目标除了安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紧张关系之外，还打算帮助重组协约国在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设施、劝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属印度政权采取更进步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姿态，并“协助推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的友好关系”[12]。

两个月间，赛克斯和他的一小群扈从在中东地区东奔西走，每天的日程都塞得满满的。但即便是这个极度虚荣自负的人，在中东也应该和在伦敦一样，看得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了。吉尔伯特·克莱顿曾专心致志地聆听赛克斯的各种计划，但这一次赛克斯在大马士革拜访

他时，克莱顿却像犟驴一样。赛克斯不知道的是，克莱顿前不久刚收到一位伦敦官员的关于如何对付这位访客的建议。“不要听马克的自夸，”这位官员告诫道，“这里没有人搭理他，我们派他出来（是他自己要出来的），就是为了耳根清净。”[13]

这次旅行固然令人羞惭，但似乎促使赛克斯对自己对于中东问题的观点做了一个真正的新评估。1919年1月，在他结束旅行后的“总结”中，他承认，英法两国在该地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现在的建议是：“不管谁接管叙利亚，都应当认识到，与其让欧洲人的班底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当地人什么也学不到，不如让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把事情做得一团糟但是有改进的前景，因为那样才是更真实的进步。”[14] 这话简直与劳伦斯的《二十七条建议》如出一辙。这个人在3年前还参与拟定了为欧洲帝国主义效劳的最后一项大条约，现在思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的确令人称奇。

但这思想转变幅度太小，来得也太晚了。1919年2月初，赛克斯在巴黎和会亮相时，他的英国同僚们对他的思想演变完全不感兴趣，更关注的是如何从顶着他的名字的条约中抽身。在巴黎和会的面对面交锋中，他们对赛克斯的鄙夷几乎到了欺负人的程度。“我对他说了些关于条约的事情，”劳合·乔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即就看到，我的话深深伤害了他。我很遗憾。我希望我什么也没说。我责怪自己。他已经尽力了。”[15]

或许首相的自责是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2月10日晚上，赛克斯说自己身体不适，早早上床休息。次日早上，他已经无法站立。医生们的诊断是西班牙流感。随后5天内，他就在酒店房间内在巨大痛苦中弥留挣扎，由妻子伊迪丝照料，尽管她自己也染了这种病。2月16日晚，赛克斯终于咽气，此时离他的4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亚伦·亚伦森也没有活到目睹自己的计划成为现实。他也参加了巴

黎和会，就像1918年的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的情况一样，他起初也被诱导，误以为自己将会在和会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中担任领导人，但在最后关头又被排挤到边缘。1919年1月16日，他得知犹太复国主义高级领导层将在伦敦开会商讨策略，在当天的日记中大发雷霆：“哈伊姆·魏茨曼偶然对我说：‘你也要来伦敦的，对吧？’‘去伦敦做什么？’我答道，‘去受更多的侮辱吗？不用了，谢谢！’我写道，我生病了，而且厌倦了自己所处的错误地位，就好像一个情妇，在男人的私室内受宠，在公众面前却不受认可。”[16]

就像在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里发生过很多次那样，亚伦森决心离开巴黎，直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懊悔地恳求他帮忙绘制巴勒斯坦地图建议稿，他才回心转意。“我讨厌他们做事的方式，”亚伦森后来在日记中带着受人强求、勉强同意的骄傲写道，“他们把重要任务交给人，却在最后一分钟意识到，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因为他们没有请专家去做。”[17] 亚伦森绘制的地图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梦想，如果被采纳的话，将把巴勒斯坦边界推进到大马士革郊区，那样的话巴勒斯坦就不再是大叙利亚的飞地，叙利亚反而成了大巴勒斯坦的枝节部分。

1919年5月15日早上，亚伦森在短暂到访伦敦后打算返回巴黎参加和会。但在伦敦以南的肯莱机场，他发现自己的飞机由于浓雾而延误了。11时30分，他已经打算放弃旅行返回伦敦，这时，浓雾部分消散，一架小得多的飞机（双座的德哈维兰式飞机，是送邮件去巴黎的）的飞行员表示可以载他一程。大约下午1点，加莱海岸附近水域的一艘法国渔船的船长听见上方有一架飞机低飞的轰鸣声，但由于浓雾，看不见飞机，随后传来坠机的巨响。渔民们在雾中搜寻，发现平静的海面上漂浮着许多邮件，但没有找到其他东西。德哈维兰飞机的飞行员和亚伦·亚伦森的遗体都无处可寻。根据犹太教律法，没有遗体就不能举行葬礼，于是亚伦森的朋友和同僚们在5月17日晚在巴黎举办了一个“礼拜会”，来纪念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贡献。

至于亚伦森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同僚（有时是对手）哈伊姆·魏茨曼，他不仅活到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还担任了首任总统，直到1952年去世。在战后的巴勒斯坦，他与自己充满反叛精神的妹妹明娜团聚了。由于明娜对同盟国战争努力的贡献，她被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天内德国与俄国的一次战俘交换中。她逃离了混乱的战后德国，返回耶路撒冷，成为具有先驱意义的犹太妇女卫生组织“哈大沙”的成员。

杰马勒帕夏在战后继续过着冒险生活，但没能混多久。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他和另外两位帕夏——塔拉特和恩维尔一道，搭乘一艘德国鱼雷艇逃离君士坦丁堡，随后在中亚的战场漫游，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结盟又分道扬镳。1922年7月，他的好运气终于到头了，他和一名助手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街头惨遭枪杀。宣称对此次暗杀负责的是一个神秘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曾立誓要除掉1915—1916年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所有罪魁祸首，此前已经在柏林刺杀了塔拉特帕夏。三位帕夏中的最后一位——恩维尔和杰马勒一样，也在高加索冒险。8月，在塔吉克斯坦，恩维尔遭遇苏联红军的埋伏，饮弹毙命。

作为美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团的中东问题专家，威廉·耶鲁的注意力不仅限于该地区的和平。同时，或许是认识到自己有一天需要一份新工作，他私下里在美国代表团中促进自己的前雇主——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利益。由于威尔逊总统坚决支持“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1918年夏季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耶鲁有很好的借口去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年夏天，在耶鲁担任艾伦比司令部的美国军事联络官期间，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长官阿瑟·莫尼将军召见了耶鲁，要求他交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油田的地图。耶鲁拒绝了，并抗议说，莫尼应当去找标准石油公司总部去谈这件事情，于是莫尼将军选择了更简单的办法：闯入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耶路撒冷的旧办公室，取走了这些地图。

在写给美国和谈代表的一系列备忘录中，耶鲁严正警告，英国人的这些强硬措施的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如果急需石油的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可以自由行事的话。这些代表果然警觉起来[18]。主要是由于耶鲁的煽动，美国人做了很大努力，力图迫使英国人尊重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石油开采权，这在随后几年内成为英美之间摩擦的一个主要来源。

但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玩弄的是一场狡猾的戏法，拼命保护自己在克恩纳布的“油田”，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可遵循的先例，以便将来获取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人控制下的油田的开采权。1924年，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油田的开采权，于是突然间放弃了在巴勒斯坦的开采权。一家英国石油公司匆匆填补这个空白，在克恩纳布做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和耶鲁的地质学家搭档鲁道夫·麦戈文在1914年的发现一模一样：只有铁尾矿[19]。尽管不时有意见相反的乐观的工业报告出台，但在克恩纳布始终没有发现有商业开采价值的油田。

1919年底，耶鲁愤怒地从巴黎和会拂袖而去，返回美国，希望能够回到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不知是因为他在百老汇大街26号大厅的失策言论，还是由于他在与英国人的石油对抗中过于高调，他未能如愿。家族的财富早已烟消云散，再加上战后美国经济萧条，很难找到工作，于是耶鲁进入一家美国贸易公司，返回了开罗。途中，他在英国停留，迎娶了他在战前在耶路撒冷邂逅的一位英国护士伊迪丝·汉娜。

在好几年时间里，耶鲁在开罗做着好几份不同的兼职工作，同时自己继续寻找石油。1922年5月，他感到自己在也门外海的法拉桑岛（在英国控制下）找到了石油。他告诉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管，英国人在保守这个油田的秘密，但如果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派来一名地质学家，耶鲁可以想办法帮助他溜上岛[20]。标准石油公司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于是耶鲁回到美国，出人意料地在新罕布什尔州农村定居，以养鸡

为业，同时学习教育学硕士课程。1928年，他被新罕布什尔大学聘任为历史学助理教授。

耶鲁的文采有限，但非常多产，教书之余写了大量关于中东的文章来挣钱。这些努力渐渐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他的文章被刊登在《大西洋月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于是他经常被邀请作讲座和参加大学研讨会。就像他居住在中东时一样，耶鲁对中东的观点在这么多年中发生了大幅度转变。在1923年，他呼吁“粉碎伊斯兰教的令人卑贱的暴政，它数百年来腐蚀了千万东方人的心智、灵魂和肉体”[21]，后来却发表了一篇意见几乎完全相反的长文，反对“犹太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本质”，他还指控说，犹太人的帝国主义是以“德国法西斯”为模板的[22]。

尽管有这些不负责的言论，但耶鲁作为中东问题专家还是享有很高地位，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任命为国务院战后计划办公室的中东问题专家。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战后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托管委员会助理秘书。耶鲁的主要关注点是，提议通过彻底废除饱受抨击的殖民委任统治制度，转而由联合国托管，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做一番重新调整。令人感到似曾相识的是，正如26年前的金-克兰委员会一样，托管委员会关于中东的所有建议都没有得到采纳。

重返平民生活后，耶鲁继续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历史，后来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直到1967年退休。1975年2月，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德里市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7岁。

在中东情报战的另一端，库尔特·普吕弗的战后生涯更为丰富多彩。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经历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历史，但我们很难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例子来审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历史。

1919年，普吕弗很快成为在战败的德国扎根的最恶毒神话之一——

所谓的“背后一剑”密谋——的热忱信徒。这种神话的说法是，德国在战场上不曾失败，而是被从内部出卖。这些国内叛徒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的自由主义政党——就在停战的两天之前，一些左翼政党的联盟控制了政府，这个时机选择真是糟糕——和国际犹太人，他们被《贝尔福宣言》的诺言诱惑，投向了协约国阵营。阿道夫·希特勒最终利用这个神话，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23]，但库尔特·普吕弗信奉这个神话要比希特勒早得多。根据传记作者唐纳德·麦克凯尔的说法，在战后初期的艰难岁月里，生活拮据的普吕弗接受了外交部的犹太同事的资助，同时却在日记中越来越凶狠地怒骂犹太人。

事实上，由于巴黎和会的未竟事业，确实有强有力的论据可以说明，德国并没有真正被战胜。协约国向先前的敌人施加不堪忍受的巨额战争赔款的重负，同时却基本上完整保留了它的统治结构，这简直是一手制造了未来冲突的最佳熔炉。德国官员们，包括库尔特·普吕弗在内，很快就开始重建联盟和影响力的网络，而正是这些曾推动了战争的爆发。在战后年代，普吕弗在外交部的最早一批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德国先前在中东的搭档——埃及民族主义者、青年土耳其党运动领导人、亲德阿拉伯人——逃脱惩罚，在先前的同盟国境内定居。当然，这意味着，德国现在拥有了一支心怀不满分子的潜在力量，可以煽动未来的动乱。

甚至在战争结束以前，普吕弗就认识到，只要德国能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还有一种新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1918年11月2日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宣传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们在和平时期重视不够，在战时却拼命临阵磨枪……我们对敌人发出眼泪汪汪的指控，喋喋不休地重复宣讲自己的胜利，有口无心地表达对伊斯兰的友谊，却希望赢得一个在精神上与我们相差甚远的民族的同情。”普吕弗敦促称，下一次，德国“必须注重于博其欢心，而不是对其颐指气使地教导”[24]。

在战后中东的政治游戏中，普吕弗很快就有机会重新开始捣鬼使坏。1921年秋，他参与了决心始终不动摇的阿拔斯·希里米的一个新计划，要推翻英国在埃及的政权。几个月后，普吕弗在罗马会见了哈伊姆·魏茨曼。魏茨曼如果知道这位访客曾经诱骗他的妹妹为德国刺探情报，那么他一定是在放长线钓大鱼。他向普吕弗表示，英国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设想止步不前，显然是由于法国人作祟，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德国人可以合作，一同反对法国。凶残地反犹但始终是机会主义者的普吕弗无疑全心全意地赞成这种观点。由于他的这些活动，英国政府最终将普吕弗的名字纳入了一份敌人黑名单，军情五处为他专门开了一份调查档案，始终没有结案[25]。

但到20世纪20年代末，普吕弗的生活逐渐平静下来。他与早就和他疏远的第一任妻子——美国人弗朗西丝·平卡姆离婚，娶了一个年轻得多的德国女人，在1930年生了个儿子。他继续在外交部攀升，最终成为至关重要的第三处（负责处理英美和中东事务）的副处长。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7月掌权时，他就在这个岗位上。

尽管普吕弗和希特勒一样抱有复兴德国的梦想，但他在最初和德国的许多保守派人士一样，认为纳粹暴发户们是可资利用的傻瓜、粗鄙的流氓，而更上流体面的统治阶层可以利用和控制他们。到1936年，普吕弗已经摆脱了这种错误判断和自己当初对纳粹的鄙夷，担任了希特勒的外交部的人事处长，一年后又正式入党。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普吕弗则前往南美，担任希特勒的驻巴西大使。

他在巴西的三年是他个人生涯的高潮。在德国外交界，普吕弗终于得到了他自1911年以来就为之奋斗的地位。另外，通过与巴西独裁者结下亲密友谊，他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这个富饶的国家加入盟国阵营，尽管巴西与美国有着这样的条约。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42年夏季，巴

西人发现，普吕弗与在巴西境内运作的一个德国间谍网有着直接联系。普吕弗受命离开巴西。大使如果为此事感到失望，至少离开的时机还不错。在他和家人乘船回国的5天之后，巴西就加入了盟国阵营，介入战争，并发出了逮捕他的通缉令（由于间谍罪，他被缺席判处25年徒刑）。

普吕弗是个宣传专家，却非常轻信，这颇有些奇怪。他显然已经对纳粹关于即将到来的最终胜利的说法信以为真，因此回到欧洲却发现德国在战争中落了下风，不禁大吃一惊。他在柏林坚持了一年时间，但在一座较小的城市买了房子，把老婆孩子送去躲避持续不断的盟军空袭。“看到这一切，我肝肠寸断，”他在1943年7月写道，“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始终是、将来也一直会是一个眷恋家乡的人，还因为我真诚地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些美丽的观念。”[26]

抛却这些美丽的观念不谈，这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在本能地寻找出路。1943年9月，普吕弗带着家人穿越边境，来到中立国瑞士，就像在1918年一样，在那里一直待到德国战败。1918年的返乡和1945年的回归的区别在于，这一次，盟军不会给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卷土重来的机会。普吕弗在巴登·巴登买的房子原来是从一个犹太人家庭手中没收的，于是他失去了这栋房子。这位前任大使还接受了美国人的“去纳粹化”调查，被排除了战争罪行的嫌疑，尽管他在外交部的很多直接上司被送去了纽伦堡。英国人或许还想抓住这个跟他们捣蛋30年的老对手，但1945年10月的消息称，身体一直比较虚弱的普吕弗患了肺结核，已经死亡，或者奄奄一息。于是英国人就此罢手。

但事实并非如此。3年后，新德里的一名目光敏锐的英国情报军官在印度《每日电讯报》上发现了一篇奇怪的小文章，讲到了德里大学对未来的印度外交官的培养。“学生们将接受普鲁弗博士的教导，”文章如此写道，“他是一位德国外交官，在纳粹政权上台前夕离开了祖国。”[27

调查最终表明，这个反纳粹的“普鲁弗”和亲纳粹的普吕弗是同一个人。就像近40年前在开罗发生的那样，英国人插手阻止普吕弗获得这个他垂涎的学术职位，于是他最终返回了德国。1959年初，他在德国去世，这一次是真的死了，享年77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独生子奥拉夫——这位东方学家和儿子长期以来一直很疏远——最终移民美国，成为一位著名考古学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东交锋的所有间谍和情报人员当中，后来最坚决地与它脱离干系的就是T.E.劳伦斯。1921年，他在殖民地部为温斯顿·丘吉尔效力期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阿拉伯人就像是我翻过去的一页，续集是很讨厌的东西。”[28]

1922年初，在殖民地部的工作结束后，劳伦斯向皇家空军总司令请愿，希望加入空军。关于这个请求，有好几个奇怪的细节。由于他的名望和之前的军衔，劳伦斯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皇家空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但他却特意请求“与新兵一样”，意味着他想当一名普通的列兵。另外，他不打算用T.E.劳伦斯的名字。他告诉皇家空军总司令，他的新名字是约翰·休姆·罗斯。

这个请求格外令人困惑的是，劳伦斯一直公开地对军事文化表示鄙夷。他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军服“在穿着它的人与普通生活之间筑起了藩篱，表明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意志和肉体卖给了国家，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即便是他们自愿开始的，也很可悲……军人允许自己的主人全天候使用他的身体，并独自掌控他的头脑和激情。”[29]

但或许他的这个选择并不奇怪。在阿拉伯半岛，劳伦斯曾对成千上万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拼凑起了一项事业，组建了一支军队。与此同时，他一直为自己的招摇撞骗感到无比愧疚，因为他知道，这些与他并肩作战的人到最后几乎一定会遭到背叛。他在《智慧的七柱》中曾暗示，还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在离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永远不希

望再一次处在需要肩负责任的位置。

此外，他还渴望默默无闻的生活，抛却他的旧身份。劳伦斯的这种意愿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改名的决定——先是改叫约翰·休姆·罗斯，后来改为托马斯·爱德华·肖，但它也有更微妙的形式，是一种心理上的金盆洗手。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的一个很短的段落曾提及开罗会议，称丘吉尔“理清了中东的全部乱麻”，在“文字和精神上竭尽凡人的能力，兑现了英国向阿拉伯人许下的诺言，同时没有牺牲我们的帝国和此事中各民族的任何利益”[30]。劳伦斯知道英国向阿拉伯人的承诺的完整内容，而且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珍爱的叙利亚还处在法国统治下，因此他知道这些论断是谎言。同样，考虑到《智慧的七柱》的全部内容，它的副标题“一场胜利”一定是在自嘲。

但或许，为了生存下去，人们不得不与过去彻底断绝关系，再也不用去想它。从劳伦斯在战后给朋友的很多信中，以及他向当时的传记作者发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而悲哀地看到，他有着当时所谓的“炮弹休克”（今天称为创伤后压力症）的很多症状。在他的余生中，劳伦斯不断受到噩梦的困扰，多次陷入极其严重的抑郁——其中有几次甚至已经考虑自杀——并逐渐与很多先前的朋友断绝了关系，一心只想要独处。

他在战场上的行动或许为他遭受的这种持续折磨埋下了伏笔。在孩提时代，他曾痴迷于亚瑟王宫廷和骑士法则的故事，梦想过上英雄的生活。但在现实的战争中，劳伦斯却目睹了人被炸成碎片（常常是他自己的爆破造成的），将伤员丢弃等死，还命令屠杀战俘。正如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有思想的人一样，劳伦斯在战场上发现，片刻的英雄主义行为肯定是有可能的，但战争的积累体验、它的日常的残酷，却与当英雄的想法完全对立。

《智慧的七柱》出版的情况也表明了劳伦斯对隐姓埋名的渴求。

1922年，他用手摇印刷机印了8本自己的战时回忆录，用来赠送好友，但随着此书的消息传开，人们敦促劳伦斯将它公开出版。他做出的妥协是在1926年出版了删节版的《智慧的七柱》，仅印了200册，同时发行了短得多的大众市场版《沙漠中的起义》。这些书原本可以让劳伦斯富裕起来，但他将极其成功的《沙漠中的起义》一书的版税全部捐献给了皇家空军的慈善组织，并拒绝在他有生之年再版《智慧的七柱》。

劳伦斯虽然在公开场合贬低自己的作品为鸡毛蒜皮，但向一位朋友私下里吐露心迹，说希望自己的回忆录能够进入英语文学经典之列。在这方面，他将会大失所望。事实上，《智慧的七柱》的各个部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偶尔有水平极高的诗情画意和震撼人心的心理洞见，但常常被关于地形的长篇论文和一大串地名及转瞬即逝的人物淹没，往往令读者抓耳挠腮。尽管受到很多人坚持不懈的赞不绝口——劳伦斯肯定是最早毫不畏缩地直面战争的丑恶的现代作家之一，但按照一位很欣赏《智慧的七柱》的批评家的说法，它仍然是那种“名声在外、享有美誉，却很少有人读的书” [31] 。

劳伦斯以“空军列兵罗斯”的身份在皇家空军过上默默无闻生活的努力失败了——英国报界很快就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化名T.E.肖加入了皇家坦克部队，1925年又悄悄转入皇家空军。在随后10年中，他担任了空军的一系列下级职务——在印度的一个偏远的皇家空军基地担任普通文书近一年时间——同时以捣鼓机械为爱好，研究一种新一代的军用高速救援快艇。1929年，他在多塞特郡农村买下了一座名叫“云山”的小屋，离他在坦克部队服役的博文顿军营只有1英里远。他就将这里当作避难所，逃避仍然对他穷追不舍的公众和报界。他继续写作——1928年，劳伦斯将自己战后的军事生涯写成了一本书《铸造》，随后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非常平庸无奇的军队工作，不执勤的时候就骑着他心爱的布拉夫摩托车在英国乡间风驰电掣，或者在“云山”拼命读书。尽管有些传记作者声称劳伦斯在这个时期

的生活仍然颇有建树、丰富多彩，但我们很难不把他看作一个忧伤的隐士。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小，只剩下几个人，而他与这极少数朋友的唯一联系就是他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见他们的短信。“请代我向S.F.纽科姆太太谦卑地道歉，”1929年2月，他给斯图尔特·纽科姆写了这封信，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在一次约好的会谈中露面，“我身体有些不适，没有精气神出去见人。”[32]

费萨尔·侯赛因坚持要面见他。1925年，这位伊拉克国王在访问英国期间，与劳伦斯在一位政治家的庄园举办的午餐会见了面。这是一次相当尴尬的重逢，两位老战友互相之间似乎无话可说。东道主还不断提到“美好的往昔”，这让劳伦斯非常不舒服。“我变了，”在这次会面之后，劳伦斯/肖写信给朋友夏洛特·萧，“曾经东奔西跑、和那种人友好相处的劳伦斯已经死了。他还不如死了。尽管我曾经认识他，他现在却是个陌生人。”[33]

1933年，费萨尔国王又一次访问英国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在英国军界的熟人，几乎是命令“列兵肖”前来。

1935年初，劳伦斯决心离开皇家空军，尽管他非常害怕等待他的漫长的、没有组织性的生活。他的担忧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退役仅仅两个月之后的5月6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称：“当下我的感觉仅仅是困惑。我想，树叶从树上落下，一直到死前的感觉一定就是我这样。但愿我不要一直这样下去。”[34]

这种状态没有持续下去。一周之后，5月13日早上，劳伦斯骑着他的摩托车去博文顿军营，去发一封电报。回家途中，在离“云山”只有几百码的狭窄道路上，他猛地转向，以躲避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擦到了其中一辆自行车的后轮胎，失去了对摩托车的控制，倒了下去，头部撞到柏油马路上。劳伦斯的脑部严重受伤，他在博文顿军营的医院昏迷了6天之久，最后在1935年5月19日清晨去世，享年46岁。

在他的葬礼上，抬他的灵柩的人包括他的老朋友罗纳德·斯托尔斯和斯图尔特·纽科姆，而前来哀悼的人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和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乔治五世向劳伦斯的弟弟阿诺德发去了吊唁信："令兄的英名将永垂青史，国王心怀感激地认可他为祖国做出的卓越贡献。"[35]

丘吉尔的悼词要长一些："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36]

丘吉尔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在暗指1935年时已经笼罩欧洲的新威胁：纳粹德国的崛起。但如果丘吉尔幻想，活着的劳伦斯能够在抵御这个威胁的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就大错特错了。劳伦斯本人多年来一直在告诉全世界，蓝眼睛的"沙漠武士"早已不见踪影，消失在了20世纪的第一次大灾难当中。

---

[1] Lawrence to Armstrong，October 6，1914；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Folder 2，File 6.

[2] Arthur Hirtzel to Curzon，June 19，1919；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4149，f. 149A.

[3] Clark-Kerr，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p.617.

[4] The Weizmann-Faisal Agreement，January 3，1919，as reproduced in Friedman，*Tension in Palestine*，pp.157-61.

[5] Weizmann，"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November 19，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371/3385.

[6] Gelfand，*The Inquiry*，pp.60-62.

[7] E. H. Byrne，*Report on the Desires of the Syrians*，October 7，1918；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Box 4，Folder 23.

[8] Yale，*It Takes So Long*，chapter 10，p.6.

[9] Garnett，*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p.294.

[10] The Weizmann-Faisal Agreement，January 3，1919，as reproduced in Friedman，*Tension in Palestine*， pp.157-61.

[11] Lawrence to Liddell Hart，Graves and Liddell Hart，*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 Pt. 2，p.143.

[12] Sykes，memorandum，October 15，1918；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3413.

[13] Hogarth to Clayton，quoted by Adelson，*Mark Sykes*， p.281.

[14] Sykes，as quoted by Adelson，*Mark Sykes*， p.289.

[15] Lloyd George，as quoted by Wilson，*Lawrence of Arabia*， p.609.

[16] Aaronsohn，*Diary*， January 16，1919；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17] Aaronsohn，as quoted by Florence，*Lawrence and Aaronsohn*， p.406.

[18] 1919～1924年英美关于石油开采权的争议，详见DeNovo，*Americ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pp.167-209；Fanning，*Foreign Oil and the Free World*， chapter 5；Shwadran，*The Middle East*，*Oil and the Great Powers*， pp.403-9；and 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141/456，File 6522.

[19] Suleiman Nassif to Yale，March 24，1924；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15，Folder 6.

[20] Yale to Birch Helms（Socony），May 5，1922；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15，Folder 5.

[21] Yale，"Islam Versus Christianity，" *North American Review*， February 1923；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11.

[22] Yale，letter to Free World，August 1942；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Box 1，Folder 9.

[23] McKale，*Curt Prüfer*， p.59.

[24] Prüfer to Otto Gunther von Wesendonck，German Foreign Ministry，November 2，1918；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T136，Roll 94，Frame 21.

[25] Security Service Records（安全部门档案） 2/3114.

[26] Prüfer， as quoted by McKale， *Curt Prüfer* ， p.177.

[27] From Prüfer’s MI5 Security Service file， Security Service Records（安全部门档案） 2/3114.

[28] Lawrence to Graves， May 21， 1912； Graves and Liddell Hart， *T.E. Lawrence*： *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 ， Pt. 1， p.15.

[29] Lawrence， *Seven Pillars* ， p.641.

[30] Lawrence， *Seven Pillars* ， p.276.

[31] Meyers， *The Wounded Spirit* ， p.11.

[32] Lawrence to Newcombe， February 28， 1929； T.E. Lawrence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藏品， 德克萨斯大学） Folder 5， File 2.

[33] Lawrence to Charlotte Shaw， as cited in Brown， *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 p.290.

[34] Lawrence to Rogers， as cited in Brown， *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 p.536.

[35] King George V to A. W. Lawrence， *Times* （London）， May 21， 1935.

[36] Churchill， quoted in A. W. Lawrence， *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1954 edition）， p.202.

致谢

本书涵盖面极广，需要我在三大洲的约20家政府档案馆或私人收藏馆做研究。许多非常精明强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在我的研究的许多方面给了我极大帮助，没有他们，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是Tara Fitzgerald、Claire Flack、Lars Luedicke、Frederic Maxwell、Andrea Minarcek、Kevin Morrow、Eamonn O’Neill和Anna Van Lenten。其中我要特别感谢Kevin Morrow，他不仅代我去加利福尼亚和以色列做研究，还监管了法国和德国档案材料的收集、组织和翻译。我确信不疑，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一定不知所措。

我还要感谢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向其寻求帮助的各家档案馆或私人收藏馆的馆长和管理者，他们全都不知疲倦地帮助我，花费了大量时间，慷慨地向我提出建议。下面的名单只是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中的一小部分。我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的Debbie Usher，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记录管理局的Liz Gray、David Pfeiffer和Eric Van Slander，济赫龙雅各布的NILI博物馆的Marion Freudenthal和Ilonit Levy，波士顿大学的Alex Rankin，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Carol Leadenham，以及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的Lynsey Robertson。我还要特别感谢Howard Diamond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署气象数据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我确定1914年1月初沙尘暴袭击贝尔谢巴的可能时间。

虽然在本书中我尽可能地参考第一手资料，但有两位作者值得我特别感激。如果没有克莱门森大学的Donald McKale教授的开拓性工作，

以及他的两本开创性著作《库尔特·普吕弗》（*Curt Prüfer* ）和《以革命为战争手段》（*War by Revolution* ），我对库尔特·普吕弗的研究一定会耗费更长时间，并且做不到完整和详尽。我还要感谢McKale教授百忙之中拨冗审读了本书的一个早期版本，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其次，任何以T.E.劳伦斯为主要人物的书籍的作者都必须感谢Jeremy Wilson的开创性成就，即他得到劳伦斯本人授权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虽然我就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的行动的若干方面不能苟同Jeremy Wilson先生的意见，但我非常感激他在劳伦斯研究领域做的海量工作，这对所有追随他足迹的后辈都帮助极大。

一小群审读者对我也有很大帮助，其中有些人是为了核实历史真实性，有些人是为了改善本书的文风。在第一类审读者中，除了Donald McKale之外，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北伊利诺伊大学的Roberto Mazza和蒙大拿州立大学的Thomas Goltz，他们慷慨地抽出许多时间，提出了很多极富洞察力的建议。在第二类审读者中，我要感谢我的朋友Michael Fields、Wilson Van Law和Seth McDowell，他们勇敢地坚持阅读了本书的一个问题多多的早期草稿；还要特别感谢Frances Shaw，她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更多。在第二类审读者中，我必须感谢我的了不起的代理人和挚友——国际创意管理公司（ICM）的Sloan Harris，他总是懂得如何微妙地同时鼓励和鞭策我。

最后，我不知道我在写作其他书时会不会也是这样，但我还记得本书源起的确切时刻：2008年冬天，和我的挚友和编辑Bill Thomas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想，我们俩当时都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需要写的一本书——事实上，在我的整个记者生涯中，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后来在写作和研究遇到困难时我偶尔会咒骂Bill，但我永远感激他在这些年中帮助我实现这个设想时表现出的热情、耐心和勤奋。我还要感谢Doubleday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本书的资料查证和稿件修改的几个月间，我几乎天天都待在出版社，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容忍，尤其是

Melissa Danaczko和Coralie Hunter毫无保留地帮助我，对付我在研究上的怪癖，以及我对电脑的无知。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在过去5年中，他们容忍了我那些取消的会面、未回复的电话和长期出差在外。现在本书已经付梓，我希望将来能做一个更好的朋友和亲戚。

注释

虽然我在本书中援引了范围极广的档案和第二手资料，但有几个资料来源与本书的主题直接相关，因此特别有价值。其中档案资料包括：亚伦·亚伦森的日记（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档案馆）、库尔特·普吕弗的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威廉·耶鲁的未出版的回忆录（波士顿大学），以及英国外交部和陆军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档案资料（英国伦敦丘园的国家档案馆）。因为其中有些资料到2002年才被解密，所以我有机会参考到一些此前从未公开过的资料。

另外，我要感谢Donald McKale的传记《库尔特·普吕弗：从德皇到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外交官》，这是关于库尔特·普吕弗早年生活的少数资料来源之一。在关于T.E.劳伦斯的资料中，John Mack的《我们的混乱时代的王子：T.E.劳伦斯传》是有史以来最深刻描写劳伦斯心理的著作。最重要的是，我非常感谢Jeremy Wilson和他得到劳伦斯本人授权的传记《阿拉伯的劳伦斯》。Wilson的研究极其详尽，是所有关于劳伦斯的严肃学术研究的起点。在描写本书的某些特定背景方面时（如战前的德国），我还参考了其他一些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我在相应的尾注中标出了我认为特别有用的资料来源。

BU—William Yale Papers，Boston University（威廉·耶鲁文件，波士顿大学）

GLLD—George Lloyd Papers，Churchill College（乔治·劳埃德文件，丘吉尔学院）

HO—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MSP—Mark Sykes Papers，Middle East Centre，St. Antony’s College（马克·赛克斯文件，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

NARA—National 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

PAAA—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

PRO—National Archives（formerly Public Records Office）（UK）（英国国家档案馆，即原公共档案馆）

PRO-ADM—Admiralty Records（海军部档案）

PRO-CAB—British Cabinet Records（英国内阁档案）

PRO-KV—Security Service Records（安全部门档案）

PRO-FO—Foreign Office Records（外交部档案）

PRO-WO—War Office Records（陆军部档案）

SADD—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苏丹档案，德伦大学）

UNH—William Yal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威廉·耶鲁收藏品，新罕布什尔大学）

UT—T.E. Lawrence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Texas（T.E.劳伦斯收

藏品，德克萨斯大学）

YU—William Yale Collection，Yale University（威廉·耶鲁收藏品，耶鲁大学）

ZY—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NILI博物馆与档案馆，以色列的济赫龙雅各布）

参考文献

Books and Articles

Aaronsohn，Alex. *With the Turks in Palestin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6.

Abbas，Hilmi. *The Last Khedive of Egypt*：*Memoirs of Abbas Hilmi* Ⅱ，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mira Sonbol. Reading，UK：Ithaca Press，1998.

Abdullah，King.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Edited by Philip Graves. London：Jonathan Cape，1950.

Adelson，Roger. *Mark Sykes*：*Portrait of an Amateur.* London：Jonathan Cape，1975.

Ahmad，Feroz. *The Young Turks*：*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

——.“Great Britain’s Relations with the Young Turks，1908-1914.”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1966）：302-29.

Aksakal，Mustafa.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Aldington，Richard. *Lawrence of Arabia*：*A Biographical Inquiry.*

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5.

Allen，Malcolm Dennis. “The Medievalism of T.E. Lawrence.” PhD diss.，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83.

Allen，Richard.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84.

Andelman，David. *A Shattered Peace*：*Versailles 1919 and the Price We Pay Today.* Hoboken，NJ：Wiley，2008.

Antonius，George. *The Arab Awakening.* New York：J.B. Lippincott，1939.

Asher，Michael. *Lawrence*：*The Uncrowned King of Arabia.* Woodstock，NY：Overlook Press，1999.

Baker，Leonard. *Brandeis and Frankfurter*：*A Dual Biography.* New York：Harper & Row，1984.

Baker，Randall. *King Husain and the Kingdom of Hejaz.* New York：Oleander Press，1979.

Ballobar，Antonio de la Cierva. *Jerusalem in World War I*：*The Palestine Diary of a European Diploma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berto Mazza. New York：Tauris，2011.

Barker，A.J. *The Neglected War*：*Mesopotamia*，*1914-1918.* London：Faber，1967.

——.*Townshend of Kut*：*A Biography of Major-General Sir Charles*

Townshend. London：Cassell，1967.

Barnard，Harry. *The Forging of an American Jew*：*The Life and Times of Judge Julian W. Mack.* New York：Herzl Press，1974.

Barr，James.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T.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1916-1918.* New York：W.W. Norton，2009.

Barrow，George. *The Fire of Life.* London：Hutchinson，1943.

Bayliss，Gwyn. *Chronology of the Great War.* London：Greenhill Books，1988.

Beraud-Villars，Jean. *T.E. Lawrence*，*or the Search for the Absolute.* 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58.

Berghahn，Volker R. *Germany and the Approach of War*，*1914.*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3.

Bernstorff，Johann Heinrich von. *Memoirs of Count Bernstorff.* New York：Random House，1936.

Bertrand-Cadi，Jean-Yves. *Le Colonel Cherif Cadi*：*Serviteur de l'Islam et de la République.* [Colonel Sharif Cadi：Servant of Islam and the Republic] Paris：Maisonneuve & Larose，2005.

Birdwood，William Riddell. *Nuri as-Said*：*A Study in Arab Leadership.* London：Cassell & Company，1959.

Bond，Bria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British Military Histo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

Bonsai，Stephen. *Suitors and Supplicants*：*The Little Nations at Versailles.* New York：Prentice Hall，1946.

Boyle，William. *My Naval Life.* London：Hutchinson，1942.

Bray，Norman. *Shifting Sands.* London：Unicorn Press，1934.

Brémond，Édouar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The Hejaz in the World War]. Paris：Payot，1931.

Brent，Peter. *T.E. Lawrence.* New York：G.P. Putnam’s Sons，1975.

Brown，Malcolm. *Lawrence of Arabia*：*The Life*，*the Legend.* New York：Thames & Hudson，2005.

——.*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ed. *T.E. Lawrence in War and Peace*：*An Anthology of the Military Writing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Greenhill Books，2005.

Bruner，Robert，and Sean Carr. *The Panic of 1907*：*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ket’s Perfect Storm.*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2007.

Bullock，David. *Allenby’s War.* London：Blandford Press，1988.

Carter，Miranda. *George*，*Nicholas and Wilhelm*：*Three Royal Cousins and the Road to World War I.*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0.

Cecil，Lamar. *The German Diplomatic Service*，*1871-1914.*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Wilhelm II.* Vol.1，*Prince and Emperor*，*1859-1900.*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

Chaliand，Gerard，and Yves Ternon. *The Armenians*：*From Genocide to Resistance.* London：Zed Press，1983.

Chernow，Ron. *Titan*：*The Life of John D. Rockefeller.* New York：Vintage，2004.

Churchill，Winston. *Great Contemporaries.* New York：Norton，1991.

Clayton，Gilbert. *An Arabian Dia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Crowley，Patrick. *Kut 1916*：*Courage and Failure in Iraq.* Stroud，UK：History Press，2009.

Crutwell，C.R.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

Dadrian，Vahakn.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Turkish Denial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A Case Study of Distortion and Falsification.* Toronto：Zoryan Institute，1999.

Davidson，Lawrence. *America's Palestine*：*Popular and Official Perceptions from Balfour to Israeli Statehood.*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1.

Davis，Moshe. *With Eyes Toward Zion.* Vol.2. New York：Praeger，1986.

Dawn，C. Ernest.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3.

DeNovo，John. *American Interests and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1900-1939*.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3.

——.“The Movement for an Aggressive American Oil Policy Abroad，1918-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1，no.4（July 1956）.

Divine，Donna Robins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Ottoman Palestine*：*The Arab Struggle for Survival and Power*. 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4.

Djemal Pasha，Ahmet.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1913-1919*. New York：Doran，1922.

Earle，Edward Mead. *Turkey*，*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aghdad Railway*：*A Study in Imperialism*. 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66.

Emin，Ahmed. *Turke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30.

Engle，Anita. *The Nili Spies*. London：Hogarth Press，1959.

Erickson，Edward. *Ordered to Die*：*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1.

Evans，Laurence. *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1914-1924*.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5.

Fanning，Leonard. *Foreign Oil and the Free World*. New York：McGraw-Hill，1954.

Fischer，Fritz.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W.W. Norton，1967.

——.*War of Illusions*：*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London：Chatto & Windus，1975.

Fischer，Louis. *Oil Imperialism*：*The International Struggle for Petroleum.* New York：International，1926.

Florence，Ronald. *Lawrence and Aaronsohn*：*T.E. Lawrence*，*Aaron Aaronsohn and the Seed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Viking，2007.

Frankfurter，Felix. *Felix Frankfurter Reminisces.* New York：Reynal，1960.

Friedman，Isaiah.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14-1918.*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

——*Palestine*：*A Twice-Promised Land*？ 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

——，ed. *Germany*，*Turkey and Zionism*，*1897-1918.* The Rise of Israel，vol.4.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7.

——，ed. *The Zionist Commission in Palestine.* The Rise of Israel，vol.9.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7.

——，ed. *Tension in Palestine*：*Peacemaking in Paris*，*1919.* The Rise of Israel，vol.10.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1987.

Fromkin，David.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Creating the Modem*

Middle East，1914-1922. New York：Holt，1989.

Gardner，Brian. *Allenby*. London：Cassell，1965.

Garnett，David. *The Essential T.E. Lawrence*. London：Jonathan Cape，1951.

——，ed. *Th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New York：Doubleday Doran，1939.

Gelfand，Lawrence. *The Inquiry*：*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1917-919*.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Gelvin，James. *Divided Loyalties*：*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Gershoni，Israel. *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ies*：*Narrat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

Gilbert，Martin. *Exile and Return*：*The Struggle for a Jewish Homeland*. Philadelphia：Lippincott，1978.

——.*The First World War*：*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Holt，1994.

——.*The Somme*. New York：Holt，2006.

Gokay，Bulent. *A Clash of Empires*：*Turkey Between Russian Bolshevism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London：Tauris，1997.

Goldstone，Patricia. *Aaronsohn's Maps*. Orlando，FL：Harcourt，

2007.

Gooch，G.P.，and Temperley，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 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6.

Gorni，Yosef. *Zionism and the Arabs，1882-1948：A Study of Ide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Gottlieb，W.W. *Studies in Secret Diplomac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7.

Grainger，John D. *The Battle for Palestine，1917.* Woodbridge，UK：Boydell，2006.

Graves，Robert. *Lawrence and the Arabs.* New York：Paragon House，1991.

Graves，Robert，and Basil Liddell Hart. *T.E. Lawrence：Letters to His Biographers.* London：Cassell，1963.

Greaves，Adrian. *Lawrence of Arabia：Mirage of a Desert War.*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7.

Guinn，Paul. *British Strategy and Politics，1914-1918.*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

Haas，Jacob de. *Louis D. Brandeis.* New York：Bloch，1929.

Halkin，Hillel. *A Strange Death：A Story Originating in Espionage，Betrayal and Vengeance in a Village in Old Palestine.* New York：PublicAffairs，2005.

Halpern，Ben. *A Clash of Heroes*：*Brandeis*，*Weizmann*，*and American Zion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Hanioglu，Sukru.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Young Turks in Opposi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Hart，Peter. *Gallipoli*.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Heller，Joseph.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1908-1914*. London：Frank Cass，1983.

Herbert，Aubrey. *Mons*，*Kut and Anzac*. London：E. Arnold，1919.

Hickey，Michael. *Gallipoli*. London：John Murray，1995.

Hill，A.J. *Chauvel of the Light Horse*. Melbourne，AU：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78.

Hillgruber，Andreas. *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 Translated by William C. Kirb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Holt，P.M. *Egypt and the Fertile Crescent*，*1516-1922*.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

Hopkirk，Peter. *Like Hidden Fire*：*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Kodansha，1994.

Hopwood，Derek. *Tales of Empire*：*The British in the Middle East*，*1880-1952*. London：Tauris，1989.

Hourani，Albert.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m Middle East.* Oxford，UK：Macmillan，1981.

Howard，Harry N.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An American Inquiry in the Middle East.* Beirut：Khayat，1963.

Hughes，Matthew. *Allenby and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1917-1919.* London：Frank Cass，1999.

Hyde，Montgomery. *Solitary in the Ranks.* London：Constable，1977.

James，Lawrence. *The Golden Warri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Lawrence of Arabia* ，New York：Marlow & Company，1994.

Karsh，Efraim. *Empires of the Sand*：*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1189-1923.*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Katz，Shmuel. *The Aaronsohn Saga*. Jerusalem：Gefen，2007.

Kayali，Hasan. *Arabs and Young Turks*：*Ottomanism*，*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1908-1918.*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Kedourie，Elie. *England and the Middle East*：*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21*. London：Mansell，1987.

Keegan，Joh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Vintage，2000.

Kent，Marian.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4.

Keogh，E.G. *Suez to Aleppo.* Melbourne，AU：Wilke & Company，1955.

Khalidi，Rashid，ed.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Kinross，John. *Ataturk.* 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1965.

——.*The Ottoman Centuries.* New York：Morrow，1977.

Kirkbride，Alec. *An Awakening*：*The Arab Campaign*，*1917-1918.* Saudi Arabia：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1971.

Knee，Stewart.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of 1919：The Articulation of Political Anti-Zionism.”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29，no.1（1977）：22-53.

Knightley，Phillip，and Colin Simpson. *The Secret Lives of Lawrence of Arabia.* London：Literary Guild，1969.

Knowlton，Evelyn，and George Gibb. *History of Standard Oil Company*：*Resurgent Years*，*1911-1927.* New York：Harper & Row，1956.

Kushner，David，ed. *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 Jerusalem：Yad Izhak Ben-Zvi，1986.

Laqueur，Walte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Schocken，2003.

Lares，J.M. *T.E. Lawrence*，*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T.E. Lawrence，France and the French]. Paris：Sorbonne，1980.

Lawrence，A.W.，ed. *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London：Jonathan Cape，1937.

Lawrence，A.W.，ed. *T.E. Lawrence by His Friends.* London：Jonathan Cape，1954.

——，ed. *Letters to T.E. Lawrence.* London：Jonathan Cape，1962.

Lawrence，T.E. *Crusader Castles.* Oxford：Clarendon，1988.

——.*The Home Letters of T.E. Lawrence and His Brothers.* New York：Macmillan，1954.

——.*Secret Despatches from Arabia* . London：Bellew，1991.

——.*The Mint* . London：Jonathan Cape，1973.

——.*Oriental Assembly* . Edited by Arnold Lawrence. London：Williams & Norgate，1939.

——.*Seven Pillars of Wisdom*：*A Triumph* （1922 “Oxford” text）. Blacksburg，VA：Wilder Press，2011.

——.*Seven Pillars of Wisdom*：*A Triumph* . New York：Anchor，1991.

——.*Revolt in the Desert* . Ware，UK：Wordsworth，1997.

LeClerc，Christophe. *Avec T.E. Lawrence in Arabie* [With T.E. Lawrence in Arabia]. Paris：L’Harmattan，1998.

Lewis，Geoffrey. “An Ottoman Officer in Palestine，1914-1918.” In

David Kushner，ed.，*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 Jerusalem：Yad Izhak Ben-Zvi，1986.

Lewy，Guenter. *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 Salt Lake City，UT：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05.

Liddell Hart，Basil H. *Colonel Lawrence*：*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 . New York：Halcyon House，1937.

——.*The Real War*，*1914-1918* . Boston：Little，Brown，1930.

Link，Arthur S.，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Lloyd George，David.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39.

Lockman，J.N. *Scattered Tracks on the Lawrence Trail*：*Twelve Essays on T.E. Lawrence* . Whitmore Lake，MI：Falcon Books，1996.

Longrigg，Stephen. *Oil in the Middle East*：*Its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Macdonogh，Giles. *The Last Kaiser*：*The Life of Wilhelm* Ⅱ .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1.

Mack，John E. *A Prince of Our Disorder*：*The Life of T.E. Lawrence* . Boston：Little，Brown，1976.

Magnus，Philip. *Kitchener*：*Portrait of an Imperialist* . New York：Dutton，1959.

Mango，Andrew. *Ataturk* . London：John Murray，1999.

McKale，Donald. *Curt Prüfer*：*German Diplomat from the Kaiser to Hitler* . 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War by Revolution*：*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 . 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McMeekin，Sea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

MacMillan，Margaret. *Paris* 1919：*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New York：Random House，2002.

MacMunn，George，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Egypt and Palestine*；*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 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28.

Mandel，Neville.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Manuel，Frank Edward.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Palestine Relations* . Washington，DC：Public-Affairs Press，1949.

Massey，W.T. *Allenby’s Final Triumph* . London：Constable，1920.

Meinertzhagen，Richard. *Middle East Diary*，*1917-1956* . London：Cresset Press，1960.

Melka，R.L. “Max Freiherr von Oppenheim：Sixty Years of Scholarship and Political Intrigue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no.1（January 1973）：81-93.

Meyers，Jeffrey. *T.E. Lawrence. A Bibliography* . New York：Garland，1974.

——.*The Wounded Spirit*：*A Study of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 London：Macmillan，1989.

Millar，Ronald. *Death of an Army*：*The Siege of Kut*，*1915-1916*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70.

Monroe，Elizabeth. *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56* . London：Chatto & Windus，1981.

Moore，Brisco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The Story of New Zealand's Crusaders* . Auckland：Whitcombe & Tombs，1920.

Moorehead，Alan. *Gallipoli* . New York：Perennial Classics，2002.

Morgenthau，Henry.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 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1918.

Morris，Benny. *Righteous Victims*：*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1881-1999* . London：John Murray，2000.

Morris，James. *The Hashemite Kings* . New York：Pantheon，1959.

Moscrop，John James. *Measuring Jerusalem*：*The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 and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Holy Land* . 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

Mousa，Suleiman. *T.E. Lawrence*：*An Arab View* . Translated by Albert Boutro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Murphy，David. *The Arab Revolt*，*1916-1918*：*Lawrence Sets Arabia Ablaze* . London：Osprey，2008.

Nash，N.S. *Chitral Charlie*：*The Life and Times of a Victorian Soldier* . Barnsley，UK：Pen & Sword Books，2010.

Nevakivi，Jukka. *Britain*，*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 . London：Athlone Press，1969.

Nogales，Rafael de. *Four Years Beneath the Crescent* .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

Nutting，Anthony. *Lawrence of Arabia*：*The Man and the Motive* . London：Hollis & Carter，1961.

O’Brien，Conor Cruise. *The Siege*：*The Saga of Israel and Zionism* .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

O’Brien，Philip M. *T.E. Lawrence*：*A Bibliography* . New Castle，DE：Oak Knoll Press，2000.

Ocampo，Victoria. *338171 T.E.*（*Lawrence of Arabia* ）. New York：Dutton，1963.

Orlans，Harold. *T.E. Lawrence*：*Biography of a Broken Hero* . Jefferson，NC：McFarland & Co.，2002.

Palmer，Alan. *The Kaiser*：*Warlord of the Second Reich* .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8.

Phillips，Harlan B. *Felix Frankfurter Reminisces* . New York：Reynal & Co.，1960.

Renton，James. *The Zionist Masquerade*：*The Birth of the Anglo-Zionist Alliance*，*1914-1918* .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

Richards，Vyvyan. *Portrait of T.E. Lawrence*：*The Lawrence of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 London：Jonathan Cape，1936.

Rohl，John. *The Kaiser and His Court*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Rose，Norman. *Chaim Weizmann*：*A Biography* .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7.

Sachar，Howard Morley. *A History of Israel*：*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07.

Sanders，Liman von. *Five Years in Turkey* . Annapolis，MD：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27.

Sanders，Ronald.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 . 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83.

Satia，Priya. *Spies in Arabia*：*The Great War and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Britain’s Covert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Schama，Simon. *Two Rothschilds and the Land of Israel* .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

Schilcher，L. Schatkowski. “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John Spagnolo，pp. 229-58. Reading，UK：Ithaca Press，1992.

Schneer，Jonatha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 New York：Random House，2012.

Seidt，Hans-Ulrich. “From Palestine to the Caucasus：Oskar Niedermayer and Germany’s Middle Eastern Strategy in 1918.” *German Studies Review* 24，no.1（February 2001）：1-18.

Shaw，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 Vols.1 and 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Sheffy，Yigal.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 London：Frank Cass，1998.

Shotwell，James Thoma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 New York：Macmillan，1937.

Shwadran，Benjamin. *The Middle East*，*Oil and the Great Powers* . New York：Praeger，1955.

Spagnolo，J.P. “French Influence in Syria Prior to World War I：The Functional Weakness of Imperialism.” *Middle East Journal* 23，no.1（1969）：44-62.

Steed，Wickham. *Through Thirty Years*，*1892-1922*：*A Personal Narrative* . New York：Doubleday，1925.

Stein，Leonard.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London：Valentine，

Mitchell & Co.，1961.

Stevenson，David. *1914-1918*：*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New York：Penguin，2004.

Stewart，Desmond. *T.E. Lawrence* . London：Paladin，1979.

Stirling，W.F. *Safety Last* . London：Hollis & Carter，1953.

Stitt，George. *A Prince of Arabia*：*The Emir Shereef Ali Haider* .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48.

Storrs，Ronald. *Orientations*：*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 . New York：G.P. Putnam’s Sons，1937.

Sutherland，James Kay. *The Adventures of an Armenian Boy* . Ann Arbor，MI：Ann Arbor Press，1964.

Symes，Stewart. *Tour of Duty* . London：Collins，1946.

Tabachnik，Stephen. *T.E. Lawrence*：*An Encyclopedia* .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4.

——.*The T.E. Lawrence Puzzle* .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2.

Tabachnik，Stephen，and Christopher Matheson. *Images of T.E. Lawrence* . London：Jonathan Cape，1988.

Tanenbaum，Jan Karl. *France and the Arab Middle East，1914-1920* . 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78.

Tauber，Eliez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 London：Frank Cass，1993.

Taylor，A.J.P. *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 . New York：Vintage，1967.

——.*The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of Europe*，*1848-1918*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54.

Teichmann，Gabriele，and Gisela Volger. *Faszination*：*Max Von Oppenheim* . Cologne：Dumont，2001.

Thomas，Lowell. *With Lawrence in Arabia* . New York：Century，1924.

Thomson，Basil. *My Experiences at Scotland Yard* . New York：A.L. Burt，1926.

——.*Queer People* . 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22.

——.*The Scene Changes* . New York：Doubleday，Doran & Co.，1937.

Tibawi，Abdul Latif. *Anglo-Arab Relations and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14-1921* . London：Luzac，1978.

Townshend，Charles. *When God Made Hell*：*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 New York：Faber & Faber，2010.

Toynbee，Arnold. *Acquaintances*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Trumpener，Ulrich.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1914-1918*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Tuchman，Barbara. *The Guns of August* . New York：Ballantine，2004.

Tuohy，Ferdinand. *The Secret Corps：A Tale of “Intelligence” on All Fronts* . New York：Seltzer，1920.

Turfan，M. Naim. *Rise of the Young Turks：Politics，the Military and the Ottoman Collapse* . New York：Tauris，2000.

Urofsky，Melvin. *Louis D. Brandeis* . New York：Pantheon，2009.

Verrier，Anthony，ed. *Agents of Empire：Brigadier Walter Gribbon，Aaron Aaronsohn and the NILI Ring* . Washington：Brassey’s，1995.

Vester，Bertha Spafford. *Our Jerusalem：An American Family in the Holy City，1881-1949* . New York：Doubleday，1950.

Wavell，Archibald. *Allenby：A Study in Greatness* . London：Harrap & Co.，1941.

——.*The Palestine Campaigns* . London：Constable，1968.

Weber，Frank. *Eagles on the Crescent：Germany，Austria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Turkish Alliance* .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Weintraub，Stanley，and Rodelle Weintraub. *Private Shaw and Public Shaw* . London：Jonathan Cape，1963.

Weizmann，Chaim. *Trial and Error*：*The Autobiography of Chaim Weizmann* . New York：Harper，1949.

Weldon，Lewen. *Hard Lying* . London：Jenkins，1925.

Westrate，Bruce. *The Arab Bureau*：*British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1916-1920* . 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Wilson，Arnold. *Loyalties*：*Mesopotamia*，*1914-1917*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

——.*Loyalties*：*Mesopotamia 1917-1920* . London：Humphrey Milford，1931.

Wilson，Jeremy. *Lawrence of Arabia*：*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T.E. Lawrence* . New York：Atheneum，1990.

Wilson，Mary C. *King Abdullah*，*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Winstone，H.V.F. *The Illicit Adventure*：*The Story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1898 to 1926* . London：Jonathan Cape，1982.

——.*Woolley of Ur*：*The Life of Sir Leonard Woolley* . London：Seeker & Warburg，1990.

Woolley，C. Leonard. *Dead Towns and Living Men* . London：Lutterworth Press，1954.

Woolley，C. Leonard，and T.E. Lawrence. *The Wilderness of Zin* .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6.

Wrench，Evelyn. *Struggle*，*1914-1920* . London：Nicholson & Watson，1935.

Yale，William. *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 .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8.

——.*It Takes So Long* . Howard Gotlieb Archival Research Center，Boston University，Box 7，Folder 7.

——.*The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Yale* . New York：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Columbia University.

——.“T.E. Lawrence：Scholar，Soldier，Statesman，Diplomat.” Undated article，probably 1935. Boston：Howard Gotlieb Archival Research Center，Boston University，Box 6，Folder 1. Yapp，M.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1792-1923* . New York：Longman，1987.

Yardley，Herbert D.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 Annapolis，MD：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te Press，1931.

Yardley，Michael. *T.E. Lawrence*：*A Biography* . New York：Stein & Day，1987.

Yergin，Daniel. *The Prize*：*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 and Power* . New York：Free Press，2008.

Zeine，Zeine N.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 Delmar，NY：Caravan，1973.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Aaron Aaronsohn Papers. NILI Museum and Archives，Zichron Ya’aqov，Israel.

Gilbert Clayton & Reginald Wingate Papers. Sudan Archives，University of Durham，Durham，England.

T.E. Lawrence Collection. 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T.E. Lawrence Papers. Bodleian Library，Oxford，England.

George Lloyd Papers. Churchill College，Cambridge，England.

National Archives（UK，formerly Public Records Office），Kew，England.

National Archives（U.S.），Washington，DC.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NY.

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Berlin，Germany.

Curt Max Prüfer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Palo Alto，CA.

Mark Sykes Papers. Middle East Centre. St. Antony’s College，Oxford，England.

William Yale Collection. Howard Gotlieb Archival Research Center，Boston University.

William Yale Collection. Milne Special Collections，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Durham.

William Yale Papers. House Collection（M658），Yale University Library，New Haven，CT.

索引

Aaronsohn，Aaron，16，287，379，434

as agronomist，15，50，51-53，86，110，216，217，431，443-44

at Arab Bureau，252-56，260，348-50，357，444

“arrest” of，216-17

background and role of，15，50-51

and Balfour Declaration，388

British inertia as frustrating to，228-29，251-53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49-50

death of，496

Djemal Pasha and，91，110-11，133-34，156，160，180-81，522*n*

on expulsions from Jaffa，298-305

family of，359-60

Lawrence and，357-60，363-64

locust plague and，110-11，131，133-36，159-60，180

NILI spy network of，347-50，359-60

pariah status with Zionist Commission，443-44

at Paris Peace Conference，482，496

and ruination caused by Ottoman entry into the war，83-86

spy network of，135-36，143-44，158-60，180-81，216-20，228-29，232，251-56，277-80，326-27，347-50，370，443，522*n*

Sykes and，220，229-32，294-96，300-304，348，371-72

U.S. missions of，51-52，394-98，410-11，458，482

Weizmann and，394-98，411，458

Yale and，366，370-72

Aaronsohn，Alex，85，134，136，143-44，219，256，360，371，372，379-80，443

Aaronsohn，Ephraim，86，378，397，536*n*

Aaronsohn，Rivka，134-35，136，144，219，298

Aaronsohn，Sam，397，443

Aaronsohn，Sarah，159，298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298

death of，379，397，443，535*n*，536*n*

as head of NILI spy network，256，298-99，326-27，376-79

Aaronsohn，Zvi，378

Aaronsohn family，75-77

Aba el Lissan，massacre of Turkish battalion at，333-35 Aba el Naam，280-83，287

attack on Turkish garrison at，328

Abbas Hilmi Ⅱ，khedive of Egypt，38-39，58，382-83，430-31，455-56，458-59，482，500

Abd el Kader，381，383-85，389，400-401，475-76

Abd el Karim，256

Abdullah ibn-Hussein，112，115-16，123，188-89，194-96，199-202，205，209，236，261，491-92，520*n*

attempt to reach accommodation with Israel by，490

British waffling criticized by，194-95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195-96

Jordan ruled by，492，493

Lawrence’s mission to camp of，275-77，280-81，286，289-90

aerial reconnaissance，100，243

Afghanistan，79，493

Africa，239

European imperialism in，29，69

Afuleh，278

Ageyl tribe，276-77，312-13，347

Agriculture Department，U.S.，51-52

Aigues-Mortes，22

Ain el Essad，Lawrence’s refuge in，461-63

airplanes，199，208，222，238-41，272，463

al-Ahd（the Awakening），140-42，145，520*n*

Aleppo，26，44，45，82，132，133，482，522*n*

Alexandretta，93，96，253，481

Doris incident and，98-99，102

Faroki’s support of British landing at，140-41

French scuttling of attack against，95，104-6，146-47，150，225，269

Lawrence’s advocacy of landing at，95-99，103-5，119，120，124，141-42，145-47

as vulnerable to British attack，96-100，102-6，123

Alexandretta，Gulf of，93，96，253，269

Alexandretta Basin，97，98，102，145

Alexandria，Egypt，64，77，79，88，89，128，143，144，252，254，291，432，452

al-Fatat，121-23，141-42，520*n*

Algeria，197，198，383，475

Ali ibn-Hussein，112，113，123，200-201，205，207，214，236-37，246，261，289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202

panicking troops of，215

Allenby，Edmund，351，363，372，421，423-25，440-42，450，486，497

at Damascus Victoria Hotel meeting，479-81，483

entry into Jerusalem of，406-8，418

Jerusalem occupied by，412，414

Palestine offensive of，361，373-75，389，395，404-7，455

Syrian offensive of，427，435，437，441-42，453，459-60，464-68，473，475-76，479

transfer to EEF of，342-45

war record of，344

Yale and，452

Zionists and，444，445

Allies：

in World War Ⅰ，*see* Triple Entente

in World War Ⅱ，501

al-Mokattam，451

Amanus Mountains，66，98，145，332

Amateurs：

Lloyd as，380

Ormsby-Gore as，254

Sykes as，153，155-56

American Colony in Jerusalem，248

American Committee to Negotiate Peace，483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451，456

American Red Cross Commission，449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249

Amman，328，392，435，436，437，442，447，460，464，492，493

Anatolia，16，46，48，91，93，96，97，98，123，130，199，273，332，410，481，492

Armenians massacred in，132，135，136-37，145，150，156，159，296

anti-Semitism，358，366

British，229

Aqaba，61-62，66，285，352，389

Arab rebel base in，367，369，374-75，381，384-85，405，406，410，412，435，445-46，448，449，454，463

Brémond’s proposal for landing at，261-65，268-72，285，529*n*

British military buildup in，427

Lawrence opposed to Allied strategy for，268-72，289-91，529*n*

Lawrence’s scheme to capture，305-7，310，320-24，327-30，335-38，342，345，353-54，375

Aqaba，Gulf of，56，61

Arab Bulletin，238，254，357，387-88，419-21，428

Arab Bureau，220-21，223，225，234，241，247，259，263，291，347，361，520*n*

Aaronsohn and，252-56，260，348-50，357，444

Hogarth at，372，380，389，400，428，454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232-33

Yale and，418

Arabia，61，70，100，165，193，206，210，213，247，258，320，347，352，383，440，453，491，524*n*

British-brokered division between Hussein and ibn-Saud，492

British military presence in，351

deserts of，367

ibn-Saud’s rule of interior，492

potential British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220-28，233-34，237-38，242

Arabian Peninsula，16，114，141，165-66，168，180，188，190

India’s sphere of influence and，161

Arabic，424

Lawrence’s fluency in，33，232，425

Prüfer’s fluency in，13，30-32，38

Arab Legion，412，414

Arab nationalism，Arab nationalists，121，215，289，312，325，363，426，428，490，493，520*n*

in Beirut，402

Lawrence’s peacetime advocacy for，483

Lebanon show trial of，179-80，248，403

in Syria，404

Arab National Party，293

Arab Northern Army，460

Arab Revolt，4，115-17，145，179，183-84，187-211，248，250，261-62，283，288，318-19，358，381，405，413，421，427，432，440，442

Allenby won to idea of，344-45

Aqaba as new headquarters of，360-61

Arab tribal forces in，256

Brémond on，197-99，214-15，224，233，385

British and French distrusted by leaders of，426，430

British invasion of Palestine and，344-45

British support of，150，190，197，205，215，221-28，233-34，245，246，262，268，275，283-84，316，323，342-45，427，429，431-32，447，453-55，528*n*

difficulty of recruitment for，384

economics of，380

French advisors in，212，222，225-26，227，407

Gallipoli and missed opportunity for，121-23，130-31

guerrilla warfare tactics of，237-38，283-84，374

Hussein’s signaling of，184

Lawrence and，184，191-96，198-206，320-24，366-67

loss of soldiers in，416

mythology of，366-67

northern tribes in，237

Ottoman rapprochement efforts with，409-10

Palestinian Jews and，358

passion as animating force of，269

senior leadership of，461

Storrs and，187-96，198-201

Syria and，190，198，212，307，314，318，322，343，374，385，393

tribal squabbling as impediment to，345

Turkish counteroffensive against，190-91

Zionists and，430，444，445-49

Arab Spring，494

Arab warriors

at Aba el Lissan，333-36

in Allenby’s Palestine plan，373-75

fighting abilities of，237-38，240，246，283，316，463

morale of，461-63

notions of war as held by，472-73

in Tafas，470-73

Arabs，54，131，396，499

Britain’s promises to，503

Christian minority of，35，143，157，171，231，450

gulf between Allies and，319，440

independent territory claimed by，152，161-65

Iraqi，168

Jews and，133，301，490

Lawrence’s relationship with，34，40，321-22

and locust plague，133，134

Muslim，35，157

in Ottoman empire，35，40，74，97

in Palestine，74，295，357，358-59，426，431，432，434，444，445-46，448-49，486-87，490，491

political gamesmanship by，318

pro-German，500

self-determination denied to，485-87

Syrian，40，234，428

tension between Turks and，102，111-14，117，122-23

wars between Israelis and，494

archaeologists：

German，30

Oppenheim as，37，38，39

Arethusa，SS，448

Armenia，Armenians，396，399，438

Djemal’s efforts to protect，132-33，145，296-97，301，403

in Jerusalem，74

in Ottoman Empire，35，74，301

Ottoman persecution of，97，121-23，131-33，135，137-38，145-46，150，156，159，228，230，296，299，301，302，304，497，519*n*

Armistice of Mudros，481

Armstrong，H.C.，485

Army，British，225，355，375，441，452，457

in Arabian theater，198，270，351-52

Palestine campaigns of，219，374，414，435，436，441

and 1918 Syrian offensive，460，461，471

Army，French，225，343，375

and 1918 Syrian offensive，461

Army，German，344

in Syria，436

Army，U.S.，Intelligence Department of，333

artillery bombardment，166-67，208

Arab and Turkish fear of，243

long-range shells in，69

Ashmolean Museum，21-22，71，87，149，369

Asquith，Herbert，66，142，243，293

Atatir，435-36，437，440

Ataturk，Mustafa Kemal，121，410，481，492，537*n*

Athlit，15，53，135，143-44，158，181，218，228，252-54，256，295，299，326-27，348，360，376-80，398

Atlantic Monthly，360，498

Auda Abu Tayi，288-91，306，312，314，320-21，323，327，334，461，470

plunder as focus of，321，335

secret negotiations with Turks by，353

Australia，Australians，89，475，476，478

Territorial troops from，56，87

Austria-Hungary，69，217，430，447

Bosnia-Herzegovina annexed by，35

in Central Powers，71，83，84

on Eastern Front，151

fall of，482

Franz Ferdinand’s assassination and，66

Jewish emigres with passports from，75

on Southern Front，375，457

Aylmer，Fenton，13th Baronet of Donadea，166-68，170

Ayoub，Selim，250

Ayyubid empire，393

Azraq，389，391，392-94，398，399-402，442

citadel at，436，460-65，467-68

Baghdad，66，150，162，493

British Indian army at gates of，164，167，248

British occupation of，315-17

Baghdad Convention，105-6

Baghdad Railway，39，40-41，66

Bair，327-29

Bakri，Fawzi al-，121

Bakri family，122，179

Baku，47，438

Balfour，Arthur，278，293，294，354，359，363，388，392

Balfour Declaration，388，395-97，398，406，408，411，419-21，426，428-31，438-40，446，462，482，490，499

Balkans，66-67，182，244，457

Balkan Wars of 1912-13，40，296

Ballobar，Antonio de la Cierva，Conde de，109-10，172-73

Bar Giora，85

Barrow，George，471-73

Bartholomew，William，453

Basra，16，162，169-70，317

Beach，Edward，171，178

Bedouins，156，361，369，403，421，425，428

in Arab strike force，345-46

British garrisons attacked by，78

hospitality of，320

in Iraq，347

with Lawrence in Tafileh，412，415

as Prüfer’s spies，126

raids into Sinai by，62，63

raids on roadbuilding crews by，65

in Suez invasion，102

as trackers，256

traditions of，312

and Zin Desert，57

Beersheva，19，54，56-57，83-84，174，239-40，332，376，387，426，522*n*

Allenby’s attack on，373，395

meeting between Lawrence and Yale at，10-13，49，57，63-64，90，421，512*n*

Turkish forces in，389

Beha-ed-din，516*n*

Beidawi tribe，256

Beirut，27，66，88，92，109，134-35，136，158，228，402，405，522*n*

French consulate in，157

Belgium，72，82，304

Belkind，Namaan，376-78，397，535*n*，536*n*

Below，Richard von，14，58，60，66

Bemis，William，43，47，138-39

Berlin，181，217，241，242，359，501

Berlin，University of，30

Berlin-Baghdad Express，*The*（McMeekin），37

Bernhardt，Olga，216-17

Bernstorff，German ambassador，535*n*

Bir Abbas，204，237

Bir el Shedia，337

Bir-es-Salem，452，459

Bir Ibn Hassani，237

Bir Said，246

Bismarck，Otto von，28-29

Black Sea，48，481

Bliss，Howard，92，109，248-49

Boer War，54，56，70，153

Bolsheviks，375，425

Bosnia-Herzegovina，35

Boston University，499

Bovington Camp，Dorset，504，505

Boyle，William “Ginger，” 211

Brandeis，Louis，304，395，396，411，431

Bray，Norman，257

Brazil，386，501

Brémond，Édouard，196-99，289，310，363，493，524*n*

Allied Aqaba landing supported by，261-65，268-72，285，529*n*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260-61

departure from Middle East of，406-7

desire to send troops to Rabegh by，213-14，222，224，227，243，261，270，528*n*

Lawrence and，211-12，214-15，242-43，264-65

obstructionist agenda of，211-16，222，224，227，233，244

Ottoman French bank supported by，261，380

warning about Abd el Kader from，384-85

Brest-Litovsk，German-Russian negotiations at，419，424-25

Brewster，William，451

Britain，British，*see* Great Britain

British Colonial Office，492，502

British Empire，272，454

global conflicts of，70

British worldview instilled by，18

British India，152，161-66，301

army of，56，87，96，441-42，453，469，474

Hussein undermined by，164-65

Indian soldiers in army of，177-78，390，522*n*

Iraq invaded by，96，150，164，167-71，182，248，273，495

rivalry between British Egypt and，154，161，163-66

troops from assisting Arab Revolt，461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Cairo，83，86-88，90，114，119，125，144-46，183，192，210，220，233，235，247，290，337，380，385-88

and Aaronsohn spy ring，136，143-44，376

and Faroki revelations，140-41

and Sykes-Picot Agreement，163，271，307

and Yale，333，385-88

British Museum，28，46

Brode，Heinrich，530*n*

Buchanan，George，231

Bulgaria，104，109，356

alliance with Central Powers of，145，457

fall of，482

neutrality of，96，107

Bulgars，296

Byzantine period，57

Cairo，32，39，49，58，139，156，188，190，194，207，222，223，232，243，251，252，258，262，264，265，300，308，315，326，337，342-44，346，348，353，359，360，372，376，408-9，

427，431，432，443，448，482，492，502

Aaronsohn in，254，359，363-64

Abdullah ibn Hussein in，115

British high command in，128，314，342，354，387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fice in，83，86-88，114，119，125，136，140-41，143-46，163，183，192，210，220，233，235，247，271，290，307，376，380，385-89

British Residency in，386

French legation in，169

Lawrence in，83，86-88，90，99，114，116，119，125，154，361，374

Prüfer as embassy dragoman in，36-38

red light district of，87，88-89，106

Socony office in，49

Syrian exiles in，292-93，308-9，420，451

unruly oilworkers in，73

Yale in，89-90，356，366，385-88，417-21，449-53，478，498

Cairo Conference，492，493，503

Cambridge University，114，153

camels，100，235-36，276，313-14，327，334-35，347，438

discomfort in riding of，202

Canberra，SS，431-32

Cape Helles，119

Capitulations，32-33，85，134

end to，74-76

Caporetto，battle of，375

Carchemish，28，32，33，34，39-40，45-46，65-66，67，143，148，187，208，383，462

Caspian Sea，15，47，438

Caucasus，38，398，419，493

Cecil，Robert，349

Central Powers，71，74，77，145，151，180，216，230，242，265-66，304，349，355，382，439，455，458，496，500

breaking point of，482

imperial wish list of，152

Ottoman Empire in，83，84

Chapman，Thomas Robert Tighe，*see* Lawrence，Thomas（father）

Chauvel，Henry，475-76

at Victoria Hotel meeting，479-81，483

Christians：

Arab，35，143，157，171，231，450

expulsion from Jaffa of，297-98

Holy Land and，152，406

in Jerusalem，74

jihad against，131

Lebanese，134，151，156

in Ottoman Empire，33，35，76，84，85，97，121-22，230

in Palestine，357，397，420，431

in Syria，438，451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498

Churchill，Winston，491-92，502，505

Dardanelles strategy advocated by，103-5

Circassians，156，199，328-29，398

Citadel，Dujaila，166-68

Clayton，Gilbert，221-23，322，372，406，420，421-23，432，449，478，520*n*

Aaronsohn and，252，279-80，444

on Aqaba，268，290，305-6，351-52

Cairo intelligence unit led by，140，220

on Hejaz，337，341-42

on Lawrence，341-42，352，361，375，380-84，389，423，524*n*

on Lawrence and Faisal，236-38，246-47，258，260，290

Lawrence selected for propaganda department by，232-34

Lawrence’s Tafileh report to，412-15

on Medina，274-75，306，351

Sykes and，315-16，318-19，348，352-53，362-65，409，428，495

on Weizmann and Faisal，445-47

Wingate and，225-26

Clemenceau，Georges，Lloyd George’s agreement with，485-86

Clouds Hill，504-5

Cohn，Isaac，127-28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CUP），*see* Young Turks

communications，Lawrence’s use of，210

communism，71

Constantinople，32，35，39，43，64，66，91，93，96，98，113，122，131，150，153，159，176，178，179，181，217，239，249，268，298，332，359，439，497

British Dardanelles strategy and，103-6

expatriates in，92

German ambassador in，157

German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 in，324-25

Germany military high command in，273

Haidar Pasha train station，122，159，325

Prüfer in，77-78，94

Russia’s desire to annex，152

Sirkeci station in，382

Socony office in，47-48，106-8，138-39，174，266

Continental Hotel，Cairo，254-55，298，326

Copenhagen，217

Cornwallis，Kincaid，432-33

Cox，Sir Percy，168

Croix de Guerre avec palme，169

Crusaders，Near Eastern castles of，23，26，465

Crusades，15，23，76，152，237

Turkish propaganda and，209

cryptography，188

Cuba，25

Curzon，George，362

Cyprus，140，377，493

Dahoum（Salim Ali），33-34，55，62-63，462-63

Daily Telegraph（India），501

Damascus，24，41，93，94，121-22，131，141，158，165，174，179，248，266，269，289，295，322，325，328，344，345，376，405，441，467-68，473-81，483，491，495，522*n*，532*n*，535*n*

Allenby’s proposed march on，435

Turkish hospital in，476-79

Damascus Protocol，122-23

Dana，A.G.，89

Dardanelles strait，96，103-6，117-19

Daud（Ali），313-14，413，436-38，455

Dawnay，Alan，453，467

Dead Sea，11-12，48，107，412，414，422，435

de Bunsen Committee，153，155

Decree on Peace，Bolshevik，404

Deedes，Windham，254-56，444

Defense Ministry，French，197

Deir al-Zour，132

Denmark，217

neutrality of，216

Deraa，373-74，394，442，455，460，467-69，471-73，479

ambulance train story，472-73

Lawrence raped and tortured in，398-402，406，413，423，455，473

de Sambouy，Major，465，469，474，477

Des Moines , USS, 143

Diplomatic Agency, U.S., 385

Djemal Pasha, Ahmed, 9, 85-86, 122, 140, 150, 157, 162, 215, 239, 248-50, 289, 296, 350, 410, 438-39, 481, 493, 527*n* , 532*n* , 537*n*

Aaronsohn and, 91, 110-11, 133-34, 156, 160, 180-81, 522*n*

in Afghanistan, 493

Americans and, 249

Armenians aided by, 132-33, 145, 296-97, 403

Beirut speech of, 402-5, 408-9

death of, 497

foreigners in Jerusalem and, 172-73

on Gallipoli landing, 130-31

German commanders and, 297, 527*n*

as governor of Syria, 91-94

Hussein's approach to, 111-13, 117, 142, 179-81

Jaffa evacuated by, 296-98, 299-305, 347, 362, 377, 530*n*

in Jerusalem, 108-11, 248

Jews and，404，516*n*

managerial style of，108-10

Morgenthau’s description of，91-92

narrowing options of，272-74

Ottoman decline denied by，248

Prüfer and，91，108，113，114，127，156-58，173

and Suez invasion，93-94，99-103，108

Yale’s meetings with，91，137-38，174-76，249-50

Djemal Pasha，Mehmet，429，446-48，454，459，537*n*

Djibouti，264

Dobell，Charles，286

Dolmabahçe Palace，138

Doris，HMS，98-99，102

Dort Yol，93

Doughty，Charles Montagu，23-24

Druze，151

Dufferin，HMS，350-51

Dujaila，166-68，170

Eastern Mediterranean 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EMSIB），252，326，347-48

Edelman，Samuel，174，249

Edmonds，William，252-53，255，278-79，326

Egypt，32，73，79，89，96，136，140，159，206，212，213，219，239，338，355，433

British rule over，14，34-39，54-56，58，68，77，78，80，91，100，102，113-17，122，125，127，145，147，164，216，220，266，301，354，439-40，493，500

British supply line to Arab rebels from，189，262，268，374，383-84，421-22

civic unrest in，439-40

French 1798 invasion of，15

Germany and，58

hope for anti-British uprising in，56，59，102

Israelites’biblical flight from，56

khedive of，38-39，58

Med-Ex soldiers in，119

mujahideen in，14

Muslim pilgrims from，113，198

Muslim recruits to Arab Revolution from，361

Nasser’s takeover of，493

nationalists in，499

NILI headquartered in，348

Ottoman rule over，36-37

power structure in，59

Prüfer in，13

rivalry between British India and，154，161，163-66

sabotage and subversion campaigns of Central Powers in，79

secret police of，60

Socony offices in，49，64

Egyptian Army，British，221

Egyptian Expeditionary Force，British（EEF），86，146，190，192，213，220-21，226，233，441，453，459-60，473

Allenby given command of，342-45，350

Desert Mounted Corps of，475

Lawrence under command of，192-93，342-43，350

Murray removed from command of，342-43

Yale as U.S. military attaché to，453，459-60，463，465-67，469-70，474，476-79，482-83

El Arish，272-73，372，374-75，381，383，389

El Houl，311-14，320

El Ula region，336，351

English Zionist Federation，294，301-2，348，359，371，379，396，398

Entente Cordiale，197

Enver Pasha，77-79，83，122，131，179，273，403，419，481，493，497，515*n*

Erlangen，University of，31

Erman，Adolf，30

Eskisehir，136

ethnic cleansing，296

Euphrates River，32，41

Europe：

Eastern Front in，151，244，375，419，438

imperialist mind-set in，269，362，491，493-95

imperial powers in，29，36，69，70，430

Jewish emigration from，75

lack of progress on battlefields of，151-52

no-man’s-land in，151，167

Southern Front in，151，375，457

trench warfare in，166-67，225

war euphoria in，68-69

Western Front in，28，81-82，87，104-5，146，149，151，166-67，197，213，225，244，268，296，331，343，366-67，375，376，424，438，441，455-56，457，482

Euryalus，HMS，212

Exodus，book of，50，56，57

Faisal I，king of Iraq（Faisal ibn Hussein），111，113，117，121-23，131，179-80，189，201-2，243，248，250，261，286，305，308，311，312，316，321，361，427，490

Allenby and，352

in approach to Wejh，256-58，259

Aqaba landing considered by，264-65，269-72，274-75

Auda Abu Tayi’s alliance sought by，288

Brémond’s overtures to，264-65，268-72，289

British liaison officer assigned to，232-34

caution toward British involvement by，220，226，243，319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205，290

as Commander of Arab Forces，336-37

Damascus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475

as disheartened，374

Djemal’s correspondence with，405，408-10

French mistrusted by，449

on Iraqi throne，492，504-5

Lawrence and，204-6，207，209-11，214，215，216，222，234，235-38，243-47，258，260，288-89，374，413，428-31，504-5

and Lawrence’s Aqaba plan，291

leadership of，245

Medina rebel force led by，191，199-200，203-6，215

military setbacks of，236-38

mountain defenses of，223

Ottoman correspondence of，537*n*，539*n* -40*n*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486-87，491

as peacekeeper and consensus builder，245，276

political gamesmanship by，318-19

as self-declared king of Syria，491

and September 1918 Syrian campaign，461-63，467-68，473

Shalaan and，393

Sykes-Picot revealed by Lawrence to，270-71，295，309-10，318，447，528*n*，531*n* -32*n*

Turkish secret dialogue of，410，439，447-49，454，459

at Victoria Hotel meeting，479-81，483

war campaign of，236-38

wariness of，toward French，261，268

Weizmann as ally of，486-87

Yale and，488

Zionists and，445-49

Faisal-Weizmann Agreement，487

Fakhri Pasha，273

Falkenhayn，Erich von，403-4

Faraifra，437-38

Farasan Island，498

Faroki，Mohammed al-，140-43，145，150，520*n*

Farraj（Othman），313-14，413，436-38，441，455

fascism，71

Fawzi Bey，Omar，78，80

Feinberg，Absalom，135，143-44，158-60，180-81，252-53，301，522*n*

death of，255-56，260，298-99，443

fellaheen，84，156，357-58

Field Aviation Detachment 300，German，239-41

First Balkan War，40

FitzMaurice，Gerald，229，232

Flavius Josephus，219

Flecker，James Elroy，66

Fliegertruppen（German Flying Corps），239

Florence，Ronald，53，83

Fontana，Winifred，82，83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French，198，315

Foreign Office，British，213，220，227，243，293-94，301-3，349-50，359，362，396，407，444，446，447，449-50，479-80，494

Fourth Army，Ottoman，91，99-103

France，20，43，69，248，287，331，403，418，430

Alexandretta plan blocked by，95，104-6，146-47，150，225，269

Allied Aqaba landing urged by，261-65，268-72

amity between Britain，Russia，and，30

Arab conspirators’exclusion of，141

Arab Revolt and，212，222，225-26，227，407

Britain and，261，270，386，479-81

on capture of Medina，233

Cilicia region and，492-93

in Dardanelles invasion，105

draft in，73

Egypt invaded by，15

Frank Lawrence on front in，129

German attacks on，72，438

Lawrence in，17-18，21，22，28，202

Lebanon and，134-35，162，199，315-17，318

Middle Eastern territory claimed by，183，211-15，224-25，233，291，309-10，317，323-24，362，404，417，450，453-54，520*n*

military mission to the Hejaz of，198

North African possessions of，197

Palestine and，293

resistance to Alexandretta landing by，95，104-6，146-47，150，225，269

Syria claimed by，146-47，152，162-65，197，199，212，215，264，270-72，289，291-92，300，307，314-15，318-19，346，363，364，374，384，405，419，429，479-81，485-86，488-89，491-93，503

technical advisors from，212，261，272，289

in Triple Entente，*see* Triple Entente

Tunisia conquered by，34，38

U.S. entry into war and，265，287

Western Front and，104-5，151，213，457-58

World War I’s impact on，70

Franco-Prussian War，28，70

Frankfurter，Felix，49，304

Franz Ferdinand，Austro-Hungarian archduke，assassination of，66-67

Free Officers Movement，493

free trade，266

Frey，Alexis，171-72

Friedman，Isaiah，232，521*n*

Fromkin，David，516*n*，520*n*，521*n*

Fuweila，329

Turkish garrison at，333，337

Gallipoli，103

military debacle at，118-23，125，130-31，139-41，145-46，150，156，170，179，190，263，268，492，518*n*

Garland，Herbert，244，282

Garmisch-Partenkirchen，458

Gary，Hampson，452

Gasim，312，314

Gaster，Moses，231-32

Gaza，54，55，272，274-75，279，297，358，364，443

Allenby’s attack on，373，404

British defeats at，286，287，293，299-300，342，343，387，403

First Battle of，299-300

Second Battle of，342，343

Turkish garrison at，389

Geneva conventions，98

Georges-Picot，Francois，162-64，230-31，300，308-9，314-15，317-18，352，372，407-8

named liaison to Murray’s army，291-93

Seven Syrians and，453-54

Georgette（German offensive），438

George V，1-2，178，314，505

Georgia，republic of，497

Germany，181，324，430，440，497

on Abbas Hilmi，382-83

airplanes of，238-39，272

approaches toward Suez available to，90-91

buildup on Western Front by，419

in Central Powers，71，83，84

class system in，28，59-60

counterintelligence agents from，217，218

diplomatic transgressions by，36-39

draft in，73

on Eastern Front，151，375

Enver Pasha’s treaty with，77-78

France attacked by，72，438

imperialism of，28-29，30，36-39

Jewish homeland and，349

militarization of，30，44，71-72

minelaying by，305

movements between the wars in，499-501

nationalism of，29-30，58

Nazi party of，500-502，505

Ottoman Empire’s relationship with，30，38，41，66，83，94，99-100，102，113-14，116，118，125，142，145，190，216，248，273，303，377，385，406，430，515*n*

Ottoma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332

provocation of U.S. by，266

Prüfer’s Jewish spy ring for，14-15，126-29，144

rivalry with Britain of，13，38，55，58-59，60，72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 undermined by，287

Russian peace overtures toward，375，419，424-25

Socony and，386

surrender of，1，482

U-boats from，104，266，287

unification of，28，29

U.S.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287，331，430

war declared on Russia by，77

on Western Front，151，213，424，440，441，457

Western Front headquarters of，455-56

withdrawal from Jerusalem of，406

World War I casualties of，70

Gideonites，85，135

Glazebrook，Otis，418

Goeland，253-55

Gorringe，George，170

Grand Continental Hotel，Cairo，87

Grand New Hotel，Jerusalem，89

Graves，Philip，254

Graves，Robert，540*n*

Great Bitter Lake，100

Great Britain，4，20，66，95，287，307，418，430，458，482

Aqaba landing supported by，268-72，285

Great Britain（*continued*）

Arab alliance with，115-17，141-42，208，212，386，408-9

Arab suspicions of，223-24

arrogance and smugness of，104，155，170，182

carrier pigeons used by，376

Chaim Weizmann and munitions industry of，128

class system in，18，271

contempt toward Turks by，104，120

Dardanelles strategy of，103-6，117-23

draft in，73

Egypt ruled by，14，34-39，54-56，58，68，77，78，80，91，100，113-17，122，125，127，145，147，164，216，266，301，354，439-40，493，500

France and，261，270，386，479-81

Germany’s rivalry with，13，38，55，58-59，60，72

imperial designs of，152，162-65，183，190-91，225，291，309，319，362，404，407，417，419，450，453-54，485-86，489，491-92，520*n*

Jewish homeland in Palestine and，349-50，371-72，377，379-80，386，396，411，432

Muslim territories controlled by，78

Ottoman Empire’s relations with，37，55，56

Prüfer on enemies blacklist of，500

self-determination advocated by，362

on Socony oil interests，64

spy ships of，144，158-60，181，253，256，278，298，326-27，360，376，378

Suez Canal and，37，55-56

territorial troops from，56

in Triple Entente，30；*see also* Triple Entente

Turkish negotiations with，409，447

war euphoria in，68-69

Great Loot，5，152，486

Great Pyramids of Giza，86

Great Rift Valley，48

Greece，Greeks，43，104，296，418，457

imperial ambitions of，153

neutrality of，96

in Ottoman Empire，35

Grey，Edward，162，231，293

Gribbon，Walter，219

Grignon Institute，51

Gunkel，Oscar，138-39

Gurkhas，461

Guweira，353，422-23，434-35

Hadassah，128，497

Hadera，135

Hafir el Andscha，101

Hague war conventions，98

Haidar，Ali，273-74

Haifa，50，136，143，358，364，469

Haig，Douglas，70，225，375

Hajim Muhittin，398-402

Hall，Henry，21

Hama，344，522*n*

Hamburg-America Line，44

Hamed（Moroccan），276-77，311-12

Hamidian Massacres，519*n*

Hamilton，Ian，140

Hampshire，HMS，184

Hamra，Arabia，204，205

Handbook of the Hejaz，*The*，259

Hanna，Edith，498

Hardinge，Lord Charles，227，349

Hareidhin，Talal el，470

Harrison，Leland，355-56，365，371，419-20，425，430-31，449，451

Hashemite clan，112，114，180，205，408，427，486

Hebrew language，372

Hebrew Union College，410-11

Hebron，332

Hebron road，65，90-91

Hejaz，112，113，131，179，292，307，316，323，347，384，439

Arab Revolt in，184，189-209，222，240，248，336-37，341，

343，346，404，407，520*n*

British officers in，268-72，352，532*n*

economy of，380

Hussein’s rule in，492

Lawrence’s permanent posting to，258

Lawrence’s postage stamps for，192

Lawrence’s return to Cairo from，232-34，247

limited access to non-Muslims in，190-91，204，209，224

Newcombe in，251

proposed Arab rebellion in，115-17，121-23，142

seasonal watercourses in，203-4

Turkish troops in，194，204-5

Hejaz Railway，41，112，244，246，261-63，273-75，281-85，288，290，305-6，327-28，336，345，351，373，390，421，427，435，436，440，460，464，467-68，520*n*

incomplete state of，98

Herbert，Aubrey，87，171，176-78

Herzl，Theodore，52，54

Hill，J. C.，43，47-49，63-65，174

Hindenburg Line，457，482

Hitler，Adolf，242，499，500-501

Hittite civilization，32

Hodgson，Captain，459

Hogarth，David，17，22-23，28，32，34，65-66，99，118，119，370

at Arab Bureau，372，380，389，400，428，454

and Lawrence’s push for Alexandretta，105-6

Hollis，Stanley，68

Homs，344，522*n*

Hotel Fast，Jerusalem，238，240

Hotel Germania，Constantinople，77，78

House，Edward，396，489

Howeitat tribe，288，312，320，323，327，329，334-35，337，353

Hungary，52

Hussein，King（Emir），111-14，115-17，121-23，141，150，

156，183-84，207，231，233，289，380，385，404，439，446，450，462，475，487

administration of，198

allies courted by，323

Arab Revolt begun by，184，188-90，192，240，273

Britain’s negotiations with，152，161-65，189，193，194-95，200，521*n*，522*n*

British alliance of，427-28，493

on British honor，311，316，318-19

Constantinople’s negotiations with，179-80

deposed，493

fighting capability of troops of，212

Hashemite dynasty of，112，114，180，205，408，427，486

ibn-Saud as chief rival of，427-28

Lawrence’s Jeddah meeting with，351-55

private phone line of，195

risks of British alliance for，190-91，209

Sykes’s double-dealing and，292，307-10，314-19，362-64，405，

409，531*n* -32*n*

Zionists and，428，449

Hussein，Zeid al-，188-89，190，207，236，238，289，435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of，201-2

Guweira gold caravan and，421-23

Hussein family，131

Husseini，Ismail Hakki Bey al-，49，173，175-76，249-50

ibn-Saud，Abdul Aziz，164-66，427-28，487，491，493

Imperator，SS，43-44，330

Imperial Camel Corps，361，441-42，446

Imperial Colonial Office，German，527*n*

Imperial General Staff，British，81-83，146，219，344，346

India，7，44，79

Lawrence in，504

Muslims in，113，161，198

Prüfer in，501-2

see also British India

Indian Expeditionary Force（IEF），164，170-71

Intelligence Bulletin for the Middle East，164-65

Iraq，16，39，87，91，199-200，117，141，166，168，182，332，441，522n

Arab Revolt and，198

British claim on，317，405，485，491，495

British Indian army in，96，150，164，167-71，182，248，273，495

British mandate in，497-98

Faisal placed on throne of，492，504-5

French claim on，162

revolt in，491

slaughter of ethnic minorities in，494

trench warfare in，167-69

2006 U.S. military “surge” in，347

Ireland，19，153

Iskenderun，*see* Alexandretta

Islam：

Wahhabism，165-66

Young Turks as supporters of，35

see also Muslims；pan-Islam，pan-Islamic jihad

Islamic jihad，4

against Christian military foes，84，85

Oppenheim’s promotion of，38，59，77-78，79，117

Ottoman promotion of，97

pan-Islam and，39，92，102，111，114，131，190，241-42，325

Prüfer’s embrace of，102，114

Isle of Man，20

Ismailia，192，342

Isonzo valley，375

Israel，50，52，490，493，496

Aaronsohn’s dream of，388

Eretz（Greater），50

modern-day，56，522*n*

wars between Arabs and，494

Israelites，ancient，56-57

Istanbul，*see* Constantinople

Italy，104，128，242，301，418，430，431，465

imperial ambitions of，153，450，520*n*

Libya invaded by，14，40

on Southern Front，375，457

Triple Entente joined by，127，129，151

Jaffa，65，73，86，126，134，240，376，435，443，452

British troops in，395

Djemal Pasha’s evacuation of，296-98，299-305，347，362，377，530*n*

Jaffa Gate，Jerusalem，89

Jebel Druze area，337

Jeddah，187，188，191，196，198，207，211，212，214，224，242-43，247，258，260，262，264，272，306-8，310，314-19，350，364，407，409，493，524*n*

French-Ottoman bank proposed for，261，390

Lawrence’s mission to，350-54

Turkish threat to，261

Jefer，wells at，327-29

Jerablus，33，34，36，39，40，41，44-46，66，97，483

Lawrence and Woolley’s leopard in，45

Jericho，110，412，422

Jerusalem，13，48-49，63，131，159，238，240，332，345，373，387，406，413，437，460，467，497，498，522*n*

British entry into，395，406-8，411

as cosmopolitan，74

expatriates in，73，171-73，418

German Hospice in，108，113，131，138，174，248，250，265

German military presence in，113，125，354

Hospice for Russian Pilgrims in，125

Lawrence’s withering appraisal of，88

Old City of，406

Storrs as military governor of，415

Yale in，72-75，88-89，137

Jewish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15，53

Jewish Chronicle，302

Jewish Committee in Alexandria，359

Jewish State，*The*（Herzl），52

Jews：

anti-Semitic suspicions against，35

assimilationist，358

British，230，448

as British spies，*see* Aaronsohn，Aaron，spy network of

diaspora of，50，395

discrimination against，50

as emigres，14-15

expulsion from Jaffa of，297-98，299-305

German，349

German protection of，378-79，535*n*

as German spies，14-15，126-29，144

in Jerusalem，74

Jerusalem as sacred to，406

Muslim Arab disdain for，84-85

in Ottoman Empire，35，50，74，76，83-86，97，134，159，230，279，378-79

in Palestine，*see* Palestine，Jewish emigration to；Palestine，Jewish homeland in

persecution feared by，159

philanthropy by，15

political alliances of，230

Russian，86，126-27，349，516*n*

in Syria，156

Turkish treatment of，535*n*

U.S.，49，230，303-4，371，396，448，458

westernized，299

Zionism and，*see* Zionism，Zionists

Joffre，Joseph，233

Jordan，61，320，392，493

modern，492

Jordan River，295，435，436，447，460，467，491

Jordan valley，348，421-22，436

Joyce，Pierce，272，352，374，460-61，467

Judaism，Ormsby-Gore’s conversion to，254

Judea，12，107，133，138

Judean foothills，49，65

Kabul，493

Kaiserschlacht ，456

Katra，133-34

Kedouri，Elie，521*n*

Kemal，Mustafa，*see* Ataturk，Mustafa Kemal

Kerak，412，414，415，416，421

Kerensky，Alexander，349，404

Kerensky regime，Russian，375，404

Khalil Pasha，170，176-78

khamsin （sandstorm），9-10，12

Kharpoutli，Mustapha，172，266

Khartoum，212，215，220-23，243

Kheif Hussein，235-36

King-Crane Commission，489，499

Kirkbride，Alec，422

Kirkwall，Orkney Islands，216-17

Kitchener，Horatio Herbert，56，146，221，382

as British secretary of war，68-69，140

death of，184

Hussein and，115-16，161

on invasion of Iraq，168-69，170

Lawrence ordered to defer enlisting by，71-72

on Prüfer’s appointment，60-61

Storrs as trusted lieutenant of，115

Sykes and，153

Knabenshue，Charles，385-86

Kornub，12，49，61-63，73，107，173，174，250，497-98

Kressenstein，Friedrich Kress von，100，129

Kuhlmann，Richard von，530*n*

Kurds，in Syria，40

Kut，164，167-72，177-78，182，183，190，268，522*n*

Kutab，Fuad al-，315，317-18

Lake，Percy，170-71

Lama，HMS，187，193-94

Lansing，Robert，332-33，355-56，452-53

Lawrence，Arnold，71，148，424，505

Lawrence，Bob，71，148

Lawrence，Frank，71

death of，129-30，139，147-48，182

Lawrence，Sarah Junner（mother），19，490

as family disciplinarian，21

family secret of，19-20，513*n*

and Frank’s death，129-30，147-48

Lawrence，Thomas（father），19

family secret of，19-20，513*n*

Lawrence，Thomas Edward，16，164，229，417，457，537*n*

affinity for East of，32-33

Alexandretta invasion advocated by，95-99，103-5，119，120，124，141-42，145-47

aliases of，485，502-5

alienation from Englishness of，27

as apologist for Arabs，258

as apologist for Faisal，258

appearance of，21，23，211，344

Aqaba campaign of，305-7，310，311-14，320-24，327-30，335-38，342，345，353-54，375

Aqaba Allied strategy opposed by，268-72，289，290，529*n*

in Arab advance into Syria，453-55

Arab dress adopted by，244，341-42，344，406，424，474，477

Arab Revolt and，184，191-96，198-206，320-24，366-67

Arabs favored over British by，385，409

Arabs’image of，384

Arabs romanticized by，34，40

as archaeologist，3，21，27-28，32-33，45-46，54-57，65-66，67

on Auda Abu Tayi，288

Beersheva meeting with Yale by，10-13，49，57，63-64，90，421，512*n*

bicycle tour of France by，17-18，21，22，202

bodyguard of，401，413-14，454

British Indian army critiqued by，182-83

burden of leadership on，311-14

as bureaucratic infighter，210-11，233

in Cairo military intelligence，83，86-88，90，99，114，116，119，125，154，361，374

in captured Aqaba，360-61，363，364，372，374

at Carchemish dig，39-41，65-66，462

circumspection of，540*n*

Clouds Hill home of，504-5

at Colonial Office，492，502

on crumbling of Ottoman Empire，36

cynicism of，539*n*

Dardanelles operation as concern of，105-6，117-19

death of，505

in Deraa railway attacks，460-65，467-69

desire to leave Syrian war theater by，421-25

despondency of，380-82，490

under EEF command，192-93

emotional constriction of，18，139，148，401

in England，66，67，71-72

as enigmatic and controversial figure，2-3

epiphany about Arab Revolt of，274，285

exaggerated navigational reputation of，384

exhaustion of，342

as family bohemian，44

as first British officer with Arab rebels in field，208

gamesmanship of，57

growing fame of，343，345-46，350-51，380-81，486

Hamed killed by，276-77，311

Hejaz postage stamps designed by，192

hopes of，turned to ashes，485-87

identification with Arab cause by，271

ill health of，276-77，280-81，283，312，406

immersion in Arab culture by，208，233-34，244-46，347，425-26

Iraq revolt predicted by，491

Jeddah mission of，350-54

Kitchener’s orders to，71-72

knighthood refused by，1-2，3，5

leave to return to England granted，483

letters of，17-18，27，34，46，55，62，66，72，82，83，87，95，99，105，106，118，119，124，129-30，139，145，148，149，369，380，384，401，410，412-14，423，461，462，485，503，505

limits of endurance tested by，20-21

as marksman，187

on 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116-17

medieval military history and Arthurian lore as fascinations of，2，21，22-23，208-9，250，271，503

Lawrence，Thomas Edward（*continued*）military culture disdained by，81，82，88，100，124，169，192-94，211，350-51，502

minimal Allied military presence in Arabia advocated by，214-15，233

missed communications as strategy of，210，445

in mission to Iraq，168-71，176-78

motorcycles ridden by，504-5

myths of，208，472-73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Faisal and the Turks，447-49

Newcombe’s affinity for，57，62

at Oxford，3，21-23，27-28，46，54，87，208，424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of，3，20-21，34，57，62，196，234，242-43，257，259，306，383，504

persuasive skills of，328

physical contact disliked by，245

“Politics of Mecca” report by，164-65

in preparations for permanent assignment to Arabia，259-60

promotions and decorations of，169，234，322，343，346，370，416，425，512*n*

Prüfer’s reverse trajectory with，241

psychic toll on，424，503

in RAF，502，504-5

rape and torture of，398-402，406，413，423，455，473

on religion，406

return from Iraq of，182-84

sense of honor of，271-72

sexuality of，313，402

snakes feared by，320-21

as stoic，402

Storrs and，114-15，116-17，187-88，191，524*n*

Sykes and，154，307-10，317，321，362-63

Syria as focus of，114，192

Syrian recruitment mission of，311-14，320-24，325，327-30，341-42，344-45

Syrian Crusader castle tour of，26-27

at Tafas，470-73，479

in Tafileh，411-16，421-23，424-25，428，455

as temporary liaison officer to Faisal，234

trademark sarcasm of，124

Turkish hospital incident and，476-79

uncomfortable camel ride of，202-3

at Victoria Hotel meeting，479-81，483

at War Office，81-83，87

Will Lawrence’s last meeting with，44

Yale and，90，410，449-50，491

Yarmuk mission of，381-82，383-85，389-90，394，400，406，423，455，464

Lawrence，Will，44，71，139

death of，148，149，182

Lawrence of Arabia（film），314，338，366

Lawrenceville School，25

League of Nations，proposed，429-30

Lean，David，314，338，366

Lebanon，27，72，111，134-35，179，322，332，344，402-3，489

Christians in，134，151，156

civil war in，494

France’s claim on，134-35，162，199，315-17，318

modern-day，480-81，493，522*n*

show trial of Arab nationalists in，179-80

Leeds，Edward，62，87，149，153，369，380，423

Légion d’Honneur，169

Lenin，V. I.，287，404

Lepsius，Karl，30

“Lewis”（Australian officer），367

Libya，Italian invasion of，14，40

Liddell Hart，Basil，147，540*n*

Lishansky，Joseph，255-56，326-27，378-79，443，535*n*

Lloyd，George，87，380-82，383-85，389，409

Lloyd George，David，243-44，293，388，457，491-92，495

Clemenceau’s agreement with，485-86

London，216，219，228，251，310，324，346，348，356，359，365-66，370-71，379，394，397，398，431，458

Loytved-Hardegg，Julius，248

Lynden-Bell，Arthur，226，260，291

Maan，274，305-6，312，327，329-30，334-35，337，437

Lawrence’s mission to，434-48

Maan-Aqaba road，329

Maccabean Society，443-44

MacDonogh，George，149

Macedonia，296，457

McGovern，Rudolf，10-11，43，47，49

in Kornub，63-65，174，498

machine guns，69，222，282，283，367，469，471

Mack，Julian，49

McKale，Donald，28，241-42，439，499

McMahon，Henry，168，205，220-21，225，227，317-18，520*n*，522*n*

on Alexandretta scheme，146

on Arab independence，150，161-63

as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for Egypt，142，223，232

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142，163，270，292，308，317，520*n*，521*n*，522*n*，531*n*

McMeekin，Sean，37

MacMillan，Margaret，486

Madeba，412，414，416，421

Mahdi War，56，221

Mallet，Louis，80

Managem，278，298，326-27，360，376-77，379，534*n*

Manchester，University of，294

Mapping of Palestine，56，57

Marmara，Sea of，103

Marne River，72

Martyrs’Square，Beirut，403

Mary，Queen，1-2

Masri，Abdul Aziz al-，140-41

Maxwell，John，146

Mecca，112，113-14，121，139，141，142，179，446，493

Arab Revolt in，184，188-90，203，237

hajj to，198

as off-limits to non-Muslims，190，270

Turkish threat to，189，236，261

Medina，41，47，112，113，114，121，131，180，189，204，284

Djemal Pasha’s withdrawal order and，274-75

France on preventing capture of，233

as off-limits to non-Muslims，190

Turkish garrison in，190，191，198，205，214，236，244，246，248，261，269，273-76，280-85，305-6，336，351，435，441

Mediterranean Expeditionary Force（Med-Ex），117-19，139

Mediterranean Sea，9，16，22，53，65，96，103，107，119，146，253，291，295，417，435

Suez Canal and，55，61

Mesopotamia（Iraq），39，87，199-200，405，522*n*

Meuse River，457

Mexico，287

Meyer，Louis，433-34

MI5，500

Michael（German offensive），438

Middle East，50，53，89，95，104，106，117，333，364，386，417

agricultural science in，15

British entanglements in，160-66，183

British war effort in，83

crumbling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39-40

European territorial claims toward，152-55，291

modern，creation of，1，3，5

oil in，46-47，72

Wilson as voice of British conscience in，307

Military Handbook for South Syria，*The*，278-79

mimeograph machines，210

Minifir，390-91

Mint，*The*（Lawrence），504

“mission creep，” 106，262

Moab Plateau，414，421-22，435

Moneim，Abdel，458-59，482

Money，Arthur，497

Mons，battle of，344

Montenegro，34，104

Montgelas，Gräfin，458

Morgenthau，Henry，91-92

Morocco，Moroccans，197，198，276-77

Mors，Robert，77，79-80

Moses，56，57，72

“Moslem-Syrian littoral，” 315

Mosseri，Jack，371-72

Mount Hermon，51

Mount of Olives，75，108，265，266

Mudowarra，368-69，380

Mudros，146

Murray，Sir Archibald，183，190-92，220-21，225-28，234，243，260，262-64，344，346

Palestine offensives of，213，225，262，269，272-75，279，287，291-93，297，299-300，345-46，373

removed from command，342-43

Muslims，30

Arab，35，157

in British Empire，308

in British military，191

control of Medina and，273

Crusaders and，23

fears of Christian intentions toward，65

in Jerusalem，74

Jerusalem as sacred to，406

Jews seen as inferior by，84-85

Kurdish，35

in Ottoman Empire，74，89

in Palestine，397，420

as pilgrims to Mecca and Medina，112，113，198

under the rule of European colonial powers，38

self-rule by，522*n*

Sunni，84

in Syria，438，451

Turkish，35

see also Islam

Mussolini，Benito，242

Mustafa Bey（town），93

Naama（camel），334-35

Nablus，83，85，466，467

expulsion of elders from，109，110-11，113

Nachrichtenstelle für den Orient（Intelligence Bureau for the East），78-79

Nakhl Mubarak，235-38，245，258

Napoleon I，emperor of France，15

Napoleonic wars，69

Nasir，Sherif，314，479

Nasser，Gamal Abdel，493

Nassif，Suleiman Bey，49，64，433-34，450-51

Navajo Bar，Panama City，26

Navy，French，off Palestinian coastline，143

Navy，German，47

Nazis，500-502，505

Nebuchadnezzar，king of Babylon，32

Necho Ⅱ，pharaoh of Egypt，32

Newcombe，Stewart Francis，12，264-65，275，315-16，318-19，352，504，505

Alex Aaronsohn spurned by，144

assigned as liaison officer to Faisal，232-33，247，250-51，258

as head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unit in Cairo，83，86-87，192，260，380

Lawrence recruited for intelligence work by，66，71

military survey conducted by，54-57，61-62，98

New Delhi，501-2

New Hampshire，University of，498-99

New York，N.Y.，24-25，46-47，64，136，144，216，218，219，330，331，356，360，388，397，458，482，489

New York，USS，356

New York Evening Post，217

New York Stock Exchange，25

New York Times，79，303，395

New Zealand，territorial troops from，87

Nicholas Ⅱ，czar of Russia，296

Nicolson，Arthur，362-63

Nile River，66，220，386，418

NILI（Nezah Israel Lo Ieshaker）spy network，278，325-27，347-48，357，359-60，376-80，397-98，431，443，535*n*

see also Aaronsohn，Aaron，spy network of

Nimr，Faris，451，452

Normandy，17，21，22

Northbrook，HMS，317-19

Nur el Bahr，274

Nuremberg trials，501

Nuri Said，479

Odyssey（Homer），504

oil：

growing demand for，47

in Middle East，493-94

see also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

Oklahoma：

Kiefer oilfield in，41，43，44，46，72，108，417

unruly oilmen from，73-74

Omdurman，battle of，69

Oppenheim，Max von，Count，37-39，40，93-94，122，440

concubines of，37-38

Constantinople assignment of，77-80

economic ambitions of，241-42，324

“going native” by，37

on Hussein，131

Islamic jihad promoted by，38，59，117

Jewish ancestry of，59-60

Montblanc pen named after，37，39

Prüfer’s dispatches to，101-2，113-14，127

wanderings in Bedouin garb by，39

Organization A，278

Orient Express，43

Orkney Islands，216

Ormsby-Gore，William，254，278，302-3，431，443

Oskar Ⅱ，216-17

Ottoman（Turkish）Army，367-68，369，398，436，463，479，481-82

Amman ruse effective against，463-64

Arab officers wanting to revolt in，140-42，168

Arab regiments in，130，177-78，448，520*n*

attempt to retake Tafileh by，413-16

at Bair，327-29

friction between German units and，324

Fuweila and，329-30

indifference of commanders to soldiers in，178

limits of supplies and reinforcements for，332

military installations of，427

oil shortage of，181

Palestine defeat of，466-69

passive resistance of，102

patrols by，37

as stretched to breaking point，273

in Syria，344

Syrian，German command over，403

Syrian deserters from，268

total collapse of，473

Turkish regiments in，130，283

Ottoman Empire，32，64，164，242，266，284，299，304，323，331，354，408，421，440，451

Aaronsohn and，359

alliances of，34-35

apathy in general population to war by，324-35

approaches toward Suez available to，90-91

Arab revolt against，4

armed forces mobilized by，76

breakup of，492

Britain’s relations with，37，55，56，220

British negotiations with，409，447

Capitulations in，32-33，74-76，85，134

carving up of，486

in Central Powers，83，382

Christian minority in，33

conservative backlash in，35

counterintelligence agents from，217，218

currency collapse of，249

decline of，16，34-36，39-40，50，79，134，182，248

diversity and cultural mosaic of，74，97，296-97

Doris incident and，98-99

in Eastern Front，438

entry into World War I by，9，83，84，89，91，94，116，126

ever-mutating nature of，438

foreign debt of，54

geography of，16，95-97

Germany’s relationship with，30，38，41，66，83，94，99-100，102，113-14，116，118，125，142，145，190，216，248，273，303，377，385，406，430，515*n*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297

Hussein’s break with，184，190

imperial intentions of Triple Entente toward，172

Islamists vs. Turkish nationalists in，410

Jews in，156-57

as launching pad for German

destabilization efforts，77-80

Lawrence and officials of，26-27，57

Lawrence’s background report on，88

Lawrence’s map of，95，150

Lloyd George and war effort against，244

mining laws of，108

pan-Islamic jihad promoted by，102，111

potential Achilles’heel of，66

religious minorities in，230

requisitioning by，76-77，134

revelation of Sykes-Picot Agreement and，404-5

and Russia's withdrawal from war，404

scorched-earth policy of，296

Sinai peninsula wrested from，37

Socony and，47-49，107，138

speculation about secret war alliance of，71，72，75-80，82

Standard Oil trucks requisitioned by，73

surrender of，1，481

Three Pashas triumvirate in，91，122，145，481

travel permits in，181，216-17，266-67

U.S. break i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324

war planes of，199

in Wilson's Fourteen Points，430

withdrawal from Jerusalem of，406

Young Turks in，*see* Young Turks

Zichron Yaakov residents as citizens of，75-76

Zionist hopes of acquiring Palestine from，54

see also Turkey

Ottoman Front，forced evacuations on，296

Oxford，66，71，169，369

Lawrence family in，20，271，383，425

Oxford High School for Boys，17，20

Oxford University，20

Lawrence at，3，21-23，27-28，46，54，87，208，372，424

pack howitzers（mountain guns），282

Palestine，9，10，27，46，50，55，65，159，190，216，239，252，261，266，298，325，332，333，370，426，453，480，481，489，496

1914 mapping of，71

and Aaronsohn on need for Jews to break from Ottoman Empire，135

Aaronsohn's spy ring in，135-36，143-44，158-60，180-81，216-20，228-29，232，251-56，277，280，326-27，347-50，370，443，522*n*

Allenby's offensive on，361，373-75，389，395，404-7，427，

435，437，441-42，453，455，459-60，464-68，473，475-76，479

Arab-Jewish tensions in，135，494

Arab Revolt and，198

Arabs in，74，295，357，358-59，426，431，432，434，444，445-46，448-49，486-87，490，491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as cover for British interests in，12

Balfour Declaration and，388-89

Britain’s interest in，485

British in，414，418-19，432，442

Palestine（*continued*）

British mandate in，492，493，497，500

as British protectorate，293-96，301，396，411，433，448-49，491

British support for Jewish enclave in，229-32，279

Christians in，357，359，420，431

coast of，56，136，143，376，467，469

European imperial ambitions toward，152

expanded boundaries for，491

expulsion of Jews from，86，126-27，516*n*

fellaheen system in，84，156，357-58

first wave of Jewish emigration to，75，85

flora and geology of，51

French in，162，418

German and Turkish troops in，464，469，471，472-73

Herzl’s attempted purchase of，54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on proposed for，293，405，407-8

Jewish emigration to，50-51，53，75-76，83-86，126-27，134，173，254，279，294-96，302-5，357-58，360，366，408，444，487，491

Jewish homeland in，4，295，348-50，357，364，366，371-72，377-80，388，420，426，432，433，448，449，458，500

Jewish paramilitary forces in，85，135

Kitchener’s mapping of，56

locust plague in，110-11，131，133-36，158-60，180

modern-day，522*n*

Murray’s offensives on，213，225，262，269，272-74，279，287，291-93，297，299-300，345-46，373

NILI relief funds in，348，360

non-Jewish population of，54，397

oil concession holders in，64

oil sought by Socony in，11，48-49

as part of Ottoman Syria，50，55，61

populations of，52-53

poverty in，52

second wave of Jewish emigration to，75，84

Socony land grab in，106-8，137-39，174-76，181，249，266-68，433，451，497-98

Socony’s road building in，65，72-73，90-91，332，387

Turkish supply line into，375

Turkish troops in，158，272-73，350，358，442

unruly oil workers in，73-74

U.S. and，386

wartime，88-89

Yale barred from battlefront in，418

Yale in，72-75，88-89，137，354，451-53

Zionism in，432，443-44，490；*see also* Zionism，Zionists

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11，46，56-57，66

Palestine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294

Panama Canal，24，26，90，417

Pan-Arab military league，99

pan-Islam，pan-Islamic jihad，39，92，102，111，114，131，190，241-42，325

Paris，72，356，359，366，370，371，372，379，397，458

Paris 1919（MacMillan），486

Paris Peace Conference，482-83，486-89，491，495-99，539*n*

private agreements in advance of，485-86

Parker，Alfred，209-10，211-13，222

Passchendaele，battle of，375

Passover，52，297，303

Persia，363

Persian Gulf，oil in，47

Petah Tikvah，134

Petraeus，David，347

Petrie，Flinders，17

Piave River，457

pigeons，carrier，376

Place des Canons，Beirut，403

Plain of Sharon，465

Playfair Cipher，188

poison gas，299

Poland，411，501

Port Said，143，252，253，255，298，347，360

Port Suez，148，168，187，264-65，308，342，350

Portugal，356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503

Provisional Law of Relocation，132

Prüfer，Agnes，28

Prüfer，Carl，28，29

Prüfer，Curt，4，16，29，248

Abbas Hilmi and，38-39，382-83，439-40，455-56，458-59，482，500

on Abd el Kader，385

appearance and personality of，13

as Cairo embassy dragoman，36-39，59

childhood of，28-29

in Constantinople for Oppenheim，77-80

deepening anti-Semitism of，499-501

Djemal Pasha and，91，108，113，114，127，156-58，173

education of，30-31

Enver Pasha psychoanalyzed by，79

and failed appointment as director of Cairo khedival library，58-61，115

in German Flying Corps，239-41

as head of German intelligence bureau in Constantinople，242，324-25

ill health of，241，325

Lawrence’s reverse trajectory with，241

marriages of，14，31，500-501

military training lacked by，100

Minna Weizmann’s relationship with，126-29，500

Mors affair and，80-81

in Nazi regime，500-502

Near East as fascination of，30

as notorious seducer of women，14

Oppenheim and，38-39，241-42

as Oriental language teacher，66-67，77

as Oriental secretary to Cairo German embassy，13-14，59-60

resignation from foreign ministry by，58

seen as menace by Jerusalem expatriates，173

as senior Nazi diplomat，129

spy network developed by，126-29，144，294，500

on Suez offensive，93-94，100-102，108，125-26

Syrian explorations of，156-58

wanderings of，in Bedouin disguise，39

Weizmann and，500

on Young Turks，113-14

Prüfer，Frances Ethel Pinkham，31，126，500

Prüfer，Olaf，502

Prussia，28

“Q”441-42

Quweira mountains，62

Rabat，197

Rabegh，190-91，194，200，203，212，215，232，236-38，246

Brémond’s desire to send troops to，213-14，222，224，227，243，261，270，528*n*

British supply line to，207

British troops considered for，223-24，238

railway sabotage，337

see also Hejaz Railway

Ramleh，424-25，440-41

Rawlinson，Henry，82

Red Sea，61，113，168，187，189，190，206，212，259，262，264，268，342，350，427

Suez Canal and，55

Report on the Desires of the Syrians，488

Republican party，U.S.，489

Revolt in the Desert （Lawrence），503-4

Richards，Vyvyan，461-62

Rifki，Falih，108-9，403

River Clyde ，SS，119-20

Riyadh，165

Robertson，William，146-47，170，226-27，346

Rockefeller，John D.，42

Rolls-Royce armored cars，413，463

Rolls-Royce “Blue Mist，” 473-74

Romani，battle of，240-41

Romania，34，128，229，356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in，50，75-76

Rome，128

ancient，393

Roosevelt，Theodore，25，49，54

Rosh Pinah，358

Ross，John Hume，*see* Lawrence，Thomas Edward，aliases of，

Rothschild，Baron Edmond de，50-51，370-72，392

Rothschild，Lord Walter，294-95

Rothschild，Moses，127-28

Rothschild family，60

Royal Air Force，British，502，504-5

Royal Army Medical Corps，British，71

Royal Engineers，British，12，46，61-62

Royal Flying Corps，British，139，148，427，465，467

Royal George，168-69

Royal Navy，British，184，198，224，243，246，305

conversion from coal to oil of，47

Dardanelles strategy advocated by，104

off Palestinian coastline，143

Red Sea controlled by，113

at Wejh，257

off Yenbo，238

Royal Tank Corps，504

Rualla tribe，323，393，462

Rudhwa，247

Russia，163，231，273，301，429，493，497

amity between Britain，France，and，30

anti-Semitism in，12，230，293

in battle of Sarikamish，104

Bolshevik rise to power in，404，406

Caucasus ruled by，38

Dardanelles strategy and，103-4

defeat of，438，440

on Eastern Front，96，151，375

German declaration of war on，77

German peace talks with，375，419，424-25

Germany’s rivalry with，38，72

governmental collapse in，343，375

imperial ambitions of，152，520*n*

Jewish emigration from，75，84-86，125-27

Russia（*continued* ）

and Jewish enclave in Palestine，231

Kerensky regime overthrown in，404，406

Minna Weizmann returned to，128

Ottoman conflicts of，34，50

Palestine and，293

Red Army of，497

Romanov dynasty ended in，286-87，304

withdrawal from war of，404，419

Russian Central Asia，79

Russo-Turkish War，50

Saad（Ageyl camp commander），313

Sahara Desert，9

Sahyun，26

Said，Mohammed，475-76

St . Paul ，SS，397

Saladin，393

Salem（Ageyl tribesman），276-77

Salt，Syria，436，437，441，442，460

Samaria，466

Samarin，50-51

Samima，188，189

Samoa，29

Samuel，Herbert，230-31，294

Sanders，Liman von，118，120-21，515*n*

San Remo conference，491

Sarajevo，66，67

Sarikamish，battle of，104

Saros，Gulf of，118

Sassoon，Siegfried，505

Saudi Arabia，165-66

Savoy Hotel，Cairo，87-88，95，105，123，124-25，140，148-50，163，184，202，210，258，260，264，300，418

“the Intrusives” at，192，220

Savoy Hotel，London，365

Scandinavian-American Line，216

Scapa Flow，216

Schaumburg-Lippe，Viktoria von，Princess，458

Schliemann，Heinrich，30

Schlotheim，Seline von，458

Schmidt，Rochus，527*n*

Schneersohn，Liova，278，348

Scotland，20，69，216

Scotland Yard，217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216

Second Balkan War，40

Secret Intelligence，Bureau of，355-56

Selective Service，U.S.，330-31

Senegal，264

Serahin tribe，389

Serbia，34，66，104，457

sesame seed oil，181

Seven Pillars of Wisdom（Lawrence），45，155，182，204，234，256，259，264，271，275，277，306，313，320，322，324，334-36，345，351，366，368，390，394，398-402，410，416，417，423-24，436，461-62，467，469-73，478，502-4，537*n*，540*n*

“Seven Syrians” letter，453-54，468

shadow plays，Egyptian，31，38

Shalaan，Nuri，320，323，393，461，462，540*n*

Shaw，Charlotte，401-2，505

Shaw，George Bernard，401

Shaw，T.E.，*see* Lawrence，Thomas Edward，aliases of

Shawish，Sheikh，78

Sheikh Saad（village），468-69，471

“shell shock，” 503

Shepheard’s Hotel，127-28

Shobek，337

Shukri Pasha el-Ayubi，475-76

Sinai land bridge，159

Sinai Peninsula，37，55，56，61，95，96，99-103，159-60，181，213，239，255，260，261，403，441

British advance across，219，262

British headquarters in，376

Lishansky's death on，255-56

railway building in，219

slavery，112，199，347

Slavs，in Ottoman Empire，35

Smith，Ian，347-50

Snakefly，170

socialism，126，128

Sokolow，Nahum，348，371

Soliman（Oppenheim's head servant），37

Somme offensive，70，225，375

South America，501

Spa，Belgium，455-56

Spain，25，109，172-73

neutrality of，304

Spring Offensive，German，457

Spring-Rice，Cecil，333

Spuyten Duyvil，24-25

spy ships，144，158-60，181，253，256，278，298，326-27，360，376，378

Standard Oil：

breakup of，42

distrust of，47-48

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York（Socony），4，26，331，333，354，370，452

Britain on Kornub interests of，64

British antipathy toward，386

Middle East wartime employees of，89-91

oil smuggled to Turkey by，107，138

oil sources sought by，47-49

Palestine land grab of，106-8，137-39，174-76，181，249，266-68，433，451，497-98

Palestine operations of，73-75，173

Palestine road building of，65，72-73，90-91，332，387

as petroleum exporter，47

private militia of，65

Yale as “on leave from，” 388，459-60，497

Yale summoned to New York by，41-43，46-47

State Department，U.S.，332-33，355-56，385-89，419，498

Steinbach-Schuh，Hilla，128

Stirling，Walter，369，400，402，473-74

“Stokes”（British officer），367

Storrs，Ronald，114-16，211，505

Arab Revolt and，187-96，198-201

on Hussein，141-42

Lawrence and，114-15，116-17，187-88，191，524

as military governor of Jerusalem，425

Sudan，54，56，69，113，205，212，213，221，233

Suez Canal，37，55-56，61，77，78，87，128，147，148，192，338

Lawrence at，342

potential Turco-German approaches to，90-91，93-94

Turco-German 1915 assault on，95，99-103，104

Turco-German 1916 campaign against，239-41，248

Sulzberger，Mayer，304

Supreme Court，U.S.，42，304，396，411

Suva，HMS，211-12，242-43，251

Sweden，neutrality of，304

Switzerland，52，324，332，333，382，409，447，458，501

Sykes，Edith，495

Sykes，Mark（Sir Tatton Benvenuto Mark Sykes，6th Baronet，of Sledmere），153-57，227

Aaronsohn and，220，229-32，300-304，348，371-72

aristocratic arrogance of，154-55，307

on Balfour Declaration，388，408，409

on Brémond，406-7

on Britain’s Jerusalem entry，406-7

death of，495

Hussein and，292，307-10，314-19，352，362-64，405，409，531*n*-32*n*

Lawrence and，154，217，307-10，317，321

as liar，307，317，319

at Paris Peace Conference，539*n*

as political liaison to Murray's army，292-95

reconsideration of Middle East views by，495

self-determination advocated by，361-62

service with War Cabinet，294-95

"Seven Syrians" and，453-54，468

Sykes-Picot Agreement and，162-64，199，230，294，307，309-10，315-17，362，409，531*n* -32*n*

Zionists supported by，229-32，294-96，301，358，364，396-97，426，428，431，447，458

Sykes-Picot Agreement，162-64，197，199，230，233，275，292，307，315-17，352，362，364，384-85，386，404-5m，407，427，430，440，447，462，479-80，485，491，494，495，520*n*，521*n*

Lawrence on，163，309-10

Lawrence's revelation to Faisal of，270-71，295，309-10，318，447，528*n*，531*n* -32*n*

Symes，Stewart，319

Syria，9，10，14，23，26，28，32，33，37，39，41，44，54，65，89，92，95，105-6，113，117，122，130，132，133，137，141，156，171，199，228，239，248，249，274，283，305，311，320，322，329，332，350，373，402，403，405，412，428，439，440，446，482，494，496

Arab advance into，453-55

Arab claim to，429，479-81，486-87，495

Arab resentment of Ottoman Turks in，102，111-13，116-17

Arab Revolt and，190，198，212，307，314，318，322，343，374，385

Arab secessionists in，150

British attitude toward，271-72，300

Christians in，438

deserts of，367

Djemal Pasha as governor of，91-94

European-imposed borders of，480-81

Faisal and，336-37，351，491

France’s interests in，146-47，152，162-65，197，199，212，215，264，270-72，289，291-92，300，307，314-15，318-19，346，363，364，374，384，405，419，429，479-81，485-86，488-89，491-

93，503

interior of，434-35

Jews in，156

Lawrence’s focus on，114，192，363

locust plague and，134

modern-day，522*n*

modernization of，403

Syria（*continued* ）

Muslims in，438

northern，57

Ottoman，Palestine as part of，50，55，61

Ottoman requisitions from，83-84

pro-independence Arab conspirators in，215

Proposed joint Arab-British advance into，345-46，351

Prüfer in，13

rampant scurvy in，325

slaughter of ethnic minorities in，494

starvation and disease in，331

Sykes’s duplicity about，539*n*

tribal leaders in，213

Turkish garrisons in，345，404

U.S. mandate proposed for，488

Syrian Committee，433-34

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92，109，249

“Syria：The Raw Material”（Lawrence），420-21

Tafas，469，470-73，479

Tafileh，battle at，411-16，421，422-25，428，455

Taif，189，194

Tajikistan，497

Talaat Pasha，122，131-32，455，481，497，535*n*

tanks，299

Taranto，431

Taurus Mountains，98，145

Taurus Railway，66

Tel Aviv，443

telegraph，wireless，210

Tell al Shehab，389

Tell Halaf，37，39，40

Texas，unruly oilmen from，73-74

36th Indian Infantry Brigade，166-68

Thomas，Lowell，486

Thomas，Lucien I.，138-39

Thomson，Basil，216，219

Thrace，64

Tigris River，66，150，164，166，170，178，182，248

totalitarianism，70-71

Townshend，Charles，164，167-69，171，178

Transjordan，491，492

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Doughty），23-24

Tremadoc，19-20

trench warfare，166-69，240，283-84，331

Triple Entente，72，74，77，94，127，129，132，151，163，180，184，196，230，249，251-52，270，291，295，304，315，332，349，355，361，363，375，377，396，406，441

bleak outlook for，419

imperial plans of，152，407

U.S. and，265-66，287，348

Trotsky，Leon，425

Tunisia，34，38

Turanism，35

Turf Club，Cairo，418

Turkey，16，32，356，489

battle of Sarikamish in，104

modern-day borders of，492

see also Ottoman Empire

Turkish Army，*see* Ottoman（Turkish）Army

Turkish Fourth Army，429

Turkish nationalists，492

Turkish Tobacco Régie，171-72

Turks，96，114，296

Feinberg’s dislike of，135

in Jerusalem，74

Twenty-Seven Articles（Lawrence），341，346-47，495

U-boats，German，104，266，287

Um Lejj，251，256，258

Union Club，Berlin，37，60

United Nations，Committee on Trusteeship of，498-99

United States，359

Aaronsohn in，49-52，216

Arabs and，430

Brazil and，501

break in Ottoma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324

as British ally，301

British Zionists’push to declare war against Ottoman Empire by，411

combustion-engine vehicles in，47

Djemal Pasha and，248-49

entry into war by，230，249，266，287，304，330-33，356，386，418，438，451

evacuation of “neutrals” from Ottoman Empire by，136，143

isolationism of，333，489

Jewish emigration to，50

Middle East military interventions of，494

military intelligence of，333，463

neutrality of，73，127，216，265-66，348，355

as new imperial power，71

seen as Middle East peacebroker，450-51，488-89，490

self-determination for oppressed peoples advocated by，362

small standing army of，330，356

troops arriving in Europe from，451，456，457-58

war against Germany by，287，331，430

wartime draft in，330-31

Vatican，neutrality of，304

V Beach，Gallipoli，119-20

Verdun，225

Vickery，Charles，258

Victoria，Queen，29

Victoria Hotel，Damascus，479-81，483

Vienna，16，217，331

Wadi Ais，247，275，280-81，283，289，306

Wadi Ghazzal，300

Wadi Hesa，414，415，424

Wadi Itm，263，305，330，337

Wadi Kitan，276-77，280，311-12

Wadi Rumm，383

Wadi Safra，204，206

Wadi Sirhan，213，320-24，328-29

Wahhabists，165-66，427-28，487，493

Wales，19，333，354

Wall Street，panic of 1907 on，25

Wangenheim，Hans von，101，127

War Cabinet，British，293-95，301-3，314，362，371，410

Near East Committee of，431

War Committee，British，191，194，213-14，222-24，227-28

War Department，U.S.，355

War Ministry，French，242

War Office，British，104-5，150，168，220，227

Kitchener at，68

Lawrence at，81-83，87

Lawrence’s correspondence with，124 war reparations，151

War Trade Intelligence Department，British，229

Washington，D.C.，49，324，331-32，371，410-11，451

Weizman，Ezer，128

Weizmann，Chaim，15，128-29，294，301-2，348-49，358-59，365，371，379，411，431-34，450

Aaronsohn and，394-98，443-44

Arab suspicions of，445-46

Balfour Declaration and，388

Faisal’s alliance with，486-87

as Israel’s first president，496

Lawrence’s meeting with，448-49

Prüfer’s meeting with，500

Weizmann，Minna “Fanny，”14-15，126-29，144，294，496-97，500

Wejh，236，246，268，270-72，288-89，291-92，305-10，311-13，320-21，335，337，342，391

Lawrence’s return to，286-87，528*n*

march on，250-51，256-62，264-65

shuttering of rebel base at，351，361

Weldon，Lewen，534*n*

Wemyss，Rosslyn，212，215，257

Westermann，William，488

wheat，wild emmer，51

“white man’s burden，” 183

White Russia（Belarus），126

Wilhelm Ⅱ，kaiser of Germany，29-30，108，458

Abbas Hilmi and，455-56

foreign policy of，36，38

Jerusalem visit of，406

secret Turkish alliance of，78，515*n*

Wilson，Cyril，193-95，200，209-10，211-13，222，226，234，238，247，258，260，272，275，288-89，306-8，311，315-16，318-19，352-53，409，532*n*

as British agent in Jeddah，193，212

Wilson，Jeremy，528*n*

Wilson，Woodrow，249，265-66，287，330，333，355，372，396，411，418，489

Fourteen Points of，429-30，446，487-88

free trade policy of，497

“lasting peace” sought by，333

“new world order” of，486

self-determination promoted by，362，429，485，488，489

and “a world made safe for democracy，” 330，362，429

Wilson administration，355，396，450，451，489

Wingate，Reginald，226-28，311，407，409-10，428，446

Aaronsohn and，278，303，350，359

and Aqaba strategy，262-63，290

and Brémond’s proposals for military intervention，213-15，220，222，225，243-44，262-63

as Egyptian high commissioner，223，232，262，292

as governor-general of the Sudan，212

Lawrence sent to Yenbo by，232-34

as sirdar of the Egyptian army，221

Sykes and，290，303，307-9，314-15，319，363，532*n*

Yale and，386-88，421，449-50

With the Turks in Palestine （Alex Aaronsohn），360

women：

in expatriate Jerusalem，171-73

as Prüfer’s spies，127

Young Turks’emancipation policy for，112

Wood，Lieutenant，381，383-84

Woolley，Leonard，12，34，62，71，253

in Cairo military intelligence，83，87

at Carchemish dig，39-41，55-57

Feinberg and，143-44

World War Ⅰ，5，108

aerial reconnaissance in，100

aerial warfare in，101

casualties in，70

Central Powers in，*see* Central Powers

Eastern Front in，72，96

European outbreak of，87

European powers jockeying for advantage as cause of，61

European theater of，3-4

as gentleman’s war，79

horse-mounted cavalry in，469

impact of Dardanelles decision on，106

impact on European imperial powers of，70-71

Middle Eastern theater in，1

Ottoman entry into，9，83，84，89，91，94，116，126

Ottoman humiliation in，98-99

peace process in，1

progress of，457

totalitarianism in wake of，70-71

Triple Entente in，*see* Triple Entente

U.S. entry into，230，249，265-68，287，304，330-33，356，386，418，438，451

weapons changes in，69

Western Front in，28，72，81-82，87，104-5，146，149，151，166-67，197，213，225，244，268，296，331，343，366-67，375，376，424，438，441，455-56，457，482

World War Ⅱ，493

Prüfer in，501

Yale and，498-99

World Zionist Congress，52

Yale，Elihu，24

Yale，William，4，16，66，67

Aaronsohn and，394-98，411，458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 of，24-26

Beersheva meeting with Lawrence by，10-13，49，57，63-64，90，421，512*n*

black market scheme of，249

Djemal Pasha and，91，137-38，174-76，249-50，265-68

as history professor，498-99

at Kornub massif，61-63

Lawrence and，410，449-50，476，491

Lawrence’s Cairo encounter with，90

in London，365-66

in Oklahoma，41-43，46，72，108，417

Ottoman oil concessions explored by，46-49

Palestine oil development projects of，72-75

Panama Canal and，24，2.6，90，417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482-83，487-89，497-98

romantic entanglements and rivalries of，171-73

search for wartime role by，330-33

and Socony’s Middle East strategy，106-8，136-38

and Spring-Rice，333，354-55

as 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agent，” 356-57，370-72，392，417-21，425-27，430-31，433-34，449-53，459-60，488

Syria report of，355-56，365

Turkish hospital incident and，476-79

U.S. entry into war and changed conditions for，265-68

as U.S. military attaché to EEF，453，459-60，463，465-67，469-70，474，476-79，482-83

in wartime Cairo，88-91，106

World War Ⅱ service of，498-99

Yale，William Henry，24-25

Yale Plan，489

Yale University，24，25-26

Yarmuk mission，374-75，381，384，400，406，423，442，455，464，467-69，471，475

Yemen，180，498

civil war in，494

Yenbo，206，233，235-38，242-44，246-47，250-51，256-58，351

Lawrence stranded in，207-11，213

Yildirim Army Group，404

Yom Kippur，52

Young Turks（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35，73，77-78，85，97，122，242，249，296，429，438，459，493，500

Abbas Hilmi Ⅱ feted by，382

Armenian massacres and，132，159

Capitulations withdrawn by，74-75

conservative Arab opposition to，111-15，117，131

Doris incident and，98-99

European liberalism and，35

Hussein and，179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92，94

modernization，Islam，and Turanism as rallying points of，35

1913 coup by，40

seen as modern and secular，97，112

Yusuf，Abdul Rahman Pasha al-，136-37

Zaki Bey，267，418-19

Zammarin，325

Zichron Yaakov，51，53，75-77，135，298，325，389，535*n*

NILI repudiated by，377-79，443

in wake of Ottoman entry into the war，83-86

Zin Desert，9，46，54，56，57，61

Lawrence in，62，65-66，71，81，143-44，264

Zionism，Zionists，15，50，128，157，293，303-5，357，417，426，448，450，482，494，496-97，500

Aaronsohn’s leadership of，15，50，53，219-20，254，370

Arab rebels and，430，444，445-49

Arabs and，430

assimilation vs.，52

British，229-32，294-95，301-2，348-50，358，359，362，370，371，395，410，411，458

British government and，365-66，388-89，486

definition of a Jewish state and，53-54

as divisive issue among Jews，279

Faisal and，445-49

Germans and，349，377-78

Hussein and，428

modern，founding of，52

opposition to，53，359，366，410

Palestine land bought by，358

Sykes’s support for，229-32，264，294-96，301，358，396-97，426，428，431，447，458

Turkey and，438-39

in U.S.，52，53，216，302，303，348-49，395-97，411，431，450

U.S. government and，486

Zionist Commission，411，431-34，443-44，449

Zionist Federation，U.S.，396-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美）安德森（Anderson，S.）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97-5923-3

Ⅰ.①阿… Ⅱ.①安… ②陆… Ⅲ.①劳伦斯，T.E.（1888～1935）-传记 Ⅳ.①K835.6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8418号

阿拉伯的劳伦斯

——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著者/〔美〕斯科特·安德森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责任编辑/冯立君 段其刚

责任校对/岳书云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阳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1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彩插印张/1.25

印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52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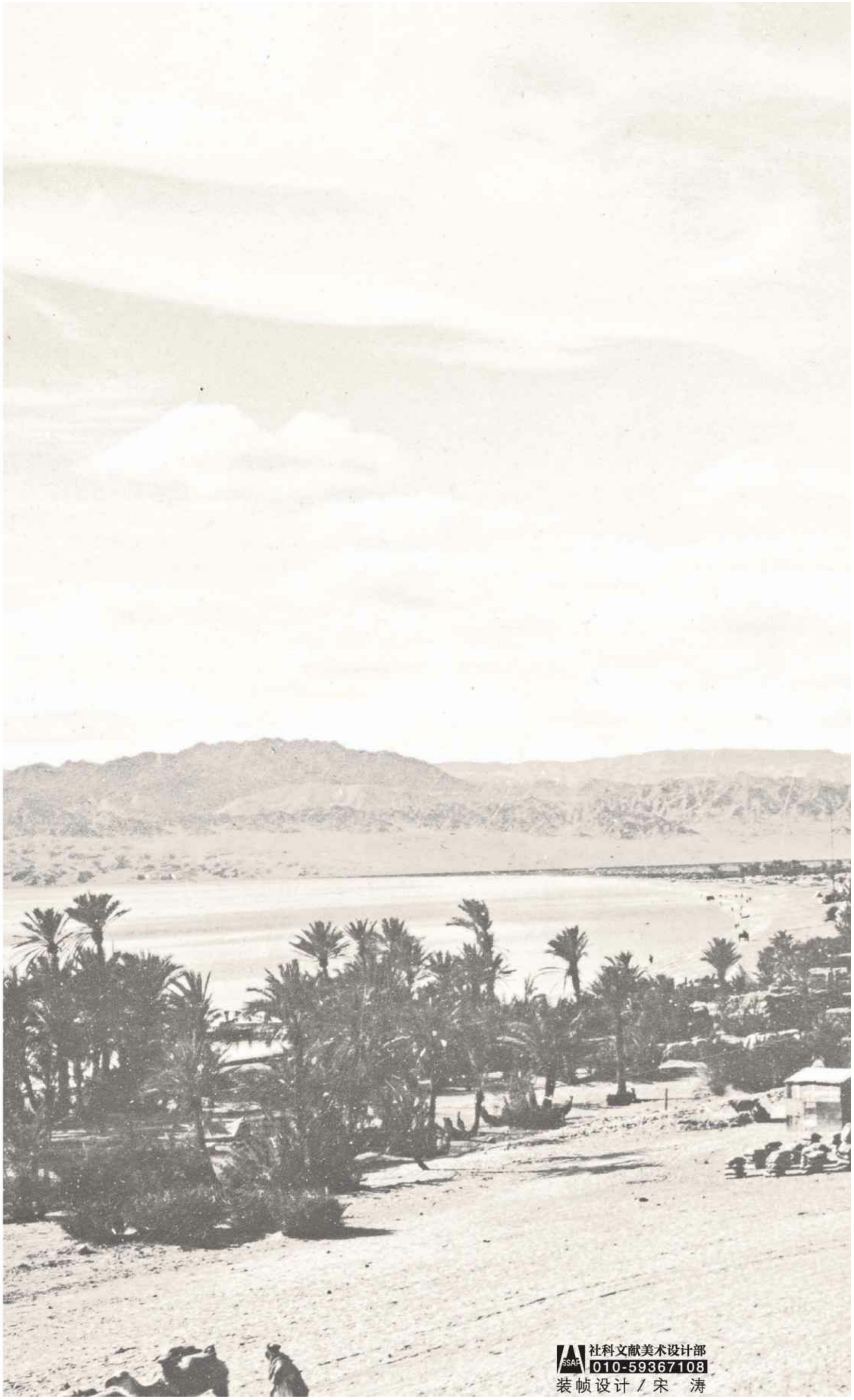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5923-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7776号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美术设计部
010-59367108
装帧设计／宋　涛

LAWRENCE IN ARABIA

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 · 历史类第一名
《纽约时报》年度最值得关注好书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年度最佳图书
《西雅图时报》年度最佳图书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圣路易斯邮报》年度最佳图书
《芝加哥论坛报》年度最佳图书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年度最佳图书
2014 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 · 传记类入围奖



ISBN 978-7-5097-5923-3
定价：79.00元
www.ssap.com.cn